



Gesammelte Werke Kafkas



插图本

卡夫卡全集

全 9 卷

卡夫卡全集

护封

专色色值

C56M89Y94K42



中央编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Gesammelte Werke Kafkas



插图本

卡夫卡全集

全 9 卷

卡夫卡全集

护封

专色色值

C56M89Y94K42



中央编译出版社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目录

第一卷 短篇小说

总序

短篇小说

编者前言

第一辑 生前问世之作[1]

观察

公路上的孩子们[2]

揭穿拙劣的骗子[4]

突然外出散步[5]

下定决心[6]

山间远足[7]

单身汉的不幸[8]

杂货商[9]

心不在焉地向外眺望[10]

归途[11]

过路人[12]

乘客

衣服[13]

拒绝[14]

为男骑手们考虑[15]

临街的窗户[16]

希望成为印第安人[17]

树[18]

不幸[19]

判决[20]

司炉[22]

在流刑营[23]

变形记[24]

乡村医生[25]

新律师[27]

在剧院顶层楼座[28]

往事一页[29]

在法的门前[30]

豺狗和阿拉伯人[31]

视察矿山[33]

邻村[34]

家长的忧虑[35]

一道圣旨[36]

十一个儿子[37]

兄弟谋杀[38]

一场梦[39]

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41]

最初的痛苦[45]

小妇人[46]

饥饿艺术家[50]

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51]

和祈祷者谈话[52]

和醉汉谈话[53]

巨大的吵闹声

铁桶骑士[54]

第二辑 遗作中之佳作[1]

一次战斗纪实[2]

乡村婚事[6]

村子里的诱惑[7]

回忆卡尔达铁路[9]

乡村教师（巨鬣）[10]

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年纪的单身汉[11]

桥[12]

猎人格拉胡斯[13]

中国长城建造时[16]

叩击庄园大门[18]

邻居[19]

一次日常的混乱[20]

杂种[21]

塞壬们的沉默[22]

普罗米修斯[23]

城徽[24]

海神波塞冬[26]

拒绝[27]

关于法律问题[28]

征兵[29]

考试[30]

陀螺[31]

回家[32]

代言人[33]

一条狗的研究[34]

夫妇[36]

地洞[37]

第三辑 微型小说[1]

桑丘·潘沙真传[2]

集体[3]

夜晚[4]

兀鹰[5]

舵手[6]

小寓言一则[7]

起程[8]

算了吧[9]

论譬喻[10]

〔中国人来访〕[11]

〔巷战〕

〔小伯爵的课外课〕

〔驯蛇〕

〔招魂会议〕[13]

〔无言的哀求〕

〔士兵的权力〕

准新郎与饿狼

〔考官〕

〔爱的险境〕

绿龙的造访

猫与鼠的对话

〔K.的愣劲〕[14]

〔统治的魔力〕

〔信号〕

马戏场里的出水芙蓉

驯人的动物

〔切不开的面包〕

〔坑道下的家庭〕

〔歌声的诱惑〕

误入荆棘丛

少女的羞涩

〔新灯〕[15]

〔驯鹤〕[16]

在阁楼上[17]

〔在墓穴里做客〕[19]

〔棺材〕[20]

〔建城〕

〔难念的家经〕[21]

包厢里的奇遇[22]

夜行船的惊讶[23]

〔世界冠军〕[24]

〔巩固〕[25]

〔督学与老师的对话〕[26]

〔室内滂沱〕[27]

〔女人的力量〕[28]

〔本性使然〕[29]

〔教堂里的“紫貂”〕[30]

〔恐惧〕[32]

第二卷 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

编者前言

失踪者

司炉

舅舅

纽约近郊乡村别墅

通往拉美西斯之路[1]

西方饭店

鲁滨孙事件

避难[3]

俄克拉荷马[4]露天剧场

附录1 残稿[6]

附录2 原出版者后记

诉讼

第一章 被捕 与格鲁巴赫太太谈话 然后与毕斯特纳小姐谈话

第二章 初审

第三章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 大学生 法院 办公室

第四章 毕斯特纳小姐的女友

第五章 打手

第六章 K.的叔父 列妮

第七章 律师 工厂主 画家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 解聘律师

第九章 在大教堂里

第十章 结局

附录

一 未完成章节

同艾尔莎约会

看望母亲的途中

检察官

法院大楼

同副经理的斗争

断片一则

二 手稿中作者自己删去的部分

第三卷 长篇小说《城堡》

编者前言

城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附录

一 小说开头的异文

二 断片

三 小说结尾的延续[10]

四 作者删去的文字和段落

第一版后记

第二版后记

第三版后记

第四卷 随笔*谈话录

编者前言

随笔

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1]

八本八开本笔记[7]

第一本八开本笔记

第二本八开本笔记[11]

第三本八开本笔记

第四本八开本笔记

第五本八开本笔记

第六本八开本笔记

第七本八开本笔记

第八本八开本笔记

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

《里夏德和萨姆埃尔》草稿[58]

致一个当局的呈文[59]

假死[60]

《他》补遗[61]

关于伊地绪语的演讲[62]

一篇正式演讲[63]

谈话录

译本序

本书的历史[3]

谈话录

附录

对话[1]

第五卷 日记（1910-1923）

编者前言

日记(1910-1923)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旅游日记

弗里德兰、赖兴贝格[1]之旅

卢加诺—巴黎—埃伦巴赫之旅

魏玛—荣波恩之旅

译后记

第六卷 书信（1900-1921）

编者前言

书信(1900-1921)

1900年

1.致谢尔玛·柯恩[1]

1902年

2.致奥斯卡·波拉克[3]

3.致奥斯卡·波拉克

4.致奥斯卡·波拉克

5.致奥斯卡·波拉克

6.致奥斯卡·波拉克

1903年

7.致奥斯卡·波拉克

8.致奥斯卡·波拉克

9.致奥斯卡·波拉克

10.致奥斯卡·波拉克

1904年

11.致马克斯·勃罗德[11]

12.致奥斯卡·波拉克

13.致奥斯卡·波拉克

14.致马克斯·勃罗德

15.致马克斯·勃罗德

16.致马克斯·勃罗德

17.致马克斯·勃罗德

1905年

18.致马克斯·勃罗德

19.致马克斯·勃罗德

1906年

20.致马克斯·勃罗德

21.致马克斯·勃罗德

22.致马克斯·勃罗德

23.致马克斯·勃罗德

24.致马克斯·勃罗德

25.致马克斯·勃罗德

1907年

26.致马克斯·勃罗德

27.致马克斯·勃罗德

28.致马克斯·勃罗德

29.致马克斯·勃罗德

30.致海德维希·W.[23]

31.致海德维希·W.

32.致海德维希·W.

33.致海德维希·W.

34.致海德维希·W.

35.致海德维希·W.

36.致马克斯·勃罗德

37.致海德维希·W.

- 38.致海德维希·W.
- 39.致马克斯·勃罗德
- 40.致海德维希·W.
- 41.致马克斯·勃罗德
- 42.致海德维希·W.
- 43.致海德维希·W.
- 44.致马克斯·勃罗德
- 45.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1908年

- 46.致马克斯·勃罗德
- 47.致海德维希·W.
- 48.致马克斯·勃罗德
- 49.致马克斯·勃罗德
- 50.致马克斯·勃罗德
- 51.致马克斯·勃罗德
- 52.致马克斯·勃罗德
- 53.致马克斯·勃罗德
- 54.致马克斯·勃罗德
- 55.致马克斯·勃罗德
- 56.致马克斯·勃罗德
- 57.致奥斯卡·鲍姆
- 58.致马克斯·勃罗德
- 59.致马克斯·勃罗德
- 60.致马克斯·勃罗德
- 61.致埃尔莎·陶西格
- 62.致马克斯·勃罗德
- 63.致马克斯·勃罗德

1909年

- 64.致海德维希·W.
- 65.致马克斯·勃罗德
- 66.致马克斯·勃罗德
- 67.致马克斯·勃罗德

- 68.致海德维希·W.
- 69.致马克斯·勃罗德
- 70.致马克斯·勃罗德
- 71.致马克斯·勃罗德
- 72.致马克斯·勃罗德[39]
- 73.致马克斯·勃罗德
- 74.致奥斯卡·鲍姆[43]
- 75.致马克斯·勃罗德
- 76.致马克斯·勃罗德
- 77.致马克斯·勃罗德
- 78.致马克斯·勃罗德
- 79.致马克斯·勃罗德
- 80.致马克斯·勃罗德
- 81.致马克斯·勃罗德
- 82.致奥斯卡·鲍姆
- 83.致马克斯·勃罗德
- 84.致艾斯纳经理[54]
- 85.致马克斯·勃罗德
- 86.致马克斯·勃罗德
- 1910年
- 87.致马克斯·勃罗德
- 88.致马克斯·勃罗德
- 89.致马克斯·勃罗德
- 90.致马克斯·勃罗德
- 91.致马克斯·勃罗德
- 92.致马克斯·勃罗德
- 93.致马克斯·勃罗德
- 94.致马克斯·勃罗德
- 95.致马克斯·勃罗德
- 96.致马克斯·勃罗德
- 97.致马克斯·勃罗德
- 98.致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

99.致马克斯·勃罗德
100.致马克斯·勃罗德
101.致奥斯卡·鲍姆
102.致马克斯·勃罗德
103.致马克斯·勃罗德
104.致马克斯·勃罗德
105.致马克斯·勃罗德
1911年
106.致马克斯·勃罗德
107.致马克斯·勃罗德
108.致马克斯·勃罗德
109.致奥斯卡·鲍姆
110.致马克斯·勃罗德
111.致索菲·勃罗德[69]
112.致马克斯·勃罗德
113.致马克斯·勃罗德
114.致马克斯·勃罗德
115.致马克斯·勃罗德
116.致马克斯·勃罗德
117.致奥斯卡·鲍姆
118.致马克斯·勃罗德
119.致马克斯·勃罗德
1912年
120.致马克斯·勃罗德
121.致马克斯·勃罗德
122.致马克斯·勃罗德
123.致马克斯·勃罗德
124.致父母亲
125.致马克斯·勃罗德
126.致马克斯·勃罗德
127.致马克斯·勃罗德
128.致马克斯·勃罗德

- 129.致马克斯·勃罗德
- 130.致马克斯·勃罗德
- 131.致马克斯·勃罗德
- 132.致马克斯·勃罗德
- 133.致马克斯·勃罗德
- 134.致马克斯·勃罗德
- 135.致恩斯特·罗沃尔特[88]
- 136.致罗沃尔特出版社
- 137.致埃尔莎·陶西格
- 138.致费利克斯·韦尔奇和马克斯·勃罗德
- 139.致罗沃尔特出版社
- 140.致马克斯·勃罗德
- 141.致马克斯·勃罗德
- 142.致罗沃尔特出版社
- 143.致马克斯·勃罗德
- 144.致马克斯·勃罗德
- 145.致罗沃尔特出版社
- 146.致马克斯·勃罗德
- 147.致马克斯·勃罗德
- 148.致韦利·哈斯[94]
- 149.致马克斯·勃罗德
- 150.致奥斯卡·鲍姆
- 1913年
- 151.致埃尔莎和马克斯·勃罗德
- 152.致埃尔莎和马克斯·勃罗德
- 153.致格特鲁德·梯伯格
- 154.致出版家库尔特·沃尔夫[96]
- 155.致库尔特·沃尔夫
- 156.致马克斯·勃罗德
- 157.致库尔特·沃尔夫
- 158.致库尔特·沃尔夫
- 159.致库尔特·沃尔夫

- 160.致格特鲁德·梯伯格[102]
- 161.致库尔特·沃尔夫
- 162.致马克斯·勃罗德
- 163.致库尔特·沃尔夫
- 164.致马克斯·勃罗德
- 165.致莉塞·韦尔奇[107]
- 166.致马克斯·勃罗德
- 167.致马克斯·勃罗德
- 168.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169.致马克斯·勃罗德
- 170.致奥斯卡·鲍姆
- 171.致马克斯·勃罗德
- 172.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173.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 174.致库尔特·沃尔夫
- 175.致莉塞·韦尔奇
- 176.致马克斯·勃罗德
- 1914年
- 177.致马克斯·勃罗德
- 178.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 179.致莉塞·韦尔奇
- 180.致莉塞·韦尔奇
- 181.致莉塞·韦尔奇
- 182.致吉查克·略韦[122]
- 183.致奥特拉·卡夫卡
- 184.致阿尔弗雷德·库宾
- 185.致费利克斯和马克斯
- 186.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1915年
- 18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188.致马克斯·勃罗德
- 189.致恩斯特·非格尔[130]

190.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迈耶先生〕

191.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192.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1916年

193.致马克斯·勃罗德

194.致马克斯·勃罗德

195.致马克斯·勃罗德

196.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197.致马克斯·勃罗德

198.致马克斯·勃罗德

199.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00.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01.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02.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03.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04.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05.致库尔特·沃尔夫

206.致西格弗里德·略韦博士

1917年

20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08.致戈特弗里德·科尔维尔[150]

209.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10.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11.致库尔特·沃尔夫

212.致伊尔玛·韦尔奇夫人

213.致库尔特·沃尔夫

214.致库尔特·沃尔夫

215.致库尔特·沃尔夫

216.致马克斯·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奇

217.致马克斯·勃罗德

218.致奥斯卡·鲍姆

219.致马克斯·勃罗德

- 220.致奥斯卡·鲍姆
- 221.致马克斯·勃罗德
- 222.致马克斯·勃罗德
- 22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224.致马克斯·勃罗德
- 225.致马克斯·勃罗德
- 226.致奥斯卡·鲍姆
- 227.致埃尔莎和马克斯·勃罗德
- 228.致马克斯·勃罗德
- 229.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230.致马克斯·勃罗德
- 231.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232.致马克斯·勃罗德
- 23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234.致马克斯·勃罗德
- 235.致奥斯卡·鲍姆
- 236.致马克斯·勃罗德
- 23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238.致马克斯·勃罗德
- 239.致马克斯·勃罗德
- 240.致埃尔莎·勃罗德
- 241.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242.致马克斯·勃罗德
- 243.致奥斯卡·鲍姆
- 244.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245.致马克斯·勃罗德
- 246.致马克斯·勃罗德
- 247.致马克斯·勃罗德
- 248.致奥斯卡·鲍姆
- 249.致约瑟夫·科尔纳[215]
- 250.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 251.致马克斯·勃罗德

252.致埃尔莎·勃罗德
253.致马克斯·勃罗德
1918年
254.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55.致马克斯·勃罗德
256.致马克斯·勃罗德
25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58.致奥斯卡·鲍姆
259.致马克斯·勃罗德
260.致约瑟夫·科尔纳
261.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62.致马克斯·勃罗德
26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64.致库尔特·沃尔夫
265.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66.致马克斯·勃罗德
267.致马克斯·勃罗德
268.致马克斯·勃罗德
269.致马克斯·勃罗德
270.致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
271.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72.致奥斯卡·鲍姆
27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74.致马克斯·勃罗德
275.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276.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77.致库尔特·沃尔夫
278.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79.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280.致马克斯·勃罗德
281.致马克斯·勃罗德
282.致奥特拉·卡夫卡

283.致马克斯·勃罗德

284.致马克斯·勃罗德

1919年

285.致奥斯卡·鲍姆

286.致马克斯·勃罗德

287.致马克斯·勃罗德

288.致马克斯·勃罗德

289.致马克斯·勃罗德

290.致约瑟夫·科尔纳

291 , 致J.W. (?) 的父母

292.致M.E.[255]

1920年

293.致M.E.

294.致M.E.

295.致库尔特·沃尔夫

296.致M.E.

297.致库尔特·沃尔夫

298.致M.E.

299.致马克斯·勃罗德

300.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301.致M.E.

302.致M.E.

303.致库尔特·沃尔夫

304.致M.E.

305.致马克斯·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奇

306.致M.E.

307.致马克斯·勃罗德

308.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309.致马克斯·勃罗德

310.致M.E.

311.致马克斯·勃罗德

312.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313.致M.E.
314.致马克斯·勃罗德
315.致埃尔莎·勃罗德
316.致M.E.
317.致马克斯·勃罗德
318.致M.E.
319.致马克斯·勃罗德
320.致莱奥·鲍姆[289]
1921年
321.致马克斯·勃罗德
322.致马克斯·勃罗德
323.致M.E.
324.致马克斯·勃罗德
325.致马克斯·勃罗德
326.致马克斯·勃罗德
327.致马克斯·勃罗德
328.致M.E.
329.致马克斯·勃罗德
330.致马克斯·勃罗德
331.致马克斯·勃罗德
332.致马克斯·勃罗德
333.致奥斯卡·鲍姆
334.致马克斯·勃罗德
335.致奥特拉·达维多娃
336.致约瑟夫·达维德博士
337.致马克斯·勃罗德
338.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33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40.致马克斯·勃罗德
341.致奥特拉·达维多娃
342.致马克斯·勃罗德
343.致埃莉·赫尔曼

- 344.致埃莉·赫尔曼
- 345.致艾莉·赫尔曼[316]
- 346.致艾莉·赫尔曼
- 34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48.致M.E.
- 349.致M.E.
- 35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3.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6.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59.致路德维希·哈尔特[319]
- 36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6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6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63.致M.E.
- 36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6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66.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6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6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6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7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7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372.致M.E.

第七卷 书信（1922-1924）家书

编者前言

书信（1922-1924）

1922年

373.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7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75.致马克斯·勃罗德

376.致马克斯·勃罗德

377.致约翰内斯·瓦尔齐迪尔[3]

378.致M.E.

37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8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8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8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83.致马克斯·勃罗德

38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85.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386.致奥斯卡·鲍姆

387.致马克斯·勃罗德

38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8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90.致奥斯卡·鲍姆

391.致马克斯·勃罗德

392.致奥斯卡·鲍姆

39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394.致马克斯·勃罗德

39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96.致奥斯卡·鲍姆

397.致马克斯·勃罗德

39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399.致马克斯·勃罗德

40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01.致马克斯·勃罗德

402.致马克斯·勃罗德

403.致马克斯·勃罗德

- 404.致E.S.
- 40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406.致马克斯·勃罗德
- 40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408.致奥斯卡·鲍姆
- 40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410.致M.E.
- 411.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 41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413.致马克斯·勃罗德
- 414.致弗兰茨·韦尔夫[46]
- 415.致马克斯·勃罗德
- 416.致马克斯·勃罗德
- 417.致马克斯·勃罗德
- 418.致马克斯·勃罗德
- 419.致M.E.
- 1923年
- 420.致奥斯卡·鲍姆
- 421.致M.E.
- 422.致M.E.
- 423.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42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42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426.致奥斯卡·鲍姆
- 427.致奥斯卡·鲍姆
- 428.致马克斯·勃罗德
- 42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 430.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 431.致胡戈·贝格曼
- 432.致埃尔泽·贝格曼
- 433.致埃尔泽·贝格曼
- 43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3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36.致蒂勒·勒斯勒尔[58]
43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38.致马克斯·勃罗德
43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40.致马克斯·勃罗德
441.致马克斯·勃罗德
442.致卡尔·塞利希[64]
443.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44.致马克斯·勃罗德
445.致马克斯·勃罗德
446.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4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48.致奥斯卡·鲍姆
449.致马克斯·勃罗德
450.致马克斯·勃罗德
451.致马克斯·勃罗德
452.致卡尔·塞利希
45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454.致马克斯·勃罗德
45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56.致马克斯·勃罗德
457.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45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59.致马克斯·勃罗德
46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6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62.致马克斯·勃罗德
463.致马克斯·勃罗德
464.致瓦莉·波拉克[84]
465.致马克斯·勃罗德
466.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46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468.致马克斯·勃罗德

469.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470.致马克斯·勃罗德

471.致奥斯卡·鲍姆

47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73.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1924年

474.致马克斯·勃罗德

47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76.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477.致莉瑟·卡茨内尔松

478.致路德维希·哈尔特

479.致路德维希·哈尔特

48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8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8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83.致马克斯·勃罗德

48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8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486.致马克斯·勃罗德

487.致马克斯·勃罗德

488.致马克斯·勃罗德

致奥特拉和其他亲属（1909—1924）

1909年

1.致奥特拉

2.致奥特拉

3.致奥特拉

4.致奥特拉

1910年

5.致奥特拉

1911年

6.致埃莉和卡尔·赫尔曼

7.致奥特拉

8.致奥特拉

9.致奥特拉

10.致奥特拉

11.致奥特拉和瓦莉·卡夫卡

12.致奥特拉

13.致奥特拉

1912年

14.致尤丽叶、赫尔曼、瓦莉和奥特拉·卡夫卡

15.致奥特拉

1913年

16.致奥特拉

17.致奥特拉

18.致奥特拉

19.致奥特拉

1914年

20.致奥特拉

21.致奥特拉

22.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23.致奥特拉

1915年

24.致奥特拉

25.致奥特拉

26.致奥特拉

27.致奥特拉

28.致奥特拉

1916年

29.致奥特拉

30.致奥特拉

31.致奥特拉

32.致奥特拉

33.致奥特拉

34.致奥特拉

35.致奥特拉

1917年

36.致奥特拉

37.致奥特拉

38.致奥特拉

39.致奥特拉

40.致奥特拉

41.致奥特拉

42.致奥特拉

43.致奥特拉

44.致奥特拉

45.致奥特拉

46.致奥特拉

47.致奥特拉

48.致奥特拉

49.致奥特拉

50.致奥特拉

51.致奥特拉

52.致奥特拉

53.致奥特拉

54.致奥特拉

1918年

55.致奥特拉

56.致奥特拉

57.致奥特拉

58.致奥特拉

59.致奥特拉

60.致奥特拉

61.致奥特拉

62.致奥特拉

63.致奥特拉

64.致奥特拉

65.致奥特拉

1919年

66.致奥特拉

67.致奥特拉

68.致奥特拉

69.致奥特拉

70.致奥特拉

71.致奥特拉

72.致奥特拉

73.致奥特拉

74.致奥特拉

75.致奥特拉

1920年

76.致奥特拉

77.致奥特拉

78.致奥特拉

79.致尤丽叶、赫尔曼和奥特拉·卡夫卡

80.致奥特拉

81.致奥特拉

82.致奥特拉

83.致奥特拉

84.致奥特拉

85.致奥特拉

86.致奥特拉

87.致奥特拉

88.致奥特拉

1921年

89.致奥特拉

90.致约瑟夫·达维德

91.致奥特拉

92.致约瑟夫·达维德

93.致奥特拉

94.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95.致奥特拉

96.致奥特拉

97.致奥特拉

98.致奥特拉

99.致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

100.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101.致奥特拉

102.致奥特拉

103.致约瑟夫·达维德

1923年

104.致奥特拉

105.致奥特拉

106.致奥特拉

107.致约瑟夫·达维德

108.致奥特拉

109.致奥特拉

110.致奥特拉

111.致奥特拉

112.致奥特拉

113.致奥特拉

114.致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

1924年

115.致奥特拉

116.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117.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118.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119.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120.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致父母亲（1922—1924）

1922年

1.致父母亲

1923年

2.致父母亲

3.致父母亲

4.致父母亲

5.致父母亲

6.致父母亲

7.致父母亲

8.致父母亲

9.致父母亲

10.致父母亲

11.致父母亲

1924年

12.致父母亲

13.致父母亲

14.致父母亲

15.致父母亲

16.致父母亲

17.致父母亲

18.致父母亲

19.致父母亲

20.致父母亲

21.致父母亲

22.致父母亲

23.致父母亲

24.致父母亲

25.致父母亲

26.致父母亲

27.致父母亲

28.致父母亲

29.致父母亲

30.致父母亲

31.致父母亲

32.致父母亲

致父亲

致父亲

附录1 《致奥特拉》原编者序

附录2 《致奥特拉》原出版者跋

第八卷 致菲莉斯情书（I）

编者前言

致菲莉斯情书（I）

致索菲·弗理德曼夫人的信[7]

致索菲·弗理德曼夫人的信

致索菲·弗理德曼夫人的信

马克斯·勃罗德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弗兰茨·卡夫卡的母亲给菲莉斯·鲍威尔的第一封信

马克斯·勃罗德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奥托·皮克致弗兰茨·卡夫卡的信

〔附录〕库尔特·沃尔夫致弗兰茨·卡夫卡的信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的父亲卡尔·鲍威尔先生的信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一封信的草稿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菲莉斯·鲍威尔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菲莉斯·鲍威尔的父母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菲莉斯·鲍威尔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菲莉斯的母亲——安娜·鲍威尔夫人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母亲安娜·鲍威尔夫人的信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母亲安娜·鲍威尔夫人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致格蕾特·勃洛赫

格蕾特·勃洛赫致弗兰茨·卡夫卡一封信的副本或底稿[224]

致格蕾特·勃洛赫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安娜·鲍威尔夫人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鲍威尔父母的信[225]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安娜·鲍威尔夫人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安娜·鲍威尔夫人

致格蕾特·勃洛赫[230]

第九卷 致菲莉斯情书（II） 致密伦娜情书

致菲莉斯情书（II）

附录1 原版前言

附录2 原编者序

附录3 原版附录

附录4 菲莉斯·鲍威尔简历

致密伦娜情书

附录1 原编者跋

附录2 原版后记

附录3 密伦娜、施塔萨和波希米亚的生活

附录4 卡夫卡生平和作品中的爱情关系

大事年表

第一卷 短篇小说



1920年的卡夫卡（护照相片）



卡夫卡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卡夫卡母亲——尤莉叶·洛韦



少女时期的卡夫卡母亲



新娘时期的卡夫卡母亲



年届不惑的卡夫卡母亲



上图是布拉格古城环形路通过的竖立在马利亚亚柱的广场左侧的第三幢楼房的“斯美塔娜之家”，是卡夫卡母亲少女时期的住处。

下图是卡夫卡父亲的诞生地——皮赛克县的沃赛克镇（南波希米亚）



卡夫卡的祖父母。祖父雅考普·卡夫卡系沃赛克镇的屠户



上图是卡夫卡祖父的磨刀石，一侧刻有希伯来语koscher（正品）

下图标的镇上30号是卡夫卡祖父成长的地方，五个兄弟姐妹住一室



左侧是旧式新犹太教教堂，右侧是犹太人的议会大厦（1896年的景观）



上图是“向塔”街27号甲，即卡尔普芬街，亦称窄街（后称麦塞尔街）即是卡夫卡的诞生地

下两图是卡夫卡父母新婚时期的照片



约一岁时的卡夫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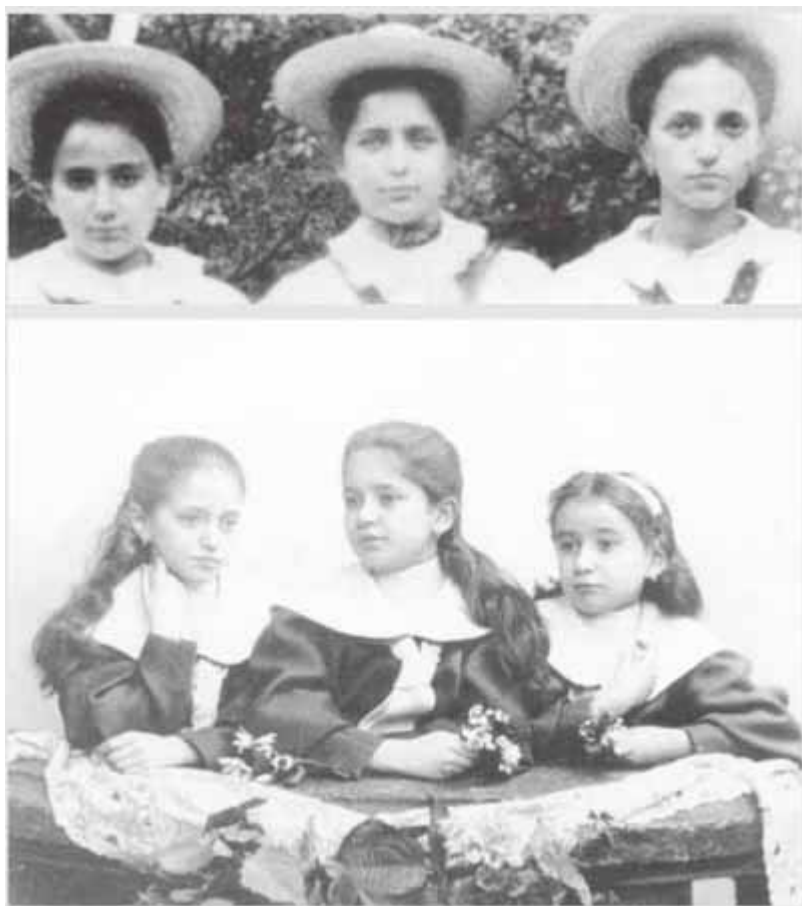
约两岁时的卡夫卡



约四岁时的卡夫卡



约五岁时的卡夫卡



上图左起分别是：三妹奥特拉（1892生）、大妹艾莉（1889生）、二妹瓦莉（1890生）

下图左起为瓦莉、艾莉、奥特拉（约摄于1893年）



穿上节日盛装的三姐妹



卡夫卡最喜欢的小妹奥特拉，约五岁



从“小”环城路看“大”环城路：后面是泰恩教堂；中左侧是带有12使徒钟的议会大厦的钟塔；左边的截图是“米诺塔”楼，卡夫卡一家在这里从1889年住到1896年



左侧标有  记号的地方，即采尔特纳街2号，是“西斯廷之家”，卡夫卡一家在那里住了一年（1888—1889）；

右边第二幢楼的“角药店”是后来卡夫卡经常光顾的文学沙龙



布拉格古城肉市街16号是当年的德语男童人民学校，1889年至1893年卡夫卡在这里上的学



约十岁的卡夫卡与他的两个妹妹——瓦莉（左）与艾莉（中）



约十三岁时的卡夫卡



吉普赛犹太教堂

P. J.

*Ich lade Sie höflichst zur Confirmation meines
Sohnes*

Franz,

*welche am 18. Juni 1896 um $\frac{1}{2}$ 10 Uhr Vormittag in der
Zigeuner-Synagoge stattfindet.*

*Hermann Kafka,
Zeltnergasse 3. *Juni*



上图是卡夫卡父亲根据习俗为儿子举行坚信礼向亲友发出的邀请函

下图是卡夫卡家迁居布拉格的头几年经常做礼拜的粉红色犹太教堂



采尔特纳街12号，第二层是父亲的妇女时尚用品商店（1906年至1912年）



采尔特纳街3号，即“通三王之家”，卡夫卡一家在这里从1896年住到1907年，卡夫卡从四年级一直上到中学毕业。这也是父亲的妇女时尚用品商店所在地（1896年至1906年）



盛年时期的卡夫卡双亲下图是父亲的店徽：乌鸦的捷克文是Kavka,主要象征德意志族；下面的树枝象征政治中立



上图右侧是古城环形路上的金斯基宫，其第三层是卡夫卡的中学所在地地图是莫尔道的平民游泳学校，卡夫卡父子经常光顾

下图右侧前面是苏菲岛旁的游泳学校，卡夫卡亦喜欢前往

Es geht ein Rauschen und ein Gef
für Sünden und oft dem - Mischel
Pang, der ist. Hogenkel.
Gung Kafka.

卡夫卡最早的手迹（1897）



约1899年的一帧卡夫卡照片



约1899年的一帧卡夫卡照片



严格的惩罚法学家汉斯·格罗斯，他为卡夫卡的小说《在流刑营》（一译《在流放地》）提供了所有过时的惩罚手段，系著名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奥托·格罗斯的父亲



卡夫卡的舅舅西格弗里德·洛韦，医生，单身汉，系卡夫卡短篇小说名作《乡村医生》中主人公的原型



上图是后来的西格弗里德舅舅可以骑机动车行医了

下图是西格弗里德舅舅的住所

Und die Klumpen waren in kleinen
Päckchen auf dem Tisch verteilt
unter diesen großen Tischen,
das von Fingern in der Ferne
bis zu fernen Fingern breitet.



卡夫卡《一次战斗纪实》的手稿（1904）布拉格德语大学学生的“读讲报告厅”，
卡夫卡和勃罗德在那里属于“创作艺术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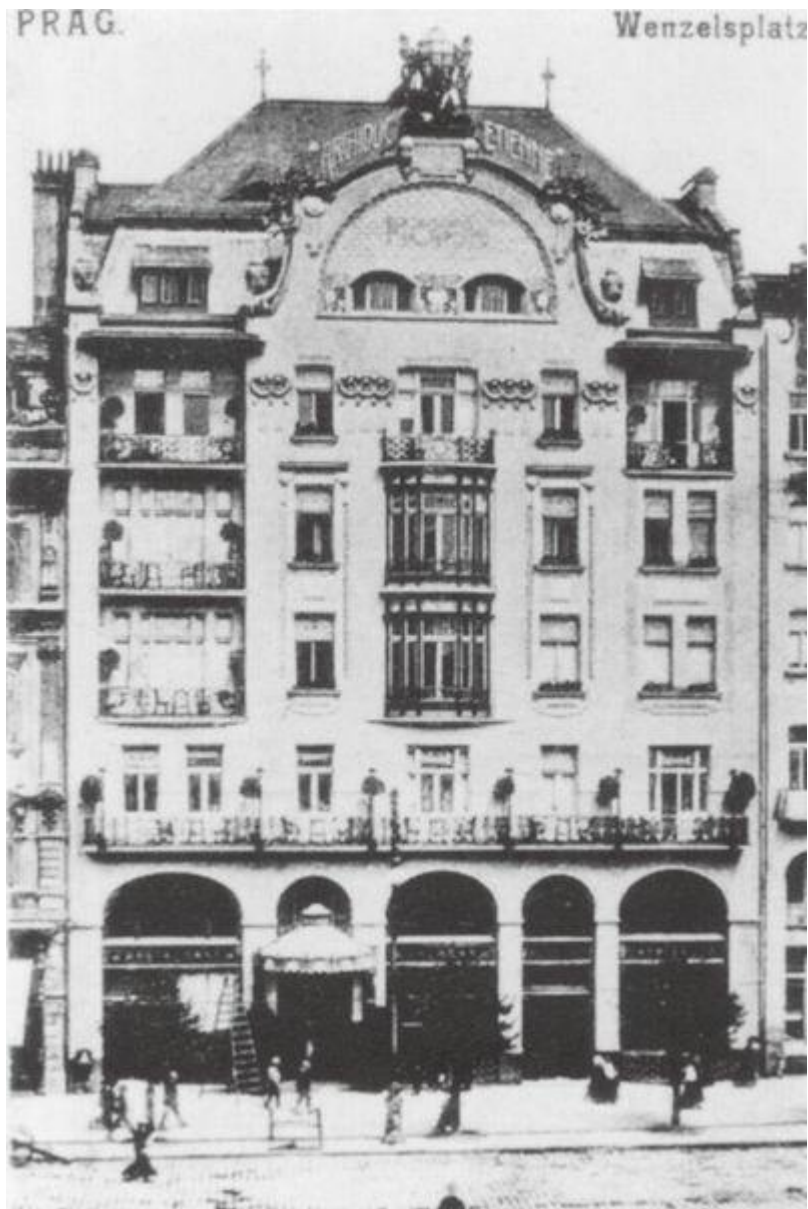


在施万恩疗养院期间的卡夫卡，1905与1906年他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并“变得相当活泼”。后来他承认：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女子，“此事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内心。”这一经历后来反映在他的断片性的长篇小说《乡村婚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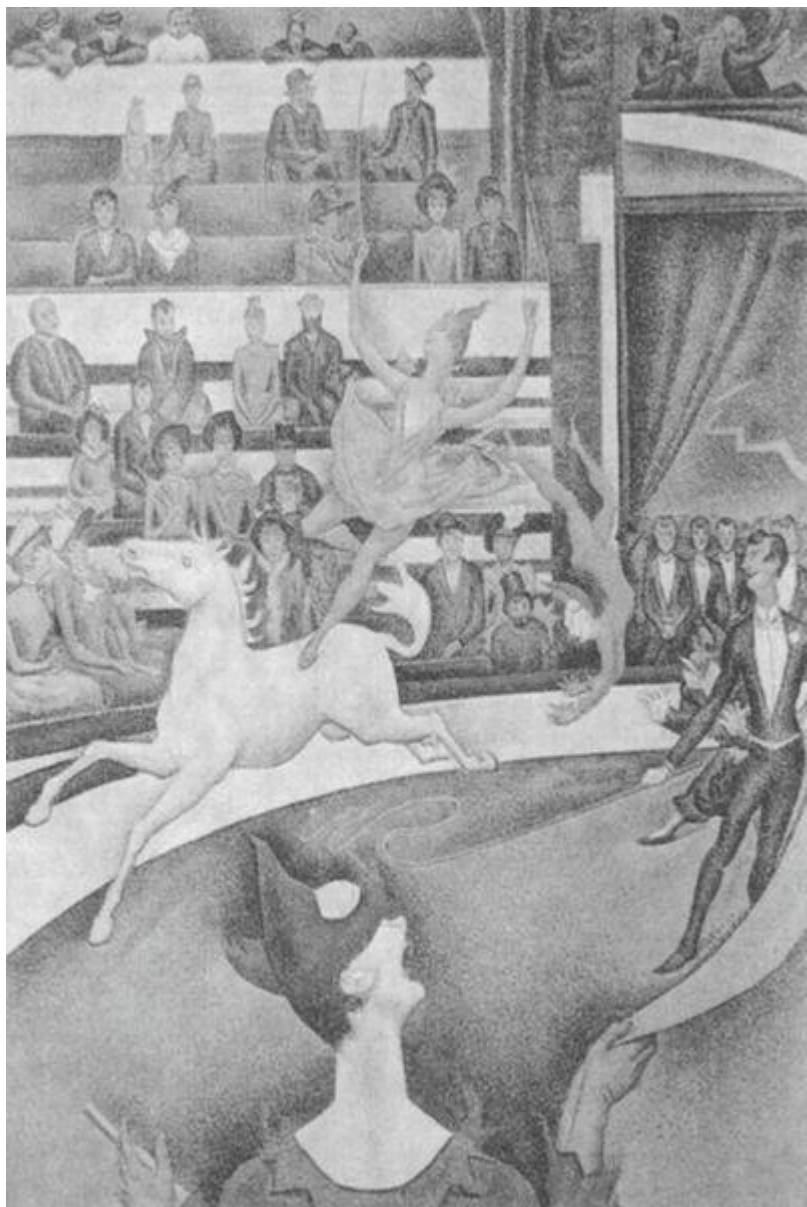


上图是布拉格中心大街旧景：有了电车以后的街景（1905）

下图是弗兰茨·约瑟夫（亦称伊丽莎白）大桥，卡夫卡的《判决》主人公最后也是从这么一座桥上跳下去的



温泽尔广场的“大公爵饭店”，1912年12月，卡夫卡在这座饭店的“镜廊”朗诵他不久前完成的短篇小说《判决》



卡夫卡曾于1910年和1911年两度去巴黎度假，每次一周左右。上图是当时卢浮宫里的马戏表演，后成为他的短篇小说《在楼座上》的原型



大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工厂。卡夫卡的父亲要卡夫卡参与其工厂的管理。卡夫卡为此痛心疾首，他恨不得以死来表示抗议（后该工厂关闭）。两个星期后卡夫卡写出了短篇小说成名作《判决》

D A S U R T E I L

E I N E G E S C H I C H T E

V O N

F R A N Z K A F K A



L E I P Z I G

K U R T W O L F F V E R L A G

1 9 1 6

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的封面

FRANZ KAFKA
DAS URTEIL



《判决》的另一版的封面

~~gehört~~ ~~war~~ zum Jahr seiner Eltern gewesen war.
 Noch hielt er sich mit schwächer werdenden
 Händen fest, erspähte ^{in dem} durch das Gelande-
 tanzen im Antommibus, das mit Leichtigkeit
 seinen Fall überstehen würde, tief leise, lichte
 Eltern ich habe Euch doch immer geliebt
 und bin noch herabfallen.

In diesem Augenblicke ging der
 die Punkte ein gerader, unendlicher Vektor.

27 Diese Geschichte, der Anteil halber in der Nacht
 von 22 zum 23 von 10 Uhr abends bis 6 Uhr
 früh in einem Zug geschrieben. Die von ^{ihnen} ~~ihnen~~
 tief gewordenen Punkte konnte ich kaum hervor-
 ziehen. Die fürchterliche Kyntrung und Freude
 wie sich die Geschichte vor mir entwickelte

Sehr geehrter Herr Oberinspektor!

Ich habe heute früh einen
 kleinen Ohnmachtsanfall gehabt
 und habe etwas Fieber. Ich bleibe
 daher zuhause. Es ist aber bestimmt
 ohne Bedeutung und ich komme
~~bestimmt~~ heute noch, wenn auch
 vielleicht erst nach 12 im Bureau



卡夫卡的第一批短篇小说发表在慕尼黑出版的杂志《许佩里翁》上。图为这家杂志社的总编辑汉斯·韦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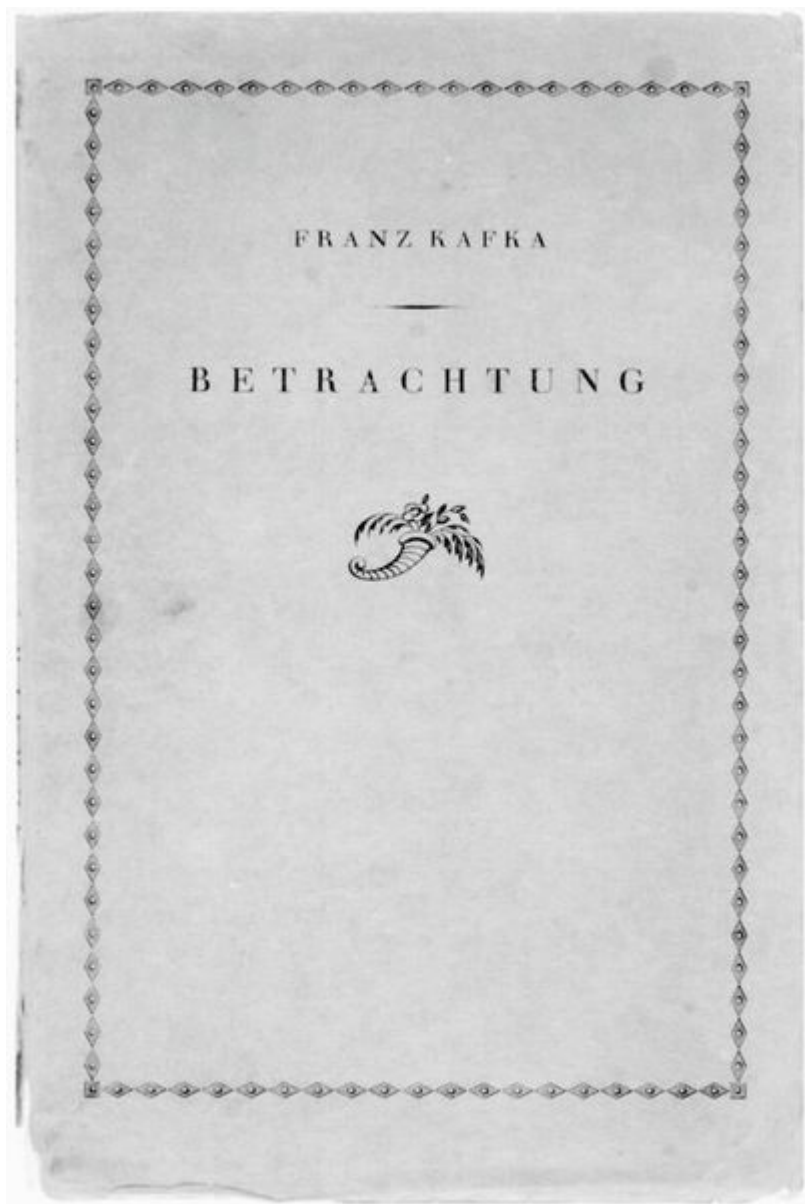
HYPERION

EINE ZWEIMONATSSCHRIFT
HERAUSGEGEBEN VON FRANZ
BLEI & CARL STERNHEIM



MÜNCHEN 1908
HANS VON WEBER-VERLAG

《徐佩里翁》的封面，1906年



卡夫卡的第一本小说《观察》的封面

DER JÜNGSTE TAG
NEUE
DICHTUNGEN

*Franz
Kafka
Der
Heizer
Ein
Frag-
ment*

LEIPZIG
KURT WOLFF VERLAG

卡夫卡的小说《司炉》的封面，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

FRANZ KAFKA
DIE VERWANDLUNG



DER JÜNGSTE TAG • 22/23

KURT WOLFF VERLAG • LEIPZI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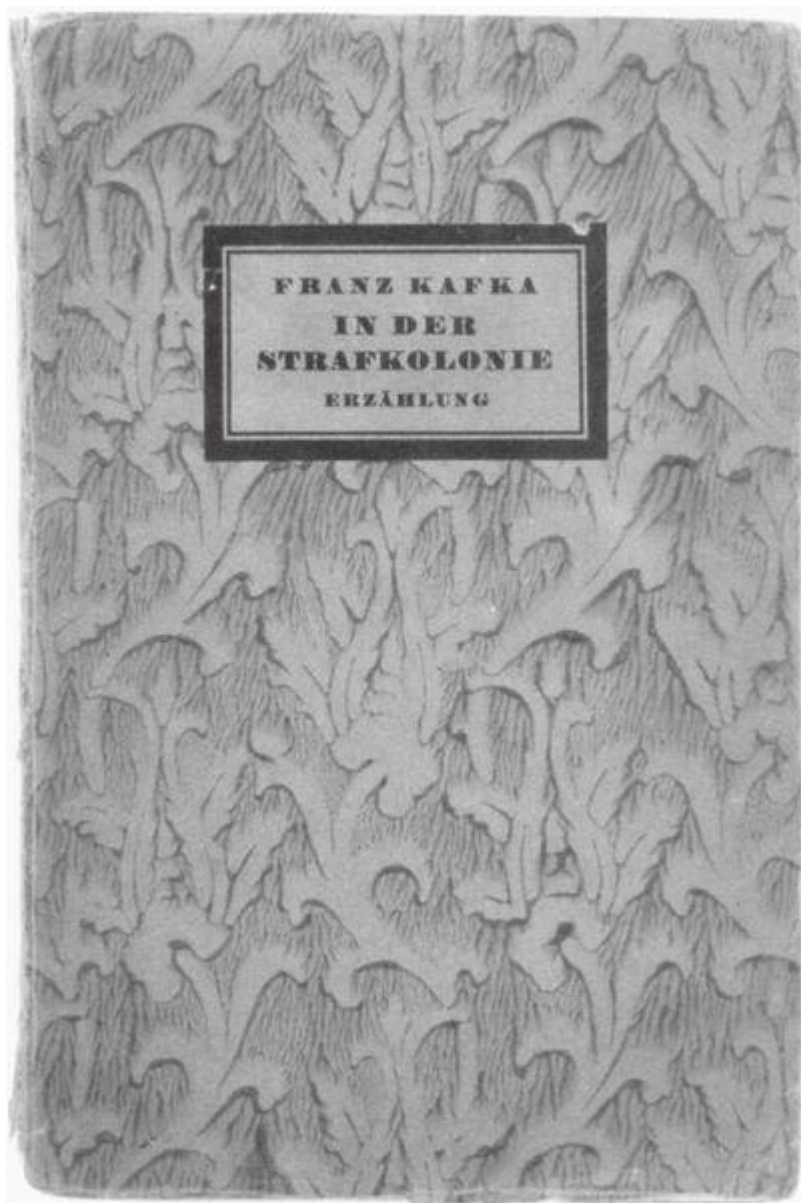
1 9 1 6

卡夫卡《变形记》的封面



上图是意大利加尔达湖畔里瓦市的疗养院和水疗所的主楼

下二图分别为该疗养院的沙滩躺休厅和餐厅。卡夫卡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并爱上一位这里的18岁的姑娘，有过“与一位被爱女人关系的甜蜜”。里瓦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猎人格拉胡斯》的背景



卡夫卡《在流刑营》封面



1916年11月小妹奥特拉租下了位于哈拉庆的阿尔希密斯滕街22号的房子提供给哥哥使用。这里诞生了《乡村医生》小说集中的好几篇小说

总序

叶廷芳

在思想文化领域，每个不同的时代都产生过不同于别的时代的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他们的存在既是时代的见证，又是这个时代精神特征的标志。如果没有了他们，则这个时代的轮廓就会模糊。

20世纪无疑是个伟大的，而且别具特征的世纪。仅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它的一大批时代精英，不仅纵向上迥异于前人，横向上亦各各有别，甚至同一个“主义”也可以划出许多界线来，如同为存在主义的克尔恺郭尔（他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生命是属于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萨特，仅仅论述他们的差别，就需要写出一本书来。文学亦然：乔伊斯、普鲁斯特、勃洛赫均属“意识流”小说家，但他们之间却个性鲜明、轮廓悬殊。

在进入主题以前，写这么一段引语，无非想说明，评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任何套语或通行例则都会失灵。

现在该请本文主人公、本全集作者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出场了。他也是有资格代表时代，因而有理由载入史册的本世纪杰出人物之一。

像本世纪前叶西方文学艺术界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样，卡夫卡降生在19世纪80年代，具体说1883年7月3日。这是个“世纪末”阴云笼罩的年代：德法战争的炮声刚停，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正雷厉风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重重，“前途未卜”的灰暗情绪困扰着人们，令人不安、憋闷。这股情绪郁结的结果，三十年后终于在表现主义运动中找到突破口，大声地“呐喊”了出来。这种呐喊的情绪，确定了卡夫卡一生的精神基调。

现代哲人尼采说过：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此乃至理名言。欧洲知识精英经过世纪末的不安岁月的折磨和彷徨的求索，一部分走向了革命，一部分激发了智慧和灵感，成为本世纪新型文学艺术的扛鼎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所诞生的那个不祥的年代，也是个为新世纪的新型文艺“育苗”的年代：与卡夫卡这茬差不多

时间出生的就有穆西尔、勃洛赫、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T·S·爱略特、乔伊斯、马拉美、普鲁斯特、伍尔夫、福克纳、毕加索、康定斯基、柯柯施卡、蒙克、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格罗皮乌斯、文丘里……可以说人才辈出。

卡夫卡的出生地波希米亚王国首府布拉格，历来是欧洲有名的大都市之一，当时约有80万人口，五分之一讲德语。这里是缪斯经常出没的地方，她不仅有辉煌的建筑，还有美妙的音乐，而在文学方面，除了卡夫卡和里尔克，还有韦尔弗、梅林格、基希、福克斯、勃罗德等。他们全都是用德文写作的，从此出现了“布拉格文学”的新概念和新学科。

卡夫卡属于犹太血统。这个民族长期没有固定的家园，历来是受歧视的，这给卡夫卡的心灵从小就罩上了阴影。无家可归的漂泊感是他的精神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成为他的创作内发力的重要来源，因而增加了他的作品的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深邃性。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智力不算出众，但作为犹太人经商是有方的，所以白手起家，成为富裕的妇女时装礼品店的老板。他只关心他的生意，对儿子的写作事业并不理解，更谈不上支持，加上他对子女的家长制管教方法，使卡夫卡在心理上从小就笼罩着威权的压力。这成为卡夫卡创作中“代沟”主题和倔强主题的生活原型。

卡夫卡的大学年代上的是布拉格的德语大学，学的是法律，但他的兴趣是文学，爱读斯宾诺莎、黑贝尔（戏剧学）、达尔文、尼采等人的作品，并开始习作。他的最早一本集子《观察》中的作品约于1902年即已写成。由于他结交了成名较早的同窗作家马克斯·勃罗德，经常随勃罗德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以致后来认识了表现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和作家韦尔弗并参与某些活动。

卡夫卡于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实习一年后，于1908年开始在官办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供职，虽然多次想摆脱以利于创作，但始终未能如愿，直到1922年因病势恶化被迫退休为止。但只要他在办公室一天，他总是“恪职守”的，以至得到他的上司的赏识。这是符合卡夫卡的性格逻辑的：内心极为执拗，外表却十分谦和。所以他在办公室里，在日常生活中人缘很好。这里不妨录一段他的朋友韦尔奇对他的回忆：

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

表情丰富。对一切都友好、认真；对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的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敬。^[1]

卡夫卡的文品和人品是完全统一的。

在回顾他的贡献的时候，笔者想起五年前访问德国文学界的世纪老人、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时听他讲过的一段话：“在我从事德语文学史期间，发现有两个人是从文学外走来的，一位是19世纪初的毕希纳，一位是20世纪初的卡夫卡。”所谓“从文学外走来”，即是说他们的作品是不符合固有的文学概念和规范的，是行外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作品从“野”的变成正宗的了。因此马耶尔认为，卡夫卡“改变了德意志语言”^[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卡夫卡“违背了”德意志语言，一种语言被违背，那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违背者未必是正确的。但一种语言被改变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说明改变者的行为已经变成了大家的行为，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

所谓语言被改变，指的主要不是语言的使用规则诸如句法、词法等被改变，而是一种话语方式的改变，亦即思维惯性，在文学领域还包括审美惯性的被改变，说到底是一种固有的文学观念被改变。正是因为文学观念改变了，衡量文学的尺度不同了，卡夫卡那些一度被认为“非文学”的作品被公认为真正的文学，卡夫卡也就由“文学外”走到了文学内，而且成了左右20世纪文学主潮的“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

卡夫卡的成功，首先应归因于他的时代意识，他适时地感知到时代的脉搏，较早地探悉到属于本世纪的或未来的审美信息。在卡夫卡成长的年代，西方以“理性”为主旨的价值秩序已经受到怀疑和动摇，马克思宣告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实行“彻底决裂”与尼采宣告“价值重估”可谓殊途同归，代表了西方不同思想派别的知识界对传统价值观的唾弃；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与尼采决心“自己来当哲学家”都表明他们要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取代它，在本世纪，特别是头30年，他们的学说在西方第一流知识精英中都找到了大批信徒。在德语文学中，布莱希特和卡夫卡堪称这两方的不同代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在颠覆旧价值观的人们中，至少有两人对卡夫卡产生过影响，即除尼采外，就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当然，卡夫卡对现存价值观的厌弃和对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洞悉主要是根源于自身的生存体验和紧张思考。奥匈帝国的专制主义统治与欧洲现代潮流的悖逆，犹太民族的无家可归与受歧视、受压抑的处境，父亲的家长制权威从小对他儿童心理的

威胁，社会上法制形式的完整性与法的实质的不存在……这一切都导致他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感和异己感，因而无法接受这个世界。于是，现代哲学家们对现代社会从理论上概括出来的“异化”概念，他却用生命作了体验和证实。一种对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充溢在他的心头，他的内心因此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借助文学手段将它宣泄出来，成了他“巨大的幸福”，否则就要“绽破”。卡夫卡就这样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但与其说他要当作家，毋宁说他为了内心表达。他的一篇篇作品，无论是幻想性的故事，还是隐喻性的寓言，杂感性的随笔，哲理性的箴言，乃至大量的书信日记，都是为世人发出的紧急报告。理解了他的写作的这种性质，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生前每发表一篇作品，都必须经过他的友人勃罗德的“强求硬讨”，不难理解他虽然一直想要有更多的写作时间，却始终没有将写作当作他的职业，不难理解他晚年为什么要嘱咐友人把他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而不想用它们在死后换取作家的殊荣。了解他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的第一性质是至关重要的：他的作品都不是凭作家的技巧“做”出来的文章，而是作者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一如他笔下的那位“饥饿艺术家”，表演的无限性和艺术的完美性是他唯一的追求，至于因此他的生命会消失他是全然不顾的，实际上他是在用生命换取他的表演（在卡夫卡是写作）的可能性。

尽管卡夫卡并不缺乏哲人的头脑，但他毕竟不是作为哲学家，而是作为艺术家名世的。因此他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或者说在美学上所取得的成功，甚至更为世人所注意。在这方面，他执著地以他独特的审美方式，改变了人们多少个世纪形成的审美习惯，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观念。

在欧洲文学史上，将近两千年来，人们一直是把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模仿论”作为永恒不变的艺术法则和美学信条的。欧人在“模仿论”的目标下在文学、艺术上所进行的追求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种成就在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峰。但一个事物的发展一旦达到了高峰，那就意味着它的时代到此为止，下坡已经开始；意味着一个新的事物已经在孕育，准备取代它了！孕育的基因，来自历史上处于非正统、受排挤地位而生命力顽强的文学、艺术形态或美学特征，这在17、18世纪集中体现在“巴洛克”的艺术和文学身上。它在19世纪，已陆续呈现出具有现代特征的端倪，从德国浪漫派的美学理论，美国霍桑、爱伦坡的小说到法国波特莱尔以及后来象征派的诗歌……，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的迹象至19世纪末已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预示着一

场美学革命的大潮正在到来。它的主旨是：弃模仿，重表现；弃客观，重主观；弃写实，重想象，整个审美视角从外向内转移。卡夫卡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竭力从自我的体验出发，正好适应了这一美学变革的潮流，同时他亲身投入了这场变革的实践运动。这场美学革命运动，通称先锋运动或现代主义运动，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头30年，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先后有过一大串“主义”，其中以表现主义运动声势最大。它从美术到建筑到文学，前后经历了二十来年，其中心在德国或德语国家，波及欧洲许多地方，它不是纯美学运动，带有鲜明的社会反抗色彩。这场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叫弗兰茨·韦尔弗，也是布拉格人，卡夫卡与他结为知交。运动对卡夫卡的影响是明显的，他的创作的旺盛期（1912—1922年）恰好是运动的高潮时期（1910—1920年）。1912年，当他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又名《美国》）的时候还宣称，这是“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小说固然有不少卡夫卡自己的色彩，但更多的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线条。然而两年以后即1914年开始写第二部长篇《诉讼》一译《审判》，特别是1922年写最后一部长篇《城堡》的时候，风格就迥然相异，显然已经“改变了德意志语言”了。

但如果给卡夫卡简单地贴一个“表现主义”的标签，那也会上当，那会妨碍你看清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的全部特质。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完全在于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他不是某一个阶段的或某一个流派的现象，他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一个世纪的现象。如果他是属于某一个流派的，也许他早就像某些流派的代表人物那样，生前就红极一时，但在文学史上不过是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在卡夫卡的美学特征里，既有他所倾向的流派的烙印（如对怪诞和神奇的爱好），又有其他流派的痕迹（如对梦境的追求和象征、譬喻的运用）；既有同时代人的这些标记，又为未来着了先鞭（如对荒诞的强烈表达和黑色幽默的成功尝试）。这不奇怪，在他身后出现的一些重要流派，无不跟他攀亲结缘：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尊他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他为典范……卡夫卡的创作就像一张涂了各种化学试剂的白纸，其斑斓的色彩是随着时间一步步显现出来的，最后才构成壮丽的图景，成了一个世纪的文学星空中的“彗星”。因此卡夫卡的成功和不平凡，不在于他在某一种艺术方法或审美特征的追求上达到了极致，而在于他对正在急速变革和逐步形成中的属于整个大时代的美学风范作了全景式的呈示，仿佛他在时代的春季（他在本世纪正好生活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至1924年），即看到了夏季、秋季、冬季要开的花，在这里显示了他的超前性和非凡性。

在谈论卡夫卡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把他与那个本世纪普遍流行的哲学范畴——荒诞相联系。是的，从卡夫卡思想和创作的前提看，他是与存在主义相关的。存在主义哲学自上个世纪中叶由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主创以后，影响日渐，经尼采、海德格尔到萨特，至本世纪中叶形成一股很大的思潮，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广泛而深远（从某种程度上说，卡夫卡的走红与这股思潮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存在主义探讨人的生存处境，它与弗洛伊德心理学可谓异曲同工，都与“人学”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在存在主义看来，人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他的存在是荒诞的，因为存在主义是从形而上的绝对自由观念来看待人的处境的。它摒除了人的一切外在关系：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道德的、法律的、宗教的等等价值法则，认为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东西都是人为地强加在人身上的，它们像“黏滞”的胶状物一样，使你不能自由行动，处处让你感到“恶心”。存在主义否认人的行为和事件的因果联系：警察追小偷，他只看到两个人在一逃一追；一个惊恐万状，唯恐被抓到，一个则处心积虑，非抓到不可；两个都是人，何以会这样？所以存在主义者很重视危机中的个人，强调人的“此在”性——此时此景的处境。

不少认识卡夫卡的人都提到，卡夫卡对一切日常的事情也表现出惊讶的神情，甚至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群当中那样尴尬。这说明他是以“自由人”的姿态去感受生存的。这样，他仿佛是个从天外抛入到世界里来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值得怀疑的。所以他不止一次说到，要对世界“重新审察一遍”，甚至这成了他的“当务之急”。（从这层意义上讲，他的写作过程就是“审察世界”的过程，只是晚年他不止一次慨叹，要对世界进行这样一次全面审察，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越到晚年，他的荒诞感越强，1922年写的《城堡》、《饥饿艺术家》，特别是稍晚一些的《一条狗的研究》都涉及这个问题。后者写一群“空中的狗”因找不到可吃的食物而绝望，与那位饥饿艺术家因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而弃世一样，表明这个世界不适合于他们生存，因而不接受它。作品主人公的这种处世态度，完全是作者荒诞意识的产物。

存在主义哲学家与以往的许多哲学家有一个不同点，即他们不满足于抽象的逻辑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总想通过形象的文学语言来图解它。从克尔恺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特别是萨特和加缪那里，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这种努力，并且都有其独到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从“此在”的体验出发的。在这过程中，他们把哲学变成了美学。卡夫卡从未用哲学语言阐述过存在主义或有关荒诞的观点，但他用文学语言

所表达的生存感受显然比上述任何职业哲学家都来得鲜明、真切、强烈。这就是说，在把哲学变成美学这一层上，卡夫卡是首屈一指的。

当然在卡夫卡与荒诞这一问题上，国际学术界不无争论。笔者最近在与德国著名卡夫卡专家H·宾德尔的交谈中，就听到他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卡夫卡与荒诞没有多大关系，人们之所以常常把卡夫卡看作是写荒诞的作家，那多半都是受了法国作家加缪的影响，加缪写过那么一篇文章^[3]。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加缪那篇文章对我国读者来说，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机会读到，而他们对于卡夫卡与荒诞的关系，在这以前就有印象了，这主要是读了他的作品以后获得的。在知道加缪的观点以后，只是有了更多的理论认识罢了。何况，看到卡夫卡作品中的“荒诞”的，远不止是加缪、尤奈斯库、贝凯特……至少有一群。再说，正如加缪对自己观点所作的解释，在关于荒诞问题上，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方法”^[4]。人们看待卡夫卡笔下的荒诞，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即他把哲学变成了美学。

我国读者在接触卡夫卡的作品的时候，还涉及另一个哲学命题：“异化”。“异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德国的一些思维巨人的著作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马克思在批判地消化了前两位哲人的观点以后，沿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思路对这一概念作过如下的概括：“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5]。显然，新的哲学概念的这些创始人，已经注意到社会化的机器生产的出现给人的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由对生产体系的支配地位变成了被支配地位。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后，“异化”概念的内涵大为伸延，仿佛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从而导致人的生存陷入更为全面、深刻的危机和困境，不仅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社会的、自然的）的关系日趋异常和对立，而且人的主观世界也发生疑问，又面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困惑，仿佛古人镌刻在古希腊神庙墙上的那句铭语“认识你自己”又复活了！

哲学与文学“嫁接”，总要发生一些变异。“异化”思潮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各种面貌，概括起来看，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要么人不接受世界，要么世界不接受人；表现在人的自身矛盾中，是人的自我失落与迷惘。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在这当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它为“寻找自我”扩充了一条重要渠道。卡夫卡在理论上对“异化”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甚至连“异化”这个

词“Entfremdung”也很少使用；偶尔见到，那都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它，而是作“疏远”解释。然而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所显现的世界，正是哲学家们想阐述的“异化”世界：作品中人的那种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放逐感、压抑感；客观世界的那种障碍重重的“黏滞”性，那种无处不在的威权的可怖性，那种捉弄人的生命的“法”的滑稽性，那种屠杀同类的凶残性……正是哲学家们想描绘而不能的令人沮丧的世界。至少它在萨特那里引起强烈共鸣，无怪乎卡夫卡成为萨特笔下提及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在“审察世界”，或者说在揭示人类生存的“异化”现象的时候，卡夫卡常常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的，他正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提取出怪异事件来，让大家惊诧，发现自己平时忽视了什么，好比一个魔术师突然从观众席中吊出一条鱼来，这时人们才恍悟：身边有鱼怎么没有注意呢！当然，卡夫卡使用了一种艺术手法，一种“间离”技巧，或曰“陌生化手段”，借以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启悟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洞察现实，进而向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认清自己的可虑的境况。生活往往由于太熟悉而不能看清它，所以“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乃至理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所做的，无非是把人们从“当事者”推到“旁观者”地位，为此他常常借助于动物题材以增加他的“推”力。动物没有被文明化、社会化，它们不懂得什么伦理、道德、宗教、法律等种种社会规范，与原始阶段的人类较近似。卡夫卡在观察和表现人类社会“异化”现象的时候，总想追溯人类久远的生存状貌，唤回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被遗忘了的记忆，以启悟我们明白今天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他认为动物没有累赘，通过动物更容易达到上述目的。因此他那些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都不是童话，也不是适合于儿童阅读的寓言，而是思想深奥的譬喻性小说，因而那些动物主人公，不论是较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是哺乳动物还是昆虫，都是人格化的化身。

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一个哲学术语有关，这个哲学术语就是“悖谬”（paradox）。悖谬，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盾与抵消。这在卡夫卡那里，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种美学特征或艺术方法。这是一个关键性术语，不了解这个术语的涵义，就很难理解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的随笔或笔记里，常有这样的描写：看见一个熟悉的姑娘，但又说不认识她；一个阳光灿烂、游船如梭的地方，他描写得很详细，但最后却说没有见过它；《法的门前》的门警不让那位乡下人进去，却又说这门只是为他而开的；当约瑟夫（《诉讼》主人公）被宣布

逮捕时，他是那样激昂慷慨，为洗清自己的罪名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但最后被提出去处决时，他却毫无反抗，态度平静，仿佛罪有应得--在这部小说里，显然有两层意思：在形而下即现实的法庭上他是无罪的，（他犯什么法！）但在形而上即真理或道义的法庭上他又是有罪的（因为他作为银行襄理也无视过平民的求告）。这种悖谬思维甚至也贯彻于他的生活原则：他那么渴望婚姻和家庭，却数次订婚又解约；他视写作为生命，最后又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几乎一生都与父亲不和，曾写了那么长的信（三万五千字）谴责父亲“专制有如暴君”，最后却又对父亲表示同情，以致那封信交都没有交出去；他分明说，他生就的只有弱点，以致任何障碍都能把他摧毁（很像是），但别的场合又不止一次地说，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确实是）……他似乎总是在不停地建构，又在不停地解构。他到底是谁？自己都表示怀疑。

但当卡夫卡把这种思维特点作为艺术表现方法加以运用时，却构成一种绝妙的审美情趣。《饥饿艺术家》中那位主人公以饥饿作为表演手段并作为艺术追求，他饿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的艺术成就越高，他一心要把他的艺术推向顶峰，这就构成悖谬：他的艺术达到顶峰之日，即是他的肉体消亡之时。小说中另一个悖谬结构是：饥饿艺术家死后，他表演时所呆的那只铁笼子里代之而来的是一只年轻的小豹，它响亮的吼叫，表明它“浑身上下直到每个牙缝都充满了力”。于是，在这只铁笼子里，一个奄奄一息的虚弱的生命消失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强壮的生命出现了。仿佛后者是前者的“涅槃”——多么有意思的新陈代谢！再看《城堡》主人公K，他为在城堡（官府所在地）管辖下的村子里取得一个临时户口，奋斗终生而不得，最后临死时，当他不需要这个户口时，却又给他了！你看，一个求之而不得，一个想要又扑空！上一段举的关于他的思维方法的例子，都可以从审美角度去欣赏。如果把诸如此类的地方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卡夫卡笔下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忽明忽暗，似有若无，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处于不断地来回滑动或摆荡之中。

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持久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真实性。真实性这里不仅指作者观察生活的精确，角度的独特和研究的认真，还在于作者体验和感受生活的真实。前面说过，卡夫卡不是把写作当作当作家的阶梯，而是内心表达的手段。所以他作品都不是凭写作的技巧或虚构故事的才能一挥而就，而是让生命的火焰锻造出来的。无怪乎他笔下的人物画廊经常晃动着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其实那就是作

者本人的投影，故姓名中常少不了一个“K.”的标记。卡夫卡本人在写完《判决》后所记的日记中也毫无保留地记下了这个秘密。我们不仅从他的前期作品如《判决》、《变形记》、《司炉》、《失踪者》（一名《美国》）、《诉讼》中察觉这个秘密，而且还可以从他的晚期作品如《城堡》、《饥饿艺术家》、《地洞》直至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歌女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发现同样情形。

但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是卡夫卡小说的自传性本身，而是它们没有流于一般传记小说或自传体小说的通病：追求事件的纵向发展和人物外部特征的近似。卡夫卡不愧是真正的艺术家，他懂得艺术想象的奥秘，抛弃了那些陈规俗套，只在某一点切入，专一于心理的真实，从心理真实来反射性格特征。至于纵向事件和外部特征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内容。尤其晚年写的上述作品，一律着以伪装：时而是一幅瘦骨嶙峋的躯壳（《饥饿艺术家》），时而是一个奇异女人的外貌（《歌女约瑟芬》），时而是动物的皮毛（《地洞》主人公）。无疑，这些怪诞的形象与卡夫卡英俊的外表毫不相干，但它们却寄寓着卡夫卡的灵魂。难怪，卡夫卡去世前一个多月，当他在病床上校完包括《歌女约瑟芬》在内的短篇集《饥饿艺术家》时，人们看到他泪流满面。如果不是看到自己的心魄在其中跳动，如何会引起他如此动容？然而卡夫卡在描写他们时，时而挖苦，时而讥诮，简直不相信他已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当然，有时也用了同情的笔调。

总之，自传性，但又像又不像。又是一个悖谬的秘诀。

在《城堡》的另一个稿本的头一章里，主人公K.在一家旅馆要求一位女招待帮助他，说他要完成一件紧要任务，为此他必须把其他一切不利于这一任务完成的东西“都要残酷地镇压下去”。

这个紧要任务就是前面提及的，他要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这可以说是卡夫卡的终身使命，是他创作的总宗旨。自从他在文学上初露锋芒（1912年），直到去世，始终都在身体力行。时间对他是最宝贵的，工伤保险公司的那个饭碗成为他最大的苦恼，他曾要求父亲资助他两年，以便暂时离开这个职业，以专心于创作，可惜为商的父亲没有这个眼光，未予答应。他只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此他恨不得弃绝一切与亲友的往来和社交活动，躲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除了吃饭，都用来写作。他睡眠很糟糕，失眠还得写作，常忍着头痛。他不愧是个“多情的种子”，先后爱过好几个女子。他也渴望有个家庭，有孩子，为此先后和

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但最后都解约了！除了最后一次迫于父亲的反对，前两次都是自己考虑的结果。为什么？笔者研究过他的日记，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文学。他把写作视为“最大的幸福”，实际上把最大的爱献给文学了，他和文学结下了“姻缘”，有排他性了。一切有碍于这一“姻缘”的，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残酷”，这里是痛苦的代词。和菲莉斯的马拉松式的“结婚准备”扯拉了5年之久，婚约订了又吹，吹了又订，说明他是多么矛盾，这个决心是多么难下，最后还是吹了，是经过多长的精神折磨的结果！不难想象，这个“残酷”的决定，使他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他自己最清楚，“肺病是菲莉斯”，是“镇压”婚姻欲望造成的后果。

问题不仅在于他如何地挚爱文学，还在于他对文学要求之高。晚年毁稿之念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这一点他通过晚年的两篇重要小说，即前面提到的《饥饿艺术家》和《歌女约瑟芬》表达得尤为强烈而清楚：前者主人公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后者主人公为了在艺术上“拿到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不利于自己歌唱（即艺术）的一切都“榨干”了，以致一阵风吹来都能把她吹倒。这是卡夫卡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位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仿佛上天降大任于斯，为了文学，他把“一切生之欢乐”都搭上了！这是一个艺术殉难者的形象，41岁的天年为他作了证。过去我们只知道，出于革命信念有人赴汤蹈火；为了科学实验有人不顾安危；自从有了卡夫卡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艺术革新领域也有人为之献身！

为任何一种事业殉难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说胆小鬼做不到，窝囊废做不到，一般的凡夫俗子也做不到。这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还需要一种把性命豁出去的牺牲精神。也许有人会说，卡夫卡自己都承认：一切障碍都能把他摧毁。是的，表面看，他确实不是一个进攻型的斗士，而是防守型的小民，某种程度上，《地洞》中那位精心营造了他的防御工事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他甚至还通过这位主人公的口说：对于任何一种比较认真的进攻，他都准备退让。但是前面说过，那个悖论的逻辑不仅左右着他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指导着他的生存方式，甚至可以说，他的整个精神结构根本就是一个悖谬：一个方面表现的软弱，正意味着另一个方面必定是坚强；或者说他在一个方面对软弱的牺牲，在另一方面必定是对坚强的增添。因此我们固然不应忘记他“手杖上”的上述铭语，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他在不止一个场合写的箴言：人是不可能没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而活着的。他认为他自己身

上就有这种东西，因此他的内心是“好斗”的。这一正负型的精神结构导致他的命运的悲壮性，使他成为作家中“生活上最没有成就的人”，而在现代艺术的探险中却是“表现主义文学中最有成就的人”[6]。但在生活上那“负”的一方经常规劝他“放弃吧！”[7]承认自己的失败，把婚约解除；而“正”的一面却始终坚持一个音响：解除了，再爱，再订，……因此第三次婚约的解除，并没有妨碍他不久又热烈爱上密伦娜，失败后又爱上多拉·狄曼特，并且要与她结婚，只是对方家长的反对而作罢，最后还是以同居方式让多拉陪伴他到死。而在成就上，那“负”的一方经常使他感到“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口味的食物”，艺术上并不成功，不应该作为作家而存在，应把文稿统统烧掉；而“正”的一方却始终坚持：一定要“把艺术推向顶峰”（《饥饿艺术家》），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歌女约瑟芬》），即便因此导致肉体毁灭也在所不惜。因此，嘱咐焚稿后他并没有停止写作，甚至直到生命最后一个半月，还在病床上校阅清样。你看他生活上的每一次失败，生命血本的每一次偿付，都意味着他艺术上的再一次奋起。卡夫卡就是凭着这种悲壮性的坚韧精神，把他完成“紧急使命”的努力一步一步坚持下去的。这是一种尼采式的抗衡悲剧命运的精神秉性。无怪乎法国加缪在寻找他的美学建构方法时，很快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希望和荒诞”，他无疑在那些诸如进不了“法的大门”等到老死也不后撤的乡下人身上，在得不到城堡批准的户口证永远不停止抗争的土地测量员K.身上，在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决不停食，宁可饿死的饥饿艺术家身上……看到了西绪福斯的现代原型。

卡夫卡也许确实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能够“粉碎一切障碍”，但他在实现自己目标的“专线”上可以说把“一切障碍”给粉碎了！过程当然是残酷的，代价是巨大的：实际上他把生命价值的一半交给了魔鬼，以成全他另一半的成功。也可以说他为了“灵”的完美，作出了“肉”的牺牲。

卡夫卡的个人牺牲和殉难给他人、给后人，特别是给世界文学带来了福音。由于他的个人牺牲所换来的贡献，为本世纪的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奠基性的篇章。作为享受这一福音的后人，我们除了对卡夫卡本人表示敬意外，对促成他成功的一些有关人员也表示钦佩。第一位无疑是马克斯·勃罗德。这位卡夫卡大学年代的犹太同窗，在卡夫卡尚未成名的时候，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他是卡夫卡价值的最早发现者和鼓励者。早在1916年，在卡夫卡才写出了《判决》、《变形记》、《司炉》、《在流刑营》和《失踪者》以及《诉讼》一部分的时候，他就指出，卡夫卡是一个堪与当时的第一流作家如霍普特曼等人相提并论的大

作家。卡夫卡在作家中是个罕见的现象：他只对朗诵自己的作品有浓厚的兴趣，但对发表却很少关心，以致他生前几乎每篇作品的发表，都要经过勃罗德“强求硬讨”。马克斯·勃罗德的最大贡献是他出于慧眼没有执行卡夫卡要他烧毁其全部书稿的遗言，而把它们一一整理发表，尤其是三部未写完而稿页零乱的长篇小说《诉讼》（1925年）、《城堡》（1926年）和《失踪者》（1927年，勃罗德为其改题为《美国》），并于1935、1936年和1949、1950年先后两次编纂了卡夫卡文集六卷集和九卷集，从而使卡夫卡的作品迅速走向世界。勃罗德作为作家和学者，又是卡夫卡的最亲密的知己，由他来从事卡夫卡的遗稿整理工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作为见证人他所撰写的《卡夫卡传》和有关卡夫卡的学术著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幸哉卡夫卡，“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另一位卡夫卡的发现者当推莱比锡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及其同名社长。他认识卡夫卡时（1912年6月），卡夫卡还才出版过一本薄薄的《观察》，其他名篇均尚未问世。但他一开始就喜欢卡夫卡的作品。此后，凡是卡夫卡的作品经马克斯·勃罗德动员交出来发表的，沃尔夫几乎来者不拒，在他写给卡夫卡的一封信里这样表示：“凡是您自己能决定的、能给我们的任何手稿都欢迎，并保证以书的形式出版。”^[8]后来他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这里值得提及的还有两位先后和卡夫卡相爱过的女性——菲莉斯·鲍威尔和密伦娜·耶辛斯卡。前者和卡夫卡恋爱了五年，前后订了两次婚，又都解除了，原因如前所述，多半在卡夫卡，他自己也承认：先后给两位姑娘带来了痛苦（另一位是1919年与卡氏订婚的沃里切克）。菲莉斯后来嫁给别人了，但是她并没有记恨卡夫卡，相反她精心保存着卡夫卡写给她的525封信件，成为卡夫卡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密伦娜与卡夫卡相爱了半年，这期间卡夫卡的爱火几经挫折不但丝毫未减，其烈焰程度反而达到顶点。他在几个月里写给密伦娜的18万字（按：译成的汉语文字）情书按笔者浅见是最具文学价值的。它们也由密伦娜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特别是在法西斯追捕期间，她想方设法辗转交到了可靠的朋友手里。1921年1、2月份，就在她与卡夫卡的关系破裂以后不久，她在致勃罗德的信里依然对卡夫卡作了很高的评价：“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唯独他是唯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唯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9]这两位女性，密伦娜和菲莉斯，都表现不平凡的眼光和胸怀，是值得称道的。

卡夫卡从30年代后期开始越出国界，历经英国、法国、美国，形成巨浪后又返回欧洲大陆，并向拉丁美洲、亚洲、非洲铺开，60个春秋过去，其势头迄今方兴未艾，他的作品被选进德语国家甚至更多的国家的中学课本、大学讲坛；他的书一版再版，翻译的语种越来越多；至少每两年有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他的著作不计其数，产生了一大批研究专家和不只一个国际学术团体。卡夫卡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他的人来自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从天主教徒到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方法不拘一格，既有社会学的，也有宗教神学的；有心理学的，也有传记学的；有存在哲学的，也有实证论的；有现象学的，也有语言学的……这使卡夫卡的作品更加多彩多姿，深邃难测，从而为其多义性、多重解释性的特征获得了科学依据，并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内涵。

卡夫卡的原始资料主要存放于英国牛津。勃罗德死后，一部分资料由他的妻子I·E·霍弗掌握，可惜她于1986年把它卖给了一家拍卖行，曾引起学术界的愤懑。80年代以来，由卡夫卡的一位外甥女授权，G·诺伊曼教授、J·波尔恩教授、M·帕斯莱教授等五位德、英学者联手合作，利用牛津的资料，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卡夫卡著作的校勘工作，出版了校勘本。这个版本纠正了旧版本中的某些疏漏，并标出了被作者删去或涂改过的段落和字句，可以看到卡夫卡在创作过程中的各种动机（motiv）和想法，为进一步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是国际卡夫卡学术界近年来的一个重大进展。当然从专家角度看，新版本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读者对西方现代文学包括卡夫卡的接触比较晚。60年代中期出了一本《〈审判〉及其他小说》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那只有少数专业人员有机会看到。70年代末，随着我国开放时期的到来，卡夫卡和其他许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终于获得我国的“签证”，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卡夫卡，无论他的“文格”还是“人格”都受到我国读者的充分肯定和看重。17年来，各报刊、出版社争相发表和出版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评论。现在我国已有卡夫卡著作的译本十余种，传记四种，评论几十篇，专著——显少一些——两种。这些读物在我国问世，对我国文学观念和审美习惯的更新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如果说，西方读者对卡夫卡的“热”度已趋于稳定，那么我国读者仍在剧增。我国德语文学界的卡夫卡研究也在迅速取得进展，已开始走向世界，并有学者参加关于卡夫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其发言受到与会者注意。正是根据这一形势，河北教育出版社在计划出版

《世界文豪书系》的时候，卡夫卡成了入选的重点对象之一。应该社之约，笔者欣然与之合作，负责卡夫卡全集中文版的编纂工作。

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数量不算多，共约三百余万字。但作为一位业余作家，特别是作为一位多年疾患在身、年寿夭折的业余作家，这个数量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事实上，卡夫卡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他的业余时间已经利用到极限——不，超过了极限，就是说都是用必要的休息和睡眠时间换来的。而且每个字都是在灵魂深处饱浸了作者心血后进发出来的，因此这些文字“水分”很少。

这些文字的构成有个特点：想象性文字，即属于通常概念“创作”的作品如小说，比例不高，仅占三分之一，而书信却占了总数的一半略强，其中情书又占了书信的一半以上。但卡夫卡的书信不能等闲视之，它们都是卡夫卡思想和情感的真实流露，具有很高的文学性。特别像《致父亲》这封超级长信，不啻是一篇杰出的政论。还有他的情书，尤其是《致密伦娜情书》，也是非常出色的抒情散文。至于他的日记、笔记、随笔、箴言等，也都是用生命写成的，都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学价值。

提到卡夫卡的书信，我们有个幸运：卡夫卡的家书即那本《卡夫卡致家属和奥特拉》中的晚年部分有好多空缺，这部分散佚信件直到1986年才在布拉格被发现，但迟迟未见出版。去年春天，卡夫卡全集译稿即将截稿，正准备写几句向读者表示遗憾的话，这时突然收到一位德国友人给我寄来的一本小书，打开一看，正是这部分空缺的信件，不啻是“及时雨”！这样，卡夫卡的家书终于以近乎完璧的面貌与读者见了面。这位寄书的德国朋友叫韦伯夫人，与她相识15年来，她经常关心我的卡夫卡研究，随时注意这方面的信息，有时主动给我寄书来，使我获益匪浅。趁此机会，向韦伯夫人表示敬意和谢忱。

这部全集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斯·勃罗德的版本翻译和编纂的。但勃罗德编的文集是以单行本的面貌出现的，有的篇幅很少，如《致父亲》，也算一集，反之亦然，如《致菲莉斯》，800多页，并且不分顺序。根据国内外通行的惯例，我们的这部翻译的全集由笔者作了重新编排，以各集的篇幅不太悬殊为原则，或分或合，恰好归纳成九集。其中，古斯塔夫·雅诺施的《卡夫卡谈话录》（一译《卡夫卡对我说》）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不无争议。但根据马克斯·勃罗德的鉴定，内容是可信的，故作为卡夫卡作品的一部分一并编入。短篇小说集主要是根据保尔·拉贝编的版

本编纂的，但作了较大的调整，编者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和散页笔记中抽出一些短篇或超短篇小说补充进去，这样使读者对卡夫卡短篇小说的全貌有个较完整的了解，特别是对他的大量的“超短篇”小说有个较深的印象。（卡夫卡堪称“超短篇小说”或“微型小说”的鼻祖！）全集中每一卷或每部作品都加了前言，有些地方根据情况由译者或编者名义增添了一些注释。

上述校勘本出版的时候，本全集的组译工作早已完成，有的译者已交了译稿，故改换版本已不可能。这多少有些遗憾。但笔者认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老版本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作为中国第一部卡夫卡全集，老版本很能给人一种历史感。

这部全集是在忙里偷闲情况下编成的，部分译文不够成熟。而这篇序言更是在国外考察、东奔西跑、没带资料卡片情况下写成的，粗浅更可想见，谨向读者表示歉意。

1996年春于伯尔尼—斯图加特

[1]见《当他向我走来》第73页，瓦根巴哈出版社，1995年版。

[2]关于语言的改变，这有一个背景：在19、20世纪相交时期，西方知识界开始出现所谓“语言危机”。许多人感到传统语言束缚人们的思想，不能充分表达人的思考和感受，那时人们要求“用心来思考”，而既存的语言“一说话就失灵”（卡夫卡的朋友韦尔夫语）。尼采、盖奥尔格、霍夫曼斯塔尔、黑塞等人都慨叹过这个问题。卡夫卡更经常抱怨所写非所思，以为自己写的是“射出去的箭，结果却成了对准自己的矛”。因此“我的力气再也不够我写成一个句子”（1910年12月日记，载《卡夫卡日记》德文版34页）。甚至“许多句子把我撕得粉碎”。（1910年12月致勃罗德信，载《卡夫卡书信集》德文版第85页）这些话当然都是夸张的说法。卡夫卡在一生的努力中确实改变了许多语言习惯，如他把非逻辑语言或怪诞的语句结构带进语言，有时整页整页用一个标点符号等等，为的是追求一种当下情境的完美表达，不过他的作品基本上还是按照传统的语法规则写成的。

[3]指加缪于1942年写的《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一文，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见《轰动事件》第六辑第336至337页，法兰克福/美茵，1963

年版。

[5]见之于马克思《资本论》第六章的初稿，转引自《新德意志报》文化周刊《星期日》1963年第31期。

[6]这是著名卡夫卡研究专家瓦尔特·索克尔的看法，见索克尔《文学的表现主义》第282页，慕尼黑，195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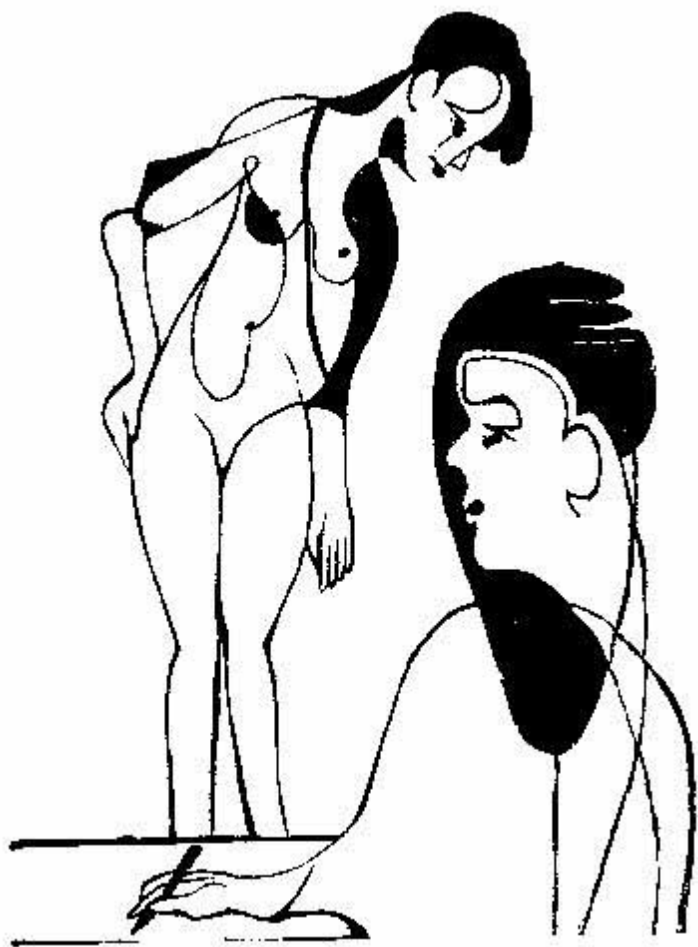
[7]这是他晚年写的一篇“超短篇”小说的题目。

[8]库尔特·沃尔夫：《作者卡夫卡》，载《卡夫卡回忆录》第99页，瓦根巴哈出版社，柏林，1995年版。

[9]《当卡夫卡向我走来……》第73页，瓦根巴哈出版社，柏林，1995年版。

短篇小说

洪天富 叶廷芳 译



《短篇小说》根据保尔·拉贝的《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和马克斯·勃罗德的《乡村婚事》重编。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法兰克福/美茵，1977，1980

Die Erzählungen, wieder Herausgegeben nach der Ausgabe von Paul Raabe»Sämtliche Erzählungen«und der Ausgabe von M.Brod »Hochzeitsvorbereitung auf dem Lande«,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77 und 1980

编者前言

短篇小说在卡夫卡的创作生涯中居于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作者生前首先是以短篇小说名世的（尽管范围不大），而且他本人每每有得意之感：或者在他的作品里标上献给某某亲属或情人的字样，或者在友人面前满怀激情地进行朗诵，甚至到了晚年，在他决心要把他的所有著作“统统付之一炬”的时候，仍有五六个短篇使他留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不同凡响的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作为西方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地位。如果说，他的长篇小说在十分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现代人类根本性的尴尬处境，那么，他的短篇小说则在极为强烈的程度上表现了某些现代人的特殊境况。与此同时，他成功地找到了一种与这种表现内容相适应的崭新的艺术语言，从而刷新了西方小说美学的面貌，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卡夫卡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对自己的作品艺术上的要求极为严格，每次发表作品几乎都要经过马克斯·勃罗德的“强求硬讨”，因此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并不多，先后只出版了7个薄薄的小册子，其中3个是短篇小说集，即《观察》（1912年，共18篇）、《乡村医生》（1917年，共14篇）和《饥饿艺术家》（1924年，共4篇），总共是36篇，绝大多数篇幅都很小。其他作为单行本出版的4个单篇是：《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刑营》（一译《在流放地》）等，都是重头作品。《司炉》原是长篇小说《失踪者》（又名《美国》）的第一章，作者生前相当看重这篇作品，特地将它从中抽出单独发表。此外，短篇集《乡村医生》中有两篇也是作者自己从别的长、短篇小说中抽出收入该集的，即《在法的门前》（摘自《诉讼》）和《一道圣旨》（摘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国外的选家们依然尊重作者的态度，编选集子时都单独保留。这里也照惯例行事。另有《铁桶骑士》等4篇已问世作品没有被作者收入任何集子。这样卡夫卡生前发表过的小说一共是44篇。

卡夫卡生前没有发表的短篇作品绝大部分都见之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和其他笔记本以及散页篇什中。国外收得最多的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当推德国保尔·拉贝编纂的《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共收78篇，除上述44篇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从这些本子中选的。但拉贝的这部短篇“全

集”其实并不算全，卡夫卡有许多堪称精彩的短篇和超短篇被他忽视了。而这些篇幅短小（有的短小到只有64个字）的短篇和超短篇（不妨称之为“微型小说”）恰恰是卡夫卡短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它们继承了德国文学史上克莱斯特、黑贝尔等人有名的“轶事风格”的优良传统，又加以发扬。这是公认的。

为了使读者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有更全面的了解和领略，编者这里又从上述各种笔记本和散页文字中“借”来48篇短小作品作为“微型小说”单独成辑，其中600字以下者约有36篇，堪称超短篇，包括拉贝选本中的9篇超短篇。在国外所有的卡夫卡短篇小说选本中，尚没见过从这一角度着眼的版本。这可以说是本卷的一个特色。

卡夫卡偶尔也把他的作品写在日记本里，如本卷的《乡村的诱惑》和《回忆卡尔达铁路》就分别记在1914年6月11日和8月15日的日记里。《乡村的诱惑》是后来《城堡》的试笔。它与《乡村婚事》（即《乡村婚礼准备》）一样，就其结构和规模看是长篇的架势，严格讲是不能算作短篇的，但苦于不好“安置”，又因其篇幅较短或不太长，只得让这卷短篇集来“收编”了。

因此，我们的这卷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就篇数而论，比拉贝的所谓“全集”要多出40篇，共达119篇。

真正的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是很难产生的，因为卡夫卡的许多短篇速记，其小说与杂文的界线已经被选家们弄模糊了，例如被拉贝选入小说集的《关于法律问题》（本卷也照收了），说它是政论又未尝不可。而像这类作品，见之于马克斯·勃罗德编纂的《乡村婚事》一书中还有不少。这就只好尊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原则了。

叶廷芳

第一辑 生前问世之作^[1]

洪天富 等译

观察

编者附记：这一组小品共16篇，长短不一，长则三千字，短则百把字；写作时间也不一，早则1903年，晚则1911年；风格也不一。总的说它们属于卡夫卡创作早期的试作。但它们已经不同程度地初露了卡夫卡特色的端倪，甚至总题目也带有当时正在兴起的表现主义的主张：弃观看（sehen），凭观察（betrachten）。该作初版于1912年11月，这是卡夫卡最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也是他的创作进入鼎盛期的前奏。

公路上的孩子们^[2]

我听见马车驶过花园的栅栏，有时，我也看到它们穿过树叶上那些微微飘动的缺口。在炎热的夏天，车上的木制轮辐和辕杆叽叽嘎嘎地响个不停！从地里干活归来的劳动农民欢声笑语，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坐在我的小秋千上，正在我父母花园里的林间休息。

栅栏外面，来往的行人和车辆络绎不绝。此刻，孩子们正奔跑着经过这里；运粮用的马车满载着禾把，在它们的上面和四周坐着男男女女，当马车经过的时候，花坛顿时变暗；傍晚时分，我看到一位绅士拿着手杖在慢慢散步，几位姑娘互相挽着臂向他迎了过来，她们向他致敬，然后走进路旁的草地。

这时，鸟儿像喷雾似地飞起，我用目光追随着它们，看它们一口气向上飞去，直到我不再觉得它们在向上飞，而是我在降落，于是，由于懦弱，我紧紧抓住秋千绳索，开始轻轻悠荡。不久，我便更加用力地打秋千，此时，凉风习习，飞鸟已经归巢，满天闪烁着星星。

我在烛光下吃晚饭。我常把双臂放在木板上，因为我已经累了，同时咬一口奶油面包。那些网眼密布的窗帘被暖风吹得鼓起来了，有时候，窗外某个过路人会用双手把它们抓住，以便更清楚地看到我，也好

跟我说话。通常，蜡烛很快就熄灭，在暗色的烛烟中，聚集在一起的蚊子还乱飞了一阵。要是有人从窗外问我，我便仔细地打量他，仿佛凝视一座远山或者一片空地，而他对回答也不怎么感到兴趣。

然而，要是有人翻过窗子的栏杆，报告说其他的人已经在门外，那我就得起床，当然是长吁短叹。

“这不行，你干吗这样长吁短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遇到了一种特殊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不幸？难道我们再也无法从中恢复过来吗？一切都真的完了吗？”

一切都是好好的。我们跑到了房子前面。“谢天谢地，你们总算在这里！”“你就是总是迟到！”“为什么这样说我？”“就是要这样说你，要是你不想来，你就待在家里吧！”“饶我这一回吧！”“怎么？饶你这一回？你说些什么？”

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忘记了白天与黑夜。很快，我们背心上的纽扣就像牙齿一样地彼此摩擦；不久，我们拉开一定的距离奔跑，口干舌燥，就像是些热带动物。我们像古代战争里的骑士^[3]，一会儿踏着沉重的脚步，一会儿高高地跳起来，我们并肩冲下那条短胡同，凭借两条腿的这一冲力，一直跑到了公路上。个别人走进了公路排水沟，他们刚一消失在那阴暗的斜坡后面，就又像陌生人一样站在上面的田间小路上，并且朝下面看。

“你们下来吧！”“你们先上来吧！”“你们休想把我们上面推下来，这点我们还明白。”“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想说，你们害怕了。来吧，来吧！”“真的要我们来？你们？正是你们想把我们推下去吗？你们想得倒美，但能成吗？”

我们开始进攻，胸部被推，然后自愿地躺倒在公路排水沟的草丛里。一切都是和谐和暖烘烘的，在草丛里，我们既感觉不到燥热，也感觉不到寒冷，只是感到疲乏。要是向右侧翻过身，把一只手枕在耳朵下面，你就会昏昏欲睡。你虽然想抬起下巴再次振作起来，但只会掉入更深的沟里。要是你把一只胳膊横着向前伸，把双腿斜着伸进吹动着的风里，那你就会遭风袭击，肯定会跌入一个更深的沟。而你绝不想就此罢休。

你可以在最后这个沟里尽量伸开四肢，特别是把膝盖伸平，好好地

睡上一觉，但你几乎还没有想到这点，而是像个病人似的仰面躺着，摆出要哭的样子。有时，一个男孩两肘贴腰，从斜坡上跳到公路上，他那黑糊糊的鞋底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这时，我们眨巴着眼睛。

月亮已升起老高，月光下有一辆邮政马车驶过。到处刮起了微风，在沟里也能感觉到它，附近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这时，没有人再想独自待在沟里了。

“你们在哪儿呢？”“上这儿来吧！”“大家集合！”“你干吗躲起来，别胡闹了！”“你们不知道邮政马车已经过去了吗？”“哎，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吗？”“当然，你睡着的时候，它就开过去了。”“我睡着了吗？没有这回事！”“别说了，我们可是看到你睡着了。”“这怎么可能呢？”“你们跟我来吧！”

我们跑拢在一起，有些人相互搀着手，因为是向下跑，所以头无法高昂起来。有人大声呼喊印第安人的战斗口号。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我们跳跃时，风儿托住髋部把我们举起。任何事情也无法阻止我们前进；我们拼命奔跑，以至超过了别人，得以交叉着双臂，不慌不忙地向四周张望。

我们在山涧小桥上停了下来；那些越过小桥继续朝前跑的人，又跑了回来。桥下的流水拍击着溪石和树根，仿佛天色还早。大家不约而同地跳到小桥的栏杆上。

在远处丛林的后面，驶出了一列火车，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当然，玻璃窗都放了下来。我们其中的一个开始唱起了流行小调，可我们大家全都想唱。我们唱得比列车行进还要快，因为我们的声音不够响亮，我们便挥动起手臂，我们挤在一起放声歌唱，感到非常愉快。当你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混合起来，你就感到像是被一只鱼钩钩住一样。

我们就这样唱着，身后是丛林，唱给远方的旅客们听。大人们还在村里守护，母亲们在为晚间整理床铺。

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我吻了吻站在我身旁的人，和另外三个靠近我的人握手告别，开始跑回家去，没有人喊我回来。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他们再也见不到我——我拐了弯，沿着田间小路又跑进了丛林。我向南方的那座城市奋力奔去，关于这座城市，我们村里的人这样谈论过：

“那儿的人真怪！你们想想看，他们从来不睡觉！”

“他们到底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他们不会感到累。”

“他们为何不会感到累？”

“因为他们是个傻瓜。”

“难道傻瓜不会感到累吗？”

“傻瓜怎么会感到累呢！”

洪天富 译

揭穿拙劣的骗子^[4]

终于，在晚上10点钟左右，我和一个从前跟我只有一面之交的人来到了那幢富丽堂皇的房子前面，应邀参加在里面举行的晚会，这次，他是意外地与我做伴，缠着我在大街小巷里转悠了两小时之久。

“好啦！”我说道，一面鼓掌，表示我坚决要跟他告别。我已经作了几次不太明显的告别尝试。我早就精疲力竭了。

“您马上就要上去吗？”他问。我听到他嘴里发出一种类似牙齿相互敲打的噪声。

“是的。”

我可是受人邀请的，我一碰见他，便把此事告诉了他。但是，我是应邀走到上面去的，我早就希望能进到这幢房子里，而不是应邀站到下面的大门口，从面对我站着的这个人的耳朵望过去。可是现在，我还得和他默不做声地站在一起，仿佛我们决心长久地待在这个地方。与此同时，我们四周的房屋立刻加入到这种沉默之中，还有房屋上空的黑暗，一直到天上的星星。看不见的散步者的脚步声，至于他们往哪儿走，我们不想猜出，那一再吹打着对面街道的风，还有冲着某间房子紧闭的窗子唱着的留声机——所有这一切，你都能从这沉默中听到，仿佛它们向来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下去。

我的同伴先是以自己的名义，然后，他微笑了一下，也以我的名义，默认了这一切，他顺着墙伸出他的右臂，闭起了双眼，把他的脸贴在伸出的右臂上。

可是，我不再把这种微笑整个地看完，因为由于羞愧，我突然感到很伤心。正是从这种微笑，我认出他是一个专门欺骗农民的骗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毕竟在这座城市里待了好几个月，曾以为完全了解这些骗子，知道他们在夜间从横街里走出来，伸出手像旅店主一样向我们迎来；知道他们此时就站在附近的广告柱周围闲荡，像是在玩捉迷藏，同时至少用一只眼睛，从圆形的广告柱后面，探头探脑地刺探情报；知道他们在各个十字路口，趁我们害怕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站到我们所走的人行道的边上！我毕竟很了解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在这些小酒店里最先结识的城里的熟人，多亏他们，我才初步认识到那种顽强的求生意志，它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现在，我很难将它从人间清除，就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已经开始感到了它。即便你早就逃离他们，即便早就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攫取，他们依旧站在你的对面！他们既不坐下，也不倒下，而是用目光死死地盯住你，尽管这目光从远处射来，但它总是充满了自信！而他们的手段总是相同的：他们站到我们跟前，尽量分开两腿；力图阻止我们去到我们渴望去的地方；为了取代我们的住所，为我们准备好了他们心目中的住宅，而当我们心里凝聚已久的感情终于奋起反抗的时候，他们便把它当做一种拥抱，头朝前地朝它扑了过来。

这一次，我和我的同伴长久地待在一起，才使我有可能识破这些故技。我把指尖放到一起，用力地搓着，以便抹去这一耻辱。

我的同伴仍然像从前那样靠在那里，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骗子，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不由得双颊上泛起红晕。

“总算认清你了！”我说道，还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然后，我奔上楼梯，楼上接待室里仆人们那几张无缘无故地显得真诚的脸，使我像得到一件美好而意外的礼物一样感到高兴。我依次看了看他们大家，他们脱下了我的大衣，掸去了我靴子上的灰尘。

我舒了口气，尽量伸展了一下四肢，然后步入了客厅。

突然外出散步 [5]

当你看来终于下了决心，在晚上待在家里；当你在晚饭后穿上便服，坐在点着灯的桌旁，从事某件工作或某种游戏，完成后出于习惯上床；当户外天气阴雨寒冷，理所当然地，你只好待在家里；当你一直在桌旁久久地保持不动，以致出外会引起大家的惊讶；当楼梯间早已一片漆黑，住房大门业已关闭；当你不顾这一切，突然感到不舒服而站起来，换下便服，立即穿上外出穿的衣服，解释说你必须出门一趟，简短的告别之后，你也这样做了，你迅速地砰的一声关上住房门，或多或少给人留下了不快；当你又一次走在街上，用特别灵活的四肢报答你为它们弄到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自由；当你由于这一决定，感到自己内心蕴藏着全部的决断能力；当你比平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你的力量的确大于你的需要，凭借这大于需要的力量，你将轻而易举地引起和轻松地愉快地忍受极其迅速的变化；当你带着这种心情，向那些长长的街道跑去，——那么，在这个晚上，你彻底地走出了你的家庭，它正化为乌有，而你自己呢，非常结实，由于轮廓清晰而显得黑黑的，你拍打着大腿，昂首阔步地前进，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

要是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探望一位朋友，查看一下他的身体情况，这还会增强上述一切的印象。

洪天富 译

下定决心 [6]

把自己从一种恶劣的处境中挣脱出来，只要自己乐于用力去做，想必轻而易举。我挣脱了安乐椅，围绕着那张桌子跑，活动一下头和脖子，让眼睛闪闪发光，把它们周围的肌肉绷紧。要控制住感情，要是甲现在来看我，就热烈地欢迎他；要是乙在我的房间里，就友好地对待他；要是在丙家里，就把他所说的一切大口大口地吸进肚里，尽管会感到费力和痛苦。

但是，尽管我这样去做，整个事情，轻而易举的和困难重重的事情，也将因为每个无法避免的错误而中止，于是，我将不得不回到我原来的圈子里转悠。

所以，最好的办法依旧是：忍耐一切，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

随波逐流，切莫让人哄骗，做出不必要的举动，用动物的眼光观察别人，也不要感到后悔，总之，要用自己的手压住幽灵般的生活中还剩下的东西，也就是说，要继续扩大那最后的、像坟墓一般的安宁，除此之外，什么也别让存留下来。

在这种状况下的特有的动作，便是用一只小指擦一擦眉毛。

洪天富 译

山间远足 [7]

“我不知道。”我悄悄地喊道，“我的确不知道。如果没有人来，那就谁也不会来。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我，但谁也不愿帮助我。尽是些无名小卒。但这并不要紧。只是眼下谁也不帮助我，——否则的话，无名小卒也能顶用。我很想——为什么不呢——同一群无名小卒进行一次远足。当然是到山里去，难道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瞧，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相互挤着，这种许许多多横着伸出去挽在一起的手臂，这许许多多分开几步的脚！当然，他们全都穿着燕尾服。我们勉强地走着，风吹过我们四肢之间的空隙。在山里，我们的脖子不再受到约束！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歌唱。”

洪天富 译

单身汉的不幸 [8]

看来，单身汉的日子真不好过，年老的时候，如果他想同大伙儿一起共度黄昏，就得请求人家接纳他，同时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生病的时候，只能从自己床铺所在的角落一连数星期注视着空荡荡的房间；总是在住房大门口向落日告别，从未伴着自己的妻子挤上楼梯；自己的房间里只有几扇侧门通向别家；用一只手端着晚饭，并把它带回家；不得不赞叹别人家的孩子们，而且有时不让再说：“我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在外表和举止上，得向年轻时记得的一个或两个单身汉学习。

将来还会是这样的，的确，不但是今天，而且在往后，他将独自站在那里，带着一副身躯，一颗真实的脑袋，还有一个前额，那是为了用手在上面捶打。

杂货商^[9]

可能会有一些人同情我，但我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我的小商店让我忧心忡忡，搞得我的前额和太阳穴疼痛不堪，但是没有任何让我感到称心的希望，因为我做的是小本生意。

我得提前几小时做出各种决定，例如，吩咐勤杂工事事都要加以注意，还得告诫他不要犯以往那些可怕的错误，至于我呢，我得在本季度里就要考虑到下一季度的热门货，不是我圈子里的那些人所需要的热门货，而是乡下那些落落寡合的人所需要的流行商品。

我的钱在别人的手里；我并不清楚他们的情况；他们可能会遭到的不幸，我也毫无所知；我怎么能防止它呢！也许他们已经过着挥霍的生活，正在一家酒店的花园里开庆祝会，而另一些人 also 来参加这次庆祝会，但只是把它当做逃往美国途中的短暂停留。

每天傍晚，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便锁上店门，突然发现我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我将不会去做任何事情以满足我业务上永无止境的需求，于是，在早上被我事先打发到远处的我的激动心情，像一股回落的潮水，在我心里翻腾，而且势不可挡，将我漫无目的地卷走。

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利用这种心情，只想走回家去，因为我的脸和双手全是汗水，龋龋不堪，我的衣服污渍斑斑，满是灰尘，工作帽还戴在头上，靴子被板条箱上的钉子划破了。我就像是在波浪上行走，把两只手的手指弹得格格作响，还摸了摸朝我走来的孩子们的头发。

然而，路程太短。我马上就到了家，打开电梯门，走了进去。

我发现，我此刻突然独自在电梯里。其他的人得爬楼梯，而且爬得有点累，不得不气喘吁吁地等着，直到有人来给他们打开住房的门，在这期间，他们当然有理由生气和急躁，此时，他们来到住宅的穿堂，把帽子挂到那儿的衣帽钩上，然后穿过有几扇玻璃门的走廊，走进自己的房间，他们也成了孤独的人。

但是，我一进电梯就成了孤独的人，我跪了下来，凝视那面狭窄的

镜子。当电梯开始上升的时候，我说：

“你们安静一下吧，你们往后退吧，你们想到树阴里，窗帘的后面，或者走进拱形的凉亭吗？”

我咬牙切齿地说。电梯外面的那些楼梯扶手，就像往下泻的水一样，顺着电梯上的毛玻璃窗滑了下去。

“你们飞走吧，但愿你们那些我从未见过的翅膀把你们带进乡间的山谷，或者带到你们想去的巴黎。

当游行的队伍从所有三条街走来，你们就凭窗享受一下这壮观的场面吧。它们互不相让，弄得乱糟糟的，直到最后的队伍走来，在它们之间又才出现空旷的广场。挥动手巾吧，感到吃惊吧，受感动吧，赞美那位驱车路过的漂亮的女士吧。

凭借木桥越过溪流，向正在洗澡的孩子们点头打招呼吧，赞叹成千上万的水兵在遥远的装甲战舰上发出的乌拉声吧。

跟踪那个不显眼的人吧，要是你们把他推进设有大门的通道，就动手抢他，然后，你们当中的每个人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目送着这个悲伤的人走进左边的胡同里。

骑着快马向四处散开的警察，勒住了他们的马，逼着你们往后退，随他们去吧，我知道，这些空荡荡的胡同将会使他们倒霉。我求你们成双搭对地离开，求你们飞快地离开这些广场，慢慢地转过街角。”

于是，我得走出电梯，让它再降下去，然后按了按门铃，女仆打开了门，我问候了她。

洪天富 译

心不在焉地向外眺望^[10]

在眼下正在迅速降临的这些春日里，我们将做些什么呢？今天清早，天空灰蒙蒙的，可是，如果你现在走到窗子旁边，你就会大吃一惊，并把你的面颊靠到窗子的把手上。

在窗子下面，你看到显然已经开始下沉的太阳把自己的光投射到那

个天真无邪的姑娘的脸上，她不慌不忙地走着，不时回头看看，与此同时，你还看到一个男子在她身后快步赶来，用自己的影子遮住她的脸。

然后，这男子从她身旁走了过去，于是，这女孩的脸庞又重新明亮起来。

洪天富 译

归途 [11]

瞧，雷雨过后，空气的说服力有多大！我的功劳显而易见，令我陶醉，我无须否认这一点。

我迈步前进，我的速度就是侧面的这条胡同、这条胡同和这个市区的速度。理所当然，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无论是对敲门、捶击桌面、祝酒词，还是对床上、新建筑物脚手架上、紧挨房墙的黑胡同里、乃至妓院无靠背矮沙发上的对对情侣，我都负有责任。

我把我的过去和我的未来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都非常好，不能说哪一方面更好，我得加以指责的，只是对我十分有利的天意的不公正。

只是当我走进我的房间的时候，不免若有所思，可是在上楼梯的时候，我似乎没有发现某种值得思索的东西。我把窗子完全打开，听到某家的花园里还演奏着音乐，但这对我都无济于事。

洪天富 译

过路人 [12]

当我们在夜间散步，正穿过一条胡同的时候，老远看见一个人——因为我们眼前的这条胡同向上伸展，而且正是月圆的时候——朝我们跑来，这时，我们千万不要抓住他，即使他身体虚弱、衣衫褴褛，即使他身后有人呼喊着重来，也不要管他，而是让他继续往前跑。

因为这是黑夜，对我们眼前这条在满月照耀下向上伸展的胡同，我们没有过错；此外，这两个人也许是追着玩的，或者说不定他俩正在追逐第三者，也可能第一个人是无辜的，但受到追逐，也可能是第二个人想杀害他，要是我们抓住他，很可能就会成为参与谋杀的罪犯，也许这

两个人彼此并不认识，只是各自跑回家去睡觉，也许他们是夜游者，也许第一个人还带有凶器。

总而言之，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感到疲乏吗？我们不是喝了好多的葡萄酒吗？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第二个人已经跑远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

洪天富 译

乘客

我站在电车供乘客上下的平台上，考虑到我在这个世界、这座城市以及我的家庭中的地位，我竟一时感到完全不知所措。我还可以郑重其事地指出，我能否在某个方面有权提出某些要求。我甚至无法为以下一些事情辩护：例如，我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平台上，抓住这个皮圈，让这辆电车把我载着走，为什么人们要给电车让路，或者静静地走，或者伫立在橱窗的前面。的确，谁也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不过，这无关紧要。

电车渐渐驶近一个停车站，一位姑娘走近梯级，准备下车。我觉得她眉目清秀，仿佛我刚才还摸过她。她身穿黑色的衣服，裙褶几乎纹丝不动，短上衣紧贴着身子，衣领是用网眼小的白色花边做成的。她的左手平直地放在电车的内壁上，右手里的伞搁在从上往下数的第二级梯级上。她的脸呈褐色，鼻子不停地上下翕动，以致两侧的肌肉有点儿紧张。她有许多棕色的头发，一小绺细发在右鬓角上随风飘动。她的小耳朵紧贴着脸，因为我就站在她的附近，所以能够看到她整个的右耳廓，还能看到右耳根部的阴影。

这时，我不禁自问：她怎么对自身不感到惊奇呢？她干吗要紧闭双唇，一句这样的话也不说呢？

洪天富 译

衣服^[13]

我常常看到一些满是皱褶和垂悬物的衣服，它们披在好看的身体上，显得格外漂亮，于是我就在想，它们不会老是这样光彩夺目，而是会生褶儿，再也无法熨平，它们会染上灰尘，这灰尘在这些装饰物里积

得厚厚的，再也无法去除，而且谁也不愿意每天穿上同一件珍贵的衣服，早穿晚脱，以免使自己显得寒酸和可笑。

然而，我也看到一些姑娘，她们的确长得漂亮，露出多种多样诱人的肌肉和骨节，还有丰满光滑的皮肤和浓浓的细发，但她们每天总是穿着那套落落大方的乔装衣服露面，总是把同一副脸蛋支撑在同一双手掌里，让她们的镜子反射出自己的容貌。

只是在某些晚上，当她们从某个庆祝会迟迟归来的时候，她们身上的衣服在镜中才显得破旧、膨胀和满是灰尘，已经被所有的人看到，而且几乎再也不能穿用了。

洪天富 译

拒绝^[14]

如果我遇到一位漂亮的姑娘，并且求她：“劳驾，请跟我来吧”，而她却默不做声地走了过去，那么，她的意思是：

“你既不是威名远扬的伯爵，也不是有着印第安人体格的宽肩阔背的美国人，后者有一双大胆而冷静的眼睛，还有那被草地的空气和流经草地的河流按摩过的皮肤；而你呢，既没有到过那些大江大海，也没有到过那些我一时讲不出的地方。所以，请问，我，一个美丽的姑娘，为什么该跟你走呢？”

“你忘记了，没有汽车会带着你长时间地颠簸着穿过高低不平的小巷；我没看到有绅士们追随在你身后，他们紧缩在自己的衣服里，在你身后形成一个半圆走着，为你喃喃地说着祝福的话语；你的胸部因为有了紧身的胸衣而显得很整齐，可是你的大腿和臀部却显得放荡不羁；你穿着一件饰有细条子折裥的塔夫绸连衣裙，在去年秋天，它使我们大家非常高兴，然而你偶尔还在微笑——这身体上的致命伤。”

“是的，我们两个都说得对，但是，为了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并非是不可辩驳的，我们不妨各自回家吧，你说对吗？”

洪天富 译

为男骑手们考虑^[15]

要是考虑一下的话，你绝不会蠢蠢欲动，希望在一场赛跑中成为最佳骑手。

作为国内最佳骑手受到承认，这份荣誉当然会使你感到无比的高兴，乐队开始演奏，为你祝贺，但是在第二天的早上，你就会感到后悔。

我们的对手是些奸诈和颇有影响的人。当我们骑马穿过狭窄的围栏，朝平坦的跑道疾驰而去的时候，他们充满了忌妒，而我们却感到痛苦。这是因为，我们前面的跑道上，除了少数被我们超过一圈的骑手正气馁地朝地平线的边缘冲去以外，很快就空无一人。

我们的许多朋友正忙着对中奖的彩票，只是从遥远的银行窗口扭过头来向我欢呼；而我们那些最要好的朋友却根本不把赌注压到我们的马上，因为他们担心，要是我们输了，他们定会生我们的气，可是现在，我们的马名列第一，而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转过脸，宁可沿着看台望过去。

落在我们后面的那些竞争者，稳稳地坐在马鞍上，试图展望他们所遭到的不幸，以及他们突然遭受到的冤屈；他们满面春风，精神焕发，仿佛一场新的比赛就要开始，仿佛在这场儿童游戏之后，一场认真的比赛就要开始。

许多女士觉得这个胜利者滑稽可笑，因为他自吹自擂，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无休止的握手、致敬、鞠躬和遥祝，而失败者们却紧闭双唇，漫不经心地拍一拍他们那些经常嘶鸣的的马的脖子。

终于，早已阴霾密布的天空开始下雨了。

洪天富 译

临街的窗户 [16]

谁孤独地生活，却有时想和别人交朋友；谁考虑到日时、气候、职业情况以及诸如此类的变化，却随随便便地想看到任何一只他可以抓住的手臂——那么，没有一扇临街的窗户，他是难以坚持下去的。而他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他根本什么也不寻求，不过是感到厌倦的人，让自己的目光在民众和天空之间上下地移动，他走到自己窗子的栏杆旁边，但

他什么也不想做，只是把头微微向后仰，所以，下面的马匹得以把他拉下去，拉进马匹身后的车子和喧哗之中，从而也把他拉进人世间的和睦之中。

洪天富 译

希望成为印第安人^[17]

但愿你成为一名印第安人，这样，你就会乐意骑在奔跑的马上，在空中斜着身子，越来越短促地战栗着驰过颤抖的大地的上空，直至你丢开马刺。因为在你扔掉缰绳之前，并没有马刺，因为实际上并没有缰绳，当你刚刚看到你眼前的土地是一片割得光光的草原的时候，却早已看不见马脖子和马头了。

洪天富 译

树^[18]

因为我们就像是雪中的树干。表面上看，它们平放着，只要轻轻地一推，就可把它们移开。不，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们牢牢地和大地联结在一起。不过，你要知道，即使那样也仅仅是个外表。

洪天富 译

不幸^[19]

当天气已经变得难以忍受的时候——那是11月里的一天晚上，临近黄昏的时候——我在我房间里像是跑道一样的窄地毯上跑着，由于看到胡同里的灯亮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便重新转过身子，可是，在房间的深处，在镜子的底部，我又发现一个新的目标，不禁大声叫了起来，不过，只是为了听我喊叫，它没有任何反响，也没有遇到任何使它失去力量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它在上升，没有停止，即使它静了下来，也不会停止。就在这时，墙上的门迅速地打开了，因为毕竟需要迅速，就连下面石子路上拉大车的马匹也扬起头来，像战场上变野的马匹一样，大声嘶叫起来。

一个就像小小的幽灵的孩子，从那尚未点灯、因而漆黑一团的走廊

里钻了出来，踮着脚尖站在微微晃动的大方木料做成的地板上。我房间里微弱的灯光顿时使他目眩，他正想迅速地用双手遮住脸，却意外地朝窗子看了一眼，使自己安静下来，在十字形的窗棂前面，街灯袅袅上升的烟雾终于被黑暗笼罩住。他站在开着的房门前面，用右肘倚着房墙，让外面的气流从四面八方抚摩他的脚关节、脖子和太阳穴。

我朝他看了看，然后说了声“你好”，一面从炉前的护热板上拿过我的外套，因为我不想半裸着身子站在那里。我把嘴张开了一会儿，以便把激动从嘴里排遣出去。我嘴里不是滋味，脸上的眼睫毛不停地颤动，一句话，我什么也不缺，缺少的恰恰是这孩子突如其来的拜访。

这孩子依然原地不动地站在墙边，右手紧紧贴在墙上，两颊绯红，似乎对这堵表面粗糙、刷成白色、并且擦伤他指尖的墙百看不厌。我说：“您真的愿意到我这儿来吗？您没有弄错吧？在这幢大楼里是挺容易搞错的。我叫某某，住在四楼。我是您要找的人吗？”

“别做声，别做声！”这孩子回过头说，“我一点儿也没有搞错。”

“那么，就进屋来吧，我想把门关上。”

“我刚才已把门关上。别费心了，您尽管放心好了。”

“谈不上什么费心。不过，在这个走廊里住着许多人，当然，他们全都是我的熟人；大多数人这时正下了班回来；如果他们听到有人在房间里讲话，他们当然认为有权打开门，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这已经是他们的习惯。这些人干完了一天的工作，在这临时获得的晚间的空闲时间里，他们决不会听命于任何人！此外，您也是知道这点的。让我把门关上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怎么啦？就我来说，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可以进来。况且我曾说过：我已经把门关上，难道您认为，只有您才可以关门吗？我甚至用钥匙把门锁上。”

“那就好。更多的我就不想说了。其实，您根本用不着锁门的。现在，既然您已经来了，那就请随便坐吧。您是我的客人。您可以完全信赖我。请随便吧，用不着害怕。我既不会强迫您留在这里，也不会把您赶走。我非得告诉您这些话不可吗？您真的不了解我吗？”

“不。您的确不该说这些话。还有，您根本不应该说这些话。我是个孩子，您干吗跟我这样客气？”

“这没什么关系。当然，是个孩子。可不算很小吧。您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您是女孩子，您千万不可把您和我关在一间屋子里。”

“我们不必为此事担忧。我只想说：我很了解您，您保护不了我，您用不着当我的面说这些假话。然而，您却一味恭维我。别这样，我求您，别这样。此外，我并非时时处处都了解您，尤其是在这片黑暗中。要是您让人把灯打开，这兴许会更好一些。不，宁肯不要打开。无论如何，我将记住，您一直都在恐吓我。”

“什么？我一直都在恐吓您？千万别这样说。我非常高兴，您终于在这里。我说‘终于’，是因为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真不理解，您为何这么晚到我这儿来。也许，当您来的时候，我由于高兴，胡言乱语了一阵，而您恰恰是这样理解我的意思的。不错，我十倍地承认，我是这样说过的，不错，我用您所希望的一切威胁了您。——天呀，千万别吵架！——可是，您怎么会认为我当面对您撒谎呢？您怎么能这样伤害我的感情呢？您干吗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您和我待在一起的这短暂的时间呢？一个陌生人也许比您更加和蔼可亲。”

“这我相信，这并不是什么大智大慧。我生来就跟您非常亲近，一个陌生人哪能跟我相提并论呢。这您也知道，何必为此忧伤呢？告诉我，您是不是想要花招，是的话，我马上就走。”

“真的吗？您也敢对我说这样的话吗？您未免有些太放肆了。说到底，您毕竟在我的房间里。您像疯了似的在我的墙上擦您的手指。我的房间，我的墙！此外，您所说的话，不仅厚颜无耻，而且滑稽可笑。您刚才说，您的天性迫使您以这种方式跟我说话。真是这样吗？您的天性迫使您这样做吗？有这样的天性，真好。您的天性也就是我的天性，如果我生来就友好地对待您，那您也应该友好地对待我。”

“这叫友好吗？”

“我说的是从前。”

“您知道，我往后会是什么样的人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

接着，我朝床头柜走去，点燃了上面的蜡烛。在那个时候，我房间里既没有煤气，也没有电灯。然后，我在床头柜旁坐了一会儿，直到我对它感到厌倦，于是，我穿上大衣，从长沙发上拿起帽子，吹灭了蜡烛。走出去时，我被沙发的一只腿绊住。

在楼梯上，我碰见了住在同一层楼的一位房客。

“又要出去吗，您这小子？”他问道，伸开双腿，站在两个梯级上。

“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说，“我刚刚在我的房间里碰见一个鬼。”

“您说这话时很不高兴，就像在汤里发现了一根头发。”

“您在开玩笑。不过请您记住，一个鬼就是一个鬼。”

“完全正确。不过，要是根本就不相信有鬼，那会怎样呢？”

“您真的认为，我会相信鬼吗？可是，我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呢？”

“很简单。假如有一个鬼真的到您这儿来，您同样无须感到害怕。”

“不错，但是毕竟是次要的恐惧。真正的恐惧是对幽灵出现的原因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是持久的。我此时心里感到的，恰恰是这种超乎寻常的恐惧。”由于紧张不安，我开始搜遍我所有的口袋。

“可是，既然您对幽灵本身并不感到害怕，您本该能够不慌不忙地打听一下它的原因的！”

“您显然还从未跟幽灵说过话。从它们那里，您是永远无法得到明确的答复的。它们只会讲来讲去，但毫无结果。看来，这些幽灵比我们更加怀疑它们自己的存在，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它们本身就很羸弱。”

“可是，我曾经听说，人们可以喂养它们。”

“这方面您消息倒很灵通。是可以喂养它们。可有谁会去干呢？”

“为什么没有人去干呢？譬如说，假如这是一个女鬼。”他说，一边

跃上更高一级梯级。

“啊，原来是这样，”我说，“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值得。”

我静心地想了想。我的这位熟人已爬得老高，为了看到我，他不得不在楼梯间的拱顶下面躬身向前。“尽管这样，”我抬头喊道，“如果您在上面夺走了我的鬼，那我们之间就一刀两断，永远一刀两断。”

“哎呀，我不过开开玩笑而已。”他说，一面把头缩了回去。

“那么好吧。”我说。要是在平时，现在我倒真的能够到外面安静地散步了。可是，由于我感到格外孤独，我宁愿走上楼去，然后躺下睡觉。

洪天富 译

判决^[20]

献给费丽丝·鲍^[21]小姐的故事

在最美好的春季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坐在二层楼自己的房间里，他的住所是沿河一长溜构造简易的低矮的房屋中的一座，这些房屋几乎只是在高度和颜色上有所区别。他刚写完一封信给居住在国外的青年时代的朋友，漫不经心地将信装进信封，然后双肘撑在书桌上，凝望窗外的小河、桥梁和对岸淡绿的小山冈。

他寻思着他的这位朋友如何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内的前程，几年以前当真逃到俄国去了。现在他在彼得堡经营一家商店，开始时买卖兴旺，但长久以来生意显然清淡，他归国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每逢归国来访时总要这样抱怨一番。他就这样在国外徒劳无益地苦心经营着，外国式的络腮胡子并不能完全遮盖住他那张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很熟悉的脸庞，他的皮肤蜡黄，看来好像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正在发展。据他自己说，他从来不和那儿的本国侨民来往，同俄国人的家庭也几乎没有什么社交联系，并且准备独身一辈子了。

对于这样一个显然误入歧途、只能替他惋惜而不能给予帮助的人，在信里该写些什么呢？或许应该劝他回国，在家乡定居，恢复同所有旧日友好的关系，——这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此外还要信赖朋友们的帮

助？但是这样做不就等于告诉他，他迄今为止的努力都已经成为泡影，他最终必须放弃这一切努力，回到祖国，让人们瞪大眼睛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这不就等于告诉他，只有他的朋友才明白事理，而他只是个大孩子，必须听从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的话去行事。你愈是爱护他，却愈加会伤害他的感情。更何况使他蒙受这一切痛苦烦恼，是否就一定有什么意义呢？也许，要他回国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他自己说过，他已经不了解家乡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将不顾一切地继续留在异乡客地，而朋友们的规劝又伤了他的心，使他和朋友们更加疏远一层。如果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回归祖国，而在国内又感到抑郁——当然不是故意这样，而是由于事实所造成的——既不能和朋友相处，又不能没有他们，他会抱愧终日，而且当真觉得不再有自己的祖国和朋友了，那倒不如听凭他继续留在外国，岂不更好吗？考虑到这些情况，怎能设想他回来后一定会前程似锦呢？

鉴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要和他继续保持通信联系的话，就不能像对一个即便是远在天涯的熟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把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这位朋友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回国了，他的解释完全是敷衍文章，说是俄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容不得一个小商人离开，哪怕是短暂的几天都不行。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成百上千的俄国人却安闲地在世界各地旅行。但是，恰恰对于格奥尔格自己来说，在这三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格奥尔格的母亲去世，——那是大约两年前的事，从那时起，他就和父亲一起生活——他这位朋友可能得悉了噩耗，在一封来信中表示了哀悼，但是毫不动情，其原因只能是，对这种不幸事件的悲痛是身居异国的人所完全无法想象的。不过格奥尔格从那时起，以全副精力从事他的商业以及所有别的事情。也许是他的母亲在世时，他的父亲在经营上独断独行，阻碍了他真正按自己的主意行事；也许是他的母亲过世后，他的父亲虽然还在商行里工作，但已经比较淡泊，不再事必躬亲；也许是鸿运高照，意外侥幸，——很可能就是如此——不管怎么说，这两年来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

可是格奥尔格的这位朋友对这种变化却一无所知。先前，最后一次也许就在那封吊唁信里，他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且详述了格奥尔格家若在彼得堡设分号，前景将如何如何。他所列的数字同格奥尔格现在所经营的范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可是格奥尔格一直不愿意把自己商业上的成就写信告诉这位朋友，假如他现在再回过头来告诉他，

那当真会令人惊讶的。

所以格奥尔格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始终仅限于写些无关紧要的、一如人们在安闲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杂乱地堆积在记忆中的琐事。他所希望的只是不要打扰他的朋友，让他保持自己在出国后的长时期里所形成的对于故乡的看法，并以此来安慰自己。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格奥尔格在三封隔开相当长时间的信中，接连三次把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和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结果完全违背了格奥尔格的意图，这位朋友竟开始对这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兴趣。

格奥尔格却宁可在信中同他谈这类事情，而不愿承认他自己在一个月前已经同一位富家小姐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订了婚。他常常和未婚妻谈起这位朋友，以及他们在通信中这种特殊的情形。“那么他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然而，我是有权利认识你所有的朋友的。”“我不想打扰他，”格奥尔格回答说，“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可能会来的，至少我认为他要来的，但他会感到非常勉强，自尊心受到损害，也许他会忌妒我，而且一定会不满意，可是又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只好孤独地再次出国。孤独——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的，难道他不会通过另外的途径获悉我们结婚的消息吗？”“这个我当然不能阻止，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太可能的。”“既然你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格奥尔格，你就根本不应该订婚。”“是的，这是我们俩的过错；不过我现在不愿意再改变主意了。”她在他的亲吻下尽管气喘吁吁，却还说道：“不管怎样，我总觉得挺生气的。”这时，他真的认为，如果他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也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正应该这样来认识我。”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无法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这种人也许比我更适宜于承担同他的友谊。”

事实上，他在这个星期天上午写的这封长信中，已经把他订婚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信里这样写道：“我把最好的消息留到最后才写。我已经和一位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是你出国以后很久才迁居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你可能不会认识。将来反正还有机会告诉你关于我未婚妻的详细情况，今天我只想说，我非常幸福；你我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这一点上起了变化：你现在有了我这样一个幸福的朋友，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了。此外，我的未婚妻——她嘱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不久还会自己写信给你的——也将成为你的真诚的女友，这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不会是无所谓的吧。我知道，以

往你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来看我们，难道我的婚礼不正是一次可以扫除一切障碍的极好的机会吗？但是，不管怎样，你还是不要考虑太多，而只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吧。”

格奥尔格手里拿着这封信在书桌前坐了很久，把脸转向窗户。有一个过路的熟人从小巷里跟他打招呼，他正想得出神而在微笑，刚好作为对人家的回礼。

他终于把信放入口袋，走出房间，穿过狭小的过道来到对面他父亲的房间里，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过来了。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到他父亲的房间里去，因为他在商行里经常同父亲见面，他们又同时在一个餐厅用午餐，晚上虽然各干各的，可是除非格奥尔格出去会朋友——这倒是常事，或者如现在这样去看望未婚妻——他们总要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坐上一会儿，各人看自己的报纸。

格奥尔格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在这个晴朗的上午，他父亲的房间还是那样阴暗。矗立在狭窄庭院另一边的高墙投下了这般的阴影。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装饰着格奥尔格亡母的各种各样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把报纸举在眼前的一侧，以弥补一只眼睛视力的不足。桌子上放着剩下的早餐，看来他并没有吃多少。

“啊，格奥尔格！”父亲说着就站起来迎上去。走动时他的厚厚的睡衣敞开了，下摆在身体的周围飘动。“我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魁伟的人。”格奥尔格心里说。

“这里黑得真受不了。”他接下去说。

“是的，确实是很黑。”父亲回答。

“那你还把窗户关着？”

“我喜欢这样。”

“外面已经很暖和了。”格奥尔格说，好像是接着前面那句话，随后坐了下来。

他父亲把早餐的杯盘收拾起来，放进一个柜子里去。

“我只是要告诉你，”格奥尔格接着说，他茫然地望着老人的动

作，“我写了一封寄彼得堡的信宣布我订婚的事。”他把信从口袋中抽出一点儿，然后又放了回去。

“为什么要写信到彼得堡去？”父亲问。

“告诉我在那儿的朋友。”格奥尔格说着，用目光追寻他父亲的眼睛。“在商行里他可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想，“瞧现在他劈开两腿坐在这里，双臂在胸前交叉着。”

“哦，告诉你的朋友了？”父亲以特别强调的口吻说道。

“父亲，你知道，我一开始并不想把订婚的事告诉他。这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情况，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寻思，他也会从别处获悉我订婚的消息，——这我可无法阻止——虽然他离群索居，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但是他反正决不会从我自己这里知道这件事情。”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父亲问道，一边把大张的报纸放到窗台上，把眼镜放在报纸上，并用一只手捂住了眼镜。

“是的，现在我已经仔细考虑了。我想，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那么我的幸福的婚约对他讲来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因此我不再犹豫，一定要把这事通知他。可是在我发信之前，我先把这件事告诉你。”

“格奥尔格，”父亲说，撇了一下牙齿都已脱落了的嘴，“听我说！你是为这件事到我这里来想要同我商量，毫无疑问你这样做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把全部事情的真相告诉我，这等于什么也没说，甚至比不说更令人恼火。我不愿意提到与此无关的事情。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已经出现了好几起很不得体的事情。也许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到了，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早一些。商行里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许并不是背着我做的——现在我可不是说这是背着我做的——我已经精力不济了，记忆力也在逐渐衰退，有许多事情我已无法顾全。这首先是自然规律，其次是你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比对你的要大得多。——但是既然我们正在谈论这件事，谈论这封信，我求你，格奥尔格，不要欺骗我。这是一件小事情，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欺骗我。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

格奥尔格非常困惑地站起来，“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个朋友也抵

不上我的父亲。你知道，我是怎样想的？你太不注意保重你自己了。年岁可不饶人。商行里的事没有你我是不可行的，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因为做生意而损坏了你的健康，那么我明天就把它永远关门。这样可不行。我们必须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并且要彻底改变。你坐在黑暗里，如果待在起居室里就有充足的阳光。你每顿早餐都吃得很少，不好好增加营养。你坐在紧闭着的窗户旁，而新鲜空气对你来说是多么需要呀。不行，父亲！我要请个医生来，我们都遵照医嘱行事。我们要把房间换一换，你搬到前面那个房间去，我搬到这儿来。你会有什么不习惯的，你的全部东西都将一起搬过去。但是办这些事要有时间，现在你要上床睡一会儿，你非常需要休息。来吧，我帮助你脱衣服，你可以看到，我会做得很好的。或者你现在就愿意到前面房间去，你可以暂时睡在我的床上。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格奥尔格紧挨着他父亲站着，他父亲白发蓬乱的头低垂到胸前。

“格奥尔格！”父亲轻声地说，身子一动也不动。

格奥尔格立刻在父亲身旁跪了下来，在父亲疲惫的脸上，他看到一对瞳孔从眼角直定定地望着他。

“你没有朋友在彼得堡。你总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连我也想愚弄。在那儿你怎么会有一个朋友呢！我根本就无法相信。”

“你再好好想一想，父亲，”格奥尔格说，一边将他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来，一边乘他父亲虚弱地站着的时候替他脱掉了睡衣，“自从上次我的朋友来看我们，到现在已快三年了。我还记得，你不是很喜欢他。至少有两次我避免让你看到他，虽然他那时正坐在我的房间里。我非常清楚你为什么对他反感，我的朋友有些怪癖。可是后来你和他就相处得很好了。你听他谈话，点着头，还提问，当时我还感到很自豪呢。如果你想一想，你一定会回忆得起来的。他当时谈了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譬如有一次，他为了营业上的事来到基辅，遇上群众骚动。他看到一个教士站在阳台上，往自己的手心里刻了一个粗粗的血淋淋的十字，还举起手来，向人群呼唤。后来你自己在某些场合还讲过这个故事呢。”

说话中间格奥尔格已经扶他父亲坐下，并且小心地替他脱掉穿在亚麻布衬裤外面的针织卫生裤，又脱掉了袜子。当看到父亲的不太清洁的

内衣时，他责怪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够。经常替父亲更换洁净的内衣，这是他应尽的责任。他还没有开口同未婚妻商量过，将来他们准备怎样安置父亲，因为他们心里早已有了这样的想法，父亲会独自留在老宅子里的。可是他现在迅速而明确地决定，要把父亲接进未来的新居。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搬进新居后再去照顾父亲，看来可能为时已经太晚了。

他把父亲抱到床上，当他向床前走这几步路的同时，他注意到父亲正在他怀里玩弄他的表链。于是产生了一种惊恐的感觉。他一时无法把父亲放到床上，因为父亲紧紧地抓住表链不放。

但是等到父亲刚在床上躺好时，看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老人自己盖上被子。还把被子盖过了肩膀，他用并非不亲切的眼光仰望着格奥尔格。

“你已经想起他了，是不是？”格奥尔格问道，愉快地向他点点头。

“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他父亲问，好像他自己无法看到，两只脚是否也盖住了。

“你躺在床上感到舒服些了吧。”格奥尔格一边说，一边把被子盖好。

“我已经盖严实了吗？”父亲又一次地问道，似乎特别急于要得到回答。

“你放心好了，你盖得很严实。”

“不！”他父亲打断了他的答话喊道，并用力将被子掀开，一刹那间被子全飞开了，接着又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他只用一只手轻巧地撑在天花板上。“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即使这只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是绰绰有余的。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他要是我的儿子倒合我的心意。因此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欺骗他。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以为我没有为他哭泣过吗？因此你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经理有事，不得打扰——就是为了你可以往俄国写那些说谎的信件。但是幸亏父亲用不着别人教他，就可以看透儿子的为人。现在你认为，你已经把他征服了，可以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而他则无法动弹，因为我的儿子大人已经决定结婚了！”

格奥尔格抬头望着他父亲这一副骇人的模样。父亲突然之间如此了解这位身居彼得堡的朋友，而这位朋友的景况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打动过格奥尔格。他看见他落魄在辽阔的俄罗斯。他看见他站在被抢劫一空的商店门前。他正站在破损的货架、捣碎的货品和坍塌的煤气管中间。他为什么非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呢！

“你看着我！”父亲喊道。几乎是心不在焉的格奥尔格奔向床前，准备忍受一切，但是在中途他又站住了。

“因为她撩起了裙子，”父亲开始用甜丝丝的声音说道，“因为她这样地撩起了裙子，这个讨厌的蠢丫头，”为了做出那种样子，他高高地撩起了他的衬衣，让人看到了战争年代留在他大腿上的伤疤，“因为她这样地、这样地、这样地撩起了裙子，你就和她接近，就这样你毫无妨碍地在她身上得到了满足，你可耻地糟蹋了我们对你母亲的怀念，你出卖了朋友，你把你父亲按倒在床上，不叫他动弹。可是他到底能动还是不能动呢？”

说完他放下撑着天花板的手站着，两只脚还踢来踢去。他由于自己能洞察一切而面露喜色。

格奥尔格站在一个角上，尽可能地离他父亲远一点。长久以来他就已下定决心，要非常仔细地观察一切，以免被任何一个从后面来的或从上面来的间接的打击而弄得惊慌失措。现在他又记起了这个早就忘记了的决定，随后他又忘记了它，就像一个人把一根很短的线穿过一个针眼似的。

“但是你的朋友毕竟没有被你出卖！”他的父亲喊道，一面摆动食指以加强语气，“我是他在这里的代表。”

“你真是个滑稽演员！”格奥尔格忍不住也喊了起来，但立刻认识到他闯下了祸，并咬住舌头，不过已经太晚了，他两眼发直，由于咬疼了舌头而弯下身来。

“是的，我当然是在演滑稽戏！滑稽戏！多好的说法！一个老鳏夫还能有什么别的安慰呢？你说——你只要马上回答我，你还是我的活着的儿子——除此以外我还剩下什么呢？我住在背阴的房间里，已经老朽不堪，周围的一批职工又是那样的不忠实。而我的儿子却欢乐地走遍全世界，因为我已经做了准备，他就很容易把生意做成，兴高采烈，忘乎所

以，俨然摆出一个高尚的人那种冰冷的面孔，走过他父亲的跟前！你以为我不曾爱过你这个我亲生的儿子吗？”

“现在他的身子将往前弯曲了，”格奥尔格想道，“要是他倒下来摔坏了怎么办！”这句话在他的头脑中一闪而过。

他父亲向前弯曲身子，不曾摔倒。他又伸直了身子，因为格奥尔格没有如他希望的走近他。

“站在你那里别动，我不需要你！你在想，你还有力量走到我这里来，只因为你不愿意过来才站在那里不动。你别搞错了！我还是要比你强得多。如果单靠我一个人也许我不得不退缩，但是你的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已经和你的朋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你的顾客的名单也都在我的口袋里！”

“他甚至连衬衣也有口袋！”格奥尔格寻思道，并且相信，他如果把这些谈话公之于世，就会使父亲不再受人尊敬。他也只是在一刹那间想到这些，因为他不断地又把一切都忘记了。

“挽着你的未婚妻走到我的跟前来吧！我会让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将她从你的身边赶走的！”

格奥尔格做了一个鬼脸，仿佛他不相信这些。他父亲只是朝格奥尔格待着的角落点点头，表示他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今天你真使我非常快活，你跑来问我，要不要把你订婚的消息写信告诉你的朋友。他什么都知道了，你这个傻小子，他什么都知道了！我一直在给他写信，因为你忘了拿走我的笔。因此他这几年就一直没有来我们这里，他什么都知道，比你自已还清楚一百倍呢，他左手拿着你的信，连读也不读就揉成了一团，右手则拿着我的信，读了又读！”

他兴奋得把手臂举过头顶来回挥动。“他什么都知道，比你清楚一千倍！”他喊道。

“一万倍！”格奥尔格说这话本来是想嘲笑他父亲的，但是这话在他嘴里还没说出来时就变了语调，变得非常严肃认真。

“这些年来我一直注意着，等你来问这个问题！你以为，我关心的是其他的事吗？你以为，我在看报纸吗？你瞧！”说着，他扔给格奥尔格一

张报纸，这张报纸是他随便带上床的。这是一张旧报，它的名字格奥尔格是完全不知道的。

“你打定主意之前，犹豫的时间可真不短啊！先得等你母亲死了，不让她经历你的大喜日子；你的朋友在俄国快要完了，早在三年以前他就已经十分潦倒；至于我呢，也到了你现在眼见的这副样子。你不是有眼无珠，我是怎么个状况你是看得见的嘛！”

“这样说来你一直在暗中监视我！”格奥尔格喊道。

他父亲替他遗憾地随口说道：“你可能早就想说这句话了。现在这么说可就完全不合适了。”

接着，他又大声地说：“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

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父亲在他身后倒在床上的声音还一直在他耳中回响。他急忙冲下楼梯，仿佛那不是一级级阶梯而是一块倾斜的平面。他出其不意地撞上了正走上楼来预备收拾房间的女佣人。“我主耶稣！”女佣人喊道，并用围裙遮住自己的脸，可是，格奥尔格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跃出大门，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他已经像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悬空吊着，就像一个优秀体操运动员；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父母曾因他有此特长而引为自豪。他那双越来越无力的手还抓着栏杆不放，他从栏杆中间看到驶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它的噪声可以很容易盖过他落水的声音。于是，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说完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

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驶过。

孙坤荣 译

司炉 [22]

十六岁的卡尔·罗斯曼，受了家里一个女仆的引诱，和她生了一个孩子，因而被他可怜的父母逐出家门，送往美国。当他乘坐的船只徐徐驶

入纽约港时，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那早已被他察觉到的自由女神雕像，它矗立在突然强烈起来的阳光下，持剑的手臂仿佛刚刚伸出来一样，高高地伸向天空，阵阵自由之风在他的身躯周围轻轻吹拂。

“好高呀！”卡尔自言自语地说。他甚至还没有想到下船的事，便被从他身旁经过的行李搬运夫汇成的那股人流慢慢地推到了甲板的栏杆旁。

一个他在旅途中结识的年轻人走过他身旁时说道：“喂，您还不想下船吗？”“不，这就走。”卡尔说着向他莞尔一笑，由于高兴得忘乎所以，也由于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便把自己的箱子扛到肩上。可是，正当他目送那个轻轻地摆动手杖的熟人随同他人一道离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雨伞给忘在船舱里了。他马上叫住这个年轻的朋友，求他照看一下自己的箱子，可这个年轻人看上去似乎不怎么乐意。卡尔再次向四周看了一下，以便回来时能找到归路，随即便匆匆地离开了。可是，下了船舱，事不凑巧，他发现一条本可以缩短不少路的过道被堵死了，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条过道被挡住呢，也许是由于全体乘客都已经出了船舱的缘故。这下子，他不得不穿过众多的小房间，下了一道接一道的矮楼梯，经过老是要拐弯的走廊，又穿过一个其中孤零零地摆放着一张写字台的空房间，费力地寻找着自己的路，因为这条路他只走过一两次，而且总是同好多人结伴而行的。他终于晕头转向，完全迷了路。他感到茫然失措，又看不见一个人影，只听到自己头顶上成千只脚不断发出的擦地而过的声响，以及机器最后转动时发出的一种喘息的声音。这时，就在他徘徊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对着一扇小房门敲了起来。

“门开着哩。”屋里有人喊道。卡尔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并打开了门。“您干吗这样发疯似的敲门？”一个彪形大汉问道，勉强地朝卡尔看了一眼。透过一扇天窗，一束混浊的、被上面的烟雾和灰尘弄得昏暗不堪的光线落进这间凄凉的机舱。在这简陋的机舱里，摆放着一张床，一只柜子，一张沙发椅，再就是那个男子，就像一件挨一件堆放着的货物。“我迷了路，”卡尔说，“在旅途中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是一条大得吓人的船。”“可不是，您说得一点不错。”这大汉有些自豪地说，同时在一个小行李箱的锁上摆弄着，他不停地用两只手压小箱子上的锁，像医生给病人叩诊那样，听锁簧扣入的声响。“您倒是进来嘛！”大汉继续说，“别站在门外！”“我不会打扰您吧？”卡尔问道。“嘿，哪儿的话！”“您是德国人吗？”卡尔为了弄清对方的身份，再次问道，因为他曾

听说过好几起初到美国的人横遭不测的事情，尤其是爱尔兰人爱干这种坏事。“是的，是的。”这人回答说。卡尔仍犹豫不前。于是，这大汉突然抓住门把，连门带人朝他自己拉过去，然后猛地把门关上。“我可受不了别人从过道里朝我张望，”这人说道，同时继续摆弄他那只箱子，“打这儿过的人，总是探头朝里张望，真叫人受不了！”“可现在走道里空空的。”卡尔说，局促不安地紧挨床柱子站着。“不错，现在是没有人。”大汉说道。“我说的就是现在嘛，”卡尔心里这样想着，“同这人说话真够难。”“您躺到床上去吧，那儿地方大点。”大汉说道。卡尔想纵身跳上床去，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只好爬进床去，一边哈哈大笑自己的无能。他刚爬到床上，便失声叫了起来：“天哪，我把我的箱子给忘了！”“它到底在哪儿？”“上面甲板上，由一个熟人照看着。可他叫什么来着？”卡尔从他母亲为他出远门缝在上衣里子上的一个暗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包姆，弗兰茨·布特包姆。”“您急需这只箱子吗？”“当然。”“是啊，那您干吗把它交给一个陌生人呢？”“我把雨伞忘在下面的船舱里了，所以回来取，但又不愿随身拖着这只箱子。后来我迷了路。”“就您一个人吗？没有旅伴？”“就我一个人。”“也许可以求他帮帮忙，”卡尔的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眼下我到哪里去找比他更好的朋友呢？”“可现在您连箱子也丢失了，雨伞的事情就更甭提了。”大汉坐到了沙发椅上，似乎对卡尔的事情产生了几分兴趣。“但是我相信，那只箱子还不至于丢失。”“有信念的人是非常幸福的，”这人说，一边用力地搔着他那黑而密的短发，“在船上生活，换一个码头，就换一种风尚。要是在汉堡的话，您那位布特包姆也许还能帮您照看那只箱子，可是在此地，多半连人带箱子都找不着了。”“这么说，我得赶紧上去瞧瞧。”卡尔说着环顾四周，看自己怎样才能出去。“您给我待在这儿吧。”这人说道，并用手顶住卡尔的胸口，粗鲁地将他推回床上。“到底为什么？”卡尔恼火地问道。“因为上去毫无意义，”这人说道，“过一会儿我也走，咱俩一起上去。行李箱要么已被偷走，找也无济于事；要么那人把它丢在原处没动，等旅客统统上岸后，反倒更容易找到它。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您的那把雨伞。”“您熟悉这艘船吗？”卡尔怀疑地问，船撤空以后更容易找到他的失物，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他觉得，事情的确有些棘手。“我可是船上的司炉。”那大汉说道。“您是司炉！”卡尔高兴地叫了起来，似乎这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用胳膊肘支撑着，仔细端详面前这个大汉。“就在我同那个斯洛伐克人睡觉的舱房前面，装有一扇天窗，透过它可以看到机器房。”“不错，我就在那儿干活。”司炉说。“我一向对技术感兴趣，”卡尔按着自己原有的思路说道，“假若我不是非来美国

不可的话，今后我肯定能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您干吗非去美国不可呢？”“噢，甭提了！”卡尔说道，并挥手做了一个不提往事的手势，一边微笑着瞧着司炉，似乎是在请求对方谅解自己不便说的苦衷。“总有原因的。”司炉说道，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要卡尔讲出原因来呢，还是不必道出，的确难以捉摸。“现在我也可以去当司炉了，”卡尔说，“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父母现在反正管不着了。”“我的位子就要空出来了。”司炉说道。他对此确信不疑，并将双手插进裤袋，把穿着起皱的、似皮革的铁灰色裤子的双腿搁到床上展一下。这一来，卡尔只得再往墙壁那边挪动身子。“您要离开这条船吗？”“是的，我今天就开路。”“究竟为什么？您不喜欢司炉这一职业吗？”“是的，这是环境造成的。我做出这样的抉择，并非总是出于我个人的好恶。不过您说的也对，我也不喜欢当司炉。您恐怕也不是真想当司炉吧！但是，如果您真的想当司炉，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所以，我坚决劝您别干这一行。假若您打算在欧洲学习的话，那您为何不在这儿学习呢？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可强多了，简直无法相比。”“有这种可能，”卡尔说，“可我几乎没钱上大学。我过去虽然读到过，有那么一个人，白天在一家商店里干活，夜里上学，直到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记得，他甚至还当上了市长，但是，这需要有很强的毅力，对不对？我怕我缺乏这样的毅力。另外，我的功课不是特别好，对我来说，同学校告别，心情确并不那么沉重。这儿的学校也许更加严格。我几乎不会英语。再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对外来的人怀有偏见。”“这个您也听说了？这就好。这下咱们就合得来啦！您瞧，咱们是在一条德国船上，这条船是汉堡—美国航运公司的，可船上的人员为什么不是清一色的德国人？为什么总机械师却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名叫舒巴尔。简直没法相信。这个无赖竟然在一条德国船上虐待我们德国人！您千万不要认为，”他上气不接下气，摆了一下手，又往下说，“我是为诉苦而诉苦。我知道，跟您说没什么用，您自己也是个穷小子。但这家伙实在欺人太甚！”他一次次地用拳头敲击桌子，而且敲打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拳头。“我不知在多少船上干过活，”他一口气连续列举出二十条船名，卡尔完全被他的言谈和举动弄糊涂了——“我干得很出色，受过夸奖，是个合船长们口味的工人，我甚至在同一艘商船上连续干了好几年。”——他站起身来，仿佛这段时间是他一生的顶峰——“可是在这条船上，一切都得循规蹈矩，不需要幽默打趣，在这里，我是个废物，总碍舒巴尔的事，我是个懒虫，只配让人赶出去，靠别人的恩赐才挣得一份工资。这一切您弄得懂吗？我可搞不懂。”“那您可不能忍气吞声哪！”卡尔激动地说。他开始时觉得自己在一条船上，在一个陌生的大陆

的海岸，举目无亲，很不安全，但他现在几乎不再有这种感觉了，此时此地，他待在司炉的床上，犹如置身于自己的家乡。“您去找过船长没有？您找他讲过道理没有？”“呸，您走吧，您趁早走吧。我不希望您待在这儿。您根本没有注意听我讲话，倒给我出了这些主意。我干吗要去找船长！”司炉又颓然坐下，两手捂住了脸。

“我还能给他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呢？”卡尔自言自语地说。他终于感到，与其在这儿为司炉出这些被认为是愚不可及的主意，倒不如去取自己的箱子好。他的父亲把这只箱子交给他时，曾经开玩笑地问道：“你能把这只箱子保存多久？”可现在呢，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真的给丢失了。唯一的安慰是，即使父亲追问起来，也不可能知道他目前的处境。除非与他一起乘船到纽约来，这样，船上的乘客还能告诉他。卡尔感到可惜的是，箱子里的东西还没有动用过，尽管他的汗衫早就需要更换了。这就是说，不该省的地方他倒是省了。而现在，才刚刚开始自己的生涯，需要穿干净衣服出场的时候，却不得不穿着肮脏的衬衫去同别人打交道。不然的话，丢失这只箱子，也许就不那么糟糕了，因为他穿在身上的这套西服要比箱子里那套好，箱子里的那一套本来只是临时应急时穿的，就在卡尔动身出发前不久，母亲还不得不把它缝补了一下。现在，他还想到，行李箱里还有一段意大利维罗纳熏肠，那是他母亲特地放在里面的。旅途中他毫无胃口，只吃掉很少一点，况且船舱里分发的汤食也已足够他吃的了。现在，他多么希望自己手里有这么一段香肠，可以奉送给这位司炉。因为像司炉这样的人是很容易笼络的，只要塞给他点小东西，就能把他争取过来，这一点卡尔还是从他父亲那儿知道的，他父亲就是用分送雪茄烟的手腕，把他在生意上要与之打交道的所有低级职员统统笼络了过来。眼下，卡尔可以送人的就只有他随身带着的一些钱了，万一他的箱子真的丢失了，他还不想动用这些钱，他的念头又转回到箱子上来，他现在实在弄不懂，要是这只箱子就这样轻易地让别人拿走，那他在旅途中何苦这样小心地看守着它呢？为了这只箱子他几乎好几个夜晚未曾合眼。他回想起船上的那五个夜晚，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怀疑睡在他左边隔两个铺位的一个矮小的斯洛伐克人在打他那只箱子的主意。这个斯洛伐克人一直在窥伺时机，只等卡尔精疲力竭，终于打起盹来的那一刹那，便用他在白天不停地耍弄或者练习的一根长竿把箱子钩过去。白天，这个斯洛伐克人看上去天真无邪，可是一到夜里，他就不时地从铺位上坐起身子来，愁眉苦脸地朝卡尔的箱子看。这举动卡尔看得一清二楚，因为这里那里总有某个人怀着移民的不安心理，点亮一盏小灯——尽管按照船上的规定是禁止这样做的——试图辨认移民

局的令人费解的移民指南。如果近处有这样的一盏小灯，卡尔就可以闭上一会儿眼睛；若火光在远处，或漆黑一团，他就得睁大着眼睛。这种紧张状态使他精疲力竭。现在看来，这种努力完全白费了。这个布特包姆，要是有一天在什么地方撞见他的话，哼！

就在这时，外面较远的地方响起了阵阵短促的打击声，打破了先前的一片寂静。这声音像是孩子们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竟变成了男子们节奏平稳的行军脚步声。这些男子显然排成一行走着，在狭窄的过道里当然只能这样，此外，还可以听到有如武器碰击发出的叮当声。卡尔早就忘了箱子和斯洛伐克人给他带来的烦恼，此时正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觉，突然，他被这意外的声音惊醒了，他推了推司炉，提醒他注意，因为这一队里打头的那个正好走到门口。“这是船上的乐队，”司炉说，“他们在上面演奏完了，现在去收拾行李。现在我们可以走了。跟我来吧！”他抓住卡尔的手，就在最后的一刹那，他还将挂在床上方墙上的一帧镶在镜框里的圣母像取下来，塞进自己前胸的口袋里，拎起他自己的箱子，拽着卡尔，匆匆离开了那个小房间。

“我现在就去办公室，向那些先生们说说我的意见。现在旅客都已下船了，用不着有所顾忌了。”这个意思司炉用不同的话重复了几次。正走着的时候，一只耗子在他前面横穿而过，他横跨一步想踩住它，却把来不及钻进洞去的耗子一脚踢进了洞里。一般地说，他的动作缓慢了一些，虽说他有一双长腿，但它们毕竟太笨重了。

他们穿过厨房的一间屋子，那儿有几个穿着肮脏围裙的姑娘——她们是故意把围裙溅脏的——在一只大圆桶里清洗餐具。司炉把一个名叫莉娜的姑娘叫到身边，用手臂搂着她的腰，一同走了一小段路，这姑娘也不停地卖弄风情，紧紧依偎在他的胳膊上。“现在发工资，你愿意一起去吗？”他问道。“干吗我要费这个心事，替我把钱捎来就得了。”她回答道，挣脱开他的手臂，抽身跑开了。“你到底在什么地方碰上了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她高声嚷道，但是并不要对方回答。在场的姑娘们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放声笑了起来。

他俩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扇门前，门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三角楣饰，由一些镀金的小女像柱支撑着。就一艘轮船的内部装饰而言，是相当奢华的。卡尔记得，他从未到过这个地方。这地方大概是行船期间为头等和二等舱的乘客准备的。此时，在全船大扫除之前，那些隔门已被人卸了下来。他们也确实遇到了几个男人，这些人肩上扛着扫帚，还跟

司炉打招呼呢，卡尔见到这么多人在忙碌，不禁吃了一惊；待在统舱里的他，自然所知甚少。过道上布着的电线，还可以听到一只铃在不停地响。

司炉毕恭毕敬地敲了敲门，当里面有人喊了声“进来”时，他打了个手势，示意卡尔别害怕，只管进去。卡尔也跟了进去，但是一进门就停住脚步。他从这个房间的三扇窗子望了出去，看到了大海的波浪，它们一起一伏，欢快异常，看到这一场面，他的心也突突地跳个不停，仿佛他五天以来还没把大海看够似的。大船来来往往，穿梭不停，并且只是在自身重量允许的范围内对海浪的冲击做一点退让。如果眯缝着眼睛看去，这些船似乎纯粹由于自身的重量而摇晃颠簸。桅杆上挂着的狭长的旗帜，船行驶时旗帜尽管绷得很直，但仍在来回飘动。响起了礼炮声，兴许是从军舰上传来的。不远处，一艘军舰平稳地向前驶去，上面的炮筒，因钢罩的反射而闪闪发光，像似在轻轻地抚摩着这些炮筒。从门口向远方望去，也可以看到一些小船和小艇，它们正成群结队地在大轮船之间驶入海口。在这片景色的后面矗立着纽约城，它那摩天大楼里数不清的窗户正凝视着卡尔。是啊，待在这间房间里，人们就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

在一张圆桌旁坐着三位先生，一位是身穿蓝色制服的海军军官，另外两位是身着黑色美国制服的港务局官员。桌上摆着高高一摞文件，那位军官，一手执笔，同时浏览各种各样的文件，然后把它们递给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时而阅读，时而做些摘要，时而把文件塞进公文包里，偶尔，那位几乎不停地用牙齿磨出小小噪声的先生口授些什么，他的同事则做着记录。

靠近窗子的一张写字台旁，背冲房门坐着一位矮小的先生，正忙着整理几本大开本的账簿，这些大的账册并排放在他眼前齐头高的一块结实的放书板上。他的身旁立着一个开着的钱柜，至少第一眼看去里面是空的。

第二扇窗下空无一人，可以从此极目远眺。第三扇窗子附近，站着两位先生，正在低声谈话。其中的一个靠在窗旁，身着船员制服，手里玩着佩剑柄。与他谈话的另一位先生则面向窗口，不时地把对方胸前挂着的一排勋章中的几个撩起来看看。此人身穿便服，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竹手杖，由于他两手叉腰，这手杖也像一把剑似的斜挂着。

卡尔来不及细看这里的一切，因为过不久就有一名侍者向他们走了过来，并轻声问司炉究竟想干什么，他那鄙夷的目光仿佛在说，司炉不配到此地来。司炉就像侍者一样轻声回答道，他想和总出纳员先生谈一谈。侍者挥了挥手，表示他本人拒绝司炉的这一请求，但仍然踮起脚，绕了一个大弯避开那张圆桌子，向正在摆弄账簿的那位先生走去。在侍者说话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先生惊呆了，但他终于转过脸来，面向希望同他谈话的司炉，然后，他挥舞着拳头，冲着司炉，同时为了保险起见，也对侍者连连摆手，表示坚决拒绝。侍者随即回到司炉身旁，用一种像是麻烦对方的声调说：“马上给我离开这房间！”

司炉听到这一回话，低头看着卡尔，仿佛卡尔是他的心，他正无声地向这颗心诉说自己的痛苦。卡尔不假思索，拔腿就跑，穿过房间，甚至轻轻地擦过那个军官坐的沙发椅。侍者弯着腰，对卡尔穷追不舍，为了抓住卡尔而张开双臂，仿佛是在追赶一只害虫，但是卡尔最先跑到总出纳员的桌子旁，用手紧抓住桌子，以防侍者把他拖开。

自然房间里顿时热闹起来。坐在桌旁的那位海军军官一跃而起，港务局的先生们冷静而留神地在一旁观望，窗口的那两位先生并排走了过来，至于侍者，眼看这些高贵的先生对屋内发生的事情表现出兴趣，觉得自己待在这里已不再合适，便往后退去。司炉站在门口，紧张地等待着需要他出来帮忙的时刻。总出纳员终于把自己坐着的有扶手和靠背的沙发椅向右转了个大圈。

卡尔从他的暗袋里掏出自己的旅行护照——他觉得，让这些人看到他的暗袋，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也不进一步做自我介绍，只是打开护照，把它放到了桌上。总出纳员似乎认为这护照无关紧要，随手用两个指头将它拾起来弹到了一边，卡尔随即把护照又塞回口袋里，仿佛这套手续已经办妥了。

“我冒昧地说几句，”卡尔开口道，“依我看，这位司炉先生受了委屈。在这儿有个叫舒巴尔的，他欺负了司炉。司炉本人已经在许多船上干过活，他可以向诸位一一报出这些船的名字，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勤快，自认为干得不错。可我确实弄不懂，为什么偏偏在这艘船上他就干不好呢？何况这艘船上的活儿并不像商船上的活儿那样繁重。所以，只能说有人在中伤他，妨碍他的晋升，使他得不到赏识，要不然，他是肯定会受到表彰的。我方才说的只是有关此事的一般情况，至于他具体受到了什么样的委屈，由他向诸位说明。”这一席话卡尔是向在场的

的先生们讲的，因为事实上他们都在注意地听，看来，在场的人当中会有一位主持公道的人，但这个人未必就是总出纳员。此外，卡尔十分机灵，避而不谈他不久前才认识司炉这件事。还有，要是卡尔没有被那位手持小竹手杖的先生的红脸搅乱了思想的话，他也许会讲得更加出色的，他从现在所站的位置上头一次瞧见这位先生涨红的脸。

“他所讲的字字句句都对。”司炉说道，虽说并没有人问他，也没有人朝他看一眼。要不是那位佩带勋章的先生明显地表示出愿意倾听司炉的意见的话，司炉的操之过急也许会铸成大错。现在，卡尔恍然大悟，此人准是船长。他伸出手，向司炉招呼道：“请您过来！”声音斩钉截铁。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司炉的举止言谈了，因为卡尔深信，正义在司炉一边。

幸好，司炉在这样的场合显得镇定自若，表明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他非常镇定地迅速从他的小箱子里掏出一束证件，像是一个笔记本，拿着它——仿佛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像是故意冷落总出纳员似的，径直走向船长，然后把他的这些证明材料摊开在窗台上。总出纳员别无他法，只好亲自出马。“这个人是个出了名的牢骚筒子，”他解释说，“他来会计室的次数比去机器房的次数还要多。他把舒巴尔这个文静的人搞得灰心丧气。您听着！”他转向司炉，“您老是纠缠不休，实在太过分了。别人多次把您从工资室赶了出去，您活该如此，我们怎能满足您所提的那些完全无理的要求呢！您多少次从那儿又跑到总会计室！人家多少次对您好言相劝，舒巴尔是您的顶头上司，您是他的下级，得甘心听他的！现在，您还趁船长在这里的时候跑过来，纠缠他，真是恬不知耻。您竟然还厚着脸皮，带来了这么个小家伙，鹦鹉学舌，充当您那些无聊的指控的代言人，在这条船上，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小子哩！”

卡尔强行克制住自己，没有向前冲出去。但这时船长已抢先一步开了腔：“我们就听听这个人讲吧！反正我觉得这个舒巴尔有问题，他越来越自作主张了，但是我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对您有所偏爱。”这后一句话是对司炉讲的，船长不可能马上替司炉撑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看来一切都很妥当。司炉开始说明自己的情况，他一开始就克制住自己，强令自己称舒巴尔为“先生”。站在总出纳员那张空无一人的写字台旁的卡尔，此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纯粹出于喜悦一再用手捺动桌上的一台邮件磅秤。——舒巴尔先生不公平！舒巴尔先生偏袒外国人！舒巴尔先生把司炉赶出机器房，让他去打厕所，这当然不是司炉干的事

情！——司炉甚至怀疑舒巴尔先生的才干，说他表面看来似乎精明干练，实际不然。司炉讲到这里时，卡尔全神贯注地瞧着船长，显得亲切可爱，仿佛船长是他的同事似的，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司炉那有些笨拙的表达方式给船长产生不利于他的影响。总而言之，司炉讲了一大堆话，但听的人还是不得要领，尽管船长始终面对着司炉，眼里流露出坚定的神色，决心听他把话讲完，可是，另外几位先生已经不耐烦了，不久，在这个房间里，司炉的声音不再独占统治地位了，这让人有几分担心。穿便服的那位先生最先表现出不耐烦，他开始用自己的小竹手杖轻轻地叩击着地板。当然，另外的几位先生也在东张西望。港务局的两位先生，显然有急务在身，便重新拿起文件，开始审阅，尽管还有点心不在焉；那位海军军官又把自己的坐椅挪近桌旁；满以为自己稳操胜券的总出纳员，出于讥讽，在一旁长吁短叹。在普遍出现的心不在焉的气氛当中，只有侍者看上去保持着注意力，他对这个受大人物摆布的可怜的汉子的不幸多少有点同情，便严肃地朝卡尔点了点头，仿佛他也想以此说明些什么。

在这同时，港口繁忙的生活景象在窗外一幕幕地不停地掠过：一艘满载堆积如山的圆桶的平板货轮——这些圆桶想必堆放得十分高明，不会产生滚动——从窗前驶过，致使室内几乎成了一片黑暗；小摩托艇，风驰电掣般地咆哮着径直朝前急驶，方向盘旁笔直地站着一个男子，双手震得直抖。现在，要是卡尔有时间的话，他会把这情景看个仔细的。小艇驶过后，从动荡的水里，时而冒出一些奇特的漂浮体，它们刚一露出水面，随即又被海水淹没，沉了下去，令看的人惊异不已。远洋轮的小艇，由水手卖力地向前划去，小艇里坐满旅客，就像是被人塞进去似的，默不做声，满怀期望地互相挤坐在一起，不过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禁不住转过头来，瞧那些变幻着的景色。这些心绪不宁的旅客的无休止的举动，传染给了束手无策的人和他们的行动！

这一切提醒人们需要抓紧时间，办事要快，说话也要简单明了。可是，司炉又怎么做的呢？他讲得满头大汗，由于双手颤抖，连窗台上的证明文件也早已捏不住了；对舒巴尔的抱怨，从四面八方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按照他的想法，只要其中的一条，就足以彻底葬送舒巴尔的前程，但是，他能向船长陈述的，仅仅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让人糊涂的东西。那位手持小竹手杖的先生早已对着天花板轻声地吹起了口哨；港务局的先生们也已经把那位军官留在他们的桌旁，看来不想再让他走开；总出纳员显然只是由于船长不动声色才没有插嘴；侍者留神地站在

一旁，时刻等候着船长发出有关司炉的命令。

这时，卡尔不能再袖手旁观。于是他慢慢向他们走去，边走边加紧考虑，如何尽可能巧妙地干预这件事情。这的确到了关键的时候，必须抓紧良机，不然的话，只需片刻工夫，他和司炉就会被他们双双赶出办公室。不错，船长可能是个好人，卡尔感到，恰恰在此时此刻，如果船长想要找个特别的理由来表明自己是个正直的上司的话，他会很好地利用这个时机，但是，船长毕竟不是别人随意利用的工具，而此时司炉恰恰把他当成了这样一种工具，当然，他是出于无比愤怒的心境才这样做的。

于是，卡尔对司炉说：“您应该讲得简单点，明白点，照您这样讲下去，船长先生是不屑听的。他知道所有的机械师和做听差的小伙子的名字，甚至教名吗？您讲出一个名字，他能马上知道您说的是谁吗？您应该把自己要说的事整理一下，先讲最重要的，然后再讲其他的，绝大部分的事情，或许压根儿没有必要对他讲。您向我讲的时候，不是很清楚的吗？”在美国既然可以偷箱子，那么也可以说谎，卡尔自我辩白地想道。

要是卡尔的这席话能帮上司炉的忙该多好啊！难道已经太迟了？司炉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时，虽然打住不往下讲了，但是，由于他男子汉的荣誉受到了侮辱，加上可怕的回忆和万分焦急的心情，泪水汩汩涌出，完全蒙住了双眼，以至看不清卡尔。他现在该如何——卡尔默默地站在此刻默不做声的司炉面前，心想——他现在该如何突然改变自己的叙述方式呢？因为司炉一方面感到，该讲的东西已经讲了，可丝毫没有得到别人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仿佛他什么也没说，因此不可能指望这些先生把他所讲的话从头到尾再仔细地听一遍。而就在此刻，卡尔，他唯一的支持者还走过来，想好好地教训他一番，但是事与愿违，卡尔给他指出的仅仅是一切都完了。

“我要是不看窗外的景物，早一点过来就好了。”卡尔自言自语道。他在司炉面前低下了头，双手拍打裤缝，表示没有任何希望了。

但是司炉误解了卡尔的意思，以为卡尔在暗暗地责怪自己，而且正打算说出这些责怪的话，便马上和卡尔吵了起来。这时，圆桌旁的先生们早已被这无谓的吵闹声激怒了，因为这吵声打扰了他们的重要工作。总出纳员逐渐对船长的耐心感到不可理解，正欲发作；侍者又完全站到

他的主子们那一边，用粗野的目光打量着司炉；那位拿着小竹手杖的先生——船长不时地亲切地朝他看看——也已经对司炉的话完全感到厌烦，他的确对司炉产生了反感，于是，他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显然在思考着其他的事情，让自己的目光在笔记本和卡尔之间来回溜动。

“我明白，我明白。”卡尔说着，努力抵挡司炉朝他发泄的滔滔不绝的话。尽管这样，在整个争吵过程中，卡尔仍向司炉友好地微笑着：“您是对的，对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由于害怕司炉挥拳向他打来，卡尔很想抓住司炉那双胡乱挥舞的手，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对方逼到墙角里去，悄悄向他讲了几句别人不该听到的安慰的话。但是司炉已失去控制，怒不可遏。卡尔甚至这样想着来安慰自己：希望司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凭着他绝望挣扎的力量去战胜在场的七个男人。他用目光示意司炉，写字台上放着一只装有多条电线按钮的瞄准器，只消用一只手按动这些电钮，就可以使全船各条过道里心怀敌意的人造起反来。

可是就在这时，那位手持竹杖、对眼前的事情漠不关心的先生朝卡尔走来，用明显超过司炉的喊叫声的语音问道：“您到底叫什么名字？”就在这当儿有人敲门了，仿佛有人站在门背后等着这位先生开口似的。侍者朝船长看了看，船长点了点头。侍者于是走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着老式帝国上衣、中等个子、身材匀称的男人，从他的外表上看，他根本不适合在机器房工作，可他确实就是——舒巴尔。要不是卡尔在所有的人——连船长也不例外——的眼睛里，看到某种满意的神情的话，那么，他会为司炉此时的那种神情大吃一惊：司炉绷直了双臂，捏紧拳头，似乎这对捏紧的拳头是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并准备为它们献出他整个的生命。现在，他所有的力量，包括使他挺立不动的力量，都凝聚在这双拳头里了。

现在，司炉的仇人就站在门口，他神情潇洒，衣着整齐，腋下夹着一个账本，可能是司炉的工资单和工作证件。他逐个地打量在场的人的眼睛，丝毫不掩饰他首先要断定每一个人的情绪。这七个人都已经是他的朋友了，因为连船长此时看上去也丝毫没有再责难舒巴尔的意思，虽说他方才还非难过他，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借口，以防司炉找他的麻烦。对待像司炉这样的人，应该更加严格，如果舒巴尔该受什么责备的话，那就是他在这段时间内未能制服司炉的倔强态度，以致这家伙今天还胆敢到船长这儿来。

现在也许还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司炉同舒巴尔在众人面前的对质，

可以起到高级法庭对质的作用，因为即使舒巴尔善于伪装，无论如何不能装到底，只要把他的恶劣行径稍许暴露一下，就足以让这些先生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卡尔想，这点他已经在做到了。卡尔毕竟了解到每位先生的机敏、弱点和脾气，就此而论，他并没白白地度过在船上的这段时间。要是司炉此时的表现好一些就行了，但是看上去他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如果人家把舒巴尔送到他面前去，司炉肯定会用拳头敲开他那可恨的脑袋。可是，司炉连朝舒巴尔走几步的能力都没有了。舒巴尔终归会来，不是他自己跑来，就是船长把他叫来，为什么这样一桩很容易料到的事情，卡尔竟然没有料到呢？为什么卡尔在来的路上没有预先同司炉讨论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而像他们实际所干的那样，毫无准备地直接进了这扇房门呢？司炉究竟还能说些什么呢？要是万一盘问起来——要能这样，当然最为有利——司炉还能不能说“是”与“不是”呢？他站在那儿，两腿叉开，膝盖在颤抖，头微略抬起，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仿佛他体内没有换气的肺似的。

卡尔却感到浑身充满力量，神志清醒，这种状况他在家也许从未有过。要是他的父母能看到他在异国、在这些有名望的人物面前主持公道，那该多好啊！即使现在他尚未取得胜利，但他已完全做好准备去夺取最后的胜利！父母会修正对他的看法吗？会让他坐在他们中间并称赞他吗？会瞧一瞧他那双如此顺从他们的眼睛吗？干吗在这种极不恰当的时候提出这些没有把握的问题呢？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相信司炉在指责我诡诈。厨房里的一位姑娘告诉我，她看到他上这儿来了。船长先生和诸位先生，我准备用我的文件，必要的时候，用没有偏见和不受影响的证人的证词，证人都在门外，来反驳对我的任何指控。”舒巴尔这样说道。这当然是一个男子汉讲的话，清清楚楚，从听者们脸上表情的变化来看，可以认为，在过了好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这才又听到了正常人的声音。他们自然没有觉察到，就连这番漂亮的话也有些漏洞。为什么舒巴尔说的第一个词是“诡诈”？也许对他的指控应该从这方面开始，而不是从他的民族偏见入手。厨房里的一个姑娘看见司炉到办公室去，而舒巴尔马上明白这姑娘话的意思，这是为什么？之所以这样敏感，不正是他心中有鬼，感到自己有错吗？他马上把证人都带来了，还说他们是没有偏见和不受人左右的，这是为什么？欺骗，这纯粹是欺骗！而这些先生竟加以容忍并把这种欺骗看作是正确的行为，这难道对吗？从厨房的姑娘告诉他到他来到这里中间隔了许多时间，毫无疑问，他在磨蹭时间，这又是为什么？他无非

是存心想让司炉把这些先生弄得疲惫不堪，以便他们逐渐失去清醒的判断力，而清醒的判断力正是舒巴尔最为害怕的。舒巴尔肯定在门外站了好久，不正是他听到了那位先生提了个小问题把司炉难倒，这才开始敲门吗？

事情完全清楚了，舒巴尔的表演正好适得其反，但现在还需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舒巴尔拙劣的表演，更加明确地告诉这些先生。需要让他们清醒清醒。于是，卡尔决定，在证人尚未出场，尚未像洪水般把一切淹没之前，他必须迅速地、至少要充分地利用这一时间！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船长却挥手止住舒巴尔，他立即——因为他的事情看来得往后搁一会儿了——退到一边，开始与那个向他走近的侍者轻声交谈起来，一边斜眼瞧着司炉与卡尔，一边非常自信地打着各种手势。舒巴尔看上去正在练习他即将发表的宏论呢。

“您不想向这年轻人问点什么吗，雅可布先生？”当大家静下来的时候，船长问这位拿竹手杖的先生。

“当然要问。”这位先生说道，同时微微躬身，感谢船长的细心。接着便再次问卡尔道：“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卡尔心想，要是尽快地对付掉这位执拗的问话者的问题，兴许对那件大事是会有利的，便不按自己以往的习惯出示护照——不然的话，他还得把它从暗袋里掏出来——而是简单地回答道：“卡尔·罗斯曼。”

“可真凑巧。”这个被人称呼作雅可布的人说，几乎不相信地微笑着往后退去。船长、总出纳员、海军军官、乃至那名侍者，一听卡尔的姓氏，也都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极度惊讶的神情。只有港务局的那两位先生和舒巴尔漠然置之。

“可真凑巧，”雅可布先生又重复了一遍，迈着有点僵硬的步子朝卡尔走去，“那么我就是你的舅舅雅可布，你就是我亲爱的外甥。方才那段时间里，我可一直有这样的预感！”他对船长说道，随后，他拥抱和亲吻卡尔，卡尔则默默地听任他这样做。

“您贵姓？”卡尔在感到对方松开手之后，虽然非常客气、但却完全无动于衷地问道，并且尽力去想象这一新的事件会给司炉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暂时还看不出舒巴尔能从这件事情中捞到什么好处。

船长觉得卡尔的这一提问有损于雅可布先生的尊严，便对卡尔说道：“您要明白，年轻人，这可是您的造化，您多走运。”而雅可布先生已经走向了窗口，不时地用一块手帕轻轻地擦拭着面孔，显然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那张激动万分的脸。“这位是爱德华·雅可布参议员，他已经向您承认是您的舅舅。同您迄今为止的期望截然相反，现在等待着您的，可是光辉的前途啊。您好好想想，事情一开头就这么顺利，您得冷静点！”

“我是有个叫雅可布的舅舅在美国，”卡尔转过脸对船长说，“可是，要是我没搞错的话，雅可布只是这位参议员先生的姓氏。”

“正是这样。”船长充满希望地说。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我的舅舅雅可布，是我母亲的兄弟，他的教名是雅可布，他的姓氏自然得同我母亲的一样，我母亲娘家姓本德尔迈耶。”

“诸位先生！”在窗旁恢复了平静的参议员，一听卡尔的这番说明，禁不住喊了起来，并精神焕发地转回身来。所有的人，除去港务局的官员外，都迸发出笑声，有的像是由于感动，有的却是莫名其妙。

“我刚才讲的这些话，显得这样可笑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卡尔心里这样想。

“诸位先生，”参议员重复道，“您们都参与到一件小小的家庭事务中来了，这既违反了敝人的意愿，也违反了诸位的意愿，因此，我不得不向诸位做一番解释，因为我相信，只有船长先生——提到这一点时，双方互相鞠了一躬——完全清楚这回事。”

“现在我可真的要注意他讲的每一句话了。”卡尔思忖道，同时斜过脸看了看，发现生命又开始返回到司炉的身子里，不禁高兴了起来。

“自从我在美国逗留这么多年以来，——逗留这个词此时用到美国公民身上，显然很不恰当，因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公民——我同我在欧洲的亲戚完全断了往来，原因很多，有的同眼前的事情无关，有的讲起来确实很费神。我甚至害怕这样的时刻，即我也许不得不向我亲爱的外甥讲述这些原因，而讲述这些原因的时候，可惜我还将不可避免地会坦率地谈到他的父母和他们的家属。”

“这是我的舅舅，不用再怀疑了，”卡尔自言自语道，一边聚精会神地听雅可布讲话，“也许他叫人把他的名字改了。”

“我亲爱的外甥如今被他的父母——我们现在只讲跟事情真正有关的话吧——撂到一边了，就像把一只惹人生气的猫扔出大门一样。我一点也不想掩饰我外甥所干的那件事，他是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的，不过，他的过错算不上什么大过失，只需简单地提一提，就足以取得别人的原谅的。”

“这倒要听一听，”卡尔心想，“不过我不希望他把这事讲给所有的人听。此外，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件事。他从何知道呢？”

“就是说，他。”舅舅接着说，并将身子略略俯在撑在他面前的那根小竹手杖上，这样一来，就驱散了不必要的庄严气氛，要不然的话，在这种场合下，肯定是会有这种气氛的，“就是说，他被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女佣人约翰娜·布鲁默尔勾引了。我用‘勾引’这个词，绝不是想以此来伤害我外甥的心，但一时又很难找出另外一个适当的字眼来。”

已经相当靠近舅舅的卡尔，这时回转身来，看看在场的人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对舅舅这番话的反应。没有一个人在笑，每个人都耐心而认真地听着。虽说他们头一次听到一位参议员的外甥的丑事，但他们毕竟没有笑话他，也没有什么可取笑的。司炉正对着卡尔微笑，尽管只是那么一丝微笑，但是它却表明，第一，司炉为卡尔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感到高兴；第二，他已经原谅了卡尔，因为刚才在舱房里，卡尔还向他隐瞒了这桩事。

“就是这个布鲁默尔，”舅舅继续说，“同我的外甥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子，洗礼时取名雅可布，这无疑是记挂鄙人的缘故，而鄙人，尽管我的外甥肯定只向她讲了一些无足挂齿的小事，想必给这位姑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说，幸亏如此。因为，这个时候，我外甥的父母为了免付私生子的抚养费，也是为了避免其他的丑闻向他们自己袭来，于是就把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送到美国来了。就像各位所看到的，只让他随身携带很少的行装和旅费，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这里我得强调一下，我既不了解那儿的法律，也不清楚他父母的其他情况。我只想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小伙子，要是没有恰恰还在美国出现的奇迹，将只好自食其力，这样的话，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在纽约港的某条小巷里堕落下去。幸亏那个女仆在写给我的那封信中——这封信由于误

投，几经周折，前天才到我的手里——向我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描述了我外甥的容貌体形，还很聪明地写上了他所乘轮船的名字。诸位先生，要是我有意为各位排遣的话，我是可以把那封信的某几个段落”——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大信纸，晃了晃——“在这儿念一念的。我想，这封信肯定会产生影响的，因为它写得有些狡诈，但用心良苦，充满着对孩子父亲的厚爱。但是，我不想用它给诸位取乐，只想说明一下情况，也不想伤害我外甥可能还存在的愿意接受这封信的感情，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在已经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里，静悄悄地把这封信读一读，以便从中吸取教益。”

但是，卡尔对那个姑娘并无感情。追溯往事，历历在目：当年，她坐在厨房里的碗柜旁，两肘撑着柜面。他有时到厨房去，为父亲取喝水的杯子，或传达母亲的某一指示，这时，她就死死地盯着他。有时，她歪斜着身子在碗柜旁写信，并从卡尔的脸上吸取灵感。有时，她用手捂住眼睛，逼得卡尔没法招呼她。有时，她跪在厨房边上自己狭小的房间里，对着一个木制十字架祈祷；卡尔走过时，只好胆怯地透过那微微开着的门缝瞧她。有的时候，她在厨房里乱转，当卡尔迎面向她走来时，她就像个女妖似的哈哈大笑，往后倒退。有的时候，卡尔进了厨房后，她便把门关上，手抓着门把，直到卡尔要求离开。有几次，她取来一些他根本不想要的东西，默默地塞到他的手里。有一次，她叫了声“卡尔”，正当他对这突如其来的称呼惊异不已的时候，她却向他扮鬼脸，喘息着将他引入自己的小室，随即关上了门，死紧地搂住他的脖子，一边请他给她宽衣，一边自己动手脱掉了他的衣裳，并把他放倒在她的床上，仿佛从现在起她决计不再把他让给别人。她要抚摩他，照料他，直到世界末日。“卡尔，你呀，我的卡尔！”她喊道，仿佛用眼睛看着他，并证实自己属于他似的。可他呢，正相反，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感到躺在太暖和的床褥上很不舒适，看来这床褥是特意为他铺垫上的。随后，她也躺到他身边，想听他吐露内心的秘密，可是他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向她吐露的，于是，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生气起来，一边摇晃他，一边把耳朵贴在他胸脯上听他的心跳，也凑过自己的胸脯让他听。可是，卡尔对她并没有言听计从，于是，她就把自己赤露的肚子压到他的身上，用手在他的两腿之间摸来摸去，弄得卡尔十分厌恶，使劲把头和脖子摇到了枕头外面，可这时，她却连续几次地用肚子撞他的身子，——他觉得，仿佛她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许出于这个原因，他迫切地需要别人来解救自己。末了，在她几次三番希望再度相会之后，他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床上。这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可是舅舅却懂得用它大作文

章。这么说，这位厨娘真的惦记着他，并把他将到美国去的事告诉了舅舅。她干得很漂亮，而他也许还要再报答她一次。

“现在，”参议员大声说道，“我想听你当众讲一讲，我究竟是不是你的舅舅。”

“你是我的舅舅。”卡尔回答说，还吻了吻他的手，作为回报，他吻了一下卡尔的额头。“我碰上了你，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你以为我的父母只讲你的坏话的话，那你就错了。撇开这一点不谈，你的话中和事实有一些出入，这就是说，我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过，你身居美国，单凭这封信是不可能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另外，我也相信，由于这种事情同在座的先生们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在向他们讲述的时候，即使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也不会造成特别的损失。”

“说得好。”参议员说，随即将卡尔带到那位显然关注着事态发展的船长的面前，并问道：“我不是有一个出色的外甥吗？”

“我有幸，”船长做了个只有受过军事教育的人才会做的姿势躬身答道，“结识您的外甥，参议员先生。我的轮船能成为这样一次会面的地点，乃是一种殊荣。不过，您外甥在旅途中一直待在统舱里，想必是非常难受的。可谁能知道船上载的是谁呢？当然，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统舱里的旅客尽可能地松快一些，至少要比好些美国的航线松快得多。但是，要将这样的航行变为一种娱乐享受，那我们始终还未能办到。”

“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好。”卡尔说道。

“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好！”参议员大笑着重复了一遍卡尔的话。

“我只担心我的箱子丢了……”他说着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以及还需要去做的事情。他环顾四周，发觉所有在场的人出于尊重和惊讶，仍默默地站在原来的位置上，眼睛都盯着他。只有港务局的那两位官员——只要看一看他们那副严肃而自鸣得意的面孔，便可想而知——表现出一种来得很不是时候的遗憾神情，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放在面前的怀表，可能比房间里已经发生的以及也许还会发生的事情更为重要。

继船长之后，第一个表示自己关怀的是司炉，令众人惊讶不已。“我衷心祝贺您！”他说着，并握住卡尔的手，也许是想借此表达诸如赞赏之

类的意思。当他接着也想向参议员讲同样的话的时候，后者往后退去，仿佛司炉这样做是超出了他的权力；司炉也马上作罢了。

但是，其余的人现在都领悟到该干什么，便争先恐后地乱作一团，把卡尔和参议员围在中间。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卡尔甚至受到了舒巴尔的祝贺，这个他也接受了，并表示感谢。待一切重新安静下来之后，港务局的官员最后走上前来，说了两句英语，给人一种可笑的形象。

参议员兴致勃勃地尽情享受这份快乐，也乐于使自己和别人回忆起一些次要的事情，当然，大家不仅耐心地、而且饶有兴味地听着。他提醒大家注意，他已将厨娘在信中提到的卡尔身上最突出的标记登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以备一时之需。刚才，他对司炉喋喋不休的废话感到无法忍受，仅仅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便掏出笔记本来，把厨娘的观察结果——当然不像侦探那样正确无误——同卡尔的外表对照了起来。他这样做不过是闹着玩的，可是，“外甥就这样找到了！”他结束这番话时的语调，仿佛是想再次得到别人的祝贺似的。

“现在对司炉该怎么办呢？”卡尔接着舅舅的话音问道。他以为自己处在一种新的地位上，心里想什么，都可以讲出来了。

“司炉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参议员说，“船长先生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办。我想，我们对司炉已感到厌烦，非常之厌烦，在座的各位先生肯定都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的。”

“牵涉到正义的事情，是不能用这种办法解决的。”卡尔说道。他站到了舅舅和船长之间，并认为以目前的地位或许可以掌握决定权。

尽管如此，司炉看来不再指望别人替他说话了。他把双手半插在裤腰带上，那皮带由于他那激动的动作而同花格子衬衫的条纹一起露了出来。这一点他毫不在意；他受的苦已经全部诉说完了，现在该让人家看看他身上穿着的这些破衣烂衫，然后再把他带走。他心想，侍者和舒巴尔，这两个船上级别最低的人，准会对他施这份最后的恩典。舒巴尔从此可以安宁了，不会像总出纳员所说的那样，再次陷入绝望了。船长将可以雇用清一色的罗马尼亚人，船上到处将可以听到罗马尼亚话，这样一来，今后的一切也许会比现在更好。总会计室里将再也听不到司炉的闲扯，只有他最后的这次闲话，或许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一段令

人感到相当愉快的往事，因为，正如参议员所强调指出的，正是司炉的喋喋不休直接促成了外甥和舅舅的相认。再说，在此之前，这位外甥还常常设法帮助司炉，所以，对司炉在他俩重逢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早就给予大大的感激了；眼下，司炉根本没有想到，他还要向卡尔提什么要求。此外，虽说他是参议员的外甥，但毕竟不是船长，而那不详的话最后还将从船长嘴里说出来。——司炉心里明白这一切，尽力不去瞧卡尔，但遗憾的是，在这间充满敌意的房间里，他的目光无处可以停留。

“别把事情搞糟了，”参议员对卡尔说，“这也许是一桩有关正义的事情，但同时又是一件牵涉到纪律的事情。这两者，尤其是后者，在此地，都将由船长做最后的裁决。”

“是这样。”司炉嘟哝着说。觉察到司炉的嘟哝并理解它的意思的人，都诧异地微笑了。

“此外，船刚刚抵达纽约港的时候，船长先生的公务定然堆积如山，我们已经麻烦他好久了，因此，现在我们该离开这条船了，别再节外生枝，毫无必要地干预这两个机械工之间无谓的争吵，以免再闹出什么事来。亲爱的外甥，我完全理解你的举动，然而，正是由于这点，我才有理由赶紧带你离开此地。”

“我马上为您放一条小艇下去。”船长说道。出乎卡尔的意料之外，船长对舅舅的这番话丝毫也不反对，无疑这番话被人看做是舅舅自谦的表现了。总出纳员急忙冲到写字台旁，打电话把船长的命令通知艇长。

“时间紧迫，”卡尔自言自语道，“但是，要想不得罪所有在场的人，我就什么事都干不成。舅舅刚刚才把我找到，我现在当然不能离开他。船长虽说客气，但仅此而已。一讲到纪律，他就不客气了，而舅舅肯定说出了船长的心意。我不愿再和舒巴尔讲话，甚至后悔不该和他握了手。此地其余的人统统是废物。”

他就是带着这种想法慢慢地走向司炉，把他的右手从裤带上扯下来，放在自己的手掌中抚摩着。“你干吗一言不发？”他问，“干吗要逆来顺受，强忍这一切？”

司炉只是皱眉头，仿佛是在寻找他所要说的话的表达方式。此外，他低头瞧着卡尔和他自己的手。

“船上的人，只有你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一点我完全清楚。”卡尔把自己的手指在司炉的手指间来回地移动，司炉则用闪烁的目光环顾四周，仿佛他获得了莫大的幸福，为此，任何人也不会见怪的。

“你得自卫，你得说是‘是’或是‘不是’，否则人家是不会知道事实的真相的。你得听从我的劝告，因为我有许多理由担心今后我再也帮不上你的忙了。”说到这里，卡尔哭了，一边吻着司炉的手，把这只几乎毫无血色的大手紧贴在自己的面颊上，仿佛那是一件不得不放弃的宝贝。——这时，参议员舅舅也已经来到他的身旁，略带强迫地把他拽开了。

“看来司炉已迷住了你的心窍。”舅舅说，并从卡尔的头顶上向船长送去会意的眼色，“你亲身感受过被遗弃的痛苦，就在那时，你找到了司炉，现在你感激他，这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看在我的面上，不要把事情做过了头，应该学着了解自己的地位才是。”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片吵闹声，还可以听到有人在喊叫，甚至像是有人在粗野地撞门。一个水手闯了进来，举止有点粗野，身上围着一个姑娘的围裙。“弟兄们在门外！”他喊道，并用胳膊肘向周围撞了一下，仿佛他还在拥挤的人群之中。终于，他又恢复了理智，正想对船长举手敬礼，却发现了自己身上那条姑娘的围裙，便扯了下来，扔到了地上，大声叫道：“真是讨厌，他们给我围上了姑娘的围裙。”随后，他喀嚓一声碰拢鞋后跟，敬了一个礼。目睹这一场面的人，有的禁不住想笑，但船长却厉声说道：“真是随心所欲。谁在外面？”

“是我的证人，”舒巴尔走上前来说，“我最诚恳地请求原谅他们不当的举动。航行结束后，弟兄们有时就像疯了一样。”

“您马上叫他们进来！”船长命令道，同时朝参议员转过身去，彬彬有礼但却很快地说道：“尊敬的参议员先生，劳驾您带着您的外甥先生跟这个水手走，他这就把您们领上小艇。有句话，我早就该说了，参议员先生，我个人能认识您，是多么愉快，多么荣幸。我只希望，参议员先生，不久能有机会同您再次继续进行我们那场被打断了的关于美国舰队情况的谈话，到那时，我们之间的交谈也许又会像今天一样，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再度被打断。”

“暂且如此吧！眼下，这样一位外甥已让我感到心满意足了。”舅舅笑着说，“感谢您的一番盛意，再会。另外，将来如有机会，”说着，他

亲切地搂住卡尔，“下次我们去欧洲旅行时，或许能有较长的时间同您聚会的。”

“那我将感到由衷的高兴。”船长说。于是，这两位先生相互握手，至于卡尔呢，他只能默默地、仓促地把手伸给船长，因为这时大约有十五个人要见他，这些人在舒巴尔带领下，虽然有些惊慌失措，他还是大声地叫着开了进来。那位水手请参议员走在前面，随即叫这批人为参议员和卡尔让开一条出路，就这样，舅甥二人轻松地躬身行礼的人群中穿过。看来。这些平常心地善良的人，只把舒巴尔同司炉的争吵看作为一场儿戏，其可笑的性质即使在船长面前也不会消失。卡尔发现人群当中也有厨娘莉娜，她正滑稽地对他眨眼示意，一边系上水手扔掉的那条围裙，因为围裙原来是她的。

他们继续跟着水手，离开了办公室，拐进一条狭小的过道，沿过道走了几步之后，就是一扇小门，从小门出去，一条短梯通向下为他们准备好的那只小艇。当他们的艇长一个箭步跳入艇内时，小艇里的水手们，都站起来敬礼。卡尔刚踏上最高一级阶梯，参议员正开口提醒他下梯子千万小心时，他却放声大哭起来。参议员用右手托住卡尔的下巴，让他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又用左手抚摩着他。他们就这样一级一级地慢慢走下去，紧紧地偎倚着下了小艇，在艇内，参议员为卡尔找了个刚好面对他自己的好座位。参议员一挥手，水手们便把小艇从轮船旁撑开，随即划了起来。他们刚离开轮船几米远，卡尔就意外地发现，他们正巧在总会计室窗户的那一侧。三扇窗口全都被舒巴尔的证人占了，他们非常友好地在挥手致意，舅舅甚至还道谢了一声，一个水手来了个绝招，他一边有规律地不停地划着小艇，一边用手向大船上送去一个个飞吻。真的，好似司炉已不复存在了。卡尔面对舅舅坐着——舅舅的膝盖差点儿就碰上他的膝盖——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这时，他心中产生了怀疑：眼前的这个男人究竟能否在任何时候代替司炉呢？舅舅也避开他的目光，去瞧那使小艇左右摇晃的波浪。

洪天富 译

在流刑营 ^[23]

“这是一台独特的装置。”那军官对考察旅行者说，同时用有点儿惊羡的目光瞥了一眼这台自己早就十分熟悉的装置。看来，旅行者似乎仅

仅出于礼貌才接受司令官的邀请的，因为司令官曾请他来此观看对一个不服从命令、侮辱上司、因而被判处死刑的士兵的处决。对这次处决，就连流刑营本地的人也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在这多沙的、四周被光秃秃的斜坡封闭的小深山坳里，除了军官、旅行者、罪犯和一个士兵以外，就没有别人了，罪犯神情迟钝、张大着嘴巴、蓬头垢面；在场的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铁链，它的末端是一些小链子，它们之间又都有链条连接着，就是这些小链紧紧缚住罪犯的手腕、脚踝和脖子。此外，罪犯看上去活像一条听话的狗，使人觉得尽可以让他在周围的山坡上乱跑，处决开始时，只需吹个口哨，他就会应声而来。

旅行者对这台装置并无多大兴趣，只是漠然地在犯人后面踱来踱去；而军官却在张罗不停，对装置作最后的检查，他一会儿钻到深深陷在地里的装置的底部，一会儿又沿梯而上，检查上面的部件。这些工作本应是机修工人干的，可军官却干得非常起劲，不知是他特别喜爱这台机器呢，还是别有原因，不肯把这项工作托给别人。“这下成了！”他终于喊道，随即从梯子上爬了下来。他显然疲惫不堪，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地呼吸，还把两条柔软精致的女用手绢塞在制服的领口里。“热带地区穿这样的制服，想必是够人受的。”旅行者说，却没有像军官希望的那样，问问机器方面的事。“那当然啦！”军官答道，一面在一只事先准备好的水桶里洗他那双满是油污的手，“但这套制服意味着家乡；我们不愿忘记家乡。——别谈这个吧，还是请您看看这台装置。”他随即补充说，同时用一块毛巾拭干双手，并朝机器上指了一指，“我先得用手操作一下，从现在起，装置就完全自动运行了。”旅行者点点头，继续听军官作介绍。军官为了怕发生什么偶然事件使自己出丑，又加了几句：“当然，也会出现故障；我当然希望今天不致如此，但我们总得估计到这种可能性。这台装置得连续运行十二小时。即使出现故障，也只不过是些小毛病，马上就能排除的。”

“您不想坐一坐吗？”军官终于问道，并从一大堆藤椅里抽出一张，并把它端给旅行者；后者无法拒绝，只好坐了下来。他现在坐在土坑的边上，用目光朝坑里匆匆地瞥了一下。这坑不太深。在坑的一边是用挖出来的土堆积而成的一堵墙，在另一边则是这台装置。“我不知道，”军官接着说，“司令官是否已经向您解释过这台机器？”旅行者做了一个含混的手势；这正中军官的下怀，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亲自解释这台机器了。“这台机器，”他说道，顺势抓住一个曲柄，把身子靠在上面，“是我们前任司令官的一项发明。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机器的所有试验工作，

直至使之最后完成。不过，发明的功劳还是应该归他一个人。您听说过我们的前任司令官吗？没有？那好，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您，整个惩罚营的设施都是他一手缔造的。作为他的朋友，我们在他归天的时候就已知道，惩罚营的设施已经十全十美，故他的继任者，即使头脑里装着上千个新的计划，至少在好多年之内也无须更动一下原来的设施。我们的预言果然应验了；新上任的司令官也不得不认清这一点。遗憾的是，您并没有结交上这位前任司令官！”军官打断了自己的话，“瞧，我乱扯到哪里去了，他所发明的机器就在我们眼前。您可以看到，它由三个部分组成。随着岁月的流逝，每一个部分都获得了通俗的称呼。底下的部分叫做‘床’，最高的部分叫‘绘图师’，在中间能上下移动的悬着的部分叫‘耙子’。”“耙子？”旅行者问。他刚才没有留心听军官讲话，阳光久久地滞留在无阴影的山谷里，叫人难于集中自己的思想。使旅行者感到更加惊叹的是，军官穿着紧身的阅兵时才穿的军服，佩有肩章，饰有丝带，他热心地向来访者解释他的机器，一面用一只扳子在这儿和那儿的螺丝上扳弄着。士兵的情况看上去跟旅行者的有些相像。他把犯人的铁链绕在自己的两只手腕上，一只手按在枪上，耷拉着脑袋，对什么都不关心。旅行者对此并不感到诧异，因为军官说的是法语，而士兵和犯人根本不懂法语。但尽管如此，囚犯仍努力地谛听军官的解释，这一点倒是更加引人注目的。他一边不停地发困，昏昏欲睡，但一边又打起精神，死死地盯着军官手指指向的地方，每逢旅行者提问打断了军官的话，他也和军官一样，朝旅行者看看。

“是的，就叫‘耙子’，”军官说，“这是名副其实的耙子。它上面安着像耙齿一样的针，整个耙子的操作也和普通耙子的一样，只不过它只用于一个地方，而且工艺水平要高得多。这一点您马上就会明白的。犯人就躺在这儿的床上。——我想，先给您描述一下这台装置，然后再让您看一看操作程序，这样您就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工作程序了。而且，绘图师上有一个齿轮已经严重磨损；机器一开动，就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嘎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互相之间几乎听不清；遗憾的是，这里很难弄到机器备件。——瞧，这里就是我才所说的床。它上面铺满了一层棉花；至于床的作用，您马上就会知道。犯人就躺在这层棉花上，腹部朝下，当然是赤条条一丝不挂的；这里是绑手用的皮带，这是绑脚的，这是绑脖子的，这就可以把他紧紧地捆住。这儿，在床头上，有一小块破毡，我刚才说过，犯人最先是脸朝下躺在这儿，所以这块破毛毡正好塞到他嘴里。这块很容易调整的破毛毡，其用途一是不让他叫，一是不让他咬破舌头。当然，犯人嘴里得衔着这块毛毡，否则捆脖子的

皮带就会让他一命呜呼。“这是棉花吗？”旅行者问道，并把身子向前弯了弯。“是的，当然是棉花军官，”微笑着说，“您自己用手摸一下吧。”他握住旅行者的手向床伸去。“这是一种特制的棉花，所以看上去和普通的不一樣；我下面会告诉您它有什么作用。”旅行者已经对这架机器产生了一点儿兴趣，他把一只手放在眼睛上挡住阳光，抬头往这部装置的高处看去。这的确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床和绘图师大小一样，看上去像两只深色的箱子。绘图师安装在床上两米高的地方；这两个部件的四角由四根黄铜棍连接起来，棍子在太阳光下熠熠生辉。在这两个箱子之间，耙子就顺着—根钢条上下移动。

那军官几乎没有发觉旅行者最初的冷淡态度，现在却非常清楚地察觉对方开始出现的兴趣，所以他中断了自己的解释，好让旅行者静静地观察—段时间。那罪犯模仿着旅行者的动作；由于他无法把手放到眼睛上，只得眯起自由的眼睛向装置的高处望去。

“那么，人是躺着的。”旅行者说，向椅背上一靠，叉起了腿。

“是的，”军官说着，把帽子微微往后推了推，用手摸摸他那发烫的脸庞，“请您继续往下听！不仅床，连绘图师也都安了电池；床的电池是供自己用的，绘图师的电池是供耙子用的。—旦犯人拴紧在皮带上，床就开始动起来。它以很快的速度同时向两侧和上下颤动起来。您在医院里大概也看到过类似的机器；只是我们床的动作是精确地计算好的；也就是说，床的动作必须非常准确地配合耙子的动作。耙子才是执行判决的真正工具。”

“那么，判决是如何进行的呢？”旅行者问道。“您连这点也不知道？”军官吃惊地问，咬了咬嘴唇，然后继续说道：“要是我的解释条理不清，请您多加原谅；我真的要请您原谅。早先时候，通常是由司令官来做解释的；可如今，新的司令官摆脱了这项光荣的义务；可是对您这样—位高贵的客人”——旅行者用双手做了个拒绝这种尊称的手势，可军官仍坚持用这种尊称——“这样—位高贵的客人，却事先不让他知道我们判决的礼仪，这又是新司令官的—种革新，而这种革新，”他嘟哝着发出—声诅咒，但马上克制住自己，然后说道：“事先也没有人告知我，这不是我的错。不过此事无关紧要，我毕竟非常擅长解释我们各种各样的判决，因为我这里有”——他拍了拍自己胸前的口袋——“我们前任司令官亲笔绘制的草图。”

“司令官亲手绘制的图？”旅行者问，“难道他一身能兼数职？他难道既是士兵、法官，又是设计师、化学家和制图师？”

“是的。”军官点头说，用沉思的目光凝视着对方，接着，他用探究的目光细细察看自己的手；手看上去不太干净，不好去拿图纸；所以他走向水桶，再次洗一洗手。随后，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只小皮夹子，说：“我们的判决并不严。只不过用耙子把犯人触犯的戒条写在犯人的身上。这个犯人，比方说吧，”——军官指了指那个人——“他的身上将要写上：尊敬你的上司！”

旅行者瞥了犯人一眼；军官指着他的时候，他低垂着头，看来正全神贯注地谛听别人的话。然而，从他那闭紧的厚墩墩的嘴唇的翕动中明显可以看出，他一点儿也不明白军官说话的意思。旅行者本想提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可是见到这个犯人，他仅仅问：“他知道自己的判决是什么吗？”“不知道。”军官说，急于要往下解释，可是旅行者打断了他：“他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重复道，然后停顿了片刻，似乎在要求旅行者进一步论证自己的问题，然后说，“压根儿没有必要向他宣布判决。他会从自己的身上知道对他的判决的。”旅行者不想再问什么了，可是就在这时，他感到犯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仿佛在问他是否赞同军官所做的这一番解释。本来他已经靠在椅背上了，这一来，他又把身子向前倾了一下，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可是他的确已被判刑，难道这点他也不知道吗？”“他连这点也不知道。”军官说道，朝旅行者笑笑，似乎在等待对方再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不知道，”旅行者说，摸了摸自己的前额，然后继续问道，“那么这犯人现在也不知道他的辩护是如何进行的吗？”“他压根儿没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军官说，并朝旁边看了一眼，似乎他是对自己说的，不想让这些自己所讲述的、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使对方感到难堪。“可是他总得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吧。”旅行者说，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军官意识到，他为了解释这台装置耽误了很长时间，这是一种危险；因此，他朝旅行者走去，拉住他的手臂，另一只手向犯人指指，犯人发现自己显然成了注意的中心，便笔直地站立着——士兵也扯了扯链条——军官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惩罚营里被委任为法官，虽然我还年轻。因为我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都协助过前任司令官，所以对这架机器知道得也最多。我裁决时所依据的原则是：罪责总是用不着怀疑的。其他的法庭可以不遵守这一原则，因为它们有许多法官，而且上面

还有较高一级的法庭。这里的情况就两样了，至少，在前任司令官的时代可以这样说。新上任的司令官显然想干预我的法庭，但到目前为止我都成功地把他们顶了回去，将来也照样能把他顶回去。——您大概曾想要我解释一下这个案子，这非常简单，跟所有的案子一样。今天早上，有位上尉向我告发，说派给他做勤务兵的这个男人在他的门口睡觉，结果由于睡过头而玩忽职守。本来，他的责任是每小时打钟的时候起来向上尉的门口敬礼。这当然不是繁重的义务，而只是一种必要的义务，因为无论是作为哨兵还是作为勤务兵，他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昨天夜里，上尉想去查看一下，他的仆人在是否在忠于自己的职责。两点钟打响的时候，他打开了房门，发现仆人蜷缩成一团在睡觉。于是，上尉取来了马鞭，朝仆人的脸上猛抽。可这仆人非但不起来求饶，反而抱住主子的双腿，摇他，还嚷道：‘把鞭子丢开，不然我把你吃掉。’——这就是案情的经过。一个小时以前，上尉找到了我，我写下了他的报告，紧接着就做出了判决。然后，我让人给这仆人戴上手铐。这一切都很简单。要是我首先传唤和盘问这个仆人，这只会产生混乱。他会撒谎，即使我成功地驳倒他的谎言，他又会用新的谎言来取代这些被驳倒的，就这样没完没了。可现在呢，我抓住了他，并且不再放过他。——您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吧？瞧，时间过得很快，处决马上就要开始，可我还没有解释完这架机器呢。”他把旅行者按回到椅子上，又走到机器前说：“您可以看到，耙子的形状是和人的身体相符的；这是对付人的上身的耙子，这是对付双腿的耙子。这把小的雕刻刀是用来对付头的。这下您该清楚了吧？”他友好地朝旅行者躬了一下身子，准备做非常详尽的解释。

旅行者皱起眉头仔细观看耙子，有关诉讼程序的报告并没有使他满意。他不得不再地提醒自己，这儿是一座惩罚营，这儿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应该尽可能地像军人那样行事。但是，除此之外，他对这位新上任的司令官寄予一定的希望，他显然打算采用——虽然是逐步地——一种新的司法程序，而这一点对于思想狭隘的军官来说是难于接受的。出于这种考虑，旅行者提出另一个问题：“司令官会来观看处决吗？”“不一定。”军官答道，这个猝不及防的问题使他非常狼狈，他那和善的面部表情顿时走了样，“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非常抱歉，我甚至不得不压缩一下我的解释。不过当然，待到明天，当这台装置重新擦洗干净以后——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弄脏——我可以进一步作些补充说明。现在我们只谈最必要的事情。——当犯人躺在床上，床开始震动的时候，耙子便垂落到犯人的身体上面。耙子自动进行调整，使针尖刚好接触到身体；调整好之后，耙子上的钢绳就立即绷紧成为一根

坚硬的钢条。这下正戏开场了。不知内情的人从外表上看是分不清各种刑罚之间的区别的。耙子看上去似乎在单调地进行工作。它颤动着把自己的尖端刺入犯人的身体，此外，身体也随着床的抖动而抖动。为了使每个人都能检查判决的执行情况，耙子是用玻璃制成的。把针固定在玻璃上曾经引起某些技术上的困难，但是经过多次试验之后终于取得了成功。我们本来就不辞辛劳嘛。现在，谁都可以透过玻璃看到身上的字是怎样刺出来的了。您愿意走近一些看看这些针吗？”

旅行者慢慢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俯身在耙子的上面。“您瞧，”军官说，“有两种排列成各种形式的针。每根长针旁边配有一根短针。长针管刺字，短针喷出用以把血洗掉的水，使刺的字始终保持清楚。接着，血水被引入好几条小沟，然后流进这条主沟，主沟有一根排水管道通到坑里。”军官用手指详细地指了指血水流经的途径。为了尽可能地做到直观生动，他在排水管的出口处用双手郑重其事地做了个接血水的姿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旅行者抬起了头，用手在背后摸索，似乎想坐回到椅子上去。正在这时，他吃惊地发现，犯人同他一样应军官的邀请正在近处仔细观察耙子的机构呢。那犯人把链子旁边的无精打采的士兵拖向前来，自己也俯身在玻璃上。可以看到，他也在用他那双疑惑不定的眼睛寻找着这两位先生刚才观察过的东西，但由于缺少解释，他终究无法探出个究竟来。他东张张西望望，眼光不停地在玻璃上溜来溜去。旅行者想把他往后赶，因为他现在的行为可能会招致惩罚。可是军官用一只手紧紧抓住旅行者，用另一只手从土堆上抄起一块土朝士兵身上扔去。士兵猛地抬起眼睛，看到犯人竟如此大胆，就扔下步枪，脚跟死劲地抵住地面，把犯人往后拖，犯人立刻倒了下来。士兵朝倒下的犯人看去，只见他在地面上翻滚，身上的链条发出叮当的响声。“把他拉起来！”军官嚷道，因为他发现旅行者的注意力由于这个犯人而大大地分散了。旅行者甚至忘记了自己俯身在耙子上，对之置于不顾，只想弄明白犯人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好好地收拾他！”军官又嚷道。他绕过机器跑到犯人跟前，亲手抓住犯人的胳膊窝，在士兵的帮助下，把双脚老是绊跤的这个犯人拖了起来。

“现在我全明白了。”旅行者对回到他身边的军官说。“还剩下最重要的一点，”军官说，顺势抓住旅行者的手臂，朝高处指去，“上面的绘图器中有一套齿轮传动装置，它决定着耙子的运动，而这套齿轮传动装置是按照判决的内容，即图纸加以排列的。我还使用前任司令官留下的各种图纸。就在这儿，”——说着，他从皮夹里抽出几张来——“不过我很

抱歉，我不能把它们交到您手里，它们可是我最珍贵的财产。请您坐下，我从这个距离让您看，这样您就可以把所有的图纸看个一清二楚。”他拿出了第一张图纸。旅行者本想说几句夸奖的话，可是他看到的却是一些迷宫式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线条，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张纸，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看出中间的空白处。“请您读一下。”军官说。“我看不清。”旅行者说。“它可是清楚的。”军官说。“它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旅行者支吾搪塞地说，“可是我无法辨认这些字迹。”“对了，”军官笑着说，并把图纸重新放进皮夹里，“这可不是给小学生临摹的书法。得好好研究才行。我相信您最后也会把它辨认出来的。当然，这可不是普通的文字；它不许一下子就把犯人杀死，而是一般地说，在十二个小时之后；转折点按计算在第六个小时上。就是说，在真正的字的周围得配上许许多多的饰物；真正的文字像一条狭窄的腰带围绕着肚子，身体的其余部分则配有饰物。您现在能够正确地判断耙子和整个装置的价值了吧？——您看我的吧！”说着他跳上梯子，转动了一个轮子，向下面喊道：“注意，靠边上站！”接着整个装置便开始运转起来。要是齿轮不发出吱吱声，那可真是好极了。军官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吱吱声所惊扰，于是用拳头对齿轮做了个威胁的姿势，又向旅行者摊了摊手，表示抱歉，接着又迅速地爬下来，从底下观察装置的运转。机器还有一点毛病，这只有他才能看出来。于是他再次爬上梯子，把双手伸进绘图器的内部，弄好之后，为了快一些下来，就不用梯子，而从一只黄铜杆上滑了下来，然后，他放开嗓子，用盖过机器噪音的声音，冲着旅行者的耳朵大声喊道：“您明白全部的过程了吗？耙子正开始写字；等它在人的背上写完第一回字以后，棉花层就滚了过来，将犯人的身体慢慢地翻过来，好让耙子有新的地方刺字。在这当儿，被耙子刺伤的部位贴在棉花上，由于棉花是特制的，马上就止住血，并为进一步加深刺文做好准备。接着，身子又翻过来，这时，耙子边上的这些尖角将伤口上的棉花撕下来，扔进坑里，好让耙子继续工作。就这样，耙子连续写了十二个小时，越写越深。头六个小时里，犯人几乎和平时一样，只不过感到疼痛。两个小时之后，那块毛毡从他的嘴上拿掉了，因为犯人再也叫不动了。在这个时候，床头上有一只电烤盆，里面盛有热的稀饭，犯人若想吃，便可用舌头舔取。没有一个犯人会错过这大好机会。我不知道有个犯人错过这机会，我看得够多的呢。只是大约在第六个小时上，犯人才失去任何食欲。这时，我通常爬到下面观察这种现象。犯人很少有把最后一口粥吞下去的，他只是让它在嘴里打转转，然后吐到坑里。这时我就得弯腰，不然他就会啐在我的脸上。可是一到第六个小时的时候，

犯人就变得多么安静！这个像大傻瓜一样的犯人顿时恢复了理智。先是从眼睛周围开始，然后从这里扩散开来。看到这种情景，人们情不自禁地也会想到愿和犯人一起躺到耙子的下面。这时没有别的情况，只是犯人开始辨认文字了，他撅起嘴，仿佛在谛听什么。您已经看到，用眼睛去辨认文字尚属不易；可是我们的犯人却凭他的伤口来辨认的。这当然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他花六个小时才完成辨认文字的工作。之后，耙子把他整个人叉起来，扔进了土坑，坑里的血水和棉花在他被扔进来的时候发出了噼啪的响声。至此，判决算是执行了，于是我们，那士兵和我，就把他埋了。”

旅行者仔细地听完军官的解释之后，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留神地观察着机器的运转。犯人也在观看，但一点也不明白。他微微弯着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来回摆动的针，这时军官向士兵做了个手势，士兵便用短刀从背后划破犯人的衬衫和裤子，使它们从犯人身上掉了下来；犯人正想抓住往下掉的衣服把自己赤裸裸的身子遮住，可是士兵把他举起来，抖落了他身上剩下的所有碎片。军官关上机器，就在这鸦雀无声的片刻里，犯人被放到了耙子底下。铁链子松开了，代之却捆上了皮带；起先，犯人还几乎感到一阵轻松。可是紧接着耙子往下降了降，因为他是一个瘦子。针尖触及他身子的时候，他皮肤上顿时起了寒战；士兵忙着拴紧犯人的右手，可犯人却盲目地把左手也伸了出来，手正好指向旅行者所站的地方。军官不停地斜过眼睛瞟旅行者，似乎想从对方的脸上看出对这次处决的反应，至少，军官对这次处决只对旅行者做了肤浅的解释。

这时，用来捆绑犯人手腕的皮带断了，可能是士兵拉得过猛造成的。军官得帮一下忙，士兵让他看了看扯断了的皮带。军官也的确向士兵走过去，把脸朝着旅行者说道：“这是一台由许许多多部件组成的机器，所以总免不了这儿那儿出现断裂或破裂的现象；但这不应该影响对它的总的评价。再说，我们马上能弄到皮带的代用品；我将使用一根链条；不过这样一来，右臂上的柔和的振动当然会受到影响。”就在他给犯人捆上铁链的时候，他又说：“现在，用于维修机器的费用大大地削减了。在前任司令官当权的时候，我可以自由支配用于这一目的的一笔款项。这里还有一个仓库，里面存放着各种各样的备件。我承认，我在使用这些备件时几乎有点浪费，我指的是在过去，而不是像新司令官所断言的现在，他目前正在寻找一切借口跟旧的那一套作斗争。现在，他自己掌管机器的费用，要是我派人去领根新皮带，他竟要求把断了的旧皮

带拿去作证，而新的皮带呢，要在十天之后才发下来，而且质地较差，不大顶用。至于在十天之内我怎样在没有皮带的情况下让机器运转，谁也不会来过问。”

旅行者私下思忖着：断然干预别人的事务，总是有危险的。他既非惩罚营里的公民，又不是统辖这个地方的国家的公民。要是他想谴责或甚至阻止这次处决的话，别人会对他说：你是外国人，请少管闲事。对人家的这种指责，他似乎无话可答，只能赶紧打圆场，说自己无意干预这桩案子，他旅行到此的目的只是为了看看，绝对不是为了改变别人的司法状况。不过，这里的情况的确非常诱人。案件的审理无疑是不公正的，对犯人的处决无疑是残忍的。谁也不会想到旅行者在这件事里有什么自私的打算，因为他与犯人素昧平生，既非同胞，也不是轻易对别人同情的人。旅行者本人持有上级机关的介绍信，在这里受到了礼遇，人家请他来参观处决，这件事本身看来甚至表明，人家需要他对这一案子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实上，他完全有可能直言自己的看法，因为他刚才十分清楚地听到，司令官并不支持这种处决方式，而且对军官抱着几乎是敌视的态度。

正在这时，旅行者听军官狂怒地大吼一声。他刚刚好不容易把毡块塞到犯人的嘴里，犯人却禁不住一阵恶心，闭上眼睛呕吐起来。军官急忙把犯人从毡块那儿拖开，想把他的头扭转向土坑；可是已经太晚了，从五脏六腑里冲出的脏物已经顺着机器流了下来。“全是司令官的过错！”军官喊道，疯狂地摇动着面前的那几根黄铜杆，“机器给弄得猪圈一样的脏了。”他用颤抖的手向旅行者指了指犯人刚才吐出来的东西，“我曾一连花了几个小时试图让司令官明白，犯人在行刑前必须饿一整天，可是他听了没有？他可听不进去。这位奉行温和的新方针的司令官有另外的看法。他的太太们总是要用糖果点心塞满犯人的喉咙，然后才让人把他带走。他一生是靠臭鱼养活的，现在得让他吃糖果点心！这也许是可能的，我对此并无任何异议，但为何人们不去弄一块新的毡片呢，三个月以前我就提出了这个请求。这犯人嘴里塞进这块上百个犯人临死前嚼咬过的毡片，怎不叫他恶心呢？”

犯人低垂着头，看上去显得很平静；士兵则忙着用犯人的衬衫擦拭机器。军官朝旅行者走去，后者怀着某种预感，向后退了一步，但军官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去。“我想私下里和您谈几句话，”军官说，“行吗？”“当然可以。”旅行者答道，接着就垂目洗耳恭听。

“您正在欣赏的这种审理程序和处决方式，在我们这儿再也没有人公开支持了。我是它们唯一的代表，也是前任司令官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我也不再想进一步发展这种司法制度，为了维持现状，我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老司令官在世时，惩罚营里尽是他的信徒；他的信仰力量我还保持了几分，可完全缺少他那样的权力；所以，他那些信徒一个个先后溜走了，目前虽然还有不少，可是谁也不敢承认。要是今天，也就是处决犯人的这个日子，您到茶馆去听他们聊天，您听到的也许尽是些模棱两可的言论。这就是那些忠于老司令官的信徒，可是在现任司令官和他的新方针的统治下，他们对我毫无用处。现在我可要问您：这样一个毕生的杰作”——他指了指机器——“会不会由于新司令官和那些影响着他的女士们而毁灭？能让它毁灭吗？即使是一个只到我们岛上来几天的外地人，难道也应该听之任之吗？现在时间已经紧迫，有人正在密谋反对我的审判权；司令官的办公室里已经开过多次会议，我是被排斥在外的；甚至您今天的来访，在我看来也是对整个形势的清楚说明；他们都是胆小鬼，所以预先把你这样的外来者打发到这里。——要是在以前，逢到处决犯人，那是什么气势！就在行刑前的那一天，整个的山谷里人山人海；所有的人只是来这里看热闹的；一清早，司令官就和女眷们来了；军号声唤醒了整个营地的人；我向司令官报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社会名流们——大官是不可缺少的——整齐地坐在机器的周围；这堆藤椅就是那个时代的可怜的遗迹。那时候，机器擦得锃亮锃亮，几乎每一次行刑，我都给机器换上新的备件。在几百双眼睛注视下——所有的观众都踮着脚一直站到那边山冈上——犯人被司令官本人带到耙子底下。今天一个普通士兵就能干的事，当时却由我这个审判长去做，可我感到光荣。接着行刑开始了！机器运转时听不到任何的噪音。有些观众根本不再去看行刑，他们闭上眼睛躺在沙地上；他们都知道：现在正义得到了伸张。在一片寂静中，人们听到的只有犯人被毡块堵得发闷的呻吟声。如今，机器已不再能从犯人嘴里榨出更加强烈的呻吟声，倒是破毡片能将他窒息。当年，书写的针能滴出一种酸液，可如今这种酸液已不再许可使用了。嗯，第六个小时终于来到了！人人都希望在近处看，但哪能办得到呢。司令官目睹这种情况，于是下令首先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因公务在身，当然一直站在犯人的旁边；我常常蹲在这儿，左右手臂上各抱着一个年幼的孩子。我们大家看到犯人那备受折磨的脸上焕发出来的幸福的表情时，是多么高兴啊！我们的脸颊沐浴在终于出现但又马上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的同志！”军官显然忘了他在跟谁说话；他抱住旅行者，把头压在对方的肩膀

上。旅行者一时感到非常狼狈，不耐烦地越过军官的头向别处望去。士兵已打扫完毕，现在正从一个罐子里取出稀饭倒到盆子里。犯人这时好像完全恢复了过来，他一看到士兵往盆里倒稀饭，便用舌头去舐。士兵一再把他推开，因为稀饭是为往后一点的时间准备的。而士兵自己却毫不讲理，将两只脏手伸进盆里，当着贪吃的犯人的面捧起粥吃了起来。

军官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我并不想打动您的心，”他说，“我知道，要让今天的人理解那样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机器还能运转，它本身还是有用的。它现在仍然发挥着作用，尽管它孤零零地矗立在这山沟里。最后，尸首还会像从前那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轻飘飘的姿态掉进土坑，尽管情况和从前有所不同，那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像苍蝇逐臭似地簇拥在土坑周围，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土坑边上筑起一道坚固的栏杆，可惜栏杆早就给推倒了。”

旅行者想把自己的脸避开军官的视线，便漫无目的地朝四周看了看。军官以为旅行者在观察荒凉的山谷；于是，他抓住对方的双手，在对方周围转来转去，以便理解他目光的含意，然后问道：“您注意到这奇耻大辱吗？”

但旅行者沉默不语。军官只好暂时不去管他；自己却又开双腿，两手叉腰，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凝望着地上。接着，他向旅行者鼓励地笑了笑，说道：“昨天司令官邀请您的时候，我就在您的附近。我听到了他邀请您的话。我了解这位司令官。我立即明白，他邀请您的目的何在。虽然他大权在握，足以采取措施来对付我，但他还不敢下手，看来，他是想借助您这样一位有名望的外国人的看法来反对我。他是经过仔细盘算的；您在岛上已经第二天了，您不了解前任司令官和他的思想境界，您囿于欧洲人的看法，也许您一般地在原则上反对死刑，尤其反对用这样的机器来处决犯人。此外，您也看到这次处决是如何进行的，既没有群众参加，使用的机器又有些破损，确实可悲——那么，看到这一切以后（司令官这样想），难道您还会认为我的审理是正确的吗？要是您认为不对，您也不该对此守口如瓶（我始终是站在司令官的立场上说话的），因为您毕竟相信您自己经过反复推敲而做出的那些结论的。是的，您见识过也知道尊重许多民族的种种奇风异俗，因此您不会像在贵国那样，全力反对我的做法。不过，司令官根本不需要您这样做。随随便便地甚至漫不经心地提上一句也就够了。您只需表面上迎合他的愿望，不必坚持按照您的信念去做。我深信，他会非常机灵地询问您。他

的女眷们就会坐在您四周，竖起耳朵听您的高见；您大概会对她们说：‘在我们国家里，被告在判决前是要经过审讯的。’或者是：‘在我们那儿，被判罪的人得知道对自己做出的判决。’或者是：‘在我们国家里，除了死刑以外还有其他的刑罚。’或者是：‘在我们那儿，只有在中世纪才有刑讯。’这些在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话，当然也是对的，但这两天真无邪的话，一点儿也没有接触到我审理的案子。可是，司令官对您所讲的话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可以想象，他，这位好司令官，会立即推开椅子，冲向阳台，我也会看到，他的夫人们一溜烟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会听到他的声音——女士们称之为雷霆的声音——嗯，他的话准是这样的：‘一位西方的大学者，派出来考察世界各国的诉讼程序，他刚才说，我们按照古老的习俗制定的诉讼程序是不人道的。鉴于他这样一位人物的这样一种意见，我当然无法再容忍这样一种法律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我命令，从今天起……’等等等等。您想干预他，说您并没有说过他刚才喊出的话，您也没有说我的审理不人道；相反，凭您深刻的眼力，您认为我的做法是人道的和最符合人类尊严的，而且您非常欣赏这架机器——可是已经太晚了；您连阳台都挤不进去，因为它早被女士们占满了；您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您想喊叫；可是一位女士的纤手会来堵住您的嘴——于是，我和老司令官的机器都双双地完蛋了。”

旅行者只好忍住了笑；如此说来，他起初认为非常艰巨的任务竟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于是，他支吾搪塞地说：“您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影响；司令官读过了我的介绍信，他知道我不是什么刑事审判的专家。如果我要发表意见，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而已，不会比任何普通人的重要，比起司令官的意见，那更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我所知，司令官在这座惩罚营里，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如果他对这种诉讼程序的看法，诚如您所想的，是这样一种明确的看法的话，那么我担心，他无须我微薄的帮助也能宣告这一制度的结束。”

军官是不是终于明白了呢？不，他还不明白。他一连摇了摇头，急促地回头向犯人和士兵扫了一眼，吓得他们不敢再去吃饭，军官走到旅行者跟前，不看他的脸，却把眼睛盯在他上衣上的某个地方，声音比以前更低地说：“您不了解司令官；您和他以及我们大家处在某种对立的——请原谅我用这样的措词——虽说是无害的状态；请您相信我，我会正确地评价您的影响的。当我听说您一个人来参观行刑时，我真是高兴极了。司令官的这种安排是想打击我，我却把它变得对自己有利。您专心致志地听到了我的解释——要是有一大群人来参观行刑，您难免要受

到不恰当的窃窃私语和鄙夷的目光的干扰而分散注意力——看到机器，这会儿又正在观察处决。您肯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便还有些小地方不够明确，但一看到处决的时候，它们就都会解决的。现在我向您提一个请求：帮助我反对司令官！”

旅行者不让他说下去：“我怎么能办得到呢，”他嚷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既帮不了您的忙，也不想加害于您。”

“您能帮我的忙。”军官说。旅行者有点担心地看到军官把拳头握了起来。“您能帮我的忙，”军官重复地说，态度更加咄咄逼人，“我有一个必定成功的计划。您以为您的影响微不足道，我却认为它是举足轻重的。不过我得承认，您是对的。但话又说回来，为了维护这一司法制度，难道不该去试试一切，甚至去试试可能是理由不足的事吗？那么，就请您听听我的计划吧。为了实行这一计划，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您今天在营地里应尽可能不流露您对这种司法制度的看法。要是别人不直接问您，您就别开口；问到的时候，您的回答必须简短和模棱两可；要让别人看出，您难以就此事发言，您感到愤懑，万一要您公开表态，您得马上装出非常生气的样子。我并不要求您说谎，我绝无此意；您只需简短地回答，例如：‘是的，我看过行刑了。’或者是：‘是的，我已经听了所有的解释。’这就行了，不必多谈。您有充分的理由流露出不满情绪，尽管这不合乎司令官的心意。当然，他会误解您的意思，并按他的理解去解释您的不快。我的计划正是建立在这种设想之上。明天，司令官的办公室里将举行一次由全体高级行政官员参加的大会，由司令官主持。司令官当然懂得把这样的会议变成为一次公演。已建好了顶层楼座，配备好了观众。我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不得不参加这个大会。而您呢，反正肯定会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要是您今天按照我的计划行事，对您的邀请就会变为迫切的请求。要是您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不被邀请，那您无论如何得跟他们提一声；这样一来，就准能得到邀请。到明天，您就会和女士们一起坐在司令官的包厢里。他会不时地向上看看，确信您已经在厢座里。在讨论完各种无关紧要、令人发笑、专为听众安排的事情——通常是海港工程，没完没了的海港工程！——之后，也要讨论诉讼程序的问题。万一司令官不提出或不马上提出讨论这个问题，我将设法让他提出来。我将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报告今天的行刑情况。非常简短，只谈处决的情况。在这样的大会上做这样的报告是异乎寻常的，但我还是要做。司令官像往常那样用亲切的微笑向我表示感谢，接着他无法控制自己了，他要利用这大好的机会。‘刚才，’他

会说这样的或类似的话，‘有人向我报告了这次行刑的情况。我只想补充一点，这次行刑是在这位伟大的研究者的目击下举行的，诸位知道，他的来访使我们的营地感到无上光荣。我们今天的会议也由于他的光临而增加了意义。诸位想不想向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提个问题，比方他是怎样评价按古老的习俗举行的行刑以及行刑前所进行的审理的。’这当然会引起一片喝彩，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掌声最大。接着司令官向您鞠了一个躬，并且说道：‘现在我以各位的名义提出这个问题。’于是，您走近包厢的栏杆。您得把手放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不然女士们会捉住您的手，玩弄起您的手指来。——这时您终于开始发言。我不知道，我将以怎样的心情度过这紧张和引人入胜的时刻。发言时您用不着拘束，尽可大声地道出实情，要把身子俯到栏杆上，要大声吼叫，把您的意见，您的坚定不移的意见，向司令官大声喊出来。也许您不愿意这样做，这不符合您的性格，在贵国，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采取另外的做法，这也是对的，这也一样能博得效果，您压根儿用不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只要说很少几句话，要悄声地说，只让您下面那些官员能听清楚，这就够了，您用不着主动去谈处决缺乏公众的支持、齿轮叽嘎作响、皮带扯断、令人作呕的毡块等等情况，您用不着去谈，这一切由我来谈。您就瞧着吧，我的发言即便不能把新司令官从大厅里赶出去，也要迫使他跪下来认输：老司令官啊，我向你屈服了。——这就是我的计划；您愿帮我实现它吗？您当然是愿意的，岂止愿意，您必须帮助我。”于是，军官抓住旅行者的两只胳膊，气喘吁吁地看着对方的脸。他最后那几个句子是大声喊出来的，连士兵和犯人都注意起来了；虽然他们一句话也听不懂，却中止了吃粥，一面咀嚼嘴里的东西，一面向旅行者看去。

旅行者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该如何回答；他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所以决不会在这里发生动摇；他心地诚实，用不着害怕别人。尽管这样，当他现在目睹士兵和犯人的情况时，他却迟疑了足足有抽一口气的时间。最后，他终于毅然地答道：“不行。”军官连连眨眼，却没有把眼光从旅行者身上移开。“您愿意听我解释吗？”旅行者问。军官默默地点头。“我不赞成这种审判方式，”旅行者继续说道，“在您未向我透露秘密之前——我当然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滥用您对我的这一信任——我就已经考虑过，我是否有权干预这种审判方式，我的干预是否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我明白，我首先必须求助于谁：当然是求助于司令官。您使我更加明白这一点，但并没有加强我的决心，相反地，您真诚的信念使我悲伤，但并没有使我动摇。”

军官默不做声，转向机器，抓住一根黄铜杆，接着，他稍稍向后仰，朝绘图器看去，似乎在检查一切是否正常。士兵和犯人看上去已结为好友；犯人向士兵示意，尽管在被皮带紧紧扣住的条件下这样做显得非常困难，士兵向他弯下身去；犯人对她悄声地说了些什么，士兵频频点头。

旅行者跟在军官的后面，说：“您还不知道我想干些什么。诚然，我要把自己对审判方式的看法告诉司令官，但不是在大会上，而是同他单独面谈；我在这里不会待得太久，没工夫参加任何会议；明天一早就乘车或乘船离开这里。”

军官仿佛并不在听。“那么，您并不信服这种审判程序。”军官自言自语地说，又微微一笑，仿佛是一位老人在笑一个孩子的胡闹似的，但在微笑的后面隐藏着他真正的思考。

“那么说时候到了。”军官终于开口说，并突然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旅行者，这目光里包含着某种要求，某种要求参与的呼吁。

“什么时候到了？”旅行者不安地问道，可是得不到回答。

“你自由了。”军官用犯人的语言对犯人说。那人起先还不相信。“是的，现在你自由了。”军官说。犯人的脸容第一次恢复了生气。这难道是真的吗？这会不会是军官一时的心血来潮？是不是这位外国的旅行者为他人求得了宽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脸上表露出这种种疑问。不过这样的时间并不长。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别人肯放他，他当然希望真的得到自由，于是他开始在耙子容许的范围内挣扎起来。

“你要把我的皮带挣断了，”军官喊道，“安静些！我们马上就解开皮带。”于是他向士兵做了个手势，示意要后者一道去解开皮带。犯人一声不吭地暗自发笑，他一会儿把脸转向左边的军官，一会儿又转向右边的士兵，同时也没有忘记旅行者。

“把他拖出来。”军官命令道。因为有耙子，拖的时候得略加小心。犯人由于操之过急背上已经擦破了几处。

从这时起，军官就不再去过问犯人了。他走到旅行者跟前，重新掏出小皮夹，在里面翻了翻，终于找到了他要求的那张图纸，并展开来给旅行者看。“您念念看。”他说。“我不会念，”旅行者说，“我已经说过，

我不会念这些图纸。”“您再仔细看看这张。”军官说，一边走近旅行者，以便和他一道阅读。可是这同样无济于事，于是军官把小指凌空悬在图纸上，仿佛图纸是绝不可触摸的，以使用这种方式指点旅行者阅读图纸。旅行者也真的尝试着去做，想至少在这方面取悦一下军官，但就是没法念下去。于是军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来，接着把用字母拼出来的词儿念了出来。“要公正！”这儿是这么写的，”军官说，“您现在当然能往下念了。”旅行者把身子朝图纸深深地俯下去，军官怕他碰上，就把它挪开一点；旅行者虽然不再吭声，但显然仍旧没法继续念下去。“要公正！”这儿是这么写的。”军官又说了一遍。“也许是吧，”旅行者说，“我相信图纸上是这样写的。”“那么，好吧！”军官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意了，于是他拿了图纸爬上梯子；他非常小心地把图纸安放在绘图器里，显然是在调整所有齿轮的位置；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因为牵涉到非常小的齿轮，有的时候他把头整个地埋到绘图器里面去了，这说明他必须非常精确地检查整个的齿轮传动装置。

旅行者站在下面目不转睛地望着军官，连脖子也弄僵了，眼睛也因天上倾泻下来的阳光而发痛。士兵和犯人这时在一块儿忙着什么。犯人的衬衫和裤子已经扔在坑里，士兵用刺刀把它们从土坑里挑了出来。衬衫脏得可怕，犯人只得在水桶里把它洗了洗。等他把衬衫和裤子穿上，两人不约而同地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因为衬衫和裤子的后面已被割开了。也许犯人觉得自己有义务逗乐士兵，便穿着这身被切割成两半的衣服在士兵面前转了又转，士兵乐不可支，蹲在地上直打自己的膝盖。要不是他俩考虑到这些先生在场，就无法控制住自己了。

军官终于结束了高处的工作，还微笑着再次通观了一下齿轮装置的各个大小部件，然后把在此之前一直开着的绘图器的盖子砰地关上，接着，他爬下梯子，先往坑里看了看，再瞧瞧犯人，满意地发现这人已将自己的衣服从坑里拿了出来，然后他到水桶跟前去洗手，可这才发现里面的水脏得叫人恶心，他因此时不能在桶里洗手而感到难过，便想出个解决的办法，干脆把手插到沙土里去——这个替代的办法虽有不足之处，但他只好将就了——然后，他站起身来，开始解开上衣的扣子。就在这时，他早些时候塞在领子后面的两块女用手绢首先掉进了他的手里。“这是你的手绢。”他说，并把它们扔给了犯人。然后又向旅行者解释道：“是女士们送的礼物。”

他显然急于脱去制服上衣和身上其他所有的衣服，尽管这样，他脱

下每件衣服时总要把它恋恋不舍地拿在手里，他甚至还用手指去抚摩军服上的银绶带，把一条缨穗抖抖整齐。但是，一等他处理完一件衣服，就厌恶地把它猛甩到土坑里，这跟他处理时的细心态度很不相称。他身上最后剩下的东西，就只有一把系有皮带的短剑。他拔剑出鞘，将剑折断，把弄断的剑、剑鞘和皮带收拾到一块儿，扔进了坑，他扔得那么猛，以致坑里发出了它们相互碰击的清脆的声响。

现在，他一丝不挂地站着。旅行者咬紧嘴唇，一声不吭。他虽然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事，但他无权阻止军官的任何行动。难道军官所留恋的诉讼程序真的就要完了——也许这还是他干预的结果呢，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果真这样，军官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完全对的；要是旅行者处在军官的地位上，也只能走这条路。

士兵和犯人起先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们最初甚至没有往这边看。犯人由于拿回来了手绢而兴高采烈，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士兵出其不意地迅速从他手里抢走了手绢。犯人想从士兵的腰带下面——手绢就藏在这里——把手绢抢回去，可是士兵保持着高度警惕。就这样，他俩就半开玩笑地扭打起来。直到军官完全赤身裸体，才引起他俩的注意。特别是这个犯人，似乎已预感到即将有重大的转变发生。过去在他身上发生的事，现在竟在军官身上发生。也许会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大概这位外来的旅行者已下达了这方面的命令。就是说，要报仇。他自己并未历尽痛苦，到头来却报了仇。于是，在他的脸上漾出一股宽广的无声的笑容，而且不再消失。

可是，军官早已转向机器走去。读者早已知道，军官非常熟悉这台机器，但是现在，当你看到他怎么操纵机器，机器又怎样服从指挥，仍然不免大吃一惊。他刚把手伸近耙子，它就多次地上下移动，直至找到正确的位置将他抓住；他刚抓住床边，床就开始抖动起来；毡块也向他的嘴移了过来，你会看到，他并不想含毡块，不过只犹豫了片刻，便顺从地把它含进了嘴里。一切均已就绪，只有皮带还垂挂在两边，可是这显然没有用，军官是用不着捆绑的。可是犯人发现了松弛的皮带，在他看来，不把皮带扣上，处决就不算完满，于是他一个劲儿地向士兵招手，要他一道去捆绑军官。军官业已伸出一只脚想去推动曲柄，以便开动绘图器；这时他看见两人朝他走来，便缩回了伸出去脚，让他们将自己系紧。可是他再也够不到曲柄；士兵和犯人是不会找到曲柄的；而旅行者则决定待在原地不动，在他看来，这没有必要。士兵和犯人刚把

皮带给军官扣上，机器便开动了起来；床颤动着，针在皮肤上跳来跳去，耙子上下滑动着。旅行者呆呆地看了一会儿，突然，他想起绘图器里有个齿轮该发出吱嘎的响声了；可是一切都很寂静，丝毫听不到嗡嗡声。

机器无声地运转着，不再引起大家的注意。旅行者观察起士兵和犯人来。在这两人里，犯人显得更为活跃，他对机器上的一切都感兴趣，他一会儿弯下腰来，一会儿又伸直身子，频频伸出食指，在给士兵指点些什么。旅行者感到痛苦。他决心在这里待到底，可是看到这两人的所作所为，他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你们回家吧。”他说。士兵倒很情愿，可是犯人把这命令看成了惩罚。他合着掌央求让他留下来，看到旅行者摇头拒绝，他甚至跪了下来。旅行者感到命令在此无济于事，正想走过去把他们撵走。就在这里，他听到头顶上的绘图器里发出一种噪声。他抬起头来看看。莫非哪个齿轮发生了故障？但他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幅图景。绘图器的盖子缓缓升起，接着又啪嗒一声地完全打开。一只齿轮的牙齿露了出来，逐渐升高，不一会儿，整个齿轮也露了出来，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挤压绘图器似的，以致齿轮不再有搁置的地方，它旋转着升到了绘图器的边缘，接着掉了下去，在沙子上还滚了好大一段，然后停着不动了。但马上又有另外一个齿轮升了起来，后面又随着升起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几乎无法区分的齿轮，它们都一一从绘图器的边缘上掉了下来。人们总以为，这下子绘图器一定可以倒空，然而又出现了一组新的、数目特别多的齿轮，升了起来，掉了下去，在沙里滚动，然后停着不动。看到这一情景，犯人完全忘记了旅行者的命令，这一个个往下掉的齿轮把他完全迷住了，他总想去抓取一个，同时催促士兵帮他的忙，可是手刚一伸出去就吓得缩了回来，因为马上又有另外一个齿轮跟着掉了下来，初看它滚动时他甚至吓了一跳。

相反地，旅行者显得非常不安；机器显然正在化为碎片；它那无声的运转只是一种假象；他甚至感到，现在有必要照顾一下军官，因为后者不再能照料自己了。但由于齿轮的落下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竟忘了瞧瞧机器的其余部分；这时，最后一个齿轮已离开了绘图器，他便向耙子俯下身去，却发现一个新的、更加让人吃惊的现象。耙子并没有在写字，而是乱戳乱刺，床也没有翻动军官的身体，而是颤巍巍地把他的身体举起来送进针里。旅行者想进行干预，可能的话，使整个机器停下来，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军官所希望实现的刑讯了，这简直就是谋杀。旅行者伸出双手想去救军官，可此时耙子已将叉起的身体举到一旁，这

一点在平时要到第十二个小时才会发生。血流成了上百条小河（并没有搀水，喷水的小管这次也失灵）。还有一件失灵的事：军官的身体并没有从长针上落下来，而是悬在土坑的上空，不断地流血，却不掉下来。耙子也想恢复原位，可是当它发现自己尚未摆脱身上的负担时，就只好停在土坑的上空。“快帮帮忙吧！”旅行者朝士兵和犯人喊道，自己则抓住军官的双脚。他心想，他在这边压住军官的双脚，那两人在另一边抓住军官的头，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把军官从针上卸下来。可是那两人不肯过来帮忙；犯人正一个劲儿地转着圈子；旅行者不得不向他们走过去，强迫他们走近军官的头部。在这里，他几乎是违愿地看到了尸首的面孔。面容一如生前（没有发现一丝期望拯救的痕迹）；别人从机器中所得到的东西，军官并未得到；他紧闭着双唇，睁大两眼，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目光镇定而自信，那根大铁钉的针尖则穿透了他的前额。

当旅行者在士兵和犯人伴随下向营地的头一批房子走去的时候，士兵指着其中的一所说道：“这就是茶馆。”

在这所房子的底层，有一个深而矮的类似洞穴的房间，它的墙壁和天花板已被烟熏黑。临街的这面，房间完全敞开着。尽管茶馆跟营地的其他房屋——除司令官宫殿般的建筑以外，所有的房屋均已荒芜——并没有多少区别，它却给旅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这是一座历史的纪念碑，让他感到了已往时代的力量。他朝前走了几步，在陪伴者跟随下穿过了几张停放在茶馆前面街道上的空桌子，吸到了屋子里涌流出来的阴冷、潮湿而有霉气的空气。“那老头儿就葬在这里，”士兵说，“神父拒绝给他在公墓上留下一块地方。起先，人们一时拿不定主意该把他葬在哪里，最后决定将他埋在这儿。此事军官肯定没有对您讲，因为他对此尤其感到羞愧。在几次夜里，他甚至想把老头儿挖出来呢，可是每一回都给人撵走了。”“坟墓在哪儿？”旅行者问道，他并不相信士兵所说的话。士兵和犯人立即双双跑到旅行者的前面，伸出手朝坟墓所在地指去。他们领着旅行者一直沿后壁走，有些顾客在那儿的几张桌子旁坐着。他们看来都是码头工人，身强力壮，满脸留着短而乌黑发亮的胡子。他们谁也没有穿上衣，衬衣也是破破烂烂的，都是些贫贱穷苦、受人凌辱的汉子。旅行者走近时，有几个人站了起来，紧贴墙壁，对着他看。“是个外国人，”旅行者周围响起了低低的耳语声，“他想看看坟墓。”他们把一张桌子推向一边，桌子底下果然露出了一块墓碑。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矮矮的，以便可以藏在桌子底下。碑上有些很小的铭文，为了念这些铭文，旅行者甚至不得不跪了下来。墓碑上写道：“老司

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们为他挖了这个坟，立了这个碑，现在只好隐姓埋名，可以预言，司令官在若干年后又将复活，从这个屋里率领他的信徒重新占领这块营地。请你们相信并等着瞧吧！”读完这段文字，旅行者就站起身来，发现周围站着不少男人，他们在微笑，仿佛同他一道念过了铭文，觉得非常可笑，正期待着他同意他们的看法。旅行者装作并未发现这点似的，把一些硬币分给他们，等了一会儿，直至桌子重新推过来盖住了坟墓，然后离开茶馆，向港口走去。

士兵和犯人在茶馆里碰上了熟人，被留了下来。但不久他们就得离开这些熟人，因为旅行者才走到通向小船的那长长的石级的半路上，他们还来得及追赶上他。也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最后的时刻迫使旅行者把他们带走。正当旅行者在下面跟一位船夫商谈引渡到轮船的价钱的时候，这两人飞速地奔下石级，一声不吭，因为他们不敢声张。可是等他们来到下面，旅行者已经上了小船，船夫正把小船撑离岸边。他们本来还想跳进小船，但旅行者从船板上拾起一根沉甸甸的、打了结的缆绳，向他们发出威胁，这才阻止了他们往下跳。

洪天富 译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略嫌小了些、地地道道的人住的房间静卧在四堵熟悉的墙壁之间。在堆放着衣料样品的桌子上方——萨姆沙是旅行推销员——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并装在了一只漂亮的镀金镜框里的。画上画的是一位戴毛皮帽子围毛皮围巾的贵妇人，她挺直身子坐着，把一只套没了她的整个前臂的厚重的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

格里高尔接着又朝窗口望去，那阴暗的天气——人们听得见雨点敲打在窗格子铁皮上的声音——使他的心情变得十分忧郁。“还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吧。”他想，但是这件事却完全办不到，因为他习惯侧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竟无法使自己摆出这个姿势来。不管他怎么使劲扑向右边，他总是又摆荡回复到仰卧姿势。他试了大约一百次，闭上眼睛，好不必看见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后来他开始在腰部感觉到一种还从未感受过的隐痛，这时他才不得不罢休。

“啊，天哪，”他想，“我挑上了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在外面跑买卖比坐办公室做生意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痒痒，便仰卧着慢慢向床头挪近过去，好让自己头抬起来更容易些；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了白色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可是立刻又把腿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引起他浑身一阵寒颤。

他又滑下来回复到原来的姿势。“这么早起床，”他想，“简直把人弄

得痴痴呆呆的了。人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后宫里的贵妇。譬如每逢我上午回旅店领取已到达的订货单时，这帮老爷们才在吃早饭。我若是对老板来这一手，我立刻就会被解雇。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被解雇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上掉下来不可！坐到那张斜面桌上并居高临下同职员说话，而由于他重听，人家就不得不走到他跟前来，这也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工作方式了。嗯，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只要等我积攒好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要五六年吧——我就一定把这件事办了。那时候我就会时来运转。不过眼下我必须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

他看了看那边柜子上滴滴答答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六点半，指针正在悠悠然向前移动，甚至过了六点半了，都快六点三刻了。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明明是拨到四点钟的；它一定已经闹过了。是闹过了，可是这可能吗，睡得那么安稳竟没听见这使家具受到震动的响声？嗯，安稳，他睡得可并不安稳，但是也许睡得更沉。可是现在他该怎么办？下一班车七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就得拼命赶，可是货样还没包装好，他自己则觉得精神甚是不佳。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他也是免不了要受到老板的一顿训斥，因为公司听差曾等候他上那班五点钟开的火车并早已就他的误车作过汇报了。他是老板的一条走狗，没有骨气和理智。那么请病假如何呢？这可是令人极其难堪、极其可疑的，因为他工作五年了还从来没有病过。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组织的医生来，会责备父母养了这么一个懒儿子并凭借着那位医生断然驳回一切抗辩，在这位医生看来他压根儿就是个完全健康却好吃懒做的人。再说，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医生的话就那么完全没有道理吗？除了有一种在长时间的睡眠之后确实是不必要的困倦之外，格里高尔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甚至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饥饿感。

他飞快地考虑着这一切，还是未能下定决心离开这张床——闹钟恰好打响六点三刻——这时有人小心翼翼敲他床头的房门。“格里高尔，”有人喊——是母亲在喊“现在六点三刻。你不想出门了？”好和蔼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中却掺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来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

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听，随后便彻底毁坏了那句话的余音，以至人们竟不知道，人们是否听真切

了。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并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是，谢谢母亲，我这就起床。”隔着木头门外面大概觉察不出格里高尔声音中的变化，因为一听到这句话母亲便放下心来，踢踢踏踏地走了。但是这场简短的谈话却使其余的家里人都注意到格里高尔令人失望地现在还在家里，而这时父亲则已经敲响了他侧边的一扇门，敲得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你怎么啦？”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而在另一扇侧门旁边妹妹却轻声责怪道：“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尔向两边回答说：“我马上就好了。”并努力以小心翼翼的发音以及在各个词儿之间加上长长的休止来使他的声音失去一切异乎寻常的色彩。父亲也走回去吃他的早饭去了，妹妹却悄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我求你了。”可是他却根本不想去开门，而是暗自庆幸自己由于经常旅行而养成的这种小心翼翼的习惯，即便在家里他晚上也是要锁上门睡觉的。

首先他想静悄悄地、不受打扰地起床，穿衣并且最要紧的是吃早饭，然后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他分明觉察到，躺在床上他是不会考虑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记得在床上曾经常感受过某种也许是由于睡姿不好而造成的轻微的疼痛，及至起床时才知道这种疼痛纯属子虚乌有，现在他急于想知道，他今天的幻觉将会怎样渐渐消逝。声音的变化无非是一种重感冒、一种推销员职业病的前兆而已，对此他没有丝毫的怀疑。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上稍稍一抬，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可是下一步就难了，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本来用胳膊和手就可以坐起来；可是他现在没有胳膊和手，却只有这众多的小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且他竟无法控制住它们。他想屈起其中的一条腿，这条腿总是先伸得笔直；他终于如愿以偿把这条腿屈起来了，这时所有其余的小腿便像散了架，痛苦不堪地乱颤乱动。“可别无所事事地待在床上。”格里高尔暗自思忖。

他想先让下身离床，可是他尚未见过、也想象不出是什么模样的这个下身却实在太笨重，挪动起来十分迟缓。当他最后几乎发了狂，用尽全力、不顾一切向前冲去时，他却选择错了方向，重重地撞在床腿的下端，一阵彻骨的痛楚使他明白，眼下他身上最敏感的部位也许恰好正是他的下身。

所以他便试图先让上身离床，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床沿。这也轻易地做到了，尽管他身宽体重，他的躯体却终于慢慢地跟着头部转动起来。可是等到他终于将头部悬在床沿外边时，他又害怕起来，不敢再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向前移动，因为如果他终于让自己这样掉下去，他的脑袋不摔破那才叫怪呢。正是现在他千万不可以失去知觉；他还是待在床上吧。

但是，当他付出同样的辛劳后又气喘吁吁像先前那般躺着，并且又看到自己的细腿也许更厉害地在相互挣扎，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平息这种乱颤乱动时，他又心想，他不能老是在床上待着，即便希望微乎其微，也要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脱离这张床，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可是他同时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三思而后行比一味蛮干强得多。这当儿，他竭力凝神把目光投向那扇窗户，但是遗憾的是，甚至连这条狭街的对面也都裹在浓雾中，这一片晨雾实在难以让人产生信心和乐观的情绪。“已经七点了，”方才闹钟响时他暗自思忖，“已经七点了，可是雾一直还这么重。”他带着轻微的呼吸静静地躺了片刻，仿佛他也许期盼着这充分的寂静会使那种真实的、理所当然的境况回归似的。

但是随后他便心想：“七点一刻以前我无论如何也要完全离开这张床。到那时候公司里也会有人来询问我的情况的，因为公司七点前开门。”于是他开始设法完全有节奏地将自己的整个身子从床上摆荡出去。倘若他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从床上掉下去，着地时他将尽量昂起脑袋，估计脑袋还不至于会受伤。后背似乎坚硬；跌在地毯上后背大概不会出什么事。他最担心的还是那必然会引起巨大响声，这响声一定会在一扇扇门后即使不引起恐惧也会引起焦虑。可是这件事做起来得有点胆量。

当格里高尔已经将半个身子探到床外的时候——这种新方法与其说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还不如说是一种游戏，他永远只需要一阵一阵地摆荡——他忽然想起，如果有人来帮他一把，这一切将是何等的简单方便。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和那个使女——就足够了；他们只需要把胳膊伸到他那拱起的背下，这么一托把他从床上托起来，托着这个重物弯下腰去，然后只需小心翼翼地耐心等待着他在地板上翻过身来，但愿细腿们一触到地便能发挥其作用。那么，姑且不管所有的门都是锁着的，他是否真的应该叫人来帮忙呢？尽管处境非常困难，想到这一层，他禁不住透出一丝微笑。

他已经到了使出更大的力气摆荡便几乎要保持不了平衡的地步，很快他就要不得不最终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因为再过五分钟便是七点一刻——正在这时候，寓所大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是公司里派什么人来了。”他暗自思忖，几乎惊呆了，而他的细腿们却一个劲儿舞动得更猛烈了。四周保持着片刻的寂静。“他们不开门。”格里高尔心里在想，怀抱着某种无谓的希望。但是随后使女自然就一如既往踏着坚定的步子到门口开门去了。格里高尔只需听见来访者的第一声招呼便立刻知道这是谁——是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了。为什么只有格里高尔生就这个命，要给这样一家公司当差，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池，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难道所有员工统统都是无赖，难道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忠诚、顺从的人，这个人即便只是在早晨占用公司两三个小时就于心不安得滑稽可笑，简直都下不了床了？若是派个学徒来问问真的不顶事——假若压根儿有必要这么刨根问底问个不休的话——秘书主任就非得亲自出马，就非得由此而向无辜的全家人表示，这件可疑的事情只能委托秘书主任这样的行家来调查吗？与其说是由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断，还不如说是由于格里高尔想到这些事内心十分激动，他用尽全力一跃下了床。响起了一声响亮的撞击声，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闹声。地毯把跌落的声音减弱了几分，后背也比他想象的更富有弹性，这声并不十分惊动人的闷响便是这么产生出来的。只有那脑袋他没有足够小心地将其翘起，撞在地板上了；他扭动脑袋，痛苦而愤懑地将它在地毯上蹭了蹭。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秘书主任在左边邻室里说。格里高尔试着设想，类似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会不会有朝一日也让秘书主任碰上；其实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像是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粗暴的回答似的，现在秘书主任在隔壁房间里坚定地走了几步，让他那双漆皮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妹妹从右边的邻室里用耳语向格里高尔通报消息：“格里高尔，秘书主任来了。”“我知道了。”格里高尔嘟哝道，但是他没敢将嗓门提高到足以让妹妹听见的程度。

“格里高尔，”这时父亲从左边邻室里说道，“秘书主任先生来了，他要知道为什么你没乘早班火车走。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对他说什么。再者，他也想亲自和你谈谈。所以请你开开门吧。他度量大的，对房间里凌乱不会见怪的。”“早上好，萨姆沙先生！”秘书主任和蔼地招呼道。“他身体不舒服。”母亲对秘书主任说，而父亲则还在门旁说：“他身体不舒服，您相信我吧，秘书主任先生。要不然格里高尔怎么会误了一班火车！这孩子脑袋瓜子里一心只想着公事。他晚上从来不出门，连我瞧着

都快要生气了；现在他已经在城里待了八天了，可是每天晚上他都守在家里。他和我一起坐在桌旁，默默读报或研究火车时刻表。如果他用钢丝锯干点活儿，这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种消遣了。譬如他就用两三个晚上雕刻了一只小镜框；您会感到惊讶的，它雕刻得多漂亮；它就挂在这房间里；等格里高尔一开门，您马上就会看到它。您的光临真叫我高兴，秘书主任先生。光靠我们简直没法让他开门，他固执极了；他一定是身体不舒服了，尽管他早晨矢口否认。”“我马上就来。”格里高尔慢条斯理地说，可是却寸步也没移动，生怕漏听了交谈中的一句话。“太太，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秘书主任说，“但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可是话也得说回来，我们买卖人——你可以说是晦气也可以说是福气——出于生意经往往只好不把这种小毛小病当做一回事。”“秘书主任先生现在可以进去看您了吗？”不耐烦的父亲又敲门问道。“不行。”格里高尔说。左边邻室里顿时出现一片令人难堪的寂静，右边邻室里妹妹开始啜泣起来。

妹妹为什么不到其他人那儿去呢？她大概现在才起床，根本还没开始穿衣吧。那么她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不起床并且不让秘书主任进来，因为他有丢掉这份差使的危险，因为随后老板就又要向父母亲逼债吗？眼下这不都是瞎操心嘛。格里高尔还在这里，丝毫也不想离开他的家人嘛。眼下他好好地躺在这地毯上，哪个知道他目前状况的人都不会当真要求他让秘书主任进来的。可是格里高尔总不会由于这个小小的失礼行为马上就被开除的吧，以后很容易就可以找个借口把它掩饰过去的嘛。格里高尔觉得现在他们与其抹鼻子流眼泪苦苦哀求，还不如别来打扰他的好。但是正是这种捉摸不定的情况令其他人感到苦恼，证明着他们的态度无可厚非。

“萨姆沙先生，”秘书主任提高嗓门说，“您这是怎么回事？您把您自己关在房间里，光是回答‘是’和‘不是’，不必要地引起您父母极大的忧虑，还以一种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方式疏忽了——我只是捎带提一句——您的公务职守。我现在以您父母和您经理的名义和您说话，并正式要求您立刻做出明确的解释。我感到惊讶，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您是个文文静静、明达事理的人，可是现在您似乎突然要耍怪脾气了。虽然今天早晨经理向我暗示了您不露面的原因——他提到了最近委托您收取的那笔现款——但是我确实几乎以我的名誉向他担保这根本不可能。可是如今我在这里看到您执拗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完全失去了任何兴致，丝毫也不想替您去说项了。您在公司里的地位绝不是最牢固的。这些话我本

来想私下里对您说的，但是既然您在这里白白糟蹋我的时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令尊和令堂就不可以也一起听听呢。近来您的成绩很不能令人满意；现在虽然不是做生意的旺季，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不做生意的季节是根本不存在的，萨姆沙先生，是不允许存在的。”

“可是秘书主任先生，”格里高尔气愤地说，一激动便忘记了一切，“我马上，我这就来开门。我有点不舒服，头晕，起不了床了。我现在还躺在床上呢。但是现在我已经又有了精神了。我正在下床。请稍等片刻！情况还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可是我已经恢复健康了。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患上这种病！昨天晚上我还好好儿的，我父母亲是知道的嘛，或许不如说，昨天晚上我就已经有所预感。想必人们已经看出我有点不对头了。我为什么没向公司告病假！我总以为，这病用不着请假待在家里我也能挺过去的。秘书主任先生！请您体谅我的父母！您现在对我所做的种种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过。也许您还没看到我已经寄出的最近一批订单吧。再者，我就乘八点钟的火车上路，这几个小时的休息使我精力充沛起来了。您别耽误时间了吧，秘书主任先生；我本人马上就上班，劳您大驾，把这一点告诉经理并代我向经理问好！”

就在格里高尔急促发出这一席话，几乎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的当儿，分明是由于有了床上的那些锻炼，他已经轻易地渐渐接近那只柜子，现在正试图靠着它使自己直立起来。他果真想开门，果真想露面并和秘书主任谈话；他很想知道，那些现在如此渴望见到他的人一旦看见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他们对这一切泰然处之，那么他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大惊小怪，只要抓紧时间就真的可以在八点钟赶到火车站。起先他从光滑的柜上滑落下来几次，但是他最后猛一使劲终于站直了起来：对于下身的疼痛他一点儿也不在意了，虽然它火辣辣地作痛。他向着近处一把椅子的靠背倒下，他用自己的细腿紧紧抓住靠背的边缘。这一下他却也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并且沉默不语了，因为现在他可以倾听秘书主任讲话了。

“您们也哪怕听懂了一句话了吗？”秘书主任问父母亲，“他不是在我们寻开心吧？”“天哪，”母亲已经带着哭声在喊，“他也许得了重病了，我们还在折磨他。葛蕾特！葛蕾特！”随后她便嚷嚷。“母亲？”妹妹从另一边叫喊。她们隔着格里高尔的房间对嚷起来。“现在你赶快去找医

生。格里高尔病了。快去请医生。你听见格里高尔现在的讲话声了吗？”“那是一种牲畜的声音。”葛蕾特说，比起母亲的叫喊来声音显得格外的轻。“安娜！安娜！”父亲通过门厅朝厨房里喊并拍着巴掌，“马上找个锁匠来！”话音未落，那两个女孩子便奔跑着穿过门厅，只听见裙子发出飕飕的响声——妹妹怎么会这么快穿上衣服的呢？——并猛一把拉开寓所大门。人们根本没听见关门声；她们大概让大门敞开着了，哪出了什么大不幸的事大门往往都是这么敞开着。

可是格里高尔的心境却平静得多了。人们虽然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的话说得相当清楚，比从前清楚，也许是因为耳朵习惯了吧。可是人们总算相信他并不是完全没病，并准备帮助他了。采取这些初步措施时的那种信心和沉着令他感到欣慰。他觉得自己又被纳入到人类的圈子里，虽然其实不太清楚医生和锁匠是什么人，却希望这两个人取得了了不起的、惊人的成绩。为了使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重要谈话中声音尽可能清晰些，他稍微嗽了嗽嗓子，当然竭力压低声音，因为很可能这种嗽声听起来就已经不同于人的咳嗽声，这正是他自己都不敢于决断的事。这当儿，隔壁房间里一片寂静。也许父母正和秘书主任一起坐在桌旁，在悄悄地说话，也许大家都靠在门旁，都在偷听呢。

格里高尔扒着椅子慢慢向门口移动过去，在门口撂下椅子，向房门扑过去，靠着门板直起身来——他的细腿的底部有一些黏性——在那儿休憩片刻，缓过一口气来。但是随后他便开始用嘴巴来转动插在锁孔里的钥匙。遗憾的是，他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牙齿——他用什么来咬住钥匙呢？——不过他的下颚倒十分结实，足以担当此项任务；在它的帮助下他也果真启动了钥匙，他没有注意到他无疑给自己造成某种伤害了，因为一股棕色的液体从他嘴里流出来，淌过钥匙并滴到地上。“您们听，”秘书主任在隔壁房间里说，“他在转动钥匙。”这对格里高尔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可是本来大家都应该对他喊，父亲和母亲也应该对他喊：“加油，格里高尔！”他们应该高喊：“永远向前，紧紧顶住锁孔！”以为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的艰难动作，他竭尽全力，死命咬住钥匙。他随着钥匙的旋转而绕着锁孔舞动；现在还在用嘴使自己的身体保持直立，他按照需要或是吊在钥匙上，或是随后使用自己身体的全部重量又将钥匙压下去。锁终于啪的一声反弹回去，这个清脆的响声简直使格里高尔如梦初醒。他舒了一口气暗自思忖道：“看我没用锁匠吧！”并将脑袋搁在门把上，想将门完全打开。

由于他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开门，所以实际上这扇门已经开出相当大的一个缝隙了，而人们却还看不见他自己的身影。他必须先慢慢绕着一扇门扇旋转，而且得十分小心，如果 he 不想恰好在人们进入房间之前重重地仰脸摔到地上去的话。他正在艰难地挪动自己，顾不上注意别的事情，这时他却听见秘书主任大声“哦”了一声——这声音听起来就像风在呼啸——而他同时也看到，最靠近门口的他怎样用一只手捂住张开的嘴巴并徐徐向后退去，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均匀作用的力在驱动他们似的。母亲——虽然秘书主任在场，她照样披散着一头一夜睡眠后蓬乱森竖的头发站立在那儿——先是合掌望着父亲，随后便向格里高尔走过去两步并倒在了地上，衣裙在她四周摊开了来，脸庞垂在胸口完全隐匿不见了。父亲恶狠狠地捏紧拳头，仿佛他要将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似的，随即犹豫不定地扫视了一下起居室，接着便用双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他的宽阔的胸膛颤抖着。

格里高尔根本就不到房间里去，而是从里面靠住那半扇关紧的门，所以只有他的半个身子以及那上面那个向一边倾斜的脑袋可以看得见，他正歪着脑袋在张望别人。这当儿，天色明亮得多了，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街对面那幢长得没有尽头的深灰色建筑的一个分段——那是一座医院——一排隔一定距离安置的窗户贯穿这幢建筑的正面；雨还在下，但是落到地面上的只是一滴滴大的、个别可以看得见的并且全然也是零星星星掉下的雨点。桌子上摆着数量极其众多的早餐餐具，因为对于格里高尔的父亲来说早餐是一天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他一边读着各种报刊一吃就是好几个小时。正对面墙上挂着一幅他服兵役时的照片，当时他是少尉，他的手按在剑上，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容，分明是要人家尊敬他的军人风度和制服。门厅的门开着，由于寓所的大门也开着，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寓所外面的前院和向下的那道楼梯的开头几个梯级。

“唔，”格里高尔说，他分明意识到自己是唯一保持着镇静的人，“我马上就穿好衣服，包好样品就走。你们愿意，你们愿意让我走吗？唔，秘书主任先生，您会看到，我并不是冥顽不化，我喜欢工作；出差是辛苦的，但是不出差我就没法活。秘书主任先生，您去哪儿？去公司吗？是吗？您会如实报告一切吗？人可能一时没了工作能力，但是随后就会不失时机地回忆起从前的成绩并想到，以后，等消除了障碍，他一定会更兢兢业业地工作。我是非常感激经理先生的，这一点您十分清楚。另一方面，我要为我的父母和妹妹操心。我处境困难，但是我也会重新摆脱困境的。您就不要来给我平白地增添麻烦了。请您在公司里帮我美言

两句！人们不喜欢旅行推销员，我知道。人们以为，他大把大把地挣钱，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诱因去更好地考虑这种成见嘛。可是您，秘书主任先生，您比公司里别的员工都更了解情况呀，而且甚至，我们私下里说说，比经理本人还更了解情况，他作为东家在做出判断时容易受迷惑对一个员工产生不好的印象。您也很清楚地知道，旅行推销员几乎整年都不在公司里，很容易成为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的牺牲品。对此他防不胜防，因为他对此等事情往往一无所知，等到他精疲力竭做完一次推销旅行，在家里亲身感受到那糟糕的、莫名其妙的后果时他才有所感悟。秘书主任先生，您先别走，您总得对我说一句话吧，向我表明，您认为我的话至少有一小部分是对的！”

可是一听到格里高尔的头几个词儿秘书主任就已经扭过身去，他只是张开嘴唇回头从耸动的肩膀上向格里高尔望去。在格里高尔讲话的期间他片刻也没有站定，而是眼睛盯住了格里高尔，向门口溜过去，一步一步地趑过去，仿佛存在着一道不准离开房间的秘密禁令似的。他已经到了门厅了，按照他最后一次将脚从起居室抽回时的那个突然的动作来判断，人们一定会以为，他刚才一定是灼伤脚跟了。可是一到门厅他便远远伸出右手指向楼梯，好似那儿有一个超自然的救星在等待着他。

格里高尔明白，如果他不想要让自己在公司里的职位受到极大的危害，他就决不可以让这位秘书主任怀着这种心情离去。父母对这一切不甚了然；天长日久，他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以为格里高尔在这家公司里工作，一辈子可以吃穿不愁了，而且现在他们一心只想着眼前的愁苦事，根本无暇顾及将来的事。但是格里高尔顾及到了。必须挽留、安慰、说服秘书主任，并在最后博得他的好感；格里高尔和他一家人的前途全系在这上面呢！要是妹妹在这儿就好了！她聪明，当格里高尔还心平气和地仰卧着的时候她就已经哭了。秘书主任，这个爱好女人的人，一定会受她的驾驭；她就会关上寓所大门，在前室里劝他不要害怕。可是妹妹还就是不在，格里高尔只好亲自出马。没有想到他还根本不了解自己眼下的活动能力，也不去想一想，他的话可能——甚至十之八九又不会被人听懂，他离开了那半扇门扇；在门洞里挤过去；想向正可笑地用双手抓住过道楼梯栏杆的秘书主任走去；可是立刻一边寻找着支撑，一边轻轻一声喊叫跌倒下来，他那众多的细腿着了地。它们刚一着地，他便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身体上的适意：细腿们踩在实地上了；他高兴地注意到，它们完全听从指挥，它们甚至竭力把他带向他想去的那个方向；他已经以为，最终摆脱一切苦难的时刻已经为期

不远了。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刹那间，就在他摇摇晃晃，由于动作受到遏制，在离他母亲不远处，躺在她正对面的地板上的时候，似乎正完全陷入沉思之中的母亲却霍地跳了起来，远远伸出双臂，叉开十指，大喊：“救命，天哪，救命！”低垂着脑袋，仿佛她想把格里高尔看得更真切些似地，可是偏偏又身不由己地向后退去；忘记了她身后摆着那张已摆好餐具的桌子，当她退到桌子近旁时便好似心不在焉地一屁股坐了上去，并且好像丝毫不曾觉察到，咖啡正从她身旁那把已打翻的大咖啡壶里汨汨地往地毯上流。

“母亲，母亲！”格里高尔轻声说并抬起头来看着她。一瞬间他把秘书主任完全忘却了；可是他的下巴却忍不住咂巴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淌出来的咖啡。母亲见状再次尖叫起来，逃离开桌子，扑进向她迎面奔来的父亲的怀里。可是格里高尔现在无暇顾及他的父母；秘书主任已经在楼梯上；下巴搁在栏杆上，他还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格里高尔急走几步，想尽快追上他；秘书主任想必有所察觉，因为他一个大步跳过好几级，消失不见了，“嗨！”可是他一边还叫喊，这叫声响彻整个楼梯间。遗憾的是，秘书主任这一逃跑似乎使迄今一直比较镇静的父亲也慌乱了起来，因为他非但自己不去追赶秘书主任，或者起码不妨碍格里高尔去追赶，他反倒用右手操起秘书主任的手杖，那根此人连同帽子和外套一起落在椅子上的手杖，用左手从桌子上抓起一大张报纸，一边踩着脚，一边挥动手杖和报纸，要把格里高尔赶回到他的房间里去。格里高尔百般请求也无济于事，他的请求也没有人懂得，不管他多么谦恭地转动脑袋，父亲只是一个劲儿拼命跺脚。那一边，母亲不顾天气凉爽打开了一扇窗户，身子探在了窗外，她把手远伸到窗户外面捂住了自己的脸。胡同和楼梯间之间刮起一阵强劲的穿堂风，窗帘掀起来，桌子上的报纸沙沙响，有几张在地面上翻滚。父亲无情地驱赶并发出嘘嘘声，简直像个狂人。可是格里高尔还根本没练习过后退，所以确实退得很慢。假如格里高尔可以转身的话，他马上就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但是他担心这极费时间的转身会让父亲不耐烦，父亲手中的手杖随时会照准他的后背或头部给以致命的一击。可是最终格里高尔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惊恐地发现，倒退起来他连方向也掌握不了；就这样，他一面始终不安地侧过头去瞅着父亲，一面开始尽量迅速、而其实却只是很慢地掉转身子。也许父亲觉察到了他的良好意愿，因为他非但不干扰他，甚至还时不时远远地用手杖尖头搞点旋转动作。父亲若不发出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嘘嘘声那该有多好！格里高尔让这嘘嘘声搞得心慌意乱。他已经几乎完全转过身来了，可是他却始终听着这嘘嘘声，竟晕头转向，又转回去了一

些。然而当他最后总算将脑袋挪到门口时，这才发现，原来他的身体太宽，一下子还挤不进去。父亲在目前的心境下自然也决不会想到应该开开另外半扇门，以便让格里高尔顺利通行。他一心只想着，格里高尔必须尽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也决不会允许格里高尔做那些繁琐的准备动作的，可是为了直起身来并且也许以这种方式从门口走进去，他就必须做好这些准备。现在他反倒大声喧嚷着把格里高尔往前赶，仿佛没有什么障碍似地；这在格里高尔身后听起来已经不再像是单纯一位父亲的声音了；现在确实不是闹着玩的了，于是格里高尔便——不顾一切地——挤进门里去。他身子的一边拱了起来，他斜躺在门口，他的一面腰部完全擦伤了，洁白的门上留下了难看的斑点，不一会儿他就给卡住了，单凭自己竟丝毫也动弹不得，身子一边的细腿们悬在空中颤抖，另一边的则在地上给压得十分疼痛——这时，父亲从后面使劲推了他一把，现在这一把倒确实救了他的性命，他当即便血流如注，远远跌进了他的房间里。房门还在手杖的一击下砰地关上了，随后屋子里终于寂静了下来。

二

直到薄暮时分格里高尔才从像是昏厥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其实过不了多久他自己也一定会醒过来的，因为他觉得已经休息好并且也睡够了，然而他却觉得，仿佛他是让一阵疾走的脚步声以及一阵小心关上那扇通向门厅的房门的响声吵醒了似的。街上的电灯在天花板上和家具的较高部稀稀拉拉投下淡淡光晕，可是下面格里高尔的身旁却是一片黑暗。他慢慢地，仍还笨拙地用自己现在才晓得珍视的触角摸索着向门口挪去，想去看一看，那儿发生了什么事了。他的左半身似乎整个儿成了一道长长的、绷得又紧又不舒服的伤疤，他的两排细腿事实上只能瘸着走了。况且，一条细腿在早晨的事件过程中受了重伤——只伤了一条腿，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如今毫无生气地搭拉在后面。

到了门边他才发现，究竟是什么把他吸引到那儿去了：那是某种可吃的食物的味道。原来那儿放着一只盛满了甜牛奶的盆子，里面还飘浮着几小片白面包。他几乎高兴得笑了起来，因为他现在比早晨更加饿了，他当即把脑袋浸到牛奶里去，几乎把眼睛也浸没了。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失望地把头缩了回来；不单单是因为他那棘手的左半身使他吃起东西来困难重重——只有整个身体一块儿呼哧呼哧喘着气，他才能吃东西——而且他还觉得这牛奶一点儿也不好喝，而这牛奶一直是他最喜欢喝

的饮料，而且妹妹一定是因此才将它放在那儿的，哟，他几乎是怀着反感地转身撒下那只盆，爬回到房间中央去了。

格里高尔从门缝里看到起居室的煤气灯点亮了，可是往日里父亲惯常在白天的这个时间提高嗓门将他的下午出版的报纸读给母亲并且有时也读给妹妹听，而现在人们却听不到一点响声。唔，也许妹妹在谈话和信中经常向他谈到的这种读报的习惯最近压根儿就改掉了吧。但是四周围也是一片寂静，虽然寓所里肯定不是空无一人。“一家人过着多么平静的日子啊！”格里高尔暗自思忖，他一边呆呆地凝视着这一片黑暗，一边在心里感到一种莫大的自豪，因为他能够让他的父母和妹妹在一幢如此美好的寓所里过上这样一种生活。可是如果现在一切宁静、一切舒适、一切满足都要恐怖地宣告结束的话，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为了使自己不致耽于这样的遐想，格里高尔宁可活动活动，于是便在房间里爬来爬去。

在这漫长的夜晚，有一回一扇边门，还有一回另一扇边门开了一条小缝，后来又迅速关上了；大概是谁要进来，可是又顾虑重重。于是格里高尔便在贴近起居室门边的地方停下，决心要设法把那个犹豫不决的来访者带进来，或者至少也要弄清楚此人是谁；但是现在门不再开启，格里高尔白等了。清晨那会儿，所有的门全锁着，大家都想进来见他，现在他开开了一扇门，其余的门显然在这一天里已经打开了，却又谁也不来了，而且钥匙也反插在外面。

夜阑人静时起居室的煤气灯才熄灭，这时很容易便可断定，父母和妹妹这么久一直还没睡，因为人们分明听得见，现在这三个人都在踮着脚尖离去。这下天亮前是会有人进来看格里高尔了；所以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考虑现在他该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可是他被迫匍匐在其地板上的这间高大空旷的房间使他感到恐惧，他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因为这毕竟是他已经住了五年的房间呀——他做了一个半无意识的转身动作并且不无一种轻微的羞耻感，便急忙爬到躺椅的下面，尽管他的背部有一点受挤压，尽管他再也不能抬起头来，他在那里却顿时感到十分舒服，唯一感到遗憾的，只是他的身体太宽，无法完全藏到躺椅的下面去。

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一部分时间他在假寐中度过，而饥饿则一再使他惊醒，另一部分时间却在忧愁和模糊的希望中度过。他左思右想，总是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目前必须态度冷静，用忍耐和极度的

体谅来协助家人克服他在目前的情况下被迫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

一大清早，天还几乎没亮，格里高尔便有机会来检验他方才所下的决心是否坚定，因为妹妹几乎完全穿好了衣服从门厅那边开开门并表情紧张地向里张望。她没有立刻找到他，但是当她发现他在躺椅下面时——天哪，他总得待在什么地方呀，他总不能从那儿飞走嘛——她大吃一惊，以致她竟情不自禁地从外面又砰地把门关上了。可是仿佛她后悔她的举动似的，她马上又打开门，像是来看望一位重病人或者甚至一位陌生人似地踮着脚尖走了进来。格里高尔把头略探出躺椅的边缘并观察她的行动。她会不会看到，他没喝那牛奶，而且并非是因为不饿，她会不会送另一种比较合他口味的食物进来？她若不自动这样做，那么他宁可饿死，也不愿去提醒她注意这一情况，尽管他其实迫不及待想从躺椅下钻出来，匍匐在她脚下，求她拿点随便什么好吃的食物来。但是妹妹立刻惊愕地发现那只盆仍然是满的，只是在四周泼洒了一些牛奶，她立即把盆拿起来，不过不是直接用手，而是用一块破布，把它端走了。格里高尔极想知道，她会拿来什么替代的食品，他做出了种种猜测。但是他永远也猜不中，妹妹一片好心实际上正在做着什么事。为了测试他的嗜好，她给他送来品种繁多的食物，全都摊在一张旧报纸上。有不新鲜的、半腐烂的蔬菜；有昨天晚饭吃剩下来的肉骨头，上面蒙着已经变稠板结的白色调味汁；一些葡萄干和杏仁；一块两天前格里高尔已经认为不可食用的乳酪；一个干面包，一个抹了黄油的面包以及一个抹了黄油、放了盐的面包。除了这一切以外，她还放上了那只盆子，往里倒了些清水，这盆子显然是永远地归他专用了。她考虑得很周到，她知道，格里高尔不会当着她的面吃东西的，所以她急忙离去，甚至还转动钥匙，让格里高尔明白，他可以舒适安乐地随意进食。眼看就要吃饭了，格里高尔的细腿们一齐奔走起来。再者，他的伤口多半也已经完全愈合了，他不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他感到惊讶并想到，一个多月以前他用刀割伤了一点点手指头，前天他还觉得这个伤口相当的痛呢。“难道现在我不那么敏感了？”他一边在想，一边就已经贪婪地吮吸起乳酪来了，在所有的食物中，这乳酪立刻就把他强烈地吸引住了。他眼里噙着满意的泪水，迅速地一口又一口地吞吃乳酪、蔬菜和调味汁；那些新鲜的食物他反倒不喜欢吃，连它们的气味他都忍受不了，甚至把他想吃的东西叼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吃。他吃饱了，正懒洋洋地躺在原处，这时妹妹为了示意让他退回去正慢慢转动钥匙。这使他立刻惊醒了过来，虽然他几乎已经睡着了，于是他又急忙躲到沙发榻下面去。但是待在沙发榻下面，即便只是妹妹在房间里的短暂的片刻，也需要他做出巨大的自我克制，

因为饱餐一顿之后他的身体有点圆鼓起来，他在那儿给挤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他憋闷得透不过气来，用略微凸出来的眼睛在一旁观看，懵然无知的妹妹怎样用一把扫帚不光把吃剩的，而且也把格里高尔根本没有碰过的食物扫成一堆，仿佛这些没碰过的食物也不再可以食用了似的，还看着她怎样急急忙忙将这一切倒进一只桶里，盖上木盖，提着它走了。她刚一转过身去，格里高尔便从沙发榻下钻出来，舒展身子，活动肢体。

如今格里高尔就是这样每天获得他的饭食，一次在早晨，就在父母和女仆还在睡觉的时候，第一次是在大家吃完午饭之后，因为这时父母同样也还要睡一会儿，而女仆则让妹妹打出去办一件什么事。他们当然也不愿意让格里高尔饿死，可是也许他们只想听人说说他吃东西的情形，他们根本不忍心亲自去看一眼吧，也许是妹妹想避免给他们增添哪怕可能只是一种小小的忧伤吧，因为他们实在是够烦心的了。

至于在那第一天上午人们是用什么借口将医生和锁匠又从寓所里打发出去的，格里高尔便不得而知了，因为既然他的话人家听不懂，所以谁也不认为，连妹妹也不认为，他会听懂别人的话，于是乎，每逢妹妹在他房间里，他便总是不得不满足于只是偶或听到她的叹息声和向圣者的祈求声。后来，她对这一切略微有些习惯了——完全习惯当然永远不可能——格里高尔才有时听到一句怀有好意的，或者是可以被解释为怀有好意的话。“今天他倒是吃得很香。”每逢格里高尔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她便会这样说。遇到如今渐渐日益频繁出现的相反的情形时，她通常就几乎总是忧伤地说：“又是什么都没碰。”

虽然格里高尔无法直接获得什么消息，他却从隔壁房间偷听到某些话，他一听到哪儿有说话的声音，便立刻跑到那个房间的房门旁边，把整个身上贴在门上。特别是在头几天，几乎没有哪次谈话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他的，即便只是秘密地谈到他。整整两天，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全家人在商量该怎么办；但是即便在饭前饭后人们也在谈论这同一个题目，因为总是至少有两个家庭成员待在家里，这大概是由于谁也不想单独待在家里的缘故吧，而且大家也决不会全都离开这寓所。女仆也在第一天——不完全清楚，对于所发生的事她知道些什么、知道多少——马上就乞求母亲立刻辞退她，而当她一刻钟以后辞别的时候，她眼泪汪汪感谢受到辞退，就像感谢人们在这里为她做了一件大好事那样，并且在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的情况下居然发了一个可怕的誓言，说

是她决不向任何人泄露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情况。

现在妹妹也得帮着母亲做饭了；其实这也并不很费事，因为人们几乎什么也不吃。格里高尔一再听到，一个人怎样徒劳地劝另一个人吃饭，得到的回答总不外是：“谢谢，我饱了。”或诸如此类的话。饮料大概是什么也不喝的了。妹妹经常问父亲，他想不想喝啤酒，她自告奋勇，说要亲自去买，她见父亲不吭声，为了打消父亲的顾虑她便说她也可以让看门的女人去买，但是这时候父亲终于断然地说了一个“不”字，于是大家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在第一天，父亲便既向母亲也向妹妹说明了家庭的经济现状和前景。他时不时从桌子旁边站起，拿来一份什么凭据或一本什么备忘记事本，这些东西都放在一只小小的保险箱里，这是五年前他的公司破产时保存下来的。人们听到，他怎样打开那把复杂的锁，拿走寻找的物件后又将其锁上。父亲的这些说明部分是格里高尔遭囚禁以来所听到的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他本来以为那家公司没给父亲留下一丁点儿财产，起码是父亲没对他说过任何与此相反的话，而格里高尔则自然也没向他问起过这件事。当初格里高尔一心只想着要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所以他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几乎是一夜之间便从一个小办事员变成一个旅行推销员，从此自然便有了更多的赚钱的机会，他在工作上的成就立刻便以佣金的形式转化成现金，可以放在家里桌上呈现在惊诧而又喜悦的家人面前。那真是无比美好的时刻，这样美好的时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至少没有这般风光地出现过，虽然格里高尔后来挣钱很多，他有能力承担并且也确实承担了全家的开支。家里人也好，格里高尔也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嘛，人们感激地接过这钱，他乐意交付这钱，可是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了。只有妹妹还令格里高尔感到十分亲近，他秘密盘算着，想在明年送她到音乐学院去学习，她跟格里高尔不一样，她酷爱音乐，拉得一手好小提琴，进音乐学院学习势必要花一大笔钱，他会想别的法子筹措这笔钱的。格里高尔在城里短暂逗留期间，在和妹妹谈话中间就经常提到音乐学院，但是始终只把这当作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这种不着边际的话父母连听都不愿意听；但是格里高尔却念念不忘这件事，打算在圣诞前夜隆重宣布这件事。

就在他挺直身子紧贴在门上在那儿倾听的当儿，他在脑海里转悠着这些在他当前的状况下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念头。有时他疲惫不堪实在无

法注意倾听，便懒懒地把头靠在门上，但是立刻又将它挺直，因为连他由此而引起的那个小小的响声也让隔壁听见了，这响声竟让所有的人都沉寂了下来。“现在他又在干什么了？”稍过片刻父亲说，这话显然是对着门说的，随后这中断了的谈话才又渐渐恢复。

于是格里高尔充分了解到——因为父亲惯常重复自己说过的话，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这些事情了，部分也因为这一切母亲并非听了一遍马上就明白——尽管遭到了种种不幸，还是从旧日的岁月里积攒下了一笔当然是相当微不足道的财产，在这期间没有动用过的利息使这笔财产略微有所增加。但是除此之外，格里高尔每月拿到家里来的钱——他自己只留几个零用钱——没有完全花掉，并且已经攒成一笔小小的资金。格里高尔在他的门后频频点头，对这种意想不到的谨慎和节俭感到喜悦。他原本可以用这些多余的款子再还掉一些父亲欠经理的债务的，他摆脱掉这个职务的那个日子也就可以早早地到来，但是现在看来，父亲做了这样的安排，这无疑好多了。

可是要让一家人靠吃利息过日子，这笔钱还远远不够；这笔钱也许可以维持全家一年，至多两年的生计，没法再多了。所以这只是一笔不可轻易动用、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的钱；过日子的钱人们还得去挣。而父亲虽然身体健康，但是已经年迈，他已经五年没做什么事，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会有什么作为了。在这五年里，在他劳累而无成就的一生中初次享受安逸的这五年里，他发胖了，并且因此而变得动作相当迟钝。年迈的母亲患有气喘病，在家里走动都很困难，每隔一天就要呼吸不畅躺在靠近敞开的窗户旁的沙发上休息，难道还要让她出去挣钱？妹妹17岁还是个孩子，她应该安享她迄今为止的这种生活方式，穿得漂漂亮亮，睡得安安稳稳，帮忙做做家务，参加一些不太花钱的娱乐活动，尤其是要拉拉小提琴，难道要妹妹出去挣钱吗？只要一谈到这种出去做工挣钱的必要性，格里高尔便离开门，一头扑到门旁那张凉丝丝的沙发上，因为他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

在漫漫长夜里他往往整宵整宵躺在那儿，一刻也不睡，只是一连几小时在皮面上蹭来蹭去。要不他就不辞辛劳将一把椅子推到窗口，然后就爬到窗台上，把背顶住椅子，靠在窗户上，显然是企图回忆从前临窗眺望时的那种自由舒畅的感觉。因为他看哪怕只是稍许远一些的东西确实一天天越来越模糊了；从前他常常诅咒街对面那座医院，因为它老是逼近在他眼前，现在他却压根儿再也看不见它了，倘若他不是分明知道

自己住在这条寂静、而完全是在市区的夏洛蒂街，他便会以为窗户外面是一片荒漠，灰蒙蒙的天空与灰蒙蒙的大地浑然成为一体。细心的妹妹只是两次看到椅子放在窗口，她就每次打扫完房间后把那把椅子重新丝毫不差地放回到窗口，甚至从此还让里面那层窗户开着。

若是格里高尔可以和妹妹说话并感谢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也许心里还会好受些；可是现在他却感到很痛苦。妹妹当然试图尽量抹掉整个事件中的那种令人难堪的成分，时间过得越久，她这一点自然也就做得越成功，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格里高尔也看得透彻得多了。她走进房间的那个样子就已经令格里高尔感到惊骇。刚刚走进房间，她便不失时机地急忙将各扇房门关上，可见她平时多么留意，不让任何人看到格里高尔房间里的样子，随即便直奔窗口，仿佛她要窒息了似地猛一把打开窗户，尽管天气还相当寒冷，也要站在窗口停留片刻，做深呼吸。她每天这样奔跑、喧哗，惊吓格里高尔两次；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在沙发榻下哆嗦，心里却分明知道，她只要能在一个格里高尔待着的、窗户紧闭的房间里逗留，她是一定不会这样来搅扰他的。

有一回，大概在格里高尔变形一个月以后，其实这时她已经没有理由见到他再吃惊了，她比平时进来得早了一些，恰好看到格里高尔一动不动、模样可怖地站立着向窗外张望。倘若她看到他待在那儿妨碍她立刻开窗所以就不进来了，对此格里高尔倒也就不觉得意外了，可是她不仅仅是不进来，她甚至还吓得朝后一退并随手关上了门；一个陌生人见了简直会以为格里高尔是埋伏在那里等候她并且想咬她一口呢。格里高尔当然马上就藏到沙发榻下面，可是他不得不一直等到中午才看见妹妹重新进来，她似乎比平时烦躁不安得多了。从中他认识到，他的模样还一直让她感到不堪忍受，今后也必定会依然让她感到不堪忍受；还认识到她一定得十分地克制自己，才不致一看到他从沙发榻下探出的哪怕只是他全身的那一小部分便逃离而去。为了连这个情景也不让她看见，有一天他用自己的后背——他做这桩活儿花了四个小时——把床单拖到沙发榻上，将它铺得完全可以遮住他的身体，妹妹即使弯下腰来也不会看得见他。如果她认为没有必要铺上这条床单，她就会将它撤走，因为对于格里高尔来说这样把自己完全封闭住绝不是开心的事，这是明摆着的嘛，可是她却让床单这么铺着，没去动它，当有一次格里高尔用头小心翼翼把床单拱起来一些想看看妹妹对这一新措施有什么反应时，他甚至以为看到了一丝感激的目光。

在头十四天里父母鼓不起勇气进来看他，他经常听到，他们怎样充分赞赏妹妹现在所做的工作，而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是经常对妹妹感到恼火，因为他们一直觉得她是一个没多大用处的女孩子。可是如今，就在妹妹在那儿打扫的当儿，两个人，父亲和母亲，便常常等候在格里高尔的房门口，她一出来就不得不详细讲述房间里的情形，格里高尔吃了些什么，这一回他行为举止怎么样，是否多少有些好转的迹象。母亲倒是相当早地就想来看望格里高尔，但是父亲和妹妹起先举出合乎情理的理由劝阻她，格里高尔十分注意地倾听这些理由，他完全赞同它们。可是后来他们就不得不用强力拖住她了，她就大声叫喊：“让我去看看格里高尔，他是我的不幸的儿子呀！你们难道不明白我必须去看他吗？”于是格里高尔便想，也许确实还是让母亲进来看看的好，当然不是每天都来，不过也许每星期一次；她各方面都比妹妹懂事多了，妹妹虽然很勇敢，可是毕竟还只是个孩子，说到底也许只是由于少不更事才承担了一项如此艰难的任务吧。

格里高尔的看母亲的愿望不久便实现了。考虑到他父母的情况，格里高尔不愿意大白天在窗户附近露面，可是爬行，他在这几平方米的地板上也爬行不了多少，这静卧不动他在夜晚就已经难以忍受了，不久他便食不甘味，所以为了消遣他便养成了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来回爬行的习惯。他尤其喜欢倒挂在上面积天花板上；这完全不同于在地板上躺着；呼吸起来比较轻松；一阵轻微的震荡贯穿全身；处于格里高尔在那上面的这种几乎是高高兴兴、精神涣散的状态中，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令自己感到惊诧不已地松开细腿，啪的一声掉在地板上。但是现在他当然完全不同于以往地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甚至在这样重重的一跌时也没伤着自己。于是妹妹立即发现了格里高尔为自己找到的这项新的娱乐活动——爬行时他也会在一些地方留下他的黏液的痕迹的——她顿时便想到要尽量为格里高尔在爬行时提供方便，应该将妨碍他爬行的家具，尤其是柜子和写字台搬走。可是她一个人搬不动；请父亲来帮忙她不敢；女佣人肯定不会帮她的忙的，因为这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子虽然自从以前的那位厨娘辞退之后勇敢地坚持下来了，但是请求主人恩准她连续不断地锁住厨房门，只有在人家特意叫她时才将门打开；所以妹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有一次乘父亲不在时叫母亲来帮忙。母亲也兴冲冲叫喊着过来，到了格里高尔的房门口却闷声不响了。妹妹自然先看了看，房间里是否一切正常；然后她才让母亲进去。这时格里高尔已经急忙将床单拉得更低些并把它弄出更多的皱褶来，整个儿看起来确实就像一条偶然张在沙发榻上的床单。这一回格里高尔也不从床单下往

外窥视了；他放弃了这一回就可以见到母亲的这个希望，只要她来便感到分外高兴了。“来吧，我们看不见他。”妹妹说，她显然拉着母亲的手。于是格里高尔听到，这两个弱女子怎样移动那只无论如何也是沉重的旧柜子，妹妹怎样总是自己拣最重的那部分活儿干，根本不听母亲的告诫，母亲怕她过度劳累。她们搬了很久。大概干了一刻钟以后母亲说，这只柜子还是放在这里别搬走了吧，因为首先它太沉，父亲回来之前她们搬不走，让这只柜放在房间中央就会每天都阻塞格里高尔的去路，而其次呢，根本就吃不准搬走家具是否称格里高尔的心意。说是她觉得情况恰恰相反；她一看到这空荡荡的墙壁心里简直堵得慌；干吗格里高尔就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呢，他早就习惯了这些房间里的家具了嘛，他在空落落的房间里会感到孤独的。“这样不就是，”母亲最后完全轻声地做结论说，她压根儿就几乎是在耳语，仿佛她不知道格里高尔精确的逗留地点，她想避免让他听到哪怕只是话语的声响似地，因为他听不懂她说的话，对此她深信不疑，“这样不就是，好像我们搬走家具是在表示我们放弃一切恢复健康的希望、对他撒手不管了吗？我以为，最好我们还是设法让这房间完全保持原样，以便让格里高尔一旦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来时觉得一切依然如故，就更容易忘掉其间这段时光。”

听到母亲这一席话格里高尔明白了，两个月里没有与人进行任何直接交谈，加上家庭内部的这种单调的生活，这一定完全把他搞糊涂了，因为他居然真的会要求腾清他的房间，对此他无法做出别的解释。难道他真的要让人把这间温暖的、配备着舒适的祖传家具的房间变成一个洞窟，他在这个洞窟里虽然可以向四面八方不受阻拦地爬行，可是同时也得迅速、完全地忘记自己以往的人性？他现在的确已经快要忘却了，仅仅是这久已不曾听见的母亲的语声才使他醒悟过来。什么东西也别搬走，一切必须保持原样；家具对他的状况的这些良好作用他不能没有；如果说这些家具妨碍他去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来回爬行的话，那么这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大优点。

但是可惜妹妹持不同看法；她已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地养成了在父母面前谈论格里高尔事务时以专家身份出现的习惯，所以现在听了母亲的建议，妹妹也有充分的理由坚持不仅搬走她起先独自想到的柜子和写字台，而且也坚持搬走全部家具，只留下那张必不可少的沙发榻。促使她提出这一要求的当然不仅仅是孩子气的倔强以及那种在最近如此意想不到和含辛茹苦获得的自信；她也确实观察到格里高尔爬行需要许多地方，而这些家具他却显然根本用不着。但是也许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们

的那种耽于梦想的意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意识一有机会便要寻求满足，现在葛蕾特受它诱惑，想让格里高尔的情况激起人们更大的惊恐，然后就可以为他做比迄今更多的事。因为进入一间格里高尔完全独霸这空荡荡的墙壁的房间里去，大概除了葛蕾特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做的了。

因此她不让母亲动摇自己的决心，母亲在这间房间里惴惴不安似乎也没有主见，不久便沉默不语，竭尽全力帮助妹妹把柜子搬出去。唔，不得已时这柜子格里高尔可以不要，可是这写字台得留下。妇人们哼哧哼哧推着这柜子刚离开房间，格里高尔便从沙发榻下探出脑袋，想看一看，他怎样才能小心谨慎、尽量妥善地干预此事。可是不幸的是，偏偏母亲先回来，葛蕾特则在隔壁房间里抱住那只柜子，独自将它摇来晃去，当然丝毫也搬不动它。可是母亲没看惯他的模样，他会把她吓出病来的，所以格里高尔惊恐万分急速到沙发榻的另一端，但是已经无法阻止床单在前面略微晃动。这就已经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怔住了，静静地站住片刻，随后走回到葛蕾特那边去。

尽管格里高尔一再默默对自己说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不过就是搬动了几件家具罢了，可是他不久不得不承认，妇人们的这阵来回走动，她们的轻声叫喊，家具在地板上的扒抓却像一阵巨大的、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喧闹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拼命把头和腿蜷缩成一团并将身体贴近地面，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切他再也忍受不住了。她们全部搬出他房间里的家具；拿走他喜欢的一切东西；那只放弓形细齿锯和别的工具的柜子已经让她们给搬出去了；现在她们正在拧松已经埋紧在地板上的那张写字台，他作为商学院学生，作为市立中学学生，甚至作为国民小学学生就已经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业了，——这时他确实没有时间去审核这两位妇女所抱有的良好意图了，况且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她们的存在，因为她们由于精疲力竭干活时已是哑然无语，只听见她们沉重的脚步声。

于是 he 就这样突然冲了出来——妇人们正靠在隔壁房间里的写字台上稍事喘息——四次改变行走方向，他的确不知道，他应该先拯救什么，这时他看到此外已是空落落的墙上醒目地挂着那位穿一身毛皮衣服的女士的画像，便急忙爬上去，紧紧地贴在镜框玻璃上，那玻璃粘住他，令他那热烘烘的肚子感到很舒服。至少这幅现在完全让格里高尔遮盖住了的画像如今是谁也拿不走了吧。他把头转向起居室门，以便观看

她们如何回来。

她们没有休息很久便回来了；葛蕾特用胳膊揽住母亲，几乎托住了她。“我们现在拿什么呀？”葛蕾特边说边环顾四周。这时她的目光和墙上格里高尔的目光相遇。大概只是由于母亲在场她才保持镇静，向母亲低下头去，以便阻止母亲东张西望，并且说道，声音中却是带着颤抖并且未加考虑：“来，我们还是暂且先回到起居室里去吧？”对于格里高尔来说葛蕾特的意图是清楚的，她想将母亲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将他从墙上轰下去。唔，让她来试试看！他趴在他的画像上，决不松开它。他还想扑到葛蕾特的脸上去呢。

但是葛蕾特的话反而让母亲感到不安，她走到一边，一眼看见印花墙纸上那个巨大的棕色斑点，她还没来得及及回过神来意识到她看到的是格里高尔，便扯开轻微沙哑的嗓门喊道：“啊，天哪，啊，天哪！”随即便好像完全绝望似地张开双臂，一头栽倒在沙发榻上，不动弹了。“你，格里高尔！”妹妹举起拳头，目光炯炯地说。这是自变形以来她直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她跑到隔壁房间里去拿某种可以使母亲苏醒过来的香精；格里高尔也想帮忙——还有时间可以去拯救这幅画像——可是他粘紧在玻璃上，不得不使了很大劲才挣脱开来；随后他又跑进隔壁房间，仿佛他像已往那样可以给妹妹出个什么主意似的，可是后来却只得无可奈何地站在她后面；她正在各种各样的小瓶子堆里翻寻着，她一转过身来，便吓了一大跳；一只瓶子掉在地上，摔碎了：一块碎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一种不知什么腐蚀性的药水环绕他四周流过；葛蕾特未敢多加逗留，拿起尽可能多的小瓶子，抱着它们直奔母亲那间房里而去，那门她用脚砰地踢上。如今格里高尔和母亲隔开了，由于他的过错母亲也许濒临死亡边缘；那门他不敢开，他生怕会吓跑了必须待在母亲身边的妹妹；除了等待，他现在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他开始爬行起来，他到处爬，他在墙上、家具上和房间天花板上爬，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

过了一小会儿工夫，格里高尔软弱无力地躺着，四周一片寂静，也许这是一个好兆头。门铃响了。那女孩当然是把自己锁在厨房里的，所以葛蕾特只好去开门。父亲来了。“出了什么事了？”他张口就问；想必是葛蕾特的那副神态向他泄露了天机。葛蕾特闷声闷气回答，显然她是把脸贴在父亲的胸脯上了：“母亲刚才晕了过去，不过这会儿她好些了。

格里高尔逃出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父亲说，“我一直告诉你们的嘛，可是你们女人就是不愿意听。”格里高尔明白，父亲把葛蕾特的过于简短的说明往坏的方面作解释，以为格里高尔犯了什么暴力行为了。所以现在格里高尔必须设法平息父亲的怒气，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向他做解释。于是他便躲避到他的房门口，蜷缩在门边，以便让父亲从门厅走进来时立刻可以看到，格里高尔怀有最美好的愿望，一心想着立刻返回自己的房间，没有必要将他驱赶回去，人们只需打开房门，他立刻就会进去的。

可是父亲无情无绪，觉察不到这种细腻的感情。“啊！”他一进门就喊，声音里仿佛既有愤怒，同时也有喜悦。格里高尔把头从门上缩回来，抬起它来瞧父亲。他确实没有想象到父亲会是这样，会是他现在站在这儿的这副模样；诚然，最近他只顾得新奇地爬来爬去，竟忘了像从前那样去关心寓所里别处发生的事，其实本应对情况变化有所思想准备的。但是，但是，这还是父亲吗？还是这同一个男子吗？从前每逢格里高尔动身出差，他便总是疲惫不堪地蒙头躺在床上；晚上回来时他总是身穿睡袍坐在靠背椅里迎候他，压根儿就不太能站得起来，而是只抬一抬胳膊表示高兴，在一年里几个星期天以及重大节日全家难得在一起散步时，他在其实已经走得很慢的格里高尔和母亲之间总是还要走得更慢一些，裹着他那件旧大衣，小心翼翼拄着拐杖艰难地向前移动步子，每逢他想说什么话，几乎总是站住脚，让陪同他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可是现在他身板挺得相当直；穿一身绷得紧紧的金纽扣蓝制服，这是银行杂役的穿扮；一个厚实的双下巴鼓出在上衣硬领外面；浓密的睫毛下一双黑眼睛射出活泼、专注的目光；那一头平时乱蓬蓬的白发梳成了整整齐齐、油光闪亮的分头。他将他那顶绣有金色交织字母、大概是一家银行名号首字母的帽子顺着弧线抛过整个房间扔在沙发榻上，将那件长长的制服上衣的下摆往后一甩，双手插在裤袋里，板着面孔朝格里高尔走去。他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过他却把脚抬得老高，格里高尔吃惊地看着他那巨大的靴后跟。然而他不多耽搁时间，他从他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起便知道，父亲认为对他只宜采取极端严厉的态度。因此他便在父亲前面奔走，父亲站住就停下，只要父亲一走动便又急忙向前奔走。他们就这样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动作来，甚至由于行走速度很慢，整个儿这件事就不像是一种追逐。所以格里高尔也暂且待在地板上，尤其是因为他害怕父亲可能会把往墙上或天花板上逃跑看作是特别恶劣的行径。可是格里高尔不得不暗暗对自己说，甚至连这种奔走他也坚持不了多久；因为父亲跨出一步，他就得完成大量的

动作。他已经开始感到气喘了，从前他那只肺也不太强。他正这样跌跌撞撞往前冲，为了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奔走上，几乎眼睛也不睁开；他愣愣怔怔除了奔跑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以拯救自己；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是可以随便上墙的，这里的墙壁当然都让精雕细镂、布满尖角和花边的家具挡住了——这时，有什么东西轻轻抛出，飞落在紧挨着他身边的地方，在他前面滚动起来。那是一只苹果；立刻又有第二只向他飞来；格里高尔惊吓得站住了；继续奔走是没有用的，因为父亲已下定决心要轰炸他。他用餐具柜上水果盘子里的苹果装满了自己的衣袋，也不好好瞄准，便将苹果一只一只地扔将出来。这些小红苹果像带了电似地在地板上到处滚动，互相磕碰。一只扔得不太用力的苹果轻轻触着格里高尔的后背，但是没有伤着他便滑了下去。紧接着又飞来的一只简直陷进他的后背里去了；格里高尔想挣扎着往前爬，仿佛一换地方这突如其来、难以置信的疼痛便会消失似的；然而他却觉得自己好像被钉住在原地，便六神无主地瘫倒在地上。他只是在投出最后一瞥时还看到，他的房门被突然用力拍开，母亲抢在尖叫着的妹妹的前头跑了过来，身穿内衣，因为为了在她失去知觉时好让她呼吸舒畅些，妹妹已经把她的衣服解开了，他还看到，母亲随后便向父亲奔去，在奔跑的路上她那已解开的衣裙一件接着一件滑落到地上，绊着衣裙向父亲扑过去，抱住他，紧紧地搂住他——可是这时格里高尔的视力已经衰退——双手抱住父亲的后脑勺请求饶格里高尔一命。

三

格里高尔所遭受的使他吃了一个多月苦头的重创——那只苹果作为可以看得见的纪念品还一直留在他身上，因为没有人敢取走它——好像使父亲也想起了格里高尔尽管具有他目前这种可悲的、令人憎恶的形态，却依然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人们不可以把他当敌人对待，而是应该把吞下并忍受厌恶、彻底忍受厌恶看作是家庭义务的准则。

即使格里高尔现在由于受了伤也许永远丧失了灵活行动的能力，眼下像一个老弱病残需要用好几分钟才能横贯他的房间——在高处爬行已是不可能——可是他为自己状况的这种恶化还是得到了一种在他看来完全足够的补偿，这就是每到傍晚时分那扇他惯常在一两个小时便加以严密观察的起居室门便会打开，致使他躺在自己房间里的暗处，不为起居室里的人所看见，可以看见全家人坐在照亮的桌子旁边，可以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这是得到全体应允的，所以完全不同于以往。

不过，这不再是昔日那种轻松活泼的闲谈，已往每逢格里高尔在小小的旅店房间里不得不疲惫不堪地钻进潮湿的被窝里时便常常怀着几分渴念想到那样的情景。他们现在往往很沉默。吃罢晚饭后不一会儿父亲便在扶手椅里睡着了；母亲和妹妹相互告诫保持安静；母亲把头低低地俯在灯下，给一家时装店缝制精致的内衣；已经当上了售货员的妹妹在晚上学习速记和法语，将来也许可以谋到一个较好的职位。有时父亲醒过来，仿佛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睡了一觉了似地，他对母亲说：“你今天又干了这么多针线活！”说罢立刻又睡着了，母亲和妹妹则神色疲倦地相视一笑。

父亲怀着一种固执，在家里也不肯脱掉他那身制服；睡袍一无用处地挂在衣钩上，而他却穿戴得整整齐齐在座位上打瞌睡，仿佛他时刻准备着应差，在这里也等候着上司的吩咐似的。因此虽然有母亲和妹妹加以悉心保护，他那身一开始就不是簇新的制服还是渐渐显得脏了起来，格里高尔常常整夜整夜地望着这身沾着层层污渍、闪着经常擦拭的金纽扣亮光的衣服，老人就穿着这身衣服极不舒服却又极安宁地睡觉。

时钟一敲10点，母亲便轻声细语，设法唤醒父亲，随后便劝说父亲上床睡觉，因为这里睡不安稳，父亲6点就要上班，极其需要睡个安稳觉。但是由于自从他当上杂役以来便犯上了这种犟脾气，他总是坚持要在桌子旁边多待一会儿，尽管他通常都会睡着，后来反正得花尽九牛二虎的力气才能说动他以床换扶手椅。不管母亲和妹妹怎样和声细语劝诫他、催促他，他总要慢慢摇上一刻钟脑袋，闭上双眼，不站起来。母亲扯他的袖管，对着他的耳朵说些奉承拍马的话，妹妹放下功课过来帮助母亲，可是父亲就是不听劝告。他更深地沉陷在他的扶手椅里。直到妇人们抓住他的胳肢窝，他才睁开眼睛，交替着望望母亲和妹妹并惯常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的平静的晚年。”于是在这两位妇人的搀扶下，他站起身来，颇费周折，仿佛他对他自己便是极沉重的负担似地，让妇人们一直扶到门口，在那里挥手叫她们回去，独自继续往前走，而母亲和妹妹则急忙分别扔下针线活和笔，追上父亲，以便继续助他一臂之力。

在这个操劳过度、疲倦不堪的家庭里，除了做些必不可少的事以外，谁还有时间去为格里高尔操更多的心呢？家庭开支日益紧缩；女仆给辞退了，一个蓬着满头白发高大瘦削的老妈子一早一晚来干些最粗重的活儿；所有其余的家务活儿都由母亲在干完众多的针线活儿之余承担

起来了。甚至从前每逢参加娱乐活动和节日庆典母亲和妹妹欢欢喜喜佩戴的那些各色家庭首饰也变卖掉了，这是格里高尔晚上从大家对各件首饰达到的卖价的议论中得知的。但是最感头痛的事却是，人们无法离开这幢对于眼下的境况来说太大的寓所，因为实在想不出什么迁居格里高尔的招儿来。但是格里高尔分明看出，妨碍迁居的不仅仅是因为顾及到他，因为用一只带几个通气孔的合适的板条箱很容易就可以把他装运走的；阻止家里人搬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那种完全绝望的情绪以及他们受到了在整个亲戚和熟人圈里谁也没有遭受过的一种不幸的打击的这个念头。世人要求穷人所做的一切，他们正最大限度地尽力去做，父亲给银行小职员们送早点，母亲含辛茹苦为陌生人缝内衣，妹妹按照顾客的命令在柜台后面跑来跑去，但是再做更多的事家里人已是力不从心了。每逢母亲和妹妹将父亲送上床之后重又返回来，放下手头的活计，靠近在一起，已经是脸颊贴着脸颊地坐着的时候；每逢母亲指着格里高尔的房间说：“葛蕾特，把那儿的门关上”；每逢格里高尔又身处黑暗之中而隔壁妇人们涕泪交流或欲哭无泪地凝视着桌子的时候；每逢这种时候，格里高尔便总是觉得背上的伤口好似重新疼痛了起来。

夜晚和白昼格里高尔几乎都是无眠地度过的。有时他想到在下一回开门时要完全像从前那样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经过了长时间之后，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经理和秘书主任，公司伙计和学徒，那个理解十分迟钝的听差，别家商号里的两三个朋友，外省一家客店里的一个侍女，一个可爱的、萍水相逢的女子，一家帽子商店里的一位女出纳员，他严肃认真而过分缓慢地向她求过爱——他们全都和陌生人或已被忘却的人混杂在一起出现，但是他们全都冷冰冰的，根本不来帮助他和他的家人，他们一消失，他便感到高兴。可是后来他又完全没有心思为他的家人分担忧愁了，而是只有对他照料不周而窝了一肚子的火，尽管他想象不出他会喜欢吃什么，他却制订计划，企图进入食物贮藏室，即便不饿，也要把本该属于他的从那儿叼走。妹妹现在再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让格里高尔吃上可口称心的饭食，她总是在早晨和中午去商店上班前急急忙忙用脚往格里高尔的房间里随便推进一点吃的，晚上根本不管这食物是否只是尝了几口，还是——大多数情况下——连碰也没碰一下，她便一挥扫帚将其扫了出去。她现在总是在晚上打扫这间房间，打扫起来简直是快得不能再快了。一条条肮脏的条纹沿墙伸展，到处都是团团尘土和垃圾。起先，在妹妹到来时格里高尔总待在这类特别引人注目的角落里，算是以这样的位置提出一种指责吧。但是他大概可以在那儿待上几个礼拜，妹妹也不会有所改进的；她分明和他一样看到这污秽的环境了，可

是她已经打定主意随它去了。然而她却带着一种在她身上完全是新的、压根儿就已经侵袭了全家的敏感维护着自己的这个打扫格里高尔的房间的特权。有一回母亲彻底扫除了一下格里高尔的房间，其实也不过就是用了几桶水的事儿——这一片湿漉漉的当然也伤害了格里高尔，他摊开身子、懊恼不堪、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榻上——但是母亲却不免受到惩罚。因为晚上妹妹刚发现格里高尔房间里的变化，她便一脸委屈地跑进起居室，不顾母亲举起双手苦苦央求，号啕大哭起来，父母——父亲当然已经从扶手椅里惊起——起先惊讶地、无可奈何地在一旁看着；后来他们也开始按捺不住了；父亲责备右边的母亲没让妹妹去清扫格里高尔的房间；随后便大声呵斥左边的妹妹，说是再也不许她去打扫格里高尔的房间；母亲则试图把激动得不能自制的父亲拉到卧室里去；妹妹啜泣得身子发抖，用自己的小拳头捶打桌子；格里高尔气得嗷嗷直叫唤，因为竟没有人想到要去把门关上，以避免让他看到这副景象听到这场吵闹。

可是即使妹妹一天上班下来疲惫不堪，懒得像先前那样去照料格里高尔，母亲也大可不必越俎代庖嘛，格里高尔不会受冷落的呀。因为有老妈子在呢。这位老寡妇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凭着她那副强壮的骨骼多半已经饱经风霜，其实不会对格里高尔怀有什么憎恶的。有一回她并非出于好奇，而是纯属偶然地打开了格里高尔的房间，一看到惊诧不已、没受人驱赶便开始来回奔走的格里高尔，便交叉着十指搁在胸前，惊讶地站住了脚。从此她便总是不失时机经常在早、晚稍稍打开房门，匆匆朝里瞥一眼格里高尔。起先她也招呼他往自己身边走拢过来，用她大概自以为客气友好的话，诸如“过来吧，老屎壳郎！”或者“你们瞧这老屎壳郎！”对于这类话语格里高尔丝毫不予理睬，而是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仿佛房门根本就没有开开似的。别让这老妈子兴致一来就这样无聊地滋扰他呀，应该命令她天天打扫他的房间嘛！有一回，是在清晨，一阵急骤的雨点敲打着玻璃窗，也许已经是春天即将来临的一个征兆了吧——

老妈子又絮絮叨叨^啰唆开了，格里高尔好不恼怒，他向她转过身去，像是要进行攻击似的，动作当然迟缓、羸弱无力。可是这位老妈子非但面无惧色，反而高高举起放在门旁的一把椅子，瞧她张大着嘴站在那儿的那副架势，她的企图十分明显，她手里的这把椅子不砸在格里高尔的后背上，她是不会把嘴闭上的。“那么不再往前走啦？”看到格里高尔又转过身去时她问，这才心平气和地把椅子放回墙角。

格里高尔几乎什么也不吃了。只是当他偶然从已准备好的食物旁边

经过时，他才玩儿似地往嘴里送上一口，在嘴里将它衔上几个小时，然后往往又将它吐掉。起先他想，是对他房间里的这种状况感到的悲痛才使他没有胃口吃饭，可是恰恰是对房间里的这些变化他很快就不以为意了。人们已经养成了把别处放不下的东西放到这间房间里来的习惯，这类东西现在多得很，因为人们把寓所里的一个房间租给了三个房客。这样一本正经的先生——三个人全都蓄着大胡子，这是格里高尔有一次从门缝里看到的——非常讲究整齐，不仅他们的房间要整齐，由于他们既然已经住进这儿来了，所以就要求整个寓所，尤其是厨房，都要井然有序。无用的，尤其是肮脏的杂物他们容忍不了。况且绝大部分生活用品他们都是自己带来的。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物件就变得多余了，这些东西卖起来虽然不值几个钱，可是人们也不愿意将它们扔掉。所有这些东西都塞进格里高尔的房间。厨房里的煤灰箱和垃圾箱同样也是如此。只要是眼下用不着的东西，做事总是急急忙忙的老妈子便干脆往格里高尔的房间一扔了事；幸亏格里高尔往往只看见那件有关的物件和拿住它的那只手。老妈子也许是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来拿走这些东西或者一下子把它们一股脑儿全扔出去，可是实际上它们经由她头一回一扔，扔到哪儿便一直一动不动待在哪儿了，如果不是格里高尔蜿蜒穿行于这堆破烂货之中，使它们有所移动的话，起先是迫于无奈，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可以自由爬行的地方，但是后来却是带着越来越大的乐趣了，虽然他在作了这样的行走之后疲倦和伤心得要死，又接连几个小时不动弹了。

由于这几位房客有时也在家公用的起居室里吃晚饭，所以有些个夜晚起居室门一直都关着，可是不开门格里高尔根本也无所谓，有几个晚上门开着他也沒好好加以利用，而是没让家里人察觉，在他那间房间里最昏暗的角落里一躺了事。可是有一回老妈子让起居室门敞开了一点点。当那几位房客晚上进来，点亮了灯的时候，那扇门依然这么开着。他们坐在桌子的上首，这是从前父亲、母亲和格里高尔坐的地方，展开餐巾，拿起刀叉。母亲端着一碗肉立刻出现在门口，妹妹端一大盆土豆紧随其后。食物冒着强烈的雾气。房客们向摆在他们面前的碗盆俯下身去，仿佛他们要在吃食之前检查它们似地，个头中等、在另外两位心目中似是权威的那个，果真就在碗里切开一块肉，显然是想断定，肉是否足够熟软，要不要退回厨房。他满意了，在一旁紧张观看的母亲和妹妹这才舒心地笑了起来。

家人们自己在厨房里吃饭。尽管如此，父亲进厨房之前先到这间房间里来，手里拿着帽子，鞠上那么一躬，绕着桌子转上那么一圈。房客

们一齐站起来，嚙动着胡子嘟哝几句。当他们随后单独待在一起时，他们几乎完全一声不吭地吃着。格里高尔觉得奇怪，他从饭桌上的种种响声中竟一再分辨出他们牙齿的咀嚼声，仿佛这是在向格里高尔表明，吃饭是要用牙齿的，若没有牙齿即便长着最漂亮的嘴巴也是无济于事。“我有食欲，”格里高尔充满忧愁地暗自思忖，“可是不想吃这些东西。像这几位房客这样吃法，我会一命呜呼的！”

恰好在这一天晚上——格里高尔记不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曾听到过小提琴声——厨房里响起了小提琴声。房客们已经吃罢晚饭，中等个儿已经拿出来一份报纸，给另外两位每人一张，于是他们往后一靠，一边读报一边抽烟。当小提琴开始奏响时，他们留神倾听，站起来并踮着脚尖走到门厅门口，他们挤成一团站住脚。人们在厨房里准是听到了他们的响声，因为父亲在说：“诸位听了这琴声也许觉得不舒服吧？可以马上不拉的。”“相反，”中等个儿房客说，“小姐不想到我们这儿来，到这儿房间里来演奏吗，这儿宽敞、舒适多了？”“哦，好的。”父亲说，仿佛是在演奏小提琴似的。房客们回到房间里去，等候着。不一会儿，父亲拿着乐谱架、母亲拿着乐谱、妹妹拿着小提琴走过来。妹妹神情安详地做着演奏的种种准备工作；父母从前从未出租过房间，所以对房客客气得过了头，竟不敢坐在他们自己的扶手椅上；父亲靠在门上，右手插在紧扣着的号衣的两个纽扣间；母亲却得到了一把由一位房客递给她的椅子，坐在边上一个角落里，因为那位房客偶然把椅子放到那里，所以她也就坐在那里了。

妹妹开始演奏；父亲和母亲各自从自己那个方向密切注视着她双手的动作。格里高尔受到琴声吸引，壮起胆向前爬了几步，脑袋已经伸进起居室了。他几乎不感到惊奇，他最近居然很少体谅别人；从前这种对别人的体谅是他引以为自豪的。然而恰恰是现在这个时候他实在是应该藏起来才是，因为由于他房间里到处积满了灰尘，稍稍一动尘土便飞扬，他身上也蒙满了灰尘；他在背上和两腰沾着绒毛、发丝和残羹剩饭爬来爬去；他现在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白天要在地毯上擦净几次后背。尽管处于这种状态，他却毫不畏惧，在起居室无污点的地板上向前爬行了几步。

不过倒是谁也没有注意他。家里人的注意力全倾注在小提琴演奏上；而房客们则先是将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妹妹乐谱架后面很近的地方，近到他们大家简直都能看见乐谱了，这势必会妨碍妹妹的，随后便

窃窃私语低着脑袋退回到窗口，他们也就待在那儿，父亲忧心忡忡地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情况确实再明显也不过了，显然他们本以为会听到美妙动听的小提琴曲的，他们失望了，对整个儿这场表演厌倦了，只是出于礼貌才继续让人扰乱自己的平静。尤其是从他们几个打鼻孔和嘴巴向空中吐出雪茄烟烟雾的那副模样中，人们可以推断出他们很不耐烦了。然而妹妹却演奏得十分精彩。她的脸侧向一边，目光专注而忧伤地追循着一行行乐谱。格里高尔又往前爬了几下，将脑袋紧贴着地面，以便也许能与她的目光相遇。既然音乐如此打动他的心，那么他是一头动物吗？他觉得，仿佛获取久盼的不知名的食物的途径正展现在他面前。他决心要一直推进到妹妹跟前，去扯她的衣裙，以此向她暗示，她可以带着她的小提琴到他的房间里来，因为这里谁也不像他那样欣赏她的演奏。他不愿意再让她离开他的房间，至少只要他活着就不愿意；他的恐怖形象他也将第一次派上用场；他要同时守卫他的房间的各扇房门，向来犯者怒吼；可是不要妹妹勉勉强强，她应该自觉自愿留在他身边；她可以和他一起坐在沙发榻上，向他低垂下耳朵，然后他就要向她透露，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让她到音乐学院去学习，倘若不是横遭不幸，他早在去年圣诞节——圣诞节已经过了吧？——当众宣布这一计划了，任何反对意见他都将置之不顾。妹妹听到之后就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格里高尔就会直向着她的肩膀直起身来，去吻她的脖子，打从她在店里上班以来她便一直不系丝带或领子地敞着颈脖。

“萨姆沙先生！”那个中等个儿房客对父亲喊，不再多说一句话地用食指指着慢慢向前移动的格里高尔。小提琴声戛然而止，中等个儿房客先是摇摇头对他的朋友们笑了笑，随后便又朝格里高尔望去。父亲似乎觉得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将格里高尔赶走，而是先去安抚房客，尽管这几位房客根本没发火，他们对格里高尔似乎比对小提琴演奏更感兴趣。他急忙向他们奔去，试图用张开的胳膊把他们推到他们的房间里去，同时用他自己的身体挡住他们看格里高尔的视线。现在他们倒真的有点儿恼火了，人们不再知道，这是由于父亲的行为，还是由于他们现在才发现住在隔壁的竟是格里高尔这样的邻居。他们要求父亲做出解释，也举起双臂，烦躁地捻着自己的胡子，只是缓慢地向他们的房间退去。这当儿，妹妹已经从演奏突然中断后陷入的迷惘中回过神来，在她懒懒散散垂着手握住了一阵小提琴和弓并继续仿佛还在演奏似地看了一阵乐谱之后，一下子迅速打起精神，将提琴搁在呼吸艰难剧烈喘息着还在扶手椅里坐着的母亲的怀里，跑进在父亲催促下房客们已更快地向之移近的隔壁房间里。人们看到，床上的被子和褥垫在她那双训练有素的手下飞来

腾去，铺叠得整整齐齐。房客们还没有走进房间，她就铺好床，溜了出来。父亲似乎又犯犟脾气了。他忘了对房客应有的尊敬。他一个劲儿驱赶，直至最后那个中等个儿房客在房门口重重地一跺脚，从而使父亲停住脚步。“我正式宣布，”他说，举起手，也对母亲和妹妹扫了一眼，“考虑到这个寓所和家庭里存在着的这种令人厌恶的状况，”——说到这里他往地板上狠狠啐了一口——“我立刻解除我的房间的租约。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这几天的房租我当然一个子儿也不付，不但不付，我还要考虑，我要不要向您提出什么——您相信我吧——极容易说明理由的要求。”他沉默不语，眼睛直勾勾看着前方，仿佛他在等待着什么似的。他的两位朋友果真立刻插嘴说：“我们也立刻退租。”话音刚落，他便抓住门把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父亲用双手摸索着踉踉跄跄向他的扶手椅走去，一头栽进椅子里；看样子他似乎伸开四肢像平时那样打个瞌睡，但是他那颗晃荡不定的脑袋的猛烈点头表明，他根本不在睡觉。整个这段时间里，格里高尔一直静静地趴在房客们当场发现他的那个地方，对他的计划失败感到失望，但是也许也是因长期挨饿而造成的身体虚弱，使他无力动弹。他怀着某种明确的预感担心下一刻大家便会向他发泄满腔的怒气并等待着。就连那把小提琴在母亲手指的颤抖下从她怀里掉落下来并发出震响，他也没有受到惊吓。

“亲爱的父母，”妹妹边说边用手拍了拍桌子算作引子，“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们也许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愿意当着这头怪物的面说出我哥哥的名字来，所以只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我们照料它、容忍它，我们仁至义尽了嘛，我认为，谁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

“她说得对极了。”父亲自言自语。还一直在气喘吁吁的母亲露出一种癫狂的眼神用手捂住嘴干咳起来。

妹妹急忙奔向母亲，扶住她的额头。父亲似乎听了妹妹的话产生了某些想法，坐直了身子，在房客们吃完晚饭还未从桌上撤下去的盘子之间把玩着他那顶杂役帽，偶或向安静的格里高尔瞥一眼。

“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妹妹如今是专对父亲说，因为母亲在咳嗽什么也听不见，“它还会要了你们俩的命的，我分明看到了这个结局。如果人们已经不得不在干着这么繁重的工作，像我们大家这样，那么人们

就不能还家里忍受这没完没了的折磨。我也受不了了。”说罢，她号啕大哭起来，她的眼泪掉在母亲的脸上，她用机械的动作擦拭母亲脸上的泪水。

“孩子，”父亲同情地、充分理解地说，“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妹妹只是耸耸肩膀表示一筹莫展，刚才她还信心十足，如今这一哭她一反常态没辙了。

“如果他懂我们的话！”父亲半带着询问的口吻说；妹妹哭哭啼啼使劲一挥手，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懂我们的话，”父亲重复说并通过闭上双眼接受妹妹认为这事不可能的信念，“那么倒也许可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可是这……”

“他必须离开这儿，”妹妹喊道，“这是唯一的途径，父亲。你只需抛开以为这是格里高尔这个念头。我们这么久一直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真正的不幸。可是这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如果这是格里高尔的话，他早就会认识到，人和这样一头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就会自愿跑掉了。我们就没有哥哥，但是能继续生活下去，会缅怀他。可是这头动物现在却在迫害我们，驱赶房客，显然是想占领整幢寓所，让我们露宿街头。你瞧，父亲，”她突然尖叫起来，“他又来了！”在一阵完全令格里高尔不可思议的惊恐中，妹妹甚至离开了母亲，简直是推开了她的扶手椅，仿佛她宁肯牺牲母亲也不愿待在格里高尔身旁似的，并急忙奔到父亲背后，父亲只是由于她的态度才情绪激动起来，也站起身，像是保护妹妹似地在她身前略略举起双臂。

可是格里高尔根本不想吓唬什么人，更不想吓唬妹妹。他只不过是开始转身，想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不过这动作显得很引人注目，因为由于身上有伤残，在做艰难的转身动作时他不得不用脑袋来帮忙，他多次抬起头来并用头撞击地面。他停下来，环顾四周。他的良好意图似乎让人给看出来了；这只是一种瞬间的惊恐。如今大家都默默而忧伤地望着他。母亲伸出并拢着双腿，躺在她的扶手椅里，她疲惫不堪地几乎合上了眼睛；父亲和妹妹并排坐着，妹妹用手搂着父亲的脖子。

“现在我也许可以转过身去了吧！”格里高尔边想边重新开始干了起来。他抑制不住因过度劳累而发出的喘息声，也不得不时不歇一口气。不过倒也没有人在催他，一切全听凭他自己做主。当他完成了转身

动作时，他便立刻开始径直往回爬去。也对于他和自己的房间之间距离之大感到惊异，根本就不明白，他身体这样虚刚才是怎么几乎不知不觉走完同样这段路的。一心只惦记着赶快爬行，他几乎没注意，现在家里人不说话不吭声不滋扰他。当他已经到达门口时，他才扭过头来，没完全扭转过来，因为他觉得脖子变僵硬了，不过他总算还看到，在身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有妹妹站了起来。他最后瞥了母亲一眼，母亲完全睡着了。

他刚进入房间，房门就被急速关上，门上门闩，锁了起来。听到身后这突如其来的嘈杂声，格里高尔大吃一惊，他的细腿顿时都发软了。是妹妹这么迅捷地采取了行动。她早已站直身子等着，然后她灵巧敏捷地向前跨出几步，格里高尔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脚步声，她一边转动锁眼里的钥匙，一边朝父母喊了声“终于锁上了！”

“现在怎么办？”格里高尔自言自语，在黑暗中环顾了一下四周。不久他便发现，他现在几乎再也动弹不了了。他对此不感到惊异，他反倒觉得，他迄今居然一直能用这些细腿活动，这才是不自然的。此外他感到相当舒适。他虽然感到浑身疼痛，但是他觉得，疼痛仿佛正在渐渐减轻，最终似乎会完全消失。背上那只烂苹果以及四周蒙上了软乎乎的尘土的那个发炎的部位他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他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3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和平和的沉思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晨曦他还经历着了。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

当清晨老妈子来时——纯粹由于力气大和性子急，不管人们怎么求她别这样，她总是乒乒乓乓摔门，整幢寓所里她一来别人就再也甭想睡安稳觉——她在做这次寻常的短暂访问时起先没发现格里高尔有什么异样。她以为，他故意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装出一副大受委屈的样子；她相信他具有一切可能具有的理解力。由于她偶然在手里握着那把长扫帚，所以她就试图站在门口用它逗格里高尔发痒。当这么逗还不起作用时，她火了，便使劲捅了捅格里高尔的身体，当她很快便弄清了事情真相时，就睁大着眼睛，吹了一声口哨，但没有多耽搁时间，而是一把推开卧室房门，扯着大嗓门朝黑暗中嚷嚷：“您们快来瞧瞧吧，它死了；它躺在那儿，完全没气了！”

萨姆沙夫妇在双人床上坐直身子，先从老妈子带来的惊吓中镇定下

来，才慢慢领悟到她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可是随后萨姆沙夫妇便各自急忙下床，萨姆沙先生将毯子往肩上一披，萨姆沙太太只穿睡衣便出来；他们就这样走进格里高尔的房间。这当儿，起居室的门也开了，自从房客们住进来后葛蕾特便一直睡在那儿；她完全穿好了衣服，仿佛她根本就不曾睡觉似的，她那张苍白的脸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死了？”萨姆沙太太边说边抬头用询问的目光望着老妈子，虽然一切她都可以自己检验而且甚至不用检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是这么认为。”老妈子一边说，一边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还用扫帚把格里高尔的尸体往旁边推移了一大段距离。萨姆沙太太做了一个仿佛想拉住那把扫帚的动作，但没去拉。“唔，”萨姆沙先生说，“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他画了一个十字，那三位妇女学他的样。葛蕾特目不转睛望着那尸体说：“你们看，他多瘦呀。这么长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吃。食物拿进去了，又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格里高尔的身体果然完全干瘪，人们现在才真正看出这一点，现在这身体不再由细腿们抬高，而且此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转移视线了。

“来吧，葛蕾特，到我们房间里来一下。”萨姆沙太太挂出一丝忧郁的笑容说，葛蕾特依依地回头看了看那尸体便跟在父母身后走进父母的卧室。老妈子关上门，打开全部窗户。尽管是清晨，清新的空气中却已透着些许暖意。毕竟已经三月底了嘛。

那三位房客从房间走出来，惊讶地寻找他们的早餐；人们把他们忘了。“早餐在哪儿？”那位中等个儿房客阴沉着脸问老妈子。这位老妈子则把指头放在嘴上，然后匆忙地、一声不响地向房客们示意，要他们到格里高尔的房间来。他们也来了，随后就双手插进他们那有点儿穿旧了的上衣的口袋，在这间如今已完全明亮的房间里围住格里高尔的尸体站着。

这时卧室房门开启，只见萨姆沙先生身穿他那身号衣走出来，一只胳膊挽着他的妻子，另一只胳膊挽着他的女儿。三个人都有点儿哭肿了眼睛；葛蕾特不时将脸贴在父亲的胳膊上。

“你们马上离开我的寓所！”萨姆沙先生没有松开妇人们，指着门口说。“您这是什么意思？”中等个儿房客有点迷惑不解地说，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另两位反剪着双手，不断地搓着，像是在愉快地期待着一场激烈争吵，而这场争吵的结局八成将对他们有利。“我的意思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萨姆沙先生回答，在两位女士的陪伴下径直朝那位房客走

去。这位房客先是默默站着，低头望着地板，仿佛这种种事情在他脑子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条理。“那我们就走吧。”随后他说，并抬头看着萨姆沙先生，仿佛在一阵突然向他袭来的谦卑中他甚至要为此决定获得新的批准似的。萨姆沙先生只是睁大眼睛多次朝他略略点一点头。紧接着这位房客果真跨着大步走进门厅；他的两位朋友安详地垂着双手已经倾听了一阵，现在简直是蹦跳着跟在他后面，仿佛害怕萨姆沙先生会赶在他们前面走进门厅，截断和他们首领的联系似的。三个人在门厅里从衣钩上拿下帽子，从手杖架上拔出手杖，默默鞠一躬，离开了这所房子。怀着一种显然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不信任，萨姆沙先生带着两个妇人走到外面的过道里；靠在栏杆上，他们看着那三个人虽然缓慢、却不停地顺着长长的楼梯下去，在每一层楼的楼梯间的某一个转弯处消失不见，过了不多一会儿又出现；他们越往下走，萨姆沙一家人对他们的兴趣便消失得越多，而当一个肉铺伙计头上顶着一只筐神态骄傲地迎着他们上楼来，随后高高地从他们头顶上越过去的时候，萨姆沙先生很快便和妇人们一道离开栏杆，大家如释重负般地回到家里。

他们决定利用今天的时间休息和散步；他们不仅理应得到这一工作间歇；他们甚至绝对需要它。于是乎，他们在桌子旁边坐下，写三封请假信，萨姆沙先生写给经理处，萨姆沙太太写给定户，葛蕾特写给店主。他们正写着，老妈子走进来说她要走了，因为她早晨该做的活儿已经做完。三个写信人起先只点点头，没有抬眼看她，只是当老妈子总是还不肯离去时，人们才生气地抬起头来。“嗯？”萨姆沙先生问。老妈子面带微笑站在门口，仿佛她要向全家报告一件大喜事，但是只有当她受到彻底盘问时，她才会把它说出来。她帽子上那根几乎挺直的小鸵鸟羽毛，那根在她整段工作时间里都惹得萨姆沙先生生气的小鸵鸟羽毛，朝四面八方轻轻摇晃。“您究竟有什么事？”萨姆沙太太问，她还最受到老妈子尊敬。“哟，”老妈子回答说，笑咪咪的简直话都说不连贯了，“是这么回事，隔壁那玩意儿该怎么弄走，你们就不必操心了。事情已经办妥了。”萨姆沙太太和葛蕾特向她们的信埋下头去，仿佛她们想继续写信似的；萨姆沙先生发觉老妈子就要开始详细描述一切，便伸出一只手果断地阻住了她。但是由于不让她讲，她便想到自己急着要走，就显出显然受了侮辱的样子说：“那就回头见吧！”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去，把门甩得乒乓直响，离开了这所房屋。

“晚上就辞退她。”萨姆沙先生说，但是既没有从他妻子那儿也没有从他女儿那儿得到答复，因为老妈子似乎已经又扰乱了她们刚获得的宁

静。她们站起身来，走到窗户口并待在那儿，互相搂抱着。萨姆沙先生在扶手椅里向她们转过身去，静静地观察了她们一会儿。然后他喊道：“你们来呀。别管那些陈旧的事了吧。你们也稍许关心一下我吧。”妇女们立刻听从他的话，急忙走到他跟前，对他爱抚一番，并迅速写完她们的信。

随后三个人便一起离开寓所，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这样做了，他们坐电车出城到郊外去。这辆电车里只有他们这几个乘客，温暖的阳光照进了车厢。他们舒舒服服靠在椅背上商谈着未来的前景，结果表明，仔细一考虑，他们的前景一点儿也不坏，因为他们彼此还从未询问过各自的工作，原来这三份差使全都蛮不错，而且特别有发展前途。目前最能改善他们状况的当然是搬一次家；他们想退掉现在这幢还是由格里高尔挑选来的寓所，另租一幢小一些，便宜一些，但是位置更有利尤其是更实用的寓所。就在他们这么闲谈着的当儿，萨姆沙夫妇一眼看到他们这位心情变得越来越轻松愉快的女儿时几乎同时发现，最近的种种忧患尽管使她的面颊变得苍白，但她还是长成一个美丽、丰满的少女了。默不做声，几乎下意识地交换着会意的目光，他们想到，现在已经到了为她找一个如意郎君的时候了。当到达目的地时，女儿第一个站起来并舒展她那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时，他们觉得这犹如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意愿的一种确认。

张荣昌 译

乡村医生^[25]

我感到非常窘迫：我必须赶紧上路去看急诊；一个患重病的人在十英里外的村子里等我；可是从我这儿到他那里是广阔的原野，现在正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我有一辆双轮马车，大轮子，很轻便，非常适合在我们乡村道路上行驶；我穿上皮大衣，手里拿着放医疗用具的提包，站在院子里准备上路；但是找不到马，根本没有马。我自己的马就在头天晚上，在这冰雪的冬天里因劳累过度而死了；我的女佣人现在正在村子里到处奔忙，想借一匹马来；但是我知道，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白白地站着，雪愈下愈厚，愈等愈走不了了。那姑娘在门口出现了，只有她一个人，摇晃着灯笼；当然，谁会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把马借给你走这一程路呢？我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可是想不出一办法；我感到很伤脑筋，心不在焉地向多年来一直不用的猪圈破门踢了一脚。门开了，

门板在门铰链上摆来摆去发出拍击声。一股热气和马身上的气味从里面冒出来。一盏昏暗的厩灯吊在里面的一根绳子上晃动着。有个人在这样低矮的用木板拦成的地方蹲着，露出一张睁着蓝眼睛的脸。“要我套马吗？”他问道，匍匐着爬了出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弯下腰来看看猪圈里还有什么。女佣人站在我的身边。她说：“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家里还会有些什么东西。”我们两人都笑了。

“喂，老兄，喂，姑娘！”马夫叫着，于是两匹强壮的膘肥的大马，它们的腿紧缩在身体下面，长得很好的头像骆驼一样低垂着，只是靠着躯干运动的力量，才从那个和它们身体差不多大小的门洞里一匹跟着一匹挤出来。它们马上都站直了，原来它们的腿很长，身上因出汗而冒着热气。“去帮帮他忙。”我说，于是那听话的姑娘就赶紧跑过去，把套车用的马具递给马夫。可是她一走近他，那马夫就抱住她，把脸贴向她的脸。她尖叫一声，逃回到我这里来，脸颊上红红地印着两排牙齿印。“你这个畜生，”我愤怒地喊道，“你是不是想挨鞭子？”但是我马上就想到，这是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而当大家都拒绝我的要求时，他却自动前来帮助我摆脱困境。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对我的威胁没有生气，只顾忙着套马，最后才把身子转向我。“上车吧！”他说。的确，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我注意到这确实是一对好马，我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好马拉过车呢，我就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不过我得自己来赶

车，因为你认识路。”我说。“当然^啰，”他说，“我不跟你去，我要留在罗莎这里。”“不！”罗莎叫喊起来，并跑进屋里，预感到自己将遇到无可逃避的厄运；我听见她拴上门链发出的叮当声，我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我还可以看到她先关掉过道里的灯，然后穿过好几个房间把所有的灯都关掉，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她了。“你同我一道走，”我对马夫说，“否则我就不去了，即使是急诊也罢。我不想为这事把姑娘交给你作为代价。”“驾！”他吆喝道，同时拍了拍手；马车便像在潮水里的木头一样向前急驰；我听到马夫冲进我屋子时把房屋的门打开发出的爆裂声，接着卷来一阵狂风暴雪侵入我所有的感官，使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工夫，因为我已经到了目的地，好像病人家的院子就在我家的院门外似的。两匹马安静地站住了，风雪已经停止，月光洒在大地上，病人的父母匆匆忙忙地从屋里出来，后面跟着病人的姐姐。我几乎是被他们从车子里抬出来的，他们七嘴八舌地嚷嚷着，我一句也听不清楚。病人房间里的空气简直无法呼吸，炉子没有人管可是冒着烟。我想打开窗子，但是我首先得看看病人。这年轻的病人长得很瘦，不发烧，不冷，也不热，有一双失神的眼睛，身上没有穿衬

衫，他从鸭绒被下坐起来，搂住我的脖子，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医生，让我死吧。”我向四周看了一眼，没有人听到这句话；病人的父母正弯身向前默默地站着，静候我的诊断；姐姐搬来一张椅子让我放手提包。我打开提包，寻找医疗用具；这孩子还是从床上向我摸过来，要我记住他的请求；我取出一把小镊子，在烛光下检查了一下又把它放回去。“是的。”我有些亵渎神明地想，“上帝在这种情况下真肯帮忙，送来了失去的马，由于事情紧急还多送一匹，甚至还过了分多送了一个马夫——”这时我才又想起了罗莎。我该怎么办，我怎样才能救她，离她有十英里之遥，而且套的两匹马难以驾驭，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样才能把她从马夫身下拉出来呢？现在，这两匹马不知用什么方法松开了缰绳，我也不知道它们怎样从外面把窗户顶开的；每一匹马都从一扇窗户探进头来注视着病人，对于这家人的叫喊毫不在乎。“我最好马上就回去。”我想好像那两匹马在要求我回去似的，但我还是容许病人的姐姐替我脱下皮大衣，她还以为我热得有些晕眩了。老人给我斟来一杯罗姆酒，拍拍我的肩膀，他拿出心爱的东西来待客表明对我的亲切信赖。我摇了摇头；老人狭隘的思想，使我很不舒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谢绝喝酒。母亲站在床边招呼我过去，我顺从了，而当一匹马向天花板高声嘶叫的时候，我把头贴在孩子的胸口，他在我的潮湿的胡子下面颤栗起来。这就证实了我的看法：这孩子是健康的，只是血液循环方面有些小毛病，这是因为她母亲宠爱过分给他多喝了咖啡的缘故，但确实是健康的，最好还是把他赶下床来。我并不是个社会改革家，所以只好由他躺着。我是这个地区雇佣的医生，非常忠于职守，甚至有些过了分。我的收入很少，但我非常慷慨，对穷人乐善好施。可是我还得养活罗莎，所以这男孩想死是对的，因为我自己也想死。在这漫长的冬日里，我在这儿干什么啊！我的马已经死了，村子里没有一个人肯借马给我。我只得从猪圈里拉出马来套车；要不是猪圈里意外地有两匹马，我只好用猪来拉车了。事情就是这样。于是我向这家人点点头。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即使他们知道了，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开张药方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了解却是件难事。好了，我的出诊也就到此结束，我又一次白跑了一趟，反正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地区的人老是晚上来按我的门铃，使我深受折磨，但是这一次还得牺牲个罗莎，这个漂亮的姑娘多年来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我几乎没有怎么管她——这个牺牲未免太大了，于是我必须在头脑里仔细琢磨一下，以克制自己不致对这家人训斥起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罗莎还给我了。但是当我关上提包，伸手去取皮大衣时，全家人都站在一起，父亲嗅着手里的那杯甜

酒，母亲可能对我感到失望——是啊，人们还期待些什么呢？——她含着泪咬着嘴唇，姐姐摇晃着一条满是血污的毛巾，于是我打定主意做好准备，在某种情况下承认这孩子也许是真的病了。我向他走去，他朝我微笑着，好像我给他端去最滋补的汤菜似的——啊，现在两匹马同时嘶叫起来；这叫声一定是上帝特地安排来帮助我检查病人的——此时我发现：这孩子确实有病。在他身体的右侧靠近胯骨的地方，有个手掌那么大的溃烂伤口。玫瑰红色，但各处深浅不一，中间底下颜色最深，四周边上颜色较浅，呈微小的颗粒状，伤口里不时出现凝结的血块，好像是矿山上的露天矿。这是从远处看去。如果近看的话，情况就更加严重。谁看了这种情形会不惊讶地发出唏嘘之声呢？和我的手指一样粗一样长的蛆虫，它们自己的身子是玫瑰红色，同时又沾上了血污，正用它们白色的小头和许多小脚从伤口深处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孩子，你是无可救药的了。我已经找出了你致命的伤口；你身上的这朵鲜花^[26]正在使你毁灭。全家人都很高兴，他们看我忙来忙去；姐姐把这个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告诉父亲，父亲告诉一些客人，他们刚从月光下走进洞开的门，踮着脚、张开两臂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你要救我吗？”这孩子抽噎着轻轻地说，他因为被伤口中蠕动的生命而弄得头眩眼花。住在这个地区的人都是这样，总是向医生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已经失去了旧有的信仰；牧师会在家里一件一件地拆掉自己的法衣；可是医生却被认为是什么都能的，只要一动手术就会妙手回春。好吧，随他们的便吧：我不是自动要去替他们看病的；如果他们要用我充做圣职，那我也只好这样；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乡村医生，我的女佣人都给人家夺去了，我还能希冀什么好事情呢！于是这家人和村子里的长者一同来了，他们脱掉我的衣服；老师领着一个学生合唱队站在房子的前面，用极简单的曲调唱着这样的歌词：

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

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

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

然后我的衣服被脱光了，我的手指捋着胡子，我把头侧向一边，静静地看着这些人。我镇定自若，胜过所有的人，尽管他们现在抱住我的头、拖住我的脚，把我按倒在床上，我仍然是这样。他们把我放在朝墙的一面，靠近孩子的伤口，然后他们从小房间里走出去。门也关上了，歌声也停止了，云层遮住了月亮；被褥使我的周身感到暖和，忽隐忽现

的马头在洞开的窗户前晃动。“你知道，”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我对你很少信任。你不过是从那儿被抛弃掉的，根本不是用自己的脚走来的。你不但没有帮助我，还缩小我死亡时睡床的面积。我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你说得对，”我说，“这的确是一种耻辱。但我是个医生。那我怎么办呢？相信我，我作为一个医生，要做什么事情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你以为这几句道歉的话就会使我满足吗？哎，我也只能这样，我对一切都满足。我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来到世界上，这是我的全部陪嫁。”“年轻的朋友，”我说，“你的错误在于：你对全面的情况不了解。我曾经去过远远近近的许多病房，可以告诉你：你的伤口还不算严重。只是被斧子砍了两下，有了这么一个很深的口子。许多人都自愿把半个身子呈献出来，而几乎听不到树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斧子靠近他们了。”“这是真的吗，或者是你趁我发烧的时候来哄骗我？”“确实是这样，你安心地带着一个公家医生以荣誉担保的话去吧。”于是他相信了，他静静地安息了。可是现在我得考虑如何来救我自己了。两匹马还忠实地站在原处。我很快地把衣服、皮大衣和提包收集在一起；我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穿衣服上；如果两匹马能像来时一样快速，那么简直就可以说我从这张床一跳就跳回到自己的床上。一匹马驯顺地从窗口退回去了；我把收拾好的那包东西扔进马车；皮大衣飞得太远了，只有一只袖子牢牢地挂在一只钩子上。这就很好了。我自己跃上一匹马。缰绳松松地拖曳着，这匹马同另一匹马几乎没有套在一起，双轮马车晃晃荡荡地随在后面，皮大衣拖在最后面，就这样行驶在雪地上。“驾！”我喊道，可是马没有奔驰起来；我们像老年人似的慢慢地拖过荒漠的雪地；在我们后面长久地响着孩子们唱的一首新编的、但是错误的歌曲：

高兴吧，病人们，

医生正陪着你们躺在床上！

这样下去我可永远回不到家；我的兴旺发达的医疗业务也完了；一个后继者正在抢我的生意，但是没有用，因为他不能替代我；在我的房子里那讨厌的马夫正在胡作非为；罗莎是他的牺牲品；我不愿意再想下去了。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的后面，可是我够不着它，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

新律师 [27]

我们有了位新律师，就是布塞法鲁斯博士。单凭他的外表你很少会想到，他还曾经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国王的战马呢。当然，如果你熟悉他的情况，你就会觉察到一些东西。最近，我在法院前的露天台阶上就看到一个非常淳朴的法院差役，此人是赛马场的一个小小的常客，当他在台阶上看到这位律师高高抬起大腿，迈着雄健的步伐，铿然有声地一级一级登上大理石阶的时候，不禁钦佩地以行家的眼光投以一瞥。

一般说来，法律界人士是赞成接纳布塞法鲁斯的。他们以惊人的洞察力告诉自己，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下，布塞法鲁斯的处境是困难的，所以，还鉴于他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他至少应受到友好的接待。如今——谁也无法否认——已没有了亚历山大大帝。诚然，有些人懂得如何谋害他人；也有些人机灵地将长矛越过筵席刺中自己的朋友；对许多人来说，马其顿的确太狭窄了，所以他们诅咒国父腓利普——然而，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开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甚至在大帝的时代，印度的大门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过，国王的宝剑倒是标出了这些大门的方向。如今，这些大门被抬到了不知什么地方，被抬到了更远和更高的地方；没有人指出方向；许多人佩戴着宝剑，但只是为了挥动它们而已；而想追随它们的目光则是茫然的。

因此，最好像布塞法鲁斯一样，埋首于法律书籍，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如今的布塞法鲁斯，不必再受骑士大腿夹击两侧肋腹之苦，也远离了亚历山大大战役的战火轰鸣，他尽可在宁静的灯光下，自由自在地翻我们古老卷帙的书页。

洪天富 译

在剧院顶层楼座 [28]

在马戏表演场里，如果某个羸弱且患病的女艺人骑着一匹摇摇晃晃的马，在不知足的观众面前，被冷酷无情的老板数月不停地挥鞭驱赶着绕场奔跑，她在嗖嗖而过的马上，时而向观众飞吻，时而扭动着腰肢，如果这场游戏在乐队和通风机的不停顿的咆哮声中一直延续到越来越明显的灰暗的未来，伴随着一阵去而复返的掌声，这掌声实际上不过是汽

锤的冲击，那么，这时会有一个坐在顶层楼座里的年轻观众穿过层层座位，奔下长长的阶梯，冲进马戏场，在一直为表演伴奏的乐队的乐曲声中大声喊道：停下！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那是一位漂亮的女士，皮肤白里透红，从骄傲的穿着号衣的勤务员为她拉开的帷幕中间飞身而出；剧院经理全神贯注地搜寻着她的眼睛，满怀深情地牵着马朝她迎了上来；他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灰斑白马，仿佛她是他最钟爱的孙女，正要启程做一次危险的旅行；他下不了扬鞭策马的决心；最后，他总算战胜了自己，叭地甩响了一鞭；他张大着嘴，和马并排地跑着；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女骑手的一腾一跃；他简直无法理解她那娴熟的骑技；试图用英语大声提醒她要当心；怒气冲冲地提醒手拿（驯兽钻圈用的）大木圈的马弁切不可疏忽大意；在做大的空中连翻三个跟头的绝技之前，他高举双手，像巫师乞神那样，乞求乐队停止演奏；表演完毕，他把这个小姑娘从颤抖着的马背上抱下来，亲吻她的双颊，发现观众的喝彩并不怎么热烈；而她本人，被他搀扶着，高高地踮起脚尖，身边飘散着灰尘，伸开双臂，小脑袋向后仰着，想让马戏团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来分享她的幸福——因为情形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位顶层楼座上的观众便把他的脸靠在栏杆上，沉浸在退场时的进行曲中，犹如沉溺于一场沉重的梦，他不知不觉地哭了。

洪天富 译

往事一页 ^[29]

看来，我们祖国的防御工作似乎严重地被忽视了。迄今为止，我们对此漠不关心，只埋头于我们的工作；最近发生的事件却使我们忧心忡忡。

我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开了一个鞋匠店。黎明时分，我刚推开店门，就看到武装的士兵占领了所有通向广场的胡同口。但这不是我们的士兵，而分明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我不明白，首都与边疆相隔很远，他们怎么会一直推进到了首都。总之，他们已经到了这儿；看来，每天早晨，他们的人数还会增多。

依照自己的习性，他们在露天下安营扎寨，因为他们讨厌住房。他们忙于磨剑，削尖箭矢，练习骑术。他们把这宁静、总是那么小心翼翼

地保持着清洁的广场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马厩。有时，我们从店里跑出来，试图至少把最令人恶心的垃圾清扫掉，可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因为这种努力是徒劳的，还会使我们遭受被野马踢伤或被皮鞭抽打的危险。

和游牧民族交谈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懂我们的语言，他们甚至几乎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像寒鸦一样互相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总是听到他们像寒鸦一样的聒噪声。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公共设施，他们同样无法理解，而且毫不在意。所以，他们也对任何的手势语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哪怕你扭伤了颌骨，把手旋转得脱了臼，他们仍旧不明白你的意思，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你的意思。他们常常扮鬼脸；随后又是翻白眼，又是吐泡沫，但是他们这样做，既不想说点什么，也不想吓唬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一种习惯。他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你还不能说他们采用了武力。他们动手抓取的时候，你只好走到一边，任凭他们为所欲为。

从我们的库存中，他们也拿去了不少好的鞋子。可是，每当我看到例如对门那位肉店老板的遭遇，我对自己的不幸不会抱怨。他刚刚运进一些货，就被一抢而空，被这些游牧民族吞食下肚。他们的马也吃肉；经常是一个骑兵躺在他的马旁边，双双共享同一块肉，各咬一端。这个屠夫胆小怕事，不敢停止供肉。我们可是明白他的处境，集资援助他。要是这些游牧民族得不到肉，天晓得他们会想出什么办法对付他；就算他们每天都得到肉，天晓得他们还会想出什么样的点子。

前不久，肉店老板想，他至少可以免去屠宰时的辛苦，便于某天早上牵来了一头活的公牛。这事他不该再做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平躺在远离他店铺的我的作坊的地板上，把我所有的衣服、被单、垫褥一股脑儿堆在身上，只是为了不要听见那头公牛的吼叫声，原来那些游牧人从四面八方方向它扑去，用牙齿一块一块地撕吃它那温热的肉。长时间的寂静之后，我才壮着胆子走了出去；他们像一群围着酒桶的酒徒，精疲力竭地躺倒在这头公牛的残骸周围。

就在那时，我以为自己看到了皇帝本人站在皇宫的一扇窗户后面；平时，他从不到宫殿的这些外部的房间，他总是生活在最里面的花园中；然而这一次，至少我是这样感觉，他却站在一扇窗户旁边，正低头看着宫前发生的事情。

“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问道，“这种负担和折磨，我们还能忍耐多久？皇帝的宫殿招引了这些游牧人，但它却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宫门一直关闭着；往常总是壮观地进出宫门的卫队，眼下全都待在装了铁栅的窗户后边。拯救祖国的重任托付给了我们这些工匠和商人；这样的任务我们可是担当不起；我们从来也没有自夸能胜任这项任务。这是一种误会，我们将毁于这个误会。”

洪天富 译

在法的门前 [30]

在法的门前站着一位门警。一位乡下人来到他的身边，请求进入法的大门。但门警说，他现在不能准许他进去。这个人考虑了一下，问道：那么他以后是否可以进去。“有可能，”门警说，“但现在不行。”由于法的大门一如往常总是敞开着，而门警也已走到了一旁，这人就躬下身去，以便透过大门看看内部情形。门警见此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就试试，不顾我的禁令，往里走好了。不过请注意：我是强大的。而我只不过是最低级的门警。但一个个大厅都站着门警，一个比一个强大。连我看到第三个就不敢再看了。”这样多的难关真是出乎乡下人的意外；他以为，法律嘛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随时都可以进入它的大门的，但当他现在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穿着皮大衣的门警，看到他那高的大鼻子，他那鞑靼人的稀稀拉拉、又长又黑的胡子，他决心宁可等下去，直到他获准进去为止。门警给了他一张小板凳，让他在门旁坐下。他在那里坐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做了很多次要求让他进去的尝试，门警都被他的请求弄疲倦了。门警时不时地对他进行三言两语的盘问，打听他是什么地方人，以及别的许多事情。但那都是些干巴巴的提问，仿佛都是些大老爷们在提似的。而末了总是对他说：他还是不让他进去。乡下人为这次出门带了很多很多东西，该花的都花了，无论如何，还得把贵重的留下，用来贿赂门警。门警呢，他什么都照收不误，但同时却说：“我收下这些仅仅是为了免得你以为耽误了什么。”在这年年岁岁的等待过程中，乡下人几乎从不间断观察这位门警。别的门警他都忘了，而这第一位似乎是他进法的大门的唯一障碍。他诅咒这个不幸的偶然性。在头几年里他毫无顾忌地大声咒骂，后来，他老了，还在喃喃讷讷地骂个不停。他变得幼稚可笑。由于他长年研究门警，连他皮领上的跳蚤都认得出来，他也请求跳蚤帮他忙，使门警改变态度。最后他的视力变弱了，他搞不清是他周围真的变暗了呢，抑或仅仅是他的眼睛

造成的错觉。但是现在他倒确实认出了一道正从法的每一重大门发出的永不熄灭的光环。眼下他活不长了。在临终前，他在脑子里把一生的全部经验集聚成迄今尚未向门警启口的问题。由于他那僵硬身体已不能再站起来了，他只向他示个意。门警不得不深深躬下身去，因为两个人个子的差别正朝着对乡下人不利的方向变化。“你现在到底还想知道什么呢？”门警问道，“你真是不知满足啊。”“人人都在追求法，”乡下人说道，“但在这么多许多年里却没有一个人要求进法的大门，这是何故呢？”门警看出此人已经走到他的尽头了，为了让他正在消失的听觉还能听得见，他对他大声号叫道：“这里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去了，因为这道大门仅仅是为你而开的。我现在就去把它关上。”

叶廷芳 译

豺狗和阿拉伯人 [31]

我们在沙漠里的一块绿洲上安营扎寨。旅伴们已经睡下。一个阿拉伯人，又高又白，打我身旁走过；他先照料好那几只骆驼，随即朝睡的地方走去。

我向后一仰，躺倒在草地上；我想睡；但就是睡不着；远处传来了一只豺狗的哀号；我又坐了起来。刚才听起来还那么远的哀号声，现在突然变得近在眼前。一群豺狗围住了我；它们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射出黯淡的金黄色的光；它们细长的身躯，像是被一条鞭子抽打着似的，敏捷而有节奏地扭动着。

有一只豺狗从后面挤过来，钻到我胳膊下，紧紧地贴着我，仿佛它需要我的体温似的，然后，它走到我的面前，几乎是冲着我的脸对我说：“我是方圆这一带年龄最大的豺狗。我很高兴还能在这儿欢迎你。我差一点儿就要放弃希望了，因为我们等你等得实在太久了；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祖上的所有各代母亲，乃至所有豺狗的始祖，都一直在等待你的光临。这是真的，相信我吧！”

“这使我感到惊奇，”我说，竟忘了点燃那堆准备用其浓烟熏赶豺狗的柴禾，“这事听起来真让我感到百般奇怪。我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儿，这纯属偶然，而且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豺狗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可能是我友好的访问使它们受到了鼓舞，它们步步进逼地向我国拢过来；个个气喘吁吁，不停地发出怒吼。

“我们知道，”那只年纪最大的豺狗开口道，“你从北方来，这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你们北方人所具有的那种理智，在这儿的阿拉伯人当中是找不到的。这些冷酷而傲慢的人，你知道，是不会有丝毫理智的。他们杀死动物，然后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掉，而腐尸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别这样大声地嚷嚷，”我说，“阿拉伯人就在附近睡觉呢。”

“你真是一个外地人，”这只老豺狗说，“否则你就会知道，在世界史上还从来没有豺狗怕过阿拉伯人的。难道我们应该怕他们？我们被驱赶到这种人中间来，难道不是已经十分不幸吗？”

“也许是这样，也许是这样，”我说，“但我对那些与我不相干的事不愿妄加评论。看来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争端，原因可能在血统上，所以这场争端也许只有用鲜血来结束。”

“你真聪明。”老豺狗说。豺狗们的呼吸更加急促了；虽然它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胸部却是一起一伏的；一股强烈的、有时只有咬紧牙关才能忍受得住的恶臭，从它们张开的嘴里涌了出来。“你非常聪明；你方才所讲的话，符合我们古老的教义。所以，我们要取他们的血，这场争端也就随之而结束。”

“噢！”我不由自主地狂叫起来，“他们会进行自卫的，他们会用自己的猎枪将你们成群成群地击毙的。”

“你误解我们了，”老豺狗说，“按照人的方式行动，即使在北方高原也没有丧失这种方式。我们根本不想杀死他们。尼罗河的水再多，也不够我们洗净身上的血污。一看到他们活的身躯，我们就都跑开，跑到空气更加清新的地方，逃进沙漠里去，因此，沙漠才是我们的故乡。”

这时，周围所有的豺狗，包括这期间从远处跑来的不少豺狗，都纷纷低下了头，将其夹在两只前腿之间，用爪子加以擦拭；豺狗们这样做，似乎是想掩盖它们内心的憎恶，这种厌恶非常可怕，以致我恨不得想纵身一跳，尽快逃出它们的包围圈。

“那么，你们想要干什么？”我问道，试图站起身来；但我无法站起来；在我身后，两条小豺狗已经紧紧咬住了我的上衣和衬衫；我只好继续坐着。“它们抓住你的裙裾，”那条老豺狗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这是尊敬你的表示。”“您们应该放开我！”我大声叫喊，一会儿转向老豺狗，一会儿转向那两只年轻的豺狗。“它们当然会放开你的，”老豺狗道，“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不过，这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按照此地的风俗它们咬得很深，得先慢慢地松开牙齿。这期间你还是听听我们的请求吧！”“你们的这种态度实在叫我无法接受。”我说。“请多多宽恕我们的笨拙，”老豺狗说，同时第一次求助于它那天生的悲哀的声调，“我们是些可怜的动物，我们只有一副牙齿；无论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好事或者坏事，我们唯一的手段就是这副牙齿。”“那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问，口气稍稍缓和了一点。

“先生，”它大声喊道，所有的豺狗也跟着嗥叫起来；这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仿佛听到一首优美的乐曲。“先生，你应该结束这场使世界不和的争吵。你正是我们的祖先所描述的那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我们必须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和平；我们需要可以呼吸的空气；需要一个被他们弄干净的广阔的地平线；不要听被阿拉伯人刺杀的绵羊的哀鸣；让所有的牲畜都平平静静地死去；应该让我们不受干扰地喝干它们的血，吃净它们的肉，只留下一些骨头。干净，我们要的仅只是干净。”——此时，所有的豺狗都哭泣和呜咽起来——“你有着高尚的心灵和甜美的内脏，你怎么能够忍受这世界上的这等事？他们的白衣肮脏；他们的丧服污秽；他们的胡须令人胆寒；看到他们的眼角就会作呕；他们一举起胳膊，腋窝下就会展现出地狱般的深渊。所以，噢，先生，所以，噢，亲爱的先生，请用你那万能的双手，请用你那万能的双手拿起这把剪刀，割断他们的咽喉吧！”说着，老豺狗猛地摆了摆头，于是一只豺狗便叼着一把锈迹斑斑的缝纫小剪刀走了过来。

“哦，剪刀终于拿来了，这下戏该收场了！”我们商队的那位阿拉伯人向导喊道，他已迎着风蹑手蹑脚地来到我们身旁，边喊边挥舞着他那条巨大的鞭子。

所有的豺狗都飞快地散去，但在不远的地方又停了下来，一只挨一只地蹲在地上，这么多的豺狗一动不动地紧紧地挨在一起，宛如一道狭窄的、鬼火在四周飞舞的栅栏。

“这么说来，先生，你也看到和听到了这场表演。”这个阿拉伯人一

边说，一边开心地笑了起来，只是因为他的部落生性矜持，他才没有太过放肆。“这么说来，你知道这些畜生想要干什么的^啰？”我问。“当然，先生，”他说，“这可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有阿拉伯人在，这把剪刀就会在沙漠里游荡，并将和我们一道游荡到世界的末日。它被奉献给每一个欧洲人去干那桩伟大的事业；在豺狗们看来，每一个欧洲人正是它们心目中能胜任这一事业的理想人选。这些畜生怀着一种愚蠢的希望；^[32]它们是傻瓜，真正的傻瓜。所以，我们喜欢它们；它们是我们的狗；比你们的狗更漂亮。你等着瞧吧，夜里死了一头骆驼，我让人把它弄到这里来了。”

四个人抬着这具沉甸甸的骆驼尸体走了过来，把它扔在我们的面前。它刚一落地，那些豺狗便高声嗥叫起来。每一条豺狗就像被绳索牵着一样身不由己地爬了过来，一会儿爬爬，一会儿停停，肚皮紧擦着地。它们忘记了阿拉伯人，忘记了仇恨，眼前这具扑灭一切、散发出刺鼻的臭味的骆驼尸体，使它们着了魔。一条豺狗早已爱上了尸体的脖子，第一口就咬住了动脉。它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抽动着、颤抖着，宛如一台飞速运转的小水泵，决心然而毫无希望地想扑灭一场凶猛的大火。刹那间，它们全都爬到了尸体上面，堆积得山一样高，干起那同样的勾当来了。

这时，那个向导扬起那条锋利的鞭子，劈头盖脸地向豺狗抽去。它们抬起了头，像是陶醉，又像是晕了过去。看见阿拉伯人站在它们的面前，嘴上这才感到鞭打的疼痛。它们跳着向后退去，逃开了一段距离。但是，骆驼的血此时已流成了一大摊，还冒着热气，尸体的好几处已被撕成一个个大裂口。它们经受不住这个诱惑；于是又重新朝尸体走来；向导又再次扬起鞭子；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先生，你做得对，”他说，“我们让它们干自己的行业吧；再说，现在也已经是动身的时候了。你已经看见了它们。了不起的动物，不是吗？可它们是多么地仇恨我们啊！”

洪天富 译

视察矿山^[33]

高高在上的工程师们今天下到我们底层来了。经理处下达了一项什么任务，铺设新坑道，工程师来做初步测量。这些人多么年轻，可是却

已经互相很不一样！他们都自由自在地发育成长起来了，年纪轻轻便无拘无束地显现出明快清醒的心性。

第一个，黑头发，活泼，两只眼睛骨碌碌向四下里张望。

第二个拿着一个笔记本，边走边记，东张西望，做比较，记记写写。

第三个，双手插在上衣兜里，弄得全身紧绷绷，挺直上身走路；保持着庄重；只是在持续不断地咬自己的嘴唇时才显露出焦躁不安的、抑制不住的青春活力。

第四个向第三个做解释，尽管人家并没要求他这样做；他比人家个头矮小，像个撒旦跟随在人家身旁，食指总是向空中伸出，他似乎喋喋不休地在向人家述说此地所见到的一切事物。

第五个，也许是级别最高的，不要别人相伴；时而在前头，时而落在后头；大伙儿按他调整自己的步伐；他脸色苍白、身体羸弱；肩负的重责使他的眼睛下陷了；他在思考问题时常常用手按着额头。

第六个和第七个走起路来微微弓着腰，脑袋挨近着脑袋，胳膊挽着胳膊，正亲切交谈着；若这里不明摆着是我们的煤矿，我们的工作地点不是在最深的坑道里，那么，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两个瘦骨嶙峋、没有胡子的大鼻子先生是年轻的牧师。其中的一个往往带着猫那样的呼噜声暗自发笑；另一个，同样微笑着，边说着话边用那只空着的手打着节拍。这两位先生必定是对自己的职位很有把握，他们想必是年纪轻轻就已经对我们的矿山立下了多大的功绩了呀，他们竟然可以在这里，在做如此重要的视察的时候，在他的上司的面前，如此明目张胆地只沉迷于自己的、或者至少是与当前的任务无关的事务之中。抑或竟然会有这样的事，他们虽然嘻嘻哈哈、心不在焉，却把一切重要的事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人们简直不敢对这样的先生做出明确的判断。

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毫无疑问，譬如这第八个就比这两个专心致志得多得多，甚至比所有其余的各位先生也更专心致志。什么他都得摸一摸，并且用一个小锤子敲一敲，他一再从口袋里掏出这个小锤子，并一再把它放在那儿。有时他不顾自己身穿讲究的衣着跪在污泥里敲击地面，然后又只是在行走时才在自己头顶上看到墙壁或天花板。有一回，他直挺挺地躺下，静静地躺在那儿；我们已经以为出什么事了；但是随

后他微微一颤动，他那个颇长的身体竟一跃而起。原来是，他又仅仅是作了一次探究而已。我们以为我们了解我们的矿山和它的矿石，但是这位工程师以这样的方式在这里不停地探究着什么，这我们就不明白了。

第九个推着一辆儿童车，车里放着测量仪器。极其贵重的仪器，放在厚厚的柔软已极的棉花层里。这辆车本来是应该由仆人来推的，但是信不过仆人，只好让一个工程师来推，看得出来，这工程师乐意推它。这位工程师大概年纪最轻，也许他还根本不懂这全部仪器，但是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这些仪器上，有时他几乎因此而险些把车撞到墙上去。

但是还有另一位工程师在车旁行走，防止车子撞墙。这位工程师显然彻底熟悉这些仪器，似乎是真正保管仪器的人。他时不时地不停车就拿出仪器的一个构件来，将其透视，旋开或旋紧螺丝，摇摇敲敲，伸过耳朵，侧耳倾听；最后，就在推车人通常站住的当儿，把那个小小的、在远处几乎看不见的物件小心翼翼重新放进车里。这位工程师有点儿贪权，但是仅仅是就这些仪器而言。在车前十步我们就应该按照一个无声的指头信号向一旁避让，即便是没有地方可以避让也罢。

行走在这两位先生后面的是那位无所事事的仆人。先生们知识渊博自然早已放下了高傲的架子，而仆人则似乎积聚了一身的傲气。一只手贴在背上，另一只手抚摩着他那件号衣的金纽扣或那质地精细的布，他频频向左右点头，就好像我们曾问候过他，如今他在回礼问候，或者就好像，他认为我们问候了他，可是他居高临下不能证实这一点。我们当然不问候他，但是人们一眼瞥见他确实几乎要以为，当矿山经理室办事处的仆人，这有点儿非同寻常。在他背后我们自然禁不住要笑，但是由于即使是一个响雷也不能使他转过身来，所以他依然作为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而受到我们的敬重。

今天干的活不会多，间断过于频繁；这样的视察使大家不能专心致志地工作。望着先生们的背影消失在试用坑道的黑暗中，这简直太诱人了。我们这一拨儿也快要下班了，我们将看不到先生们返回啦。

张荣昌 译

邻村^[34]

我的祖父常说：“生命非常之短。我现在想起，生命对我来说正在凝

结，以致我几乎无法理解，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决定骑马到邻村去，而不用担心——完全撇开众多的不幸的偶然事件不谈——这寻常的、幸福地流逝的生命的時間，对这样一次骑行来说已经远远不够。”

洪天富 译

家长的忧虑 [35]

一部分人说，“奥德拉德克”一词源于斯拉夫语，并试图以此来说明这个词的形成。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此词源于德语，斯拉夫语只不过对此产生影响而已。但是，这两种解释均不可靠，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两者均不准确，尤其因为它们并没有赋予这个词以一定的意义。

当然，要是确实不存在叫做奥德拉德克的生物，谁也就不会从事这样的研究了。初一看，它像是个扁平的星状线轴，而且看上去的确绷着线；不过，很可能只是一些被撕断的、用旧的、用结连接起来的线，但也可能是各色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线块。但是，这不仅仅是个线轴，因为有一小横木棒从星的中央穿出来，还有另一根木棒以直角的形式与之连结起来。一边借助于后一根木棒，另一边借助于这个星的一个尖角，整个的线轴就能像借助于两条腿一样直立起来。

人们似乎觉得，这东西以往曾有过某种合乎目的形式，而如今它只不过是一种破碎的物品。然而事情看上去并非这样；至少没有破损的迹象；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足以说明这种现象的征兆或断裂处；整个东西看上去虽然毫无意义，但就其风格来说是自成一体的。此外，有关它的情况，无法较为详细地说明，因为奥德拉德克极其灵活，不容易抓住它。

他交替地守候在阁楼、楼梯间、过道和门厅里。有的时候，他几个月不露面；在这期间，他大概移居到了其他的住所；可他又必然回到了我们的家里来。有时，每当人们走出门，恰巧看到他靠在下面的梯栏上，这时，人们想同他讲话。当然，人们并没有向他提出一个个难题，而是像对待孩子——他的矮小就诱使人们这样做——那样对待他。“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人们问他。“奥德拉德克。”他回答说。“你住哪儿？”“没有确定的住所。”他边说边笑；但这只是一种像是缺肺的人发出的笑声。听起来就像是落叶发出的沙沙声。谈话通常就这样结束了。此外，就连这些回答也并不是总能得到的；他常常长久地默不做声，看上去就像一块不会说话的木头。

我徒劳地自问，对他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会死去吗？一切正在死亡的东西，以前都曾有某种目的，某种活动，正是它们耗尽了它的精力；这并不符合奥德拉德克的情况。由此可见，他将来会不会带着拖在身后的合股线咕噜咕噜地滚下楼梯，一直滚到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脚前呢？显然，他绝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是，一想到他也许比我活得更长，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难言的痛苦。

洪天富 译

一道圣旨 [36]

有这么一个传说：皇帝向你这位单独的可怜的臣仆，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他在弥留之际恰恰向你下了一道圣旨。他让使者跪在床前，悄声向他交代了旨意；皇帝如此重视他的圣旨，以致还让使者在他耳根复述一遍。他点了点头，以示所述无误。他当着向他送终的满朝文武大臣们——所有碍事的墙壁均已拆除，帝国的巨头们伫立在那摇摇晃晃的、又高又宽的玉墀之上，围成一圈——当着所有这些人派出了使者。使者立即出发。他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标志着皇天的太阳；他就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人口是这样众多，他们的家屋无止无休。如果是空旷的原野，他便会迅步如飞，那么不久你便会听到他响亮的敲门声。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他的力气白费一场；他仍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便他通过去了，那也无济于事：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了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即使有，则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但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

叶廷芳 译

十一个儿子 [37]

我有十一个儿子。

老大的长相很不好看，但他为人严肃认真，聪明机智；虽说我像疼爱所有其他的孩子那样疼爱他，但我并不怎么器重他。我觉得他的思想过于简单。他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更不朝远处看；他总是在他那狭小的思想范围内到处乱跑，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原地旋转。

老二长得漂亮，身材修长而匀称；他击剑时的那个姿势，看了使人心醉神迷。他也聪明，而且涉世颇深；他见多识广，所以，就连家乡的人也喜欢和他亲切交谈，而不愿和待在家里不出远门的人交谈。然而我相信，他的这个长处不应该仅仅归功于他的游历，这绝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毋宁说是这孩子天生具有一种别人无法仿效的气质，这一点，每一个想模仿他的人都承认的。例如，有人想模仿他高台花样跳水的动作。他一连几个筋斗，巧妙地控制住自己，优美、准确地跳入水中。可是他的模仿者呢，这人虽然有勇气和兴致走到跳板的边缘，可是并不想从那儿往下跳，而是突然坐下，很抱歉地举起了双臂。——尽管这样（有这样一个孩子，我实在应该感到庆幸），我和他的关系不总是纯洁无瑕的。他的左眼略小于右眼，而且老是眨巴眨巴的。当然，这只不过是小小的缺陷，有这个缺陷，他的面孔倒显得比没有这个缺陷时更加大胆放肆，跟他天生的那种令人难以接近的孤傲性情相比，眨巴眼睛不过是小小的毛病，谁也不会想到去注意和挑剔。我这个做父亲的倒是很在意的哩。当然，使我伤心的并不是这个生理上的缺陷，而是某种与他的性格相符的精神上的小小的失常，某种在他的血液里彷徨的毒素，某种只有我能看出的无能，即不能充分发扬他生来就有的那种天赋。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恰恰是这种无能使他成为我的真正的儿子，因为他的这个毛病同时也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毛病，只不过是这个儿子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罢了。

第三个儿子也很美，但并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美。那是歌唱家的美：弧形的嘴，若有所思的眼睛，需要后面有帷幔衬托才给人以印象的脑袋，高高隆起的胸脯，一双动不动就迅速扬起、动不动就更加迅速地放下的手，以及一双由于不能支撑体重而忸怩作态的腿。此外，他的音色并不圆润，能迷惑人于一时，引起行家们侧耳细听，但过一会儿便逐渐轻微以至消失了。——尽管一般说来，这一切诱使我炫耀这个儿子，但我情愿把他隐藏起来；他自己倒也不想出风头，原因并非因为他了解自己的短处，而是出于他的单纯无知。他也感到跟我们的时代格格不

入，仿佛他虽然是家里的成员，但同时还属于另一个他永远失去的家庭似的。他常常无精打采，对什么都缺乏兴趣，什么也提不起他的兴致来。

我的第四个儿子也许是所有的儿子当中脾气最随和的。他是他的时代的一个真正的孩子，人人都能理解他，他和所有的人站在一个共同点上，所以每个人都愿意向他点头打招呼。也许是由于这种普遍的赞赏，他的举止变得有些轻浮，动作变得有些随便，对人和对事的判断变得有些毫不在乎。他的某些格言人们时常想加以引用，当然只是某些格言，因为就整体而言，他毕竟又有了极端轻浮这一毛病。他就像是这样的一种人：令人赞叹地从空中跳下，像燕子一样地穿入云空，可是随后却在荒漠中悲惨地了却一生，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看到这孩子的时候，脑海里总会出现这些使我败兴的念头。

第五个儿子可爱而善良，很少向别人许诺他办不到的事情；一向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人们在他的面前确实会感到孤单；但是，他因此却赢得了某种声誉。如果有人问起我，这是怎么造成的，我几乎无言以答。也许单纯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穿过暴风骤雨，而他是单纯的。也许太过于单纯。对任何人都友好。也许太友好了。我承认：每当有人在我面前称赞他，我总是感到不安。称赞像我儿子这样一个显然非常值得称赞的人，这种赞誉未免太轻率了。

我的第六个儿子，至少是第一眼看上去，是所有的儿子当中情绪最消沉的。一个垂头丧气的人，但却是个饶舌者。所以，他很不好对付。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便陷入无法克服的悲伤之中；一旦占了上风，他便使用滔滔不绝的空谈来保持他的优势。然而我不否认他具有某种因陷入沉思而忘记自己周围一切的激情；他常常在大白天梦幻似的苦思冥想。没有病——相反，他非常健康——他却有时步履蹒跚，尤其是在黄昏之际，但不需要人搀扶，不会跌倒的。也许这个现象是由他身体发育不良造成的，和他的年龄相比，他长得太高了一点，使他在整体上显得不漂亮，尽管个别部位，例如双手和双脚，却异乎寻常的漂亮。此外，他的前额也不好看；皮肤以及骨骼构造不知怎么地显得干瘪。

跟所有其他的儿子相比，第七个儿子也许更合我的心意。这世界不懂得赏识他，这世界不理解他那种特殊的机智。我并没有对他估计过高，我知道，他非常微不足道；如果这世界的过错仅只是不懂得赏识他，那它还总算是完美无瑕的。但是在这个家庭的内部，我却不愿缺少

这个儿子。他既带来不宁，也带来对传统习俗的敬畏，并将两者，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结合成为一个不容争辩的整体。当然，他自己很少知道用这个整体开始干点什么事，他不会去推动未来的车轮向前滚动的；但是他的这种天赋是非常鼓舞人心和非常富有希望的。我希望他儿孙满堂，后继有人。可惜这个愿望似乎难以实现。他怀着自满的心情（我对此既理解，又痛惜），完全不顾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独自一人到处流浪，不为姑娘的事操心，尽管这样，他却从来也不会丧失他的良好的心绪。

我的第八个儿子是个令人忧虑的孩子，我还真说不上这是什么原因。他像个陌生人似地看着我，我却觉得有一条父爱的纽带把我同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时间弥补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而在从前，我想起他便不寒而栗。他走他自己的路，断绝了同我的一切联系。的确，靠着那个硬脑壳，靠着他那矮小壮实的身体——只是他那两条腿小时候就相当虚弱，不过在这期间可能已经恢复正常——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他想干什么，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有好多次想叫他回来，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问他为何这般疏远父亲，他到底想干什么，可是如今他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这么多的时光已经消逝，现在也只好听其自然了。我听说，他是我儿子当中唯一蓄络腮胡子的；对这么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来说，留大胡子当然是不会好看的。

我的第九个儿子非常文雅，有着专为女人生就的那种甜蜜的目光。有的时候，我也被他那柔情似水的甜蜜目光迷惑住了，虽然我知道，一块湿海绵就足以抹去这超凡的光彩。但是，这孩子与众不同的地方却在于，他压根儿也不想诱人；他一生所追求的，只是躺在长沙发上，痴望着天花板，或者更好是垂下眼皮闭目养神。要是他处于他所偏爱的这种状态，他便喜欢谈话，而且谈吐不俗，简洁而生动；不过，话题只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以内，一旦超出了这些范围——由于话题范围狭小，他又难免要越出范围——他说起话来便空洞无物。人们会向他使个眼色，叫他停止讲话，如果人们希望他那充满睡意的目光能够觉察到这点的話。

我的第十个儿子被认为是个不诚实的人。我不想完全否认这个缺点，也不想完全确认它。可以肯定的是，谁要是见到他以远远超出他年龄的威严神态走过来，看见他穿着纽扣总是紧紧扣住的大礼服，头戴虽旧但却细心刷过的黑礼帽，面部毫无表情，下巴略向前突出，高高隆起

的眼皮遮掩着目光，两个手指头动不动就摸摸嘴唇——谁要是见到他的这副模样，都一定会想：这是一个极端虚伪的人。不过，你还是听听他的谈吐吧！明智，慎重，待人冷淡，态度傲慢，以恶毒而生动的语言干扰问题；与整个世界保持着惊人的、自然而又愉快的一致，一种必然会使人挺直脖子、昂起头来的一致。有许多自以为聪明的人，由于这个缘故，正如他们所说的，讨厌他的外表，但由于他的谈话，却深深地喜欢上他。还有另外一些人并不在意他的外表，但却觉得他的话虚伪。我，作为父亲，不想在这里下什么断言，但我必须承认，后一种评论者无论如何比前一种评论者更值得注意。

我的第十一个儿子身体娇嫩，大概是我儿子当中最虚弱的了；但他的虚弱是一种假象；因为他有时会显得强壮而果断，然而即便在这种时候，不知是何原因，虚弱总是根本的。不过，这并非是使人感到丢脸的软弱，而只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令人觉得是软弱的某种特性。例如，鸟起飞前的准备活动，诸如摇摆身子、犹豫不定、扑打翅膀，不也是一种虚弱吗？我儿子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类特性。当然，父亲是不会为这样的特性感到高兴的；它们的目的在于破坏这个家庭。有时候他看着我，仿佛想对我说：“我会带你一起去的，父亲。”这时我就想：“你也许是最后一个值得我信赖的人。”他的眼神似乎又在说：“那么，我至少能做这最后一个人吧。”

这就是我的十一个儿子。

洪天富 译

兄弟谋杀 [38]

情况表明，谋杀是以下列方式进行的：

约莫晚上9点钟，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凶手施马尔站在那条街的拐角处，受害者韦斯从他办公室所在的那条胡同拐进他所住的那条胡同时，必得由此经过。

夜风寒冷，令人全身战栗。而施马尔只穿着一套单薄的蓝制服；且短外衣的扣子开着。他并不感到冷；他也不断地走动。他的杀人凶器，一半像刺刀，一半像厨房用刀，他完全将其外露，并始终紧紧地将它攥在手里。对着月光，他察看了一下那把刀子：刀刃发出闪光。施马尔还嫌不够，他举起刀子朝铺石路面的砖石砍去，顿时火光迸溅；他也许有些后悔；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他抬起一条腿，向前弯下身子，像拉小提琴似地在他的靴底上抹擦刀口，一面倾听刀子在他靴子上发出的声音，同时窥视着这条充满灾难的胡同。

领养老金者帕拉斯从附近三楼的窗口观察着这一切，他为何甘心忍受这一切？探究一下人性吧！他的衣领翻起，肥硕的身体上紧束着睡衣，一边摇着头，一边往下瞧着。

离这儿五幢房屋远的地方，在帕拉斯的斜对过，韦斯太太身着长睡衣，外面还披了件狐皮大衣，正向外张望，寻找她的丈夫——他今天异乎寻常，迟迟未归。

终于，韦斯办公室前面的门铃响了。对于一般的门铃来说，这铃声未免太大，它响彻了整个城市，直冲云霄。韦斯这个勤勉的上夜班的人，从屋里走了出来；铺石路面上立刻响起他那富有节奏的从容不迫的脚步声。

帕拉斯把头探出窗外，他急于了解下面发生的一切。韦斯太太听到铃声，心情顿时平静下来，便当啷一声关上了她的窗子。而施马尔却跪了下来；由于他此刻已彻底暴露，他只好把脸和双手紧贴在石子上。路面上全都结冰，而施马尔却全身发热。

恰恰在这两条胡同交叉的地方，韦斯停了下来，只把手杖插到对面的胡同里，支撑着自己的身子。他一时心血来潮。夜空以其深蓝和金黄

的色彩吸引着他。他糊里糊涂地眺望天空，糊里糊涂地脱下帽子，摸了摸头发；天空里毫无动静，没有任何东西能向他指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待在自己毫无意义和玄妙莫测的位置上。本来，韦斯继续往前走，是非常合理的行为，然而他却走到了施马尔的刀口上。

“韦斯！”施马尔喊道，他踮起脚站着，伸出一只胳膊，猛地将刀子插了下来，“韦斯！朱丽娅白等你了！”施马尔从右给韦斯的脖子一刀，从左给脖子一刀，再给肚子深深地戳了一刀。韦斯顿时发出一种类似被剖开肚皮的水耗子发出的声音。

“干掉了，”施马尔说着，把刀子——这多余的沾满血的包袱——朝附近一家门前扔去，“杀人乃至高无上的幸福！从别人的流血中会得到宽慰和鼓舞！韦斯，老夜游神，朋友，啤酒店里喝酒的伙伴，你正渗入这条街下面的深黑色的泥土里。为什么你偏偏不是一个充满血的气泡，好让我坐在你的上面，而你也会因此化为乌有。并非一切都会实现，并非所有如花似锦的梦想都会成熟，你沉重的残骸就躺在这里，对任何的脚踢已毫无反应。你无声地提出的问题又有何用处呢？”

帕拉斯强忍着胡乱吞下这一切恶果，站在他那两扇突然敞开的房门当中。“施马尔！施马尔！我看到了一切！什么也没有放过。”帕拉斯和施马尔相互打量着。帕拉斯感到心满意足，而施马尔却感到事情还没有做完。

韦斯太太夹在人群当中匆匆赶来，她的脸由于惊恐而变得十分苍老。她解下皮大衣，扑倒在韦斯的身上，这穿睡衣的身躯是属于韦斯的，而像坟墓上的草坪一样覆盖在这对夫妇身上的皮大衣则是属于这一群人的。

施马尔把嘴贴在警察的肩上，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了这最后的作呕，警察步伐轻盈地把他带走了。

洪天富 译

一场梦 [39]

约瑟夫·K. 做了一个梦：

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K. 想去散散步。可是他刚刚跨出两步，就来

到了一座公墓。那儿有几条设计得非常精巧、不切实际地迂回曲折的道路，可是他在一条这样的道路上摇摇晃晃地滑行着，仿佛漂浮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上。从老远的地方，他就注意到了一座新堆积起来的坟丘，他想在那座坟墩旁歇脚。那座坟墩对他简直有着一股诱惑力，他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滑到那儿去。可是，有时候他又几乎看不见那座坟丘，因为有几面旗帜遮住了他的视线，这些旗子翻卷着，猛力地相互拍击着；虽然看不到旗手，但却仿佛听到那儿的一片欢呼声。

就在他把目光再次投向远方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同一座坟丘就在自己身旁的路边上，甚至几乎就在他的身后。他连忙跳进草丛里。可是，由于他跳开的脚下的那条路还在继续飞奔，他打了个踉跄，正巧跪倒在那座坟头前。两个男人站在坟的后面，把一块墓碑举在他们中间；K.刚一出现，他们马上就把那块墓碑砸进地里，于是，它便像用砖砌似的牢牢竖立在那里。从灌木丛中立刻走出来第三个男人，K.立即认出他是一位艺术家。这画家只穿着裤子和一件纽扣没扣好的衬衣，头上戴一顶天鹅绒便帽，手里拿着一支普通的铅笔；他一边向坟丘走近，一边用那支铅笔在空中写着画着。

此时，他正开始动笔在墓碑上方写字；墓碑很高，他根本用不着弯腰，但不得不探身向前，因为他不愿踩的那座坟头将他和墓碑隔开了。因此，他踮着脚，用左手撑住墓碑石的平面。他以其精湛的技艺，成功地用那枝普通的铅笔写下了几个金色的大字，他写道：“这里安息着——”每个字母都显得那么清晰和优美，深深地镌刻在碑石上，金光闪闪。他写完这五个字后，回头看了看K.；K.正渴望知道铭文的进展情况，几乎没有注意那个写字的人，两眼只顾盯住那块墓碑石。果然，那个人又开始往下写了，但是却写不下去，有什么东西在妨碍着他，他放下铅笔，再次向K.转过身来。这回K.也定睛细看了画家，发现那个人非常狼狈，但又说不出狼狈的原因，他先前的那股轻松活泼劲儿完全消失了。K.也陷入了狼狈的境地。他们彼此交换着无可奈何的眼色，显然发生了一场讨厌的、谁也无法消除的误会。此时，送葬乐队的小钟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但是艺术家举起手挥了挥，钟声于是停止了。片刻之后，它又响起来；这一次非常轻微，而且未经人干涉便立刻中断了；仿佛这次它只想试试自己的音色。K.对艺术家的这种窘况感到非常伤心，他开始哭了起来，抱头呜咽了很长时间。艺术家等到K.平静下来以后决定仍然继续写下去，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他最初的轻轻一笔，便使K.化悲为喜，但是艺术家显然是非常勉强地写出这一笔的；字体不再那么

优美洒脱，同时也失去了金色的光辉，显得苍白无力和缺乏自信，笔画向下一拖，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字母。那是一个J^[40]字，就在这个字母快要写完的时候，艺术家怒气冲冲地一脚跺入了坟丘，以致泥土四下飞溅，溅到了空中。K.终于明白了艺术家想干什么；可是，已来不及求他宽谅自己了。艺术家用十个手指刨土，几乎是顺利地把土刨开了。一切看来是事先策划好了的，坟丘上的那一层薄薄的地壳只是用来做样子的，就在它的下面，开着一个有着峭壁的大洞穴。K.感到被一股轻微的气流从背后推动了一下，随即坠入洞中。可是，当他在下面脑袋还竖立在脖子上便被这看不透的深渊接纳的时候，而在上面，他的名字正以巨大的花体字疾书在那块墓碑上。

他被这景象所陶醉，便醒过来了。

洪天富 译

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41]

尊敬的科学院的先生们！

承蒙各位邀请，我向贵院呈交一份关于我过去所经历的猴子生涯的报告，我感到十分荣幸。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无法满足诸位的要求。我脱离开猴子生涯已将近五年，从日历上测算，这也许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要快马飞奔经历这段时间，就像我曾经所做的那样，却需要无限漫长的岁月，在我行经的路程上，段段都陪有优秀的人们、忠告、喝彩和管弦乐，然而从根本上来我是孤独的，因为所有的随行人员，为了表明他们与我不同，总是远远地离开栅栏。要是我执著地坚持自己的出身，执著于青年时代的回忆，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恰恰是放弃任何的固执，才是我给自己规定的最高准则；我，无拘无束的猴子，甘心接受这样的约束。但是这样一来，我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也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如果人们曾经愿意的话，我最初是完全可以穿越上天在地球上空筑起的那座大门，回复到原来的生活，可是与此同时，我那被鞭子抽打出来的向前发展的造化就会变得越来越低级和狭隘；我觉得自己在人类的世界里更加舒服，也更加受拘束；从我的过去向我身后吹来的那股狂风平息下来了；今天，它只是一股使我的脚踵凉快的气流；而远处的那个洞，即气流从中发出和我以往从中爬出的那个洞，已变得那么狭窄，即使我有足

够的力量和意志想回到洞里，在穿越入口时也非落个遍体鳞伤不可。老实说，尽管我很喜欢用形象的语言来说明这些事情，老实说，您们猴子般的生涯——先生们，只要您们经历过这样的生涯——和您们现在之间的距离，不见得比我过去与目前之间的距离大多少。可是人世间的任何一个走兽都有搔脚跟的癖好：上至伟大的阿器里斯^[42]，下至小小的黑猩猩。

然而，如果把话题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我也许完全能够回答诸位的询问，我甚至非常高兴为诸位效劳。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握手，握手表示坦诚；但愿今天，当我达到自己事业的顶点的时候，除了和诸位初次握手以外，还能开诚布公地说上几句话。我要告诉贵院的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能远远满足不了诸位的要求，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向诸位说明：一只过去的猴子通过什么样的方针，才能闯入人类的世界，并在那儿定居下来。但是，假如我对自己没有完全的把握，假如我的地位在文明世界的所有杂耍舞台上尚未得到磐石般的巩固，我是绝对不敢向诸位陈述下面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来自黄金海岸^[43]。关于我是如何被捕获的这件事，我只好引用别人所写的报告。哈根贝克公司派出的一个打猎探险队——顺便插一句，从那时以后，我与探险队的队长还一起干掉许多瓶上好的红葡萄酒呢——就埋伏在岸边的矮树丛里，恰巧我和一群同类傍晚时分跑来喝水。他们向我们开枪；我是唯一被击中的，我挨了两枪。

头一枪打中我的面颊，这一枪很轻，可是留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大红疤。它给我带来了一个讨厌的、完全不恰当的名字，即红彼得。这名字显然是由一只猴子捏造出来的，仿佛是为了把我跟那只早就死去的、远近闻名的和训练有素的猴子彼得区分开来，因为我跟他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的脸上有个红斑。不过，此乃插话而已。

第二枪打中我的大腿。这伤势严重，直到今天我的腿还有点瘸。最近，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万只灵猩^[44]中的某一只写的，这万只灵猩在报纸上对我大加议论，说我还没有完全克制住自己猴子的本性；证据是每逢参观者来访时，我总爱脱下裤子让他们看那颗子弹射入的地方。写这篇文章的那小子，应该让子弹把他的手指一个一个地打断。至于我，只要我愿意，当然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脱下我的裤子；人们在那儿不会发现什么别的东西，只会发现一张梳理很好的毛皮和一颗子

弹——请允许我为了某种目的在这里选用某一个兴许不会引起误解的词儿——一颗罪恶的子弹所造成的伤疤。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什么都不用隐瞒；每当涉及真理的时候，任何具有高尚节操的人都会抛弃各种极其文雅的举止。相反地，要是那位作者敢于在来访者面前脱下裤子，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以理智的名义担保，他是不会这样干的。既然如此，他也用不着拿他的体贴来纠缠我！

在挨了那两枪之后，我醒来时——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开始恢复我自己的记忆的——发现自己被关在哈根贝克轮船统舱里的一只笼子里。这不是四面都是铁栅的那种笼子，而是钉在一只箱子上（箱子本身为一面）、其余三面是铁栅的那种。整个笼子低得我站不直，窄得我坐不下去。因此，我只得弯着一刻不停地颤抖的膝盖蹲着，也就是说，由于我最初也许不愿见到任何人、只想待在黑暗当中，所以我总是把脸朝向箱子，以致笼子的铁条都嵌进了我背部的皮肉。人们认为，在捉到野兽后的最初阶段，用这种方法保藏野兽是会带来好处的，我今天根据自己的经验也无法否认，从人道的意义上说，这的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生平第一次没有了出路，至少是没有简捷的出路；我直接面对的是那只箱子，一块块木板紧紧地接在一起。这些木板之间虽然有一个贯通的空隙，当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还无知地满怀喜悦地吼叫了一声对它表示欢迎呢，可是这个缝隙小得连尾巴都塞不进去，就是使出猴子的全身力气也休想把它撑大一些。

据说我发出的声音非常之小，这也是后来有人告诉我的，人们从我微弱的声音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就是我很快就会死去，要就是假如我能成功地活过最初的危急时刻，就完全可以进行训练。我活过这危急的时刻。我低沉地啜泣，痛苦地捕捉跳蚤，厌倦地把一只椰子舐来舐去，不停地用脑袋叩打箱子的板条，逢到有人走近时就对他龇牙咧嘴，——这就是我在新生活中的最初活动。可是，尽管所有这一切，我只有一种感觉：没有出路。当然，我现在只能用人类的语言来描绘我当时像猴子似的感觉，并因此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虽然不再能够达到那原来的猴子的真实，我所作的描写至少在方向上最符合猴子的实情的，这点无须怀疑的。

到目前为止，我的确曾经有过许多解救的办法，可是现在不再有了。我身陷精神上的囹圄。就算我被钉死在一个地方，我的迁徙自由也不至于比现在更小些。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我搔足趾间的肉的时候，

我找不到这个原因。当我用背死命地顶铁条，直到身子几乎被铁条分成两半，我还是找不到这个原因。我没有出路，但是我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否则我就活不下去。总是面对这箱子的板壁——总有一天我必然会悲惨地死去。可是在哈根贝克公司的轮船上，猴子们是要面对这箱子的板壁的——既然是这样，我只好不当猴子了。这真是一个明确而出色的思路，总之，我准是用肚子把它想出来的，因为猴子们是用肚子思考的。

我担心人们不会确切地理解我对出路看法。我是就它最通俗也是最完整的意义上来用这个词的。我故意不说自由。我指的并不是这种在各方面都自由自在的伟大的感觉。作为猴子我也许知道这一点，我也结识了一些渴望这种自由的人。可是就我来说，不论过去或是现在，我都不要求得到自由。顺便说明一下：在人们中间，有人常常拿自由欺骗自己。如同自由被视为最崇高的感情之一一样，相应的欺骗也被视为一种最崇高的感情。好多次，在游乐场里，在我登台之前，我看到一对艺术家在紧挨天花板的吊架上做着空中飞人表演。他们在秋千上荡来荡去，然后向空中跳去，伸开双臂相互扑在一起，这一个用牙齿咬住那一个的头发。这时我就在想：“这种自负的动作居然也称得上是人类的自由。”这是对神圣的自然的莫大讽刺！要是猴子们看到这种表演，游乐场的整个建筑不给他们笑坍才怪呢。

不，我不要自由。我要的是一条出路，右边、左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我不提别的要求；即使这条出路只是一种欺骗，那也无妨；我的要求很低，欺骗因此也不会更大。前进，继续前进！再也不要举着胳膊静静地站着，再也不要身子紧贴在箱子的一块板壁上。

今天我懂得了，没有内心深处的极大平静，我是永远也逃不出这牢笼的。事实上，我也许应该把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归功于船上头几天所感到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我又该把它归功于船上的水手们。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些好人。直到今天，我还很高兴回忆他们那沉重的脚步声，这声音总是在我当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时发出回响。他们有这样一个习惯，不管干什么事，开始时总是慢吞吞的。比如说，一个人打算揉眼睛，他举手的时候就像是在举一副千斤的担子。他们的玩笑非常粗野，但却十分诚恳。他们的笑声总是夹杂着一种听起来很怕人、但却无关紧要的咳嗽声。他们嘴里总有东西要吐出来，至于吐到什么地方他们是无所谓。他们总是埋怨我把跳蚤传给他们，然而他们并不真

的对我生气，因为他们知道，在我的毛皮里跳蚤容易生长，而跳蚤是跳跃动物，总是要跳的；所以，他们也只好容忍了。每当空闲的时候，他们中的某几个人往往围成半圆形坐在我周围；他们几乎不说话，而是相互叽里咕噜；伸展四肢躺在箱子上抽烟斗；只要我稍许动一动，他们就拍膝盖；时不时还有人拿根棍子来给我搔痒。要是今天有人邀请我随同这艘船作一次旅行，我肯定是会拒绝的，但是，同样肯定的是，我对那次在统舱里度过的日子的留恋的回忆倒也不全是可憎可厌的。

我在这些人当中得到了平静，这是我不想逃走的最主要原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至少已经预感到，要是我想活下去，我必须找到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靠逃跑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也不知道，是否有可能逃走，但我相信能够逃走；对一只猴子来说，逃走始终是可能的。今天，我用牙齿打开坚果时得多加小心，可是在那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准能用牙齿把门锁咬穿。可我并没有那样做。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刚刚把头探出去，人们又会把我捉住，关进更加糟糕的笼子里去；或者我悄悄地跑到其他的动物——例如我对面的蟒蛇——那儿去，但它们会把我缠得闷死过去的；或者我偷偷地溜上甲板，跳出船舷，然后在世界海洋上颠簸一阵子，接着就淹死在水里。这一切都是绝望的行动而已。我不会像人那样精打细算，但是在我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我的行为仿佛都是事先考虑好了似的。

我没有进行考虑，不过我倒是静静地进行观察。我看到这些人走来走去，老是这几张脸，老是这些动作，我常常觉得，这些都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就这样不受阻挠地走着。一个崇高的目的渐渐在我心中升起。谁也没有向我许诺，假如我变得和他们一模一样，笼子上的铁条就可以撤走。人们是不会做出这种显然无法实现的许诺的。可是，如果人们履行自己的诺言，那么，这些诺言事后也只会人们在人们早先徒劳地寻求它们的地方出现。现在，我对这些人本身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假如我是上面提到的那种自由的拥护者，我宁愿选择大洋，而不愿选择这些人的忧郁的目光为我指出的出路。总而言之，我在想到这些事情之前，就已经把这些人观察了很久，是啊，就是这些积累起来的观察，才迫使我走上这条明确的道路。

模仿这些人，的确极其容易。就在最初几天，我就学会了吐唾沫。然后，我们就互相朝脸上吐唾沫；所不同的只是，事后我把脸舐干净，而人却不这样。很快，我抽起烟斗来就像个老头儿；尔后，每逢我用大

拇指压压烟袋锅，统舱里的全体船员就发出欢呼声；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分不清塞满烟丝的烟斗和空的烟斗。

最让我感到麻烦的是烧酒瓶。这气味就够我难受，我尽量强迫自己喝酒，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勉强克服了不适之感。说来也很奇怪，水手们对我的这种内心的思想斗争，比对我身上的其他任何现象都更关心。我在自己的记忆中也分不清这些水手，不过有个水手我一直还把他记住，这人老是上我这儿来，有时单独来，有时和伙伴们一起来，白天来，晚上也来，随时随刻都来；他手拿烧酒瓶站到我的面前，给我授课。他不了解我，他要猜出我生存的谜。他慢慢地拔去瓶塞，然后注视着我，目的是想考查我是否听懂了他的话；我承认，我总是怀着狂热的感情和急切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类的老师能找到像我这样的人类的学生。瓶塞被拔去之后，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我的目光一直盯到了他的咽喉；他点点头，表示对我满意，又把瓶子放到唇边；我由于逐渐理解他的动作而欣喜若狂，便一边尖叫，一边上下左右地乱搔乱挠。他欢叫起来，把瓶子凑近嘴喝了一口；我急躁而绝望地极力效法他，结果不仅我，而且笼子，都给洒下的酒弄脏了，这又使他大为满意。在此之后，他把酒瓶拿离开嘴，远远地伸向前面，随即又迅速地把它举到嘴边，做了一个夸张的有教育意义的动作，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气把酒喝干。我被他的严格要求弄得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跟他做下去，只是软绵绵地靠在铁栏上，而他呢，揉了揉肚子，狞笑了一下，以此结束了这堂理论课。

然后，才开始实际的练习。我不是已经被理论弄得精疲力竭了吗？也许是这样，太精疲力竭了。这是我的命运。尽管这样，我还是尽可能地拿起别人递给我的瓶子，我用颤抖的手拔去瓶塞，这个成功的动作逐渐给我带来新的力量。我几乎像老师那样举起瓶子，放到唇边，然后——然后就厌恶地、非常厌恶地把它甩到地上，虽然瓶子是空的，里面只有酒的气味。这不仅使我老师感到伤心，而且使我感到更加伤心；我在扔掉瓶子之后，的确并没有忘记好好地抚摩一下我的肚子和咧嘴冷笑一下，但是，用这个办法，我无法使他和我自己感到满意。值得佩服的是，我的老师并没有生我的气；诚然，他有好几次把燃着的烟斗放到我的毛皮上，以致在几处我不易摸到的地方都开始冒烟了，但是他接着又用他那只慈爱的大手把火扑灭；他没有生我的气，他认识到，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反对猴子的本性而斗争，而我这方面的任务是更为艰巨的。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举行庆祝晚会，有架留声机在播放音乐，一个军官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我趁人不备，悄悄地抓起一瓶由于疏忽而留在我笼子跟前的烧酒，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严格按照规定地拔去瓶塞，然后把酒瓶放到嘴上，毫不犹豫地、嘴也不歪地像个内行的酒徒那样喝起酒来，我把两只眼睛睁得滚圆滚圆的，不断地摇晃着喉咙，的的确确把酒一饮而尽。之后，我不再像绝望者那样，而是像艺术家那样把酒瓶扔掉。我虽然忘记了抚摩肚子，但却作为替代用人类的语言简短明确地发出了一声“哈罗”，因为我不会别的，因为我感到事情紧迫，因为我酩酊大醉、神志不清。随着这声叫唤，我跳入了人类社会。马上，传来了它的回音：“你们听，他说话了！”听到这一回音，我顿时感到我那整个汗淋淋的身子得到了一个亲吻。这对我的老师以及对我来说，是何等重大的胜利啊！

我重复一遍：模仿人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之所以模仿人类，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寻求一条出路。即使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胜利，我也没有取得多少。很快，我又失去了人类的声音；几个月之后才重新获得；对烧酒瓶的反感甚至比以前更加强烈。不过我所选择的方向倒是永远地定下来了。

当我在汉堡被移交给第一个驯兽者的时候，我很快就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两条出路：要么进动物园，要么进杂耍园子。我毫无犹豫。我对自己说：要想尽一切办法进杂耍园子，这就是出路；动物园只是一只有栅栏的笼子，一进到这只新的笼子，你就算完了。

因此，先生们，我正在学习。啊，当你不得不学的时候，你就得好好地学；如果你想找一条出路，你就得学习，毫无顾忌地学习。你甚至会用鞭子监督自己；只要你稍有反抗，就会被撕成粉碎。猴性翻着筋斗匆匆地离我而去，以致我的启蒙老师却险些自个儿变成了猴子，他不得不放弃教学而进了一家疯人院。幸亏不久他又出院了。

可是，我却累坏了许多老师，有几个甚至是同时给我累坏了。当我对自己的能力更加有把握，公众追赶我的进步，我的未来开始闪耀的时候，我就自己收容老师，让他们坐在五间相互连接的房间里，自己不间断地从这间跳到那间，同时接受他们的教诲。

我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知识的光芒从四面八方渗入我那不断觉醒的脑子！我不否认：这使我很高兴。但是，我也承认：我没有过高地估

计自己的进步，当时不曾，现在更是没有。我以世上从来没有过的努力，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欧洲人的中等文化水平。这件事本身也许不值一提，然而正是它，帮助我走出了樊笼，为我创造了这条特殊的出路，这条人类的出路。有一句非常好的德国成语：溜之大吉。我正是这样做的，我已溜之大吉。我没有别的出路，其前提始终是：自由是无法选择的。

当我展望自己的发展及其到目前为止的目标，我既不抱怨，也不志得意满。我把双手插在裤袋里，桌子上放上一瓶葡萄酒，在摇椅上半躺半卧，望着窗外。有客人来，我就接待他，恰如其分地接待他。我的舞台经理就坐在前堂里；我一按铃，他就进来听候我的吩咐。我几乎每晚都有演出，但演出效果总没有提高。每当我深夜从宴会、科学界的社交聚会以及愉快的聚会回家时，总有一只半驯服的小黑猩猩在等待着我，这时，我又像猴子那样，让自己从她那里得到无穷的快乐。在白天，我不愿见到她；因为在她的目光里，有一种被训练搞得晕头转向的动物所特有的疯狂；这种疯狂只有我能看出来，这是我无法忍受的。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我还是达到了我想达到的目的。人们不会说，这事是不值得花费力气去做的。另外，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评价，我只想传播知识，我只做报告，对诸位来说，尊敬的科学院院士们，我也仅仅是做了一个报告。

洪天富 译

最初的痛苦 [45]

一位空中飞人表演者——众所周知，这种在大的杂耍场的高高的穹顶下表演的技艺是人类最难完成的一种特技——是这样安排他的生活的：只要他一直在同一个杂耍场里表演，他就得夜以继日地待在高秋千上，这最初只是出于追求完善，往后却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他的全部需要，况且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需要，是由相互接替的一帮勤杂工加以满足的，他们在下面看护着，把上面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放在特地设计的容器里，拉上去，再拉下来。这种生活方式不会给周围的世界带来特别的麻烦；只是在表演其他节目的时候，多少会出现一些干扰，因为他无处藏身，只好待在上面，而且尽管他在这些时候通常保持安静，但观众中不时有人分散注意力，向他投来一瞥。然而，经理们原

谅了他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家。当然，人们也认识到，他并非故意要待在高秋千上，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坚持不懈地进行练习，从而使他的技艺保持完美的水平。

反正，待在上面也有益于健康，每当较暖的季节来临，杂耍场拱顶四周的侧窗就被打开，阳光随着新鲜空气势如破竹地泻入这昏暗的场地，这样一来，这种高空生活甚至是美妙的。不过，他与人的交往因此受到了限制，只是偶尔有个体操运动员攀着绳梯爬到他那儿，然后他俩坐在秋千上，一左一右靠在系秋千的绳索上聊天，或者修理屋顶的建筑工人们通过一扇开着的窗子，同他交谈几句，或者消防人员来检查顶层楼座的应急照明，向他呼喊几句充满敬意、但很少听得懂的话。在其他情况下，他四周静悄悄的；偶尔有位职员约莫在下午时分误入这空荡荡的剧场，若有所思地抬头凝望那几乎看不见的高空，在那里，这位空中飞人表演者并不知道有人在观察他，正在练功或者休息。

如果没有那些令他十分讨厌、但又不得不进行的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的话，这位空中飞人表演者本可以享受平静的生活。诚然，舞台经理关心他，尽量减去他任何一种不必要的痛苦：在城市里旅行，使用赛车，要是在夜里，或者在黎明时分，车子以最后冲刺的速度疾驰，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但对渴望自由的空中飞人演员来说，这速度还太慢；若是乘火车，经理就把整个车厢包下来，让这位空中飞人演员在搁置行李的网架上度过旅途时间，这虽然使他叫苦不迭，但毕竟是他历来生活方式的某种补偿；在下一个巡回演出地点，早在他到达之前，剧院里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秋千，不仅如此，所有通向剧场的门均已开着，所有的走廊都畅通无阻——然而，在经理的生活中，只有当空中飞人演员登上绳梯，一转眼间终于又高高地吊在了他的秋千架上的时候，这才是最美好的瞬间。

尽管经理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次旅行，但每一次新的旅行总让他难堪，因为这些旅行，除了别的事情之外，总令这位空中飞人演员紧张不安。

有一次，他俩又一同旅行，空中飞人演员躺在行李架上，正在做梦，经理在对面的角落里靠着窗读书，这时，空中飞人演员先开头跟经理说话。经理马上洗耳恭听。空中飞人演员咬紧嘴唇，忐忑不安地说，从今以后，为了他的表演，他必须要有两个秋千，而不是迄今的一个，而且这两个秋千应该相互对着。经理立刻表示同意。但是，空中飞人演

员似乎想要表明，经理的同意如同他的反对一样毫无意义，便说他今后再也不仅仅在一个秋千上表演，无论如何也决不肯。一想到他今后仍然会在一个秋千上表演，他似乎战栗不止。经理犹豫和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再次声明他完全同意，两个秋千毕竟比一个好，此外，这个新的装置有利可图，它会使表演更加丰富多彩。听到这句话，空中飞人演员突然哭了起来。经理大为吃惊，一下子跳了起来，问到底出了什么事，由于得不到回答，经理便爬到长凳上，用手抚摩他，并把他的脸贴在自己的脸上，以致他满脸都是空中飞人演员的泪水。在经理提了不少问题和说了许多谄媚的话之后，空中飞人演员才呜咽着说道：“手里只有这一根吊杠——叫我怎样生活下去呀！”这下，经理安慰他就容易得多了；他答应马上从下一站为了第二个秋千的事给下一个巡回演出地点打个电报；他责备自己，不该让这位空中飞人演员长时间地只在一个秋千上工作，感谢并热情地赞扬他终于使他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就这样，他成功地使这位空中飞人演员慢慢地平静下来，又能重新回到他的角落。但是，经理本人并没有平静下来，他怀着深深的忧虑，偷偷地越过书本的上端观察着那位空中飞人演员。这样的念头一旦开始折磨他，唉，它们会完全停止吗？它们难道不会逐渐地加剧吗？它们不会威胁他的生存吗？的确，经理相信自己看到，在继一阵哭泣之后的显然安详的睡眠中，空中飞人演员那平滑的孩子气的额头上明显地出现了最初的皱纹。

洪天富 译

小妇人^[46]

这是一个普通的妇人。生来相当苗条，但她还紧紧地束腰；我看到她总是穿着同样的上衣，它是用淡黄加灰色的、有点儿像木头颜色的料子做成的，饰有少量的流苏或同样颜色的纽扣状的垂悬物；她一直不戴帽子，她那无光泽的淡黄色的头发光滑而整齐，但非常蓬松。她虽然束腰，但动作却很灵活，灵活得实在显得过分，她喜欢双手叉腰，猛地把上身转向一侧。她的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说实在的，我还未曾看到过像她这样的手，它的五指之间界线格外分明。尽管这样，她的手从解剖学上看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它是一只完全正常的手。

这位小妇人对我很不满意，她总是动不动就批评我，她总是由于我的缘故而受冤屈，我处处使她生气；如果我能把生命分成若干极小的部分，并对每个小部分分别进行评价的话，那么我生命的任何极小的部分

对她肯定是一种烦扰。我常常在想，我为何使她如此生气；也许是我身上的一切不符合她的美感和习惯，与她的正义感和习俗有矛盾。世上有如此相互矛盾的天性，可是她为何不能容忍我的天性呢？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也谈不上我这使她痛苦的问题。她只需决定把我看作完全陌生的人，我的确也是个外地人，而且我不会反对这样的一种决定，相反会非常欢迎它。她只需决定忘记我的存在，我的确从没有把自己的存在强加给她，或打算强加于她。果真是这样，一切的痛苦显然就会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考虑自己，也不去考虑她的举止——当然，它也使我觉得难堪——我之所以避而不谈它，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和她的痛苦相比，我的一切难堪不足挂齿。当然，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意识到，这并不是令人喜欢的痛苦；她压根儿不想使我真正变好，此外，她对我的种种指责，从性质上看丝毫无助于我的进步。她同样也不关心我的进步，她只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即对我给她带来的痛苦进行复仇，和防止我将来可能给她带来的痛苦。我曾多次试图向她指出，如何才能最好地结束这种没完没了的怨恨，可是，恰恰是我的这一建议使她无比冲动，以致我再也不敢重提这一建议。

当然，我得承认，我对此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尽管我也不熟悉这个小妇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的唯一的关系是我给她带来的不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让我给她带来的不快，我毕竟不能对她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是因为，她不仅精神上感到痛苦，而且肉体上同样经受痛苦。我有时听到一些消息——最近有所增多——说她在早晨脸色苍白，因彻夜不眠而筋疲力尽，受头痛的折磨，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她使她的亲属担心，人们反复劝她寻找一下自己情况的原因，但至今她没有找到它们。只有我知道它们，这就是旧的和一再新的愤怒。当然，我不会像她的亲属那样为她担心；她是个坚韧不拔的女人；谁能够如此地生气，想必也能克服生气的种种后果；我甚至怀疑她装做——至少部分地装做——受苦的样子，以使用这种方式把世人的怀疑引向我。坦率地讲，我用我的存在折磨她，而她对此感到十分自豪；为了我的缘故而向他人呼吁，她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她之所以关心我，只是出于反感，出于一种不停的、永远催逼着她的反感；当众讨论这件不光彩的事，在她看来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可是，完全避而不谈这件事——它不停地对她施加压力——她也感到非常羞愧。所以，她凭着自己妇道的狡猾试图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她沉默不语，只想通过一种隐藏心中的痛苦的外部标记，让公众去评判这件事。也许她甚至希望，如果公众完全注意到我，他们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就会用那些强有力的愤怒的手

段更加凶狠地和更加迅速地把我消灭，而这一点，相对无力的个人的愤怒是办不到的。果真这样，她就可以退却，松口气，不再理睬我。怎么，难道这些真的是她的希望吗？她可是弄错了。公众不会担任她的角色；公众从来也不会像她那样没完没了地指责我，尽管它非常仔细地观察我。我并非像她认为的那样是个完全无用的人；我不想炫耀自己，特别是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吹自擂；我谈不上特别有用，但肯定也不是废物；只是对她来说——她白眼看人——我是个废物，而其他任何人是不会相信她的看法的。那么，在这方面我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呢？不，反正不；因为如果人们真的知道，我的行为简直使她病倒，而有些窥伺者，就是那些最勤劳的消息传递者，已开始洞察此事，或至少装做洞察此事的样子，那么世人就会朝我走来，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到底为什么要用自己的不可救药折磨这位可怜的小妇人？我是否打算把她逼死？我什么时候才能冷静下来，产生人的纯朴的同情心，以便停止对她的折磨？——如果世人这样问我，我是难以回答他们的。难道我应该承认，我并不非常相信那些病症？难道我应该以此引起这样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即我为了摆脱一种罪责而控告其他的人，而且是以这样一种粗野的方式？难道我能公开地说，我丝毫没有同情心，尽管我相信她真正有病，因为我完全不熟悉这个妇人，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由她建立的，只是因她的方面而存在的。我不想说，人们不会相信我；更确切地说，人们既不会相信我，也可能会相信我；人们根本还没有到达可以相信我的程度；人们仅仅会把我关于一位体弱多病的妇女所做出的回答记录下来，这对我来说似乎是颇为不利的。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我做出这样的回答，还是做出其他任何一种回答，世人都不能加以正确地理解，他们总是怀疑我跟她有一种爱情关系，我的一切回答都是由它决定的，尽管事情非常清楚地表明，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假定有这种关系，不如说是由我引起的，因为我的确会佩服这个小妇人的判断的说服力和她不倦的推论，如果我不正是由于她的这些优点而常常受到惩罚的话。然而，她对我根本就不友好；在这点上她倒是坦率和真诚的；我最后的希望建立在这上面；即便她认为使人相信她对我友好符合于她的作战计划，但她很快就会忘记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在这方面完全麻木的公众会坚持她的看法，始终会做出反对我的决定。

所以，我唯一的办法是，在世人干涉之前，及时地改变自己的做法，即不去消除这个小妇人的愤怒——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无论如何要使它变得温和一些。我的确常常反躬自问，我目前的情况是否使我非常满意，以至于我根本不想改变它，我是否应该改变自己的某些做法，

尽管我想改变它们的原因，不是我深信它们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安慰这个妇人。坦白地说，我曾费力而认真地试图这样做，这甚至符合我的愿望，简直使我开心；个别的变化出现了，而且非常明显，我必须不让这个妇人注意到它们，她在我之前就注意到所有这样的变化，她已经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我的意图；因此我并没有成功。我怎么会成功呢？她对我的不满，正如我现在已经认识到的，的确是一种原则上的不满；什么也无法消除它，就连我自己的毁灭也无法消除它；她一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准会怒不可遏。现在我无法想象，她，这个感觉敏锐的妇人，同我一样认识不到这一点，即不仅她那些毫无希望的努力，而且我的无辜，我的无能，尽管有最良好的愿望也是不可能符合她的要求的。她当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作为富有斗争性的人，她因热衷于斗争而忘记这一点，而我的不幸的本性——我只能选择这样的本性，因为它只给予我一次——在于，我想给怒不可遏的人轻声地发出警告。用这种方式我们当然永远无法互相取得了解。每天一大清早的时候，我幸福地走出家门，就会看到那张为了我的缘故而憔悴的面孔，那快快不乐地撇起的嘴，那审视的、在考试之前就已知结果的目光，它掠过我身上，即使它匆匆而过，但什么也休想逃过它，那钻入少女般的面颊里的尖刻的微笑，那哀怨地仰望天空，那使自己固定的双手叉腰，那由于愤怒而发白的脸色和发抖的身子。

最近——趁此机会，我惊异地向自己供认——我第一次向一位好朋友对这件事作了一些暗示，只是顺便说说，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话，我把整个事情的意义——尽管它从表面上看来对我其实并不重要——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奇怪的是，我的朋友却洗耳恭听，他甚至主动地给这件事增添意义，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坚持听我讲话。当然，更加奇怪的是，尽管他心神专注，他在关键性的一点上却低估了这件事，因为他郑重地向我建议，我应该出外旅行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建议；这些事情虽然简单，任何人只要进一步进行观察都能看清它们，但它们毕竟不那么简单，靠我的出走，是无法使一切或者至少使这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恢复正常的。相反地，对出走的事我得格外当心。我如果应该执行某一项计划，那么无论如何只能是这样的计划，即将事情保持在它至今的、狭窄的、还没有将外界计算在内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像我现在一样保持安静，不要由于这件事情而引起大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还有，不要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之所以要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是一桩危险的秘密，而是因为这是一件纯属个人的小事，至少容易忍受，因此也该是这样。在这点上，我朋友的那些意见毕竟是有益的，它们虽然没有教给

我任何新的东西，但却使我坚定自己的基本看法。

只要更加仔细地想想，就会发现，事态在时间的进程中似乎经历了的变化，并不是事情本身的变化，而只是我对她的看法的发展，也就是说，我的看法部分地变得更加冷静，更加具有男子气概，更接近核心，但另一方面，也还部分地受那些持续的、尽管非常轻的震动的无法克服的影响，因而有些紧张不安。

我对这事变得更加冷静，这是因为我认识到，一种抉择，尽管它有时看上去似乎即将来临，毕竟还不会到来；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容易倾向于认为，各种抉择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的年轻的女法官由于被我注视而变得虚弱，侧身躺在沙发椅上，用一只手抓住椅子靠背，用另一只手摆弄她的紧身胸衣，愤怒和绝望的眼泪从她的双颊上滚落下来，这时我总在想，现在已经有了抉择，我马上就会被传唤，就此事说明自己的责任。然而，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抉择，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责任，妇女们容易得病，世人没有时间去注意所有的事件。在所有这些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除了这样的事件反复发生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它们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它们的总数更大。人们在附近闲荡，只要找到可以进行干涉的机会，他们就乐意进行干涉；但他们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到目前为止他们只依靠自己的嗅觉，光是嗅觉虽然足以使其拥有者忙个不停，但它对其他的事情并不适用。例如，总是有那么一些无用的二流子和游手好闲者^[47]，他们总是以某种过于狡猾的方式，最喜欢用亲缘关系，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他们总是留神地进行观察，他们的鼻子总是充满嗅觉（意为他们总是喜欢四处打听），然而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只是他们依然站在那儿。整个的区别在于，我逐渐认出他们，能够区分他们的面孔；以往我认为，他们从四面八方逐渐地汇集到一起，这件事的规模变大，本身会迫使他们做出决定；如今我认识到，所有这一切自古就已存在，和做出决定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至于决定本身，我为何要这样强调它呢？如果有一天——当然不是明天和后天，也许这一天永远不会来——公众对这件与他们无关的——正如我一再说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48]（指做出决定——译者）竟然产生了兴趣，那么它虽然会有损于我的声誉，但毕竟值得加以观察。它说明公众对我是熟悉的，我向来就光明正大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对他们充满信任，也获得他们的信任，所以，这个后来冒出来的受苦的小妇人——顺便指出，不是我而是别人也许早就认出她是牛蒡^[49]，而且替公众用自己的靴子悄悄地把它踩坏了——对我来说，顶多对我的声誉产生一点

儿不良的影响，因为公众早就把我宣布为他们的值得尊敬的成员。这就是事情的现状，我无须为此感到不安。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毕竟变得有些不安，但这和此事本来的意义毫不相干；频繁地使某人生气，你是根本没法坚持下去的，尽管你也许认识到，使别人生气是毫无道理的；你不安起来，你开始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从肉体上期待着各种决定，尽管你从理性上并不十分相信它们的到来。这部分地也和年龄的老化现象有关，青年人喜欢美化一切，许多不美的细节消失在青年人旺盛的精力之中。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也许有过虎视眈眈的目光，但你对它并不见怪，别人根本没有觉察到它，你自己也没有觉察到它，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剩下的只是一些残余，每个残余都是需要的，因为新的不会产生，每个残余都受到观察，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的虎视眈眈的目光，正是一种非常清楚的虎视眈眈的目光，要确定它是不困难的。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现象，谈不上目光本身在变坏。

总之，不管我从什么角度观察此事，我总觉得，虽然我用手轻轻地掩盖住这件小事，我还会摆脱世人的干扰，平静地把我迄今的生活长久地继续下去，不管这妇人如何纠缠我。

洪天富 译

饥饿艺术家^[50]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大为淡薄了。从前自行举办这类名堂的大型表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今天则完全不可能了。那是另一种时代。当时，饥饿艺术家风靡全城；饥饿表演一天接着一天，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每人每天至少要观看一次；表演期临近届满时，有些买了长期票的人，成天守望在小小的铁栅笼子前；就是夜间也有人来观看，在火把照耀下，别有情趣；天气晴朗的时候，就把笼子搬到露天场地，这样做主要是让孩子们来看看饥饿艺术家，他们对此有特殊兴趣；至于成年人来看他，不过是取个乐，赶个时髦而已；可孩子们一见到饥饿艺术家，就惊讶得目瞪口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互相手牵着手，惊奇地看着这位身穿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这位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去坐，只是席地坐在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致意，时而强作笑容回答大家的问

题，他还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亲手摸一摸，看他多么消瘦，而后却又完全陷入沉思，对谁也不去理会，连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钟鸣（笼子里的唯一陈设就是时钟）他也充耳不闻，而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双眼几乎紧闭，有时端起一只很小的杯子，稍稍啜一点儿水，润一润嘴唇。

观众来来去去，川流不息，除他们以外，还有几个由公众推选出来的固定的看守人员。说来也怪，这些人一般都是屠夫。他们始终三人一班，任务是日夜看守这位饥饿艺术家，绝不让他有任何偷偷进食的机会。不过这仅仅是安慰观众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内行的人大概都知道，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点食不进的，你就是强迫他吃他都是不吃的。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当然，并非每个看守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的，有时就有这样的夜班看守，他们看得很松，故意远远地聚在一个角落里，专心致志地打起牌来。很明显，他们是有意要留给他一个空隙，让他得以稍稍吃点儿东西；他们以为他会从某个秘密的地方拿出贮藏的食物来。这样的看守是最使饥饿艺术家痛苦的了。他们使他变得忧郁消沉。使他的饥饿表演异常困难。有时他强打精神，尽其体力之所能，就在他们值班期间，不断地唱着歌，以便向这些人表明，他们怀疑他偷吃东西是多么冤枉。但这无济于事；他这样做反而使他们一味赞叹他的技艺高超，竟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另一些看守人员使饥饿艺术家甚是满意，他们紧挨着笼子坐下来，嫌厅堂里的灯光昏暗，还用演出经理发给他们使用的手电筒照射着他。刺眼的光线对他毫无影响，入睡固然不可能，稍稍打个盹儿他一向是做得到的，不管在什么光线下，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大厅里人山人海，喧闹不已。他非常愿意彻夜不睡，同这样的看守共度通宵；他愿意跟他们逗趣戏谑，给他们讲他漂泊生涯的故事，然后又悉心倾听他们的趣闻，目的只有一个：使他们保持清醒，以便让他们始终看清，他在笼子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让他们知道，他们之中谁也比不上他的忍饥本领。然而他感到最幸福的是，当天亮以后，他掏腰包让人给他们送来丰盛的早餐，看着这些壮汉们在熬了一个通宵以后，以健康人的旺盛食欲狼吞虎咽。诚然，也有人对此举不以为然，他们把这种早餐当做饥饿艺术家贿赂看守以利自己偷吃的手段。这就未免太离奇了。当你问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一心为了事业，值一通宵的夜班而不吃早饭，他们就会溜之乎也，尽管他们的怀疑并没有消除。

人们对饥饿艺术家的这种怀疑却也难于避免。作为看守，谁都不可

能夜以继日、一刻不停地看着饥饿艺术家，因而谁也无法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证明他是否真的持续不断地忍着饥饿，一点漏洞也没有；这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才能知道，因此只有他自己才是对他能够如此忍饥耐饿感到百分之百满意的观众。然而他本人却由于另一个原因又是从未满意过的；也许他压根儿就不是因为饥饿，而是由于对自己不满而变得如此消瘦不堪，以致有些人出于对他的怜悯，不忍心见到他那副形状而不愿来观看表演。除了他自己之外，即使行家也没有人知道，饥饿表演是一件如此容易的事，这实在是世界上最轻而易举的事了。他自己对此也从不讳言，但是没有人相信。从好的方面想，人们以为这是他出于谦虚，可人们多半认为他是在自我吹嘘，或者干脆把他当做一个江湖骗子，断绝饮食对他当然不难，因为他有一套使饥饿轻松好受的秘诀，而他又是那么厚颜无耻，居然遮遮掩掩地说出断绝饮食易如反掌的实情。这一切流言蜚语他都忍受下去，经年累月他也已经习惯了，但在他的内心里这种不满始终折磨着他。每逢饥饿表演期满，他没有一次是自觉自愿地离开笼子的，这一点我们得为他作证。经理规定的饥饿表演的最高期限是四十天，超过这个期限他决不让他继续饿下去，即使在世界有名的大城市也不例外，其中道理是很好理解的。经验证明，大凡在四十天里，人们可以通过逐步升级的广告招徕不断激发全城人的兴趣，再往后观众就累了，表演场就会门庭冷落。在这一点上，城市和乡村当然是略有区别的，但是四十天是最高期限，这条常规是各地都适用的。所以到了第四十天，插满鲜花的笼子的门就开了，观众兴高采烈，挤满了半圆形的露天大剧场，军乐队高奏乐曲，两位医生走进笼子，对饥饿艺术家进行必要的检查、测量，接着通过扩音器当众宣布结果。最后上来两位年轻的女士，为自己有幸被选中侍候饥饿艺术家而喜气洋洋，她们要扶着艺术家从笼子里出来，走下那几级台阶，阶前有张小桌，上面摆好了精心选做的病号饭。在这种时刻，饥饿艺术家总是加以拒绝。当两位女士欠着身子向他伸过手来准备帮忙的时候，他虽是自愿地把他皮包骨头的手臂递给了她们，但他却不肯站起来。现在刚到四十天，为什么就要停止表演呢？他本来还可以坚持得更长久，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为什么在他的饥饿表演正要达到最出色的程度（唉，还从来没有让他的表演达到过最出色的程度呢）的时候停止呢？只要让他继续表演下去，他不仅能成为空前伟大的饥饿艺术家——这一步看来他已经实现了——而且还要超越这一步而达到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峰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饥饿能力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要剥夺他达到这一境界的荣誉呢？为什么这群看起来如此赞赏他的人，却对他如此缺乏耐心呢？他自己还能继续饿下

去，为什么他们却不愿忍耐着看下去呢？而且他已经很疲乏，满可以坐在草堆上好好休息休息，可现在他得支立起自己又高又细的身躯，走过去吃饭，而对于吃，他只要一想到就要恶心，只是碍于两位女士的份上，他才好不容易勉强忍住。他仰头看了看表面上如此和蔼，其实是如此残酷的两位女士的眼睛，摇了摇那过分沉重地压在他细弱的脖子上的脑袋。但接着，一如往常，演出经理出场。经理默默无言（由于音乐他无法讲话），双手举到饥饿艺术家的头上，好像他在邀请上苍看一看他这草堆上的作品，这值得怜悯的殉道者（饥饿艺术家确实是个殉道者，只是完全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罢了）。演出经理两手箍住饥饿艺术家的细腰，动作非常小心，以便让人感到他抱住的是一件极易损坏的物品；这时，经理很可能暗中将他微微一撼，以致饥饿艺术家的双腿和上身不由自主地摆荡起来。接着就把他交给那两位此时吓得脸色煞白的女士，于是饥饿艺术家只得听任一切摆布。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就好像它一滚到了那个地方，就莫名其妙地停住不动了；他的身体已经淘空；双膝出于自卫的本能互相夹得紧紧，但两脚却擦着地面，好像那不是真实的地面，它们似乎在寻找真正可以着落的地面；他的身子的全部重量（虽然非常轻）都落在其中一个女士的身上，她气喘吁吁，四顾求援（真想不到这件光荣差事竟是这样的），她先是尽量伸长脖子，这样至少可以使饥饿艺术家碰不到她的花容。但这点她并没有做到，而她的那位较为幸运的女伴却不来帮忙，只肯战战兢兢地持着饥饿艺术家的一只手——其实只是一小把骨头——举着往前走，在哄堂大笑声中那位倒霉的女士不禁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只得由一个早就站着待命的仆人接替了她。接着开始就餐，经理在饥饿艺术家近乎昏厥的半眠状态中给他灌了点流汁，同时说些开心的闲话，以便分散大家对饥饿艺术家身体状况的注意力，然后，据说饥饿艺术家对经理耳语了一下，经理就提议为观众干杯；乐队起劲地奏乐助兴。随后大家各自散去。谁能对所见到的一切不满意呢，没有一个人。只有饥饿艺术家不满意，总是他一个人不满意。

每表演一次，便稍稍休息一下，他就这样度过了许多个岁月，表面上光彩照人，扬名四海。尽管如此，他的心情通常是阴郁的，而且有增无已，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体察他的心情。人们该怎样安慰他呢？他还有什么可企求的呢？如果一旦有个好心肠的人对他表示怜悯，并向他说明他的悲哀可能是由于饥饿造成的，这时，他就会——尤其是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饥饿表演之后——用暴怒来回答，那简直像只野兽似的猛烈地摇撼着栅栏，真是可怕之极。但对于这种状况，演出经理自有一种他喜欢采用的惩治办法。他当众为饥饿艺术家的反常表现开脱说：

饥饿艺术家的行为可以原谅，因为他的易怒性完全是由饥饿引起的，而对于吃饱了的人并不是一下就能理解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就讲起饥饿艺术家的一种需要加以解释的说法，即他能够断食的时间比他现在所作的饥饿表演要长得多。经理夸奖他的勃勃雄心、善良愿望与伟大的自我克制精神，这些无疑也包括在他的说法之中；但是接着经理就用出示照片（它们也供出售）的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艺术家的那种说法驳得体无完肤。因为在这些照片上，人们看到饥饿艺术家在第四十天的时候，躺在床上，虚弱得奄奄一息。这种对于饥饿艺术家虽然司空见惯、却不断使他伤心丧气的歪曲真相的做法，实在使他难以忍受。这明明是饥饿表演提前收场的结果，大家却把它解释为饥饿表演之所以结束的原因！反对这种愚昧行为，反对这个愚昧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在经理说话的时候，他总还能真心诚意地抓着栅栏如饥似渴地倾听，但每当他看见相片出现的时候，他的手就松开栅栏，叹着气坐回到草堆里去，于是刚刚受到抚慰的观众重又走过来观看他。

几年后，当这一场面的目击者们回顾这件往事的时候，他们往往连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在这期间发生了那个已被提及的剧变，它几乎是突如其来的，也许有更深刻的缘由，但有谁去管它呢；总之，有一天这位备受观众喝彩的饥饿艺术家发现他被那群爱热闹的人们抛弃了，他们宁愿纷纷涌向别的演出场所。经理带着他又一次跑遍半个欧洲，以便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地方仍然保留着昔日的爱好；一切徒然；到处都可以发现人们像根据一项默契似地形成一种厌弃饥饿表演的倾向。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就有一些苗头，由于人们被成绩所陶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切实加以防止，事到如今要采取什么对策却为时已晚了。诚然，饥饿表演重新风行的时代肯定是会到来的，但这对于活着的人们却不是安慰。那么，饥饿艺术家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位被成千入簇拥着欢呼过的人，总不能屈尊到小集市的陋堂俗台去演出吧，而要改行干别的职业呢，则饥饿艺术家不仅显得年岁太大，而且主要是他对于饥饿表演这一行爱得发狂，岂肯放弃。于是他终于告别了经理——这位生活道路上无与伦比的同志，让一个大马戏团招聘了去；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他对合同条件连看也不屑看一眼。

马戏团很庞大，它有无数的人、动物、器械，它们经常需要淘汰和补充。不论什么人才，马戏团随时都需要，连饥饿表演者也要，当然所提条件必须适当，不能太苛求。而像这位被聘用的饥饿艺术家则属于一

种特殊情况，他的受聘，不仅仅在于他这个人的本身，还在于他那当年的鼎鼎大名。这项艺术的特点是表演者的技艺并不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减色。根据这一特点，人家就不能说：一个不再站在他的技艺顶峰的老朽的艺术家想躲避到一个马戏团的安静闲适的岗位上去。相反，饥饿艺术家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饥饿本领并不减当年，这是绝对可信的。他甚至断言，只要准许他独行其是（人们马上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他要真正做到让世界为之震惊，其程度非往日所能比拟。饥饿艺术家一激动，竟忘掉了时代气氛，他的这番言辞显然不合时宜，在行的人听了只好一笑置之。

但是饥饿艺术家到底还没有失去观察现实的能力，并认为这是当然之事，即人们并没有把他及其笼子作为精彩节目安置在马戏场的中心地位，而是安插在场外一个离兽场很近的交通要道口，笼子周围是一圈琳琅满目的广告，彩色的美术体大字令人一看便知那里可以看到什么。要是观众在演出的休息时间涌向兽场去观看野兽的话，几乎都免不了要从饥饿艺术家面前经过，并在那里稍停片刻，他们本来是要在那里多待一会儿，从从容容地观看一番的，只是由于通道狭窄，后面涌来的人不明究竟，奇怪前面的人为什么不赶紧去观看野兽，而要在这条通道上停留，使得大家不能从容观看他。这也就是为什么饥饿艺术家看到大家即将来参观（他以此为其生活目的，自然由衷欢迎）时，就又颤抖起来的原因。起初他急不可待地盼着演出的休息时间；后来当他看到潮水般的人群迎面滚滚而来，他欣喜若狂，但他很快就看出，那一次又一次涌来的观众，就其本意而言，大多数无例外地是专门来看兽畜的。即使是那种顽固不化、近乎自觉的自欺欺人的人也无法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可是看到那些从远处蜂拥而来的观众，对他来说总还是最高兴的事。因为，每当他们来到他的面前时，便立即在他周围吵嚷得震天价响，并且不断形成新的派别互相谩骂，其中一派想要悠闲自在地把他观赏一番，他们并不是出于对他有什么理解，而是出于心血来潮和对后面催他们快走的观众的赌气，这些人不久就变得使饥饿艺术家更加痛苦；而另一派呢，他们赶来的目的不过是想看看兽畜而已。等到大批人群过去，又有一些人姗姗来迟，他们只要有兴趣在饥饿艺术家跟前停留，是不会再有人妨碍他们的了，但这些人为了能及时看到兽畜，迈着大步，匆匆而过，几乎连瞥也不瞥他一眼。偶尔也有这种幸运的情形：一个家长领着他的孩子指着饥饿艺术家向孩子们详细讲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讲到较早的年代，那时他看过类似的、但盛况无与伦比的演出。孩子呢，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学历和生活阅历，总是理解不了——他们懂得什么叫饥饿吗？

然而在他们炯炯发光的探寻着的双眸里，流露出那属于未来的、更为仁慈的新时代的东西。饥饿艺术家后来有时暗自思忖：假如他所在的地点不是离兽笼这么近，说不定一切都会稍好一些。像现在这样，人们很容易就选择去看兽畜，更不用说兽场散发出的气味，畜生们夜间的闹腾，给猛兽肩挑生肉时来往脚步的响动，喂食料时牲畜的叫唤，这一切把他搅扰得多么不堪，使他老是郁郁不乐。可是他又不敢向马戏团当局去陈述意见；他得感谢这些兽类招徕了那么多的观众，其中时不时也有个把是为观看他而来的，而如果要提醒人们注意还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从而使人们想到，他——精确地说——不过是通往厩舍路上的一个障碍，那么谁知道人家会把他塞到哪里去呢。

自然是一个小小的障碍，一个变得越来越小的障碍。在现今的时代居然有人愿意为一个饥饿艺术家耗费注意力，对于这种怪事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这种见怪不怪的态度也就是对饥饿艺术家的命运的宣判。让他去就其所能进行饥饿表演吧，他也已经那样做了，但是他无从得救了，人们从他身旁扬长而过，不屑一顾。试一试向谁讲讲饥饿艺术吧！一个人对饥饿没有亲身感受，别人就无法向他讲清楚饥饿艺术。笼子上漂亮的美术字变脏了，看不清楚了，它们被撕了下来，没有人想到要换上新的；记载饥饿表演日程的布告牌，起初是每天都要仔细地更换数字的，如今早已没有人更换了，每天总是那个数字，因为过了头几周以后，记的人自己对这项简单的工作也感到腻烦了；而饥饿艺术家却仍像他先前一度所梦想过的那样继续饿下去，而且像他当年预言过的那样，他长期进行饥饿表演毫不费劲。但是，没有人记天数，没有人，连饥饿艺术家自己都一点不知道他的成绩已经有多大，于是他的心变得沉重起来。假如有一天，来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他把布告牌上那个旧数字奚落一番，说这是骗人的玩意，那么，他这番话在这种意义上就是人们的冷漠和天生的恶意所能虚构的最愚蠢不过的谎言，因为饥饿艺术家诚恳地劳动，不是他诳骗别人，倒是世人骗取了他的工钱。

又过了许多天，表演也总算告终。一天，一个管事发现笼子，感到诧异，他问仆人们，这个里面铺着腐草的笼子好端端的还挺有用，为什么让它闲着。没有人回答得出来，直到一个人看见了记数字的牌儿，才想起了饥饿艺术家来。他们用一根竿儿挑起腐草，发现饥饿艺术家在里面。“你还一直不吃东西？”管事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停止呢？”“请诸位原谅。”饥饿艺术家细声细气地说；管事耳朵贴着栅栏，因此只有他才能听懂对方的话。“当然，当然。”管事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摸了摸自

己的额头，以此向仆人们暗示饥饿艺术家的状况不妙，“我们原谅你。”“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我们也是赞赏的。”管事迁就地回答说。“但你们不应当赞赏。”饥饿艺术家说。“好，那我们就不赞赏，”管事说，“不过究竟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饥饿艺术家说。“瞧，多怪啊！”管事说，“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别的办法呢？”“因为我，”饥饿艺术家一边说，一边把小脑袋稍稍抬起一点，撮起嘴唇，直伸向管事的耳朵，像要去吻它似的，唯恐对方漏听了他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

“好，归置归置吧！”管事说，于是人们把饥饿艺术家连同烂草一起给埋了。而笼子里换上了一只小豹，即使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在弃置了如此长时间的笼子里，这只凶猛的野兽不停地蹦来跳去，他也会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小豹什么也不缺。看守们用不着思考良久，就把它爱吃的食料送来，它似乎都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利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是随着它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致观众感到对它的欢乐很受不了。但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

叶廷芳 译

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51]

我们的女歌手名叫约瑟芬。没有听过她歌唱的人，是不会知道她歌唱的力量的。没有人不被她的歌声所吸引，这一点，由于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不喜欢音乐，所以更加值得赞誉。我们最喜爱的音乐是宁静的和平；我们的生活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设法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忧虑，我们也不可能使自己升华，获得类似音乐这种远离我们惯常生活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深感悲痛；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优点是某种实用的狡猾，当然，我们也非常迫切需要这种狡猾，不论遇到什么事，我们总习惯于用狡猾的一笑来安慰自己，即使我们有一天感到，应该要求得到也许来自音乐的幸福，但

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唯独约瑟芬是个例外；她热爱音乐，也懂得介绍音乐；她是唯一的一个；要是她死了，音乐也会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天知道会消失多长时间。

我常常思考，对这种音乐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毕竟对音乐一窍不通；我们理解约瑟芬的歌唱，或者由于约瑟芬否认我们的理解能力，以为至少能理解她的歌唱，这怎么可能呢？最简单的回答也许是：她的歌唱的确太美了，就连最迟钝的感官也无法抗拒它，不过这种回答并不能使人满意。假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在听到这种歌唱的时候，想必最初会觉得它不同凡响，而且始终会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从她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我们以往从未听到过的，我们甚至也没有能力听这歌声，只有这个约瑟芬才能使我们听懂它，而任何旁人却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看法一点儿也不合乎实际情况，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发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感觉。在知心朋友的范围内，我们相互坦率地承认，约瑟芬的歌唱，作为一种歌唱来说，一点儿也不特别。

这究竟是不是歌唱呢？我们尽管缺乏音乐天赋，但却有歌咏的传统；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古代就有歌唱；传说里就曾讲到过这点，甚至歌曲还保存了下来，当然，在今天，谁也不会再去唱这些歌曲。所以说，对什么是歌唱，我们毕竟有一种先觉，而约瑟芬的艺术本来就不符合我们的预感的。那么，约瑟芬的歌唱到底是不是一种歌唱？会不会只是在吹口哨？吹口哨我们大家当然都很熟悉，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技巧，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技艺，而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会吹口哨，但是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冒充为艺术，我们吹口哨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吹口哨是我们民族的特点之一。倘若约瑟芬真的不是歌唱，而只不过是吹口哨，也许，至少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她几乎没有越出一般吹口哨的范围——她也许连一般吹口哨的气力都没有，而一个普通的挖土工人倒能一边干活，一边毫不费劲地吹上一整天的口哨——倘若一切当真如此，那么，约瑟芬的所谓的艺术家气质虽然会被驳倒，但是这样一来，人们更需解开她为何具有巨大影响这个谜。

可是，她发出的声音恰恰不只是口哨声。倘若你站在离她很远的地方侧耳倾听，或者采取更好的办法考察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比方让约瑟芬在其他的歌手中间歌唱，你自己的任务在于从这些声音当中把

她的声音辨认出来，这时你能听出来的，肯定只是一种平常的、顶多由于纤细或柔弱而稍显突出的口哨声。但是，如果你站在她的面前，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口哨声了；总之，要了解她的艺术，不仅需要听她唱，而且还要看她唱。即便这只是我们日常吹出的口哨，但在这里它却首先给人一种奇特的印象，即某人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他所做的无非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敲开一个核桃确实算不上是一种艺术，因此也没有哪个敢于召集观众，在他们面前敲核桃，以此来为他们解闷。要是有人居然这么做了，而且如愿以偿，那么这就不能仅仅看作单纯地敲核桃了。或者就算是敲核桃吧，但结果只会证明我们忽视了这门艺术，因为我们毫不费劲就掌握了这门艺术，同时还证明，正是这位敲核桃的新手第一次使我们看到了敲核桃的真正诀窍，假如他敲核桃不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样熟练，那效果反倒会更好呢。

也许敲核桃的事与约瑟芬的歌唱有某些类似之处；我们欣赏她身上的某一特长，而这一特长若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不会去欣赏的；顺便提一下，在后面这一点上，她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有一次我正巧在场，不知哪个提醒她——这自然是会经常发生的——注意全民族都在吹口哨，这只不过是一桩小事，可是约瑟芬却感到受不了。像她当时流露出的那种狂妄自大的微笑，我还没有见到过呢。她，一个外表生来就十分娇柔的女子，即使是在我们这个不乏这类女性的民族里，她的娇柔也是足够突出的，但是在当时，她却显得格外卑鄙；顺便提一下，生性非常敏感的约瑟芬，也许立即觉察到了自己的不是，便镇静了下来。总之，她矢口否认自己的艺术和吹口哨之间有任何的关联。对于持相反看法的人，她只报以蔑视的态度，还可能怀恨在心。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心，因为跟她作对的这一派人（我也一半属于这一派）和群众一样，同样钦佩她，但是约瑟芬不仅仅要大家钦佩，而且要求大家严格按照她所规定的方式钦佩她，对她来说，单单钦佩是一钱不值的。总之，如果你坐在她面前，你就会理解她；只有在你远离她的时候，你才会反对她；当你坐在她面前时，你就会明白：她在这儿用口哨吹出的东西，并不是吹口哨。

由于吹口哨是我们的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所以你也许会认为，约瑟芬的听众里也会有哪个吹起口哨来；她的艺术会给我们带来愉快，而当我们快活的时候，就会吹口哨；但她的听众并不吹口哨，而是像耗子一样一声不响，仿佛我们分享到盼望已久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单靠我们自己吹口哨，至少是无法获得的，我们沉默着。使我们心醉神迷的，

是她的歌唱呢，还是她那细弱的噪音周围的肃穆的宁静呢？有一次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正当约瑟芬歌唱的时候，有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也天真烂漫地吹起了口哨。怎么，这竟然与我们听到的约瑟芬的歌声一模一样；那里，在前面，是那尽管很熟练，但却始终是怯生生的口哨声，而在这里，在观众中，则是那个出神的女孩子的口哨声；要把两者加以区别，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立即向这个捣乱的女孩发出一片嘘声和唿哨声，尽管这样做压根儿没有必要，因为当约瑟芬洋洋得意地吹起口哨、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把脖子伸得不能再长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肯定会感到害怕和羞愧而溜走的。

再者，约瑟芬总是本性难移，每件小事，每一偶然事件，每一种违抗行为，比方正厅前排座位里发出的喀嚓声，咬牙切齿声，照明干扰，她都认为有助于提高她演唱的效果；在她看来，她毕竟是在为聋子演唱；尽管听众并不缺乏热情，常为她的演唱鼓掌喝彩，可她认为，她早就不指望会有什么知音了。她因此觉得有种种干扰反倒更好；一切外来的、与她的歌唱的纯洁性相对立的干扰，只需稍加斗争，甚至不经过斗争，仅仅用对阵就能加以战胜，这种种的干扰有助于唤醒大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理解，却也能使他们学会肃然起敬。

小事尚且能助她一臂之力，大事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每天都发生使人惊异的事，使人惶恐不安，每天都带来希望和恐惧，要是有人每时每刻，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得不到同伴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忍受这一切的；但是，要得到同伴们的支持，往往相当困难；有的时候，本该由一个人去承担的重担，却把上千个人的肩膀压得颤颤巍巍的。这时，约瑟芬认为她的良机到了。她早已站在这里，这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胸脯以下抖动得尤其厉害，看了使人害怕，仿佛她把全身的力气都凝聚在歌唱上，仿佛她身上不直接服务于歌唱的一切，诸如每一分力量，几乎是每一滴生机，都被夺走，仿佛她被剥夺了一切，被人抛弃，唯有善良的神灵保护着她，当她如此付出整个身心、忘情地歌唱的时候，仿佛一丝冷风吹过就能将她杀死似的。但是，恰恰在目睹此情此景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敌人却习惯于对自己说：“她连吹口哨都不会呢；她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却不是为了歌唱——我们别谈歌唱吧——而是为了勉强吹出几声流行全国的口哨声来。”我们就是这样看的，然而，如上所说，这是一种虽说不可避免、但又转瞬即逝的印象。我们很快也就沉浸在大众的感情里，他们身子挨着身子，热情洋溢地屏息谛听。

我们的耗子般的听众几乎一直处在运动之中，他们往往为了不怎么明确的目的而到处乱窜，为了把这批听众聚集到自己周围来，约瑟芬多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后仰着小脑袋，半张着嘴巴，眼睛向上瞧，摆出一副即将歌唱的姿势。她随时随地都可以这样做，不一定要在某个老远就被人看见的地方，任何一个偏僻的、一时高兴选中的角落，同样可以很好地派上用场。她要唱歌的消息马上就会传开，紧接着，大批大批的听众就会蜂拥而来。但有时也会发生故障，约瑟芬喜欢在动荡不安的时刻歌唱，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各种各样的忧虑和困难迫使我们选择各式各样的道路，即使大家都非常愿意去听，也很难像约瑟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集合到一起，于是这一次，她只好摆出一副大架子站在那儿，也许过了好久，听众的数目依然不足——这下她当然大为恼火，使劲跺脚，破口大骂，完全不像个少女，她甚至咬牙切齿。但是，就连这样的行为也无损于她的名声；人们非但不想遏制一下她那些过分的要求，反而极力迎合她；人们派出了信差，以便把听众接来，这可是瞒着她干的；于是人们看到周围的道路上布置了岗哨，这些岗哨向来者招手示意，让他们加快步子；这一切不断地进行着，直到最后凑齐了相当数量的听众。

究竟是什么促使这耗子般的民族为约瑟芬如此卖命呢？比起约瑟芬的歌唱到底算不算歌唱那个问题来，这个问题不见得更加容易回答。假如断言这个民族正是由于约瑟芬的歌唱才无条件地顺从她，那就可以取消这个问题，把它跟第二个问题合并。但情况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这个民族几乎不知道什么叫无条件的顺从，这个民族遇事总喜欢耍点小聪明，像儿童那样地交头接耳地说话，扯些仅仅用以活动嘴皮子的、因而自然是无害的闲话，这样的一种民族无论如何是不会无条件地顺从的，约瑟芬恐怕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尽量提高她那微弱的声音与之作斗争。

当然，人们在作这种泛泛的评论的时候，不可走得太远，这个民族毕竟顺从了约瑟芬，只不过不是无条件地顺从罢了。比如，他们没有能力嘲笑约瑟芬。人们可以向自己承认：约瑟芬身上有些引人发笑的东西；本来，笑一向与我们有缘；尽管我们生活中有种种不幸，但我们几乎总是善于微微一笑；但是我们不嘲笑约瑟芬。有时候，我有这样的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它与约瑟芬的关系的：她，这个脆弱的、需要别人爱护的、总之是杰出的、在她本人看来是由于她的歌唱而出类拔萃的女人，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这个民族，因此，它必须照料她；至于原

因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只有事实看来是肯定了的。既然她被托付给了自己，就不能嘲笑她；若是嘲笑她，就等于是玩忽职守；要是我们当中的最恶毒的人偶尔说：“看见约瑟芬，我们就笑不起来了。”这可算作是对约瑟芬的最恶毒的攻击了。

总而言之，这个民族像父亲照顾孩子那样照顾着约瑟芬，孩子向父亲伸出小手——谁也说不清，这是请求呢还是要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认为我们这个民族不适宜于履行这种父亲的义务，但实际上它履行着这样的义务，至少在照顾约瑟芬上堪称楷模；在这方面，作为整体的民族所能做到的，任何个别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民族和个人之间的力量的差别是巨大的，只要这个民族把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给予他以温暖，而他也受到了充分保护，这就够了。当然，对约瑟芬，大家还不敢讲这些事情。“我才不在乎你们的保护呢。”她会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这样想。此外，要是她反抗，这并不意味着她真的要反驳，毋宁说是一派孩子气和孩子式的感谢罢了，而父亲的态度是不要把她的造反放在心上。

可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更难用这个民族同约瑟芬的关系来加以解释。这就是说，约瑟芬持有相反的看法，她认为是她在保护这个民族。据她说，她的歌唱能把我们从恶劣的政治或经济处境里解救出来，它的作用就在于此，她的歌唱即使不能消除不幸，但至少也能赋予我们力量去承受不幸。她并没有这样讲出来，也没有用另外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一般很少说话，在喋喋不休的人群当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她那闪烁的目光却表达了出来，从她紧闭的嘴上——在我们这儿，只有少数几个人能闭嘴缄默，她却可以闭嘴——可以看出她的这种想法。每当坏消息传来——在有些日子里，这种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其中有假的和半真半假的——她会立刻一跃而起，而往常她总是懒洋洋地往地上躺；这次她一跃而起，伸长脖子，像暴风雨来临前的牧人那样，用目光四处搜寻她的人群。诚然，孩子们也会以他们那种粗野和冲动的方式提出类似的要求，但是约瑟芬提出要求时，有根有据，不像孩子们那样没有道理，当然啦，她拯救不了我们，也给不了我们力量，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民族吃惯了苦，毫不爱惜自己，当机立断，视死如归，由于长期生活在蛮勇的气氛当中，只是表面上显得怯懦罢了，此外，这个民族不仅繁殖力强，而且喜欢冒险——我是说，事后以这个民族的救星自居，是件容易的事，这个民族始终还在设法自救，尽管要做出牺牲，而大量的牺牲，准会使历

史研究者——总的看来，我们完全忽视历史研究——吓得发愣。然而，我们恰恰在危急时刻比平时更加专心地倾听约瑟芬的声音，这也是事实。即将临头的种种威胁使我们变得更安静，更谦恭，更顺从约瑟芬的指挥；我们喜欢聚会，喜欢相互挤在一起，特别是因为有某种机缘的时候，而这机缘与折磨着我们的事情完全无关；仿佛我们在战斗前夕还必须抓紧时间——不错，必须抓紧时间，可惜约瑟芬经常忘记这一点——共饮一杯和平之酒。这与其说是歌唱演出，不如说是一次群众集会，更确切地说，是一次集会，在这个集会上，除了前面轻轻的口哨声之外，四下里一片沉寂；这一时刻非常严峻，以致谁也不希望用聊天的方式白白地把它度过。

当然，这样一种关系决不会使约瑟芬感到满意。她的地位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她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尽管如此，她因自己的自信而目眩，看不到某些事情，而且不必费大劲就能使她忽视更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从一种普遍有用的意义上说，常有一群谄媚者在活动，——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不被人注意地在群众集会的角落里唱歌，尽管这事本身不乏价值，她肯定是不愿为此奉献出她的歌唱的。

不过，她也无需这样做，因为她的艺术始终受到重视。尽管我们内心深处关心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场内的寂静也不单单是为了取悦于女歌手，有些人根本不抬头去看，而是把脸埋进邻座的毛皮里，看来约瑟芬在台上是白费力气了，然而——不可否认——她的口哨声却必然或多或少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这口哨声响起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人都被迫保持沉默，仿佛它以全民族的名义在向每个成员发出信息；约瑟芬在困难的抉择中所发出的低微的口哨声，几乎就像我们民族在充满骚乱的敌对世界中所过着的贫穷生活。约瑟芬坚持着，这微不足道的声音坚持着，这毫无成就的歌唱坚持着，并且传到了我们的耳边，这也许是值得思考的。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歌唱艺术家出现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忍受的，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演出荒唐，而一致加以拒绝。但愿约瑟芬没有认识到，我们倾听她唱歌这一事实，是反对她唱歌的一种表示。她大概也猜到了这一点，否则她干吗极力否认我们是在听她歌唱呢？但她仍一再地歌唱，不理睬这种猜测。

不过，她总还能得到一点安慰：我们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认真地听她歌唱，就像认真地听某位歌唱艺术家的演唱一样；约瑟芬达到了一个歌

唱艺术家在我们这里费尽力气也达不到的效果，而这效果恰恰产生于她那些贫乏的手段。这大概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在我们这个民族中，人们没有青年时代，也几乎没有非常短暂的童年时代。虽然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应当保证让孩子们得到特殊的自由，特殊的爱护，让他们有权利稍许逍遥自在些，稍许胡闹几下，多少玩一玩，应当承认孩子们有这些权利，并且帮助实现这些权利；这样的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几乎人人都赞成，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要求更应该得到赞成的了，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要求更少地得到承认，大家赞同这些要求，并试图按照它们的意思去做，但随即又一如往昔。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环境，就得像成年人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太多，到处为我们设下的危险无法计算——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避开生存竞争，否则他们就会过早地死亡。当然，除了这些可悲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突出的原因：我们的部族生殖力特强。一代——每一代都是人数众多——排挤另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但愿在其他民族那里，儿童会受到细心的照料，但愿在那里为儿童办起学校，但愿在那里，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这些学校里蜂拥而出，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的，始终是同一批儿童。我们没有学校，但是，在极短的间隔时间里，便从我们的民族中涌现出一群又一群数量无法估计的儿童，在他们尚未学会吹口哨之前，他们兴高采烈地发出咿咿声或尖叫声；在他们还不会跑的时候，他们打滚，或者凭借自身的重力继续往前滚；在他们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们结伙笨拙地把一切都拖走，我们的儿童啊！不像在那些学校里，总是同一批儿童，不，总是一批又一批新的儿童，没完没了的，没有中断，一个孩子刚出世，他就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马上又挤满了数目众多、急急匆匆、难以分辨的新的孩子的脸，它们由于幸福而泛出红润的色彩。当然，尽管这是件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但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这自有其后果。它使我们这个民族内心里充满了某种永不消失且根除不了的孩子气；这同我们最大的优点——可靠的、注重实际的头脑——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的时候，我们的行动非常愚蠢，跟孩子们干傻事一模一样，缺乏理智、铺张浪费、慷慨大方、轻举妄动，而所有这些行径常常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虽然我们因此而得到的乐趣赶不上孩子们的乐趣，但其中必定还有那么一点成分。约瑟芬也和我们一样，向来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孩子气中得到好处。

然而，我们的民族不仅有孩子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未老先衰，在我们这儿，童年与老年的发展情况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代，我们一下子就变为成年人，而成人阶段又太长，因此，从成年时期开始，我们这个从总体上说具有坚韧不拔精神和前途无量的民族，普遍感到某种困倦和失望。这也许还跟我们缺乏音乐天赋有关；我们过于暮气沉沉，不适合于搞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的老成持重很不合拍，我们对音乐感到厌倦，摇手将之拒绝；我们退而吹口哨，偶尔吹几声口哨，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音乐天才；但是，即使有音乐天才，他们想必在尚未得到发展之前就被自己同胞的这种性格给压制了。相反，约瑟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者唱歌，随她怎么说都行；这并不打扰我们，而且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完全能受得了；要是其中含有一点儿音乐成分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这保持了某种音乐传统，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

但是，约瑟芬给这个具有如此情绪的民族带来的东西还远不止这些。在她的音乐会上，尤其是在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只有那些黄口小儿对这位女歌手感兴趣，只有他们惊讶地观看她怎样掀起嘴唇，从小巧玲珑的门牙之间喷出气来，观看她如何在欣赏她自己发出的声音的时候渐渐死去，以及如何利用这一倒下激励自己，获取新的、她越来越无法理解的成就，可是，真正的听众只顾自己的事，这是一目了然的。这个民族在斗争之间短暂的间歇里做着梦，仿佛每一个人的四肢都松弛了，仿佛每一个心神不定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在这个民族温暖的大床上摊开手脚伸展一下身子。约瑟芬的口哨声不时地传入了这些梦里；她觉得她的口哨声珠落玉盘、清脆悦耳，而我们则觉它有如裂帛、刺耳难听；但是，不管怎样，这声音在这里恰如其分，而其他任何的声音，比如音乐，在这儿就从来也没有获得它所盼望的时机。在她的口哨声里，包含着某些我们短暂而不幸的童年情景，包含着某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也包含着某些积极的今日生活，包含着今日生活中小小的、不可理解的、然而的确存在的、并且无法消灭的欢乐。而这一切不是以高亢的声调，而是以轻柔的、耳语般的、亲切的、有时甚至有点沙哑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这自然是吹口哨。怎么会不是呢？吹口哨是我们民族的语言，有的人一辈子只吹口哨，但他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在这里，吹口哨不仅使我们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桎梏，而且使我们得到了短暂的解脱。不用说，这样的演出我们是不愿失去的。

但是，从这种看法到约瑟芬的断言——她在这样的时刻给予我们新

的力量，云云，等等——还需要走非常远的路。当然，这是对一般公众而言，对约瑟芬的谄媚者来说又当别论。“怎么会有别的解释呢？”——他们厚颜无耻地说——“对听众云集的现象，尤其是在危险迫在眉睫时听众云集的现象，还能做别的解释吗？这种现象有时甚至妨碍我们采取充分而及时的措施来防止危险。”不幸的是，最后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但这并不属于约瑟芬的光荣的功绩，尤其是假如我们补充上这样一个情况，即这些集会突然被敌人驱散，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不得不因此而丧命，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咎于约瑟芬，是的，很可能就是她的口哨声把敌人招引来的，可是她却始终占据着那小块最为安全的地方，并且由她的追随者保护着，头一个悄悄地迅速地溜走了。这点大家也都清楚，尽管这样，当下一次约瑟芬随便在什么地方随时举行演唱的时候，大家照旧匆匆赶去。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约瑟芬几乎不受法律的约束，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她的行动危及到全民族的安全，大家也会宽恕她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芬的要求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是的，从这个民族给予她的这种自由中，从这种特殊的、除她之外谁也得不到的、根本违反法律的馈赠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对以下的情况的自白，即如约瑟芬所断言的那样，这个民族不理解她，它束手无策地惊奇地注视她的艺术，感到自己不配欣赏她的艺术，因而给约瑟芬带来了内心的痛苦，于是他们便企图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努力来补偿她的这种痛苦，而且正如她的艺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那样，约瑟芬本人及其愿望也被他们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外。当然，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做法，也许这个民族的个别成员会迅速地向她屈服，但是，正如这个民族不会向任何人无条件地投降那样，它也不会向她屈膝投降的。

很久以来，大概从她开始自己艺术家生涯的那天起，约瑟芬就力争要大家照顾她，要求免去她的任何工作，以便她能专心致志地歌唱；这也就是说，让她不必去为每天的面包操心，也不必去参加与我们的生存竞争有关的一切活动，而这些活动——十之八九——应该转嫁到整个民族的身上。一个很快就会激动的人——在我们当中也确有这种容易兴奋的人——单单根据这种特殊的要求，根据能够想出这种要求的精神状态，便可推断出这种要求的内在的合理性。我们的民族却从中得出了另外的结论，并心平气和地拒绝了她的要求。他们也用不着费尽心力去反驳她提出请求的理由。比方说，约瑟芬指出，费力的劳动有害于她的嗓子，虽说劳动时花的力气比歌唱时花的要小得多，但毕竟会使她在演唱之后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机会，同时使她无法为新的演唱积蓄充沛的精力，在新的演唱会上，哪怕她竭尽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决不

会取得自己的最佳成绩。大家注意地听她申辩，但对之却不予理睬。这个很容易受感动的民族有时候也会无动于衷的。他们有时会斩钉截铁地拒绝，连约瑟芬也给惊呆了，于是她表现出服从，干她自己该干的那份活儿，尽其所能地唱好歌，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一时的表现，过不了多少时候，她又以新的力量重新投入战斗了——看来她在这方面有着无穷的力量呢。

现在清楚了，约瑟芬所争取达到的，原来并不是她嘴上所说的要求。她很明智，她不怕干活，是的，在我们这儿，好逸恶劳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即使批准了她的要求，她肯定也不会过一种和从前不同的生活，劳动压根儿不会妨碍她的歌唱，当然，她的歌唱也不会变得更美。因此，她努力追求的，只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永久地、打破一切先例地承认她的艺术。但是，在她看来几乎达到其他所有目的的时候，却没有达到要大家承认她艺术的目的。也许她从一开始就应该把进攻的目标指向另一个方向，也许她现在认识到自己所犯的这个错误，但她现在无法回头了，走回头路意味着背离自己的信念，她必须坚持这个要求，否则就得死去。

倘若如她所说的那样，她真有敌人的话，那么，她的敌人满可以开心地袖手旁观这场斗争。但她并没有敌人，即使有些人有时会反对她，但这场斗争也不会使谁感到高兴的。其原因是，这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会表现出一种冷静的、法官式的态度，这在我们这儿平时是极其罕见的。尽管你在这种场合下可能赞成这种态度，但是，只要你能想到，有朝一日这个民族也会对你采取类似的态度时，你就丝毫不会感到高兴。无论是这个民族的拒绝，还是约瑟芬的要求，问题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这个民族竟能以这种神秘的方式拒绝它的一位同胞，而以往这个民族却是慈父般地、甚至是慈父所不及地，简直是卑躬屈节地关怀这位同胞，相比之下，就显得更加难以捉摸了。

在这个问题上，假如把整个民族换成个别的人，你就会相信，这个单个的人会一直对约瑟芬提出的一个接一个的迫切要求做出让步，直到最后结束这种让步。他之所以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是因为他坚信，这种让步总会有个合适的限度；的确，他做了一些不必要的让步，目的只是为了促进事情的发展，只是纵容约瑟芬，促使她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直到她真的提出这最后的要求；这时，他自然可以断然拒绝她的最后要求，因为他早就有所准备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这样，这个

民族不需要这种诡计，此外，它对约瑟芬的尊敬是真诚的和经过考验的，而约瑟芬的要求的确过高，每个天真的孩子都会预先告诉她事情的结局；尽管如此，在约瑟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里，也包含了那样一些猜想，即这个民族在施诡计，因此，遭到拒绝的约瑟芬，除了痛苦之外，还感到了辛酸。

但是，尽管她有这样一些猜想，她却并不因此而害怕斗争。最近，斗争甚至激化了；迄今为止，她只是进行舌战，而现在，她开始采取别的手段，在她看来，这些手段更有效，而我们却认为对她更加危险。

有些人认为，约瑟芬之所以变得如此咄咄逼人，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正在衰老，声音不行了，所以，她觉得，现在是为争取得到承认而进行最后斗争的关键时刻了。我可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约瑟芬也就不成其为约瑟芬了。

对她来说，不存在衰老的问题，也不存在声音变差的问题。如果她提出某种要求的话，那并非出于外部的原因，而出于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考虑。她之所以伸手去抓悬在最高处的桂冠，并非因为此刻它恰恰挂得低了一点儿，而是因为它确实挂在最高处；倘若她有这方面的权力，她还会把桂冠挂得更高一些。

对外界困难的藐视当然并不妨碍她使用这些最不足取的手段。她不怀疑自己的权利；至于她的权利是如何得来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尤其是在她眼前展示出的这个世界上，有价值的手段恰恰不灵。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她甚至把争取自己权力的斗争从歌唱的领域转移到另一个对她说来并不怎么重要的领域。她的追随者们将她的格言到处散播，根据这些格言你可以知道，她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凭她的歌唱使这个民族的各个阶层，直至隐蔽得最深的反对派，都能获得一种真正的乐趣，不过这不是这个民族头脑里所想的真正的乐趣，因为它断言，它向来从约瑟芬的歌唱中感到了这种乐趣，而是约瑟芬所要求的那种乐趣。但是，她补充说，她不能假充高尚，也不能迎合低级趣味，所以她只能听其自然，该怎么唱就怎么唱。至于她为摆脱劳动而进行的斗争，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虽说这也是一种为争取自己的歌唱而进行的斗争，但在这里她没有直接用歌唱这个珍贵的武器去进行斗争，因此，她所使用的任何手段都是够好的。

比如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如果不对约瑟芬让步的话，她就打算少唱

花腔。我对声乐的花腔一窍不通，从她的歌声中我从未听出什么装饰音。而约瑟芬却要减少装饰音，暂时不想取消，只是减少而已。据说她真的把她的威胁付诸实施了，而我当然听不出她现在的演唱和她以往的演唱之间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整个民族照旧聚精会神地听她唱歌，并没有对装饰音发表什么意见，他们对约瑟芬的要求所持的态度也没有发生变化。此外，不容否认的是，有的时候，约瑟芬不仅在其外形上，而且在其思想上，会表现出相当的优美和灵活。比如在那次演出之后——在当时，她感到自己关于装饰音的决定对公众来说似乎过于严厉或过于突然——她当众宣布，下一次演出时，她将重新完全唱花腔。但是，下一次音乐会之后，她又改变了主意，决心再也不唱委婉动听的花腔了，除非大家做出一个对她有利的决定，否则她是不会再唱花腔的。而这个民族呢，对所有这一切声明、决定和决定的修改充耳不闻，就像陷入沉思的成年人对一个小孩的絮絮叨叨充耳不闻一样，态度尽管十分友好，但就是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

但是，约瑟芬不肯示弱。比如她不久前又声称，她干活时碰伤了脚，这使她站着歌唱有困难；可是，正因为她只能站着唱歌，所以她现在就得缩短演唱时间。尽管她一瘸一拐地走，而且让她的追随者搀扶着，但谁也不相信她真的受了伤。就算我们承认她那可爱的身体特别敏感，但我们毕竟是个劳动的民族，而约瑟芬也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要是我们由于擦伤了皮肤就想一瘸一拐地走，那么整个民族就会没完没了地瘸着走道了。但是，尽管她一瘸一拐地让人搀扶着走，尽管她以这种值得人怜悯的姿态比以前更经常地露面，这个民族仍以感激的心情听她唱歌，而且像以往那样被她的歌声迷住，并不因为缩短时间而小题大做。

因为她不能老是瘸着走，所以她又想出别的点子来，她借口累了，情绪不佳，身子虚弱。这下我们除听音乐会以外还有戏看了。我们看到她的追随者们跟在她的后面，一个劲地恳求她唱歌。她很乐意唱，但她不能。他们安慰她，拍她的马屁，几乎把她抬到了事先找好的演唱地点。最后，她终于含着无法解释的眼泪让步了，可是，正当她显然带着遗憾打算开始唱歌的时候，她却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两条胳膊不像往常那样前伸，而是有气无力地在身上吊着，使人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这两只胳膊短了一截似的——正当她想要开始唱歌的时候，她又感到不行了，她生气地猛一摇头，随即就瘫倒在我们眼前了。当然，她终于又挣扎着站了起来，并且唱了起来，我觉得这次的歌唱与以往的没有多

大区别，要是有人听觉灵敏、善于分辨音调的极为细微的差别，也许会从中听出一点儿不寻常的激情来，这激情当然对这件事有好处。唱到最后她甚至不像开始时那样疲倦了，她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舞台，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她那一闪而过的小步奔跑的话，拒绝追随者们的任何帮助，用冷冷的目光审视着那些毕恭毕敬地给她让路的群众。

那都是不久前发生的事了，可是最近一次，当大家期待着她唱歌的时候，她却不见了。不仅她的追随者在找她，许多人也帮忙寻找她，但一切都徒劳无益；约瑟芬溜走了，她不愿意唱，她甚至不希望人家请她唱，她这次是彻底离弃我们了。

真奇怪，她怎么会打错算盘，这个聪明的女人，竟会如此失策，以致人们觉得，她压根儿没有进行算计，只不过是在听凭命运的摆布，而在我们的世界里，她的命运只会变成一种非常悲惨的命运。是她自己主动放弃歌唱，是她自己破坏了她通过征服民心而获得的权力。她很少了解民心，却获得了这种权力，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站起来了，不再唱了，而这个民族依旧从容不迫，看不出有什么失望，依旧盛气凌人，四平八稳，这个不动脑子的民族只知道馈赠，尽管表面上不是这么回事，从来不会接受馈赠，哪怕是约瑟芬的馈赠，这个民族在继续走它的路。

而约瑟芬的情况必然每况愈下。过不了多久，她将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便永远沉默了。她不过是我们民族永恒的历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当然，这对我们来说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集会怎么会变得鸦雀无声的呢？当然啦，有约瑟芬在场的集会不也是鸦雀无声的吗？难道她吹出的口哨声确实要比对它的回忆更响、更生动、更值得一提吗？难道她在世时吹出的口哨声仅仅是一种回忆吗？难道约瑟芬的歌唱不正是由于它具有永恒的价值而被这个民族以其聪明智慧捧上了天吗？

因此，我们往后也许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东西，而约瑟芬呢，她已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在她看来，凡是出类拔萃的人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她将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数不清的英雄的行列里；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解脱，并被遗忘。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一座教堂里去，因为我爱上的一位姑娘晚间在那儿跪着祈祷半个小时，这时，我可以静静地观察她。

有一次，那位姑娘没有来，我闷闷不乐地朝那些祈祷者看，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人，他那整个瘦削的身子扑倒在地板上。他不时地用全身的力量揪住他的脑袋，唉声叹气地把脑袋咚咚地撞击在平放在石块上的手心上。

教堂里只有几个年老的妇女，她们常把自己包裹着的小头朝侧面转过去，以便向那位祈祷者望去。她们的这种全神贯注的观察似乎使他感到幸福，因为每当他那虔诚的感情爆发之前，他都要巡视一番，看看观察他的人是否很多。我觉得这很不对劲儿，于是决定在他走出教堂的时候先跟他打招呼，询问一下他为何以这种方式祈祷。说实在的，我很恼怒，因为我的那位姑娘没有来。

可是，才过了半小时，他就站起来，认认真真地画了个十字，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向圣水盆。我站在盆和门之间的路上，心里明白，他要是做出解释，就休想从我这里走过去。我扭歪着嘴——每当我准备坚决要说话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我用右腿朝前跨了一步，以便支撑着身子，继而把左腿随便地支撑在脚尖上；这样也能使我站得稳。

这时，此人正把圣水洒到自己的脸上，也许正朝我偷看，也许早就注意到我，显得不安，因为此时他突然从门里奔了出去。玻璃门砰地关上。我紧跟着他从门里走出来，可是再也看不到他，因为那儿有几条狭窄的街道，而且交通十分繁忙。

在往后的几天里，他没有来，而我的姑娘却来了。她身穿黑色衣服，衣肩上有透明的花边——其下面是半月形的衬衫边——一只剪裁得很好的领上的丝绸从花边的下端垂落下来。由于这位姑娘的到来，我忘掉了那位年轻人，即便他以后按时再来，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祈祷，我也不会去管他。然而，他总是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而且把脸转过去。也许原因在于，我总以为他处在运动之中，所以，即使他站着，我也觉得他在蹑手蹑脚地走似的。

有一次，我很晚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尽管这样，我仍然走进了

教堂。我在那儿再也找不到那位姑娘，正打算回家。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个年轻人躺在那儿。于是，我突然想起往事，急于想知道他的一切。

我踮起脚尖轻轻地走向门的通道，给了在那儿坐着的那个瞎子乞丐一个硬币，然后从他身旁溜到了那扇开着的门后；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也许脸上现出一副奸诈的样子。我在那儿感到舒服，决定常到这里来，在第二个小时里，我觉得专为那位祈祷者坐在这里毫无意义。但是，我仍然度过第三个小时，愤怒地让蜘蛛在我的衣服上爬来爬去，与此同时，最后的人们大声喘着气从黑暗的教堂里走了出来。

这时，他也来了。他小心地走着，在双脚着地之前，他先用自己的脚迅速地触一下地面。

我站了起来，笔直向前迈出一大步，抓住了这个年轻人。“晚安！”我说，然后抓住他的衣领，推着他走下石级，来到了有灯光照明的广场上。

当我们在下面的时候，他用一种完全求饶的声音说：“晚安，亲爱的、亲爱的先生，您别生我的气，我是您最忠诚的仆人。”

“好吧，”我说，“我想问您一下，我的先生；上次您逃脱了我，这回您休想再从我的手里逃走。”

“您充满同情心，我的先生，您会放我回家的。我值得您同情，这是实话。”

“不，”我大声喊道，这喊声盖过了正在驶过的电车的嘈杂声，“我不放您走。我恰恰喜欢这样的巧事。我有幸抓住了您，我为自己祝贺。”

于是他说：“天哪，您有一颗热烈的心和一颗像是用石头雕出的脑袋。您把我叫做您有幸抓住的东西，想必您是多么地幸福！因为我的不幸是一种动荡不安的不幸，一种在薄薄的尖端上动摇不定的不幸，一旦你碰到了它，它就会落到提问者的身上。晚安，我的先生。”

“好吧，”我说，同时紧紧地抓住他的右手，“要是您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要在这里的街道上开始呼喊。这样一来，所有现在下班的商店女售货员，以及所有她们的情人——他们高兴地盼望着她们归来——都

将聚拢来，因为他们将会以为是一匹拉出租马车的马倒了下来，或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到时，我将让他们看您。”

这时，他边哭边交替地吻我的双手，“我将告诉您您想知道的事情，不过我请求您，我们最好走到对面的小街里。”我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一同朝小街走去。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街道的黑暗——在这条街上，只有几盏相互隔得很远的黄色的提灯——还把我引进了一所旧房子的低矮的门厅走廊，我们走到了一盏小灯的下面，这灯悬挂在木梯的前面，灯里的油不时地滴落下来。

在那儿，他煞有介事地掏出了手帕，把它铺在梯级上，然后对我说：“请坐吧，亲爱的先生，这样您可以好问一些，我站着，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回答。可千万不要折磨我。”

于是，我坐了下来，我一边眯缝着眼睛朝他仰望，一边开口道：“您是一位滑稽可笑的疯子，您就是这样的人！您在教堂里的举止多么滑稽可笑！这多么讨厌，观众们看了，多么难受！如果人们不得不注视您，他们会多么地入神。”

他把自己的身体紧贴在墙上，只有头能在空间自由活动。“您别生气——您干吗要生那些不属于您的事情的气呢。每当我举止笨拙时，我就会生气；但是，若是别人行为不良，我会感到高兴。所以，要是我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被人们注视，您也不必为此生气。”

“您在说什么！”我大声地喊道，对那低矮的过道来说，这喊声未免太大，但我害怕把这声音减弱，“真的，您在说什么！说实在的，自从您头一次见到您，我就预感到，千真万确地预感到，您的处境如何。我有这方面的经验，要是我说，这是大陆上的一种晕船病，您别以为这是在说笑话。这种晕船病的本质是：您忘记了事物的真正名称，现在，您急于给它们灌注偶然的名称。要快，要快！可是，您刚一跑离开它们，就又忘记了它们的名称。这就好比是被您称之为‘巴别塔’的田野里的白杨，因为您不知道，或不想知道，这是一棵白杨，它再次无名地摇晃，依我看，您得把它叫做‘喝醉酒的诺亚’。”

“我很高兴我听不懂您刚才所说的话。”他说。听了这句话，我颇为震惊。

我激动地迅速说道：“您对听不懂我的话感到高兴。正好说明您听懂了我的话。”

“当然，我有这种表现，先生，不过，您也说得也太玄乎了。”

我把双手放到较高的梯级上，并把身子向后靠，以这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姿势——这种姿势是摔跤运动员用以拯救自己的最后手段——问道：“您用一种有趣的方法拯救自己，即假定您的情况和别人的完全一样。”

接着，他变得大胆起来。他把双手交叉地放在一起，为的是使自己的身体保持统一，然后颇有些勉强地说道：“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反对大家，譬如说，也不是为了反对您，因为我不能这样做。不过，要是我能办到这一点，我会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再需要引起教堂里的人们的注意。您知道我为什么需要他们注意吗？”

这个问题使我进退两难。无疑地，我并不知道，而且我相信，我也不想知道。当时我就对自己说，我根本也不想到这里来，可是这个人强迫我听他讲话。所以，我现在只需摇摇头，就能向他表明，我并不知道他所提的问题，但是我不能摇头。

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微微一笑，然后蹲了下来，做出想睡的鬼脸说道：“我一向对自己的生活缺乏自信。我只是用一些非常陈腐的观念理解我周围的事物，我总以为，这些事物曾经生存过一次，但是现在，它们正在沉没。亲爱的先生，我一直有兴致观察事物，总觉得在它们向我显露之前，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它们可能是美丽的和心平气和的。想必只能这样，因为我常常听到人们以这种方式谈论它们。”

由于我默不做声，满脸不由自主地抽搐，表现出不快的神色，他便问道：“您不相信人们是这样谈论吗？”

我觉得必须点头同意，但我不能这样做。

“真的，您不相信吗？啊，听我说吧：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我睡了一会儿午觉，醒来后睡眼蒙眬地听到我的母亲以自然的语调从阳台上向下问道：‘您在干什么，我亲爱的。天气这么热。’一位妇女从花园里答道：‘我在绿树下吃野餐。’她不假思索地说，而且不太清楚，仿佛这是人人都该预料到似的。”

我以为此人在问我，因此我把手伸进了后面的裤子口袋，装做寻找东西的样子。可是，我什么也不找，只是想改变一下我的视角，以便表明我在参与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说，这一事件非常奇特，我根本不理解它。然后我补充说，我不相信它是真的，想必它是为了某种目的——我对此一无所知——而编造出来的。然后我闭上眼睛，因为它们使我痛苦。

“啊，您和我的看法一致，这很好。您为了告诉我您的这种看法而把我留在这里，想必是出于大公无私的目的。对吗？我不能笔挺地走路，而且步履维艰，不能用手杖敲击铺石路面，不能轻轻触摸大声地从我身旁走过的人们的衣服，但是，难道我该为此感到羞愧吗？——或者说，难道我们该为此感到羞愧吗？——我不过是一个长着方肩的幽灵，沿着一幢幢房屋跳跃，有时消失在陈列窗的玻璃里，难道我没有理由对此表示不满吗？

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度日如年！为什么所有的建筑如此之坏，有时，高楼大厦无缘无故地倒塌。我爬到废墟上，问每一个我所遇到的人：‘这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城市里——一所新房子——今天，这已经是第五幢房子——您想一想吧。’谁也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常有人摔倒在街上，然后变成一具僵尸躺在那里。这时，所有的商人打开了他们用商品蒙住的门，敏捷地走过来，把死者弄进一幢房子里，然后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一边说着：‘你好——天空是苍白的——我正卖出不少头巾——是啊，这是战争。’我跳进房子，在多次胆怯地举起食指弯曲的手之后，我终于敲响了房屋看管人的那扇小窗。‘对不起，’我客气地说，‘听说有个死人已经送到您这里。我求您让我看一看他。’他摇了摇头，似乎尚在观望。于是，我坚定地说：‘对不起。我是秘密警察。请马上让我看死者。’“一个死者？”他现在才问，几乎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不，我们这里没有死人。这是一幢循规蹈矩的房子。’我向他致意，然后走了。

可是，正当我不得不穿越一个大广场的时候，我又忘记了一切。这件事的困难把我搞糊涂了，我心常想：‘如果人们只是出于狂妄而修建这么大的许多广场，那么，人们为何不也去修建一个能贯穿广场的石栏杆呢。今天，刮起了西南风。广场上的风很大。市政厅塔楼的尖顶被刮得直打小转。为何不让拥挤的人群保持安静！所有的窗玻璃都在喊叫，路灯柱像竹子一样地弯曲下来。圆柱上的圣母马利亚的披风蜷缩起来，狂

风正把它撕碎。难道没有人看到这一切？该在石子路上走路的先生们和女士们随风飘荡。每当风喘口气，他们就停住，相互交谈几句，互相鞠躬问候，但是，一旦风重新猛刮起来，他们又都无法抵抗，所有的人同时举起了他们的脚。他们虽然不得不紧紧抓住他们的帽子，但是他们的目光流露出快活的神情，仿佛遇上温和的气候，只有我感到害怕。”

我感到自己好像受到了虐待，于是对他说：“我觉得，您刚才讲述的有关您母亲和花园里的那位妇女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不仅因为我听到过和经历过许多这样的故事，我甚至还参与编造了其中的某些故事。这种事情毕竟是非常符合人类天性的。您不认为，要是我曾经站在阳台上，也会说同样的话和从花园里做出同样的回答吗？一桩非常简单的事件。”

听了我的话，他似乎非常高兴。他说，我穿得漂亮，他很喜欢我的领带，我的皮肤多么细嫩。如果你收回各种自供状，那么，它们将变得非常清楚。

洪天富 译

和醉汉谈话 [53]

当我小步走出房门的时候，突然看见巨大的苍穹，明月高挂，星光闪烁，还有那环形广场，上面耸立着市政厅、马利亚圆柱和教堂。

我从容不迫地从暗处走到月光下，解开了大衣的扣子，暖和一下身子，然后举起双手让呼啸的夜晚沉寂下来，开始进行思考：

“你们装做是真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们想使我相信，我自己不是真的，而且滑稽地站在这绿色的石子路面上？可是，你天空，毕竟自古以来就是真的，而你环形广场，从来就不是真的。”

“的确，你们一直比我强，但毕竟只是在我不打扰你们的条件下。”

“谢天谢地，月亮，你不再是月亮，但是，也许是我一时疏忽，把你被称做月亮的东西一直叫做月亮。当我把你称作‘被忘却的色彩奇特的纸灯笼’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再这样目空一切？当我把你叫做‘马利亚圆柱’的时候，你为何差一点隐没？马利亚圆柱，当我把你称作‘投下黄光的月亮’的时候，我再也看不到你那咄咄逼人的态度。”

“每当人们思考你们，你们就感觉不舒服，看来，这是真的，你们的勇气正在减少，你们的健康正在每况愈下。”

“天哪，如果思考者向醉汉学习，想必是非常有益的！”

“为何到处静悄悄的？我猜想风不再吹了。那些常常像在小轮子上滚过广场的小房子，早已被踩实在土里——寂静——寂静——人们甚至看不到那根平时把它们和地面分开的黑色细绳。”

我开始跑了起来。我绕着那大广场顺利地跑了三圈，由于未遇见任何醉汉，我便以原有的速度，轻松地朝卡尔大街跑去。我那往往显得比我要小的影子在墙上和我并排奔跑，如同在墙和街底之间的谷道里一样。

当我经过消防队的那幢房子的时候，从小环形路那儿传来了喧闹声，我在那儿转弯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醉汉站在井栏杆的旁边，他把双臂平放在栏杆上，用穿着木拖鞋的双脚踩地。

我先停住脚，以便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朝他走去，从头上脱下大礼帽，作了自我介绍：

“晚安，柔弱的贵人，我已23岁，但还没有名字。您的大名肯定惊人，甚至让人歌颂，想必您来自巴黎这座大城市。您的四周弥漫着法国越轨的宫廷发出的那种完全不正常的气味。”

“您那双染过的眼睛肯定看到了那些高贵的女士，她们早已站在那既高又明亮的平台上，扭动着苗条的腰肢，面带嘲讽的表情转过身来，而她们摊开在阶梯上的着了色的拖裙的底部还落在花园的沙土上。——不是吗？仆人们分散在各处，他们穿着灰色的、剪裁得很粗俗的燕尾服和白色的裤子，爬在长长的杆子上，双腿朝上，绕在杆子上，而上身往往朝下和弯向一边，因为他们不得不借助于绳子把巨大的灰色银幕从地上拾起来，并把它张紧在高处，因为一位高贵的女士想看一下浓雾弥漫的早晨。”由于他打嗝儿，我几乎感到大吃一惊，然后说道：“先生，您来自我们的巴黎，来自暴风骤雨的巴黎，啊呀，来自这种狂热的冰雹天气，这是真的吗？”当他再次打嗝的时候，我不知所措地说：“我知道，这是我的莫大光荣。”

我迅速地用手指扣上大衣的纽扣，然后热情而谨慎地说：“我知道，

您认为不值得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今天不向您提问，我势必要过一种含泪的生活。”

“我求您，如此打扮的先生，人们向我讲述的故事是真的吗？在巴黎，有没有仅由饰有装饰物的衣服组成的人？在那儿，有没有只有大门的房屋？据说，夏日里那儿的天空一片蔚蓝，只是由于贴上一朵朵心状的白云而显得美丽，这是真的吗？那儿有没有一个观众络绎不绝的珍奇物品陈列馆？据说里面只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树，挂在树上的小牌子上写着最著名的英雄、罪犯和情人的名字。”

“后面这则消息！这显然是骗人的消息！”

“巴黎的这些街道突然分叉，对吗？它们显得不安，对吗？一切并非总是正常，这怎么可能呢！有一次，发生了不幸事故。人们以大城市人惯常走路的方式，脚轻轻触及石子路面，从四面八方的小街走来，聚集到出事地点；大家虽然好奇，但也怕失望；他们急促地呼吸，并把他们的小头朝前伸。但是，每当他们相互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深深地鞠躬，请求对方原谅：‘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这里十分拥挤，请您原谅——我很笨拙——我向您认罪。我的名字是——我的名字是叶罗梅·法罗什，我在卡柏丹大街开了一个调味品小店——请允许我邀请您明天吃顿午饭——我的妻子也会很高兴的。’他们就这样谈着，而街道却早已失去知觉，烟囱里冒出的烟弥散在房屋之间。事情就是这样。也许在这个时候，优雅的市区的某条热闹的林荫大道上正停着两部车子。仆人们庄重地打开车门。八条纯种的西伯利亚狼狗从车上蹦跳下来，一边吠着，一边连蹦带跳地跑过车行道。这时，有人会说，这是八个化了装的年轻的巴黎人，他们都是好打扮的人。

他紧闭双目。当我沉默的时候，他把双手伸进嘴里，不停地扯拉下颌。他的衣服全给弄脏了。也许，他被人们从一家小酒店里扔了出来，而他对此还不明白。

也许，这就是我们在白天和夜晚之间所能获得的短暂而非常安静的休息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头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一切都悄然地停止运动，因为我们不去观察它们，所以它们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我们独自留下，弯身向四处张望的时候，再也看不到什么，也不再感到空气的阻力，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时刻想到，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排排房子，黑暗正透过屋顶和烟囱——幸好是方形的——流入

住宅，透过阁楼流入各种各样的房间。所幸的是，明天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你将会看到周围的一切。

这时，那醉汉扬起眉毛，以至于眉毛和眼睛之间出现了一丝亮光，然后断断续续地解释说：“这是因为——因为我感到困倦，所以我要去睡觉。——因为我的一位内弟住在温泽尔广场附近——我要到那儿去，因为我住在那儿，因为那儿有我的床。——我现在就去。——只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住在何处——我觉得我把这事给忘了——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有一位内弟。——现在，我得走了。——您相信我会找到他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这是肯定的。不过，您来自外地，而您的仆人们凑巧不在您的身边。请允许我为您带路。”

他不回答。于是，我把自己的胳膊递给他，以便他挽着。

洪天富 译

巨大的吵闹声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整个住宅的吵闹声的大本营里。我听到所有的门在乒乓作响，由于它们的噪声，我才得以避免听到在它们之间走动的人们的脚步声，我还听到厨房里的炉门啪的一声关上。父亲一连冲开我房间的好几道门，拖曳着长睡衣打我这儿经过，在隔壁房间里，他正刮去炉子里的灰烬。父亲透过前厅逐字地大声嚷嚷，问他的帽子是否早已刷过。回答他的先是一阵我所熟悉的嘘声，继而是一声更加强烈的喊叫。住宅大门的门把被揪动了，发出一阵像是从患黏膜炎的喉咙里发出的噪声，然后，随着一个女人的歌声，大门打开了，紧接着，随着一个男人极其粗暴地猛地一推，门又沉重地关上了。父亲走了，现在，那更加柔和、更加分散和更加绝望的吵闹声，在两只金丝雀叫声的带领下开始了。我老早就想到了这一点，现在，当这两只金丝雀开始鸣叫的时候，我又重新想起，我是否应该把门打开一个小缝，像蛇一样地爬进隔壁的房间，卧地向我的妹妹们和她们的保姆请求安静。

洪天富 译

煤全用完，煤桶空空，煤铲闲着；炉子呼吸着冷气，房间鼓满了寒风；窗前树木在严霜中发僵，天空成了抵挡想向它呼救的人的银盾。我得弄些儿煤来；我不能干挨冻呀；我背后是冷冰冰的炉子，我前面是铁石心肠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在两者之间赶紧骑行出去，向居中的煤店老板去求助。可是那老板对我的平平常常的请求麻木不仁，我必须一五一十地向他证实我连一粒煤屑都没有了；因此他对我简直意味着就是天上的太阳。我得像乞丐那样，饿得只剩最后一口痰，眼看就要倒毙在人家的门槛上，主人家的厨娘这才决定把最后的咖啡渣滓倒给他；同样，卖煤的将怒气冲冲，但想到“你不要杀人！”的训诫，乃将满满一铁锹煤铲进我的煤桶里。

我照这个办法出去一定能解决问题，于是我骑着煤桶前往。我骑在桶上，手抓住上面的桶架把，那是最简单的玩具，我艰难地随桶滚下台阶；但到了下面我的桶儿却往上升起，妙哉，妙哉；那些卑屈地躺卧在地的骆驼们，在牵引的鞭子的威吓下站起来的时候，没有这样庄严。我以不快不慢的速度穿过冻硬的街巷，我常常被驮到二层楼那么高；从未下降到屋门那么低。结果我以超乎寻常的高度飘到煤老板的拱形地窖的门前，只见他在很深的地窖下面蹲在他的小桌旁写字；他嫌太热，便让窖门洞开着。

“煤老板！”我用冻僵了的、被呼出的寒气蒙住的闷声喊道，“煤老板，请给我点儿煤吧，我的煤桶已经空得可以骑着它走了。帮个忙吧。等我一有钱，就会付清的。”

老板用手掩住耳朵。“我没有听错吧？”他扭过头去问他正坐在炉台上打毛衣的妻子道，“我没有听错吧？有一位顾客。”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妻子说，她平静地呼吸着，手上织针不停，背朝炉子，舒舒服服地烤着火。

“哦，对的，”我喊道，“是我呀，一个老顾客；一向是不拖欠的；只是目前一时没有办法。”

“夫人，”老板说，“我的确没有听错，是有一个人；我的耳朵不会那样不顶用的；那是一个老顾客，一个很老很老的顾客，他懂得说什么话才能使我这样感动。”

“你怎么啦，丈夫？”妻子说，她略停片刻，把针线压在胸口，“并没

有人啊，街道是空的，我们所有的顾客都供应过了；我们可以打烊歇几天了。”

“可是我正坐在这儿的煤桶上呀，”我喊道，因寒气流出的没有感情的眼泪模糊了我的两眼，“请您朝上面看一眼吧，您马上就会发现我的；我请求给一满锹，如果您能给我两铁锹，那我会无比高兴的。确实所有其他的顾客都供应过了。唉，假如我能听到桶里的煤块噼啪作响该有多好啊！”

“我来了。”老板说，但当他正要迈开短腿爬上地窖台阶时，他的妻子已到了他身边，紧紧攥住他的臂膀说：“你待着吧。要是你执意要去，那就由我上去。想想你今天夜里那个咳嗽样儿吧。为了一桩买卖，何况那只是一桩想象中的买卖，你就不顾老婆孩子，牺牲你的肺不成。我去。”

“那你把我们库里所存的各种各样的煤——告诉他，我在底下向你喊价钱。”

“好。”妻子说，随即走出地窖到街边。她当然一眼就见到我。“煤店老板娘，”我喊道，“你好啊，只要一铁锹，就铲在这煤桶里；我自己把它拿回家去；一锹最次的就行。钱我当然会完全照付的，但不是马上，不是马上。”“不是马上”这几个字多么像钟声，它和附近教堂塔顶发出的悦耳的晚钟的响声混杂在一起！

“他要什么呀？”老板喊道。

“没有什么，”妻子回答说，“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呀；我没有见到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只听见钟敲了六下，我们打烊吧。天气冷得要命；看来明天我们还要忙乎一阵呢。”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但她解下围裙，用它竭力要把我扇走。可惜她成功了。我的煤桶具有一匹良驹的所有优点，抵抗力它却没有，它太轻了，一件妇女的围裙把它一扇，它的两条腿就飘离地面。

“你这个狠心肠的女人，”我还是大声地回答她，这时她半轻蔑、半满足地挥动着手臂，又去做她的生意，“你这凶狠的女人，我只向你讨一锹最次的煤，你也不给。”说着我登上了冰山地带，方向不辨，永不复

返。

叶廷芳 译

[1]卡夫卡生前已发表的短篇小说共有44篇，其中先后三次结集出版的有36篇，此外有4篇名作是单独出版的，即《判决》、《司炉》、《变形记》和《在流刑营》。这些作品的篇目均按写作和出版先后顺序加以编排。其中有几篇篇幅极短的“微型小说”，为保持各集子的原来风貌，未予抽出另外归辑。——编者

[2]该作是作者《一次战斗纪实》第二个稿本中的第三章，根据马克思·勃罗德的判断约写于1903—1904年，是卡夫卡最早的作品之一。——编者

[3]原文为Kürassiere，指15—19世纪的穿胸铠的骑士或骑兵。——译者

[4]该作约写于1911年。作者在1912年8月8日的日记中称：“骗子手完成得还算满意。”——编者

[5]该作见于作者1912年1月5日的日记，付印时略事加工。——编者

[6]本篇原出作者1919年2月5日日记，出版时做了些改动。——编者

[7]该作约写于1903—1904年之间，原为《一次战斗纪实》的第二稿本中的片断。——编者

[8]本篇原名《入睡之前》，最初见于作者1911年11月14日日记，结集时作者作了压缩。——编者

[9]本篇约写于1907年，首次发表于《徐佩里翁》1908年第1期。——编者

[10]本篇约写于1907年，初次发表于《徐佩里翁》1908年第1期，后以《在窗边》为题发表于《波希米亚报》1910年3月27日。——编者

[11]本篇写作的年代与首次发表的年代与上篇同。——编者

[12]本篇写作的年代与首次发表的年代与上篇同。——编者

[13]本篇约写于1903—1904年间，原为《一次战斗纪实》第一稿本中的一段，出版前先后在《徐佩里翁》1908年第1期和《波希米亚报》1910年3月27日上发表。——编者

[14]本篇约写于1906年，与上面数篇一样，曾无题首次发表于《徐佩里翁》1908年第1期。——编者

[15]本篇首次发表于《波希米亚报》1910年3月27日，写于发表前不久。——编者

[16]根据瓦根巴哈估计，本篇的写作时间约在1906—1909年之间。——编者

[17]本篇写作时间和首次发表情况不详。——编者

[18]本篇写于1903—1904年之间，见于作者《一次战斗纪实》的第二个稿本，1908年在《徐佩里翁》发表时作了重写。——编者

[19]本篇为卡夫卡第二本日记本的开篇，约写于1910年11月6日之前不久。——编者

[20]该篇于1912年9月22日晚10时至翌日清晨6时“一气呵成”。这是作者献给他刚结识不久的女友费丽丝·鲍威尔的礼物。1913年首次发表是由马克斯·勃罗德主编、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创作年鉴《阿卡迪亚》上。这是卡夫卡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和旺盛期的第一个成果，也是他的创作生涯中自己颇为得意的五六个短篇作品之一。——编者

[21]费丽丝·鲍威尔，卡夫卡第一个未婚妻。1912年8月卡夫卡与之认识并先后于1914年、1917年两度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译者

[22]此篇为长篇小说《失踪者》（一译《美国》）的第一章，但作者是把它当做独立的短篇小说看待的。作者当时在致他的女友费丽丝·鲍威尔的信中称：他于1912年冬至1913年春写的这篇50页的故事是以550页废稿为代价的。他曾想将这篇小说与《判决》、《变形记》集成一册，题为《儿子们》，后放弃了，于1913年夏单独发表在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创作年鉴《末日审判》第3卷上。——编者

[23]此篇写于1914年8月4日至18日，即在他与费丽丝·鲍威尔第一次解除婚约后不久。起初不愿发表，后由于勃罗德和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催促，他才于1916年打算把它与《判决》、《变形记》合成一集，以《惩罚》作书名出版，但未果，最后才于1919年由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编者

[24]这是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从作者当时致其未婚妻费丽丝·鲍威尔的信中可以看出，该作写于1912年11月中下旬至12月上旬。卡夫卡曾想以《儿子们》为题，将它与《判决》、《司炉》结集出版，未果。后于1915年发表在勒奈·布克尔编辑的《白色书页》上。同年由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作者曾为此书的封面设计致函这家出版社：“封面上可千万别画上那只昆虫啊。”最后，封面上的图像画的是一个孤苦的青年哭泣着走出家门。——编者

[25]这篇梦幻性小说也是作者自己最喜爱的短篇之一。可惜未能留下手稿。估计写于1917年，翌年首次发表在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创作年鉴《新创作》上，1919年与其他13个短篇集成同名小说集出版。——编者

[26]原文Bume为花朵，卡夫卡在这里把鲜红的伤口比作鲜红的花朵，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译者

[27]本篇写于1917年2月，见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同年7、8月间发表于《马尔斯雅斯》杂志第1期。——编者

[28]本篇未能留下手稿，见于作者《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中的篇名目录，据此推断约写于1917年2月。——编者

[29]本篇见于作者《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六本，约写于1917年3、4月间，发表于同年7、8月《玛尔斯雅斯》创刊号。——编者

[30]这篇譬喻性杰作是长篇小说《诉讼》（一译《审判》）中的一节，是该书的画龙点睛之作，写于1914年秋，1916年首次发表在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新创作年鉴《末日审判》上。后收入短篇集《乡村医生》。

[31]本篇见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约写于1917年2月，1917年10月初次发表在马丁·布伯编的《犹太人》月刊上。1919年与其

他13个短篇一起收入《乡村医生》。——编者

[32]指豺狗——译者注。

[33]本篇为短篇集《乡村医生》中的一篇，因未留下手稿，写作时间很难确定，如果它与《等级偏见》是同一篇作品，那么它的成稿时间就是1917年初。——编者

[34]没有留下手稿，人们估计《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中的篇目中的《一个骑手》可能就是本篇。——编者

[35]本篇未留下手稿，约写于1917年夏天。后由作者收入《乡村医生》于1919年出版。——编者

[36]这是《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一个片断，作者生前将它抽出单独成篇，收入小说集《乡村医生》，写于1917年3、4月间，初次发表于1919年9月24日布拉格的《自卫报》。——编者

[37]这篇小说没有留下手稿，据《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德文版编者保尔·拉贝的估计，约写于1917年，1919年它与其他13篇小说一起集成《乡村医生》，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分别在慕尼黑和莱比锡出版。——编者

[38]本篇没有留下手稿，只在作者《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的目录中有其题目，据此推测该作约写于1917年2月以前。同年7、8月间发表于《玛尔雅斯》创刊号。在此之前曾以《一起谋杀》为题在K.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新创作》年鉴上发表过。——编者

[39]这篇作品是长篇小说《诉讼》的大轮廓，故约写于1914—1915年，1917年初次发表于由布拉格《自卫》杂志编辑部编的作品集《犹太人的布拉格》上。——编者

[40]Josef（约瑟夫）的开头字母。

[41]这篇寓言小说写于1917年5、6月间，见于第二本《八本八开本笔记簿》，1917年10月发表于《犹太人》杂志。后于1917年收入短篇集《乡村医生》。——编者

[42]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译者

[43]加纳的旧称。——译者

[44]一种身体细长、善于赛跑的狗，此处比喻轻率的人。——译者

[45]本篇约写于1921年秋末至1922年初。1924年与其他三篇由作者收入《饥饿艺术家》，由“锻造坊”出版社出版。——编者

[46]该篇写于1923年，后由作者自己收入他最后一个短篇集《饥饿艺术家》；其原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学。——编者

[47]原文为Lufteinatmer（吸空气者）。

[48]指做出决定——译者注。

[49]指喜欢纠缠别人的人——译者注。

[50]该篇写于1922年春，发表于同年10月《新观察》，为作者自己所珍重的几个短篇小说之一，1924年他曾以此为书名，与其他三个短篇结集出版。同年4月，即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他在病榻上校阅本篇清样时，不禁泪流满面，可见与书中主人公发生共鸣。可惜该集子出版时，作者已辞世。——编者

[51]这是卡夫卡的最后一篇作品，写于1924年3月，即他去世（6月3日）前的三个月，最初发表于同年4月20日的《布拉格日报》“复活节增刊”上，后与其他三篇小说集成一册，题为《饥饿艺术家》，同年由柏林“锻造坊”出版社出版。——编者

[52]本篇没有留下手稿，1912年10月初次发表于布拉格先锋派小刊物《赫尔德杂志》第4、5期，该杂志由卡夫卡的朋友威利·哈斯和诺伯特·艾斯勒主编，马克斯·勃罗德、奥斯卡·鲍姆、弗兰茨·韦尔弗、奥托·皮克等参与合作。——编者

[53]本篇也是作者从《一次战斗纪实》第一稿本的手稿中抽出，和《与祈祷者的谈话》一同发表在1909年3、4月份的《徐佩里翁》双月刊上，但后来作者没有将它们收入集子。——编者

[54]该篇写于1917年初，见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1921年12月25日与一批奥地利第一流作家如穆西尔、韦尔弗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在《布拉格日报》的《圣诞增刊》上。作者曾拟收入《乡村

医生》，最后却又将它抽去了。——编者

第二辑 遗作中之佳作 [1]

张荣昌 等译

一次战斗纪实 [2]

人们穿着衣服

在砂砾上晃晃悠悠地散步

在这广阔的天空下，

远方的丘陵星罗棋布

天空正向远处的丘陵伸展。

—

将近12点的时候，有几个人已经起床，他们又是鞠躬，又是互相握手，不约而同地说晚上睡得很好，然后通过那高大的门框走进前室穿衣。女房东站在房间的中央，机灵地频频鞠躬致意，她身上的衣服打起矫揉造作的皱褶。

我坐在一张小桌子的旁边——它有三只绷得很紧的细腿——正在品尝第三小杯甜药酒，与此同时，我观察了一下我那少量的糕点储备——我自己挑选出的，还把它们堆放在一起——因为它们的味道挺好。

这时，我的一位新朋友朝我走来，有点儿心不在焉地对我的活动微微一笑，然后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请原谅我到您这儿来。不过，在此之前，我和我的情人独自坐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从十点半开始，离现在才个把小时的时间。请原谅我把这事告诉您。我们的确互不相识。不是吗？我们在楼梯上相遇，互相说了几句客套话，可现在我就向您谈起我的情人，不过，您得——我请求您——原谅我，幸福在我心中不会维持太久，我没有别的办法，除您之外，我在这里并没有值得我信任的朋友……”

他就这样说着。我却悲伤地注视着他——因为我嘴里的那块水果蛋糕味道不好——我便冲着他那张漂亮而红润的脸蛋说道：“我很高兴您觉

得我值得信任，但我伤心的是，您把此事告诉了我。您自己——如果您不是这样糊涂的话——也会感到，向一个独自坐着喝烧酒的人讲述一位爱您的姑娘，是多么地不得体。”

听了我的话以后，他猛地坐下来，把身子往后靠去，垂下双臂。然后，他收拢双臂，用相当大的声音自言自语地开始说：“我们独自坐在那儿的房间里，只有我和安娜，我吻了她，我——吻了——她的——嘴，她的耳朵，她的肩膀。”

站在附近并且估计正进行着热烈谈话的几位先生，打着呵欠朝我们走来。因此，我站了起来，大声地说：“好吧，如果您愿意，我这就走，不过，现在去爬劳棱茨山，未免愚蠢，因为天气还凉，那儿还下过一场雪，道路就像滑冰场一样。不过，如果您想去，我愿奉陪。”

他先是吃惊地定睛看了看我，继而张开他那张嘴唇又厚又红润的嘴。可是，当他发现这几位先生就站在附近的时候，便笑了笑，然后站起来说道：“哦，是这样，天气凉快会有好处，我们的衣服上全是热气和烟雾，我也许有点儿醉了，虽然我喝得不多，对，我们先去告辞，然后一同上路。”

于是，我们去找房东太太。当他吻她的手的时候，她说道：“我真高兴，您的脸今天显得格外快活，平时它总是非常严肃和单调。”她的这些亲切友好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他再次吻她的手；这时她微笑了。

在前室里站着一个丫鬟，我们现在第一次看到她。她帮我们穿上大礼服，然后拿来了一盏手提式小灯，给我们照路，一同走下楼梯。的确，这姑娘很漂亮。她的脖子裸露，只是在下颌的下面围系着一条黑色天鹅绒带子，当她紧握小灯在我们前面走下楼梯的时候，她那穿着随便的身子优美地向下弯曲。她的两颊绯红，因为她曾喝了葡萄酒，两唇半开半闭。

在楼梯的下面，她把灯放到了一个梯级上，有点儿蹒跚地朝我的朋友走了一步，然后拥抱和亲吻他，并一直搂着不放。只是在我把一枚钱币放到她手里之后，她才慢吞吞地把她的双臂从他身上松开，然后慢慢地打开了房门，把我们留在黑暗里。

在一条空无一人、灯光均匀的道路上空，一轮明月悬挂在云层稀薄、因而显得更加广阔的天空。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雪。走路时两脚直

打滑，所以得小步地走。

我们刚一走到室外，我便得意忘形起来。我纵情地抬高双腿，让关节发出快乐的喀嚓声，我向街对面呼喊一个名字，仿佛一个朋友在街道拐角处逃开了我似的，我一边跳一边高高地抛起帽子，然后虚张声势地把它接住。

可是，我的朋友在我身旁无忧无虑地走着。他低着头，而且一言不发。

这使我感到惊奇，因为我曾预料，如果他的周围不再有社交界，他会高兴得发疯。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正当我朝他的背上一击，以便使他高兴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感到羞愧，便笨拙地把手收回来。因为我不再需要它，便把它塞进了我大衣的口袋里。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走着。我注意地听我们脚步发出的声音，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怎么也无法和我的朋友保持步调一致。这使我有点儿激动。月亮是明亮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有些地方，有人靠在一扇窗子上，正在观察我们。

当我们来到斐迪南大街的时候，我听出我的朋友开始哼唱一首曲调，他唱得很轻，但我能听到。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他为何不同我说话？如果他不需要我的话，他为何不让我安宁。我气呼呼地想起那些好吃的甜点心，我为了他的缘故把它们遗忘在我的小桌子上。我还想起那甜药酒，心里感到快活一些，甚至高傲起来。我双手叉腰，自以为自己在独自散步。我曾参加社交界的活动，拯救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使他免遭耻笑，现在，我在月光下散步。白天坐办公室，晚上参加社交活动，夜里在街上四处游荡，一点儿也不过分。一种极其自然的生活方式！

然而，我的朋友还一直跟在我的后面，是呀，当他发觉自己落在了后面，他甚至加快自己的步伐。仿佛这是理所当然似的。我却在考虑，是否要拐进一条侧街，因为我毕竟没有义务和他一同散步。我可以独自回家，而且谁也不会阻挡我。我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燃那盏用铁架子托着，并且安放在桌子上的灯。我将坐在那把停放在撕破的东方地毯的扶手椅里。——当我这样盘算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四肢无力，而且一旦我不得不想到，我又将走进自己的住所，又将在涂了色的四壁之间和在地

板上——这地板在那面挂在后壁上的镶金边的镜子里显得有些倾斜——孤单地度过一些时刻，我就越发感到四肢无力。我的双腿变得无力，而且就在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家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怀疑，我现在离去的时候，是否应该和我的朋友打个招呼。可是我太胆小怕事，不跟他打招呼，我是不会离去的，然而我又太虚弱，不能大声和他打招呼，所以，我又停住，把身子靠在一堵被月光照耀着的墙上，静静地等着。

我的朋友迈着欢快的脚步走来，看上去也有些不安。他故作姿态，又是眨眼皮，又是把双臂沿水平方向伸出，还猛地把自己的头——上面戴着一顶硬邦邦的黑帽——朝我伸过来，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想说明，他十分赏识我为了使他开心而开的玩笑。我一筹莫展，轻声地说：“今天晚上您真快活。”一边尴尬地笑了笑。他回答道：“是的，您刚才看到那丫鬟是怎样吻我的吗？”我无法说话，因为我的脖子上满是眼泪，因此我试图像一只驿号那样吹起来，以便不使自己成为哑巴。他先是用手捂住耳朵，继而亲切地握了握我的右手，以示感谢。想必他摸到的是一只冰冷的手，因为他马上就放开了它，并且说道：“您的手很冷，那个丫鬟的嘴唇要温暖得多。”“是啊。”我明智地点了点头。我一边请求亲爱的上帝给予我坚强，一边说道：“是的，您说得对，我们就要回家了，天色已晚，明天一早我还要上班；您想想看，我当然可以在办公室里睡觉，但这是不合法的。您说得对，我们就要回家了。”与此同时，我伸手给他，仿佛这事已彻底解决。可是对我的讲话方式，他报之以微笑：“是的，您是对的，这样的夜晚，我肯定不会在床上睡着的。请您想一想，要是我独自一人睡在自己的床上，多少个幸福的想法会被我用被子扼杀，多少个不幸的梦想会被我用被子加热。”由于这突然产生的念头使他高兴不已，他便从胸前——更高的地方他够不到——用力地抓住我的大衣，高兴地摇动我的身体；然后他眯缝着眼睛，亲密地说：“您知道，您是多么古怪，多么滑稽可笑。”说着，他开始往前走，我不由自主地跟在他的后面，因为我脑子里正在思考他的这句话。

当初他的这句话使我高兴，因为它似乎说明，他在我身上猜想到某种东西，这东西虽然在我身上并不存在，但是经他这样猜测，反倒引起了他对我的重视。这样一种关系使我感到幸福。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刚才并没有回家，而我的朋友对我来说显得非常宝贵，他是世间头一个赏识我的人，而我事先无需收买他！我满怀深情地注视我的朋友。下意识地保护他，使他免遭各种危险，特别是使他免遭情敌和有醋意的男人们的攻击。我觉得他的生命比我的更加宝贵。我感到他的面孔漂亮，我为

他在女人们那里所获得的成功感到自豪，我分享了他在今天晚上从那两位姑娘那里得到的亲吻。啊，这个晚上真快活！明天我的朋友就要与安娜小姐谈话；理所当然地，先是谈一些日常的事情，然后他会突然说：“昨天夜里我和一个人在一起，亲爱的安娜，我敢肯定，你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他看上去——我该怎么描述呢——像一根摇摇晃晃的杆子，上面有点儿笨拙地叉着一个黄皮肤的和黑头发的脑袋。他的身上披挂着许多相当小的、刺眼的和淡黄的布料，这些布料昨天把他完全盖住，因为这天夜里风平浪静，它们平滑地紧贴在他的身上。他羞怯地走在我的身旁。你啊，我亲爱的安娜，你很会亲吻，我知道，要是你看到他在场，你或许会微微一笑，而且感到有些害怕，可是我呢，由于爱你，我的灵魂早已完全向你飞去，有他在场，我反而感到高兴。他也许陷入不幸的境地，所以他默不做声，可我在他的身旁却陷入了一种永久的幸福的不安。的确，我昨天屈服于自己的幸福，差一点儿忘记了你。我觉得繁星密布的天空的坚硬的拱顶，仿佛随着他扁平的胸部的呼吸而起伏。地平线出现了，在火红的云层下面展现出无限风光，使我们感到无比高兴。——我的天啊，安娜，我多么爱你，我感到你的亲吻比风景更可爱。我们用不着再去谈论它，反正我们彼此相爱。”

当我们慢步登上码头的时候，我虽然羡慕我的朋友所得到的一次次亲吻，但我也高兴地感觉到他在观察我时想必感到的内心的羞愧。

我就这样想着。可是我当时思想混乱，因为莫尔道河^[3]和彼岸的市区被黑暗笼罩住。只有几盏灯亮着，像闪烁的目光一样。

我们站在栏杆旁边。我戴上自己的手套，因为从水面上吹来一阵冷风；然后像人们在夜里面对一条河所能做的那样，无端地叹了一口气，打算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朋友朝水里看，压根儿不想动。然后他还更加走近栏杆，把胳膊肘支撑在铁链上，双手捧着前额。我觉得他的行为愚蠢。我感到冷，便把大衣领子向上翻转过来。我的朋友舒展了一下四肢，然后把此时倚靠在张紧的双臂上的上身靠到栏杆上。我羞愧地赶紧说话，以便把呵欠压下去：“恰恰只有夜晚能使我们完全沉浸在回忆里，这的确是件怪事，不是吗？例如我现在就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在傍晚的时候，我扭歪着身子坐在河岸边的一条长凳上。我看到——我把头靠在那只放在长凳的木制靠背上的胳膊上——河对岸的那些昏暗的山，听到有人在海滨旅馆里拉小提琴，琴声轻柔，委婉动听。河的两岸上，火车带着闪闪发光的烟雾穿梭不停。”——我一边这样说，一边拼命地试

图在这些话的后面编造出具有奇特情节的爱情故事；当然，少许的残忍和永久的强奸是不可缺少的。

可是，我刚一说出头几句话，我的朋友先是对还在这里看到我感到惊异——我有这样的感觉——继而冷淡地转向我，并且说道：“您瞧，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今天晚上，在我不得不去参加社交活动之前，我走下楼梯，以便还去散一下步，这时我惊异地发现，我的微红色的双手在白色的硬袖口里来回地溜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快活。这时我预料到会有奇遇。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最后这句话是他在走的时候说的，只是顺便提一下，作为一种普通的观察。

可是它却使我非常激动，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高大的身材也许让他感到不快，他走在我的身旁兴许会显得太矮小。这种高矮悬殊的情况一直折磨着我，尽管已是夜里，路上几乎遇不到任何行人。为了摆脱这种痛苦，我尽量弯下腰来，让双手在走的时候碰到膝盖。可是，为了不使我的朋友觉察到我的意图，我非常缓慢地和小心翼翼地改变自己的姿势，试图通过谈论射手之岛的树木以及桥上的灯在河里的倒影，分散他对我注意力。可是他把自己的脸猛地转向我，并且宽宏大量地说道：“您干吗要这样走路？您现在完全弯下了腰，几乎和我一样地矮小！”

由于他的话充满善意，我便回答道：“可能是这样。不过我喜欢这种姿势。您知道，我的身体有些虚弱，笔挺地走路对我来说非常困难。这是件小事，我的个子很高——”

他有点儿不相信地说：“这不过是您一时心血来潮。我相信您从前一直是笔挺地走路，在社交场合里，您也挺着身体坐着。您甚至跳舞还是没有跳？没有跳？可是您毕竟直着身子走路，现在您也还会笔挺地走路。”

我做了个制止他的手势，坚定地回答道：“是的，是的，我直着身子走路。可是您低估了我。我知道什么是良好的举止，所以我弯着腰走。”

可是他似乎听不懂我的话，而且由于被自己的幸福弄糊涂了，以致不理解我的话的内在联系，只是说：“好吧，随您的便！”然后仰望磨坊塔上的钟，这时已将近1点。

我却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多么冷酷！他对我这番谦恭的话竟然采

取如此独特和明显的冷淡态度！他的确是幸福的，而幸福者们总是把他们周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幸福创造出一种卓越的关系。如果我现在跳进了水里，或者如果我在拱道下面的铺石路面上，当着他的面抽搐得心肺欲裂，我将始终安静地适应他的幸福。的确，如果他任性起来——幸运儿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也许会像一个拦路抢劫的凶手把我打死。这是确定无疑的，由于我胆小，即使受了惊吓，我也不敢大声喊叫。——天哪！——我忧心忡忡地四下张望。在远处一家装有长方形黑色玻璃窗的咖啡馆前面，有位警察轻手轻脚地溜过铺石路面。他的马刀有点儿妨碍他走路，他把它拿到手里，这样走起路来要好看得多。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还轻轻地欢呼，于是我坚信，如果我的朋友想打死我，他也不会来救我。

不过这时我也知道，我该做些什么，因为恰恰是在面临可怕的事件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坚定。我得跑开。这非常容易。现在，我先向左拐，走上卡尔大桥，然后向右一拐，就能跳进卡尔大街。这条街是弯弯曲曲的，那儿有一些昏暗的房门和小酒店，它们还开着；我无须感到绝望。

当我们沿着拱道下面走到码头的尽头的时候，我扬起双臂奔进了街道；可是正当我来到教堂的一扇小门的时候，我摔倒了——因为我不曾看到过那儿有一个梯级——发出砰的一声，最近的那盏提灯掉下来了，我躺在黑暗之中。从对面的小酒店里，一个胖女人拿着一盏烟雾腾腾的小灯走了出来，以便查看一下街上发生了什么事。钢琴演奏停止了，一个男人把现在半开着的门完全打开，装模作样地往一个梯级上吐了一口痰，一面在那胖女人的胸部摸来摸去，直弄得她发痒，并且对那女人说，刚才发生的事大概无关紧要。然后，他俩转过身，把门重新关上。

当我试图站起来的时候，我又跌了下去。“这是薄冰层。”我说，同时感到膝盖里一阵疼痛。可是我毕竟感到高兴，因为从小酒店里走出来的顾客不可能发现我，因此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非常悠闲地待到黎明。

我的朋友并未觉察到我的告别，他也许独自朝大桥走去，因为过了一会儿他才向我走来。他看到我时，并不感到惊异。他满怀同情地朝我弯下身子，用柔软的手抚摩我。他在我的颧骨上摸来摸去，然后把两只肥大的手指按到我低矮的前额上：“您受伤了，不是吗？路上有冰，得小心——您的头痛吗？不痛？啊，是膝盖，好吧，就这样。”他娓娓而谈，仿佛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反正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有关一只膝盖里

早已去除的疼痛的故事。他也动了下胳膊，但他并不想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我把头靠到我的右手上——胳膊肘支撑在一块铺路石上——为了不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我急忙说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向右跑。不过，在这座教堂的那些门廊下面——我不知道这座教堂叫什么名字，哦，请您原谅——我看到一只猫在跑。一只小猫，它有一身光亮的毛皮。因此我发觉了它。——啊，不，不是这么一回事，对不起，不过，要整天地控制住自己，得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之所以睡觉，正是为这种努力增强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不睡觉，我们往往就会干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要是我们的陪伴者们对这些事情大声地表示惊异，那就未免失礼了。”

我的朋友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先向空无一人的大桥望去，然后朝耶稣教堂，然后仰望晴朗的天空。由于他未曾注意听我讲话，所以他担忧地说：“是呀，您到底为什么不说话，我亲爱的；您身体不舒服？——是呀，您究竟为什么不站起来？——这儿可是冷啊，您会着凉的，再说我们还要去爬劳棱茨山。”

“当然，”我说，“请原谅。”于是我独自站起来，但感到剧烈疼痛。我摇摇晃晃地走，不得不死死盯住卡尔四世的立式雕像，以便站稳脚跟。可是月光办事不灵活，也使卡尔四世动了起来。我对此感到惊异，由于恐惧，我的双脚变得更加有力，如果我不采取镇静的态度，卡尔四世可能倒了下来。过后，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无济于事，因为正当我突然想起我被一个身穿漂亮的白衣的姑娘爱着的时候，卡尔四世毕竟倒了下来。

我干着无益的事，耽误了许多事情。涉及白衣姑娘的这一想法多么出色！——月亮也一样可爱，因为它也照我，但是，当我看出月亮照耀一切毕竟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的时候，出于谦虚，我想置身于吊桥悬索支柱的拱顶之下。因此，我高兴地张开双臂，尽情地欣赏月亮。——这时，我想起了一首诗：

我像个喝醉了酒的跑街，

蹦蹦跳跳地穿过一条条街道，

踏着沉重的脚步穿过空间。

当我懒洋洋地用双臂做着游泳的动作、毫无痛苦地和毫不费劲地往

前走的时候，我的心情轻松愉快。我的头因凉爽的空气而感到舒适，而白衣姑娘的爱情使我悲喜交集，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正在游离开这位情人和她所在地区的那些多云的山。——于是我想起，我曾憎恨一个走运的朋友，他现在也许还走在我的身旁。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记忆力非常之好，它甚至牢牢记住这样一些次要的事情。因为记忆力得承受许许多多的东西，所以我突然知道这许多星星的名字，尽管我从来也没有学过它们。是的，这是一些奇特的名字，难以记住，但是我知道所有这些名字，而且非常准确。我把食指指向天空，大声地说出各个星星的名字——但我不想继续列举它们，因为我得继续游泳，以免沉下去。但是，为了往后人们不会对我说，人人都会在铺石路面上空游泳，这事不值一谈，我便迅速地跃过栏杆，游着围绕每一个我所遇到的圣徒雕像打转儿。——到了第五个圣像，正当我从容地拍打着停在铺石路面上空的时候，我的朋友抓住我的手。于是我又重新站在铺石路面上，而且感到膝盖里一阵疼痛。我已经忘记了这些星星的名字，关于那位可爱的姑娘，我只知道她穿过一件白色的衣服，但我压根儿不再能够想起，我出于什么动机相信这位姑娘的爱。我勃然大怒——这是有理由的——抗议我的记忆力，担心我会失去这位姑娘。于是我使劲地和不停地说“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以便至少用这个暗号把这位姑娘保持在我的记忆里。但这样做丝毫也无济于事。我的朋友一边说话，一边更加向我逼近，就在我开始听懂他的话的那一瞬间，一道微弱的白光沿着桥的栏杆优美地跳了过去，掠过吊桥悬索支柱，跳进了黑暗的道路。

“我一直喜欢，”我的朋友指着圣女卢德米拉^[4]的雕像说道，“左边这位天使的双手。它们极其细嫩，张开着的手指在发抖。不过从今天晚上起，我不再喜欢它们，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吻的是真正的手。”——于是他拥抱我，吻我的衣服，并用他的头撞击我的肚子。

我说：“说得对，说得对，我相信这点，我不怀疑。”同时趁他放松小腿肚的时候用手指捏它们。可是他没有感觉到。于是我自言自语地说：“你为何同这个人一道走？我不喜欢他，也不恨他，因为他的幸福只在于一位姑娘，而且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穿着白衣。由此可见，这人对你无所谓——我重复地说——是无所谓的。不过，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他也没有危险。所以，继续同他去爬劳棱茨山吧，因为在美丽的夜晚你已经上路，不过你让他说话，你自己则以自己方式娱乐吧，这样——我轻声地说——你也能最好地保护你。”

1. 骑马

我异常熟练地跳到我朋友的肩上，用两只拳头击他的背部，使他小跑起来。可是他还有点儿不情愿地用脚踩地，有时甚至停了下来，于是我多次用我的靴子戳他的肚子，以使他更加振作起来。我成功了，于是我们快速朝前跑，终于来到了一个大的、可是尚未完成的地区的内部，此时已是傍晚。

那条我在上面骑马的公路铺满石块，而且坡度相当大，可是这正中我的意，我让它变得更加多石和更加陡峭。每当我的朋友失足，我就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拉起来，他一唉声叹气，我就用拳头敲他的脑袋。对此我感到心情舒畅，因为这种晚间的骑马非常有益于我的健康。为了使他更加恼怒，我让猛烈的逆风一阵阵地朝我们吹来。现在，我竟异想天开，在我朋友的宽肩上表演骑马跳跃的动作：我用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脖子，他自己的头尽量往后仰，观察着形形色色的云，它们比我虚弱，慢慢腾腾地随风飞走。我笑了，而且激动得发抖。我的外衣像两只张开的翅膀，给予我力量。与此同时，我使劲地挤压双手，仿佛不知道这样做会把我的朋友卡死。

可是，我不顾骑得满身大汗，对着天空——它渐渐地被那些我让长在路边的树的弯枝遮住——喊道：“我毕竟还有其他的事要做，不能老是听谈情说爱的废话。他为什么到我这儿来，这个喋喋不休的情人？他们个个幸福，要是别人知道这点，他们会特别幸福。他们以为有一个幸福的夜晚，所以他们已经为未来的生活感到高兴。”

这时我的朋友摔倒了，当我检查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膝盖受了重伤。他对我不再有用，所以我让他躺在石子路上，一面吹口哨从天空唤下几只兀鹰，它们顺从地飞落到他身上，紧闭着喙，认真地守卫着他。

2. 散步

我无忧无虑地继续走。因为我是步行，害怕走山间崎岖的公路，所以我让这条路变得越来越平坦，终于使它在远处下降成为一个山谷。

石头按照我的意愿消失了，风静止了，而且在晚间消失了。我迈步前进，因为是下坡，我抬头、挺身、把双臂交叉在脑后。因为我喜欢松

林，所以我穿过松林。因为喜欢默默地眺望繁星密布的天空，所以在广阔的天空上，繁星为了我缓慢而从容不迫地升起，往常它们也是这样。我还看到了一些拉长的云，它们被一阵只在它们高度上吹的风从空中卷走。

公路对面相当远的地方，也许我被一条河隔开，我让一座高山出现，它的顶峰与天接壤，上面长满了灌木丛。我还能清楚地看到那些最高的树枝的小分枝和动作。这种景象——不管它多么寻常——使我高兴不已，以致我变做一只小鸟摇摇晃晃地停在这些遥远而蓬乱的灌木的枝条上，忘记让月亮升起，它已躺在山背后，也许因为迟延而生气。

可是现在，月亮升起之前，山上展现出一道凉光，突然月亮本身在一棵不安的灌木后面升起。可是在这当儿我正朝另一个方向看，当我现在朝正前方看的时候，突然看到它几乎像满月一样大放光芒，我睁着黯淡无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着，因为我这条向下倾斜的道路似乎正通向这轮非常吓人的明月。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就习惯于它，而且冷静地观察，它上升的时候是多么地困难。我和它相互迎着走了一大段路之后，我终于感到一种愉快的睡意，这睡意显然是由于白天的劳累而产生的，当然我再也无法想起它。我闭着眼睛走了一会儿，为了使自己保持清醒，我只好大声而有规律地拍手。

可是在此之后，我感到这条路即将从我的脚下滑落，一切像我一样地疲惫不堪，而且开始消失，于是我惊恐不安地赶紧爬上公路右边的那个斜坡，以便还能及时到达那片高大而杂乱的松林，在这片松林里我想睡一夜。匆忙是必要的。群星早已变暗，月亮有气无力地沉入天空，就像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那座山也已成为黑夜的一部分，公路在我转向斜坡的地方可怕地终止了，从这片松林的内部，越来越近地传来倒下的树干发出的哗啦声。我恨不得马上躺倒在苔藓上睡觉，可是我因为害怕蚂蚁，便用缠绕在树干上的双腿爬到一棵树上——虽然没有风，它也已经摇晃起来——卧倒在一根树枝上，头靠在树干上，很快就入睡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一只小松鼠抱着笔直的尾巴坐在这根树枝的颤动着的尖端上，不停地摇晃着。

我睡得很沉，并没有做梦。月落和日出都无法把我唤醒。即使我已经醒来，我又平静下来，我对自己说：“你昨天很辛苦，所以要爱惜你的

睡眠。”于是又重新睡着了。

可是，尽管我没有做梦，我的睡眠终究受到不间断的轻微干扰。我整夜听到有人在我身旁说话。除了个别的词句，诸如“河岸边的长凳”，“多云的群山”，“带着闪闪发光的烟雾的火车”，我几乎听不到词句本身，只听到它们的重音种类。我想起我在睡梦中由于高兴而搓手，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无须认出这些个别的词句，因为我刚好在睡觉。

午夜之前，这声音非常有趣，这对我是一种侮辱。我不寒而栗，因为我以为有人在下面把我的树——它早就不停地摇晃——锯断。午夜过后，这声音变得更加严肃，并且开始退却，它的句子断断续续，仿佛是在回答我没有提出的那些问题。此时我感到更加惬意，而且敢于伸展四肢。将近天亮的时候，这声音变得越来越亲切。这位说话者的床铺看来并不比我的稳当，因为我此时发觉，他是从邻近的那些树枝对我说话的。于是我大胆起来，把背靠到他身上。我这样做显然使他伤心，因为他停止说话，长时间地保持沉默。直至上午的时候，他不用这种噪声——我对它已完全不习惯了——而用一声低声的叹息把我叫醒。

我看了看云层密布的天空，它不仅在我头的上空，而且甚至在我周围。厚厚的云层低低地移向苔藓上空，撞到树上，被树枝撕成碎片。有些云层不时地落到地上，或被树夹在中间，直到一阵更加猛烈的风把它们吹走。大多数的云层带着冷杉球果、折断的树枝、烟囱、倒毙的野兽、做旗子的布、风信鸡和其他大多无法辨认的东西，这些东西是飘浮的云层从远方的某处带来的。

我自卑地蹲坐在我的树枝上，不得不考虑把那些威胁我的云层推开，或者如果云层弥漫，就设法避开它们。这对我来说可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我还处在半睡状态，它被一声声的叹息困扰着，我相信我还常常听到它们。

然而我惊奇地发现，我的生命越有保障，天空也就向更高和更远的地方伸展。终于，在我打最后一个呵欠之后，晚间的这个地区已无法辨认，它现在已被雨云笼罩。

这种如此迅速出现的辽阔的景致使我大吃一惊。我暗自思考，我为何来到这个地区，它的道路我并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是在梦中迷路而到了这里，只有在醒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我可怕的处境。幸亏我此时听到

一只小鸟在林中啼叫，这对我是一种安慰，我想，我毕竟是为了消遣的缘故而来到这里的。

“你的生活是单调的，”我大声地说，以便使自己确信。“你被带到另一个地方，这的确是必要的。你可以满意了，这里挺有趣。阳光普照。”

这时，太阳照耀着，雨云在蔚蓝色的天空上变白、变轻、变小。雨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欢腾跳跃。我看到山谷里有条河。

“是的，它是单调的，你理应得到这种娱乐，”我勉强地继续说，“不过这样的娱乐也会危害你的生活。”这时，我听到有人在附近发出可怕的叹息声。

我想迅速地爬下去，可是树枝像我的手一样抖个不停，于是我呆若木鸡地从高处掉了下去。我安全着地，也没有疼痛，不过我感到极其虚弱和不幸，以致我把脸埋进林中的地里，因为我再也没有兴趣去观察我周围的一切。我深信，任何动作和任何思想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应该避免它们。相反地，躺在这儿的草地上，把双臂放在身上，用手捂着脸，却是天经地义的。我劝自己，既然已经处于这种自然的境地，就应该高兴起来，否则的话，为了达到这种境地，我须做出许多艰苦的努力，比方不停地走路或不停地说话。

可是我躺了不久，就听到有人在哭。而且哭声就在我附近，因此我非常生气。我怒不可遏，以致我开始考虑，谁会是这位哭者。可是我刚开始考虑，就又怒又怕地在地上疯狂地翻滚起来，以致全身尽是松针地滚下斜坡，掉进了公路的尘土里。尽管我的双眼满是灰尘，看到的一切仿佛只是幻觉，我仍旧在公路上继续奔跑，以便最终逃脱所有像幽灵一样的人。

我跑得气喘吁吁，在混乱中对自己失去控制。我看到我的双腿连同它们向外凸出的膝盖骨高高地举起。可是我再也熬不住了，因为我的双臂就像是在非常愉快的结局时候那样来回地摆动，我的头也在摇晃。尽管这样，我冷静地和绝望地做出努力，希望能获得搭救。这时我想起那条想必在附近的河，使我高兴的是，我立即看到一条窄路，它拐向侧面，只需在草地之间跳上几跳，就能把我带到河岸边。

这条河很宽，它的喧闹不止的涟漪被阳光照耀着。在对面的河岸上也有草地，它们转化为灌木丛，在灌木丛后面，老远就可看到浅色的由

果树组成的林荫大道，它们通向绿色的丘陵。

看到这种景象，我感到高兴。我躺了下来，一面用手捂住耳朵，以免听到可怕的哭声，一面在想，这里我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这里人烟稀少，而且风景秀丽。在这里生活，无需许多勇气。你在这里，必然会感到痛苦，在其他的地方也一样，但是在感到痛苦的同时，你无须做出优美的举动。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里只有群山和一条大河，而我还相当清楚，它们只是一些无生命的东西。是的，如果有一天的晚上我独自踉踉跄跄地走在这些向上伸展的草地的路上，我不会感到比山更孤独，只有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我相信，这种感觉也还会消失的。

我就这样和我未来的生活玩着游戏，并且想方设法把它忘掉。在这种情况下，我眯起眼睛看了看那色彩异常美丽的天空。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灿烂多彩的天空了，我为之感动，而且想起了那些个别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也曾以为这样看到它。我把双手从耳朵上放下来，张开双臂，让它们落到草丛里。

我听到远处有人在低声地啜泣。风在吹，大量干枯的树叶——我从前没有看到过——沙沙作响地满天飞扬。未成熟的水果从果树上掉下来，发疯似的打到地上。在一座山的后面升起了讨厌的云。河里的波浪嘎嘎作响，在大风面前节节后退。

我迅速地站起来。我感到心痛，因为现在我似乎无法摆脱我的痛苦。我正想转身，以便离开这个地区，回复到我从前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就在我们的时代，有教养的人们竟然以这种困难的方式被运送过河，这真是咄咄怪事。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别无其他解释。”我摇了摇头，因为我负伤了。

3. 胖子

a. 向风景致词

从对岸的灌木丛里威风凛凛地走出四个赤身的男子，他们的肩上扛着一副木制的担架。一个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男子以东方的姿势端坐在这副担架上。尽管他被人抬着穿过人迹罕至的灌木丛，他并没有推开那些有刺的树枝，而是用自己纹丝不动的身体冲破它们。他那些呈褶皱状的脂肪块小心翼翼地摊开，盖住了整个的担架，两边还像一块淡黄的地毯的镶边一样垂下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打扰他。他那个不长头发的脑袋很

小，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他的脸上流露出一天真的表情，像一个在思考的人，而且并不致力于掩饰它。他偶尔闭上自己的眼睛；当他重新睁开它们的时候，就扭动一下自己的下巴。

“风景妨碍我思考，”他轻声地说，“它让我的思考像水流湍急时的链式吊桥那样摇晃。风景是美丽的，所以必须加以观察。”

“我闭上自己的眼睛，并且说：你啊，河边绿色的山，你有滚动的岩石，它们可以对付水流，你是美丽的。”

“可是山并不满意，它要我睁开眼睛看它。”

“可是，如果我闭着眼说：山，我并不喜欢你，因为你使我想起了云，想起了晚霞，想起了向上伸展的天空，它们差一点要使我哭，因为要是我让人用小轿子抬着，我就休想够着它们。可是，诡计多端的山，要是你向我展示这一切，你就会遮住使我开心的远景，因为远景可以很好地眺望，而且可及。所以我不喜欢你，河边的山，不，我不喜欢你。”

“可是，如果我不睁着眼睛说话，山似乎对我的这次谈话像对上次谈话那样不感兴趣。此外，他并不满意。”

“山对我们的脑浆有一种乖张的偏爱，如果我们不和它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做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维护它——它就会把它参差不齐的影子朝我投来，就会默不做声地把那些可怕的素壁推到我的面前，我的挑夫们就会被路上的小石头绊个跟头。”

“可是，不仅山是如此的自负，如此的纠缠不休，如此的爱报复，所有其他的东西也一样。所以我得反复地睁圆眼睛，哦，它们使我痛苦。”

“是的，山啊，你是美丽的，你西面的山坡上的森林使我高兴。——我对你，花呀，也感到满意，你粉红的颜色使我心旷神怡。——你啊，草地上的野草，已经长得又高又粗，给人以凉意。——你啊，奇特的灌木丛，你突如其来地扎人，使我们不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可是河啊，我对你非常满意，我恨不得让你柔顺的水把我带走。”

在他屈从地微微挪动自己的身体，十倍地高唱这种赞歌之后，他垂下头，闭着眼睛说道：“可是现在——我请求你们——山、花、草、灌木丛以及河——给我一点空间，以便我能够呼吸。”

这时，在周围那些前面被云雾笼罩着的山里，出现一种匆忙的移动。林荫大道虽然固定不动，并且几乎保护着公路的宽度，但是它们过早地变得模糊不清。天空里有一片湿云，其边缘被阳光照射得有些通红，在它的阴影下，大地更深地下沉。与此同时，一切的事物都失去了自己美丽的界限。

挑夫们朝我的河岸走来，我已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但是在黑暗中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他们的四方脸，别的什么也分不清。我只看到他们把脸侧向一边，佝偻着身子，因为负担特别重。我为他们而担忧，因为我发现他们已经累了。因此，我紧张地在一旁观看：他们先是走进岸边的草丛，然后仍以整齐的步伐穿过潮湿的沙滩，最终沉入满是烂泥的芦苇，在那里，后面的两位挑夫还更低地弯下身子，以便使轿子保持平衡。我捏紧双手。现在，他们每走一步，都得高举自己的脚，以致他们的身体在这多变的下午的冷风中因流汗而闪闪发光。

那胖子安静地坐着，两手放在大腿上；每当前面的挑夫走过，长长的芦苇尖就弹起来，擦过胖子的身体。

挑夫们越走近水，他们的动作就越发不整齐。轿子偶尔摇晃起来，仿佛它已经在浪头上。芦苇中有些小水潭，他们得跳过去，或者绕道而行，因为它们也许很深。有时，野鸭鸣叫着腾空而起，直插云霄。这时，我看到胖子的脸抽搐了一下；他显然非常不安。我站了起来，急忙笨拙地跳过把我和水隔开的那道多石的斜坡。我不顾这样做会有危险，心里只是在想，如果他的仆人们不能再抬他，我就应该帮助他。我不假思索地奔跑，以致在下面的水里无法止住脚步，不得不继续跑进浪花四溅的水里，直至水淹到我的膝盖，我才站住不动。

可是在那边，仆人们早已歪歪扭扭地把轿子抬入水里，他们一边用手把自己保持在不平静的水面上空，一边用四只多毛的手臂顶住轿子，以致可以看到它们异常发达的肌肉。

水首先拍击下巴，然后上升到嘴，挑夫们的头向后仰，木制的担架落到了肩上。水已经轻快地拍击鼻梁，可他们还一直费力地抬着轿子，虽然他们几乎还没有到达河心。这时，一个低浪打到了前面两个挑夫的头，于是，这四条汉子一声不吭地淹死，一面疯狂地用自己的手把轿子拉下去。水劈头盖脸地将他们吞没。

这时，从那大片云的边缘上折射出夕阳的偏光，使远方地平线上的大小群山显得美好，而河流和周围的地区在云层下面则显得模糊不清。

那胖子朝着急流的方向慢慢地旋转，像一尊用浅色的木头雕成的偶像顺流而下，它已经是多余的，因此被人们扔进了河里。他在雨云的映照下迅速地离去了。长方形的云拖着他，矮小而伛偻的云移动着，以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我还能从水拍击我的膝盖和岸边的石头上觉察到它。

我迅速地再次爬上斜坡，以便能陪同胖子离去，因为我真的喜欢他。也许，我能得知这个表面上安全的地区的某些危险情况。因此我踏上一片沙土地带——我首先得习惯它的狭窄——把手插在口袋里，把脸呈直角转向河流，以致下巴几乎搭在肩膀上。

在岸边的石头上停着一些温柔的燕子。

那胖子说：“岸边亲爱的先生，您别试图救我了。这是水和风的报复，我现在全完了。是的，这是报复，因为我们多次进攻过这些东西，我和我的那位做祈祷的朋友，我们的刀刃曾多次呼呼作响，我们的铜钹和漂亮的长号曾多次闪闪发光，我们的铜鼓曾多次发出闪光。”

一只小海鸥展翅飞过胖子的肚子，迅速向远方飞去。

那胖子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b.和祈祷者已经开始的谈话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到一座教堂里去，因为我曾爱上的一位姑娘晚间在那儿跪着祈祷半小时，此时我可以静静地观察她。（以下从略，因内容与《和祈祷者谈话》一文完全相同。）

c.祈祷者的故事

然后，他坐到我的身旁，因为我已感到害羞，便把头转向一侧，给他让出位子。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察到他有点儿不知所措地坐着，总是尽量和我保持小的距离，然后他吃力地说：

“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昨晚我参加了一次聚会。正当我在煤气灯下向一位小姐鞠躬，对她来说“我真高兴我们已接近冬天”的时候；正当我一面鞠躬一面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满地注意到，我的右腿已经脱位。膝盖骨也有些松动。

因此我坐了下来，因为我一直试图对我的句子保持全貌，便说道：“因为冬天更加不用费力；人们的行动更加方便，说话的时候用不着这样吃力。不是吗？亲爱的小姐。我希望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与此同时，我的右腿给我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开头它似乎完全脱节，只是在我用力压和巧妙地移动之后，它才逐渐差不多恢复正常。

这时，我听到那位姑娘——出于同情，她也早就坐了下来——轻声地说：“不，您根本无法使我感动。因为——”

“请等一下，”我满意地和充满期望地说，“亲爱的小姐，和我谈话您甚至无需花费五分钟的时间。谈话之间您务必吃点东西，我请求您。”

于是我伸出手臂，从由一个带翼的青铜男孩高举的盘子里拿过一串丰硕的葡萄，把它在空中举了一会儿，然后放到一个蓝边的小碟子里，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那位姑娘。

“您根本无法使我感动，”她说，“您所说的一切，既无聊又令人费解，所以也不会是真的。因为我认为，我的先生——您为何总是把我叫做亲爱的小姐——我认为，您之所以不同真理打交道，只是因为它太费力。”

天啊，这正中我的下怀！“是的，小姐，小姐，”我几乎是喊了起来，“您说得多么地对啊！亲爱的小姐，您知道，得到您如此的理解，我真是喜出望外，虽然它并没有什么目的。”

“我的先生，对您来说真理的确是太费力了，因为瞧您现在像什么样子！您从头到脚都是用棉纸剪出来的，用黄色的棉纸，所以看上去就像是剪影，您一走路，人们必定会听到您沙沙作响。所以，也用不着为您的姿势或看法生气，因为您得随房间里刚好有的穿堂风弯腰。”

“我不懂您所说的话。这儿的房间里的确闲散地站着几个人。他们把自己的手臂放在椅子靠背的周围，或者他们依靠在钢琴上，或者他们胆怯地走进隔壁房间，他们在黑暗中碰到一只箱子，因而弄伤自己的右肩之后，他们便站在一扇开着的窗子旁边，一面呼吸一面思考着：那儿是

金星，也就是昏星。可是，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如果这事有某种关联的话，那么我并不理解它。我甚至也不知道，这事是否有某种关联。——您瞧，亲爱的小姐，在所有这些人当中——他们依照自身的模糊，行动很不坚决，甚至非常可笑——看来只有我值得您发表如此明确的看法。您为了使您的看法听起来悦耳动听，还用嘲讽的口吻表达它，以致显然还剩下一点儿东西，就像透过一所内部被烧焦的房子的那些重要的墙壁所看到的那样。现在，视线几乎没有受到阻挡，白天的时候，透过这些大的窗洞可以看到天空里的云层，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繁星。可是，就连这些云层也常被灰色的石头打下，而群星则形成反常的景象。——如果我感谢并委托您在将来把所有愿意生活的人变得和我一样的长相，——如您所注意到的，用黄色的棉纸剪制而成，像剪影一样，行走时沙沙作响——那么情况会怎样呢？他们将和现在一样，但长相将和我的一样。就连您，亲爱的——”

这时我觉察到，那姑娘已不再坐在我身旁。想必她说完最后几句话之后，很快就离开了，因为此时她站在离我挺远的一扇窗子旁边，被三个年轻人包围着，他们又说又笑，高而白的衣领特别显眼。

对此，我高兴地喝了一杯葡萄酒，然后走向那位完全与世隔绝的钢琴演奏者，他正点头演奏一首忧伤的乐曲。我小心地朝他的耳朵弯下身子，只是为了不使他受惊，然后合着这首乐曲的旋律轻声地说：

“尊敬的先生，劳驾让我现在演奏一下，因为我正想使自己幸福。”

由于他没有听从我，所以我不知所措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抑制住自己的胆怯，从一个客人走向另一个客人，顺便说道：“今天我就要弹钢琴。的确。”

所有的人似乎知道我不会弹钢琴，但他们因为自己的谈话被愉快地打断而友好地笑了。只是当我大声对钢琴家说“尊敬的先生，劳驾让我现在演奏一下。我因为正想使自己幸福。这关系到胜利的喜悦”的时候，他们才完全注意到我。

那位钢琴家虽然停止了演奏，但并没有离开他那褐色的长凳，而且似乎也不理解我。他一边叹气，一边用他长长的手指遮住他的脸。

我有些同情他，正当我打算鼓励他重新演奏的时候，女房东带着一群人走了过来。

“这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念头。”他们边说边大声地笑，仿佛我所从事的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那姑娘也参加进来，鄙夷地看了我一下，然后说道：“我求您，夫人，让他演奏一下吧。说不定他还能为我们助兴。这是值得称赞的。夫人，我求您了。”

所有在场的人高兴得大声叫了起来，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显然认为姑娘的话中带刺。只有钢琴家默不做声。他低垂着头，用他左手的食指抚摩长凳的木头，仿佛是在沙子里画画。我的手发抖，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我把双手塞进裤袋里。我也不再能够清楚地说话，因为我整个的脸似乎想哭呢。所以我得很好地斟酌词句，务使听众们觉得我想哭这个念头是可笑的。

“夫人，”我说，“我现在得演奏，因为——”由于我把理由早就忘了，我便突然坐到钢琴旁边。这时我又明白自己的处境。那位钢琴家站了起来，体谅地爬过长凳，因为我挡住他的去路。“请熄灯，我只能在黑暗里演奏。”我挺直身子。

这时，两位先生抓住长凳，抬着我远远地离开钢琴，一边用口哨吹出一首歌，一边轻轻地摇晃我，把我抬向一张餐桌。

所有在场的人看上去都是赞同的，于是那位小姐对女房东说：“您瞧，夫人，他演奏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事。而您刚才还非常担心。”

我领会姑娘的好意，便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谢意。

人们给我倒柠檬汽水，一位涂着口红的小姐拿住杯子让我喝。房东太太用一只银盘子给我端来蛋白甜饼，一位全身穿白色衣服的姑娘把甜饼塞进我的嘴里。一位身材丰满、金发浓密的小姐一边注视我畏缩的目光，一边把一串葡萄举在我的头上，我只消摘取。

大家待我很好，所以，当我想重返钢琴，竟被他们一致拦住的时候，我当然感到惊奇。

“现在可以结束了。”房东先生说，此人我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发觉。他走了出去，马上又回来，手里拿着一顶古怪的大礼帽和一件紫铜色的有花样的外套，“这是您的东西。”

这些东西虽然不是我的，但我不想麻烦他再查看一下。房东本人还帮我穿上这件外套，它紧紧地贴在我瘦削的身子上，显得很合身。一位面孔慈祥的女士慢慢地弯下身子，从上到下地为我扣好外套的钮子。

“那就再见吧，”房东太太说，“欢迎您再来。我们总是欢迎您的，这您知道。”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向我鞠躬致意，似乎这是完全必要的。我也试图鞠躬还礼，可是我的外套紧紧地贴在身上。于是我脱下帽子，笨手笨脚地走出了门。

当我小步走出房门的时候，突然看到天空巨大的穹顶上明月高挂、星星闪烁，还看到环形广场，上面耸立着市政厅、马利亚圆柱和教堂。（以下从略，因内容与《和醉汉谈话》一文完全相同。）

d. 胖子和祈祷者之间继续进行的谈话

可是，我早就努力鼓励自己。我揉了揉自己的身子，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是你说话的时候了。你已经不知所措过。你现在还感到窘迫吗？你等着瞧吧！你的确知道这些情况。不用急，慢慢地考虑吧！周围的人也会等待的。”

“这次的聚会和上星期的聚会一样。有人宣读副本中的一段。我应他的请求亲自抄写了一页。我感到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读我所抄的这一页，顺便说一下，它是和他所写的那几页放在一起的。这是毫无根据的。人们从桌子的三面向我的那一页弯着身子。我边哭边发誓，这不是我的笔迹。”

“可是，我的笔迹为何跟今天的相似呢？现在出现一次受到限制的谈话，这的确是我的过失。所有在场的人都是心平气和的。我亲爱的，努力吧！——你会找到某种借口的。——你可以说：‘我很困，想睡觉。我头痛。再见。’快，赶快。快让人注意到你！——这是什么？又是困难和障碍？你想到什么？我想到一片高地，它作为地球的盾牌直插广阔的天空。我从一座山上看到了它，正准备步行漫游它。我开始唱歌。”

当我往下说的时候，我的嘴唇干燥并且不听使唤：

“难道你不能换一种方式生活吗？”

“不。”他微笑着用探询的口气说。

“可是您为何晚间在教堂里祈祷呢？”我进一步问道，此时，我和他之间的所有关系——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突然崩溃了。

“不，我们干吗要谈论这件事呢？晚上独自生活的人不负责任。他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身体也许会消失，担心人们真的会是黄昏时所表现出的那样，担心自己没有手杖就无法走路，所以，走进教堂，呼喊着重进行祈祷，以便让人注视和获得身体，也许是个好办法。

因为他这样说话，然后沉默不语，我便从衣袋里掏出我那块红色的手帕，弯着腰哭了起来。

他站了起来，吻了吻我，然后说道：

“你为什么哭？你身材高大，这我喜欢，你有长长的双手，它们几乎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你为何不为它们感到高兴？我劝你一直穿带深色袖边的衣服。——不，我奉承你，尽管如此，你哭了？生活里的这一困难，你毕竟非常冷静地承受下来。”

“我们正在建造众多本来无用的战争机器、塔楼[5]、城墙和丝绸的帷幕，如果我们对此有时间，我们对这些东西会更加感到惊奇。我们始终飘浮在空中，我们不会坠落，我们扑翅飞翔，尽管我们比蝙蝠更丑恶。美好的日子即将来临，到那时，几乎没有谁会妨碍我们说：‘天哪，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因为我们早就被安排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生活的基础是我们的协调一致。”

“我们就像是雪里的树干。表面上看，它们只是滑溜溜地横卧在那儿，只消轻轻地一推，就能移动它们。可是不，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们牢牢地同地面联系在一起。不过你瞧，即使那样也只是个外表。”

沉思妨碍我哭泣：“现在是晚上，明天谁也不会责备我现在会说些什么，因为很可能我是在睡梦中说这番话的。”

于是我说：“是的，是这么回事，可是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不能谈论天空的照明，因为我们毕竟站在过道的深处。不——我们刚才本该可以谈论天空的照明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谈话中并不是完全独立

的，这是因为我们既不想达到目的，也不想达到真理，而只想达到玩笑和娱乐的目的。可是，您能否再次给我讲一下花园里那位太太的故事呢？这位太太多么聪明，多么值得钦佩！我们必须按照她的榜样行事。我多么喜欢她！不过，我能遇见您，并把您捕获，也算是幸运了。对我来说，能和您交谈，是件天大的乐事。到目前为止，我也许有意听到一些我不熟悉的东西——我感到高兴。”

他看上去满意。尽管接触人体对我来说始终是件难堪的事，我不得不拥抱他。

然后我们走出过道，置身于天空之下。我的朋友吹散了一些稀薄的云层，以致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片群星璀璨的景象。我的朋友吃力地走着。

4. 胖子的灭亡

这时，一切被某种力量迅速抓住，落到了远方。河水向下倾泻，它想控制住自己，还在被弄碎的边缘上波动，但立即化为团块的烟雾落了下去。

那胖子无法继续说话，他得旋转，消失在咆哮着迅速向下落的瀑布之中。

经历过这么多娱乐的我站在河岸上，目睹了这一切。“我们的肺该做些什么呢？”我喊了又喊，“如果您迅速地呼吸，就会因为自身的内毒而窒息；如果您慢慢地呼吸，就会因为不适宜于呼吸的空气，因为那些令人气愤的东西而窒息；可是，如果您想寻求您所需要的速度，您就会因为寻求而不灭亡。”

此时，这条河的两岸极度地延伸，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手心摸到远处一小块路标的铁链。我对这事并不完全明白。我毕竟渺小，几乎比平时还要渺小，一棵结满白色野蔷薇果实的灌木迅速地抖动着，高出于我之上。我看到这点。因为片刻前它就在我的身边。

可是尽管这样，我刚才准是弄错了，因为我的双臂像连绵阴雨的云那样巨大，只是后者更加匆忙。我不知道，它们为何想要压扁我可怜的头。

我的头毕竟很小，像一只蚁卵，只是它有点儿损伤，所以不再是完全圆的。我不停地转动它，以此请求别人的帮助，因为我的眼睛太小，别人似乎是无法觉察到它们的表情的。

可是我的双腿，我那不成体统的双腿，悬在树木茂密的山的上空，给乡村里的山谷遮阴。我的双腿在长，它们在长！它们已经高耸入不再有风景的空间，它们的长度早已超出我的视力范围。

不，事情并非如此——我毕竟非常渺小，暂时非常渺小——我在滚动——我在滚动——我是山里的一次雪崩！过路人啊，请行行好，请告诉我，我有多大，请测量一下我的双臂和双腿。

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朋友说，刚才他和我一起离开了社交晚会，现在正同我漫步在劳棱茨山的一条路上，静静地走在我身旁，“请您停一停，好让我把这事弄个明白。——您知道，我有件事要办。走路真吃力——这夜晚大概很冷，也有月光，但这风情绪不好，有时它看上去甚至改变了那些金合欢花的位置。”

园丁小屋的月影横跨在稍许凸起的路上，点缀着少量的积雪。当我看到位于门旁的长凳的时候，我举起手指了指它，因为我缺乏勇气，期待着我朋友的责备，所以我把自己的左手放到胸前。

他厌倦地坐了下来，一点儿也不考虑他那身漂亮的衣服，当他把自己的胳膊肘压在自己的腰部、用完全弯曲的指尖捧着自己前额的时候，我不禁大吃一惊。

“好吧，我现在就告诉您这件事。您知道，我生活很有规律，对它无可非议，我正在做一切必要的和受人称赞的事情。我与之交往的那伙人感到习以为常的不幸，正如周围的人和我满意地看到的那样，并没有饶过我，而这普遍的幸福并没有控制住自己，我本人在小圈子里可以谈论它。总之，我还从未真正地热恋过。我有时对此感到难过，但是我使用那句成语，如果我需要它的话。现在，我得告诉您：我的确在热恋，而且由于热恋而激动不已。我是姑娘们所希望的那种疯狂的情人。可是我本该考虑到，正是以往的这一缺点例外地使我的情况发生了有趣的、特别有趣的转变。”

“千万别激动，千万别激动，”我冷淡地说，一边只想自己的事，“我听说您的情人很漂亮。”

“是的，她很漂亮。当我坐在她身旁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这种冒险行动——我真勇敢——那样我就进行海上旅行——喝几加仑的葡萄酒。’可是，每当她笑的时候，她并不像我所期待的那样露出她的牙齿，我只能看到她嘴的模糊的、微微弯曲的缝隙。每当她在笑的时候把头朝后仰，看上去既奸诈又老态龙钟。”

“我无法否认这一点，”我叹息着说，“也许我也看到了这一切，因为她的动作想必引人注目。不过这不仅仅是动作的问题。根本的是姑娘们爱美！我常常看到一些饰有形形色色的褶裥、皱边和垂悬物的衣服，它们出色地穿在俊俏的身体上，这时我就想，它们不会长久地这样保持下去，而是会起皱，再也无法熨平，它们的装饰物中会积上厚厚的灰尘，再也无法去除，而且谁也不会去想早晚穿脱同一件贵重的衣服，以免使自己显得非常寒酸和可笑。然而，我也看到一些姑娘，她们的确漂亮，露出诱人的肌肉和节骨，还有紧绷绷的皮肤和浓密的细发，可是每天穿着一身朴素的化装舞会服装露面，总是用自己相同的手掌支撑着同一副脸蛋，让它从自己的镜子里反射出来。只是有些时候，当她们晚上参加庆祝活动，很晚才回来的时候，她们的衣服才在镜中显得破旧、膨胀、布满灰尘，已经被所有的人看过，几乎再也不能穿用了。”

“可是我在路上经常问您，您是否觉得那位姑娘漂亮，而您总是把身子转向另一边，拒不回答我的问题。告诉我，您是不是有些幸灾乐祸？您为何不安慰我？”

我站稳双脚，殷勤地说：“您无须让人安慰。有人爱着您呢。”与此同时，我把我那块饰有蓝色葡萄图案的手帕放到嘴前，以免感冒。

现在，他转向我，并把他胖胖的脸靠到长凳低矮的靠背上：“您知道，一般说来我还有时间，我始终有办法马上结束这刚刚开始的爱情，比如通过无耻行径，或通过背信弃义，或通过启程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说真的，我很怀疑，我是否应该为刚开始的爱情而激动。什么都靠不住。谁也不会向我明确地指出方向和期限。如果我怀着把自己喝醉的意图走进一家小酒店，那么我知道，这个晚上我将喝醉了酒，不过这只是我的情况！一星期之后，我们打算和一个朋友的一家去远足，在这十四天里，我们的心里会不会暴跳如雷？这个晚上的一次次的亲吻使我昏

昏欲睡，以至于我没地方去做那些无法抑制的梦。我抗拒此事，夜里去散步，这时出事了，我不停地激动，我的脸像阵风过后那样又冷又热，我不得不一再地摸我衣袋里的那根粉红色的带子，我感到非常担心，但无法去探究担心的原因，我甚至忍受得住您，我的先生，否则的话，我肯定不会和您谈这么长的时间的。”

我觉得很冷，这时，淡白色的天空已稍许倾斜。我微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耻行径，背信弃义，还是启程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都无济于事。您将不得不自杀。”

在我们对面，在林荫大道的另一边，有两棵矮树，在它们的后背坐着城市。它还有点儿灯火。

“好吧，”他喊道，一边用他那小而结实的拳头敲长凳，但马上把它放在长凳上面，“可是您活着。您没有自杀。没人爱您。您什么也达不到。您无法控制下一个时刻。您就这样对我说话，您这卑鄙的小人。您不会爱，您只会引起恐惧。瞧瞧我的拳头。”

于是，他迅速地解开他的外套、他的背心和他的衬衫。他的胸脯的确又宽又美。

我开始讲述：“是的，像您这样固执的人，我有时也看到过。那是在今年的夏天，事情发生在河边的一个村庄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我常常歪着身子坐在岸边的一条长凳上。那儿也有一家海滨旅馆。我常听到有人在拉小提琴。年轻力壮的人们坐在花园里的桌子旁边，一边喝啤酒，一边大谈打猎和艳遇。在对面的河岸上，群山布满了云。”

我无精打采地扭歪着嘴站了起来，走进长凳后面的草地里，也折断了一些积雪的小树枝，然后悄声地对我的朋友说：“我已订了婚，我承认这事。”

我的朋友对我站了起来并不感到惊奇：“您已订了婚？”这时，他看上去的确非常虚弱，只是被长凳的靠背支撑着。然后他脱下帽子，露出他的头发，这头发香气扑鼻，梳得漂亮，以一种清晰的圆形的线条，覆盖着脖子肉上面的那滚圆的头。这是今年冬天流行的一种发式。

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刚才巧妙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是的，”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样，他在社交场合就能带着灵活的脖子和无所事事的双手

走来走去。 he 可以和一位女士进行友好的交谈，领着她穿过一个大厅，无论是屋前下雨，还是那儿站着个胆怯者，还是发生某种悲惨的事情，都绝不会使他感到不安。不，他总是好好儿地向女士们鞠躬。可是这会儿他坐着。”

我的朋友用一块麻纱手帕擦了擦前额。“请吧，”他说，“请把您的手放到我的前额上。我请求您。”我没有马上做，于是他十指交叉。

我们的忧虑仿佛使一切变暗，我们坐在山顶上，犹如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尽管我们早就觉察到清晨的日光和风。尽管我们彼此毫无好感，我们仍紧挨在一起，可是我们彼此不能远远地离开，因为四周的墙壁把我们团团围住。不过，我们可以可笑地和不顾尊严地行动，因为在那些我们头顶上的树枝和那些在我们对面的树的面前，我们无须感到害臊。

这时，我的朋友直截了当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一把刀子，若有所思地把它打开，然后像玩游戏似地把它刺进自己的左上臂，但并没把它拔出来。血马上淌了出来。他红润的双颊一下子变得苍白。我把刀子拔出来，切断冬大衣和燕尾服的袖子，划破衬衫的袖子。然后上下地跑了一小段路，以便看看那儿有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所有的树枝简直是刺眼和静止不动。然后我吸了一下深深的伤口。这时，我想起了园丁的小屋。我跑上通向房屋左边的那片增高的草地的楼梯，我匆匆地检查了那些窗子和门，我跺着脚怒气冲冲地按铃，尽管我马上发现，这房屋没人住。然后我看了看伤口，它血流如注。我把手帕在雪里弄湿，笨拙地捆扎他的手臂。

“你啊，亲爱的，你啊，亲爱的，”我说，“你为了我而弄伤了你自己。你生活宽裕，朋友众多，在大白天，每当远近的桌子之间，或山丘的道路上出现许多穿着细心的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散步。想想吧，春天的时候，我们将乘车去果木园，不，不是我们，这的确令人遗憾，而是你和安娜，你们将乘马车高兴地前往。是啊！相信我吧，我请求你，到那时，太阳将最亲切地让所有的人看你们。哦，那儿有音乐，人们老远就听到马蹄声，你用不着发愁，那儿有叫喊声，在那些林荫大道上，街头艺人在玩手摇风琴。”

“天哪！”他边说边站了起来，靠到我身上，并且同我一起走，“那儿肯定没有人帮助我。这不会使我感到高兴的。请原谅。时间已经晚了吗？也许明天一早我该做点什么。天哪。”

附近的墙上亮着一盏路灯，把树干的阴影投到道路的白雪上，与此同时，各种树枝弯曲和破碎的阴影笼罩在山坡上。

洪天富 译

乡村婚事^[6]

爱德华·拉班穿过前厅过道，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天正下雨。雨下得不大。

就在他面前的人行道上，有许多迈着各种各样步子的行人。不时有人走到人群的前面，横穿过马路。一位小姑娘在向前伸出的双手里捧着一只疲倦的小狗。两位先生相互交换着信息。其中的一个手心向上，有节奏地摆动着双手，仿佛托着什么悬空的重物。这时，走来了一位女士，她的帽子上饰着许多缎带、别针和花朵。一个拄着细手杖的年轻人匆匆而过，他那似乎瘫痪的左手平放在胸前。不时走来一些男人，他们抽着烟，嘴里冒出一缕缕直而长的小烟云。有三位先生——其中的两个把轻便的外衣搭在屈伸的下臂上——多次从房屋墙根走到人行道的边上，观察着那儿发生的事情，然后又边说边退回到原处。

透过行人之间的空隙，可以看到马路的排列有序的石子路面。马匹伸长着脖子拉着架在柔软高大的轮子上的车子。车上那些靠在软垫座位上的人，默默地望着行人、商店、阳台和天空。每当一辆马车想要超越前面一辆的时候，马匹就相互挤在一起，缰绳也因此松弛而悬挂着，并且来回地晃动。马匹用力地迅速拉着辕杆，马车随即滚滚向前，急速地摇晃着，直至完成超车所需的弧度，此时，马又重新分开，只是它们瘦长而宁静的头还凑在一起。

有几个人匆匆地向房门走去，停留在干燥的马赛克路面上，慢慢地转过身来，望着被塞进这窄胡同的蒙蒙细雨。

拉班感到疲乏。他双唇苍白，就像他那厚实的、印有摩尔人图案的领带的褪了色的红色。在对面一扇有石头保护的门的旁边，站着一位女子，此时，她正瞧着他，在这以前，她一直盯着自己那双由于裹紧了裙子而格外醒目的鞋子。她漫不经心地瞧着他，兴许她看的只不过是前面落雨，或者是他头顶上那块钉在门口的商店小招牌。拉班相信她正吃惊地看着。“是啊，”他想，“要是我能把情况告诉她，她就根本用不着

吃惊了。人们在机关里超时超量地工作，结果也疲劳过了头，连自己的假期也不能好好享受了。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卖力地工作，还是无望得到所有人的以爱相待，反倒愈加孤独，完全成了陌生人，只成了人家好奇的对象。只要你讲的时候不用‘我’而用‘人们’，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你尽可把这故事讲完，但是，只要你承认这里讲的就是你自己，人家马上就会瞪着眼睛把你看穿，你就会感到惊惧。”

他放下缝有格子布套的手提箱，同时弯了弯膝盖。雨水已经在马路边上汇集成像带子一样的细长的水流，正向位于低处的下水道流去。

“但是，如果我自己把‘人们’和‘我’区分开来，我怎能去埋怨别人呢。他们也许是公正的，但是，我现在太累了，没法去弄明白这一切。我甚至累到了这样的程度，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走完到车站去的这段路，虽说这段路不长。我何不留在城里度假，好生养身体呢？我真是愚蠢。——我明明知道旅行会把我弄病的。我将去住的房间不会很舒适的，乡下的条件只能是这样。现在正值六月上旬，乡下的空气往往还很凉爽。我虽然会注意多穿点衣服，可是，我将不得不加入那些晚间散步的人的行列。那里有许多池塘，大家将沿着池塘边散步。那时候我肯定会着凉的。与此相反，和大家交谈时，我将少出些风头。我不会把这里的池塘跟另一个遥远的国度的池塘进行比较，因为我从未旅行过，至于谈月亮，感受幸福，热衷于去登瓦砾堆，已不是我所关心的事情，我毕竟太老了，不希望让人耻笑。”

人们略微低着头走过，头上打着深色的雨伞，一晃一晃的。一辆运货马车也驶了过去，在垫有干草的马车夫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懒洋洋地伸着两条腿，一只脚几乎触及了地面，另一只脚则好好地搁在干草和碎布片上。看上去，他仿佛是在美好的天气里坐在一处田野上。但是，他全神贯注地握住缰绳，所以，这辆马车——它上面的铁杆相互碰撞着——得以顺利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在潮湿的地面上，可以看到铁杆的倒影，弯弯扭扭的，慢慢地由一排铺路石滑向另一排铺路石。马路对面那个站在女子身旁的小男孩，穿戴得活像个种葡萄的老农。他那起皱的衣服只系着一根皮带，以致在它的下方，几乎就在两腋下面，形成了一个圆圈。他那半球形的帽子一直压到眉毛上，一个绒球从帽尖一直挂到左耳朵旁。下雨使他高兴。他从门里跑出来，睁大眼睛朝天上望，想要逮住更多的雨点。他不时地蹦跳起来，溅起许多水，惹得行人狠狠地责备他。这时，那女子喊住了他，拉着他的手走开了；可他并没有

哭。

拉班猛地一惊。是不是天色已经很晚？他的大衣和上装都敞着，他赶紧去掏他的表。表停了。他满不高兴地向一位稍许站在过道深处的邻人打听时间。那人正在跟人说话，边谈边笑，应了一声：“已过四点”，就又掉转头去了。

拉班连忙撑开伞，拎起他的箱子。可是，正当他打算走上马路的时候，却被几个行路匆匆的女人挡住了去路，他只得让她们先走过去。这时，他低头看见一个小姑娘的帽子，这帽子是由染成红色的麦秆编成的，在波浪形的帽檐上系着一个小小的绿色花环。

他上了马路以后，仍念念不忘方才的印象。在他要去的方向上，马路略微有些坡度。于是，他忘却了刚才的印象，因为他现在得用力爬坡；箱子虽小，但此时对他来说却不轻，况且风又朝他迎面吹来，把外衣都吹拂起来了，并且由前面压迫着雨伞的伞骨。

他被逼得大口喘气；低处一个不远的广场上，一只时钟已敲四点三刻，他从伞下看到迎面而来的人们轻快而短小的步子，被刹住的车轮发出吱吱的响声，慢慢地转动着，马匹伸出它们瘦骨嶙峋的前腿，像山间的羚羊一样进行着冒险。

这时拉班觉得，他也将能熬过往后十四天漫长倒霉的时间。因为这仅仅是十四天，也就是说，是一段有限的时间，虽说心中的烦恼会与日俱增，但必须忍受这些烦恼的时间毕竟会一天天地减少。因此，勇气无疑也会增长。“所有想要折磨我、并且现在已经占领了我周围整个空间的人，会由于这些日子的有效的流逝而渐渐地被迫向后退去，无须我帮他们什么忙。于是，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只能是软弱的和默默无闻的，可以任凭别人摆布，但是，仅仅由于这些正在流逝的日子，一切毕竟肯定会变好的。

再说，难道我不能像我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那样干吗？我压根儿用不着亲自到乡下去，这没有必要。我只需把我穿着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当我的躯体摇摇晃晃地走出我的房门时，这摇晃并非表示恐惧，而是表示这躯体的虚无。当这躯体跌跌绊绊地走下楼梯，呜咽着乘车去乡下，哭泣着在乡下吃晚餐，这一切也并非表示心情激动。因为我此时此刻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全身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

凭从微微开着的房门里透进来的小风吹着。胡同里干净的地面上，车辆在缓慢地行驶，人们在迟疑地行走，因为我还在做梦。马车夫和散步者全都怯生生的，每往前走一步，他们都要注视我，以求得我的同意。我鼓励他们，他们未遇障碍。

当我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

在一个橱窗（里面的一块湿玻璃后，小棍子上面挂着男士帽）前，他停住了脚步，噘着嘴唇往里瞧。“还好，我的帽子还可以戴到假期结束，”他边想边向前走，“假如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帽子而讨厌我，那岂不更好。

一只硕大的甲虫，不错。于是，我装出正在冬眠的样子，把我的细腿贴在我的鼓起的肚子上。接着，我吱吱地说了几句话，这是对我那悲伤的躯体发出的命令，它紧靠我站着，弯着腰。我很快就吩咐完毕——它鞠了一躬，然后匆匆离去，在我卧床休息期间，它将妥善处理一切。”

他到达了一个敞开着的圆拱形门洞，这门洞在坡度大的小巷的高处，通向一座小广场，广场四周是许多灯火通明的商店。在广场的中央，由于四周有灯光而显得有些昏暗，这里有一座低矮的纪念碑，上面坐着一个沉思的男人。行人像细长的挡光板在灯光前移动，由于地上的水洼把所有的亮光向四处远远地伸展开去，至使广场的景象不停地变幻着。

拉班在广场上一直朝前走，不得不急促地躲过奔跑着的马车，从一块干的铺路石跳到另一块干的铺路石，高举起手中拿着的撑开的雨伞，以便看清周围的一切。终于，他停在了一根竖立在一小块四方形结构的石子路面上的路灯柱旁，这是一个车站。

“在乡下的人肯定在等我。他们会不会为我担心呢？他们到乡下已有一个星期，可我一直没有给他们写信，只是今天早晨才给他们去信。他们肯定已经把我想象成另一个模样了。他们也许以为我向谁打招呼时，就会向谁冲过去，但这并非是我的习惯；或者他们以为，我一到达时，就会跟人拥抱，这也不是我的习惯。相反地，当我试图劝慰他们时，我会使他们发怒。唉，要是我试图劝慰他们时能使他们发怒，那倒好了。”

这时有一辆敞篷马车徐徐驶过，在它的两盏亮着的车灯后面：可以

看到两位女士坐在昏暗不清的小皮椅子上。一个往后靠着，用面纱和她帽子的影子遮住自己的脸。另一个的上身却直立着；她的帽子小巧玲珑，边上饰有细羽毛。谁都能看得见她。她微微抿着下嘴唇。

就在这马车从拉班身旁驶过时，不知一根什么杆子挡住了这辆车右边的那匹马，随即，坐在高得出奇的驾驶座位上的车夫——他头戴一顶大礼帽——被推到了两位女士的前面，——这时，马车已向前行驶了好大一段路，——随后，她们的马车绕过了一幢小房子的屋角，当这幢小房子现在呈现在眼前时，那辆马车却消失不见了。

拉班目送着那辆马车，他低着头，把伞柄靠在肩上，以便看得清楚些。他把右手的拇指塞进了嘴里，来回地擦牙齿。他的箱子搁在他的身边，一侧横倒在地。

一辆辆马车从一条胡同出来，穿过广场，驶进另一条胡同，马的身子像被抛掷出去似的沿水平方向飞去，但头部和颈部却一高一低地，说明马在费力地向前快速奔跑。

四周围，在所有三条在此汇合的马路的人行道边沿，站着许多无所事事的人，他们用小棍子敲击石板路面。在一群群人中间，是一些小塔状的售货亭，姑娘们把柠檬水卖给雇客；接着是挂在细杆上的笨重的街钟；接着是一些胸前和背后挂着大牌子的男人，在这些牌子上，登着用五颜六色的字母写成的各种娱乐广告；接着是搬行李工人……〔此处缺两页〕一小伙人。两辆横穿过广场驶进向下倾斜的胡同的华丽马车，拦住了这伙人中的几位先生，可是在第二辆马车后面——其实，在第一辆马车的后面，他们就怯生生地试图这样做——他们又同自己的一伙人聚在一起，然后排成一长列走上人行道，拥进了一家咖啡馆的门，匆匆地被悬挂在门口的电灯的光线照射了一下。

在附近，长长的电车车厢驶过，另外几辆电车停在远处的街上，静悄悄的，模模糊糊的。

“她的背驼得多么厉害，”拉班这时瞧了瞧那张照片，心里这样想着，“她永远也挺不直，也许她的背是圆的。我可得多加注意。她的嘴那么宽，下唇无疑是凸出的，是啊，我现在也想起来了。再说她那身衣服！当然，对于服装我一窍不通，可那两只缝得太窄的袖子肯定很难看，看上去像绷带似的。还有那顶帽子，帽檐儿的每处都以不同的方向

上弯曲，把脸部暴露无遗，但她的眼睛是美的，假若我没有弄错的话，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大家都说她的眼睛漂亮。”

此时，一辆电车停在了拉班面前，他周围的许多乘客开始移向电车的台阶，他们把稍许打开着的尖的雨伞竖着提在紧贴肩膀的手里。臂下挟着箱子的拉班，被拉下了人行道，重重地踩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水洼里。车厢里，有个孩子跪在凳子上，把双手指尖按在嘴唇上，似乎是在同此时离去的什么人告别。几个乘客下了车，不得不顺着电车走了几步，才从拥挤的人群里走了出来。接着，一位女士登上了第一级台阶，她双手抓住的拖裙刚好在她的膝盖上面。一位绅士抓住一根铜杆，抬头对那位女士说了几句话。所有想上车的人，全都着急。售票员在大声嚷嚷。

这时，一直站在等候上车的人群边上的拉班转过身去，因为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啊，列蒙特！”他慢腾腾地说道，并向走过来的一位年轻人伸出握伞的那只手的小指头。

“原来这就是乘车来看新娘的新郎。看上去他是完全被迷住了。”列蒙特说，然后合嘴微笑。

“是的，我今天就乘车回去，还得请你原谅，”拉班说，“我在下午也给你写了封信。我当然很乐意明天和你一道走，可明天是星期六，到处都拥挤不堪，再说，旅途又长。”

“这根本没有关系。尽管你答应过我，但是如果人家在热恋中——。我本该独自乘车走的。”列蒙特一只脚踏在人行道上，另一只脚踩在石板上，上身的重心一会儿支撑在这条腿上，一会儿又支撑在另一条腿上。——“你现在想上电车吧？它刚刚开走。来，我们走去吧，我陪你。时间还足够。”

“请告诉我，现在去时间不已经晚了吗？”

“你这样谨小慎微，这不奇怪。不过，你的确还来得及。我，就不那么着急，因此刚才跟吉列曼错过了。”

“吉列曼？他不是也将要住到郊区去吗？”

“不错，他和他妻子，下星期他们就要乘车到郊区。所以我才和吉列曼约好，在今天，当他办好公事的时候，同他见面。他打算就他们住房设备的事对我作些指示，所以我得跟他碰头。可现在，不知怎么地，我迟到了，我买了些东西，正当我考虑要不要去他们家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你，首先是对你的箱子感到吃惊，然后才跟你打招呼。不过，现在去拜访人家已经太晚了，再到吉列曼那儿去，几乎是不能了。”

“当然。这么说我在郊区也有熟人了。顺便提一下，吉列曼太太我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呢。”

“她非常漂亮。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可现在，生了一场病之后，显得苍白了。她有一双我从未见到过的极为美丽的眼睛。”

“请问，漂亮的眼睛是什么样的？是目光吗？我从来不觉得眼睛是漂亮的。”

“就算你说得对吧，我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她可是一位漂亮的女人。”

透过一家平房咖啡馆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紧挨窗户的一张有三面的桌子，周围坐着看报和用餐的先生们；其中的一个把报纸垂放到桌上，手里举着个小杯子，斜着眼朝胡同张望。在这些靠窗的桌子后面，在这个大餐厅里，每件家具和用具都被客人用上了，他们分成几个小的圈子互相挨着坐在那里。〔此处缺两页〕……“碰巧这不是一家令人讨厌的店家，不是吗？许多人愿意自找这份罪受，我这样想。”

他俩走进一个相当昏暗的广场，其实这广场早在他们刚才站的街道的一侧就开始了，因为对面的那一侧也在不断地显现。他俩沿着广场的一侧继续往前走，在这里，有一排长长的相互连接的房子，在它的拐角，又是两排房子，它们先是分开，各自向不可辨认的远方延伸，后来似乎在远处又合在一起。大多数小房子前的人行道都很窄，看不到商店，也没有车辆打这儿驶过。离他们走出来的胡同口不远，有一根铁架子，上面有几盏灯，由两个平行的上下重叠悬挂的圆环固定着。在一片钟楼形的黑暗笼罩下，那梯形的火舌像在一间小屋子里似地在连接在一起的玻璃板之间燃着，使几步以外的地方陷入茫茫的黑暗之中。

“你瞧，现在肯定已经晚了，你向我隐瞒了实情，害得我误了火车。为什么？”〔此处缺四页。〕

“是的，我最多向你隐瞒了匹克斯荷夫，不错，就是这个人。”

“我想，这名字出现在贝蒂的信里，他是个铁路上的候补职员，不是吗？”

“是的，铁路上的候补职员，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只要你见到他那又小又厚的鼻子，你就会同意我的看法。我告诉你，要是你和他一起走过单调的原野的话……顺便提一下，他已经调走了。我相信并且希望，他下星期离开那儿。”

“等等，你刚才说过，你劝我今夜留在这儿。我考虑了一下，这恐怕不大好。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们，我今晚到，他们会等我的。”

“这很简单，你打个电报就行了。”

“对啊，这样似乎就行了——不过，要是我不乘车去的话，这未免有点不像话吧——再说，我也累了，还是走吧；——他们收到电报，说不准会吓一跳的。——这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们上哪儿去呢？”

“那么，要是你乘车走的话，这倒的确更好。我只不过想——。我今天也不能和你一起走了，因为我还没睡醒，感到困倦，刚才我忘记告诉你这点了。现在就向你告别吧，我不想陪你走过这座潮湿的公园了，因为我还想去看看吉列曼夫妇。现在是五点三刻，还可以到好朋友家里作客。再见！祝你一路平安，替我问候大家！”

列蒙特向右转身，伸出右手向他握手告别，这样一来，在一瞬间的时刻，他得朝列蒙特伸出的手臂走去。

“再见。”拉班说道。

走了一小段路，列蒙特又回头喊道：“你啊，爱德华，听我说，把你的雨伞收拢吧，雨早就不再下了。我忘了告诉你这事了。”

拉班没有回答，把雨伞收拢起来，灰白昏暗的天空笼罩在他头上。

“眼下要是我，”拉班心里想，“上错火车，那才好呢。这样我会觉得计划已经开始了。当我后来弄清了错误，又乘车回到原来的车站上时，心里会觉得更加好受些。要是那个地方果真像列蒙特说的那样荒凉，那倒不是什么害处。相反地，这样就可更多地待在房间里，也压根儿用不

着打听所有其他的人在何处，因为要是附近有一座废墟，人们肯定按早些时候的约定一块儿散步到那儿去了。大家想必为这样的活动感到高兴，因此不大可能会错过机会。要是没有这样的名胜古迹，人们当然事先也不会相约，因为他们预料到，只要有人一反众人的习惯，突然认为长途远足不错，就很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只需派位姑娘到其他人的家里去，把这消息告诉正在写信或读书的人，他们听了，定会感到欣喜若狂。当然，要抵挡这样的邀请，倒也并不困难。可我终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抵挡住，因为事情并不像我想象那么简单，因为我此时还是独自一人，还能干我所想干的一切，要想回去就回去，反正在他们那儿，我没有一个我随时可以去拜访的人，也没有一个我可以和他一起作更加劳累的远足的人，他将指给我看他庄稼的长势，或者让我参观他经营的采石场。就连那些老相识，我也根本没有把握。列蒙特今天不是对我很友好吗？他毕竟给我讲了一些情况，他把一切描绘得如同我所想象的一样。尽管他不想从我这儿打听什么，尽管他本人还有别的什么事情，但他还是向我打招呼，然后又陪我走了一段路。现在，他可是不知不觉地走开了，对此，我能责怪他什么呢。我虽然拒绝在城里过夜，但这是合乎情理的事，不会冒犯他的，况且，他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车站的钟响了，已是五点三刻。拉班停住了脚，因为他感到了心扑扑地跳，然后，他沿着公园的水池快步向前走，穿过位于高大的灌木丛之间的一条狭窄而灯光昏暗的路，奔向一个广场，在那儿的小树旁，停靠着许多空着的长凳，然后，他放慢了脚步，穿过栏杆间的裂缝，走到一条大街上，越过它之后，一步跳进车站的大门，片刻之后就找到了售票口，随即不得不敲了一会儿售票口的铁皮窗。这时，有个职员探出头来说，再过一会儿就下班了，他接过钞票，把要的车票和找的零钱乓的一声扔到窗前的板上。拉班本想赶快数一数找回的钱，因为他想钱可能多找了，可是一个在附近走动的服务员，却把他推进玻璃门上了站台。拉班在月台上四下张望，一边对服务员喊道“谢谢，谢谢！”由于找不到检票员，他只好独自迈上最近一节车厢的踏板，先把箱子提到更上的一级，然后自己跟着上去，一只手拄在雨伞上，另一只手提着箱子的把手。他上的这节车厢，被他刚从中走出来的候车大厅的灯光照得通明；在某些玻璃窗前——所有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最高处，严严实实地关着——明显地挂着一盏吱吱作响的弧光灯，在灯光的反照下，窗玻璃上的许许多多雨点泛着白光，不断有一滴滴的雨点往下流。拉班即使关上了车厢门，仍然听得见从月台上传来的嘈杂声，他看到浅褐色的长木板凳上尚有最后一个小小的空位，便坐了下来。在他的眼前，是许多人的脊

背和后脑勺，透过它们之间的缝隙，可以看见对面板凳上向后仰着的脸。有好几处地方，烟斗和香烟的烟雾在空中缭绕，有时还缓缓地飘过一女孩子的脸。旅客们不时地调换自己的座位，彼此商量着座位的调换；或者他们把放在木凳上空的狭小的蓝色网套里的行李转移到另一个网套里去。要是有一根棍子或包有护片的箱子的边凸出来，就有人提醒它们的主人多加注意。于是，他走了过去，把东西摆好。拉班也考虑了一下，干脆把他的箱子放到自己的座位底下。

在他左边靠窗的地方，面对面坐着两位先生，正在谈论商品的价格。“这是跑买卖的，”拉班想，并且平静地瞧着他们。“商店老板把他们派到乡下来，他们只好遵命，乘上火车，到了每个乡村，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有时候他们坐着马车穿梭于乡村之间。他们无须在任何地方长久地逗留，因为做买卖就得快，他们必须做的就是不断地谈论商品。瞧，他们能为这么舒服的职业卖命，是何等的高兴！”

那年轻一点的突然从后面的裤袋里猛地抽出一个笔记本，用迅速在舌头上沾湿的食指翻着，每翻一页，就用指甲背压着它，一边读着。当他的眼睛离开笔记本向上一看的时候，他看到了拉班，就在他此时大谈缝衣线价格的时候，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拉班的脸，就好像为了不忘记要说的事而盯住某处看一样。他边说边皱眉头。左手拿着那半闭的笔记本，大拇指放在读过的那页上，如有必要，就容易把它翻开来查阅。在这种情况下，笔记本不住地哆嗦，因为握它的这只手臂无依无靠，而正在行驶的车厢又像锤子似地在铁轨上敲打着。

另一个跑买卖的旅行者靠在椅子背上，专心听着，有节奏地点着头。可以看得出，他对那人所说的一切并非完全同意，待那人说完以后，他肯定要发表自己的看法的。

拉班把握成半圆的手掌放在膝上，身子略向前弯曲，透过这两位旅行者脑袋间的缝隙看窗子，再透过窗子看掠过的和向后飞到远方的灯光。他一点也听不懂那旅行者的话，另外一个旅行者的答话，他也不想弄明白。要弄懂他们之间的谈话，需要作一番大的准备，因为这里的人从年轻时候起就和各种商品打交道。要是有人手里经常拿着线卷，并常常把它递给顾客，那他一定会知道它的价格，而且对此有发言权。火车在向前飞奔，一座座村庄朝我们迎面扑来，又匆匆掠过，同时转向大地的深处，渐渐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然而，这些村庄里肯定有人居住，说不定还有跑买卖的旅行商人在走村串户做生意呢。

车厢另一头的角落里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手里拿着玩牌大声喊道：“喂！玛丽，你把和风薄呢衬衫带来了没有？”“带来啦！”坐在拉班对面的那女人说。她刚刚睡了一会儿，所以当那问话把她叫醒时，她自言自语地回答，仿佛她是冲着拉班说的。“您是到容布茨劳赶集的吧？”那活泼的旅行商问她。“是的，去容布茨劳。”“今年的集市规模很大，是吗？”“是的，大的集市。”她困倦不堪，把左胳膊支在蓝色的行李小包上，脑袋沉重地顶在她的手上，致使面颊和颧骨上的肉凹陷下去。”“她多么年轻！”那旅行商说。

拉班把售票员找给他的钱从背心小口袋里掏出来，把它再数一遍。他把每一枚硬币垂直地久久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并用食指尖使钱在拇指内侧上翻来翻去。他久久地注视着钱上的皇帝像，接着他又把目光落到了那月桂冠上，看它是如何用带子打成的结和飘带系在皇帝的后脑勺上的。最后，他发现钱数对了，便把它放进一只大的黑色钱包。正当他想对这位旅行商说：“那是一对夫妇，您说是吗？”的时候，火车停了。火车行驶时的噪音没有了，乘务员喊着站名，拉班一声不吭。

火车又慢慢开动了，乘客似乎能想象出车轮是如何转动的，可是紧接着不久，火车就疾驶起来，朝一低地开去，一座大桥的长栏杆毫无准备地从车窗前闪过，看上去就像是被扯开，然后又合拢来似的。

火车开得这样快，正合拉班的意，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待在前一站。“要是那儿天已经黑了，要是那儿一个熟人也没有，要是那儿离家这么远，那么，白天那儿肯定也是令人吃惊的。下一站，或者前面的几站，或者下面的几站，或者我现在乘车去的那个村子，会是另一番景象吗？”

那个旅行商突然提高了说话的嗓门。“路还远着呢！”拉班想。“先生，您肯定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制造商派人到这些穷乡僻壤，让他们低三下四地到极端卑鄙无耻的小商贩那儿去，您以为他们给小商贩出的价格会不同于给我们大商人出的价格吗？先生，那就让我告诉您吧，完全相同的价格，昨天我还白纸黑字看得清清楚楚的呢。我把这叫做无耻行为。人家欺压我们，在今天的情况下，做生意简直是不可能的，人家压榨我们。”他又注视了拉班一下；他（指商人）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但并不为此感到羞愧；他把左手的指关节压在嘴上，因为嘴唇在发抖。拉班往后靠了靠，用左手轻轻地捋着他的小胡子。

坐在对面的女商贩醒了，微笑着用双手抚摩前额。旅行商压低了嗓门。那女人又一次挪正身子，像要继续睡觉，半躺着靠在自己的小行李卷上，叹了口气。她右臀部上的裙子绷得紧紧的。

她身后坐着一个头戴旅行帽的男人，正在看一张大报纸。坐在他对面的姑娘，可能是他的亲戚，她求他——与此同时，她把头朝右肩低了一下——打开窗子，因为里面太热了。他头也不抬地对她说，他马上就开窗，可是得先把报纸上的这一段看完，并指给她看他读的是哪一段。

那女商贩再也睡不着了，她坐直了身子，朝窗外张望，然后久久地望着挂在车厢顶上的煤油灯的黄色火苗。拉班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当他抬头仰望时，正好看到那女商贩在咬一块涂了棕色果酱的点心。她身旁的小行李卷已经打开了。那个旅行商默默地抽着一支香烟，不停地弹着，仿佛要把烟头上的烟灰弹掉。另一个旅行商则用刀尖在怀表的齿轮上刮来刮去，刺耳的声音传到了周围人的耳朵里。

拉班的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仍然能模糊地看到那戴旅行帽的先生在拉窗子上的皮带。一阵凉风扑了进来，把一顶草帽从一个挂钩上吹了下来。拉班相信自己醒着，所以他的双颊非常凉爽，要么是有人开门，把他拖进了房间里，要么是他不知怎么地弄错了，然后就深深地呼吸着入睡了。

二

拉班现在下车了，他踩着的车厢阶梯还震颤了几下。雨点扑打在他那张刚从车厢的空气里钻出来的脸上，于是，他不得不闭上眼睛。——雨水嗒嗒地打在车站大楼前的铁皮屋顶上，但是，雨落到广阔的田野上时，只让人以为自己听到了一阵阵有规则地刮过的风。一个赤脚的男孩跑了过来——拉班没看见他是从哪儿跑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地求拉班让他扛箱子，因为天正下着雨，可是拉班却说：的确，天正在下雨，所以他要乘公共汽车。他不需要他。这男孩对此做了一个鬼脸，仿佛他认为，在雨中行走，让人扛着箱子，要比乘车显得更加高贵，接着便转身跑开了。拉班想喊住他时，为时已经太晚了。

有两盏路灯亮着，一个车站职员从一扇门里走出来。他毫不犹豫地冒雨朝机车走去，双手交叉地静静地站在那儿，直到火车司机从驾驶室

栏杆上弯下腰来和他说话。叫来了一个车站勤杂工，随即又把他打发回去。列车的一些窗子旁边站着不少乘客，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座平平常常的车站建筑物，所以他们的眼睛没神，眼皮像车子行驶期间那样合拢了。一个女孩子从公路上走了过来，打着一把有图案花的太阳伞，她急匆匆地来到了站台，把开着的伞放到地上，坐下来，伸开两腿，好让裙子快点干，一面用指尖在绷紧的裙子上划来划去。只亮着两盏路灯，所以她的脸看不清楚。打她跟前走过的车站勤杂工，抱怨雨伞底下冒出了不少水洼，一面把两臂弄圆，表示这些水洼有多大，然后又把双手分开，接连做了几个像鱼沉到深水中去那样的动作，以此说明这雨伞也阻碍了交通。

火车开动了，像一扇长长的滑门消失不见了，在轨道对面的白杨树后，是一片令人神往的景色。那是茫茫暮色还是一片森林？是一个池塘还是一座住着早已入睡的人们的房子？是一所塔形的教堂还是小丘之间的深谷？谁也不敢到那儿去，但是谁都无法克制住自己。——

拉班一见到那位铁路职员——他已经到了办公室前的台阶上了——，便跑到他面前，并且拦住他说：“请问，这儿离村子远吗？我要上那儿去。”

“不远，一刻钟时间，但是要乘公共汽车——天正下着雨呢——您五分钟之后就到那儿了。请吧。”

“天在下雨。这可不是美好的春季。”拉班接着说。

那职员右手叉腰，拉班透过由胳膊和身子形成的三角形，看见那女孩子早已收拢伞，坐在长凳子上。

“要是现在车去避暑，并在那儿待上些时候，那是要向人抱歉的。本来我想他们可能会来接我的。”他环顾四周，以使这话显得可信。

“我担心您会误了公共汽车，它不会等得太久的。不用谢。——往那儿的路两旁是灌木丛。”

车站前的马路没有照明，只从大楼底层三个窗户里射出一丝阴沉沉的光，照射距离并不远。拉班跺着脚走过烂泥地，连续高喊：“车夫！”“喂！”“出租马车！”“我在这儿。”他一边喊，一边不断地陷进黑糊糊的街道边上的几乎是一个接一个的水洼里，最后只得用全脚掌继续踩

水前进，直到他的前额突然碰着一个湿乎乎的马鼻子。

这就是出租马车，他迅速跳进空无一人的车厢，在车夫驾驭台后靠玻璃窗的地方坐了下来，躬着腰靠在角落里，因为他已经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因为要是车夫睡觉，明天将近天亮时才会醒来；要是他死了，还会来一位新的车夫或老板；要是新的车夫或老板也没有来，乘客会搭早班火车来的，这些匆匆忙忙的人总是吵闹不堪。不管怎样，他现在可以得到安静了，他甚至可以吧窗帘拉上，等着车子开动时的那猛地一动。

“是啊，在我采取了这么多行动之后，明天我肯定能见到贝蒂和妈妈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不过，有件事是实在的，而且事先能预料到的，即我的信明天才能到，既然如此，我何苦不待在城里，在埃尔维那儿舒舒服服地过上一夜呢，用不着为第二天的工作担心，否则的话，是会败坏我的兴致的。哎，瞧，我的两只脚全给弄湿了。”

他从背心小口袋里取出一小截蜡烛，把它点着后放在对面的长凳上。在外面黑暗的笼罩下，蜡烛发出的微光足以使他看到没有玻璃窗的、刷成黑色的出租马车车厢四壁。用不着马上想到，车厢底下是轮子，前面还有一匹套好的马。

拉班仔细地擦了擦搁在长凳上的双脚，穿上一双新的短袜，把身子坐正。这时，他听到有人从车站那边朝他喊来：“嘿！”要是出租马车内有旅客的话，他是会答应的。

“是我，是我，请快开车。”拉班把身子探出打开着的车门，右手紧紧抓住门柱，左手张开靠近嘴边高声回答。

车夫用两块破麻布袋片裹住身子，连忙朝拉班走了过来，他手里的马灯的反光在他脚下的水洼里跳跃。他闷闷不乐地开始解释说：“请注意，他正好和勒贝达在玩纸牌，火车到的时候，他们正玩得上劲呢。所以那阵子他根本不可能出来瞧瞧，不过他也不想把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骂一顿。再说，这儿是个无法无天的穷地方，谁会想到有这样一位先生光临此地呢？更何况他及时地钻进了车子，丝毫没有流露出抱怨的情绪。匹克斯荷夫先生——对不起，是阿德容克特先生——刚才进屋说，他好像觉得有位金黄头发的矮个子先生想要乘车。问题是，他当时及时追问了呢？还是他也许并没有及时追问？

马灯被固定在车杠顶上，在车夫低沉的吆喝声下，马拉着车子开始

跑了起来，此时，车顶上被搅动的水，透过车棚缝隙慢慢地滴进了车里。

山区的道路崎岖不平，泥浆不断溅到轮辐里，小水坑里的水，在车轮滚过之后，像扇子一样哗哗地向后流，车夫手握大多松弛的缰绳，小心翼翼地驾着满身湿淋淋的马。——难道这一切不都是用来谴责拉班吗？车杠上摇摇晃晃的马灯，突如其来地照亮了许许多多的水坑，它们被车轮劈开，掀起水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拉班要到他的新娘子贝蒂，一个稍老但漂亮的姑娘那儿去。就算有人早就想谈论这件事，可有谁会赞赏拉班在此作出的功劳呢？他心里明白，他的功劳只不过是其所忍受的那些谴责，当然，这些谴责没有人会向他公开说出来。毫无疑问，他甘愿忍受人们对他的谴责，因为贝蒂是他的新娘子，他爱她，要是她为此而感谢他，那会使他感到厌恶的，但是，贝蒂毕竟会感谢他的。

他无意识地多次用头敲击他倚靠着的那面车厢壁，然后又抬头朝顶棚看了一会儿。有一次，他的右手从大腿上滑了下去，他原先是用右手扶着大腿的。但是胳膊肘却还留在肚子和腿之间的某一角落里。

公共马车已穿梭于房屋之间，偶尔车厢里透进来某间屋子里射出来的灯光，一个台阶——为了看到它的最初几级，拉班不得不站起来——直接通向一座教堂，在一个公园的大门口，点着一盏火苗很大的灯，可是一座圣像仅凭一家杂货店的灯光从黑暗中显现出来，这时，拉班发现他那只蜡烛已经烧完，流下来的蜡一动不动地从长椅子边上挂下来。

当马车停在一家客栈前时，可以听出雨下得更大了，而且——也许是由于有一扇窗户开着的缘故——还能听到客人们的声音，这时拉班自问，是马上下车好呢，还是等客店老板到车跟前来好。这个小镇的风俗如何，他不得而知，不过贝蒂肯定已经向人谈到过她的新郎了，他的举止的好坏，将影响到她在此地的声望的大小，同时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声望。可现在，他既不知道她有什么样的声望，也不知道她对别人说了他什么一些话，所以他愈加感到难受和困惑。美丽的城市，美丽的归途！要是那儿下雨，就乘电车经过淋湿的石板路回家，可是在这儿，只得坐这种双轮小车穿过沼泽地到一家酒店来。——“这儿离城远着呢，就算我现在想家都快想死了，也不会有人再送我到城里去。——好了，眼下我也不会死的——不过在那里，将有人把专为今晚准备的菜肴给我端上桌来，右边，盘子后面放着报纸，左边是一盏灯，而在这里，人们将

给我端来叫人害怕的油腻饭菜——人家不知道我胃不好，就算他们知道吧，——一份陌生的报纸，许多我已听说的人将在场，还有一盏众人共用的灯。它会发出什么样的光呢？玩纸牌时还行，但是读报时能行吗？

店主没有来，他对旅客丝毫不感兴趣，他大概是个不友好的人。要么他知道我是贝蒂的新郎，所以有理由为了我的缘故而不来。这似乎同在车站时马车夫让我等那么久的情况不谋而合。贝蒂以前常讲，她多次受到过这些好色的男人的欺侮，又如何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也许在这里也发生了这种事……〔文章到此中断〕

〔第二个手稿〕

当爱德华·拉班穿过门廊，走到门口时，便能看到天正下雨。雨不大。

在他面前的人行道上，不高不低地（整齐地）冒雨走着许多行人，间或有个行人走出队伍，横穿过马路。

一个小姑娘在向前伸出的双臂上托着一只灰色的狗。两位先生为某一件事彼此交换着信息，他们有时把整个的前身转过来碰在一起，然后又慢慢地转过身去；这使人联想到被风吹开的两扇门。其中的一个手心向上，均匀地上下摆动，仿佛是为了检查一下手中托着的悬空的重物的重量。此外，可以看到一位苗条的女士，她的脸微微抽搐，就像星星发出的闪光，她的平顶帽，从顶端到帽檐，饰有叫人无法辨认的东西，堆得高高的；她无意让所有的行人觉得她奇特，但就像由一项法律所决定一样，她使他们必然对她感到奇怪。一个拄着细手杖的年轻人匆匆走过，他的左手像瘫痪了似地平放在胸前。许多人赶去上班；他们虽然走得快，但看到他们的时间要比看到其他人的时间更长，他们一会儿在人行道上走，一会儿又走到人行道下面，他们的制服很不合体，他们根本不注意自己的举止，他们让别人碰撞，也撞别人。有三位先生——其中两人把轻便外衣搭在屈伸的下臂上——从房屋墙根走到人行道的边上，以便观察马路上和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的情况。

透过行人之间的空隙，起初只能粗略地看到，随后便能一目了然地看到马路上排列整齐的铺路石块，在它们上面，一辆辆马车在车轮上摇摇晃晃，由伸长着脖子的马拉着迅速向前滚动。车上靠坐在软垫座位上的人，默默地望着步行者、商店、阳台和天空。要是有一辆马车超越前

面的一辆，马匹就挤在一起，缰绳也因此悬挂着，并且来回地晃动。马匹拼命扯着辕杆，车子摇晃着急速地滚滚向前，直至完成超车所需的弧度，然后马又重新分开，只是它们瘦长的头还凑在一起。

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快步朝房门走去，停在干燥的马赛克路面上，转过身来，然后望着被塞进这窄胡同的细雨。

拉班放下缝有黑布的手提箱，放的时候略略弯了一下右膝。雨水已在马路边上汇集成像带子一样的水流，正向位于低处的下水道匆匆流去。

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随便站在离拉班很近的地方，拉班半靠在木制的门扇上，那先生不时地朝拉班看，尽管他为此不得不用力扭转脖子。可他这样做仅仅出于一种自然的需要，因为他眼下闲着无事，可以仔细观察一切，至少是他周围的一切。这种毫无目的的东张西望，其结果是有许多东西没有被发觉。例如，他没有察觉到拉班的嘴唇非常苍白，同他那领带的完全褪了色的红色相差无几，这领带是摩尔式的，曾经引人注目过。要是他发觉了这一点，他内心里肯定会对此发出一声喊叫，但这又没有必要，因为拉班总是脸色苍白，尽管最近肯定有些事情弄得他特别疲乏。

“瞧这天气！”那位先生轻声地说，摇了摇头，虽说是有意意识的，但多少也是由于高龄所致。

“是啊，是啊，每当有人外出旅行的时候。”拉班言道，赶紧站了起来。

“这天气是不会好转的，”那位先生说，为了在最后时刻再把周围的一切审视一下，他弯下身子，向左右两旁的胡同看去，然后又看看天空，“这样的天气可能持续几天，也可能持续几个星期。就我所记得的，天气预报说六月和七月初不会有好天气。唉，这不会使人高兴，拿我做例子吧，我得放弃散步，而散步对我的健康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然后他打了个呵欠，显得精疲力竭，因为他刚才听到了拉班的声音，和他进行了交谈，现在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更不用说交谈了。

这给拉班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因为毕竟是那位先生最先和他打招呼的，所以他想趁此炫耀一下自己，即使不一定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是

的，”他说，“在城里人们完全可以放弃对健康不利的东西。如果不放弃，那到头来只会因其不良后果而谴责自己。人们会后悔，并由此才真正明白，下一回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已在个别的……〔此处缺两页〕……”“我说这些话并无所指。毫无所指，”拉班急忙补充说，这样还可以为那位先生的心不在焉辩解，因为他还想把自己炫耀一番。“所有这些均出自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我和其他人一样，在前些时候的晚上读到过这本书。我多半单独生活。那时候的家庭情况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所有其他的東西不谈，晚饭后读一本好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了。我向来就这样。最近我在一份书目上看到某作家的一条语录：‘好书是最好的朋友’，千真万确，一点不错，好书是最好的朋友。”

“是啊，要是年轻的话——”那位先生说，他这话并无特别的含义，无非是想说下雨的情况，诸如雨又下大了，根本没有要停的意思，可是这话在拉班听来，却好像是那位六十岁的先生还把自己当做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并且倒过来把三十岁的拉班看得一钱不值，如果允许的话，他似乎还想说，他三十岁的时候肯定要比拉班理智得多。他似乎认为，像他这样一个老年人，尽管没事可干，但站在这儿的过道里观雨，毕竟是浪费时间，要是再加上用闲扯来消磨时间，那便是双倍地浪费时间了。

拉班此时心想，一段时间以来，别人对他的能力或见解所发的议论，一点儿也不能触动他，相反地，他干脆离开了他曾专心地倾听一切的那个地方，这样一来，别人现在对他的议论，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等于是放空炮了。所以他说：“咱们各讲各的，因为您不想听我要讲的话。”

“讲吧，讲吧！”那位先生说。

“好吧，事情并不那么重要。”拉班说，“我只是认为，书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有用的，尤其是在人们不希望它的时候。因为要是人们想干一件事情，那些在内容上与人们要干的事情毫不相干的书，偏偏是最有用的。因为一心想干那件事情的读者，不知怎么地激动起来（尽管只有那本书的作用才能使他激动起来），通过读这本书，激发他产生与他所要干的事情有关的思想。由于这本书的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所以压根儿不会妨碍他产生他那些思想，他可以带着这些想法去浏览这本书，我想说，就像犹太人当初渡过红海似的。”

现在拉班觉得那位老先生的整个表情十分令人讨厌。他觉得那老先

生似乎对他特别亲近。——不过这无关紧要……〔此处缺两页〕……“报纸也是这样。——我还想说，我只不过到乡下去，只去十四天，我获准休假，好久以来第一次休假，再说这也是必需的，尽管如此，一本书，例如我向您提到的那本我最近读到的书，对我这次短途旅行所给予我的教益，要比您所能想象到的多得多。”

“我听着呢。”那位先生说。

拉班不做声了，把两只手插进大衣的口袋，由于他直挺挺地站着，口袋的位置显得有些高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老先生又才开口说：“看来这趟旅行对您来说特别重要。”

“您可是说对了，说对了。”拉班一边说，一边又把身子靠到门上。现在他才看到，过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就连房屋台阶的前面也站着人，一个职员——他跟拉班一样，在同一个女房东那里租了一间房间——走下台阶时，不得不请人家给他让路。他越过几个人的头，大声向拉班喊道“旅途愉快”，这时，所有这几个人都转过脸来朝拉班看。他喊完之后，重申他显然在此之前作出的许诺：下星期天他准会去拜访拉班。

〔此处缺两页〕……一个令人愉快的职位，他也对此感到满意，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他坚韧不拔，内心里充满了喜悦，他不需要别人为他解闷，可是大家需要他。他始终健康。啊呀，您怎么不说话？

“我不想争辩。”那位先生说。

“您不想争辩，也不愿承认您的错误，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如果您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的话，只要您和他谈谈，我敢打赌，您就会忘掉这一切。您会责备我，说我现在没能更有力地驳倒您。如果他只谈论一本书的话。他对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马上兴奋起来的。”……

洪天富 译

村子里的诱惑^[7]

一个夏日傍晚，我来到一个从未到过的村子。我注意的是这里的道路宽敞、开阔。人们到处可见农家院落前面高大的古树。那时正是一场

雨后的景象，空气清新，所有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舒适。我试图通过向站在大门前的同胞致意来表达我的这种惬意，我表现得虽然有点拘谨，同胞们却也友善地回敬我。我想，要是我到一家旅馆，在这里过夜该多美啊。

在我正从一家院落的高高的被绿色植物覆盖住的围墙旁边走过的时候，这墙里的一扇小门启开了，有三个人伸头朝外张望，一会儿又消失了，最后门又关上了。“真奇怪。”我向着一旁说道，好像我有一个同伴似的。啊，真的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汉站在我的旁边，就像是要让我尴尬似的，这个男子没戴帽子，没穿外套，穿一件编织的黑色马甲，吸着烟斗。我马上克制住自己，装出我早就知道他在我旁边的样子说道：“这门！您也看见了，这小门怎么自己开的呀？”

“是呀，”这个人说道，“可是这为什么会是奇怪的呢？他们是佃户的孩子，他们听到您的脚步声，并要看看是谁这样晚了还在这里走路。”

“这倒是一种简明的解释，”我微笑着说，“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看来一切都是奇怪的，我谢谢您。”我继续走下去。但这个人跟着我。我本来对此并不感到惊异，这个人要走的可能是同一条路，可是这不是理由，我们为什么一先一后地走着，而不是并排地走呢？

我转过身子说话了：“这条路通往乡村旅馆，对吗？”

这个人站住了说：“我们这里没有乡村旅馆，或更为确切地说，我们有一个乡村旅馆，可是住不了人。它是属于教区的，因为没有人谋求这个旅馆，在多年之前教区就已经将它给了一个年老的残疾人，教区为这位残疾人操心至今。这位残疾人现在和他的老婆管理着这个旅馆，虽然如此，可是人们几乎无法路过它的门口，因为从那里出来的是极浓烈的恶臭味。有人曾在旅馆的房间里踩在肮脏的东西上面滑倒。真是一个可怜的客栈，是村子的耻辱，是教区的耻辱。”

我有兴致与这个人站一下，他的外貌吸引着我，这副基本上是瘦削的面孔有着黄色的、皮革似的、微微鼓起的面颊和在颌骨运动之后穿过整个面孔的模糊的黑色皱纹。“这样，”我说道，并不继续表现出我对这种情况的惊奇，然后接着说道，“那，我还得去那里住宿，因为我已经决定在这里过夜。”

“那当然，”这个人勿急地说道，“但去旅馆您得从这里走，”他给我

指了我从那里来的那个方向。“您一直走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向右拐弯。那时您马上会看到一个旅馆的牌子，那里就是。”

我感谢他的回答，便又从他的身边走过，现在他特别仔细地盯着我看。对此，他即使可能只是给我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我当然也无法抵挡，他大概是想既不让我惊异他现在逼我从他身边走过，也不让我惊异他如此迅速而明显地放弃有关旅馆的警告。也许有一个别的什么人也会向我指出那个旅馆是脏兮兮的，那么我也只能在这肮脏的环境里睡觉，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我的执拗的话。此外，我也没有更多别的选择，这时天色已晚，乡村的路都被雨水泡软了，那条通往另一个村庄的路还长着哩。

我已经将这个男子甩在了身后，我不想再去顾及他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女子跟这个男子说话的声音。我转过身去。在一组法国梧桐树下，从黑暗里走出一个个儿高大而挺直的女人来。她的裙子闪着黄褐色的光彩，在头上和肩上披着一块黑色的网眼布。“已经到家了，”她跟这位男子说，“你干吗不进来？”

“我已经来了，”他说，“只是再等一小会儿，我只是还想在旁边看看，这个人在这里到底想干什么。他是个陌生人。他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打转。你看看。”

他谈论着我，就好像我是聋子，或者是我听不懂他的语言。不过，他说什么，我当然不会过多地将它放在心上，但我自然也不会觉得舒服，要是他在这个村子里播散任何有关我的谣言的话。因此，我向这个女子传过话去：“我在这里找旅馆，没有别的事。您的丈夫没有权利用这种方式谈论我，而且给您带去的有关对我的看法大概是错误的。”

但这个女子根本不看我，而是朝她的丈夫走去，我倒是认准了，那个人是她的丈夫，一种如此直截了当的不言而喻的关系存在于他们之间——她将一只手放在丈夫的肩上说道：“如果您要什么的话，那您跟我的丈夫说好了，不用跟我说。”

“我根本不要什么，”我说，并对这种态度感到厌恶，“我跟你没关系，您也不用为我操心。这是我唯一的请求。”在黑暗中我还能看到这个女子头部颤动了一下，但她双眼的表情却看不见了。显然她想回答什么，但她的丈夫出声了：“别说了！”她就不再吭声了。

这个相遇的场面对我来说现在看来是完全结束了。我转过身，想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个时候，有人在叫“先生”。这声音好像是对我而呼的，在开始的瞬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但后来我看见在我的上方，院落的墙头上，坐着一个年轻男子，晃动着双腿，交叉着双膝，漫不经心地朝我说话：“我现在听明白了，您是要在村子里过夜。除了这里的院子之外，您在哪个地方也找不到一个所需要的住宿的地方。”

“在院子里？”我问道，而且是无意识地，我后来对此愤怒了，我疑惑地看着那对夫妇，他们还互相靠着站在那里观察着我。

“是这样的。”他说道，在他的回答里跟在他全部的举止中一样，都是傲慢。

“这里有床铺吗？”我再次问道，为了有把握，也为了将这个人推到出租人的角色上。

“有，”他说的时候已经把目光从我身上稍稍移开，“这里有床铺让给过夜的人，但不是每个人，而只是我们愿意为之提供的那个人。”

“我接受，”我说，“我当然为床铺付钱，就像在旅馆一样。”

“请，”那个人说，他早已不看我了，“我们不会占你们这些人的便宜的。”

他坐在上面俨然像个主人，我站在下面像个小仆人，我非常兴致。向他扔去一粒石子，让他在上面显得更活跃一些。我当然并没有这么做，我说：“那就请您给我把门打开。”

“门并没关着。”他说。

“门没有关着。”我低声地重复着，几乎还不清楚怎么一回事，我便打开门进去了。刚一进去，我偶然再看院墙上面，那个年轻男子已不见了，他显然不在乎院墙的高度而跳了下去，可能与那对夫妇商谈去了。他们可能在讨论，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这个人身上的现款刚刚超过三个古尔登^[8]，其他的所有除了那件放在旅行袋里的衬衫和裤袋里的左轮手枪外，什么也没有了。此外，这些人从外表看并不像要偷某个人的东西似的。他们到底能要我干什么呢？

那是一座平常的没经整修的农家大院的花园，坚固的石头围墙比想象的长得多，在高高的青草里挺立着错落有致的、已开过花的樱桃树。人们看到了远处的那座农舍、一座在平地上延伸的建筑。天色已经很黑了，我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客人；要不是那个在墙上的年轻男子不管用什么方法说谎的话，我可能还处在一种不舒适的境遇里。在去那座农舍的路上，我没遇到任何人，但离房子前面还有几步的时候，我通过洞开的门看到第一个房间里有两个身材高大的老人，丈夫和妻子，并排着，面孔对着门，从一个盆子里吃着一种什么糊状的东西。在黑暗中我区别不出更为清楚的东西来。只是那丈夫的衣服上有的地方闪着金色的光芒，那大概是纽扣，或者也许是表链。

我先没跨门槛，在致意后才说话：“我正在这里寻找过夜的地方，一位坐在您院墙上的年轻人告诉我，说我可以在这个院子里付钱过夜。”这两个老人将调羹放在糊状的食物里，在长木凳上向后靠了靠，并沉默地看着我。他们的态度并不显得非常好客。我因此补充道：“我希望我打听来的情况是对的，我不是随随便便来打扰您的。”我说这些话的声音很高，因为这两位老人有可能重听。

“请您走近点。”过了一小会儿丈夫说道。

只是因为他这么大的年纪，我才顺从了他，否则我自然要坚持到清楚回答我的明确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在进门的时候说了：“接纳我要是对你们哪怕只有些许困难的话，那就请你们坦率地说出来，我是绝不固执的。我就去旅馆，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他说那么多话。”妻子轻声说道。

这只能意味着侮辱，这么说，对我的彬彬有礼，他们只是用侮辱作答，可是那是一位老太婆，我不能反击呀！也许正是这种不反抗成了这位老太婆那个不用回击的意见在我身上的作用大大多于它应得的效果的原因。我感觉不管怎样的指责总有些道理，倒不是因为我说得太多，因为我确实说了只是必要说的话，但出自于其他的、完全为达到我的生存的原因。我不再说什么了，坚持不回答，在近处黑暗的角落我看见一条长凳，便走过去，坐下来。

两个老人又开始吃上了，一位姑娘从旁边的房间里出来，将一支点亮的蜡烛放在桌上。现在比刚才看得见的东西更少了，所有的东西全浓

缩在黑暗中了。只有小小的烛光在有一点儿下俯的老人头上跳动。几个孩子从花园跑进来，一个孩子跌倒了好一会儿，并大哭起来，别的孩子在奔跑中停了下来，在房间里分散地站着，老头说道：“孩子们，睡觉去吧。”

他们马上聚到了一起，那个哭着的孩子只是还在抽泣，一个小家伙拽了拽我的外衣，好像他认为，我也应该与他们一起走，说实在的我也是想睡觉去了，我便站了起来，作为一个大人走在这些孩子中间，这些孩子大声而一致地道着晚安，便默默地走出了房间。这位友好的小家伙牵着我的手，使我在黑暗中轻松多了。我们倒是很快地走到了一处阶梯，攀登而上，到了地板上。透过开着的小天窗，正好可以看到狭窄的残月，在天窗之下行进挺有意思——我的脑袋几乎可以伸到天窗里去——还能呼吸到柔和清凉的空气。在挨着一面墙的地板上铺着稻草，那里的地方足够我睡觉的了。孩子们——两个男孩、三个女孩——大笑着脱衣服。我和衣躺在稻草上，我是在陌生的人群中啊，我没有被要求留在这里的啊。我支着膀子向孩子们看了一小会儿，他们都光着身子在一个角落玩耍。后来，我感觉很累，便将头枕在我的旅行包上，伸展手臂，还稍稍地瞥了一下屋梁，就入睡了。在开始入睡之际，我相信还听到一个孩子的呼喊声：“注意，他来了！”然后是孩子们向着自己睡觉地方的急速小跑声传进我已经逐渐消失的知觉里。

我当然只是睡了极短的时间，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月光几乎毫无改变地通过天窗照在地板上同样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醒了，因为我没做梦，睡得太死。这个时候，大约在我旁边齐耳朵高度的地方，我发现一只很小的浓毛狗，一只引起某些人讨厌的哈巴狗，脑袋颇大，被卷曲的毛遮盖得严严实实，一双眼睛和一张嘴巴就像是用什么没有生命的角状物质制成的装饰品松散地镶嵌在这个脑袋上。这样一种大城市豢养的狗怎么会来到农村里的？是什么驱使它在屋子里转悠的？它为什么停在我的耳朵旁边？我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让它离去，它大概是孩子们的玩物，只是迷误地来到我的身边了。它害怕我嘘它，可是并不离去，而只是转过身去，用弯曲的小腿立在那里，跟它的大脑袋相比，它的躯体显得特别瘦小。因为它安静地待着，我便又想睡了，但我无法睡了，我正要闭眼之时，便看到狗在空中摇晃并瞪着眼睛。这是无法忍受的，我不能让这畜生留在我身旁，我站起身来，将它放在手臂上，准备将它放出去，但这个一直没有表情的畜生开始反抗了，并企图用爪子抓我。但我得保全它的小爪子，那自然是很容易的，我一只手就能抓住所有的四

只小爪子。

“啊，我的小狗！”我朝着下面激动得卷毛都颤抖起来的小脑袋说道，便带着它一起走到黑暗中去寻门。现在我才注意到，这只小狗显得多安静，它不狂吠，也不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只是感觉到血液在它身上通过所有的血管在搏动。走了几步之后——由于这只狗的打扰而使我不小心——我碰撞到一个睡着的孩子，令我很不高兴。现在这顶楼的房间里也完全黑了，只有很少的光线透过天窗。这个孩子呻吟起来，我轻轻地站立了一会儿，连足尖也没移动一下，我保持住这种不动的姿态只是为了不继续弄醒这孩子。可是太晚了，我已经看到四周的孩子突然穿上白衬衣起来了，就像是互相约定了一般，就像听到了一声命令，但这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弄醒了一个孩子，这种碰醒也完全不叫唤醒，而只是一种小小的干扰，一个孩子在熟睡的时候根本不会把它当一回事的。可是，他们现在都醒了。“你们想干什么，孩子们，”我发问了，“继续睡觉啊。”

“您刚刚拿着什么东西？”一个小家伙说道，所有五个孩子在我身边转悠着寻找。

“是的，”我说，我没有必要掩盖什么，如果这些孩子想将这个畜生弄到外面去，那就更好了。“我要将这只狗弄到外面去，它不让我睡觉，你们知道它是谁的吗。”

“是克鲁斯特太太的。”至少我相信，从他们混乱的、不清楚的、睡眠朦胧的、不是针对我的、而只是他们互相叫喊的声音中，听出是这样说的。

“那谁是克鲁斯特太太呢？”我问，但我从这些激动的孩子们那里再也得不到回答。有一个孩子从我的手臂上取走了这只狗，它现在变得十分安静，这个孩子急速地带着它走开了，所有的孩子都追去。

我不想独自待在这里，现在我也毫无睡意了，我虽然犹豫了一会儿，在我看来，我好像太多地参与这座住宅的事务了，而在这座房子里没有人对我表示很大的信任，最终我却还是跟着孩子跑了，我听到他们就在我前面摸索着走路的声音，因为是在完全的黑暗中，何况还是在陌生的路上，我常常跌跌撞撞，有一次甚至可笑地把头撞在墙上了。我们又进入了我开始见到过的那两位老人的房间里，现在这里已经空无一

人，通过那扇还一直开着的门，我看到花园里如水的月光。“到外面去，”我自言自语，“夜是温暖而明亮的，我可以继续行进，或者也可以在露天里过夜。在这里跟着孩子们跑真没意思。”可是我还在继续地跑，我还有帽子、手杖和旅行包放在楼上的地上哩。可是孩子们是怎么跑的呀！就像我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他们蹦跑了两下，飘动的衬衣就飞过了那间月光照耀的房间，我突然想起，我的的确确该感谢这座房子里缺少待客热情，因而我将孩子们惊醒了，在这座房子里转着圈子跑，自己不去睡觉，而搞得整座房子都在响（孩子光脚的脚步声在我沉重的靴子声里几乎是听不到的），甚至还不知道，作为这一切的后果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突然出现灯光。在我们前面开着的房间里，有几扇窗户大大地开着，在一张桌旁坐着一位娇柔的妇人，她正在旁边一盏大落地灯的灯光下写着东西。“孩子们！”她惊异地叫起来，她还没有看见我，我站在门前的阴影里。孩子们将狗放到桌上，他们大概很喜欢这位夫人，他们不停地想办法看到她的眼睛，一个小姑娘抓住她的手，并抚摩着她，她任她去抚摩，几乎没加注意。那只狗立在她面前的刚刚她在写着什么的信纸上，并朝她伸出颤动的小舌头，这小舌头就在灯罩的前面，我看得很清楚。孩子们正请求留下来，想用甜言蜜语获得这位夫人的同意。夫人没做决定，站起身来，伸了伸手臂，指了指一张桌子和坚硬的地上。孩子们有点儿不满意，试着躺在他们刚刚站立过的地面上；一瞬间，一切都静悄悄的了。这位夫人双手交叉在腹前，微笑地看着地上的孩子们。不时地有一个孩子抬起脑袋，当他看到别的孩子也躺着的时候，他就又躺了下去了。

孙龙生 译

回忆卡尔达铁路[9]

在我的生命中有一段时间——距今已有四年了——我在俄罗斯内地的一段不长的铁道上有过一个职务。我还从来没有在那样孤零零的地方待过。出于各种与此不相关的原因，我那个时候正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越使我感到荒僻，对我来说就越觉得可爱，就是现在我也无怨无悔。在最初的时间里，我只是缺少忙碌。

这小段铁路一开始大概是出于某种经济的目的而铺设的，但是资本

不足，建筑停顿下来，暂时不能通往离我们这里驱车要五个白天路程的下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卡尔达，这段铁路正好在一个荒僻地带的小居民区停住了，从这个地方还需要整整一天的路程才能到达卡尔达。这段铁路当然最终要延伸到卡尔达，但时间却是难以估计，如今也只好无利可获地躺在那里了，因为它的全盘计划完全不适用，乡村需要公路，而不是铁路，现在这段铁路还存在着，其实有没有它完全无所谓，每天来去的两趟列车装载着轻便车就可以运输货物，旅客嘛，也只是夏天里的几个农业工人。但有人并不想让这段铁路完全停下来，因为他们总希望通过这段铁路的运营为扩建吸引资本。以我看来，这种希望并不是那种很有希望的希望，还不如说是绝望和懒惰。只要手头还有物资和煤，这段铁路就运行着，几个工人得到的工资既没规律，而且还在减少，好像那是他们得到的恩赐，主管人是不是在等待着彻底的崩溃。

我被录用在这段铁路上，住在一间木头棚屋里，这座木屋还是在建筑这段铁路时留下的，它同时还兼作车站房子用。木屋里只有一个房间，里面为我放了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可能为了写字用的。桌子上方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当我春天到这里的时候，一趟列车很早就经过了 this 站——不久就改变了——而且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某一位乘客来到本站，而我正在睡觉。这位乘客自然不会待在露天里——直到夏季的中期这里的夜还是很凉的——而是来敲门。我拨开门问，我们常常是用聊天来度过整个的时间。我坐在木板床上，我的客人蹲在地上，或者我让他泡茶，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友善的默契中同饮。所有这些农村的人都是非常容易相处的。此外，我发现，我并不很适应忍受这种完全的孤独，但同时我也不得不跟自己说，我强加给自己的这种孤独，在不长的时间之后已经开始驱散了过去的烦恼。我特别感觉到，这是一种对不幸的巨大的考验力量，它能持续地控制一个处在孤寂中的人。孤独比任何一切都更有力，并驱使一个人再次回到人群中去。当然人们又会试图寻找另外的、表面上少些痛苦的、实际上还是完全陌生的道路。

我在那里结识的人比我想象的还多。自然不是有规律的来往。我涉及五个村子中，每个村子不单单是距离本站，就是距离别的村子，也是几个小时的路程。让我离开车站太远我还真没有那个胆子，如果我不想丢掉这个职务的话，至少在这里的最初的时间里我也完全不想这么干。我也不能亲自去这些村子，只有依赖旅客或不在乎走远路的人代我去作拜访了。在第一个月里，这些人就已经过来了，但不管他们怎么友好，还是能让人容易看出来，他们的到来，大约只是为和我做买卖，再

说，他们也完全不隐瞒他们的目的。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货物，一般在我有钱的情况下，我先是几乎不加考虑，什么都买，这些人，特别是那几个人，极受我的欢迎。后来我当然限制了这样购买的做法，此外，还因为我认为我发现了我的这种购买方法在他们看来是浅薄的。除此而外，我还从火车上得到生活必需品，不过这些物品很不好，而且比农民带来的东西贵得多。

我本来打算开辟一座小花园，买一头奶牛，用这种做法来尽量使自己不依赖大家。我也带来了开辟花园的工具和种子，这里的土地极多，未经耕耘的土地非常平坦地延伸在我木屋的四周，极目所至，没有一点儿高凸的地面。可是我身体太弱，没有能力去平整这些土地。那是一处难以垦凿的土地，到了春天地面还冻结得板板实实的，即使我用那把新的锐利的锄头也凿不下去，我又怎么在这块土地里下种呢，这是毫无希望的了。我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多次感到失望。我整日躺在木板床上，甚至连列车开来了，我也不出去。我只是将脑袋伸出正好在木板床上方的小窗外，表示我病了。后来由三个男子组成的列车工作人员进到我屋里想取点暖，但他们并没有找到许多暖热，因为我尽可能避免用旧的、容易发生爆炸的铁炉子。我宁愿裹着一件旧的、暖和的大衣躺着，并用各种各样的毛皮盖在上面，这些毛皮也是我先后从农民那里买来的。“你常常生病，”他们跟我说，“你是个病秧子。你再也不会从这里离开了。”他们说这个大约并不是让我悲哀，而是他们在努力地婉转地说出真情，如果那只要是可能的话。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双眼里发出奇特的直愣愣的目光。

一个月里一次，但总是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一位督察来这里检查我的备忘记事簿，从我这里拿走收进的钞票——但并不总是如此——付给我工资。他的来到总是在前一天由那些在前一站放他下车的人通知的。那些人认为这事先通知是他们能够向我表示的较大的善意，尽管我每天在一切方面不消说是井井有条的。对此倒是不必花什么力气。但是督察进到站里总是带着一种神情，好像他这一次一定要揭开我管理上的不善之处。他总是用膝盖撞开我木屋的门，同时凝视着我，几乎还没有打开我的记事簿，就找到了一个错误。我在他的眼面前再算一次向他证明，不是我而是他犯了一个错误，这就得要花去长长的时间。他对我的进款总是不满，然后他啪的一声合上记事簿，又是目光锐利地看着我。“我们一定要停掉这段铁路了。”他每次都这样说。“这样的事会来的。”我通常这么回答。

在完成修正之后，我们的关系有了改变。我总是准备了白酒，并尽可能地弄来某些精美的食品，我们在一起饮酒，他用还过得去的嗓子唱歌，但一唱总是两支歌，一支是悲哀的，开始是：“小孩子，你到哪里去，在森林里？”第二支歌是欢乐的，是这样开始的：“快活的年轻人，我属于你们！”——我得到我部分的工资，要是我能将他带到这样的情绪里。但只是在开始进行这样聊天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带有某种目的，不久我们就变得完全一致了，用污秽的语言谩骂主管部门，我便得到了他在我耳边悄声说出的有关他想为我获取职位的许诺，最终我们抱成一团，一起倒在了木板床上，我们的拥抱常常是10个小时也不分开。第二天他又作为我的上司离去。我站在列车前面，向他敬礼，他通常在登车的时候将身子转向我，并说道“噢；我可爱的朋友，一个月后我们又见面了。你知道，前途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还看见他用力转向我的肿胀的面孔，所有的部分，两面的面颊、鼻子、嘴唇，都在这张脸上突现出来。

这是这个月里绝无仅有的一次大变动，在这变动中，我可以走动了；还有一点儿白酒糊里糊涂地留下来了，当督察走了之后，我马上将它一饮而尽，在它咕噜咕噜地进入我的喉咙的时候，我还听到了列车离去的信号声。在这样的一夜之后，我渴得可怕；这就像在我的身体内有着第二个人，他从嘴巴里伸出脑袋和脖子，喊叫着要喝点什么。督察被照顾得很好，他在车上总是喝着带在身边应有尽有的饮料，而我只靠着残存的一点儿什么。

后来，我居然在这整整的一个月里什么也不饮用，我也不抽烟了，我干自己的工作，别的什么都不想做。就如已说过的一样，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但我做这些工作是彻底的。例如我的责任是每天在这个站一公里远近的轨道两边打扫卫生和检查情况。而我并不按规定，常常走得很远，走到正好不能看见这个站头那么远的地方。在晴朗的天气里，这距离还可能达到五公里左右，这里的土地完全是平坦的。要是我走到在我的眼前我的木棚在远处只是闪烁的影子那么远的地方时，我会由于眼睛的错觉而有时候看到许多黑点向着木屋移动。那是一大帮人，全是部队，有时候却是真的来了一个人，我便挥着锤子跑完这整整的一段长距离的路，回到木屋。

将近晚上，我工作完毕，最终回到我的木屋。在这段时间里一般来说没有人来看我，因为夜里走回到村子的路是很不安全的，这一带有各

种各样的流氓、恶棍出没，但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出没无常，常常走了又回来。我看见过那一帮子人，这个孤寂的车站吸引着他们，他们不是那么危险，但人们必须要认真地与他们周旋。

也就是这些人在这个长长的昏暗时辰里来骚扰我。否则的话，我就躺在木板床上，不想过去，不想铁路，也不想下一趟列车要在晚上10到11点之间经过本站，简而言之，我什么也不想。有时候我看一份旧报纸，那是火车上有人扔给我的，这里也许有令我感兴趣的来自卡尔达的丑闻故事，但孤立地从某些日期的报纸来看，我就不可能理解这些故事了。除此而外，在每一份报纸上都有一部小说的连载，这部小说叫：

《指挥官的复仇》。我有一次梦见了这位指挥官，他身边总是带着一把匕首，在某种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他甚至将匕首置于牙齿之间。其余的内容，我就不去多读了，因为天色马上就黑下来，煤油和蜡烛都贵得令人难以支付。我一个月从铁路当局那里只得到半公升的煤油，这个月还没过完，这煤油早已经在晚上为列车燃点半个小时的信号灯而用完。可是这种灯也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后来我在有月光的夜里就不再去点燃这盏信号灯了。我正确地预计到，夏天过后煤油会是很急需的，因此我在木屋里的一个角落挖了一个槽，在槽里放了一个用沥青将缝隙涂塞好的小啤酒桶，将每个月节省下来的煤油倒进去。然后全部用稻草盖好，谁也看不出里面有什么东西。木棚里的煤油味越浓，我越觉得满意；因为那是一只用旧了的有裂纹的木板做成的桶，它吸饱了煤油，所以发出如此浓烈的煤油气味。后来，我将这只桶小心翼翼地挖出木屋，因为督察有一次在我面前拿着一盒蜡制火柴，当我想要的时候，他将这盒火柴一根接一根地点着抛向空中。我们两个人，还有煤油，都处在万分的危险之中，我掐住他的脖子，直到他放下所有的火柴，我总算挽救了一切。

我在空闲的时间里常常考虑冬天里怎么照管自己。如果我现在在这温暖的季节里就已经感到寒冷——如这里人说的，现在天气比许多年前温暖多了——那到了冬天对我来说会非常糟糕的。我攒积煤油只是一种心境，我其实真该理智地为冬天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社会不会特别地关注我，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太无忧无虑了，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不是无忧无虑，但我太少重视自己，以致我肯定不想在这方面做出许多努力。现在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我还过得去，便任其保持原样，并不想再继续干些什么事情。

把我带至这个车站的诱惑之一，曾是狩猎的旷野风光。有人跟我说过，这里是一个特别的蛮荒所在，而且我已经为自己弄到一支枪，如果我积蓄了一点钱，我想就将那支枪转寄过来。现在看来，这里并没有狩猎野兽的痕迹，只有狼和熊可能会在这里出没，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既没看见狼，也没看到熊，除此而外，这里倒是有奇特的大老鼠，这个，我却是马上能观察到，它们是如何地成群结队，就像随风而来，穿越过这里的草原。但我为之兴奋的野兽却是没有。这里的人并没跟我说错，野兽出没的地方是有，只是离这里有三天的旅程——我没有想到，在这一百多公里远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上的情况会是不可靠的。不管怎么说，我暂时还不需要那枝枪，便可以将这些钱用在别的方面。为了冬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筹措一支枪，我为此按时将钱放在一边。对于有时候侵袭我的食物的大老鼠，我那把长刀就足够了。

在开始的时候，我对一切还是新奇的，我有一次戳住了一只这样的大老鼠，将它放在我面前齐眼高度的墙上。要是你将它置于齐眼的高度，你就会仔细地看到这只小动物；要是你弯着身子朝地上去看它，你得到的有关它们的想象便会是错误的，不完全的。这些老鼠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爪子，爪子大而稍有点陷进去，最末端是尖的，它们很适合在墓穴里生活。置于我面前墙上的老鼠在发颤，在这最后的颤抖中，它一反活泼的本性，绷紧了爪子，爪子像是一只小手，在向着一个人伸去。

一般来说，这种小动物很少令我烦恼，只是在夜里，它们有时将我吵醒，那是因为它们在坚硬的地上跑动的时候发出咻咻声，然后穿过木屋，这时，我便坐起身来，可能点上一支小蜡烛，这样，我能看见某个地方的木柱下的一个小洞中，一只老鼠从外部伸进去的爪子正拼命工作着哩。这种工作完全是无效的，因为它要为自己挖一个足够大的洞，必须要干上一整夜，而一当天色稍有点亮的时候，它就逃之夭夭了，尽管它工作得像一个知道自己目的的工人。它努力地工作，虽然有未注意到的微粒在它的洞穴下飞起，但没有成绩的话，它大概永远不会动用那爪子的。我常常在夜里凝神注视，直至在注视中产生的规律和寂静让我困倦。后来我连吹熄蜡烛的力气都没有了，烛光便继续照着那只在工作的老鼠。

有一次在一个温暖的春夜里，当我又一次听见这个爪子的工作的时候，我小心地、摸黑地走出，想亲自去看看这动物。它把带有尖嘴的头

部深深地垂着，几乎伸在两个前腿之间；只是为尽可能地紧紧挨近木头，并尽可能深地将爪子伸到木头下面。人们也许可以相信，谁要在木屋里死死地抓住爪子，并欲将它整个身子拽出，那儿，这一切都是要非常聚精会神的。这一切也可一下子解决，即将这小动物打死。在完全清醒的时候，我是不能容忍我唯一占有的木屋遭到袭击。

为对付老鼠保住木屋，我用稻草和麻絮填塞了所有的洞穴，每天早晨向地面审视一圈。我也曾想将木屋里至今还是用脚踩实了的泥土地的地面铺上木板，这对冬天来说也可能有好处。最近的村子里的一位农民，名叫叶考茨，他早已答应为我带来好看的烘干的木板，我也常常为这允诺而招待他。他也从来不是过好长时间才来，而是每隔两个星期来一次，有时还托列车上人送来包裹，但却是没把木板带来。他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托辞，最多的是他本人年纪太大了，不能拖拽这么重的东西，他的儿子将会把这些木板带来，但现在他儿子正忙着农活。按他的说法，叶考茨如今看上去也是那么个样子，已经远远超过七十岁了，但还是一位身材高大、体格颇壮的男子。除此而外，他还改变托辞，有一次他谈到要弄像我需要的那么长的木板有不少困难。我并不催逼他，我并不需要这些木板，本来也是叶考茨自己让我有铺地板这个想法的，大概这种铺设也并没有什么好处，一句话，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倾听这个老头的谎言。我与他见面的致意用语总是：“啊，木板，叶考茨！”他马上使用半是喃喃的言语开始了抱歉的话语，我叫他督察、上尉或电报员，他不只答应我下一次带来木板，而且要他儿子和几个邻居来帮忙将我的整个木屋摧毁，代之建成一座坚固的房子。我聆听得那么久，直到我感到疲倦并将他推出去为止。但为了取得原谅，他在刚走到门口的时候，便举起看上去好像是虚弱的手臂，其实他完全可以用这双手臂压死一个成年男子。我知道，他为什么不拿来木板，他是在想，如果冬天临近，我会急需木板，到时价钱就高多了，此外，只要木板没拿来，他本人对我来说就会有较大的价值。他当然不是笨蛋，并知道我看出了他内心的想法，但在这里面，我看出来了又有何益，他看到了他的优势，他保持住这样的优势。

我——我服务工作的第一个季节将近结束之际——真的生病的时候，我为木屋对付那些小动物和保护自己过冬所做的一切准备不得不停了下来。我至今有一年长的时间没有生过任何病，哪怕是最轻微的不舒适感也没有过，这一次我却病了。开始表现为一种厉害的咳嗽。从车站向内走大约两个小时距离的地方有一条小溪，我总是从这里打上一桶水

装上手推车运回，作为我的储备用水。我还常常在这里洗澡，咳嗽就从这里得的。染上的咳嗽极为厉害，我在咳嗽的时候都必须佝偻着身子，我相信，我如果不佝偻着身体，拿出所有的力量来，我会敌不住这咳嗽的。我想，列车上的人员会对这种咳嗽大吃一惊的，但他们清楚这种咳嗽，他们称它为狼咳。自此之后，我开始从这咳嗽里听出了狼的嚎叫。我坐在木屋前的小凳子上，狼嚎般地迎接列车，又狼嚎般地等着列车离去。夜里，我不是躺着而是跪在木板床上，将面孔挤压在皮毛里，至少让自己听不到狼嚎之声。我紧张地等待着，直到任何一根重要的血管爆裂而结束一切。但这样的事情怎么也没发生，甚而至于没过多少天，咳嗽便不见了，那是一种茶医好了这种咳嗽，那位火车司机答应给我带这种茶来，但他向我解释，我必须在咳嗽开始后第八天才饮用这种茶，否则它就没有效。第八天他真的带来了这种茶，据我回忆，好像除了列车人员，还有乘客，两个年轻农民，来到我的木屋，因为在喝茶之后听到第一声咳嗽就会出现好的预兆。我才喝第一口茶，竟抑制不住地咳到了在场人的脸上，但然后真的马上就感到轻松，在后来的两天里这种咳嗽虽然已经减弱些了，但留下了发烧，而且不退。

这发烧使我十分疲倦。我失去了所有的抵抗力。还不时地发生这些情况，即在我的额头上完全突然地出汗，我全身颤抖，倒在了我所在的地方，直等到知觉再恢复过来，我感觉很清楚，我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坏了，对我来说很有必要乘车去卡尔达，我要在那里住些日子，直到我情况有所好转。

孙龙生 译

乡村教师（巨鼯）[\[10\]](#)

那些像我这样见了一只普普通通的小鼯鼠都感到讨厌的人，倘若见到那只大鼯鼠，一定会厌恶致死的。几年前曾有人在一个小村子的附近见到过那只大鼯鼠，而那个小村子也就因此一度出了名。现在那个村子当然早已又为人们所遗忘，和那整个现象一样湮没无闻了。那个现象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而人们也没有怎么费劲去搞清楚它。当初那些本应过问这件事的人却令人不解地疏忽了它，没有人比较透彻地研究过它，因此它也就被人们忘却了。可是，那些人对无足轻重得多的事情倒是非常操心的。那个村子离铁路线很远，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们可以疏忽的理由。许多人出于好奇心远道而来，甚至从外国来到这里，而那些

不只应该有好奇心的人反倒不来。是啊，要不是个别的普通老百姓，即那些忙于日常工作而没有喘息机会的人，要不是那些人无私地关心这件事情的话，有关那个现象的传闻很可能就不会传播开去。必须承认，大凡传闻，平常几乎是不胫而走的，这一次简直是凝滞不动了，若不是人们使劲推动了一下，它是不会传播开来的。但是这肯定也不是不去探索这件事情的理由，相反，恰恰是这个现象不也需要加以研究吗？可是人们不去研究它，却让那位上了年纪的乡村教师写了仅有的那么一篇论述那件事情的文章，那位乡村教师固然是个很称职的人，但毕竟学识有限，根基浅薄，无法对那个现象做出彻底而又适当的描述，更不用说提供说明了。那篇小文章印了出来，大批出售给了当初来参观那个村子的人，并且获得了某些好评，但是那位教员心中有数，他知道自己在没有得到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星半点的努力终究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说他仍然不放松努力，并把这件按其性质看一年比一年更难有结果的工作当做他毕生的事业，那么，这一方面证明了那个现象产生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一个不起眼的乡村老教师是多么有毅力，多么忠实于他的信念。但是他却曾遭到过权威人士的非难。他给自己的那篇文章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增补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当然，那个增补是几年以后才做的，那时候几乎谁也记不得文中涉及的事情的始末根由了。在那个增补里，乡村教师也许不是用巧妙的言词，而是用诚实的态度，令人信服地控诉了他在那些最不应该不明事理的人身上所见到的那种懵懂无知。他一语中的地数落那些人道：“不是我，而是他们说像乡村老教师。”他曾专程登门拜访过一位学者，在增补中他援引了那位学者的话。他没有写明那位学者的姓名，但有种种蛛丝马迹，让别人能猜得着那位学者是谁。几个星期前教师就提出要拜会那位学者，并克服了很大的困难，总算可以同那位学者见面了。可是刚一见面他就发现，在他这件事情上，学者囿于一种无法克服的成见。乡村教师按照文章的内容提要作长篇报告，可是，那位学者听的时候却是那么心不在焉。这表现在他假装思索片刻后所说的那番话里：“您那个地方，泥土黑油油的特别肥。嗯，所以那泥土也就给鼯鼠提供了特别丰富的养料，于是鼯鼠就长得出奇的大。”“但总不至于有这么大呀！”教师大声说道，一边用手在墙上比划了两米长；他出于愤慨未免有点儿夸张。“哦，有这么大呀！”学者答道，显然他觉得这件事整个儿都非常滑稽。教师带回家去的就是这样一个答复。他讲到，晚上他的妻子以及六个孩子怎样冒着雪在公路上等候他，他怎样不得不向他们承认，他的希望已经彻底成了泡影。

我读到有关学者对教师的态度的消息时，还根本没有读过教师的那篇主要文章。但是我马上决定自己动手去收集、整理我能查明的有关那件事情的全部资料。我不能拿拳头去威吓那个学者，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文章为教师辩护吧，说得更确切些，我将不过分强调教师是一个正直的人，但要突出教师是个无权无势的人，怀着善良的意愿。我承认，后来我为这个决定而后悔了，因为随后不久我便感觉到，实施这个决定必然会使我陷入一种特殊的境地。一方面，我的影响力也不大，远不足以促使学者改变看法，甚或扭转公众舆论，使之有利于教师。而另一方面，教师准保会看出，我关心的不是他的那个主要的意图，即证实那只大鼯鼠确曾出现过，我关心的是为他的正直的品性辩护，而他却又觉得，他为人正直，这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任何辩护。到头来，我这个本想声援教师的人便会为他所不解，很可能非但帮不了他的忙，自己反倒需要一个新的帮助者，而这样的帮助者多半是不会有。此外，我下的这个决心，是自告奋勇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我要让人心服口服，那我就不能援引教师的文章，因为教师本人都未能让人信服嘛。他那篇文章只会使我受到迷惑，所以在我自己的文章未完成以前我避免去读它。甚至，我连一次招呼都没跟教师打过。不过，通过中间人他对我所从事的研究也有所耳闻，可是他不知道，我是在顺着他的思路干还是在和他对着干。是啊，他甚至多半还以为是后者呢，尽管后来他矢口否认，我却有证据，证明他曾给我设置过种种障碍。他设置起障碍来很容易，因为我是被迫去重复他已经进行过的研究，因此他总是可以先我一着。不过，这却是对我的研究方法所能做出的唯一公正的指责了，而且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指责。但是，由于我立论严谨，敢于自我否认，那种指责也就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了。除此以外，我的文章却没有受到过教师的任何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也许甚至过于吹毛求疵，简直就好像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件事情似的，似乎我是第一个听目击者作证的人，是第一个整理那些材料的人，是第一个从中得出结论来的人。后来我在读教师的那篇文章时——那文章的标题很冗长：《一只鼯鼠，其身体之大，前所未见》——我果真发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尽管我们两人都自以为已经证明了那件主要的事情，即证明了那只鼯鼠的存在。不管怎么说，因为那些意见分歧，我未能建立起我曾竭力希望建立的那种同教师的友好关系。从他那方面几乎产生了某种敌意。他虽然始终对我谦逊而恭顺，但是人们却可以越发明显地觉察出他的真实的心情。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完全损害了他和那件事情的利益，我自以为帮了他的忙或者可能帮了他的忙，这说得好听点是天真，其实多半还是自

负或诡计呢。尤其是，他不时地指出，迄今为止他所有的反对者不是根本不表示反对就是仅仅在私下或者至少也只是在口头上表示反对，而我竟认为有必要将我全部的反反对意见立刻付印。此外，那些尽管只是粗略地、但却是真正研究过那件事情的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们倒是起码要先听听他的，也就是教师的意见，即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我却从毫无系统地收集起来的、部分是以讹传讹的资料里引出了结论，这些结论即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必然是既不能令民众信服，也不能令有教养的人信服。可是，在这方面，只要有那么一点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就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虽然他的这种指责遮遮掩掩，但我很容易就能对此做出答复——譬如我可以说，他的那篇文章才是不可靠到了顶点，但要消除他在其他方面提出的怀疑，这就不容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般对他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这就是说，他在心底里认为，我是想毁坏他的名誉，使他当不成第一个公开宣布存在大鼯鼠的人。现在就他个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人家只觉得他可笑罢了，而且觉得这种可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当然是不想去争当那种可笑的人。可是另外我曾在我那篇文章的序言里明确宣称过，任何时候教师都应该被认为是那只鼯鼠的发现者——其实他才不是那个发现鼯鼠的人呢——我还声明，只是那种对教师命运的同情心理才促使我撰写了那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我就是这样过于激昂慷慨地结束我的文章的，但这符合我当时的激动心情——“设法使教师的文章得到应有的传播。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我的名字便应该立刻从这件事情中抹掉，因为我只是短暂地、而且仅仅表面地被卷入到这件事情中去的。”所以说，我是直截了当地拒绝更多地参与此事的；仿佛我有什么本事，预先料到了教师的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责难似的。尽管如此，他却恰巧在这段文字里找到了非难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说的话里，说得更确切一点，在他所作的暗示里，似乎有那么一点根据，这是我好几次都已经注意到了的。我也不否认，在有些方面他对我比在他的文章里表现出了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声称，我的序言是口是心非。如果我果真旨在传播他的文章，那我为什么不一心一意去研究他和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不指出那篇文章的长处，即它的雄辩的说服力？为什么我不局限于强调指出这个发现的意义并加以阐述？为什么我完全置那篇文章于不顾，硬是自己要去发现什么新东西？不是都已经发现过了吗？难道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需要发现的吗？可是如果我果真以为必须再作一次发现，那么为什么我在序言里那么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曾作过什么发现呢？本来把这说成是假谦虚也就可以了，可是不行，

这件事性质更为恶劣。他说我贬低这一发现，我让人注意它，目的只是为了贬低它，我研究过它以后便将它搁在一边了。围绕着这件事的纷争也许已经稍稍平静一点了，如今我又在兴风作浪，但同时使教师的处境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为他正直的品性辩护，这对教师有什么意义呢！他关心的是那件事情，仅仅是那件事情而已。可是那件事情却让我给出卖了，因为我不理解它，因为我对它估计得不对，因为我不懂得它。它远远超出我的理解力。他坐在我面前望着我，那张年老有皱纹的脸上现出安详的神色，然而只有上述那些意见才是他的真实想法。不过，说他只关心那件事情，这不对，他甚至相当贪图虚荣而且也想捞钱。考虑到他家里人口众多，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他觉得我对那件事情相对来说兴趣极其微小，因此他相信，他不用说什么过分离奇的假话便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毫无私心的人。果不其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人的这些指责根本上只能归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双手紧紧抱住他那只鼯鼠，将每一个只是伸着手指头想接近他的人都说成是叛徒，我这么想的时候，内心一点自我满足的感觉也没有。不是那么回事，他的态度不是用吝啬，至少不是单单用吝啬所能解释得了的，倒不如说那是一种愤慨，是他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那些努力的毫无成效在他心中激起的那种愤慨。但是也不能一切都用愤慨来解释。也许我对这件事情的兴趣确实太小了。一般人不感兴趣，对此教员已经习以为常，一般来说他对此是感到难过的，但已不再事事都往心里去了。但这里却终于出现了一个用不寻常的方式关心这件事的人，而居然连这个人也不了解那件事。这一点我根本就不想否认，我这是赶鸭子上架的嘛。我不是动物学家，如果是我自己发现了那只鼯鼠，那么也许我会从内心深处感到振奋，可是那只鼯鼠不是我发现的。一只那么大的鼯鼠肯定是件稀罕事，不过人们也不能要求全世界的人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更何况鼯鼠的存在未曾用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过，人们无法把那只鼯鼠拿出来给人看。我也承认，即使我是那个发现鼯鼠的人，我也决不会像我这样心甘情愿为教师效劳似地去为那只鼯鼠奔走呼喊的。

假如我的文章取得成功，那么我和教师之间的不一致可能很快就消除了。但是文章偏偏又没有获得成功。也许文章写得不够好，说服力不够，我是个商人，撰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力不从心，比教师写一篇文章还感到吃力，尽管就掌握这个领域全部必要的知识而言我远比教师强。对于文章的不成功也还可以另做解释，也许文章发表的时机不利。发现那只鼯鼠这件事，当时都未能引起广泛的重视，如今这件事一方面时间还不算离得太远，人们还不至于完全忘记，所以也不会对我的文章感到

十分惊异，可是另一方面，时间却又隔得够久的了，原先曾有过的那种淡漠的兴趣已经全然消失了。那些压根儿就对我的文章感到担心的人，怀着几年前就曾支配过这场讨论的那种绝望心情，心想现在大概又该开始为这样枯燥乏味的事情枉费唇舌了，而有些人甚至把我的文章误看成是教师的文章。在一份有分量的农业杂志上登了如下一段话，幸而这一段话登在杂志的末尾并且是小号字刊印的：“又给我们寄来了关于那只大鼯鼠的那篇文章。我们记得，几年前我们就曾对它捧腹大笑过。自那以后，文章的作者没有变聪明，我们也没有变愚蠢。不过要我们第二回笑，我们可是笑不出来了。我们倒是要问一问我们的教师联合会，一个乡村教师除了追求大鼯鼠以外，是否就没有更有益的事可做的了。”一场不可原谅的误会！人们既没有读过那第一篇，也没有读过这第二篇文章，那些先生们只是匆忙间偶然看到大鼯鼠和乡村教师这两个可怜巴巴的词儿，便站出来俨然以公众利益代表的身份讲话了。按理说，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完全可以办好的，但是由于和教师互相缺乏了解，我竟没有办成。我反而试图尽量对他隐瞒那份杂志的事。但是那件事他很快就发现了，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在圣诞节期间来看望我，我从那封信的一段话里就看出了苗头。信中他写道：“世界上的人品质恶劣，而有人却在推波助澜。”他的意思是说，我属于这个品质恶劣的世界，但是我不安于我身上固有的恶劣品质，竟还去给这个世界推波助澜，这就是说，从事活动，把那种普遍的恶劣品质诱发出来，使其得逞于一时。好吧，既然已经做出了必要的决定，现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等待，心平气和地看着他怎样到来，看他怎样比平素更不讲礼貌地默不做声地坐在我的对面，小心翼翼地从他那件古里古怪的棉袄的胸袋里掏出那份杂志，并把它翻开，推到我面前。“我读过了。”我说，一边将那份杂志原封未动推了回去。“您读过了！”他叹口气说道，他有教师的重复别人答话的这个老习惯。“我当然不会甘愿忍受这种事情的。”他继续说道，愤激地用指头敲敲那份杂志，一边直愣愣地望着我，仿佛我持着相反的意见似的；我想说什么话，对此他大概有所预感；我以为，没有他这话，从其他的迹象上我也一样会看出，他对我的意图常常有一种非常正确的感觉，但不对它让步、不受它迷惑。当时我对他说的话，现在我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复述出来，因为谈话完毕后我曾马上把谈话内容记了下来。“您请便吧，”我说，“从今天起我们分道扬镳。我相信，对此您既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感到不合时宜。眼前这份杂志上的这段评论不是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它只不过是最终坚定了我的这个决心罢了；真正的原因在于，我本来以为我出面会对您有利，可是现在我认识到我在各方面都

使您受到了损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我不知道，对于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总是可以作多种解释的，不要只寻找那些于我不利的解释。想想您自己吧，把这件事情通盘地细细观察一下，您也是怀着一片好心，但却遭到了失败。这话我不是说着玩的，我说可惜您与我的联系也可算是您的一个失败，我这话是针对我自己说的。我现在退出这件事，这既不是怯懦也不是背叛。甚至可以说，这样做不是没有内心斗争的；我非常尊敬您的人格，这从我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某些方面您已经成为了我的教师，我都快要喜欢上那只鼯鼠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往旁边靠靠，您是发现者嘛，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是在妨碍您获得可能获得的荣誉，我在吸引失败并将失败转嫁到您的身上。至少您是这样认为的吧。够啦。我可以接受的唯一处罚，就是我请求您原谅，我在这里向您做的这一番自白，我也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譬如说在这份杂志上再做一遍，如果您要求这样做的话。”

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这些话并不十分诚恳，但是别人却不难从中听出诚恳的心意来。我的这个声明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与我所预料的大致相同。大凡老年长者对小辈们来说性格上都有某种迷惑性、欺骗性，别人在他们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以为彼此的关系毫无问题，别人也了解那些盛行的意见，并且一再得到证实，这种平和的关系是可靠的，认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突然间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事件而那长期存在的平静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些年老长者却像陌生人一样挺身而出，他们持有更加深邃、更加强烈的意见，现在才算正式亮出了他们的旗帜，于是人们怀着惊恐在那旗帜上读到了新的至理名言。这种惊恐主要由于老人现在所说的话确实合理得多，意义更加深远，更加合乎情理，仿佛其不言而喻的程度会增长似的。在这件事情上的极大的欺骗性恰恰在于，从根本上看来，他们现在所说的话正是他们以前一向所说的，而且一般人事先还就是料想不到会是这样。我十之八九已经把他的性情脾气摸透了，所以他现在说的话并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孩子，”他说，一边将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友好地搓着，“您怎么会想到要去参与这件事情的呢？——我头一次听说这件事，马上就和我的妻子谈了。”他挪动椅子，坐得离开桌子一点，张开双臂，眼睛望着地上，就好像他的妻子身材十分矮小，在那下面站着，他正在和她说活似的。“‘这么多年了’，我对她说道，‘我们都是孤军作战，可是现在城里似乎有一个有地位的赞助者在为我们辩护，城里的一个名叫某某的商人。现在我们该感到非常高兴了吧，嗯？城里的一个商人非同一般；如果是一个卑微的农民相信我们，说出他的看法，这对我们不会有什么用处

的，因为农民干的事总是不正派不体面的，农民说乡村老教师说得对也罢，农民不合体统地啐一口也罢，二者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如果不是一个而是一万个农民站出来说话，那么，效果可能更坏。城里的一个商人则不然，这样的一个人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即使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的话，也会广为流传，新的赞助者便会来关心这件事，譬如有一人会说：我们也可以向乡村教师学习的嘛，第二天就会有一大批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开了，看那些人的外表，决计料想不到他们会这样的。现在有了资助这件事的资金了，一个人筹款，别人把钱交到他手里，人们认为，必须把乡村教师从村里请出来。他们来了，并不计较我的相貌，把我接走，由于妻子和孩子们舍不得我，人家便把他们也一同接走了，你观察过城里人吗？不停地叽叽喳喳。如果他们在一起排成一行，这叽叽喳喳声便从右到左，从左到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就这样，他们叽叽喳喳地将我们抬上马车，他们简直连向我们大家点点头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坐在车夫座上的那位先生扶了扶夹鼻眼镜，挥动马鞭，我们便乘车走了。大家向那村子挥手告别，那样子就好像我们还在那儿，就好像我们不是坐在他们中间似的。从城里有几辆马车向我们迎面驶来，车上的人心情特别焦急。当我们相互靠近的时候，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伸长脖子，想看我们。那个筹款的人总管一切，提醒大家保持冷静。我们进城的时候，已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了。我们曾以为欢迎仪式已经过去，却不料到了旅馆前面欢迎仪式才刚刚开始。在城里，一人振臂高呼，响应者顿时云集。一人有了忧愁，众人立刻前来相帮。他们互相商量，互相取长补短。并非所有这些人都能乘马车，他们等候在旅馆前面，另外有些人虽然本来是可以乘马车的，但是他们自觉不乘。这些人也在等候。真是不可思议，那个筹款的人多么有魄力。”

我平心静气地听他说话；是的，在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内心变得越来越平静。我把所有我还拥有的我那篇文章的文本堆在桌上。只缺了很少几本，大多数文本我都收到了。顺便提一下，许多方面的人士彬彬有礼地给我来信说，他们完全记不得曾收到过这样一篇文章，万一果真曾寄来过，那么很遗憾，他们准是把它给弄丢了。这样倒也好，归根到底，我图的也不是别的嘛。只有一个人请求我允许他把那篇文章当作稀世珍品留在自己身边，保证遵照我信中的意愿，在今后二十年内不给任何人看。那封信乡村教师根本还没有见过。我感到高兴，有他这一席话，我便可以无所挂虑地把信给他看了。不过，即使没有他这一席话，我也大可不必为此担忧，因为我在信中措辞十分谨慎，丝毫没有忽视乡村教师以及那件事情的利益。信中几句关键的话是这样写的：“我请求收

回那篇文章，并不是因为我放弃我在该文中陈述的意见或者也许认为其中有些看法错误或者哪怕只是认为那些看法无法加以证明。我的请求有着仅仅是个人的、然而却是无可辩驳的理由；可是我的这个请求决不能说明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特请注意这一点，有便的话，也请将此意代为传播。”

我眼下还用双手捂住了那封信，说道：“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您就要责怪我吗？您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我们不要互相怀着怨恨分手。要看到，您虽然作了一个发现，但是这个发现并不是盖世无双的，因此您所遭的不公正的对待也并不是无与比拟的。我不了解学术界的章程，但是我相信，即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您也不会受到哪怕只是稍稍近似于您向您那位可怜的妻子所描述的那种接待。如果说我期望这篇文章会有什么效果的话，那么我是以为，也许有一个教授会注意我们，他会委托某一个年轻大学生去调查那件事，这位大学生会去找您并用他自己的方法复查一遍您和我所做的调查结果，末了他会，如果他觉得复查结果值得一提的话——这里应该指出，所有的年轻大学生都疑心很重——那么他就会自己写出一篇文章，对您所写过的内容进行科学论述。然而，即便实现了这个希望，也还是没有取得大成绩。大学生的那篇文章，为这样一件奇特的事件作了辩护，也许因此就会遭到大家的嘲笑。您从这份农业杂志的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出，这种事很容易发生，而且科学杂志在这方面更显得无情。这也可以理解，教授们对自己、对科学、对后世肩负着重大责任，他们不能对每个新发现都欣喜若狂。我们这种人在这方面比他们优越。可是我现在不谈这些，我愿意设想，大学生的文章取得成功了。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人们也许会怀着尊敬几次提及您的名字，这多半也会有利于提高您的地位，人们会说：‘我们的乡村教师有眼力。’这儿这份杂志，如果有记忆力和良心的话，就得向您公开道歉，也就会有一个好心的教授设法给您弄到一份奖学金，人们也确实可能会试图调您进城，给您在一所市立国民小学安排一个工作，以便给您提供利用市里拥有的科学资料来进修的机会。但是如果我直言不讳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明，我以为，人们仅仅是试试看而已。人们把您召唤到这里来，您也来了，以一个普通申请者的身份，这样的申请者多着呢，不会有什么隆重的接待，人们和您交谈，赞赏您的真诚的努力，可是同时却也看到，您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在您这个年龄开始搞科学研究，是毫无希望的。人们看出，您与其说是按计划还不如说是偶然做出了您的那个发现，您根本无意于超出这个个别事件的范围以外去做什么进一步的研究。那么，出于这些原因，人们也许会让您留在村里。您的发现当

然会有人去继续加以研究的，因为您那个发现并不是那样微不足道，一经受到重视便不会轻易被人忘掉。但是您再也不会听到多少有关那个发现的情况了，您听到的，您几乎都理解不了。每一个新发现将立刻被纳入科学宝库的总体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不再是一种发现了，它便整个地升华了，消失了，人们得有一种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力才能将其辨认。有人会将一个新发现同一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原理联系在一起，在学术争论中，同这些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新发现又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我们怎么会理解这种事呢？譬如，我们在旁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以为是在讨论那个发现，而其实讨论的完全是别的事情，下一回我们以为是讨论别的事，不是讨论那个发现，可是讨论的却恰巧正是那个发现。

“您明白这个道理吗？您会留在村里，可以用您拿到的钱稍稍改善一下您家里的伙食和衣着，但是您的发现者的权利就会被剥夺，而且您还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进行反抗，因为那个发现是到了城里才发挥出真正的效力来的。人们也许决不会对您忘恩负义，人们大概会在做出那个发现的地方盖一个小小的纪念馆，它会成为村子里的一处名胜，您则是掌管钥匙的人，一如科学工业的仆人们惯于佩戴奖章，人们也会授给您一枚佩戴在胸前的小奖章，这样，您连荣誉勋章也有了。这一切都有可能；可是这一切是您所希望的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完全正确地反问道：“这么说，您曾力图为我谋求过这些东西的**啰**？”

“也许是的。”我说，“我当时采取的行动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所以现在我也无法明确地回答您。我想帮助您，但是事情失败了，甚至是我所干的事情中失败得最惨的一次，因此现在我想退出，并尽力设法把我所干的事情一笔勾销，就好像我从未插手过那样。”

“那么好吧。”乡村教师说道，一边掏出烟斗装上了一袋烟，他身上所有的衣袋里都装着烟叶子。“您自愿关心过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现在也是自愿退出。这一切都做得完全正确！”“我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我说，“您觉得我的建议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没有，一点也没有。”乡村教师说道，这时他的烟斗已经冒起烟来。我受不了他的烟叶的那股气味，便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以前的几次商谈中我已经习惯了乡村教师对我沉默寡言，他一旦来了便不想挪动身子离开我的房间。有时候这曾使我感到十分惊愕；他还想要点什么东西吧，我总是

这样以为，并且给他钱，而他通常也都接受。但是他总要待够了才走。通常是在抽完那袋烟以后，他便晃晃悠悠绕着圈手椅转，随后又规规矩矩、毕恭毕敬将那把圈手椅挪到桌子旁边，从墙角拿起他的那根结节拐杖，热烈地握握我的手，走了。可是今天，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我简直讨厌已极。如果一个人，如同我已经做过的那样，一旦向另一方表示了彻底分手的意向，而且对方认为这样完全正确，那么那个人就得尽快处理完那尚需共同解决的不多的事务，不要漫无目的一声不吭地坐在人家面前，惹人生厌。如果有人从背后看一眼这个固执的小老头儿，看他怎样坐在我的桌子旁边，他一定会认为简直没有任何办法把这个小老头从房间里弄走。

张荣昌 译

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年纪的单身汉^[11]

一天晚上，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岁的单身汉，上楼到他的寓所去。这可是一件辛苦事儿，因为他住在七层楼。他一边爬楼梯一边想——近来他经常如此——这种孤寂冷清的日子真难挨。现在他简直是偷偷摸摸地爬上这六层楼梯，爬到楼上他那几间空落落的房间里，在那儿又简直是偷偷摸摸地穿上睡衣，点上烟斗，稍稍翻阅一下那份他几年来一直放着的法国杂志，边看边饮一种他自己配制的樱桃酒。半个小时以后他终于上床睡觉，上床前还得重新把被子彻底铺过一遍，那个怎么教她也不改的女佣人总是随心所欲地把被子往床上一扔就算了事。如果随便有个什么人来做伴，来看看他的这些活动，布鲁姆费尔德一定会非常欢迎的。他曾经考虑过他要不要弄一只小狗来养养。这种动物惹人喜欢，尤其是它感恩图报而且忠实。布鲁姆费尔德的一个同事就有一只这样的狗，除了它的主人以外，它跟谁也不亲近，只要有一会儿工夫没看见它的主人，再见到他时它便会立刻大声汪汪叫着迎接他，显然它是以此来表示重新见到它的主人，这位特殊的恩人时的喜悦。养狗当然也有坏处。即使很注意让它保持清洁，它也会把房间弄脏。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不能每次带它进房间来以前都用热水给它洗澡，何况这于狗的健康也不利。而房间里不干净，布鲁姆费尔德又受不了，对他来说，房间的干净整洁是某种生活的必需，他每周都要跟在这一点上可惜不很讲究的女佣人争吵好几回。由于她耳背，他通常都是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到房间里他认为没有收拾干净的那些地方去。多亏这样严格地要求，他才使他的房间整理得接近于符合他的愿望。可是弄一只狗

来，这简直就等于于是自愿把迄今为止一直被小心翼翼地抵挡着的污秽引进他的房间里来。跳蚤，那些狗常有的伴侣，也会跟着来了。一旦有了跳蚤，那么，布鲁姆费尔德把他的那间舒适的房间让给那只狗、自己再另找一间的时刻也就不远了。而不干净只不过是狗的一个坏处。狗也会犯病，而且狗病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会瞧。狗一生病，便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或者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哀鸣，不断地轻咳，疼得喉咙哽噎，你用一条毯子裹住它，对它吹吹口哨，把牛奶罐推到它跟前，简单一句话，你一边照料它一边希望这是一场很快便会见好的小病，而且也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可实际上又往往是一种严重而可恶的传染病。即使那条狗一直没有病，那么将来有朝一日它会衰老，而你又未能拿定主意，及时把那条忠实的狗送掉，于是会有那么一天，你一看到那对泪汪汪的狗眼，便会顾影自怜，想到自己也老了。可是随后你便不得不同那只眼睛半瞎、肺部虚弱、因肥胖而行动迟钝的动物一道受罪，不得不为那只狗从前所带来的快乐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不管布鲁姆费尔德现在多么盼望有一只狗，他还是宁愿再独自一个人爬三十年的楼梯，也不愿意以后受这么一条老狗的连累，这条老狗喘气的声音会比他自己的还要粗，并在他的身边艰难地一级一级往上爬。

就这样，布鲁姆费尔德将继续过独身生活。他倒是没有老处女常有的那种欲望。老处女希望身边有一个隶属于自己的有生命的东西，她可以保护这个生命，她可以对这个生命表示温存，她愿意一直侍候这个生命，因此一只猫、一只金丝鸟或者几条金鱼便能满足她的欲望，使她如愿以偿。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侍弄侍弄窗前的花卉她们也会心满意足的。可是布鲁姆费尔德却只愿意要一个做伴的，一头动物，他用不着为这头动物操多少心，偶尔踢它一脚也没什么关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在胡同里过夜，可是如果布鲁姆费尔德想它了，它便会立刻又吠又跳，摇尾乞怜，过来听候使唤。布鲁姆费尔德要的就是这样的玩意儿。可是他看出，不蒙受巨大的损失他是养不了它的，所以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他旧习不改，不时地会转悠起这个念头来，今晚也是如此。

他来到楼上，站在他的房门口，从口袋里摸钥匙，这时房间里传出来一阵响声，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种古怪的吧嗒吧嗒的声音，不过很清晰，很有规则。由于布鲁姆费尔德刚才还想到过狗，因此这声响使他联想起狗的两个前爪轮流拍打地面所发出的那种响声。但前爪不会吧嗒吧嗒响的，那不是前爪。他急忙打开房门，扭开电灯。万没想到他看

到的竟是这样一副景象。这简直是变魔术，两个白底蓝条纹小赛璐珞球在镶木地板上交替地跳上跳下。一个球着地，另一个就在高处，它们不知疲倦地玩着这样的游戏。有一回中学做一次有名的电学实验时，布鲁姆费尔德曾看见一些小球类似这样地跳动，这可不是做电学实验。布鲁姆费尔德朝小球俯下身去，想把它们看个真切。毫无疑问，这是普普通通的球，多半球体内部还有几个更小的球，是它们发出了吧嗒吧嗒的声音。布鲁姆费尔德朝空中抓了一把，看看小球是否吊在什么线上，没有，它们完全是在独立运动。可惜，鲁姆费尔德不是小孩，否则看到两个这样的球他一定会喜出望外的，而眼下，这件事却给他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光棍无声无息地活着，并不是毫无价值的，现在有人——不管他是谁——打破了这个无声无息的状况，给他送来了这两个滑稽的球。

他想抓住一个，但两个球都避开他向后退去并引诱他在房间里跟着球跑。他寻思道，这样跟着球跑实在太蠢了。于是他便站住，在一边望着球，眼看它们在追逐似乎已经停止的时候也在原地停住了。他又想，我还是得设法逮住它们，便又急忙向它们奔过去。它们立刻避开，但布鲁姆费尔德叉开两条腿将它们逼进一个墙角，在墙角上那只箱子跟前，他成功地逮住了一个球。那是一个凉丝丝的小球，在他的手心里旋转着，显然渴望逃脱。另外那个球仿佛看到了它的同伴处于困境似的，跳得比原先更高了，但放慢了跳跃的速度，直至它碰着了布鲁姆费尔德的手。它撞击那只手，越跳越快地撞击着，改变着攻击点，由于它对那只能一把将它握住的手无可奈何，于是它便又往高处跳起来，多半是想够着布鲁姆费尔德的脸。布鲁姆费尔德也完全可以把这个球逮住，把两个球都禁锢在某个地方，但此刻他觉得对两个小球采取这样的措施未免太过分。占有这样的两个球，也是件开心的事儿嘛，况且过不了一会儿它们就会疲惫不堪，滚到一个柜子下面安静下来的。可是尽管有这样的考虑，布鲁姆费尔德心里还是在冒火，不由将那只球往地上一扔，真奇怪，那个脆弱、几乎透明的小球竟然没有碎。那两个球随即又做起先前那种低矮的、协调一致的跳跃动作来。

布鲁姆费尔德心平气和地脱衣服，理了理衣箱里的衣服，他一向惯于仔细查看女佣人把房间拾掇整齐了没有。有那么一两回，他扭过头去望望那两个球。它们没受到跟踪，现在倒好像跟踪起他来了，它们已经向他这边移动过来，紧靠在他的背后跳动。布鲁姆费尔德穿上睡衣，走到对面墙根前，从那儿的烟斗架上拿一个烟斗。转身之前他情不自禁

向后面踢了一脚，那两个球却很会躲闪，没给踢着。当他绕着烟斗架走时，那两个球立即跟了上来，他趿拉着拖鞋，脚步错乱地走着，但是他每跨出一步，球便几乎不间断地撞击一下，它们跟他合着脚步呢。布鲁姆费尔德突然转过身，想看看那两个球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刚一转过身去，球便绕到了他的背后，他再转身，球又绕到他的背后，这样重复了许多次。它们像下级随从人员，竭力避免在他面前停住。到现在为止，看来它们只是为了向他作自我介绍，才斗胆在他面前停过，但如今它们已经尽过他们的职分。

到眼前为止，他每逢遇到特殊情况而又没有能力控制局面的时候，总是只有装聋作哑这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常常很灵验，通常起码会使局面好转。他现在也采取这个态度，站在烟斗架跟前，撅着嘴挑了一只烟斗，慢条斯理地用准备好的烟袋里的烟叶装烟斗，无动于衷地任凭那两个球在他背后跳跃。可是他还踌躇着不马上走到桌子跟前去，听到跳跃声和他自己的脚步声发出整齐的节奏，他心里几乎感到难过。他就这样站着，故意磨磨蹭蹭地装烟斗，一面估摸着他和桌子之间的距离。最后他终于鼓足了劲，狠命跺脚，走完了那一段路。他跺得地板咚咚响，根本没有听见球的声音。当他坐下来时，它们在他的圈手椅后面跳跃的声音又清晰可闻了。

桌子上方的墙上，在伸手就可以够到的地方，安了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那瓶樱桃酒，酒瓶四周摆满了小酒杯。酒瓶旁边有一摞法国杂志。（恰好今天来了一期新的。布鲁姆费尔德把新到的杂志拿下来。那酒他全然忘了，他甚至有这种感觉，仿佛他今天只是出于自我安慰才不受干扰地干他往常所干的事，真要读点什么他倒也不想。他一反往常一页一页仔细翻阅的习惯，打开杂志，随便翻到一页，发现有一幅很大的画。他强迫自己仔细看那幅画。画上是俄国皇帝和法国总统会见的情景。会见是在一艘船上进行的。从四周到远处还有许多别的船只，船上烟囱里吐出的烟雾在蔚蓝的天空袅袅上升。两个人，皇帝和总统，急匆匆迈着大步互相迎面走了过来，恰好相互握住了手。皇帝和总统的背后各站着两个显贵。与皇帝和总统的欢快的神色相比，随员们的神色都显得极其严峻，各方随员的目光都一齐望着各自的主子。这个场面显然发生在船只的最高层甲板上，而底下，水手们站在长长的行列里敬礼，这敬礼的水手的行列到了画面的边缘便被切断了。布鲁姆费尔德看着看着便对这幅画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随后便把那画挪得稍微远一些，眨巴着眼睛仔细观看它。对于这样伟大壮丽的场面他始终具有很高的鉴赏

能力。主要人物这样毫不拘谨、热烈而轻松自如地互相握手，他觉得这很符合实际情况。而随员们——当然都是达官显贵，下面注有他们的名字——在其举止态度上保持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严肃性，这样处理同样也是对的。）

布鲁姆费尔德没有把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拿下来，而是不声不响坐着，两眼望着那一直还没有点燃的烟斗。他窥测着时机，蓦地，他生机勃勃，猛地一下连同圈手椅一道转过身去。但球也保持着相应的警觉，或者是漫不经心地服从着那条支配它们行动的法则，在布鲁姆费尔德转身的同时，它们也换了地方，隐藏在他的背后。布鲁姆费尔德就背对着桌子坐着，手里拿着那只凉烟斗。现在球在桌子下面跳跃，由于那儿有一条地毯，所以声音很微弱。这是一大好处，只有极其轻微而低沉的响声，要非常注意才听得见。而布鲁姆费尔德却十分留神，听得一清二楚。但这只是现在才如此，再过一会儿他多半就一点儿也听不见了。它们在地毯上如此不惹人注意，这在布鲁姆费尔德看来，似乎是球的一大弱点。人们只需垫上一块或者更保险一点垫上两块地毯，它们便几乎无能为力了。当然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此外，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某种力量了。

现在，布鲁姆费尔德倒觉得很可以养一只狗了，这样一只年轻、野性的动物马上就会把这些球治服的。他想象这只狗怎样追逐着用前爪抓球，怎样地驱赶它们，怎样追得它们满屋子乱跑，最后终于一口咬住了它们。布鲁姆费尔德不费什么劲便可以在最近弄到一只狗的。

但是眼下，那两个球只需要提防布鲁姆费尔德，而他却不想去收拾它们，也许他只是下不了决心。晚上下班回来他累了，正当他需要休息的时候，竟出其不意给他来了这一手。现在他才感到他有多么疲倦。这些球他反正是一定要收拾的，并且很快就会动手，但眼下不会，多半要到第二天才会去收拾它们。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看一看整个儿这件事情，那么应该说，这两个球的举止行为是够谦虚的。比如说，它们本可以不时地向前跳跃，露一下面便又回到原处，或者跳得更高些，好撞击桌面板，以补偿被地毯压低的声音。但是它们不这样做，它们不愿意不必要地去惹怒布鲁姆费尔德，它们显然只限于做必不可少的事。不过，这必不可少的事也足以使布鲁姆费尔德对待在桌子旁边兴味索然。他才在那儿坐了不多几分钟便想去睡觉了。他在那儿不能抽烟，因为他把火柴放在小床头柜上了，这也是他想去睡觉的缘由之一。这就是说，他要抽烟

就得去取那火柴，但既然他已经到了床头柜跟前，那还不如待在那儿就势躺下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还有一个隐情，原来他以为那两只球一味跟在他背后，并且会跳到床上来的，而他一躺下去便会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压碎。他不相信球的碎片也会跳的。不平常的事物，也得有个限度。平常，整个儿的球也会跳，尽管不是不停顿地跳，可是，球的碎块是从来都不会跳的，所以在这不平常的情况下也不会跳动。

“起来！”他嚷道，经过这番考虑他几乎任起性子来了。他背后带着球，踏步向卧床走去。他的希望似乎就要得到证实，当他故意贴近床的时候，马上便有一个球跳到床上。可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另外那个球竟跑到床底下去了。球也会在床底下跳，这种可能性是布鲁姆费尔德完全不曾想到的。他对那一个球感到恼火，虽然他觉得这是多么不公平，因为那个球在床下跳，所以它完成任务也许要比床上的那个球完成得好。现在要看那两个球决定待在哪儿了，因为布鲁姆费尔德不相信它们会长时间分开工作。不一会儿，下面那个球果然也跳到床上来了。现在我要它们的好看了，布鲁姆费尔德心里这么说，兴奋得有些激动了，一把扯下身上的睡衣，急忙躺到床上去。但这时，从床下跳到床上来的那个球偏偏又在往床下跳去。布鲁姆费尔德怀着极度失望的心情简直是瘫倒在床上了。那个球多半只是在床上张望了一下，它不喜欢待在那儿。于是乎，另外那个球也跟着它跳下去，自然也就待在下面了，因为下面更好些。“这一整夜我都得在这儿跟这些鼓手们做伴了。”布鲁姆费尔德心想，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他郁郁不乐，其实他并不知道那两个球夜里会对他有什么损害。他睡眠一向极好，这点小小的声响他好对付。为了有充分的把握，他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在它们下面垫了两块地毯。仿佛他养了一只小狗，现在给它铺了软和的床铺。仿佛那两个球也疲乏了、困倦了，它们也跳跃得比先前低而慢了。每当布鲁姆费尔德跪在床前，用那盏床头灯往床下照时，他有时便以为那两个球永远躺在地毯上不动弹了，因为它们落地时十分无力，滚动一小段距离时的速度也十分缓慢。不过，它们随后又尽责地蹦了起来。如果布鲁姆费尔德第二天一早起来再看那床底下时，他便会发现那儿有两个安静的、不会伤人的儿童球，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但它们似乎连坚持跳到早晨都不能了，因为布鲁姆费尔德一躺到床上就听不见它们的响声了。他竭力想听到一点动静，他从床上探出身子

去仔细倾听，什么声响也没有。地毯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唯一的解释是，两个球不跳了。要么地毯软，弹性不够，它们弹跳不起来，因而暂时停止跳动了，要么就是——这个可能性更大——它们永远也不会再跳了。布鲁姆费尔德满可以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对房间里终于寂静下来感到满意，所以他宁愿躺着，连用目光接触一下那静止下来了球都不愿意。他甚至连烟也不想抽，一转过身去，马上便睡着了。

可是他并非不受干扰。同往常一样，他这一夜也没有做梦，但睡得很不安稳。夜里他无数次被惊醒，误以为有人在敲门。他也肯定知道没有人敲门，谁愿意半夜三更来敲门，敲他的门，敲一个孤独的光棍的门呢。他虽然肯定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仍然每次都会惊起，神情紧张地朝房门张望一阵，张着嘴，睁大了眼睛，一绺绺头发在潮湿的额角上抖动着。他想计算出他一共醒过来多少次，所得出的数字很大，弄得他迷迷糊糊，重新睡着了。他自以为知道那敲门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敲的不是房门，完全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敲，但他在睡意朦胧中想不起来他是根据什么这样推测的。他只知道先有许多微小而可厌的打击声聚集到一起，然后才汇成那巨大而强烈的敲门声。假如他可以避免听到那敲门声的话，那么，那些微弱打击声尽管讨厌他还是乐于忍受的，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已经为时过晚，他在这方面无法进行干预，错过了时机，他连话都没有，只是张嘴打着无声的呵欠，他气愤不过，猛然把脸埋在枕头里。这一宵就这样过去了。

早晨，女佣人的敲门声把他唤醒了，他用一声舒心的叹息欢迎他平常总是嫌声音小得听不见的轻柔的敲门声，他正想喊“进来”，这时他突然还听见了另外一声急促的、虽然微弱但确实杀气腾腾的敲击声。那是床底下的球。难道它们醒过来了？难道它们同他相反，睡了一夜精力又充沛了？“马上就来。”布鲁姆费尔德对女佣人喊道，说着从床上坐了起来，但为谨慎起见，他要让两个球待在他的背后的位置上，于是他一纵身跳到了地上，但始终背对着它们。他扭头朝它们望去，这一看不打紧，他简直快要骂娘了。看来那两个球像夜里踹掉讨厌的被子的孩子，这一夜它们一拱一拱地把地毯从床下拱出来了那么一截，它们下面又露出了光光的镶木地板，又可以发出声响了。“回到地毯上去！”布鲁姆费尔德恶狠狠地说道，直到那两个球由于地毯的作用重新寂静下来的时候，他才喊佣人进来。她是一个迟钝的、总是直着身子走路的胖女人。她应声进来把早餐放在桌上，便张罗着打扫起房间来，而这时布鲁姆费尔德却身穿睡衣站在床边，好让那两个球待在床底下。他用目光紧紧盯

住女佣人，想看看她是否有所察觉。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她耳背。可是布鲁姆费尔德却自以为看见女佣人不时地停住脚步，扶住一件什么家具，竖起眉毛在偷偷地听，这一切他都归咎于自己因睡眠不好而引起的精神亢奋。如果他可以使女佣人干活干得稍许快一点，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但她几乎比平时还要慢。她笨手笨脚地抱起布鲁姆费尔德的一堆衣服和靴子往过道里走去，很长时间她都没再进来，只听见传来零星而单调的敲打声，那是她在外面拍打衣服的声音。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布鲁姆费尔德不愿意将球引出来，所以他固守在床上，动弹不得，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咖啡凉下来，而他本来是最喜欢喝热咖啡的。他没有别的事好做，只好盯住垂下的窗帘，窗帘外面晨光熹微。最后女佣人终于拍打完毕，道过一声早安，就想走了。但在最后离去之前，她还在门口站了片刻，稍稍翕动着嘴唇，狠命地盯住布鲁姆费尔德看。可是正当布鲁姆费尔德想问她这是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她却一扭头走了。布鲁姆费尔德恨不得一把拉开房门，冲着她的后背，大骂她是个愚笨痴呆的老太婆。但他随即想了一想他究竟同她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只觉得事情十分荒唐，她无疑什么也没有觉察到，可是却想装出觉察到什么的模样来。他的思绪多么紊乱！而且仅仅由于一夜没睡好觉就成了这个样子！他为他没有睡好觉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原因，那就是昨天晚上他没按自己的习惯去做，既没吸烟也没喝酒。我一不吸烟不喝酒便要睡不好觉，这就是他思考后得出的最后结论。

从现在起他要更加注意身体，他当即从挂在床头柜上方的药包里拿出药棉，往耳朵里塞了两个小棉花球。然后他站起来，跨出一步试了试。两个球虽然跟着他走了，但是他几乎听不见它们的声音，于是他又塞了一个棉花球，便把它们的声音完全消除了。布鲁姆费尔德又走了几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不愉快的事。布鲁姆费尔德和两个球，各自都自成一体，虽然它们互为约束，但是它们互不干扰。有一回布鲁姆费尔德转身转得比较快，而有一个球在做相对运动时动作却不够快，仅在此刻，布鲁姆费尔德的膝盖才把它磕着了。这是唯一的意外，除此以外，布鲁姆费尔德就是平心静气地喝咖啡。他饿了，仿佛这一夜他不是睡了一觉，而是做了一次长途跋涉，他用极其清凉的冷水洗了洗身便穿上了衣服。到此刻为止，他一直没有把窗帘拉起来，为了谨慎起见，他宁愿待在昏暗里也不想让陌生人的眼睛看见他的球。但他现在已经做好了出门的准备，万一两个球也敢于跟着他上街——这一点他并不相信——他得想法子不让它们得逞。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打开那只大衣箱，背对着它。那两个球好像看出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似的，便留神着不到衣箱

里去，布鲁姆费尔德和衣箱之间的每一个空隙它们都充分利用，实在没有办法时就一下子跳进箱里，随即又从黑咕隆咚的箱子里逃了出来。他没有法子把它们从箱沿弄到衣箱里去。它们宁愿渎职，几乎紧贴在布鲁姆费尔德的身边。但是，它们的小花招丝毫也帮不了它们的忙，因为现在布鲁姆费尔德自己后退着跨进了衣箱，这一下它们当然也就不得不跟进去了。它们一跟进去也就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因为箱底放着各种小件物品，有靴子、盒子、小箱子，那些东西虽然全都——现在布鲁姆费尔德为此感到惋惜了——放得整整齐齐，但却妨碍那两个球的行动。这时，几乎已将衣箱门随手拉上的布鲁姆费尔德，以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敏捷，一下子从衣箱里跳了出来，关上箱子，转动钥匙，当即把两个球锁在了里面。“这下子总算成功了。”布鲁姆费尔德心想，一边抹了抹脸上的汗。那两个球在衣箱里吵闹得多凶啊！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仿佛在拼命了。而布鲁姆费尔德却十分满意。他离开房间刚一踏上那空寂的走廊，精神顿时就为之一爽。他拿掉塞在耳朵里的棉花，听见了屋子里人们醒来的种种响声，心里禁不住地高兴。外面人很少，时间还很早。

女佣人的那个十岁小男孩正站在楼下穿堂里那扇矮门的前面，那扇门是通向女佣人住的地下室的。那个孩子跟他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一看见孩子的这张面孔便会想起老太婆的丑陋相貌。他，两条罗圈腿，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那儿呼哧呼哧直喘气，因为他这个年纪就已经得了甲状腺肿大，呼吸有困难。平时，布鲁姆费尔德一见这个男孩便要加紧脚步赶快走开，尽可能避免看到他那番表演，但今天他简直想待在他身旁不走了。即使这个男孩是由那个女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身上带着母亲的种种标记，可眼下他是个孩子，粗笨难看的脑袋里是天真的稚气，如果你好好跟他谈谈，问他点什么，那么他多半会用响亮的声音天真而恭敬地回答你的。内心经过一番斗争以后，你也就会去抚摸抚摸他的两个面颊。布鲁姆费尔德这样寻思着，但还是从孩子身边走了过去。在胡同里，他发觉天气比他在房间里想象的要好。晨雾在消退，一阵强劲的风吹过，天空露出了蓝色。布鲁姆费尔德感谢那两个球，多亏了它们他才比平时早得多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那份报纸他连读都没读就放在了桌子上。不管怎么说，他因此就赢得了许多时间，现在可以慢慢地走了。真奇怪，自从他把两个球甩掉以后，他很少为它们担忧。只要它们跟在他后面，他就得把它们看做是他所拥有的某种东西，某种在评价他这个人时必须一同加以考虑进去的因素，可是现在，它们只不过是家里衣箱内的一个玩具罢了。这时布鲁姆费尔德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得替那两个球找一个应有的归宿，这样，他也许就能轻易地使它们不再为

非作歹。那个男孩子还在那穿堂里站着呢，布鲁姆费尔德可以把球送给他，不是借给他，而是明确地送给他，而送给他和下令消灭它们，其意义当然是相同的。即使它们会完好无损，但毕竟是在孩子的手里，比起放在箱子里，身价要低一档。屋里所有的人都会看见那个孩子怎样玩弄它们，别的孩子也会加入进来，一般人都会认为那是供人玩耍的球，不是布鲁姆费尔德的什么终身伴侣，这个意见会变得不可动摇、不可抗拒。布鲁姆费尔德跑回屋里。那个男孩刚刚走下地下室楼梯，在下面正想开门。布鲁姆费尔德只好喊住那个孩子，叫了一声他的名字。跟那孩子有联系的所有事物一样，他的名字也滑稽可笑。“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他喊道。那个孩子迟疑了良久。“你过来呀！”布鲁姆费尔德喊道，“我给你一样东西。”房东的两个小女孩从对面的房门里走了出来，好奇地站在布鲁姆费尔德的左右两边。她们理解事物比那个男孩快得多，不明白为什么他不马上跑过来。她们招手叫他过来，一边用眼睛紧紧盯住布鲁姆费尔德，但揣摩不透阿尔弗雷德究竟会得到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她们为好奇心所驱使，两只脚交替着一跼一跼。布鲁姆费尔德笑她们，也笑那个男孩子。这男孩子似乎终于明白过来，正呆板而迟钝地沿着楼梯走上去，就连他迈步的姿势也跟他的母亲一样，她此时已出现在地下室门口了。布鲁姆费尔德故意大声叫喊，好让女佣人也明白他的意思，必要的话还可以监督他执行任务。布鲁姆费尔德说道：“楼上，在我的房间里，有两个很好看的球。你想要吗？”男孩只是撇了撇嘴，他不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扭转身，用询问的眼光向下望着他的母亲。但女孩子们立刻围着布鲁姆费尔德跳了起来，并向他要球。“那球你们也可以玩的。”布鲁姆费尔德对她们说道，却等着男孩的答话。他本来可以立刻把球送给女孩子的，但他觉得她们太轻浮，现在他更信任那个男孩子。在这同时，这个男孩子没有跟母亲交换一句话就已从她那儿讨得了主意，并对布鲁姆费尔德再次提出的问题点点头表示同意。“那你注意听着，”布鲁姆费尔德说，他深知自己不会因为送了礼物而受到感谢，对此他毫不介意，“我房门的钥匙你母亲有，你得从她那儿把那钥匙借来，我把我衣箱的钥匙给你，球就在那个衣箱里。拿到球后再好好地把衣箱和房门锁上。那球你就拿去随便玩吧，不用再送回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遗憾的是那个孩子没有听明白。布鲁姆费尔德原想把一切都给这个理解力无比迟钝的孩子讲清楚，但正因为如此，他说话重复太多，钥匙、房间、衣箱颠来倒去地讲，弄得那孩子睁大眼睛望着他，好像他不是在做好事，而是在勾引他干坏事。女孩子们倒马上就全听明白了，拥到布鲁姆费尔德跟前，伸手就要拿钥匙。“等一等。”布鲁姆费尔德说

道，他在生大家的气了。时间也在流逝，他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要是女佣人说一声她已经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会替那孩子把一切都办妥帖的，那该有多好。可是不，她还是一直站在下面门口，像腼腆的耳背女人那样忸怩地微笑，也许是以为布鲁姆费尔德在上面突然喜欢上她的孩子，正在听孩子背乘法口诀呢。可是布鲁姆费尔德却又不能走下地下室楼梯，对着女佣人的耳朵大声嚷嚷他的请求，愿她的儿子看在上帝分上使他摆脱掉那些球。他愿意把他衣箱的钥匙交给这家人一整天，这说明他已经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他自己不带那孩子上楼，不去那儿把球交给他，而是在这儿把钥匙递给他，这并不是他怜恤自己的身体。他总不能在楼上先把球送掉，然后又从孩子手中夺走，因为那两个球会跟在他背后一起走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他开始重新进行解释，但一见那孩子懵懂的目光便又立刻停下，几乎是神色忧郁地问道：“这么说，你还听不懂我的意思？”一束如此懵懂的目光可以使人失去抵御的能力。它会诱人说不愿意说的话，而人们之所以那样，仅仅是为了好用理性去填补空虚。

“我们去给他拿球！”女孩们喊道。她们机灵，她们已经看出，只有通过男孩这个中间人她们才能得到球，但她们还得靠自己让这个中间人起作用。房东的房间里一只时钟敲响了，提醒布鲁姆费尔德抓紧时间。“那你们就把这钥匙拿去吧！”布鲁姆费尔德说道，他刚一伸手，钥匙便从他手里被夺走了。假如他把钥匙给了那个男孩，那他就根本不用这么担心了。“房门钥匙到下面那位太太那儿去拿，”布鲁姆费尔德还说道，“你们拿了球回来，就把两把钥匙交给那个太太。”“知道，知道！”女孩子们说着便一溜烟下楼去了。她们什么都知道，真是无所不知。仿佛布鲁姆费尔德受了男孩理解迟钝的传染似的，现在他自己都不明白，她们怎么会这样快就从他所作的解释中得知这一切情况的。

这时，只见她们已经在下面拉扯住了女佣人的裙子，但不管这多么诱人，布鲁姆费尔德却没工夫再去看她们怎样执行她们的任务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时间已晚，而且也是由于他不愿意目睹那两个球跑到室外来的情景。他甚至想在女孩子们刚到楼上开房门的时候就走出几条胡同去。他无法预料那两个球后来会怎么样。于是，今天早晨他第二次来到街上。他还看见那个女佣人怎样全力以赴抵御女孩们的进攻，那个男孩怎样晃动着那两条罗圈腿跑去帮助母亲。布鲁姆费尔德不理解，像女佣人那样的人怎么会在世界上生长、繁殖开来的。

在去他受雇的那家内衣厂的路上，他对工作的思虑渐渐占据上风，压倒了一切其他的杂念。他加快了脚步，尽管那男孩耽搁了他不少时间，他还是第一个来到了办公室。这是一间用玻璃隔开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布鲁姆费尔德用的写字台和两张布鲁姆费尔德手下的实习生用的立式斜面桌。虽然立式斜面桌又小又窄，像是给小学生用的，但是由于这间办公室极其窄小，实习生们还是坐不下，因为假如他们一坐下来，布鲁姆费尔德的圈手椅就没地方搁了。因此，他们就整天趴在立式斜面桌上。对他们来说这当然很不舒服，但这也使得布鲁姆费尔德难于对他们进行观察，他们常常急切地挤到斜面桌跟前，但不是去工作，而是相互咬着耳朵窃窃私语，甚至打瞌睡。布鲁姆费尔德对他们很恼火。他承担着大量的工作，而他们对他的支持却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工作是负责处理与在家干活的女工之间的全部货款往来，那些女工是工厂为制造某些较为上等的衣服而雇佣的。为能判断这项工作有多繁重，就必须对全部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自从布鲁姆费尔德的顶头上司几年去世以来便再也没有人了解这个情况，因此布鲁姆费尔德就也不能赋予任何人以评判他的工作的权利。譬如工厂主奥托马尔先生就显然低估布鲁姆费尔德的工作。布鲁姆费尔德在厂里二十年所作出的成绩他当然是重视的，这不仅因为他必须重视，而且也因为他尊敬布鲁姆费尔德，认为他是个忠诚、值得信赖的人，但对他的工作他却低估了，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可以比布鲁姆费尔德现在的做法安排得更简单些、因而在各方面也都将更有效些。人们说，奥托马尔之所以很少在布鲁姆费尔德的科里露面，仅仅是为了免得看见布鲁姆费尔德的工作方法而生闲气，这话大概并非不足信。这样受人曲解，布鲁姆费尔德心里当然感到难过，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他总不能强迫奥托马尔连续在他自己的科里待上一个月，研究科里要做的种种头绪纷繁的工作，并运用奥托马尔自己以为是更好的办法，而这样一来，势必会把科室搞得一团糟，随后，奥托马尔才会信服布鲁姆费尔德。因此，布鲁姆费尔德就毅然决然按老章程办事。过了很长一段时候以后，有一次奥托马尔到他的科里来了，他吃惊之余仍本着下级人员的责任感勉强试着给奥托马尔解释各种设施的用途，此人听罢低垂着眼睛默默颌首走了。他感到痛心的倒不是受到了这种曲解，他痛心的是，他想到一旦自己退休离职，科里马上会给弄成一团糟，因为他不知道工厂里有谁能顶替得了他，能接替他的职务，并使工厂里的生产接连几个月避免出现最严重的停滞状态。如果上司瞧不起什么人了，那么职员们便会设法尽量比上司更瞧不起那个人。因此，人人都瞧不起布鲁姆费尔德的工作，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到布鲁姆费尔德

的科里去工作一段时期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如果录用了新职员，也没有人会主动要求到布鲁姆费尔德手下去工作。正因为如此，布鲁姆费尔德的科里就后继乏人了。布鲁姆费尔德只有一名勤杂工相助，一应事务均独自一人料理。当他要求雇一名实习生时，竟交涉了几个星期，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布鲁姆费尔德几乎每天都来到奥托马尔的办公室，心平气和、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为什么他那个科里需要一名实习生。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布鲁姆费尔德想偷闲，他布鲁姆费尔德不想偷闲，他干着繁重的工作，并不打算撂下不干，但请奥托马尔先生想一想，业务日益发达兴旺，所有各科室都相应地扩大了，只有他布鲁姆费尔德的科一直被遗忘了。可是，恰恰在那个科里，工作量增长得多快！他刚到那个科里来的时候，奥托马尔肯定记不得那个时代了，那时科里只跟十个左右的缝纫女工打交道，今天有五六十个了。干这样大量的工作，要有人手才行，他布鲁姆费尔德可以保证自己为工作鞠躬尽瘁，但要他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这样的保证从现在起他可是下不了啦。当然喽，奥托马尔先生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布鲁姆费尔德的请求，他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老职工，可是他那种爱听不听的 attitude，撂下正在提请求的布鲁姆费尔德同别人说话，哼哼哈哈地允诺，几天过后又把一切抛到脑后：——这种态度是相当伤人感情的。提出这样的请求不是为了布鲁姆费尔德，布鲁姆费尔德不是个好幻想的人，荣誉和赞扬虽说非常美好，布鲁姆费尔德可以不需要，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不顾一切坚持到底，反正他有理，而合理的事情终究是会得到赞赏的，尽管有时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就这样，布鲁姆费尔德最后还是要到了两名实习生，不过天晓得是两名什么样的实习生。别人简直会以为，奥托马尔已经看出，他给实习生比不给实习生更能清楚地表示他对那个科的藐视。甚至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即奥托马尔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搪塞布鲁姆费尔德，仅仅因为他在搜罗这样的两名实习生，而且显然在长时间内搜罗不着。现在，布鲁姆费尔德可是有苦也没法诉了，他可以预料到老板会怎么答复他：他不是只要求加一个实习生吗？现在不是给了你两个实习生了吗？这一招奥托马尔干得巧妙至极。当然，布鲁姆费尔德还是诉了苦，但这仅仅因为他陷于困境，万不得已，并不是因为他现在还希望增加帮手。他也不是一味地诉苦，只是遇到合适的机会时顺带诉说两句。尽管如此，在歪心眼的同事中间不久便传开了这样一个谣言：有人曾问过奥托马尔，布鲁姆费尔德在得到了这般出类拔萃的帮手以后还一直在诉苦，是否真有这么回事？奥托马尔回答说，是的，布鲁姆费尔德还一直在诉苦，但诉得在理。他，奥托马尔，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并打算逐步做到有一个

缝纫女工就给布鲁姆费尔德配备一名实习生，这就是说将总共配备六十名左右。万一这么多实习生不够用，他将再派人去，他将不停地派人去，直到那座疯人院成为完美无缺的疯人院时为止。须知，布鲁姆费尔德的那个科几年前就已经变成疯人院了。不消说，这种话是惟妙惟肖地模仿着奥托马尔的口吻说的，但他本人决不会用那种口吻说他，即便只是用相似的口吻也不会，对此布鲁姆费尔德并不怀疑。这全是二楼办公室里那帮懒汉编造出来的，他一概不予理睬。假如对于那些实习生他也能这样泰然处之就好了。但他们站在那儿，再也撵不走了。他们是脸色苍白、体质羸弱的孩子。按照他们的材料上的介绍，他们已经过了结束学业的年龄，这实在没法叫人相信。他们显然还需要母亲的照料，连把他们交托给教师家长都不会愿意的。他们自己还不懂得活动身子，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站久了他们便累得不得了。一不注意，他们就会体力不支，伛偻着背，歪斜着身子，站在一个角落里。布鲁姆费尔德试图给他们讲清楚，假如他们老是这样懒散图舒适，他们会落下终身残疾的。差实习生挪挪身子去办点事，是要担风险的。有一回，他差一个实习生去办事，那家伙才挪动几步路，不料由于热心过了头，跑过去时撞在斜面桌上把膝盖都磕破了。当时房间里坐满了缝纫女工，斜面桌上堆满了衣服，但布鲁姆费尔德只好把一切工作都搁在一边，领着那个哭哭啼啼的实习生走进办公室，在那儿给他包扎了一下。但实习生们的这种热心也只是表面文章，他们就像真正的孩子，有时想出出风头，但他们更多的是想，或者说得确切点，他们几乎总是一味地想迷惑上司的注意力，欺骗上司。有一回正是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布鲁姆费尔德汗水淋漓，急匆匆地从他们身旁经过，发现他们正躲在一捆捆衣服之间换邮票呢。他真想用拳头朝他们的脑袋狠狠揍下去，这对于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惩罚，但他们是孩子，布鲁姆费尔德可不能把孩子打死了。就这样，他继续忍受着他们给他带来的痛苦。本来他设想，在分发活件的时候实习生可以帮他一把。这是桩既紧张又细致的活儿。他曾想，他可以站在中间，站在斜面桌后面，始终可以综观全局，办理登记手续，而实习生们则按照他的命令来回奔走分发所有的活件。他曾设想，不管他监督得多么严格，那么一大堆人还是照顾不过来的，实习生们的悉心协助便能弥补疏忽。他还设想，这些实习生会渐渐积累起经验，不至于仍旧什么小事都是依赖他发号施令，终于能自己学会分辨缝纫女工们对活件的需要量和可信赖的程度。就这两名实习生的情况看，他的希望完全是空想。布鲁姆费尔德不久便认识到，他压根儿就不可以让他们去跟缝纫女工说话。因为从一开始起，他们根本不走道有些缝纫

女工面前去，他们不是嫌恶便是害怕她们，但他们对另一些缝纫女工则怀有好感，常常迎着她们跑过去，一直跑到门口。她们要什么，他们就给她们送去什么，用一种诡秘的方式把东西塞到她们手里，虽然那些缝纫女工完全有权利接受那些东西。他们在一个空架子上为这些享受优惠的女工搜集各种零头碎布和无用的边角料，但其中也掺有能用的小布头，他们在布鲁姆费尔德的背后欣喜地挥动着那些布头，远远地向她们示意，他们为此而得到的报酬便是嘴里经常有糖果吃。布鲁姆费尔德固然不久便制止了这种胡闹，缝纫女工们一来，他便将她们哄进隔扇围成的小室里。但是他们还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不公平，犟头犟脑，故意折断笔尖，虽然不敢抬起头来却不时地大声敲打玻璃板，好让缝纫女工们注意，按照他们的意见，是布鲁姆费尔德让他们遭受这种恶劣的待遇。

他们自己做的事不在理，这一点他们硬是不明白。比如说他们来上班几乎总是迟到半个小时。而布鲁姆费尔德，他们的上司，则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认为至少提前半小时上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促使他这样做的不是向上爬的野心，不是过分的忠于职责，只是某种要规规矩矩做人的感觉。因此，布鲁姆费尔德通常得等候一个小时以上才见到他的实习生姗姗而来。布鲁姆费尔德一般都是一边站在工作间斜面桌后面啃着当早饭的小面包，一边结算女工们的小账簿里的账目。不多一会儿，他便专心致志埋头于工作之中了。正当这时候，他突然被吓了一跳，连他的手都颤抖了好一会儿。有一个实习生跌跌撞撞地进来了，仿佛他快要倒下似的，他一只手扶住了什么，另一只手按住直喘气的胸脯——但这一切无非意味着，他是因为迟到了而在道歉，那道歉的话说得可笑之极，布鲁姆费尔德只好假装没有听见，要不然的话，他非得狠狠揍那个男孩一顿不可。就这样，他只是看了他一眼，伸手指了指那间隔出来的小工作室，就又忙着干他的工作去了。现在人们总可以期望那位实习生体察上司的好意，急忙奔向他的工作岗位上去了吧。可是不，他不慌不忙，踮起脚，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跳舞似的蹭过去。他想嘲笑他的上司吗？倒也不是。这只是害怕和洋洋自得两种感情混杂在一起，人们一般是无法抗拒的。否则下面的事情就无法解释了。今天，布鲁姆费尔德上班要比往常晚得多，但还是在等待了良久以后——他很有兴致检查那些小账本——才透过那个愚蠢的勤杂工用笤帚在他面前扬起的尘土，望见了那两名实习生正悠悠忽忽从胡同里走过来。他们紧紧抱成一团，似乎都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对方讲述，那些事情即使与厂里的业务有关，那也是一种不合法的关系。他们越走近玻璃门，脚步便放得越慢，其中一个终于

已经握住了门把，但不往下压。他们还一直互相讲述着，倾听着，笑着。“给我们的老爷们开门呀！”布鲁姆费尔德举起双手，冲着勤杂工喊道。但当实习生们走进来的时候，布鲁姆费尔德却不想吵架了，也不回答他们的问题，便径直朝自己的写字台走去。他开始算账，但不时抬头看看实习生在干什么。其中的一个似乎很疲倦，正在擦眼睛，他把外套挂到衣钩上以后，便趁势在墙上靠了一会儿。在胡同里他生龙活虎，但一接手工作他便困倦不堪。另一个实习生倒有兴致工作，但只对某些工作有兴致。他向来就希望允许他打扫房间。但这不是他分内的工作，打扫房间是那个勤杂工的事。这位实习生要打扫，布鲁姆费尔德本来倒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实习生愿意干那就让他干去吧！谁也不会比那个勤杂工干得还糟的。但是，如果那个实习生想打扫，那他就应该早一点，在勤杂工开始打扫前就来，因为只有办公室工作才是他的本职，他不应该在上班时间内打扫。如果这个小青年不懂事，那么那个勤杂工，那个肯定不会被厂主安插在别的科而只会安插在布鲁姆费尔德的科的并且只靠上帝和厂主的怜悯过活的半瞎老人，至少总会随和一些，总会把笤帚交给那个孩子一会儿的，而那个孩子又是笨手笨脚的，过不了一会儿就会失去对扫地的兴致，拿着笤帚去追那个勤杂工跑，劝说他重新去扫地。但现在那个勤杂工似乎恰恰对扫地特别尽职，那男孩刚一走近他，他使用打战的手把笤帚握得更紧些，他宁可站住不动并停止扫地，从而使大家都注意到那把笤帚是在他的手里。那个实习生不是用言语去请求，因为他害怕似乎正在算账的布鲁姆费尔德，何况一般的言语也没有用，而只有直着嗓门喊叫，那个勤杂工才能听得见。于是乎，那个实习生先轻轻扯了扯勤杂工的袖子。勤杂工当然知道是为了什么事，他把脸一沉，望着那个实习生，边摇头边把笤帚往身边移动，一直移到胸前。这时，那个实习生双手合掌请求开了。当然，他并不希望通过请求达到什么目的，他只是觉得这样请求好玩。另外那个实习生注视着这件事情的经过，边看边哧哧地笑，显然以为布鲁姆费尔德听不见他的笑声，尽管他这样以为是令人不可理解的。那个勤杂工毫不理会这种请求，他转过身去，认为现在又可以平安无事地用那把笤帚扫他的地了。但那个实习生一边搓着双手作恳求状，一边用脚尖一踮一踮地跟着他，又在这边请求了起来。勤杂工不停地跟着跳到他的前面去，这样重复了多次。末了，勤杂工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并发觉这样下去他准保会比实习生先累垮的，只要他稍稍有一点脑子，这一点他一开始就能发觉的。于是，他便寻求别人的帮助，用手指威吓那个实习生，指指布鲁姆费尔德，如果实习生再纠缠不休，他就要去向布鲁姆费尔德告状了。那个实

习生认识到，如果他想拿到那把笤帚他就得赶快下手，于是他撕破脸皮伸手去夺笤帚。另外那个实习生也大叫一声，预示该下决心去夺了。勤杂工后退一步，将笤帚顺势一带，没让对方把笤帚夺走。这时，那个实习生也不甘示弱，他张着嘴，眼睛闪闪发光，一个箭步跨向前去，勤杂工拔腿就要逃，但他那两条老腿一个劲儿地打战，硬是动弹不得。实习生伸手来抢笤帚，虽说没有抓到，笤帚却掉到了地上，对于勤杂工来说，这等于是把笤帚丢了。不过这对于实习生来说，笤帚也是丢了，因为笤帚掉到地上时，他们三个，两个实习生和勤杂工，全都惊呆了，他们心想，这下子准是让布鲁姆费尔德看在眼里了。果不其然，布鲁姆费尔德在他那窗洞口抬起眼睛，仿佛他现在才变得警觉起来似的，他用严厉的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每一个人，连地上的那把笤帚都不放过。兴许是这沉默延续得太久了，要不就是因为那位肇事的实习生抑制不住要扫地的欲望，总之，他弯下了腰，当然是极其小心翼翼地，好像在捕捉一头动物不是在抓笤帚似的拿起笤帚，用它扫起地来。但他一见到布鲁姆费尔德跳起身来，并从工作间走出来时，便立即惊恐地扔掉笤帚。“两个人都干活去，不许再瞎闹！”布鲁姆费尔德吼道，一边伸出手指着那两个实习生，要他们回到斜面桌跟前去。他们立即听从了，但他们不是羞愧地低着头，而是直挺挺地旋转着身子从布鲁姆费尔德的身旁过去，一边还盯着他的眼睛，仿佛想以此来阻止他打他们。他们若能凭过去的经验就完全可以知道布鲁姆费尔德原则上从来不打人的。但他们过于胆怯，体会不出来，因此总想维护他们那些或真实或虚假的权利。

张荣昌 译

桥^[12]

我既僵直又冰冷，我是一座桥，跨卧在一条深涧上。这边是脚尖，那边是双手，都探伸入地里，松碎的黏土将我牢牢地咬住，我的上衣的下摆在我的两肋飘动。在我身下很深的地方，哗哗地流淌着那条盛产鲑鱼的冰冷的溪流。登山旅游者谁也不会误入这不能通行的高处，因为这座桥在地图上还没有标出来。——我就这样静卧着，等待着；我必须等待。一座桥一旦建造起来，只要不倒塌，它就始终是桥。

有一次，将近傍晚的时候——是第一天，还是第一千天，我说不清楚——我的思想总是混乱，总是打转转。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溪流的潺潺声渐变深沉，我听到了一个人的脚步声！向我走来，向我走来。——伸展你的身躯吧，桥，行动起来吧，没有栏杆的板梁，托住这位信赖你的人吧。要是他的脚步不稳，你就悄悄地让它保持平衡，而要是他步履蹒跚，你就公开自己的身份，像一位山神那样把他猛地抛到对岸。

他来了，像是进行体检似的，用他手杖的铁尖叩击我的身体，然后又用它挑起我上衣的下摆，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到我身上。他把手杖的铁尖插入我浓密的头发，也许是由于他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的缘故，竟把它留在里面好长的时间。然后——我正梦想着跟随他越过高山峡谷——他双脚一跳，跳到了我身躯的当中。我顿感周身剧痛，战栗不已，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谁啊？一个小孩？一场梦？一个拦路抢劫者？一个自杀者？一个诱惑者？一个破坏者？于是，我转过身来想要看看他。——桥还会转身！可是，不等我转过身来，我已经跌落了下去，我坠落了，眨眼间，我断裂开来，一头扎在那些尖利的石头上，这些岩石一向从奔腾不息的水中探出头来，安详地往上凝视着我。

洪天富 译

猎人格拉胡斯^[13]

两个男孩坐在码头的围墙上掷骰子。一个男子坐在一座纪念碑的台阶上，在那挥舞着马刀的英雄投下的阴影下读报。井边有位姑娘正在把水打进自己的水桶。一个水果小贩躺在他的货物旁边，望着湖面。在一家小酒店的深处，透过门窗的漏孔可以看到两个汉子在喝葡萄酒。店老

板坐在前面的一张桌子旁打盹。一只小船像是被人在水面上抬着似地，轻轻地、晃晃悠悠地漂进了小港。一个身着蓝色工作外套的汉子登上岸，用铁环拖拉缆绳。另外两个身穿缀有银纽扣的深色上衣的汉子，抬着一副担架，跟在水手长的后面，担架上，在一条饰有流苏的大花绸巾下面显然躺着一个人。

码头上谁也不去管这些新来的人，甚至在他们放下担架、等候还在忙于系缆绳的船主的时候，也没有人走向他们，没有人走上去问一问，更没有人仔细地瞧瞧他们。

这时，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出现在甲板上，怀中抱着个小孩。船主还被她耽搁了一会儿。随后，他赶了上来，指了指左边一所临湖而立的黄色三层楼房。那两个抬担架的汉子重新抬起担架，穿过一道低矮、但由细柱子构成的大门。一个小男孩打开了一扇窗户。那由黑色橡木精心镶成的大门此时也紧紧地关上了。一群在这之前一直绕着钟楼飞来飞去的鸽子，现在飞落在楼房的前面。它们聚集在大门前面，仿佛屋里贮藏着它们的食物似的。一只鸽子飞到了二层楼，用喙啄窗子上的玻璃。这是些长着浅色羽毛、饲养得很好、活泼可爱的小动物。那位从小船里走出来的妇女，使劲地向它们抛撒谷粒，它们先是啄食地上的谷粒，然后又朝她飞去。

有好多条狭窄而又向下大为倾斜的小巷通向码头。一位头戴饰有黑纱的大礼帽的绅士模样的男子，从其中的一条小巷里走来。他凝视自己的周围，对一切都感到忧心忡忡，看到一个角落里垃圾狼藉的时候，他的脸都变了样。纪念碑前的石阶上丢着果皮，他经过的时候，用自己的手杖把这些脏物推了下去。他来到了那幢楼前，敲了敲房门，一边把礼帽摘下来拿在戴着黑手套的右手里。门顿时打开了，约莫五十个小男孩在长长的过道里组成夹道欢迎的行列，向这位来者鞠躬致意。

水手长走下楼梯，欢迎这位先生，并领他上楼去。在二楼上，水手长带着他绕过四周是结构简单、装饰精巧的凉廊的院落，走进屋子后侧一间既凉快又宽敞的房间，这时候，孩子们怀着敬畏的感情，拉开一定的距离，簇拥在他们的身后。在这屋子的对面再也看不到别的房子，只看到一面光秃秃的黑灰色石壁。抬担架的那两个人正忙着在担架靠头的地方竖起几只长长的蜡烛，并将其点燃。然而蜡烛并没有因此产生亮光，却只惊动了那些先前安息在这里的幽灵，它们一闪一闪地在墙上跃动，盖在担架上的绸巾被掀开了，下面躺着一个男人，头发和胡子像野

地里的杂草一样，乱糟糟地长在了一起，皮肤黝黑，看上去像是个猎人。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紧闭双目，似乎毫无气息。但是，尽管如此，只有周围的环境表明他可能是个死人。

那位先生走向担架，把一只手放到躺着的人的额上，然后跪下来祈祷。水手长示意担架的运送者离开房间。他们走出房间，赶走了那些聚在外面的儿童，并随手关上了门。可是，那位先生还觉得不够安静，他瞪了水手长一眼，后者明白他的意思，就从侧门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担架上的那个汉子立刻睁开眼睛，苦笑着把脸转向那位先生，问道：“你是谁？”那位跪着的先生站起身来，毫不惊讶地答道：“里瓦^[14]市市长。”

担架上的那汉子点了点头，有气无力地伸出手臂指了指一张沙发椅，在市长应他邀请坐下来之后，又说：“这我早就知道，市长先生。不过，在最初的时刻我总是忘了一切，我头脑有些糊涂，所以，即使我什么都知道，还是要问一问，这样会更好一些。也许您也知道，我就是猎人格拉胡斯。”

“当然当然，”市长说，“昨天夜里，我就接到您要来这里的消息。那会儿我们早睡了。快到半夜时分，我妻子突然大声喊道：‘萨尔瓦多，’——这是我的名字——‘你瞧窗户上有只鸽子！’确实是只鸽子，但大得像只公鸡似的。鸽子飞到我耳边对我说：‘明天已故的猎人格拉胡斯要来，你以全城的名义接待他吧。’”

猎人点点头，把舌尖伸出嘴唇：“是的，这些鸽子比我先飞来了。不过，市长先生，您认为我该留在里瓦市吗？”

“这我还不能说，”市长答道，“您是死了吗？”

“是的，”猎人说，“就像您现在看到的一样。许多年以前，可不是，这肯定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在黑森林^[15]——那是在德国——追捕一只羚羊，从一处悬崖上摔了下来，从此以后我就死了。”

“可您现在还活着呐。”市长说。

“在一定程度上，”猎人说，“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活着。我的死神之舟迷了航，也许是转错了舵，也许是驾驶员一时心不在焉，或者让我家乡的美景转移了注意力，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却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留在了世上，而我的小船却从此航行在尘世的河流上。就这样，原

来只想生活在山区的我，死后竟周游世界各国。”

“这样说来，天堂里并没有您的份儿？”市长皱着眉头问道。

“我，”猎人答道，“我总是处在通向天堂的大阶梯上。我就在这漫无边际的露天台阶上游荡，忽上忽下，忽右忽左，始终处在运动中。我从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您别见笑。”“我没有笑。”市长辩解说。

“这很明智，”猎人说，“我一直在运动着。可是，每当我使出全身的劲儿往上腾跃、天国的大门已向我闪闪发光时，我就在我那只停泊在尘世某一条河流里的旧小船上苏醒过来。我那次的死是一次根本的错误，它正在我的舱房里对我发出狞笑。船主的妻子尤丽娅又会敲门进来，把我们的船正驶经的国家的早晨饮料送到我担架跟前。我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穿着——观察我这模样并非是件愉快的事——一件肮脏的尸衣。又灰又黑的头发和胡须乱糟糟地绞在一起。我的双腿上盖着一块印有花纹、边缘上饰有长长的流苏的女用大绸巾。我头顶的上方点着一支教堂用的蜡烛。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小画，显然是非洲西南的布须曼人，正用他的矛瞄准着我，他本人却尽可能地在画得很好的盾牌后面躲藏起来。在船上你经常能看见一些无聊的图画，而这是最无聊的画中的一张。否则的话，我那木笼子里便什么也没有了。南国夜晚的暖风从侧壁上的舷窗吹了进来，我耳边响起了海水拍击旧船的声音。

当我还是活猎人格拉胡斯的时候，我在老家黑森林山上追捕一只羚羊，不小心从山崖上摔了下来，从那时候，我就一直躺在这里。一切都按顺序发生：我追赶羚羊、坠下山崖、在峡谷里流尽鲜血、然后死去；这只小船本来是送我到彼岸世界的。我记得，我头一次伸展四肢躺在这木板上是多么地开心啊！群山还从未像这四堵当时还是半明半暗的板壁一样听我唱过歌呢。

我曾愉快地活过，也曾愉快地死去，在登上这只小船之前，我高高兴兴地扔掉了那个装有罐头、袋子和猎枪的破包，这破包我已往总是骄傲地把它背在身上。我迅速穿上那件寿衣，就像一位姑娘穿上结婚礼服一样。我躺在这儿，并且等待着。后来就发生了这桩不幸的事。”

“一种噩运，”市长举了举手，表示拒绝地说，“难道您在这方面丝毫没有过失？”

“没有，”猎人说，“我生前是个猎人，难道这也是一种过失？我被提

名为黑森林地区的猎人的时候，那会儿山里还有狼群出没哩。我埋伏，开枪射击，命中目标，剥下狼皮，难道这是一种过失？我的工作受到大伙儿的祝福，被授予‘黑森林地区的伟大猎手’的称号。难道这也是一种过失？”

“我没有受命对此做出评判，”市长说，“我也觉得，您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过失。可是，究竟是谁错了呢？”

“船主错了，”猎人说，“谁也不会去读我在这儿写的东西，谁也不会来帮助我；就算把帮助我作为一项任务定下来，家家户户的门仍然长期地关闭着，大家都躺在床上，用被子紧蒙着头，整个大地就像深夜里的一家小客栈。这很有意思，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谁知道我；即使有谁知道我，他也不会知道我住在何处；即便有人知道我的住处，他也无法在那儿抓到我；所以，他也不知道如何帮助我。想帮助我的念头是一种疾病，一种必须卧床治疗的疾病。

这我知道，所以没有呼救，即使是在某些瞬间——比方恰好是现在，我已控制不住自己——我非常想大喊大叫要人来帮助。但是，如果我环顾四周，想起了我现在在何处——我也许可以这样断言——想起了我几百年来住在什么地方，这就足以使我打消喊叫的念头了。”

“了不起，”市长说，“了不起。——那么，现在您想留在我们里瓦市吗？”

“我不想。”猎人微笑着说，同时把手放到市长的膝盖上，以减轻话语里的嘲讽意味，“我在这儿，更多的我就知道了，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一点。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从冥府最深处吹来的风行驶。”

洪天富 译

中国长城建造时^[16]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相联结。这种分段修建的办法在东西两支劳动大军的内部也以小的规模加以实行。方法是：二十来个民工为一小队，每队担负修建约五百米长的一段，邻队则修建同样长度的一段与他们相接。但等到两段城墙联接以后，并不是接着这一千米的城墙的末端继续施工，而是把这两队

民工派到别的地段去修筑城墙。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它们是渐渐地才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在长城已宣告竣工之后才补全。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它可能仅仅是围绕长城而产生的许许多多传说之一，由于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凭自己的眼睛用尺度来验证这种说法的，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

人们一开始就会这样认为的吧，建造长城时把它联成一气，或者至少在两个主体部分之内联成一气，这从哪方面说都是更为有利的。众所周知，长城之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但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这一段段城堞孤零零地矗立于荒无人烟的地带，会轻易地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摧毁，尤其是这些游牧民族当时看到筑墙而感到不安，便像蝗虫一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辗转迁徙，因此他们对于工程的进展有可能比我们筑墙者自己还要看得清楚。尽管如此，建筑的方法除了现在这个样子也许没有别的途径可想。为了理解这点，必须考虑下列各点：长城要起几百年的防御作用；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的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挣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此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须有深切的领会。工程越大，则要求越高。这样的人事实上都在应命，尽管数量不敷工程的需要，但数目确实很大。

这项建筑不是草率动工的。在破土前五十年，在整个需要围以长城的中国，人们就把建筑艺术，特别是砌墙手艺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了，一切其他技术，只要与此有关的，一概加以赞许。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孩提时候，两脚刚刚能站稳，就在老师的小园子里，被命令用鹅卵石建造一种墙。记得当时老师如何撩起长袍，朝这堵墙冲来，当然一切都推倒了，由于我们的墙造得太单薄，他把我们训斥得这样严厉，以致我们号哭着四散跑回父母的身边。这件事的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很能反映那时的时代精神。

我很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通过初级学校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谓之幸运，因为有许多人当年在自己所称心的课程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却常无法施展他们的知识，他们头脑里有最宏伟的建筑蓝图，却一筹莫展，久而久之，知识也大量荒疏了。那些

好容易当了施工领班的人，哪怕是最低一级的，到了工地，也觉得是值得的。那是一些泥水匠，他们对于工程已经考虑得很多，并且还继续不停地考虑下去。是他们让人在墙基上放下第一块石头，他们以此感到自己和长城互为一体了。自然，这样一些泥水匠除了渴望着把工作彻底完成外，也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长城最后以完美无缺的面貌诞生。民工是不会有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的，他们只管拿工资，那些高级领班，甚至是中级领班眼看工程多方面进展也足令他们精神上为之一振了。但对于那些基层的、精神上远远超过他们表面上那微小的任务的领班人员，就得事先为他们考虑到别的情况，譬如你不能让他们在一个离家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山区，经年累月，一块接一块地往墙上砌石头；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因此之故人们采取了分段建造的办法。五百米长城约在五年内可以完成，然后那些领班们通常已经精疲力竭，百无聊赖，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信心。因此，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城会合的兴奋之中时，就已经被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旅途上他们看到一段段完工的长城突兀而起，经过上级领队们的大本营，接受了勋章，见到了从深谷下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见到树林被砍伐，以用于施工的脚手架，看到山头被凿成无数的砌墙的石块，看到虔诚的信徒们在圣坛上诵唱，祈祷长城的竣工。所有这一切慰平了他们的烦躁情绪。在家乡过了一些时候的安闲生活，使他们养精蓄锐，每个建筑者所拥有的威望，他们的报告在邻里间所获得的信任，那些质朴、安分的老乡对长城有朝一日完成的确信不移，所有这一切把心灵的弦又拉紧了。于是，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他们告别了家乡，重返岗位，为民众事业效劳的欲望又变得不可遏止了。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的乡亲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群，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因此，分段而筑的办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此外还有别的理由。我对这个问题这样久久不肯放过，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此乃整个长城建筑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初看起来无足轻重。如果我要把当时的思想和经历介绍出来的话，我恰恰对这一问题不能追究到足够的深度。

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当时长城所完成的业绩，比起巴贝尔塔^[17]的建筑毫不逊色，显然，天意也，至少根据人类的计算，它与巴贝尔塔的建筑完全相反。我之所以提及这点，因为在该建筑动工之初，有一位学者写了本书，对这两项建筑作了详尽而精确的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贝尔塔之所以没有最后建成，绝不是由于大家所说的那些原因，或者至少在这些公认的原因中没有最重要的那几条。他的论证不仅依据文字记载，而且据称他还做了实地调查，并且发现，巴贝尔塔的倒塌在于基础不牢，因而必然失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时代远胜于古代。今天，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门的泥水匠，在打基础方面是不会有错失的。但这位学者却根本不朝这个方向去论证，而是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贝尔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先筑长城，而后才建塔。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但我承认，我至今仍然不甚明白，他是怎样设想那座塔的建造的。长城连一个圆圈都没有形成，而不过是四分之一或者半个圆圈，难道这就可以作为一座塔的基础了吗？这只能从精神角度去理解。然而，长城又是为了什么呢？它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为什么在那本著作中要写上那座塔的计划——显然是迷雾一般的计划——和一个个具体的建议：即应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强大的新的工程？

那时候，人们头脑中充满许多混乱的东西，这本书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之所以这样，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想把这样多的可能性都汇集到一个目的上。人的本质说到底还是轻率的，天性像尘埃，受不了束缚；如果他自己束缚起来，不久便会疯狂地猛烈挣脱束缚，把长城、锁链以及自身都扯得粉碎。

很可能，这些对建造长城甚至是相悖的考虑，主事者们在决定分段而筑的时候，并非没有顾及到。我们——我在这里以许多人的名义讲话——实际上是在——研究了最高领导的命令以后才认识了自己本身的，并且发现，没有上级的领导，无论是学校教的知识还是人类的理智，对于伟大整体中我们所占有的小小的职务是不够用的。在上司的办公室里——它在何处，谁在那里，我问过的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转动，而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但透过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画的那些计划之上。

因此，公正的旁观者并不认为，领导者要是真的愿意，他们对构成

长城连贯而筑的那些困难会克服不了。所以结论只能是：分段而筑乃领导者有意为之。可是，分段而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实际意义。如果结论是：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的话——奇妙的逻辑！——一点不假，而且他们还从其他方面为自己找理由。今天谈论这些事也许不会有危险了。当时许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个秘密的原则：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一旦到达某种限度，就要适可而止，进行思考。这是一条十分明智的原则，在尔后经常重复出现的比较中，它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不要因为有害于你，就停止进一步思考，而且谁也没有把握说，将来一定会有害于你。这里根本不能说有害，也不能说无害。事情之于你，犹如春天之于河流。河流在春天里上涨着，变得更强大，更有力地肥沃着两岸的土地，并且获得它固有的本质，以一条真正的河流的面貌继续注入大海，因而在大海眼里它与别人的身份更平等了，也更受大海的欢迎了。——你要把领导者的指令思考到这个程度。——但接着，河流泛滥于两岸，失去了它的轮廓和面貌，减慢了它的流速，违背它自己的本质，在内陆形成一个个小海洋，毁坏一片片农田，但是这种扩展并不能持久，然后又重新涌回岸内，甚至至于到了跟着来的炎热季节干涸枯竭，一片惨状。——你不要把领导的指令思考到这个地步。

当年，在建筑长城期间，这个比方也许是格外恰当的，但对于我现在的学术报告来说，它只有有限的价值。我的考查仅仅是历史性的；从早已消逝了的雷雨云层里已经发不出闪电了，因此我可以寻找一种分段而筑的说明。这个说明要比当时人们借以满足的那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思考能力的界限是够狭小的，但这里需要驰骋的领域却是无限的。

万里长城是防御谁的呢？防御北方民族。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那里没有北方民族能威胁我们。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他们，他们本性中所具有的残忍使我们坐在平和的树阴下喟然长叹。我们在艺术家们真实描绘的图画上，看到那一张张狰狞的脸面，张得大大的嘴巴，长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像是已经瞄中了猎获物，马上要抢来供嘴巴撕裂、咬啮似的。要是孩子撒泼，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图画，于是他们吓得边哭边往你怀里躲。但是，关于这些北方国家，除此之外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从未见到过他们，假如留在自己村子里，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径直追赶我们，——国土太大了，没等到追上我们，他们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离乡背井，辞别双亲，离开饮泣的妻子，待学的孩儿，开到遥远的城市去受训，我们的思想甚至飞到北方的长城？为什么呢？去问首领吧。他们了解我们，他们，心头翻江倒海，忧虑重重，他们懂得我们，懂得我们卑微的营生，看见我们大伙一齐坐在低矮的茅屋里，看见家父傍晚时分的祈祷，也许高兴，也许不高兴。如果允许我对领导阶层发表这样一种看法的话，那么我得说，领导阶层早就存在了，他们聚集到一块，不是像那些高级官吏，由于一场美好的晨梦的激发而心血来潮，匆匆召集一次会议，又草草做出决议，当晚就叫人击鼓将居民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哪怕是仅仅为了搞一次张灯结彩，以欢庆一位昨天对主子们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灯一灭，就立刻把他们驱赶到黑暗的角落里去。与此不同，领导阶层确实是古已有之，而造长城的决策在那时就定下来了。那些天真的北方民族，他们还以为这是为了他们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无辜的皇帝也以为那是他下令造的。关于建筑长城之事，我们所知并非如此，并且保持缄默。

在当年建筑长城期间和自那以后直至今天，我几乎完全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有一些问题可以说非用这个方法搞不透彻——并且发现，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研究它们的原因，尤其是后一种现象的原因，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吸引力，今天仍然如此，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也是跟这些问题相关的。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当然，在京城，就是说在朝廷范围内对这个问题是有所了解的，尽管也是现象多于真实。在高等学校教国家法和历史的老师也自以为他们在课堂上讲的这些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并能继续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学校的级别越是接近基层，人们便越不怀疑自己的知识，这已成了当然之事，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

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这里我当然只能还谈我的家乡。除了神晁和那一年到头如此富有变化而好看的祭神仪式外，我们想到的就是皇帝。但不是当前的皇帝，或者倒不如说，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皇帝，或者对他有所了解的话，我们本来就已经想到他了。我们唯一的新奇之处

是，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想在这件事上打听到某种情况，可是说来也怪，几乎不可能打听到任何事情，向走过那么多地方的香客打听不到，向远近的村庄打听不到，向那些不仅航行在我们的小溪上，而且也航行在各条圣河上的艄公们也打听不到。诚然，听到的不少，但一件也不能落实。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的。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诚然，卧榻是很宽大的，但也可能是很窄很短。同我们一样，他有时也伸展四肢，如果他很累的时候，也张开他那线条柔和的嘴巴打呵欠。但我们在千里迢迢的南方，都快到达西藏高原了，如何知道这一切呢。再说，纵使有消息抵达我们这里，但已经太晚了，早已失去时效了。皇帝周围总是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仆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奸险的用心，他们抵制君权，总是设法用毒箭把皇帝从轿舆上射下来。君权是不灭的，但皇帝个人是会倒毙的，甚至整个王朝最终也要垮台，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关于这些争斗和痛苦老百姓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他们像迟到者，像初到城市的人站在拥挤的小巷的尽头，安闲自得地嚼着所带的食物，而在前面，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他们的主子正在受刑。

有一个传说对这一状况做了很好的描述：皇帝向你这位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他在弥留之际恰恰向你下了一道谕令。他让使者跪在床前，悄声向他交代了谕旨；皇帝如此重视他的谕令，以致还让使者在他耳根复述一遍。他点了点头，以示所述无误。他当着为他送终的满朝文武大臣们——所有碍事的墙壁均已拆除，帝国的巨头们伫立在那摇摇晃晃的、又高又宽的玉墀之上，围成一圈——皇帝当着所有这些人派出了使者。使者立即出发；他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标志着皇天的太阳；他就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人口是这样众多，他们的家屋无止无休。如果是空旷的原野，他便会迅步如飞，那么不久你便会听到他响亮的敲门声，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他的力气白费一场；他仍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便他通过去了，那也无济于事；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

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即使有，则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但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

同样，我们的百姓对于皇帝既深怀失望，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在学校里许多这样的朝代一个接一个地都学过，可是在这方面普遍是不清楚的，其程度之严重，连最好的学生都未能避免。在我们的各个村子里，早已死去的皇帝，大家以为他还坐在龙位上；新近牧师在祭坛上宣读了一份诏书，而颁发这诏书的皇帝只活在歌谣里。我们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街坊欣喜若狂，带着这新闻奔走相告。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年代过得越久远，这一切情形被渲染得越可怕，一旦村民们得知，几千年前一个皇后如何痛吮她丈夫的鲜血，不禁失声悲鸣。

老百姓就是这样把已往的统治者弄得面目全非，把今天的统治者与死人相混淆。如果有朝一日——一生中只要能遇上一次——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巡视本省，偶尔来到我村，代表当权者发布敕令，稽查税收，检查教学，向牧师询问我们的行为，然后在他上轿之前向聚集来的村民发一通长篇训诫，于是每个人脸上都掠过一丝笑意，悄悄地向旁人递个眼色，弯下身去，与孩子们一起，以便不让当官的察看。有人想：怎么，他讲起一个死人来就像讲一个活人一样，这位皇帝确实早已死了。王朝也已经消灭了，这位官老爷在拿我们寻开心吧。但是我们装做好像什么也没有觉察，以便不得罪他。我们需要认真听从的是现今的长官，因为不这样做那是犯罪。在匆匆离去的钦差的轿子后头，从已经瓦解的骨灰坛中专横地升起一个乡村老爷的形象。

与此相似，我们这里的人通常很少遭遇当代的战争和国家的革命。此刻我想起青年时代的一件事。在毗邻的、但是很遥远的一个省份爆发了起义。原因我已记不起来了。这在现在也并不重要，那里每天都有暴乱发生，那是些很激动的民众。当时有一次，一个途经那个省的乞丐把一张起义的传单带到我父亲的家里。那天正好是节日，宾客挤满了我们的房间，牧师坐在中央，钻研着那张传单，忽然大家都笑了起来，传单

在一片拥挤中被撕得粉碎。那个显然已被大大款待了一番的乞丐，被人推着赶出了房间，大家都开了心，并且跑回去享受美好的节日。为什么呢？原来邻省的方言与我们的基本上是不同的，这在某些书面语言的款式中也看得出来，它们使我们觉得有一种古音古调的特点。几乎没等牧师念上两页，人们已经做了决定了。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弭。记得在我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说出了可怖的生活，但大家却笑着直摇头，什么也不愿听。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来抹杀今天的现实的。

假如有人根据这些现象断定，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皇帝，那么他离真理并不太远。我得反复说：“也许没有比我们南方的百姓更为忠君的了，但是忠诚并没有给皇帝带来好处。虽然在村口的小圆柱上盘曲着一条圣龙，自古以来就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可是对村里的人来说京城比来世还要陌生。难道真有一个村子，房屋鳞次栉比，盖满一片又一片原野，从我们的小冈峦上看去一望无际，并且昼夜都挤满了人的吗？我们难以想象有这样一个都城，难以相信京城和皇帝是一回事，就好比不好理喻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一样。

我们持这样一些看法，结果我们的生活就颇为自由，无拘无束。但这并不是不道德。——然而，这是一种不受任何现今法律管束的生活，它只听从古代留传给我们的训诫。

我并不想以点概面，决不断言我省所有上万个村落甚或全中国所有五百行省的情形都是如此。但也许我可以根据我在这一带所读到的许多文字记载，以及根据我自己的种种观察——特别是在建筑长城的问题上，关于人的材料给了一个敏感者以通晓几乎一切省份的人的灵魂的机会——根据这一切也许我可以说：这些人对于皇帝的看法跟我的家乡的人的看法时时处处都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特征。我绝不认为持这种看法算得上什么美德，正好相反。不错，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应归咎于政府。自古以来它缺乏能力，或者顾此失彼，没有把帝国的机构搞到这样明确的程度，使得帝国最遥远的边疆都能直接地并不断地起作用。但另一方面，这当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着弱点，他们未能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沦中起死回生，并赋予现实精神，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但臣仆的胸脯并不想起更好的作用，不过是感受一下这种接触，让帝国从它胸前消逝。

因此持这种看法并非美德。尤为引人注目的倒是：恰恰是这种弱点

似乎成了联合我们民众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的，如果敢用这句话来表达的话：这种看法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要在这里对一种责难充分阐述理由，据说不仅有违我们的良心，而且——令人气愤得多——我们休想站得住脚。因此之故，对这个问题的考查我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

叶廷芳 译

叩击庄园大门^[18]

那是夏日炎炎的一天。我和我的妹妹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座庄园的大门。我不知道，她是故意地敲门，还是由于心不在焉，还是仅只用拳头威胁它一下，压根儿就没有敲。离庄园数百步远的地方，在向左转的公路旁边，出现一个村庄。我们不熟悉它，但是，就在我们走过第一幢房子之后，看到有人走了出来，他们友好地或告诫地向我们招手示意，自己却惊恐万状，吓得弯下了腰。他们指着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庄园，提醒我们敲击大门的事。庄园主们将要控告我们，调查马上就会开始。我非常冷静，还安慰我的妹妹。也许她根本就没敲，即使敲了，世上没有一处地方会因此传讯她。我试图向我们周围的人们说明情况，他们倾听着，但不做出判断。后来，他们告诉我，不仅我的妹妹，就连作为兄长的我，也将受到指控。我点头微笑。我们大家回头向庄园看去，如同观察远方的一团烟云，等待火焰从中出现。果然，不久我们就看到一群骑兵策马驰入敞开的大门；尘土飞扬，掩盖了一切，只见他们长矛的尖端闪闪发光。这支队伍刚刚消失在庄园里，就又调转马头，直奔我们而来。我催促妹妹赶紧离开，由我独自澄清一切。她拒绝让我独自一人留下。我告诉她，她至少应该换换衣裳，以便穿着更好的衣服去面见这些先生。她终于听我话，便动身回家，踏上遥远的归途。骑兵们已经到了我们跟前，他们就从马上垂问我的妹妹。她眼下不在这儿，我忧心忡忡地回答道，但过一会儿她就会来。对我的回答，他们几乎无动于衷；最重要的看来是他们已经找到了我。他们当中为首的是两位先生：一位法官，这是个机灵的年轻人，和他的沉默寡言的助手，名叫阿斯曼，他们要我走进一家农舍。我一边摇头，一边推了推裤背带，在这些先生锐利的目光监视下，慢慢地开始行走。我还几乎相信，只要说一句话，就足以把我这个城里人从这些农民手里解救出来。甚至还让他们尊敬我。可是，当我跨过这家农舍的门槛的时候，法官已经抢先一步，在屋里等着我，并对我说：“我很同情你。”毫无疑问，他这样说，不是指我目前的

处境，而是指我即将遇到的麻烦。这家农舍看上去更像一间牢房，而不像一家农舍。由大石块铺成的地面，昏暗和毫无装饰的墙壁，在房子某处的墙上，还嵌着一个铁环，房屋正中，是某种半像木板床、半像手术台的东西。

除了监狱里的空气，我还能品尝到别的空气吗？这是个大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只要我还有出狱的希望，兴许能品尝到别的空气。

洪天富 译

邻居^[19]

我的事务完全落在我的肩上。在接待室里，有两位负责打字和管理账本的小姐，在我的办公室里，安放写着字台、钱箱、咨询台、安乐椅和电话，这就是我全部的办公设备。这样可以通观全局，这样可以便于管理。我很年轻，我的生意滚滚而来。我不抱怨，我毫无怨言。

新年过后，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地租下了我隔壁那套面积很小且空着的住房，而我却傻头傻脑地，迟迟没有把它租下来。它也是由一个接待室和一间办公室组成，此外还有一间厨房。——本来，正室和前室对我是很有用处的——我的两位秘书小姐有时候已经感到负担过重——可是，那间厨房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个小题大做的顾虑，导致了我让人拿去这套住房的过错。现在，这个年轻人就坐在那儿。他叫哈拉斯。他到底在那儿干些什么，我不得而知。门上写着：“哈拉斯，办公室”。我做了些调查，有人告诉我，这是一家跟我的公司相类似的公司。关于向他提供贷款的事，人们并不急于向我提出警告，因为他毕竟是个奋发努力的年轻人，他的事业也许很有前途，但是，人们并不建议我给他提供贷款，因为从一切迹象看，他目前并没有任何资产。人们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通常只能提供这些情况。

有的时候，我在楼梯上遇到哈拉斯，想必他总是有急事，他简直是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甚至还没有正面看清过他，他手里总是拿好办公室的钥匙。此刻，他打开了门。他像只耗子尾巴似的溜了进去，而我又站在“哈拉斯，办公室”这块牌子的前面，我不知多少次看见了它，实在不想再看它了。

这些极薄的墙壁，既能出卖诚实肯干的人，也能掩护善于欺诈的

人。我的电话就安装在把我和我的邻居隔开的那堵房墙上。不过，我只把它当做一件特具讽刺意义的事实加以强调罢了。就算它挂在对面的墙壁上，你在隔壁的房间里也会把一切听得一清二楚。我已经戒掉了在电话上提顾客名字的习惯。但是，大脑稍许机灵的人，当然能从那些独特而又不可避免的交谈用语中猜出顾客的名字。——有时，我把听筒贴在耳朵上，诚惶诚恐地踮着脚尖围着电话机直转悠，但这样做，还是防止不了机密泄露出去。

这样一来，我在做商业上的决策时，自然缺乏把握，我的声音开始颤抖。我打电话的时候，哈拉斯在干什么呢？如果我想大为夸张一下，——人们为了搞清楚某事，往往不得不这样做——我会说：哈拉斯不需要电话机，他用我的就行了，他把他的长沙发挪到墙边，仔细地听着，与此相反，每当电话铃响了，我就得朝电话机跑去，听取顾客的愿望，做出重大的决定，做大量说服工作——但是，在整个通话期间，我首先要做的，是不由自主地通过这堵墙，给哈拉斯做报告。

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耐心地等到谈话结束，而是在那段足以使他弄清楚事态的谈话之后，就站起身来，依照他的习惯，无声地快步穿过这座城市，而且，就在我挂上听筒之前，他也许已经开始策划反对我的阴谋了。

洪天富 译

一次日常的混乱 [20]

一桩日常发生的事情：他得忍受一次日常的混乱。

A通过H决定同B做一笔重要的买卖。他到H那儿进行预备性商谈，来回各用了十分钟时间，到家后他为这一特别快的速度而感到自豪。第二天，他又到H那儿去，这次去是为了把这笔交易最后定下来。因为敲定这笔买卖大概需要好几个小时，所以A——大清早就出发了。虽然一切附带情况同前一天的完全相同，至少A是这样认为的，但这次到H那儿他却需要十个钟头。当他黄昏时分疲惫不堪地到达那儿的时候，有人告诉他，B由于未见到A来而大为生气，半小时前赶到A的村子去了，他们本来应该在途中碰头的。有人劝A等一等。但他急于做这笔生意，便立刻动身，匆匆赶回家。这一次，他连蹦带跳，真是一会儿工夫就回到了家。到家后他才得知，B早就已经到了——就在A离开之后；他甚至在房

门里碰到了A，并提醒他那笔生意，但A却说他这会儿没空，得赶紧离开。

尽管A的这一举动莫名其妙，B仍旧待在这里等着A。诚然，他曾多次打听A是否还会回来，可他这会儿仍然还待在楼上A的房间里。A庆幸现在还能见到B，还能向他说明这一切，便跑上了楼梯。就在他快跑到最后一级楼梯时，却绊倒了，还扭伤了筋，疼得几乎晕倒，甚至连喊都喊不出来，只能在黑暗中哀泣，这时他模模糊糊地听到——不知B离他很远，还是紧紧挨着他——B怒气冲冲地跺着脚走下了楼梯，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洪天富 译

杂种^[21]

我有一只奇特的动物，一半像小猫，一半像羊羔。它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但是，到了我的时候，它才发展成为半像小猫半像羊羔的杂种，已往的时候，与其说它是小猫，不如说它是羊羔，如今它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怪兽。它的头和爪取自猫，而大小和形体则取自羊；它的眼睛取自猫和羊，目光狂乱，不安地颤动；它的皮毛柔软，紧贴在身上；它的动作既像猫又像羊，有时蹦跳，有时潜行。它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上蜷缩成一团，不时发出呜呜声；在草地上，它发疯似的乱跑，简直无法抓住它。见了猫，它就逃走，见了羊羔，它就发动进攻。在月夜里，它最喜欢沿着屋檐走动。它不会像猫那样咪咪叫，而且害怕耗子。它能够在鸡舍旁守候好几个小时，却从来没有利用时机去杀害一只鸡。

我用加了糖的牛奶喂它，这非常合乎它的胃口。它通过它那食肉动物的牙齿，大口大口地吮吸牛奶。当然^啰，对孩子们来说，这可是一大奇观。星期天上午是会客时间。我把这只小动物抱在怀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围着我站着。这时，他们提出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例如，为何偏偏只有这样一只动物，为何恰恰是我有了这只动物，是否在它之前已经有了这样一只动物，它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它是否感到孤独，它为何没有生小猫，它叫什么名字等等。对这些千奇百怪的问题，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

我无须费神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无须做更多的解释，只需向他们显示我所占有的东西就够了。有几次孩子们带来了几只猫，有一次他

们甚至牵来了两只羊羔。但是，与他们的预料相反，并没有出现相认的场面。这些动物以它们动物的眼光平静地彼此相望，显然把它们的存在当做神圣的事实共同接受下来。

在我的怀里，这小家伙既不知道惧怕，也没有追捕的欲望。它紧贴在我身上，感到非常惬意。它站在把它抚育成长的家庭一边。这也许谈不上是什么非凡的忠诚，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动物的天性而已，它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无数的姻亲，但也许没有一个血亲骨肉，因此它在我们这里受到的保护，对它来说显然是神圣的了。

有时，它在我的身上嗅来嗅去，在我两腿间钻来钻去，简直不想离开我，弄得我禁不住想笑。它并不满足于自己是羊和猫的杂种，甚至还想成为一只狗。有一次，我在生意场上和一切与生意有关的事情上连连碰壁，再也找不到出路，我心灰意懒地躺在家里的摇椅里——像我这样的情形，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发生——膝上躺着和我形影不离的小动物，当我偶然向下看的时候，发现眼泪正从它那巨大的胡须上滴下。这是它的眼泪，还是我的眼泪？难道这只心灵像羔羊一样纯洁驯良的猫也有人的虚荣心？我从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几件东西，可是这件继承物倒是值得观赏的。

它身上具有两种不安的心绪，猫和羔羊的惶恐不安的心绪，尽管两者截然不同。这正是它感到自己的毛皮太紧的原因。有的时候，它跳到了沙发椅上，紧紧地挨着我，用前腿顶住我的肩膀，把它的嘴和鼻子贴在我的耳朵上，仿佛它想对我说些什么，事实上它已躬身向前，瞧着我的脸，以便观察它的言语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为了讨它欢喜，我装出听懂它的话的样子，然后打起盹来。在这种情况下，它从沙发椅上跳到了地上，跳跳蹦蹦地向四处走开了。

也许屠夫的屠刀对于这只动物将是一种解救，但是我决不会让它落得这个下场，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传家宝呀。所以它得等待，直到它的呼吸自行停止，尽管它有时用人所具有的理智的目光瞧着我，敦促我采取理智的行动。

塞壬们的沉默 [22]

就连有欠缺的、甚至是幼稚的手段，也可以用来救人，下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

为了使自已幸免于海妖塞壬们的诱惑，尤利西斯用蜡把自己的耳朵堵住，并让船员用铁链把自己牢牢地绑在桅杆上。当然，自古以来，所有的旅行者（除了那些从老远的地方就被塞壬们诱惑的旅行者以外）可能也曾这么做过。不过，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办法是毫无用处的。塞壬们的歌声能够穿透万物，而那些被诱骗者的激情一旦爆发出来，就会炸毁包括铁链和桅杆在内的更多的东西。可是，尤利西斯并没有想到这点，虽然他对此或许有所耳闻。他完全相信那一小撮蜂蜡和那一捆铁链，对自己的这些小手段感到一种天真的喜悦，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朝塞壬们所居住的海域驶去。

然而，塞壬们如今有一种比她们的歌声更为可怕的武器，那就是她们的沉默。虽然未曾发生过，但也许可以想象，有人似乎曾经逃脱了她们的歌声，但绝逃不过她们的沉默。可是，世上的人却坚持认为，单凭自己的力量以及从这种力量中产生出的横扫一切的傲慢自负，就可以战胜她们。

事实上，当尤利西斯驶近时，这些强大的歌女们并没有歌唱，或许是她们的相信，只需用沉默就能对付这个敌人，或者因为尤利西斯一心一意只想着蜂蜡和铁链，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竟使她们忘却了所有的歌唱。

可是，尤利西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并没有听到她们的沉默，他相信她们在歌唱，自以为只有他可以避免听到她们的歌声。起先，他匆匆地向她们瞥了一眼，看到了她们扭动的脖子，她们深深的呼吸、泪汪汪的眼睛以及半张着的嘴，但是他却相信，这些都是唱咏叹调所需要的，这些咏叹调他虽然听不见，但却在他的四周慢慢地消逝。但是过了不久，这一切就从他的视线中滑过去了，他的目光凝视远方，塞壬们在他坚定的态度面前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在他最靠近她们的那一刹那，他都不再感知她们的存在。

但是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得美丽——伸直四肢，并且

旋转起来，让那可怕的长发在风中自由地飘拂，在岩石上宽宽地伸展开她们的利爪。她们不想再去诱惑人，只想尽可能长久地捉住尤利西斯那双大眼睛里反射出来的光芒。

如果塞壬们有意识的话，她们当时就会被消灭了。但是，她们并没有被消灭，依旧在那里，只有尤利西斯逃过了她们。

另外，对这个传说还有一点补充说明。据说尤利西斯诡计多端，活像一只狡猾的狐狸，连命运女神都难以看透他的心。也许，虽然人的理智无法理解这一点，他确实发现了塞壬们的沉默，所以他编造了上述的虚假事情，把它作为某种盾牌来对付她们和诸神。

洪天富 译

普罗米修斯 [23]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有四种说法；

第一，他为人类背叛了众神，被钉在高加索的一座悬崖上，众神派鹰鹫啄食他每日新生的肝脏。

第二，身子紧靠着岩崖的普罗米修斯在鹰嘴的不断啄食下痛楚万分，以致日益陷进岩石，直至与它融而为一。

第三，数千年后，他的叛逆行为随着时光流逝逐渐被人遗忘，众神遗忘了，鹰隼遗忘了，他自己也遗忘了。

第四，留下的是那不可解释的山崖。这个传说试图对这不可解释之现象做出解释。由于它是从真实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后必定也以不可解释告终。

叶廷芳 译

城徽 [24]

起初，在建巴别塔[25]的时候，一切还算井井有条；的确，这项工程也许过于庞大，人们太多地考虑到向导、译员、工匠的住处以及道路联络，以至于忘了尚须从事数百年自由的劳动。当时甚至流行着这样一

种看法：无须多少时间，就可以很快地把塔建成；这种看法只要稍许加以夸大，人们定会吓得连地基也不去打。人们是这样陈述理由的：整个计划的核心，只是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一念头。除了这个念头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个想法，一旦人们领会了它的重要意义，便再也不会打消掉；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也就会有将这座塔建造成功的强烈愿望。但是，就这一点而论，人们不必为未来而忧心忡忡，正相反，人类的知识与日俱增，建筑艺术已取得了进步，而且将继续取得进步，一百年之后，我们花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也许在半年里就能完成，而且更好，更耐久。所以，干吗现在就竭尽全力，拼死拼活地干呢？要是能够希望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建成这座塔，这也许还有点意义。但是，这绝不可以指望。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下一代人凭借他们完善的知识，会觉得上一代人的工作不好，会把已经建成的部分拆除，以便重新开始。这样一些想法使得人心涣散，于是，人们更多地关心建造一座工人城市，而很少关心建塔。每个同乡组织都想占有最好的市区，于是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乃至发展到流血的战斗。这些战斗旷日持久；对于首领们来说，它们可是个新的论据：也因为缺乏必要的专注，建塔的事就得非常缓慢地进行，或者宁可在大家缔结和约之后才进行。但是，人们并没有把时间仅仅用在战斗上，在战斗间歇，人们也去美化城市，这样，必然又诱发了新的忌妒和新的冲突。第一代人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往后几代的时间并没有好一些，只是伎俩不断得到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战斗的狂热也与日俱增。需要补充的是，第二代人或第三代人业已认识到建造通天塔的荒谬，但是，由于大家彼此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谁都不愿离开这座城市。

所有在这座城市里产生出来的传说和歌谣，都充满了对一个预言之日的渴望，到了那一天，这座城市将被一只巨大的拳头连续迅击五下而粉碎。所以，这座城市的市徽也是一只拳头。

洪天富 译

海神波塞冬 [26]

波塞冬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伏案计算着。管理所有的海域，使得他的工作十分浩繁。他本来可以随意要他所需要的助手，而且他的确有一大批助手，可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他总是把所有的账目亲自再查看一遍，所以他的助手们对他很少用处。谈不上他喜欢这项工

作，他之所以干它，仅仅因为这是他的一种义务，的确，诚如他所说，他曾多次申请调换一件较为愉快的工作，可是每当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的时候，他总感到不中他的意，还是他目前所担任的职务更适合于他。总之，要为他另找一件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人们毕竟不能派他去主管某个特定的海洋；这是因为，那里的计算工作不少，但更为琐碎，除此之外，伟大的波塞冬毕竟始终只能担任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职务。再说，要是给他提供一个与海洋无关的职位，这个想法就会引起他的反感，他神圣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他古铜般的胸膛就会上下起伏。顺便提一下，人们其实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的抗议；当一个强有力的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别人必须装出对他让步的样子，尽管在这种事情上双方都毫无希望；从来没有人真正考虑过把波塞冬从他的职位上撤换下来，从太古时起，他就被任命为海洋之神，这是无法更改的，只能是这样。

最使他生气的是——这也是引起他对自己的工作不满的主要原因——他听到了人们对他提出的各种意见，例如说他经常手持三叉戟，驾着马车在海潮中巡游。事实并非这样，在这期间，他倒是坐在世界海洋的深处，不停地算账，偶尔旅行到朱匹忒那儿，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打断单调，而且通常总是怒气冲冲，扫兴而归。就这样，他几乎没有察看海洋，只是在匆匆攀登奥林匹斯山的途中，飞快地瞥上一眼，而且他的确从未在海洋里航行过。他常说，他以此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到那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个安静的时刻，就在末日快要来临之前，在检查完最后一笔账目之后，他还来得及做一次快速而短暂的旅行。

洪天富 译

拒绝^[27]

我们的小城并不位于边境，而是远离边境，由于它离边境很远，我们小城的居民几乎没有人去过那儿，要到那儿，不仅得穿越荒凉的高地，还得穿过广阔而富饶的平原。人们只要想象一下这路程的一段，便会顿生厌倦，比这段路更长的旅程压根儿是不堪想象的。沿途还有几座大城市，每座城市都比我们这座小城大得多。十座像我们这样的小城并列在一起，它们的上空还塞进了这样十座小城，但是，这二十座小城加在一起，仍然造不出一座这样巨大而狭窄的城市。就算你在到边境的途中没有迷路，在这些小城里你准会走错路，要避开它们是不可能的，因

为它们的规模太大了。

但是，要是能把这样的距离加以比较的话，它们比到边境的距离还要远，就好比说，三百岁的人比两百岁的人更老，这就是说，从我们的小城到首都的距离，要比到边境的距离远得多。如果说我们有时还能听到有关边境战事的消息的话，那么，有关首都的消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我指的是我们的市民，至于政府官员，他们当然与首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两三个月之后，他们就能从首都得到消息，至少他们是这么声称的。

值得注意的，并且使我一再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小城的居民对来自首都的命令总是默默地服从。几个世纪以来，任何政治变革都不是出自市民的愿望而发生的。在首都，最高统治者相互接替，更有甚者，连历史的王朝都废黜了或者消灭了，一些新的王朝开始了，在上一个世纪里，甚至首都本身也遭到了破坏，一座新的都城在距它很远的地方建立起来了，但是不久，这座新的都城也被毁坏了，旧都又被重建起来，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这座小城。我们的大大小的官吏依然坚守自己的岗位，最高长官从首都派来，次一级的官员至少是外地来的，最低的官员才来自我们当中，这已经成了惯例，我们对此也习以为常。最高长官是税务长，有上校军衔，人们也这样称呼他。如今，他已是一位老人，我认识他已有多年，因为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名上校了。起先，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后来就停滞不前，凭他的军衔，他足以担任我们小城的长官，在我们这里，军衔再高一些似乎就不大相称了。当我设法去拜见他的时候，我看见他正坐在他那幢位于集市广场上的房子的阳台上，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上面的屋顶上飘扬着帝国的旗帜。这阳台很大，有时可以在上面举行小型的军事演习，在阳台的边上，晒着洗好的衣服。他的孩子们，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在他周围玩耍，他们是不允许下到集市广场上去的，那里的孩子们是不配与他们为伍的，但广场毕竟对他们有吸引力，因此他们至少将脑袋从栏杆之间钻出去，当下面的孩子们吵架时，他们也在上面跟着吵。

总之，这位上校统治着这座城市。我想，他还从未向谁出示过一份赋予他这种权力的文件。他大概也没有这样的文件。也许他真的是一名税务官。但这就是一切吗？当了税务官，难道就有权管理其他所有的部门吗？的确，他的职务对国家非常重要，但对市民来说，不见得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市民几乎有这样的印象，仿佛有人在说：“既然你拿去了我

们所有的一切，那么连我们也拿去好了。”当然，实际上他并没有攫取了政权，也并非是个暴君。因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即税务官就是最高的官员，而且上校和我们一样顺从了这个传统。

可是，尽管他不过分强调自己身份地生活在我们中间，他毕竟不是像我们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市民。当某个代表团前来向他请愿时，他就像世界的墙壁一样站在那儿。他身后空无一物，人们想象着在他身后定会发出几声窃窃私语，但这也许只是一种错觉，他毕竟意味着整个事情的结束，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每逢这样的接待，人们十之八九能看到他。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曾目睹了接待的场面。有个市民代表团向他请求一笔政府津贴，因为最贫困的市区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我父亲是位马掌匠，深受市区居民的尊敬，他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把我也带了去。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遇到这种场合，人人都会争先恐后挤去看热闹，人们几乎辨别不出哪些是群众，哪些是代表团。由于这样的接待大都在那个阳台上举行，于是也有不少人从某市广场跑来，借着梯子往阳台上爬，越过栏杆，参与上面的事情。按照当时的布置，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阳台留给这位上校，群众则挤满了阳台其余的地方。有几个士兵在一旁监视，形成一个半圆形站在上校周围。实际上，一个士兵就完全够用了，见了这么几个士兵，大家都感到非常害怕。我完全不知道这些士兵是从哪里来的，总之，是远道而来的，他们彼此非常相像，完全用不着穿军服。这是一些矮小、体格并不强壮、但是很敏捷的人。他们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副简直挤满了口腔的结实的牙齿，和一双略带不安的闪亮的小眼睛。孩子们见了他们这副长相，吓得毛骨悚然，当然，这也是孩子们的乐趣，因为他们一再希望被这些牙齿和眼睛吓一大跳，以便拼命地跑开。甚至连成年人大概也摆脱不了儿童时代的这种惊恐，至少，它继续产生影响，当然，产生这种惊恐，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些士兵讲着一种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方言，而且他们也几乎不能习惯我们的语言，因此，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某种与世隔绝的、难以接近的特质，这也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沉默寡言，严肃认真，固执呆板。他们实际上并不干什么坏事，但是从一个坏的意义上说，他们几乎是叫人受不了的。例如，一个士兵来到了一家商店，买些零星物件，他只靠在柜台上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别人的谈话，也许听不懂，但是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听懂了，他本人一言不发，只是呆呆地望着讲话的人，然后又望着倾听谈话的人，与此同时，他的手一直放在挂在他腰带上的长刀的柄上。这真令人厌恶。人们失去了谈话的兴致，顾客们离开了店铺，当店里人走空了，那个士兵才跟着离开。凡是这些士兵出现的地方，我们生

性活泼的人民群众就会变得鸦雀无声。这一次也是如此。每逢节庆日，这位上校总是笔挺地站着，那双朝前伸出的手里握着两根长长的竹竿。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它的意义大致是：他支撑着法律，法律也支撑着他。虽然每个人都知道，阳台上期望着他什么，但是一上了阳台，人们又都会重新大吃一惊。那一次也一样，那个被推选出来发言的人不想开口，他已经站在上校的对面了，可是他丧失了勇气，他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重新挤回到人群中去了。再也找不到乐意发言的合适人选，尽管有几个不合适的人毛遂自荐。接着是一片混乱状态，于是，人们向各式各样的市民派去了信使——知名的演说者。在这整个期间，上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呼吸的时候胸脯明显地下垂。并不是他呼吸困难，而是他的呼吸十分惹人注意，活像青蛙呼吸一样，只不过青蛙的呼吸总是这样的，而上校此时的呼吸却颇为异常了。我从大人中间钻进去，透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瞧着他，直到一位士兵用膝盖把我踢开。在这当儿，那个原先被指定发言的人聚精会神起来，由两个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了他的演说。他在这次严肃的演说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场惨重的灾祸，不停地微笑着，令人感动，这是一种极其谦卑的微笑，徒劳地想从上校的脸孔上引出某种轻微的反应。最后，他阐述了他的请求，我想，他不过是在请求豁免一年的税款，也许还在请求低价出售皇家森林的木材。然后，除了上校和他身后的士兵和几个官员之外，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深深地鞠躬，并且把这个姿势保持了好一会儿。在这决定性的间歇时刻，那些站在靠阳台边上的梯子上的人，为了避免让人看到，不得不爬下几节梯子横档，而且不时地越过阳台的地板好奇地向四处张望。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这样持续了好一会儿之后，一个小个子官员走到了上校跟前，踮起脚尖，试图凑近上校的脸。上校除了深深地呼吸外，仍然一动不动，只是向凑上来的小个子官员耳语了几句什么，于是小个子官员拍拍手，大家便都直起了腰身。“请愿已被拒绝，”他宣布，“你们可以走了。”一种不容争辩的轻松感在群众中掠过，大家蜂拥而去，几乎没有谁去特别注意一下那位上校，此时，他又完全变成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我只是看到，他的确已经精疲力竭，他松开了手中的竹竿，让它们落到了地面，然后躺倒在由几个官员抱过来的一把扶手椅上，匆匆地把烟斗塞进了嘴里。

这个整个的事件并不是个别的，它的发生带有普遍性。当然，有时小的请愿也会获准，但是，这看上去似乎是这位上校作为一个有权力的个人由他负责做出来的，而且他这样做，必须——当然不是坚决的，而是出于对舆论的考虑——完全对政府保守秘密。因为在我们的小城里，就

我们所能判断的，上校的眼睛无疑也就是政府的眼睛，但是也有所不同，完全理解这种不同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在重大的事情上，市民们总觉得肯定会遭到拒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今，没有这种拒绝，人们反而觉得有些过不下去；此外，前去请愿，接受拒绝，这完全不是一种形式。人们总是精神焕发和严肃认真地前去请愿，又总是从那里折转回来，即使不完全感到振奋和喜悦，也不会感到失望和厌倦。我无须向任何人打听这些事情，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内心里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也无须受好奇心驱使去探究这些事物的关系。

当然，就我观察所及，有某一年龄等级的人是对此不满的，这是一些年龄大约在十七至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也就是说，是一些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对最微不足道的思想、更谈不上是革命的思想的作用完全缺乏预见能力。但是，不满的情绪却悄悄地在他们当中滋生。

洪天富 译

关于法律问题 [28]

我们的法律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们是一小撮统治我们的贵族的秘密。我们深信，这些古老的法律被严格地遵守着，但是，依照人们不知道的法律而让人统治着，这毕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我在这儿所想到的，不是解释这些法律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也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而不是全体人民被允许参与解释法律时所带来的害处。这些害处也许并不十分严重。这些法律由来已久，非常古老，为了解释它们已经做了几百年的工作，而且这种解释也许早已变成了法律本身，虽说对法律的解释至今还一直存在着某些可能的特权，但是它们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此外，贵族显然没有理由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受他们个人利益的左右，以致给我们带来不利，因为这些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为贵族制定的；贵族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法律显然只交到了贵族的手里。当然，这里面有智慧——有谁会怀疑这些古老法律的智慧呢？——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里面同样也有痛苦，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这些虚假的法律，归根结底，也可能只是一种推测出来的东西。法律存在着，而且被当做秘密托付给了贵族，这已形成一种传统，但这仅仅是，也仅仅只能是一种古老的，因岁月而获得信任的传统

而已，因为这些法律的性质也要求对它们的存在进行保密。但是，如果我们老百姓自远古以来就密切注视贵族的这些行为，拥有我们的祖先对这些行为所做的记录，并认真地将它继续写下去，如果我们老百姓能在无数的事实中看出某些能让我们推断出这种或那种历史命运的方针，如果我们试图按照这些经过极其缜密的筛选和整理而得出的结论，为目前和将来做出某种安排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把握的，也许不过是一场智力竞赛而已，因为我们在这里试图猜出的这些法律，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有一伙人确实持有这种看法，他们试图证明，如果存在着什么法律，它只能是这样：贵族的言行就是法律。这伙人只看到贵族的专横行为，他们摒弃民众的传统，在他们看来，民众的传统只会带来微小和偶然的好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会带来严重的害处，因为它给人民一个虚假而骗人的安全感，使他们在事件发生时轻举妄动。这种危害不容否认。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却认为，这害处的原因在于这民间传统还远远不够，所以还须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诚然，它的材料表面上看似非常巨大，但实际上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花上几百年的时间才会使它足够。对目前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昏暗的前景，只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将它照亮，即有朝一日，传统和对它的研究将轻松地叹口气而了结自己的存在，一切又将变得清清楚楚，法律只属于人民，而贵族将会消失。这可不是怀着对贵族的憎恨而说的，根本不是，任何人都没有这样说过。毋宁说我们憎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不配享有法律。这也正是那伙不相信真正的法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伙人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始终如此少的原因，因为他们也充分肯定贵族及其存在的权利。

人们实在只能用一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来表白这一点：一个党，如果它除了相信这些法律以外还拒斥贵族，便会在自己的身后立即招来全体人民，但这样的一个党不会产生，因为谁也不敢拒斥贵族。我们就生活在这把刀子的锋刃上。从前有位作家这样概括地说过：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唯一的、显而易见而又不容置疑的法律就是贵族，难道我们真的愿意从我们身上剥夺掉这唯一的法律吗？

洪天富 译

征兵^[29]

征兵常常是必要的，因为边境战斗从未停止，征兵采取以下方式：

颁布一道命令，要求某城区的全体居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某天某日一律不准外出，务须待在自己的住所里。往往约近正午，负责征兵的那位年轻贵族便出现在城区的入口处，步兵分队，步兵和骑兵，自破晓时分起就已等候在那儿了。这是一个身材细长、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身体虚弱，穿着邋遢，眼神疲惫，心神不定，频频发抖，好像一个打寒战的病人。他谁也不瞧，只是用鞭子——他唯一的装备——做了个手势，几个士兵便与他结伴同行，他走进了第一家住宅。一位熟知本城区所有居民的士兵，宣读这户居民的名单。他们照例全都在家，列成一队，早已站在室内，双目注视着这位贵族，仿佛他们也都变成了士兵。然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这家或那家缺一个人，而且总是缺少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找个借口，更不必说撒个谎了，人人沉默不语，低垂着头，这家人由于不堪忍受这个命令的压力而公然违抗命令，但这个贵族的沉默态度毕竟使他们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个贵族青年发出了一个暗号，简直说不上是点了下头，只有从他的眼神里才能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两个士兵便开始搜寻那个缺席的人。搜查压根儿并不费力。他从不在户外，也从不想逃避兵役，他仅仅是由于害怕才未到场；然而，他之所以不到场，也不是出于对当兵的恐惧，从根本上说，他怕露面，对他来说，这道命令的确太威严，吓得他胆战心惊，靠他自己的力量他是不会走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逃跑，只是躲了起来，要是他听到这位贵族在屋子里，他兴许也会从他藏身的地方蹑手蹑脚地走出来，悄悄地溜到房门口，马上被从屋里走出来的士兵抓住。他会被带到贵族军官的面前，这位贵族双手紧握鞭子——他太虚弱了，用一只手根本干不了什么事——痛打这个想逃避兵役的人。鞭打几乎没有引起大的痛苦，然后，一半由于筋疲力尽，一半由于厌恶，他扔下了鞭子，被鞭笞的人得拾起鞭子，把它递给它的主人。然后，他才允许加入其他人的行列；此外，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被征募。但是，也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更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场的人超出了名单上的人数。例如，屋里多了一个从外地来的少女，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贵族；她从外地来，也许来自乡下，是征兵这件事把她吸引到这里来的；有许多妇女，觉得外地的征兵——家乡的征兵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说来也奇怪，女人屈服于这种诱惑，并不会看作是一种耻辱；相反地，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妇女们的一门必修课，是她们为自己的性别所偿付的一笔债务。事情发生的经过也总是很相似的。某某少女或某某女人听说某个地方，兴许离得很远，在她的亲戚或朋友那里要举行征兵，她便请求家人准许她做一次旅行；她得到了

同意，这种事情可是不便拒绝的；她穿上自己最美最好的衣裳，比平时显得更加高兴，但同时又显得镇静和亲切，不管她在别的时候表现如何；然而在镇静和亲切的后面，她又是难以接近的，如同一个正在返回自己的故乡的完全陌生的女人，此刻想不到别的什么事。在征兵即将进行的那一家里，她受到了不同常客的接待，大家都对她奉承拍马，她得穿越家里的所有房间，从所有的窗户向外探望，如果她把手放到谁的头上，其意义胜过父亲的祝福。当这个家庭准备应征的时候，她得到了最好的位置，紧挨着宅门，她在那儿既可以最清楚地看到那位贵族，也能够被他最清楚地看到。但是，只有当那位贵族进屋之时，她才能享受到这份殊荣，此后，她便像开败的花朵一样，完全被人委弃了。他对她和对其他人一样不屑一顾，即使他的目光落到谁身上，那个人也感觉不到自己受到了注视。这是她所不曾料到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她肯定已经预料到了，因为情况只可能是这样；但是，也不是这种相反的预料把她驱赶到这里来，而是现在业已结束的那桩事情。她感到无比的羞愧，这种羞愧也许是我们的妇女以往从未感到过的；仅仅此刻，她才真正意识到，她是争着来参加一次旁人的征兵的；当士兵宣读名单的时候，并没有读到她的名字，片刻寂静之后，她战战兢兢地弯着腰逃出了大门，背上还挨了士兵的一拳头。

假使多余的是个男人，那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同其他人一道应征，尽管他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但这也是毫无希望的，从来也没有一个多余的人被征去当兵，也将绝不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

洪天富 译

考试^[30]

我是个仆人，但在主人的家里却无事可做。我向来胆小怕事，不喜欢出风头，甚至怕跟别人挤在一块儿，但这只是我无事可做的一个原因，也有可能，这和我的无事可做毫无关系，总之，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喊我去做事，别的仆人曾被喊过，但他们还不如我，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的确，他们甚至没有被喊去做事的愿望，而我呢，至少在某些时候，这种愿望却非常强烈。

因此，我躺在仆役住的房间的木板床上，两眼向上，凝视着屋顶的房梁，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又醒来，但很快又睡着了。有的时候，我

走进对面的酒店，要了一瓶酸啤酒，有的时候，我讨厌这种啤酒，索性把它从瓶子里倒掉一杯，然后又继续喝下去。我喜欢坐在酒店里，因为从那扇关着的小窗后面，可以看到对面我们房子上的那些窗子，而不会被人发现。然而，从那里看出去，并不能看到好多东西，我猜想，临街的地方，只是过道的几扇窗子，而且并不是通向东家住房的那些过道的窗子。一次，不等我发问，有个人就断言，我也许弄错了，从房子前部总的印象来看，他的看法一点儿也不错。这些窗子很少被打开，若是打开了，那肯定是某个仆人干的，那时他很可能正凭栏俯视。因此，这些走廊便成了他悄悄地享受快乐的地方，因为谁也不会突如其来地发现他。顺便提一下，我并不认识这些仆人，他们经常在楼上干活，睡在别的地方，而不在我的房间。

有一次，当我走进酒店，便发现有位顾客已经坐在我那观察位置上。我不敢仔细地朝他看，正想立即转身，离门而去。但这位顾客却叫我走近他，原来他也是一位仆人，我过去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但至今还没有跟他说过话。

“你干吗要跑开？坐下来跟我喝上一杯吧！我付钱。”于是，我坐了下来。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但我答不上来，我甚至听不懂这些问题。因此，我说：“你现在也许后悔不该邀请我，那么我最好还是走吧。”于是我准备起身。然而，他从桌面伸过手来，将我按下，并且说：“待着吧，这只不过是一次考试。谁回答不出问题，就算通过考试了。”

洪天富 译

陀螺^[31]

有位哲学家经常在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闲荡。只要看到一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只陀螺，他就焦躁地暗中等候。陀螺刚一旋转起来，这位哲学家便盯住它，以便将它捉住。孩子们大吵大闹，试图不让他靠近他们的玩具，但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只要他在陀螺仍在旋转的时候抓住它，他就感到非常的快乐，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工夫，然后他把陀螺扔到地上，走开了。因为他认为，对任何小事，比如对一只旋转着的陀螺这件小事的理解，就足以理解所有的事物。所以，他不致力于研究大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很不经济。只要真的认识了芝麻大的小事，那就等于认识了一切，所以，他只研究这只旋转着的陀螺。只要有人准备使这只陀螺

旋转起来，他就有成功的希望，而一旦陀螺旋转起来，他就气喘吁吁地跟在它后面跑，于是希望变成了现实，然而，当他用手抓住这块不会说话的木头的时候，他却感到恶心，孩子们的呼喊——直到现在，他还不曾听见——此刻却强烈地传入他的耳朵，并把他赶走；他就像一只被笨拙的鞭子抽打着的陀螺，踉踉跄跄地走开了。

洪天富 译

回家 [32]

我回来了，我穿过门厅，向四周看了看。这是我父亲去住过的农家院落。院子中间有个小水坑。破旧的、不能再用的农具，交错地乱堆在一起，堵住了通向顶楼楼梯的道路。那只猫潜伏在楼梯的扶手上。那块曾被我缠绕在一根棍子上用来玩耍的破布，在空中随风飘扬。我到家了。谁会接待我呢？谁会在厨房门后等我呢？烟囱里冒出烟，晚餐用的咖啡正在沸腾。你感到亲切，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吗？我不晓得，我心里很不踏实。这是我父亲的房子，但是，一幢幢房屋冷冷地靠在一起，仿佛每一幢房屋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至于它们忙些什么，有的我忘记，有的我从来就不知道。尽管我是我父亲——那个年老的农夫的儿子，但我能对它们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不敢敲厨房门，只是从远处谛听，只是站得远远地谛听，以免作为窃听者被人撞见。由于我从远处谛听，所以什么也偷听不到，只听到一声轻微的钟声，或者以为是听到了它，这也许来自我童年的那些日子。至于厨房里正发生些什么，这是坐在里面的那些人的秘密，他们正对我保守着那个秘密。你在门前踟躅得越久，你就越发成了陌生人。如果此刻有人打开门，问我一下，那将会是怎样的呢？我自己会不会也变成一个希望保守自己秘密的人呢？

洪天富 译

代言人 [33]

很难肯定，我是否有过代言人，有关此事的详情，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厌恶的表情，大多数迎面朝我走来的人，和我经常在过道上遇到的人，看上去就像一些年老体胖的妇女；她们系着遮住全身、色调深蓝和白色的带条纹的大围裙，抚摩着肚子，笨拙地来

回转动着。我甚至无法知道，我们是否在法院大楼里。有些情况说明是，许多情况则说明不是。撇开所有的细节不谈，法院里最令我想起的是一种雷鸣般的嗡嗡声，这声音来自远方，不绝于耳，谁也说不清楚，它来自哪个方向，总之，它充满了每个房间，使人觉得它来自四面八方，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你偶然所站的地方，恰恰就是发出那嗡嗡声的地方，但这无疑是个幻觉，因为它来自远处。这些走廊狭窄，通通盖有拱顶，逐渐地向前蜿蜒，配有几扇稍加装饰的高高的门。看来，是专为幽静而设计的，它们是博物馆或图书馆的走廊。然而，如果它不是法院，我为何要在这里努力寻找一位代言人呢？由于我到处寻找一位代言人，所以到处都需要他，的确，与其说在法庭里需要他，不如说在别的地方需要他，因为法庭是根据法律做出自己的判决的，假定它在这时办事不公或草率行事，就会草菅人命，所以，人们得信任法庭，相信它会自由地运用威严的法律，因为这是它唯一的任务，但是，就法律本身而言，一切就是控告、辩护和判决，任何个人的干预在这里都将是犯罪。不过，对于判决所依据的（犯罪行为的）事实构成，则又当别论了，这个事实构成根据这里和那里、从亲戚和陌生人、从朋友和仇敌、在家庭和在社会中、在城市和乡村里，简言之，到处所做的调查。在这方面，迫切需要找到代言人，大量的代言人，最好的代言人，一个接一个地，这无异是一道活的墙壁，因为代言人天生就很不机灵，而那些起诉人，个个都像狡猾的狐狸，他们像黄鼠狼那样敏捷，像小老鼠那样让人看不见，他们溜过最狭小的裂缝，在代言人的腿间无声地穿行。所以要小心哪！这正是我到这里搜寻代言人的原因。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只有那些年老的妇女不断地来来往往；如果我不是在搜寻，我就会昏昏入睡了。我没有找对地方，唉，我就是无法摆脱我没找对地方的感觉。我应该到形形色色的人聚会的地方去，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来自各阶层和各种行业，而且年龄各不相同，我应该有个机会，从人群中慎重地选出几个合适的人，几个能理解并同情我的人。这样的地方最好莫过于大的年市。但我不在那里，而是在这里的走廊里无所事事地闲荡，只能见到这些老太太，而且只是她们当中的几个，而且总是那么几个，但是，就连这少数几个，尽管头脑迟钝，也不愿为我提供帮助，而是从我身边一闪而过，像雨云一样地飘走，完全忙于只有她们才知道的事情了。我为何不读一读门上的题词，就冒失地匆匆走进这幢房子呢？反正，我已经在这些走廊里，而且那么执拗地待在这里，以致忘了我曾经到过这幢房子的前面，曾经跑上过楼。但是，我绝不回头。因为走回头路意味着耽误时间，意味着承认误入歧途，这会使我不堪忍受的。你说

呢？在这短暂而仓促、伴随着焦急不安的嗡嗡声的生涯里，就这样跑下楼去吗？这是不可能的。属于你的时间非常之短，如果你失去一秒钟，你就已经失去了你整个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不会更长久，它总是恰如你失去的时间一般长。所以，一旦你开始走上了一条路，就应该继续走下去，无论如何也要走下去，你只会获胜，而不会冒危险，也许最后你将坠毁，但如果你刚迈出几步就回头跑下楼去，那么你一开始就已经坠毁，而且不是什么也许，倒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如果你在这里的走廊里什么也没有找到，那么就打开房门吧；如果你在这些门后面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么还有新的楼层呢；如果你在上面这些楼层里什么也没有发现，千万别着急，只需跃上新的楼梯。只要你不停止攀登，楼梯也就不会停止，在你攀登的脚下，它们正向上增长。

洪天富 译

一条狗的研究^[34]

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现在，每当我回首往事，回想起我作为狗的成员在狗类当中生活的岁月，分担过他们的各种忧虑，仔细一看，我终究发现，这里向来有点儿不正常，存在着一条小小的裂缝，在那些狗类举办的非常令人崇敬的活动中，我总有些不愉快的感觉。的确，有些时候，不，不是有些时候，而是经常，即使是在朋友的圈子里，我只要看到一只我喜欢的狗，只要一看到，尽管是用新的眼光看，我就会感到尴尬、惊慌、手足无措，甚至感到绝望。我做了些努力来劝慰自己，那些我曾向他们吐露自己心事的朋友，出于好心也来帮助我，于是，我又得以获得较为清静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虽然仍有那些使人惊异的事，但我能较为冷静地对待它们，较为沉着地把它们纳入我的生活。也许它们使我感到悲伤和厌倦，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有着这些惊异的事，我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只正规的狗，尽管有些冷淡、矜持、谨小慎微和精打细算。没有这段休息时期，我怎么会达到我现在享有的年龄呢？没有这段休息时期，我怎么会获得安宁呢？有了这份安宁，我才能观察我青年时代的恐惧，忍受老年的惊吓。没有这段休息时期，我怎么会想到，从我的——我得承认——不幸的，或者说得更小心些，不很幸运的气质中得出结论，而且几乎完全按照它们去生活呢？我现在离群索居，孤家寡人，只从事一些毫无指望的、但对我来说不可缺少的小小的研究。但是，我并没有因为研究而远离我的人民，看不到它的全貌，相反地，经常有消息传到我这

儿来，我有时也给朋友们写信。人们尊敬我，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但对它并不见怪。就连年轻的狗，新一代的狗——对他们的童年，我几乎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当我有时在远处看到他们跑过的时候，也对我毕恭毕敬地敬礼问候。

可不要忘记，尽管我的行为显得古怪，但我毕竟并没有完全丧失狗的本性。每当我考虑这件事——我有时间，也有兴致和能力去考虑——我便觉得，我和狗类有着不可思议的关系。我们的周围，除了我们狗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可怜的、瘦小的、一言不发的、只会叫几声的生物。我们狗当中的许多狗研究这些生物，给他们取名字，试图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变好，诸如此类等等。对我来说，只要他们不试图打扰我，我就无所谓，我把他们搞混淆了，也不去理会他们。但是，有一点非常突出，以致我必须加以指出，这就是说，和我们狗类相比，他们很少能团结在一起。他们相互走过的时候，总是像陌生人和哑巴一样，而且还带有几分敌意。只有那最共同的利益能将他们在表面上稍许联系在一起，而且从这一利益中甚至还会产生出仇恨和争吵。我们狗类则相反！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大家简直生活在一个唯一的群体里，尽管几百年来有关种类划分的大量而深入的研究证明，我们大家实际上迥然各异。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群体里！我们相互挤在一起，什么都无法妨碍我们对这拥挤感到满足，我们所有的法律和公共设施——少数的我还知道，无数的我已经忘记——溯源于对那最大的、我们能够达到的幸福的渴望：对温暖地聚集在一起的渴望。但是，在这方面，也产生了对立面。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生物像我们狗这样如此分散地生活着，没有任何生物有这么多的、简直无法明了的等级、种类和职业的差别。我们总想团结在一起，而且在那些感情奔放的时刻，我们总能成功地聚集在一起，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恰恰是我们相互隔得很远，各自从事着自己特有的、旁的狗往往无法理解的职业，遵守着那些并非是我们狗类的规章制度；更确切地说，甚至反对我们狗的规章制度。这是些多么复杂的事情，宁肯不要去碰它们——我也理解这种观点，而且对它的理解胜过于我对自己看法的理解——然而，我却完全沉醉于它们。我为何不像其他狗那样去生活呢？我应该和我的人民和睦相处，默默地接受干扰这一和睦的言行，把它当做一次大计算中的小错而加以忽略，始终转向那使人民幸福地结合在一起的事物，而不转向那把我们人民圈子里拉出来的事物，当然，后者一再发生，而且不可抗拒。

我想起了我青年时代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当时处在一种非常幸福、

却无法解释的兴奋状态之中，类似的兴奋状态，我还不只一次地经历过，而每个作为孩子的人或许正在经历这种种的兴奋状态。那时，我还是一只非常年轻的狗，我喜欢一切，一切都跟我有关系，我相信，在我的周围即将发生一些大的事情，我将是他们的首领，必须为他们摇旗呐喊；我还认为，有些东西，如果我不为他们去跑，不为他们晃动我的身躯，就必然悲惨地停留在地面上，现在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孩子们的幻想而已，随着岁月流逝，它们也将烟消云散。可是在当时，这种种想法却十分强烈，并把我完全迷住了，当然，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它似乎说明，我那些狂热的期待是对的。就其本身而言，那件事一点儿也不特别，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还碰到过许多类似的事情和比它们更加奇怪的事情，但是在当时，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我，给我留下头一个强烈的、不可磨灭的、对许多后来的印象起决定性作用的印象。因为我遇到一小群狗，更确切地说，我没有遇到他们，是他们朝我走来。我当时在黑暗里长时间地奔跑，预感到——预感当然容易迷惑人，因为我经常有预感——即将有大事发生，我长时间地在黑暗里奔跑，漫无目的地交叉来回，对一切置若罔闻，心里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渴念。当我感觉到我已到了正确的地点的时候，我突然停住脚步，抬头一看，发现此时已是大白天，只有少许雾气，周围的一切充满了胡乱起伏和令人陶醉的气味，我向喧闹的早晨问候，这时，七条狗——仿佛我用咒语把他们召来似的——从某个黑暗的地方发出一声我还从未听到过的可怕的噪音，然后走到了有光亮的地方。要是我没有看清楚，这是一些狗，而且这噪音是他们自己带来的，虽然我无法认识到，他们是怎样发出这噪音的，那我早就跑开了，可是我并没有跑开，而是停了下来。当时，我对这只授予狗类的创造性的音乐天赋还几乎一无所知，由于至今我的观察力才慢慢发展起来，所以我自然没有注意到它，但是，这种音乐毕竟从我的婴儿时代起就在我的周围鸣响，我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和不可缺少的生活要素，丝毫不把它跟我惯常的生活分开，人们根据孩子的智力水平，试图以各种暗示向我指明这一点，所以，当我看到那七位伟大的音乐艺术家的时候，感到更加意外，简直令我倾倒。他们不说，也不唱，几乎以一种大的强忍精神，普遍保持沉默，但是，从这空荡荡的场地里，他们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了音乐。一切都是音乐，他们脚的一起一落，头部的某些转动，他们的奔跑与止步，他们彼此采取的姿势；他们相互结合，形成轮舞那样的场面，例如，某个音乐家把他的前爪搭在另一个音乐家的背上，然后，他们依次这样做下去，以致头一个音乐家直挺挺地担负起所有其他音乐家的重量；或者他们用自己匍匐在

地面上的身子构成各种相互交错的图形，而且绝不会出错；甚至最后那个音乐家也是如此，虽然他还不够熟练，老是不能立即与同伴连接上，有时在旋律响起时显得有些摇晃，但是，这种不稳只是与其他人的熟练相比较而言的，而且，即便是相当的不稳，甚至是完全的不稳，观众绝不会感到扫兴，因为其他的大师们牢牢地掌握着节奏。然而，人们又几乎看不到他们，的确，几乎看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刚才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人们是从心底里把他们当做狗来欢迎的，虽然伴随他们而来的喧闹声曾把观众弄得头脑发昏，但是，他们毕竟是狗，像我和你一样的狗。我是出于习惯把他们当做像是路上遇到的狗而加以观察的，我想走近他们，和他们互致问候，他们也离我很近。这是一群狗，岁数虽比我的大得多，也不是和我一样的毛茸茸的长毛狗，但是他们的个子与身材，我并不感到太陌生，相反地，还相当熟悉。这样的狗或类似的狗，我见过不少，可是，正当我还沉浸在这些思考之中的时候，音乐声已逐渐增大，全然把我抓住，并把我拖离开这几条真正的小狗。于是，我完全违反自己的意愿，全力进行反抗，像疼痛时那样大声号叫。此时，我所能听到的就只有音乐，那从各个方向，从高处、低处和四面八方传来的音乐，这音乐以这位听众为中心，铺天盖地地向他袭来，将他压倒在地上，他在快被消灭的时候，仍在近处——实际上已经在远处——隐隐约约地听到军号声。然后，它又放开了我，因为我已被彻底击垮，精疲力竭，极度虚弱，根本无法再听下去。我获得了自由，可以观看这七条小狗的列队跳跃表演。尽管他们看上去很不乐意，我还是想祈求他们，向他们讨教，问问他们究竟在这里干些什么——当时我是个孩子，总以为可以向任何人提问——但是，我刚一开口，好不容易才感到我与这七条狗之间友好、亲密和像狗一般盲从的关系的时候，他们的音乐又再次响了起来，把我弄得不知所措，我围着圈子打转，仿佛我也成了这些乐师中的一员，而实际上我不过是他们的牺牲品。不管我如何祈求宽恕，乐声总是把我抛来抛去，最后，他们把我推进了一片树丛，把我从他们自己的暴力中拯救出来。直到现在，我一直未发现这地区的周围长着这片丛林，现在，我被困在它的当中，沮丧地低着头，虽然这儿的旷野里还响着雷鸣般的音乐，但我终究可以喘口气了。说真的，与其说我对这七条狗的艺术感到惊奇——我既不理解它，也和我的能力完全联系不上——不如说我对他们那种完全听凭其造物摆布的勇气惊异不已，不仅如此，我还钦佩他们那种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对命运处之泰然的力量。当然，当我现在从自己的藏身处更加仔细地观察时，发现他们并不那么泰然，而是非常紧张，表面上看，他们腿的动作非常平稳，

其实每走一步的时候，腿部不停地颤抖，可怕地抽搐。他们用近乎绝望的目光彼此凝视着，他们的舌头刚一收回到嘴里，马上又从嘴里耷拉下来。使他们如此激动的，不可能是由成功引起的害怕；谁要是敢于做出这种举动，不可能再感到害怕。——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有谁强迫他们在这里做出这样的举动呢？我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尤其是当我现在看到他们莫名其妙地需要我的帮助的时候，于是我用盖过所有喧闹声的嗓门，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问题，并要求得到回答。然而——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他们并没有回答，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似的。而一只狗要是同类的呼唤拒不回答，无疑是违背良好的社会习俗的，这一点，无论是最小的狗，还是最大的狗，都是绝对不可原谅的。难道这些不是狗吗？他们怎么不是狗呢？我现在更加仔细地倾听，甚至听到了他们用轻声的呼唤相互激励，相互提醒对方注意各种困难，防止各种错误。我还看到那只走在最后的最小的狗——大多数的呼唤是针对他的——他不时地朝我偷看，仿佛很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但又竭力忍住，因为回答是不允许的。可是为什么不允许呢？我们的法律总是无条件地要求人们回答问题，为什么这一次却不允许呢？我怒火中烧，几乎忘记了音乐。此地的这些狗触犯了法律。不管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魔术师，也应该遵守法律，这是我这个小孩子也很清楚的道理。从树丛里望出去，我还觉察到更多的东西。假如他们是出于负罪感而沉默，那么，他们的确有理由保持沉默。由于沉溺于音乐，我到此时才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简直不知羞耻，这些卑鄙的家伙同时干着最可笑和最不正经的事情，他们用两条后腿直立着行走。呸，见他的鬼去吧！他们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卖弄自己；他们对此洋洋得意，如果他们一时受良好的本能的驱使，把前腿放下，就会大吃一惊，仿佛天性是一种错误，于是又迅速地举起前腿，他们的目光似乎流露出请求观众原谅的神色，因为他们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的罪孽。世界颠倒了吗？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了我自身的生存，我不能再犹豫了。我摆脱了将我团团围住的树丛，一跃身从中跳了出来，打算朝那几条狗跑去，我这个小学生必须成为教师，必须让他们明白，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必须劝阻他们不要继续去干伤天害理的事。“这么大年纪的狗，这么大年纪的狗！”我接连重复着说。然而，就在我刚刚获得自由，离这些狗只有两三跳远的时候，喧闹声又响起来了，而且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要不是另外一种清晰、严厉、始终不变的声音，以其所有的洪亮——这洪亮是可怕的，但也许毕竟是可以克服的——从老远的地方向我传来——也许这声音就是喧闹声的内在旋律——迫使我屈服，也许，我加以努力，是会

受得住这种我早已熟悉的喧闹声的。哎，这些狗制造出来的音乐，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我无计可施，再也不想教训他们，就让他们继续又开双腿犯罪作孽去吧！就让他们诱使别的狗犯下袖手旁观的罪孽去吧！我不过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狗，谁能要求我承担起如此艰巨的任务呢？我使自己变得更加渺小，我开始哀鸣起来，如果此时那些狗为此征求我的意见，我也许会承认他们做得对。顺便提一下，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带着所有的喧闹声和亮光，重新消失在黑暗中。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在漫长的一生中，一个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再用孩子的眼光加以观察，就会觉得更加奇特。此外，人们当然会对这件事情，正如对所有的事情一样——正像这一确切的词语所表示的——“说三道四”^[35]，对这件事情，人们无非会说：有七位音乐家一同来到此地，想在寂静的早晨演奏音乐，一只小狗乱闯到这里，他们想用特别可怕或庄严的音乐赶走这名讨厌的听众，却是枉费心机。他用一个个的问题打扰他们，本来，他们一看到这个陌生人在场，就已经感到是一种严重的干扰，难道他们还要应付这种纠缠，用各种回答来扩大它吗？即使法律规定，对任何人的问题都必须加以回答，难道跑到这儿来的这样一只极小的狗也配称得上是某某人吗？况且，他们也许压根儿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毕竟相当含混不清地吠出了他的各种问题。也可能他们听懂了他的意思，而且自我克制地作了回答，但是他，这小东西，不习惯于音乐，不能把回答跟音乐区分开来。至于后腿的事，也许那天他们的确破天荒地只用它们行走，这大概算是一种罪孽吧！但是，当天只有他们七只狗，七个朋友中的朋友，而且是朋友之间的聚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自己家里，可以说是单独在一起，因为朋友毕竟不是公众，而没有公众的地方，一条在街上乱跑的好奇的小狗也是无法创造出公众的，就这件事来说，岂不是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虽然并不完全如此，但也相差无几，而父母本应教育自己的小孩少到外面乱跑，宁肯让他们保持沉默，在家孝敬长辈。

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问题就都解决了。当然，在大狗们看来已经解决的问题，对小狗们来说并未解决。我四处奔走，既讲述故事，也提问题，既谴责，也研究，希望把每一只我所遇到的狗引向发生过这一切的地方，给他指出我曾经站过的地方，给他指出那七条狗在过的位置，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如何进行跳舞和奏乐。如果有谁跟我一道走，我兴许会牺牲自己的清白，设法用后腿站立起来，以便把这一切仔细地解释清

楚，而不用担心他会把我甩开，或者把我嘲笑一番。如今，人们对孩子的一切都看不惯，但最后又会原谅他的一切。我可是一直保持着这种儿童般的气质，在这期间变成了一条老狗。那时候，我没完没了地大声谈论那个事件，将它分解成若干部分，以在场者们的身份衡量它，而没有考虑到我所处的社会；如今，尽管我对那个事件的评价比当时要低得多，但我一直忘不了它，我跟别的狗一样对它感到厌烦，所不同的是，我力图通过研究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以便最终又能把目光转向普通、宁静和幸福的日常生活。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仍和当时那样工作，尽管采用了一些天真的手段——然而，差别并不很大——但如今我不再继续这样做了。

事情是从那场音乐会开始的。我对此毫无怨言，这是我天生的本性，它在此起了作用，纵然没有那场音乐会，它也会去寻找另一个机会，以便取得突破。只是那场音乐会一下子就举行，使我在当时有时感到难过，因为它夺去了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年轻的狗享有欢欣的生活，有些狗能将它延长到数年之久，我虽然也享有这样的生活，但它却只有短短几个月。这没有关系。有比童年更重要的东西。也许，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我在老年时能获得更多的儿童式的幸福，并且将有力量承受这种幸福，而一个真正的儿童则缺少这种力量。

那时，我开始研究一些最简单的问题，我并不缺乏材料，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材料过多，使我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陷入了绝望。我开始研究，狗类是以什么为食物的。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自远古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它，它是我们思考的主要对象。在这个领域里，充满了无数的观察、实验和观点，它已成为一门科学，其规模之宏大，不仅超越了个别狗的理解力，而且超越了所有学者的理解力，只有整个的狗类联合起来，才能承担起研究这门学问的重任，但是，即使是整个的狗类，也只是唉声叹气地勉强承担起这一重任。在那古老而且早就被人占用的庄园里，石灰老是从墙上剥落下来，得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补上，至于我在研究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种种几乎无法实现的条件，那就更不用提了。对于这一切，人们无须进行辩驳，任何普通的狗，包括我在内，都知道这一切。我并没有想到要干预这门真正的学问，我理所当然地对它怀有十分尊敬的心情，但是我无法充实它，因为我缺乏知识、勤奋、宁静和胃口，后者在最近几年尤其缺乏。我狼吞虎咽地吞下食物，但事先压根儿不想对农业进行最起码的有条理的研究。在这方面，我觉得一切科学的提要，即母亲让婴儿断奶，使之步入生活时所说

的“尽你的可能，把一切弄湿”这条小小的规则，就已经足够了。这条规则岂不是几乎包含了一切？从我们的祖先起就已开始的研究，又能增添多少举足轻重的内容？细节、细节，一切是多么地靠不住！而只要我们仍然是狗，这条规则就将永远存在。它涉及我们的主食。诚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辅助手段，但在紧急情况下，或者在年岁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靠这主食过活，我们在地上找到这种主食，而土地需要我们的水，以它为食物，只有我们付出这一代价，土地才会给我们提供食物。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咒语、歌唱和动作，加速食物的出现。在我看来，这就是全部的内容；从这方面来说，根本无须再提这件事。在这一点上，我和大多数的狗是一致的，任何与此相违背的异端邪说，我都严加拒绝。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与癖性无关，也谈不上什么刚愎自用，如果我能和同胞们看法一致，我定会感到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正是这样。然而，我的行动却选择了另外的方向。从表面现象看来，如果按照科学的规则对土地进行浇灌和耕作，它就会给我们提供食物，而且在质量、数量、方式、地点和时间上符合于完全地或部分地被科学确证的规律。这一点我也接受，但我要问的是：“土地是从何处弄到这食物的？”对这个问题，人们往往假装没听懂，至多这样回答我：“你要是不够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分给你一点。”我重视这个回答。我知道：把我们在某次弄到的食物拿去平分，这不是我们狗类的长处。生活是艰难的，土地是龟裂的，科学富于知识，但是实际的成果却少得可怜。因此，谁有食物，就留着自己享用。这不是自私自利，相反地，这是狗的法则，是人民一致做出的决定，它源于克服自私的愿望，因为拥有食物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你要是不够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分给你一点”这句回答，只是一句常用的成语，一句玩笑话，一种戏弄。我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但在当时，当我带着自己的问题周游世界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嘲笑我，这对我来说，意义就更加重大了；尽管人们从来也不给我东西吃——你叫他们到哪儿去取食物呢？——即使他们刚巧有食物，也自然会因为饿得发狂而不考虑我的需要，但他们的诚意是不用怀疑的，有的时候，要是我抢得快，也的确能得到一点小东西。我不明白，他们干吗待我这样特别，这样爱护，这样优待？是因为我是条瘦弱、营养不良的狗呢，还是因为我很少为食物操心？但营养不良的狗比比皆是，而且到处乱跑，甚至他们那少得可怜的食物，也被别的狗从嘴边抢走，这往往不是出于贪欲，而是出于原则。不，他们是偏爱我，我虽然拿不出具体的证据，但的确有这样的印象。是不是他们对我的问题感到高兴，觉得它们很聪明呢？也不是，他们并不高兴，而且认为我所有的问题都很愚

蠢。总之，引起他们注意的，只可能是我所提的那些问题。看样子，他们宁肯做出巨大的牺牲，用食物堵住我的嘴——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有这种意图——也不愿容忍我的提问。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更加巧妙地把赶走，禁止我提出问题。不，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虽然不愿听我的问题，但是恰恰因为我的这些问题而不想把我赶走。虽然他们对我百般嘲弄把我作为一头愚蠢的小动物来对待。把我推来推去，然而，那段时间却是我声望的鼎盛时期，后来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形。那时，我到处都可以进入，谁也没有阻拦我，人们找借口粗暴地对待我，实际上却百般地奉承我。人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的问题、我的急躁和我的研究欲。是不是他们想以此麻痹我，不以暴力，而是以近乎爱的方式，使我离开一条错误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谬误显然还没有到达允许他们使用暴力的程度？——一定的尊敬和畏惧也能防止暴力的使用。那时我已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则是一清二楚，而且比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知道得更加清楚。的确，他们当时想把我诱离我的道路。他们没有成功，而且适得其反，我的注意力更为集中。我甚至发现，想诱惑别人的其实是我，而且我的诱惑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多亏狗类的帮助，我才开始明白自己的问题。例如，当我问“土地是从何处弄到这食物的”时候，是否有迹象表明，我在关心土地，关心土地的忧愁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久我就认识到，土地和我毫无关系，我只关心狗，别的什么也不关心。因为除了狗以外还有什么呢？在这广阔而杳无人烟的世界里，除了狗我们还能呼唤谁呢？一切知识，所有问题和答案的总合，均已包含在狗的身上。要是能使这些知识发挥作用，把它们揭示出来，该多好啊！要是他们知道的东西不比他们承认的和他们对自己承认的要多得多，那该多好啊！就连最健谈的狗也比通常放最好的食物的地方更难于接近。你蹑手蹑脚地围着你的同类打转，垂涎欲滴，用自己的尾巴痛打自己，提问、恳求、吠叫、撕咬，得到你不费吹灰之力也可以获得的东西：深情的倾听，友好的触摸，光荣的嗅闻，热烈的拥抱，我的号叫和你的号叫混合成为一体，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一种迷醉、忘却和发现。但是，你首先想达到的目标，即承认知识，却始终没有达到。如果你把诱惑推向极端，那么对这个请求——不论是无声的还是大声的——回答，至多也不过是麻木的表情、乜斜的目光以及低垂而无神的眼睛。这跟我在那时看到的情形相差无几，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大声招呼那七条演奏音乐的狗的时候，他们却沉默不语。

也许有人会说：“你抱怨你的同胞，责怪他们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沉默；你声称他们知道的要比他们承认的以及想在生活中承认的要多得

多；而这种隐瞒——对其原因和秘密，他们当然也会守口如瓶——毒化了生活，使你不堪忍受，你不得不改变或放弃这种生活，这有可能，但你自己毕竟是一条狗，而且懂得狗的知识，那就把它说出来吧，不仅以提问的形式，而且要加以回答。你要是把它说出来，谁会反对你呢？所有的狗组成的大合唱队将开始演唱，仿佛它期待已久。于是你将如愿以偿，不仅弄清事实真相，而且获得了承认。你在背后大加诅咒的这种卑鄙的生活的屋顶将会打开，我们所有的狗将会一条接一条地升上自由的天空。即使这最后一点也不能实现，即使情况比以前更糟，即使完整的真理比不完整的真理更不堪忍受，即使事实证明沉默者作为生活的维护者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我们现存的一线希望变成彻底的绝望，努力把话说出来总是值得的，因为你不想再过你目前可以过的生活。现在的问题只是，你为何指责别的狗沉默寡言，而自己却一言不发呢？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是一条狗。我在本质上完全和其他的狗一样，都是沉默寡言，难以接近，非常害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严格地讲，至少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之所以向狗类提问，只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回答吗？我有如此愚蠢的期望吗？难道我一边目睹我们生活的根基，猜到它的深度，目睹工人们建设，从事着他们难以捉摸的活动，一边却始终盼望着因为我的问题而结束、毁灭和抛弃这一切？不，我真的不再有这样的期望。我理解狗类，我和他们有血缘关系，我的血管里有他们那可怜的、一再年轻的和自始至终充满渴望的血。然而，我们共同拥有的不光是血，还有知识，不光知识，还有打开知识的钥匙。没有其他的狗，我就没有这一切，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无法拥有这一切。——那些含有极其珍贵的骨髓的铁一般硬的骨头，只有全体狗用所有的牙齿一起去咬，才能对付得了。这当然只是一种夸张的比喻；假若所有的牙齿都做好了咬的准备，那么他们无须再去咬，骨头会自动打开，骨髓会暴露出来，听凭最弱小的狗去享用。如果我坚持这个比喻，那么我的意图、问题和研究就必然会追求某种惊人的目标。我打算迫使所有的狗聚到一起，让这块骨头在众狗跃跃欲试的压力下自动打开，然后把他们打发到他们喜欢的生活中去，这样，我便可以张大嘴巴，独自啜饮骨髓。这听起来非常可怕，仿佛我赖以生存的不单单是某块骨头的骨髓，而是整个狗类的骨髓。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比喻。我在这里所说的骨髓，并不是食物，相反地，是毒药。

我不想再用自己的问题使自己忙个不停，我想用沉默这个我还能从周围得到的唯一回答来激励自己。通过你的研究，你日益清楚地意识到狗类沉默不语，而且将永远沉默下去，对此你还将忍受多久呢？你还将

忍受多久呢？这正是我所要提的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它高于一切个别的问题：这问题只是对我提出来的，不会给其他的狗带来麻烦。可惜我对这个问题比我对那些个别问题更容易回答：我大概将忍受到自己寿终正寝之日，老年时的安宁更加容易忍受那些使人惶恐不安的问题。也许，我为沉默所包围，将默默无闻地、近乎安详地死去，我将视死如归，毫不畏惧。也许是命运的恶意安排，我们狗类天生就有一颗值得钦佩的、冷酷无情的心和一对不会过早衰竭的肺，我们忍受得住所有的问题，甚至是自己的问题，我们是沉默的堡垒。

近来，我越来越频繁地思考我的生活，寻找我也许犯过的那个贻害无穷的重大错误，但是我无法找到它。但我肯定犯过这样的错误，因为要是我没有犯过错误，尽管通过一辈子诚实的劳动也未能达到我想达到的一切，那就正好说明，我想要的一切都是做不到的，从而产生彻底的绝望。看看你一生的事业吧！最初是研究“土地是从何处为我们弄到食物的”这一问题。一条年轻的狗，从根本上说是渴望寻欢作乐的，而我却放弃一切享受，绕道避开一切文娱活动，将头埋在两腿之间，以抵御各种诱惑，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这不是学者的工作，无论从博学多才、方法，还是从意图上看，都不是。这些或许就是错误，但是它们不可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我没有多少学问，因为我很早就离开了母亲，很快就习惯于独立生活，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过早就独立生活是和系统的学习相敌对的。不过，我耳闻目睹了不少东西，与许多不同种类和职业的狗作过交谈，自以为对一切理解得透彻，能将个别的观察很好地联系起来，这多少弥补了学识的不足。此外，尽管独立性对学习不利，但对我的研究却大有裨益。就我的情况而言，独立性显得更加必要，因为我不懂得遵循科学的真正方法，即利用前人的著作，并把自己跟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联系起来。我完全靠自己，万事从头学起，相信我有一天偶然画上的句号，也必定会是最终的句号，这种意识令青年人高兴，却令老年人感到非常压抑。我现在和一向是否真的是单枪匹马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呢？既是又不是。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个别的狗都不可能处于我这样的境地。我的处境还不至于糟到这种地步。我和狗类毫无差别。每条狗都与我一样好问，我与每条狗一样喜欢保持沉默。所有的狗都喜欢提问。否则的话，我的问题怎能引起那些最轻微的震动呢？当然，我看到这些震动，总是兴奋不已，甚至有些陶醉。否则的话，我势必达不到更多的目标。至于我喜欢沉默，这一点可惜无须特别的证明。我与其他任何一条狗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尽管我与狗类之间存在着各种意见分歧和反感，大家都还承认我，我也同样承认每一条狗。所不同的

只是我们之间在元素混合上不尽相同，这对单个的狗来说是个很大的区别，但对狗类来说却微不足道。如果说在过去和现在，这些始终存在的元素的混合还从未产生过类似我的混合这样的结果，如果人们想把我的混合称之为不幸，这样一来岂不是还要不幸得多？这似乎是与所有其余的经验背道而驰的。我们狗类从事着许许多多非常了不起的职业。要是你在这方面缺乏非常可靠的消息，你就根本无法相信这些职业的存在。在这方面，我最喜欢举的例子便是飞狗。当我第一次听说有飞狗的时候，禁不住哈哈大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狗呢？据说是一种极小的狗，比我的头大不了多少，即使到了高龄也不会长高。当然，这种狗体弱多病，看样子是一种人造的、幼稚的和梳理得过分精细的东西，而且根本就不会跳。据说这种狗通常在高空中移动，但并不从事看得见的工作，而是在静养。不，要想让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这简直是在滥用一条年轻的狗的天真烂漫。但过不了多久，我又从别处听到了有关另一条飞狗的传闻。这会不会是人家串通好了来愚弄我呢？但接着我便看到那几条演奏音乐的狗，从这时候起，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没有了成见，我的理解力就不再受限制，我追查那些极为荒唐的谣传，尽可能地跟踪它们，我觉得在这毫无意义的生活中，最荒唐的事比有意义的事更有可能发生，这对我的研究特别有用。飞狗的事也是这样。我听到各种各样有关他们的传闻，虽然至今我未能亲眼见到一条，但对他们的存在我早就深信不疑，他们在我的世界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引起我深思的当然并不是艺术。谁也无法否认，这些狗能够在空中飘浮是不可思议的。在对此表示惊异这一点上，我和狗类是一致的。但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狗存在的荒谬，那种沉默的荒谬。总的说来，对这种荒谬，根本提不出任何理由，他们飘浮在空中，而且永远留在那里，生活继续按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人们有时提起艺术和艺术家们，这就是一切。可是，十分善良的狗类，这些狗为什么只飘浮在空中呢？他们的职业有何意义呢？为什么我得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解释？他们为什么飘浮在上面，让作为狗类的骄傲的四条腿萎缩下去，离开了供养他们的土地，不劳而获，据说甚至靠狗类提供的费用而吃得特别好，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可以自夸的是，我的问题多少引起了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关注。人们开始提出理由，并急急忙忙地收集理由，但仅限于这一开始，并未越出这一范围。但不管怎样，毕竟有所行动。他们虽然未能揭示出真理——这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但却揭示出谎言深处的某些混乱情况。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荒唐的现象，尤其是那些极其荒唐的现象，均可得到合理的解

释。当然不是全部——那是天大的笑话——但足以防止那些令人难堪的问题。我仍以那些飞狗为例子：他们并不像我们当初想象那样目空一切，相反地，特别需要同类的帮助，要是你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就会明白这一点。当然，他们不能公开这样做，因为这会违反保密的义务，所以，他们必须以某种别的方式努力求得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谅解，或者至少分散人们对它的注意力，把它忘掉。据说，他们为此采取了几乎让人难以忍受的喋喋不休的方式。他们不停地夸夸其谈，一会儿大谈其哲学思考——由于完全放弃了体力劳动，他们只能持续地从事哲学思考——一会儿又大说特谈他们在高空所做的各种观察。虽然由于这种游荡的生活，他们的智力理所当然地不很出色，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观察一样毫无价值，几乎无助于科学的发展，况且科学根本就不需要依赖这样一些可怜的辅助手段，尽管如此，要是你问这些飞狗究竟想要干什么，你总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说他们在为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你对此回答说：“这是对的，但他们的贡献毫无价值，而且令人厌烦。”对方就会用耸肩、转移话题、恼火或嘲笑回敬你。你若过一会儿再问，回答仍然是他们在为科学做出贡献。如果你继续追问，问得对方几乎失去控制，最终得到的仍是同样的回答。也许，不要太固执，做些迁就，这会好些，即你纵然不承认这些业已存在的飞狗的生存权利——要承认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得容忍它。不过，你可不要提出更多的要求，否则就太过分了。然而，你还是坚持己见，要求容忍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飞狗。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他们是通过繁殖来增加成员的吗？难道他们还有繁殖的力量？他们顶多还有一张漂亮的毛皮，还能繁殖什么呢？即便不大可能的事有可能发生，它该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他们总是独自待在空中，而且安于现状，即使偶尔勉强跑了起来，也只是短短的一会儿时间，装模作样地走上几步，而且总是独来独往，沉醉于一些据称——至少他们是这样断言的——是他们竭尽全力也无法摆脱的思想。然而，如果他们不繁殖后代，会不会有些狗自愿放弃陆地上的生活，甘愿变成飞狗，牺牲舒适和某种熟练的技巧，而选择气垫上的那种荒凉的生活呢？这是无法想象的，繁殖和自愿结合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现实表明，总是不断有新的飞狗出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我们的理智遇上难以克服的障碍，一种业已存在的狗，不管它有多么奇特，都不会绝种，至少不容易灭绝，至少在任何一类狗中都不乏成功地保护自己的成员。

如果这一点适用于像飞狗这样一种古怪、缺乏理智、外表非常奇特和毫无生活能力的狗的话，那么对我这类的狗来说，难道不该接受吗？

何况我的外表一点儿也不特别，一副普普通通的样子，至少在这一带极为常见，既无超群出众之处，亦无特别可鄙之处。在我的青年时代，以及我壮年的某个时期，只要我不放松自己，多活动活动，我甚至称得上是一条相当漂亮的狗。特别是我的正面形象，被其他的狗赞不绝口，还有那四只苗条的腿、漂亮的头部姿势，以及那身灰白黄三色相间、毛尖蜷曲的毛皮，都非常讨人喜欢。这一切并不奇特，奇特的只是我的性格，但我从来也没有忘记，就连我的性格也应该到狗类的性格中寻找根据。甚至飞狗也并非是孤零零的，在庞大的狗类世界里，在有些地方总能找到一条飞狗，而且狗类世界甚至还会从无到有地繁殖出新的后代，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不着灰心丧气，尽可满怀信心地生活下去。当然，我的同类们想必有着特殊的命运，他们的存在永远不会给我带来看得见的帮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几乎永远认不出他们。我们被沉默压得喘不过气来，正是出于对空气的渴求，我们想打破这种沉默，而在其他的狗看来，沉默能使他们感到舒服，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象，就拿那七条演奏音乐的狗来说吧，他们表面上镇定自若地奏乐，实际上却非常激动。然而，这种假象非常强烈，人们试图对付它，它则对一切进攻报之以嘲讽。我的同类们是如何互相帮助的呢？他们为了生活下去，做了怎样的努力呢？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回答。我在年轻的时候，试图通过我的提问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也许可以向那些好问的狗求助，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类。有一阵子，我曾试图克制自己，不再提问，之所以自我克制，是因为我关心的，主要是那些应该回答我问题的狗，那些老是拿我通常无法回答的问题来打扰我的狗，总令我讨厌。此外，年轻时谁不好问，从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中，我怎样才能找出恰当的呢？一个问题听起来像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提问的意图，而意图总是隐蔽的，往往连提问者也不清楚。况且，提问的确是狗类的一种怪癖，大家七嘴八舌地乱提问题，仿佛这样就能抹去那些正确的问题的痕迹。不，在那些年轻的提问者当中，我找不到自己的同类，在包括我在内的那些年老的沉默者当中，我同样找不到自己的同类。而提问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所有的问题都落空了，也许我的同胞比我聪明得多，为了忍受这种生活，他们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杰出手段，当然，正如我想补充说的，这些手段也许能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起到一种镇静、麻醉、变种的作用，但总的说来仍如我的那些手段一样无力，尽管我多次翘首以盼，总是看不到一点成就。我担心，我今后只会从所有其他的方面，而不会从成就上认出我的同类。但是，我的同类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使我感到悲痛的问题，这正是我所悲叹的。他们在哪里呢？无所不在，却无处可寻。也

许他就是离我三跳远的我的那位邻居，我们常常见面打招呼，他也来过我这儿，但我从不到他那儿去。他是我的同类吗？我不知道，从他身上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我的同类，但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没有比这更不可能的了。当他在远处时，我凭借所有的想象力，能够在他身上发现某些使我既感到亲切也感到可疑的东西，但是一旦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的一切发现简直可笑。他是一条老狗，个子比我还小——而我的个子几乎还不到中等——棕色，短毛，耷拉着脑袋，吃力地拖着脚步走，左后腿因患疾而一瘸一瘸的。很久以来，除了他以外，我从未跟别的狗有过如此密切的交往。我很高兴自己还能忍受他。每当他离去的时候，我总是从后面大声地向他说些非常友好的话，这当然不是出于对他的爱，而是出于对自己的愤怒，因为我要是跟随他，就会发现他拖着脚，夹着尾巴，悄悄地溜走，这当然只会引起我的厌恶。有时，仿佛是想嘲笑自己似的，我竟然在自己的头脑里把他称作同类。即使在我们的谈话当中，他丝毫也没有透露他是我的同类，虽然他很聪明，在我们当中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才学，我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但我要找的难道是聪明和学问吗？我们通常谈论的是地方上的问题，交谈的时候，我惊异地发现，我的孤独反倒使我在这方面的目光变得更加敏锐，我清楚地认识到，哪怕是对一条普普通通的狗，即使在一般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免遭那些司空见惯的巨大危险，需要多少智慧啊。诚然，科学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规则，但是，要了解它们，哪怕是肤浅和粗略的了解，谈何容易。就算你理解了它们，真正的困难还在后头，即把它们运用于本地的实际情况——在这一点上，谁也无能为力，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出现新的任务，每一小块土地都有自己特殊的任务。谁也不敢断言，他已做了一劳永逸的安排，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行发展下去，即使像我这样的人，尽管需求一天比一天减少，也不敢这样断言。所有这些无穷无尽的努力——到底为了什么？仅仅为了使自己在沉默中越陷越深，再也无法让人拉出来。

人们常常赞美狗类在各个时代所取得的普遍进步，指的似乎主要是科学的进步。的确，科学在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它甚至在加速前进，愈来愈快，但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这就如同你想颂扬某人，是因为他随着年龄增长而变老，因而越来越快地接近死亡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而且可憎的过程，对此，我觉得根本无须加以夸耀。我看到的只是衰落，但这并不是说过去几代狗在本质上比我们要好，他们只不过年轻一些而已，这是他们的一大优点，他们的记忆尚未像今天的记忆那样处于超负荷状态，要让他们说话还比较容易，尽管谁也没有成功过，但

可能性比现在要大得多，正是由于这种较大的可能性，我们在倾听那些古老的而实际上很单纯的故事的时候，总是激动不已。我们不时听到一句暗示的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感觉不到数百年来加在我们身上的负担。不，尽管我反对我们的时代，但以往的几代人并不比最近的几代人要好，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要坏得多、弱得多。当然，在那时候，奇迹也不会自由地越过大街小巷任人抓住，但狗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我找不出别的词来表达——阿谀奉承、奴性十足。那时的狗类在组织上还很松散，真话还能起作用，还能对营造加以确定、修改、随意改动和引向反面。那时存在着真话，至少近在咫尺，悬浮在舌尖上，每条狗都能听到它；可是今天它到哪里去了呢？即便你搜索枯肠，也无法找到它。我们这代人也许是完了，但它却比那一代更加无辜。我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犹豫，说实在的，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犹豫，而是对上千个夜间所做的并且上千次被忘却的梦的遗忘，谁会因为这上千次的遗忘而对我们发怒？同样地，我相信自己能理解我们祖先的犹豫，要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兴许也只能这样做。我几乎想说：我们真够幸运，无须承担罪责，可以在这个被别人搞得乌烟瘴气的世界里保持着几乎是无罪的沉默，急匆匆地奔向死亡。当我们的祖先迷路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没有尽头的迷途，他们毕竟还能看到十字路口，随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返回。他们之所以犹豫着没有返回，只是因为他们还想享受一下狗的生活，其实，那并非狗所特有的生活，可是在他们看来，已经是迷人的美了，以后，至少过一会儿又会怎样呢？于是他们继续错下去。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观察历史进程时会预感到什么，不知道心灵的变化先于生活的变化，不知道在他们开始欣赏狗的生活之前，他们肯定已经有了一颗相当老的狗心，根本不再接近他们心目中的或他们那双陶醉于一切狗的欢乐的眼睛欲使他们相信的那一出发点。——今天有谁还会说起青年人。他们是真正年轻的狗，可惜他们唯一的抱负是想成为老狗，当然，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会失败，这不仅为随后的几代狗所证明，而且被我们最近这一代充分地加以证明。

当然，我跟我的邻居是不谈所有这些事情的，但每当我坐在他的对面，或把嘴埋入这条典型的老狗的毛皮的时候——他身上的毛皮已散发出类似被剥下的毛皮那样的气味——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些事情。和他谈论那些事情，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跟其他狗也一样。我知道这样的谈话会是什么样子。他会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提出一些小小的异议，最终表示赞同——赞同是最好的武器——于是事情便被埋葬，干吗要费力把它从坟墓里拉出来呢？尽管如此，我相信在我和那位邻居之间，也许

存在一种超越单纯的话语的更为深刻的共识。我一直这样断言，虽然我并无证据，而且这也许只是一种简单的错觉，因为很久以来他是我唯一与之交往的一条狗，我得紧紧地依靠他。“你也许就是我的同类吧？你会因为你一切都遭到了失败而感到羞愧吗？瞧，我的情况完全和你的一样。每当我孤零零的时候，我常为之号啕大哭。来吧，两条狗在一起要甜蜜得多。”我有时这么想，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没有垂下目光，但从他身上我无法推断出什么。他麻木不仁地瞧着我，一脸的惊奇，似乎是在问，我为什么沉默不语，又为什么中断了我们的谈话。不过，这种目光也许正是他提问的方式，而我却使他失望，就像他使我失望一样。要是我回复到青年时代——那时，我不觉得其他的问题更为重要，只觉得自己能胜任一切——我也许已经大声地问他，而且得到了一个无力的肯定回答，可他今天沉默不语，这样的回答当然更少了。但大家不都同样沉默不语吗？我有理由相信，大家都是我的同类，我从前就有过一个从事研究的同行，可惜他连同他那些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一起被埋没和遗忘，而我呢，由于以往时代的黑暗，或由于当代的拥挤，再也无法获得他的消息。我更加有理由相信，在任何领域里，我向来都有自己的同类，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地工作，但大家都按自己的方式毫无成效，都按自己的方式保持沉默或奸诈地喋喋不休，正如那无望的研究所带来的那样。若是这样，我也根本无须与世隔绝，尽可心平气和地跟其他的狗待在一起，无需像个淘气的孩子从成年人的队列里挤出去，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想往外挤，只是他们身上唯有的一点理智使我迷惑不解，它似乎在告诉他们，谁也挤不出去，所有的拥挤都是愚蠢的。

这些想法显然受了我那位邻居的影响，他使我不知所措，使我变得忧郁起来；而他自己却非常快活，至少当他从事自己分内的工作时，我听到他在欢呼和哼唱，这使我感到非常讨厌。也许，我应该放弃这最后的交往，不再沉湎于那些模糊的梦想，因为任何与狗的交往，不管你自以为是千锤百炼，都必然会产生出这样的梦想；我宁肯把留给我的这一点时间用于自己的研究。如果他下次来的时候，我将爬进窝里装睡，并一直这样对待他，直到他不来找我为止。

我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混乱，我的热情开始减退，感到疲惫不堪，不再像过去那样兴奋地奔走，而只是忧郁地没精打采地慢慢走。我回想起当时我所提出的问题：“土地是从何处弄到我们的食物的”，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当然，那时我生活在民众之中，往民众最密集的地方挤去，希望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我工作的见证人，这些证人对我来说甚至比我的

工作更重要；由于我还期待某种普遍的影响，因此自然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如今，这种激励对我这个孤独者来说已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我还年轻，闯劲十足，以致做出一些闻所未闻、与我们所有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事情，当时的每一位证人肯定还记得那些叫人害怕的事情。通常，科学总是追求极端的专门化，但是在某一点上我却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简单化倾向。科学教导我们，土地主要给我们提供食物，然后，在这先决条件下，它又给我们指出用以获取各种精美丰富的食物的方法。说土地提供食物，这当然是对的，也毋庸置疑，但是，问题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必须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就拿日常生活中一再发生的那些最简单的事情来说吧，如果我们完全无所事事——我现在几乎就是这样——对土地进行马马虎虎的耕作之后，就蜷缩着身子等待结果，假若真的会有某种结果的话，我们当然会在地上找到食物。然而，这毕竟不是惯例。谁要是对于科学不抱任何成见——当然，对科学抱成见的只是少数人，因为科学吸引的圈子越来越大——尽管他不打算进行特别的观察，也容易认识到，大部分地上的食物是从空中落下来的，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熟练和贪婪程度，在它尚未接触到地面之前，截获其中的大部分。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反对科学的意思，土地的确为我们提供这样的食物。至于是否一部分食物来自土地本身，另一部分食物被土地从空中呼唤下来，这也许不是什么本质的区别。科学业已证明，在两种情况下，都必须对土地进行耕作，它也许用不着去研究那些区别，常言道：“口中有食，问题全消。”只是我觉得，科学以隐蔽的形式，至少部分地研究着这些问题，因为它毕竟知道获取食物的两种主要方法，即本来的土地耕作和以咒语及歌舞的形式表现出的补充性的精致化工作。在这件事上，我发现一种虽不彻底但足够清楚的第二等份，符合于我的区分。在我看来，土地耕作有助于获取两种食物，因而永远不可缺少，而咒语和歌舞则较少涉及狭义的地上食物，而主要用于把食物从上面拉下来。传统支持了我的这种看法。这里，民众似乎在不知不觉地纠正科学，而科学也不敢进行自卫。如果像科学所希望的那样，那些仪式只应该服务于土地，以便赋予它把食物从空中取下来的力量，那么，它们必然合乎逻辑地只在地面上进行，一切的低语只会说给土地听，一切的跳跃和舞蹈只会表演给土地看。据我所知，科学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奇怪的是，民众及其所有的仪式都对准高处。这并不违反科学，科学并不禁止这样做，它在这方面给予农夫以自由，在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科学只想到土地，只要农夫贯彻执行它关于土地的教导，它就心满意足了。但我认为，科学的思路本应提出更多的要求。而我呢，由于向来对科学知之甚少，所以很

难想象学者们怎能容忍我们举世无双的狂热的民众朝天上呼喊咒语，向上苍哀唱我们古老的民歌，表演蹦蹦跳跳的舞蹈，似乎他们忘却了土地，一心只想飘向高空。我以强调这些矛盾为出发点，不管根据科学的教导收获季节何时到来，我都完全局限于土地，一边跳舞一边嚓嚓地锄地，还扭转头，以便尽可能地接近土地。后来，我还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把嘴放在里面吟唱，以便只让土地听到，旁边和上面的狗则休想听到。

我的研究成果微不足道。有时我得不到食物，可是，正当我想要欢呼自己的发现的时候，食物却又送来了，仿佛人们当初被我那奇特的表演弄糊涂了，但现在认识到它带来的好处，于是乐于放弃要我呼喊和跳跃的要求。往往，送来的食物甚至比从前更加丰富，但也有完全吃不到食物的时候。我以年轻的狗们从来没有过的勤奋，详细地列出自己所要做的全部实验，刚以为在某个问题上发现了引我走向深入的一点儿迹象，刹那之间，它又变得模糊不清了。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在科学上准备不足也起了妨碍作用。例如，我认为，食物缺乏不是由于我的实验，而是由于不科学的土地耕作引起的。可是，谁愿支持我的这种看法呢？谁愿担保我没有错呢？如果我的看法是对的，那么我所有的结论都会站不住脚。如果我完全不靠土地耕作，而光凭针对上苍的仪式，成功地使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借助只针对土地的仪式使食物缺乏，那么，我将完成了一项相当精密的实验。我也曾做过这样的实验，但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完善的实验条件，因为我坚信一定的土地耕作至少总是必要的，尽管那些不相信这点的异教徒可能是对的，但他们却无法加以证明，因为土地的浇灌是迫不得已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我的另一项实验——当然，它有些冷僻——情况要好一些，引起了一些轰动。我同意从空中截获食物这种流行的看法，但我决定让食物落下来，但不去抓住它。为了这个目的，每当食物落下来的时候，我总是轻轻地往上一跳，而且跳的时候总是算好不让自己够着，于是食物大多毫无生气地漠然落地。我怒气冲冲地朝它扑去，不仅因为饥饿，而且因为失望而发怒。不过，在个别情况下，也发生了另外一种颇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情况：食物并不落地，而是跟随我一起往上跳，食物在跟踪饥饿者。这情况为时不久，食物只跟了我一小段距离，然后终究落了下来，或者消失殆尽，或者——这是最常见的情况——由于我的贪婪，我把食物通通吃光，从而提前结束实验。总之，当时我很幸福，我的周围是一片窃窃私语，人们感到不安，变得留神起来，我觉得我的朋友们更关心我的那些问题，在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求助的目光，虽然这并不

过是我自己目光的一种反射，但我希望这样，而且感到心满意足。后来我才知道——别的狗也与我一起得知——这种实验在科学里早就有描述，而且比我所做的要成功得多，虽然这种实验由于它所要求的那种自我控制难于做到，早就没有人再去做了，而且由于它在科学上据说毫无意义，因此没有重复的必要。它只不过证明了人们早就知道的事情，即土地不仅以垂直的形式，而且以倾斜的、甚至是螺旋的形式，从空中获取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我停止了自己的实验，但我并不气馁，因为我还很年轻，相反，这一切激励着我去做出一生中也许是最伟大的成就。我不相信自己的实验在科学上毫无价值，但这里相信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只是证明，而这正是我想提出的，我要借助证据充分说明这本来就有些冷僻的实验，使之成为我研究的中心。我要证明，当我避开食物时，不是土地把食物斜着拉下去，而是我吸引着它跟在我身后。当然，我无法进一步扩大这一实验，一边看着近在眼前的食物一边从事科学实验，这是无法持之以恒的。但我决定另辟蹊径，我打算尽我所能忍受地彻底绝食，当然，在绝食的时候，也要避免见到任何食物，避开各种诱惑。如果我就这样隐退，夜以继日地闭着眼睛躺着，无须为保存和截获食物而煞费苦心，并且如我不敢说出口却隐隐希望的那样，放弃所有其他的措施，只依靠那不可避免的和效率低的土地浇灌及默默地背诵咒语和歌曲（为了避免把身体搞垮，我打算放弃舞蹈），食物就会自动地从天而降，也无须为土地操心，只要敲敲我的牙齿，食物就会进入我的口内——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么，科学虽然未被驳倒，因为它对特殊情况 and 个别情况有着足够的灵活性，但是所幸没有这么多灵活性的民众又会说些什么呢？况且，科学所认为的特殊情况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特殊情况毕竟是两码事，根据历史上的传说，当谁因为身体有病或忧郁而拒绝准备、寻找和接受食物时，众狗便会联合起来，齐声念咒，让食物偏离通常的路线，正好落入病狗的口中。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我身体健康，精力旺盛，胃口特好，以致我成天不想别的只想进食。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是自愿禁食的，我自己有能力让食物掉下来，也想这样去做，但我需要狗类的帮助，甚至非常坚决地禁止他们帮助我。

我在一片偏僻的灌木丛里给自己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在这里，我既听不到有关饮食的谈话，也听不到吧嗒吧嗒地吃东西和啃骨头的声音。我饱餐了一顿，然后躺下休息。我要尽可能地闭着眼睛度过所有的时间；只要食物还没有来，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始终是黑夜，不管持续几天还是几个星期之久。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睡一会儿觉，或者最好干脆不睡，因为我不仅得通过念咒把食物从天上弄下来，还得多加

留神，以免因睡着而未注意到食物的到来。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这是因为，一方面我虽然这样想，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喜欢睡觉，因为睡着比醒着挨饿的时间更长。由于这些原因，我决定慎重地安排时间，做到睡的次数多一些，但每次睡的时间要尽量短。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在睡的时候总把头靠在一根嫩弱的树枝上，它一会儿就会折断，从而把我弄醒。我就这样躺着，时睡时醒，时而做梦，时而独自默默地吟唱。起初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许食物来的地方，根本没有人发现我在这里对抗事物的通常进程，因此一切太平无事。我有些担心的是，狗儿们发觉我不在，过不了多久就会找到我，并且采取一些反对我的行动，这无疑会干扰我的努力。我担心的第二件事是，土地——尽管在科学看来是不毛之地——单单依靠灌溉也能产生出所谓的意外食物，它的气味会诱惑我。幸而暂时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可以继续挨饿下去。除了这些担心，我目前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尽管我所从事的是取消科学的工作，心里却充满了惬意和科学工作者那种有口皆碑的宁静。在我的那些梦幻中，我获得了科学对我的谅解，我的研究在科学里也找到了一席之地，我深感欣慰地听说，不管我的研究多么成功，我也决不会被逐出狗类的生活，尤其是在成功的时候不会产生这种遭遇。科学对我抱着友好的态度，它将亲自解释我的研究成果，这一许诺本身就意味着它的实现。以往，我内心深处感到自己受到排斥，我发疯似的冲击我们狗类的城墙；如今，我到处受到同胞们的尊敬，浑身洋溢着那盼望已久的由聚集在一起的狗体产生的温暖，我将骑到我同胞们的肩上，很不自在地摇晃。这是最初挨饿时产生的奇特效果。我感到自己成绩斐然，出于感动和自怜，不禁在那宁静的灌木丛中哭了起来。当然，这一举动多少有些费解，因为如果我期待的正是这种应得的报酬，那又为何要哭呢？也许只是由于惬意的缘故。每一次，只要我感到惬意，我就会哭，但这样的时候很少。而且哭过就算了。那些美丽的画面随着饥饿的加剧逐渐消逝了，过不了多久，我迅速地告别了所有的幻想和激动，腹中只感觉到难以忍受的饥饿。“这就是饥饿”，那时我无数次地对自己这样说，仿佛要使自己相信，饥饿和我仍是两码事，我可以像摆脱一个讨厌的情侣似地摆脱它，然而实际上我们极为痛苦地融为一体。当我向自己解释“这就是饥饿”时，我指的正是饥饿，它在说话，并以此取笑我。这是多么不吉利的时光啊！每一想到它，我就不寒而栗，但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我那时感受到的痛苦，而且主要是因为当时还不成熟。如果我想有所成就，就得再次感受这种痛苦，因为我至今仍把饥饿看作是我研究所需的最后和最有力的手段。节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最高的境界

可以达到，那么唯有通过最高的效率方能达到，而这最高的效率对我们来说就是自愿节食。所以，每当我仔细思考过去那些岁月——为了我的生活，我乐于反复思考它们——这也意味着我在认真思考那些即将威胁我的岁月。看来，要从这样的实验中恢复元气，几乎得花一生的时间。我整个的壮年时期都耗费在那次节食上，至今仍未恢复元气。如果下次我再开始节食，我也许比上次更加坚决，因为我的经验比以往更加丰富，而且更加认识到这种实验的必要性，然而我的力量较前减少，至少，一想到那熟悉的恐惧，我就会变得疲惫不堪。食欲减退不会给我带来帮助，它只会稍许降低实验的价值，也许还会迫使我把节食的时间比那次所需的时间更加拉长。对于这些和另外一些前提，我相信自己已经明白，因为在这段长的间隔时间里，我已经预先做过多次实验，我常常咬紧牙关，尽量节制饮食，但尚未走到极端，而青年时代那种无拘无束的攻击欲自然一去不复返了，它在我当初节食期间就已消逝。那时，各种各样的考虑折磨着我。我感到我们的祖先是一种威胁。虽然我认为——尽管我不敢公开讲——他们对一切负有罪责，是他们招致了狗的生活，但我还能以牙还牙，反过来威胁他们；不过，我佩服他们的知识，这些知识来自一些我们不再了解的源泉，所以，尽管我急于反对他们，我也决不会违反他们的法则，只是凭自己特殊的嗅觉，从这些法则的漏洞中穿身而过。关于节食，我想引用我们的智者们的一个著名的谈话。一位智者主张禁止节食，另一位智者用“有谁曾想到过要节食呢？”这样一个问题劝阻了他。前者被说服了，于是收回了禁令。但紧接着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说节食真的没有被禁止吗？”对此，大多数评论员作了否定的回答，认为节食是准许的。他们赞同第二位智者的看法，所以并不担心因错误的评论而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我在开始节食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可是现在，当我饿得缩成一团，精神有些错乱，不住地求助于后腿，绝望地在上舔着、啃着、吮吸着，直到肛门为止时，我却感到对那次谈话的一般解释是完全错误的。我诅咒评论这门学问，我诅咒自己竟然让它引入歧途。就连孩子也能认识到，那次谈话不仅仅包含着有关节食的唯一禁令，还包含有更多的内容。第一位智者打算禁止节食，他所希望的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节食被禁止了；第二位智者不仅赞同他的看法，甚至认为节食是不可能的，于是在第一道禁令上又加上了第二道，即禁止狗的天性本身；第一位智者承认了这一点，并且收回了那道明确的禁令，也就是说，他在对一切做了说明后，要求众狗认识到，他们自己应该主动禁止节食。这就构成了三重的禁令，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一道，而我却触犯了它。我至少应该——尽管现

在已为时太晚——听从禁令，能够停止节食，但在痛苦之中也继续存在一种节食的诱惑，我贪婪地追随它，犹如追随一条陌生的狗。我无法停止节食，也许我也已经精疲力竭，无法站立起来，走到有人烟的地方拯救自己。我在林中的落叶上辗转反侧，无法再继续睡下去，到处是吵闹声，我至今的生活一直与之相伴的那沉睡的世界，似乎由于我的节食而醒了过来。我想，我将永远不能再吃东西了，因为我要是再吃，势必会使那刚获释的喧闹的世界重归沉寂，而这却是我无能为力的。当然，我所听到的最大的喧闹声，是在我的腹中，我常把耳朵贴在肚子上，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我几乎无法相信我听到了什么。由于情况太坏，眩晕似乎也抓住了我的天性，后者徒然进行反抗。我开始去嗅食物，久违的精选的食物，我的孩提时代的欢乐。的确，我闻到了母乳的香味，忘了自己要抗拒气味的决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并未忘记它。我怀着似乎属于这一方面的决心，拖着脚步吃力地向四面八方走去，但总是只能走几步，而且用鼻子嗅，仿佛我之所以喜欢食物，只是为了提防它。我一无所获，但并不失望，食物是有的，只是它们总是离我几步，显得太远，而我的腿事先就支撑不住。与此同时，我当然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食物，我之所以做出这些小小的举动，只是由于担心自己最终会倒在那个地方再也爬不起来。最后这些希望破灭了，最后这些诱惑消失了，我将在此悲惨地毁灭。我的那些研究——那些来自童年般幸福时期的天真无邪的实验——想要干什么呢？此时此地，形势是严峻的，我的研究本可以在此证明它的价值，但研究在哪里呢？这里只有一条茫然地张口向空处咬去的狗，尽管他拼命地忙个不停，不由自主地频频浇灌着土地，但是在他的记忆里，从那堆杂乱无章的咒语里，再也无法找到任何的词句，甚至新生儿用以钻到母腹下的那小小的诗句也无法找到。我觉得，我与弟兄们之间相隔不是只有几步，而是无限地远，我决不会因为饥饿而死，而将死于孤独。显然，不论是在地下、地上还是空中，都没有人关心我，我将死于人们的冷漠，这种冷漠说：他快要死了，而且不久就会死亡。我不也赞成这种说法吗？我没有说过同样的话吗？我不是曾经希望这种孤独吗？不错，你们这些狗，但我不是为了在此就这样死去，而是为了从这个谎言的世界走向真理那边。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告诉你真理，包括我这个谎言之国的土生土长的公民。也许真理并不十分遥远，所以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孤独，别人并没有抛弃我，是我抛弃了自己，我不中用，注定灭亡。

但是，我不会像神经质的狗那样，以为自己马上就会死。我只是昏厥而已，当我苏醒过来，举目一看，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一条陌生的狗。

我不感到饿，我非常强壮，关节充满了弹性，尽管我并未试着站起来，考验一下自己的身体。我像往常那样漫无目的地看了一下，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条漂亮、但不太异常的狗，我看到的只是这一点，但我总觉得，他身上的东西比我平时看到的要多。我的身下是血，初看的时候，我以为是食物，但马上看清是自己所吐出的血。我把目光从血上移开，转向那条陌生的狗。他很瘦，腿长，棕色的皮毛里夹杂着白色的斑点，探究的目光美丽而炯炯有神。“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开口道，“你必须离开这里。”“我现在不能离开。”我回答道，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我该如何向他解释这一切呢？而且他看上去还有急事。“我请你走开！”他又说，一边不安地一只接一只地抬起腿。“别管我，”我说，“你走吧，别管我，别的狗也不要管我。”“我是为了你好才请你离开这里的。”他说。“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想请我离开，我都不能走，即使我想走也没有这个能力。”“你完全有这个能力，”他微笑着说，“你能走。正因为你看上去身体虚弱，所以我求你现在就慢慢地走开，你要是犹豫不决，往后就得跑了。”“这事就让我来管吧！”我回答说。“这事我也要管。”他说道，并因为我的顽固而感到悲伤。看来，他已打算暂时把我留在这里，但想借此机会巴结我，故而和我亲热一番。要是在别的时候，我也许乐于忍受这条漂亮的狗，但当时不知怎的我却感到一阵恐慌。“走开！”我大声喊道，因为除此之外我无法找到别的自卫方法。“那就随你的便吧，”他边说边慢慢地往后退，“你真是不可思议。你难道不喜欢我吗？”“要是你走开，让我安静一会儿，我就会喜欢你。”我回答说，但不再像我想使他相信那样肯定。凭我那些通过节食而变得敏锐起来的感官，我从他身上看到或听到了某种现象。它刚刚萌生，正在逐步形成，正向我靠近，我终于知道，这条狗有一种把你撵走的力量，尽管你现在还无法想象自己怎样才能起来反抗。我怀着越来越大的好奇心注视着这条狗，他对我的粗暴回答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你是谁？”我问道。“我是一名猎手。”他回答道。“你为何不愿让我待在这里？”我问。“你妨碍我，”他说，“你在这儿，我就没法打猎。”“你试试看，”我说，“也许你还能打猎。”“不，”他说，“很抱歉，你必须走开。”“你今天就别打猎了吧！”我求道。“不行，”他说，“我必须打猎。”“我必须走开，你必须打猎，”我说，“全是必须。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必须吗？”“不，”他说，“这问题根本用不着明白，这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事。”“不见得吧，”我说，“你刚才还为你必须把我赶走感到难过，但你仍然要把我赶走。”“是这样，”他说。“是这样，”我气呼呼地重复他的话，“这不是回答。放弃打猎与放弃赶我走这两种想法之间，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容

易？”“放弃打猎。”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既然如此，”我说，“这里就存在着矛盾。”“到底是什么样的矛盾？”他说，“亲爱的小狗，你难道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必须吗？你难道连理所当然的事也不明白吗？”我不再回答任何问题，因为我发现——此时，我突然感到新的生命，一种由于恐惧而产生的生命——从一些不可理解的细节中，我发现——除我之外，也许谁也没有发现这些细节——这条狗已运足气准备开始唱歌。“你就要唱歌。”我说。“是的，”他严肃地回答，“我马上就要唱了，但现在还没唱。”“你已经开始唱了。”我说。“不，”他说，“还没有。不过，你做好听的准备吧。”“我已听到你在唱了，尽管你否认。”我颤抖着说。他默不做声。当时，我觉得自己清楚地看到了已往的任何狗也不知道的某种东西，至少传说中对此只字未提，于是我怀着无穷的恐惧和羞愧，急忙将脸埋在我面前的那滩血中。我觉得自己发现的事情是，那条狗已开始唱歌，但他自己还不知道，不仅如此，旋律还和他分开，按照自己的法则在空中飘荡，从他的头顶上掠过，仿佛跟他毫不相干，只是冲我而来，把我当成了目标。——今天，我当然否认所有这一类的认识，把它们归咎于我当时的过度兴奋。不过，就算这是一个错误，它也有某种伟大之处，它是把我从挨饿中救到这世界来的唯一的现实，尽管只是虚假的现实。它至少表明，在完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我们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而我那时确实完全忘乎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也许患了重病，不能动弹，可是我无法抵挡这旋律——看来，那条狗马上就要把它当做自己的旋律接受下来——它越来越强，也许无限制地增强，现在就已几乎要把我的耳朵震坏。然而最糟糕的是，似乎只是为了我而存在，这声音——由于它的庄严，树林静了下来——只是为我而存在。我是谁呢？我怎敢一直待在这儿，满身血污地躺在它的面前？我颤抖着站了起来，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副模样可怎么走路呢，我还在这样想时，身子已被那旋律驱赶着，美妙地飞腾而去。这事我压根儿没有告诉我的朋友们，我一到达，也许会告诉他们一切，但那时我太虚弱，后来我又觉得这件事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有时，我禁不住向他们做了些暗示，但这些暗示在谈话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外，数小时之后，我的身体即已康复，精神上却至今留有后遗症。

我又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狗的音乐。当然，科学在这里同样有所作为，据我所知，关于音乐的科学也许比关于食物的科学在内容上更为丰富，总之，基础更为坚实。这是因为前一个领域的工作可以比后一个领域的工作更加缺乏热情，前者更多地从事单纯的观察和系统化，而后者主要看重实用的结论。与此相联系，人们更多地尊敬音乐科学，而较少

地尊敬食物科学，但前者从未像后者那样能够深入民众。拿我来说吧，在听到树林里的声音之前，我对音乐科学比其他任何科学更加感到陌生，虽然那次跟七位狗音乐家的经历使我对音乐科学有所认识，但那时我还太年轻。况且，即使是接近这门科学，也非容易的事，它被认为是一门特别难的学问，自我封闭，大多数人是不会问津的。虽然那几条狗最初使我注意到的是他们的音乐，但我觉得比音乐更重要的还是他们那种守口如瓶的狗的本性。我在其他地方也许根本找不到类似他们那样的可怕的音乐，我宁可把它忘掉，但他们的本性我从那以后在所有的狗身上都能碰到。在我看来，要想探究狗的本性，最合适的方法莫过于对食物进行研究。这样做，既可避免走弯路，也能达到目的。也许我在这个问题上搞错了。当然，这两门科学的一种边缘学科，即关于唤下食物的歌声的学说，当时即已引起我的怀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又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认真地研究过音乐科学，在这方面甚至远不如那些一再受到科学特别鄙视的一知半解者。我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在学者面前，我只怕连最简单的科学考试也很难通过，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撇开已经提到的生活状况不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首先在于我在科学上的无能，想象力贫乏，记性不佳，尤其是不能时刻牢记科学的宗旨。对这一切，我不仅供认不讳，甚至有些乐意。因为我觉得我在科学上无能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本能，而且的确不是坏的本能。要是我想夸口的话，我会说，正是这种本能毁灭了我的科学能力，因为我对科学虽然一窍不通，但对学者们却了如指掌，这可以从我的研究结果中得到验证。此外，我对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确很不简单的事情颇能领悟，但是，尽管这样，我从来也不敢涉足科学，哪怕是最低一级台阶也不敢攀登，这至少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也许正是为了科学，这种本能能使我把科学——一种与人们今天从事的科学不同的科学，一种最后的、自由的科学——看得高于一切，自由！当然，我们今天所能获得的自由，只是一种发育不健全的新生物，但它毕竟是自由，总算是一种财产。

洪天富 译

夫妇[36]

一般地说，营业情况很糟，以致我有时候在办公室闲着无事，可抽出时间，拿起样品袋，亲自走访我的主顾们。此外，我早就想到N先生那儿去；我以往一直和他保持商务上的联系，但是，在最近这一年里，

由于某些我所不知道的原因，这种业务上的联系几乎断绝。事实上，对这样一些干扰，根本也用不着去寻找真正的原因；在当今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往往一桩琐事，一种情绪，就能决定一切，同样地，一件琐事，一句话，又能使一切恢复正常。但是，要前进到N那儿，却有点儿麻烦；他是个老人，且最近体弱多病，虽然他仍牢牢掌握着商业上的事情，但毕竟很少到办公室去；如果你想找他谈话，就得到他的寓所去，而这样的外出办事，人们喜欢推迟。

但是，昨晚六点钟过后，我终于启程了；当然，这时登门拜访，已经不是时候，但这毕竟不是一般的社交活动，而是商业上的大事。我很幸运，N在家；在前厅里有人告诉我，他刚刚同他的妻子散步回来，现在正在他儿子的房间里，他儿子稍感不适，正卧床休息。我也被邀请到他儿子那儿去；起先，我犹豫了一下，但后来想尽快结束这次尚可的拜访的愿望占了上风，于是，我像往常那样，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手里拎着样品袋，让人引着穿过一间暗黑的房间，进到了一间灯光黯淡的室内，那儿正聚集着一小群人。

也许是凭借本能，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位我十分熟悉的商业代理人，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我的竞争者呢。所以，他早在我之前就偷偷地溜到这儿来。他舒舒服服地紧挨病人的床坐着，仿佛他是位医生；他身穿一件漂亮的钮子没有扣上因而显得鼓鼓囊囊的大衣，威风凛凛地坐在那儿；他的狂妄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位病人也许有类似的想法，他躺在床上，两颊因发烧而微微发红，不时地朝代理商看看。再说，这病人已不年轻，他是N的儿子，跟我同岁，蓄着短的络腮胡子，因为患病显得有些蓬乱。N老先生，个子高大，宽肩阔背，但是，由于病魔缠身，相当消瘦，而且哈腰弓背，颤颤巍巍，真令我惊讶不已。他像刚走进来那样，仍然穿着毛皮大衣站在那里，朝儿子嘟哝着什么。他的妻子矮小而虚弱，但对丈夫却非常热情，关怀备至——她几乎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些旁人——正忙着帮助丈夫脱去毛皮大衣，但是，由于两人身高不等，脱时颇为困难，但是她终于成功了。顺便一提，也许真正的困难在于N的急躁，因为他正不停地用两只手摸索那把靠背椅，而他的妻子刚把大衣脱下来，就急着把它给他推了过去。她自己则拿着这件几乎把她盖住的大衣走了出去。

眼下，在我看来，我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还没有到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是，如果我还想试

一试，就得立即动手去做，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商业会谈的条件只会越来越坏；而且，我会像那位代理商显然希望的那样，永远地坐着不走，这可不是我的作风；此外，我根本不想把他放在心上。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开始陈述我的事情，虽然我注意到，N正心血来潮，想同他的儿子聊几句。令人遗憾的是，我有个习惯，每当我谈得有些兴奋时——这很快会发生，而且在这间病室里，比平时发生得还要早——便站了起来，而且边说边来回走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无疑是一种相当好的习惯，可是在别人的住宅里，这样做未免令人讨厌。可是，我无法控制住自己，尤其是当我缺少习以为常的香烟的时候。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坏习惯，但是，跟那位代理商的坏习惯相比，我还十分欣赏我的坏习惯呢。例如，他把他的帽子放到膝盖上，在那儿慢慢地推来推去，有时又突然地、完全出乎别人意料地把它戴到头上，对此，别人会讲些什么呢？当然，他马上又把它摘下来，仿佛无意中出了错，但一转眼间，他又把它长时间地戴在头上，而且他总是这样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动作。这样一种表演可以称得上是不法行为。然而，这不干我的事，我照旧来回走动，专心思考着我的问题，压根儿不理睬他；但是，或许有一些人被这种玩帽子的游戏弄得不知所措。当然，我在激动的时候，不仅注意不到这种干扰，而且根本不理睬任何人，我虽然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不感到累，或者只要我刚巧没听到反对意见，我就几乎不加过问。例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N根本就没有在听，他两手扶着靠背椅的扶手，不舒适地来回转动着，望都不望我一眼，而是若有所思地茫然注视着空中，他的面孔看上去毫无表情，仿佛没有听见我说话的声音，甚至感觉不到我的存在。我虽然看到了他所有的病态行为，也感到很少有希望，但是尽管这样，我仍然继续讲下去，仿佛我还抱有希望，通过我的言谈，通过我那些对他有利的建议——我本人对自己所做出的这些无人要求的让步也感到吃惊——最终又会使一切恢复平静。我偶然发现，那位代理商终于让他的帽子停止了活动，并把双臂交叉在胸前，这给我带来一定的满足；我的论述——的确，有一部分就是针对他的——看来已经狠狠地刺痛了他的计划。要不是那个至今被我当做次要人物而加以冷落的儿子突然在床上半支起身子，用拳头发出威胁，要我停止讲话的话，我在由于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快感中，也许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显然，他还想说点什么，指出点什么，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起初，我把这一切看作是高烧性谵妄，但是，当我无意间抬头看到老N的时候，我便更加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N坐在那儿，睁着眼睛，目光呆滞，眼皮肿胀，大概还能看上片

刻，他哆嗦着向前倾身，仿佛有人抓住或敲击他的后脖子，他的下唇，甚至牙龈完全暴露出来的下颚，控制不住地垂了下来，整个面部变得支离破碎；他还能呼吸，尽管很困难，不过霎时之后，他像获得解救似的向后倒靠到椅背上，闭上了双眼，某种过度劳累的表情还掠过他的面部，然后，一切都完了。我迅速跳到他的身旁，抓住他那只垂着的手，它冰凉且毫无知觉，我不禁毛骨悚然；手上也不再有了脉搏跳动。这样看来，一切都过去了。当然，这是一位老人。但愿我们能像他这样安详地死去。但是，现在有多少事需要去做啊！而且首先得赶紧做什么呢？我四下观望，寻求援助；但是，那个儿子把被单朝头上一盖，你可以听到他那没完没了的啜泣声；那个代理商，冷若冰霜，稳稳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上，离N只有两步远，显然，除了耐心等待时光流逝，别的任何事情他都坚决不去做；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我一人来做点什么的了，现在，我马上要做一件最难的事，即以某种让人受得了的方式，也就是世上并不存在的方式，将这个信息转达给他的妻子。我已经听到她从隔壁房间走出来时的急促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她跟往常一样，始终穿着日常便服——她没有时间更换——拿进来一件在炉子上烤暖的睡衣，想现在就给她的丈夫穿上。“他睡着了。”她说，且微笑着摇摇头，与此同时，她发现我们默不做声地坐着。带着这位无辜者对她的无限信任，她将他那只我刚才怀着厌恶和敬畏的心情握过的手抓住，像进行一场夫妻间小小的游戏一样亲吻它，于是——我们三人多么想观看其他人的表情啊！——N竟动了起来，大声打着呵欠，让人给他穿上睡衣，面带几分生气和几分挖苦的表情，容忍他的妻子对他进行的温存的责备，她怪他不该散步散了这么久，以致使自己过度疲劳，N却对他的入睡，向我们作了另外的解释，而且出于无聊，奇怪地说了一些话。然后，为了不使自己在通往另一个房间的路上受凉，他暂时躺在他儿子的床上；他的妻子赶紧拿来两个靠垫充当他的枕头，并把它们放到儿子的脚头。这场虚惊过去之后，我再也没有发现任何离奇的事。这时，他要了晚报，不理睬那些客人，把它放到眼前，但并没有认真阅读，只是随意浏览，与此同时，他以商人特有的惊人的洞察力，对我们的建议说了几句令人相当不快的话，一面用他那只空手不停地打着轻蔑的手势，还砸舌做声，暗示我们的商人习气在他的嘴里引起不好的味道。那位代理商情不自禁地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意见，也许他认为，尽管他感觉迟钝，也能感觉到在此事发生之后有必要做出某种补救，但是，照他的办法，是根本无法做出补救的。我于是马上起身告辞，我几乎得感谢那位代理人；若不是他在场，我还会做出马上离开的决定。

呢。

在前厅里，我还遇到了N太太。一看见她那可怜的样子，我便连思带想地说，她使我有点儿想起我的母亲。由于她一言不发，我便补充道：“不管人家怎么说，她能够做出奇迹。被我们弄坏了的东西，她还能够使它复原。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失去了她。”我故意放慢说话的速度，非常缓慢和十分清楚地说，因为我猜想这位老太太听觉迟钝。然而，她也许已经聋了，因为她突如其来问道：“我丈夫看上去怎么样？”此外，从几句告别的话语中，我发觉她把我同那位代理商搞混了；我乐于相信，要是她耳朵不聋，她会对我更加亲切一些。

然后，我走下了楼梯。下楼比早些时候的上楼更难，连这次下楼也并不那么容易。啊，多少次商务旅行都失败了，还得继续挑起重担。

洪天富 译

地洞 [37]

我造好了一个地洞，似乎还蛮不错。从外面看去，它只露出一个大洞，其实这个洞跟哪里也不相通，走不了几步，便碰到坚硬的天然岩石。我不敢自夸这是有意搞的一种计策。不妨说，这是多次尝试失败后仅留的一部分残余。但我总觉得不要把这个洞孔堵塞为好。当然，有的计策过于周密，结果反而毁了自己，对此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而由于这口洞孔引起人们的注意，发觉这里可能有某种值得探索的东西，这也确是勇敢的表现。但如果谁以为，我是怯懦者，仅仅因为胆怯才营造了这个地洞，这就看错我了。离这个洞口约千把步远的地方，有一处上面覆盖着一层可移动的苔藓，那才是通往洞内的真正入口处。它搞得这样万无一失，世界上所能做到的安全措施也莫过于此了。诚然，也可能有什么人踩到那层苔藓，或者把它踩塌，那么我的地洞就暴露了。倘谁有兴趣，也可能闯将进去——请格外注意，非有精于此道的稀有本领不可——把里面的一切进行永久性的破坏。这我是明白得很的。我现在正处于我的生命途程的顶点，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也几乎得不到一个完全安宁的时刻。在盖着苔藓的那个幽暗的地方，正是我的致命之所在。我经常梦见野兽用鼻子在那里贪婪地来回嗅个不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满可以把洞口堵死，上面覆以一层薄薄的硬土，下面填上松软的浮土，这样我就用不着费多大气力，每次进出，只要挖一次洞口就行

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防备万一，我必须具备随时一跃而出的可能性，为了谨慎行事，我必须随时准备冒生命的风险，可惜这样的风险太频繁了。这一切都得煞费苦心，而神机妙算的欢乐有时是促使人们继续开动脑筋的唯一原因。我必须做好随时能够冲出去的准备，有了高度的警惕性，难道我就不会受到完全突如其来的袭击了吗？我安安稳稳地住在我的家的最里层，与此同时，敌人却从某个什么地方慢慢地、悄悄地往里钻穿洞壁，向我逼近。我不敢说他的嗅觉比我更灵，很可能他对我就像我对他一样，知道得很少。但有些不顾死活的盗贼，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地乱掘乱挖一通，由于我的地洞的范围广大，他们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碰上我的许多途径中的一条，也未始不可能。当然，我在自己的家里，自有谙熟所有途径和方向的长处，盗贼会很容易地成为我的牺牲品和晚餐。但我正在变老，有许多同类比我更强，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我逃避了一个敌人，又落入另一个敌人之手，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的。唉，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但无论如何，我非有一个比较容易到达的、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出去的、完全敞开的出口做保障不可，这样就不至于在我没命地挖掘时（不管土层多薄），突然——天呀，保佑我！——感到后腿被追踪者的牙齿咬住了。而且威胁我的不仅有外面的敌人，地底下也有这样的敌人。我虽没见过，但传说中讲到它们，我是坚信不疑的。那是地底下的生物，传说中也说不清它们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做了它们的牺牲品，还几乎没见过它们。它们来的时候，就站在你站立的地底下——它们生活的世界——当你刚刚听到它们的爪子发出抓东西的响声的时候，你就没救了。遇到这种场合，与其说你在自己的家中，毋宁说你在它们的家中。在这种情况下，那条通往出口的通道也救不了我，可以说，那根本就不是救我的东西，而是毁我的东西。但它是一种希望，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除了这条大道以外，还有几条很狭窄的、但相当安全的小道，它们使我与外界保持联系，向我提供自由呼吸的空气。这些路本来是鼯鼠筑成的，我因势利导，把它们引进了我的地洞里，我通过这些途径可以嗅得很远，使我得到保护。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经由这些途径来到我跟前，成了我的食物。这样。我根本用不着离开地洞，就可以进行一些小小的狩猎活动，以维持一种简朴的生活；这是十分宝贵的。

我的地洞的最大优点是宁静。当然，这是没有准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中断，一切告终，也未可预料。不过就目前来说总算是宁静的。我可以在我的通道上蹑着脚走好几个钟头，有时听到个把小动物的声音，不一会儿这小动物也就在我的牙齿间安静下来了；或者泥土掉落的

沙沙声，它告诉我什么地方需要修缮了；除此以外便是寂静。树林中的空气透进来，既暖和又清凉。有时我惬意地伸展身子，在通道上打起滚来。当秋天到来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住所可以安身，这对于一个渐近老年的人，算是美好的了。通道上每隔一百米的地方，辟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在那里我舒舒服服地蜷曲着身子，一边休息，一边使自己暖和暖和。在那里我可以甜甜蜜蜜地睡上一觉，这是和平宁静的睡眠，是满足安全感的睡眠，是实现了建立安心之所的愿望的睡眠。不知是由于过去的习惯，还是这座家屋确实存在着足以唤起我的警觉的危险，使我常常有规律地从酣睡中惊醒，肃然谛听着那日夜支配着这里的宁静，然后宽慰地微微一笑，旋即又舒展四肢，沉入更为香甜的梦乡。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虫们啊，他们在马路上、在树林中流浪，至多只能匍匐在堆积的树叶底下，或者与同类结伙，暴露在天地间的一切灾厄之中！我则躺在这各方面都安全的广场上——这样的广场在我的地洞里有五十几处之多——在瞌睡和熟睡之中来消磨那任我选定的时间。

缜密地考虑到极端危险的情况——不是直接的追踪，而是包围——在洞穴的近中心处修建了一个中央广场。在一切其他场合，都是极端紧张的脑力劳动多，体力劳动少，这个城郭则是我的艰巨的体力劳动的成果，比地洞里的所有别的部分都艰巨。有好几次，我由于身体疲乏不堪，濒于绝望，想弃绝一切；仰卧着翻过来，滚过去，诅咒这地洞，并艰难地爬出洞外，任穴口洞开着。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不想再回去了，直到几小时或几天后我后悔了，回去一看，见地洞完好无损，我恨不得引吭高歌，并以发自内心的喜悦重新开始劳动。这个城郭的工程之所以增加了不必要（说不必要，因为地洞从那种无效劳动中并未得到真正的益处）的困难，是由于按计划安排所确定的这个场地恰恰土质很松，而且充满砂粒，因此必须把这地方的土层夯实，才能建造起美丽的大穹顶和圆形广场。从事这样一种劳动，我只能靠额头。所以，我不分白天黑夜，成千成万次地用前额去磕碰硬土，如果碰出了血，我就高兴，因为这是墙壁坚固的证明，而且谁都会承认，我的城郭就是用这样一种办法建成的。

我利用这个城郭来贮藏我的食物：凡是洞内抓获而目前还不需要的一切，和外面猎获的全部，我统统把它们堆放在这里。场地之大，半年的食物都放不满。于是我把东西一件一件铺了开来，在其间漫步，同时玩赏着它们，悦目于其量之多，醉心于其味之杂。任何时候，只要我想看一看储藏品，都能一目了然，而且我还可以随时进行重新排列，根据

不同季节，做出必要的预计和狩猎计划。有这样一些时候：由于洞里食物富足，我对饮食漠不关心，因而对这些出没的小动物根本不去理会，当然从别的理由考虑，这也许是欠慎重的。由于经常从事防御准备工作，使我原想充分利用地洞来进行防御的主张有了小幅度的改变和发展，于是我常常觉得以城郭为防御基地是危险的。地洞的复杂性确实也向我提供了采用多种防御办法的可能性。而我觉得将存粮稍加分散，利用某些小广场来分批贮藏，似乎更为周到些。于是我决定约每隔两个广场设一个预备储粮站，或者每隔三个设一正储粮站，每隔一个设一副储粮站，如此等等。再则，为了迷惑敌人，我划出几条道路不堆贮藏品，或者，各按它们通向主要出口的位置，挑选少数广场错杂其间。自然，每一项这样的新计划都要求艰巨的搬运工作，我必须做出新的安排，然后就是来回搬东西。当然，我不用着急，可以慢慢地干，把珍贵的东西衔在嘴里搬运，高兴在什么地方歇一歇，就在什么地方歇一歇。遇到可口的东西就吃它几口，这是满不错的。糟糕的是，我每每从梦中惊醒，就仿佛觉得目前的这种粮食分贮法是完全失算的，它会招致严重的危险，非立即加以纠正不可，睡意和疲劳也在所不顾。于是我急忙就走，快步如飞，连考虑一下的工夫都没有。为了实施这一新的、全新的计划，我不顾一切，凡是碰到嘴边的东西，就只管逮住，用牙齿咬着，拖呀，背呀，喘息着，呻吟着，踉踉跄跄地前进。只要对目前这种我感到过于危险的状况有任何些微的改变，我就心满意足了。直到睡意渐渐地消除，脑子完全清醒过来，我几乎不理解何以有这一番极度的紧张活动，对于被自己扰乱了的家里的和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我的卧所，由于新造成的劳累而立即睡着了。醒来时，作为这几乎像梦一般出现的夜间劳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是牙缝间还挂着的一只耗子。此后又有一些时候，我觉得还是把所有的食粮集中于一个场地为上策。贮藏在小广场上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呢？那里到底放得下多少东西呢？无论你拿什么放到那里去，都会堵塞道路，一旦有防务活动，奔跑起来，说不定反而成为我的障碍。再说，不把所有的储藏品集中在一起，因而不能对自己的财产一目了然，势必损伤自己的自尊心，这种想法固属可笑，却是难免。分成这么多摊，不会散失很多吗？我总不能老在纵横交错的通道上四处奔跑，以便看看是否一切仍然原封未动。分散贮藏的基本想法是对的，但必须有个前提：拥有好几个像我的城郭这样的场地。好几个城郭！一点不假！但是谁能够把它们建筑起来呢？在我的地洞建造的总计划中，现在也没有增添的余地了。我承认，这一点正是我的地洞的缺陷，就好比任何东西如果只有一种样品时，都有缺陷一样，而且我也

承认，在建筑整个地洞期间，我对于拥有几个城郭的要求在自己的意识中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说我有过这一良好愿望，那就清清楚楚了。我没有按照那种要求去做，对于这项巨大的工程，我感到自己太弱了，甚至，我就是想象一下这项工程的必要性也感到自己太弱了。我以同样模糊的感觉聊以自慰，这在平常是难以做到的，但在这一场合我却做到了，这是一种例外，也可能是一种神的恩赐，因为保留我的前额以代替铁锤正是天意所使然。现在我只拥有一个城郭，但觉得一个不够用的那种模糊感觉，已经消失了。不管如何，我只得满足于一个。想用许多小广场来代替它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当这种想法在我心中热起来的时候，我就又动手把各个小广场上的所有东西重新搬回城郭里。于是所有的场地和通道又空出来了，看见城郭里的肉类成堆，连最边远的便道都闻得到许多种肉类混杂的味道，我老远就能把它们一一辨别出来，而每一种味道都使我喜欢。有一阵子对我这一派气象真感到宽慰。这以后出现了一段和平时期。我利用这些太平时日，把我的卧所从外围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里移，因而沉浸于越来越重的气味之中，以致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一天夜里我冲进城郭，从肉堆里挑出我所爱吃的上等品，扎扎实实地、如醉如狂地饕餮大嚼了一番，把肚子塞得饱饱的。这是幸福的时期，也是危险的时期；只要有人了解个中奥秘，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无须冒什么风险，就可轻而易举地将我毁灭，这与缺少第二、三个城郭的弊害不无关系。我之所以受诱惑，正是由于食物集中堆在一起造成的。我正准备通过各种途径来抵御这种诱惑，保护自己，把粮食分散储藏在各个小广场上，也就是这类措施之一。可惜的是，它也像其他类似的策略一样，由于感到缺乏而引起了更大的欲望，这欲望压住了理智，听凭欲望的驱使，任意改变防御计划。

这以后，在对地洞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缮之后，我经常离开地洞——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去外面溜达，以便让自己冷静冷静，同时检查一下地洞是否坚固。要是长时间离开地洞，我会感到受惩罚似的难以忍受，但短时间出去走动走动，我以为也是很有必要的。每当我走近出口时，我总有一种庄严感。住在家里时，我是避免到那里去的，甚至连通向它的任何一条最小的岔道儿我都是不迈步的；再说到那一带去转悠也并不容易，因为我已经在那里建筑了一套完善的、小规模의迷津暗道；我的地洞就是从那里起始的，但当时我还不能指望能够如愿以偿地按照我的计划去完成，我开始半游戏似的从这个小犄角干起来，在迷津的建筑中，我第一次充分领略到劳动的愉快；这项迷津建筑在我当时看来是一切建筑之冠，但从今天的眼光看，说它气派太小，与整个地洞建

筑不相称，该是比较公允的，虽然在理论上它也许堪称宝贵——“这是去我家的入口”，我当时讥讽地对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们说，并仿佛看到了它们全部窒息在入口迷津里的景象——可是事实上，一种墙壁非常单薄的草率工事，对于认真进攻或者孤注一掷的亡命之徒是很难进行抵抗的。但我因此就应该把这一部分重建吗？我犹豫不决，大概要永远维持这样的现状了吧。且不说重建需要我付出巨大的劳动，而且也是一件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危险的事情。在我刚开始挖筑地洞的时候，我是能够比较安心地在那里劳作的，那时风险并不比别的地方大多少。但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今天那样做就未免轻举妄动了，那就等于要把社会的注意力引向整个地洞上来。我感到高兴的是，眼下这一处女工程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比方说吧，一旦发生大规模的进攻，什么样的入口构造才能救我呢？在使进攻者迷惑、错愕、困扰这一点上，这个入口是可以应急的。但如果遇到真正大规模的进攻，那我就必须设法使用整个地洞的一切手段和身心的全部力量来对付——这是理所当然的^啰。所以这个口子就让它维持原样不动好了。尽管地洞有着这样多的天然强加于它的缺陷，但毕竟是我亲手所创；虽然事后才认识到这些缺点，却认识得这样精确，那就让它保留着吧。但这并不是说，这个缺点没有经常地或者也许是始终使我感到不安。平时散步时，我都要避开地洞的这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一看见它就感到不舒服，既然这个缺点已经在我的意识中发出噪音，我就不愿意让它老是在我的目光中呈现。那上面入口处的缺点是无法匡正了，但只要能够回避，我就尽可能不去看它。我只管朝着出口的方向走。虽然我与入口处之间隔着通道和广场，我依然感到我已经陷入一种巨大危险的氛围之中。有时候我好像觉得我的皮变薄了，不久仿佛我只能以赤裸裸、光溜溜的肉身站在那里，这时候，我的敌人以吼叫来欢迎我。说实在的，这样一种感觉足以致使出口本身失去对我的家屋的保护作用，但使我格外苦恼的，仍是入口的构造。有时我做梦，梦中我已经把它重建了，一夜之间以巨人般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而彻底地把它改造了，这下谁也攻不破了。我做梦的这一觉睡得比任何时候都香甜，醒来时我的胡子上还滚动着欢乐和宽慰的泪珠。

所以，如果我要外出的话，还得克服这条迷津给我肉体上造成的苦痛。而我有时一度迷失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因而显得这工程似乎还须不断奋斗下去，以便向我这个早就对它下了坚定不移的判断的人证明它的存在权利，这时候我又气恼又感动。接着我就来到青苔盖底下，在我留在家这段期间，它与树林中毗连的地皮长在一起、互相衔接了，现

在，只要我用头一顶，就可以到外边的天地去。这个小小的动作我已经很久没敢使用了，若不是今天又得克服入口的迷津，我一定会从这里折回，逛回家去，为什么呢？你的家闭关自守，固若金汤。你的生活安宁、温暖，佳肴佳饌不断，你是无数通道、广场的主人，独一无二的主人。这一切你不希望牺牲，但有一部分你打算放弃，虽然你有信心把它们重新夺回来，但你有胆量下一个危险的、非常危险的赌注吗？对此有没有合适的理由呢？没有，在这类问题上不会有合适的理由。但接着我小心翼翼地掀起门盖，到了外面，又轻轻把它盖上，并赶紧跑离这个正在暴露的地点。

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在野外生活，虽然我不再憋在通道里行走了；而是要在大森林中狩猎，我感到身上有一种在地洞里没有任何地盘包括城郭——哪怕它再扩展十倍——让它施展的新的力量。外面的伙食也更好吃，狩猎固然比较困难，很少成功，但其收获从任何方面讲都是价值更高的。这一切我并不否认，并且懂得如何领略并享受它们。至少也得和别的动物一样，说不定比它们还强得多，因为我狩猎时，不像流浪汉那样轻率和绝望，而是目的明确，从容不迫。我也并不是非过野外生活不可，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不允许我永远狩猎下去，等到有人向我发出召唤，而我也愿意，并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倦的话，我将不能抵御人家的邀请。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充分领略这里的时光，无忧无虑地度日。其实却不尽然，许多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并没有做到，地洞的事情忙得我团团转。我很快跑离洞口，不一会儿又赶回来。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藏身之所，并守望着我的家门——这一回是从外面——一连几天几夜。让人家去说我傻好了，我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并从中得到安慰。于是我仿佛不是站在我的家门前，而是站在我自己的前面，觉得自己既能一边熟睡，一边机警地守护着自己，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有一定的长处，不仅能在睡眠时的那种只身无助和妄自轻信的状态中看得见夜间的精灵们，而且同时能以完全清醒时的力量和沉着的判断力与它们在实际中相遇。我发觉很怪，情况并不像我通常所认为（并且只要下洞回到家里也许还会那么认为）的那样糟。从这一方面看是如此，从别的方面看也不例外，但尤其是从这一方面看来，这次外出确是必不可少的。

的确，我把入口处选在斜坡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那里的交通情况——根据一周来的观察所得——确是熙来攘往，十分频繁。然而凡是能够居住的地方，恐怕都是这样的。再说，选在一个往来频繁的地方，由

于频繁，大家跟着川流，这说不定比十分冷僻的地方更保险；在冷僻的地方反而会有精明的入侵者慢慢找了来。这里有着许多敌人，有着更多的敌人的帮凶，他们之间也互相争斗，在紧张追逐中从地洞旁边跑了过去。在这全部过程中，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搜寻过，这对己对敌都是一种幸运，因为要不然，我会为了我的地洞着想不顾一切地朝他的喉咙扑过去。诚然，也出现过一些兽类，我不敢接近它们，只要远远预感到它们存在，我便立即警觉，拔腿就跑。关于它们对地洞的态度，我本来实在是很难确定的。但当我不久回到家来，发现它们中没有一个在场，入口处也完好无损，于是我总算满意地放心了。也有一些幸福的时期，我很想对自己这样说：世界对我的敌意也许停止或者平息了吧，或者地洞的威力把我从迄今为止的毁灭性战斗中拯救出来了。地洞所起的保护作用也许比我已往所想象的，或者当我身临其境之际所能想到的还要大。有时甚至产生这样幼稚的想法：压根就不回地洞，而就在这里的洞口附近住下，专门观察洞口以打发日子，并不断想象着：假如我置身洞中，它能够多么坚固地保护着我的安全；在这样的想象之中获得我的幸福。但幼稚的梦想很快就惊破了。我在这里所观察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安全呢？我在地洞中所遇到的危险到底能不能根据我在外边得到的经验来判断呢？要是我不在地洞中，我的敌人到底能不能根据气味准确地嗅出我来呢？他们对于我肯定有几分嗅得出来，但完全嗅出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能完全嗅出，岂不经常成为正常危险的前提了吗？因此，我在这里所进行的试验只有一半或十分之一能够使我放心，而放松警惕又导致极度的危险。不，我所观察的与其说是我的睡眠（如我以为的那样），毋宁说是在坏家伙醒着的时候，我自己却在睡觉。也许他就混在那些疏忽大意地走过入口处的人们之中，无非像我那样，只想证实门户仍安然无恙，静候袭击，就走了过去。因为它们知道主人不在家里，或者也许它们清楚得很，主人就埋伏在附近灌木丛中，天真地守候着家门。而我呢，户外的生活已经厌倦了，遂离开我的观察哨，仿佛觉得无须再在这里学什么了，现在和将来都不必了。我愉快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走下地洞，永远不回到外面去了，外界的事情听其自然吧，不再作无用的观察来阻止它们了。可是，这段时间，我一任自己看了入口上面所发生的一切，现在又用了极为惹人注意的办法下了地洞，而不知道在我的背后以及在按原来样子关好的入口的顶盖后面的整个周围将发生什么，感到十分不安。起初，我曾在几个风雨大作的夜晚，试着把猎获物快速地掷进去。这一行动看起来是成功的，但是否真的成功，得等我自已进去以后方能知道，但那时对我来说已搞不清楚了，或者即便清

楚，也已太晚。于是放弃了这项试验，不进里面去。我挖了一个——当然是距离真正的入口处足够远的地方——试验性的坑，其大小和我的身体相仿，也用一个青苔盖封口。我爬进坑里，把背后掩蔽好，认真等待着，计算出一天中长短不一的各个不同时刻，然后掀开青苔，爬了出来，记下我的各种观察，取得了种种好坏不一的经验，却找不到一种下地洞的一般法则或安全可靠的方法。因此，我至今还没有从真正的入口处下去过，而不久又不得不下去，这真使我焦躁不已。我并非完全没有到远方去回复往日那种惨淡生活的念头，那种生活虽无安全可言，却是诸种危险无区别的连续，因而个别具体的危险就不明显，不必为之恐惧，这正是我的较为安全的穴居生活与其他地方的生活对照之下，不断启示给我的道理。诚然，这样一种念头是由于毫无意义的自由自在生活过得太久而产生的，也许是完全愚蠢的；现在地洞还属于我，只要再迈出一步，我就安全了。我摒除了一切犹豫，在大白天径直向洞门跑去，这次可一定得把门完全打开了吧。然而我却没能做到。我跑过头了！我特意倒进荆棘丛中，以惩罚自己，惩罚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罪过。但到头来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的想法是对的，即不把所有最宝贵的东西公开舍弃——哪怕只是短暂的，交给周围所有那些地上的、树上的和空中的飞禽走兽，则我要下去是不可能的。危险并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非常实际的事情。那种兴致勃勃地跟着我来的，并非真正的敌人，倒很可能是某种身份清白而又不知好歹的渺小家伙，某种令人讨厌的小生物，它好奇地尾随着我，从而不知不觉地当了我的敌人的向导。或者不是那么一回事，说不定是——而这并不比别的情况好，在某些场合甚至是最糟的——说不定是跟我同一种类型的人，是地洞营造的行家，或者某个森林隐士，或者和平的热爱者，但也可能是个想不劳而获的粗野的无赖。假如现在他真的来了，带着肮脏的贪欲发现了入口，动手去掀苔藓，而且居然掀开了，挤身进去，窃巢而居，甚而至于弄到这种地步：有一瞬间他屁股正好对着我的脸儿，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就会像疯了一般，不顾一切地从后面向他扑去，把他咬个稀巴烂，咬成一块块，撕得粉碎，喝干他的血，并立即把他的尸骸拖到别的猎获物当中。但最最要紧的是，我好不容易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洞穴，这回甚至对迷津起了赞赏之意，可我首先得把我头顶上的苔盖盖好，然后安下心来休息，恐怕我全部的、或部分的余生都要在这里度过了。然而事实上谁也没有来，我依然单独一人度日，我始终一心扑在各种困难的事情上，恐惧倒减轻了不少。我不再回避走近入口处了，在那里绕着圈子走动成了我最喜欢的活动内容，以致仿佛我自己成了敌人，窥视着顺利突入的良机。

假如我有某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把观察哨的任务交给他，那我就可以放心地下去了。我会跟这个我所信赖的人约定，在我下去的时候，在下去以后的长时期内，严密观察形势，一旦发现危险迹象就敲打苔藓盖子，没有情况就不敲，这样我头顶上面的心腹之患便为之一扫而光，连一点残余都留不下，唯一留下的便是那个我所信赖的人了。——难道他不要求报酬吗？最起码的，他连地洞也不想看一看吗？自动让什么人进我的地洞可是我的最大忌讳啊。地洞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访问者而挖筑的，我想，我是不会让他进去的，哪怕他以让我能够进得地洞里面为交换条件，我也不会让他进去的。但我之所以压根儿不让他进去的原因是：让他独自下去吧，这绝无考虑之余地；我跟他同时下去呢，则他在我背后放哨给我带来的益处便成泡影了。那么信赖如何维持呢？在面对面的时候，我信赖他，假如我见不到他，假如苔盖把我们隔开，我还能同样信赖他吗？信赖一个人，在同时监视着他，或至少能够监视他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甚至远隔两地，多半也是可能的。但是从地洞的内部，亦即从另一个世界去完全信赖一个外面的什么人，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这样一种疑问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这样想一想就够了：在我下去期间或下去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无数偶然事件，都能阻碍所信赖的人履行他的义务，而他的任何一个最小的障碍都会给我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总而言之，我毋须抱怨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而只能孑然一身。这样，我肯定丧失不了什么利益，而且还可能使我避免损失。但可信赖的，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地洞了。这一点我早点想到就好了，对于我现在为之忙碌的事情也是早该虑及的，至少，在地洞的建筑开始阶段就应该实现一部分的。第一条通道应该这样设计才行：它需有两个彼此间隔适当距离的入口，这样，我经过各种不可避免的周折通过这个入口下去后，马上经由第一条通道跑到第二个入口，稍稍掀开一点为此目的而建造起来的苔盖，从那里以几天几夜的工夫试着观察情况。这看来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了吧。固然，两个入口使危险增加一倍，但这一忧虑此刻是不必要的，仅仅作为观察哨设想的那个入口做得很狭窄就行了。于是我一头扎进技术研究中去，重温起一个完美无缺、万无一失的地洞建筑的旧梦，稍稍聊以宽慰。我悠然陶然地闭上眼睛，眼前便浮现出那各种可能的图像，我可以在那里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进出出。

当我这样躺着，想象着以上各种情景时，对那些建筑方案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仅仅是从技术角度，而不是从实际效用角度出发的。这种不受阻拦的溜进溜出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你心神不定，缺乏自信，意味着卑污的欲念，邪恶的个性，这个性面对地洞时还要坏得多。地洞仍

然存在，只要向它完全敞开心扉，便可给予注入和平。现在我显然还在它的外面，正在寻找一种回去的可能性；为此，很想掌握必要的技术设施，但也许并不见得那么重要。如果把地洞仅仅看做一个想尽可能安全地爬进去的洞穴，那么像眼下这样神经质似的恐惧，岂不意味着大大贬低了地洞的价值了吗？的确，它也是一个安全的洞穴，或者应该是那样的洞穴，而当我设想我是处于危险之中时，那么我就要咬紧牙关，用尽意志的全部力量来证明这地洞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为拯救我的生命而存在的一个窟窿，它必须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这个明确地赋予它的任务，而别的一切任务我都给豁免了。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地洞在实际上——而处于巨大困境之中的人们是顾不上观察实际的，甚至在岌岌可危之际，也必须经过努力方能投以一瞥——虽然是相当安全的，但绝对是不够的，难道在其中什么时候停止过忧虑了吗？那是另一种的、更为骄傲、内容更为丰富的、深深压抑着的忧虑，可是它对于身心的消耗并不亚于生活在外面的时候所产生的忧虑。就算这个地洞仅仅为了我的生活保障而建造，就算我为此没有受别人的骗，然而付出的巨大的劳动与得到的事实上的保障相比，至少就我所能感觉到的和从中所能得到的利益而言，对我来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承认这一点是极为痛苦的，但是面对前面的入口不得不这样做，这个入口现在把我——他的建造者和所有者——关在外面，不，让我在外面挣扎。但是地洞确也不仅是一个救命之窟。当我站在周围堆积着高高的肉类贮藏品的城郭之中时，纵览从这里伸展出去的十条通道，每一条都根据中央广场的地势或低或高，或直或曲，或宽或窄；条条宁静而空阔，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把我引向同样宁静而空阔的各个广场——于是我心目中关于安全的观念淡忘了，因为我清清楚楚知道，这里是我的城堡，是我用手抓，用嘴啃，用脚踩，用头碰的办法战胜了坚硬的地面得来的，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归任何人所有，它是我的城堡啊，我最终也要在这里安然地接受我的敌人的致命的一击，因为我的血渗透在我自己的这块土地里，是不会丧失的。在和平中半睡着，在愉悦中半醒着；经常在这些通道上度过的这种美好时辰的意味，除此以外，怕是没有地方再有了；这些通道是为了我舒畅地伸展身子，孩子般地打滚，蒙蒙眈眈地躺着，甜甜蜜蜜地睡着，经过精心设计而建造的。那些小广场的每一个我都了如指掌，尽管互相之间彼此相像，但是我闭上眼睛也能根据墙壁的形状把它们辨别得一清二楚，它们和平地环抱着我，那种温暖，任何鸟儿在它的窝巢里都得不到。一切的一切宁静而空阔。

但是，既然是这样，那我又为什么踌躇呢？为什么我害怕入侵者甚

于害怕永远不能返回我的洞穴的可能性呢？好了，现在这后一点谢天谢地成为不可能了，地洞对我意味着什么，搞清这个问题，压根儿是不必要的；我和地洞这样相依为命，不管我遇到多大恐惧，我都能泰然自若地留在这里，无须设法说服自己，打消一切顾虑，把入口打开。我只要清闲地等着就完全够了。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永远分开，无论如何，到最后我是肯定要下去的。但当然，到那时还需有多长时间呢？在这段时间里，在这里的上面，在那边的下面，将有多少事情发生呢？而我的责任在于：缩短这段时间，并立即着手从事必要的事情。

好了，我已累得想都不能想了，耷拉着脑袋，步履踉跄，半醒半睡，与其说在走路，毋宁说在摸索，这样才渐渐接近入口处，缓缓掀开苔盖，慢慢往下挪动身子，因为神思恍惚，让入口无故敞开了很久，及至想了起来，又上去把它关好。但为什么又爬到上面去呢？我只要把苔盖拉上就行了，好吧，我又下去，这回到底把苔盖给合上了。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在这种例外状况下，才能下洞穴。——于是乎我躺在猎获物的堆垛之上，仰面是苔藓，周遭是血水和肉汁，总算开始睡上渴望的一觉了。没有东西打扰我，没有谁跟踪我。苔藓上面看来是平静的，至少直到现在平静的，即使不平静的话，我想现在也不能对它进行监视了；我已换了地点，从上面的世界来到我的地洞，我立即感觉到了它的作用。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具有新的力量；在上面的那种疲惫不堪，在这里却没有。我是旅行回来的，累得几乎晕倒，我省视旧日的住处，着手积压着的修缮工作，匆匆巡视一下所有的场地，但首先是赶紧冲向城郭；这一切把我的劳累变成了不安与焦急。刚走进地洞那一瞬间，我仿佛死死地酣睡了一大觉。第一步工作是非常吃力的，任务十分繁重：猎获物须通过狭窄而墙壁单薄的迷津搬运。我竭尽全力向前推进，走是能走的，但我感到太缓慢。为了加快速度，我从肉垛上拉回了一部分肉块，然后从肉垛的上面跨过去，从它的中间穿过去，于是我的面前只剩下一部分了，把它们搬到前面去，就容易一些了。但是在一条堆满着肉类的狭窄通路上，尽管只有我一个人，并不总是很容易通过的，以致有时我简直要被窒息在自己的贮藏品中，只有边走边吃边喝，才不至于被肉块压伤。但运输完成了，我没有花太长时间就结束了这一工作，迷津被克服了。我站在一条正规的通道上喘了口气，通过一条联结支线，把猎获物搬到一条专为这类项目特设的中心大道，它以很大的坡度向下直通城郭。这下再没有工作可做了，这全部东西都由它自行往下滚动或流动。于是终于到了我的城郭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了。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至于我一眼便发现的那些细小的破

损不久即可修复。再有就是在此之前在各通道上的徜徉了，但这并不费力，等于跟朋友聊天，我过去常是这样做的，或者——我并不算老，但许多记忆已完全模糊了——是我听人这样说的。在我看到了城郭以后，我就开始有意慢慢地走第二条通道，我有的是时间——在地洞里面我总是有的是时间——因为我在那边所做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好事，并使我得到一定的满足。我从第二条通道出发，半路上中断了视察，转向了第三条通道，并循着它折回城郭。这样，第二条通道显然还得重新再去，我就是这样又干又玩，自得其乐，独自发笑。工作很多，头绪纷繁，但永不脱离工作，不断增加着工作量。你们通道、广场和城郭啊，我为了你们而来，尤其是为了城郭的问题我连生命都在所不惜，可是长期以来，我却愚蠢得为生命而战栗，犹犹豫豫不敢回到你们当中。现在，我置身于你们当中了，危险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们的，我们结合成一体了，有什么奈何得了我们呢。即使上面那些家伙已经迫近并准备好用嘴巴拱穿苔盖也不在乎了。而洞穴又以他的沉默和空阒来迎接我，证实着我所说的话。——但是，一种懒洋洋的情绪向我袭来，在一个我最喜爱的广场上，我微微蜷曲着身子躺了下去，我还远没有把一切都视察完毕呢，但我要继续视察下去，直到最后，我不想在这里睡觉，只是经不起在这里躺一躺卧一卧的引诱，想试试看，在这里睡觉是否始终还像过去那样安稳。成了！可我一躺下就不想起来了，我就在这里进入了深沉的梦乡。

我大概睡了很久很久，直到最后实在睡足了，我才自然而然地开始醒过来，最后睡意一定是十分淡薄了，因为一种几乎无法听到的“”的微弱响声把我唤醒了。我立刻明白，这是一种我过去对它太不注意、过分宽容的小东西，趁我不在，在什么地方钻通了一条新路，与我的旧路相交，风一吹就发出“”之声。好一个埋头苦干的家伙啊，而它的勤奋又多么叫人讨厌啊，我非得把耳朵贴在通道的墙上听一听，在墙根试着挖一挖，把骚扰的地点找出来不可，然后才能消除响声。此外，新挖的洞孔如果符合地洞的某项建筑要求，就作为新的通气孔，这对我也是需要的。但那些小东西我要比以前加倍严密注意，一个也不饶恕。

由于我对这类检查工作训练有素，说干就可以干起来，也无须多长时间即可完成，虽然手头有别的工作要做，但这是当务之急，我的每条通路都应保持宁静才是。这一种响声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虽然我刚回来时这响声就早已有之，但我一点儿都没有听见；直到重新在家里

完全安顿下来之后，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用主人的耳朵去听的时候，才能听得到。而这种响声并非常有，中间有很长时间的间隔，那显然是气流受到阻碍时发出的。我开始检查，却找不到下手的地方，虽然挖了几个洞，但那是漫无目标的乱挖一气，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挖的工程固然巨大，但白白花费的填堵和平整的工夫则更为巨大。我压根儿就没有接近过发出响声的地点，每隔一定的间歇，一会儿传来微弱的“——

”的声音，一会儿又传来“呼——呼”的声音。这个，目前暂且不去管它，响声固然恼人，但我所认定的原因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声音几乎没有怎么提高。相反，倒有可能——迄今为止我显然从来没有等待过这么久——那小东西在继续钻小孔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响声会自行消失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种偶然的机会使你毫不费力地找到骚扰的踪迹，而有目的有计划去寻找却长久找不着。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很想再到各条通道上去徜徉，看看那回来后还没有去看过的许多广场，其间也到城郭去转转。但不行啊，我得继续寻找才是。大好的时光被这伙小东西所耗费，它本来是可以利用在更好的场合的。在检查纰漏方面，通常吸引我的技术上的问题，例如我的耳朵具有辨别任何细微差异的能力，能够绘形绘色地使我想象出产生响声的原因，而这原因是否符合实际，这回我很想搞个水落石出。只要这方面没有得出可靠的结论，我就没有足够的理由在这里感到安全，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沙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何况是这样的响声，它在这一方面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重要也好，不重要也好，无论我怎样寻找，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或者反过来说，发现的东西太多了。事情一定是恰恰发生在我那最喜爱的广场上！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远远地离开那儿，几乎走到通往下一个广场的中间，这整个事儿简直是一种笑话，仿佛我想要证明，并非正好是我最心爱的广场才有这种骚扰，别的地方也有种种骚扰，于是我微微笑了起来，侧耳谛听着，但不久我就敛起笑容，因为果不其然，这里也有同样的“”声。这么说来什么也没有——有时我这样想——除了我以外，谁也听不见的，我的经过训练的耳朵显然是敏锐的，现在分明听得越来越清楚了，虽然事实上到处都有完全相同的“

”声，跟我通过比较所证实的一模一样。只要站在通道之中，而不必耳朵贴墙，便可听得出来，那声音并不更大。那场合，我非得用心，不，全神贯注才能时不时听到一丝儿声息，不过，与其说是听到的倒不如说是猜到的呢。但正是这处处有之的相同响声叫我最为搔头，因为这跟我最初的推断不能吻合。假如我对响声原因的推测是正确的，即是说响声确是从某一个场所——这场所是非找出不可的——以最大音量向周围发

放，那么它必定是越来越小。但如果我的解释是不准确的，那么别的解释是什么呢？也有可能存在着两个发音的中心，直到现在我都是从距离中心很远的地方进行监听的，而当我一步步接近这个中心时，它的响声固然逐渐加强，而另一个中心的响声则渐次减弱，故传到耳朵里的两个中心的音量的总和就老是一个样了。当我洗耳谛听的时候，我几乎以为听出了那与我新的推测相符的声音差别来，尽管那声音非常模糊不清。无论如何，我必须把检查区域在检查过的基础上大加扩展。于是我循着通道直达城郭，从那里开始监听。——奇怪，这里也有同样的响声。哦，这是某些微不足道的动物们趁我不在家的時候，放肆地掘洞所产生的声音。不管怎样，他们是不会有反对我的企图的，他们无非是致力于自己的工作罢了。只要中途不发生障碍，它们是要朝着既定的方向搞下去的。这一切我全明白，虽然并不理解它们何以要这样做，弄得我焦躁不安，扰乱了我的对于工作非常必要的理智，它们竟敢驱近我的城郭。但经我观察，迄今未发现城郭周围的墙壁有被掘穿的情况。是由于城郭地处深层、范围广大呢，还是由于因广大而引起的强劲的气流把掘洞的家伙们吓住了呢？或者城郭的存在这一事实的本身使这些感觉迟钝的家伙们闻之也不能不有所慑服呢？无论如何我不想去鉴别究竟是哪种原因使这些挖掘者踌躇不前的。动物受了强烈的气味的吸引，成群结队而来。这里本是我的可靠的狩猎场。但那时它们是从上面某个地方挖穿顶壁，进入通道的，虽然战战兢兢，却经不起强烈的引诱，终于从通道上跑了下来。现在呢，他们却在通道里钻洞。假如我至少完成了青年时期和壮年早期那些最重要的计划，或者说我有过实行那些计划的力量就好了，因为我并不缺乏意志。我最心爱的计划之一，是把城郭跟它周围的泥土隔开，就是说，城郭四壁留下约与我的身高相等的厚度，然后沿着城墙的外围，在那道可惜无法与泥土分开的墙基外面，挖一层腔室，其大小与城墙的体积相同。我总是不无理由地把它设想为我所能有的最上等的寓所。在这个圆形体的上面，我悬吊呀，攀缘呀，下滑呀以及翻滚呀，最后又站在地上。所有这一切游戏都是在城郭的本体上面做的，没有真正到它的室内去。现在能避开城郭就避开，能不进去看就不看，把看的快乐留在以后，不必因此而为之怅然，那是为了把它牢牢掌握在手里，不过假如仅仅拥有一条通往那里的普通的公开通道那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但好在可以为它放哨，这就补偿了看不见它的内部这一缺憾。要是让我在城郭和腔室之间选择一个作为我的终身寓所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后者，宁可不断地上上下下巡逻，以守备城郭。这样一来墙壁里就不会有响声了，不会有东西向城郭大胆挖掘了；于是那里的和平有了保

证，而我成了和平的守护者；我用不着怀着反感情绪去倾听小动物们的挖掘，而是带着我现在完全消失了的如痴如醉的情怀，沉浸在城郭的一片宁静的气氛之中。

但是这一切美妙的情景眼下毕竟还不是现实，我还得干，而我目前所干的也是和城郭直接相关的，我真要为之高兴，因为它鼓舞着我。事情越来越明显，这件起初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工作，显然需要我全力以赴了。我现在所做的是全神贯注地细听城郭周围的墙壁，不论高处还是低处，也不论墙上还是地面！入口还是内里，我无处不听，而我所听见的到处是同样的声音。长久倾听这断断续续的声音，得付出多少时间，经历多少紧张的场面。只要你愿意自己欺骗自己，也可以从这当中得到一点小小的安慰，即城郭这地方与通道不同，由于它范围大，只要你耳朵一离开地面，便什么都听不到了。仅仅为了休息，为了保持冷静，我往往做这样的试验：聚精会神地听着，结果什么都听不见，这使我欣幸。可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用我最初那些说法来解释这种现象完全讲不通，但我所能设想的别的解释又不得不加以排斥。我所听到的，也许就是那种小畜生自己干活时的声音。但这是同所有的经验相矛盾的。凡是我从未听到过的，虽然它一直都存在，但我总不能突然一下就听到了。我在洞穴中对于骚扰的敏感性也许与年俱增，但听觉绝不会变得更敏锐。听不见它们的声音，这正是那些小畜生们的本质特征。不然，我过去怎么容忍得了呢？哪怕冒着饿死的危险，我也恨不得把它们彻底铲除掉。但是我渐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也许是一种我现在还不认识的动物，这不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在下面生活我是够小心谨慎的，但世界是千变万化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然而那不会是个别的动物，必定是大群大群的吧，它们乘我不备突然侵入我的范围。这一大群听得见的小动物，其地位固然在那种小玩意之上，但超出很有限，因为它们干活的声音本身就很微弱。所以有可能是一些不熟悉的动物，它们成群结队地外出漫游，仅仅从这里经过一下，惊动了，但它们的队伍不久便会过去。所以我只要等待便可以了。多余的工作是不会有。可是，既然都是陌生的动物，为什么我见不到它们呢？我挖了好些陷阱，想逮它一只，但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可能那是小而小的动物，比我所认识的那种还要小得多，只是它们发出的响声却大得多。于是去检查挖出来的泥土，把土块抛入空中，让它们砸得粉碎，还是看不见噪音的制造者。我渐渐明白了，这样小规模地偶然挖几下，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的，这种搞法，只不过在洞穴里的墙壁上挖了一些洞，手忙脚乱地这里挖一下，那里掘一通，连

堵洞的工夫都没有，许多场地泥土成堆，阻碍道路，挡住视线。当然，这一切对我的妨碍并没有什么了不得，我现在既不能出外徜徉，也不能去各地巡视，也不能休息。我常常干着干着就在某个洞窟里睡着了，一只前脚的爪子扎进了上面的土层里，那是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下想从那里抓下一把泥土来。我权且改变一下办法吧，今后就朝着响声的方向挖一个正规的大洞，摆脱任何理论，不找到响声的真正根源就不停止挖掘。一旦找到根源，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就要把它消除；倘力不从心，我至少也掌握了确实的情况。这种确实的情况不是给我带来安宁，就是给我带来绝望。但安宁也罢，绝望也罢，二者必居其一；总有一种结果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是合乎情理的。这个决心一下，我的精神为之一爽。我迄今所做的一切，弊在操之过急；回到家来，心情激动，还没有摆脱上面世界所笼罩的那种不安全感，还没有与地洞里的和平气氛相融合，脱离洞穴中的和平生活那么久，神经变得十分敏感，只要遇到一点特殊现象，就会叫我惊慌失措。到底有什么呢？一种轻轻的“”声罢了，间隔好久才听得见，微不足道也，但我愿意承认它能使我成为习惯，不，那是习惯不了的。但目前不要与之针锋相对，我且观察一段时间再说，那便是：经常花几个钟头凝神谛听一番，耐心地把结果记录下来，但不能像我以前那样，听的时候耳朵挨着墙壁轻轻移动，而且差不多一听到有点什么动静就急忙挖掘起来，那样做原本并非想发现点什么，而是内心不安的一种必然举动罢了。今后不那样干了，这是我所希望的。但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是我闭上眼睛不得不承认的，虽然同时为此对自己光火——因为不安在我的心中颤动，仍像在此之前几个钟头一样，要不是理智抑制着我，很可能我会不论什么地方，不管在那里是否听到了什么，迟钝地、执拗地去挖掘，仅仅为了挖掘而挖掘，几乎就像那些小畜生那样，它们不是毫无意义地掘地，就是仅仅为了啃泥而挖土。合乎理智的新计划又吸引我，又不吸引我。计划本身是无懈可击的，至少在我是提不出异议的，据我理解，照它做去，肯定会达到目的。尽管这么说，我还是不相信这个计划，因为不相信，所以，我对于实行计划的结果可能带来的可怕性并不担心，对于结果的可怕性我也是不相信的；是的，我觉得，从最初发现响声以来就想到这样一个彻底的挖掘计划就好了，只是由于我信不过它，一直都没有付诸实施。尽管如此，今后我自然是要着手挖掘的。因为对我来说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我不打算马上就开始，我将把这项工作稍稍往后挪一挪。如果理智应该重新受到尊重，那么它就应该得到完全的尊重，今后我不再一头扎进这一工作中去。无论如何我要事先弥补一下由于我的乱掘乱挖给地洞造成的损失；

这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但这是必要的。新的开挖计划如果真的要达到某种目标，时间上它将会拉得很长；要是它达不到任何目标，它就会变得无休无止。不管如何，这项工作意味着更长久地远离地洞，环境不像上面世界那么恶劣，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时中断工作，回家来看看，要是不这样做，则城郭的风将向我吹拂，在我工作的时候围绕着我，但这仍然意味着远离地洞，把自己交给一种不可预料的命运。因此我想把地洞整顿好了再走，为了地洞的安宁而战的，总不该让人说：是我自己把它搞乱，而又不立即把它恢复。于是我开始把泥土加以集中，送回到一个个洞孔中去。这是我的拿手活计，几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活计就已经干过无数次了，特别是最后这道夯实抹平工序——确实不是自夸，那是实情——我可以做得比谁都好。可这一回我却感到难了，我的注意力太不集中，干活时一再让耳朵贴着墙壁倾听，而刚刚提起来的土稀里哗啦地又掉回到土堆里去，我都不闻不问。最后这些完善性的工作，要求注意力更要集中，我却几乎干不了。留下一堆堆难看的疙瘩，碍眼的裂缝，更不用说，旧的墙壁的动摇是不能以这样草率的修修补补使其恢复原状的。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以此自慰。等我回来，恢复了和平，再做全面彻底的修缮，那时一切都将进行得很快，君不见，童话里就是一切都进行得很快的，这种慰藉也是属于童话世界的。最好当然是，现在马上把工作完满地完成，这比老是把它中断，在通道上漫游，寻找新的声音来源要有益得多；寻找新的声音来源其实是轻而易举之事，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听一听，仅此而已，我的毫无益处的发现还要多呢。有时候好像觉得响声没有了，很长时间寂然无声，这样的“

啾啾”声往往是会听漏了的，因为自己的脉搏在耳朵里跳动得太厉害了，于是两种间隔时间正好相重，遂合而为一，顷刻间你就以为那“

啾啾”声似乎永远消失了。这一来就不用再监听下去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整个生活为之改观，仿佛泉源突然打开了，从中流泻出来的是地洞的宁静。我没有急着去检验这一发现，而去找一个我能与之推心置腹的人倾谈一番，于是就直奔城郭而去，我一生为之奋斗的新生活终于苏醒了！我这才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便从半埋在土里的粮食贮藏品中随便抽出些东西，狼吞虎咽起来。同时我利用这点吃饭时间，赶回那不敢全然置信的发现的地点，想再证实一下这件事的可靠性如何。我的这一举动不过是顺便为之，原想一带而过，谁料侧耳一听，立刻表

明，我大错特错了：那老远的地方明白无误地响着“啾啾”声。我恨不得把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踩进地里去，回头继续工作吧。但到哪里去呢？全无头绪。有的地方像是需要，而这样的地方有的是，就着手干点

什么吧，但动作机械得很，就好像看见监工来了，不得不做做样子。但这样的活没干多久，又出现新的情况。响声好像加强了，当然强不了多少，但这里的问题往往就发生在最细微的差别上，响声确实有了些许的加强，强到耳朵可以清晰地听得出来。而这种声音的渐强像是由于距离渐近之故，因为渐近，就听得更加清楚，仿佛可以目睹它走进来的脚步似的。我跳离墙壁，想居高临下看一看这一发现将引起的种种可能的后果。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我的地洞本来就不是为了防御进攻而建造的。防御的意图虽然是有的，但抛却一切生活经验，则进攻的危险以及由此产生的防御的设施对一个人来说仿佛都成为遥远的事情——或者，虽不遥远（这怎么可能），但在轻重缓急上，次于和平生活的设施，这类设施在地洞里是处处给予优先地位的。许多防御设施本来是可以在不干扰总体计划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却是由于一种不可理喻的原因被耽误了。这些年头我享尽幸福，幸福使我麻痹，虽有不安，但幸福之中的不安是无关宏旨的。

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不外乎是，把地洞的建设放在防御及根据防御所设想的一切可能性上进行详细而周密的考察，制订出防御及所属的建设计划，然后像青年人那样，朝气蓬勃地立即开始工作。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当然——顺便说一句，搞得太晚了点，但那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啊。然而，那种试探性的随地大挖其洞的做法，绝对不能搞了，那样做，原来的唯一目的是让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防御意义地用于寻找险情上，干着一种杞人忧天的傻事，危险迟迟不来，而时时担心着它来，突然，我不理解以前的计划了，以前那样理路分明的计划，变得完全不可思议了。我又把工作搁下，也不去监听，此刻我不想去发现声音的加强了，我的发现已经够可观了。我把一切都撇开，只要把内心的抗辩平息下去，我就太平了。我又沿着我的条条通路到了更遥远的地方，从野外回来后我还没有到那里去看过，我的前爪还一点也没有碰到过，那里的宁静等待着我，我一到便被它完全笼罩了。我不想在那里待着，匆匆穿了过去。我压根儿就不明白，我究竟在寻找什么，也许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吧，我越走越迷路，以致来到迷津暗道。我很想在苔盖附近谛听一番，那遥远的事情——眼下是这样遥远——吸引着我的兴趣。我挤到上面去听了听，万籁俱静。这里多叫人称心如意呀，外边谁也不注意我的地洞，每个人都有跟我无关的工作，这正是我为之努力的结果。现在，这苔盖旁边几个钟头之久也听不到响声，这在我的地洞边缘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场所了。——这同地洞里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昔日的危险之地反成了和平之乡，而城郭呢，却被卷进了吵闹的世界及其危险

之中。尤为糟糕的是，这里其实也没有和平，这里的情况什么也没有改变，宁静也罢，吵闹也罢，危险一如既往潜伏在苔藓之上。不过我对于危险已变得感觉迟钝了，那是由于我的墙壁的“嚙嚙”声使我用心过甚之故吧。我是为此用心了吗？那响声越来越强，步步逼近。但我绕来盘去通过了迷津，来到入口通道的高处，躺在苔藓底下，这一来就几乎把家交给那“嚙嚙”声了，只要在这上面稍稍休息一会儿，我就心满意足了。让给了“嚙嚙”声？难道我对那响声的原因有了某种新的明确看法了吗？那响声不就是那些小玩意挖洞时产生的吗？难道这不就是我的明确的见解吗？这种见解我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放弃呢。假如这声音不是直接从它们的洞中发出的，那也是跟那些洞有某种间接关系的。即便跟它们毫无联系，那就说明从一开始什么蛛丝马迹也没有找着，只好等着，直到把原因找到，或者它自行暴露为止。眼下这会儿人们自然也可以虚构各种说法来戏谑，比如，说：远处某地方水漏进来了，而我所听到

的“嘟嘟”声或“嚙嚙”声，原来就是漏水声。但这方面我是毫无经验可言的，姑且不谈了吧——地下水我是一开始就发现的，马上把它排引开了，此后这沙土地里就没有再发现水——之所以姑且不谈，因为那到底是“嚙嚙”声，不能当做水的声音。但是多多勉励自己平静是会有好处的，虽然想象力不会静止，而事实上我也那么认为——自己加以否认也是徒然——那声音就出自一种动物，不是许多动物，也不是小动物，而是一头大动物。也有一些反对的理由。那就是响声随处可闻，强弱始终相同，而且不分昼夜，有规律地传来。的确，最初我满以为那是许多小动物。但我在发掘时本来是会找到它们的，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有一头大动物的存在了，同时也有似乎与这种解释相矛盾的说法，它所涉及的东西倒不是证明上述动物不可能存在，而是它们越出了一切可以想象的界线，变成耸人听闻的了。因此，我反对这一种说法。我排除了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很久以来我就玩味着这样的想法：之所以老远也听得到那声音，就是因为那动物在迅猛地工作；它以人们在外面上散步的速度，在迅速地钻掘前进，大地为之震颤，即使钻掘已经过去，那余震和工作本身的响声在远处汇成一片，我仅仅听到这行将消逝的余音，觉得到处听起来都是相同的。再者，那动物不是朝着我这个方向前进的，因此声音没有变化。多半它已有一项计划，其意向我不得而知，我只认为，该动物——我决不想断言它知道我的情况——正在我的周围绕圈子，自从我对它进行观察以来，它在我的地洞周围已经绕了好几圈了。——声音的种类，“嚙嚙”声或“嘘嘘”声引起我许多想法。我若以自己的方法来刨地或掘土时，听起来却完全不同。我

对“**嚙嚙**”声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动物的主要工具不是它的爪子（爪子大概仅作辅助用），而是它的嘴和鼻，且不说这两样东西有着巨大的力气，只看它们的锐利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钻地时兴许用鼻子朝地里猛力一撞，一大块土就掘起来了，这期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是间歇吧，但接着又是一撞，并吸一口气。这吸气的动作就使地面发出噪音，这不光是它使了气力，而且还由于它的匆忙，它的劳动热情；这噪音在我听起来，就成了轻微的“**嚙嚙**”声了。它那不倦劳动的能力显然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也许那片刻的间歇就把短暂的休息包括在内了吧，可真正像样的休息似乎它还不曾有过。它夜以继日地挖掘着，始终气力十足，精神饱满，一心要赶紧完成它的计划，又拥有实现这一计划的一切能力。好家伙，这样一个敌人我想都没有想到过。但是，这头巨兽的特点且不提了吧，现在发生的那不过是我本来一直都在提心吊胆、随时准备对付的一件事：有人接近了！蹊跷的是，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能够一切平安无事，而且幸福度日呢？是谁控制着敌人的行动路线，使它们避开我的驻地，让它们拐了个大弯走了过去的呢？为什么这样长期地保护着我，而现在又让我受着这样的威胁呢？比起这一危险来，我一直所思虑着的那些小的危险又算得了什么！作为地洞的主人，我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任何来犯者吗？我作为这样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主人的幸福感使我娇纵，地洞的脆弱性使我敏感。只要地洞受到伤害，我就会切肤之痛，如同我自己受到伤害一样。而正是这一点我应该事先就预见到的，不应只为我个人的防御着想——就是在这方面我过去做得多么草率和无效——而应从地洞的防御着想。尤其需要事先筹划的是，当有人来进攻的时候，能把地洞的一个一个部分——尽可能把许多这样的部分——在极短时间里做到用土堵死，使它们与受威胁较轻的部分分割开来，通过大量泥土的堵塞和由此达到的卓有成效的分割，使得进攻者万万料想不到在这后面才是真正的地洞。还有，用泥土堵塞，不仅掩蔽了地洞，而且还能埋葬来犯者。诸如这样一些事情，我没有采取过任何步骤，这方面一丝一毫的工作也没做过，我以前轻狂得像个小孩，我以孩子般的游戏度过了我的成年岁月，甚至在设想危险的时候，也当做儿戏，对于真正的危险，我也没有认真地想过。我把事情耽误了，虽然这期间不断有情况向我发出警告。

堪与目前这样的情况相比的事情当然没有发生过，但在地洞初创时期，类似的事情却频频有之。所不同的主要就在那是初创时期……那时我还是个正式的小学徒，从事第一条通道工作，迷津的设计才有了一个

初步的轮廓，我已挖出了一个小广场，但在大小的设计和墙壁的筑造方面却完全失败了；总之，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只能当做一种尝试，当做一种一不满意便立即报废而不足为惜的事情。有过这么一件事：在一次劳动间歇——平生劳动间歇的时间花费得太多了——时，我躺在我的许多土堆之间休息，忽然远处传来一种响声。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听到这声音与其说害怕，毋宁说新奇。我撂下活儿，竖起耳朵来听，我总是就地谛听，并不需要跑到苔藓底下的高处，躺在那里去听，却什么也听不到。我在这里至少是听到了的，我能准确地鉴别出，那是挖掘的声音，同我这里的情形相仿，听起来比较微弱一些，但离这里有多远，我估计不出来。我也紧张过，不过通常是冷静、平和的。我想过：也许我进了别人的地洞了吧，它的主人现在正朝着我挖过来呢。假如我的这一想法属实，则我立即离开，到别的地方去营建，因为我从未有过占领欲或进攻心。不过，自然^啰，我还年少，还没有一个地洞为家，我还能够做到冷静与平和。后来事态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引起我真正激动过，只是要说清楚这事情的过程并不容易。如果那边的挖掘者听到了我在挖掘，真的向我这边推进，或者它中途又改变方向（像现在已发生的那样），那也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在这样做，因为，这可以是由于我的劳动间歇使它失去了目标，也可以是由于它自己改变了意图。但说不定是我自己完全搞错了，此君根本就没有以我为直接目标；不过那声音倒确实加强了一会儿，仿佛那挖掘者越来越接近于我。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倘看见它突然从地里冒出来，也许是不会感到不快的。但这类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挖掘声从某一点开始转弱了，听起来越来越轻微，挖掘者像是渐渐改换了最初的方向，及至突然中断，好像它现在下决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背着我的方向往远处推移。

在我重新开始劳动以前，还静静地听了很久。这一次警告是够明显的吧，但我很快就把它忘了，它对我的建设计划几乎没有产生过影响。

从那时到今天这一段正是我的壮年时期；但这期间不是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吗？劳动时我仍一直安排长时间的间歇，贴着墙壁谛听，发现那个挖掘者新近改变了主意，来了个向后转。它正旅行回来，它以为，这期间它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做好迎接它的准备。然而从我这方面说，整理工作一切都不如当时，偌大的地洞毫无防御设施，而今我已不再是小学徒，而是老建筑师了，我身上还留存的那点力量已无法支持我做出对敌行动的决断了。但不管我多么老，我似乎还希望活得比现在更老，老到在我的青苔底下的卧榻上一卧不起。因为在青苔底下其实我是忍耐不

住的，只要一起来，就去狩猎，好像我在这里并不是休息，而是充满新的忧虑，于是又跑回下面的家里去。——那么这以前情况是怎样的呢？“

嚙嚙”声减弱了吗？没有，它变强了。我随便找了十个地方听了听，发觉我明显搞错了，“嚙嚙”声依然如故，丝毫未变。对面的情况仍是老样子，人家在那儿安闲自在，时间任由支配；而这里却每一瞬间都在振荡着监听者。于是我又沿着漫长的道路回城郭去，我感到周围的一切很激动，都凝望着我，但旋即又把视线移开，以免扰乱我。但又竭力想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保卫家园的决心。我摇了摇头，我还没有那个决心呢。我去城郭也并不是为了在那里实施什么计划。我经过一个原来打算建立研究室的地方，我又把它检查了一遍，那可真是个好场所啊，那洞穴朝着有许多小气孔的方向，有了这些气孔，我的工作似乎会轻松许多。看来根本用不着挖得那么远，不必挖到响声的策源地，只需把耳朵贴在出气孔上监听就行。但考虑来考虑去，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鼓励我从事这一挖掘工作，这个地洞能给我带来安全保障吗？我的心情已经是这样：安全保障根本就不想要了。到城郭里挑它一块上等的去皮的鲜红的肉，拿着它一起钻进一个土堆里，那里无论如何该是宁静的吧，如果说这地洞里还存在着真正的宁静的话。我舔了舔肉，咬了一口咀嚼着，不时想着远处那头正在行进的陌生动物。只要我还有可能，我何乐而不尽情享受一番自己的贮藏品？此举大概是我的计划中唯一切实可行的一项了吧。此外，我很想破那头动物的计划的谜。它是在漫游的途中呢，还是在营造它自己的地洞呢？如果它是在漫游，那么和它取得谅解也许是可能的。如果真的在朝我这边挖掘，就把我的贮藏品分一些给它。这样它准会离开这儿，继续往前走的吧。在土堆中我自然可以梦见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包括梦见和它取得谅解这件事，虽然我心中有数，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可能见之于现实的，而且就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刹那，甚至就在我们仅仅感到彼此距离已很接近的那一瞬间，会立即互相——分不出谁先谁后——以一种新的异样的饥饿向对方扑过去，尽管双方的肚子本来都是填得满满的。这种情况任何时候都是没有例外的，因为一个人即使在漫游途中，难道会由于一见地洞就改变他的旅行和未来的计划的吗？但说不定那头动物在掘它自己的洞穴呢，要是这样，那么要取得谅解连做梦也不能了。纵使这头动物是这样特殊，它能够容忍其洞穴与别人为邻，则我的地洞也不能与之相容，至少一种咫尺相闻的近邻它是忍受不住的。现在，那动物好像明显地去得很远了，只要它哪怕继续往回走几步，那响声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吧，那样一来，昔日的美好生活都会恢复如初，因而此事就成为了一种虽然不祥，却颇为有益的经验，它将激

发我进行各方面的改善。只要我获得安宁，没有危险直接威胁着我，我一定还能做出各种像样的事情。也许那头动物就是鉴于它自己在能力上具有巨大的潜力，才放弃了朝我这边来扩展它的洞穴的打算，转向别的方面去谋取补偿。这种事当然不是通过交涉所能达到的，而只有通过那动物自己的智力，或由我这方面施加压力。这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动物是否知道我，并且知道我的什么。这些事我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动物听到我工作的声音一说之不可能。尽管我难以想象，但它也许听闻到关于我的某种消息，那倒未始不可。但它不可能听到了我的声音，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我对它的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它就不可能听得到我，因为我在这里是保持寂静的，没有人做到比我重返地洞时更寂静的了。后来，当我进行了一些探究性挖掘时，它听到了我也说不定，虽然我的挖掘方法是很少发出声音的；不过假如它听到了我，我也一定会有所觉察的，那它至少得经常停下工来谛听，——但是一切始终毫无改变。

叶廷芳 译

[1]现有的德文版最全的卡夫卡短篇小说集所收的卡夫卡遗作只有32篇，本辑特从卡夫卡随笔集《乡村婚事》一书中增选了18篇，同时将上述原文版中的“微型小说”24篇从本辑中剔出，归入第三辑，故本辑从篇数上讲减少了8篇，一共26篇。——编者

[2]这篇未完成的幻想性作品是卡夫卡的早期之作，根据马克斯·勃罗德的判断，该作写于1903至1904年间，也就是大学年代的作品。曾经有两个稿本，分别由路德维希·迪兹和勃罗德整理发表。1936年勃罗德第一次编纂卡夫卡全集时，决定将两个稿本加以合成，遂成现在这个样子。——编者

[3]易北河的支流，位于捷克境内。——译者

[4]卢德米拉（860—921），波希米亚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侯爵，遭到杀害，后被波希米亚人奉若神明。

[5]指监狱——译者注。

[6]本篇写于1907至1908年间，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断片，有三种稿本。马克斯·勃罗德曾以此为书名编了《乡村婚事》（一译《乡村婚礼筹备》）一书，1933年问世。——编者

[7]卡夫卡于1914年夏天写的小说中，有两篇抄录在他的日记本里，除本篇外，还有下面的《回忆卡尔达铁路》。《村子里的诱惑》这篇故事成为1922年长篇小说《城堡》的写作准备。可见《城堡》这部生命力作已经酝酿多年了。仅就这点而言，《诱惑》这篇作品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有文献价值。——编者

[8]德国旧钱币名。

[9]作品写于1914年，录在8月15日的日记里。这正是作者写完长篇小说《失踪者》（即《美国》）的一年。从小说的思想内容和写作风格看，都与《失踪者》有联系。——编者

[10]根据作者日记所载，该篇写于1914年12月18日，是在“几乎无意识”的情况下写的，继续了几个晚上后辍笔。不久后，1915年1月6日的日记却宣称“暂时放弃了”。因此这是一篇未完成之作。1935年马克斯·勃罗德第一次编纂卡夫卡全集时，曾将这篇作品冠以《巨鼾》的标题编入《一次战斗纪实》卷。——编者

[11]此篇作于1915年2月8日至3、4月间，没有写完。1935年首次发表在短篇小说集《一次战斗纪实》中。——编者注

[12]本篇写于1917年1、2月间，见于作者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1931年才首次发表。——编者

[13]这篇小说写于1917年初，手稿见于作者《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1931年才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14]意大利一座有名的历史文化小城，位于加尔达湖滨，人口只有1.3万。——编者

[15]位于德国西部，最高峰达海拔1493米，为德国著名的游览和疗养胜地。——编者

[16]该篇见之于作者第六本《八本八开笔记簿》，约写于1917年3、4月间。显然未写完，故作者在《乡村医生》结集时，只从中收入一个片断，即《一道圣旨》。全篇直到1931年由马克斯·勃罗德编辑问世。——编者

[17]古代巴比伦国王内布卡德内察尔所建、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拆除

的梯形寺庙；《圣经》中称为“通天塔”，为所谓“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编者

[18]本篇见之于卡夫卡《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六本，约写于1917年3、4月间，1931年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19]本篇见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的第二本，这一本标的日期是1917年5、6月。该作发表于1931年。——编者

[20]本篇于1917年10月21日写进《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的第三本，于1931年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21]本篇最初见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二本，故约写于1917年5、6月间。1931年首次问世。——编者

[22]本篇最初见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三本，所载日期为1919年10月23日，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23]本篇见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三本，写于1918年1月17日。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24]本篇和以下10篇作品出自一捆稿子，根据帕斯莱所标示，日期是1920年秋末。1931年问世。它们在《乡村婚事》中标示的日期是自1920年9月15日始。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25]基督教《圣经》中所提及的未建成的通天塔。——译者

[26]本篇与《城徽》等11篇速记式小说最初见于一捆手稿，根据帕斯莱标明的日期为1920年秋末，后收入《乡村婚事》所标的写作日期为始于1920年9月15日。1936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
——编者

[27]本篇与《城徽》等11篇速记式小说最初见于同一捆手稿，根据帕斯莱所标的日期是1920年秋末，后收入《乡村婚事》中所标的写作日期为始于1920年9月15日。标题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28]本篇与《城徽》等11篇速记式小说的原稿捆在一起，根据帕斯莱标的日期是1920年秋末，它们在《乡村婚事》集中所标的日期是1920年9月15日起。本篇于1931年首次发表。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

加。——编者

[29]本篇最初见于作者的一捆手稿，包括《城徽》等11篇速记式小说，根据帕斯莱所标的写作日期是1920年秋末，后收入《乡村婚事》所注的日期是1920年9月15日起。标题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30]本篇出处与《城徽》同，约写于1920年秋末，1936年才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31]本篇的出处和产生经过与《城徽》等以上10篇速记式小说同，约写于1920年秋末，1936年随着勃罗德编纂卡夫卡全集方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32]本篇最初见于作者的一本蓝色方形笔记簿，约写于1920年秋末，1936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33]本篇出处与《起程》和《一条狗的研究》同，均见于作者遗物中一本棕色的方形笔记簿，约写于1922年春。1931年方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34]本篇与《起程》和《代言人》出处同，均见之于作者一本棕色的方形笔记簿，约写于1922年春，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35]原文为verreden。——译者

[36]本篇与《算了吧》出处同，见于作者在波德莱那遗物中的一本黑色方形笔记簿，所标日期为1922年末。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37]本篇写于1923至1924年间，即住在柏林期间，此时作者已病重。但原稿结尾丢失。1924年作者结集最后一个短篇集《饥饿艺术家》时，该篇未被收入。故直到1931年才由马克斯·勃罗德编辑问世。——编者

第三辑 微型小说^[1]

黎奇 等译

桑丘·潘沙真传^[2]

桑丘·潘沙——顺便提一句，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就——几年来利用黄昏和夜晚时分，讲述了大量有关骑士和强盗的故事，成功地使他的魔鬼——他后来给它取名为“堂吉诃德”——心猿意马，以致这个魔鬼后来无端地做出了许多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由于缺乏预定的目标——要说目标，本应当就是桑丘·潘沙——所以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桑丘·潘沙，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沉着地跟着这个堂吉诃德——也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吧——四处漫游，而且自始至终从中得到了巨大而有益的乐趣。

洪天富 译

集体^[3]

我们是五个朋友，有一次，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第一个人先走，站到了大门旁边，接着第二个人走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只水银小球似的轻巧地从门里滑出来，站到了离第一个人不远的地方，然后第三个人，然后第四个人，然后第五个人。最后，我们大家排成了一行。人们注意到了我们，指着我们说：“这五个人现在都从这幢房子里走出来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共同生活在一起，要是没有第六个人频频地插手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是很平静的。他没有做任何损害我们的事，但是我们讨厌他，这就让我们够受的了；他干吗要闯进来呢？我们并不认识他，也不想把他收留在我们这里。过去，我们五个彼此也并不相识，也可以说，我们现在也互不了解，但是，我们能够办到和可以容忍的事，那第六者却办不到，也无法容忍。此外，我们就五个人，不想成为六个人。像这样继续生活在一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五个人也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但我们既然生活在一起，就只好由它去，不过，我们不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社团，这恰恰基于我们的经验。但是，怎样才能使他明白这一切呢？长时间地向他解释，几乎就等于接纳他到我

们的圈子里来，我们宁肯什么也不解释，也不收留他。不管他怎样撅嘴，我们都用臂肘推开他，但是，不管我们怎样推开他，他还是要回来。

洪天富 译

夜晚^[4]

沉寂的深夜。就像一个人有时垂头沉思一样，大地完全沉入了夜色。人们在四周睡觉。他们以为自己正睡在房间里，在结实的床上，在坚固的屋顶下，伸展四肢或蜷缩着身体躺在床垫上，头上裹着围巾，身上盖着被子，其实，他们和从前先后经历过的没有两样，依然聚集在一片荒野里，在露天安营扎寨，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这是一大群老百姓，他们在寒冷的露天下，冰冷的地面上，倒卧在他们早先站过的地方，额头枕着胳膊，脸朝着地，平缓地呼吸着。而你正在站岗，你是一位守卫者，你挥动一根从你身旁的干柴堆捡起的燃烧着的柴枝，发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站岗呢？据说得有人站岗。必须有个人在那儿。

洪天富 译

兀鹰^[5]

有一只兀鹰在猛啄我的双脚。它早就把靴子和长袜撕成了碎片，这下正在猛啄脚的本身。它总是猛地啄它们一下，然后烦躁地围绕我的身子飞来飞去，再继续啄击我的双脚。这时，正好有一位绅士经过，他驻足观望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为什么要容忍那只兀鹰。“我可是手无寸铁，”我说，“当它飞来，开始啄击我的时候，我当然想把它赶走，我甚至试图把它绞杀，可是，这畜生身强力壮，它甚至要跳到我的脸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宁肯奉献出我的双脚。你瞧，这双脚快被撕碎了。”“想不到您竟让它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这位绅士说，“砰的一枪，那兀鹰就完蛋了。”“真的吗？”我问，“那么，您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当然愿意，”绅士道，“只是我得回家去取我的枪。您能再等上半个小时吗？”“这很难说。”我说，由于疼痛而僵直地站了一会儿。接着，我说：“无论如何，请您试试吧。”“那好吧，”那位绅士说，“我会尽快赶回来。”就在我和那位绅士交谈的时候，那只兀鹰在一旁悄然倾听着，把它

的目光在我和绅士之间溜来溜去。现在，我明白，它已经听懂了我们所有的谈话；它展翅飞起，远远地倾身向后，以图获得足够的冲力，然后，像一个标枪投手，将它的利喙通过我的口腔深深地插入到我的体内。我向后倒下，像得到解救似的感到，它已无可挽回地淹死在我那填满一切沟壑、淹没一切堤岸的血泊之中。

洪天富 译

舵手^[6]

“我难道不是舵手吗？”我大声嚷嚷。“你？”一个来历不明、身材高大的男子问道，并用手擦了擦眼睛，仿佛要驱散一个梦。在漆黑的夜里，我一直就站在舵旁，在我的头顶上悬着一盏光线昏暗的提灯，然而就在这时，此人却走了过来，想把我推到旁边。我哪肯对他让步，于是他一脚踏在我胸口上，将我慢慢地踩下去，而我仍然紧紧握住舵轮的把柄不放，在倒下去的时刻，仍然迅速地拨转驾驶盘。但是，那人接着抓住了驾驶盘，把它扭转回来，并用力把我推开。我立即静下心来想了一想，然后奔到通向船员室的舱口，大声喊道：“船员们！同伴们！快来呀！一个陌生人把我从舵旁赶开了！”他们慢慢地来了，从船梯上爬了上来，个个身材高大，步履蹒跚，疲惫不堪。“我是舵手吗？”我问道。他们点点头，可他们的目光只注视着那个陌生人，围着他站成半圆形，而他却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别打扰我！”他们于是聚集到了一起，向我点了点头，然后又顺着船梯走了下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哪！他们也会思考吗？或者他们只是毫无目的地在这世上曳足而行？

洪天富 译

小寓言一则^[7]

“啊哟，”老鼠说，“这世界一天天变得更加狭小了。起先，它广阔无垠，简直使我害怕，我不断地往前跑，终于在远方看到左右两堵墙，我为此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这两堵长长的墙却迅速地合拢来，以致我只好在最后的那间小屋里，那儿靠墙角的地方还设有一只捕鼠机，我正好跑了进去。”“你只需改变跑的方向。”猫说道，同时吃掉老鼠。

洪天富 译

起程 [8]

我吩咐把我的马从马厩里牵出来。仆人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便亲自走进马厩，给我的马鞴上鞍子，然后跨上了马。在远方，响起了号角声，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听到。在大门口，他拦住我，并且问道：“你骑马上何处去，主人？”“我不知道，”我说，“只想离开这儿，只想离开这儿。经常地离开这儿，只有这样，我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答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嘛：‘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你还没有带上干粮呢。”他说。“我不需要带任何干粮，”我说，“旅行非常漫长，要是我一路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肯定得饿死。干粮是没法救我的。所幸，这的确是一次真正惊人的旅行。”

洪天富 译

算了吧 [9]

一大清早，街道清洁，空无一人，我朝火车站走去。当我把塔楼大钟和我的表对了一下的时候，我发现时间比我猜想的要晚得多，我得匆匆赶路，这一发现给我带来的惊恐，使我晕头转向，走也走不稳，我对这座城市还不怎么熟悉，幸亏附近有一位警察，我向他跑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问路。他微笑着说：“你想从我这儿打听到路吗？”“是的，”我说，“因为我自己无法找到路。”“算了吧，别费心了！”他说，然后就像那些独自想笑的人一样，猛地转过身去。

洪天富 译

论譬喻 [10]

许多人抱怨说，智者的话往往只是一些譬喻，但在日常生活中却用不上，而我们唯独只有这种日常生活。当智者说：“走过去”，他的意思并非要我们走到另一边去，如果这条道路的结果有价值，我们毕竟会走到那边去的；他指的是某种神话般的对面，某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对这个地方，他也没有进一步地加以说明，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他说的话一点儿也没用处。所有这些譬喻，归根结底，只想说明，不可理解的就是不可理解的，这点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每天费尽心力去做

的，却是另外的事情。

关于这一点，有人曾经说过：“你们干吗要抗拒呢？只要你们照着譬喻去做，你们自己也就会变成譬喻，这样就能摆脱日常的操劳。”

另一个人则说：“我敢打赌，这也就是一个譬喻。”

头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但是很遗憾，只是在譬喻方面。”

头一个人说：“不，在实际上；在譬喻方面，你却输了。”

洪天富 译

〔中国人来访〕 [11]

午饭后，我苍老地，通体鼓胀，心脏略有些不舒服，躺在床上，一只脚垂在地上，阅读着一本历史读物。姑娘走了进来，两只手指抵在翘起的嘴唇上，通报一位客人的到来。

“谁啊？”我问道，在我等待下午的咖啡时来客使我感到烦恼。

“一个中国人。”姑娘说，并且痉挛般地竭力把她的笑声压下去，以免给门外的客人听到。

“一个中国人？到我这儿来？他是穿着中国服装吗？”

姑娘点点头，还在强忍着笑。

“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再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找我，在左邻右舍中我都是默默无闻的，更别说在中国了。”

姑娘悄悄走到我身边，轻声说道：“他只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请求准许他进来。他不会说德语，说的是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我不敢从他手里把名片接过来。”

“让他进来！”我喊道，又陷入了由于心脏的毛病经常发生的激动之中，书掉在了地上，我诅咒着这女佣人办事的不力。我站了起来，从而撑直了巨大的身躯，我这身躯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来

访者吓得够呛，接着便向门口走去。果然，这个中国人一看见我，就赶紧往外溜。我仅仅追到过道里，就拽住了他，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丝绸腰带，把他拽进我的屋里来。他显然是个学者，又瘦又小，戴着一副角边眼镜，留着稀疏的、黑褐色的、硬邦邦的山羊胡子。这是个和善的小人儿，垂着脑袋，眯缝着眼睛微笑。

廷芳 黎奇 译

〔巷战〕

我们的部队终于从南门突入城池了。我们班驻扎在一个城郊花园里半烧焦了的樱桃树下，等待着命令。可是，当我们听到南门那儿传来高亢的军号声时，便再也忍耐不住了。顺手抓起身边的武器，毫无秩序地，胳膊搭着战友的肩膀，高喊着“卡西拉！卡西拉！”我们这一长串的队伍便穿过沼泽，向城市方向涌去。在南门那儿我们看见的只有尸体和在地面上飘着的笼罩一切的黄烟。可是我们不甘心坐享其成，立即便奔入那些狭窄的、至今未受到战斗波及的小巷中去。第一扇房门被我一脚踹得粉碎，我们疯狂般地冲入那走道，以致我们自己一时被互相撞得直打转。有个老头从这长长的、空空荡荡的走道那头迎面而来。这是个奇怪的老头，他有翅膀。宽宽地张开着的翅膀，翅膀的边缘比他的身子还要高。“他有翅膀！”我对战友们喊道。我们这些最前面的人向后退了几步，但退路被源源涌入的后来者堵住了。“你们感到奇怪，”老头说，“我们大家都有翅膀，但它们对我们毫无用处，要是能够把它们扯下来，我们早就那么干了。”“你们为什么不飞走？”我问道。“要我们飞离我们的城市？离开我们的家乡？离开亡者和诸神？”

廷芳 黎奇 译

〔小伯爵的课外课〕

伯爵正坐在那儿吃午饭，这是一个寂静的夏日中午。门开了，但这回进来的不是仆人，而是他的哥哥菲罗塔斯。“哥哥，”伯爵说着站了起来，“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已经很久连做梦也没有梦见你了。”通往阳台的玻璃门上的一块玻璃在地上摔成了碎片，一只像山鹑一样红褐色的，但更大一些，长着长长的喙的鸟飞了进来。“慢着，看我先把它抓住！”哥哥说着，边一手撩起衣摆，另一手去捕捉这只鸟。这时仆人正好

端着一盘像样的水果走进来，这只鸟便静静地在水果盘上盘旋着，使劲地啄食。

那仆人呆住了似的端着果盘，带着并不似惊讶的表情凝视着手上的水果、这只鸟和仍在追逐着鸟儿的伯爵哥哥。另一扇门开了，村民们捧着一份请愿书走进来，他们请求开放一条林间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他们更便于管好庄稼。可是他们来的不是时候，因为这位伯爵还是个小学生，正坐在小凳子上读书。老伯爵自然是已经死了，于是这位小伯爵就得接掌权力，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历史上的一段休息时间，这个村民代表团因而失去了对象。他们该上哪去呢？他们将回去吗？他们是否会及时认识实际情况？代表团中的那位老师已经从队伍中走了出来，开始给小伯爵上起课来。他一伸手把桌上的一切都撸到了地上，把桌面竖起来，置于高处当黑板，用粉笔在上面写下了第一个字母^[12]。

廷芳 黎奇 译

〔驯蛇〕

可爱的蛇，你干吗离得那么远，过来，再近一点，行了，就待在那儿。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界限的。你不承认任何界限，我又怎么让你听命呢？那将是个艰巨的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你盘起身来。我说的是盘起来，可你却展了开来。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你显然听不懂。但我说得很明白啊：盘起来！不对，你没有明白。我用棍子指点给你看。你得先盘成一个大的圆圈，然后在里面紧挨着再盘上第二个，如此以往。如果说你现在还仰着小脑袋，那么待会儿，随着我吹出的笛子的旋律慢慢地沉下去，停止演奏时，你也就静下来，届时你的脑袋将正好处于最里面那圈。

廷芳 黎奇 译

〔招魂会议〕^[13]

在一个招魂会议上，有个新的幽灵来报到，下面就是与他的一段对话：

幽灵：对不起。

发言人：你是谁？

幽灵：对不起。

发言人：你要干什么？

幽灵：离开。

发言人：可你还刚到这儿。

幽灵：这是个误会。

发言人：不，这不是误会。你来了，就留在这里。

幽灵：我忽然不舒服了。

发言人：很厉害吗？

幽灵：很厉害。

发言人：身体上？

幽灵：身体上？

发言人：你用问话来回答问题，这是不对的。我们有惩罚你的办法，好好答话吧，要不然我们马上就开除你。

幽灵：马上吗？

发言人：马上。

幽灵：一分钟后？

发言人：别装得这么可怜。我们将开除你，如果我们……

廷芳 黎奇 译

〔无言的哀求〕

那是乡间一个傍晚。我坐在我的阁楼里关着的窗后注视着那个牧牛人。他站在刚割过草的田野上，嘴里叼着烟锅，手杖插在地里，好像对

在近处远处深沉的寂静中平静地吃着草的牲口漠不关心似的。这时响起了敲打窗户的声音，我从沉醉中惊醒，镇静了一下，大声说：“没什么，是风在撼动窗户。”当敲打声再次响起时，我说：“我知道，那只不过是风。”但在第三次敲打时响起了一个请求放他进来的声音。“那确实只是风。”我说着拿来放在箱子上的灯，点燃了它，把窗帘也放了下来。这时整个窗子开始颤抖，一种卑屈的、无言的哀求。

廷芳 黎奇 译

〔士兵的权力〕

来了两个士兵，抓住了我。我挣扎着，可他们抓得很紧。他们把我押到他们的主人那儿，那是个军官。他的制服是多么的花！我说：“你们想要干什么？我是个老百姓。”那军官微笑着说：“你是个老百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抓你。军队拥有对一切的权力。”

廷芳 黎奇 译

准新郎与饿狼

彼得有个未婚妻住在邻村。一天晚上他去找她，有许多事要商量，因为过一个礼拜就要举行婚礼了。商谈进行得很成功，一切都如他所愿地得到了安排。将近十点时，他嘴里叼着烟袋，心满意足地回家去。对这条他十分熟悉的路他根本没在意。忽然，他在一片小树林里吓了一跳，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看见了两只闪着金光的眼睛，一个声音说道：“我是狼。”“你想要干什么？”彼得说，由于紧张，他张开胳膊站着，一只手攥着烟斗，另一只攥着手杖。“要你，”狼说，“我找吃的找了一整天了。”“求求你，狼，”彼得说，“今天放过我吧，过一个礼拜就是我的婚礼，让我经历这一天吧。”“这可亏了，”狼说，“等待能给我什么好处呢？”“过后你可以吃我们俩，我和我的妻子。”彼得说。“婚礼前又有什么呢？”狼说，“在那之前我可也不能饿肚子啊。现在我已经对饥饿感到厌恶了，如果我不能马上得到什么，即使不情愿，我现在也得吃了你。”“求你了，”彼得说，“跟我来，我住得不远，这个礼拜我将拿兔子喂你。”“我至少还得得到一头羊。”“好的，一头羊。”“还有五只鸡。”

廷芳 黎奇 译

〔考官〕

“怎么样？”这位先生一边微笑着看着我，一边挪动着他的领带。这景象我的目光还能忍受得住，但过了一会儿我还是主动地微微侧转点身子，越来越全神贯注地盯着桌面看，好像那儿开启了一个洞口，且越来越深，把我的目光往下拽去。这时我说：“您想考核我，但并不能证明您有这资格。”这回他大笑“我的存在就是我的资格，我坐在这儿就是我的资格，我的提问就是我的资格，我的资格就是，您理解我。”“好吧，”我说，“权且算是这么回事。”“那么我就要考核您了，”他说，“现在我请您端着椅子退回去一点，您这样使我感到很挤。我还要请您不要看两边，而看着我的眼睛，也许对我来说，看着您比听您的回答更重要。”我照他的要求做了之后，他便开始了：“我是什么人？”“我的考官。”我说。“没错，”他说，“我还是什么人？”“我的叔叔。”我说。“您的叔叔，”他叫了起来，“回答得太棒了。”“是我的叔叔，”我强调地说，“不是什么更好的东西。”

廷芳 黎奇 译

〔爱的险境〕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围着，他们的矛尖是向外的。无论何时，只要我想要接近，我就会撞在矛尖上，受了伤，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

这姑娘对此没有罪责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或不如说，我知道她是没有的。前面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我也是被全副武装的人围着的，而他们的矛尖是向内的，也就是说是对着我的。当我想要冲到那姑娘那里去时，我首先会撞在我的武士们的矛尖上，在这儿就已是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儿，即使我能够到达，将已是浑身鲜血，失去了知觉。

那姑娘始终是一个人待在那里吗？

不，另一个人到了她的身边，轻而易举，毫无阻挠。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筋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他们俩进行第一次接吻时两张脸靠拢而穿过的空气。

廷芳 黎奇 译

绿龙的造访

门开了，绿色的龙进入房间里，精力充沛，两边圆滚滚的，没有足，用全部下部挪动进来。我请它全身进来。他表示遗憾说，它太长了，所以没法办到。于是不得不让门就这么开着，这是够难受的。它半不好意思、半带点狡猾地微笑着，开始说道：“由于你的渴望的感召，我从远方爬了过来，我身体下面都已擦伤了。可是我情愿。我乐意前来，乐意向你展示我。”

廷芳 黎奇 译

猫与鼠的对话

一只猫抓住一只老鼠。“你现在想要干什么？”老鼠问道，“你的眼睛好可怕。”“噢，”猫说，“我的眼睛总是这样的。你会习惯的。”“我宁可走开，”老鼠说，“我的孩子们在等着我。”“你的孩子们在等？”猫说，“那么就走吧，越快越好。”“我本来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就请问吧，时间确实已经不早了。”

廷芳 黎奇 译

〔K.的愣劲〕 [14]

当你想要有人引你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时，你会先去找一个共同的熟人，请求他帮个忙。如果你一个都找不到，你会忍耐，等待一个有利的机会。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地方，这种机会是不会没有的。如果今天没有，那么明天一定会有。如果不出现这样的机会，那么你也不至于就这样动摇了世界的支柱。假如一个家庭能不在乎没有你，那么你至少不会更在乎没有这个家庭。

这些本来是不言自喻的，只有K.无法理解。最近他心血来潮，想要闯入我们的地主家庭去，却不是通过社交的路线，而是愣干。也许他觉得通常的那条路太迂回漫长，这是对的，可是他想要走的那条路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此并不想夸大我们的地主的作用。他是个善于理解人的勤劳的、值得尊敬的人，但也仅此而已。K.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呢？他想被雇用地主庄园里吗？不，他没有这种想法，他自己是富有的，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是爱上了地主的女儿吗？不，不，他跟这种怀疑丝毫沾不上边。

廷芳 黎奇 译

〔统治的魔力〕

人们羞于说，那位皇家军队上校是靠什么统治我们这座小山城的。我们如果想要动手，马上就能解除他那几个士兵的武装，即使他能够召唤援兵来（他哪能召唤呢），那也几天、几个星期都来不了。也就是说，他的处境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顺从，可他既不通过残暴手段来迫使我们，也不通过献殷勤来拉拢我们顺从。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容忍他这令人憎恶的统治存在下去呢？毫无疑问：仅仅由于他的目光。当人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一个世纪前这是我们这儿的长老们的议事厅），他一身戎装坐在写字台旁，手里握着钢笔。他不喜欢客套或甚至演戏，他不会继续写下去，让来访者干等着，而总是立即中断工作，身子靠回到椅背上去，当然钢笔仍然攥在手里。于是，他便以这斜倚着的姿势，左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来访者。来访的请求者的印象是，上校看着的不仅仅是他这个短暂地从人丛中冒出来的陌生人，否则上校为什么要这样仔细地、长时间地、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呢？再说，这也不是一种尖锐的、有穿透力的目光，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浮动的、然而却又绝不移开的眼光，这是一种人们观察远处一群人移动时的那种目光。不间断地伴随着这种长时间的目光的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会儿像是嘲讽，一会儿又像是恍恍惚惚地沉浸在回忆之中。

廷芳 黎奇 译

〔信号〕

在教堂前的台阶上，孩子们像在一个游戏场上一样跑来跑去，互相

喊着粗话，这些话他们当然并不懂，他们只是吸收，就像婴儿吮吸棒头糖那样。一个教士走了出来，他把身后的僧衣撸平，在一个台阶上坐了下来。他想要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因为他们的叫喊在教堂里都能听见。可是他只能不时局部地做到这点，他把一个孩子拽到身边，那一群孩子却总是抓不住，他们仍然毫不考虑他的存在而继续玩耍着。他看不出这场游戏玩的是什么，即使努力从最遥远的孩子意识出发去看也看不出来。就像往地上拍的球一样，他们不知疲倦地、似乎也毫不费力地在所有台阶上蹦跳着，互相之间除了那些呼喊外不存在任何联系，这令人感到乏味，催人入眠。在昏昏入睡之际他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小姑娘，把她前面的衣服稍稍掀开了一些——为此她开玩笑地轻轻打了他一个耳光——在那儿他看见了一个信号，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正是想到了的信号，于是他叫了一声“啊”，推开了这个孩子，喊了一声呸，吐出口水来，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十字，急忙向教堂里跑去。在门口他和一个年轻的女人撞在了一起，她赤着脚，穿着一条镶着白色图案的红裙子，一件白色的、衬衫式的、前面不经意地敞开着的胸衣，棕色的头发随便地盘着。“你是什么人？”他叫道，他的声音里还含着孩子们给他带来的激动。“你的妻子爱密丽尔。”她轻轻地说，慢慢地靠在他的胸口。他不再做声，倾听着她的心跳。

廷芳 黎奇 译

马戏场里的出水芙蓉

马戏场里今天将上演一出大型哑剧，一出水中哑剧，整个场子将沉入水中，波塞冬将带着他的随从在水下追逐，奥德赛的船将会出现，而塞壬们将会唱起歌来，然后维纳斯将赤裸裸地从波涛中升起，从这里开始将转化成在一个现代的家庭澡盆里的生活描述。经理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可还始终是个腰板挺直的马戏骑手，他保证这出哑剧会大获成功。成功也是非常必要的，去年情况很糟，一些失败的旅行造成了重大的亏损。现在人们来到了这座小城市。

廷芳 黎奇 译

驯人的动物

这就是那个拖着毛茸茸的尾巴的动物，一条长达好几米的尾巴，就

像狐狸那样的。我很想把这尾巴抓到手，可是办不到，这动物老是动个不停，尾巴老是甩来甩去。它像一只袋鼠，但它那几乎像人一样扁平的、椭圆形的小脸上无特点可言，只有它的牙齿颇有表达力，无论是遮掩着还是龇咧着。有时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动物想要训练我，要不然它为什么总是在我下手去抓的时候把尾巴抽开，然后又静静地等着，直到我再度受到诱惑，它又一次跳走呢？

廷芳 黎奇 译

〔切不开的面包〕

桌上放着一大块面包。父亲拿着一把刀走了过来，想要把它切成两半。可是，尽管这把刀又重又快，这面包既不太软也不太硬，刀却怎么也切不进去。我们这群孩子惊讶地仰着脑袋看着父亲。他说：“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难道办成功一件事不比办不成一件事更怪吗？睡觉去，也许我到头来会成功的。”

我们躺下睡觉了，可是不时地，在夜间的不同时辰，我们中间总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从床上坐起来，伸长脖子，窥探父亲的动静。每回总是看到他，这个身着长外套的高大的男人，仍然架着弓步，试着把刀子摁到面包里去。当我们清晨起来时，父亲刚刚把刀放下，他说：“你们看，我还是没有成功，这事情就是这么难。”我们想要表现自己，也都来试一试，他也允许我们试，但我们几乎没法子把这把刀、这把被父亲攥得火热滚烫的刀子拿起来，只能勉强地使它翘起来。父亲笑着说：“放下吧，现在我要进城去，晚上我还要试着把它切开。我就不信会让一个面包给耍了。最终它一定会让人把它切开的，只不过它有反抗的权力，那就让它反抗吧。”可是当他说完这番话，这个面包忽然开始收缩，就像一个下定决心面对一切的人的嘴巴那样收缩，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面包。

廷芳 黎奇 译

〔坑道下的家庭〕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地头。一根木杆斜斜地插在土里，顶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坑道”。我应该是到了目的地了，我猜测着，环顾四周。距我立足之地仅几步路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爬满绿藤的小木

房，我听到那儿传来轻轻的盘碟碰击声。我走了过去，把脑袋从低矮的口子探了进去，在里面的黑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但仍然问候里面的人，并问道：“您知道这地板门由谁管的吗？”“我自己，为您效劳。”一个友好的声音说道，“我这就来。”现在我渐渐习惯了黑暗，辨认出了里面的人们，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三个额头几乎够不着桌面的孩子，一个拥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坐在小木屋深处的那个男人想马上就站起来，挤出来，那女人却恳求他先把饭吃完了，他指了指我，她又说，我会友好地等一会儿，而且会赏脸，同他们一起吃这顿可怜的午餐。而我呢，我真是恨透了自己，竟然会跑到这鬼地方来，把一个快乐的星期天搅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不得不说：“遗憾，遗憾，亲爱的夫人，可惜我不能接受邀请，因为我必须在此时此刻，确确实实就在此时此刻让人把我放下去。”“好极了，”那女人说，“偏偏挑个星期天，而且还是吃午饭的时候。世上的人真是不可捉摸。这种无休无止的苦役实在是没法说。”“您别这样嚷嚷，”我说，“我不是出于恶意要求您的丈夫这么做的，假如我知道这事该怎么做，我早就自己干了。”“别听这女人的，”那个男人说道，他这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旁，边说边拽着我走，“您别指望女人有理智。”

廷芳 黎奇 译

〔歌声的诱惑〕

有歌声从一家小酒馆里传出来，一扇窗开着，没有挂上钩子，在那里晃来晃去。这是一栋小小的平房，周围是一片空旷，这里已经离城相当远了。这时来了一位迟来的客人，悄悄地走来，他穿着一套紧身的衣服，像在一片漆黑之中向前摸索，其实这时月光十分明亮，他侧耳在窗前倾听，然后摇了摇头，弄不懂，这么美妙的歌声怎么会从这么一家酒馆中传出来，他双手一按窗台，背向跃了上去，可是他够不小心的了，竟然没能在窗台上坐住，而是一下子掉进了屋里，但跌得并不深，因为有一张桌子紧挨着窗放着。酒杯飞落在地上，坐在桌旁的两个男人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两脚还悬在窗外的新客人又从窗子里扔了出去。他掉在了柔软的草丛中，一个翻身就站了起来，再度侧耳倾听，可是歌声已经停止了。

廷芳 黎奇 译

误入荆棘丛

我误入了一片无法通过的荆棘丛中，只能大声叫喊公园管理员，他马上就来了，但却无法穿过荆棘走到我身边来。“您是怎么跑到这片荆棘丛当中去的？”他喊道，“您不能沿着同一条路走出来吗？”“不可能，”我喊道，“我再也找不到那条路了。我刚才一边想着事一边平静地走着，突然就发现我在这个地方了，就好像是我走到这里来了以后，荆棘丛才长了出来。我再也走不出去了，我完了。”“您像个孩子，”管理员说，“您首先沿着一条禁止通行的路，愣穿过从来没人走过的树丛，然后您就叫起苦来。但您并不是在一个原始森林里，而是在一个公园里，人们会把您弄出来的。”“可是一个公园里根本不该有这样的树丛，”我说，“而且人们又怎样能救我呢？谁也进不来。如果人们要试试看的的话，那就抓紧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在这里过夜我可受不了，而且我已经给荆棘刮得遍体鳞伤，我的夹鼻眼镜又掉了下去，再也找不到了，没有眼镜我简直就是半个瞎子。”“这一切都很有道理，”管理员说，“可是您还是得忍耐一会儿，我总得先去把工人找来，让他们开出一条路来，而且在这之前还得获得公园主任的批准。稍稍拿出点耐心和男子汉气概来，好不好？”

廷芳 黎奇 译

少女的羞涩

一辆金色的车子的轮子在滚动，在石子路上吱吱嘎嘎叫着停了下来。一位姑娘想要下车，她的脚已经踏在踏板上了，这时她看见了我，便又缩回了车里。

廷芳 黎奇 译

〔新灯〕 [15]

昨天我第一次踏入经理办公室。我们这个夜班推举我为代言人，由于我们的油灯设计和装的油不足，我的任务是到经理办公室去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把办公室指给我看，我敲了门，走了进去。一个温柔的、脸色很苍白的年轻人在他的大写字台后冲着我微笑。他点了很多次头，应该说太多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坐下来，那儿虽然放着一把椅子，可是我想，由于是第一次来访，我可能不应该马上就坐下去，于

是我便站着陈述那些事。可是我的谦虚反而给这年轻人造成了困难，他不得不向我转过脖子，仰起脸来，否则他就得把他的椅子换个方向，而他却不愿移动椅子。可是尽管他有听的诚意，但这样坐着，势必无法把脖子整个扭过来，所以在我述说的整个过程中，他只能半边脸对着我，其余的眼光便都斜射向了上方的屋角，而我则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我讲完后，他站了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道：是这样，是这样，把我推入了隔壁一个房间，那里的一位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先生显然正在等我们，因为他的桌子上没有任何工作的痕迹，而一扇敞开着的玻璃门通往一个种满花和灌木的小花园。那年轻人在他耳边只说了几句话，这位先生似乎就已经明白了我们多方面的申诉。他立刻站了起来，说道：亲爱的……他顿住了，我想他大概是想知道我的名字，我便张开嘴来，想再自我介绍一番，可是他先说了下去：是的，是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我对你很熟悉，你的或者你们的请求是有道理的，看来只有我和经理班子的先生们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人的处境，我想，比工作的处境更受到我们的关心。为什么不呢？活儿总是可以重新干过的，只不过是花点钱的问题，让钱见鬼去吧，可是如果一个人完蛋了，那就意味着一个人完蛋了就会留下寡妇，孩子。我的上帝！所以每一个关于建立新的安全设施、新的减轻工作的设施，新的舒适条件和享受的建议，我们都特别欢迎。谁带来这类建议，他就是我们的人。你把你的建议留在这里好了，我们将认真地考虑，任何与此有关的好消息我们都不会贪污的，等一切完成了，你们就将得到你们的新灯。回去告诉你们的人：我们一天没有把你们的矿井变成沙龙，我们就一天不休息，如果你们不曾穿着黑靴子死去，那就永远不会这样死去。尽管放心吧！

廷芳 黎奇 译

〔驯鹤〕 [16]

我晚上回到家里时，看到一个很大的、大得异常的蛋。它差不多跟桌子一样高，鼓得圆圆的。它轻轻地来回晃动。我感到很好奇，把它夹在两腿中间，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剖成两半。它已经孕育完成。蛋壳皱巴巴地碎了开来，从里面跳出一只鸟，它像只鹤，还没有羽毛，用它那太短了一些的翅膀拍击着空气。“你到我们的世界里来想要干什么？”我很想问问它，我在它面前蹲了下去，注视着它害怕地眨动着的眼睛。可是它离开了我，沿着墙边跳着，不时扑打着翅膀，好像脚痛似的。“人人互相帮助。”我想道，于是从桌上打开我的晚餐，向那只鸟招招手，它这时

正用它的鸟喙捅着我的几本书。它马上就来到了我这儿，显然已经有点习惯了，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开始发着鸣叫声的呼吸嗅我放在它面前的肠块，可是刚刚啄起来，又扔了下去。“我犯了个错误，”我想，“当然了，刚从蛋里蹦出来，怎么能马上就吃肠子呢。这里需要有女人提供经验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想看看是否能从外部看出它想吃什么。“如果它是来自鹤的家族，”我想起来了，“那么它一定会喜欢鱼的。甚至要我去给它弄鱼来我也干。当然不是白干了。我的收入允许我养一只家鸟的。如果我做出这样的牺牲，我就要求它做出同样价值的具有维持生命意义的生活服务。它是一只鹤，那么等它长大了，被我的鱼养肥了，它就能载我到南国去。我早就想到那儿去旅游了，但由于没有鹤的翅膀我至今只能搁下这个愿望。”我立即取来纸和墨水，把它的鸟喙蘸上墨水，挥喙写道（这整个过程中这只鸟都没有反抗）：“我，像鹤的鸟，在此保证，在你用鱼、青蛙和蚯蚓把我喂养到能飞之时的前提下（后两样东西我是因为想到它们很便宜而加上去的），让你乘坐在我的背上飞往南国。”然后我把鸟喙擦干净，把这张纸又拿到它眼前放了一会，才折叠起来，放入皮夹子中。接着，我马上动身去买鱼；这回我不得不付出高价，但那小贩对我说，今后将始终给我准备好价格低廉的臭鱼和足够的蚯蚓。也许南国之行不至于太贵。看到这只鸟那么爱吃我带来的东西，我很高兴。只听它格格响着把鱼吞了下去，填满了浅红色的肚子。日复一日，与人类的孩子没法比，这只鸟很快地生长着。尽管臭鱼那令人无法忍受的味道不再离开我的房间，不断地发现鸟粪并清除掉也不是易事，再说寒冷的冬天和煤的涨价不允许我进行必不可少的通风——可是一旦春天到来，我在轻盈的空气中游向灿烂的南方，那该多美。翅膀长了起来，铺上了羽毛，肌肉开始变得结实，是开始进行飞行练习的时候了。可惜没有鹤的母亲在场，如果这只鸟不太情愿，我的教授水平肯定是不够的。但它显然看出来了，它必须用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最大的努力来填补我教学水平的不足。我们开始练滑翔了。我跳起来，它就跟在后面，我张开双臂跳下去，它便振动翅膀往下落。后来我们越过桌子，再后来我们越过大棚，可是所有的练习都得有系统地重复很多遍。

黎奇 译

在阁楼上 [17]

孩子们有个秘密。在阁楼上，在一个成年人已经走不过去的堆满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破烂货的很深的角落里，律师的儿子汉斯发现了一个陌

生人。他坐在一个竖起来靠在墙边上的木箱上面。当他看到汉斯的时候，他的脸上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惊讶的表情，只有麻木。他以清澈的目光迎着汉斯的目光。一顶用羔羊皮制作的很大的帽子盖住了他的脑袋的很大一部分。一副强有力的一字胡向两边翘出。他身上套着一件褐色的宽大的大衣，用一条特别宽的，让人想起马的套具的皮带束着。腿上佩着一把不长的弯形军刀，刀鞘闪着微弱的光。两脚插在装有马刺的靴子里，一只脚搁在一个倒着的酒瓶上，另一只脚直立着，脚跟和马刺插在木头上。当他慢慢伸出手向汉斯抓来的时候，汉斯喊道：“滚开！”转过头跑向阁楼较新的那部分，跑得远远的，直到晾在那儿的湿衣服碰在他的脸上。然后他却又马上走了回去。那个陌生人带着一点轻蔑噙着下唇坐在那儿，一动也没动。汉斯慢慢地向前走，试探他之所以不动是不是一个阴谋。可是这个陌生人看来真的没有什么恶意，放松地坐在那儿，放松得让人几乎觉察不到他在点头。于是汉斯终于敢把将他和这陌生人隔开的最后一道障碍，一块炉子挡板推开，走得离他很近，最后甚至敢去碰他。“你身上灰那么大！”他吃惊地说着赶紧缩回已经弄黑了的手。“是的，都是灰。”那陌生人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发音是那么怪，以致话音落地之后汉斯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叫汉斯，律师的儿子，你是谁？”“原来这样，”陌生人说，“我也是一个汉斯，我叫汉斯·施拉格，是巴登州的猎人，从涅卡河畔[18]的阔斯伽腾来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是猎人？你曾打过猎？”“喔，你还是个小孩子，”陌生人说，“你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嘴咧得那么大？”这个毛病也是当父亲的律师给他指出过的，可是对一个说话几乎让人听不懂的猎人来说，在他面前咧大了嘴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种责备由他说出来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廷芳 黎奇 译

〔在墓穴里做客〕 [19]

我在死人那儿做客。这是个宽敞整洁的墓穴，有几个棺材已经停放在这里，可是还有许多空地，有两个棺材开着盖，里面看上去像是睡觉的人刚离开的乱糟糟的床。一张写字台放在靠边上的地方，所以我没有马上就看到，一个身体壮实的男人坐在写字台后面。他右手拿着一支笔，好像他刚才还在写什么而现在正好停了下来似的，左手在背心前玩弄着一根闪闪发光的表链，脑袋低垂在表链上。一个女佣人在扫地，其实根本没什么可扫的。

不知出于哪门子的好奇心，我扯了一下那把她的脸完全裹住的头巾。这回我看清了她的脸。这是个我一度认识的犹太姑娘。她长着一张丰满而白的脸，细窄的深色的眼睛。她从把她弄得像个老妇人似的破布中向我露出笑脸，我说：“你们在演喜剧吧？”“是的，”她说，“有那么一点。你真是内行！”可是接下来她指了指坐在写字台边的那个男人，说：“你现在先到那里去向他问好，他是这里的主人。在你向他问过好之前，按理说我是不能跟你讲话的。”“他到底是什么人？”我轻轻地问。“一个法国贵族，”她说，“他叫德·波尔坦。”“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问。“这我不知道，”她说，“这里是一团糟。我们在等一个能整顿秩序的。你就是这个人吗？”“不，不。”我说。“这是很理智的，”她说，“现在还是到那位先生那儿去吧。”

于是我走了过去，鞠了个躬。由于他不抬头，我只能看到他乱七八糟的白头发，我道了晚安，可是他仍然一动不动，一只小猫沿着桌子边缘跑，它显然是从他的怀里蹿出来的，而现在又回到了那里去。也许他根本没在看着表链，而是在往桌子底下看着。我正想解释，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可这时我那个熟人扯了扯我的上衣，说道：“这已经够了。”

我对此很满意，我向她转过身去，我们挽着胳膊在这墓穴里走动起来。那把扫帚老是碍手碍脚的。“把这扫帚扔了。”我说。“不行，求你了，”她说，“让我拿着它吧。在这里扫地一点都不费劲，你一定已经发现了，对不对？这对我有些好处，我可不愿意放弃这些好处。你打算留在这里吗？”她转开了话题。“为了你的缘故我愿意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说。我们现在身子紧挨着，就像是一对情人。“留下吧，留下吧，”她说，“我是多么想你啊。这里不像你可能担心的那么坏。周围怎么样对我们俩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我们的胳膊互相松开了，现在我们拥抱在一起了。我们走在干道上，左右两边都是棺材，这个墓穴非常之大，至少非常地长。这里虽然是昏暗的，但还不是伸手不见五指，这儿有一种微弱的光，在我们所到之处比别处更亮一些，在我们身边形成了一个光圈。她忽然说道：“来，我给你看我的棺材。”这使我惊讶。“你没有死啊！”我说。“没有，”她说，“可是我得承认，我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所以我对你能够来到这里感到特别高兴。很短的时间里你就能明白一切，现在你可能已经比我看得清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有个棺材。”我们向右拐进一条岔道，也是在两列棺材之间。这里的整个结构使我想起了一个我曾经见过的很大的藏酒地窖。在这条路上我们还经过了一条很小的、几乎不到一米宽的小溪，水流湍急。然后我们很快

就到了这位姑娘的棺材旁。里面放着绣着精美的花边的枕头。这姑娘坐了进去，引我下去，与其说是用手指，不如说是用目光。“亲爱的姑娘。”我说，把她的头巾揭了下来，手停留在她松软的头发上。“我还不能待在你这儿。这墓穴里还有一个人，我必须跟他谈谈。你愿意帮我去找他吗？”“你必须跟他说话？这地方可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她说。“但我不是这里的人。”“你觉得你还是要离开这里吗？”“没错。”我说。“那么你就更不应该浪费时间了。”她说。接着她在枕头底下寻找起来，从那里拿出一件衬衣来。“这是我的丧服，”她说从下面递给我，“可是我不穿它。”

廷芳 黎奇 译

〔棺材〕 [20]

一个棺材完工了，木匠把它装上了手推车，打算送到棺材铺去。从横街走来一位老先生，在棺材前站了下来，用手杖在上面画了一下，同木匠开始了一番关于棺材工业的小小的对话。一位拎着买菜包的妇人沿着主要街道走过来，碰了这位先生一下，接着认出他是个老相识，于是也站了一会儿。助手从工场里走出来，有几个关于他手头上的活儿的问题要问师傅。工场上方的一扇窗户中露出了木匠老婆，手中抱着最小的孩子，木匠开始远远地逗他的孩子，那位先生和提着买菜包的妇人也微笑着抬头看着。一只麻雀幻想着在这里找到什么吃的，飞落在棺材上，在那儿跳上跳下。一只狗在嗅着手推车的轮子。

这时忽然从里面猛烈地敲响了棺材盖。那只鸟飞了起来，害怕地在车子上空盘旋。狗狂叫起来，它是所有在场者中最激动的，好像是为失职而感到绝望似的。那位先生和那位妇人蹦到了一边，摊开着手等待着。那助手出于一个突然的决定，一下跃到棺材旁，坐在了那儿，他好像觉得坐在这个位置上不像看着棺材打开，敲击者钻出来那么可怕。也许他已经为这匆忙的举动感到后悔，但既然他已经坐在了上面，他就不敢再爬下来了，师傅怎么赶也赶他不下来。上面窗口的女人可能也听到了敲击声，但却无法判断来自何处，至少根本不可能想到这声音来自棺材里，所以她完全理解不了下面的进程，惊讶地注视着。一个警察，在一种无以名状的心理要求的驱使下，又在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的阻止下，犹豫不决地慢慢踱了过来。

这时盖子被大力推开，那助手滑到了一边，一个短促的、异口同声的尖叫从所有的人口中发出，窗口里的女人消失了，显然她正抱着孩子顺着楼梯飞奔下来。

廷芳 黎奇 译

〔建城〕

一些人来到我这儿，请求为他们建造一座城市。我说，他们人太少了，有一幢房子就足够容纳他们，我不会为他们建造城市的。可他们却说，还有其他人要来，其中还有夫妻，他们将会生儿育女，而且也不需要一下子建成这座城市，只需先定下轮廓，然后逐步逐步地搞。我问他们想把城市建在哪里，他们说，这就把地点指给我看。我们沿着河边，一直走到一个相当高的、河岸那边十分陡峭、而其他方向平缓下降的非常宽广的高地上。他们说想把城市建在这上面。那上面只稀稀拉拉地长着野草，没有树木，这我是满意的，可我觉得河岸那边的坡度太陡了，我提请他们注意这一点。他们却说，这没有什么害处，城市可在其他方向的坡上扩展，会有足够的通往水边的口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找到制服这陡崖的办法的，无论如何这不至于构成阻止在这个地方建造城市的障碍。再说他们年轻力壮，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这陡坡上爬上爬下，他们立刻就要示范给我看。他们真的这么干了；他们的身躯像壁虎似地在岩石缝中晃悠着往上蹿去，一会儿就到了上面。我也爬了上去，我问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儿建造城市。对于防卫来说这地方不太合适，只有朝河的那边堪称有天然的屏障，而恰恰那边是最不需要防卫的，那儿反而需要随时可以轻易退走的条件；从其他所有方向则都能毫不费劲地来到这个高地上，所以由于其广阔的延伸而难以防御。此外，这里土壤是否肥沃尚未经过检查，依赖于下面的平原，靠马车运输来维持供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始终是危险的，更别说在不太平的年代中了。而且这上面是否能找到足够的饮用水还没有确定，他们指给我看的那个小水源看来不足为凭。

“你累了，”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你不想建这座城市。”“我是累了。”我说着在水源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们把一块毛巾浸入水中，然后给我擦脸，我谢了他们。接着我说，我想要一个人在这高地上走走，便离开了他们；我转了很长时间；等我回到那儿，天已经黑了；大家都躺在水源边睡觉；天上开始下起小雨来。

第二天早晨我又问了一遍昨天的那个问题；他们未能一下子理解，我怎么会早晨重复晚上的问题。但接着他们还是对我说，他们无法将他们选择这个地方的理由确切地告诉我，是世代传下来的话题，建议选择这个地方的。上辈子的人就想要在此建城市了，但出于某些同样不曾传得很清楚的原因才未能着手。无论如何他们不是由于心血来潮而到这个地方来的，恰恰相反，他们并不十分喜欢这个地方，而且我所说的那些反驳理由他们自己也已经发现了，并承认那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偏偏有那先辈的遗命，谁不听从遗命，就将被消灭。所以他们觉得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还要犹豫，而不是昨天就开始建城。

我决定离开，沿着陡坡向河边爬下去。可他们中有一个醒了，叫醒了其他人，于是他们便站到了岸边来，这时我刚爬到一半，他们请求我，喊我。我又爬了回来，他们帮着把我拉上去。这回我答应了给他们建这座城市。他们很感激，没完没了地向我阐述他们的心情，还纷纷吻我。

〔难念的家经〕 [21]

一个农民在公路上拦住了我，请求我跟他到他家里去，他说，也许我能够帮助他，他同妻子发生了争执，这场争执使他生活得十分痛苦。他还有几个好动而脑子单纯的孩子，他们只会毫不懂事地往什么地方一站，要不就干脆跟你捣乱。我说，我愿意跟他去，但是实在是没有把握，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是否能帮得上他什么忙，孩子们我也许可以引导他们去干些什么，可是在他的老婆面前我可能会束手无策，因为老婆好斗的根源一般因丈夫的品质而来，由于他不想争执，他一定已经做出了改变自己的努力，但既然他都没有成功，那么我又能干什么？我顶多能把他老婆的好斗嗜好引到我身上来。这段话我与其说是对他讲，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可我接下来明确地问他，我如果为此做出努力，他将给我什么报酬。他说，这都好商量，只要我能起到一点作用，我就可以要什么就拿走什么。听了这话，我停下了脚步，我说，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不能满意，必须明确地商定，他每个月给我什么。他对我要求月薪感到惊讶。我对他的惊讶感到惊讶。难道他认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里处理好两个人该欠一辈子的账吗？难道他认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后背上一小麻袋豌豆作为给我的酬劳，感激地吻他的手，用我的破布裹住自己，然后继续在冰冷的公路上漫游下去吗？不行！这个农民低着头，一声不吭地、但却是紧张地听着。事实上，我说，我将长时间地待在他那儿，以

求找到可以给事情带来改善的下手之处，然后我将不得不待更长的时间，以求尽可能把事情安排妥当，然后我就老了，疲倦了，将根本就不再离开，而是在那儿休养，享受他们大家的感激。

“这是不可能的，”农民说，“那样你就赖在我的房子里不走了，而最后还会把我赶走。这样我在我已经够重的负担上还得加上最重的一个。”“没有相互信任我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我说，“我不是也把我的信任给予你了吗？我需要的只是你的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你是完全可能会撕毁的。在我照你的愿望把事情处理好之后，你可能会不顾任何承诺而把我撵走。”农民看着我说道：“你不会让我把你撵走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把我想成什么样都行，可是别忘了，我是像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那样友好地这么对你说的，即使你不带我去，你家里的情况你也忍受不了多久的。你怎么跟这个女人和这些孩子一起生活下去：如果你不敢马上带我到你家里去，那还不如放弃你的房子和你将会进一步面临的照料义务，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流浪，我不会记恨你的不信任的。”“我不是个自由的人，”农民说，“我跟我的老婆已经一起过了15年了，那日子是难受的，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尽管如此，我在做出一切使她变得能让人忍受的尝试之前还是不能离开她走我的。正当这时我在公路上看到了你，当时我就想，我可以跟你一起做最后一次伟大的尝试。跟我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我要的并不多，”我说，“我不想乘你之危。你可以始终把我当成雇工，我会干很多活，对你会很有用的。可是我不想成为和别的雇工一样的雇工，你不能命令我，必须是让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工作，这回干这个，下回干那个，然后又什么都不干，完全凭我的兴趣。你可以请求我干一个活，但不能纠缠不休；当你发现我不想干这个活时，你就得认了。钱我不需要，可是就像我现在穿着的外衣、内衣和靴子在需要的时候必须给我换新的；如果在村子里买不到这些东西，你就得进城去买。可是我对这些现在并不担心，我现在穿着的几年里还坏不了。雇工通常的伙食对我来说没问题，不过我每天得有肉吃。”“每天吗？”他立刻插嘴道，好像他对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意见似的。“每天。”我说。“你的牙很特别。”他说，以此对我的奇怪愿望表示谅解，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嘴里去摸我的牙齿。“那么尖利，”他说，“简直和狗牙差不多。”“一句话，每天我都有肉吃，”我说，“啤酒和烧酒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这要求可是多了一点，”他说，“我喝得很多。”“那更好，”我说，“但是你可以限制你自己，那么我也可以限制我自己。可能你只不过因为家里的不幸才喝得那么多。”“不，”他说，“这扯得上吗？那么你可以得到和我一样多的酒，

我们一起喝。”“不，”我说，“我不会跟任何人一起吃饭和喝酒的。我将永远一个人吃饭和喝酒。”“一个人？”农民惊讶地问道，“我心里已经在反对你的愿望了。”“那实际上并不多，”我说，“差不多就这些了。只有油还是我需要的，再来点一盏小油灯，它将通宵地在我身边点燃着。这盏小油灯就在我的包里，一盏很小的小灯，用油很少的。这本来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提到它只不过想要把话说得全一点，以免今后出现争执；在报酬方面我受不了任何争执。如果有人拒绝我们约定的事，那么我这个平时很好说话的人会变得很可怕的，咱们丑话说在头里。如果欠我的东西不给我，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就有本事在你睡着的时候在你的头顶上把房子点着。如果你不拒绝我们约定的这些，甚至不时出于爱再给我一些小礼物，也可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我对你将是忠心耿耿的，并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很有用的。除了我所说的以外，我不再要求别的了，只有在8月24日，我的命名日得给我5升装的一小桶罗姆酒。”“5升！”农民叫了起来，双手握在了一起。“没错，5升，”我说，“这并不多。你肯定想要降低我的份额。可是我已经限制了我的需求，当然是为你考虑，因为如果有第三者在旁边听着，我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在第三者面前我不可能这样对你说话。谁也不能知道我们今天谈的话。再说，也没人会相信。”可是这农民说道：“你还是走你的吧。我将一个人回去，自己试着跟老婆和解。最近我打她打得很多，现在我要稍微减少一些，她也许会因此而感激我的，孩子们我也打得很多，我总是从马厩里拿来鞭子揍他们，我将稍稍克制一点，可能情况会好一点。当然我已经经常停止过，可是情况并没有改善。可是你所要求的我没办法承受，即使我也许能够承受，不，经济上承受不了的，不，不可能，每天有肉，5升罗姆酒，就算是可能的，我的老婆也不会答应，如果她不同意，我就不能干。”“那谈判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呢？”我说……

廷芳 黎奇 译

包厢里的奇遇 [22]

我坐在包厢里，旁边坐着我的妻子。正在演出一个紧张的剧作，主题是忌妒，这时，在一个金碧辉煌的、由立柱围着的大厅里，一个男人正在他那缓缓向出口移步的妻子身后举起匕首。我们紧张得趴在了胸墙上，我感觉到我妻子的鬃发拂在我的太阳穴上。这时我们忽然吓得缩回了身子，胸墙上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我们以为是铺着天鹅绒的胸墙却原来是一个细高个子男人的背脊，他正好和胸墙的宽度一样，到刚才为

止一直肚子朝下地趴在那儿，而现在正慢慢地转身，好像在寻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我的妻子颤抖着贴着我。他的脸离我很近，比我的手掌还窄，干净得可怕，像个蜡像，长着黑色的尖胡子。“你为什么要吓唬我们？”我问道，“你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对不起！”这人说，“我是您的妻子的一个崇拜者，感觉到她的胳膊肘支在我的身上使我十分幸福。”“艾米尔，我求你，保护我！”我的妻子叫道。“我也叫艾米尔，”那人说道，他的脑袋支在一只手上，躺在那儿就像躺在一张舒适的卧床上似的。“到我这儿来，甜美的小人儿。”“无赖，”我说，“再敢说一句，我就让您摔到下面观众席上去。”大概我觉得他肯定还会说话，我就动手把他往下推去，但这并不容易，他好像是牢牢属于胸墙的一部分似的，好像是安装在了胸墙里，我想把他翻个个儿，但却办不到，他只是微笑着，说道：“省省吧，你这小笨蛋，别过早把力气都用尽了，斗争还刚刚开始，结果只能是您的妻子满足我的渴望。”“绝不！”我的妻子叫道，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求你了，马上把他推下去。”“我不行，”我喊道，“你也看到了我是多么卖力，可是这里肯定有个什么花招，就是办不到。”“噢，天啊！噢，天啊！”我的妻子痛苦地叫着，“我怎么办呢？”“安静点，”我说，“我求你了，你的激动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计划，我要用我的刀把这里的天鹅绒割开，然后连同这个家伙一起掀到底下去。”可是我这时却找不到我的刀了。“你知道我的刀在哪里吗？”我问道。“是不是让我给落在存衣处的大衣里了？”我差点就要往存衣处跑去了，这时我的妻子使我恢复了理智。“你现在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艾米尔！”她叫道。“可是我没有刀怎么办？”我回头喊道。“拿我的。”她说，用颤抖的手指在她的小口袋里寻找，当然她找出来的无非是那把一丁点儿小的贝壳小刀。

廷芳 黎奇 译

夜行船的惊讶 [23]

我站着把小船划进了一个小港口，那里空荡荡的，在一个角落里停着两条挂帆的小舟，其他地方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小船。我轻而易举地为我的小船找到了一个停靠的地方，从那儿上了岸。这只是一个港口，但有着结实的堤墙，维持得很好。

有一些小舟在水面上滑过。我呼喊其中的一艘。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头是船上的领班。我在上岸的台阶上犹豫了一会儿，他微笑着，我边

注视着他边踏上了他的船。他向小船的头上指了指，我便在那里坐了下来。但我马上就蹦了起来，说道：“你们这里有大蝙蝠！”因为有大翅膀在我的头上掠过。“放心吧。”他说，同时已经开始操作起那根桨来，我们一下子就被推离了岸边，我差不多是被摔回到了我的板凳上。我没有告诉这位领班我要到哪里去，而只是问他是否知道，从他的点头上可以得出结论，他是知道的。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解脱，我伸开腿，把脑袋靠在后面，可是仍盯着这个领班，一边琢磨：“他知道你要到哪里去，这个脑壳里面知道这一点。他把桨往海里打，只是为了把你送到那里去的。你从那么多船里正好叫的就是他，当时上船前居然还犹豫不决。”于是我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在我看不见那人时至少还想听到他的声音，于是我问他：“像你那么大的年龄一定不想再工作了。你难道没有孩子吗？”“就你一个，”他说，“你是我唯一的孩子。只为了你我才走这一趟，然后我就把这艘船卖了，以后就不再干活了。”“你们这儿把乘客称为孩子吗？”我问道。“是的，”他说，“这是这里的风俗。而乘客把我们称为父亲。”“这可真够奇怪的，”我说，“那么母亲在哪里呢？”“在那儿，”他说，“在船舱里。”我直起身子，看到设在小船中间那船舱的圆形小窗里伸出一只手来向我致意，接着那里露出了一张用一条三角黑头巾裹着的强壮的妇女的脸。“是母亲吗？”我微笑着问道。“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她说。“可是你看上去比父亲要年轻得多。”我说。“是的，”她说，“是年轻得多，他可以当我的祖父，而你可以当我的丈夫。”“你知道吗，”我说，“当人们单独在夜里行舟，忽然出现了一个女人，是多么地令人惊讶。”

廷芳 黎奇 译

〔世界冠军〕 [24]

“那伟大的游泳健将来了！那伟大的游泳健将来了！”人们呼喊。我从安特卫普奥运会回来，我在那儿拼出了一个游泳世界纪录。我站在家乡城市火车站前的台阶上，这城市在哪儿呢？俯瞰着暮霭中模糊不清的攒动着的人头。一个让我顺手摸了一下脸蛋的姑娘利索地给我套上了一条绶带，上面用一种外语写着：献给奥运会冠军。一辆汽车开了上来，几位先生把我拥入车内，有两位也坐了进来，市长和另一个人。我们马上就进入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当我步入时，楼厅上一个合唱团唱了起来，这里聚集着的几百个客人都站了起来，有节奏地喊着一个什么口号，我没听清他们喊的是什么。我的左边坐着一位部长，不知道为

什么，介绍他的那个词竟会使我如此惊恐，我用毫无顾忌的目光打量着他，但马上就醒悟过来。右边坐着市长夫人，一个胖女人，我觉得她身上，尤其是胸脯以上，插满了玫瑰花和鸵鸟毛。我对面坐着一个胖男人，脸色白得引人注目，介绍他的名字时我没注意，他把两个胳膊肘都支在桌子上——人们给他留的地方特别大——茫然注视着前方，一声不吭。他的左右两边坐着两个漂亮的金发姑娘，她们很快乐，有着说不完的话，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尽管灯光十分充足，但其他客人我都看不太清，也许是因为一切都在运动吧，服务人员来回穿梭，菜端上桌子，杯子举了起来，也许是灯光过亮地照着一切吧。此外还有一种秩序混乱，唯一的一种秩序混乱，即有些客人，尤其是女士们，背朝着桌子坐着，而且不是椅背位于桌子和背脊之间，而是背脊几乎碰到了桌子。我把这现象指给我对面的两位姑娘看，可是本来话那么多的这两位这回却什么也没说，而只是长时间地微笑着看着我。有人摇响了铃，服务员们的身形顿时在座位之间凝住了，对面那胖子站了起来，开始发表讲话。这人为什么这样悲伤？他一边讲话，一边用手帕擦着脸；这本来是所谓的，像他这么胖，厅里这么热，再加上讲话的用劲，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清楚地发现，这是个骗人的幌子，是用于掩饰他擦去眼泪的动作的。他老是看着我，但却仿佛他看的不是我，而是我敞开的坟墓。他讲完后，当然我就得站起来，也讲一番话。我正好有一种讲话的冲动，因为有些事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或许也在别的地方做出公开的、坦率的澄清，于是我说开了：

“尊敬的与会者！我不得不承认，我获得了一项世界纪录，但你们如果问我，我是怎么得到它的，我却无法给予你们满意的答复。其实我根本不会游泳。我一直想学，可始终没有机会。那么怎么会把我从祖国送到奥运会去的呢？这个问题也是我正在研究的。首先我必须肯定一点，我在这儿并不是在我的祖国，尽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可这儿说的话我仍是一句也听不懂。那么你们会想，最大的可能是搞错人了，可是并没有搞错人，我是得到了世界纪录，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我的名字就是你们称呼我的这个，到这里为止一切都没错，可是从这里开始一切都不对了，我不是在我的家乡，我不认识你们，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还有一点也许虽然不能确切地，但总之是能够否认搞错了人的理由：我听不懂你们的话我没觉得有什么关系，听不懂我的话你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关系。从我前面那位尊敬的发言者的讲话中我相信我只明白了一点，即这篇讲话是极其伤感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不仅已经足够了，而且太多了。我到这里后所参加的所有谈话的进程大体上都是如此。现在

让我们把话题回到我的世界纪录上吧。”

廷芳 黎奇 译

〔巩固〕 [25]

在店里我们有五个人，会计是个忧郁的近视眼，他像个青蛙似的趴在主账簿上，绝对安静，只有吃力的呼吸有节奏地使他的身体一起一落，再就是那个伙计，这是个有着运动员般宽阔胸脯的小个子，只要一只手撑在案子上，他就能轻巧而姿态美妙地一跃而过，只是他的脸色在这时显得很严肃，严厉地巡视四周。我们还有个女店员，一个老小姐，纤细温柔，穿着得体，大多数时候她的脑袋总歪在一边，用她那大嘴薄唇微笑着。我这个小学徒除了拿着抹布在案子上东按一下西按一下外，没多少事要做的。当我们的小姐把她那长而弱的、干枯的、木头颜色的手漫不经心地搁在案板上时，我经常想要去抚摩它，甚至去吻它，或者，这是最理想的，把我的脸放在那个好地方，不时地改变一下位置，以便能保持舒服的姿势，而且每一边脸颊都能享受到这只手。可是这从来没有发生过，每当我靠近这位小姐，她总是偏偏就伸出这只手，给我指出一个新的工作任务，要不就是在一个老远的角落里，要不就是在梯子上方。后者尤其不舒服，因为那上面由我们用来照明的煤气火焰散发出来的热令人难以忍受，而且我也不是不会头晕的人，在那里，我经常感到恶心。有时我以要打扫得特别干净为理由，把头伸到一个格子里去，哭上一小会儿；或者，在没有人往上看的时候，我就对下面的小姐发出一通无声的言论，对她大加谴责。虽然我知道，她远远没有决定的权力，无论在这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可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相信，如果她想要这种权力，那么她就会得到，并且对我有利地使用之。可是她不要这种权力，她甚至不利用她本身拥有的权力。比如，她是店员中唯一能让那店仆稍微听点话的人，这个店仆是个特别爱自行其是的人。当然了，他是店里资格最老的，老经理那时他就在这里干了，他参加过这里的许多事，而我们这些人对此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他从这一切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他对一切都比其他人更懂，比如做账，他认为自己可以不是跟会计差不多，而是更好得多，能比那伙计更好地伺候顾客，等等。他说，他仅仅是出于自愿接受了店仆的位置，因为其他任何人，甚至没有能力的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于是这个以前不见得有多强壮，而现在无非是一堆废肉的人便以手推车、箱子和包裹折磨了自己整整四十年。他是自愿接受这个工作的，可是人们忘记了这点，新的时

期接踵而至，人们不再承认他，店里，在他的周围发生了许多巨大的错误，人们却没让他插手，于是他不得不咽下绝望，同时仍然被束缚在他的沉重的工作上。

廷芳 黎奇 译

〔督学与老师的对话〕 [26]

那是一个商店学徒夜校，学徒们得到了一些小算术作业，要求他们现在用书面完成。可是从所有的板凳上发出巨大的噪声，任何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静下心来计算。最安静的是讲台上的老师，他是个瘦瘦的年轻大学生，他拼命使自己相信，学生们正在做作业，因此他可以进行自己的学习，他用大拇指堵着耳朵进行着。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夜校的督学。那些年轻人马上闭上了嘴，尽其一下子放弃所有有趣话题的力量，老师也把课本压在了他自己的本子上。督学还是个年轻人，比那大学生年纪大不了多少，他以疲倦的、显然有点近视的眼睛扫视着课堂。然后他登上了讲台，拿起课本，不是为了打开它，而是为了亮出下面压着的本子，接着他示意老师坐下来，他自己也在半挨着老师，在半对着他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于是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全班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后排还站了起来，为了能看得清楚些。

督学：看来这里什么也没在学。我在楼下都听到了这里的噪声。

老师：班里有几个非常不听话的年轻人，可是其他人在做他们的算术作业。

督学：不对，没有人在做作业，您坐在上面学习罗马法律，别的事情也不可能做。

老师：是的，我利用班级里做作业的时间来学习，我想以此减少一点今夜的劳动量，白天我一点没有学习的时间。

督学：好吧，听上去您是无辜的，可是我们要进一步看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这里是什么学校？

老师：商人公会学徒夜校。

督学：这是一个高等学校还是初等学校？

老师：一个初等学校。

督学：也许是最初等的之一？

老师：是的，是最初等的之一。

督学：对了，这是最初等的之一。它比大众学校更低，因为在教材不是重复大众学校的教材的情况下（当然这是值得尊敬的），这里涉及的便是最最初级的东西。所以我们大家，学生、老师和我——督学，都在工作，或者说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义务在最初级的学校之一中工作。这大概是不光彩的吧？

老师：不，没有一种学习是不光彩的。再说这学校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通道。

督学：那么对于您来说呢？

老师：对我来说其实也是的。

.....

廷芳 黎奇 译

〔室内滂沱〕 [27]

他用上牙紧紧地咬住下唇，目视前方，一动不动。“你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的生意不算太好，可也并不糟糕；再说，即使破了产——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你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出路，你又年轻又健康，学过经济学，人很能干，需要你操心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母亲，所以我要求你振作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大白天把我叫来，又为什么这个样子坐着？”接着出现了小小的间歇，这时我坐在窗台上，他坐在屋子中央的一把椅子上。他终于开口了：“好吧，我这就都告诉你。你所说的全都没错，可是你想想：从昨天开始雨一直下个不停，大概是从下午五点开始的吧，”他看了看表，“昨天开始下雨，而今天都四点了，还一直在下。这本来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的事。但是平时街上下雨，屋子里不下，这回好像全颠倒了。你看看窗外，看看，下面是干的，对不对？好吧。可这里的水位不断地上涨着。它爱涨就涨吧。这很糟糕，但我能够忍受。只要想开一点，这事还是可以忍受的，我只不过连同我的

椅子漂得高一点，整个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所有东西都在漂，只不过我漂得更高一点。可是雨点在我头上的敲打使我无法忍受。这看上去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偏偏这件小事是我无法忍受的，或者不如说，这我也许甚至也能够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仅仅是我的束手无策。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我戴上一顶帽子，我撑开一把雨伞，我把一块木板顶在头上，全都是白费力气，不是这场雨穿透一切，就是在帽子下，雨伞下，木板下又下起了一场新的雨，雨点的敲击力丝毫不减。”

廷芳 黎奇 译

〔女人的力量〕 [28]

“你的势力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

“你认为我是有势力的吗？”

“我认为你非常有势力，几乎同样令我敬佩的是你施展你的势力时所表现的保留态度，不自私，或者说你在对自己施加这种势力的时候所表现的果断和坚决。你不仅对外谨慎，而且你甚至斗争自己。对你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不想问，这是你自己的财产，我只想问你的势力是从何而来的。我之所以有问这事的权力，我认为是因为我看出了这种势力，至今为止许多人都没能看出，我已经感觉到它的威胁（由于你的自我抑制它今天还没有走得更远），感觉到其不可抗拒。”

“你的问题我可以很容易地回答：我的势力是建筑在我的两个女人身上的。”

“在你的女人身上？”

“是的，你不是认识她们的吗？”

“你说的是那两个我昨天在你的厨房里看见的女人？”

“是的。”

“那两个胖女人？”

“是的。”

“这两个女人。我几乎没有注意她们。她们看上去，对不起，像两个女厨子。可是她们不太干净，穿得很随便。”

“对，那就是她们。”

“嗨，你说什么，我总是马上就相信的，只是比起我不知道那两个女人的时候，我现在对你更不理解了。”

“可是这不是谜，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我将试着向你叙述。我跟这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你在厨房里看见了她们，可是她们是很少做饭的，吃的多半是从对面饭店里取来的，这回采西去取，下回就是阿尔巴去取。谁也不反对在家做饭，但这太困难，因为这样她们俩互相不能容忍，我这是说，她们俩相处得非常好，但必须是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比如她们可以几个小时平静地挨着躺在狭窄的长沙发上而不睡，就她们胖的程度而言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可是在干活方面她们互相不能容忍，马上就会爆发争吵，从争吵又发展成揪打。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她们对理智的话是很愿意接受的），尽可能少干活。而且这也符合她们的天性。她们相信已经把房间打扫得特别干净了，而实际上房间里却是特别地脏，以致我踏上门槛就感到恶心，可是只要我走了进去，我也就很容易适应了。

“只要不干活，就不会有任何争吵，尤其是忌妒对她们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忌妒又从何而来呢？我几乎无法把她们俩区分开来。也许阿尔巴的鼻子和嘴唇比采西更像黑人的，可是有时我又觉得恰恰相反。也许采西的头发比阿尔巴少一点，阿尔巴的头发本来就已经少得超过了允许的程度了，可是我会对此注意吗？我始终无法把她俩区分开来。

“我工作完后已是晚上才回到家里，白天只有在礼拜天我才能较长时间地看到她们。我总是很晚回到家里，因为在工作后我总喜欢一个人东游西逛。为了节约，我们晚上不点灯。我真的没有这笔钱，养这两个女人已经用去了我所有的收入，她们有着毫不间断地吃东西的能力。晚上我在黑暗的住处前按响门铃，然后听到这两个女人气喘吁吁地向门边跑来。采西或者阿尔巴说：‘是他。’然后这两人气喘得更厉害了。如果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他非害怕不可。

“然后她们打开了门，而我惯于开个玩笑，门刚开了一道缝，我就钻了进去，同时搂住两个人的脖子。‘你。’一个人说，这意思是：‘你是这

么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两个人都用低沉的滚动喉音笑了起来。从这时开始她们只知道跟我纠缠，要不是我抽出一只手来关上门，这道门整个晚上都会开着。

“接下来总是穿过会客室，这是只有几步远却要花上一刻钟的路，这段路上她们几乎是抬着我走。在度过不容易的一天后我真的是累了，我一会儿把脑袋搁在采西的肩膀上，一会儿搁在阿尔巴的肩膀上。两人都几乎是一丝不挂，只穿着衬衫，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也是这样的。只有在预告说有客人要来的时候，比如最近你来的那一次，她们才穿上几件褴褛肮脏的破衣服。

“然后我们进入我的房间，她们总是把我推进去，而她们则待在外面，然后关上门。这是一个游戏，因为这时她们为谁先进入而开始了斗争。这不是什么忌妒，不是真正的斗争，只是游戏而已。我听见她们互相给予的轻而响亮的击打声、喘息声，现在这已经是意味着真正的呼吸困难，不时交换的一两句话。最终我自己把门打开，她们一下子就冲了进来，热烈，穿着撕碎的衬衣，带着呼吸中刺鼻的气味。然后我们倒在地毯上，于是一切渐渐地静了下来。”

“喂，你怎么不说下去了？”

“我忘了上下文了。刚才是怎么说的？你问我的所谓势力来自什么地方，而我说到这两个女人。没错，就是从这两个女人那儿产生了我的势力。”

“仅仅产生于与她们的同居吗？”

“产生于同居。”

“你变得这么沉默寡言。”

“你看到了，我的势力是有局限的。有某种力量在命令我沉默。再见。”

廷芳 黎奇 译

“奇怪！”狗说道，它用手抹着额头，“我刚才是在什么地方跑了半天呢，先是穿过市场广场，然后穿过一条山隘向山丘上跑，然后在高地上纵横跑了好几遍，然后跌下山来，然后在公路上跑了一段，然后向右拐跑到小溪，然后沿着白桦树列跑，然后从教堂旁边跑过，而现在到了这里。为什么会这样？我都绝望了。又能够回到这里真是幸运。我害怕这种毫无目的的胡跑，害怕那些大而荒凉的空间，我在那里是怎样一个可怜的、无助的、弱小的、别人根本就找不到的狗。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我离开这里，这个院子是我的地方，这里是我的小屋，这里有我的锁链，以防止有时会发生的想咬人的现象，这里什么都有，包括充足的食物。你说说看。我永远不会自愿地离开这个地方，我在这里感到过得很舒服，对我的地位感到自豪，当我看到其他牲口的时候，一阵舒服的、然而确实是有根据的优越感便会渗透到我全身骨头里去。可是有别的哪个动物像我这样毫无意义地跑开的吗？一个都没有，那只猫不能算，那个柔软的、长着爪子的东西，那个没人要、没人想的家伙，她有她的秘密，我对此毫不关心，她在上班的时候到处跑，可也只是在这座房子的区域里。我是唯一开过小差的一个，这肯定会在什么时候使我失去我高贵的地位。幸亏今天好像没有人发现，可是主人的儿子理查德最近就此说过一个看法。那是个星期天，理查德坐在板凳上抽烟，我躺在他的脚边，脸颊贴在土地上。‘凯撒，’他说，‘你这只不忠实的坏狗，你今天早晨到什么地方去了？清晨五点我找过你，这时候你还应该在放哨，可是院子里哪儿都找不到你。直到六点一刻你才回来。这是严重的失职，.你知道吗？’就这么又被发现了一回。我站了起来，坐到他的身边，用一只胳膊搂着他说道：‘亲爱的理查德，这回再原谅我一次，不要说出去。我很痛心，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我哭得伤心极了，出于许许多多原因，出于对我自己的绝望，出于对惩罚的害怕，出于对理查德平静的脸色的感动，出于对当场没有惩罚的工具的高兴，我哭得是那么伤心，以至泪水沾湿了理查德的上衣，以至他把我甩开，命令我趴下。当时我是保证了要改正，而今天又重复了同样的事情，我甚至比那回离开的时间更长。当然，我保证改正是发自内心的。而这不是我的过错……”

廷芳 黎奇 译

〔教堂里的“紫貂”〕 [30]

在我们的犹太教堂里生活着一只像紫貂般大小的动物。人们经常可

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它，它允许人们走到距离它顶多两米的地方。它的毛色是一种淡青色。它的毛皮还没有人摸过，这根本谈都不用谈，人们几乎认为，它的毛皮的真实颜色是看不出来的，也许能够看见的颜色只是沾在毛上的灰尘和泥浆的颜色，这种颜色也确实像教堂内抹的灰浆颜色，只是淡一点而已。撇开它的畏怯不谈，这是一个非常安静和安分的动物。如果不是它经常被赶开，它也许几乎不会更换地方，它最爱待的地方是女人室的网格栅栏，它喜欢带着显而易见的满足感抓住网格，探入脑袋，观察下面的祈祷室，这个勇敢的位置好像使它感到快乐。但是教堂仆人有任务，就是不让它待在栅栏那儿，它可能会习惯于这个位置，可是由于那些害怕它的女人而不能允许它待在那里。为什么她们会害怕它就不清楚了。当然，第一眼看上去它是令人生畏的，尤其是那长脖子，三角脸，几乎呈水平状突出的上排牙，上唇上那一溜长长的、盖过牙齿的、显然很坚硬的、浅色的髭须，这一切是令人生畏的，可是人们很快就能看出，这一切看上去可怕的现象是毫无危险的。尤其是它总是避开人，比森林里的动物更胆小，而且看上去只受到这座建筑的约束，而它整个的不幸显然是：这座建筑物恰恰是一个犹太教堂，也就是说有时会很热闹。如果人们能够跟这个动物对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安慰它说，我们这座山区小城的教区一年小于一年，现在要筹集维修教堂的资金都困难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后，这座教堂变成了一个粮仓或类似的场所，于是这个动物便得到了它现在痛苦地渴望着的安宁。

当然害怕这个动物的只是女人，男人早就无所谓了，一代人把它指给另一代人看，人们不断地看到它，最后人们看都不看它一眼了，甚至第一次见到它的孩子们也不会感到惊奇。它成了这座犹太教堂的家畜，为什么这座教堂不能有一个独特的、别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家畜呢？要不是那些女人，人们几乎要忘记了这个动物的存在。但即使是女人们对这个动物也并没有真正的畏惧，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老是害怕这么一个动物也就太离奇了。虽然她们以此为自己辩护：这个动物会跑到离她们比离男人们近得多的地方来，而这也是事实，它不敢下来到男人们的跟前，男人们从来不能看见它出现在地面上。当人们不让它趴在女人室的栅栏上的时候，它多半就待在栅栏对面墙上同样高度的地方。那里的墙壁有一条狭窄的突棱，顶多也就两指宽，这条突棱环绕着教堂的三面，这个动物有时在这条突棱上跑来跑去，但大多数时候它总是静静地蹲在面向女人们的一个地方。它能如此轻巧地利用这条如此狭窄的道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它在那上面尽头处折转方向的方式是值得—

看的，这已经是一个很老的动物了，可是它仍然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最勇敢的空翻来，而且从来就没有失手过，它在空中转身，然后再沿着原路往回跑。当然，如果人们见过几次，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老是盯着看。其实使女人们躁动的既不是畏惧也不是好奇心，如果她们沉浸在祈祷中，她们可以完全忘却这个动物的存在，虔诚的女人们也确实如此，而其他女人，这却是大多数，她们总是想要引起人们对她们的注意，而这个动物就是一个受到她们欢迎的借口。如果她们能够的话，如果她们有这个胆量，她们就会把这个动物吸引得更近一些，以便能够更充分地受到惊吓。但实际上这个动物根本不会向她们靠拢，如果它不受到攻击，它对她们同对男人们一样漠不关心，它最希望也许是始终生活在隐蔽的状态中，就像它在教堂开放的时间之外所过的那种生活，显然在某一个洞穴中，一个我们还不曾发现的洞穴。只有在祈祷开始后，它才出现，被噪音所惊醒。它是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是想要保持警惕，是想要保持自由之身，以便随时可以逃跑吗？它是出于恐惧而跑了出来，出于恐惧开始它的胡闹，而不敢退回去，直到对上帝的礼仪结束。它喜欢待在高处当然是因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栅栏上和墙壁突起处最有利于它的奔跑，但它绝不总是在那两个地方，有时它也跑到距离男人们更近的低处来，约柜^[31]的幕布由一根闪亮的黄铜杆支撑着，这看来对这个动物有吸引力，它经常悄悄地潜到那里，但那里总是安静的，即使它离约柜很近，人们也不会说它带来了干扰，它以它那闪闪发亮的、总是睁开着的、也许没有睫毛的眼睛似乎在看着教民们，其实它谁也没看，而只是迎着它感到威胁着它的危险。

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到不久以前，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不比我们的女人们更好理解。有什么危险值得它害怕的？谁又企图动它了？它难道不是从很多年来一直自顾自地平安生活着吗？男人们不关心它的存在，大多数女人好像会为失去它而感到惆怅。而且它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一个动物，所以根本就没有敌人。这一点从年复一年的历程中已经能看得出来。对上帝的礼仪连同它的噪音也许对于这个动物是可怕的，但它每天以有限的规模重复着，在节日扩大规模，总是保持着规律，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这个胆小的动物应该可以习惯于这种环境的，尤其是当它看到，这不是来自追逐者的噪音，而只是一种它根本不懂的噪音时。可它仍然害怕。这是出于对早已过去的时代的回忆，或是对未来时代的预感？也许这个动物比每次汇集在教堂里的三代人知道得更多？

人们说，很多年前，人们确实尝试过把这个动物撵走。这有可能是

真实的事情，但更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有据可查的是，人们当时从宗教法的角度探讨过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容忍这么一个动物待在上帝的殿堂里。人们请诸多著名的拉比做出鉴定，观点是不统一的，大多数认为应该把它赶走，重新为教堂举办开张仪式。但是从远处发号施令是容易的，在实际上却不可能抓住这个动物，所以也不可能把它撵走。因为只有抓住它，送到遥远的地方，才有一定的把握可以说是摆脱了它。

许多年前，人们说，人们真的尝试过把这个动物撵走。教堂仆人回忆说，他的祖父，当时也是教堂仆人，特别喜欢述说这一段往事。这个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听说摆脱不了这个动物的事了，他特别善于爬高，于是他的虚荣心膨胀了，在一个光线明亮的上午，这时整个教堂所有的角落都为阳光所笼罩，他悄悄地溜进了教堂，带着一根绳子、一个弹弓和一根曲棍。

廷芳 黎奇 译

〔恐惧〕 [32]

回过头来看蒙德利律师的暴死，首先能够确认的事实经过是：一天早晨将近四点半的时候，那是个美好的6月清晨，这时天已经很亮了，蒙德利太太从她四层楼上的居室中跑出来，在楼梯栏杆上弯下腰，张开臂膀叫喊，显然想要让整个房子里的人出来帮忙：“我的丈夫被谋杀了！老天啊！老天啊！我的好丈夫被人谋杀了！”第一个看到蒙德利夫人和听见她的叫喊的是一个面包房小伙计，他正好在这个时候，两手提着装小面包的篮子，走在通往三楼的最后一段楼梯上。也是他在第一次审讯时断言，他牢牢记住了蒙德利太太叫喊的每一个字。可是在他后来面对蒙德利太太的时候，他却收回了自己的证言，声明说，他可能会搞错蒙德利太太说的话，因为在第一个瞬间他被这个女人的突然出现吓了一大跳。这当然是很可能的，因为在过了这几周后，他在描述这个事件的时候还是那么激动，以致他用手和脚的过分的动作陪伴着他的述说，使听众至少能够产生一种接近于他心中的那种感受的印象。根据他的陈述，蒙德利太太当时从门里跑了出来，他根本没有发觉门是怎么打开的，因此他相信门本来就是开着的，她一下子扯开了痉挛地握在脑袋上方的双手，飞快地奔向楼梯。她只穿着睡衣，系着一块灰色的布，这块布甚至未能把她的上身全部遮掩住。她的头发是散开的，一部分垂在脸前，这也是使她的叫喊模糊不清的原因之一。在她奔向楼梯时，她刚看见这个

面包房伙计，就用颤抖的手把他一把拽了上来，跑到他的身后，把他作为一个掩蔽物向前推，牢牢地搂着他的肩膀。在匆忙中小伙子根本就没有想到把装面包的篮子在什么地方放一下，于是整个过程中就没有脱手。他们便这样以快速然而很小的步子向女人的房门走去，这女人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把他越搂越紧，他们跨过了门槛，在昏暗而窄小的会客室里往前走。这女人的脸不时从小伙子的左边或者右边露出来，她似乎在等待着某种东西，某种马上就会出现的东西，有时她把小伙子往回拽，好像不可能再往前走了，但接下来她又以整个身体把他往前推。这女人用一只手打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门，而另一只手牢牢地从后面抓住小伙子的脖子。她看了看地板、墙壁和屋顶，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便让那道门开着，更坚决地向第二道门走去，仍然把小伙子推在前面。第二道门早就大敞着的。刚进去时看得到的只有两张并列的床。房间里光线很暗，因为沉重的窗帘拉得很紧，只有狭小的缝隙中透出一点儿白昼的光。在进门后的第一张床旁的床头柜头上有一小段残存的蜡烛在燃烧。这张床上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另一张床上。现在轮到小伙子不愿往前走了，可是这个女人用拳头和膝盖把他往前赶。在一次审讯时人们问他，为什么他会迟疑，是否害怕将会在床上看到的情景。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害怕，当时也没有害怕，但当时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躲在房间里，会突然地跳出来。对于这个他无法描述的“东西”，他要等它出来了才往前走。但由于这个女人如此急于到第二张床那里去，他终于让了步。

廷芳 黎奇 译

[1]卡夫卡写有大量的速记式的短小故事，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别具特色，很能代表作者的短篇叙事风格，即德国文学史上有过的“轶事风格”。但国外选家却选得很少。这次编者对卡夫卡的随笔集即《乡村婚事》一书进行了筛选，从中筛出24篇，同时将第二辑中的这类作品共24篇抽出，归入本辑，这样本辑“微型小说”一共有48篇，它们最长不超过650字。各篇题目除洪天富译的以外，均为编者所加，故以方括弧标之。——编者

[2]本篇亦见之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三本，1931年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自本篇至《论譬喻》系选自P.拉贝编的德文版《卡夫卡短篇小说集》，按原出版年代顺序编排。——编者

[3]本篇与《城徽》等其他10篇速记式小说最初均见于一捆稿子，

但1936年始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4]本篇出处与《城徽》同，约写于1920年秋末。1936年才随着勃罗德编纂卡夫卡全集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5]本篇最初出版情况与《城徽》同，约写于1920年秋末，1936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6]该篇出处与《城徽》等11篇速记式小说同，即写于1920年秋末，首次发表于1936年，标题与上述各篇一样，均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7]本篇的原稿见于作者在波德连那遗物中的一捆手稿，与《城徽》等篇一样，均成稿于1920年秋。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8]本篇与前面的《新律师》和《一条狗的研究》均见于遗物中一本棕色的方形笔记本。约写于1922年春，1936年开始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力口。——编者

[9]本篇与《夫妇》出处同，均见于作者在波德莱那遗物中一本黑色笔记簿，所标日期为1922年末。1936年方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10]本篇原稿见于作者在波德莱那遗物中第二本黑色方形笔记簿，写于1922年至1923年间。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编者

[11]从本篇起至《少女的羞涩》共22篇均选自《乡村婚事》中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和《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时间自1917年初起。——编者

[12]即英文的“我”。

[13]从这篇起至《少女的羞涩》共18篇均选自卡夫卡《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它们均于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14]这是长篇小说《城堡》的一段试笔。附在笔记本中的一页上，

写的年份是1920。——编者

[15]本篇选自《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五本，约写于1918年上半年。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从本篇起至《在阁楼上》3篇均选自《八本八开本笔记簿》，时间均在1918年上半年。由于国外选家都没有选到过，故把它们编在一起。并把它们插在1918—1920年的篇目之间。——编者

[16]本篇选自《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六本，约写于1918年3、4月间。——编者

[17]本篇选自《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七本，具体时间不详，估计写于1918年。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

[18]巴登州位于德国西南，涅卡河是流经该州的一条不大但颇为有名的河流。——译者

[19]从本篇起直到《恐惧》共14篇均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每篇产生的确切时间不详，可以确定的是均在1920年秋至1924年春之间。它们于1953年由M.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由于未见国外选家选到过，故把它们辑在一起，并插在1920至1922年的篇目之间。——编者

[20]本篇出处与前几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确切时间不详，约在1920年秋至1924年春之间。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21]本篇出处与前两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约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于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编者

[22]本篇出处与前几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约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于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23]本篇出处与上几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约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24]本篇出处与上几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约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25]本篇出处与上几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后者于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26]本篇出处与上几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后者于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27]本篇出处与上几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28]本篇出处与前几篇同，即选自作者《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29]本篇出处与前几篇同，即选自《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30]这篇出处与前几篇同，即选自作者《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31]宗教用语，犹太人用以珍藏刻有摩西十诫的石块的柜子。——编者

[32]这篇出处与前几篇同，即选自作者《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写于1920年秋至1924年春。1953年由马克斯·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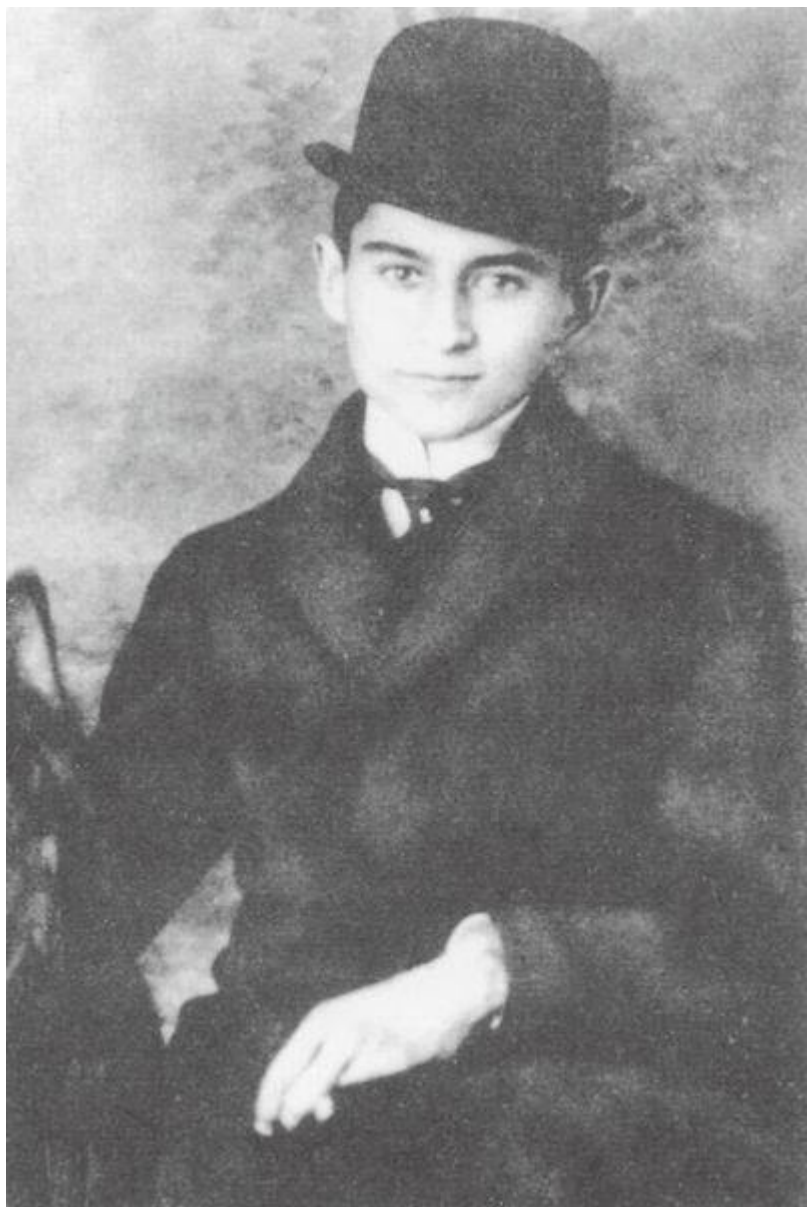
第二卷 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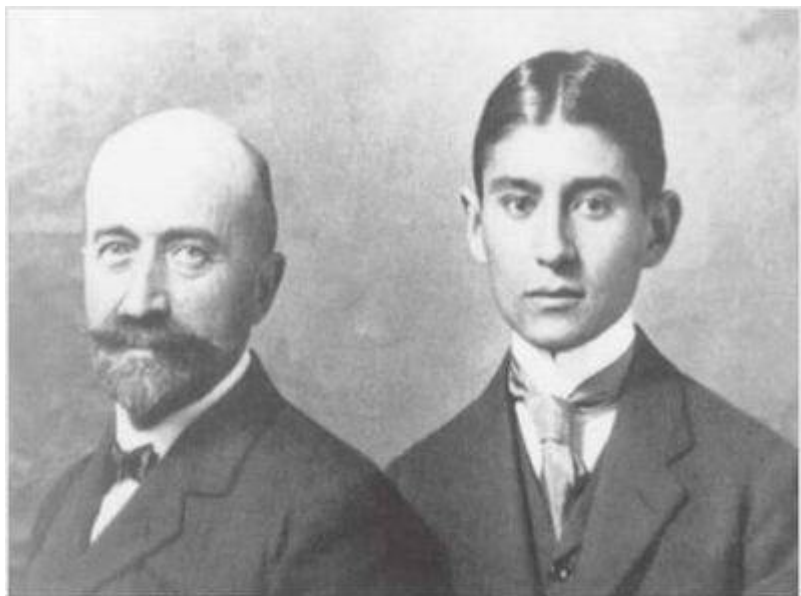
1915/16年，32/3岁的卡夫卡，此时正值写《诉讼》期间



马克斯·勃罗德从“布拉格圈”里翻印的卡夫卡照片



卡夫卡像（合影的放大照）



大学生卡夫卡与他“马德里的舅舅”阿莱弗雷德的合影，约摄于1906或1908年卡夫卡与一位名叫汉西·尤莉叶·斯措科尔的饭店女侍的合影



上图是卡夫卡父亲（右）和他的两个兄弟：路德维希夫妇（左一、二，先是商人，后是布拉格保险代理人）和菲利普夫妇（中、右二），菲利普在考林经商，其妻克拉拉是《失踪者》（《美国》）中克拉拉·泡隆德尔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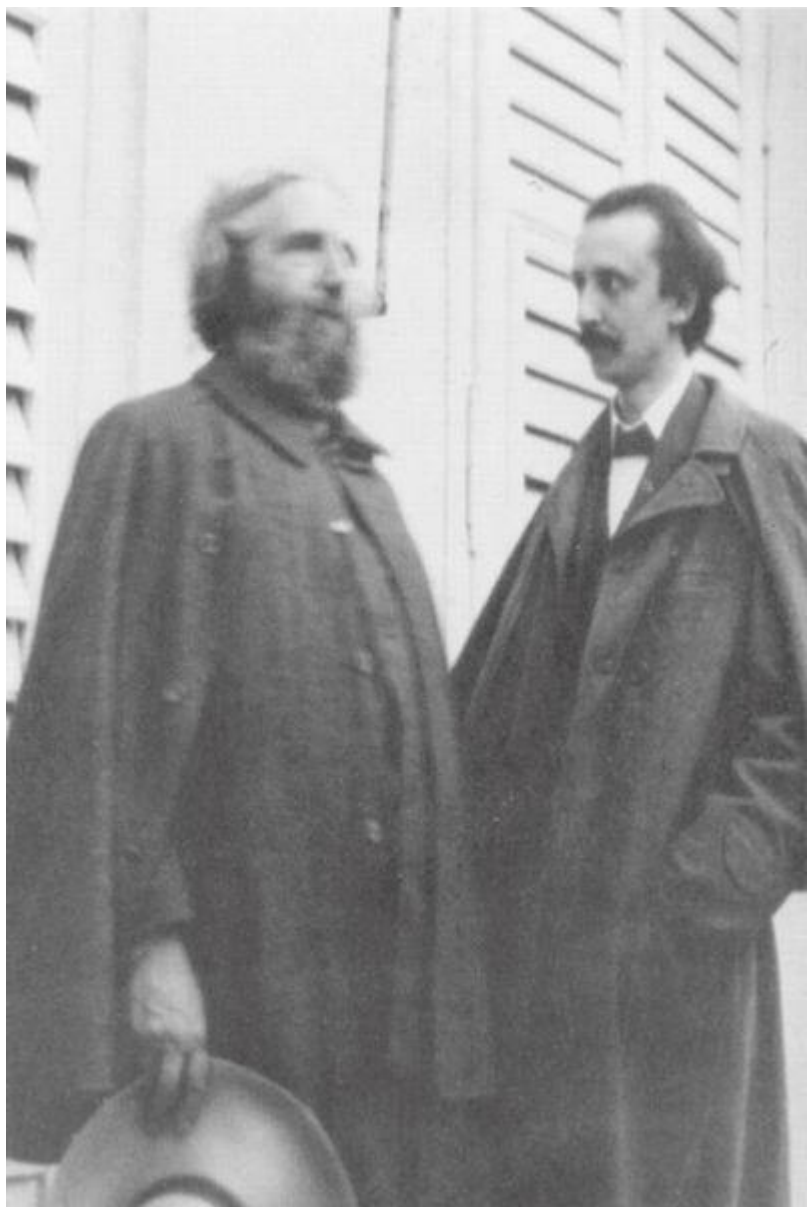
下图是布拉格的水果市场，后面标的地方是卡尔·费丁南德德语大学的法学系朗诵厅；1901年秋卡夫卡进入这座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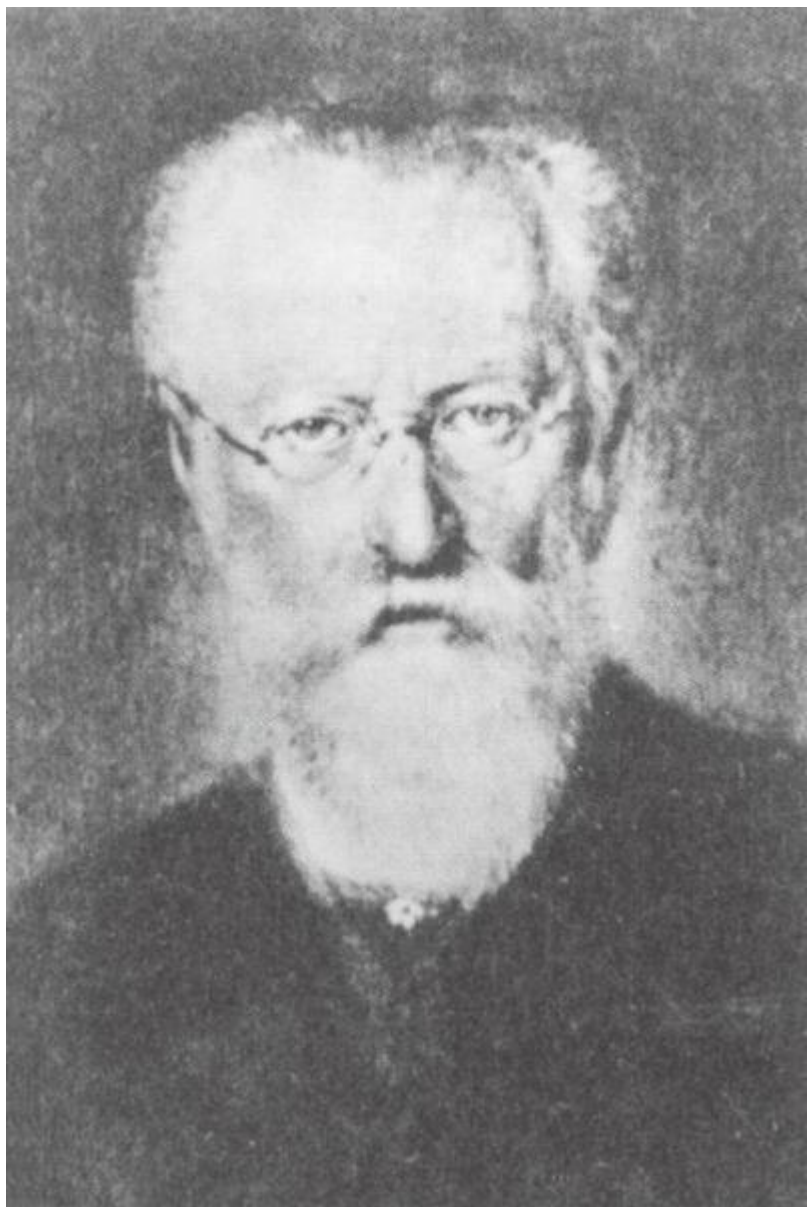
布拉格大学具有哥特式网格的教学大楼



心理学老师安东·马尔蒂，系弗兰茨·布伦塔诺的学生



提帽者弗兰茨·布伦塔诺，著名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法学的中心角色贺拉斯·克拉斯诺波尔斯基，以严格著称



卡夫卡的博士生导师阿尔弗雷德·维勃



上图是1903年夏，卡夫卡通过了法律史考试，第一次进入德国德累斯顿的一家名叫“白鹿”的疗养院——当时最有名气的自然疗法的场所

下图是位于易北河大桥附近的“白鹿”疗养院全景



卡夫卡在疗养院工作期间居住过的埃伯尔特别墅



卡夫卡的终身至友马克斯·勃罗德



取得博士学位时的卡夫卡（1906）

Name, Alter und Geburtsort des Candidaten. Name und Charakter des Vaters. Datum des Abschlusses.	Rigorosum I. Aus dem reinen, lateinischen und deutschen Recht.	Rigorosum II. Aus dem Internationalen Grundsatz, Handels- und Wechselrecht, österreichisches Grundsatz und deutsches Staatsrecht.	Rigorosum III. Aus dem allgemeinen und deutschem Staatsrecht, dem Völkerrecht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atum der Promotion und Name des Promotors.
<u>Jung, Hanka</u> geb. am 2. Juli 1883 in Prag in Böhmen, Sohn des Johann K. Jung, Kaufmann. Abg. Prag 2/1905	Am 13. Juni 1906 aus dem reinen und deutschen Recht Präsident Prof. Dr. v. Wetzlar	Am 13. Juni 1906 aus dem Internationalen Grundsatz, Handels- und Wechselrecht, österreichisches Grundsatz und deutsches Staatsrecht Präsident Prof. Dr. v. Wetzlar	Am 13. Juni 1906 aus dem allgemeinen und deutschem Staatsrecht, dem Völkerrecht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Präsident Prof. Dr. v. Wetzlar	Am 13. Juni 1906 Prof. Dr. v. Wetzlar

FRANZ KAFKA BEEHRT SICH ANZUZEIGEN, DASS
ER AM MONTAG DEN 18. JUNI D. J. AN DER K. K.
DEUTSCHEN KARL FERDINANDS-UNIVERSITÄT IN
PRAG ZUM DOKTOR DER RECHTE PROMOVIERT WURDE.

PRAG, IM JULI 1908.

通过博士论文三项严格答辩的记录卡夫卡给朋友的通告：弗兰茨·卡夫卡谨向各位告知：他已于今年6月18日成为布拉格卡尔·费丁南德德语大学的法学博士



19世纪前期的布拉格旧城模型：① 是卡夫卡的出生地；② 是全家在密努塔（“Minuta”）街的住宅；③ 是全家在采尔特纳街的住宅



旧式犹太人教堂



1890年左右的布拉格犹太人居住区，布拉格中心大街旧景；1890年左右的马车道和咖啡馆（中）



布拉格最古老的卡尔大桥（1900）



通向古城的卡尔大街，“通向金色泉”的房子即位于此街



古城大环形路经过的马利亚柱



弗兰茨·约瑟夫火车站，为欢迎皇帝莅临而装饰一新，1907年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布拉格，19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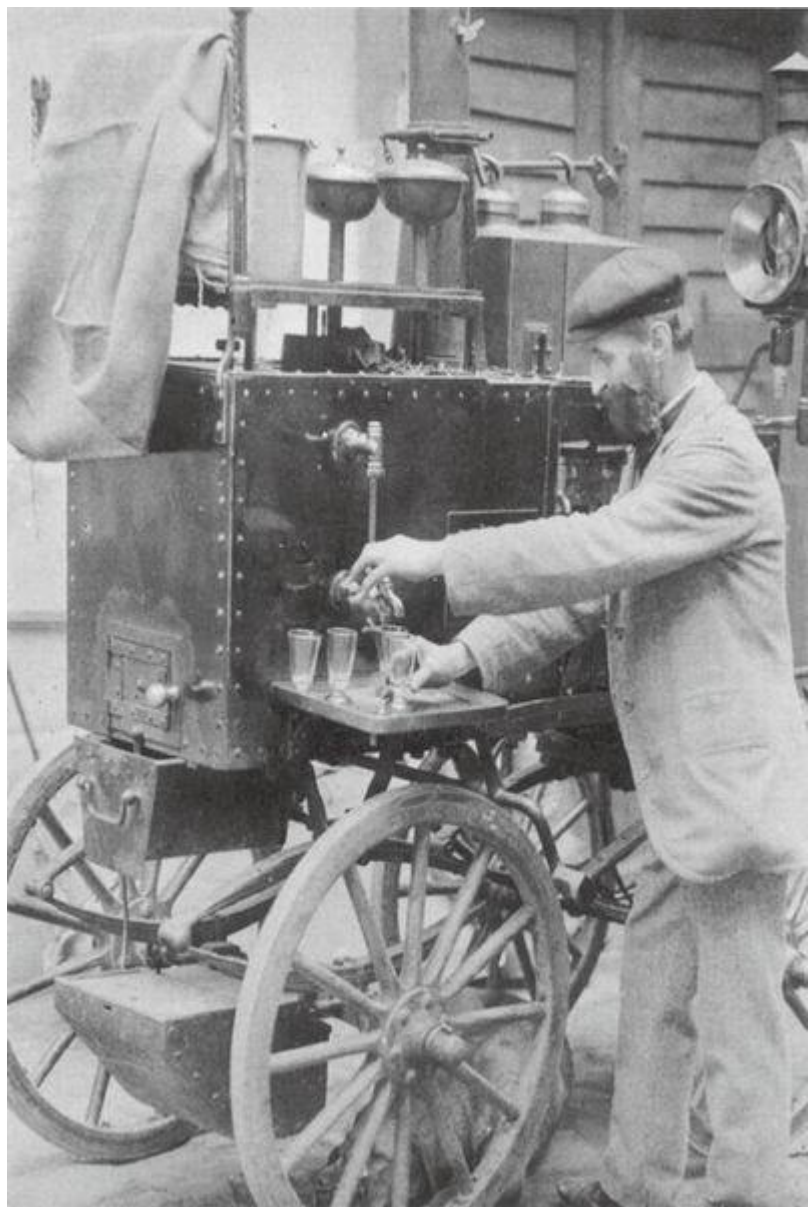


上图是古城环形路广场

下图是当时的水果市场（1906年）



市中心的啤酒酒店



流动咖啡摊（1910年）



烤栗子商贩



上图是圣诞节前环形路上尼古拉市场的玩具摊

下图是蒸汽机缆车（1891）



上图是最早的电影院之一（1911）

下图是贩毒车正在停靠站等待顾客（1910）



一个妓女正在下囚车（1905年）



拉德茨基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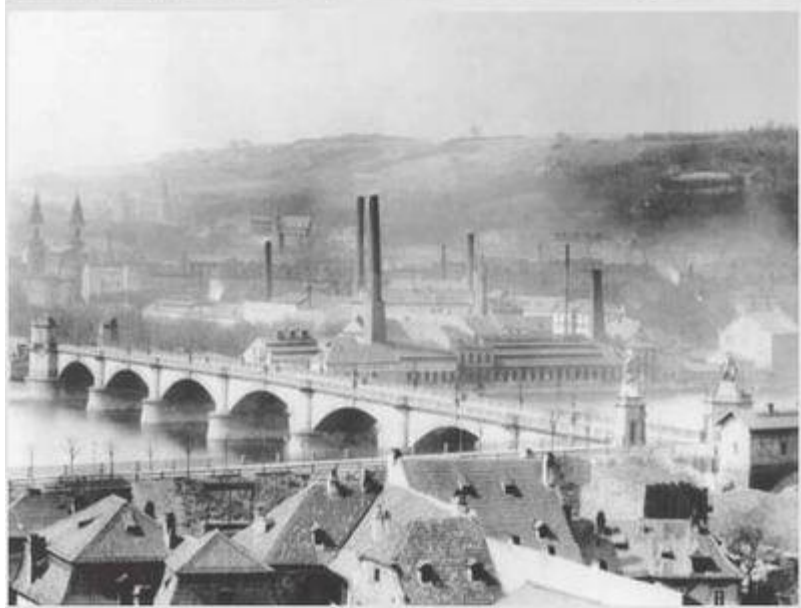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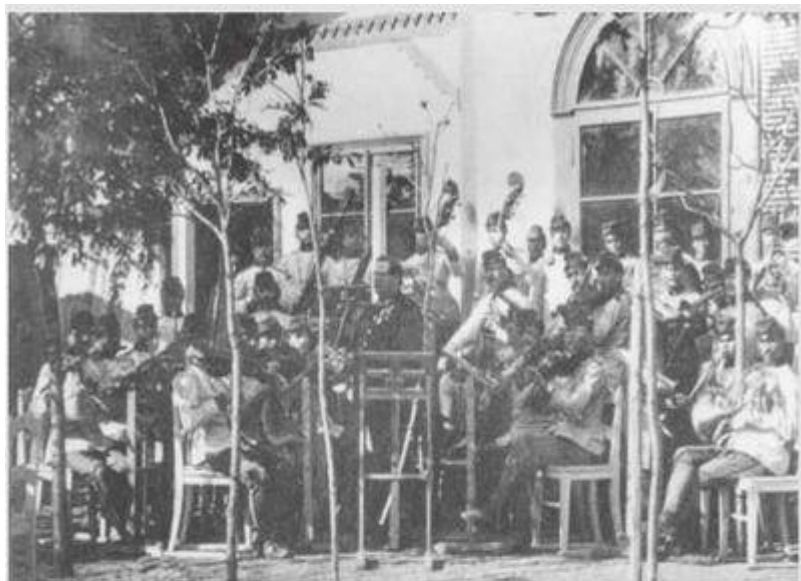


上图是尼可拉斯大街的咖啡城，早期的卡夫卡和勃罗德出入的场所下图是布伦塔诺文学圈子的活动中心——青年风格的咖啡馆“卢浮宫”



上图是卡夫卡最喜欢的散步之处：鲁道夫王储公园

下图是从劳伦兹山看弗兰茨皇帝大桥和所谓的“饥饿长城”



上图是消夏公园里的军乐队演奏

下图是斯米乔夫河上的帕拉茨基大桥和工厂以及工人居住区



市场上卖苦力的手推车工人



上图是民间饮食



下图是社会民主党游行高呼：“我们要普选权！”（1905年10月10日）



在容波恩，卡夫卡进行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美国》）的构思。他在致勃罗德的信中写道：“这里我很喜欢……一种对美国的预感被吹进这些可怜的肉体。”还说：“请不要说任何反对这种社交方式的话！我也是因为有这些人才来这里的……看我在布拉格过的是什么生活！这种对人的要求，这种已被我变成并且它自己已经变成恐惧的要求，如果要使它充实起来，那只有在野外才合适。”

编者前言

《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一译《生死不明的人》），又名《美国》（»Amerika«），是卡夫卡在创作上进入旺盛期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12年至1914年。这期间，作者的艺术个性似还未完全定型，所以打算写一部狄更斯式的小说（“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的确，就作品的内容看，或者就作品所描述的现象看，比如贫富悬殊、劳资对立、党派斗争等，颇像狄更斯的小说。但这时的卡夫卡已是写出了《判决》、《变形记》等作品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已经显露出来的艺术特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亦已无从“掩饰”，例如，主人公的被抛弃与被损害的境遇，他的孤独感与陌生感以及环境描写中的怪诞情趣等等。因此，这部作品在卡夫卡创作整体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书中的第一章即《司炉》，作者曾将其抽出单独成篇，作为短篇小说发表，可见作者对其珍视。关于这一点，还可参阅马克斯·勃罗德写的本书后记。

像卡夫卡后来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样，《失踪者》也没有写完，是出于作者的一种美学主张，还是出于对自己努力的一种否定？这始终是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作者晚期在给其挚友马克斯·勃罗德遗嘱中，这部作品亦是无例外地要予以“付之一炬”的文稿之一。幸亏这位朋友是一位有眼力的作家，他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卡夫卡的“最后的请求”，将他的遗稿——加以整理发表。继《诉讼》和《城堡》后，这部《失踪者》于1927年作为单行本顺利出版。无疑，作为原始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其中也难免渗入少量的主观意图，比如根据自己对朋友的深切了解，尽可能使作品符合朋友的“可能的意图”，恢复那些被作者自己删除的部分。

本书存在两个书名。卡夫卡生前没有去过美国，但他对那里的民主制度很感兴趣，也经常提到他的“美国小说”。勃罗德根据这个理由把这部小说题为《美国》。但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它时又称《失踪者》。1994年11月由德国费歇尔出版社出版的此书即以后者为书名。这个译本亦照此起名。

《诉讼》（»Der Prozess«）是卡夫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写于1914至1918年，是断断续续写成的，说明作者对这部作品构思时间不短。《失踪者》完成的这一年，正好是《诉讼》写作起始的一年。但这一年恰恰是卡夫卡长篇小说创作划时期的分界线。如果说，从“模仿”狄更斯出发的《失踪者》尽管已经初露了某些属于卡夫卡的艺术个性特征，但总体上讲它仍未脱离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模式，人们仍然可以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来理解它、解读它，在传统现实主义美学范畴内来分析它，欣赏它。而《诉讼》则不然，在这里，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体验已升华为形而上的精神拷问，从而从人文思维到审美意识都具有了“现代”特征。

翻译本书的书名»Der Prozess«是颇费斟酌的。起初人们从英文转译时译为《审判》，德文原名也是有这个意思的。但»Der Prozess«还有一个常见的意思，即“诉讼”。诉讼是一场“官司”的过程，而审判则是它的结果。从书的内容看，两种情况都存在。但作者要强调的，或者说他所着力表现的显然不是有结果的审判，而是无结果的诉讼过程，是这个过程消耗了人的毕生精力！在他看来，这也是人的根本处境：一个人自懂事起，只要你介入了社会生活，无不卷入不知不觉的、无休止的、而且是无望的诉讼过程中。基于这样的理解，编者和译者经过共同讨论，认为译为《诉讼》似乎更恰切些。

和其他两部长篇小说一样，这一部也是未打“句号”的。这个谜留给读者去解。无疑，在卡夫卡给马克斯·勃罗德的遗嘱中，此书也在被焚之列。早就洞见卡夫卡作品价值的勃罗德当然不会执行朋友的这一决绝的遗嘱。卡夫卡死后，勃罗德首先于1925年整理出版了这部杰作。

《失踪者》、《诉讼》两书的译者张荣昌先生、章国锋先生生专攻德语，造诣很深，并且有了大量的翻译经验，他们的译文在原意表达的准确性上是靠得住的。

叶廷芳

1995年春

失踪者

张荣昌 译

司炉

16岁的卡尔·罗斯曼受家里一个女仆的引诱，而且这女仆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因此他被他可怜的父母送往美国。当他乘坐的船只徐徐驶入纽约港时，他一眼就看见了那座久已受到瞩目的自由女神雕像，它矗立在突然强烈起来的阳光下。女神持剑的手臂像是猝然伸向天空，她的身躯周围吹拂着阵阵清风。

“好高呀！”他暗自思忖，因为根本就没想到要下船，所以就让他身旁经过的越来越膨胀的提着行李的人汇成的人流慢慢挤到了甲板上的栏杆旁。

一个与他在旅途中有过一面之交的年轻小伙子一边从他身旁走过一边说：“喂，您还不想下船？”“我这就下船。”卡尔朝他笑笑说，说罢便顽皮地把箱子举到肩上，显出自己是个强壮的小伙子。可是正当他眼看着他熟人轻轻挥动着木棍随同他人一道离去的时候，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雨伞落在下面船舱里了。他马上叫住那个熟人，求他照看一下自己的箱子，那人似乎并不怎么乐意。他察看着周围情况，熟悉一下回来的路，便匆匆离去。不巧，大概是为了送客上岸的缘故，他发现底舱里那条本来可以使他少走不少路的过道头一次被堵死，便不得不穿过曲里拐弯的走廊，穿过一间只放着一张孤零零写字台的空落落的房间，费劲地寻找那一层又一层楼梯，直至他确确实实完全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条路他只走过一两次，而且都是跟着好多人一起走。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而且由于他看不见一个人影，只听见头顶上成千入脚步擦地时发出的沙沙声和从远处传来机器终于停止运转时发出的好似一种喘息的声音，他便随着寻路脚步之所至，不假思索地对着随便一扇什么小门敲了起来。

“门开着呢。”屋里有人喊，卡尔舒了一口气打开门。“您为什么这样发疯似的敲门？”一个彪形大汉问，他几乎瞧都没瞧卡尔一眼。透过船舱里什么地方的一扇天窗，一束混浊的、被上面的烟雾和灰尘弄得昏暗不

堪的光线落进这间凄凉的舱房。舱房内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沙发椅和这汉子挨在一起站着，活像入库的物件。“我迷路了。”卡尔说，“乘船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现在才知道这艘船大得了不得。”“可不是，您说得对。”大汉有些自豪地说，不停地摆弄着一只小箱子上的锁，他用双手一再关压那箱子，听锁簧扣入的声响。“您倒是进来呀！”大汉继续说，“您别站在门外嘛！”“我不打扰您吗？”卡尔问。“啊，看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是德国人吗？”卡尔还试图确认一下，因为他听说过许多有关新来美国的人受坏人威胁、尤其是受爱尔兰人威胁的事。“是的，是的。”大汉说。卡尔仍还犹豫。于是，大汉猝然抓住门把手，就势把门这么一拉，迅速把门关上，将卡尔拉进房间，拉到自己身边。“我受不了别人在过道上往里瞧我。”大汉说，他又在鼓捣他的箱子，“每个人从旁边走过，都往这里面瞧一眼，鬼才受得了呢！”“可是过道里现在空空如也嘛。”卡尔说，他颇不舒服地挤在床杆旁边站着。“是呀，现在。”大汉说。“说的就是现在嘛。”卡尔心想，“这个人真难说话。”“您躺到床上去吧，还是床上地方大一点。”此人说。卡尔尽量小心翼翼爬上床去，边爬边大声嬉笑头一次企图一跃而上床的徒劳尝试。可是他刚一上床，他便叫喊：“天哪，我把我的箱子完全给忘记了！”“箱子在哪儿？”“上面甲板上，一个熟人在照看。可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说着，他从他母亲为他这次旅行特意在上衣的衬里上缝的暗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尔鲍姆，弗兰茨·布特尔鲍姆。”“您急需这只箱子吗？”“当然喽。”“噢，那您为什么把它交给一个陌生人呢？”“我把雨伞忘在下面了，就赶紧跑来取伞，可又不愿意随身扛着箱子。后来我竟然还在这儿迷了路。”“您独自一个人？没有个伴儿？”“嗯，一个人。”“或许我可以求这个人帮帮忙，”卡尔在脑子里转悠，“我到哪儿能马上找到一个更好的朋友呢？”“现在您把箱子也给弄丢了。雨伞就更甭提了。”此人坐到沙发椅上，卡尔的事情似乎多少引起他关注了。“可是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我才不信呢，”大汉说，使劲搔他的那一头短而密的黑头发，“码头变了，船上的风尚也跟着变。在汉堡您的布特尔鲍姆也许会照看箱子，在这儿八成是两样都没影儿了。”“那我可得赶快上去看看，”卡尔说，一边环视四周，看他怎样才能出去。“您待着吧。”此人说，并用一只手朝他的胸脯简直是狠狠地一推，把他推回到床上。为什么？”卡尔生气地问。“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这人说，“过一会儿我也走，到时候我们一起走。箱子要么已被偷走，再找也无济于事；要么那人把它放在原地了，等旅客统统上岸后，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找到。您的雨伞也是这样。”“您熟悉这艘船？”卡尔怀疑地问，他觉得，在空船上最容易找到他

的东西，这个想法在平时令人信服，如今却似乎隐伏着什么麻烦。“我是船上的司炉。”此人说。“您是船上的司炉！”卡尔高兴地叫了起来，简直是喜出望外了，并撑着双肘，仔细端详这个汉子。“我和那个斯洛伐克人同睡一个房间，就在那房间前面开了一个舱口，从那舱口我可以看到机房里面。”“不错，我就在那儿干活。”司炉说。“我一向对技术感兴趣，”卡尔顺着自己原有的思路说，“假如我不是必须来美国的话，今后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您为什么非来美国不可呢？”“噢，甬提了！”卡尔说，一挥手做了个轻蔑的不屑一谈的手势。与此同时，他面带微笑望着司炉，似乎是在请求对方谅解自己不便说出的苦衷。“事出有因嘛。”司炉说，不太清楚他这么说是想要卡尔说出事因还是不要他说出。“现在我可以当司炉了，”卡尔说，“我当什么，我父母现在完全管不着了。”“我的职务快要空下来了。”司炉说，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似的将双手插进裤袋，皱巴巴铁灰色皮裤里的双腿一跃便上了床，想舒展舒展双腿。卡尔不得不朝墙边挪动一下身子。“您要离开这艘船？”“是的，我们今天开路。”“这究竟为什么呢？您不喜欢当司炉？”“噢，这要看具体情况，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并不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也让您说对了，我也是不喜欢。您大概不是真的想当司炉，可是这样却偏偏最容易就当上司炉。我坚决劝您别干这个。既然您曾想在欧洲上大学，为什么您不可以在这儿上大学呢？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强多了。”“这完全可能，”卡尔说，“可是我根本没有钱上大学。我虽然读到过有关一个人的事迹，这个人白天在一家店铺干活，晚上一直学习到深夜，后来成了博士，我想，还当上了市长呢，可是这需要很大的毅力，对不对？我怕我没有这个毅力。另外，我上中学时功课并不特别好，离开学校时我心里确实没感到难过。这儿的学校也许更严。英语我几乎一点儿都不会。我看，这儿的人压根儿对外来人都有偏见。”“这您也领教过了？嗨，那就好嘛。那您就是我的人啦。您瞧，我们在一艘德国船上，它属于汉堡—美国航线，为什么这儿不全是我们德国人？为什么司炉长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而这狗娘养的居然在一艘德国船上欺压我们德国人！您别以为，”——他喘不过气来，他摇摇头——“我是为发牢骚而发牢骚。我知道，您没有什么势力，本身又是个穷小子。但这家伙欺人太甚！”说罢，他用拳头多次敲击桌子，敲打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拳头。“我在那么多的船上干过活，”——他像说一个词儿似的一口气接连举出二十条船名，把卡尔听得头昏脑涨——“干得很出色，受过嘉奖，是个合乎船长们口味的工人，我甚至在同一艘商船上连续干了好几年，”——他站起来，好像这是他一生的顶峰——“而这儿

在这艘船上，一切都得循规蹈矩，用不着动半点儿脑筋，在这里我毫无用处，在这里我总是碍舒巴尔的事，是个懒汉，只配让人给撵出去，拿到的工资是别人的恩赐。您懂这个吗？我不懂。”“您决不要容忍这样的事。”卡尔激动地说。他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是在一艘船的不安全的甲板上、在一个陌生的大陆的海岸上的感觉，在这里，在司炉的床上他倒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您找过船长了吗？您向他摆过您的理了吗？”“啊，您走吧，您最好还是走开。我不希望您待在我这儿。您不注意听我说什么，却给我出主意。我怎么可以去找船长呢！”说罢，司炉又颓然坐下，两手捂住脸。

“我没法给他出更好的主意。”卡尔暗自思忖。他根本就觉得，他本来就应该去取自己的箱子的，不该在这里出什么主意，人家还认为这都是馊主意呢。当父亲把箱子永远交给他的时候，父亲曾开玩笑问他：“你能把它保存多久？”而现在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当真已经丢失了。唯一的安慰是，即使父亲查询起来，也无从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一直随船到达纽约，轮船公司能说的无非也就是这句话而已。可是令卡尔感到惋惜的是，箱子里的衣物他几乎都还没动用过，尽管他譬如早就应该换换衬衫了。这么说来，他是白节省了。现在，自己的生涯刚刚开始，正需要穿戴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穿着这件肮脏的衬衫抛头露面。不然的话，丢失这只箱子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因为他身上穿着的这套西服比箱里的那套还好，箱里的那套本来只是临时应急穿的，就在动身前不久妈妈还不得不把它缝补了一下。现在他也回忆起，行李箱里还有一段意大利味罗那腊肠，那是他妈妈特意给他装进去的，旅途中他毫无胃口，况且船舱里分发的肠也足够他吃的了，所以他只吃了其中最小的一节。可是现在他却巴不得手上能有这段腊肠，好把它孝敬给这位司炉。因为给这样的人随便塞点小玩意儿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卡尔是从他父亲那儿得知的，父亲就是用撒雪茄的办法来赢得那些跟他有业务关系的下级职员的支持。现在卡尔可以赠送的也就只有他随身带着的钱了，而这钱他暂时还不愿意动用，万一他真的把行李箱丢了。他的思绪又回到他的行李箱上，现在他确实无法理解，既然现在这只行李箱他这样轻易地就让人给拿走了，那么一路上他又何苦那样小心翼翼看守它，弄得自己晚上几乎都无法合眼呢？他回想起那五个夜晚，一个小个子斯洛伐克人睡在他左边离他两个床位的地方，他一直怀疑这个斯洛伐克人在打自己的行李箱的主意。这个斯洛伐克人一直在暗中窥伺，只要卡尔终于犯困打一小会儿盹儿，他就可以用那根白天一直拿在手里玩弄或练习着的长棒把行李箱钩到他那边去。白天，这个斯洛伐克人看上

去相当天真无邪，可是夜幕刚刚降临，他就不时地从自己的铺位上坐起来，忧伤地朝卡尔的行李箱这边望过来。这一切卡尔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尽管船章明令禁止，时不时仍有人怀着移民的焦灼不安点燃一个小火，试图努力读懂移民管理处的难懂的移民须知。若近处有一个这样的火光，卡尔就可以稍稍闭闭眼，若火光在远处，或漆黑一团，那他就得睁大着眼睛。这个劳累的差使弄得他精疲力竭，现在看来他完全是白受这份劳累了。这个布特尔特姆，别叫他在什么地方碰上他！

就在这时，从外面远处传来一阵阵短促的敲击声，打破了迄今为止的完全的寂静，这声音像从孩子的脚发出，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最后变成男人们节奏均匀的脚步声。他们显然排成单行前进，在这条狭窄的通道里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们听见了有如武器碰击的叮当声。正想在床上舒摊开四肢、摆脱掉箱子和斯洛伐克人带来的种种忧愁睡一睡的卡尔，吓了一跳，推了推司炉，提醒他务必注意，因为这队人的排头似乎已经到达门口了。“这是船上的乐队。”司炉说，“他们已在上边演奏过了，现在正去收拾行装。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可以走了，您来吧！”他抓住卡尔的手，在最后一刻还急忙从床头墙上取下一帧配上镜框的圣母像，将它塞进上衣胸前的里袋，拿起他的行李箱，带着卡尔匆匆离开了舱房。

“现在我到办公室里，我要向那些先生们摆摆我的看法。船上没旅客了，不必有什么顾忌。”这话司炉颠来倒去说了好几遍，行走中向旁边一脚，想踢死一只在脚跟前跑过的老鼠，但是他这一脚也只不过是把这只还算及时抵达洞口的老鼠更快地踢进洞里罢了。他压根儿就动作迟缓，虽说他长着一双长腿，可是这两条腿却太笨重。

他们穿过厨房的一个隔间，那儿有几个姑娘身穿脏围裙——她们故意用水溅他们——在大圆桶里洗涤餐具。司炉将某个叫莉娜的叫到身边，用手臂搂住她的腰，带着她走了一段路，她撒娇地在他的臂弯里挣扎着。“现在付工资，你愿意一起去吗？”他问。“为什么要我费这个劲呢，你把钱给我送来不就得了。”她回答，从他的胳膊下溜脱，跑了。“你哪儿捡到了这个漂亮男孩？”她还喊着，但是没等得到回答便离去了。人们听见姑娘们的笑声，她们都停下了手上的活儿。

他们却继续往前走，走到一扇门前，门的上方有一个三角楣饰，由一些镀金小女像柱托着。作为一种船上设施，这看上去相当奢侈。卡尔这才发现，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多半是行船期间只有一二等舱的

旅客才有资格到此地来，现在船上即将进行大扫除，隔离门已经给拆卸走了。他们也果真已经遇见过几个扛着扫帚并和司炉打了招呼的男人。卡尔对这种热闹的景象感到惊讶，他在自己的统舱里对此当然很少有所了解。也有电话线沿过道延伸，人们不时听见一只小钟的响声。

司炉毕恭毕敬地敲门，听到有人喊“进来！”后便一挥手要卡尔不用害怕只管进去。卡尔也就走了进去，但是就在门旁便站住了。透过房间的三扇窗户他看到了大海的波浪，在观看波浪欢快地起伏跳动时，他的心也怦怦跳动，仿佛他没有在漫长的五天里不停地看过大海似的。一艘艘大船来往穿梭，浪花拍击着船身。眯起双眼望去，这些船似乎只是由于自身的重力而在摇晃。船的桅杆上挂着窄而长的旗帜，在行驶时它们虽然绷紧了，但是仍然在猎猎飘动。兴许是从军舰上传来了礼炮声，在不远处驶过一艘这样的军舰，它的炮筒在其钢外壳的反射光下闪闪发亮，像是在接受平稳而不呈水平方向行驶的军舰的爱抚。人们只能，至少从门这儿，远远地观看那些小船和舢板，看它们怎样成群结队驶入大船之间的缝隙之中。而纽约城则矗立在这一切的后面，并用其摩天大楼的万千窗户凝视着卡尔。是的，在这个房间里你知道，你到了哪里了。

在一张圆桌旁坐着三位先生，一位是身穿蓝色船员制服的高级船员，另外两位是着黑色美国制服的港务局官员。桌上高高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文件，高级船员手里拿着笔，先粗略阅读那些文件，然后再将它们递给另外两个人。那两位时而读，时而作摘录，时而把文件放进他们的公文包里，假如其中的一个，几乎不停地发出轻轻磨牙声的那个，不是恰好口授什么要他的同事作记录的话。

窗口一张写字台旁边，背对着房门，坐着一位个子比较矮小的先生，他正在翻阅几本大账本，它们齐头并排放在他面前一块结实的木板上。他身旁放着一只敞开着、至少第一眼看去空空如也的钱箱。

第二扇窗户毫无遮拦，窗外的景色一览无余。但是在第三扇窗户近旁却站着两位先生，正小声地交谈着。其中一位倚在窗边，也穿一身船员制服，手上把玩着佩剑柄。与他谈着话的那位面对着窗，时不时一动身子，使得另一位胸前挂着的一排勋章露出几枚。他穿一身便服，手持一根细细的竹手杖，由于他两手紧紧叉着腰，所以这竹杖也像一把斜挂着的佩剑。

卡尔无暇——细看，因为不久便有一位仆役向他们迎面走来，用一

种仿佛在责备他不该来这儿的目光问司炉，他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司炉用与发问者一样轻的声音回答说，他想和出纳课长先生谈谈。仆役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本人拒绝这个请求，但是却仍然踮着脚尖，走一条大弧线绕过圆桌，向翻阅大账本的那位先生那儿走去。听了仆役的话，这位先生——这一点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简直惊呆了，但是终于向这个想找他谈话的人转过身来，随后就以严词拒绝的态度，向司炉并且为了牢靠起见也向仆役一挥手。仆役当即返回司炉身边并用一种像是向他透露什么机密似的声调说：“您立刻离开这个房间！”

听到这答复后司炉低头看着卡尔，好像卡尔是他的心，他正向它默默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没有多加思索卡尔便撒腿跑起来，横穿过房间，甚至轻轻地擦过高级船员的沙发椅，仆役弯腰伸出抓人的双臂追赶，宛如驱赶一只害虫。但是，卡尔先到出纳课长的桌旁，他牢牢抓住桌子，以防仆役将他拖走。

房间里当然顿时就热闹了起来。桌旁的高级船员已经跳将起来，港务局的先生们冷静而聚精会神地作壁上观，窗边的那两位先生已经并排走到一起，仆人则向后退了回去，他以为，既然这事已引起了大人先生们的注意，他就不宜再过问了。站在门口的司炉紧张地等待着需要他出面讲话的時刻的到来。出纳课长终于在他的沙发椅里做了一个大的向右转动作。

卡尔从他的暗口袋里掏出他的旅行护照，他丝毫也不怕这些人看见这只暗口袋，他没多作什么自我介绍，而是径直将护照打开放到桌上。出纳课长似乎觉得这护照无关紧要，因为他用两个指头把它弹到一边，随后卡尔便仿佛觉得这一手续已经办妥似的将护照重新放进口袋。

“我冒昧地说几句，”卡尔开腔道，“我认为司炉先生受了冤屈。这儿有个叫舒巴尔的人，这个人骑在他的头上。他本人曾在许多船上干过活，各方面对他都十分满意，他可以——举出这些船的名字，他勤奋，干起活来认真负责，所以我实在不明白，譬如比起商船上来，这船上的活儿不算过分艰难，可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艘船上会干不好呢？所以这只能是中伤，这种中伤妨碍他取得进展，使他得不到本来完全应该得到的赏识。以上我只讲了有关这件事的一般情况，具体情况由他本人来向诸位申述。”这一席话卡尔是向在场的所有的先生们讲的，因为事实上也果真所有的人都在注意地听着，而且他们当中很可能会有一个主持公道的人，虽然这个主持公道的人不一定非得是出纳课长不可。此外，卡尔

机智地避而不谈他才刚刚认识司炉不久。再者，如果卡尔没有被那位拿着小竹手杖的红脸先生搅乱了思路的话，他还会讲得更精彩，从他现在站着的位置上，他第一次看见这张红脸。

“他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司炉抢着接茬说，虽然这时还没有人问起他，甚至压根儿还没有人瞥过他一眼。司炉这样急于插话本来也许会酿成大错，倘若不是这位佩戴勋章的先生，这位卡尔现在豁然开朗觉得准是船长的人，已经拿定主意要听司炉申述的话。他伸出手，对司炉喊道：“您过来！”这声音铿锵有力，简直可以斩钉截铁。现在全看司炉的了，因为正义在他的一边，对此卡尔并不怀疑。

在这件事上值得庆幸的是，司炉显出自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镇定自若地一下就从他的小行李箱里拿出来一小叠纸和一个笔记本，仿佛这是不言而喻似的。完全没把出纳课长放在眼里，拿着它们便径直向船长走去，将他的证明材料摊开在窗台上。出纳课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自己讪讪地凑近过去。“这个人是个出名的爱找碴儿的人，”他解释说，“他泡在账房间里的时间比在机房里干活的时间还多。他把舒巴尔这个心平气和的人弄得完全无所适从了。您听着！”他转身对司炉说，“您胡搅蛮缠得实在太过分了。人们已经不知多少次把您从账房间里赶了出去，您拿完完全全、毫无例外都是不合理的要求纠缠不休，活该被赶出去！从账房到总会计室您来回跑了多少趟！我们好心好意告诉过您多少遍了，舒巴尔是您的顶头上司，您作为一个下属应该听从他的吩咐！而现在，趁船长先生在这儿，您竟然跑到这儿来，恬不知耻地缠住他，还肆无忌惮地把这个小家伙带来，作为您的荒唐指控的训练有素的传声筒，这小鬼我根本是第一次在船上看见他！”

卡尔强行克制自己，没有跳将出来，不过这时船长也已经抢先一步表了态，他说：“让我们听听这个人怎么说吧。反正我觉得这个舒巴尔越来越自说自话了，不过我这样说一点也没偏袒您的意思。”这后一句话是讲给司炉听的，理所当然，他不能马上就替他说话，不过一切都似乎已走上正确轨道。司炉开始申述，他以“先生”称呼舒巴尔，从而一开始就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卡尔站在被冷落的出纳课长的写字台旁边感到何等的高兴，他纯粹为了消遣而一再压下写字台上的一台秤。——舒巴尔先生不公道！舒巴尔先生偏袒外国人！舒巴尔先生把司炉赶出机房，让司炉去打扫厕所，这当然不是司炉干的活儿嘛！——有一次甚至连舒巴尔先生是否干练都受到了怀疑，这种干练与其说是实际上存在着，还不

如说是表面上存在着。司炉说到这句话时，卡尔使尽全力凝视着船长，露出亲切的神情，仿佛他是他的同事，只希望船长不致因为司炉的有点笨拙的表达方式而对司炉产生不好印象。从这一大席话里人们毕竟没听出什么要领来，即使船长还一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眼睛里流露出这一回一定要把司炉的申述听到底的决心，可是其他几位先生却显得不耐烦了，司炉的语声不久便不再在这个房间里拥有无限的权力，这可是一件有些令人担忧的事。穿便服的先生首先挥动起他的小竹杖叩击地板，尽管只是轻轻的。其他几位先生自然时不时地瞥他一眼，港务局的先生们显然有紧急公务，他们又拿起文件翻阅起来，尽管还有些心不在焉，高级船员又把自己的桌子往身边挪了挪，而自以为已经胜券在握的出纳课长则现出嘲弄神态深深叹了一口气。只有仆役似乎没有受到这种普遍出现的散漫情绪的影响，他对这个被置身于大人物之中的可怜汉子的苦恼颇有同感并神情严肃地向卡尔点点头，仿佛他想以此解释什么事情似的。

这当儿，窗前继续呈现出港口繁忙活动的景象，一艘装着堆积如山的圆桶的平底货船从窗前驶过，几乎使舱室里变得一团漆黑，而那些圆桶一定码放得极好，它们竟然不会滚动起来。小摩托艇随着一位笔挺站着掌舵的男子双手的颤动笔直呼啸而去，要是卡尔现在有时间的话，他真想仔细地瞧瞧这些小摩托艇！奇特的漂浮物体不时自己从翻腾的浪花中浮现出来，立刻又被淹没，在惊诧的目光下沉入水中。远洋轮船的小艇在水手们的奋力划动下向前行驶，载满了乘客，他们宛如被人塞进来似的，如今安静地、满怀期望地坐着，尽管有些人忍不住转动脑袋观看不断变幻着的景色。一种无休止的运动，一种骚动，由这不宁静的自然力传播给无依无靠的人类，感染着他们的行动！

但是一切都在催人快速、明确、讲话简洁明了，可是司炉在干什么？诚然，他讲得汗流浹背，窗台上的证明材料他早已无法用颤抖的双手拿住。对舒巴尔的一个个抱怨从四面八方一齐涌上他的心头，按照他的意见其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将这个舒巴尔彻底埋葬，但是他能向船长陈述的，却只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包括所有抱怨在内的大杂烩。拿小竹手杖的先生早就轻轻朝舱顶吹起了口哨，港务局的先生们拉住高级船员让他待在他们的桌旁，丝毫没有让他离去的意思，出纳课长显然仅仅由于船长态度冷静才没有贸然进行干预，仆役毕恭毕敬等待着他的船长随时发出针对司炉的命令。

这时卡尔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他慢慢向那几个人走过去，边走边

迅捷地盘算着，他怎样才能尽量巧妙地处理好这件事。确实是到了时候了，只要再过一小会儿，他们俩就完全有可能被逐出办公室。船长兴许的确是个好人，卡尔觉得，反正恰好现在船长也许有某种特殊理由需要表现出自己是个公正的上司。但是他毕竟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工具——而司炉则正是这样对待他，尽管是出自自己无比愤怒的内心。

于是卡尔对司炉讲：“您必须把事情讲得简单点，讲得明白点，像您现在这种讲法，船长先生没法对事情作出正确的判断。难道他知道所有轮机长和勤杂工的名字或者甚至教名？您只要一说出一个这样的名字，他马上就会知道这是谁。您把您要申诉的事情理清楚，先拣最重要的说，然后再依次讲其他的，也许到后来大多数事情根本连提都不必提了。您给我讲可一直讲得清清楚楚的嘛！”“人家在美国既然可以偷箱子，我也不妨可以撒撒谎。”他自我解嘲地想。

要是这能帮上忙就好！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了呢？司炉一听见这熟悉的语声虽然立刻中止说话，但是他的眼睛里噙满了饱含受伤害的男子汉荣誉、可怕的回忆、眼前极大的痛苦的眼泪，用这一双眼睛他已经无法看清卡尔的面目了。他现在怎么还会——卡尔大概在这位现在沉默不语的人的面前默默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现在怎么还会突然改变他的讲话方式，因为他确实觉得，仿佛一切要说的话他都已经说了，却没引起丝毫反应。可是另一方面仿佛他压根儿就什么话还都没说，可又不能苛求这些先生们再听他诉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卡尔，他的唯一追随者还来凑热闹，想对他好言相劝，可是没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却给他指出，现在一切一切全完了。

“要是我没看窗外，早点过来就好了！”卡尔心想，在司炉面前低下头并将双手贴住裤缝，表示一切希望都已告吹。

但是司炉误解了，从卡尔身上嗅到了某种暗暗责备自己的味道。于是，怀着劝阻他作这种责备的善良意图，他使自己的行为达到了顶峰，竟在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和卡尔争执了起来。就在现在，就在圆桌旁的先生们早已对扰乱了他们的公事的无谓的喧嚷怒不可遏的时候，就在出纳课长渐渐觉得船长的忍耐不可思议，眼看马上就要发作的时候，就在仆役完全又受制于他的老爷们用狂怒的目光打量司炉的时候，就在手持小竹手杖的先生，甚至船长都不时向之投来友好的一瞥的这位先生，对司炉已经完全麻木不仁，甚至对他感到厌恶。他终于掏出一本小记事本，而且显然思考着别的事情，目光在记事本和卡尔之间溜来溜去的时候。

“我知道。”卡尔说，他使劲抵挡司炉的现在冲他而来的连珠炮式的话语，但是，尽管如此，在整个争吵过程中仍始终对他露着一丝友好的笑意，“您说得对，说得对，我从来没有对此怀疑过嘛。”由于怕挨打，他真希望能抓住那双来回挥动着的手，更是恨不得能把他推到一个角落里，咬着耳朵悄悄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别人谁也听不见的话。但是司炉却怒不可遏。卡尔现在甚至已经开始得到一种安慰，因为他想到，遇到紧急情况时司炉在绝望中使出浑身力量，也许可以把所有在场的七个男人都制伏。不过，朝那边瞥一眼就可以看见，写字台上有一块加装上去的木板，那上面有许许多多电线线路的按钮。一只手只要那么轻轻往下一摁便可将整船的人连同充斥各过道里的那些持敌对态度的人统统叫来。

这时，那位兴趣索然、手持小竹手杖的先生向卡尔这边走过来，用不太高但明显地超过司炉的叫嚷声的话音问：“您究竟叫什么名字？”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人敲门，仿佛此人在门外正等着先生的这句话似的。仆役看看船长，船长点点头。于是仆役走到门口，开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穿一件旧上衣的男子，看他的外貌不像一个在机房干活的人，然而他却是——舒巴尔。如果说卡尔没有从先生们流露出某种连船长也有的满意神色的眼睛上看出这一点来的话，那么，他也势必会惊骇地从司炉身上看出这一点来，司炉绷直手臂捏紧拳头，仿佛这样捏紧拳头是他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生命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之最重要者。现在这两个拳头里凝聚着他的全部力量，也包括压根儿支撑着他的那股力量。

那么这位就是敌人啰，潇洒自如，衣着整齐，腋下夹着一本账簿，里面大概有司炉的工资清单和劳动登记卡，依次扫视了一下大家的眼睛，他毫不畏缩地承认，想首先确定一下每个人此时的心绪。这七个人也已经都是他的朋友了，因为即使船长从前对他有些异议抑或也许只是假托有异议，在司炉使船长遭受这般不幸之后，船长似乎已经觉得对舒巴尔的工作完全无可非议了。对一个像司炉这样的人怎么严厉也不算过分，如果说对舒巴尔有什么要责备的话，那就是在这期间他没有能够适当制伏司炉的桀骜不驯，致使此人今天竟敢在船长面前撒野。

现在人们甚至也许还可以认为，司炉和舒巴尔在这些大人物面前对质，会产生和在一个更高一级的法庭上对质一样的效果，因为即使舒巴尔可以巧妙伪装自己，他肯定无法坚持到最后的。稍许抖搂一下他的恶劣行径就足以使先生们看清他的嘴脸，这件事卡尔要来管一管。他已经顺便

了解了每位先生的洞察力、爱好、脾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迄今为止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掉。司炉的斗志旺盛一点该有多好，可是他似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如果有人把舒巴尔推到他跟前，他一定会用拳头砸烂舒巴尔那可恨的脑壳的。但是就这么向他走几步路，他还硬就是走不过去，舒巴尔最终一定会来，他自己不来，船长也会把他叫来，这么一件十分容易预见到的事卡尔怎么就没有预见到呢？为什么他没有在来这儿的路上与司炉商谈出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来，而是如他们实际上已经做的那样，毫无思想准备，瞎碰瞎撞，看见有门就往里闯呢？司炉压根儿还能说话吗，还能说是和不是吗，一如情况有利对他盘问时他必须所做的那样？他站在那儿，叉开双腿，双膝晃晃悠悠，脑袋稍稍抬起，空气从张开的嘴里吸进呼出，仿佛体内没有进行气体交换的肺了似的。

而卡尔却感到浑身充满力量而且神志清醒，也许在家里时他还从未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愿他的父母能看到他怎样在异国他乡、在有名望的大人物面前维护好人的利益，尽管他还没有使好人获胜，但是已完全作好了最后夺取胜利的准备！他们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吗？会容纳他、称赞他吗？会看一下、看一下这双对他们极其谦恭顺从的眼睛吗？尽是一些没有把握的问题，而且提出这些问题的时机也不合适！

“我来，是因为我相信，司炉正在指控我不诚实。厨房里一位姑娘告诉我，说是她看见他上这儿来了。船长先生以及在座的诸位先生，我愿意用我的凭据，必要时用在门口站着的不带任何成见、没有任何偏见的证人的证词来驳斥对我的任何指控。”这就是舒巴尔讲的话。这就是一个男子汉简洁明了的讲话，就凭听的人的面部表情的变化人们也可以相信，经过长时间之后他们第一次听见了人的声音。他们自然没注意到，就连这一席漂亮的演说词也有漏洞。为什么他想起来的第一个具体的词儿是“不诚实行为”？也许一提指责就必定是这种事，而竟然不会是指责他有民族偏见？一个厨房里的姑娘看见司炉到办公室里来，而舒巴尔居然立刻就全明白了？不正是这种负疚感使他头脑敏锐吗？证人他立刻就带来了，而且还称他们是没有成见、不带偏见的。招摇撞骗，纯粹是招摇撞骗！而这些先生们竟容忍这种事，还把这尊之为正确的行为。为什么他毫无疑问地在厨房姑娘报信和他到达这里之间白白浪费掉了许多时间呢？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司炉把先生们拖得疲惫不堪，使他们渐渐失去清醒的判断力，而最让舒巴尔感到担惊受怕的正是这种清醒的判断力。他肯定已经在门后站了很久，由于那位先生提了个无关紧

要的问题，他便料定司炉输定了，不正是在这个时刻他才敲门的吗？

一切都清楚了，一切甚至也都是由舒巴尔违背自己本意这样揭示出来了，但是人们还得用另一种方式，用更简洁明了的方式向先生们指出事情的真相。他们需要清醒清醒头脑。那么，卡尔，赶快，在证人上场并将一切淹没之前，这段时间你至少得充分利用！

但是就在这时候船长朝舒巴尔一挥手，舒巴尔当即——因为他的事情似乎暂时得搁一搁了——走到一边并开始和那个立刻就向他凑近过来的仆役轻声交谈起来，交谈时还不时也斜着眼睛看司炉和卡尔并做着极富自信的手势。舒巴尔似乎正在背诵他的下一篇演说词。

“您刚才不是要向这个年轻人询问什么事情吗，雅各布先生？”在一片寂静中船长对持小竹手杖的先生说。

“当然是的。”此人说，微微一欠身表示感谢对他的关注。随后便再次问卡尔：“您究竟叫什么名字？”

卡尔以为，如果这个固执提问的意外事件马上得到解决，这对这件重大的正经事是有利的，便没有按他的习惯，先把护照找出来，然后再将它出示，作自我介绍，而是简短地回答说：“卡尔·罗斯曼。”

“哎呀！”被称做雅各布的人说，几乎不相信地微笑着先往后退了几步。船长、出纳课长、高级船员，甚至连仆役，也都在听到卡尔的名字时明显地表现出极度的惊讶。只有港务局的先生们和舒巴尔显出若无其事的神态。

“哎呀！”雅各布先生重复道，迈着有点僵硬的步子向卡尔走去，“那我就是你的舅舅雅各布，你就是我可爱的外甥啦。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有这个预感！”他对船长说。说罢便拥抱、亲吻卡尔，卡尔则对这一切默默听之任之。

“您叫什么名字？”卡尔在觉得自己已经被放开之后问，虽然彬彬有礼，却很不动感情，并竭力想这个新情况对司炉会有什么后果。暂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舒巴尔可以从这件事情上捞到什么便宜。

“您要明白呀，年轻人，这是您的造化。”船长说，他以为卡尔的问题伤害了雅各布先生的人格尊严，雅各布先生已经走到窗口，显然是

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那张激动的脸庞，那张他一直在用一块手帕轻轻擦拭的脸庞，“刚才向您自称是您舅舅的，是参议员爱德华·雅各布。现在等待着您的是锦绣前程啊，这是您迄今为止根本没有料想到的哩。您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开头就这么顺顺当当的，您要克制住自己！”

“我确实有个雅各布舅舅在美国，”卡尔转身对船长说，“可是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雅各布只是这位参议员先生的姓。”

“正是如此。”船长神态威严地说。

“嗯，我的舅舅雅各布，他是我母亲的兄弟，可是他的教名叫雅各布，他的姓当然和我母亲的姓是一样的^罗，我母亲娘家姓本德尔迈尔。”

“诸位先生！”听了卡尔的说明，参议员在窗口休息后走回来，惊叫了起来。除那位港务局官员以外，所有的人都放声大笑，有的人像是受了感动，有的人则捉摸不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不至于可笑到这个地步吧。”卡尔想。

“诸位先生，”参议员重复道，“您们违背我的和您们自己的意愿正在参与一个小小的亲人相认的场面，这样我就不得不向诸位作一番解释，因为据我所知，只有船长先生”——说到这里，双方彼此鞠了一躬——“完全了解情况。”

“现在我可要真的注意听他讲的每一句话了。”卡尔暗自思忖并感到高兴，因为他斜眼一瞥发现司炉身上开始恢复生气了。

“自从我逗留美国这许多年的漫长岁月以来——逗留这个字对于我这个全心全意的美国公民来说当然很不恰当——自从这许多年的漫长岁月以来，我一直与我欧洲的亲属完全没有来往，至于原因嘛，一则不适合在这个场合讲，再则，一讲起来，我真的会给弄得疲劳不堪的。我甚至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到时候我也许将不得不把这些原因讲给我亲爱的外甥听，在讲述这些原因时很遗憾，有些话将不可避免地公开涉及他的父母以及他们的亲属。”

“毫无疑问，他是我的舅舅，”卡尔心想并仔细倾听，“也许他改了名字了。”

“我亲爱的外甥如今简直是被他的父母——让我们只用这个也确实说明事情本质的词儿吧——抛弃了，就像人们把一只惹人生气的猫扔到门外那样。我根本不想美化我外甥所干的事，不想掩饰他受到这样的惩罚，但是他的过错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只要把它一说出来，他就足以获得别人的谅解了。”

“这话中听，”卡尔想，“但是我不希望他把什么都讲出来。而且这事他也不会知道的呀。从哪儿知道呢？”

“原来，他被——”舅舅接茬儿说，略略俯身撑住顶在他跟前地上的那根小竹手杖，这样他果真成功地清除了这件事情上那种不必要的隆重的气氛，否则这种气氛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原来，他是被一个女仆，约翰娜·布鲁默尔，一个约莫三十五岁的女人引诱了。我丝毫也不想用‘引诱’这个词来伤害我的外甥，但是确实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同样恰当的词儿。”

卡尔已经走到离舅舅相当近的地方，这时他转过身来，想从在场的人的脸上看出对这番叙述的反应。没有人笑，大家都耐心地、神情严肃地倾听着。毕竟人们也不会有机会初次见面便讥笑一位参议员的外甥的嘛。人们倒不妨可以说，司炉倒是在向卡尔微笑呢，尽管只是略带一丝笑意，而这一丝笑意首先作为新的生命征象是可喜可贺的，其次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舱房里卡尔曾想对这件现已为人所共知的事严加保密。

“这个布鲁默尔，”舅舅继续说，“给我的外甥生了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举行洗礼时得了个雅各布的名字，无疑是为了纪念鄙人，想必是鄙人，尽管我的外甥一定只是稍带提及我几句，给这个姑娘留下了深刻印象了吧。真是幸运啊，哎哟！因为这时候父母为了避免提供生活费用或是为了避免出现惯常的会涉及他们自身的那种丑闻——这里我必须强调指出，我既不了解那儿的法律，也不了解父母的其他情况——这就是说，为了避免提供生活费和避免出丑，他们就把他们的儿子，我的亲爱的外甥打发到美国来了，一如大家所见到的，只带了几件随身衣物。这样，这孩子若没有恰恰在美国还会出现的奇迹，孤苦无援，大概很快就会沦落在纽约街的街头。倘若不是那个女仆在一封给我的信里，一封几经周折前天我才收到的信里，向我叙述了这件事情的全部过程，还给我描述了我的外甥的外貌特征，并且还明智地也给我说了这艘船的名字的话。如果我存心想娱乐您们，诸位先生，我可以将那封信的几个段

落”——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大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摇晃了一下——“在这里念给您们听一听。这封信一定会给诸位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是用一种有点朴素的、即使是始终怀着好意的精明并且怀着对孩子父亲的热爱写成的。可是我只想说明情况，既不想不必要地过多地来娱乐大家，也不想也许甚至就在迎接他的时候就来伤害我外甥可能还怀有着的感情，我外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已经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里静静地读它，以接受教训的嘛。”

卡尔可是对那个姑娘没有什么感情。在众多日益淡漠的往事的回忆中，只记得她坐在厨房里橱柜旁边，她把一肘支在橱柜板上。他偶或到厨房来拿一杯水给父亲喝或者转达他母亲吩咐办的一件事，她便总是看着他。有时她在橱柜一侧歪斜着身体写一封信并从卡尔的脸上汲取写信的灵感。有时她用手捂住双眼，这时她谁也不搭理。有时她跪在厨房旁边她那间窄小的小房间里，对着一个木十字架祈祷。于是，卡尔就在从旁边走过时胆怯地透过略微开着的房门的门缝观察她的动静。有时她在厨房里奔跑，当卡尔挡住她的路时便像一个女巫似的哈哈大笑着退回。有时等卡尔进来后她便关上厨房门，用手握住门把手，直至他要求出去。有时她拿来他根本不想要的东西，默默将它们塞在他的手里。但是有一次她说了声“卡尔”就扮着鬼脸叹着气地把还在对这一声突如其来的称呼感到惊讶的他带进她的小房间，并随手将房门锁上。她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就在她请求他脱光她的衣服的当儿，实际上她已经脱光了他的衣服并把他抱到她的床上，仿佛从现在起不再把他让给任何别人似的，爱怜地抚摩他，直到销魂失魄。“卡尔，哦，你是我的卡尔！”她喊道，仿佛她看见他并且证实自己已经占有他了似的，而他却什么也没看见，躺在她似乎特地为他堆起来的厚实暖和的褥垫上觉得很不舒服。随后，她也躺到他身边，想从他身上掏出什么秘密来，可是他没有什么秘密告诉她，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恼了，摇晃他，细听他的心跳，把自己的胸脯送上去要他也一样听，可是她就是没法让卡尔就范，就将她赤裸裸的肚皮压到他身上，用手在他裆部掏摸，摸得卡尔恶心得脑袋都晃离开了枕头，然后就拿肚皮对准他撞了几下——他顿时觉得，仿佛她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了，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被一种可怕的急需救助的感觉所攫住。在她一再地表示了以后再相会的心愿之后他终于哭哭啼啼钻到他自己的床上。这就是这件事的全部过程，可是舅舅却很会将这件事大肆渲染。而厨娘居然也想到了他并把他到达的消息通知了舅舅。这件事她干得漂亮，为此他也许还会再报答她一次。

“而现在，”参议员大声说，“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听你说说，我是不是你的舅舅。”

“你是我的舅舅，”卡尔边说边吻他的手并在额头上受到回吻，“遇见你我很高兴，可是如果你以为我的父母只讲你的坏话，那你就错了。但是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你讲的话里也仍有几处错误，这就是说，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事都是像你说的那样。不过待在这里你也确实难以对那边的事情作出公正的判断，此外我还以为，诸位先生在一件确实与他们关系不大的事情上听到一些有点儿不太正确的细节报道，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嘛。”

“说得好，”参议员说，将卡尔领到面露关注神态的船长的跟前并问，“我不是有一个了不起的外甥吗？”

“结识了您的外甥，”船长鞠了一躬说，这种姿势只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才做得出来，“参议员先生，我感到很幸运。能为这样一次相聚提供场所，这对我这艘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是坐统舱一定很不舒服，啊呀，谁会知道，是谁搭乘统舱呀。嗯，我们以后要尽力而为，让统舱里旅客的旅途生活过得尽量舒服些，譬如比美国航线要更舒服些，但是要将这样的一趟航行变成一种愉快的享受，我们现在可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我没有关系。”卡尔说。

“他没有关系！”参议员大声笑着重复了一遍。

“只不过我的箱子恐怕是丢掉了——”随之他想起了一切已经发生和还有待于去做的事情，环顾四周，看见所有在场的人出于尊敬和惊讶都默默待在原来的地方，眼睛都盯着他。可是人们只要看看港务局官员的那张严肃、自得的面孔，人们便可以看出，他们为自己来得不是时候而感到遗憾，现在放在了他们面前的那块怀表对他们来说大概比一切房间里正在发生以及也许还将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奇怪的是，继船长之后第一个表示关切的是司炉。“我衷心祝贺您。”他说并和卡尔握手，他也想以此表示些许类似赞许的意思。当他随后同样也想向参议员表示祝贺时，参议员向后退去，仿佛司炉此举超越了他的权力范围了似的，司炉也就立刻作罢了。

而其余的人现在却领悟到他们该干些什么事，立刻争先恐后拥到卡尔和参议员的周围。这一下，卡尔甚至受到并接受了舒巴尔的祝贺而且还为此道了谢。待周围重新平静下来之后，港务局官员才作为最后一批祝贺者走过去，说了两句英语，给人留下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形象。

为了尽情享受这一欢娱，参议员兴致勃勃地自己并让别人也一道回忆起一些细微末节，这些琐碎小事大家当然不仅耐着性子，而且还趣味盎然地听了。例如，他提醒大家注意，他曾将厨娘信中提及的卡尔身上最特出的识别记号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以备一时之需。就在司炉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的当儿，他掏出笔记本，试图做游戏似的将厨娘的当然不是那么十分缜密的观察和卡尔的外貌进行联系比较，他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散散心。“我就这样找到了我的外甥！”他结束讲述说，听那口气仿佛他还想受一次贺喜似的。

“现在对司炉该怎么办呢？”卡尔问，他没怎么注意听舅舅最后讲述的那段话。他以为自己处在这样新的地位，心里想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对司炉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参议员说，“还得看船长先生以为怎么办才合适。我相信，我们对司炉已经厌烦，很厌烦了，在场的每一位先生肯定都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的。”

“这可不是厌烦不厌烦的问题，而是公正还是不公正的问题。”卡尔说。他站在舅舅和船长之间，自以为也许在这个地位的影响下可以左右裁决。

尽管如此，司炉却似乎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将双手半插进裤腰带里，情绪一激动起来裤腰带连同一件花衬衫的狭长条片一齐露了出来。对此他毫不在意，他已经将自己的全部苦水吐出来了，现在人们也还可以看看他身上的破衣烂衫嘛，然后他们就可以把他抬出去。他想象，仆役和舒巴尔，这两个地位最低下的人，他们将会给他送葬。然后，舒巴尔就会得到安宁，就不会再如出纳课长所说的那样陷于绝望之中。船长就可以全部雇佣罗马尼亚人，到处都说罗马尼亚语，也许以后果真一切都会变好。再也不会再有司炉到总会计室里来唠叨，只有他的最后这次饶舌人们将会留在相当友好的回忆之中，因为这次饶舌，正如参议员强调说明的那样，提供了辨认外甥的简捷的诱因。不过话说回来，这位外甥先前曾多次试图帮他的忙，所以早就还清了在亲人相认上欠他的情而且还足足有余呢，现在司炉根本不想还去向他提什么要求。况

且，尽管他是参议员的外甥，可离船长还差一大截呢，而那句凶恶的话却最后将从船长嘴里说出。——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司炉也就力图不朝卡尔那边望去，但是遗憾的是，在这个敌人房间里舍此也就没有别的可供他的目光停留的场所了。

“你别误解了实际情况，”参议员对卡尔说，“也许这是一件涉及公正的事情，但是同时也涉及纪律。这二者，尤其是后者，在这里都应该由船长先生来判断。”

“是这么个理儿。”司炉喃喃自语。看出并懂得这个理儿的人，露出了诧异的笑容。

“船刚到纽约，船长的公务一定十分繁忙，可是我们却已经耽误了船长的许多时光，现在已是刻不容缓，我们该离船了，别再节外生枝横插一杠把两个机工之间的这场微不足道的争吵闹得沸沸扬扬。而且我完全理解你的行为方式，亲爱的外甥，可是恰恰正是这一点给了我立刻将你从这儿带走的权力。”“我马上叫人给你们放只小艇。”船长说，卡尔感到不胜诧异，船长竟然对舅舅的话没有表示出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的异议，而舅舅的这几句话无疑是可以被看作是舅舅的一种自贬的。出纳课长急忙奔向写字台，用电话把船长的命令通知小艇艇长。

“时间紧迫，”卡尔暗自思忖，“可是不得罪所有的人，我就什么事也干不成。舅舅好不容易才找到我，我现在当然不能离开他。船长虽然客客气气，但是也只是客气客气罢了。一涉及纪律问题他就丝毫不客气了，而舅舅则一定说出了船长心里想说的话。我不愿意和舒巴尔说话，我甚至后悔刚才和他握了手。这儿所有其余的人都是秕糠。”

他边转悠着这些念头边慢慢走到司炉身旁，将司炉的右手从裤带里拉出来，把它放在自己的手里抚弄着。

“你为什么什么话也不说？”他问，“你为什么忍受这一切？”

司炉只是皱起眉头，仿佛他在为他要说的话找词儿似的。此外，他只低头看着卡尔的和他自己的手。

“这艘船上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一点我完全清楚。”卡尔在司炉的手指之间来回移动自己的手指，司炉则用闪闪发光的眼睛向四下里张望，仿佛他心头漾起一阵狂喜而又生怕别人会为此而嗔

怪他似的。

“可是你必须进行自卫呀，你必须明确表明你的立场，否则人家就不会知道事实真相，你必须答应我，你将听从我的劝告，因为我有许多理由担心，恐怕我自己今后再也帮不了你的忙了。”说着，卡尔哭了，他吻司炉的手，并拿起这只皴裂的、几乎毫无生气的手，将它贴在自己的面颊上，就好像这是一件人们不得不放弃的珍宝。——可是这时参议员舅舅也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并把他——即使只是带着极轻微的强制——带走了。

“司炉似乎把你给迷住了。”他说，并从卡尔头顶上朝船长投去会心的一瞥。

“你正感到自己很孤独的时候，你找到了这位司炉，现在你感激他，这是很值得称道的。可是就算是为了我的缘故吧，你也别做得太过分了嘛，你得学会理解你的身份。”

门口起来一阵骚乱，人们听见喊声，甚至好像有人被粗暴地撞到门上。一名水手走进来，相貌有点邋遢，身上围着一条女式围裙。“门外有人。”他喊道并用胳膊肘儿向四周捅了一下，仿佛他还在拥挤的人群里似的。终于他又清醒了过来，正想向船长敬礼，这时他发现了那件女式围裙，便将它扯下，扔到地上，喊道：“真讨厌，他们给我围上了一条女式围裙。”但是说完他就并拢脚跟敬了个礼。有人禁不住想笑，可是船长却厉声说：“我看你们快活得很哩，究竟谁在门外？”

“都是我的证人，”舒巴尔上前一步说，“我竭诚请求您原谅他们举止不当。这些人在航行结束之后，有时他们会像发了疯似的。”

“您马上去叫他们进来！”船长命令，旋即他又转身对参议员彬彬有礼、但却迅捷地说道：“尊敬的参议员先生，现在有劳您的大驾，请您和您的外甥先生跟着这位水手走，他将把你们领上小艇。我不说您也知道，参议员先生，能结识您个人我感到多么愉快、多么荣幸。我只希望不久能有机会和您，参议员先生，再次进行我们被打断了的有关美国舰队情况的谈话，届时我们也许还会再次以今天这样愉快的方式被打断。”

“眼下有这么一个外甥我就知足了，”舅舅笑道，“请接受我对您的盛情好意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后会有期。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们”——他热情地紧紧搂住卡尔——“下一次旅行欧洲时也

许可以和您进行更长时间的聚谈。”

“这将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船长说。两位先生互相握手道别，而卡尔则只能默默地、仓促地和船长草草拉了拉手，因为船长已经忙着要应付那大约十五个人了，这十五个人在舒巴尔率领下虽然神色有点慌张、但却闹哄哄地走了进来。水手请求参议员允许自己在头里走，他分开人群，让参议员和卡尔轻松自如地穿过鞠躬行礼的人群。看来，这些一般还算善良的人把舒巴尔同司炉的这场争吵看做是一种戏谑，这场滑稽戏竟一直演到船长这儿来了。卡尔在人群中也发现了厨娘莉娜，她正一边开心地向他眨眼，一边系那条被水手扔掉的围裙，因为这是她的围裙。

他们继续跟着水手走，离开办公室，拐进一个小过道，走了几步就走到一扇小门的门口，一道短短的楼梯从小门通向那艘为他们准备好了的小艇。水手长一个箭步往下跳入小艇，艇内的水手们起立敬礼。正当参议员提醒卡尔往下走时要小心谨慎，卡尔竟在最高一级梯级上号啕大哭起来。参议员将右手放到卡尔的下巴下面，将他搂紧在自己身上并用左手抚摩他。就这样，他们慢慢地一级一级往下走，紧紧依偎着走进小艇，参议员给卡尔找到了一个恰好在自己正对面的好位置。参议员一发信号，水手们便将小艇撑离大船并立刻全力划行起来。刚离开大船几米远，卡尔便意外地发现，他们正巧位于大船总会计室开着窗户的这一边，三扇窗户的窗口站满了舒巴尔的证人，他们友好地挥手致意，舅舅甚至挥手致谢，一个水手来了个绝招，他没有中止均匀划桨的动作便向大船上送去一个飞吻。这确实令人觉得，仿佛司炉已不复存在。卡尔的膝盖几乎碰着了舅舅的膝盖，他仔细盯着舅舅的眼睛，对于这个人是否能取代他的司炉，他心里顿生疑窦。舅舅也避开他的目光，朝着那在小艇四周翻腾滚动的波浪望去。

舅舅

卡尔不久便习惯了舅舅家里的新环境。可是舅舅也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对他客客气气，卡尔从来都不必自己去找麻烦、碰钉子，不必品尝大多数入初到国外生活时的那种辛酸。

卡尔的房间位于一所楼房的七楼上，舅舅的商号占了这座楼房的下面的六层以及底层以下的三层地下室。每逢他清晨从他的小卧室走进他

的这间房间，从两扇窗户和一扇阳台门照射进来的光线便总是一再使他惊讶不已。假如他以可怜的小移民的身份登岸的话，他会住在哪里呢？噢，人们也许甚至会不让他进入美国境内，而是将他遣送回家，根本不管他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了，舅舅按自己对移民法的认识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人们在这里别指望会得到同情，卡尔读到的有关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似乎只有幸运者才在其周围人的无忧无虑的面孔之间真正享受自己的幸福。

一个狭窄的阳台延伸在房间的前面，与整个房间的长度一样长。可是这个如果在卡尔的故乡城市大概会成为最高眺望处的地方，在这里让人看到的却不比一条街道的全景多出来多少。这条街道在两排全然不连贯的房屋之间笔直地延伸，所以看上去似乎向后倾斜着伸向远方，远处雾气缭绕中一座大教堂的轮廓巍然耸立。早晨、晚上以及在夜晚的梦里，这条街上永远交通拥挤，从上面看，那是一个由扭曲了的人的形象和各色各样车辆顶盖组成的、不断重新组合着的混合物，从中还升腾出一个新的、猛烈增加的、更狂乱的由喧闹声、尘土和各种气味组成的混合物。而这一切则被一束巨大的光线攫住和渗透，它一再被大量物件分散带走并且又热情地带回来，对于受迷惑的眼睛来说它显得十分有质感，仿佛在这条街的上空一块盖住一切的玻璃板每时每刻都一再被人用全力打碎。

舅舅做什么事都小心谨慎，他劝卡尔暂时真的什么事也别干。他可以对一切进行检验和观察，但是别让自己的心窍给迷惑住。说是一个欧洲人在美国的头几天可以比作为一次分娩，即使人们在这里，为了不致使卡尔不必要地感到害怕，习惯新环境，比从天堂进入人间还快，人们还是得牢牢记住，第一个判断总是不可靠的，人们不可以因此而使自己所有今后的判断陷于混乱之中，如果人们想凭借着它们的帮助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的话。说是他自己就认识某些新来的人，这些人不按这些好的原则处世行事，譬如就接连几天站在自己的阳台上，像迷途的羔羊那样看下面的街道。这势必会把人弄糊涂的！可以允许，也许，即便不是无保留地，甚至还可以奉劝一个旅游者，在繁忙的纽约的一天中，去这样孤独地、无所事事地消磨自己的时光，对于一个将在这里留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堕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平心静气地使用这个词儿，即便这是一种夸张也罢。每逢舅舅接待一位他的来客时见到卡尔在阳台上，他的这些客人每天总是只来一次，而且总是在一天的不同的时候，每逢这种时候，舅舅果真总是气鼓鼓扭歪着脸。卡尔不久便有所觉察，

因此便尽可能放弃这种站阳台的享受。

这也远不是他所获得的唯一的享受。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张优质美国写字台，正是他父亲多年来渴望得到、在各种拍卖场合试图以一种他出得起的便宜价格购得，由于囊中羞涩一次也没买成的那种写字台。当然，这张写字台与那些在欧洲拍卖行飘荡的所谓的美国写字台是不能相比的。譬如，它顶端有一百个大小不等的格子，连美国总统也可以为他的每份文件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除此之外在边上还有一个调节器，转动一个曲柄便可以按需要任意调整并新编组各个格子。薄薄的小侧壁板缓缓降下，构成新耸立起来的格子的底或新升起来的格子的顶；旋转一圈，顶端就完全改变模样，一切进行得缓慢抑或出奇地迅速，全看你怎么转动曲柄。这是一项最新的发明，却使卡尔清楚地回忆起家乡圣诞集市上表演给惊异的孩子们看的耶稣诞生戏，卡尔也常常站在那玩意儿的前面，身上裹着一身冬装，不停地把一个老头儿操作下的曲柄转动与耶稣诞生戏里的效果进行比较，与神圣三王断续前进、与星星的闪烁以及圣殿里拘束的生活进行比较。他总是觉得，仿佛站在他后面的母亲观看所有事件都不够仔细；他把她拉近自己身边，直至他感觉到她挨着他的后背，长时间地大声嚷嚷着把隐蔽的现象指给她看，也许是一只小兔子，它在前面草地上交替着前脚离地端坐在后脚上，随后又作准备奔跑状，最后母亲堵住他的嘴，又陷入方才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状况。这张桌子自然不是仅仅为了让人回忆起这样的事情才做的，但是在发明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卡尔记忆中那样的模糊的联系。舅舅与卡尔不同，他根本不喜欢这张写字台，只是，他想给卡尔买一张像样的写字台，而如今这样的写字台全都装有这种新装置。这种新装置有个优点，这就是，它可以不花费多少钱安装在旧写字台上。不过，舅舅却不失时机地劝告卡尔尽可能别去使用那个调节器。为了加强这个劝告的效果，舅舅声称，这套装置很敏感，极易受到损坏，修复起来价钱非常昂贵。不难看出，这样的说法只是借口罢了，即便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不得不说，这调节器很容易就可以被固定住的，只是舅舅不这么做而已。

在头几天里，卡尔和舅舅之间曾比较频繁地进行过交谈，卡尔也曾讲到，他在家里弹钢琴虽然弹得不多，但却挺喜欢弹，他弹钢琴当然只是凭着母亲教给他的那些入门知识。卡尔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一番讲述同时也就是请求给一架钢琴，可是他已经作了足够的观察，知道舅舅不必省俭着过日子。尽管如此，他的这个请求没有马上得到满足，但是大约8天之后，舅舅几乎是以一种不情愿的坦白承认的方式说，钢琴已

经送到，卡尔愿意的话可以去监督搬运。这当然是一桩轻活儿，可是实际上却压根儿就不比搬运本身轻松多少，因为楼里有一部专门搬运家具的电梯，它容纳得下整整一辆家具搬运车而不显拥挤，钢琴也在这部电梯里向卡尔的房间飘荡上去。卡尔本人虽然原本可以乘同一部电梯和钢琴以及搬运工一道上楼，但是由于就在旁边就停着一部专门供人乘用的电梯，他便乘这部电梯，握住一个把手使自己与另外那部电梯一直保持相同位置，透过玻璃墙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件漂亮的乐器，这架钢琴现在归他所有了。当他把钢琴搬进房间并敲响头几个音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了，他没有继续弹下去，而是跳了起来，隔着一定的距离，两手叉腰，惊奇地注视着这架钢琴。房间的音响效果也非常好，这有助于彻底消除他开始时怀有的那种住在一所铁屋里似的轻微不舒服感觉。尽管从外面看去这座楼房像是铁铸的，人们在房间里果真也看不出丝毫铁建筑材料的痕迹，而且哪怕只是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整体舒适感的设施上的小纰漏也没有人能指得出一个来。最初，卡尔对弹钢琴寄予厚望并且不觉羞耻地至少要在入睡前想一想用这种弹钢琴的方式去直接影响美国环境的可能性。他弹的曲子也确实特别，他在窗户前对着外面一片嘈杂声弹他家乡的一首古老的士兵之歌，晚上士兵们躺在兵营窗口，望着窗外幽暗的广场，从窗户到窗户互相对唱这首歌——但是他弹完一曲后一看街上，街道没有变化，只是一个大循环里的一小角，不了解在这个大圈子里起作用的全部力量，人们其实是无法阻挡这一小角的运动的。舅舅容许弹钢琴，对此也没说什么，况且卡尔也遵照他的劝告只很少享受这种弹琴的乐趣。是的，他甚至还给卡尔送来美国的各种进行曲乐谱，当然也有美国国歌的乐谱，但是有一天他毫无戏谑之意地问卡尔，他是否也想学拉小提琴或者吹圆号，而这大概也就无法单纯从喜爱音乐的角度去进行解释吧。

学习英语当然是卡尔的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任务。一所商学院的一位年轻教授每天早晨七点来到卡尔的房间，便发现他已经坐在写字台前做作业或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背单词。卡尔分明看出，掌握英语刻不容缓，而且他在这方面有最好的机会，可以用迅速取得进步使舅舅感到惊喜。起初，在和舅舅交谈时英语只限于问候和告别用语，不久果真就可以渐渐过渡到用英语表达越来越多的谈话内容了，与此同时，比较机密的话题也就由此应运而生。一天晚上，卡尔向他舅舅朗诵了第一首美国诗歌，这首描写一场大火的诗歌使舅舅在满意之余露出了极其严肃的神情。当时他们俩站在卡尔房间里的一扇窗户旁边，舅舅望着窗外，窗外天空中一切光亮均已消逝，他有感于诗中的情调而缓慢、均匀地拍着手

掌，而卡尔则直立在他身旁，目光呆滞使出浑身力气诵读这首艰难的诗。

卡尔的英语越好，舅舅就越是愿意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熟人，并以防万一而规定，在这种会面场合，英语教授暂时还都得待在卡尔的身边。一天上午给卡尔介绍了天字第一号熟人，这是一个身材细长、年轻、极柔顺的人，舅舅带着特别殷勤的态度将这个人带进卡尔的房间。他显然是那些众多的、从父母的立场上看来教养不好的百万富翁子弟中的一个，他过着那样一种生活，一个普通人哪怕只要注视一下这个年轻人生活中的任意一天，就不会不感到痛心疾首。就仿佛他知道或料想到这一点似的，就仿佛他尽自己力所能及地反对这一观点似的，他的嘴角和眼角不断挂着一丝幸福的笑意，他似乎在对他自己、对自己对面的人以及对整个世界微笑。

在舅舅无条件的赞同下，与这个年轻人、一位马克先生商定，五点半或去马术学校，或去野外，一起去骑马。卡尔虽然起先犹豫不决，没有马上答应，因为他还从来没有骑过马，想先稍许学一点骑术，但是由于舅舅和马克一再撺掇他并把骑马描绘成纯粹的娱乐和有益于健康的锻炼，而绝不是技巧，他最终还是答应了。现在他当然四点半就得起床，这往往使他感到十分惋惜，因为大概由于白天经常精神高度集中的缘故，他在这里简直患上了嗜眠症了，但是在他的洗澡间里这种惋惜情绪不久便渐渐消失。整个浴盆上方架着与浴盆长度和宽度相应的淋浴器筛分装置——家里哪位同学，不管他多富有，拥有这类设备而且还是独自一人享用——卡尔伸展四肢躺着，在这只浴盆里他可以伸开胳膊，并且可以随意先让温水，后让热水，随后又让温水、最后让冰冷的凉水局部地或是全面地往下流到自己身上。他犹如还在慢慢继续品尝甜蜜睡眠滋味似的躺着，并且特别喜欢闭着眼睛接住那最后零星掉落下来的几滴水珠，它们随后便散开，顺着脸往下流去。

卡尔从舅舅的高顶篷汽车里下来时，那位英语教授已在马术学校里等候他，而马克则无例外地稍迟一些才来。不过他也完全可以来得稍晚些，因为真正的、生气勃勃的骑马活动要等他来了以后才开始。他一进来，马儿不是就从它们迄今为止的那种半睡半醒状态腾跃而起，跑马场里啪啪马鞭声不是就响得更清脆，四周的回廊上不是突然就出现零星的人——观众，养马员，马术学校学员或其他什么别的人？而卡尔则利用马克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稍稍作一些哪怕只是最低级的骑马前的准备

动作。有一个高个儿男子，他几乎不用抬高胳膊就可以把人送上最高的马背，此人给卡尔教授这门总是几乎还不到一刻钟的功课。卡尔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出类拔萃，他可以随时学会许多英语诉苦话，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他上气不接下气向他的英语教授发出诉苦的喊声，那位英语教授则总是靠在门框柱子上，通常都是睡眠惺忪。但是马克一来，对骑马的全部不满便几乎荡然无存。高个儿男子被打发走，不久，在这间还一直是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们便什么别的声音也听不见，只听见奔马的马蹄声，人们几乎看不见别的什么，只看见马克高举胳膊向卡尔发号施令。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愉快地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便停止了。马克有急事，告辞卡尔，有时候，如果他对卡尔的骑马特别满意，还拍拍卡尔的面颊，然后便离去，行色匆匆竟顾不得和卡尔一道走出门去。然后，卡尔便带着教授一起上汽车，他们通常都乘车绕道去上英语课，因为那条本来是从舅舅的房子直接通向马术学校的大街上交通拥挤，从那儿走就会损失掉太多的时间。此外，英语教授的这种伴学不久就停了，因为卡尔不忍心无用地烦劳这个疲倦的人到马术学校里来，况且用英语与马克交谈是一桩很简单的事，于是就请求舅舅免去教授的这项差使。舅舅略一思索，也同意了这个请求。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舅舅才决定允许卡尔稍微看一眼他的商行，虽然卡尔已经请求过多次。那是一种委托、运输商行，据卡尔所能回忆的，这种商行在欧洲也许根本就没有。原来，商行从事一种居间贸易，可是它并不是把商品从生产者那里介绍到消费者或者也许是商人那里，而是给各家大联合企业以及在它们之间进行各种商品和初级产品的居间介绍业务。所以，这是一家不停歇地进行大规模购货、储存、运输和销售活动并必须与客户保持十分精确的不间断的电话和电报联系的商行。电报机厅不是比故乡城市的电报局小，而是比它大，有一回，在一位在电报局有熟人的同学的带领下，卡尔曾参观过家乡的那家电报局。在电话厅里，一眼望去，只见电话亭的门开呀关的，电话铃声令人头晕目眩。舅舅就近打开一扇这样的门，人们看见那里电灯光的闪耀下有一位职员，对门的任何响声都漠然处之，脑袋上夹着一副钢带，这钢带使听筒贴住他的耳朵。右胳膊放在一张小桌子上，仿佛它特别沉重似的，只有握着铅笔的手指头异常均匀和迅速地颤动着。他对着话筒说话时，用词非常俭省，人们甚至常常看见，他也许对讲话者有一些不同意见，想稍许详细地问问他，但是他听到的某些话却迫使他在实施自己的意图之前先垂下眼皮写字。舅舅小声向卡尔解释说，他也不必说话，因为同样的消息，这个人记录下来了，同时还有另外两位雇员也将它们记录下

来了，然后将它们进行比较，尽量避免出现差错。就在舅舅和卡尔从门里走出来的同一个瞬间，一个实习生钻进门去，拿着那张在这期间已写好的纸走了出来。大厅中央不断有人急匆匆穿梭往来奔走。没有人打招呼，打招呼被废除了，每个人都紧跟着在他前面行走的人的步伐，眼睛看着地板，想在那上面尽快前进，或者只是瞟一眼纸上的个别词语或数字，那些纸握在他的手里，随着他的步伐飘动着。

“你确实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一次卡尔在商行里的一条过道上说，即便只是走马看花看看各个部门，要看遍商行也得花费许多天的工夫。

“而这一切都是我在30年前自己创办起来的，你要知道。当初，我在港口区，有一家小商号，那儿一天卸五箱，业务就撑足了，我就趾高气扬地回家。今天我在港口拥有第三大仓库，那家铺子是我的第65队搬运工的吃饭间兼工具室。”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卡尔说。

“在这里一切事业发展得都非常快。”舅舅中断谈话说。

一天，快要吃饭的时候，卡尔正想照例独自一人去吃饭，这时，舅舅走来，要卡尔立刻穿上黑色礼服，和他一道去陪两位商业合伙人吃饭。卡尔在隔壁房间里换衣服的当儿，舅舅在写字台前坐下，检查刚做完的英语作业，用手一拍桌子，大声喊道：“确实棒极了！”

毫无疑问，卡尔听到这句赞词，穿衣穿得更顺溜了，不过他也确实对自己的英语已经相当有把握了。

在舅舅的餐室里，在这间从他到达的第一个晚上起便留在他记忆中的餐室里，两个高大、体胖的先生起身欢迎他们，后来在席间谈话过程中才得知，其中一个叫格雷恩，另一个叫波伦德尔。原来，舅舅通常都只字不谈熟人的情况，总是让卡尔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获取必要的或是有趣的信息。在正式用饭的过程中只洽谈了内部业务，这意味着给卡尔上了一堂很好的商业用语课，大家让卡尔安安静静地吃饭，仿佛他是个孩子，主要得好好饱餐一顿。吃罢饭，格雷恩先生向卡尔弯下身，明显地努力把英语讲得明白易懂，一般地询问卡尔对美国的初步印象。在一片寂静中，卡尔偷偷瞥了几眼舅舅，作了相当详细的回答并且试图用一种略带纽约味的腔调来博取大家的欢心，以示感谢之意。在说到一句话的

时候，甚至三位先生全部乱哄哄哈哈大笑起来，卡尔已经在担心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了。然而不是，据波伦德尔先生说，他甚至是讲了一句妙极了的话。这位波伦德尔先生似乎压根儿就特别喜欢卡尔。就在舅舅和格雷恩先生重又回过头去洽谈业务的时候，波伦德尔先生让卡尔把他的椅子挪近自己身边，先是详细询问了他的名字、他的出身以及他的旅途情况，直至后来为了重新让卡尔得到休息，他终于笑着，咳嗽着，迫不及待自己讲起自己以及他的女儿的情况来。说是他和女儿住在纽约近郊一所小庄园上，不过他只能在那儿度过晚上的时光，因为他是银行家，他的职业使他整个白天都得滞留在纽约。卡尔当即受到到这所庄园去小住几天的热情邀请，说是一个像卡尔这样新来乍到的美国人一定也需要有时离开纽约以便恢复一下身体。卡尔立刻请求舅舅允许他接受这一邀请，舅舅也似乎愉快地答应了，却没有如卡尔和波伦德尔先生所期望的那样说定具体的日期，抑或哪怕只是考虑一下具体的日期。

但是第二天卡尔就被叫到舅舅的一间办公室里（仅在这幢房子里舅舅就有十间不同的办公室），他看见舅舅和波伦德尔先生都默不做声地躺在办公室的靠背椅里。

“波伦德尔先生，”舅舅说，房间里光线昏暗几乎认不出他来，“波伦德尔先生来接你到他的庄园去，这件事我们昨天曾商谈过的。”

“我不知道今天就要去，”卡尔回答，“要不我就做好准备了吧。”

“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就以后再去吧。”舅舅说。

“什么准备呀！”波伦德尔先生喊道，“一个小伙子随时都是准备好的。”

“不是因为他的缘故，”舅舅转身对他的客人说，“他总还得上楼到他的房间去一趟吧，这个就要耽误您的工夫了嘛。”

“我有时间在这儿等着，”波伦德尔先生说，“我事先考虑到会有耽搁，提前下班了。”

“你看，”舅舅说，“你人还没去，就已经给人家带来多少麻烦。”

“我很抱歉，”卡尔说，“可是我马上就回来。”说着跳起来就要走。

“您别着急，”波伦德尔先生说，“您一点儿也没有给我带来麻烦，相

反，您来做客，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你将耽误明天的马术课，你已经请假了吗？”

“没有，”卡尔说，他高兴地期盼着的这次出访开始成为一种累赘了，“我不知道——”

“尽管如此你还是要去？”舅舅继续问。

波伦德尔先生，这个和蔼可亲的人，当即就帮忙解围。

“我们途中在马术学校停一下，把这件事办妥。”

“这句话中听，”舅舅说，“可是马克会等候你的呀。”

“等候是不会等候我的，”卡尔说，“不过他倒是反正会去的。”

“那怎么办？”舅舅说，仿佛卡尔的答话丝毫也不成为理由似的。

又是波伦德尔先生一锤定音：“可是克拉拉”——她是波伦德尔先生的女儿——“也在等待他，盼着他今天晚上就去，她也许应该比马克优先得到照顾？”

“那还用说，”舅舅说，“好吧，你赶快到你的房间里去吧。”他边说边多次好像是无意识地敲击靠背椅的扶手。卡尔已经到了门口，舅舅再次叫住他问道：“明天早晨你回这儿来上英语课吧？”

“啊呀！”波伦德尔先生喊道，惊讶得在靠背椅里尽他的胖体所能地转了转身，“难道他不可能至少明天一天在外面过吗？我后天早晨再把他送回来。”

“这可不兴，”舅舅答道，“我不能就这样让他的学业陷于混乱之中。以后，等他有了正经八百的职业，我将很乐意给他更长的时间，允许他接受如此盛情的令人感到荣幸的邀请。”

“简直是自相矛盾！”卡尔心想。

波伦德尔先生神情沮丧了：“可是玩一个晚上睡一宵就回来，这实在有点不值得。”

“我也是这么认为。”舅舅说。

“知足者常乐，”波伦德尔先生说，说着又笑了起来。“好吧，我等着！”他对卡尔喊，卡尔见舅舅不再说什么，便撒腿就跑。

当他不大会儿工夫作好出门准备回来时，他只在办公室里见到波伦德尔先生，舅舅已经走了。波伦德尔先生极为高兴地握着卡尔的双手，仿佛他想竭尽全力确保卡尔现在将和他同行似的。卡尔因一路奔跑还在浑身冒汗，也主动和波伦德尔先生握手，他为可以作这次郊游而感到高兴。

“舅舅没有因为我要走而生气吧？”

“没有的事！刚才那些话他也就是随便说说而已。他很关心对您的教育嘛。”

“他自己对您说过，他方才说那些话不是当真的？”

“哦，是的。”波伦德尔先生拖长声调说，以此证明他不会撒谎。

“真奇怪，虽然您是他的朋友，可是他却多么不乐意让我去拜访您。”

波伦德尔先生也无法对此作出解释，虽然他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当两个人乘坐波伦德尔先生的汽车行驶在傍晚的和风中的时候，他们还在久久地思索着这个问题，虽然他们立刻谈论起别的事情来了。

他们紧挨在一起坐着，波伦德尔先生用自己的手握住卡尔的手，他讲述着。卡尔想多听点有关克拉拉小姐的情况，仿佛他对长途行驶感到不耐烦，听着这些讲述便可以比实际上早一些到达目的地似的。虽然他从未在晚上坐车在纽约大街上行驶过，越过人行道和车行道，每时每刻改变着方向，风驰电掣般疾驶着，不像是由人在驱动，倒像是一种陌生的自然力。但是卡尔在试图仔细倾听波伦德尔先生讲述的同时，对什么事都不注意，只注意波伦德尔先生的深色背心，那上面静静地斜挂着一条深色铁链。他们驶离那些街道，那些观众显然怕迟到而迈着飞快步伐，乘着急如星火行驶的车辆涌向各家剧院的街道，穿过边缘市区进入市郊。在市郊区，他们的汽车一再被骑马警察疏导到小巷里，因为大路全让罢工、游行的金属加工业的工人们给占领了，只有在交叉路口才最

低限度地允许一些车辆行驶。他们的汽车从昏暗、发出沉闷回响的小巷里一出来，穿越过一条像整个广场一样宽阔的大马路，便看到马路两边充满了望不到尽头的迈着细小步伐移动着的人群，他们的歌声比单独一个人的声音还整齐划一。可是在不阻塞的车行道上，人们却偶或见到一个骑在马上不动的警察，或者扛着旗帜或在街道上空张贴横幅标语的人，或者一个被工友和联络员们围住的工人领袖，或者一辆电车，它没有及时、迅速地逃遁，如今空荡荡、黑糊糊地停在那儿，而司机和售票员则坐在平台上。好奇的人三三两两站在远离真正的游行示威者的地方，并不离开他们站立的地方，虽然他们依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卡尔却高高兴兴地靠在波伦德尔先生搂着他的臂弯里。一想到不一会儿他就将在一幢乡村别墅里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客人，他便感到浑身舒坦。尽管由于开始犯困，他不再能够正确无误地，或者至少是不无间断地理解波伦德尔先生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还是时不时地振作一下精神，抹一抹眼睛，又睁眼看一看，波伦德尔先生是否发现他打瞌睡了，因为这是他无论如何也希望要加以避免的事情。

纽约近郊乡村别墅

“我们到了。”正当卡尔又迷迷糊糊的时候，波伦德尔先生说。汽车停在一幢乡村别墅前面，按纽约郊区富人乡村别墅的风格，这幢乡村别墅比一般的只供一家居住的乡村别墅更大些、更高些。由于屋里只有底层亮着灯，人们根本无法计算出这幢房屋的高度有多少。屋前，栗子树簌簌作响，一条林间小径——栅栏已经打开——通向房屋的一道露天台阶。卡尔以为从自己下车时的疲倦的感觉上可以得知，汽车行驶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黑糊糊的栗子树下他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自己身旁说：

“雅各布先生终于来了。”

“我姓罗斯曼。”卡尔边说边握住向他伸过来的一位姑娘的手，现在他分辨出姑娘的轮廓来了。

“他只是雅各布的外甥，”波伦德尔先生解释说，“自己叫卡尔·罗斯曼。”

“这没关系，我们一样高兴他到这儿来。”姑娘说，她并不看重名字。

尽管如此，当卡尔在波伦德尔先生和姑娘之间迈步向屋子走去的时候，他还是问道：“您就是克拉拉小姐？”

“是的，”她说，这时已经有从屋里来的些许微弱的灯光照在她那张正向他俯过来的脸上，“可是我不愿在这里黑咕隆咚地作自我介绍。”

“难道她在栅栏旁等候我们了。”卡尔暗自思忖，他走着路渐渐地清醒了。

“顺便说一句，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位客人。”克拉拉说。

“不可能！”波伦德尔气恼地喊道。

“格雷恩先生。”克拉拉说。

“他什么时候来的？”卡尔问，好像围于一种预感。

“到了不多一会儿。你们没有在你们的汽车前面听见他的汽车的声音？”

卡尔抬起头来朝波伦德尔望去，想知道，他怎么看这件事，但是他把手插在裤兜里，只是踏着更沉重一些的脚步走路。

“只住在紧靠着纽约市区以外的地方，这无济于事，你免不了还是要受打扰。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我们的住地再搬得远一点，哪怕我要开半宿的车才能到家也在所不惜。”

他们在露天台阶旁边停住脚。

“可是格雷恩先生已经很久没到这儿来了。”克拉拉说，她显然完全同意她父亲的意见，却想尽量安慰他。

“为什么他偏偏今天晚上来呢。”波伦德尔说，此话已经怒冲冲从鼓起的下嘴唇中发出，松弛、沉重的嘴唇很容易便大动起来。

“真是的！”克拉拉说。

“也许他一会儿就会走的。”卡尔说，自己都感到惊讶，他居然会与这些昨天尚完全陌生的人取得如此一致的看法。

“哦，不会的，”克拉拉说，“他有一笔什么大生意要和爸爸谈，一谈大概就得谈很长时间，因为他曾开玩笑吓唬我说，要是我想当一个有礼貌的女主人的话，那么我就得在一旁听着，一直听到明天早晨。”

“居然还要这样。那他就是要在这里过夜了！”波伦德尔喊道，仿佛这下子情况终于糟糕到了极点了。“我真想，”他说，因产生了这个新的念头态度变得和气起来了，“我真想重新请您上车，罗斯曼先生，把您送回到您舅舅那儿去。今天这个晚上一开始就给搅了，谁知道，您的舅父大人下一回什么时候才会再把您交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今天就送您回去，那么下一回他就只好拒绝您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了。”

说着，他抓住卡尔的手，就要实施他的计划。但是卡尔不动弹，克拉拉请求将他留下，说是因为至少她和卡尔将丝毫也不会受到格雷恩先生的干扰，最后，波伦德尔自己也发现，他的这个决心并非最坚定。况且——这一点也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突然听见格雷恩先生从台阶的最上面那个平台上冲着下面花园里喊：“你们在哪儿呀？”

“你们来吧。”波伦德尔边说边转身走上露天台阶。卡尔和克拉拉跟在他后面，他们现在在灯光下互相打量着对方。

“瞧她那殷红的嘴唇。”卡尔暗自思忖，想到了波伦德尔先生的嘴唇，它们长在女儿脸上变得多么漂亮。

“吃完晚饭后，”她说，“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立刻就到我的房间里去，如果爸爸必须和格雷恩先生打交道的話，那么至少我们就可以摆脱他。我就可以劳您大驾，给我弹弹钢琴，因为爸爸曾说过，您钢琴弹得好极了，我可是一点儿也不会演奏音乐，一点儿也不摸我的钢琴，而其实我是很喜欢音乐的。”

卡尔完全同意克拉拉的建议，即便他很想让波伦德尔先生也和他们待在一起。在格雷恩的巨大身形面前——卡尔刚刚已经习惯了波伦德尔的身材——随着他们拾级而上，格雷恩的巨大身形便慢慢展现在他们眼前，卡尔想于今天晚上将波伦德尔先生从这个人身边引诱走的一切希望自然也就统统泯灭了。

仿佛要弥补许多损失掉的时间似的，格雷恩先生极其匆促地与他们寒暄几句，便拉着波伦德尔先生的胳膊，推着卡尔和克拉拉走进餐室，这餐室特别由于桌上摆着有新鲜树叶陪衬的鲜花而显得非常具有节日气

氛，使人对扰人的格雷恩先生的在场格外感到惋惜。正当在餐桌旁等候别人入座的卡尔还在为通往花园的那扇大玻璃门将开着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因为一股浓郁的芳香好似正在飘进一个园亭里来，正当这个时候，格雷恩先生气喘吁吁走过去将这扇玻璃门关上，弯腰别上下面的、伸手插上上面的插销，这一切动作如此干净利落，以致急忙赶来的仆人竟一点儿也没能插上手。格雷恩先生在餐桌上讲的头几句话是对卡尔居然会得到舅舅的许可进行这次访问表示惊讶。他一边一满汤匙接着一满汤匙地往嘴里送，一边冲着右边对克拉拉、冲着左边对波伦德尔先生解释，他为什么感到如此惊讶，舅舅怎样照管卡尔，舅舅对卡尔的爱如何太高尚，以致人们简直无法还把这称作一个舅舅的爱。

“他横加干涉这里的事情还不够，他同时还要在我和舅舅之间横插一杠。”卡尔暗自思忖，一口金黄色的汤也喝不下去。可是随后他却又不想让人发现他觉得自己受妨害了，便开始默默往自己肚里灌汤。这顿饭吃得慢腾腾的，简直像是在受罪。只有格雷恩先生以及充其量还有克拉拉活泼轻快，偶或找到机会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波伦德尔先生只是在格雷恩先生开始谈及业务时才几次卷入谈话之中。可是不久，连这样的谈话他也不参与了，而格雷恩先生则不得不在过一些时候之后又出其不意地用这种谈话去突袭他。而且，他着重指出——这时候，仿佛即将发生什么危险似的，卡尔仔细倾听着，于是不得不由克拉拉提醒卡尔注意，他面前放着烤肉，他是在吃晚饭——他一开始就没有来当这个不速之客的意思，至少最重要的部分本来是可以今天在城里洽谈的，较为不重要的部分便可以推迟到明天或以后去谈。所以，他也确实在下班前很久就已经来到波伦德尔先生的办公室，却没有遇见他，于是他不得不给自己家里打电话通知他今晚不回家，不得不来这儿登门拜访。

“那我得请求原谅，”别人还来不及答话卡尔便抢先大声说，“因为波伦德尔先生今天提前下班，对此我是负有责任的，我对此深表遗憾。”

波伦德尔先生用餐巾遮住他的一大部分脸面，而克拉拉则虽然对卡尔微微一笑，然而这并不是关切同情的笑，而是一种企图设法影响他的笑。

“这用不着什么原谅，”格雷恩先生说，他正在使劲切一块鸽子肉，“完全相反，我很高兴与诸位一道度过这个愉快的晚上，我就可以不必独自在家吃晚饭，让我的老女管家来侍候我，’她老态龙钟，从门口到我的餐桌这段路都快要走不动了，如果我想观看她走这段路，我简直可

以靠在我的靠背椅里歇好久好久呢。不久以前我才设法让男佣人把菜肴送到餐室门口，而据我对她的了解，从门口到我的餐桌这段路则非她莫属。”

“我的上帝，”卡拉拉喊道，“真叫一片忠心！”

“是的，世界上还有忠心耿耿的人。”格雷恩先生边说边往嘴里送一口菜肴，卡尔冷不丁看见他嘴里的舌头一下便把那口菜接住。卡尔几乎恶心得要吐，他站起来。波伦德尔先生和克拉拉几乎同时抓住了他的双手。

“您还得坐着。”克拉拉说。当他又坐下之后，她咬着他的耳朵对他悄悄说：“一会儿我们一起走，您耐心点。”

这当儿，格雷恩先生一直在从容不迫地吃他的饭，仿佛假如他引起卡尔反感的话，那么让卡尔平静下来，这理所当然是波伦德尔先生和克拉拉的任务。虽然他时刻准备不疲倦地享用每一道新上来的菜，但是由于他每一道菜都吃得认认真真，这顿饭便拖得特别长，这的确给人以一种印象，仿佛他想乘他的老女管家不在好好吃一顿饭似的。他不时称赞克拉拉小姐管理家政有方，这显然使她心里感到甜滋滋的，而卡尔则心里痒痒的直想把他挡回去，仿佛他是在攻击她似的。可是格雷恩不安于和她搭讪，而是时不时眼不离盘子地对卡尔引人注目的食欲不振表示遗憾。波伦德尔先生为卡尔的食欲辩护，虽然他作为主人本来也应该鼓励卡尔多吃。而由于整个一下午卡尔都觉得别别扭扭，这时候他果然觉得自己特别容易生气，他竟一反自己较好的判断能力把波伦德尔先生的这番好意视作不友好的表示。正是由于他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所以他有一回完全不合时宜地吃得又快又多，随即便又长时间厌倦地放下刀叉，成为饭桌上最麻木无表情的人，弄得递送菜肴的仆人简直对他无所适从。

“我明天就告诉参议员先生，您是怎样不吃饭而伤了克拉拉小姐的心的。”格雷恩先生说，他只限于做出他怎样摆弄刀叉的样子，来表示这些话中诙谐的意图。

“您瞧瞧这姑娘吧，她多伤心。”他继续说并摸了摸克拉拉的下巴颏。她听凭他摸，闭上了眼睛。

“你这个小丫头。”他喊道，往回一靠，哈哈大笑，脸涨得通红，显

出酒足饭饱后浑身都是力气。卡尔徒劳地试图揣度波伦德尔先生的态度。他坐在盘子前面，眼睛盯着那盘子，仿佛那里正在发生真正重大的事件似的。他不把卡尔的椅子拉近自己的身边，而一旦他讲话，他就对大家讲，可是对卡尔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的。相反，他容忍格雷恩这个狡诈的纽约老光棍带着明显的意图触摸克拉拉，容忍他侮辱卡尔，侮辱波伦德尔的客人或至少把卡尔当孩子一样对待，谁知道他酒足饭饱后一时兴起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在大家离席之后——当格雷恩觉察到饭桌上的一般情调时，他第一个站起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大家随着自己一起站了起来——卡尔独自一人朝不远处用白色狭窄边框隔开的大窗中的一扇走去，那些窗户通向露台，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它们就是正式的门。波伦德尔先生和他的女儿起初对格雷恩感到的那种反感，那种当初卡尔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反感，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呢？现在他们和格雷恩站在一起，正在向他点头呢。格雷恩先生的雪茄烟雾在厅里弥漫，把格雷恩的影响也传送到他永远不会亲自涉足的角落和壁龛。那支雪茄是波伦德尔的礼物，它粗得出奇，父亲在家里偶或讲起过那样粗的雪茄，讲的时候总是把它当做一种他大概从未亲眼目睹过的事实。卡尔尽管站得远远的，他还是觉得鼻子里一阵烟熏的刺痒。他只是从他站立的地方很快瞟了格雷恩先生一眼，便觉得此人的行为卑鄙。现在他根本就再也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了，即舅舅之所以久久拒不允许进行这次访问，仅仅是因为他知道波伦德尔先生性格懦弱，因此即便没有精确预见到、也大致料到卡尔在进行这次访问时会受委屈。这个美国姑娘也不中他的意，虽然他自己事先根本也就没有把她想象得比这漂亮多少。自从格雷恩先生和她凑在一起，他甚至对她的脸居然能现出这样美丽的容貌来感到惊奇，尤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她那骨碌碌转动着的眼睛的光辉。一条像她这样的紧紧贴住身体的裙子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浅黄色的、柔软而结实的布料上的小褶痕显示出绷紧的强度。然而，卡尔对她毫不在意，他真巴不得别把他带到她的房间里去，以防万一他已经用双手握住门把手，他巴不得能打开这门，钻进汽车里，抑或，如果司机已经睡了，就独自一人步行去纽约。明净的夜晚满月悬空，向每个人敞开着胸怀，卡尔觉得担心到了外面野外会害怕是愚蠢的。他想象着——在这个厅里他第一次觉得舒服了——他将怎样在早晨——以前一直是不允许他步行回家的——使舅舅感到惊喜。虽然他还从来没有去过舅舅的卧室，也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是他可以问的嘛。然后他就敲门，随着一声拘泥于礼节的“进来！”便跑进房间，出其不意地给亲爱的舅舅来一个惊喜，迄今为止他只见过身穿整齐的、扣上纽扣的服装的舅舅，如今

他看见舅舅坐直在床上，两眼惊奇地望着门口，身穿睡衣。这件事本身也许还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得想一想，这也许会带来什么结果。也许他就破题儿头一遭和他的舅舅一道吃早饭。舅舅在床上，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早饭摆在他们之间的一张小桌子上，也许这种共进早餐会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安排，迄今为止他们只在白天见一次面，由于这种方式的早餐，他们也许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于是自然也就可以更坦率地互相交谈。说到底，也只是因为缺乏这种坦率的交谈，他今天才对舅舅有点不顺从。抑或，说得更恰当些，对舅舅倔强。即便他今天不得不待在这里过夜——可惜看上去情况正是如此，虽然人们让他自顾自地站在这儿窗口也许这次不幸的访问会成为与舅舅改善关系的转折点，也许今天晚上舅舅正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转悠着类似的念头呢。

他稍觉宽心地转过身去。克拉拉站在他面前并且说：“您一点也不喜欢在我们这儿吗？您不想稍许习惯一下这里的环境？您来吧，我愿意做最后的尝试。”

她领着他横穿过餐厅向门口走去。在边上的一张桌子旁边，两位先生坐着喝满杯的起着小泡沫的饮料，卡尔不知道那是什么饮料，他真想尝尝是什么滋味。格雷恩先生将一个胳膊肘支在桌上，他的整个脸面尽量向波伦德尔先生移近。假如人们不认识波伦德尔先生的话，人们完全有可能会以为，这里正在策划什么罪恶阴谋，不是在谈什么生意。波伦德尔用亲切的目光目送卡尔到门口，而格雷恩却一丁点儿也没有回头看卡尔，虽然一个人哪怕是情不自禁地通常也会顺着面对面的人的目光望去的。于是，卡尔便觉得，这种态度表明格雷恩相信，卡尔和格雷恩，每个人都应该各自设法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本事，他们之间的必不可少的社会联系将会逐渐由于两人之中一人的胜利或失败而得以建立。

“要是他这样认为，”卡尔心想，“那他就是一个傻瓜。我确实不想要他怎么样，他也别来打搅我嘛。”

刚走进过道，他便想起，他多半举止不礼貌了，因为他是眼睛盯着格雷恩让克拉拉几乎是从房间里拖出去的。现在他走在她身旁倒心甘情愿了。在穿越各个过道的时候他起先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他看见每隔20步便有一个穿号衣的仆人拿着一个枝形烛台站着，那些仆人双手握住烛台的粗台杆。

“迄今只在餐室里安了新的电线，”克拉拉解释说，“我们不久前才买

了这幢房子，并在一所有自己独特建筑风格的老房子所许可的范围内，把它彻底改建了。”

“这么说，在美国也已经有老房子了。”卡尔说。

“当然，”克拉拉笑道，拉着他继续走，“您对美国的看法真奇怪。”

“您不应该取笑我。”他气恼地说。毕竟他已经知道欧洲和美国，她却只知道美国。

克拉拉边走边伸手轻轻推开一扇门，没有停下脚步，说：“您将睡在这里。”

卡尔当然想马上看看这个房间，但是克拉拉不耐烦地并且几乎是大声嚷嚷地解释说，房间他可以等一会儿再看，现在他应该跟她走。他们在过道里来回拉扯了一会儿，卡尔终于认为，他不必什么事都听克拉拉的，便挣脱开身，走进那间房间。窗户前一片令人惊异的黑暗原来是一棵树的树梢，它正在那里迎风摇曳。人们听见鸟儿在歌唱。在房间里，由于月光还没有照射进来，人们却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卡尔后悔没把舅舅送给他的手电筒带来。在这幢房子里，一只手电筒是必不可少的，要是有几盏这样的灯，就可以让仆人们统统都去睡觉了。他坐到窗台上，望着窗外，仔细倾听。一只惊起的鸟儿似乎在这棵老树的枝叶间挤来挤去。一列纽约市郊火车的鸣笛声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响起。除此之外，四周一片寂静。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克拉拉急匆匆走了进来。她显然怒气冲冲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并拍打她的裙子。卡尔想等她态度客气点后再回答她。但是她迈大步向他走去，喊道：“您跟不跟我一起走？”并故意抑或只是由于激动猛一推他的胸膛，如果不是他在正要从窗台上滑下去的最后一刹那间用双脚触着房间地板的话，他早就摔到窗外去了。

“瞧我快要掉到外面去了。”他用责备的语气说。

“真可惜你没掉下去。您为什么这么不听话？我再次把您推下去。”

说着，她果真抱住他，拖着她自己的受过体育运动锻炼的身体，把起初惊愕得忘记抗拒的他几乎快要抱到窗口。可是在窗口他醒悟了，一扭腰挣脱开身并把她抱住。

“啊，您弄得我好痛。”她当即说。

可是现在卡尔却以为再也不可以放开她。他虽然给她以随意行走的自由，却跟随着她并且不放开她。这样也比较容易将穿紧身连衣裙的她抱住。

“您放开我，”她小声说，冒热气的脸紧挨着他的脸，他得使劲看她，她和他挨得太近了，“您放开我，我给您一样好东西。”“她为什么这么哼哧哼哧呢，”卡尔想道，“不会弄痛她的嘛，我没有搂紧她呀。”不过他还不放开她。可是在漫不经心、默默无语地站了片刻之后，他蓦地又在自己的身体上感觉到她那正在增强的力量，她倏地挣脱他的控制，双手就势向上一翻将他抓住，用一种奇特格斗技巧的脚姿挡住他的双腿，极有规则地喘着气，推着他把他逼到墙边。可是那里有一张长沙发，于是 she 就把卡尔放倒在长沙发上，没怎么向他俯下身去就说：

“现在你动一动试试看。”

“猫，疯猫，”卡尔恼羞成怒，无可奈何地喊道，“你是疯子，你这只疯猫！”

“你说话当心点。”她边说边将一只手伸向他的脖子，开始使劲掐它，掐得卡尔毫无还手之力，只有张着嘴大口喘气的份儿，与此同时，她用另一只手向他的面颊掴去，宛若试验性地触着他的面颊，又将那只手向空中抽回，而且不断往回抽，随时都可以一个耳光向他扇下去。

“怎么样，”她问，“为了惩罚你对一位高贵的女士的恶劣态度，我要不要狠狠给你一个耳光打发你回家去？也许这会对你将来走上人生道路有所帮助，即使这不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我同情你，你是个还可以过得去的英俊的男孩，要是你学过柔道的话，你一定会痛打我一顿的。可是，可是——瞧你现在躺在这儿这模样，我简直太想打你耳光了。我多半会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如果我对此表示遗憾的话，那么你现在就听着，我将几乎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对此表示遗憾。而且我自然不会安于只打你一记耳光的，我要左右开弓，打得你两个面颊鼓胀起来。也许你是个有荣誉感的人——我几乎想相信这一点——挨了这些耳光不愿意活下去了，要自寻短见。可是你为什么这样跟我闹别扭？我不中你的意吗？不值得到我的房间里去吗？注意！现在我真的会突然打你一记耳光。如果你今天还想这样好好离去的话，以后你就放规矩点。你可以跟你的舅

舅赌气，我可不是你的舅舅。此外，我还要提醒你注意，如果我没打你耳光就放你走，那么，你大可不必以为，从荣誉的立场上来看，你现在的状况和真的挨了耳光是一码事。要是你这样以为的话，那我还不如真的打你耳光呢。不知道马克会说些什么，如果我把这一切讲给他听的话？”

一想起马克，她就放开卡尔，卡尔迷迷糊糊地觉得马克是个解放者。他还略微感觉到克拉拉的手挨着他的脖子，所以还稍稍一转身，随后便静静地躺着。

她要他站起来，他不答话，一动不动。她点燃了不知哪儿的一支蜡烛，房间里有了亮光，天花板上现出蓝色锯齿形图案。卡尔躺着，脑袋枕在沙发坐垫上，保持着克拉拉把他安放上去时的姿势，纹丝不曾将它转动。克拉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的裙子绕着她的大腿簌簌作响，也许她在窗口站了好长一会儿工夫。

“气赌完了？”卡尔听见她问。

卡尔心情沉重地感受到，在这间波伦德尔安排他宿夜的房间里，他得不到安宁。这个姑娘在这儿来回踱步，停住脚步，说话，他简直对她腻烦透了。赶快睡一觉，离开这儿，这便是他唯一的愿望。他根本就不愿意到床上去睡了，他就想留在这张长沙发上。他只等着她离去，他就可以在她背后快步奔到门口，插上房门插销，随后又回到长沙发上躺下。他很想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但是在克拉拉面前他不愿意这样做。于是他就这样躺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上面，感觉到自己的脸越来越静止不动，一只绕着他打转儿的苍蝇在他眼前颤动，而他却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克拉拉又走到他身边，对着他的视线俯下身去，他若不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话，他就得凝视她了。

“现在我走，”她说，“也许过一会儿你有兴趣来找我。从这扇门算起，第四扇门通向我的房间，就在过道的这一边。你接连走过3扇门，你便找到了那扇门，那扇通向我房间的。我不再下楼到客厅去了，我就待在我的房间里。你也已经把我折腾得很疲倦了。我不专门等你，可是如果你愿意来的话，你就来。记住，你曾答应给我弹钢琴。不过，也许我已经把你弄得筋疲力尽，你动弹不了了，那你就待着，好好睡一觉

吧。关于我们打架的事，我暂时不会对父亲说什么的。我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怕你会为此而感到担心。”说罢，他猛跨两大步便离开了房间，尽管她自称很疲倦。

卡尔马上坐直起来，老这么躺着，他早就受不了了。为了稍许活动一下，他走到门口，朝外面过道里张望了一下，可是那儿一片漆黑！他感到高兴，他已经关上并锁上了房门，又在烛光下站在他的桌子旁边了。他的决心是，不再留在这幢房子里，而是下楼去找波伦德尔先生，坦率地告诉他，克拉拉是怎样对待他的——他毫不在乎承认自己失败——凭借这个充足的理由请求波伦德尔允许他乘车或步行回家。万一波伦德尔先生对这样立刻回家有什么反对意见，那么，卡尔至少也要请求他派一个仆人领他到最近的一家饭店去。虽然一般来说，人们不用卡尔打算采取的这种方式对待友好的主人，但是人们更不会像克拉拉所做的那样去对待一个客人的呀。她甚至还把她的暂时不把打架的事告诉波伦德尔先生的允诺当做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这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噢，难道卡尔是应邀来参加一场摔跤比赛的，所以他会觉得丢尽脸面，因为他让一个女孩子给摔倒了，而这个女孩子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很可能就是在学摔跤招法中度过的？说到底，她接受过马克的训练。让她去把这一切讲给马克听好了。马克一定明白事理，这一点卡尔是知道的，虽然他还从未有过机会去具体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卡尔也知道，如果马克教他的话，他会比克拉拉取得大得多的进步。然后，总有一天他会再到这儿来，很可能是不请自来，当然是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熟悉这儿的情况就曾是克拉拉的一大优势嘛，然后就抓住这同一个克拉拉，就在这同一张长沙发上把她痛打一顿，她今天就是把他扔在这张长沙发上了。

现在只要找到回客厅去的路就行，起初他心不在焉地多半是也把他的帽子放在那儿的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了。这蜡烛他当然是要拿着的，但是即便有亮光也不容易看清这儿的情况。譬如，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房间和客厅是否在同一个层面上。在来这儿的路上，克拉拉拉着他一个劲儿走，他根本不可能回过头去看一看。格雷恩先生和掌灯的仆人们也让他分心，简言之，他现在确实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当初爬过一层还是两层楼梯抑或也许根本就没爬过楼梯。从看到的远处景色来判断，房间的位置相当地高，所以他试图设想，他曾爬过楼梯。可是既然当初进大门的时候就已经不得不爬楼梯了，那么为什么房子的这一面就不会是加高了的呢？不过，假如过道里什么地方可以见到一扇门里射出一束

光线或者听到远处传来哪怕极轻微的说话声音，那该有多好！

他的怀表，舅舅的一件礼物，指着11点，他拿起蜡烛，走到外面的过道里。他让房门开着，以便万一找不到客厅时起码还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房间，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据此找到克拉拉的房门。为了保险起见，他用一把靠背椅把门别住，使门不致自动关上。一到过道里，麻烦就来了，迎面向着卡尔——他当然从克拉拉的房门向左走——吹来一阵穿堂风，这阵风虽然很微弱，但是毕竟还是可以把蜡烛轻易吹灭的，于是卡尔就不得不用手挡住火苗并且时不时还得停住脚步，以便让压下的火苗升起来。这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于是这段路因此也就显得倍加漫长。卡尔已经从完全没有门的大段大段的墙壁旁边走过，人们想象不出墙后面是什么。然后又是一扇又一扇的门，他试图打开其中的好几扇，它们都锁着，这些房间显然都无人居住。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房间，卡尔想到了舅舅曾答应要带他去参观纽约东区，据说那里的一个小房间里住着好几家人，一个家庭的住所由房间里的一个角落组成，孩子们就在这个角落里围着他们的父母。而这里却有这么多的房间空着，它们唯一的用途就是，有人敲门时好发出空落落的响声。卡尔觉得波伦德尔先生受了假朋友的骗，溺爱他的女儿，所以变坏了。舅舅一定对他有过正确的评价，都是由于舅舅的原则是不对卡尔如何怎样评价人施加影响，他才会进行这次访问并在这些过道里游荡。卡尔要在明天毫无顾忌地把这个看法告诉舅舅，因为按照舅舅的这个原则，舅舅也是会心甘情愿并且心平气和地倾听外甥对他的这个评价的。此外，这个原则也许是卡尔对舅舅唯一感到不喜欢的，而且连这种不喜欢也不是绝对的。

突然，过道一边的墙壁到了尽头，一道冰冷的大理石栏杆取而代之。卡尔把蜡烛放在身边地上，小心翼翼地俯过身去。空洞和黑暗向他迎面扑来。如果这是房屋的主厅的话——烛光下现出一个拱顶形状天花板的一小角——为什么人们不是穿过这个厅走进屋里来的呢？这个又大又深的房间是干什么用的？人们站在这儿上面就像站在一座教堂的楼厅里。卡尔几乎为不能在这所房屋里待到明天而感到惋惜了，他真想在大白天让波伦德尔先生带着自己到处看看，向他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栏杆倒不长，不大工夫，卡尔便进入封闭的过道。过道一个急转弯，卡尔重重地撞在围墙上，万幸的是，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使劲握住蜡烛，所以蜡烛总算没有坠落、熄灭。由于过道怎么也走不到尽头，哪儿

也没有窗户可以让人看到外面的景色，高处低处都没有丝毫动静，卡尔已经在以为，他一直在绕着同一个圆圈转圈子，并且已经在希望也许能重新找到他的房间的那扇开着的房门，但是房门和栏杆都没有再出现。迄今为止，卡尔一直忍着没有大声叫喊，因为他不愿意深更半夜在别人家里喧嚷，但是现在他认识到，在这幢没有灯光的房子里这样做并不为过，正打算要向过道两边大喊“喂！”的时候，他却发现在他来的方向有一盏小小的灯光正在移近过来。现在他总算能估算出这条过道的长度来了。这所房子是一座堡垒，不是别墅。见到这盏救命的灯火，卡尔简直是喜出望外，他不顾一切、忘乎所以地向它奔过去。刚奔出头几步，他的蜡烛便熄灭了。他并不在意，因为他不需要它了。这时，一个老年仆人手持一盏提灯向他迎面走来，此人定会给他指路的。

“您是谁？”仆人问并举起提灯照卡尔的脸，这下，他同时也照亮了他自己的脸。由于蓄着一大把白胡子，他的脸显得有点呆板，胡子在胸口才散成丝一般的卷儿。“既然人们允许他蓄一把这样的胡子，他必定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卡尔边想边上下左右仔细端详这把胡子，丝毫没有因他自己受对方打量而感到有所不自在。而且，他立刻回答说，他是波伦德尔先生的客人，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想去餐室，却找不到了。

“啊，这么回事，”仆人说，“我们还没有安装电灯。”

“我知道。”卡尔说。

“您要不要用我的灯点亮您的蜡烛？”仆人问。

“好的。”卡尔说着并点着了蜡烛。

“这儿过道里穿堂风很厉害，”仆人说，“蜡烛容易给吹灭，所以我拿了一盏提灯。”

“对，提灯实用多了。”卡尔说。

“您身上也已经滴着了许多蜡烛油了。”仆人一边说，一边用蜡烛照了照卡尔的西装。

“这我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卡尔喊道，他心里感到很难过，因为这套黑色西装不一般，舅舅曾说过，所有西装中就这套他穿了最合身。和克拉拉的这场打斗大概也没给这套西装带来什么好处，这一点他现在想

起来了。仆人相当的殷勤周到，在匆忙之中尽量把衣服擦拭干净。卡尔在他面前一再来回转动身子，不时在这儿和那儿向他指出一个斑点，仆人顺从地将它除去。

“这里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穿堂风呢？”卡尔问，他们又继续往前走了起来。

“这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建造，”仆人说，“改建工程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进展很慢。您也许知道，现在建筑工人也还在罢工。这样一幢建筑物麻烦多着呢。现在这里已经出现了几个大裂口，没有人去砌墙封住它们，于是整幢房子里都是穿堂风。要不是我在耳朵里塞满了棉花，我简直就会受不了的。”

“我是不是要说话大声点？”卡尔问。

“不必，您说话很清楚，”仆人说，“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这幢建筑物吧。特别是这里在这座小教堂附近，穿堂风厉害得简直叫人受不了，这座小教堂以后无论如何也要和这幢房屋的其余部分隔开来。”

“这么说来，我在这过道里从栏杆旁边走过，那栏杆外面就是一座小教堂，^啰？”

“是的。”

“这一点我当时立刻就想到了。”卡尔说。

“小教堂很值得一看，”仆人说，“若不是为了它的话，马克先生八成就不会买下这幢房子了。”

“马克先生？”卡尔问，“我想，这房子是属于波伦德尔先生的吧？”

“当然是的，”仆人说，“但是马克先生在买房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不认识马克先生？”

“哦，认识，”卡尔说，“可是他和波伦德尔先生是什么关系？”

“他是小姐的未婚夫。”仆人说。

“这我还真不知道。”卡尔说着并停住脚。

“这让您感到如此惊讶吗？”仆人问。

“我只想把事情弄清楚。要是不了解这样的关系，那是要犯最大的错误的。”卡尔回答。

“我只是感到惊奇，他们竟然什么也没有对您说。”仆人说。

“嗯，是这么回事。”卡尔羞愧地说。

“人们大概以为，您知道这件事，”仆人说，“这不是什么新闻了嘛。哟，我们到了。”说着，便打开一扇门，只见门后有一道楼梯，它垂直通向和到达时一样灯火通明的餐室的后门。

人们听见从餐室里传来波伦德尔先生和格雷恩先生的声音，这声音和大约两个小时以前的没有什么变化。就在卡尔走进这间餐室之前，仆人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在这里等候您，再把您领回到您的房间里去。初来乍到，第一个晚上就要自己认路，这确实有困难。”

“我不回我的房间去了。”卡尔说，不知道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心里怪难过的。

“情况不至于这么严重的吧。”仆人说，脸上露出一丝从容的笑意，并拍拍他的胳膊。他八成是把卡尔的话理解成为，卡尔企图整个夜晚都留在餐室里，和老爷们闲谈，和他们一道喝饮料。卡尔不愿意在现在这个时候供认自己的真实想法，此外，他还想，这个仆人比这里的其余的仆人都更中他的意，这个仆人待会儿可以给他指明到纽约去的路，所以便说：“如果您愿意在这里等候，这无疑是您的一片好意，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这一片好意。不管怎么样，过一小会儿我就会出来，然后就告诉您，我下一步将怎么办。我想，我还会需要您的帮助的。”“好的，”说着，仆人就将提灯放在地上，自己就势坐在一个低矮的基座上，这个空洞的基座大概也和这所房子的改建有关联。“我就在这儿等吧。蜡烛您也可以留在我这儿。”当卡尔拿着亮着的蜡烛就要走进厅里去时，仆人又添上一句。

“我真是丢三落四的。”卡尔边说边把蜡烛递给仆人，仆人只是对他点了点头，人们看不出，他是有意点头呢，抑或这是他用手指他的胡子而造成的结果。

卡尔开开门，他没怎么着这门就当唧唧响声大作起来，因为这扇门由一整块玻璃板组成，如果有人迅速开门并且只紧紧抓住门把手，门几乎就会弯曲。卡尔惊惧地松手放开门，因为他恰恰是想寂静无声地走进来。没怎么转过身去，他便看到，他身后那位显然是已经从他的基座上下来了的仆人怎样小心翼翼、不出丝毫声响地把门关上。

“我打搅了，请原谅。”他对两位睁大眼睛惊讶地望着他的先生说。但是他同时也匆匆扫视了一眼餐厅，看看他是否能在什么地方很快找到他的帽子。可是哪儿也没有帽子的影儿，餐桌已经完全收拾干净，也许那顶帽子不尴不尬地不知怎么给弄到厨房里去了吧。

“您把克拉拉留在哪儿啦？”波伦德尔先生问，他似乎并不觉得这打扰来得不合适，因为他立刻就在他的靠背椅里换了一个坐姿，把整个脸都转向卡尔。格雷恩先生装出不参与的样子，掏出一只又大又厚、古里古怪的皮夹子来，似乎在从许多个口袋中找一张什么纸片，却边翻寻也边读信手拣起的别的文件。

“我有一个请求，您可是别误解。”卡尔说，急忙向波伦德尔先生走过去，为了靠近他就把手放在靠背椅的扶手上。

“有什么请求呀？”波伦德尔先生问并且用坦诚的、毫无保留的目光望着他，“您的请求当然会得到满足。”说着，他用胳膊搂住卡尔，把他搂近自己身边夹在两腿之间。卡尔乐意容忍这样对待他，虽然他一般来说觉得自己已经成年，人家不该把他当小孩对待。可是他的请求自然就更难以启齿了。

“您喜欢我们这儿吗？”波伦德尔先生问，“您不也觉得，一个人从城市里出来，一到乡下就所谓的得到解放了？一般来说”——说到这里，一束明白无误的、被卡尔稍许遮去一些的斜视目光投向格雷恩先生——“一般来说，我一再的有这种感觉，每天晚上都有。”

“他讲起话来，”卡尔心想，“就仿佛他对这幢大房子、对那些没有尽头的过道、对小教堂、对那些空落落的房间、对到处漆黑一团一无所知似的。”

“嗯，”波伦德尔先生说，“请求！”说着他便友好地摇晃默默站着的卡尔。

“我请求，”卡尔说，尽管他尽量压低声音，坐在旁边的格雷恩仍将不可避免地听到一切，而卡尔却实在不愿意当着此人的面说出可能会被理解为侮辱波伦德尔的请求来——“我请求，您让我回家吧，现在，今晚就回去。”

由于这句最不愉快的话已经说出口来，其他的话也就一齐迅速涌了出来，他丝毫也没撒谎地说了一些他事先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我很想回家。我愿意以后再来，因为，波伦德尔先生，您在哪儿，我也喜欢去哪儿。只是，今天我不能留在这里。您知道，舅舅并不是很乐意允许我到这儿来的。他这样做一定有其充分的理由，他做一切事情都是如此，我却擅自行动，简直是违背了他的明智的洞察力强迫他答应了我。我简直是滥用了他对我的一片爱心。他对这次访问有什么顾虑，这个问题现在无关紧要，只是，我完全清楚地知道，这个顾虑中丝毫不含有可能会，波伦德尔先生，可能会伤害您的感情的成分，您是我舅舅最好的、最最好的朋友哇。说到我舅舅的友谊，没有人哪怕能在一丁点儿上比得上您。这也是可以为我的不听话辩护的唯一的理由了，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您也许并不十分了解我舅舅与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只想谈最显而易见的事情。只要我的英语课还没有结业，只要我在做生意方面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实际知识，我就完全离不开我好心的舅舅的帮助。诚然，作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我可以享受这种帮助。但是您切不可以为，我现在就可以从事某种体面的——上帝首先应该保佑我——谋生的职业。可惜我从前受到的教育太不实用了。我在一所欧洲的十年制完全中学里读了四年书，成绩平平，凭这点本事想挣钱不啻痴心妄想，因为我们的中学的教学计划是很落后的。如果我告诉您我学了些什么，您听了会笑的。如果您想深造，上完中学，上大学，那么这一切大概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最后你受到了正规的教育，它使你可以有所作为，它给你挣钱的毅力。可惜我的这个连贯性的学习过程却被突然中止了。有时候我认为，我根本一无所知，而且说到底，对于美国人来说，一切我可能知道的知识，也始终都是太少。在我的家乡，最近到处都在建立改革中学，学生也要学现代语言，也许也学商业学。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这种学校呢。虽然我的父亲想请人给我上英语课，但是第一，当初我无法预料，我将会遭到怎样的不幸，我将会多么需要英语。第二，我要为上好十年制完全中学而努力学习，我无暇顾及别的事了。——我提到这一切，是为了向您表明，我多么依赖于我的舅舅，我因此也就对他负有多么大的责任。您一定会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不可以冒昧行事，哪怕只是一丁点儿违背他的即便只是猜想到的意志的事也

不能做。所以，为了哪怕只是稍微弥补一下这个我已经对他犯下的错误，我必须立刻回家。”

卡尔发表这篇长篇演说词的当儿，波伦德尔先生一直注意地听着，时不时地，尤其是在提及舅舅的时候，将卡尔即便是觉察不到地搂紧在自己怀里，几次神情严肃、充满期望般地向一直在侍弄皮夹子的格雷恩那边望去。然而，卡尔在自己讲话的过程中越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对舅舅所处的地位，他就越是烦躁不安，曾情不自禁地试图挣脱波伦德尔的胳膊。这里的一切使他感到压抑，通往舅舅的路穿过玻璃门，越过楼梯，穿过林荫路，越过公路，穿过市郊到通衢大道，汇入舅舅的房屋。他觉得这条道路是某种严格地同属一个整体的东西，它空荡、平坦、为他准备好了一切地呈现着并且在用一个强劲的声音召唤他。波伦德尔先生的善良和格雷恩先生的卑劣渐渐变得模糊起来，除了告别的许可之外，他不想从这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为自己要到任何别的什么东西。虽然他觉得自己对波伦德尔先生没有什么依赖，对格雷恩先生做好战斗准备，但是他的内心却充满了一种不明确的恐惧，它一阵阵地模糊了他的眼睛。

他后退一步，站在了离波伦德尔先生和格雷恩先生一样远的地方。

“您刚才不是想对他说什么吗？”波伦德尔先生问格雷恩先生，好像请求似的抓住了格雷恩先生的手。

“我真不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格雷恩先生终于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来一封信，将它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说道。

“他愿意回到他舅舅身边去，这是很值得称赞的，人们十之八九都会以为，他这样做将会使舅舅特别感到高兴。想必是他由于不听话已经大大地惹怒了舅舅，这也是可能的嘛。这样的话，那他当然还是留在这里的好。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是，我们俩虽然是他舅舅的朋友，并且恐怕也很难在我的友情和波伦德尔先生的友情之间分出等级差别来，但是舅舅的心思我们现在无法了解，我们这里和纽约隔着许多公里路程，更是没法看透。”

“哎，格雷恩先生，”卡尔说，一边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走近格雷恩先生，“我听您的话的意思是，您也认为我最好立刻就回去。”

“这话我可没说过。”格雷恩先生说，并专心致志地观看那封信，他

用两个指头在信的边沿擦来擦去。他似乎想以此来暗示，他已经被波伦德尔先生问过，也已经回答过他了，而他和卡尔现在却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当儿，波伦德尔先生已经走到卡尔身边并轻轻将他从格雷恩先生身边拉到一扇大窗户跟前。“亲爱的罗斯曼先生，”他说，俯身对着卡尔的耳朵，并用手帕擦脸，手停在鼻子旁边，他擤鼻涕，“您总不会以为，我会违背您的心愿不让您离开这里。根本不会的嘛。汽车我虽然不能提供给您使用，它停放在离这儿很远的一个公共车棚里，这里一切还都在初创阶段，我还没来得及盖一个自己的车库，而且司机又不睡在这个屋里，而是睡在车库附近，我真的连自己也不知道，他睡在哪儿。何况，他的职责根本就不是现在待在家里，他的职责只是早晨及时把车开到这儿来。可是这一切不会妨碍您即刻回家的，因为如果您坚持要回去的话，我立刻就送您到最近的市郊铁路车站，不过就是这车站离这儿很远，所以您乘市郊火车不会比您早晨——我们七点钟就出发——和我一道坐我的汽车提前很多时间到家的。”

“不过我还是，波伦德尔先生，宁可乘市郊火车，”卡尔说，“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市郊铁路。您自己说，我坐市郊火车比早晨坐汽车早到家。”

“可是只有很小很小的差别。”

“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波伦德尔先生，”卡尔说，“我记着您的好意会随时乐意来这儿的，前提当然是，假如在我今天的这种表现之后您仍然还愿意邀请我的话，也许下一回我将能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今天我要尽早见到我舅舅，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似乎他已经得到离去的许可了似的，他补充说：“可是您千万别送我。这也完全没有必要。外面有一个仆人，他愿意把我送到车站。现在我还只要找一找我的帽子。”话音未落，他就从房间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匆匆忙忙作最后一次尝试，看他的帽子是否还能找到。

“我可以帮您一个忙给您一顶便帽吗？”格雷恩先生问，从口袋里摸出一顶便帽，“也许您戴它碰巧还合适呢。”

卡尔惊愕地停止脚步说：“我可不能拿走您的帽子。我完全可以光着头走。我什么也不需要。”

“这不是我的帽子。您拿着吧！”

“那我就多谢了。”卡尔说，为了不耽搁时间便拿起帽子。他戴上帽子，笑了起来，因为帽子很合适，随即又将它拿在手里，仔细观看，寻找良久却未能在帽子上找到有什么特殊之处，这是一顶崭新的帽子。“这帽子挺合适！”他说。

“喔，挺合适！”格雷恩先生喊道，拍了拍桌子。

卡尔正要到门口去喊仆人，这时，格雷恩先生站了起来，饱餐一顿、静止良久之后伸一伸懒腰，便使劲拍了拍他的胸膛，用一种介乎劝告和命令之间的口吻说：“您走之前必须去向克拉拉小姐告别。”

“您是得去一趟。”波伦德尔先生也说，他同样也已经站了起来。人们听得出来，他的这句话不是发自内心，他让双手微微贴住裤缝，一再地将他的上衣扣解开又扣上，按眼下流行的式样，这件上衣相当短，将够着腰部，跟波伦德尔先生这样的胖人很不相称。而且，他这样站在格雷恩先生的身旁，人们明显地就感觉到，波伦德尔先生胖得不健康，整个后背都有点弯，肚子看上去软绵绵、好像支撑不住似的，一个真正的累赘，脸色苍白、神情疲倦。格雷恩先生站在这里则相反，也许比波伦德尔先生还显得胖一些，但是那是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胖，双脚军人似的靠拢，脑袋笔直、摇晃，他似乎是一个体操运动员，一个做示范性体操动作的人。

“您先去找，”格雷恩先生接茬说，“克拉拉小姐，这一定会使您感到愉快并且和我的时间安排也很合拍。因为我确实有些有趣的消息要在您离开这里之前告诉您，这也许也对您的回归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可惜我受到不可抗拒的命令的束缚，午夜以前什么也不能向您泄露。您可以想象，我自己也为此感到遗憾，因为这妨碍我睡眠，但是我坚决执行我的任务。现在是十一点一刻，我还可以与波伦德尔先生商谈完我的事情，您待在这儿只会妨碍我们，您可以和克拉拉小姐在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12点正，您到这儿来，您就会获悉您必须知道的消息了。”卡尔能拒绝这个要求吗，人家确实只要求他对波伦德尔先生表现出一丁点儿的礼貌和感激，况且这个要求是由一个一向无动于衷的粗鲁的人提出来的，而当事人波伦德尔先生却尽量少言寡语、不动声色。那个有趣的消息，到了半夜里他才可以知道的那个消息，那是个什么消息？现在它使他推迟三刻钟回家，如果它待会儿不能至少让他提前这损失掉

的三刻钟到家的话，他才不会对他感兴趣呢。但是他的最大的疑虑却是，他到底能不能去见克拉拉，去见他的敌人。要是他至少随身带着那块舅舅送给他当镇纸用的铁尺，那该有多好！克拉拉的房间可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巢穴。可是现在在这里对克拉拉一句坏话也不能说，因为她是波伦德尔的女儿呀，而且他现在已经听说，她甚至还是马克的未婚妻呢。倘若他对他的态度哪怕只改变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早就会公然赞赏她的这些关系了。他还在暗暗考虑着这一切，但是他已经发现，人们并不要求他考虑什么问题，因为格雷恩开门，对从基座上跳下来的仆人说：“您领这位年轻人去见克拉拉小姐。”

“人们就是这样执行命令的。”卡尔想道，这时仆人几乎奔跑着，因年老体虚而呻吟着顺着一条短路拽着他到克拉拉的房间去。当卡尔从他的房间旁边走过，见到房门还一直开着，他就想进去待一会儿，也许是想镇定镇定自己的情绪吧。可是仆人不允许他这样做。

“不行，”他说，“您必须去见克拉拉小姐。您自己已经听见了的。”

“我只在里面待一小会儿。”卡尔说，他想在长沙发上躺一会儿排遣烦闷，好让时间快一点临近午夜。

“我执行我的任务，您别给我添麻烦。”仆人说。

“他似乎把我必须去见克拉拉小姐当做一种惩罚了。”卡尔心想并走了几步，却固执地又站住了。

“您来吧，年轻的先生，”仆人说，“您已经到了这里了嘛。我知道，今天夜里您就想走，不是一切事情都可以如愿以偿的嘛，我当即就告诉您了，这几乎不可能的嘛。”

“是的，我想走，我也一定会走的，”卡尔说，“现在也只不过是向克拉拉小姐告别一下。”

“是吗？”仆人说，卡尔从他的神情上看出，他不相信自己说的话。“您为什么迟迟疑疑，不去告别呢？您来呀。”

“谁在过道里？”响起了克拉拉的声音，人们看见她从近处一扇房门里探出身来，手里拿着一盏红灯罩大台灯。仆人急忙过去向她禀报。卡尔在他后面缓缓跟上。

“您来晚了。”克拉拉说。

卡尔没有搭腔敷衍她，而是对仆人小声说，但是由于他已经了解他的本性，所以声音中带着严厉的命令口吻：

“您在这扇房门的门口等我！”

“我刚才已经要睡觉了。”克拉拉说并把灯放在桌上。和在楼下餐室里一样，仆人在这里也又小心翼翼地外面把门关上。“已经11点半多了。”

“过了11点半了？”卡尔又问了一遍，好像对这几个数字吃惊不小。“那我可就得立刻告辞了，”卡尔说，“因为我必须正12点到下面餐厅去。”

“您有什么紧急的事呀！”克拉拉边说边心不在焉地理平她那件宽松睡衣上的褶儿。她两颊绯红，她不停地微笑。卡尔自以为可以认定，现在不存在和克拉拉再次打起架来的危险。“您不能弹一会儿钢琴吗，昨天爸爸还有今天您自己都答应过我的呀？”

“可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卡尔问。他倒是很乐意为她效劳，因为她和先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就仿佛她不知怎地已经升格进入波伦德尔并且还进入马克的圈里了。

“是的，是晚了，”她说，她对音乐的兴趣似乎已经消失，“而且这里的每个响声也会在整幢房屋里发出回响，我相信，您一弹钢琴，上面阁楼间的仆人们都会醒过来的。”

“那我就不弹钢琴了，我希望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来。顺便说一句，如果您不觉得特别麻烦的话，您不妨来拜访一下我的舅舅，顺便也看看我的房间。我有一架很漂亮的钢琴，是舅舅送给我的。您愿意听的话，我就把我的那些小乐曲都弹给您听，可惜并不是很多，它们也完全不适合用这么大的一件乐器来弹奏，只有名演奏家弹它才好听呢。但是即便这种乐曲您也将能享受到，如果您事先告诉我您来访的日期的话，因为舅舅不久就要给我聘请一位著名的教师——您可以想象，我多么高兴地期待着这位教师的到来——就为了听他弹钢琴，也值得上课的时候来拜访我。说老实话，我对现在弹钢琴已经太晚感到高兴，因为我还根本不会弹什么曲子，您会感到惊讶的，我弹得多么差劲。现在请您允许我向

您告辞，毕竟现在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由于克拉拉亲切友好地望着他，似乎并不因打架的事对他耿耿于怀，他一边向她伸过手去，一边笑嘻嘻补充说道：“在我的家乡大家都习惯说：‘睡个安稳的觉，做个甜蜜的梦。’”

“您等着，”她说，没有握他的手，“也许您还是可以弹一会儿钢琴。”说着，她便消失在一扇边门里，钢琴就放在边门旁边。

“怎么回事？”卡尔想，“不管她多可爱，我可不能久等。”有人在过道里敲房门，那个仆人不肯完全开开门，从一条小门缝里悄声说：“对不起，刚才有人召我回去，我不能再等了。”

“您去吧，”卡尔说，他现在敢独自一人回餐室去了，“您给我把提灯放在门口。顺便问一句，现在几点了？”

“快11点三刻了。”仆人说。

“时间过得真慢！”卡尔说。就在仆人快要把门关上的时候，卡尔想起，他还没有给他小费，便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硬币——现在他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总是把硬币丁零当啷地放在裤兜里，把纸币放在背心小口袋里——递给仆人并说：“谢谢您的周到的服务。”

克拉拉已经又走了进来，双手摀着扎紧的头发，这时卡尔才想起，他不应该将仆人打发走，待会儿谁带他去市郊铁路车站呀？嗯，波伦德尔先生也许会另找一个仆人，也许这个仆人已被叫到餐室去，待会儿随时可供调遣。

“我请您弹一会儿钢琴吧。我们在这儿很少听到音乐，所以我们不愿意放过听音乐的机会。”

“那可就别耽误时间了。”卡尔不假思索地说并立即在钢琴前坐下。

“您要用乐谱吗？”克拉拉问。

“谢谢，我根本还不能完全读懂乐谱。”卡尔回答，随即便弹了起来。他弹一首短小的歌曲，卡尔分明知道，这首歌曲本来是应该用相当缓慢的节奏弹奏的，以便让人，尤其是外国人，能够听懂它，但是他却以飞快的进行曲速度草草将它弹完了事。一曲弹完后，屋里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人们迷迷糊糊地坐着，一动也不动。

“好极了。”克拉拉说，可是卡尔在弹完这一曲之后是听不进任何奉承话的了。

“现在几点了？”他问。

“11点三刻。”

“那我还有一点儿时间，”他边说边暗自思忖，“可以选择一下。10首会弹的歌曲我用不着全都弹奏，但是其中的一首我可以尽量弹好。”他开始弹奏他那首心爱的士兵之歌。弹得如此缓慢，听的人简直迫不及待要伸手去抓取下一个音符，而卡尔却将它拦住，迟迟不肯弹出来，在弹每一首歌曲时他确实得先用眼睛搜寻到必要的键，但是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内心产生一种痛苦，它超越这首歌的结尾，寻找另一个结尾而无法找到。“我什么也不会弹。”弹完这首歌后卡尔说，眼泪汪汪地望着克拉拉。

这时，从邻室里传来响亮的拍巴掌的声音。“还有人在听呢！”卡尔如梦初醒般喊道。

“马克，”克拉拉小声说。话音刚落，人们就听见马克在喊：“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

卡尔一跃双脚同时跃过钢琴椅，开开门。他看见马克半躺半坐在那里的一张有天盖的床上，被子松散地盖在大腿上。这张简单、笨重的床上，唯有这蓝丝绸天盖显示出童话般的华美。小床头柜上只燃着一支蜡烛，可是床单被褥以及马克的衬衫都很白，以致落在它们上面的烛光几乎发出耀眼的反光。略带波纹，没有完全张紧的丝绸天盖，起码在边缘上，也闪着亮光。紧挨着马克身后，床和一切便沉没在一团漆黑之中。克拉拉倚靠在床杆上，只注意看马克了。

“您好，”马克把手递给卡尔说，“您弹得不错嘛，迄今为止我只见过您的骑马术。”

“这两样我都一窍不通，”卡尔说，“要是我知道您听的话，我一定不会弹的。可是您的小姐”——他顿了一顿，他迟疑着没说“未婚妻”，因为马克和克拉拉显然已经在一起睡觉。

“我料定会这样，”马克说，“所以克拉拉才不得不把您从纽约引诱到

这里来，否则的话，我就根本听不见您弹琴了。弹奏得还相当生疏，即便在这些您练习过的、很简单的歌里，您也有几个错，不过听到您弹琴，我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且不说，不管谁弹钢琴，我概不鄙视。您不坐下，再在我们这儿待一会儿？克拉拉，给他一把椅子吧。”

“我谢谢，”卡尔嗫嚅道，“不管我多么愿意，我也不能再待下去了。我知道得太晚了，这幢房子里有这么舒适的房间。”

“一切我都在按这种风格进行改建。”马克说。

这时，接连迅速响起12下钟声，一声紧追着另一声，卡尔在面颊上感觉到这些钟声的强烈飘荡。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村庄，竟会有这样的钟！

“不能再耽搁了。”卡尔说，只向马克和克拉拉伸了伸手，没去握住他们的手，便急忙走进外面的过道。他没在那儿找到提灯，便后悔过早地给了仆人小费。

他想摸着墙壁向他的房间的敞开着的房门走去，可是刚走了一半的路，他便看见格雷恩先生高举蜡烛急急忙忙、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他举着蜡烛的那只手里还握着一封信。

“罗斯曼，您为什么不来呀？您为什么让我等您？您在克拉拉小姐那儿都干了些什么？”

“许多问题！”卡尔思忖，“现在他还会把我挤到墙上去呢，”因为他果然紧挨着卡尔面前站着，卡尔则背靠着墙壁。格雷恩在这个过道里本来就已经显得身材高大得滑稽可笑，卡尔还开玩笑提了一个问题，问他莫不是把善良的波伦德尔先生吃进肚里去了。

“您果然是个不信守诺言的人。说好12点下去，到时候不下去却蹑手蹑脚地在克拉拉小姐房门口转悠。而我则曾答应在午夜告诉您一则有趣的消息，现在我来了。”说着，他把信交给卡尔。信封上写着“午夜交给卡尔·罗斯曼亲启，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他”。

“归根到底，”卡尔打开信的时候，格雷恩先生说，“我为了您的缘故驱车从纽约来到这里，我以为，这就已经是值得称道的了，您就大可不必再让我在过道里跟在您后面跑来跑去的了嘛。”

“舅舅的！”卡尔刚瞄了一眼信便说，“这是我预料到的。”他转身对格雷恩先生说。

“您预料到了还是没有预料到，这对我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您还是快读吧。”格雷恩把蜡烛向卡尔伸过去说。卡尔就着烛光读到：

“亲爱的外甥！正如你在我们的可惜太短暂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想必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我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这不仅令我周围的人，而且也令我感到很不愉快、很难过，但是我之所以成为我，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我的原则，谁也不可以要求我自毁根基，谁也不可以，我亲爱的外甥，你也不可以，即使你也许恰好是第一个，如果我会想起来的话，是第一个容许对我作那样一般性攻击的人。我多么愿意用正在拿着纸给你写这封信的这双手把你接住并托起来呀。但是由于暂时还根本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发生了今天的这个事件之后我就无论如何也必须把你从我身边打发走，而且我迫切地请求你既不要自己来找我，也不要试图通过写信或通过爱搬弄是非的人来与我建立联系。既然你已经违背我的意愿作出了今天晚上离我而去的决定，那么，你也就一辈子坚持这个决定吧。唯有如此，这才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决定。我选择我的最好的朋友格雷恩先生来传递这个信息，他一定会找到足够的关怀、体谅你的话语，这样的话眼下我确实是一句也没有。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当你在自立道路迈出头几步时，看在我的分上，他也会大力帮助你的。为了理解现在在这封信的结尾时我又觉得似乎不可思议的我们的离别，我不得不再反复在内心说：你的家庭，卡尔，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影响。万一格雷恩先生忘记把你的箱子和你的雨伞交给你，你就提醒他一下。衷心祝你一切如意。

你的忠诚的舅舅雅各布。”

“您读完了吗？”格雷恩问。

“读完了，”卡尔说，“我的箱子和雨伞您带来了吗？”卡尔问。

“箱子在这儿，”说着，格雷恩便将迄今一直被他用左手藏在背后的卡尔的那只旧旅行箱放到卡尔身边的地上。

“雨伞呢？”卡尔又问。

“都在这儿，”格雷恩边说边把雨伞也掏了出来，他一直把这把雨伞放在一个裤袋里，“这些东西是一个叫舒巴尔的人，汉堡——美国航线上的一个机工长送来的，他说是在船上找到的。有机会您可以去谢谢他。”

“至少这几件旧物我失而复得了。”卡尔说并将雨伞放在箱子上。

“可是将来您要好好照看好它们啊，这是参议员先生让我转告您的。”格雷恩先生说。随后便带着明显的个人好奇心问道：“这究竟是只什么稀奇古怪的箱子？”

“这是一只我们家乡士兵参军时带的箱子，”卡尔回答，“这是我父亲的旧军用箱。它还挺实用的呢，”他笑嘻嘻补充一句，“前提是，你别把它随便丢弃在什么地方。”

“您到底是受到足够的教训了，”格雷恩先生说，“在美国您大概并没有第二个舅舅。这儿我还给您一张去旧金山的三等车票。我替您作了进行这趟旅行的决定，因为首先，对您来说东部就业机会好得多。其次，在这里，您做什么事，都会受到您舅舅的干预，并且无论如何也必须避免相遇。在旧金山您可以放开手脚干活。您只管从最底层干起好了，您可以设法渐渐往高处走。”

从这些话里卡尔没听出有什么恶意，这个坏消息在格雷恩心头埋藏了一整个晚上，如今已经转达完毕。从现在起，格雷恩似乎是一个没有危险的人物，人们和他说话可以比和任何别人说话都坦诚布公。最好的好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被选中当了传递一个如此机密和令人痛苦的决定的使者，只要他保留着这个决定，那么他就必定会让人觉得有可疑之处。“我要，”卡尔说，期待着一个有经验的人的认可，“立刻离开这幢房屋，因为我只是以我舅舅的外甥的身份才受到了款待，如今作为一个陌路人我在这里就不会受欢迎了。可以劳您驾带我到大门口，然后把引领上路，让我就近找到一家旅店吗？”

“可是得快点，”格雷恩说，“您给我带来不少麻烦。”

见到格雷恩当即便迈开了大步，卡尔不禁一个愣怔，这样急着要走岂不蹊跷。于是，他便抓住格雷恩上衣的下摆，突然认清了个中就里似的说：“有一点您还须给我说清楚，您应该交给我的这封信，信封上明明写着，不管在哪里遇见我，我都应该在午夜时分收到它。11点一刻我想离开这儿的时候，当时您为什么以这封信为由把我挡在这里呢？您这样做超出您的使命的范围了。”

格雷恩开始回答前先做了一个手势，夸张地表示出卡尔的意见全是无稽之谈。然后就说：“信封上也许写着，我应该不管自己的死活为您卖命，信的内容也许可以让人推断出，信封上的这句话可以这样去理解？倘若我没有挡住您的话，我就得午夜在公路上把信交给您了。”

“不，”卡尔断然地说，“不完全是这样。信封上写着：‘午夜以后交。’如果您太疲倦的话，您也许根本就不会来追我了，或者午夜时分我

也许就已经到我舅舅身边了，不过这一点倒是连波伦德尔先生也是加以否定的。或者，用您的汽车把我送回到我舅舅那儿，说到底这也许还是您应尽的责任呢，因为我有这个强烈要求嘛，可是突然对您的汽车只字不提了。信封上的话不是清清楚楚地意味着，对我来说午夜还应该是最后的期限？对我耽误了这个期限负有责任的是您。”

卡尔用犀利的目光望着格雷恩，分明看到，在格雷恩内心，因受这一揭露而感到的羞耻正在与因目的达到而感到的喜悦进行着斗争。最后，他敛了敛神，用一种仿佛是他打断其实已沉默良久的卡尔说话的口吻说：“别再说什么了！”把他，把已经又拿起箱子和伞的他，从一扇他抢在他之前推开的小门推了出去。

卡尔惊讶地站在室外。一道加建在房屋边上的无栏杆楼梯在他面前通往下面。他只需往下走，然后稍稍向右转走上林荫道，林荫路就通向公路。在明亮的月光下是决不会迷路的。他在下面花园里听见阵阵狗吠声，那些狗被放出来，在黑糊糊的树林间到处乱跑。在四周的一片寂静中，人们清楚地听到它们狂奔乱跳跌进草地的声音。

卡尔幸好没受这些狗的惊扰就从花园里出来了。他不能确切地断定，纽约位于哪个方向。他在来这儿的路上太不注意细微特征了，它们现在本来会对他有用处的。末了，他暗自思忖，他也不是非去纽约不可，在纽约没有人等待他，甚至有一个肯定不等待他。他随意选择了一个方向，上路走了。

通往拉美西斯之路 [1]

步行了不多一会儿工夫，卡尔便来到一家小客栈。这家小客栈其实只不过是纽约牲口拖曳载重车运输线上的最后一个小站，所以一般不留宿客人。卡尔要求客栈设法提供一个最便宜的床位，因为他认为必须立刻就开始节约用钱。按照他的要求，老板似乎把他当雇员似的示意他上楼去。一个头发蓬乱的老妇人在楼上接待他，她因被搅了好觉而气呼呼的，几乎没听他说什么，便一边一迭连声地提醒他轻轻走路，一边领他走进一个房间。她先向他“嘘”了一声，然后便关上了房门。

卡尔起初没弄清楚，只不过是窗帘放下来了呢，还是这个房间也许根本就没有窗，房间里黑糊糊的。最后他发现一扇挂上窗帘的小窗户，他拉开窗帘布，顿时便有一些亮光照进来。房间里放着两张床，可

是两张床都已经被别人占了。卡尔看见那儿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躺在床上酣睡，那模样尤其显得不可信赖，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理由而和衣而睡，其中的一个甚至还穿着靴子。

就在卡尔拉开窗帘的刹那间，睡者中的一个稍稍抬高一下胳膊和大腿，卡尔一看他那副样子，竟忘了自己的忧愁，禁不住吃吃地笑了起来。

不久他便看出，且不说也没有别的床了，既没有沙发榻也没有沙发，而且他也不能安心睡觉呀，因为他不能拿他这只刚刚失而复得的箱子以及他随身带着的钱去冒险的嘛。离开这儿可是他也不愿意，因为他不敢立刻又走过老妇和老板身边离开这所房子。说到底，这儿也许并不见得就比在马路上更不安全一些。然而，引人注目的却是，在昏暗的光线下勉强还可以看出，整个房间里居然一件行李也没有。可是也许，而且十之八九这两个年轻人是客栈的勤杂工，他们一会儿就得起床侍候客人，所以就与衣而睡了。那样的话，和他们睡在一起，这当然就不是特别光彩了，不过倒也比较安全。只是，只要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他就决不可以躺下睡大觉。

床下放着一支蜡烛，还有火柴，卡尔轻手轻脚地把它们拿出来。他不怕点上蜡烛，因为照老板的安排这间房间既属于另外那两个人，同样也属于他所有，而那两个人反正已经美美地睡了半宿的觉，占了两张床，所以还占了他的便宜呢。况且，他举止行动自然尽量小心谨慎，好不致吵醒他们。

首先，他想检查一下他的箱子，大致了解一下他的东西，对它们他已经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其中的最值钱的东西多半已经丢失了。因为什么东西一经舒巴尔的手，那么这东西就很少还有希望会完好无损地回到你的手里去的。诚然，他可以指望从舅舅那儿得到一大笔赏钱，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把丢失个别物件的责任完全推到那个事实上看守箱子的人，即布特尔鲍姆先生的头上。

打开箱子一看，卡尔大吃一惊。漂洋过海时，他一路上花费了多少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整理箱子，现在一切全都乱七八糟地塞在里面，塞得开锁时箱盖都会自动跳起来。

可是不久卡尔便欣喜地看到，箱里之所以杂乱无章，原因仅仅在

于，有人后来把那套他在船上穿过的西装也一起装箱了，而箱里自然本没有放这身西装的地方。东西丝毫没有短少。西装上衣暗袋里不仅护照在，而且从家里带出来的钱也在。这样，加上他身上带着的那笔钱，卡尔眼下钱是够用的了。他到达时穿在身上的内衣裤也在，已经洗干净并且熨过。他也立刻就把表和钱放在那只可靠的暗袋里。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那根意大利香肠也没有短缺，把它的气味散发到全部衣物上去了。如果不想个法子除掉这股气味的话，卡尔眼看就只好接连几个月带着这股气味到处跑了。

在掏摸放在最下面的几件衣物时——那是一本袖珍本《圣经》、信纸和父母的照片——他的便帽从头上掉下，落进箱子。便帽一回到旧物中间，他便立刻认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这就是他自己的那顶便帽，就是母亲在他上路时给他的那顶。然而，出于谨慎，他在船上没有戴这顶帽子，因为他知道，在美国，大家一般都戴便帽不戴宽檐帽，所以他不想在到达美国之前就让自己的帽子戴旧了。那么，格雷恩先生当然是利用它来逗卡尔玩的了。莫不是舅舅也委托他这么做了呢？他无意之间怒气冲冲使劲一把抓住箱盖，箱子“啪”的一声关上。

现在没辙了，两个睡觉的人惊醒过来。先是其中的一个伸懒腰、打哈欠，另一个紧随其后也如法炮制起来。这时，箱子里的全部衣物几乎都已经倾倒在桌子上，如果他们是小偷的话，那么他们尽管可以走过来挑选。不单单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可能性，而且也是为了即刻澄清情况，卡尔手持蜡烛走到床跟前并解释，他是凭什么权利来这里的。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料到有人会作这种说明，因为还得睡过许多时光才会说话，所以他们只是没有丝毫惊诧之意地望着他。他们俩都很年轻，但是艰苦的劳动或是贫困已经过早地使他们脸部的骨头凸现出来，下巴颏儿四周胡子拉碴，久已没有理过的头发凌乱不堪地盖在他们的脑袋上，昏昏欲睡中，他们还在用手指节骨揉搓他们那深陷的眼睛。

卡尔想利用他们的暂时的虚弱状态，所以便说：“我叫卡尔·罗斯曼，是德国人。既然我们同住一个房间，那就请你们把你们的名字和国籍也告诉我。我还要马上说明一点，我不要求得到一个床位，因为我这么晚才来，我压根儿就不想睡觉。另外，对我的漂亮衣服请你们不必介意，我是个没有前途的穷光蛋。”

两个人中较矮小的那个——就是穿靴子的那个——用胳膊、大腿和脸部表情表示，他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兴趣，而且现在也根本不是这样咬

文嚼字的时候，躺下就睡。另一个，一个深色皮肤的人，也重新躺下，但是在睡着之前还懒洋洋一伸手说：“这位叫鲁滨孙，是爱尔兰人，我叫德拉马什，是法国人，现在请让我睡觉吧。”话音刚落，他便猛吹一口气把卡尔的蜡烛吹灭，倒头便睡。

“这个危险暂时排除了。”卡尔暗自思忖着回到桌子旁边。如果他们的困倦不是借口的话，那就一切顺利。讨厌的只是，有一个是爱尔兰人。卡尔记不太清楚，在家里他曾在哪本书里读到过，说是人们在美国应该提防爱尔兰人。住在舅舅那儿时，他本来倒是很有机会去彻底研究爱尔兰人的危险性这个问题的，但是由于以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永远有了着落，所以倒反而把这件事完全耽误了。现在，他想至少借助这根又被他点亮的蜡烛仔细看一看这个爱尔兰人，看完他觉得，恰好是这个人比那法国人的模样还中看一些。卡尔隔着一定的距离、掂着脚尖尚能看得出，他甚至还有一丝面颊丰满的痕迹，而且在睡梦中笑得相当亲切。

不顾一切下定决心不睡觉了，卡尔就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暂时停止收拾箱子，因为他一整个夜晚都可以用来收拾它，翻阅了一下《圣经》，却没读进去什么。然后，他拿起父母的照片，照片上矮个儿父亲高高挺直身子站着，母亲则身体略微下陷地坐在他前面的靠背椅里。父亲的一只手扶在椅子的靠背上，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搁在一本画册上，画册打开着放在他身边的一张薄木板小桌子上。另外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卡尔和他的父母在一起。父亲和母亲用锐利的目光望着他，而他却必须遵照摄影师的嘱托两眼盯着照相机。不过，他上路时这张照片没有让他带走。

因此，他越发仔细地注视放在他面前的这张照片，并试图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去截获父亲的目光。可是不管他怎么用不同的烛光位置改变着视角，父亲的模样却怎么也逼真不起来，他那水平方向的浓密的髭须和真的一点儿也不像，这不是一张好照片。而母亲却照得比较好，她撇着嘴，仿佛她内心受到了伤害却还在强作笑颜似的。卡尔觉得这好像必定会引起每一个观看这张照片的人极大的注意，以致转瞬间他会觉得这个印象的明晰性太强并且近乎荒谬。人们怎么会从一张照片上对照片上人的隐蔽情感如此明确地获得无可辩驳的信念呢！他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片刻。当他把目光重新移回来时，母亲的手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只手从靠背椅扶手前端垂下，近得叫人直想吻它。他想，是不是还是给父母写封信的好呢，他们俩确实都曾（父亲最后在汉堡曾很严厉地）向他提出

过这个要求。当初，在一个可怕的夜晚，当母亲在窗户边上通知他要他去美国时，他自然曾赌咒发誓以后决不写信，可是在这里的新环境中，一个无知少年的这样一个誓言算什么呢？当初他也完全可以发誓，他到美国两个月以后就要当美国民兵将军，而实际上他却是与两个流浪汉一起待在一间阁楼间里，在纽约市郊的一家小客栈里，而且还得承认，他在这里的确找到了自己的适当的位置。他微笑着审视双亲的面孔，仿佛他能从他们脸上看出，他们是否还一直渴望得到有关他们的儿子的消息。

看着看着，他不久便发现，他很疲倦，这一夜实在是挺不过去了。照片从他手中掉落，然后他把脸贴在照片上，照片的凉爽使他的面颊感到舒适，他怀着一种愉快的感觉渐渐入睡。

一大清早，他就被胳肢窝里的瘙痒搔醒。是法国人对他这样放肆胡来。但是爱尔兰人也已经站在卡尔的桌前，比起昨晚卡尔对他们来，他们俩却是颇感兴趣地注视着他。卡尔对于他们起床时没把他吵醒并不感到惊讶，他们居心不良，举止行走根本不会特别轻声的，他没醒是因为他睡得酣，况且穿衣，显然还有洗脸，都没化去他们多少工夫。

于是，他们郑重其事地用某种礼数互相问好，卡尔这才得知，这两个人是钳工，在纽约已经很久没有能找到工作了，所以相当的潦倒。为了证明这一点，鲁滨孙打开自己的上衣，人们可以看见，他没穿衬衫，这一点人们当然从那个松松垮垮缝在上衣后脖上的领子上本来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们打算步行到离纽约有两天路程的小城布特福脱去，据说那里有活儿干。他们不反对卡尔与他们结伴同行，并且答应首先可以给他提提箱子。其次，如果他们自己找到工作的话，便给他弄个学徒工的活干干，只要他们找到工作，这压根儿就是小事一桩。卡尔还没完全表示同意，他们就已经在好心好意地劝他脱下这件漂亮衣服，说是因为它会妨碍他找工作的。说是在这幢屋子里恰好有一个好机会，可以脱手这件衣服，因为这个房间的勤杂女工做服装生意。他们帮助在衣服问题上也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的卡尔脱下衣服，拿起来就走。当被撇下的、有点儿睡眠惺忪的卡尔还在慢慢穿他那件旧旅行服的当儿，他责备自己卖掉了那件衣服，它也许会在谋取学徒工位置时使他受损，但是在谋取一个较好的职位时只会对他有好处。于是乎，他打开房门，想把那两个人叫回来，却已经和他们撞了个满怀，他们把一个半美元币作为卖衣款项放在桌上，看他们那个高兴的样儿，简直没法叫人不相信他们卖衣服

时也捞了一笔，而且还是狠狠地捞了一笔。

不过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勤杂女工走进来，完全和昨晚一样的迷迷瞪瞪，就要把三个人都轰到外面过道里，说是要收拾、整理好这个房间，以便接待新来的客人。可是其实当然满不是这么回事，她只是故意刁难罢了。卡尔正想整理自己的箱子呢，却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人双手抓起他的衣物就使劲往箱子里扔，那力气之大，仿佛它们都是一头头动物，要把它们都扔趴下才解气呢。那两个钳工虽然缠住她，扯住她的裙子，敲她的后背，但是每逢他们想帮助卡尔整理箱子，这一套就全不灵了。当这妇人关上箱子之后，她便把把手塞进卡尔手里，甩开钳工们，把三个人都从房间里轰出去，并威胁说，他们若不听话就没有咖啡喝。这妇人显然已经完全忘记，卡尔并非一开始就是和钳工们一伙的，因为她把他们当做一个团伙来对待了。当然，钳工们把卡尔的衣服卖给她，由此也向她表明了他们有某种共同的属性。

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在过道里来回踱步，尤其是已经挽着卡尔的胳膊的法国人更是骂骂咧咧，威胁说，只要老板敢出来，就要把他揍趴下。他一个劲儿地摩拳擦掌，似乎在作拳击准备动作。终于来了一个无辜的小男孩，他不得不伸长了胳膊，把咖啡壶递给法国人。可惜只有一只壶，人们怎么也无法让那孩子明白他们还要杯子。就这样，总是只能一个人喝，其余两人就站在他面前等着。卡尔不想喝，可是又不愿得罪别人，所以轮到他喝时便无所事事地站着，用嘴唇抵一抵壶。

临别时，爱尔兰人把咖啡壶向石头地板扔去。他们偷偷地离开屋子，走进浓密的、带黄色的晨雾之中。他们一般都并排着寂静无声地沿着马路的边沿走，卡尔还得提着他的箱子，别人大概在他请求下才会替换他。从雾中时不时飞驰出一辆汽车，于是这三个人便扭头看那些通常都是车身巨大的汽车，它们的构造十分引人注目，显现的时间又那么短暂，以致人们连哪怕只是看出是否有人坐在里面的时间都没有。后来，开始出现往纽约送粮食的马车车队，它们分成五列沿着马路的整个路面不停地向前行进，这时简直是谁也无法横过马路。有时候马路逐渐变宽而成一个广场，一个警察在广场中间一个塔状小土冈上来回踱步，他要综观全局并用一根小警棍指挥马路上以及从各小巷汇流到这里的车辆，这些车辆在到达下一个广场、受下一个警察指挥之前便一直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却由沉默不语、全神贯注的马车夫和汽车司机自愿维护着必要的秩序。对于这普遍的安静状态卡尔感到不胜惊讶。若不是有逍遥自

在的供屠宰的牲畜的叫喊声的话，除了马蹄的嗒嗒声和汽车防滑轮胎的嗖嗖声，人们也许就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车辆行驶的速度自然并非总是是一样的。如果在个别广场上由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辆太多而必须作重大调整，各路车队便停滞不前，只是一步一步地行驶，可是随后也会又出现短时间内一切车辆飞快掠过情况，最后，像是受唯一的一个制动器控制似的，它们又渐渐缓和下来。这时，马路上不扬起丝毫尘土，一切都在极清新的空气中移动。步行者是没有的，这里不像在卡尔的家乡，没有一个个市场女贩步行进城，却时不时出现大而低矮的汽车，上面站着20来个背背篓的妇女，也许就是市场女贩，伸长着脖子，极目远眺，巴望着车子能开得快一点。然后，人们看见类似的汽车，几个男子双手插在裤袋里在车上来回漫步。在这些挂着各种标语牌的汽车中的一辆上，卡尔在轻轻一声惊叫声中读到：“雅各布运输行招募码头工人。”这辆汽车恰好驶得极慢，一个站在汽车踏级上的矮小、弯腰、活跃的男子招呼这三个步行人上车。卡尔躲到钳工的背后，仿佛舅舅在车上，会看见他似的。他对这两个人也拒绝这一邀请感到高兴，即便他们拒绝上车时脸上现出的那种高傲神态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他的感情。他们大可不必以为自己是上等人，是不屑于受舅舅雇用的。他立刻便向他们表示了这一层意思，虽然用词自然并不很明确。德拉马什随即便请他最好还是不要干预他不懂的事情，说是这种招募人员的方式是可耻的欺骗，而且雅各布公司在全美国臭名昭著。卡尔不搭茬儿，但是从此便更向着爱尔兰人，他也求爱尔兰人现在给他提一会儿箱子，在卡尔的再三请求下，爱尔兰人也就给他提了。只是，他不断抱怨箱子沉，后来才弄明白，原来他只不过是减轻箱子里的意大利香肠的分量，他大概在旅店店里就已经对它馋涎欲滴了吧。卡尔不得不把香肠从箱子里拿出来，法国人拿过去，拿起他那把匕首形状的小刀便切，几乎完全独自一人把香肠吃光。鲁滨孙只偶尔得到一片，卡尔则一片也没吃着，仿佛他已经预先把自己的那一份吃掉了似的。他不想把箱子扔在马路上，所以只好又把它提了起来。他觉得为一小片香肠而乞讨，这未免太寒碜了，但是他心中感到愤愤不平。

全部雾气都已经消退，一座巍峨的山脉在远处闪闪发光，它的山脊向更远的薄雾蜿蜒伸展。马路边上是耕作粗陋的田地，它们围绕着冒着黑烟耸立野外的大工厂向四周延伸开去。在毫无次序地任意修建起来的兵营式出租楼房里，那众多的窗户一遇震动便跟着在灯光下颤抖，在所有那些单薄的小阳台上，妇女和儿童们忙忙碌碌，而在他们四周则晾挂起来的布块和衣服在晨风中飘动并剧烈鼓起来。目光一移开这些楼房，

人们便看见云雀在高空飞翔，低处则又是燕子，就在离行驶着的人的脑袋上方不太远的地方。

许多东西使卡尔回想起他的家乡，离开纽约，深入这个国家的腹地，他不知道他这样做对不对。纽约靠着大海，随时都有返回家乡的可能。于是他停住脚步，对他的两个同伴说，他又想待在纽约了。当德拉马什想干脆强拉着他往前走时，他就是不走并且说，他总还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行动吧。爱尔兰人不得不居间调解并解释说，布特福脱比纽约漂亮得多，两个人好说歹说了半天，他才又继续往前赶路。即便那样他本来也还是不会走的，倘若他不是考虑到，去一个返回家乡的机会不是那么可以轻易得到的地方，这对他来说也许更有好处。他一定会在那里干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因为在那里就不会有无益的念头来妨碍他了。

现在是他在牵着另外那两个人的手走了，而他们俩对他的热心是感到如此高兴，以致他们不等卡尔相求便主动轮流提箱子，弄得卡尔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让他们变得这样高兴起来的。他们来到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有时他们站住脚，他们一回头便看到整个纽约和纽约港越来越开阔地展现在自己眼前。把纽约和布鲁克林联结在一起的那座桥梁轻柔地悬挂在东方大江的上空，而如果你眯起眼睛，你便会觉得它就颤动。那座桥上似乎没有车辆来往，它下面横跨着那条没有生气的、平滑的水带。两座大城市里的一切似乎空洞而无用地竖立着。形形色色的房屋几乎没有大小之分。在街道的看不见的深处，生活按其自身的方式继续着，但是在街道上空却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得见薄薄的雾气，它虽然不动，但是似乎不费什么劲就可以被驱散。宁静似乎也已经降临到港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了。大概是回忆起从前在近处看到的景象了吧，人们也只是偶或以为看见了一只船，它正在作短距离行驶。可是人们也不能长时间地盯住它，它逃脱视线，消失不见了。

但是德拉马什和鲁滨孙看到的显然要多得多，他们指向右边和左边，伸出双手指点广场和花园的位置，列举出它们的名字。他们无法理解，卡尔在纽约生活了两个多月，除了这座城市的一条街道以外，其他地方几乎什么也没见过。他们答应他，等他们在布特福脱挣够了钱，一定和他一起去纽约，带他去看一切值得一看的地方，当然尤其是要带他去看那些可以让人销魂落魄的地方。说罢，鲁滨孙就使劲唱起一首歌来，德拉马什击掌伴奏，卡尔听出来这是他在家乡听过的一首轻歌剧里

的歌曲，他觉得配上英语歌词，这首歌比他在家里听到过的还要好听。就这样，在野外举行了一场小小的演唱会，三个人都参加演唱，只有下面这座据说风靡这首歌曲的城市似乎对此毫不知情。

有一次卡尔问，雅各布运输行在哪儿？他当即看到德拉马什和鲁滨孙伸出食指指向也许是同一个、也许是相距甚远的不同的地方。当他们继续走路时，卡尔问，他们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攒足了钱回纽约去？德拉马什说，这完全可以在一个月内实现，因为布特福脱缺工人，工资高。说是他们当然要把挣来的钱放在一起，这样，他们作为伙伴在工资上出现的某些差别也就可以得到弥补了。卡尔不喜欢把钱放在一起，虽然他作为学徒工当然比满师的工人挣得少。此外，鲁滨孙还说，如果在布特福脱找不到活儿干，他们当然就得继续往前走，不是在什么地方落脚当农业工人，就是到加利福尼亚去淘金，按鲁滨孙详细讲述的情况来判断，后者是他最心爱的计划。

“既然你们现在想去淘金，那么你们怎么当钳工了呢？”卡尔问，他不喜欢听人说必须进行这种没把握的长途跋涉。

“我为什么当了钳工？”鲁滨孙说，“总不是为了好让我老娘养的儿子饿死吧。淘金可以挣大钱。”

“那是从前。”德拉马什说。

“现在还是。”鲁滨孙说，他讲了许多个淘金致富的熟人的故事，他们还一直在那儿，当然一点儿也不动手了，但是出于老交情愿意帮他，当然也愿意帮他的同伴们发财致富。

“我们会在布特福脱找到工作的。”德拉马什说，并且说出了卡尔的心里话，不过这也并不是一句信心十足的话。

白天他们只在一家酒店歇了一回脚，在酒店前的外面靠着一张卡尔看上去似乎是铁制的桌子旁吃几乎是生的肉，人们用刀叉切不动这肉，而是只能将它撕碎。面包的形状像个滚筒，每一个面包上都插着一把长刀。吃这顿饭时还喝一种烧得嗓子火辣辣痛的黑色液体。德拉马什和鲁滨孙却喜欢喝这种饮料，他们常常为祝贺各种愿望得以实现而举起酒杯，互相碰杯，并且让酒杯互相挨着在空中停留片刻。旁边一张桌旁坐着身穿溅有石灰污斑衬衫的工人，大家都喝那同样的饮料。大量从一旁驶过的汽车将一层层尘土洒向桌面。大张大张的报纸互相传递，人们激

动地谈论着建筑工人罢工，马克的名字不时被提及。卡尔打听这个名字并获悉，这是他认识的那个马克的父亲，纽约最大的建筑业主。这场罢工使他损失几百万，也许危及他的商务地位。对于不了解情况、心怀恶意的这些流言蜚语卡尔一概不信。

此外，卡尔吃这顿饭心里还有一个疙瘩，这就是这顿饭怎样付账还很成问题。顺理成章的做法当然应该是各付各的，可是不管是德拉马什，还是鲁滨孙，他们分明都已经察觉，他们仅存的那点钱已经为昨夜的床位花光了。没看到谁身上有表、戒指或其他什么可以变卖的东西。卡尔总不能说他们卖他的衣服还赚了点钱，说这种话不啻侮辱人、与人绝交。可是怪就怪在，德拉马什和鲁滨孙都不为付账的事发愁。相反，他们性情相当愉快，试图尽量和傲视阔步往来穿梭于各餐桌之间的女招待多搭讪几句。她的头发有些松散地披散在额头和面颊上，她一再用双手自下往上，把披散的头发掠回去。最后，当人们也许正期待着她说出第一句友好的话语的时候，她走到桌子跟前，将双手放在桌子上，问：“谁付钱？”绝不会有谁的手比德拉马什和鲁滨孙的手举得更快的了，他们一齐飞快地举手直指卡尔。卡尔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因为这正是他已经预料到了的，并且觉得，既然他也希望从同伴那里得到某些好处，那么他们让他付几个饭钱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即便在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把这件事情明确谈清楚，这样做本来也许就会显得更体面一些的。为难的只是，他得先把这钱从暗袋里掏出来。他本来曾打算将这钱保存起来以备急需之用，这样就可以暂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与他的同伴们相同的地位。他由于拥有这笔钱、尤其是由于对他的同伴隐瞒拥有这笔财产而获得的这个优势被他的同伴们绰绰有余地抵消掉了，因为他们从小就一直在美国，他们有足够的挣钱的知识和经验，他们毕竟过惯了现在的这种生活，并不习惯更优裕的生活境况。迄今为止卡尔就他的钱所怀有的这些打算其实也不会因付这笔账而受挫，因为四分之一美元他毕竟还付得起，所以不妨可以把一个25美分的硬币搁在桌子上并解释说，这是他仅有的一点钱，他愿意为共同奔赴布特福脱而将它贡献出来。作这趟徒步旅行，有这样一笔钱也完全够了。可是他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零钱，加之这钱以及收放在一起的纸币都放在暗袋的深处呢，要找到暗袋里的什么东西，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里面的全部东西都抖搂到桌子上，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让同伴们获悉有关这只暗袋的什么情况嘛。现在似乎运气不错，同伴们始终还是对女招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并不在意卡尔怎样凑钱付账。德拉马什要女招待结账，从而诱使她来到自己与鲁滨孙之间，她只好把整只手放在这一个或另一个的脸上

并把他推开，避开这两个人的纠缠。这当儿，卡尔使出浑身力气在桌面底下用一只手集拢那钱，用另一只手在暗袋里将那钱一个一个清点并拿出来。虽然他并不十分了解美国货币，最后他还是认为，至少按硬币的数量来看，他的钱够了，并当即将那些硬币放到桌子上。钱币的声响当即打断了笑谑。令卡尔感到气恼、令大家感到惊奇的是，桌面上竟几乎放着整整一美元。虽然没有一个人问为什么卡尔先前只字未曾说起过有这笔钱，有这笔钱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坐火车到波特福脱去的嘛，但是卡尔却感到十分尴尬。付清饭费后，他慢慢把剩下的钱收回，德拉马什竟从他手里拿走一个硬币，他要拿它当小费送给女招待，他拥抱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然后从另一侧把钱递给她。

卡尔感激他们在继续行进途中没有提起这钱的茬儿来，有一阵子他甚至想把他全部财产的底儿告诉他们，但由于没有适当的机会，也就作罢了。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一个颇具乡村风味的、土地肥沃的地方。四周都是整片整片的田地，它们披着嫩绿铺陈在平缓的山丘上，富贵的庄园环绕着马路两旁，人们接连数小时之久都行走在镀金花园栅栏之间，他们多次越过那同一条缓缓流过的河流，他们不时听到头顶上火车在高架桥上轰鸣。

太阳刚从远方森林平坦的边缘落下，它便在一个小丘上的一小簇树林中间坠入草地之中，以便休养精神，舒解疲劳。德拉马什和鲁滨孙躺在地上，尽情地伸展着四肢。卡尔笔挺地坐着，望着脚下几米远处蜿蜒伸展的马路，和整个白天的情况一样，马路上不断有汽车彼此轻捷地疾驰而过，仿佛有人按精确的数目将它们从远处发出，又有人在远方的另一头按同样的数目将它们接收似的。自大清早以来的整整一天里，卡尔没见过一辆汽车停下，没见过一个乘客下车。

鲁滨孙建议就在这里过夜，说是因为他们大家都够累的了，第二天他们可以早一点出发，反正他们天黑以前找不到更便宜、更合适的投宿处所了。德拉马什表示同意，只有卡尔自以为有义务要说明，他带着足够的钱，大家都去住饭店他也付得起。德拉马什说，这钱他们还会用得着的，他应该将它保管好。德拉马什丝毫不隐讳他已经算计上卡尔的钱了。由于他的第一个建议已经被接受，鲁滨孙便进一步解释说，但是为了恢复体力以利于明天赶路，在睡觉以前他们还得好好吃点东西，说是应该派一个人到饭店去给大家把饭买来，那家饭店的“西方饭店”招牌就在近处公路边上闪闪发亮。作为最年轻的人，况且由于别人谁也没应

声，卡尔便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去办这件事，并且在他得到要吃熏板肉、面包和啤酒的口头通知后随即就走进那边的那家饭店。

附近必定有一座大城市，因为卡尔走进饭店的第一座饭厅，就看见里面挤满了大声说话的人群，许多胸前系围裙的招待员在沿着一道纵向墙和那两道横向墙一溜儿摆开的餐柜边上不停地奔走，却还是不能使焦急的客人们感到满意，因为人们一再地在各处听到诅咒声和拳头敲击桌子的声音。谁也没有理会卡尔，饭厅餐桌上也没有人提供服务，客人们坐在极小的、有三个人围坐便显得小得微不足道的桌子旁边，想吃什么，一切都是自己到便餐供应部去取。所有的小桌子上都放着一只装有油、醋等调料的大瓶子，所有从便餐供应部取来的菜肴在食用之前都浇上这只瓶子里的调料。卡尔想先挤到便餐供应部那儿再说，尤其是因为他订的食品量大，所以大概到了那儿困难才真正开始。于是，他不得不从许多餐桌之间挤过去，不管他多么小心翼翼，他往前挤的时候也难免和客人们磕头碰脑的，而客人们则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忍受这一切。甚至有一回，当然也是因为被一个人挤了，卡尔撞在一张小餐桌上，差点儿没把桌子掀翻，人家也毫无反应。他虽然也道歉了，但是显然没被人理解，而且也丝毫都没理解人家对他说的话。

到了便餐供应部那儿，他费了好大劲儿找到一个小小的空当儿，可是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视线被四周邻人支起的胳膊肘挡住了。支起胳膊肘，握着拳头顶着太阳穴，这似乎压根儿就是这里的一种习俗。卡尔不由得想起，拉丁语教授克龙帕博士恰恰就憎恨这种姿势，他总是悄没声地突然走过来猛地抽出一把直尺戏弄似的猛一捋把胳膊肘从桌面上捋下。

卡尔紧紧贴住餐柜站着，因为他刚在这里站稳脚跟，他背后便支起了一张桌子，正在那儿落座的客人中的一个只是在说话时微微那么把头朝后仰了一仰，他的大宽檐帽便重重地擦着了卡尔的后背。挤成了这样，甚至那两个粗胖邻人都已经心满意足地走了，想从招待员那儿得到什么，这个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卡尔几次伸手从桌子上方抓住了招待员的围裙，但是每次总是让这个人扭歪脸挣脱了。哪个招待员也拦不住，他们只是奔走着，一个劲儿奔走着。哪怕只要卡尔身边有什么可吃可喝的东西呢，他一定会要的，他会问清楚价格，把钱放过去，他就会高高兴兴地离去。但是他面前偏偏只放着一碗一碗鲱鱼那样的鱼，黑色鳞片在碗沿闪着金光。这鱼可能很贵，大概也填不饱肚子。而且盛朗姆酒的

小酒杯也够不着，不过他也不想给同伴们带朗姆酒，他们似乎反正一有机会就要弄这种烈性酒喝，他不想再给他们火上浇油了。

所以卡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另找一个位置，一切从零开始。可是现在时光也已经不早了，餐厅另一头的时钟显示出，现在已经过了九点了，瞪大了眼睛，人们从烟雾中将还能看清那只时钟的指针。可是在餐柜旁边，哪儿都比先前那个有点儿偏僻的地方更拥挤。此外，时光越晚，餐厅里的人就越多。不断有新客人带着欢声笑语从正门走进来。有些地方，客人们独断专横地收拾干净餐柜，坐到斜面桌上，互相对饮起来，这是最好的位置，人们俯瞰着整个餐厅。

卡尔虽然还在继续往前挤，但是对于是否真还能弄到什么吃的，他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责备自己不了解当地情况就自告奋勇接受了这桩差使。他的同伴们完全有理由斥责他，甚至还会以为他只是为了省钱才什么也没买回来。现在，他甚至是站在一个四周桌旁都有人在吃热的土豆烧肉美味菜肴的地方，使他费解的是，这些人是怎么弄到这东西的。

这时，他见自己面前几步远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显然是饭店职工的妇女，她正笑着和一位客人说话。她一边说着话，一边不停地用一只发叉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卡尔当即决定去向这个妇女进行订购，首先是因为作为餐厅里唯一的女性对他来说意味着普遍喧嚷和奔跑中的一个例外，其次也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这就是因为她是能向之求助的唯一的——一个饭店职员。当然得有个前提，这就是她不会在听他向她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便跑开办事去。而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卡尔还根本没有主动与她攀谈，而只是稍微窥伺她一下，她便一如人们有时在谈话中间会斜眼看一下旁边那样地朝卡尔望去，并中断了自己的说话，友好地用法文清楚明了的英语问他，他是不是有什么事。

“是有点事，”卡尔说，“我在这里什么也买不到。”

“您跟我来吧，小家伙。”她说，随即告别她的熟人，此人则摘下帽子，这在这里好像是一种极有礼貌的举止。她拉着卡尔的手，走到立式餐柜旁边，把一个客人推向一边，打开斜面餐台上的一扇活动翻板门，越过斜面餐台后面的过道，在那儿人们必须注意那些不倦地奔走着的招待员们，打开一扇双重裱糊门，他们便到了宽大、凉爽的储藏室。“有熟人就是好办事。”卡尔暗自思忖。

“喏，您要什么呀？”她边问边殷勤地对他低下头来。她很胖，她的身体摇晃着，但是她的脸容，当然是相对而言，却几乎显得比较娇嫩。一看到这里架上和桌上小心翼翼码放着许多食物，他几乎禁不住引诱，想订一份更美味可口的晚餐，尤其是因为他可以指望得到这个有权势的女人的优惠。可是由于他一时想不起什么合适的食物，最后他还是又只说了熏板肉、面包和啤酒。

“不要别的了？”妇人问。

“谢谢，不要了，”卡尔说，“不过要三个人的。”

由于妇人问起另外那两个人，卡尔便三言两语简单讲了讲他的同伴的情况，稍许受到别人询问，这使他感到高兴。

“可是这简直是给囚犯吃的饭。”妇人说，显然还在等待卡尔再要点什么。卡尔却担心她会白送给他，不肯收他的钱，所以沉默不语。“这几样东西我们马上就可以配齐。”妇人说，以一种就其肥胖的身躯而言值得钦佩的敏捷向一张桌子走去，用一把既长又薄的锯条形刀切下一大块带着许多肉的板油，从一个架子上拿下一个大面包，从地上拿起三瓶啤酒并把一切全放进一只轻便的草篮子里，把篮子递给卡尔。在这期间，她向卡尔解释说，她之所以带他到这里来，是因为外面便餐供应部的食物受烟雾和各种气味熏烤尽管消费很快却总是不新鲜。但是对于外面的人来说一切都够好的了。卡尔一声也不吭，因为他不知道，他凭什么受到这种特殊照顾。他想到了他的同伴，尽管他们是美国通，他们大概也不会深入到这些储藏室里，而是只好将就着吃便餐供应部的不新鲜的食物。人们在这里听不见餐厅里的喧闹声，墙壁一定很厚，所以才能使这个拱顶地窖保持足够凉爽的温度。卡尔已经将草篮在手里提了一会儿，却不想付钱，也不动弹。只是当妇人后来又要将一只类似外面桌子上的那种瓶子放进篮子里去的时候，他才战战兢兢地表示感谢。

“您还要走很远的路吗？”妇人问。

“一直走到布特福脱。”卡尔回答。

“这还有很远的路呢。”妇人说。

“还有一天的路程。”卡尔说。

“然后就不走了？”妇人问。

“噢，不走了。”卡尔说。

妇人摆放好桌上的几件东西，一个招待员走进来，四下里寻找着什么，后来妇人向他指指一只大碗，碗里放着一大堆沙丁鱼，鱼身上撒着少许香菜，招待员便抬起双手捧着这只碗向外面的餐厅走去。

“您究竟为什么要在露天过夜呢？”妇人问，“我们这里有地方。您在我们这儿饭店里睡吧。”

这对卡尔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因为昨夜他睡得那么糟糕。

“我的行李在外面呢。”他犹豫不决地、并非完全不带虚荣地说。

“行李您带这儿来好了，”妇人说，“这不碍事的。”

“可是我的同伴呢？”卡尔说，并且立刻发现，他们倒真的有点碍事。

“他们当然也可以在这里过夜。”妇人说。

“您就来吧！您不要这么不好意思嘛。”

“我的同伴倒也都是正派人，”卡尔说，“可是他们身上不干净。”

“您没有看见餐厅里那个脏样？”妇人扭歪着脸说，“确实是最邋遢的人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的。我马上让人准备三个床位。当然只好睡在阁楼上，因为饭店客满了，我也搬到阁楼上去了，不过这总比睡在露天强吧。”

“我不能把我的同伴带来。”卡尔说，他想象得出来，这两个人会在这家高级饭店的过道里怎样大声吵闹，鲁滨孙会把什么都弄脏，而德拉马什则肯定会把这位妇人都惹厌烦的。“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妇人说，“可是如果您要这样的话，那么您就让您的同伴待在外面，您独自一个人来我们这儿吧。”

“这不行，这不行，”卡尔说，“他们是我的同伴，我必须和他们待在一起。”

“您真固执，”妇人说并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人家是为您好，很想帮您一把，您却拼命反对。”

这个道理卡尔全明白，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说了句：“我衷心感谢您的好意。”他这才想起，他还没付钱呢，便问该付多少钱。

“这钱您就在给我把这只草篮子送回来的时候再付吧，”妇人说，“最晚明天早晨您得把它还我。”

“好吧。”卡尔说。她打开一扇径直通向室外的门，就在他一鞠躬走出去的当儿还说了句：“晚安，您可是做得不对呀。”他已经走出去几步了，她还冲着他的背影喊：“明天见！”

他刚到外面，就又听见从餐厅传来并不曾减弱的喧闹声，现在这喧闹声中还掺杂着一个吹奏乐队的声响。他为不必穿过餐厅走出去而感到高兴。现在，饭店的六层楼里全都灯火通明，并且照亮了饭店门前的一大段马路。外面始终还有汽车在行驶，虽然已经是断断续续，但是它们从远处驶来时速度比白天更快，用车前灯的白光探测马路的路面，使苍白的车灯光与饭店的光区相交，亮晃晃急忙驶进前方的黑暗之中。

卡尔发现同伴们已经在酣睡，不过他也的确离开得太久了。他正想将带来的食物干净整齐地摆放在他在篮子里找到的纸上，等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去叫醒同伴。这时，他惊恐地发现，他把他的箱子锁着留下的，箱子钥匙还在他衣兜里呢，可是如今这只箱子却完全打开了，箱里的一半衣物散落在四周的草地上。

“起来！”他喊道，“你们还睡大觉呢，小偷光临过了。”

“短什么东西了吗？”德拉马什问。鲁滨孙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便伸手去抓啤酒。

“我不知道，”卡尔叫喊，“可是箱子开着呢。躺下睡大觉，将箱子扔在这里不管，这是一种轻率行为。”

德拉马什和鲁滨孙哈哈大笑，前者说：“下一回您可别离开这么久。饭店离这儿十步远，而您一来回需要三个小时。我们饿了，曾以为您的箱子里可能有什么吃的东西，把这锁鼓捣了半天才把它鼓捣开了。不过，箱子里什么吃的也没有，您把这些东西都好好装回箱子里去吧。”

“原来如此。”卡尔说，眼睛盯着正在腾空的篮子，耳朵听着鲁滨孙喝啤酒时发出的特有的响声，因为这啤酒先深深灌进咽喉，随后却带着一种口哨声又反弹回来，然后才大口大口喝下肚去。

“你们已经吃完了吗？”看到那两人喘气想歇一会儿，他便问。

“难道您没有在饭店里吃过什么？”德拉马什问，他以为卡尔是在要他的那一份。

“如果你们还要吃，那就快点吃。”卡尔边说边向他的那只箱子走去。

“他好像耍脾气了。”德拉马什对鲁滨孙说。

“我没有耍脾气，”卡尔说，“可是，乘我不在砸开我的箱子，把我的东西全扔出来，这种做法难道合适吗？我知道，大家是伙伴嘛，有些事就得忍着点，对此我也是做了思想准备的，但是这件事太过分了。我要在饭店里过夜，我不去布特福脱了。你们快吃完，我得把篮子送回去。”

“鲁滨孙，你瞧，他这样说话，”德拉马什说，“这是文雅人的说话方式。他是个德国人嘛。你一开始就告诫我要提防着他点，可是我真是个大傻瓜，还是带着他上路了。我们相信他，拖着他走了一整天，至少因此而丧失掉了半天的工夫，而现在——因为那儿饭店里不知哪个人勾引了他——他要告辞了，干脆就告辞了。但是由于他是个虚伪的德国人，所以他不公然这样做，而是找箱子作借口，又由于他是个粗暴的德国人，所以我们拿他的箱子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不伤害我们的名誉，不称我们是贼，是不会离去的。”

卡尔收拾行李，没有转身：“您尽管这么说好了，您就让我走得心里宽舒些。我很清楚，什么是友情。我在欧洲也曾有过朋友，没有一个朋友会说我对他虚伪或粗野。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联系了，但是如果我再次回到欧洲的话，他们都会热情接待我，立刻承认我是他们的朋友。而您，德拉马什，还有您，鲁滨孙，你们这么热情，关心我，答应在布特福脱给我找一个徒工职位，这事我决不会忘记的，我会出卖你们吗？可是现在是另外一码事嘛。你们一无所有，这丝毫也没有在我的心目中贬低了你们的地位，可是你们忌妒我的这一点点财产并因此而试图羞辱我，这样的事我不能忍受。而且，你们砸开我的箱子以后，你们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还骂我，进而还骂我的民族——可是您这一骂，也

骂得我实在没法再和你们待在一起了。顺便说一句，鲁滨孙，这些话本来都不是针对您的。对您的性格我只有一点意见，这就是您太依赖德拉马什了。”

“我们总算看见了，”德拉马什说，他走到卡尔跟前，轻轻推了他一下，像是为了让他注意，“我们总算看见了，您是怎样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的。您整天都跟在我后面走，拉着我的衣服，模仿我的每一个动作，平时像小老鼠一样一声不响。可是现在，因为您感觉到饭店里有人支持，所以您说起话来腰板儿就硬了。您是个小滑头，我还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平心静气地忍受这件事。您白天从我们身上学去的知识，我们要不要让您付学费呢。你，鲁滨孙，我们妒忌他——这是他说的——妒忌他的财产。在布特福脱干一天活——加利福尼亚就更甭提了——我们挣的钱就比您露给我们看的以及您在您那件上衣里可能还藏着的多十倍。哎哟，讲话留点神吧！”

卡尔整理好箱子站起来，看见睡眼惺忪，但是喝了啤酒已经有了点生气的鲁滨孙也正在走过来。“如果我还在这里久留的话，”他说，“我或许还会遭到别的意想不到的事件。您似乎想揍我吧。”

“一切忍耐都是有限度的。”鲁滨孙说。

“鲁滨孙，您还是别说话的好，”卡尔说，眼睛紧紧盯着德拉马什，“在内心里您同意我的意见，可是表面上您却必须站在德拉马什的一边。”

“您也许想收买他吧？”德拉马什问。

“我没这个意思，”卡尔说，“我为我的离去而感到高兴，我不想再和你们当中的任何人打交道了。只有一点我还想说一说。您曾指责我，说我有钱，把钱藏起来不让您看见。假定这是真的，对于我才认识了几个小时的人，我这样做不是做得很对吗，而且您不是还在用您现在的行为证明着这样一种行为方式的正确性吗？”

“你别动。”德拉马什对鲁滨孙说，虽然鲁滨孙并没有动一动。然后，他问卡尔：“既然您如此厚颜无耻得坦率，既然我们如此无拘无束地站在一起，那么，您索性就再坦率一次，您就坦白承认，您究竟为什么要到饭店里去。”卡尔不得不越过箱子退后一步，因为德拉马什向他逼近过来，离他很近了。但是德拉马什不受迷惑，把箱子推到一边，向前跨

进一步，一脚踩着了一只落在草地上的白色衬衫假领，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像是作出回答似的，一个手持一只闪着强光的电棒的男人从马路那边向这几个人走来。那是饭店的一位服务员。他一看见卡尔就说：“我几乎已经找了您半个小时了，马路两边各个斜坡我全都搜索遍了。女厨师长太太要我告诉您，她借给您的那只草篮子，她现在急着要用呢。”

“篮子在这儿。”卡尔用一种因激动而显得惴惴不安的声音说。德拉马什和鲁滨孙故作谦逊地走到一边去，这是他们在陌生的、境况良好的人的面前的惯常做法。服务员接过那只篮子，说道：“女厨师长太太还问您，您是不是考虑过了，愿不愿意在饭店里过夜。也欢迎另外两位先生去，如果您愿意带他们去的话。床位已经准备好。今晚天气暖和，可是睡在这里，睡在这块坡地上，这可绝不是没有一点危险的事，这里经常有蛇。”

“既然女厨师长太太如此友好，那我就接受她的邀请了。”卡尔说并且等着他的同伴们作出某种表示。可是鲁滨孙毫无表情地站着，而德拉马什则双手插在裤兜里，望着天空的星星。两个人显然指望着卡尔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带走的。

“既然如此，”服务员说，“那么我的任务就是带您进饭店，给您提行李。”

“劳驾，请您再稍许等一会儿。”卡尔边说边弯腰将尚还散落在四周的几件衣物放进箱里。

突然，他直起腰来。那张照片没了，它放在箱子的最上层，如今哪儿也找不着了。一切都齐全，只缺那张照片。“我找不到那张照片了。”他用请求的口吻对德拉马什说。

“什么照片？”此人问。

“我的父母的照片。”卡尔说。

“我们没见过照片。”德拉马什说。

“里面没有什么照片呀，罗斯曼先生。”鲁滨孙也在一边证实说。

“可是这怎么会呢？”卡尔说，在他的求助的目光下，服务员走近过来。“照片本来放在上面的，现在照片不见了。你们别拿我的箱子寻开心呀！”

“不可能搞错的，”德拉马什说，“箱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照片。”

“对我来说，这张照片比箱里所有的其他物品都更重要。”卡尔对服务员说，服务员走来走去，在草地中寻找。“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我得不到第二张的了。”当服务员停止作毫无希望的寻找时，卡尔还说：“这是我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我父母的照片。”

于是，服务员直言不讳地大声说：“也许我们还可以搜一搜先生们的口袋吧？”

“对，”卡尔立刻说，“我必须找到这张照片。但是在我搜查口袋之前，我还是说，谁主动把照片给我，谁就可以得到这整箱的东西。”在普遍静场了片刻之后，卡尔对服务员说：“我的同伴们显然希望我们搜查口袋，但是即便现在我也甚至答应，在谁的口袋里找到照片，我就把整只箱子给谁。多了我拿不出来。”

服务员立刻动手搜查德拉马什，他觉得此人比鲁滨孙难对付，所以就把鲁滨孙交给卡尔去处理。他提醒卡尔注意，必须同时搜查这两个人，因为不然的话，其中的一个可能就会偷偷地将照片藏匿起来。卡尔一伸手就在鲁滨孙的口袋里摸到一条属于他的领带，但是他没有拿走领带，却对服务员喊道：“不管您从德拉马什身上找到什么，请您全给他留下。除了照片以外，别的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照片。”

摸上衣胸前的里袋时，卡尔的手触着了鲁滨孙的热烘烘、油腻腻的胸脯，他当即意识到，他这样对待他的同伴也许是很不公正的。他尽快匆匆摸了摸口袋。而且，一切都是枉然，既没有在鲁滨孙身上，也没有在德拉马什身上找到那张照片。

“没有办法。”服务员说。

“八成是他们已经把照片撕碎并且把碎片扔掉了，”卡尔说，“我以为他们是朋友，可是他们净想着在暗地里伤害我。其实这不是鲁滨孙干的，他才不会想到这张照片对我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可是德拉马什却干得出来。”卡尔只看见自己面前的服务员，他的电棒亮了一个小圆圈，

而其他一切，也包括德拉马什和鲁滨孙，则都在一片深深的黑暗之中。

现在当然根本谈不上带这两个人到饭店里去了。服务员把箱子一抡抡到肩上，卡尔拿起草篮子，他们走了。卡尔已经到了马路上，他若有所思停止前进，站住脚，向上对着一片黑暗喊道：“你们听着，你们中间哪个要是还有那张照片，愿意给我送到饭店里来——他仍还可以得到这只箱子，而且，我发誓，他决不会受到告发。”没有真正的答复传下来，只听见一句不连贯的话，鲁滨孙刚开始喊出声来，德拉马什显然立刻就将他的嘴堵住了。卡尔还等了好一会儿，看上面他们会不会改变决定。他间隔着喊了两次：“我还一直在这儿哪！”但是没有声音作出回答，只有一次顺坡滚下来一块石头，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没有扔准。

西方饭店

一到饭店，卡尔立刻就被带进一间类似办公室的房间，女厨师长手里拿着一本备忘录，正在那里向一个年轻的女打字员口授一封信。极其精确的口授声，熟练而富有弹性的打字机键盘的弹击声急促追逐着只是偶或可以听得见的挂钟的滴答声，那挂钟几乎已指向11点半。“好了！”女厨师长说，合上记事本，女打字员一跃而起，把木盖罩在打字机上，在做这一机械性工作时眼睛始终没离开卡尔。她看上去还像个女学生，她的围裙熨得非常讲究，譬如两肩都带着波纹，头发蓄得高高的，看了这些细节之后再看她那张严肃的面孔，人们不免有点感到惊异。先向女厨师长、后向卡尔欠了欠身之后，她便离去，卡尔则不自觉地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望着女厨师长。

“好哇，您到底来了，”女厨师长说，“您的同伴呢？”

“我没有带他们来。”卡尔说。

“他们大概一大早就上路的吧。”女厨师长说，好像是在向自己解释这件事情似的。

“难道她会不想到，我也要一起上路的吗？”卡尔暗暗问自己，为了排除任何怀疑所以便说：“我们闹翻了。”

女厨师长似乎把这理解成为一则愉快的消息。“这么说，您现在自由了？”她问。

“是的，我自由了。”卡尔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无用的了。

“您听着，您不想在这儿饭店里弄个差事干干吗？”女厨师长问。

“很愿意，”卡尔说，“可是我的知识少得可怜，譬如我连打字都不会。”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女厨师长说，“也许您暂时只得到一个小小的职务，然后您就得争取通过勤奋和谨慎步步高升。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在某个地方站住脚跟总比到处闲荡要好些，要可取些。我觉得您不适合到处闲荡。”

“所有这些看法舅舅也会同意的。”卡尔暗自思忖并赞许地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他想起来，人家这么为他操心，可他还没作自我介绍。

“噢，请您原谅，”他说，“我还没有作自我介绍，我叫卡尔·罗斯曼。”

“您是德国人，对吗？”

“是的，”卡尔说，“我来美国的时间还不长。”

“您是哪里人？”

“波希米亚布拉格人。”卡尔说。

“您瞧，”女厨师长操着带浓重英语腔的德语说，几乎把胳膊也举了起来，“那我们就是同乡了，我叫格蕾特·米策尔巴赫，是维也纳人。布拉格我熟悉极了，我曾在文策尔广场的金鹅饭店里干过半年。您想想这有多巧。”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卡尔问。

“这已经是许多年，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老金鹅饭店，”卡尔说，“已经在两年前拆掉了。”

“是呀，当然。”女厨师长说，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了。

但是她突然又变得活跃起来，抓住卡尔的双手喊道：“现在，既然已经证实您是我的同乡，您无论如何也不可以离开这儿了。您决不可以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譬如您愿意当开电梯工吗？只要您说一声愿意，那您就当上了。您已经跑过一些地方，想必您也知道，谋到这样的职位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开端。您会接触到所有的客人，人们总是见到您，人们让您去办些小差事。总之，您每天都有机会，您会有出息的。其余的事就全包在我身上了。”

“开电梯工我很愿意当。”稍过片刻卡尔说。以读过5年中学为由而对开电梯工的职务抱有顾虑，这未免太荒唐了。在这儿美国，其实倒是蛮有理由为这五年中学感到羞愧的。况且，那些开电梯工一直很中卡尔的意，他觉得他们就像是饭店的装饰品。

“不要求具备语言知识吗？”他还问。

“您会说德语，又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这足够了。”

“英语是我到美国以后两个半月内才学会的。”卡尔说，他以为，他不可以隐瞒自己的这个唯一的优势。“这说明您有足够的有利条件，”女厨师长说，“现在我回想起，英语曾给我造成了多大的麻烦。这当然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昨天我还谈到过这件事。因为昨天恰好是我的50岁生日。”说罢，她面带笑容试图从卡尔的面部表情上看出这50大寿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那我祝您生日快乐。”卡尔说。

“这可是一个人随时都用得着的。”她说，握了握卡尔的手，因在用德语交谈时想起的这句古老的家乡俗语而变得有些忧郁了。

“可是我在这里耽误您的时间了，”随后她大声说道，“您一定很累了，有什么事我们明天白天再谈吧。遇到了一个同乡，一高兴就把人高兴糊涂了。您来吧，我领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我还有一个请求，女厨师长太太，”卡尔望着桌上的电话机说，“明天，也许是一大清早，我从前的同伴会给我送来一张照片，我急需这张照片。可以劳您驾给门房打个电话，请门房让来人来见我，或者让我去见他们？”

“可以，”女厨师长说，“可是让门房替您把照片收下，这不行吗？可不可以问一下，这是一张什么照片？”

“这是一张我父母的照片，”卡尔说，“不行，我得亲自和来人谈谈。”女厨师长不再说什么，打电话给门房值班室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她在电话里说了卡尔的房间号码是536。

然后，他们穿过一扇与大门对着的门，走到外面的一条小过道上，看见一个小个儿开电梯工靠在栏杆边上打瞌睡。“我们可以自己开电梯。”女厨师长小声说，让卡尔走进电梯。“一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这对于这样一个男孩来说确实是太长了点了。”随后她说，他们乘电梯向上，“但是这种怪事就出在美国。譬如这儿这个小家伙，他也是半年前才同他父母一块儿到这儿来的，他是意大利人。现在看他那模样，仿佛他

顶不住这工作，面孔瘦削，上班时睡着了，虽然他生性殷勤热情——但是他还只需要在这里或在美国的别的什么地方干半年，便可毫不费劲地顶住一切困难，5年以后他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了。这样的例子我给您讲几个小时也讲不完。不过，我根本没想到您，因为您是个壮实的孩子。您今年17岁，嗯？”

“下个月我满16周岁。”卡尔回答。

“甚至才16岁！”女厨师长说，“好好干吧！”

到了楼上，她把卡尔领进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作为阁楼虽然有一堵墙是斜的，但是在两个白炽灯泡的照耀下却显得起居很舒适。“陈设简陋，您别见怪，”女厨师长说，“因为这不是饭店的客房，而是我的三间一套的住房中的一个房间，所以您丝毫不妨碍我。我插上套间的房门，您就可以随意待在房间里。明天，作为饭店的新雇员，您自然就会有您自己的一间小房间。倘若您和您的同伴一起来，那我就叫人给你们在勤杂工睡的通铺房里搭张铺了，但是由于您现在是独自一人，我想，您还是住这儿合适，哪怕您只得睡在一张沙发上。现在您好好睡一觉吧，养足了精神好干活儿。明天的活儿还不会太累。”

“我衷心感谢您的一片好意。”

“等一等，”她在门口站住脚说，“您这样可是不一会儿就会被吵醒的。”说着，她走向房间的一扇边门，敲门喊道：“特蕾泽！”

“什么事，女厨师长太太。”小女打字员应声道。

“早晨叫醒我的时候，你得从过道走，这儿房间里睡着一个客人呢。他累极了。”她说这句话时，对着卡尔笑了笑，“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女厨师长太太。”

“那好吧，晚安！”

“祝您晚安。”

“几年来，”女厨师长解释说，“我就一直睡眠很不好。现在我可以对我的职位满意了，本来就没有什么要发愁的了。但是这准保是我从前的忧愁带来的不良后果，造成我今天的这种失眠。要是凌晨三点能入睡，

我就很高兴了。但是由于我5点，最晚5点半就得上班，所以我不得不让人叫醒我，而且叫醒我时还得特别小心，别让我那业已紧张的神经变得更紧张。平时喊醒我的正是这个特蕾泽。不过现在您确实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简直扯个没完。晚安！”尽管她体态臃肿，她却几乎轻捷快步地走出了房间。

卡尔巴不得睡上一觉，因为这一天下来他已是疲劳不堪。他根本不敢奢望还会有比这更舒适的环境可以让他美美地睡上一大觉。虽然与其说这个房间是作卧室用的，还不如说它是一间起居室，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女厨师长的一间会客室，而且还特意为他搬来了一张盥洗台供他今晚使用。然而，卡尔却并不觉得自己是个闯入者，而是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受到更好的照料罢了。他的行李箱已拿来放好，大概已有好长时间没处于比这里更安全的场所了吧。一只上方罩有一条大网眼羊毛毯的、带活动格层的矮柜上，摆放着各种带镜框的和夹在玻璃下面的照片。参观房间时，卡尔在柜前站住脚，仔细观看照片。大多是些旧照片，照片上的人多数是女孩子，她们身穿旧式、不舒适的衣服，头戴松弛、小而高耸的宽檐帽，右手拄着一把伞，脸对着观者，目光却避开观者。在男人的照片中，一位年轻士兵的照片特别引起卡尔的注意，他已将小便帽放在一张小桌上，蓄着一头蓬乱的黑发挺直身子站着，脸上堆着一片骄傲的、却受到抑制的笑容。照片上，他的制服上的纽扣被人在事后涂上了金色。所有这些照片八成还是在欧洲拍的呢，人们本来也很可能会在照片的反面看出这一点来的，但是卡尔不想去拿它们。一如这些照片在这里这样放着，他本来也想把他父母的照片这样摆放在他未来的房间里的。

为了他的女邻居的缘故，卡尔尽量轻手轻脚，彻底擦洗了一下身上。正当他擦洗完毕后伸展四肢躺在他的沙发榻上准备享受甜蜜的睡眠的时候，他好像听见有人在轻轻敲击一扇房门。人们无法马上断定，是哪扇房门，也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响声。这声音也没有马上就重复出现，而正当卡尔几乎就要睡了的时候，那声音却又响了。但是现在没什么可疑的了，是敲门声，是从女打字员的那扇房门那儿传来的敲门声。卡尔踮着脚尖跑到门边，用小到即使隔壁有人在睡觉也不会把任何人吵醒的声音问：“您有什么事吗？”

马上传来同样小声的回答：“您不想把门打开吗？钥匙插在您那一边呢。”

“行，”卡尔说，“只是，我得先穿上衣服。”

出现片刻的寂静，随后那边说：“这就不必要了。您开开门后就躺到床上去，我等一会儿。”

“好吧，”卡尔说，也这样做了，而且他还拧亮了电灯，“我已经躺下了。”随后他便稍许大声一点说。话音刚落，小女打字员也就已经从她那间黑糊糊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穿着在下面办公室里穿的衣服，看来整个这段时间里她一直没想到要睡觉。

“请您多多原谅，”她稍稍弯下身子站在卡尔床榻前说，“还请您别把我泄露出去。我也不想打扰您多久，我知道您已累了。”

“没那么严重，”卡尔说，“可是我也许还是穿上衣服的好。”他不得不伸直身子躺着，为的是可以齐脖上盖住身子，因为他没穿睡衣。

“我只待一会儿，”她说，并伸手抓住一把椅子，“我可以坐到沙发榻旁边来吗？”

卡尔点点头。于是，她紧挨沙发榻坐下，卡尔不得不将身子往墙边挪了挪，以便可以仰头看到她。她长着一张匀圆脸，只是额头高得异乎寻常，不过这也许只不过是她的发式不太合适的缘故吧。她的衣服干净、整齐。她的左手捏着一条手帕。

“您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吗？”她问。

“还没完全决定，”卡尔回答，“但是我想，我会留下来的。”

“那就很好，”她说，并用手帕擦了擦自己的脸，“我在这儿孤零零一个人。”

“这就怪了，”卡尔说，“女厨师长太太对您可友善啦。她根本就不像对待一个雇员那样对待您。我本来还以为你们是亲戚呢。”

“哦，不是的，”她说，“我叫特蕾泽，贝希托尔德，我是波美拉尼亚人。”

卡尔也作了自我介绍。随后，她便第一次正眼望着他，仿佛这一通姓名他觉得他更陌生了一点了。他们沉默了片刻。随后她说：“您可不要

以为我是个不知感恩的人。没有女厨师长太太，我的境况就要糟糕得多。以前我在这家饭店里当过帮厨女工，而且差一点已经被解雇了，因为我干不了那繁重的活儿。这儿的人要求很高。一个月以前，一个帮厨女工仅仅由于过度劳累而晕倒了，在医院里躺了14天。我的身体不是很强壮，从前我吃过许多苦，所以有点儿发育不良，您一定看不出我已经18岁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强壮一些了。”

“这儿的活儿想必确实一定很累，”卡尔说，“刚才在楼下我就看见一个开电梯的孩子站着睡着了。”

“可是开电梯工的境况还是最好的呢，”她说，“他们挣的小费可多啦，干的活毕竟也远不如厨房里的人辛苦。可是有一回，我确实很走运。有一次，女厨师长太太需要一个女孩子去给一个宴会摆餐巾，派人下来到我们帮厨女工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儿有将近50个这样的女孩子，我恰好被选中，并且很使她感到满意，因为摆餐巾这活儿我一直很在行的。于是，从那时候起，她就把我留在她的身边，渐渐地把我培养成了她的秘书。我跟着她学到了许多东西。”

“有那么多要打字的吗？”卡尔问。

“啊，多着呢，”她回答，“这一点您可能根本想象不到。您已经看到，今天我一直工作到11点半，而今天还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当然我也不是老是打字，城里我还有许多事要办呢。”

“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卡尔问。

“这个您不知道？”她说，“拉美西斯。”

“这是一座大城市吗？”卡尔问。

“很大，”她回答，“我不喜欢进城去。可是您莫非真的想睡觉了吧？”

“不，不，”卡尔说，“我还根本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

“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不是一个容易伤感的人，但是如果确实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话，那么，现在终于有人听我讲话，我也就感到幸运了。在楼下餐厅里我就已经看见您了，我恰好来叫女厨师长太太，看见她正领着您到食物贮藏室里去。”

“那个餐厅大得吓人。”卡尔说。

“我已经完全不觉得它大了，”她回答，“可是我方才只是想说，女厨师长太太确实对我很亲切，只有母亲才会对我这样亲。可是我们在职位上差别实在太大了，就无法推心置腹地和她说话。从前，在帮厨女工中我曾有过几个知心朋友，但是她们早就不在这儿了，而新来的女孩子们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有时，我竟觉得，我干现在的工作比干从前的工作还吃力，可是我还不如从前干得好，女厨师长太太只是出于同情才让我留在我现在的这个岗位上。说到底，还真的要受过比较好的学校教育才能当秘书哩。说这话是个罪过，可是我常常担心自己会精神错乱，天哪。”她突然以快得多的速度说并轻捷地伸手握住卡尔的肩头，因为他的双手在被子下面呢，“可是您不许向女厨师长太太吐露一个字，否则我真的就完蛋了。我工作不得力，已经给她造成了麻烦，如果我再给她添加烦恼，那我就真的惨了。”

“我当然什么也不会对她说的。”卡尔回答。

“那就好，”她说，“您就留在这儿吧。您留下，我会感到高兴的，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互相帮助。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我马上就对您产生了信任。可是，尽管如此——您看，我这个人多坏——我也产生过恐惧，我怕女厨师长太太会让您顶替我当秘书并将我解雇。刚才您在楼下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儿坐了很长时间，我才把这件事情想通了。我觉得，您接手我的工作，这甚至是件大好事，因为您肯定更胜任这些工作。要是您不愿干到城里去跑腿的事，这些活儿可以仍然由我来干。不然的话，我可是在厨房干活一定会更有用武之地的，尤其是因为现在我的身体也已经变得强壮一些了

“事情已经办妥了，”卡尔说，“我当开电梯工，您仍然当女秘书。如果您把您的这些打算向女厨师长太太哪怕透露那么一丁点儿，我就把您今天对我说的其他的话也透露出去，尽管我会因此而感到难过。”

这种口气使特蕾泽感到如此激动，以致她竟扑倒在床上，啜泣着把脸埋进被褥里。

“我什么也不说，”卡尔说，“可是您也不许说什么。”

这时，他再也不能完全藏身在被子下面了，稍稍抚摩她的胳膊，找不到一句合适的可以安慰她的话，只是心里在想，这儿的日子真不好

过。她终于平静下来，平静到起码为自己哭泣觉得羞愧了，感激地望着卡尔，劝他明天好好睡一觉，并答应，如果抽得开身，就在八点左右上楼来叫醒他。

“叫醒人您倒是挺在行的。”卡尔说。

“嗯，有些事我干得来。”她说，用手轻柔地掠了一下他的被子向他告别，跑进她的房间里去。

第二天，卡尔坚持马上上班，虽然女厨师太太想在这天放他的假，让他去逛逛拉美西斯城。但是卡尔坦率陈述，说是逛拉美西斯城以后还会有机会，现在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开始工作，因为一项为另一个目的的工作他已经在欧洲无谓地中断了，如今开始当开电梯工，而那些比较能干的男孩在他现在这个年龄起码都快要按自然顺序承担更高级的工作了。说是他从当开电梯工干起，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必须特别抓紧时间，这同样也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逛城市，他决不会快活的。特蕾泽要他走一条捷径，他连这条捷径也决定不去走。他脑海里总是浮现着这样的想法，即倘若他不努力的话，他到头来可能会落得和德拉马什和鲁滨孙相同的下场。

在饭店裁缝那儿，他试穿开电梯工制服，那些制服缀有金纽扣和金绿带，外表显得很华贵，可是一穿起来，卡尔不禁微微打了一个寒颤，因为特别是上衣的腋下寒丝丝、硬梆梆的，还带着在他之前穿过这件衣服的开电梯工留下的永不干涸的汗渍。主要是制服的胸上方部位还得特意为卡尔加宽，因为十套现有的制服中没有一套他能将就着穿的。尽管这项缝纫活非做不可，虽然裁缝师傅似乎十分顶真——制服交付后两次经裁缝的手退回车间返工，一切都在几乎不到5分钟之内全解决了——而卡尔在离开试装室时则已是个身穿贴身裤子和一件紧巴巴短上衣的开电梯工。尽管裁缝师傅口口声声说短上衣不紧，可是卡尔穿在身上却憋闷得一再要作深呼吸运动，因为他想知道，他还能不能随时进行呼吸。

随后，他到侍者总管那儿去报到，他将在这个总管的手下干活。这是一个身材颀长、相貌堂堂的大鼻子男子，年龄在40岁上下。他连和卡尔寒暄几句的时间也没有，仅仅是按铃叫来了一名开电梯工，还恰巧就是卡尔昨天见过的那个。总管只叫他的教名吉阿科莫，卡尔后来才弄清楚这个教名，因为凭英语发音是没法听出这个名字来的。这个男孩便接到了向卡尔讲解开电梯要领的任务。可是他是如此胆怯和匆忙，以致尽

管从根本上来说有待讲解的要领很少很少，卡尔却几乎连这很少的几个要领也未能从他那儿学到手。吉阿科莫肯定也很恼火，显然由于卡尔的缘故他不得不离开开电梯的岗位，被分配给女服务员去当下手，按照某些他不肯说出口来的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他觉得这是一件有损他名誉的事。卡尔特别感到失望的是，一个开电梯工和电梯机械装置的关系仅仅是简单按一下电钮将电梯开动而已，而修理传动机构则完全是饭店机修工的事，所以譬如吉阿科莫尽管已经开了半年电梯却既没有亲眼见过地下室里的传动机构，也没有亲眼见过电梯内部的机械装置，虽然据他直言相告，他是很想开开这个眼界的。这压根儿就是一桩单调乏味的工作，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白班和夜班交替着干，按吉阿科莫的说法，这活儿累得简直叫人无法忍受，假如不会站着睡几分钟觉的话。卡尔听了什么话也没说，但是他心里明白，恰好是这种本事让吉阿科莫丢了这份差事。

卡尔开的电梯只管最高的那几层，这正中卡尔的下怀，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必和很苛求的富人们打交道了。不过话说回来，人们在这里也不能像在别处那样学到许多东西，这活儿也只是对初出道的人来说才是个好差事。

过了第一个礼拜之后，卡尔便认识到，他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他那部电梯里的黄铜部件擦得锃亮，其余的三十部电梯中没有一部可以与之媲美。假如与卡尔同开这部电梯的那个男孩哪怕只是近似于这么勤奋并且并不因为卡尔勤奋就觉得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偷懒的话，那么，它们也许还会更加金光闪亮。那人是个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名叫雷内尔，是个黑眼睛、面颊平坦而略显凹陷的爱打扮的男孩。他自己还另有一套漂亮的西装，晚上不当班时，他便穿上这身西装，洒上点香水，急匆匆进城去。有时他也请卡尔晚上给他代班，说是因为他得出去给家里办点事。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衣着打扮同这类托辞自相矛盾。尽管如此，卡尔能容忍他。而且，每逢这样的晚上，雷内尔身穿自己的西装外出之前，总要到下面电梯旁在他面前站住脚，一边将手套套在手上，一边还稍稍表示歉意，随后便穿过走廊离去。每逢这种时候，卡尔还感到高兴呢。不过，卡尔给他代班，也只不过是给他帮个忙而已。他觉得，向一个年龄较大一点的同事效这份劳，这在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理所当然的，老这么干那是不行的。因为没完没了地在电梯里上上下下实在是够累的，况且在晚上的钟点里电梯几乎一直得不停地开着。

不久，卡尔也学会了深施短促的鞠躬礼，这是开电梯工都必须学会的，而且小费他也接得飞快。小费迅速塞进他的背心口袋里，谁也无法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判断出，小费是多还是少。他格外殷勤地给女士们开电梯门，跟在她们后面慢慢一跃进入电梯，她们生怕弄坏了裙子、帽子和悬挂着的饰物，进电梯时一般都比男士们迟缓。电梯行驶时他紧靠着门口站着，背对着他的乘客，因为这样最不惹人注意，并且用手握着电梯的门把手，为的是好在电梯停靠的瞬间可以迅速向一边推开电梯门而又不致把乘客吓着。电梯行驶过程中，偶尔会有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询问一件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仿佛正等着人家问他似的，他便会急忙转过身来，并用响亮的嗓音给予回答。尽管有许多部电梯，还是常常会拥挤，尤其是在剧院散场或某几次特别快车到达之后更是拥挤不堪，以致乘客刚一出电梯门到达楼上，他马上又得向下飞奔，去接在那儿等候的客人。他也可以拉一根从电梯间穿过的钢丝绳，提高平常速度，然而这是电梯操作规则上明令禁止的，而且这样做也有危险。当电梯里载有乘客的时候，卡尔从不这么干，但是如果他已在楼上将乘客送出电梯，而下面另有客人等着，他便毫无顾忌，像个水手那样用力地、有节奏地一把一把拉那钢丝绳。而且他也不知道，别的开电梯工也是这么干的，他不愿意让别的开电梯工抢走了他的乘客。个别久住这家饭店的客人——这种情况在这里相当普遍——偶或露出一丝笑意表示他们把卡尔看作是自己的开电梯工，卡尔表情严肃、内心却愉快地领受这份好意。有时候，如果乘客比较稀少，他也能接受某些特殊的小差事，譬如给一位不愿再烦神回自己房间去的客人取一件落在房间里的小物件，于是他就独自乘着他那部在这样的时刻令他倍感亲切的电梯飞快上楼，走进那间陌生的房间。他从未见过的稀罕物件通常不是到处乱放在房间里便是挂在衣钩板上，感觉到一块外国肥皂、一种香水、一种漱口药水的特殊气味，丝毫没有多耽搁时间便拿着通常是尽管交代得不清楚也找到了的物件又飞快返回。他常常为不能承接更重要的差事而感到惋惜，因为这类事都由专门的仆人和跑腿的男孩去干，他们出门办事都骑脚踏车，甚至骑摩托车。卡尔只能在时机有利时干些从客人的房间到餐厅或游乐厅的跑腿的差事。

每逢他干完12个小时的活之后接连三天于晚上6点，接下去又接连三天于早晨6点下班的时候，他总是如此疲惫不堪，以致他顾不得看上旁人一眼，便径直上床睡觉。他的床就在开电梯工的集体大寝室里，女厨师太太的影响力也许确实并不像他在第一天晚上所想象的那么大，她虽然尽力想给他弄个自己的小房间，而且这事她大概也几乎快要给办

成了。但是由于卡尔看到，这事造成了多大的麻烦，为这件事女厨师长太太和她的上司、那么忙得不得了的侍者总管通了多少次电话，他便主动放弃这个要求并指出，他不愿意因为享受到一种并非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好处而受到别的开电梯工的妒忌，从而使女厨师长太太相信他主动提出放弃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这间大寝室当然不是什么安静的卧室。由于每一个人不尽相同地在这十二个小时的业余时间里吃饭、睡觉、娱乐、挣外快，所以大寝室里始终活动频频、热闹非凡。有几个人在睡觉，用被子蒙住了耳朵，好不听这嘈杂声，一旦有一个人被吵醒，他就气得大叫大嚷，直骂别人叫嚷，结果是那些睡得还算安稳的人也受不了了。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烟斗，这也算是一种奢侈了吧，卡尔也弄来了一个并且很快便对它喜欢上了。可是在上班的时候不许抽，结果就是，在大寝室里，只要不是非睡觉不可，便人人都在抽烟斗。于是，每一张床都笼罩在一片每人自己吐出的烟雾中，一切都沉浸在腾腾的雾气里。虽然其实多数人原则上都同意夜里只在寝室的一头亮一盏灯，可是这一条却根本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倘若这个建议得以贯彻的话，那么那些想睡觉的人就可以在半个黑暗的寝室里——这是一间四十个床位的大寝室——安安稳稳地睡他们的觉，其余的人就可以在亮处掷骰子、打牌，或干些其他需要灯光照明的事情。倘若一个人想睡觉了，而他的床却在半个寝室的亮处，那么他就可以睡在暗处的一张空床位上，因为空床位有的是，没有人对别人这样临时占用自己的床位表示些许的反对。但是这样一种安排没有一个夜晚会得到遵守的。譬如，总有那么两个人，他们利用暗处睡了会儿觉之后心血来潮，在他们的床上，在一块搭在两张床之间的木板上玩起扑克牌来了，他们理所当然地就拧亮了一盏合适的电灯，如果睡觉的人正好脸对着这盏灯，那么那刺眼的灯光便会刺得他们猛地跳起来。人们虽然还会来回翻几个身，但是最后也无可奈何，只好和同样被吵醒的邻床就着新亮起来的灯光也玩起扑克牌来。于是，所有的烟斗自然也就又冒起烟来。当然也有几个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睡觉——卡尔通常均属此列——他们不是把脑袋枕在枕头上，而是将枕头盖在脑袋上，或者用枕头裹住脑袋。可是，如果邻床半夜三更起来，想在上班前还到城里去寻欢作乐一番，如果他在安装在自己床位一头的洗脸盆里哗啦哗啦、水珠飞溅地盥洗，如果他不但扑腾扑腾地穿靴子，而且还要跺跺脚使靴子穿在脚上更舒适些——尽管是美国的靴型，几乎所有人的靴子都太紧；最后，梳妆打扮时他发现还缺一样小物件，就掀起睡者的枕头，人家头蒙在枕头下面，其实早已被吵醒，便没好气地对他一顿臭骂，如果情况是

这样，人们如何还能继续睡觉呢？可是他们却也都是体育运动员，是年轻的、通常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是不愿意错过进行体育锻炼的机会的。如果你半夜里被大吵大闹的声音惊醒而起，你准保会看到在你自己床旁边地上有两个摔跤运动员，还会在刺眼的灯光下看到在四周所有的床上笔挺地站着穿裤衩和背心的行家里手。有一次在进行一场这样的夜间拳击比赛的时候，拳击手中的一个被正在睡觉的卡尔绊倒，而卡尔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从那孩子的鼻子里流出来的鲜血，人们还没来得及采取什么防范措施，整床被褥就被鲜血染红了。卡尔往往是在企图获得几个小时睡眠的尝试中度过几乎是那整整12个小时的时光的，虽然他也很想参加别人的闲谈，可是他总是觉得，别人在生活上都领先他一段距离，他必须通过更勤奋的工作和清心寡欲来弥补自己的这个不足。虽然主要是从工作上考虑，他很重视睡眠，但是他既不向女厨师长也不向特蕾泽抱怨大寝室里的情况。因为首先，基本上所有的开电梯工都在遭这个罪，大家都没怎么抱怨；其次，他怀着感激的心情从女厨师长手中接受了开电梯工这份差事，而大寝室里的磨难正是他作为开电梯工必须完成的一部分任务。

在交接班时，他每星期可以得到一次24小时的休息时间，他利用其中的一部分空闲时间去看望一两回女厨师长，瞅准了特蕾泽有那么一点空闲的时候去和她简短交谈几句，在随便什么地方，在一个角落里，在一条走廊上，难得在她的房间里。有时他也陪她到城里去办事，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极其迅速地办完。然后，卡尔拎着她的包，他们几乎奔跑着赶到最近一个地铁车站，列车行驶得飞快，仿佛它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被那么一吸就吸过去了似的，他们不一会儿就已经下车，也不等电梯，因为他们嫌它太慢，就啪嗒啪嗒踏着梯级而上。出站一看，只见一个个大广场，星罗棋布的街道从广场向四周分叉开去，四面八方径直汇来的交通洪流使广场喧嚣一片。可是卡尔和特蕾泽互相紧挨着急忙奔进各式各样的办公室、洗衣铺、仓库和商店，办理一些用电话不容易办妥、而又并非特别责任重大的订购业务和进行交涉。特蕾泽不久便发现，卡尔在这方面的帮助不容忽视，在他的帮助下许多事情办得快多了。有他作陪，她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往往是等着那些十分忙碌的生意人什么时候有空来听她的。他走到斜面桌前，不停地用指关节敲桌面，直敲到有人来答话为止，他越过人墙喊出他那还一直有点过分尖锐的、从成百个人的声音中轻易就能听得出来的英语，他毫不犹豫地向着那些人走过去，即便他们已经神情傲慢地退回到最长的营业厅的深处也罢。他不是出于任性才这样做并且尊重各种阻力，但是他觉得自己有可靠的后盾，自己有

这个权利，西方饭店不是一家可以等闲视之的主顾，况且特蕾泽尽管有办事经验，但毕竟也需要帮助。

“您就一直帮我一起干吧。”有时她乐呵呵地说，因为他们特别顺利地办完了一件事。

在卡尔逗留拉美西斯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只有三次在特蕾泽的小房间里待了较长的时间，在数小时以上。她的小房间当然比女厨师长的任何一个房间都小，摆在房间里的不多几样物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堆放在窗户四周而已。但是卡尔单凭他自己在大寝室里的亲身体验也就懂得一间自己的、比较安静的房间的价值，他即使不明讲，特蕾泽照样也看得出，他多么喜欢她的这个房间。她对他没有秘密，当初，第一天晚上她就来访，打那以后也就无需再对他保守什么秘密了。她是个私生子，她父亲是个建筑工的工头，把母女俩从波美尼亚接来了。可是就在她们到来之后不久，他没有多作解释便移居到加拿大去了，仿佛他把人一接来便已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了似的，抑或仿佛他期盼的是别人，不是他从码头上接来的疲惫不堪的妇人和身体羸弱的孩子似的，被撇下的人既没有得到他的一封信，也没有得到有关他的别的什么消息，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足为奇，因为她们在纽约东部的下等投宿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有一次，特蕾泽——卡尔站在她身旁，凭窗眺望大街——谈到她母亲的死。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母亲和她——当时她可能五岁上下——怎样每人挟着各自的行李卷在街道上匆匆行走，寻找睡觉的地方。母亲起先怎样挽着她的手——当时风雪交加，她们步履艰难——后来手疲软无力了，她没有回头朝特蕾泽看一眼便将她松开，于是，特蕾泽便不得不使劲自己抓住母亲的裙子。特蕾泽时常跌跌撞撞，甚至摔倒，可是母亲像发了疯了似的，不停下脚步。这漫长、笔直的纽约街道上的暴风雪呀！卡尔还没有经历过纽约的冬天。你顶着风走，风绕着圈儿转，你就一刻也睁不开眼，风不停地搓碎着你脸上的雪，你走呀走呀，却就是前进不了，这真是有点儿最后挣扎的味道。在这种时候孩子当然比成年人有利，孩子穿行在风头下面，对这一切还有点儿感到喜欢。就这样，当初特蕾泽也就没能完全理解她的母亲，如今她坚信，如果她在那天晚上——当时她还刚刚是个小黄毛丫头——对母亲态度聪明些的话，母亲也就不会死于非命了。当时母亲已经两天没有工作了，身上分文全无，白天没吃一口东西在野外度过了，她们吃力地扛着行李卷里毫无用处的破

布条儿四处奔走，她们也许是出于迷信才没敢把它们扔掉。现在有人已经答应她第二天早晨到一家建筑工地去干活，但是一如她整天试图向特蕾泽解释的那样，她生怕抓不住这个好机会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极度疲劳，早晨就已经在巷子里咳出了很多鲜血，把行人都吓坏了，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找个随便什么暖和的地方休息休息。偏偏今晚又找不到一块歇脚的地方。在那儿，她们倒是没有在大门通道里就被住房勤杂工赶了出来，而在那大门通道里她们本来倒总还可以稍许避避风寒、歇息歇息的；可是她们却进了那幢楼房，急匆匆穿过一道道狭窄、冰冷的走廊，爬过高高的楼层，绕着院子里狭小的平台转悠，毫无选择地敲门，起先不敢向任何人开口，后来又向她们迎面遇见的每一个人求助。有那么一两回，母亲气喘吁吁地在一道寂静的楼梯的梯级上坐下，将几乎是抗拒着的特蕾泽拉进自己怀里，痛苦地抿紧嘴唇吻她。如果你事后知道这是最后的亲吻，你就不会明白，哪怕你只是个小黄毛丫头，你怎么会那样糊涂，没看出这点来呢。他们从有些房间的门口走过，那些房间的房门都开着，为的是好把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放出来，从像是由失火引起的、在房间里弥漫开来的腾腾烟雾中，只走出来某个人身影，这个人站在门框里不是以其沉默不语的态度便是用简短的一句话证明相关的房间里无法留宿人。现在特蕾泽似乎回忆起，母亲只是在开头几个小时里认真寻找过栖身地，因为大约午夜过后，她大概再也没有恳求过谁，虽然直至拂晓前她除了稍稍歇息过几次，便一直不停地继续急速行走，虽然在这些楼门和单元门都没锁上的楼房里一直有人在活动并且你处处都会遇见人。当然，她们并不是在急速向前奔走，那只不过是她们能作出的一种极大的努力，其实也很可能只不过是慢慢往前挪步而已。特蕾泽也不知道，从半夜到凌晨五点她们是进了20栋房屋，还是两栋或者甚至只进了一栋房屋。这些房屋的走廊是按照最佳利用空间的精明设计建造的，但是没顾及到让人容易辨认方向，她们在同样的走廊里不知跑了多少回！特蕾泽还依稀记得，她们跑遍了一栋房屋的每个角落，后来又离开这栋房屋的大门，但是她分明又觉得，她们似乎在巷子里立刻转身又猛然扑进这栋房屋。对于这孩子来说，时而让母亲抓着，时而自己紧紧抓住她，听不到半句安慰的话，被拖着东跑西颠，这自然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痛苦，而当初不懂事的孩子对于这一切似乎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母亲想抛弃她。所以，即使母亲拉着她的一只手，为了安全起见，特蕾泽仍然用另一只手抓住母亲的衣裙不放，并且不时地嚎哭。她不愿意被留下，被遗弃在那些人中间，那些人在她们前面噤噤噤地上楼，那些人在她们后面，还没有为她们所看见，正从楼梯的一个转弯处后面走过

来，那些人在一扇门前的过道里互相争吵，互相推推搡搡把对方推进房间里去。喝醉酒的人哼着低沉的歌在楼里游来荡去，母亲带着特蕾泽还算幸运地从这样的正在合拢起来的人群中溜了过去。夜深了，人们不再那么留意，谁也不那么顶真了，起码她们本来完全可以挤进企业主出租的公共大寝室中的一间里去，她们从几间这样的公共大寝室旁边走过，但是特蕾泽不懂，而母亲则不愿休息了。早晨，一个美丽的冬日开始了，她们俩靠在一堵楼墙上，也许在那儿睡了一会儿，也许只是睁着眼睛呆望四周。后来发现，特蕾泽把自己的行李卷给丢了，母亲举手就要打特蕾泽，惩罚她疏忽大意，但是特蕾泽没听见打击声，没感觉到挨打。然后，她们穿过一条条开始热闹起来的胡同继续赶路，母亲靠着墙根走，她们走过一座桥，母亲在桥上用手擦去桥栏杆上的霜，最后正巧来到母亲那天早晨受雇干活的那个建筑工地，当初特蕾泽觉得这事没什么，今天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并没有告诉特蕾泽，她该等着还是离去，于是特蕾泽就把这当作要她等候的命令，因为这最符合她的心愿。于是，她就坐在一个砖瓦堆上，在一旁看着母亲打开行李卷，拿出一块花布条，用它系住她整夜都戴着的那块头巾。特蕾泽太疲倦了，连想都没想到应该去帮帮母亲。没有像通常那样到临时工棚里去报到，也没有问问哪个人，母亲径直就登上一个梯子，仿佛她自己就知道分配给她干什么活儿似的。特蕾泽感到奇怪，因为女运料小工一般只在下面和和灰泥、递递砖瓦并干些其他的简单的活儿。所以她想，母亲今天想干一桩工钱比较多的活儿了，

便睡眠蒙

她仰脸向她微笑。建筑物还没向高处伸展出去，将将才盖了一层高，虽然高高的脚手架已然耸入蓝天，摆好了继续往上盖的架势，只是还没在架子上铺上木板而已。母亲在上面灵巧地绕开泥瓦工，他们正在一块一块地砌砖，竟令人不解地没有质问她，她小心翼翼地用柔弱的手扶住一块作栏杆用的木头档板，下面的特蕾泽刚在迷迷糊糊中惊叹这种熟练技巧，还以为看到了母亲投来的亲切的一瞥。可是母亲这时正朝着一小堆砖头走去，这堆砖头前面没有栏杆，大概路也断了，可是她不扶住栏杆，竟撞在那堆砖头上。她的熟练技巧似乎已经离她而去，她撞倒那堆砖头，随着砖头一道坠落下去。许多块砖头在她身后滚滚而下，最后，过了相当长时间之后，不知什么地方一块厚木板脱落，哗啦一声向她砸下来。特蕾泽对她母亲的最后的印象就是，她怎样叉开两条腿躺在那里，身上穿着那条还是从波美尼亚带来的方格裙，那块压在她身上的

粗木板怎样几乎盖没她的全身，大家怎样从四面八方跑拢过来以及上面工地上不知哪个人怎样怒气冲冲朝下面嚷嚷着什么。

当特蕾泽结束她的叙述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一反往日的习惯，讲得很详细，而且恰恰是讲述无关紧要的情节，例如在描述脚手架一个个独自耸入高空的时候，她往往不得不眼里噙着泪水顿住。当时发生的每一个细节，现在，10年之后，她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而由于母亲在快要盖得的一楼楼顶上的样子是母亲这一生留给她的最后的纪念，怎么向她的朋友作介绍她都觉得不够清楚，所以她在叙述完毕之后还想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却顿住，双手捂住脸，不再说一句话了。

不过，在特蕾泽的房间里也有比较快乐的时光。就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卡尔便看见那儿放着一本商业信函实用教科书并经请求借到了这本书。双方同时谈定，卡尔要做教科书里的练习题并将它们交特蕾泽审阅，她根据自己平凡的工作的需要已研读过这本书。于是，卡尔便整宿整宿地躺在大寝室里下面他的床铺上，耳朵里塞着棉花，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卧姿，埋头读书，用一支自来水笔将练习题涂写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这支自来水笔是女厨师长为奖励他帮她编制出大宗财产清单并将其全部登录完毕而赠送给他的。他在做英语练习时不断向别的孩子们讨教，直到他们感到疲倦，不去打搅他时为止，从而成功地使别人的干扰往好的方面转变。他常常感到惊讶，其他人居然已经完全安于自己的现状，对自己工作的临时性质——大于20岁的开电梯工是不容许的——丝毫没有感觉，对有必要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早作定夺没有认识，尽管有卡尔作榜样仍然什么书也不读，充其量只读侦探小说，脏兮兮的破书一床一床地传阅着。聚在一起时，特蕾泽便不厌其烦地改作业；出现了有争议的观点，卡尔搬出他那位大纽约教授来作证，但是教授和开电梯工们的语法见解一样，对特蕾泽都不起什么作用。她拿过他手里的自来水笔，划掉她确信是错误的文句，但是遇到这样的有争议的情况时，为了精确起见，卡尔总是将特蕾泽划的杠杠重新划掉，虽然一般来说这儿没有比特蕾泽更高的权威了。不过，有时女厨师长走来，然后便总是作出有利于特蕾泽的裁决，这当然还不能令卡尔信服，因为特蕾泽是她的秘书嘛。不过，她同时也带来了普遍和解的气氛，因为她一来就煮茶、拿糕点，于是卡尔就得讲欧洲，当然，卡尔的话会不时被女厨师长打断，她一再地提问并惊讶不已，由此倒是让卡尔意识到，在相对来说较短的时间内那边多少事情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不在的时候有多少事情可能已经变了样子并且现在还正在不断地变化着。

卡尔大约已经在拉美西斯待了一个月了吧，一天晚上，雷内尔从他身边走过时对他说，一个名叫德拉马什的人曾在饭店前同他攀谈并向他打听卡尔的情况。雷内尔没有理由要隐瞒什么情况，就如实地讲了卡尔当开电梯工，然而由于得到女厨长的提携还有希望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职位。卡尔察觉出，雷内尔受到德拉马什多么慎重的对待，那天晚上他甚至邀请他共进晚餐。

“我和德拉马什没有任何关系了，”卡尔说，“你也提防着他点吧！”

“我？”雷内尔说，伸了个懒腰，匆匆走了。他是饭店里长得最清秀的男孩，在别的开电梯工中间流传着一个谣言，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传出来的，说是他被一位已经在饭店里住了好长时间的贵妇人至少是在电梯里吻过多次。对于知道这个谣言的人来说，看着那位自信的、从其外表上丝毫也看不出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来的贵妇人，迈着她那从容、轻盈的步伐，戴着轻柔的面纱，身穿系得很紧的紧身胸衣，从自己身边走过，这无论如何也是很有诱惑力的。她住在二楼，雷内尔的电梯不是她专用的，但是如果别的电梯都满员了，人们当然也不能拒绝这样的客人乘另外一部电梯。就这样，这位贵妇人时不时就乘卡尔和雷内尔的电梯，而且果不其然，总是只是在雷内尔当班的时候。这可能是偶然，可是没有人相信这会是偶然，每逢电梯载着这两个人开走，在整个开电梯行列里便有一种费很大劲才克制下去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已经招致过侍者总管的干预。也许是由于这位贵妇的缘故，也许是由于那个谣言的缘故，反正雷内尔这个人变了，变得自信多了，把擦拭的活儿全交给卡尔去干，在大寝室里根本就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而卡尔则已在等待机会，打算和他彻底谈谈这个问题。别人谁也没有这样完全退出了开电梯工的这个集体的，因为一般来说，起码是在工作问题上，大家都是挺齐心协力的，并且有一个受到饭店经理部承认的组织。

卡尔在脑海里转悠着这一切，也想到了德拉马什，此外就是一如既往地上班干活了。午夜前后他可以稍许消遣一下，因为经常送小礼物让他惊喜的特蕾泽带给他一个大苹果和一条巧克力。他们闲谈一会儿，虽然一开电梯他们就得上中止谈话，但是他们并不怎么觉得因此而受妨碍。话题也转到德拉马什身上，卡尔发现，如果说他一些时候以来就把他看作是一个危险人物的话，其实他这也是受了特蕾泽的影响，因为特蕾泽按照卡尔所讲的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然而，卡尔却基本上认为他只不过是因遭到不幸而落难的流浪汉，还是可以和他打交道的。特蕾泽却

竭力反对这种说法，苦口婆心要卡尔答应不要再和德拉马什说话。卡尔没有作出这个允诺，而是反复催促她去睡觉，因为午夜早已过了，当她不听劝说时，他便威胁说，他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送她回自己的房间去。当她终于表示愿意离开时，他说：“特蕾泽，你为什么总要这样瞎操心呢？为了好让你睡个好觉，我愿意答应你，只有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我才会和德拉马什说话。”随后，来了许多乘客，因为开旁边那部电梯的孩子被叫去帮忙干别的活了，于是卡尔就不得不开两部电梯。有客人在说秩序混乱了，一位先生陪同一位女士，甚至用散步用的手杖捅了捅卡尔，催他快开电梯，一种相当没有必要的催促。客人们既然看到一部电梯没有开电梯工，你倒是起码赶快到卡尔的电梯这儿来呀，但是他们不，他们走到那部电梯跟前，待在那儿，手扶着门把手，或者甚至自己走进电梯，而按照严格的操作规程这是开电梯工无论如何也应该加以防止的。就这样，卡尔跑来跑去，疲于奔命，可是他却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在严格履行职责。此外，凌晨三点左右，一个提行李的老人想请他帮忙干件什么事，他和这个老人有一点儿交情，但是他眼下没法帮他这个忙，因为恰好他的两部电梯前都站着客人。他当即跨出几大步决定给一批人开电梯，这还真要有点沉着镇静的精神才能做得到的哩。所以他很高兴，他看到另外那个开电梯工又上岗了，便给他扔过去几句责备他长时间离开岗位的话，虽然他可能并不对此负有责任。

凌晨四点以后稍许安静了下来，不过卡尔也急需歇息片刻。他沉重地倚在电梯旁边的栏杆上，慢慢吃苹果，咬了第一口以后，那苹果便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从一个玻璃采光井往下看，这个采光井四周围着储藏室的大窗户，成串成串挂在窗户后面的香蕉在黑暗中闪着微光。

鲁滨孙事件

有人拍他的肩膀。卡尔当然以为这是一位客人，便急忙将苹果塞进口袋，几乎没瞅那人一眼，便向电梯奔跑过去。

“晚上好，罗斯曼先生。”可是此人却说：“是我，鲁滨孙。”

“您可真是变了样了！”卡尔边摇头边说。

“是呀，我日子过得挺好。”鲁滨孙说，并顺着自己的衣服往下看，一件件的衣服也许都相当精致，但是杂七杂八的，以致看上去竟显得破旧。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件显然第一次穿在身上的白色西装背心，它有四

只镶黑边的小口袋，鲁滨孙挺起胸脯，试图由此而引起人们对这件背心的注意。

“您穿高级衣服。”卡尔说；并不禁想起他那件漂亮、大方的衣服，他穿上那件衣服甚至可以和雷内尔一比高低，而这两个坏朋友却把它卖掉了。

“是的，”鲁滨孙说，“我几乎天天买几件穿。您觉得这件背心怎么样？”

“很好。”卡尔说。

“可是这不是真正的口袋，只不过是做成这种样子而已。”鲁滨孙说着，抓住卡尔的手，要卡尔自己去摸摸。但是卡尔往后退缩，因为从鲁滨孙的嘴里一股难闻的烧酒气味扑鼻而来。

“您又喝多了。”卡尔说，他已经又站在栏杆旁边。

“不，”鲁滨孙说，“不多，”与他先前的心满意足心态自相矛盾地补充说，“否则人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一个客人乘电梯打断了这场谈话，卡尔刚刚回到楼下，有人便打来了一个电话，要卡尔去请饭店医生，因为八楼的一位女士昏厥过去了。去请医生时，他在心里暗暗盼望着鲁滨孙在此期间已经离去，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看见自己和他在一起，并且，心里想着特蕾泽的警告，也不愿意听说德拉马什的什么事。但是鲁滨孙露出一副醉酒者的呆板相还在等候着。这时，恰好有一位穿黑色小礼服戴礼帽的饭店高级职员打从一旁走过，幸好似乎没有特别留意鲁滨孙。

“罗斯曼，您不想去我们那儿看看吗，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美气。”鲁滨孙用诱人的目光望着卡尔说。

“是您还是德拉马什邀请我？”卡尔问。

“我和德拉马什，我们一致邀请您。”鲁滨孙说。

“那我就告诉您并且请您把这句话转告德拉马什，如果说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意思还不清楚的话，那么，现在我就挑明了吧，我们那次告别是最后一次告别。你们两位给我造成的痛苦比任何人都多。你们也许在打什么鬼主意，往后也要让我不得安宁吗？”

“我们是您的伙伴嘛，”鲁滨孙说，眼里噙着醉态的、令人厌恶的眼泪，“德拉马什让我告诉您，他愿意赔偿您以前的全部损失。我们现在和布鲁娜姐住在一起，她是位出色的女歌唱家。”说罢，他就要引吭高歌唱一曲，倘若不是卡尔及时发出嘘声制止他的话：“您别吱声，等一会儿，您简直不知道，您这是在哪儿！”

“罗斯曼，”鲁滨孙说，要唱歌的念头算是给吓退了，“我是您的伴儿嘛，您想说什么，您只管说。您在这儿干上了这么一桩美差，您可以接济我几个钱吗？”

“您只不过是又喝酒把钱喝光了，”卡尔说，“我看见您的口袋里甚至藏着一瓶烧酒，刚才我离开的那一会儿工夫，您准是喝了这瓶里的酒，因为起初您还相当清醒。”

“这只是我在路上为了提神才喝的。”鲁滨孙抱歉地说。

“我再也不想改正您了。”卡尔说。

“可是钱呢？”鲁滨孙睁大眼睛说。

“您大概是受到德拉马什的委托，要带钱回去。好吧，我给您钱，但是得有个条件，这就是您必须立刻离开这儿，永远不再到这儿来找我。如果您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您就写信给我。卡尔，罗斯曼，开电梯工，西方饭店，有这个地址就够了。但是，我再说一遍，你决不可以再到这儿来找我。我在这儿当班呢，没有时间接待客人。您愿意接受这个条件拿这钱吗？”卡尔问，并把手伸进背心口袋，因为他决心把今晚得到的小费贡献出来。鲁滨孙只是对这个问题点了点头，便艰难地喘着粗气。卡尔把这解释错了，再一次问：“愿意还是不愿意？”

这时，鲁滨孙示意他到他身边去，已经十分明显地摇晃着身体，悄悄说：“罗斯曼，我很不舒服。”

“见鬼。”卡尔脱口而出，他用双手把他拖到栏杆边上。鲁滨孙顿时就张嘴往下吐了起来。在呕吐间歇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胡乱向卡尔蹭过去。“您确实是个好小伙子。”然后他说，或者说，“马上就不吐了。”而实际上却远没有吐完呢，或者说：“那些狗杂种，他们在那儿给我灌了些什么酒呀！”卡尔既担心又厌恶，在他身旁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便来回踱起步来。这儿，在电梯旁边的角落里，鲁滨孙还隐蔽一些，可

是如果有人发现他，如果一个神经质的、富有的客人发现他，这些客人就会等着向跑过来的饭店管理人员提抗议，这位饭店管理人员然后就因此而向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报复，抑或如果这些不断变换着的饭店侦探中的一个从这儿走过，要知道除了饭店的管理部门以外谁也不认识那些侦探，每一个也许只是由于近视而露出审视的目光的人都被人认为是侦探，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又该如何是好。餐厅部是通宵不停止营业的，下面只要有人要到储藏室里去，惊讶地发现玻璃采光井里那一堆呕吐物并打电话来问卡尔：天哪，上面究竟出了什么事？到时候卡尔能不供出鲁滨孙来吗？假如他供出鲁滨孙，愚笨的鲁滨孙在绝望之中就不会非但不作任何道歉，反倒恰恰只把卡尔牵连进去的吗？然后不是卡尔立刻就得被开除吗？因为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事了。一个开电梯工，这家饭店服务人员巨大的等级阶梯上最低下、最无关紧要的雇员，居然让自己的朋友弄脏饭店并且让客人受惊吓或者简直把客人赶跑了？人们还能继续容忍一个有这样的朋友的开电梯工吗？他在自己当班的时候居然让他们来找自己玩儿。这情况看上去岂不完全就好像这样一个开电梯工自己就是个酒鬼，或者甚至是个更邪恶的家伙，因为还会有哪个猜想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他长期用饭店储存的食品大把大把喂养他的朋友们，一直喂到他们在这同一家保持得干干净净的饭店里随便哪个场所像现在鲁滨孙那样将这些食品呕吐出来？这样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只限于偷窃食品呢，因为众所周知客人们个个都粗心大意，到处都是敞开着的柜子，桌子上四处摆放着贵重物品，如打开着的首饰盒以及漫不经心随意乱扔的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偷窃的机会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的呀！

卡尔恰好看见远处有客人从一间地下室酒店里上来，那里的一场游艺演出刚刚结束。卡尔走到他的电梯跟前，根本不敢回头看一眼鲁滨孙，因为他害怕他将会看到的情景。令他略微感到宽慰的是，他没有听到那儿发出一声响声，连一声叹息声也没有。他虽然在侍候他的乘客，与他们一起乘电梯上去、下来，但是他无法完全掩饰自己心不在焉，每次往下去的时候他都准备着在楼下会遇上意想不到的难堪的事。

终于他又有时间去看鲁滨孙了，此人躲在角落里缩成一团，把脸压在膝盖上。他已经把他那顶硬梆梆的圆宽檐帽从额头推到后脑勺上。

“现在您就走吧，”卡尔小声、断然地说，“这儿是钱。如果您赶快走，我还能告诉您一条捷径。”

“我怕是走不了了，”鲁滨孙用一块小手绢擦擦额头说，“我会死在这

儿的。您想象不出，我现在多么难受。德拉马什到处带着我下高级饭馆，可是我穿这种装模作样的衣服真受不了，这话我天天都对德拉马什说。”

“这儿您可不能待，”卡尔说，“您想一想，您现在是在哪里。如果人家发现您在这里，您就会受到惩罚，我就会丢掉我的饭碗。您愿意这样吗？”

“我走不了了，”鲁滨孙说，“我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呢。”说着，他从栏杆间往玻璃采光井里指了指，“如果我在这里这么坐着，我还能忍得了，但是我站不起来，您刚才离开的那会儿，我已经试过了。”

“那我去叫一辆车来，您坐车去医院。”卡尔说，稍许晃了晃鲁滨孙的两条腿，他随时都有陷入完全麻木状态的危险。但是鲁滨孙一听到医院这个词儿，这个似乎在他心头唤起可怕想象的词儿，他便号啕大哭起来并向卡尔伸出双手请求宽恕。

“别出声。”卡尔说着，轻轻一巴掌把他的双手打下去，走到一个开电梯工的跟前，他在夜里曾给这个开电梯工顶过班，现在请他同样代劳片刻。然后急忙回到鲁滨孙身边，用尽全身力气，把这个一直还在啜泣的人扶起来并悄悄对他说：“鲁滨孙，如果您想让我来照顾您，那么，您可就得自己使劲，现在就挺直身子走一小段路。我带您到我的床上去，您可以在我的床上一直待到直至您觉得舒服时为止。您会感到惊讶的，因为您很快便会恢复过来。可是现在您要放明白点，因为走廊里到处都是人，而且我的床位也是在一个公共大寝室里。您只要引起人家哪怕是一点点的注意，我对您就什么忙也帮不上了。您的眼睛得睁开，我不能像拖着一个危重病人那样拖着您到处乱跑。”

“只要您认为是对的，我什么都愿意干，”鲁滨孙说，“可是您单独一人是扶不动我的。您不能把雷内尔也叫来吗？”

“雷内尔不在这里。”卡尔说。

“啊，是的，”鲁滨孙说，“雷内尔和德拉马什在一起。是这两个人派我来找您的。我把什么都搞混了。”卡尔利用鲁滨孙莫名其妙自言自语，推着他往前走，也还幸运地和他一道一直走到一个角落里，一条灯光比较黯淡的走廊从这里通向开电梯工们的大寝室。这时，恰好一个开电梯工急急忙忙向他们奔跑过来，从他们身旁一掠而过。直到现在为止，他

们倒也只遇到过一些没有什么危险的情况，因为四五点之间是最安静的时间，卡尔心里明白，如果他现在不能把鲁滨孙拽走，天一亮，白天的活动一开始，那就根本不可能把他弄走了。

大寝室里，在这寝室的另一头，恰好有人正在大打出手，或者在举办别的什么活动，人们听到有节奏的拍手声，激烈的跺脚声和体育比赛式的喊叫声。在靠近门口的这半个寝室里，人们只看见不多几个人不为所动地仍在床上睡觉，大多数人仰卧在床上，凝视着空中，这当儿，时不时有一个人或恰好身穿衣服或恰好一丝不挂地跳下床来，去看寝室另一头的事态发展。就这样，卡尔把已经渐渐有些适应了行走的鲁滨孙相当不引人注目地带到雷内尔的床上，因为这个床位离门很近，而且幸亏没被占用，而他远远地看到，他自己的床上却正躺着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陌生男孩，在安安稳稳地睡觉。鲁滨孙刚一沾上床，他立刻就——一条大腿从床上吊下还在晃动——睡着了。卡尔将被子向上拽，远远盖过他的脸，相信至少暂时可以不必担心，因为鲁滨孙肯定不会在早晨六点以前醒过来，到那时候，他将会返回这里。然后，也许就和雷内尔一道，找到一个把鲁滨孙送走的办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高层管理机构才派人查看大寝室，从前的那种通常的一般性检查若干年以前就在开电梯工们的抗议下取消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当卡尔回到他的电梯那时，他看到，他的电梯以及与他相邻的那部电梯都恰好在向顶上升去。他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不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这部电梯下来得早一点，只见从电梯里走出来的就是不多一会儿以前在走廊里走过的那个男孩。

“咳，罗斯曼，你哪儿去啦？”此人问，“你为什么走开了？你为什么不报告？”

“可是我告诉了他呀，要他顶我一会儿班嘛，”卡尔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开旁边那部电梯的孩子，他正走过来，“我也曾在上下乘客最多的时候替他开过两个小时之久的电梯的嘛。”

“这一切都很好，”对方说，“但是这不符合规定呀。你难道不知道，在班上哪怕离开一小会儿工夫也要向总管办公室报告吗？你这儿有电话机嘛。我倒是乐意顶你的班，可是你知道的，这不那么容易呀。两部电梯前恰好都是4点30分特快列车上新来的客人，我不能先开你的电梯，让我的客人等着，所以我就先开着我的电梯上去了！”

“后来呢？”卡尔神情紧张地问，因为两个男孩都沉默不语了。

“后来，”开旁边那部电梯的男孩说，“恰好总管从这儿走过，看见客人们站在你那部没人开的电梯前，便火冒三丈，这时我赶快奔跑过来，他问我，你在哪儿，我不知道呀，因为你压根儿就没告诉我你去哪儿，于是他就马上打电话到大寝室，立刻另外叫来了一个男孩。”

“我还在走廊里遇见过你呢。”顶卡尔班的人说。卡尔点点头。

“当然

，”另外那位开电梯工竭力申明道，“我立刻就说，你曾请我代你的班，可是这种申辩难道他会听得进去吗？你大概还不了解他。他要我们转告你，他要你立刻到他的办公室去。你还是别耽搁时间，快去吧。也许他还会原谅你这一回，你确实只离开了两分钟。你完全可以提出，你请我代班了。至于你曾经代过我的班，这一点你还是别谈的好，听我的错不了，我不会出什么事，我是得到许可的，可是现在去谈论这样一件事，还把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扯混在一起，这样做不好嘛。”

“我这是第一次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卡尔说。

“事情总是这样的，只不过人家就是不相信罢了。”那男孩说，并向他的电梯跑过去，因为这时有人要上电梯了。

那个顶卡尔班的，一个大约14岁的男孩，他显然同情卡尔，他说：“已经出过许多起事件，这种事情他们都原谅了。一般来说都改派别的活儿。为了一件这样的事而被开除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你得想出一个好的托词来。你决不要说，你突然觉得不舒服了，他会讥笑你的。比较好的招儿是，你说，一个客人让你去向另一个客人转达一个紧急的口信，你现在记不得，谁是第一个客人，而那第二个客人你没能找到。”

“哟，”卡尔说，“不会这么严重的吧。”按照他听到的这一切来判断，他再也不相信会有什么好结果。即便这次失职行为会得到宽恕，里面大寝室里还躺着鲁滨孙这个活生生的罪证呢，而且从总管那暴躁的性格来看，他多半不会草草调查一下就了事，终究还是会把鲁滨孙搜寻出来的。大概并没有不许带陌生人进入大寝室的明文禁令，但是之所以不存在这个禁令，也仅仅是因为想象不出来的事情不禁止而已。

当卡尔走进总管办公室时，此人正坐着在喝早晨咖啡，啜饮了一口，便又埋头阅读显然是由同样也在场的饭店门卫班长给他送来的一份表格。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他那身厚实、挂有许多装饰物的制服——肩上以及顺着胳膊往下还蜿蜒伸展着金色链条和带子——使他的身材显得比实际上更魁伟。一部又黑又亮的小胡子，胡子梢拉成尖形，就像匈牙利人蓄的那种小胡子，即使脑袋以最快速度摇动这小胡子也纹丝不动。况且，由于这套行头，他的动作压根儿就不灵活，并且站立时不用别的姿势，总是叉开着两条腿，以便合理分摊身体的重量。

卡尔是不拘礼节、急急忙忙地走进来的，这是他在这个饭店里养成的习惯，因为慢条斯理和小心谨慎，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意味着是有礼貌，可是对于开电梯工来说，却被认为是懒惰。另外，也不是非得一定要在进门时就让人家看出他有负疚感嘛。总管虽然匆匆朝正在开启的门瞥了一眼，但是随后立刻又回过头去喝他的咖啡读他的材料了，没有再理睬卡尔。但是门房也许觉得卡尔一来自己受到惊扰了，也许他要报告一个什么机密消息，或者提出一个请求，反正他每时每刻都低垂着僵硬的脑袋恶狠狠地瞅他。随后，一旦显然是正合其意地与卡尔的目光相遇，便又把脸转向总管。而卡尔却认为，既然他已经到了这里，如果他现在没有得到总管的相应的命令便又离开这间办公室，这样做是会产生不好的印象的。而总管却仍在研读表格，一边吃着一块糕点，还不时地把糕点上的白糖抖搂下来，而又不停止阅读。有一回，一页表格掉到地上，门房连做一下试图拾起它来的动作都没做，他知道，这件事他办不成的，这也没有必要，因为卡尔已经趋上前来，把那页纸递给总管，总管顺手从他手中接过那页纸，瞧他那神态，仿佛那页纸是自动从地上飘起来似的。整个儿这一小小的效劳毫无用处，因为门房依然没有收敛他那恶狠狠的目光。

尽管如此，卡尔还是比以前更镇静了。他的事情在总管看来似乎不怎么重要，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个好兆头。说到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一个开电梯工自然根本就无足轻重，所以是不可以无知妄为的，但是正因为无足轻重，他也就不会做出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毕竟总管年轻时自己做过开电梯工——这还是这一代开电梯工的骄傲呢，是他第一次把开电梯工们组织了起来，而且他一定也有那么一回未经允许就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尽管现在当然谁也不会强迫他去回忆这件事，尽管人们也不可以忽略了，正是因为曾当过开电梯工，所以他才往往会用毫不容情的严厉态度来整饬这个行当，以恪尽职守。此外，卡尔可是

就寄希望于时间的向前移动了。按照办公室里的时钟，现在已经五点一刻，雷内尔随时都可能会回来，也许他甚至已经在这儿了，因为鲁滨孙没有回去，这必然会引起他注意的，而且正如卡尔现在想起来的，德拉马什和雷内尔可能根本就待在离西方饭店不远的地方，因为不然的话，鲁滨孙身体那样虚弱也就不会找到路摸到这儿来了。如果现在雷内尔发现鲁滨孙在他的床上，如果果真如此，那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像雷内尔这样讲实际的人，尤其是如果事情涉及自身利益的话，他定会想办法立刻把鲁滨孙从饭店里弄出去的，而且这件事也比较容易办到，因为在这期间鲁滨孙已经稍许恢复了一下体力，况且也许德拉马什就在饭店前面等着接他呢。可是如果鲁滨孙已经被打发走，那么卡尔对付总管心里就踏实多了，这一回也许挨一顿训斥，哪怕是严厉的训斥吧，他也就能够渡过这一难关了。然后他再去和特蕾泽商量，他是否可以把实情告诉女厨师长——就他本人而言，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很可能，这件事没造成什么特别的损失就可以彻底地了了。

正当卡尔经过这样一番考虑情绪稍微平静，正要悄悄点一点今晚到手的小费，因为凭感觉他就知道今天的小费收入似乎特别丰厚，这时，总管说了声“费奥多尔，请您再等一会儿吧”，就把那份表格放到桌子上，敏捷地跳起来，冲着卡尔大声嚷嚷，吓得卡尔目瞪口呆，直愣愣地盯着那张黑洞洞的大口。

“你未经允许离开岗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解雇。我不愿听辩解。你那一套信口胡编的借口你还是收起来的好，对我来说，你不在岗位上，这个事实就完全足够了。如果我容忍并原谅这一回，到头来所有40个开电梯工都会在上班时跑掉，我就得一个人把我的五千个客人背上楼去。”

卡尔不吭声。门房走近过来，把卡尔那件起了几个褶儿的短上衣往下拽了拽，无疑是为了促使总管特别注意卡尔在着装方面的这一小小的纰漏。

“你也许是突然身体不舒服了吧？”总管狡黠地问。

卡尔用审视的目光望着他，回答说：“不是。”

“原来连身体不舒服都没有？”总管嚷嚷得更凶了，“那么你一定已经编好了一个了不起的谎言了。你有什么好说的？快说吧。”

“我不知道，我必须打电话请求准假。”卡尔说。

“这真有趣。”总管说，抓住卡尔的上衣领子，几乎是把他两脚悬空地提到钉在墙上的电梯操作规章前面。门房也跟在他们后面向墙边走去。“这儿，念！”总管指着一条条款说。卡尔以为是要他给自己默念。“大声念！”总管却命令说。

卡尔没有大声念，却抱着可以更好地平息总管怒气的希望说：“我知道这个条款，我也拿到过操作规章并仔细读过。但是恰恰是这样一条人们永远不需要的规定，人们竟忘了。我已经干了两个月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岗位。”

“所以现在你就要离开它了。”总管说，向桌子走去又拿起那份表格，仿佛想继续读它似的，却把它砸在桌上，仿佛它是一张无用的破纸片，额头和面颊涨得通红，在房间里交叉来回踱步。“为了这么一个捣蛋鬼就得遭这份罪！值夜班闹得个鸡犬不宁！”他怒气冲冲地喊了几次。“您知道吗，当这儿这个家伙离开电梯的时候，恰好是谁想乘电梯上楼去？”他转身向门房道。接着，他举出了一个人的名字，门房当然熟知全部客人的情况，一听这个名字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便很快朝卡尔瞥了一眼，仿佛卡尔的存在便是一份证明书似的，证明了那位叫那个名字的人在一部跑掉了开电梯工的电梯前不得不白白等了好长一段时间。

“真是可怕！”门房露出无限忧虑的神色对着卡尔徐徐摇摇头说，卡尔则沮丧地望着他，心想自己这下将不得不因这个人的理解迟钝而遭殃了。

“而且我也已经认识你了，”门房伸出他那粗壮而僵硬的食指说，“你是唯一的一个一贯不问候我的开电梯工。你究竟是何居心！每一个从门房间旁边走过的人都必须问候我。对其他的门房你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可是我要求受到问候。虽然有时我装出不在意的样子，但是你完全可以放心，谁问候我谁不问候我，我心里很清楚，你这个无赖！”说罢，他转身离开卡尔，昂首阔步向总管走去，而总管却吃罢早饭，正在浏览一张一个仆人刚刚送进办公室里来的晨报，没有对门房的事发表什么评论。

“门房班长先生，”卡尔说，他想乘总管不注意至少把和门房的这件事先解决了，因为他懂得，门房的这个指责也许伤害不了他什么，可是

此人的敌对情绪却对他很不利，“我肯定是问候您的。我在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出生在欧洲，众所周知，人们在欧洲问候之频繁远远超出需要的程度。这个习惯我当然还没有完全能够改掉，两个月前，我在纽约偶然与比较上层的圈子里的人交往，人们一有机会就劝我别那样过分拘泥于礼节。而我却偏偏会没有问候您！我每天都问候过您几次。可是当然我也不是每次见到您都问候您，因为我每天从您身旁走过一百次呢。”

“你必须每次都问候我，每次，毫无例外，你和我讲话的时候，自始至终你都把帽子拿在手里，你必须永远用‘门房班长’称呼我，而不是用‘您’。每次都这样，每次。”

“每次？”卡尔轻声用询问的口吻重复道，现在他回忆起，在他逗留此地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受到这位门房的严厉和责备的目光的注视，从那第一天早晨起就已经如此，那天早晨他在对自己的侍候人的身份还不太适应的情况下有点儿太冒失，竟毫无顾忌地、烦冗而急切地向他询问，是不是有两个小伙子来打听他并给他留下一张照片。

“现在你看到了，这样一种态度会导致什么结果，”门房又走回到卡尔的身边，指着还在读报的总管说，仿佛此人是他的复仇代理人似的，“以后不管你在哪儿干活，你都要问候门房，哪怕也许只是在一家下等酒吧间里也不例外。”

卡尔认识到，他实际上已经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了，因为总管已经说过这话，如今门房班长又作为既定事实重复这句话，开除一个开电梯工大概用不着得到饭店经理处批准的。诚然，事态发展得比他想象的快，因为毕竟他已经竭尽全力地干了两个月，肯定比某些开电梯工干得更好。但是在关键时刻，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显然没有人会顾及这些情况的，对事态发展作出决断的，将是一个人在勃然大怒时信口作出的判决。也许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他立刻就辞别而去，女厨师长和特蕾泽也许还在睡觉，为了避免当面告别引起她们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与悲哀，他还是写信告别，迅速收拾好行李，悄悄地离去为妙。可是如果他即使还只待一天，他当然也需要稍许睡一会儿，那么，等待着他的就不是别的，而是把他的事大加渲染、引起轰动，各方面的指责，特蕾泽的、也许甚至还有女厨师长的那副叫人受不了的眼泪汪汪的模样，也许到了也还会受到惩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觉得怅惘，在这里他站在两个敌人的对面，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不是遭到这一个，便是遭到另一个的指摘和曲解。所以他沉默不语，暂时享受

着笼罩在房间里的宁静气氛，因为总管还一直在读报，而门房班长则在按页码整理他那份撒在桌面上的表格，他显然眼睛近视，整理起来很吃力。

总管终于打着哈欠把报纸放下，瞥一眼卡尔证实此人还在，按响桌上的电话铃。他喊了几次“喂！”但是没有人接电话。“没有人接。”他对门房班长说。卡尔看得出来，门房班长一直怀着特殊的兴趣在观看打电话，这时，门房班长说：“现在已经5点3刻。她肯定已经醒了。您把声音拨大一点。”正在这时候，没有再拨电话，对方自己打来了电话。“这里是总管伊斯巴吕，”总管说，“早晨好，女厨师长太太。我没有把您给吵醒了吧？我感到很抱歉。对，对，已经5点3刻了，但是我真心诚意地感到抱歉，我让您受惊吓了。您曾想在睡觉时把电话机关掉。不，不，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特别是因为我想找您谈的这件事情是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可是我当然有时间，您请便，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就守在电话机旁。”

“她准保是穿了睡衣来接电话的。”总管微笑着对门房班长说，整个这段时间里此人一直神情紧张地俯身注视着那部电话机。“我确实把她叫醒了，她一向都是让在她那儿打字的那个小姑娘叫醒自己，这小姑娘今天一定是破例地误了事了。我感到抱歉，我把她叫醒了，她本来就神经过敏。”

“为什么她不讲话了？”

“她去看那姑娘出了什么事了，”总管回答时已经把听筒贴在耳朵上，因为电话铃又响了，“会找到她的。”他对着话筒里继续说，“您不要对什么都这么担惊受怕的嘛。您确实需要好好休息。那好吧，我冒昧问一下。这里有一个开电梯工，名字叫”——他带着询问的目光向卡尔转过身去，卡尔一直注意地听着，便立刻说出自己的名字，帮了他一把——“名字叫卡尔·罗斯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曾对他有过一点儿兴趣。可惜他辜负了您的一片好心，他未经允许就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由此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现在还无法估量的麻烦，所以我刚才把他辞退了。我希望，您不要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了。您说什么？辞退，是的，辞退。可是我告诉您了嘛，他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在这件事上我确实不能向您让步，亲爱的女厨师长太太。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威信，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这么一个孩子会给我把整个队伍的作风败坏了的，恰恰是对开电梯工我们必须极其留神。不，不，在这件事上我

不能帮您这个忙，尽管我一向愿意竭诚地为您效劳。即便我不顾一切让他留在这里的话，这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的，只会给我留下一个祸根，为了您的缘故，是的，为了您的缘故，他也不能留在这儿。您对他表示关心，可是他根本不配，由于我不仅认识他，而且也认识您，所以我知道，这准会让您感到大失所望的，而这正是我无论如何也要加以避免的。我完全直言不讳，虽然这个不思改悔的孩子站在我面前几步远的地方。得辞退他，不，不，不派他做别的工作，他完全不能用了。此外也还有人对他提出别的指控。譬如门房班长，怎么样，什么呀，费奥多尔，是的，费奥多尔抱怨这个孩子无礼和粗野。嗯，这还不够吗？哟，亲爱的女厨师长太太，您为了这个男孩而迷失您自己的本性了。不，您不可以这样来折磨我。”

这时，门房俯身对着总管的耳朵悄悄嘀咕了几句。总管起先惊讶地望着他，然后就那样快速地对电话机说话，以致卡尔一开始竟并不能完全听懂他说的话，就踮着脚尖走近过去两步。

“亲爱的女厨师长太太，”卡尔听见总管在说，“直说了吧，我简直不敢相信，您看人竟如此缺乏眼力。刚才我听说到一些有关您这位宝贝孩子的情况，这些情况将彻底改变您对他的看法，我几乎感到遗憾的是，偏偏得由我来把这些情况告诉您。原来这位高尚的少年，您称他是守礼仪的楷模，没有一个不当班的夜晚他不跑到城里去的，每次他总是早晨才从城里回来。哟，哟，女厨师长太太，这是有证人加以证实了的，无可指摘的证人，是的。现在您也许可以告诉我，这寻欢作乐的钱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吗？他怎么还会聚精会神地上班？也许您也还要我向您描述一番，他在城里干些什么勾当吗？摆脱掉这个孩子我可是刻不容缓。请您以此为戒，对流浪汉我们应该多加小心才是。”

“可是，总管先生，”卡尔嚷嚷道，他简直如释重负了，因为这里似乎发生了天大的误会，它很可能还会导致一切出乎意外地好转起来，“事情肯定搞错了。我相信，门房班长曾告诉您，说我每天夜晚都外出。可是这完全是不对的，相反，我天天晚上都在大寝室里，这一点所有的男孩都可以证明。如果我不睡觉，我就学商业通信，可是我一宿也没有离开过大寝室。这一点是很容易证明的。门房班长先生显然把我跟别人混淆了，现在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以为我不问候他。”

“您快给我闭嘴，”门房班长喊道，并挥舞拳头，换了别人，大概会挥动一个手指头的，“我会把你跟别人混淆的！对了，那我岂不就当不成

门房班长啦，如果我把人们都搞错了的话。我已经在职30年，还从来没有把人搞混过呢，从那时候起我们有过几百个领班，他们一定可以为我作证，可是在你身上，好小子，我会把人搞混淆了的。在你身上，凭着你这张引人注目的、光溜的鬼脸。这有什么会混淆的！你可以每天夜里都从我背后跑进城里去，我仅仅凭你这张脸便可证明，你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

“算了吧，费奥多尔！”总管说，他同女厨师长太太的电话交谈似乎已经突然停止，“事情很简单。问题根本就不在于他的夜间娱乐活动。他也许是企图在离去之前还诱使我们对他的夜间活动进行一场大规模调查。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出来，这样干他正巴不得呢。这就可能要把40个开电梯工都叫上来，听取他们作证，他们当然也统统把他混淆了。于是，渐渐地全体饭店工作人员都必须出来作证，饭店自然就得中止一段时间营业，这样，他最后被赶出去的时候，至少他已经把我们愚弄了一番了。这种事我们还是别干的好，女厨师长，这位好心的太太，已经让他给耍了，千万别再上他的当。我什么也不想听，你因失职已被当场解除职务。这儿我给你一张支付通知，你的工资就发到今天为止。顺便提一句，根据你的态度——我们私下说说——这简直是白送的，是我看在女厨师长太太的份上送给你的一份礼。”

这时有人打来一个电话，使总管不能立刻在支付通知上签字。“今天这帮开电梯工净给我找麻烦了！”他听了头几句话便嚷嚷开了，“这简直太不像话了！”过一会儿他嚷道。他从电话机转脸对饭店门房说：“劳驾，费奥多尔，看住这家伙一会儿，我们还有话要跟他说。”说罢，他向电话机里命令：“立刻上来！”

现在门房班长至少可以尽情发泄私愤了，这是他凭嘴讲话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他紧紧抓住卡尔的上臂，但是这不是那种毕竟还能忍受得了的平稳的抓人动作，而是他时不时地一松手，旋即又抓住，并且越抓越紧，他身强力壮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卡尔眼前顿时便一片黑暗。但是他不仅抓住卡尔，而且仿佛他也得到要同时拉伸他的命令似的，他也时不时地把他往上提升并摇晃他，一边还一再半询问的口吻对总管说：“我现在还会不会把他看错，我现在还会不会把他看错。”

当开电梯工班长，一个叫贝斯的，一个永远发着呼噜声的胖男孩走进来，并稍稍吸引住了门房班长的注意力的时候，卡尔才算得到了拯救。卡尔感到疲惫不堪，以致当他诧异地看见特蕾泽在那孩子背后脸色

煞白、衣履不整、头发蓬乱着悄悄走进来时竟几乎没打招呼。瞬间，她便来到他身边并悄悄问：“女厨师长已经知道了吗？”

“总管已经打电话告诉她了。”卡尔回答。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她赶快说，眼睛闪着明快的光。

“不，”卡尔说，“你不知道，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必须离开这儿，女厨师长也已经对此确信不疑了。请你别待在这里，上去吧，我随后会来向你告别的。”

“可是，罗斯曼，你想哪儿去啦，只要你喜欢，你完全可以留在我们这儿。女厨师长要办的事，总管样样都会去干的，他爱她呀，这是我最近知道的。你只管放心好了。”

“唉，特蕾泽，现在你走吧。你在这儿，我就不能有效地为自己辩护。而我又必须很好地为自己辩护，因为人们对我提出了许多谎言。可是我越是注意，给自己辩护得越好，我也就越有希望留下。所以，特蕾泽——”可惜他突然感到一阵疼痛，便万般无奈地轻声补充说，“要是这个门房班长能把我放开就好了！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敌人。瞧他老不停地拧我、拽我。”“为什么我说这个呀！”他同时在想，“没有一个女人会平心静气地听这种话的。”果不其然，没等到他用那只自由的手将她拦住，特蕾泽就转过身去对门房班长道：“门房班长先生，请您立刻放开罗斯曼，您弄得他好痛。女厨师长太太立刻亲自来这儿，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全是冤枉的。您放开他。折磨他，会给您带来什么快活呀！”说着，她甚至去拉门房班长的手。“命令，小姐，命令。”门房班长说，并用空着的那只手热情地把特蕾泽拉向自己怀里，与此同时，他用另一只手甚至使劲压住卡尔，仿佛他不仅想给他带来痛苦，而且也仿佛他对这条他拥有的胳膊抱着一个特殊的目的，这个目的还远没有达到。

特蕾泽花费了一些时间才从门房班长的搂抱中挣脱出来，正想找一直还在听噜里噜苏的贝斯讲话的总管替卡尔说情，这时，恰好女厨师长快步走了进来。

“谢天谢地！”特蕾泽喊道，一时间人们在房间里什么也没听见，只听见这句响亮的话。总管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把贝斯推到一边。

“您亲自来了，女厨师长太太？为了这件小事？我们在电话里谈过之

后，我能预感到会这样，但是我确实没想到您还真会来。可是您的被保护人的事情却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我担心，我果真将不辞退他，而是必须把他关押起来。您自己听吧。”说着，他招手让贝斯走过来。

“我想先和罗斯曼说几句话。”女厨师长边说边在一把沙发椅上坐下，因为总管再三请她就座。

“卡尔，你过来。”随后她说。卡尔走近或者不如说是被门房班长拖近过来。“您放开他，”女厨师长太太生气地说，“他不是谋财害命的凶手！”门房班长果真将他放开，但是松手前还狠狠地捏了他一把，捏得他怎么拼命控制也忍不住泪水涌进眼眶。

“卡尔，”女厨师长说，平静地将两手放在膝间，低头望着卡尔——这根本就不像审问——“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仍还完全信任你。总管先生也是一个公正的人，这一点我可以担保。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俩都愿意让您留在这里。”——说到这里，她朝总管匆匆瞥了一眼，仿佛她是在请求他不要打断她的话似的，他果然没插话，“迄今为止人们也许在这里对你说了些什么，这些话你都把它们忘了吧。尤其是门房班长先生对你说的话，你更别往心里去。他虽然是个情绪冲动的人，他干这一行所以也不奇怪嘛，但是他也有老婆和孩子，知道人们犯不着去折磨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这种事有人会妥善处理的。”

房间里鸦雀无声。门房班长露出企求澄清的神色看了看总管，总管则看了看女厨师长，摇了摇头。开电梯工贝斯在总管背后傻笑。特蕾泽悲喜交集，嚤嚤啜泣起来，竭力不让人听见。

而卡尔却没有正眼去看无疑正期待着他的目光的女厨师长，而是愣愣地望着地板，虽然这只能被理解为不祥的征兆。他的胳膊抽搐着，疼痛向周身扩散开去，衬衫粘在条纹伤痕上，他本来是应该脱下上衣，察看一下伤势的。女厨师长所说的话，当然是一番好意，但是不幸的是他觉得，仿佛正是女厨师长的这种态度才势必会显出，他不配领受别人的好意，女厨师长两个月来的良苦用心他受之有愧，咳，他什么也不配，活该落到门房班长的手中。

“我说这话，”女厨师长继续说，“是为了让你可以一如我自以为了解你的那样，不受干扰地回答我的问题，不管你到底干了什么事。”

“对不起，现在我可以去请医生吧，因为那个人可能会失血过多而死

去的。”开电梯工贝斯突然彬彬有礼地，然而却很扰人地插话说。

“去吧。”总管对贝斯说，贝斯当即快步离去。随后总管对女厨师长说：“事情是这样的。门房班长不是闹着玩儿才抓住这儿这个孩子不放的。楼下，在开电梯工的大寝室里，在一张床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人们发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喝得酩酊大醉的汉子。人们当然把他叫醒了，想把他撵走。可是这个汉子却大撒起酒疯来了，反复大声叫嚷说，大寝室是属于卡尔·罗斯曼的，说他是他的客人，是他把他带到这儿来的，谁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就会惩罚谁的。此外，他之所以必须等待卡尔·罗斯曼，也是因为此人已经答应给他钱并且已经取钱去了。女厨师长太太，请您注意：答应给钱并且已经取钱去了。你也可以注意听着，罗斯曼。”总管顺便给卡尔捎了一句，卡尔恰好已向特蕾泽转过身去，她像着了魔似的凝视着总管，一再地不是掠去额头上的头发，就是无意识地做着这个手势动作。“不过我也许要提醒你记住你还有事要办呢。因为下面那个人还说过，等你回去后你们俩要在夜晚去拜访某个歌女，不过这个歌女的名字却谁也没有听明白，因为他始终只能边唱着歌边说出这个名字来。”

说到这里，总管便顿住，因为脸色明显已经发白的女厨师长把沙发椅稍稍往后一推，倏地站了起来。

“我不打搅您了，别的事就别说了吧。”总管说。

“不，不，”女厨师长抓住他的手说，“您尽管继续往下讲吧，我愿意听到全部情况，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嘛。”

门房班长走到前面，大声拍着自己的胸脯，表示他一开始就把一切全都看透了，这时，领班说了句：“对，您完全正确，费奥多尔！”既抚慰、同时也拒斥了他。

“没有多少事情可讲的了，”总管说，“那些男孩子都是那样的人，他们先把那个人耻笑一番，然后就和他争吵起来，由于那里优秀的拳击手比比皆是，所以他一下子就被击倒了，我根本就没敢问，他身上哪儿流血，有多少处伤口，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很厉害的拳击手，对一个醉鬼他们自然应付裕如！”

“好吧，”女厨师长扶着沙发椅的扶手，望着她方才离开的座位说。“现在请你说一句话吧，罗斯曼！”然后她说。这时，特蕾泽已经离

开原先的位置，走到女厨师长的身边，挽住了女厨师长的胳膊，平时卡尔从未见她做过这个动作。总管紧挨着女厨师长的背后站着，慢慢抚平女厨师长已经略微翻起的朴素的小花边衣领。卡尔身旁的门房班长说：“嗯，说不说？”却只想做出一个推的动作，以便乘机给卡尔后背一拳。

“这是真的，”卡尔说，由于挨了这一拳显得比预期的更不稳固了，“是我把那个人带进大寝室里来的。”

“别的事我们不想知道。”门房代表所有的人说。女厨师长默默转向总管，随后又转向特蕾泽。

“我没有别的办法，”卡尔继续说，“那个人是我从前的一个同伴，我们已经两个月没见面了，这回他到这儿来，是来拜访我，可是喝得酩酊大醉，以致无法独自一人离开这儿。”

总管在女厨师长身边轻声自言自语：“原来他是来做客的，后来喝得醉醺醺的，就走不了了。”女厨师长扭过头去悄悄对总管说了些什么，总管露出一丝显然与此事不相干的笑意似乎提出异议。特蕾泽——卡尔只瞥了她一眼——完全茫然地把脸紧紧贴在女厨师长身上，再也不想看见什么。唯一对卡尔的解释感到完全满意的，是门房班长，他反复说了几遍：“完全正确，他的酒友他不得不帮助呀。”并且试图通过眼神和手势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牢牢记住他的这句话。

“我的过错就是，”卡尔说，并且顿了一顿，仿佛他等着他的法官们说一句友善的话，鼓励他继续替自己辩护，但是没有人说话，“我的过错仅仅是，我把那个人——他叫鲁滨孙，是个爱尔兰人——带进了大寝室。他所说的其他的话，统统都是酒醉后说的胡话，是不对的。”

“你没有答应给他钱？”总管问。

“答应了。”卡尔说，他感到很抱歉，他居然把这件事给忘了，由于考虑不周或精神涣散他已经用了过于明确的言词声称自己没有过错。“我是答应给他钱了，因为他曾向我要钱。但是我不是想去取钱来给他，我是想把我昨天夜里挣的小费给他。”说着，他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在手心里亮出那几个小硬币给大家看，以证明自己的话不假。

“你越说越离谱了，”总管说，“要是相信你的话，那就得始终忘掉你

从前曾经说过的话。起先你只是把那个人——连你说的鲁滨孙这个名字我都不信，自从有了爱尔兰以来，没有一个爱尔兰人叫这个名字的——起先你只是把他带进了大寝室，顺便提一句，单凭这一点，你就可以立马被解雇，可是起先你没有答应给他钱，后来，人家出其不意地问你，你又答应给他钱了。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搞问答游戏，我们是想听你的申辩。可是起先你不想去取钱，而是想把你今天的小费给他，可是后来事实表明，这钱还在你身上端着呢，所以显然还是想另外去取别的钱的，你长时间不在也证明了这一点。说到底，你想从你的箱子里取钱给他，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而你竭力否认这一点，这倒有点奇怪了。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你也始终闭口不谈，你是在这儿饭店里才把他灌醉的，这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嘛，因为你自己已经承认，他是独自一人来的，却不能独自一人离去，况且他自己就在大寝室里到处叫喊，说他是你的客人。现在还只有两件事要问一问，如果你愿意简单了结这件事，这两个问题你可以自己回答，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你不合作，我们也会把问题弄清楚的：第一，你是怎样设法进入储藏室的；第二，这准备送人的钱你是怎么积攒起来的？”

“如果人家没有良好的愿望，我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卡尔暗自思忖，不再回答总管的提问，尽管特蕾泽会因此而感到很痛苦。他知道，他所说的话，到头来全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会和本意完全不一样，是好是坏，这全看你怎么判断了。

“他不回答。”女厨师长说。

“这是他所能采取的最明智的做法了。”总管说。

“他会想出什么鬼点子来的。”门房班长边说边用那只以前颇残忍的手小心翼翼抚摩自己的胡子。

“你安静点，”女厨师长对身边开始啜泣起来的特蕾泽说，“你看见了，他不回答，我还能帮他什么忙呀？说到底是我在总管先生面前做错了事嘛。你说吧，特蕾泽，你是不是觉得是我耽误了事，没出力帮他的忙？”特蕾泽怎么会知道这个，女厨师长向这个小姑娘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这个请求从而使自己大失体面，这有什么用吗？

“女厨师长太太，”卡尔说，他再次打起精神，但是仅仅是为了可以使特蕾泽避免作出回答，没有别的目的，“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给您丢

脸的事了，仔细调查以后，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认为的。”

“任何一个人，”门房班长用指头指着总管说，“这是在挖苦您呢，伊斯巴吕先生。”

“嗯，女厨师长太太，”总管说，“现在6点半，时间不等人了。我想，在这件已经处置得太宽容的事情上，您最好还是让我来提出最后的处理意见吧。”

这时，小吉阿科莫已经走了进来，正要向卡尔走去，却因慑于笼罩全场的一片寂静气氛而收住了脚，等待着。

自卡尔讲完最后那几句话以来，女厨师长就一直没有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已经听见总管的这个意见了。她睁大眼睛望着卡尔，这一双眼睛又大又蓝，但是由于上了年纪和劳累过度而显得有点儿暗淡。瞧她这样站在那里，轻轻摇晃着面前的沙发椅，人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期盼，她马上就会说：“嗯，卡尔，我琢磨着，这件事还没有弄清楚，如你所说的，事情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这调查我们现在就进行，不管人家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因为必须秉公办事。”

但是女厨师长没说这样的话，在一个无人敢惊扰的小间歇之后——只有座钟敲响六点半证实总管说的话，而且谁都知道，整个饭店里所有的钟都同时在敲响——女厨师长说：“不，卡尔，不，不！我们不想轻信这种话。正义的事情也会有一种特殊的外观，而你的事情，我不得不承认，却没有这样的外观。这话我可以说，而且我也必须说，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是我怀着对你的最好的偏见到这儿来了。你看到了，特蕾泽也沉默了。”（可是她没有沉默，她在哭。）

女厨师长突然一下狠心顿住并说：“卡尔，你过来一下。”当他走到她跟前时——总管和门房班长立刻在他背后凑到一起热烈交谈起来——她用左手抓住他，带着他以及没有主意跟着一起走的特蕾泽走到房间尽里头，在那儿和两个人踱了几个来回的步，她边踱步边说：“有这个可能，卡尔，你似乎相信会这样，要不然，我简直无法理解你了，进行一次调查有可能会证明你在一些细微末节上是对的。怎么不会呢？你也许确实问候门房班长了。我甚至对此深信不疑，我也知道，我该怎样看待门房班长，你看，现在我自己就对你直言不讳。可是这种小小的辩白丝毫帮不了你的忙。经过多年的交往，我非常赏识总管的鉴别人的能力，

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可靠的人，如今他已经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你的过错，我觉得这过错确实是不可辩驳的。也许你只不过行动欠考虑，可是也许你并不是我所认为的那样的人。不过，”说到这里，她几乎是自己顿住，回过头去匆匆瞥了一眼那两位先生，“我还会改变我的看法，我仍然认为你根本上看来是个规矩正派的孩子。”

“女厨师长太太！女厨师长太太！”总管截住她的目光提醒道。

“我们马上就谈完了，”女厨师长说，旋即用更快的语速规劝卡尔，“听着，卡尔，据我对事情的了解，总管不想进行调查，我还感到高兴呢。因为，如果他要调查，我就得为你的利益而出面阻止。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怎样并且是用什么款待那个人的，而且那个人可能不是如你所伪称的那样，是你从前的同伴中的一个，因为在分手时你曾和他们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你不会在现在这个时候去招待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所以这只能是你夜晚在市里哪家酒店里轻率结交的一个熟人。所有这些情况，卡尔，你怎么可以向我隐瞒呢？也许你在大寝室里受不了了，也许起初你是出于这个无可非议的理由才在夜里出去游荡的，可是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知道，我当初想给你弄一个单间，完全是在你的请求下才放弃了这个打算。现在看来，似乎你倒是更喜欢那公共大寝室，因为你觉得住在那儿可以更加不受拘束。你的钱你都存放在我这儿，每周的小费你都交到我这儿。天晓得，孩子，你从哪儿弄来的钱去寻欢作乐，你现在又想到哪儿去取钱来给你的朋友？这自然纯粹都是些我至少现在决不可以向总管透露的事情，因为不然的话也许调查也就无法避免了。所以你无论如何也必须离开这家饭店，而且越快越好。你直接就到布雷纳膳宿公寓去——你已经和特蕾泽一道到那儿去过多次——凭这份推荐他们会免费接收你的。”——说着，女厨师长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金色笔，用这笔在一张名片上写了几行字，可是写字的时候她没有停止说话——“你的箱子我马上让人给你送去。特蕾泽，你快到开电梯工更衣室里去收拾他的箱子！”（但是特蕾泽还没动弹，而是在经受了这一切痛苦之后如今也想亲眼看到卡尔的事情因女厨师长的善良意愿而出现好的转机。）

有人没有露面把门开开一条小缝，随后立刻又把门关上。显然是有人对吉阿科莫说了什么话，因为此人走过来说：“罗斯曼，我有话要向你转告。”

“马上就完，”女厨师长说，把名片塞进卡尔的口袋里，卡尔一直低

着头听她说话，“你的钱暂时由我保存，你知道，你是可以信赖我的。今天你就待在家里，考虑考虑你的事情，明天——今天我没有时间，而且我在这里也滞留得太久了——明天我到布雷纳那儿去，到时候我们再看，我们还能再为你做些什么。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不管怎样，这一点你今天就应该认识到。对你的未来你不必操心，你还是多想想过去的时光吧。”说罢，她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便向总管那边走去。卡尔抬起头来，目送着这位身材高大、魁伟的妇女步履稳健、姿态潇洒地离去。

“难道你一点儿也不觉得高兴，”在他身边留下没走的特蕾泽说，“这样的结局不是很好吗？”

“哦，是的。”卡尔对她微微一笑说，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人家把他当小偷赶走感到高兴。特蕾泽的眼里闪烁出纯真的喜悦的光芒，仿佛既然人家让他走人，不管是光荣地离去还是耻辱地溜走。那么，卡尔做没做坏事，他受到了公正还是不公正的评价，这对她来说也就完全是无所谓的了。恰恰是这个在她自己的事情上一丝不苟、对女厨师长的一句并不完全明确的话会反复揣摩、探究几个礼拜的特蕾泽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故意问：“你马上去收拾我的箱子并把它送走吗？”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惊讶地直摇头，因为特蕾泽居然这么快就领悟了这个问题的意义。她确信，箱子里一定有必须严加保密不能让大家看见的东西，所以，她没顾得上看卡尔一眼，没顾得上和他握一握手，而是只悄悄地说了声：“当然，卡尔，马上，我马上去收拾箱子。”话音刚落，她就撒丫子跑开了。

这时，吉阿科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因久等而情绪冲动起来，大声嚷嚷：“罗斯曼，那个人在下面过道里打滚，不愿意让人把他弄走。他们想送他去医院，可是他抗拒并声称，你决不会容许他进医院的。他要人家叫一辆汽车来送他回家，说是你会付车钱的。你愿意付吗？”

“这个人信任你。”总管说。卡尔耸耸肩膀，把钱点清塞到吉阿科莫的手里。“我再也没钱了。”然后他说。

“他们也要我问问你，你愿不愿意随车一起走？”吉阿科莫还问，把钱弄得叮当响。

“他不跟车走。”女厨师长说。

“好吧，罗斯曼，”总管没等吉阿科莫到外面便赶快说，“你现在就被

解雇了。”

门房班长点了好几回头，就好像这是他自己的话，总管只是在复述而已。

“解雇你的理由我不能大声张扬，因为如果一张扬出来，我就得把你关起来。”

门房班长向女厨师长投去极严厉的一瞥，因为他想必已经看出，她是这一过分宽大处理的原因。

“现在你去贝斯那儿，换衣服，把你的制服交给贝斯，立刻离开这栋房子，立刻离开。”

女厨师长闭上眼睛，她想以此来安慰卡尔。就在他鞠躬告别的时候，他仓促间看到，总管好像正偷偷地抓住女厨师长的手在抚摩它。门房班长迈着沉重的步伐陪着卡尔走到门口，他不让卡尔把门关上，而是自己让门敞开着，以便可以对着卡尔的背影叫喊：“15秒钟以后我要看着你在大门口从我身边走过！你记住这一点！”

卡尔尽快料理一应事务，想避免在大门口受纠缠，但是事情办起来比他希望的慢得多。首先，没有马上就找到贝斯，现在，正当吃早饭的时候，哪儿都挤满了人，其次是卡尔发现自己的旧裤子让一个开电梯工借走了，他不得不找遍了几乎所有床上的挂衣钩才找到那几条裤子，致使大概过了五分钟以后，卡尔才来到大门口。这时正好有一位女士夹在四个男士的中间在他面前行走。他们大家都朝一辆正在等候他们的大轿车走去，一个穿号衣的仆人手扶着一扇已打开的车门，同时将左臂平直地向旁边伸出，显出一副极其庄严的样子。但是卡尔想躲在这几个高贵人士的背后悄悄溜出去的希望落空了。门房班长早已一把抓住他的手，将他从两位男士之间拖出来，边向那两个人道歉，边将他拖到自己身边。

“这哪儿是15秒钟呀？”他从旁边看着卡尔说，仿佛他是在观看一只走时不准的钟似的。“你来一下。”随后他领着他走进那间大门房间，虽然卡尔早就想仔细看看这间门房间，但是现在，他却是在门房班长的推拉下满怀着疑虑走进来了。他都已经进了门了，却还转过身去，试图推开门房班长，溜出去。

“不，不，你从这儿进去吧。”门房班长将卡尔扭转过身去说。

“我已经被解雇了嘛。”卡尔说，他这话的意思是说，饭店里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向他发号施令。

“只要我留住你，你就走不了。”门房说，这话当然也对。

卡尔毕竟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他干吗要反抗门房呢。从根本上来说，人家还会拿他怎么样？况且这门房间的四壁全由巨大的玻璃板组成，通过这些玻璃板人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前厅里熙来攘往的人流，仿佛人们就置身在他们的中间似的。嘿，整个门房间里似乎没有一个角落能躲过别人的视线。尽管外面的人似乎都行色匆匆，因为他们伸出胳膊、耷拉着脑袋，东张西望，高举着行李，纷纷寻找着自己的路，可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错过了向门房间里瞥一眼的机会的，因为门房间玻璃板后面总是挂着告示和通知，它们不仅对客人而且对饭店职工都有一定的重要性。而且除此之外门房间与前厅之间还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因为在两扇大推移窗的窗口坐着两个门房助理，忙不迭地对各种各样的询问给予答复。这简直就是些劳累过度的人，卡尔敢断言，他所认识的这位门房班长在自己的晋升过程中已经绕过了这种职务了。这两个问讯处服务员——这一点人们从外面无法正确想象——始终在窗口至少面对着十张询问的面孔。在这十个不断交替着的问题中间常常夹杂着一阵杂七杂八的话语，仿佛每一个人都是被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派遣来似的。总是有几个人同时提问，此外还总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同时说话。大多数人想从门房间里取走或在那里寄存什么物件，于是乎，人们也总是看到人群里伸出焦躁地挥动着的手。有一回，一个人想得到一张报纸，不料这张报纸在空中展开，霎时间遮住了大家的脸。所有这一切这两个门房助理都必须经受住。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单靠说话是不够的，他们喋喋不休，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一个神情阴郁、蓄着一部围住了整张脸面的黑胡子的人，他毫不停歇地回答着提问。他既不看桌面，虽然他的两只手不停地在桌面上忙乎着什么，也不看这一个或那一个提问者的脸，而是只愣愣地凝视着前方，显然是为了节省和积聚自己的力量。而且他的胡子大概有点儿妨碍别人听懂他的话，站在他旁边的卡尔很少听懂他说的话，尽管很可能此人讲的是一口带英语腔调的外国语。此外，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一个答复紧紧衔接着并且变成为另一个答复，以致往往一个提问者神情紧张地悉心倾听，因为他以为，现在还在说他的事情呢，可是片刻过后才发现，原来他的事已经了结了。人们也必须习惯于门房助理

从不请人重复一个问题，即便这个问题大体上可以理解，只是问题提得有点不清楚，随后那几乎觉察不到的一摇头便表示，他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而认识自己的错误并用较好的措词表达问题，这便是提问者自己的事情了。有些人特别为此而在窗口前化去了很长的时间。为了协助门房助理的工作，还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名跑腿的童仆，这童仆飞快奔跑，从一个书架上或者从各个不同的箱子里取来门房助理所需的東西。这是饭店里小青年里报酬最高、但也是最辛苦的职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比门房助理还辛苦，因为门房助理只需要思考和说话，可是这些小青年却必须同时思考和奔跑。他们一旦拿来了什么不对头的东西，门房助理百忙之中当然无暇用长篇大论去教训他们，他猛一挥手把他们给他放到桌上的东西干脆推到地上。极其有趣的是门房助理换班，卡尔刚进来恰好就赶上了。这样的换班，至少在白天，自然必须经常进行，因为大概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窗口后面坚持一个小时以上的。换班时间一到，一只钟便敲响起来，两个来接班的门房助理同时从一扇侧门走进来，每人后面都跟随着一个供差遣的童仆，他们暂且无所事事地站在窗口附近，观看一小会儿外面的人，以断定眼下的答问正处于哪个阶段。一旦他们觉得时刻适宜于插入进去，他们便拍拍该被换下的门房助理的肩膀，此人虽然迄今丝毫不曾理会他背后发生的事，却立刻心领神会，腾出自己的位置。全部过程进行得如此迅速，以致外面的人往往会感到突然，一看到自己面前突然冒出来新的面孔竟会吓得几乎要往后退缩。被换下来的那两个人舒展一下肢体，然后便就着两个放满了水的洗手盆冲了冲自己的发热的脑袋。可是换下来的跑腿童仆还不可以舒展肢体，他们还得花一点时间将在他们当班期间被扔到地上去的物件拾起来并将它们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

所有这一切卡尔高度聚精会神在片刻瞬间印入了自己的脑海之中，他带着轻微头痛默默跟随着门房班长继续往前走。门房班长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回答问讯的方式给卡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突然一扯卡尔的手说：“你瞧，在这里是这样干活的。”诚然，卡尔在这家饭店里并没有偷过懒，但是他却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工作，他几乎完全忘却了门房班长是他的大敌，竟抬头望着他，默默地、赞许地点了点头。可是门房班长却又似乎觉得这是过高估计了门房助理并且对他本人也许是一种不礼貌行为，因为仿佛他已经愚弄过了卡尔似的，他嚷嚷道，而且并不担心人家会听见他说的话：“这儿这活儿当然是全饭店里最愚蠢的活儿，仔细听上一个小时后，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来你几乎就全知道了，其余的问题是不需要去回答的。倘若你不是狂妄粗鲁，没有撒谎、放荡、酗酒和偷

窃的话，我也许就会雇你在这样一个窗口干活，因为我一概只用头脑迟钝的人干这种活儿。”

卡尔完全没有理会这种针对他的辱骂，因为令他感到极大愤慨的是，门房助理的诚实而艰苦的劳动没有受到赞赏，反倒受到嘲弄，况且是受到这样一个人的嘲弄，这个人如果胆敢在这样一个窗口坐下，不出几分钟便一定会在所有提问者的一片耻笑声中败下阵来。

“您放开我，”卡尔说，他对这间门房间的好奇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不愿意再和您打什么交道。”

“要离开这儿，没这么便宜。”门房班长说，扭住卡尔的两条胳膊，扭得卡尔一点也动弹不了它们，简直是他拖到了门房间的另一头。外面的人没有看见门房班长的这种暴力行为？抑或，倘若他们看见了，那么他们究竟怎样理解这件事呢，居然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指摘，没有一个人起码来敲敲玻璃板向门房班长表示，他被人注意上了，不可以对卡尔为所欲为？

但是不久卡尔也就再也没有希望得到前厅里的人的帮助了，因为门房班长一把抓住一根绳子，霎时间黑色的窗帘合拢遮住了除顶端以外的半个门房间的玻璃壁。在门房间的这一角里也有人，但是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一切与他们的工作不相干的事。而且他们完全受制于门房班长，不管门房班长想出什么鬼点子来，他们非但不会帮卡尔的忙，反倒会帮门房班长去掩盖，譬如这里有六个门房助理守着六部电话机。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这样分工的，即总是一个人只听电话里的谈话，邻座的那个人便按照第一个人接收到的信息将委托要办的事用电话传达给别人。这是那种最新式的电话机，无需为它们设电话间，因为电话铃声不比小鸟唧唧叫声响多少，人们可以用耳语声对着话筒说话，这些话通过特殊的电子扩大器到达终端时音量极大。所以人们几乎听不见那三个对着电话机讲话的人的声音，还以为他们是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观看电话机话筒里的一个什么过程呢？而另外那三个人则犹如被那向他们传过来的、而对周围的人来说却是听不见的喧闹声震得麻木了，他们低头对着纸，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纸上作记录。在这里也是在这三个说话的人中的每一个的身边又站着一个男孩在一旁帮忙，这三个男孩不干别的，只交替着把脑袋伸向他们的主子专心地听，然后就犹如被刺痛了似的，急急忙忙去翻阅大厚本黄皮电话号码簿——翻动大量书页的响声远远盖过电话机发出的每个声音——找出电话号码来。

卡尔实在忍不住，定要把这一切看个仔细，虽然已经坐下的门房班长用一种扭抱动作将他紧紧揪住。

“这是我的义务，”门房班长边说边摇晃卡尔，仿佛他只想让卡尔对他转过脸来似的，“总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耽误了的事，我总应该以饭店经理处的名义起码是略微弥补一下吧。这里大家总是这样互相帮衬的。没有这种精神，这么一家大企业是无法正常运作的。你也许想说，我不是你的顶头上司，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更应该关心这件否则就无人过问的事情。而且我作为门房班长在某种意义上管着所有的人呢，因为饭店里所有的门都受我管辖，其中包括这座大门、三座中门以及七座侧门，那不计其数的小门和没有门的出口就更不用提了。所有在考虑之列的服务人员当然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我，因为享有这份殊荣。所以另一方面，我自然就要对饭店经理处尽义务，这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哪怕只有丝毫可疑形迹的人溜出去。而我却恰恰觉得你甚至特别形迹可疑，因为我爱怀疑谁就可以怀疑谁。”说着，他高兴地举起双手，随后又使劲拍回到卡尔身上，只听啪的一声，拍得卡尔疼痛难当。“有这个可能，”他补充说，洋洋得意地侃了起来，“你会从另外一个出口悄悄溜出去，因为我觉得不值得为你而发布特别的指令。不过既然现在你到了这儿了，我就要好好受用受用你。顺便告诉你，我们约好在大门口见面，你就会守约而来，对此我丝毫没有怀疑过，因为狂妄者和不顺从者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儿，这是一条规律。你一定还会经常从你自己身上体察到这一点的。”

“您别以为，”卡尔说，并且闻到了一股从门房班长身上散发出来的奇特的霉味，在这里，他紧挨着他身边站了这么久，他才闻到了这股怪味，“您别以为，”他说，“现在我完全受您的控制，我可以喊叫的。”

“我可以堵住你的嘴。”门房平静而快捷地说，必要时他确实是会这样干的。“难道你真的以为，如果有人为了你而进来，就会有人说你做得对，我，门房班长，做得不对？现在你大概看出来你的希望荒唐极了吧。你知道吗，当你还身穿制服的时候，你看上去还有那么一点儿威风，但是穿上这身西装，确实只有在欧洲人家才会理睬你！”——说着，他拉扯这身西装的各处不同的部位，这身西装虽然五个月前几乎还是新的，现在却已穿旧，皱皱巴巴，而且还油渍斑斑。这油斑主要应该归咎于开电梯工们干活时从不体恤别人，他们按规定每天要保持寝室地面平滑、不沾尘土，但是他们偷懒，不认真清扫，而是用一种什么油喷洒地

面，同时也就使衣架上的所有衣服溅上了油渍。人们自然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收藏在自己乐意收藏的地方，可是总会有某个人，恰恰手头没有自己的衣服，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别人的藏起来的衣服并借来穿了。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恰好就是轮到今天搞寝室清扫的那个人，于是此人就不仅在衣服上溅上油渍，而是从上到下浇足了油。只有雷内尔把自己的贵重衣服藏在一个秘密地点，几乎从来未曾有人从那儿把他的衣服掏出来过，尤其是因为也许也不会有人出于恶意或吝啬借穿别人的衣服，而是纯粹由于匆忙和马虎才信手胡拿。但是连雷内尔的衣服上，在后背中央，也有一个浅红色的圆形油斑，而在城里，这个斑点哪怕是在这位优雅的年轻小伙子的衣服上，内行人一看也可断定这是个开电梯工。

在回忆这些往事时，卡尔深感自己作为开电梯工也已经就受够了苦，而且一切都枉然，因为现在看来，这个开电梯工的差事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是谋取更好的职位的一个预备阶段，现在他反倒被人踩进更深的泥坑，甚至险些就要被人投进监狱。此外，他现在还被门房班长揪住，此人正在琢磨，他如何才能继续羞辱卡尔。卡尔完全忘记了门房班长根本不是那种也许可以晓之以理的人，竟用那只刚刚挣脱出来的手多次拍着额头大声说：“就算我果真没有问候过您，一个成年人怎么可以因为人家疏漏了一次问候就有如此强烈的复仇欲望呢！”

“我不是有复仇的欲望，”门房班长说，“我只想搜查你的口袋。我虽然相信我什么也不会找到，因为你想必早有防备，一定已经让你的朋友每天转移一点，逐渐地已经把全部东西都转移走了。但是搜查还是要对你搜查的。”说罢，他用手伸进卡尔的一只上衣口袋，他用力如此之猛以致边上的线缝顿时便裂开。“这里面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他边说边用手一把把这只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一张饭店的日历广告，一页商务公函练习题，几粒上衣和裤子纽扣，女厨师长的名片，一把修指甲刀，是一位客人有一回收拾箱子时扔给他的，一面旧小镜子，是雷内尔有一回大概是为了感谢他代了他十次班而送给他的，还有几件别的小物件。“这里面已经什么也没有了。”门房班长重复道，把全部东西都扔到椅子下面，仿佛卡尔的东西，只要不是偷来的，便理应扔到椅子下面去似的。

“现在可是够了。”卡尔暗自思忖——他的脸准是涨得通红——当门房班长因贪欲而放松了警觉，在卡尔的第二只口袋里来回掏摸的时候，卡尔猛地一用劲一下从袖管里挣脱出来，身子还没站稳便急忙奔跑起来，把一个门房助理相当厉害地撞倒在他的电话机上，穿过闷热的门房

间跑到门口，他跑得其实比预计的慢，却在身穿沉甸甸大衣的门房班长还没来得及站起身之前便已幸运地到了外面。门卫的组织工作想必并非堪称楷模，虽然从几个方面响起了铃声，但是天知道这铃声是什么意思！饭店员工们虽然在门厅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们人数众多，人们几乎会以为，他们想悄悄地封锁出口，因为除此以外人们看不出这样走来走去的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可是，不管怎么说，卡尔很快就走出大门，但是还必须沿着饭店人行道走，因为他无法走到大街上去，一辆接一辆的汽车时断时续地从饭店大门口驶过。这些汽车急于驶离这条堵车的街道，简直互相啮合住了，每一辆都被随后跟上的那辆推动向前。有特别紧要的事情要办的行人虽然时不时地从一辆辆汽车的缝隙中间穿行过去，仿佛那儿是一个公共的人行横道似的，他们全然不顾，汽车里只是坐着司机和仆人，还是也坐着高贵的人物。但是卡尔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人家想必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才敢于这样做。他很可能会碰上一辆汽车，坐在里面的人对此大为光火，便把他撞倒在地，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作为一个在逃的、可疑的、只穿衬衫的饭店职工最惧怕的也莫过于此了。这些汽车毕竟不会永远这么一辆接一辆行驶下去的，其实只要他沿着饭店走，他也就最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卡尔果然终于来到一个地方，那儿的汽车行列虽然没有中断，但是都顺着街道拐过弯去，行列有所松动。他正想溜进街上涌流的车辆和人群之中，人群里看上去比他可疑得多的人都在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正在这时候，他听见附近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去，便看见两个他熟识的开电梯工正从一个低矮、窄小得像墓穴口的门洞里竭尽全力把一副担架拖出来，卡尔一眼便认出，躺在担架上的正是鲁滨孙，头、脸和胳膊用绷带层层包扎着。看着他胳膊移向眼睛，想用绷带擦去他由于疼痛或由于别的心酸事或甚至由于与卡尔重逢感到喜悦而流下的眼泪，心里很不是滋味。

“罗斯曼，”他用责备的语气说，“你为什么让我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不让他们把我抬走，我已经抗拒了一个小时了，你才来。这帮家伙”——说到这里，他给了其中的一个开电梯工一个栗暴^[2]，仿佛他绑上了绷带就不怕挨打了似的——“都是真正的魔鬼。啊，罗斯曼，这次拜访你可让我吃足了苦头了。”

“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卡尔边说边向担架走近过去，开电梯工笑着把担架放下，乘机歇息歇息。

“你还问，”鲁滨孙叹了口气，“你瞧，我成什么样子了。咳，我很可能被打成终身残废了。我身上疼极了，从这儿到这儿”——他先指指脑袋，后又指指脚趾——“我真恨不得让你看见，我是怎么流鼻血的。我的西装背心全给糟蹋了，我已经干脆把它扔在那儿，我的裤子撕成碎片，现在我只穿裤衩”——说着，他略略掀开毯子，要卡尔往里看。“我会落个什么下场！我至少得躺几个月，我想马上给你把话挑明，我没有别人，只有你可以照料我，德拉马什太没有耐性。罗斯曼，小罗斯曼！”说罢，鲁滨孙向稍稍后退的卡尔伸出手，想抚摩他以赢得他的同情。“我为什么一定要拜访你呀！”他重复了好几遍，以便让卡尔不致忘了，他对自己的不幸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不过卡尔却立刻便看出，鲁滨孙的抱怨并非因伤口所致，而是由于醉酒后醒来时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造成，因为他醉醺醺地刚刚睡着，立刻就被叫醒，莫名其妙地让人给打得流血，一旦清醒过来便觉得完全无所适从了。他的伤口无关紧要，这一点从那奇形怪状的、用旧布片绑成的绷带上就已经可以看出来，开电梯工们显然是闹着玩儿用这种绷带把他全身都裹住了。担架两头的那两个开电梯工也时不时扑哧扑哧地笑出声来。可是这里不是使鲁滨孙恢复知觉的地方，因为行人急匆匆在这里飞奔而过，谁也不理会担架旁边的这几个人，常常有人以地道的体操运动员的跳跃动作从鲁滨孙身上跳越过去，那位用卡尔的钱雇的司机嚷着：“前进，前进！”开电梯工使出浑身力气抬起担架，鲁滨孙抓住卡尔的手谄媚地说：“来吧，你来呀。”卡尔现在这副打扮，钻进汽车里岂不是最安全可靠了？于是，他就在鲁滨孙身旁坐下，鲁滨孙把头倚在他身上。留在原地的开电梯工通过车窗和他、和这位他们从前的同事热烈握手，汽车一个急转弯驶向街上，仿佛一定要出事故了似的，可是这辆汽车笔直行驶，立刻也就平静地汇入到大街上各种车辆组成的洪流中去了。

避难 [3]

这准是市郊的一条偏僻的街道，汽车在这条街上停下，四周一片寂静，有孩子蹲在人行道边上玩耍。一个肩上搭着好多件旧衣服的男人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边仰脸朝着房屋的窗户叫喊。当卡尔从汽车里出来走到被上午的太阳照得热乎乎、亮晃晃的柏油路上时，他觉得浑身疲倦、不舒服。

“你真的住在这里？”他朝汽车里问。

整个行车期间一直睡得安安稳稳的鲁滨孙咕哝了一句不知什么模糊不清的表示肯定的话，似乎在等着卡尔把他背出去。

“那这里就没有我的事了，再见吧。”说着，卡尔撒腿就要顺着那条缓缓向下倾斜的街道走去。

“我说卡尔，你究竟是怎么啦？”鲁滨孙嚷着，纯粹由于担心居然已经相当挺直地站立在车里，只不过就是膝盖还有些晃悠。

“我得走了。”卡尔说，他亲眼看见鲁滨孙已经迅速康复。

“就只穿了衬衫？”鲁滨孙问。

“我会去挣钱买一件上衣的。”卡尔回答，满怀信心地朝鲁滨孙点点头，向他举手行礼并且或许真的就走掉了，倘若不是司机把他叫住的话：“再稍等片刻，我的先生！”

真叫人感到尴尬，司机提出要加付车费，因为在饭店前的等候时间还没付钱。

“噢，是的，”鲁滨孙从汽车里证实这个要求合理，“我在那里不得不等了很长时间。你还得给他几个钱。”

“是的，没错。”司机说。

“好吧，不知道我还有钱没有。”说着，卡尔把手伸进裤袋，虽然他明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

“我只能向您要钱，”司机叉开两腿站着说，“我不能要那儿的那位病人付钱。”

一个酒糟鼻小伙子从大门那边走近过来，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听他们说话。这时，一个警察恰好在街上巡逻，便低着头盯住那个只穿衬衣的人，收住了脚步。

鲁滨孙也发现了这个警察，却干了件蠢事，竟从另一扇车窗向他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听那口气，仿佛人们可以像驱赶一只苍蝇那样驱赶一个警察似的。已经注意上这个警察的孩子们，因他站住不动便也注意起卡尔和司机，便一溜小跑奔跑过来。一个老太太站在对面门

洞里，呆呆地朝这边看。

“罗斯曼！”这时，高处一个声音在喊。这是德拉马什，是他在从最高一层的阳台上叫喊。在白晃晃、蓝盈盈的天空的映衬下，他自己的身影相当的模糊不清，显然穿了一件睡衣，在用一只观剧望远镜观看街上的动静。他身旁撑开着一把红色遮阳伞，伞下似乎坐着一个女人。“喂！”他使尽最大力气喊，想让人家听清楚他的话，“鲁滨孙也在吗？”

“在。”卡尔回答，并得到了鲁滨孙从汽车里发出的第二个响亮得多的“在”的有力支持。

“喂！”德拉马什大声回答，“我马上就来！”

鲁滨孙从车里探出身来。“这真是个男子汉。”他说，这句对德拉马什的赞语是说给卡尔、说给司机、说给警察和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听的。虽然德拉马什已经离开阳台，但是人们心不在焉地还在注视着阳台，人们看到，上面阳台上遮阳伞下果然有一个体格强壮、身穿无腰身红色连衣裤的女人站立起来，从阳台栏杆上拿起那架观剧望远镜，用它观看下面的人，而那些人们则正渐渐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卡尔等待着德拉马什，朝楼门里并进而朝庭院里张望着，一列几乎依次相连的勤杂工穿越这庭院，他们个个都在肩上扛着一只虽小但显然很沉重的箱子。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司机走到车子跟前，用一块布擦拭车灯。鲁滨孙触摸四肢检查疼痛情况，似乎对痛感极轻微感到惊讶，因为他尽管检查得极其认真却没觉得怎么痛，于是就深深低下头开始小心翼翼地解开大腿上厚厚实实的绷带中的一个。警察把黑色小警棍横在胸前，以警察不管是在执行普通公务还是在埋伏以待都必须具有的巨大耐心默默等待着。酒糟鼻小伙子坐在楼门口一块石头上，伸出了双腿。孩子们迈着小步渐渐走近卡尔，因为这个人虽然不注意他们，他们却因他穿了那件蓝衬衫而觉得他是所有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

从德拉马什从楼上到这儿所耗去的时间长久上，人们可以推算出这幢楼房是很高的。而且德拉马什甚至来得还是十分仓促的，只匆匆披了件睡衣。“哎哟，你们来了！”他既高兴又严厉地嚷着。他迈大步行走时，他的花里胡哨的内衣裤常常瞬间露出。卡尔不完全明白，德拉马什为什么在这里，在这座城市里，在这栋巨大的出租公寓里，穿得这样随便便地四处行走，仿佛他是在自己的私人别墅里似的。德拉马什也和

鲁滨孙一样模样大变了。他那张黑黝黝、光溜溜、无比洁净、线条粗犷的脸庞露出骄傲和令人敬畏的神色。他那现在总是有些眯缝着的眼睛的锐利的光芒令人感到惊异。他那件紫色睡衣虽然旧了，有污点并对他来说太大，但是从这件难看的衣服的上端却鼓出来一条厚实、深色的丝绸领带。

“嗯？”他问所有在场的人。警察走近过来一点，身子靠在汽车的发动机箱上。卡尔作简单的解释。

“鲁滨孙身体有点虚弱，但是如果他使点劲儿的话，他是能爬上楼去的。这位司机除了我已付的车费以外还要求补付一笔等车费。现在我走了。日安。”

“你别走。”德尔马什说。

“我也已经告诉他别走了。”鲁滨孙从车里说。

“我走。”卡尔说，并且朝前走了几步。但是德拉马什已经追上他，强行将他拉回来。

“我说，你留下！”他嚷着。

“你们让我走嘛。”卡尔说，并做好准备，打算必要时用拳头为自己赢得自由，虽然面对一个像德拉马什这样的人，成功的希望简直微乎其微。可是这儿站着警察呢，司机在这儿呢，不时有一拨拨工人在这条通常都平静无事的街道上行走呢，人们会容忍德拉马什欺侮他吗？要是在一个房间里，他会不愿意与他单独待在一起的，可是在这里呢？德拉马什现在正在不慌不忙付钱给司机，司机连连鞠躬把这笔数目不小的外快放进口袋，出于感激而走到鲁滨孙身边，显然是在和他谈论，怎样抬他出来最好。卡尔看到没有人注意自己，也许德拉马什网开一面有意让他悄悄离去。如果能避免争吵，这当然最好，于是卡尔便干脆走进车道，想尽快脱身。孩子们涌向德拉马什，提醒他注意卡尔已逃跑，但是他根本不必亲自过问此事，因为警察一伸警棍说：“站住！”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用胳膊夹住警棍，慢慢掏出一个本子来。卡尔现在第一次仔细打量他，这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但是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

“卡尔·罗斯曼。”他说。

“罗斯曼。”警察重复道，毫无疑问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态度冷静、办事认真的人，而卡尔在这里其实是第一次和美国当局打交道，却已经看出，这一重复道出了某种怀疑。果然，他的事情可能不妙，因为连自顾不暇的鲁滨孙也从车里探出身来，用无声、热烈的手势动作请求德拉马什帮帮卡尔的忙。但是德拉马什连连摇头拒绝他的请求，无所事事地在一边看着，两手插在他那过大的衣兜里。门口石阶上的那个小伙子给一个现在才从大门里走出来的妇女解释整个事件的始末经过。孩子们在卡尔背后站成一个半圆形，抬头默默望着警察。

“出示你的证件。”警察说。这个问题大概只是虚晃一枪，因为如果一个人没穿上衣的话，他身上也不会有什么证件的。所以卡尔沉默不语，宁可详细回答下一个问题，打算就这样把没有证件尽可能掩盖过去。

可是下一个问题是：“原来你没有证件？”卡尔不得不回答：“身上没有。”

“这可不妙，”警察说，若有所思地环顾四周，用两个指头敲敲他那本书的封面，“你从事什么职业吗？”末了，警察问。

“我当过开电梯工。”卡尔说。

“你当过开电梯工，就是说现在不当了，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现在我正在找一个新的工作。”

“对，你被解雇了吧？”

“是的，在一个小时以前。”

“突然？”

“是的。”卡尔像是表示歉意似的抬起手来说。事情的全过程他不可能在这里叙述，即使有这个可能，那么，通过讲述一个已蒙受的冤屈来抵御一个即将降临的冤屈，这似乎完全是毫无希望的事。如果说他没有受到善良的女厨师长和明理的总管的公正对待的话，那么，他也肯定不会受到这儿马路上这群人的公正对待的。

“没穿上衣就被解雇了？”警察问。

“是这样。”卡尔说；原来在美国，行政当局也都是这种作风，他们明明看见了还偏要问（他的父亲在办理旅行护照时对官员们毫无意义的没完没了的询问生多大的气！）卡尔很想跑掉，在什么地方躲一躲，不必再听这些问题。可是现在警察甚至提出了那个他最害怕的问题，他一直惴惴不安地预料到会提这个问题，所以迄今为止的态度大概比一般应有的更轻率。

“你究竟是在哪家饭店干活？”

他低下头，不回答，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听凭自己在一个警察的押送下又回到西方饭店，在那里进行审讯，把他的朋友和敌人们都传来作证，女厨师长完全放弃她那业已动摇了的对卡尔的好评，因为她本以为他在布雷纳膳宿公寓，如今却发现他被一个警察抓住，只穿一件衬衫，丢了她的名片，又回来了，而总管则也许仅仅表示充分理解地点点头，门房班长却会说是上帝的手终于找到了这个无赖。

“他在西方饭店干活。”德拉马什边说边走到警察的身边。

“不，”卡尔跺着脚嚷嚷，“这不是真的！”德拉马什嘲讽地噙尖着嘴望着卡尔，仿佛他还会泄露出许多别的事情似的。卡尔的突如其来的激动使孩子们动了起来，他们拥向德拉马什，宁可从那儿仔细观看卡尔。鲁滨孙从汽车里伸出整个脑袋，心情紧张态度却相当冷静，时不时眨一眨眼睛，便是他唯一的动作了。坐在门口的小伙子乐得拍起巴掌来，他身旁的那个妇人用胳膊肘捅他一下，让他安静。行李搬运工们恰好休息吃早饭，便全来看热闹，拿着大壶黑咖啡，用条状面包来回搅动咖啡。有几个坐在人行道边上，大家都在大声地啜饮咖啡。

“您认识这个孩子？”警察问德拉马什。

“简直是太了解他了，”此人说，“想当初我为他做过许多好事，可是他却以怨报德，您已经对他进行过简短的盘问，自己想必对此有所了解。”

“是的，”警察说，“他似乎是个冥顽不灵的孩子。”

“一点不错，”德拉马什说，“但是这还不是他的最坏的个性。”

“是吗？”警察说。

“是的，”德拉马什说，他滔滔不绝讲了起来，一边用口袋里的双手晃荡他的睡衣，“这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我和那儿车里的我那位朋友，我们偶然在他潦倒不堪时遇见了他，他当时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刚从欧洲来，他在欧洲也是混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带着他一起走，让他和我们一起生活，向他解释一切，想给他找个工作，打算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打算不切实际。可是，有一天夜里，他不见了，干脆走了，个中还有一些别的情况，这些情况我还是就别说了吧。情况是这样不是？”最后，德拉马什扯着卡尔的衬衫袖子问。

“回去，你们这些孩子！”警察嚷嚷，因为这些孩子一个劲儿往前挤，德拉马什几乎让一个孩子给绊倒了。这当儿，迄今对这场盘问的趣味性一直估计不足的行李搬运工们也变得神情专注起来，密匝匝围成一圈聚集在卡尔的背后，此时的卡尔连后退一步也不能，而且这些搬运工的乱哄哄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用一种完全听不懂的、也许夹杂着斯拉夫词语的英语与其说是在说话，还不如说是在大声叫骂。

“谢谢您介绍这些情况，”警察说并向德拉马什敬礼，“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走并让人把他送回到西方饭店去。”但是德拉马什说：“我请求您暂时把这孩子交给我，我有几件事要和他了结一下。我保证事后亲自把他送回饭店去。”

“这可不行。”警察说。

德拉马什说：“这是我的名片。”说着，递给他一张小纸片。

警察露出赞许的神色看了看名片，却带着亲切的微笑说：“不，这还是不行。”

迄今为止卡尔一直小心提防着德拉马什，现在他却把他看作唯一的救星。眼看着此人怎样向警察谋求得到卡尔，这虽然令人觉得可疑，但是劝说德拉马什别把他送回饭店去，无论如何也要比劝说警察来得容易些。即使卡尔在德拉马什的带领下返回饭店，这也比在警察压送下返回要少严重得多。可是眼下卡尔当然不可以让人觉察出他果真愿意去德拉马什那儿，不然的话，一切就全完了。他焦躁不安地望着警察的手，生怕它随时都举起来抓他。

“我起码得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被解雇了。”警察最后说，而德拉马什则面带愠怒把头撇向一边，用指尖把名片揉成一团。

“可是他根本没有被解雇呀！”鲁滨孙令人惊异地喊道，他扶住司机，弯着腰尽量从车里探出身来，“相反，他在那儿有一个好职位。在寝室里他是个头儿，可以随便领人进去睡觉。只是，他忙得不得了，如果有人想找他要点什么东西，就得等候很长时间。他老是待在总管那儿，呆在女厨师长那儿，是个很受信任的人。他是决不会被解雇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了这句话。他怎么会被解雇呢？我在饭店里受了重伤，于是他接受委托，把我送回家来，因为他恰好身上没穿上衣，他也就没穿上衣坐上车一起来了。我总不能等他拿来了上衣再走嘛。”

“原来如此。”德拉马什伸开胳膊说，听那语气，仿佛他是在责备警察对人缺乏了解，他的这句话似乎使鲁滨孙的这段不明确的表白变得清楚易懂、毫无异议了。

“可是这也是真的吗？”警察用已经缓和下来的口气问，“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孩子为什么要说被解雇了呢？”

“你应该回答。”德拉马什说。

卡尔看看警察，这警察要在这里的陌生人，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之间整顿秩序，于是他那种关心公共福利的精神中有某些东西也转移到卡尔身上。他不想撒谎，把双手紧紧互握着放在背后。

大楼门洞里出来一个监工并拍了拍巴掌，表示搬运工们又该干活了。他们倒掉咖啡壶里的渣滓，迈着晃晃悠悠的步伐默不做声地进屋去了。

“这样下去我们没有个完了。”警察一边说一边就要伸手去抓卡尔的胳膊。卡尔不由自主地稍稍往后一缩，感觉到搬运工们这一撤走给他腾出空地来了，便转过身去，撒腿就跑。孩子们大喊一声，甩开小胳膊跟着跑了几步。

“抓住他！”警察顺着那条长长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小巷往下喊，在均匀发出的这种喊声下，迈着无声的、显示出巨大力量和训练有素的步子跟在卡尔后面追赶。这场追捕发生在一个工人区里，这对卡尔来说是一桩幸事。工人们不站在当局的一边。卡尔在车行道中间跑，因为那里

障碍最少，时不时地看到有工人站在人行道上静静地看着他，而警察则向他大喊“抓住他！”机智地使自己保持在平坦的人行道的位置上，边奔跑边不断向卡尔伸出警棍。卡尔很少有逃脱的希望，现在，他们正接近一定也有警察巡逻的横向小巷，那位警察吹出简直是震耳欲聋的哨子声，卡尔也就几乎完全丧失了希望。卡尔的优势仅仅在于他的衣服单薄，他顺着越来越向下倾斜的街道飞奔，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俯冲而下，只是，由于困倦而精神涣散，他往往作些过高的、耗时而又无用的跳跃。可是警察却始终盯着他的目标，而不必进行什么思考，对于卡尔来说则相反，奔跑其实是次要的事，他必须进行思考，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不断作出新的决断。眼下，他的有点儿绝望的计划是避开横向的小巷，因为人们无法知道，那些小巷里潜伏着什么危险，也许他会径直跑进一所警卫室里去的。只要可以，他就要坚守住这条视野清晰的大街，它一直延伸到下面很远处才与一座桥相衔接，那座桥刚显出身影，便在水气和雾气中消失了。他决心加快奔跑速度，正要一鼓作气飞快冲过第一条横向小巷，这时他看见在自己前方不远处有一个警察，他躲在背阴处一所房屋的墙根下窥伺着，准备时机一到便向卡尔猛扑上来。现在没辙，只有这条横向小巷了，当在这节骨儿眼上听到有人从这巷子里和声细语地喊他的名字——虽然起先他觉得这是一种错觉，因为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耳朵里一直在嗡嗡作响——他便不再迟疑，一闪身拐了一个九十度大弯，一头扎进这条小巷，以便尽可能给警察来个措手不及。

他刚刚奔跑了两步——有人喊过他的名字，这一点他已经又忘记了，现在第二个警察也吹起哨子来，人们看得出他有着充沛的精力，这条巷子里远处的行人似乎加快了行走的步伐——一扇小屋门里便有一只手伸出来抓住卡尔，随着一声“别吱声！”将他拖进一个黑乎乎的门厅。是德拉马什，上气不接下气，脸颊上直冒热气，他的头发粘着在他的脑袋的四周。他把睡衣夹在腋下，只穿着衬衫和裤衩。他立刻把门关上并锁住，那扇门其实并不是这所房屋的正门，它只不过是一道不引人注目的边门而已。

“等一会儿。”然后他说，仰起头靠在墙上，艰难地呼吸着。卡尔几乎是躺在他的臂弯里，半昏迷半清醒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胸脯上。

“那警察老爷们正在奔跑。”德拉马什对着门伸出指头仔细倾听着说。现在那两个警察确实正从大门旁边跑过去，他们的奔跑声在这座空

巷里听起来就像是钢铁撞击在石头上。

“你这回可真是遭了大罪了。”德拉马什对卡尔说，卡尔还一直憋得透不过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德拉马什小心翼翼地扶他坐在地上，在他身边跪下，抚摩了好多次他的额头，端详他。

“现在已经没事了。”卡尔吃力地站起来说。

“那就走吧。”又已经穿上了睡衣的德拉马什说，推着尚还浑身乏力、低垂着脑袋的卡尔往前走。他不时摇晃卡尔，让他清醒头脑。

“你累什么呀？”他说，“你在外面可以跑得像一匹马那样欢，可是我却不得不在这儿蹑手蹑脚地穿行于这些该死的过道和庭院之间。不过幸亏我也是一个跑步运动员。”他骄傲地使劲一拍卡尔的后背，“偶尔和警察这样赛一次跑，这是一种很好的练习。”

“我开始奔跑时就已经累了。”卡尔说。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替跑得蹩脚开脱，”德拉马什说，“若不是我的话，他们早就把你抓住了。”

“我看也是，”卡尔说，“我应该好好感谢您。”

“毫无疑问。”德拉马什说。

他们穿过一道又长又窄的、铺设着深色、平滑石块的门道，左右两边时不时出现一道通往上面的阶梯，抑或人们可以瞥见另外一个较大的门厅。几乎看不见一个成年人的影儿，只有孩子在空荡荡的楼梯上玩耍。一个小女孩站在一道楼梯栏杆旁边哭泣，她眼泪汪汪的整个脸蛋儿都闪亮着。她一看见德拉马什，便张着嘴大口喘着气，顺着楼梯往上奔跑，高高地跑到楼上，她频频转过身来，确信没有人跟随她或者愿意跟随她，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方才我急忙奔跑把她撞倒了。”德拉马什笑着说并伸出拳头吓唬她，吓得她大声叫喊着继续往上奔跑。

他们所穿越的庭院也显得冷冷清清的。只是偶或有一个仆役推着一辆双轮手推车走过，一个女人用泵往一只壶里灌水，一个邮递员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横穿过整个庭院，一个蓄着两撇儿八字胡的老人蹣跚起二郎

腿坐在一扇玻璃门前抽烟斗，一家搬运公司门前正在卸箱子，闲散的马匹安静地转动着脑袋，一个穿工作服的男子手里拿着一张纸监督着整个卸货的工作。在一间办公室里窗户打开着，一个坐在斜面写字台旁边的职员转过身去，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卡尔和德拉马什恰好从那儿走过。

“再没有比这儿更安静的地方了，”德拉马什说，“晚上有几个小时的大声吵嚷声，但是整个白天这里十分安静。”卡尔点点头，他觉得，这儿简直安静得出奇。“我根本不能住在别的地方，”德拉马什说，“因为布鲁娜姐绝对受不了嘈杂声。你认识布鲁娜姐吗？你就要见到她了。反正我劝你举止行动尽量要安静。”

当他们来到通往德拉马什寓所的楼梯口时，那辆汽车已经开走了，酒糟鼻小伙子丝毫也没对卡尔的重新出现感到惊讶，并报告说，他已经把鲁滨孙背到楼上去了。德拉马什只向他点点头，仿佛他是他的仆人，履行了一项分内的职责似的，便拉着犹犹豫豫、望着阳光灿烂的街道的卡尔一起上楼去。“我们马上就到楼上。”这话爬楼梯时德拉马什说了几遍，但是他的预言怎么也应验不了，总是爬完了一道楼梯后在觉察不到的改变了的方向又出现一道新的楼梯。有一回，卡尔甚至站住了脚，倒不是因为走不动了，而是因为觉得面对这么长的楼梯自己毫无自卫能力。“寓所在很高的楼上，”他们继续走时，德拉马什说，“但是这也有它的优点。人们就很少出门，整天穿了睡衣，我们日子过得很自在。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爬到这这么高的楼上来做客的。”

“哪儿来的客人呀？”卡尔心想。鲁滨孙终于出现在一个楼梯平台上，在一扇关着的单元门前，他们总算到了。楼梯压根儿还没到尽头，而是在半明半暗中继续延伸，看不出一点儿行将终止的迹象。

“我早就想到了，”鲁滨孙小声说，似乎疼痛还在压抑着他，“德拉马什会把他带来的！罗斯曼，没有德拉马什你会落到什么下场！”鲁滨孙身穿内衣裤站在那儿，想方设法尽量用人家在西方饭店里给他的一条小被子裹住自己的身体，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不进寓所去，而是偏要在这里惹可能会从这儿走过的人的耻笑。

“她睡了吗？”德拉马什问。

“我想没呢，”鲁滨孙说，“但是我宁可等你来了再说。”

“我们先得看看，她是否睡了。”说着，德拉马什便弯下身子去看锁孔。他来回扭动脑袋观看良久后，站起身来说：“看不太清楚，卷帘放下来了。她坐在沙发榻上，可是她也许在睡觉。”

“难道她病了吗？”卡尔问，因为德拉马什站在那儿，仿佛他在求人帮他拿主意似的。可是他却厉声反问：“病了？”

“他不了解她嘛。”鲁滨孙打圆场说。

再过去几扇门，有两个女人走到走廊上来，她们在自己的围裙上擦干净手，看着德拉马什和鲁滨孙，似乎在谈论他们。一个金发闪亮的小女孩从一扇门里蹦跳着出来，依偎在两个女人之间，挽住她们俩的胳膊。

“这些女人真讨厌，”德拉马什小声说，但是显然仅仅是因为顾忌正在睡觉的布鲁娜妲，“过些时候我要去向警察告她们，就可以过几年安生日子，不怕她们了，别往那边看。”说罢，他对卡尔嘘了一声，卡尔觉得，既然不得不在走廊里等候布鲁娜妲醒来，那么看一眼那几个女人，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于是，他气恼地摇摇头，仿佛他不必接受德拉马什的什么告诫，而且为了更清楚地显示这一点，还想朝那几个女人那边走过去，可是这时候鲁滨孙说了句“罗斯曼，小心！”便拉住了他的袖管，而已被卡尔激怒的德拉马什，在听到小姑娘突然发出一声大笑时便火冒三丈，以致他竟撒腿就朝那几个女人猛冲过去，女人们一阵风似的飞快闪进各自的家门里。

“在这里我必须经常这样打扫楼道。”德拉马什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回来时说。这时，他回想起卡尔的抗拒，便说：“我希望你改一改你的态度，不然的话，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这时，房间里传来一个声调柔和、带疲倦腔的询问的声音：“德拉马什？”

“在，”德拉马什回答，和颜悦色地望着门，“我们可以进来吗？”

“哟，进来吧。”里面的声音说，德拉马什瞥了一眼那两个在他身后等着的人，随后就慢慢把门打开。

人们走进一片黑暗之中。一扇窗户也没有，阳台门的帷帘一直落到

地面，仅有朦胧的微光透入，可是此外，房间里塞满了家具，到处挂着衣服，使房间里更添几分黑暗。空气是混浊的，人们简直是嗅到了人手触摸不到的墙旮旯里积聚着的尘土的味道。卡尔进来时最先看到的，是紧挨着一溜儿排开的三只箱子。

沙发榻上躺着那个先前从阳台上向下张望的女人。她的红连衣裙下端已经有点走样，一个大裙子角一直垂落到地上，人们看见她的大腿几乎一直看到膝盖处，她穿白色毛袜，鞋子她没穿。

“这里真热，德拉马什。”她说，把脸从墙那边转过来，懒洋洋、晃悠悠地把手向德拉马什伸过去，德拉马什抓住她的手就吻。卡尔只看着她那个随着脑袋的转动而一起滚动的双下巴。

“也许我该让人把帷帘拉起来吧？”德拉马什问。

“千万别拉，”她闭着眼睛宛如绝望似的说，“拉上去就更糟了。”

卡尔走到沙发榻的末端，以便仔细观看这个女人，他对她的抱怨感到奇怪，因为房间里并不是特别热。

“等一等，我可以让你躺得稍微舒服一些。”德拉马什胆怯地说，解开脖子下方的几个纽扣，在那儿把连衣裙敞开，袒露出脖颈和胸脯，现出汗衫柔软的浅黄色的花边。

“这是谁，”女人突然用指头指着卡尔说，“为什么他这样盯着我？”

“你马上就可以开始帮忙干点活了，”德拉马什把卡尔推到一边说，随后他安慰那女人说，“这只不过是个我带来侍候你的男孩。”

“可是我不要别人来侍候我嘛！”她嚷着，“你为什么把陌生人带到我家来？”

“可是这一阵子你一直想雇一个仆人呀。”说着，德拉马什就在地上跪下。沙发榻虽然很宽大，可是布鲁娜姐身边竟没有一丁点儿空地方。

“啊，德拉马什，”她说，“你不理解我，不理解我呀。”

“那我可真的就不理解你了，”德拉马什双手捧住她的脸说，“不过这没什么关系，你愿意的话，他马上就可以离开这儿。”

“他既然已经来了，就让他留下吧，”她改口说，而疲惫不堪的卡尔对这句也许根本不怀有什么好意的话却是如此感恩戴德，以致他一直朦朦胧胧地还在想着那永无尽头的楼梯，想着他也许马上又不得不下楼去，就迈步从躺在被子上安安稳稳睡觉的鲁滨孙身上跨过去，不顾德拉马什一个劲儿气鼓鼓地挥动双手，说道：“不管怎么说，我感谢您愿意让我还在这里待一些时光。我大概已经24个小时没睡过觉了，活儿倒是干了不少，还受到了种种惊吓。我筋疲力尽，我根本就不太清楚我现在身在何处？可是如果我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您就不妨可以随意把我打发走，我会很乐意走的。”

“你当然可以留在这儿，”那女人说，还讥讽地添上一句，“你看见了，地方我们这儿有的是。”

“这么说来，他必须离开这儿，”德拉马什说，“我们不能收留他。”

“不，让他留下。”那女人又改用严肃的口吻说。于是，德拉马什像是实施这一愿望似的说：“那好吧，你在随便什么地方躺下睡吧。”

“他可以睡在窗帘布上，不过他必须脱下靴子，以免踩坏了什么。”

德拉马什向卡尔指了指她说的那块地方。在门和那3只箱子之间胡乱堆放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窗帘布。如果人们顺序把所有的窗帘布叠好，厚实的放在最下面，渐次往上最轻薄的放在最上面，最后把塞在布堆里的各种木板和木圈拿出来，那么这就可以成为一个蛮不错的床铺。现在这个样子，这只是一团晃荡、滑动的布，可是，尽管如此，卡尔还是躺在它上面，因为他太累了，顾不得去做那些特殊的睡前准备工作，况且也得顾及他的主人，尽量少给人家添麻烦。

正当他几乎已经快要酣然入睡时，他听见一声大叫，便坐起来，看见布鲁娜姐笔挺地坐在沙发榻上，张开胳膊，搂住了跪在她面前的德拉马什。见到这副景象颇感尴尬的卡尔，便又向后一倒，把头埋在窗帘布里继续睡觉。他在这里两天也忍不过去，这一点他似乎清楚了，可是为了可以头脑清楚、快速而冷静地作出决断，先美美地睡上一觉，便显得更加有必要了。

但是布鲁娜姐却已经看见了卡尔的那一双因疲倦而睁得大大的、已经惊吓过她一回的眼睛，喊道：“德拉马什，我热得受不了了，我身上火辣辣的，我得脱掉衣服，我得洗澡，你让这两个人离开房间，去走廊，

去阳台，随你的便，只要别让我再看见他们就行！人家是在自己的家里，却老是受到骚扰。德拉马什，要是我和你单独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啊，上帝，他们还一直在这里！这个不要脸的鲁滨孙竟当着一个人的面身穿背心裤衩就伸开四肢躺下了！还有这个陌生的男孩，他刚才用狂乱的目光盯着我，后来又躺下，以便迷惑我！把他们打发走吧，德拉马什，他们是我的一个累赘，他们压在我的胸脯上，如果我现在有个三长两短，那全是他们的过错。”

“马上就让他们到外面去，你只管脱衣服吧。”德拉马什说，并向鲁滨孙走去，用脚踩在他胸脯上摇晃他。他同时向卡尔叫喊：“罗斯曼，起来！你们俩必须到阳台上去！如果没有叫你们，你们就进来，看我怎么治你们！现在赶快，鲁滨孙”——说罢，他更加使劲地摇晃鲁滨孙——“还有你，罗斯曼，小心别让我也来踩你。”说罢，他大声拍了两下巴掌。

“真磨蹭！”布鲁娜妲在沙发榻上嚷嚷，她远远叉开两条大腿坐着，以便为她那过分肥胖的身体谋得更多的空间，只是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频频喘气下，经过多次歇息，她才能勉强弯下腰去，将够着她的袜子的最上端并将它们略微捋下去一点。她无法完全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这件事必须由德拉马什来做，她等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卡尔疲惫不堪、无精打采地从布堆上爬下来，慢吞吞走向阳台门，一小块窗帘布缠住了他的脚，他满不在乎地拖着它行走。当他从布鲁娜妲身旁走过时，他甚至还漫不经心地说：“我祝您晚安。”然后才从正在将阳台门帷帘稍稍拉回去一点的德拉马什身旁擦身而过，走到外面阳台上。鲁滨孙紧随其后，大概一样的又困又乏，因为他在哼哼唧唧：“人家老是虐待你！如果布鲁娜妲不一块儿来，我就不到阳台上去。”但是，尽管他这样信誓旦旦，他还是乖乖儿地走了出去，看到卡尔已经躺倒在那儿的沙发椅里，便立刻在石板地面上躺下。

当卡尔醒来时，天色已晚，天空已经是繁星闪烁，月亮从街道对面的高楼后面冉冉上升。环顾了几次这陌生的地方，深深呼吸了几口凉爽、清新的空气之后，卡尔这才意识到，他在哪里。他是多么的不谨慎呀，把女厨师长的全部忠告、特蕾泽的全部警告、自己的全部忧虑一股脑儿丢到了脑后，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德拉马什的阳台上并且甚至已经在这儿睡了半天，仿佛这帷帘后面不是德拉马什，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似的。鲁滨孙在地板上懒洋洋缩作一团，拽卡尔的脚，他似乎也是用这个

办法把他叫醒的，因为他说：“你睡得真香，罗斯曼！这就是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你还想睡多久呀？我本来想让你再睡一会儿的，但是首先，我在地板上太无聊了，其次，我饿极了。我求你了，稍许站起来一点，我在这儿下面，在沙发椅里藏了点吃的，我想把它拿出来。我也给你一点。”卡尔站起来，看着鲁滨孙怎样没有站起来，而是肚子贴着地把自己的身躯挪动过去，伸出双手从沙发椅下面摸出一只镀银的碟子，这碟子大约是盛名片用的。可是这只碟子里却放着半截黑糊糊的香肠，几根细细的香烟，一只已经开启、但仍装得满满的、油汪汪的沙丁鱼罐头以及一些大多已被压碎、挤成一团的糖果。然后，还有一大块面包和一只类似香水瓶的瓶子，可是这瓶子里装的似乎不是香水，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鲁滨孙露出特别满意的神情指着那只瓶子，抬头向着卡尔连连咂嘴。

“你看，罗斯曼。”鲁滨孙说，他一口一口地吞食沙丁鱼，不时用一块羊毛披肩擦手上的油，这块披肩显然是布鲁娜姐落在阳台上的。“你瞧，罗斯曼，如果你不想饿死，你就这样给自己储藏吃的。唉，我完全受排挤。如果一个人一直被人家当狗对待，末了，他就会想，他真的是狗。罗斯曼，你一来，这就好了，我起码可以和人说话了。在屋里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们被人憎恨，全都是为了这个布鲁娜姐。她当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嘿——”他招手让卡尔向自己俯下身来，悄悄对他说——“有一回我看见她光着身子。噢！”他沉浸在对这件赏心乐事的回忆之中，竟开始拧扭和拍打起卡尔的大腿来，直到卡尔大喊：“鲁滨孙，你疯了。”并抓住他的双手，将它们朝后推去。

“你还是个孩子，罗斯曼。”说着，鲁滨孙从衬衣下面掏出一把系在颈部饰带上的匕首，摘下匕首套，切那块硬香肠。“许多东西你还得从头学，不过，在我们这儿你算是找到理想的学习场所了。你坐下呀。你不想也吃点什么？嗯，你看着我吃，也许看着看着就会来胃口的。喝酒你也不愿意？你可简直是什么也不愿意。说话你恰恰也不是特别爱说话。不过，和谁一起在阳台上，这是完全无所谓的事，只要压根儿有人在就行。我经常在阳台上。布鲁娜姐拿这来取乐。她只要随便想出一个什么主意，一会儿她冷了，一会儿热了，一会儿她想睡觉，一会儿她想梳头，一会儿她想解开胸衣，一会儿她想把它穿上，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被打发到阳台上来。有时，她确实做她所说的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她只是那么依然如故地躺在沙发榻上，一动也不动。从前我往往把帷帘稍稍拉开一点，偷偷往里看，可是自从有一回德拉马什抓住一次这样的

机会——我很清楚，他不愿意这样干，而是在布鲁娜姐的请求下才这样干的——用鞭子往我脸上抽了几下以后——你看见这伤痕了吗？——我就再也不敢偷看了。后来我就这样躺在阳台上，除了吃就再也没有别的乐趣。前天，当我晚上这样独自躺着并从这栏杆向下看的时候，当时我还穿着我的那身漂亮衣服，可惜这身衣服让我给丢在你的饭店里了，那帮狗崽子，硬是把这身贵重衣服从人家身上撕下来！——当我在这里这样独自躺着并从这栏杆向下看的时候，我心里难受已极，竟开始号哭起来。恰巧就在这时候，我没有马上就发觉，布鲁娜姐向我这边走了出来，身上穿着那件红连衣裙——所有的衣服中就这件最合她的身——看了我一眼，后来就说：‘鲁滨孙，你为什么哭？’说罢，她撩起她的裙子，用裙边擦我的眼泪。谁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倘若不是德拉马什在喊她，倘若她不是马上又不得不走进房间里去的话，我当然就以为，现在该轮到我了，就透过帷帘问，我是否可以进房间了。你猜，布鲁娜姐说什么：‘不！’她说，‘你想到哪儿去啦？’她还说。”

“既然人家这么对待你，你为什么待在这儿？”卡尔问。

“对不起，罗斯曼，你问得不是很聪明，”鲁滨孙回答，“你也会留在这里的，即使人们待你更坏。话说回来，人们待我根本不是那么坏。”

“不，”卡尔说，“我一定要走，可能今天晚上就走。我不留在你们这儿。”

“今天晚上就想走，那么譬如说吧，你怎么个走法呢？”鲁滨孙问，他已经把面包上软些的部分切下，小心翼翼浸上沙丁鱼罐头的油，“如果你连房间都不可以进去的话，你想怎么离开这儿呢？”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进去？”

“嗯，只要铃声没响，我们就不可以进去。”鲁滨孙说，他尽量张大着嘴吃着蘸油面包，同时用另一只手接住从面包上滴落下来的油滴，以便时不时地用吃剩的面包去蘸那权当容器的掌心里的残油。“这里一切都变得更严厉了。起先这里只有一块薄薄的帷帘，虽然没有去窥视，但是晚上看得出人的身影。布鲁娜姐感到别扭，于是，我不得不把她的一件看戏时穿的大衣改做成一块帷帘挂在这里，换下了那块旧的。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从前我总是可以主动问，我是否可以进去了，人家按具体情况回答我说可以或不可以，可是后来，这个权利我也许利用得过于频

繁，问得太勤了，布鲁娜姐受不了了。——她虽然身体丰满，可是体质却很弱，她常常头痛，大腿痛则几乎始终不断——于是就规定，我不许再问了，而且，每逢我能进去，人家就按桌上的铃。这一按，便铃声大作，甚至可以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为了解闷，我曾在这里养过一只猫，它被这铃声吓跑了，一直没回来过。嗨，这铃声今天还没响呢，一旦响起铃声，我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进去——既然已经这么久没响铃声了，那么，可能还要等很久呢。”

“是呀，”卡尔说，“可是适用于你的，还不是非得适用于我嘛。这种规定压根儿就只适用于逆来顺受的人。”

“可是，”鲁滨孙嚷嚷，“为什么这个规定会不也适用于你呢？它当然也适用于你。你还是和我一起在这里安心等着响铃声吧。然后你就可以试一试，看你能不能离开这儿。”

“你到底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仅仅是因为，德拉马什是你的朋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曾经是你的朋友。难道这就是生活？在布特福脱不是可能会更好些吗，你们起初是想去那儿的呀？或者干脆去加利福尼亚，你在那里有朋友呀？”

“哟，”鲁滨孙说，“这种事没人能预料到。”他拿起香水瓶呷了一大口说，“祝你健康，亲爱的罗斯曼。”然后，他继续往下讲，“当初你那样不讲情义地把我撂下不管，我们那时的处境是很艰难的。我们在头几天里没能找到工作，再说德拉马什也不愿意找活干，要愿意的话他也就找到了，他一个劲儿派我出去找，而我又运气不好。他只是到处游荡，可是天色已经晚下来了。他只带来了一只女式小钱包。这钱包虽然非常漂亮，用珍珠做的，现在他已经把它送给布鲁娜姐了，可是钱包里几乎空空如也。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到各家各户去乞讨，在乞讨时人们当然就有机会找到某些有用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去乞讨，为了样子好看些，我就在寓所门前唱歌。德拉马什总是走运，我们刚到第二家寓所前，这是底层一家很富有的寓所，在门口给厨娘和仆人唱了几支歌，这时，这栋寓所的女主人，就是布鲁娜姐，上楼来了。她也许是身上的衣服系得太紧，那几级楼梯竟压根儿爬不上来了。可是她的模样儿多漂亮，罗斯曼！她穿一件雪白的连衣裙，拿一把红色的遮阳伞。她叫人垂涎三尺，她让人神魂颠倒。啊，天哪，啊，天哪，她真漂亮！这样一个女人！不，你说说，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女人的！女佣和男仆自然立刻就向她迎面奔跑过去，几乎把她抬了上去。我们站在门的左右两边并且敬了

礼，这是当地人的习俗。她站住了一会儿，因为她还一直没喘过气来，后来我就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由于饥饿神智不很清醒，而她在近处就显得更漂亮，极其健壮，并且由于一件特殊的紧身胸衣身上到处都紧绷绷的，以后我可以让你去看箱子里的那件胸衣。简言之，我从后面稍稍摸了她一下，但是轻极了，你知道吗，只是那么触摸了一下。人们自然不能容忍一个乞丐触摸一个富有的贵妇人。几乎没有接触到什么，但是毕竟是摸了一下。谁知道，这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倘若德拉马什没有立刻给了我一记耳光的话，这一记耳光打得我不禁立刻用双手捂住了面颊

“你们干的什么好事！”卡尔说，他被这个故事完全吸引住了，便坐到地板上，“这就是布鲁娜吗？”

“可不是吗，”鲁滨孙说，“这就是布鲁娜。”

“有一回你不是说过他是个女歌唱家吗？”卡尔问。

“当然她是个女歌唱家，一个大女歌唱家，”鲁滨孙回答，他嘴里含着一大团糖果，时不时有一块从嘴里挤出来，他就用指头又把它压回去，“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当时当然还不知道，我们只看出，这是一个富有的、非常高贵的女人。她做出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也许她也是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因为我确实只用指尖轻轻碰了她一下。可是她却不断地打量德拉马什，德拉马什也回过头去看她——他恰好与她的目光相遇。随后，她便对他说：‘你到里面来一会儿。’并用阳伞指指寓所，要德拉马什在她前面走进去。然后，他们便走了进去，仆人等他们进去后就把门关上。我就让他们给晾在了外面，我心想，这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就坐在楼梯上等候德拉马什。可是出来的不是德拉马什，而是那个男仆，他给我送出来一碗碗汤。‘还是德拉马什体贴我！’我暗自思忖。我喝汤时，仆人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给我讲了一些有关布鲁娜的事情，我这才看出来，这次拜访布鲁娜对于我们可能会有怎样的意义。因为布鲁娜是个离了婚的女人，有一大笔财产并且完全独立自主！她从前的丈夫，一位可可工厂主，虽然还一直爱着她，但是她却根本不愿意理睬他。他经常到这寓所里来，每回来总是穿得漂漂亮亮，宛如参加婚礼——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自己就见过他——可是，尽管受了大笔的贿赂，那仆人却不敢去问布鲁娜，她愿不愿意接待他，因为他已经问过几次，每次布鲁娜都是手里恰好有啥就把啥扔到他的脸上。有一回甚至扔了她那个装满热水的大汤婆子，她用它打掉了他的一颗门牙。

哎，罗斯曼，你等着瞧吧。”

“你怎么认识那个人的？”卡尔问。

“他有时也上楼来。”鲁滨孙说。

“上楼来？”卡尔惊讶得用手轻轻一敲地板。

“你完全有理由惊讶，”鲁滨孙继续说，“当初佣人把这个讲给我听时，连我也感到惊讶。你想想，每逢布鲁娜姐不在家，那个人就让佣人把自己领到她的房间里去，总是拿走一件小玩意儿作纪念，总是给布鲁娜姐留下点非常昂贵和精美的东西，并且严格禁止佣人说出这东西是谁送的。但是有一次，他带来了一件——这是佣人说的，我相信佣人的话——简直是价值连城的瓷器，布鲁娜姐想必是不知怎么认出来了，立刻把它扔在地上，在那上面来回地踩，往那上面啐唾沫，还作了点什么的处理，致使佣人恶心得几乎没法把它清扫出去。”

“那个人怎么得罪了她了？”卡尔问。

“这个我也说不好，”鲁滨孙说，“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起码我自己不知道有什么事。我有时曾和他谈过这件事。他每天都在那条街的拐角处等我，我一来，我就必须讲点新闻给他听。我若是来不了，他总是等候半个小时，然后才离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很好的外快，因为他付的信息费很丰厚，但是自从德拉马什听说这件事之后，我就必须把全部收入交给他，所以后来我就很少去了。”

“可是那个人想得到什么呢？”卡尔问，“他想得到什么呢？他听见了，她不愿意理睬他。”

“是呀。”鲁滨孙叹口气，点燃一支香烟，使劲一挥胳膊把烟雾吐到空中。随后，他似乎另有打算，说道：“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只知道，如果他可以像我们这样躺在这儿阳台上，他会为此付很多钱的。”

卡尔站起来，靠在栏杆上，望着下面的街道。月亮已经清晰可见，但是它的光芒还没有进入这条小巷的深处。白天空空荡荡的小巷，尤其是屋门前，都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慢慢腾腾地活动着，男人的衬衫袖管，女人的浅色连衣裙在黑暗中隐约可见，大家都没戴帽子、头巾。周围众多的阳台上现在全都有人，那边在一盏白炽灯的灯光下坐着一家一

家的人，分别依照阳台的大小，或围着一张小桌子而坐，或只是坐在一排靠背椅上，抑或他们至少把脑袋从房间里伸出来。男人们叉开两腿坐着，双脚从栏杆之间伸出去，读报纸，报纸几乎一直落到地板上，或玩牌，表面上看来悄然无声，其实不时有人使劲敲打桌子，女人们忙着做手里的针线活，只是偶或抽空匆匆瞥一眼四周或大街。相邻阳台上一个金黄头发、身体羸弱的妇女不停地打哈欠，一边还东张西望，总是把一件她恰好在补缀的衣服举到嘴前；甚至在那些最小的阳台上孩子们也都要互相追逐嬉耍，使父母们很感讨厌。在许多房间的内部摆着留声机，吹奏出歌曲或管弦乐曲，人们并不特别在意这种音乐，只是偶或有家庭中的父亲一挥手，某个人便急忙跑进房间，放上一张新的唱片。在有些窗户口，人们看见一对一对纹丝不动的情侣，卡尔对面的一扇窗户旁边就笔挺地站着一对这样的男女，小伙子用胳膊搂住姑娘，用手摸她的乳房。

“你认识邻近一带的什么人吗？”卡尔问鲁滨孙，这时鲁滨孙也已经站了起来，除了自己的那条还把布鲁娜妲的被子也裹在了自己的身上。

“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处在这样的地位，这是相当糟糕的，”说着，鲁滨孙把卡尔拉近自己身边，以便能对他悄悄耳语，“除此之外，眼下我倒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为了德拉马什的缘故，布鲁娜妲卖掉了她拥有的一切，带着她的全部财富迁进了这栋市郊寓所里，以便她可以完全委身于他，可以不受任何人骚扰，而且这也正是德拉马什所希望的。”

“她把佣人都辞退了？”卡尔问。

“完全正确，”鲁滨孙说，“这里哪儿有佣人们睡觉的地方呀？那些佣人都是很苛求的老爷。有一回，德拉马什在布鲁娜妲家里扇耳光把一个这样的佣人从房间里赶了出去，飞快的耳光扇了一个又一个，一直把那人扇到门外。其余几个佣人自然就和他联合起来在门前吵闹，于是德拉马什便出来（当时我不是佣人，而是家庭常客，但是我却和佣人们待在一起）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年纪最大的那个佣人，某个叫伊索多尔的，接口回答说：‘您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女主人是仁慈的太太。’你也许注意到了，他们尊敬布鲁娜妲。可是布鲁娜妲却并不理会他们，跑到德拉马什身边，当时她还没像现在这么笨重，当着大家的面拥抱、亲吻他并称他‘最亲爱的德拉马什’。‘你把这些猴子打发走吧。’最后她说。猴子——佣人们都是猴子，你想象一下吧，他们听了这话脸上是什么表情。然后，布鲁娜妲拉着德拉马什的手伸向她拴在腰带上的钱

袋。德拉马什把手伸进去，开始付清佣人们的工资，布鲁娜姐参与这次的支付活动，仅仅是敞开着腰带上的钱袋在一旁站着而已。德拉马什不得不频频伸手摸钱袋，因为他发钱不点数、不审核应付款项。末了，他说：“既然你们不愿意和我说话，我就只以布鲁娜姐的名义告诉你们：你们滚开，立刻就滚。”就这样，他们被辞退了，后来还打了几场官司，德拉马什甚至不得不出过几次庭，可是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就知道了。只是，辞退了佣人们之后，德拉马什立刻就对布鲁娜姐说过：“现在你没有佣人了？”她说：“有鲁滨孙在这儿呢。”随后德拉马什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好吧，你就当我们的佣人吧。”于是，布鲁娜姐就拍拍我的面颊。如果有机会的话，罗斯曼，你也让她给你拍拍面颊。你会惊讶的，这多美呀。”

“这么说来，你当上了德拉马什的佣人了？”卡尔总结性地说。

鲁滨孙听出了这个问题中的惋惜之音，回答说：“我是佣人，但是这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得出来。你瞧，你自己本来也不知道嘛，虽然你已经在我们这儿待了一些时候了。你已经看到了，我昨晚在你们那儿饭店里穿得怎么样。我穿的是最高级的衣服。佣人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只是，问题就在于，我不可以经常出门，我必须随叫随到，总有什么家务活要干。这么多活儿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在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许多东西，凡是大搬家时未能卖掉的，我们都带来了。当然我们本来也可以把它们都送给别人的，但是布鲁娜姐什么也不送人。你想想吧，把这些东西扛上楼来，这要费多大的劲。”

“鲁滨孙，这全都是你扛上来的？”卡尔问。

“除了我还有谁呀？”鲁滨孙说，“还有一个辅助工，一个懒货，大多数活儿我不得不独自一个人干。布鲁娜姐站在楼下汽车旁边，德拉马什在楼上指挥，这些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停地跑来跑去。一共干了两天，干了很久，对不对？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房间里有多少东西，所有的箱子都是满满的，箱子后面也都塞满了东西，一直高达天花板。倘若当时能雇几个人搞搬运，也许很快就全整理好了，可是除我以外，布鲁娜姐不愿意把这事托付给别的什么人。这是人家的一番好意，可是我当初却把我这一辈子的健康毁了，除了我的健康我还有什么财富呀？现在我只要稍稍使点劲，我便在这儿和这儿还有这儿感到针刺一般疼痛。你以为，饭店里的那些男孩，那些癞皮狗——他们不是癞皮狗是什么？——他们居然能够战胜得了我，倘若我身体健康的话？可是

不管我有什么病，我对德拉马什和布鲁娜都只字不提，能支撑多久，我就干多久，如果支撑不住了，我就躺倒，死去，然后他们才为时过晚地看到，我一直有病。可是，尽管如此，我却一直不断地干活，为他们效劳，一直干到累死。啊，罗斯曼——”最后他说，并用卡尔的袖管擦干眼睛。少顷，他说：“你不冷吗，你就这么穿了衬衫站在这儿？”

“没事，鲁滨孙，”卡尔说，“你老是哭。我不认为你有病。你看上去很健康，但是因为你老是躺在这儿阳台上，你便胡思乱想开了。也许你有时候感到胸口一阵刺痛，这种感觉我也有，人人都有。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遇到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哭鼻子，那么所有阳台上的人都得哭了。”

“我心里比你清楚。”鲁滨孙边说边甩他的被子角擦眼角。“有个大学生，住在隔壁也给我们做饭的女房东太太那儿，最近我把餐具送回去的时候，大学生曾对我说：‘您听着，鲁滨孙，您不是病了吧？’我是被禁止与人说话的，所以我把餐具一放下就要走。这时，他向我走过来并且说：‘您听着，哎呀，您别把事情做绝了嘛。您有病了。’是的，那么，请问，我该怎么办呢？’我问。‘这是您的事。’他边说边转过身去。在那儿就餐的人听了都笑了，这里到处都有我们的敌人，所以我还是走了。”

“那就是说，愚弄你的人你信，对你怀着一番好意的人你不信。”

“可是我必须知道，我有什么病。”鲁滨孙怒气冲冲说，可是立刻又重新哭泣起来。

“你是不知道你有什么病，你应该为你自己随便找一份什么体面的工作，不要在这里给德拉马什当什么佣人。因为据我按照你所讲述的以及按照我自己亲眼目睹的来判断，这儿的这种做法不是服务，而是一种奴役。这是没有人能忍受得了的，我相信你也忍受不了。但是你想，因为德拉马什是你的朋友，你就不可以离开他，这就错了嘛；如果他不清楚你正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那么，你对他也就无丝毫义务可言。”

“这么说来，罗斯曼，你确实相信，我放弃在这里的服役，我就能重新把身体养好？”

“肯定。”卡尔说。

“肯定？”鲁滨孙又问一遍。

“完全可以肯定。”卡尔微笑道。

“那我立刻可以开始休养了。”鲁滨孙注视着卡尔说。

“此话怎讲？”卡尔问。

“嗯，因为你就要接管我在这儿的工作了呀。”鲁滨孙回答。

“这是谁对你说的？”卡尔问。

“早就有这个打算了。这件事已经谈论了好几天。起因是，布鲁娜姐叱责我，因为这寓所我保持得不够整洁。我当然答应马上把一切都整理好。嗯，这做起来却很难。譬如我现在这种状况，我无法到处爬来爬去，去擦拭灰尘，我在房间中央就动弹不了了，哪儿还有力气到那儿家具之间和储存物之间去擦呀？若想把一切都仔细擦拭干净，就也得把家具挪开，这活儿要我一个人去干？而且，这些活儿都得轻手轻脚地干，因为布鲁娜姐是决不可以受到骚扰的，而她又几乎从不离开这个房间。我虽然答应要把一切都擦拭干净，可是事实上我没有做到。布鲁娜姐发现了这个事实，就对德拉马什说，这样下去不行，还得另外再雇一个人手。‘我不希望，德拉马什，’她说，‘让你来指责我管理不好家务。我自己使不上劲儿，这一点你是看得出来的，而鲁滨孙又不够用。起初他精力充沛，很会张罗，但是现在他总是觉得累，通常都坐在一个角落里，而一个我们这样的有许多家什的房间是不会自动保持整洁的。’此后，德拉马什便考虑，该采取什么可行的办法，因为人们当然不能任意雇一个人到这样一个家庭里来，试也试不得，因为方方面面的人都在注意我们呢。可是因为我是你的好朋友，我还从雷内尔那儿听说你在饭店里挺受苦的，所以我就推荐了你。德拉马什立刻表示同意，虽然你当时曾冲撞过他，而我当然很高兴能为你效这个劳。这个职位对你特别合适，你年轻力壮，机敏过人，而我却一点儿也没有用了。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你还没有被正式录用，如果你不中布鲁娜姐的意，我们就不能用你。所以你努努力吧，让她喜欢你，其余的事就由我来办。”

“我在这里当佣人，你干什么呢？”卡尔问。他感到轻松自在，鲁滨孙通报的情况在他心头引起的最初的恐惧已经消散。这么说来，德拉马什并不怀有什么更大的恶意，无非就是想让他当佣人而已——倘若他怀有更大的恶意的话，饶舌的鲁滨孙肯定早就把这泄露出来了——可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卡尔就敢在今晚和他们分道扬镳。人们不能强迫

一个人接受一个职位嘛。从前，卡尔曾担心，为了不致挨饿，他能不能在这被饭店辞退之后尽快找到一份合适的、也许并不更寒酸的工作。而现在，比起这儿要他做的这份差事来，比起这份他厌恶的差事来，他觉得任何一个别的职位都够好的，甚至他宁可没有工作、穷困潦倒，也不愿干这份差事。可是他根本不试图让鲁滨孙去领会这个道理，因为鲁滨孙完全囿于成见，希望让卡尔来减轻自己的工作，从而无法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那我就，”鲁滨孙说，边说边做着愉快的手势——他把胳膊肘支撑在栏杆上——“先把一切都给你讲一讲，领你去看看储存物。你受过教育，肯定也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你可以马上开出一份所有这些我们所拥有的物品的清单来。布鲁娜姐早就希望得到这样一份清单。如果明天上午天气晴朗，我们就请布鲁娜姐坐到阳台上去，在这期间我们就可以在房间里踏踏实实干活，就不会妨碍她了。因为这是你，罗斯曼，首先必须注意的。千万不要惊扰布鲁娜姐。什么声音她都听得见，也许她作为女歌唱家耳朵十分灵敏。譬如你把箱子后面的烧酒桶滚出来，酒桶发出嘈杂声，因为它重，而且那儿四处都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物件，以致人们不是一下子就能轻易把它滚出来。譬如布鲁娜姐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沙发榻上逮苍蝇，这些苍蝇简直惹得她厌烦透了。于是你便以为，她不会管你的，你就继续滚你的酒桶。她还一直安静地躺着。但是就在我根本料想不到、就在我发出最小嘈杂声的那个瞬间，她突然坐直身子，用双手拍打沙发榻，拍得尘土飞扬，简直叫人看不见她的身影——自从我们到这儿以来，我从未拍打过这张沙发榻，我没法拍打，她老是躺在那上面——并骇人地大声喊叫起来，像一个男子汉，就这样接连喊叫数小时之久。左邻右舍禁止得了她唱歌，可是谁也禁止不了她喊叫，她必须喊叫，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现在很少发生，我和德拉马什已经变得很谨慎了。这也很有损于她的健康。有一次她晕了过去，我就不得不——德拉马什恰好不在——把隔壁的那位大学生请来，他用一只大瓶里的液体浇在她身上，这倒也奏效了，可是这种液体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只要把鼻子伸向沙发榻，你现在还闻得到那股气味。那个大学生肯定是我们的敌人，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你也必须提防所有的人，不要和任何人来往。”

“哎，鲁滨孙，”卡尔说，“这可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你真是给我介绍了一桩美差呀。”

“你别担心，”鲁滨孙边说边闭上眼睛摇晃脑袋，企图消除卡尔可能有的种种顾虑，“这个职务也有别的职务无法向你提供的好处。你老是

待在一位像布鲁娜姐这样的贵妇人的身边，有时候你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这本身就会带来种种舒适安逸的感觉。会付给你丰厚的报酬的，钱有的是，我作为德拉马什的朋友一个子儿也没拿到过，只有当我出门时，布鲁娜姐才总要给我一点钱，可是你当然会和别的佣人一样拿到工钱的。你也没有什么别的身份嘛。可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将大力减轻你的工作负担。起初我当然将什么事也不干，我要好好休养，但是我只要稍许恢复一下体力，你就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帮助。那固有的侍候布鲁娜姐的活儿，也就是梳头和穿衣，只要德拉马什不干，那么，这些活儿仍还由我来干。你只管打扫房间、买东西和繁重的家务活儿。”

“不，鲁滨孙，”卡尔说，“这一切对我没有吸引力。”

“罗斯曼，你别犯傻，”鲁滨孙贴近卡尔的脸说，“你别坐失了这个好机会。你在哪儿能马上找到一份工作？谁认识你？你认识谁？我们，两个男子汉，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奔波了几个礼拜也没找到工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卡尔点点头，并且对鲁滨孙能如此理智地讲话感到惊讶。不过，这些建议却对他毫无用处，他不可以待在这里，这座大城市里会有他的一块安身之地的，所有的饭店，这一点他是清楚的，通宵达旦都挤满了人，人们需要侍候客人的服务人员。他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会迅速而不引人注目地适应随便哪种活动的。对面那所房屋的楼下恰好就设有一家小旅店，从那里传出来一阵嘈杂的音乐声。主要入口处只用一大块黄色的门帘遮挡着，有时刮起一阵穿堂风，那帘子便一个劲儿直朝外面的巷子里飘荡。除此之外，巷子里已经变得寂静多了。大多数阳台都黑糊糊，只有在远处还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但是人们刚刚注意上它，那儿的人便都站起身，就在他们涌回寓所里去的同时，一个男子向那盏白炽灯伸过手去，作为最后一个留在阳台上的人，匆匆瞥了一眼巷子里之后，便拧灭了灯火。

“现在黑夜开始了，”卡尔暗自思忖，“我若还继续在这儿待下去，那么我就是他们一伙的了。”他转过身去，想拉开寓所门前的帘子。“你要干什么？”鲁滨孙站到卡尔和门帘之间说。

“我要走，”卡尔说，“让我走！让我走！”

“你别去惊扰了她，”鲁滨孙嚷嚷，“你想干什么！”说着，他用双臂抱住卡尔的脖子，用自己全身的重量吊在他身上，用自己的双腿夹住卡尔的双腿，就这样一下子把他扳倒在地上。但是卡尔在开电梯工中间曾学过一点扭打功夫，于是乎，他便一拳朝鲁滨孙的下巴颏下面打去，但手下留情，用力不大。鲁滨孙则迅速而毫无顾忌地用膝盖狠狠一顶卡尔的肚子，但随后便双手捂着下巴开始号啕大哭起来，致使相邻阳台上一个男人狂拍巴掌命令“安静！”卡尔还静静地躺了一小会儿，以便熬过鲁滨孙这一顶给他带来的疼痛。他只是把脸转向那块门帘，它平静而沉甸甸地挂在显然是黑沉沉的房间的前面。房间里似乎没有人，也许德拉马什和布鲁娜妲一道出去了，卡尔已经有了充分的行动自由。举止行为确实像一条看家狗的鲁滨孙已经被彻底甩掉了。

这时，从小巷深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和喇叭声。许多人零零星星的喊声不久便汇集成为齐声呐喊。卡尔转过头去，看到所有的阳台又重新活跃起来。他慢慢站起来，他不能完全站直，不得不重重地趴在栏杆上。下面人行道上，年轻小伙子们阔步行进，他们伸出双臂，高高举起的手里拿着便帽，面孔转向后面。车行道上仍还空着。少数人挥动着高杆上的裹在一层浅黄色烟雾里的灯笼。正当吹鼓手们排着长队走进灯光之中，卡尔对他们人数之众多感到不胜惊讶的时候，他听到自己背后有语音，便转过身去，只见德拉马什正在撩起沉甸甸的门帘，随后又看见布鲁娜妲正从幽暗的房间里走出来，身穿红连衣裙，肩披一条花边披肩，一顶黑色小帽戴在大概没有梳理过、只是堆成一堆的头发上，发梢松散地从帽檐底下露出来。她手里拿着一把打开的小扇子，但是并不摇动它，而是把它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

卡尔沿栏杆退到一边，给这两个人腾出地方。肯定没有人会强迫他留在这里的，即使德拉马什试图留他，布鲁娜妲也会按照他的请求立刻辞退他的。她根本就不喜欢他，他的眼睛使她感到害怕。但是当他向门口迈出去一步时，她发觉了并且说：“去哪儿，小家伙？”卡尔被德拉马什那严厉的目光镇住了，布鲁娜妲将他拉到自己身边。“你不想看看下面的游行队伍？”说着，她就把他推到栏杆旁边。“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卡尔听见她在自己身后说，徒劳地做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动作，想挣脱她的压力。他忧伤地望着下面的小巷，仿佛那儿是他忧伤的根由。

起先，德拉马什交叉着双臂站在布鲁娜妲的背后，后来，他走进房间，给布鲁娜妲拿来了观剧望远镜。下面，在乐师们之后，出现了游行

队伍的主体部分。在一个身材高大魁伟的男子的肩上骑坐着一位男士，在这个高度上人们只看得见他那闪着黯淡光泽的秃顶，此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见他将他的礼帽高高举起在秃顶的上方，频频向大家致意。他四周显然有人抬着木标语牌，从阳台上往下看，那些标语牌显得很白，它们排列得井井有条，从各个方向簇拥着这位男士，他就从那些标语牌中凸现出来。由于一切都在行进之中，这道标语牌墙不断松动，也不断地重新排列。在外层圈里，以这位先生为中心的巷子的整个幅面都挤满了这位先生的追随者，尽管，就人们在黑暗中能估摸到的而言，其纵面并不深远。追随者们一齐鼓掌，可能唱着一首庄严的颂歌，在喊出这位先生的名字，一个简短而含混不清的名字。三三两两巧妙分布在人群里的人拿着灯光特别强烈的车灯，他们让灯光慢慢上下移动，照射街道两侧的房屋。在卡尔的这个高度，那灯光干扰不了什么，但是在下面的阳台上，人们看见那些受这强光刺激的人都急忙用双手捂住眼睛。

德拉马什按照布鲁娜姐的请求向相邻阳台上的人打听，举行这样的活动有何含义。卡尔颇有一点儿好奇，很想知道人家是否会并且将如何回答他。德拉马什果然连问了三遍也没有得到回答。他已经冒着危险从栏杆上探出身去，布鲁娜姐对邻居气得轻轻跺脚，卡尔感觉到了她的膝盖。最后终于来了一个答复，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个挤满了人的阳台上，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后，德拉马什向那边叫喊着什么，那样声嘶力竭，若不是整个巷子里恰好嘈杂声四起的话，四周的人一定会惊奇地仔细倾听的。不管怎么说，这一叫喊起了作用，不一会儿那笑声不自然地就止息了。

“我们这个区里明天选一个法官，他们在下面抬着的那个人是候选人，”德拉马什完全心平气和地返回到布鲁娜姐身边说，“不！”然后他叫喊并爱抚地拍了拍布鲁娜姐的后背，“我们简直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德拉马什，”布鲁娜姐把话题扯回到邻居的态度上来说，“我真想搬到别处去住，倘若搬家不是那么费劲的话！可是遗憾的是我不可以这样奢望自己。”她唉声叹气，焦灼不安，心不在焉，用手指揉搓着卡尔的衬衫，卡尔则试图尽量悄悄地一再把这一双肥胖的小手推开，这一点他也轻易地做到了，因为布鲁娜姐的心思不在他身上，她心里正琢磨着别的事情呢。

但是不久卡尔也忘了布鲁娜姐，听任她的胳膊压在自己的肩膀上，

因为街上的游行活动深深地吸引着他。一些打着手势的男人紧挨着候选人的前面行进，他们的叙谈八成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人们看到四面八方都有人向他们俯下脸去仔细倾听。在他们的命令下，游行队伍出其不意地在旅店前停住了。这些权威性的男人中的一个举起手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不仅适用于游行队伍，而且也适用于候选人。游行队伍顿时静了下来，骑在他的运送者肩上多次企图站起来后又多次倒下恢复骑坐姿势的候选人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讲话时他不时飞速地挥动他那顶礼帽。这一切人们看得一清二楚，因为他讲话的时候所有车灯都对着他，致使他处在一片光亮的中央。

不过现在人们也已经看出，整条街道对这件事情都颇有兴味。在候选人的党内同人占领的阳台上，人们同声和唱着他的名字，将手远远伸出到栏杆外有节奏地鼓掌。在其余的、甚至占了多数的阳台上响起了一阵强烈的对抗歌声，不过这阵歌声没有统一的效果，因为他们是不同候选人的追随者。不过，除此之外，这位在场候选人的所有敌人还联合在一起共同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声，甚至还接连不断地放留声机助阵。个别阳台之间展开政治性的争吵，由于是在夜间，大家的情绪尤其激奋。大多数人已经身穿睡衣，只披了件外衣，妇女们裹着宽大、深色的披肩，未受人注意的孩子们令人惊惧地在阳台围栏上爬来爬去，他们人数越来越多，纷纷从黑暗的房间走出来，他们本来已经在房间里睡了。偶或有特别激动的人把看不清是什么的零星物件朝他们的对手的方向扔去，有时候它们到达目的地，但是通常都掉落到街上，往往引起一阵愤怒的叫骂声。一旦下面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男人觉得这嘈杂声太厉害了，鼓手和号手们就受命进行干预，于是他们那高亢响亮的、竭尽全力奏出的、没有尽头的信号便压住了直至房屋屋顶上在内的所有的人语声。他们总是完全突然地——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戛然而止，随后在这方面显然训练有素的大街上的人群便利用这瞬间出现的普遍的寂静大声吼唱他们那一派的派歌——在车灯的灯光下，人们看到一张张的张得大大的嘴——直至后来在这当儿已经醒悟过来的对手从所有阳台和窗户发出比先前强10倍的叫喊声，使下面那一派人在获得短暂的胜利后至少对于处于这一高度的人来说又完全沉寂了下来。

“小鬼，你觉得怎么样？”布鲁娜坦问，她紧挨着卡尔身后来回转动，想用观剧镜尽可能把一切都看清楚。卡尔只是点点头作为回答。此外，他还发现，鲁滨孙正在起劲地向德拉马什介绍种种显然是有关卡尔的态度的情况，可是德拉马什似乎并不重视鲁滨孙的话，因为他用右手

搂着布鲁娜姐，一再试图用左手把鲁滨孙推到一边去。“你不想用观剧镜看看？”布鲁娜姐问，并敲敲卡尔的胸膛，以表明她是在问他。

“我看得够清楚的。”卡尔说。

“试试这个吧，”她说，“你会看得更清楚的。”

“我的眼力挺好，”卡尔回答，“我什么都看得见。”当她把观剧镜向他的眼睛移近过来时，他并不觉得这是态度亲切，而是觉得这是一种妨碍。果然她什么话也不说，只说了“你！”这一个词儿，声音悦耳动听，却带着威吓的味道。观剧镜已经摆在卡尔的眼前，现在他果然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说罢，他就想甩掉观剧镜，可是她紧紧握住观剧镜，而那颗埋在她胸脯上的脑袋他既缩不回去也没法移到一边去。

“可是现在你已经看见了。”她一边旋动观剧镜上的螺丝，一边说。

“不，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卡尔说并且想到，他事实上已经无意中减轻了鲁滨孙的负担，因为布鲁娜姐那喜怒无常的脾气现在发泄到他身上了。

“什么时候你才会终于看见？”她边说边——现在卡尔的整个脸面都感觉到她那沉重的气息——继续旋动螺丝。“现在呢？”她问。

“不，不，不！”卡尔嚷嚷，尽管他现在事实上已能辨认一切，虽然不是太清晰。但是这时候布鲁娜姐恰好有什么话要和德拉马什讲，她只是把观剧镜松松地握在卡尔的面前，于是卡尔就能从观剧镜下面朝大街上望去，而不至于会引起她特别的注意。后来她也不再固执己见，将观剧镜收归己用了。

从下面的旅店里走出来一个服务员，他跑进跑出，接受游行活动领导人们的订单。人们看到，他伸长了脖子观察酒店内部，招来尽可能多的服务人员。在人们显然为举办免费酒会而作准备的时候，候选人并没有停止演讲。他的负荷者，那个身材魁梧、只为他效劳的男子，总是在他讲完几句话之后便转一下身，以便使各个方向的群众都能听到他的演说。候选人通常都蜷曲着身子，企图用急促地挥动那只空着的手和另一只拿礼帽的手尽量给他的话增强说服力。但是有时候，几乎是每隔一定

的间隙，他便浑身震颤，他伸开双臂站起来，他不再与一个小团体，而是与全体谈话，他对这些公寓里乃至最高层处的居民讲话，然而分明最下面几层楼里就已经没有一个人听得见他讲的话了，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压根儿不会有人愿意听他演讲的，因为每扇窗户里和每个阳台上至少都有一个人在声嘶力竭地发表演讲呢。这当儿，几个服务员从酒店里抬出来一块一张台球桌那么大的木板，木板上摆了满满当当的闪光的酒杯。领头人组织分发，分发以列队通过酒店大门口的形式进行。但是木板上的酒杯虽然一再被重新加满，它们还是不够大家喝的，两排酒店的伙计不得不穿梭往来于木板的左右两边，不断给大家供酒。候选人当然已经停止演讲，利用这个间歇养精蓄锐。他的负荷者驮着他离开人群和刺眼的灯光，慢慢走来走去，只有离他最近的几个追随者在那里陪伴着他并仰着脸对他讲话。

“瞧这个小家伙，”布鲁娜妲说，“他光顾着看，忘记自己在哪儿了。”说着，她出其不意地用双手把卡尔的脸扭向自己，她逼视着他的眼睛。但是这只延续了一会儿工夫，因为卡尔立刻就甩开了她的双手。恼怒于人们不让他得到片刻的安宁，同时又兴致勃勃想到街上去就近观看一切，他便试图竭尽全力挣脱布鲁娜妲的压迫并且说：

“请您放我走吧。”

“你留在我们这儿。”德拉马什说，他没有把目光从街道上移开，只伸出一只手，拦住卡尔的去路。

“你别这样，”布鲁娜妲挡开德拉马什的手说，“他会留下来的。”说罢，她把卡尔更紧地压在栏杆上，他要摆脱她，就势必会和她扭打起来。他即使成功地摆脱了她，他又能怎么样呢！他的左边站着德拉马什，右边则立着鲁滨孙，他简直可以说是被俘虏了。

“我们不把你撵出去，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嘛。”鲁滨孙边说边用从布鲁娜妲的胳膊下抽出来的那只手叩打卡尔。

“撵出去？”德拉马什说，“一个负案在逃的小偷我们不撵走，我们把他交给警察。如果他不老老实实，我们明天一早就送他去警察局。”

从这时候起卡尔再也没有兴趣去观看下面的景象了。因为他受制于布鲁娜妲而直不起腰来，所以实在不得已，只好从栏杆上微微俯下身去。他忧心忡忡、心神不定地望着下面一伙二十来个男人三三两两走到

饭店门前，拿起酒杯，转过身来，对着现在正陷入沉思之中的候选人那个方向挥动这些酒杯，高呼一声党内问候词，把酒杯一饮而尽，又轰隆隆放下酒杯，放在木板上，不过在这么高度的地方这隆隆声是听不见的。就这样，他们为急不可耐、吵吵嚷嚷的后来者让出位置。在领头人的委托下，迄今一直在饭店里演奏的乐队走上了街头，他们的大型吹奏乐器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闪着亮光，但是他们演奏的乐曲几乎淹没在四周的嘈杂声里。如今这条街道，至少饭店所在的那一侧，已经挤满了人。他们从上面，从早晨卡尔坐在汽车里来的那个方向，向下面涌去，还有的人则从下面，从桥那个方向走上来，甚至在屋里的人也经受不住这个诱惑，想亲自去插手这件事，阳台上和窗口几乎只留下妇女和孩子，男人们纷纷从下面楼门里冲出去。现在音乐和款待可是已经达到了目的，集会的规模够大的了，一位两侧摆着两盏车灯的领头人挥手让音乐停下，发出一阵强烈的哨子声，于是人们便看见那位有一点儿偏离了正道的负荷者驮着候选人从一条由追随者开辟出来的道路急匆匆走过来。

他刚到饭店门前，候选人便在仅仅照着他四周一个狭小圈子的车灯的灯光下开始作新的演讲。但是现在一切都比先前困难多了，负荷者不再有丝毫的自由活动的余地，人群太拥挤了。那些离得最近的追随者先前曾试图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候选人演说的效果，如今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使自己得以待在他的身边，二十来个人竭尽全力紧紧抓住负荷者。但是甚至连这个强壮的汉子也不能随意挪动一步，眼下已经无法通过某些转身动作或通过适当的前移或后退来对群众施加影响了。人群漫无目的地涌动着，一个人贴着另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站直了的，由于获得了新的听众，对手们的人数似乎大大增多了，负荷者在饭店门口坚持了很长时间，但是如今他看似未作任何反抗地随波逐流，在街上飘来荡去，候选人不停地讲话，但是人们已经听不太清楚，不知道他是在阐述他的纲领呢还是在呼喊求助。如果并非一切都搞错了的话，也已经出现了一个或者甚至好几个竞选对手，因为人们不时看到在突然亮起来的灯光下从人群里冒出一个脸色苍白、紧握拳头的男子开始演讲，他的话受到嘈杂的喊叫声的支持和欢迎。

“那儿发生什么事了？”卡尔神情紧张、困惑不解地向看守他的人转过身去问。

“这小鬼多激动！”布鲁娜姐一边对德拉马什说，一边抓住卡尔的下巴，将他的脑袋往自己身边拽。可是卡尔不愿意这样，他受大街上事件

的刺激而变得毫无顾忌，便使劲抖动身子，抖得布鲁娜姐不仅松了手，而且还向后退去，完全把他放开了。“现在你已经看够了，”她说，显然让卡尔的行为惹怒了，“到房间里去，铺床，为过夜做好一切准备。”她向房间伸出手去。这正是几个小时以来卡尔一直想去的那个方向，他没说一句反对的话。这时，人们听见从巷子里传来劈劈啪啪许多玻璃摔成碎片的声音。卡尔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迅步跨到栏杆边上，急忙再次向下张望。对手们的一次打击，也许是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成功了，候选人的追随者们凭借着车灯的强光使全体公众至少可以看到竞选活动的主要场面并由此而将一切活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今这些车灯一股脑儿都在同时被击碎，于是候选人及其负荷者周围是一片和大家一样的摇曳不定的灯光，这灯光突然扩散开来就像一片昏暗。现在人们连候选人大体在什么位置也说不出来了，一阵刚刚开始的同声齐唱的歌声，从下面，从桥那边渐渐逼近过来，更增添了黑暗的迷茫。

“我没有告诉你现在该干什么！”布鲁娜姐说，“赶快。我累了。”她添上一句，随后便将胳膊高高举起，致使她的乳房比平时隆起得高得多。一直还搂着她的德拉马什，把她拉到阳台的一个角落里。鲁滨孙跟着他们走去，他想把还放在那里的他吃剩的东西推到一边去。

这个有利的机会卡尔必须加以利用，现在没有时间去看下面了，街上的热闹他到了下面就可以看个够，比这儿楼上看得更清楚。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忙穿过亮着淡红色灯光的房间，但是房间锁着，钥匙已经拔掉。现在必须找到钥匙，可是谁有本事在这个杂乱无章的房间里找到一把钥匙呢，况且要在可供卡尔支配的这段短暂、宝贵的时间里！现在他本来已经可以到楼梯上，在拼命奔跑了。可是如今他却在找钥匙！在所有能打得开来的抽屉里找。他在桌子上乱翻，桌上凌乱地放着各种各样餐具，餐巾和一件不知什么已绣了几针的刺绣品，受到一把靠背椅的吸引，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衣服，钥匙可能就在那堆衣服里，可是你休想找着它，最后便扑倒在那张果真散发着臭味的沙发榻上，在所有的角落和缝隙里摸索那把钥匙。后来他停止搜寻，愣愣地站在房间中央。布鲁娜姐一定把钥匙系在腰带上了，他暗自思忖，那上面挂着那么多东西，一切搜寻都是徒劳的。

卡尔胡乱拿起两把刀子，将它们插进门缝之间，一把上，一把下，构成两个相互分离的作用点。他刚用力一撬，刀口便折断。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残余部分更容易握住，他可以将它们更紧地插进去。于是，他

伸直双臂，叉开两腿，竭尽全力，边发出呻吟声边撬门，同时仔细地注视着门。它顶不住多久的，从清晰可闻的门门松动的响声上他愉快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这门门松动得越慢，事情就越好办，千万不可让锁蹦掉，否则，他们在阳台上就会警觉起来，这锁必须慢慢地松开，卡尔朝着这个目标小心翼翼地撬着，眼睛越来越逼近着锁。

“你们看。”他听见了德拉马什的声音。三个人全都站在房间里，帷帘已经在他们身后拉上，卡尔一定没听见他们进来，一看见刀子他的手便垂了下来。但是他根本就来不及说一句解释或道歉的话，因为德拉马什一阵远远超出对眼前这件事的狂怒的发作下——他那条已经解下来的睡袍带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弧圈——向卡尔猛扑过去。卡尔猛一闪身躲过这一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刀从门上拔出来并用它们来自卫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弯腰、跃起，一把抓住德拉马什的宽大睡袍衣领，将它向上翻起，随后又将它提起来——这件睡袍对德拉马什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恰巧用衣领蒙住了他的脑袋，德拉马什猝不及防，起先胡乱挥舞双手，过了一阵以后才用拳头砸在卡尔的背上，但还不是砸得完全有效，而卡尔则扑向德拉马什的怀里，以便保护自己的脸部。卡尔忍受着这些拳击，尽管他痛得缩成一团，尽管打击越来越重，可是他怎么会忍受不了这打击的呢，他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了嘛。双手抱着德拉马什的头，大拇指正好按在他的眼睛的上方，他将他朝着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家具推去并试图用脚尖将睡袍带缠住德拉马什的双脚，想用这个办法将他绊倒。

可是由于他必须全力以赴对付德拉马什，尤其是因为他感觉到此人的反抗越来越强烈，这个敌对的躯体越来越强劲有力地顶住他，所以他确实忘记了，他并非和德拉马什单独在一起。不过这一点马上就有人来提醒他，因为他的双脚突然不听使唤了，原来鲁滨孙已经在他身后扑倒在地上，大声喊叫着把他的双脚扒开。卡尔呻吟着松开了德拉马什，后者一个趔趄往后退了一步。布鲁娜妲叉开双腿，弯着膝盖胖墩墩地站在房间中央，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仿佛她真的参与扭打似的，她重重地喘着气，用眼睛瞄准，慢慢向前动自己的双拳。德拉马什翻下自己的衣领，眼睛重又获得了光明，现在当然不再是扭打，而是一种单纯的惩罚。他抓住卡尔衬衣的前襟，几乎把他从地上提起来，鄙夷不屑地看也不看他一眼便使劲将他向着一只几步远处的柜子扔去，以致卡尔一开始还以为，他撞击在柜上而引起背部和头部的钻心的疼痛直接出自德拉马什之手。“你这个无赖！”他两眼震颤，眼前一阵发黑，却还听见

德拉马什在大声嚷嚷。他精疲力竭昏倒在柜前时，“你等着瞧吧！”这句话还隐隐在他耳边回响。

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四周一片黑暗，也许仍还是在深夜里吧，从阳台那边，一抹微弱的月光通过帷帘下面渗进房间。人们听到那三个睡者的平稳的呼吸声，其中最响亮者均出自布鲁娜妲之口，她在睡觉时鼻孔里咻咻地出着气，一如她有时讲话时所做的那样。但是要判断出睡者们各自在什么方向，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整个房间里都充满了他们的呼噜呼噜的喘气声。他稍许审视了一下周围环境之后，卡尔才想到了自己。这时，他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即使他觉得自己痛得完全蜷缩成一团，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可以会严重受伤乃至流血。可是现在他头上有一个重荷，整个脸面、脖子，衬衫里面的胸脯都湿漉漉的好像有血。他必须到亮处去，以弄清楚自己的情况，也许人家已经把他打成残废了，那么，德拉马什就会很乐意把他一脚踢开，可是他以后该怎么办呢，以后他真的就没有前途了。他想起了大门通道里那个酒糟鼻小伙子，他用双手将脸捂住了片刻。

然后，他情不自禁地转身对着门，向门那边摸爬过去。不一会儿，他使用指尖触摸到一只靴子，后来又摸到一条大腿。这是鲁滨孙，除了他还有谁穿了靴子睡觉的？人家命令他横躺在房门口，以防止卡尔逃跑，可是难道他们不了解卡尔的伤势吗？眼下他根本不想逃跑。他只想到亮处去。既然他出不了门，那么，他也就只好到阳台上去了。

他发现餐桌不在晚上的地方，而是在一个显然完全不同的地方，卡尔当然小心翼翼地接近沙发榻，可是这沙发榻出人意外地空着，他在房间中央却撞上了一堆即便压得紧紧却仍然擦得高高的衣服、被子、帷帘、靠垫和地毯。起先他以为，这只是一小堆，就像他晚上在沙发上看到的那一堆，也许是那一堆滚落到地上来了，但是他继续往前爬时便惊讶地发现，那里堆放着整整一卡车这样的杂物，它们白天存放在箱柜里，如今大概是拿出来供过夜用的。他绕着这堆衣物爬行，不久便看清，整个这一堆合成为一种类似床铺的东西，他小心摸索了一阵后便确信，德拉马什和布鲁娜妲就安睡在这一堆东西的顶上。

现在他终于知道大家都睡在哪儿了，便赶快来到阳台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于是，在帷帘的外面，他便很快站立起来。呼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沐浴着皎洁的月光，他在阳台走了几个来回。他看了看街上，街上一片寂静，酒店里还有音乐声传出来，但声音已经压得很

低，门前一个男子在扫人行道，晚上在大众狂暴的喧嚷中，这条街上一个竞选候选人的狂叫简直无法与成千上万其他人的呐喊声区别开来，如今人们却清晰地听见扫帚在石子路面上的嚓嚓声。

相邻阳台上一张桌子的移动声引起了卡尔的注意，有人坐在那儿，正在学习呢。这是一个蓄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的年轻小伙子，他一边读书一边不停地捻着自己的胡子，嘴唇迅速活动着。他脸对着卡尔，坐在一双小小的摊满了书籍的桌前，他已经将那盏白炽灯从墙上取下来，将它夹在两大本书之间，受到了它那耀眼的灯光的充分照射。

“晚上好。”卡尔说，因为他自以为已发现那个年轻人朝他瞟了一眼。

可是这肯定是他搞错了，因为那个年轻人似乎压根儿还没看见他，将手放在眼睛上方，以便遮挡那强烈的灯光，看清是谁突然向他问好，由于始终什么也看不见，便高高举起那盏白炽灯，想用它也稍稍照亮一下相邻的阳台。

“晚上好，”然后他也说，用敏锐的目光朝那边看了片刻，然后补充说，“有什么事吗？”

“我打扰您了吧？”卡尔问。

“当然，当然。”那人说并将白炽灯重新放回原处。

诚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就是拒绝建立任何联系的意思，但是，尽管如此，卡尔却不离开他离此人最近的那个阳台角落。他默默地看着此人读书，翻书页，不时以闪电般迅速的动作拿起另一本书查阅着什么，并不时往一个笔记本里作着笔记。记笔记时，他总是将脸极低地垂向笔记本。

这个人莫非是个大学生？看那样子，他好像在研究什么学问。卡尔坐在家里的桌子旁边——这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写作业的情景跟这没有多大的差别，那时，父亲总是读报或记账和为协会料理信件来往事宜，母亲则做针线活，将线从衣料中高高抽出。为了不妨碍父亲，卡尔只把练习本和文具放到桌上，那些必不可少的书籍他都整理好放在自己左右两边的椅子上。那儿多么安静！多么难得有陌生人到那个房间里来！卡尔在孩提时代就总是喜欢观看母亲傍晚时用钥匙锁上住宅

门。她决想不到，现在卡尔竟会落到试图用刀子撬开别人房门这步田地。

他学过的知识都有什么用呀！他全都忘记了，倘若要他在这里继续他的学业的话，他会觉得非常困难的。他回想起，有一回他在家病了一个月，他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耽误的课程补上。现在，除了那本英语商业信函——教科书以外，他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一本书了。

“喂，年轻人，”卡尔突然听人家在喊他，“您不能待在别的地方吗？您直勾勾地往这边看，搅得我心神不定。半夜两点了，人们总可以要求在阳台上不受干扰地学习一会儿了吧。您要我为您做什么事吗？”

“您在学习？”卡尔问。

“是的，是的。”那人边说边利用这片刻荒废掉的学习时间重新整理了一下他的那些书。

“那我就不想打扰您了，”卡尔说，“我这就回房间里去。晚安。”

那人连吭都没吭一声，在排除了这一干扰之后，他突然敛一敛神又开始学习起来并将额头重重地支在右手上。

这时，卡尔刚到帷帘跟前，却回想起，他究竟是为什么出来的，他根本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势如何呢。是什么这么沉甸甸地压在他脑袋上？他伸手一摸，吃了一惊，那儿并不是如他在黑糊糊的房间里所担心的那样，是什么流血的伤口，那只是一块缠头布模样的、仍还一直湿乎乎的绷带。从星星点点垂挂下来的残余花边可以推断出，它是从布鲁娜姐的一件旧衣服上撕下来的，兴许是鲁滨孙将它草草绑在卡尔的脑袋上了。只是，他忘了将它拧干了，于是乎，在他失去知觉的时候，那么多的水便顺着他的脸往下流，流到衬衫里，把卡尔吓了一大跳。

“您还一直在这儿呢？”那人眯起眼睛望着那边问。

“现在我可是真的就要走了，”卡尔说，“我本来只想到这儿来看样东西，房间里一片漆黑。”

“您倒是谁呀？”那人说，将钢笔放进在他面前翻开的书上，走到栏杆旁边，“您叫什么名字？您怎么到这些人这儿来的？您在这儿时间久了吗？您要看什么东西？您拧亮您那盏灯呀，我就可以看见您了。”

卡尔把灯拧亮，却在答话前先把帷帘拉严实了，好让室内的人看不见丝毫亮光。“对不起，”然后他用耳语声说，“我这样轻声说话。假如里面的人听见我，我就又要挨剋了。”“又要？”那人问。

“是的，”卡尔说，“刚才晚上我就和他们剋了一架。这儿我一定还肿起来一块了呢。”说着，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你们剋什么架呀？”那人问，见卡尔不马上回答便添上一句，“您受了这帮人的什么委屈，您只管放心对我说好了。因为我憎恨那三个人，尤其是您那位女主人。而且我简直感到惊奇，他们竟然会没有唆使您来攻击我。我叫约瑟夫·门德尔，是大学生。”

“对。”卡尔说，“他们倒是对我讲起过您，但没说什么坏话。您大概给布鲁娜太太治过一回病吧，对不对？”

“有这么回事，”大学生笑道，“沙发榻还有那股味道吗？”

“噢，还有。”卡尔说。

“这个我听了高兴，”大学生说，用手掠了一掠头发，“他们为什么打得您起包？”

“我们打了一架。”卡尔边说边思虑着，他该如何向大学生解释这件事。可是随后他却顿住，改口说：“我不打扰您吗？”

“第一，”大学生说，“您已经打扰了我了，而我可惜又很神经质，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安定下来。自从您在阳台上散起步来，我就再也学不下去了。不过第二，我在3点的时候总是休息一下。您放心讲好了。我也有兴趣听。”

“事情很简单，”卡尔说，“德拉马什要我当他的仆人。可是我不愿意。我恨不得晚上立刻就走呢。他不肯放我走，把门锁上了，我想撬开门，后来就扭打起来了。我真不幸，我现在还待在这儿。”

“您有别的工作了吗？”大学生问。“没有，”卡尔说，“可是我不在乎这个，我只要能离开这儿就行。”“您听着，”大学生说，“您不在乎这个？”两人都沉默了片刻。“为什么您不愿意留在这些人身边呢？”大学生然后问。

“德拉马什是一个坏人，”卡尔说，“我从前就认识他。有一回我和他一起徒步行走了一天，后来幸好我不再和他在一起了。现在我倒要在他这儿当仆人？”

“要是所有的仆人挑选自己的主人都像您这样吹毛求疵，那还得了！”大学生似乎含着微笑地说，“您瞧，我白天是售货员，最低等级的售货员，说白了就是蒙特立百货商店里供差遣的仆人。这个蒙特立无疑是个恶棍，但是我对此并不介意，只有当支付给我的报酬太低的时候我才发火。您就拿我作榜样吧。”

“怎么？”卡尔说，“您白天当售货员，夜里学习？”

“是的，”大学生说，“没有别的办法。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这种生活方式还是最好的呢。几年前我是个纯粹的大学生，白天和黑夜都是，可是我几乎饿死，睡在一间肮脏破旧的棚屋里，身穿我当初的那身西装不敢到教室里去听课。但是这种情况已经过去了。”

“可是您什么时候睡觉呀？”卡尔惊奇地望着大学生问。

“**噓**，睡觉！”大学生说，“睡觉我都是在学习完了以后才睡。暂时先喝点黑咖啡。”说罢，他转过身去，从书桌下拿出一只大瓶子来，将瓶里的黑咖啡斟进一只小杯子里，就像吃药尽量少感觉到药味那样把一杯咖啡一下倒进肚里。

“真是妙极了，这黑咖啡，”大学生说，“可惜，您离得这么远，我没法给您递过去一点。”

“我不喜欢喝黑咖啡。”卡尔说。

“我也不喜欢喝，”大学生笑道，“可是没有它我怎么能行呢。没有这黑咖啡蒙特立一刻也不会用我的，我总是对蒙特立说，我精力充沛，尽管此人当然不了解真情。我简直不知道，假如我不是在那里的斜面架里始终准备好和这只一样大的瓶子的话，我将会怎样照看好生意，因为我还从来没敢停止喝咖啡，可是，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不久就会在斜面架后面躺下睡觉的。遗憾的是，人家猜到了，他们在那儿叫我‘黑咖啡’，这是一句无聊的玩笑话，肯定已经损害了我的前程。”

“您的学业什么时候结束呢？”卡尔问。

“进展缓慢。”大学生垂下头说。他离开栏杆，又在桌前坐下，胳膊肘支在翻开的书本上，用双手一掠头发，然后他说：“可能还要一两年。”

“我也曾想上大学。”卡尔说，仿佛这个情况会赋予他得到更大的信任的权利似的，仿佛现在闷声不响的大学生已经对他证明了这一点似的。

“噢，”大学生说，情况不太清楚，不知道他已经又埋头读他的书了呢还是只是心不在焉地凝视着书本，“幸亏您放弃了上大学。我自己这几年来其实已经只是硬着头皮在上大学。从中我很少得到满足，前途更是渺茫。我会有什么前途呀！美国充斥着假博士。”

“我本来想当工程师的。”卡尔还急切地对着看似已经完全不专心了的大学生那边说。

“现在您却要给这些人当仆人了。”大学生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说，“这当然使您痛心。”

诚然，大学生的这个结论是一种误解，但是大学生的这种误解也许对卡尔有用。所以他问：“我可不可以也得到一份百货商店里的工作呢？”

这个问题使大学生完全抛开了他的书，他根本没想到，他可以帮卡尔找工作。“您试试吧，”他说，“要不您还是别试的好。我在蒙特立找到了一份工作，是迄今我一生中的最大的成功。倘若要我在上大学和我的这份工作之间作一选择的话，我当然会选择这份工作的。我努力学习，就只是为了可以不必去作这样的选择。”

“在那儿找一份工作有这么难哪。”卡尔更多地是自言自语说。

“啊，您想什么呀，”大学生说，“在这里当区法官比在蒙特立当开门员还容易。”

卡尔沉默不语。这个大学生，此人比他有经验多了，此人出于某种卡尔尚还不清楚的原因憎恨德拉马什，相反，对卡尔则肯定不抱任何恶意，这个大学生竟说不出一句鼓励卡尔离开德拉马什的话来。而且他还根本不知道卡尔有受警察威胁的危险，他只有在德拉马什这儿才多少受

到保护可以免受警察威胁。

“晚上您看见下面的游行了吧，对不对？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就会以为，这个候选人，他叫罗伯特，很有希望当选，或者他至少在可供考虑之列，是吧？”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卡尔说。

“这是一个错误，”大学生说，“但是撇开这点不谈，您有眼睛和耳朵嘛。那个人毫无疑问曾经有过朋友和敌人，这一点您不会没有觉察到的。现在您想一想，依我看，这个人丝毫没有当选的希望。碰巧我知道他的底细，有一个住在我们这儿的人认识他。他不是一个无能之辈，按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经历来看，他恰好是区里合适的法官。但是没有人认为他会当选，他将和许多别人一样，堂而皇之地落选，他将会为竞选活动破费掉一笔钱，如此而已。”

卡尔和大学生相对默视了片刻。大学生点头微笑，用一只手揉了揉疲倦的眼睛。

“嗯，您还不睡觉？”然后他问，“我也不要学习了。您看，我还有多少东西要学。”说罢，他迅速将半本书翻阅一下，为了让卡尔明白，还有这么多功课等着他去完成呢。

“那就晚安了。”卡尔一欠身说。

“有空您就到我们这边来坐坐，”大学生说，他已经又坐在桌子旁边了，“当然只是在您有兴趣的时候。这儿总是很热闹的。晚上九点至十点，我也有时间，可以和您说说话。”

“那么您是劝我留在德拉马什这儿^①？”卡尔问。

“一定留下。”说着，大学生就埋头读起书来，就仿佛根本不是他说了这句话，像是由一个比大学生的那个声音更深沉的声音讲出来似的，这句话还在卡尔的耳边回响着。他慢慢走向帷帘，还瞥了一眼大学生，只见大学生现在一动不动，为一片漆黑所包围，坐在他的灯光下，然后才溜进房间里去。他受到三个睡者联合鼻息声的接待。他沿墙寻找沙发榻，当他找到它时，他便心安理得地伸展四肢躺在它上面，似乎这就是他的惯常的床铺。既然了解德拉马什底细、谙熟当地情况并且又是一个

受过教育的大学生劝他留下，眼下他也就没什么顾虑了。像大学生这样的崇高的目标他没有，谁知道，他在家是否成功地学完大学里的功课，如果这件事在家乡都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谁也不能要求他在这儿异乡做到这一点。但是找到一份工作，作出一点成绩，让自己的成绩得到承认，他的这个希望肯定是更大了，如果他暂时接受在德拉马什这儿当仆人这份差事，并在这个安全港里耐心等待着有利时机的话。这条街上似乎有许多中、低等档次的办事处，一旦需要用人，它们在挑选员工方面也许不会过分挑剔。万不得已时，他倒也乐意当个商号里的听差，但是毕竟根本并不完全排除录用他去干纯粹办公室工作的可能性嘛，他也可以像那个他今天早晨穿过那些庭院时见到的那个职员那样，当个办公室职员坐在写字台前，无忧无虑地从敞开着窗户里眺望一阵街景。当他闭上眼睛时，他便安然地想到，他还年轻，德拉马什总有一天会放他走的，这个家看上去也确实不像是个永远不散的筵席。可是如果卡尔在一家办事处得到一份这样的工作，那么，他就别的事一概不管，他就要一心扑在办公室工作上，不想象大学生那样分散精力。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也愿意把夜晚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由于他商业知识贫乏，人家反正也会这样要求他的。他会一心只想着他所服务的那家商号的利益，乐意承担各种工作，甚至包括那些别的职员认为有失自己身份而不屑于去干的工作。他满脑瓜子都转悠着这些美好的决心，仿佛他未来的上司就站在沙发榻前并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的这些决心似的。

卡尔转悠着这样的念头入睡，只是在刚朦朦胧胧地进入半睡状态时，他才受到布鲁娜姐一阵大声呻吟的惊扰，她显然受噩梦的折磨，在自己的铺位上翻来滚去。

俄克拉荷马^[4]露天剧场

卡尔在一个街角上看见一张广告牌，上面写着：“今天从早晨六点至午夜在克莱顿^[5]赛马场为俄克拉荷马大剧场招聘职工！俄克拉荷马大剧场在呼唤你们！它只在今天呼唤，只呼唤一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谁憧憬未来，谁就是我们的一员！每一个人都受欢迎！谁想当艺术家，请报名吧！我们剧院可以让每个人都有用武之地！谁选中了我们，我们当即在此向他祝贺！但须从速，赶在午夜前报到！12点一切关闭，不再开启！谁不相信我们，谁就活该倒霉！到克莱顿来吧！”

广告牌前虽然站着许多人，但是它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有那么多广告牌，广告牌没人信了。何况这张广告比一般的广告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它主要是有一个大毛病，广告词中对报酬只字未提。哪怕报酬只要有那么一点儿值得一提，广告肯定就会提及的，它不会把最吸引人的东西忘掉的。艺术家没人愿意当，但是人人都愿意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得到报酬。

但是对于卡尔来说，这则广告却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每一个人都受欢迎”，广告说。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卡尔。他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被忘却，没有人会因此而指责他什么。他可以申请找一份工作，这不是卑贱低下的工作，这是人家可以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家也会接受他的，这也是同样公开允诺了的嘛。他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只想最终找到一个规矩正派的职业生涯的起点，而这里也许显示出了这个起点。哪怕广告上所有冠冕堂皇的话都是谎言，哪怕这俄克拉荷马大剧院可能是一个小流动马戏团，它想招聘人，这就足够了。卡尔没有第二遍读广告，却又一次把“每一个人都受欢迎”这句话寻找出来。起先，他想步行到克莱顿去，但是那就要吃力地行走3个小时，于是他也许恰好就赶上听到消息说别人已经占去了所有可提供的职位。诚然，按广告牌上所说，待聘者的数目不受限制，但是所有这类征聘广告都是这样撰写的。卡尔认识到，他要么放弃应聘，要么就坐车去。他大略计算了一下自己的钱，不乘这趟车，手头的钱够他花八天，他将那些小硬币放在掌心推来移去。一位已经观察他良久的男士拍拍他的肩膀说：“愿您去克莱顿多多走运。”卡尔默默点头，继续盘算着。但是他很快便当机立断，划出乘车需用的钱，向地铁走去。当他在克莱顿下车时，他马上听见许多喇叭的嘈杂声。那是一片乱糟糟的嘈杂声，那些喇叭互相不配合，吹起来

毫无顾忌。可是卡尔听来并不觉得心烦，这倒是向他证明了，俄克拉荷马剧院是一家大企业。但是当他走出站台，眺望眼前的整座设施时，他看到，一切都比他所能想象得出来的还要大，他不明白，一家企业怎么会仅仅为了招聘人员就花费这么大的开支。赛马场入口处前搭了一个长而矮的平台，有几个妇女穿扮成天使模样，身上裹着白布背上插着大翅膀，在平台上吹着长长的、闪着金光的喇叭。可是她们并不是直接站在平台上，而是每人都站在一个脚踏上，而这个脚踏却是看不见的，因为天使服中那飘动的长袍把脚踏全裹住了。由于那些脚踏都很高，有的可能高达两米，妇女们的形态看上去十分魁伟，只是，她们的小脑袋和魁伟的身材显得有点不相称，她们那松散的头发披在肩上，在大翅膀之间显得太短而且几乎滑稽可笑。为了不致显得形式单调乏味，人们使用了高矮不一的脚踏。有很矮的女人，不比真人高出多少，但是她们身边的其他女人却耸立得很高很高，高得简直让人以为轻轻刮一阵风她们就有被吹倒的危险。所有这些女人都在吹喇叭。没有很多听众。在这些硕大的身形的映衬下，十来个小伙子在平台前小模小样地走来走去，仰脸望着那些妇女。他们相互指指这个女人或指指那个女人，可是他们似乎没有进去应聘的意思。只看见唯一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他站得稍远些。他当即把他的妻子和童车里的一个孩子也带来了。那妇人用一只手扶住童车，她用另一只手搭在那男人的肩膀上。他们虽然欣赏这表演，但是人们看得出，他们感到失望。他们大概也期待着找到一个谋职的机会，可是他们对这样吹喇叭却感到迷惑不解。卡尔颇有同感。他走近到那男人的身旁，听了一会儿喇叭，然后说：“这里就是俄克拉荷马剧场的接待处吧？”

“我也这么以为，”那男人说，“可是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几个小时，除了喇叭声外什么也没听见。哪儿也看不见广告牌，哪儿也不见有人来公布什么，哪儿也没有人提供什么信息。”

卡尔说：“也许人们等着多来点人呢。这儿确实人还很少。”

“可能是的。”那人说，他们又不吭声了。在嘈杂的喇叭声中听人说话，这也真难。可是后来妻子对她丈夫悄悄说了些什么，他点点头，于是她马上朝着卡尔喊道：“您不能到那边赛马场去问一问，招聘在哪儿进行呀？”

“能，”卡尔说，“可是我得越过平台，从天使们之间穿过去。”

“这有那么困难吗？”那女人问。

她觉得这几步路对卡尔来说轻而易举，可是她却不愿意派她的丈夫去问。

“那好吧，”卡尔说，“我这就去问。”

“您真是个大好人。”那女人说，她以及她的丈夫都和卡尔握手。

小伙子们走拢过来，以便从近处看卡尔怎样爬上平台。好像那些女人吹得更响了，这是在向第一个谋职者表示欢迎。可是卡尔恰恰从其脚踏旁边走过的那些女人却甚至从嘴上放下喇叭，向一边弯下身子，注视着他的行踪。卡尔看见一个男人在平台的另一头焦灼不安地来回踱步，此人显然只等着人来，他就可以向他们提供他们希望得到的各种信息。卡尔正想向他走去，却听见有人在自己头顶上喊自己的名字。

“卡尔！”天使喊道。卡尔抬头望去，惊喜地笑了起来。那是法妮。

“法妮！”他边喊边向上挥手致意。

“你来呀！”法妮喊，“你别不声不响就从我身边溜过去呀！”说罢，她撩开长袍，露出脚踏和一道通往上面的狭窄的梯级。

“允许我上来吗？”卡尔问。

“谁要禁止我们互相握握手呀！”法妮边喊边愤怒地环顾四周，看是否已经有人要来下这个禁令。而卡尔却已经登上梯级。

“慢点！”法妮嚷嚷，“这脚踏和我们俩都会翻倒的！”可是没事儿，卡尔平安无事地登上最高一级。“你看，”他们相互问候完毕后，法妮说，“你看，我得到了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这工作不错。”卡尔说，并环顾四周。附近的所有女人都发现了卡尔并吃吃地笑。“你几乎站得最高。”卡尔边说边伸出手去衡量别人的高度。

“你从地铁站一出来，”法妮说，“我马上就看见你了，但是可惜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排，别人看不见我，喊我也不能喊。我虽然特别大声地吹喇叭，但是你没认出我来。”

“你们吹得都很蹩脚，”卡尔说，“让我吹吹看。”

“那敢情好啊，”法妮边说边把喇叭递给他，“可是你别打乱了合奏，要不人家会解雇我的。”

卡尔开始吹喇叭。他曾以为，这是一个制作粗糙的喇叭，专门用来吹嘈杂的喇叭声的，可是事实上这是一件几乎可以吹出任何一首优美乐曲的乐器。如果所有乐器都具有同样的质量，那么它们真是大大地被糟蹋了。卡尔不受别人的嘈杂声的干扰，大声吹出一首他在某家酒店里听到过的歌曲。他感到高兴，因为他遇到了一位老女友并且在这儿受到可以吹喇叭的特殊优惠，也许一会儿还能得到一份好的差事。许多女人停止吹奏，仔细倾听，当他突然停吹时，几乎只有不到一半的喇叭还在吹，完整的嘈杂合奏声渐渐地才又重新形成。

“你简直是个艺术家，”当卡尔将喇叭还给她时，法妮说，“让他们雇你当吹喇叭的吧。”

“难道也雇用男人吗？”卡尔问。

“是的，”法妮说，“我们吹两个小时。然后身穿魔鬼衣服的男人们便来接替我们。一半人吹喇叭，一半人击鼓，好看极了，整个服装道具压根儿就非常昂贵。我们的衣服不是也很漂亮吗？还有翅膀呢？”她顺着自己身上往下看。

“你以为，”卡尔问，“我也还会得到一份工作吗？”

“肯定会的，”法妮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多巧呀，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当然这要看你干什么工作。即使我们俩都在这里受雇用，我们也很可能互相根本见不到面呢。”

“难道这整个剧院确实有这么大吗？”卡尔问。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剧院，”法妮重复道，“我自己虽然还没有见过它，但是我的某些已经去过俄克拉荷马的同事说，它几乎无边无际。”

“可是来报名的人不多。”卡尔指着下面的小伙子们和那个小家庭说。

“这是真的，”法妮说，“但是你想想，我们在所有城市都招募人，我

们的招募队不停地旅行，而且这样的招募队还有许多个呢。”

“难道这个剧场还没有开张吗？”卡尔问。

“噢，是的，”法妮说，“这是一个旧剧场，但是它在不断扩大。”

“我感到奇怪，”卡尔说，“居然没有多少人争先恐后地来报名。”

“是的，”法妮说，“这真奇怪。”

“也许，”卡尔说，“这么一搞天使和魔鬼没把人吸引来，反倒把人吓跑了。”

“亏你想得出来！”法妮说，“不过这也有可能。你把这话去跟我们的头儿说吧，也许你这主意能帮他的忙呢。”

“他在哪里？”卡尔问。

“在赛马场，”法妮说，“在评判台上。”

“这也使我感到奇怪，”卡尔说，“招募为什么在赛马场上进行呢？”

“哟，”法妮说，“我们到处都作好最充分的准备，以迎接最拥挤的人群。赛马场地方宽敞，所有平时进行赌赛的小隔间里都设立了招募办事处。据说共有两百个各种各样的办事处呢。”

“可是，”卡尔嚷嚷，“俄克拉荷马剧场有这么大的收入去维持这样的招募队吗？”

“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法妮说，“可是你去吧，卡尔，别耽误了事儿，我也又要吹了。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在这支招募队里谋一个职位，然后马上就來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记着，我焦急不安地等着你的消息呢。”

她和他握手，提醒他下去时小心，又把喇叭搁到唇边，但是没看到卡尔安全到达下面地上就不吹。卡尔又把披巾铺在梯级上，使其恢复原样，法妮点头致谢，卡尔一边反复揣摩着刚才听到的话，一边向那个早已看见卡尔在上面法妮那儿并已走近脚踏来迎候他的男人走去。

“您想加入我们的队伍？”那人问，“我是这支招募队的人事科长，我

欢迎您。”他不断像是出于礼貌似的微微向前弯下身子，一跳一蹦，虽然他没有离开原地，抚摩着自己的表链。

“谢谢，”卡尔说，“我读过贵公司的广告牌，如今按广告上的要求来报名。”

“非常正确，”那人赞许地说，“可惜这里并非每个人的态度都这么正确。”

卡尔想到，现在他可以提醒这个人注意，招募队的这些招人手段可能恰恰因其宏伟壮丽而失灵了。可是他没说，因为此人根本就不是招募队的头儿，况且，他根本还没被录用马上就提出什么改进工作的建议，这种做法不怎么可取。所以他只说：“还有一个人在外面等着呢，他也不想报名，是他派我先来打听情况的。现在我可以去把他叫来吗？”

“当然可以，”那人说，“多多益善嘛。”

“他还带着一个妻子和一个童车里的小孩。也要他们来吗？”

“当然，”那人说，似乎在笑卡尔的多疑，“所有的人我们都用得着。”

“我马上就回来。”说着，卡尔又跑回到平台边上。他向那对夫妇招手并大声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他帮着把童车抬到平台上，于是他们便一起走。那群小伙子看到这情景，互相商量了几句，便双手插在裤兜里，直到最后一刻还犹豫不决地、慢慢登上平台，终于跟着卡尔和那一家人走去。这时，正好有新的乘客从地铁站里出来，他们一见那天使平台惊讶地抬起了胳膊。不管怎么说，谋职申请活动似乎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了。卡尔非常高兴，他高兴自己也许是第一个来这儿的人，那对夫妇忧心忡忡，提出各种问题，询问是否会提出很高的要求。卡尔说，他还了解任何具体情况，但是他确实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每个人都会毫无例外地被录用，说是他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人事科长已经在向他们迎面走来，很满意来了这么多的人，搓了搓手，向每个人都微微一鞠躬表示问好并将他们所有的人都排成一行。卡尔在排头，然后是那对夫妇，以后才是其余的人。当他们都排好队后——小伙子们起先挤成一团，乱过一阵后他们那儿才平静下来——喇叭声才停下，人事科长便说：“我以俄克拉荷马剧场的名义向诸位表示欢迎。你们来得早（可是明明已经快到中午了），报名的人还不很拥挤，所以录用你们的手续很快

就会办妥的。你们大家当然都带了身份证了。”

小伙子们立刻从衣兜里掏出一些证件来，拿着它们朝人事科长摇晃，那位丈夫捅了一下他的妻子，妻子当即从童车的羽绒被褥下掏出一整捆证件来。卡尔却什么证件也没有。这会妨碍他被录用吗？不过，卡尔凭经验知道，只要有一点决心，这类规定还是容易绕过去的。这不是没有可能。人事科长审视全排人，查明大家都有证明，由于卡尔也将手，当然是只空手，举了起来，他便以为，卡尔也证件齐全。

“就这样吧，”人事科长然后说并向那些现在就想马上要他检查证件的小伙子们挥了挥手，“现在到招募办事处去检查证件。你们已经从我们的广告牌上看到，我们可以录用每一个人。可是我们当然必须知道他迄今干过什么工作，以便我们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差事，发挥他的专长。”

“这可是一座剧场呀。”卡尔疑惑地思忖着并仔细地倾听。

“所以我们，”人事科长继续说，“在赛马经纪人小屋里开设了招募办事处，每一个办事处分管一类职业。现在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把各自的职业告诉我，家眷一般来说跟着丈夫的职业走。然后我领你们到办事处去，在那里先检查你们的证件，然后再考核你们的专业知识，这只不过是一场非常简短的考查，谁也不必害怕。你们会在那里立刻被录用并将得到进一步的指示。让我们开始吧。这儿，第一办事处，牌上写着呢，只限于招工程师。你们中间也许有谁是工程师吗？”卡尔应声报名。他以为，正因为他没有证件，他就必须力争尽快办完一切手续，这小小的报名权他也是有的嘛，因为他是曾经想当工程师的呀。可是当那帮小伙子看到卡尔报名时，他们忌妒了，也就都报了名，大家都报名。人事科长拉长了脸对小伙子们说：“你们是工程师？”这时他们才把手慢慢地放下来，而卡尔却不改初衷。人事科长虽然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因为他觉得卡尔穿得太寒碜，也太年轻，不可能是工程师，但是他没说什么，也许是出于感激吧，因为至少在他看来是卡尔把这些应聘者领进来的。他仅仅是用邀请的手势向办事处那边指了指，卡尔当即走过去，人事科长则转过身去招呼其他人。

在工程师招聘办事处，有两位先生坐在一张方桌的两侧，比较着两份摆在他们面前的大表册。一个朗读，另一个在他那份表册上划线标出已读过的名字。当卡尔边问候边向他们跟前走去时，他们立刻将表册放到一边，拿出另外的大登记簿来并将它们打开。

显然只是记录员的那一个说：“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可惜我没带在身上。”卡尔说。

“他没带身份证。”记录员对另一位先生说并立刻将这个回答登记在登记簿上。

“您是工程师？”然后另一个人问，此人似乎是办事处的领导。

“我现在还不是，”卡尔赶快说，“但是……”

“够了，”那先生出口更快，“那您就不属于我们这儿管。我请您注意标牌。”卡尔咬紧牙齿，那先生准是看出来了，因为他说：“不必担心。所有的人我们都用得着。”说罢，他把在栅栏之间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的仆人中的一个招呼过来，说：“您领这位先生到技术人员招募处去。”

仆人按字面的意义理解这道命令，拉住了卡尔的手。他们穿行于许多小隔间之间，卡尔已经在隔间里看见了小伙子中的一个，他已经被录用，正在和那里的先生们握手向他们致谢。卡尔被领进一间招募处，在这间招募处里，正如卡尔已预料到的，事情的经过与第一间招募处的相类似。只是，由于人们听说他上过一所中学，人们就由此处把他送进曾上过中学者招募处。可是当卡尔在那儿说，他上过一所欧洲的中学，那儿的人也声明无权受理，让他到欧洲中学生招募处去。那是最靠边上的一个隔间，不仅比所有其他的都小，而且甚至还矮。把他领到了这儿来的那个仆人对这番长途跋涉和频频遭拒绝感到愤怒，他认为这全是卡尔一个人的过错。他不再等待提问，而是立刻扭头就走了。这个招募处大概也是最后的庇护所了。当卡尔一眼瞥见招募处主任时，他对此人酷似一个也许现在还在家乡一所实科中学教书的教授几乎感到大吃一惊。诚然，正如很快就表明的那样，只在个别部分存在容貌的相似之处，但是那副架在宽大鼻梁上的眼镜，那部金黄色的、像一件珍玩那样保养得很好的络腮胡子，那微微弯曲的后背以及那总是出其不意爆发出来的响亮的噪音使卡尔还惊讶不已了一些时光。幸好他也不必非常专心致志，因为这里办手续比在别的招募处简单多了。这里虽然也把他没有身份证登记在案，招募处主任称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疏忽，但是在这里占上风的记录员很快略过这一点，在主任提过几个简短的问题之后、正要提出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就宣布卡尔已经被录用。主任张着嘴向记录员转过身去，记录员却作了一个最后总结性的手势，说了声“录用

了”并且也立即将这一决定登记入册。记录员显然是认为，是一名欧洲中学生，这已经就是某种十分可耻的事情了，所以谁声称自己是，旁人尽管可以放心地相信他的话。卡尔本人对此没什么好反对的，他向他走过去，想感谢他。但是当人们现在问他的名字时，他还迟疑了片刻。他没有马上回答，他羞于说出并让人登记上他的真实名字。只要他在这里哪怕只是得到最卑微的职位并圆满地履行职务，那时人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可是现在不行，既然他已经隐姓埋名这么久了，现在也大可不必泄露出真名来。由于他一时想不出别的名字来，所以他就说了个他在最近几个工作岗位上用的名字：“内格罗。”

“内格罗？”主任问，摇摇头并做了一个鬼脸，仿佛卡尔现在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顶点了。记录员也用审视的目光凝视了卡尔片刻，但是随后他重复了一遍“内格罗”，便将这名字登记上册。

“您记的不是内格罗吧？”主任斥责他道。

“是，是内格罗。”记录员心平气和地说，还做了一个手势，仿佛是在说，下面就是主任的事了。主任倒也克制住了自己，站起来，说：“您被俄克拉荷马剧场——”可是下面的话他说不出口，他不能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便坐下，说道：“他不叫内格罗。”

记录员竖起眉毛，亲自站起来说：“那我就通知您，您被俄克拉荷马剧场录用了，现在让人来把您介绍给我们的领队。”

又喊来了一个仆人，这仆人将卡尔带到评判台。

在下面梯级旁边，卡尔看见了那辆童车，这时恰好那对夫妇也下来，女人怀里抱着孩子。

“您被录用了吗？”那男人问，他比先前活跃多了，那女人也喜滋滋地望着他。当卡尔回答说，他刚才被录用了，现在去面见领队，那男人便说：“我祝贺您。我们也被录用了。这似乎是一家好企业，当然人们不可能马上就了解全部内情，哪儿也都是这样嘛。”他们还相互道了一声“再见”，卡尔就登上评判台。他慢慢行走，因为上面那个小房间里似乎挤满了人，他不想挤进去。他甚至站住脚，眺望整座大赛马场，它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直达远处树林。他陡生兴致，想看一场赛马，他在美国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小时候在欧洲，他曾被带去看过一场跑马比赛，但是什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是母亲拉着他从那些不肯让路的人中

间穿过去的。其实他根本还没看过赛马。这时他听见背后有台机器哒哒地响起来，他转过身去，看到在赛马时公布优胜者名字的仪器上现在正向上升起如下的字样：“商人卡拉以及妻子和孩子。”原来这里正在向各办事处通知被录用人的名字。

这时恰好有几位先生手里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互相热烈交谈着从梯级上走下来，卡尔贴着栏杆，让他们走过去，随后便拾级而上，因为上面已经有空位子了。在用木头栏杆围起来的平台的一个角落里——整个平台看上去就像一座狭窄塔楼的平坦的屋顶——坐着一位先生，他的双臂沿着木栏杆伸出，一条白色绸带横贯胸前，上面写着：“俄克拉荷马剧场第十招募队领队”。他身旁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一台肯定也是赛马时使用的电话机，领队显然在介绍前就用它了解了每一个求职者的必要的情况，因为他起先根本不向卡尔提什么问题，而是对一位双腿交叉、手托下巴靠在他身边的先生说：“内格罗，一个欧洲中学生。”仿佛此话一出口正在深深鞠躬的卡尔的事对他来说便已谈妥了似的，他顺着梯级往下看，看是否又有人上来，但是由于没有人上来。他有时就仔细倾听另一位先生与卡尔进行的谈话，但是通常都是俯视赛马场，用指尖敲打着栏杆。这些细嫩而有力、修长而快速活动着的手指不时吸引了卡尔的注意力，虽然他需忙着和另外那位先生周旋。

“您原先没有工作？”这位先生先问。这个问题，以及几乎所有他提出的其他的问题，都非常简单，完全不会使人为难，而且没有用插入提问来对回答进行复核。但是，尽管如此，这位先生却善于以其睁大眼睛说出那些问题，前倾着上身观察它们的效果，低垂着脑袋听取并不时大声重复那些答话的那种方式赋予那些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意义，人们虽然并不懂得这种意义，但是，对它的预感却不免使人变得小心和拘谨。经常出现卡尔急切想收回已作出的答复，想用另一个也许会更受欢迎的答复去取而代之的情况，但是他一直还在克制着自己。因为他知道，这样动摇不定势必会给人留下多么坏的印象，况且答复的效果通常都是何等的难以揣摩。可是这当儿，他的被录用似乎已成定局，这一意识增强了他的信心。

他是否失业这个问题，他用一句干脆利落的“是的”作了回答。

“您最后受雇于哪儿？”那先生然后问。卡尔正要回答，那先生却举起食指，再次说：“最后！”

卡尔已经正确理解了第一个问题的意思，便一晃脑袋毅然决然回答说：“在一家办事处。”

这倒还是句真话，可是如果这位先生要求进一步了解办事处的性质，那么他就只好撒谎了。可是那位先生没有那样做，而是提了个轻而易举就可以完全如实加以回答的问题：“您在那儿满意吗？”

“不！”卡尔嚷嚷，几乎是打断了对方的话。卡尔斜眼一瞥，看到领队面带一丝微笑。卡尔后悔自己对最后这个问题回答得欠考虑，但是他实在经受不住引诱，所以情不自禁地就喊出了这个“不”字，因为在整个儿最后那段工作时期里他只有一个夙愿，只盼着会有某个陌生的雇主走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可能还会带来另外一个不利情况，因为这位先生可能会问，他为什么不满意。然而，他没问这个，却问：“您觉得自己适合于干什么工作？”这个问题可能确实是个圈套，因为既然卡尔已经被录取当演员了，干吗还提这个问题呢？可是虽然他明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却仍然可能会克制不住自己而声言，他觉得自己特别适合干演员这一行。所以他绕过这个问题，冒着会显得自己倔强的危险说：“我在市里读了广告牌，因为那上面写着，剧场用得着每一个人，所以我就报了名。”

“这个情况我们知道。”那先生说，说罢就沉默不语并由此表明，他坚持他原先提出的问题。

“我已经被录用当演员。”卡尔犹豫不决地说，想让那位先生明白，最后的这个问题使他陷入了困难境地。

“这是对的。”那先生说，说罢又沉默不语了。

“不，”卡尔说，已经找到一个职位的全部希望动摇了，“我不知道，我是否适合演戏。但是我愿意努力，尽力去完成委派给我的一切任务。”

那位先生向主任转过身去，两人点点头，卡尔似乎回答对了，他又鼓起了勇气，振作起精神等待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您本来想学什么专业？”

为了将这个问题表述得更准确——这位先生始终非常看重表述的准确——他补充说：“我是指在欧洲。”说罢，他将手从下巴放下，做了一个轻微的手势动作，仿佛他想以此同时暗示，欧洲多么遥远，在那里构

思的计划多么无关紧要。

卡尔说：“我本来想当工程师。”这个回答虽然违背他的本意，在充分意识到自己迄今在美国的职业生涯的情况下重新提起他曾经想当工程师这件往事，这是荒谬的嘛——即便是在欧洲难道他就会当上工程师了吗？——但是他恰好一时找不到别的答案，所以就这么说了。

但是那位先生对这件事很认真，他对什么事都很认真。

“嗯，工程师，”他说，“您大概也不是马上能当得上的，不过也许您可以暂时先做些低级一点的技术工作。”

“当然。”卡尔说，他很满意，虽然他接受这个建议就从演员身份转到技术工人的行列中去了，但是他确实认为，他干这工作能干得更出色。况且，这一点他一再在心里默默念叨，做什么样的工作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压根儿在某个地方长期站稳脚跟。

“您身体强壮，干得了比较重的活儿吗？”那先生问。

“噢，是的。”卡尔说。

随后，那先生便让卡尔走近自己身边并摸一摸他的胳膊。

“这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然后他边说边拽住卡尔的胳膊把他拉向领队。领队微笑着点点头，仍然安坐着没有直一直身便把手递给卡尔说：“那我们就谈妥了。一切还要在俄克拉荷马复核。您要为我们的招募队争光！”

卡尔鞠躬告退，然后他也想向另外那位先生告别，可是此人却仿佛自己的工作已经完全结束了似的，脸朝着天，已经在平台上来回踱起步来了。就在卡尔下去的当儿，梯级旁边的告示牌上竖起告示：“内格罗，技术工人。”

由于这里的一切进行得井然有序，所以倘若告示牌上亮出他的真名，卡尔也不会再对此表示多大遗憾的了。甚至一切都安排得极其认真细致，因为还在梯级下端卡尔就已经受到一个仆人的迎候，此人将一条臂章系在他的胳膊上。卡尔随后抬起胳膊，想看清臂章上写着什么，这时，他看到，那上面一字不差赫然印着“技术工人”的字样。

可是不管卡尔会被带到哪儿去，他都想先告诉一下法妮，一切进行得多么顺利。但是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从仆人那儿获悉，天使们和魔鬼们都已开赴招募队的下一个招募地点，为招募队第二天到达那儿做宣传去了。

“可惜，”卡尔说，这是他在这家企业所经历的第一次失望，“天使中有我的一个女友。”

“您会在俄克拉荷马再次见到她的，”仆人说，“可是现在您来吧，您是最后一个了。”

他带领卡尔沿着方才天使们站过的平台的后侧走去，现在那儿只剩下空落落的脚踏了。但是事实证明，卡尔认为没有天使们的音乐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求职的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因为现在平台前面根本就没有成年人了，只有几个孩子在争抢一根长长的白色羽毛，它可能是从一只天使的翅膀上掉落下来的。一个男孩将它高高举起，别的孩子们则想用一只手摁下他的头，用另一只手去抓那根羽毛。

卡尔指指那些孩子，仆人却目不斜视地说：“您走快点吧，拖了很長時間您才被录用。莫不是人家有怀疑？”

“我不知道。”卡尔惊讶地说，可是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哪怕事情已经再明白也不过了，却总还会有人杞人忧天。但是当他们来到大看台，看到那副赏心悦目的景象，卡尔很快便忘掉了仆人的那句话。原来这个看台上有一张又大又长的条凳，上面铺着一块白布，所有被录用的人背对着赛马场坐在依次矮一级的条凳上并受到款待。大家都兴高采烈、情绪激昂，恰好就在卡尔作为最后一个悄悄在条凳上坐下的时候，许多人高举酒杯站起来，一个人向第十招募队领队祝酒，在祝酒词中称他为“谋职者之父”。有人让大家注意，说是大家从这儿看台上也能看见领队，果然大家都看见了在不太远处的评判台和那两位先生。于是，大家就向这个方向挥动酒杯，卡尔也拿起放在他面前的酒杯，可是不管他们怎样大声呼喊，不管他们怎样试图让人家注意自己，评判台上就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人家看到了或者起码是愿意看到这欢呼喝彩的场面。领队依然靠在角落里，另外那位先生站在他旁边，手托着下巴。大家快快地又坐下，时不时还有人向评判台转过身去，但是不久人们便一心一意吃起这顿丰盛的饭来了。仆人们用盘子托着卡尔见都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块禽肉，带着许多叉子的松脆喷香的烤肉穿梭往来，仆人们还一再给大

家斟酒——大家几乎都没有察觉，大家都低着头吃自己碟子里的肉呢，酒杯里红葡萄酒溢流——谁不愿意和大家一起神侃，谁就可以看俄克拉荷马剧场的风光图片，它们摆在长条餐桌的一端，可以互相传着看。然而，人们并不很在意这些图片，于是乎，传到卡尔，这最后一个人手里的，竟然只有一张图片。可是从这张图片可以推断出，所有图片一定都值得一看。这张图片照的是美国总统包厢。第一眼看上去，人们会以为这不是一间包厢，而是舞台，因为护墙成弓形向空荡的空间远远伸出。这道护墙的各个部分都是包金的。在各个像是最精致的剪刀剪出来的小柱子之间并排安放着一届总统的嵌在圆形框架里的画像。其中一个长着一个显眼的塌鼻子，两片向外翻起的嘴唇，隆起的眼皮下嵌着一双呆滞下陷的眼睛。包厢四周，从各个侧面和顶上，都有灯光照射，白色而柔和的灯光照亮着包厢的前部，而包厢的后部，则在沿着整个边缘垂挂下来并用绳索绾着、闪耀着多层次红光、起着皱褶的天鹅绒的后面，看上去就像一片幽暗的、闪着浅红色光的空间。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出这个包厢里的人是什么样子，一切看上去都显得很有自我意识。卡尔没忘记吃饭，但仍不时观看那张已被他放到他的碟子旁边的图片。

他巴不得最后至少能再看到一张其余的图片，可是自己去取他又不愿意，因为一个仆人用手摀住那些图片，次序是必须遵守的，所以他试图通观餐桌以断定，是否还有一张图片正在传过来。这时，他惊奇地发现——起先他根本不相信——在这些深深躬着腰吃饭的人当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吉阿科莫。他立刻向他奔走过去，“吉阿科莫！”他喊道。

吉阿科莫一如既往，遇到意外事总腼腆腼腆，他放下刀叉站起身来，在条凳间的狭窄空间里一转身，用手抹了抹嘴，一看是卡尔便高兴得不得了，请卡尔坐到自己身边来，一会儿又自告奋勇要到卡尔座位那边去，他们互相有许多话要说，愿意永远待在一起。卡尔不想妨碍别人，所以大家应该暂时各自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吃，这顿饭马上就要吃完，然后他们自然就要永远互相帮助。但是卡尔仍还待在吉阿科莫身旁，只是为了好好看看他。对往事的回忆一齐涌上心头！女厨师长在哪里？特蕾泽在干什么？吉阿科莫自己的模样几乎一点儿也没有变，女厨师长曾说他在半年内一定会变成一个体格强壮的美国人，这个预言没有应验，他和从前一样柔弱，面颊和从前一样凹陷，不过眼下它们倒是圆鼓鼓的，因为他嘴里嚼着一大口肉，正在把多余的骨头慢慢剔出来，然后将它们扔进碟子里。卡尔从他的臂章上可以看出，吉阿科莫也不是被录用当演员，而是当开电梯工，俄克拉荷马剧场似乎真的用得着每一个

人！入神地看着吉阿科莫，卡尔也离开自己的座位太久了。他正想返回去，这时人事处长走过来，站到一张较高的条凳上，拍拍巴掌，作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这当儿，大多数人都站立起来，那些依然坐着、不肯停止用餐的人在别人的推搡下最后也被迫站了起来。

“但愿，”他说，卡尔这时已经蹑着脚跑回到自己的座位，“诸位对我们的招待宴会感到满意。一般来说，人们都称赞我们这支招募队的宴会。遗憾的是，现在我不得不宣布宴会到此结束，因为送诸位去俄克拉荷马的火车五分钟后就要开车。这虽然是一次长途旅行，但是诸位将会看到，诸位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的。现在我把这位先生介绍给诸位，他负责照管诸位这趟旅行，诸位要服从他的安排。”

一位瘦削、矮小的先生爬上人事处长站立的那张条凳，他几乎都没有草草鞠一躬，而是立刻就神经质地伸出双手指点起来，他们大家应该怎样集合、整队和开拔。但是起初人们不听他的，因为被录用人当中那个方才致过祝酒词的人用手拍打桌子，开始致起一篇较长的感谢词来了，虽然——卡尔变得非常烦躁不安——方才已经说过，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但是演讲者竟丝毫也没注意连人事处长也不在听而是在给带队的人作种种指示，他侃侃而谈，历数端上来的每一道菜，对每一道菜发表一通评论，最后像作总结似的高呼：“尊敬的先生们，他们就这样赢得了我们！”除了他所指的那些人以外，所有的人都笑了，可是这与其说是句玩笑话，毋宁说是句大实话。

这篇演说使他们付出了代价，现在他们不得不跑步去火车站。不过这倒也并不是很困难，因为——这一点卡尔现在才发现——谁也没有带行李。唯一的一件行李就是那辆童车了，它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在父亲的驾驭下，像悬浮着似的上下跳动着。何等可疑的无产者在这里汇集在一起并受到了如此好的款待和照管呀！那个带队人对他们简直是关怀备至。一会儿他亲自用一只手抓住童车的操纵杆并举起另一只手给大家鼓劲，一会儿他到最后一排人的后面督促，一会儿他沿着队伍两侧跑，瞅准了队伍中个别跑得慢的人，挥动着双臂试图向他们表明，他们必须怎样跑才对。

当他们到达车站时，火车已经作好出发的准备。火车站上的人对这批人指指点点，人们听到种种叫喊声，诸如：“这些人全都是俄克拉荷马剧场的！”这剧场的知名程度似乎大大超过了卡尔所估计的，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剧场的事。这支队伍包乘一整节车厢，带队人比乘务员更

急切地催大家快上车。他先察看每一个隔间，不时安排些什么，然后他自己才上车。卡尔偶然得到一个靠窗的位置，把吉阿科莫拉到自己身边。就这样，他们俩紧挨着坐在一起，打心眼里都对这趟旅行感到高兴。他们在美国还从未这样无忧无虑地旅行过。当火车启动时，他们从窗户向外挥动双手，而他们对面的小伙子们则互相推推搡搡觉得这滑稽可笑。

他们行驶了两天两夜。现在卡尔才领悟到美国疆土的辽阔。他不知疲倦地向窗外张望，而吉阿科莫则一个劲地也往窗边挤，直到对面好玩牌的小伙子们对此感到腻烦，自愿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了他。卡尔感谢他们——吉阿科莫的英语并非人人都听得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态度变得友好多了，这也正是在旅伴当中常有的事，不过他们的友好态度也常常会成为累赘，因为譬如每逢他们有一张牌掉在地上，他们就在地上寻找，就使劲捏卡尔或吉阿科莫的大腿。然后，吉阿科莫便大声喊叫，总是每次都感到惊恐，抬起大腿，有一回卡尔试图猛踢一脚回敬他们，但是一般来说都默默忍受这一切。面对着外面的大千世界，对在这小小的、甚至开着窗户还烟雾缭绕的隔间里所发生的一切，人们也就不以为意了。

头一天他们穿行过一座高山，暗蓝色的悬岩以其尖尖的楔子向列车逼近，人们从窗户向外探身，徒劳地寻找着峰顶，幽暗、狭窄、被撕裂的山谷张开着，人们用手指头指引着那些山谷渐渐隐去的方向，宽阔的山涧在连绵起伏的丘陵上像巨浪一样匆匆涌来，夹带着万千汹涌的泡沫浪花，它们从火车驶过的桥下奔腾而过，它们离人如此之近，以致它们那凉丝丝的气息让你的脸冷得打战。

附录1 残稿^[6]

I

“起来！起来！”一大早，卡尔刚睁开眼睛，鲁滨孙就嚷嚷。门帘还没拉开，但是从透过空隙照进来的、均匀的太阳光人们看得出，现在已经是上午什么时候了。鲁滨孙急急忙忙、神色忧虑地走来走去，一会儿他拿着一条毛巾，一会儿提着一只水桶，一会儿拿着内衣、裤和衣服，每当他从卡尔身边走过，他都试图用点头来鼓励他起身，用高举手中恰好拿着的东西来表示，今天他还在最后一次替卡尔受苦，第一天早晨卡

尔当然无法了解这项工作的种种具体内容。

但是不久卡尔便看到，鲁滨孙究竟在侍候谁。在一个用两只柜子与房间的其余部分隔开的、卡尔迄今还没见过的小间里，有人正在彻底大洗身。人们看见布鲁娜妲的脑袋，那裸露的脖子——头发恰好贴在脸上——以及脖颈儿的下端从柜顶伸出，德拉马什的不时举起来的手里拿着一块水注四射的海绵，他就是用这块海绵给布鲁娜妲洗身、擦澡。人们听见德拉马什向鲁滨孙下达的简短的命令，鲁滨孙不是通过那个现在已被堵塞住的、固有的入口往小隔间里递东西，而是凭借一个柜子和一面屏风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缺口，他每次递东西时都得将胳膊远远伸进去，将脸扭向一边。

“毛巾！毛巾！”德拉马什嚷嚷。鲁滨孙这时正在桌子下面寻找别的什么东西，听了这声喊叫不由大吃一惊，正当他惊魂未定从桌子下面探出脑袋来时，只听里面又在喊：“水在哪儿，见鬼！”话音刚落，只见柜顶上便冒出德拉马什的那张愤怒的面孔。一切按卡尔的意见人们为洗身和穿衣只需要用一次的东西，在这里颠来倒去地要求并送来了许多次。总有一桶水坐在一只小电炉上加热，鲁滨孙总是一再地在远远叉开的两腿之间提着这桶沉甸甸的水向洗澡间走去。由于他要干的活儿很多，所以假如他并不总是严格执行这些命令，有一回，当又要求拿一块毛巾的时候，他干脆从房间中央的大睡铺上拿一件衬衫，将它团成一团从柜顶扔将过去，这些便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德拉马什的活儿也不轻，也许他之所以对鲁滨孙怒气冲冲——他怒气冲冲的完全不理睬卡尔了——仅仅是因为他自己不能让布鲁娜妲感到满意。“啊！”她大喊一声，连一向无动于衷的卡尔听了也大吃一惊，“你弄得我好痛！走开！与其这样受罪，我还不如自己洗呢。现在我又抬不起胳膊来了。你这么压我，我难受极了。我的背上一定都是青紫块。当然，你不会告诉我的。等着，我要让鲁滨孙来给我看看，或者让我们那个小家伙来看。不，我不这样干，可是你也多少温柔点呀。你要体谅人家嘛，德拉马什，可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每天早晨都反复说，你就是不肯体谅人。——鲁滨孙！”然后她突然大声喊叫，并在自己头顶上挥舞一条花边小裤衩。“来给我帮个忙，看看，我在遭什么罪，他称这种酷刑为洗澡，这个德拉马什！鲁滨孙，鲁滨孙，你在哪儿，你也没有心肝呀？”卡尔用手指默默给鲁滨孙一个暗号，示意他快过去，但是鲁滨孙垂下眼睛冷静地摇摇头，他自有主张。“你想干什么？”鲁滨孙俯身对着卡

尔的耳朵说，“她不是这个意思。我只过去过一次，以后再也不去了。当时他们俩抓住我把我浸到浴盆里，差点没把我淹死。后来布鲁娜姐接连好几天指责我不要脸，她一再反复地说：‘现在你已经很久没和我一起洗澡了，’或者‘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洗澡？’我双膝下跪求过她几次之后，她才算作罢。这件事我决不会忘记。”

就在鲁滨孙这样讲着的当儿，布鲁娜姐一再地喊：“鲁滨孙！鲁滨孙！这个鲁滨孙哪儿去啦！”

虽然没有人来帮她的忙，甚至连一句答话都没有——鲁滨孙坐到卡尔身边，两个人默默朝柜那边望着，布鲁娜姐或德拉马什的脑袋不时在柜顶上方出现——尽管如此，布鲁娜姐仍在不停地大声责怪德拉马什。“可是德拉马什！”她嚷嚷，“现在我又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你在给我洗澡。你的海绵哪儿去啦？你抓住它呀！要是我能弯腰，要是我能动弹得了，那该有多好！我就会做给你看，你该怎样给我洗澡。想当初在少女时代，我在那边科罗拉多父母的庄园里每天早晨都游泳，在所有我的女友当中最敏捷最机灵。可是现在！你什么时候才会学会给我洗澡呀，德拉马什，你来回转动海绵，使出好大的劲儿，而我却毫无感觉。如果我说你不要压伤了我，我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愿意这么站着得感冒。你看我从浴盆里跳出来跑掉，我会这样做的！”

但是后来她没有实施这个威胁——其实她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德拉马什似乎由于怕她感冒而已经抓住她并将她摁进浴盆里，因为现在正发出强烈的劈劈啪啪的溅水声。

“你就会这样，德拉马什，”布鲁娜姐压低一些嗓门说，“每逢你做坏了什么事，你就来亲热，一个劲儿亲热。”便出现了片刻的寂静。“现在他在吻她。”鲁滨孙扬起眉毛说。

“现在干什么活儿？”卡尔问。既然他已经决定留下，他也就要立刻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让不搭腔的鲁滨孙一个人在沙发榻上待着，开始将那个硕大的、漫漫长夜里在睡者的重压下还一直团成一团的床铺拆开，然后将这一大堆衣物一件件整理码放好，这一堆东西大概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整理了。

“去看看，德拉马什，”布鲁娜姐说，“我相信，他们正在乱扔我们的床。什么事我都得想着，我永远得不到安宁。你必须对这两个人更严厉

点，不然，他们就为所欲为。”“这准是那小鬼在瞎卖力气了！”德拉马什嚷嚷，并且眼看就要从洗澡间冲出去了，这时卡尔已经把一切都从手里扔掉，但是幸好布鲁娜妲说：“别走开，德拉马什，别走开。啊，这水多热，这么洗洗就累了。待在我身边，德拉马什。”卡尔现在才真正看到，柜子后面水蒸气怎样不停地往上冒。

鲁滨孙大惊失色地将手放在面颊上，仿佛卡尔闯下什么祸了。“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响起了德拉马什的声音，“你们难道不知道，布鲁娜妲洗完澡还要躺一个小时吗？简直乱弹琴！等我来收拾你们！鲁滨孙，你大概又在做梦了！你，我要你一个人对发生的一切负责。你要管束好那个孩子，这里不是按照他的脑袋瓜子来干活的。人家要点啥，你们总是啥也拿不来，没有什么事要干的了，你们又忙乎起来。你们随便爬到哪儿待着，需要你们的时候再出来！”

但是这一切马上就被忘记了，因为布鲁娜妲在窃窃私语，疲惫无力，仿佛她被热水淹没了似的：“香水，拿香水来！”“香水！”德拉马什喊道。“快去拿呀！”是，可是香水在哪儿呀？卡尔看看鲁滨孙，鲁滨孙看看卡尔。卡尔发现，他必须独自一人来主持这里的一切事务，鲁滨孙不知道香水在哪里，他干脆躺倒在地上，不停地用两条胳膊在沙发榻下回来扒拉，可是什么也没扒拉出来，只扒拉出来一团团尘土和女人头发。卡尔先奔向紧靠门旁边放着的盥洗台，但是盥洗台抽屉里只有旧的英文小说、杂志和乐谱，一切都塞得满满的，你一旦把它们打开，就休想再把它们关上。“香水，”其间，布鲁娜妲还在唉声叹气，“多久才能拿来呀！我今天是否还拿得着我的香水呀！”布鲁娜妲这样不耐烦，卡尔自然哪儿也没法好好寻找，他只好凭肤浅的初步印象行事。柜里没有那瓶子，柜顶上压根儿就只有旧的小药瓶和软膏，其余的一切反正都已经送进洗澡间里去了。也许那只瓶子在餐桌抽屉里。但是在去餐桌的路上——卡尔只想着香水，别的什么也不想——他猛一下撞在终于已经放弃在沙发榻下寻找、朦胧意识到香水所在地而好像瞎了眼似地向卡尔跑过去的鲁滨孙身上。卡尔保持沉默，鲁滨孙虽然没停下脚步，但为了减轻疼痛，却持续不断过于大声地叫喊起来。

“他们不找香水，倒打起架来了，”布鲁娜妲说，“这种混乱状况会把我整出病来的，德拉马什，我一定会死在你的臂弯里的。——我必须拿到香水，”然后她喊道，吃力地站了起来，“我无论如何也要拿到它！不给我把香水送来，我就不从这浴盆里出来，哪怕我得一直在这里待到晚

上。”说着，她用拳头击水，人们听见水花四溅的声音。

可是餐桌抽屉里也没有香水，虽然那里净是布鲁娜姐的化妆用品，诸如旧粉扑、小胭脂罐、发刷、小髻发和许多乱蓬蓬、粘在一起的小玩意儿，但是那儿没有香水。鲁滨孙一边还一直在喊叫，一边在一个角落里将堆在那里的一百多只盒子和小匣子一个一个打开、翻寻，每打开一只便总有一半东西，大多是缝纫用具和信件，掉到地上并且也就待在地上不动了，从他时不时用摇头和耸肩向卡尔所表示的意思来看，他什么也没能找到。

这时，德拉马什身穿内衣从洗澡间里跳将出来，与此同时，人们听见布鲁娜姐在抽泣。卡尔和鲁滨孙不再寻找，望着德拉马什，他浑身湿透——他的脸上和头发上也在流水——大喊一声：“现在你们快给我去找！”“这儿！”他先命令卡尔，然后又“那儿！”命令鲁滨孙去找。卡尔真的寻找起来，而且还检查鲁滨孙已奉命找过的地方，但是他和鲁滨孙一样，也没找到香水，鲁滨孙寻找得比他还卖力，如今在一旁看着德拉马什，此人则踏着沉重的脚步从房间的一头到另一头走来走去，一定恨不得要把卡尔和鲁滨孙都痛揍一顿才解气。

“德拉马什！”布鲁娜姐喊道，“你至少来给我擦干身上呀！那两个人找不到香水了，只会把什么都搅得乱七八糟。让他们赶快别找了。马上停止！把手里的东西全撂下！什么东西也别再碰了！他们大概是想把这所住房变成狗窝。如果他们不停止寻找，德拉马什，你就揪住他们的衣领！可是他们还一直在干，刚才有一只盒子掉了。不要让他们把盒子拣起来，让一切原地放着，让他们从房间里出去！他们出去后上上门闩，然后到我这儿来。我泡在水里的时间太长，我的两条大腿全冷了。”

“马上就来，布鲁娜姐，马上就来！”德拉马什边喊边和卡尔以及鲁滨孙奔向单元门。但是在打发他们走以前，他委派他们去取早餐，如有可能就向别人给布鲁娜姐借一瓶好香水。

“你们这儿真是又乱又脏，”卡尔在外面过道里说，“早饭一拿回来，我们就开始整理。”

“要是我不这么病歪歪的就好了！”鲁滨孙说，“这样对待我！”鲁滨孙一定对此感到伤心：布鲁娜姐对已经侍候了她好几个月的他和昨天才来的卡尔丝毫不加区别。但是他咎由自取，卡尔说：“你必须稍许振作一

下精神。”为了不致让他完全陷于绝望，他补充了一句：“就只干这一次活儿。我给你在柜后铺一个床位，等一切稍许理出点头绪来，你就可以整天躺在那儿，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现在你自己明白我的身体怎么样了吧，”鲁滨孙说着并把脸别转过去，不再看卡尔，以便自己独自咽下这口苦水，“可是他们难道会让我安心躺着的吗？”

“如果你愿意，这件事由我自己去跟德拉马什和布鲁娜姐谈。”

“布鲁娜姐会顾惜人吗？”鲁滨孙大喊一声，没向卡尔打一声招呼便用拳头撞开一扇门，他们刚走到这扇门的门口。

他们走进一间厨房，黑色烟雾从厨房里那似乎急需修理的灶上袅袅上升。昨天卡尔在走廊里见过的妇女中的一个跪在灶门前，用两只光手把大煤块放进灶火里，并从各个方向观察灶火的火势。她边干活边叹着气，她的这个跪着的姿势对一位老妇来说很不舒服。

“当然，这个讨厌鬼还来呢。”她一看见鲁滨孙便说，一面吃力地站起身来，手撑在煤箱上，关上灶门，这灶门把手她已用自己的围裙缠绕起来。“现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卡尔惊讶地望着厨房里的挂钟——“你们还要吃早饭？你们这一伙！——坐下吧，”然后她说，“等到我有了空闲的时间再给你们准备吧。”

鲁滨孙拉着卡尔在门旁一张小板凳上坐下，对他悄悄说：“我们必须听从她的安排。因为我们依赖于她。我们租了她的房间，她当然随时可以解除我们的租约。可是我们却不能换住房，我们该怎样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运走呀，首先布鲁娜姐根本就搬不动。”

“这里这一层上就没有别的房间可找了？”卡尔问。

“没有人接受我们，”鲁滨孙回答，“整幢楼房里都没有人接受我们。”

他们就这样默默坐在小板凳上等着。那妇人在两张桌子之间，在一只洗衣圆木桶和灶台之间不停地来回奔走。从她的叫嚷声中人们得知，她的女儿身体不适，所以她不得不独自一人承担全部工作，服侍30个房客，管他们的伙食。偏偏这炉子又有毛病，饭怎么也做不熟，熬着两大

锅稠糊糊的汤，不管她如何频繁地用大汤勺翻搅，将汤舀起来让它从高处往下流，这汤就是熬不好，这一定全是火势不旺造成的，她就这样几乎坐在灶门前的地上，用拨火钩来回拨弄通红的煤块。厨房里烟雾弥漫，呛得她直咳嗽，有时她咳得非常厉害，她就抓住一把椅子，一个劲儿接连咳上几分钟之久。她时不时地就说，今天她根本就不再供应早饭了，因为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做早饭。由于卡尔和鲁滨孙一方面得到了取早饭的命令，可是另一方面又没法强人所难，所以他们对这样的话不予回答，而是依然如故地默默坐着。

四周，椅子上和小板凳上，桌面上和桌子底下，还摆放着房客们的没洗过的早餐具，甚至一个墙角落地上也堆放着一些。其中有还剩余少许咖啡和牛奶的小壶，有些小盘子里还有残剩的黄油，从一只翻倒的大铁皮罐里饼干滚了出来。完全可以将所有这些东西配制成一份早餐，布鲁娜姐将对这份早餐无可非议，假如她不知道它的来源的话。卡尔正转悠着这个念头，向挂钟投去的一瞥也告诉他，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布鲁娜姐也许正在发火并挑动德拉马什去整治仆人，正在这个时候，这妇人边咳嗽边喊道——这当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卡尔：“你们尽管在这儿坐着，但是早餐你们是拿不到的了。两个小时以后你们倒是可以得到晚餐。”

“来，鲁滨孙，”卡尔说，“我们自己来配制早餐。”“嗯？”那妇人说，歪斜着脑袋。“请您放明智点，”卡尔说，“您为什么不肯供给我们早餐？现在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这够长的了。大家一样都付钱给您的嘛，我们出的价肯定比所有其他人都好。我们这么晚吃早饭，这肯定给您带来不少麻烦，但是我们是您的房客，习惯晚吃早饭，您也得稍许照顾一下我们嘛。今天由于令爱有病您当然也有特殊困难，不过我们可以用这儿剩余的食品自己配制早餐，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您不给我们新鲜食品的话。”

但是这妇人却不想和什么人进行一场友好的交谈，她觉得，对于这几位房客来说，普通早餐的残羹剩饭就已经质量上乘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她也腻烦这两个仆人的软磨硬泡，所以就一把抓起一只杯子，将它顶住鲁滨孙的身体，过了一会儿鲁滨孙才哭丧着脸明白过来，原来这是要他拿着那只杯子去盛这妇人搜罗来的食物。她急匆匆地虽然在杯子里装进了一大堆吃的，但是它们整个儿看上去就像是一堆垃圾，不像可以端上餐桌的早餐。正当这妇人将他们推出去、他们弯着腰仿佛怕挨骂或挨

摸似的急忙夺门而去的当儿，卡尔便已经从鲁滨孙手里拿走了那只杯子，因为他觉得杯子在鲁滨孙手里不够牢靠。

离开女房东家的房门足够远之后，卡尔便在走廊里坐下，将杯子放在地上，首先将杯子擦干净，将同属一体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就是说将牛奶倒在一起，将各种残剩黄油刮在一个碟子里，然后将所有使用过的痕迹抹掉，就是说将刀和匙擦干净，将已咬过的小面包切平整，这样就给整体以一种比较好看的形象。鲁滨孙对此颇不以为然并声言，早餐的模样一向都比这要难看得多，但是卡尔不听他那一套，并且为手指头脏兮兮的鲁滨孙不愿参与此项工作而感到高兴。为了安抚他，卡尔分给他几块饼干和一只原先装满巧克力小罐的一层厚厚的残渣，当然他同时也告诉他，他分得这一份就算是全部早餐了。

当他们来到自己寓所的门口，鲁滨孙二话没说就用手按住门把手的时候，卡尔止住他，因为还不清楚，他们可不可以进去。“当然可以进去，”鲁滨孙说，“现在他只是在给她梳头而已。”果然，在那间还一直没有通过风的、窗户都紧密遮蔽住的房间里，布鲁娜姐又开着两条大腿坐在靠背椅里，站在她背后的德拉马什低垂着脸正在梳理她那一头虽短、却可能很蓬乱的头发。布鲁娜姐又穿上了一件非常宽松的连衣裙，不过这一回是淡红色的，这一件也许比昨天那件稍许短一些，至少人们看见那白色的、编结粗糙的袜子几乎一直伸到膝盖。布鲁娜姐对长时间的梳头感到不耐烦，用厚厚的红舌头在嘴唇间舔来舔去，有时候她甚至大喊一声：“啊呀，德拉马什！”完全挣脱开德拉马什，后者则高举着梳子心平气和地等着她把脑袋重新搁回来。

“时间拖得长了，”布鲁娜姐泛泛地说，她专门对卡尔说，“你必须动作敏捷些，如果你希望人家满意你的话。你别学好吃懒做的鲁滨孙的样儿。这会儿你们一定已经在什么地方吃过早饭了，我告诉你们，以后我不容许这样。”

这是很不公正的，鲁滨孙也摇头并翕动着嘴唇，当然没发出声音来，卡尔却认识到，人们只能用一个办法影响女主人，这就是让她毫不怀疑地看到自己所干的工作。所以，他从一个角落里拉来一张低矮的日本小桌子，铺上一块布，将带来的东西摆到桌面上。谁见过这份早餐的来源，便会对这整体表示满意。可是除此之外，卡尔自己心里明白，这份早餐还是颇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的。

幸亏布鲁娜姐饿了。她看着卡尔准备好这一切，朝他满意地点点头，她常常抢先用她那软乎乎、肥胖胖、可能立刻会把一切都压扁的手给自己抓一口吃的，从而妨碍了他的准备工作。“他干得不错。”她咂着嘴说并拉着德拉马什在自己身边一把圈手椅上坐下。德拉马什则将梳子插在她的头发里留待以后再用。德拉马什一看见这些吃的态度也和蔼了起来，两个都饿极了，他们的手在小桌上方来回交叉急速挥动。卡尔认识到，他在这里只要总是尽量多弄东西回来便可以让人感到满意，他回想起厨房里还有各种各样可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他便说道：“头回生，二回熟，下一回我会干得更好。”但是还在说这话的时候他便想起来，他正在对谁说话，他太过于就事论事了。布鲁娜姐满意地朝德拉马什点点头，赏赐给卡尔一把饼干。

II 布鲁娜姐出行记

一天早晨，卡尔推着布鲁娜姐坐在其中的救护车从住房大门里出来。时光已经不再如他所希望的那般早了。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半夜便开始实施出行计划，以免在街上引起轰动，要是在白天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布鲁娜姐愿意很不起眼地用一大块灰布盖在自己身上。但运送下楼耗去了太多的时间，尽管有那位大学生的热心帮助，不过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大学生比卡尔身体虚弱得多。布鲁娜姐表现得很勇敢，几乎没有呻吟，想方设法减轻搬运者们的工作。但是没有别的好办法，人们只好每抬五个梯级就把她放下，以便停下来喘口气，同时也让她歇息片刻。这天早晨天气凉爽，楼道里冷风飕飕像是在地窖里，但是卡尔和大学生却汗流浹背，在休息的时候不得不每人各自拿起布鲁娜姐友好地递送上来的她那块灰布的布角擦脸上的汗。就这样，他们抬了两个小时才到达楼下，那辆小车从晚上起就一直放在那里。将布鲁娜姐抬进去也还相当费了一点劲，可是随后人们便可将整个这件事看作为大功告成，因为这辆车轮子高，推起来一定不难，现在只剩下一件令人担心的事了，这就是这辆车在布鲁娜姐的重压下可能会散架。不过，这个风险人们必须承担，人们没法带一辆备用车呀，尽管大学生倒是半开玩笑地自告奋勇说可以弄一辆并自己来推它。现在该向大学生告别了，这别离的场面甚至是很真挚的。布鲁娜姐和大学生之间的一切龃龉似乎已被忘却，他甚至旧事重提，为在布鲁娜姐患病的时候他曾侮辱过她而表示道歉，而布鲁娜姐却说，一切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并且已经大大得到补偿了。末了，她请求大学生务必拿她的一块钱留作对她的纪念，她费力地从她那些众多的衣裙里将那一块钱掏了出来。就布鲁娜姐有名的吝啬而

言，这件礼物是很具有深意的，大学生得到它也确实很高兴，把这个硬币高高的扔向空中。后来他当然就只好在地上寻找，卡尔不得不帮他找，最后卡尔也在布鲁娜姐的车底下找到了它。大学生和卡尔之间的告别当然简单得多了，他们只是互相握了握手，表示坚决相信，他们后会有期，到那时候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个——大学生声称是卡尔，卡尔则说是大学生——会有所出息了，可惜迄今为止谁还都没什么出息。然后卡尔便鼓起勇气抓住车把手，把车推出大门。大学生一直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直到他们的身影看不见时为止，而且还一边挥舞着一块布。卡尔不时往回点头示意，布鲁娜姐也恨不得转过身去，可是这样的动作对她来说太费劲了。可是为了使她能够作一次最后的告别，卡尔在街的末端推着车转了一圈，致使布鲁娜姐也能见到大学生，大学生则乘机特别起劲地挥舞那块布。

可是随后卡尔便说，现在他们不可以再耽搁时间了，路途漫长，而他们又很晚才出发，比预计的晚多了。人们果然已经时不时看见马车以及去上班的行人，尽管人数很稀少。卡尔只是就事论事说了那句话，并没有其他的含意。布鲁娜姐却感情细致对这句话另有一番理解，便用她那块灰布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卡尔对此没有提出什么异议，用一块灰布盖住的手推车虽然很引人注目，但是比起没有遮盖住的布鲁娜姐来不知要少惹人注意多少倍。他推车推得非常小心，在拐过一个街角之前，他先察看下一条街的情况，若看上去似有必要甚至就让车停住，独自走出去几步，倘若他预见到会有某种也许是不愉快的遭遇，他便等候着，直至避过了风头，或者甚至另辟蹊径，完全走另外一条街。即便这样他也绝不会有绕远道的危险，因为各种可能的道路他都已经事先仔细研究过了。当然也出现了一些虽然曾担心过，但是其细微末节却未曾料想到的障碍。就这样，在一条街上，在一条略微向上伸展、一览无余并且幸好空无一人的街上——一个卡尔急如星火试图加以利用的环境——从一座楼门的幽暗角落里突然走出来一个警察并且问卡尔，他这辆如此小心翼翼遮盖住的车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可是尽管他神情十分严肃地凝视着卡尔，当他掀开灰布，看见布鲁娜姐那张冒着热气、惊惧不安的脸时，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嗯？”他说，“我本以为，你这里装着十袋马铃薯，现在就这么一个女人？你们去哪儿？你们是什么人？”布鲁娜姐根本不敢正眼看那警察，而只是一个劲儿盯住卡尔，显然是怀疑连他也救不了她了。但是卡尔有足够的与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他觉得整个儿这件事不再具有危险性。“小姐，您出示一下，”他说，“您拿到的证书吧。”“噢，好的，”布鲁娜姐说并开始以一种如此令人绝望的方式寻找起

来，以致她势必确实让人觉得十分可疑。“这位小姐，”警察用怀疑中透着讽刺的口吻说，“找不到证书了。”“噢，会找到的，”卡尔心平气和地说，“这证书她肯定有，她只是不知道把它放到哪儿去了。”说罢，他开始自己去寻找，果然将它从布鲁娜妲的背后掏了出来。警察只是匆匆瞥了它一眼，“原来证书在这儿，”警察笑道，“这小姐是这样一位小姐？而您，小家伙，就管中间介绍和运输？您真的找不到更好一点的活儿干了？”卡尔只是耸了耸肩膀，这又是众所周知的警察干预。“好吧，一路平安。”警察见卡尔不搭腔便这样说道。警察的话可能带着蔑视，所以卡尔也不打招呼推起车来就走，警察的蔑视比警察的专心致志更好。

不一会儿，他遇到了一件可能更不愉快的事。原来是一个男人向他凑近过来，此人推一辆大牛奶壶车，极想了解卡尔车上灰布下面是什么。看不出来他和卡尔同路，然而他却一直待在卡尔的旁边，尽管卡尔时不时便出其不意地转换方向。起先，他满足于喊几声，诸如“你装的货一定很沉吧！”或“你装得不好，上面会有东西掉出来的！”但是后来他便直截了当地问：“你布底下装的是什么东西？”卡尔说：“这关你的什么事？”但是由于这句话更加激起了那人的好奇心，卡尔最后就说：“是苹果。”“这么多苹果！”那人惊讶地说并且不停地重复着这句叹词，“这是整整一年的全部收成呢，”然后他说。“嗯，是呀。”卡尔说。但是许是他不相信卡尔的话，许是他想气恼他，他走近过来，开始——一切都发生在行车过程中——戏谑似地将手向那块布伸出去，最后甚至竟敢拉扯起那块布来，布鲁娜妲受多大的罪！顾及到她的处境，卡尔不想和这个人争吵，便把车就近推进一座开着的楼门里，似乎目的地已到了似的。“我到家了，”他说，“谢谢你一路相送。”那人惊讶地在大门前停住脚步，望着卡尔的背影，卡尔则为形势所迫，镇定自若地开始穿越整个第一个庭院。那人没法再怀疑了，但是为了最后一次满足自己的幸灾乐祸心情，他停住自己的车，踮着脚尖跑步追上卡尔，使劲拽拉那块布，以致他几乎完全裸露出布鲁娜妲的脸来。“让你的苹果透透气。”他边走回去边说。连这种事卡尔也忍了，因为这最终使他摆脱掉了那个人。然后他就把车推到庭院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摆着几只大的空箱子，他想在那些箱子的掩护下对躺在灰布下的布鲁娜妲说几句安抚的话。但是他不得不长时间地劝说她，因为她哭得泪人儿似的，十分严肃地恳求他整个白天就待在这里，待在这些箱子后面，等天黑了才继续赶路。也许他单独一个人根本没法让她相信这样做很不合适，可是当有人在这堆箱子的另一头轰隆一声巨响将一只空箱子扔到地上，空荡荡的庭院里回声四起的时候，她吓了一大跳，吓得她不敢再说一句话，将布蒙住自己的脸并且也

许当卡尔当机立断立刻将车推将起时还不胜欣喜呢。

现在街道上越来越热闹了，但是这辆车的引人注目的程度倒不像卡尔所担心的那么大。也许更明智的办法压根儿就是选择另外的时间进行运送。假如再要这样推车送人，卡尔就敢在中午时刻来加以实施。没有受到多大的纠缠，他终于拐进那条狭窄、昏暗的小巷，25号企业就坐落在这条巷子里。门口站着手拿怀表、眼睛斜视的管理员。“你老是这样不准时吗？”他问。“遇到各种麻烦事了。”卡尔说。“众所周知，这种事总是有的，”管理员说。“可是在这儿这所房子里我们才不管这些呢。你记住这一点！”对于这类话语卡尔几乎不再认真去听，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的权势，辱骂身份低下的人。人们一旦习惯了挨骂，它听起来跟钟的均匀敲打声就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当他现在把车推进门厅时，比比皆是，不过却又是他意料之中的污秽倒着实让他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却又不是伸手可摸得着的污秽。门厅的石板地面几乎扫得干干净净，墙壁是新粉刷过的，人造棕榈树上只蒙着一点点灰尘，可是一切却显得油腻而恶心，让人觉得，仿佛什么都给使用坏了，仿佛再怎么整洁也没法把这弥补过来了。不管到哪儿，卡尔都乐意考虑，那儿什么工作可以加以改进，而立刻进行干预，不顾及这会招来也许是没完没了的工作，这该是何等的快乐。可是在这里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慢慢揭下布鲁娜姐身上的那块布。“欢迎，小姐。”管理员忸怩作态地说，毫无疑问，布鲁娜姐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一旦布鲁娜姐看出这个意思，她是会马上利用它的，卡尔满意地把这看在了眼里。近几个小时里的种种忧虑统统一扫而光。

附录2 原出版者后记

第一版后记

弗兰茨·卡夫卡的手稿没有标题。在谈话中他惯于称这本书为他的《美国小说》，后来又按单独出版的开头一章（1913）简单称之为《司炉》。卡夫卡怀着极大的兴趣创作这部作品，通常都在晚上写作，一直写到深夜，手稿纸上修改和删除之处少得惊人。卡夫卡意识到并且常常在交谈中强调这一点，即这部长篇小说比迄今他写过的全部作品都更乐观、更“光明”——在这方面我也许还可以说，弗兰茨·卡夫卡很喜欢读游记、回忆录。富兰克林传是他最喜欢读的书之一，他也喜欢将书中的一些章节读给别人听，他心头常常跃动着一种对自由和遥远的国度的渴

望。在这期间，较长的旅行（超越法国和上意大利）他没有作过，是想象的曙光赋予这本冒险奇遇之书以其特殊的色彩。

完全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卡夫卡突然中断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小说一直未完成。从谈话中我得知，描写“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的现有的未完成的这一章是全书的最末一章，带有和解的色彩，这一章的引子卡夫卡特别喜欢，朗读得优美动听、扣人心弦。卡夫卡用谜一般的话面带笑容暗示，他那位年轻的主人公在这座“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剧场”里将会犹如通过美妙的魔力似的重新找到职业、自由、依靠，甚至还会找到故乡和双亲。

最后一章之前同样也缺了一些故事情节。有两篇较大的残篇，都是描写在布鲁娜姐处效劳的，但填补不了这个空白。这两个残篇作为补编收进本册，因为我着眼的是故事的大体轮廓，不是语文学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可以留待后人去做。卡夫卡只对前六章划定了段落、定了篇名。

非常清楚，这部小说与他（按年月顺序）依次排列的《诉讼》和《城堡》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卡夫卡留下的孤独三部曲。主题就是人的陌生感，孤寂感。《诉讼》中被告的处境——《城堡》中那个未受邀请的异乡人的状态——激荡着生活狂澜的《失踪者》中一个没有经验的孩子的无依无靠——这里是三个基本事实，它们那神秘的共同性通过卡夫卡的艺术清楚而象征性地、然而却往往根本不带通常的象征性语言并且用最朴素的现实用语显露了出来。所以，相互比较着去读，这3部长篇小说就容易读懂了，它们有着同一颗心灵。所有3部小说所探讨的都是个人进入人类社会的问题，而且，由于这涉及最崇高的公正，所以同时也是个人进入天国的问题。恰恰是谨慎善良和公正诚实的人所遭遇到的那种巨大的障碍被揭示出来了。在《诉讼》和《城堡》中，这些障碍占了上风——这使这两本书成了悲剧性的文献。在《失踪者》——小说中则相反，由于主人公的天真无邪和感人肺腑的质朴、纯洁，灾祸恰恰还将受到控制。我们感觉到，这个很快就赢得了我们的全部的爱的善良孩子卡尔·罗斯曼定会冲破种种虚伪的友情和奸刁的敌意的阻力达到他的目的，在生活中经受住考验，证明自己是规矩正派的人并和父母和解（在1927年7月15日第28期《文学世界》的一篇短文《克莱斯特和卡夫卡》中，我曾指出几个构成这一提法基础的几个主题）。但是这条通向这个目的地的道路却是荆棘载途。“如果对方没有善良的意愿，我就不

可能为自己辩护。”这句在那次接受侍者总管审讯时说出来的话，在这里听起来也是充满悲伤和控诉性的，这个审讯场面与《诉讼》中所描写的审判程序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只是，这一回这场争取公正的斗争是心安理得地并且带着青年人的不屈意志进行的。徒劳的、常常受到讽刺、愚弄地寻找职务与《城堡》中的事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这里，在《失踪者》中，最后响起了那句拯救人的，虽然由于某些附带情况而显得并不完全充分有效的“被录用了”。

卡夫卡对待他的卡尔·罗斯曼不比对待那另外两个主人公更宽容些，那两个主人公的名字的首字母同样都是K。（——我）。因为在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中，在清澈的、不加修饰的表达方式的后面所蕴含着的，也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推测的，是作家的冷酷，而只是无限的严厉，与最细致的感情、赞赏最复杂的免罪因素以及无限同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种严厉。不过，人们的印象却是，仿佛卡夫卡在这部《美国》小说里，面对他刻画的正派、诚实、孜孜不倦的男孩行动更自由一些。他动情了，当他的毫无自卫能力的、无辜的主人公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心痛欲碎。这本书中的有些场面（尤其是发生在市郊，我称之为“避难”的那些场面）势必会令人回想起卓别林的电影，回想起无比美妙的卓别林电影，这些电影当然还没有写出来——请大家不要忘记，这部小说最早出版的时候（战争之前！），卓别林并不知名或者也许根本还没有登台演出呢。

很可能，恰恰是这部小说揭示了一条新的理解卡夫卡的道路——纯朴的、有同情心的人性的道路——很可能从这里出发，所有已出版的作品，尤其是另外那两大部遗作，不用作任何解释，自身就会显示出效果来。从我日益频繁地收到的信件和评论文章中我看到，卡夫卡毕生巨著的独一无二性及其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理解和热爱。——遗作中还包含两篇篇幅较大的未完成的中篇小说，这两篇小说的轮廓是清楚的，还有一篇戏剧小品，一套自成一体的论述罪恶与拯救这个主题的格言集，数量众多的断片和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其中许多片断都塑造了最有效的人物形象。如果这一切全都刊印出来的话，卡夫卡就可能展现出他那今天还完全未被人们意识到的重大意义。

马克斯·勃罗德

[1927]

除了两处修改，是异文，不是增添，卡夫卡对《失踪者》——小说的原稿没有作什么重大的改动。唯有出自布鲁娜妲——插曲中的两个片断，以及最后一章故事的一个简短的延伸部，构成了附录的材料。

卡夫卡在世时出版的第一章完全没有改动，完全忠实于初次发表时的那个文本。其余部分有几处小的改动，以使全文与新版的语言协调一致。

马克斯·勃罗德

〔1935〕

第三版后记

原稿不分章节。不过，第二本原稿卷首空白页上有卡夫卡手写的第六章标题的总目录（连同页码），我用它们给各章标上了标题。全书中只有《布鲁娜妲出行记》这个标题是卡夫卡自己标上去的。还应该补上一笔的是，卡夫卡在日记中提到这整部作品时用的是《失踪者》这个标题。

马克斯·勃罗德

〔1946〕

[1]* 这一章的标题在1994年11月费歇尔出版社出版的校勘本中改为“挺进拉美西斯”。——编者

[2]即用手指弯曲起来打人头顶。

[3]* 这一章的标题在1994年费歇尔出版社出版的校勘本中改为“这准是市郊的一条偏僻的……”——编者

[4]美国南部的一个州。

[5]美国的一个小城市。

[6]* 以下两篇残稿在1994年11月由费歇尔出版社出版的校勘本中被挪到了正文的末章。

诉讼

章国锋 译

第一章 被捕 与格鲁巴赫太太谈话 然后与毕斯特纳小姐谈话

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他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娘每天早上8点钟本应给他送早餐来的，这天却没有露面，这种事过去从未发生过。K.又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看见住在街对面的那位老太太正以一种对她来说异乎寻常的好奇打量着他。他又惊讶又饿，便拉了拉铃，并立即听见有人敲门。一个他在这所公寓里从未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又高又瘦，却长得相当结实，身穿一件合身的黑衣服，像旅行装那样有许多褶边、口袋、束带和纽扣，此外，还系了一条腰带。虽然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但这身装束看上去却十分合身。“你是谁？”K.在床上坐起来问。可是，来人并不回答K.的问话，仿佛用不着解释他的出现。他只说了一句：“您拉铃了吗？”“安娜该给我送早餐来了。”K.说，接着便仔细地打量起来人，并猜测他究竟是谁。这人经不起K.长时间的注视，便转过身走到门边，把门打开一条缝，对显然站在门后的某个人说：“他让安娜给他送早餐来。”隔壁房间里响起一阵短促的笑声，不知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发出来的。虽然陌生人从笑声中没听出他早已知道了的回答，但仍然用报告的口气对K.说：“这可不行。”“真新鲜。”K.说着跳下床，匆匆穿上裤子，“我倒要看看隔壁房间里到底有什么人，格鲁巴赫太太怎样向我解释这样的打扰。”虽然他马上意识到不该大声说出这句话，这样做就等于承认陌生人有权监视他的行动，但又觉得此刻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不过，陌生人倒的确是这样理解的，他对K.说：“您不觉得您应该待在这里吗？”“只要您不说明您是谁，我就既不待在这里，也不想跟您说话。”“我是好意。”陌生人说着自愿打开门。K.慢慢走进隔壁房间，第一眼看到那里同昨天晚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和地毯，陈列着许多瓷器和照片，也许空间比过去稍大，但乍一看是很难发觉的，尤其是因为屋里发生了一个主要变化：一个男人手拿一本书坐在窗前。那人抬眼望着K.。“您得待在自己屋里！弗兰茨没告诉过您吗？”“不错。不过您到这儿来干吗？”K.说，并

把目光从这个新相识移向站在门边的那个叫弗兰茨的人，接着又移回来。透过敞开的窗户，他看到那位老妇人怀着老年人特有的好奇走到了对面的窗前，打算把一切看个仔细。“我想向格鲁巴赫太太……”K.说着移动脚步，仿佛想摆脱那两个远远站着的人，向门口走去。“不行！”窗边的人把书扔在桌上，站起身来说，“您不能出去，您已经被捕了。”“看起来似乎是这样，”K.说，“不过，为什么呢？”他问道。“我们无权告诉您。回到您的房间去，在那儿等着。已经给您立了案，在适当的时机，您会知道的。假如我和颜悦色地跟您讲话，我便越出了我的权限。但愿除了弗兰茨谁也没听见。他刚才已经违反规定，对您太客气了。如果您的运气继续像有我们这样的看守那样好，您就用不着担心。”K.想坐下，但他发觉，屋里除了靠窗的那张椅子，根本没有地方坐。“您会发现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弗兰茨说，并同另一个人向K.走来。那人比K.高得多，常常拍拍他的肩膀。两人仔细察看着K.的睡衣说，他现在得换一件差一些的衬衣，当然，他们会替他保管这件睡衣和其他衣服的，等他的案子有了好结果，他们将把所有的东西还给他。“您最好把东西交给我们而不要交到仓库，”他们说，“因为仓库常常失窃，而且过一段时间他们就把所有东西卖掉，不管有关的案子是否了结。另外，这样的案子不知会拖多久，特别是最近这些日子！当然，您最终会从仓库得到一笔赔偿，但首先这笔赔偿少得可怜，因为他们总是把东西卖给行贿最多的人，而不是出价最高的人。其次，根据经验，这笔赔偿费几经转手，年复一年地拖延，也会越来越少。”K.对这些话毫不感兴趣，他目前仍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而这种权利是否能保留，对他来说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但是，有这些人在场，他根本无法思考。第二个看守——他只能是看守——不断地用肚子友好地撞他，然而，当他抬起头来，看到的却是一张与这肥胖的身躯极不相称的脸，干枯而颧骨突出，脸上长着一个向一旁扭曲的大鼻子。此时，这张脸已在K.的头顶同另一个看守交换眼色。这是些什么人？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是哪个机构派来的？K.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到处都很安定，所有法律都得到贯彻，是谁胆敢闯进他的住宅对他如此无礼呢？他向来不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只有最坏的事发生后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这种事，因此从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甚至危险即将降临时也如此。不过此时此地他却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虽然他可以把这一切看作一场玩笑，一次恶作剧，是他银行里的同事出于他尚不清楚的原因——也许因为今天是他30岁生日——而策划的。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他只需对两个看守放声大笑，他们准会同他一起笑。或许，他们是在街角干活的听差，他们看上去同那

些人有些相像。尽管如此，这一回他仍然决定，从看见那个名叫弗兰茨的看守的那一刻起，面对这些人决不放弃他的优越感。别人事后也许会说他居然不懂得开玩笑，但他并不在乎。这并不是因为他惯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而是因为他回忆起几件并不重要的小事，有几次他不顾朋友们的劝告，丝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意识地放纵自己，最后闹得几乎不可收拾。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至少这一次不能重演。倘若这是一场喜剧，那么他也应当参加演出。

这样看来他还是自由的。“请原谅！”说着，他快步从两名看守中穿过，回到自己屋里。“看来他还是理智的。”他听见身后有人说。回到屋里，他立即拉开写字台的抽屉。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的，不过，由于激动，他一下子没有找到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终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执照，本来想拿着它去找那两名看守，但又觉得这类证件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于是他继续寻找，最后找到了他的出生证。当他再次来到隔壁房间时，对面的门开了，格鲁巴赫太太似乎想进来。但他只同她照了一面，因为她一看见他脸上便露出了尴尬的神情，一面道歉一面退了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您进来吧。”K.刚想说，门就关上了。他拿着自己的证件站在屋子中央，又朝门那边看了一眼，但门再也没有打开。他被看守的声音吓了一跳，发现他们正在敞开的窗户边那张小桌上吃自己的早餐。“她为什么不进来？”他问道。“她不许进来，”高个子看守说，“您已经被捕了。”“您又来了。”那人说，并把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在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可你们必须回答，”K.说，“这是我的证件，现在让我也看看你们的证件，特别是逮捕令。”“我的天！”那看守说，“直到现在您还不明白您的处境，还要不知好歹地激怒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会儿可是最关心您的人，关心您胜过所有的人！”“请您相信，事实的确如此。”弗兰茨也说，他虽然端着咖啡，但没送到嘴边，却以一种似乎是意味深长但难以理解的目光久久地看着K.。K.不由自主地同弗兰茨交换了一下目光，又拍了拍自己的证件说：“这儿有能证明我身份的证件。”“您的证件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高个子看守嚷道，“您的表现比一个小孩子还要坏。您想干什么？难道想同我们这些看守讨论什么证件和逮捕令，并很快了解您那该死的案子吗？我们不过是低级职员，不认得什么身份证件，除了每天看守您10个小时并为此得到报酬外，同您的案子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尽管如此我们心里也很清楚，我们为之服务的高级机关在下达这样的逮捕令之前，对逮捕的理由和被捕者的人品了解得一清二楚，在这方面是绝不会出错的。据我所知，我们的机构——当然，我只了解较低

的机构——从来不去民间寻找罪行，而是像法律所说，被罪行所吸引，这才不得不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出去。这就是法律，它错在什么地方？”“我不熟悉这种法律。”K.说。“那对您来说就更糟。”高个子看守回答道。“这种法律也许只存在于你们的头脑中。”K.说。他很想以某种方式了解看守们的想法，以改善自己的处境或适应这种想法，但高个子看守却令他扫兴地说：“您以后会体会到的。”弗兰茨这时插进来说：“瞧，威廉，他承认他不懂法律，可又声称自己没罪。”“你说得对，可我们没法让他明白。”K.没有再搭话，他想，难道我应当被这两个低级职员——他们自己刚才这样说——的废话把我的头脑搅得更乱吗？他们谈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也不懂的事情，他们的自信只不过建筑在他们的愚蠢之上。只要跟智力水平与我相等的人谈上几句，一切就会真相大白，同这些人再啰嗦也没有用。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看见对面那老妇人拉着一个年纪比她更大的老头儿凑到窗前。K.想结束这出闹剧。“把我带到你们的上级那儿去！”他说。“他什么时候想见您，我们就带您去，在这之前可不行。”那个叫威廉的看守说。“我劝您，”他又补充道，“回到您的房间去，安安静静在那儿待着，并等待对您做出的决定。我们的忠告是，别胡思乱想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您得认真考虑，因为将向您提出一系列重要问题。您对待我们的态度辜负了我们对您的好意，您忘记了，我们不管是什么人，同您相比至少是自由的，这可是个不小的优势。虽然如此，假使您有钱的话，我们还是乐意从对面的咖啡馆替您买一份早餐。”

K.没有回答他们的建议，又在原地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也许他假如打开隔壁房间的门，甚至于起居室的门，这两个人并不敢阻拦他，也许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不过，他们或许真的会抓住他，一旦自己被他们抓住，那么，直到目前为止他对他们所保持的优势也就完全丧失了。出于这种考虑，他还是选择了较为稳妥的解决办法，任凭事情自然发展。他又回到自己的屋里，没同看守再说一句话。

他走下床去，从洗脸架上取来一个他昨晚留下来准备早餐时吃的红苹果。现在，它成了他唯一的早点。他咬了一大口，确信这比从那些肮脏的通宵营业的咖啡馆买来的早餐味道好多了，而看守们曾大发慈悲答应从那儿给他买一份早点来。吃完苹果，他觉得好受多了，心里充满了自信。虽然他今天上午无法去银行上班，但他的职位较高，旷工的事很容易敷衍过去。他应当把真实原因讲出来吗？他认为应当这样做。假如

别人不相信他——这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他可以让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请对面的两位老人作证，他们现在或许已经回到他房间对面的那扇窗边了。K.感到奇怪，至少从看守的角度来看觉得奇怪，他们竟将他赶回自己的房间并让他独自待在那里。要知道他有多种方法来自杀。但同时他也问自己——这回是从自己的角度看——他有什么理由自杀。仅仅因为隔壁坐着两个陌生人，并抢去了他的早餐吗？自杀毫无意义，即使他想自杀，也不会因为一件无意义的事而自杀。如果两名看守的智力不是那样低下，那么他就可以肯定，即使是他们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不会认为让他独自待着会出什么危险。假如他们愿意，他们现在可以过来看K.是怎样走到小壁橱旁——那里有他保存的一瓶好酒——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以弥补早餐的损失，接着又干了一杯，为的是给自己壮胆，最后又喝了一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应付不测。

隔壁房间传来的喊声吓了他一大跳，他的牙齿碰到酒杯发出响声。“监督官叫你去！”这是一声令他胆战心惊的、短促而粗暴的喊声，像是一道军令，使他难以相信是看守弗兰茨发出的。不过，他倒是很欢迎这道命令。“终于有消息了！”他应了一声，关上壁橱，匆匆走进隔壁房间。但站在那里的两名看守好像理所当然似的又把他推了回去。“您是怎么回事？”他们嚷道，“难道想穿着睡衣去见监督官吗？他会让人揍您一顿，我们也得跟着挨打！”“见鬼，别管我！”被推回到衣柜旁的K.喊道，“谁要是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就别指望我穿得整整齐齐的。”“再喊也没有用。”看守说。只要K.大喊大叫，他们就平静下来，甚至变得有点忧伤。这把他弄糊涂了，或者说使他稍稍恢复了理智。“可笑的形式！”他咕哝着从椅子上拿起一件上衣，双手撑着，仿佛征求看守们的意见。他们摇了摇头。“得穿一件黑衣服。”他们说。K.把衣服扔在地上说：“还没到主要审讯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看守笑了笑坚持道：“您必须穿黑衣服。”“假如这样能使事情快些了结，我也并不在乎。”K.说，并打开衣柜，在一大堆衣服中找了好半天，终于找出他那件最好的黑衣服，一件制作精细的西装，他的熟人见他穿上这件衣服曾赞不绝口。他又挑出一件衬衫，开始精心打扮自己。他暗自高兴，由于看守们忘了让他洗澡，他已经加快了解决整个事情的步伐。他瞥了他们一眼，看他们是否仍然会叫他洗澡。他们当然不会想到这一点，倒是威廉没有忘记派弗兰茨去向监督官报告，K.正在更衣。

当他穿戴停当，便由威廉紧紧跟着穿过已空无一人的隔壁房间，来到旁边那间屋子。屋子的两扇门大开着。K.知道得很清楚，这间屋不久

前租给了一位名叫毕斯特纳小姐的打字员。她每天很早去上班，很晚才回来，除了相互问候，他同她没有讲过几句话。现在，她床边的小桌子被搬到屋子中间权当审判台，监督官便坐在桌子后边，跷着二郎腿，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1〕} [1]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三个年轻人，正在观看墙上一只镜框里毕斯特纳小姐的照片。在敞开的窗户边，一件白色的女衬衣挂在把手上。对面的窗后又出现那两位老人的身影，但这一次圈子扩大了，在他们身后又多了一个男子。他比他们高出一头，衬衣领口敞着，并不停地用手指捻着他那发红的山羊胡。“您是约瑟夫·K.？”监督官问道，或许只是为了把K.心不在焉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来。K.点点头。“您大概对今天早上的事感到意外吧？”监督官一边问，一边用双手把小桌上的几件东西——一支蜡烛、一盒火柴、一本书和一个针线包推到面前，仿佛这些东西对于审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K.说，心中升起一股快意，他终于遇到了一个讲道理并可以同他一起谈论自己事情的人，“当然，我感到意外，但同时又并不觉得十分奇怪。”“并不十分奇怪？”监督官反问道，并把那支蜡烛移到桌子中央，把其他东西摆在蜡烛周围。“您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K.赶紧补充道，“我是说……”K.停顿了一下，朝四周看了看，想找一把椅子。“我可以坐下么？”他问道。“一般来说不可以。”监督官答道。“我是说，”K.不再犹豫，“我当然很吃惊，但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30年，并且不得不独自闯出一条路，因此，对令人吃惊的事早已习以为常，并不看得很严重。特别是今天早晨不这样。”“为什么特别是今天早晨不这样呢？”^{〔2〕} “我不想说整个事件像一场玩笑，对于一场玩笑来说，它的准备工作做得太充分，太周全了，不但公寓里所有的人，而且你们全体都得参加。这未免太过分，所以我认为这绝不是玩笑。”“对极了。”监督官说，并察看着火柴盒里还有多少火柴。“不过另一方面，”K.又说，并把脸转向所有的人，想把正在看照片的三个年轻人的注意力也吸引过来，“另一方面，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猜想，虽然我被控告，但你们却找不到任何指控我的罪证。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是谁控告了我？哪一级机构将审理我的案件？你们是否是法官？你们谁也没穿制服，假如我可以把您的衣服，”说到此他把脸转向弗兰茨，“不称之为制服的话。它顶多只是一件旅行服。我要你们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并相信，在问题弄清后我们便能友好地再见。”监督官把火柴盒扔在桌上。“您大错特错了，”他说，“这里的几位先生和我本人在您的案子中完全没有地位。我们甚至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我们当然可以穿上最正规的制服，但你的情况也不会变得更糟。我也无法告诉您

是否被控犯有罪行，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知道是否有人控告了您。您被捕了，这倒是千真万确，但更多的我就知道了。或许看守们胡说了些什么，但那只不过信口开河而已。^{〔3〕}不过，我即使不能回答您的问题，也想劝告您，与其一个劲地捉摸我们和您将遇到什么事，还不如多想想您自己。不要大声嚷嚷，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对于改变对您的坏印象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更糟。另外，您得少说话，您刚才说过的话——虽然您只说了几句话——都可以写进您的表现记录，这将对您没有好处。”

K.愣愣地看着监督官。他难道在接受一个或许比他还要年轻的人的训斥吗？难道只因为直言不讳而要受到责罚吗？难道他不应该知道逮捕他的理由以及是谁下令逮捕他的吗？他心烦意乱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谁也不阻止他。他挽起袖口，触摸胸脯，拢头发，从那三个人身边走过，并说：“这简直是胡闹！”。他们则向他转过身来，用讨好但严肃的目光看着他。最后，他在监督官的桌边站住。“检察官哈斯特勒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当然，”监督官说，“不过我不懂这有什么意义，除非您有什么私事同他商量。”“有什么意义？”K.与其说感到恼怒不如说非常吃惊，“您究竟是谁？您想知道有什么意义，但却在此演出一场闹剧，这难道不荒唐么？你们先是闯进我的家，现在又在此晃来晃去，让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在你们看来，既然我已经被捕，打电话给检察官似乎已没有什么意义？那好吧，我也不想打了。”“打吧，打吧，”监督官伸出手指了指前厅，那儿有电话，“请打吧。”“不，我现在不想打了。”K.说着走到窗户边。外面几个人正隔着玻璃看得津津有味，K.的靠近似乎打扰了他们。两个老太太想站起身来，但她们身后的老头儿让她们不用惊慌。“还有人看热闹。”K.大声对监督官说，用手指了指窗外。“走开！”他朝他们喊道。三个人立即后退了几步，两个老妇人甚至躲到那老头儿身后。后者用他那肥胖的身体挡住她们，嘴里嘟哝着什么。但由于距离太远，K.什么也没听清。他们并没有走开，而是在等待机会重新凑到窗前。“多管闲事、不知羞耻的家伙！”K.愤愤地回到屋子中间。他瞟了监督官一眼，觉得他好像赞同自己的看法。不过他也许什么也没听见，因为此刻他正把手摊在桌面上，似乎在比较五个手指的长短。两名看守坐在一只蒙了一块花布的木箱上搓着膝盖。过了一会儿，三个年轻人又双手叉腰，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屋里静悄悄的，像一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好吧，先生们，”K.大声说，在这一瞬间似乎自己应对一切负责似的，“从你们的神态看来，我的事情好像了结了。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别再想你们的行为是否合法，

而是大家握握手，以友好的方式把这件事解决了吧。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他走到监督官的桌前，向他伸出手。监督官咬着嘴唇，抬眼望着K伸出的手。K相信，他无疑会紧紧地握住它。然而出乎意料，监督官却站起身来，拿起放在毕斯特纳小姐床上的那顶硬圆帽，双手仔细地戴好它，好像在试一顶新帽子。“您把一切看得多么简单！”他对K说，“您认为我们应当用友好的方式解决这种事吗？不，不，的确办不到。当然，这并不是说您应当放弃希望。不，为什么要放弃呢？您只是被捕了，别的没什么。我奉命来通知您这件事，并且已经通知了您，同时也看到了您的反应。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现在可以再见了，当然只是暂时的。您这会儿一定乐于去银行吧？”“去银行？”K问道，“我想，我已经被捕了。”他的问话里带着一种挑衅的口吻，因为，虽然他握手的提议未被接受，却觉得他同这些人越来越不相干，尤其当监督官站起身来要走时。他要同他们开个玩笑，打算在他们离开时一直追到大门口，请他们逮捕自己。因此他又重复了一遍：“既然我已经被捕了，又怎么能去银行呢？”“原来如此，”已经走到门边的监督官说，“我想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您被捕了，这不假，但这并不妨碍您从事您的职业，也不妨碍您过正常的生活。”“那么，被捕也不是什么坏事。”K走近监督官说。“我从未认为这是一件坏事。”监督官说。“这样看来，通知我被捕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K靠得更近了。现在，大家都挤在门边的一小块地方。“这是我的职责。”监督官说。“愚蠢的职责。”K毫不让步地说。“也许是吧，”监督官答道，“不过我们还是别在这样的谈话中浪费时间。我猜想您是愿意去银行的。既然您这样计较每一个用词，那我不得不补充一句：我并不强迫您去银行，只是猜测您会愿意去。为了给您提供方便并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到达那里，我把这三位先生——他们是您的同事——留在这里，听您使唤。”“什么？”K吃惊地喊道。这三个没有性格的、患贫血症的年轻人的确是他银行的同事，他依稀地记起曾在一张集体照片上见过他们。他们并不是他的同事——监督官刚才言过其实，证明他并非什么都知道——而是银行里的低级职员。K怎么没发现这一点呢？他怎么会只认定他们是监督官和看守，而没有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呢？这就是那个死板的、不断挥舞手臂的拉本施泰纳，站在他身边的是金黄头发、眼睛凹陷的库里希，面对着他的是永远微笑着的患慢性肌肉抽搐症的卡米纳尔。“早上好，”愣了好一会儿，K才向三位朝他谦卑地鞠躬的先生伸出手，“我真的没认出你们。那么，现在让我们上班去，好吗？”三个人讨好地笑着点点头，似乎早就等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K想起忘在房里的帽子时，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去取，以掩饰他们脸上的窘

态。K.站着不动，透过两扇敞开的门望着他们。落在最后的当然是神情冷漠的拉本施泰纳，他只做了一个优雅的迈步姿势。卡米纳尔递过帽子，而K.不得不提醒自己——这在银行里常常是十分必要的——这家伙脸上的笑容是强装出来的。平时，即使他真想笑，也笑不出来。在前厅，格鲁巴赫太太为这一行人打开大门。她看上去丝毫也不感到内疚。像往常一样，K.低头看了看系在她那肥胖身躯上的围裙，它完全没有必要系得那么紧。在楼下，K.掏出怀表来看了看，决定叫一辆出租车，免得再延误上班时间，因为直到现在，他已经迟到半个钟头了。卡米纳尔跑过街角去找车，另外两个人则竭力想使他开心。突然，库里希指了指对面房屋的大门。此时，那蓄着金黄色山羊胡子的高大男人正从门里走出来。他显然对露出了自己整个身子感到难为情，立即退后几步倚在墙上。那两个老太太也许正从楼梯上下来。K.讨厌库里希让他注意那男人，其实他早就看见他了，并且一直盼着他出现。“别朝那边看！”他低声喝道，没有意识到以这样的口吻对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说话是多么不合适。不过，解释也没有必要，因为这时汽车已经开过来。他刚刚坐定，汽车便启动了。K.这时才想起，他没有注意到监督官和看守们是怎样离开的。监督官先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使他没认出那三个职员，而后来，职员们又让他把监督官忘得一干二净，这证明他心不在焉。K.决定今后在这方面要观察得更仔细一些。他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伸长脖子向后张望，想看看监督官和看守是否还站在那里，但他立即又转回身来舒舒服服地靠在车的一角里，此刻他不想见到任何人。虽然如此，他倒是很想同别人聊聊。但他的同伴们仿佛都累了，拉本施泰纳从他右边，库里希从他左边望着车窗外，而卡米纳尔则脸上挂着强装出来的微笑谦恭地望着他[2]。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拿这种笑容开玩笑是绝不允许的。

这年春天，K.习惯于以这样的方式消磨晚上的时光：下班以后——他一般待到九点——如果可能，他总要独自散一会儿步，或者和几个同事一道走进一家啤酒馆，坐在一张大多是上年纪顾客常坐的桌边待到十一点。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银行经理有时出于对他的下属表示关心或信任时，也会请K.乘汽车去兜兜风或去他的别墅吃晚饭。除此之外，K.每星期要去看望一次一个名叫艾尔莎的姑娘。她在一家酒吧当女招待，得从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白天，她总是在床上接待来访者。

不过这天晚上——白天在繁忙的工作和同事们热情友好的生日祝贺中飞快地过去了——K.决定立即回家。在工作的间歇，他总是想着早晨

发生的事。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把格鲁巴赫太太的整个住宅搅得一塌糊涂，而恢复那里的秩序恰恰是他义不容辞的任务。只要那里恢复了正常，这件事的痕迹也就全部被抹去了，一切也就走上了正轨。特别是那三个职员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他们重新融入了银行庞大的员工队伍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变化。K.曾好几次把他们单独或一起叫到他的办公室里，仅仅是为了观察他们。每次让他们退出去时，他都感到很满意。〔4〕

当他九点半钟回到他住的那栋房子时，发现大门口站着一个小伙子。那年轻人双腿叉开，嘴里叼着一只烟斗。“你是什么人？”K.凑近小伙子的脸问道。门洞里很黑，他看不清那人的脸。“我是房东的儿子，尊敬的先生。”小伙子答道，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退到一边。“房东的儿子？”K.用手杖不耐烦地敲敲地面问。“先生是否需要什么？要不要去把父亲找来？”“不，不。”K.用原谅的口气说，仿佛小伙子干了什么错事。“很好。”他说着继续朝前走，但在上楼之前又回过身来看了一眼。

他本来可以直接走进自己的房间，但他有话同格鲁巴赫太太说，便敲了敲她屋子的门。她正坐在桌旁补袜子，面前还放着一堆旧袜子。K.心不在焉地道歉说，这么晚了还来打扰她真不好意思，但格鲁巴赫太太显得很和蔼，请他不必介意，她什么时候都愿意跟他聊一聊，因为他是她最好、最受尊敬的房客。K.环顾四周，屋里已经恢复了原先的样子，早晨放在窗边桌上的早餐餐具已经拿走。“女人的手不声不响就把一切收拾干净了。”他想，如果是他，也许当场就把它打得粉碎，而决不会将它们拿出去。他用感激的眼神看了格鲁巴赫太太一眼。“为什么这样晚了您还干活？”他问道。他们两人都坐在桌边，K.不时地把手伸进袜子堆。“活儿太多，”她说，“白天我得替房客们做事，只有晚上才能腾出手来干自己的事情。”“我今天大概给您增加了额外的工作吧？”“为什么？”她有点紧张，把正在做的活计放在膝上。“我指的是今天早上来的那几个人。”“原来是这样，”她恢复了平静，“这并没有给我添什么麻烦。”K.一声不响地看着她又开始干活。当我提起这事时她似乎很惊讶，K.想，好像我不该谈。可越是这样，我就越应该弄清楚，这样的事只有跟一位老太太才好谈。“哪里，肯定给您增加了麻烦，”他说，“不过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当然不会再发生了。”她很有把握地说，并几乎忧伤地向K.微笑着。“您真这样认为？”K.问。“是的，”她小声说，“不过您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事看得太严重。世界上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既然您这样信任地同我谈话，K.先生，我也得向您承认，我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两

个看守对我讲了一些事。这关系到您的幸福，的确使我很担心，也许担心有点过分，因为我不过是您的房东。是的，我听到一些传闻，但我不想说情况特别糟糕。不，您虽然被捕了，但同一个小偷被捕不大一样。假如像一个小偷那样被捕，事情当然很糟，不过像您这样的被捕……我觉得有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请原谅我讲了些蠢话，我觉得有些事情难以解释，我虽然不懂，但人们也不必去弄明白。”

“您的话一点也不蠢，格鲁巴赫太太，至于我，是部分同意您的看法的。只是我对整个事情的判断比您更敏锐，我认为这件事丝毫不难解释，它完全是无中生有。我被搞懵了，这就是事实。假如我醒来之后不去想安娜为什么没有露面，而是立即起床，不顾有人阻拦直接来找您的话，我本来可以破例在厨房里用早餐并请您到我房里把我的衣服拿来。总之，倘若我头脑清醒一点，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一切也就被消灭在萌芽之中了。可惜的是我当时毫无准备。在别的时候，比如在银行，我总是胸有成竹，这样的事在那里绝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有自己的仆人，外线电话和银行内部电话就摆在我的办公桌上，顾客、上司和职员们来来往往。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始终处在一种工作环境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要是在那儿遇到这样的事，我一定会感到十分有趣的。好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本来不想再提起它，只是为了听听您的看法，一位明智的太太的看法，我才来打扰您的。我很高兴我们观点一致，我得和您握握手，来证明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同。”

她会同我握手吗？监督官可没有和我握手，他一面想一面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目光打量着她。由于K.已经站起来了，她也站起身来，显得有点窘，因为K.的话她没有完全听懂。正因为如此，她讲了一些她并不想说并且文不对题的话。“您不必把这事看得太重，K.先生。”她说，声音里带着哭腔，当然也忘了同K.握手。“我想我并没有把它看得很重。”K.说。他突然感到有点累，发现这个女人的赞同对他并没有什么用处。

在门边他转过身来问：“毕斯特纳小姐在家吗？”“不在。”格鲁巴赫太太答道，并在作出这一干巴巴的回答时微笑着表示她那已经没有必要的关心。“她看戏去了。您找她有事吗？要不要我给她留个口信？”“啊，我只是想同她谈几句话。”“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每次去看戏，她都回来得很晚。”“不要紧，”K.垂着头，转身朝门口走去，“我只想向她道个歉，今天早上我借用了她的房间。”“用不着道歉，K.先生，您太客

气了。小姐什么也不知道，她一大早出门后直到现在还没回来，何况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您可以去看看。”说着，她打开毕斯特纳小姐的房门。“谢谢，我相信是这样。”K.虽然如此说，但还是走进敞开的门。月光静静地照着那间黑洞洞的房间，凡是眼睛能够看到的東西，的确已经放回原处，挂在窗把手上的那件女衬衫已经不见了。床上的垫褥看上去高得出奇，一部分被月光照亮。“小姐常常很晚回家。”K.瞧着格鲁巴赫太太说，好像她应当对此事负责。“年轻人就是这样！”格鲁巴赫太太抱歉似的说。“不错，不错，”K.说，“不过，这也太过分了。”“的确是这样，”格鲁巴赫太太说，“您说得对极了，K.先生，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如此。我不想说毕斯特纳小姐的坏话，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姑娘，又和蔼，又正派，又精明能干，这一切我都很佩服。不过有一点我却看不惯，她应该更自尊，更庄重一点才好。光是这个月，我就在僻静的马路上碰见过她两回，每一次都和不同的男人在一起，连我都感到很尴尬。向仁慈的上帝发誓，这事我只对您讲，K.先生。当然不可避免地，我也要同小姐本人谈谈，当面劝告她。另外，使我对她产生疑心的还不止这件事。”“您完全错了，”K.几乎难以掩饰心中的怒气，“您显然误解了我对小姐的看法，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真诚地劝告您别向小姐提任何这方面的事。真是乱弹琴，我很了解小姐的为人，您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不过，我也许是多管闲事，我不想阻拦您，您想说什么，就对她说吧！晚安。”“K.先生，”格鲁巴赫太太恳求道，并跟着他一直走到他的房门口，这时，K.已打开了门，“我什么话也不会对小姐说，我当然还要继续观察。刚才我只不过把我知道的对您一人讲了。无论如何，我是为房客们着想，为了维护这幢公寓的名声，并没有其他意思。”“名声！”K.透过门缝大声说，“假如您想维护这幢公寓的名声，就应该首先把我赶出去。”接着他砰的一声关上门，不再理睬那轻轻的敲门声。

他毫无睡意，决定守在那里看毕斯特纳小姐什么时候回来。尽管已经很晚了，也许他还能同她聊上几句。他伏在窗台上，疲倦地闭上眼睛，脑子里甚至闪过要教训一下格鲁巴赫太太，劝毕斯特纳小姐同他一起搬出这幢公寓的念头。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样做太过分，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因为早上发生的那件事而想搬家。如果是那样，那就太荒唐，太无聊，太卑鄙了。〔5〕

当他看够了外面空空荡荡的街道，感到不耐烦时，便把通往前厅的门打开一条缝，躺到沙发上。这样，如果有人从外面回来，他马上就能看到。他静静地躺在沙发上抽雪茄，直到十一点钟左右，但后来无法再

躺下去，便走进前厅，似乎这样毕斯特纳小姐就会早些回来。其实，他对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甚至记不清她的长相。而现在，他却很想同她谈谈，甚至对她深夜不归极为恼火，觉得这会给他这一天最后几个钟头带来不安和混乱。再说，他今天没吃晚饭，没去看望艾尔莎也是因为她的缘故。当然，这两件事还可以弥补，他现在就可以去艾尔莎干活的那家酒馆。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同毕斯特纳小姐谈话之后再说。

大约十一点半，楼梯间传来脚步声。在前厅胡思乱想并像在自己屋里那样很响地踱步的K.赶快跑回自己的卧室，在门后仔细地听了听。回来的的确是毕斯特纳小姐。她关上正门，打了个哆嗦，用一条丝质的大围巾裹紧自己瘦削的肩膀。再过一会儿，她就该走进自己的房间了。深更半夜，K.当然不能闯进去，所以，他必须现在和她谈。不幸的是，他忘了打开自己房间的灯。假如他摸黑走出去，她一定会以为有人拦路抢劫，至少会吓一大跳。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在仓皇之中，他透过门缝低声叫道毕斯特纳小姐！”声音听起来不像喊人，而像哀求。“谁在那儿？”毕斯特纳小姐问，并瞪大眼睛四下张望。“是我。”K.从门里走出来说。“噢，是K.先生，”毕斯特纳小姐微笑道，“晚上好。”她朝K.伸出手。“我想同您说几句话，不知您是否允许。”“现在？”毕斯特纳小姐问，“非得现在谈吗？真有点奇怪，不是吗？”“从九点起我一直在等您。”“原来是这样。我看戏去了，不知道您在等我。”“我想跟您说的是今天才发生的事。”“那好吧，我并不特别反对，只是我累得站都站不住了。过几分钟您上我房间来，我们可不能在这儿谈话，那会把大家都吵醒。我讨厌这样，不光是为别人着想，更多的是为我们着想。您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把屋里的灯打开，然后您再把这儿的灯熄掉。”K.关掉灯，在原地等着，直到毕斯特纳小姐在房间里低声请他进去。“请坐。”她指着一张矮沙发说，自己虽然很疲倦，却在床的柱子边站着，甚至连头上那顶点缀着许多鲜花的帽子也没有摘下来。“您想说什么？我真的有点好奇了。”她双腿微微交叉说。“您也许会讲，”K.开口道，“事情并不很紧急，非得现在谈不可，但是……”“我向来不喜欢开场白。”毕斯特纳小姐说。“那么，我说起来就更容易了。”K.说，“您的房间今天早晨稍稍被弄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过错。虽然是几个陌生人背着我的意愿干的，但我刚才说过，我也有责任，因此，我要向您道歉。”“我的房间？”毕斯特纳小姐问，没有察看自己的房间，却审视地望着K。“事情是这样的，”K.说，两人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就不必多费口舌了。”“不过那恰恰是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毕斯特纳小姐说。“并非如此。”K.说。“那好吧，”毕斯特纳小姐说，“我不想探听别人

的秘密，既然您坚持说这没什么意思，我也没有理由反对。您请求我原谅，我当然很愿意，特别是我根本没发现我的房间弄乱了。”她张开两手，撑着腰在屋里转了一圈，并在嵌着许多照片的镜框前站住。“您瞧，”她大声说，“我的照片被弄乱了，真讨厌！看来真的有人未经允许进过我的房间。”K.点点头，暗暗地咒骂那个名叫卡米纳尔的职员，那家伙从来不能控制自己粗鲁荒唐的行为。“真稀奇，”毕斯特纳小姐说，“我现在不得不禁止您干您应当禁止自己做的事情来了，也就是说，我不在的时候，您不能进我的房间。”“我已经向您解释过了，小姐，”K.说着也走到镜框前，“我并没有弄乱您的照片。不过既然您不相信，我就不得不承认调查委员会派了三个银行职员来，其中的一个很可能动过您的照片。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把他开除。不错，调查委员会的人来过这里。”由于小姐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K.补充道。“因为您的缘故吗？”小姐问。“是的。”K.答道。“这不可能！”小姐大笑着说。“的确如此，”K.说，“您相信我不会干坏事吗？”“哼，会不会干坏事……”小姐说，“我不想立即做出某种也许会带来后果的判断，另外，我还不了解您。不过，假如专门为一个人成立了什么调查委员会，那他的罪行一定很严重。既然您仍然是自由的，至少从您的镇静可以得出结论，您不是越狱的逃犯，那么，您不可能犯了大罪。”“说得对，”K.说，“可是调查委员会既可能承认我是无辜的，也可能像他们猜想的那样宣布我有罪。”“不错，两种可能都有。”毕斯特纳小姐沉思地说。“您瞧，”K.说，“您在法律问题上缺少经验。”“不错，确实如此，”毕斯特纳小姐说，“我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我很想获得各方面的知识，对法律问题尤其感兴趣，法院对人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不是吗？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马上就会丰富起来的，因为下个月我就要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当职员了。”“那太好了，”K.说，“那样您就可以在我的案子里给我一些帮助。”“当然可以，”毕斯特纳小姐说，“干吗不呢？我很想利用我的知识。”“我是当真的，”K.说，“至少像您一样有一半认真。我的事还不至于严重到要请一位律师，不过一位顾问倒是需要的。”“不错，可是您既然请我当顾问，我也应当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毕斯特纳小姐说。“问题就出在这里，”K.说，“事情的起因连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样看来，您不过是拿我开玩笑而已。”毕斯特纳小姐大失所望地说，“深更半夜开这种玩笑可太没有必要了。”说着，她从他们俩紧紧地一起站了好久的照片旁走开。“不是的，小姐，”K.说，“我没有开玩笑，请相信我！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您了，甚至我所说的已经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因为来的并不是什么调查委员会，我这样叫它，只不过想不出别的名词来称呼它罢了。事

实上也并没有调查什么，我仅仅是被捕了，被一个委员会逮捕了。”毕斯特纳小姐坐在长沙发上又大笑起来。〔6〕“那是怎么回事？”她问道。“可怕极了。”K.说，但他不再想自己的事，而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毕斯特纳小姐，后者一只手托着下巴，肘部支在沙发垫上，另一只手慢悠悠地抚摩着自己的髁部。“这可太笼统了。”毕斯特纳小姐说。“怎么太笼统了？”K.回过神来问，“要不要我向您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他想表演一下当时的情景，但没有移动身体。“我困了。”毕斯特纳小姐说。“可您回来得太晚。”K.说。“瞧，您倒责备起我来了。不过，我这是自作自受，当初我就不应该让您进门，何况根本没有必要表演事情的经过。”“当然有必要，这您马上就会看到的。”K.说，“可以把那只小柜子从您的床边移开吗？”“您又想出什么怪念头？”毕斯特纳小姐说，“当然不行！”“那我就没法表演了。”K.激动地说，仿佛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好吧，既然是表演需要，您就把柜子移开好了。”毕斯特纳小姐说，过一会儿又用微弱的声音补充道：“我太累了，只好由您去折腾。”K.把床头柜挪到屋子中央，自己坐到它后面。“您得准确想象每个人的位置，很好玩的。我就是监督官，那边的箱子上坐着两名看守，照片旁边站着三个年轻人。顺便提一句，窗户的把手上还挂着一件白衬衣。我现在就要开始了。啊，我把自己忘了，我是最重要的角色。喏，我就站在这只小柜子前面。监督官舒服自在地跷着二郎腿，胳膊搭在椅背上，简直像个乡巴佬。现在真的开始了。监督官大喊了一声，好像要把我从梦中叫醒，他简直是在吼叫。为了使您明白当时的情景，我也不得不吼叫。当然，他叫的只是我的名字。”正在笑着听K.讲述的毕斯特纳小姐赶紧伸出一个手指头按在嘴上，示意他别大喊大叫。可是太晚了，K.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他扯开嗓门喊道：“约瑟夫.K.！”声音虽然不像他所形容的那么响，但却突然爆发出来，逐渐在房间里扩散。

猛地，隔壁房间传来敲门的声音，既短促、响亮，又有节奏。毕斯特纳小姐脸色发白，手捂住胸口。K.也吓了一跳，适才他的思想完全沉浸在早晨发生的事件里了，眼前只有那个看他表演的姑娘。刚刚恢复常态，他就跑到毕斯特纳小姐身边，一把抓住她的手。“您用不着害怕，”他耳语道，“由我来应付一切。会是谁呢？隔壁是一间起居室，没有人在那儿睡觉。”“不，”毕斯特纳小姐在K.的耳边低声说，“从昨天起，格鲁巴赫太太的侄子，一名上尉，就在那儿睡了。没有别的空房间了。我把这事给忘了。谁让您大声嚷嚷来着！我着实吓了一大跳。”“没有理由害怕。”K.说，并吻了吻已经坐到垫褥上的毕斯特纳小姐的前额。“走吧，走吧，”她说又匆忙地站起身来，“快走，别再耽搁了。您

还想干什么？他现在正在门后偷听呢，他什么都听得见。您真是折磨人！”“在您平静下来之前，”K.说，“我决不离开。到那个角落里去，我们在那儿说话他肯定听不见。”她毫无反抗地由他把自己带到屋角。“别担心，”他说，“这虽然会使您有点不自在，但绝不会有危险。您知道，格鲁巴赫太太在这种事情上说话很管用，特别因为上尉是她的侄子。另外，她对我很尊重，绝对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她还有求于我，因为我借给了她一大笔钱。您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解释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怎样说我都同意，即使有点荒唐也不要紧。我保证格鲁巴赫太太不但在表面上，而且打心底里真心实意地相信您的解释。您用不着为我操心，即使您说我强奸了您，格鲁巴赫太太听了也会深信不疑，但同时又不失去对我的信任。她太依赖我了。”毕斯特纳小姐缩成一团，一声不吭地望着地板。“格鲁巴赫太太为什么不会相信我强奸了您呢？”K.补充道。他仔细地打量着她的头发，那蓬松的、微微发红的头发中间分开，脑后束成一个堕云髻。他以为她会把目光转向自己，但她却一动不动地说：“请原谅，我是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着了，而不是怕上尉偷听所带来的后果。您喊了一声后开始静悄悄的，后来就响起了敲门声，所以我才吓了一跳。我就坐在门旁边，那声音就像从我身边发出来的。谢谢您的建议，不过我不想接受。对于我房间里发生的一切，我会自己负责，不管谁来问都一样。我很奇怪，您竟然没有察觉您的建议是对我的莫大侮辱。您的用意是好的，这我当然不否认。可现在您还是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安静一会儿。您开始时只求我跟您谈几分钟，可现在已经半个多钟头了。”K.抓住她的手，接着又握住她的手腕说：“您没生我的气吧？”她挣脱他的手回答说：“不，不，我从来不生任何人的气。”他又抓住她的手腕，这次她没有挣扎，却把他拉到门口。他几乎下决心要离开，但到了门边又站住，仿佛没有料到这儿竟有一扇门。乘此机会，毕斯特纳小姐甩开他的手，并打开门走进前厅，在那儿小声对K.说：“现在请出来吧，您瞧，”她指着上尉的房门，门下的缝里透出一道光，“他开着灯，正在偷听我们呢。”“我这就来。”K.说着跑进前厅，抱住她吻了她的嘴，接着又吻遍了她的脸，好似一头饥渴的野兽贪婪地喝着终于找到的泉水。最后他亲吻她的脖子，并长时间地把嘴唇贴在她的喉头处。上尉屋里传来一声响动，他抬头朝那边望了望。“现在我要走了。”他说。他想叫一声毕斯特纳小姐的名字，但又不知她的名字是什么[3]。她疲倦地点点头，侧着身子任凭他吻自己的手，仿佛对此毫无感觉，然后便低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儿K.便上了床，几乎马上睡着了。进入梦乡之前，他思考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并对此感到十分

满意。但奇怪的是，他又有点不满意，由于上尉的缘故，他着实为毕斯特纳小姐担忧。

第二章 初审

K.接到电话通知，下星期天将对他的案子进行一次简短的审理。打电话的人提醒他注意，审讯将经常举行，即使不是每周一次，但也不会隔得太久。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早日结束这件案子对大家都有好处；另一方面是因为审讯必须十分彻底，但又不能由于花费了大量精力而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采取了这种连续而又简短的审讯方式。审讯选择在星期天是为了不打扰K.的业务工作。人们期待他同意这一安排，假如他希望改在别的日子进行，只要可能，他们也会满足他的要求。例如，审讯也可以在夜间进行，不过那时候K.可能会头脑不太清醒。无论如何他们倾向于星期天，只要K.不反对。审讯时他必须出席，这是不言而喻的，希望用不着再提醒他。他们还告诉了他应当去的那幢房子的门牌号码。它坐落在郊区一条偏僻的街道上，K.还从来没去过那里。

K.得到通知后，没有回答便把电话挂了。他当即决定星期天去赴约，这无疑是必要的，案子已经有进展了，他必须认真对付，使第一次审讯变成最后一次。他沉思地在电话机旁站了一会儿，身后突然传来副经理的声音。副经理想打电话，但K.却挡着他的路。“坏消息吗？”他随口问道，并不是想知道点什么，而是想叫K.让开电话机。“不，不。”K.说着向一旁闪了闪，但并没有走开。副经理拿起听筒，利用电话尚未接通的机会转过脸来对K.说：“我想问一下，K.先生，您有没有兴趣星期天上午乘我的帆船出去玩？我邀请了不少人，其中肯定有您的朋友，比如检察官哈斯特勒先生。您肯赏光吗？您一定要来！”K.留神地听着副经理的话。这对他来说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副经理同他的关系向来不好，这次邀请显然是他作出的和解的表示，证明K.在银行里的地位多么重要，以至于银行第二把手也十分看重同他的友谊，至少希望他保持中立。即使这个邀请是在等电话接通时随便说的，对于副经理来说已经是屈尊了。不过，K.不得不第二次让副经理屈尊，他说：“非常感谢，可惜我星期天没空，已经跟别人约好了。”“真遗憾。”副经理说，并转过脸去打电话，因为线路已经接通了。他讲了很长时间，心烦意乱的K.一直站在电话机旁，直到副经理挂上电话，他才如梦初醒般解释自己毫无意义地站在这里的原因：“有人打电话给我，约我到一個地方去，可忘了告诉我应

该几点钟去。”“那您就再打个电话去问问好了。”“不过没什么关系。”K.说，本来便不大令人信服的理由更加站不住脚了。副经理转身走开之前又说了其他的事，K.耐着性子答了几句话，心里却想，星期天上午最好还是九点钟去那个地方，因为平日法院总是在这个时候开庭。

星期日天气阴沉。K.非常疲乏，昨天晚上他参加了酒吧间的老顾客聚会，直到深夜才回家，所以差点睡过头。他没有时间考虑一星期来制订的种种计划，匆匆穿好衣服，没吃早餐便直奔指定的那个郊区。虽然他很匆忙，无心注意过路的行人，却奇怪地发现了曾介入过他的案子的那三个职员拉本施泰纳、库里希和卡米纳尔。前两个人乘一辆电车从他面前驶过，卡米纳尔却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当K.走过时，他从栏杆上探出身来好奇地打量着他。三个人都望着他的背影，好像想弄清楚他们的上司忙着上哪儿去。出于某种对抗心理，K.决定不乘车去那个地方，他不愿意别人在他的案子里帮任何忙，不想求助于任何人，甚至不想别人哪怕稍微介入一下他自己的事情。另外他也毫无兴趣一分不差地准时到达那里，在审讯委员会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份。不过他现在还是加快了步伐，以便尽量在九点钟时到达，尽管没有人给他规定到达的时间。

他本来以为那幢房子准会有某种标志——到底有什么标志他想象不出来——或者门前聚了许多人，从远处就能认出来。但是，他要去的那条尤利乌斯大街两旁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灰色高楼，里面住满了穷人。K.在街口站了一会儿。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大多数窗口都有人，男人穿着衬衣靠在那儿抽烟，或小心而慈爱地扶着坐在窗台上的孩子。有些窗口晾着被单，偶尔有一个女人蓬乱的头发从被单上方露出来。人们隔着巷子相互打招呼，K.的头顶上正好有人大喊了一声，引起一阵哄笑。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家卖食品的小店，它们大多低于街面，要下几级台阶才能到达。女人们在这些店里进进出出，或者站在店门口的台阶上闲聊。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向街两旁窗口里的人推销自己的货物，一不留神，手里小车差点把心不在焉的K.撞倒。一架在某个较富裕的城区用坏了的留声机开始演奏，发出叫人难以忍受的杂音。

K.缓缓地沿着大街往前走，越走越远，他的时间似乎很充裕，预审法官也许会从某个窗口里看到他，知道他已经到来。九点已经过了，K.又走了很久才找到那栋房子。这是一幢大得出奇的建筑，特别是大门，又高又宽，大约是为运送货物的车辆设计的。宽阔的院子四周是一间间

栈房，门口挂着许多家商号的招牌，有些商号的名称K.在银行的业务往来中已经很熟悉。他一反常态，在院子的入口处停了一会儿，仔细打量起眼前的情景来。在他不远处，一个赤脚男人坐在一只大箱子上看报；两个男孩坐在一辆手推车里摇来晃去；一个瘦弱的年轻姑娘身穿睡衣在水泵前一边打水一边看着K.；在院子的一个角落，两扇窗之间系了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刚刚洗过的衣服；一个男人站在衣服下大声指点着别人干活。

K.转身走向楼梯，打算去审讯室。但他又站住了，因为除了这条楼梯，院子里还有三条楼梯，另外在院子尽头还有一条窄窄的过道似乎通向另一个院子。他很生气，打电话的人竟然不告诉他审讯室的确切位置，他们对他的疏忽和冷淡已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一定要把这一点当面向他们大声而明确地指出来。他终于登上那条楼梯，心里想着那个叫威勒姆的看守说过的话：法律总是被罪恶所吸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审讯室肯定就在K.偶然选中的这条楼梯上面。

上楼时，他碰到了许多在楼梯上玩的孩子，由于他从他们中间穿过而打扰了他们的游戏，孩子们一个个恼怒地瞪着他。“如果我下次再来，”他自言自语道，“一定要带些糖果来哄他们，或者带根棍子来揍他们一顿。”快到二楼时，一颗弹子从楼梯上滚下来，他不得不站住，等弹子停止滚动。这时两个满脸皱纹、未老先衰的小男孩揪住了他的裤子。假如他把他们甩开，他们一定会被摔痛。他怕他们嚷嚷起来。

到了二楼他才真正开始寻找。不过他不好直接打听审讯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于是想出了一个寻找细木工兰茨的主意——他想起这个名字，是因为那个上尉，格鲁巴赫太太的侄子，就叫兰茨。他打算挨家挨户地问，这里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并乘机向屋里瞄上一眼。这样做其实并不费劲，因为几乎所有的门都开着，小孩子从里面跑进跑出。大多数家庭只住着一间带一扇窗的小屋，并且正在做饭。不少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在炉子上忙碌。即将成年的女孩子除了围裙似乎没穿别的衣服，来来回回地操持着家务。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的是病人，有的还在酣睡，有的即使已穿好衣服还赖着不起来。如果哪家的门关着，K.便敲敲门，问这儿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来开门的大多是女人，听了他的问话往往转身对屋里的某个人说话，那人便欠起身来。“这位先生问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兰茨的细木匠。”“叫兰茨的细木匠？”那人在床上问。“对。”K.说，其实他已经明白，审讯委员

会决不会在这里，他用不着再费口舌。许多人以为找到细木匠兰茨对K.来说事关紧要，于是绞尽脑汁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某个细木匠来，不过那人不叫兰茨。也有人说出一个与兰茨发音相近的名字来，或者向邻居打听，或者领K.到住得很远的另一家去，因为他们认为，那间房子已被转租出去，新住户可能就叫兰茨，或者那家人也许能提供确切消息。终于，K.明白不必再问了，因为他已经跑遍了二楼。他为自己制订的这个计划感到懊悔，当初，他还以为这种做法是切实可行的。当他快到六楼时，他决定不再寻找。他向一个愿意带他继续打听的热情的青年工人道别后便朝楼下走去。但是，他为自己白白地忙碌了半天而恼怒，于是又爬上六楼，敲了敲第一家住户的門。他在小屋里第一眼看到的東西是一架大挂钟，指针已经指到十点了。“一位名叫兰茨的细木匠住在这里吗？”他问道。“就在那边。”一个长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的年轻女人正在桶里洗小孩衣服，她伸出一只湿漉漉的手指，指了指隔壁房间开着的門。

K.觉得好像走进了一间会议室。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有两扇窗，天花板下是一圈楼座。屋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连楼座也挤得满满的，那儿的人只能弓着身子站着，脑袋和背几乎碰到天花板。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新来的人。K.站了一会儿，觉得空气太污浊，便又退了出来。他对那个看来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思的年轻女人说：“我是来找一個细木匠的，他名叫兰茨。”“没有错，”那女人说，“您请进去吧。”要不是她朝他走了两步，抓住門把手并对他说“我得关上门，在您之后任何人都不得再进去”，K.也许会走开。“说得对，”他说，“不过里面确实太挤了。”尽管如此，他仍然走了进去。

門边有两个男人在谈话，其中的一个伸开两手做出数钱的姿势，另一个人立即睁大眼睛紧紧盯住他。这当儿，从两人中间伸过来一只手抓住了K.。这是一个红脸膛、个子矮小的年轻人。“过来吧，过来。”他说。K.任他带着往前走，闹哄哄的人群中看来似乎有一条窄窄的通道，把在场的人分成两派。K.朝前几排的左右两边看了看，发现没有一个人脸对着他，所有的人都背对着他，只同自己那一派的人说话和打手势。大多数人身穿老式的黑色节日长外衣，下摆松松地垂下来。假如不是这身打扮使K.感到迷惑，他一定会认为这里在举行一次地方性政治集会。

[7]

K.被带到会议室的另一头，那儿有一个低矮的讲台，上面同样挤满了人。讲台上横放着一张小桌子，一个矮胖子喘着粗气坐在桌子旁的讲

台边上，在一阵哄笑中同一个站在他身后的人说话。那人胳膊肘撑在椅背上，两腿交叉，不时挥舞着手臂，仿佛在模仿某个人的滑稽动作。带领K.到来的那个小伙子两次踮起脚尖，想通报K.已经到了，但都没有引起矮胖子的注意。直到讲台上有人指着小伙子提醒他，他才转过脸来，俯下身子听后者小声报告。接着，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又扫了K.一眼。“您在一个钟头零五分钟之前就应该到这里了。”他说。K.刚想回答，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矮胖子还没说完，屋子的右半部就响起了一片不满的喧哗。“一小时零五分钟之前您就该到这里了。”矮胖子提高声音重复道，并匆匆地扫了会议室一眼。不满的声音更响了，矮胖子住嘴好一阵才渐渐平息下来。现在会议室里比K.刚刚进来时安静多了，只有楼座上的人还在议论着什么。那儿虽然光线昏暗，烟雾腾腾，尘土飞扬，但K.还是看出来，他们的衣着比下面的人寒酸。一些人还带着垫子，塞在他们的脑袋和天花板之间，以免碰伤。

K.决定少讲话多观察，因此并不为他所谓的迟到辩护，而只是说：“我也许是来得晚了点，但我已经到了。”话音刚落，屋子的右半部便响起了掌声。这些人很容易争取过来，K.想，但又为屋里左半部分的沉默感到不安。这些人就在他身后，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为他鼓掌。他考虑着应该说些什么，才能把所有的人一下子争取过来，即使做不到，至少也应该先把大多数人争取过来。

“不错，”矮胖子说，“不过我不再有义务现在便审讯您了。”不平之声重又响起，但这次意义相当含混。矮胖子挥挥手把声音压下去又说：“不过我可以把今天算做例外，下次无论如何不能再迟到了。现在到前面来！”一个人跳下讲台，给K.腾出一块地方。K.登上讲台，紧挨着桌子站着。身后十分拥挤，他不得不使劲顶住，以免把预审法官的桌子，也许还有预审法官本人推下讲台。

不过预审法官并不为此而担忧，他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对身后的人说完最后几句话，才抓起桌上唯一的一件东西——一个小笔记本。这是一个小学生用的那种老式笔记本，由于它的主人经常翻阅，早已变形。“那么，”预审法官一边翻着笔记本，一边用确信无疑的口气问K.，“您是房屋油漆匠¹？”“不对，”K.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首席业务助理。”这个回答使房间右半部的人开心地大笑起来，K.也不禁笑了。人们双手撑住膝盖，笑得身子直抖，简直喘不过气，楼上甚至也有几个人开怀大笑。恼怒万分的预审法官看来没有足够的权威控制会议室里的

人，于是便向楼座上的人发泄自己的怒气。他跳起来，向他们发出威胁，两条并不引人注目的眉毛在眼睛上方挤成又粗又黑的一团。

但是，房间左半部的人仍然保持着沉默，他们站成一排排，脸朝讲台，静静地听着刚才的对话和对立的一派发出的哄笑声。他们甚至容忍自己这一派的某些成员做出同对立面一样的举动。他们看上去虽然比另一派的人数要少，也许从根本上说无足轻重，但他们的沉默却是意味深长的。K.开始讲话，确信自己代表了他们的观点。

“预审法官先生，您问我是不是房屋油漆匠——事实上您并不是在问，而是把一个称呼强加给我——这种问话方式暴露了强加在我身上的这次审讯的全部特征。您也许会提出异议，说这根本不是一次审讯。您说得完全对，因为只有在我承认这是一次审讯的情况下，它才称得上是审讯。不过此刻出于怜悯，我承认它是一次审讯。倘若人们愿意正视它，便不得不对它抱怜悯的态度。我不想说这是一次下流的审讯，但我很愿意把这个称呼让给您，供您自己去使用。”

K.说到此停顿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整个会议室。他的话说得很尖刻，尖刻得超过自己的预想，但却是理直气壮的，他料想会激起阵阵掌声。然而掌声并没有响起，大家显然正紧张地等他继续说下去。也许沉默之后便是爆发，一切将在爆发中结束。但令人扫兴的是，恰恰在这时，会议室那一端的门突然开了，那个年轻的洗衣妇走了进来，看来她已经洗完了衣服。尽管她小心翼翼，仍然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唯一使K.开心的是预审法官，自己刚才的话显然击中了他的要害。他像被钉住了一样呆呆地听着，因为当他站起来斥责楼座上的人时，K.突然开始讲话，使他忘记坐下。直到此刻，他才利用这个间歇坐回到椅子上。他的动作缓慢，似乎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许是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他又拿起了笔记本。

“这不会有多大用处，”K.接着说，“您的笔记本，预审法官先生，会证实我所说的话。”他对自己能在这个陌生的集会上用平静的语调讲话感到十分满意，甚至一把从预审法官手中夺过笔记本，用手指捏着中间的一页高高举起，仿佛怕那斑渍点点、边缘发黄的小本子脏了他的手。笔记本里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页倒垂着向两边散开。“这就是预审法官的记录，”他松开手指，让笔记本掉到桌上说，“您尽管看吧，预审法官先生，我一点也不怕您这个记录罪状的小本本，虽然它对我是保密的。我甚至不愿用手去拿它，最多只用两个指头捏住它。”这显然是一种极大的

侮辱，至少是这样被理解的，因为预审法官急忙抓过笔记本，使劲将它抚平，并重新开始翻阅。

K.朝台下瞥了一眼，前几排的人正紧张地看着他。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有几个胡子都白了。也许他们正是能左右会场的人？即使预审法官受了侮辱也无动于衷？自从K.开始讲话以来，他们一直脸上毫无表情。

“我受到的待遇，”K.的声音比刚才平静了一些，他留心地看着前几排那些人的脸，因而有点走神，“我所受到的待遇只是个别情况，本身并没什么了不起，我也并不把它当回事，但它却体现了一种程序，一种针对许多人的程序。我在这里大声疾呼，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他们的尊严。”

他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屋子里有人高举双手鼓掌并大喊：“好极了！应该这样！干吗不呢？太对了！”第一排有几个人捋了捋胡子，但谁也不回过头去看看喊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K.虽然对此也不大在意，但仍感到鼓舞。现在，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赢得所有人的掌声，只要大家能认真地思考这件事就够了，通过说服，他还可以争取到一部分人。

“我不想当个演说家，在这里赢得大家的喝彩，”出于上述考虑，K.说，“即使我想这样做也做不到。预审法官的口才也许就比我好得多，这是他的职业需要。我所要求的仅仅是公开讨论一下人们普遍蒙受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请听我说，大约10天以前，我被捕了，被捕的方式连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可笑。不过，这并不属于今天的话题。我是在清晨躺在床上时被捕的，也许，他们接到命令去逮捕一名同我一样的油漆装饰匠——从预审法官的话来看，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却抓了我。两名粗暴的看守占据了我隔壁的房间。即使我是个危险的强盗，他们采取的防范措施也不会更严厉了。此外，这些看守都是些道德败坏的家伙，他们喋喋不休地暗示我向他们行贿；使出各种花招企图骗走我的内衣和外衣；他们厚颜无耻地当着我的面吃掉了我的早餐，然后又向我要钱，声称要替我买早点。不仅如此，我还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见监督官，那是一位我一向很敬重的女士的卧室。我不得不亲眼目睹那间屋子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这虽然是由于我的缘故，但并不是我的过错。当时要保持平静是很困难的，但我却极力克制自己。我用十分冷静的口气问监督官，为什么要逮捕我——假如他现在在场，可以出来作证。监督官却悠闲自得地靠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女士的椅子上，那副蛮横傲慢的样

子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是怎样回答的呢？先生们，他压根儿什么也答不上来，也许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他逮捕了我，这就万事大吉了。他甚至还做了件额外的事：把我银行三名低级职员叫进那位女士的房间，任凭他们乱翻乱动那位女士的照片和财物。让那三个职员在场当然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指望他们和我的房东太太及其女佣人一样，到处散布我被逮捕的消息，以毁坏我在公众中的形象，动摇我在银行里的地位。但是，这种意图完全落空了，即使是我的房东，一位普普通通的妇女——我很荣幸地在这儿说出她的名字，她叫格鲁巴赫太太——即使是格鲁巴赫太太，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方式的逮捕简直就是一次突然袭击，就像野孩子在草地上搞的恶作剧一样不值得认真对待。我重复一遍，这一切只不过使我感到愤慨和恼火而已，但是，它难道不会引起更坏的后果吗？”

K.停顿了一下，并朝一声不吭的预审法官瞥了一眼，好像看见他正在给大厅里的某个人使眼色，以传递一种信号。K.笑了笑说：“坐在我身边的预审法官先生刚才给你们中的某个人发出了一个秘密信号。看来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受坐在上面的人操纵的。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让你们鼓掌呢还是嘘我。由于我过早地揭露了这个事实，也就自觉地放弃了获悉它的真实含义的权利。对此我毫不在意，并且可以授权给预审法官先生，让他公开对他雇佣的人发出命令，而用不着递暗号。他可以大声说：‘现在嘘他！’或者说：‘现在鼓掌！’”

由于尴尬或不耐烦，预审法官在椅子上蹭来蹭去。他对身后的人说了句什么，那人立即俯下身来，好像在给他打气，或给他出主意。下面的人议论纷纷，声音虽然不高，但很热闹。原先似乎势不两立的两派此刻汇合到一起了，有的人用手指着K.，另一些人则指着预审法官。大厅内烟雾弥漫，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无法看清站在远处的人的面孔。楼座上的人更是深受其害，他们一面胆怯地瞟着预审法官，一面小声向楼下的人打听事情的进展。回答的人同样用手挡住自己的嘴，尽量压低嗓门。

“我马上就要说完了。”K.说，由于桌上没有铃，他用拳头捶了捶桌子。预审法官和给他出主意的人听到响声吃了一惊，凑在一起的两个脑袋立即分开了。“因为我将此事置之度外，所以能冷静地做出判断。而你们——除非你们把这个所谓的法庭当一回事——听听我的看法会大有益处的。不过我请你们以后再对我所讲的话进行讨论，因为我时间紧迫，

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大厅里立即安静下来，K.完全控制了会场。人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乱喊乱叫，甚至不再鼓掌。他们好像被说服了，或者马上就要被说服了。

“毫无疑问，”K.轻声说，他对全场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感到高兴，大厅内寂静得可以听见人们的呼吸声，这比最热烈的掌声更令人激动，“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采取的一切行动——在我的案子里对我的逮捕以及今天的审讯——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在操纵。这个机构不但雇用了索贿的看守，愚蠢的监督官和至少是不中用的预审法官，而且豢养了一批高等的，甚至最高级别的法官，这些人手下还有一大帮不可缺少的听差、办事员、宪兵和其他助手，也许还有刽子手，我并不忌讳这个词。先生们，这个庞大机构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呢？在于逮捕无辜的人，对他们进行荒谬的审讯，这种审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结果，就像我的案子一样。既然一切都是荒唐的，官员们贪赃枉法又怎么能避免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高法官也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正因为如此，看守们便想方设法去偷被捕者穿的衣服，监督官便强行闯入陌生人的住宅，无辜者还未审讯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羞辱。看守们曾经说起，被捕者的财产存放在一些仓库中，我倒很想去看看囚徒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财物怎样在那里霉烂，即使它们未被看守仓库的官员们偷走。”

K.的话突然被大厅尽头发出一声尖叫打断。由于光线昏暗，他不得不在浓浓的烟雾之中将手搭在眼睛上方，想看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是洗衣妇，她刚一进门，K.就意识到大厅里的秩序有可能被搅乱。但这一次究竟是不是她的错，他还不能肯定。^{〔8〕}K.只看见，一个男人把她拽到门边的一个角落里，紧紧地搂住她。但是，发出尖叫的并不是她，而是那男人。他嘴巴张得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小群人。楼座上离他们较近的人看到K.在审讯过程中造成的严肃气氛由于这件事情遭到破坏，似乎很开心。K.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跑过去制止他们，他想，所有的人都急于恢复秩序，至少希望把那两个引起混乱的人赶出大厅。然而，前面几排人却一动也不动，谁也不给他让路。实际上他们是在阻止他，老头们伸出胳膊不让他过去，一只手——他没功夫回头看——从后面揪住他的衣领。K.此刻已顾不得那两个人了，他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好像自己真的被逮捕了。他不顾一切地跳下讲台，现在同拥挤的人群面对面站着。他是不是对这帮人做出了错误的

判断？是否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讲话的效果？当他讲话的时候，这些人是否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立场？而现在，当他把所有的看法都讲出来之后，他们是否对自己的伪装感到厌倦了？瞧瞧周围这些人的脸！他们那黑色的小眼睛诡谲地东张西望，脸颊像酒鬼一样松弛下垂，长长的胡子又硬又稀，如果把它们捏在手里，一定像捏着鬼爪子一样而根本不像胡子。最令人吃惊的是，在胡子下方的衣领上别着大小五颜六色的徽章——这才是K.真正的发现——而且，一眼望去，所有的人都戴着同样的徽章。原来所有的人表面上分成左派和右派，实际上却是一伙。当他突然转过身来，发现预审法官的外衣领子上也别着同样的徽章。这会儿，法官正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悠闲自得地看着他。“原来如此！”K.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们全是当官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帮贪赃枉法的家伙！你们挤到这里来，一边听，一边还用鼻子闻。你们假装分成两派，一些人给我鼓掌，为的是引诱我讲下去。你们想尝试一下，怎样捉弄无辜的人！现在，你们终于达到了目的，或者从一个无罪的人的辩护中寻到了开心，或者——滚开，不然我就揍你！”K.对一个挤到他跟前的抖抖索索的老头儿喊道，“或者，你们真的明白了一些东西，我祝愿你们所干的勾当成功！”他飞快地拿起放在桌边的帽子，在全场一片静默——由于惊愕而引起的静默中挤出人群，朝门口走去。但预审法官的动作似乎比K.更快，因为他已经等在门边了。“等一下。”他对K.说。K.停住脚步，眼睛没有看预审法官，而是望着门，手也已经按在门把上了。“我只想提醒你，”预审法官说，“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今天你自己放弃了一次审讯将对被捕者肯定会带来的全部好处。”K.对着门大笑起来。“你们这帮无赖，”他喊道，“我把所有的审讯都送给你们吧！”说完便打开门，朝楼下快步走去。在他的身后响起了重新变得热闹起来的大厅里那乱哄哄的议论声，在场的人似乎以学者的方式讨论起刚才发生的事来了。

第三章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 大学生 法院 办公室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K.一天天地等待着再次审讯的通知。他不相信自己拒绝被审讯的声明会被认真对待。由于直到星期六晚上他还没接到通知，他于是猜测，他们准是等着他在同一时间到老地方去。因此，星期天一早他又上那儿去了。这一次他径直登上楼梯，穿过走廊。几个还认得他的人在自家门口同他打招呼，但他已不必向任何人问路了，很快便来到审讯室的门口。他刚敲了一下门，门就开了，站在门后

那个女人是他早已认识了的。他没有朝她看一眼，便直接往旁边的屋里走去。“今天不开庭。”那女人说。“为什么不开庭？”他疑惑地问道。女人打开隔壁房间的门，他才相信了。屋里确实空荡荡的，看起来比上个星期天更加破败。讲台上的那张桌子还像上次那样摆着，上面有几本书。“我可以看看那几本书吗？”K.问，并不是出于特别的好奇，而完全是为了不白来一趟而已。“不行，”那女人一面回答，一面关上门，“这是不允许的，那些书属于预审法官。”“原来如此，”K.点点头说，“它们大概是法律书，专为这类审判准备的，也就是说，不但无罪的人反正要被判刑，而且得不明不白地进班房。”“大概是这样吧。”那女人说，并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好吧，那我就回去了。”K.说。“要我给预审法官带个口信吗？”女人问道。“您认识他？”K.问。“当然，”女人说，“我男人是法院听差。”直到现在，K.才注意到，上星期天除了一只洗衣盆以外一无所有的房间，已经布置成一间设备齐全的居室。那女人看到他惊讶的神情又说：“是的，这间屋子是我们的家，不过在法院开庭的日子，我们得把屋子腾出来。我男人干这差使有些不利地方。”“对这间屋子我并不特别惊讶，”K.恼怒地望着她说，“惊讶的是您居然已经结婚了。”“您指的大概是上次开庭时，我扰乱了您的发言吧？”女人问。“当然是那件事，”K.说，“不过那早已过去，我差不多把它忘了。当时我确实很生气。而现在，您自己说您已经结婚了。”“那天打断您的话，对您来说并没有害处，从过后人们对您的议论来看，他们对您的讲话相当恼火。”“可能吧，”K.想转移话题，“不过您好像对此并不感到内疚。”“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原谅了我，”女人说，“揍我的那个男人长期以来死皮赖脸地追我。一般说来我对男人也许没有什么魅力，可对他却是个例外。我没法摆脱他，我男人事到如今也只能听之任之，他如果不想丢掉饭碗，就得忍气吞声。那家伙是个大学生，将来很可能成为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他没完没了地纠缠我，今天还来过，他前脚刚走，您就来了。”“在这种地方，这事并不奇怪，”K.说，“对此我并不十分吃惊。”“您上这儿来，大概想改善一下这里的状况？”女人注视着他，慢慢吞吞地说，仿佛她说出的话对她自己和K.都很危险，“我是从您的讲话中猜出来的，我本人很喜欢您的讲话，当然只听了一部分，开头我没听到，您快要讲完的时候，我和那个大学生正躺在地板上。这儿的一切都令人恶心。”她停了一会儿，拉住K.的手说：“您以为，您真能改善这儿的状况吗？”K.微笑着，转动了一下被她那柔软的双手握着手腕。“其实，”他说，“我上这儿来，并不像您说的那样，是为了改善这里的状况。假如您这样对预审法官说，您要么会遭到嘲笑，要么受到惩罚。事

实上即使我出于自愿，也绝不会干预这种事情，我决不会由于这种司法制度需要改革而睡不着觉。但是，由于有人声称我已被捕——我似乎被逮捕了——我不得不掺和进来，为的是保护我自己。当然如果在此同时我能够以某种方式帮助您，我是很乐意的，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仁爱，而是因为，作为回报，您也能助我一臂之力。”“我怎样才能帮助您呢？”女人问。“比如说，让我看看桌上的那几本书。”“当然可以！”女人大声说，并马上拉着他朝讲台走去。那些都是又脏又破的旧书，其中一本的硬封面几乎裂开，书页间只连着几根细线。“这儿的一切都那样肮脏！”K.摇头说。那女人抢在K.的前面，用围裙拭去封面上的尘土。K.打开最上面的那本书，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不堪入目的图画：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画画者的下流意图很明显，但画技拙劣，画面上只有两个僵硬呆板的人直挺挺地坐在那儿，并且，由于透视法极其糟糕，作者无法使他们面对面坐着。K.没有继续往下翻，而是打开第二本书的封面。这是一本小说，书名是《汉斯如何折磨他的妻子格蕾特》。“这就是那帮人在这儿研究的所谓法律书，”K.说，“审判我的就是这种人！”“我会帮助您的，”女人说，“您愿意吗？”“您真的能帮助我，而不给自己带来麻烦吗？您刚才说，您男人在上司面前唯命是从。”“别去管他，我照样愿意帮您的忙，”女人说，“过来，咱们得好好谈谈，别再说些什么我会遇到危险，只有在我害怕危险的时候我才害怕它。过来吧。”她坐到讲台边上，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您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他们坐下后，她从下面望着K.的脸说，“别人说，我的眼睛也很漂亮，可您的眼睛要可爱得多。您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您。正是因为您的缘故，我后来偷偷溜进了会议厅，我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禁止的。”原来是这么回事，K.想，她自己送上门来了。她像这儿所有的人一样堕落了，同这儿的官员们玩腻了，因此可以理解，想勾引每一个来这儿的陌生人，恭维他漂亮的眼睛。K.沉默着站起身来，似乎已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如此向那女人表明了态度。“我不相信您能帮我什么忙，”他说，“要想帮我，就得同高级官员有关系，而您肯定只认识一些在这儿转来转去的低级职员。您无疑十分了解他们，可以让他们干某些事，不过，恐怕他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这次审讯的最终结果毫无影响，而您却会因此而失去几位朋友对您的宠爱。我不希望这样，保持您同他们的关系吧，我觉得这对您是不可缺少的。我这么说感到很遗憾，因为，为了报答您对我的恭维，我也很喜欢您，特别是您现在这样忧伤地看着我，而您毫无理由感到忧伤。您属于我所反对的那个阵营，而您对自己的地位感到满意。您甚至爱那个大学生，假

如您不爱他，您至少会觉得您的男人比他强。从您的话中很容易看出这一点。”“不！”女人喊道，并没有站起身来，而是抓住K.来不及缩回的手，“您不能走，不能带着对我的错误判断离开！您真忍心现在就走吗？我真的这样下贱，您连同我一起多待一会儿也不愿意吗？”“您误解了我的意思，”K.重新坐下来，说，“如果您真的想让我多待一会儿，我当然愿意留下来，我有的是时间。我到这里来，本来是以为法庭会开庭的。我刚才想说的是，请您不必为我的案子操心。但您不必生气，如果您以为我对案子的结局毫不在乎，即使给我判刑也只会一笑了之。这样说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次审讯有一个真正的结局。但对此我是十分怀疑的。相反，我倒相信，由于负责本案官员的懒惰、健忘，甚至可能是惧怕，实际上已经中断，或者即将束之高阁。当然，他们也可能假装继续审判，试图敲诈我一笔钱财。但我现在就可以说，这样做是徒劳的，我永远不会去贿赂任何人。您倒是可以为我做一件事：您可以去告诉预审法官或任何一个喜欢传播消息的人，就说我绝不会向这帮先生们行贿，即使他们耍尽他们惯用的阴谋诡计也不行。您可以公开对他们说，他们的鬼点子不会得逞。或许他们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即使他们现在还不明白，我也不在乎他们是否知道了我的态度。这只会让他们省点事，当然也使我省点麻烦。但是，我很乐意忍受他们给我造成的不快，因为我知道，害人者终将害己。我会让这种事发生的。顺便问一句，您真的认识预审法官吗？”“当然认识，”女人说，“当我提出要帮助您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我不晓得他只是个低级官员，既然您这么说，我想一定是真的。尽管这样，我相信他向上司递交的报告还是会产生某种影响。他写许许多多的报告。您刚才说，官员们都很懒惰。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懒惰，预审法官尤其不是这样。他总是写呀写呀，比如上星期天，会议开到很晚才结束，其他人都走了，预审法官却留在审讯室里。我只好给他送一盏灯去，我只有一盏厨房用的小灯，但他已经很满意了，马上开始写起来。一会儿我男人回来了，那个星期天他不上班。我们把家具搬回来，重新布置好屋子。后来又来了几个邻居，我们点上蜡烛聊了一会儿天，完全把预审法官给忘了。后来我们就上床睡觉了。半夜——那时准是很晚了——我突然惊醒，预审法官站在床边，一只手遮着灯，好像怕灯光照着我男人。其实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谨慎，我男人睡觉一向很死，光线再强也不会醒，我吓了一跳，差点喊出声来。预审法官却很和蔼，提醒我别出声，并凑近我小声说，他一直写到现在，他是来还灯的，他永远不会忘记我躺在床上的模样。我对您说这些，只是想告诉您，预审法官确实一直在忙着写报告，特别是关于您的报告，因

为对您的审讯肯定是星期天开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么长的报告不可能完全没有作用。另外，您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猜出，预审法官也开始追起我来了，而我恰恰在现在，在开始的时候，可以对他施加很大影响，因为他刚刚看上我。我还有其他证据证明他急于把我搞到手：昨天，他让那个大学生给我送来一双丝袜，大学生是他的助手和心腹。他说，这是为了报答我给他打扫审讯室。其实这不过是借口，因为打扫清洁是我分内的事，我男人为此拿到了工钱。这双袜子可真漂亮，您瞧，”她伸出双腿，把裙子撩到膝盖以上，欣赏起袜子来，“这么好看的袜子，可惜太高级了，对我这种人合适。”

她突然不吭声了，把手放在K.的手上，似乎想让他保持镇静，并悄声说：“别出声，贝托尔特在偷看咱们。”K.缓缓地抬起目光。审讯室的门口站着一个人，矮个子，罗圈腿，蓄着又短又稀疏的红胡子，想让自己的外貌尽量威风一些。他不停地用手指捋着胡子。K.好奇地打量着他，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学法学的大学生，那陌生的行当里第一个有形体的人，将来有一天，他也许会爬上某个高级职务。大学生却丝毫不理会K.，似乎根本没看见他，他暂时停止了捋胡子，伸出一个指头给那女人打手势，并朝窗户走去。女人弯下腰，在K.耳边小声说：“别生我的气，我请求您，别以为我很坏。我得上他那儿去了，讨厌的家伙，瞧他两条罗圈腿。我去去就来，然后就跟您走，假如您愿意带我走的话。您上哪儿我都跟着您，您对我干什么都行，如果能长期离开这里，我会感到幸福的，最好是永远不回来。”她抚摩着K.的手，然后跳起来跑到窗边。K.情不自禁地想抓住她的手，但却抓了个空。那女人确实对他产生了诱惑力，他思来想去，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屈服于这种诱惑。他轻而易举地打消了自己的疑虑：她也许是按照法院的指示来引他上钩的。她能用什么手段引他钻进圈套呢？他不是有足够的自由来摧毁整个法庭，至少对他本人的审讯吗？难道他连这一点自信也没有？她提出愿意帮他的忙，听起来是真心诚意的，也许并非毫无价值。把这个女人从预审法官和他的仆人手里抢走并占为己有，也许是对他们最好的报复。到那时，当预审法官绞尽脑汁写完了谎话连篇的关于K.的报告，深夜来到这女人的床边，就会发现床已经空了。床空了，因为这女人已被K.所占有，因为这个此刻站在窗边的女人那裹在深色粗布衣服里的丰满、柔软、温暖的身体只属于K.所有。

在他琢磨了好一阵，消除了对那女人的疑虑之后，开始觉得窗户那边的窃窃私语未免太长了，他于是用指关节敲了敲讲台，接着又用拳头

使劲擂了起来。大学生的目光越过那女人的肩膀，朝K.扫了一下。但他并不理会K.的打扰，反而和那女人贴得更近了，甚至伸出胳膊紧紧搂住她。她则低下头，仿佛正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在她低下头的那一刻，他在她脖子上很响地吻了一下，那滔滔不绝的讲话只停顿了片刻。K.从这个举动看出，大学生的确可以对那女人为所欲为，正如她刚才所抱怨的那样。他猛地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一面斜着眼打量那家伙，一面考虑怎样才能尽快把他赶走。于是，K.的来回踱步渐渐变成了生气的跺脚。大学生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打扰——而这正是K.求之不得的——对他说：“假如您等得不耐烦了，可以走嘛。您早就该走了，谁也不会拽住您的。您甚至在我进来的时候就应该走，赶快走得远远的。”大学生讲这几句话时怒气冲冲，并流露出傲慢的口吻，俨然像一个未来的法官向一个讨厌的被告训话。K.在他的身边停住脚，微笑着说：“我的确等得不耐烦了，但消除我的不耐烦的最简便的办法是您赶快离开此地。倘若您上这儿来是为了看书——我听说您是个大学生——我很乐意为您腾出地方，并带着这个女人离开。另外，在您当上法官之前，还有许多东西要学，虽然我不大了解法律事务的细节，但我猜想，只会出言不逊——您当然已精通到无耻的地步了——还远远不能学到。”“不能让他到处乱窜，”大学生说，好像要向那女人解释K.刚才那番侮辱性的话语，“这样做是不行的，我早就向预审法官提出过。在两次审讯之间，至少应当把他软禁在自己的房间里。预审法官有时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废话少说，”K.说着朝那女人伸出手，“来吧。”〔9〕“原来如此，”大学生说，“不，那可不行，您休想把她带走。”说着，他一把抱起那女人，谁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大的力气。他一面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一面微微弯着腰朝门口跑去。尽管从他的神情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有些害怕K.，但仍然冒着进一步激怒K.的危险，用空着的那只手抚摩并搂紧那女人。K.追了几步，准备揪住他，必要的话甚至掐住他的脖子。然而这时，那女人却说：“这没有用，预审法官派他来找我，我不能同您走。这该死的小怪物，”她摸了摸大学生的脸又说，“这小怪物不会放我走的。”“可您自己并不想获得自由！”K.喊道，并抓住大学生的肩膀。大学生转过脸来想用牙齿咬他的手。“不，”那女人嚷道，并伸出双手把K.推开，“不，不，别这样，您想到哪儿去了！这会毁了我的，放开他吧，我求求您！他只不过遵照预审法官的命令把我带到他那儿去。”“那就快滚，我永远不想再见到您！”K.感到非常失望，怒气冲冲地说。他朝着大学生的后背打了一拳。大学生踉跄了几步，差一点摔倒，于是松了一口气，抱着那女人以更快的步伐一蹦一跳地走了。K.跟在他

们后面慢慢地走着，终于承认这是他与这帮人打交道时遭到的第一次明白无误的失败。当然，他没有理由因此而胆怯，因为，他之所以失败，是他主动挑起了纠纷。假如他待在家里过正常的生活，他将比这帮人中的任何一个优越一千倍，可以把任何挡他道的家伙一脚踢开。他于是设想了一个最可笑的场面，比如说，这可悲的大学生，这自以为了不起的白痴，这长着罗圈腿的丑八怪跪在艾尔莎的床前，扭曲着双手乞求她的垂青。这想象使他极为满意，于是他决定，一有机会便带大学生去拜访艾尔莎。

出于好奇，K.赶到门口，想看看那女人被带往何处，因为大学生不可能抱着她穿过街道。其实，他们并没有走多远。屋子对面便有一条狭窄的木楼梯，好像通往阁楼。楼梯拐了个弯，无法看到它的尽头。大学生正抱着那女人往上爬，他走得很慢，一面还喘着粗气，因为跑了一阵之后，他已经没多少力气了。那女人朝下面的K.招招手，并不停地耸着肩膀，表明她本人在这次劫持中是无辜的。然而，从她的动作中并不能看出多少遗憾来。K.毫无表情地看着她，好像她是一个陌生人，他既不想在她面前流露出失望，也不想表明他已经轻而易举地克服了失望情绪。

那两个人已经消失了，但K.还站在门口。他不得不承认，那女人不仅背叛了他，而且编造了一个她是被带到预审法官那儿去的谎言欺骗了他。预审法官绝不会坐在阁楼上等着，而那道木楼梯无论怎么看，也不会使人产生多少联想。正在这时，K.发现楼梯边贴着一张小纸条。他走过去，看见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似乎是小孩的笔迹：“法院办公室在楼上”。如此说来，法院的办公室的确就在这幢破败公寓的阁楼上喽？这绝不是一个能让人产生尊敬的机构。这儿的住户属于最穷困的阶层，房间里塞的都是些没用的破烂。假如法院只能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这种地方，便可以肯定它是多么缺钱。想到这一点，一位被告心里无疑会宽松不少。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钱本来是足够的，但官员们把它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不是用到法律事务上去。根据K.迄今为止的经验，这甚至是很有可能的。果真如此，那么，这种贪污行径虽然会被被告看不起，但从根本上说，比法院本身的穷困更让人放心。K.现在也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在第一次审讯时不好意思把被告带到阁楼上，而在一个住户的家里羞辱他。与法官相比，K.处在多么优越的地位！法官只能在阁楼上混日子，而K.在银行里却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外面还有一间客厅，透过大玻璃窗，他可以俯瞰城市的繁华景象。不错，他没有通过受贿和贪污得来额外钱财，也不能让下属给他弄个女人来，但他

心甘情愿地放弃这种卑鄙勾当，至少这辈子不会去干。

当K.站在那张纸条前胡思乱想时，一个男人从楼梯走上来，透过敞开的门向屋里张望——从这儿也能看见更里边的审讯室。过了好一阵，他终于问K.，刚才在这儿是否见到过一个女人。“您是法院听差，对不对？”K.问。“不错，”那汉子说，“啊，您原来是被告K.，我认出来了，欢迎，欢迎。”他出乎意料地向K.伸出手来。“可是，今天并没有宣布要开庭。”他见K.不说话，又补充道。“我知道。”K.说，并端详着法院听差身上的便服，除了普通纽扣，衣服上还有两颗似乎从旧军服上拆下来的金黄色扣子，作为他官方身份的唯一标志。“我刚才还同她讲话来着，可她已经不在了，那个大学生把她抱到楼上预审法官那儿去了。”“您瞧，”法院听差说，“他们老是把她从我身边弄走！今天是星期天，我本来不用干活，可他们为了把我支开，又让我去传达一个毫无用处的通知。当然他们派我去的地方不是太远，我想，要是我抓紧时间，也许还能及时赶回来。我于是赶紧跑到那个办公室门口，透过门缝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喊几声，把口信传了过去，他们差点儿没听懂我的意思。完事之后我又使尽全身力气往回跑，可那个大学生还是抢在了我前面。当然他用不着跑那么远的路，只要从阁楼爬下这条木楼梯就行了。假如我不是怕丢饭碗，早就把他在这堵墙上挤成肉饼了，就在这张纸条边。我连睡觉都梦见这事，我梦见他双臂伸直，手指伸直，两条罗圈腿绕成一个圆圈，站在地板上一点点被挤成肉酱，周围溅满了血。不过，直到目前为止，它只是一个梦。”“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么？”K.微笑着问。“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法院听差说，“现在情况更糟糕了，过去他把她弄走，只是为了自己寻欢作乐，如今他又把她带到预审法官那儿去。当然我早已料到这事迟早会发生。”“难道您老婆一点过错都没有？”K.问，尽管他仍在吃醋，问这话的时候也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感情。“那当然，”听差说，“主要是她的错，她是自己送上门去的。至于预审法官，看见女人就要追。光是在这幢楼里，他因为偷偷溜进别人家里，已经被五户人家赶出来。我老婆是整个公寓里最漂亮的女人，而我又无法自卫。”“假如是这样，那的确没有别的办法。”K.说。“为什么没有？”听差问，“那大学生是个胆小鬼，如果他在动我老婆时狠狠揍他一顿，他就再也不敢了。不过我不能这么干，而别人又不愿帮我，所有的人都害怕他的权势。只有像您这样的人才可以揍他。”“为什么我可以揍他呢？”K.惊奇地问。“因为您已经被起诉。”“不错，”K.说，“正因为这样我更应该怕他才是。尽管他可能对案子的结局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也许会在预审时说对我不利的话。”“这话不错，”听差说，仿佛K.的看法同他的看法完

全一致，“不过，在我们这儿一般来说不审判毫无希望的案子。”“我不这样认为，”K.说，“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一有机会就教训那个大学生一番。”“那样的话，我就得谢谢您了。”听差一本正经地说，似乎并不相信他最大的愿望能够实现。“你们这儿还有一些官员，”K.继续说，“也许是所有的官员，都该挨揍。”“的确如此。”听差说，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然后，他信任地望着K.，尽管他一直很友好，但这种眼神还是头一次出现。他补充道：“其实，大家一直在反抗。”不过，这样的谈话似乎使他有些不安，他不想再继续下去，于是说：“我得到上面汇报去了，您想同我一起去吗？”“我去那儿无事可干。”K.说。“您可以参观一下办公室，谁也不会干涉您的。”“办公室值得一看吗？”K.犹豫不决地问，他突然产生了上去看看的强烈愿望。“当然，”听差说，“我想，您会感兴趣的。”“那好吧，”K.终于说，“我同您一起去。”于是，他跑着上了楼梯，比听差还要快。

进门的时候他差点摔了一跤，因为门后还有一级台阶。“他们不大为公众着想。”他说。“他们什么都不管，”听差说，“您瞧瞧这间候审室。”这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一扇扇简陋的门通往各个办公室。虽然光线无法直接射进走廊，但这里也并非一片漆黑，因为有些办公室靠走廊的墙不是一整块木板，而是一直通到屋顶的木栅栏，栅栏缝里透过一些光。借着这点微弱的光，人们能看见办公室里的职员有的在伏案书写，有的站在栅栏前，透过缝隙看走廊里的人。大约因为是星期天，走廊上的人不多。他们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坐在固定在走廊两边的木长凳上，彼此间的距离大致相等。尽管从他们的脸部表情、态度、胡子的式样以及许多不易察觉的细节来判断，他们显然属于上等阶层，但衣着并不太讲究。由于走廊里没有衣帽钩，他们都把帽子放在长凳下面，大约是相互模仿的结果。坐在离门最近的那几个人看见K.和听差，立即站起身来向他们问候。其余的人见到这一场面，以为也必须这样做，于是在他们从自己身边走过时纷纷从凳子上站起来。他们站得不是很直，弓着背，屈着膝，像沿街乞讨的叫花子。K.等走在后面的听差赶上时对他：“这些人多么谦卑有礼啊！”“是的，”听差说，“他们是被告，全是被告。”“真的吗？”K.说，“这样说来，他们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了。”他朝自己身边一个高个子、身体瘦削、头发几乎全白了的人转过脸去。“您在等什么？”K.十分客气地问。那人没有料到K.会向他发问，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神情十分狼狈，K.对此甚为不解，此人看来饱经世故，应当知道怎样应付各种局面，绝不会轻易变得惊慌失措。可是，此时他连如此简单的问题也不知怎样回答，只好瞧着其他人，仿佛他们有义务帮助

他，仿佛假如没人来帮他解围，谁也别指望从他那儿得到回答。幸亏这时听差走上前去讲了一句使他安心并鼓起勇气的话：“这位先生只想问问您在等什么，您就告诉他吧。”也许听差的声音是他所熟悉的，他稍微镇静了一些：“我是在等……”那人刚说了一句便停下来，显然是想给K.的问题一个确切的回答，但却不知如何措词。旁边的几个人一齐凑上前来围在这人身边。“走开，走开，别把路堵住。”他们稍稍退后了一点，但并未回到原来的位置。直到这时，被问的人才完全恢复平静，甚至脸上有了些笑容地说：“一个月以前我递交了几份有关我的案件的证据，现在等着结果呢。”“看来您作了许多努力。”K.说。“当然，”那人说，“这是我的案子嘛。”“不见得人人都像您这样想，”K.说，“比如，我也被起诉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我从没递交过什么证据，也没干过任何类似的事。您认为这样做有必要吗？”“我说不准。”那人又一次失去了自信。很显然，他认为K.在同他开玩笑，因此为了避免再次出错，还是重复刚才的回答为妙。面对K.那不耐烦的目光，他只好又说：“关于我的案子，我已经交了几份证据。”“您大概不相信我被起诉了吧？”K.问。“哪里，当然相信。”那人说着朝旁边退了几步，说话的口气中却没有相信的成分，只有害怕而已。“您并不真相信我的话，对吗？”K.又问，并不由自主地抓住那人的胳膊，仿佛要逼他相信。对方那副奴颜婢膝的态度使K.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愤怒。他不想弄痛那人，只是用两个手指轻轻捏着那人的手臂，可对方却尖叫起来，好像K.用一把烧红的钳子夹住他似的。这可笑的尖叫声使K.无法忍受。看来那人的确不相信K.被捕了，那样更好。他大概甚至把K.当成了法官。于是，K.同那人分手时故意狠狠捏了他一把，并把他推回到长凳上，然后继续往前走。“大多数被告都这么敏感。”听差说。在他们身后，几乎所有的当事人这时都围到那人身边，好像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人已不再叫唤。一名卫兵走到K.面前。K.主要是根据他身上的佩剑断定他是卫兵的。剑鞘是铝制的，起码从颜色上看是这样。K.对此感到惊奇，并用手去摸了摸。卫兵是听到喊声而走过来询问这里乱成一团的原因。听差想用几句简单的话请他放心，但他坚持要亲自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看到一切正常，他才向听差敬了个礼，匆匆地走了。也许是患风湿病的缘故，他的步伐很小。

K.不再关心卫兵和走廊里的人，因为他走过半条走廊后，发现一条向右拐的通道，通道口没有门。他问听差往这儿走是否正确，后者点点头，他便朝右边拐去。他感到自己总是走到听差前面一两步很不自在，在这种地方，别人很可能把他当成一名在押的囚犯。于是，他常常停下来等听差赶上他。但听差见他站住，也总是停住脚步。最后K.为了结束

这种尴尬的局面，不得不对听差说我已经看清楚这儿的情形了，现在想走了。”“您还没有看到所有的地方呢。”听差极其诚恳地说。“我并不是什么都看，”K.说，他确实有点累了，“我要走了，怎样才能走到出口呢？”“您不至于已经迷路了吧？”听差惊奇地说，“您一直走到拐弯的地方，然后向右拐，沿着走廊一直走，尽头就是门了。”“您带我去，”K.说，“给我指路。这儿的过道密密麻麻的，我可能找不到路。”“这儿只有一条路，”听差面带责怪的神情说，“我不能跟您往回走，我得去交差了。因为您，我已经耽误了许多时间。”“您得送我出去！”K.更加坚决地说，仿佛他终于发现了听差也在欺骗他。“请别嚷嚷，”听差小声说，“这儿到处都是办公室。您如果不想自己往回走，那就再跟我走一段，或者在这儿等着，交完差我很乐意带您出去。”“不，不，”K.说，“我不想再等了，您得马上领我出去。”K.还没来得及看看他所在的地方，周围许多扇木板门中的一扇突然开了。K.抬头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门里，大概是K.的大嗓门引起了她的好奇。她问道：“这位先生有何贵干？”K.看见在她身后较远的地方，一个男人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中向这边走来。K.看了听差一眼，他刚才不是说，谁也不会注意K.吗？而现在，却有两个人冲着他来了。用不了多久，也许所有的官员都会注意到他，问他在这儿干什么。唯一可以使人理解和接受的解释只能是：他是被告，想知道下一次审讯的时间。但他恰恰不想这么解释，尤其是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他上这儿来仅仅出于好奇，或者说只是想证实自己的猜测：这一整套司法制度的内部和它的外部一样令人厌恶，而这样的解释他就更加无法说出口。实际上，他的猜测看来是对的，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调查下去，直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已经使他极为沮丧了。此外，从这些门后随时可能走出一位较高级的官员来，而此时他同任何高级官员的冲突对他都十分不利。他得走了，同听差一起走，或者，如果必要，单独离开这个地方。

他的沉默和犹豫很引人注目。的确，那年轻女人和听差瞪大眼睛瞧着他，好像他身上即将出现某种重大变化，而他们决不想错过亲眼目睹这一变化的机会。K.刚才远远地看到的那个男人此刻站在走廊尽头，扶着低矮的门框，踮起脚尖轻轻晃动，好像一位好奇的观众。那女人首先发现，K.的反常神态是由于身体稍感不适引起的，便搬来一把椅子问道：“您是否想坐下？”K.立即坐了下去，胳膊靠在椅背上，想坐得安稳些。“您觉得有点头晕，是吗？”她又问。她的脸凑近他，露出严肃的表情。许多女人在她们最美好的年龄表情往往是很严肃的。“不必担心，”她说，“在这种地方，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差不多每个初来此地的

人都有类似的状况。您是第一次来吧？看得出来是这样。那么，用不着紧张。太阳烤着房顶，房梁给晒得滚烫，所以空气又闷又热。这地方的确不适宜做办公室，尽管有几个很大的优点。这儿空气污浊，尤其是当事人很多的时候，叫人简直透不过气来，而当事人差不多天天都挤得满满的。如果您再想想，各种乱七八糟的衣服洗了都要拿到这儿来晾干——您总不能不让住户们上这儿来晾衣服——您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会头晕了。不过，久而久之就会习惯的，您只要来过一两次，就再不会感到透不过气来了。您觉得好点了吗？”K.没有回答，他为自己突然头昏眼花，在这些人的面前出了洋相而羞愧。此外，他现在虽然知道了头晕的原因，但并没觉得好受些，相反却更加难受了。那姑娘马上看出了这点，顺手拿过靠在墙边的带钩的长棍，捅开了K.头顶上的天窗，好让新鲜空气进来。可是，大量的煤烟马上涌了进来，她不得不重新关上天窗，并用自己的手帕把K.的双手擦干净，因为K.已经虚弱得无法照顾自己了。K.真想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等体力恢复了再离开，也许，这些人越少来麻烦他，他的体力恢复得就越快。然而，那姑娘却说：“您不能待在这儿，我们妨碍别人走路了。”K.露出疑惑的神色，不明白自己到底妨碍谁走路了。“如果您愿意，我可以送您到病房去。请帮我一下。”她对站在门口的那男人说。后者马上走了过来。可是，K.不愿去病房，不想被带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走得越远，他心里就越感到厌恶。“我已经可以自己走了。”说完，他想从舒适的椅子上站起来。也许是坐久了，乍一站起来，他的两腿不停地颤抖，简直无法站直。“看来还不行。”他摇着头说，并重新坐了下去。他想起了听差，不管怎样，这家伙倒可以扶他出去。可是，听差早就不见了。K.透过姑娘和那男人身体的缝隙寻找着，但没发现听差的影子。

“我想，”那男人说，“这位先生感到不舒服是因为这儿空气不好的缘故，最好的办法是——他可能也最希望——别把他带到病房去，而是送他离开办公室。”他穿着考究，特别是那件时髦的灰色背心十分显眼，背心下襟是两个又细又长的尖角。“说得对，”K.大声说，兴奋得立即打断那人的话，“我肯定只要离开这儿，就会立即好的。我并不是真的很虚弱，只要有人扶我一下就行了，不会给你们添很多麻烦，也用不着走很远。只要扶我到门口，我再在楼梯上坐一会儿，体力很快就会恢复。我从没有得过这种病，这一次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也是一名职员，对办公室的空气早已适应，但这儿的空气实在太坏了，刚才你们自己也这样说。你们能不能行个好，扶我走一段？我有点头晕，一站起来就恶心。”他抬起胳膊，好让他们搀着他走。

可是，那男人并未满足K的要求，双手仍安安稳稳地插在裤子口袋里，并大声笑了起来。“您瞧，”他对姑娘说，“我说对了吧，这位先生只是在这儿才感到不舒服，在别的地方就没有事。”姑娘也笑了起来，但用手指尖轻轻戳了戳那人的手臂，仿佛他跟K开的玩笑有点过头了。“您想到哪儿去了，”那人仍在笑，“我当然愿意扶这位先生出

去。”“那就好，”姑娘说着歪了歪那漂亮的头。“别介意这位先生刚才开的玩笑。”姑娘对K说。此时，K又变得沮丧起来，呆呆地坐在那里，其实，他并不需要什么解释。“这位先生——我可以把您介绍给他吗？”（那人挥了挥手，表示同意。）“这位先生是问讯处的官员，他解答在这儿等待消息的被告提出的任何问题。由于公众不大了解我们的诉讼程序，总是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他对每个问题都能给予回答。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考一考他。当然，这并不是他唯一的长处，他还有另一个优点，那就是他那身时髦的衣服。我们，也就是全体官员，有一次做出决定，认为问讯处的官员总是第一个跟被告打交道，因此必须穿得漂亮些，以便给人留下威严的最初印象。我们其他人的衣着都很寒酸、陈旧，这您大概已经看出来了。另外，对我们来说把钱花在穿着上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几乎不出办公室，甚至睡都睡在这里。不过，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大家认为问讯处官员衣着漂亮是十分必要的。遗憾的是，管理处在这方面非常奇怪，居然一毛不拔，所以我们只好大家凑点钱——当事人也纷纷捐款——给他买了这身时髦的衣服和其他行头。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打算给人一个好的印象，而他却用他那该死的笑声把这一切给毁了，把人都吓跑了。”“的确如此，”那人嘲讽地说，“可是不明白，小姐，您干吗要把我们的内部秘密一股脑儿告诉这位先生，或者更确切地说，硬灌进他的耳朵？他根本就不想听。您瞧，他这会儿正想着自己的心事，压根儿没有兴趣听您的唠叨呢。”K没有精力去反驳他的话，姑娘的用意可能是好的，她大概想让K开开心，或者乘此机会养养精神，但她的办法失灵了。“我只不过想向他解释一下您笑的原因，”姑娘说，“可您使我感到难为情。”“我相信，只要我们扶他出去，他对这一切都不会介意的。”K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抬眼望他们一下，任凭他们议论他，仿佛他是一件物品。说实在的，他倒是希望他们一直议论下去。然而，他突然觉得那男人的手扶起他的一只胳膊，那姑娘的手则搀着他的另一只胳膊。“那么起来吧，你这虚弱的家伙。”问讯处官员说。“多谢二位！”K大喜过望地说，并慢慢地站起身来，将两个陌生人的手移到他觉得最需要支撑的位置。“看起来，”当他们走进过道时，姑娘在K的耳边悄悄说，“我好像在说问讯处官员的好话，不过您可以相

信，我说的是真话，他的心肠确实不坏。他没有义务将生病的当事人扶出去，可是像您看到的这样，他却十分乐意地做了。也许我们这儿的人心肠都不坏，愿意帮助所有的人，但我们是法院的人，人们很容易根据表面现象断定我们心肠狠，不肯帮助别人，这使我很伤心。”“您不想在这儿坐一会儿吗？”问讯处官员问。他们已经走到了过道中央，面前正好坐着刚才同K.交谈过的那个被告。K.觉得很尴尬，刚才他在那人面前胸脯挺得那么高，现在却被两个人搀扶着，他的帽子被问讯处官员用一只手指挑着转圈，他的头发也蓬乱地垂在满是汗水的额头上。可那名被告似乎什么也没发现，他谦卑地站在东张西望的问讯处官员面前，一个劲儿为自己待在这里而道歉。“我知道，”他说，“我的申请今天还不会有结果，而我还是来了。我想，我一定得等下去，今天是星期天，而我有的是时间，我不会打扰任何人。”“您用不着道歉，”问讯处官员答道，“您的细心确实值得称赞。虽然您在这儿占了不必要的地方，但我并不想阻止您在这条走廊里及时了解您的案子的进展，只要您不碍我们的事。可耻地玩忽职守的人见得多了，人们也就学会了忍受像您这样的人了。您请坐下吧。”“瞧他多么善于同被告讲话！”姑娘小声说。K.点点头，但同时又吃了一惊，因为此时问讯处官员问他：“您不想在这儿坐一会儿吗？”“不，”K.说，“我不用休息。”虽然他的口气很坚定，但实际上很想在这儿坐一坐。他好像置身于一條在大浪中颠簸的船，翻滚的波涛冲击着两边的墙壁，过道深处仿佛传来海水咆哮的声音，过道本身好像要翻转过来，而坐在两边的当事人似乎一会儿被淹没，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搀扶他的姑娘和问讯处官员却是那样平静。这使他简直无法理解。他现在全靠他们支撑，假如他们松手，他一定会像一块木板一样倒下去。他们的小眼睛目光敏锐地打量着周围，K.感觉到他们均匀的步伐，但他却没有迈步，因为此刻他几乎是被他们架着往前挪。他终于发现他们在对他讲话，但讲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懂，他耳朵里灌满了噪声，其中一种汽笛般尖厉的声音经久不息。“请大声些。”他垂着头说。他感到难为情，因为他知道，他们讲话的声音已经够响了，而他仍然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终于，他面前的墙好像裂成两半，一股清新的风向他涌来，他听见身边有一个声音说：“他开始坚决要走，可后来你向他讲一百次，告诉他们就在他面前，他也一动不动。”K.发现自己就站在大门口，门是那姑娘打开的。他的力气仿佛一下子恢复了，他要先享受一下自由的乐趣，于是伸出脚去走下一级台阶，向搀扶他的两个人告别，他们现在正俯身看着他。“太谢谢你们了，”他反复说了几次，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们握手，直到他看出，他们的确只习惯于办公室里的

空气，一接触到从楼梯口涌来的比较新鲜的空气就不舒服时，才松开。他们简直连回答他道谢的力气都没有了，假如K.不赶快把门关上，那姑娘很可能会昏倒在地。K.又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掏出口袋里的镜子，把头发理好，并捡起下面那级楼梯上的帽子——很可能是问讯处官员扔在那儿的——然后便迈着轻快的步子快步跑下楼梯。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连他自己也有点害怕了，他的身体一向很结实，从未出过今天这样的毛病，难道他体内酝酿着一次剧烈的变革，以迎接一次新的考验？直到目前为止，他对旧的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考虑下次是否去看医生，无论如何，他打定主意今后一定要把星期天上午的时间用在比今天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在这方面，他还是拥有自主权的。

第四章 毕斯特纳小姐的女友

在以后几天中，K.发觉很难同毕斯特纳小姐搭上话，甚至打个招呼也不可能。他千方百计接近她，但她总是设法避开。下班后他立即回家，待在他的房间里连灯也不开。他坐在沙发上，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前厅里的一举一动。如果女仆从他门前走过，顺手关上他那间似乎没人的房间的门，过一会儿他便会重新把它打开。每天他比平时早一个钟头起床，希望能在毕斯特纳小姐上班前同她单独待一会儿。但是，这些办法没有一个奏效。他于是给她写信，往她办公室寄，往她家里寄。信中，他一再为自己的行为解释，表示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他的鲁莽行为，并保证今后决不越出她所规定的界限。他请求她给他一次同她讲话的机会，因为不同她事先商量，他无法和格鲁巴赫太太谈妥任何事情。最后他告诉小姐，下星期天他整天都在屋里待着，等候她的回音，希望她或者答应他的请求，或者至少解释一下，尽管他已保证对她言听计从，为什么她还是不愿见他。信没有退回，但也没有回音。不过，到了星期天，他倒是得到了一个意思明白无误的信息。一大早，K.透过自己房门上的钥匙孔发觉前厅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忙碌。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一名教法语的女教师搬进了毕斯特纳小姐的房间。这是个德国姑娘，名叫蒙塔格，瘦弱，脸色苍白，脚有点跛。直到昨天，她还是单独住一间房。她在前厅来回走动，整整忙碌了几个小时。看来她总是丢三落四，不是忘了一件内衣，就是忘了一块床单或一本书，必须专门再跑一次把它拿到新房间去。

当格鲁巴赫太太给他送来早餐时——自从那次惹K.生气后，她一直亲自伺候他——K.忍不住打破他们之间五天来的沉默。“今天前厅里为什

么这样吵？”他一面倒咖啡一面问，“不能安静一下吗？干吗非要在星期天搬家？”K.虽然没有抬眼看格鲁巴赫太太，但明显地感到她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尽管K.问得很严厉，她却认为K.已经原谅了她，至少开始原谅她了。“不是搬家，K.先生，”她说，“只不过蒙塔格小姐搬到毕斯特纳小姐房间去住而已。”她没有往下说，而是等K.的反应，看他是否允许她继续说。但K.却故意折磨她，一声不响地用小勺搅着咖啡，好像在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看着她说：“您已经打消了对毕斯特纳小姐的怀疑吗？”“K.先生，”格鲁巴赫太太大声说，她正等着这个问题，她把扭在一起的双手伸向K.说，“您把我随便说说的话看得过于认真了，我从没想过要得罪您或是别的人。您认识我已经很久了，K.先生，应当相信这一点！您不知道这些天我是多么难受！我怎么会说房客坏话！而您，K.先生，竟相信了这事！您还说，我应当让您搬走，让您搬走！”最后一句话变成了啜泣，她撩起围裙，掩面痛哭起来。

“不要哭，格鲁巴赫太太。”K.说，眼睛望着窗外，心里却想着毕斯特纳小姐，想着她竟然会让一个陌生姑娘搬进自己的房间。“别哭，”他又说了一遍，当他转过身去时，发现格鲁巴赫太太还在哭，“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事看得那么严重，我们彼此误解了，这种情况即使是老朋友之间有时也会发生。”格鲁巴赫太太把围裙从眼睛上移开，想看看K.是否真的息怒了。“好了，就这样吧，”K.说，接着又大胆地加上一句，因为他根据格鲁巴赫太太的表情判断，她的侄子，那位上尉，并没有向她透露任何事情，“您真的认为，我会为一个陌生姑娘同您作对吗？”“我正是这样认为的，K.先生，”格鲁巴赫太太说。只要她稍微觉得轻松点，准会说些不合适的话，这是她的不幸，“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K.先生要这样为毕斯特纳小姐操心呢？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自己讲出来的每一句不大好听的话都会使我失眠，还要为了她和我吵架呢？况且关于这位小姐，我只讲了亲眼看到的事实而已。”对此K.没有说什么，当她讲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应该把她赶出屋去，可 he 不想这么做。他只顾喝自己的咖啡，让格鲁巴赫太太自己觉察出她待在这里是多余的。他又听见蒙塔格小姐在外面来回走动的声音，她正在一瘸一拐地从前厅的这一头奔到那一头。“您听见了吧？”K.指着门说。“当然，”格鲁巴赫太太说着叹了口气，“我想帮帮她，让女仆也替她拿些东西，可她十分固执，非要自己动手。我对毕斯特纳小姐的做法感到不解，连我都常常后悔不该把房子租给蒙塔格小姐，而毕斯特纳小姐却让她搬进了自己的房间！”“您不必为此担心，”K.一面说，一面用小勺将杯底的糖块碾碎，“这样您便遭受了某种损失吧？”“那倒没有，”格鲁巴赫太太说，“这件事本身对我甚至还

很有利呢，多出的一间房，我可以让我侄子，那个上尉住进去。我一直担心，过去几天他可能打扰了您，因为我只能将他安顿到您隔壁的起居室里。他向来不大为别人着想。”“瞧您说的！”K.说着站起身来，“根本谈不上打扰。您大概以为我神经脆弱吧，只因为我无法忍受蒙塔格小姐走来走去？听，她现在又往回走了。”格鲁巴赫太太几乎感到绝望了。“K.先生，要不要我去告诉她，让她早些时候再搬剩下的东西呢？假如您愿意，我马上去说。”“可她得搬到毕斯特纳小姐的房间里去！”K.说。“是的。”格鲁巴赫太太说，但她不明白K.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好吧，”K.说，“那就让她把自己的东西搬过去吧。”格鲁巴赫太太只点了点头。这种无声的茫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倔强，显然更加激怒了K.。他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从窗前走到门边，又从门边走回到窗口，想以这种方式阻止格鲁巴赫太太溜出房间。

当K.再一次踱到门边时，有人在外面敲门。进来的是女仆，报告说，蒙塔格小姐想同K.先生讲几句话，请他上餐厅去，她在那儿等着他。K.默默地听女仆说完，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用一种近乎嘲讽的目光看着大吃一惊的格鲁巴赫太太，似乎在说，他早就料到蒙塔格小姐会向他发出邀请，这同格鲁巴赫太太的房客星期天早晨对他的烦扰配合得实在太好了。他让女仆回去转告，他马上去，然后走到衣柜前，换了件上衣。格鲁巴赫太太此时嘟囔着抱怨那女人太不知趣。K.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请她把早点端走。“可您几乎动都没动。”格鲁巴赫太太说。“唉，让您拿您就拿走吧！”K.喊道，他觉得什么都同蒙塔格小姐搅在一起了，事情变得一团糟。

他穿过前厅时，瞥了一眼毕斯特纳小姐关着的房门。蒙塔格小姐没有请他进屋，而是邀请他去餐厅。他没有敲门，一把推开餐厅的门。

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只有一扇窗，地方不大，只能勉强在靠门的两个角落斜着摆两个碗柜。一张餐桌几乎占满了餐室的其他部分，餐桌这头靠近门口，那头一直伸到窗边，几乎让人无法走到窗子跟前。餐具已经摆好，准备供许多人就餐，因为星期天差不多所有的房客都在这里吃午饭。

K.走进餐厅后，蒙塔格小姐沿着餐桌的一侧，从窗口迎面向他走来。他们相互默默点头致意，接着蒙塔格小姐开始说话。像往常一样，她很自然地昂着头。“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我。”K.皱起眉头看了她一眼。“当然认识，”他说，“您在格鲁巴赫太太这儿已经住了很长时间

了。”“但我相信，您对周围的房客不大感兴趣。”蒙塔格小姐说。“不错。”K.说。“您不想坐下吗？”蒙塔格小姐说。他们一声不吭地从餐桌尽头拖来两把椅子，面对面坐下来。但是，蒙塔格小姐马上又站起来，因为她把手提包忘在窗台上了。她一拐一拐地穿过整个餐厅，然后又摇晃着手提包一拐一拐地走回来。“我只不过受我朋友的委托同您说几句话。她本来想亲自来的，可她今天有点不舒服。她请您原谅，让我向您传话。反正她对您说的也不会比我向您说的更多，相反，我倒认为我还能对您多说一些，因为我相对而言要客观一些。您不这样认为吗？”

“那么，您想说什么呢？”K.说，他发觉，蒙塔格小姐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自己的嘴唇，心里不太舒服，“显然，毕斯特纳小姐拒绝了我直接和她谈话的请求。”“是这样，”蒙塔格小姐说，“或者说根本不是这样，是您自己的表达太严重了。一般情况下，别人约您谈话，您当然不能随便答应，也不能轻易拒绝，但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看不出谈话有什么必要。此时此地正是如此。根据您刚才的态度来判断，我似乎可以坦率地谈谈。您写信或传口信，要求我的朋友与您谈话，而我的朋友至少据我猜测，已经知道会谈些什么内容，因此，她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深信这样的谈话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说实在的，只是到了昨天，她才简单地跟我提起这事。她还说，您自己也并不十分看重这种谈话，因为您准是偶然动了这个念头。甚至用不着多解释，您不久就会明白——如果您现在还不明白的话——整个事情是多么愚蠢。我对她说，很可能如此，但我主张，要把事情完全澄清，还是应该让您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主动提出充当你们的中间人。我的朋友犹豫了好久才答应我的建议。我希望这样做也符合您的愿望，因为即使事情很小，只要有一点点误会也会让人不舒服，如果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就像这次一样，那就应该当机立断。”“多谢您了。”K.说，并慢慢站起来，看看蒙塔格小姐，又看看餐桌，然后看看窗外，太阳照着对面的房子。他朝门口走去。蒙塔格小姐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似乎不怎么信赖他。然而到了门口，他们都不得不退了回来，因为门开了，兰茨上尉走了进来。K.第一次离得这么近看到他。上尉个子很高，大约40岁，肥胖的面孔晒得黝黑。他微微欠身，向K.和蒙塔格小姐致意，然后走到后者面前，恭恭敬敬地吻她的手。他动作潇洒，对蒙塔格小姐彬彬有礼的态度与K.对她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如此，蒙塔格小姐似乎并不生K.的气，因为她还想把K.介绍给上尉，至少K.是这样认为的。不过K.并不愿意被介绍，他既不想和上尉也不想同蒙塔格小姐拉近乎，吻手这个举动在他看来意味着他们俩已经串通一气了，目的在于以一种表面看来最无害和无私的

方式阻止他和毕斯特纳小姐接近。K.还看出了更多的名堂，他发觉蒙塔格小姐选择了一种得心应手的、一箭双雕的手段。她夸大了毕斯特纳小姐和K.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首先是夸大了K.约见毕斯特纳小姐这件事的重要性，同时又要手腕，让人以为夸大其词的实际上是K.。她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错了，K.从不喜欢夸大任何事情，他知道，毕斯特纳小姐只是个小打字员，不会长期抗拒他的。在这方面他丝毫用不着考虑格鲁巴赫太太讲过的关于毕斯特纳小姐的那些话。这些他都考虑到了之后，几乎没有告别就离开了餐厅。他想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但蒙塔格小姐的嗤笑从他身后的餐厅里传出来，这使他立即产生一个念头：他可以乘机做一件出乎他们俩——上尉和蒙塔格小姐——意料的事。他朝四周看了看，又仔细听了听，确信所有的房间里都很安静，没有人会来妨碍他。除了餐厅里叽叽咕咕的谈话声和通向厨房的过道里格鲁巴赫太太的声音，四周静悄悄的。看来机会难得，K.来到毕斯特纳小姐的房门前，轻轻敲了敲门。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又敲了一次，仍旧没人答应。她在睡觉吗？或者真的不舒服？或许她知道只有K.才会这样轻轻敲门，因而装做不在家？K.认为她是装做不在家，便重重地敲了一下。最后，由于敲门毫无反应，他小心翼翼地，带着做了一件无理和无益的事的歉疚推开了门。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另外，它同K.前些日子见过的样子几乎完全不同了。墙边并排放着两张床，门背后的三把椅子上堆满了外衣和内衣，一个衣柜的门大开着。看来，毕斯特纳小姐乘蒙塔格小姐在餐厅里同K.谈话的机会溜出去了。K.并不感到惊讶，他丝毫不期待能如此轻而易举地遇见毕斯特纳小姐。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气气蒙塔格小姐而已。当他重新关上房门时，发现餐厅的门开着，蒙塔格小姐和上尉站在门口谈话，这使他大吃一惊。看来，当K.推开毕斯特纳小姐的房门时，他们已经站在那里了。他们压低嗓子，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注视着K.的每一个动作。侃侃而谈的人打量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人时，用的就是这种眼光。虽然他们竭力装出并未注视K.的样子，但他们的目光却对K.是一种威胁。他贴着墙，匆匆地朝自己房间走去。

第五章 打手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K.下班后回家——这天，他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他穿过走廊，朝楼梯走去。只有收发室的两个职员还在一盏白炽灯暗淡的光线下工作。突然，他听见从一间屋子的门后传来一阵呻吟。过去，他一直认为那是一间废物储藏室，但并没有亲自进去看过。他诧异地停住脚步，又仔细听了一下，以证实他是否听错了。开始时什么声音也没有，可是过了一会儿，呻吟声又响起来了。他本想叫一个收发室职员作为证人同他一起去看个究竟，但在无法抑制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猛地一下推开门。正像他一直猜测的那样，这是一间废物储存室，一捆捆没用的旧印刷品和陶制的空墨水瓶乱七八糟地堆在门后。然而，屋里却站着三个男人，由于天花板很低而弓着身子。一个书架上插着一支蜡烛，发出微弱的光。“你们在这儿干什么？”K.惊讶地问，但声音并不高。他们中的一个显然控制着另外两个人，并首先吸引了K.的目光。他身穿一件深色皮外套，脖子、前胸的很大一部分和两只胳膊全露着。此人没有回答K.的问话，另两个人看见K.却大喊起来：“先生，我们得挨鞭子，因为您在预审法官面前告了我们！”直到这时，K.才发现他们原来就是名叫弗兰茨和威廉的看守，而第三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鞭子准备抽他们。“怎么回事？”K.瞪大眼睛看着他们说，“我从来没有控告过你们，仅仅如实讲了我房间里发生的事。当然，你们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先生，”威廉说，而弗兰茨直往他身后躲，以避免那人，“假如您知道我们挣的工资多么可怜的话，您就不会对我们这样苛刻了。我得养活一大家子人，弗兰茨也要娶媳妇，所以各人只好想尽办法多挣些钱。光靠干活就得饿死，白天黑夜拼命干也不行。您的漂亮衣服对我们是个诱惑，我们的确想据为己有，但那种事情是禁止看守们干的，我们做得是不对。不过，囚犯们的衣服历来是看守们的外快，这已经形成传统。请相信事实就是这样，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一个倒霉透顶的囚犯来说，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可是，一旦这种事情公开出去，看守们就得受惩罚。”“你们所说的一切我都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要求惩罚你们，我当时只是在维护一种原则。”“弗兰茨，”威廉转过脸去对另一名看守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这位先生并没有要求惩罚我们吗？现在你也听见了，他甚至不晓得我们得受惩罚。”“别听他们胡说八道，”第三个人对K.说，“惩罚是公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别听他的，”威廉说，但刚一开口就住了嘴，因为他的手被鞭子抽了一下，他赶紧把手凑到嘴

边，“我们挨打，只因为您告发了我们，否则我们就会平安无事的，即使他们知道了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这难道就是公正吗？我们两人，特别是我，已经当了多年的看守，您自己都得承认，从当局的立场来看，我们干得不错。我们本来有晋升的机会，也许不久就能当上打手，就像这个人一样。而他只不过运气好些，没人告发他罢了，因为这样的控告确实少有。可是现在，先生，一切都完了，我们的前程给断送了。我们从此得去做比看守还要低下的工作，并且，现在还得忍受痛苦的鞭打。”“鞭子抽在身上真的很痛吗？”K.一面问，一面仔细看了看打手挥舞着的鞭子。“我们得先把衣服脱光。”威廉说。“原来如此。”K.说，并仔细打量了一下打手，他晒得像水手一样黑，长着一脸横肉，粗壮结实。“有没有办法让这两个人不挨打？”K.问打手。“没有办法。”那人笑着摇摇头。“脱光衣服！”他命令那两个看守，又对K.说，“别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他们怕挨打怕得失去了理智。比如说，”他指着威廉说，“这家伙大谈什么晋升等等，完全是胡说八道。您瞧他有多胖，头几鞭子抽在他身上连印子也没有留下。您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胖吗？他去逮捕谁，准会把谁的早餐吃掉，他大概把您的早餐也吃掉了吧？我说的肯定没错。这样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永远也不会晋升为打手，绝对不可能。”“也有像我这样的胖打手。”威廉一面坚持自己的看法，一面解开裤腰带。“当然没有，”打手用鞭子蹭了蹭威廉的脖子，吓得他一哆嗦，“不许插嘴，赶快把衣服脱下来！”“假如你放他们走，我会重重赏你。”K.说着没有瞧打手一眼便掏出钱包，这样的交易双方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大概打算以后也告我一状吧，”打手说，“好让我也挨一顿打？不，不！”“好好想想吧，”K.说，“如果当初我想让他们受惩罚，我现在就不会用钱来赎这顿打，我可以关上门，闭上眼睛、堵住耳朵回家去。但我不愿这样，而是真的想救他们。假如我当初知道他们会受到惩罚或可能受到惩罚，我就决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罪，有罪的是那个机构，那些高级官员。”“说得对极了！”看守们喊道，但脱得光光的背上立即挨了一鞭子。“倘若你打的是一位高级法官，”K.一面说，一面把重新举起的鞭子压下去，“那我就不会阻止你，相反，会给你一笔钱，让你更加卖力地干这种好事。”“您讲得合情合理，”打手说，“不过我拒绝受贿。我干的活儿就是打人，我要打了。”那个叫弗兰茨的看守大约希望K.的干预能成功，因此原先尽量往后缩，现在却跑到门边。他只穿着裤子，一到K.面前就双膝跪下，拽着K.的手低声说：“既然您无法让他饶恕我们俩，那就想想办法，至少让他饶了我吧。威廉比我大，比我耐打，前几年也挨过打。而我却从来没像这样丢过面子。何

况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威廉教的，不论干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可怜的未婚妻这会儿还在楼下银行门口等着事情的结果呢。我真没有脸去见她。”他在K.的外衣上揩干脸上的泪水。“我不能再等了。”打手说，并用双手举起鞭子，抽了弗兰茨一下。威廉蜷曲在角落里偷偷地朝这边看，连头都不敢转动一下。弗兰茨发出一声凄厉而拖长的尖叫，这声音仿佛不是从人的喉咙里，而是从一架受刑的机器里发出来的，在走廊里回荡，整座楼里大概都能听见。“别叫！”K.大声说，他再也无法忍受，神情紧张地朝职员们可能闻声赶来的方向望去，同时推了弗兰茨一把，虽然没用多大力气，但也足以使这个半失去知觉的人跌倒在地。弗兰茨浑身抽搐，双手抓着地板。这样他也免不了继续挨打。鞭子往躺在地上的他身上雨点般落下，鞭梢随着他在地面上翻滚的频率而有规律地上下挥舞。远处已经出现一名职员，在他身后几步还有另外一名。K.赶快砰的一声关上门，走到附近一扇朝向院子的窗户，把窗子打开。尖叫声完全停止了。为了不让职员们走近，K.大声说：“是我在这里！”“晚上好，襄理先生！”职员们回答道，“出了什么事？”“没什么，没什么，”K.说，“院子里好像有条狗在叫。”看到职员们仍然站着不动，K.又补充道：“你们可以回去工作了。”由于他不想同职员们多谈，便朝窗外探出身去。过了一会儿，当他又向走廊里望去时，发现他们已经走了，但他仍然站在走廊里，不敢回到储藏室去，也不想回家。他看了看窗外，那是一个正方形的小院子，周围全是办公室，所有的窗子都是黑洞洞的，只有最高一层的几块窗玻璃反射出月亮的微光。他朝院子里一个黑暗的角落望去，那里胡乱堆着几辆手推车。他感到内疚，因为没能使看守们免受鞭打，但这不是他的错，如果不是弗兰茨尖叫起来——他肯定很痛，但在紧要关头应当挺住——那么他或许能找到别的办法说服打手放过他们。如果这一机构所有下层人员都是无赖，那么，干这种最没有人性的工作的打手又怎么会例外呢？况且K.看得清清楚楚，打手的眼睛一见到钞票立即发亮。他坚持要鞭打那两个可怜虫，无非是想抬高要价罢了。K.绝不会吝惜钱，他真的想解救那两名看守。既然他打算同整个腐败的司法机构作斗争，对这件事进行干预便是他理所当然的义务。但是，在弗兰茨开始叫喊的那一刻，一切努力都白费了，K.不能让职员们和其他人发现他正在储藏室里同那帮人待在一起干那种勾当。不，任何人也不能要求K.作出这样的牺牲。即使需要他作出某种牺牲，他倒情愿脱掉自己的外衣，代替看守们挨打，那样不是简单多了吗？打手当然不会同意K.代替看守们挨打，因为那样一来他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有可能被控严重失职，〔10〕甚至是在两个方面严重失职。因为K.的案子

一天不结束，作为被告便一天受到保护。在这方面有特殊规定。总而言之，K.除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外毫无办法，虽然关上门以后也不能把所有的危险都消除。遗憾的是他最后还推了弗兰茨一把，这只能归咎于他当时很激动。

他听见职员们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为了不引起他们注意，他关上窗户，朝楼梯口走去。经过储藏室时，他驻足听了一会儿，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打手也许已经把两名看守打死了，在他的淫威面前，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K.的手已经触到了门把，但又立即缩了回来，他现在再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况且职员们随时都可能出现。不过，他发誓将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并找出真正的罪犯——那些高级官员，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这帮家伙迄今为止不敢公开露面。他走下银行大门前的台阶时，仔细地察看了所有的行人。然而，即使在附近的街道上也没有见不到一个正在等人的姑娘。弗兰茨声称他的未婚妻在等他之类的话完全是一片谎言。不过这倒是可以原谅，他只是想博得更多的同情而已。

第二天K.仍然忘不了那两个看守。他始终心不在焉，为了完成工作，不得不比头一天在办公室待更长的时间。当他离开办公室再次走过那间储藏室时，他忍不住又推开了储藏室的门。然而，那儿并非一片黑暗，眼前出现的景象使他茫然。每样东西都和他前一天晚上见到的一模一样。一捆捆作废了的印刷品，一个个墨水瓶还堆在门后，手执鞭子的打手和两名脱得光光的看守仍旧在那儿，书架上仍然插着一支蜡烛。看守们一看见K.，立即哀求地喊道：“先生！”K.赶快把门关上，并在门上擂了几下，似乎这样它便会关得更严。他差不多是哭着跑去找职员，他们正安静地在拷贝机旁忙碌。职员们见到他这副样子，都诧异地看着他。“赶快把那间废物储藏室清理干净，”他嚷道，“脏得真让人受不了！”职员们答应第二天马上去干，K.点点头，今天太晚了，他不能强迫他们立即动手，虽然他本来希望这样。他坐下待了一会儿，想和他们做个伴。他翻翻复印文件，似乎他在检查工作。后来，他发现这些人不敢与他同时下班，便拖着疲惫的身躯，脑子一片空白地回家了。

第六章 K.的叔父 列妮

一天下午，当天的函件即将发出时，K.忙得不亦乐乎。两名职员送来几份文件请他签字，然而这时，K.的叔父卡尔——一个农村来的小地

主——走进屋来，把他们粗暴地推到一边。叔父的到来并不使K感到吃惊，因为他早就担心他会来。他迟早会来的，差不多一个月来，K就对此深信不疑。K常常想象叔父的模样，此刻发现他和自己的想象毫无区别：背有点驼，左手拿着一顶揉皱了的巴拿马草帽。一进门，他就扬起右手，鲁莽地隔着办公桌，伸到K的鼻子面前，碰翻了屋里每一样东西。叔父总是很匆忙，因为他脑子里始终有一个可悲的想法：不管什么时候进城，原订计划中的所有事情都得天天办完。另外，他还不放过任何一个跟人交谈、办事和娱乐的机会，而K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帮他办妥所有的事情，有时甚至得给他安排住处，因为他过去是K的监护人，K对他特别感激。“农村来的魔鬼！”K背地里总是这样称呼他。

刚打完招呼，他就要求同K私下里谈一谈——他没有时间在K给他端来的椅子上歇一会儿。“事情紧急，”他气喘吁吁地说，“必须谈一谈，这样我才能放心。”K马上吩咐两名职员出去，并告诉他们别让任何人进来。“我听到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约瑟夫？”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俩时，叔父大声问道。他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拿过几份文件，连看也不看就垫在屁股底下，好坐得舒服点。K一言不发，心里明白将发生什么。猛地从紧张的工作中松弛下来，他感到一阵惬意的轻松。他透过窗子，望着街对面，从他坐的地方只能看见一小片三角地带，这是两个商店橱窗之间一所住宅的外墙。“你倒有闲心看窗外！”叔父挥舞着手臂嚷道，“看在上帝的份上，约瑟夫，回答我的问题！这是真的吗？可能是真的吗？”“亲爱的叔父，”K把目光收回来，说，“我一点也不明白你要我回答什么。”“约瑟夫，”叔父忧虑地说，“据我所知，你向来是说真话的。难道我应该把你刚才讲的话看成是坏兆头吗？”“我猜到了你想知道什么，”K顺从地说，“你大概听说了我被控告的事吧。”“的确是这样，”叔父微微点头说，“我听说了你在吃官司。”“谁告诉你的？”K问。“艾尔娜给我写了封信，”叔父说，“她和你不大来往，而你也不大关心她，这使我非常忧虑。尽管这样，她还是知道了。今天上午我收到信，便立即赶来了。我来这儿没别的原因，不过光是这个原因已经足够了。我可以把她在信中提到你的部分念给你听。”他从皮包里抽出那封信，“在这儿。她写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约瑟夫了。上星期我到银行去找他，可他很忙，我根本见不到他。我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来只好离开那儿，因为我得上钢琴课。我真想同他谈谈，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在我的命名日，他寄给我一大盒巧克力，他真好，考虑得真周到。上次写信时，我忘了把这事告诉你们，现在你们问起，我才想起来。至于巧克力，你们知道，在寄宿学校里很快就不翼而飞了，礼物丢了后，是很难

想起有人曾送过你东西的。不过关于约瑟夫，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我上面说过，我那天在银行里无法见到他，因为他当时正和一位先生谈话。我老老实实等了一会儿以后，问一位职员，谈话是否还要进行很久。那位职员回答说很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也许和襄理先生卷入的一桩案子有关。我问是什么案子，他是不是搞错了。他说没搞错，的确是一件案子，一件很严重的案子，详细情况他也不清楚。他本人当然很愿意为襄理先生帮忙，因为襄理先生是个善良正直的人，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他，只好祝福有影响的人物站在他一边替他讲话。不过，事情肯定会顺利的，结果一定会很圆满，只是目前根据襄理先生的情绪来推测，情况似乎不妙。我当然不会把这位职员的话看得过于严重，劝那位头脑简单的先生放心，并请他别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我相信他的话不过是无稽之谈而已。尽管如此，亲爱的父亲，你下次进城去看他的时候如果能详细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更好些。你会轻而易举地查明事实真相，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请你那些有影响的熟人进行干预。即使这一切是多余的——事情很可能如此——那么，你至少也可以给你女儿一个不久便能拥抱你的机会，对此她将会十分高兴。’真是个好孩子。”叔父念完信以后说，并揩干眼里的泪水。K.点点头，近来他由于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完全把艾尔娜给忘了，甚至连她的生日都忘了，至于巧克力的事，那完全是瞎编的，为的是在叔叔和婶婶面前给他留点面子。这真是令人感动，他打算从现在起定期给她送戏票，以示回报，这当然是不够的。但是，到寄宿学校去看她，和一个18岁的小女孩聊天，他觉得在目前情况下也不太合适。“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叔父问，女儿的信使他忘记了匆忙和不安，仿佛他仍然在重读那封信。“不错，叔父，”K.说，“这是真的。”“真的？”叔父惊呼道，“怎么会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这是一件什么样的案子？不会是一桩刑事案件吧？”“的确是一桩刑事案件。”K.答道。“既然是一件刑事案件，你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叔父嚷嚷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我越是镇静，事情的结局就越好，”K.疲倦地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你的这个要求可真妙，”叔父大声说，“约瑟夫，亲爱的约瑟夫，为你自己想想，为亲戚们想想，为我们家族的名声想想吧！你一直是我们的骄傲，可不能给我们抹黑啊！你的这种态度，”他歪着头望着K.说，“使我很伤心，没有一个理智的被告会采取这种态度的。赶快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好给你帮忙。准是和银行有关，对吧？”“不对，”K.说着站起身来，“你的声音太大，听差们准站在门外偷听呢。亲爱的叔父，我可不喜欢这样。我们最好还是到外面去谈，我会尽量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很清楚，

我应当向全家人作出解释。”“很好，”叔父嚷道，“好极了！那就赶快，约瑟夫，快走。”“我还得交代几件事。”K.说完便打电话请他的助手来。几分钟后助手就到了。情绪激动的叔父打了个手势，说明是K.叫他来的，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K.站在办公桌旁，小声地向这个年轻人解释应当怎样处理他手中的几份文件，后者冷静而专注地听着。紧接着，K.又告诉助手他不在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叔父睁大眼睛，咬着嘴唇在一旁站着，使K.觉得很不自在。其实他并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但他那副似乎在听的神态就足以使K.心烦了。接着，他又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时地在窗前或一幅画的前面停下来，嘴里冒出一句话，如“简直不可理解”或“天晓得事情会怎么样”。年轻的助手装做什么也没觉察到，聚精会神地听着K.的指示，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下点什么。K.讲完后，助手向K.和叔父微微鞠了个躬，便离开了办公室。但此时叔父正好背对着他，双手抓住窗帘，望着窗外。门刚关上，叔父便嚷道：“这笨蛋终于走了，现在我们可以出去了，谢天谢地！”他们来到大厅，那里站着几个职员和仆役，副经理正好也迎面走来。急不可待的叔父在这里便想打听案子的情况。倒霉的K.没法让他住口。“我说约瑟夫，”叔父开口说，大厅里的职员向他们鞠躬致意，他点点头表示回答，“现在坦率地告诉我，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案子？”K.似是而非地回答了几句，笑了笑，直到下楼时才向叔父解释，他不愿当着下属的面谈论这件事。“不错，”叔父说，“可是现在全都说出来吧。”他抽着一支又短又粗的雪茄，歪着头仔细听着K.的叙述。“首先要说明的是，叔父，”K.说，“这不是一件由普通法院受理的案子。”“糟透了。”叔父说。“什么？”K.看看叔父问。“我说糟透了。”叔父重复道。他们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由于门卫好像在听他们讲话，K.拉着叔父走下台阶，汇入到街上的人流之中。叔父挎着K.的胳膊，不再急于打听案情。在他们默默地走了一阵之后，叔父突然停下脚步，向K.提出一个问题——走在他后面的人吃了一惊，赶紧避开——“但是，这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类事情不会突如其来，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先肯定有某种征兆。你为什么写信给我？你知道，我得为你的一切操心，在某种意义上，我仍然是你的监护人，直到今天还为此而自豪。我当然会尽力帮助你的，但现在由于案子已经开始审理，我就很难帮上忙了。无论如何，你最好请几天假，到我们乡下来住一段时间。我发现你比以前瘦了，在乡下就能恢复过来。这对你会有好处，因为很快你就要全力应付审讯了。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暂时避开法院的纠缠，他们在这儿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机器，肯定会开动起来对付你。可是你如果在乡下，他们要找你就得派人来，或者发信，拍电报，

打电话来。那样，效果自然就差多了。虽然你不能彻底摆脱他们，但至少可以松一口气。”“可他们也许会禁止我离开。”K.说，他有点被叔父的建议打动了。“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叔父沉思地说，“况且，你的离开并不会对他们的权力造成多大的损害。”“我本来以为，”K.拽住叔父的胳膊，让他别站着，“你比我更加不在乎这个事，可现在看来，你把它看得很严重。”“约瑟夫！”叔父嚷道，想挣脱开来继续站在原地，但K.没有松手，“你变了，你的头脑向来很清醒，现在怎么变糊涂了？你想输掉这场官司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彻底完蛋！而你的亲戚也会跟着倒霉，至少蒙上耻辱，名誉扫地。约瑟夫，你得振作起来，你这种无所谓的态度简直叫人发疯。别人一看到你这副样子，就会想起那句老话：‘遇上这样的官司，还没打就输了。’”

“亲爱的叔父，”K.说，“激动是没有用处的，不但对你，而且对我都一样。靠激动是打不赢官司的。我一向很尊重你的实际经验，现在也仍然如此，虽然你的突然来访使我吃惊不小。可是，请你也听听我的实际经验吧。既然你说，由于这件案子全家都会跟着倒霉——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不过这无关紧要——那我就听从你的劝告。可是我觉得，到乡下去即使你的本意是好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畏罪潜逃，换句话说，等于承认自己有罪。此外，虽然我在这儿受到的压力比较大，但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说得对，”叔父用一种赞同的口气说，似乎他们终于想到一块了，“我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我觉得，假如你待在这里，事情会由于你那无所谓的态度而搞糟，与其这样还不如我来替你活动。假如你愿意自己努力为案子奔走，那当然更好。”“这样我们的意见就一致了，”K.说，“关于我首先应该做什么，你现在有什么建议吗？”“我当然还得把整个事情好好想一想，”叔父说，“你知道，我在乡下已经住了20年，几乎从未离开过，因此在处理这种事情上的眼光不像过去那样敏锐了。我在乡下很少同别人来往，许多重要的联系都断了。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在这类情况下或许比我内行，但天长日久，我同他们的关系已经疏远。只是发生了眼下这样的紧急情况，我才意识到这样做的害处。另外，你的事来得太突然，在接到艾尔娜的信以后我就猜到出了什么事，今天一见到你，我就差不多完全肯定了。不过这些都是废话，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别再浪费时间。”还在讲话的时候，他便踮起足尖，招手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此刻，他大声地将地址告诉司机，然后钻进汽车，并把K.也拽进去。“我们去找胡尔德律师，”他说，“他是我的同学。你肯定知道他的名字，对吗？不知道？真有点奇怪！作为辩护律师，穷人的律师，他的名声很大呢。不

过，我之所以特别信任他，是因为他很有人情味。”“无论你怎么做，我都没有意见。”尽管叔父处理事情的仓促和轻率使他有些不快，他仍然这样说。作为一个有求于人的人被带到一个替穷人说话的律师那儿去，他觉得很不是滋味。“我原先不晓得，”他说，“在这类案件中还可以聘请律师。”“当然可以，”叔父说，“这还用说！为什么不可以？现在把直到目前发生的事全告诉我，好让我心中有个数。”K.开始讲述事情的前后经过，一个细节也没有隐瞒，因为只有绝对坦率，才是对叔父所声称的这件案子带来的奇耻大辱的一种抗议。毕斯特纳小姐的名字K.只捎带着提起过一次，这并不说明他不坦率，而是因为小姐与案子没有什么关系。他一面讲，一面透过车窗看着外面。他发现他们已经驶入郊区，而办公室设在阁楼上的那所法院恰恰坐落在这一带。他提醒叔父注意这个事实。但叔父似乎不大理会这个巧合。出租车在一幢深灰色的房子前面停下。叔父按了按底层第一户人家的门铃。当他们等人来开门的时候，叔父露出他的大板牙笑着在K.耳边说：“现在是八点钟，委托人很少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他，不过胡尔德不会见怪的。”门上的观察孔里露出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打量了两位来访者好一阵后又消失了，但门并没有开。叔父和K.相互证实，他们确实看到了那双眼睛。“一个新来的女仆，大概害怕生人。”叔父说，接着又敲了敲门。那双眼睛再次出现，眼神似乎有点忧伤，但这也许是那盏没有罩的煤气灯造成的错觉。煤气灯正好照着他们的头顶，发出刺耳的嘶嘶声，光线却十分暗淡。“快打开门！”叔父擂着门喊道，“我们是律师先生的朋友！”“律师先生病了。”在他们身后有人小声说。这条窄窄的走廊尽头的另一扇门里站着一个穿睡衣的男人，压低嗓门告诉他们。由于等得太久而怒气冲冲的叔父猛地转过身去冲他嚷道：“病了？您说他生病了？”并气势汹汹地朝那人走去，仿佛那人就是疾病的化身。“门已经开了。”那人指着律师的门说，接着裹紧睡衣进了屋。门的确开了，一位年轻姑娘——K.认出了那双微微凸起的黑眼睛——系一条白色的长围裙，手里拿着一支蜡烛站在门里。“下一次开门麻利点！”叔父没有问候，而是教训她说。她行了个屈膝礼。“来吧，约瑟夫。”他对K.说。K.慢慢地从姑娘身边走过。“律师先生病了。”由于叔父眼也不抬地径直朝里屋走去，那姑娘又说。K.仍在打量她，而她正转过身去把大门关上。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不仅双颊和下巴，而且太阳穴和前额也是圆的。“约瑟夫！”叔父又喊道，接着问那姑娘：“是心脏病吗？”“我想是的。”姑娘端着蜡烛，走在他前面说，并把里屋的门打开。在烛光照不到的一个屋角里，一张蓄着长胡子的脸从枕头上抬起来。“列妮，谁来啦？”律师问，他被烛光照花了眼，看不清来客。“是你

的老朋友阿尔伯特。”叔父说。“噢，是阿尔伯特。”律师说着又躺到枕头上，好像没有必要在客人面前强打精神。“真的很不舒服吗？”叔父一面说，一面坐到床沿上，“我可不大相信。不过是心脏病又一次发作而已，像前几次一样，很快就会过去的。”“也许吧，”律师小声说，“可这次比过去每一次都厉害，连呼吸都困难，根本睡不着觉，身上一天比一天没劲。”“是这样，”叔父那只粗壮的手将巴拿马草帽使劲压在膝上说，“那可真糟糕。那么，佣人对你的照顾周到吗？这儿看上去阴沉沉的，光线太暗。我上一次到这儿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这里的气氛似乎好得多。另外，你这位佣人小姐好像不大开心，也许她是装的。”姑娘仍然端着蜡烛站在门边，从她那闪烁不定的目光来推测，她更多的是在看着K，而不是他的叔父，即使后者在谈论她的时候，她也并未转过头来。K这时已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她的身旁，舒服地靠在椅背上。“谁要是像我一样得了病，”律师说，“就需要安静。我并不觉得这儿阴沉沉的，”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列妮对我照料得很好，她是个好姑娘。”〔11〕但叔父似乎并不相信，他对这个女看护显然抱有成见，虽然没有反驳病人的话，但却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那支蜡烛。她走到床前，把蜡烛放在床头柜上，朝病人俯下身去，一边摆好枕头，一边对他轻声说着什么。叔父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病人的房间里，他猛地站起身来，在姑娘身后踱起步来。假如这时他抓住姑娘的裙子，把她从床边拖开，K，也不会感到奇怪。作为旁观者，K静静地看着这一场面，律师生病对他来说并不是坏事。叔父对他的案子的关心过于热情，而他又没法拒绝这种关心，现在，用不着他出面，叔父的热情便遭到了挫折，这无疑是他愿意看到的。然而，大概是想使女看护难堪，叔父突然说：“小姐，请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我和我的朋友有点私事要商量。”姑娘这时正俯下身，把靠墙那一边的床单抚平，听了这话便侧过头心平气和地说：“您已经看到，我的主人病了，不能商量任何事。”这与叔父那充满怒气，结结巴巴，然后又忽然变得十分流利的语调形成鲜明对比。或许，仅仅是出于省事，她才重复了叔父使用过的字眼，但即使在旁观者看来，这也似乎是反唇相讥。叔父像被黄蜂螫了一下，顿时暴跳如雷。“见你的鬼去吧！”由于激动，他口齿不清地骂道。K吃了一惊，他虽然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仍感到十分突然。他站起身来向叔父奔去，想伸出双手堵住他的嘴。幸好这时姑娘身后的病人在床上坐了起来。叔父做了个鬼脸，仿佛吞下了什么令人厌恶的东西，接着用较为平静的口气说：“我们当然还没失去理智。假如我所要求的事根本办不到，我是不会提出要求的。现在请您走吧。”姑娘直起腰来站在床边，转过身

来面对叔父，一只手仍然抚摩着律师的手，至少K.是这样认为的。“你可以当着列妮的面谈任何事情。”病人用恳求的语调说。“这事与我无关，”叔父说，“并不是我的秘密。”他转过身去，好像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却给律师一个考虑的机会。“那么是关系到谁呢？”律师重新躺下，有气无力地问。“我的侄子，”叔父说，“我把他带来了。”他开始作介绍：“银行襄理约瑟夫·K。”“噢，”病人活跃多了，并向K.伸出手来说，“请原谅，刚才我没看见您。你走吧，列妮。”他对女看护说，并同她握了握手，好像要同她分别很久似的。列妮顺从地走了。“这么说来，”律师终于对叔父说，后者这时已息了怒，走到病人床前，“你并不是来看望我，而是有事找我。”仿佛一想到别人是来看望一个病人自己就病得快死似的，律师这会儿显得好多了。他支着双肘靠在床上，一只手伸进胡须中不停地捋着，缠绕着，这当然是很累的。“那个小妖精一走，你的病看上去就轻了不少。”叔父说。他突然住了嘴，然后悄悄地说：“我敢打赌，她在门外偷听。”他奔到门口看了看，但门外一个人都没有。他又走回来，一点也不觉得难堪，因为他认为她不偷听肯定是出于更大的恶意，于是便恼怒地说：“这该死的巫婆！”“你对她不公道。”律师说，不再为姑娘辩护，也许想要表明，她根本用不着别人替她辩护。接着，他用关切得多的口吻说：“至于你侄子的事情，假如我微薄的力量能够胜任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当然会感到很荣幸，不过，我担心我的力量有限，但无论如何，我会尽全力的。如果我一个人不能成功，还可以请别人来帮忙。老实说，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决不会放弃过问它的机会。即使我的心脏支持不住，我也至少会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一个值得的理由让它完全衰竭。”这番话K.连一个字也没听懂，他看了看叔父，希望能从他那儿得到解释，但叔父手里拿着蜡烛坐在床头柜上。一只药瓶从床头柜上滚了下来掉在地毯上。不管律师说什么，叔父都点头，仿佛完全同意律师所说的一切。有时，他还瞥K.一眼，似乎要求K.也表示赞同。难道叔父已经把这件案子的所有情况都向律师谈了吗？但这是不可能的，今天发生的事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不明白……”于是他插话道。“嗯，难道我误解了您的意思？”律师问，同K.一样惊奇和困惑，“也许我太性急了，您究竟要同我谈什么呢？我想，是关于您的案子？”“当然是的，”叔父说，并转过头去问K.，“你想说什么？”“不错，可是，您是从哪儿听说我和我的案子的情况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律师笑道，“我是一名律师，同司法界有来往，他们经常谈起各种各样的案件，其中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案子，尤其是一位老朋友的侄子的案子，自然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你到底

想说什么？”叔父又问，“你看上去有些不安。”“您同司法界来往？”K.问。“当然。”律师说。“你的问题就像小孩子问的。”叔父说。“我如果不和我的同行来往，那该跟谁来往呢？”律师补充道。这话听起来无可非议，K.无言以对。“不过，您准是同司法大楼里的那家法院有来往，而不是设在阁楼上的那一家。”他本来想这么说，但没有说出口。“您应该想到，”律师以一种似乎在解释一件不言而喻的、多余的事的口吻淡淡地说，“您应该想到，从这样的交往中，我能为我的委托人争取到很多便利条件，而且是各方面的便利条件，这当然不便公开说明。现在由于我病了，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在法院工作的好朋友来看我，我可以从他们嘴里了解很多情况，也许比一些身体健康，成天待在法院里的人知道的还要多。比如，现在就有一位好朋友在这儿。”他朝屋里一个黑暗的角落指了指。“在哪儿？”K.吃了一惊，有些唐突地问。他半信半疑地朝四周看了看。小蜡烛的光根本照不到对面的墙，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的确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叔父把蜡烛举过头，借着烛光，他们看到一位年事已高的先生坐在屋角的一张小桌旁。他大概连气也没有喘，以至待了那么久居然没被人发现。此刻，他缓缓地站起身来，显然为自己被人发现而感到不快。他的双手像鸟的翅膀一样上下摆动，仿佛表示他拒绝任何介绍和寒暄，似乎在示意他不愿因为自己的在场而打扰别的先生，并恳求让他重新回到黑暗中，别人最好把他忘掉。但他再也无法享受这种权利了。“你们的来访太突然了，”律师解释道，并向那位先生招了招手，请他上前来。那人慢慢挪动脚步，犹豫地看着四周，但仍摆出一副高傲威严的架势，“法院办公室主任先生……啊，请原谅，我还没有作介绍，这是我的朋友阿尔伯特·K.，这位是他的侄子，银行襄理约瑟夫·K.，这位是法院办公室主任先生。法院办公室主任先生今天屈尊来看我，这次探望的价值只有熟悉法院内情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因为只有他们才懂得办公室主任先生是多么忙。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抽空来看我。在我的病体尚能坚持的情况下，我们平静地交谈着。我们没有禁止列妮将来访者放进来，因为没有料到会有人来。不过我们确实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们。可后来传来了你砸门的声音，阿尔伯特，办公室主任先生于是只好把椅子和桌子挪到屋角里。当然现在，我们有可能，我是说有一种愿望商谈一件与大家都有关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坐在一起吧。办公室主任先生。”律师面带谦恭的微笑，侧着头对那人说，并指了指床边的一张靠背椅。“遗憾的是我只能再待几分钟，”办公室主任客气地说，在靠背椅上大摇大摆地坐下，又看了看表，“我还有公事。不过我不愿错过在这里认识一位我朋友的朋友的机

会。”他朝叔父歪了歪头。后者看来对结识了这个人而感到满意，但生来不会表示谦恭的他只是用一阵莫名其妙的大笑回答法院办公室主任的这番话。真令人厌恶！K.冷眼看着这一切，因为谁也不去注意他。那位老先生既然已经处在突出地位，便当仁不让地成了谈话的主角，这好像是他的习惯。律师开始时装做身体虚弱，大概只是为了谢绝来客，现在他把手拢在耳朵边，聚精会神地听着。叔父作为执烛人，把蜡烛放在大腿上保持平衡——律师不时投来担心的一瞥——很快便摆脱了尴尬，此刻正兴致盎然地听着办公室主任妙语连珠的演讲，欣赏着他讲话时波浪一般上下起伏的手势。K.靠在床架上——老先生大约有意冷落他，完全把他撇在一边——只有做个单纯听众的资格。可惜他几乎没听懂老先生讲些什么，此外也没有心思听他讲话，脑子里先是想起了女看护，想起叔父对她的粗暴态度，后来又琢磨他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位法院办公室主任：也许初审的时候他就在听众当中吧。即使自己记错了，那么这位胡子硬撅撅的老先生坐在第一排听众当中也是很合适的。

正在这当儿，门厅里传来一阵响声，好像是瓷器被打碎的声音。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K.说，并慢悠悠地走到门口，仿佛想给其他人提供一个叫他回来的机会。他刚走进门厅，伸出手在黑暗中摸索时，一只比他的手小得多的手抓住他仍然扶着门的手，轻轻把门带上了。是女看护，她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没事，”她悄悄地说，“是我往墙上扔了只盘子，想把你引出来。”K.有些尴尬地说：“我也想着你。”“那就更好，”女看护说，“跟我来。”他们走了几步，来到一扇毛玻璃门前。她打开门说：“进去吧。”这里显然是律师的办公室，月光透过三扇大窗子射了进来，照亮窗前地板上一个个小方块。借着月光可以看见屋里摆满了古色古香的旧式家具。“到这儿来。”女看护指着一把深色的雕花靠背椅说。K.一面坐下，一面打量着这间屋子。这是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大屋子，这位穷人律师的顾客在这间屋子里一定会有茫然若失的感觉。〔12〕K.仿佛看到了这些委托人胆怯地迈着细碎的步骤朝那张硕大无比的办公桌走去。但他很快忘记了一切，眼睛只盯着女看护。她紧挨K.坐着，几乎把他挤得紧靠椅子扶手。“我想，”她说，“你会自己出来找我的，用不着等我来叫。真有点奇怪，你一进门就不停地看我，却让我等了这么久。你就叫我列妮吧。”她匆匆地说，仿佛不想浪费这次幽会的时间。“很高兴这样称呼你，”K.说，“至于你说奇怪，列妮，很容易解释，首先，我不得不听那几个老头唠叨，不能无缘无故跑出来；其次，在女人面前我向来很拘谨，从不敢放肆。我想，你大概也不是一上来就愿意的姑娘，列妮。”“不对，”列妮把手搭在椅背上望着K.说，“你

一开始大概不喜欢我，现在没准还是不喜欢我。”“喜欢这个字太一般了。”K.闪烁其词地说。“啊！”她微笑地说，K.的话和这声轻轻的感叹使她觉得自己占了一点上风。K.却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已经习惯了这间屋子的黑暗，可以看清楚各种摆设的细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房门右侧的一幅大型油画。他上身前倾，为的是看得更清楚些。画上是一个身穿法官长袍的人，坐在一张高靠背椅上。那是一张镀金椅子，金晃晃的颜色在画面上显得很突出。奇怪的是法官并没有平静而威严地坐着，而是左臂撑在椅子的扶手和后背上，右臂却悬空吊着，手掌抓住另一边的扶手，仿佛正要站起来，做一个激烈的，也许是愤怒的手势，说出一个决定性的观点或甚至是宣布一个判决。被告也许就站在法官宝座下的台阶上，而最上面几级台阶上铺着的黄地毯已经画出来了。“没准他就是审理我这桩案子的法官。”K.伸出手指着那幅画说。“我认识他，”列妮也看着画说，“他常到这儿来。这幅画是他年轻时请人画的，但一点也不像，既不像他年轻时，也不像他现在，因为他个子很矮，几乎是个侏儒。虽然如此，他却让人把他画成这么高，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他爱虚荣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我也很爱虚荣，不甘心你不喜欢我。”K.对她最后那句话没有回答，只是伸出双臂搂住她，并把她拉到身边。她把头静静地靠在他肩上。他问：“他担任什么职务？”“他是预审法官。”她说，并抓住他搂她的那只手，抚弄着他的手指。“只不过是个预审法官，”K.说，显得非常失望，“高级官员都藏了起来。可是，他却坐在宝座上。”“全都是瞎画的，”列妮把脸伏在K.的手上说，“实际上他是坐在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上，屁股底下垫了一块折起来的盖马毯子。你干吗总是惦记着你的案子呢？”她又慢条斯理地问。“哪里，我根本不去想它，”K.说，“也许我恰恰想得太少了。”“你的错误并不在这儿，”列妮说，“你太倔强，这是我听说的。”“听谁说的？”K.问，感觉到她的身体靠在自己的胸脯上，于是低头看了看她那浓密的梳得整整齐齐的黑发。“假如我告诉你，那我透露得可就太多啦，”列妮回答道，“请别问我他叫什么名字，记住我的忠告就行了。别再这么倔强，你斗不过法院，你得认罪。下次审讯时就认罪吧，只有这样你才能逃脱他们的魔掌，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救你自己。不过，即使认了罪，没有外来的帮助也没有用。可你用不着为此发愁，我来想办法吧。”“你好像对法院和法院里耍弄的阴谋诡计很熟悉。”K.说着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因为她紧紧地靠着他，他觉得太重。“这样更好。”她说，一面在他膝盖上坐直，一面抚平裙子，拉直上衣。然后她伸出双手搂住他的脖子，身体向后仰，久久地端详着他。“假如我不认罪，你就不能帮助我吗？”K.试探地问，感到有

些吃惊，他最初是找毕斯特纳小姐，后来又找法院听差的老婆，现在又找这个小看护帮忙，而她似乎对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瞧她坐在自己膝盖上的样子，仿佛这就是她应该坐的唯一地方！“不能，”列妮缓缓地摇着头说，“那样我就没法帮你。不过你好像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你无所谓，显得很傲慢，并且不听别人的劝告。”“你有情人吗？”过了一会儿，她问。“没有。”K.说。“不，你有。”她说。“好吧，我有，”K.说，“你瞧，我否认我有情人，身上却揣着她的照片。”在她的恳求下，他拿出艾尔莎的照片让她看。她蜷曲在他的膝盖上，久久地打量着照片。这是一张快像，艾尔莎正在跳一种旋转舞，她常常在酒吧里跳这种舞。她的裙子高高地向后扬起，双手按在结实丰满的臀部上，脖子侧向一旁，向某个未被拍进照片里的人笑着。“她的衣服绷得太紧，”列妮指着她认为绷得太紧的地方说，“我不喜欢她，她太壮实，太粗野。不过，她也许对你很温柔体贴，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像她这样高大健壮的姑娘往往除了温柔体贴什么也不会。她会为你而牺牲自己吗？”“不会，”K.说，“她既不温柔也不体贴，更不会为我而牺牲自己。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要求她做上面几件事。另外，说实在的，我还从来没有像你这样仔细地看过这张照片。”“这么说来，你并不十分喜欢她，”列妮

说，“她也不是你的情人^哪？”“当然是，”K.说，“我并不否认我所说过的话。”“就算她现在还是你的情人，”列妮说，“可你一旦失去她，或者说用我来代替她，你也不会太想她，是吗？”“不错，”K.微笑地说，“这是可以想象的。但她有一点比你强得多：她对我的案子一无所知，即使她知道了，她也不会为此而操心。她不会劝我随和些。”“这可不是什么优点，”列妮说，“如果她比我强的地方就是这些，那我就还有信心。她有生理缺陷吗？”“生理缺陷？”K.问。“是的，”列妮说，“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生理缺陷，你瞧，”她张开右手，食指和中指间连着一层膜，几乎延伸到指尖。在黑暗中，K.一时没弄明白她想给他看什么，她于是抓过他的手，让他摸摸那皮膜。“大自然的造化真是奇妙，”K.说，他仔细看了看整只手后又补充道，“不过的确是只美丽的小手。”列妮得意地看着K.，后者不胜惊奇地把那两个手指掰开又合拢，并在放开它们之前还轻轻地吻了一下。“啊，”她立即欢呼道，“你吻了我！”并张大嘴，急急忙忙地爬起来跪在他的膝盖上。K.大吃一惊，抬眼看着她。她此刻紧紧地挨着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像胡椒粉一样刺激性的气味。她一把搂过他的头，俯下身去，咬着、吻着他的脖子，一直咬到他的头发根。“你已经用我代替她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嚷道，“瞧，你用我代替她了！”这时，她的膝盖滑了一下。她轻轻喊了一声，差一点跌倒在地毯上。K.抓住她，想把

她扶起来，却被她拽倒在地。“你现在属于我了。”她说。

“这是大门钥匙，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这是她最后一句话。在他转身离开时，他漫无目的地在她肩膀上亲了最后一下。他走出大门，外面正下着小雨。他朝街心走去，希望能看列妮最后一眼，此刻，也许她正站在窗前向他张望呢。然而，他的叔父突然从停在房子前面的一辆汽车里钻了出来，心不在焉的K.刚才根本未发现这辆车。叔父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朝门口推去，好似要把他钉在门上。“浑小子，你怎么能这样干！你的案子本来有点希望了，可这下子又被你搞砸了！你溜到一个不要脸的小娼妇那里同她鬼混，一待就是几个钟头！看样子她准是律师的情妇，而你连个借口也不找，明目张胆地跑到她那儿去，同她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却坐在那儿为你的事情操心，一个是替你来回奔走的叔父，一个是应该争取过来的律师，特别是法院办公室主任，一个可以左右你的案子的大人物。我们想商量一个办法帮助你。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同律师周旋，而律师又一再向办公室主任赔小心。我本指望你至少能助我一臂之力，而你却溜得无影无踪。最后谁都明白你去了哪里，只不过两位老先生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当面说出来而已。大家都觉得十分尴尬，再也没心思谈你的案子。我们就这样干坐着，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响动，希望你终于回来。可一切都白搭，办公室主任待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只好起身告辞，并遗憾地说他无法帮助我。出门时他还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表现出极其友好的态度。他走了我倒轻松了不少，在那以前我简直尴尬得喘不过气来。你的行为对生病的律师打击更大，当我告辞时，这个好心的老先生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也许正是你使他的身体一下子垮掉，并会加速他的死亡，而你还指望他的帮助呢。至于我，你的叔父，已经在雨中等了你几个钟头——你摸摸，我已经湿透了——并且还得为你继续发愁。”

第七章 律师 工厂主 画家

一个冬天的上午——外面正下着雪，天气昏暗——K.坐在办公室里。尽管时间还早，但他已经觉得很累了。为了至少在他的下属面前保持尊严，他指示仆役别放任何人进来，因为他有重要的事要办。但他并没有工作，而是坐在转椅上摇来摆去，懒洋洋地把写字台上的东西推开，然后不由自主地伸出两只胳膊摊在写字台上，低下头一动不动地坐着。

那件案子萦绕在他心头，他再也无法摆脱。他经常想，他是否应当写一份辩护词呈交法院。他要在辩护词中简述自己的生平，每涉及一件大事就详细解释一下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现在他对那时的做法是赞同还是反对，理由是什么。这种成文的辩护词同一个本身并非无懈可击的律师的口头辩护相比好处无疑很多。K.不知道律师正在为这件案子忙些什么，反正成果不大。一个多月以前，霍尔德派人来找过他，他和律师初步接触几次后，便留下了律师帮不成什么大忙的印像。这首先是因为，律师很少盘问他，尽管有许多问题应该问。提问是一切的关键。K.觉得他自己便能提出所有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来。但律师非但不问，反而漫无边际地瞎聊，或是沉默地同他面对面坐着，身子前倾——也许是听觉不太好的缘故——俯在办公桌上，捋着下巴上的一撮胡子，怔怔地望着地毯，大概正瞧着K.和列妮躺过的地方。他不时给K.几句不痛不痒的忠告，就像告诫小孩一样。这些告诫既无用又无聊，最后算账时K.肯定不会为此付一文钱。等到把K.奚落够了，律师通常又会说几句安慰的话，给他鼓点劲。他声称，他已经为当事人打赢过许多类似的官司，有的全部赢，有的部分赢。虽然那些案子没有这件案子那样棘手，但乍看起来却更加没有打赢的希望。他抽屉里——他敲了敲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有一份这些案子的记录，可惜他不能给K.看，因为这涉及官方的秘密。不过通过办这些案子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对K.来说无疑是有好处的。他当然立即就开始了工作，一份申诉的初稿几乎已经写好了，不久就可以上交。第一份申诉很重要，因为辩护留下的第一印象常常决定今后的整个诉讼程序。不幸的是，他必须提醒K.注意，头几份申诉往往不起作用，因为法院根本不看。法官们把它们往卷宗里一塞，说什么目前对被告的审查和审讯比任何书面申诉都更加重要。假若申诉人催促，他们会说，做出判决前他们会认真研究全部案卷的，其中当然包括第一份申诉书。可惜的是这一点在许多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做到，第一份申诉常常放错地方，甚至不翼而飞，即使幸存到最后，也很少有人看过。这一切令人遗憾，但并非没有缘故。K.应该注意到，审讯过程是不公开的，如果法院认为必要，当然也可以公开，但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必须公开。正因为如此，法院的各种文件，首先是起诉书，对于被告及其辩护人，是严格保密的。由于这个缘故，人们一般不知道，至少不能确切了解到申诉书应该反驳哪些指控，所以只有在完全碰巧的情况下，申诉书才会包含某些实质性内容。只有在了解到或者在审讯过程中猜测到指控和指控依据的证据后，人们才能呈递真正具有针对性的、说服力强的申诉书。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自然处在十分不利和困难的局面。

不过这种局面是法院有意造成的，因为法律并不鼓励辩护，而只是不阻止辩护而已。甚至在是否允许辩护并容忍辩护这一点上，人们也有意见分歧。因此，严格说来，法院是不承认律师这一职业的，那些在法庭上以律师身份出现的人，从根本上说只是些让人瞧不起的讼师而已。这对于律师来说当然是一种侮辱，如果K有机会参观一下法院的办公室，可以去看看律师们工作的地方，他一定会大开眼界的。面对那一群挤在一起的可怜虫，他也许会大吃一惊。光是那间又矮又小的办公室就能表明法院对他们是多么歧视。室内只靠一扇小天窗采光，而天窗又很高，假如想看看外面，就得让某个同僚把你驮在背上。但附近一根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会把你呛得喘不过气来，并把你的脸熏得污黑。再比如说，办公室的地板上一年多来有一个洞，尽管还没有大得能掉进一个人，但也足以陷进一条腿。律师们办公的地方在阁楼的上面一层，假如有人陷进洞里，他的腿就会悬在那些等待接见的委托人的头顶上。律师们抱怨这种状况是丢他们的脸并非言过其实，向当局抗议也毫无成效，律师们自己筹措经费进行修缮是严格禁止的。律师们受到这种待遇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人们正在考虑取消辩护，而让被告自己承担辩护的责任。这样考虑从根本上说并非没有道理，但仅从此出发得出结论说，被告不需要辩护律师，那就大错特错了。与此相反，恰恰是这样的法院更需要辩护律师在场，因为审判程序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也不让被告知道。尽管不一定能做得到，但人们却不遗余力地防止情况外传。因此，被告无法了解到法院文件的内容，并且很难从审讯中猜测到法院手中掌握了哪些材料，更不用说他们大多由于忧虑而分心了。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干预就十分必要了。一般说来，辩护律师不能出席审讯，而必须在审讯结束后向被告打听审讯时的情况，当然越快越好，最好在审讯室的门口便详细了解清楚，以便从被告杂乱无章的叙述中得出对于辩护有用的东西。不过最要紧的并不是这些，因为从被告的叙述中无法了解许多东西，虽然能干的人可以多掌握一些。最重要的是辩护律师同法官的个人关系，他的主要价值便在于此。从亲身经历中K大约已经发现，法院机构的底层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中有不少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的官员，使这个组织严密的机构出现一个相当大的缺口。正是从这个缺口中，许多律师钻了进去，依靠贿赂探听情报，而文件失窃的事情过去时有发生。不可否认的是，以上办法可以取得对被告暂时有利的结果，律师们也因此而感到自豪，并以此为诱饵，招徕新委托人。但这种办法对案件的发展并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只能起到坏作用。除了同地位较高的官员有私人关系值得羡慕以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价值。只有

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影响审判过程，当然，这种影响开始时也许不易察觉，但随着案子的进展会越来越明显。有这类关系的律师人数甚少，因此K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也许只有一两位律师才能自夸像霍尔德博士那样拥有如此有效的关系。这些人自然用不着挤在律师办公室里，也不会同那帮平庸之辈有丝毫来往。但尽管如此，他们与法院官员们的关系却密切得多。霍尔德博士甚至不用在法院开庭时到场，不用挤在前厅里等待预审法官出场，不用为了取得某种虚假的成功甚至更坏的结果而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不，K亲眼看见，法官们，连地位很高的法官，也会主动找上门来，心甘情愿地、毫不隐瞒地向他提供情况，至少向他明白无误地作出暗示，并同他讨论各种案子下一步的审讯情况。他们有时会被他说服，接受他的某种看法。不过对此不能期望过高，即使他们很快就接受一种有利于被告的看法，他们回到办公室后，第二天或许又会做出相反的决定，给被告以更加严厉的判决，比他们当初声称将放弃的原判重得多。推翻已经做出的判决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私下里对你说的，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能在公开场合兑现。即使辩护律师以别的办法博得了这些先生的好感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说这些先生并非出于同情或友好才来拜访辩护律师，当然是业务能力极强的律师，也是对的，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辩护律师。法院机构的缺陷恰恰在这一点上暴露出来，他们知道，这个从一开始就坚持要保密的司法体系弊病很多：官员们脱离百姓，只会办一般的案子，这类案子几乎用不着费力，只需推一把。可是，如果碰到过于简单或过于棘手的案件，他们往往会一筹莫展。由于他们白天黑夜纠缠于法律条文，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而这一点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只能去拜访律师们，向他们求教。在这种时候，他们身后总是跟着一个仆人，抱着秘密文件。人们料想不到会在一位律师家的窗前看到平时很难见到的先生们焦虑不安地望着外面的街道，而律师则坐在办公桌旁研究这些文件，看是否能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只有在这种场合人们才会发现，这些先生多么担心丢掉自己的饭碗，在他们碰到不可逾越的困难时又是多么绝望。应当说，他们的处境并不容易，对他们不应过于苛求，否则就太不公正了。在这种司法体系中，向上爬的阶梯是无穷无尽的，连内行也很难弄清楚。法院的诉讼程序一般来说对低级官员是保密的，因此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经手的案件下一步会如何进展。他们往往不晓得，他们正在办的案子来自何处，将要转呈到哪里。他们只了解案件某些孤立阶段中的某些情况，对终审判决以及做出这一判决的理由一无所知。他们只允许过问法

律允许他们过问的那一部分审判程序，而对于以后的事情，即对于所办案件的结果的了解，甚至还不如辩护律师。后者通常可以在案子审理完以前同被告保持联系，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可以从辩护律师那儿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假如K.对这一切心中有数，那么，当他发现法官们脾气暴躁，对待被告态度蛮横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几乎每个人都受到过法官们的粗暴待遇，法官们个个脾气都很坏，即使他们表面上显得很平静时也如此。小律师们深受其害，感受尤其深刻。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看起来完全是真的：一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老法官，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律师们递交几份申诉书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他已经研究了整整一天一夜——这类法官的确认真得让人难以置信。就这样，经过24小时几乎毫无成效的苦干，到了早晨，他走到门口，躲在楼梯旁，把每一个试图进入他办公室的律师推下楼去。律师们聚集在楼下商量对策。一方面，他们本来无权进入法官的办公室，因此在法律上很难采取行动反对法官的这一做法，何况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以免激怒法官。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只要有一天不进入法院，就失去了一天的时间，于是想尽办法要闯进去。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把那位老先生拖累才是上策。律师们轮流奔上楼去，做出最有效的消极抵抗的姿势，任凭法官把他们推下楼，反正楼下的同事们会伸出手接住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后，那位老先生——通宵未眠，的确已经精疲力竭了——渐渐支持不住，这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下面的人开始还不相信，派一个人上楼去，藏在门后观察了好半天，直到确信楼梯口没有人了，大家才鱼贯而入。他们进门后一声都不敢吭，因为这些律师即使是最不起眼的小律师，也能看出这里的门道。他们从来不敢提出改善司法制度的建议，更不敢坚持这些建议。相反，几乎每个被告，即使是头脑简单的被告，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一种希望改革的热情，往往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上面。其实，这些时间和精力完全可以用在更有效的方面去。唯一理智的做法是让自己适应现在的状况。即使在这方面可以做一点局部改进——抱这种希望的人肯定是个疯子——由此得到好处的也只是未来的被告，而提建议者本人的利益反而会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冒犯了报复心极强的法官们。千万别去惹法官们！不管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你也得委曲求全。你应该懂得，这个庞大的司法机构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有人稍微变动一下这个机构的组织，就会摔跟头从而彻底毁灭，而这个机构则可以靠自身其他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会变得更加牢固，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凶恶。人们应该放手让律师们工作，千万别

去打扰他们。指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尤其是当指责别人的人连自己也不明白指责的理由时更是如此。另外必须指出的是，K.对法院办公室主任的无礼已经给自己的案子带来了很大损害，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字差不多可以说，从也许能为K.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去了。他现在故意不关心与K.的案子有关的任何事情。法官们在某些方面像小孩子，往往为了一点小事——遗憾的是K.的行为不在此列——而大动肝火，甚至见了老朋友也不理睬，连招呼也不打扭头就走，并且，在一切事情上想方设法同他们作对。可是后来，他们又会因为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之所以敢开这样的玩笑，因为一切看来都没有什么希望了——而以最令人吃惊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捧腹大笑，接着便和你重归于好。总而言之，同他们打交道既容易也困难，几乎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可以遵守。有时你会感到惊奇，某个平庸之辈反而能应付自如，取得一些成功。当然，他们也有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谁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有时似乎一切都已经绝望，似乎只有那些一开始就知道能打赢的官司的人才能取得好的结局，即使没有别人的帮助也能赢，而其他所有的案子，不管怎么使劲，怎么求人帮忙，表面上取得多少令人高兴的小进展，注定都会一败涂地。这时候，你会感到灰心丧气，不敢驳斥人家对你的指责。由于你的插手，某些案子出了岔子，如果你不干预，进展本来会很顺利的。你于是失去了自信，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承认自己无能。律师们经常面对这种十分尴尬的局面——当然，只是令人尴尬而已，别的倒也没什么——特别是当一件案子进展令人满意时，当事人突然不让你再过问案子了。这无疑是律师们碰到的最坏的情况。不过，当事人解聘律师，不让他再插手案子事情还从未发生过，被告一旦聘请了一位律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得同他在一起，因为，他既然请人帮忙，又怎么能自己单独干呢？但尽管如此，下面的情况倒发生过几次：案件的进展突然发生了转折，律师们无法再过问案子了。案件、被告和其他的一切一下子把律师完全甩开。在这种时候，律师哪怕同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没有用，因为法官们自己对这种转折也一无所知。案子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任何帮助也无济于事，它已被转到常人进不去的法院去审理。在那儿，律师甚至根本见不到被告。然后，不知哪一天，当你回到家里，会发现桌子上放着许多申诉书。这些申诉书都是你冥思苦想、满怀希望写成的，可现在全都退还给了你，因为审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已经成了一堆废纸。但这并不是说官司已经打输了，完全不是，至少还没有确切证据说明这一点，你只不过再也不会知道有关这个案子的任何事情了，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仅仅是

例外，K.的案子即使属于同一性质，也得很久以后才会进入这个阶段。在目前，采取合法手段的机会还很多。K.可以相信，这些手段将会得到充分利用。刚才已经提到，第一份申诉书还没有递交上去，这事不必太着急。现在更重要的是同有关法官们进行磋商，这点已经做了，但坦率地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至于细节，最好还是暂时别透露，因为这可能会从坏的方面影响K.或者使他过于乐观，或者令他过于沮丧。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某些法官虽然讲得天花乱坠，也表示愿意帮忙，但实际上什么也不做，而另一些法官虽然讲话不怎么动听，却并不拒绝合作。总的来说，尽管不能得出最后结论，但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所有谈判最初都是这样进行的，只有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判断出这些谈判是否真正有价值。无论如何，迄今为止还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如果法院办公室主任既往不咎，能被争取过来的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案子用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就可以被看作一个已经清理过的伤口，在等待下一步进展时就不必紧张了。

律师滔滔不绝地大谈一阵。K.每次来访，他就把上述内容重复一遍。他总是说又有进展，究竟是什么样的进展却闭口不谈。他一直在为第一份申诉书忙碌，但总也完不成。不过，在K.下次来访时，这却成了件好事，因为最近几天很不适宜向上呈递申诉书，而这种事是谁也无法预料的。假如K.对律师的陈词滥调感到厌倦——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向他指出，即使所有的困难都考虑在内，案件的进展看来也太慢，他就会反驳说，进展一点也不慢。当然，倘若K.能及时上他这儿来，进展就会更快些。遗憾的是K.没有这样做，这种疏忽带来了不利，何况并非暂时的不利。

打断这种谈话的唯一福音是列妮。她总是利用K.在场的机会给律师送茶来。她会站在K.的椅子背后，仿佛看着律师贪婪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往杯子里倒茶并大口地喝着。实际上，这时她一直让K.偷偷地握住她的手。在一片寂静中律师惬意地喝茶，而K.却紧紧地握着列妮的手，有时列妮甚至会壮着胆子摸摸K.的头发。“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喝完茶，律师往往会问。“我得把茶盘端走啊。”列妮说。于是，K.最后一次捏了捏她的手，律师则捂了捂嘴，以新的精力重新开始向K.发表长篇大论。

律师是想让他绝望呢还是想安慰他？K.拿不准，但不久便断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律师所说的一切也许完全符合事实，尽管他夸大自己

重要性的企图十分明显。他可能从未接过一件在他看来比K.的案子更重要的案件。但他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同法官们的私人交情，这实在令人起疑。谁能肯定，他利用这些关系仅仅是为K.着想呢？律师从不忘记说明，这些官员们级别甚低，这意味着，他们听命于别人，一些案件的转折很可能对他们的升迁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利用律师，使案子发生这类对被告总是不利的转折吗？或许他们并非在每件案子的审理中都这么做？这一点可以肯定，有时他们也会让律师占一点上风，作为对他们的报偿，因为维护律师的声誉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倘若事情果真如此，他们会把K.的案子归入哪一类呢？律师一再声称，这个案子很棘手，因而也很重要，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法院的特别注意。用不着多想就能猜到他们会怎么做，律师的谈话已经露出蛛丝马迹。第一份申诉书直到现在还没交上去，而案子已经拖延好几个月了，可律师仍声称，诉讼只是处在开始阶段。这些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的，目的在于蒙骗被告，让他处于被动地位，以便最终用突然宣布判决来制伏他，或者至少对他说，预审已经结束，情况对他不利，本案已转交上一级法院审理。

K.亲自干预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个冬日的早晨，感到精疲力竭的K.脑子里翻腾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再也无法拒绝亲自出马的念头。他曾一度不把这件案子当一回事，现在却不得不正视它了。假如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便会轻而易举地对此一笑了之，而且在那种情况下，这类事情本身也根本不会发生。可是现在，他的叔父已经把他拽到律师这儿来了，他不得不考虑家庭的因素。他的职位也不再与此案的进展完全无关，因为他自己极其不谨慎地带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得意，向他的几个熟人提起过这件事，不知什么原因，其他人也知道了。他同毕斯特纳小姐的关系也随着案子的进展而时好时坏。总之，在接受审讯和拒绝受审之间，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已经置身于诉讼过程之中，必须采取行动来自卫。他感到疲惫无力，这不是个好兆头。

当然，现在还没有理由过分忧虑。他曾在较短的时间内巧妙地谋到了银行的一个高级职位，并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保住了这一职位。现在，他只需把上天赋予他的才干，用一点点来对付这个案子，便肯定会取得良好的结果。假如他想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彻底排除他有罪的想法。他是无辜的，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一桩大交易，就像他经常做的、能为银行带来利益的交易一样。在这样的交易中，通常要排除潜伏着的各种危险。为此，当然不能怀着自己内心有愧的想法，而必须时刻想着

自身的利益。从这个观点来看，做出把案子从霍尔德博士手中撤回来的决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就办。在律师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或许还是对他的侮辱，但K.决不能容忍自己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竟被他的代理律师一笔勾销。一旦摆脱了律师，申诉书就得马上呈递上去，他就得天天去催促法官对申诉书予以特别重视。要达到这一目的，像其他人一样把帽子塞在长凳下，温顺地坐在阁楼过道里等当然不够，K.本人应该天天上法官那儿去，或者雇个女人或别的人去，逼着法官们不再透过木栅栏监视过道，而是在办公桌边坐下来研究K.的申诉。他必须坚持这样的努力，一切都得有组织，有检查。法院这回事总算遇到一个晓得怎样维护自身权利的被告了。

可是，尽管K.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切，起草申诉书的困难却难以克服。一个星期以前，他一想到要亲自草拟申诉书就有一种羞愧之感，从未料到这项工作是如此之困难。他还记得，一天上午他正埋头工作时，突然心血来潮，把手头的事情推在一边，拿出拍纸本，打算写一个申诉书的提纲交给霍尔德博士，催催这位行动迟缓的律师。然而，正当这时经理室的门开了，副经理大笑着走了进来。这对K.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堪的时刻，虽然副经理肯定不是在笑他写申诉书，因为他对此一无所知，而是被他在证券交易所刚刚听到的一个笑话逗得哈哈大笑的。为了说明这个笑话的真正含义，需要画一张图加以解释。副经理于是朝K.的办公桌俯下身去，从K.手中拿过铅笔，在K.准备起草申诉书的那页纸上画出那张图。

今天K.不再感到羞愧，申诉书非写不可。假如他在办公室里没有时间——这是很可能的——那就得夜里在家写。如果夜里的时间不够，他就只好请假。无论如何不能半途而废，干业务工作也好，任何别的事情也好，半途而废都是最愚蠢的。起草申辩书无疑是一项花费无休止劳动的工作，不一定非得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人才会相信，拟成一份申诉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并非由于K.的懒惰或律师为阻止这份申辩书的完成而设置的种种障碍，而是因为K.根本不知道自己因何被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他罪状。他只得仔细地回忆他的一生，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详细解释清楚。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头痛的工作！也许对于退休以后无所事事，脑子退化到童年时代，需要把每天的时间打发掉的人最合适不过了。可现在，K.必须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工作，他正处于上升阶段，并已对副经理构成某种威胁，每一个钟头对他来说都十分重要，都在飞快地流逝。此外，作为一个单身小伙子，他

需要享乐，晚上和夜间本来就很短促。然而正在这种时候，他却不得不坐下来起草这样一份申辩书！他再次陷入了沉思，觉得自己很可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按了按通往接待室的电铃的按钮，同时看了一下表。现在是11点，长长的、宝贵的两个钟头就在胡思乱想中浪费掉了，而他比以前更加疲倦。不过，这两个钟头也没有白白浪费，他做出了几个可能会有价值的决定。仆人送来了几封信和两位已经等了很长时间的先生的名片。他们是银行极为重要的主顾，根本不应该让他们等这么久。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间来访呢？而一向工作勤奋的K.为什么会为了自己的私事而把一天中最好的工作时间糟蹋掉呢？两位先生似乎在门外反问。对过去的事情感到烦恼，对未来的事情感到厌倦的K.不得不站起身来接待第一位来访者。

这是一位身材矮小、性格活泼的男人，K.很熟悉的一位工厂主。他对自己打扰了K.的重要工作表示道歉，K.则对自己让对方等了这么久表示遗憾。不过，K.表示遗憾的语调十分平淡，明显地缺乏诚意，如果工厂主不是一心想着将要商谈的业务，肯定会察觉到的。工厂主从几个口袋里掏出一大叠写满统计数字和表格的文件，摊在K.面前，逐条向他解释，并不时改正一些小的计算错误。即使看得如此之快，他也能发现这些错误。他提醒K.，一年前他们曾做成过一笔类似的交易，并顺便透露道，这一次另一家银行正准备作出巨大牺牲，揽过这笔生意。最后他不说话了，等待K.作出回答。开始时K.的确听得很仔细，这项重要的交易对他也产生了吸引力。但不幸的是，没过多久他就不再注意听了，只是不时地对工厂主越来越响的讲话点点头。最后，他头也不点了，只怔怔地凝视着工厂主俯在文件上的光秃秃的脑袋，并暗自问道，工厂主什么时候才会明白自己的长篇大论完全是白费口舌？当工厂主终于停下来时，K.开始的确以为，他之所以停住不讲，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声明，他目前的状况不适于谈业务。但遗憾的是，他发觉工厂主眼里露出紧张的光，似乎在等待他的回答。这意味着谈话将继续下去。他于是像听到命令似的，低下头，让铅笔在那些文件上来回移动，偶尔也停下笔来，注视着某个数字。工厂主怀疑K.是在挑毛病，那些数字的确并不可靠，或者在这笔交易中不起决定作用，于是伸出手来遮住它们，并凑近K.又从头谈起了关于这笔生意的总设想。“这样就很难成交。”K.又抿着嘴唇说，这些文件是唯一具体的东西，但现在却被遮住不让他看了。他情绪低落，靠在椅子扶手上。当经理室的门被打开，副经理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也只稍稍抬起头看了一眼。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好似裹在一层纱中。K.无暇细想副经理出现的原因，而仅仅关注他的露面所产生的效

果。这效果对K.来说当然是值得高兴的，因为工厂主一见到副经理，马上从椅子上跳起来，向他跑去。K.真希望工厂主的速度再快上十倍，因为他害怕副经理会重新消失。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位先生互相迎上前去，热烈握手，然后又一道来到了K.的办公桌前。工厂主抱怨道，他提出的那笔生意未能引起襄理先生的足够热情，一只手还指着K.。在副经理的注视下，K.不得不再次低下头去研究文件。然后两位先生靠在办公桌旁，工厂主开始说服副经理接受他的想法。K.有一种感觉，似乎在他的头顶上，两个无比巨大的男人正在谈论着有关他的事情。他慢慢抬起头来，小心翼翼地向上看去，想弄明白头顶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并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平摊在手上，慢慢举起来，自己也随之站起来，面对着两位先生。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想法，而只是觉得，当他完成了那份能彻底证明他无罪的详细的申辩书后，他应当这样做。副经理正聚精会神地同工厂主谈话，只扫了一眼文件，连上面写着什么也没看清，因为，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看作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从K.手里接过文件，说了声“谢谢，我都知道了”，便把文件放回桌上。K.挖苦地瞥了他一眼，但副经理毫无察觉，或许即使察觉了，也只觉得开心而已。他时而大笑，时而巧妙地反驳工厂主的看法，使后者感到难堪，但接着往往又否定自己的反驳，不使工厂主丢面子。最后，他邀请工厂主到他的办公室去，把这笔生意谈妥。“这是一桩重要的买卖，”他对工厂主说，“我得亲自过问。至于襄理先生……”他说这话时，眼睛仍然只看着工厂主，“一定会乐意我们把它接过来。这笔生意需要认真考虑，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另外，有几个人已经在前厅里等了他几个钟头啦。”K.此刻还有足够的自制力，转过脸去故意不看副经理，仅对工厂主报以友好的微笑，但这微笑显得那样僵滞。除此之外，他并没有进行任何干涉。他身体前倾，双手撑在办公桌上，像一个职员，看着他们一边谈话，一边收拾文件，并走进副经理的办公室。临出门时，工厂主还转过身来说，他现在还不想同K.道别，因为过一会儿他还要把谈判成功的消息告诉襄理先生，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还有一桩小事要和K.谈谈。

K.终于独自待着了。他没有任何心思再见顾客，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外面等着的那些人一定以为他还同工厂主谈判呢。这真令人惬意，这样，就不会有人，包括仆人在内，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到窗台上，一只手扶着窗框，俯视下面的广场。雪还在下，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久久地坐着，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他犯愁。不过，他不时地转过头去，吃惊地看着通往前厅的门，他好像听到那边发出了什么声响。然而并没有人进来，他又平静下来。他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洗了洗脸，清醒一下头脑，然后又回到窗前。他感到下决心自己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比他原先想象的要难办得多。由于这个案子一直由律师操办，K.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费过心。他总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来观察此案，没有直接与本案接触。假如他愿意，他可以监督案子的进展，也可以完全从中脱身出来。而现在，他打算自己进行辩护，就必须用全部身心来对付法院，至少目前会如此。这样做如果成功，能导致彻底宣判他无罪的结果，但同时也可能，至少暂时可能使他卷入更严重的危险。倘若他以前对此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他今天见到副经理和工厂主时的状况便足以说明这一点。仅仅由于他要下决心为自己辩护，便头脑发昏，呆呆地坐了大半天！如此下去，今后又会怎么样呢？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他能够从重重困难之中找到一条通向良好结局的道路吗？要为自己进行深思熟虑的辩护——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难道不意味着他得放弃任何别的活动吗？他能够坚持到底吗？在银行里，他怎么能过问自己的案子呢？这不仅仅是写一份申辩书而已，完成这份申辩书，他只需请几天假——但即使是请假，在目前也是一次很大的冒险——而且还关系到审判的全过程。谁知道审判到底会延续多久呢？在K.的生活中，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障碍！

难道他此刻还应当为银行卖命吗？他怔怔地望着办公桌。现在是他会见顾客，同他们洽谈业务的时候吗？他的案子正在审讯过程中，法官们正在那间阁楼上起草起诉书，在这种时候，他难道还能专心致志地考虑银行业务吗？这一切难道不像是一种刑罚，一种被法院认可并与案件有关的刑罚吗？人们在评价他在银行里的工作时，会不会考虑他的特殊处境而原谅他呢？不，谁也不会原谅他，永远不会。〔13〕银行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吃官司，虽然还不十分清楚哪些人知道，知道得有多详细。但愿消息还没有传到副经理的耳朵里，否则，他一定会不顾同事关系和做人的道德，利用这件事大肆诋毁K.。还有经理，他会怎么样？当然，他很赏识K.，一旦听说了案子的事，或许还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减轻K.的工作负担。不过，他的好意肯定通不过，因为这件案子已经开始损害K.的声望，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向副经理倾斜，另外，副经理也在利用经理生病的机会加强自己的势力。K.还能指望什么呢？也许，他的这些顾虑只会削弱自己的抵抗力，然而，不再欺骗自己，尽可能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形势，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他打开窗户，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只是不想回到办公桌边。窗子很紧，不容易打开。他不得不双手使劲拧动把手，让窗子完全敞开。一股夹杂着烟尘的浓浓的雾气立即涌了进来，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几片雪花也飘了进来。“一个讨厌的秋天。”K.身后传来工厂主的声音。他已经同副经理谈完话，无声无息地走进K.的办公室。K.点点头，不安地看了一眼工厂主的公文包。他准会从包里拿出所有的文件，向K.介绍同副经理谈判的结果。不过，工厂主只是注视着K.的双眼，拍了拍公文包，没有打开。“您也许想听听谈判的结果，这笔买卖的协议书可以说已经装在我的公文包里了。你们的副经理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但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大笑握紧K.的手，想让K.也笑起来。可工厂主不让K.看文件，又引起了K.的疑心。他觉得工厂主的话并没有什么好笑的。“襄理先生，”工厂主说，“您今天精神不好，大概是天气的缘故吧？您看上去心情不太愉快。”“是的，”K.揉着太阳穴说，“头疼，家里出了点事。”“肯定是这么回事，”急性子的工厂主说，他从来不肯把别人的话听完，“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K.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跨了一步，好像要送工厂主出门。可工厂主说：“襄理先生，我还有一件小事要告诉您。我担心今天用这事来打扰您不合适，但我前两次到您这儿来，都把它给忘了。如果我再不说，它也许就完全失去了意义，那会很可惜的，因为我提供的消息对您来说或许不是没有价值。”K.还未来得及回答，工厂主已走到他身旁，伸出一个指头敲了敲他的胸脯，低声对他说：“您卷入了一场官司，对不对？”K.退了一步，嚷道：“一定是副经理告诉您的！”“哪儿的话，”工厂主说，“副经理怎么会知道呢？”“那么，您是怎么晓得的？”K.又问，显得镇静多了。“我偶尔也听到一些关于法院的消息，”工厂主说，“最近听到的事情恰恰是我想告诉您的。”“同法院有关系的人真不少！”K.低下头说，把工厂主让到办公桌边。他们又像先前那样坐下来。工厂主说：“可惜的是，我要向您提供的情况并不很多，不过在这种事情上，哪怕最不重要的消息也很重要。另外，我很想帮您的忙，即使我的能力极其有限。我们在业务上一直是好朋友，不是吗？所以我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K.想对他今天在业务谈判中的态度表示道歉，但工厂主不想听K.道歉，把皮包夹在腋下，表示他急着要走。他又说：“我是从一个叫蒂托雷里的人那儿听说您的案子的。他是位画家，蒂托雷里是他的艺名，我不晓得他真名叫什么。几年来，他常常来我的办公室，给我送几幅小画，而我则给他一些钱，类似于施舍——他简直像个乞丐。那些画倒也不错，画的是荒野什么的。对于这种交易，我们早已习惯了，进行得很顺利。可是有一段时间，他来得太频繁了。我向他表示了我的

不快，然后便同他交谈起来。我问他光靠卖画怎么能维持生计。他的回答令我惊奇，原来他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给人画肖像的收入。他说，他在给法院的人画像。我问他是哪一家法院，他便对我讲了关于某一家法院的许多事。您一定能想象出，我听了他的话是多么吃惊。从此以后，他每次来都要告诉我一些法院的最新消息，而我也就对法院的内部情况渐渐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当然，蒂托雷里太爱唠叨，我常常显得很不耐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撒谎，主要是因为我这个生意人本身就有许多业务上的烦恼，不想再去管别人的事。这些都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蒂托雷里也许对您会有些用处，他认识许多法官，尽管他本人没有多大影响，至少能给您出出主意，告诉您怎样同有影响的人挂上钩。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给您出的主意没有多大价值，我觉得对您也会有参考作用。您几乎就是位律师，我常对人说，K.襄理跟律师一样精明能干。啊，我大可不必为您的案子担心。您愿意意见蒂托雷里吗？有我的推荐，他一定会乐意尽力为您效劳的。您应当见见他，当然不必今天就去，只要您有时间，任何时候去都行。我还想补充一句，别因为我建议您去找蒂托雷里，您就觉得非去不可，千万别这样。如果您认为没有必要去找他，当然最好别让他掺和进来。您大概已经制订了一个详细计划，蒂托雷里可能会帮倒忙。假如是这样，您就完全用不着去找他，尽管缺了这么个家伙出主意有些可惜。反正，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这是我的推荐信，这是地址。”

K.失望地接过信，将他揣进口袋。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封推荐信给他带来的好处，比起工厂主知道了他正在吃官司以及画家可能广为散布这一消息的事实，也显然要小得多。他打不起精神向正在往外走的工厂主说几句感谢的话。“我会去拜访他的，”在门口与工厂主告别时他说，“或者写信请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因为我这几天很忙。”“我知道您能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工厂主说，“不过，我想您最好还是避免让蒂托雷里这类人到银行里来，别在这儿谈您的案子。另外，给这种人写信也不大合适。当然您经过深思熟虑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K.点点头，把工厂主送到前厅。他虽然显得十分平静，但内心却吃了一惊。尽管他刚才说要给蒂托雷里写信，只不过想向工厂主表示，他很重视工厂主的介绍，准备尽快同画家联系，但是，假如他觉得蒂托雷里的帮助真的很重要，他的确会毫不犹豫地给画家写信。想不到这一行动带来的危险竟要工厂主向他当面指出！难道他的理智已经丧失到这种程度了吗？既然他想写信请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到银行里来，在同副经理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商谈他的案子，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忽略了其

他的危险，或者不知不觉干了危险的事。要知道，他身边并不总是有人在提醒他。想不到恰恰是现在，当他准备集中精力应付这场官司的时候，竟对自己的警惕性产生了怀疑，这在以前还从未有过。难道说，他在处理业务工作时遇到的困难，也会蔓延到他的案子上吗？无论如何他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想到要写信给蒂托雷里，请他到银行里来。

正当他不住地摇着头，为自己的轻率懊悔的时候，仆人走到他身边，提醒他还有三位先生在前厅的长椅上等着他。他们急着见他，已经等了好长时间。见仆人指着他们向K.说着什么，三位先生急忙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往前挤，想让K.首先接见自己。既然银行可以毫无顾忌地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认为自已也可以不必再拘泥于礼节。“襄理先生……”其中一个人抢先说道。但K.已让仆人取来了大衣，并在仆人帮助下穿大衣时说：“对不起，先生们，我此刻没有时间接见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有要紧的业务必须出去一趟，现在就得走。你们自己也看到了，刚才那位先生占了我多少时间。你们是否可以明天或以后再来？另外，你们也可以打电话。或者，你们现在用三言两语把事情简单说说，我以后再给你们一个详细的书面答复如何？当然，最好是你们以后再来。”三位先生白白等了大半天，听了K.的话惊愕得面面相觑，一个个目瞪口呆。“看来你们已经同意了？”K.一边问一边转向仆人，后者已经给他拿来了帽子。透过办公室敞开的门，K.看见外面雪越下越大了，于是，他竖起大衣领子，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下。

正在这时，副经理从隔壁办公室走了出来。他微笑地看了看穿着大衣同顾客讲话的K.，问道您要出去吗，襄理先生？”“不错，”K.说着挺直身子，“我有一桩业务要办。”但副经理把脸转向三位顾客。“那么，这三位先生怎么办？”他问，“我相信，他们已经等了很久啦。”“我们已经谈妥怎么办了。”K.说。然而，那几位先生不再沉默不语了，他们围住K.，纷纷抱怨说，他们之所以等了那么久，是因为他们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紧急，必须同K.单独详谈。副经理在一边听他们嚷嚷，并观察着手里拿着帽子，不时神经质地掸掸灰的K.，然后说：“先生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假如你们同意，我很高兴代替襄理先生同你们谈判。你们的事情当然应该马上办理，像你们一样，我们也是搞实业的人，知道时间对你们来说多么宝贵。请上我的办公室好吗？”他打开门，把三位先生让进了他办公室的客厅。

副经理闯进了K.被迫放弃的领地，干得多么巧妙！K.是不是非得放

弃这些领地呢？当他毫无把握、希望渺茫地——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画家时，他在银行里的声望却受到严重的损害。也许，他最好还是脱掉大衣，至少把那两位还在等待副经理接见的先生请回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假如不是看见副经理在他的办公室里乱翻他的东西，仿佛这些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他也许就这样做了。K.生气地回到办公室门口，副经理高声说：“啊，您还没有走！”他转过脸来望着K.，脸上一道道绷紧的皱纹仿佛不是年龄的象征，而是权力的象征，随即又继续寻找。“我在找一份协议书，”他说，“那位公司代表说，它应该在您这儿。您能把它找出来吗？”K.向前跨了一步，但副经理又说：“谢谢，我已经找到了。”他拿着一大叠文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除了那份协议书，显然还有许多别的文件。

“现在我不想跟他计较，”K.暗暗地说，“可是，等我的个人问题一解决，他将第一个知道我的厉害，我会让他吃苦头的。”想到此，他稍稍得到些安慰。仆人早已为他拉开了通往过道的门。他吩咐仆人，见到经理时请转告他，就说K.出门办事去了。然后，他离开了银行，几乎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为自己的案子而奔走一番了。

他乘车径直来到画家的住处。这儿是郊区，恰好位于法院办公室所在的那个地方相反的方向。这一带更加贫穷，房屋更加陈旧，街巷非常肮脏，垃圾随着融化的雪缓缓流动。画家住的那栋房子只有半扇门开着，另半扇门下的台阶有一个大缺口，从缺口里流出一股令人恶心的、发黄的臭水，几只耗子从缺口处跑出来，消失在附近一条阴沟里。K.跨进大门。楼梯下面趴着一个小孩，正在大哭大叫。但他的哭声几乎听不到，因为大门另一侧有一家白铁铺，里面发出震耳欲聋的敲打声。白铁铺的门大开着，三名伙计围成一个半圆形，正在抡起大锤敲打一件铁器。墙上挂着一大块白铁皮，发出惨白的光，映照着两名伙计当中的空间，照亮了他们的脸和围裙。K.只匆匆地朝他们看了一眼，他得尽快找到画家，向他提几个问题，然后马上赶回银行。倘若他在此有所收获，那将对他今天在银行的工作产生良好的影响。刚爬上四楼，他已经气喘吁吁，不得不放慢速度。这儿的楼梯同这栋房子一样，高得令人吃惊，而画家恰恰住在楼顶的阁楼上。楼里空气恶浊得令人窒息，楼梯很窄，夹在两堵光秃秃的墙之间，甚至连通风口也没有，隔很长一段距离才有一扇开在高处的小窗子。正在K.停下来喘口气的当儿，几个小女孩从一家住户里跑出来，嬉笑着朝楼上奔去。K.慢慢地跟在她们后面，赶上其中的一个。她是摔了一跤才落在后面的。K.和她并排走着，并问她：“画

家蒂托雷里是住在这儿吗？”女孩子有点驼背，看上去还不到13岁。她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斜着眼打量着他。虽然她年纪很小，身体畸形，但早已经堕落了。她毫无笑意，只是用锐利而大胆的目光看着他。K.装着没有注意她的神情，又问道：“你认识画家蒂托雷里吗？”她点点头反问道：“您找他干什么？”K.觉得借此机会可以多了解一些关于蒂托雷里的情况，便答道：“我想请他画像。”“请他画像？”她张大嘴问，并轻轻拍了K.一下，仿佛他说了什么出人意料或愚蠢的话。然后，她用双手提起她那过分短小的裙子，飞快地追赶其他小女孩去了。从楼梯上方隐隐约约地传来她们的喧闹声。然而在下一个转弯处，K.又遇见了她们。那个驼背姑娘显然已经把K.来此的目的告诉了其他人，她们因此才在这儿等着他。她们站在楼梯两边，紧靠着墙，让K.从她们中间穿过，同时用手抚平身上的裙子。所有的脸上显露出既天真又世故的表情。等K.从她们身边走过，她们才爆发出一阵阵哄笑，跟在K.身后慢慢向楼上走去，领头的便是那驼背姑娘。多亏她的指点，K.才没有走错路。本来他想沿着楼梯一直往上爬，但她指着旁边一道狭窄的梯子说，那才是通向蒂托雷里的房间的。那条梯子又高又陡，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一直通向蒂托雷里的房门。门的上方斜开着一扇小天窗，窗外射来的光线照着门，使它比整个黑洞洞的楼梯要亮得多。门没有刷过漆，上面用红颜色歪歪扭扭地写着蒂托雷里的名字。K.和他的随从刚爬到梯子的中间，上面的门便开了一条缝，显然是姑娘们的吵闹声打扰了这里的主人。一个好像只穿着睡衣的男人出现在门缝里。“啊！”他看见来人喊了一声，但紧接着又消失了。驼背姑娘高兴地拍了一下手，其他的女孩子则催促K.赶快上去。

他们还没有爬到梯子顶上，画家已经打开门，深深鞠了一躬请K.进去，但却把那帮女孩子挡在门外。无论她们怎样哀求，或不经他的允许想闯进门，他都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只有那驼背姑娘从他伸开的手臂下钻了进去，但他立即追了上去，揪住她的裙子，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放到门外。其他的女孩子看到画家离开了门口，却不敢跨进门槛。K.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看上去画家和女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她们一个个伸长脖子，举起双手，大声同画家说着打趣的话——K.对这些话一句也听不懂——画家也哈哈大笑把驼背姑娘扔到门外。然后他关上门，又向K.鞠了一躬，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说：“画家蒂托雷里。”姑娘们仍在门外窃窃私语。K.指了指门说：“看来您在这儿很受欢迎。”“噢，那帮丑八怪！”画家一面说，一面想扣好睡衣的扣子，却总也扣不上。他光着脚，穿一条肥大的黄色亚麻布裤子，腰系一条长长的裤

带，带子末端不停地摆动。“这帮丑八怪真把我烦死了。”他又说，不再为睡衣浪费时间，因为最上面的那颗扣子刚才掉了。他拿过一把椅子，请K坐下。“我曾给她们中的一个画过像——这姑娘今天不在——从此以后，她们便老来打搅我。假如我在家，她们在我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进来；可我要是不在家，她们中起码有一个人会溜进来。她们配了一把我房间的钥匙，互相借来借去。真想象不到，这给我带来了多大麻烦。比方说，我带来一位女士，要给她画像，当我用我的钥匙打开房门，突然发现那驼背丫头坐在小桌前，用我的画笔往嘴唇上涂红颜色，而她的几个小妹妹正在屋里跑来跑去，把每个角落都弄得乱七八糟。昨天晚上我很晚才回来——请您原谅，因为这个我才穿着睡衣，屋子也没收拾——我回来得很晚，正要上床睡觉时，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拽住我的腿。我往床底看了看，拖出来一个小丫头。她们为什么要来缠我，连我也不知道。您肯定看出来了，我并不欢迎她们待在我屋里，这当然会妨碍我画画。如果不是我用不着付房租，我早就搬出去了。”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清脆而胆小的声音：“蒂托雷里，我们可以进来了吗？”“不行。”画家回答道。“我一个人也不行吗？”那声音又问。“也不行。”画家又说，并走到门边，把门锁上。

K.乘机打量了一下屋子。他绝对想不到，这间又小又破的屋子竟然也能称为画室。房间的长和宽都不到两步，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木板拼成的，木板之间有许多明显的裂缝。K.对面的墙边放着一张床，床上堆着五颜六色的卧具。屋子中央有一个画架，上面绷着块画布，被一件衬衫罩住，衬衫袖子耷拉在地板上。K.的身后有一扇窗，透过窗外的烟雾，除了旁边房屋积雪的屋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提醒K.，他不打算在这儿待很久。于是，他掏出工厂主的推荐信递给画家，并说：“我是从这位先生那儿听说您的，他是您的熟人，建议我来找您。”画家匆匆看完信便把它扔在床上。如果不是工厂主非常肯定地告诉过K.，画家是他的熟人，并且靠他的施舍过活，K.一定会认为，蒂托雷里根本不认识工厂主，或至少早已把他忘了。不仅如此，画家还居然问他：“您是来买画的，还是来画像的？”

K.惊奇地看着他，不禁疑惑起来。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K.理所当然地认为，工厂主会告诉蒂托雷里，K.此行并没别的目的，只是想打听一下关于案子的事。他匆匆赶到这里来，未免太轻率了！然而，此刻他必须给画家一个回答，于是，看了一眼画架问道：“您正在画画吗？”“是

的，”画家说，一把扯下罩在画架上的衬衫，扔在床上那封信的旁边，“这是一幅肖像，一幅挺不错的画，不过还没完工。”看来运气不错，K.一下子便找到了提起法院的机会，因为这显然是某一位法官的肖像，与他在律师办公室看到的那幅惊人地相似。虽然这幅画画的是另一位法官，一个蓄着浓密的黑色络腮胡子的矮胖男人，而且那幅画是油画，这幅则是用水粉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的，但其他的一切都非常相似。画布上的法官也坐在一张高靠背椅上，一只手紧紧抓住椅子扶手，气势汹汹地想站起来。“这是一位法官。”K.刚想说出来，忽然住了口。他走到画的跟前，仿佛要仔细研究一番。他不明白画在椅背正中的那个高个子女人是谁，便向画家请教。“还有几个细节没画完。”画家答道，说着从桌上拿起画笔，在那人的轮廓上又添了几笔。但K仍然认不出来。“那是正义女神。”画家终于说。“现在我认出来了，”K.说，“这是她眼睛上蒙着的布，这是天平。不过，她的脚后跟上不是长着翅膀，并且在飞吗？”“不错，”画家说，“我得到指示，必须画成这个样子。这实际上是正义女神和胜利女神的结合。”“但这样的结合并不怎么妙，”K.微笑地说，“正义女神应该稳稳地站着，不然天平便会摇晃，做出的判决就不会公正。”“我得按顾客的要求办事。”画家说。“当然，”K.说，不想因自己的看法得罪画家，“您把她画得好像站在高背椅上。”“不对，”画家说，“我既没看见过她，也没看见过高背椅，这一切只是想象而已。人家告诉我该怎么画，我就怎么画。”“什么？”K.装做听不懂的样子，“坐在椅子上的这个人难道不是位法官吗？”“当然，”画家说，“但不是位高级法官，另外，也从来没人在这样一把椅子上坐过。”“但他却让您把他画成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对吗？他坐在那儿，简直像位法院院长。”“是的，这些先生的虚荣心都很强，”画家说，“他们得到上面的允许，可以让人把他们画成这样，每个人都得到过确切的指示，自己可以被画成什么样子。遗憾的是，根据这幅画人们无法判断他们的服饰和坐椅的细节，用水粉画这种画不太合适。”“的确，”K.说，“奇怪的是，您怎么会用水粉来画这样的画。”“因为那位法官希望如此，”画家说，“这幅画是送给一位女士的。”一看到这幅画，他仿佛又燃起了工作的热情。他卷起袖子，拿起一支画笔。K.看到，随着笔尖的颤抖，法官头部周围渐渐出现一个发红的光圈，光向外散射，到了画的边缘竟成了细细的线条。这个光环既像是一种装饰，又像是地位显赫的标志。但正义女神的形象仍模糊不清，由于颜色太淡，她好像浮到了画的前面，看上去既不像正义女神，也不像胜利女神，倒好像是正在追逐猎物的狩猎女神。画家的工作吸引了K.，使他忘记了时间。终于他责备起自己，待了这么久，竟然

还没有进入正题。“这位法官叫什么名字？”他突然问。“我不能告诉您，”画家回答道。他朝画像侧过身去，故意冷落这位他刚才还十分尊重的客人。K.认为这是画家脾气古怪的缘故，又为自己因此而浪费了时间而感到恼火。“您大概深受法院的信任吧？”他问道。画家听到这话立即放下笔，直起身来搓了搓手，微笑地望着K。“您就说真话吧，”他说，“您想知道法院的事情，推荐信里也是这么写的。您先和我谈画，只是为了赢得我的好感。不过我并不怪您，您大概不知道，这一套在我这儿吃不开。啊，您用不着辩解！”他看到K.想说什么，做出一个坚决拒绝的姿势又说，“另外，您说得也完全对，我深受法院的信任。”他停顿了一下，仿佛想给K.一点时间来正视这个事实。从门外又传来姑娘们的声音，她们此刻也许正挤在钥匙孔周围，往屋里窥视。K.未作任何辩解，因为他不想转移画家的话题，但也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从而趾高气扬，于是问道：“您的职务是正式任命的吗？”“不！”画家断然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打断了他的思路。但K.急于让他讲下去，便说：“不过，这类不被人承认的职务往往比公开任命的职务更有影响力。”“我的情况恰恰如此，”画家皱起眉，点点头说，“昨天我向那位工厂主说起您的案子，他问我能不能帮帮您的忙。我回答道，他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很高兴您这么快就来了。看来您很关心您的案子，这当然一点也不奇怪。您想不想脱掉大衣？”尽管K.不想在这儿待多久，对画家的这个建议仍然很高兴。屋里的空气几乎使他窒息，他不时惊奇地看看屋角那只显然并未生火的小铁炉，弄不明白这儿为何如此闷热。当他脱掉大衣并解开上衣扣子时，画家抱歉地说：“我有些怕冷。这儿很舒服，是不是？这间屋子在这方面倒是不错。”K.没有吭声，不过，使他感到不自在的并不是热，而是那污浊的、令他喘不过气来的空气，这儿大概很长时间没通过风了。这种不自在的感觉还由于画家让他坐在床上，自己却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而更加强烈。不仅如此，画家还丝毫不理解K.为什么只坐在床沿上，一再请他坐得舒服点，并站起身来，强行把犹豫不决的K.推到毯子、被子和枕头中间。然后，他回到椅子上坐下，终于向K.提出了一个实质性问题，使K.忘记了所有的不快。“您是清白的吗？”他问。“是的。”K.回答道。他很高兴能这样回答，特别是因为他此刻只同画家一人谈话，用不着顾虑任何后果。为了品味一下这种愉快，他又补充道：“我完全是无辜的。”“是这样。”画家低下头说，似乎在沉思。突然，他抬起头说：“假如您真是无辜的，那事情就简单了。”K.的目光暗淡下来，这个自称深受法院信任的家伙讲起话来简直像个无知的小孩。“我的无辜并不能使事情变得简单些，”K.说，忍不住笑了笑，慢慢地摇摇头，“这里

面牵涉到许多细节问题，而法院却完全无视这些细节。到头来他们会无中生有，编出一条骇人听闻的罪状来。”“当然，当然，肯定如此，”画家说，似乎K.毫无必要的打乱了他的思路，“您真是清白无辜的吗？”“这还用说！”K.答道。“这是最重要的。”画家说。他并没有被K.的回答说服。尽管他说得很肯定，K.仍不明白，他的话究竟是出于相信还是故意敷衍。为了弄清这一点，K.说：“您对法院的了解肯定比我多，我只是从各式各样的人那儿听说一些。不过所有的人都认为，起诉不是轻率作出的，一旦对某人提出起诉，法院就认定被告有罪，并且很难改变这种看法。”“很难吗？”画家问，伸出一只手在空中飞舞，“法院永远不会撤回起诉。假如我把所有的法官并排画在这块画布上，而你站在画布前为自己进行辩护，成功的希望也会比在真的法院里要大得多。”“我知道。”K.自言自语道。他忘了他上这儿来只想问画家一些情况。

门外又响起一个小姑娘的声音：“蒂托雷里，他一会儿就走吗？”“别闹！”画家对着门喊道，“你们没看见我正在跟这位先生谈话吗？”但姑娘并不罢休，又问：“你要给他画像吗？”见画家不回答，她又说：“请别给他画像，他长得太难看了。”接着是一阵唧唧喳喳的声音，赞同她的意见。画家一个箭步窜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K.看见从门缝里伸进来一双双哀求的手。画家说：“如果你们再闹，我就把你们全都推下楼去。乖乖地坐在楼梯上，别说话！”她们大概没有立即服从，因为画家又呵斥道：“快坐下，坐在楼梯上！”门外这才安静下来。

“请原谅。”画家回到房间后对K.说。K.并没有朝门看，他完全不介意画家是否打算保护他，并采取什么方式来保护他。即使是现在，当画家弯下腰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他也一动不动。为了不让门外的姑娘们听见，画家压低声音说：“这帮丫头也是法院的人。”“什么？”K.转过头来望着画家问。但后者重新坐到椅子上，半开玩笑地解释道：“一切都属于法院。”“这我以前从未听说过。”K.说，但无论如何，画家关于姑娘们的解释不再使K.感到不安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朝门看了一眼。门外的女孩子这会儿大约已经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了，只有一个将一根麦秆从门缝里塞进来，慢慢地上下移动。

“看来您对法院了解得太少，”画家叉开两腿，脚尖点着地板说，“不过，既然您是清白的，也就用不着有太多的了解。我一个人就能使您解脱。”“那您准备怎么干呢？”K.问，“几分钟前您还说，法院根本不重视证据。”“只是不重视开庭时当场提出的证据，”画家说，并伸出一个指头

晃了晃，似乎K.忽略了一个微妙的区别，“可是如果在幕后活动，那就不同了，我是说在走廊里，或者举例说，在画室里。”K.觉得，画家现在所说的并不是不可信，这和他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完全一致。是的，他的案子或许有希望了。倘若像律师说的那样，法官们的确很容易受私人关系的影响，那么，画家同那些虚荣心极强的法官们的交情就十分重要了，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如此说来，在K.为自己物色的一批帮手中，画家将成为最突出的一位。在银行里，人人都称赞K.的组织天才，而现在，当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棘手的事情时，他又发现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画家满意地观察着他的话在K.身上产生的效果，然后稍微有点心虚地说：“您没发现，我说话像个法学家吗？这是因为，我不断地同法院的先生们打交道，深受他们的影响。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但也失去了许多在艺术上成名的机会。”“最初您是怎么同法官们拉上关系的呢？”K.问，他想先取得画家的信任，然后再让他为自己效劳。“这很简单，”画家说，“我继承了这种关系。我父亲是法院的前任画家，这个职位可以世代相传，不必雇用新人。对于给不同级别的官员画像，法院制订了许多复杂的、必须严格保密的规定，这些规定除了几个家族之外不得外传。比如说，那边那个抽屉里保存着我父亲画的所有肖像，我从来没给人看过。只有仔细研究过这些肖像，才有资格为法官们画像。不过，即使这些画丢了也没有关系，我脑子里记住的规定已经足以保证我的职位不被别人抢去。每一位法官都希望自己被画得同以前的大法官一模一样，而这一点只有我能做到。”“这真值得羡慕，”K.说，并想到了自己在银行的职位，“那么，您的职位是不可动摇的啰？”“当然，不可动摇。”画家自豪地耸耸肩说，“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胆量不时帮助一些吃官司的可怜虫。”“您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们呢？”K.问，仿佛画家刚才所说的“可怜虫”不是指他。但画家不容他插嘴，接着说：“比如说关于您的案子，由于您是完全无辜的，我将采取以下措施。”画家一再提到K.的无辜，使他感到有些不快。他有时觉得，画家一再强调这一点，是预计到案子肯定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局，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才愿意提供帮助的。但这样一来，他的帮助便毫无意义了。尽管有这样的怀疑，K.并不说出来，而是让画家继续说下去。他不想失去画家的帮助，已下定决心依靠他，另外，他刚才所说的也并不比律师的信口开河更不可信，相比之下，K.倒更愿意接受他的好意，因为他显得更诚恳，更坦率。

画家把椅子拉到床边，压低声音说：“我忘了先问您一句，您希望获得哪种形式的无罪判决？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真正宣判无罪，另一种是表面宣判无罪，第三种是无限期延期审判。真正宣判无罪当然是最好

的结局，但我对这种解决方式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我觉得任何人都无法促使法庭做出这样的判决。唯一决定的因素是被告是否的确清白无辜。既然您是无辜的，您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等待这种结局。那样一来您就既不需要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了。”

这种有条有理的分析开始时使K.感到吃惊，他用同样轻的声音对画家说：“我觉得您自相矛盾。”“为什么？”画家耐住性子反问道，并微笑地靠在椅背上。这种笑使K.产生一种感觉，仿佛他即将揭露的并不是画家讲话中的矛盾，而是法院审判过程自身的矛盾。即使如此，他并不让步，仍然继续说道：“您先是说，法院根本不理会证据，后来又把这限定在公开审理时当庭出示的证据，而现在，您又声称无辜的被告在法庭前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便能被宣判无罪。这本身就自相矛盾。此外，您一开始就说，私人关系可以使法官改变看法，而现在您又否认，您所说的真正无罪宣判可以通过私下交涉来促成。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矛盾。”“这些矛盾很容易得到解释，”画家说，“这里说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件是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另一件是我亲身体会到的，您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在法律条文中——我承认我没看过——当然写着无辜者应当无罪释放，但另一方面，上面也没有写，法官可以受别人的影响啊！我的经验则完全相反，我从来未听说过有哪名被告是被宣判无罪的，但却见过许多案子由于外来的影响而改变判决。当然，在我听说过的案子中，可能没有一名被告是完全无辜的。但是，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吗？在那么多案子里，就没有一名被告是真正清白的吗？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我父亲讲他了解的一些案子，法官们到他画室里来，也常常谈法院的事。在我们的圈子里，这几乎是唯一的话题。我刚刚开始为法官们画像，就充分利用同法官们的关系，旁听了许多案子关键阶段的审判，并密切关注它们的发展。但是，我得承认，还从来没见过有哪一件案子是真正宣判无罪的。”“如此说来，没有一名被告能逃脱有罪的判决，”K.好像在对自己和自己的希望说，“这恰恰证实了我对法院的看法。只要一名刽子手就能取代整个法院。”“您不能一概而论，”画家不高兴地说，“我刚才说的只是我的经验。”“这就够了，”K.说，“您过去听说过无罪释放的先例吗？”“从理论上讲，”画家答道，“应该有过，只不过很难证实而已。法院的最后宣判是不公开的，甚至连法官本人也不知道，因此，关于过去的案例只留下传闻，而传闻中的大多数案子的最后判决都是无罪释放。人们虽然相信它，但无法证实。尽管这样，谁也不能忽视这些传闻，因为它们总有某些真实的成分，另外也很美丽动人。我曾经画过几幅以这些传闻为题材的画。”“光是传闻并不能改变我的看

法，”K.说，“人们在受审时总不能以这些传闻为依据要求无罪释放吧？”“当然不能。”画家说。“那么，说这些就毫无用处。”K.说，他必须暂时赞同画家的一切看法，即使他觉得这些看法很不可信，并与他以前听到的有矛盾。他现在没有时间核实画家讲过的每一句话，也不想去反驳。他已经达到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即说服画家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即使帮不上大忙也不要紧。于是他说：“那咱们就别谈真正宣判无罪了。您刚才还提到另外两种可能性，对吧？”“表面宣判无罪和延期审理，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了，”画家说，“在我们继续谈下去之前，您不想脱掉外衣吗？您好像很热。”“好吧，”K.说，他刚才只顾同画家谈话，把别的事全忘了，而现在，经画家一提，额上才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热得简直受不了。”画家点点头，仿佛对K.的不自在十分理解。“不能开一下窗子吗？”K.问。“不行，”画家说，“上面那块玻璃是固定在屋顶上的，根本打不开。”K.这才意识到，他刚才一直盼望着的，其实是画家或他本人果断地走到窗前，把窗打开。他做好了思想准备，哪怕吸上两口夹杂着烟尘的新鲜空气也好。与外面的空气完全隔绝的感觉使他头晕脑胀。他轻轻拍打着羽毛床垫，声音微弱地说：“这既不舒服，也不卫生。”“噢，不对，”画家为他的窗子辩护道，“这样密封性更好，虽然只有一层玻璃，但比双层玻璃更保暖。假如我想通气——其实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墙壁上全是缝，本身就透风——我完全可以打开一扇门或两扇门。”听了这个解释，K.稍稍放心了，立即环顾四周，寻找第二扇门。画家猜到K.在干什么，便说：“它就在您背后，我用床把它顶上了。”K.这才看到，他身后那面墙上有一扇小门。“这间屋作为画室实在太小了，”画家似乎知道K.会如此评论，便抢先说，“我不得不尽量布置得紧凑一些。床当然放得不是地方。就拿我现在正在为之画像的那位法官来说，他总是从床背后那扇门里进来。我给了他一把那扇门的钥匙，如果我不在家，他便可以先到画室里来等我。不过，他一般都是早上来，那时我还没有起床呢。当然，不论我睡得多么死，只要床边的门一开，我总会马上醒来。您要是听到我诅咒他的那些话，准会对所有的法官失去尊重。他一大早就踩着我的床爬过来，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即使我把钥匙要回来也没有用，因为这儿的每一扇门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卸下来，那样做除了得罪人没有任何好处。”当画家滔滔不绝地发牢骚时，K.考虑是否应该把上衣脱掉，最终他明白了，假如他不这样做，便再也无法在这间屋里待下去。他于是脱下上衣，搁在膝盖上，准备谈话一结束马上再穿上。他刚刚脱下衣服，就听见门外一个小丫头喊道：“瞧，他把上衣脱掉了！”接着是一片乱糟糟的脚步声，所有的小姑娘这时都拥到门边，透过门缝向

里张望。“她们以为我要给您画像，”画家说，“所以您才脱掉衣服。”“原来如此。”K.兴趣索然地说，因为，虽然他此刻只穿着衬衣，并不比刚才好受多少。他闷闷不乐地问道：“您刚才提到的两种可能性是怎么说的？”他早已忘记它们的确切称呼了。“表面上宣判无罪和延期审理，”画家说，“至于选择哪一种，那就看您的了。我能帮您实现其中的任何一种，当然要费一番气力。它们的区别在于，表面宣判无罪要求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而无限期延缓审判花的力气虽然比较小，但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先谈谈表面无罪宣判吧，倘若您希望获得这种结果，我就写一份证词，证明您是无罪的。这种证词的格式我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简直无懈可击。带上这样一份证词，我将轮流拜访我所认识的每一位法官，先从现在让我画像的那位法官开始，比方说，当他今天晚上来画像时，我就把证词摊在他面前，向他说明您完全是无辜的，并且以我的名义作出担保。这种担保不是徒有虚名，而是严肃的，有约束力的。”画家眼里闪着略带责备的目光，似乎K.不该让他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您真是太好了，”K.说，“可是，法官即使相信您的担保，仍不肯做出宣判我无罪的决定怎么办？”“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画家答道，“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法官都会相信我的证词，有的人也许会要求亲自见您，那我就得带您去见他们。当然，假如到了这一步，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到时候我会事先详细地告诉您，在每一位法官面前应该使用哪些策略。真正难办的是那些看也不看证词就一口回绝的法官们——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我当然会继续努力说服他们，但他们如果顽固不化，我们也只能撇开他们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个别法官的反对起不了决定作用。假若能争取到相当数量的法官在这份证词上签字，我就可以拿着它去找审理您案子的法官，说不定他也会在这上面签名。那样一来，事情的进展就快了，一般说来，也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困难，被告的信心也足了。他们的心情甚至比听到自己被宣告无罪时更加轻松，这虽然有点奇怪，却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不必再花多少力气，主审法官有了这份有许多法官签名的担保书，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宣判您无罪。虽然还有一些手续要履行，但他肯定会这么做，因为，他不想得罪我和其他朋友，而您则结束这场官司，完全自由了。”“我就自由了吗？”K.半信半疑地问。“是的，”画家说，“但仅仅是表面上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暂时自由。我的熟人都是些低级法官，无权做出彻底无罪的宣判，只有最高法院才能做出这样的判决，而最高法院是您、我和其他所有人无法接近的。那儿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了解，顺便说一句，也不想了解。总而言之，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法官无权做出被告无罪的判决，但他们却有权

力让您逃脱起诉。也就是说，假若您被宣告免于起诉，您暂时就不会被起诉，但罪名仍然是存在的，一旦上面下来命令，起诉便会立即生效。由于我和法院关系密切，我也可以告诉您，法院各办公室在处理彻底宣判无罪和表面宣判无罪时有哪些明文规定。一旦做出彻底无罪的宣判，与案子有关的文件都要销毁，它们彻底消失了，不仅起诉书，而且庭审记录，甚至宣告无罪的判决书都被销毁。但表面宣判无罪就不是这样，各种文件都必须保留，包括无罪担保书、宣布免于起诉的决定和做出这一决定的说明。它们并未撤出诉讼过程，而是按规定在各办公室之间转来转去，最后转到最高法院，然后又转回来，回到低级法官手里。就这样，这儿耽搁几天，那儿压上些日子。文件往返的次数是无法计算的，局外人有时会以为，整个案子早已被遗忘，文件已经遗失，被告已经没事了。但了解内情的人就不会这么看，实际上任何文件都还在，法院并没有忘记这件案子。也许有一天——谁也不准是什么时候——某个法官会出其不意地拿起一份案卷仔细阅读，觉得这个案子的起诉仍然有效，并立即签署逮捕令。不过我猜想，从表面宣告无罪到重新逮捕被告之间要过很长时间；但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被宣告免于起诉的人刚刚回到家，便发现有人在那儿等着要重新逮捕他了。那样一来，他当然再也别想自由了。”“那么，案子又会重新审理吗？”K.有些不相信地问。“那还用说，”画家说，“案子又得重新审理，但结果可能同上次一模一样，宣布被告免于起诉。为此，有关的人又得全力以赴，丝毫不能松劲。”画家说最后一句话时，发现K.显得有些泄气。“可是，”仿佛想掩饰自己的沮丧，K.问道，“争取第二次免于起诉是不是比第一次更难呢？”“关于这一点，”画家答道，“谁也不敢说死。您大概认为，第二次被捕会影响法官们对被告的看法吧？不会的，在他们做出宣告被告免于起诉的决定时，已经估计到他会被重新逮捕了。这并不会对今后的事产生多大影响。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法官们的情绪以及他们在法律上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可能改变，因此一般说来，您得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投入比第一次更大的精力。”“可是，第二次免于起诉也不是最后结果！”K.不以为然地转过脸去。“当然不是，”画家说，“第二次宣布免于起诉后还可能有第三次被捕，第三次免于起诉后又会有第四次被捕，如此下去没完没了。表面宣判无罪的概念本身就包含这个内容。”K.不吭声了。“您显然对表面宣判无罪不大满意，”画家说，“延缓审判也许对您来说更加合适。要不要我向您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K.点点头。画家仰面朝天地靠在椅背上，睡衣敞开了一道很宽的缝。他用手搓着胸脯和腋下说：“所谓延缓审判，”他低头想了一下，仿佛在寻找

合适的词，“所谓延期审判，是说诉讼停留在最初阶段，不再往下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被告和他的帮手，特别是后者，就得与法院始终保持个人接触。我得重复一遍，这虽然不像争取表面宣判无罪那样需要全力以赴，但必须保持更大的警觉，得密切关注案子的进展。不仅要隔几天去问候主审法官一次，在特殊情况下还得到他的府上去拜访，想方设法讨好他。假如您本人同他没有私人交情，那就得通过认识的法官对他施加影响，力争同他面对面地交谈。倘若这些方面都做到了，那就可以肯定案子会滞留在初级审理阶段而不至于转到上一级法院。这样一来，诉讼虽然仍在进行，但被告几乎就像自由人一样，不必担心会被判决有罪。与表面上宣布无罪相比，延期审判有一个好处——被告的前景比较明确，用不着成天为自己重新被捕而担惊受怕，免去了他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刻，还要为案子担心和焦虑的痛苦，而这在争取表面上无罪宣判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延期审判对被告来说也有一些不容低估的坏处。我不是说这样一来被告便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即使是争取到表面无罪的宣判，他也不见得真正自由了。延期审判的坏处在别的方面——要想把案子搁置起来，至少要找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因此，为了对外有个交代，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做出安排，审问被告一次，录取一点口供什么的。审问在很小范围内进行，被告必须到场。这无疑会给被告带来一些不方便。不过，您不必把它想象得过于严重，一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比如说，假如您没有时间或心情不好不想去，审讯会三言两语便结束，您也可以事先打个招呼，表示抱歉而不出庭。您甚至可以同法官们共同商量，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审讯日期作出安排。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即作为被告，您得定期到主审法官那儿去报个到。”画家在讲最后几句话时，K已经把上衣搭在手臂上站起来。“瞧，他站起来了！”门外立即有一个小丫头喊。“您这就要走吗？”画家也站起身来说，“一定是这儿的空气太坏，把您赶走的。我很遗憾，本来还有好多话要对您说，现在不得不简单地提一提了。但我希望，您已经了解了我的意思。”“噢，那当然。”K说，刚才由于聚精会神地听画家讲话，他的头都疼了。尽管得到了这个证实，画家仍然总结了几句，仿佛想在K回家之前再给他一点安慰：“两种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被告可以避免遭到判决。”“可它们也使被告永远不能被无罪释放。”K小声说，似乎为认识到这种局面而感到尴尬。“您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画家紧接着说。K抓起上衣，但仍然没有下决心把它穿上。他很想拿着衣服赶快奔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尽管门外的姑娘们已经作出预报，说他在穿衣服，他仍然犹豫着。画家似乎看透了K的心思，望着他说：“您对我的建议还

没有做出决定。我赞成您的慎重，甚至劝您别匆忙做出选择。每一种方式都有利有弊，得仔细衡量一下。不过，也不能拖得太久。”“我不久会再来的。”K.顿时下定决心，穿好上衣，披上大衣说，并朝门口走去。门外的女孩子立即尖叫起来。K.仿佛透过门看到她们乱成一团。“您得守信用，”画家说，并没有跟在K.身后，“否则我就会去银行，当面问您。”“请您把门打开。”他拉了一下门把，觉得有阻力，一定是那帮小丫头在使劲拽着。“您不想被姑娘们缠住吧？”画家问，“最好还是从这边走。”他指指床后的那扇门。K.立即表示同意，退回到床边。但画家并没有去开门，而是钻到床底下问：“请等一下，您想看几幅画吗？我可以把它们卖给您。”K.不想扫画家的兴，他的确很关心自己，而且答应继续帮助自己。此外，K.直到现在才想起，他还没提过付给画家多少报酬的事呢。既然画家提出卖画，他当然不能推诿。于是，他同意看一看，尽管他急着走，已经不耐烦到极点。画家从床下拖出一大堆没有镶框的画，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灰，轻轻一吹便满屋飞扬，K.几乎睁不开眼睛，呛得喘不过气。“荒原风景。”画家把一幅画递到K.手里说。画面上是两棵瘦弱的树，离得很远，长在深绿色的草丛中，背景是色彩斑斓的落日景象。“很漂亮，”K.说，“我买下了。”K.的回答简单得出乎自己的意料，但画家并未感到受了委屈，而是从地上又拿起一幅画来。“这幅画正好和那幅配上。”画家说。两幅画的确可以配对，二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画上也是两棵树，一片草地和行将落下的太阳。但K.并不在意。“两幅优美的风景画，”他说，“我都买下，把它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看来您喜欢风景画，”画家说，接着又拿起第三幅画，“真是凑巧，我这儿还有一幅相似的作品。”然而，第三幅与其说与前两幅相似，不如说完全相同，上面的风景也是日落时的荒原。画家显然是利用这个机会，推销无人问津的旧画。“3幅画一共多少钱？”“下次再说吧，”画家说，“您这会儿急着要走，反正我们还会联系的。很高兴您喜欢这些画，找个机会我会把床底下的画都给您送去，全是荒野风景。我画了几十幅这样的画，有人不喜欢这种题材，说是格调太低沉，可另一些人，包括您，却喜欢格调低沉的作品。”但K.此刻毫无兴趣听这位靠施舍过活的画家谈自己的艺术见解。“请把这三幅画包好，”他打断画家的唠叨说，“我的仆人明天会来取的。”“没有必要，”画家说，“我可以找个搬运工，现在就把画给您送去。”他终于爬到床上，把门打开。“您尽管踩在床上过去，”画家说，“从这儿进出的人都这么干。”即使画家不说，K.也会这么做的，他一只脚早已踩在羽毛床垫的正中。可是，他探头朝门外看了看，又把脚收回来。“怎么回事？”他问画家。“有什么问题吗？”画家奇怪地反问

道，“外面是法院的办公室。您知道吗？每一栋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院办公室，这儿干吗要例外呢？我的画室实际上也是法院办公室的一部分，只不过法院借给我使用罢了。”K.大吃一惊，倒不是因为他发现了这儿也有法院的办公室，而是因为自己对法院的事情了解得如此之少。他知道，对于一名被告来说，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对任何事情都应该有心理准备，永远不能处于措手不及的地位，如果法官出现在他的左面，他的眼睛决不能毫无察觉地往右看。而他却恰恰违反了这条原则，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错！他的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从那儿涌过来的空气同画室里的相比，就算是很新鲜的了。走廊的两边摆着几张长凳，同审理K.的案子的办公室外边的过道一模一样。看来办公室内部的陈设是有明文规定的。走廊里的当事人不多，一个男人半躺着坐在长凳上，脸埋在胳膊肘里，好像睡着了，另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的阴影中。K.踩着床走出门，画家夹着画跟在他身后。他们不久便碰到一名法院听差——从衣服上金晃晃的扣子，K.便能认出他们来，此人身上同样有一颗金色的纽扣。画家吩咐他把画送到K.的办公室去。K.掏出手绢捂住嘴，摇摇晃晃地从走廊里走过。当他们快要走到走廊尽头时，那帮小丫头突然拥了过来，K.最终未能避开她们。她们显然看见画室的另一扇门开了，于是便绕道赶到这儿来。“我不能再送您了，”画家在姑娘们的簇拥下笑着说，“再见吧，抓紧时间好好考虑一下！”K.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来到街上，他赶紧叫住一辆出租马车。他得甩掉法院听差，那颗金晃晃的纽扣对别人来说也许没什么，他却感到非常刺眼。忠于职守的听差也想登上马车，但K.打发他回去了。K.回到银行时，中午早就过了。他本想把画扔在马车上，但又怕画家哪一天会问起它们，于是只好将它们拿进办公室，锁在写字台最下面的抽屉里。至少最近几天，他不能让副经理看见它们。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 解聘律师

K.终于决定不让律师代理他的案子了。虽然他还拿不准采取这一步骤是否明智，但非如此不可的信念最后还是占了上风。在他打算去见律师，把这个决定通知他的那一天，他的工作效率很低，不得不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才走。当他来到律师家门口时，已经10点多了。按铃之前，他又考虑了一番。也许打电话或写信通知他已被解聘更好，当面谈双方肯定很难堪。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用别的方式解聘律师，律师也许会默认此事，或者用一两句客气话表示认可。那样一来，除非K.

通过列妮去了解，否则便永远别想知道律师对解聘有什么反应了。另外，他也很想听听律师对解聘自己所引起的后果会有什么说法，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倘若同律师面谈，并出其不意地提出解聘要求，那么，不论律师多么小心谨慎，他也能从律师的面部表情和举止察觉他所要知道的一切。另一方面，假若他从律师的话里得出结论，还是让律师作为此案的代理更为明智，他还可以收回解聘的决定。

按第一次铃时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动静。“列妮的动作应该迅速一点。”K.想道。不过，这一回比上次好多了，没有不相干的人来管闲事，不论是那个穿睡衣的家伙还是别的讨厌鬼都没有露面。K.一面按第二次铃，一面盯着旁边那扇门，但它关得紧紧的。终于律师门上的窥视孔里出现一双眼睛，不过不是列妮的眼睛。有人拧开了门锁，但仍顶着门，朝屋里喊道：“是他来了！”然后，门才开了。K.使劲推开门，一只脚刚跨进去，就听见身后另一所住宅门锁转动的声音。他几乎是跑着冲进了门厅，看见列妮穿着内衣，沿着过道一溜烟地跑了。刚才那人的喊声准是向她发出的警告。他注视了一会儿她的背影，这才转过脸去看是谁开的门。这是个又矮又瘦，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支蜡烛。“您是这儿的佣人吗？”K.问。“不，”那人回答说，“我是这儿的客人。律师是我的代理人，因为法律上的事务，我才来找他的。”“没穿上衣就来了么？”K.指着上身只穿衬衣的他问道。“啊，请原谅。”那人借着烛光看了一下自己，仿佛刚刚意识到自己这副模样。“列妮是您的情妇吗？”K.直截了当地问。他微微叉开两腿，拿着帽子的双手在背后握紧拳头。因为穿了件大衣，他觉得自己比那瘦骨嶙峋的家伙优越许多。“啊，上帝，”那人伸出一只手吃惊地挡在脸前否认道，“不，不是，您想到哪儿去了！”“看来您说的是真话，”K.微笑道，“但是，这也没什么。请吧。”他挥了挥帽子，让那人在他前面走。“您叫什么名字？”K.一面走一面问。“布洛克，我是个商人。”那矮子说，并在自我介绍时转过脸来望着K.。但K.不想让他站住。“这是您的真名吗？”K.问。“当然，”那人答道，“您为什么要怀疑？”“我想，您可能有某种原因不愿暴露真名。”K.说。他感到很轻松，仿佛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同一个素不相识的、身份比自己低的人谈话，自己的事可以守口如瓶，而别人的事则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在这样的谈话中，他既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当他们走到律师的书房门口时，K.停住脚，推开门，叫住正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的商人：“别忙着走，照一照这儿！”K.想，列妮也许躲在书房里。他让商人端着蜡烛，照遍了每一个角落。但书房里没有人。在法官的肖像前，K.拽住商人的衣领问：“您认识他吗？”并用手指

了指那幅画像。商人抬起蜡烛，眨巴着眼看了一下画像说：“他是一位法官。”“一位高级法官？”K.问，并退到一旁，观察着这幅画会给商人留下什么印象。“是一位高级法官。”商人说。“您的眼力可不大好，”K.说，“他是个级别最低的预审法官。”“我想起来了，”商人放下蜡烛说，“以前我也听人讲过。”“当然是这样，”K.故作惊讶地说，“我竟然忘记了您也听说过。”“请别取笑，请别取笑。”他只能继续朝前走，因为K.在背后推着他。在过道里K.问：“您一定知道列妮藏在什么地方。”“干吗要藏起来呢？”他说，“不，她大概在厨房里给律师煮汤。”“您为什么不早说呢？”K.问。“我正想把您带到那儿去，可您把我叫住了。”商人答道。K.自相矛盾的说法把他搞糊涂了。“您自以为很机灵吧？”K.说，“带我到那儿去！”K.还从未到过厨房，厨房大得叫人吃惊，设备齐全，光是炉子就比一般炉子大3倍，其他东西却看不清楚，因为只有一盏小灯挂在门边。列妮像往常一样穿着白围裙站在炉子边往锅里打鸡蛋。锅的下面是一只酒精炉。“晚上好，约瑟夫。”列妮瞥了他一眼说。“晚上好。”K.答道，并指了指角落里一把椅子，让商人坐下。后者顺从地坐下了。K.走到列妮身旁，弯下腰在她的耳边问：“这人是谁？”列妮一只手挽着K.，让他贴近自己，另一只手搅着汤说：“一个可怜虫，一个名叫布洛克的几乎破产的商人。瞧他那副模样。”两人都回过头看了看。商人坐在K.指定的那把椅子上，已经把那支多余的蜡烛吹灭了，此刻正用手捏住烛芯，不让它再冒烟。“你刚才只穿着内衣。”K.把列妮的头转过去对着炉子。她没有吭声。“他是你的情人？”K.问。她想去端汤锅，但K.抓住她的两只手说：“回答我！”她说：“到书房来，我全讲给你听。”“不，”K.说，“我要你在这儿告诉我。”她搂住他的头要吻他，但K.挣脱开说：“我不想你现在吻我。”“约瑟夫，”列妮用乞求但很坦率的目光看着他，“你不会吃布洛克先生的醋吧？鲁迪，”她转过脸朝商人喊道，“来帮帮我。您瞧，他怀疑起我来了。别摆弄蜡烛。”商人刚才似乎一直心不在焉，但此刻马上明白列妮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懂，您怎么会忌妒起我来了？”他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K.看着他笑着说。列妮哈哈大笑起来，乘着K.心情正好时挽住他的胳膊低声说：“让他独自待着吧，你也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家伙。我今天对他稍微客气了些，因为他是律师最重要的主顾，仅此而已。你最近怎么样？今天晚上还想见律师吗？他病得很厉害，不过，假如你一定要见他，我当然可以通报。你今天得在我那儿过夜，你已经好久没上这儿来了，连律师都常常问起你。你的案子决不能疏忽大意，另外，我也听说了一些情况，正想告诉你呢。这会儿先把大衣脱掉！”她帮他脱下大衣，

接过他的帽子，跑到门厅里挂好，接着又跑回来看了看锅里的汤。“我先去通报，还是先给他送汤呢？”“先去通报一声吧。”K.说。他很恼火，本来想就整个案子，尤其是解聘律师的事同列妮好好谈谈，可商人在这里，把一切都给搅了。尽管如此，他觉得这件事太重要了，即使这矮鬼在场可能起干扰作用也不得不谈。他于是把已经走进过道的列妮叫了回来。“先给他送汤吧，”他说，“在他与我谈话之前得补补身子，需要喝碗汤。”“您原来也是律师的当事人。”商人坐在屋角里小声说，似乎想得到证实。“这关您什么事？”K.说。列妮也呵斥他道：“用不着你来插嘴！”然后对K.说：“那么，我先给他送汤去。”她把汤舀进盘子里说：“只怕他喝完汤就会睡着。每次吃完东西他都要睡一觉。”“我要对他讲的话会使他睡不着觉。”K.说。他始终想暗示，他有重要的事同律师谈，盼着列妮来问他，那样他就可以请她出主意。但列妮并未提问，只是严格地按照他的吩咐做。当她端着汤从他身边走过时，故意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并轻声对他说：“他一喝完汤我就通报，好让你尽快回到我身边来。”“快去吧，”K.说，“快去！”“别那么不高兴。”她说着端着汤转身走了。

他望着她的背影。他已经下定决心将律师解聘，也许事先不同列妮商量更好，她不仅对整个事情看得不如他透，而且准会劝他改变主意，动摇他的决心，使他又陷入疑虑和不安之中。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得重新下决心，因为，解聘律师只是迟早的事，解决得越早，造成的损失就越小。也许，商人能对此发表一点有用的看法。

他于是朝商人转过身去。那人一看见他向自己走来，便要站起身来。“坐着别动，”K.说着拉过一把椅子，在他身边坐下，“您早就是律师的委托人了，对吧？”“是的，”商人说，“很早就是。”“他代理您的案子有多少年了？”K.又问。“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商人说，“在业务上——我是个谷物商——律师从我一开业就是我的法律代理人，大概有20年了；在我个人的案子里——您大约指的是这个——他也一开始就是我的律师，到现在有五年多了。是的，已经超过五年了，”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拿出一个旧笔记本，“这里面全记着。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告诉您确切日期。光凭脑子，这一切是记不住的。我的案子实际上开始得还要早得多，我妻子一死就开始了，肯定在五年半以前。”K.把椅子挪得更近。“律师也过问一般的法律纠纷吗？”他问。律师原来同这种事也有联系，这使他安心了不少。“当然，”商人说，接着又压低嗓门道，“听人说，在处理这类法律纠纷上，他更在行。”他后悔不该说这样的话，伸出

一只胳膊搭在K.肩膀上说：“求求您别出卖我。”K.拍拍他的大腿请他放心，并说：“不会的，我从不出卖任何人。”“他的报复心很重。”商人说。“像您这样忠实的当事人，他肯定不会报复的。”K.说。“啊，会的，”商人说，“他一旦发火，就会六亲不认。另外，我对他也并不很忠实。”“为什么？”K.问。“我也许不应该告诉您。”商人犹豫地说。“我想，您不妨说出来。”K.说。“那好吧，”商人说，“我可以告诉您几件事，但您也得把您的秘密讲一件给我听，这样我们就可以齐心合力来对付律师了。”“您真谨慎，”K.说，“可我还是要告诉您一个秘密，好让您彻底放心。您是怎样对律师不忠实的？”“除了他以外，”商人迟疑地说，好像在招认一件见不得人的事，“除了他以外，我还聘请了别的律师。”“这算不了什么。”K.有些失望地说。“可在这儿，”商人自从透露了那个秘密，一直呼吸沉重，听了K.的话才略微放心，“这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当你聘请了一位正式律师后，绝不允许再找那些没有营业执照的律师。而我恰恰这样干了，除了他，我还请了5个非正式律师。”“5个！”K.对这个数字感到吃惊，“除了这位，还请了五个律师？”商人点点头继续说：“我正准备请第六位呢。”“可您要那么多律师有什么用？”K.问。“他们每一个对我都有用处。”商人答道。“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K.又问。“当然可以，”商人说，“首先，我不想输掉官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不能放过任何对我也许有用的东西，哪怕带来好处的希望很小也得抓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打官司上了。比方说，我把全部资金从生意里抽了出来。从前我的公司占了差不多整整一层楼，而现在，我只需要一间朝北的小房间，一个小听差就够了。不过，生意每况愈下倒不仅仅是因为资金花光了，而主要是因为我精力全用在打官司上了。一个人当他成天为自己的案子奔忙时，是不会有精力管其他事情的。”“如此说来，您也同法院直接打交道喽？”K.问，“我正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这方面我没有多少可说的，”商人说，“开始时我也试图这么做，可不久就不得不作罢。这太累人，而且收效甚微。亲自同法官们打交道，与他们讨价还价，在我看来至少是不可能的，光是坐在那儿坐着等待接见就得耗费很大的精力。您知道法院办公室里的空气怎么样。”“您怎么晓得我去过那儿？”K.问。“当您从过道里走过时，我正坐在旁边的一张长凳上。”“真凑巧！”K.嚷道，他已被商人的话吸引住，完全忘了他刚才那副可怜相。“那么，您看见我了！当我从办公室经过时，您刚好在那儿。的确，我去过那儿一次。”“也并不是什么巧合，”商人说，“我几乎天天在那里。”“从现在起，我大概也不得不经常上那儿去，”K.说，“不过，不会受到像那次一

样隆重的接待了。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迎接我，他们准是把我当成一位法官了。”“不对，”商人说，“我们当时是向法院听差表示敬意。人人都晓得您也是个被告，这类消息传得很快。”“你们早已知道了，”K.说，“那你们一定觉得我的举止很高傲吧？有没有人谈起这点呢？”“没有，”商人说，“相反，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为什么是愚蠢的呢？”K.问。“干吗要刨根问底呢？”商人不快地说，“看来您不了解那帮人，没法猜透他们的心思。您得考虑到，打官司的人整天谈论的话题都是什么。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再也无法用理智来思考，于是便求助于迷信。我在说别人，可我自己并不比他们好多少。比方说，有一种迷信认为，可以从一个人的长相，特别是他嘴唇的线条，看出他的案子结局会怎样。而那天所有的人都说，根据您嘴唇的线条，您准会被判定有罪，而且判决书不久就会下来。我重复一遍，这完全是可笑的迷信，并且在大多数案子里证明是荒唐的。但在那个圈子里，要摆脱这种迷信是极其困难的。您可以想象，这类迷信的影响有多大。那天，您同一个人讲话来着，对不对？他根本没法回答您的问话，其中的原因很多，可原因之一恰恰是看到您的嘴唇后被吓着了。据他后来说，他从您唇部的线条看到了他自己也会被判有罪的兆头。”“我的嘴唇怎么？”K.问道，并掏出一面小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嘴唇。“我看不出我的嘴唇有什么特别的，您呢？”“我也看不出，”商人说，“丝毫看不出。”“那帮人多迷信！”K.大声说。“我不是告诉过您吗？”商人说。“他们相互之间经常来往并交换看法吗？”K.问，“我从不同他们打交道。”“一般说来他们不大来往，”商人说，“也不可能经常见面，因为人太多了。另外，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少，即使有些人偶尔发现了一些共同之处，但很快就会明白他们错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采取统一行动来对付法院，即使有一个共同的计划也无法贯彻下去。个别人可能秘密地取得少许进展，可其他人只有事后才会晓得，而且天知道是通过什么方式取得的。大家都彼此戒备，虽然在过道里频频相遇，但却很少交谈。迷信自古以来就有了，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厉害而已。”“我看见许多人等在过道里，”K.说，“觉得他们完全是白等。”“并不是白等，”商人说，“只有独立采取行动才是白费劲。我刚才说过，除了这位，我还请了5个非正式开业的律师。您可能会想——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这下子我可以撒手不管了。如果是这样，那您就大错特错了。比起只有一个律师来，我所花费的精力一点也不少。您大概不太明白吧？”“是的，”K.伸出一只手，按在商人的手上，让他讲话别这么快，“请您讲慢一些好吗？这些事对我极其重要，我跟不上您讲话的速度。”“好吧，多谢您提醒了我，”商

人说，“在打官司方面，您是位新手，年纪又这么轻。您的案子刚刚半年，对不对？没错，我听说过。刚刚打了半年官司，时间太短了。而我对这种事已经考虑过无数遍了，它差不多成了我的本能。”“您的案子进展到这一步，您一定很高兴吧？”K.问，他不想直截了当打听商人的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但得到的也是含糊的回答。“不错，我已经为这件案子奋斗了5年，”商人说着低下了头，“这是个不小的成绩。”他沉默下来。K.注意听了听，看列妮是否已经转来，因为他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不想让列妮看见他正和商人进行如此亲密的交谈，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列妮明知道他在这儿还在律师房里待那么长时间而生气。送一盘汤哪会用那么长时间！“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刚开始时的情况，”商人继续说，K.则立即集中注意力，“当我的案子大约进行了半年，处在您目前这个阶段时，开始对霍尔德先生产生不满——那时我只有他一个律师。”现在我可以知道我想要知道的一切了，他想，并赞同地点点头，仿佛鼓励商人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我的案子那时毫无进展，”商人接着说，“预审法庭虽然开过几次庭，我也每次都到庭了，甚至还搜集了不少证据，带去了我的账本，但后来我才知道，一切都白搭。我常上律师这儿来，他也呈递了好几份申诉书……”“好几份申诉书？”K.问。“是的，好几份申诉书。”商人说。“这一点对我很重要，”K.说，“目前他正在为我的案子写第一份申诉书，还没有写出来。现在我明白了，他对我的案子一点都不卖劲，太卑鄙了。”“申诉书没有写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商人说，“另外，后来看起来，他为我写的那些申诉书也毫无用处。多亏一位老法官的好意，我甚至看过其中的一份。虽然写得很有学问，但空洞无物。首先，里面有许多拉丁文，我看不懂；其次，整整几页是向法院进行的一般性申诉；然后是对某些法官的吹捧，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了解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谁；接下去就是律师的自我吹嘘，与此同时又对法院阿谀奉承；最后才是对几个据说与我的案子相似的去案案例的分析。这种分析据我看来还算细致。不过，我并不想以此来评价律师的工作，那份申诉书也只不过是许多申诉书中的一份而已。尽管如此，我看不出我的案子有什么进展。”“您希望获得什么样的进展呢？”K.问。“这个问题提得好，”商人微笑道，“在这类案子中，要取得进展是很难的，但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我是个商人，那时比现在更看重实际的东西。我想看到看得见的进展，整个案子应该很快结束，至少得按正常程序发展。可是，与我的愿望相反，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传讯，内容大致相同，而我的回答也像背祷文一样。法院听差每个星期要来我的公司好几次，有时也上我家来。这当然令人厌烦（现在这方面至少要好得

多，他们可以打电话，所以干扰也就不那么厉害了），另外，关于我吃官司的谣言也在我业务上的朋友，特别是我的亲戚中流传开来。我受到的损害是多方面的，而法院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将在近期内审理我的案子。我于是来找律师，向他发牢骚。他虽然作了详细的解释，但断然拒绝按照我的意思办，声称任何人也无法促使法院确定审理日期，在申诉书里提出这一要求——我正是这样希望的——是闻所未闻的，只会毁了我自己和他。当时我想，这位律师不愿做和做不到的事，另一位律师也许想办并能办到。我于是去找另外的律师。但我不得不告诉您，没有一位律师请求过法院确定审理我的案子的日期，也没有谁作过这样的努力，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儿有一个前提，过一会儿我再解释。在这一点上，这位律师并没有骗我。可话又说回来，我并没有为找了其他律师而懊悔。您大概已经从霍尔德博士那里听说过非正式开业律师的事了，他准是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实际上他们的确如此。然而，他每次谈起他们，将他们与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作比较时，总要犯一个小小的错误，我得顺便提醒您注意这一点：他总是把自己圈子里的律师称为‘大律师’，这是不对的。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在自己的头衔前面加上‘大’，但在这件事情上，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法院的习惯称呼。按照这一习惯，除了非正式律师外，还有大小律师之分，而我们这位律师和他的同事只配称作小律师。至于那些大律师，我只听说过，却从来没见过。他们高居于这帮小律师之上，对他们就像这帮人对待非正式律师一样，简直不屑一顾。”“那些大律师，”K.问，“是些什么人？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看来您对这方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商人说，“被告们听说大律师的事以后，没有一个不梦想见他们一面的，可我劝您别上当。我不晓得他们是些什么人，也不相信谁能找到他们。我从未听说过哪件案子是他们肯定干预过的。他们也为某些人辩护，但并不是谁想找他们辩护，他们就为谁辩护，只有他们想为之辩护的那些人才能见到他们。另外，也只有那些越过了低级法院审理范围的案子，他们才肯接。因此，我劝您忘掉他们，否则您听到小律师们的夸夸其谈和他们出的那些馊主意，准会感到恶心和乏味。我本人就有过这样的体会，当初我真想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躺到床上睡大觉。可那样干恰恰是最愚蠢的，因为即使您躺在床上也休想得到安宁。”“那么，您那时没找过去找大律师吗？”K.问。“想过，但没想多久，”商人又笑了笑说，“可惜的是，谁也没法把他们完全忘掉，特别是晚上，这种想法总要冒出来。可我那时急切盼望着案子马上有个结果，因此便求助于那些非正式开业的律师了。”

“你们俩坐得真近呀！”列妮端着汤盆回来了，她站在门口嚷道。他们的确坐得很近，谈到要紧处甚至头挨着头。个子本来就很矮小的商人由于弓着身子，显得更加矮小，K.不得不弯下腰去，才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别打岔，我们一会儿就谈完了！”K.不高兴地说道，并不耐烦地挥舞着手。刚才，这只手还按在商人的手上。“他让我谈谈我自己的案子。”商人望着列妮说。“谈吧，尽管谈好了。”她用和蔼而傲慢的口吻对商人说。这种口气引起了K.的不满，无论如何，K.这会儿已经发现商人对他来说有一定的价值，至少可以向人介绍些经验。他恼火地看着列妮从商人手中拿过蜡烛，用围裙擦干净他的手，并在他身边跪下，刮去滴在他裤子上的烛泪。“您刚才讲到那些非正式开业的律师——”K.说，并不由分说地推开列妮的手。“你这是怎么啦？”列妮问，轻轻拍了K.一下，继续刮商人裤子上的蜡。“是的，那些非法律师——”商人说，并用手摸摸前额，仿佛在回忆。K.提醒他说：“您想马上有个结果，所以去找他们。”“对。”商人说，但没有继续往下讲。他大概不愿当着列妮的面讲这些事，K.想。不过，他强压下急于想听下文的心情，不再催商人继续讲。

“你通报过了吗？”他问列妮。“当然啦，”她说，“律师正等着你呢。让布洛克歇一会儿吧，以后再找他谈。他总待在这儿。”K.仍犹豫着。“您总在这儿吗？”他问商人，想让他自己回答，而不愿列妮替他回答，仿佛他不在场似的。不知为什么，他今天对列妮总有一股无名的怒气。但是，回答他的问话的仍然是列妮：“他常在这儿过夜。”“在这儿过夜？”K.大声说，他本想等他同律师的短暂谈话一结束，便和商人一起离开，找个地方不受干扰地彻底谈一谈。“是的，”列妮说，“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约瑟夫，爱什么时间来找律师就什么时候来，你甚至以为，夜里十一点钟来拜访他这样一个病人，他也会接待你。你把朋友对你的帮助看做理所当然的。当然，你的朋友，至少是我很乐意这样做，我不需要你的感谢，只希望你能喜欢我。”喜欢你？K.想了一会儿，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喜欢她的。尽管如此，他却攻击其一点不计其余：“他不能不接待我，因为我是他的委托人。假如这还需要别人帮助的话，那我每干一件事情，都得乞求和感恩了。”“他今天火气可真大，是不是？”列妮对商人说。现在我倒成了第三者了，K.想，并开始怨恨起商人来了。这家伙学着列妮那没礼貌的口气说：“律师肯接待他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的案子比我的要有意思得多。此外，他的官司刚刚开头，也许还没来得及审理，因此律师愿意同他打交道。至于以后怎样，那就难说了。”“没错，没错。”列妮望着商人笑道，接着又把脸转向K.，“瞧他多会胡说八道！

他的话你一句也别相信，他虽然是个好人，但太饶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律师无法忍受他。所以，律师只有心情特别好时才接见他。我费了很大劲想改变这一状况，可是没有用。有几次我通报说布洛克来了，但他直到第三天才打算接见他。律师想接见他时，可他又不在，因此机会又丧失了，他又得重新等待。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允许他睡在这儿。过去曾发生过律师半夜按铃叫他去的事，打那以后，布洛克必须随时等候律师接见，即使半夜也得做好准备。有时也遇到过律师改变主意的情况，有一次他发现布洛克确实等在这儿，又故意取消了接见他的打算。”K.向商人投去疑问的目光。商人点头证实，用刚才同K.谈话时的坦率，但掺杂着羞愧的口吻说：“是的，越往后我就越离不开律师。”“他说的只是表面理由，”列妮说，“实际上他很愿意在这儿过夜，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好几次这样对我说。”她朝一扇小门走去，并把它推开。“您想看看他的卧室吗？”她问。K.走过去，站在门口向里看了一眼。那间屋子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要上床就得从床架上爬过去。床头那边的墙上有一个洞，洞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支蜡烛、一瓶墨水、一支笔和一卷纸，也许是有关他的案子的文件。“您睡在女仆的房间里？”K.把脸转过来望着商人问。“这是列妮安排的，”商人回答说，“这很方便。”K.久久地注视着他，他给K.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也许不错，他有经验，因为他的案子已经拖了好几年，但他为取得这些经验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K.突然觉得再也不能忍受商人的这副模样。“让他上床去！”他朝列妮嚷道。她好像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其实他是想马上去见律师，不仅解聘他，而且一劳永逸地摆脱列妮和商人的纠缠。但是，他还没走到律师卧室的门口，商人使用极低的声音对他说：“襄理先生！”K.生气地转过身来。“您忘了您的诺言，”商人哀求地向他伸出手，“您得告诉我一个秘密。”“不错，”K.说，并瞥了列妮一眼，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他，“那么听着，不过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我现在就要到律师那儿去，告诉他我打算解聘他。”“他要解聘他！”商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接着举起双臂，在厨房里转圈，一面跑一面大叫：“他要解聘律师！”列妮想拉住K.，但商人挡住了她的去路，她攥紧拳头打了商人一下，赶紧去追K.，但K.已走出好远。等她追上K.，K.已经跨进律师的卧室。他打算随手把门关上，但列妮伸出一只脚挡住门，抓住他的手腕，想把他拉回来。K.使劲捏住列妮的手，疼得她喊了一声，不得不松开K.。她不敢硬挤进屋，K.把钥匙一转，门锁上了。

“我已经等了您好半天啦。”律师靠在床上说，并将刚才借着烛光阅读过的一份文件放在床头柜上，戴上一副眼镜，用锐利的目光盯着K.

K.并未表示歉意，而是说：“我不会占用您很多时间。”律师似乎并不在意K.没有道歉。“下次如果再这样晚，我就不见您了。”他说。“这和我的想法一样。”K.说。律师用疑问的目光打量着他，“坐下吧。”他说。“既然您希望这样，”K.说，“那我就坐下。”他拉过一把椅子，在床头柜旁坐下来。“您好像把门锁上了。”律师说。“不错，”K.说，“那是因为列妮的缘故。”他不想袒护任何人。律师问：“她又来缠您了？”“缠我？”K.反问道。“是的，”律师笑起来，但一阵猛烈的咳嗽打断了这笑声，咳声止住后又笑了起来，“您大概发现她已经缠上您了？”他轻轻拍了拍K.放在床头柜上的手问。K.猛地缩回手。“您并不看重这事，”律师见K.并不回答又说，“这样更好，否则我就要替她向您道歉了。这是列妮的坏毛病，我早就原谅她了。假如您刚才不锁上门，我是不会再提这事的。这个毛病我最不愿意向您提起，不过，由于您如此困惑不解地看着我，我就不得不解释一下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列妮觉得大多数被告都很可爱。她喜欢他们，爱上了他们每一个人，显然也被他们所爱。为了让我开心，她常把这些事告诉我，当然，这种事只有得到我的允许她才能干。对此我并不大惊小怪，而您却感到非常吃惊。如果一个人眼力不错，他就一定会发现，被告往往是可爱的。这是一种奇怪的自然现象。一个人被控告以后，他的外貌并不会立即发生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变化。他们的官司与普通案件不同，大多数人继续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假如有个能为其奔走的好律师，也不会因为案子受到多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有经验的人仍然能在茫茫人海中辨认出哪些人是被告。您也许会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恐怕不能使您满意，不过我可以告诉您：所有的被告都是长得最漂亮的。不是罪行使他们变得漂亮了，作为律师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并非所有的被告都有罪，也不是行将到来的惩罚使他们变美了，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不会受到惩罚，原因只能是对他们提起的诉讼。诚然，他们之中有的长得更漂亮些，但总的说来全都很可爱，即使那个可怜虫布洛克也是如此。”

律师发表这番宏论之后，K.完全镇静下来，甚至对律师最后几句话点头表示赞同。他一贯的看法又一次得到了证实：律师总是用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忘记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律师究竟为他的案子做了哪些实际工作。律师显然发觉K.这一次比往常更加不好对付，便住了嘴，给K.一个讲话的机会。见K.仍然一言不发，他就问道：“您今天来有什么特别的事吗？”“是的，”K.说，并用手遮住烛光，以便把律师看得更清楚些，“我来是想通知您，从今天起，我不再让您过问我的案子了。”“我没听错吧？”律师用手撑住枕头，欠起身问。“但愿

如此。”K.挺直身子，好似在观察律师的表情。“好吧，我们可以就这个想法好好聊一聊。”律师待了一会儿说。“这不是什么想法，而是决定。”K.说。“就算是吧，”律师说，“那咱们也用不着这样匆忙。”他有意使用“咱们”这个称呼，似乎想抓住K.不放手，即使他不能再当K.的代理人，至少也要做他的顾问。“丝毫也不匆忙，”K.说，并慢慢站起身来，踱到椅子背后，“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我已经考虑很长时间了，绝不会再改变主意。”“既然如此，那就请让我再说几句。”律师掀开鸭绒被，坐到床沿上。他那两条长着白色汗毛的腿冻得瑟瑟发抖。K.扯过被子替他盖上说：“您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冻着。”“这件事太重要了，”律师用被子裹住上身，盖好两腿说，“您叔父是我的朋友，坦率地说，我也渐渐喜欢上了您，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K.很不愿意听这种令人感动的话，因为这就迫使他详细解释自己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而这正是他想避免的。另外，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律师的话虽然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但令他很尴尬。“我很感谢您的友好态度，”他说，“我也欣赏您为我的案子出了很多力，做了您认为对我有利的东西。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渐渐觉得，这还非常不够。我当然不会把我的看法强加给您，一个无论在年岁或经验上都比我多的人，但如果我不慎这样做了，那就得请您原谅。正如您所说，事情非常重要，按照我的看法也非常必要，我不得不采取比迄今为止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干预我的案子。”“我理解您的意思，”律师说，“您感到不耐烦了。”“我并不是不耐烦，”K.有些恼火地说，不再斟酌字眼，“还在我同叔父一道第一次来拜访您的时候，您大概已经发现，我并不把这件案子当一回事，如果不是别人强行让我想起它，我恐怕把它完全忘记了。可我的叔叔坚持要我聘您做代理人，为了让他高兴，我这样做了。从那时起，我就希望这件案子对我的压力减轻一些。〔15〕因为，请律师做代理人的目的就是要将压力匀一些给律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我聘请您做我的代理人以后，这件案子反而使我更加苦恼了。我独自一人时，什么措施也没采取，但我几乎感觉不到案子的存在。现在，我有了代理人，似乎条件已经具备，只等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了，我日夜等待您的干预，越来越焦急不安，而您却什么事也没做。当然，我从您那儿了解了不少关于法院的情况，这些情况也许是别处打听不到的，可这对我来说远远不够，特别是现在，案子正悄悄地逼近我，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我。”K.推开椅子站起来，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当官司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律师压低声音，平静地说，“就不会发生什么新鲜事了。许多当事人在案子进入这个阶段后，也像您一样跑到我这里来，说出同样的话。”“那么，”K.说，“这些当事人

和我一样，完全说对了。这一点并不能反驳我。”“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反驳您，”律师说，“只是想补充，我本以为您的判断力比他们要强，特别是在我向您透露了更多的关于法院和我本人工作的情况之后。而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尽管这样，您对我还是不够信任。您真叫我头疼！”律师在K.面前多么低声下气，甚至不顾自己的职业尊严，而一个律师在这方面恰恰是最敏感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看上去他似乎业务繁忙，生活阔绰，并不在乎失去一个当事人和一点酬金。此外，他还生着病，对于减轻他的工作负担应当高兴才是。但他却紧紧抓住K.不放，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同K.的叔叔有私人交情还是因为真的觉得K.的案子很特殊，希望通过为K.辩护抬高自己在K.和法院里的朋友心目中的声望呢？至少这后一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尽管K.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但也无法断定是什么原因。旁观者几乎会认为，律师故意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为的是看看他的话会引起什么样的效果。然而，律师显然对K.的沉默作了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接着说：“您一定注意到，我的办公室虽然很大，但却没有助手。前几年可不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学法律的学生在我这儿帮忙，今天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业务活动的变化，我渐渐地只过问像您这样的案子了；另一方面是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不能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托给别人，从而给我的当事人和我为之奔走的案子带来损失。既然我决定亲自去干所有的事情，那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不得不拒绝大部分其他的委托而只致力于我特别感兴趣的案子。在我家附近便有不少可怜虫，凡是我拒绝接受的委托，他们都像饿狼一样争来抢去。另外，由于工作过于劳累，我的身体也垮了。尽管这样，我并不为我的决定而后悔。也许我还应该拒绝更多的委托，以便更加专心致志地打好我所为之辩护的那些官司，这样做看来绝对必要，并且已被我所取得的成功所证明。我曾读到过一篇文章，文中对普通案件的代理人和您这类特殊案件的代理人作了十分精辟的区分。作者是这样说的，一些律师用一条细线牵着他们的委托人走向判决，而另一些律师则把他们的委托人背在背上，直到判决下达绝不把他们放下，甚至判决以后仍背着他们。事情的确如此。要说我挑起这么重的担子一点都不后悔，那也不完全是事实，如果我的努力遭到了严重的误解，就像您刚才所做的那样，我也会有些后悔。”但这番话并未让K.心悦诚服，而是使他更加不耐烦了。〔16〕从律师的口气里，他似乎听出了他早已预料到的陈词滥调：已经重复多次的那些废话又会从头开始，什么申诉书快要完成啦，法官的态度已经好转啦，接着就是他的努力遇到了巨大困难啦，如此等等。总而言之，那套早已令人厌烦的鬼话又会

搬出来，目的在于用虚假的希望欺骗K，用子虚乌有的威胁吓吓K。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因此K说：“如果您继续做我的代理人，您将采取什么措施？”律师甚至对这个挑衅性的问题也忍气吞声。他说：“我会继续做目前已经着手做的那些事。”“我早就料到了，”K说，“那么，再谈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我将再试一次，”他说，仿佛生气的是他，而不是K，“我猜想，您不仅错误地估计了我的业务能力，而且您的其他表现也很糟糕。作为被告，您受到的待遇太好了，更确切地说，他们对您太疏忽了。当然，这样做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与其给被告戴上镣铐，不如让他们享受虚假的自由。不过我得让您瞧瞧，其他的被告得到的是什么待遇，那样您也许会从中得到点教训。我现在就把布洛克叫来，您最好把门打开，在床头柜旁坐好！”“非常愿意。”K说着按律师的要求做了。他总是愿意学到些新东西。不过，为了慎重，他又问了一句：“您知道我要解聘您吗？”“当然，不过您如果想改变主意的话，今天还来得及。”他重新躺到床上，把鸭绒被一直拉到下巴，然后转过身去脸朝着墙，按了按铃。

几乎在铃响的同一刻，列妮便出现在门里。她匆匆地看了屋内一眼，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她看到K安安静静地坐在律师的床边，似乎放心了。她微笑着向K点点头，但K只是怔怔地望着她。“让布洛克进来。”律师说。列妮并未去领布洛克，而是在门口喊了一声：“布洛克！律师叫你！”也许是因为律师脸朝墙躺着，无法看见她，她悄悄走到K的背后，上身俯在椅背上，伸出手温情脉脉地抚弄他的头发，或抚摩他的面颊。K觉得很不舒服，最后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让她别再摸。她反抗了一阵，只好屈服。

布洛克听到叫声立即跑来了，但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阵，好似在考虑应不应该进去。他扬起眉毛，歪着头，仿佛在听让他去见律师的命令是否会重复一遍。K本想示意让他进来，但他已决定不但同律师，而且也同这所住宅里所有的人彻底断绝关系，所以坐着没有动。列妮也一声不响。布洛克发现，至少屋里的人没有赶他走，这才踮起脚尖轻轻走进来。他面部表情紧张，双手痉挛地背在背后，让门开着，以便随时可以退回去。他顾不上看K一眼，只盯着隆起的被子。由于律师脸紧贴着墙蜷缩在被子下面，他根本没法看见。这时，床上传来一个声音：“是布洛克吗？”这个声音仿佛给了布洛克一拳，已经快走到律师床边的他不由得跌跌撞撞地退了好几步。他好像胸前挨了一下，接着背后挨了一下，几乎站都站不稳。终于，他双脚站定，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愿为您效

劳。”“你来干什么？”律师问，“你来得不是时候。”“不是有人叫我吗？”与其说他在问律师，不如说在问自己。接着，他伸出双手护住自己，准备随时逃出去。“是有人叫你，”律师说，“尽管如此，你来得也不是时候。”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你来得总不是时候。”自从听见律师的声音，布洛克不再往床上看，而是朝着一个角落发呆，并听着每一个动静，仿佛律师的声音让他害怕，叫他受不了。但他吃力地听着，因为律师的脸贴着墙，说话的声音又轻又快。“您希望我走开吗？”布洛克问。“既然你已经来了，”律师说，“那就待着吧！”这话听起来让人觉得，律师并不是想满足布洛克的愿望，而是在威胁他要揍他一顿。布洛克果真浑身颤抖起来。“昨天，”律师说，“我遇见了我的朋友第三法官，谈着谈着，谈到了你的案子。你想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吗？”“啊，当然。”布洛克说。但律师没有立即回答。布洛克又央求了他一次，并弯下身子，好像要跪倒在他的面前。K.忍不住大声呵斥他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列妮想堵住他的嘴，他于是把她另一只手也抓住了，但这并不是爱抚。她呻吟了几声，想挣脱开。然而，由于K.的愤怒，最后吃苦头的却是布洛克。律师冷不防又提了一个问题：“你的律师是谁？”“当然是您。”布洛克说。“除了我还有谁？”律师问。“没有别人。”布洛克说。“那就不许跟别人打交道！”律师说。布洛克立即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他恶狠狠地瞪了K.一眼，朝他使劲摇摇头。假如把这个动作翻译成语言，那就是一顿粗暴的谩骂。K.刚才竟想同这种人友好地谈论自己的案子！“我再也不管你的闲事了，”K.往椅子背上一靠说，“不管你下跪还是在地上爬，都不关我的事。我绝不再多一句嘴。”但布洛克也有自尊心，至少在K.面前是这样。他挥舞着拳头向K.走去，并壮起胆子，用他在律师面前敢于发出的最大声音嚷道：“不许用这种腔调同我说话，绝对不许！你想侮辱我吗？居然在这儿，当着律师先生的面？他是出于怜悯才让我们待在这儿的。你并不比我好到哪儿去，你也是个被告，同我一样也在吃官司。如果说你还是位绅士，那我也是，并且和你一样体面。我要你像对待一位绅士那样对待我。倘若你觉得心安理得地坐在那儿比我在地上爬——你刚才就是这么说的——要好，那我就告诉你一句古老的法律谚语吧：受到怀疑的人最好多活动，而别待着不动，因为待着不动就会不知不觉被放到天平上称称他的罪到底有多重。”K.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疯狂的家伙。在短短的一个钟头内，他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难道是他翻来覆去唠叨的那件案子使他丧失了理智，以至连敌友都分不清了？他难道没有看出来律师在故意羞辱他，为的是在K.面前显显威风并让K.屈服？要是布洛克连这点

都看不出，或者怕律师怕到明明看出来却不敢反抗的程度，那么，他又怎么能如此狡猾和大胆，竟想欺骗律师，背着他去请别的律师呢？他明知K.可能揭穿他的谎言，又为什么要如此鲁莽地攻击K.呢？然而，他的胆子比K.想象的大得多，竟然走到律师床前，告起K.的状来了。“律师先生，”他说，“您听见这个人对我讲的话了吗？他的案子刚开始没有多久，就教训起我这个已经打了五年官司的人来了。他甚至还骂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却侮辱我，我可是以我的微薄的精力仔细研究过什么是公德、义务和法律准则啊。”“别管别人怎么说，”律师说，“你自己觉得怎么对就怎么干好了。”“一定照办，”布洛克好像在给自己打气，向两旁瞥了一眼便跪倒在床前，“我给您跪下了，律师先生！”他说。^[17]但律师没有吭声。接着，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抚摩被子。在一片寂静中，列妮挣脱K.说：“你把我捏疼了，放开，我要到布洛克那儿去。”她走过去坐在床沿上。布洛克见她来到自己身边十分高兴，频频打着手势请她向律师求情。他显然急于从律师口中得到一些消息，好让其他律师利用这些消息采取新的行动。看来列妮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套出律师的话，于是噘起嘴唇，做出吻手的姿势。布洛克心领神会，立即亲吻了律师的手，并在她的暗示下，把这个动作又重复了两遍。但律师仍一言不发。于是，列妮挺直身子，露出她那优美的曲线，俯下身去，凑近律师的脸，轻轻抚摩他那长长的白发。这终于引出了一个回答。“我还在犹豫，不知该不该告诉他。”律师说。K.看见他轻轻摇了摇头，也许是为了更加亲近列妮的手。布洛克低着头侧耳静听，仿佛偷听别人讲话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要犹豫呢？”列妮问。K.觉得，他是在听一段背得滚瓜烂熟的对话，这种对话以前常常进行，以后也会经常重复，只有布洛克一人不觉得乏味。“他今天表现如何？”律师没有回答，倒是提了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列妮先低头看了布洛克一会儿，后者朝她伸出双手，做哀求的姿势。她终于点点头，转过脸去对律师说：“他又安静，又勤快。”一个上年纪的商人，留胡子的男人，竟哀求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妞为自己说好话！尽管他有难处，但在旁人眼里，无论如何是太丢脸了。K.实在不明白，律师怎么会试图用这样拙劣的表演把他争取过去。假如说直到刚才为止他还没有彻底使K.对他失望，但现在通过这一幕丑剧却完全办到了。即使是旁观者看了也会羞愧难当。看来律师所玩弄的手腕——幸亏K.及时摆脱了他的控制——就是：让委托人忘记世界上的一切，一心一意跟着他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爬向案子的终点，委托人再也不成其为人，而成了律师的一条狗。假若律师命令此人爬到床底下去，就像爬到狗洞里一样，并且在那儿学狗叫，此人一定会高高兴兴地照办。K.冷

冷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受到某人的委托，要把这里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向上级机关检举报告。“他这一天都干了什么？”律师问。“我把他关在女仆住的那间小屋里，”列妮说，“不让他妨碍我干活。他始终待在那儿，我可以透过窥视孔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他一直跪在床上，读你借给他的文件。他把文件摊在窗台上，一字一句地读，给我留下了好印象。那间小屋的窗子对着小天井，透不进多少光线，可他仍然专心致志地读，一丝不苟地做你让他做的事情。”“听你这么说不，我真高兴，”律师说，“不过，他读懂了吗？”布洛克不停地翕动嘴唇，对律师的问话作出无声的回答，以此授意列妮也这样回答。“这我当然不能肯定，”列妮说，“不过看得出来他读得很仔细，整天翻来覆去地看同一页。他用手指着，一行一行慢慢地往下看。我每次透过窥视孔观察他，都看见他在叹气，好像读起来很费劲。你借给他的文件也许太难懂了。”“是的，”律师说，“它们太深奥，我也不相信他能读得懂。给他看这些文件只是要让他明白，我为他进行的辩护是一场多么艰巨的战斗。这场艰巨的战斗是为了谁呢？说起来真可笑，为的是布洛克。他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一直在看吗？”“差不多从未停下来过，”列妮答道，“只有一次他向我要了点水喝，我从通风口给了他一杯水。8点钟的时候我让他出来，给了他一点吃的。”布洛克瞟了K一眼，仿佛这些话是在夸奖他，K也应当学学他的榜样。他的希望似乎增大了，行动也不那么谨慎了，双膝不停地在地上蹭来蹭去。然而，律师下面的话却使他一下子僵在那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你在夸奖他，”律师说，“但这只能更难让我开口，因为法官讲的话对他十分不利，既对他本人，又对他的案子不利。”“不利？”列妮问，“这怎么可能呢？”布洛克神情紧张地望着她，似乎她有能使律师说出的话变成有利于他的话。“是的，非常不利，”律师说，“他甚至讨厌提起布洛克。‘别再提布洛克。’他说。‘他可是我的委托人呀。’我说。‘您被他利用了。’他说。‘我不认为他的案子没有希望了。’我说。‘他是在利用您。’他又说。‘我不信，’我说，‘布洛克始终在关心他的案子，并且非常卖力。为了及时了解案子的进展，他几乎一直住在我那里。像他这样卖力的委托人确实少见。当然，他本人叫人恶心，举止粗俗，身上很脏，但在打官司方面却是无可指责的。’我说无可指责，其实是太夸张了。‘布洛克是只老狐狸，’他听了马上反驳道，‘他只不过经验丰富而已，懂得怎样把案子拖延下去。可他不管多么狡猾还是被蒙在鼓里了。要是他知道他的案子还没有开始审理，第一次开庭的铃声还没有摇响，他会怎么说？’别乱动，布洛克！”律师喝道，因为此时布洛克哆嗦着两腿想站起来，显然想请律师解释一下。这是律师第一次直接对布洛克说

话，他用疲倦的目光朝四周看了看，接着又朝下看了看。布洛克在律师的注视下又慢慢地跪好。“法官的这些话对你来说并没有多大影响，”律师说，“用不着为每个字眼心惊肉跳。假如你再这样，我就什么都不告诉你了。我每讲一句话，你就用这样一种眼神瞧着我，好像我在宣判你的死刑。当着我另一位委托人的面，你应当感到害臊！这样你也会动摇他对我的信任。你这是怎么啦？你还活着，还在我的保护之下，干吗这样害怕？简直像个白痴！你肯定在某个地方读到过，某些案子的最终判决往往是不知在什么时候，由于某个人随便讲了一句什么话而做出的。有人当然不相信，这也没有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那副胆小如鼠的神态叫我恶心，它表明你对我还缺乏必要的信任。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只不过重复了法官讲过的话而已。你也知道，法官们对一件案子往往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最后弄得一团糟。比如，这位法官认为官司要从这一刻算起，而我却认定应该从另一刻算起，这只不过是意见分歧而已。按照古老的习俗，官司打到一定程度就得摇铃，这位法官于是认为诉讼这才正式开始。我无法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懂。你只需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就行了。”焦虑万分的布洛克此时掀起律师床前铺的毛皮地毯来了。律师的话使他害怕得要命，他顾不上再在律师面前装出谦卑的样子，一心想着自己的事，并反复琢磨着法官那些话的真正含义。“布洛克，”列妮用警告的口气说，并拽住布洛克的衣领，把他往上拉，“别动地毯，听律师讲话！”

（在作者的手稿中，此章未完——译者）

第九章 在大教堂里

K.受命接待一位意大利同行。他是银行非常重要的顾客，首次访问该城，想参观几处名胜古迹。要在平时，K.肯定会把这项差事看作一种荣誉，但现在，在他竭力维护他在银行里的表面声望的时候，他不愿接受这项任务。离开办公室的每一个钟头对他都是一种折磨。虽然他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充分利用上班时间工作，而只是装模作样似乎在干正经事，可是，他如果不在办公室坐着就会更加忧心如焚。他仿佛看见副经理总在窥探他的秘密，隔一会儿便溜进他的办公室，在他的写字台边坐下，翻看他的文件，接待K.多年来与之打交道并成了他的老朋友的那些顾客，把他们从他那儿抢走，或许还在他的工作中找茬儿。K.心里明白，工作中的各种差错正在不断地威胁自己，而他再也无法防范了。因此，如果委派给他一件差事，哪怕是能大出风头的差事，需要他离开办

公室或者作一次短途旅行，他就会猜疑他们是想把他支开，以便检查他的工作，至少是为了证明办公室缺了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大部分差事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推辞掉，但他不敢这么干，因为即使他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拒绝出差也会被认为是心里有鬼。正因为如此，他装出十分坦然的样子，每桩差使都接受下来。上一回，他正患着重感冒，别人却请他出两天差。他本来可以用秋天阴湿的天气可能加重他的病情为由推诿掉，然而，他却只字不提自己生病的事。等他带着剧烈的头痛回到银行时，却获悉别人已决定让他第二天去陪意大利客人。拒绝这一次任务的愿望十分强烈，尤其是他应该干的事与业务丝毫没有联系，这只能是对一位外国同行应尽的社交义务而已。诚然，这项义务十分重要，但K.觉得对自己无关大局，因为他知道，他只有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才能保住自己在银行里的位置，工作做不好，即使意大利人发现他是一位极其出色的陪同，也毫无意义。他一天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害怕不会再让他回来，这种恐惧太强烈了，虽然他知道自己过虑了，但仍然无法摆脱。他找不到一个可以站住脚的理由推掉这项差事。他的意大利语固然并不精通，但应付一下还是行的。更重要的是，他早年学过艺术史，对艺术略知一二。这件事在银行里尽人皆知，并且被夸大到荒谬的程度，因为有段时间由于工作关系，K.曾出任本市文物保护协会的会员。据说那个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也是个行家，假如的确如此，那么挑选K.陪同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这是一个雨雾蒙蒙的早晨，一阵阵寒风迎面刮来。K.对即将开始的这一天十分恼火。七点钟他便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打算在客人到来之前起码要干完几件事。他感到很疲倦，因为昨天晚上他花了半夜时间啃一本意大利语法书，以便为今天的苦差事做些准备。办公室的窗子比写字台对他更具有吸引力，最近他常常坐在窗台上想心事。但他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坐下来准备工作。可是，正在这时仆人推门进来，并报告说经理先生让他来看看，襄理先生是否已经上班了，如果已经来了，就请他到接待室去，那位从意大利来的客人已经到了。“我马上去。”K.说。然后将一本袖珍词典塞进口袋，夹着一本为外地客人准备的城市游览画册，走过副经理办公室，来到经理办公室。他庆幸自己来得很早，经理一叫马上就到了，这点大概谁都没料到。副经理的办公室自然静悄悄的，连一个人也没有，很可能仆人也来请过他，但他连影子也见不到。K.走进接待室时，两位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经理面带亲切的微笑，显然对K.的到来很高兴，并立即把客人介绍给他。意大利人使劲握住K.的手，笑着称某人起床甚早。K.不明白他指的是谁，那个名字的发音很

怪。愣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对方说的正是自己，于是用几句流利意大利语寒暄了一番。意大利人又笑了一次算是回答，同时神经质地摸了摸他那浓密的灰蓝色胡子。那胡子一定喷过香水，K.真想凑近去闻一闻。他们重新坐下后，开始了简短的交谈。当K.发现意大利人讲的话他只能听懂一部分时，心中很是不安。要是他讲得慢一些，语调平静一些，K.便差不多全能听懂，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那家伙往往像放机关枪一样讲得又快又急，一面还摇晃着脑袋，仿佛对自己的口才很欣赏，说到得意处还要改用方言。对K.来说，这根本不是意大利语，但经理却既能听懂又能与客人对话。K.当然不知道，此人来自意大利南部，而经理曾在那里待过好几年。无论如何K.渐渐明白了，要和意大利人交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此人的法语也讲得实在太糟糕，K.几乎无法听懂。观察他嘴唇的动作猜测含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嘴唇完全被胡须遮住了。K.预感到此次差遣将遇到许多麻烦，于是暂时放弃了听懂意大利人讲话内容的打算。在如此了解他的经理面前，他用不着费力劳神。他坐在一旁，神情沮丧地观察着意大利人逍遥自在地靠在沙发上，不时拽一拽他那剪裁时髦、但又短又小的上衣，并抬起手臂不经意地比比划划解释某事。

〔18〕尽管他俯下身子注视着那人的每一个动作，仍然猜不透对方兴致勃勃地谈论的究竟是什么事。最后，他干脆呆坐在那里不参加谈话，只是机械地看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侃侃而谈。早晨的倦意重新向他袭来，当他发现自己心不在焉地想站起身来撇下他们就走时，不禁吃了一惊，幸亏他及时制止住了自己。终于，那意大利人看了看表，从沙发上跳起来，与经理道别后走到K.面前。他靠得那么近，K.不得不把沙发往后挪了挪，才使自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经理大概从K.的眼里看出他听不懂意大利人的话，处境非常尴尬，便巧妙而委婉地插进来，似乎是给K.出几个小主意，其实是简单地重复了一下客人刚才滔滔不绝的谈话的大致内容。K.这才知道，意大利人有几件业务上的事情要处理，时间很紧，因此不打算匆匆忙忙地把所有的名胜古迹都看一遍。如果K.同意——一切都取决于K.——他只想参观一下大教堂，当然要看仔细一点。能有一位如此博学而热情的先生——这当然指的是K.——陪同他参观，他感到非常高兴。K.尽量不听他讲话，而是牢牢记住了经理复述的内容：意大利人请求K.，假如时间合适的话，他想在两个钟头之后，也就是说十点，在大教堂见到他，而他自己一定会在那个时间赶到。K.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表示同意，那人于是先和经理握了握手，接着握握K.的手，然后又同经理握了一次手，才朝门口走去。经理和K.把他送出接待室，在此过程中，他又侧过身子讲了一大串话。送走了客人，K.又在经理室待

了一会儿。经理今天看上去身体特别不好。他说——他们俩站得很近——他应该向K.道歉，本来想亲自去陪意大利人，后来转念一想，觉得还是让K.去更好——他没有说出确切的原因。倘若K.开始听不懂意大利人的话也不必着急，用不了多久他就渐渐能懂。即使完全不懂也不要紧，因为客人完全不在乎这些，何况K.的意大利语并不差，一定能应付自如。说完这些，他就让K.回办公室了。K.利用剩下的时间抄录了一些参观大教堂也许能用得上的生词。这是一件令人厌烦的工作。仆人接二连三地送来文件，职员们纷纷前来向他请示。当他们看见K.正忙得不可开交，便站在门口不走，直到K.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才肯离开。副经理也不放过打搅他的机会，好几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拿过他手里的词典随便乱翻——他显然对意大利语一窍不通。前厅里的顾客们更使他心烦，只要门一开，他们便纷纷站起身来向他鞠躬，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但是否能引起他的注意却心中无数。所有这一切都围绕K.进行，仿佛他是一切的中心，而他则忙着查词典，收集他需要的单词，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练发音，试图把它们背熟。过去他极好的记忆似乎离他而去，有时他火冒三丈，对那个给他带来这么多麻烦的意大利人恨之入骨。他把词典塞到文件堆下面，下决心听天由命，不再准备了。但他转念一想，他总不能一声不吭地陪着那意大利人在教堂珍藏的艺术品前走来走去吧。于是，他压下更大的怒气，又把词典拿了出来。

9点半钟他刚要走，电话铃便响了。列妮向他问好，并问他近况如何。K.匆匆地道了谢，告诉她现在没时间跟她聊了，他得上大教堂去。“上大教堂？”列妮问。“对，去大教堂。”“干吗去大教堂？”她又问。K.准备简单地向她解释几句，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列妮突然说：“他们逼得你好紧啊。”这种他既没有要求也没有料到的同情使他无法忍受。他用两句话同她道了别，便挂上电话。不过，在他把听筒放回原处时，却咕哝道：“是的，他们逼得我好紧。”这话一半是对自己，一半是对那已经听不见他的话的远方姑娘讲的。

已经不早了，他恐怕不能按时赴约，便叫了一辆出租车。临上车时，他想起那本画册。在此之前，他没有机会送给那个意大利人，现在可以带上了。他把画册搁在膝盖上，一路上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打着封面。雨小多了，但天色阴暗，空气又潮又冷。大教堂里看得清的东西大概不会太多，而好几个钟头踩在冰凉的石头地上，无疑会大大地加重K.的感冒。教堂前的广场空无一人。K.回忆起，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狭窄广场四周的房子，所有的窗户都被窗帘遮得严严实

实。可以理解，在今天这样的天气更是如此。教堂里似乎也空荡荡的，人们当然不会选择这种时候来参观。K.走遍了兩间侧殿，只看见一个老妇人裹着厚厚的披肩跪在圣母像前望着它。后来他远远地看见一个教堂杂役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侧殿的一扇门。K.是准时到的，他走进教堂时，正好钟敲10点，但意大利人连影子都见不到。K.回到大门口，在那儿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冒雨围着大教堂走了一圈，看那个意大利人是否会在哪扇旁门等着。但哪儿都找不到他，是经理把时间搞错了？有谁敢保证他百分之百地听懂那个意大利人的话呢？无论如何，他也得再等上半个钟头。他累了，想找个地方坐下，于是又走进教堂。在一道台阶上他发现一块地毯模样的东西，便用脚尖把它勾到一条长凳边，裹紧大衣，竖起领子，在长凳上坐下。为了消磨时间，他打开画册，心不在焉地翻阅起来。但不久他不得不作罢，因为光线太暗，当他抬起头，连离得很近的侧殿里的东西都很难分辨清楚了。

在远处的主祭坛上，燃烧的蜡烛排成一个大三角形。K.无法肯定，他以前是否见过主祭坛上燃着蜡烛，也许，它们是刚刚点燃的。教堂杂役出于职业习惯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人们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动静。K.偶然转过身，发现他身后不远处燃着一支又长又粗的蜡烛。蜡烛插在廊柱上，形状很美，是用来照亮挂在两旁小祭坛里的圣像的。那些祭坛隐藏在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不仅没照亮它们，反而使它们更暗了。意大利人没有来，这虽然是失礼，但也是明智的，因为即使来了，他也看不见什么，顶多只能借助K.手电筒的光零零碎碎地看到几尊圣像。为了证实这一猜想，K.走进旁边的一个小礼拜堂，登上几级台阶，来到一排低矮的大理石栏杆前，掏出手电筒并探出身子，照了照祭坛上的塑像。祭坛前一盏长明灯飘忽不定的灯光仿佛使手电筒的光也晃动起来。K.首先看到的——或者不如说是猜到的——是边上站着的一个身材魁梧、披着铠甲的骑士，他手握一柄剑，剑刃插在光秃秃的地上，骑士好像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发生在他眼前的事。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只站在原地不动，而不走到出事地点去。也许他的职责是站岗。很长时间没有欣赏过艺术品的K.久久地打量着这位骑士，虽然他觉得手电筒发绿的光有些刺眼，不得不眯缝起眼睛。当他移动手电光，照亮神坛其余部分时，才发现祭坛上表现的是基督入殓时的情景，同人们在别的教堂里见到的没有什么不同。此外，塑像似乎是新近才完成的。他收起手电筒，回到刚才坐过的地方。

看来用不着再等那个意大利人了。外面也许正下着瓢泼大雨，教堂

里并不像K.想象的那么冷，他于是决定，暂且先在这里待一会儿。他旁边就是神父布道的讲坛，小小的拱形坛顶上斜架着两个金色的十字架，顶部互相交叉。讲坛外沿的栏杆上以及将栏柱连接起来的部分，都雕有绿色的叶片，叶片间有许多小天使，有的显得活泼，有的恬静。K.来到讲坛前，从各个角度仔细观察。石雕精美纤巧，叶片间和叶片后镂有许多深深的洞，黑暗似乎在这里被捉住，再也无法逃逸了。K.把手指伸进一个深洞，小心地摸了摸石头洞壁。过去，他并不知道大教堂里有这样一个布道坛。蓦地，他发现身后最近一排长凳后站着一个教堂杂役，身穿一件宽大、垂地的黑色长袍，左手拿着一个鼻烟壶，正在打量着他。他在干什么？K.想，看我可疑，还是想求我施舍？杂役看到K.发现自己，便举起右手，朝某个方向指了指，指间还捏着一撮鼻烟。K.不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犹豫了一会儿。但那人仍一个劲地指着什么，一边还不停地点头，仿佛强调他的手势的重要。“他到底想干什么？”K.小声问自己，在这个神圣的地方，他不敢大声说话。然后，他掏出钱包，沿着长凳间的空隙朝那人走去。但那人立即做出拒绝的姿势，耸耸肩，一瘸一拐地走了。K.还是小孩时，就常常像这个匆匆离去的跛子一样，模仿过骑马的动作。“一个像孩子一样的老人，”K.想，“智力只够当个教堂仆役。我一停下来，他也不走了，但还充满期待地望着我，看我是否继续往前走。”他微笑地跟着老人穿过侧殿来到主祭坛前。老人仍然指着什么，但K.故意不转过脸去。他的手势不会有什么目的，只不过想让K.离开刚才那地方而已。K.不再跟着他，一方面是不愿吓着他，另一方面是想，万一意大利人来了，看到这个场面也很尴尬。

K.回到中堂，寻找他刚才坐过的那张长凳，他把那本画册忘在那儿了。这时，他发现唱诗班座位附近的柱子旁有一个小小的副讲坛。这个讲坛外形简单，用光秃秃的浅色石板砌成。讲坛是那样小，远远看去好像一个尚未安放圣像的壁龛，布道者要从石栏杆往后退一大步都很困难。石砌的拱形坛顶没有任何装饰，而且很低，边缘还向上翘起，连中等个子的人也无法在拱顶下站直，只能弓起身子倚着栏杆。整个讲坛仿佛是为了折磨布道者而设计的。K.简直不明白，为什么别的讲坛那样大，装饰得那样精美，而这一个却如此低矮简陋。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倘若不是在这个小讲坛上方挂着一盏布道开始前必须点燃的灯，K.肯定不会注意到它。难道说，这儿马上就要举行一次宗教仪式？在这空无一人的教堂？K.朝下面紧贴着廊柱、并盘旋而上，一直通往讲坛的窄

台阶望去，这道台阶更像是那些柱子的装饰，而不是供人上下的楼梯。然而，在讲坛的底部确实有一位神父手扶栏杆准备拾级而上。K.惊讶得几乎笑出声来。神父仰望着K.，向他微微点点头。作为回答，K.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向神父躬身施礼。其实，他早该这样做了。神父一个箭步，迈着小步飞快地登上讲坛。他真的要布道吗？难道那教堂杂役并非智力低下，而是想把K.引到小讲坛这边来？在这座空无一人的教堂里，这样做完全是应该的。不过，教堂里还有一位老妇人在圣母像前站着，她也应该来听布道呀！再说，如果一次宗教仪式即将开始，管风琴为什么不奏乐呢？管风琴沉默着，一排排长管子在黑沉沉的教堂顶部闪着暗淡的光。

K.犹豫着，不知是否应该立即离开。假如他现在不走，布道一开始便无法脱身了。那样一来，他就得一直待到仪式结束，到后再回办公室就太晚了。再等意大利人已经没有必要。他看了看表，已经11点了。不过，真的要布道了吗？K.一个人能代表全体信徒吗？假如他只是一个来参观教堂的陌生人，那又会怎样呢？实际上，他差不多就是这样。在这样坏的天气，在这个并非周末的日子里，在上午11点钟才开始布道，这想法实在太荒唐了。神父——那人无疑是一位神父——是个年轻人，黑黑的脸膛上一条皱纹都没有。他爬上讲坛肯定是想灭掉那盏由于疏忽而点燃的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神父凝视着那盏灯，甚至将它拧亮了一些。接着，他缓缓转过身来，双手扶住栏杆边缘，静默地站了一会儿，并朝四周看了看。K.向后退了一大段距离，双肘撑在最前面一排长凳上。他觉得教堂杂役正静静地坐在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驼着背缩成一团，仿佛已经完成了自己分内的工作。大教堂里此刻是多么寂静！但K.要打破这种寂静，他不想在这儿再待下去。倘若这位神父的职责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种环境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布道，那就随他的便好了。即使没有K.在场，他也能办到，就算K.在场，效果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于是，K.慢慢地移动脚步，踮起脚尖沿着长凳往外走，一直走到两行长凳间的过道里。没有什么东西挡住他的去路，只有他的脚步在石头地面上发出轻微的响声，响声传到拱顶上反射回来，变成持久不断的、有规律的回声。K.感到孤独，空无一人的长凳间只有他独自在行走。他觉得神父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而教堂是那么大，大得令人无法忍受。他走到原先坐过的地方，没有停步便匆匆拿起长凳上的画册。当他快要走到两排长凳的尽头，踏上通往大门的一片空地时，突然听到神父的声音。那

声音是如此洪亮而训练有素，在死一般寂静的教堂里久久回荡。但是，神父的声音并非针对众教徒，而是明白无误地针对K。“约瑟夫·K！”他喊道。

K.吃惊地停住脚步，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地面。暂时他还是自由的，还可以继续向前走，穿过不远处那三扇黑色的小木门中的一扇走出教堂。这将意味着他没听懂这喊声，或者虽然听懂了但并不理会。假若他转过身去，他将无法脱身，因为那就等于承认，他就是那个被喊的人，并且乐于听从神父的召唤。倘若神父再一次喊出他的名字，他也许会毫不犹豫地走掉，然而，尽管他站在那里等那声音再次响起，周围却静悄悄的。他忍不住稍稍转过头去，想看看神父在做什么。但神父仍站在讲坛上一动不动，显然已经注意到K.头部的动作。假若K.不完全转过身去，他们也许会像孩子们玩捉迷藏一样互相猜度对方的心思。但K.这样做了，神父于是勾起一只手指叫他走近些。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回避了，K.三步并着两步朝讲坛跑去，既是出于好奇，也是为了缩短在此逗留的时间。在最前面几排长凳边，他停了下来。但神父仍觉得他们间的距离太远，便伸出一只胳膊，食指做出命令的姿势，指着讲坛面前的某个地方。K.照办了，在这儿，他必须仰起头才能看见神父。“你是约瑟夫·K.？”神父抬起手，在石栏杆上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是的。”K.说，心中却想，过去他通报自己的姓名时是何等坦然，但一段时间以来，这却成了他的一大负担。而现在，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也都知道他叫什么了。他多么向往先作自我介绍，然后再相互认识的时光啊。“你是一名被告？”神父压低嗓门说。“不错，”K.说，“有人这样告诉我。”“那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神父说，“我是监狱神父。”“原来如此。”K.说。“是我让人叫你到这儿来的，”神父说，“我要跟你谈一谈。”“我可不知道，”K.说，“我上这儿来是想陪一个意大利人参观教堂。”“别打岔，”神父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祈祷书么？”“不，”K.答道，“是一本介绍本市名胜古迹的画册。”“那么，扔掉它。”神父说。K.用力把画册扔出去，画册打开了，带着散乱的书页跌落在地上，并向前滑了一段距离。“你知道你的案子不太妙吗？”神父问。“我也这样觉得，”K.说，“我作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至今毫无成效。当然，我的申诉书还没写好。”“你认为结果会怎么样？”神父又问。“过去我想，肯定会一切顺利，”K.说，“可现在我自己有时也怀疑起来了。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你知道吗？”“不，”神父说，“不过我担心会很糟。他们认为你有罪，你的案子也许永远不会通过低级法庭这一关。至少，他们暂时认为你的罪行已被证实。”“但我并没有罪，”K.说，“这是一个误会。一个人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被判有罪呢？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彼此并没有区别。”“这话不错，”神父说，“可是，有罪的人都这么说。”“你对我也有偏见吗？”K.问。“我对你并没有偏见。”神父说。“那么，我得感谢你，”K.说，“然而，所有参与审理此案的人都对我有偏见。他们的看法甚至影响了与此案无关的人。我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你把事情理解错了，”神父说，“判决并不是突然做出的，审判过程本身会逐渐变成判决。”“原来如此。”K.低下了头。“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神父问。“我想争取更多的帮助，”K.抬起头说，想看看神父的反应，“有几种可能性我还没尝试过。”“你过于依赖别人的帮助了，”神父不以为然地说，“尤其是女人的帮助。你不觉得这种帮助并没有用吗？”“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可以同意你的看法，”K.说，“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女人的作用是很大的。倘若我能动员我所认识的女人一起为我出力，我就一定能打赢官司。特别是这个法庭的法官，几乎全是些好色之徒。预审法官只要远远瞧见一个女人，就会把审判桌和被告撇下，迫不及待地去追她。”神父将头伸过石栏杆，现在才感到低矮的讲坛对他的压迫。外面的天气一定糟透了，教堂里此刻完全黑下来，仿佛沉沉的夜幕已经降临。没有一丝光透过大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照亮黑暗的墙壁。而正在这时，教堂杂役开始把主祭坛上的蜡烛一支支熄灭。“你生我的气了吗？”K.问神父，“你也许不知道，你为之服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庭。”他没有得到回答。“这只是我的经验而已。”K.说。上面仍然沉默着。“我不想使你难堪。”K.又说。突然，讲坛上传来神父的喊声：“你难道不能看得远一些吗？”这既是愤怒的喊声，又好像是看到别人摔倒，情不自禁地发出的惊叫。

两人久久地沉默着。在一片黑暗中，神父当然看不清站在下面的K.，相反，在那盏小灯的照耀下，K.却能看清神父。他为什么不走下讲坛？他没有布道，只告诉了K.一些消息。仔细想来，这些消息只会对K.有害，而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K.觉得神父的本意无疑是好的，假如他走下讲坛，他们或许能达成一致，甚至他还可能从神父那儿得到某种决定性的忠告，比如怎样影响审判的进程，如何逃避审讯并逍遥于案件之外自由自在地生活等等。这些可能性并不是没有，K.最近也常常考虑过。倘若神父知道，那么K.恳求他，他也许就会把一切都透露给K.，尽管他自己也是法院的人，尽管当K.攻击法院时，他违背了自己温和的天性，对K.大喊大叫起来。

“你不想下来吗？”K.说，“你并没有布道，那就下来吧。”“现在我可以下来了，”神父说，也许是对刚才的叫喊感到懊悔，他把灯从钩子上摘

下来说，“我必须先隔着一段距离对你讲话，否则我就太容易受影响而忘掉我的职责。”

K.在阶梯底下等着。神父还没有走到最下面一级便向K.伸过手来。“你能抽出点时间同我谈谈吗？”K.问。“你想谈多久就谈多久。”神父说，并把那盏小灯递给K.，让K.提着。即使他们靠得很近，神父也保留着庄严的神态。“你对我很友好，”当他们并肩在黑漆漆的中堂里来回踱步时，K.说，“在所有替法院干事的人当中，你是个例外。相比之下，我对你比对他们任何人都信任，因为我太了解他们了。在你面前，我可以畅所欲言。”“别欺骗自己。”神父说。“我干吗要欺骗自己呢？”K.问。“在法院里，你可是一直在骗自己，”神父说，“在法律的序言中，是这样描述这种欺骗的：在法律的大门前有一个人在站岗。一个乡下人来到看门人面前，请求他让自己去见法官。守门人对他说，现在还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考虑了一下问，那么他以后是不是可以进去呢？‘也许可能吧，’守门人说，‘但现在不行。’由于法律的大门始终开着，而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着身子向里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对他说：‘既然你这样好奇，那就试试在没有我的允许的情况下走进去。不过你得注意，我的权力很大，而且是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面每一道门都有一个人守着，权力一个比一个大。即使是第三道门的看守，我也不敢看一眼。’乡下人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大的困难，他本来以为，法律应该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见的。于是，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身穿皮外套、长着一个又长又尖的鼻子、蓄着稀疏的黑色鞑靼胡子的守门人，决定还是等到获得他的允许再进去。守门人给他一张矮凳，让他在大门边坐着。他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此期间一再尝试获得进门的许可。他的恳求使守门人厌烦了，于是不时对他进行小小的询问，问他家乡的情况和别的事情。但提问的口气十分冷淡，就像大人物向小人物问话那样，而且最后总是说，他现在还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出门时带了许多东西，他倾其所有，无论多值钱的东西也不吝惜，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虽然收下了一切，然而却说：‘我收下这些东西，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你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在漫长的岁月里，乡下人几乎不停地在观察守门人，他忘记了其他的守门人，以为这就是阻止他去见法官的唯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他渐渐老了，只能喃喃自语。他变得幼稚起来。由于多年的观察，他甚至同守门人皮衣领子里的跳蚤都混熟了。他于是请求跳蚤们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视觉减退了，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他的眼睛在欺骗他。然而，他却在黑暗中看到一束亮光从法律的大门

里源源不断地射出来。他的生命快结束了。临死以前，他一生的经历在他头脑里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此以前他从未向守门人提出过。他招手请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僵硬，再也无法动弹了。守门人不得不低低地俯下身子，因为他们之间的高度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乡下人早已萎缩了。‘你现在还想知道什么？’守门人问，‘你真是贪得无厌啊。’所有的人都想到达法，’乡下人说，‘但这么多年，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求见法，这是为什么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马上就要死了，为了在他死前让他听见，便在他耳边大喊道：‘谁也不能得到走进这道门的允许，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这样说来，守门人欺骗了那乡下人。”K.被这故事深深吸引了，马上说。“先别忙，”神父说，“别不假思索就接受一种看法。我按照原文，一字一句地给你讲了这个故事。故事里并没有提到欺骗。”“但这是显而易见的，”K.说，“你的第一个解释完全正确，守门人是在那个使他获救的消息对乡下人再也无用的时候，才把它告诉他的。”“乡下人在此以前并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神父说，“另外，你得想想，他只是个守门人，作为守门人，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为什么你认为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K.问，“他没有尽到职责，他的职责也许应当是把别人都赶走，而让这个人进去，因为门是为他而开的。”“你不大忠实于原文，更改了故事情节，”神父说，“在故事中，关于是否可以进入法律的大门，守门人讲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结尾。第一句话是：他现在不能放他进去；另一句话是：大门是专为乡下人而开的。假如两句话有矛盾，那你的看法就对了，守门人就欺骗了乡下人。然而，这里并没有矛盾。相反，第一句话甚至对第二句话作出了暗示。几乎可以这样说：倘若守门人允诺他将来可能让乡下人进去，那他就越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在那个时候，他的职责似乎就是不让乡下人进去。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在解释这段序言时对守门人作出这种暗示表示惊讶，因为守门人看来办事认真，严守岗位，那么多年从未擅离过职守，直到最后才把门关上。他明白自己职务的重要，因为他说‘我的权力很大’；他尊重上司，因为他说‘我不过是级别最低的守门人’；他守口如瓶，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只提过几个‘冷淡’的问题；他不会被收买，因为他在收礼时声明‘我收下这些东西，只是使你不至于认为，你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既不为怜悯也不为愤怒所动，因为乡下人的恳求‘使他厌烦了’；最后，甚至他的外貌也说明他的性格迂腐守旧：一个又长又尖的鼻子，稀疏的黑色鞑靼胡子。有哪一个守门人比他更忠于职守呢？当

然，守门人性格中也混杂着似乎对请求进入法律大门的人有利的因素，这也使人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越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向乡下人作出将来可能放他进去的暗示。不可否认，他的确头脑有点简单，因此也有点自负。但即使他提起过自己的权力以及其他看门人的权力，甚至说过那些人的模样他连看一眼也不敢之类的话，我是说，即使他的这些话本身符合事实，那他说话的方式也表明，是头脑简单和自负给他的理解能力蒙上了一层阴影。解释者对此评论说：‘对一件事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完全相互排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头脑简单和自负尽管表现得不很明显，但还是会妨碍他严密地守住大门，这恰恰是守门人性格中的缺陷。另外，守门人看上去天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并不总是摆出官方的架子。一开始他就开玩笑说，乡下人不妨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的情况下进去，后来不但不把乡下人赶走，而且还给他一张矮凳子让他坐在门边。这么多年来他耐着性子听乡下人苦苦哀求，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收下他的礼物，宽宏大量地不去理会乡下人当着他的面大声诅咒自己的不幸遭遇，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他有怜悯心。并非每一个守门人都会像他一样。最后，他还按照乡下人的手势低低地俯下身去，给他提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守门人只有一次表现出不耐烦，他知道一切即将结束，但还是说‘你真是贪得无厌’。有的人在解释这句话时走得更远，他们甚至认为，‘你真是贪得无厌’这句话表达了一种由衷的钦佩，尽管其中并非没有居高临下的成分。总而言之，守门人的形象与你解释的完全不同。”“对于这个故事，你知道得比我早，也比我详细。”K.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K.又说：“那么你认为，那个乡下人并未受骗？”“别误解我的意思神父说，“我只不过向你介绍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而已，你不必过分看重它们。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不同的看法往往反映的是人们的困惑。在这件事情上，甚至有人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这种说法更进了一步，”K.说，“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神父回答道，“守门人头脑简单。他们说，守门人并不了解法的内部，而只知道在大门外来回巡逻。他对法律大门内的想象是幼稚的。他用来吓唬乡下人的东西恰恰是他自己害怕的东西。是的，他比乡下人更加害怕，因为乡下人即使听说了大门里面那些令人生畏的守门人，仍一心一意要进入大门，而这个守门人却不想进去，至少故事里没有提到。虽然有些人认为他肯定进去过，理由是法律既然雇佣他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叫他进去办理手续。这种说法很容易反驳，因为也许是大门里传出话来让他当守门人的。即使他进去过，也不会进得很深，他自己说，他连第三位守门人的模样也不敢看一眼。另外，故事里除了提到大门里的

守门人，这么多年从未说起过他还透露过什么里面的情况。也许有命令禁止他这样做，但故事里并没有提到过这一禁令。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他对里面的情况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始终被蒙在鼓里。甚至在那个乡下人面前，他也是个受骗者，因为他事实上是乡下人的附庸，自己却不知道，反而把乡下人当作比自己身份低的人来对待。关于这一点，有许多细节可以证明，你一定还记得。按照这种看法，守门人是乡下人的附庸同样是明白无误的，因为一个自由人总比一个被职责拴住的人要优越。那乡下人的确是自由的，他愿意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只有法律的大门他进不去，也只有一个守门人禁止他走进去。他坐在大门外的一张矮凳上，在那一直等到死，那完全是出于自愿，故事里从未提起过有谁强迫他。那守门人则不然，他被自己的岗位拴在那里，不能擅自离开，同样也不能走进大门，即使他想这样做也不行。另外，虽然他受雇于法律，但为之服务的只是一道门，也就是说只为那乡下人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下人而开的。即使从这方面讲，他也是乡下人的附庸。可以想象，他这么多年来，差不多整整一辈子，所干的差事在某种意义上是浪费生命，因为有人曾对他说，他必须等一个人到来，即等那人长大并来到他守卫的大前门。他必须长期等待，以便自己工作的目的得以实现，而这又取决于那人的意愿，因为只有他想来的时候才会来。此外，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是由那个人寿命的长短决定的，所以直至使命结束，他都是那个人的附庸。在故事中一再提到，守门人对这一切显然一无所知。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根据这种看法，守门人受到的蒙蔽更加厉害，直接牵涉到他的使命。直到最后，他提到法律的大门时还说：‘我现在得去把它关上了。’然而故事一开头却说，法律的大门始终是开着的，既然一直开着，就意味着不管乡下人是否活着，这扇为他而开的门都必须敞开着，守门人无权把它关上。关于这一点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守门人说要去关门，是想给乡下人一个答案，另一种认为这表明他忠于职守，第三种认为他想让乡下人死前感到懊丧和悲哀。不过，很多人在守门人无权把门关上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他们甚至认为，至少在故事的结尾，守门人在智力上不如乡下人，因为乡下人看见一束光从法律的大门内射出来，而守门人却由于履行职责背对着大门。何况故事里也没有说起他注意到了这种变化。”“论证得很有道理，”K低声对自己重复了神父几点解释后说，“论据很充分，我也同意守门人是受骗者的结论。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原来的看法，因为两种观点并不相互排斥。守门人究竟是了解内情还是受蒙蔽并不重要。我说过，乡下人是受骗者，如果守门人了解内情，那乡下人也许会起疑；但如果守门人自己

都是受骗者，那么，乡下人肯定无法看穿这一骗局。那样一来，守门人虽然不是欺骗者也是个头脑极其简单的人，应当立即从他的岗位上被赶走。你应当注意到，守门人受了骗本人并不会损失什么，但会给乡下人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种看法遭到了一些人的驳斥，”神父说，“他们认为，故事本身并没有给人以评论守门人的权利。不管他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他终究是法律的仆人，从属于法，因此对普通人的评价在他身上不合适。也正因为如此，说他是乡下人的附庸是不对的。即使他由于自己的职责不能离开法律的大门一步，那些自由自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也无法同他相比。乡下人要求见法，而他已经在法那儿了。他受雇于法律，怀疑他的尊严就是怀疑法律本身。”“我不同意这种看法，”K.摇头说，“因为，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那就必须把守门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真理。这是荒唐的。你自己刚才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神父说，“用不着把他的每句话都看作真理，只要当成必须如此就行了。”“令人沮丧的结论，”K.说，“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19〕

这是K.说的最后一句话，但并非他最后的判断。他太疲倦了，无法仔细考虑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的所有结论。他被引导到陌生的思路去了，其中涉及的问题对他来说过于深奥，更加适宜于法官们来讨论。那简单的故事逐渐变得模糊了，他想摆脱掉它的缠绕。表情温和的神父注意到他情绪的变化，默默地听着他的评论，虽然这与他自己的看法完全不同。

他们又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K.虽然同神父靠得很近，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手中的灯早已熄灭了。几座镀银的圣像间或在他眼前闪烁了一下，接着又沉没在黑暗中。为了不过分依赖于神父，K.问道：“我们离大门不远了吧？”“不，”神父说，“我们离它还远着哩。你想走了吗？”虽然K.并没想到要走，但还是立即回答道：“当然，我该走了。我是一家银行的襄理，有人在等着我呢。我来是想陪一位外国客户参观大教堂。”“是这样，”神父说，并向K.伸出手来，“那么走吧。”“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去的路。”K.说。“走到左面的墙边，”神父说，“然后顺着墙一直走，你会找到一扇门。”神父刚刚走出几步，K.又大声说：“请等一下。”“我等着呢。”神父说。“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K.问。“没有。”神父说。“你刚才对我很友好，”K.说，“向我作了那么多解释，现在却让我离开，似乎对我并不关心。”“你该走了。”神父说。“那好吧，”K.说，“你知道，我是身不由己。”“你首先应该知道我是谁。”神父说。“你是监狱神父。”K.又走回到神父身旁，他并不急于马上回到银

行。“我是属于法院的，”神父说，“为什么要向你提要求呢？法院是不会向你提要求的。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

第十章 结局

K.31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大约9点钟——此时街上已寂静无声——两个男人来到他的住所。他们身穿礼服，脸色苍白，体态臃肿，头戴好像脱不下来的大礼帽。在大门边，他们彼此谦让了一番，在K.的房门前又更加客气地相互推让，请对方先进门。K.不知道他们的到来，此刻正身穿黑色礼服，坐在门边的一把扶手椅上，慢慢地戴一副新手套。他好像在等人。在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来人之后，他急忙站起身来。“你们是来找我的吗？”他问。来人点点头，其中的一个将手中的帽子向另一个指了指。K.意识到他等的不是这两个人，便走到窗前，朝漆黑的街上望了一眼。街对面几乎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的，许多窗子放下了窗帘。整栋楼只有一扇窗里还亮着灯，几个孩子在铁栅栏后玩耍，由于他们还不会走路，只能伸着小手去抓对方。“他们把又老又蹩脚的演员派来了，”K.自言自语说，并朝四周瞧了瞧，仿佛想证实一下自己的印象，“想随随便便把我干掉。”他猛地转过身来问他们：“你们演的是什么戏？”“演戏？”其中的一个抽动着嘴角问另一个人，仿佛请那人出主意。另一个人装得像个哑巴，丑陋的五官不停地颤动着。“他们不准备回答任何问题。”K.想，并去取帽子。

还在下楼时，两个人就想抓住K.的胳膊。但K.说：“等到了街上再说。我不是病人。”一出大门，他们就以一种K.从未见过的姿势抓住他，肩膀紧紧地顶着他的肩膀，胳膊并不弯曲，而是伸直了扭住K.的整个手臂，并以一种训练有素，使人无法反抗的方式抓住他的双手。K.挺直身躯，姿态僵硬地走在他们中间，三个人连成一个整体，倘若其中的一个倒下，其他二人也会立即倒下。只有无生命的东西才能组成这样一个整体。

在街灯下，K.一再试图看清那两个人的面貌，刚才在灯光暗淡的屋子里，他没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把他夹得很紧，他仍然看到了他们的脸。“他们也许是男高音吧。”瞧见他们鼓起来的双下巴，他想。那两张过分干净的脸让他恶心，他仿佛看到，一只手仍在摩平他们眼角上的皱纹，按摩他们的上嘴唇，搓揉他们肥胖的下巴。〔20〕

想到这儿，K.停住脚步，其他二人也立即站住。他们来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广场边。广场上点缀着花坛，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他们为什

么偏偏派你们来！”他不是在做问，而是在喊。那两个人似乎无言以对，空着的手臂垂下来，仿佛在等待一个需要休息的病人。“我不再往前走了。”K.试着说。然而用不着语言的回答，两个人紧紧抓住K.，拖着他往前走，这就足够了。K.极力反抗着。“我需要用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把它用光吧，”他想起了在粘蝇纸上竭力挣扎，直到折断了它们的细腿的苍蝇，“他们将发现我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这时，从一条地势较低的街道通往广场的台阶上，出现了毕斯特纳小姐的身影。K.不能肯定那就是她，但样子很像。究竟是不是毕斯特纳小姐，K.也并不在乎，重要的是他已经意识到反抗毫无意义。即使他反抗，给那两个人制造一些麻烦，并以此使他的生命延长一刻，那也算不上什么英雄行为。想到此他迈开脚往前走，这着实使那两个人松了一口气，而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也感染了他。他们现在让他自己选择方向，他便选择了毕斯特纳小姐消失的方向。他并不是想追上她或尽可能看见她的背影，而是为了记住她给他的警告。“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他心中说，他的脚步与那两个人完全一致，这更坚定了他的想法，“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直到最后一刻保持冷静和理智。我这一生总想用20只手来抓住世界，这种欲望也并不值得称道，并不十分高尚。难道我现在要向世人表明，一年的被告生涯还没教会我什么东西吗？难道在我死后人们谈起我还要说，在案子开始时我想结束它，而在它结束的时候，我又想让它重新开始吗？我不愿意人们这样说。我得感谢他们派了这两个半哑半傻的家伙来送我上路，并且让我向自己说出必然的结果。”

前面那位小姐已经拐进了一条小街，但K.此刻不再想她了。他任凭那两个人押着他走。月光下，三人步调一致地走过一座桥。K.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得到那两个人的附和。当他侧身转向栏杆时，他们也立即转过身去。在月光的照耀下，河水闪着银光，微微颤抖，并在一个小岛两边分开。岛上长着茂密的树木和野草，远远望去好像被绑在一起。树丛中蜿蜒着几条砾石小路，但此刻K.看不见它们。夏天，他常常躺在路旁舒适的长椅上休息。“我并不想停下来。”他对押解他的人说，并对他们的温和顺从感到内疚。其中的一个好像在K.的背后向另一个人做了个责备的手势，怪他误解了K.的意思，在桥上停了下来。然后，三人继续往前走。〔21〕

他们穿过几条上坡路，路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个警察站着或来回巡逻，有时离他们很远，有时离他们很近。一个大胡子警察手握刀柄，

好像有意走到一群有点可疑的人面前。那两个人停下来，警察似乎要开口讲话，但K.却用力拖着押解他的人往前走，并不时小心地转过头来，看那个警察是否跟在他的身后。当他们拐过街角，避开警察的视线后，K.马上迈开脚步跑起来，那两个人也不得不随他一起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

他们很快出了城。在这里，城市连着田野，几乎没有中间地带。一个荒无人烟的小采石场紧挨着一幢几乎完全城市式样的房子。那两个人在这里停下来，不知是他们事先就选定了这地方，还是已经精疲力竭，不想再走了。现在他们松开K.，让他站在那儿等着。他们脱下大礼帽，一面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珠，一面观察采石场。月亮的光芒以它的纯洁和宁静照耀着四周，世界上没有别的光能与它相比。

在下一项任务应该由谁来执行的问题上，两个人又谦让起来。显然，他们在接受使命时分工并不明确。他们中的一个走到K.身边，脱下他的上衣和背心，接着又脱下他的衬衣。K.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那人于是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一下，好似要让他放心。然后，他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起来，仿佛它们什么时候还会派上用场。为了不让K.在冷飕飕的夜风中呆站着，他挽住K.的手臂来回走了一阵，而另一个人则在采石场上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找到地方后，他便挥手让他们过去。他的同伴把K.带到那儿。那地方在采石场开采面的附近，有一块采下来但未运走的大石头。两个人让K.坐在地上，背靠那块大石头，头枕在石头上。但他们无论怎样煞费苦心，K.多么顺从，他的姿势总是非常别扭，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于是，他们中的一个便招呼另一个，让他来独自摆布K.。但他也并没做得好一些。最后他们只好放弃努力，虽然K.这时的姿势还不如刚才的好。一个人解开外套，从挂在背心皮带上的刀鞘里抽出一把屠夫用的又长又薄的双刃刀，并举起刀，在月光下试了试刀是否锋利。接着，两人又令人厌烦地互相谦让起来，其中的一个在K.的头顶上把刀递给另一个，另一个又从K.头顶上将刀还给第一个。K.现在清醒地意识到，当刀在他头顶上传来传去的时候，他应当把它抢过来刺进自己的身体。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转动着尚能自由活动的脖子，向四周看了看。他完全身不由己，无法代替当局完成所有的工作。这个最后的失误应当归咎于他自己，因为他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来做这件事了。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那儿的一扇窗灯光一亮，蓦地打开了，窗里出现一个模糊、细瘦的身影。突然，他把身体探出窗口，双手远远地伸向前方。他是谁？是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

想帮助他的人？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现在帮忙还来得及吗？〔22〕是不是有人提出了过去被忽略了的，然而有利于他的论点？这样的论点肯定应该有。虽然世界上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但它无法抗拒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他从未见到过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永远无法企及的高级法院又在哪儿？他把双手举向天空，张开十指。

然而，一个人的双手扼住了K.的喉咙，另一个人将刀深深地刺进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他看见那两个人就在他的面前，头挨着头，观察着这最后一幕。“真像是一条狗！”他说，意思似乎是，他的耻辱应当留在人间。

附录

一 未完成章节

同艾尔莎约会

一天，K.刚要走，便有人打电话通知他去法院办公室，并警告他不得违抗命令。然而，他的回答却令打电话的人非常吃惊。他说，对他的审讯毫无用处，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他不再理会所有的电话通知和书面通知了，并将把法院派来的人赶走。那人告诉他，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将记录在案，并会给他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他为什么不屈服呢？难道他没看到，法院不在乎时间和精力，决心把他的案子搞个水落石出吗？难道他想继续顽抗下去，迫使他们采取那些迄今为止尚未对他使用过的强制措施吗？今天是最后一次通知他了，他想干什么就随他的便，但他必须考虑，最高法院是绝不允许有人拿自己开玩笑的。

虽然K.已定好这天晚上同艾尔莎约会，完全可以以此为由拒绝法院的传讯，并且为能有这个理由而感到高兴，但他仍决定不使用这一借口，而且今后也决不使用。即使他今天晚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干，他也绝不会去法院。他意识到自己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此故意在电话里问，假若他不去法院，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知道怎样找到您。”对方回答道。“我会为此而受到惩罚么？”K.问，并微笑地等待那人将说些什

么。“不。”对方回答道。“好极了，”K.说，“我有什么理由非得出席今天晚上的审讯呢？”“别强迫法院使用暴力手段。”对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完全消失了。“他们不这样做才真正可惜呢，”K.一面想一面往外走，“我倒要见识一下所谓的暴力手段。”

K.一刻也没耽搁，叫了一辆马车直奔艾尔莎的住处。他舒适地倚在车角，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望着熙熙攘攘的街道。天渐渐冷了。他得意洋洋地想，假如法院真的已经开始行动，他会给它制造不少麻烦的。刚才他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将到庭受审，此刻法官说不定正等着他呢，或许会等他整整一个晚上。另外，K.的缺席也肯定会让那帮旁听者大失所望。然而一霎时，他竟疑惑起来，不知道自己在胡思乱想中是否随口说出了法院的地址。他于是又大声向车夫说了一遍艾尔莎的地址。车夫点点头，看来K.刚才告诉他的地址并没有错。此后，K.渐渐忘记了法院，像往常一样，银行里的事又涌上他的心头，并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

看望母亲的途中

吃午饭时，他突然想到应该去看看母亲。春天快要过去了，而他已经3年没见到她了。那一年，她让他过生日那天回去看她，他虽然很忙，但仍然照办了，而且还答应，以后每年都回家过生日。他已经连续两次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一次虽然离生日还有14天，但他不想再等了，而是准备立即动身。他对自己说，现在尽管没有特别的原因必须回家，相反，从他表兄每两个月写来的信上看，母亲的健康状况比过去甚至有所改善，他还是得马上回去。K.的母亲住在一个小城市，表兄不仅替她照看一家商店，而且保管着K.寄给她的钱。母亲的眼睛几乎快瞎了，但K.根据医生的诊断，前几年就料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她的身体还算可以，老年病不仅没有恶化，反而减轻了一些，至少她自我感觉如此。据表兄说，这是因为她这些年来变得虔诚了——那次回家，K.已经看到了某些迹象，心中有些不快。表兄在一封信中详细谈到了这一点，说老人过去连行走都很困难，现在却在他的搀扶下每个星期去教堂。K.相信表兄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向来谨慎小心，每次写信宁可报忧而不报喜。

不管怎么说，K.决定现在就动身。最近一段时间，他除了许多不顺

心的事，还感到自己的内心十分忧伤，有一种无法遏止的渴望，想让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得到满足。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坏毛病总算起到了好的作用。

为了让自己振作起来，他走到窗边，吩咐女佣人撤去午餐，并通知格鲁巴赫太太他要出远门，请她收拾好必要的东西装进他的旅行箱里。接着，他向屈纳先生交了几件业务上的事情，请他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处理妥当。这一回他竟没有对屈纳先生那几乎成了习惯的无礼举止感到恼怒：每次K.向他交代任务，他都把脸转向一边，似乎已经知道自己该干什么，K.的指示无非是走走过场罢了。做完这一切，K.就去找经理。当他向经理请两天假，说是要去看母亲时，经理便问，他的母亲是不是病了。“不是。”他说，没有作进一步解释。他站在屋子中央，手背在背后，皱起眉头想，这次旅行是否决定得太匆忙了？留在这里也许更加明智？他是不是一时冲动才突然决定出门的？难道他太多愁善感，有意要避开什么重要的事情，避开亲自干预案子的机会？在案子几个星期毫无动静，听不到一点确切的消息的情况下，这样的机会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可能到来。他的突然出现会不会吓着母亲？他当然不想这样，但情况很可能事与愿违。他不是已经做了许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吗？再说母亲也并不特别想念他。过去表兄在信中经常转告母亲的请求，希望他回去看看她，但长时间以来这一点早就不提了。他回家并不是为了母亲，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他如果是怀着某种莫名的希望踏上回家乡的旅途，那他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并且最终会陷入绝望，自食苦果。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想改变自己的决定，仿佛所有这些疑虑并不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而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K.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等待仆人给他拿行李来。副经理好几次走到他面前，打听他这次外出的原因，他都没有回答。当他的旅行包终于送到时，他立即提上它匆匆下楼，准备登上事先已预订好的马车。然而，他还没有走下楼梯，就被那个名叫库里希的职员叫住了。此人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显然想请示他应该怎样处理。K.挥挥手让他走开，但这个金发大脑袋的家伙竟误解了他的意思，挥舞着信封三步并作两步跳下楼梯朝他跑来。K.恼怒万分，就在库里希跑到他面前的那一刹那夺过他手中的信封，将它撕得粉碎。当他登上马车转过脸来时，看到库里希还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马车，好像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身边的门卫却脱下帽子向K.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K.原来仍然是银行最高级的官员之一，假如库里希想忽略这一点，门卫便会站出来反驳

他。连K.的母亲几年来也始终以为K.就是银行经理，无论别人怎样解释都没有用。她认为，无论K.的威望受到多么大的损害，他的地位也不会动摇。在他刚刚准备动身的时候能够亲眼证实，他，一位银行高级官员，尽管卷入了一场法律诉讼，仍然能够从一个低级职员手中夺过一封公文撕得粉碎而用不着道歉，用不着考虑后果，这也许是个好兆头。

（由此开始被删掉——译者）

……此时此刻他恨不得在库里希那苍白滚圆的脸上狠狠地抽上两下。虽然他不能这样做，但很想这样做。他恨库里希，不仅恨他，而且恨拉本施泰纳和卡米纳尔。他觉得他向来就恨他们，尽管这种仇恨是在他们出现在毕斯特纳小姐房间里的那一刻变得自觉的，但实际上还要久远得多。最近一段时间，K.甚至由于这种仇恨得不到发泄而备受折磨。他们都是最低级的职员，K.几乎没有机会同他们打交道。这帮家伙一钱不值，除了熬年头永远别想升上去，即使是由于干的年头长了往上升一两级，速度肯定也比别的人慢得多，因此几乎不会对K.构成威胁。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倒是库里希的愚蠢，拉本施泰纳的懒惰，卡米纳尔那令人恶心的阿谀奉承。K.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敦促银行解雇他们。这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只要向经理说上几句就够了。K.当然不屑于干这种事，但如果一向公开或隐蔽地同K.对着干的副经理站出来袒护这三个家伙，那K.也就决不会心慈手软。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副经理在这方面倒一反常态，完全站在K.一边。

检察官

K.在银行已经工作多年，不仅善于识别各种人，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处世经验。尽管如此，他仍然发现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的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并为自己能置身于他们之中而倍感荣幸。这些人几乎都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年轻的法院职员和律师助理。不过，他们都坐在桌子最边上，并且，只有在争论中某个特殊的问题问到他们时，他们才能插上嘴。提这样的问题大多只是为了活跃气氛，逗在场的人发笑。尤其是坐在K.旁边的哈斯特勒检察官，最喜欢以这种方式羞辱那些年轻人。每当他把一只长满汗毛的大手摊在桌子中央，向桌子尽头提出一个古怪的问题，并侧过脸去等待回答时，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竖起耳朵，想听听这些初出茅庐的家伙怎样回答。那些无名小卒则

要么根本不懂检察官的意思，要么望着面前的啤酒杯发愣，要么喋喋不休地说一些文不对题的外行话，逗得年长的先生们哈哈大笑。直到他们笑够了，不再在椅子上转来转去，他们似乎才感到舒服些。至于那些严肃的专业问题，只有他们才有发言权。

（以上片断在手稿中紧接第七章，开头就写在那一章的结尾后面——译者）

K.是为了招待一位出任银行法人代表律师才和这帮人聚在一起的。由于他同这位律师在银行里进行的长时间商谈直到深夜才结束，于是邀请对方到这家饭店来吃晚餐。在主顾桌旁，他看到一群博学多才、声望卓著、在某种意义上极有权势的先生们正在高谈阔论。这些人的业余消遣方式似乎就是为解决那些与日常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的难题而绞尽脑汁。K.很少插嘴，但十分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了解许多他过去不了解的东西。这对他今后在银行里的工作无疑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同法院的人建立一些私人联系，这也总是有用的。那些先生看来并不反对K.同他们坐在一起。作为业务上的内行，K.不久就得到他们的承认，在这类问题上的看法尽管有时也遭到冷嘲热讽，但总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旦某两位先生在商法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双方往往都要征询K.的意见。在此后的争论中，甚至非常抽象的论证中，K.的名字会一再被提到。渐渐地，K.了解了许多情况，特别是发觉坐在他身旁的检察官哈斯特勒先生的谈话对他非常有用。检察官也对他十分友好，似乎有意接近他，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甚至常常陪他回家。只不过K.很久以来就不习惯于同一个男人手挽手地走路了，何况检察官又是那样高大，几乎可以把K.装进自己的大衣口袋。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年龄上的差异似乎不存在了。他们来往频繁，仿佛是老朋友。如果说两人的关系中有谁稍占上风的话，那准是K.而不是哈斯特勒，因为检察官的全部知识都在法律方面，对法律以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这种友谊当然很快就被坐在那家饭店主顾桌旁的人注意到了。人们几乎已经忘记K.是怎样混进他们圈子里的。一旦有人对K.坐在他们当中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哈斯特勒便会站出来为他辩护，而K.也可以以哈斯特勒朋友的身份理直气壮地驳斥对方。这样，K.便在这帮人当中占据了特别优越的位置，因为哈斯特勒不仅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大家都惧怕他。他在法律问题上的思维令人叹服，尽管许多先生在这方面并不亚于

他，但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那副咄咄逼人的气势往往会把人压倒，使人对他产生畏惧。每当他伸出食指直逼对方时，许多人便会退缩。这时，他的对手就会忘记自己置身朋友和同事之中，争论只涉及与现实无关的纯理论问题。这时，他们便会沉默下来，连摇一下头都不敢。如果对手胆敢看哈斯特勒一眼，如果哈斯特勒看到对手因为坐得很远而敢于与他对抗，就会推开盘子，慢慢站起身来朝那人走去。在这种时刻，坐在附近的人都会低下头来避开他的目光。当然，这样的场面很少出现，只是涉及法学问题，特别是与他办过的案子或正在办的案子有关的法学问题时，检察官才会激动起来。如果不触及这类问题，他倒是和蔼可亲，始终面带微笑，专心吃喝。有时他甚至不理睬别人，而只和K.交谈。他把一只胳膊搭在K.的椅背上，小声地打听银行的事，并向K.讲述自己的工作以及和他相好的女人。他同女人打交道的的时间几乎同在法院工作的时间一样多。在这种场合，他的同事们从未见过他对谁如此亲密过。于是，当他们对哈斯特勒有所求——大多是请求他原谅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时，他们往往先请K.从中斡旋，而哈斯特勒一般总是看在K.的面子上饶过那人。尽管如此，K.在同这帮人打交道时从不利用他与哈斯特勒的关系，相反，他对任何人都非常谦虚，非常礼貌，并且懂得怎样正确识别这些人职务的高低——这往往比谦虚和礼貌更加重要——然后根据每个人级别的高低区别对待。当然，在这方面哈斯特勒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以指导，而检察官本人也始终遵守着这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使在争论中生起气来亦如此。此外，K.对那些坐在桌子尽头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还谈不上级别——总是使用一种笼统的称呼，似乎他们是一个集体。正因为这样，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尊敬K.。当K.11点钟站起身来准备回家时，竟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帮他穿上大衣，另一个在K.和哈斯特勒出门时向他们深深鞠躬并替他们打开门。

最初一段时间，K.只是陪哈斯特勒走一段路，或者哈斯特勒送K.一程。到后来，哈斯特勒开始邀请K.到他的住处去坐一会儿。他们于是在一起喝酒抽烟，聊了一个钟头。有几个星期，哈斯特勒尽管留一个名叫海伦娜的女人天天在家过夜，仍然不愿放弃同K.一起度过令人愉快的晚上。海伦娜是个肥胖的、上了年纪的女人，皮肤发黄，披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头几天K.每次去哈斯特勒家，她几乎都躺在床上，总是在读一本廉价小说。她从来不关心他们的谈话，只是当夜太深的时候才伸伸懒腰，打个哈欠，以期引起他们的注意。倘若这一招不能奏效，她便抓起一本小说向哈斯特勒扔去。每到这时，哈斯特勒便会微笑地站起身来，K.也才会告辞。后来，哈斯特勒对海伦娜开始厌倦了，她对他们的打扰

也改变了方式。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地等待两位先生归来。她身上那件衣服大约是她所有的衣服中最贵重的，她以为穿上它很漂亮，很合身，但实际上，那只是件旧的、过时了的晚礼服，特别是作为装饰的那几道长长的流苏叫人看了很不舒服。K.从未仔细看过那衣服一眼。不仅如此，他也不愿看那女人一眼，通常总是半闭着眼睛坐在那儿。海伦娜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不停地扭动腰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还故意坐在K.的身边，想通过挑逗K.来引起哈斯特勒的忌妒。有几次她甚至将她那裸露的、肉滚滚的后背俯在桌子上，脸挨近K.的脸，想迫使K.睁开眼睛。可惜她这样做，除了吓得K.不敢再到哈斯特勒那儿去以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过了一段时间，当K.再次跨进哈斯特勒的住所时，海伦娜已经被打发走了。这天晚上，两人待的时间比过去更长。哈斯特勒提议为他们的友谊干杯。K.回家时差不多已经喝醉了。

第二天早上，经理请K.去商量一些银行业务，谈话中顺便提到他昨天晚上曾看见K.来着。假如他没有搞错的话，当时K.正和检察官手挽手地走在大街上。经理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并说出了他见到两人的确切地点——这恰恰符合他一贯办事严谨的风格：那是在某座教堂的旁边，附近有一个喷泉。经理讲述这事就好像在描绘一幅幻景。K.只得解释说，检察官是他的朋友，他们昨天晚上的确曾从教堂边走过。经理对此十分惊讶，微笑着请K.坐下。过去，这个体弱多病、经常咳嗽、工作过度劳累的老人曾多次对K.的健康和前途表示过关心。据受到过同样待遇的其他同事说，这种关心仅仅是表面的，只不过走走形式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想花两分钟时间把那些最有能力的职员紧紧拴住，让他们为银行卖命。但K.却不这样认为，每每在这种时刻，他都会被经理亲切的态度所感动。也许经理同K.打交道的方式有所不同。同其他人谈话时，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威严而冷漠的神情，而和K.在一起，他就会忘记他们之间地位的差异，像一位长辈对待自己的孩子或一位长者对待一个无知的、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那样语重心长地给予教诲。每到这时，K.内心总是感到一阵温暖。要是换了别人或在别的时刻，K.一定难以容忍对方用这种口气同自己讲话，然而在这种时刻，他却觉得经理的关心是真诚的，是他无法拒绝的。K.也意识到自己这个弱点，也许是因为自己办事情的确有许多幼稚的地方。他的父亲死得很早，所以他从未享受过父爱，而他的母亲差不多是个瞎子，又长期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很少关心他，他也不大需要她的关心。他最后一次去看她，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正因为如此，K.对经理有一种眷恋之情，而今天，这种感情又占据了整个身心。

“我对你和检察官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经理说，那淡淡的、亲切的微笑使他那严厉的表情缓和了不少。

法院大楼

K.尝试着通过各种方式打听到那家首先对他提起诉讼的法院在什么地方。他这样做开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出乎他的意料，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了，不但蒂托雷里，而且沃尔法特毫不犹豫地把法院大楼的确切地址告诉了他。后来，蒂托雷里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已制订了一个秘密的、暂时还不能透露的计划，而这家法院在计划中并不重要。他之所以把这一点告诉K.，是因为他受到K.的委托。虽然这家法院是整个庞大的诉讼机构最外围的组织，但被告仍然无法进入。假如他们对诉讼机构有什么要求的话——这种要求当然总是很多的，但提出来并不十分聪明——还得先通过这家最低级的法院。总而言之，被告本人既不能接近诉讼机构，他们的要求也永远无法到达这个机构。

K.已经对画家的性格有所了解，因此并不反驳他，也不再提问，只是点点头，记住他说的话。K.再次感到——他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蒂托雷里在折磨人方面实在不亚于律师，区别仅仅在于，蒂托雷里还没有完全把他握在手心里，如果他愿意，可以随时摆脱画家。另外，蒂托雷里的口不像律师那么紧，甚至有些饶舌，过去比现在更加如此。正因为这样，K.有时也故意采取一些办法来折磨蒂托雷里。

在这件事情上K.就是这样做的。他常常用一种不信任的口气说起法院大楼，似乎蒂托雷里隐瞒了什么，似乎他本人已同那里的某些人建立了什么联系，似乎这种关系还未牢固到某种地步，因此不能泄露。一旦蒂托雷里请他说出详情，K.便岔开话题，很长时间不再提起这事。他为这些小小的成功感到高兴，相信自己对这帮吃法院饭的人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自己已能随心所欲地同他们周旋，甚至能混迹于他们中间。至少，他认为自己已经像这些人一样登上了通往法院的第一级台阶，对法院看得清楚了一些。不过，万一他失去了这一有利位置怎么办？那也不要紧，还有补救的可能。他只需混到那些人中间，即使他们由于身份太低或因为别的缘故无法帮助他打赢官司，至少会收容他，将他藏起来。他已经仔细考虑过了，并在暗地里作了安排，他们无法拒绝以这种方式帮助他，尤其是蒂托雷里，K.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熟人和主要施舍人。

当然，K.并不会为这种希望所陶醉，一般说来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忽略任何困难或试图越过这些困难。但尽管如此，他有时——往往是晚上下班后在极度疲劳的状况下——也会用白天发生的微不足道的、意义并不明确的事情安慰自己。这种时候他大多躺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现在，他不在长沙发上躺一个钟头以恢复体力便无法回家——在脑海里把他观察到的景象一幅幅拼接起来。出现在他眼前的并不都是与法院有关的人和事，相反，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所有白天看到的人和事都混在一起了。他忘记了法院要审理的案子有千千万万，觉得被控有罪的只有他一人，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像是法官和法院职员，他们在法院大楼的走廊里乱哄哄地走来走去，连最迟钝的家伙都低着头，下巴抵着胸脯，撅起嘴唇，呆呆地望着面前，做沉思状。格鲁巴赫太太的房客们仿佛结成了一个小团体，总是凑在一起头挨着头地议论什么。他们大张着嘴巴，好像在齐声唱一支控告他的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他不认识的，因为K.长久以来便不再关心公寓里发生的事了。正因为不认识的人太多，他每次同这帮聚在一起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感到不舒服。但为了找毕斯特纳小姐，他有时也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他扫了那群人一眼，突然看见一双陌生的、烁烁发光的眼睛正盯着他。他没有发现毕斯特纳小姐。他恐怕自己太粗心了，于是又找了一遍，这次终于看见毕斯特纳小姐了。她站在这群人中间，两边各有一位先生用胳膊搂着她。这一场面并不使他吃惊，因为他曾在毕斯特纳小姐的房间里见过一张她在海滨浴场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情景同现在他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感到很不自在，因此以后再看见这帮人聚在一起时，他便迈着大步匆匆从他们身旁走过。公寓里的每个房间他都了如指掌，那些像迷宫一样的走廊他虽然从未到过，但觉得很熟悉，仿佛那就是他自己住了很久的住宅，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异常清晰地刺进他的脑海，并一再浮现在他眼前。一个外国人在前厅里散步，穿着打扮像一位宰牛工，那件用粗布制成的黄色上衣又短又小，紧箍在身上，好似把他拦腰切断。K.好奇地打量着那人，接着又弓起身子溜到他身边，睁大眼睛欣赏起他的衣服来。但那人并未因此而停止散步。K.熟悉那件上衣上的图案，熟悉那些花边，熟悉衣服上的每一道皱褶，但仍看个没够。或者，他早已看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根本没兴趣看，但却无法控制自己。“外国人的服装多么稀奇古怪啊！”他一边想一边把眼睛睁得更大。他就这样一直跟在那人身后，直到翻身时脸碰在皮沙发上。

（以下被删掉——译者）

他就这样长时间躺着，体力的确得到了恢复。他虽然仍在思考，但在黑暗中无人来打搅他。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蒂托雷里。蒂托雷里坐在椅子上，而K.却跪在他面前，抚摩着他的手臂并想方设法讨好他。蒂托雷里看透了K.的心思，却装得似乎什么也不知道，用这种办法来折磨K.。然而，K.心里明白，他最终将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蒂托雷里是个轻率的、没有责任感、很容易被收买的家伙。法院同这种人搅在一起真是无法理解。K.知道，假如法院还有什么薄弱环节的话，只有在这儿才能打开一个缺口。K.决不会被蒂托雷里那无耻的微笑所迷惑，尽管这家伙此刻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他毫不懈怠地恳求着，并抬高手臂，抚摩起蒂托雷里的面颊来。这样做他并不觉得勉强，反而感到很开心，因为他是出于逗乐才故意把事情拖长的，他确信自己会取得成功。用计谋战胜法院是多么简单的事！蒂托雷里终于低下头面对着他了，仿佛是某种自然法则起了作用。画家慢慢睁开的眼睛和蔼地望着K.，表明他准备满足K.的请求。他使劲握了握K.的手。K.站起身来，脸上露出庄重的神情，但蒂托雷里讨厌庄重，他一把搂住K.，拉着他走出画室的门。他们来到法院大楼，快步登上楼梯，不过并非一直往上走，而是忽上忽下，K.一点也不觉得费力，他好像坐在一条小船里，在水面上轻轻飘浮。然而，正当K.低头看着脚下，感到这美妙的运动在他奔波忙碌的一生中从未经历过时，在他的头顶却发生了变化。直到目前为止从下面射来的光改变了方向，令人眩晕地从前面闪烁起来。K.抬眼朝上看去，蒂托雷里向他点点头，叫他转过身去。K.发现自己又置身于法院大楼的走廊里，但周围变得安静了，两边的长凳和等待着的人消失了，走廊里空无一物。K.向走廊尽头望去，并挣脱蒂托雷里一直往前走。今天K.穿了一件新的黑色长袍，这衣服又重又暖和。他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暗自庆幸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有罪。在走廊的一面墙上开着一扇大窗户，窗户旁的一个角落里堆着他过去穿过的衣服，那件黑色的上衣，瘦腿的裤子，最上面是他的衬衣，两只袖子张开，在轻轻地颤抖。

同副经理的斗争

一天早晨，K.觉得自己比平时精神好多了，身体也强壮了。他几乎不再想法院的事，偶尔想起，也觉得那晦暗一片的庞大机构在某个隐蔽的、藏而不露的部位轻轻一击便能连根拔除并打得粉碎。在这种出色的精神状态中，K.甚至想邀请副经理到他的办公室来，商量一下积压下来

的业务问题。在这种场合，副经理每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似乎他和K.的关系最近几个月丝毫没有恶化。他不露声色地来了，像往常同K.争风吃醋时一样，静静地听着K.的讲述，并不时以K.熟悉的，表面上十分友好的口气插一两句话，表示他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使K.迷惑不解的是，他有意无意地抓住某些业务上的主要事情不放，以坚韧不拔的劲头不让K.转移话题，而K.却无视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一再试图将谈话引导到与此无关的方面去。于是，谈话最后变成了副经理的业务演说。有一次，K.甚至发觉副经理突然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K.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许谈话应该结束了，也可能副经理对谈话内容不满意不想再谈了，或者，K.无意伤害了副经理的自尊心，再有一种可能是，副经理发现K.并没有听他说话，而是在想着别的事情。甚至于，K.也许在副经理的诱导下做了什么错误的、可笑的决定，副经理急不可待地要利用它去损害K.的声望。K.不愿去想这些，反正后果已经造成了，再也无法挽回。副经理那边看不出有什么动静，暂时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劲。不过K.决不会为这一次谈话失败而吓倒，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K.的精力得到恢复，他就要走到副经理办公室的门边，主动跟他谈话或邀请他去自己的办公室谈话。K.没有时间像过去那样躲着副经理了。他对于很快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从而一劳永逸地摆脱所有的忧虑，并恢复同副经理旧日的关系不再抱任何希望。K.已经认识到，他决不能让步。倘若他退缩，副经理便会像事实证明的那样得寸进尺。不能让这家伙认为K.已经屈服，带着这种幻想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室里。他得让副经理心里感到不踏实，得让他常常晓得，K.还活着，即使今天对他构不成威胁，有朝一日将会以新的能力使他大吃一惊。虽然K.有时对自己说，他使用这种方法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罢了，其实对他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会把自己的弱点一再暴露给副经理，加强对方的安全感，并使对方有观察自己并根据情况随时改变策略的可能，但K.无法左右自己的行为。他已经陷入了自我欺骗的境地，有时甚至坚信，现在是他无忧无虑地和副经理较量的时候了。那些不幸的经历并未使他吸取教训，认为即使第十次尝试失败了，第十一次一定会成功。而实际上，这场较量始终对他是不利的。每次他同副经理谈话之后都筋疲力尽，浑身大汗，脑袋里空空，不知他当初这样做的时候究竟抱的是希望还是绝望。然而下一次，他又满怀成功的希望急急忙忙走到副经理办公室的门口。

（以下段落从开始直至“安排几件特殊任务，他就一定能办到”被删掉——译者）

这天早晨这种希望特别强烈。副经理慢吞吞地走进K.的办公室，一只手按在额头上抱怨头痛。K.开始想打听一下副经理头疼的原因，后来想了一下便立即开始谈业务，连问也没问一下副经理究竟为什么头疼。也许是副经理头疼得不怎么厉害，也许是对业务的关心使他忘记了头疼，反正副经理在谈话过程中放下了按在额头上的手，并且像往常一样果断而不假思索地回答K.的问话，好似一个模范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K.这一次完全可以应付，有几次甚至能反驳副经理的看法，但副经理头疼的事一再妨碍他集中精力，仿佛那头疼不是副经理的不利之处，而是有利的因素。瞧他的忍耐力有多强，竟能忍住头疼侃侃而谈！有时他甚至无缘无故地微笑起来，好像在夸耀他的头疼。他心里想的当然是另一回事。他们表面上似乎在谈业务问题，内心却进行着另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副经理虽然并不否认他有头疼，但却一再强调，这种疼痛并不怎么厉害，和K.常患的那种完全不同。K.本想反驳他，但副经理那若无其事的神态使他无话可说。与此同时，副经理的表现也给了他一个榜样，他也能把业务工作之外的忧虑深藏在心底。只要他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工作，在银行里推行一些新措施——他近来一直在考虑这事——通过访问和出差重新巩固他同客户们已经有些疏远了的关系，经常向经理汇报并请求他给自己安排几件特殊任务，他就一定能办到。

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副经理立即来到他的办公室，但却站在门边擦着他的夹鼻眼镜——这已经成了他最近一个时期的习惯——先打量了一下K.，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屋里，表面上似乎是利用这个机会检查一下自己的视力，实际上是在不露声色地猜度K.的用意。K.在他的注视下并未退缩，甚至还微笑着请副经理坐下。他自己则坐在他的靠背椅上，并把椅子拉得尽量靠副经理近一些。然后，他从桌上拿起必要的文件，开始谈自己的意见。一开始，副经理好像根本没注意听，而在研究K.的办公桌。办公桌周围有一圈低矮的栏杆，栏杆由一根根雕花的柱子组成，整个桌子做工十分精细，栏杆也很牢固。可是，副经理却突然用食指敲了一下栏杆，仿佛发现一根柱子松动了，他想把它敲紧似的。K.刚想停下来，副经理便殷切地请他往下讲，并解释道，他听得很仔细，完全明白K.的意思。由于K.暂时尚未征求他的具体意见，副经理掏出一把小刀，并拿起K.的尺子，试图把那根柱子拔出来，然后再把它按进原来的地方，使它更加牢固。K.今天将提出一条新建议，本来想以此引起副经理的意外，给他一个突然打击。现在，他就要谈到这个建议了。他不想停下来，也无法停下来，因为，他此刻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之中，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往日的自信又回到了他的身上，而一段时间以

来，这种自信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他在银行里还是有影响，有威信的，他的思想仍然敏锐而清晰，完全可以为他出色的工作能力辩护。也许这种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不仅可以用在银行事务上，而且能运用到自己的案子中。自我辩护是最好的辩护，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好。在这种思想状态下，K.完全没有时间把副经理的注意力从那根栏杆柱子上拉回来。只有两三次，他一面宣读他的建议，一面用空着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写字台的栏杆，仿佛想让副经理停下那毫无意义的工作，仿佛想告诉他，栏杆并没有毛病，即使有毛病，也可以以后再修理，现在更重要的是听听K.的新建议，否则就太不成体统了。可是，像许多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样，副经理对手工活似乎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当真把那根栏杆柱拔了出来。现在，他又试图把柱子重新塞进原来的洞里去。这可比将它拔出来要困难多了。他不得不站起来，用双手抬起桌面，并试图将那根柱子压进去。然而，尽管他使尽全身力气，那柱子仍然不听使唤。K.在读他的建议时，模模糊糊地觉得副经理似乎站了起来。虽然对方一直在他的视线以内，但他完全没注意到对方在干什么，只觉得这动作与他的建议有某种联系。于是，他也站起身来，用手指指着一个数字，将那份书面建议递给副经理。副经理这时认识到只用两只手还不足以把那根柱子压回去，便把整个身体压在写字台上。这回他成功了，那柱子吱吱地响着回到原来的位置，不过接着它又咔的一声折成了两段。“这木头太糟了。”副经理恼怒地说。

断片一则

他们走出剧院时，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乏味的剧情和糟糕的表演使K.感到非常疲倦。一想到还得给叔叔安排住处，他的情绪更加低沉。今天晚上，他本来想去找F.B[4]的，说不定她愿意再和他谈一次。叔父的到来把他的这个计划给毁了。乘夜班车回去当然还来得及，但叔叔对K.的案子这样关心，劝他今天就回去看来没有什么希望。尽管如此，K.还是得试一试。“叔叔，”他说，“过几天我恐怕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帮助，我还没想好。无论如何，我得请你帮忙。”“你只管放心，”叔父说，“最近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给你帮上忙。”“你还是老样子，”K.说，“只是我担心，过几天要是我再让你到城里来，婶婶会生气的。”“你的事情更重要，即使她生气也没什么。”“我可不这样想，”K.说，“不管怎样，我不想不必要地让你和婶娘分开。我可能很快又得让你

来，你不想暂时先回去吗？”“明天就走？”“是的，明天就走，”K.说，“或者，现在就乘夜班车回去，这样更舒服。”

二 手稿中作者自己删去的部分

〔1〕看来审讯只进行一会儿，K.想，应该允许他们威风一阵子。我要是知道是哪个机构在一件对它来说毫无成功希望的事情上如此虚张声势就好了。这一切的确是虚张声势，用三个人来对付我，把两间房间搞得乱糟糟的，角落里还站着另外三个年轻人，乱翻毕斯特纳小姐的照片。

〔2〕有人对我说——是谁说的我记不清了——一个人要是早上醒来，发现所有的东西像头天晚上一样至少大部分还在原来的地方，那就谢天谢地了。这至少说明，他在睡梦中并没有受到监视。因此，那人说得很对，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必须有绝对清醒的头脑，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立即驱散睡意，以确信头天晚上放的东西的确还在原来的地方。醒来的一刹那因而是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刻，假如他熬过了这一刻，没有被人从床上拖走，那他一整天就平安无事了。

〔3〕您应该明白，下级职员总是比他们的上司知道得更多。

〔4〕他这样做会不会同样给了他们一个观察自己的机会呢？要知道他们很可能接受了这样的任务。但他觉得这个想法太可笑了。他把手按在太阳穴上，想使自己清醒一些。“再有几个这样的想法，”他自言自语地说，“你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傻瓜。”他那有点沙哑的声音是那样响，叫他吓了一跳。

〔5〕在公寓大门外有一名士兵迈着均匀而有力的步伐走来走去。如此说来，他们到底还是安排了一名看守。为了看清那名士兵，K.不得不把头远远伸出窗外，因为士兵是沿着墙根来回走的。“哈！”他朝那人喊，但声音不大，那人没听见。然而，不久K.便发现，那名士兵是在等一个年轻女仆，刚才她去对面一家饭店买啤酒，这会儿正从灯火辉煌的饭店大门里走出来。K.问自己，他们会不会因为怕他逃跑而给他安上一个看守呢？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6〕“您真叫人无法忍受，谁也不知道您的话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笑。”“这样说并不是完全不对，”K.说，同这个漂亮的姑娘聊天，他感到很开心，“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认真不起来，所以只能用开玩笑的方式谈严肃的事，用严肃的口气来开玩笑。不过，我被捕了，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7〕社会主义集会（手稿中改为“地方性政治集会”——译者）。

〔8〕K.只看见她那件没扣扣子的上衣滑到了腰部，一个男人把她拉到靠门的角落里，紧紧搂住她只穿内衣的上身。

〔9〕K.刚想抓住那女人畏畏缩缩地伸过来的手，大学生的话却引起了他的警觉。这家伙原来是个饶舌而自负的傻瓜，K.或许能从他嘴里探听出对自己提出起诉的确切原因。如果K.知道了原因，肯定就会不顾手可能受伤，立即猛击一拳把整个官司打得粉碎，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10〕是的，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即使K.用钱贿赂他，他也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的，因为那样一来，他就有可能被控双重失职。而作为被告，K.的案子一天不结束，便一天会受到保护。

〔11〕但姑娘对这种称赞未作任何表示，甚至好像没听见一样。叔叔说：“也许吧。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找一位护士。如果你觉得她不称职，还可以解雇她。别让我失望，你总得试一试。在这样的环境，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你的身体只会越来越糟。”“这儿并不总是这样寂静，”律师说，“只有我不得不用护士时，我才会接受你的好意。”“你必须接受。”叔叔说。

〔12〕一张办公桌几乎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办公桌对着几扇窗，律师平时一定是背对着门办公的，因此，一个来访者首先得穿过整个屋子才能看得见律师的脸。倘若律师情绪不好，不想转过脸来看人，来访者就会觉得自己像个贼。

〔13〕不，K.决不希望自己吃官司的事传得尽人皆知，因为那样一来，人们即使不会像法官那样盲目而匆忙地给他定罪，至少也会想方设法使他丢脸。那样做是很容易的。

〔14〕房间里一片漆黑，也许是因为窗上蒙着厚厚的帘子，从外面透不进一丝光。刚才一溜小跑使K.有些喘。他想也没想便向前跨了几

步，但接着又停下来。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房间里哪个地方。律师似乎睡着了，K.听不见他的呼吸声，因为，他睡觉时习惯于完全钻进被子里面。

〔15〕……从那时起，我作为一名被告就仿佛在等待生的希望……

〔16〕您没有开诚布公地同我谈过，从来没有，因此，如果您认为您被误解，那也怨不着别人。我从来不隐瞒我自己，因此不怕别人误解。您硬要做我的案子的代理人，并许诺打赢这场官司，而我现在觉得，您根本没有尽力，您没认认真真做过一件事，而且还要隐瞒真相，阻止我亲自干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有朝一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对我的判决。我即使不说您有意如此……

〔17〕K.忍不住想嘲笑布洛克。列妮的手由于被K.抓住，此刻便乘他不注意的时候胳膊肘撑在椅背上轻轻地摇晃起来。K.一开始没有理会，而是望着布洛克轻轻地掀开被子一角，寻找律师的手，显然准备吻它。

〔18〕K.猜不透意大利人究竟在说什么，只觉得——至少暂时觉得——他的声音仿佛是喷泉里的水落下时发出的响声。

〔19〕说完这句话，他沉默下来。他注意到，他根本没读过那段叙述了这个故事的法律引文，也不知道对它的解释出自何处，却冒冒失失地发表了对故事的看法，甚至对它做了判断。他被引导到完全陌生的思路上去了。难道说，神父像所有的神职人员一样，只管对K.的处境作一番模糊的暗示便不再吭声，而不顾K.是否被引入歧途吗？想到此，K.不知不觉忘记了手上提着的灯。灯冒出了黑烟，直到熏着他的下巴他才发觉。他想把灯拧小一些，但它却熄灭了。他站在那里，四周一片漆黑。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教堂里的什么地方。由于他身边也没有一点响动，他于是问：“你在哪儿？”“在这儿，”神父说，并抓住K.的手，“你为什么要把灯熄掉？来吧，我带你到圣器室去，那儿有灯。”K.很高兴离开了教堂大厅，那高大、空旷、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厅使他感到压抑。过去，他常常望着那高不可测的穹隆，心想它到底有什么用，每次都觉得黑暗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他的手被神父拉着，他跟着神父来到圣器室。圣器室里亮着一盏小灯，比K.刚才提的那盏还要小。它挂得很低，几乎只照亮圣器室的地面。圣器室虽然很小，但天花板几乎与教堂大厅一样高。“到处都这样黑。”K.说，并用手揉了揉双眼，似乎由于睁大眼睛辨

别方向而感到疼痛。

〔20〕他们的眉毛仿佛是安上去的，每走一步便上下抖动一下。

〔21〕他们穿过几条上坡路，路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个警察站着或来回巡逻，有时离他们很近，有时离他们很远。一个大胡子警察手握国家托付给他的腰刀的柄，好像有意走到一群有点可疑的人面前。“国家给我提供了这个人的帮助，”K.在一位同行者耳边悄悄说，“假如我用我的案子来影射国家法律会怎么样？下一次我也许会在国家面前为二位先生辩护的。”

〔22〕（正文结尾处被删掉的部分——译者）……是不是有人提出了过去被忽略了的、然而有利于他的论点？这样的论点肯定应该有。世界上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但它抵挡不住一个想活下去的人。法官在哪里？最高法院在哪里？我有话要说。我举起手来了。

[1]表示作者在手稿中删掉的部分，这些部分将附在正文后逐段译出。——译者

[2]原文如此。前面作者提到这三人并未上车，此时又说他们坐在车里。——译者

[3]在西方，直呼其名表示亲近，而毕斯特纳只是小姐的姓。——译者

[4]可能指毕斯特纳小姐，此处仅是缩写。——译者

第三卷 长篇小说《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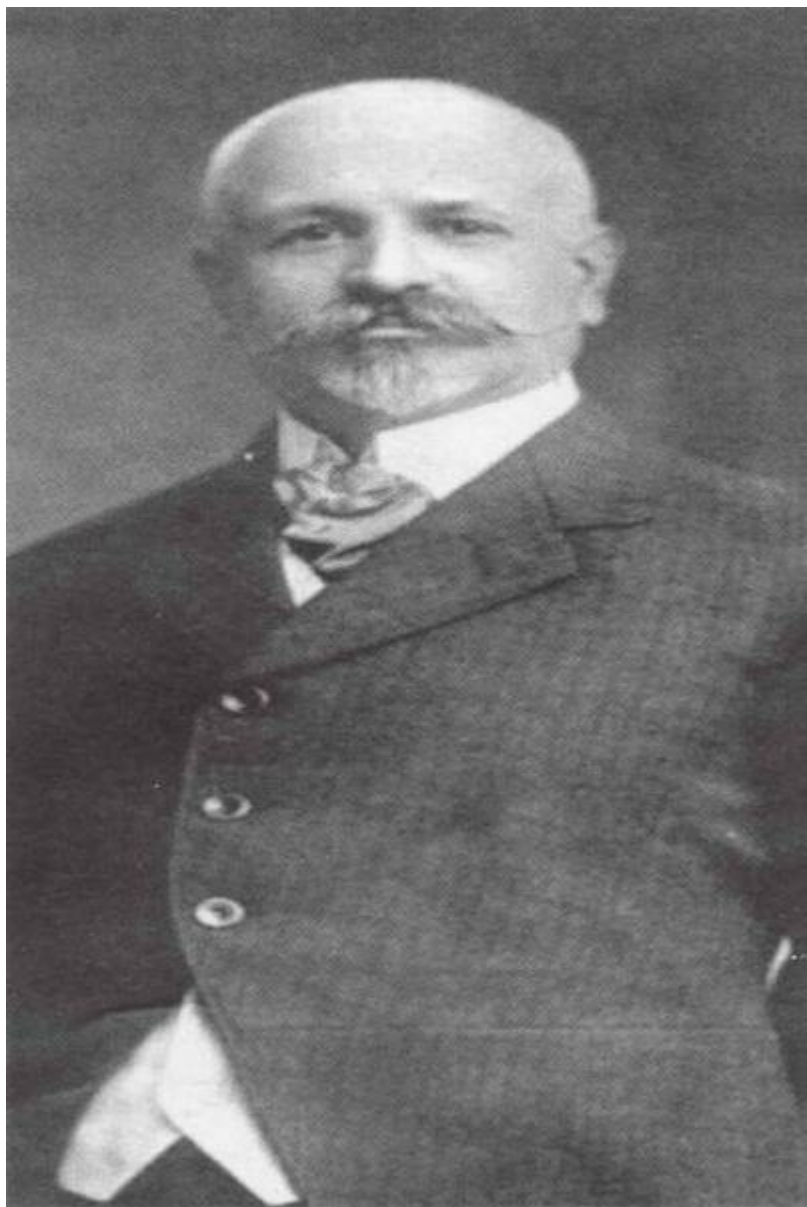


约1920年，36岁的卡夫卡



上图是一位捷克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照片系警察所摄），卡夫卡曾被邀请参加“maladgch俱乐部的活动。（该俱乐部后于1910年10月被迫宣布解散）

下图是1909年5月1日在温泽尔广场举行的为妇女解放的游行



教育改革家F.费勒，卡夫卡曾为其《自由学派》而倾倒



《一个女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卡夫卡十分赞赏她的这一著作，并经常将它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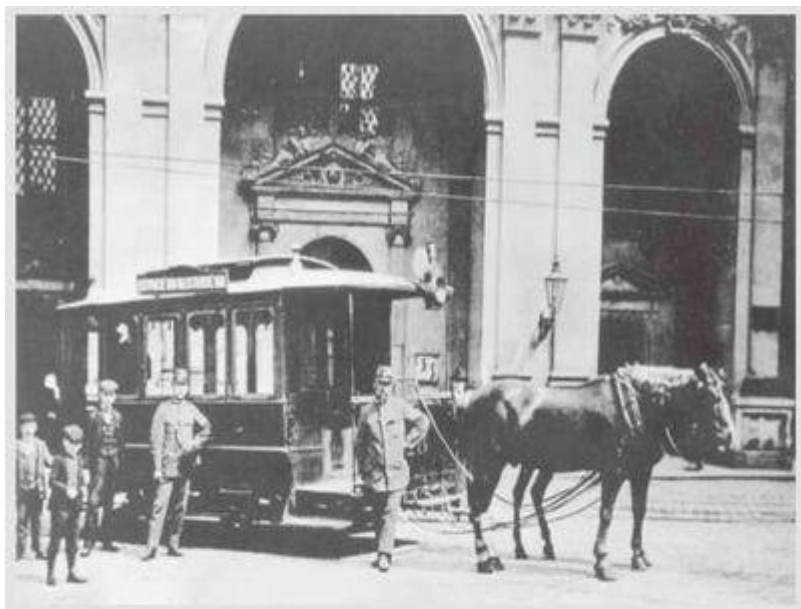


上图是德意志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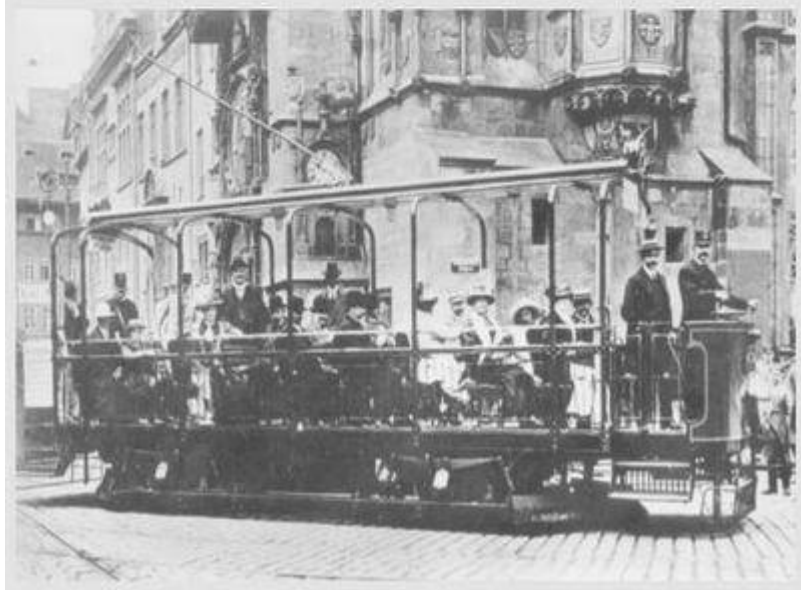
下图是卢采那演艺厅两处都是卡夫卡经常光顾的地方



卡夫卡经常光顾的艺术收藏博物馆



上图是马拉交通车，1905年



下图是电动沙龙车厢，1913年



上图是布拉格的第一辆小卧车模型，18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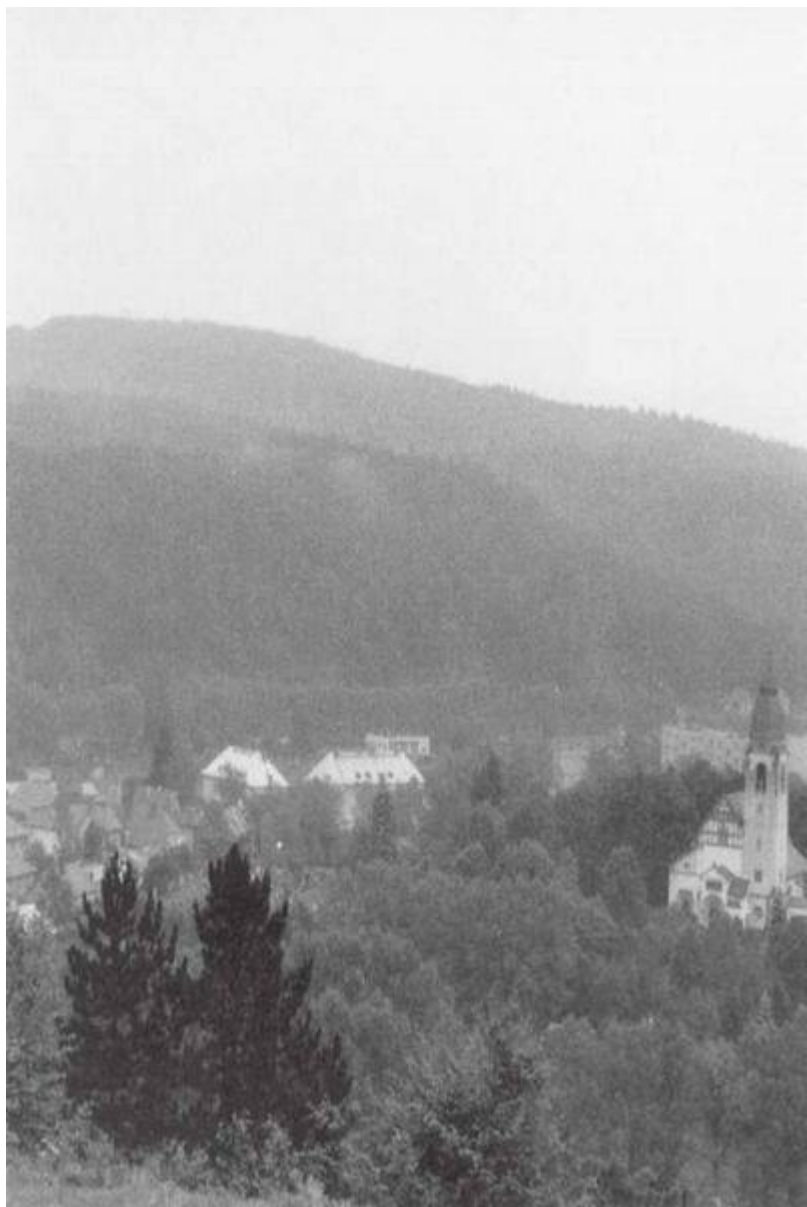
下图是布拉格的第一架飞机，1910/11年



卡夫卡最喜欢散步的路径（前面）通往巧特公园的街道；后面建筑群前头的为
达里波尔卡圆塔。卡夫卡于1916年至1917年曾在塔内写作



河畔游览胜地



穆尔道旅游胜地



卡夫卡旅游期间常下榻的旅馆



旅游中的卡夫卡，正当而立之年



马克斯·勃罗德的画像



马克斯·勃罗德的画像



马克斯·勃罗德头像



马克斯·勃罗德住宅



盲作家鲍姆



哲学家韦尔奇



药剂师夫人贝尔塔·凡塔，卡夫卡及其朋友们经常出入她的沙龙



穆尔道河上的苏菲岛是举办各种活动的好去处



卡夫卡的母亲，时年54岁1910年秋全家在一家照相馆照了一次相，那正是两位大女儿准备找对象的时候



卡夫卡的父亲，时年58岁1910年秋全家在一家照相馆照了一次相，那正是两位大女儿准备找对象的时候



卡夫卡的大妹艾莉，21岁



卡夫卡的二妹瓦莉，20岁



卡夫卡的小妹奥特拉，18岁



卡夫卡的三个妹妹，左起：瓦莉、艾莉、奥特拉



玛丽·维尔纳——“他们的小姐”，在卡夫卡家当了几十年的管家，通常只叫她“小姐”。这是她在库赫尔浴场的一帧照片



玛丽·维尔纳——“他们的小姐”。这是她在布拉格的一张照片



上图是生活在施特拉康尼茨的亲戚：左边坐着的是卡夫卡父亲，右边坐着的是卡夫卡的姑父，尤莉耶姑母的丈夫西格弗里德·埃尔曼后排左起依次是：陌生客人、阿娜姑母（寡妇）、尤莉耶姑母、母亲尤莉叶

下图：沃塔瓦河畔的施特拉康尼茨



北波希米西的弗里德曼。1911年1、2月份卡夫卡在这里出差了较长时间。上左的建筑物是克拉姆·加拉斯伯爵的宫殿，是卡夫卡后来写《城堡》的原型



上图是施品德尔磨坊（大山区）和山羊脊一瞥。1922年1、2月份卡夫卡在这里度了几周假，然后又开始写作，诞生了长篇小说《城堡》的头几章

下图是明信片上的施品德尔磨坊

编者前言

卡夫卡的《城堡》写于1922年1月至9月，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两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唯一一气呵成的巨著。当然说它“一气呵成”只是与其他两部长篇相比而言，其实9个月中间，他还写了那篇杰出的《饥饿艺术家》以及那篇篇幅不短的《一条狗的研究》，此外还有别的小品。作为一个结核病(当时是不治之症)的晚期患者，这样的写作速度是足以惊人的了。当然更重要的还不在速度，而在作品的厚度和力度。《城堡》是卡夫卡创作风格成熟和定型的标志，在哪个意义上讲都堪称作者的“压轴之作”。如果说，荒诞——是卡夫卡小说风格的基本特征，那么《城堡》便是它的典型；它在荒诞外衣的掩盖下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寓言的意蕴！

尽管如此，作者本人却并未对这部作品格外垂青，在他留给马克斯·勃罗德的遗嘱中，《城堡》也未能幸免。靠了勃罗德的眼力，它才得以保留了下来，并由杂乱的状态，被勃罗德整理成有序的整体，于1926年作为单行本出版。友谊再一次显示了力量。

本书译者赵蓉恒教授是经验丰富的老译者，他德文过硬，汉语老到，是德语翻译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叶廷芳

1995年夏

城堡

赵蓉恒 译

第一章

K.到达时，已经入夜了。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连影子也不见，浓雾和黑暗包围着它，也没有丝毫光亮让人能约略猜出那巨大城堡的方位。K.久久伫立在从大路通往村子的木桥上，举目凝视着眼前似乎是空荡荡的一片。

然后他去找过夜的地方；酒店里人们还都没有睡，店老板虽然无房出租，但在对这位晚客的突然到来感到极度惊讶和慌乱之余，还是愿意让他在店堂里一个装稻草的口袋上睡觉，K.也同意这一安排。有几个农民还在喝啤酒，但他无意同任何人交谈，便自己去阁楼上把草袋搬下来，在炉子附近躺下了。屋里很暖和，那几个农民说话声音很低，他用困倦的双眼打量了他们一番便倒头睡去。

然而没有多久他便被吵醒了。这时只见一个城里人装束、长着一副演员似的面孔、浓眉细眼的年轻人同店老板一起站在他身边。那些农民也都还没有走，其中几个把椅子转过来对着他们，以便看得更清、听得更真些。年轻人吵醒了K.而十分客气地向他道歉，自我介绍说是城堡主事的儿子，然后说道：“这村子是城堡的产业，凡是在这里居住或过夜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在城堡居住或过夜，没有伯爵大人的许可，谁也不能在此居留。可是您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许可，至少您并没有出示这样的证明嘛。”

K.半坐起身子，捋了捋头发，仰头看着众人说道：“我迷了路，这是摸到哪个村子来了？这里是有一座城堡吗？”

“那还用问，”年轻人慢条斯理地说，这时店堂各处都有人大惑不解地冲着K.摇头，“这里是伯爵大人威斯特威斯城堡。”

“一定要得到许可才能在这儿过夜吗？”K.问道，似乎想弄清刚才他听到的那些话是不是在做梦。

答话是：“是必须得到许可才行。”紧接着这个年轻人伸出胳膊，向店老板和酒客们问道：“难道竟有什么人可以不必得到许可吗？”那话音和神态里，包含着对K.的强烈嘲笑。

“那么我只好现在去讨要许可了。”K.打着哈欠说，一面推开被子，似乎想站起来。

“向谁去讨要？”年轻人问。

“向伯爵大人，”K.答道，“恐怕没有什么别的法子了吧。”“现在，半夜三更去向伯爵大人讨要许可？”年轻人叫道，后退了一步。

“这不行吗？”K.神色泰然地说，“那么您为什么叫醒我？”这时年轻人憋不住火了。“真是死皮赖脸的流浪汉作风！”他喊叫起来，“伯爵衙门的尊严必须维护！我叫醒您是想告诉您：您必须立即离开伯爵领地！”

“好了，戏做够了吧。”K.用异常轻的声音说，接着又躺下去，拉过被子盖在身上，“年轻人，您太过分了点，我明天还要再考虑考虑您今天的表现的。如果一定要见证的话，酒店老板和这里的各位先生就可以作证。现在请您听清楚：我是伯爵招聘来的土地测量员，明天我的几个助手就要带着各种器件乘车随后跟来。我因为不想失去这个踏雪觅途的好机会，所以步行前来，可惜几次迷路，才到得这样晚。现在到城堡去报到时间已经太迟，这一点我自己很清楚，用不着您来赐教。正因为这样我才勉强在这草袋上凑合过夜，而您竟然——客气点说吧——举止失礼，打搅我休息。好了，我的话说完了，晚安，诸位先生！”说到这里K.翻了一个身，转向炉子去了。“土地测量员？”他听见背后有人将信将疑地问，过后又无人做声。然而不久那位年轻人便克制住自己，用压低了的——低到可以看作是为了照顾K.的睡眠——然而又大到能让他听清楚的声音对老板说道：“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下。”怎么，在这个乡村小酒店里居然还有电话？唔，设备还真够齐全的。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听来也使K.感到惊奇，不过总起来却又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发现，电话差不多正好摆在他的头顶上方，刚才他睡眠惺忪，没有注意到。现在，如果年轻人一定要打电话，那么他无论如何不能不打搅K.的睡眠，问题只在于K.让不让他打这个电话？K.决定还是让他打。可是这样一来，在底下装睡便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K.又恢复了仰卧的姿势。他看见农民们怯怯地聚到一起，嘁嘁喳喳议论，看来土地测量员的到来不是一件小事。这时厨房的门早已打开，膀大腰圆的老板娘站在那里几乎把门框塞

满，店老板踮着脚尖走到她跟前去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一切。现在，电话接通，开始通话了，听得出，城堡主事已经就寝，然而一位副主事——为数不多的副主事当中某位名叫弗里茨的老爷——在那边接电话。年轻人自报姓名，说是叫施瓦尔策，接着便说他发现有一个名叫K.的30多岁的男子，衣冠不整，心安理得地在酒店里一个草袋上睡觉，这人枕着一个长得可怜的背囊，手边放着一根拐杖。他施瓦尔策自然觉得此人形迹可疑，而因为店主在这件事上显然失职，他施瓦尔策当然就责无旁贷地要过问此事，进行查询了。对于被叫醒盘问，对于他施瓦尔策按职责惯例作出的要将K.逐出伯爵领地的警告，K.的反应是很不耐烦，总之看起来火气不小，然而也许不无道理，因为他自称是伯爵大人聘来的土地测量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至少从例行手续上看有必要对他的话进行核实，因此，他施瓦尔策恳请弗里茨老爷向城堡总办公厅询问一下是否确有这样一位土地测量员应聘前来，并请将答复电话告知。

电话打完便安静下来，弗里茨在那边询问，这边在等着回话。K.的神态一如既往，连头也不回，看样子一点也不急于知道结果如何，两眼茫然直视前方。施瓦尔策对事情的描述是一种不怀好意和谨小慎微的混合物，这番话给了K.一种印象：城堡里连施瓦尔策这样的小人物也能很容易得到可说是外交手腕方面的训练。另外，看起来那里的人也决不偷懒；你看，总办公厅有人上夜班呢。而且显然很快就作出回答，因为这时弗里茨打电话来了。不过，好像这个回话太简短，因为施瓦尔策马上又气呼呼地把听筒挂上。“我早就说了嘛！”他大声叫道，“土地测量员，连影子也没有！这人真是卑鄙的、信口雌黄的流浪汉，说不定还更坏呢！”此时K.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想：所有的人，就是施瓦尔策、那个农民，还有店老板、老板娘和其他人，眼看就要向他猛扑过来。为了至少避一避这个凶猛的势头，他从头到脚，整个儿蜷缩到被窝里面去了。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而且，K.觉得声音特别急促响亮。于是他又把头从被子里慢慢伸出来。虽然电话几乎不可能仍是涉及K.的事情，但所有的人还是一下子突然肃静下来，施瓦尔策则回到电话机旁去。他站在那儿耐心地听完了一番较长的解释之后，低声说道：“那么是弄错了？我实在是太难为情。办公厅主任亲自打来了电话？真是怪事，真是怪事。我该怎么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解释才好呢？”

K.听了这些话精神为之一振。这么说，城堡已经任命他为土地测量员了。这个情况一方面对他不利，因为它表明，城堡已经了解他的底细，在反复掂量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后，决定成竹在胸地开始同他较

量。可是另一方面，情况又对他有利，因为在他看来这同时也证明对方低估了他，他将会有兴许比他自己起初敢于希冀的还要更多的一些自由。并且，如果以为通过这从心理战来看不能不说是高明的一着，即公开承认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就能使他经常处于诚惶诚恐、心惊胆战的状态的话，那他们就错了；这一官方认可使他吃了一惊，但也就止此而已。

对于羞怯地向他走来的施瓦尔策，K.摆手示意他不必过来了；他只接受了老板递给他的一杯催眠饮料，又从老板娘手里接过一盆水、肥皂和毛巾。现在，根本用不着他开口叫人离开店堂，原来这时所有的人都把脸背过去使劲往外挤，可能是怕明天被他认出来吧。关灯之后，他终于可以休息了。他睡得很香，除了一两次被跑过的老鼠惊醒之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早饭后——这顿早餐以及他的全部膳食，据老板说都将由城堡支付——他想马上到村里去。但由于老板带着乞求的目光不断围着他转——想到他昨天的表现，K.到目前为止只同这位老板说了几句非说不可的话——他觉得这人挺可怜的，就让他在自己身边小坐一会儿。

“我还不认识伯爵，”K.说道，“据说他对于工作好的人给的报酬是很高的，对吗？谁要是像我这样扔下妻子儿女远走他乡，总是想带点什么东西回去的吧。”

“在这方面，大人可以不必担心，这里还没有听到谁抱怨报酬低呢。”“唔，”K.说，“我这个人可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就是对一位伯爵，我也有什么说什么，不过同这里的老爷们当然还是心平气和地打交道要好得多。”

老板坐在K.对面窗台的边沿上，他不敢坐舒服些，这段时间一直瞪大他那双褐色的眼睛战战兢兢地紧盯住K.，先前他是唯恐挤不到K.的身边，现在呢，看来恨不得马上就溜之大吉。他是害怕被详细诘问关于伯爵的情况呢，还是怕他心目中的“大人”K.靠不住？K.必须给他打打岔。他看了看钟说道：“我的助手们很快就要到了，你这里有地方给他们住吗？”

“当然有，大人，”他说，“可是他们不跟你一块儿住在城堡里吗？”

难道他就是这么轻松愉快地放弃顾客，特别是放弃K.，非要提醒他

到城堡里去住不成？

“这还不一定，”K.说，“首先我得弄清给我安排什么工作。万一需要我在这下面工作，那么住在下面也更明智些。另外我担心，我可能不适应上面城堡里的生活，我想永远自由自在的。”

“你不了解城堡。”老板轻声说。

“当然，”K.说，“不能过早下断语。目前，我对城堡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那里的人善于挑选一个合适的土地测量员。或许那里还有另外一些优点吧。”说到这里他站起身，以便解脱那个不知所措地一个劲咬嘴唇的老板。要赢得这个人的信任是颇为不易的呵。

离开酒店时，墙上一个深色像框里的一幅黑乎乎的肖像画引起了K.的注意。早先他从睡觉的地方就已经看见它，可是因为距离太远，看不清细部，便以为原来框中的画像已被拿走，眼前见到的只是一层黑色的衬板而已，但现在看上去那确是一张画像，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的半身像。他的头向前胸低低垂下，使人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他所以低头，主要原因似乎是那高高突出的过于沉重的前额和那又长又大的鹰钩鼻子。他的大胡子由于头的姿势而被下巴压扁了，往下就向两旁铺开去。左手扶着头，手指叉开伸进厚实的头发里，但已无法把头撑起来。“这是谁？”K.问道，“是伯爵吗？”K.站在画像前，根本不回头看老板一眼。“不是，”老板说，“这是主事。”“城堡里真是有一位相貌堂堂的主事呢，”K.说，“可惜他的儿子太不争气了。”“不是的，”老板说，一面将K.拉到自己身边把嘴凑到他耳边悄悄说：“施瓦尔策昨天是高抬自己了，他父亲只是副主事，而且还是好多个副主事中末几个里面的。”此刻K.觉得老板像个孩子。“这个混账东西！”K.笑着说，然而老板并不跟着笑，却一本正经地说：“不过他的父亲也很厉害，能呼风唤雨呢。”“去你的吧！”K.说，“在你眼里谁都能呼风唤雨，都很厉害，也包括我吧？”“你，”他有些胆怯而又很严肃地说，“我并不觉得你厉害。”“看起来你还挺会看人，”K.说，“因为，对你说句心里话：我的确不是个厉害人。所以我在那些呼风唤雨的厉害人面前感到的诚惶诚恐大概不亚于你。只是我没有你那么老实，有时候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为了安慰老板并表现得亲切一些，K.轻轻拍了拍他的脸。现在老板总算有点笑意了。他真还是个孩子，圆乎乎的脸上没有几根胡子。真不明白，他是怎么和那个相当显老的大块头女人结为夫妻的？——这时候可以从一个门镜里看见她在隔壁厨房里甩开膀子大干呢。但K.不想再追问他什么，免

得把好不容易才引出来的微笑又吓回去。所以他只是用手示意老板把门打开，然后就走了出去，进入冬日一片美丽的晨曦之中。

此刻，他在明澈的空气中看清了城堡的轮廓，且由于那层山上处处皆是薄薄积雪把任何物体的形状都勾勒出来，形状益发明晰可辨了。山上的积雪看来比村里少得多。K.此时在村里踏雪前进，并不比昨天在大路上省力。这里的积雪一直堆到与那些简陋小屋的窗户齐高，稍往上一一点，低矮的屋顶上也沉甸甸地堆满了雪，而山上的那些建筑物，却都那么自由自在、轻松地愉快挺立着，至少从这里看上去的印象是如此吧。

站在这里，从远处看去，城堡的外观大体与K.的预料相符。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式的豪华建筑，而是一座宽阔的宫苑，其中两层楼房为数不多，倒是有许许多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那么可能会以为它不过是一个小城镇。K.只看见一座塔，它究竟是属于一所住宅还是属于一所教堂，就无法看清了。一群群乌鸦在围着它盘旋。

K.心里什么别的都不想，两眼看准城堡继续朝前走。但是愈走近城堡，他就愈觉失望，那的确不过是一个相当寒酸的、看去全是一色普通村舍的小城镇，只有一个优点，就是或许所有的房子全是石结构的；但是墙上的灰泥早已掉光，砌墙的石块看来也开始剥落了。K.蓦地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小镇，它同这座所谓的城堡相比几乎毫无逊色。如果K.的目的只是观光，那么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便太不值得，倒不如重访自己多年未归的故里更明智些呢。于是他在心中将家乡那座教堂的塔同眼前山上的塔作了一番比较。家乡那座塔从低到高、由粗而细笔直伸向天空，塔顶较宽，红瓦覆盖，诚然仍是一座不能超凡脱俗的建筑——我们凡人还能盖出什么别的样式来呢？——但它比周围大片低矮房屋有着更崇高的目标，比人间那晦暗的终日劳碌，具有更明朗的意态。然而这里山上这座塔呢——这是此处唯一可见的塔——现在已能看清是一所住宅的塔，说不定就是城堡主楼的塔，它是一座单调的圆形建筑，部分蒙常春藤垂青加以覆盖，塔身有不少小窗子，此时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反光——这使人觉得有些荒唐。塔顶类似阁楼，其雉堞瑟瑟缩缩、杂乱无章、残颓破败地戳向蓝天，就好像是一个害怕画错或是很不认真的孩子信手涂鸦胡乱画上去似的。面对这景象，人有一种感觉，仿佛这楼中有一个忧心忡忡的居民，按理本应老老实实在地把自己关在楼中最偏僻的角落向隅而

泣，现在居然冲破楼顶，探出身来向全世界亮相了。

K.再次停下步来，似乎停下步子能增加他对眼前景象的判断能力。然而这时他受到了干扰。他站住的地方离村教堂（其实这不过是个小礼拜堂而已，只是像仓库似地扩建了一下，以便能容纳全村的教民）不远，教堂后面就是村子的小学。这学校是一座长长的低矮楼房，给人一种既是临时又非常古老的、奇特的混合印象，楼前有一座围了铁栏杆、眼下是一片白雪覆盖着的花园。这时孩子们正好同老师一起从楼里走出来。一大群孩子把老师团团围住，每双眼睛都盯着他，从四面八方对他哇啦哇啦地唠叨个不住，K.一点听不清他们那连珠炮似的话。这位老师是个年轻人，小个子，窄肩膀，不过样子并不可笑，身子直挺挺的，他从老远处一眼就看到了K.，当然，除了他和他的一群学生之外，K.是这方圆数里内目力所及唯一可见的人。K.作为一个外乡人，首先打招呼问好，更何况是向这个在这里享有相当权威的小个子男人呢。“你好，老师！”他说。这话一出口，孩子们一下子就鸦雀无声，这突然的肃静作为他开口说话的先导，看样子使这位老师颇为得意。“您在观看城堡吗？”他问这问题时的态度，比K.预料的要和蔼些，然而那语气似乎不赞同K.这样做。“是的，”K.说，“我不是本地人，是昨天晚上才到村里的。”“您不喜欢这城堡吗？”教师很快又问。“什么？”K.反问一句，有点震惊，然后用比较温和的语气重复那个问题：“我喜不喜欢这城堡吗？为什么您要猜想我不喜欢它呢？”“没有一个外乡人喜欢它。”教师说。为了避免在这里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K.改变话题问：“您大概认识伯爵吧？”“不认识。”教师说着便准备扭头走开。然而K.并不罢休，他追问道：“什么？您不认识伯爵？”“我怎么会认识他？”教师低声说，然后使用法语大声补充道：“请您考虑一下这里有这么些天真无知的孩子在旁边。”K.听到这话便抓住时机问道：“老师，我可以拜访拜访您吗？我打算在这里待较长时间，可我现在就感到有点孤单了；我既不是农民中的一员，大概也不能算是城堡中的一员吧。”“农民和城堡没有太大的区别。”教师说。“也许是这样，”K.说，“可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处境。我可以拜访拜访您吗？”“我住在天鹅巷肉铺。”虽然这话听起来只像是在说出住址，而不是发出邀请，K.仍然说道：“好的，我一定来。”教师点点头，就同这时突然又大吵大嚷起来的孩子们一起继续走他的路了。不久，他们便消失在一条地势陡然下降的小巷里。

然而K.现在却有些心神不宁，这次谈话使他心中颇感不快。自从到达此地以来，他现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疲倦了。到这里来的这一段很远

的路，本来好像并不使他感觉吃力，这些天来，他是怎样日复一日、从容不迫、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啊！——可是现在呢，过度紧张的后果到底还是显现出来了，无疑，来得真不是时候。他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强烈冲动，希望在这里尽量多结识一些人，但是每认识一个人都增添他一分倦意。^[1]^[1]他想，在他今天这种竞技状态下，如果能咬牙坚持这次步行，至少走到城堡大门，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

于是他又继续前行，但是路仍然很长。走着走着他发现，这条同时是村子主要街道的大路并不是通到城堡所在的山上去的，它只通到城堡近处，虽然眼看快到山脚下了，却像故意作弄人似的在那里拐了弯，然后，尽管沿它走下去并不会离城堡越来越远，却怎么也无法再接近它一步。K.一直在期待着这条大路最终总会拐进城堡里去，也仅仅因为他抱有这一期望，他才不住地往前走；显然由于他感觉疲劳，才没有毅然决然离开它，另外，这个其长无比的村子也使他惊诧不已，它没有尽头，大路两边老是出现同样的小房子、冻了冰的窗户、厚厚的积雪，一个人影都不见——最后他终于还是下决心离开这条缠人磨人的大路，转进一条狭窄的小巷，这里雪更厚，把陷进雪里的脚拔出来艰巨异常，累得他满身大汗，突然间他站住了，再也走不动了。

细想起来，他倒也并不完全孤单，左右两旁不都是农舍吗？于是他捏了一个雪球，向一扇窗户掷去，门应声开了——这是他在村子里走了这大半天第一道打开的门——一个老农，身穿棕色皮夹克，头歪向一边，和蔼可亲地、颤巍巍地站在那里。“我可以到您屋里歇一会儿吗？”K.说，“我太累了。”他完全没有听清老头说些什么，只是感激地接受了老者的好心：给他推过来一块木板，这木板当即把深陷雪中难以自拔的他救了出来，只跨过了三五步，他就进了老农屋里。

屋子挺大，笼罩在一片朦胧的光线中。刚从外面进来的K.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他趑趄几步，快撞到一个洗衣盆时，一只女人的手拉住了他。从屋子的一角传来好几个孩子的叫嚷声。从另一个角落则涌出滚滚烟雾，使本来就半明半暗的屋子变成一片漆黑。K.如置身云雾中。“他喝醉了。”有人说。“您是谁？”另一个声音厉声喝问，然后大概是冲着老头问：“你为什么把他放进来？难道可以把大街小巷里东溜西窜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放进来吗？”“我是伯爵的土地测量员。”K.说，试图用这话在那些直到现在仍唯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一下。“哦，原来是土地测量员。”这时响起的是一个女声，继之而来的是全然的寂

静。“你们听说过我？”K.问道。“当然。”同一个声音简短地答道。人家听说过他，这好像不是在抬举他吧。

浓烟终于稍稍散去了一些，K.渐渐可以辨认四周了。看来今天是个大洗涤的日子。离门不远处有人在洗衣服，但雾气是来自屋子另一角，那里放着一个很大的木澡盆，K.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澡盆——约有两张床那么大——两个男人泡在热气腾腾的水里洗澡。然而更加令人惊奇、可又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惊奇的，是屋子右边那个角落。屋子后墙上有一个大缺口，通过这后墙上唯一的开口处，兴许是从院子里吧，射进来一道煞白的雪光，使一个坐在角落处一把高高的靠椅里、面带倦容的女人身上穿的衣服发出一种类乎丝绸的光亮。这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她四周有几个孩子在玩耍，显然都是农家孩子，但她似乎同他们并不属于一类人，当然，疾病和疲倦，甚至也能使农民变得高雅起来的。

“您请坐吧。”两个男人中的一个说，这人一脸络腮胡外加两髭向上翘起的小胡子，不断张着嘴喘气，他从水里伸出手，越过盆边——那副样子颇为滑稽——向一个大木箱指去，甩了K.一脸热水。木箱上已经坐着一个人，正是那个把K.放进来的老头，在那里发愣。对自己终于可以坐下来，K.心里很是感激。现在没有人再理睬他了。在洗衣盆旁边的那个女人头发金黄，青春焕发，边洗边轻声哼着小曲，澡盆里的男人则不停地蹬腿翻身，孩子们想到他们跟前去，但一再被盆里溅出的大量洗澡水打退，K.也未能幸免，靠椅里的女人泥塑木雕似地靠在椅背上，甚至连胸前的孩子她也不低头看上一眼，而只是视而不见地仰望空中。

K.盯着她——这尊凝滞不动的、美丽、忧郁的雕像——大概看了好久，然后他一定是睡着了，因为当他听见有人大声叫他而猛可惊醒时，他的头是枕在他身旁的老者肩上的。这时两个男人早已洗完澡，穿好衣服站在K.面前，澡盆里现在是孩子们在金发女人的看管下扑腾了。现在看来，两个男人中那个大嗓门的大胡子是地位低一些的。另一个的个头不比大胡子高，胡须也少得多，是个少言寡语、从容思考的人，他身材矮胖，长着一张宽脸，老是低着头。“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不可以老待在这里，请原谅我的失礼。”“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待下去，”K.说，“只是想稍稍休息一下。现在已经休息过了，我这就走。”“您大概奇怪我们这里不太殷勤好客吧，”那人说，“我们这里可没有殷勤好客的习惯，我们是不需要客人的。”K.小寐以后觉得精神稍好，注意力也比先前

容易集中一些，听到这些直率的话很高兴。他行动不那么拘谨了，用手杖一会儿拄拄这，一会儿拄拄那，然后向靠椅里的女人走了过去。他也是这屋里个子最高的。

“不错，”K.说，“你们要客人干什么呢。不过恐怕间或也会需要个把人的，比如我，土地测量员。”“这个我不知道，”男人慢吞吞地说，“既然叫您来，那么大概是需要您，这可能是个例外，可我们呢，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我们是按常规办事，这一点您不能怪我们。”“哪里，哪里，”K.说，“我对您只有感谢，对您和这里所有的人。”这时，出乎众人的意料，K.突然嗖地一跳转过身去，站在那女人面前了。她用失神的蓝眼睛看着K.，一块透明的真丝头巾一直盖到她前额正中，婴儿已在她怀里睡着了。“你是谁？”K.问道。她拂袖——究竟这一轻蔑的表示是针对K.的还是针对她自己的回答，弄不清楚——答道：“一个从城堡来的少女。”

这一切只是一瞬间的事。现在K.发现自己已经一左一右夹在两个男人中间并被——好像根本没有别的交流思想的办法——一声不响地但却是用尽全力地拽到门边来。老头儿这时不知在乐什么，高兴得拍手。洗衣女人也在突然拼命吵嚷起来的孩子们旁边格格笑了。

可是K.呢，不久后又站在门外小巷里，那两个男人站在门槛上紧盯着他。又下起了雪，尽管如此天似乎比原先明亮了一点。大胡子不耐烦地叫道：“您要上哪儿？这边通城堡，这边通村里。”K.不回答他，却冲着另外那个，虽然地位优于头一个，但给K.的印象比他更随和的男人问道：“您是谁？我应该感谢谁让我在这儿待了一阵呢？”“我是鞣皮匠拉塞曼，”他答道，“可是您用不着感谢谁。”“好吧，”K.说，“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看不会了。”那人说。这时大胡子突然举起手叫道：“你好，阿图尔，你好，耶里米亚！”K.回头看，原来在这个村里街上毕竟还是能见到人的！从城堡方向走来两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两人都是瘦溜身材，衣服紧绷在身上，样子长得也非常相像。两人的脸均呈深棕色，但黝黑的山羊胡子仍与脸色形成强烈的反差。就目前的路面条件而言，他们走路的速度快得惊人，细长的腿有节奏地嚓嚓地踏雪前进。“你们有什么事？”大胡子叫道。同他们交谈只能大声嚷嚷，因为他们走得飞快，又不停步。“公事！”他们笑着回头叫道。“到哪儿去？”“酒店。”“我也去那儿！”K.突然用比别人更大的嗓门大喊，他迫切希望这两人带他一起去；虽说认识这两个人他觉得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但他们显然可以

成为消除路途寂寞的好伙伴。两人听见了K的话，但并不停下，只是点了点头就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去了。

K.始终还站在雪地里，他现在没有这个雅兴把腿从雪里使劲拔出来，然后又让它在前面一小步远的地方重新深深陷进去；鞣皮匠和他的同伴呢，由于最后总算是把K.扫地出门而露出满意之色，这时一面不断回头看K.，一面慢慢地从那仅开着一条缝的门轻轻缩回屋去，于是，K.又是孤身一人站在漫天飞舞的雪片包围之中了。“如果我不是有目的地到这里来，而是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他蓦地寻思，“那真有点山穷水尽的味道呢。”

这时，他左手边一座简陋小房的一扇很小的窗子开了；关闭时，也许是由于雪的反光吧，这窗子呈深蓝色，它极小，以致现在打开时也不能看到那个往外窥视的人的整个脸庞，而只能瞥见他的一双眼睛，一双褐色的老人眼睛。“他站在那儿呢。”K.听到一个颤抖的女声在说。“那是土地测量员。”一个男声说道。然后，男人便走到窗前向外问话了，那语气并非不友好，然而却让人明白觉出他对于保证在他房前的街上不出任何差错是很重视的：“您在等什么人？”“等着来一辆雪橇让我搭车走。”K.说。“这里不会有雪橇来，”那男人说，“这里没有什么车辆来往。”“那不是通向城堡的大路吗？”K.提出异议了。“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男人话音里有一种铁面无情的味道，“这里没有什么车辆来往。”然后两人都沉默了。但那男人显然还在考虑什么，因为他始终没有关上窗子——窗里现在冒出了烟。“这路很不好走啊。”K.又说一句，为的是促使他的考虑快些得出结果。

可那人只说了句：“是啊，确实很不好走。”

但是过了一小会儿他终究还是又开口了：“如果您愿意，我就用我的雪橇送您吧。”“那太好了，”K.喜不自胜地说，“您要多少钱？”“不收钱。”那人说。K.惊讶不已。“您是土地测量员啊，”那人解释道，“是城堡的人嘛。您要上哪儿去？”“到城堡里去。”K.应声立即答道。“那我不去了。”男人马上说。“我不是城堡的人嘛。”K.重复那人自己说过的话。“是也不去，”男人还是拒绝。“那么您送我去酒店吧。”K.说。“好的，”那人说，“我去套了雪橇马上就来。”这场谈话给人的印象不是特别友好、助人为乐，而是对方抱着一种自私的目的，谨小慎微、挖空心思、千方百计，不把K.从他们门前这块地方弄走决不罢休。

院门开处，一辆什么座位都没有的平板轻便载重雪橇，由一匹瘦弱的小马拉着出来了，那男人紧随在后，躬腰，虚弱，一瘸一拐地走着，那张瘦脸冻得通红，又看得出在患鼻伤风，一条毛围巾把头和脖子紧紧裹住，使这张脸显得特别小。这个人显然有病，仅仅为了能把K.赶快送走而勉为其难地出门。K.谈起这一点时，那人摆摆手叫他别说了，K.从他口里摸到的情况只有：他叫盖尔斯泰克，是个赶车的，另外就是他所以套这辆不方便乘坐的雪橇，是因为它正好放在那里没人用，而如果要拉另一辆出来就太浪费时间了。“您坐下吧。”他用鞭子指着雪橇后部说。“我要坐在您旁边。”K.说。“我走路。”盖尔斯泰克说。“为什么呀？”K.问。“我走路。”盖尔斯泰克重复说那句话，说完突然大声咳嗽起来，震得他只好两腿叉开支在雪地里，双手紧紧扶住雪橇的边沿。K.不再说什么，坐到雪橇后部，咳嗽渐渐平息下去，他们上路了。

山上的城堡这时已奇怪地暗下来，K.本来希望在今天之内到达那里，现在它又越来越远了。但是，仿佛要向他作出一个暂时告别的表示，那里响起了钟声，欢快、急速的钟声，这钟声至少使他的心有一刹那的悸动，似乎在警告——因为它也使它听着揪心——他，他心中那朦胧的渴望就要变成现实降临到他头上！但不久之后，这大钟便悄然止息，接替它的是微弱而单调的铃声，这铃声也许来自山上，也许就是从村里传来的。这丁丁零零的声音自然与他们缓慢的雪地行进更为协调，也与那个可怜兮兮但却铁面无情的车夫显得更合拍些。

“喂，”K.突然叫道——这时他们已经到了村教堂附近，离酒店已没有多少路，K.没有必要再缩手缩脚了——“我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胆敢冒险自作主张让我乘着雪橇到处跑，难道上头准许你这样做吗？”盖尔斯泰克对此不予理会，心安理得地继续在小马旁边走着。“嗨！”K.又一次叫他，同时从雪橇上抓了一把雪攥成一团向盖尔斯泰克扔去，正中他的耳朵。现在他站住了，回过身来；但是，当K.从近处细看他时——因为雪橇又向前滑行了一小段——当他看到这个躬腰驼背，可以说是备受折磨的人，看到他冻红了的、疲惫不堪的瘦脸上似乎不对称的、一边平一边凹的两颊，看到他大张着呼哧呼哧喘气的嘴，以及嘴里仅有的七零八落的几颗牙齿时，他不得不把刚才气头上说的话又用同情的语调重复一遍，即问盖尔斯泰克，是否会因为送了他而受到处罚。“您想要什么？”盖尔斯泰克问，他根本没听懂K.的问题，但也不等他再作解释，就吆喝牲口，继续驱车前行了。

第二章

当他们快到酒店——K.还记得那近处的一个拐弯——时，他大为惊异：天竟然完全黑了。他离开这里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吗？可是他估算一下，大约才不过一两个小时而已，他是早上离开酒店的，现在一直还没有感到有吃饭的欲望，不久之前又还是大白天，现在可就突然漆黑一片了。“多短的白天哟！多短的白天哟！”他自言自语着，从雪橇上就势滑下来，向酒店走去。

令他十分欣慰的是，酒店老板已经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迎接他，手里还举着风灯为他照路。K.走了几步又匆匆记起车夫而停了一下，黑暗中什么地方有人连连咳嗽，那就是他了。先不管他了吧，反正很快就会再见到他的。等K.上了台阶，走到毕恭毕敬地向他敬礼的店老板面前时，才发现他左右两侧各站着一个人。他从老板手里接过了风灯，就着光亮细看这两个人；原来这正是他在路上遇到过的那两个被称为阿图尔和耶里米亚的男子。现在他们向他举手行军礼。这使他回想起他服役的日子，想起那些快活的岁月而笑了。“你们是什么人？”他问，同时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您的助手。”他们回答。“他们是您的助手。”店老板低声证实道。“怎么着？”K.问，“你们就是我那两个老助手，就是我让你们随后来，我在这里等着你们的那两个人吗？”两人点头称是。“很好，”片刻之后K.说道，“你们来了很好。”“不过，”又过了片刻，K.说，你们迟到得太久了，你们太拖拉了。”“路很远啊。”一个说。“路是很远，”K.重复说，“可是你们从城堡来时我碰上你们了。”“对。”他们说，没有更多的解释。“仪器你们都放在哪儿了？”K.问道。“我们没有仪器。”他们说。“就是我交给你们保管的那些仪器。”K.说。“我们没有。”他们又重复一遍。“唉，你们是怎么搞的！”K.说，“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土地测量？”“不懂。”他们说。“如果你是我的老助手，那么你们就必须懂这个。”K.说。他们不言语了。“好，那么来吧。”K.说着便推着两人进了酒店。

之后，他们三个几乎是一声不响地坐在店堂里一张小桌旁，啤酒摆在桌上，K.坐在中间，两个助手一左一右。除他们外，店里现在就只有另一张桌旁坐着几个农民，与头天晚上差不多。“同你们相处可难了，”K.说，一边来回比较两人的脸庞，像他多次做过的那样，“我到底怎么分清你们两个呢？你们只有名字不同，除此以外，你们长得太像了，没有一点区别，就跟”——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便不由自主地说下去

——“除此以外你们长得就跟两条蛇一样相像。”他们微笑了。“除了名字以外人们也是很容易区别我们的。”他们分辩说。“这我相信，”K说，“我亲眼看见了，可是我呢，我只能用我的眼睛，而光用眼睛是无法分清你们两个谁是谁的。因此，我将把你们当成一个人看待，管你们都叫阿图尔，你们不是有一个叫这个名字吗？是不是你？”K问其中一个。“不是，”这人答道，“我叫耶里米亚。”“这没什么关系，”K说，“我将管你们两个叫阿图尔。要是我说派阿图尔去哪里，那么你们两人都去，要是我让阿图尔做某件事，那么你们就两人都去做这件事。这对我虽然有一个很大的不便，就是我不能分别使用你们，然而却也有一大优点，就是对我交给你们做的任何工作，你们都共同担负全部责任。你们自己内部怎样分工我不管，但你们不能互相推诿，对我来说你们只是一个人。”他们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这样我们觉得太别扭了。”“怎么能不别扭呢，”K说，“这对你们当然一定会很别扭，可就得这样定下来。”

这一阵子以来，K早看见一个农民轻手轻脚地在他们桌旁转悠，探头探脑，欲言又止，现在他终于下决心走到一个助手身后，想对他说几句悄悄话。“对不起，”K说，同时猛捶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这两位是我的助手，我们现在正在谈正事。谁都没有权力来打扰我们。”“哦，请便，哦，请便。”那农民战战兢兢地说，边说边往后退着，一会儿就回到和他一起的那帮人那里去了。“这一点你们两个务必注意，”K重新坐下后说道，“没有我的许可，你们不得同任何人谈话。我在这里是个外乡人。既然你们是我的老助手，那你们也就是外来的。因此，我们三个外来人要齐心，伸出你们的手，让我们拉拉手吧。”两人忙不迭地向K伸出手来。“你们两个也握一握手吧，”他说，“对我要有令则行。我现在要去睡了，我劝你们也去睡一觉。今天我们耽误了一个工作日，明天必须很早开始工作。你们要设法找一辆雪橇来，我们好去城堡，6点钟必须一切准备停当在这门口待命。”“好的。”其中一人说。但另一个却抢白说：“你说‘好的’，可你明明知道这办不到。”“不要说了，”K说，“难道你们现在就要一个跟一个闹分裂？”但是，现在第一个助手也否认了：“他说得对，没有许可任何外人是不得进入城堡的。”“要到哪里去申请许可呢？”“我不知道，也许是找主事吧。”“那我们就打电话到那儿去申请，你们两个听着：马上打电话给主事！”两人立即跑步来到电话机旁，接通了主事——瞧他们那争先恐后的劲头儿！从表面看，他们真是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到可笑的地步——问道，K可不可以同他们一起上城堡。电话里厉声回答“不行！”就连K坐在他身旁也听见了。然而答话

比这还要多一点，叫做：“明天不行，什么时候都不行。”“我自己来打。”K.说着站了起来。到目前为止，除了那个农民引起的干扰外，很少有人注意K.和他的两个助手，然而现在他这最后一句话却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跟他一齐站起来，然后，虽然老板力图把众人推开，他们仍在电话机旁组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子将K.包围了。他们议论纷纷，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K.将得不到任何回答。K.不得不请求他们安静下来，说他并没有要求他们把他们的意见讲给他听。

听筒里传来一片K.以往打电话时从未听到过的嗡嗡声。听来就像从一大片乱哄哄的孩子吵嚷声中——可这嗡嗡声又不是真正的嗡嗡声，而是从远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歌唱声——神奇而不可思议地逐渐幻化出一个单一的、很高的强音，这声音猛烈撞击着他的耳鼓，仿佛它强烈要求深深钻入人体内部而不只是接触一下那可怜的听觉器官似的。K.全神贯注地等候，一句话不说，左臂支在摆电话机的小桌上，就这样聚精会神地恭候着。

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知道后来老板拉扯他的上衣，告诉他有一个信差来找他。“走开！”K.憋不住大叫一声，也许这吼声传进听筒里去了吧，因为那边马上有人接电话了。于是他听见了下面的话：“我是奥斯瓦尔德，那边是谁呀？”听筒里叫道，这是一个严厉的、高傲的声音，话里K.觉得有个小小的语言错误，那声音力图超越自身，用更加咄咄逼人的凌厉气势来弥补这个错误。K.在犹豫，没有立即报上自己的名字，在电话面前他是赤手空拳、没有防御能力的，对方可以厉声呵斥他，可以把听筒撂下，这样一来K.就无异于自己把一条也许是相当重要的通路堵死了。K.的犹豫使那边的男子不耐烦起来：“谁呀？”重复喝问之声接着又补充道：“请你们那边不要老打电话来好不好？刚刚才来过一个电话嘛！”K.没有理睬这句话，他突然灵机一动，报上自己身份说：“我是土地测量员先生的助手。”“什么助手？什么先生？什么土地测量员？”K.想起了昨天的电话。“请您问问弗里茨吧。”他简短地说。使他吃惊的是这话居然奏效了，比这更使他惊讶的是那里办事的一致性。答话是：“我知道了。那个永远扯不清的土地测量员。是了是了。还有什么？哪个助手？”“约瑟夫。”K.说。他对农民在他身后嘀嘀咕咕有些不快；显然他们不同意他没有报上真实身份这一做法，但K.没有工夫去考虑他们的意见，因为应付电话已够使他费神的了。“约瑟夫？”那边反问道，“两位助手不是叫”——到这里那边稍稍停了一下，显然是在让谁告诉名字——“阿图尔和耶里米亚吗？”“他们是新来的助手。”K.说。“不，他们是

老助手。”“他们是新的助手，我才是老助手，是今天比土地测量员先生晚一步后到这里的。”“不对！”那边大叫起来了。“那么我是谁呢？”K.问道，一直保持着冷静。这样过了一会儿听筒里又响起同一个声音，带着同样的语言错误，可同时又的确像是另一个更低沉些、更令人肃然起敬的声音：“你是老助手。”

K.过于专注地琢磨那声音的韵味，以至几乎没有听见对方的问话：“你想做什么？”〔2〕现在他真是恨不得立刻放下听筒。他已不再期望能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点什么。他只是硬着头皮匆匆再问了一句：“什么时候我的主人可以到城堡来？”——“什么时候都不行”就是回答。“知道了。”K.说着便挂上了听筒。

这时他身后那些农民早已挤到他跟前来了。两个助手一边不断斜眼看K.，一边不住地挡住农民不让他们靠近。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农民们实际也已经对谈话结果感到满意而逐渐后退了。正在这时，从他们后面，一个人大步流星，把农民向两边分开走了过来，他向K.鞠了一躬，递交给他一封信。K.手里拿着信，两眼注视着来人，觉得这人眼下比别的事情更加重要。他和两个助手有许多相似之处，同他们一样身材瘦长，一样穿着紧身衣服，也同他们一样敏捷灵巧，可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要是他K.的助手是这个人多好！他某些地方使K.想起在盖尔斯泰克那里见过的那个怀抱婴儿的女人。他的着装几乎全是白色，那套衣服大概不是丝绸的，它是很普通的冬衣，但却具有丝绸衣服的柔和与庄重。他的脸明亮而开朗，眼睛非常大。他的微笑有出奇的感染力；他以手拂面，那神气似乎想赶走这微笑，然而却不成功。“你是谁？”K.问道。“我叫巴纳巴斯，”他说，“我是个信使。”说话时他那两片嘴唇一张一闭，既显出阳刚之气，又饱含柔和之美。“你喜欢这个地方吗？”K.问道，同时指了指那伙农民，到现在他一直还保持着对他们的兴趣，这些人有着一张张简直就是受苦受难的脸——他们的颅骨似乎被人打扁了，面部线条则是挨打后的痛苦表情勾勒出来的——和厚大的翻嘴唇，他们张开大嘴站在一旁观看，但同时又没有观看，因为有时他们的目光游移不定，茫然若失地盯住某件无关紧要的东西瞅一阵，然后才又返回到他和巴纳巴斯身上来；除这些农民外，K.又指了指他的两个助手，这两人现在紧紧地手拉着手，脸贴着脸，面带微笑，无法确定这笑是卑逊的呢还是轻蔑的，他把他们全都指给他看，仿佛在介绍一批特殊境遇强加于他的随从，并期望着——这期望里有一种一见如故的心情，K.很希望同这个人谈谈心里话——巴纳巴斯时时把他和这些人区别开来。但是

巴纳巴斯根本就不回答——当然不含任何恶意，这是看得出来的——他的问题，恰似一个训练有素的仆人在听到主人仅仅表面上针对他而说的话时露出的表情那样，只是默默地听着，只是按照所提问题的意思左顾右盼，然后他举手向农民中的熟人打招呼，又同两个助手交谈了几句，言谈、举止、神态是自由而自主的，一点没把自己同他们混同起来。K.转眼——他问话碰了个软钉子，但并不觉难堪——看看手中的信并拆开了它。这封信是这样写的：“非常尊敬的先生！如您所知，您已被聘任为大人供职。您的直接上司是村长，他还将告知您有关您的工作及薪俸的一切细节，而您也将负责向他汇报工作。尽管如此，我本人还是要在百忙中兼顾您一下。递送此信的巴纳巴斯将不时向您询问以了解您的愿望，然后及时告我。您将发现，我会尽一切可能为您提供方便。使我的部下心满意足，实为我所期盼。”签字很潦草，看不清楚，但在签署旁边印有“第十办公厅主任”字样。“你等一等！”K.对正向自己鞠躬的巴纳巴斯说，然后他叫老板带他去一个房间，说他想一个人再好好看看这封信。同时他又想到，不论自己对巴纳巴斯有多少好感，他毕竟只是个信差罢了，于是吩咐拿些啤酒给他。K.留意观察他对此的反应，看到他显然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赏赐，立刻喝了。然后K.便随老板而去。在酒店这所小房子里，只能做到为K.准备好一间阁楼斗室，而即使这一点也不那么容易，因为必须把原来在这房间里睡觉的两个女仆安排到别处去住。其实，也只不过是让她们出去而已，房间本身看来原封未动：唯一的一张床上，没有床单、枕套等物，只有几块垫子和一床粗毛毯子，还保持着昨夜使用过以后的原状。墙上挂着几张圣徒画像和士兵照片。屋子里甚至没有开窗换换空气，显然是希望新来的客人不要在这里长住，所以不做任何能吸引他留下的事。但K.挺能凑合，怎么都行，他披上毯子，坐到桌前，开始借着一支蜡烛的光亮再次读起那封信来。

这封信的内容前后并不一致，有几处像在同一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人谈话，他自己的意愿受到尊重，如信头，还有涉及他的愿望的那句话都是如此。然而信中也有一些地方或隐晦或明显地把他当成一个小小的、从办公厅主任座椅上看去小得几乎看不见的下属，主任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在百忙中兼顾”他一下，他的上司只是村长，K.甚至还有向这位村长汇报工作的责任，他的唯一同事恐怕就只有那个村警了。这无疑都是一些矛盾，它们过于明显，使人觉得一定是有意这样措辞的。K.几乎不敢在这样的官府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这里可能有犹豫不决的因素在起作用，相反，他觉得信中是给他提出了两种可能的选择，完全让他自己决定如何对待信上的安排，是想做一名同城堡有着说起来倒是

很光彩、然而却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联系的农村工作人员呢，还是做一名仅仅是表面上的农村工作人员，而事实上却由巴纳巴斯带的信息来决定他和城堡的全部工作关系？K.在选择上毫不犹豫，而且即便他没有到这里之后取得的那些经验，他也是不会犹豫的。只有作为一名农村工作人员，离城堡老爷们愈远愈好，他才有可能在城堡达到一定的目的。村里这些人，现时对他还抱着很大的不信任，而一旦他不说成为他们的朋友，就算只成为同他们一样的村民，他们就会开口说话，而一旦他同盖尔斯泰克或拉塞曼没有任何区别——这一点必须迅速做到，这是关键的一步——那么，在他面前所有的道路就一定会一下子畅通无阻，而如果他仅仅寄希望于山上那些老爷们及其恩典，他就不仅会永远被阻挡在这些大路之外，而且恐怕连这些路的影子也永世看不到呢。当然，存在着一种危险，信中反复强调了这种危险，在说明它时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种喜悦，似乎它是摆脱不掉的了。这危险就是他的下属地位：供职、上司、工作、薪俸、汇报、部下，这封信中充斥着的就是这些词，就是在谈到别的问题，比较涉及个人的问题时，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如果K.愿意，那么他马上可以成为这个部下，但那就是极为严肃的事，没有丝毫另就的可能。K.知道人家并没有拿要采取任何真正的强迫手段来威胁他，他不怕强迫，尤其在这个地方更不怕，但是他害怕这个使人泄气的环境对他产生的强大压力，害怕对各种失望逐渐习以为常的那样一种习惯势力，害怕无时无刻不在向他袭来的各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的强大压力，然而无论怎样害怕，他必须冒着这些危险勇敢地投入战斗。信上不是也不讳言，如果真需要靠斗争来一决雌雄，那么K.是有胆量先发制人的嘛；话说得很含蓄，唯有一颗焦灼不安的心——是焦灼不安的心，而不是深感歉疚的心——才能觉出这里的弦外之音，正是“如您所知”那几个关于他被录用为大人供职的字眼，暗含着这层意思。K.只是报了到，但自那时起他便如信中所说，已经知道被录用了！

K.从墙上取下一张画，把信挂在那个钉子上；既然他将在这间屋子里住，那么信就理应挂在这里。

然后，他下楼来到底下店堂里。巴纳巴斯同两个助手坐在一张小桌边。“啊，你在这儿。”K.说，并不想说什么特别的，只是为见到巴纳巴斯心里感到高兴而顺口说一句。巴纳巴斯一见他便倏地跳起。K.刚进店堂，那些农民就都站起向他拥来，看见他就尾随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了。“你们老是缠住我干什么？”K.叫道。但他们并不动气，而是慢慢轻身走回自己的座位去了。其中一人转身时讳莫如深地微笑着（有几个人

也随他做出笑脸），大大咧咧地解释道：“总可以听到点新鲜事啊，”一面说一面舔着嘴唇，好像这新鲜事是一道可口的菜肴似的。K.现在一句软话不说，他觉得，还是让他们对自己有那么一点尊重为好，但是他在巴纳巴斯身边还没有坐稳，就又感到脖子后面一个农民的呼吸了；这个农民说他是来拿盐瓶的，但K.气得跺脚，那农民也就没拿盐瓶跑开了。要制服K.倒也真容易，比如只消把这些农民煽动起来反对他就行了，他们那顽固的纠缠对他来说比别人的守口如瓶更厉害，另外，这种顽固的纠缠本身也是守口如瓶，因为，要是K.坐到他们桌旁去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再坐着不动而是立即走开的，只是由于巴纳巴斯在场，他才没有向这些农民大发雷霆。但他还是回头向他们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农民们也都正面向着他。然而当他此刻眼见他们一个个直挺挺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谁也不跟谁交谈一句，互相间没有任何一点看得见的联系，唯有一个相同点：全都直眉瞪眼地盯着他，这又使他觉得，似乎他们尾随自己根本不是出于恶意；也许他们真的有求于他而只是说不出来罢了，如果也不是这样，那么或许只是由于懵懂无知吧，看来这种稚气是此地土生土长的东西；难道那个店老板不也是像个孩子一样吗？瞧他双手捧着要端给某位顾客的一杯啤酒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只顾伸着脖子看K.，连老板娘从厨房窗子探出头来喊他都没有听见。

K.现在气消了一些，转身准备同巴纳巴斯谈话。他很想把两个助手打发走，然而一时又找不到借口。两人这时一声不吭地瞅着摆在自己面前的啤酒。“信我已经看过了，”K.开口说，“你知道信里写的是吗？”“不知道，”巴纳巴斯说，他的眼睛似乎比他的嘴更会说话。也许K.看错了他，把他想得太好了，如同他也看错了农民把他们都想得坏了那样，因为他身上总散发出使K.感到舒服的气息。“信上也提到了你，让你时不时在我和主任之间传递信息，所以我才想你是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的。”“我的任务只是，”巴纳巴斯说，“转交这封信，然后等着，到信看完后，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我再把口头的或者书面的回话带回去。”“很好，”K.说，“用不着写信了，请向主任大人转告——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信上的签字我看不清楚。”“克拉姆。”巴纳巴斯说。“那就请向克拉姆老爷转告我对他录用我表示谢意，还要感谢他对我的特别友好的态度，作为一个在这里还完全没有经受过工作考验的新手，我非常珍视这种友好态度。我一定完全按他的意思办事。今天我没有特别的要求了。”巴纳巴斯仔仔细细听完了这些话，请求让他将他的任务重复一遍。K.答应了，于是巴纳巴斯一字不漏地把K.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然后就站起来向K.告辞了。

在进店堂以来的整段时间里，K.一直在不断细心琢磨巴纳巴斯的脸，现在他最后又审视一次。巴纳巴斯个子同K.大致相当，但他看K.时目光好像总是向下似的，然而这种俯视又几乎是谦卑、恭顺的，要这个人羞辱别人是不可能的。当然他只是一个信使，并不知道他递送的信件的内容，但是就连他的目光，他的微笑，他的步态，也都好像在传递信息，尽管他对这些信息懵然无知。K.这时向他伸出手来，这显然使他吃了一惊，因为他原只想鞠个躬就走的。

他一走——在开门之前，他又用肩膀在门上靠了一会儿，并将整个店堂扫视一遍，目光不再针对某一个人——K.便对两个助手说：“我去屋里把我的笔记拿来，然后，我们来谈谈下一步的工作。”两人想一起去。“你们留在这儿！”K.说。然而他们还是坚持要去。K.只得更加严厉地把他的命令又重复了一次。门厅里已看不见巴纳巴斯了，可他又明明是刚刚才离开的呀！而且，就是赶到酒店门前——这时外面又下起雪来——K.也仍然不见他的踪影。他大声叫：“巴纳巴斯！”没有回答。难道他还在店里不成？似乎没有别的可能了。尽管这样想，K.仍然扯着嗓子大声喊叫他的名字。这名字在夜空中轰鸣，于是从遥远的地方终究还是传来一声微弱的回答；这么说，巴纳巴斯的确是走得很远了。K.叫他回来，同时自己也向他迎去；在两人相遇的那个地方，从酒店已经无法看见他们。

“巴纳巴斯，”K.开口了，无法抑制声音的颤抖，“我还想跟你说几句话。我觉得现在这种安排确实相当不好，如果我需要知道一点城堡里的消息，只能指望着你不知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一趟。要是我这会儿不是碰巧赶上了你——你走得飞快，我原以为您还在店里呢——谁知道我还得等多久你才会再来？”“你可以请求主任，”巴纳巴斯说，“让我按你规定的固定时间来。”“这样办也不理想，”K.说，“也许我会整整一年没有什么事让你去禀报，可是正好在你刚走一刻钟后就有什麼火烧眉毛的急事呢。”“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向主任报告，”巴纳巴斯说，“希望在他和你之间通过别的方式联系，不用我了？”“不是，不是，”K.说，“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顺便提提这事罢了，这一回我还是很幸运，总算追上了你啊。”“我们要不要回酒店去，”巴纳巴斯说，“你在那里可以再给我分配新任务？”说着他已经抬脚向酒店方向走了一步。“巴纳巴斯，”K.说，“不必回去了，我可以和你一起走一段路的。”“为什么你不愿意回酒店去？”巴纳巴斯问。“那里的那些人妨碍我，”K.说，“你自己也看见了，那伙农民老来纠缠不休。”“我们可以到你的房间里去。”巴纳

巴斯说。“那是女仆们的房间，”K.说，“又脏又潮；正因为不想在那儿待我才打算和你走一走；不过你得让我挎着你的胳膊，”K.又补充这一句，以便最终打消他的犹豫，“因为你走得比我稳。”说完K.便挎起了他的胳膊。四下一片漆黑，K.一点看不见他的脸，只是隐约看见他的身影，还在说这话之前一会儿，他就不得不伸手去搜寻他的胳膊了。〔3〕

巴纳巴斯不再坚持回酒店，他们朝着与酒店相反的方向走去。不过，K.觉得他不管使多大劲都很难跟上巴纳巴斯，他成了妨碍巴纳巴斯自由行动的累赘，他又感到，就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小事也一定会使人一事无成，更何况是去走一些像那条使K.今天上午深陷雪地的小巷一样的街巷呢，只有巴纳巴斯，才能不断把他从雪地里连拉带背地拽出来，但是，现在K.完全抛开了这一类顾虑，巴纳巴斯的沉默不语，也使他感到一定的慰藉；既然他们现在默默无言地走着，那么这件事只能意味着，巴纳巴斯也觉得他们在一起的目的无非是继续朝前走而已。

他们走着，但K.不知道往哪儿走；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甚至连他们是否已经走过了教堂也不知道。由于不停地艰难行走劳累异常，他渐渐难以控制自己的思想。他无法集中精力想一件事，而是浮想联翩思绪纷乱。故乡不断在他脑海里浮现，乡思一时间填满了他的心房。那里的中心广场上也耸立着一座教堂，它有一部分建筑的周围是一块古老的墓地，这墓地四周又有一堵高墙，这围墙，只有很少很少几个男孩有本事爬上去，K.还没有能爬上去过。并不是好奇心促使他们去翻墙，那墓地对他们已不是什么神秘的地方了。他们早已从它那扇小栅栏门进去过多次，他们只是想攻克、想拿下那光滑而高耸的墙。一天上午——那平静、空旷的广场沐浴在一片耀眼的阳光中，K.不记得此前或此后还有哪次曾见过广场有这样豁亮——他却轻易得出奇地爬上去了；在围墙的一处他曾多次失败的地方，这一回他用牙咬住一面小旗，第一次冲锋就成功地上墙了。细碎的砖石还在沙沙滚下，而他已经高高地昂然站在上面。他把旗子插在墙头，风展旗，旗飘飘，他举目远眺，他俯视地面，他回首顾盼，他看地上似乎要沉入地面的一个个十字架；此时此地没有谁比他更高大了。过了一会儿，老师偶然路过这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慌忙从墙上下来。虽说跳下来时他摔伤了膝盖，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回到家里，但是那高墙他却是千真万确地上去过了。当时他就感到这胜利的自豪感将永远鼓舞他，一辈子受用不尽，这想法现在看来并非纯属愚妄，因为，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他扶着巴纳巴斯在雪夜中艰难行进时，这种自豪感就出来帮助他了。

他更紧地挎住了巴纳巴斯的胳膊，巴纳巴斯几乎是拽着他走，沉默仍一直未被打破。关于他们走的路线，K.只知道他们现在据路面情况判断还没有转进任何一条小巷里去。他暗下决心不要因为行路难，更不要因为担心如何返回而畏缩不前。到末了不得已让人拖着走，办到这一点怎么说他的力气也还是够用的吧。再说难道这路会没有尽头吗？白天他已经看到城堡明明就在眼前不远处，更何况信差肯定会抄近道呢。

走着走着，巴纳巴斯站住了。他们这是到哪里了？是不能往前走了吗？巴纳巴斯想和他分手了吗？唔，他休想。K.紧紧抓住巴纳巴斯的胳膊，攥得太使劲，弄得他自己的手也有点疼。要不，难道竟出现了难以置信的事，即他们已经进了城堡或者已经来到了城堡门下？但K.一回想，他们根本就没有上过山呀！要不莫非巴纳巴斯带着他沿一条缓坡上了山？“我们这是到哪儿啦？”K.轻声问，听起来更像自言自语而不像在问别人。“到家了。”巴纳巴斯同样轻声喃喃道。“家？”“现在请先生留神不要滑倒，要下坡了。”“下坡？”“只有几步路了。”他补充说，不一会儿就举手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姑娘；门开了，但两人现在几乎是摸黑站在一间大屋子门口：原来屋里只有左边远处一张桌子上挂着一盏小得可怜的油灯。“谁跟你一块儿来了，巴纳巴斯？”那姑娘问。“土地测量员。”他说。“是土地测量员。”姑娘提高嗓门冲着桌子那边说。她一说完那里便有两个老人，一男一女，还有另一个姑娘，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一齐向K.问好。巴纳巴斯把他们一一介绍给K.。原来这是他的父母、他的姐姐奥尔嘉和妹妹阿玛莉亚。K.几乎还未及看上他们一眼，他的湿外套便被拿去炉边烘烤了。K.默默地听任他们这样做。

原来如此！并不是他们到家了，而只是巴纳巴斯到家了。可为什么他们要上这里来？K.把巴纳巴斯拉到一旁问道：“你为什么跑回家来？莫非你们家就在城堡的范围内？”“城堡的范围内？”巴纳巴斯机械地重复着，似乎听不懂K.的话。“巴纳巴斯，”K.说，“你从酒店出来以后不是想去城堡的吗？”“不，先生，”巴纳巴斯说，“那时我是打算回家；我早上才去城堡，我从不在那里睡觉。”“原来是这样，”K.说，“当时你就不打算去城堡，而只想到这里来。”——现在K.觉得巴纳巴斯的微笑好像若有若无，他本人则变得更不起眼了——“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没问我啊，先生，”巴纳巴斯说，“你只是想给我布置一个任务，可是你既不想在店堂里也不愿在你房间里吩咐，所以我就想，你大概可以在我父母

这里不受打扰地吩咐那件事吧。只要你说声让他们走，他们立刻就走开；还有，要是你比较喜欢我们这儿，也可以在这里过夜。我这么做不对吗？”K.无言以对了。这么说是闹了个误会，一个气人的、糟糕透顶的误会！而K.居然一心一意任其摆布！他完全被巴纳巴斯那件绸子般闪闪发光的紧身上衣迷住了。现在呢，巴纳巴斯正在解开这上衣的扣子，露出里面穿的一件又脏又黑、打了许多补丁的粗布衬衫，衬衫下又露出干粗活的佣人那粗壮的胸脯。周围的一切不仅与这一形象合拍，而且有过之无不及，瞧那位患风湿病的老态龙钟的父亲，他更多地靠那双瑟瑟摸索的手而主要不是靠那两条僵硬的、慢吞吞移步的腿走路，再看那位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的母亲，她全身虚胖，也是步履维艰，移动半步也难上加难。父母两人全在K.一进屋后就从他们所在的屋角朝他走来，而直到现在离他仍有一大截子。两个姐妹呢，都是金黄头发，两人长得很像，也都像巴纳巴斯，只是比巴纳巴斯脸上更多几分严峻，她们高大、健壮，像干粗活的女佣的样子，现在两人一边一个站在刚进来的两个男人旁边，等着K.对她们说一句什么见面的客套话。但是K.什么也说不出；原先他虽以为这个村子里每个人对他都有一定的重要性，或许这看法也是对的，不过现在恰恰是这里的这几个人他一点不感兴趣。^{〔4〕}如果他有本事一个人走向酒店去，那么他早就离开这里了。明天一早可以同巴纳巴斯一起去城堡，这一点对他毫无吸引力。他是想今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由巴纳巴斯带着闯进城堡去的，而且必须是由到这儿之前他心目中的那个巴纳巴斯，那个他觉得比他在村里见到的所有的人都同他更亲近的巴纳巴斯带领，他同时感到这个人同城堡的关系很密切，与他那表面上看得见的仅仅是职务上的联系远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要他同这家人的一个儿子一起去，同这个跟家里人难舍难分、现在已经和家人坐在一张桌子旁的孝子，同这个连在城堡睡一夜的资格都没有的——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人手挽着手大白天走进城堡，这就简直不可思议，完全是一种可笑的、毫无成功希望的轻举妄动。

K.在一处窗台上坐下来，他决心这一夜就在那里这样待着，不再领情接受这家人的任何招待。村里那些把他轰走的人，或是那些怕他的人，他觉得对他都不怎么危险，因为他们实际上等于把他推给了他自己，这就有助于他保持警觉，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可这样一些看起来貌似好心肠的人呢，他们不是带领他去城堡，而是靠一点小小的伪装把他请到家中，这是在转移、分散他的注意力，不管有意无意，他们是在一点一点地咬蚀、消磨他的力量。这样想着，人家从桌旁大声唤他，请他过去他也没有理睬，而是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呆坐在他那窗台上。

这时，奥尔嘉站了起来，她是两姐妹中比较温柔的一个，也表现出些许少女的腼腆。她走到K.身边，请他到桌旁去坐。她说，面包和熏肉都摆好了，她这就去取啤酒。“到哪儿去取？”K.问。“酒店。”她说。听到这话K.喜出望外。他求她别去取啤酒，而是陪他到酒店去，他在那里还要办一些重要的事情呢。但是接着K.就发现原来她不是去他住的那家酒店，那太远了，而是去另一家近得多的名叫“贵宾楼”的酒店。尽管如此，K.仍请求允许他随她一道去。他想，也许可以在那儿找到一个睡处吧；不论那里居住条件如何，他都宁肯去那边过夜而不愿在这里哪怕最舒适的床上睡觉。奥尔嘉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回头朝桌子那边看了一眼。她的弟弟已经在那儿站了起来，痛快地点着头说：“只要是先生愿意去就带他去吧。”这个积极的表态几乎使K.想立即收回自己的请求，因为，这家伙只有毫无用处的事才会赞同的啊。但是，当接下去谈到那家酒店会不会让K.进去，大家都对此表示怀疑时，K.仍然坚持一定要同奥尔嘉一齐去，不过同时也煞费苦心地为这个请求编造了一个可以取信于人的借口；这家人对于他这个人，不管是什么样都得认了，在他们面前他可说没有羞耻心了。唯有阿玛莉亚那严肃的、直视前方、毫不动情、也许还有些呆滞的目光，使他对这个态度有片刻的惶乱和迟疑。

在去酒店的一小段路上——K.仍挎着奥尔嘉的胳膊，几乎完全同先前跟她弟弟一起来时一样被她拖着走，除此他没有别的办法走路——K.得知这家酒店实际上是专为城堡的老爷先生们开设的，这些人到村里办事时就在这里吃饭，有时甚至还在这里过夜。奥尔嘉同K.说话时声音很轻，态度亲切，他觉得与她同行心里很舒服，几乎跟与她弟弟同行一样。K.很不愿意有这种舒适惬意的感觉，然而这感觉却是实实在在的，无法抗拒。

这家酒店同K.住的那家外表非常相似。这村子里的房子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外部区别，然而小区别却是一目了然的。在这里，门口的台阶旁装有栏杆，门的上方还安着一盏精美的风灯。他们走进酒店时，头上一面旗帜飘扬，那是伯爵家族的宗旗。一进入门厅，他们就遇见了显然正在四处巡视的酒店老板；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他眯着眼睛——说不准是着意打量还是睡眠惺忪——看了看K.，说道：“土地测量员先生最多只能到酒吧里为止。”“没问题，”奥尔嘉说着立刻便来关照、保护K.，“他只是陪我来的。”但是K.却不知感恩，他毫不客气地甩开了奥尔嘉，把老板拉到一边说话去了。奥尔嘉则耐心地在门厅尽头处等着。“我想在这里过夜。”K.说。“很遗憾，这不可能，”老板说，“看来您还不知

道这个酒店是供城堡的老爷先生们专用的。”“虽然这是规定，”K.说，“但是让我随便在哪个犄角睡一觉总是可以的吧。”“我本人确实很愿意为您提供方便，”老板说，“但是，姑且不说这项规定非常严格——您提到这项规定时的语气，说明您是个外乡人——即使不考虑这条规定，也无法让您在这里住宿，因为城堡的老爷先生们是极端敏感的；我敢担保他们如果在这里见到外人会受不了，至少是毫无精神准备而难于接受；所以，假如我留您在这里过夜，而您又碰巧——这类巧事的出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城堡的老爷先生们——被发现了，那么不仅我，就连您自己也完了。这话听来可笑，但却是真的。”这位身材高大、不苟言笑的老板，一手支墙，一手叉腰，两腿交错着，微微弯下腰做出亲密的样子同K.说话，这时，尽管他那件深色衣服还像农民穿的节日服装，看上去他却几乎不再像是村里人了。“我完全相信您说的，”K.说，“并且，虽说我刚才的话有些措辞不当，我也丝毫没有低估规定重要性的意思。不过我想请您注意一点；这就是我同城堡有着很不一般的关系，而且还会有更不一般的关系，这些关系能保证我在此过夜引起的麻烦不至于对您产生任何危险，也能保证我有能力对您向我提供的一点小方便作出完全对等的酬谢。”“我知道，”老板说完又重复一遍，“这个我知道。”本来，K.还可以更加郑重其事地、明确地提出他的要求，但正好老板的这一回答分了他的神，于是他就只是问道：“今天城堡有很多位老爷在这里过夜吗？”“在这方面今天的情况比较有利，”老板说这话的语气有点像在引诱K.住下似的，“只有一位老爷留下来了。”这时K.虽然仍旧不能催逼老板答应他，但已是抱着希望：看来老板差不多已经答应了；因此他只问了问那位老爷的名字。“克拉姆。”老板漫不经心地说，一面回头看他的妻子。她穿着一身不知怎么很显旧的、满是皱褶和饰边但却十分精致的老式服装，沙沙响着走了过来，说是来叫老板，主任大人有事要他去办。老板走前又一次问K.，好像K.可否在此留宿的问题不再应该由他老板而是该由K.自己来决定似的。但现在K.什么也说不出，特别是偏偏他的上司正好在这里这一情况使他惊愕。他自己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觉得在克拉姆面前他不如面对城堡其他人那样自由；K.觉得，如果在这儿被他意外抓住，虽然不会有老板说的那么严重，那样可怕，但总归是他的一种令人难堪的闪失，就好比 he 本来欠着某人的情，却反而轻率地出入人家的洋相时体验到的那种滋味；同时他很难受地看到，这种为难的处境分明已经显示出他原先担心的那种当下属、当部下的很不愉快的后果，尤其是，甚至在这种后果如此明白地摆在眼前时，自己竟也无可奈何，不能战而胜之。于是，他现在只好站在那里紧咬嘴唇，一言不发。

老板在门框处消失之前，再次回头看了看K。K.一动不动地目送他离去，直到奥尔嘉来把他拉走。“你求老板什么事？”奥尔嘉问。“我想在这儿过夜。”K.说。“你不是要在我们那儿过夜吗？”奥尔嘉诧异地说。“嗯，对。”K.说，至于如何理解这个回答的含义，他就让奥尔嘉自己去琢磨了。

第三章

在酒吧——一间很大的、当中完全空着的屋子——里，立着一箱箱啤酒，农民们有的在酒桶边，有的在酒桶上靠墙坐着，但他们的模样与K.住的那家酒店里那些农民完全不同。他们衣着整洁、划一些，都穿一色浅土黄粗布，上衣鼓起，裤子紧身。这些男人全是矮个儿，乍一看长相都差不多，都是扁平脸庞，额头、颧骨、下巴突出，却又有多肉的面颊。他们一概少言寡语，几乎纹丝不动地坐着，只用目光尾随新来者，然而眼神又是迟滞、冷漠的。尽管如此，因为人多，又非常安静，他们仍然给了K.一定的印象。他再次拉起了奥尔嘉的胳膊，算是告诉众人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这酒吧的一角有一个男人站了起来，这是奥尔嘉的一个熟人，他想到这边来，可是K.立刻挎起她的胳膊推着她朝另一个方向走了。这一点除她本人外谁都没觉察到，她微微一笑，斜睨了他一眼，算是默许他这个行动了。

斟啤酒的是一个名叫弗丽达的少女。这是个头发金黄、脸颊瘦削、有着一双忧伤眼睛、不引人注目的小个子姑娘，可是她的目光却令人吃惊，那是一种特别高傲的目光。当它落在K.身上时，K.觉得它似乎已经把所有与他有关的事情统统解决了，他本人现在还一点不知道有这些事情，然而这目光却使他坚信这些事情的存在。K.一直不停地从侧面看着弗丽达，就是当她已经同奥尔嘉说话时也还在打量她。要是朋友吧，奥尔嘉和弗丽达可不大像，她们只是冷冷地交谈了几句而已。K.想帮她们一把，所以突然动问道：“您认识克拉姆先生吗？”奥尔嘉忍不住笑起来。“您笑什么？”K.生气地问。“我并没有笑啊。”嘴上这么说，实际上仍不停地笑。“奥尔嘉这姑娘还真够孩子气的。”K.说，同时靠着柜台把身子使劲向下弯，以便再次把弗丽达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但她仍低垂眼皮，轻声说道：“您想见克拉姆先生吗？”K.说请求一见。她便指着一扇正好就在她自己左手边的门。“这门上有个小孔，您可以从这儿往里面看。”“那么这儿的这些人呢？”K.问道。她噘了噘下嘴唇，用她那异常柔软的手把K.拽到门边。把眼睛贴在那个显然是为了窥视而钻

出的小孔上，他几乎可以将隔壁房间一览无余。

屋子中央，一张桌旁有一把舒适的圆形靠椅，椅子上坐着的正是克拉姆先生，他面前挂着一盏亮得刺眼的电灯。这是一位中等身材、颇为富态、看来一定行动不便的老爷。他的脸还算光溜，但面部肌肉却已经由于年龄的分量而有些下垂了。黑色的小胡子长长地伸向两边。一副歪戴着的不锈钢的夹鼻眼镜挡住了他的眼睛。如果克拉姆先生完全伏案工作，那么K.就只能看见他的侧面；但因为他现在几乎是面对K.坐着，所以K.可以看清他的整个面庞。克拉姆左肘支在桌上，拿着一支弗吉尼亚雪茄的右手搁在膝盖上。桌上摆着一个啤酒杯；由于桌子的边条较高，K.不能看清桌上是否有任何文件之类，但他觉得桌面似乎是空的。为保险起见，他请弗丽达也从小孔中看一看然后告诉他究竟有还是没有。但是，因为她不久前刚到过那屋里，所以便确有把握地向他证实那桌上并没有什么文件。K.问弗丽达他现在是否必须走开，可是她说如果他乐意，趴在门上看多久都行。现在K.身边只有弗丽达，奥尔嘉呢，K.匆匆注意到她已经找到了她的熟人，这时高高坐在一只桶上，脚不停地荡来荡去。“弗丽达，”K.小声说，“您同克拉姆老爷一定很熟！”“唔，是的，”她说，“是很熟。”她靠墙站在K.身边，并且——这时K.才注意到——用手轻轻地抚弄她那件薄薄的肉色开领衬衫，这件衣服同她那可怜的瘦小身躯很不相称。俄顷她说：“您不记得奥尔嘉刚才的笑了吗？”“记得，这个淘气鬼。”K.说。“不过，”她带着和解的口吻说，“她笑是有道理的。您刚才不是问我是不是认识克拉姆吗？可我恰好是，”——说到这里她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胸脯，同时她那与谈话内容毫无关系的高傲目光再次越过K.的头投向别处——“我恰好是他的情人啊。”“克拉姆的情人。”K.说。她点点头。“那么在您面前，”为不让他们之间的气氛过于严肃，K.微笑着说，“我必须肃然起敬了。”“不光是您。”弗丽达和蔼地说，但并不是受到了他那微笑的感染。K.想到一个煞一煞她的傲气的办法，现在使了出来；他问道：“您到城堡里去过吗？”可这难不倒她，她立即答道：“没去过，可是我在此地这个酒吧里，这不就足够了吗？”她的虚荣心显然非常强，并且，看来正想在K.的身上满足一下这种虚荣心。“当然啦，”K.说，“在此地这个酒吧里，您是很擅长于做酒店老板工作的嘛。”“是这么回事，”她说，“可我一开始时是在‘大桥’酒店当喂牲口的女佣人呀。”“难道就用这双这么娇嫩的手喂牲口吗？”K.带着疑虑的语气说，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这话究竟只是为了说点好听的呢，还是他真的已经被她俘虏了。她的两只手确实小巧而又娇嫩；但是，管它们叫做干瘪瘦弱、索然无味也未尝不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这个，”她说，“就

是现在——”K.疑惑地看着她，她摇摇头不想说下去。“当然，您有您的秘密，”K.说，“您是不会同一个刚认识半小时，还没有机会向您介绍自己情况的人谈论这些秘密的。”可是，这话看来说得很不合适，就好像弗丽达本来处在一种对他很有利的半醒半睡的迷糊状态，而他一下子把她摇醒了似的。她从自己腰带上挂着的皮包里拿出一小块木头把门上小孔堵住，对K.说话时显然在竭力抑制自己，不让他觉察她内心的变化：“至于说到您，那么我知道您的底细，您是土地测量员。”然后又补充道：“现在我得去干活了。”说完便走到柜台后面她的位置上，时不时有一两个酒客站起来，到柜台前让她斟酒。K.还想再同她悄悄谈一次，因此从一个架子上取下一只空杯向她走去。“我只想再说一句，弗丽达小姐，”他说，“从一个喂牲口的女佣人，苦干到当上酒吧女招待，是非常了不起的，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可是对于这么个不寻常的人，最终目标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这是个荒谬的问题。请别笑我，弗丽达小姐，从您的眼睛里我看到的不完全是您过去的奋斗，而更多的是您将来的奋斗。但这个世界上各种阻碍是很大的，目标越大阻碍也越大，所以，希望争取到一个无权无势但也在奋斗着的小人物的帮助，便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了。也许我们两人可以好好地单独谈谈，别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说话。”“我不知道您想干什么，”她说，但这次却与她的意愿相反，语调中似乎听不到生活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傲气，而只有数不清的失望的凄楚了，“兴许您想把我从克拉姆身边拉走吧，我的老天！”她两手合拢一击掌。“您把我看透了，”K.说，那样子似乎被太多的不信任弄得疲惫不堪，“这一点正是我最隐秘的意图。您最好离开克拉姆，成为我的情人。好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奥尔嘉！”K.叫道：“我们回家了。”奥尔嘉顺从地就势从桶上滑下，可还不能立刻摆脱那帮包围她的朋友。这时弗丽达瞪了K.一眼，低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同您谈谈？”“我可以在这儿过夜吗？”K.问。“可以。”弗丽达说。“现在我可以留下吗？”“您先同奥尔嘉离开这里，我好设法支走眼前的这一帮人。再过一会儿您就可以来了。”“好吧。”K.说，焦急地等着奥尔嘉。但是那些农民却不放奥尔嘉，他们发明了一种舞蹈，奥尔嘉站在中央，他们围着她跳起了轮舞，每当众人大喝一声，便有一人走到奥尔嘉旁边，一只手紧紧搂住她的腰，带着她呼啦啦旋转几圈，这轮舞越跳越快，吆喝声中流露着饥饿，伴着呼哧呼哧的喘息，越来越齐，渐次变得几乎像一个声音在呼喊。奥尔嘉起初还想笑着冲出圈子，后来也只能头发散乱地、摇摇晃晃地从一个人身边蹭到另一个人身边。“他们就是把这样一些人弄到我这儿来。”弗丽达咬着薄薄的嘴唇恨恨地说。“这是些什么人？”K.

问。“都是克拉姆的仆人，”弗丽达说，“他老是带着这么一大帮人来，在这里闹腾，把我都快吵死了。我都快记不得今天跟您土地测量员先生说过些什么话了；要是我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请您原谅，都因为这伙人在这里，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最让人恶心的家伙，可我还得给他们往杯里斟酒。我不知道向克拉姆求过多少次了，请他别把他们带出门；别的老爷带仆人来，我没法子，只能忍了，可是他总可以照顾一下我吧。但是，怎么求也是白搭，每次都是在他到达之前一小时这帮人就一窝蜂冲进来，像牲口进圈一样。现在他们也真的该回他们自己待的厩棚去了。要是您不在这儿，我就会把这儿的这道门痛痛快快地打开，克拉姆就一定会自己出来轰走他们了。”“难道现在他就听不见他们吵闹？”K.问。“听不见，”弗丽达说，“他睡着了。”“什么？”K.叫起来，“他睡着了？我刚刚从门孔看他还是醒着的，在桌子旁边坐着呀。”“他还会这样一直坐下去的，”弗丽达说，“您刚才看见他时他也是在睡觉。要不我还会让您趴在门上往里看吗？他睡觉的姿势就是这个样子，老爷们睡觉的时间特别长，长得你简直就没法相信。不过要是他不睡那么久，他又怎么能受得了这伙人？好了，现在得由我来把他们赶出去。”说完她从屋角抄起一根鞭子，纵身一跳——跳得挺高，但不大稳，有点像小羊羔蹦起来那样——便到了那伙狂舞的人面前。起初他们转身面对着她，似乎在迎接一个新的女舞伴，事实上有一刹那功夫，那光景也确实好像弗丽达就要扔下手里的鞭子了，但转瞬她又扬起了鞭子。“克拉姆要我这么办，”她大声说，“你们全给我回圈里去！都回去！”现在他们明白她这是动真格的了；于是这些人怀着一种K.觉得莫名其妙的恐惧开始向酒吧后部猛挤过去，头几个人在那里撞开了一道门，夜间的凉气随之吹了进来，接着，所有的人便和弗丽达一起消失在黑夜之中，显然她是把他们赶过院子轰进马厩去了。

但是在这突然来临的一片寂静中，K.却又听到门厅那边传来了脚步声。为了随便找一个什么防身的所在，他跳到柜台后面，那儿是这间屋子里唯一可以藏匿的地方。诚然人家并没有禁止他在酒吧逗留，但因为打算在此过夜，所以必须留心不要让人看见自己现在还没有走。所以当门真的开了时，他便悄悄钻到柜台底下去了。在那里自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被发现的危险，但是，编一个口实，说自己是为了躲避那帮狂呼乱跳的农民而到那里去藏身，也总不是完全不可以的吧。来人是酒店老板。“弗丽达！”他一边叫着一边在酒吧里来回巡视了几趟。

幸而弗丽达很快就回来了，而且没有提起K.，只说了些抱怨那伙农

民的话，然后就走到斟酒柜台后面来找K。K缩在那里可以碰到她的脚，从这时起便有了安全感。因为弗丽达没有提起K，终归还是得由店老板开口：“土地测量员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也许他一贯就是个客客气气的人，由于经常同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比较无拘束地打交道而锻炼得举止温文尔雅，不过在同弗丽达说话时却用了一种特别尊重的语气，这一点由于他在谈话中同时仍不断表现出雇主与女雇员的关系而十分显眼，加之还表现出是同一个说话相当不知深浅的女雇员讲话的神态。“土地测量员吗，我倒把他给忘了，”弗丽达说，同时把她一只瘦小的脚搁在K的胸膛上，“大概他早走了吧。”“可我没看见他呀，”老板说，“我这大半天一直在门厅里呢。”“可他不在我这儿。”弗丽达冷冷地说。“也许他藏起来了，”老板说，“从他给我的印象看，恐怕他是干得出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来的。”“恐怕他还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吧。”弗丽达说着更使劲地踩住K。她性格中也有欢快活泼、无拘无束的一面，这一点K先前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现在呢，它一发而不可收拾，简直令人咋舌。她突然格格地笑着说：“也许他躲在这底下吧？”边说边向K弯下腰去，很快地吻了他一下，又猛一抬头站直了身子，无可奈何地快快说：“唉，他不在这儿！”可是老板的表现也令人吃惊，他接下去说：“我感到很遗憾，现在不能确切知道他是否已经走了。这不仅关系到克拉姆老爷，这关系到执行规定的问题。您，弗丽达小姐，必须严格执行规定，我也一样。酒吧这一部分就由您负全责了，店里其他地方我还要细细搜查一遍。再见！祝您睡个好觉！”他人还没有完全走出酒吧，弗丽达已经关了电灯钻到柜台底下K身旁来了。“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宝贝儿！”她轻轻喊着，可是一点不碰K，她像被狂热的爱弄晕眩了似的仰卧地上，两臂张开，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而觉得时间似乎凝滞不动，她嘴里轻轻哼着一支小曲儿，呻吟声多于歌唱声。^{〔5〕}过了一会儿，因为K一直不声不响，若有所思，她便猛地翻身一骨碌坐起来，像孩子似的使力拽他：“来，这底下快闷死人了！”他们紧紧拥抱，她那瘦小的身子在K两手抚摸下热烘烘的好似一团火，他们沉醉在爱的狂欢中，浑然无所觉地在地上翻滚，K不断挣扎着，想从这种痴醉迷乱的状态下解脱出来，然而完全徒然，就这样滚了好几步远，直到撞在克拉姆的门上，^{〔6〕}然后就颓然躺在地上，躺在身下那些泼洒出来的啤酒小水洼和各种丢弃物上一动不动了。就这样躺着过了几个小时，这是两人呼吸在一起、心跳在一起的几小时，在这段时间里K一直有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迷了路四处游荡，或者是来到了一个在他之前人迹未至的天涯海角，这块异土上甚至空气也与家乡迥然不同，待在这里定会因人地生疏而窒息，在它那形形色色的荒诞

无稽的诱惑面前，除了不停地走呀走，不断地继续迷途踟躅之外别无选择。处在这样的心境中的K，当听到克拉姆房间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冷冰冰的带着命令语气的声音呼唤弗丽达时，至少开始时并不觉惊吓，而是感到一种给人以慰藉的清醒。“弗丽达。”K凑近弗丽达的耳朵说，算是把这声呼唤传达给她了。在那几乎可以说是天生的唯命是从心理的驱使下，弗丽达立刻想纵身起来，但紧接着她想到了自己现在待的地方，便伸了个懒腰，轻轻地笑起来，说道：“我怎么能走呢，我决不去他那儿。”K本想提出反对，他很想催促她到克拉姆那儿去，开始动手把她散乱的衣衫拉平整，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因为拥抱着弗丽达他感到太幸福了，同时幸福与惧怕交织在一起，因为他觉得弗丽达一旦离开他，他便失去了一切。弗丽达呢，仿佛有K的默许为她壮胆，便攥起拳头捶门，并大声叫道：“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呢！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呢！”现在克拉姆倒是不吭声了。K却坐起身来，然后在弗丽达旁边跪下，在凌晨扑朔迷离的光线中环顾四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希望在哪里？现在一切都暴露了，他还能指望从弗丽达那里得到什么呢？他不是采取与强大的敌人和巨大的目标相适应的步骤小心翼翼地、步步为营地行进，反而在这地上，在这撒满啤酒的水洼里滚了一整夜，直到现在这残留的啤酒味还那样刺鼻地难闻。“你都干了些什么啊！”他自语道，“我们两人都完了。”“不，”弗丽达说，“只有我一个人完了，不过我又赢得了你啦。别急了。你瞧，他们两个笑得多开心！”“谁呀？”K问，回头去看。原来是他的两个助手正坐在柜台上，虽然有点睡眼惺忪，样子却很快活；这是忠于职守者在尽职之后感到的快乐。“你们两个到这儿来干什么？”K厉声喝问，似乎两人是这一切祸事的罪魁。他四下里搜寻弗丽达昨晚用的那根鞭子。“我们得找你呀，”两个助手说，“因为你没有到楼下店堂我们那儿来；后来我们又到巴纳巴斯家找，终于在这里找到你了。我们已经在这里坐了一整夜了。给你当助手这活儿可不容易啊。”“我需要你们的时候是白天，不是夜里，你们快些给我走吧。”“现在不已经是白天了吗？”两人说，兀自一动不动。的确，现在已经是白天了，院门已经打开，农民们和奥尔嘉一起——K早把她忘了——潮水般涌了进来。虽然衣服和头发蓬松散乱，奥尔嘉仍同昨晚一样活泼，一来到门口她的两眼就开始寻找K。“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回家去？”她说着几乎流下泪来。“原来就为了这么个娘儿们！”她接着说，这话又重复了几遍。弗丽达在离开了一两分钟后现在拿着一小包换洗衣物回来了。奥尔嘉伤心地退到一旁。“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弗丽达说；不言而喻，她指的是回“大桥”酒店。K和弗丽达，后面跟着两个助手，一行人就这

么几个。那些农民不断对弗丽达撇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从昨晚以来她一直对他们挺凶；其中一个甚至拿起了一根手杖，摆出一副要挡住她去路的架势；但是她对他一瞪眼便把他吓跑了。来到外面雪地里，K.觉得稍稍松了一口气。户外空气清新，使他心情舒畅，以致觉得路途的艰难这一回也不那么不可忍受了；如果K.只是独自一人，那么他走起来会更加愉快。到了酒店，他立刻去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弗丽达则在旁边地上打地铺。两个助手紧随他们硬闯进屋，随即被赶走，然而又从窗户爬了进来。K.太疲劳，没有气力再轰他们。老板娘特地上来同弗丽达寒暄，弗丽达管她叫“大娘”；两人寒暄问候的场面亲热得出奇，阵阵热吻，半天拥抱。总的说，这间小屋很少有安静的时候，穿着宽大的男靴的女仆们也经常出出进进，送来什么或是取走什么，踩得地板砰砰蹦蹦乱响。当她们需要从那张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床上拿走什么时，便肆无忌惮地硬是把它们从K.身下拽出来。从弗丽达跟她们打招呼的语气，可知她们的地位是相同的。尽管这屋子乱作一团，K.仍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一整夜没有动弹。需要什么小东西都是由弗丽达递给他。当他翌日早晨终于神清气爽地起床时，已是他到村子后的第四天了。

第四章

他很想同弗丽达推心置腹地谈谈心，可是那两个助手——补说一句：弗丽达时不时也同他们逗笑打趣——硬是赖在屋里不走，这一点对他来说是很碍事的。不过他们倒也不来纠缠，而是在屋子一角的地上铺了两条旧裙子坐在上面。他们一再对弗丽达说，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不打搅土地测量员先生，尽量少占地地方，为此他们想出了各种办法，如抱臂、盘腿、紧挨着蹲在一起等等，当然在做这些时也不停地窃笑和嘁嘁喳喳，在迷离恍惚的凌晨光线中，能看见的只是屋角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可惜虽然如此，有了白天的经历的K.心里仍很清楚，那是两个严密监视他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盯着K.这边的动静，或者佯装孩子游戏把手掌卷起作望远镜状放在眼上窥探以及其他类似的胡闹，或者干脆只是不断朝这边挤眼，多半则是忙于梳理、捋顺自己的胡子，表现出他们是刻意追求胡须样式的，两人无休无止地就胡子的长短、疏密反复进行比较，每次又总要让弗丽达发表意见。

K.多次从床上带着完全漠然的表情冷眼旁观三个人的活动。

当他感觉体力恢复到足以下床时，三个人便都一拥而上过来服侍

他。他还没有足够的气力来抵制他们伺候自己，所以想抵制，是因为他觉得老让他们伺候无异使自己陷入某种对他们的依附地位而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然而现在只得由它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吃饭时喝着弗丽达端来的咖啡，在弗丽达生起的炉火旁取暖，让两个助手忙不迭地笨手笨脚地左一趟右一趟跑上跑下端洗脸水，拿肥皂、梳子、镜子，最后，在K.只稍稍加暗示有这种需要时又马上去取来一杯甜烧酒——这滋味怎么也不能说是很不舒服吧。

享受着这一声令下便有人围着自己团团转的乐趣，K.这时更多出于惬意的兴之所至随便说说，而不是真正希望立刻照办的心情说道：“你们两个走吧，眼下我暂时不需要什么了，我想同弗丽达小姐单独谈谈。”当发现两人脸上毫无抗拒的表情时，他又加上一句让他们宽心的话：“过一会儿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找村长，你们在下面店堂里等着我好了。”奇怪的是，两人竟没有二话地立即服从了，只在临走前又说了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等的。”K.对此的反应是：“我知道可以，但我不愿意这样。”

但是当弗丽达——助手一走她立刻扑到K.怀里，坐到他腿上——说出下面的话来时，K.有点恼火，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乐意听，弗丽达说：“亲爱的，你干吗要跟这两个助手过不去？在他们面前我们不用保守什么秘密。他们是忠心耿耿的。”“唉，什么忠心耿耿，”K.说，“他们一个劲儿地暗中监视我，这很无聊，但很可恶。”“我想我懂得你的意思。”她一面说，一面搂住他的脖子，还想说点什么而又说不下去；因为椅子就靠床立着，他们一侧身便就势倒在上面了。现在他们躺在那里，但不似昨夜那般如痴如醉，她在寻找什么，他也在寻找什么，他们都发狂地、龇牙咧嘴地恨不得把脑袋钻进对方胸膛里，不断地寻找着，他们那热烈拥抱、不断翻滚的身躯并不能使他们忘记反而提醒着他们想到自己的职责是找东西；像饿狗拼命在地上乱刨，他们也在对方身上乱抓乱刨；等到毫无办法了，完全失望了，为再捞到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又不时用舌头舐遍对方的脸。直到精疲力竭，才停歇下来，互相怀着感激之情。这时女仆们又上来了。“瞧这俩是怎么躺的。”一个女仆说，出于同情，她扔了一块单子盖在他们身上。

当后来K.掀开身上的单子四下观看时，两个助手又在那个角落里了——这一点他并不奇怪——他们用手指着K.，相互示意要好好干正经事，又向K.举手敬礼；但是，这时还有一个人挨床坐着，原来是老板娘，她手上拿着一只长袜正在编织。这个小小的活计同她那巨人般的、

几乎把射进屋里的阳光完全挡住的大块头颅不相称。“我已经等了很久了。”她说便抬起头来，让人看见一张宽宽的、已有不少老年皱纹、然而大体上仍是光洁的、也许过去曾经一度很美的脸庞。她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责怪，但却是无的放矢，因为K.原本没有让人请她来，所以他听了这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就坐起身。弗丽达也站了起来，但却从K.身边走开，过去倚在老板娘坐的椅子边上。“老板娘太太，”K.心不在焉地说，“能不能把您想对我说的话推迟一点，等我去见了村长回来以后再讲？我在那边有一次重要的谈话。”“现在我要谈的更重要，您相信我好了，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说，“您在那边也许只是要谈一件工作，可是这里我要谈的事关系到一个人，关系到弗丽达，我的好帮手。”“原来如此，”K.说，“那自然又当别论；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放心交给我们两个自己去管呢？”“因为爱，因为关心人。”老板娘说着便把弗丽达的头搂到自己胸前——弗丽达站着也只跟老板娘坐着时的肩一般高。“既然弗丽达这样信任您，”K.说，“那么我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听您的。又因为弗丽达不久前说我那两个助手是忠心耿耿的，所以我们大家就都是朋友了。情况既然如此，我也就可以向您，亲爱的老板娘提出，就是我觉得现在最好让我同弗丽达结婚，而且要很快办这件事。很遗憾、很遗憾的是我这样做并不能弥补弗丽达因我而失去的东西，即贵宾楼那份工作和克拉姆的友情。”这时弗丽达抬起头来，眼里充满了泪水，胜利者的傲气连一点影子也不见了。“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偏偏挑上我呢？”“什么？”K.和老板娘异口同声问道。“她的心乱了，可怜的孩子，”老板娘说，“这么多幸福和不幸一下子集中在她身上，她给搞得心乱如麻了。”似乎为了证实这些话，弗丽达扑向K.怀里，旁若无人地狂吻他，然后又哭着在他前面跪下来，同时仍紧抱着他不撒手。K.一面双手抚摸着弗丽达的头发，一面问老板娘：“看起来您是同意我的话了？”“您是个说一不二的人，”老板娘说，她的声音也带着哭腔，看样子有些体力不支，呼吸也困难；尽管如此她仍然鼓起劲来说道：“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必须向弗丽达做哪些保证，因为不论我多敬重您，您到底还是个外乡人，您一个保人都没有，您的家庭情况这里谁也不知道。所以说，作出保证是必要的，这一点您一定明白，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您自己不也特别强调弗丽达同您结合不管怎么说都有不少损失吗。”“当然，我一定作出保证，”K.说，“也许当着公证人的面最好，不过可能伯爵大人的其他主管部门也会出面干预这事吧。另外，我本人在举行婚礼前也要办完应办的事。我必须同克拉姆谈谈。”“这是不可能的，”弗丽达说，一边将身子直起来一点，更紧地偎依着K.，“真是异想天开！”“非谈不

可，”K.说，“如果我做不到，那么你得同他谈谈。”“我不行，K.，我不行，”弗丽达说，“克拉姆决不会同你谈的。你怎么竟以为克拉姆会同你谈！”“那么他会同你谈吧？”K.问。“也不会，”弗丽达说，“既不会同你也不会同我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说到这里她转身向老板娘伸出双臂说：“您瞧，老板娘太太，他究竟想干什么哟！”“您太特别了，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说，这时她身子坐正了一点，撇开两腿；两个硕大的膝盖把薄薄的裙子高高撑起，样子相当吓人，“您想做的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可能？”K.问。“这个我会给您解释的，”老板娘说，那语气仿佛这解释不是最后再帮助K.了解一些情况，而已经是她对K.实行第一次惩罚了，“我很乐意给您作解释。虽然我不是城堡的人，仅仅是个女人，只是这里这个末流酒店——还不是最末流，不过也差不离了——的老板娘，所以很可能您对我的解释不大以为然，可是我这辈子一直没有闭着眼睛过日子，我跟许许多多人打过交道，独自个儿挑过这酒店的大梁，因为我男人虽说是好人，但他不是当酒店老板的料，什么叫负责，他这辈子是弄明白了。比如您吧，您现在能待在这村里，能舒舒服坦地坐在这张床上，仅仅是多亏他疏忽大意——那晚上我累得都快趴下了。”“什么？”K.从有点走神的精神状态突然警觉起来问道，话音里好奇多于生气。“我说，您能舒舒服服待在这里仅仅是多亏他疏忽大意！”老板娘又用食指指着K.大声说了一遍。弗丽达力图劝说她冷静下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老板娘迅速地扭动着身子说道，“土地测量员先生在问我话，我就得回答他提的问题。不然他怎么会明白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说克拉姆老爷决不会同他谈话，我刚说什么来着？‘不会’，不，是‘不能’。您听清楚了，土地测量员先生！克拉姆老爷是城堡的人，即便撇开克拉姆担任的职务不说，仅仅这一点本身，是城堡的人这一点，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级别了。可是您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居然还在这里低三下四地求您同意同弗丽达结婚！您一不是城堡的人，二不是村里的人，您什么也不是。但是可惜的是您又确实是个人，您是一个外乡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在这里处处碍事的人，一个不断给人找麻烦的人，为了您我们得让女仆腾房间，您想干什么谁也不知道，又把我们最可爱的小弗丽达勾引了去，弄得我们只好狠心把她嫁给您。实际上我摆出这些来倒不想责备您。您就是您嘛；我这辈子见过的多了，碰上现在这点事儿还会有什么受不了的？现在请您好好想一想您究竟提了个什么要求吧。您要求一位像克拉姆那样的老爷跟您谈谈！我听说弗丽达让您从门上小孔往里看感到很痛心，她这样做本身就说明已经上了您的钩了。您倒是说说，您看到克拉姆以后有什么感觉，您经受得住吗？

您不必回答，我知道您会说您看了以后完全经受得住，没事一样。其实您根本就没有能耐真正看见克拉姆老爷，我说这话不是小看别人，因为我自己也是没有这个能耐的。嗨，要克拉姆跟您谈谈！可是他甚至不同任何村里人谈话，他从来还没有亲口跟村里哪个人说过一句话呢。说来弗丽达是得到了很大的宠幸，她的这种荣幸是我终生引以为豪的，这就是克拉姆至少常常喊她的名字，并且她也能对他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允许她从小孔往里看，但是克拉姆同她也是连半句话也没有说过的。还有，他有时候叫叫弗丽达的名字，完全不一定有别人喜欢附会上去的那种意思，他不过是叫了声‘弗丽达’这个名字罢了——谁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当然弗丽达应声急忙赶来，这是她的事，克拉姆也不加反对，让她走到自己跟前，这是克拉姆的好心，可是硬说克拉姆是在叫她来，不是太武断了么？好了，现在是连到手的那一点东西也丢了，永远也找不回来了。也许克拉姆还会叫‘弗丽达’这个名字，这是有可能的，可是要说再让她这个跟您混在一起的女人到自己跟前去，这种事是绝不会再有的了。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我这笨脑瓜怎么也弄不明白，那就是一个被人们称作克拉姆的情人的姑娘——不过我觉得这种称呼太过分了——怎么会让您沾自己的身子，哪怕只是沾一下呢？”

“对，这确实很奇怪，”K.说着便把弗丽达一把搂到怀里，她虽低头不语，仍立即依从了，“不过我觉得这也证明事情并不完全像您想的那样。比如说吧，您说我在克拉姆面前什么也不是，这话确实不错；另外，我现在仍然坚持要求同克拉姆谈话，即便听了您这番解释后也不改初衷，这也还不等于说，我在没有隔着一道门的情况下见到克拉姆会感到没事一样，说不定他一在我面前出现我就会撒腿跑出房间呢。但是，这种虽说颇有根据的担心，我觉得还不能称其为理由，使我不敢去冒险求见。只要我能做到经受住他的威慑力量，在他面前站稳了脚，那么他同我谈话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我只需要看到我的话给他造成的印象就够了，即使我的话引不起他任何反应或者他根本不愿意听我讲，我也还是有一点收获：即终于在一个掌权的大人物面前无拘无束地说了话。您呢，老板娘太太，您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人的本领，还有弗丽达，她昨天还是克拉姆的情人——我看没有什么理由改变这个称呼——你们肯定可以轻而易举地给我找到一个同克拉姆谈话的机会的；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就在贵宾楼好了，或许他今天就也还在那里吧？”

“这是不可能的，”老板娘说，“我看您是榆木脑瓜怎么也说不通。您倒是说说看，您究竟想跟克拉姆老爷谈什么呢？”“当然是谈弗丽达。”K.

说。

“谈弗丽达？”老板娘大惑不解地问，然后便转身向弗丽达，“你听见没有，弗丽达，他，就是他，居然要同克拉姆，要同克拉姆谈你呢！”

“唉，”K.说，“老板娘太太，您是个很聪明的、令人尊敬的女人，可您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不错，我是要同他谈弗丽达，这并没有什么可怕，恰恰相反，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嘛。如果您觉得从我出现那一刻起弗丽达对克拉姆就无关紧要了，那您肯定又错了，要是您这样看，您就低估了他。我很清楚，在这一点上教训您对我说来未免太不自量，可我不得不这样做。克拉姆同弗丽达的关系不可能因为我而发生任何变化。他们要么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这实际上是那些把情人这个体面称呼从弗丽达头上拿掉的人们的看法——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要么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关系怎么可能因为我，如您刚才说的一个在克拉姆眼里什么也不是的人，怎么可能因为我而遭到破坏？这种怪事一个人在吓一跳的瞬间会相信，但只要稍稍动一下脑子，就知道其大谬不然了。不过让我们还是来听弗丽达说说她对这事的看法吧。”

弗丽达把脸贴在K.胸前，眼睛瞅着远处说：“事情肯定是像大娘说的那样：克拉姆不会再理我了。不过那当然不是因为您，亲爱的，不是因为您来了，这类事不会对他有丝毫影响的。我觉得倒反而可能正是他的安排，有意让我们两人在那个柜台底下相会；那个时刻是该祝福而不该诅咒的。”“如果是这样，”K.慢吞吞地说，因为弗丽达的话说得很甜，他闭上了几秒钟眼睛，以便充分品味这甜蜜的滋味，“要是这样，那就更没有必要害怕同克拉姆谈话了。”

“真是的，”老板娘以居高临下的架势看着K.说道，“您有时让我想起我的男人，您也同他一样倔，一样孩子气。您到我们这里才几天啊，就自以为什么都比本地人知道得多，比我这个老太婆、比弗丽达知道得还多，弗丽达在贵宾楼什么事没有眼见耳闻过？我不否认，完全违反规定、违反多年的老规矩办成件把事情也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没见过这样的事，据说有这方面的例子，就算是有吧；但是即使真有这种事，那么也一定不会像您这样干法，就是说老是顶牛，脑子老是拐不过弯来，丝毫也听不进别人出于好意的劝告。您以为我的担心是冲着您的吗？原先您独来独往那阵子，虽然说管管您恐怕是件好事，恐怕可以避免好多麻烦，但我那时候管过您吗？那时我对我男人只讲过一句关于您的话，那

就是：“你离他远着点！”要不是弗丽达现在也卷到您的事情里去，和您同命运，两人拴在一起了，那么这句话我今天也还是要对她讲的。正是因为她——不管您爱不爱听——我才来认真过问您的事，甚至才注意到您这个人的存在。您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我推开，因为您要对我，这个唯一像母亲一样关心保护小弗丽达的人，负完全责任。也许弗丽达说得对，你们之间发生的事全是按克拉姆的意思安排的；但是我现在一点不知道克拉姆的情况，我永远不同他说话，他对我完全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是您呢，您现在就坐在这里，拉住了我的弗丽达，并且也被我——我没有必要隐瞒这一点——拉住了，是的，被我拉住了，不信要是我也把您赶出门，年轻人，您到这个村子里去找个住处试试看，要能找到，哪怕是个狗窝，那才怪呢！”

“谢谢，”K.说，“您的话说得很坦率，我完全相信您。这样看来，我的地位很不牢靠，这又牵连到弗丽达，连她的地位也不牢靠了。”

“不对！”老板娘怒气冲冲插嘴说，“弗丽达的地位在这件事情上同您的地位毫无关系！弗丽达是我店里的人，谁也没有权力说她在这里的地位不牢靠。”

“好，好，”K.说，“在这一点上我也承认您说得有理，特别是因为弗丽达好像很怕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敢发表意见。所以，我们就暂时先只谈谈我吧。我的地位是非常不牢靠的，这一点您不否认，反而在竭力提供证明。跟您谈的每件事一样，您在这件事上也只说对了一多半，然而不是全部。比如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可以随时让我去过夜。”

“在哪儿？在哪儿？”弗丽达和老板娘齐声叫起来，两人都同样急切要求回答，似乎她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也是完全一样的。“巴纳巴斯家。”K.说。

“那是些什么东西！”老板娘嚷起来，“那是一窝坏透了的东西！巴纳巴斯家！你们听见没有——”这时她扭头冲着屋角，但两个助手早已从暗处走了出来，他们手挽手站在老板娘身后，而老板娘此刻呢，似乎需要人扶着她才能坐稳，一把抓住了其中一人的手，“你们听见没有，这位先生在哪儿混？在巴纳巴斯家里！当然啦，他在那里有过夜的地方，唉，要是他就在那里过夜不就好了吗，那要比在贵宾楼强！可你们两个当时到底在哪里呢？”

“老板娘太太，”K.抢在助手答话之前说道，“这两个人是我的助手，可听那话音倒好像他们是您的助手、我的看守似的，在所有别的问题上我很乐意客客气气地同您至少是讨论讨论，但是在我的助手这个问题上不行，因为这里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我请您别跟我的助手谈话，如果求不动您，那我就要禁止我的助手回答您的问题。”

“这么说我不能跟你们说话了，”老板娘说完这句话三个人都笑起来，老板娘是讥嘲的冷笑，但比K.预料的要温和得多，两个助手的笑则带着他们常有的那种煞有介事但却空洞无物、一点不负责任的神情。

“你可别生气，”弗丽达说，“你得理解我们的激动心情。其实也可以说，我们唯一应该感谢的人是巴纳巴斯，亏得他我们两个现在才好起来。我在酒吧里第一次见到你之前——当时你挎着奥尔嘉的胳膊走进来——虽然也知道你的一些情况，但总的来说我对你是没有一点感情的。并且我不仅对你完全没有感情，差不多对什么都没有感情。那时我也对许多事感到不满，对不少事感到气恼，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不满，什么样的气恼啊！比如客人中有一个在酒吧里侮辱我，这伙人老是来纠缠我——你已经见过那些家伙了，可是来酒店的还有些人更难对付得多，克拉姆的仆人还不是最糟的——话说回来，刚才说有一个人侮辱我，那么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事后我的感觉是：似乎那是好多年前发生的事，或者事情根本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只是听别人讲过，或者我自己已经把这事全忘了。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不能细说这种事，我连再想一想它们都不能了，你看，自从克拉姆离开我以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弗丽达中断了她的叙述，伤心地低下了头，双手交叉着放在怀里。

“您看看吧，”老板娘大声说道，那神气似乎不是她自己在说话而是把嗓子借给弗丽达用，同时她也把身子凑近弗丽达，几乎快挨着她了，“您看看吧，土地测量员先生，看看您都干了什么好事吧，还有您的助手，您不许我跟他们说话的两位助手，也可以在一边看看，受受教育吧！您硬是把弗丽达从命运从来没有给过她的最最幸福的生活中拽了出来，您所以成功，主要就因为弗丽达像个孩子似地心太软，她眼瞅着您挎着奥尔嘉的胳膊，想到您是上了巴纳巴斯家人的当，于心不忍。她救了您，牺牲了她自己。现在呢，在事情已经发生，弗丽达拿自己拥有的一切作代价才换到了坐在您腿上这种幸运之后，在这种时候您却跑出来打出您那张得意的王牌，说什么您有可能在巴纳巴斯家过夜。大概您是想证明您并不依赖我吧。确实，要是您真在巴纳巴斯家过了夜，那么您

倒真的一点不必依赖我了，您得马上，就是说一秒钟也不许停留从我这里出去！”

“我不知道巴纳巴斯家犯了什么大罪，”K.一面说一面把有气无力的弗丽达从地上扶起来，又慢慢扶她在床上坐下，然后自己站起身，“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您有理，但我刚才请您不要管我们的事，即不要管弗丽达和我的事，我这样做肯定也没有错。您刚才提到什么爱和关心，可我却觉不出有多少爱、多少关心，反而尝到了更多的恨、嘲笑和逐客令的滋味。如果您是打算把弗丽达从我身边或把我从弗丽达身边拉走，那么您做得还确实相当巧妙；但我觉得您终归不会成功，就说您万一成功了吧，那您也会——请允许我也来一个听起来不那么愉快的警告——后悔莫及。至于说到您给我提供的住处——您指的只能是这间令人作呕的斗室了——那么说您这是出于自愿恐怕大成问题，相反，看起来关于这件事伯爵衙门是有一纸命令在案的。现在我就要去报告，说这里已经让我退房了，然后，如果上面给我分配另一住所，大概您会如释重负吧，可是我会更加感到轻松愉快呢。好了，现在我要去村公所办这件事和别的事了；请您至少关照一下弗丽达吧，您刚才用您那番慈母般的讲话已经把她折磨得够可以的了。”

说完这些话他转向两个助手。“跟我走。”他说，一边从钩上取下克拉姆的信，打算就这样动身了。老板娘一直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直到他手已经放在门把上时，她才开口道：“土地测量员先生，我还想送您几句临别赠言，因为，不管您说了多少不得体的话，不管您怎样想侮辱我，侮辱我这个老太婆，您以后总归要做弗丽达的男人。仅仅因为这个我才想告诉您：您在这里各方面的情况无知得惊人，听您说话，再在心里把您说的、想的同实际情况一比，那简直就让人觉得天花乱坠，天旋地转。您这种无知不是一下子能改变得了的，也许永远改不了；但是如果您稍微听我两句忠告，并且牢牢记住自己的无知，许多事情就可能办好些。比如说，那样一来您就马上会对我公道一点，就会慢慢体会到，当我看到我最可爱的小弗丽达简直等于离开了天上飞翔的雄鹰而把自己同地下乱爬的草蛇拴在一起时，我是给吓成什么样子啊——这一惊吓的后果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平息下去——可实际上弗丽达的遭遇还要糟糕得多，现在我不得不使劲克制自己不去想它，要不我连一句话也没法平心静气地讲。唉，瞧您现在又火了。不过您先别走，我只要您再听听我这个请求了：无论您走到哪儿，您都要明白自己在这里是最无知的人，还是小心点好；在我们这儿有弗丽达在旁边保护您免受伤害，您还

可以随心所欲地胡侃一气，比如您可以告诉我们，您打算去和克拉姆谈话；到了办正事，到了办正事的时候，您可千万、千万别再这样了！”

她由于激动而有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K跟前，拉起他的手，用请求的目光看着他。“老板娘太太，”K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为了这点小事要屈尊求我。如果真如您所说，我同克拉姆谈话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不论谁求我还是不求我不都一样吗，我反正谈不成就是了，但要是万一可能呢，那么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做这件事？特别是您持反对意见的主要理由一旦不存在，那么您的其他担心也就随着一律站不住脚了。当然，我的确是无知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这是我非常可悲的地方；可是这倒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所以，在我的力量还够用时，我倒是挺愿意再保持一阵这种无知的状态并承担它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后果的。可是这些后果基本上只涉及我，主要是这一点，使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来求我。您总是一定要照顾弗丽达的吧，如果弗丽达完全见不到我的面，那么在您心目中这不完全是一件幸事吗？所以说您究竟怕什么呢？您总不至于——无知的人似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说到这里K已经打开了门，“您总不至于是为克拉姆担忧受怕吧？”老板娘默默地目送着他匆匆下了楼梯，也瞅着两个助手紧跟在他后面走了。

第五章

同村长的谈话并不使K感到怎么头疼，这一点几乎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试图这样来解释：根据他迄今为止的经验，他同伯爵衙门的公事往来一直是非常单纯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处理他的事情上显然已经一劳永逸地颁布过一条明确的、表面上对他十分有利的原则，另一方面则由于衙门办事那令人赞叹的口径统一、步调一致，特别是在那些表面看去这种一致性似乎并不存在的地方可以觉出它特别完美地存在着。有时，当K只想到这些时，他差不多快要觉得自己的处境是令人满意的了，虽然他每次在这样自我陶醉一阵之后很快就对自己说，危险也恰恰就在这里。

同衙门各级办事机构直接打交道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因为不论它们组织得如何严密，总是代表远在天边谁也看不见的老爷们维护一些远在天边谁也看不见的东西，而K则是在为活生生的、近在眼前的事情奋斗，在为自己奋斗；加之——至少在最初时刻——又是完全出于自己主动，因为他是进攻一方；并且不仅他在为自己奋斗，而且显然还有另外

一些势力也在奋斗，他不知道这些势力，但根据衙门的措施他可以相信它们的存在和力量。可是，由于衙门一开始就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比较重要的事——给了K.不少照顾，它也就使他失去了获得一些微小胜利的可能，从而也就没有可能体验与胜利相联系的满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为今后进行更大战斗所必需的坚实信心。它给予K.的，反倒只是处处（当然只限于村里）开绿灯让他顺利通行，用这种方法娇惯他、削弱他的斗志，在这里把任何斗争都取消掉，把他置入一种非公务的、完全莫名其妙的、摸不清看不透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活之中。这样下去，如果他不是时时保持警觉，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有朝一日尽管衙门对他多方照顾，尽管交给他的全部轻而易举的任务都圆满完成，他也会在人家给予他的似是而非的恩宠的蒙蔽下在公务以外的生活中有失检点，致使自己在这方面栽大跟头，那时衙门就不得不出面，依旧是文雅而和蔼可亲地、摆出一副违反本意爱莫能助的姿态，根据某一条他不知道的有关公共秩序的法令把他清除掉。说来说去，那公务以外的生活在这儿究竟是怎样的？K.从来还没有在别处见过公务和生活像此地这样完全交织在一起，它们是如此纵横交错密不可分，以致他有时会觉得公务和生活似乎互换了位置。例如，克拉姆对于K.的公职所拥有的到目前仅仅有名无实的权力，同克拉姆在K.的卧室中拥有的实实在在的权力相比，究竟有多大分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只有在直接面对衙门时采取一种比较随便、可说是纯粹放松的态度才是合适的，除此之外就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觉，每走一步都需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K.对此地衙门的这种看法，首先在村长处得到了完全的证实。这是个和颜悦色的、胖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他是在病中，在风湿病严重发作时躺在床上接见K.的。“这么说您就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先生了。”他说，同时想坐起来表示欢迎，但怎么使劲也无用，于是带着歉意指指自己的腿又颓然躺回枕头上。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给K.拿来了一把椅子摆在床前，这间屋子的窗子本来就很小，又因拉上了窗帘而更加昏暗，所以几乎只能看得见这女人那影影绰绰的轮廓。“您请坐，您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请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K.念了克拉姆的信又加上几句自己的话。现在他再次体味到同衙门打交道时那种异常轻松的感觉。衙门简直就肩负着所有的重担，您可以把什么都推给它，自己落得个轻松自在。村长似乎从他那一方面同样感到了这一点，在床上很不舒服地翻了个身。最后他说：“您已经看到了，土地测量员先生，整个这件事情我是早就知道了的，我之所以还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第一是因为我生病，另外就是您很久没来，我已经在想您大概已经放弃这工作了。但现在呢，既然您亲临寒舍造访，我当然就必须把令人不快的全部实情倾囊相告。如您所说，您已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但是遗憾得很，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里可以说一点适合他做的工作也没有。我们这些小家小户的土地界线是划定了的，一应事项已全部有条不紊登记在案。产业易主的事极少发生，小的边界纠纷我们自己解决。所以我们要土地测量员干什么？”虽然原先他完全没有细想过这一点，但K内心深处确信自己早已料到会得到类似的说法。^{〔7〕}正因为如此，他立即说道：“这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我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现在我只希望这是一个误会。”“可惜没有误会，”村长说，“情况正像我说的那样。”“可这也太不像话了！”K叫起来，“难道我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这里就为了让人再把我送回去吗！”“这是另一码事，”村长说，“这件事我无权决定，但您所谓的那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我倒可以给您解释解释。对一个像伯爵衙门这样的大衙门来说，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个部门发出这一项指令、另一个部门发出另一项指令而互相不通气的事，虽然上一级的监督检查是极为严格的，但检查很自然地往往晚到一步，于是总会出点小差错，当然毫无例外都是在一些微乎其微的小事上出错，比如您这件事。在大事上我还没听说出过什么错，不过就是小事也够让人尴尬的了。至于说到您这件事，那么我可以坦率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您听，我不用保守公务秘密——要保密我的官还太小，我是务农的，一辈子务农。很久以前，那时我当村长才几个月，上头来了一份公函，我记不清是哪个部门发出的了，那公函用高级长官特有的命令口气通知说，拟聘任一名土地测量员，指令村公所将该测量员工作必需的各项计划和全部文字材料立即备齐待命。这公函上指的人当然不可能是您，因为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要不是现在我卧病在床，有的是时间去回想那些最最可笑的事情，那么我也是不会记起这事来的。——米齐，”他突然中断叙述对那个一直在屋里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乎什么的女人说，“请你去那边柜里看看，兴许能找到那份文件。——这项指令，”他接着对K解释，“是我刚当上村长那段时间下达的，那时我把所有的文件都保存起来了。”那女人当即打开柜子，K和村长在一旁看着她。柜子里各种文件纸张塞得满满当当，柜门一开，两大捆像劈柴一样被捆成一大卷的文件便骨碌碌滚了出来，把那女人吓了一跳，一下子闪开了。“下面，可能在下面。”村长在床上指挥着，那女人则驯顺地张开两臂把大批大批的文件抱出来撂在地上，以便去拿那最底下的文件。现在一卷卷文牒纸片已堆满半间屋子。“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村长颌首说，“这些还只是一小部分

呢。大宗的我都存放在库房里，而且绝大部分文件都丢失了。谁有本事把全部文件都保存下来！库房里还有很多很多呢。”“你找得着那份指令吗？”过一会儿他又对他女人说，“你先得找一份上面有‘土地测量员’字样，底下还画了蓝道道的文件。”“这儿太暗了，”那女人说，“我去取一支蜡烛来。”说罢就迈步跨过地上的大堆文牍出屋去了。“我女人在这项繁重的公务中帮了我的大忙了，”村长说，“我还有别的事务，这个工作只能算是兼管一下。虽说我还有一个助手帮助我整理这些文字材料，这就是那位老师，可即使这样也仍然做不完，总是剩下许多堆积起来，这些还没整理的全集中在那边那个柜子里，”他指指另一个柜子，“现在我这一病倒呢，那里简直就堆成山了。”说完这句他又疲倦地、然而却面带骄傲之色地躺了下去。“我可不可以，”当那女人取来了蜡烛后又跪在柜子前继续找那份指令时，K.说道，“帮着您太太一起找？”村长微笑着摇摇头：“刚才我说过，对您我没有什么公务秘密可保；可是，要让您本人去文件堆里翻东西，那我确实又走得太远了。”现在，屋里一片安静，唯闻纸张窸窣窸窣之声。村长甚至微微打起盹来。一阵轻轻的叩门声使K.回身一看，当然又是两个助手。不过无论如何，两人现在总算有点长进：他们不是砰砰嘭嘭闯进屋来，而是站在外面通过微开的门缝轻声说：“我们在外面待着太冷了。”“谁呀？”村长被惊醒了，问道。“没别人，是我的两个助手，”K.说，“我不知道该让他们在哪儿等我，外面太冷，这儿嘛他们又让人讨厌。”“我不在乎他们，”村长和气地说，“您让他们进来好了。其实我认识他们，我们是老相识了。”“但是我讨厌他们。”K.直言不讳，他把目光从两个助手身上移到村长身上，又从村长身上移回到助手身上，发现三个人的微笑一模一样，毫无区别。“既然你们两个到这儿来了，”他带着试探的口吻说，“那么就留下来帮着村长太太找一份文件吧，文件上写着‘土地测量员’，字底下画着蓝道道。”村长并无反对意见，就是说，不许K.做的，两个助手倒可以做。两人也立即投身纸堆，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可是，与其说他们在找文件，倒不如说在纸堆里乱翻一气更恰当，而且，当一个人正读文件标题时，另一个人总是一把将文件从他手中抢走。那女人则跪在那现在已经空空如也的柜子前面，看样子根本没有在继续找，至少蜡烛离她老远老远。

“这么说这两个助手，”村长又开口了，洋洋得意地微笑着，似乎在说：所有这些尽是他一手安排的，可谁都无法猜到这一点，“他们让您讨厌了，可他们是您自己的助手啊。”“不对，”K.冷冷地说，“他们是我到此地后才跑到我身边来的。”“怎么，跑来的，”村长说，“您的意思大概是说派来的吧。”“好吧，就算是派来的吧，”K.说，“但说他们是从天外

飞来的也未尝不可，这种派法也够随便的了。”“这里办什么事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村长说，急得连腿疼也忘了，一骨碌坐起来。“办什么事都不是随随便便的，”K说，“那么招聘我这事又怎么说？”“聘用您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村长说，“只是有一些次要因素起了干扰作用罢了，我可以用有关的文件向您证明这一点。”“这些文件恐怕找不到了。”K说。“找不到？”村长叫起来，“米齐，请快点找！不过，不要文件我也可以先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您听听。刚才我提到的那份指令，我们接到后当即回复上面表示感谢，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但是这封回信看来是没有送回发出指令的那个部去，我管它叫A部吧，而是误送到另一个部，送到B部去了。这样A部就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然而可惜连B部也没有收到我们复信的全部；一种可能是公文袋里装的信落在村公所，再一种可能是在半路上遗失了——肯定不会在部里遗失，这我敢担保——总之，B部也只收到一个空公文袋，袋上只注明封套内所装的、可惜实际上并不在内的文件是关于聘任土地测量员一事的。A部呢，一直还在等着我们的回复，这个部虽然已将此事记录在案，但部主管人指望着我们会答复，等着在收到答复之后他们或者聘任土地测量员，或者根据需要继续同我们就此事进行磋商。这种坐等下面回信的事绝非绝无仅有，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办什么事都讲求准确、一丝不苟的地方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可是结果呢，因为他指望着我们，所以也就不大重视部里那份有关记录，弄到后来就把这事忘记了。但是在B部就不同，公文袋送到了一位以认真负责闻名的部主管人手里，他叫索尔蒂尼，是个意大利人；连我这个内行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像他那样能干的人会被长期安置在那个可以说很低的职位上。这位索尔蒂尼自然把空文件袋派人送回给我们要求补上内容。但是，从A部发出第一封函件到那时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甚至已经好几年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按常规如果一份文件送对路了，那么最迟在第二天也就送到部里，同一天就可以处理；但如果没送对路——在组织非常严密完善的情况下，文件要走这条错误的路简直得费很大力气拼命去找，否则是找不到的——那么，那么当然就会拖很久很久了。因此，当我们收到索尔蒂尼的便函时，就只能隐隐约约地记起这件事来，当时我们管这事的只有两人，就是米齐和我，那位老师还没有分配给我，我们两个只能对最重要的事保存一份副本，简短地说吧，我们只能给他一个很笼统的回答，说我们完全不知道聘任一事，我们这里也不需要什么土地测量员。”

“但是，”村长顿住了，似乎发觉在乐此不疲的叙述中忘其所以，把话扯远了，或者至少有可能扯远了，“这个故事您听着不觉得腻味吧？”

“不，”K.说，“我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村长说：“我讲这些给您听不是为了给您解闷。”

“我所以觉得它有意思，”K.说，“仅仅因为我听了这事后，对那种可笑的混乱算是窥见了一斑，这种混乱有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

“您还没有真正窥见一斑，”村长正色说，“我可以接着跟您讲。我们的回答当然满足不了索尔蒂尼那样的人。我很佩服这个人，尽管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疼。为什么？因为他谁都不信赖，比如，即使他有无数次机会进行了解，完全知道那是个最可靠的人，可到下一次再碰上时他还是不信任那人，好像他根本不认识人家，或者更正确些说，好像他知道那人是个无赖。我认为这是对的，一个公职人员就应该这样；可惜我的天性使我不能按这条原则办事，你不是看见了吗，我现在对您这个外乡人把什么底都亮出来了，我这叫做禀性难移，没法子。而索尔蒂尼一接到我们的回信就起了疑。于是便有了一连串的通信往来。索尔蒂尼问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说不要聘用土地测量员；我仗着米齐的好记性回信说，这事最初是上头提出来的呀（至于事实上是另一个部发来的文件，这一点我们早忘记了）；索尔蒂尼对此的说法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提起上级的这封公函；我又回复他说：因为我现在才想起这封公函来嘛；索尔蒂尼呢：这真是太奇怪了；我：对于拖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件事，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索尔蒂尼：这事确实很奇怪，因为我想起来的那封公函并不存在；我：当然不存在啦，因为关于这事的文件都丢失了；索尔蒂尼：如果确有那第一封函件，就必定会有一条有关的记录在，然而这样一条记录并不存在。这时我无话可说了，因为要说是索尔蒂尼那个部出了差错，这话我是既不敢讲又不相信的。您，土地测量员先生，也许会暗暗埋怨索尔蒂尼，心想只要他考虑一下我的话，至少会去向别的一些部打听打听这事吧。然而真要这样做恰恰是不对的，我不想让您哪怕只是在心里产生一种索尔蒂尼身上还有点毛病的印象。压根不考虑有出错的可能性，正是衙门的一条工作原则。由于组织十分完备严密，这条原则是正确的，而如果想达到极高的办事效率，它也是必要的。所以说索尔蒂尼根本就不能去向其他各部打听，而且就算他去打听，这些部门也绝不会答复他，因为他们马上就会感觉出：这是在追究一个出差错的可能性。”

“村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一下，向您提个问题，”K.说，〔8〕“您不是提到过一个检查机关吗？按照您在这里办事情的描述，如果设想

一下这里也许没有检查机关，那么一个人会感到不堪忍受的。”

“您非常严格，”村长说，“但您就是再严格一千倍，同衙门对待自己的那种严格相比，您的严格也仍然等于零。只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外乡人才会提出您提的问题。要问有没有检查机关吗？这里有的是检查机关。

当然啰，这些检查机关不是为了查出一般意义上的错误而设立的，因为这里是不会出错的，即便某次出了一个错，如您的情况，但是谁敢下定论，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误！”

“这个说法真是太新鲜了！”K.叫起来。

“对我来说这是很旧很旧的说法，”村长说，“我同您差不多，也确信是出了一个错，索尔蒂尼因为对这事伤透脑筋毫无进展而得了重病，第一批检查机关官员来了，亏得他们揭出了错误的来源，看出这里有一个错，可是谁敢拍着胸脯说，第二批检查机关官员也会作出同样的判断，第三批和以后各批也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就算是这样吧，”K.说，“不过我最好还是不要对这些想法妄加评论，另外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些检查机关，当然还不可能懂得它们的职能。但我觉得在这里必须区别两点：第一是机关内部发生的事，以及仍然从机关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事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第二是我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我这个身在公职机关以外的人，现在正面临着公职机关无视我的存在的危险，这种无视现实是如此荒谬，以致我直到现在总不大相信这危险是实际存在着的。对于第一点，很可能您村长先生刚才讲的那些话都是对的，您对内情如此了如指掌令人叹服，只是我在听了您这番话后也想听您说说我个人的事情。”

“我也正想来谈这一点，”村长说，“但如果我不预先说明几句，您是听不懂我的话的，我刚才提起检查机关官员，看来是为时过早了。所以现在我要再回过头来谈谈我跟索尔蒂尼的分歧。我已经说过，渐渐地我招架不住了。但索尔蒂尼哪怕只比他的对手略胜一筹，他就等于大获全胜了，因为这样一来他办起事来精力就更集中、精神就更饱满，就更加指挥若定；结果是他的手下败将一见他就胆战心惊，而他手下败将的敌人看着他就会拍案叫绝。只因为我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对这后一点也有亲身体会，我才能以像现在这样的态度讲他。不过我还从未有幸亲眼见过他，他不能到下面来，他真是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至极，有人对我描述过他的房间，说四壁全被大捆大捆的卷宗挡满，一捆摞一捆，形成了一

根根高大的方柱，而且这些还仅仅是索尔蒂尼当时正在处理的文件，由于不断从一捆捆卷宗中抽出、插进文件，并且又都是为赶时间匆匆忙忙地做，这些卷宗堆成的柱子就不断倒塌下来，正是这种接二连三、每隔一会儿就出现一次的轰然巨响，成了索尔蒂尼办公室的突出特征。这也难怪，索尔蒂尼是个一丝不苟的工作人员，不论是最小的事还是最大的事，他都一视同仁，一样认真对待。”

“村长先生，”K说，“您总把我的事叫做小事一桩，但我这件事使许多公职人员忙个不亦乐乎，或许它在开始时只是一桩很小的事吧，可是由于像索尔蒂尼那样的官员们积极参与，它确实已经变成一件大事了。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遗憾，这是完全违反我的本意的，我不敢有那样的奢望，就是想让关于我的事情的卷宗也变成高大的柱子又随时哗啦啦塌下来，我只希望做个小小的土地测量员，在一张小小的绘图桌旁安安心地工作就行了。”

“不，”村长说，“您的事不是大事，在这一点上您没有理由抱怨，您的事确实是诸多小事中最小的一件。工作量大小并不决定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您这样想那您对衙门的了解就太皮毛了。但即使工作量大小能说明问题是否重要，您这件事也仍然是一粒微不足道的芝麻，普遍的事由，即那些没有出所谓差错的事，办理起来工作量就大得多，工作的成果自然也丰富得多，不过您还根本不知道您的事给人造成的实际上的工作量呢，我现在就来说说这个。首先要说的是，索尔蒂尼虽然不再追问我，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来了，每天都要在贵宾楼对一些有声望的村民进行几次质询并作翔实记录。大部分人支持我的说法，然而也有少数人起了疑心；土地测量问题触及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们嗅出有人在算计他们，觉得这里头有些不公平的事，他们还找到了一个领头的，于是索尔蒂尼从他们提供的情况中得出结论，确信：如果我当初把问题提到村民大会上讨论，是会出现全体一致反对聘用土地测量员的情况的。

〔9〕这样一来一件原本是明摆着谁都明白的小事——即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不管怎么说至少被弄得成了问题了。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叫布伦斯维克的表现得特别突出——您大概不认识他吧——他也许不是坏人，但又蠢又狂，他是拉塞曼的一个妹夫。”

“是那个鞣皮匠拉塞曼吗？”K问，接着便描述了他拉塞曼家见到的那个大胡子的长相。

“是的，正是他。”村长说。

“我还认识他的女人。”K.有点一搭没一搭地说。

“这是有可能的。”村长说，然后便沉默了。

“她很美，就是气色不大好，病恹恹的。她大概是城堡里来的人吧？”这后一句话只是带着疑问的语气说出来的。

村长看了看表，将药水倒进一把汤匙里急急忙忙灌下肚去。

“您大概只认得城堡里那些办事机构吧？”K.颇不客气地问道。

“对，”村长带着自嘲然而却是感激的微笑说道，“机关也是最重要的啊。至于说到布伦斯维克，要是我们能把他从村里驱逐出去，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拉塞曼也不会是最不开心的一个。可是当时布伦斯维克给自己拉了一些支持者；他虽然不是演说家，倒也会大喊大叫，而这样对某些人也能起作用。于是，终归我还是被迫把这件事提交村民大会讨论。不过这也就是布伦斯维克取得的唯一的胜利了，因为到了村民大会上，当然是绝大多数人反对聘用土地测量员的。这次大会也又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些年来这件事一直没有平息，这部分是因为索尔蒂尼太认真，他通过极为周密细致的调查，力图摸清多数派和反对派的动机，再就是因为布伦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同官府有各种各样的私人关系，而且有层出不穷的、异想天开的新招数去利用这些关系。当然索尔蒂尼不会上布伦斯维克的当，布伦斯维克怎么瞒得了索尔蒂尼？——可是，恰恰是为了不致上当受骗，需要进行新的调查，新的调查还没有结束，布伦斯维克又想出了新花招，他这人很灵活，这正是他那愚蠢的一种表现。好，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政府机构的一个特殊性质。与它的精细严密相适应，它也极为敏感。如果一件事已经深思熟虑了很久很久，那么即使考虑还没有完结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在某个事先无法预见事后也无法找到的地方会闪电般突然冒出来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虽说多半是正确地了结了那件事，但无论如何总带有一定的随意性。那情形就好像是：政府机关再也受不了那绷得太紧的弦、受不了同一件也许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那长年累月的刺激，从而自发地、不等哪个官员来过问就作出决定了。当然，不是说出现了什么奇迹，可以肯定地说，是某位官员挥笔写下了这个解决方案，或是作了一个口头的决定，但无论如何至少从我们这里，从此地，甚至从公职机关都不可能弄清楚究竟是哪位官员在这事上作了定夺，是根据什么理由这样决定的。这些全是检查机关在很久以后才查明的；而我们呢，就永远不得而知

了，实际上这事过了那么久恐怕也不会有谁感兴趣了。我说过，正是这类决定，它们多半是很好的，只有一点不足，就是——这类事通常都是如此一般人知道得太晚，因此在知道前的一段长时间里一直还在对那早已决定了的事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不知道在您的事情上是否也发出过一个这样的决定——有迹象说明发出过，也有迹象说明没有发出过——假如已经发出，那么聘任书就可能早已寄给了您，然后您就会长途跋涉到此地来，这些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与此同时索尔蒂尼却还会一直在这里为这同一件事操劳着，累得精疲力竭，布伦斯维克也还会绞尽脑汁搞阴谋诡计，而我就会在他们两人中间受尽了夹板气。这个可能性只是我的揣测，但我确切知道的是这一点：一个检查机关曾经查出来好多年前A部曾就聘任土地测量员一事向村里发出过询问函件，之后直至现在一直没有收到回音。新近又有官员向我查询这事，这样一来全部事实当然也就真相大白了，A部对我提供的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一回答表示满意，索尔蒂尼则不得不看到：原来他并不主管这件事情，并且还做了许多无用的、让人伤透脑筋、把人弄得精疲力竭的虚功——当然，他是无辜的。要不是这段时间也同以往一样新的工作任务不断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要不是您的事情说到底仅仅是桩很小的事——几乎可以说是各种小事当中最小的——那么我们大家一定都会感到如释重负的，我相信索尔蒂尼自己也会这样，只有布伦斯维克有一肚子怨气，但那只会让人觉得可笑罢了。好，现在，恰恰是现在，在整个这件事总算善始善终顺利了结之后——从那时起到今天又已经过去好久了——您突然又冒了出来，事情似乎又像要从头开始的样子，请您，土地测量员先生，设想一下我有多么失望啊。现在我下了大决心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决不让这类事再发生，这一点想来您是能够明白的吧？”

“那当然，”K.说，“可是我更明白，我在这里得不到起码尊重，这里甚至还滥用法律。我是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的权益的。”

“您打算怎么办呢？”村长问。

“这我不能透露。”K.说。

“我不想强加于人，”村长说，“我只想请您考虑一下我是您的——我不想说是朋友，因为我们完全是陌生人——可说是一个公务伙伴吧。我只是坚决反对聘任您作土地测量员；除了这一点以外您任何时候都可以信赖我求我帮忙，当然要在我的权限之内，我的权力是不大的。”

“您一再提到，”K.说，“要聘用我为土地测量员，可是实际上我已经被聘用了。这里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信因有克拉姆的签署而很有价值，很有分量，这签字看来也是真的，但除此以外就——可是我不敢独自一人对这封信发表意见——米齐！”他叫道，接着说：“你们究竟在干什么哟？”

他们好长时间没有理会的两个助手和米齐，显然没有找到那份需要的文件，就想把所有拿出来东西再装回柜子里去，但因为文件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没法全装回去。于是，也许是两个助手想出来的主意吧，此刻他们正将它付诸实行：他们把柜子放倒在地，把所有的文件使劲往里塞，然后和米齐一起坐到柜门上，现在正在用尽全身力气一下一下地慢慢把门压下来关紧。

“那么那份文件没有找到，”村长说，“很遗憾，不过事情的经过您现在已经知道，其实我们也就不再需要那份文件了，但是肯定还能找到的，大概在那位老师那里，他那儿还有好多好多文件呢。现在把蜡烛拿过来，米齐，让我们来看看这封信吧。”

米齐走了过来，此刻，当她坐在床沿上，身体紧靠着这个精神饱满的胖子，让他紧紧搂抱着自己时，她显得更加灰溜溜、更加不起眼了。只有她那张小脸在烛光中还引人注目，那上面线条清晰，冷峻异常，仅仅由于上了点岁数而有所缓和。她目光一投向信纸，便轻轻交叉起双手。“是克拉姆写的。”她说。然后两人便一同看信，边看边轻声耳语，最后，当两个助手终于成功地将柜门压上并紧并在那里高声欢呼、米齐向他们投去感谢的一瞥时，村长说：

“米齐和我意见完全一致，我想现在我敢说出我的看法了。这封信根本不是公函，而是一封私人信件。从抬头‘非常尊敬的先生’这一称呼来看，事情就很清楚了。此外信中只字未提您已经被聘为土地测量员，只是很笼统地说为大人供职，而且就连这话的措辞也没有约束力，说您被聘只是‘如您所知’，就是说您已被聘这一点要由您自己来证明。最后，在公务上，只要求您找我这个村长，您的直接上司，由我告诉您一切细节，这件事我已经做了一大半了。对一个读官方文件很在行，因此也更会读非官方信件的人，这些都再清楚不过了。您是外乡人，看不出这一点我并不觉奇怪。总的说来，这封信只能说明克拉姆在一个条件下打算亲自过问您的事，那就是：如果您被聘为大人供职。”

“村长先生，”K.说，“这封信让您这么一解释，到最后差不多只剩下一个写在一张白纸上的签名了。〔10〕难道您不觉得您这么做是在贬低您口口声声说要尊重的克拉姆的名声吗？”

“这是误解，”村长说，“我并不是看不到这信的重要意义，我的解释并没有贬低它的价值，而是恰恰相反。一封克拉姆私人信件当然比一份公函意义要重大得多；只是您认为它有的那种意义它正好没有罢了。”

“您认识施瓦尔策吗？”K.问。

“不认识，”村长说，“你大概认识吧，米齐？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这真是怪事，”K.说，“他是城堡一位副主事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您怎么可以要求我认识所有城堡副主事的所有儿子？”

“很好，”K.说，“那么您就只好相信我说的，承认他就是城堡一位副主事的儿子。同这个施瓦尔策，我在到这里的当天就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争论。后来他打电话给一个叫弗里茨的副主事询问，答复是我已经被聘任为土地测量员了。这您又怎么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这一点正好说明您从来还没有同我们的官府接触过打过交道嘛！所有这一切接触统统是表面文章，由于对情况完全无知，您竟将它们信以为真了。至于说到电话嘛，您瞧，我和官府在公务上的联系怎么说也是够多的了吧，可是我这里就没有电话。在酒店一类地方电话可能有相当大的好处，好比是百音盒那一类东西，更大的作用也就没有了。您在这里打过电话吗？打过？好，那您也许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城堡里的电话显然非常灵；我听人说过，那里总是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这当然使工作的进度加快许多。那边连续不断的电话，我们这边电话机里听起来就是不停的嗡嗡声和歌唱声，这您一定也听到了。但我们这里的电话所能传达的唯一正确可信的东西，也就是这种沙沙声和歌唱声，别的信息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同城堡之间并无确定的电话线路，没有总机接转我们打去的电话；从这里给城堡中某人挂电话时，那边最下一级的办事部门的电话就都一齐响起来，甚至于，这点我知道得很清楚，要不是城堡里几乎所有电话机上的响铃装置都关上了，那么所有的电话机就都会响起来的。偶尔有个别过于疲劳的官员觉着需要放

松一下消遣消遣，特别是晚上或夜间，他就会把响铃装置打开；那时我们就能听到回话了，可那叫什么回话，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谁有权力为了想解决自己一点小小的私人困难而用电话铃声去干扰那些极为重要的、忙得人晕头转向的紧张工作？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连一个外乡人也会以为，要是他比如说打电话给索尔蒂尼，那么接电话答复他的就一定是索尔蒂尼了。说多半会是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部门的一个小小记录员，这可能性不是反倒更大些吗？反过来说，在极少有的时候当然也会出现打电话给小记录员时反倒是索尔蒂尼本人来接电话的情况。那时当然是趁着还没听到他开腔说第一句话就赶紧跑开为妙。”

“我确实没有这样去看问题，”K.说，“这些细节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可是我对这些通过电话进行的谈话并不寄予多大期望，我一直很清楚，只有直接在城堡听到的或者争取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重要的东西。”

“不，”村长抓住K.话中的一点说，“这些电话答复当然是实实在在的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说不是？怎么可以说一个官员从城堡发出的一条信息一点不重要？这一层刚才谈到克拉姆的信时我已经说了；他的信中的所有的话都没有公务上的重要性；如果您认为有，那您就错了；可是反过来说，它们在表达友情或敌意方面对个人来说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多半比任何公务上的重要性还大呢。”

“好吧，”K.说，“如果情况真的都像您说的那样，那么我在城堡里已经有一大批朋友了；严格说来，许多年前那个部关于可以考虑聘请土地测量员的想法本身，就已经是对我的一个友好行动，往后，这种友好行动便接踵而至，直到我终于——当然这不是好结果——被哄骗到这里，现在又警告我说要把我轰出去。”

“您的看法中有一定的正确成分，”村长说，“您认为不能单从字面上理解城堡的话是对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小心谨慎总是必要的吧，不仅仅在这里，而且，有关的那句话越是重要，就越要小心谨慎。可您后说的什么被哄骗到这儿来，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您听我的话时更细心一些，那么您怎么会不知道，聘请您来这个问题是太难太难了，我们不可能在这儿通过一次短短的交谈就说清楚的。”

“那么，我们谈话的唯一结果就是，”K.说，“除了轰我走一点很明确外，别的什么都是一团乱麻、一笔糊涂账了。”

“谁敢轰您走呀，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正是因为聘任前许多问题不清楚，才保证了这里能以最礼貌的方式对待您，只是看样子您这人太敏感了。这里是没有谁拉住您不让您走，但这还不等于轰您啊。”

“哦，村长先生，”K.说，“现在您倒又成了对某些事情独具慧眼洞若观火的人了。我要告诉您的是，这里有的是拉住我不让我走的情况，我可以列举一些给您听：我为了来这里不得不牺牲家乡的一些东西；我经过长途跋涉才到了这里；由于受聘，我心里萌发了一些合情合理的希望；我现在经济上莫名分文，现在也不可能在家乡重新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条：我的未婚妻是这里的人。”

“唔，弗丽达，”村长毫不惊奇地说，“我知道的。不过弗丽达不管您去哪儿都会跟着去的。当然对其余的问题的确需要作一些考虑，有关情况我将向城堡报告。万一有什么决定下来或者在此之前还有必要质询您，我会派人请您来的。这样办您同意吗？”

“不，我决不同意，”K.说，“我不需要城堡的恩赐，我只想讨个公道。”

“米齐，”村长向一直紧贴在他身边坐着的妻子说，她早已把克拉姆的信折成一只小船，现在怔怔地把它拿在手里玩弄着，K.见状大吃一惊，立即从她手里把信夺了过来。“米齐，我的腿又疼得厉害起来了，我们得换一条新的敷布了。”

K.站起身来。“那么我就告辞了。”他说。“是得换换了，”米齐说，已经在调制膏药，“这儿过堂风也太大了。”K.转身准备走；两个助手呢，在一听到K.说要走的话之后立刻又表现出他们那总是让人觉得别扭的积极性，马上把两扇门都打开了。为了不让病人受到那骤然涌入的寒气袭击，K.只能匆匆向村长一鞠躬。然后他拽着两个助手跑出屋去，迅速把门关上。

第六章

酒店前，老板在等着他。看那样子不问他话他是不敢吭声的，因此K.问他有什么事。“你找到新住处了吗？”老板眼睛瞅着地面问。“是你太太让你来问的，”K.说，“你大概什么都得听她的吧？”“不，”老板说，“不是她让我来问的。但是现在她因为你的缘故情绪很激动，心里很

不舒坦，什么活也干不下去，只是躺在床上叹气，一个劲地诉苦。”“要我去看看她吗？”K.问。“我求您了，”老板说，“我早就到村长家去接你，一直在门外候着，但你们正在说话，我不想打搅，另外我也惦记着我女人，又跑回去一趟，可她不让我走近她跟前，我没法子，只好在这儿等你了。”“那我们就快走吧，”K.说，“我不需要多久就可以使她心安的。”“要是真能那样就好。”老板说。

他们穿过明亮的厨房，那里，三四个女仆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干活，相互离得挺远，一见K.进来简直就一下子呆若木鸡了。在厨房里已经听得见老板娘唉声叹气了。她躺的地方是用一块薄木板从厨房隔出来的、没有窗户的隔断。这个隔间只能放下一张较大的双人床和一个柜子。床的位置放得使人可以从床上看到整个厨房以便监视女仆们干活。反过来，从厨房几乎看不见隔断里任何东西。那里黑洞洞的，仅可见白红相间的床单微微闪亮。人走到里面去，眼睛逐渐适应了之后，才能分辨隔断里的各种物品。

“您终于来了。”老板娘说，显然很虚弱。她仰卧着，四肢伸直，看来呼吸有点困难，羽毛被也掀了起来。她躺在床上比穿起衣服来时显得年轻得多，可是她头上戴着的用细花边织成的小睡帽，虽然由于太小扣在头发上有点摇摇欲坠，却使人对她那张病恹恹的脸产生怜悯之情。“我怎么会早来呢？”K.柔声说，“您又没有派人去叫我。”“您不应该让我等这么久，”老板娘带着病人常有的固执说，“您请坐，”她说指着指床沿，“你们别的人统统出去！”原来，这小屋此时除了两个助手外那几个女仆也挤了进来。“我也出去吧，加尔德娜。”老板说，这是K.初次听到这女人的名字。“你当然也出去，”她慢条斯理地说，心里似另有所思，又漫不经心地补充道：“为什么偏偏你一个人留下？”但当所有的人都退到厨房——两个助手这次也立即遵命，不过他们是紧迫在一个女仆屁股后面——之后，加尔德娜又不那么走神了，她发觉从厨房里能听到这里面谈的每一句话，因为隔墙并没有门，于是就又命令所有的人离开厨房。全体马上照办了。

“劳驾，”现在加尔德娜说，“土地测量员先生，柜子里靠柜门挂着一件斗篷，请递给我，我想拿它盖在身上，这羽毛被我受不了，压得人气都喘不过来。”K.把斗篷拿给她以后，她说：“您瞧，这件斗篷很好看，不是吗？”K.觉得那是件很普通的毛呢斗篷，仅仅出于礼貌伸手摸了摸，什么话也没说。“是啊，这斗篷确实很好看。”说着加尔德娜便把斗篷围

盖在身上。现在她心神宁静地躺着了；似乎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光，她甚至想到她那由于老躺着而弄乱了的头发，坐起来一会儿，用手整整小睡帽四周的发穗儿。她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K.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口道：“老板娘太太，您曾经让人问我是不是找到了另一个住处。”“我让人问您了吗？”老板娘说，“没有这事，您弄错了。”“您丈夫刚刚问过我这事。”“这我相信，”老板娘说，“我跟他吵了一架，我不愿让您在这儿那会儿，他留下了您，而现在呢，我很高兴您能住这儿了，他却要把您轰走。他这个人老这样，差不多总是跟我对干。”“这么说，”K.说，“您对我完全另眼相看了？一两个小时工夫看法全变了？”“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老板娘说，声音又变得弱了些，“请把手伸给我。对，就这样。好了，现在请您答应我要说心里话，我对您也说心里话。”“好的，”K.说，“可谁先开始呢？”“我先说。”老板娘说。她这话给人的印象并非想照顾K.，倒像是她自己急于一吐为快似的。

她从床垫下面抽出一张照片递给K.。“您看看这张照片吧。”她央求说。为了看清楚一点，K.向厨房方向走了一步，然而即使这样，想看清照片上有什么也很不容易，因为这张照片日久褪色，有多处折痕，揉得皱巴巴的，并且上面尽是污渍。“这照片保护得不太好。”K.说。“太可惜，太可惜了，”老板娘说，“长年累月的老带在身边到处跑，就成了这样。可是您要是仔细看，那肯定还是什么都能看清的。另外我也可以帮帮您，您告诉我您都看见什么了吧，听人讲讲这照片我是很高兴的。那么，您看上面是什么？”“一个年轻的男人。”K.说。“对，”老板娘说，“他在干什么？”“我看他是躺在一块木板上，在那儿伸懒腰、打哈欠。”老板娘笑起来，“完全错了。”她说。“可这里明明是块木板，他就躺在这里嘛。”K.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您倒是再仔细看看呀，”老板娘有点生气了，“他真的是躺着吗？”“对了，不是躺着，”K.这回说，“他不是躺着，是悬在半空中，还有，现在我看清了，底下也根本不是什么木板，看样子大概是根绳子，对，这年轻人正在跳高。”“这就对啦，”老板娘高兴地说，“他在跳高，官府的信差就是这样练习的。我早知道您一定会看出来。他的脸您也看清楚了吗？”“脸很不清楚，”K.说，“他显然很卖力，张着嘴，眼睛眯成一条缝，头发也飘起来。”“太好了，”老板娘赞许地说，“一个没亲眼见过他的人再多就看不出来了。他是个美男子；我只同他见过一面，时间也很短，但永远也忘不了他。”“这到底是谁呀？”K.问。“他，”老板娘说，“就是克拉姆头一回派来叫我去的信差。”

K.现在没法集中精力听她讲，一阵咚咚咚咚敲玻璃的声音分散了他的注意。他立刻找到了干扰的来源：原来是两个助手。他们在外面院里两脚交替不断在雪地里蹦蹦跳跳；这会儿做出一副又见到K.感到特别高兴的样子；每人都欢天喜地地指K.给对方看，并不停地用手指尖敲厨房窗子。K.向他们打了一个吓唬的手势，两人便立即停止了敲窗，每人都想挤到另一人前面去，但另一个马上闪开，过一会儿两人又都站在窗前。K.赶忙跑回隔间里一个两人从外面看不到他而他也不必看他们的地方。可是即使在那里，窗玻璃那轻轻的好似在请求的咚咚声也久久缠绕着他。

“又是两个助手。”他抱歉地向外面指指，对老板娘说道。然而她没有理睬，这时她早已把照片从K.手里拿了过去，看了一阵后，把它抹抹平又塞到床垫底下去了。她的动作此时比先前迟缓了一些，但不是由于疲乏，而是回忆的重压所致。她刚才只是想给K.讲点什么，但讲着讲着倒把它忘了。现在她拨弄着她的手绢的穗子。片刻之后才又抬起头来，用手很快揉了一下眼睛说：“这条手绢也是克拉姆的。还有这顶小睡帽也是他的。照片、手绢和睡帽，这就是我保存着的克拉姆的三件纪念品。我没有弗丽达年轻，没有她那么大的野心，也没她那么会体贴人，她非常会体贴人；总之，我能将就着过日子，可有一样我得承认，就是如果没有这三样东西，我在这里是挺不了这么久的，唔，我在这儿大概连一天也熬不下去。这三件东西也许您觉得微不足道，可您瞧，弗丽达同克拉姆来往时间够长了，却什么纪念品也没有。我问过她的，她太喜欢幻想，也太不知足；我恰好相反，克拉姆那里我只去过三次——后来他就再没派人来叫我，我不知为什么——可是我好像有预感，知道的时间不长所以捎回来这几件纪念品。当然，这事得自己操心，克拉姆什么也不会主动给人的，但要是你看见他那里摆着什么，可以求他送你。”

不论这些故事与他多么有关，K.听了总是感到阵阵不舒服。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叹口气问道。

“20几年前，”老板娘说，“是20多年、快30年前的事了。”

“过了这么长时间对克拉姆还那么一往情深，”K.说，“可是，老板娘太太，您心里是不是也很清楚，如果我现在想到自己将来的婚姻，那么听到您这些自白会使我产生很大的忧虑呢？”

老板娘觉得K.要把自己的事情搅和进来未免不成体统，气呼呼地也斜了他一眼。

“别生气，老板娘太太，”K.说，“我一句克拉姆的坏话也没说，但我不知怎么阴错阳差地竟同克拉姆有了某种关系；这一点即便克拉姆最大的崇拜者也不能否认吧。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说，只要一提到克拉姆，我便总联想到自己，这是一点办法没有的事。不过，老板娘太太，”说到这里K.握住了她那犹犹豫豫的手，“您想想，我们上次谈话的结果是多么不愉快，让我们这次和和气气地分手吧。”

“您说得对，”老板娘说完低下头去，“但是请您不要捅我的痛处。我不比别人更敏感，而是相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敏感部位，我只有这一个敏感部位。”

“可惜这正好也是我的敏感部位，”K.说，“但我一定能做到自我克制；不过老板娘太太，请您倒是给我讲讲，如果弗丽达在这方面也跟您差不多，那么我婚后究竟应该怎样忍受这种对克拉姆的可怕的一往情深呢？”

“可怕的一往情深？”老板娘不满地说，“难道那是忠贞不渝的深情？我只对我的男人有忠贞不渝的深情，而克拉姆呢？克拉姆使我一度做了他的情人，难道我什么时候会丢掉这种风光体面？要问您在弗丽达身边怎么忍受这一点吗？哎呀，土地测量员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敢这样问？”

“老板娘太太！”K.发出警告了。

“我知道，”老板娘说，不再咄咄逼人了，“可我男人就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说谁不幸——是那时的我呢还是现在的弗丽达；是那个轻率地离开了克拉姆的弗丽达，还是克拉姆没再派人来叫的我？也许还是弗丽达不幸，虽说她看样子不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是，我当时的不幸确实更使我揪心，因为我老想不开总是问自己，就是到今天实际上我也还没有停止自问：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克拉姆三次叫你去过，不再叫第四次了，永远不会再有第四次了！那时还有什么事让我想得更多？不久以后我就同我现在的男人结婚了，结婚后那段时间我跟他还能谈什么别的？白天我们没时间，我们接管酒店时铺子的情况很糟，我们得使大劲扭转局面让它好起来，可到了夜里呢？好几年我们夜里说话都

只是围着克拉姆转，围着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转。有时说着说着我男人睡着了，我就叫醒他，然后我们又接着说下去。”

“现在我想，”K.说，“如果您允许，现在我想提一个很不得体的问题。”

老板娘沉默不语。

“那么您是不许我问了，”K.说，“行，我觉得这也够说明问题了。”

“当然啰，您觉得这也够说明问题了，特别是我的态度您觉得够说明问题了。您真是什么都要曲解，连不说话也要曲解，真没办法，您还会干什么别的呢？我允许您提问。”

“如果我什么都曲解，”K.说，“那么也许我也曲解我自己的问题，也许它根本就不那么不得体吧。我只想知道您是怎样认识您丈夫的，这酒店是怎样到你们手里的？”

老板娘皱起了眉头，但仍从容不迫地坦然说道：“这事很简单。我父亲是铁匠，汉斯呢，就是我现在男人，他原来是一个富裕农民的马车夫，那时他常来找我父亲。那是在我同克拉姆最后一次会面以后的事，当时我伤心极了，其实不应该那样，因为什么事都没有出，不就是我不能再去克拉姆那儿了吗，这是克拉姆的决定，也就是说这是对的；仅仅是为什么不能去的原因不清楚，尽可以去弄弄清楚好了，然而伤心是不对的。可是有什么法子，我还是伤心了，干不了活，成天价坐在我家屋前的小花园里。汉斯就是在那儿看见我的，他时不时来我旁边坐坐，我没有对他诉苦，但他知道我的心事，因为他心眼儿好，所以我们两人经常哭做一处。那时候的酒店老板因为死了妻子不得不出让他的酒店——另外他也老了——当他有一次路过我们的小花园，看见我们坐在那里时，就站住，干脆地提出把酒店出租给我们，他说他信任我们，不要我们预先付钱，将来租金也定得很低。我当时只是不想成为父亲的累赘，别的什么都不在乎，于是，心里想着酒店，想着那新的工作，它也许能使我忘记一点往事，我便把手伸给汉斯^[2]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一阵沉寂之后，K.说：“那位店老板的做法是好的，但不够谨慎，要不，是不是他有什么特殊理由才对你们两个这么信任？”

“他对汉斯很了解，”老板娘说，“他是汉斯的舅舅。”

“这就对了，”K.说，“那么汉斯家显然巴不得同您结亲了？”

“也许吧，”老板娘说，“我不知道，我从不操心这事。”

“但事情肯定是这样的，”K.说，“不然这家人怎么会心甘情愿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把酒店就这样没有任何担保交给了您？”

“后来的事实说明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不谨慎，”老板娘说，“我干活卖力，身体壮，铁匠女儿嘛，我不需要女仆也不需要男仆；哪里都是我管，店堂里，厨房里，马厩里，院子里，我做的饭菜好，把贵宾楼的客人都给拉过来了。您还没在我们酒店吃过午饭，中午的客人都不认识，那会儿客人比现在还多，后来有不少人不再来了。苦干的结果，我们不光按期交了租金，几年后又把整座酒店买下了，今天我们几乎一点债也不欠。当然另一个结果是我的身体垮了，得了心脏病，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您也许觉得我比汉斯老得多，可事实上他只比我小两三岁，而且他是不会老的，他干的活——叼烟斗、听客人聊天、叼烟斗、偶尔去端杯啤酒——干这些活人怎么会变老呢？”

“您是劳苦功高，令人敬佩，”K.说，“这点没有疑问，可我们谈的是您结婚以前，那时汉斯舅舅家作出经济上的牺牲，至少是冒着把酒店白白送人的巨大风险，催着你们结婚，这样做时，看见的只是您这个当时人家还根本不知底细的劳动力和汉斯那个实际上等于零的劳动力（这一点也一定不会是后来才知道的），除此之外别的什么指望也没有，这些在当时总会让人感觉奇怪吧。”

“是啊，”老板娘疲倦地说，“我知道您讲这些是什么意思，您这样想是大错特错了。克拉姆跟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他犯得着为我操心吗？说得更准确点：他怎么可能操心我的事？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他对我的情况就一点不了解了。他没有派人叫我，就明明白白表示他已经忘掉了我。只要他不再叫谁，就把谁忘得一干二净。我不想当着弗丽达谈这一点。可事情还不只是忘记，比忘记还糟。你要是忘了谁，以后还可以重新认识，但对克拉姆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不再叫谁，那么他不仅把这人的过去忘得干干净净，而简直就是今后一辈子也不可能再认得他了。我现在如果费点劲，完全能设想出您这会儿的心思，这些想法在我们这里是很荒谬的，在您的家乡也许行。很可能您已经荒唐到这种地步，就是以为克拉姆把汉斯给我做男人，正是为了他以后再叫我去时，我不会遇到多少阻碍。这种想法真是荒唐透顶。克拉姆一发话，世

界上哪个男人能挡住我跑到他那儿去？荒唐，不折不扣的荒唐；同这种荒唐想法扯皮，真是会把自己都给弄糊涂呢。”

“不，”K.说，“我们不要把自己搞糊涂，虽然说出老实话我的思路是朝着那个方向走，但我的想法远不像您设想的那么糟糕。目前使我惊讶的只是，为什么您的亲戚会对这门亲事抱那么大希望，这些希望又都真的没有落空，当然，靠的是您全心全意的投入和牺牲您的健康。这些事实同克拉姆有关系，这个想法的确不由自主地在我脑里出现了，但并没有或还没有达到您描述的那种荒唐程度，您所以要夸大，显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有理由再训我一顿，因为这样做使您感到愉快。好，我就给您这种愉快吧！可是我的真实思想是这样的：首先，克拉姆显然促成了这桩婚事。要不是克拉姆，您当初就不会感到不幸，不会无所事事地坐在屋前小花园里，要不是克拉姆，汉斯就不会在那里看见您，当时您要是不伤心，那个腼腆的汉斯绝不敢跟您搭腔，要没有克拉姆您决不会同汉斯哭做一处，没有克拉姆好心肠的酒店老板舅舅决不会见到您和汉斯两人和和顺顺地待在一起，没有克拉姆您就不会把人生看淡了因而也就不会同汉斯结婚。好了，恐怕已经可以说在所有这些事上克拉姆的影响都够大了吧，然而还不止这些。要不是您一个心眼儿想忘掉过去，您就不会那样一点不顾惜自己拼命工作，就不会把酒店搞得那么红火。您看，这儿又有克拉姆。除此之外，克拉姆还是您得病的原因，因为您在婚前就已经被那不幸的热恋弄得心力交瘁了。现在还剩下的问题是，这门婚事对汉斯的亲戚吸引力这么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您自己提到过做克拉姆的情人意味着一辈子丢不掉的风光体面；那么可能这一条对他们有吸引力。但我认为除了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希望那颗福星，那颗把您引到克拉姆身边的福星——如果说那确是一颗福星的话，您自己是这样说的——能永远高照在您头上，永远与您同在，决不像克拉姆所做的那样，突然一下子离开您。”

“您这些话全是认真的？”老板娘问。

“全是认真的，”K.不假思索地答道，“不过我觉得汉斯的亲戚抱着那些希望既不完全对又不完全不对，我还觉得自己已经看出他们究竟错在哪里了。从外表上看，似乎一切都如愿以偿，汉斯生活有了保障，有个身强力壮的妻子，日子过得体面，店铺也不亏欠。但事实上并非事事如愿，如果他同个普通姑娘结合，如果他是这姑娘的初恋、热恋的对象，那么他肯定比同您结合要幸福得多；您怪他有时候像丢了魂儿似的

站在店里发愣，我看他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他的确觉得自己像丢了魂儿似的——当然他肯定不会因此而觉得不幸，这一点我对他还是了解的——可同样肯定的是，像他这样一个长相很好又一点不笨的男人，要是同另一个女人结婚，就会更幸福，我说的幸福同时也是指更独立、更勤快、更有男子气。而您本人呢，现在肯定是不幸的，并且如您说的，要是没有那三件纪念品您一天也活不下去，另外您还得了心脏病。这么说汉斯的亲戚抱着那些希望就错了吗？也不尽然。福星的确在您头上高照着，福气就在头上，只是你们谁也不会把它取下来罢了。”

“我们到底耽误了什么？”老板娘问。这时她伸直身子仰卧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

“你们本来该去问一问克拉姆的。”K.说。〔11〕

“这不我们又回到您的事上去了。”老板娘说。

“或者说是回到您的事情上，”K.说，“我们的事情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你究竟想找克拉姆做什么呢？”老板娘问，这时她坐直了身子，把枕头抖松垫在身后靠着，目光直视K.的眼睛，“我已经把我的事情坦率地告诉了您，希望您能从中得到一点教益，现在请您也同样坦率地告诉我您想问克拉姆什么。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了弗丽达到楼上她自己房里去；我担心当着她的面您是不会痛痛快快说话的。”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K.说，“但我想请您先注意一点。您刚才说克拉姆忘性很大。首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其次这一点也无法加以证明，显然不过是那些刚刚在克拉姆那里失宠的姑娘们臆想出来的无稽之谈。我觉得奇怪的是您怎么也相信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臆造。”

“这不是无稽之谈，”老板娘说，“而是大家的经验之谈。”〔12〕

“所以说也就可以用新的经验来驳倒它嘛，”K.说，“另外您同弗丽达还有一点不同。说克拉姆不再叫弗丽达去了，可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相反，他是叫了她而她没有去。甚至有可能他一直还在等着她呢。”

老板娘不言语了，只是把K.上下打量了一阵，然后说：“我想平心静气地听听您有些什么要说的。您最好还是坦率地有什么讲什么，不要考

虑我能不能接受。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您别提克拉姆的名字。您管他叫‘他’或者什么的都行，就是别点名。”

“完全可以，”K.说，〔13〕“不过我想求他点什么很难说。首先，我想亲眼见见他，再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另外还想知道他对我 and 弗丽达结婚抱什么态度。还想再求什么，这就要看我们谈话的进展如何才能决定了。可能有些事要谈谈，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能面对面地同他说几句话。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同任何一位真正的官员直接谈过话。这事看起来比我原先设想的要困难些。但是现在我有责任请他以私人身份同我谈谈，办到这点我觉得要容易多了。他以官员身份出现，我就只能在他那也许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的办公室里会他，不是在城堡里就是在贵宾楼（这后者现在看来也成了问题）。可是如果以普通人身份出现，就不受地点限制了，可以在家里，在街上，只要我能碰上他，什么地方都行。碰见他时我面对的人附带也是官员，这一层我将乐于忍受，但会见官员不是我的首要目的。”〔14〕

“好，”老板娘说，一边把脸埋到枕头里去，似乎在说什么羞于启齿的话，“如果我通过我的各种关系把您求见的愿望转达上去，让克拉姆知道，那么您能不能答应我在回话下来之前不自作主张采取任何行动？”

“这个我不能答应，”K.说，“虽然我很乐于满足您的请求，照您的意思办事，然而这件事我不能答应。因为事情很紧急，特别是我同村长谈话的结果很不理想。”

“这个考虑是没有必要的，”老板娘说，“村长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难道您没有看出这点？他什么事都是老婆说了算，老婆不在他连一天村长也当不下去。”

“是米齐吗？”K.问。老板娘点点头。“我见村长时她也在场。”K.说。

“她说什么了吗？”老板娘问。

“没有，”K.说，“我的印象是，恐怕她也说不出什么来。”

“您又来了，”老板娘说，“您把这里的事全看偏了。总而言之，在您的问题上村长不管发什么指示都无效，而他的女人我有机会时会跟她谈的。现在，如果我再答应您克拉姆的回话最迟一星期就会来，您大概再

没什么理由跟我顶下去了吧？”

“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K.说，“我主意已定，即便下来的回话是拒绝，我也仍要努力按我的这个主意去做。但既然我一开始就有这种打算，我就不能事前请人转达我的会见请求了。未经事先请求去做，也许怎么说也只是冒昧的，然而真心诚意的企图，但如果在遭到拒绝后仍坚持做，那就成了蓄意违抗，那就糟得多了。”

“糟得多吗？”老板娘说，“不管哪种做法都是蓄意违抗。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请把裙子递给我。”

她不再理睬K.，穿上裙子急忙到厨房去了。这时，已有好一阵子可以听到从店堂传来的吵闹声。有人敲过墙壁上的窥视窗，两个助手也有一次猛地把它推开，向屋里叫嚷肚子饿，接着又有另一些面孔在那里出现过，现在甚至可以听见有一些人在轻声哼一支混声合唱。

的确，K.同老板娘的谈话大大推迟了做午饭的时间，现在饭还没有做好，而客人已经聚起一大堆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违反老板娘的禁令进入厨房。可这会儿呢，窥视窗旁的几个探头探脑的人报告说老板娘已经动身，那帮女仆便马上跑进厨房去了，K.走进店堂时，那多得出人意料的一群人，20多个男女，穿着俗气而不土气的衣服，便从窥视窗他们原来聚集的地方一窝蜂向店堂的一张张桌子拥去，为的是抢到一个座位。只有屋子一角的一张小桌旁已经坐着一对夫妇和几个孩子；那男的是个和颜悦色的先生，有一双蓝眼睛，长着灰色的、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正弯腰向着孩子们，用餐刀指挥他们唱歌，不断示意孩子们压低声音；也许他是想用唱歌来使孩子们忘记肚子饿吧。老板娘过来向众人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道歉话，没有谁责怪她。她四下张望寻找店老板，但此公大概早已为躲开这难以应付的局面而逃之夭夭了。然后，她慢慢地向厨房走去；对现在奔向自己的房间去找弗丽达的K.，她再不看一眼了。

第七章

在楼上，K.碰到了那位教师。弗丽达真是个非常勤快的人，她已经把屋子收拾得焕然一新，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现在屋里空气新鲜，炉火正旺，地板也擦洗干净，床铺整整齐齐，那几个女仆的衣物，那堆讨厌的破烂儿，连同她们的照片全部杳无踪影，桌子呢，原先它那张糊满了污垢和油渍的面板简直是不管人转到哪里都在身后紧盯着，弄得人浑身不自在，现在也铺上了一块手工编织的白生生的台布。已经可以在此接待客人了；K.的换洗衣服弗丽达显然一大早就洗了，这会儿挂在炉子旁边烘干，倒并不怎么碍眼。教师和弗丽达原先坐在桌旁，一见K.进屋便都站了起来。弗丽达用一个吻迎接K.，教师则向他微微鞠了一躬。K.因为刚同老板娘那一席谈话的影响，情绪还没有平复，有点神思恍惚地向教师就自己直到现在还未能造访他表示歉意；那神态，使人觉得似乎他以为教师是因他一直未去而急不可耐地自己找上门来了。然而教师却表现出从容不迫的神色，好像他现在才渐渐回忆起在他与K.之间过去曾有过造访之约似的。“哦，土地测量员先生，”他慢条斯理地说，“您不就是我前几天在教堂广场幸会过的那位外乡人吗。”“对。”K.简短地回答；上一次他是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只好忍气吞声，现在是在这里，在他的房间里，用不着再受这份窝囊气了。他立即转向弗丽达，同她商量一次重要出访的事，说他必须立即进行这次访问，而且要尽可能穿得讲究些。弗丽达不再细问，立刻叫那两个此刻正琢磨新台布的助手，吩咐他们把K.就要脱下来的外衣和靴子拿到下面院子里去好好刷干净。她自己则从晾衣绳上拿下一件衬衫，跑到下面厨房里熨烫去了。

现在，K.同那重又默默坐在桌旁的教员单独在一起了；他让他再等一会儿，自己脱去衬衫，到洗脸盆边擦洗起来。只是到了这时，即当他背对着教员时，才开口问他的来意。“我是受村长先生的委托而来的。”他说。K.表示很想听听是什么委托。由于K.的话音在洗澡水声干扰下听不清楚，教师只得走近一些，靠在K.身旁的墙上。K.以计划中的访问十分急迫为理由，请教员原谅他现在必须洗一洗，原谅他现在无法安下心来。教员对此不置可否，只是说：“您对村长先生这位劳苦功高、经验丰富、备受尊敬的老前辈也太不客气了。”“我不知道我对他有什么不客气的地方，”K.一边擦干身上的水一边说，“但是，要说我当时因为心里有别的事情要考虑而没有想到应该注意自己的风度举止，那倒是真的。为什么要想别的？因为事情关系到我的生存，我的生存受到可耻的

官僚机构的威胁，这套官僚机构的详细情况我用不着向您作什么解释，因为您本人就是这个官府机构的一名活动分子。村长抱怨我了吗？”“他向谁去抱怨你呢？”教员说，“即便有这么个人，但难道他这个人会抱怨吗？我仅仅根据他口述的简短记录，整理了一份关于您同他谈话的材料，从这份材料中我对村长先生的善意，对您答话的方式获得了足够的了解。”

K.一面翻找梳子——一定是弗丽达归掇屋子时把它收起来了——一面说：“什么？一份记录？背着我让一个谈话时根本不在场的人事后整理出一份记录？这可真不简单呀。请问究竟为什么要记录？难道那次谈话是一次官方的公务往来？”“不，”教员说，“是半官方的，记录也是半官方的；这样做仅仅因为我们这里任何一件事都必须符合严格的制度。无论如何现在这份材料已经是白纸黑字，它不是给您脸上增添光彩的。”这时K.找到了梳子——它滑到被子里去了——心情平和了一些，说道：“白纸黑字就白纸黑字吧。您就是特地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吗？”“不是，”教师说，“但我不是一部机器，是个活人，我得把我的看法告诉您。而我接受的这一委托则进一步证明了村长先生的善意；我要强调一下：我自己并不理解这种善意，我只是职务在身，身不由己，再就是怀着对村长先生的敬意才来执行这个委托的。”现在K.已经梳洗完毕，安然坐在桌旁等着衬衫和其他衣服；对教员给他带来的消息，他并不怎么急于要知道；另外他也受到老板娘对村长那不屑一提的态度的影响。“现在大概已经过了中午吧？”他心里想着要上路的事发问道，然后又改口说：“您刚才说要向我传达村长的什么话来着。”“唔，是的，”教员说，耸了耸肩，似乎想以此摆脱自己对这事任何责任，“村长先生担心，如果关于您的事的决定迟迟不能下达，您会自作主张采取欠考虑的行动，至于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担心；我的看法是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我们又不是您的守护神，没有责任您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可有什么法子呢。村长先生持不同的看法。决定本身是伯爵大人当局的事，村长当然无法让它快些下达，然而他可以而且也准备在他的权限范围内作出一个暂时的、真正是豁达大度的决定，现在问题只在您接受不接受这个好意；那就是：作为临时措施，他先给您提供一个学校勤杂工的工作。”K.首先并不怎么关心提供他的究竟是什么工作，而给他提供一个工作这个事实本身，他倒觉得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村长认为他有能力为保护自己而采取某些行动，而为了防范这些行动使其不致危及自身，村公所甚至觉得作出某些破费也值得。他们是多么重视这件事啊！这个在这里等了他好一阵、来之前又整理了文字记录的教员，肯定是被村长下一道十

万火急的命令轰赶到这里来的！当教员看到他的话真的使K动了心，开始考虑这个建议时，便接下去说：“我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我指出我们一直不需要勤杂工；教堂司务的女人时不时来打扫一次，我们的女教师吉莎小姐负责督促她。我自己光对付那帮孩子就够受的了，不想再跟一个什么勤杂工怄气。村长先生回答说，可现在学校里确实很脏。我照实情回答他说，情况并不是那么严重。然后我又补充说，难道我们用这个人当勤杂工就能使情况好转？肯定是不可能的。撇开他完全不会干这些杂活不谈，拿住处来说，学校只有两间大教室，没有多余的房间，这个勤杂工来了只好同他的家属住两间教室中的一间，在那里睡觉，也许还要在那里做饭，这当然不可能改善学校的卫生状况。但是村长先生指出，这个工作对您来说是救您的急，所以您是会全力以赴，忠于职守的；另外村长先生又说，争取了您，我们同时也就争取到了您的妻子和助手作为劳动力，这样一来不仅学校那所房子，就是校园也可以保持最佳的清洁整齐状态。他这些话我全都轻而易举地驳倒了。最后村长再也提不出什么理由为您说好话，便笑着说，您不是土地测量员吗，那自然能把校园里那些花坛整治得笔直漂亮啊。您看，玩笑话是没法反驳的，于是我就带着他的委托到您这儿来了。”“您过虑了，老师，”K说，“我是决不会接受这个职位的。”“这太好了，”教师说，“太好了，您这是毫无考虑余地的断然拒绝。”说完他拿起帽子，鞠了一躬，走了。

紧接着，弗丽达神色慌乱地跑上楼来，手里的衬衫并未熨过，问她话也不回答；为了给她打打岔，K把刚才教师在这里的情况和学校的聘用建议讲给她听；她还没有听完，就把衬衫扔在床上又跑了。过一会儿她再次回来，然而同教员一起，教员一脸的不高兴，对K不理不睬。弗丽达请他再耐心等待一下——显然在到这里来的路上她已经求过他多次——然后就拉着K穿过一道他原先完全不知道的侧门来到隔壁阁楼上，最后，在那里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给他讲她遇到了什么事。原来，老板娘大动肝火，因为自己在K面前竟降低身份说了那么多心里话，更糟的是竟在关于同克拉姆会见的问题上对K作出了让步，而且得到的结果用她的话来说只是冷冰冰的、毫无诚意的拒绝，盛怒之下，她决心不再让K在自己店里待下去了；要是他同城堡有联系，那么就请他自己赶快去利用这些渠道吧，因为他必须在今天之内，不，必须立即离开这里，只有接到官方强制性的直接命令，她才会再接纳他；但是她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她同城堡也有不只一条联系渠道，她是知道怎样让它们发挥作用的。另外，他之所以来到店里纯粹是老板疏忽大意的结果，他本人也不是非住这儿不可，今天早上他还得意洋洋地夸口说有个地方为

他预备好了住处呢。老板娘说，弗丽达当然应该留下来；如果弗丽达要同K.一起搬走，那么她老板娘会非常伤心，在厨房里她一想到这个就禁不住哭起来摔倒在炉灶旁边，她这个可怜的、有心脏病的女人！但是，现在事关克拉姆的荣誉（至少在她的想象中是如此），她哪里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弗丽达说，老板娘的情况就是这样。弗丽达呢，她说她当然会跟随K.走遍天涯海角，这当然无须多讲，可无论如何他们两人的情况现在都非常糟糕，所以她对村长的建议感到欢欣鼓舞，即使这工作对K.不合适，但人家不是特别说明了吗，它只是临时的，这样做可以赢得时间，容易再找别的工作，即便上头的最后决定下来对他不利也无妨。“万不得已时，”最后弗丽达大声说，她这时已搂着K.的脖子，“我们就出走，到外地去，这个村子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可眼下呢，我最亲爱的，唔，我们就先答应做这个工作吧。我把老师拉回来了，你就对他说声‘我同意’，别的什么都不要再讲，我们这就搬到学校去。”

“这太糟了，”K.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因为住哪里他不大在乎，另外他现在只穿着内衣待在这里两边无墙无窗、仅有一股冰冷刺骨的穿堂风的阁楼上，也感觉冷得厉害，“现在你刚把房间归掇得整整齐齐舒舒服服，我们就要搬走！我真是很不乐意、很不乐意答应接受这个工作，在这个小小的教员面前表现得那么低声下气我已经很不自在了，何况还要让他做我的上司！哎呀，要是能在这里再待上一小会儿也好，或许今天下午我的情况就会有变化也难说。至少，如果你能留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等着瞧，先给那教员一个不肯定的答复，至于我，如果需要，找个住处总还是很好办的，真的，在巴纳……”没说完弗丽达就用手掌捂住他的嘴。“别说了，”她胆怯地说，“求你别再说这个了。除了这点我什么都依你。要是你愿意，我就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管这样我多么伤心。要是你愿意，我们就回绝人家，不管这样做我觉得多么不对。因为你看吧，如果你找得到另外的工作，甚至今天下午就能得到，那么我们当然马上就放弃学校这个工作，谁也不会阻拦我们。至于说到在教员面前低声下气，那么你让我来管这事好了，不会这样的，我会去同他谈，你只消一声不响站在一边就行，以后也是一样，如果不愿意你永远不必跟他说话，实际上只有我一人是他的下属，甚至我也不一定非当他的下属不可，因为我知道他的弱点。所以，如果接受这工作我们什么损失也没有，而要是拒绝，那损失就大了；特别是如果你不是今天以内就从城堡方面得到点什么，那么你在村里不论什么地方就都真的不能给自己哪怕是一个人找到住处，我的意思是说找到一个住处而不让我这个你未来的妻子感到寒碜。如果你没有住处，那么难道你要我睡在

暖暖和和的屋子里心安理得地想着你外面黑魆魆的夜里顶着冷风东跑西颠吗？”K.这一阵子一直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用手不断敲打后背以暖暖和和身子，现在他说：“这么说是一点别的办法也没有，只好答应了。走！”

一到屋里，他立刻跑到火炉边去；教员在那里，他根本不予理睬；这个人坐在桌旁，掏出表来，说道：“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是好在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了，老师，”弗丽达说，“我们答应做这个工作。”“好，”教员说，“可是这个工作是给土地测量员先生的。他本人必须表明态度。”弗丽达过来帮K。“当然，”她说，“他答应做这个工作，难道不是吗，K？”这样，K.就可以把他的表态压缩到只剩一个“是”字，甚至还不必对教员，而是对弗丽达说话。“那么，”教员说，“我现在需要做的只还有一件事，即向您明确您的职责，以便我们在这方面自始至终保持一致；土地测量员先生，您的职责是每天清扫两间教室，在教室里生火，对楼内及学校的工具及体操器材的轻度损坏进行修理，保证校园中路上没有积雪，负责为女老师和我递送文件，天暖和时还要负责校内全部园艺工作。与这些职责相适应，您有权在两间教室中挑选一间住宿；但是，如果不是两间教室同时上课，而您恰好在上课的那间住着，那您当然必须搬到另一间去。您不得在校内做饭，而是由村里出钱，让您和您的家属在这家酒店用膳。至于您的行为举止必须无损学校的尊严，特别是决不能让孩子们亲眼看到（尤其在上课时更不行）您家庭内部某些令人不快的场面，我这里只是附带提一提就够了，因为您是个有教养的人，一定明白这一点。与此有关，我这里还要提出，我们不能不坚决要求您尽快把您同弗丽达小姐的关系合法化。就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再加上其他几件小事，我们要拟定一份供职合同书，您一搬进学校就必须签署这份合同。”教员说的这一大套K.觉得都不重要，好像这与他无关，或至少对他没有约束力；只是教员那股子傲气激怒了他，于是他轻描淡写地说：“说来说去不过也就是一些很一般的职责罢了。”为减弱这话的影响，弗丽达出来打圆场，问薪水多少。“是否发给薪水，”教员说，“要试用一个月后才能考虑。”“这对我们可太苛刻了，”弗丽达说，“要我们几乎两手空空地结婚，要我们白手起家！老师，我们能不能向村公所递一份申请，请求马上发给我们一小笔薪水？您看这样做合适吗？”“不行，”教员说，一直是冲着K.讲，“只有经过我推荐，这样的申请才能获得批准，但我是不会推荐的。让您做这个工作不过是对您的一种好心的照顾，而对于一个责任感强的公职人员来说，这类好心的照顾是不能做得太过分的。”现在K.终于忍无可忍，几乎违反他的本意插嘴

了。“说到好心的照顾嘛，老师，”他说，“我认为您错了。恐怕说我是在好心照顾人更合适吧。”“不对，”教员微笑着说，他总算把K的嘴巴打开了，“关于这个我对情况非常了解。我们对勤杂工需要的迫切程度，就跟对土地测量员的差不多！不论勤杂工还是土地测量员，都是我们背上的包袱。雇勤杂工我还得大伤脑筋，考虑如何向村公所说明这笔开支的必要性。干脆把要求扔到桌上而根本不作任何解释，那样最好、最符合实际情况了。”“我正是这个意思，”K说，“您这是违心地、不得不接受我。虽然这事要让您大伤脑筋，可您还是不得不接受我。好了，如果某人被迫接纳另一个人，而这另一个人顺从了，愿意让他接纳，那么，总该说是这另一个人好心照顾他吧。”“真是奇谈怪论，”教员说，“究竟是什么迫使我们接纳你？是村长先生那颗善良的、过于善良的心迫使我们这样做！现在我看得很清楚，土地测量员先生，您得丢掉您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否则恐怕就无法做一个有几分用处的勤杂工了。对于发不发薪水一点来说，您这些言论当然也只能是帮倒忙。还有，令人遗憾的是我又发现您的品行以后还会给我带来许许多多麻烦；看吧，您和我谈话这么长时间了，可一直——我是瞪大眼睛不断看着，简直就不相信有这种事——只穿着背心裤衩。”“对了，”K一拍巴掌，笑起来说道，“这两个助手真够可以的！他们到底在哪儿杵着？”弗丽达忙向门口跑去；教员感到现在想再让K同自己谈话已不可能了，就问弗丽达，他们打算几时搬进学校。“今天。”弗丽达说。“那么我明天早上到学校查看一下。”教员说，然后挥手告辞，打算从弗丽达为自己打开的那道门出去，但在那里却同原先住在这里的那两个女仆撞了个满怀，原来她们已经抱着自己的东西回来，准备在这屋里重新安家了。两人简直就是横冲直闯，教员不得不左躲右闪地从她们中间穿行，弗丽达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你们也真够性急的，”K说，这一回他对她们非常满意，“我们还没有走你们就非得搬进来了？”两个女仆不回答，只是不好意思地把抱来的大捆衣物翻了一个个儿，于是K看见他早先见过的那些脏兮兮的破衣烂衫从包袱皮里耷拉出来。“你们大概从来没洗过这些东西吧。”K说，话音里并不带气而带有某种怜爱。她们也觉出了这点，同时咧开她们那棱角分明的嘴巴，露出两排美丽的、像动物牙口一般健全的牙齿，不出声地笑着。“来吧，”K说，“把你们的東西铺开放好，这是你们的房间呀。”当她们仍犹豫时——大概她们觉得自己的房间变得面目全非了吧——K就拉起其中一人的手臂，准备帮她迅速行动起来。但他立即又撒了手，因为两人目光露出极度惊讶，她们互使一个会意的眼色，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K。“现在你们总算把我看够了吧。”K一边说一边力图驱散郁积

在心中的某种不舒服的感觉，他拿起弗丽达刚送上来（两个助手紧紧地跟着她）的衣服和靴子，一一穿起来。他一直就不明白，现在仍然不懂：为什么弗丽达对两个助手竟有那么大的耐心。他们本应在院里刷衣服的，她下去找了半天，才发现两人在底下心安理得地吃午饭，衣服没刷，而是揉成一团放在腿上，于是她只得自己动手去刷那几件衣服；她很会驾驭下人，完全不同他们吵，并且，在他们面前数落他们太不认真时就像讲一个小笑话那样，甚至还像讨好似地用手指轻轻弹一下其中一人的脸。K.打算过一会儿就这一点好好说说她。但现在刻不容缓的事是赶快走。“两个助手留在这里帮你搬家。”K.说。可是他们不同意；两人这会儿已经填饱了肚子，兴高采烈地很想活动活动筋骨。直到弗丽达说“当然啦，你们留下”时，他们才顺从了。“你知道我现在要到哪儿去吗？”K.问。“知道。”弗丽达说。“那么你不再阻拦我了？”K.问。“你会遇上许许多多障碍的，我说句话管什么用？”她给了K.一个告别的吻，因他还没有吃午饭，又给了他一小包她从楼下为他捎来的面包和香肠，提醒他不要再回这里而是直接去学校，然后就一手扶着他的肩，把他送出门外。

第八章

撇开别的先不说，K.首先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热烘烘的屋子里两个女仆和两个助手的纠缠。户外温度已是零下，有一点冰冻，雪有些冻结，路也就好走些了。但这时天也渐渐暗下来，他加快了步伐。

城堡的轮廓已渐次模糊，它仍一如既往，一动不动地静卧在远处，K.还从未见到那里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生命的迹象，或许站在这样远的地方想辨认清楚什么根本不可能吧，然而眼睛总是渴求着看到生命，总是难以忍受这一片死寂。每当K.观看城堡时，他往往有一种感觉，似乎他在观察着某人，这人安然静坐，两眼直视前方，但并非陷入沉思而不能对周围事物作出反应，而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犹如一人独处，无人在观看他，可是他又不得不觉出有人在看他，然而这又丝毫也不能打扰他内心的平静，的确——不知是原因呢，还是结果——到后来，观看者的目光到底还是坚持不住而移往别处去了。这一印象今天由于天黑得早而更加强烈；他看城堡时间愈长，能辨认出的东西就愈少，眼前一切就愈加陷入一片朦胧混沌之中。

K.来到还没有上灯的贵宾楼时，恰好二楼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个胖

胖的、穿着皮上衣、脸刮得光光的年轻人从窗口探出身来，然后就呆住不动。K.向他招呼问好，可对方毫无反应，连一丝点头作答的影子都没有。在门厅和酒吧里K.均未遇上任何人。泼洒在地上的啤酒散发出比上次更刺鼻的气味，这种事在“大桥”酒店大概是不会发生的吧。K.径自向上回窥视过克拉姆的那道门走去，轻轻按下门把，可是门从里面闩上了；然后他试着去摸那个窥视孔，但也许小孔的挡板装得太严丝合缝了吧，他光用手摸怎么也摸不到，于是他划着一根火柴。火光一闪，他被“啊”的一声吓了一跳。原来，在门和服务台之间，离火炉不远处，一个少女蜷缩在角落里，火柴闪亮时她吃力地睁开惺忪的睡眼盯着K.。显然，她是弗丽达的接替人。她迅速恢复了镇定，拧开了电灯，脸上仍余怒未消，这时她认出了K.。“哦，是土地测量员先生，”她微笑着说，一面把手伸给他，自我介绍道：“我叫佩碧。”她小个子、红脸蛋、金黄中微呈红色的头发编成一条粗大的辫子，脸庞四周鬈发丛丛，身穿一件松散宽大很不合身的、用光洁的灰色衣料做的连衣裙，腰间像孩子般很不利索地系着一条绸带，绸带尽头处打了个蝴蝶结，这带子看样子勒得她挺难受。她问起弗丽达，问她是不是不久就要回来。这问题简直近乎恶意挖苦。“我是弗丽达刚走，”她接着说，“就被紧急调来的，因为这里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顶得上用场的，来这儿前，我是客房女招待，不过换到这里来可不是什么美差，这儿晚上、夜间活儿很多，太累人，我都快受不了啦，弗丽达不想再干下去我一点也不奇怪。”“弗丽达在这里是非常满意的。”K.说，以便让佩碧明白她和弗丽达的不同，这个区别她是忽略了。“您可别信她的，”佩碧说，“弗丽达很会克制自己的感情，没几个人有她这种本事。要是她不愿承认做了一件事，那她就是硬不承认，可是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其实正是她自己干了那件事情。我在这里同她一起干活好几年了，我们一直睡一张床，可我跟她还是不熟，肯定她现在已经再也想不到我了。也许她唯一的朋友就是大桥酒店那个上了点岁数的老板娘，这一点也很说明问题。”“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K.一边说一边顺便寻找门上那个窥视孔。“我知道，”佩碧说，“所以我说这些，要不讲这些有什么用呢。”“我懂了，”K.说，“您的意思是说，我可以为追上了一个很含蓄内向的姑娘而骄傲吧。”“对。”她说发出满意的笑声，那神情，好像她已经争取到K.同自己就弗丽达这个人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默契似的。

但是此刻K.脑子里转着的、弄得他不能集中精力找门上窥视孔的，其实倒不是她说的这番话，而是她的外貌以及她这个人在这件事情本身。当然，她比弗丽达年轻得多，几乎还带着稚气，她的衣服也很可

笑，显然她是根据自己对于一个酒吧女郎的重要性所作的歪曲夸大的设想来穿着打扮的。可是另一方面这些设想从她的角度来看又不无道理，因为，这个她根本不适合做的工作，大概是在她并没有突出表现的情况下意外地让她来临时做一做的，就连弗丽达在这里时经常掖在腰间的那个小皮包，人家也还没有放心地转给她使用。口称对这工作不满意嘛，实际上不过是炫耀自己有能耐罢了。〔15〕但是无论如何，不管她多么幼稚、多么糊涂，却很可能同城堡有一定的关系；要是她没有说谎，她不是当过客房女招待吗？她真是不知道自己拥有一笔财富却在这里糊里糊涂混日子呢，但是，拥抱一下这个胖胖的、稍微有点虎背的娇小身子，虽说还不能一举把她这笔财富完全夺到手，然而却可以有点滴收获，鼓舞自己去走面前这条艰难的路吧。那么，同她在一起跟同弗丽达在一起也许没有两样？啊不，还是不一样。只消想想弗丽达的眼神，就能明白这一点了。K.是决不会碰佩碧一下的。可是现在他不得不用手把眼睛挡住一会儿，因为他是那样馋涎欲滴地盯着她。

“现在用不着开灯，”佩碧说，又把电灯关了，“刚才只是您把我吓着了我才开灯的。您到这儿来有事吗？是不是弗丽达忘了什么？”“是的，”K.说，指了指门，“这隔壁屋里的一块桌布，一块手工编织的白桌布。”“对，是她的桌布，”佩碧说，“我记得的，织得真好，我帮着她一起织的，可是恐怕不在这间屋子里。”“弗丽达说在里面。谁住这儿呀？”K.问。“没人住，”佩碧说，“这是贵宾室，贵客们在这里吃饭喝酒，我的意思是说这屋子是派这个用场的，但大部分客人都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里不下来。”“要是我知道，”K.说，“现在隔壁真的没人，我真想进去找找那块桌布，但我拿不准；比如克拉姆就常常喜欢坐在里面。”“克拉姆这会儿肯定不在里面，”佩碧说，“他马上就要乘车离开这里，雪橇已经在院里等着了。”

K.一听到这个，一句向佩碧解释的话也没有就马上离开了酒吧，到门厅后，也不是向大门而是转身向酒店后院跑去，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就到了院里。啊，这里是多么寂静、多么使人感到舒坦呀！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三面被酒店环抱，另一面临街——是一条K.不知道的侧街——只隔着一堵高高的白墙，墙正中是一道又大又重的门，此时敞开着。在这里，从院子一侧看去，酒店似乎比从正面看要高些，至少是这后面整个二楼完全扩建过，从这里看显得比前面大，因为它四周加盖了一条木结构的封闭式游廊，只留出了一条齐眼高的很细的缝隙与外界沟通。在K.的斜对面，有一个通进店铺的入口，敞开着，没有门，这入口

仍属于酒店主建筑，但已接近同侧楼连接的拐角处了。入口前停着一乘加了篷的、套好了两匹马的深色雪橇。由于离得较远，此时在昏暗的光线中K.只能隐约觉出车夫的身影而看不清他的外貌，除了他，这里就见不到任何人了。

K.两手插在衣兜里，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地顺着白墙附近走，走过了方形院子两条边，来到了雪橇跟前。车夫是最近去过酒吧的那些农民中的一个，他紧裹在皮袍里，无动于衷地看着K.向雪橇走来，就像看一只猫爬过来似的。就是K.已经站在他身边，同他打招呼，甚至连两匹马也被这个从黑暗中冒出来的生人惊动了时，他也仍然纹丝不动，呆若木鸡。对此K.感到正中下怀。他靠在墙上，把食品包打开，心里很感激弗丽达，她替他想得多周到啊，接着便偷偷往房子里窥探。只见那里有一道楼梯从上面通下来，中间拐了一个弯呈直角形，在下面又垂直地接上一条低矮的、然而似乎很长的走道；墙壁全刷得白白净净，映入眼帘的都有棱有角、轮廓分明。〔16〕

在这里等待的时间比K.预料到的要来得长。面包香肠他早吃完了，寒气袭人，薄暮已让位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而克拉姆却迟迟不出来。“可能还要过很久很久呢。”一个粗哑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吓了他一跳。原来这是车夫，他好像刚睡醒，一边伸懒腰一边大声打哈欠。“什么还要过很久很久？”K.问，心中对这句话不无感激，因为这无休无止的寂然无声和紧张心理早已使他厌烦了。“到您离开这里那会儿。”车夫说，K.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也不再追问，他感到这是让那些摆架子的人开口的最好办法。在这个黑魆魆的地方，发问而得不到回答简直让人恼火。真灵，车夫过了一小会儿果真开口了：“您想喝口白兰地吗？”“太好了。”K.不假思索地说，现在他正冻得打冷战，这层好意对他诱惑实在太大了。“那么请您打开雪橇门，”车夫说，“侧面那个口袋里有几瓶，您拿一瓶，喝几口再递给我。我穿着皮袍下来太不方便。”K.本不喜欢像这样给他递东西，不过既然已经同他搭上了腔，也就依着他，甚至不惜冒着可能在出入雪橇时突然撞上克拉姆的危险。他打开那扇宽宽的门，本可以立即从拴在门后那个袋子里取出一瓶酒，但门既然开了，一股强烈的好奇便油然而生，他按捺不住，很想进去哪怕只坐上几秒钟也好。于是他轻轻一纵身跳了进去。雪橇内暖和异常，并且虽然车门大开——K.不敢关上——仍一直暖和如初。他一点不知道是否坐在一张凳子上，因为身下是一大堆毛毯、软垫和皮衣；人坐在里面身子可以变换各种方向，随意伸胳膊蹬腿，无论怎么活动都陷进一堆软绵绵、暖融

融的东西里去。现在，K.伸开两臂，头靠在一堆软垫上——里面这东西真是唾手可得——从雪橇里向昏暗的房子深处看去。为什么克拉姆这么久还不下来？K.在久立雪地之后被这里面那暖烘烘的空气弄得有点昏昏然，盼着克拉姆赶快出来。至于最好别让克拉姆撞见他像现在这样待在雪橇里，这个念头仅在他脑中一闪而过，留下一点点怅然的余味。车夫的态度对他这种懵然忘乎所以的精神状态无异是一种支持，因他明知K.在雪橇里待着而不闻不问，连白兰地也不向他要了。唔，他的确挺会照顾人，不过原先是K.要帮他一个忙呀。想到这里K.笨拙地、一点不改变自己的姿势伸手去够门后挂着的口袋，然而不是开着的门，那门离他太远，而是身后另一道关着的门，其实倒也无所谓，这扇门上反正也挂着几瓶酒。他抽出一瓶，拧开了盖子，拿起来闻了闻，不禁微微笑了，真是香气袭人、甜美无比，犹如一个人听见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人夸他，尽说好听话，然而他一点不知道那人到底在说些什么，也根本不想知道讲什么，只知道是他，是这个自己最喜欢的人在娓娓而谈从而心里感到无比舒畅。“这真的是白兰地吗？”K.将信将疑地问自己，满怀好奇尝了一口。不错，确实是白兰地，真奇怪，辣乎乎、热烘烘的。怎么会一喝到嘴里就变了味呢，从一种几乎只散发出甘美馥郁清香的酒，一下子变成一种只适合车夫的口味的饮料！“这怎么可能呢？”K.自问着，似乎在自责，接着又喝了几口。

这时——正当K.往下咽一大口酒的当儿——周围豁然一亮，电灯一下子全打开了；楼里是楼道、走廊、门厅，楼外是那个敞开的出入口的上方，霎时间灯火通明。下楼梯的脚步声清晰可闻，K.手里的酒瓶子滑落了，白兰地洒在一件皮外衣上，K.一跃而起跳出了雪橇，他刚来得及把门撞上——这发出一声巨响——便有一位先生慢条斯理地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现在唯一令人感到宽慰的是，此人并非克拉姆，或许恰恰是这一点令人深感遗憾？来人是K.先前在二楼窗户里看见过的那位先生。这位年轻的先生保养得极好，皮肤白里透红，但表情十分严肃。K.也阴沉着脸注视他，然而这阴沉的眼神是针对他自己的。他心想：还不如把两个助手派来呢；刚才自己做的那些事，他们也一定完全做得来。现在，他眼前这位先生仍一直沉默不语，就好像他那过于宽阔的胸膛里吸入的空气不够用，无法将他想说的话说出来。“这太不像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开口了，同时抬手把戴得过低的帽子微微向上推了一下。什么？这位先生大概总不至于知道K.刚在雪橇里待过一阵吧，怎么他竟觉得有什么事不像话？比如说，他是在指责K.不该私自闯到这后院来吗？“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没等K.想出个头绪，这位先生已经轻声动问了，他已

呼出了胸膛里的积气，露出对既成事实无可奈何的神情。这叫什么问题啊！要他怎么回答呀！难道要他K.郑重其事地亲口向这位先生承认，他抱着这么大的希望来到这里又是白费气力了？K.不答话，而是转身向雪橇走去，打开门把忘在里面的帽子拿了出来。这时他颇不痛快地发现，白兰地还在滴滴答答落在踏板上。

然后他又转向那位先生；现在他对于让这人知道自己刚才在雪橇里待过已经没有顾虑了，他知道这一点，也还不是最糟糕的事；如果这人问起来——当然也只是在他主动问起时——他不想隐瞒是车夫让他去的，至少是他让他打开雪橇门的。真正糟糕的是，这位先生猝不及防地走了出来，就使他来不及回避以便过后再无所顾忌地继续等候克拉姆，或者说糟糕的是他刚才没有做到遇事不慌，镇静自若地在雪橇里待着，把门关上坐在那里面的皮大衣上等克拉姆，或者至少在那里先待着，等这位先生走远了再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原先怎么可能知道这个现在出来的人一定不是克拉姆本人？如果知道是克拉姆出来，那么自然是在雪橇外面迎接他要合适得多。是的，刚才还有考虑的余地，可现在一点没有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您跟我来。”那先生说，这话其实本身不带命令语气，但命令不在话音里，而在那伴随这句话的短促的、有意做得若无其事的一个挥手动作里。“我在这里等一个人。”K.说，这时他已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而只想笼统地说说算了。“您跟我走。”那位先生再次坚定不移地说，似乎想表示他从未怀疑过K.在等一个人。“可是一走开我不就错过了我等的那个人了吗？”K.耸耸肩说。无论有过多少波折，他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争取到的可说是一笔财富，虽说现在他抓在手里的是一份无影无形的虚财，但也不能一听到谁随便发个什么命令就轻易把它扔掉吧。“您反正是要错过他的，等和走都一样。”那位先生说。这话的内容本身虽然冷酷，但对处于目前思想状况中的K.来说却很像句软话。“那么我宁肯在这里等着错过他。”K.仍硬顶住，他决意不让这个年轻人几句话就把自己从这里赶走。之后，年轻人把头微微向后一仰，脸上带着一种优越的神态闭目少顷，似乎在表示他要从K.那不可理喻的态度转回到自己通情达理的立场上来，又用舌头舐了一圈那微开的嘴唇，然后对车夫说：“把马的套具卸了吧。”

车夫对这位年轻先生的吩咐表现出唯命是从的样子，同时狠狠地乜斜了K.一眼，现在他不得不穿着皮外衣从驾驭座上跳下来，拉着马开始

把雪橇退着向侧楼推去，显然那里的一道大门后面便是马厩和车房，他拉马动作磨磨蹭蹭、犹犹豫豫，好像在等什么，好像不是等年轻人发出相反的命令，而倒像在等着K.改变主意似的。K.眼见只剩下自己一人留在这里了；这一边，雪橇逐渐离他远去，那一边，沿着他刚才来的路，那年轻人也走远了，当然，两边走得都很慢，似乎在告诉K.，现在扭转局面把他们叫回来的权力仍操在他自己手里。〔17〕

也许他有这种权力，但这权力对他却丝毫用处也没有；把雪橇叫回来无异于把自己赶走。于是他一言不发，成了这儿成功地固守阵地的胜利者，然而这胜利却不能给人带来喜悦。他一会儿目送年轻人，一会儿目送车夫远去。年轻人这时已走到K.先前进院的那道门，他再次回过头来看，K.隐约觉得他在为K.的顽固不化不住摇头，然后，毅然一转身进了门厅，接着就消失了。车夫在院子里时间要长些，他在雪橇上还有不少活，他得打开那沉重的厩门，把雪橇退着推回原位，给马下套然后牵回马槽边，这一切他做得严肃认真，旁若无人，一点没有流露出希望不久再套车的情绪；K.感到这种一声不吭、目不斜视、对K.不屑一顾、一个劲儿只管干活比那年轻先生对他的责怪要厉害得多。现在，马厩里的活干完了，车夫便慢吞吞、摇摇晃晃地横穿过院子，关上大门，又走回来，每一步都慢吞吞，简直就像是在细看自己在雪地里踩下的脚印，然后他便把自己锁在厩里，把各处的灯全关了——开着灯给谁照亮呢？——只剩上面木结构的回廊上那条细缝还透出光亮，可以稍稍吸引住人的不知所之的目光，到这时K.突然觉得似乎人家斩断了一切同他的联系，似乎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自由，可以在这块原是禁止他来的地方愿等多久就等多久，而且他是经过奋斗争得的这个自由，这点很少有谁能做到，现在谁也伤不了他一根毫毛或是把他赶走，甚至谁都难得跟他说上一句话；虽然如此，但同时他又觉得——这个想法至少同上面的感觉一样强烈——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刀枪不入的状态更荒谬、更让人绝望的事了。

第九章

他下了个狠心，挪动步子，走向贵宾楼酒店去，这一次不是沿着墙走，而是在院子中央踏雪前进。在门厅里他遇见了店老板，老板向他默默点头招呼，又向他指指通往酒吧的门，他只觉浑身发冷，也想见见人，便顺老板所指的方向走去。但是，当他看见在一张兴许是特意临时支起的小桌旁——因为平时那儿只放几个酒桶权且充作座位——端坐着

那位年轻先生，而在他前面——这场面K.看了心里觉得压抑——站着大桥酒店老板娘时，他感到非常失望。佩碧得意地扬着头，脸上挂着那永远一成不变的微笑，看得出她充分意识到自己那不容置辩的风光体面，每一转身都把发辫一甩，她在酒吧里来往穿梭奔忙着，这时又拿来啤酒、墨水和钢笔，原来那位年轻先生面前桌上摆满了一份份摊开的文件纸张，他一会儿在这张纸上，一会儿又在桌子另一端的一张纸上找到某几个数字，将两者进行比较，现在正准备写点什么。老板娘的眼睛从高处向下俯视，她嘴唇稍稍翘起，好像很心安理得地看着年轻人和那堆文件，那神情似乎表示她已经把最重要的事全部说完，她的话也都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了。“土地测量员先生，您终于来了。”年轻人在K.进来时抬头望了他一眼说，话音一落便又埋头纸堆。老板娘也只向K.投来漠然的、毫无惊异之色的一瞥。佩碧则似乎是当K.来到柜台前要一杯白兰地时才看见他的。

K.靠在柜台上，一只手捂住眼睛，对周围的事一概不予理会。然后他呷了一口白兰地，把杯推回去，说这酒简直没法喝。“所有的贵宾都不喝这种酒。”佩碧只说了这一句，就把剩酒倒掉，冲洗了酒杯，把它放回架上去了。“贵宾们还有比这更好的白兰地酒喝。”K.说。“可能吧，”佩碧说，“可是我没有。”说完她就算是招待完了K.，转身去伺候那位年轻先生了，但是那位现在并不需要什么，她就只是在他脊背后面打转转，从这边到那边，来回走动，每次都毕恭毕敬地试着从他肩膀上看过去，看一眼桌上的文件；但她这样做纯粹是好奇，是装模作样抬高自己，就连老板娘也皱起了眉头对她颇感不满。

突然间，老板娘一下子露出注意的神色，竖起耳朵，两眼直勾勾地视而不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K.回过头去，但他什么也没有听见，看样子别人也没有听到什么响动，可是老板娘却踮起脚尖大步向通往后院的门跑过去，俯下身子穿过锁眼往外看了看，回过头来时，眼睛便瞪得老大老大，腮帮涨得通红通红看着众人，然后用手指招呼他们过去，于是，众人便轮流趴在锁眼上往外看，看的次数最多的自然是老板娘，然而佩碧也屡受照顾，而与众人相比，对此最不关心的要算那位年轻先生了。佩碧和那位先生也在不多时以后就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只有老板娘还在那里使劲张望，她腰弯得很低，简直都快跪倒在地上，这种样子几乎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她只是在那里苦苦哀求锁眼开恩放她出去，因为，这时外边院子里大概早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当她终于又直起身，两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理了理头发，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睛似乎不

得不重新适应这房间和这里的人（这样做她很是不情愿，真是勉为其难）时，K.开口发问了——并不是想让她确证一下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是为了先发制人，免得再次受到打击，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一想到受打击简直就心惊肉跳。“这么说，克拉姆已经乘雪橇走了？”老板娘不言语，从他身旁走了过去，然而那位先生却从他的小桌那边回答道：“毫无问题，走了。既然您放弃了您坚守的岗位，克拉姆当然就可以走了。可老爷非常之敏感，这真是太令人佩服了！老板娘太太，您注意到了刚才克拉姆老爷是多么焦躁不安地往四下里察看吗？”看来老板娘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那位先生仍接着说下去：“唔，幸亏他什么也看不出来，连雪地里的脚印车夫也全都扫平了。”“老板娘太太什么也没有注意到。”K.说，然而他说这话并非抱着某种希望，而只是被那位先生的话惹恼了，听他那口气，好像一切都成了定局，一切都无可挽回似的。“也许那会儿正好没轮到我从锁眼往院里看，”老板娘说，这话首先是为了袒护那位先生，接着她又想说明克拉姆没有什么不足之处，于是补充道：“不过，我不相信克拉姆会那么过于敏感。当然，我们深怕他受到打扰，想方设法保护他，我们是从设想他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出发这样做的，这是对的，肯定也符合克拉姆的意思。可是事实究竟怎样我们并不知道。不错，克拉姆不想跟谁谈话他就决不会跟这个人谈话，不论这人费多大力气，不管他怎么软磨硬泡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克拉姆决不会跟他谈话、决不会主动让他来到自己面前，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够了，为什么定要说他事实上一看见谁就受不了呢。至少这一点没法证明，因为这种例子是永远不会有。”那位先生不住点头。“当然，我的想法基本上也是这样，”他说，“刚才我那些话措辞上有些不同，这只是为了让土地测量员先生好懂些。不过克拉姆刚才出来时确实向左右两边来回看了好几次。”“也许他是在找我吧。”K.说。“有可能，”那位先生说，“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一层呢！”这句话引起全场哄笑，佩碧对所讲的这些几乎完全听不懂，可她却笑得最响。

“既然我们现在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过了一会儿那位先生说，“我想恳请您，土地测量员先生，给我提供一些情况，以便补上我这些卷宗里的空缺。”“这里写的东西真是太多了。”K.说，一边从远处向那堆文件投去一瞥。“是呀，这是个坏习惯，”那位先生说着又笑起来，“可是您也许还一点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叫莫姆斯，是克拉姆的村秘书。”这话一出口，整个屋子里气氛顿时严肃起来；老板娘和佩碧虽说当然是认识这位年轻先生的，但在听到提及他的名字和职务时仍为之一震。就连那位先生本人似乎也觉得自己说的话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似乎他想至少是

躲避一下这句话中蕴含着的、说出后仍继续施放出的非同小可的威力，便赶紧埋头去看他的文件并提笔书写起来，以致屋里一时只听见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村秘书？村秘书是做什么的？”少顷K.问道。显然莫姆斯认为在他作了自我介绍之后再亲自作这类解释是不合适的，于是老板娘便代他回答：“莫姆斯先生是克拉姆的秘书，跟克拉姆任何其他秘书一样，但他的职务地点、办公地点，还有，要是我没有弄错，还有他的职务范围、职权范围，”这时莫姆斯一面写一面起劲地摇头，于是老板娘纠正自己的话说：“这就是说，只有他的办公地点，不是说他的职权范围，是在这个村子里。莫姆斯先生负责起草克拉姆在本村需要拟定的全部文件，最先过目和处理本村人呈送上来的所有申请书。”K.这时脑子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用失神的两眼木然盯着老板娘，弄得她有点发窘，补充道：“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安排的，城堡的每位老爷都有一批自己的村秘书。”莫姆斯听这些话比K.专心得多，这时他补充老板娘的话说：“绝大部分村秘书只为一位老爷服务，而我是同时为两位老爷办事，克拉姆和瓦拉贝纳。”“对，”老板娘现在想起这点来了，便又对K.说：“莫姆斯先生为两位老爷办事，克拉姆和瓦拉贝纳，所以他是双重秘书。”“嗨，秘书还外加双重。”K.一边说，一边向这时几乎完全趴在桌上抬起头来面对面瞅着自己的莫姆斯点头，恰似听见别人夸一个孩子时向那孩子点头一般。如果说这种点头包含着某种轻蔑的成分，那么它不是没有被注意到，就简直是完全自找。怎么偏偏要在这个连让克拉姆偶然看上眼的资格都没有的K.面前大夸特夸一个克拉姆手下人的功劳，毫不掩饰地意欲博得K.的赞赏呢！可是K.却一点不识抬举，比如，他现在是在千方百计要求一见克拉姆的，却不觉得一个能在克拉姆眼皮底下过日子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更谈不上欣赏和羡慕。因为，说实在的，接近克拉姆本人并不是他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而是：他K.要亲自（不是别人）带着自己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要求去会见克拉姆，会见克拉姆并不是为了在那里歇着而是经过他身边继续前进，到城堡里去。

于是他看了看表说道：“现在我得回去了。”这话一说出口，情况马上变得有利于莫姆斯。“唔，当然啦，”莫姆斯说，“学校勤杂工的活在等着您。不过您还得再给我一分钟。只有几个简短的问题。”“对此我不感兴趣。”K.说着便想向门走去。莫姆斯一捶桌子站起来：“我以克拉姆的名义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以克拉姆的名义？”K.重复道，“难道他会管我的事吗？”“对这一点，”莫姆斯说，“我无权发表意见，您恐怕就没有这个权利了，所以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让他自己去决定好了。但是，我凭着克拉姆授予我的职权，却可以要求您留下回答问题。”“土地测量

员先生，”老板娘插嘴说，“我不想再给您出什么点子了；我给过您不少劝告，我纯粹是为您着想，那是天下最最好心的劝告了，可您不识好歹，全都顶了回来，现在我所以到秘书先生这儿来——我什么都用不着隐瞒——仅仅是为了好好向村秘书汇报一下您的所作所为、您的意图，并且永远杜绝您重新在我们店里留宿的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了，这种情况恐怕以后再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现在我说出自己的想法绝不是为了帮助您，而是为了给秘书先生稍微减轻一点负担，他面对的是您这么个人，是同您打交道，这项任务太艰难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是正因为我是完全坦率的——同您打交道我只能坦率直说而不可能有别的方式，但即便这样我也是勉为其难——所以只要您愿意，您还是可以从我的话里得到好处的。要是您愿意，我现在就请您注意：您想到克拉姆那儿去，唯一的通路就是先让这位秘书先生作记录。不过我也不想把话说过头了，也许这条路还是通不到克拉姆那里，也许它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就到头了，这全得看秘书先生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您来讲这是唯一的一条至少是朝着克拉姆那个方向去的路。可您现在却不想走这条唯一的路，而又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是因为爱顶牛吗？”“唉，老板娘太太，”K说，“这既不是通向克拉姆的唯一道路，它也不比别的路更值得去走。您呢，秘书先生，如果我在这里说点什么，那么是您来决定我这些话能不能传到克拉姆那里去了？”“当然啰，”莫姆斯说，一面得意地低垂眼皮左顾右盼，然而两边什么也没有，“否则要我这个村秘书干什么。”“好，老板娘，您瞧，”K说，“现在不是说我到克拉姆那里需要一条通路，我首先还得打通到秘书先生这里的路呢。”“我原想给你打通这条路的，”老板娘说，“上午我不是提出愿意把您的请求转到克拉姆那里去吗？我想的就是通过秘书先生办到这事。可是您拒绝了，而现在您除了这条路确实没有别的路好走。当然，照您今天这种表现，在您还试图对克拉姆来个突然袭击之后，成功的希望是更小了。但是这最后一丁点儿、一丝丝儿、差不多等于零的希望，却是您唯一的希望。”“这是怎么回事，老板娘，”K说，“为什么您原先起劲地阻拦我，叫我别费力去找克拉姆，现在却这样重视我的请求，好像以为要是我这事办不成就一切都完了？如果说您原来是真心诚意劝我干脆放弃找克拉姆的打算，那么怎么可能现在又似乎是同样真心诚意简直是催着逼着我走这条路，甚至明明知道这条路根本通不到目的地也还是要劝我去走？”“我催您逼您了吗？”老板娘说，“我说您的打算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这叫催您逼您吗？您居然这样把自己的责任推到我身上，这真是——天下还有比这更蛮不讲理的吗？是不是当着秘书先生的面您才来劲了？不，土地

测量员先生，我一点没有催您逼您去干什么，我只可以承认一点，就是我头一次见到您时也许把您估计过高了些。您那么快就把弗丽达弄到手，把我吓着了，当时我真不知道您还能干出些什么可怕的事来，我想避免再出什么祸事，就以为只有通过请求、警告等办法能打动您，防止事态恶化。可从那时到现在这段时间我学会了比较冷静地全面考虑这件事。好了，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您的活动也许能在外边雪地里留下很深的脚印，除了这个还会有什么结果？”“您说了半天，我觉得您态度上的前后矛盾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讲清楚，”K.说，“不过我总算是指出了这个矛盾，这我也就满足了。但是现在我倒要请您，秘书先生，告诉我一下，老板娘刚才说您同我谈话的记录以后可能会有什么结果之一，就是允许我谒见克拉姆，这话对不对？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我愿意马上回答您的问题，为了这个，我是什么都豁出去了。”“不，”莫姆斯说，“这种逻辑关系并不存在。这里做的事仅仅是把今天下午的情况详实地记述下来以便交克拉姆的村档案室存档。现在这篇记述已经写完，只差两三处空白需要由您补上，这是制度；作记录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抱着任何其他目的也是达不到的。”K.默默地看着老板娘。“您干吗老盯着我？”老板娘问，“难道我说的同他说的有什么不同？他就是这样，秘书先生，他就是这样。先歪曲人家提供给他的情况，然后硬说别人给他提供了错误的情况。我打一开始就是对他这么说来着，今天是这样说，以前也都这样说，告诉他想受到克拉姆接见是没有任何指望的；既然没有任何指望，那么有了这份记录不也一样？这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我又说这记录是他能同克拉姆建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公务联系；这话不也同样清清楚楚，一点怀疑的余地也没有吗？但是，现在他不信我的，一个劲儿地希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有什么目的——能钻到克拉姆身边去，那么，如果顺着他的思路想，不就只有他现在同克拉姆之间仅有的这一真正的公务联系，就是说这份记录，才能帮他一点忙吗？我说的话就只有这层意思，谁要是硬把别的意思安在我头上，那就是不怀好意歪曲我的话。”“如果是这样，老板娘太太，”K.说，“那么我请求您原谅，是我误会您的意思了；因为我原以为——现在看来这是错了——从您以前的话里听出的意思是我确实还有一星半点希望的。”“对极了，”老板娘说，“这确实是我的意思，您现在又在歪曲我的话了，不过这一回是反过来歪曲罢了。按我的意思，这种希望对您来说确实是存在的，但它只能建立在这份记录上。说有希望，也不是说您就可以劈头盖脸地拿‘我回答了问题，就可以去见克拉姆了吗’这样的问题将秘书先生的军。如果一个孩子这样问，大家一笑就完了，但如果一个成年人提这种问题，那就是

对官府的一种侮辱，只是秘书先生给您留点情面，用他那巧妙的回答把这点掩盖过去了而已。我说的那一点点希望，正是指您通过这份记录才同克拉姆有了联系，也许可以算是一种联系吧。难道能说这不是希望吗？要是问问您，您到底有什么功劳使您有资格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送给的这点希望，您能讲得出一丝一毫来吗？当然，对这点希望现在还不可能说得那么确切，特别是秘书先生以他的官员身份，绝不可能对这个作出哪怕只是一星半点暗示。正如他刚才说过的，他只是按制度办事，把今天下午的情况记录下来；多一点他也是不会说的，即使您现在根据我说的去问他，也一定问不出什么来。”“秘书先生，”K问，“克拉姆会不会看这份记录？”“不会的，”莫姆斯说，“为什么要看？他看得了所有的记录吗？实际上他连一份记录也不看。他常说‘别拿你们那些记录来烦我了！’”“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抱怨道，“您这些问题真是让人头疼！要克拉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这份材料，了解您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这难道有什么必要，或者哪怕只有一点点益处？您干脆放下架子，求别人不要让克拉姆看到这份记录，不是更好些吗？当然，这个请求也同那个一样荒谬——谁能瞒得住克拉姆什么事？——可怎么说也还能让人对您有点好印象吧。再说，为实现您所谓的希望，有必要让克拉姆看材料吗？难道不是您自己说的，只要有机会在克拉姆面前讲话就满足了，即使他不看您一眼不叫您说话也行？有这份记录，您不是至少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弄得好说不定收获还会大得多呢！”“大得多？”K问，“怎么个多法？”“只要您别总像小孩子似的，”老板娘叫起来，“希望人家把什么都端到嘴边给您吃就行！谁有本事回答您这些问题？记录要送到克拉姆的村档案室，这您已经听到了，对这个问题只能说到这儿，再多就说不准了，可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份记录有多么重要，秘书先生、村档案室有多么重要吗？您知道秘书先生审问您意味着什么？也许，唔，很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审问的意义呢。正如他说的，他是按制度办事，平心静气地坐在这里尽他的职责。但请您注意，他是克拉姆任命的，是代表克拉姆办事的，他做的事即使永远到不了克拉姆耳边，却是自始至终得到克拉姆同意的。如果不是完全符合克拉姆的精神，能得到他的同意吗？我说这些决不是想当面拍秘书先生的马屁，我要有这个意思他也会坚决制止的，我不是在孤立地谈他这个人，而是在谈克拉姆同意他办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的是现在的实情：他是一个工具，克拉姆的手就放在他身上，谁不服从他谁就等着倒霉吧。”

K并不怕老板娘这些恐吓，而她用来诱他上钩的这希望那希望他也听腻了。克拉姆是远不可及的。有一次，老板娘曾把克拉姆比作老鹰，

当时K.觉得这未免可笑，现在不然了；他想到克拉姆的远不可及，想到他那无法攻克的住所，想到他总是一声不响，也许只偶尔被他自己那K.还从未听到过的大声喊叫打断，想到他那从上向下俯视时凌厉逼人的目光，那既无法证实又无法否认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想到他那高高在上、按人们无法掌握的规律在自己四周划出的一层又一层的圆圈，这些圆圈人们的眼睛只能偶尔看见，K.从他低下的地位看去是一道又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这些都是克拉姆同老鹰的共同点。然而眼下这份记录同这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此刻，莫姆斯正趴在记录上掰开一个椒盐卷饼，就着啤酒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盐粒和卷饼碎屑撒得满桌文件上到处都是。

“再见，”K.说，“我对任何审问都很反感。”说完他真的移步向门走去。“他到底还是要走。”莫姆斯话音里几乎带着惧怕对老板娘说。“他不敢。”老板娘说。下面的话K.就听不清了，他已经到了门厅里。^[18]天气很冷，刮着大风。从对面一道门的后面，老板走了出来，看来他一直在那门后通过窥视孔监看着门厅的动静。门厅里穿堂风猛烈地吹打他外衣的左右下摆，使他只好把它们卷起掖在腰间，“您这就走了吗，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觉得这很奇怪吗？”K.问。“是的，”老板说，“不审问您了吗？”“对，”K.说，“我不愿受审。”“为什么不愿？”老板问。“因为，”K.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服服帖帖受人审问，为什么要让别人拿我开玩笑，为什么要让人在我身上使官老爷性子。也许哪天我也来了兴致，开开心，使使性子，那时可以奉陪，可是今天不行。”“是啊，对，没错，”老板唯唯诺诺，然而只是出于礼貌随声附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同意。“现在我得叫服务员们到酒吧去了，”他接着说，“他们早该上班了。刚才我只是不想打扰审问才没叫他们来。”“您觉得这审问有那么重要吗？”K.问。“当然非常重要。”老板说。“那么说我刚才不该不接受审问了？”K.说。“是啊，”老板说，“您不该这样做。”因为K.不说话，老板又补充一句，或者为了安慰K.，或者为了快点脱身，说道：“咳，咳，不过事情总还没有严重到引起天上下雹子吧。”“对极了，”K.说，“看这天气不像会下雹子。”两人哈哈大笑分手了。

第十章

K.走出去，来到狂风阵阵的露天扶梯上，眼前一片漆黑。天气真是很糟、很糟啊。似乎与此有某种关联，他想起老板娘如何竭力迫他就范配合作记录，他自己如何顶住没有服从。当然，她的努力又是比较隐晦的，实际上她暗中同时又在把他从记录上拽开；弄到最后他简直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顶住了她呢还是向她让了步。真是诡计多端，就像这风一样，表面上漫无目的，实际上却是受到远不可及处某种异己力量的主使，这里头的奥秘从来是讳莫如深，从未有人窥见过的。

他刚在大路上走了几步，就看见远处有两盏灯在摇摇曳曳闪亮；这点人间烟火的标志使他心里一阵高兴，便匆匆向灯光走去，那灯光也自是摇摇晃晃向他迎来。当认清原来是两个助手时，他感到莫名的失望。但他们确实向他走来了，大概是弗丽达派来的吧，那两盏风灯把他从包围着他的一片黑暗中、从四面袭击他的呼啸的寒风中解脱出来，它们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感到失望，他原是期望着遇上陌生人而不是这两个老相识，这是他背上的两个包袱。然而来者还不止这两个助手，从两人中间的暗处，又走出来另一人：巴纳巴斯。“巴纳巴斯！”K.叫道，向他伸出手。“你是来找我的吗？”意外重逢的喜悦，使他把巴纳巴斯曾在他心中引起过的一切不快全忘记了。“是找你，”巴纳巴斯同往常一样和气地说，“我带来一封克拉姆的信。”“克拉姆的信！”K.猛一仰头说，同时急忙从巴纳巴斯手中接过信来，“你们两个拿灯给我照着！”他命令两个助手，于是两人一左一右紧挨着他举起了灯。K.不得不把那张很大的信纸折成小块来念，因为风刮得太厉害了。他读道：“大桥酒店土地测量员先生鉴：对您迄今为止进行的土地测量工作我深感满意。二位助手的工作也值得赞扬，这是您督促有方的结果。请先生切勿懈怠！并请善始善终做好各项工作，如工作中啰我将十分不快。此外请放宽心，酬金问题指日可获解决。我将继续关注您的情况。”读完，K.的眼睛一直瞅着这封信，直到比他看得慢得多的两个助手为欢庆这一好消息而发出三声欢呼，同时不断摇晃风灯时，K.才抬起头来。“你们别嚷，”他说，然后转向巴纳巴斯：“这是个误会。”巴纳巴斯不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个误会。”K.重复道，下午的倦意又向他袭来，现在他觉得到学校去的路还很长很长，在巴纳巴斯身后，他的全家人似乎都出现了，两个助手仍不断挤他，使他只得用胳膊肘把他们顶开；弗丽达也真是，怎么能把这两个家伙派来迎他啊，他明明吩咐过让他们留在她那儿的。他一个人也能找得到回家的路的，比有这伙人跟着还容易些呢。更可恨的是，一个助手脖子上系着一条围巾，两角被狂风吹得劈里啪啦乱飞，好几次打在K.的脸上，虽说每次另一个助手总是马上用他那又长又尖、时常用来搔首弄姿的手指把围巾从K.脸上撩开，可这样仍然于事无补。更气人的是两个家伙甚至渐渐发觉这种来回折腾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就像他们对刮风、对不安生的夜晚本身就感到兴高采烈那样。“走开！”K.喝道，“你们既然来接我，为什么不把我的手杖捎来？现在我拿什么赶你

们回去？”两人应声后退，躲到巴纳巴斯身后去了，然而也并没有被K.这些话吓倒，还是大胆地把他们的风灯一左一右地放在他们主人的肩上，当然，K.立刻就甩脱了这个负担。“巴纳巴斯。”K.说，感到心情沉重，因为巴纳巴斯显然没有听懂他的话，平时，巴纳巴斯的上衣闪着悦目的光，但到了关键时刻却不能给K.帮助，而只是用沉默的抵抗来对付他，对这种抵抗他是奈何不得的，因为巴纳巴斯自己也赤手空拳束手无策，唯有他那张脸总是笑嘻嘻的，但这同天上的星星之于地上的狂风，完全是无济于事的。“你看看，老爷大人都给我写了些什么，”K.说着便把信递到巴纳巴斯眼前，“老爷大人听到的情况是错的。我哪里在做什么土地测量工作啊，至于两个助手能帮上什么忙，你也亲眼看到了。我没有做的工作，当然也无法中辍，我连让老爷不快都没有办法，又拿什么去使他满意！在这种情况下让我宽心，我怎么可能办得到！”“我会把你的这些意思汇报上去的。”巴纳巴斯说，这段时间他一直把目光从信上移开瞅着别处，其实他想看也无法看，因为那信离他的脸太近了。“唉，”K.说，“你答应我把我的意思汇报上去，可是我能相信你吗？我非常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信差，现在比别的时候更需要。”说着K.急得用牙齿紧紧咬住嘴唇。“先生，”巴纳巴斯说，温顺地低下头去——K.几乎又被这个驯顺的动作欺骗而相信巴纳巴斯——“我一定会把你的意思汇报上去，你最近让我办的那件事，我也同样一定要汇报上去。”“什么？”K.叫起来，“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把那件事汇报上去！你不是第二天就到城堡去了吗？”“没有，”巴纳巴斯说，“我的好爸爸年纪大了，你不也亲眼见过他吗，那时候正赶上家里有很多事要做，我得帮助我老爸，不过现在我很快就要再去城堡了。”“你都干了些什么啊，我真服了你了！”K.拍拍自己的脑门叫道，“难道克拉姆的事情不比别的事情重要？你肩上担负着信使这样重要的职责，就是这样马马虎虎地办事吗？伺候你老爸，谁来不行？克拉姆在那里等着消息啊，可你呢，你倒好，不是勤勤恳恳、三步并作两步拼命赶路，反而去干那些起圈运粪的事去了！”“我父亲是鞋匠，”巴纳巴斯不管K.怎样发火仍不动声色地说他自己的，“他接了布伦施维克的订货，我是父亲的帮工。”“鞋匠——订货——布伦施维克，”K.强忍怒气恨恨地从牙缝中挤出这几个字，好像要把这些字每一个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在这里这些一辈子也见不着个人影的路上，谁需要穿靴子？这些乱七八糟的做鞋、补鞋什么的，与我到底什么相干？我信任你，让你替我传递一条消息，难道就是为了叫你到鞋匠铺去坐着把它忘掉或是把它记错了吗？我当时是叫你马上把它带给老爷去的呀！”说到这里，K.稍稍冷静了一点，因为他突然想起，很可能克拉姆这一段时间一

直就不在城堡而在贵宾楼，可是当巴纳巴斯为了证明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K.的第一次口信而开始一字一句背诵起来时，他又被激怒了。“够了够了，我什么都不要听。”K.说。“先生，请别生我的气。”巴纳巴斯说，同时，似乎下意识地想惩罚一下K.，他扭头不再看K.而把目光低垂下去，不过这也可能是对K.的叫嚷感到惊异而不知所措的表现吧。“我没有生你的气，”K.说，现在他的气转而针对着自己了，“我的气不是冲着你，但是，为我办最重要的事情的，竟只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信使，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糟糕了。”

“你看，”巴纳巴斯说，那语气似乎在斗胆犯上为他的信使荣誉辩护，“克拉姆并没有在等着消息呀，甚至我每次去他那里他都觉得讨厌。‘怎么，又有新的消息了。’有一回他这样说，还有，他多半是老远看见我来就站起身到隔壁屋里去，不接见我，再说，也没有哪条规定要我一有信立刻就送去，如果有这样的规定，那么我当然会马上就去的，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规定，就是我一次不去，也不会受到告诫处分。我送信完全是自愿的。”

“很好。”K.说，一面审视着巴纳巴斯，使劲把目光从两个助手身上移开，原来，这两个家伙轮番地在巴纳巴斯肩后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地慢慢露出脸来，转眼又模仿风声轻轻打个唿哨然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一见到K.就吓得魂飞天外。两人就这样乐此不疲地嬉戏了好久。“克拉姆那里的情况我不知道；说你有本事把那里的情况看个一清二楚，我也表示怀疑，而且就算你有本事把什么都看明白，我们想改进局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过送个口信你总是能做到的，我正是请你做这件事。就那么条简短的口信。你能不能明天就把这信送去，明天就把回话告诉我，或者至少回来告诉我你在那里受到了怎样的接待？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愿不愿做这件事？你做了，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也许我还会有机会酬谢你，要不或许你现在就有一个什么愿望吧，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肯定要去办你吩咐的这件事的。”巴纳巴斯说。“那么你愿意努一把力尽量把这件事办好，就是说把口信带给克拉姆本人，从克拉姆本人讨得回话，而且是马上去做，全都在明天，不要过了明天上午，你愿意这样做吗？”

“我会尽最大努力，”巴纳巴斯说，“不过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呀。”“现在我们不再争论这个问题了，”K.说，“我这就把口信清清楚楚地说一遍给你听：土地测量员K.，请求长官大人准许他本人面见长官；

如果需要的话他将毫不迟疑地接受得到该项许可所附加的任何条件。他不得不提出这项请求，因为迄今为止通过所有中间人联系均未能成功，这一点他可以举例证明，如迄今他从不曾做过任何一点测量工作，而且据村长说今后也决不会做此类工作，因此读了长官大人最近来信实在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现在唯有面见长官大人一法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本土地测量员深知这一请求确有斗胆不自量冒犯神威之嫌，但他将努力把对长官大人的打扰减小到最小限度，并愿意接受任何时间限制，即使大人认为有必要对他在会见时被允许说话的数量加以限定，他也乐于服从，比如他自己觉得，只要让他说十句话就足够了。眼下他正诚惶诚恐、万分焦急地期待着长官大人的定夺。”K.忘其所以、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仿佛他已经站在克拉姆的门口，在同守门人说话一般。“这些话现在这么一说出来，比我原先想的要长多了，”他接着说，“不过你还是得把它们口头转达上去，信我是不想写了，写下来的信不又得去长途跋涉，走那条没有尽头的公文旅行老路吗？”为备忘记，K.摊开一张纸放在一个助手背上，另一个助手则举灯照着亮，他想就这样草草地写下以上口述的内容，仅仅为了帮巴纳巴斯一个忙，但意外的是K.这时已经可以听着巴纳巴斯口授来写了，这家伙已经把那一大堆话完全记在脑子里，现在像小学生背书那样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丝毫不受两个助手的干扰——这两个在一旁不断地插嘴提词，但张口就错。“你的记性真是太不一般了，”K.说，一边把写好的纸条递给他，“可是我求求你，请你在别的方面也表现得 not 一般些，好吗？现在就来说说你的愿望吧，你没有什么要求要提吗？我就直说吧，考虑到让你带的这个口信会有什么命运，你最好还是向我提一些要求，那样我会心安一些。说说看，有什么要求？”巴纳巴斯先是不作声，过一会儿他说：“我的姐姐和妹妹让我向你问好。”“你的姐姐和妹妹，”K.说，“对了，就是那两个长得很壮实的高个子姑娘。”“她们两个都让我给你带好，不过特别是阿玛莉娅，”巴纳巴斯说，“这封给你的信也是她今天从城堡带回来交给我的。”一听这话，K.便抛开所有别的先紧紧抓住这个新信息，问道：“那么她能不能也把我这口信带到城堡去？或者，你们能不能两人都去，每人都试一试自己的运气怎么样？”“阿玛莉娅没有进官府办公厅的许可，不能进去，”巴纳巴斯说，“否则她一定非常乐意办这件事。”“我也许明天到你们家来，”K.说，“但你一定要先把回话告诉我。我在学校等着你。请你也代我向你的姐姐妹妹问好。”K.表示要去他们家似乎使巴纳巴斯非常高兴，握手告别后，他又轻轻摸了摸K.的肩膀。此刻K.觉得好像一切都同以前——即巴纳巴斯第一次充满朝气地来到农民们中间时——完全一样，

于是他觉得这触摸像是一种鼓舞，只不过这次是面带微笑罢了。由于心情已经平静了一些，他在回去的路上就听任两个助手为所欲为了。

第十一章

他冻得浑身麻木地回到了现在的家——学校，四处一片漆黑，马灯里蜡烛已经燃尽，他在这两个对此地环境很熟悉的助手带领下摸索前行，好大一阵才走进了一间教室。“这是你们今天立的头一大功。”他想起了克拉姆的信，这样说道；这时从一个角落传来弗丽达睡意蒙眬的叫声：“你们让K.睡吧！别打搅他了好不好！”她多么惦记K.啊，甚至就在半醒半睡状态中，在她无法抗拒睡魔、等不及他回来先就寝的情况下，心里仍然想着他。现在灯点着了，但是不可能拧到足够的亮度，因为煤油太少了。学校建校时间不长，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屋里虽然生了炉子，可是这间同时又充作体操室的大房间——各种体操器械到处乱放着，还有的挂在天花板上——存放的劈柴已全部用光，据说，刚才屋子已经烧得相当暖和了，可惜现在又完全凉了下來。虽然在一个仓库里还堆着大批木柴，但这个仓库锁着，钥匙掌握在那个教员手里，而他是要到上课生火时才许去取木柴的。其实，要是这里有两张床，可以钻到被子里去躺着的话，那么也就勉强过得去了，但是说到这一点嘛，屋里除了唯一的一个草袋之外别无长物，弗丽达把她的一件呢子斗篷平平整整地铺在上面，令人顿生感激之情，可是，没有羽毛被，只有几乎不能保暖的两条硬邦邦的粗毛毯。然而即便是这个可怜巴巴的草袋，两个助手也馋涎欲滴地盯着，当然，他们并不抱任何希望获准在那上面躺下。弗丽达怯生生地看着K.，她善于把哪怕最简陋的房间也布置得舒适惬意的本领，在大桥酒店已充分表现出来，但是这里就不同了，她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唯一的室内装饰就是这些体操器械了。”她满脸泪痕、强作笑颜说。但是，提到两项最大的欠缺即床铺和取暖柴禾时，她却胸有成竹地告诉K.说，第二天局面就会改观，请K.暂时忍耐一下。虽然K.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是他先从贵宾楼、这次又从大桥酒店硬是把拉走，但他却没有听到她一句话和一丁点儿暗示，没有看见她脸上有一点特别的表情说明她心中对K.怀着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怨气。因此，K.现在就努力克制自己，对一切都表示可以将就，事实上做到这点他也丝毫不觉困难，因为现在他一门心思在巴纳巴斯身上，一面思想上随他远去，一面还在逐字逐句重复自己的口信，不过不是追忆他先前如何如何说给巴纳巴斯听，而是设想着根据自己的估计巴纳巴斯在克拉姆面前

会怎样说这些话。当然他也的确满心欢喜地等着喝弗丽达用一个小酒精炉为他煮的咖啡，并靠在逐渐冷却下去的炉子上，瞅着她以十分灵巧、极为纯熟的动作在讲桌上铺开那块必不可少的白台布，摆上一只绘有花卉图案的咖啡杯，又在杯子旁边摆上面包、腊肉，甚至还有一个沙丁鱼罐头。现在一切就绪了。弗丽达自己也还没有吃晚饭而是一直等着K。屋里有两把椅子，于是K和弗丽达便在桌旁坐下，两个助手则坐在他们脚边、讲台的台基上，但两人从不老老实实待着，即便在吃饭时他们也不断来骚扰，虽然他们每样东西都得了不少，离吃完也还差得很远，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站起来，探头探脑地向桌上张望，看看东西是否还富余，他们是否还有希望再分得一些。K没有理他们，只是弗丽达的笑声才引起他们对他们的注意。他讨好地把自己的手压在弗丽达放在桌上的手上面，轻声问她，为什么她对他们这样宽容，连他们的坏毛病也只一笑置之。像她这样永远也别想甩脱他们，而如果换一种方法，用比较强硬的、实际上对他们的胡来倒是对症下药的态度对待他们，也许就能做到：或者是使他们变得老实、规矩，要不就是——这是可能性更大的、更好的情况——使他们无法忍受现在这个位置而终于溜之大吉。看来，在这儿这所学校待下去是不会太痛快的了；当然啦，在这里也是待不长的，不过要是两个助手走了，只剩他和他两人住在这所安安静静的小房子里，那么这里的所有缺憾就几乎觉察不出了。难道她没有和他一样看出来，两个家伙一天比一天更放肆，情形好像是，有了弗丽达他们简直有恃无恐，还有，心想在弗丽达面前K不会像她不在时对他们那么厉害，这也使两人胆更壮了。另外，也许还有很简单的办法干脆利索地摆脱他们，也许弗丽达就知道这类办法，她对这里的情况不是非常熟悉吗？况且，对两个助手来说，想个法子赶走他们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在这里过的也不是多么舒服的日子，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无所事事清闲懒散，从现在起至少不会完完全全那样了，因为他们得干活啦，弗丽达在近几天的紧张、激动之后需要体恤一下自己，而他K呢，也得集中精力想出一条良策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不过，如果两个助手真的走了，那么他会如释重负，这样就一定可以轻松愉快地完成学校勤杂工的全部工作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

弗丽达专心听他讲完了这番话之后，慢悠悠地抚摩着他的手臂说，这些也完全是她的意愿，只是K也许把两个助手的坏毛病看得过于严重，这不过是两个年轻小伙子，生性活泼，有那么点儿缺心眼儿，刚刚脱离城堡的严格管教，这是初次被指派为外来客人服务，所以他们总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什么事都感到新鲜奇特，处在这样的心态中有时也

就会干出些蠢事来，对这些胡闹，生气是很自然的，但更聪明的办法就是哈哈一笑由它去。她自己有时就忍不住要发笑。不过话说回来，她还是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即最好把两人打发走，她和他能单独在一起。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椅子挪近K，低下头靠在K肩上，蒙住了自己的脸。这样的姿势，说话声音很不清晰，以致K不得不也弯腰低头去就着她。她说，但是她想不出什么法子支走两个助手，她担心K的想法会完全落空。据她所知，是K自己要他们来的，现在他们来了，也只好留下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把他们放在心上，把他们当成可有可无的人——实际上他们也正是这样的人——这才是对付他们的上策。

K.不满意这个回答。他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看来她同他们是一伙，至少是对他们很有好感，是呀，两个家伙长得倒是挺讨人喜欢；不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点真心实意想甩脱，那么怕是谁能硬是死缠住人的。他将拿这两个助手做例子证明这一点给她看。

弗丽达说，如果他真能甩脱他们，她会非常感激他。不过嘛，从现在起她将不再笑两个助手，也不再同他们说一句多余的话。她的确也觉得他们身上再没什么可笑之处了，老是被两个男人紧紧盯着也确实不是什么无所谓的小事，她渐渐学会用他的眼光去看这两个人了。她说到这里，两个助手又一次站起来，一是想再看看清楚桌上还有多少吃的，二是竖起耳朵想听明白弗丽达和K.在嘁嘁喳喳谈些什么，当她看到这个场面时，也真是觉得一阵浑身不自在。

K.赶紧抓住机会让弗丽达疏远两个助手。他把她拉过来紧紧贴在自己身边，两人就这样肩挨肩地吃完了饭。这个时辰本来早该睡觉了，几个人都很疲倦，一个助手甚至吃着吃着便睡着了，对此另一个助手非常开心，他想引起主人注意，看看那个伙计睡着以后的傻样，然而没有成功，K.和弗丽达没有理他，而是高坐台上无动于衷。屋子里冷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所以他们也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躺下睡觉；最后K.宣称必须再生火取暖，否则睡觉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到处找斧子一类工具，两个助手知道哪里有斧子，便去取了来，于是他们便到堆放劈柴的仓库去了。不一会儿那道轻便的门便被撬开，两个助手兴高采烈地——似乎他们从未得到过这种美差——你追我赶、你推我搡地把木柴往教室里搬，不久那儿便堆起了一大堆，火生起来了，大家都围着炉火躺下，两个助手得了一条毯子，可以钻进去把全身裹起来，一床毯子就够用，因为商量好两人轮流睡觉，始终有一个人负责看炉子续柴火，并且，不多久炉边就

也暖和得完全不需要被盖。关灯以后，K.和弗丽达便在这温暖、寂静的气氛中舒坦地躺下，伸直身子睡觉了。

半夜里，当K.被不知是什么的声响吵醒，睡眼惺忪地伸手去摸弗丽达时，他发现不是弗丽达而是助手中一个躺在他身边。他吓了一跳，而且，大概由于他现在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精神状态吧（突然被吵醒也就够让他产生这种心态了），这猛吃一惊成了他到这村子以来受到的最厉害的惊吓。他大叫一声半坐起身，怒不可遏地给了这个助手狠狠一拳，打得他当即哭了起来。然而事情马上也就真相大白。原来是弗丽达先惊醒，原因是——至少她觉得是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大概是一只猫吧，跳到她胸口上然后又跑了。她起来点起了一支蜡烛，在屋里到处找这个东西。这时助手之一便趁机跑来享受一下躺草袋的滋味，现在他是为此尝到苦头了。弗丽达什么也没找到，刚才也许只是她的错觉吧，她走回K.这里，半路上，似乎已把昨晚一席谈话全忘了，她抚摩了一下那个缩成一团呜呜咽咽哭着的助手的头发以示安慰。对此K.一句话没说；他只是吩咐两个助手不要再续柴火了，因为搬来的劈柴差不多全用上了，现在屋里已经热得让人难受了。

第十二章

早晨，直到第一批小学生已经到校并好奇地围观他们的床铺时，几个人才一觉醒来。这局面令人颇为难堪，因为，由于屋里太热——当然凌晨时分又感觉有点凉意了——他们全都脱去了衣服，仅穿着贴身衬衣，另外就是正当他们开始穿衣服时，这里的女教师吉莎，一个头发金黄、容貌美丽、只是动作稍嫌生硬的高个子少女，便在门口出现了。她显然对新来的学校勤杂工有了思想准备，并且也已从男教师处得到了如何对待这个人的行动指示，瞧，一跨进门她就开口了：“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看你们把这屋子弄成了什么样子！你们只得到准许在教室睡觉，而我可没有义务在你们的卧室里上课。好家伙，一个勤杂工，全家都住到这里来，懒觉一睡就睡到大上午！呸！”唔，K.心想，这一指责未免也太过分了点，特别是什么全家人和睡懒觉，一边想，他一边急忙同弗丽达一起——两个助手现在没有一点用，他们躺在地上直眉瞪眼地盯着女教师和孩子们——把双杠和木马推过来，把被子搭在上面，算是打了一个隔断挡住了孩子们的视线，这样便至少可以穿衣服了。但是要说消停嘛，却连半分钟也没有，先是女教师不住地骂骂咧咧，因为洗脸盆里没有一点干净水；K.刚刚还想去把脸盆拿过来给自己和弗丽达使呢，听到

叫骂声他暂时放弃了这个打算，免得给女教师的怒气火上浇油。然而这忍让也无济于事，过不了一会儿又爆发出一阵大吵大闹：原来他们昨晚不慎把吃夜餐剩下的残渣留在了讲桌上忘了收拾，现在女教师用一把直尺把所有残留的食物稀里哗啦一下子全拨到地上；沙丁鱼油和没喝完的咖啡溅得到处都是，咖啡杯被砸了个粉碎，这一切女教师全不用犯愁，不是有勤杂工吗，他马上会来收拾的。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的K和弗丽达，倚在双杠上看他们这份小小的财产横遭毁灭；两个助手显然没有丝毫想穿衣起来的意思，他们趴在地上，从挂着的两条被子中间探出头来向外窥视，那模样使孩子们看了乐不可支。弗丽达最心疼的自然是那只很大的咖啡杯给毁了；只是当K安慰她，向她保证一定立刻去找村长要求补发时，她才稍稍心安，并且顾不得只穿着衬衣衬裙立即从这个小隔间跑了出去，以便至少把桌布抢救下来，免得再弄上什么脏东西。尽管女教师不住地用她那把直尺震耳欲聋地劈劈啪啪抽打讲桌吓唬她，到底她还是成功地把台布取过来了。K和弗丽达都穿好衣服后，他们又不得不连催带打地叫两个助手——两人在这一连串的事件面前变得跟木头人似的——穿衣服，甚至还得亲自动手帮着他们穿。然后，待大家都穿着停当，K便分派下一步的工作：两个助手去取劈柴生火，不过首先要到另一间教室去生火，那边现在还是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库——因为男教师大概已经来了。他让弗丽达扫地擦地，他自己则马上去提水并负责收拾别的；早饭目前暂时是谈不上了。但是，为了先大致摸一摸女教师情绪如何，K打算自己先从隔间走出去，让其余三人等他叫时再跟出去，所以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因两个助手干点什么蠢事而一开始就把局面弄得更糟，另一方面则由于他想尽可能保护一下弗丽达，因为她有虚荣心而他却没有，她很敏感而他不会，她只想着眼前的一些让人腻味的琐碎小事而他心里却想着巴纳巴斯和未来。弗丽达对他的安排一一听从照办，几乎是眼不离他。他刚一走出来，女教师就在孩子们的哄笑声——这笑声从此就再也没有停过——中叫道：“唔，终于睡够了？”因为这并非真正在问他，所以K也没有理睬而是径直向盥洗台走去，于是女教师又问道：“您到底把我的咪咪怎么样了？”只见一只又肥又大的老猫，懒洋洋地趴在桌上，女教师在察看它那显然受了点轻伤的爪子。这么说弗丽达还真是猜对了，这只猫虽然并没有跳到她身上，因为它恐怕是想跳也跳不动了，却是从她身上爬过去的，由于这间一向空空荡荡的屋子里突然来了好几个人，它受到惊吓，在很不习惯地慌忙躲藏时不小心受了伤。K试图心平气和地向女教师解释这一特殊情况，但对方却只抓住面前的结果不放，说：“好啊，你们伤了它，这就是你们

到我们这儿来的见面礼！您倒是来瞧瞧！”这时她把K.叫到讲台上，拿猫爪给他看。一刹那功夫，K.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她已经用猫爪在他的手背上狠抓了一下；虽然那爪子并不很锐利，但女教师——这次她可顾不上心疼那只猫了——却紧紧按住了爪子使劲抓，结果K.的手背上立时出现了道道血痕。“现在您去干您的活吧。”她不耐烦地说，又弯腰去看她的猫了。同两个助手倚在双杠后面把这一幕完全看在眼里的弗丽达，一看到血不禁叫了起来。K.把手背伸给孩子们看，说：“你们看吧，这是一只又凶恶又狡猾的猫给我抓的。”他这话当然不是说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安静下来，因为这帮孩子的叫闹和嬉笑现在早已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什么新刺激都不需要，也没有什么话能盖过吵嚷声或对它有什么影响。但是，由于女教师对这句挖苦话也只报之以一眼斜睨，然后就又要去对那猫大施温存，也就是说，经过这流血的惩罚，她开始时的震怒此刻似已平息下去，于是K.便呼叫弗丽达和两个助手，开始干活了。

当K.把盛满脏水的桶提出去，换了干净水回来，开始在教室里扫地时，一个约莫12岁光景的男孩离开座位走过来，碰了碰K.的手，说了点什么，在一片嘈杂中完全听不清。这时，所有的喧哗声突然间戛然而止，K.立即回头去看。整个早晨一直在担心着的事终于发生了。原来，此刻男教师站在门口，别看他个子小，却两手一左一右各揪住一个助手的衣领；大概他是在他们去搬木柴时把两人截在半路抓获的吧。只听他一字一顿地厉声呵斥道：“是谁胆大包天，竟敢硬闯到木柴仓库里去？是谁指使他们干的？我要把他剁成肉酱！”这时弗丽达从地上爬起来——她正趴在女教师脚边呼哧呼哧地擦地——她看了K.一眼，好像想靠这个给自己打气，然后，目光里、神态中又带上往日那种优越感开口道：“这是我干的，老师，我没有别的法子。要想生火，让两个教室一早就暖暖和和的，就得去打开仓库门；可是半夜三更去找您拿钥匙我又不该；那时候我的未婚夫在贵宾楼酒店，可能一宿不回来，所以我只好自己决定了。要是我做错了，请您原谅我没经验；我未婚夫回来看到我干的这些事，把我骂了个够。他甚至不许我一大早生火，因为他觉得您既然把门锁了，就说明您不想让人在您自己到校前先把火生着。所以说，没有生火是他的错，而撬开仓库门是我的错。”“是谁把门撬开的？”男教师喝问两个助手，两人直到现在仍在白费力气，使劲想挣脱他的手心。“是那位先生。”两人答道，为了免除误会，又用手指着K.。弗丽达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似乎比她的话更有说服力，笑过之后，她使用桶接着，动手把擦地板用的那块抹布拧干，那神情似乎在说，由于她已经解释过，这事也就已经了结，而两个助手的话，不过是事后开个玩笑罢了；直到她又跪

下去，准备继续干活时，才又说道：“我们这两个助手是两个大小孩儿，岁数是不小了，可还是跟小学生似的欠管教。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个人傍晚时用斧子砸开了门，做这件事非常简单，完全用不着助手，他们两个只会越帮越忙。但后来我的未婚夫夜里回来了，为了看看到底损坏成什么样子，如果可能就修理一下，他又出去了一趟，那时两个助手也跟着跑了出去，大概他们是害怕单独同我一起待着吧，他们见我未婚夫在撬开的门边干活，所以现在就这么说——没法子，他们是孩子呀。”虽然两个助手在弗丽达作解释时不住摇头，不停地指着K，拼命使眼色想叫弗丽达改变她的说法；但这些努力一概无效，最后他们还是顺从了，把弗丽达的话当成命令，不再回答男教师又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么说，”男教师说，“你们刚才是说瞎话？至少也是不负责任地责怪学校勤杂工了？”两个助手仍一声不吭，但他们浑身发抖、目光怯怯，好像说明他们知道自己有了过错。“那么我要好好打你们一顿。”男教师说着便派一个小孩到另一间屋去取藤条鞭子。到他举起鞭子就要打下去的时候，弗丽达突然叫起来：“两个助手说的是实话呀！”她说完就把抹布狠命往桶里一扔，水溅得老高，接着她就跑到双杠后面躲起来了。“没句真话的东西！”女教师说，这时她刚替猫包扎完爪子，把它抱在怀里，她的腰身比较瘦削，相形之下这猫简直就太胖太大了。

“现在就看勤杂工先生怎么说了，”男教师说，一面推开了两个助手，转身向这段时间一直挂在扫帚把上默默旁听着的K.说道：“这位勤杂工先生居然胆小怕事到任人歪曲事实，让别人代己受过的程度！”“好吧，”K.说，他现在看得明白，弗丽达为息事宁人挺身而出，总算使男教师初时的狂怒平息了一些，“如果两个助手挨点儿打，我是不会心疼他们的；他们是有十次该打而每次都受到了宽大对待，那么挨一次冤枉鞭子算是赎回以前的过失，也不能说不可以吧。然而即使不谈这点，我还是非常希望，要是我同您这位老师之间刚才不幸发生的正面冲突能避免就好了，也许您也不是不愿意这样吧。可是既然现在弗丽达为救两个助手牺牲了我——”说到这里K.顿了一下，在片刻的寂静中可以听见挂着的被子后面弗丽达在抽泣，“那么当然必须把事情弄个明白。”“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女教师说。“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吉莎小姐，”男教师说，“您，勤杂工，由于犯下这个可耻的职务过失，当然是立即被解雇了；同时我还保留进一步对您进行惩处的权利；现在您马上卷起您的铺盖从学校滚出去！这样我们就甩掉了一个大包袱，总算可以开始上课了。快滚！”“我不打算从这里挪动一步，”K.说，“您是我的上司，然而并不是任命我担任这个职务的上司，任命我的是村长先生，我只能接受

他的解聘令，但他给我这个位置，总不会是我同我的人在这里冻死，而是——如您自己也曾经说过的——为了防止我冒冒失失轻举妄动吧。因此，现在突然解雇我是直接违背他的意愿的；只要我没有听到他亲口说出与此相反的话，我不相信他会解聘我。顺便再说一句，我不服从您这条轻率的解雇令，恐怕到头来对您本人也是大有好处的呢。”“这么说您是不服从了？”男教师问。K.摇摇头。^[3]“您要好好考虑考虑，”男教师说，“您作的决定并不都是最明智的；比方说，想想您昨天下午拒绝受审的事吧。”“您为什么现在要提这件事？”K.问。“因为我乐意，”男教师说，“现在我再最后重说一遍：滚出去！”但是当这句话也仍然没有效果时，男教师便向讲台走去，在那儿同女教师嘀嘀咕咕商量了一阵，女教师提到警察什么的，但男教师不同意，最后两人达成一致，男教师叫孩子们都到他那个班去同那边的孩子合班上课。这种新鲜事使所有的孩子兴高采烈，于是孩子们在一片欢笑喧闹声中离开了这间教室，男教师和女教师跟在后边。女教师一手抱着班级记事簿，上面悠闲自在地趴着那只大肥猫。男教师似乎很想把猫留在这边，然而他婉转地表示了这层意思后女教师立即以K.对猫很残忍为理由坚决反对；这样一来，K.除了给男教师惹了各种气恼之外现在又多了一条罪状：把猫这个累赘也加在他的头上了。这一点很可能对男教师走到门口时再回过头来对K.说的最后几句话起了作用：“由于您顽固不化，拒绝服从我的解雇令，又由于谁也无权要求吉莎——小姐人家是位年轻姑娘——在您这肮脏龌龊的吃喝拉撒睡环境中上课，小姐现在是迫不得已，只好同孩子们一起离开这间教室了。这就是说，您现在可以旁若无人地在这里为所欲为，不用担心正派人的厌恶和反对了。然而这种情况是长不了的，这点我可以担保。”说完便砰的一声带上门走了。

第十三章

那些人刚一走，K.就对两个助手说：“你们出去！”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弄得目瞪口呆摸不着头脑，一时便服从了，但当K.在他们出去后把门关上时，他们又想进来，在门外苦苦哀求，不住地敲门。“你们已经被解雇了！”K.叫道，“今后我永远不会再用你们。”两个助手不肯就此罢休，他们砰砰砰砰对教室的门拳打脚踢。“我们要回到你那里，先生！”他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好像K.是一片陆地而他们立时就要被大浪淹没似的。但是K.丝毫不为所动，他急切地等着这难以忍受的噪声终究会迫使男教师出来干预。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您倒是让您这两个倒霉

的助手进去行不行！”他大声嚷道。“我已经把他们解雇了！”K.也大声喊叫着回答；这句话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就是让男教师看一看，某某人不仅有足够的力量宣布解雇别人，而且也能将这解雇令付诸实施，这是多么气派。现在，男教师尽力对两个助手加以好言抚慰，要他们在这里耐心等着，坚持一会儿K.终归是不得不让他们进去的。说完就走了。这时，如果不是K.又开始大声对他们说，他们的被解雇是最终决定，没有丝毫收回成命的希望，那么也许他们就不再吵闹了，由于K.说了这样的话，两人便又同先前一样大吵大闹起来。男教师又过来了，但这次可不是来同他们商量，而是把他们从学校赶了出去，显然用上了那根令人望而生畏的藤条鞭子。

过不多久，两人又在这间体操室的窗外露面，不断敲打玻璃，大声嚷嚷；但究竟喊些什么完全听不清。不过他们在那里待的时间倒也不长，因为积雪很厚，他们心急火燎总要蹦蹦跳跳，这点无法做到。于是他们就跑到学校花园的栏杆处，纵身跳上那比地面稍高的基座，从那个位置，虽说远些，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教室里的动静；他们在那儿手扶栏杆跑来跑去，过一阵子又停下来远远向K.打躬作揖苦苦乞求。就这样，软磨硬泡了很久，丝毫不考虑他们这些辛苦完全是白费力气；他们似乎已经失去理智，为了免得看着心烦，K.干脆把窗帘放了下来，然而在此之后，两人大概也还没有停止这种折腾。

现在屋里光线昏暗，K.走到双杠边去，想看看弗丽达在做什么。他眼瞅着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头发，用毛巾擦了擦脸，默默无言地去煮咖啡。虽然她对刚才发生的事一清二楚，K.还是正式通知她：他已经把两个助手解雇了。她只点了点头。K.坐在学生座位上观看她那疲惫的一举一动。以前，是她的青春活力、她的决断果敢赋予她那瘦小的身躯某种美；然而现在这种美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同K.一起生活才几天，就把她拖到了这步田地！酒吧里服务工作并不轻松，可现在看来大概对她更适合一些。或者会不会是因为离开了克拉姆，才使她日渐憔悴呢？经常克拉姆左右，使她具有了令人销魂的魅力，正是由于有这种魅力，她才一举把K.俘虏了，可是现在呢，在K.的怀里她凋谢了。〔19〕

“弗丽达。”K.说，这时她正收起咖啡壶，朝K.坐着的地方走过来。“你在生我的气吧？”她问。“不，”K.说，“我想你也没有别的法子。你在贵宾楼日子过得挺舒服，我本该让你留在那儿的。”“对，”弗丽达说，忧伤地凝视着前方，“你本该让我留在那里的，我不配同你生活在一

起。没有我的拖累，也许你想办什么事都能办成。为了我，你宁愿受那横蛮的教员的气，为了我你答应下这份倒霉差事，又费牛劲去争取同克拉姆谈一次话。这些全都是为了我，可是我却不能给你相应的回报。”“不对，”K.说，一面伸出手臂温存地搂起她的腰，“这些全是小事，我一点也不在乎，去找克拉姆也不单纯是因为你的缘故。再说，你为我做了多少事啊！认识你以前，我在这里完全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愿留我，我硬是厚着脸皮去求人吧，人家也是过不了多久就让我走人。而如果说我本来可以在某些人家里找到安身之所，可恰恰是这些人我又赶紧躲开了，比如巴纳巴斯家的人就是这样。”“你赶紧躲开了他们？真的？最亲爱的！”弗丽达兴奋地大声说，但在K.吞吞吐吐地说了声“对”之后，便又恢复了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的样子。可是K.这时也已经打不起精神来向她说明，由于同她相好，情况对他来说已经有了转机是体现在哪里。他缓缓地从她腰间把手臂撤了出来，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弗丽达呢，好像K.的手臂刚才给了她温暖而现在她再也缺少不了这温暖似的，又开口说道：“这里的日子我真是受不了啦。如果你想让我留在你身边，那么我们得离开此地，不管哪儿，法国南部，西班牙，都可以。”“我可不能离开这里，”K.说，“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留在这里。我一定要留在这里。”然后，好像在自言自语，他又补充了一句反过来说的话，然而丝毫无意对此作出解释：“要不是有留在这里的强烈愿望，还有什么能把吸引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接着他又说：“可是你也会留在这儿的，这里不是你的家乡吗。现在你只不过缺少了克拉姆，这就使你这么心灰意懒了。”“你是说我离不了克拉姆？这叫什么话！”弗丽达说，“这里克拉姆要多少有多少，走到哪儿都能碰上克拉姆；正是为了躲开他，我才想离开这里的。我不是离不了克拉姆，我是离不了你，为了你我才想走；因为在这儿我没法尽情享受同你待在一起的幸福，这里谁都要来缠我。唉，我宁愿哪一天干脆破相，宁愿哪一天变得面黄肌瘦，只要能在你身边过上安稳平静的日子就好！”K.从她的话里只听出来一点。“克拉姆还一直同你有联系吗？”他马上问道，“他还叫你去吗？”“克拉姆的情况我一点不知道，”弗丽达说，“我说的是别人，比如那两个助手。”“啊，原来还有这两个助手！”K.大吃一惊说道，“他们在纠缠你吗？”“难道你一点没看出来？”弗丽达问。“没有，”K.答道，同时却怎么也回想不起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过这类事情，“说这两个家伙嘴馋、眼馋、好纠缠，也许不冤枉他们，但要说他们竟敢对你动手动脚，那我倒还没看见。”“没看见？”弗丽达说，“你没看见在大桥酒店我们的房间里怎么也赶不走他们？你没看见他们一身的醋劲盯我们的梢？没看见其中一个不久前居然

躺到草袋上我睡觉的地方来？没听见刚才他们说话时尽说你的坏话，唯恐赶不走你，拼命毁你的名声，好让他们可以单独同我在一起？难道这些你全没有看见？”K.凝视着弗丽达不作答。对两个助手的这些指控可能都不错，但是，也可以用两人那可笑、幼稚、古怪、放肆的品性来解释，这样他们的问题也就轻得多了。并且，他们两个总是处心积虑地紧紧尾随K.而不留在弗丽达身边，这一事实难道不也是对这种指控的反驳？想到这里K.说了一句意思与此大致相同的话。“他们是假装正人君子，”弗丽达说，“这一点你也没有识破？对了，如果不是这些理由，那你又为什么要赶走他们呢？”说到这儿她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一条缝，朝外面看了看，然后招呼K.过去。两个助手这时仍然在外面那栏杆边上，尽管看上去已经很疲劳，仍时不时铆足了劲朝学校房子这边打拱哀求。其中一个为了不必老用手扶着栏杆，就把上衣的后摆撩起来套在一根栏杆的顶部挂住。

“真可怜，真可怜！”弗丽达说。

“要问我为什么赶走他们吗？”K.接上弗丽达刚才的话问道，“直接的导火线就是你。”“我？”弗丽达问，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你对这两个助手态度太好了，”K.说，“你惯着他们的坏毛病，你对他们总是嘻嘻哈哈的，你抚摩他们的头发，你老觉得他们可怜，这不，现在又说他们‘真可怜，真可怜！’，最后就是刚才发生的事，为了使两个助手免遭鞭打，你拿我做牺牲品也在所不惜。”“你说到点子上了，”弗丽达说，“我想说的正是这个，正是这一点使我难过，使我同你有距离，而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待在你身边，永不分离，没有间断，没有尽头。我经常梦见，这世界上没有一块净土让我们在那里不受干扰地相爱，村里没有，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所以我向往着一座坟墓，一座又深又窄的坟墓；在那里我们俩像被钳子夹住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把脸紧贴着你，你也把脸紧贴着我，谁也再看不到我们。可是这里呢——瞧这两个助手！他们打躬作揖，不是冲着你求你而是冲着我求我。”“但是现在盯着他们看的，”K.说，“不是我，而是你。”“当然啦，是我，”弗丽达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说，“我不是一直在讲这一点吗？要不然，两个助手老缠着我不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吗？就算他们是克拉姆派来的人，老跟着我也不必在意。”“克拉姆派来的？”K.说，虽然他觉得这个说法很合情理，但乍一听仍然感到一惊。“一定是克拉姆派来的，不会错，”弗丽达说，“但是又怎么样？他们不同时也是两个浑球吗？管教他们还得用鞭子。这两个家伙要多讨厌有多讨厌，要多丑有多丑！他们的脸倒是长得

像大人，甚至有点像大学生，可是他们的举止又多幼稚、多蠢！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硬放在一处简直是四不像！你以为我没有看到这点吗？我只是为他们感到害羞罢了。可问题的关键也正好在这里：我并不厌恶他们，而是为他们感到害羞。我忍不住老想看他们一眼，如果谁跟他们这样的人怄气，我会憋不住要笑的。如果谁要揍他们，我又忍不住想去胡撸胡撸他们的头发。夜里我躺在你身边睡不着时，就老是越过你身上看着他们一个紧紧裹在被子里蒙头大睡，另一个跪在打开的炉门前生火，我得使劲欠着身子看，生怕把你碰醒。其实不是那只猫吓了我一跳——嗨，什么猫我没见过，在酒吧里整夜睡不踏实经常被吵醒的日子我也早习惯了——不是那只猫吓着了，是我自己吓着自己。〔20〕根本不需要吓人的大肥猫捣乱，随便一点小小的响动都会使我受惊。我一会儿担心你会醒，那样就一切都完了，一会儿我又翻身跳起来点上蜡烛，想叫你快些醒来保护我。”“这些我原来全不知道，”K.说，“我只是凭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把他们赶走的；不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走了，那么也许一切都好了。”“是呀，他们总算走了，”弗丽达说，然而说这话时脸上露出的是痛苦而并非愉快的神色，“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啊。说他们是克拉姆派来的人吧，我在心里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玩笑似的这样看他们，但是也许他们真的就是克拉姆派来的呢。瞧他们那眼睛，那两双直愣愣的但同时又是熠熠闪光的眼睛，总使我不知怎的联想到克拉姆的眼睛，对了，是这话：从他们眼里发出的那种有时叫我不寒而栗的眼神，就是克拉姆的目光！所以，我刚才说我为他们感到害臊是不对的，我其实只是希望我能做到这样。我知道，如果是别人在别处做出同样的举动，那么我一定觉得是愚蠢的、讨厌的，可是他们这样做就不一样了。我是怀着尊敬、赞赏心情看着他们做那些蠢事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他们是克拉姆派来的人，那么谁有本事使我们摆脱他们；再说摆脱他们究竟有没有好处？很难说。如果没有什么好处，那么你恐怕得赶紧去把他们找回来，而他们来了你就应该很高兴是不是？”“你是想让我再把他们放进来？”K.问。“不，不，”弗丽达说，“我最不愿的就是这个。要我看着他们欢蹦乱跳冲进来，看着他们又见到我时那种兴高采烈的模样，看着那跟孩子一样的蹦蹦跳跳和大人一样的打躬作揖，这些我也许完全受不了。可是我又想，要是你这样对他们强硬下去，也许就等于是自己把克拉姆找上门来的路子堵死了，这样我就又打算千方百计劝阻你不要这样硬顶，免得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让他们进来为好。K.，你就快让他们进来吧！不用管我，我有什么要紧！我会尽量提防他们的；万一我跟他们斗斗输了，那就让它输吧，不过那

时我也会想到这是为了你而心安的。”“你说的这些只能更加坚定我对两个助手的看法，”K.说，“我是决不会同意让他们进来的。我已经把他们弄出去了，这不是证明这两个家伙有时也还是可以驾驭的吗？同时这一点又证明他们同克拉姆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昨晚我刚收到克拉姆一封信，从信上可以看出，克拉姆对这两个助手的情况完全了解错了，而从这里又只能推论出两人对他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否则他一定会设法弄到有关他们的确实情况的。至于说你看他们像克拉姆，这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非常遗憾的是你一直还摆脱不掉老板娘的影响，所以到处都看见克拉姆的影子。你现在实际上依旧是克拉姆的情人，还远不是我的妻子。有时想到这个我心里很难受，觉得似乎一切都完了，觉得我好像是刚刚来到村里似的，可又不真像初来时那样满怀着希望，而是心里很明白有一连串的失望在等待着自己，我得一杯接一杯地喝完这苦水，连底上的残渣也得吞下肚里去。不过这种感觉只是时不时才有，”最后这句，是K.看见弗丽达听了他这番话两腿发软站不住，才微笑着补上的，“并且它实际上说明了一件好事，即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是很重的。如果你现在让我在你和两个助手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两个助手一上来就输了。要你还是要两个助手，这还用考虑吗？好了，现在让我们就彻底摆脱他们吧，不说他们，也不想他们。哎哟，谁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浑身发软是不是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饭呢？”“很可能。”弗丽达说，一面带着疲倦的微笑干活去了。K.也又重新拿起了扫帚。

过了一会儿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巴纳巴斯！”K.大叫一声，扔下扫帚三步两步就来到门边。一听到这个名字，弗丽达无比惊愕地看着K.。他激动得手直发颤，一下子打不开那把旧锁。“我这就给你开门。”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而不问问究竟来人是谁。结果，他不得不眼看着门被猛地一下推开，紧接着跨进屋来的并非巴纳巴斯，而是一个小男孩，就是以前曾经有一次想和K.说话的那个孩子。但K.这时没有一点心思去回忆在哪里见过他。“你上这儿来干吗？”他说，“上课是在隔壁。”“我就是从那儿来的，”男孩说，同时毫无惧色地抬起头，用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凝视着K.，两只手臂紧紧贴着身子，笔直地立正站在那里。“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快说！”K.说着把腰稍微弯下一点，因那男孩说话声音很低。“我可以帮助你吗？”男孩问道。“他想帮助我们呢，”K.转过身去对弗丽达说，接着又问男孩道：“你叫什么名字？”“汉斯·布伦施维克，”男孩说，“四年级学生，马德莱纳街上的鞋匠师傅奥托·布伦施维克的儿子。”“哦，你是布伦施维克家的。”K.说，对男孩态度和蔼多了。原来，汉斯先前看到女教师在K.手上抓出几道血印时就感到很

气愤，当时就决心帮助K.了，现在他擅自行动，冒着受严厉处罚的危险，像个逃兵似的从隔壁教室偷偷溜了出来。这个行动可能是出自小男孩常有的好打抱不平的天真心理吧。与这种心理相适应，他现在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表现出一本正经的严肃神情。只在开始时还有点腼腆、拘束，很快就同K.和弗丽达混熟，而等到他喝上了热气腾腾的上好咖啡时，就越发活泼、亲昵起来，一个接一个地提些刨根究底的问题，好像他想尽快摸清全部重要情况然后单独为K.和弗丽达拿大主意似的。另外他还带着一种颐指气使的神气；然而这种神气却又同天真无邪的稚气混合在一起，使人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心甘情愿在他面前俯首听命。总而言之，他这段时间占据了两个人的全部注意力，结果他们什么正经事没做，早饭时间也拖得很长很长。虽然这孩子坐在课椅上，K.坐在台上讲桌上，弗丽达坐在K.旁边一把椅子上，但给人的印象却是：似乎汉斯是教员，是考官，在对考生的回答给出评语；他那线条柔和的嘴唇四周浮着一丝笑意，仿佛在暗示别人他心里很明白这只是一场游戏，然而唯其如此，他除了这点以外对其余的事情就表现出高度的认真，或许那浮现在嘴边的根本就不是微笑，而是幸福童年的一种流露吧。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承认他早就认识K.了，就是K.到拉塞曼家去的那一次。K.听到这点非常高兴。“那天你是不是在那个女人的脚边玩儿？”K.问。“是的，”汉斯说，“那是我妈。”这话一说出口，他只好讲讲关于他妈的一些事，可是说得有点支支吾吾，而且经过一再追问才说，这时的他，说来说去终究还是表现出自己是个小男孩，虽然时不时，特别在提问题时，或许出于对未来的某种预感，然而也可能仅仅由于焦急、好奇的听众的一种错觉，他似乎表现出一种近乎大人的果断、聪明和目光远大，但这个大人转瞬间又会猝然恢复小学生的面目，一下子又成了一个对某些问题丝毫听不懂对另一些问题则作出错误解释的小学生，虽一再提醒他大点声他仍耍小孩脾气，不听话，继续唧唧咕咕说话，再就是对某些紧急的问题似乎犯犟脾气根本不愿回答，只是一声不吭，而且表情没有一点窘态，这是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整个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在他看来仅仅他有资格提问，别人问他则好像违反、破坏了某项规定，纯粹是浪费时间。所以，问他话时他就低着头撇着嘴，直挺挺地坐着半天不开腔。弗丽达很愿意看他这个样子，于是不断向他提问，希望拿这些问题封住他的嘴；她这样做有时也的确很灵，但是K.却不痛快。总的说来，问了半天没有打听出多少新东西。得知的情况是，他母亲常常闹点病，究竟什么病则问不出来，布伦施维克太太抱着的那个孩子是汉斯的妹妹，名字叫弗丽达（听说盘问他的女人也叫弗丽达，汉斯一脸

的不高兴)，他们全家都住在村里，但不是住拉塞曼家，那天他们只是去他家洗澡，拉塞曼家有个大澡盆，在那里面洗澡、扑腾、玩水是孩子们特别快活的事，可他汉斯已经不是小小孩儿，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玩；谈到父亲时，汉斯满怀敬畏或者说惧怕，但只在单独谈起他而不是同时谈到父母时才这样，显然，同母亲比起来父亲在他感情生活中分量不重，除此以外，对有关他们家庭生活的所有问题，不管用什么办法试图探听他都一律不予回答。关于父亲的职业，得知他是本村的头号鞋匠，谁也比不上他，这一点在回答别的问题时也多次重复，说他甚至还给别的鞋匠派活，比如巴纳巴斯的父亲。布伦施维克给巴纳巴斯父亲派活大概只是一种特别的照顾，至少是，汉斯在谈到这点时洋洋得意地把头一摆，让人觉得是如此，这个扭头动作使弗丽达情不自禁地跳下讲台去吻了他一下。问他是不是去过城堡，这问题重复了好几次他才回答：“没有去过。”问他妈是不是去过，他压根就不回答。最后K.觉得很累了；另外也觉得这样问下去毫无用处，这一点他觉得男孩是对的，再者，想兜着圈子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嘴里套出人家的家庭秘密就够丢脸了，而加倍丢脸的是用这种办法也仍然一无所获。于是，当最后K.问那孩子到底他想来帮他们做什么，他回答说只是想帮他们干活，免得男老师和女老师再同K.吵得那么凶时，K.就不再觉得奇怪了。K.向汉斯解释说，他们不需要他帮着干活，大概那位老师本来就爱吵架，恐怕活干得怎么细也免不了要吵。说到干活嘛，这里的活并不重，只是因为一些偶然情况，他今天才没有按时干完，另外他对这种吵嘴也不像一个小学生看得那么重，吵过就不放在心上，可以说他对吵架一点也不在乎，更何况他还有希望不久就完全摆脱男老师的支配呢。既然汉斯来这里只是为了帮K.同男老师处好，那么他K.非常感谢汉斯的好意，现在他可以回去了，但愿他不要因为到这里来又受处罚。K.没有特别强调说他不需要的仅仅是帮助他同男教师和解，只是无意随便说出来，没有提需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帮助，尽管如此，汉斯还是完全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就问他要不要什么别的帮助；他说他很愿意帮K.，如果自己帮不了他可以去求他妈帮忙，那就一定成了。虽然说父亲有顾虑，但他还是要去求母亲的。他妈有一次也问起K.，她自己可以说简直不出门，那次去拉塞曼家只是一次例外；他汉斯呢，倒是常常去找拉塞曼的孩子们玩，所以有一次妈妈问他土地测量员是不是又去过那儿了。是啊，妈妈身体那么弱，精神那么不好，不能让她着急，所以他只简单地答了一句，说他在那儿没见着土地测量员，说完以后大家也都没再提这事了；可是现在他发现K.在学校里，所以觉得一定要同他说句话，好去把情况告诉妈妈。因为

妈妈最高兴的就是不等她开口就主动照她的意思去办。听完汉斯这些话，K.思索片刻后说道，他不需要任何帮助，他什么都不缺，但汉斯提出要帮他是一片好心，他感谢他这片好心，说不定以后他还会需要什么的，那时一定找他帮忙，他不是已经知道他们家的住处了吗。这一次也许反倒是他K.能帮上一点忙。汉斯的母亲体弱，爱闹点病，看来这里又没有人能治她的病，这使他感到心里很不安；这样耽误下去，一种本来很轻的病也往往可能会拖严重的。他K.正好有一点医学知识，更有用的是他还有看病的经验。有些连医生都没办法的病他也给人治好了。在家乡，因为他有这妙手回春的本领，还得了个“苦口良药”的绰号呢。总之他很愿意去看看汉斯的母亲，同她谈谈。也许他能出个好主意，仅仅为了汉斯，他就也很乐意这样做了。当K.提出愿为母亲看病时，汉斯开始时眼睛一亮，这使K.误以为有门了，便进一步提出具体意见，想把事情定下来，但结果令他很不满意；因为，不论K.怎样翻来覆去地问，汉斯都只说——说时甚至不怎么觉得这是件让人心焦的事——陌生人是不能去见他母亲的，她需要好好保养；那一次，K.虽然只同她说了一两句话，事后她也接连好几天起不了床，当然，几天起不了床的事是常有的。父亲当时对K.非常生气，他是决不会再让K.去看母亲的；对了，当时他甚至想专门找K.一趟，就他的表现惩罚他一下，仅仅因为母亲阻止才没有去成。但是，主要是母亲自己一般不愿同任何人谈话，她打听K.，并不能说明K.可以例外，恰恰相反，提到他时她本来正好可以趁机表示一下见见他的愿望，可她并没有这样做，这不就已经把她的意愿表示得很清楚了吗。她只想了解K.的情况，而同K.谈话是不愿意的。再说她也不是真有什么病，她心里很明白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像现在这样不好，有时从她的话里也能听出这层意思：她说大概是这儿的空气她不适应；可是考虑到父亲和孩子们，她又不愿离开这里。说现在比起从前来也已经好点儿了。以上这些，大体就是K.从汉斯嘴里听来的全部情况。一旦需要保护自己的母亲免受K.的打扰，汉斯的思维能力显然比平时高出许多，他在抵制K.，抵制这个他宣称要帮助的人；是的，他出于好心，为了阻拦K.去找自己的母亲，在某些方面甚至说出些自相矛盾的话，比如关于母亲的病就是。然而尽管如此，现在K.也仍然觉得汉斯对他还是怀着善意，只是一谈到他母亲他就把别的全忘光了；不论什么人站到母亲对面去，这个人马上就一无是处，这一次是K.，但也可能是别人，比方说是他父亲。K.很想利用这后一种可能，便说，汉斯的父亲这样尽力保护母亲免受外人打扰当然做得很对啦，而他K.呢，当时要是汉斯对汉斯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哪怕只是稍有察觉也是肯定不会莽撞地去跟她说话

的，现在虽说事情早已过去了，但他还是要请汉斯回家去代自己请求她原谅。可是他不完全明白，既然病因已经清楚，像汉斯刚才说的，那么为什么他父亲还要阻拦他母亲去别处换换空气休养休养呢；只能说是他在阻拦她，因为她不愿离开家的唯一原因是孩子们和他，但孩子们她可以带上一块儿去，因为她不用离开很久，也不必去很远的地方，到城堡山上去，不就完全换了一种空气吗？这样一次郊游的费用他父亲想必不会发愁，他不是村里的头号鞋匠吗，再说他或者母亲在城堡里肯定也有亲戚或熟人，他们会乐意接纳她的。为什么他不让她走？请他不要小看这种病，他K.只同汉斯的母亲匆匆见过一面，正是她那引人注目的脸色苍白和体质虚弱使他禁不住去同他攀谈两句，当时他就觉得奇怪：汉斯的父亲怎么竟让自己生病的妻子待在那么多人洗澡、洗衣裳的地方呼吸污浊空气，而且还一点不收敛地大声说话。这位父亲大概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吧；即使病情近来可能有点起色，但这一类病是反复无常的，如果不去治，不下大力去治，那么终究是会严重恶化的，到那时就毫无办法了。如果说他K.一定不能同汉斯的母亲谈，那么，也许同他父亲谈谈，提醒他注意刚才说的这些，总是会有好处的吧。

汉斯专心致志地听完了这番话，听懂了一大半，剩下的听不懂，但其中包含的警告他也强烈感觉到了。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说K.不能同他父亲谈，他父亲不喜欢K.，可能会像男老师一样对待他。汉斯在说这几句话时，提到K.就腼腆地微笑，提到他父亲就露出怨恨和伤心的表情。然而他又补充说，也许K.还是有可能同他母亲谈谈的，不过一定不能让他父亲知道就是了。讲了这话，汉斯两眼直勾勾地在那儿动脑筋，那样子活像一个想偷吃禁果的女人正在想办法怎么能吃到果子又不受惩罚。想了一会儿，他说，也许后天就行，他父亲后天晚上要去贵宾楼，他在那里有事同人洽谈，到时候他汉斯会来接K.到他母亲那儿去，当然，这还得他母亲同意才行，而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很难说。主要的问题是 she 做事从不违背父亲的意思，什么都顺着他，就连那些他汉斯都看得出来是不近情理的事，她也完全依着他。现在，汉斯真的在求K.帮他想法对付他父亲了；情形似乎是他认识到了他原来误以为是自己想帮助K.，实际上呢，因为本地谁也帮不了他，他是想来弄清楚现在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连母亲也提到过的陌生人能不能帮这个忙的。这男孩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多么讳莫如深，简直有点诡计多端呢！这一点，在此之前从他的举止和言谈中几乎丝毫觉察不出；只是从那些有意无意间从他口里追问出来的、可说是事后的表白里，才让人感觉出来。现在他和K.长谈，考虑有哪些困难需要克服。他们不得不看到，不管汉斯多么想促成此事，困

难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他自己使劲动脑子，同时不断焦急不安地眨巴着眼睛向K.求援。在父亲离家之前他一点不能向母亲透露这事，不然父亲一知道，所有的路子就堵死了，就是说他只能在父亲走后提这件事；然而即使在父亲走后，考虑到母亲的特殊情况，也不能没头没脑地一下子告诉她，而要慢慢来，找到适当的时机；到那时，才可以去请求母亲同意这事，然后再来接K.过去；但是那样一来会不会就太晚，父亲随时可能回家呢？不会的，这不可能。但K.却提出证明说这不是不可能的。他说，大可不必担心他们在他们家的时间不够用，一次简短的谈话，一次简短的会见就足够了，汉斯也完全不用来接他。他将藏在他们家近处某个地方等着，只要汉斯给一个信号他就立即行动。不行，汉斯说，K.决不能在他家附近等——这时候那种一想到母亲便突然警觉、敏感起来的心态又控制了他——不行，母亲知道此事之前K.决不能先动身去他们家，他汉斯决不能瞒着母亲同K.达成这样的默契；一定得他到学校来接K.，而且必须在母亲知道并且准许他这样做以后。好吧，K.说，如果非这样不可，那么就真是很危险了，这样做父亲很可能在家里当场把K.抓住；退一步说即便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母亲也一定会因为害怕出现这种情况而根本就不让K.来，这样，最终一切还是都会因为父亲的缘故而告吹的。K.这些想法，说出来后又遭到汉斯反驳，于是这场争辩就这么你来我往地继续下去。

K.这一阵子早已把汉斯从课椅上叫到了讲台上，让他坐在自己两腿间，时不时怜爱地轻轻抚摩他。虽然汉斯有时还表现出抗拒心理，但这种亲昵表示终归还是起到了使他们感情融洽的作用。最后两人达成了如下的一致意见：汉斯先去对母亲讲出全部真情；不过，为了使她表示同意不致感到太困难，还要加上一句，说K.也想同布伦施维克本人谈谈，自然不是谈母亲的事，而是谈他自己的事。其实跟他谈谈K.自己的事也是应该的，因为在同汉斯谈话的过程中K.突然想到过，就算布伦施维克在别的方面是个心怀叵测的危险人物，但他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是K.的敌人了，因为，至少据村长说，他曾经是那批——尽管出于政治原因——要求聘任土地测量员的农民的带头人啊。这样分析起来，K.到村里布伦施维克心中必定是很欢迎的了；不过要是这样的话，头一天他那气呼呼的见面礼，还有汉斯说的那种不喜欢K.的情绪又从何而来呢？会不会恰恰是因为K.没有先找他帮忙他才耿耿于怀？或者出了一个什么别的误会？总之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几句话就解释清楚的。要是果真把事情说清楚了，那么布伦施维克很可能就会成为K.在同男教师甚至同村长较量时的后盾，村长和男教师用来对付K.、阻碍他去找城堡当局，又把他硬安

插到学校勤杂工位置上的那一整套官府愚弄老百姓的把戏——不是这个还能是什么别的——就可以被揭露出来；可以设想，如果最近在布伦施维克和村长之间出现过因K.而引起的争执，布伦施维克一定会把K.拉到自己一边，这样，他K.将有可能成为布伦施维克家的座上客，布伦施维克的权力手段他将可以使用，村长也就奈何他不得；谁知道这样一来他的事情会取得多大的进展啊，不管怎么说，经常在那女人左右是不会有问题的了——K.就这样沉湎在这些虚虚实实的梦幻中，而汉斯呢，心里只惦记着他母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沉默不语的K.，就好像面对着一位正在冥思苦索、力求想出能治好某种重病的良方的医生时的神情，对于K.想同布伦施维克交谈他的土地测量员位置那个建议，汉斯是同意的，然而仅仅因为这样做可以应付父亲保护母亲，另外这也只是不得已时的做法，但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此之外，汉斯就只问了问K.，他怎么向他父亲解释这么晚到他们家来，最后虽然脸色有点阴沉，总算还是勉强同意了K.的回答，即K.将这样说：他不能忍受学校勤杂工的职务，加上男教师又侮辱他的人格，这就使他在绝望中一时间把什么别的都忘了。

这样，他们尽可能考虑了各种情况，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至少不是一点没有，到这时汉斯才从他那苦思苦想的重压下得到解脱，样子高兴些了，然后他又带着孩子气先同K.后同弗丽达闲聊了一阵，这多半天弗丽达一直好像心不在焉地呆坐一旁，到现在才又开始参与交谈。她问汉斯长大后想做什么，他略加思索便说他想做一个像K.这样的人。问他为什么，他自然是答不上来，而问他莫非想当学校勤杂工，他断然否定。经一再追问，才发现原来他是拐了一个大弯才产生这个愿望的。K.目前的处境丝毫不令人羡慕，而是相反，他的情况是可悲、可惨的，这一点汉斯也看得很清楚，而且为了做到这点他根本不需要去察言观色琢磨别人的态度；他自己早就很不愿意K.看母亲一眼、同母亲说一句话，怕那会影响母亲的情绪。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来找K.，求他帮助，在他答应帮助时感到很高兴，他觉得好像别人也抱着跟他类似的想法，但是最重要的是母亲自己也提起过K.呀。由于对K.的这一矛盾态度，在汉斯心中逐渐生出一个信念，就是K.目前虽然还地位低下，令人退避三舍，但将来——当然这个将来遥远得很，还在虚无缥缈中——将来他终归会出人头地的。正是这种虚无缥缈的远景，以及那种可以引为骄傲的、朝着这个方向的步步发展，对汉斯有很大的吸引力；想到将来那个K.，为了那个K.他对现在这个K.就认了。汉斯这个愿望，既是稚气未消又少年老成的，这表现在：他以一种长辈看年轻人的姿态看K.，觉得这个年轻人

比“他自己”前途远大，比“他自己”，可他不过还是一个小男孩！另外，在弗丽达一再追问下他不得不谈这些时，那神态也是一种近乎忧郁的严肃。只是当K.说，现在他知道汉斯究竟是羡慕他什么了，说一定是喜欢他那根曲柄手杖时，他才又高兴起来；这手杖一直放在桌上，在他们谈话的这段时间里，汉斯有一阵走神时曾经摆弄过它。现在K.说，好了，这种手杖他自己会做，等他们的计划实现以后，他一定给汉斯做一根更好看的。汉斯听到K.这个许诺非常高兴，他欢天喜地地同K.告别，还紧紧握了握K.的手，并说：“那么后天见。”这时已经搞不大清楚，他究竟是否真的仅仅因为将要得到手杖才那么兴高采烈。

汉斯再不走确实也不行了，他刚离开一会儿男教师便猛地推开门，一见K.和弗丽达还心安理得地在桌旁坐着便大喊道：“实在对不起，打搅二位一下！你们倒是说说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间屋子打扫出来？我们只能在那边挤着，挤得气都透不过来，教学大受影响，可你们倒好，在这间很大的体操室里如鱼得水，要躺下就躺下，要坐着就坐着，想折跟斗就折跟斗，干什么都自由自在！就这样还嫌地方不够，又把两个助手也轰走了！都什么时候啦，这会儿你们总该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了吧？”说完这些又冲着K.嚷道：“你现在就去大桥酒店给我把早餐端来！”这些话全是怒气冲冲、气急败坏地大吼出来的，但用词还算比较温和，甚至那个本来很粗鲁的“你”字^[4]也显得不那么太生硬。K.准备马上照办；但为了顺便再从男教师口中探出点东西，他又说了一句：“我不是已经被解雇了吗？”“解雇了还是没解雇，你都去给我把早饭端来！”男教师说。“解雇了还是没解雇，我想知道的恰恰就是这个。”K.说。“你废什么话，”男教师说，“你不是没有接受解雇令吗？”“我没有接受，解雇令就无效吗？”K.问。“对我来说它仍然有效，”男教师说，“这一点你给我听明白，可是对村长来说它是无效的，我可真弄不明白。好了，现在你给我麻利点，要不你真的就要滚出去了！”K.满意了，从男教师的话判断，看来他已经去找村长谈过，或者也许根本没有去谈，而只是说出了据他自己预料村长一定会表示的意见，然而不论是哪种情况，村长的意思都是对K.有利的。于是他立即行动，急忙去取早饭，可是刚走到走廊上，男教师就又把他也叫了回来；可能是他想用这个特别的命令来考验一下K.是否忠于职守，并据此决定自己下一步如何行动，也可能是他此时再次心血来潮，很想要一耍发号施令的威风，以看到K.在自己号令下先是忙不迭地跑开，听到自己另一个命令又马上像个堂倌似地急匆匆转回来为乐事吧。从K.这方面来说，他很清楚，如果自己过于逆来顺受，就会沦为男教师的奴仆和由他任意打骂的小厮，但是现在他愿意在一定的

限度内忍受男教师的颐指气使，因为，虽然现在看来男教师没有合法的资格解雇他，但千方百计折磨他直至无以复加非人所能忍受的地步，这个人却是完全做得出来的。而对K来说，恰恰是这个位置现在比以往更加重要了。同汉斯的长谈，他萌发了一些新的希望，不能不说这些希望十分渺茫，几乎纯属空中楼阁，然而却始终萦系于他的脑际不能忘怀；有了这些希望，他差点忘掉了巴纳巴斯。每当他沉湎于这些希望中时——他无法抑制自己不这样——他总是集中全部心力，什么别的都不去想，不想吃的，不想住处，不想村公所，连弗丽达也不想；可是说到底，一切都只是为了弗丽达，因为他所有的操心事都与她有关。因此，他必须竭力保住这个多少能给弗丽达一些安全感的差事，为达到这个目的去忍受男教师那超出自己所能忍受限度的折磨，就不能老是想不开了。其实，这一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痛苦，它们是生活中那一系列永无休止的细小烦恼的一部分，同K追求的目标相比，简直就算不上一回事，再说他也不是为了过体面、平静的生活才到这里来的啊。

于是他同先前一听到命令就准备马上跑到酒店去一样，现在一听到新的命令也立即执行，打算动手先把这个房间收拾干净，以便女教师能再把她那班学生带过来上课。但是动作必须十分迅速，因为这里收拾完他还得去取早餐，男教师这会儿已经很饿很渴了。K保证一切都按男教师的意思办；男教师这时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看着K急急忙忙把床铺挪开，把体操器具推回原来位置，又飞快地清扫地面，而弗丽达则擦洗讲台。看到两人干活卖力，男教师似乎感到满意了；他提醒他们，说门前还放着一堆准备生火用的木柴——仓库他大概不会准许K再去——然后，一面威胁着说他过一会儿就要回来检查，一面抬脚到孩子们那边去了。

不声不响地干了一阵之后，弗丽达问K为什么现在对男教师这么顺从。可能这是个表示同情的、充满了关切的问题吧，但K这时想到的是弗丽达原来曾答应过要保护他免受男教师滥施淫威之苦，这个诺言几乎一点没有兑现，所以他只冷冷地回答她一句说，既然他已经当了学校的勤杂工，当然就得做自己分内的事了。这之后又是一阵沉默，然后K——刚才这简短的一问一答，正好提醒了他，使他想起弗丽达已经有好长时间一直好像若有所思、心事重重，特别是几乎在他同汉斯谈话的整段时间里都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就在搬木柴进屋时直率地问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她缓缓地抬眼望他，回答说没有想什么特别的事；她只是在想老板娘，想她说的有些话真是对极了。在K不断逼问时，她才在

好一阵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之后多说了几句，但说话时仍不停手里的活，这倒不是因为勤快，她手里的活实际上没有丝毫进展，她所以不停下来仅仅是为了不必正眼看着K罢了。现在她告诉他的情况是：在K同汉斯谈话时，起初她专心听着，后来呢，K有些话使她大为吃惊，就开始仔细琢磨这些话的意思，这一琢磨，就再也止不住老想着K那些话实际上证实了她从老板娘那里听来的一种看法，原先她一直不愿意相信那看法是对的。K听着这些不痛不痒的话心里恼火，弗丽达那眼泪汪汪的表情、诉苦抱怨的腔调让他气恼多于感动——特别是因为老板娘现在又一次闯入他的生活，至少是由于她本人到目前为止在K身上成效甚微，现在就通过让他回忆的方式再次闯入他的生活——于是他赌气地把抱着的柴禾往地下一扔，一屁股坐了上去，义正词严地要求弗丽达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个清楚。“已经有许多次了，”弗丽达开始讲了，“从一开始起就这样，老板娘总使劲跟我唠叨，想让我怀疑你，她倒不说你在撒谎，正好相反，她说你这人跟孩子一样直，可是你的为人和我们太不同了，所以即使你说老实话我们也很难强迫自己相信你，而且如果不是一个要好的女朋友早点救我们，我们就得经过痛苦的经验才能养成相信你的习惯。她说，即使她这个有眼力、善于识别人的人，碰上你这号人也跟别人一样没法子。但是上次在大桥酒店同你谈话以后——我现在只是把她当时讲的那些恶狠狠的话重复一遍——她算是看透了你的鬼把戏，现在，哪怕你使劲掩饰自己的意图，想再诳她也办不到，她不会再上当了。可是事实上呢，你是什么都不掩饰，这一点她说了又说。

后来她又对我说：你随便找个机会好好听听他说话吧，别只是浮皮潦草地听，那样不行，要真正一点不走神地仔细听。她说她自己也不过就是这样做了，结果就从你的话里听出你对我的意图是：你之所以打我的坏主意，跑来纠缠我——她的话说得就那么难听——只是因为碰巧遇着我，瞅着我也还不难看，还因为你把一个酒吧女招待错误地看成命中注定的、随便哪个伸手求欢的酒客都可以玩弄的牺牲品。除此之外她又从贵宾楼老板那里听说，你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想在贵宾楼过夜，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利用我。这些加起来，就足够促使你跟我来个一夜风流了。但是为了再多捞到点什么别的，就还需要别人，而这“别人”就是克拉姆。老板娘没有硬说她知道你想从克拉姆身上得到什么，她只是说，认识我以前和认识我以后你都坚决要求见克拉姆。不同的仅仅是：以前你觉得那是件没有希望的事，而现在呢，以为有了我这条可靠的路子，靠我就能很快地真正去接近克拉姆，甚至以更优越的身份去到克拉姆跟前了。今天听你说你认识我以前在这里是两眼

一抹黑时，我真是吓了一跳——不过这只是乍猛一惊马上就过去了，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你那句话和老板娘跟我说的简直就差不多；她也说你是认得我以后才目标明确起来。她说，这是因为你觉得占有了我就是把克拉姆的一个情人夺到手，也就等于有了一个人质，只有出最高的价码才能赎回。她说，跟克拉姆就这件事讨价还价就是你成天孜孜以求的。她还说，因为我对你本来无足轻重，只有那价码才是你的头等大事，所以你在关系到我的问题上怎么妥协都行，而在关系到价码的高低时就寸步不让。所以你对我丢掉了贵宾楼的位置完全无所谓，对我不得不离开大桥酒店也完全无所谓，对我只得去干学校勤杂工的重活也完全无所谓。你对我没有什么柔情，甚至一点时间都没有，你撒手把我交给了两个助手，没有一点嫉妒，我在你心中的价值就是做过克拉姆的情人，实际上你完全不知底细，就一个劲儿地想让我别忘记克拉姆，以便当决定性的时刻到来时我不至于太抵触；尽管这样，你同时也在同老板娘过不去，你认定她是唯一能把我从你身边拉走的人，所以就有意同她越吵越凶，达到同我一起离开大桥酒店的目的；如果命运只由我自己来左右，那么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你的人，这一点你丝毫不怀疑。你把同克拉姆的谈话设想成一宗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如果能争取到你想要的价码，你什么都肯干；如果克拉姆要我，你就毫不犹豫把我送给他；如果他要你待在我身边，你就待在我身边；如果他要你把我赶走，你就把我赶走；可是你也愿意演一出喜剧；只要有利可图，你会假惺惺地说你爱我，而如果他对这一点满不在乎，你就会特别强调自己的微不足道，然后用连你这么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居然也成了他的接替人这个事实使他感到羞耻，这样来促使他不能满不在乎，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把确实说过的对他这个人表示爱慕的那些话转告他，请求他再次接纳我，当然，条件是付给你那笔要价；如果实在没有别的法子，那么你会以K.夫妇两人的名义干脆去向别人乞讨。老板娘最后说，但是如果你后来发现自己完全错了，各种估计都错了，所有的希望也都落空了，那么，我受罪的日子也就到了，因为，那时候我才真成了你的唯一财产、你的唯一依靠，然而同时又是你手里一件已被事实证明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你也就会以相应的态度对待这件东西了，因为你对我除了占有的感情之外没有别的感情。”

K.一直紧闭嘴唇，聚精会神地听着，竟一点没有注意到他坐下的柴禾早就在他身体的压力下开始滚动，现在他自己也已经快要滑到地上去了；这时他才站起来，坐到讲台上，拉起了弗丽达的手——她想轻轻挣脱他——说道：“在你刚才说的这么多话里，我有好些地方分不清哪是你

的，哪是老板娘的意思。”“全是老板娘的意思，”弗丽达说，“她说什么我都听着，因为我崇拜她；可是这回我是这辈子第一次百分之百地反对她的看法。当时我就觉得她说的那些话全都一文不值，对我们俩的情况是一点也不了解，一点没说到点子上，我倒觉得她说的那些话的反面才是对的。那时我想起了我们相会第一夜过后的那个阴天的早晨，想起你当时跪在我身边时眼里露出的沮丧神情，似乎一切都完了。我又想到，后来事情果然不尽如人意，不管我努多大力都帮不上你的忙，反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因为我的缘故，你同老板娘结了仇，这是一个强大的敌手，到现在你还是对她估计过低；你对我非常关心，为了我你不得不去努力争取一个位置，在村长面前处于不利地位，又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去伺候那个男教师，还要忍受两个助手的捣乱，但最严重的是：为了我的缘故，你恐怕已经大大冒犯、得罪了克拉姆。当时我还想：你现在老惦记着找克拉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软弱的、希望缓和一下他的怒气的努力罢了。我私下对自己说，老板娘对这一切都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她之所以要给我说那么些悄悄话，只是不想让我过分自责吧。她倒是出于好心，可是她费这个力气完全是多余的。我对你的爱，就能帮助我渡过所有的难关，我的爱终归也能激励你奋发有为，不是在这个村里也会在别处；我这种爱情的力量，难道不是已经得到一次证明了吗：它救了你，使你免受巴纳巴斯家的纠缠。”“这就是你当时同老板娘的看法相反的看法了，”K.说，“那么打那以后有什么变化吗？”“我不知道，”弗丽达说，看了一眼K.的手，这只手现在拉着她自己的手，“也许什么都没有变吧；现在你坐得离我这么近，这么心平气和地问我话，我就觉得什么都没变。可事实上呢，”——说到这里她挣脱了K.拉着她的手，正对他坐直了身子，伤心地哭了起来，也不蒙脸；她这样毫无顾忌地把这张泪如泉涌的脸正对着他，似乎在表示她并不是在为自己而哭泣，所以也没有必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似乎她是在为K.的负心而痛哭，所以就该让他好好看看她这副模样，以便受到良心的谴责——“事实上呢，从我刚才听了你同那个男孩子的一席谈话以后，一切全变了。瞧，你开始时表现得多么单纯可爱啊，你问他们的家庭情况，问这问那；我一时好像又看到你刚来酒吧时的样子，大大方方的有什么说什么，像个孩子似的着急地不断看我的眼睛。你的样子同那时比确实没什么不同，我当时真希望最好老板娘也在这里，也在旁边听你说话，看她还有什么本事坚持她的看法！可是过了一会儿，不知怎的，我突然就觉得你同那孩子说话是别有用心。你说了那些关心的话，赢得了他那一般人很难赢得的信任，这一着得手后，你就长驱直入向你的目标大步挺进了，一点一点地，我也

看清了你这个目标。就是那个女人！从你对她那些貌似关心的话中，只是赤裸裸地暴露出你心里那本生意经。你是在还没有赢得她的信任之前就先欺骗了她。从你的话里我不光听到了我的过去，也听到了我的将来；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像老板娘就坐在我旁边，你一边说她一边给我解释你的话，我呢，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想把从我脑子里赶出去，可同时心里又明白这完全是白费力气，当时我又觉得受骗的根本就不是我——我连受骗的份儿也没有了——而是那个陌生女人。后来我还是使劲打起精神，问汉斯他长大后想干什么，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人，瞧，他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你的尾巴了，这时候，他这个在这里被利用的好心的男孩，同当时酒吧里的我，我们两人之间究竟还有多少不同呢？”

“你说的这些，”K.说，由于现在已经听惯了指责，他现在反而平静下来，“你说的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这些话不是不符合事实，只是敌对情绪太重。这些全是老板娘，即我的对头的想法，你觉得它们是你自己的想法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想到这点我觉得很欣慰。可是这些思想倒很有教育作用，向老板娘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虽然她对我一向不留情面，但并没有对我本人讲过这些想法；显然，她把这件秘密武器传授给你，是希望你在某个特别艰难、面临几种巨大抉择的时刻使用它。如果硬要说我在利用你，那么她同我差不多，也在利用你嘛。可是，弗丽达，你要考虑一点：就算一切都像老板娘说的那样，丝毫不差，那么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事情会非常严重，那就是你不爱我。在这个条件下，也只有在在这个条件下，情况才的确是我搞阴谋诡计把你骗到手然后再拿你去敲诈勒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恐怕连我为了博得你的同情而同奥尔嘉手挽手走到你面前那件事也是我蓄谋的一部分，只是老板娘忘了把它列入我的罪状中去罢了。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并不是一头狡猾的猛兽扑到你身上把你攫获，事实是你主动亲近我，我也同样主动亲近你，我们心心相印，一同陶醉在爱情中，你说说看，弗丽达，从这个事实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只能说我是把我的事和你的事完全同样对待吗？这里我们是不分你我的，哪个女人硬要分开我们，她就只能是我们的仇敌。这一点在哪里都可以这么说，也包括和汉斯的关系。顺便提一句，谈到我同汉斯的谈话时，你太敏感，所以也言过其实了，因为尽管汉斯和我的目的不完全一致，可是也还没有到针锋相对那样严重的地步，另外就是，你我之间的不一致也没有逃脱汉斯的眼睛，要是你不信这点，那你就太小看这个细心的小家伙了，退一步说，即使这一切完全瞒过了他，可总不会有谁对此感到难受吧，我希望这样。”

“想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真是太难了，”弗丽达说着叹了一口气，“我对你绝对没有过不信任，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受了老板娘一点影响，我是会把这点影响痛痛快快地扔掉，然后跪下来请求你原谅的，其实我也一直在这样做，尽管我说的话很不中听。但你呢，你有好些事瞒着我一点不假；你忽而来了忽而又走了，我根本不知道你打哪儿来上哪儿去。汉斯敲门那会儿，你甚至叫出‘巴纳巴斯’这个名字来。唉，要是你有哪一回像叫他那么亲热地叫我一声就好了，真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叫起这个可恨的名字来有那么股子亲热劲儿！你不信任我，又怎么能要求我不起疑心呢；你那样做就是把我完全推到老板娘一边去了，因为你看上去就像是在用你的行动证实她的看法似的。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不敢说你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在证实她的看法；你看，难道不正是你为了我把两个助手赶走的吗？唉，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满心希望在你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中，不论它们多么使我痛心，也能找出一些为我考虑的成分来啊！”“主要的是，弗丽达，”K.说，“我确实对你没有丝毫隐瞒。你瞧瞧，老板娘多恨我，使出多大的劲想把你从我身边拉走啊！她使用的手段又是多么卑劣！而你呢，又那么言听计从，弗丽达，你对她太软了！你倒是说说，我到底哪件事隐瞒了你？我想找克拉姆，你是知道的，你不能帮我办成这件事所以我只好完全靠自己单枪匹马地干，这你也是知道的，这事直到现在没有成功，你也看见了。莫非你要我给你讲我每一次努力怎样白费力气，讲我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够了窝囊气？再讲一遍不是让我受双份的窝囊气吗？难道你要我拍拍胸脯吹嘘自己如何站在克拉姆的雪橇旁边挨冻，白白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我好不容易庆幸自己不必再想这些事，兴冲冲赶到你身边来，可是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一股脑儿气势汹汹地从你那里冒出来了！要说巴纳巴斯吗？不错，我是在等他。他是克拉姆的信差呀；又不是我给他派的这个差使。”“又是巴纳巴斯！”弗丽达叫起来，“我看他决不是个好信差。”“也许你说得对，”K.说，“可他是派到我这儿来的唯一的信差啊。”“那就更糟，”弗丽达说，“正因为他是唯一的信差，你就更应该提防他。”“可惜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让我感到有任何提防他的必要，”K.微笑着说，“他很少来，而且每次带来的东西全是无关紧要的；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是直接从克拉姆那里来的。”“瞧瞧，”弗丽达说，“现在连克拉姆也已经不是你的目标了，也许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原来你老是想撇开我去找克拉姆，这很糟，而现在呢，你好像对克拉姆也不再感兴趣了，这就糟糕得多，这一点连老板娘也没预料到。照老板娘的看法，我的幸福，就是那种很成问题的、然而又是真正的幸福，在你终于看清你对克拉姆抱的希

望完全落空的时候就到头了。可是现在你连这一天也等不及；突然冒出来一个小男孩，你就开始同他一道拼命争取他的妈妈，就像在拼命捞救命稻草似的。”“对我跟汉斯的谈话，你倒是没有理解错。”K.说，“事实的确是这样。但是，难道你以前的生活就沉沦到这种地步——当然，只在你同老板娘走到一起之前，因为老板娘是不让自己被你拽着一起沉沦下去的——以至于你都不明白一个人要想上进就必须努力奋斗，特别是一个出身最底层的人？你不知道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哪怕是一线希望也要争取？那个女人是从城堡来的，这是我头一天迷路去到拉塞曼家时她自己告诉我的。难道这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请她出个主意甚至帮个忙吗？如果说老板娘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只是要去见克拉姆有哪些障碍，那么这个女人很可能知道该走哪条路才能通到克拉姆那里去，因为她自己就是从这条路走下来的嘛。”“通到克拉姆那里去的路？”弗丽达问。“不错，是通到克拉姆那里去的路，不去他那里还能去哪里？”K.说，接着便跳了起来，“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再不去取早饭绝对不行了！”弗丽达执意求他别走，那坚决态度，远远超出仅仅出于不愿让他去取早饭这一个原因，那神情，似乎唯有留下才能证明他刚才所有安慰她的话是真心实意。但是K.提醒她想想男教师的命令，指指那随时可能被砰砰轰轰踢开的门，答应她马上就回来，说她甚至不必给炉子添柴火，等他回来他会弄的。最后弗丽达不再坚持，默然顺从了。当K.来到室外，踏着积雪艰难地移步时——路上的积雪早该铲除、清理干净了，真奇怪，这活怎么干得这样慢啊——他看见两个助手中一人在那里紧紧扶着栏杆，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只有一个，另一个到哪里去了？这么说，K.终于还是至少摧垮了一个人的韧劲儿？当然，留下来的这一个仍然在十分卖力地干他的那套营生；这一点很清楚，因为他一看见K.立时就活跃起来，当即使劲不断地向K.打躬作揖，急得眼珠都快瞪出来了。“他那股子顽强劲真够得上模范了，”K.自语着，却也不得不添上一句：“可这股子劲会让人冻死在这栏杆上的。”心里虽然这样想，但表面上K.只对这个助手恨恨地扬了扬拳头，表示绝对禁止他走近自己跟前来，这助手被吓得噤若寒蝉，往后退缩了好几步。这时弗丽达正好打开一扇窗户，这是她同K.商量好的，要在续火之前先给屋子换换空气。那个助手一见此景立刻受到不可抗拒的吸引，立即扔下K.转身向那窗户溜了过去。此刻弗丽达既对这个助手和颜悦色，又对K.露出苦苦哀求然而却无可奈何的神情，以致她的脸扭曲得相当难看，她从窗户上面伸出手来微微挥动了一下——这个动作就连是表示拒绝呢还是表示欢迎都不清楚——但那个助手也并不因她这个动作而在他向窗户逼近的行动上有所

迟疑。于是弗丽达急忙关上了外层窗，可是自己却仍然站在窗后，一手扶着窗把，头歪向一侧，眼睛睁得老大，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她知不知道这副模样对那助手更多的是引诱他过来而不是将他吓跑呢？然而这时K.不回头看了，他现在一心想着的是赶快走，尽快回来。

第十四章

现在K.总算——天已经黑下来，是傍晚时分了——把花园里路径上的积雪扫净，将雪堆在道路两旁，用铲夯实，这样，白天的活就算是干完了。他站在学校花园的大门边，环顾四周，目力所及处就他独自一人。他在几小时前就把那个助手赶跑，并且追击了他好长一段路；后来那家伙藏在小花园和花园小屋间什么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之后也再没有钻出来。弗丽达在屋里，要不是在洗衣服，就是仍在给吉莎的猫洗澡；吉莎把这个任务交给弗丽达，说明她对弗丽达的巨大信任，当然，这活挺腻烦，不适合弗丽达做，要不是觉得在一连串失职之后利用每个机会改善一下他们在吉莎心中的印象很有好处，K.是决不会让弗丽达接这个活的。〔21〕当时吉莎先是站在一旁高高兴兴地看着K.把那只儿童用的小澡盆从顶楼上拿下来，接着他同弗丽达烧热了水，最后小心翼翼地把猫抱到盆里去。之后，吉莎甚至完全放心地把猫交给了弗丽达，因为施瓦尔策，即K.来此第一晚上认识的那个人，到这里来了，他同K.打招呼时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的表情：源于那天晚上的某种心虚歉疚和对一个学校勤杂工理应表现出的极度轻蔑兼而有之，招呼过后，他就同吉莎一起到另一间教室去了。现在两人还待在那里。在大桥酒店时，曾有人告诉过K.说施瓦尔策这位副主事公子因为爱上了吉莎，已经在村里住了很久，他通过他的关系网让村政府任命他当上了助理教师，但是，担任这个职务的主要方式，却是几乎次次必到地去听吉莎的课，不是坐在学生中课椅上，就是——更乐意——坐在讲台边上吉莎的脚边。他这样做早已不再碍眼，孩子们早见怪不怪了，并且，由于施瓦尔策既不喜欢孩子也不懂得孩子的心理，同孩子们几乎无话可讲，除了接替吉莎上体操课之外，对总待在吉莎身边闻她呼出的空气、感受她身体的温暖这样的日子就已经觉得挺满意，这样也许孩子们就更容易习惯他了。他的最大愉快就是坐在吉莎身旁批改学生的作业。今天他们也是做这件事，施瓦尔策抱来一大摞练习本，男教师也总是把他的本子交给他们改，天没有完全黑之前，K.一直看见两人坐在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工作，头挨着头，一动不动，而现在呢，只看得见两支蜡烛的烛光在那里晃动。把两人连结在一起的，是一种一本正经、少言寡语的爱情；凡事自然是吉莎说了算，她是个慢性子，虽然时不时也会起急冒火而言行失控，但却受不了别人在别的时间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性格活跃的施瓦尔策也只好顺着她，走起路来慢条斯理，说起话来慢吞吞的，经常不苟言笑；不

过可以看出，他做这一切都是有丰厚报偿的，那就是这样一来吉莎便毫无二话地、安然待在他身边。可是也许吉莎根本就不爱他；反正，从她那双可说从来就目不斜视、而似乎只有瞳仁在转动着的圆圆的灰色眼睛里，是找不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来的；人们只看得见她默默地、相安无事地同施瓦尔策待在一起，毫无反感，然而她心里肯定没有对自己荣幸地被一位主事公子爱上而感到受宠若惊，而且不论施瓦尔策是否在盯着她紧瞅，她都同样一如往常，处之泰然，并不在他看自己时着意显示自己那丰腴、富态的肉体。施瓦尔策则相反，他对她作出持续的牺牲，即屈居在这个小村子里。父亲经常派人来接他回去，他却怒气冲冲地把来人打发走，似乎由于差人的到来使他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瞬间想到城堡、想到他做儿子的义务就是严重地、不可弥补地打扰破坏了他的幸福。可是实际上他的空闲时间又绰绰有余，因为吉莎一般说来只在上课和批改作业时才在他的眼前露面，这自然并非出于心计，而是因为它懒得动弹，因此也最喜欢一人独处，大概她感到最痛快的时候就是能在家里自由自在地伸开手脚躺在长沙发椅上，有那只猫趴伏在自己身边，它一点也不给她捣乱，因为它几乎已经动弹不得了。于是，施瓦尔策一天倒有大半天无所事事，到处闲逛，但他也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在这样的時候他总有可能——他也多次利用了这种可能性——跑到吉莎住的狮子巷去，跑上楼梯来到她那间小阁楼房间门前，驻足于此，在那永远是门着的门上俯耳细听良久，每次都毫无例外地确认屋里真正是一片绝对无声无息的、令人大惑不解的寂静之后，再匆匆离去。然而无论如何，某些时候——但永远不会当着吉莎的面——这一独特的生活方式也会在他身上表现出它的后果：在他身上那官少爷的骄气蓦然苏醒的瞬间，他会突然大发雷霆，当然，这种表现与他目前的地位恰恰极不相称；出现了这种情况后，收场自然不太美妙，这一点K.那一次已经体验到了。〔22〕

只有一点令人颇感惊异，即人们谈到施瓦尔策时——至少在大桥酒店是如此——总带有几分敬意，即使在谈到一些可笑的而不是令人尊敬的事情时也是如此，甚至吉莎也在这些敬仰者之列。但是如果施瓦尔策觉得自己是助理教师，在K.面前就无比优越，可以趾高气扬，那么他就错了，这种优越性并不存在；一个学校勤杂工对于所有教员，尤其是对像施瓦尔策这样的教员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人，轻视不得，否则就要吃苦头，如果哪个教员出于等级观念不能放弃对勤杂工的轻视，那么他至少必须用适当的安抚来加以补偿。K.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考虑这个问题，加之施瓦尔策在他到达的头一个晚上也还欠下他一笔债，这笔债，并不因为此后几天发生的事实际上证明了施瓦尔策对K.的那种接待方式

是正确的而有所减少。因为不能忘记，也许恰恰是施瓦尔策那次接待为尔后发生的一切定了向。由于施瓦尔策的做法，出现了很荒唐的事，即K.在刚刚到达的第一个小时内就已引起官府注意，当时，他在村里完全是个陌生人，没有一个熟人，没有栖身之地，一路长途跋涉使他精疲力竭，躺在那个草袋上一筹莫展，陷于随时可能被官府揪住质问的被动地位。只要那头一夜平平静静什么事也没发生，以后一切便都可以大大改观，他的事情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基本上是静悄悄地而不是沸沸扬扬地顺利进行下去了。可以肯定地说，谁也不会知道他来干什么，不会对他起疑，至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当成一名漫游工匠^[5]收留一天；人们会发现他是有用的、可靠的人，这个消息会在这一带居民中传开，这样他很可能不需多久就能在某一家当上雇工而住下来。当然，这是瞒不过官府的。但是，半夜三更因为他的缘故去惊动城堡的中央办公厅或是接电话的另外什么官员，要求立刻作出决定，表面上诚惶诚恐讨求指示，实际上却是提出一个令人讨厌的咄咄逼人的要求，加之打电话的又是这个上面大概不怎么喜欢的施瓦尔策，这情形同另一种局面相比怎么说也是大不一样的吧，那另一种局面便是：这一切全都没有发生，而是K.在第二天办公时间内去求见村长，老老实实地按规矩报上自己的外来漫游工匠身份，声明自己已在某一村民家有了住处，很可能明天就继续上路；这样一来也许又会出现另一种哪怕是可能性极小的情况，即他在此地找到了活干而留下来，当然只留几天，因为他决不想在这里多待。想想看吧，要不是施瓦尔策跑来插一杠子，情况就会是这样或者大致是这样了。官府自然也会继续管这事的，但那时就会是平心静气地、完全通过正常的官府渠道进行而不受那种官府大概非常讨厌的干扰，即下面诸方各执一词、都急不可耐地要求解决问题而不断来纠缠。现在看来，对已经发生的一切K.并没有责任，施瓦尔策对此应负全责，可是施瓦尔策是某位城堡主事的儿子，而且从表面看他的所作所为一概名正言顺，无可指责，于是，就只好由K.来代人受过了。然而再一想，引发这一切忙乱的那根十分可笑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回答是：也许那天正好吉莎情绪不佳，因而导致施瓦尔策彻夜不眠，东游西逛，然后就碰上了K.，于是就拿K.做了他的出气筒。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K.必须大大感谢施瓦尔策那天的态度和做法。多亏了他，K.才做成了他独自一人绝对做不到、决不敢冒险去做、官府方面恐怕也不会承认的事，那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耍什么计谋，而是公开地、面对面地同官府打交道，这一点在一般情况下恐怕是很难办到的。不过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头疼的垂青，K.能这样做，诚然是省得他去编造各种谎话，去搞许多遮遮掩掩的

动作，可是同时也弄得他几乎失去了自卫能力，怎么说也是使在这场较量中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要不是他只得对自己说：在权力上，官府同他之间有天壤之别，这样大得无以复加的差距，他就是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全部心机也不可能使之发生有利于他的变化——要不是他这样想，那么看到这种绝对的劣势很可能使他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但是这不过是K聊以自慰的一个想法罢了，施瓦尔策怎么说也还欠他一笔债，如果说他以前损害过K，那么也许他近期有可能帮点忙吧，今后，K即便是很微小的些许帮助可能也是需要的，他需要最最起码的帮助，在这一点上，比如就是巴纳巴斯看来也没有做到。

考虑到弗丽达的情绪，K一整天都在踌躇，没有到巴纳巴斯家去打听他；为了不必当着弗丽达的面接待巴纳巴斯，K一直在屋外干活，活干完以后也仍然留在外边等着巴纳巴斯，但巴纳巴斯就是迟迟不来。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去找他的两个姐妹问问，只去一小会儿，只站在门口问一下很快就回来。想到这里他把铁铲往雪堆上一插拔腿就跑。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巴纳巴斯家，在门上敲了两下便猛力推开门，也没有好好看看屋子是什么样子就问道：“巴纳巴斯一直没有回来吗？”问完这句话他才发现奥尔嘉不在，两个老人和上次一样神情呆滞地在很远处那张桌子边上坐着，对门口发生的事还没有弄明白，过一阵才慢慢地转过头来，最后，K看见阿玛莉娅捂着被子躺在灶沿凳[6]上，一见K便猛一惊翻身坐了起来，用一只手掌捂住脑门定了定神。如果奥尔嘉在家，便会立刻回答K的问题，他也可以马上走了，可现在呢，他起码得走上那几步路，来到阿玛莉娅跟前向她伸出手来。她默然无言地握了握他的手，他又不得不请她劝劝两位受惊的老人不要随便乱走，她照办了，同他们说了几句话。阿玛莉娅告诉K，奥尔嘉这会儿在院子里劈劈柴，她自己刚才累得一塌糊涂——她没有说干什么这样累——不得不躺下休息，巴纳巴斯现在还没有回来，但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因为他从不在城堡过夜。K感谢阿玛莉娅告诉他这些，心想现在他可以走了，但是阿玛莉娅问他想不想再等奥尔嘉一下；他说可惜他没有时间了。阿玛莉娅又问他今天是不是跟奥尔嘉谈过；他惊奇地回答说没有，并问阿玛莉娅，奥尔嘉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告诉他。阿玛莉娅好像有点赌气似地撇了撇嘴，一声不响地冲K点点头——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便又重新躺了下去。但躺下后她仍继续打量他，那神情似乎是奇怪他为什么还不走。她的目光同往常一样冷峻、明澈、凝滞；这目光不是径直对准观察的对象，而是——这使人感到颇不自在——稍微偏离目标一点点，不细心也觉察不出，然而却是确定无疑的，其所以如此，看来并不是软

弱，不是难为情，也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亏心事，而是出自一种对孤独的不断渴求，这种渴求压倒了其他一切感情，也许她自己唯有这样做才能意识到这种渴望吧。K.依稀记得好像在他来这里的头一个晚上这目光就引起过他的注意，甚至可以说这家人第一面就给他留下的整个不愉快的印象，大概就是这目光造成的，它本身倒并不让人讨厌，而是充满自豪，冷若冰霜恰恰显示了它的真诚。“你总是那么忧愁，阿玛莉娅，”K.说，“你有什么烦恼吗？能不能给我说说？我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农村姑娘呢。说实在的我直到今天，直到现在才注意到这点的。你是本村人吗？是在这里出生的吗？”阿玛莉娅回答“是的”，似乎K.只提了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她说：“这么说你还是想等等奥尔嘉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问这个，”K.说，“我不能久待，因为我的未婚妻在家等着我。”

阿玛莉娅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说她不知道K.有个什么未婚妻。K.说出了名字。阿玛莉娅说不认识。她问，奥尔嘉知不知道他订婚了，K.说他想大概是知道的，奥尔嘉见过他跟弗丽达在一起，另外这类消息在村里也传得很快。但是阿玛莉娅十分肯定地对他说，奥尔嘉并不知道，她听到这事一定会非常伤心的，因为看样子她在爱着K.呢。她没有公开对人讲过，因为她是个非常含蓄不爱说话的人，可是爱情是会自然流露出来的啊。K.说他确信阿玛莉娅是弄错了。阿玛莉娅微微一笑，虽然这是苦笑，却使她整个皱缩的、阴沉的脸为之一亮，沉默有了含意，陌生变为熟悉，这笑泄露了一个秘密，一个迄今为止一直秘而不宣的隐私，这个隐私，虽说也还可以收回，然而绝不可能全部收回了。阿玛莉娅说，她肯定没有搞错；唔，她甚至知道得更多，她知道K.也对奥尔嘉有好感，知道他来找她嘴上说是为了听巴纳巴斯带回的一些什么消息，但这不过是借口，实际上他是专为找她而来。她说，现在呢，既然她阿玛莉娅完全知道底细了，你K.就不用再严守秘密，可以常来了。她说，她想跟他讲的就只这一点。K.一边摇头一边再次提醒说，他已经是订了婚的人了。阿玛莉娅看来没把这订婚当回事放在心上，对她来说，K.现在明明白白是独自一人站在她眼前，这个直接的印象起着决定性作用；她只是问K.是什么时候认识那个姑娘的，他来村里不是还没有几天吗。K.叙述了在贵宾楼那个夜晚的经过，讲完后阿玛莉娅只简短地说，她当时非常反对把他领到贵宾楼去。她又叫这时刚好抱着一堆劈柴进来的奥尔嘉，让她为她作证，奥尔嘉此时带着满身清爽凛冽的寒气、勃勃的生机与活力从外面进来，同她以往闷声不响地站在屋里的那副形象相比，这室外劳动使她判若两人了。她把劈柴就势往地上一扔，无拘无束地同K.打招呼，接着便问起弗丽达。K.向阿玛莉娅投去会意的一瞥，但是看来

她并不认为自己输了。K.对此有点恼火，便干脆讲起弗丽达来，讲得比他平时来得详细，他讲述弗丽达如何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在学校里操持——怎么说也算是一种——家务，由于讲得过急——因他一直惦记着赶紧回家——慌忙中竟在同这姐妹俩告辞时脱口说出请她们哪天到他那里去坐坐的话。当然，话一出口，他自己也大吃一惊，说不下去，阿玛莉娅则根本不给他一点打圆场的机会，立时宣布接受这一邀请；现在奥尔嘉也只好附和她，表示接受邀请。但K.呢，一再被必须赶紧离开的念头所迫，又在阿玛莉娅那种目光下浑身不自在，便不再犹豫也不再加任何别的搪塞掩饰，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刚才的邀请是大大欠考虑，纯粹是他个人一时心血来潮时的失言，很遗憾，他只能收回这一邀请，因为弗丽达同巴纳巴斯家有仇，不过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势不两立。“这不是什么仇，”阿玛莉娅说，一面掀开被子从灶沿凳上站了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是随大流，跟着大伙儿起哄罢了。好了，现在你走你的，去找你的未婚妻吧，瞧你都急成什么样子了。你也不用害怕我们来，我打一开始就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故意激你一下。你倒是可以常上我们这里来，这大概没什么障碍吧，你每次都可以打着找巴纳巴斯听消息的幌子嘛。我还可以告诉你，拿这个作掩护是很容易的；告诉你，以后即便巴纳巴斯有信从城堡带来给你，他也不能再跑到学校去找你报告了。他不能老那么东跑西颠的，可怜的小伙子，这差事都快把他拖垮了，以后你得自己来，自己来讨信。”K.还没有听阿玛莉娅一连串说过那么多话，语气也同她以往说话很不一样，这里面有一种威仪，不仅K.觉出这一点，奥尔嘉显然也感觉出来，因为她这个姐姐对妹妹平素太熟悉了。奥尔嘉站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两手搁在怀里，仍是她平日那种两腿叉开、上身稍向前倾的姿势，两眼盯着阿玛莉娅，而阿玛莉娅则只看着K。“这是一个误会，”K.说，“如果你以为我等巴纳巴斯只是做做样子，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在这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同官府之间的事处理好，这实际上也是我唯一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需要巴纳巴斯的帮助，我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虽然他曾让我大大失望了一次，但是那主要是我的过错，他的责任很小。事情发生在我初来乍到的头几个小时，当时一切都毫无头绪，我那时以为通过晚上的一次小小的散步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后来呢，一见事情不成——其实要办成谈何容易——我便对他耿耿于怀。这种情绪甚至影响到我对你们家、对你们几个人的看法。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觉得我对你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你们甚至是，你们也许比村里任何别的人更……”说到这里K.一时找不出确切的字眼，于是就勉强用上碰巧想到的

一个词——“好心肠，比我到现在为止认识的任何一个村里人的心眼儿都好。可是现在，阿玛莉娅，现在你又把我搞糊涂了，你即使不是在贬低你哥哥的工作，那么至少也是贬低他这个工作对我所具有的重要性。也许你不详细了解巴纳巴斯办的事的内情，那么这叫做情有可原，我就不想再深究，然而你也许是了解内情的——我的主要印象是这样——那就很糟糕，因为这说明你哥哥在骗我。”“放心吧，”阿玛莉娅说，“我不了解内情，给我多少好处我也不想去听他讲他那些事，就是为了你，我也不想管他的事，本来我是很愿意帮你的，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是好心肠的人。可我哥哥的事情是他的事，我除了偶然听到一星半点之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奥尔嘉就完全不同了，她什么都可以告诉你，因为她跟巴纳巴斯是无话不谈的。”说完这些，阿玛莉娅就转身走开，她先到父母那里同他们说了几句悄悄话，然后就到厨房去了；她没有同K道别就走，似乎知道他还要在这里待很久，现在还用不着道别。

第十五章

K.脸上带着几分惊异的神色眼看阿玛莉娅走了，奥尔嘉笑他，把他拽到灶沿凳边，看来她确实为现在可以同他单独待在一起坐一会儿感到高兴，然而这是一种平静、舒坦的喜悦，肯定没有掺和嫉妒心的杂质。正是这种与嫉妒心不沾边因而也没有任何疾言厉色的态度使K.感觉舒服；他很愿意看着这双蓝色的、不作媚态、毫不霸道而只是娴静腼腆、羞怯凝视的眼睛。他觉得似乎弗丽达和老板娘向他发出的那些警告没有使他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更好理解，而是使他注意力更集中、脑子更加灵活了。奥尔嘉表示奇怪，为什么K.偏偏要说阿玛莉娅心肠好，说阿玛莉娅这也行，那也行，其实唯独说她心肠好是不恰当的，奥尔嘉一说这，K.同她一起笑了。然后K.解释说，当然他这句赞扬的话是冲着奥尔嘉说的，但阿玛莉娅太霸道了点，她不仅把别人当着她的面说的所有夸奖话全都揽到自己头上，甚至逼得人把什么好话都冲她一个人说。“这倒是一点不假，”奥尔嘉稍微收敛笑容，正色说道，“简直比你想的还厉害。阿玛莉娅比我小，也比巴纳巴斯小，可在家里是她说了算，是好是坏全由她定夺；当然，她的担子也比我们重，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她承担的多。”K.觉得这话未免言过其实，因为阿玛莉娅刚才还举例说她对哥哥的那些事就不想过问，而奥尔嘉什么全知道。“我怎么给你解释好呢？”奥尔嘉说，“阿玛莉娅是既不关心巴纳巴斯也不关心我；事实上她除了关心父母以外谁也不关心，她白天黑夜地照顾他们，刚才又在问他

们想要什么，到厨房给他们做吃的去了，为了他们她撑持着从床上爬起来，从中午开始她就病了，一直躺在这里凳上。可是虽然她不过问我们的事，我们却得听她的，就好像她是老大似的，要是她给我们出主意，我们都会照着她的点子去办，但是她自己就不听我们劝，我们在她眼里简直跟外人差不多。你是从外地来的，接触过的人很多；你难道不也觉得她特别聪明吗？”“我觉得她特别不快活，”K.说，“可是你说你们很尊重她的意见，而现在比如说巴纳巴斯当信差这个差事阿玛莉娅是不赞成的，甚至她看不起这工作，这怎么解释呢？”“要是他知道还可以干别的，那他马上就会扔下这个她非常不满意的信差工作的。”“他不是学过鞋匠活吗？”K.问。“不错，”奥尔嘉说，“所以他附带着也帮布伦施维克干干活，而且只要他愿意干，白天黑夜都有活干，可以挣好多钱。”“就是嘛，”K.说，“他本来是可以不干信差的嘛！”“不干信差？”奥尔嘉惊奇地问，“难道他是为挣钱才干这个差事的吗？”“也许你说得对，”K.说，“不过你刚才不是提到他对这差事不满意吗？”“他是不满意这差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奥尔嘉说，“可是，干这个是为城堡工作呀，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为城堡办事，恐怕至少应该相信这一点吧。”“怎么，”K.说，“就连这一点你们也还有怀疑吗？”“唔，”奥尔嘉说，“实际上并没有怀疑。你看吧，巴纳巴斯到城堡的各个办公厅去，同那儿的管事们平等地打交道，也能远远地看见个别官员，交给他送的信也都是比较重要的，甚至非常信任他，放心让他带口信，你说他办的事还不够多吗？我们可以为他这么年轻就这样有出息感到骄傲了。”K.点点头，现在他不想回家了。“他也有一套专用的制服、号服什么的吧？”他问。“你指的是那件上衣吗？”奥尔嘉说，“不，那件衣服是阿玛莉娅给他做的，那时候他还不是信差呢。不过你已经快接触到要害问题了。他早该得到的不是什么制服号服，城堡是没有这玩意儿的，他早该得的是一套在职工工作服，上头也答应过要发给他，可是在这类事情上，城堡的人办事是很慢很慢的，最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这种慢速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是说明事情正在受理过程中，但也可能是表示根本还没有开始受理，就是说官府还打算对巴纳巴斯先进行一段时间的考验，最后，又可能意味着事情已经受理完毕，上头根据某些原因撤销了当时的诺言，巴纳巴斯这辈子也休想领到那套工作服了。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法知道，或者要过很久以后才能知道。我们这里有句俗话，可能你听到过，叫做：‘官府的决定像大姑娘一样腼腆，千呼万唤也难出来。’”“真是独具慧眼，”K.说，对这事，他比奥尔嘉还要更重视些，“的确是独具慧眼，看得挺准，官府的决定恐怕同大姑娘还有别的一些共同点呢。”“也许是

吧，”奥尔嘉说，“不过我不明白你这话具体意思是什么。说不定你是在夸官府吧。可是说到工作服，这确实是巴纳巴斯的许多苦恼之一，而又因为我和他的苦恼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让我头疼。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个答案：为什么他得不到工作服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也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那些官员们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服；据我们所知，巴纳巴斯也告诉我们，官员们都是穿着普通服装，当然，都是高级的便服啦。对了，你不是见过克拉姆吗？巴纳巴斯当然不是什么官，连最低一级的芝麻官都不是，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妄想当官。可是即使职位比较高的管事（这些人你在村里当然根本见不着），按巴纳巴斯说也没有专门的工作服；也许可以一开始就认为这对他是个安慰吧，但这是自欺欺人，因为，难道巴纳巴斯是职位较高的管事吗？不是，不管大家怎么对他有好感，也不能说这话，他不是高级管事，他到村里来，甚至还住在村里，这本身就证明他不是这种人，高级管事比官员们更少出头露面，也许这是有道理的，也许他们级别比某些官员更高些；我这样说是根据的：他们做的事要少些，听巴纳巴斯说，看着这些非常高大非常富态的男人慢条斯理踱着方步穿过走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巴纳巴斯总是大气不敢出、蹑手蹑脚在他们中间钻来钻去。简单说吧，巴纳巴斯绝对谈不上是职位较高的办事人员，那么照理说他就应该是个低级的办事人员了吧？可是那些低级办事人员全都有工作服，至少，在他们下到村里来时是穿着工作服的，这不是真正的制服，各人穿的也有很多小地方不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看到这种服装一眼便能认出是城堡来的人员，在贵宾楼你不是也见到过这样一些人嘛。这种服装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多半都非常紧身，干农活的或者做手工的人恐怕是没法穿的。好了，巴纳巴斯没有这种衣服，这不光是让人感觉寒碜，觉得脸上无光，这倒还能忍受，严重的是使人对什么事都怀疑起来，特别是在情绪低落消沉时更是这样——我们，就是巴纳巴斯和我，我们时不时会情绪很低落的，说时不时，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遇上这种时候我们就琢磨，巴纳巴斯做的工作到底算不算是城堡的工作；不错，他是在城堡的那些办公厅里进进出出，但那些办公厅就是真正的城堡吗？就说城堡肯定有不少办公厅吧，但是，允许巴纳巴斯进出的那些办公厅是城堡的办公厅吗？他是走进了一些办公厅，可那毕竟只是所有办公厅中的一部分呀，那儿另有些栅栏门，栅栏门后面还有另外一些办公厅。人家倒也没有禁止他穿过这些栅栏，可他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在栅栏这边他就找到了他的那几个上司，他们听完他的报告就让他走人了。另外，在那里行动是受到监视的，至少人自己有这个感觉。再说即使他穿过了栅栏又

有什么用处呢，他在那边又没有要办的事，那样做岂不是成了一个擅自闯入公务重地的异己分子？你也不能把这些栅栏设想成某种不许越过的界线，巴纳巴斯也多次让我注意这一点。原来，在他进出的那些办公厅里也是有栅栏的；这就是说也有那么一些栅栏是他经常穿行的，而且这些栅栏跟他还没有穿越的那些看上去并没有两样，所以说也不能一开始就猜想在他没有穿越的栅栏后面会有跟他去过的那些办公厅大不相同的什么别的办公厅。不就是我们只在情绪低落消沉时才有这种想法嘛？就这样，我们的疑心越来越大，根本不能抗拒。再举个例子说吧，巴纳巴斯是跟一些官员说话，巴纳巴斯是得到人家让他传送的信，可那究竟是些什么官员，是些什么信啊！他自己说他现在是分配到克拉姆手下了，克拉姆本人亲自给他派任务。好，这应该说是很抬举他了吧，连一些高级管事也没有争取到这份差事，唔，恐怕这是把他抬得太高了，真让人担心会摔个粉身碎骨的。你想想看，直接分给克拉姆调遣，同他嘴对嘴地说话！真是这么回事吗？是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可是到底为什么巴纳巴斯又怀疑那个被称为克拉姆的人是不是真是克拉姆呢？”“奥尔嘉，”K.说，“你别开玩笑，怎么可能对克拉姆的外貌产生怀疑呢，他的长相谁都清楚，连我都亲眼见过他。”“我一点也不是开玩笑，K.，”奥尔嘉说，“这不是什么玩笑，这是我最感到揪心的忧虑。但是，我给你讲这些并不是想轻松轻松，让你替我分分忧，而是因为你刚才问起了巴纳巴斯，阿玛莉娅又嘱咐我跟你讲讲这些，另外也因为我觉得知道些详细情况对你有好处。再就是我也是为了巴纳巴斯才讲这些，让你知道后好别再对他抱太大希望，免得他使你失望，他又因为你失望而难受。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比如昨天夜里他一宿没睡觉，就因为你昨天晚上对他表示了不满；听说你昨天对他说，只有一个像他巴纳巴斯这样的信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糟糕了。你这句话弄得他整夜睡不着觉。当时你大概没怎么发觉他情绪异样吧，因为城堡的信差必须要抑制自己的感情，不让它们外露。可是真够他难的，就连伺候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你自己呢，一定觉得对他要求并不太高，你对信使工作自有你一套从外面带来的看法，又拿这套看法作标准去衡量你对他提出的要求。但城堡对信使工作却有另一套标准，这同你的标准没法一致，即使巴纳巴斯为这个工作把自己的什么都搭进去也不行，而我心疼的是，他有时候真像是很乐意这么干呢。本来嘛，做这个工作就应该服从，不应当有二话，可问题出在不知道自己做了半天是不是真在做信使工作。在你面前他当然是不能对这个表示怀疑的；要是他这样做他就是砸自己的饭碗，就是严重违反那些他自己觉得现在还必须遵从的法规，就连在我面前他说话也不

自由，我得哄着他、捧着他，使劲吻他，才能从他嘴里挤出表示怀疑的话，甚至就是说出了那样一些话以后，他也还是躲躲闪闪，不肯承认那些怀疑话是怀疑。他的性格有点像阿玛莉娅。虽然我是唯一他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他肯定还是没把什么全告诉我。可是我们有时候倒也谈谈克拉姆，我还没见过克拉姆——你知道，弗丽达不怎么喜欢我，她是怎么也不乐意让我见到克拉姆的——但他的相貌在村里当然是人人都知道的，有少数人见过他，所有的人都听说过他，于是从见过的人得到的印象、道听途说听来的材料、再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添油加醋的描述，就勾画出了一幅也许大体上符合实际的克拉姆画像。但只能说是大概。除基本轮廓外，别的方面就有比较大的出入，而这些描述的出入之处也许还没有克拉姆的真正外貌的变化来得大呢。据说他到村子里来时模样完全变了，而到离开村子时又变一个样，喝啤酒前是一个样，喝完后又是另一个样，醒时一个样，睡着了又一个样，独自一人时一个样，跟人谈话时又一个样，根据这些，说他在上头城堡里时完完全全是另一个人就不由你不信了。再一点，即使那些有关他在村里时的外貌的说法，也有很大出入，关于他的个子、姿势、胖瘦、胡子等方面的说法很不一致，只有在穿着一点上，幸好大家的说法总算一致了：都说他老是穿同一件衣服，一件有长摆的黑色上装。为什么会有这么些很不一样的说法？当然不是克拉姆会变魔术，而是因为见到他的人当时的心情、激动的程度、各自抱的希望或者绝望的复杂心境千差万别，数也数不清，加上见到他的人多半都只被允许匆匆一面，考虑到这些，有那么多不同说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现在我对你讲的全是巴纳巴斯常对我解释过的话，要不是亲身参与，一般说来听了这些也就可以心安了，可是我们不能心安，对巴纳巴斯来说，同他谈话的是否真是克拉姆，这是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啊。”“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他。”K.说，这时他们在灶沿凳上坐得又更靠近了些。

听到奥尔嘉讲的所有这些对他很不利的新闻，对K.虽然是当头一棒，但是，他在这里发现有些人至少从表面上看同他的遭际相去无几，就是说他可以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同他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而不是像他跟弗丽达那样只在某几个方面可以交谈，这样一想，他的惊愕便又大部分释然了。尽管他对巴纳巴斯的信息能助他成功已渐渐失去希望，但巴纳巴斯在上头愈是不顺利，在下面跟他K.就愈加接近，K.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村子里竟会出这么一件如此不幸的事，就是巴纳巴斯和他姐姐的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当然，事情离清楚明白还差得很远，最后甚至会跟原来想的完全相反也未可知；不能一看到奥尔嘉那确定无疑的

率真无辜的性格，就马上不假思索地认为巴纳巴斯也一定是老实的。“有关克拉姆的相貌的各种说法，”奥尔嘉接着说，“巴纳巴斯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搜集了很多，把它们互相比较，也许他收集的太多、多得没法再多，还有一次他透过一辆车的车窗亲眼看到了克拉姆，或者说他觉得好像是看见了克拉姆，好了，总可以说他为了认出谁是克拉姆，准备做得够充分的了，然而——你怎么解释这怪事呢——当他到了城堡，走进一个办公厅，别人在几个官员中指着一个人告诉他那就是克拉姆时，巴纳巴斯还是认不出来，事后也有好久没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人就是克拉姆。但是如果你问巴纳巴斯，那人跟人们脑子里想象的克拉姆有什么不同，他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而是向你一点一点细说城堡里那位官员的外貌，可说来说去同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克拉姆的那些说法又丝毫不差。‘哎呀好了好了，巴纳巴斯，’我说，‘你干吗要怀疑，干吗要折磨自己？’然后，他急得满头大汗地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城堡里那个官员有些什么特点，可是这些特点倒像是他凭空臆想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看到的，而且又全是些鸡毛蒜皮——比如什么点头的姿态有点特别啦，什么上装背心的扣子没扣上啦等等——弄得人哭笑不得。我觉得，更重要的倒是克拉姆怎样跟巴纳巴斯打交道。巴纳巴斯常常给我细讲这一点，甚至还画了一张图。通常，巴纳巴斯被领进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可那不是克拉姆的办公厅，也根本不是某一个人的办公厅。这个大房间是长方形的，一张两头顶着边墙的长斜面写字台，把它又隔成一窄一宽两半，窄的那一半，两个人迎面走需要侧身让道，那是官员们的地方，宽的那一半则是供上访上告各方、观众、管事、信差一应人等使用的，写字台上，一本挨一本地打开放着又厚又大的书，大部分书前面都有一个官员站在那里阅读。但他们并不只是老看一本书，可也不是交换书而是交换位置，使巴纳巴斯感到最最稀奇的景观就是他们在互换位置时不得不你挤我，我挤你，熙来攘往好不热闹——那隔间确实是太窄了一点。紧靠写字台的前面立着一张张小矮桌，每张桌旁坐着一个秘书，他们根据官员们的要求把他们口授的东西记录下来。巴纳巴斯对这种口授记录究竟是怎么进行的总是觉得非常稀奇。原来那批官员口授前并没有发出什么明确的指令，口授时声音也很小，人们几乎感觉不出谁在口授，那个口授的官员反倒是像在继续看他的书，跟原先可说没有两样，只有一点不同，就是他现在一边看书一边口里念念有词打着喳喳，而就是这一丁点儿声音秘书也还是听明白了。有时，官员口授的声音实在太小，秘书坐着根本不可能听到什么，那时他只好跳将起来，伸长脖子竖起耳朵使劲捕捉这空中信息，一经截获便飞快坐下唰唰唰把它们记下，然后再次跳起来……

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下去。真是稀奇、新鲜，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巴纳巴斯当然有的是时间观察这一切细节，因为，在克拉姆的目光终于落到他身上之前，他在那个观众间里要站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即使克拉姆已经看见他，他赶紧直挺挺地立正站好等待命令，也还不等于就有戏了，因为克拉姆可能又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再去看书而把他忘掉；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这到底算个什么信使工作啊，有他和没他不是完全一样吗？每当巴纳巴斯一大早说他要去城堡时，我心里真是好难受。大概又是白跑一趟，大概又是白白浪费一天，大概又是一次希望落空，这究竟算个什么事儿？再看看家里吧，家里是鞋匠活堆成山没人做，布伦施维克天天又催又赶。”“不错，”K.说，“巴纳巴斯是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接到一项任务。这是很好理解的，看起来，这里的职员人数绰绰有余，不可能每人每天都有事做，这你们就不必抱怨了，大概谁都这样吧。可是不管怎么说巴纳巴斯总归还是得到任务了，就拿我来说，他不是已经给我送来两封信了吗？”“很可能我们是没有理由抱怨，”奥尔嘉说，“特别是我，因为我什么都是道听途说听来的，我又是女的，对这些事不像巴纳巴斯那么懂，何况他还有一些事瞒着我呢。可是现在你听我说说他送的那些信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拿送给你的那两封信做例子吧。这两封信他不是直接从克拉姆手里而是从秘书那里拿到的。不知道是哪天有信，不知道是白天有还是晚上有，随便什么时间都可能有——所以我说这份差事表面看很轻松，实际上非常累人，因为巴纳巴斯一刻也不能放松警觉——只要那位秘书一想起他，就马上招呼他过去。看样子也完全不是克拉姆让他叫，因为克拉姆在旁若无人地读他的书；当然，有时巴纳巴斯到那里时恰好碰上他在擦他的夹鼻眼镜（他平时倒也常擦眼镜的），那时他也许就会看巴纳巴斯一眼；还得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戴夹鼻眼镜也能看得见人，巴纳巴斯怀疑他是否能看见，因为擦眼镜时克拉姆的眼睛几乎是闭着的，样子像在打瞌睡，似乎是在一边做梦一边擦眼镜。这时秘书从他桌子下面的一大堆文件和书信中翻出了一封给你的信，就是说，那信并不是他刚写好的，恰恰相反，从那信封看，是一封已经在那里搁了很久的、很旧很旧的信了。既然是一封旧信，那为什么让巴纳巴斯等那么久？也可以说为什么让你等那么久？最后还可以说，为什么让信等那么久？这时才拿出来，不早就过时没有意义了吗？这样一来还让巴纳巴斯也背上了黑锅，人们会说他是个很次的、办事拖拉的信差。秘书当然轻松得很，他只消把信交到巴纳巴斯手里，说一声‘克拉姆写给K.的’就完事了，就把巴纳巴斯打发掉了。可是接下去呢？巴纳巴斯回家来了，一路赶得上气不接下气，

把那封终于抓到手的宝贝信小心翼翼地放在衬衣底下贴身揣着带回家，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也是在这灶沿凳上，就跟我们两人现在似的，他给我讲了事情的全过程，我们就一点一点地分析、琢磨，看看他这一趟究竟有什么收获，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太少太少了——可就连这一点点很少很少的收获是不是真正的收获也还是成问题的，于是巴纳巴斯便把信撂在一边，没有心思去送，但他也没有心思去睡觉，拿过鞋匠活来又做不下去，结果是坐在小凳上发了一夜的愣。事情就是这样，K，这就是我的全部秘密，现在你大概不会再奇怪为什么阿玛莉娅不愿意过问这些事了吧？”“那么我那封信呢？”K问。“信？”奥尔嘉说，“唔，过了一段时间，我把巴纳巴斯催烦了，大概是过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吧，他这才拿起那封信去送。这些大面上的事他倒是完全听我的，因为听了他讲的那些个事情我开始时虽然受不了，但能很快理智起来，不再感情用事，而这一点他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比我知道的事情多呀。冷静下来后我经常对他说：‘巴纳巴斯，你到底想要什么呀？你是在做梦，做官儿梦，做干大事的梦吗？难道你想爬到一个高官儿的位置上去，要到永远也见不着我们、永远见不着我的面才甘心？这就是你拼命追求的目标吗？我不能不这样想，要不我就不懂：为什么你对现在已有的东西会这么老大的不满意？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左邻右舍有哪一个混得跟你一样？当然，人家的经济情况跟我们不同，人家不需要千方百计去捞外快，不过就是不跟人家比，你不也得承认你现在是一路顺风的吗？难处是有的，不顺心的事是有的，失望的时候也是有的，可是这些难道不是仅仅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白送给你，正相反，每件小东西都得靠自己努力争取才能获得吗？这样做了，应该使人更有理由感到自豪，而不是沮丧！再说，你难道不也是在为我们奋斗吗？难道这对你竟一点不重要？不能给你鼓劲？还有，我觉得很幸福，甚至差点为有你这样一个弟弟感到骄傲，难道这不会使你心里感觉踏实吗？说真的，你使我失望的倒不是你在城堡难得如愿，而是我在你身上难得如愿啊。你能去城堡，经常在那些办公厅里出出进进，整天同克拉姆待在一个房间里，是个大家公认的好信差，有资格要一套在职工作服，得到重要的公文和信件去递送。这就是你呀，这些你全能办到，你已经很不错了。但是 you 从上头下来，一见到我不是和我拥抱，不是同我一起高兴得流泪，倒反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你什么全怀疑，只有鞋楦头可以吸引你，而那封信呢，那是我们未来的保证啊，你倒好，让它躺在那儿睡大觉！’我就是常常这样说他的，而每一次，都是我把这些话来回唠叨了好几天，他才叹口气，拿起信走了。可是，大概根本不是我的话起了作

用，而是他自己又急着想去城堡了，因为要是没有完成手里的任务，他是不敢再到那儿去的。”“可是你对他说的这些话也没有一点错啊，”K.说，“你这些话说得多对，总结得多好啊，真让人佩服。你的头脑多清楚呀！”“不，”奥尔嘉说，“你这个印象错了，这么说，我的话也使他产生了错觉。你看，他到底达到了什么目的呢？说他能进一个办公厅，可是那地方看样子并不是什么办公厅，倒更像一个办公厅的前厅，也许连这个也不是，而只是一间专用房间，用来阻挡那些不该去真正的办公厅的人。说他同克拉姆谈话了，可那人真的是克拉姆吗？说那是个样子有几分像克拉姆的人不是更恰当些吗？那人也许充其量是个秘书，因为长得有点像克拉姆，就使劲装得更像克拉姆一些，装模作样地模仿克拉姆那种半醒半睡、迷迷糊糊、不把人放在眼里的样子。克拉姆身上这一点最容易模仿，不少人都试着这么干，当然，对他的其他方面，他们都有自知之明，不敢随便胡来。像克拉姆这样一个谁都渴望着能见面可又很难见到的人，是很容易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各种各样的形象的。比如这村子里有一个叫莫姆斯的秘书。什么？你认识他？这人也是很少露面的，不过我倒见过他几回。这是位年轻的、长得挺富态的先生，对吧？说实在的，他长得一点不像克拉姆。但村里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拍着胸脯赌咒发誓，说莫姆斯就是克拉姆而决不能是别人。你瞧瞧，人就是这样自己把自己越搞越糊涂的。城堡里又怎么样？肯定不会是这样吗？有人告诉巴纳巴斯说那个官员就是克拉姆，那人同克拉姆也的确确有相像的地方，但对这点相似巴纳巴斯总是一再产生怀疑。而且，各种迹象都在加深他的怀疑。想想吧，难道说克拉姆竟然必须坐在这谁都可以进来的房间里，铅笔夹在耳朵后面，在别的官员中间挤来挤去？这不是太玄乎了吗？巴纳巴斯有时常常带着点孩子气——不过这已经是一种有信心情绪了——说：那个官员真是太像克拉姆啦，要是他坐在一间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自己的书桌旁边，并且门上有名牌——那么我就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是的，这话是有点孩子气，可也确实很在理。当然，如果巴纳巴斯在上面时趁热打铁，多向几个人打听一下实情，那他就更明白事理、就成熟多了。他自己不是说那个大房间里闲站着好多人吗？就算这些人回答他的不见得比那个不等问话就主动把克拉姆指给他看的人说的可靠多少，可是从他们那五花八门的说法中至少总能归纳出几条线索来吧。去问问这些人，这不是我的新招，是巴纳巴斯自己想到的，可是他还是不敢去动问；因为怕会在不知不觉中违犯不知哪一条法规而丢掉这个位置，所以他跟谁都不敢搭腔，你看他心里多没底，多胆怯啊；他这种说来真够可怜的心虚胆怯，使我对他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

回事看得更清楚，比说上几百句话更灵。你想，连张嘴问一个谁也碍不着的问题都没有胆量，他在那里要不是看着什么都疑神疑鬼、战战兢兢才怪呢。一想到这些，我就责怪自己怎么让他到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事，结果弄得连他这个本来不胆小而倒是有些莽撞的小伙子，大概也成天在那里害怕得浑身发抖呢。”〔23〕

“说到这儿，我想，你快要道出问题的症结了，”K.说，“关键正在这里。你说了那么些话，到现在我觉得事情已经一目了然。这就是：巴纳巴斯做这个工作人太嫩了点。他说的那些话没有哪句可以完全当真。既然他在上头害怕得六神无主，在那里就不可能做到耳聪目明。硬要逼他讲那里的事，听到的又怎能不是一堆乱糟糟的无法相信的话？对这种惧怕心理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你们这里的人是天生对官府抱着诚惶诚恐的敬畏态度，出生后又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四面八方不断向你们灌输一辈子这种敬畏心理，你们自己也竭尽全力配合人家向自己灌输。不过，对这一点我总的说并不反对；一个官府衙门如果是好的，为什么不让人对它抱着敬畏的态度呢？问题是，敬畏只管敬畏，怎么能把像巴纳巴斯这样一个连村子大门都没出过，对世事一无所知的毛头小伙子一下子就派到城堡去，接着便要求他回来如实地报告那里的情况，然后又把他说的每句话都当成神明启示仔细琢磨研究，接下去再把对这些话的破译看成决定吉凶祸福的大事？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当然，我也一点不比你好高明，我也让他给搞蒙了，又是对他寄予希望，又是为他经受失望的痛苦，而希望也罢，失望也罢，两者都是根据他说的话，就是说都几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奥尔嘉沉默不语。“我知道，”K.说，“想动摇你对你弟弟的信任是不容易的，我看到你太爱他，对他抱着太大的期望。然而无论多困难我也得做，而且我所以要这样做，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考虑到你对他的爱和期望。不是吗，你看，总是有点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妨碍你看清楚事情的底里，不是要你去看看巴纳巴斯爬到了多高的位置，而是看看清楚人家都送了一些什么东西给他。就拿他能到办公厅去这件事来说吧，哦，或者照你说的，是一个什么前厅；唔，前厅就前厅好了，可是那里总有门可以通到别处去，总有一些栅栏可以过得去，只要人机灵点不就行了吗？比方说我吧，我就根本没法去那个前厅，至少暂时完全不可能。巴纳巴斯在那儿跟谁说话我不知道，也许那个秘书是最低一级的办事人员，可就算他是最低级的，他总可以带你到他的顶头上司那里去，再如果他不能带你去，那么至少可以告诉你那位上司的名字，再退一步，如果他也不能告诉你上司的名字，那么总可以指定你去找一个能告诉你这名字的人吧？就算那个被认

为是克拉姆的人同真克拉姆丝毫不像，看上去像克拉姆不过是巴纳巴斯太紧张眼神出毛病产生的幻觉，就算那人是个最低级的官员，甚至什么官儿都不是，可是他既然在写字台前站着，总有一个什么任务、总是在他面前的那本大书里看点什么、总是跟那个秘书噉噉喳喳说了点什么吧，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目光一下子落在巴纳巴斯身上了，那时他脑子里无论如何总会动一动吧？好，现在退一万步说，即使我刚说这些全不对，那人和他那些神情举动什么都说明不了，那么总归还得有人安排他站在那儿，叫他站在那里必定是有某种用意的。说了这么一大堆，我的意思是：巴纳巴斯手里总归还是有点东西的，总归人家是给了他一点什么，至少是一点一点什么，如果说拿着这点东西却什么也不会干，反而生出一大堆怀疑、恐惧，人也搞得灰溜溜的，那么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说的这些都是作最坏的设想，而这种最坏的情况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我们现在到底还有两封信在手里攥着，虽然我不敢太相信它们，但它们总比巴纳巴斯的话可信得多吧。就算这是两封过时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信，是从一大堆同样毫无价值的信中胡乱抽出来的，像年市上的金丝雀那样，不动脑筋，碰上什么就是什么，从一大堆纸签中把一个人的命运之签叨出来，[171](#)即使是这样，但这两封信至少是提到了我的工作；虽然它们也许不是为了我的利益而写，但很明显的是写给我的。经村长和他的妻子证实，它们的确是克拉姆的手笔，而且，又是根据村长的话，虽然它们只是写给我个人的，并且意思相当含混，但毕竟是有很大重要性的。”“村长说过这话吗？”奥尔嘉问道。“对，他说过。”K.答道。“我要把这个告诉巴纳巴斯，”奥尔嘉接口就说，“这对他会是个很大的鼓励。”“可是他并不需要鼓励，”K.说，“鼓励他，就等于跟他说他做对了，他只管照自己现在的做法一直做下去就行了，然而恰恰是照这种做法他将永远一事无成。如果一个人的眼睛被手巾蒙住，那么无论别人怎样鼓励他使劲瞪大眼睛看，他也是永远看不见什么的，只有给他把那块手巾解下来，他才看得见。巴纳巴斯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鼓励。你想想吧：那边山上就是官府，它是个让人理不出头绪来的庞然大物，一个解不开的谜——我来这里以前，竟然自以为对它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不差的了解，你看我那时够多幼稚啊——好，接着说下去，那里就是官府，巴纳巴斯朝它走去，没有别人，只有他一个人，可怜巴巴，孤孤单单，像这样干法，如果他将来不是落一个缩在不知哪个办公厅中哪个黑洞洞的角落里一辈子下落不明的下场，那还算是万幸呢。”“K.，你别以为，”奥尔嘉说，“别以为我们对巴纳巴斯承担的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们对官府抱着诚惶诚恐的敬畏态度，这是你

自己刚才说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敬畏态度，”K.说，“是一种用错了地方的敬畏态度，结果反而给受到敬畏的一方脸上抹了黑。你看吧，巴纳巴斯能去那个房间，他不知道好好利用人家送他的这份礼物，却成天待在那里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浪费时间，从那里下来以后，又对那些他刚刚还敬畏得发抖的人又是怀疑又是贬低，或者，由于灰心绝望或太累又不马上去递送信件，不立刻去办上头信任他让他去通知的事情，他这样做，还能叫做敬畏吗？恐怕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什么敬畏了。然而我的责备还不止限于巴纳巴斯，我还要说说你，奥尔嘉；我没法不怪你，你虽然自以为对官府怀着敬畏，又明明知道巴纳巴斯是个不懂事的毛头小伙子，为什么又偏偏叫他孤零零一个人到城堡去？至少是没有阻止他去？”〔24〕

“你埋怨我这一点，”奥尔嘉说，“实际上我自己也一直都在这样埋怨自己。当然我不是责怪自己叫巴纳巴斯去城堡，我并没有叫他去，是他自己去的，可是也许我应该千方百计阻止他，硬性强迫也好，使个计策也好，拼命说服也好，都是可以的嘛。我本应该阻拦他，可是，如果今天那是那一天，是我决定让他去的那一天，如果现在我又像当时那样感到巴纳巴斯的困难和我们家的困难，如果巴纳巴斯还是同那天一样明明知道这样做的责任和危险仍然微笑着轻轻挣脱我的手要去那儿，那么，就是今天，虽然说从那时到现在我长了好多见识，我还是不会阻拦他的，并且我想，如果你是我，你也只能这样做。你不了解我们家的困难，所以你错怪了我们，但首先是错怪了巴纳巴斯，当时我们抱着希望，比今天大些，可是即使在那时也没有抱很大希望，很大的是什么？只是我们的困难，直到在这困难还是一样大。弗丽达没有给你讲过我们家的事情吗？”“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讲了一点点，”K.说，“没讲太具体的东西，可是一提到你们的名字她就很激动。”“老板娘也什么都没讲吗？”“对，一点没讲。”“别人也一点没讲过？”“没有。”“当然啰，怎么可能有人给你讲点什么呢。谁都知道一点我们家的事，要不就是知道真实情况——如果那些人能听到真情的话——要不至少也知道一点听来的或者多半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谣言，人人都想到我们，连不该想的时候也想，可是要说把这些想法讲给别人听吧，谁都不这样做，把这些事用嘴说出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他们是对的。这些话的确很难出口，就是对你K.讲也一样困难，很可能你听完后拔腿就走，再不想同我们来往，尽管这些事看起来同你没什么关系。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你，而你现在对于我来说，不瞒你说，差不多比巴纳巴斯为城堡办事更重要。可是想来想去——这种矛盾心情已经折磨了我整整一晚上——我觉得还是得让你知道这些

事，否则你就不了解我们家，就会一直错怪巴纳巴斯，这样我会特别心疼的；不这样我们就不齐心（齐心是非常必要的），你就不能帮助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特殊帮助。不过这儿还有一个最起码的问题：你到底想听不想听？”“你为什么要问这个？”K.说，“既然有必要，我当然想知道，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我有点迷信，”奥尔嘉说，“我怕你会卷进我们家的事情里来，而你是无辜的，几乎跟巴纳巴斯一样无辜。”“你快讲吧，”K.说，“我不怕。你们女人老是前怕狼后怕虎的，结果会把本来不那么严重的事也给弄严重了。”

阿玛莉娅的秘密

“你自己下判断吧，”奥尔嘉说，“说来也怪，这些个事听起来非常简单，可你就是不能马上明白它们怎么会那么重要。事情是这样的：城堡里有一个叫索尔替尼的大官。”“我知道这人，”K.说，“聘任我的官员中就有他。”“我不信，”奥尔嘉说，“索尔替尼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你一定是把他跟索尔蒂尼搞混了吧，就是‘蒂’字用‘d’拼写的那个？”“你说对了，”K.说，“我听说的是索尔蒂尼。”“是的，”奥尔嘉说，“索尔蒂尼是非常有名的，他是最最勤恳的官员之一，人们经常谈起他；而索尔替尼就简直不露面，没有几个人认识他。三年多以前，我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见到这个人。那是七月三日，那天消防协会举办一次联欢活动，城堡也来人参加了，还捐赠了一台新的灭火器。据说索尔替尼是兼管消防事务的（但他也许只是临时代理——当官的经常是你代理我我代理你，所以很难弄清楚某位官员真正主管的部门），那天他来参加灭火器的捐赠仪式；当然，城堡还来了些别的官员和办事人员，索尔替尼一直待在别人最不注意的地方，这一点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这位先生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喜欢闷声不响地思考问题；使每一个难得发现他的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皱眉头时样子非常特别，原来，他额头上的皱纹——虽说他肯定超不过四十岁，但皱纹非常多——在皱眉时一条条笔直地奔向鼻根聚拢，活像一把没有完全撑开的折扇，这种模样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好，回过头来说那次联欢活动。我们，就是阿玛莉娅和我，好几个星期前就高兴地盼着这次活动了，我们把自己的节日盛装拿出来，有几件还重新浆洗熨烫一遍，特别是阿玛莉娅的衣服很漂亮，白衬衫的前胸高高鼓起来，花边擦花边，妈妈把她在这上头的全部家当都拿出来给她用，当时我眼红得在联欢活动前一天夜里整整哭了半宿。直到第二天清早大桥酒店的老板娘来看我们时……”“大桥酒店的老板娘？”K.问。“对，”奥尔嘉说，“她和我们家是很要好的朋友，对，她来了，看出阿玛莉娅比我

打扮得好看，为了安慰我，她就把自己的镶有波希米亚钻石的项圈借给我戴。可是，我们都梳妆打扮好准备要出门了，阿玛莉娅站在我面前，我们大家都对她的美赞不绝口，父亲说：“你们记着我说的吧，今天阿玛莉娅准会找到姑爷的。”在这样的時候，我不知怎的一下子就把这个给我脸上添了光彩、使我很得意的项圈摘下来给阿玛莉娅戴上了，我这时一点不妒忌她了。她能压倒群芳，真叫我低头服输了，当时我还想，谁都会在她面前低头服输的，我这样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当时见她跟往常比完全变了样而突然惊呆了吧，因为，她的长相原本说不上美，但她那忧郁的目光（从那天以后就一直保持下来了）有一种比我们高出许多的、傲视一切的气势，使人真正要不由自主地在她面前低头弯腰呢。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包括来约我们一起去参加活动的拉塞曼和他的妻子。”“拉塞曼？”K.问。“对，拉塞曼也来了，”奥尔嘉说，“我们家当时很受人尊敬啊，比如说这次联欢活动吧，要是没有我们参加恐怕很难搞得起来，因为父亲是消防队的第三教练。”“那时你们父亲的身体还挺硬朗么？”K.问。“我们的父亲吗？”奥尔嘉反问道，似乎不完全明白K.的意思。“三年前他还可以说是个年轻人呢，比如，有一次贵宾楼发生火警，他能把一个官员，就是那个又胖又重的加拉塔，背在背上跑步救出去。当时我也在场，那次虽然算不上真正的火灾，只是一个炉子边上堆放的干柴开始冒烟了，但加拉塔害怕起来，从窗户往外呼救，消防队来了，尽管火已经扑灭，我父亲还是得把他背出去。是啊，加拉塔行动很不方便，遇到这类危险时只能多加小心呗。我讲这件事的目的是想说明我父亲的变化，从那时到现在才不过三年出头，可是你看看吧，他坐在那里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K.才发现阿玛莉娅又回到屋里来了，不过这一次她站得离K.很远，在她父母坐的那张桌子旁边，喂母亲吃东西，母亲风湿病很重，胳膊不能活动，阿玛莉娅一边喂又一边不断安抚父亲，要他耐住性子再稍等一会儿，她很快也就来喂他了。然而这些宽慰话未能奏效，那位父亲现在是馋涎欲滴，恨不得马上把汤喝到嘴里，在这种强烈欲望的驱使下，他居然克服了体力上的衰弱伸长脖子使劲去够，一会儿想够着汤勺啜上一口，一会儿又想直接从盘里把剩下的汤喝光，然而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有时在他嘴还没有碰到汤勺之前汤就光了，有时又不是嘴而是那两络耷拉着的小胡子泡进了汤里，弄得汤汤水水唏里哗啦四处乱溅，唯独一滴也不往他嘴里去，于是他便气呼呼地咕哝起来。“三年就把他弄成这副模样了？”K.问，但他到这时对这两个老人、对那个放祖传饭桌的屋角仍然还是没有同情而只有厌恶。“三年，”奥尔嘉慢吞吞地说，“或者更准确些说是一项联欢活动上的几个小时。那次活动是在村

前小溪边一块草地上举行的，我们到那儿时，人已经很挤很挤了，附近几个村子也来了许多人，吵吵嚷嚷，弄得人头昏脑涨。首先父亲当然带我们来到那台新灭火器旁，他一看见这机器便高兴得笑起来，一台新灭火器使他很快活，他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一边给我们讲解起这部机器来，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不许别人说半个不字，也不许别人不置可否；如果是要看看机器底下的什么部件，我们就得大弯腰，甚至几乎爬到机器底下去；巴纳巴斯不愿往里钻还挨了打。只有阿玛莉娅一个人不关心这台灭火器，她穿着那件漂亮的连衣裙昂然站在一边，谁都不敢跟她搭腔，有几次我跑过去挎起她的胳膊，但她还是一声不响。就是今天，我也还是弄不明白当时我们怎么会在灭火器那儿站那么长时间，你看，直到父亲从灭火器旁走开时我们才发现索尔替尼也在那儿，父亲讲话这段时间他一直站在灭火器后面，靠在一根手柄上。那天真是吵得要命，比平常的节日活动吵闹得厉害得多。原来城堡又送了消防队几支小号，这几支号挺特别，根本不用使多大劲，连孩子也能行，就能吹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简直会以为土耳其人又来了^[8]，人简直没法习惯这声音，每次重新响起来时都要吓一大跳。再说因为全是新号，谁都想拿过来吹两下，又因为这是一次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上头也就不禁止人们这样胡来。我们周围正好有几个这样的警脚号手，也许是阿玛莉娅把他们招来的吧；在这种乱哄哄的情况下要集中注意已经很难了，如果还要照父亲的要求仔细听他讲灭火器，那么你可以想见，我们当时只能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这才那么老半天都没有注意到索尔替尼，何况我们原先又谁也不认识这个人呢。‘索尔替尼在那儿。’拉塞曼终于悄悄凑着父亲的耳朵打喳喳说——我正好站在他俩旁边把这话听见了。于是，父亲转身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并激动地示意我们也鞠躬。在此之前父亲根本不认识索尔替尼，但一直知道他是个消防专家，对他很敬佩，在家里多次提到他，所以，现在面对面地见到索尔替尼了，我们大家就感到意外的惊喜，觉得是件大事。但是索尔替尼对我们不理不睬——这不是索尔替尼的什么独特之处，大部分当官的在公众场合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再说他也很累了，仅仅因为想到公务在身，他才坚持在这下面的村子里留下来；那天参加活动的官并不是最坏的官，他们恰恰觉得这种代表官府、显示官府气派的任务是一种负担；别的官员和办事人员心想，既然来了，就干脆与民同乐，就和老百姓一起活动吧；索尔替尼却不然，他一直待在灭火器旁边，谁试着去请他或是对他说句恭维话，一概被他一声不吭地顶了回去。这样，他发现我们就比我们发现他还要晚。只是到了我们毕恭毕敬地向他深深鞠躬，父亲又一再为我们告

罪时，他才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然后就没精打采地挨个儿看我们每一个人，样子很疲倦；那神情似乎在叹气：怎么看完一个，旁边老是又冒出来一个？一直看到阿玛莉娅，他才停了下来，他只能抬起头看她，因为她比他高好多。一看见阿玛莉娅，他惊呆了，接着便纵身跳过灭火机的辕杆，这样可以离阿玛莉娅近一些，开始我们误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大家都想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近他，可是他举手示意我们不要近前，接着又挥手示意我们走开。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过后我们好多次拿这事逗阿玛莉娅，说她真的找到一个姑爷了，那天，整个下午我们还都傻乎乎的，玩得非常高兴；但阿玛莉娅却比往时更加少言寡语了。‘她是完全让索尔替尼把魂儿勾去了。’布伦施维克说。他这个人平素老有点粗里粗气，对像阿玛莉娅这样性格的人完全无法理解。可是这一次我们倒觉得他这话说对了十之八九，那天我们都玩得昏头昏脑，后半夜回到家时，除了阿玛莉娅外，谁都让城堡送下来的葡萄酒给整治得晕晕乎乎的。”“那么索尔替尼呢？”K.问。“是啊，索尔替尼，”奥尔嘉说，“后来在联欢活动中我好几次从他身边走过时都还看见他，他坐在灭火机辕杆上，两只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一动也不动，就这样一直坐到城堡来车把他接走。他甚至连消防表演也没有走过去看看，而那天的表演，父亲之所以在他的同龄人面前表现得特别突出些，正是因为他总抱着希望，就是索尔替尼会在旁边看。”“那么后来你们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吗？”K.问，“听你的口气你好像特别尊敬索尔替尼似的。”“对，是尊敬，”奥尔嘉说，“对，你说的不错，我们也很快就又听到他的消息了。那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头天的酒劲还没有完全消退，大家都还在昏睡中，突然间被阿玛莉娅的一声大叫惊醒了。别人是一惊坐起来，然后又躺下去接着睡，可我是一点也睡不着了，就跑到阿玛莉娅那里去。她站在窗子旁边，手里拿着一封信，那是一个男人刚从窗户外面给她递进来的，那人还站在外面等着回话。阿玛莉娅已经看完信——信很短——拿着信纸的手有气无力地耷拉着，每次我见到她那种疲倦的样子，总觉得她又可怜又可爱。我在她身边蹲下来看她手里那封信，但我还没来得及看完，阿玛莉娅瞟了我一眼就又把信拿起来，可是已经无法强迫自己再看一遍了，而是将它撕个粉碎，把纸屑向外面那人的脸上扔了过去，然后就关上了窗子。这天早上对我们来说就成了决定命运的一个早晨。我说它是决定命运的早晨，但是头天下午的每一分钟也同样是决定命运的。”“那信上写了些什么？”K.问道。“对了，这个我还没有讲，”奥尔嘉说，“是索尔替尼的来信，写明收信人是戴钻石项圈的姑娘。写些什么我没法说。信里提了个要求：要阿玛莉娅到贵宾楼他那里去，而且是立即

去，因为再过半小时他索尔替尼就要走了。那封信里全是些不堪入耳的话，我还从没听到谁说过那些话，我只能从上下文猜出他的大致用意是什么。谁如果不了解阿玛莉娅而是只看这封信，一定会认为，即便这姑娘身子还没有被男人碰过，那她至少也是个名声很不好的姑娘。怎么竟有人敢写这样的信给她！那不是一封情书，里面没有一句奉承的甜言蜜语，相反，索尔替尼显然是在为自己看见阿玛莉娅后心旌动摇，神不守舍，再也无法专心去办他的公事而大为恼火。后来我们是这样来分析这件事的缘由的：大概索尔替尼原来想参加完活动以后当天晚上就回城堡，仅仅因为阿玛莉娅的缘故才在村里留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又因为自己整整折腾一夜也没法忘掉阿玛莉娅而气急败坏，这才怒气冲冲地写下了那封信。不管是谁，看到这封信都必定会先是非常气愤，连最有涵养的女人也受不了，可是气愤过后呢，如果换了别人，不是阿玛莉娅，多半就会被那气势汹汹的恐吓语气吓倒，害怕就会占了上风，但阿玛莉娅不同，她是一直怒气难平，她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自己遭殃也不怕别人受罪。后来我又钻进被窝，心里重复着信上最末了那句只说出了一半的话：‘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是马上来，还是——’这时阿玛莉娅一直还坐在窗台上往外看，似乎她还在等着第二个、第三个……信差，随时准备用对付头一个的办法去对待他们。”“这些当官的原来就是这样，”K.迟疑片刻说道，“他们当中竟有这类货色。你父亲有什么反应？我希望，要是他不愿意走那条又近又稳当的路去贵宾楼告索尔替尼，那么也去过主管部门对索尔替尼作强硬的投诉了吧？其实这件事情上最令人恶心的倒不是阿玛莉娅受到侮辱，这是很容易得到补偿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偏要特别看重这一点；索尔替尼怎么可能靠这样一封信就使阿玛莉娅一辈子背上坏名声呢？听了你刚才的话也许会这么想，其实不然，这一点恰恰是不可能的，要求给阿玛莉娅赔礼道歉并不难做到，然后过不了几天人们也就把整个这件事忘了，索尔替尼并没有使阿玛莉娅丢脸而是使自己丢尽了脸。我听了这事倒是被索尔替尼吓坏了，一想到居然会有这种滥用职权大施淫威的事，我简直要被吓得退避三舍的。索尔替尼在这件事上所以没成功，是因为信上是白纸黑字写得非常露骨，又偏偏碰上阿玛莉娅这么个高明的对手，但是在上千件别的事情上呢，只要情况比这一件稍稍不利一点，他就完全能够得手，而且还可以瞒天过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连受害者本人也蒙在鼓里呢。”

“快别说话，”奥尔嘉说，“阿玛莉娅在朝我们这边看。”阿玛莉娅已经喂完两个老人吃饭，此时正在给母亲穿衣服；她刚给她解开了裙子，把母亲的一只胳膊搭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样把她稍稍抱起来一点，褪下

她的裙子之后又把老人轻轻放回原处坐好。那位父亲呢，一直还在为刚才先伺候母亲嘟囔着——其实阿玛莉娅这样做显然只是因为母亲身体更不方便，比他更需要照顾——现在他赌气试着自己脱衣服，大概这也是为了对女儿表示惩罚吧，因为他觉得女儿太拖拉、动作太慢。但是，虽然他是从最不需要别人帮助、最容易的地方开始，即先脱那双比他的脚大出许多、只是松松地套在脚上的拖鞋，仍然怎么也脱不下来；累得他呼哧呼哧直喘气，只好作罢，重又直挺挺地靠在他的椅子背上。

“最关键的地方你没有看出来，”奥尔嘉说，“你说的也许都对，但关键的问题是阿玛莉娅没有去贵宾楼；她对那个信差的态度其实倒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还是可以遮掩过去的；但是她这一不去贵宾楼，就等于我们家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这样一来对信差的态度也成了不可原谅的，对外人家甚至把这个硬说成是最主要的问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啊！”K叫起来，但随即又压低了声音，因为奥尔嘉向他摆双手叫他别太大声。“你这个做姐姐的总不至于想说阿玛莉娅当时应该对索尔替尼俯首帖耳，立刻跑到贵宾楼去吧？”“我不是这个意思，”奥尔嘉说，“你可千万别这样猜我的心思；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像阿玛莉娅这样事事做得在理的了。当然，如果她真去了贵宾楼，我也会同样说她做得对；而她没去呢，这就叫做很勇敢。拿我来说吧，跟你说句实话，如果是我收到这样一封信的话，那么我就去了。那种担惊受怕，害怕大祸临头的折磨我会受不了的，只有阿玛莉娅什么都不怕。遇上这种事，本来也还是有些办法对付的，比如说，要是换了另一个女人，可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不就磨蹭掉了一些时间吗，然后呢，那时再上贵宾楼去，到了那里就会听说索尔替尼已经走了，兴许会听说他在刚把信差派出去之后就走了，这后一种情况甚至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老爷们是喜怒无常，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可是阿玛莉娅不这样做，她深深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对那封信回绝得斩钉截铁，不留一点后路。假如说她哪怕只是表面上装作服从一下，只要及时去到、哪怕只刚刚迈进贵宾楼的门槛，那么我们家的厄运也还可能得到扭转，我们这儿有那么些聪明绝顶的律师，有能耐把没有的事也照你的意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连‘没有的事’这个有利条件也不具备；有的反倒是对索尔替尼的信的大不敬和对信差的侮辱两条事实。”“可是你们遭受的究竟是什么厄运，”K说，“这里有的又是什么样的律师啊，总不至于会因为索尔替尼的罪恶行径反而指控阿玛莉娅甚至判她的刑吧？”“会的，”奥尔嘉说，“可以这样做的；当然，不是正儿八经地起诉，给她判刑，而且也不是马上就惩处她，而是用别的方式惩罚

她和我们全家，这惩罚究竟有多厉害，你现在也开始有点体会了吧。你这会儿觉得这是一件不公道的、骇人听闻的事，这种看法在村里只是极个别的人有，这看法对我们很有利，有这种想法的人想用这话安慰我们，而如果这一看法不是显然基于一些错误的认识，那么对我们也的确是一种安慰。我可以很容易地给你证明这一点，对不起，为了证明这个我要提到弗丽达，告诉你吧，弗丽达同克拉姆之间发生的事——不管事情最后发展成什么样——跟阿玛莉娅同索尔替尼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差不多，而你呢，虽然起初可能曾经大吃一惊，可现在终归还是认为这没什么不对了吧。这并不是习惯成自然，在只需要作出简单明了的判断时，人是不可能因为习惯势力而变得这样麻木不仁的，我要说你只是改正了原先的错误认识。”“不对，奥尔嘉，”K.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弗丽达扯到这里头来，弗丽达的情况跟这件事完完全全是两码事，你可别把两件根本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还是接着讲你的故事吧。”“对不起，”奥尔嘉说，“请你别见怪，我还是坚持要拿这两件事来作比较，谈到弗丽达，如果你觉得一定得挺身而出保护她，反对拿她来比较，那么你也还是没有完全摆脱错误认识。弗丽达根本用不着谁来为她辩护，她只应当受到称赞。我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不是说我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好比黑色和白色那样不同，白的是弗丽达。对于弗丽达，人们最多只能笑笑她，就像我那次在酒吧里笑她那样，过后我很后悔，因为这做得很不像话，但即便是只笑笑她这个人，也已经是不怀好意或者心怀妒忌了，不过，不管怎么说笑一笑总还是可以的吧。对阿玛莉娅呢，除去她的亲人，别人就只能是看不起她。所以，这两件事虽然根本不同，就像你刚说的，但也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吧。”“它们也不相似，”K.一边说一边很不高兴地摇头，“你饶了弗丽达吧，弗丽达没有像阿玛莉娅那样收到一封索尔替尼的信，一封满纸‘斯文话’的信，弗丽达真正爱克拉姆，不信可以问问她自己，她直到现在还爱着他呢。”“可这又有多大区别呢？”奥尔嘉问道，“你以为克拉姆不会给弗丽达写过同样的信吗？老爷们从他们的写字台后面一站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只要一走进现实世界，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会漫不经心地说出些最最粗野的话，我不是说所有的老爷都这样，但许多人是这样。给阿玛莉娅那封信，就很可能是在一种心神不宁，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的情况下草草写下來的。我们怎么晓得老爷们脑子里想些什么？难道你没有亲耳听到过或是听人讲过克拉姆同弗丽达交往时用的是一种什么腔调吗？关于克拉姆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说话很凶，听说他会接连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然后劈头盖脸来一句凶神恶煞的话，吓得

人魂不附体浑身哆嗦。没听说索尔替尼态度很凶，这个人的情况我们本来知道的就少。实际上只知道一点，就是他的名字和索尔蒂尼很像，如果没有这一点名字上的相像，大概谁都不会知道这个人的。就拿消防专家这一条来说，人们很可能也把他同索尔蒂尼搞混，索尔蒂尼才真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且还利用两人名字差不多这一点，把出头露面的事全推给索尔替尼，自己乐得个清静，可以不受打扰地工作。你得承认，一个像索尔替尼那样的很不善于同别人周旋的人，突然被一个乡村姑娘弄得神魂颠倒，那么这种爱情的表现形式当然同比方说隔壁的木匠帮工爱上哪个姑娘是不一样的。另外还要考虑到，一个当官的和一個鞋匠的女儿，这两人之间确实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总得有个什么办法消除一下，索尔替尼试图用他这种方法来消除，另一个人可能就用另一种方法。虽然都这么说：大家都是属于城堡的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距离，也就没有什么消除差距的问题，这话在平时讲讲也许是对的，但是，可惜我们有机会看到，恰恰在节骨眼上就不是那么回事。说了那么多，现在至少你对索尔替尼的做法可能比较能够理解，不会再感到那么骇人听闻了吧，事实上，他的行为和克拉姆的行为比起来，的确是可以理解得多，并且，即便事情与人关系相当密切，也容易忍受得多。克拉姆就是写一封温情脉脉的信，也比索尔替尼写一封满是粗话的信令人难堪。我说这话你不要误会，我可不敢对克拉姆评头品足，我只是打个比方给你听，因为你反对我打比方。克拉姆简直就是女人头上的司令，一会儿命令这个女人，一会儿命令那个女人到他那儿去，不许让他久等，而且如同他命令一个女人马上来一样，他也很快又命令她赶快走。唉，我看克拉姆恐怕压根儿就懒得提笔写信呢！那么，比较起来，平素深居简出的索尔替尼——他同女人的关系至少没人知道——现在坐下来，用漂亮的官员字体写上一封信，就算是一封让人恶心的信吧，还能说这是件骇人听闻的事吗？如果说我这个比较的结果不是对克拉姆有利，而是相反，那么，难道可以用弗丽达对他的爱来说明比较结果是对克拉姆有利的？告诉你吧，女人同官员的关系是很难说清楚的，或者恰好相反，很容易说清楚。这里决不缺少爱。不幸的官员之爱是没有的。说某个姑娘——我这里指的远不止弗丽达一个人——是纯粹因为爱情才委身于某个官员，在这里并不是一种夸奖。不错，姑娘因为爱官员，才把自己的身子给了他，这是事实，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夸奖的。你会反驳说，但是阿玛莉娅并不爱索尔替尼啊。好吧，她没有爱过他，可是也许她真的爱过他呢？谁说得清？连她自己也不准。她这样断然拒绝索尔替尼，恐怕从来还没有哪个官员碰过这么硬的钉子，她这样做了，能说她坚信自己没有爱

过他吗？巴纳巴斯说阿玛莉娅直到今天有时想起三年前她使劲撞上窗户时那种激动心情来还会浑身发抖。这也是老实话，所以不能问她，去捅她的痛处；她同索尔替尼的关系已经了结，现在记得的只有这一点了；她说不清自己爱不爱他。可是我们知道，当官的一看上哪个女人，这女人就除了爱这个官员而没有别的法子；甚至不论女人自己怎么不承认，实际上她们是在当官的看上她们之前就爱当官的了，而索尔替尼不仅仅是一般的看上阿玛莉娅，他是一看到阿玛莉娅就纵身跳过了灭火车轱辘杆，并且是用他那双趴在办公桌上坐僵了的腿，一下子跳了过去。你又可能会说，但阿玛莉娅是个例外。对，她是个例外，用拒绝上索尔替尼那儿去的行动，她证明了这一点，这的确够得上是例外了；但除此以外，如果硬要说她根本没有爱过索尔替尼，那么恐怕这个例外就有点太稀奇，简直是让人无法理解了。那天下午我们虽然都玩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但不管有多糊涂，我们对阿玛莉娅坠入情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察觉，这总是说明我们还有一分清醒吧。好了，现在要是把我讲的这些都加在一起，弗丽达和阿玛莉娅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弗丽达做了，而阿玛莉娅拒绝做而已。”“也许是这样吧，”K.说，“然而对我来说她们的区别是：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而阿玛莉娅实际上只在一点上与我有关，就是她是巴纳巴斯的妹妹，城堡信使的妹妹，她的命运同巴纳巴斯的工作也许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官员对她做了一件令人极为气愤的错事——你讲起这事来我最初觉得是这么回事——那么我对此自然非常关心，然而就是关心，也更多的是作为一件与百姓疾苦有关的事而不是针对阿玛莉娅个人的痛苦。可是现在呢，听你讲完之后，看来事情又不是我原先想的那样了，尽管我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但因为这不是别人而是你讲出来的，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所以我现在很愿意完全不管这事，听了权当没听，我又不是消防队员，索尔替尼与我有什么相干。但是弗丽达我却很关心，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不可理解，怎么连你这个我原来就很信任以后也愿意永远信任的人，居然试着从阿玛莉娅身上拐个弯儿来攻击弗丽达，使我对她生疑。我并不认为你是有意这样做，更不认为你这么做法是怀着恶意，否则我在这里早就待不住了。你不是故意的，你做这件不该做的事是客观情况造成的；因为你爱阿玛莉娅，于是就把她捧得很高，高出所有别的女人，又因为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阿玛莉娅身上找不到足够的值得称道的东西，于是就用贬低别的女人的办法来抬高她。阿玛莉娅的表现是很奇怪的，可是你对她的行为表现讲得越多，听的人就越难说她究竟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是聪明呢还是愚蠢，是勇敢呢还是懦弱，阿玛莉娅做那件事的动

机，她是深深锁在心里的，谁也撬不开她的心扉看个究竟。而弗丽达正好相反，她一点怪事也没有做，她只是跟着自己的感情走，对任何不是抱着成见去看她的所作所为的人，这一点非常清楚，谁都可以去调查实际情况，在这里闲言碎语背后议论是没有市场的。我既不想贬低阿玛莉娅，也不想为弗丽达辩护，而只想跟你说清楚我同弗丽达的关系，让你明白对弗丽达的任何攻击也就是对我自己的攻击。我是自愿到此地来的，同样出于自愿在这里留了下来，但我到这儿以后得到的一切，尤其是我在这里的前途——不管这前途多么黯淡，然而无论如何总还是有前途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弗丽达，这是说什么也抹杀不掉的。尽管我是以土地测量员身份被接纳到这里，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人家是拿我耍着玩，哪家都把我赶出门，到今天我也仍然被人耍着玩，只不过现在不那么容易了，可以说我在这里已经有了一点根基，而这一点就是不小的收获了，你看，不论听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我终归已经有了一个家，一个位置，也真正有事可做，我有了一个未婚妻，在我需要处理别的事务时她代我上班尽职，我将要同她结婚，成为村子里正式的一员，同克拉姆，我除去公务上的关系之外也还有一层私人关系，只是这层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利用上罢了。这些成果难道能说很少吗？再说，我到你们家来，你们欢迎的是谁？你是对谁推心置腹地讲出自己家的故事？你又是希望谁能给你们一点不管什么样的帮助，哪怕这种可能性很小，微乎其微？你大概不会对那个当土地测量员的我，那个仅仅一星期前还被拉塞曼和布伦施维克从他们家里轰出来的土地测量员抱什么希望，而只能对一个手里已经握有一点权力的人抱希望吧，可是我现在有这点权力全靠弗丽达，弗丽达又很谦虚，如果你想问问她这方面的事，她一定是丝毫不肯承认自己有这种能力的。但是我们谈来谈去，看来还是天真无知的弗丽达比傲气十足的阿玛莉娅办成的事要多些。你看看吧，现在我的印象是，你在为阿玛莉娅求援。求谁帮助她呢？难道实际上不恰恰是在求弗丽达吗？”“我真的说了弗丽达那么多坏话吗？”奥尔嘉说，“我的本意决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也没有中伤她，不过客观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家的情况很糟，同什么人的关系都很坏，只要一发起牢骚来就打不住，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扯到哪里去了。是的，你说得对，现在我们家的姑娘和弗丽达的确很不一样，强调一下这种不同是有点好处的。三年前，我们两姊妹是市民家的女儿，弗丽达是孤儿，在大桥酒店当女佣人，那时我们从她身边走过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当然，我们当时是太傲气了点，可是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贵宾楼那个晚上，你可能就已经看出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了：弗丽达手里拿着鞭

子，而我却挤在一大堆仆人当中。可是还有更糟的呢。弗丽达看不起我们倒也罢了，她有那个位置，这也难怪，是客观环境促使她这样做的。难受的是，不管什么人都看不起我们！谁要是决定给我们白眼，他马上就身价百倍。你认识接替弗丽达的那个姑娘吗？她叫佩碧，我是前天晚上才认识她的；她原先是客房女招待。她那样子，肯定比弗丽达更看不起我。她站在窗户旁边，见我来打啤酒了，就跑到门口把门闩上了，我不得不央求半天，还得答应把我头发上扎的那条丝带送给她，她才给我开了门。可是当我把丝带送给她时，她一把接过去就扔到墙犄角去了。有什么法子，只好让她看不起了，在有些事情上不是得依赖人家吗，人家是贵宾楼的酒吧女郎啊；当然啦，她这个位置也只是临时的，要说长期受雇做那个工作，她肯定还不够格。只请听一下老板用什么语气跟她佩碧说话，再比一比人家怎样同弗丽达说话就够了。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佩碧同样看不起阿玛莉娅，其实，我看阿玛莉娅只需要瞪她一眼，就足够把这个小小的佩碧吓得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房间，梳着什么样的小辫、戴着什么样的发网都没用，而要不是想钻地缝，那么她那两条又短又粗的腿，恐怕一辈子也跑不了那么快的。就拿昨天来说吧，我又得硬着头皮强忍怒气听她没完没了地数落阿玛莉娅，直到最后酒客们来帮我她才罢休，当然，那些人是怎样帮我解的围，这你已经见过一回了。”“瞧你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巴巴的，”K.说，“我不过是把弗丽达摆到她应有的位置上，并不像你现在觉得的那样，想贬低你们家的人。我也感觉到你们家有某种特殊的地方，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但是为什么这一点特殊之处竟能造成人们普遍看不起你们，这我就搞不懂了。”“唉，K.，”奥尔嘉说，“恐怕连你也会尝到这种滋味的；阿玛莉娅对索尔替尼的态度，是引发这种看不起的第一个原因，难道这你一点不懂？”“真是太离奇了，”K.说，“可以因为阿玛莉娅那种态度佩服她或者谴责她，怎么会出来个看不起？再者，人们出于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感情真的去看不起阿玛莉娅也就得了，为什么又要把这种轻蔑扩大到你们身上，你们家里别人不是无辜的吗？比如，连佩碧这样的人也瞧不起你，这未免太过分了，我再去贵宾楼一定为你出这口气。”“K.，”奥尔嘉说，“要是你想说服所有看不起我们的人改变态度，那么这可是太难了，因为这一切的根子都在城堡。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早晨过后第二天上午的情形。布伦施维克那时是我们家的帮工，他跟每天一样到我们家来，父亲给他派完活就让他回家去了，然后，我们全家坐下来吃早饭，除阿玛莉娅和我之外，大家都谈笑风生，父亲喋喋不休地讲头一天的联欢活动，他考虑了有关消防工作的好几个方案，原来城堡有一支专职消防队，这个队也派了一

些代表参加联欢，父亲同他们商量了他的某些计划，城堡下来的老爷们那天看到了我们消防队的成绩，对这些成绩表示相当满意，把城堡消防队的成绩同我们的作了比较，结果肯定了我们的一些优点，于是谈到可以考虑对城堡消防队进行一次整顿，为了这个目的，需要从村里派出一些人员，虽然有好几个人可以考虑，但父亲是最有希望的人选了。吃早饭时他就大讲特讲这些，他同往常一样，喜欢在饭桌上横行霸道，就是把两只胳膊趴在桌上占去半张桌子，后来他又把头探出窗外仰望天空，那张脸显得非常年轻，喜笑颜开，充满了希望。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这种表情了。话说回来，当时阿玛莉娅带着一种我们在她身上还没有见过的洋洋得意的神色说，对老爷们讲的这一套不要信以为真，在这样的场合老爷们就是喜欢说好听的，他们的话里没有几句能兑现或者全是空话，说完了也就忘光了，可也怪，到下次人们还是会上他们的当。母亲训斥阿玛莉娅，说她不该讲这些无礼的话，父亲只是笑阿玛莉娅这副少年老成、似乎饱经沧桑的样子，但过一会儿他突然一愣，接着便好像在找什么刚发现丢了的东西，可实际上又什么都不缺，然后他说：布伦施维克对他提到一个信差，又讲到一封信被撕碎什么的，于是他问我们是不是听说了，信是写给谁的，撕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吭声，当时还年轻得像只小羊羔的巴纳巴斯讲了一句特别荒唐或是特别鲁莽的话，然后大家便谈起别的事情来，这件事也就没有再提了。”

阿玛莉娅受罚

“可是没过两天，我们就得应接不暇地答复来自四面八方的有关那封信的询问，来的人有朋友，有对头，有熟人，有生人，但都待不长，越是要好的朋友越是急急忙忙说几句话就告辞。拉塞曼平时总是慢条斯理、大模大样的，这一回走进我们家时，那样子像是只想检查一下这房间有多大，只见他眼珠一转，事情看来就都齐了，我们眼看他急急忙忙开跑，父亲马上撂下别人跟在他后面猛追，追到大门口怎么也追不上，只好作罢，这场面真是跟小孩打闹捉迷藏差不多，搅得人心烦意乱；布伦施维克也来通知父亲他不再跟父亲干了，说他想学着独立干，话说得很诚恳，那是个聪明人，很会抓时机；我们的顾客们也都上门来了，他们到父亲的库房里把送来修补的靴子全找了出来，起初父亲还试图劝说他们改变主意——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帮着他说——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一声不响地帮着顾客找鞋，接活登记本里划掉了一行又一行，顾客们存放在我们家的皮料也都退给了人家，欠款——如数付清，没有一点争吵，什么事全办完，人人都满意能这样干净利索地同我

们家断绝关系，即使在了结这些事情时受点损失也不在乎。最后，也是预料中的，泽曼来了，他是消防协会会长。当时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泽曼又高又大，只是稍微有点罗锅，还有点肺病，脸上老是一本正经，压根儿就不会笑，他站在我父亲面前，这人原来很欣赏父亲，两人在谈得热火时他曾经答应过一定帮忙让父亲将来当副会长，现在他的任务是通知父亲协会取消了他的会员资格，并请他交还会员证书。当时正好在我们家的那些人一听说泽曼来了，都停下手里正在做的事，走过来围住了这两个男人。泽曼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一个劲儿拍父亲的肩膀，好像想把那些他应该说而又说不出口的话拍打出来似的。他一边拍一边还不住地笑，大概是想这样来缓和一下他和众人的紧张情绪吧；可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笑，别人也从来没听他笑过，所以这时也就没有一个人把他那种表情和声音当成是笑。但是父亲呢，他从这一天开始就精疲力竭，心灰意懒，完全绝望，再也无法帮谁什么忙了，唉，他那模样，好像他累得连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劲儿都没有。我们几个儿女也同样绝望，不过因为我们还年轻，还不相信我们家怎么能就这样一垮到底，我们总是暗暗希望，在那些挨个儿到我们家来的人中间，哪一阵终于会出来这么个人，他断然下命令停止这一切胡闹，用他的铁腕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让它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傻乎乎地觉得泽曼就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了。所以我们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希望他笑着笑着，末了终究会迸出那句我们盼望已久的钉是钉铆是铆的话来。我们心想，这会儿究竟有什么事情可笑呢？难道不是只可能笑那强加在我们家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吗？会长先生，会长先生，请您倒是快些对这些人说句公道话呀，我们就这样一面想着一面挤到他身边，可是结果呢，这只能使他怪模怪样地扭动身子躲躲闪闪。最后，他到底还是开口说话了，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隐秘的心愿，而是为了对付那不断从人群中发出的喊叫声，这些人一部分在鼓励他快开口，另一部分对他老不开口感到不耐烦，不管怎样，他到底说话了。他开始讲时我们仍然抱着希望。他先是把父亲大大夸奖了一通，说他是协会的光荣，年轻一代人望尘莫及的表率，不可或缺的成员，他的退出简直等于协会失去了顶梁柱，没有了他这样的中坚，协会简直就面临崩溃。这些话说得太好了；要是他就讲到这里为止多好啊！可是他说下去了，他说，现在协会不得不忍痛割爱，决定恳请父亲退出，当然啦，这只是暂时的，不过既然必须这样做，可以看出迫使协会非走这一步不可的情况是多么严重了。也许，要是昨天联欢活动时父亲没有表现出那么卓越的成绩反倒好些，可是，恰恰是这些表现大大引起了官府的关注；这样一来，协会现在正处

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比原先更加注意自己队伍的纯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侮辱信使事件，协会实在是别无选择，而他泽曼呢，也只得硬着头皮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来宣布这项决定。请父亲千万不要再给他完成任务增添困难。泽曼终于鼓足劲说完了这些话，说完之后他是多么轻松啊，因为自信讲得还不错，他甚至不再像先前那样横不是竖不是的了，现在他干脆就指着挂在墙上的协会会员证书，动动手指示意把它取下来。父亲点了点头便走过去取证书，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不能把证书从钩子上摘下来，于是我就站到一把椅子上去帮他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什么都完了，父亲连把证书从相框中取出来的力气都没有，而是把东西整个儿地递给了泽曼。然后，他走到一个角落里坐下去，一动不动，再也不跟谁说一句话，所以就只好由我们几个同来客洽谈各项事务，尽我们的能力，争取做得好一点就是了。”“那么你觉得在这件事上城堡的影响在哪里呢？”K.问，“看来城堡暂时还没有干预吧。这一阵你说来说去不外是讲了些莫名其妙的害怕、对别人出问题的幸灾乐祸情绪、再加上不可靠的友谊，等等，这些并不新鲜，到处都可以碰到，即使从你父亲的角度来看——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也可以说只是件小事，因为，那张证书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过是证明他有某种能力罢了，而他的能力不是还在他身上谁也抢不走吗？如果说这些能力能使他成为不可缺少的人，那就更好，把证书连相框一起递过去也没什么，只有在会长开始宣布那项决定，话还没有说完如果你父亲就把证书扔到他脚底下，才可以说是真正给会长的工作添麻烦了。不过，我觉得你讲的这些有一点特别突出，那就是绝口不提阿玛莉娅，阿玛莉娅是整个灾祸的罪魁祸首，你们在着急，她大概还心安理得地待在哪个角落里袖手旁观吧。”“不，”奥尔嘉说，“谁也不能怪，谁都是身不由己的，这一切全是城堡的影响。”“城堡的影响。”这时刚刚悄然从院子里进来的阿玛莉娅重复着这几个字，父亲和母亲早已在床上躺下了。“这是在讲城堡的故事吧？你们到现在还一直坐在一块儿？你来时不是说马上就要走吗，K.？现在都快十点了。这些事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儿有些人是靠讲这些故事吃饭的，他们也总是像你们两个这样凑到一起神聊这些事，我给你大讲特讲，你给我大吹特吹，可是我看你不像是这种人哪。”“不，”K.说，“我恰恰是这样的人，我对那些自己不关心而只是让别人去操心这些事的人反倒没有多少好印象。”“就算是这样吧，”阿玛莉娅说，“可人跟人的兴趣是很不一样的，我就听说过这么个男人，他是白天黑夜都一个心思惦记着城堡，别的什么事都不管，别人都担心他要变得不识人间烟火了，因为他的整个心思全部都只在上头的城堡里面打转

转。但后来真相大白，原来他并不是关心城堡，而只是念念不忘在那儿的办公厅洗碗刷盘子的一个老妈子的女儿，终于他也真的得到了那个姑娘，于是一切就又恢复正常了。”“我想，我会喜欢这个人的，”K.说。“你会喜欢那个人？”阿玛莉娅说，“这我不信，也许你喜欢他的老婆倒还差不多。好了，我不想打搅你们了，不过我现在要去睡了，我得把灯关掉，这是为了照顾二老；虽说他们是躺下就着，可是睡一个钟头就再也睡不踏实，那时候一丁点儿亮他们都是受不了的。晚安。”不一会儿屋里也真的就变得一片漆黑，阿玛莉娅可能在父母的床近处什么地方打地铺。“她刚才讲的那个年轻男人是谁？”K.问。“我不知道，”奥尔嘉说，“也许是布伦施维克吧，虽然这门亲事跟他不怎么般配。不过兴许会是另一个人。阿玛莉娅的话不怎么好懂，你常常不知道她是在说反话呢还是说正经的。多半是：谈的是正经事细听起来那口气像是说反话。”“别尽琢磨她的话了！”K.说，“你是怎么变得这样什么都受她左右的？是不是那次祸事之前早就这样了，还是那以后才这样？你就从来没有想自己也要有点主见，不要老依赖她？还有，这种凡事都依着她也总得有点正当理由吧，有吗？她是最小的，最小的就该听话才是呀。先不追究谁的责任，反正使全家遭殃的是她嘛。现在她不仅不每天请求你们每个人原谅，反而在众人面前趾高气扬，除了简直有点像施舍那样关心一下父母之外，就什么也不管，像她自己说的，什么都不想过问，如果开一次金口，跟你们说句话，那也多半是一本正经，听起来口气又像反话。要不，是不是像你有时候说的，她是因为长得漂亮才在家里那么霸道？我得说，你们三个长得都很像，但是，她跟你们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完全对她不利的，在我初次见到她时，她那种冰冷呆滞的目光就把我吓跑了。再就是，虽说她是年龄最小的，但从外表上一点看不出来，她属于那种从外貌无法确定年龄的女人，这种女人总不见老，但又很难说什么时候真正年轻过。你是天天见她，久而不闻其味，一点觉不出她脸上的神情是多么冷峻生硬，所以细想起来，我甚至也不能把索尔替尼对她的好感太当真了，说不定他只想用这封信惩治她一下而不是真的想叫她去呢。”“我不想谈索尔替尼了，”奥尔嘉说，“城堡的老爷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不论对方是最漂亮的还是最难看的姑娘。不说这个吧，你对阿玛莉娅的看法完全错了。你瞧，我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让你对阿玛莉娅印象特别好呢！我所以在你面前为阿玛莉娅说话，只不过是替你着想。阿玛莉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造成我们家不幸的根子，这点没有问题，可是就连父亲，你得承认受到这次不幸打击最重的是他吧，他又是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肚子里从来存不住话，尤其在家里更是这

样，可即便是父亲在我们家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也从没说过一句责备阿玛莉娅的话。而这又绝对不是因为他赞成阿玛莉娅的行为，父亲这个很敬佩索尔替尼的人，怎么可能赞同她的做法呢？他是一丝一毫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会干出那样的事来的，他真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所有都奉献给索尔替尼才好！当然不是像现在这种奉献法，现在是已经奉献完了，索尔替尼大概还在那里生气呢。我说大概还在生气，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索尔替尼半点消息；如果说在那件事以前他已经是深居简出了，那么那件事以后他就是无影无踪，好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了似的。〔25〕说到阿玛莉娅，你真应该看看她那段时间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不会再对我们家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惩罚了。就是人人都不再同我们家来往罢了。这里的人也好，城堡的人也好，全都一样。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的人避开我们当然是看得见觉得出的，而城堡方面我们就影子也见不着。可不是吗，以前我们就没有感觉出城堡对我们有过任何关心，现在又怎么可能感觉出什么态度上的突然变化来呢？这种一点动静也没有的滋味是最难受的了。人们回避我们倒还不那么严重，他们并不是因为确实相信我们家有问题才躲避我们，也许他们对我们根本就没有多大意见，那时候，今天他们对我们的这种看不起的态度还一点没有，他们躲开我们纯粹是害怕，躲开了，又在观望着看事情最后怎样了结。当时我们也还不用为衣食犯愁，欠我们钱的也全都还清了，生意上原来商定的价钱就没有让我们吃亏，即使偶尔缺点吃的吧，有几个亲戚暗地里帮我们一把，这事不算难，因为当时正值收获季节，当然我们自己并没有土地，而想帮人家干活吧又哪儿都不欢迎，我们这辈子头一次简直可以说是被判服那种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刑。每人就那么在家里干坐着，七八月大热天关着窗户。什么动静也没有。没有传我们去问话，没有一星半点新消息，没有人来告诉我们点什么，没有人来我们家坐坐，什么也没有。”“那么，”K.说，“既然什么事都没有，也不必担心会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惩罚，那你们究竟还怕什么呢？真是拿你们这些人没办法！”〔26〕“我该怎么给你解释才好啊？”奥尔嘉说，“我们不是害怕将来会有什么事，我们是在受眼皮子底下事情的折磨，我们已经在服刑了。村里的人只不过是等着我们主动上门找他们，等着父亲的铺子重新开张，等着做得一手漂亮服装活的阿玛莉娅——当然她只给最尊贵的人家做活——再来揽活，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家都为对我们做得那么绝情感到内疚。如果村里一户挺有威望的人家突然被完全排除在大伙的交际圈以外，那么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损失吧，村里的人在同我们断绝来往时实际只是在做一件等因奉

此事，我们要要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他们其实也不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听说有个信差手里捧着一堆碎纸片回到了贵宾楼。弗丽达看见他出去，然后又见他回来，她同他说了几句话，接着就把从他那儿听到的立时传开了；但是她也完全不是存心要和我们作对，而只是出于责任感，任何别人处在她的地位都会有这种责任感的。现在再说村里的人吧，我刚才说过，要是这档子事最终能得到皆大欢喜的解决，那就最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假如我们突然到他们家，带去消息说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比如，可以这样说，事情原来就是一场误会，现在已经完全消除；或者也可以告诉他们说，虽然我们做错了一件事，但已经用行动改正了错误；再不还可以说——即使这么说人家也完全可以接受——我们通过城堡里的关系，成功地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人们一定会重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吻我们，拥抱我们，同我们一起热烈欢庆，这种事我已经见到别人家有不止一次了。但是，再退一步说，就连送去这样一条消息也都不必要；假如我们想开了，跟没事一样大胆主动去找别人，恢复从前同众人的联系，只字不提那封信的事，那也就足够了，大家也都会高高兴兴地闭口不谈那件事；因为，人家之所以同我们断绝往来，除了害怕以外，主要的原因就是事情本身令人感到尴尬，人们回避我们，主要是为了不再听到那件事，不必谈到、不必想到、不必以任何方式同那事沾边。弗丽达把这事捅了出去，她这样做不是幸灾乐祸，不是为了说着解气，而是要让自己和所有的人提高警觉，提醒全村人注意：这里出了那么件事，希望大家千万小心别做类似的事。不是说我们这家人怎么怎么样，而只是这件事情不好，谈我们只是对事不对人，是我们全家都卷进这件事中去了嘛。话说回来，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又走到众人面前，只要我们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只要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经把那件事完全甩开（不管是用什么办法），这样大家就会确信，那件事无论在发生的当时掀起过多大的波浪，以后再也不会旧事重提——只要情况是这样，那也就皆大欢喜了。我们会跟从前一样到处遇到人们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即使我们没有把那事忘得一干二净，大家也会理解我们，会帮助我们把它完完全全忘掉。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窝在家里，闭门不出。我真不知道那时我们究竟在等什么，可能是等阿玛莉娅作决定吧，自打那天早上起，她就把家长的大权夺了过去，然后紧紧抓住不再撒手。可她又不安排我们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不下任何命令，不提什么要求，几乎只用一声不吭的方式来主持这个家。当然，我们另外的几个人有许多事要商量，家里从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父亲会突然感到心惊肉

跳，把我叫过去，于是我便在他的床沿上坐到半夜。或者，我们有时蹲在一起，我是说我和巴纳巴斯，他对这档子事前前后后有很多很多地方弄不明白，所以一个劲儿逼着我给他讲这讲那，提的老是同样的问题。他心里清楚，他的同龄人将来都会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岁月，他是不会再有了，我们就这么紧挨着坐着——K，很像我们两人现在这个样子——完全忘记了时间，从晚上到深夜，又从深夜到早晨。母亲是我们当中最经不起打击的，大概因为她不光经受全家共同的苦难，而且还要同家里每个人一起经受那个人特有的苦难吧，就这样，我们吃惊地发现她身上有了许多变化，我们又预感到明天这些变化也会在全家人身上发生。那时她喜欢待的地方是一把长沙发的一角——我们现在早没有这张沙发——现在它摆在布伦施维克的大屋子里，母亲当时就是坐在这沙发的角落里——不知道她究竟在那儿做什么——是打盹呢，还是在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从她嚅动着的嘴唇看似乎是自言自语。事情渐渐发展到了这步田地，就是我们几个人自然而然地不断反复讲那封信，横着讲，竖着讲，讲大家都确有把握的全部细节，也讲谁也说不准的各种可能。我们自然而然地每天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一些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办法，一个高招赛过一个高招，一个主意压倒一个主意，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一天不这样也过不去，可是很不妙，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本想从那个泥潭里爬出来，实际上反而在烂泥中愈陷愈深。但是，这些招数再高又有什么用呢？每一个主意离了阿玛莉娅都行不通，所有的点子说来说去不过是敲敲边鼓罢了，左敲右敲反正都敲不到阿玛莉娅耳朵里，所以这些嘁嘁喳喳就都成了废话，退一步说即使阿玛莉娅听清了，这些敲敲打打也只能撞在她那堵一声不响的墙上。唔，幸亏我现在比那时更了解阿玛莉娅了。她当时承受的压力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大，她居然硬是挺住了，同我们一起一直坚持到今天，实在是不可思议。母亲当时也许承受着我们所有各人的痛苦，她只能承受着，因为苦难就降临到她头上，可她承受这压力的时间并不长；不能说她今天还在承受着这些痛苦，其实就在当时，她脑子也已经有点糊涂了。而阿玛莉娅当时不仅承受着痛苦，同时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穿了这痛苦是怎么来的。我们当时只看到结果，她却看到了根子；我们寄希望于一些小小的解决办法，而她心里很清楚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改变；我们当时可以嘁嘁喳喳悄悄商议，而她只有默不做声一条路，她就是这样面对现实，正视现实，默默忍受着我们这种苦难的生活。当时这样，直到现在仍然还是这样。我们当时虽然也有很多苦处，但是比起她来我们的日子还算好过多了。我们当然得搬出我们住的房子，布伦施维克搬了进去，上头把这个小棚

子分配给我们住。我们用一辆小推车跑了几个来回，把全部家当都搬到这里，巴纳巴斯和我在前面拉，父亲和阿玛莉娅在后面帮着推，母亲呢，一开始我们就把她先送到了这里，让她坐在一个木箱上，每次我们运东西来到时都见她抽抽搭搭地哭。可是我还记得，就连在这几趟很累人的搬家路上——不光累人，也很寒碜，因为我们不止一次碰到运送新收割下来的庄稼的车子，那些跟车的见到我们马上一句话不再说，赶紧就把头扭开去——就连在这搬家的路上，我们，巴纳巴斯和我，也还是撂不下那件事，老是谈我们的种种烦恼和打算，谈着谈着就站住不动，直到父亲“喂，喂”叫我们，才提醒我们又该往前走了。但是不管怎么谈来谈去，说破了嘴皮也还是改变不了我们的苦日子，搬家后和搬家前都一个样，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搬家后我们也逐渐开始尝到穷日子的滋味了。亲戚们停止了资助，我们的钱快用光，而恰好在这段时间里人家又逐渐开始看不起我们，这就是你也看见的情形。人们发觉我们老是在撕信事件上想不开，庸人自扰，不能自拔，就对我们全都没好气。尽管人家对我们遭遇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并没有低估命运对我们的沉重打击，而且人家也知道如果自己碰上同样的事未必能比我们家更好地经受住命运的考验。但是，越是这样就越觉得有必要同我们完全绝交。如果我们自己摆脱了这件事的阴影，人家就会非常敬佩我们，但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点，人家就往前进了一步，把原先只是暂时对我们采取的态度变成永久性的了：终于把我们排除在每一个社交圈子外面。现在谈起我们来时，就好像我们不是人，完全不提我们的姓名；在不得不提名道姓地谈到我们时，也只说巴纳巴斯那一家。因为他是我们全家最无辜的，连我们住的这个小窝棚也声名狼藉，如果你回想一下，就会记起第一次上这儿来时你也感到人家看不起我们不无道理。稍后一些，偶尔又有人来我们家了，但是一来就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撇嘴摇头，譬如说看着那盏小油灯挂在桌子上方不顺眼。不挂在桌子上方，让我们挂在哪儿好呢？可人家就是觉得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油灯挂到别处去，同样一点不解决问题，人家看着会照样碍眼、讨厌。总之，凡是跟我们沾点边，不管我们怎么着，人家都一概看不起。”

四处求情

“在那段时间里，后来我们又干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件糟得不能再糟的事，我们让人瞧不起，原本还有点冤枉，可是一做出这种事，恐怕人家瞧不起我们就理所应当了：我们甩开了阿玛莉娅，挣脱了她那无声的命令的束缚，我们感到没法再那样生活下去，那种没有丝毫希望的日

子，我们确实过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各显其能，各人按自己想出的办法去行动，去向城堡提出请求或者苦苦哀求，求上头宽恕我们。虽然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弥补我们的过失，我们也知道，由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同城堡之间唯一有希望能对我们有帮助的联系，即通过索尔替尼，通过这个对父亲印象还不坏的城堡官员同城堡沟通，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但是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不顾一切地行动起来，父亲首先带头，左一趟右一趟地去找村长，找各位秘书、各位律师、各位书记求情，可全是白跑，十次有九次人家不见他。即使他靠耍个小花招或者运气好碰巧见到人家的面——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真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也是被人家三言两语打发走，以后就再也不见他了。另外回答他的话也确实非常容易，城堡办什么事都是那么轻而易举！他到底求人做什么呢？谁把他怎么样了？他想请人家宽恕、原谅什么？城堡里究竟在什么时候、有谁对他哪怕只是动过一个小手指头？当然，他穷了，没有主顾了，等等，等等，可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是手工工匠的事，是市场的事，要城堡大大小小事无巨细一概都管，可能吗？当然实际上城堡也无事不管，但它不能简单粗暴地干预事物的发展，决不能仅仅为了个别人的利益而草率行事吧。难道要求城堡派出许多官员跟在父亲的顾客屁股后面跑，使劲追上他们，强迫他们回到父亲那里去？父亲反驳说，但是——所有这些事我们都是大家一起事先在家仔细商量，事后又挤在一个角落里唠叨，好像躲着阿玛莉娅似的。阿玛莉娅虽然把一切全看在眼里，但她总是一声不响，不管我们——父亲反驳我们说，但是他现在并不是跑去向人家哭穷呀，所有在这里失去的东西，他是能够很容易重新得到的，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只要得到宽恕、原谅，别的就什么都好办了。‘你究竟要别人原谅你什么？’这就是他从人家嘴里得到的回答。接着人家又说，到目前为止，官府并没有接到告发，至少在案卷里没有这项记录，再退一步，至少在律师们有权看到的案卷里没有这项记录。所以，在目前可能查明的范围内，既没有什么人告发过他，也没有人在作这方面的打算。他举得出有哪一条针对他的恶行颁发的官府命令吗？父亲自然是举不出来。于是人家又说，或者有哪一個官府部门干预过这事？父亲对这方面又是一无所知。那么好了，既然他什么都不知道，既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么他到底要什么？究竟让人家原谅他哪一点呢？充其量也许可以请求人家原谅他现在对官府各部门进行无端骚扰吧，然而这种行为恰恰是不可原谅的呀。父亲仍不罢休，那时他身体还很有劲，而且，既然把无事可干的日子硬加在他头上，他也有的是时间。‘我要替阿玛莉娅把名誉争回来，你们等着瞧吧，不需要

多久了。’他有几次白天对我和巴纳巴斯说，但是声音很轻，为了不让阿玛莉娅听见。不过这话到底还是说给阿玛莉娅听的，因为实际上父亲根本没有想到争回名誉，而只是想着请求宽恕。但是，为了求得宽恕，他得先弄清自己犯了什么过错，可官府各部又都否定了这个说法。这样一来他便生出一个古怪念头，深陷进去不能自拔——这说明他当时精神状态已经相当虚弱——这就是，他总觉着别人是在瞒着他，不告诉他有什么过失，而原因又是他打点得不够，原来，他一直只上缴明文规定的各种款项，这笔费用，至少从我们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来看，已经是够高的了。但是现在父亲觉得他必须再多交些钱，他这个想法肯定不对头，因为我们的官府虽然为了办事简便避免不必要的口舌也收受一点贿赂，可是行贿的人是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的。毫无办法，既然这是父亲的愿望，我们也就不忍心阻拦他。我们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家私——差不多尽是些生活必需品——好让父亲有足够的钱去摸清情况，这样，我们便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每天早晨可以自我安慰一下，因为父亲早上动身出门时，口袋里至少总有那么几块硬币叮当响着。我们呢，当然就得挨一天饿，而靠变卖东西弄钱给父亲得到的唯一实惠，就是父亲能维持总觉得还有希望那样一种乐观的心境。但是这一点也很难说是好事。你看，这样一来他成天东跑西颠疲于奔命折磨自己，而没有钱倒干脆些，该是什么结果很快见个分晓心里也就踏实了；有点钱呢，事情反而拖泥带水，没完没了，短痛成了长痛。官府既然不可能因为父亲多给了钱而在事实上给他一些额外的特殊优待，有时候某位书记员便试着至少做做样子，为父亲做点什么，譬如答应他说将要作进一步的调查，暗示他已经发现某些迹象，官府将跟踪查询，说这并不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纯粹只为了照顾父亲的愿望。父亲听了这些不是更加起疑，而是越来越信了。他把这种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敷衍搪塞的空头支票带回家来，高兴得就像把福星请进了家门似的。每逢这样的時候他总是站在阿玛莉娅背后，咧着嘴笑，笑得比哭还难看，瞪大眼睛朝阿玛莉娅努努嘴，悄悄暗示我们，阿玛莉娅得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对这事她自己会比谁都更感到意外惊喜的。不过嘛，现在还一点不能泄露，我们得严守秘密——每次我们看到他这个样子真是痛心极了。要不是我们到最后完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也不能给父亲弄到一点钱，那么这种让人心碎的日子肯定还会继续很久很久。在那些日子里，虽然经过我们多次请求，巴纳巴斯被布伦施维克收为助手，不过只能是晚上摸黑去取活，做完后又摸黑去送活——必须承认布伦施维克收巴纳巴斯当助手是为了我们而承担一定的风险。他的生意可能因此受影响，可是他付给巴纳巴斯的工钱也非常

少，而巴纳巴斯干的活是无可挑剔的——话说回来，虽然巴纳巴斯被收为布伦施维克的助手，但是他的工钱只够我们家勉强维持生活，让我们饿不死罢了。为了不伤父亲的心，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才向他宣布我们不得不停止给他资助，可他听了之后情绪却非常平静。这是因为，尽管他已经不再能从理智上看清自己那些辛苦奔波是毫无希望的，但那接二连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也确实弄得他太疲倦了。

虽然他说——他的口齿不像以前那样清楚了，而原来他说话口齿是最清晰不过的——其实他只再要一点点钱就够了，明天，甚至今天，兴许他就可以把什么全打听明白，而现在是前功尽弃了，没别的，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缺那么点钱，等等，但说话的语气表明，他实际上也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话。可不是嘛，他马不停蹄，立刻又想出了新的计划付诸实行。由于没能查清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也就无法进一步通过官方途径达到请求宽恕的目的，于是他最终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到处去求情上，私下里到处去找当官的求情。当官的肯定也有一些好心眼的、有同情心的人，虽然不许在办理公务时表现心软，但在公务以外，只要在合适的时机趁他们没有思想准备时突然去找他们，那么他们也是完全有可能一下子发善心的。”

这时，一直在聚精会神听她讲述的K.插问道：“那么你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了？”尽管他知道奥尔嘉讲下去对他这个问题必定会有答案，但还是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先知道这一点。

“不错，我是这样想，”奥尔嘉说，“什么同情啦，怜悯啦，这类事情是根本不会有的，不论我们多么年轻，多么没有经验，可这一点还是知道的，父亲当然也知道，但是他把这给忘了，什么事他差不多全忘光了。他想好了一个计划，就是到城堡附近大路上官员们乘车总要经过的地方去站着，一有机会赶紧抓住，向当官的提出希望得到原谅的请求。说句良心话，这个想法真是太荒唐了，即使太阳从西边出来，他的请求真的传到某个当官的耳朵里了，这个想法也还是非常荒唐。难道个别官员能对他表示原谅？充其量恐怕只能是整个官府作这种表示吧，但就连整个官府大概也不能对他表示什么原谅，而只能依法作出裁决。可是即使一个当官的愿意屈尊下车过问这事，他又怎么可能在听了父亲这个可怜巴巴、有气无力的糟老头子对他咕咕哝哝说几句话后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弄清楚？当官的都很有学问，但是每个官员也只是精一行，如果涉及的是本行，一个官员听到老百姓说一句话马上就可以猜透他的一大串

思想，可要是隔行呢，老百姓可以跟他解释上几个钟头，他也许会客客气气地点头，却一句也听不懂。这是很自然的，谁要是不明白，只消好好想一下那些与自己有关的细小的公事，那些芝麻大的琐碎公事就行了。想一想，当官的只用耸耸肩膀的工夫就把问题解决掉，而他自己如果想去从根本上弄清楚这些琐碎的、芝麻大的公事，那么这辈子就什么的也别再做，即使赔上这么多工夫，末了也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退一步说，即使父亲走运，恰好碰上一个主管这件事务的官员，那么这位官员在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案卷不在身边的情况下，也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尤其是不能在大马路上解决。没法子，他还是不能表示什么原谅，而只能照章办事，为此又只能指示父亲去走公事公办那条路，而想靠走这条路捞到点什么，父亲不已经是一败涂地了吗？唉，你看，父亲居然认真地想用这一手，用这个新招去找到突破口，这说明他的精神状态惨到什么地步了！假如这样干有一丝一毫成功的希望，大路上请愿告状的岂不是要挤破了头？而事实上呢，这事连初小学生都懂得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那里的路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也许就连这一点也让父亲又添了一分希望吧，他是不管抓到什么都赶紧拿来为自己打气了。父亲也不能不这样做；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根本用不着像他那样盘算来盘算去钻牛角尖，必定能从明摆着的一些现象上就看出事情根本不可能。再说每次官员们乘车到村里来或是回城堡去可都不是游览观光兜风消遣，而是村里和城堡里有事等着他们去做，所以他们的车子总是跑得飞快。另外他们也是决不会心血来潮，有什么雅兴看看车窗外，更不会去找有没有人等着要递上申请书什么的，车上满满当当装载着各种文件，官员们一路都在用心研究呢。”

“可是我却见过，”K说，“可我见过一个官员的雪橇里是什么样子，那里并没有什么文件。”奥尔嘉的叙述，无异在K眼前展现了一个十分巨大的、几乎不可信的世界，结果是他简直憋不住想用自己的一桩桩细小的经历去碰一碰它，以便自己能真正相信这个世界的确存在着，他自己这个人也的确存在着。

“这是可能的，”奥尔嘉说，“可是这种情形就更糟，就是说，它说明那个官员需要处理的事务非常重要，所以有关文件太贵重或者太多，不可能随车携带，这样的官员就总是让车夫使劲催马飞奔。总而言之，谁都腾不出一点多余的时间来听父亲讲他那一套。还有呢：从大路通往城堡的车道有好多条，有一阵子，某一条车道很走俏，大多数官员都走那条路，过一阵，换了另一条了，大家又一窝蜂地挤到那边去。这种流行

色的变化有什么规律现在还没有人琢磨出来。譬如早晨8点钟时，所有的车都在第二条车道上，10分钟后都跑到第三条车道上去了，半小时后也许又在第一条上，然后就整天都在那条路上跑，但每秒钟又都可能有变化。虽然所有车道都在这村子附近汇合，可是到汇合处时所有的车子都已经跑得跟飞似的，而到离城堡不远处时速度倒还稍稍慢下来一点。正如车子经过哪条车道驶出城堡没有规律那样，车子究竟有多少也是谁都说不清的，经常是连续好几天一辆车都见不着，可是接下去就出现大批车子。现在你想想看，我们的父亲面对的就是这么多让人头疼的难处。他每天早晨穿上他最好的那套衣服——过不了多久这套衣服就成了他唯一的一套了——带着我们大家的祝福走出家门。一枚很小的消防队徽章，那是他本不应该留给自己的，他也装在身上，到了村外再把它佩戴起来。在村里，虽然这枚徽章小到别人离他两步远就几乎看不见，他也害怕人家发现他戴着，可是就连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父亲竟然也认为用来吸引乘车路过的官员注意他挺合适！离城堡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贩种的菜园，这园子的主人是一个叫做贝尔图赫的商贩，专门供应城堡蔬菜，父亲就在他那园子铁栅栏的石头基座上挑个地方坐下来。贝尔图赫也允许他坐那儿，因为这人以前是父亲的朋友，也是他的一个最忠实的老主顾，这又是因为这人的一只脚稍微有点畸形，他觉得只有父亲能替他做一双合脚的靴子。于是，父亲便天天在那里坐着，那是一个阴沉沉的、雨水很多的秋天，可是天气他一点不在乎；每天早上他总是在固定的钟点把手放在门把上，向我们示意他要走了，而到晚上回来时——看上去他一天比一天更躬腰驼背了——总是全身湿透，一头躺倒在墙犄角就不能动弹了。最初几天他还给我们讲讲他碰上的一些小事，比如贝尔图赫怎样同情他，怎样讲老朋友交情，从栏杆上给他扔过来一条毯子，或者，讲他隐约觉着在一辆路过的马车中认出了某位官员，再不，就是说又有哪几个马车夫认出他来，还跟他开玩笑，用马鞭轻轻地在他身上蹭了一下。后来他就不讲这些了，显然他已经不抱希望能在那里使自己的事情哪怕只得到一点点进展，而只是把每天去那儿待一天当成一种义务，当作一种打发日子的手段。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得了风湿病，冬天快到了，雪也来得很早，我们这里冬天是说来就来的；唔，就这样，在那个地方他有时坐在满是雨水的、湿漉漉的石头上面，有时又坐在雪地里。到夜里他浑身疼痛，唉声叹气，第二天早晨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再去，可是经过一阵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走了。母亲老是死死拽住他不放他走；而父亲呢，大概是想到他那双已经不那么听使唤的腿脚有点心虚吧，也就答应让她跟着自己一块儿去，这样一

来母亲也得了风湿病。我们经常到他们待的地方去，有时是送吃的，有时只是去看看他们或者想劝他们回家。唉，我们有多少次看到两位老人背靠背地瘫在那块巴掌大的石头基座上，缩成一团，披着一块不能将两人完全裹严实的薄薄的毯子，包围着他们的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雪花和雾气，方圆几里内几天不见一个人影和一辆马车，哎呀，真是太惨了，K，真是太惨了！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过去，直到一天早上父亲怎么也没法把他那双僵硬的腿从被子里伸出来，情况很糟，一点办法没有，父亲那天还有点发烧说胡话，他说他好像看见恰好是现在有一辆马车在半山坡上贝尔图赫家门前停住了，一位官员正从车里走出来，眼睛顺着栅栏看，到处找他，瞧，那不是他这会儿不住地摇着头，气呼呼地又回车里去了吗！说到这里从父亲嘴里突然迸出一阵撕肝裂胆的大叫，听起来好像他人躺在这里就想让上头那位官员听见他看见他，而且他要向那个当官的解释：他这会儿所以不在那里，完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结果呢，这一不去就不是三五天，而是成了很久很久，从此他再也回不到那儿去了，好多个星期一直起不了床。阿玛莉娅虽然伺候他，给他换洗，给他治病，什么全是她干，除了中间休息过几次，她实际上就这样一直干到今天。她会用各种镇痛的草药，精神非常好，几乎不睡觉，她从不胆怯，天不怕地不怕，从不会不耐烦，照顾父母的活她一人全包了下来；在我们谁也帮不上忙只是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她又能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保持冷静沉着。但是，后来当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父亲已经可以由人一左一右扶着小心翼翼地慢慢蹭下床来时，阿玛莉娅立刻就撒手不管，把父亲完全交给我们了。”

奥尔嘉的计划

“现在的问题是，得给父亲再找一个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做，要有那么一件事，至少可以使父亲觉得他做起来是在为洗刷我们家的罪名尽一点力才好。找到这样一件事情给他做其实不算困难，能起到像在贝尔图赫的菜园子前面坐着那种作用的事，实际上到处都有，但我却找到了一件甚至给了我一点希望的事让他去做。事情是这样的：不论去哪儿，在官府衙门里还是在秘书们当中还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只要一谈起我们家的过错，一概都是只提侮辱索尔替尼的信差那件事，谁也不敢再接着追问下去。所以我就琢磨，既然大家都只知道侮辱信差一事，即使只是装装样子，那么，如果可以做到去给信差道个歉，说几句好话，哪怕也是做做样子，不也就行了吗，不也就可以弥补我们的过失了吗？不是说官府还没有收到举报告发信吗？也就是说，还没有哪一级官府正准备受理

这桩事情，所以那个信差完全有自由针对只牵涉他个人的这件事对我们表示原谅，更多的问题也就没有了。虽说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也不可能再带来什么别的结果，但是总可以使父亲高兴高兴，这样做，也许能使那许许多多官府办事人员稍稍感到一点难为情，也就能使父亲多少感到一些宽慰了吧，那伙人用他们那些一点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回答，把父亲也折磨得够呛了。当然，首先得找到那个信差。当我把这个打算告诉父亲时，他先是很生气，这段时间他的脾气变得非常倔，原因一方面是他以为——这种想法是他生病期间产生的——我们总是在他快要大功告成时给他来一手，使他前功尽弃：起先是撤了给他的资助，现在又硬要让他躺在床上不许他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脑子已经迟钝得完全无法领会别人的意思了。我还没有把我的打算讲完，他就气呼呼地把它给毙了；照他的意见，他得继续每天去贝尔图赫的花园等着，并且，因为他肯定不能再像原先那样每天走路爬坡了，我们就必须用手推车推着他到那里去。但是，不管他多倔我还是苦口婆心地劝他，渐渐地他也就勉强同意了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他心里还老有个疙瘩，那就是办这件事他完全得依赖我，因为只有我见过那个信差，他不认识那人。不过，所有的仆人外貌都很像，就是我，也不敢打保票准能再认出那个信差来。主意已定，我们就开始到贵宾楼去，在那里的好些仆人当中寻找。虽然那信差是索尔替尼的一个仆人，而索尔替尼不再到村子里来了，但是老爷们是经常互换仆人的，所以很有可能在另一位老爷的仆人中找到他，如果找不到，那么也许总可以从别的仆人那里打听到他的一点消息吧。不过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每天晚上到贵宾楼去，而我们是到处遭白眼的，在这个地方就更不用说了，以酒客身份出现，在那儿花钱吃喝我们又做不到。但是事实说明我们去那里确实还是有点用处。你很清楚，弗丽达是非常头疼那帮仆人的，不过总的说来那伙人多半是安分守己规规矩矩的，因为不干什么重活，把他们都给惯坏了，做事很不利索。官员们中间常说的一句相互祝愿的口头禅就叫‘祝你活得像个跟班的’。事实上，说到过舒心适意的日子，听说那些跟班的仆人才真正是城堡里的老爷呢。他们自己也知道并且很珍惜这一点，所以当他们在城堡里，就是在有法律、规章约束他们行动的地方时，就表现得又斯文又正经——这我听好多人说过——到村里来的仆人中也能见到个别有这种表现，但只是极个别的。此外那些仆人就因为在这里城堡的法规不完全能管束他们而好像完全变了样，他们成了一群粗野的、简直要造反的暴徒，根本不管什么法律，只知道在他们那永远满足不了的欲望支配下任意胡来。他们无耻到了极点，对我们村来

说，幸亏他们只有得到命令才准离开贵宾楼，但在贵宾楼里呢，我们就必须设法对付这伙人了，弗丽达觉得这事非常难办，所以，能用上我、让我帮着同那些仆人周旋，是她求之不得的事，两年多来我最少每星期两次整夜同那些仆人一起待在马厩里。早些时候，当父亲还能同我一起去贵宾楼时，他就在酒吧里随便找个地方睡觉，等着我也许清早就能告诉他好消息。每次都没有多少新鲜事好讲。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信差，听说他一直还在给索尔替尼当差，索尔替尼很满意他，在索尔替尼辞去原职被调到比较远的办公厅去时，听说他也跟去了。在贵宾楼遇到的那些仆人也多半同我们一样很久没有见到他，即使有个别人硬说前一阵还见过他，那也大概是记错了。这么说，我的计划应该说是落空了吧，但实际上又不完全是这样。不错，我们是没找到那个信差，而且父亲跟着上贵宾楼，一路往返很劳累，在那里又睡不好，也许还要加上一条：在他精神稍好时，还要为我受苦跟着一起痛苦，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把父亲完全拖垮了，到现在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你现在看见的这副模样。唔，说起来可能比母亲还强一点，我们心里都明白，母亲每天都可能走到人生的尽头，所以能拖到今天，全仗阿玛莉娅花大力气精心护理。话说回来，不错，我们虽然没有找到人，又添上那么些倒霉事，但是我在贵宾楼还是有点收获的，那就是跟城堡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如果我现在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点不后悔，你可别看不起我。也许你会想，天晓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同城堡的联系哟。你想得对，那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联系。虽然说我现在已经认识许多仆人，认识所有近几年到村里来过的老爷们的仆人，万一哪天我去城堡，在那里我就不是生人了。当然我只是在村里认识这些仆人，在城堡里他们就完全两样，很可能见谁都不认得，特别是一个只在村里同他们打过几次交道的人，他们就更不认识你是老几了，尽管在马厩里他们上百次赌咒发誓，说要是将来在城堡里能再见面他们很高兴，那也完全白搭。其实那伙人说这样的话等于没说，对这点我已经有亲身体会了。但是，最重要的根本不是这个。重要的是通过这伙仆人我不仅同城堡有了联系，而且兴许还会出现一种情况——但愿如此——就是有人从上面观察我，观察我的表现——管好这么大一支仆人队伍，当然是官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劳神费事的工作——而经过观察，这个人也许就会对我的看法不那么苛刻，他兴许会看出，虽然我努力的方式很成问题，但我怎么说也是在为自己的家争取应有的待遇，是在继续做父亲努力想做到的事呀。如果能这样看，人家也许就会原谅我收那些仆人的钱拿来补助我们的家用了吧。除此以外，我还有别的收获呢，可是你也

把它看成是我的过错了。什么收获？就是我从仆人们那里知道了一些是怎样通过别的路子，不经过那种一拖就是好几年的、难得要命的正式申请就能到城堡去工作的办法，这样做尽管还不是正式受雇，而只是一个人家睁只眼闭只眼悄悄接受下来的准雇员，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没义务更糟，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各种事情都能在近处看到，就能较方便地抓住和利用一些有利机会，尽管不是雇员，却偶尔也可能有事可做。一个雇员恰好不在，听见呼叫就赶紧跑过去，这样，一秒钟前还不是很的，这时一下子就是了，就是说成了雇员了。但究竟什么时候有这种机会呢？有时候说来就来，你人才到，还没有来得及东张西望，机会就到了你身边，任何新来的人碰到这种情形都不会那么当机立断立即抓住它，可是如果放过去再等下一次机会呢，兴许又比通过正式申请的途径要多等好几年，而且，正式申请被录用，对于这样一个人家睁眼闭眼暗中接受的准雇员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就是说，人家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可是人家又不告诉你正式录用的程序中挑选得非常严格，一个出身于名声上有点小问题的家庭的人，是一上来就要给刷下去的。结果呢，譬如说一个出身于这类家庭的人不知底里，提出了申请，他愿意接受这种严格的审查程序，于是就得战战兢兢，好几年悬着心，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从他申请的头一天起，谁都惊异地问他怎么竟冒冒失失地做这种毫无指望的事，可是他本人仍然抱着希望，不然他怎么活下去啊。但是，好多年以后，也许他都已经成了一个糟老头儿了，才得到不予录用的通知，才知道一切都完了，这辈子算是白过了。当然，这里也有例外，正因为有例外，人才那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跃跃欲试啊。有过恰恰是一些名声不好的人被录用的事，有那么一些官员，他们简直憋不住，明知不合适也想闻闻这类野味，在录用考核时，他们伸长脖子东闻闻，西闻闻，又是咧嘴，又是翻白眼，一个这样的候选人看来简直能招得他们流三尺长的涎水，为了顶住这种强烈难挨的欲望，他们往往不得不随时拿出法律条文来作根据。不过这样一来有时就不能使那个人得到录用，而只是使录用程序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拖到最后根本没有任何结果，在那人死后不了了之。所以说，按法定程序也好，走别的路子也好，总之，想得到录用，这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困难，有明的也有暗的，谁如果想走这一步，最好事先多掂量掂量。那么我们呢，我们，巴纳巴斯和我，在这上头也没少伤过脑筋。我每次从贵宾楼回来，就同他坐到一起，把听来的最新消息告诉他，然后我们一起来回琢磨好几天，弄得巴纳巴斯把自己手头的活也耽误了。我这样做，可能就是犯了你指的那种错误了。因为我明明知道那伙仆人的话不大可靠啊。我知道他们

从来就没有心思给我讲城堡的事，他们一讲起来就总是扯到别的话题上去，说每句正经话都得我求爷爷告奶奶才开金口，而要是哪一阵他们说顺口了，就絮絮叨叨胡侃一气，自吹自擂，你说得离奇，我讲的比你更玄乎，结果呢，在他们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在黑洞洞的马厩里大吼乱嚷出来的大堆废话里，最多也许只有那么一两句隐隐约约露出一星半点真实情况。但是我把听到的看见的一股脑儿全灌给巴纳巴斯，他呢，一来还一点没有能力分辨真假，二来因为我们家的困难处境简直就是如饥似渴地想听这类东西，于是就把所有这些大口大口地全都吃了进去，又瞪大眼睛急着想听新的。说实在的，我的新计划也只能全仗巴纳巴斯。想从那帮仆人那里得到什么收获是毫无指望的了。索尔替尼的信差怎么也找不着，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到，他和他的信差好像越来越少露面、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人们常常忘记了他们的长相和名字，我常常需要向人描述老半天，人家才能勉强记起一点，而除了这点模糊的印象之外，别的就什么也说不出来。说到我同那帮仆人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么人家说我什么我当然都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别人如实了解我在那里做的，希望我做的能抵消一点我们家的过错，但是有没有效果我一点也看不到。不过我还是坚持做下去，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以在城堡里为我们家争取到点什么。可是我发现巴纳巴斯倒是有这种可能的。如果仔细揣摩一下那帮仆人讲的那许多话（只要有兴趣动这个脑子就行，而我很乐意揣摩这些话），就能悟出一点道理，那就是：谁如果被录用为城堡工作，他就能替自己家办很多很多事情。当然，他们那些云山雾罩的话里究竟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呢？这是没法弄明白的，清楚的只有一条，就是可信的东西太少太少。难道不是吗？比如说吧，有一个我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第二次、万一见到兴许也认不出来的仆人，向我郑重其事地保证要帮助我弟弟在城堡里谋一个差事，谋不到的话至少在万一巴纳巴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来到城堡时也能帮帮他的忙，比如说给他点饮料提提神也好——据那些仆人说有这样的事，就是求职的人因为等候的时间太长太长，重的晕倒在地上，轻的也昏头昏脑不辨东南西北，要没有朋友当场关照一下就完了——这个仆人对我讲这些还有许多别的，把这些话当成对求职人发出的警告，要他们千万三思而后行大概还可以，但其中那些保证和诺言就完全是空话了。巴纳巴斯却不这么想，我虽然警告他，叫他别相信那些诺言，但是我把这些诺言刚刚说出来，他一听到就高兴得马上表示支持我的计划。我自己加进去的话对他倒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他起了主要作用的，还是仆人们讲的那些。这样一来，我实际上差不多完全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同父亲母亲谈得拢的只

有阿玛莉娅，别人谁都不行。我越是用我自己的办法去努力实现父亲原来的计划，阿玛莉娅在我面前就越是少言寡语，当着你或别人的面她跟我讲话，可单是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就无话可说了。贵宾楼的那些仆人把我当成他们的玩物，发起狠来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这两年中我没有跟他们中哪一个人说过一句贴心话，他们讲来讲去尽是些不怀好意、胡诌瞎编、荒唐透顶的话。这样我就只剩下巴纳巴斯一个人可以说话了，但是巴纳巴斯又太年轻。对他讲那些事情时，当我看到他眼里兴奋得闪光——这种兴奋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一直保持下来——时，我吓得心直跳，可我并没有停下不讲，因为我心里没底，怕不把知道的全说出来会影响我们全家的大事。当然，父亲那些虽然空泛但却很庞大的计划我是没有的，我没有男人那种果断，我想做的不过是对侮辱信差那件事作一点补偿，甚至还希望人家能充分肯定我这点微薄的努力，给我记上一功呢。但自己一个人做不到的，我现在就想通过巴纳巴斯采取别的稳妥办法去实现。我们是侮辱了一个信差，等于把他从第一线的办公厅挤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不就是把巴纳巴斯送去当新的信差，让巴纳巴斯顶替那个受了侮辱的信差吗？这样一来那个信差不就能安心地待在二线、三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他觉得需要多久才能忘掉那次受辱的事就待多久？当然我知道，尽管这个计划乍一看要求不高，可实际上还是有点狂妄，它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在给官府指手划脚规定如何处理人事问题，或者似乎我们怀疑官府有能力自己定出最佳处理方案，怀疑人家官府甚至在我们想都还没想到这里也许可以安插一个人之前早就把一切都妥善处理完了。虽然我很清楚这些，但我接着又想，官府还是不可能这样误解我吧，或者即使误解那也不是不明白我的意思而是故意曲解，要是那样的话，不是根本就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凡是我做的一切，不是一开始就要受到谴责了吗？这样一想，我也就没有停止努力争取让巴纳巴斯去那里工作，而巴纳巴斯自己的野心在这件事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段准备时间里巴纳巴斯变得非常骄傲，觉得鞋匠活太脏，不适合他这个未来的城堡办公厅工作人员做；是的，他骄傲得甚至在阿玛莉娅难得跟他说上一句话时也敢同她顶嘴，而且是硬顶。我不数落他，心想就让他在家里跋扈几天吧，不难预料，等他到城堡去时，第一天他的欢喜、他的傲气就会一扫而光的。这以后，我跟你讲过的那种准雇员的日子就开始了。使人惊奇的是巴纳巴斯居然第一次就找对了城堡，更正确些说是找对了办公厅走了进去，这个办公厅可以说从此就成了他的工作室。这么大的成功，当时真使我都快高兴疯了，当那天晚上巴纳巴斯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我时，我

立刻跑到阿玛莉娅面前，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到一个角落里发狂地吻了个够，弄得她又是吃惊又是疼，哭了起来。当时我太激动，什么话都说不出，另外我们也好长时间没有交谈过了，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就想，过几天再好好跟她说说吧。可是几天以后当然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个成功来得很快，可是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再没有什么进展。巴纳巴斯就这样整整两年时间过着那种单调的、憋气的日子。我认识的那伙仆人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写过一封短信让巴纳巴斯带上，请他们关照关照他，信里我还提到他们曾经答应过愿意帮忙的话，巴纳巴斯呢，他每次见到一个仆人都把信拿出来举着给人家看。虽然他有时也恐怕是碰上了一些不认识我的仆人，并且就是碰上我的熟人，他那愣头愣脑捧着信一声不吭的傻相——他在上头是不敢开口的——也挺气人的，但是，整整两年时间，谁都不帮他，这不太丢脸了吗？所以，有一次，一个说不定已经好几次被他拿这封信杵到鼻子跟前纠缠烦了的仆人，一把将信夺过去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这下子真是把巴纳巴斯给解救了，当然，老实说这种解救法靠我们自己本来也是早就可以办到的。当巴纳巴斯告诉我这事时，我心想，那人简直可以在扔信时说上一句：‘你们不也差不多是像这样对待来信的吗！’但是，尽管整整两年我们的努力毫无进展，可这段时间对巴纳巴斯还是起了好作用，那就是——如果这也可以算是好事的话——他少年老成了，早一点成了一个男子汉；唔，他不仅老成，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得比一般成年男人更严肃沉闷、更深通世故。看着他那人小心老的样子，跟两年前还是个毛手毛脚的孩子的他一比，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他是个大人了，可是我却一点感觉不出他作为男子汉也许能给我的那种安慰和安全感。没有我他恐怕很难进得了城堡，可自从他到了那里以后，就完全自作主张了。我是他唯一可以说贴心话的人，但他心中的烦恼肯定只对我讲了一小部分。他告诉了我许多城堡里的见闻，但是仅仅从他讲的那些事、那些琐碎的小事中怎么也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东西就能使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尤其弄不懂的是，为什么他作为一个男子汉在上头竟然会把他做男孩时曾经使全家人非常头疼的那种勇气和冲劲丢了个精光呢？当然，这种一天又一天的白白站着干等，天天这样，月月这样，没有丝毫指望会发生变化，这是能把一个人所有的棱角都磨平的，是会让人得疑心病，最后甚至使人除了成天杵在那里傻等白等以外就什么别的事也不会干的。但是为什么他早些时候也不反抗呢？特别是当他很快就认识到我说得有理，就是如果抱着野心、抱着过多的奢望，在那个地方是什么也捞不着的，想改善一下我们家的境况嘛倒还可以？原来，在那里人人都

是兢兢业业、诚惶诚恐地——除了管事们情绪有些多变以外——工作，人的野心和奢望全都这样的在工作中寻求满足，而由于工作本身需耗费大部分精力，人就渐渐忘记了自己以至最后完全融化在工作中了，在那个地方，一个人少年时代的愿望是没有实现的余地的。另一方面呢，巴纳巴斯告诉我，他觉得倒也看清了一件事，就是：连那批相当成问题的官员——只许巴纳巴斯去到这些官员的房间——的权力也大得很，知道的事也多得很。他看见他们口授指示和命令时眯起眼，急促地打着手势，说话飞快，看见他们只需动一个指头，半句话不说就把哭丧着脸的管事打发走，一旦被打发走，这些人便喘着粗气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还看见，当这些官员在他们面前摊开的书中发现一句什么重要的话时，就在那上面猛击一拳，算是拍案叫绝，然后别的人便争先恐后地一下子全跑过来，把那条很窄的通道挤了个水泄不通，伸长脖子探头张望。就是这些，再加上一些类似的别的事，使巴纳巴斯崇拜起这些人物来了，他得到了一个印象，就是：如果他能做到让他们发现他在这里，如果他能跟他们攀谈几句——不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而是以办公厅同事的身份，当然，是下级同事——那么，也许就能为我们家办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可是他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碰上这种机遇，要说积极行动起来，自己主动去争取让人家注意自己吧，巴纳巴斯又没有这个胆量，尽管他清楚地知道，由于全家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他现在是年纪轻轻就已经肩负起一家之长的重任了。唔，行了吧，现在再向你交最后一点底：一个星期前你来了，我在贵宾楼听见有人谈起这事，但没有怎么在意。什么，来了个土地测量员？这名词儿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可是第二天晚上巴纳巴斯回家——平常我总是在他快要到家时出去迎他——比平时早，他见阿玛莉娅在屋里，就把我拉到外面大路上，一头扎在我肩膀上就哭了足足好几分钟。这时候，他又跟几年前那个小男孩一模一样了。他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他没法对付的事。听他那口气，好像是在他面前突然冒出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个新世界带来的各种幸福与苦恼是他承受不了的。但是实际上呢，发生的事仅仅是他拿到了一封让他送交给你的信罢了。当然这是第一封信，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接受的第一个任务。”

奥尔嘉说到这里打住了。现在屋里除去两个老人那艰难的、时不时呼噜呼噜作响的喘息声之外是一片寂静。K.有一搭没一搭地，似乎是在补充奥尔嘉的话，说道：“你们是在我面前演戏呢。你看吧，巴纳巴斯给我送信来时，完全像一个为公事奔波忙碌的老信使，而你和阿玛莉娅呢，这一回她可是和你们坐一条板凳了，瞧你和她那副神情，似乎当信

使以及当信使送的那些信件全是无关紧要的、附带着干干的事情。”“你不能把我们三个人看成一样的，”奥尔嘉说，“巴纳巴斯，不管他对自己干的工作有多少怀疑，在得到那两封信后简直又变成了一个快活的孩子。他的怀疑只是针对着自己和我；而在你面前呢，他就以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信使为荣，努力把这份工作做好，要跟他心目中设想的真正的信使干得一样出色。比如，虽然他现在得到一套工作服的希望比以前大多了，但还是一定要我在两小时内赶着替他把他那条裤子改出来，让它至少有那么点像工作服的紧身裤，好在你面前穿得像模像样的，当然，在这一点上你也是比较好蒙的。这就是巴纳巴斯。可是阿玛莉娅就不同了，她确实一直看不起信差这个工作，现在巴纳巴斯有了一点成就——这一点她从巴纳巴斯和我的表情上、从我们两个老是坐在一起嘀嘀咕咕很容易看出来——可是她也比以前更看不起这份差事了。所以，她说的是实话，你不要瞎怀疑，弄到后来把自己也给蒙了。我呢，K，我有时也说过些贬低信使工作的话，但我并不是想骗你，而是害怕。到目前为止巴纳巴斯经手过的就只有这两封信，这是我们家三年来第一次得到的恩惠，当然这是不是我们的福气还很成问题。这个转机，如果真是一次转机而不是错觉的话——错觉比转机更经常有——那么它是跟你到这里来有关的，我们家的命运可以说已经操在你手里了，也许这两封信仅仅是开个头，巴纳巴斯将不光给你送信，他的工作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只要我们还可以抱这种希望，我们就希望能这样——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的一切都要指望你了。现在，在那上面我们只能是人家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在这下面呢，我们倒兴许能发挥一点自己的主动性，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努力使你对我们有好感，至少也要让你不讨厌我们，或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尽我们的全力、充分利用我们的经验来保护你，力求做到让你别失去同城堡的联系——我们也许能靠这点联系吃饭的。那么，这些要怎样才能顺利地做起来，有个良好的开端呢？我想应该做到在接近你的时候不引起你的疑心，因为你是初来乍到，肯定对周围发生的事时时处处存着戒心，完全正当的戒心。此外，我们是被人看不起的，而你自然会受到众人对我们的看法的影响，特别是你未婚妻的影响；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去接近你，才能比方说不同你的未婚妻闹得不愉快——尽管我们根本不是有意跟她过不去——从而伤害你呢？再说那两封信，你拿到之前我仔细看过——巴纳巴斯没有看，他觉得自己是信差，不能那样做——乍一看它们似乎不太重要，好像已经过时，信上要你去找村长谈，这本身就说明这封信一点也不重要。那么，在你面前我们究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才好呢？如果我们强调信的重要性，那就

会引起你的怀疑，你会觉得我们这样做明明是在小题大做，夸大其辞，我们作为信件的传递人向你使劲夸大这些信的作用，是抱着个人目的而不是在替你办事，我们这样做的结果甚至可能反而降低了这些信本身在你心目中的价值，这就完完全全违反我们的本意，实际上等于欺骗了你。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这些信不太重要吧，这同样会引起你的疑心，你会想为什么我们要忙着递送这些不重要的信，为什么我们说的和做的互相矛盾，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这种做法不仅欺骗你这个收信人，而且也欺骗让我们送信的人，因为人家把这信交给我们去投递，绝不会是让我们在收信人面前说些贬低来信的话吧。再一种态度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就是给那些信一个公正的说法，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信的价值本身就不断在变，它们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考虑，而这些考虑是没有穷尽的，什么时候抓住哪一种想法不再往下想纯粹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这些信的看法也总是没有定准的。现在还要加上我又为你担忧，这种心情也掺和进来捣乱，于是什么全乱了，所以你不能对我说的每句话都那么太认真苛求。比如说巴纳巴斯曾经跑来告诉我，说你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听了你的话吓得赶紧——可惜这里头并不是一点没有当信差的人自己的神经过敏在作怪——主动提出不想再做这个工作了，我听了他这话能不急吗？当然就会去蒙、去诳、去骗，总之是只要有用，能挽回他这个错误，我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这样做既是为我们家，也同样是替你着想呵，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有人敲门。奥尔嘉很快跑过去开了门。一盏风灯的光柱射进这间漆黑的屋子里来。

这位深夜来客打着喳喳问了几句什么，奥尔嘉也同样打着喳喳回答了，然而来人对答话并不满意，想硬闯进屋里来。奥尔嘉大概是怎么也挡不住他，于是就叫阿玛莉娅，显然是希望阿玛莉娅想方设法把来人赶走，以免影响二老睡觉。阿玛莉娅也真的立即跑了过来，推开奥尔嘉，一脚跨出门去顺手把门关上了。只是过了一眨眼的功夫，她便又回到屋里来，奥尔嘉刚才办不到的事，她一转眼就办到了。

接着K.便从奥尔嘉处得知，那位访客是来找他的；原来这是两个助手之一，是弗丽达派来找他的。刚才奥尔嘉是想帮K.一个忙，即不让那助手知道他在这里，要是K.自己以后去向弗丽达坦白承认他到这里来过，那是他自己的事，随他的便，但奥尔嘉不愿让那个助手发现这事去报告。K.对此表示赞许。可是奥尔嘉主动提出让他在此过夜等巴纳巴

斯，这一建议他拒绝了。本来他也许可以接受这个邀请，因为夜已经很深，再者他觉得，现在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同这一家人的关系已经相当熟了，在这儿住上一夜，如果是出于别的原因也许让人觉得尴尬，然而如果考虑到这层较熟的关系，却是他在这村子里碰上的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尽管有这些想法他还是拒绝了。那个助手的到来使他大吃一惊，醒悟过来，他心里纳闷，怎么弗丽达明明知道他的心思，却同两个尝到了他的厉害而很害怕他的助手一个鼻孔出气，不惜派出一个来找他，而且是只派一个，另一个大概就留在她自己身边了吧。他问奥尔嘉有没有一根鞭子，鞭子她没有，但却有一根柳条，于是K.拿起了这根柳条。然后他又问能不能从另一处出去，回答是可以的，经过院子就行，不过那样一来就得翻过邻居花园的篱笆，再穿过人家这个花园，才能去到马路上。K.准备就这样办。当奥尔嘉领着他穿过院子向篱笆走去时，K.抓紧这个时间安慰她，叫她别担心，明确向她表示，他对她在讲述那许多事情时耍的小花招一点不生气，而是非常理解她，感谢她对她的信任，她今天给他讲了这么多，再次证明了这种信任。然后他请奥尔嘉等巴纳巴斯一回来就叫他马上到学校去，就是天还没有亮也立即去。他说，虽然巴纳巴斯带来的信件并不是他唯一的希望，如果真是这样他的情况就太惨了，但他决不想放弃这一点希望，他要根据这些信息行事，同时又不忘记奥尔嘉，因为简直可以说奥尔嘉本人，她的勇气、她的周到、她的聪明，她为全家人牺牲的精神，比那些信对他更加重要。如果要他在奥尔嘉和阿玛莉娅两人中作出选择，那么他是不会费多少考虑的。在他已准备翻身向篱笆跃起之际，又一次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

第十六章

当他过一阵子来到大路上时，还能透过阴云满天的黑夜，隐约看见那个助手在上面巴纳巴斯家门前走来走去，他不时停下，用风灯照着透过窗帘使劲往屋内窥探。K.大声叫他；听见叫声，看不出他有多少吃惊的样子，而是停止了窥视活动向K.这边走来。“你在找什么人？”K.问，同时把柳条放在大腿上握了握试试它的韧性。“找你啊。”助手一边走近他一边说道。“你究竟是谁？”K.突然发问，因为他觉得现在走到自己跟前的这个人好像不是那两个助手中的任何一个。这人看上去要老些，神情更加无精打采，脸上皱纹更多，可是却显得更胖，还有，他的步态也同两个助手那种像触了电似的过分敏捷完全不同，而是举步迟缓，腿还有点瘸，带着一种富贵的病态。“你不认识我了吗？”那人

问，“我是耶里米亚，你的老助手呀。”“原来是你，”K.说着又把已经藏到身后去的那根柳条鞭稍稍往旁边挪了挪，“你可是大大变样了。”“这是因为，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了，”耶里米亚说，“我在没有人做伴时也就没有了欢乐的朝气。”“阿图尔到哪里去了？”K.问道。“阿图尔？”耶里米亚重复问，“那个可爱的小伙子吗？他离职了。你对我们也太凶了点。他跟棵嫩苗似的，怎么受得住？他已经回城堡去，把你告下了。”“那么你呢？”K.问道。“我可以留下来，”耶里米亚说，“阿图尔告你也代表我。”“你们到底告我什么？”K.问。“告你不懂玩笑，”耶里米亚说，“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不过是跟你开了点玩笑，乐呵了一阵子，逗了逗你的未婚妻罢了。而且这些又全是按上头的命令办的。加拉特派我们到你身边来时——”“加拉特？”K.问。“对，加拉特，”耶里米亚说，“那时他正好代理克拉姆。他派我们上你这儿来时，说——他的话我每个字都记住了，因为这是我们办事的根据：‘你们到那里去是当土地测量员的助手。’我们说：‘可我们对这工作一窍不通。’他就说：‘这不是最要紧的，需要的话他会教你们怎样做的。最要紧的是，你们要让他稍微快活些。我听到报告说，他把什么事都看得很严重。他现在刚到村里，马上就觉得他的到来是一件大事，实际上这根本什么事也算不上。你们要帮助他认清这一点。’”“那么，”K.说，“加拉特说对了吗？你们又完成了任务没有呢？”“这我不知道，”耶里米亚说，“这么短的时间恐怕也不可能完成。我只知道你很凶，我们告的就是这个。我弄不懂，你自己也只是个雇员，连城堡的雇员都还不是，怎么会看不到我们这种服务工作的艰难，怎么会不明白像你那样使性子，简直像个不懂事的孩子那样耍脾气，尽给我们的工作制造困难是很不应该的。你太残忍了，让我们两个在铁栏杆边上挨冻，对阿图尔，这个连谁说他一句狠话都要难受好几天的人，你却把他按在垫子上，挥起拳头差点把他打死，下午你又赶着我在雪地里到处跑，累得我后来花了整整一小时才缓过劲来。我可 not 年轻了啊！”“亲爱的耶里米亚，”K.说，“你讲的这些都不错，只是你应该去说给加拉特听才好。是他自作主张把你们两个给我派来的，又不是我把你们从他那儿请来的。既然我没有要求你们来，我就可以让你们回去，我也愿意和和气气地叫你们走而不愿用强迫手段，可是你们两个分明是逼着我这样做嘛。不过，为什么你不是一来就像现在这样，老老实实对我说明来意呢？”“因为那时我在职，”耶里米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么说你现在已经不在职了？”K.问。“现在不了，”耶里米亚说，“阿图尔已经在城堡为我们辞掉了工作，至少，我们的辞呈现在已经在审批了。”“但是你现在还来找我，好像你现在还在职似的。”K.

说。“不对，”耶里米亚说，“我找你只是为了让弗丽达放心。事情是这样的：当你为了找巴纳巴斯家的两个姑娘离开了她时，她心里难受极了，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失掉你，主要是因为你背弃她；不过她也早就看出这事迟早会来的，为这事已经难受了好久。我正好又一次走到那个教室的窗户外面，想看一看，兴许过了这么半天你已经变得通情达理些了吧。可你不在那里，只有弗丽达一个人坐在一张课桌边上哭。于是我就去到她身边，我们一起商量定了该怎么办。现在所有的事情也都办完了。我在贵宾楼做客房招待，至少，在我辞职的事城堡没有审批下来之前，暂时先这样干着，弗丽达又回到酒吧去了。那里对她更合适些。原来她想嫁给你，那个想法是一时冲动，很欠考虑。另外你也辜负了她愿为你作出牺牲的一片心意。但是这个好心肠的姑娘还在时不时犯嘀咕，担心是不是她委屈了你，老想也许你压根儿没去巴纳巴斯家吧。尽管我觉得你在什么地方根本不成问题，可我还是决定跑一趟，好把你的去处弄个一清二楚。因为，在碰上了那么多费心劳神的事情之后，现在怎么也该让弗丽达安安心心睡一觉了，当然，我也一样。于是我就走了，结果不仅找到了你，而且附带着还看到了那两个姑娘对你那么百依百顺。特别是那个长得黑一些的，真是只野猫，处处为你打头阵。没法子，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个人有个人的爱好嘛。不过不管怎么说你没有必要绕道穿过街坊的花园，我知道那条路的。”

这么说，早就可以料到然而又无法阻止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弗丽达离开了他。这不一定就是最终决裂，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要想把弗丽达争取回来还是有可能的，她很容易受别人左右，甚至会受两个助手的影响，这两个家伙把弗丽达的地位看得同他们自己的差不多，现在他们自己辞掉了工作，也就撺掇弗丽达这样干。但K只消去到她面前，再向她一一陈述自己的长处，她就会后悔而又成为他的人的，要是他能利用那两姐妹提供的情况，使自己的事情得到新的进展，就等于为他这次家访作了很好的辩护，那么，争取弗丽达回心转意就会更加顺利。但是，尽管他努力用这些考虑来安慰自己，希望做到不为弗丽达的离开感到不安，却怎么也安不下心来。曾几何时，他还在奥尔嘉面前夸他的弗丽达，把她说成自己的唯一依靠；现在呢，这个支柱却不那么牢靠了，用不着哪个有权有势的人插手，就可以把弗丽达从他身边抢走，连这个叫人腻味的助手都能办到。这只是一堆肉，有时给人一种似乎不是长在活人身上的印象。

这时耶里米亚已经转身走了，K把他叫了回来。“耶里米亚，”他

说，“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也请你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一个。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主仆关系了，这不仅你感到庆幸，我也感到庆幸，这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要互相欺骗了。你看，现在我就当着你的面把这根柳条折断，这鞭子是给你预备的，我不是因为怕你才挑了穿过花园那条路，而是想给你来个突然袭击，在你身上试试鞭子。好了，现在你也别再生我的气，让人气恼的事全都过去了。假如你当初不是官府硬性派给我、强加在我头上的仆人，而只是我的一个熟人，那么，尽管你的长相我有时候看着觉得有点别扭，但我们肯定是会处得很好的。现在我们来亡羊补牢，也还是不算晚吧。”“你觉得能行吗？”助手说，一面困得直打哈欠，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本来我可以给你把事情讲得更详细些，但我没有时间了，我得上弗丽达那儿去，姑娘在等着我呢，她还没有上班，经我好说歹说，老板总算——她一到那里就想一头扎进工作里去，大概是想忘掉不愉快的事——又给了她一小段时间让她休息休息，我们两个总可以至少是一块儿度过这段时间吧。至于说到你刚才提的建议，那么我确实没有必要对你说假话，可也同样没必要向你掏心窝。因为我的情况跟你不同。原先我和你之间有职务上的关系，那时你对我来说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人，这又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我这样的工作任务，当时是你要我干什么我就会为你干什么，但是现在你对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撅折柳条鞭也打不动我的心，只能让我想起我过去有过一个非常凶狠的主人，想用这种办法让我对你产生好感是办不到的。”“现在你跟我说话这种口气，”K.说，“就好像一切都已经铁板钉钉子，就是说你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怕我的时候了。可实际上事情并不是这样。很可能到最后你还是摆脱不了我的管束，在这个地方审批手续是不会那么快的哟。”“有时候相当快，”耶里米亚反驳道。“有时候这样，”K.说，“可是现在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次已经审批完了，至少不论是你还是我，两人手头都还没有拿着批准文件吧。这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审批工作还在进行，而且我也还没有通过我的各种关系对此加以干预，但我是一定要干预的。要是将来审批结果对你不利，那么你现在就是没有给自己好好留条后路，在你的主人面前好好表现一番让他对你有点好感，如果那样的话，也许我刚才撅折柳条鞭也是多余的了。我承认，你是把弗丽达拽走了，因为做到了这一点，你现在洋洋得意，尾巴翘得老高。但是，虽然我很尊重你的人格——即使你现在已经不再尊重我，我仍不改变这个态度——可我很清楚，我只需要对弗丽达说上几句话，就足够戳穿你用来蒙她、骗她上钩的谎言了。告诉你吧，要想让弗丽达离开我，只能是靠谎言。”“你这些恐吓是吓不倒我的，”耶里米亚说，“你根

本就不想要我做助手，你害怕我当你的助手，你压根儿就怕任何一个助手，正是因为害怕你才打了好心的阿图尔一顿。”“也许是这样吧，”K.说，“不过，难道因为害怕才打，打起来就不那么疼了吗？也许我还有机会不止一次地用这种方法表示害怕你的。再就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发现你对当助手不那么乐意了，那么不管我多怕你，强迫你好好干还是会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说具体点吧，这次我会努力争取不要阿图尔，只要你一个，那样我就有可能更多地关照你了。”“你以为，”耶里米亚说，“我会怕这些，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害怕？”“我确信，”K.说，“你肯定是有怕的，而如果你是个聪明人，那么你就会非常害怕。要不是这样你为什么不上马跑到弗丽达那里去还到这儿来找我干什么？你说说，你是不是爱她？”“爱？”耶里米亚说，“她是个聪明的好姑娘，是克拉姆以前的情人，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她都是值得尊敬的。她一个劲儿地求我帮她摆脱你，我没有理由不帮她这个忙，特别是我帮了她也不伤你的心，你不是已经在活该倒霉的巴纳巴斯家找到安慰了吗？”“好，现在我可看清楚你在害怕了，”K.说，“你真是怕得够呛，怕得可怜！所以只好靠撒谎救命，想骗我掉进你的圈套！事实上，弗丽达只求过人一件事，就是帮助她甩开两个狂野、放肆，跟畜生一样贪婪、缠人的助手；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工夫，不能完全满足她的这个请求，现在我可是尝到这个失误的苦果了。”

“土地测量员先生，土地测量员先生！”有人在大声喊叫，喊声从大路另一头传过来。原来是巴纳巴斯赶来了。他跑到这里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但仍不忘向K.鞠了一个躬。“我成功了。”他说。“什么事成功了？”K.问，“你把我的请求当面告诉克拉姆了吗？”“这不行啊，”巴纳巴斯说，“我费了好大好大劲，可这是办不到的呀，我使劲挤到前面去了，没等人叫我就挤到了离长写字台很近的地方去站着，站了一整天，因为站得离写字台太近，结果被一个书记一把推开，原来我挡住了他的亮。克拉姆每次一抬眼皮，我就把手举起来，这是犯禁的，可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厅待的时间最长，后来只剩下我和几个服务员在那儿，再后来，我又很高兴地看到克拉姆回来了，但他当然不是为了我才回来的，他只是想在一本书里查点什么，很快查完就又走了，最后，因为我一直站着不动，值勤的差点拿笤帚把我扫地出门。现在我是把什么都给你说清楚了，你不要又对我不满，说我不卖力了吧。”“可是你这么卖力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啊，巴纳巴斯，”K.说，“你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吗？”“可我是有收获的，”巴纳巴斯说，“当我从我的办公厅出来时——我管那个办公厅叫我的办公厅——看见一位老爷从一

条比较深的走廊里朝这边走过来，那时别的人全走光了；是呀，时间确实已经很晚很晚了。我决定等他，这是一个在那里继续待下去的好机会，其实我真恨不得干脆就待在那儿不走，那样岂不更好，免得老是只能给你带回坏消息。不过，就是不为这点，等一等这位先生也是值得的，那是埃尔朗格。你不认识他吗？他是克拉姆的几个一级秘书中的一个。这位老爷身体瘦弱，个子小，走起路来有点瘸。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的记性非常，又有很大的知人本领，这两条是出了名的，他只消眉头一皱，就谁都认得，还常常认得他从来没见过面，只是听人说过或者在报告里读过的人，比如我吧，他也许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但是，虽然他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谁，还是总要先问一问，那样子就像很没有把握。‘你不是巴纳巴斯吗？’他冲着我说，然后问：‘你认得土地测量员，对不对？’接着他又说，‘这太巧了；我现在就乘车到贵宾楼去，你让土地测量员到那里去见我。我住十五号房间。不过他必须立刻来，我在那边只安排了很少几次谈话，早上五点钟还得赶回来。你告诉他我很重视同他的谈话。’”

这时耶里米亚突然拔腿就跑。巴纳巴斯只顾急急忙忙说话，几乎一直没有注意到他，现在巴纳巴斯问道：“耶里米亚想干什么？”“抢在我前头去见埃尔朗格呗。”K.说着便也跑步去追耶里米亚，追上后便一把揪住他，拽着他的胳膊说：“你这么急，是不是现在突然很想弗丽达？我渴望见到弗丽达的着急心情并不亚于你，所以就让我们一起齐步走吧。”

第十七章

在黑洞洞的贵宾楼门前站着一小群男人，其中有两三个手里提着风灯，照亮了几个人的脸。K.只认出了一个熟人，那就是车夫盖尔斯泰克。这人用来迎接他的是一个问题：“你一直还在村里？”“对，”K.说，“我是到这里来长住的。”“这跟我没什么关系，”盖尔斯泰克说完这话便大声咳嗽起来，接着就转向别人去了。

原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在等着晋见埃尔朗格的。埃尔朗格已经来了，不过这时还在同莫姆斯谈话，然后才接见前来找他解决纠纷的老百姓。站在这里的人们议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不让在里面等而非要在外边雪地里站着这件事。这外面说冷倒也不算太冷；但是让上访百姓半夜三更站在酒店门前说不定等上好几个钟头，也未免太无情了点。当然这并不是埃尔朗格的过错，其实他本人倒是个很随和的人，他几乎不知道这

个情况，如果向他报告这件事，他一定会对这种做法感到生气的。这是贵宾楼老板娘的问题，她着意追求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成癖，容不得上访的人们一下子都涌进店里来。“如果一定要到这里来解决问题，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她常常说，“那么，看在老天爷面上，就挨着盘儿一个一个地按顺序进来吧。”最初，上访的人是在一条走廊里等，后来改在楼梯上，再后又改在门厅里，再往后又到了酒吧里，最后，在她的坚持下，还是把这些人都推到门外大街上去站着等了。然而即使这样她也仍然不满意。用她自己的话说，坐在自己家里老觉得“被包围着”，简直叫人受不了，另外她也不明白上访各方究竟有什么必要跑到这里来交涉。“为了把一进门那道楼梯弄脏呗。”有一次她谈起这件事时，一个官员这样对她说，大概是气话吧；可是她觉得这话说得有理，常常喜欢引用。她竭力主张——这一点倒是同上访老百姓的愿望不谋而合——在贵宾楼对面盖一座楼房，可以考虑让那些人到那里面去等候。要按她的意思，最好连上头来人与纠纷各方谈话及对他们的审问也都别在贵宾楼进行，可是官员们反对，而官员们一旦大力反对，老板娘自然也就无法坚持到底，虽说她凭她那不知疲倦的、同时又充满了女性柔情的积极活动，在一些次要问题上有点像个小小的暴君那样可以靠横行霸道得逞。可以预料，老板娘大概到头来还是得继续忍受在贵宾楼进行那些谈话和审问，因为到村里来的城堡老爷们拒绝在贵宾楼以外的地方处理各项公务。他们永远是急事缠身，万不得已才勉为其难地到村里来，他们没有丝毫兴致除去绝对必需的时间之外在此地再多作停留，因此，不能要求他们仅仅考虑到贵宾楼内部环境的安静整洁就带着他们的全部、大量文件临时搬到马路对过另一所房子里去办公，这样做势必白白耽误许多时间。实际上，官员们最乐意的是在酒吧里或者他们自己房间里处理公务，甚至在吃饭时，要不就是入睡前或者早晨一觉醒来人还懒洋洋的、还想舒舒坦坦地再躺一会儿那样的时候办理各类公事。不过话又说回来，盖一座候见楼的问题看来倒是在逐渐趋近解决，当然，谁都感觉得到这里有对老板娘的一种惩罚——人们对此难免忍俊不禁——因为恰恰是有关候见楼是否需要兴建的问题，使得层见叠出、不知凡几的各种谈话成为必不可少，以致酒店的全部走廊几乎从无宁日了。

在候见者当中，许多人都是压低声音谈论这些事，有一点特别引起K.的注意，就是虽然不满情绪相当大，却没有一个人对埃尔朗格三更半夜召见上访百姓这一点有什么意见。他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对这一点人们甚至还得感谢埃尔朗格。据说他是纯粹出于好心和对公务的高度责任感才大驾光临本村的；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这样办甚至

更符合规章制度——随便派一个低级秘书来，让该秘书作出记录然后呈他批阅就行了。但他多半拒绝这样做而宁愿事必躬亲，为此就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夜间休息，因为在他的公务日程表上，并未规定有他到村里来办事的时间。K.反驳说，连克拉姆也都白天到村里来，甚至还在这儿待上好几天；难道仅仅是秘书的埃尔朗格，上面城堡里会更加离不了他？这时一部分人宽厚地笑了，另一部分人则噤若寒蝉默不做声，终于这后一种人占了上风，于是K.就再也听不到一句像样的回答了。只有一个人吞吞吐吐地说，当然克拉姆是离不了的啦，城堡里也好，村子里也好，都是一样不能缺少他的呀。

这时酒店大门打开，莫姆斯左右各由一个掌灯的管事照着亮出现了。“第一批人现在可以到埃尔朗格秘书先生那里去了，”他说，“他们是盖尔斯泰克和K.，这两个人现在在这里吗？”两人自然应声答在，但耶里米亚却抢先说了句“我是这里的客房招待”，在莫姆斯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以示欢迎之后，就泥鳅一般溜进酒店去了。K.一边对自己说着：我得更多地提防耶里米亚，但同时他心中一直很清楚，耶里米亚同在城堡里跟他作对的阿图尔比起来，对他的危险性大概要小多了。或许，让他们当助手、忍受他们的折磨，比让他们不受约束地到处乱窜、肆无忌惮地搞阴谋甚至还要划算些吧，他们似乎有耍阴谋搞诡计的特殊素质。

当K.从莫姆斯身边经过时，莫姆斯做出一副似乎到现在才认出原来这个人就是土地测量员的样子。“啊，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这位非常不喜欢受审的人，也挤到这儿来受审了。那天要是让我来办这事，不是省事多了吗？不过嘛，预先挑选应该接受哪次审讯倒也是件难事。”K.听到这几句针对他的话刚打算站住，莫姆斯又开腔了：“您往前走啊，往前走啊！上次我需要您的回答，现在可不需要。”尽管如此，被莫姆斯的态度逼急了的K.仍然说：“您秘书阁下心里只想着阁下自己。如果纯粹只出于公务需要，那么我是不回答问题的，上次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莫姆斯说：“您到底要我们心里想着谁呢？究竟还有谁在这里？您走您的吧！”在门厅里，一个管事接待他们，带着他们走K.已经熟悉的那条路，先经过院子，然后穿过客房部的大门，进入了那条低矮的、稍稍有点坡度的走道。这楼的上面几层，住的显然只是职位较高的官员，秘书们则住这条走道两边的房间，包括埃尔朗格在内，虽然他是地位最高的秘书之一也不例外。那管事拧灭了他的风灯，因为这里有明亮的电灯了。从这里看，这楼房的内部结构处处显得小巧玲珑。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走道的高度刚好人站直身子行走。两旁房间密集，几乎是门挨着

门。墙壁没有顶着天花板，大概是考虑到通风的需要吧，因为这条地势很低的、类似地窖的走道，其两侧的小房间可能是没有窗户的。这种不完全封闭的墙，缺点就是走道内颇不安静，房间里必然也不安静。看来许多房间都有人住着，其中多数房间里客人还没有就寝，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锤击声和酒杯碰撞声。然而站在这里得到的却并非欢快热闹的印象。人声全是压低嗓门的说话声，只能偶尔听到只言片语，并且也不像是交谈，而大概只是有人在口授什么让别人写下来或诵读什么给别人听，恰恰在那些传来杯盘碰撞声的房间里听不到说话声，而锤击声则使K.记起他在什么地方听人讲过，说有些官员为了在持续的紧张脑力活动之后恢复一下精神，往往做一会儿木工、精密机修工以及诸如此类的手工活。走道本身是空的，只有一道门前坐着一位脸色苍白的瘦高个子老爷，他身上穿着皮大衣，大衣下面露出睡袍。大概他是感到屋里太闷才到这外面来坐坐吧，他在看报，但并不专心，不住地打哈欠，一打哈欠就中断阅读，并欠着身子顺着走道向远处张望，或许他是在等一批已经传见却迟迟不来的上访者吧。当K.一行几人从他身边经过时，那管用眼色示意，瞟了他一眼对盖尔斯泰克说：“这就是平茨高尔！”盖尔斯泰克点点头。“他好久没到下面来了。”他说。“是有很久很久没来了。”管事确证说。

最后他们来到一扇门前，这门同其他的门并无两样，但据管事说里面住的正是埃尔朗格。管事让K.把他背起来，趴在K.肩上，从墙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隙处往屋里看看情况。“这会儿他躺在床上，”管事一面下来一面说，“只是躺着，没有脱衣服，可是我估计他一定在打盹儿。有时候在村里他会突然犯起困来，这是作息时间改变引起的。我们得等一等。他醒了会按铃叫我们的。当然，他也会睡过头，就是把在村里的时间完全睡过去，一醒来就不得不马上乘车回城堡，这样的事也有过。不过这倒没什么，他在这里的工作本来就是自愿，尽义务嘛。”“我倒是希望他这一觉干脆把在这儿的时间睡完，”盖尔斯泰克说，“因为，要是他醒来时发现剩下的工作时间只有一点点，就会非常恼火自己怎么竟睡着了，于是拼命赶时间，那时你简直就没法把话说完的。”“您是为盖房子要车运料的事来的吗？”管事问道。盖尔斯泰克点了点头，把管事拉到一边，凑着耳朵对他打喳喳；但是管事只是心不在焉地听他说话，他越过比他矮一头还多的盖尔斯泰克的脑袋看着远处，同时神情严肃地、慢条斯理地捋着头发。

第十八章

当K.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时，在走道远处一个拐弯的地方发现了弗丽达。她装作没认出他来的样子，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盯住他，一只手上托着一个放着空杯空碟的茶盘。他对管事说（但这个管事完全没有理他——这人似乎你越跟他多说，他就越发心不在焉），他去去马上就回来，便向弗丽达跑过去了。一到她跟前，K.就紧紧抓住她的双肩，好像这样就把她又夺回自己手里来了似的，然后便一面问她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一面竭力琢磨她的眼神。可是她那茫然若失的样子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她神情恍惚地将托盘上的餐具挪动了一阵，说道：“你找我做什么？你还是到那家人那儿去吧——谁家吗？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你是知道的。你不是刚从那儿来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K.很快把话题岔开；他觉得他们的谈心最好别这样毫无准备地开始，更不要从最棘手、对他最不利的地方开始。“我原以为你在酒吧呢。”他说。弗丽达惊异地看着他，然后用她那只空着的手缓缓地、轻柔地抚摩他的前额和脸颊。似乎忘记了他的相貌，所以要用这个办法一点一点回忆起他是什么模样，一边抚摩，一边眼里也流露出人在吃力地追忆往事时才有的那种迷离恍惚的神情。“我又被安排在酒吧工作了，”过了一会儿，她慢吞吞地说，好像她说的话并不重要，而她在这些话语之外同K.进行着另一次交谈，似乎那无声的交谈、那言外之意才更重要。“这里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做这些事；每一个女人，只要会铺床叠被，会笑脸相迎，不怕客人纠缠甚至还能勾引客人，都能当客房女招待。可是酒吧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我当时不是很体面地离开那个位置的，但这次还是马上又被起用了，当然，这回我有保人。老板很高兴我有保人，这样他就能比较容易地重新用我。唔，他们简直就不得不催着我赶紧答应接受这个位置，你只要想一想酒吧让我联想到什么，就会明白了。最后我还是接受了酒吧的位置。这里我只是临时帮忙。佩碧求我们不要让她立即离开酒吧，这太丢脸了，所以我们给了她24小时限期，因为她确实很勤快，每件事情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这一切都安排得很好，”K.说，“不过你原先是为了我的缘故才离开酒吧的；现在我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你反而又要回酒吧去吗？”“不会有什么婚礼了。”弗丽达说。“是因为我变心了吗？”K.问，弗丽达点点头。“你看，弗丽达，”K.说，“这个所谓变心的问题我们谈过好几次了，每一次都是到最后你不得不承认这种怀疑对我不公平的。在我们谈完以后，我这方面

丝毫变化也没有，我一直没有什么错处，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不可能变。所以，一定是你那方面有了变化，是受到别人的挑唆了，或者是受到什么别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是错怪我了，因为，你看看，我跟那两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呢？长得黑一点的那个——我简直都不好意思像现在这样一条一条地为自己辩解，可是你逼得我非这样做不可——我是说，长得黑一点的那个，你瞅着她心里不痛快，可我瞅着她心里大概不会比你更痛快些吧。我是能躲开她就躲开她，她那方面也使我这样做不感觉困难，没有人比她更沉静内向了。”“对呀，”弗丽达大声说道，她现在说的话好像不是她的本意，有些言不由衷，看到她这样乱了阵脚，K.心里挺高兴。现在她的表现是身不由己，“你只管叫她沉静内向好了，你把最不要脸的女人叫做沉静内向，尽管这话听起来叫人难以相信，可你却是真心真意这么想的，你不会装假，这我知道。大桥酒店的老板娘说你就是这么个人，她说：‘我没法喜欢他，可是让我扔下他不管我也做不到，谁看见一个还不太会走路可又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劲儿往前冲的小孩子能憋得住不去拉他一把？’”“这一次你就好好学学她吧，”K.微笑着说，“但是那个姑娘——不论她是沉静内向也罢，不要脸也罢，这一点我们先不管——现在我不想谈她了。”“可是你为什么说她沉静内向？”弗丽达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K.觉得她对这个问题这样关心是一个于他有利的标志。“你是亲身体会到她沉静内向，还是想拿这话来贬低别人？”“都不是，”K.说，“我这样说她是出于感激，因为她让我很容易了解她这个人，另外也因为如果她不是这样那么即使她主动多同我攀谈我也下不了决心再到她们家去，而不去，实际对我是个很大的损失，这你是知道的，为了我们两人的共同利益，我必须到那里去。既然去了，也就只好也同另一个姑娘谈话，虽然我对这个姑娘的精明能干、胆大心细和忘我精神感到钦佩，但是谁也不能说她会勾引人吧。”“那些仆人可不这样看。”弗丽达说。“是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在许多别的问题上也都和我看法不同，”K.说，“难道你想从那些仆人的贪馋好色，推论出我会变心吗？”弗丽达不言语了，她默默让K.从她手中接过托盘放在地上，然后挎起她的胳膊，接着两人便开始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踱步。“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忠贞不贰，”她说，同时把他从自己身边稍稍推开一点，“你在那两个姑娘面前怎样表现倒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竟会跑到那家人的家里去现在又跑回来，浑身上下都带着她们家那间小屋的味儿，光这一点我就觉得是件不可忍受的、丢脸的事情。还有，你根本不打个招呼就从学校里跑掉，然后干脆去她们家待上整整半夜。到有人来问起你时，又让那两个姑娘瞒住人家说你不在，唔，捶胸顿足地保证说

你不在，特别是让那个最最沉静内向最最不爱说话的妞儿替你办这件事。然后又偷偷摸摸从一条暗道溜出门去，说不定是想维护那两姐妹的名声吧？哼，那两个姐妹的名声！够了，够了，我们现在谈这些干什么呀。”“不谈这些可以，”K.说，“然而我们可以谈点别的，弗丽达。关于这件事，实在也没有什么再多好谈的了。我为什么得上那儿去你是知道的。我很不想去。可我还是克服一下，勉强去了。去那里我本来就已经是难为自己了，你不应该再给我增加困难啦。今天我原本只打算去一会儿，打听一下巴纳斯到底回来了没有，他早就说要给我送一封重要的信来。他没有来，但是人家向我保证，看那样子也完全可信，说他一准很快就回来。要说让人转告他，叫他随后到学校来找我吧，我又不愿意，为的是不想让他惹你讨厌。于是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可惜他总是回来。气人的是，反而来了一个我痛恨的家伙。要让我默默忍受他暗中盯梢，我可没那个兴致，所以才从邻居家的花园出去，但是要我在他面前躲躲藏藏我也不愿，于是就在大路上大摇大摆地朝他走过去，说老实话，手里还拿着一根非常结实的柳条鞭子呢。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说关于这件事再没有什么别的好讲了，但是还有另一件事我们得说道说道。那两个助手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提他们，我几乎跟你听别人提起那家人时一样，真是感到恶心！比一比你跟他们两人的关系和我跟那家人的关系吧。我理解你对那家人的反感，能体会你的心情。可我去他们家纯粹是为了办事，有时我简直都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觉得自己尽在利用人家。你同两个助手的关系可完全相反！你一点不否认他们是在纠缠你，也承认他们对你有吸引力。我并不因此生你的气，我明白这里面有些你无法左右的因素在起作用，看到你至少对那两个家伙还不是百依百顺，我就已经很高兴了，除此以外我又尽力维护你，可是，仅仅因为我有几个小时放松，这种疏忽又是由于我对你十分信任、知道你不会变心，当然也由于我心想校门锁得严严实实，两个助手这回是最终地被赶走，再也回不来了——恐怕直到现在我还是低估了这两人的能量——好，就仅仅因为我有那么几个小时放松了对你的保护，又因为那个耶里米亚，那个细看原来身体并不怎么好、像个老头儿一样的家伙，厚着脸皮硬往教室窗户里探头探脑，仅仅因为这两点，就要我失去你弗丽达，就该让我听到‘不会有什么婚礼了’这样的欢迎辞吗？要说责怪，难道不正是我才有责怪人的权利吗？可是我并没有责怪你，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这样做。”K.这时再次感到给弗丽达打打岔很好，于是就请她去给他拿点吃的来，说他从中午到现在还什么东西也没吃呢。显然弗丽达听到这个请求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她点了点头就小

跑着去取，但并不是沿走道朝着K.猜想厨房所在的那个方向去，而是向侧面走下几级台阶。不久，她端来了一盘已切成片的肉肠和一瓶葡萄酒，但也许只是某一顿饭吃剩下的东西了：看得出来，为了不致露出破绽，那一片片肉肠是匆匆忙忙重新码起来的，连肠皮也忘在盘子里，那瓶酒也已经喝去了四分之三。可是K.什么话也没有说，端过盘子便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你是去了厨房吗？”他问。“没有，是去了我的房间，”她说，“我在这下面有一个房间。”“你刚才叫着我一块儿去岂不更好，”K.说，“现在我就到下面去吧，在那儿吃饭可以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搬把椅子来。”弗丽达说着已经开步走了。“谢谢，”K.说，拉住了她，“我既不想下去，也不再需要椅子了。”弗丽达把心一横，强忍K.抓住她的手，咬紧嘴唇深深低下头去。“是呀，他是在下面，”她说，“难道你会料不到这一点吗？现在他躺在我床上，他在外头着凉了，冷得打哆嗦，几乎一点东西都没吃。说到底，错全在你一个人身上；要是你没有把两个助手赶走，没有跟在那家几个人的屁股后面跑，那么我们这会儿不就能安安生生在教室里坐着了吗？是你一手把我们的幸福破坏了。你以为耶里米亚在他当差那会儿敢把我拐走吗？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一点不了解这里的制度了。他想来找我，他感到痛苦，他暗暗瞅准机会亲近我，这些都对，但不过是敲敲边鼓罢了，没有办法动真格的，就像一只饿狗总围着饭桌蹦蹦跳跳可终究不敢跳到桌上去一样。我的情况正是这样。他对我的确有吸引力，我们是小时候常在一块儿玩的伙伴——那时我们一块儿在城堡的山坡上玩，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你还从没问起过我的过去呢——但是，只要耶里米亚受着职务的约束，这些全都不打紧，因为我很清楚我作为你未来的妻子应尽的义务。但是后来你把两个助手赶跑了，还对这件事洋洋得意，好像为我做了件好事。是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么回事在阿图尔身上你如愿以偿了，当然也只是暂时的，他太嫩，没有耶里米亚那股子天不怕地怕的蛮劲。另外，你那天夜里那一拳——那也是给了咱俩的幸福重重一拳——差点儿把他打散架了，他逃到城堡去告你，即使不久以后会再回来，但不管怎么说 he 现在是走了。可是耶里米亚却留了下来。当差时，他连主人眨一下眼睛都害怕，不当差，他就什么也不怕了。他一来就把我拽走，你撇下了我，我这个老朋友又死活缠住我，这样一来我还怎么能挺得住？我并没有大开校门放他进来，是他砸碎了窗户硬把我拉出去的。我们跑到这里，店老板挺看重他，客人们对于这样一个客房招待也是求之不得，酒店马上就用我们了，所以说不是他住在我房里，应该说是我们两个人共同使用一个房间。”“不管怎么说，”K.说道，“我对于解雇两

个助手一点不后悔。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你对我的忠贞不贰一定要以把两个助手拴在我身边作为条件，那么现在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倒是件好事。做夫妻而必须夹在两头野兽中间，又是两头只有用鞭子猛抽才老实的野兽，这种婚姻幸福也未免太不怎么样了。这样看来，我还得感谢那一家人，他们在无意中也对我们的分手出了一把力呢。”说到这里两人都沉默了，又肩并肩地来回踱步，不过这次弄不清是谁先开的头。弗丽达离K.很近，似乎在生气。他这一回没有再挎着她的胳膊。“好，现在是人人各得其所，”K.接下去说道，“我们也许可以告别了，你去找你的耶里米亚先生，他在校园外面着了凉，很可能现在还没有好利索，考虑到这一层，你让他一个人待着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呢，我一个人去学校，或者，因为没有你我去那儿什么事都干不了，我去一个什么别的地方，一个有人用我的地方。话虽这么说，但我现在还是有点犯犹豫，这是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对你刚才讲的那些始终还有那么一点点怀疑，根据就是：我从耶里米亚那里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印象。他在当差的时候一直对你垂涎三尺纠缠不断，我就不信单凭这点当差的身份，就能阻止他哪一天对你动真格的来个突然袭击。但是现在呢，从他自以为已经不当差的时候起，情况不同了。对不起，我是这样来解释这一变化的：自从你不再是他的主人的未婚妻，你对他就不再像原来那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不错，你是他小时候的朋友，可是我认为他并不——其实我只是通过今天夜里的一次简短的谈话才对他真正有所了解的——怎么看重这些感情方面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有一股子蛮劲。我反倒觉得他这个人有点老谋深算。在关于我的事情上，他从加拉特那儿接受了一些什么任务，这也许对我不大有利，他执行这项任务非常卖力，我承认在这一点上他有一股子蛮劲、有一股子狂热——这种干起公务来就一身狂热劲的现象在这里并不是太罕见的——而破坏我们俩的关系，便是这项任务的一部分。他可能试着用了好几种办法来做这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试图用色迷迷的追求勾引你，另一个办法——在这点上老板娘也帮了他一手——就是胡诌什么我变了心。他的阴谋得逞了，人们觉得他跟克拉姆有那么一点儿像，这也可能帮了他的忙，现在他虽然丢掉了他的差事，但也许正是时候，他已经不再需要这份差事了，现在他正在摘取胜利果实，把你从那教室的窗户里拽了出来。但是，这样一来他的工作也就结束了，那股当差办事的狂热劲一旦离开了他，他就感到很疲劳，宁愿自己是阿图尔，阿图尔现在根本就没有去告我，而是在领奖，在接受新任务，可也总得有个人留下来注意这下面的事态发展哪。说他照顾你，这事对他来说是有点讨厌而又不得不硬着头

皮去做。他对你连半点爱也没有，这一点他向我老实承认过。你是克拉姆的情人，所以他当然尊重你，而在你的房间里住下来，体会一下小克拉姆的滋味，他肯定觉得非常之舒服，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你本人在他眼里现在什么也不是，把你带到这里来，只是他应该完成的主要任务的收尾工作罢了。为了不使你感到不安，他自己也留下来，但只是暂时的，一旦他从城堡得到新的消息，一旦你给他治好了感冒，他就马上走人了。”“你怎么能这样诬蔑他？”弗丽达说，气得把两只小手攥成拳头相对一击。“诬蔑？”K.说，“不，我不想诬蔑他。但是我也许是错怪了他，这倒是有可能的。我刚才谈到他时讲的那些，都不是非常明显一目了然的东西，它们也可以作别的解释。但哪里是什么诬蔑呢？要说诬蔑，那么目的恐怕只是想用这种手段来极力反对你对他的爱，使你不再爱他。如果有必要，如果诬蔑是合适的手段，我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谁也不能因为我这么做而谴责我吧，他有那样的上级，这使他的地位比我大为有利，我这个只能靠自己单枪匹马作战的人，兴许也就有权利稍微说几句过头的话吧。说两句别人的坏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无辜的、归根结蒂也是软弱无能的手段。所以说，你不要生气了，让你的拳头休息一下吧。”说到这里K.拉起弗丽达一只手；弗丽达想挣脱他，但却微笑着，而且不使大劲。“我一点用不着诬蔑他，”K.说，“因为你并不爱他啊，你只是自以为爱他罢了，我帮助你纠正了这个错觉你是会感激我的。你瞧，要是有人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不用武力，而是用心计，用策略，那么他大概只能叫这两个助手来帮忙。这两个家伙表面上很善良、幼稚、活泼、做事大大咧咧不负责任，又是通天的，是从城堡里腾云驾雾而来的，还附带着一点儿时的甜蜜回忆，这一切不都是非常可爱的吗，尤其是，我可以说完全是这一切的反面，我成天价忙着办各种你不会懂、惹你生气的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又使我同一些你很痛恨的人混在一起，同他们厮混的结果是，虽然我本人不负一点责任，但也染上了一些可恨可憎的气味。这整套把戏，只是不怀好意地、当然是非常聪明地利用了我们俩关系的弱点。人与人之间的每种关系都有它的弱点，何况我们的关系，我们两个是各自从完全不同的世界走到一起来的，自从我们认识以来，每个人的生活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我们心里都还没底，因为这条路的确太新了。我不是讲我，对我来说这并不太重要，说实在的，从你看上我以来，我就一直在不断地接受着馈赠，习惯于接受馈赠并不难。可你呢，撇开所有别的不谈，你是从克拉姆身边硬是给拉走的，这件事有多大分量我没有谱，但是慢慢地我对这个也略知一二了。碰上这样的事，人是会被弄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虽然

我乐意时时和你在一起，但我不能老在你跟前，而就是我在你跟前，有时你的幻想也完全占据着你的心，或者，还有更加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比如老板娘，也总揪住你不放。总而言之，有过那么一些时候，就是你扭头不看而我而沉湎在幻想中，憧憬着一些半明半暗、隐隐约约的前景，多么可怜的姑娘啊，只要在你目力所及之处站上一些合适的人，你就会立刻成为他们的俘虏，你就会误认为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些幽灵、陈年的记忆，那些实际上已经逝去、在记忆中越来越模糊的往昔生活——误认为这一切都是你现在的、真实的生活。这是一个错误，弗丽达，它不是别的，只是我们这短暂的结合中的最后一道难题，正确地看应该是一个不在话下的问题。清醒过来，冷静下来吧！尽管你曾经认为那两个助手是克拉姆派来的——这根本就不对，其实他们是从加拉特那儿来的——尽管他们利用你这个错误迷惑了你，使你甚至觉得在他们的脏话和下流勾当中也看到克拉姆的影子——这就好像某个人觉得他在粪堆里看见了从前丢失的一颗宝石，而事实上即使那颗宝石果真在那里，他也是根本找不着的——可是他们终究只是两个跟在马厩里过夜的仆人同类的家伙，所不同的仅仅是他们没有那些仆人那样壮实，稍稍接触一点新鲜空气就能让他们病倒在床，不过，他们倒是挺会使出那种下人的诡计来替自己找到病床的。”弗丽达这时已把头靠在K.肩上，两人手挽着手，默默无言地走来走去。“哎，要是我们，”弗丽达慢悠悠地、平静地、几乎是舒坦地说，听那语气似乎她知道自己只剩下很少时间能把头靠在K.肩上安适地歇息了，然而却想充分享用这种舒适的滋味，吮尽这甜美的液汁，“哎，要是我们就在那天夜里出走该有多好啊，那样我们这会儿就可以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永远在一起，你的手总在我身旁，我一伸手就能抓到；我是多么需要你待在我身边啊；自打认识你以后，你不在时我觉得多么孤单啊；相信我吧，希望你总待在我身旁，这就是我整天做着的一唯一的梦。”这时，从侧面走道里传来一个人的叫喊声，原来是耶里米亚。他站在那儿最低一级台阶上，只穿着汗搭，然而却披着弗丽达的一件斗篷。他站在那里那种样子，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稀稀拉拉的胡子像淋了雨似地湿乎乎的，眼睛吃力地、乞求地而又充满责难地瞪得老大老大，那本来很黑的脸烧得通红，但皮肤里面却像是包着一堆过于松散的筋肉而向下耷拉着，两只小腿裸露在外面，冻得发抖，以致那斗篷的长穗儿也被带动起来，瑟瑟缩缩地颤个不停。这副模样活像一个从医院溜号的病人，面对这么个人，除了想着赶快把他送回病床去之外，谁如果有别的想法简直就是罪过。弗丽达也正是这样想的，她挣脱了K.的手，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那下面。现在她在他身边，

体贴入微地把斗篷给他披严实，又十分急切地要把他送回房去，仅仅这几条，看来就已经使他精神好些了。他似乎现在才认出K来。“啊，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一边轻轻抚摩弗丽达的脸，意思是让她别急，因为弗丽达现在根本不让再交谈什么。“请原谅我的打扰。可是我身体很不舒服，实在是没法子，真是对不起，我觉得我在发高烧，得喝杯热茶发发汗。校园后面那该死的栏杆，我大概再也忘不了那可恶的玩意儿了，本来已经受凉，刚才又半夜三更东跑西颠。嗨，这不是在为一些根本就不值当的事情毁自己吗，真是，稀里糊涂蛮干了好久才发现这一点！可是您呢，土地测量员先生，您不必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就缩手缩脚，您只管到我们房间来好了，您就算是来看望一个病人，也把您还要跟弗丽达说的话都说完吧。在一起待惯了的两个人，现在要分开了，在这最后几分钟里当然有许多许多话要说，第三个人是不可能理解他们这种心情的，何况这个人还病得躺在床上，等着人家答应过的就要给他送来的热茶呢。您只管进来好了，我会一点不出声，老老实实在一边待着的。”“得了，得了，”弗丽达说，使劲拽他的胳膊，“他在发高烧，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K，你可别跟我们去，我求求你了。那是我和耶里米亚的房间，更正确些说只是我的房间，我禁止你进去。你现在还老缠着我，唉，K，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苦苦纠缠我呀？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再回到你身边去的了，我只要一想到在你身边就不寒而栗。你就上你那两个姑娘那儿去吧。我听说了，她们只穿着汗背心同你肩挨肩地坐在灶沿凳上，当有人来接你时她们就破口大骂人家。既然那里对你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大概那个地方才是你的家吧。我好多次阻拦你，叫你别去那儿，可怎么都拦不住，不过，我总算是尽了我的力阻拦过你，现在这一切全过去了，你自由了。幸福美好的日子在等着你，对两个人中的一个，你可能还得费点劲去同那伙人争一争，可要说另一个嘛，你同她待在一起天底下是不会有哪个人眼红的。那是上天注定的美满良缘嘛。你别反驳我，我敢断定，这会儿你什么全能驳倒，可是到末了还是什么也没有驳倒的。耶里米亚，你想想，他居然把什么都驳倒了！”说到这儿，两人会心地点头微笑了。“但是，”弗丽达又接着说，“就算他把什么都驳倒了，又怎么样？又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那与我又有何相干？那里那伙人日子过得怎么样，那儿发生什么事情，完全是人家的事，是他的事，又不是我的事。我的事是服侍你，一直服侍到你病好，跟从前一样，跟K为了我的缘故而折磨你以前一样。”“那么您真的不跟我们一块去了，土地测量员先生？”耶里米亚问，但这一次，他终于被弗丽达拽走了，走前弗丽达根本不再回头看K一眼。从这里，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道小门，比这走道两侧的门还要低一些——不仅耶里米亚，就是弗丽达进门也得低头弯腰——屋子里面好像很亮、很暖和；K.又听到几句低声细语，大概是弗丽达在哄劝耶里米亚上床吧，过一会儿门便关上了。

现在，K.才发觉这一阵走道里变得多么寂静啊，不光是他同弗丽达刚才一起漫步过的、看来两侧是办公用房的这一段走道很静，而且连那一段两边是曾经非常热闹的房间的很长的走道，也非常安静。这么说，那些先生终于还是睡着了。K.也感觉十分疲倦，也许正是由于疲倦，才没有同耶里米亚顶嘴，而他本来是应该顶那家伙几句的。现在看来，或许按耶里米亚的办法去做要来得聪明些，那家伙显然夸大了他的感冒——他那副寒碜相并不是感冒引起的，而是天生的，喝什么健身茶都治不了——唔，完全按耶里米亚的那一套办，就是说，同样拼命表现出自己确实是太累了，何况自己真的也非常累，然后瘫软地倒在这走道上（这种就地躺下本身，一定是件非常痛快的事），躺着稍稍打它个盹儿，然后大概也可以同样让人服侍服侍自己，岂不美哉！只是这不会得到像耶里米亚那样美满的结果，就是说耶里米亚在这场争取同情的竞争中肯定会击败他，而且大概是理所当然吧。不仅这场竞争，显然在任何一场竞争中他K.都会败北的。现在K.实在是太疲倦了，他困得甚至产生了一个念头，即是否可以试着在这些房间中找一间——这儿肯定会有几间空着的吧——走进来，在一张舒服的床上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大觉。他觉得，睡足了觉可以使许多损失得到弥补。定神饮料他现在也是带在身上的。刚才弗丽达撂在地上没拿走的那个托盘里还有一小瓶甜酒，想到这里K.不惜拖着疲乏的身子，硬挺着又走回刚才那个地方去，将那瓶甜酒几下就喝光了。

现在他感到自己至少已经有足够的气力去面对埃尔朗格了。他到处寻找埃尔朗格的房门，然而由于那个管事和盖尔斯泰克早已不见踪影，所有的房门又都一模一样，所以他怎么也找不着。但他觉得自己还记得那道门大致在走道的哪一段上，就决定大着胆子去推开一道他认为很可能就是自己目标的门。这个尝试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因为如果是埃尔朗格的房间，那么埃尔朗格本人就可能接见他；如果是另一个人的房间，那么他总是可以道个歉马上离开的；再如果客人在睡觉，这是最最可能碰上的情况了，那么K.进来根本不会被察觉；只有一种情形很糟，那就是屋里没人，因为那样一来K.就很难顶得住那种巨大的诱惑，会一头躺倒在床上一直睡到不知什么时候才醒了。他再次扫视了一遍走道的两

头，看看是否有人来，可以打听出确切的房间，就不必去瞎碰了，但这条很长的走道现在是寂然无声，空空如也。他又把耳朵贴在门上细听，也听不到有客人在里面发出什么响动。他轻轻叩了叩门，轻得不致吵醒一个睡觉的人，当这样做了之后屋里仍然毫无动静时，他便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声轻轻的惊叫。

这是一个小房间，一张宽大的床，占去了屋子一半多，床头柜上亮着电灯，灯旁放着一个旅行包。床上躺着一个人，然而是在被盖底下藏而不露，他先烦躁不安地在被子里乱动了一阵，然后通过被子和床单之间的一条缝打着喳喳发问道：“是谁呀？”现在K.不可能拔腿就走了，他晦气地看了看这富丽堂皇、只可惜已有人捷足先登的卧床，然后，想到了被子里发出的问话，便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显然这起了好作用，床上那人把脸从被子里稍稍露出一点了，可是，看得出是战战兢兢的，时刻准备着一遇外面有情况立刻又缩回去。但是，过了一阵他便毫无顾虑地掀开了被子，在床上坐了起来。看样子这人肯定不会是埃尔朗格了。现在出现在K.眼前的，是一个五短身材、气色颇佳的先生，他那张脸呈现着某种矛盾的统一，即脸蛋像孩子一样胖乎乎的，眼睛也是孩子一般闪动着快活的光，然而那高高的额头、尖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两片嘴唇好像总也闭不拢——还有那几乎快要化为乌有的下巴，却又一丝孩子气也没有，反倒泄露出他有的是一个精于算计的脑瓜。大概正是因为他对自己有这种能耐、对自己这个人感到心满意足的缘故吧，他现在还保留着相当多健康的稚气。“您认识弗里德里希吗？”他问。K.的回答是否定的。“可是他认识您。”那位先生微笑道。K.点了点头，这儿认识他的人多的是，这甚至是他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我是他的秘书，”那先生说，“我叫比尔格。”“对不起，”K.说着便伸手去握门柄，“很遗憾，我把您的门同另外一道门弄混了。我是应埃尔朗格秘书的约请而来的。”“真是太遗憾了，”比尔格说，“并不是您应约到别的房间去，而是您走错了门使我感到遗憾。我正在睡觉，一旦被吵醒，就肯定再也睡不着了。不过对这一点您也不必太感内疚，这是我个人的不幸。为什么这里连房门都不能关上呢，您说不是吗？当然，这是事出有因的。这是因为按照一个老的说法，秘书的门应该总是敞开着，不过嘛，对这句话自然也不必那么太咬文嚼字就是了。”比尔格用询问的目光快活地注视着K.，同他刚才的怨气相反，他的神色倒是表明他睡眠是相当充足的。像K.现在这样的疲倦不堪的滋味，比尔格也许这辈子还从没有体验过吧。“您现在打算上哪儿去呢？”比尔格问道，“现在是4点钟，您不管去找谁都一定会吵醒人家，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习惯了受打扰，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耐心、不发脾气。秘书们全都是些急性子。所以说，我看您还是再待一小会儿吧，近5点时就有人起床了，那时您再去赴约不就最合适了吗？请您不要老捏着门把，还是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吧，当然这里地方窄了点，您最好是坐到这床沿上来。您一定奇怪为什么我这儿既没有椅子又没有桌子吧？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让我在两个房间里挑一间，一间设备齐全，有一张比较窄的床，另一间除这张大床外只有一个盥洗台。我挑了有大床的这间，卧室嘛，床总是最主要的啦！哎哟，谁要是福气能伸直手脚舒舒服坦睡个好觉，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睡得香的人来说，躺在这张床上简直就赛过神仙！但即便我这个老是感觉疲倦可又睡不着的人，就连我这样的人，也能感觉到它非常舒服，我在这张床上度过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处理所有的信件，在床上对上访各方进行审问。这样办事是挺不错的。当然，上访各方没有地方坐，可是这一点他们能够将就，因为对他们来说，自己站着，让作记录的舒服点，总比自己舒舒服服坐着，同时却得挨骂挨训要好受些。这样一来，我接待来客就只好利用床沿上这个位子了，好在这里并不是办公地点，而只是用来作夜间谈话的地方罢了。哟，您怎么老不开口呀，土地测量员先生？”“我太疲倦了。”K.说，他早在对方让他坐下时就已经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到床上并且靠在床栏杆上了。“当然啰，”比尔格哈哈笑道，“这里每个人都很疲倦。比如说吧，我昨天办的和今天也已经办完的事就不是什么轻松省力的活。我想现在睡着觉，这个可能性简直就等于零。但是万一这件可能性极小极小的事真的发生了，要是万一您还在这里时我竟然睡着了，那么我求求您，请您千万不要出声，也请您不要开门。不过您先别怕，我肯定是睡不着的，最理想的情况也只是睡上一两分钟。因为我的特点是：大概因为我同上访老百姓打交道太习惯了吧，所以在有人陪着我时，我怎么说也是最容易睡着的了。”“您只管睡好了，请便吧，秘书先生，”K.说，心里对比尔格这一安民告示颇觉高兴，“如果您睡了，那么，如蒙您允许，我也睡上一会儿。”“不行，不行，”比尔格又哈哈笑起来，“可惜的是光靠别人请我睡我是睡不着的，只有在谈话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机遇，跟别人谈话对我的催眠作用最大。是啊，干我们这一行神经是要吃苦头的哟。比方说，我是联络秘书。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吧？弗里德里希同村子之间最主要的联络工作”——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乐滋滋地搓起手来——“由我来完成，这就是说，他的城堡秘书们和村秘书们之间的联系是由我负责的，我多半在村里，但并不总在村里；我必须随时随地作好上车去城堡的精神准备。您看见那个旅行包了吧，这是一种多么不安定的

生活呵，不是每个人都干得了这种工作的。然而另一方面，要说我恐怕已经离不了这个工作，这话也对，让我去做任何别的工作我都会觉得味同嚼蜡的。土地测量员工作如何？”“我没有做这个工作，这里并没有安排我做土地测量员工作。”K.说，这时他已经没有怎么注意听比尔格说话了，实际上他此时此刻最最热切盼望的，就是比尔格赶快睡着，然而就是这种渴望，也只是在某种对自己身体的责任感驱使下产生的，在心灵深处，他感到自己很清楚比尔格究竟什么时候睡着实在是一件既不可望又不可及的、遥遥无期的事。“唔，这很稀奇，”比尔格精神抖擞地把头一甩说道，接着便从被子底下抽出一本笔记簿，准备记下点什么，“您是土地测量员，却没有土地测量员的工作。”K.木然点点头，这时他早已将左臂伸直搭在床栏杆的顶端，并把头枕在臂上，在此之前，他反复摸索试验了多种如何坐得舒服一些的办法，最后发现还是这个姿势最理想，像这样待着，他也能更好地注意比尔格在说些什么。“我可以继续关心这件事，”比尔格说下去了，“在我们这里肯定不会容许有这样的事，就是让一个专门人才闲着，使他不能人尽其才。对您本人来说，这也一定是很憋气的，难道说这样您不觉得难受吗？”“我是挺难受的。”K.慢吞吞地说，心里不免忍俊不禁，因为恰恰是现在他丝毫不为这件事感到难受。另外，对比尔格的积极表态他也不怎么感兴趣。那是句十足的外行话。对聘任K.的背景、对这一任用在乡里和城堡里遇到的各种困难、对K.在此地逗留期间已经出现或初露端倪的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这一切全是一团漆黑，甚至连一丁点儿说明自己对这些哪怕只有一点风闻的表示也没有——而这对一个秘书来说恐怕是点起码的要求吧——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拍着胸脯说就凭他那个小小的笔记本，经他一举手之劳，就能把上头的事情纳入正轨，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您好像已经有过一些失望的经历了。”比尔格说，这句话却又的确表明他还是有一定的知人之才的，自从迈进这间屋子以来，K.也总在不时告诫自己不要低估了比尔格，但是处在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下，除去对自己的疲劳之外，要对任何别的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是很困难的。“不，”比尔格说，好像在回答K.的一个思想，似乎想照顾他一下，省得他再费口舌把那个想法说出来，“您不要被那些失望吓倒，这里的某些事情似乎是专为吓人而安排的，而您如果是新来的，那么就会觉得这些障碍简直是一堵铜墙铁壁挡住您的去路。我不想深究这种情形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也许表面现象真的与实际情况相符，处在我的地位，我缺乏观察问题所必需的一定的距离，所以不好断言，但是请您注意，有时候又的确会出现一些同这里的总体情况几乎完全相悖的机遇，如果碰上了这种机会，一句话、

一个眼色、一个会心的手势就能比一辈子疲于奔命的劳累收获更大。的确，情况就是如此。当然，这类机会到最后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同总体情况完全一致，那就是它们从来就利用不上。我老是纳闷，究竟为什么这些机会不能得到利用呢？”K.不知道为什么；尽管他感到比尔格说的跟他大概有很大的关系，但他现在对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事都十分反感，他把头往一边挪了挪，好像在给比尔格的问题让路，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同这些问题完全脱离接触了。“还有，”比尔格继续说，一边说一边又是伸懒腰又是打哈欠，这与他那些话的严肃内容形成尖锐的矛盾，令人迷惘，无所适从，“秘书们经常抱怨他们被迫在夜间进行村里的大部分审讯。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抱怨呢？是因为夜间审讯太累人吗？是因为他们觉得夜里的时间最好是用来睡觉吗？不是的，他们肯定不是为这些而诉苦。当然，秘书有勤奋的和不大勤奋的，这在哪里都一样；但是他们谁都不抱怨工作太累人，更不会公开诉苦。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作风。在工作上我们不分普通时间和工作时间。这样来区分时间对我们是格格不入的。那么，秘书们究竟为什么才不满意夜间审讯？难道是为了体恤照顾上访老百姓吗？不，不，也不是这个原因。对上访的各方秘书们是丝毫不讲情面的，当然，他们对待自己也同样毫不留情，决不手软，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待老百姓。其实，这种不讲情面不过是铁面无私地执行公务、严格按公职的要求办事罢了，而这，正是上访老百姓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大的体恤照顾。这种铁面无情实际上也是——当然一个只看表面现象的人是看不到这点的——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可的，譬如说，这里恰恰是夜间审讯大受老百姓欢迎，从没有任何原则上反对夜审的诉状送到官府来。那么，到底为什么秘书们仍然对夜审反感？”K.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连比尔格是真想从他口里听到问题的答案还是只做做样子也弄不清楚。这会儿他心里想着的是：如果你让我躺到你床上去睡一觉，那么到明天中午，或者更好一点，到明天晚上，我就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了。但是比尔格看来一点没有注意到K.的表情，他满脑子转来转去的只是他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顾不上其他了：“据我的观察和我自己的亲身经验，秘书们在夜审问题上大致说来有如下这一层顾虑：夜间同上访百姓谈话之所以不大合适，是因为在夜里很难、或者简直就不可能完全维持谈话的公事公办性质。这并不是出于某些表面的原因，各项应当履行的程序在夜里当然也完全可以和白天一样严格遵循，要多严格就可以多严格。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夜里很难做到秉公而断。夜间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倾向于从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去判断是非，上访各方提出的各项申诉理由常常受到过多、过分的重视，

对上访老百姓的其他特殊情况、对他们的各种烦恼和忧虑等等与断案完全无关的因素往往会加以考虑，而这类考虑也掺杂到判断中来；上访老百姓和官方人员之间的必要界线，尽管表面上泾渭分明，实际上却往往模糊不清，而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应该只是毫不含糊地上面发问下面答话，有时却会出现审问人和受审人互换位置那样一种极不像话的局面。至少，秘书们都这样讲，就是说讲这些话的是一些由于职业上的原因对这类事情异常敏感的人。可是就连他们这样的人——这一点在我们这些秘书中间经常谈到——在夜审中也很少能觉察出自己已经受到了那些不利因素的影响；相反，他们一开始就努力抵制这类因素的作用，所以到最后就自以为还是成效特别特别卓越的哩。但是，事后查看一下审讯记录，常常对它们那些特别明显的弱点和欠缺感到吃惊。这就是一些误断，更具体些说，往往是让上访百姓得了一半是不应当得到的好处，这样一些错误，至少按我们的法规通过一般的简便途径是不可能挽回的。到将来的某一天，它们肯定还要由一个检查机关来加以纠正，但这只能起以正视听的作用，对那些占了便宜的人是不可能再损伤他们一根毫毛了。有这样一些情况，秘书们的抱怨难道不应当说是非常有理的吗？”K.早就撑持不住，已经迷迷糊糊打了一会儿盹，现在又被这个问题惊醒过来。为什么要说这一大套？侃这些干什么？他心里这样问着，一面用困得上眼皮直往下耷拉的眼睛瞅着比尔格，他现在的感觉是：自己眼前的并不是一个正在同自己讨论一些困难问题的官员，而是一件妨碍他睡觉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再也找不出这东西还有什么别的用处。但是，此刻完全沉湎于自己思路之中的比尔格却在微笑，似乎他刚刚成功地捉弄了一下K.，把他引入了歧途，在为此暗自得意。但是他随时准备着立即再把K.拉回正道上来。“不过嘛，”他说，“要说这些怨言完完全全合理，那也还是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讲。虽然没有哪一条规定要求必须夜间审讯，就是说如果尽可能避免夜审并不违反任何一条法规，但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如工作的极度繁忙、城堡官员的特殊工作方式、他们很难从日理万机中抽出身来等等，另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要求对纠纷各方的审讯必须在其他有关调查全部结束之后才能进行，而调查一旦结束又必须立即开始，所有这些情况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就使夜间审讯成了必然的、舍此别无他途的事情。而如果说它们已经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必要之举——下面这话是我说的——那么它们同时也是我们的各项法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至少是一个间接的结果吧！那么，对夜间审讯本身心怀不满大发牢骚，不就几乎等于是——当然我这话有点夸张，不过正因为是一种夸张，我就敢这样讲——不就简直是也在对我们的各项法

规心怀不满大发牢骚了吗？

“反过来说，秘书们也始终有权在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争取不进行夜审，尽量避免夜审所特有的那些或许只是表面上的不利之处。他们实际上也在这样做，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做。比如说吧，他们只批准就那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极少让人担心会横生枝节的审讯内容进行夜审，在审前过细地检查准备工作是否充分。而如果检查结果证明有必要，那么哪怕是在开审前一秒钟也果断地宣布取消所有审讯，又通过往往是先传讯十次不审，到第十一次才真正进行审讯的办法来磨炼自己。也喜欢让一些不直接主管该案因而可以更容易处理本案的同事代审，再把审讯的时间至少定在夜晚开始时或结束时，避开深夜那几个小时，等等。这一类措施还很多很多，秘书们可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让人钻空子、那么好对付的，简直可以说，他们既有极强的抵抗力，同时又极度敏感受不得任何刺激。”K.这一阵一直在睡觉，虽然并不是真正睡着，而是迷迷糊糊半醒半睡，也许在这种状态下他听比尔格说话比起先前在那种困得要命却硬挺着不睡的状态下听起来更清楚。比尔格的话一字一字地撞击着他的耳鼓，但厌恶感减弱了，他感到自由自在，现在已经不是比尔格揪住他不放，现在只是他在时不时向比尔格的方向伸手摸索，唯恐失去这种享受。K.还没有深深沉入酣睡的大海，但已经泡进睡神为他预备的一池清水中了。谁也不许再来抢走他的这点小小的清福！这时他依稀觉着自己似乎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瞧，那不是已经有一群人在那里庆祝这一胜利了吗，他自己，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正在为欢庆胜利而高高举起香槟酒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艰苦奋斗和获取胜利的全过程又重演了一遍，或者，也许根本就不是重复演示，而是现在才真正在奋战，可是胜利却已经提前庆祝了，人们不停地庆贺着，因为人人都知道K.是福星高照、胜券在握了。有一个秘书，赤身裸体，样子很

像一尊古希腊神祇的雕像，K.在战斗中把他挤垮了。那情景非常滑稽，K.在睡梦中看着那个秘书被K.的不断英勇挺进整治得一再惊愕不已，其傲气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下来，每次都不得不把高举的手臂和攥紧的拳头飞快地放下去遮挡他那赤条条的身体，可是即便这样快也还是来不及而窘态毕露，看着这些，K.含蓄地微笑了。奋战持续的时间不长；K.迈开大步，步步为营地向前挺进。这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一场战斗？并没有多大的阻碍啊，只是偶尔听到那个秘书嗓子眼里发出叽的一声尖叫，这个

古希腊的神祇，竟像一个被人胳肢的小女孩那样叽叽嘎嘎地叫起来！最后他不见了，只有K.独自一人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仍然斗志昂扬地转

身去寻找他的对手；但是现在什么人也都没有了，那一帮庆祝胜利的人也全都不知去向，唯有那只摔坏了的香槟酒杯还在地上。K.把它踩了个粉碎。可是碎片扎进了他的脚底，疼得他浑身一抽搐，终于又醒了，这时他心里非常难受，就像一个睡得正香的孩子被大人弄醒时那样。尽管如此，当他一眼看到比尔格那袒露着的胸口时，一个来自方才梦中的念头仍不禁油然而生：哟，这不就是你那个古希腊神祇吗！原来在这儿！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快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但是，”比尔格又开口了，同时若有所思地仰头看着天花板，那样子好像是在记忆中使劲搜寻能说明问题的例证然而却怎么也找不到，“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有那么多的防范措施，上访百姓仍然有可能钻空子，利用秘书们这种夜间才有的弱点——不要忘记：如果算是弱点的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这种可能是非常罕见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种几乎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可能。什么可能？它就是：某一方未经事先报告，半夜里突然来了。您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说这种看起来是非常可能的事是非常罕见的？这不怪您，您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嘛。然而就是您，可能也注意到了官府组织那极度严密、滴水不漏的情况了吧。这种毫无漏洞的严密组织，其结果就是，任何人，不论他是有什么迫切要求打算上访也罢，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必须就某个问题接受审讯也罢，都丝毫没有拖延，多半还在他本人把那件事、那个问题想出个头绪之前，唔，甚至于在他自己知道那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收到传票了。传票是收到了，但这次他还不受审，这时候一般说来事情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但传票他是接到了，所以也就不可能不报自来，充其量他可以在非指定的时间跑来。那好办，只用提醒他一下传讯他的准确日期和具体时间就行了，然后呢，如果他按时又来了，通常都让他先回去，这没有什么困难。传票在上访人手里，上访时间提前登记在案卷里，这就是秘书们的防身武器，虽说并不总是完全够用，然而确实是强有力的武器。当然，这一条只是针对正好主管那件案子的秘书而言的，任何人都仍然可以在半夜三更突然跑来向其他秘书求情。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果真做了，也差不多是白费力气。首先，这样做会大大得罪主管该案的秘书，虽说我们这些秘书之间决不会为谁工作多点少点互相妒忌，我们每人都挑着一副分量很重的、确是毫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地揽到自己肩上的工作担子，但在上访各方面前，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主管范围混乱、职责不清的事情发生的。某些人打输了官司，正是因为他们以为，既然在主管秘书那里达不到目的，那么到另一位秘书那里去试着蒙混一下兴许就能如愿以偿。第二，这种到别的秘书那里去蒙混的企图是一定会失败的，因

为一个非主管秘书，即便是在半夜遭到猝不及防的袭击，即使他满心意愿帮忙，也恰恰因为他不是主管人而几乎无法比随便哪一个律师更容易插手，或者说实际上是难得多，因为他缺少——就算他确实也能帮上一点忙，因为他总归是比所有的律师先生更熟悉法律上的秘密途径的——因为他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时间去办这件不归他管的事务，他连一分钟也挤不出来。所以，既然希望如此渺茫，谁还肯大半夜冒失跑来麻烦非主管秘书呢？再说，上访老百姓在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之外还要满足主管部门的多次传讯和招呼，做到随叫随到，这些事就够他们整天忙乎了，这‘整天忙乎’自然只是就上访百姓的标准而言，与秘书们的‘整天忙乎’当然还远远不能同日而语。”K.微笑点头，现在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听明白了；并不是因为这些话使他多感兴趣，而是因为他此时坚信在未来的几秒钟内自己必定会睡着无疑，这一回是既不会做梦也不会有任何干扰；一边是主管秘书们，另一边非主管秘书们，前面是一大群整天忙乎的老百姓，他即将在这几部分人中间沉沉睡去，从而摆脱一切了。现在他对比尔格那轻微的、自鸣得意的话音——这声音显然怎么也无法让它的主人入睡——已经非常习惯，以致这声音与其说是妨碍他睡着不如说是在催他入眠了。风车啊，你轱辘轱辘地转吧，风车啊，你轱辘轱辘地转吧，他暗想，你是在为我一人轱辘轱辘转啊。“那么，”比尔格又说下去，一边用两个手指轻轻抚弄下唇，眼睛瞪得老大老大，脖子伸得老长老长，那模样活像他在一次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之后，在似觉山穷水尽之时，眼前突兀出现一个柳暗花明的绝美景点似的，“那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非常罕见、几乎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可能究竟在哪儿呢？这个秘密就隐藏在那些有关主管职权范围的规定里。原来，情况并不是、在一个很大的生气勃勃的组织中也不可能是每件案子只由一个秘书负责。情况仅仅是：一个秘书负主要责任，另有许多秘书则各自分工负责某几部分，哪怕只是负责较小的范围。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即使他是最精明强干的工作能手——单独一人把哪怕是最小的案件的一切复杂关系和方面全部集中在自己的写字台上进行处理？甚至我刚刚说的关于负主要负责的话也都讲得过分了。难道最小的责任和主管范围中不也就包含着全部责任？难道这里不是秘书们处理问题时那股子火热的劲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难道这种劲头不是始终保持十足、始终如一的？尽管秘书们在这方面都有这样那样的差别，这些差别多得难以胜数，但在工作劲头上却是没有差别的。如果一个要求提到了他的面前，要他处理一件他哪怕只负极小责任的事，那么他们当中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坐得住而不立即全身心投入的。当然，对外必须做到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审讯，于是，上访各

方中的每一方都分别由一个固定的秘书负责大面上的活动，各该方有公事一律找他去谈。可是这个人不一定非得是那个对该案负最大责任的主管，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的需要、是组织彼时彼地的特殊需要。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好，那么请您土地测量员先生考虑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吧：上访的某一方，某个老百姓，不知出于什么特殊原因，竟不顾我刚才已经向您描述过的那些一般说来已经足够拦住他的障碍，仍然半夜三更跑去突然袭击一位对该案只负某一部分责任的秘书，对他来个不报自访。您大概还没有想到这种可能吧？这我完全相信您。实际上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因为它几乎永远不会出现。想想看，这个老百姓必须是一颗多么奇特、构造多么特别的小沙粒啊，否则他怎么能够从那把精细得无与伦比的筛子的网眼中间滑过去？你认为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出现吧？您想得对，这种情况确实根本不会出现。可是某一天夜里——谁能对什么事都开保票——这种事真的发生了，你信不信？当然在我认识的人中还没有谁碰上这种事，是啊，虽然这一条很难说明问题，因为我认识的人同我们现在所谈的人从数量上相比相当有限。再者，一个碰上过这种事的秘书是否乐意承认也很难说，怎么说这也是一件纯属个人的、在某种意义上严重触动公务员羞耻心的事吧。然而无论如何，我的经验也许还是能够说明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实际上只在道听途说的传闻中存在而完全未经其他佐证证实的事，这也就是说，害怕出这种事是大可不必要的。即使万一真的出了这样的事，也可以——要是相信能这么做的话——轻而易举地消除它的坏作用，办法就是以实际行动证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种事的地位的。总而言之，如果因为对这种事很害怕，比方说怕得钻进被子里躲起来，连掀开被子往外看一眼都不敢，那就是一种病态了。退一步说，即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事突然有鼻子有眼地站在你面前，难道就一切都完了吗？恰恰相反，一切都完了，这是比可能性最微小的事更不大可能的事。当然，如果某个老百姓已经走进了你的房间，那么情况的确很严重。这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你还能顶多久？碰上这事的人心里会这样问。但是他根本不会去顶的，这一点他心里同样明白。您必须好好设想一下那时的情况，不要想错了。想想看吧，那从来没有见过、天天盼时时盼、真正是如饥似渴地望眼欲穿然而又被不无道理地认为是可望不可及的老百姓，现在活生生地坐在你眼前了。他不用开口，只消在你面前一坐，就等于发出了无声的邀请，请你去了解他的穷苦生活，像关注你自己的财产那样去详细过问他的经济状况，然后跟他一起，为他的要求纯粹是徒劳而苦恼。这种静夜里的无声邀请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一旦接受了这

个请求，你实际上就等于不再是公职人员了。这种情景能软化人心，如果置身其中，很快就无法再拒绝任何请求。严格说来，人那时是处于绝境之中；再严格一点说，他又是很幸运的。怎么说是绝境？因为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处境，他一筹莫展地坐等老百姓提出请求，同时心里又明白那请求一经说出他就得答应，即使它——至少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无异于把官府的严密组织砸烂，也不得不答应——这种处境大概是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可能碰上的最最要命的厄运吧！说是绝境，还特别是因为——撇开所有其他因素不谈——他在这里所做的事等于在一小段时间内擅自黄袍加身，来了个平步青云，突然身价百倍。要按我们的职位，我们是根本无权答应诸如老百姓在这里提出的这类请求的，可是由于夜间上访的老百姓离我们太近，我们的职权可以说也就相应地扩大了，于是我们就向人家保证一些自己权限范围以外的事。唔，我们甚至还会把这些保证付诸实行。老百姓在半夜里，就像森林大盗那样，逼着我们作出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作出的牺牲。很好，这会儿老百姓还在旁边，为我们壮胆，逼迫我们，给我们打气，一切都在昏昏然飘飘然的状态中进行，日子还过得去；可是过后又会怎么样呢？当事情已过，老百姓心满意足地离开我们扬长而去，剩下我们孤零零地、赤手空拳地坐在屋里，面对着自己滥用职权这一事实时，情形又如何呢——简直不堪设想！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又是幸运的。您瞧，幸运有时真是能要了人的命！也许我们有可能尽量向老百姓隐瞒事实真相吧？老百姓靠自己是不差什么也觉察不到的。照老百姓的想法，大概只是某些无关紧要的偶然因素——过度疲劳再加上失望，又由于过度疲劳和失望而顾不了许多而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使他闯进了一间他原本不想去的房间，现在他糊里糊涂坐在那里发愣，就是脑子里想着点什么，也只是想他走错了门或者他太累了那一类事情。那么难道不可以就在他那样想着的时候干脆离开他完事？不行。幸运儿都是噜苏的，这位还非给那个老百姓把什么话都解释清楚不可。他一定得毫不顾惜自己地对老百姓细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个机会是如何非常非常难得，是个独一无二的大好时机；他一定要说明，这个告状的老百姓虽说是完全赤手空拳、无依无靠地——除了告状的老百姓，再没有任何人这样赤手空拳无依无靠了——居然也瞎撞到这个机会上的。但现在要是他愿意的话，您听好，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这会儿就能跟老爷一样支配主宰一切，要办到这点他不需要做什么别的，只要把他的请求随便怎样说出来就行了，上头是有求必应的。唔，请求的实现简直就近在眼前，等等，所有这些，他这个官员都非一一说清楚不可。这是当官的人面临的一道

难关。但是，如果这些也都做完了，那么，土地测量员先生，最必要的事也就全办完了，人就得知足，就该慢慢等着瞧了。”

K.仍在睡，对四周发生的一切处于闭锁锁定的状态。他那起初枕着左臂靠在床栏杆上的头，在睡觉时滑了下来，现在悬浮在半空，渐渐地越沉越低；光靠左臂在上面支撑身体已经不够，K.便不由自主地把右手支在床上作为新的支撑点，然而碰巧正好一把捏着了被子底下比尔格的一只翘起的脚。比尔格瞅了那里一眼，尽管面有不快之色，但仍听之任之，让K.捏着脚未加理睬。

这时，砰砰砰，一边墙上传来重重的敲击声。K.猛可一惊，坐直了身子，抬眼望那墙壁。“是土地测量员先生在隔壁吗？”墙那边一个声音发问道。“是的。”比尔格说，接着就从K.手里挣脱了那只脚，然后突然像个小男孩一样在被子里乱蹬乱踹起来。“那就让他快点过来吧，怎么老是不来。”那边又说话了，命令颇为强硬，对比尔格，或者说对比尔格是否还需要K.再留一会儿完全不予考虑。“这就是埃尔朗格，”比尔格打着喳喳悄悄说，看那样子，对埃尔朗格就在隔壁他并不感到惊异。“您现在马上就到他那边去吧，他已经在发火了，您要设法给他消消气。他的睡眠很好；可是我们说话的声音确实太大了点；唉，一讲起某些事情来，人简直就没法控制自己和自己的声音。喂，您倒是快走呀，瞧您这个样子，好像根本睡不醒似的，快走吧，您到底还想在这里干什么？不必了，您大可不必为您犯困向我道歉，为什么要道歉？人的体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可恰恰是这个限度在任何时候都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谁能左右得了？不能，谁都没有办法。世界就是这样不断调整、纠正自己而保持平衡的。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巧妙得一再令人难以想象的安排，尽管从另一方面看又有点令人伤心。好了，您走吧，我真不明白您干吗要这样盯着我。如果您再拖时间，埃尔朗格就要拿我问罪了，这一点我可是很不希望的。您倒是快走呀，谁知道那边等着您的是什么，我们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机会。不过有些机会可以说是太大了吧，大得人没法利用，有些事情不是因为别的而只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才归于失败。是啊，这真是令人惊叹。顺便说一句，现在我还希望能再睡一会儿。当然，已经五点了，很快就要乱起来的。唉哟，您现在倒是快些走好不好！”

K.睡得正香被猛地一下叫醒，一时只觉昏昏沉沉，恨不能再睡它三天三夜，由于这半天很不舒服的坐姿，又感到浑身疼痛，基于这两方面

的原因，他迟迟未能下决心站起来，而是一个劲儿手摸脑门低头看着自己怀里，就连比尔格那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也不能打动他使他离开，仅仅是感到在这房间里待下去毫无用处，才逐渐在他心中萌生出要走的意念。现在他觉得这房间有说不出的萧索凄凉。是刚刚变得这样，还是一直就是这样，他不知道。就连要他在此地再睡着一次他也做不到。坚信这一点甚至成了他离开的决定因素。于是，他微笑了一下，站起身来，碰上什么就扶什么，就这样扶着床、扶着墙、扶着门一步步走出去，并没有向比尔格道别，似乎他老早就跟这个人告别过了。

第十九章

要不是埃尔朗格站在开着的门口向他招手示意，大概他也会同样冷冰冰地从此人的房门旁边走过去的。说招手，实际上只是伸出一个食指微微弯曲了一下而已。^{〔27〕}埃尔朗格已完全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身穿一件紧领黑皮大衣，领口已经扣上了。一个仆人正一手把手套递给他，另一只手里还举着一顶皮帽。“您早就该来了。”埃尔朗格说。K.想说句道歉话。埃尔朗格一脸倦容，懒洋洋地闭上了眼睛表示谢绝听这类话。“找您来是为下面这件事，”他说，“酒吧原先雇用过一个叫弗丽达的女人，我只听说过她的名字，不认识她本人，我也不管她的事。这个弗丽达有时候给克拉姆端过啤酒。现在好像是另一个女招待在那儿。当然，换人是件小事，可能对谁都是小事，对克拉姆更毫无疑问是小事一桩。但是，工作越是繁重——克拉姆的工作自然是最繁重的——工作越繁重，余下的精力就越少，就越难抵御外界的影响，以至于那些最无足轻重的小事的任何一点无足轻重的变动，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干扰。写字台上每一点最细小的变化，如擦去一直就有的一小块污渍，所有这些事都能形成干扰，一个新的女招待也完全一样。不过，这些变动即使对任何一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时都会产生干扰，对克拉姆却不会，克拉姆是绝对受不到任何干扰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责任保证克拉姆有一个最舒适的环境，这就要求排除一切干扰，甚至包括那些对他来说并非干扰——大概没有什么能干扰得了他——而我们发觉它们有可能对他形成干扰的情况。我们排除这些干扰，并不是出于对他和他的工作的考虑，而是考虑到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良心，让我们自身感到心安。因此，那个弗丽达必须立刻回到酒吧去，也许恰好她回酒吧这个行动会对克拉姆形成干扰，那也好办，我们再把她调走就是了，然而目前她必须回去。我听人说您现在同她一起生活，所以请您立即叫她回去。在这个问

题上不能考虑个人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也不打算对这个问题多费唇舌。如果您在这件小事情上表现得好一点，那么在适当的时候这可能对您的前途是有利的，我提一提这点，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我需要说的话的范围了。我要对您讲的就是这些。”说到这里他向K.点头以示告别，然后戴上仆人递过来的皮帽，由仆人尾随着，迅速地，但有点一瘸一拐地，沿走道离去了。

有时候，这里发出的命令非常容易执行，现在这一条命令也是这样。这不仅仅因为它牵涉到弗丽达，并且，在发令者虽为命令，在K.耳里却像是某种讥笑，不，不仅因为这一点，更重要的还因为K.感到这条命令向他宣布了自己全部努力的破产。各种各样的命令，对他不利的也好，对他有利的也好，都在他头顶上嗖嗖地飞来飞去，就是那些对他有利的到头来也许还是包藏着一个不利的核心，不管怎么说，横竖一切命令都忽视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他自己地位又太低太低，不能奈何它们，更无法制止它们，不能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现在，如果埃尔朗格摆摆手让你走人，你怎么办？假如他不摆手让你走，你又能对他说得出些什么来？K.这样想。虽然他心里很清楚，他今天这样困倦比他在此地的全部倒霉遭遇更加害苦了自己，但是为什么他这个曾经对自己的身体有着十足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就根本不会动身到这里来的人，竟连几个不愉快的夜晚和一个不眠之夜都经受不住，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个地方困得眼睛都睁不开，随时都会倒下去呢？这里谁都不困，或者恰恰相反，人人都犯困意而且老是犯困，然而这种困倦并不影响人家的工作。唔，看来它反而对工作有促进作用。逻辑的结论就是，人家的困倦是另外一种，很特别，与他K.的困倦完全两样。大概这是在愉快的工作中感到的困倦吧；这东西外表看上去像是困倦，实质上则是一种固若金汤的安适，一种固若金汤的平静。譬如人到中午时都感觉有点困倦，这正是顺乎自然的、幸福愉快的一天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对这里的这些老爷先生们来说，时时刻刻都是中午，K.心里这样想。

与K.的这种看法很合拍的是，现在刚五点钟，走道西侧的气氛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些房间里人声鼎沸，听起来充满了极度的欢快。一会儿像一群正要去郊游的孩子那样欢呼雀跃，一会儿又像大清早鸡栏里的雄鸡啼鸣高唱，声声充满那种与清晨同时醒来的喜悦，某处甚至有一位先生真的在模仿公鸡打鸣。走道本身虽然还是空空荡荡的，然而两边的房门却已经活动起来，不断有门拉开一条缝又迅速关上，整条走道一片乱哄哄的开门关门声。K.还看到在天花板与墙壁间的空隙处时不时有一

两个清晨梳洗前头发蓬乱的脑袋露了出来紧接着又缩了回去。现在，远处出现了一辆小车，它慢慢地沿着走道过来了，一个管事仆人推着车，车上装满了文件。还有一个管事仆人走在小车旁边，手里拿着一张清单，显然在根据这张单子核对门上的房间号和卷宗号。在大多数门前小车都停下来；然后，一般说来门也随即开了；接着，那些应当由该房间接取的文件，有时只是一小张纸——在这种情况下房间里便向走道里发话，话不多，大概是责备那管事仆人几句——便被递进屋去。如果门不开，那么文件就被小心翼翼地堆放在门槛上。遇到这后一种情况时，K总觉得这道门的左邻右舍尽管也已经分得了文件，但那些门的活跃程度并无减弱之势，反而更加剧烈了。也许是这些房间里的房客在馋涎欲滴地窥探那一大摞莫名其妙地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取走的文件吧，他们真是弄不明白，怎么居然有人在只需一开门之劳便能享有那批文件的情况下竟迟迟不采取行动。或许情况甚至可能是这样：那批最后一直没有取走的文件有可能分发给其他房间，于是现在这些先生就情不自禁地想通过反复窥探看清那些文件是否仍安然在门槛上放着，也就是说他们是否还有希望再分到一些。加之这些没有取走的文件多半又都是特大的好几捆；K猜测，那道门里的先生或者是想炫耀自己，或者是想捉弄别人，或者也可能出于一种正当的、意欲鞭策一下同僚们的自豪感而暂时让大捆大捆文件放在自己门口吧。当他继而看到以下这个情况时，便更加觉得这一猜测不谬了：有几次，每次都恰好是他把目光稍稍移开时，那个装着大捆大捆文件的、在门口放着展览够了的袋子便被猛地一下拽进屋去，之后门又跟先前一样紧闭不动了；接着近处那些门便也都安分下来，显然是为这一不断弄得人心痒难搔的兴奋灶终于排除而感到失望，或者也可能是感到满意吧，然而不久之后，这些门便又渐次活跃起来。

K观看这一切时不仅满怀好奇，而且并非置身事外。他几乎感觉置身于这一忙忙碌碌的漩涡之中相当惬意，一会儿看看这边，一会儿看看那边，用目光尾随着——虽然时近时远——那两个管事仆人，看着他们分发文件，当然，两人也早就多次回头看他，多次低着头撇着嘴恨恨地瞪他。这项分发工作愈往后愈不顺利，不是清单不完全对，就是管事有时不能很快分清哪些文件应分给哪位先生，要不就是有些先生提出其他理由不接受分给他的文件而要求另外一些。总而言之，出现了必须将某些已经分发出去的文件收回重分的情况。这时，小车就又退回去，管事仆人在门前通过门缝同里面的先生就退还文件一事进行洽谈。这种洽谈本身已经是困难重重了，可是还一再出现雪上加霜的事，即：只要谈判的目的是归还文件，那么恰恰是那些原先最活跃的门现在都对管事仆人

冷面相向紧闭不启，似乎在表示此事绝再无商谈的余地。在这种时候，真正的困难才开始了。那位自认为文件应归他的先生表现出极度的烦躁不安，在他的房间里大吵大闹，又是拍手又是跺脚，并接二连三地通过门缝向走道里大声呼叫某一卷宗号。小车呢，这时往往就无人看管。因为一个管事仆人忙不迭地使劲安抚、劝慰那位烦躁不安的先生，另一个管事仆人则在那扇紧闭不启的门前为归还文件而苦斗，两个人的工作都很难做。那位烦躁不安的先生经安抚之后往往更加烦躁不安，他丝毫无意再听管事仆人的空话，他不要安慰，他要文件。有一次，一位这样的先生从墙头上把整整一盆水浇在管事仆人身上。另外一个管事仆人显然比去安抚的管事仆人级别高些，但他遇到的困难也大多了。如果该先生至少总算还愿意谈一谈，那么就有一连串就事论事的商谈，这时管事仆人援引清单为证，那位先生则援引他早先的记录，证明那上面恰恰就有现在要求他归还的文件，他把它们紧紧抱住不放，捂得严严实实，管事仆人那双急得快得要夺眶而出的眼睛几乎连小小的一角也见不着。然后，管事仆人为了取得新的证据又得跑回小车去，而小车则又由于走道稍有坡度而老是自动滑行了一段距离，使他不得不疲于奔命，或者，他只好到那位声称应是文件得主的先生那边去，把目前占有文件的先生所持的反对意见转达给他，再把他对这些反对意见提出的新的反对意见带回来。这种来回扯皮持续的时间很长很长，偶尔也有达成一致的时候，比如那位先生最后终于交出了一部分文件，或者是又得到别的文件作为补偿，因为问题出在先前分发时张冠李戴了。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形，即被要求归还文件的那位先生不得不毫无保留地割爱交出全部文件，这或许是因为他被管事仆人提出的各种证据逼得无言以对，或许是因为他对这种无休无止的扯皮感到腻烦了。然而不论是哪种情况，在放弃那批文件时都不是把它们递给管事仆人，而是勃然变色，使尽全身力气把全部卷宗远远扔到走道上去，结果是系卷宗的绳子全部开结脱扣，文件纸片满空飞舞，以致两个管事仆人费了许多工夫才把它们重新整理好。但是，这些事情相对说来也都还比较简单，遇上管事仆人一再请求交还文件却根本得不到一点回答的情况那就严重了，遇上对方这样干脆不理不睬，管事仆人就站在那紧闭的门前再三央求，苦苦哀告，不断朗读清单上的有关部分，援引各项规章制度，但一切努力全然徒劳，怎么也听不见屋里有丝毫响动，而未经许可，管事仆人显然又无权擅自进入房间。这样一来，有时就连这位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管事人员也失去了自我克制而不能坚持下去，他回到他的小车旁，一屁股坐到文件上，擦去额头的汗水，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干，只是无可奈何地将悬空的双脚不断甩

来甩去。四周对发生的事兴趣极浓，到处是嘁嘁喳喳的窃窃私语，几乎没有哪一扇门安分守己，高处，天花板下墙头上露出一张张头裹方巾、面部几乎全被蒙住的怪模怪样的脸孔，它们一秒钟也不老实待着，而是不停地蠕动，瞪大眼睛观察底下发生的一切。在这场动乱中，K.注意到比尔格的房门这段时间一直关着，而两个管事仆人已经走过了走道的这一段，却并没有给比尔格分发文件。也许他还在睡吧，不过，在这么吵闹的环境里仍能安然熟睡，不正说明他的睡眠情况极佳？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得到文件呢？像这样小车过其门而不发文件的房间为数极少，而且大概都是无人住的房间。相反，埃尔朗格的房间里现在已经进去了一位特别能吵闹的新房客，估计埃尔朗格夜里简直就是被他赶出屋来的，这种猜想同埃尔朗格那冷若冰霜、大而化之的性格颇不相称，但埃尔朗格不得不站在门槛边上等K.这一事实，又的确让人隐约觉得他是被赶出来的。

K.总是在观看了一阵走道两边的热闹之后很快又回过头来看看那个管事仆人。对于这个管事来说，K.以前听到的那些关于城堡管事们的一般描述，如说他们如何无所事事，如何过着安逸的生活，如何自负等等，真是完全对不上号。可能管事中也有例外吧，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也分成不同的类型，因为K.现在看到了管事中有许多细别，而前此他几乎连这些差别的影子也不曾见到。特别是这个管事仆人那种百折不挠的韧劲他非常欣赏。在他同这许多顽固不化的小房间的战斗中——K.常常感到这是一场人与房间的战斗，因为几乎完全看不到住这些房间的人——这个管事仆人一直在大力拼搏，现在他虽然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谁干这种事能不精疲力竭？——但不多时就又打起精神，就势一滑从小车上跳了下来，挺直腰杆，咬紧牙关，又向下一道尚待攻克的房门大步挺进了。以后的情况是，他又有两三次被打得败下阵来，怎么败下来的？很简单，仅仅是被那气死人不偿命的沉默战术击退了，然而虽然败阵，他却根本没有吃败仗。情况是这样：由于他看到靠明火执仗的进攻是不可能取得任何一点战绩了，就试着改变战术，比如说，要是K.没有看错的话，他决定巧用计谋，进行智取。主意已定，他便佯装不再叫门，像这样可以说是让它自己去逐渐耗尽那沉默的精力，他自己则撇下这道门不顾，转而去对付其他各道门，过了一阵他又回来，并且大声呼叫另一个管事仆人。走路时故意把地踩得很响，呼叫时也是放开嗓门犹如商贩招摇过市，然后他便动手，在那道紧闭的门的门槛上把一捆又一捆的卷宗往高处擦起来。那情景，就像是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现在他认为不仅不能从那位沉默到底的先生处取走任何文件，而是相反，倒是

应该再分发一些给他才合理合法。堆放完毕之后他就走开，然而眼睛的余光始终瞄着那道门。接下去，当那位先生——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打开门以便将那摞文件拖进屋里去时，那管事仆人便几个箭步蹿了回来，急速把一只脚伸到门缝中，这样，就迫使那位先生至少先跟他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从而通常总是可以取得一点差强人意的结果。假如用这种办法仍然不奏效，或者他觉得在某一道门前这个办法不合适，那么就又另辟蹊径。比方说把气力全部使在那位自称是文件主人的先生身上。他把另一个只知道很刻板地干活的管事仆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助手——推到一边去，自己开始起劲地劝说那位先生，跟他打喳喳咬耳朵，样子神秘兮兮的，头伸得老长，深入到屋里去，大概是在那里给那位先生许愿，担保下次分发文件时将给那位拒不交出文件的先生以应有的惩罚吧。不管说什么。至少，他多次指着敌方那道门，如果当时不觉太累的话，还会哈哈笑上几声。不过，约有那么一两次吧，他也完全放弃了一切努力，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時候K.也仍然感到那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放弃，或者退一步说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放弃。因为看吧，他不动声色地往前走了，默默忍耐着那位吃了亏的先生的吵嚷和怒骂，头也不回地走了，仅仅从他过一阵就闭一会儿眼睛这一事实，就可以推知他听着那吵嚷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再过一阵那位先生的火气也就逐渐平息下来，正像小孩子不住地大哭大闹总会渐渐变为间隔愈来愈长的抽噎一样，那位先生的叫骂也渐次变得稀疏了；但即便在风平浪静之后，也还能偶尔听到一声叫喊，或是把门匆匆打开又砰地关上。无论如何，情况表明在这里那位管事仆人大概也是做得完全正确的。最后，只剩下一位先生了，这一位是怎么也劝说不动，他有较长时间不吭声，然而只是为了养精蓄锐，之后便又大吵大闹起来，那劲头比之先前毫无逊色。为什么他这样大嚷大闹，原因不大清楚，也许根本就不是因为分发文件的事吧。现在，管事仆人已经结束了他的工作。只有唯一的一份文件，其实只是薄薄的一张纸，从笔记簿上撕下的一张，是由于那个助手的闪失而落在小车里的，现在无从知道该把它分给谁才对了。唔，这很可能是一份关于我的事情的文件，K.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村长不是说过这是一件最小最小的公事吗？这样想着，不管他自己实际上觉得这种揣测是多么不着边际和可笑，K.仍然移步朝那个此时正专心致志地查看那张纸上内容的管事仆人走过去。这并不那么容易，因为那位管事仆人对K.的积极参与一直横目冷对，就是在刚才最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总忘不了挤出时间，神经质地伸长脖子气呼呼或不耐烦地瞪K.几眼。现在，分发工作已经完毕，他似乎才把K.

稍稍忘记了一会儿。另外他总的来说精神也不如刚才那样充沛，这工作已使他精疲力竭，松弛下来一点也完全可以理解，对于那张纸条他也不那么上心了。也许，他压根就没看纸条上写什么而仅仅装出一副在看的样子而已，并且，虽然他不管把这张纸发给走道两边任何一位房间主人大概都能使那位先生喜出望外，但他仍然作出了另外的决定，对分发文件他已经腻烦了。他把食指竖放在嘴唇上暗示他的伙伴不要作声，随即把纸条撕成碎片——K.这时离他还相当远——然后又把这些碎纸片塞进了衣袋，这也许是K.在此地见到的第一桩执行公务时不按规定办事的例子。当然，也有可能他把这件事也理解错了。另外即使这是一件出格的事，它也情有可原。在这里的这种环境中工作，管事是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的，那越积越多的气恼，那越积越多的烦躁，总有个爆发的时候，而如果说这爆发仅仅表现为撕碎一张小小的纸条，无论如何也是不应怪罪的了。听吧，就是到了现在，那位横竖不听劝的先生那刺耳的喊叫声还在走道里轰鸣，而他的同僚们呢，在别的问题上，他们相互间并不太友好，而在眼前这大吵大闹的问题上，看来意见倒是完全一致的；渐渐地，事态的发展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仿佛那位先生专门承担了代表全体在那里大喊大叫这项任务，所以这些观众自然唯有不断喝彩，频频点头称是，鼓励他坚持闹下去了。可是现在那个管事仆人根本就不再理睬这一套，他的工作已然结束，他指了指小车的扶手示意另一个管事仆人准备推车，然后两人便同来时一样，推着小车离去了，所不同的只是现在两人已经完成了任务，心情高兴一些，所以把小车推得飞快，使得那车子也在他们前面欢蹦乱跳起来。只有一次他们突然一惊回头看，原来，那位一直不停地大喊大叫的先生——K.此时正在他房间门前转悠，因他很想弄明白此公究竟意欲何为——显然是好半天找不到台阶下，这时大概发现了电铃按钮，于是，也许因为终于找到了解脱的出路而欣喜若狂吧，就立即停止了大声嚷嚷继而连续不断地按起铃来。紧接着其他房间里便掀起一场交头接耳的低声细语，似乎对此表示支持，看来那位先生是做了一件所有的人早就想做，而仅仅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不得不作罢的事情。或许，那位先生是想按铃叫侍者，也许是想叫弗丽达来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让他按下去吧！弗丽达这会儿正在忙着给耶里米亚冷敷，退一步说即使他现在感冒完全好了，她也没有时间来，因为那样一来她就躺在他的怀抱里了。不过这电铃一响倒也真是立竿见影。瞧吧，那远处，贵宾楼的老板不是亲自忙不迭地跑过来了吗？他同往常一样穿一身黑，而且扣得严严实实；可他跑得飞快，像是忘记了自己的尊严；他双臂向两旁半张着，那样子，就像是这里出了一件很大的

祸事，叫他来，为的是要他将那肇事的孽障一下子抱住然后马上把它捂死在胸前似的。在奔跑过程中，只要铃声稍有不规则的变化他都像被蜚了似地蹦起来，然后跑得更快。他身后，离他有一大截远，他的妻子也跟来了，她也是张着双臂，然而却忸忸怩怩，碎步小跑。K.心想，她一准迟到无疑，等她到时，老板肯定已经把该做的事全做完了。为给飞奔过来的老板让路，K.把身子紧紧贴在墙上。但老板却恰恰在K.的身边停了下来，好像K.就是他飞奔的目标。不多一会儿老板娘也到了。于是，两人同时左右开弓，劈头盖脸对K.扎扎实实地来了一顿数落。他们说得太急，他又处于猛然受惊后惊魂未定的状态，所以两人劈里啪啦说些什么他一点也听不懂。特别是那位先生的铃声也掺杂其中，甚至别的房间的电铃也来凑热闹，一时铃声大作，现在按铃已不再是为了救急，而只是为了取乐，是乐不可支的情绪的宣泄了。因为很想听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所以这时K.心甘情愿地让老板挽起他的手臂同他一起快步离开这个喧嚣之地。这种噪音此时仍有增无已，原来在他们身后——K.根本没法回头看，因为老板从这一边，更加气势汹汹的老板娘从另一边，两人喋喋不休地对他两面夹攻把他钳制住了——走道两旁的门现在已经全部敞开，随即走道上也热闹非凡，只听见人声嘈杂，熙来攘往，恰似一条熙熙攘攘、比肩叠背的小胡同，他们还没走过的那些门，显然在急不可耐地等着K.快些过去，以便能赶快把住在里面的先生们释放出来。而与这一切混响成一片的，是不断嘟嘟噜噜尖叫的电铃声，此未伏而彼已起，似在欢庆一次胜利。直到最末了——这时他们又来到了安静的、白雪覆盖的院子，这里有几辆雪橇在等着——K.才逐渐听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老板和老板娘都不能理解，K.怎么竟敢做出这样胆大妄为的事来。“可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呢？”K.一再问，但很长时间问不出个所以然，因为对那两个人来说，他的过错是太明显，太不言而喻了，所以他们压根不考虑K.还会安什么好心。又过了好大一阵子，K.才弄清了一切。原来他在走道里逗留是不合法的，在一般情况下，他至多可以去到酒吧为止，而且还得经上头恩准，上面并有权随时撤销这一许可。如果他是受某先生传讯而来，那么他当然必须到指定的审讯地点去，然而在那里也必须时刻牢记——他总不至于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吧？——自己是待在一个原本不该自己去的地方，仅仅是由于某位先生万般无奈，纯粹出于公务所需，从而可以得到公务通融，才勉为其难把他叫了来。因此，他就必须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接受审讯，一旦审讯完毕就尽可能更加迅速地离开，才是正理。难道他站在那里走道上竟连一点点与周围气氛格格不入的感觉都没有吗？如果说有，那么又怎么能在那里来

回转悠，像牲口在草地上那样？难道他不是被传来夜审的吗？难道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实行夜间审讯？夜间审讯的目的——这里K.又听到了一个关于夜审目的的新解释——难道不仅仅是为了让老爷先生们能够安心听取那些他们白天看见就受不了的老百姓申诉？夜里审问可以进行得快些，又能在不太强的人为的光线下进行，而且可以在审讯之后睡一觉，以便把那些丑陋的面孔和姿态全部忘掉。可是，K.的行为完全无视所有保证审讯顺利进行的措施。连鬼都在天快亮时就回避，而他K.却大模大样地待着，两只手揣在衣兜里，那副神气倒像是在等着整条走道两边所有房间里的先生们走，而他自己是不走了！至于说到走嘛——这一点K.完全可以相信——只要有一星半点可能，老爷先生们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走，因为老爷先生们都是非常非常体贴人、做事非常非常讲究分寸的。比如决不会有哪位先生跑来把K.轰走，就连要求他快点走那样的实际上是理所应当的话他们也都不会说。尽管当K.站在旁边时他们很可能气得发抖，而且他们的黄金时间——早晨就这样白白被糟蹋了，但是谁也不会去催K.走，他们宁肯自己受罪而不愿去咄咄逼人地质问K.。当然，他们同时也可能抱着一线希望，即K.也终于一定会逐渐觉察到那种凡是长着眼睛都能看到的令人十分难堪的场面，然后，眼见先生们那样痛苦，自己一定也会对自己这样一大清早非常刺眼地在这里众目睽睽下杵着愈来愈感到痛苦不堪，直至最后无法忍受而自动走开。他们的这个希望是落空了。他们不知道，或者因为他们心肠太软、爱民如子，不肯承认这世上居然还有那么些麻木不仁的、任何敬畏官长的教育也感化不了的榆木脑瓜、铁石心肠。就连那小小的昆虫扑灯蛾，不也会在天亮以后去找个清静的角落趴伏着，恨不得钻到地里去，做不到这一点就表现出一副沮丧的样子？K.却相反，明目张胆地走到最惹眼的地方去站着，而且，假如他靠这个办法能阻止白天到来，他也会照干不误的。他不能阻止白天到来，但是可惜却能够推迟白天的到来，使白天很难开始。他不是站在旁边看到分发文件了吗？这是除了直接有关人员以外谁都不许旁观的，是连他们，老板和老板娘，在自己的酒店里也都不许看的。这项工作他们只是听到别人很笼统地说过一句半句，譬如今天，就是听两个管事仆人这么讲的。难道他就没有看到分发文件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说起来，原本决不应该这样，因为老爷先生们每位都一心一意想着公务，从不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必然是竭尽全力促使分发文件这项很重要的、根本性的工作做得又快、又顺利、又不出差错的。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如此之困难呢？难道他K.真的就没有想到，哪怕只是有过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一闪念，即一切困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分发工

作不得不在几乎是关着房门的情况下进行，老爷先生们之间没有可能直接交流思想——如果他们能当面交流当然只需一眨眼的功夫就能互相心领神会——而通过管事仆人做中间人，必然使分发工作费时费事，持续好几个钟头，决不能十分顺利，这样不论对老爷先生还是对管事仆人都是一种难挨的痛苦，并且对今后的工作很可能还会造成有害的后果。要问为什么老爷先生们不能面对面交流思想吗？**噶**，K.怎么就老是不明白呢？像K.这样怎么说都不开窍的人，她老板娘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说到这里老板立刻插嘴说，他也同样从没见过这种人——呢，连他们这样的同五花八门的犟脾气打过交道的人，都从没遇到过！看吧，任何别的时候都不敢说的话，现在也得跟他一字不落地讲出来，要不他就连最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好吧，既然非说不可，那就全说出来得了：就是因为他，仅仅是因为他一个人，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老爷先生们才不能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因为他们在大清早，在刚起床不久时太难为情、太容易冲动，所以不愿把自己暴露在生人的目光面前；尽管他们已经穿得衣冠楚楚，仍然感到自己全身露出的部分实在太多而不愿让人看见，至于为什么他们感到难为情，原因很难说，也许他们这些不知疲倦、一心只想着工作的人是在为他们竟然睡了觉而感到难为情吧。但是，比被人看见也许更加令他们感到难为情的是见到陌生人；经过夜审，他们很庆幸自己总算好不容易把面对老百姓、看见老百姓这道难关、这个不堪忍受的苦难熬过去了，现在他们又怎么愿意让这种使人遭罪的众生相突然活灵活现地再次闯进自己眼里来？这样的打击他们是绝对经受不住的。谁要是不尊重他们的这种感情，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哟！对了，这种人就只能是同K.一样的人了。他这样的人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大大咧咧，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法律和最起码的对人的尊重一概不放在心上，害得分发文件的工作差点进行不下去，酒店的声誉被破坏也满不在乎，又破天荒地一手造成了空前的严重事态，即把老爷先生们逼到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使他们也不得不来自卫，在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自我克制之后，忍无可忍地甚至动用电铃呼救求援，以便把这个用别的办法怎么也搬不动的K.赶走！连他们，老爷先生们，都起来呼救了！假如老板、老板娘和酒店全体服务人员敢不叫自来，敢在一大早就自己跑到这里老爷先生们跟前来露脸，哪怕只是很快地来帮一下忙马上就离开，那么，他们不是早就都跑过来了吗？他们一直就在走道的这一头入口处等着，被K.的荒唐行为气得发抖，又为自己一点劲也使不上只是干着急，那其实是怎么也没料到的电铃声，倒是把他们从这种又气又急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了。好了，现在最要命的时候总

算过去了！要是这会儿能够看一眼老爷先生们在终于摆脱了K之后那种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活动场面该有多带劲啊！当然，对K来说事情还没有过去，他必须为他在这里制造的混乱和破坏负全部责任。

他们边说边走，这时早到了酒吧里面。为什么老板虽然怒气冲冲但还是把K领到这里来，原因不大清楚，也许是他不管怎么说也看到K现在太疲劳，不可能这会儿就叫他离开酒店吧。到了这里，K没等叫他坐下听候发落便一屁股坐到一只酒桶上，简直就是瘫倒在那儿动弹不得了。在放酒桶的这个黑咕隆咚的角落里待着，他觉得很舒服。这个很大的厅堂里，此时仅有一盏光线微弱的电灯在啤酒桶龙头上方发出光亮。外面仍旧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并且好像还起了风雪。既然在这儿待着这么暖和，就该知是感恩，谢天谢地，还要赶紧想法防患于未然，可别被人赶出去了。老板和老板娘一直还站在面前守着，似乎他这个人即便到了眼前这种地步，身上也还是蕴藏着某种危险，似乎因为他这个人一点也靠不住，所以目前决不能排除他有突然一跃而起，溜之大吉，然后再次窜入走道兴风作浪的可能。老板和老板娘两口子也因为这一夜的惊恐和起得太早而相当疲劳，特别是老板娘，她穿着一件绸子般窸窣响的咖啡色大摆连衣裙，扣子没全扣上，腰带也没有完全系利索——在那么匆忙的情况下，她这是从哪里翻出来的？——她的脖子像折断了似的，头软绵绵地靠在丈夫的肩上，用一块细布小手绢轻轻擦拭眼睛，时不时像孩子一样狠狠地瞪K一眼。为了宽慰一下这对夫妇，K说他们刚才对他讲的这些他全是第一次听到，但是虽然他一点不知道这些，他本来也不会在走道里待那么久，因为在那里他确实无事可干，更谈不上想折磨任何人，造成那一切不愉快的罪魁祸首，完全是他的过度疲劳。他说，他要谢谢两位，是他们一举结束了那个令人难堪的局面，如果说要追究他的责任，那么他非常乐意配合这样做，因为只有查清情况才能防止以讹传讹，以免众人误解他的行为。他的错误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太疲劳。而他所以这样疲劳，又是因为对审讯的紧张还不习惯。他来这里毕竟还为时不久。如果将来他在这方面有些经验了，类似的事也就不会再发生了。或许他把审讯看得太重，可是重视审讯本身总不是什么缺点吧。他今天得接受两次审讯，一次紧接一次，第一次在比尔格处，第二次在埃尔朗格处，尤其是第一次，弄得他精疲力竭，不过第二次倒没有多长时间，埃尔朗格只是请他帮个忙，可是两次加在一起就超过了他一次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样的事如果换了别人，比方说让您老板遇上了，也许同样会承受不了的吧。其实，第二次审讯完他已经是东倒西歪地离开审讯地点的了。当时他简直可以说是

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因为他是第一次见到那两位先生，初次听他们谈话，但又必须回答他们的问题。就他现在记得起的来说，他觉得两次的结果都不错，可是接着就发生了那些遗憾的事，然而如果体察一下他在此之前所经历的特殊情况，恐怕很难把这件憾事当成罪过记在他账上吧。可惜只有埃尔朗格和比尔格两个人了解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及精神状态，而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他们是一定会关照他一下从而也就避免了后来发生的一切的，这特殊原因就是埃尔朗格审讯一结束就必须走，看起来是要去城堡，而比尔格呢，很可能也被那场审讯弄得很疲劳——所以怎么能要求他K.精神饱满地坚持到底呢？——而睡着了，他甚至因此睡过了头，把整段分发文件的过程都耽误了。如果他K.也有和比尔格类似的条件和福气，那么他一定会求之不得地抓住利用和享受一番，而非常乐意放弃站在一边看那些严禁观看的事情，更何况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来说他实际上根本什么也看不成，放弃这个一饱眼福的机会也就更加容易办到了。既然他什么好戏也没法看，所以就是那些最敏感最爱难为情的老爷先生们也可以不必羞羞答答，只管大着胆子在他面前亮相也无妨了。

K.提到两次审讯——特别是同埃尔朗格的那一次——以及他谈起两位先生时的尊重态度，使老板对他的印象好了一些。眼看他就要答应K.的请求，允许他在几只桶上放块木板，躺在木板上至少睡到天亮了，可是老板娘却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她才发现她的连衣裙没有穿利索，于是一面毫无用处地东拉拉西拽拽，一面不住地摇头。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事关酒店纯洁性的争论，又已经箭在弦上，眼看就要爆发。对于疲劳困倦已极的K.，这夫妻俩现在的谈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是再让人从这里赶走，他觉得是比迄今为止所遇上的一切倒霉事更大的不幸。即使店主夫妇最后联合起来整治他，也不能让他们把自己轰走！这样想着，他便蜷缩在酒桶上机警地盯着两人，静观待变，作好应变准备。终于，老板娘出于她那早已引起K.注意的异乎寻常的敏感，突然横向跨出两步——大概她已经同老板又谈了几句别的话了吧——叫道：“他老盯着我看个什么劲儿！快叫他走人！”K.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他坚信自己一定能留下，把握大到几乎神情坦然毫不在乎的程度，他说：“我不是在看你，我只是在看你的连衣裙。”

“看我的连衣裙干吗？”老板娘气鼓鼓地说。K.耸耸肩。

“走吧！”老板娘对老板说，“他喝醉了，这个流氓。就让他在这儿睡

一觉醒醒酒得了！”于是她又大声呼唤佩碧，佩碧应声从暗处走了出来，头发凌乱，一脸睡意，手里懒洋洋地拖着一把扫帚，老板娘命令她给K. 随便扔一个枕头过去。

第二十章

当K.醒来时，他起初感到好像跟没有睡过差不多，这酒吧间同他睡前一样空空的，仍旧挺暖和，四壁一片漆黑，啤酒桶龙头上方那盏电灯已经熄灭，几道窗户也是黑魆魆的。但是当他一伸懒腰，枕头掉在地上，铺板和酒桶格格作响时，佩碧便立即走了过来，于是他得知现在已经是晚上，他已经睡了远远超过十二个小时。白天，老板娘曾几次问起他，还有盖尔斯泰克，今天清早K.同老板娘说话时他就已经在啤酒桶旁边暗处等着找K.，但是到后来就不敢再打搅K.，白天他又来过一次，想看看K.当时情况怎样了。最后，据说弗丽达也来过，在K.身边站了一会儿，但她主要不是来找K.，而是必须在这里做各项准备，因为到晚上她就该恢复原职了。“她大概不再爱你了吧？”送咖啡和点心来时，佩碧问道。但她说话时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恶狠狠的语气，而是调子低沉，似乎在这一段时间里尝到了世上邪恶的滋味，在这种邪恶面前她自己那点狠劲不啻小巫见大巫，没有什么作用了。现在她像对待一个难友那样同K.说话，当K.尝了尝咖啡，她好像看到K.感觉咖啡不够甜时，便跑去为他拿来满满的一盒糖。当然，她的情绪低沉并没有妨碍她今天也许比上次花更多工夫打扮自己；她身上扎的蝴蝶结和头发上编的丝带琳琅满目，额头的刘海儿和鬓角的头发都精心烫过，衬衣的领口开得很低，脖子上戴着一串项链，一直垂到裸露的前胸。这时K.已经美美地睡了一觉，现在又能享用上一杯很好的咖啡，当他心满意足地偷偷伸手去摸佩碧身上的一个蝴蝶结，想把它拉开时，佩碧懒洋洋地说了声：“放开我吧。”然后就在他旁边的一个酒桶上坐下来。根本不等K.问她有什么苦恼，她自己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一边讲一边呆呆地盯着K.的咖啡杯，似乎在讲述中也需要一点排遣，似乎她连在讲自己的苦恼时也不能完全一心一意地集中精力叙述，因为这已经超过她力所能及的范围了。K.首先听到，原来他自己才是佩碧伤心的根子，不过她说她是不会以牙还牙的。在讲述中，她不住地点头，不让K.有插嘴反驳的机会。她说，他起先把弗丽达从酒吧间带走，这就使她佩碧有了升迁的机会。弗丽达坐在酒吧里，就像蜘蛛稳坐在自己编织的网中央一样，蛛丝抽得很长很长，伸到四面八方，都同哪里有关系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想违反她的心意把她挖走是

绝对办不到的，只有爱上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就是同她的位置天差地远极不般配，才能迫使她离开酒吧这一位置。除去这个原因，实在是再想不出会有什么别的因素能使弗丽达放弃酒吧这个岗位了。而她佩碧呢？她什么时候想到过要争取这个位置？她是客房女招待，这是个不大重要的、没有多少前途的工作，她也像每个姑娘一样梦想着有美好的未来，人不能禁止自己做梦，但是她没有认真想过自己哪天会高升，对现有的工作她已经很知足了。现在呢，弗丽达一下子离开了酒吧，事情来得那么突然，老板当时身边没有合适的人替代，在他匆匆忙忙找人时目光便落到了佩碧身上，当然，听到这个位置出现空缺，她自己也使劲往前钻了一下。那时候她在爱着K，以前她还从没有爱上过谁。来酒吧前她成年累月坐在底下她自己那间又小又暗的屋子里，已经打算就在那里无声无息地过上许多年，情况最糟的话甚至过上一辈子。可正好在这个时候K.突然出现了，一个英雄，少女的救星，他一来就为她扫清了升迁路上的障碍。当然，他一点不了解她，他也不是为了她的缘故才做那件好事，但这丝毫无损于她对他的感激之情，正式起用她到酒吧的头一天夜里——那时是否用她还没有最后决定，但已经是八九不离十的事了——她不是花了几个小时跟他谈话，把感谢的话悄悄说给他听了吗？另外，他自愿把恰恰是弗丽达这个包袱而不是别的什么背到自己背上，这更增加了他的英雄行为在她心中的分量。为了使佩碧能出头，他把弗丽达认作自己的情人，这个行动包含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忘我精神。弗丽达，这是个长相难看、瘦小单薄、未老先衰的女人，头发又短又稀，除此以外还是个阴毒的女人，她总是有点什么秘密，这大概跟她的外貌有一定关系。既然她脸上和身上那副寒碜相是明摆着的，那么她至少得有另外一些别人没法细查和弄清的秘密可以唬唬人吧，比如说她自称同克拉姆有亲密关系。当时佩碧甚至产生过如下这些想法：难道K.可能真正爱上弗丽达？他爱弗丽达会不会只是自己骗自己？或者他干脆就只想骗骗弗丽达？会不会到头来这一切的唯一结果只是佩碧的提升呢？K.以后会不会发觉自己错了，或者不想再掩盖自己的错误了，于是就不愿意再见弗丽达而只想见佩碧？这后一点完全可能不是佩碧想入非非，因为，姑娘跟姑娘比，她是完全有资格同弗丽达较量一番的，这谁也不会否认。再说实际上的确也主要是弗丽达那个位置，加上她一副伶牙俐齿把这工作吹得天花乱坠，才把K.一时蒙住了。在这些考虑的鼓舞下，佩碧就梦想着，在她有了这个位置以后，K.就会来找她，追求她，那时她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答应K.，丢掉这位置；要么拒绝K.，可以步步高升。而她现在就为自己仔细考虑好了，她决定放弃一切前程来低就K.，让他好好

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爱，这种爱他在弗丽达那里永远得不到，这是不受世界上任何显赫职位影响的爱！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并不像她设想的那样。到底是谁的过错？主要就是K.，第二当然是狡猾透顶的弗丽达。首先是K.，因为，K.究竟想干什么呀？真是个怪物！他到底在追求什么，他脑子里转的尽是些什么重要得不得了的事，到头来竟然把最亲最亲、最好最好、最美最美的东西完全忘记了？佩碧是个牺牲品，一切都是胡闹，一切都完了；她真恨啊，谁要有本事放火把这整个贵宾楼酒店点燃、烧光，就像把一张纸放到火炉里烧得一点不剩那样，那么他今天就是佩碧的心上人！是的，话说回来，佩碧调到酒吧来了，就在三天前，快吃中饭的时候。这里的活真不容易，简直就是要人的命，可是能办成的事也真不少。佩碧就是在来这里以前也没有糊里糊涂混日子，虽然她从来不敢异想天开得到这个位置，但她确实对这个工作观察了很久，知道它有多重要，她并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工作的。没有准备谁都不敢接这个活，否则做几个小时就要丢掉这份差事。要是把做客房女招待的一套搬到这里来，那就丢得更快！当客房女招待会逐渐觉得孤苦伶仃没人关心。那种工作就像在矿井底下干活，至少在秘书们的走道里是这样。在那儿，一连好多天，除了几个白天来打官司的，就是那么几个跟风似的呼呼进去呼呼又出来连头都不敢抬的老百姓，顶多再加上另外的两三个客房女招待。此外你就什么人也见不着了，就说那两三个同事吧，也差不多跟自己一样，也是一肚子的怨气。早上根本不准走出自己的房间，那时秘书们想自己单独待一会儿，早餐由仆从从厨房直接给他们送去，通常这事同客房女招待没什么关系，进餐时间也不许到走道上来。只是在老爷先生们工作时，才让客房女招待进屋去收拾整理，但当然不是去有人住的房间，而只能去那些正好空着的房间，干活时又得手脚特别轻，不许出声，以免打扰老爷先生们工作。可是，轻手轻脚、不出声音怎么可能呢，老爷先生们已经在那些房间住过好几天，加上仆人们——那些脏得要命的家伙——在房间里干活时毛手毛脚乱折腾一气，弄得房间在交给客房女招待收拾时简直不成样子，恐怕古时候的大洪水^[9]来了也冲洗不干净呢！全都是些高贵的老爷先生，这一点儿不假，但是收拾他们住过的房间就得使劲忍着恶心免得呕吐。客房女招待的活儿说起来倒也不是太多，可干这种活得有过硬的耐性才行。还有，永远听不到一句好话，耳朵里灌满了责骂，特别是这句最让人伤心的、老挂在嘴边的责骂：说是在收拾房间时丢了文件了。事实上什么都没丢，我们就是拾到一张小纸条也都交给了老板。当然，文件倒也确实丢过，但那不是收拾房间的姑娘们弄丢的呀。然后就来了专门调查组，

姑娘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屋子，调查组就在她们的床上乱翻一通，姑娘们实际上没什么财产，她们那一点点细软用一个背篓全装下了，可是调查组还是要在她们屋里找上几个小时。当然他们什么也找不着，文件怎么会跑到那儿去呢？姑娘们要那些文件干什么使？但是，调查的结果又只是听那些大失所望的调查组先生们通过老板转达过来的骂人话和恐吓话。再就是从来没有个安宁的时候，白天没有，夜里也没有，吵吵嚷嚷直到半夜，一大清早又乱起来。倒是别非让人住那儿也稍微好点啊！可又一定得住在那儿，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老爷先生们想吃点东西，就得吩咐厨房做各种小吃送去，这里就有客房女招待的事，尤其是夜里这样的事情不少。他们总是突如其来用拳头猛捶女招待的屋门，大声吩咐要吃什么，女招待就得赶忙记下来，飞快跑到下面厨房里把正睡觉的厨房小伙计推醒。老爷先生们要的食品从厨房取回来后，又用托盘盛着放在姑娘们的屋门口，然后仆人们再从那儿把这盘吃的端走给老爷先生们送去。这一连串的忙乎真是够折腾人的了。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呢。最受不了的反倒是没人来叫你预备吃的，就是说深更半夜，当谁都应该在睡觉、而且大部分人总算真的已经睡着了时，在客房女招待的屋门前间或听到有人蹑手蹑脚走来走去。遇到这种情况姑娘们便都从床上爬下来——床是双层的，姑娘们的屋子很窄，整个房间说实在的也就是个大的三斗柜罢了——爬下床趴在门上竖起耳朵细听，几个人都跪在地上，吓得紧紧抱着不敢动。门外那吡啦吡啦的脚步声总是没完没了，老听得见。要是那人干脆进来，大家兴许也就安心了，可什么事也没有，没有任何人进屋里来。姑娘们只好对自己说，不一定真有什么危险，也许只是哪位老爷在姑娘们的屋门前踱来踱去，在考虑要不要订小吃，最后还是定不下来，可能也就只是这么回事了，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也许是跟要小吃毫无关系的什么别的事。实际上女招待们哪位老爷也不认识，因为简直见不着面。总之，姑娘们在屋里吓得半死，而当外面终于安静下来时，她们就靠在墙上，浑身瘫软，怎么也爬不上床去了。现在这种日子又在等着佩碧，已经通知她，要她今天晚上就搬回到自己原来的床位去。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K.和弗丽达啊。她这才刚刚逃出来，又要叫她回到那种生活中去，虽说K.帮了一把，但她自己也是费了天大的劲才从那里逃脱出来的啊。真是太难受了！干那种工作，姑娘们会越来越邋遢，就连那些一向非常细心注意自己外貌的姑娘也是这样。让她们打扮给谁看呢？谁都不看她们一眼，充其量只有厨房里的师傅和伙计；要是哪个姑娘觉得让他们看看自己就心满意足了，也许她还打扮打扮。但是除此以外就总是待在自己那间小屋里，要不就在老爷先生们的房间

里，在那儿，穿得干干净净哪怕只进去一趟也是拿这些衣服开玩笑，也是一种浪费！还有，老在灯光下，见不到一点阳光，整天呼吸潮湿的空气——所以屋里断不了生火——弄得人事实上什么时候都感到很乏。每周唯一的一次放假一个下午，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厨房中随便哪个小隔断里待着，可以不受惊吓地安心睡上一觉。所以说打扮干什么？是的，几乎一件像样的衣服都不穿。想想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佩碧突然被调到了酒吧。如果想要在那里站稳脚跟，那么需要的正好相反，那儿是被众人的目光包围着，那许多酒客当中有非常挑剔、非常讲究的老爷先生，所以必须尽量穿得好一些，让人看着感到舒服。唔，这是人生的一次转折，佩碧可以骄傲地说，她在这个转折中没有一点疏忽和闪失。至于事情以后会怎样，她可不费那个心思去想、去担忧。她一心一意想的就是自己有干好这个工作所必要的全部才能，这一点她深信不疑，这种信心她现在仍然保持着，谁也抢不走，就是今天，她打了败仗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夺走她这个信心。只有一点，就是刚调来的头一段时间她该怎样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个工作的确很难，因为她原先是个可怜巴巴的客房女招待，一无衣裳二无首饰，并且老爷先生们也没有耐心等待她学会新的一套，而是一上来就要求她完全像个正经八百的酒吧女郎那样，否则他们就会拂袖而去。也许有人会想，他们的要求恐怕不能说太高吧，不是连弗丽达都能使他们满意吗？但这是不对的。佩碧以前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曾经多次同弗丽达见面说话，还有过一段时间跟她住在一起。要想识破弗丽达的诡计是很不容易的，谁要是不大留神——有哪位老爷先生是很留神很细心的呢？——谁就立刻上她的钩。没有谁比弗丽达自己更清楚她的长相够多寒碜的了。比如说吧，谁头一回看见她把头发披散开都会非常可怜她，由不得把手掌合拢来求上天保佑她，像这样的女人，要是不走邪门歪道，那是连当客房女招待都不够格的；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时夜里为这个伤心痛哭，抱住佩碧，把佩碧的头发拉过来往自己头上盘。可是她一上班，所有的自卑、自暴自弃情绪就全都无影无踪了，她把自己看成最美最美的人，又很会来事，变着法儿让每个人都觉得她美。她把人都琢磨透了，这倒是她的真本事。她不用动脑子，张口就能撒谎，就能骗人，要让对方还来不及仔细看看她就掉进她的圈套里去。不过光靠这一手，时间长了当然不够，人都是长着眼睛的，眼睛总归是分得清黑白的吧。不过，她一旦感觉出有某种危险，马上就又准备好了另一手，最近一段时间的例子，就是她同克拉姆的关系。哼，她同克拉姆有关系！谁不信可以自己去调查核实嘛；去克拉姆那里亲自问一问好了！真是太狡猾，太狡猾了！要是万一你不敢仅仅就

为了这么个问题去找克拉姆；要是你即便带着一些比这不知重要多少倍的问题也许仍然得不到许可去见克拉姆；还有什么，哦，要是你觉得你一辈子也休想见得到克拉姆本人了——只是你和你这号人，别的人，比方说她弗丽达就不同，她是什么时候想去，连蹦带跳就去到他身边——那又怎么办？好了，就算情形是这样，你也还是可以弄清事实真相的，很简单，只要等着瞧就是了！你想想看吧，克拉姆是绝对不会长时间容忍这个捏造出来的谣言的啊，他肯定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追查酒吧里、客房里人们都讲了些什么有关他的话，议论他什么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发现有谣传，他就会立刻辟谣，一有说错的，他就会出来纠正。

可是他并不出来辟谣，不出来纠正；那就说明没有什么可纠正的，可见事情就半点不掺假了！瞧，这一手多厉害！是啊，人们看见的只是弗丽达把啤酒送到克拉姆的房间里去，然后拿了钱又从那里出来；而没有看见的呢，弗丽达就会讲，人们就只好相信她的。一般都会这样以为。可是弗丽达并不讲这些，这些都是秘密，她怎么能随便乱讲？她不讲，可是这些“秘密”不胫而走，在她周围传开了，然后呢，既然“秘密”已经公开，她自己也就不怕再讲这些事了，但是讲起来又很有分寸，从不提新的事实，只重复那些反正谁都知道的内容。也不是什么都说，比如，自打她到酒吧以后，克拉姆啤酒比以前喝得少了，不是少了很多，然而确实是明显地少了，这件事她就不谈，这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反正近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克拉姆就是觉得啤酒味不如以前好，或者是因为有了弗丽达的缘故连喝啤酒都忘了。总而言之，不管这事多么让人吃惊，弗丽达还是成了克拉姆的情人！好，连克拉姆都满意，别人还能不啧啧称赞？所以这个弗丽达一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个大美人，一个安插在酒吧里再合适不过的女人；唔，她简直太美，太有本事，酒吧这么块小地方都快容纳不下她这个大能人了。事实上也真是这样——人们都奇怪她为什么还一直待在酒吧里。当个酒吧女郎不那么简单，从这点上看，她同克拉姆的关系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这位酒吧女郎已经成了克拉姆的情人了，那么为什么他还要让她待在酒吧里，而且还让她待那么久？为什么他不把她提拔到一个高一些的位置上去？你可以对人们说上一千次，说这里没有什么矛盾，克拉姆这样做是有一定理由的，或者说弗丽达的提升是会说来就来的，说不定就在明天、后天。但是讲这些话全都没有多少作用，人们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想法，不管你怎样能说会道，他们很难最终改变这些看法。不是已经没有任何人怀疑弗丽达是克拉姆的情人了吗？就连那些明明是更了解内情的人也太烦、

太累，不愿意再怀疑了。他们心想，就算你是克拉姆的鬼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人吧，可如果你真的是，那么你倒是也用你的高升证明给我们看看呀。但是人们什么证明也没看到，弗丽达还是原封不动待在酒吧里，一点没有挪窝，她心里其实还在暗暗庆幸呢！可是在人们心目中她的面子受到了影响，这一点她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察觉，她一贯就是个三年早知道嘛。一个真正长得很美、又待人热情的姑娘，只要习惯了酒吧的工作，根本用不着耍什么花招玩什么手段；只要她长得美，又不出什么特别的、倒霉的事，那么她是会一直当酒吧女郎的。但是一个像弗丽达这样的姑娘就不能不经常担心失去自己的位置。当然，她很聪明，这种担心从不外露，反倒常常发牢骚，对这个工作老是骂骂咧咧的。可是暗中她一直在观察着人们情绪的变化。于是她发现人们对她渐渐冷淡了，她来到人前时，人家连抬抬眼皮看她一眼都嫌累，就是仆人们也不再理她，这伙人也多长了个心眼，只去找奥尔嘉和跟她差不多的姑娘。弗丽达又从老板的态度和举止上看出，她越来越不是不可缺少的了，又不可能层出不穷地不断编造关于克拉姆的新故事，凡事都有个限度啊，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弗丽达便决定采取一个新行动。唉，要是有人能马上识破她这个招数就好了！她佩碧是隐约感觉到这一招的，可惜也并没有识破它。弗丽达决定制造一桩耸人听闻的事件：让人听说她，这个克拉姆的情人，现在突然随随便便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这个男人如果是个最不起眼的小人物效果就更好！这就一定会引起轰动，人们会长时间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到最末了总归又会回想起她原来作为克拉姆的情人意味着什么，而敢于在新欢的迷醉中抛弃这一荣耀体面又说明了什么！要实现这个打算，困难的只是找到合适的男人来同她一起串演这出聪明的把戏。这人不能是弗丽达的熟人，甚至不能是仆人中的一个，因为，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先是惊奇得目瞪口呆瞅她一阵，然后就继续走他的路，主要是他不会表现出足够的认真合作态度。这样一来，那就不管多么伶牙俐齿，也不可能让人相信她弗丽达是遭到突然袭击，抵抗不住对方的强暴、在拼命挣扎中失去了知觉这才被他占有的。这个男人虽然必须是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又必须可以让人相信，尽管他冥顽不灵、举止粗俗，可是又不去追求别人而偏偏追求弗丽达，让人能相信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我的老天——同她弗丽达结婚！另外，这人虽然得是个普通老百姓，地位也许比一个仆人还低，甚至低得多，但同这人来往，又不至于引起每个姑娘的讥笑，在这个人身上，另一位有眼力的姑娘也许哪一天会发现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好了，究竟上哪儿去找这么个人呢？要是换了别的姑娘，大概一辈子也找不着。弗丽达走运，好运

气把土地测量员给她送到酒吧里来了，也许恰恰是她第一次有这个打算的那天晚上。啊，土地测量员！是呀，K.到底在想什么？他脑子里有些什么特别的打算？他想达到什么特别的目的？想谋一个好职位，想受到奖励？他是在打这类主意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从一开始起步时就没有搞对路。看吧，他什么都不是，看到他那副惨相谁心里都难受。他是土地测量员，就是说他学过点什么，可是他有这套本事在这里什么都干不了，这种本事还不是跟没有一样？而且他又提出一些要求，没有一点后台就提要求，不是明目张胆地提，可你感觉得到他在提一些什么要求，真是叫人又好气又好笑。他知道不知道，连一个客房女招待同他说话时间长了点都会觉得脸上无光？好，带着这一堆特殊要求，他到这儿的头一晚上就扑通一下掉进到处是刺的陷坑里去了。难道他不害臊？弗丽达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迷住了他？现在他总可以交代一下了吧。难道他真的会爱上她吗，这个又黄又瘦的女人？不会的，哪里是什么爱，他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她，她只告诉他说，她是克拉姆的情人，他还觉得这算条新闻呢，这个重磅炸弹扔出来，他一下子全完了！不过这样一来她就得走人，在贵宾楼当然不会再有她的位置了。佩碧就在他走前的那天早上还见到她，酒店的全体服务人员都跑来了，谁都想看看热闹呗。那时她还很得人心，大家都还为她的走感到可惜；所有的人，包括她的对头在内，也都为她的走感到遗憾。瞧，她的如意算盘第一步就成功了，什么，降低身价钻进这么一个男人的怀抱，这一点谁都不能理解、无法相信，于是就都觉得是命运对她的打击，在厨房干活的那批使女，她们当然是对每一个酒吧女郎都很佩服、很羡慕的，这时就都非常伤心。甚至佩碧也被这场面感动了，连她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尽管她的注意力实际上是集中在别的方面。她注意到，弗丽达其实并不难受。在大家眼里，怎么说也是个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了，所以表面上她倒也装出一副非常伤心的模样，可是装得不到家，她这套把戏瞒不过佩碧的眼睛。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难道是有了新欢感到幸福？根据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不可能。但是，不是这又是什么呢？是什么给了她力量，使她竟能面对着当时已经算是她的接替人的佩碧仍然能够一如往常，大面上和颜悦色不失分寸？当时佩碧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为了走上这个新岗位，她要做的准备工作太多了。很可能要她几个小时以后就上班，而她还没有好看的发式、没有漂亮的衣裳、没有高级的衬衣衬裙、没有像样的皮鞋。这些东西全得在几个钟头以内准备好或置备齐全；要是不能把自己打扮得像模像样的，那么倒不如干脆放弃这个位置还好些，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上班不到半小时就准会丢掉这个位

置。还好，这些准备她总算做了一些。做头发她特别有灵气，有一次老板娘甚至叫她来给自己做头发，在这方面她天生一双巧手，当然，对她自己来说，她那一头浓密的长发也是好条件，想做什么发式它们都很听使唤。衣裳也有了办法。她的两个女同事诚心诚意地帮助她，她们组里出一个酒吧女郎也是她们的光荣嘛，再说，如果佩碧将来出人头地，也会有她们的好处的。两人中的一个很早就保存着一块贵重衣料，那是她的宝物，曾经不止一次拿出来给大家观赏，人人交口称赞，也许她梦想着哪天为自己给它派上大用场吧，但现在呢——这一点她做得非常漂亮——现在佩碧需要，她二话没说，立即割爱拿出来了。接着，两人便积极帮助她缝制起衣裳来，就是给自己做衣服，她们也不会比这更卖力气了。甚至可以说干这活她们简直就是兴高采烈心中甜美无比。两人各自坐在自己床上，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边做活边唱歌，每人做完某一部分，就把这部分连同针线等递给另一人，就这么递上递下，干得热火朝天。现在佩碧每想起这件事时，心情一次比一次沉重，因为所有的辛苦全都白费了，她现在两手空空地又要回到女友们那里去了！这是多么不幸的事，造成这个不幸的罪魁祸首拿别人的幸福多不当回事啊，特别是K！当时女友们看到这件新连衣裙都心花怒放，它就像是成功的保证，后来又发现衣裙上有一处还可以加一条小飘带，这样一来就更是锦上添花了。这件连衣裙，难道它不是确确实实很漂亮吗？现在它已经有一点皱，也有几处蹭脏了，有什么办法呢，她佩碧没有第二件了，只能成天成宿穿着这一件。不过，即使这样现在也还能看得出它非常美，就是巴纳巴斯家那个该死的丫头也做不出比它更好看的来。再说这件连衣裙还可以随意收紧或者放松，上下都行，就是说它虽然是件连衣裙，但却随时可以变换成别的式样——这是它一个特别的优点，其实是她们的新发明。当然，给佩碧做衣服也不难，她并不为炫耀自己而把这件事老挂在嘴边，又年轻又健康的姑娘，穿什么都是好看的。困难得多的是设法弄到衬衣、衬裙和皮靴，说实在的，她的失败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在这件事上两个女友也尽力帮忙，可她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佩碧能凑起来的，全是些打了补丁的粗布内衣内裤，没有半高统高跟皮靴，就只好穿普通的皮便鞋代替，穿出去实在是太寒碜了。她们安慰佩碧说：弗丽达不也没有穿得很漂亮吗，有时候她衣服穿得邋里邋遢的就在酒吧里转悠，使客人见了就皱眉头，宁愿让看酒窖的几个小伙子来斟酒也不要她。情况的确是这样，不过弗丽达可以这么干，她已经得宠了，已经有面子了。要是一位高贵的女士偶尔有一次穿着不整洁，还会有更吸引人的特殊风韵呢，可是对一个像佩碧这样的新手，这样行吗？再说弗丽达

根本就不会穿衣服，她压根儿就不懂什么是美。一个人皮肤已经有点蜡黄色了，这当然没法子，可也用不着像弗丽达那样火上浇油，再穿上一件大领口的浅黄色衬衣，结果是一片狗屎黄，瞅着刺得人眼泪都快流出来。退一步讲，即使她不是不懂得这些，那也是太小气，舍不得买好的穿；她挣的钱全都紧紧攥在手心里不花，谁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上班的时候她是不需要花钱的，靠说瞎话、耍花招就够用了，这套本领她佩碧是不想学，也学不会的，所以她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她这样做是为了把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初来乍到时必须这样。唔，要是她当时能有更好的条件充分显示自己的优点的话，那么，弗丽达就是再诡，K.就是再蠢，她佩碧也早就是竞争中的胜利者了。看吧，她头一炮就打得挺响的。当酒吧女郎所必需的那点手艺和知识，她是以前就花力气学会了的。一到酒吧，她马上就熟悉了环境。在干活时，谁也不觉得弗丽达走后这里缺点什么。到第二天才有几位客人打听弗丽达上哪儿去了。工作中一点差错也没有，老板挺满意，第一天他还很不放心，左一趟右一趟跑到酒吧来看，后来就只时不时来瞅上一眼，最后，因为账目也丝毫不差——平均收入甚至比弗丽达在时还要高一点——他就完全撒手，什么事都放心让佩碧去干了。她还搞了一些革新呢。以前弗丽达总是自己监督佣人干活，不说全体佣人至少也有一部分吧，特别是当着别人的面盯得更紧，这不是因为她勤快，而是因为她小气，权欲熏心，害怕把自己手里的权哪怕只是让出一点点给别人。佩碧呢，她把监督佣人干活的事完全交给看酒窖的那几个伙计去做，他们干这个也合适得多。这样一来她就省出了更多时间来管那些贵宾室，使客人们迅速得到服务。尽管如此她还是能同每位客人谈上几句话，不像弗丽达——据她自己说是——所有的时间都保留给克拉姆一个人，把自己跟别人说一句话、稍稍亲近一点都看成是冒犯和伤害克拉姆。当然，她这也是很聪明的一招，因为这样一来，只要她哪回让谁接近一下自己，那个人就会感到受宠若惊了。但是佩碧讨厌这些花招，再说它们对一个初来的人也没有用处。佩碧对每个人都和蔼可亲，而每个人也都对她报以友好之情。看得出，大家都为这次人事变动感到高兴。老爷先生们没日没夜地为公事操劳，当他们在过度劳累之余挤出一点时间坐下来喝杯啤酒时，如果你跟他们说上一句话，关心地看他们一眼，向他们耸耸肩，那简直就能使他们一下子年轻许多。人人都喜欢抚摩佩碧的鬈发，弄得她每天大概得重做十次发型，鬈发和蝴蝶结的诱惑力谁也抵挡不住，就连一向呆头呆脑的K.也不例外。就这样，工作虽然繁忙但收获却很大的、激动人心的几天飞快地过去了。它们要是过得不那么快，这

样的日子要是再有该多好啊！虽然紧张得人都快累趴下，但四天还是太少，说不定再加上第五天就够了，可是四天毕竟是少了一点。虽然在这四天里，如果佩碧没有看错所有向她投来的目光的话，她已经是赢得了一批热情支持她的人和好朋友了，看吧，每当她提着啤酒罐子姗姗走来时，简直就立刻被淹没在一片友好的海洋里。有一个叫巴特迈耶的书记员被她迷得神不守舍，把这一串带有垂饰的项链捧到她跟前，垂饰中嵌着他的相片，当然，这个举动也太冒失了。虽然这件事以及另外一些事都是她的收获，但是说来说去也才四天呀，在四天的时间里，由于佩碧努力，人们可以说差不多快忘记弗丽达了，但是终究还不能完全忘记。如果弗丽达没有制造那桩丑闻使自己继续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那么她兴许还能被人忘得快些，只是出了那件丑事之后，她在人们心中又火起来，也许人们纯粹只是出于猎奇心理才很想见她。一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激不起一点兴趣甚至使他们感到腻味的人，现在由于K.的功劳，由于这个原本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K.的功劳，对他们又产生了吸引力。当然，只要佩碧一天不离开酒吧，一直在酒吧用她的人品和行动吸引他们，那么他们是不会愿意牺牲她去换弗丽达的。可是，来酒吧的大多是些上了点年纪的老爷先生，干什么事情都慢条斯理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要他们完全适应一个新来的酒吧女招待，不管新来的比原来的好多少，也总是需要几天的吧。老爷先生们自己希望快些也不行，无论如何需要有几天时间，就说只要五天吧，但四天是不够的，四天中，佩碧表现再好也总还是被看成一个临时工。还有一个也许是最大的不幸：这四天中，克拉姆虽然头两天在村里，但没有到下面贵宾专用室来。要是他来了，佩碧就算是经受了最大的考验，老实说她最不怕的就是这个考验了，不但怕，她还盼着它快来呢。克拉姆真来了她也不会——当然这种话最好根本不要说出口——变成他的情人，也不会厚着脸皮胡吹自己是怎么攀上高枝的，但她至少能同弗丽达一样乖巧地把啤酒杯摆到桌上，招呼客人时也不会像弗丽达那样拼命套近乎纠缠人招人讨厌，而是彬彬有礼、落落大方，跟客人告别也是一样。如果克拉姆确实想在某个姑娘的眼睛里寻找一点什么的话，那么在佩碧的眼睛里他就能发现这种东西多得不能再多了。可他为什么就是不来呢？这纯粹是偶然的吗？佩碧当时也这样想过。那两天，她简直每时每刻都在盼着他来，就是夜里也在等着他。克拉姆就要来了，她好多次这样想，热锅上蚂蚁似地不断跑来跑去，这不为任何别的，就只因为焦急的期待，因为渴望着能在他来时第一个看到他。接连不断的失望使她伤神，弄得她非常疲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的活才干得不如她本来可以做到的那样出色吧。只要有一点

点时间，她就悄悄溜到楼上严禁服务人员进入的走廊里，在那儿钻进一个壁龛里等着。要是克拉姆现在就来多好啊，她想，要是我能把这位老爷从他的房间里接出来，再把他扶到下面贵宾专用室去多好啊，就是抱我也能把他抱下楼去，不管他有多重我都是不会给压趴下的！但他就是不来。楼上这条走廊非常静，没到过那里根本就想象不出那儿有多安静，一丝丝声音也没有，人待久了真是受不了，那真叫静得吓人，简直吓得人随时想扭头跑掉。可她佩碧也真没出息：十次被吓跑，又有十次再跑上去。这真叫瞎折腾。如果克拉姆想来，那么他自己就会来，可是如果他不想来，你佩碧就是在壁龛里盼得心都从胸膛里跳出来不也白搭，不也没法把他勾引出来吗？这确实是瞎折腾，但是如果他根本不来，那不是差不多等于她佩碧的一切努力都是瞎折腾了吗？唉！可惜他怎么也不来。今天，佩碧知道克拉姆那时为什么不来了。那两天要是弗丽达能到楼上走廊里看见佩碧躲在壁龛里面两手放在胸口上望眼欲穿等着克拉姆出来那副模样，那么她可就开心死了。原来，克拉姆所以不下来，就是因为弗丽达不答应。她并不是靠不断求他最后达到了这个目的，她的请求是到不了克拉姆耳边的。但她这只毒蜘蛛有一张谁也摸不透的关系网。佩碧跟客人什么话都是直说，坦然地大声说，说什么邻桌都能听到。弗丽达一般无话可说，总是把啤酒摆在桌上转身就走；客人只听见她那条唯一舍得花钱买的绸衬裙沙沙响。但是一旦她开口说话了，那么也不是大声直说，而是弯下腰去把嘴凑到客人耳边打喳喳，弄得邻座都好奇地竖起耳朵。她说的大概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然而也不完全是，她有关系网，又靠这几处关系支撑那几处关系，即使大部分关系失灵——谁愿老管她的事？——那么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总还有一处没有断线的。现在她就开始利用这些关系了。K.给她提供了方便，他不是安安分分地跟她待在一起，好好看着他，而是几乎不着家，到处逛荡，东找一个人谈谈，西找一个人聊聊，什么事他都很留意，唯独不注意弗丽达，最后为了让她再自由点，他干脆从大桥酒店搬到空荡荡的学校里去了。瞧这两人的蜜月开始得多棒！但是要责怪K.没有老老实实同弗丽达厮守在一起，别人也许会这样做，佩碧当然决不会。她是觉得谁都没法同弗丽达长期厮守的。可是，既然不跟她一起又为什么不完全离开她，为什么不止一次地离开了又回去，为什么要通过到处奔波制造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在替她卖力？为什么要让人看起来事情似乎是：他只是在同弗丽达接触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废物，想努力使自己配得上弗丽达，于是想方设法尽快向上爬，现在暂时放弃一下同她待在一起，为的是以后可以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来弥补现在遭的这些罪？K.不在

时，弗丽达并没有闲坐着，她是人在学校稳坐——其实大概就是把K.指使到那里去的——眼观贵宾楼的动静，也监视着K.的行动。她身边有两个最出色的信差——K.的两个助手，K.把他们——真是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即使很了解K.，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完全放手让她差遣。她派他们去她的老朋友那里，让人家又想起她来，向人诉苦，说她被一个像K.这样的男人缠住了，说佩碧的坏话，放出风声说她自己不久就要回去，求他们帮助她，苦苦哀求他们千万不要向克拉姆透露任何消息，又做出一副必须爱护克拉姆因此决不能让他下酒吧间来的样子。她在一部分人面前把不让克拉姆下楼说成是对他的爱护，在酒店老板面前就把克拉姆下来说成是她的胜利，提醒老板说，克拉姆是不会再来的了。底下就只佩碧一个人伺候，他怎么可能来？虽说老板没有责任，这个佩碧怎么说也是当时所能物色到的最好的接替人，只是光她顶替弗丽达是不够的，就是仅仅几天也不够！对弗丽达的所有这些活动，K.是一无所知的，就是他不出去到处逛荡的时候，也只是糊里糊涂地躺在她的脚边，而她呢，这时却在心里暗暗数着钟点，盘算着还有多少时间她就要返回酒吧了。但是那两个助手还不仅仅是当跑腿的信差，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用处，那就是让K.心生妒忌，让他对弗丽达继续保持热度！弗丽达从小就认识这两个助手，他们之间肯定是什么秘密也没有的了，但是为了做给K.看，他们竟又害起了相思病，在K.眼里便成了一个危险，就是她和助手的关系会发展成为难舍难分的爱情。于是K.做什么都是为了讨弗丽达喜欢，连最矛盾荒唐的事也干出来，就是一方面他吃那两个助手的醋，另一方面却又容忍他们三人在一起而自己一人出去游逛。他简直成了弗丽达的第三助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弗丽达根据自己多方面的观察，最后决定采取强有力的一着：她决定回酒吧去。事实上也的确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弗丽达这个鬼灵精，及时看出了情势危急，于是抓住时机立即行动，这种本事确实叫人佩服。这种敏锐的观察力，这种当机立断的魄力，是弗丽达身上别人休想学到的功夫。要是佩碧也有这种本事，那么她的日子就不知比现在要好多少了。如果弗丽达在学校里再多待一两天，佩碧就谁也赶不走了，她这个酒吧女郎就站稳了脚跟，人人喜欢她，人人不让她走，而且也挣到了足够的钱可以在那套应急的服装之外再添置些像样的衣服。只要再过那么一两天就行了，那时候什么阴谋诡计就再也挡不住克拉姆下到贵宾专用室里来。他来了，喝上了酒，感觉很惬意，然后，万一发现弗丽达不在，那么也只会对这一人事变动感到非常之满意，只要再过一两天，弗丽达这个人，连同她的丑闻、她的关系网、她的助手，她的一切，就都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她就再无出

头之日了。到那时，兴许她反倒能更紧地靠着K.，并且，假如她还不至于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的话，也许还能真正爱上他吧？不，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连K.也只需要再过一天，就会腻烦她的，就会看清她是多么可耻地欺骗了他，就会明白她的那一套，什么漂亮啦、对爱情忠贞啦，特别是什么克拉姆爱她啦，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他只是再需要一天，连两天都用不着，就可以把弗丽达从家里赶出去，连同那两个所谓的助手，还有他们三人干的那些个龌龊勾当，一齐扫地出门。想想看，就连K.这样的人也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了！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正当她处在腹背受敌的绝境中，正当她可以说是死到临头的时候——K.傻头傻脑的还给她伸过去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她溜了——这一点几乎谁都没有料到，因为太不合常理了——突然间，反倒是她把一直还爱着她、紧紧追求着她的K.轰走了；反倒是她，摇身一变成了在朋友们和两个助手的苦苦催逼下出现在老板面前的大救星了！而且，经过了那次丑闻，她居然能比以前吸引力大得多。看吧，事实证明她既受卑贱者也受高贵者欢迎，只是一时失足被迫投入一个卑贱者的怀抱，但不久就理所应当坚决踢开了他，然后便又同以前一样，对于这个卑贱者也好，对于所有其他人也好，又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所不同的只是，以前人们对她那别人望尘莫及的地位曾经有过正当的怀疑，而现在对这一点却是深信不疑了。她就这样凯旋，老板斜睨了佩碧一眼，有点犹豫——要不要牺牲她呢？她表现得多么出色啊！——但他很快也就被说服，弗丽达的优势太明显，特别是她将能争取克拉姆回贵宾专用室来。现在是晚上了。她佩碧不会闲坐着等弗丽达来耀武扬威地从她手上把这个位置接过去。收入的票款她已经交给老板娘了，现在她可以走了。底下女招待屋里的床位已经为她预备好。她即将回到那儿去，她的女友们将哭着欢迎她，她将气呼呼地把这件连衣裙脱掉，把那些绸带从头发上扯下来，把这些东西全塞到一个角落里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免得她毫无必要地回想起那几天，那是她希望永远忘掉的日子。然后，她就要提起那个大污水桶，拿起扫帚，咬紧牙关去干活了。但是在她快走之前还得对K.把事情原原本本讲清楚，以便他——这个即使到了现在没人指点一下也还是看不清事实真相的人——能明白：他是多么对不起佩碧，害得她现在这样惨。当然，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被人利用了。

佩碧讲完了。她如释重负，喘了口气，擦去眼角和脸上的几滴泪水，然后便看着K.不住地点头，那神情似乎在说，问题实际上根本不在于她如何不幸，这不幸她是承受得了的，在这方面她既不需要别人尤其

是K的帮助，也不需要他们的安慰。她虽然年轻，但已经备尝了生活的艰辛，她的不幸不过是印证了她的生活知识罢了。问题是在K方面，她讲这么多是想把事实真相画成一幅图画拿给他看，即便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她也觉得有必要这样做。“你的幻想也真太不着边际了，佩碧，”K说，“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你现在才发现了你刚说的这一切，这些全是你住在你们下面那间又黑又窄的女招待小屋里产生出来的幻想。放在那间小屋里，这些幻想还说得过去，然而拿到这里来，在这个宽敞的酒吧里，听起来就让人觉得离奇古怪了。抱着这些想法，你在这里站不住脚是理所当然的。就拿你提起来挺得意的那件连衣裙和你的发式来说吧，那是你们那间小黑屋里不见天日的环境中和那张柜子般的床底下长出来的两株怪苗，在那里它们诚然是很美的，但在这里就只能使每个人都暗暗发笑或者大声讥笑了。你还讲了些什么呢？哦，说我被利用了，受骗了。是这样吗？不对，亲爱的佩碧，我同你一样，既没有被利用，也没有受骗。不错，弗丽达眼下是离开了我，或者照你说的，她跟一个助手一块儿溜了，你的确看到了一点点实情，并且她将来成为我妻子的可能性也确实极小，但是，说我已经厌烦她甚至打算明天就把她赶走，或者说她像通常某个女人骗某个男人那样欺骗了我，都是完完全全不符合事实的。你们这些客房女招待习惯了趴在锁眼上偷看别人，渐渐就形成一种管窥蠡测的思想方法，看见个斑点就以为是只金钱豹，看到一粒芝麻就能推论出一个非常了不起、但却完全错误的结论。弄到最后，我在这件事上反而比你知道的少得多！我远远不能像你那样，把弗丽达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原因解释得那么头头是道。我觉得，最接近真实情况的解释是我怠慢了她，这一点你轻描淡写地提到，但没有把它看成真正的原因。可惜这是事实，我的确怠慢了她，但这是另有特殊原因的；要是她现在回到我身边，我是会很高兴的，可是我马上又会开始怠慢她了。事情就是这样。当她在她身边时，我老是东跑西颠的，让你笑话了；而现在呢，她走了，我又几乎无事可干了，我感到很疲倦，巴不得该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才好。怎么办呢？你不能给出个主意吗，佩碧？”“当然可以，”佩碧说，突然活跃起来，两只手一齐抓住K的肩膀，“我们两个都是受骗的，就让我们待在一起吧！来，跟我一块儿到下面姑娘们那儿去！”“如果你老认为自己是受骗的，对此牢骚满腹，”K说，“那么我们两个就谈不通。你总是想要扮演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因为这可以提高你的身价，能增强你的自信。然而事实是你不适合做这个工作。你想，就连我这个在你眼里是糊涂到家的人都能看明白，你干这个工作很不合适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是个好姑娘，佩碧，但认识到这

一点不大容易，比如我就曾经认为你心狠、傲气，可你并不是这样的人，问题只是出在那个工作上，是它把你弄得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你做这工作不合适呀。我的意思不是这位置对你来说太高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重要工作，细想一下也许它比你原来的工作稍微体面些，但是总的说来区别不大，倒不如说这两种工作看上去简直差不离更恰当些。唔，甚至可以说当客房女招待比在酒吧里干活、当酒吧女郎更好，因为在那里总跟秘书们在一起，这里却相反，虽然也可以在贵宾专用室招待秘书的上司们，但是也不得不跟一些地位很低的人打交道，比如说我，不是吗？按规定我除了酒吧以外是不得在任何别的地方逗留的，那么，难道说有可能跟我来往竟是无上光荣、无比体面的事？看来你觉得是这样，或许你有你的道理吧。但恰恰因为这一点你做这工作就不合适。这只是跟别的工作一样的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可在你眼里成了天堂，于是你在这里干起什么来都过分卖力，把自己打扮得跟你心目中的天仙一样——实际上天仙也不是你打扮的那种样子——为这个工作兴奋得发抖，老觉着有人跟在自己后面转，拼命用一些过分殷勤的举动去争取所有你以为可以支持你的人。可是这样一来反而让人心烦，招人讨厌，因为人家到酒店是为找清静来的，不想在自己原有的心世上再添上你酒吧女郎的心事。本来嘛，弗丽达走了这事，可能在那批高贵的客人中谁也没有觉察到，但今天他们全都知道了，而且确实非常希望弗丽达回来，因为也许弗丽达在各方面都跟你的做法完全不同。不管她别的方面怎么样，也不管她是怎么看待这个工作的，有一点没问题，这就是她干这个工作很有经验、很冷静、很善于掌握分寸，这一点你不也特别指出来了吗？可你却不善于从她那里汲取经验。你注意过她的眼神没有？那已经不完全是一个酒吧女招待的眼神而几乎是一个老板娘的眼神了。她一眼就看到了所有的人同时又看到了每个人，而她那双眼睛看每个人的那点点余光，就足够把被看到的人镇住了。也许她是瘦了点，是有几分显老，谁见她都会想要是她有一头更光洁的头发就会更好些，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同她确实拥有的东西相比这些都是小节，而谁如果看见这些缺点老觉得不顺眼，只不过表明他缺乏看到大事的眼力罢了。人们肯定不能指责克拉姆缺乏这种眼力，而你之所以不相信克拉姆会爱弗丽达，只是一个年轻无知的姑娘看问题的错误观点在作怪。你觉得克拉姆——这一点你是对的——高不可攀，于是就以为弗丽达也亲近不了克拉姆。你错了。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我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我也只相信弗丽达的话。不管她的话你觉得多么不可信，不论这些话同你对世界、对当官、对高贵、对女人美的作用的想法如何大相径庭，它们终归

是符合事实的，就像我们两人现在并排坐在这里，我的两只手拉住你一只手，克拉姆和弗丽达大概也曾经这样并排坐着，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当时是自愿下来的，甚至是急急忙忙跑下来的，没有谁在走廊里暗中等着他而耽误应当做的工作，克拉姆只能劳动大驾亲自走下来，弗丽达衣着上的毛病，你见了差点气死，他却根本不在乎。你还硬不相信弗丽达的话！你不知道你这种态度其实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恰恰暴露出你的幼稚无知！就连一个对她同克拉姆的关系一无所知的人，也必定能从她的为人上看出某个大人物的决定性影响——这个人物比你、比我、比村里所有的老百姓都更加重要——又必定能看出她的谈吐超出了酒客们和女招待们之间常见的那些打趣逗笑，而你的生活目标看来不过就是这些与酒客们的说说笑笑吧。不过我对你还是不大公道。因为，你对弗丽达的优点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你注意到了她敏锐的观察力，她当机立断的魄力，还有她驾驭人的本领，只不过你对这一切的解释当然都完全错了；你认为她只是自私自利，使用这一切手段给她自己捞好处、干坏事，甚至用这些当武器来打击你。不对了，佩碧，即使她有一枝枝这样的箭，这么近的距离怕也没有用武之地吧。自私自利吗？我倒觉得正相反，可以说她是牺牲了她已经拥有的和可以期望得到的东西，为我们两人提供了机会，使我们能在更高的工作岗位上表现自己，但我们两个却令她大失所望，于是就简直等于强迫她重新回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另外我也一点不清楚我的过错在哪里，只是每当我拿自己跟你比较时，不知怎的总会蓦地产生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两个太幼稚、太天真、太不懂事，我们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大吵大闹去争取一件东西，这东西譬如说要是用上弗丽达的沉着镇静、用上她的务实精神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到手的，而我们却又哭又叫、胡抓乱搔、生拉硬拽——活像一个小孩揪着桌布使劲往下拽，结果什么也捞不着，只是把一桌山珍海味稀里哗啦全掀到地上，这样一来他自己也就永远别想再吃到这些珍馐佳肴了——我不知道事情是不是这样，但是这比你讲的那些更接近事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是啊，”佩碧说，“弗丽达甩下你跑了，所以你现在又对她犯起单相思来了；她人不在这里，对她犯犯单相思也没什么难的。但是，即使事情全像你希望的那样，即使你什么都说对了，就连你把我说得那么可笑也是对的，可你现在怎么办呢？弗丽达已经离开了你，不论按我的解释还是按你的解释，都没有希望使她再回到你身边。退一步说，就算她能回来，那么在她来到之前这段时间你总得找个地方去打发打发吧，这会儿很冷，你没有工作，二没有床铺，到我们那儿去吧，你会喜欢我那两个朋友的，

我们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你也可以帮着我们干点活，那些活我叫我们几个姑娘干确实太重了，这样我们几个就不会无依无靠了，夜里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走，到我们那儿去！我的两个好朋友也都跟弗丽达挺熟，我们会给你讲关于弗丽达的好多故事，一直讲到你听腻了为止。来吧！我们还有些弗丽达的照片，可以拿给你看。从前弗丽达比今天随和文静，可能你很难认出她来，最多还可以看出她那双眼睛，那眼神当时就有点锋芒毕露了。好了，说了半天，你到底去是不去？”“难道允许我去吗？昨天刚出了那件大丑事，因为我在你们的那条走道上被当场抓住了。”“那是因为你被当场抓住，但是如果你在我们那儿，就不会被抓住的。谁也不会知道你在那儿，就只有我们三个知道。啊，你来了我们多快活呀！现在跟前几分钟比，我已经觉得那儿的的日子不那么难挨了。也许，现在我必须离开这里对我根本就不是多大的损失呢。告诉你吧，就是在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底下那会儿，我们也没有觉得无聊过，人总得苦中作乐啊。我们还年纪轻轻就得过苦日子，不过我们三个很团结，我们尽量把在那儿的日子安排得有意思些，特别是亨丽埃特，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埃米莉也一样，我已经给她们两个讲过你的事了，在那儿，她们听到这些事情总觉得不可信，好像在自己的小屋子外面实际上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似的。屋子里很暖和，很挤，可是我们三个更紧地挤在一起；唔，尽管我们只能相依为命，谁也离不了谁，但是我们谁也不腻烦谁；恰恰相反，只要我一想到我的两个好朋友，我几乎是很乐意再回到那里去的；有什么理由要高出她们一头？本来嘛，把我们拴在一起的，正是我们三个都同样没有什么高升的希望，可是现在我到底还是来了个突破，同她们分开了。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她们，刚一离开她们就琢磨着怎样为她们办点事；当时我自己的地位还不牢靠——究竟能干多久我心里根本没底——可我就已经跟老板谈起亨丽埃特和埃米莉的事来了。对于亨丽埃特，老板并没有完全封口，但对比我们两个都大得多的埃米莉——她跟弗丽达年龄差不多——他的态度就很坚决，不给我一点希望。可是你想想，她们两个根本就不想离开，她们知道自己在那里过的日子很惨，但是这两个心地太善良的姑娘已经认命了。我觉得，我们分别时她们所以流泪，多半因为她们伤心的是我得离开我们共同的房间，要一人到外面冰冷的世界中去了——在那里我们觉得，出了我们的屋子，外面一切都是冰冷的——我得在那些陌生的大房间里同陌生的大人物打交道，目的又只不过是混日子，这一点没出去前我跟她们在一起不是也已经办到了吗？现在我回去，很可能她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仅仅因为受到我的感染，一时心软才会掉几滴眼泪，说上几句对我的命运表示惋惜

的话吧。但是，接着她们就会看见你，就会又觉得我离开她们几天确实是件好事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男人帮助和保护我们，她们是会很高兴的，加上这一点必须严格保密，有了这个秘密我们又会比以往更加心连心，唔，这样一来她们简直会手舞足蹈的！走吧，哎，走啊，到我们那儿去吧！这对你不会成为一种约束，你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一辈子被拴在那小屋子里的。过一段时间，等到开春时，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找到了住处，如果你不喜欢在我们这儿待下去了，那么你随时都可以走。只有一条你得答应，就是到那时你当然也得保守咱们的秘密，决不能出卖我们，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在贵宾楼就待不下去了，当然，现在你在我们这儿也得多加小心，不能在我们觉得危险的任何地方露面，并且什么事都得听从我们的安排。这是对您的唯一约束，对这个你必须和我们一样重视，但除了这点你就是完全自由的了，我们分派你干的活不会太重，这你不用担心。好，又说了半天，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呀？”“到开春还有多久？”K.问。“到开春还有多久？”佩碧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我们这儿冬天很长，老长老长的，而且很单调很无聊。但我们待在下面从不叫苦，那儿很安全，冬天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再说春天、夏天总是要来的，而且它们也许不会很快就过去的；可是在我们的记忆里，现在回想一下，春天和夏天好像非常短，好像两个季节加起来也不过两天多一点似的，而且，就是这两三天时间，甚至就连最晴朗的一天也包括在内，有时也还是会下起雪来呢。”

这时门呀的一声开了。佩碧吓了一跳，因为她的遐想将她带到离酒吧太远的地方去了，但推门进来的并不是弗丽达，而是老板娘。看到K.还在这里，她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K.道歉说，他只是想在这儿等老板娘，同时他要感谢老板娘允许他在这里过夜。老板娘表示不明白为什么K.要等她。K.说他有一个印象，就是老板娘还想同他谈话，如果这是个错误的印象，那么他请她原谅，不过现在他也确实该走了，他是学校的勤杂工，离开那里时间已经太长了。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昨天的传讯上，这方面他的经验还太少，像昨天那样给老板娘添那么多麻烦这种事，以后是肯定不会再发生了。说完这话他就鞠躬告辞。这时老板娘用一种迷离恍惚的眼神看着K.，就像在做白日梦一样。K.本想就走，然而她这种神态一时又拴住了他。现在老板娘脸上又露出一丝笑意，及至看到K.那惊异的表情，她才可说是如梦方醒；似乎是她一直在期待着K.对她那一丝笑意作出回答，由于老是没有反应，这才从梦中醒过来了。“我记得你昨天放肆地对我穿的衣服说了点什么。”K.表示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吗？哼，昨天是斗胆放肆，今天又缩成一团了。”K.当即向老板娘致歉，

说他昨天实在是太疲劳了，在那样的时候胡诌了点什么是很可能的，总之他现在是记不起来了。关于老板娘的衣服，他又能说过些什么呢？也许是说太漂亮了，他还从没见过那么好看的衣服吧。至少，他还没有见过哪位老板娘在工作时穿这样的衣裳呢。“别说这些了！”老板娘迅速打断K，“我一点不想再听你谈论衣服了。我的衣服用不着你管。我严禁你这样胡说八道！”K.再鞠一躬，然后向门走去。“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老板娘又在他身后叫起来，“什么你还没有见过哪位老板娘在工作时穿这样的衣裳？说这种废话是什么居心？这不纯粹是废话吗？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K.回转身来，请老板娘不要动气。他说，这句话当然是废话。他对衣服也确实一窍不通，从他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觉得每一件没有补过的干干净净的衣服都是贵重的。当时他只是看见老板娘半夜三更在那条走道上穿着那么漂亮的晚装出现在所有那些几乎没穿衣服的男人中间感到有些惊奇罢了，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好了好了，”老板娘说。“看样子你到底还是记起你昨天说的话来了。想起了老话，又添上一堆新的胡诌。说你对衣服一窍不通，这倒是不错。既然知道不通，那么就别——我严肃、郑重地向你提出这个要求——瞎议论什么是贵重的衣服啦，什么是不合适的晚装啦……这一类的问题了！总之”——说这句话时她似乎打了一个寒战——“不许你对我的衣服说长道短，你听见了没有？”当K.一声不响，正想转身走开时，她又问：“你关于衣服所知道的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K.耸耸肩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老板娘说，“那你也就别不懂装懂硬充行家。走，到账房那边去，让我来指点你一下，但愿这样一来以后你就会收敛些，永远不再说那些混账话了。”她于是带头先出了门，这时佩碧也一个箭步来到K.身边，她借口向K.收钱，两人迅速商定了下一步的举措。要想脱身是很容易的，因为K.熟悉这个院子，它有一道大门通向侧街，大门旁边还有一道小旁门，他们约定，佩碧在大约一小时后站在这道旁门后面，听到敲三下便开门。

内部账房在酒吧对过，只需穿过门厅便可以去到那里，老板娘现在已经站在亮着灯的账房里不耐烦地看着K.向她走过来。然而半路上又出了一点岔子。原来，盖尔斯泰克早已在门厅里等候K.，要跟K.谈点儿事。要想甩脱他颇不容易，老板娘也过来帮忙，呵斥他胡搅蛮缠。“你到底还是上哪儿去啊，你这到底是上那儿去啊？”门已经关上了，还听见盖尔斯泰克在外面门厅里喊叫，喊声中又夹杂着叹息声和咳嗽声，听起来十分刺耳。

这是一间小屋子，炉火烧得过旺令人感到闷热。屋子呈长方形，靠两边的窄墙分别立着一张斜面写字台和一个铁制钱柜，靠两堵宽墙则分别放着一个大铁柜和一张睡榻。最占地方的大铁柜，它不仅把整整一堵宽墙占满，而且极深，这便使屋子更显狭长，装了三道手推门，要完全打开柜子需将三道门推开。老板娘指指卧榻示意K.可以在那里坐下，她自己则在斜面写字台旁的转椅上落座了。“你是不是学过裁缝？”老板娘问。“没有，从来没学过。”K.说。“你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土地测量员。”“这是干什么的？”K.对此作了解释，老板娘听了直打哈欠。“你没有真话。为什么你不说真话？”“你不也不说真话吗？”“我？你大概又要胡说八道了吧？就算我没有说真话，那又怎么样？——难道我还得向你作交代？我在哪点上没说真话？”“你并不像你自己说的那样仅仅是老板娘。”“嘿，瞧瞧！你的新发现还真不少呢！除了老板娘，我究竟还是什么哟？你这胡说八道确实也太没边儿了！”“我不知道你还是别的什么。我只看到你是一个老板娘，另外又穿着一些不适合老板娘穿的衣服，据我所知，这个村子里除了你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穿这样的衣服。”“好了，现在我们总算说到点子上了。我看你还是憋不住要说的。也许你根本不是放肆胡说，你只是像个小孩儿一样罢了，一个孩子要是知道了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那么大人是怎么也没法让他不到处讲的。好，那你就讲它个痛快吧！我穿的衣服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要是说出来，你准会生气的。”“我不会生气，我只会觉得好笑，小孩子的废话不是只会叫人发笑吗？快说，这些衣服究竟怎么样？”“你一定要知道，那我就说说吧。这些衣服料子很好，相当贵重，但是它们都过时了，装饰得太花哨，翻来改去太多，都穿得太苦、太旧了，既不适合你的年纪，又不适合你的身材，也不适合你的身份。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穿的衣服特别显眼，那是大约一星期以前的事，就在这儿门厅里。”“果然来了！真是要什么有什么！听听，我的衣服都过时了，装饰得太花哨，还有什么来着？你这一套都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我自己看得见，用不着别人教。”“是啊，你当然是一眼就能看出毛病来的。你根本用不着到什么地方去打听，马上就知道什么样的服装是符合时尚的了。这么说你倒是个不可缺少的人才，可以当我的参谋，因为对漂亮衣服我还确实有那么一点偏爱呢。哟，这个柜子里衣服都满了，对这一点你又有什么高见？”说着她推开了所有三道柜门，可以看见，里面的衣服是一件紧挨着一件，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塞满了整个衣柜，大部分是深色的、灰色的、褐色的和黑色的衣服，全都仔仔细细地挂起来和平平整整地摞起来。“这些就是我的衣服，全都像你说的，过时了，装饰得太花哨

了。但它们只是一小部分，是因为楼上我房间里没地方搁才放在这儿的，在那里我还有满满当当的两大柜衣服，两个大衣柜，每一个都差不多跟这一个一样大。你惊呆了不是？”

“没有，我预料的跟你说的的大体上一致；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不仅当老板娘，你心里还有别的打算。”

“我心里只有一个打算，就是穿得漂漂亮亮的，而你呢，你这个人要么是个傻瓜，要么是个孩子，要么就是一个非常坏的危险人物！你走，你赶快走！”

K.已经到了门厅里，盖尔斯泰克又揪住了他的袖子，这时老板娘仍然在他后面大声叫着：“明天我又有一件新衣服做得了，也许我会派人去把你找来的。”

附录

一 小说开头的异文

酒店老板向客人道了安。二楼上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房间。“这是特等房间。”老板说。这房间很大，有两道窗户，两窗之间是一道玻璃门，因为空空荡荡的，所以让人感觉大得难受。屋里胡乱放着寥寥可数的家具，腿一律细得出奇，乍一看可能会以为是铁做的，实际却是木制品。“请不要到阳台上去，”当客人从一道窗户看了看外面的夜色，然后向玻璃门走去时，老板制止他说，“那阳台下面的房梁有点朽了。”客房女招待这时走了进来，先在盥洗台左近忙乎了一阵，然后问房间里炉子生得是否够暖和了。客人点了点头。但是，尽管直到现在他并没有挑出这房间有什么毛病，却仍然不脱大衣，手杖和礼帽也仍然拿在手里，就这样在房中踱来踱去，好像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要在这里住下来似的。老板站在客房女招待旁边。突然间，客人走到两人身后叫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悄悄话？”老板惊恐地答道：“我刚在这里嘱咐这个丫头换床单。很抱歉，我现在才发现这个房间没有完全按我要求那么细心地布置好。不过一切都要马上重新做好的。”“问题不在这儿，”客人说，“我本来就没有期望别的，早料到会是一个很脏的下处、一张让人恶心的床了。不要拿这些来分我的心。我现在只想知道一点：是谁预先通知你我来的？”“谁也没有通知，先生。”老板说。“可你是在等着我来。”“我是客店老板，总是等着客人来的。”“这个房间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我们什么时候都这样。”“好吧，好吧，我承认你原先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不在这儿住。”说到这里他猛地推开一扇窗子，向着窗外大声喊道：“别卸下马缰绳，我们还要上路的！”但是当他急步向门口走去时，女招待挡住了他的去路，她是个瘦小、单薄、简直还稚气未消的柔弱女孩儿，这时她低着头说道：“别走；是的，我们是在等着你来，只是因为我们不大会回答客人的问话，又不清楚你有什么要求，所以才没有告诉你。”姑娘这副模样感动了客人，但她的话又使他心生疑窦。“让我跟这姑娘单独谈谈。”他对老板说。老板犹豫了一下也就走了。“来，”客人于是对姑娘说，然后两人一起在桌旁坐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客人问，将手伸过桌面，拉住姑娘的手。“伊丽莎白。”姑娘说。“伊丽莎白，”他说，“你好好听我说。我现在要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把我一生的都献给了它。我做这件事是心甘情愿，虽苦犹乐的，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可是因为它，就是说这项任务，是我的一切，所以，凡是有可能对我执行任务形成干扰的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会毫不留情地坚决打击，把他们

压下去。告诉你，我毫不留情时是会达到疯狂程度的。”他捏了捏姑娘的手，姑娘看着他点了点头。“那么，你是听懂了，”他说，“那你就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要来的吧。我想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不想问你们对问题有什么看法。我是为了战斗才到这里来的，可我不想在到达前就先挨一闷棍。好了，快说说我来之前这里有什么情况。”“满村的人都知道你要来，我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好几个星期以来大家就都知道这件事了，可能消息是从城堡来的吧，别的不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城堡有人到这儿来通知我我要来？”“不是，谁也没有来，城堡的老爷们跟我们没有来往，可是上头的管事们可能谈起这事，村里的人有可能在那儿听到他们讲，也许消息就这样传开了。这儿很少有外乡人来，所以一谈起外乡人，大家的话就很多。”“很少有外乡人来？”客人问。“唉，”姑娘说着微微笑了——这微笑看起来既亲热又陌生——“什么人家都不来，好像全世界都把我们给忘了。”“这倒也是，干什么非上这儿来呢，”客人说，“难道这里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吗？”姑娘慢慢把手从K.的手里挣脱出来，说道：“你一直还是不信任我。”“说得对，”客人说，站了起来，“你们全是些坏种，而你比老板更危险，你是城堡专门派到这里来伺候我的。”“城堡派来的？”姑娘反问道，“你对我们这儿的情况真是太不了解了！因为不信任，你就要离开这里，你大概马上就要走了吧？”“不，”客人说，同时愤然脱下了大衣，把它扔在一把椅子上，“我不走，你看，就连把我从这里赶走这一条，你也是办不到的！”但是，他突然站立不稳，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就扑倒在床上了。那姑娘立即赶到他跟前：“你怎么啦？”她轻声问，接着便马上跑去拿洗脸盆端来了水，跪在他身边给他洗脸。“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他吃力地说。“我们没有折磨你呀，”姑娘说，“你想让我们帮你做点事，而我们又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就跟我直说吧，那样我就可以照直回答你的问题了。”

二 断片

昨天K.对我们讲了他同比尔格见面的经过。他碰上的偏偏是比尔格，这真是太滑稽了。你们都知道，比尔格是城堡官员弗里德里希的秘书，而弗里德里希的名声近几年是大不如前了。为什么会这样，说来话长，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讲出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反正有一点毫无问题，那就是，弗里德里希的议事簿今天在哪里都很不吃香了，这种情况，对于连弗里德里希的一等秘书都不是而仅仅在一大串秘书中排在最末尾的比尔格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是谁都能看出来。这一点人人明白，

唯独K.不明白。你们看，他已经在我们这儿村里住得够久的了，可是对这里的情况仍然很生疏，就好像昨天晚上刚来似的，就是在村子里仅有的三条街上他也还会迷路呢。他倒是很努力，很留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对自己要办的事也是像猎狗追踪一样紧追不舍，可他就是没法适应这里的环境。譬如我今天跟他讲比尔格的事，他很专心地听着，因为凡是人们讲的有关城堡官员的事都与他息息相关，他边听边提一些很在行的问题，对我所讲的理解得又快又正确，不仅是表面上懂，而是真懂；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到明天他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或者说恰好相反，他全都记住了，什么也没忘掉，但是记的东西太多，各式各样的官员弄得他眼花缭乱，凡是听来的他一概没有忘记，他听到的又太多，因为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增加自己的知识，在对官员的了解方面他也许理论上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在这一点上他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要让他运用一下这些知识，那么他不知怎的总是不对劲，他好像在一个万花筒里团团转似的，那些知识一点也用不上，它们只是使他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说到底，大概这一切全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吧。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他要办的事也就搁浅了。你们知道：他硬说自己是我们的伯爵大人聘来这里做土地测量员的。关于聘任一事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要讲起来那就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我现在在这里不打算扯到这上头去，总之，他被聘为土地测量员，也打算在这里做这个工作了。为了这件小事，他到目前为止已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然而一点成效也没有，这个情况你们至少从道听途说中已经知道。要是换了别人，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已经测量完十个州的土地了，可是他直到今天还在这村子里各位秘书中间来回转悠，东晃晃西晃晃，根本不敢去找城堡官员，至于是否有可能某一天被允许去城堡办公厅，他大概从来没抱过这样的希望吧。他找到那些从城堡到贵宾楼来的秘书已经知足，他一会儿受日审一会儿受夜审，他一再对贵宾楼悄悄进行窥探，就像狐狸悄悄围着鸡栏转，所不同的只是，实际上秘书们是狐狸而他是鸡。这些只是附带说说，我想讲的还是比尔格。从头说起吧，且说K.昨天夜里又一次被传去贵宾楼见埃尔朗格秘书谈他自己的事，他的事主要就是由埃尔朗格主管的。对于这样的召见他每次都感到受宠若惊，兴高采烈，在这方面，失望情绪休想钻进他心里，这一点真是人人望尘莫及！每次新的召见在他看来都是一个新的证据，不是证明在多次失望之上又增加了一次，而只是证明他以前各次所抱的希望又一次来了。于是，在这次新召见的鼓舞下，他就兴冲冲、急匆匆地赶到贵宾楼去。但是他的竞技状态不佳，因为他并没有料到会有这次召见，所以会见前仍在村里为他的事进行了多方面的紧张活

动。他在这里拉上的关系已经比在本地生活了几百年的老家庭还要多了，所有这些关系，全是用来为他做土地测量员一事服务的，因为这些关系都是他经过艰苦努力才拉上的，一旦断线又必须再次经过艰苦努力才能重新接上。所以他必须时时处处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它们。你们得想清楚他的情况：这些关系的线头，简直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可能一不小心就从他手中滑脱掉！所以说他总是一天到晚为这个操心奔忙。可是同时他又挤出时间来跟我或者随便哪一个人扯另外一些离他的正事非常远的闲事，一扯就是老半天，但这样做仅仅因为他认为没有哪件闲事、小事不是跟他那件正事有关的。这样，他就老是忙个不停，说实在的我从不记得他什么时候睡过觉。然而情况又的确是：睡觉在他和比尔格的这个故事中甚至起着主要作用。原来当他匆匆跑到贵宾楼去见埃尔朗格时，人已经疲倦到了极点，他不是没有预料到有这次召见吗，于是就随随便便胡乱安排自己的时间，头天夜里一点没睡觉，这之前的两天也是每夜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因此，接到埃尔朗格半夜召见的传票虽然使他心花怒放，就像接到任何一张这类纸条一样，但同时又使他忧心忡忡，因为精神不佳，这种状态可能会大大影响他，使他不能做到像精神抖擞时那样在谈话中随机应变。好，他来到了贵宾楼，找到了秘书们住的客房所在的那条走道，倒霉的是在那儿碰上了一个他认识的客房女招待。他在这里的桃色新闻也真不老少，一切全用来为他那件事服务嘛！这个女招待有点什么事要跟他讲，是关于另外一个也是他认识的女招待的，就拉他到自己的小屋里去，他二话没说就跟去了——这时还没到半夜——这是他的一条原则啊：决不放过任何能了解到新情况的机会。这种抓紧一切机会的做法除了有好处之外，有时也带来一些很大的坏处。唔，也许几乎总是这样，比如这一次就是如此，你看，当他困得东倒西歪，离开了那个喋喋不休的女招待又来到走道上时，已经都四点钟了。他这时一心一意只想着不能误了埃尔朗格的召见。在一个不知谁忘在墙角没拿走的茶盘上，他发现还有一瓶甜烧酒，于是拿来喝了，精神便稍觉好了些，也许甚至好得过了头，他有了气力，于是就蹑手蹑脚走过这条很长的、别的时候非常热闹但此时却像墓地小路一样死寂的走道，来到他认为是埃尔朗格住的房间门前。为了不致惊醒可能正在睡觉的埃尔朗格，他没有敲门，而是径自推开了门，当然，是极度小心地轻轻推开的。好了，现在我就来把这段故事尽我所能按照K.的原话原原本本讲给你们听，争取一点细节也不漏掉，跟昨天K.带着各种各样绝望到极点的表情给我讲的一模一样。但愿在这次召见后，他又从另一次新的召见中得到了一点点安慰吧。这段故事本身可是太滑稽可笑了，不过你们听着：真

正滑稽可笑的，当然恰恰是描述得非常细致的地方，所以说你们听我的转述肯定会有不少损失的。如果我的转述很成功，你们就有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K，当然对比尔格恐怕至多只能了解到一点皮毛。如果我转述得很成功的话——这一点是前提。因为这个故事弄不好听起来也会味同嚼蜡的，它也还包含着这个因素。不过让我们来大胆试一试吧。

……临别时握了握手，“跟您谈话我真是感到非常愉快，简直可以说，这使我良心上得到了安慰。也许不久还能再见到您吧。”

“可能我还会有事再来的，”K说，弯腰鞠躬时嘴离米齐的手很近了，他想硬着头皮吻这只手一下，但米齐吓得轻轻地惊叫了一声，从他手里挣脱了自己的手，把它藏到坐垫底下去了。“小米齐，亲爱的小米齐。”村长会意地、怜爱地说，一边抚摩着她的脊背。

“我们这里随时欢迎您来，”他说，这话也许是为了帮助K摆脱米齐刚刚制造的这个窘境，但是他接下去又说。“特别是现在，就是在我生病的时候。等到我病好后又能坐办公桌了，公务当然就会把我的时间完全占满的。”

“您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K问，“即便您今天同我谈话也不是公务性的？”

“完全正确，”村长说，“我是没有同您谈公事，可以把这次谈话叫做半公务性质的吧。我说过，您太小看非公务性质的谈话，但是您同样也小看公务性质的谈话。比方说吧，一个公务上的决定，决不像这儿床头柜上这个药瓶一样。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它了。在作出一个真正的公务决定之前，首先必须有不计其数的过细的调查研究，这就需要有一大批优秀的官员长年累月地工作，即使比方说这些官员一开始就知道最后决定是什么也不例外。再说真有什么最后决定吗？检查机关是做什么的？它们的工作就是不让出现最后决定嘛。”

“是啊，”K说，“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细密周详，谁还会怀疑这些呢？不过，您给我把总的情况讲得太吸引人了，说得我不想尽一切办法把所有的细节也完全了解清楚就不能安心。”

K连鞠几个躬以后走了。两个助手另外再用噼噼喳喳、嘻嘻哈哈的特殊方式向主人告别，但不多时也就跟了出来。

在酒店里，K.发现自己的房间已收拾得焕然一新，使他几乎认不出来。弗丽达确实太勤快了，现在她站在门槛上，用一个亲吻迎接他。屋里空气完全换过，炉火生得很旺，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床上被盖叠得整整齐齐，那几个女仆的衣物和她们的相片一概不见了，现在挂在上方墙上的只有一张新照片。K.走近几步，那些相片……

……相反，不管我想走到哪里都行，而且还带着孩子们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在急急忙忙走来走去时我正好到了阿玛莉亚身边，把那只织好的袜子从她手里轻轻拿过来扔到桌上，家里其余的人都已在桌旁坐好了。“你干什么？”奥尔嘉叫起来。“唉，”我说，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你们全让我生气。”然后我坐到灶沿凳上，把刚在那儿打盹的一只小黑猫抱起来放在怀里。我在这里觉得多么陌生，可同时又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啊，到现在我还根本没同两个老人握过手，跟两个姑娘也几乎没说上一句话，跟那个我感到他在这里完全变了样的巴纳巴斯呢，也同样没说什么话。然而我又的的确确坐在温暖的氛围中，这时没人睬我，因为我同姑娘们拌了几句嘴，那只毫不认生的猫呢，沿着我的前胸一直爬到了我的肩上。虽然我在这里曾感到失望，但现在从这里确实又萌发出新的希望来了。巴纳巴斯现在没有去城堡，但是明天一大早他就要去的，而且即使城堡那个姑娘不到这里来，那么也肯定会有另一个姑娘来的。

弗丽达也在等着，然而不是等K.；她在观察着贵宾楼，也在观察着K.的动静。她可以放心了，她的处境比她自己原来料想的好些，她可以毫无妒忌地坦然旁观佩碧怎样吃力地干活，冷眼旁观佩碧怎样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到适当时候她就会出来结束这一局面的。她也可以冷静地旁观K.怎样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四处活动，她是不会让事情发展到他完全离开她那一步的。

三 小说结尾的延续^[10]

盖尔斯泰克一边气呼呼地使劲挥手，似乎想从远处制止同他捣乱的老板娘说话，一边叫K.跟他一起走。要他对此作更多的解释他先是怎么也不愿讲。K.提出反对意见说他现在得上学校去，盖尔斯泰克的反应几乎是无动于衷。直到K.极力抵抗，说什么也不让他拉走时，盖尔斯泰克才对K.说，他不用担心，他需要的东西他家里全有，学校勤杂工那个位置他可以辞掉了，现在他怎么也得上他家去，他已经等了他一整天，他

母亲根本不知道儿子到哪里去了呢。K.逐渐软下来，问盖尔斯泰克供给他食宿交换条件是什么。盖尔斯泰克只笼统地回答说，他需要K.临时帮他管一管马匹，他现在有别的活要干，不过，请K.这会儿别再顶牛，别给他再添多余的困难了。如果他想要工钱，他也会付给他的。但是不管怎样拉怎样拽，K.兀自站在原地不动。他说，他对马一窍不通。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嘛，盖尔斯泰克焦急地说，气得交叉双手，企图打动K.跟他一起走。“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叫我跟你走了。”最后K.说。盖尔斯泰克对K.知道什么一点不感兴趣，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因为你以为我可以替你在埃尔朗格那儿争取到点什么。”“当然啦，”盖尔斯泰克说，“要不我找你干吗。”K.笑起来，挎起了盖尔斯泰克的胳膊，让他牵着自己摸黑上路了。

盖尔斯泰克那间简陋的小屋，只靠灶火的一点点微弱光亮和一支快要燃尽的蜡烛头起照明作用，有一个人，在一个壁龛里那几根凸出来的歪歪斜斜的房梁下弯着腰看书。那就是盖尔斯泰克的母亲。她向K.伸出瑟瑟颤抖的手，让K.在她旁边坐下，她说起话来非常吃力，要听懂她讲什么也很费劲，但她所说的那些……（手稿于此处中断。）

另一稿本

现在盖尔斯泰克终于觉得时机到了。虽然他多时以来一直在琢磨着怎样劝说K.听从他，但是一开口还是相当粗鲁生硬（显然他只会这样说话）：“你有活儿干了吗？”他问。“有了，”K.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在哪儿？”“在学校。”“可你不是土地测量员吗？”“不错，我现在这个位置也只是暂时的，等接到土地测量员的聘书时，我就离开那里。你明白吗？”“明白。到那时还要很久吗？”“不，不，不会很久，聘书随时都可能来，这件事昨天我跟埃尔朗格谈过了。”“跟埃尔朗格？”“你是知道我跟他谈这事的。别再烦我了。快走你的。饶了我吧。”“哦，你跟埃尔朗格谈过了。我原以为这是个秘密。”“我是不会把我的任何秘密告诉你的。那天我困在你门前雪地里，是你对我耍态度说难听话来着。”“可我后来还是用雪橇把你送到大桥酒店去了。”“这倒不假，我还没给你车钱呢。你要多少？”“你有多余的钱吗？在学校你的工钱多吗？”“过日子够用了。”“我知道一个地方，你上那儿干活可以得更多的工钱。”“是不是到你家去照管你那些马？对不起，多谢你的好意了。”“是谁告诉你的？”“你不是从昨晚起就虎视眈眈地要抓到我吗？”“你大错特错了。”“错了就更好。”“这会儿，我看到你这么一副狼

狈相，你，一个土地测量员，一个有学问的人，还是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裳，没有皮外衣，又黄又瘦，看着都叫人伤心，又跟那个小野丫头佩碧串通一气，她大概给你点支援吧——直到这会儿，当我看到这些时，我才又想起我妈说过的一句话，她说：不应该让这个人在走上穷途末路啊。”“这话说得好。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到你家去。”

四 作者删去的文字和段落

〔1〕 可是，难道这些能算是真正的熟人？他听到过哪怕只是一句半句坦率的、热情的话吗？听听这类鼓励是很需要的。因为他心里明白，只要他在此地虚度几天工夫，这短短的时间就会使他永远失去采取决定性行动的能力。尽管如此，他觉得还是不能轻举妄动。

〔2〕 但是过了一两秒钟他便又镇静下来，说道：“我的主人让我问他要他明天什么时间到城堡来。”对方回答：“告诉你的主人，可是别忘记给他传达下面的每一个字：即使他让十个助手打听要他什么时间来，他也永远只能得到一个回答，就是，既不是明天，也不是以后任何时候。”K.恨不得立刻放下听筒。这样的谈话不可能使他的事情有任何进展。他很清楚，自己必须用别的方法，用跟比如说这种谈话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努力。用这样的方法，他不是在同别人斗，而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当然，他是昨天才到此地，而城堡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有了，不能操之过急。

〔3〕 正如K.在想到这个人时总有一些连他自己也觉得与实际不符合的想法——比如说，觉得他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而且只有他K.能分清这两个人，现实生活中两人是没有区别的——现在K.感到并不是自己的计谋，而是自己那副心事重重、不抱多大希望的面孔（尽管是黑夜，他也能看见的）感动了他，他才带自己走的。他的希望正是建筑在这上面。

〔4〕 K.回转身去，想找他的外衣，他打算穿上，湿就让它湿着好了，穿上立刻回酒店去，不管怎么困难也要回去。他认为有必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上了当，而唯有现在马上回酒店，他觉得才是充分承认自己是受骗了。然而他主要是不愿让自己心里产生没有把握的情绪，不想让一件起初看来大有希望、现在却已表明毫无希望的事转移自己的大方向。这时有一只手在轻轻拉扯他的衣袖，他当即甩脱了，连看都不看一

眼是谁的手。

现在他听见那个老头子对巴纳巴斯说：“城堡那个姑娘到这儿来过。”然后他们就低声交谈起来。K.对他们已是很不信任，所以仔细地观察了他们一阵子，以便弄清这句话是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但是情况大概并非如此，那位喋喋不休的父亲东一件事西一件事地对巴纳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时不时母亲也补充一句，巴纳巴斯弯下腰去听他叙说，边听边朝K.这边微笑，好像想让他同他一道为他父亲高兴似的。当然K.不会这样做，但他仍有一小会儿十分惊奇地看着他微笑。然后他转向两个姑娘问道：“你们认识她吗？”她们不明白他的意思，并且还有一点愕然，因为他无意中问得很快而又严厉。他于是给她们解释说，他指的是城堡来的那个姑娘。两人中比较温柔的一个，叫奥尔嘉的——她也表现出些许少女的腼腆，而阿玛莉娅则以一种一本正经、咄咄逼人、冷漠无情，也许还有点视而不见的目光盯着K.——回答说：“城堡来的姑娘么？我们当然认得她。今天她还来过我们这儿呢。你也认识她吗？我想，你是昨天才来的呀。”“对，昨天，可是我今天已经遇到她了，我们交谈了几句，但接着就被打断了。我很想再见到她。”为了表现得不那么唐突，K.又补充道：“她想在一件事情上请人出个主意。”现在他已经觉得阿玛莉娅的目光令人讨厌了，于是说道：“你这是怎么啦？我请你别老这么盯着我看好不好？”然而阿玛莉娅并不道歉，而只是耸了耸肩走开了，她走到桌旁，拿起一只还没织完的长袜，就不再理睬K.。奥尔嘉想为阿玛莉娅这种不懂规矩的态度向K.表示一下歉意，便说道：“她大概明天还要再来我们这儿的，那时你就可以跟她谈谈了。”“好吧，”K.说，“那么我就在你们家住一夜吧；当然，在鞋匠拉塞曼家我也是可以同她谈的，不过我觉得在你们这里更好些。”“在拉塞曼家？”“不错，我就是在那里遇上她的。”“哟，那么我们弄误会了。我指的是另一个姑娘，不是在拉塞曼家的那一个。”“你怎么不早说！”K.叫起来，开始在小屋里来回走，他愤愤地疾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又疾步从那一头走向这一头。他觉得这些人的本性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尽管他们有时也挺友好，但他们又那么冷若冰霜、守口如瓶，他们甚至可以心怀叵测、诡计多端地以K.不认识的老爷们的名义出现，然而这一切却又都至少部分地得到了中和——当然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加强，但K.并不这样看，这不符合他的品性——这是因为他们笨手笨脚、想问题孩子般缓慢、孩子般腼腆，唔，甚至还因为他们有某种唯命是从的奴性。如果能做到扬长避短，利用他们本性中友好的一面，避开那敌对的一面——当然，为达此目的，不仅需要比灵巧更多的功夫，大概甚至还需要他们自己的帮助和合作，舍此别无他

法——，那么他们就不再是障碍，就不会再拖K的后腿，如K.迄今为止一再碰上的那样，那时他们就会成为他的后盾了。

〔5〕 K.更多地想到的是克拉姆而不是她。赢得了弗丽达的心，就要求他改变原来的计划，因为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件武器，有了它，也许原打算在村里花费的全部时间都会成为多余的了。

〔6〕然后就几乎是脱光了衣服——因为每人都不仅用双手，而且用牙齿把对方的衣服全撕扯开——躺在那一汪汪洒泼在地上的啤酒小水洼里。

〔7〕 他现在确实已经学会了游戏对付这部官府机器的本领，掌握了弹奏这架构造精良、总能自我平衡奏出和谐乐音的钢琴的技巧。这种艺术基本上就在于什么也不干，让机器自己转动，并且只用一个办法迫使它转动起来，那就是：以自己这尘世之躯的全部重量岿然不动地站着，纹丝不动地稳站在这里，谁也休想挪动毫分！

〔8〕 “村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一下，向您提一个问题，”K.说，舒适地靠在他的椅子上，不过现在他不像先前那样自在了。他一直在努力促使村长说出一些情况，但村长的话匣子一打开便一发而不可收，使他感到太过分了，“您不是提到过一个检查机关吗？.....”

〔9〕 我当然不可能拿着每一封官府来函跑到村民大会上去，但是索尔蒂尼不知道那封信，他否认有过那封信，这样一来就好像是我错了。

〔10〕 我的解释与此不同，而且，尽管我另有完全不同的斗争手段，但我仍然坚持这种解释，并将竭力促使它得到承认。

〔11〕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算是已经问过他了，”老板娘说，“结婚证上有他的签字嘛，当然，只是偶然的，因为他那时正好代理另一个部门的主管，所以证书上写的是：‘克拉姆代。’我还记得当时我是怎样拿着这张证书从结婚登记处小跑着回家，到家后也不脱结婚礼服就立刻坐到桌旁，把证书摊开在桌上，一遍又一遍地念那个非常珍贵的名字，然后又带着一个17岁姑娘那种幼稚的热情试图模仿他的签名。我花了许多工夫，写满了整张整张的纸，竟一点没有注意到汉斯就站在我的椅子后面，他不敢打搅我，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我写。很可惜，那张结婚证后来在所有该签字的都签完以后，就不得不送交村公所去了。”

“不是的，”K.说，“我指的不是这种问法，完全不是指官方手续那一类事情，我不是说一定要找作为官员的克拉姆谈，而是要同作为普通人的他私下谈谈。事情一牵涉到官府，多半就要蛮拧，比如，要是您今天也像我一样看到堆得遍地都是的村公所档案就好了！您那张心爱的结婚证书也许正好在那里面，如果不是在粮库里同老鼠待在一起的话——我想，要是您看到那种景象，你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

〔12〕也许它除此以外同时也是一种无稽之谈，但那它就一定是那些被遗弃的女人臆造出来在生活中聊以自慰的东西。

〔13〕“完全可以，”K.说，“好吧，现在来说说我想对他讲些什么。我大致会这样说：‘我们，就是弗丽达和我，我们相爱了，我们打算结婚，而且越快越好。但是弗丽达不光爱我，她也爱您，当然，对您的爱完全是另一种爱，人的语言太贫乏，对这两种感情用了同一个字，这我没有办法。弗丽达心里也有我，这一层她自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只能相信，这样的事只是您有这样的意思才可能发生。听完弗丽达讲的一切，我也只好同意她的看法了。不过说来说去这总归是一种猜测，除去这个猜测，就只剩一种想法，那就是：我这个外乡人，按老板娘的说法，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跑来在弗丽达和您中间强行插足。为了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我现在斗胆向您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我看，这样做是够尊重他的了。”

老板娘叹了一口气，“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说，“表面上看够聪明的，可是同时又无知到极点。您居然打算像跟自己未来的老丈人那样同克拉姆商谈。我的意思是，比方说您爱上了奥尔嘉——可惜您并没有爱上她——去跟老巴纳巴斯谈那样。真是老天有眼，让您永远不可能去同克拉姆谈话。”

“您这段插话，”K.说，“我在同他谈话时——这谈话无论如何必须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是不会听到的，所以我也不必为这个伤脑筋。但是说到他的反应，那么可能有三种情况，他或者说：‘那不是我的意思’，或者说：‘那正是我的意思’，或者沉默。第一种可能性我暂时不考虑，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照顾您，而沉默我将认为是默认即同意的想法。”

“也还有别的可能，而且是大得多的可能性，”老板娘说，“如果要我顺着您异想天开，居然同他会见了这种神话想下去的话。比如，他撂下

您一人站在那里自己干脆走掉。”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K.说，“我会走到他面前挡住他，逼着他听我讲。”

“逼着他听您讲！”老板娘说，“逼着狮子吃草！多了不起的英雄行为！”

“老板娘太太，您总是那么容易冲动，”K.说，“我不过只是回答您的问题，又没有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您头上。何况我们也不是在谈哪一只狮子，而是在谈一位办公室主任，如果说，我现在要从公狮子那里把母狮子娶走了，那么公狮子总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它至少得听听我说点什么吧。”

〔14〕“您啊，土地测量员先生，您在我们这里什么事都不摸门儿，”老板娘说，“您一说起话来总是错误百出。也许弗丽达做您的妻子可以帮您在这儿站住脚，但是这一点对这个柔弱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一项过于困难的任务。她自己也知道这个，当她觉得没有人看见她时，就唉声叹气、就止不住要流泪。我承认，我丈夫也是我的包袱，可是他并不想指手划脚操纵一切，而且即使他想这样做，他尽可以干出一些蠢事来，但是作为一个本地人，他干的事决不会给别人带来灾难；然而您就不同了，您满脑子尽是些最最危险的错误想法，而且永远也改不了。您说什么把克拉姆当作普通人。有谁见过克拉姆是普通人？谁能哪怕只是设想一下他是个普通人？您会反驳说您就能，但是这不正是您的不幸吗？您能这样做，那是因为您也不能设想他是个官员，唔，您压根设想不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弗丽达曾经是克拉姆的情人，您就觉得她见过他是个普通人，因为我们爱他，您就以为我们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爱。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官员，是不能说他这会儿官味儿多些，那会儿官味儿少些的，事实上他不论什么时候都是百分之百的官员。不过，为了让您对问题至少能有一丝丝理解，我现在不想多费唇舌谈这个，我只想说：在我很幸福的那段时间里，他是比别的任何时候官味儿都足的，我和弗丽达在下面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我们爱的就只是当官的克拉姆，是高官克拉姆，是地位非常高的大官克拉姆。”

〔15〕但是无论如何，当K.此刻看见她在这里，坐在弗丽达的椅子上，旁边就是那个房间……也许克拉姆今天仍在那房间里，当他看见她那双小小的、胖墩墩的脚踩在自己和弗丽达曾经躺过的地上，看见她在

这儿，在贵宾楼这一专为官员老爷们服务的酒店里时，他不得不承认，如果那天他在这里碰到的不是弗丽达而是佩碧，并且猜想到她可能同城堡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她大概也真有这种关系——那么，他是会竭力通过同样热烈的拥抱把那些秘密弄到手的，就像他当时不得不这样对待弗丽达那样。唔，不管她多么幼稚多么糊涂，她也很可能是同城堡有关系的，等等。

〔16〕现在，他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只有等着了。克拉姆必定会从这里经过的，也许，在这儿见到K.他会有点吃惊。但唯其如此，就会听取他的陈述，甚至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对这里的那些禁令，用不着太认真了，实际上不会有说的那么严重。瞧，他K.现在已经有不小的成绩了。虽说规定只许他进入酒吧，但尽管如此他现在不是明明站在这里，在这院子的深处，离克拉姆的雪橇仅一步之遥，很快就要同他面对面了吗？想到这里，K.便津津有味地吃起他带着的东西来，觉得比在哪里都香。

突然，唰的一下到处豁亮，房子里面的走道里和楼梯上的电灯亮了，外面所有进入房子的入口处上方的电灯也都亮了，院里一片白雪，更增强了光线的亮度。这一切使K.感到很不自在，原来是站在幽静的暗处，现在好像一下子被揪出来放在众目睽睽之下似的。然而另一方面这灯光又似乎在报喜，它预示着克拉姆即将出现，当然，K.也早就可以料到，克拉姆是不会为了给他K.提供方便而摸黑下楼来的吧。但是可惜，出来的人并不是克拉姆，而是老板，后面跟着老板娘，两人微微躬着腰从走道深处走出来，这原也是意料中事，难道这样一位贵客他们竟可以不来送吗？可是对K.来说，现在他就只好躲到暗处去回避一下，从而也就不得不放弃原来站的地方可以很好地观察楼梯那个优点了。

〔17〕K.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就让他们离开他吧，这甚至还给他以新的希望。当然，马的套具卸了，这是个令人沮丧的迹象，但大门还在那儿，而且是开着的，无法锁上，这就无异于继续在给予他某种许诺，使他可以继续抱着期望。这时他又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急忙向门厅里迈出一只脚，并随时准备着需要时马上撤回来，一边抬起头往上观看。他惊奇地看到下楼来的是大桥酒店的老板娘。她似乎心事重重，但仍很平静地走下来，手在栏杆上有节奏地抬起、放下。到了楼下，她和气地同K.打招呼，在别人的地盘上，似乎两人之间那一场老争论就不算数了。

那位先生与K.有什么相干！让他走他的吧，越快越好。这是K.的一个胜利，遗憾的只是这个胜利眼下对他没有实际的利用价值，特别是雪橇也同时离他远去了，他伤心地目送着这辆车子。“要是我现在马上从这里走开，”他突然灵机一动，回过头去向那位先生大声说道，“那么雪橇可以再回来吗？”说这话时，K.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向一种强迫他的势力让步——如果是让步他就不这样做了——而是觉得他是在把一件好事主动让给一个比自己弱的人，觉得自己有理由为做了善事而高兴。当然，从那位先生那种发号施令的语气中他立即看出，他自以为他的行动是出于自愿，说明他的情绪紊乱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刚才明明在请求那位先生对他发出强制性的命令，这怎能说他是在自愿行动？“雪橇可以回来，”那先生说，“但条件是您必须跟我走，不犹豫、无条件、不变卦地跟我走。您到底干不干？我这是问最后一遍了。您不会不信吧：负责在这个院子里维持秩序实际上并不属于我的职务范围。”“我走，”K.说，“但不是跟您走；我出这里这道大门”——他指了指那扇很大的门——“到大街上去！”“好吧，”那先生说，话音又是那种退让和严厉的混合，听来让人很不自在。“那么我也同您一道去。可是您得快些。”于是那位先生回到K.这里，两人并行，穿过院子中央，一步步踏在尚无人踩过的雪地上；那先生迅速回头向车夫示意，车夫便又把雪橇拉到大门口，再次坐到驾车人位子上，看来他又要重新开始等了。然而使那位先生恼火的是K.也又等起来，因为他一出院门就又站住不走了。“您真是固执得让人难以忍受。”那先生说。但是K.呢，他离开自己犯错误的见证——那辆雪橇越远就越感觉无拘无束，同自己的目标就越紧地联结在一起，同这位先生就愈加平等，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地位比他更优越。所以K.这时便毫无惧色地转身面对着他说道：“是这么回事吗？您不是想我吧？‘固执得让人难以忍受。’听到这样的话我可真是感到最大的愉快了。”

说到这里K.突然感到脖子后面有什么东西轻轻蹭了他一下，弄得他痒痒的，他想把那东西赶开，便用手向后打去，并转身去看。啊，雪橇！一定是刚才K.还在院子里时雪橇便已启动了，它在深深的雪地里悄然行驶，没有铃声，也没有灯光，这时刚从K.身后飞速驶过去，车夫开了个玩笑，扬鞭在K.的后颈上蹭了一下。现在，两匹马——这是两匹上等好马，先前在它们站着等候时K.无法判断其优劣——已经绷紧全身筋肉然而仍是轻松自如地飞奔，急转弯时也一点不减速，劲直向城堡驰去了，说时迟，那时快，须臾间一切便消失在暗夜中。

那位先生从身上抽出怀表，带着责怪的口吻说：“克拉姆不得不等了足足两个小时啊。”“是因为我的缘故吗？”K.问。“是的，肯定是的，”那先生说。“他看见我就受不了了吗？”K.问。“对，”那先生说，“是看见你就受不了。好了，现在我又要回店里去了，”他补充说。“您根本想象不出那里堆着多少事情要我去做啊，因为我是克拉姆在此地的秘书。我的名字叫莫姆斯。克拉姆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在他左右的人必须效法他，尽力而为。”这位先生变得十分健谈起来，即便K.现在天南海北地问他一些问题，大概他也是有兴致回答的。然而K.却沉默不语，他看来只在那里仔细观察秘书的脸，似乎想努力探究出克拉姆看见受得了的脸孔究竟是按照什么法则构造出来的。但是他什么特殊之处也没有找到，于是便转开去，没有理睬秘书向他道别，只是看着他现在艰难地在一大群人中间开出一条路，向院中走去。那些人是从院里出来的，显然是克拉姆的仆从，他们两个两个地走着，但除此之外便既无秩序也无走相，边走边聊天，有几对在经过K.身旁时交头接耳。到他们都快出来完了时，院门便在他们身后慢慢关上了。K.此时渴望着温暖、光明，渴望着一句亲切的话语，也许在学校里他可以期望得到这一切，但他有一种感觉，即在他目前的情况下他是找不到上那里去的路的，何况他这时还站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街上呢。另外，学校这一目标对他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因为，当他使劲把他将要在那儿遇上的一切设想得非常美好时，发现在今天这些东西也仍然是不能使他心满意足的。然而此地又不能久留，于是他还是上路了。

〔18〕K.并不怕老板娘的恐吓，用来诱他上钩的这希望那希望他也并不怎么感兴趣，然而这记录现在却真的对他有吸引力了。想一想，它倒真不是无关紧要的，老板娘说K.不能放弃任何一点希望，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是不对的，但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却是对的。在未曾受到失望的打击——如今天下午的遭遇之后——而有所动摇时，K.自己也一直有这个看法。可是现在他渐渐缓过劲来了，老板娘的攻击磨炼了他的意志，因为，尽管她一再说他无知，不可教，但她那样激动，不正好证明她觉得教给他怎样做是非常重要的吗？不是教别人，而恰恰是他！再者，尽管她力图用回答他时的提问、语气贬低他，但她说这些话时那三丈无名火，不又正好表明他那些小小的问题对她具有多么强大的威力吗？难道说自己要白白丢掉这点影响？他对莫姆斯的影响也许就更大了。虽然此人很少开口，一旦说话也喜欢大声嚷嚷，但是难道这种沉默寡言不是谨慎，难道他不是想慎用自己的权威，难道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把老板娘也带到这里来，因为她无官一身轻，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完全根据K.

现时的表现决定对策，时而甜言蜜语，时而挖苦奚落，力图迫他就范，引诱他上他们那份记录的圈套？这记录又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定说它是到不了克拉姆手里的，然而在克拉姆之下，在通往克拉姆的路上，难道K.就无事可做？难道今天下午的经历不是恰恰证明，谁要是以为靠毫无把握的瞎碰就能达到同克拉姆面对面谈话的目的，那他就确实大大低估了在自己和克拉姆之间横着的那一段不小的距离？如果说同克拉姆面对面谈话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么也必须是一步一步地去接近他，而在这条路上的确也就要经过比如说莫姆斯和老板娘。难道今天不是唯有这两个人才能挡住他，不让他见克拉姆，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首先是老板娘，她禀报了他要来，然后就是莫姆斯，他从窗户里看清楚K.果真来了，马上就发出一切必要的命令，所以车夫也才知道，在K.走开以前不能驾车离开这里，因此他才很不满意发牢骚说，到K.离开那会儿可能还要过很久很久，这话K.当时听了还觉得莫名其妙呢。看吧，一切都是这样预先安排好了的，虽然如老板娘几乎已经不得不承认的，不可能是克拉姆的什么敏感，那种这里人喜欢说得神乎其神的敏感，阻碍着他让K.来见他。如果老板娘和莫姆斯不跟K.作对，或者至少不敢表露出对立情绪，那么，谁知道可能办成什么事了？也有可能，并且可以说十之八九即便在那种情况下K.也仍然到不了克拉姆跟前，因为又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障碍，阻碍也许是无穷无尽的。但怎么说K.也是得到了一种满足，即按自己所知，做了应做的一切。而今天呢，他却不得不临时穷于应付老板娘的突然插手干预，为保护自己成功地抵制这一干预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但是K.现在只知自己是犯了错误，至于当时应该如何避免这些错误他仍感茫然。他在接到克拉姆的信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即在村里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不起眼的部下那个打算，确实是很明智的。然而，当巴纳巴斯那迷惑人的外表使他误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到城堡里，容易得比如说像星期日一次小小的散步中走上一座小山丘那样时，他又怎能不放弃原来的打算？更有甚者，这个信差那种微笑、那双眼睛简直就是在要求他这样做，要他去走这条捷径。然后，紧接着，他连思索一下的功夫都没有，弗丽达便闯入，随她而来的，是那即便到了现在也仍然不能完全放弃的信念，即通过她作为媒介，同克拉姆便有了一种可以说是近在咫尺、简直可以通过耳语进行交谈的关系，这一亲近关系最初也许只是他K.一人意识到，但只需再有一个小小的动作、一句话、一个眼色，它就会首先在克拉姆面前，跟着也就在所有人面前清楚地显露出来。虽然看上去难以置信，但却又是由于生活之必然、由于两情相依之必然而使人觉得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好了，实际事态的发展并不

是那么简单，K.也没有先安安心心做部下，而是好长时间而且直到现在仍在急不可耐地、毫无结果地伸出双手企图探到克拉姆。可是在同一段时间里，几乎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其他一些可能性：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学校勤杂工位置——也许从K.的要求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个合适的位置，它太像因神设庙、专为K.而安排，太显眼，太临时，又太受许多上司特别是那个教员的制约——但是无论如何这总是个实实在在的起点吧，并且它的欠缺由于他即将结婚而得到很大的弥补。这结婚的事K.原先几乎连想也不曾想过，而现在他却突然开窍，恍然悟出它的极端重要性了。没有弗丽达他能做什么呢？离了弗丽达他完全是个废物，只能跟在巴纳巴斯或那个城堡来的少女那一类人身上放出的那些闪着丝绸光亮的、令人头晕目眩不知所云的团团磷火后面瞎碰乱转。当然，有了弗丽达的爱，他也还不能说就能像通过一次突袭行动那样一举赢得克拉姆，他仅仅在虚妄的幻想中自以为或几乎已经确信自己做到了这一点，现在，尽管这种期望仍未完全泯灭，似乎在事实面前一再碰壁也动摇不了，但在他的计划中总归是不再指望这种闪电式的行动了。另外，他确实不再需要这样做，通过结婚，他又赢得了另一种更好的安全感——正式村民——有权利和义务——不是外人——结了婚，他就只需提防一下不染上所有这些人那种自满自足的情绪就行了，有城堡在眼前，要做到这点是容易的。比较难的是顺应服从，是在小人物家做些打下手的活。现在他打算从头做起，第一步就是先服从眼下这配合作记录的命令。然后他准备扭转谈话的走向，这样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弄明白事情真相。于是，好像他们之间还没有过意见分歧似的，他平静地问道：“关于今天下午，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了吗？所有这么些文件都是有关这件事的吗？”“所有的文件都是，”莫姆斯和气地说，似乎早已等着他这样问了，“这些全是我的工作。”事情就这样：如果有能耐毫不间断、可以说是眼皮也不眨一下地盯着看，就可以看到许多；但是只要哪怕只有一次疏忽懈怠，闭上了眼睛，那么一下子所有的东西就都成为一笔糊涂账了。“我能不能看看这些文件？”K.问。莫姆斯在文件里翻起来，似乎想查一查有哪一张可以拿给K.看，然后他说：“不行，很遗憾，这不可能。”“这给我一种印象，”K.说，“似乎这堆文件中有一些材料是我可以驳倒的不实之词。”“应该说是您竭力反驳而驳不倒的实际情况，”莫姆斯说，“是的，文件里确实有这一类材料。”说到这里他拿出一支蓝铅笔，微笑着在一份文件的几行字下面画上了很粗的道道。“您这样做我一点不觉稀奇，”K.说，“您只管画您的线好了，秘书先生。您已经心安理得地、未加核实地把许多说我十恶不赦的话写了进去，这我也无所谓。档

案里存放着这些东西碍不着我什么事。我只是想，文件里也许还会有某些对我有教益的东西，它们会告诉我，一个在此地扎根多年的官员是如何正直地对我作出具体评判的。这种材料我很想看看，因为我很想受点教育，我不想犯错误，不想给人添麻烦。还有，我很想装出一副幼稚无辜的样子！”老板娘说：“您还是听一听秘书先生的话吧，那样您的愿望就有一部分可以实现了。从对您提的问题中，您至少可以间接知道一些记录的内容，而通过您的回答，您又能对整个记录的精神施加一定的影响。”“我对秘书先生太尊重了，”K.说，“所以无法相信他会违反自己的意愿，通过提问把本来决心不告诉我的事情透露给我。另外我也没有兴趣用我愿意回答问题这个事实，以及用让人把我的答话附在那些敌视我的文字之后这种做法，来增强那些也许是不正确的、对我提出不正确指控的话的分量，哪怕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增强。”

莫姆斯一边考虑着，一边抬头看老板娘。“那么，让我们把我们这些文件全收起来吧，”他说，“我们等待的时间已经拖得够长了，土地测量员先生不能再怪我们没有耐心了吧。刚才土地测量员先生怎么说来着？‘我对秘书先生太尊重了’，等等，这就是说，他对我太尊重了，尊重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了。如果我能减少一点他对我的尊重，那么就可以得到他的回答了吧？然而可惜我只能继续增加他对我的尊重：这就是我现在要说明，这里的这些文件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回答，因为它们既不需要任何补充，也不需要任何修正，而他自己反倒是很需要这份记录的，既需要我提的问题，也需要他的回答，并且，如果说我是在请他回答问题的话，那么这完全是为他的利益着想。可是现在呢，随着我离开这个房间，他也就永远失去了这份记录为他提供的机会，而且这记录也永不会再在他的眼前敞开了。”老板娘慢吞吞地对K.点着头说：“当然，这层利害关系我早就知道，但我只能暗示，也尽自己的力暗示您了，但是您不明白我的意思。在后面院子里您白等了克拉姆半天，而在这里这份记录的问题上，您又让克拉姆白等了您半天，您多糊涂，您多糊涂啊！”老板娘眼里噙着泪水。“不过，”K.说，主要是受了这眼泪的影响，“现在秘书到底还在这里，记录也还在啊。”“但我这就要走了。秘书说，一边将文件装进公文袋，站了起来。“难道您到现在还不回答问题吗？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问。“太晚了，”秘书说，“佩碧得开门了，早就到仆人们进来的时候了。”的确，这里早就听到通向院子的门上砰砰的叩门声，佩碧站在门后，手扶着门栓，她只是在等着这里同K.的谈话一结束就开门。“您只管开门吧，小鬼！”秘书说，话音落处门一开，穿着土色制服的一群人，如K.曾经见过的那些一样，便一下子你推

我挤、争先恐后、不顾一切地蜂拥而入。他们一脸怒气，因为等得太久，对K、老板娘和秘书在这里视若无睹，硬是分开他们从中间挤过去，似乎这三人也是跟他们一样的酒客。幸而秘书已经把全部文件装进公文袋夹在腋下，因为那张小桌子在这帮人一进来后就立时被掀翻了，现在还没有扶起来，那伙人一个接一个地从它上面迈过去，跨过表情很认真，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行。只有秘书的啤酒杯很快得救，是来入中的某一个用他那粗而低的喉音欢喜地吆喝一声，把它抢到手中，随即向佩碧冲过去，但佩碧这时已经完全消失在人堆之中。看得见的只是她四周许多手臂高高举起指向壁钟，意思是让她明白：她这样晚才开门，对他们是多么不公道。可是虽然迟开门不是佩碧的问题，实际上罪魁是K。（尽管是不自觉的），但看来佩碧没有能力在他们面前为自己辩解，她太年轻，太没经验，要想出点什么好办法来对付这伙人确实太难了点。要是弗丽达处在佩碧目前的地位，那么她一定会痛骂一顿，立刻就把他们全部甩脱掉！然而佩碧却怎么也无法从他们当中脱身出来；当然这帮人也无意让她走脱，他们主要还是想让她斟满啤酒好马上喝呀。可这群人已失去自制，结果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直喝不上酒，而他们每个人又是那样馋涎欲滴！现在，这推来搡去的人群，还在不断地把这个小个子姑娘夹在他们中间一会儿拥向东、一会儿拥向西，只有在一点上佩碧表现得很勇敢，那就是她一点儿不叫喊，从她嘴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通向院子的大门处，还有人在不断挤进来，房间已经水泄不通，秘书没有办法走出去，通往门厅的门和通向院子的门他都无法走近，三个人紧紧挤着站在一起，老板娘紧挨着秘书的手臂，K.与两人对面，被挤得差不多跟秘书脸贴着脸了。但是，秘书也罢，老板娘也罢，两人对这种猛烈的拥挤都一点不觉惊奇或生气，他们默默忍受着，好像面对一场自然灾害，只是尽量保护自己免于被撞得太凶，必要时干脆靠在人群身上随大流移动，需要低头时就低下头，以避免不住地嘟嘟囔囔找佩碧要酒喝的人们那粗重的喘息和咆哮。但除此以外，两人样子仍很平静，并且还有些心不在焉。由于此刻K.离秘书和老板娘非常近，况且，虽然他们两个表面上看不愿承认，实际上三人已是联结成一个整体面对屋里另外的那些人，K.就觉得他与两人的整个关系都变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公务关系、个人关系，还有因等级不同而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界线，现在似乎荡然无存或者至少是暂时推迟到以后去了。那份记录呢，现在对K.来说也绝不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唔，现在您到底还是走不成。”K.对秘书说。“是啊，暂时是走不成了。”秘书回答说。“那么那份记录呢？”K.问。“在公文袋里放着。”莫姆斯说。“我很想看一眼，”K.

说，同时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伸手去够公文袋，而且已经抓住它的一角了。“不行，不行。”秘书说，一面挣脱他。“您这是在干什么呀？”老板娘说，轻轻打了一下K的手背。“难道您以为可以用暴力手段重新得到您由于轻率和狂妄而失去的机会吗？您真是恶人、是个可怕的人！您以为记录到了您手里还会有什么价值吗？在您那儿，它就好比一朵花扔到草地上让牛给吃了。”“但是到我手里我会撕掉它，”K说，“既然现在您不愿再主动把我的话写到记录上去，那么，我就换一个目标，就是把记录毁掉也好，您看怎么样？我非常乐意干这件事。”说到这里，他果真毅然决然地把公文袋从秘书腋下拽了出来抱在自己身上。秘书欣然让他把公文袋拿过去；唔，他很快就松开了夹公文袋那只胳膊，快得如果K不马上伸出另一只手去抓住的话，口袋就掉到地上去了。“为什么现在才这样做呢？”秘书问，“用暴力手段您不是早就可以拿到它了吗？”“这是以暴抗暴，”K说，“您现在毫无道理地拒绝您早先主动提出的对我进行审讯，或者至少是拒绝让我看一看文字材料。仅仅是为了迫使您同意其中一项，我才把公文袋夺过来。”“可是您拿它作抵押品了。”秘书微笑着说。这时老板娘说话了：“扣留抵押品，这一手他是很在行的。秘书先生，这一点您在记录中已经证明过。能不能把那一页给他看看？”“完全可以，”莫姆斯说，“现在可以让他看那一张了。”于是K便举起公文袋让拿，老板娘在里面乱翻了一阵，看那样子好像是找不出来。她不再找了，只精疲力竭地说了句：一定在编号是十的那一张上。于是K自己动手找起来，并且立即找到了，老板娘把那一页纸接过去，为的是看看拿得对不对；看后她说对，就是这一张。为了找个乐子，她很快地又把那上面的内容看了一遍，秘书也弯腰凑近她的胳膊跟她一起看。看完后他们把纸递给K，K便看起来。只见那上面写的是：

“土地测量员K.首先必须力争在村里立足。这并非易事，因无人需要他的工作；除遭他突然袭击被迫接待他的大桥酒店店主之外，无人愿接纳他，也无人——除了几位官员同他说几句玩笑话以外——理睬他。于是他就表面上看似似乎是漫无目的地四处游逛，终日除扰乱村内治安外无所事事。然而实际上他极为忙碌；他不断窥测方向、伺机而动，不久便找到机会。贵宾楼的年轻酒吧侍女弗丽达，相信了他的许诺，被他勾引终于落入了他的圈套。

“要证明土地测量员有罪并非易事。因为，唯有不怕难堪硬着头皮强迫自己设身处地沿着他的思路去想，才能一步步识破他的诡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如发现他从外表看去令人难以置信地恶劣，也不能动摇、

怀疑这种做法，相反，走到这一步决非误入歧途，而实在是接触到要害之处。试举弗丽达一事为例。显然，土地测量员并不爱弗丽达，并非出于爱情想与她成婚，他相当清楚，她相貌丑陋、专横跋扈，又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事实上他对她的态度也是符合此一看法的：他到处逛荡，并不关心她。此即基本事实。诚然，对此项基本事实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依此K.可以被说成或是软弱、或是愚蠢、或是高尚之士、或是卑鄙之徒。然而凡此种种，均不符合事实。欲知真实情况，唯有过细地追踪他与弗丽达结合之前在此所走过的每一步路方有可能，他在走这每一步时留下的足迹，我们是自他抵达此间开始就悉数记录在案了。当然，一旦发现那令人发指的真实情况，还必须强使自己相信它，然而舍此别无他法。

“K.纯粹出于极端龌龊的心计才去接近弗丽达，且在他的如意算盘尚有得逞希望之时，是决不会放过她的。原来，他以为占有她就是夺得了主任大人的情人，从而拥有一人质，可以索取最高的赎金。现在，同主任就该项赎金问题进行谈判，就是他唯一孜孜以求的事情了。由于弗丽达对他分文不值，而赎金是他的全部希望所在，所以涉及弗丽达时他乐于作出任何让步，而在赎金问题上则毫无疑问地态度强硬，寸土必争。眼下除了他的种种猜想和各项建议令人生厌之外，他暂时尚属无害。虽然如此，一旦他发觉自己大错特错，原形毕现时，甚至就会凶相毕露，当然，只能是在他那微不足道的活动能量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造成危害。”

那一页上的文字到这里就结束了。边上还有一幅很像是小孩画的、歪歪斜斜的影线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少女，少女的脸低垂在男子胸前，但这个比少女块头大得多的男人眼睛却越过姑娘的肩向他手里捧着的一页纸看去，一面还喜形于色地将一些累计数字记在纸上。当K.从这一页纸上的内容抬起头来时，站在房间中央的已经只剩他、老板娘和秘书三个人。原来，在这段时间里老板来了，大概是他又使这屋里恢复了秩序吧。现在他沿壁而行，用他那彬彬有礼的姿态举起双手抚慰众人，在墙边，男人们各人都有了啤酒，已经安顿了尽可能多的人坐在酒桶上，其余的人也都在桶旁的地上坐了下来。这时也可以看出，其实人并没有开始拥挤时感觉的那样多得出奇；仅仅由于所有的人都拼命想挤到佩碧身边去，才把局面弄得那样糟，那样不可收拾。现在也仍然还有一小堆到目前一直还没有得到酒喝的狂野之徒包围着佩碧。在刚才那样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她必定克服了常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当然现

在她也还是泪流满面，美丽的辫子散乱了，连衣裙的前胸甚至被扯破，贴身汗褙也露了出来。但她丝毫不顾惜自己，大概也是受到老板那沉着镇静、指挥若定的态度感染吧，仍在啤酒桶的龙头旁不知疲倦地干活。见到她这副惹人怜爱的模样，K.把她曾给自己带来的不愉快全抛到九霄云外，完全原谅她了。“是啊，这一页东西，”K.边说边把那张纸放回公文袋，把口袋递给了秘书，“请原谅我刚才过于急躁地从您那儿把公文袋拿了过来。不过也要怪那时太挤，人们的情绪太激动了，嗯，我想您一定会原谅我的。另外，您和老板娘太太也有一种特殊本领，就是能激起我的好奇，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可是这一张纸却令我大失所望。它确实像老板娘说的，不过是草地上一朵非常普通的花罢了。唔，作为一份工作报告，它也许有一定的公务上的价值，然而对我来说，它只是背着我不本人说我的坏话，完全是些危言耸听的、空洞无物的、可悲可笑的、长舌妇喜欢的嘀嘀咕咕。对了，这份材料的作者为了写它肯定找女人帮过忙。也许这个地方还有一定的公道可讲，就是说也许我可以到官府的这个部门去投诉这份材料对我的诬蔑，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不仅因为这样做太降低我的身份，还因为我很感激你们两位。你们很会来事，弄得我对这份记录有点心里发毛，可是现在它丝毫不能再让我心里发毛了。使我感到毛骨悚然的只剩下一点，那就是这样的货色居然堂而皇之地被拿来当作审讯的根据，甚至为此不惜滥用克拉姆的名义。”“如果您是您的敌人，”老板娘说，“那么您这样评论这份文件我真是求之不得。”“哦，对，”K.说，“您不是我的敌人。为了使我高兴，您甚至不惜让人诬蔑弗丽达呢。”“您大概还不至于认为那上面是说出了我对弗丽达的看法吧！”老板娘叫起来，“那不过是您的意思；您不恰恰就是这样高高在上，低下头去看那个可怜的孩子吗？”K.不再回答这话，他觉得老板娘只是在骂人罢了。秘书呢，这时正在竭力掩饰自己收回公文袋的喜悦而又徒然；他笑容满面地看着这个口袋，好像这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一个新的、别人刚送给他的礼物，一眼根本看不够。他把公文袋紧紧抱在胸前，似乎它散发着一股特殊的、使他浑身舒坦的暖意。他甚至于借口要放对位置把K.看过的那一页又拿出来重读一遍。这一遍，他对每个字都像碰到了个不期而遇的老朋友那样笑脸相迎，只是到了这一遍读下来之后，他才感到自己是最终夺回了这份记录了。看那样子，他真恨不得把它也拿给老板娘再读一遍才痛快呢。现在K.让这两人去高兴他们的，他几乎连一眼也不再去看他们。原先，这两个人对他怎么说也有一定重要性，可是这种重要性同目前两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相比差距太大了，现在他们对他是一文不值。瞧他们这两个合伙人在那里相依为命，

靠他们仅有的那点可怜巴巴的秘密互相打气鼓励那副模样！

〔19〕“我知道，”弗丽达突然说，“要是我离开你，大概对你会更好些。可是如果一定要我那样做，我的心就要碎了。尽管让人心碎，但如果有可能我也会离开你，然而事实上离开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高兴，至少，在这个村子里这是不可能的。正如两个助手也同样不可能离开你一样。你以为你真的已经如愿，最终把他们赶走了吗？那是做梦！”“我倒的确希望这是事实。K.说，对弗丽达讲的另外那些话未加评论，因为某种心中无底的感觉在阻碍着他，在他眼里，这双现在正以缓慢的动作擦拭咖啡壶的柔弱的小手和腕子，显得愈来愈可怜了。“两个助手是不会再回来了，你说的那些个不可能到底是怎么回事？”

弗丽达这时已经停下了手里的活；她眼里噙着泪水，这挡住了她的目光，所以K.看不清她看他时是什么眼神。“我最亲爱的，”她说，“你不要误会我。决定这一切的并不是我，我只不过是对你作些解释，因为你要求我这样做，另外也因为我可以为我做的某些事辩解一下，不这样你就没法理解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就会觉得我的做法同我爱你是矛盾的。你是个外乡人，在这里是要求任何东西的权利都没有的，也许这里的人对外乡人特殊严厉或者很不公道，这个我说不准，但你没有提任何要求的权利是个事实。比如说吧，一个本地人如果需要助手，他可以自己找人当助手，如果他长大成人，想结婚了，他就可以娶个妻子。官府在这些事情上也起很多作用，但主要的还是每人都能自由决定自己的事情。而你这个外乡人呢，就得靠施舍过日子了；当局高兴给你助手，就给你派助手，乐意给你妻子，就给你一个妻子。当然这也不完全是随心所欲，但总完全是官府的事，就是说，为什么要作这个决定而不作那个，这里头的原因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当然你也许可以拒绝接受这些施舍，这一点我说不准，也许你可以拒绝吧；但是你一旦接受下来，那么这件施舍品上就有官府的压力，就是说你身上也有官府的压力了；只有官府愿意，这种压力才能从你身上撤去，决没有别的办法摆脱它。老板娘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这些完全是从她那儿听来的，她说，在我结婚之前，她要让我明白一些事理。她特别强调说，所有很了解这里情况的人都劝那些外乡人，最好安安分分地享受他们已经收下的这些礼品，因为想甩掉它们是办不到的；如果硬干，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把这些怎么不好也总还是带着一丝善意的、白送给你的东西变成一辈子也休想甩脱的敌人。这些都是老板娘说的，我只是把她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你听罢了，老板娘什么事不知道啊！我们得相信她的话。”

“她的话有些是可以相信的。”K.说。

〔20〕“不是那只猫吓着了，而是我自己良心不安。当猫跳到我身上时，我的感觉是好像谁捅了我胸口一下，那意思是告诉我：我心里的秘密被看穿了。”弗丽达放下了窗帘，关上了里屋窗子，然后嘴里求着，手里拉着，把K.拽到草袋边上。“后来我点蜡烛也不是为了找猫，而是想快些把你叫醒。事情就是这样，亲爱的，亲爱的。”“他们是克拉姆派来的。”K.说，同时从背后把弗丽达拉到自己怀里，吻了一下她的后颈，这使她猛地一惊，跳了起来，接着两人便都滑倒在地，抱成一团，互相在对方身上乱挤乱钻，急急忙忙、气喘吁吁、战战兢兢，似乎都想在对方身上藏匿自己，好像他们此刻享受的欢乐本是属于某个第三者，他们现在只是把它从人家那里偷来享用似的。“要不要我去开门？”K.问，“你会跑出去找他们吗？”“不！”弗丽达大叫一声，挎住了K.的一只胳膊，“我不想去找他们，我要留在你身边。你要保护我，让我待在你身边。”“可是，”K.说，“如果像你说的，他们是克拉姆派来的人，那么关着门又有什么用，我保护你又有什么用，并且，即使有用，难道这种用处是好事吗？”“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弗丽达说，“我说他们是克拉姆派来的，是因为克拉姆是你的上司，他们又是公家给你派来的助手，除此以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最亲爱的，你就让他们回来吧。可别得罪那个可能是派他们来的人，落个犯上的罪名啊。”K.挣脱了弗丽达，说道：“两个助手只能在外边，我决不想让他再回到我身边来。你说什么？他们两个有本事带我去见克拉姆？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即便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也没有能力跟他们去；对，仅仅是他们总待在我旁边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失去任何熟悉此地环境的能力了。他们搅得我心烦意乱，而且，遗憾的是我刚才听你说他们也让你心烦。我让你在我和他们之间作出选择，你也已经决定要我，既然如此，那么其他一切你就都让我来处理吧。我希望不出今天就能得到重要消息。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做法就是把你从我身边拉走，犯错还是不犯错，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弗丽达，难道你相信我真的会给你开门，为你扫清路上的障碍吗？”

〔21〕另外，看起来弗丽达好像很乐意干这个活，好像恰恰是每一件脏活、累活，每一件能完全占据她的身心，使她可以不去思考、不去梦想的工作，她一律都喜欢做。

〔22〕教室里面蜡烛刚刚熄灭，吉莎就出现在楼门口；显然，在她

离开教室时蜡烛还亮着，因为她很重视举止行为合乎规矩，不给人留下话柄。不久之后施瓦尔策也出来了，现在他们一起走在积雪已经扫净的路上，看见这条路上已没有雪，两人感到意外的满意。当他们来到K.面前时，施瓦尔策拍拍他的肩膀说：“要是你能保持这儿学校的整洁，”他说，“你就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帮助。但是对你今天早上的表现，我听到有人对你怨气很大。”“他在逐渐改好。”吉莎说，既不看K.，也不停步。“他这个人不这样也不行。”施瓦尔策说着便急忙加快脚步，以便迅速跟上吉莎。

〔23〕“那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奥尔嘉，”K.说，“我只知道我很羡慕巴纳巴斯能做所有这些你觉得那么可怕的事。当然，如果他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已经得到的一切而没有一点怀疑，那就更理想，可是，就算他只是到了那些办公厅中最最没有价值的前厅吧，但他怎么说至少也还是到了那儿，到了那个前厅了；同比方说我们现在坐着的灶沿比一比，你看，他把我们甩在下面有多远！我很奇怪，你为了安慰巴纳巴斯，虽然表面上也看到这一点很宝贵，但实际上自己似乎还是不明白它的重要性。可是同时——这一点就使我更感到你这个人莫名其妙了——看样子你好像又在鼓励巴纳巴斯去做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这一点，顺便说说，在我们认识的那第一个晚上以后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你看错我了，”奥尔嘉说，“我没有鼓励他去做那些事，根本没有；如果巴纳巴斯做的事不是绝对必要，那么我会第一个起来阻拦他去，要他永远待在这里的。难道他不也已经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了吗？你看，该做的事他不做，反而把精力全都耗费在一会儿搞搞手工活，一会儿干干信使差事上，站在上头那张斜面写字台前，绷紧每根神经等着那个长得像克拉姆的人什么时候看他一眼，到最后总算盼到一封积满尘土的陈年旧信，一封对谁都没有用、只能到处制造混乱的信。”“可这完全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K.说，“巴纳巴斯递送的信件毫无价值或者甚至有害，这可以作为一条理由，用来投诉公职部门，还可以对收信人，比如说我吧，造成严重的后果，然而对巴纳巴斯却是不会有任何损害的，他的任务不过是来回传递信件，连信的内容也不知道，所以他不论送什么信都是个无可指责的信使，这不正符合你们的愿望吗？”“唔，”奥尔嘉说，“也许是这样吧。每当我有时一个人坐在这里时——巴纳巴斯在城堡，阿玛莉娅在厨房，可怜的父亲和母亲在那边打瞌睡，我拿起巴纳巴斯准备修补的鞋来，用我这双一点不会做这种活的手帮他做了一会儿以后又把鞋撂下想事情，可又怎么想也想不出个名堂来，因为就我一人，要把这些个事想明白我这脑子远远不够用——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心里就乱糟糟的，什么

全都搅和在一起，连害怕和担心也都同别的思想搅在一块儿，分不清哪是哪了。”“那么为什么别人都看不起你们呢？”K.问，他回忆起那第一个晚上这家人给他的极不愉快的印象，当时全家在小油灯下挤坐在桌旁，一个紧挨一个地脊背冲着他，每人都显得又短又粗，两个老人的脑袋几乎耷拉到汤碗里，等着人来伺候他们。这一切他当时觉得多么令人厌恶，并且，由于无法一一说清这个印象究竟是怎么来的而使人更觉可恶，因为，当时已经把各项细节作为理由逐一列出，但所有的细节又都不是原因，这种厌恶感的产生是另有原因，可又说不出是什么。直到K.在村里了解了一些情况，促使他对自己那些最初的印象持审慎态度，甚至不仅对最初的印象，也对进一步的及再进一步的印象持审慎态度，直到后来这个统一的家庭对他来说已经分解为单个的人。其中一部分他能理解，然而首先是能同他们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像朋友之间一样的共鸣，在这个村子里，除他们之外他就再没有找到什么朋友了——直到这时，原先那种厌恶感才逐渐消退，但一直仍未彻底消释。蜷缩在他们那个角落里的老两口，这盏小油灯，还有这十分简陋的小屋本身——要平静地默默忍受这一切并不容易，必须得到一些与此相反的印象与之抗衡，如奥尔嘉讲的这些事情，才能稍稍缓解一下这种厌恶感，而且仅仅是表面上的、暂时的缓解。想着这些，K.补充道：“现在我确信你们受到不公道的待遇，这一点我要一开始就讲清楚。不过要想不对你们不公平也一定很难，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知道。要想摆脱对你们的成见，必须是一个处在我这样的地位的外乡人，而我自己也有好长一段时间受到这种成见的影响，这影响大得使我觉得人们普遍对你们抱有的偏激情绪——这种情绪不仅仅是蔑视，里面也包含着恐惧——是理所当然的，使我不动脑筋去想，也不问是什么原因，根本不打算为你们辩解。当然，整个这件事也与我不沾边，或者说看起来与我沾不上边。但是现在呢，事情在我面前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现在我觉得那些看不起你们的人并不是总对为什么这样做守口如瓶，而是他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对你们进行了解，特别是对你，奥尔嘉，有进一步的了解，才能从那种顽固的偏见中解放出来。现在人们指控你们的显然只是你们想冒尖，想比别人高出一头。巴纳巴斯当上了城堡的信使，或者说努力争取当上城堡的信使这一点，人们对你们总是耿耿于怀非常眼红，为了不必对你们表示钦佩，就反过来瞧不起你们，并且把这种蔑视做得很绝，把你们也给压垮了。看吧，你们的那些担忧啊，害怕啊，疑心啊，不正是这种遭到人们普遍蔑视的结果吗？”奥尔嘉微笑了，她以一种聪敏机灵、熠熠闪光的眼神看着K.，以致K.一时几乎愕然，那情景，就好像他说了些荒谬

绝伦的话，奥尔嘉现在得揪住他步步进逼加以追问，以纠正他的错误，而她对于做这件事颇感乐此不疲似的。现在K.又觉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同这家人对立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对此仍非常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不，”奥尔嘉说，“不是这样，我们的情况没有那么好，你这是想为你没有在弗丽达面前为我们辩护作补偿，所以现在就来为我们辩护，可是又做过头了。我们并不想比别人高出一头。想做城堡的信使就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向上爬的高大目标吗？每个会跑路、能记住几句要他转达的话的人，都有本事当城堡的信使。这也不是一个有报酬的差事。在这里，人们好像都是这样来看争取做城堡信使这件事的：就好比一些没事干的小孩子一个劲儿地纠缠大人，央求大人让他们为大人跑跑腿、办点事，目的完全是使自己脸上有光、为了有点事做做罢了。我们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有一点不同，就是这里没有许多人像孩子一般来纠缠，并且对那个或是真正被选中、或是仅仅表面上被选中的人，不像对孩子那样和蔼可亲，而是让他受各种折磨。是的，谁都不羡慕我们这种光荣，人们反倒是同情我们，不管对我们怀有多大的对立情绪，间或也总还是表现出一星半点儿同情心来。也许你心里也有这种感情，要不是这样，什么别的东西能把你吸引到我们家来呢？仅仅是巴纳巴斯捎来的信吗？这我没法相信。也许你从来就没有太看重那几封信，只是因为同情巴纳巴斯，或者主要是因为同情他，才坚持要这些信的吧。你的这番心意也没有白费。虽然巴纳巴斯因为你提出的高要求无法达到感到苦恼，可是同时他也因此而有了一点自豪感、一点信心，你对他的信任、对他的不断关怀，使他在上面时摆脱不了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怀疑稍稍消除了一点。你到村里以来这段时间，他的情绪比原先好些了。你对他的这种信任也使我们另外几个人沾了点光；要是你来得更经常些，对我们家就会更好。你不到我们这儿来是考虑到弗丽达，这一点我能理解，这层意思我也对阿玛莉娅说了。可是阿玛莉娅心情很烦躁，最近我有时几乎连最必要的事也不敢同她谈。别人跟她说话时她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就是听，也好像听不懂人家说什么，就是听清楚了人家说的话，又好像觉得人家全是胡扯。但是，这一切在她都不是故意的，所以不能生她的气；她越是冷漠、发横，就越要对她温柔点。实际上她也只是外强中干罢了。比如昨天巴纳巴斯说你今天要来，因为他了解阿玛莉娅，为小心起见，就补充说你只是有可能来，还不是肯定会来。但是尽管如此，阿玛莉娅仍然什么别的事都干不成，硬是站着等了你一整天，只是到晚上她才坚持不住，只好躺下了。”“现在，”K.说，“我明白为什么我对你们那么重要了，实际上我是愧不敢当的。我们之间有关系，正如任何信使同

他的收信人之间那种关系一样，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你们不要夸大其词；我太珍惜你们对我的友情，特别是你，奥尔嘉，对我的友情，所以决不愿让它由于过多的不现实的期望而受到危害；这就类乎因为我对你期望过多，结果你们反倒几乎完全同我生分了。如果说你们受到耍弄，那么我也同样受到耍弄，那么总的看来这是一场而不是两场比赛，是一场配合得很巧妙的游戏。从你今天对我讲的这些事情，我甚至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巴纳巴斯带给我的那两封信是到目前为止上面让他递送的仅有的两封信。”奥尔嘉点点头。“承认这一点我觉得害臊，”她低垂着眼皮说，“或者也可以说我是害怕，怕这样一来这两封信对你可能变得更没有价值了。”“可是你们两个，”K.说，“你和阿玛莉娅，又在那里使劲让我对两封信越来越不抱希望，这又怎么解释？”“对，是这样，”奥尔嘉说，“阿玛莉娅是在这样做，而我是跟着她。为什么？因为我们完全绝望了。我们觉得这两封信毫无价值是明摆着的事，这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就是提一提这种明摆着的东西也不会坏事，反而会增加你对我们的信任和怜悯，而这个，说到底又是我们唯一希望得到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两封信等于废纸，想从它们当中直接汲取鼓舞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了，你是个聪明人，在这一点上是蒙不了你的，即使我们能蒙你，那么巴纳巴斯就只是个撒谎骗人的信差，而靠撒谎骗人是救不了自己的。”“这样看来，你对我还是不真诚，”K.说，“连你也不对我说真话。”“你还不了解我们的苦处，”奥尔嘉说，一边怯怯地看着K，“这大概是我们这方面的过错吧，我们很不会同别人打交道，也许这就使你对我们有反感，正因为我们拼命想把你拉过来，结果倒反而把你推开了。你说我不讲真话吗？没有谁比我对你更真诚了。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不告诉你，那么仅仅是因为我对你有点害怕，这种惧怕心理我也不瞒着你，而是老老实实让你看到，如果你能使我不怕你，那么我对你就完完全全没有一点保留了。”“你到底怕什么呢？”K.问。“怕失去你，”奥尔嘉说，“你想想吧，巴纳巴斯为争取到一个位置苦了三年，我们苦等苦熬盼着他的努力获得成功也有三年了，可是一切全是白费力气，丝毫收获都没有，有的只是耻辱、痛苦，时间白白耗过去，未来又让人忧心忡忡。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封信回来了，就是给你的那封。‘来了个土地测量员，就像是专为我们来似的。他跟城堡的全部联络工作都是我管了。’巴纳巴斯说。‘看来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他又说。‘当然啦，’我说，‘一个土地测量员！他一定会做好多工作的，这样就会有好多信要送。好了，这下子你是真正的信使了，很快就会得到正式工作服了。’这是有可能的。”巴纳巴斯说。唔，连他这个已经绝望，

成天自己折磨自己的小伙子，也说‘这是有可能的’了。那天晚上我们很开心，就连阿玛莉娅也用她自己的方式对此表示关心，她虽然不听我们讲什么，但却把她的小凳子——她坐在上面织毛衣——挪近我们一些，时不时朝我们这边瞅一眼，看我们嘻嘻哈哈笑着叽叽喳喳说话。可惜好景不长，还在当天晚上我们的幸运就到头了。虽说当我们晚上意外地看到巴纳巴斯同你一起回家来时，这颗福星似乎还在升起，但是同时怀疑也开始了，尽管你的来到是我们家的光荣，可是这事打一开头就是别别扭扭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心里想，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现在你特意跑到我们这个穷家陋舍，能说明你真是我们心目中那个大人物吗？为什么你不好好待在自己住的地方，把信差叫到自己那儿去，接了信、给他交代完任务就立刻让他走，那样做不是才符合你的尊严和身份吗？难道你到我们家来这一点，不正好表明巴纳巴斯的信使位置不那么太重要吗？再说，你不仅是外乡人的穿着，而且穿得很寒酸，我当时帮你脱下来那件湿漉漉的外套，又难受地把它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一阵子。我们盼望了很久，才终于遇到了第一个收信人，难道又是倒霉碰错了人？当然，过后我们也看到你不跟我们平起平坐，而是一人待在窗户边，说什么也不肯到我们这桌人这边来。当时我们没有转过身去看你，可是我们心里想着的就只有这一件事。你来是不是只为了考察考察我们？为了看看你的信差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是不是来到村里第二个晚上就已经怀疑我们了？这考察的结果是不是对我们很不利呢，因为你一直阴沉着脸，对我们没有一句话，又那样急着要走，恨不得马上就离开我们？你的走，对我们说就是一个证明，证明你不仅不重视我们，而且严重得多的是你不重视巴纳巴斯带来的信。光靠自己，我们是没有能力看出这些信的真正意义的，只有你能看出，因为这些信同你直接有关，它们讲的就是你做的那种工作。所以说，实际上是你教给我们怀疑的；从那天晚上起，巴纳巴斯在上头办公厅里那些伤心的观察就开始了。那天晚上没有解开的疑团，到第二天早晨，当我从马厩里出来，看到你同弗丽达和两个助手走出贵宾楼，就是说看到你已经对我们不抱希望，已经彻底离开我们时，就算是最终解开了。当然这一点我完全没有对巴纳巴斯讲，他自己那些头疼事已经压得他够呛了。”“可是我这不是又来到你们这里了吗？”K说，“我现在不是让弗丽达等着，不是在听你讲你们家的苦处，就好像那是我自己的事一样吗？”“对，你来了，”奥尔嘉说，“我们很高兴。你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本来已经渐渐减弱了，所以我们确实非常需要你再来。”“我也是需要再来找你们的，”K说，“这一点我明白。”

〔24〕“阿玛莉娅当然一点没有插手这件事，尽管听你那意思她对城堡的事知道得比你多；唔，也许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主要就是她吧。”“你的眼力真是太好了，”奥尔嘉说，“有时候你能一语道破，帮我看清问题，唔，也许因为你是外乡来的人，旁观者清吧。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浑身都是伤心的经历和各种担心，整治得我们连木头咔嚓响一声都会吓一跳，一点抵抗力也没有，第一个人胆战心惊，第二个人马上跟着也心惊肉跳，到底为什么这样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怎么还能对事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即使有细致、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这些女人是从来没有过这种能力的——在这样的心态下也会失去这种能力的。所以说，你来了，对我们说是多么大的幸运啊。”自从到这个村以来，K.现在是第一次听到对自己这样毫无保留的欢迎词，但是不管他迄今为止多么迫切需要这种热烈的欢迎，不论他觉得奥尔嘉多么值得信任，他仍然很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话。他不是为了当某人的救星到这里来的，如果碰巧遇上这种机会，那么他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帮人一把。但是谁也不应该把他当成救星来欢迎，谁这样做，谁就是扰乱他的视线，使他有可能走入迷途，谁就是硬要他去做一些本来不应强迫他做的事；如果这样，那么他只好表示爱莫能助，坚决不干了。但是奥尔嘉接着说下去又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当然，当我自以为我所有的担心都不必要，因为你会对一切作出解释、找到出路的时候，你突然又说出一些大错特错的话，一些令人痛心的错话，比如这话：阿玛莉娅知道的最多呀，她没有插手呀，罪魁祸首主要就是她呀。不对了，K.，我们根本比不上阿玛莉娅，要是责怪她，那就比她差得更远！你的友好态度、你的勇气，这些在你判断所有别的事情时都有用，但把它们用到阿玛莉娅身上就不可能判断正确了。我们得首先对阿玛莉娅受的是什么样的苦心里有一点谱，才有资格责怪她。恰恰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她特别烦躁，心里藏着很多东西不愿讲出来——实际上，她藏在心底的肯定没有别的而只有她自己的痛苦——所以我几乎连最必要的事也不敢同她谈。刚才我进屋来，看见她跟你一起心平气和地谈话时，真是大吃一惊；实际上，现在这种时候没法跟她谈话，有时也会有她心情比较平静的日子，或者也许不是比较平静而只是比较疲倦吧，可是现在她的心情是最坏的时候。别人跟她说话时她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就是听，也好像听不懂人家说什么，就是听清楚了人家说的话，又好像觉得人家全是胡扯。但是，这一切在她都不是故意的，所以不能生她的气，她越是冷漠、发横，就越要对她温柔点。实际上她也只是外强中干罢了。比如昨天巴纳巴斯说你今天要来；因为他了解阿玛莉娅，为小心起见，就补充说你只

是有可能来，还不是肯定会来。但是尽管如此，阿玛莉娅仍然什么别的事都干不成，硬是站着等了你一整天，只是到晚上她才坚持不住，只好躺下了。”从这些话里，K.又一次首先听出了这一家人对他提出的要求。在这家人中间，如果不小心是会迷失方向的。只是他心里感到很内疚，因为正好是在面对着奥尔嘉时，他脑子里转的尽是这样一些无法启齿的思想，这些想法使他们之间现在这种亲切的气氛受到了干扰。奥尔嘉率先创造了这样一种推心置腹的气氛，它使K.感到舒服，令他简直恨不得把离开这里的时间无限推迟下去。“我们大概很难取得一致了，”K.说，“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接触实质性问题，就左一个矛盾右一个分歧。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统一意见也许不难，同你我很快就能取得一致看法，你没有私心，又很聪明；但是问题在于这不仅是我们两人的事，我们甚至连主角也不是，这里还有你的全家，对你们全家我们两人恐怕不大可能达成共识，对阿玛莉娅就更是肯定不可能了。”“你认为阿玛莉娅一无是处吗？”奥尔嘉问，“你并不了解她就谴责她？”“我并没有谴责她，”K.说，“我也不是看不到她的优点，我甚至承认我对她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要做到不对她不公平非常难，因为她高傲、孤僻，再加上盛气凌人；如果她不是同时也很忧伤并且显然很不幸，那么就很难与她和解。”“你对她所有的意见就是这些了吗？”奥尔嘉问，现在她自己也忧伤起来了。“恐怕这些也就够多了吧。”K.说，现在她才看见阿玛莉娅又已进屋来了，但离他们很远，在二老的桌子那边。“她不是在那儿了嘛。”K.说，他的话里违心地同时含有某种弦外之音，那就是对这顿饭、对所有的参与者的厌恶。“你对阿玛莉娅有成见。”奥尔嘉说。“我对她是有成见，”K.说，“为什么我对她抱有成见？”“如果你知道就告诉我好了。”“你很真诚，这一点我很赞赏，但是你只在关系到自己的事情上真诚，而对弟弟妹妹，你就觉得必须靠你的沉默来保护他们。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不了解跟巴纳巴斯有关的一切，又因为阿玛莉娅在你们家事事有份，所以如果我不同时也了解与阿玛莉娅有关的一切，那么我就无法支持、帮助巴纳巴斯。难道你愿意我自己去做点什么而由于对情况了解得不够细，并且仅仅只因为这一点，就把事情弄砸了，对你们、对我自己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吗？”“不，K.，”奥尔嘉稍停片刻后说道，“我不愿意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切照旧更好。”“我不相信，”K.说，“我不相信一切照旧会更好，我不相信巴纳巴斯继续当这个所谓的信差成天稀里糊涂混日子，你们也都跟他一起分享这种日子会更好。你们都是大人，却只能靠别人拿去喂小孩子的东西活命。要是巴纳巴斯同我联合起来，让我在这里好好想出最佳办法和途

径，那时就可以不再只靠自己孤军作战，而是经常有人关心，充满信心地为了他的也为了我的利益自己放手去做一切事，继续设法去深入办公厅；或者，也许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但却完全可以就在他已经去到的那个房间里学着理解一切、利用一切——我就不信一切照旧会比这样做更好。我不相信这样做是不好的，是不值得为之作出某些牺牲的。但是，当然也有可能是我错了，有可能恰恰是你不愿说出的那些情况说明你正确。不过，假如是这种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仍然可以继续做好朋友，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完全不能缺少你的友情。但是那样一来我就没有必要整整一个晚上待在这里，让弗丽达老等着我了，只有巴纳巴斯的重要的、刻不容缓的急事，才能成为我在这里待着的正当理由。说到这里K.想站起来，奥尔嘉制止住了他。“弗丽达对你讲过我们的事没有？”她问。“没有讲过什么具体的。”“老板娘也没讲过？”“没有，什么也没讲。”“这个我早料到了，”奥尔嘉说，“从村里不管什么人那里你都不可能听到一点点关于我们的具体情况。反过来说，每一个人，不论是知道事情底细的，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只信村里流传着的或者他自己编造出来的谣言的，总之是每个人一般说来都会很愿意表现出看不起我们，显然他觉得，要是他不这样做，那他就必定是看不起自己了。弗丽达和所有的人全都是这样，可是这种看不起总的说只是笼统地对着我们，对着我们全家，而实际上它的矛头完全只是针对阿玛莉娅一人的。我特别感激你的一点，K.，就是你虽然也受到一般议论的影响，但却既不是瞧不起我们，也不是瞧不起阿玛莉娅。你只是对我们有点成见，至少是对巴纳巴斯和阿玛莉娅有成见，可谁又能完全摆脱环境的影响呢？而你居然能顶住这种影响，做到现在这一步，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的一大部分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我不管别人有什么看法，”K.说，“对这些看法是怎么来的也不感兴趣。也许我这种状况会变——果真那样的话就很糟，然而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在我结了婚，适应了此地的环境以后有可能变，但是现在我还是自由的；虽说瞒住弗丽达我到你们家来，或者找出理由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来对我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到底还是自由的，到底还可以没有多少顾虑地去做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比如巴纳巴斯这件事，而且是想做多细致都行。现在你总该明白我为什么要苦苦催你们快些作决定了吧——现在我还在你们这里，但只是好像随时处在整装待命状态中那样，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人来把我叫走，而走了以后，什么时候再来我就知道了。”“可是巴纳巴斯不在这儿啊，”奥尔嘉说，“没有他，能作出什么决定呢？”“我暂时不需要他，”K.说，“现在我暂时需要一些别的東西。但是，在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件列举出来之前，

我想求你一件事：就是如果我的话听起来有点盛气凌人，那么请你不要误会，我既没有当官的瘾头，也不想当包打听，我既不想让你们当我的奴仆听我支使，也不想把你们的秘密全部套出来，我只想用我希望别人用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你们。”“你现在说话听起来怎么同我们那样见外，”奥尔嘉说，“你不是已经跟我们亲近多了吗？你这些顾虑完全不必要。我从没怀疑过你，以后也不会怀疑你，可你也不要对我有什么怀疑啊。”“如果说我现在说话跟以前不同，”K.说，“那么这是因为我想比以前更亲近你们，我想在你们这里待着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下面这两点，二者必居其一：不是我像这样同你们联合起来，就是我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不是我们在巴纳巴斯的事情上完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是我们完全避免任何哪怕只是短暂的、使我丢面子也许也使你们丢面子的、于事无补的接触。但是，对于这种我希望能实现的联合，对于这一以城堡为目标的联合，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障碍：阿玛莉娅。所以我要先问一句：你能代表阿玛莉娅说话，代表她回答问题，为她担保吗？”“我可以代表她说某些话，代表她回答某些问题，但不能为她担保。”“你不想叫她过来吗？”“叫她来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你从她那儿知道的只会比从我这儿听到的少。她会拒绝任何联合，不接受任何条件，她甚至会禁止我回答问题，她会非常巧妙、毫不让步地——这种机灵和坚决你在她身上还根本没有见过——强迫你中止我们的谈话、离开我们家，不过然后呢，等你到了外面之后，她兴许就会晕倒在地上的。她就是这么个人。”“可是没有她，什么事都办不成，”K.说，“没有我们就不上不下、什么都没个定准。”“也许，”奥尔嘉说，“也许你现在对巴纳巴斯的工作有更好的了解了吧，我们两个，就是他和我，只有我们两个在工作；没有阿玛莉娅，我们就像是在盖一所没有地基的房子。”

〔25〕“也许他因为写信的事到底还是受到上级处分了吧？”K.问。“因为完全见不着他的面，你就这么猜想吗？”奥尔嘉反问一句，“恰恰相反。这种完全不露面是一种奖励，据说官员们人人都在争取得到这样的待遇呢，因为管老百姓的纠纷，对他们来说就是受罪啊。”“可是索尔替尼就是以前也几乎没有管过这些事吧，”K.说，“要不，难道他写那封信也算是在管让他受罪的百姓纠纷？”“K.，请你不要这样问，”奥尔嘉说，“自从阿玛莉娅进屋里来以后，你态度就不一样了。你问这样一些问题有什么用？不管你是认真地提问，还是开开玩笑，反正谁都没法回答这些问题。你的问题使我想起了阿玛莉娅在这些不幸年月中最初一段时间里的情形。那时她几乎什么话也不说，但却很注意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比现在注意得多，可有时她也打破自己的沉默，提出一个问题，这

问题也许使她这个提问的人难堪，但无论如何是使被问的人感到难堪，毫无问题地更会使索尔替尼难堪。”

〔26〕“城堡本身已经比你们不知强大多少倍了，尽管如此，它是否一定稳操胜券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疑问吧，但是你们不去利用这一情况，而是看来好像把全部努力都用在绝对保证城堡取胜上了，因此你们在斗争正艰苦时突然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结果呢，更加重了你们的软弱无能。”

〔27〕“请随便坐吧。”埃尔朗格说，他自己则坐到写字台旁，先迅速扫视一遍一些装有文件的封套，据此重新整理了这几份文件的顺序；然后将它们放到一个小旅行包里，这手提包跟比尔格那只很相似，但看来它装这么些文件显然太小了点。埃尔朗格不得不把已经装进去的文件又拿出来，然后试着改换方式重新装进去。“您早该来了。”他说，他原本已经很不耐烦，现在大概又加上那些不听使唤的文件引起的气恼，这样就一股脑儿往K.身上发泄。由于来到新的环境里，又受到埃尔朗格那不苟言笑的神态的刺激，K.一下子倦意全消，埃尔朗格那八面威风的样子他觉得有些像那个男教师，只是地位不同而相应地程度上有所区别——外表上两人也有一些相似之点，K.觉得自己坐在这里这把椅子上好像一个小学生，而他左右两旁的同学今天全都旷课——现在他尽可能仔细地答话。首先，他提到他来时候埃尔朗格正在睡觉，说他为了不打扰他的睡眠便走开了，但接下去就闭口不谈他离开这段时间内所做的事，然后再从他找错了房门起继续讲，最后提了一下他今天极度疲劳，请求对这一特殊情况予以谅解。埃尔朗格马上就抓住了K.答话中的弱点：“真是怪事，”他说，“我睡觉是为了恢复精力好去做我的工作，而您在同一时间里却不知在什么地方东游西逛，以便到了审问该开始时拿疲劳来给自己做挡箭牌。”K.刚想回答，埃尔朗格挥手制止了他：“您的疲劳看来也不能使您的饶舌有丝毫收敛，”他说，“在隔壁房间里喋喋不休唧唧咕咕几个小时，恐怕也很难说是为了照顾我的睡眠，您自称很不愿打扰的睡眠吧。”K.又想搭腔，但埃尔朗格再次制止了他。“我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埃尔朗格说，“我只想请您帮个忙。”可是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现在看来，他这一阵子一直是在朦胧恍惚地想着一些别的分心的事情，也许他对待K.的那种疾言厉色只是表面现象，仅仅是他内心烦乱引起的吧。这时他按下写字台上的一个电铃按钮。从一道侧门里——这样看来埃尔朗格和他的仆从们住着好几个房间——应声立即出来一个仆人。显然这是个公务上管事的仆人，即奥尔嘉给他讲过的那些管事之

一，K.自己还不曾见过这种人的面。这是一个相当矮小、但横宽极为可观的男子，他的脸也很宽，而且五官各自相距甚远，从而那双永远不能完全睁开的眼睛显得越发细小。他的衣服样式有点像克拉姆的，只是已经非常旧，而且又很不合身，特别是两只太短的袖子十分惹眼，因为这个仆人的胳膊也相当短，而这套衣服显然又是给另一个比他更为矮小的人做的，大概仆人们都是穿官员们穿旧了的衣服吧。这可能也就是管事仆人们所以产生那有口皆碑的傲气的原因之一了。眼前这个仆人也觉得他应铃声而到就已经做完了所有分内之事，于是使用严厉的目光看着K.，好像他的职责就是来对K.发号施令似的。埃尔朗格则一声不响地等着仆人去做某件他叫他来做的事，看起来这是件例行公事，他不需要再给仆人发出更明确具体的指令了。但是仆人并无任何动静，只是一个劲儿横眉立目或一肚子不满地盯着K.，于是埃尔朗格气得直跺脚，几乎要把K.——现在K.不得不再次承受并非由他的过错引起的气恼，做它的出气筒——轰出门去；他厉声要求K.暂时先出去一下，等一会儿就会让他再进来的。后来，当K.被埃尔朗格以一种比叫他出去时好得多的态度再叫回屋里来时，那个仆人已经走了，K.第二次进来发现房间里唯一的变化是：已有一道木制屏风把床、盥洗台和柜子全挡住了。“这些仆人真够气人的。”埃尔朗格说，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这点令人吃惊，当然，如果这不是自言自语的话。“唉，气恼和忧虑本来就够多的了，”他继续说道，说话时仰身靠着椅背，双手攥成拳头，搁在离身体很远的桌面上，“我的上司克拉姆老爷最近几天心情烦躁不安，至少我们这些生活在他左右的人，我们这些在他左右揣摩他的每句话、力求体会他每句话的意图的人感觉是如此。我们感觉是如此，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如此，就是真的烦躁不安——烦躁不安怎么可能同他沾边？——而是说我们自身烦躁不安，我们这些在他周围的人烦躁不安，并且工作时几乎无法在他面前掩饰。当然这种状况一秒钟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就要——对每个人，也包括您——造成极大的损失！我们努力寻找原因，发现了可能造成这种局面的各种不同的因素。这里面有一些极为可笑的东西，这用不着奇怪，因为极端可笑和极端严肃往往相去无几。尤其是办公室工作，这是非常消耗精力的工作，因此只有仔细注意每一个最琐碎的细微末节，尽可能在这方面不允许作任何变动，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举例来说：一个墨水瓶从它平时的位置挪开了一掌之远，这件小事就可能对最重要的工作造成危害。注意着不要出任何这类纰漏，本来是管事仆人们的任务，但实际上遗憾的是这些人很不可靠，因而这项工作中一大部分必须由我们来做，我在其中做的绝不

是最少，在这方面我被众人认为眼光特别敏锐。然而这是一项非常敏感、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工作，如果让那些麻木愚钝的仆人的手来做，他们转眼之间就做完了；而对我，这却是件伤透脑筋的麻烦事，它距离我的其他工作非常之远，造成我来回奔忙、两头照顾，极易顾此失彼。这种情况对于一个神经只需比我稍微衰弱一点的人来说，也许就会完全毁掉他的健康。您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第一版后记

在写到意味着是主人公一次重大的、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失败的这个地方，弗兰茨·卡夫卡的这部小说遗作还没有结束，还继续发展了好大一段。紧接而来的是一次新的失败。破题儿头一遭有一个城堡秘书和K.亲切交谈，——虽然这种亲切的态度也令人产生某种怀疑，但是这毕竟是城堡的一个官员第一次表现出良好的愿望，甚至表示愿意过问这件事，帮K.的忙，虽然这件事不属他所主管的范围（麻烦就出在这里了）。但K.太疲乏，太困，没有心思对这个建议哪怕只是进行一番考虑。在关键时刻他的身体顶不住了。在紧接着的几个情景中，K.误入歧途，越来越远离他的目标。——所有这些故事都只交代了一下前奏，只开了个头。因为它们再也没有结尾了，让我将来出补遗的集子时再把它们（类似长篇小说《诉讼》中的那些未完成章节）收进去吧。

结局一章卡夫卡没有写。但是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将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这就是：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至少得到部分的满足。他不放松斗争，但却终因心力衰竭而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村民们聚集在他周围，这时总算下达了城堡的决定，这决定虽然没有给予K.在村中居住的合法权利，——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村里生活和工作。

这部作品与歌德的“谁不停地努力奋斗，我们便可以解救他”的格言是相似的（其相似程度极其微小，似乎讽刺性地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也许可以称之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浮士德诗剧的这部作品本来正是想以此告终的。这当然是一个故意衣着朴素，乃至衣衫简陋的浮士德，这个浮士德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推动这个新浮士德前进的不是对人类的最终目标以及终极认识的渴望，而是对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对安居乐业、对加入公众生活的需求。乍看起来，这个区别似乎很大，但是如果人们

感觉到，对于卡夫卡来说这些简陋的目标具有宗教意义，并且完全是正当的生活、正当的道路，那么这个区别便会明显缩小。

在出版小说《诉讼》的时候，我在后记里故意对这部作品的内容不加任何评论，未曾附加任何说明性的文字。后来我在别人的评论文章中常常看到对这个问题的极不恰当的解释，诸如在《诉讼》中卡夫卡意在抨击司法制度方面的弊端之类的话，每逢这种时候我总对我所持的保留态度感到惋惜。但是假如我作了某种阐释，从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肤浅的或不明智的读者的误解，那么无疑我会更加后悔莫及的。——这一回情况不同了。《城堡》不同于《诉讼》，还没有到可以付印的程度，但是《城堡》（跟《诉讼》完全一样）纵使外在形态不完善，却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充分体现了作家想要表达的情感。对于卡夫卡的几部未完成的伟大小说的真正读者来说，从小说中情节发展诸条件几乎充分具备的某一点起，结尾的外表形式就失去了其重要性，这一点是卡夫卡创作艺术的秘密之一，是卡夫卡独具一格的创作艺术。比起这一回来，《诉讼》停留在现在那个阶段而没有完成，毕竟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如果一幅图画接近外在形式的结尾，那么它就不再需要辅助线了。如果它没有完成，那么为了展示这幅画以后可能会呈现的样子，人们就有理由利用辅助线以及其他现有辅助手段，利用草图等等。当然人们决不会愿意把这件绘画艺术品与辅助线、支座、略图等等混淆起来，或者将它们掺和在一起。

我以为在《城堡》中这些辅助线不像在《诉讼》中那样可有可无，这些辅助线中的一条可以追溯到《诉讼》这部小说。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其相似之处不单单在于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诉讼》里的约瑟夫·K.——《城堡》里的K.）的名字相同。（这里应该提一笔，《城堡》一开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后来作者本人对头几章作了修改，所有用“我”的地方都改用了K.，以后的那些章节全部改成了这样的写法）主要的是，《诉讼》里的主人公受到一个看不见的神秘莫测的当局的迫害，受到法庭的传讯，《城堡》里的主人公则同样受到一个这样的当局的摒弃。约瑟夫·K.躲藏、逃跑——K.强求、进攻。尽管方向相反，但基本情感是完全相同的。而《城堡》里的那些奇特的案卷，它那深不可测的官吏等级制度，它的变化无常，诡计多端，它那种要求别人对它无条件尊重，无条件服从的（而且完全是正当的）权利，这样的——《城堡》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不排斥作更为专门的解释的可能性，这些解释可能完全正确，但却全都包括在这个最广博的解释之中，就像一座

中国木雕艺术品，其内壳包在外壳之中一样，——这座K.未能进入、令人不解地连接近都未能真正接近的《城堡》正是神学家们称之为“仁慈”的那种东西，是上天对人的（即村子的）命运的安排，是偶然事件、神秘的决定、天赋与损害的效力，是不该得到和不可得到的东西，它超越于一切人的生命之上。在《诉讼》和《城堡》里，神的（在犹太神秘哲学意义上的）这两种表现形式——法庭和仁慈——恐怕就是这样来表现的吧。

K.设法在城堡脚下的村里扎下根，以寻求与神的恩惠的联系，——他为在一定的生活圈子里谋得一个职位而奋斗，他想通过选定职业和结婚来巩固自己内心的信念，想作为“陌生人”，即从孤立的地位出发，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去夺取那普通人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的東西。——有一次弗兰茨·卡夫卡向我谈到福楼拜的外甥女在他的通信集的序言里提及的一件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对于形成我上述的这个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她这样写道：“他（福楼拜）没有选择平平常常的生活道路，在他的晚年不为此而感到遗憾吗？每当我想起有一次我们沿着塞纳河走回家时他脱口而出的那句感人的话，我便几乎相信他确实是为此而感到遗憾了。我们刚拜访了我的一个女友，看到她被围在她那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中间。‘他们真美气啊。’他说道，他这话指的是这可尊敬的美好家庭生活。”

如同在《诉讼》里一样，K.当然是以一种真心实意、毫不掺假的态度依靠那些妇女给他指明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生活道路的——因为否则的话，K.就不会接受这种生活道路，而使他为争取爱情、为争取加入公众生活的这场斗争变成一场带宗教色彩的斗争的，恰恰是这一严格的态度。小说有一处写到K.过高估计了他取得的成绩，他自己这样解释他的斗争目标：“不管这一切多么微不足道，我好歹已经有了一个家，一个职位和实实在在的工作，我有了一个未婚妻，我工作忙不过来，她可以帮我点忙，我将娶她为妻并且成为村里的一个居民。”——这些妇女（拿小说里的话来说）“跟城堡有联系”——她们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她们有这些联系，这当然就使双方，使男方和女方产生了许多错觉，也使双方蒙受了许多真真假假的冤屈。原稿中一处删去的地方（在他的原稿中被删去的部分与所有其他部分一样的优美和重要，这也是作家卡夫卡的一个特色——即使没有多少预言家的才能，我们也完全可以预见到，下一代人有朝一日也会将那些删去的部分发表出来的），那个删去的地方是关于侍女佩碧的，它这样写道：“他准保心里在想，假如他在这里没有遇

见弗丽达，而是遇见了佩碧，并且猜测到她与城堡有某种联系，那么，他一定会像对弗丽达那样，试图用同样的拥抱去攫取这个秘密的。”

这全部事实，当然完全是用敌对的眼光来看的，在乡村秘书莫姆斯的书面报告的一个（后来删掉的）片断里有所反映。这里不妨将它当作全部计划的一个良好、然而却极其片面的纲要引证如下：

“首先土地测量员K.必须力求在村里站稳脚跟。这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人需要他干的那种活儿，除了那个让他给镇住了的大桥酒店老板，谁也不愿意收留他，除了几个官吏老爷跟他寻寻开心之外，没有人理睬他。这样，他表面上无所事事，游来荡去，尽干些扰乱和平的事。实际上他却是非常的忙碌，他在等待机会，并且不久便找到了这个机会。弗丽达，那个年轻的酒吧间侍女，相信了他的诺言，上了他的钩。

“证明土地测量员K.的罪过并非一件易事。这里因为不管多么令人难堪，人们只有强迫自己完全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才能看穿他的诡计。如果人们用这个办法发现了一桩看来似乎难以置信的卑劣行径的话，人们八成没有受迷惑，相反，如果人们已经走得这么远了，那么他肯定没有迷路，他算是到达恰当的地方了。我们就拿弗丽达的情形作例子吧。很明显，土地测量员并不爱弗丽达，不会出于爱情娶她的，他很清楚，她是一个其貌不扬态度专横的姑娘，况且名声不好，他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她，到处闲荡，不把她放在心上。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对此可以作不同的解释，K.可以作为一个或懦弱、或愚笨、或高尚、或卑鄙的人出现。然而这种说法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只有密切注视这里所揭示的从他到达起直至与弗丽达结合的全部踪迹，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一旦找到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我们当然也还得习惯于相信它，而舍此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K.完全是出于最肮脏的意图而去讨好弗丽达的，只要他还存有一线希望，认为他计算得不错，他便不会离开她。因为他以为她是部长先生的情妇，占有了她就是占有了一件抵押，要赎回它就得付出很大的价钱。与部长先生谈判价钱，这就是他现在唯一的奋斗目标。由于他对弗丽达满不在乎，他系之于心的是那个价钱，因此在有关弗丽达的问题上他十分迁就，而在有关那个价钱的问题上他却极其固执。眼下，除了他的假设和建议令人讨厌以外，他不会伤害人。一旦他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并且大丢面子，那么他甚至会图谋不轨，当然是在他那微不足道的能力的限度以内。”

“这一页稿纸以此告终。稿纸边上还有一幅透着幼稚的、用虚线勾成的画，一个男人搂着一位姑娘，那姑娘的脸贴在男人的胸口上，那个个头儿大得多的男人两眼从姑娘的肩头盯住自己手里的一张纸，他乐滋滋地在纸上记下了几笔款项。”倘若人们觉得K.所体验、所猜想的妇女和“城堡”（即上天的安排）之间的那种联系难以捉摸，尤其觉得那个关于索尔替尼的插曲——这位官员（上天）明目张胆地要那个姑娘去干一种不道德的龌龊勾当——不可思议，那么大家还是去读一读克尔恺郭尔的《恐惧与颤抖》吧——这是一部卡夫卡非常喜欢、经常阅读并且在许多信件里深刻评述过的作品。索尔替尼插曲非常类似克尔恺郭尔的书，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上帝甚至要亚伯拉罕去犯罪，拿他的孩子去祭供。书中的这种荒谬性有助于我们作出明确的论断：决不能把道德的范畴和宗教的范畴想象成是完全等同的。——二者反映了尘世活动和宗教活动的不可通约性，这种看法直接通向卡夫卡这部小说的核心。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克尔恺郭尔这个基督徒从不可通约性的这一冲突出发，在以后的作品中日益明显地走向放弃今生；而弗兰茨·卡夫卡的主人公却顽固地、不遗余力地坚持按照“城堡”的指示去安排他的生活，虽然他遭到了所有的城堡代理人的简直是粗暴无礼的拒绝。这诱使他对他在内心深处满怀敬畏的那个“城堡”发表了极不恭敬的意见，作出了极其轻蔑的表示，这一点别具一格地构成了这部无与伦比的小说的诗意的生活气息，构成了它的讽刺意味。因此，所有这些挖苦的意见和诽谤的话语仅仅显示了人的理性和上天仁慈之间的距离，当然这是从井蛙的立场，从人的角度来看，而那人（K.也好，巴纳巴斯一家下等人也好）表面上举止行为十分合理，实际上却往往令人不解地不合理。人和神之间的这种歪斜不平的关系，这一距离通过合理途径的不可逾越性，再也没有比通过用神奇的幽默所描绘出来的下述这一事实表达得更好的了（所以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小说的这种表面上怪异的写作方法却是唯一可行的写作方法），这个事实就是：天意在人的理智的注目下，它时而显得崇高，值得大家爱，恰似克拉姆先生的备受爱戴，时而又受到带讥讽意味的批评，有明智的批评，也有愚蠢的批评；这个事实就是，上天有时甚至呈现出一种极其可鄙（那个文件保管室）、悲惨、混乱或放纵或阴沉或乖戾（那两个助手）或庸俗，而始终都是难以捉摸的景象。卡夫卡对上天的细节描写并不像风琴那样单调，而是层次清楚，具有十分细腻的悲剧以及悲喜剧色彩。他那描写上天的对立面、描写尘世的失意的表现力同样也很丰富。“怎么干都是错的”——K.企图与村子和城堡建立适当的联系的所有那些徒劳无益的尝试为这句话作了一个最有切身体会的绝妙旁

注。援助怎样一再从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而老老实实、怀着最好的意愿制定的计划却怎样以可怜的结局，譬如以喝白兰地而告终，最小的诱惑怎样导致毁灭（对照《乡村医生》：一旦听从了半夜误打的钟声，事情便再也无法补救），以及人怎样茫然地倾听着外面那个对他关于善与恶的永恒的问题不予作答或是只作最含糊不清的回答的世界，而心灵深处却怎样不可磨灭地埋藏着对那条给我走的、我注定要走的唯一光明的道路的希望（比较《在法的门前》）。我觉得，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从思想上和情绪上（二者是无法区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简直是完美无缺地表现了上述这种种评价和直觉对人的所有这些戏弄，表现了作为人所经历的一切心理上的抑制、模糊不清的事物、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人生的坎坷乃至困厄以及我们在纷乱之中朦胧地意识到的更高的上天的秩序。那种在有些地方也许一开始会令人感到奇怪的过细描述也全是这种完美无缺性的一种表现，这一点只有那些还从来没有试图对生活中的随便哪一个事实（例如对拿破仑）及其在（这个人自己的，或者是人类的）“正确道路”上的作用作出判断的人才会觉得不可理解。奥尔嘉在谈到巴纳巴斯的那些信件时说：“那些信件所引起的思虑是无穷无尽的。”这句话适用于所有那些人们以严肃态度对待的生活条件。抑或如同小说里（删掉的）一处地方所称：“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许多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作为一个具有这种眼力，很有才干，可以以特殊的力量在最深沉的爱情（一种往往是充满怨恨而却又是如此温柔的爱情）的推动下始终睁着眼睛的人，卡夫卡曾经——用他那适度的语言来说——“看见了许多许多”，许多先前未曾料想到的事情。

在出版这部遗著的时候，凡涉及版本及出版方面事宜，我还是遵循那些在《诉讼》后记里提出过的原则。对原作当然没有任何改动。只对明显的错误作出纠正。再者，就是我在少数几处作了章节的划分。此外，原稿中作者本人曾对章节的划分有所提示。奥尔嘉插曲各节的标题也出自他的手笔。整部原稿没有名字。在谈话中卡夫卡经常把这部小说称作《城堡》。我出于开头阐明的理由而删去的是原稿的最后几页，还删掉了K.与汉斯之间的那段情节以及吉莎-施瓦尔策插曲中各一处，每处约删去了一页。

马克斯·勃罗德

[1926]

第二版后记

新版《城堡》这部小说是按与《诉讼》相同的原则编排的。第一版删去的两个段落如今已经按上下文联系纳入全文之中，从前被取消了的最后几章也被采纳并恢复其原来的位置。附录中收录了一段小说开头的异文及一系列作者删掉的段落。这些增补的文字中有几处摘引自几个比较大的段落，这些段落作者后来自己就曾改头换面使用了。被我们称为《断片》的、附录中的最后那部分文字是对主要章节里的一个情节的释义，由于偏离正文所以刊印在这里。这个片断是在《城堡》手稿第六册里发现的。还要提及一点，这就是，第一版后记中的第一句话自然是针对小说第一版的结尾而言的。对莫姆斯的信只是暗示了一下，这封信在第一版后记里才作了全文引证。

马克斯·勃罗德

〔1935〕

第三版后记

我要特别感谢也曾参与二版1-3卷编纂工作的海因茨·波里策，感谢他在确定二版文本时所给予的帮助。

故事在手稿中比小说第二版所叙述的还要多出几行文字。

小说的这最后几行文字在一页稿纸的中间突然中断（这一本手稿还有几页空白稿纸），它们是这样的：

“盖尔斯泰克气恼地挥舞着手，就仿佛他想从远处封住搅扰他的老板娘的嘴巴似的，他要求K.和他一起走。起先他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K.提出现在他必须到学校去，对K.的这个异议他几乎不予理会。及至K.坚决不从，不肯让他拽着和他一起走，盖尔斯泰克这才告诉K.，说是他不必担心，他会在他盖尔斯泰克那里得到他需要的一切的，那个学校勤杂工的职务他可以辞掉，他怎么也要上他家去，他已经整天都在等着他，他的母亲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儿。K.渐渐对他让步，问，他供给他膳宿想叫他去干什么事。盖尔斯泰克只是草草回答说，他需要K.当临时帮手来看管马匹，说是他自己现在有别的事，可是现在请K.别这么磨磨蹭蹭

的，别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说是他若要工钱，他也会付给他的。可是这下任凭怎么拽，K.也站住不动了。说是他根本对马一窍不通。盖尔斯泰克则不耐烦地说，也没有这个必要嘛，他边说边气恼地交叉十指，劝K.和自己一起走。‘我知道为什么您愿意把我带走。’K.终于说道。盖尔斯泰克对于K.知道什么毫不在意。‘因为你以为，我可以在埃尔朗格那儿为你办成点什么事。’当然是这样，’盖尔斯泰克说，‘不然你对我还有什么用。’”K.笑了笑，挽住盖尔斯泰克的胳膊，跟着他走进黑暗之中。

盖尔斯泰克小屋的这间房间里只亮着黯淡的灶火和一段蜡烛头，有人在一个壁龛里正弯着腰在那儿凸出的斜屋梁下就着那烛光读一本书。那是盖尔斯泰克的母亲。她向K.伸出颤抖的手并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她讲起话来有气无力，费大劲才听懂她的话，但是她所说的，（手稿到此结束）

在一个在前面的、被删掉的、有好几页长的段落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对话的下面的这段异文。我公布这段异文，因为人们也许在一位母亲的和好的话语里——不管书中的主人公起先怎样执拗地对她避之唯恐不及——可以为末一章里问题得到比较积极的解决找到最初的苗头，我在第一篇后记里根据卡夫卡的一个口头意见曾谈到这一积极的解决办法。事实上。“人们不应该让这个人堕落”这句话确实与小说《诉讼》结尾的得救幻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关心别人的人？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个别人？是所有的人？……”上文提到的与盖尔斯泰克的对话的那段异文是这样的：“现在盖尔斯泰克终于觉得时机到了。虽然他多时以来一直努力要让K.倾听自己的意见。‘你有活儿干了吗？’他问。‘有了，’K.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在哪儿？’在学校。’‘可你不是土地测量员吗？’‘不错，我现在这个位置也只是暂时的，等接到土地测量员的聘书时，我就离开那里。你明白吗？’‘明白。到那时还要很久吗？’‘不，不，不会很久，聘书随时都可能来，这件事昨天我跟埃尔朗格谈过了。’跟埃尔朗格？’‘你是知道我跟他谈这事的。别再烦我了。快走你的。饶了我吧。’‘哦，你跟埃尔朗格谈过了。我原以为这是个秘密。’我是不会把我的任何秘密告诉你的。那天我困在你门前雪地里，是你对我耍态度说难听话来着。’‘可我后来还是用雪橇把你送到大桥酒店去了。’这倒不假，我还没给你车钱呢。你要多少？’‘你有多余的钱吗？在学校你的工钱多吗？’‘过日子够用了。’我知道一个地方，你上那儿干活可以得更多的工钱。’是不是到你家去照管你那些马？对不起，多谢你的好意了。’是谁告诉你的？’你不

是从昨晚起就虎视眈眈地要抓到我吗？”你大错特错了。“错了就更好。”这会儿，我看到你这么一副狼狈相，你，一个土地测量员，一个有学问的人，还是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裳，没有皮外衣，又黄又瘦，看着都叫人伤心，又跟那个小野丫头佩碧串通一气，她大概给你点支援吧；直到这会儿，当我看到这些时，我才又想起我妈说过的一句话，她说：不应该让这个人走上穷途末路呵。”这话说得好。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到你家去。””

从另一个被删去的段落中，还有下面这段有代表性的文字值得一提：

“‘你有惊人的概括能力，’奥尔嘉说，‘有时候你说一句话便帮了我的忙，这大概是因为你来自异乡。而我们则有可悲的经历和层层忧虑，我们一听到木头的劈啪声就吓得要死，决不进行任何抵抗。如果这一个害怕了，另一个立刻也害怕，且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害怕。这样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来的。即使人们有能力对一切进行思考——我们女人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丧失这种能力的。我们多么幸运啊，你终于来了。’K.在这儿村里第一次听到一席这样的毫无保留的欢迎词，但是尽管迄今为止他曾多么需要听到它，而且他也觉得奥尔嘉多么值得信赖，他现在却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他不是为了给什么人带来幸福才来的，只要需要，出于自己的意愿，他也会来帮忙的，但是谁也不可以把他当作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来加以欢迎；谁这样做，谁就是迷惑他的道路，要他服务于他这样受逼迫决不会为之效劳的事物；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然而奥尔嘉弥补了她自己的错误，她接茬说：‘当然啰，当我随后以为，我可以放下我的全部忧愁，因为你会为一切找到解释、找到出路的，那时你又会突然说上点什么话，说点什么令人痛心的、不正确的话。’”

马克斯·勃罗德

〔1946〕

[1] 此书中凡有〔 〕标出的地方，原稿中作者勾掉了某些字、句，这些地方都在本书最后的附录中一一加以复原。——编者

[2] 德风俗，表示答应对方的求婚。——译者

[3] 在西方一些国家，回答是非疑问句时不论其是否含否定词，摇头

均表示“非”，在这里，摇头就是表示不服从。——译者

[4]在德语中，除对亲戚、好友、小辈等用“你”称呼表示关系亲密外，有时也用“你”称呼下属和下人。——译者

[5]旧时手工业帮工需外出漫游几年，增长见识，然后才能参加出师考试。——译者

[6]旧时砌在炉灶边上的长凳。——译者

[7]德奥等国旧时民俗，在年市等场所用鸟叼纸签的方式算命。——译者

[8]16世纪奥斯曼帝国侵占许多欧洲国家，此处即指这一历史事件。——译者

[9]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大洪水，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称，上帝为惩罚人类连降四十天暴雨，洪水泛滥，仅挪亚及其家人幸免于难。——译者

[10]此段据马克斯·勃罗德为小说第三版写的后记译出。——译者

第四卷 随笔*谈话录



1901年，18岁时的卡夫卡



1905/06年，22岁的卡夫卡



上图是柯林市场上的胡斯纪念碑，弗兰崔斯克·毕莱克的这一作品备受卡夫卡赞赏

下图是易北河岸的柯林景观



卡夫卡的大伯父费利普·卡夫卡，在柯林市经商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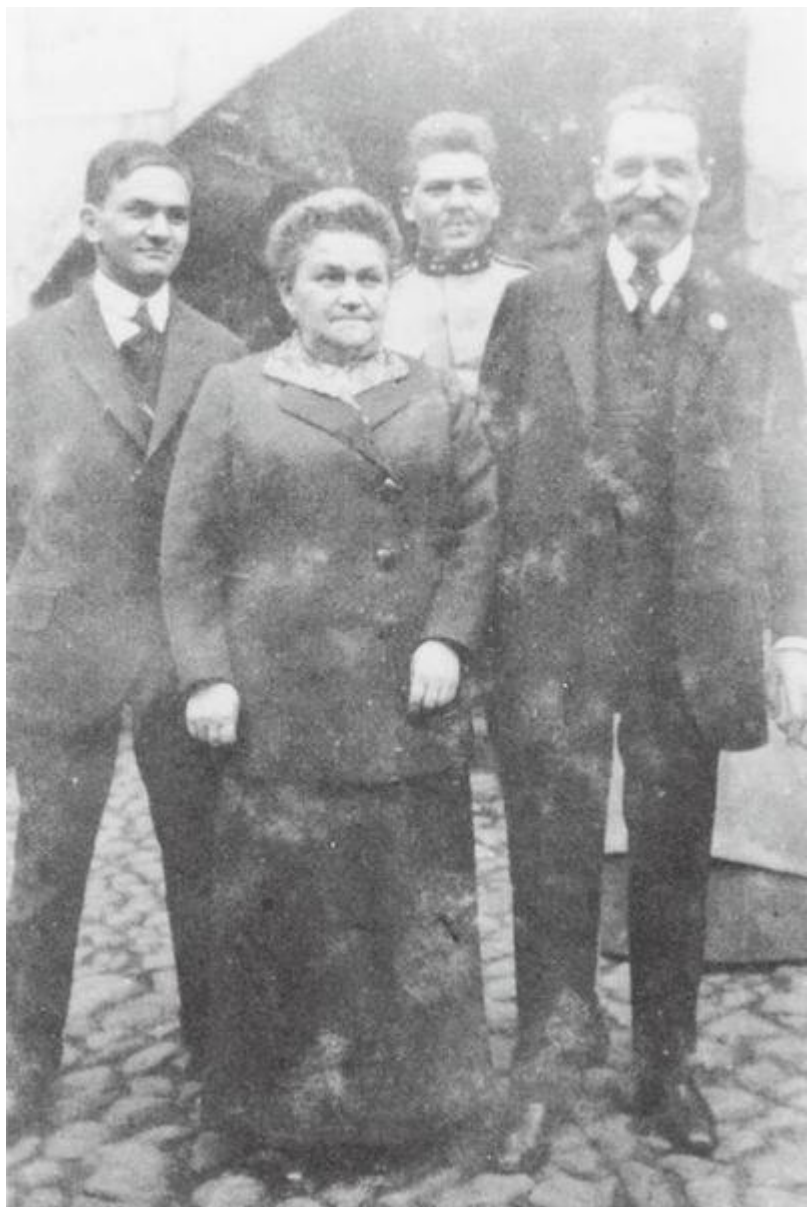


上图是费利普大伯（前排右一）和他的孩子们（三男一女）与亲戚

下图是柯林的堂兄弟罗伯特与他的未婚妻，他后来成了布拉格的律师。卡夫卡很赞赏他的体育技能



奥托·卡夫卡，费利普的大儿子，远涉美国而发迹



在莱特迈尔茨的亲戚，婶母卡罗琳，卡夫卡一直很喜欢她。丈夫死后她嫁给了商人S.柯恩，后面是她的两个孩子，罗伯特和弗里茨



“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莱德·洛维，母亲的大哥。他常来布拉格，给卡夫卡出主意，找工作。他通过比利时一位金融家的帮助而发了财，最后成为铁路经理



舅舅鲁道夫·洛韦，布拉格附近一家啤酒厂厂主，单身汉，信天主教。“一个不可猜度、过分友好、过分谦逊、孤单同时又近乎是个饶舌鬼。”卡夫卡与他很亲近，他被父亲用来与卡夫卡对比，是个“家里的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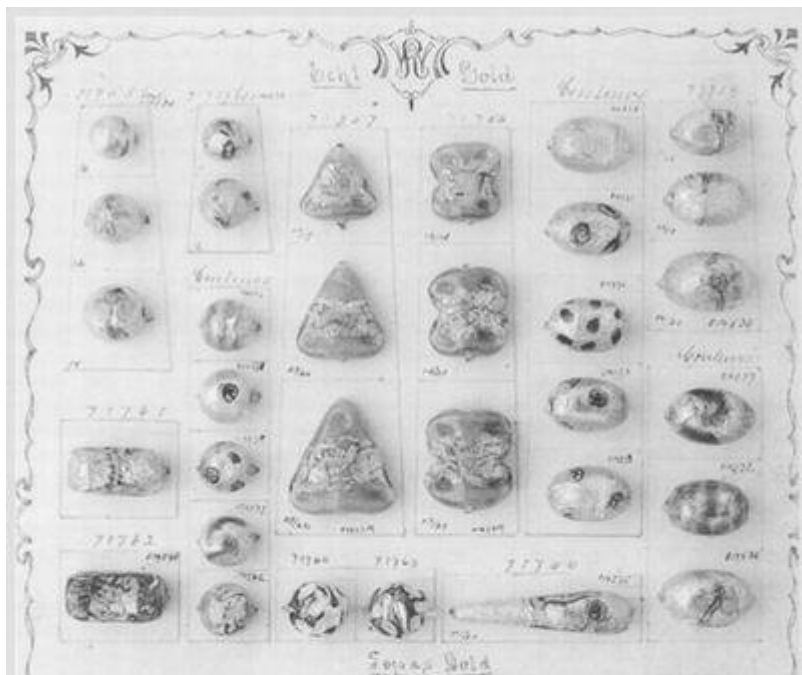
约1908年至1910年的家庭照。前排左起：卡夫卡母亲、父亲和来自施特拉柯尼茨的姑母尤莉叶；后排左起：来自特里施的舅舅西格弗里德，一个乡村医生；舅舅理查德及其妻子



舅舅理查德·洛韦，布拉格水果市场旁一家劳动服商店的店主



1912年时的卡夫卡父母



上图是父亲的妇女时尚用品商店的货品

下图是父亲商店所在地的“金斯基宫”，在右边的第一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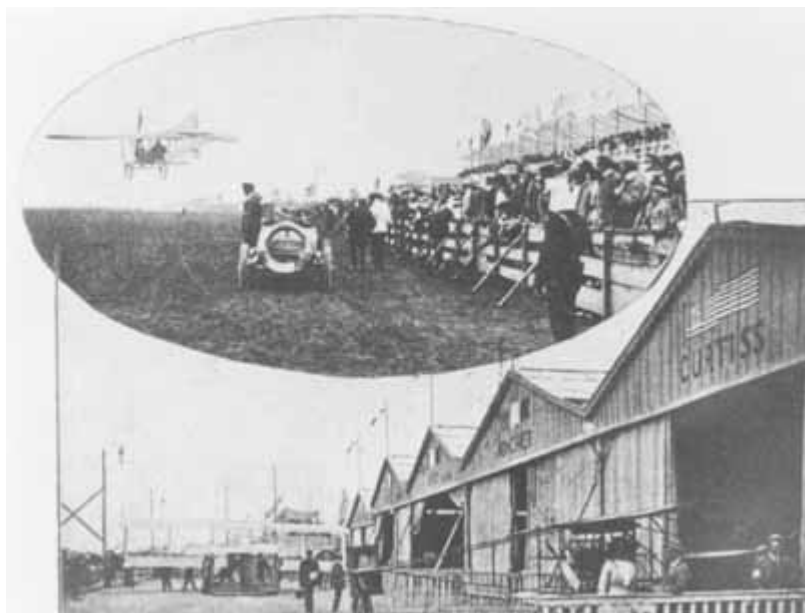


卡夫卡（右）与勃罗德弟弟奥托·勃罗德的合影。1909年秋卡夫卡与勃罗德兄弟俩一起去意大利加达湖畔里瓦游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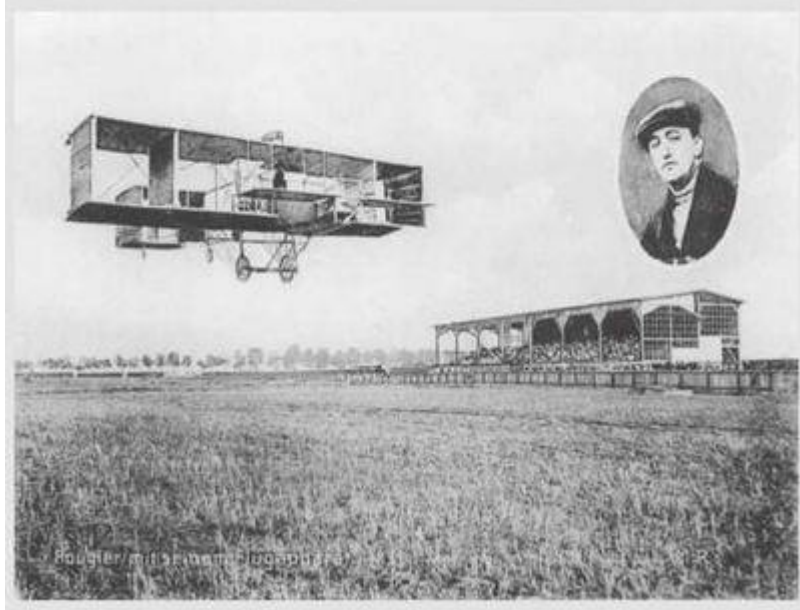


上图是加达湖

下图是布莱西亚市的钟塔



表演现场1909年9月5日至13日在布莱西亚附近举行航空展览（这是意大利首次举行这样的国际展览），卡夫卡和勃罗德兄弟俩前往参观



上图为速度比赛现场，G.措尔梯斯获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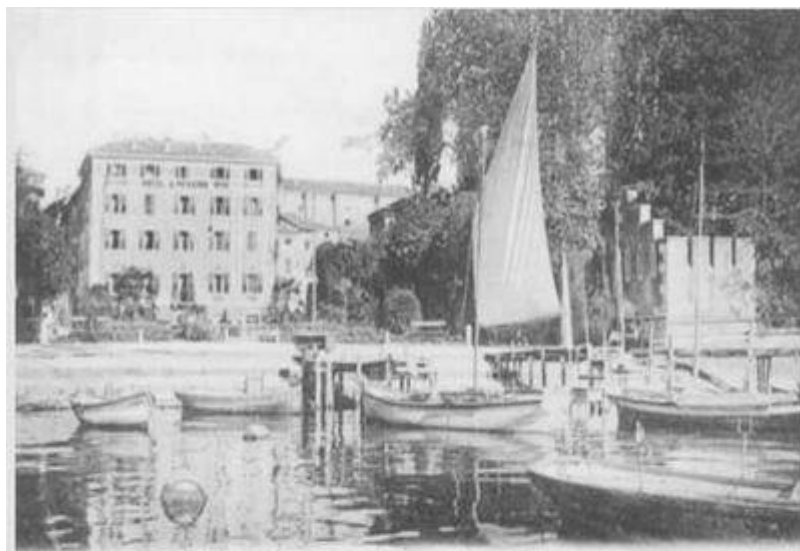
下图为高度比赛现场，H.罗杰以198米夺冠。卡夫卡为这次航空展写了《布莱西亚观飞记》一文，发表在布拉格的《波希米亚报》上

Die Aeroplane in Brescia.

Von Franz Kafka (Prag).

Wir sind angekommen. Vor dem Aerodrom liegt noch ein großer Platz mit verdächtigen Holzhauschen, für die wir andere Aufschriften erwartet hätten, als: Garage, Grand Büfett International und so weiter. Ungeheure in ihren Wägelchen fettgewordene Bettler strecken uns ihre Arme in den Weg, man ist in der Eile versucht, über sie zu springen. Wir überholen viele Leute und werden von vielen überholt. Wir schauen in die Luft, um die es sich hier ja handelt. Gott sei Dank, noch fliegt keiner! Wir weichen nicht aus und werden doch nicht überfahren. Zwischen und hinter den Tausend Fuhrwerken und ihnen entgegen hüpfst italienische Kavallerie. Ordnung und Unglücksfälle scheinen gleich unmöglich.

高度比赛，H.罗杰以198米夺冠。卡夫卡为这次航空展写的《布莱西亚观记》一文，上图即是发表在布拉格的《波希米亚报》上的该文复印件段落



Hotel Riva" in Riva am Gardasee



上图是里瓦的景点，图中的左后五层楼为卡夫卡与勃罗德兄弟俩下榻的“里瓦吃住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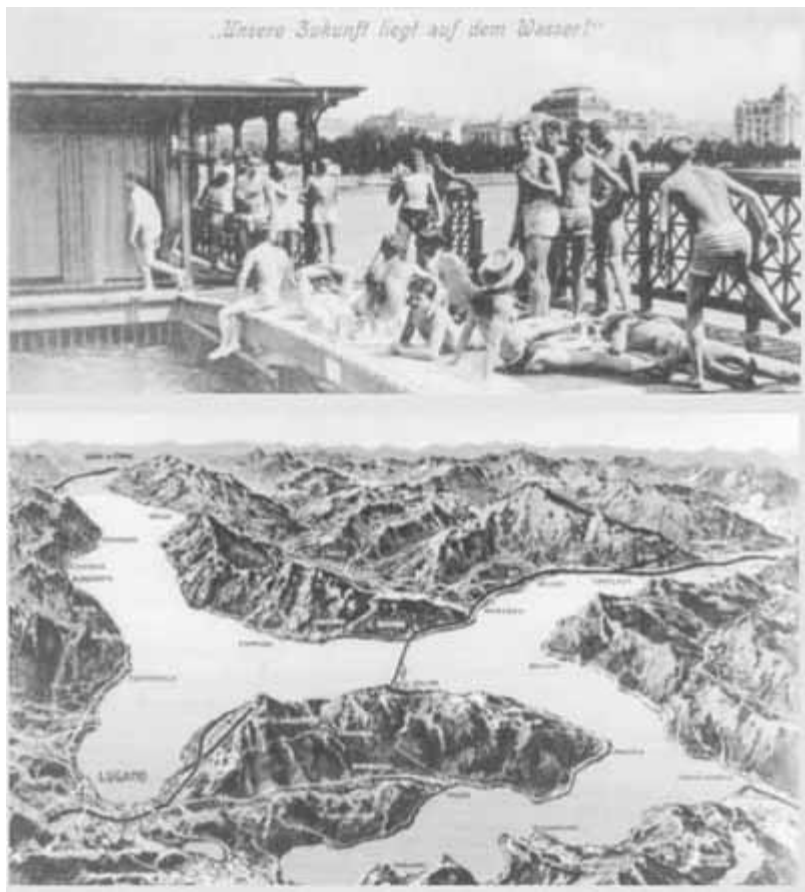
下图是里瓦的景点



上下两图是里瓦的景点



卡夫卡与一陌生旅游者的合影



上图是苏黎世的男士游泳场1911年夏卡夫卡与勃罗德一起经过苏黎世去瑞士著名风景区卢嘉诺度假，那里有最受人喜欢的干达里亚浴场

下图是卢嘉诺湖（卡夫卡寄给他小妹奥特拉的明信片）。这次旅行他们还经米兰去了巴黎



干达里亚浴场，那里的“船上都建有张帆用的架子，像牛奶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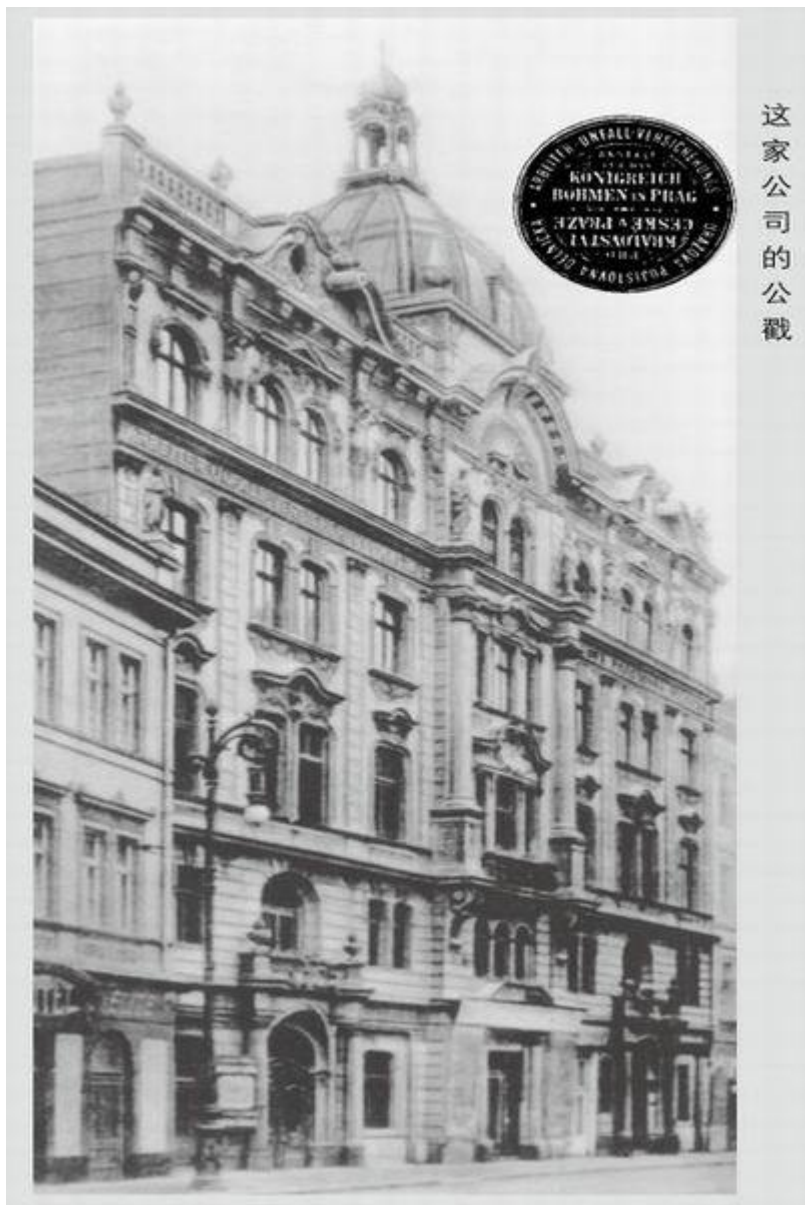


巴黎的里沃里大街，右边第二排大楼的前面一幢即卡夫卡与勃罗德下榻的S.玛
丽饭店



上图是1983年的布拉格采尔特纳街状貌，右侧通向水果市场的拐角处系州法院，1906/07年卡夫卡曾在这里实习一年1907—1908年卡夫卡曾在国际私人法律保险公司就职一年。

下图中右侧外面为该公司所在地



卡夫卡所供职的“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一译‘公司’）”大楼。他的办公室位于最高层。他在这里从1908年工作到1922年病退为止



保险公司大楼内的楼梯和过道



保险事务所所在的波里策大街拐角处的咖啡馆

Department: I. 3-11
 Additum:

Qualifikationsliste Kvalifikatsioonitabel

den Auskult-Präsidenten J. H. Dr. Franz Thapka
 in der

Art der Beschäftigung. Spisob zamestnani.	Fluss u. Ambition. Pile a snauvost.	Verwendbarkeit. Spisobitost.	In der Beschäftigung verwendet seit Prüfung bestand Ordnung an der od wie ordnet.
In der Art der Beschäftigung, welche die Arbeiter,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Prüfung, die in der	In der Art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Juli 1911, die in der 16. April 1919

Allgemeine Bemerkungen: In der Art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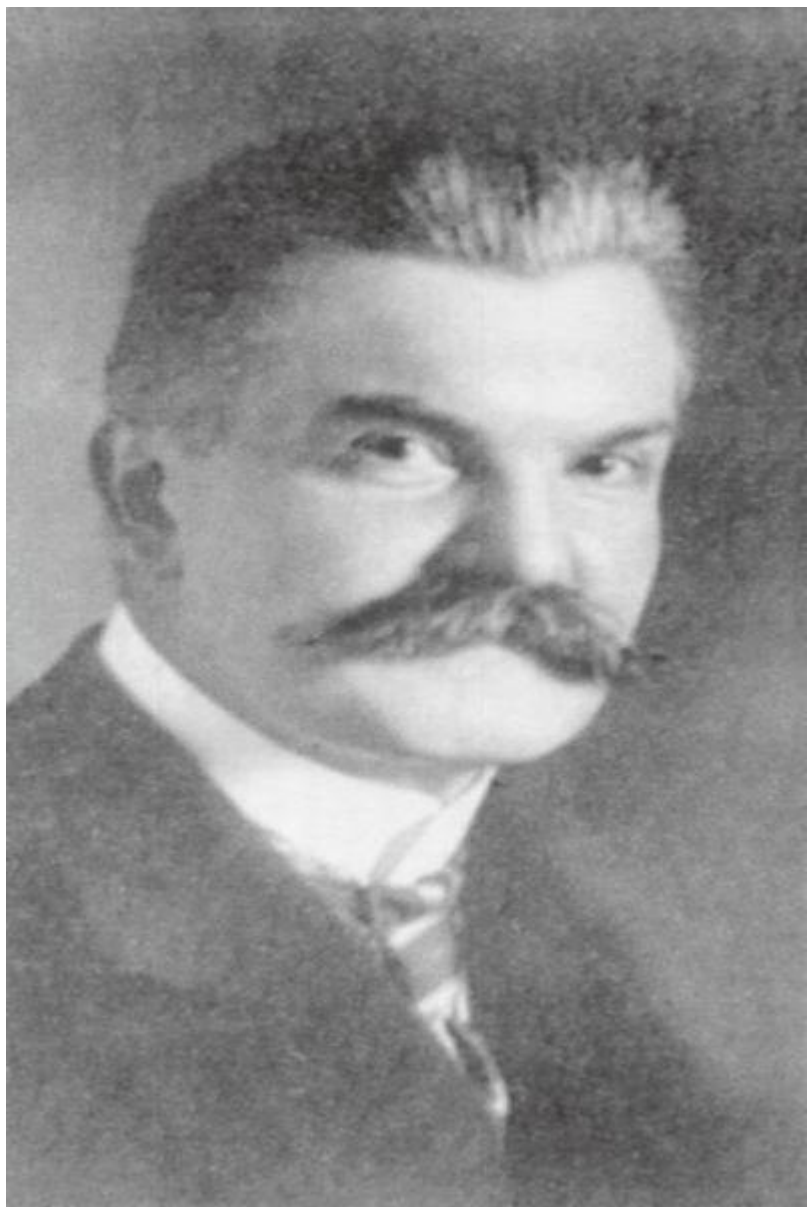
Prüf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Vorstand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in der Beschäftigung, die in der

卡夫卡在保险事务所头10个月的考勤表。他的顶头上司（技术室主任）欧根·普
 尔证言称，卡夫卡对工作“充满热情，克尽职守”，且“业余时间也关心公司工
 作”



保险事务所董事长奥托·普里卜拉姆博士



保险事务所经理罗伯特·马尔施纳博士



1907年布拉格一家公司的办公室情景



上图是1894年时的小汽车

下图是当时一家纺织厂车间的劳动情形



卡夫卡工作辖区的一家工厂所在地的村子的景观（卡夫卡于1909年寄给他小妹奥特拉的明信片）



卡夫卡小妹奥特拉在布拉格古城扬·胡斯纪念碑前

编者前言

卡夫卡是个具有思想家特色的艺术家，他的生存似乎包含着“三维世界”：一维是想象领域——作为艺术家的存在；一维是思考的领域——作为哲学家的存在；一维是实生活领域——作为公司雇员或平常人的存在。他的想象是服从他的思考的，或者是他的思考的一种手段；他的思考是研究现实人生或人的根本存在的，他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而作为俗生活的平常人则是他的前二维世界的评论员。你看，这个主体化的卡夫卡显得多么丰富而又复杂！

卡夫卡的想象世界，即他的那些虚构作品也就是小说所体现的世界已包含在本全集的前三卷里了。这一卷里收集的都是直接记录他的思考内容的文字，加上他的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式的与青年朋友雅诺施的谈话录。诚然，前一部分，即见之于马克斯·勃罗德编的那本《乡村婚事》（或译《乡村婚礼筹备及其他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即箴言、随笔、杂感等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想象性文字，即那些短小精悍的小故事、逸事等，但它们有时也有杂感的性质。其中有一部分已作为短篇或超短篇小说归入“短篇小说卷”了，考虑到它们虽篇数较多但总字数并不大，如将它们“挖”出去必会影响原来的面貌，故仍予保留。但另有几篇已经被别的选家“挖”走了，由于数量不多，亦保留其被“挖”的状貌。

叶廷芳

1995年秋

随笔

黎奇 译

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1]

1.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2.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乱，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

3.人类的主罪有二，其他罪恶均由此而来：急躁和懒散。由于急躁，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懒散，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懒散。由于懒散他们被驱逐，由于懒散他们回不去。

4.许多逝者的影子成天只忙于舔死人河的水流，因为它是从我们这儿流去的，仍然含有我们的海洋的咸味。出于厌恶，这条河流将水翻腾倒流，把死者们冲回到生命中去。但他们欣喜万分，唱起感恩歌，抚摩着这愤怒的死人河。

5.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这一点是能够达到的。

6.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所以那些把以往的一切视为乌有的革命的精神运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过。

7.恶的最有效的诱惑手段之一是挑战。

8.它犹如与女人进行的、结束在床上的战斗。

9.A.是目空一切的，他以为他在善方面远远超出了他人，因为他作为一个始终有诱惑力的物体，感到自己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来自至今不明的各方面的诱惑。

10.正确的解释则是，一个大魔鬼附上了他的身，无数小魔鬼就纷纷而来为大魔鬼效劳。

11/12.观念的不同从一只苹果便可以看出来：小男孩的观念是，他不得不伸长脖子，才能刚好看到放在桌子上的苹果；而家长的观念呢，他拿起苹果，随心所欲地递给同桌者。

13.认识开始产生的第一个标志是死亡的愿望。这种生活看来是不可忍受的，而另一种又不可企及。人们不再为想死而羞愧；人们憎恨旧的牢房，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在那里人们将学会憎恨这新的牢房。这种想法包含着一点残余的信念，押送途中主人会偶尔穿过走道进来，看看这个囚徒，然后说，“这个人你们不要再关下去了。让他到我这儿来吧。”

14.*假如你走过一片平原，假如你有良好的走的意愿，可是你却在往回走，那么这是件令人绝望的事情；但你如果是在攀登一座峭壁，它就像你自身从下往上看一样陡峭，那么倒退也可能是地理形态造成的，那你就不用绝望了[2]。

15.像一条秋天的道路：还未来得及扫干净，它又为干枯的树叶所覆盖。

16.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17.这个地方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呼吸与以往不同了，太阳旁闪耀着一颗星星，比太阳更加夺目。

18.如果当时有这种可能性：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

19.*别相信恶之所为，你在他面前不妨保守秘密。

20.豹闯入寺院中，把祭献的坛子一饮而空；这事一再发生；人们终于能够预先打算了，于是这成了宗教仪式的一个部分。

21.像这只手这样紧紧握着石头，仅仅是为了把它扔得更远。但即使那么远，也仍然有路可通。

22.你是作业。举目所及，不见学生。

23.从真正的敌对者那里有无穷的勇气输入你的体内。

24.理解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出你双足覆盖的面积。

25.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26.*藏身处难以数计，而能使你获救的只有一处，但获救的可能性又像藏身处一样多。

*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

27.做消极的事，正成为我们的义务；而积极的事已经交给我们了。

28.一旦自身接纳了恶魔，它就不再要求人们相信它了。

29.你自身接纳恶魔时所怀的隐念不是你的念头，而是恶魔的念头。

*这头牲口夺过主人手中的皮鞭来鞭打自己，意在成为主人，它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是由主人皮鞭上的一个新结产生的。

30.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

31.自我控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自我控制意味着：要在我的精神存在的无穷放射中任意找一处进行活动。如果我不得不在我的周围画上这么一些圆圈，那么最佳办法莫过于瞪大眼睛一心看着这巨大的组合体，什么也不做，这种观看适得其反地使我的力量得到增强，我带着这种增强了的力量回家就是。

32.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

33.*殉道者们并不低估肉体，他们让肉体在十字架上升华。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

34.他的疲惫是斗士斗剑后的那种疲惫，他的工作是将小官吏工作室的一角刷白。

35.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

36.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能理

解，我怎么竟会相信能够提问。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

37.他对这一论断——他也许拥有，但不存在——的答复，仅仅是颤抖和心跳。

38.有人感到惊讶，他在永恒之路上走得和气轻松，其实他是在往下飞奔。

39.a.对恶魔不能分期付款——但人们却在不停地试着这么做。

可以想象，亚历山大大帝尽管有着青年时代的赫赫战功，尽管有着他所训练的出色军队，尽管有着他自我感觉到的对付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他却在海勒斯彭特（Hellespont）^[3]前停下了脚步，永远不能跨越，这不是出于畏惧，不是出于犹豫，不是出于意志薄弱，而是由于土地的滞重。

39.b.道路是没有尽头的，无所谓减少，无所谓增加，但每个人都用自己儿戏般的尺码去丈量。“诚然，这一尺码的道路你还得走完，它将使你不能忘怀。”

40.仅仅是我们的时间概念让我们这样称呼最后的审判，实际上这是一种紧急状态法。

41.世界的不正常关系好像令人宽慰地显现为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关系。

42.把充满厌恶和仇恨的脑袋垂到胸前。

43.猎犬们还在庭院里嬉耍，但那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正在飞速穿过一片片树林。

44.为了这个世界，你可笑地给自己套上了挽具。

45.马套得越多，就跑得越快——就是说不会把桩子从地基中拽出（这是不可能的）；但会把皮带扯断，于是就成了毫无负担的欢快驰骋了。

46.“sein”这个字在德语中有两重意思：“存在”和“他的”。

47.他们面临选择，是成为国王还是成为国王们的信使。出于孩子的天性，他们全都要当信使。所以世界上尽是信使，他们匆匆赶路，穿越世界，由于不存在国王，他们互相叫喊着那些已经失去意义的消息。他们很想结束这种可悲的生活，但由于职业誓言的约束，他们不敢这么做。

48.相信进步意味着不相信进步已经发生。这其实不是相信。

49.A.是个演奏能手，而天空是他的见证。

50.*人不能没有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持续不断的信赖而活着，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之物还是这种信赖都可能长期潜伏在他身上。这种潜伏的表达方式之一就是对于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

51.*需要由蛇来居中斡旋：恶魔能诱人，但无法变成人。

52.*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

53.不可欺骗任何人，也不可欺骗世界，隐瞒它的胜利。

54.除了一个精神世界外，别的都不存在，我们谓之感性世界的东西，不过是精神世界中的邪恶而已，而我们谓之恶者，不过是我们永恒发展中的一个瞬间的必然。

*以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前面，它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前面，它会恼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

55.这一切都是骗局：寻求欺骗的最低限度，停留于普遍的程度，寻求最高限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想要使善的获取变得过于容易，从而欺骗善；通过给恶提出过于不利的条件而欺骗恶。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人们即使在尘世中生活也不追求善，从而欺骗善。在第三种情况下，人们通过尽可能远远避开善而欺骗善，并由于希望能通过把恶抬高到极限使它无所作为，从而欺骗恶。这么看来，比较可取的是第二种情况，因为无论何种情况下善总是要被欺骗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至少看上去如此，恶没有受到欺骗。

56.有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除非我们生来就不受其约束。

57.除了感性世界外，语言只能暗示性地被使用着，而从来不曾哪怕近似于比较性地被使用过，因为它（与感性世界相适应）仅仅与占有及其关系相联系。

58.*人们尽可能少说谎，仅仅由于人们尽可能少说谎，而不是由于说谎的机会尽可能的少。

59.*一级未被踏得深深凹陷的楼梯台阶，就其自身看，只是木头的一种单调的拼凑。

60.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察觉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前提是，人们与他的本质是相称的。

61.*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界之内爱他人，那么这与在这个世界之内爱自己相比，既非更不正当亦非更正当。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第一点是否能做到。

62.只有一个精神世界而没有其他存在这一事实夺去了我们的希望，而给我们以确切性。

63.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现实照耀得眼花缭乱的存在：那照在退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岂有他哉。

64/65.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被逐出天堂虽然已成定局，在尘世生活虽然已不可避免，但尽管如此，过程的永恒性（或照尘俗的说法：过程的永恒的重复）却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有一直期望留在天堂中的可能，而且有事实上一直留在那里的可能，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

66.他是地球上一个自由的、有保障的公民，因为他被拴在一根链条上，这根链条的长度够他出入地球上的一切空间，但其长度毕竟是有限的，不容他越出地球边界半步。同样，他也是天空中的一个自由的和有保障的公民，因为他也被拴在一根类似的天空链条上。他想要到地球上，天空那根链条就会勒紧他的脖子；他想要到天空中去，地球的那根就会勒住他。尽管如此，他拥有一切可能性，他也感觉到这一点；是的，他甚至拒绝把这整个情形归结于第一次被绑时所犯的一个错误。

67.他追逐着事实，犹如一个初学滑冰者，而且他无论什么地方都滑，包括禁止滑冰的地方。

68.有什么比信仰一个家神更为快活！

69.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但不去追求它。

70/71.不可摧毁性是一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它，同时它又为全体所共有，因此人际存在着无与伦比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72.*同一个人的各种认识尽管截然不同，却有着同一个客体，于是又不得不回溯到同一个人心中的种种不同的主观上去。

73.他猛吃着他从自己桌上扔下的残食；这样他虽然有一阵子比谁都饱，但却耽误了吃桌上的东西；于是后来就再没有残食扔下来了。

74.如果天堂中应该被摧毁的东西是可以摧毁的，那么这就不是关键性的，那么我们就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中了。

75.*用人类来考验你自己吧，它使怀疑者怀疑，使相信者相信。

76.有这种感觉：“我不在这里抛锚”——就马上感觉到周身浪潮起伏，浮力陡增！

*一个突变，回答问题时瞻前顾后，小心翼翼，怀着希望，窥测方向，绝望地在问题的那不可接近的脸上探索着，跟着它踏上最荒唐的、亦即为回答避之唯恐不及的道路。

77.与人的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

78.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时，它才会自由。

79.性欲的爱模糊了圣洁的爱；它单独地做不到这一点，但由于它自身无意识地含有圣洁的爱的因素，它便能做到。

80.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无法认识自己；谁要想认识它，就必须是谎言。

81.谁也不能要求得到归根结底对他有害的东西。如果在哪个人身上

有这种表象——这种表象也许一直是有的——那么可以这样来解释：某人在一个人身上要求某物，此物虽然对这个某人有益处，却对半为评判此事而被牵扯进来的第二个某人^[4]有严重损害。如果那个人从一开始，而不是到评判时，就站在第二个某人一边，那么第一个某人也许就消失了，于是那种要求也随之消失。

82.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所致。

83.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过无关。

84.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天堂生活，天堂是为我们的享用而存在。到如今我们的使命已经改变了；天堂的使命是否也随之而改变呢，没有人说出。

85.恶是人的意识在某些特定的过渡状态的散发。它的表象并非感性世界，而是感性世界的恶，这恶在我们的眼里却呈现为感性世界。

86.自原罪以来，我们认识善与恶的能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偏偏在这里寻找我们特殊的长处。但在这种认识的彼岸才开始出现真正的不同。这种相反的表象产生于下述原因：没有人仅仅获得这种认识便满足了，而一定要努力将这种认识付诸实施。但他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必须摧毁自己，即使要冒风险：摧毁自己后甚至可能会得不到那必要的力量，但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做此最后的尝试（这也是吃认识之禁果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死亡威胁之真谛；也许这也是自然死亡的本来意义）。面临这种尝试时他畏惧了，他宁可退还对善与恶的认识（“原罪”这一概念可追溯到这种恐惧）；但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倒退，而只能搅浑。为此目的产生了种种动机，整个世界为它们所充斥，甚至整个可见的世界也只不过是想要安宁片刻的人们的一种动机而已。这是一种伪造认识之事实的尝试，是将认识搞成目的的尝试。

87.一种信仰好比一把砍头斧，这样重，这样轻。

88.死亡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壁上一幅描绘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一生都要通过我们的行动来使之暗淡或干脆磨灭它。

89.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当他愿意这样生活时，他是自由的；现在他当然不能退回去了，因为他已不是当时愿意这样生活的他了，而就这点而言，他活着又何尝不是实施他当初的意愿的方式。

第二，在他可以选择这一生的行走方式和道路时，他是自由的。

第三，他的自由表现在：他作为那样一个人（他有朝一日将重新成为那样一个人），怀着这么一种意愿，在任何情况下都沿着这一人生道路走下去，并以此方式恢复自我。诚然，他走的是一条虽可选择，但繁如迷宫的道路，以致这一生中没有一块小地方不曾被他的脚印所覆盖。

这就是自由意志的三重性，但它也是（因为它是同时的）一种单一性，而且从根本上说是铁板一块，以致没有一点空隙可容纳一种意志，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

90.*两种可能：把自己变得无穷小或本来就是这么小。第二种是完成式，即无为，第一种是开端，即行动。

91.*为避免用词上的误解：需要用行动来摧毁的东西，在摧毁之前必须牢牢抓住；自行粉碎的东西正在粉碎，但却无法摧毁。

92.最早的偶像膜拜一定是对物的恐惧，但与此关联的是对物的必然性的恐惧，与后者关联的是对物负有责任的恐惧。这种责任似乎非常重大，以致人们不敢把它交给任何非人的力量，因为即使通过一种生物的中介，人的责任仍不可能充分减轻。仅仅同一种生物交往，也将会留下生物的许多印迹。所以人们让每一种物都自己负责；不仅如此，人们还让这些物对人相对地负起责任来。

93.*最后一次心理学！

94.生命开端的两个任务：不断缩小你的圈子和再三检查你自己是否躲在你的圈子之外的什么地方。

95.*有时恶握在手中犹如一件工具，它自觉不自觉地、毫无疑义地让人撂在一边，只要人们想要这么说的话。

96.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

磨。

97.只有在这里苦难才是苦难。并非那些在这里受难的人在别的地方会由于这种苦难而升腾，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苦难的事，在另一个世界上（一成不变，仅仅摆脱了它的反面）是极乐。

98.*关于宇宙的无限宽广和充实的想象是把艰辛的创造自由的自我思索之混合推到极端的结果。

99.对我们尘世生活短暂性的理由的一度的永恒辩护哪怕只有半分相信，也要比死心塌地相信我们当前的负罪状况令人压抑得多。忍受前一种相信的力量是纯洁的，并完全包容了后者，只有这种力量才是信仰的尺度。

*有些人估计，除了那原始大欺骗^[5]外，在每一件事件中都有一个独特的小骗局在针对着他们，这好比是：当一出爱情戏在舞台上演出时，女演员除了对她的情人堆起一副虚伪的笑容外，还有一副特别隐蔽的笑容是留给后排座位中完全特定的一个观众的。这可谓“想入非非”了。

100.关于魔鬼的知识可能是有的，但对魔鬼的信仰却没有，因为再没有比魔鬼更魔鬼的东西了。

101.罪愆总是公然来临，马上就会被感官抓住的。它归结于它的许多根子，但这些根子并不是非拔出来不可的。

102.我们周围的一切苦难我们也得去忍受。我们大家并非共有一个身躯，但却共有一个成长过程，它引导我们经历一切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就像孩子成长中经历生命的一切阶段，直至成为白发老人，直至死亡（而这个阶段从根本上看似乎是那以往的阶段——无论那个阶段是带着需求还是怀着畏惧——所无法接近的），我们同样在成长中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这同人类的关系并不比同我们自己的关系浅）。在这一关系中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但也不容对苦难的惧怕或作为一个功劳来阐述苦难。

103.你可以避开这个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

105[6].这个世界的诱惑手段和关于这个世界只是一种过渡的保证符号，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世界才能诱惑我们，同时这也符合真情。可是最糟的是，当我们真的被诱惑之后，便忘记了那个保证，于是发现善将我们引入恶，女人的目光将我们诱到她的床上。

106.谦卑给予每个人，包括孤独的绝望者以最坚固的人际关系，而且立即生效，当然唯一的前提是，谦卑必须是彻底而持久的。谦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它是真正的祈祷语言，同时是崇拜和最牢固的联系。人际关系是祈祷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是进取关系；从祈祷中汲取进取的力量。

*难道除了欺骗你还懂得别的什么吗？一旦欺骗消除，你就不能朝那边看了，或者说你会变得呆若木鸡。

107.大家对A.都非常友好，就像是人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一张出色的台球桌，连优秀的台球手都不让碰。直到那伟大的台球手到来，他仔细检查桌面，不能容忍在他到来之前造成的任何损坏。然后他自己开始击球时，却以最无所顾忌的方式大肆发泄一通。

108.“然后他回到他的工作中去，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似的。”这是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记不清在多少旧小说中出现过，虽然它也许从来没有在任何小说中出现过。

109.“不能说我们缺乏信仰。单是我们的生活在其信仰价值方面就是取之不竭的。”——“这里面有一种信仰价值吗？人们总不能不生活吧。”“恰恰在这‘总不能’中存在着信仰的疯狂力量；在这一否定中这种力量获得了形象。”

*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

八本八开本笔记[7]

第一本八开本笔记

每个人体内都带有一个房间。这一事实甚至可以通过谛听来验证。当一个人快速地在街上走着，并倾听着，比如在夜间，周围万物沉寂，这时他就能听见一个固定得不够结实的壁镜在叮当作响。

他走着，胸脯内缩，肩膀前耸，双手下垂，两腿几乎不抬，目光凝集一处。这是个司炉工。他铲起煤来，投入火焰熊熊的炉孔。一个小孩偷偷穿过了工厂中的20个院落来到这儿，拽着他围裙的一角。“爸爸，”他说，“我把汤给你带来了。”

这里比下面那冬天的土地上暖和吗？周围是一片雪白，我的木桶是这儿唯一深色的东西。刚才我是在高处，现在却是在低处了，仰望群山差点没把我的脖子给扭断了。白色的冻结了的冰面，偶尔可见被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滑雪板划出的几条道道。在厚厚的、一点都下陷的雪地上，我追踪着北极犬的足印。骑马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下了马，把木桶扛在肩上。

V.W.[8]

请接受我对贝多芬一书最衷心的感谢。叔本华我今天开始读。这书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但愿您能用您那最温柔的手，用您注视真正的现实的最有力的目光，用您诗人本质那吞吐着的强有力的基本之火，用您无限广博的知识，继续塑造这类纪念碑——以满足我无可言喻的快乐。

午饭后，我苍老地，通体鼓胀，略有些心脏的不舒服，躺在床上，一只脚垂在地上，阅读着一本历史读物。姑娘走了进来，两只手指抵在翘起的嘴唇上，通报一位客人的到来。

“谁啊？”我问道，在我等待下午的咖啡时来客使我感到烦恼。

“一个中国人。”姑娘说，并且痉挛般地竭力把她的笑声压下去，以免给门外的客人听到。

“一个中国人？到我这儿来？他是穿着中国服装的吗？”

姑娘点点头，还在强忍着笑。

“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再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找我，在左邻右舍中我都是默默无闻的，更别说在中国了。”

姑娘悄悄走到我身边，轻声说道：“他只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请求准许他进来。他不会说德语，说的是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我不敢从他手里把名片接过来。”

“让他进来！”我喊道，又陷入了由于心脏的毛病经常发生的激动之中，书掉在了地上，我诅咒着这女佣人办事的不力。我站了起来，从而撑直了巨大的身躯，我这身躯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要把来访者吓得够呛，接着便向门口走去。果然，这个中国人一看见我，就赶紧往外溜。我仅仅追到过道里，就拽住了他，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丝绸腰带，把他拽进我的屋里来。他显然是个学者，又瘦又小，戴着一副角边眼镜，留着稀疏的、黑褐色的、硬邦邦的山羊胡子。这是个和善的小人儿，垂着脑袋，眯缝着眼睛微笑。

一天早晨，律师布策法鲁斯博士把女管家叫到床前来，对她说：“今天我哥哥控告特罗尔海塔公司案件将要拉开宏伟的序幕。我代表原告。因为这次审理至少要持续几天，而且将几乎毫无间歇地进行，所以我今后几天内就不回来了。一旦审理结束或者眼看就要结束，我就给您打电话。现在我不能说更多的话了，也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因为我必须考虑保护嗓子。今天早餐您就给我送两个生鸡蛋和放了蜂蜜的茶来吧。”然后他慢慢地靠回到软垫上去，一手遮着双眼，再也不说话了。

这个一贯唠唠叨叨、但在男主人面前又敬畏得要死的女管家大吃了一惊。这如此特别的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昨晚主人还跟她讲过话，可是对这事一字未提。这个案件的审理总不会是昨天夜里才决定的吧。世上难道有什么几天几夜不间断的审理吗，主人又为什么把当事双方都告诉她呢，他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啊。主人的哥哥，那小个子蔬菜商阿道夫·布策法鲁斯会有什么这样惊人的大案子呢，再说主人跟他的关系长期以来看来不怎么样啊。像主人现在这样疲惫地躺在床上，用手遮着似乎是衰颓的脸，假如不是早晨的光线带来的错觉，怎么能够适应他即将面临的紧张得无法想象的工作呢？而且只要茶和蛋，而不像往常那样要点葡萄酒和火腿，以便让生命的幽灵完全清醒过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女管家就这样不停地想着回到了厨房中。她在窗前她最喜爱的那个面对花和金丝雀的位置上只坐了一会儿，看了看院子对面的房子，一扇窗的窗栅后有两个半裸的孩子在嬉戏扭打，然后她便叹了口气，倒上茶，从餐室中拿来两个蛋，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托盘上，忍不住出于好心又拿上了那瓶葡萄酒，全部端着走进了主人的卧室。

房间里没人。怎么回事？主人总不至于已经走了吧，总不见得在一分钟之内就穿好了衣服？可是内衣外套全都不见了。天晓得主人是怎么回事？到起居室去！大衣、帽子和手杖全都不见了。到窗边去！果然不错，主人正从门里走出来，帽子盖在后脖子上，大衣敞开着，公文包紧紧地夹着，手杖柄挂在大衣口袋里。

您知道巴黎的特洛卡得罗吗？单凭别人的描述，您简直都不可能对这个建筑物做出哪怕是比较接近的想象。就在这幢建筑物中，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大诉讼案的主程序。您也许会想，在这么个可怕的冬天怎么给这么一幢建筑物供暖呢？这儿没有烧暖气。只有在您生活着的可爱的乡村小镇，才会在这种情况下马上就想到暖气。特洛卡得罗里没有烧暖气，但这并没有影响诉讼的进行，恰恰相反，在这从四面八方上下左右不断袭来的寒冷之中，正在用从容不迫的速度上上下下纵横交错地进行着诉讼。

昨天我这儿来了一个令人昏倒的人物。她住在隔壁那幢楼里，傍晚我经常看见她弯着腰走进那个低矮的门里。这是位高大的女士，身着线条流畅的长外衣，戴着插有羽毛的帽子。她以最快的速度，衣服发出簌簌的响声，闯进了我的房门，好像是一个担心来晚一步病人就会死去的医生。

“安冬，”她以那空洞的，然而颇引以为自豪的嗓音叫道，“我来了，我到你这儿来了！”

她一屁股坐在了我指点给她的椅子上。

“你住得真高，你住得真高。”她喘着气说。

深深倚在椅子上的我点了点头。我的眼前出现了通向我的房间的无数台阶，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眼前跳动，像小小的波浪般滚滚涌来。

“为什么这么冷？”她一边问，一边脱下了她那长长的、陈旧的击剑手套，扔在桌子上，脑袋向前一伸，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感到我就像一只麻雀，在楼梯上跳跃，而她正在把我柔软的、成片的、灰色的羽毛搞乱。

“你对我如此热恋令我感到衷心的抱歉。当你站在下面院子里，看着

我的窗口时，我经常确实是伤感地看着你憔悴的脸。好吧，我对你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如果说你还没有拥有我的心，那么你还是有机会获得它的。”

人能进入什么样的散淡之中啊，对正确道路的已经迷失是何等深信不疑啊！

一个迷误。我在上面那长长的过道里打开的不是我的房门。“搞错了。”我边说边想要退出去。这时我看见了里面住着的人，那是个瘦瘦的没有胡子的男人，紧闭着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桌上除了一盏煤油灯外一无所有。

我们这栋位于城郊的巨大的房子是从一个无法摧毁的中世纪废墟中脱颖而出的出租房子，今天，在这个雾蒙蒙的严寒的冬日早晨，一个号召在房子里传播着：

致全房所有居民：

我拥有5枝儿童枪。它们挂在我的箱子里，一个钩子上挂着一枝。第一枝属于我，其他的愿要者可以申报。如果申报者超过4人，那么超过者就必须把他们自己的枪带来，存放在我的箱子里。因为必须有统一性，没有统一性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此外，我拥有的枪对于其他用途是完全无效的，机械坏了，枪栓断了，只有撞针还能击响。必要时再搞几枝这样的枪不会很困难的。但是在初期实际上没有枪的人对我来说同样需要的。我们这些有枪的人在关键时刻将把没枪的人围在中间。这种战斗方式在美国第一批农庄主面对印第安人时便得到了考验，为什么在这儿就会行不通呢，情况毕竟是相似的。人们甚至可以长期地放弃枪支，连这5枝枪也不是非要不可的，可是它们既然已经在这儿了，它们就应该得到应用。如果没有另外4个人愿意扛那4枝枪，那么就让它们待在这儿好了。那样我将作为领袖单独扛上一枝。可是我们又不需要领袖，所以我也将把枪砸碎，或者弃置。

这是第一个号召。在我们这栋房子里没人有兴趣去读号召，更别说去思考了。很快，这些小纸片就在垃圾河中漂流了，这条垃圾河源于屋顶，在每一条走道里都得到补充，沿着楼梯往下奔流，并与从下往上涌来的逆流搏斗着。可是只不过隔了一个礼拜就出现了第二个号召：

同楼居民们！

至今没人到我这儿来申报。我在不是为了生计非出门不可的时候总是待在家里，即使在我不在的时候，我的房门也总是开着，我在桌子上放了一张纸，愿意者随时可以登记。可是没人这么做。

有时我相信，当我晚上或者上了夜班后早晨从机器厂回家时，我所感受到的骨头的疼痛能够消弭我过去和未来的罪孽。干这活儿我的体力远远跟不上，可是我什么也不去改变。

在我们这栋巨大的城郊房子里，在这从中世纪的废墟脱颖而出的出租房子里，在我住的同一条走道的一家工人家庭中住着一位书记员。他们虽然称他为官员，可是他顶多只是个小书记员，他生活在那对陌生的夫妇和他们的6个孩子的窝中间，在铺在地上的草袋上度过一个个夜晚。如果说他只是个小书记员，那又有什么值得我关心的呢？在这栋汇集着这座城市所酿出的苦难的房子里，肯定就有100人以上……

在我所住的同一个走道里住着一个缝补匠。无论我多么小心谨慎，我的衣服总是破得很快，最近我又不得不把一件上衣拿到缝补匠那儿去。这个裁缝和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的住处只有一个房间，这房间同时又是厨房。此外他还有个房客，那是税务局的一个写字员。我们这栋房子里的状况已经够糟的了，可这个房间的状况更是超出了这儿的一般状况。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一切都听其自然，裁缝对他的节约当然会有一套无可辩驳的理由，任何外人都没有想过要去追问根源。

1917年2月19日。

今天读了《赫尔曼和朵洛台亚》^[9]，读了利希特的生平回忆^[10]看了他的照片，最后读了霍普特曼的《格里塞尔达》中的一幕。在接下来的那个时辰中我成了另一个人。一切前景尽管仍然一如既往的朦胧，但朦胧的图像改变了。在我今天第一次穿上的沉重的靴子中（这本来是军人用的），我成了另一个人。

我住在克鲁姆霍尔茨先生那儿，同一个税务局的书记员共住一室，此外，在同一个房间中的同一张床上还睡着克鲁姆霍尔茨的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7岁。从这个书记员搬进来的第一天起，我自己已经在克鲁姆霍尔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我对他就产生了一种一开始完全是无法解释的怀疑。这个人个子在中等以下，虚弱，显然肺部状况不佳，身着灰色的肥大的衣服，看不出年龄的布满皱褶的脸，经梳理绕过双耳的灰

黄色的长发，一副耷拉在鼻子上的眼镜，小小一丛同样发白了的山羊胡子。

我当年在刚果建造铁路时度过的可不是快乐的日子。

我坐在木屋前有屋檐遮盖的平台上。取代通常的照壁的是一张网眼特别细小的防蚊网，这是我从我们的铁路穿过的一个地区的酋长、当时的工人领班那儿搞来的。这是张大麻编就的网，既结实又柔软，在欧洲也许根本就编不出来。这是我的骄傲，我为此而受到许多妒忌。要没有这张网，那就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太太平平地坐在晚间的平台上，把灯扭亮，研读一张过时的欧洲报纸，一个劲儿地吸着烟斗。

我有着——谁还能如此自由地谈论他的能力呢——一个上了年纪而不知疲倦的钓鱼者的那种手关节。比如在去钓鱼之前，我坐在家，目不转睛地看着，将右手一会儿向这儿转，一会儿向那儿转。这便足以从视觉上和感觉上向我宣示过会儿垂钓的结果，直至细节。这就是这灵活的关节的预感能力，休息时，我往往把它锁在一个金手镯中，让它积蓄力量。我看见在特定的时辰特定的水流中我的垂钓点上的水，河流向我显示出一个截面来，鱼儿从10个，20个，100个地点向我这个截面涌来，数量和品种无不一清二楚。这时我就知道了，该如何引导我的钓钩，有些鱼未受干扰地伸着脑袋闯到这个截面上，我便在它们面前晃动钓钩，一下子就钩住了它们，甚至等它们被端到了家里的桌面上时，我仍然在为这一决定鱼类命运的瞬间之短暂而惊叹不已。其他的闯到那儿时已经是肚子冲着钩子了，这便是最后的关头了，有的还是被我逮住了，可还有一些晃着尾巴脱离了这块险区，于是这一次便让它们从我手底下溜掉了，但也就是这一次，一个真正的钓手手下是跑不了一条鱼的。

第二本八开本笔记^[11]

〔此处紧接在小说《杂种》之后〕

一个小男孩在他父亲去世后通过父亲唯一的遗产——一只小猫——成了伦敦的市长。我通过我这小动物，这份遗产，将得到什么样的命运？这座巨大的城市延伸到什么地方？

写下的和流传的世界历史往往通盘失误，人的预感能力虽然也经常引向误区，但总是在导引，并不弃人而去。比如流传在史书中的世界七大奇迹始终由一个谣传伴随着，即此外还有个第八奇迹。关于这第八个奇迹有着各种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说法，人们把这种没把握归因于远古的朦胧。

女士们，先生们，（穿着欧式服装的阿拉伯人对旅游团说的开场白大体是这样的——这些人几乎没在听，只是装模作样地低头观察着那在他们面前光秃秃的石质地上突出的难以令人置信的建筑物）在这个地方你们一定会承认，我的公司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旅行社，包括那些确实悠久而著名的在内。那些竞争者们按照他们不值钱的老习惯只是把他们的客人引到历史书上有记载的7个世界奇迹中去，而我们的公司则向你们展示第8个世界奇迹。

不，不。

有些人说，他是个骗子，有些人则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我的父母认识他的父亲；当他上星期天到我们家来做客时，我直截了当地问起了他儿子的事。可这位老先生非常狡猾，简直没法对付他，而我对这样的进攻又一点都不在行。一开始，谈话进行得十分热烈，但我刚抛出这个问题，马上就静场了。我的父亲开始紧张地摸弄他硬邦邦的胡子，我的母亲站了起来，去看看茶煮好了没有，这位先生却以他蓝色的眼睛微笑着看着我，然后把他那浓密的白发笼罩下的多皱而苍白的脸扭向了一边。“是的这孩子。”他说，接着把目光转向了桌上的灯，在这个冬日夜晚这灯已经早早地点燃了。“您跟他谈过话吗？”他问道。“没有，”我说，“可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事，我很愿意同他谈谈，假如他哪天能够接待我的话。”

“什么事？什么事？”我喊道，还躺在床上在睡意中挣扎着的我举起了胳膊。然后我爬了起来，对当前的处境还远未弄明白，感觉中我似乎必须把一些挡住我的人推到一边去，也确实做出了一些相应的手臂动作，最后终于还是走到了敞开的窗前。

无所适从，仿佛春天的一座粮仓，春天的一个肺结核患者。

有时是会发生这种事的，原因往往无法知道：最伟大的斗牛士选择一座偏僻的小城市里一个破败的场子为他的战斗场地，马德里的观众以

前可能都没有听到过这座城市的名字。一个被人遗忘了几百年的斗牛场。这边野草丛生，是孩子们嬉戏的场所，那边光秃秃的石头滚烫，是蛇和蜥蜴栖息之处。观众席的上缘早就被拆得差不多了，这儿堪称周围所有居民的采石场，现在只剩下小小的一圈，500个人都坐不下。没有附加建筑，尤其是没有牛栏，但最糟糕的是，铁路还没有修到这里来，从最近的火车站到这里，得先坐3小时马车，再徒步走7个小时。

我的双手开始了一场战斗。它们合上了我正在读的书，把它推到一边，以免碍事。它们向我敬礼，封我为裁判。它们已经开始将手指互相穿插，在桌缘展开了追逐，随着优势劣势的互易，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是我的手，我必须公正，否则一个错误的裁决会给我自己带来难以忍受的压力。可是我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在两个手掌的阴影中它们使用着各种掐和捏的手段，我绝不能忽略，所以我将下巴顶在桌子边上，这回就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我一生中总是重视右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左手有什么恶意。假如左手哪一回说出它的怨言，那么以我的灵活性和公正，一定会马上停止这种歧视行为的。可是它并不抱怨，乖乖地在我的身边垂着，当右手在街上挥舞着我的帽子时，左手畏畏缩缩地贴在我的大腿旁。对于现在进行的这场战斗来说，左手这个样子实在是准备不足。左手腕，你这样怎么能长时间地顶住强大的右手的攻势呢？你那姑娘般的手指怎么与另5个手指拮据抗衡呢？在我的感觉中这再也不是战斗了，而是左手必然完蛋的结局。它已经被迫到了桌子的边缘，右手在它的旁边像个机器活塞似地一起一落。在我眼看着这种艰难场面时，如果我不曾宽慰地想到，处于战斗之中的是我自己的双手，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分开，从而结束这场战斗和困境，如果我不这么想，那么左手就会从手腕上折断，被甩离桌面，然后，右手也许会出于胜利者的狂妄向我全神贯注的脸扑来。这种事没有发生，相反，现在它们安静地叠着，右手抚摩着左手的背脊，而我这不诚实的裁判在对着它们点头。

我们的部队终于从南门突入城池了。我们班驻扎在一个城郊花园里半烧焦了的樱桃树下，等待着命令。可是，当我们听到南门那儿传来高亢的军号声时，便再也忍耐不住了。顺手抓起身边的武器，毫无秩序地，胳膊搭着战友的肩膀，高喊着“卡西拉！卡西拉！”我们这一长串的队伍便穿过沼泽，向城市方向涌去。在南门那儿我们看见的只有尸体和在地面上飘着笼罩一切的黄烟。可是我们不甘心坐享其成，立即便奔入那些狭窄的，至今未受到战斗波及的小巷中去。第一扇房门被我一脚踹

得粉碎，我们疯狂般地冲入那走道，以致我们自己一时被互相撞得直打转。有个老头从这长长的、空空荡荡的走道那头迎面而来。这是个奇怪的老头，他有翅膀，宽宽地张开着的翅膀，翅膀的边缘比他的身子还要高。“他有翅膀。”我对战友们喊道。我们这些最前面的人向后退了几步，但退路被源源涌入的后来者堵住了。“你们感到奇怪，”老头说，“我们大家都有翅膀，但它们对我们毫无用处，要是能够把它们扯下来，我们早就那么干了。”“你们为什么不飞走？”我问道。“要我们飞离我们的城市？离开我们的家乡？离开亡者和诸神？”

第三本八开本笔记

1917年10月18日。对夜的畏惧。对非夜的畏惧。

10月19日。在精神斗争中把自己的和外人的分开之毫无意义（此词流于过分）。

就绝对而言，一切科学都是方法论。所以对这明显是方法论之物的任何恐惧都是没有必要的。它是套筒，但是不适用于一切，只适用于一个。

我们大家在进行同一场斗争（假如我受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攻击，而伸手到身后去抓取武器，我将无法在武器中选择，即使我能选择，我也只能拿“他人的”，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一批武器储备）。我不能进行自己的斗争；如果何时我以为是自立的，发现周围没有别人，那么马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我不能立即到达，或根本不能到达大家的位置，我便必须接受现在这个岗位。当然，这并不排除先驱者、后来人、左右翼和战争的一切习惯和怪异特点的存在，但是确没有自立的战争进行者。这是对虚荣心的（打击）？是的，但同时也是对其必要的、实事求是的鼓舞。

我因迷误而下了道。

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总是在虚荣心和自我陶醉的爆发之后才得以喘口气。阅读《犹太人》中的那篇小说时如痴如醉^[12]，就像是笼子里的一只松鼠，对活动

的幸福感，对空间狭窄的绝望，持续不断之令人发狂，外界的宁静之灾难感。同时这一切又是不断地更替着，始终在悲惨结局的污秽之中挣扎。

一线幸福的阳光。

对细节和自己的世界观进程的记忆之弱——一个很糟糕的信号。只是整体的残片。如果你不能这样地总结自己，在需要决断时把自己整个地握在手中，就像握着一块准备投出的石头，一把准备屠宰的利刃，那么，哪怕你只是想要触及那最伟大的任务，只是想嗅及它的临近，只是想梦到它的存在，只是想求得有它的梦，只是斗胆去学这种请求的字母，又怎么做得到呢？另一方面，在拳拢双手之前，并没有向手心吐唾沫的必要。

有可能想某种无可安慰的事吗？或者不如说在没有丝毫安慰的情况之下去想无可安慰的事？这里有一条出路：这么一种认识就是一种安慰。人们完全可能这么想：你必须排除你自己，人们完全可能不必篡改这种认识即保持不倒，保持这种意识：我认识到了。这将真的意味着，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沼泽。在肉体世界中可笑的东西，在精神世界中往往是可能的。重力定律在那儿是不起作用的（天使不会飞，他们没有任何重力需要克服，只不过我们这些俗世的观察者不懂得更好的思维方法），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只有在更高的层次上才能想象。与我对我的房间的认识相比，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多么可怜啊。（晚上）为什么呢？对外界的观察是存在的，但对内心世界的观察不存在。至少描写心理学在整体上也许是一种人神同形同性论，是对界线的啃噬。内心世界只能经历，不能描绘。——心理学是俗世描写在天界中的映像，说得更正确些，是我们这些彻头彻尾的大地归属者之想象描写的映像，因为映象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大地，我们面对的也只是它。

心理学是烦躁。

所有人类的错误都是烦躁，这是方法论的一种过早断裂，一种似乎存在的事物的似乎的植入。

堂·吉诃德的不幸不是他的幻想，而是桑柯·潘萨。

10月20日。在床上。

人类的主罪有二，其余皆由此而来：急躁和懒散。由于急躁，他们被逐出了天堂；由于懒散，他们再也回不去。但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由于急躁，他们受到驱逐，由于急躁，他们再也回不去。

以沾上世俗的污斑的眼睛看，我们的处境相当于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出轨的火车的乘客，所处的地方恰恰是：来自隧道始端的光线再也看不到，而终端的光线微乎其微，以致不得不不间断地用目光去搜索，却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目标，弄得连哪是始哪是终都没有把握了。可是，出于我们意识的混乱或是其高度的敏感，我们周围尽是怪物，而且出于每个人不同的情绪和烦恼，不断演示着一个或是令人着迷、或是令人厌倦的万花筒。

我应该怎么办或者为什么我要这么干，这些不应该是在这种地方提出的问题。

许多逝者成天只忙于舔死人河的水流，因为它是从我们这儿流去的，尚含有我们的海洋的咸味。出于厌恶，这条河流将水倒流，把死者又卷回到生命之中。然而他们却深感庆幸，唱着感恩歌，抚摩着愤怒的死人河。

从某一点开始不再有回头路，这一点是能够达到的。

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是从不间断的。所以那些宣布以前的一切皆为虚无的精神革命运动是有道理的，因为实际上还什么都没有发生。

人类史是一个漫步者的两个步子之间的瞬间。

晚上散步去沃伯尔克雷。

从外界，人们总是胜利地用理论把世界压入坑中，自己也一同掉进去，可是只有从内部才能够维护住自己并且使世界保持平静和真实。

恶的一个最有效的诱惑方法是挑战。这就好比同女人的斗争，它是在床上结束的。

丈夫真正的外遇，正确地理解，从来就不是有乐趣的。

10月21日。在阳光下。

世界之音之变得沉寂和稀少。

日常的迷惘

一种日常的情况：他所忍受的是一种日常的迷惘。A要同H地的B拍板一笔生意。他到H地去谈判，来回路上都只用了十分钟，回家后他对此特快自夸不已。第二天他又去H地，这回是去最后拍板。由于这估计要用好几个小时，A一大早就出了门。尽管所有枝节情况都跟昨天一样，至少A是这么认为的，这回他走到H地却用了十个小时。当他晚上精疲力竭地到达那里时，人们告诉他，B对他迟迟不来非常恼火。半小时前到A所在的村子去找A了，他们俩本该在路上碰到的。人们建议A在那儿等。可是A怕生意泡汤，马上就动身，匆匆往回赶。

这回他没有注意时间，很快就赶了回去。到家后他得知，B一大早就到了这儿，A一出门他就来了；他在门口还碰到了A，提醒他生意的事，可是A说，他现在没有时间，他必须马上动身。尽管A的行为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B还是留了下来，等待A回来。尽管他已经问了好多遍，A到底回来了没有，可是现在还是在楼上A的房间里等着。得知现在还能跟B谈，解释一切原因，A高兴地跑上楼去。就在他已经快要到达楼上的时候，他绊倒了，扭伤了筋，疼得几乎昏了过去，甚至叫不出声来了，在他轻微的哀鸣中，他听到，B在黑暗中，不清楚是在远处还是就在他的身边，怒冲冲地踏着楼梯走了下去，终于离开了这里。

魔怪有时获得善的外表，甚或完全化身其中。如果它不在我面前暴露，我当然只有败北，因为这种善比真正的善更吸引人。可是如果它们不用伪装而出现在我的面前呢？如果我在一场狩猎追逐中被魔鬼撵入善之中去呢？如果我作为厌恶的对象被周围的无数针尖翻入、刺入、逼入善之中去呢？如果肉眼可见的善的利爪纷纷向我抓来呢？我会后退一步，软弱而悲哀地进入恶之中去，它自始至终一直在我身后等待着我的决定。

〔一个生命〕。一只发臭的母狗，众多狗崽子之母，有些部位已经发烂，可是在我的童年它曾是我的一切，它忠实地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我总是舍不得打它，在它的面前，我一步步地后退，躲着它，如果我没能做出别的决定，它最终会把我逼到已经在望的墙角，会在那儿在我身上，同我一起完全腐烂，直至最终——我感到光彩吗？它那满足虚荣的虫一般的舌头舔着我的手。

恶有时会有出人意料的举动。它突然转过身来说道：“你误解了我。”也许真是这样。恶变成你的嘴唇，让你的牙齿咬它，而你用你的新嘴唇（以前的嘴唇再没有比它对你的口腔更服帖的了）说出了善的话来，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桑柯·潘萨真传

尽管桑柯·潘萨从来没有为此自我吹嘘，可他确实在这几年中通过提供一系列骑士和强盗小说，在晚上和夜间把他的魔鬼（他后来给他起名叫堂·吉诃德）引了开去，那位于是毫无顾忌地做出了世上最疯狂的事情，但由于没有预先定下的对象（本来这个对象正应该是桑柯·潘萨），所以这些事情对谁都没有损害。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桑柯·潘萨始终跟着堂·吉诃德的行踪，也许是出于一定的责任心吧，从而得到莫大的、有益的消遣，直到生命的终了。

10月22日。夜间五点。

堂·吉诃德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一个比跟风车的斗争更重要的行动是：他的自杀。死者堂·吉诃德想要杀死已死的堂·吉诃德；但为了实施这一行动，他需要有一个活着的位置，他持着他的剑不断地而又徒劳地寻找着这个所在。在这一忙碌过程中，这两个死者以无休无止的、看上去分明是生龙活虎的翻跟斗形象穿越整个时间。

上午在床上度过。

A非常自高自大，他认为在善的方面比其他人强得多，因为他明显地作为一个始终有诱惑力的对象，感到自己越来越多地经历着从他至今搞不清楚的各种方向涌来的诱惑。可是这一现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一个大魔鬼在他内心坐镇下来，于是无数较小的魔鬼纷纷前来为大魔鬼效劳。

晚上去林子里，月亮越来越圆；度过了莫名其妙的一天。（马克斯的明信片）胃不舒服。

比如对一个苹果就有不同的观感：伸长脖子才能勉强看到桌面上的苹果的小男孩的观感，和拿起苹果随手递给同席者的男主人的观感。

10月23日。很早就上了床。

这是以不足的、甚至是幼稚的手段也能救人的证明：

为了不受塞壬的诱惑，奥德赛把棉花塞进自己的耳朵，并让人把他牢牢地捆在桅杆上。当然，自古以来所有的旅行者都可以这么做，除非有的人在很远的地方已经受到了塞壬的诱惑，可是全世界都知道，这么做根本是无济于事的。塞壬的歌声能够穿透一切，而受诱惑者所感受到的狂热足以崩碎一切链条和桅杆而且绰绰有余。可是奥德赛没有去想这一点，尽管他兴许也听说过。他给予那一小团棉花和一条铁链以充分的信任，怀着对他的小手段的天真的喜悦向塞壬迎面驶去。

可是塞壬有一种比歌声更可怕的武器，即她的沉默。尽管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也许还可以想象的：有的人也许会在她的歌声面前得救；但在她的沉默面前得救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种以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她的感觉，那种由此而产生的忘乎一切的自豪自傲，是人间任何力量都无法对付的。

事实上，当奥德赛到来时，那些强大的塞壬并没有唱，也许是因为她们认为只有用沉默才能对付这个对手，也许当她们看到那个只想着他的棉花和链条的奥德赛陶醉的脸色时，全都忘了歌唱。

可是奥德赛呢，可以这么说，没有听到她们的沉默，他以为她们正在唱，只是由于他得到了自己的保护而听不见。他先是匆匆瞥见了她们脖子的转动，她们深深的呼吸，满含泪花的眼睛，半启着的嘴，却相信这一切都是由于她们正在唱着咏叹调，歌声正在他身边回荡，只不过他听不见而已。接着一切从他那望着远方的目光中退开，塞壬似乎是在他的坚决面前消失了，而恰恰在他离她们最近的时候，他已见不着她们。

而她们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伸展、转动着身躯，让可怕的头发自由自在地在风中飘拂，爪子随便地张开在礁石上。她们不再想诱惑人，只想尽可能长时间地看见奥德赛那对大眼睛的余晖。

如果那时候塞壬们有意识，她们那时也许便毁灭了自己。可是她们仍然生存了下来，只不过奥德赛从她们手中逃脱了。

这里还有个附带的说法流传了下来。人们说，奥德赛是那么的足智多谋，狡如狐狸，甚至连命运女神都无法进入他的内心最深处。也许

他，尽管这已经超出了人的理解力，实际上已经发现了塞壬们的沉默，而他只不过将上述虚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幌子在她们的和诸神面前演示一遍而已。

下午目睹一个淹死在水井中的癫痫病人的葬礼。

认识你自己，并不意味着：观察你自己。观察你自己是蛇的语言。其含义是：使你自己成为你的行为的主人。但其实你已经是了，已经是你的行为的主人。于是这句话便意味着：曲解你自己！摧毁你自己！这是某种恶——只有当人们把腰弯得很低时，才能听见他的善，是这么说的：“为了还你本来面目。”

10月25日。悲哀，神经质，身体不适，对布拉格的恐惧，待在床上。

那是一群无赖，这就是说，这不是无赖，而是普通的人。他们总是聚在一起。比如他们之中如果有谁以某种无赖的方式（当然这又意味着不是任何无赖方式，而是普通的，通常的方式）欺负了某个外人，即不属于他们这伙的人，然后来向大伙忏悔，他们便加以审查，做出裁决，给予处罚，或予谅解，如此等等。他们的心不坏，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得到严格的维护。忏悔者的行为根据其显示的色彩由大伙的裁决得到补充：“怎么了？你为此而烦恼吗？你只不过做了很自然的事，就像你应该做的那样。换了别的任何行为都将是不可理解的。你只是太激动了。冷静些吧。”他们就这样始终抱成团，直到死后他们也不放弃他们的集体，而是排着队升上天去。从整体上看，在他们往上飞的那个瞬间体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天真无邪。可是由于在天门之前一切都按照不同的元素被击碎，他们便落了下来，化成了岩石。

认识开始的第一个信号是求死的愿望。这种生活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另一种生活似乎遥不可及。人们不再为想死而感到羞愧；人们请求把他从这个他所憎恨的旧牢房里移到另一个他将学会憎恨的新牢房里去。一丝信念的残余在此也起着作用：在搬运他的过程中主人也许会偶然地穿过走道，看看这个囚徒，说道：“此人你们别再关押了。他正上我这里来。”

11月3日。前往沃伯尔克雷。晚上在奥特拉房间里写T·[14]。

假如你徒步穿越一个平原，怀着走过去的良好愿望，迈出的却是倒

退的步子，那就是一件绝望的事；可是如果你正在攀登一个陡峭的山坡，至少你在下面往上看时的感觉是那么的陡峭，倒退的步子也只是为地面情况所迫才走出来的，那你就没有必要绝望了。

11月6日。就像秋天的一条路：刚扫干净，又为枯干的树叶所覆盖。一个笼子在寻找鸟。

11月7日。（很早就上了床，在“一通猛侃”之后。）

假如有把剑刺入了心灵，就应该：目光冷静，滴血不流，以石头般的冷来接受剑的冷。通过剑刺，在剑刺之后不受伤。

这地方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呼吸变了样，在太阳旁边照耀着一颗星星，比太阳更炫目。

11月9日。去沃伯尔克雷。

如果有可能建成巴比伦塔^[15]而不去攀登它，那么建塔的事就有可能得到允许。

11月10日。床。

别让恶使你相信，你在它的面前保得住秘密。

一些豹子闯入教堂，把祭供的瓦罐里的水喝得干干净净；这事不断发生；最后人们终于能够算准时间了，于是这便成了仪式的组成部分。

激动（布吕尔，塔格尔）^[16]。

11月12日。长时间在床上，抵御。

手把石头攥得多么的紧。可是它之所以攥得那么紧，只是为了把它扔得更远。可是仍然有路通往那个远处。

你是作业。四处不见学生。

从真正的对手那儿有无穷的勇气向你涌来。

要理解这个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不会超出你双脚的覆盖面。

除非遁入世界之中，否则又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欣喜呢？

11月18日。

藏身处不计其数，可救命的只有一处，但是救命的可能性又像藏身处一样多。

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踌躇。

干消极的事之任务还落在我们身上；积极的则已经给过我们了。

一驾载着三个男人的农家马车在黑暗中正在一个坡道上缓缓行驶。一个陌生人迎面走来，向他们喊叫。交换了几句话后，他们明白了，他是想要搭车。人们给他腾出一个地方，把他拽了上来。车行了一段后人们才问他：“你是从对面那个方面来的，现在又坐车回去？”“是的，”陌生人说，“我先是朝你们这个方向走的，但后来又掉了头，因为天黑得比我估计的早。”

你抱怨这沉静，抱怨沉静的无穷无尽，善的大墙。

荆棘丛是古老的封路者。如果你想走下去，就得点火烧了它。

11月21日。客观的无用能够让人掩盖手段的无用。

一旦接受了恶，它便不再要求你相信它。

你接受恶时的隐念并不是你的，而是恶的。

这头兽夺过主人手中的鞭子来鞭挞自己，想要从而成为主人，却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幻觉，这是由主人在鞭子上新打上的一个结造成的。

恶即引开者。

恶认识善，可是善不认识恶。

只有恶才有自我认识。

恶的一个手段是对话。

建立者从立法者那儿带来法律，信徒们的任务是给立法者宣读这些法律。

宗教的事实是证明个人不可能始终为善的证据吗？建立者摆脱了

善，给自己以人形。他是为了其他人才这么做的吗？或者因为他认为，只有跟其他人在一起，他才能保持本来的自我，因为他为了不必爱这个“世界”而必须摧毁它？

善在一定意义上是绝望。

谁持有信仰，就不可能经历奇迹。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

谁创造奇迹，就会说：我不能不管大地。

把相信正确地分配给自己的言语和自己的信念。一种信念，不能在得知它的瞬间让它咝咝作响。拿出信念来的责任感，不能随便转到言语上去。不能让言语偷换信念，是言语的吻合还是信念占上风，尚未决出胜负，良好的相信也还未做出其间的取舍。这样的言语始终还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或是把这样的信念夯入土中，或是将之挖出来。

宣布并不见得是对信念的一种削弱（也不用为此而抱怨），但却是信念的一种弱点。

我并不追求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意味着：截取我的精神存在的无穷无尽的放射过程中偶然的一点，对它施加影响。但是如果我不得不在我的周围布上这些圈子，那么我宁可一动不动地静观这可怕的一团，而只把这一瞬间反而会给我带来的力量携回家去。

乌鸦宣称，只需一只乌鸦即可摧毁天空。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对天空来说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天空恰恰意味着：非乌鸦的力量所能及。

殉道者们并未低估尸体，他们使之升起在十字架上。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

他的疲惫是斗剑士战斗后的那种疲惫，他的工作相当于将小官吏办公室的一角刷白。

11月24日。人对人的行动的判决是真实的和虚无的，也就是说，先是真实的，然后是虚无的。

人们从右边的门涌入房间内，那儿正在召开家庭委员会，他们听见的是最后一个发言人的最后一句话，他们抓住委员会成员，从左边的门

涌出去，大声宣布了他们的判决。真实的是对这句话的判决，虚无的是这个判决本身。如果他们要真正真实地做出判决，他们就必须永远待在屋子里，这样他们将成为家庭委员会的成员，于是便不再有能力去判决。

真正有能力判决的只有这个党，但作为这个党他们又无法判决。据此，世界上便不存在判决的可能性，而只有其光泽。

没有所有，只有存在，只有需要最后一次呼吸，需要窒息的存在。

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得不到对我的问题的答复，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会相信我能够提问的。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只是提问而已。

关于他也许拥有，但却不是的论断，他的回答只是颤抖和心跳。

独身和自杀立于相同的认识层次上，自杀和殉难却绝不是，也许婚姻和殉难是的。

一个人感到惊讶，永恒之道路他怎么走得那么轻松；其实他是在往下疾奔。

各种善齐步走着。其他人对它们的存在一无所知，在它们周围跳着时代之舞。

向恶分期付款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却无休止地尝试着。

完全可以设想：尽管亚历山大大帝有着年轻时代的赫赫战功，有着他一手建立的出色的军队，有着他自己感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但他最终却在海勒斯彭特停了下来，永远也越不过去，这却不是出于畏惧，不是出于优柔寡断，不是出于意志薄弱，而是由于大地的重力。

疯子和濒临淹死者，两人都举起胳膊。前者制造的是与诸因素的和谐，后者制造的则是与诸因素的冲突。

我不识内涵，

我没有钥匙，

我不信谣传，

一切均可理解，

因为一切就是我自己。

11月25日。道路是无尽的，丝毫不可缩短，丝毫不可增加，可是每个人还都想把他那幼稚可笑的一公尺加上去。“没错，这一公尺路你也必须走，人们不会忘记的。”

只不过我们的时间概念让我们这样称呼最后审判，其实那是一种军法管制。

11月26日。虚荣是丑恶的，本来它应该自杀，而它却仅仅自伤，于是成了“受伤的虚荣”。

令人安慰的是，世界的不调和似乎只是一种数量上的问题。

下午。把充满厌恶和仇恨的脑袋垂到胸前。这没错，可是如果有人正在扼你的脖子，那你怎么办呢？

11月27日。读报。

11月30日。弥赛亚^[17]将会到来，只要这个最无拘束的信念的个性主义成为可能——任何人都不毁灭这种可能性，任何人都不容忍这种毁灭，故坟墓会自行开启。这或许也是基督教的教义，它既体现在对事例，一个让人效法的个性主义的事例的真实阐述中，也体现在对中间人在每个人的心中复活的象征阐述中。

信仰意味着：解放自己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或说得更正确些：解放自己，或说得更正确些：存在即不可摧毁，或说得更正确些：存在。

懒散是一切恶癖的开端，一切善德的顶峰。

猎狗们仍在院子里嬉耍，可是那个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现在正飞速穿越了重重树林。

你为了这个世界而可笑地把挽具套上了身。

你套上的马越多，事情就发生得越快——不是把木桩从地基中拽出来，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扯断缰绳，从而得以愉快地空拉快跑。

一路上不同的驿站，绝望的境地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sein”这个字在德语中有两重意思：“此在”和“他的”。

12月2日。他们面临选择，成为国王或是成为国王的信使。按照孩子们的天性大家都要当信使。所以到处都是信使，他们不停地穿越世界，由于没有国王，他们便互相呼喊已经失去意义的消息。他们很想结束这悲惨的生活，可是又不敢，因为他们都受到职业誓言的约束。

12月4日。暴风雨之夜，上午收到马克斯的电报，俄国停战。

到弥赛亚成为无必要时，它会到来的，它将在到达此地一天后才来，它将不是在最后一天到来，而是末日那天。相信进步意味着进步已经出现。这就谈不上是相信了。A是个演奏高手，而天空是它的证明。

12月6日。宰猪。

三点：

将自己视为某种陌生体，忘记这种看法，保留目光。或只有两点，因为第三点已包含了第二点。

恶是善的星空。

12月7日。人不能没有对自己内心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持久的信赖而活着，而无论是这种不可摧毁之物还是这种信赖也许都长时间地潜藏在他身上。这种潜藏的表达可能性之一是对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

天空是沉默的，只有在这沉默中响着回音。

这需要由蛇来中介：恶能够把人诱入歧途，但不能成为人。

12月8日。床，便秘，背疼，激烈咳嗽的一晚，房间里的猫，头昏脑涨。

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要帮助世界。

不能欺骗任何人，也不能从世界那儿骗去它的胜利。

只有一个精神世界，别的都不存在；我们称为感性世界的，其实是

精神世界中的恶，我们称为恶的，只是我们永恒的发展中一个瞬间的必要。

以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眼前面，它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前面，它会恼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

这一切都是骗局：寻求欺骗的最低限度，停留于普遍的程度，寻求最高限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想要使善的获取变得过于容易，从而欺骗善；通过给恶提出过于不利的斗争条件而欺骗恶。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人们即使在尘世生活中也不追求善，从而欺骗善，并由于希望能通过把恶抬高到极限使它无所作为，从而欺骗恶。这么看来，比较可取的是第二种情况，因为无论何种情况下善总是要被欺骗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至少看上去如此，恶没有受到欺骗。

有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除非我们生来就不受其约束。

除了感性世界外，语言只能暗示性地被使用着，而从来不曾哪怕近似于比较性地被使用过，因为它（与感性世界相适应）仅仅与占有及其关系相联系。

人们尽可能少说谎，仅仅由于人们尽可能少说谎，而不是由于说谎的机会尽可能的少。

如果我对这个孩子说：“擦擦你的嘴，然后就把点心给你”，这并不意味着，通过擦嘴可以赚到点心，因为擦嘴和点心的价值是无法比较的，这么说也不等于把擦嘴作为吃点心的前提，因为尽管这个条件非常之低，但是这孩子无论如何也能得到点心，因为这是他的午餐的必然的组成部分——所以这句话绝不构成对这一过渡的刁难，而只能使之更加容易，擦嘴只是个很小的好处，发生在吃点心这一更大的好处之前。

12月9日。昨天〔举行〕教堂落成典礼舞会。

一级末被脚步踏得深深凹陷的楼梯台阶，就其自身看，只是木头的一种单调的拼凑。

心灵的观察者是无法闯入心灵的，可是时机倒有一种擦过边缘时，可以触及心灵。在一接触所给予的认识是：心灵对自己也一无所知。也

就是说，它必须保持不被认识的状况。只有在除了心灵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东西的情况下，这才是可悲的，但是并没有其他东西。

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体察真正的人的本质，这种本质无非是能够被人爱。前提是：人们与他的本质是相称的。

如果谁在这个世界之内爱他人，那么这与在这个世界之内爱自己相比，既非更不正当亦非更正当。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第一点是否做得到。

只有一个精神世界而没有其他存在这一事实夺去了我们的希望，而给我们以确定性。

12月11日。昨天高级督察。今天《犹太人》。斯泰因：圣经是圣物，世界是秽物。

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照耀得眼花缭乱的存在：那照在退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见到真实，但每个人都是真实。

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被逐出天堂虽然是已成定局的，在尘世生活虽然已不可避免，但尽管如此，过程的永恒性（或照尘俗的说法：过程的永恒的重复）却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有一直期望留在天堂中的可能，而且有事实上一直留在那里的可能，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

总有某种跨越时间的东西与每一个瞬间相应。一个彼岸之物不能跟随此岸之物，因为那彼岸是永恒的，所以不可能同此岸之物发生时间上的接触。

12月13日。已开始读赫尔岑，为《美妙的珍品》^[18]和报纸分散了注意力。

谁若寻找，便找不到，可是谁若不找，便会找到。

12月14日。昨天、今天都是最糟糕的日子。对此做出贡献的有：赫

尔岑，一封给魏斯博士[19]的信，其他一些搞不清的事。恶心的伙食：昨天猪蹄，今天尾巴。穿过公园通向米歇洛普的路。

他是地球上一个自由的、有保障的公民，因为他虽被拴在一根链条上，但这根链条的长度足以容他出入地球上的空间，只是这根链条的长度毕竟是有限的，不容他越出地球的边界。同样，他也是天空的一个自由的和有保障的公民，因为他被拴在一根类似的天空链条上。他想要到地球上去，天空那根链条就会勒紧他的脖子；他想要到天空去，地球的那根就会勒住他。尽管如此，他拥有一切可能性，他也感觉到这一点；是的，他甚至拒绝把这整个情形归结于第一次被缚时所犯的一个错误。

12月15日。科尔纳博士、瓦克拉夫·梅尔[20]、母亲来信。

这里不会决定结局，但是决定结局的力量只能在这里受到检验。

12月17日。空虚的日子。给科尔纳、普弗尔、普利布拉姆、凯瑟尔、父母写信[21]。

那个从世界展览会送回家去的黑人，想家想得精神不正常了，在他的村子里的他的氏族的一片悲叹声中，作为传播和义务，以最最严肃的神色表演了笑话，这便被当成非洲的习俗而使欧洲观众着了迷。

艺术的自我忘怀和自我升华：明明是逃亡，却被当成了散步或进攻。

高的书信[22]。

他追逐着事实，犹如一个初学滑冰者，而且他无论什么地方都滑，包括禁止滑冰的地方。

12月19日。昨天宣告F.[23]将要到来，今天独自在我的房间里，对面炉子在喷烟，跟纳坦·斯泰因去了察尔特，他对女农民说，世界是个剧院。

有什么比信仰一个家神更为快活！

这是从真正的认识下面钻过去和一种天真幸福的站起来！

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但不

去追求它。

12月21日。给F.[\[24\]](#)的电报。

亚当被逐出天堂后蓄养的第一个家畜是蛇。

12月22日。腰痛，夜里算账。

12月23日。愉快而局部无精打采的行车。

睡得不好，紧张的白昼。

不可摧毁性是一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它，同时它又为全体所共有，因此人间存在着无与伦比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天堂里总是这样的：罪孽所造成的和罪孽所认识的是一回事。良知即恶，它是那么无往不胜，以致重复一次从左边跳到右边在它看来都是多余的。

那种忧虑带来的压力使受优待者向受压迫者表示歉意，这种忧虑即对能否保住优待的忧虑。

同一个人的各种认识尽管截然不同，但有着同一个客体，于是又不得不回溯到同一个人心中的种种不同的主观上去。

12月25、26、27日。F.的离开[\[25\]](#)。哭泣。一切很困难，不公平，但却是正确的。

他猛吃着从他自己桌上掉下的残食；这样他虽然有一阵子肚子比谁都饱，但却耽误了吃桌上的东西；于是后来就再没有残食掉下来。

12月30日。不算太失望。

如果天堂中应该被摧毁的东西是可摧毁的，那么事情就不是关键性的；假如它是不可摧毁的，那么我们就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中了。

1月2日[\[26\]](#)。老师有真正的、学生有持续的不怀疑。

用人类来考验你自己吧。它使怀疑者怀疑，使相信者相信。

明天鲍姆[\[27\]](#)离开。

有这种感觉：“我不在这里抛锚！”——就马上感觉到周身浪潮起伏，浮力陡增！

一个突变。回答问题时瞻前顾后，小心翼翼，怀着希望，窥测方向，绝望地在问题的那不可接近的脸上探索着，跟着它踏上最荒唐的、亦即为回答所避之唯恐不及的道路。

与人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

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的时候，它才会自由。

以打猎为借口，他出了门，以监视这座房子为借口，他向最难爬的高处爬去。假如我们不知道他是去打猎，我们就会不让他走。

1月13日。奥斯卡同奥特拉[28]一起走了，通往艾施维茨的路。

性欲的爱模糊了圣洁的爱；它单独地做不到这一点，但由于它自身无意识地含有圣洁的爱的因素，它便能做到。

1月14日。阴沉，虚弱，烦躁。

只有两种东西：真理和谎言。

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无法认识自己；谁要想认识它，就必须是谎言。

1月15日。烦躁。身体好转，夜间散步去沃伯尔克雷。

谁也不能要求得到归根结底对他有害的东西。如果在哪个人身上有这种表象——这种表象也许一直是有的——那么可以这样来解释：某人在一个人身上要求某物，此物虽然对这个某人有益处，却对半为评判此事而被牵扯进来的第二个某人[29]有严重损害。如果那个人从一开始，而不是直到评判时，就站在第二个某人一边，那么第一个某人也许就消失了，于是那种要求也随之消失。

1月16日。出于自己的意愿，他像一只拳头般地转动，避开世界。

一滴也没有溢出来，再加一滴的地方也没有了。

我们的任务恰好跟我们的生命一样大，这一点给予了他以无穷无尽

的表象。

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生命之树，被逐了便吃不到它的果子了。

1月17日。

普罗米修斯

关于普罗米修斯有四个传说。第一个说：由于他把诸神出卖给了人，于是被牢牢地拴在高加索，诸神派老鹰去啄食他那源源不绝长出来的肝。

第二个说：啄食的鸟嘴给他带来的疼痛使普罗米修斯越来越深地挤压入岩石，最终与岩石成了一体。

第三个说：几千年后，他的背叛被遗忘了，诸神忘了，老鹰忘了，他自己也忘了。

第四个说：人们对这变得没完没了的事厌倦了。诸神厌倦了，老鹰厌倦了，伤口厌倦地合拢了。

剩下的只有那无法解释的岩石山脉。——传说试图解释这不可解释的。可是由于传说来自一个真实的基础，所以它本身也结束于不可解释之中。

四对舞的规则是明明白白的，所有跳舞者都懂得，自古以来就没有变过。可是生活中不应该出现，但又偏偏反复出现的种种偶然中的不知哪一种却令你从行列当中穿了过去。也许这么一来行列自身也乱了套了，但这你就知道了，你所知道的只是你的不幸。

1月17日。通往沃伯尔克雷的路。局限。

身在魔鬼之中仍然尊重魔鬼。

1月18日。抱怨：如果我能成为永恒，那么明天我将成为什么呢？

我们两面同上帝隔开了：原罪把我们与它隔开，生命之树把它与我们隔开。

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恶无关。

生命之树——生命的主人。

我们被逐出天堂，但它未被摧毁。被逐出天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因为，假如我们未被驱逐，也许天堂就必须被摧毁。

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天堂生活，天堂是为我们的享用而存在的。如今我们的使命已经改变了；天堂的使命是否也随之而改变呢，没有人说出。

上帝说，亚当必将在吃知识之树的果子那天死去。按上帝的说法，吃知识之树的果子的结果是当场死亡，按蛇的说法（至少人们至此还能理解它），其结果则是与上帝比肩。二者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为不正确。人没有死，而是变成有死亡的，他们也没有变得与上帝同等，但却获得了成为同等的不可或缺的能力。二者也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为正确的。不是人死去，而是天堂的人死去，他们没有成为上帝，但是得到了上帝的智慧。

恶的无可救药的眼界：在认出善与恶之时他便认为看到了与上帝同等的地位。受贬丝毫不能使他的本质更糟：他将以其的肚子丈量道路的长度。

恶是人的意识在某些特定的过渡状态的散发。它的表象并非感性世界，而是感性世界的恶在我们的眼里构成为感性世界。

1月22日。试图走路去米歇洛普。泥泞。

自原罪以来，我们认识善与恶的能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偏偏在这里寻找我们特殊的长处。但在这种认识的彼岸才开始出现真正的不同。这种相反的表象产生于下述原因：没有人仅仅获得这种认识便满足了，而一定要努力将这种认识付诸实施。但他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必须摧毁自己，即使要冒风险；摧毁自己后甚至可能会得不到那必要的力量，但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作此最后的尝试（这也是吃认识禁果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死亡威胁之真谛；也许这也是自然死亡的本来意义）。面临这种尝试时他畏惧了（“原罪”这一概念可

追溯到这种恐惧)；他宁可退还对善与恶的认识但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倒退，而只能搅浑。为此目的产生了种种动机，整个世界为它们所充斥，甚至整个可见的世界也许亦只不过是想要安宁片刻的人们的一种动机而已。这是一种伪造认识之事实的尝试，是将认识搞成目的的尝试。

在所有的烟下面是火，而双脚烧着了的那个人不会由于他到处看见的只有烟而幸免。

我们吃惊地看着这匹大马。它冲破了我们小屋的房顶。多云的天淡淡地沿着它强大的轮廓移动，鬃毛在风中沙沙作响。

对艺术和生活的立场就是在艺术家的心中也是各不相同的。

艺术围绕着真实飞翔，然而怀着坚定的意图：不让自身焚毁。它的能力是，在这片黑暗的空旷中找到一个地方，那儿能够在光线处于隐蔽状态的情况下，强有力地捕捉住它。

一种信仰好比一把砍头斧，这样重，这样轻。

死亡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壁上一幅描写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一生都要通过我们的行动来使之暗淡或干脆磨灭它。

1月25日。晨曦。

自杀者是这么一个囚徒，他在监狱院子里看到人们竖起一个绞刑架，他错误地以为那是为他竖的，于是他在夜里闯出牢房，走了下去，把自己吊死了。

认识我们是有的。谁若特别努力地想要获得它，那就会引起怀疑，他是在致力于反对它。

在踏入最神圣的地方之前，你必须把鞋脱掉，可不仅是鞋，而是一切，旅行服装和行李，然后是裸体和裸体下的一切，以及掩藏在这一切之下的一切，然后是核心和核心的核心，然后是剩下的和残余，最后便是不灭之火的光。只有这火本身才被最神圣的所吸取，它也让它吸取，两者对之都无法抗拒。

不是自我抖搂，而是自我消耗。

对于原罪有三种惩罚可能：最轻的是事实上那种，即逐出天堂；第二种是：摧毁天堂；第三种（这应该说是最严厉的一种）是：封锁永恒生命的道路，而保留其他一切。

1月28日。有几天虚荣心和忘我[30]。

两种可能：把自己变得无穷小或本来就是这么小。第二种是完成式，即无为，第一种是开端，即行动。

为避免用词上的误解，需要以行动来摧毁的东西，在摧毁之前必须牢牢抓住；自行粉碎的东西正在粉碎，但却无法摧毁。

A既不能同B和睦地生活，也不能（离婚），于是他便开枪自杀了，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不可结合的结合起来，即与自身“进入尘土”。

“假如……，你就必须死”的含义是：认识是两方面的，通往永恒生命的阶梯设在它前面的障碍。如果你在获得了认识之后想要到达永恒的生命（你也只能“想要”，因为认识是这方面的意志），那么你就必须摧毁自己这个障碍，以求能够建造那个阶梯（这就是摧毁的结果）。因此被逐出天堂不是行动，而是事件。

第四本八开本笔记

通过赋予一种过大的责任或干脆所有责任你便是自找压力。最早的偶像崇拜一定是对物的恐惧，但与此关联的是对物的必然性的恐惧，与后者关联的是对物负有责任的恐惧。这种责任非常重大，以致人们不敢把它交给任何非人的力量，因为通过一种物的中介会给人的责任染上污点。所以人们让每一种物都由自己负责；不仅如此，人们还让这些物对人相对地负起责任来。人们不能够做出足够的努力来造就制衡力量，这个幼稚的世界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其幼稚性完全在残忍中延续下去。

假如你被赋予了所有的责任，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瞬间为这些责任所驱使，可是你一旦真的去尝试了，你便会发现，什么也没有赋予你，而是你就是这责任本身。

地图册可以有这么一种想法：如果它想要，它可以让地球跌落，而它自己便悄悄地溜之大吉；除此之外，别的想法是不允许它有的。

日子、季节、一代代人、一个个世纪互相接替过程那种表面的寂静是一种倾听；马匹就是这样走在车子的前面。

1月31日。园艺劳动。前景暗淡[31]。

一场绝对得不到，在任何阶段都得不到掩护的斗争。尽管人们知道这点，但却总是忘却。即使人们没有忘记，却也仍然在寻找掩护，这只是为了通过寻找得到休息，尽管人们知道后果将是严重的。

2月1日。伦茨的信。

最后一次心理学！

生命开端的两个任务：不断缩小你的圈子和再三检查你自己是否躲在你的圈子之外的什么地方。

2月2日。沃尔夫[32]来信。

有时恶握在手中犹如一把工具，它自觉不自觉地、毫无疑问地让人摺在一边，只要人们想要这么说的话。

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

2月4日。长时间躺着，睡不着，斗争意识产生。

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对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

受难是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

受难只在这里是受难。这并不是说，在这儿受难的人在其他地方地位会提高，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叫做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上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面：快乐。

2月5日。美好的早晨，无法回想起一切。

只有第一，在世界是恶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与我们的意识相违背，第二，在我们有能力去摧毁它的情况下，摧毁这个世界才能成为我们的任务。第一点似乎是如此，第二点我们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我们不能摧毁这个世界，因为并不是我们把它作为某种自立的东西建立起来，而是我们误入了其中，还不止此：这世界是我们的失误，作为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不可摧毁的，或者说它是一种只能通过它的走向终结，而不能通过对它的放弃来加以摧毁的东西，当然走向终结只能是摧毁的一个结果，但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之内。

对我们来说存在着另一种真理，就像通过认识之树和生命之树所描绘的那样。即行动者的真理和休憩者的真理。在第一者中善与恶分离，在第二者中只有善自己，无论对善还是恶它都一无所知。第一个真理是真正交给了我们的，第二个只能去感觉。这是一幕可悲的景象。愉快的景象是：第一个真理属于当前，第二个真理属于永恒，所以第一个真理也在第二个的光中熄灭。

2月6日。去了弗略豪。

关于宇宙的无限宽广和充实的想象是把坚信的创造和自由的自我思索之混合推到极端的结果。

2月7日。搬石头的士兵，吕根岛。

厌倦不一定意味着信仰弱，要不真的有这种含义？厌倦无论如何意味着不知足。我在所有意味着自我的东西中都感觉转不过身来，甚至我所意味着的永恒对于我来说也太狭窄了。可是如果我比如说读一本好书，比如一本游记，它却能唤醒我，满足我，使我知足。这便证明了，以前我没有把这本书纳入我的永恒之中，或没有使之逼进至能够感觉到这永恒的地方，然而永恒却是同样围绕着这本书的。——从认识的一定层次开始，厌倦、不知足、狭窄感和自我蔑视必然会消逝，这个层次就是我有力量把以前作为一种异体使我振奋，给我满足，把我解放，让我升华的东西认识为我自己的本质的时候。

但是如果它以前是被误以为是异体而具有那种效果的，而你在获得了这种新的认识后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会失去以往的那种慰藉呢？当然，它只是作为异体才具有那种效果，但并不仅仅是这种效果，而是通

过它的继续作用把我推上了这更高的台阶。它没有停止作为异体存在，而是除此之外还开始成为自我。——可是你所身为的异体不再是陌生的。于是你便否认创始之说，从而否认了你自己。

照理我是欢迎永恒的，找到永恒我又很悲伤。难道我应该通过永恒完全感觉到我自己，从而感觉到我被压在地上吗？

你说：我应该——感觉；你这是表达了你心中的一种信条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可是像你这样，仅仅听着这个信条，此外什么也不做，不可能只有一个信条被植入你的心中。这是一个持续的还是仅仅是暂时的信条呢？

这我无法断定，然而我相信，这是一个持续的信条，可是我仅仅是暂时地听到它。

你的根据是什么？

根据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听到了它，可是在我听不到它的时候，它是变成了本身无法让人听到，然而同时把对抗之音压了下去，或使之渐渐陷入痛苦，那对抗之音即使我对永恒感到索然无味的那个。

这时，在这个信条对着永恒发言之时，你也同样听见了那对抗之音了吗？

肯定也会如此，有时我甚至相信，除了那对抗之音外我什么也没听到，其余一切皆是梦，我让梦在白天出现。

为什么你把这内心的信条同一个梦相提并论？难道它也像梦那样，无意义，无衔接，不可避免，奇特，给人以无底的幸福感，或者令人害怕，不是对整体是间接的，迫使人去传述吗？

这一切都对；——无意义，因为只有在我无法追随它的时候，我才能在这里存在下去；无衔接，我不知道是谁提供它，它所针对的又是什么；不可避免，它在我全无准备的情况下降临，同梦对睡眠者的突如其来一样，当然，睡眠者在躺下时，还是有做梦的心理准备的。它是奇特的，或至少似乎如此，因为我无法跟上它，它不同真实搅和在一起，从而保持了它那不可侵犯的奇特性；它带来无底的幸福和恐惧，当然前者

比后者要少得多；它不是直接的，因为它是无从捕捉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它迫使人们去传述它。

基督，瞬间^[33]

2月8日。很快就起床了，有可能投入工作了。

2月9日。有些天无风，到来者的喧哗，我们这儿的人跑出去欢迎他们，好多地方挂上了旗帜，人们跑进地窖去取酒，从一扇窗口有一朵玫瑰掉出来，落在地上，谁都没有耐心，上百条臂膀抓住船推上岸来，陌生的男人们东张西望，走上广场光线最亮的地方。

为什么容易的事这么难？我想到引诱。

别罗列理由了。容易的事就是难。这是这么容易而又这么难。就像一场狩猎游戏，唯一的休息场所是世界之海彼岸的一棵树。

可是他们为什么徙迁离开了那里呢？——岸边的海浪是最厉害的，他们的领地是那么窄小，那么难以抵达。

我真想把“不问”带回来，提问把你推出又一个世界之海以外。——不是他们迁移了，而是你。

狭窄将不断地压迫我。

可是永恒不是时间性的静止。

想象永恒时的令人压抑之处是：时间在永恒中必然要求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辩白和由此而来的我们自己的辩白，即我们本身。

即使是以往对我们的时间局限性的永恒的辩白之最弱的相信，也比对我们目前罪孽深重的状况的最坚定的相信要令人压抑得多。只不过忍受第一种相信的力量（它由于其纯洁性而完全包容了后者）是信仰的尺度。

有些人相信，除了那原始大欺骗外，在每一件事中都有专门针对他们一个小骗局上演。这就像：当一个爱情剧在舞台上演出时，女演员给她的情人的装模作样的微笑中还含有一种特别隐蔽的给楼座最后一排一个特定的观众的微笑。这就叫太过分了。

2月10日。星期天。乌克兰和平。

雾消失了，统帅和艺术家的，情人和富人的，政治家和运动员的，海员的……

自由和束缚在其根本意义上是一个东西。在什么根本意义上？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奴隶没有失去自由，故在某种角度看比自由人更自由。

世代之链不是你的本质之链，然而两者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一代又一代就像你生命中的一个个瞬间那样接踵死去。——其中有何区别？

这是个古老的笑话：我们抱着世界抱怨说，是它抱住了我们。

你在一定意义上否认这个世界的存在。你把存在解释为一种休息，一种在运动中的休息。

2月11日。俄国和平。

他的房子在普遍的大火中得以幸免，这不是因为他虔诚，而是由于他有意识地让他的房子得以幸免。

观察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共同生活者，他抱着生活者，试图跟上风速。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生命意味着：处于生活的中间；用那种我创造了这种生活的眼光去看它。

只有在创造世界的那个地方看上去，世界才呈现为好的，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宣布过：看，它曾是好的——也只在那里才能判决它和摧毁它。

时刻准备着，他的房子是可移动的，他永远生活在他的家乡。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特性是其可逝性。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一个个世纪并没有走在这个当前的瞬间前面。所以可逝性的延续不能给人任何安慰；新的生命从废墟中发芽开花，与其说证明了生命的坚韧，不如说证明了死亡的坚韧。如果我要与这个世界斗争，我就必须在它关键的特

性中斗争，即在其可逝性中。我在此生中能够真正地，而不仅仅凭希望和信念做得到吗？

这就是说你要与这个世界斗争，而且是用武器，它比希望和信念真实。这样的武器也许是有的，但它们只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是可认识的和可使用的；我先要看看，你是否具备这样的前提。

看吧，可是，如果我没有，我也许也能够去争得。

没错，可是我在这方面不能帮你的忙。

这就是说，你只在我已经得到那些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帮我？

是的，说得更准确些，我根本就帮不了你，因为如果你有了那些前提，你便已经有了一切。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先考我呢？

不是为了向你表明你缺少什么，而是向你表明，你缺某种东西。我这么做也许会带给你一个好处，因为你虽然知道你缺某种东西，可是你不相信。

那么，你对我最初的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个证明：我必须提出问题。

我提供的不止这个，也就是根据你现在的状况无法确切知道的东西。我提供了证据：你应该用另一种语言来提出你最初的问题。

这意味着：你不想或不能回答我。

“不回答你。”——就是这么回事。

而这个信念——这你是能给予的。

2月19日。从布拉格回来。奥特拉在察尔西。

月夜使我们目眩。鸟儿从一棵树叫到另一棵树。原野上风在呼号。我们爬过尘土，一对蛇。

直觉和经历^[34]。

如果“经历”是在绝对之中的休息，那么“直觉”只能是绕过世界通往

绝对的道路。一切都想达到目的，而目的只有一个。当然平衡是可能的，肢解只能是时间中的一种肢解，也就是说只能是一种虽然发生在每一个瞬间的，但实际上根本不能完成的肢解。

关于魔性的知识也许是有的，但是没有对它的相信，因为没有比知识中存在着更多魔性的了。

罪孽总是公开到来，凭感性立刻便可抓住。它深入感性的根部，无须把它扯开。

谁只为未来操心，比只为当前操心的更不能防患于未然，因为他连为当前操心都没做到，而只是为其延续操心。

我们周围的一切苦难我们也得去忍受。我们大家并非共有一个身躯，但却共有一个成长过程，它引导我们经历一切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就像孩子成长中经历生命的一切阶段，直至成为白发老人，直至死亡（而这个阶段从根本上看似乎是那以往的阶段——无论那个阶段是带着需求还是怀着畏惧——所无法接近的），我们同样在成长中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这同人类的关系并不比同我们自己的关系浅）。在这一关系中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但也不容对苦难的惧怕或作为一个功劳来阐述苦难。

2月22日。

内省和行为有它们的现象真实性；可是从内省发生的或不如说回到内省的行为才是真实。

你可以避开这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

你的意志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当它想要穿越沙漠时，它是自由的，因为它可以选择穿越的道路，所以它是自由的，由于它可以选择走路的方式，所以它是自由的，可是它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不自由，因为无论哪条路，由于其迷宫般的特点，必然令你触及这片沙漠的每一寸土地。

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是自由的，因为他想要这个生命；现在他当然无法走回头

路了，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初想要这个生命时的那个人了，他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执行他现在生活在其中的当初的意志。

第二，他是自由的，这体现在他能够选择这一生命的行走方式和道路。

第三，他是自由的，这体现在，他还将成为从前的那一个人，怀有这么个意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走完这一生，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回归自己，而这是通过一条虽然可以选择，但又是那么迷宫般的道路实现的，走在这条道路上，这个生命的任何角落都将被他踏遍。

这就是自由意志的三点式，但它也同时是一点式，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极端的一点式，以致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某一种意志，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意志。

2月23日。一字未写的信。

女人，或者说得更尖锐些，婚姻是你应该与之争执不休的生活的代理人。

这个世界的诱惑手段和关于这个世界只是一种过渡的保证符号，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世界才能诱惑我们，同时这也符合真情。可是最糟的是，当我们真的被诱惑后便忘记了那个保证，于是发现善将我们引入恶，女人的目光将我们诱到她的床上。

2月24日。谦卑给予每个人，包括孤独的绝望者以最坚强的人际关系，而且立即生效，当然唯一的前提是，谦卑必须是彻底而持久的。谦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它是真正的祈祷语言，同时是崇拜和最牢固的联系。人际关系是祈祷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是进取关系；从祈祷中汲取进取的力量。

难道除了欺骗你还能懂得别的什么吗？一旦欺骗消除，你就不能朝那边看了，或者说你会变得呆若木鸡。

发明赶在我们前面，就像海岸总是赶在不断被其机器震撼着的蒸汽轮船的前面一样。发明做出一切能够做出的事来。这么说就不对了：飞机飞得不像鸟，或者，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创造出一只鸟来。这些当然做不到，但错在这种责备，这就像要求一艘蒸汽轮不走笔直的航线，而不

断地开到第一个港口那儿去。一只鸟不可能通过一个起始行为被创造出来，因为它已经被创造了出来，并在第一个缔造行为的基础上不断地产生，要在这基于一个起始的、不间断的意志被创造出来并生活着并继续繁衍的系列中插上一脚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传说中说的，尽管第一个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成的，但是这一行为再也不会重复，而是从那以后男人总是娶其他人的女儿做老婆。缔造鸟和——争论的焦点在这里——飞机的方法和趋势却不一定肯定是不同的，而野蛮人把枪击和雷击混为一谈的解释也有一定的真理。

一种真正的前世的证明是：我以前曾经见过你，这是史前的和生命终结时的奇迹。

2月25日。早晨的清朗。

并不是惰性、恶意、笨拙（尽管所有这些都有点关系，因为“这虫害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使我干什么事都失败或甚至连失败都不让：家庭生活，友谊，婚姻，职业，文学，造成这一结果的其实是立足之地、空气、信条的缺乏。创造这些是我的任务，并不是说我这样可以把失去的补回来，而是这样我可以什么都不曾失去，因为这个任务像任何其他任务一样好。它甚至是最起始的任务或至少是它的余晖，就像人们攀登一个空气稀薄的高地时突然进入了遥远的太阳的光芒之中一样。它也不是例外的任务，而肯定是已经经常提出来的了。当然是否也曾以这样的规模，我就知道了。据我所知，我没有带来任何生活之要求，而只带来了人的普遍弱点。我用它（从这方面看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强有力地接纳了我的日子的负面，这一日子距我非常之近，我永远不会有与它斗争的权力，而只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它的权力。在那一点点正面和那最极端的、正在转化为正面的负面上，我没有继承到哪怕一星半点份额。我不是像克尔恺郭尔那样是被基督教那已经沉重地下垂的手引入生活的，也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抓住了正在飞去的犹太教袍的最后一个衣角。我是终结或开端。

他的太阳穴感觉到就像墙对想要打进去的钉尖那样。这就是说他没有感觉到。

没有任何人在此除了他的精神生活可能性外还能造就别的什么；那种他为他的吃、穿等等工作的表面现象是次要的，在可见地每吃一口东西时都有一种不可见的东西塞进他的嘴里，套上每一件可见的衣服时都

有一件不可见的套在他的身上，如此等等。这是每一个人的辩白。表面上看，他好像总在他的存在之下垫上辩白，可是这只是心理上的倒写，事实上他在他的辩白之上建立他的生活。当然每个人都必须能够为他的生活（或者为他的死亡，这其实是一回事）辩白，这一任务是他不能回避的。

我们看见每个人生活着他的生活（或者死亡着他的死亡）。没有内心的辩白这事是做不到的，没人能够生活一种未经辩白的生活。如果从此出发，会基于对人的低估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在为他的生活垫上辩白。

心理学是阅读一种倒写体，很吃力，就其永远正确的结论而言，又堪称成果累累，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一个人死后，即使在人世间，从死者的角度出发，在一段时间里也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舒适的寂静，那种人间的狂热静止了，看不到死亡的继续，一种误会似乎消除了，就连活着的人也得以喘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死人那间房子的窗子都打开的原因了，——直到这一切被证实是假象，痛苦和心酸重新开始。

死亡的残忍之处在于，它带来了终结时真正的痛苦，但未带来终结。

死亡的最残忍之处是，一种表面的终结引起一种真正的痛苦。

在死者床前的哭泣实际上是在哭泣这里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我们一如既往地不得甘心于接受这种死亡，一如既往地把这游戏玩下去。

2月26日。阳光灿烂的早晨。

人类的发展——死亡力量的增长。

我们的拯救是死亡，但不是这个死亡。

大家对A.都非常友好，就像是人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一张出色的台球桌，连优秀的台球手都不让碰，直到那伟大的台球手到来，他仔细检查桌面。不能容忍在他到来之前造成的任何损坏。然后，当他自己开始击球时，却以最无所顾忌的方式大肆发泄一通。

“然后他回到他的工作中去，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似的。”这是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记不清在多少旧小说中出现过，虽然它也许没有在任何小说中出现过。

每个人都面临两个信仰问题，一是究其生活信仰的可信性，二是究其目的信仰的可信性。两个问题都由每个人通过其生活之事实那么坚决而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这就让人吃不准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理解了。无论如何必须探索一下这个基本的肯定，因为在其表面下的深处，这些答复在这些问题的冲击下显然是混乱而又缩头缩脑的。

“不能说我们缺乏信仰，单是我们的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在其信仰价值方面就是取之不竭的。”

“这里面有一种信仰的价值吗？人们总不能不生活吧。”

“恰恰在这‘总不能’中存在着信仰的疯狂力量；在这一否定中这种力量获得了形象。”

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

悖谬的不可传达性也许是存在的^[35]，但并不表现为这么一种，因为亚伯拉罕自己也不明白。那么好吧，他不需要或者不应该明白，因此也不能为自己去解释它，但他在别人面前却是可以试着为其解释的。一般性在这意义上也不清楚，伊菲格尼事件表明，预言从来就是不清楚的。

一般中的静止？一般的两可性。有时把一般解释为静止，在别的场合则解释为在个别和一般之间“一般的”来与往。静止才是真正的一般，但也是最终目的。

就好像是一般和个别之间的来与往在真正的舞台上演出，而一般中的生活则仅仅被勾画在布景上。

不存在那种由我非常间接地使之毫无意义的，能使我感到厌倦的发展。这可逝的世界对于亚伯拉罕^[36]的展望来说是不够的，因此他决定

带着它进入永恒。不知是城门出口还是入口太窄，反正他那运家具的车过不去。他把这归咎于他发号施令的嗓门太弱。这是他生活中的痛苦。

亚伯拉罕的精神贫困和这一贫困的笨拙是一种优势，它使他易于精神集中或不如说它本身就是精神集中，当然这么一来他的这一优势便又失去了，因为这优势就在集中精神的力量之运用上。

亚伯拉罕陷入了这么一种误解之中：他无法忍受这个世界的单调。可是众所周知世界是非常之丰富多彩的，这在任何时候，只需抓起一把世界拿到近处来看一看，就可以得到证实。这一点亚伯拉罕当然是知道的。因此对世界的单调的抱怨实际上是抱怨同这世界的丰富多彩掺和得不够深。所以说，这抱怨其实是跃入世界的跳板。

与他的援引证据并存着一种魔法。人们可以遁入魔法世界以躲开援引证据，可以遁入逻辑学以躲开魔法，可是两者同时压来，两者在一起便成了第三种东西，成了活的魔法或者成了对这个世界不是摧毁性的，而是建设性的摧毁。

他拥有过多的精神，他带着他的精神乘坐着一辆魔法车穿越大地，包括那些没有路的地方。他自己无法知道，那里是没有路的。这么一来，他为了继任的谦卑请求便成了蛮横，而他那“在路上”的真诚信念成了狂妄。

无产的工人群众

义务：不拥有或不能得到钱与值钱的东西。只允许拥有以下的财产：最简单的衣服（都有具体规定），干活所必需的东西，书籍，自用的生活用具。其他一切均属于穷人。

只能通过劳动获得生活之必需。只要在不伤害健康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就不得逃避劳动。或者自己选择工作，或者，在这不可能的情况下，服从从属于政府的劳动委员会的安排。

除了为两天的生活必需（具体由各地规定），不得为赚取其他收入而工作。

要过最有节制的生活。只吃最必需的东西，比如作为最低酬劳，同时也是最高酬劳：面包、水、枣子。吃最穷者的伙食，住最穷者

的住处。

将与雇主的关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永远不能要求法庭调解。在任何情况下，除非有严重的损害健康因素，接受的任何活计都必须干完。

权利：最长工作时间为六小时，体力劳动为四至五个小时。

生病时和年老体迈时可进入国立养老院和医院。

将劳动生活视为良心问题和对其他人的信任问题。

带入的财产献给国家，用于建设医院和养老院。

至少暂时不雇用生意人、已婚者和妇女。

向政府咨询（重要义务）。

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也同样，〔此处两句话无法辨认。〕在可以帮忙的地方，在被人遗弃的地方，穷人院，〔作为〕教师。

最多收五百人。

试用期一年。

在建筑过程中，一切他都用来得心应手。外籍工人运来大理石，全都是凿好了的，一拼就行。他用手指丈量完后，这些石头便立了起来，移动起来。从来没有哪个建筑物像这座庙宇形成得那么容易，或者说，像它这般以真正的庙宇样子形成。只是，在每一块石头上——它们是从哪个采石场来的？——都刻满了出于儿童之手的笨拙的痕迹，或者更可能的是未开化的山野居民出于愤怒或为了亵渎或为了彻底的破坏用显然非常锋利的工具划出来的道道儿，它们将超出庙宇的生存极限，永恒地存在下去。

沿着潺潺的小溪而上。茂密的荆棘丛林。老师愤怒的叫喊，孩子们的轻声嘟囔。红红地沉落着的、渐渐变得苍白的、战栗的太阳。猛然碰上的炉门。咖啡煮好了。我们倚在桌边坐着，等待着。稀疏的小树立于路的一边。三月。你还不满足吗？我们从坟墓中爬出来，也想要穿越世界，但我们没有一定的计划。

你想要离开我？好吧，这是一个决定，同别的决定一样好。可是你想上哪儿去呢？哪儿有这个“离开我”？在月亮上？甚至那儿也没有，而且你也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还不如待在那些温暖而黑暗的角落里？你没在听我说？你在摸索一扇门。哪儿又有一扇门呢？我记得，这间房间是没有门的。在盖这座房子的时候，有谁会想到像你如今这样震惊世界的计划呢？不过，什么也不会失落的，这么一种想法是不会失落的，我们将在圆桌会议上详尽地讨论它，而微笑将是你所获得的报酬。

苍白的月亮升了起来，我们驱马驰过树林。

波赛冬厌倦了他的海洋。他失去了三叉戟。他静静地坐在岸边礁石上，一只为他的在场所麻木了的海鸥起伏地绕着他的脑袋飞翔。

狂野地滚动着的车。

啊，什么在此迎候我们！

树林下的床铺和营地，

绿色的荫，干燥的叶，

太阳微弱，香气潮湿，

啊，什么在此迎候我们！

欲望将我们推向何处？

成功何如？失败何如？

我们无谓地吸饮着尘灰，

把我们的父亲们窒息，

欲望将我们推向何处？

欲望将我们推向何处？

它从屋子里卷了出去。

笛声诱惑着，奔跳的小溪诱惑着。

你觉得有耐心的现象

沙沙地在树梢上掠过，

还有花园的主人在谈说。

我在他的字符中寻找

探索更迭之剧的隐秘，

字句和溃疡……

伯爵正坐在那儿吃午饭，这是一个寂静的夏日中午。门开了，但这回进来的不是仆人，而是他的哥哥菲罗塔斯。“哥哥，”伯爵说着站了起来，“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已经很久连做梦也没有梦见你了。”通往阳台的玻璃门上的一块玻璃在地上摔成了碎片，一只像山鹑一样红褐色的，但更大一些，长着长长的喙的鸟飞了进来。“慢着，看我先把它抓住。”哥哥说着，一手撩起衣摆，另一手去捕捉这只鸟。这时仆人正好端着一盘像样的水果走进来，这只鸟便静静地在水果盘上盘旋着，使劲地啄食。

那仆人呆住了似地端着果盘，带着并不像惊讶的表情凝视着手上的水果、这只鸟和仍在追逐着鸟的伯爵哥哥。另一扇门开了，村民们捧着一份请愿书走进来，他们请求开放一条林间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他们更便于管好庄稼。可是他们来的不是时候，因为这位伯爵还是个小学生，正坐在小凳子上读书。老伯爵自然是已经死了，于是这位小伯爵就得接掌权力，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历史上的一段休息时间，这个村民代表团因而失去了对象。他们该上哪儿去呢？他们将回去吗？他们是否会及时认识实际情况？代表团中的那位老师已经从队伍中走了出来，着手给小伯爵上起课来。他一伸手把桌上的一切都撸到了地上，把桌面竖起来，置于高处当黑板，用粉笔在上面写下了第一个字母I。

我们在喝着酒，沙发对我们来说已显得太挤了，挂钟的指针不停地转着圈。跑堂在朝屋里看来，我们纷纷举起手招呼他。可是他似乎被窗前沙发上的一个现象定住了。一个穿着薄薄的、闪着丝绸光泽的黑衣的老先生在那里慢慢地站起来，他的手指仍然不停地在沙发扶手上敲打着。“爸爸。”儿子叫道。“艾米尔。”老头叫道。

通往同仁的道路对我来说非常之长。

布拉格。宗教像人一样在失败。

小小的灵魂，

你在舞步中跳跃，

把脑袋放入温暖空气中，

把脚拔出闪光的草，

草在风中有棱角地运动。

第五本八开本笔记

我本来应该很满足了。我是市政府的一个官员。在市政府当个官员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工作不多，收入足够，有许多业余时间，在城里到处享受过分的尊敬。如果我仔细设想一个市政府官员的处境，我不可避免地会妒忌他。如今我自己成了这么一个人，成了市政府官员，却恨不得，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把这一切荣耀统统扔给那每天上午从一个房间窜到另一个房间收集早餐残食的办公楼的猫，让它去吃个干净。

如果我在不久的将来死去或完全失去生活能力（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我最近两个夜晚已连续咳出大量的血来），那我可以说，是我撕碎了自己。如果说，我父亲以前在野蛮而空虚的威胁中习惯于这么说：我把你像一条鱼一样撕成碎片（实际上他一根手指都没动我），那么现在这个威胁在与他毫不相干的情况下实现了。世界（F.[37]是它的代表）和我的自我在难分难解的争执中撕碎我的躯体。

我将在这座大城市中上学。姑妈在火车站等我。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这座城市来时，曾经见过她。这回差点认不出她来了。

乌鸦，我说，你这不吉利的东西，你干吗老是缠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你总是坐在路上，竖起你那几根毛。讨厌！

是的，他边说边在我的前面垂着头踱来踱去，好像老师在讲课那样，不错，这都快使我感到不舒服了。

他终于来到了这座城市，他将在这里上学。找到了一间住房，箱子东西都拿了出来，放开了，一个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的老乡带着他在街上散步。完全偶然的，在一条横街的另一头出现了那在所有教科书上都画着的著名的奇怪景象。他激动地喘着气，而那老乡只是举起手向那儿招呼着。

浑小子，我们把这里清理一下怎么样？

不，不，我坚决反对。

我对此毫不怀疑。尽管如此，你将被清除掉。

我会把我的亲戚们找来的。

这我也已经考虑到了。也得把他们扔到墙上去。

不管那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把我从本来会把我碾碎的两块磨盘石中拽了出来，我感觉到的是，那是善举，前提是，那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肉体痛苦。

小小的阳台平伸入阳光之中，堤坝在平和地不间断地哗哗作响。

没有任何东西挡着我。

门和窗统统敞开。

宽阔而空旷的平台。

K.曾是个伟大的魔术师。他的节目有点单调，但由于他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始终有吸引力。我对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那场演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尽管已经时隔二十年，而那时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他未经事先宣布就来到了我们这座小城市，而且在到达的当天晚上就进行了表演。在下面那家旅馆那个大餐厅中间放了一张桌子，周围留出了一点空地，这就是全部的演出准备工作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大厅挤满了人，可现在看来，在一个小孩子的眼中每一个房间都是挤满了人的，只要那儿有一些灯亮着，周围响着成年人乱哄哄的话声，有个跑堂的跑来跑去，等等。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看这场匆匆忙忙举办的表演，当然，在我整个记忆中，大厅挤满人这一可能是错误的印象左右着我对这整个表演的印象。

我触及什么，什么便破碎。

服丧之年已经过去，

鸟儿翅膀耷拉下垂。

月亮裸露在清冷的夜里，

杏和橄榄树早已透熟。

岁月之善举。

他面对着一摞账单。长长的栏目。有时他移开目光，把脸埋在手
里。这些账单会告诉他什么结果？阴暗的，阴暗的账单。

昨天我第一次踏入经理办公室。我们这个夜班推举我为代言人，由于我们的油灯设计和装的油不足，我的任务是到经理办公室去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把办公室指给我看，我敲了门，走了进去。一个温柔的、脸色很苍白的年轻人在他的大写字台后冲着我微笑。他点了很多头，应该说太多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坐下来，那儿虽然放着一张椅子，可是我想，由于是第一次来访，我可能不应该马上就坐下去，于是我便站着陈述那些事。可是我的谦虚反而给这年轻人造成了困难，他不得不向我转过脖子，仰起脸来，否则他就得把他的椅子换个方向，而他却不愿移动椅子。可是尽管他有听的诚意，但这样坐着，势必无法把脖子整个扭过来，所以在我述说的整个过程中，他只能半边脸对着我，其余的眼光便都斜射向了上方的屋角，而我则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我讲完后，他站了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道：是这样，是这样。把我推入了隔壁一个房间，那里的一位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先生显然正在等我们，因为他的桌子上没有任何工作的痕迹，而一扇敞开着的玻璃门通往一个种满花和灌木的小花园。那年轻人在他耳边只说了几句话，这位先生似乎就已经明白了我们多方面的申诉。他立刻站了起来，说道：亲爱的……他顿住了，我想他大概是想知道我的名字，我便张开嘴来，想再自我介绍一番，可是他先说了下去：是的，是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我对你很熟悉，你的或者你们的请求是有道理的，看来只有我和经理班子的先生们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人的处境，我想，比工作的处境更受到我们的关心。为什么不呢？活总是可以重新干过的，只不过是花点钱的问题，让钱见鬼去吧，可是如果一个人完蛋了，那就意味着一个人完蛋了，就会留下寡妇，孩子。我的上帝！所以每一个关于建立新的安全设施、新的减轻工作的设施、新的舒适条件和享受的建议，我们都特别欢迎。谁带来这类建议，他就是我们的人。你把你的建议留在这里好了，我们将认真地考虑，任何与此有关的好消息我们都不会贪污的，等一切完成了，你们就将得到你们的新灯。回去告诉你们的人：我们一天没有把你们的矿井变成沙龙，我们就一天不休息，如果你

们不曾穿着漆靴子死去，那就永远不会这样死去。尽管放心吧！

奔驰吧，小马，

驮我进入沙漠，

所有城市、村庄和可爱的河流在沉没。

可敬的学校，放荡的酒家，

姑娘的脸蛋在沉没，

由东边的暴风卷着。

这是个很大的社交场面，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我采取这样的战略：先是保持绝对沉默，慢慢寻找最容易接近的对象，然后通过他们加入到其余谈话圈子中去。这个只有一扇窗的房间够小的了，可是却有将近20个人在这儿。我站在敞开的窗前，模仿一些人的样子，从靠墙的小桌上取香烟，静静地抽着。可惜尽管我竖起了耳朵，却一点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有一回，我是这么感觉的，他们的话题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后来又关于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可是由于总是围绕着这么3个人，而我对所争论的那几个人已经搞不清楚，更何况这些人的故事了，所以看来毛病主要出在我的迟钝上。我觉得毫无疑问的是，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3个人或至少这3个人中的一个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值得赞成。但对故事本身，由于已是众所周知，所以人们就不再谈及。

傍晚在河边。一叶小舟漂浮水面。云中太阳在落下。

他在我面前倒了下去。我告诉你们，他倒下去的时候离我就这么近，就像我现在顶着的这张桌子。“你疯了吗？”我喊道。这时午夜已经过了很久，我刚参加完一个晚会，很想独自走一会儿，而现在这个人就在我面前倒了下去。要把这巨人扶起来我办不到，而我也不愿意让他在这个荒凉的、四外不见人迹的地方就这么躺在地上。

许多梦向我滚滚涌来，我疲惫而我无可救药地躺在床上。

我病倒在床上。由于这是一场重病，人们便把我同屋的草袋拿了出去，于是我日日夜夜就这么一个人待着。

在我健康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关心过我。这我总的觉得挺好，并不想现在事后开始抱怨，我只是想强调这个区别：我一生病，探病的人便来了，几乎源源不断，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

绝望地乘着一只小船绕过好望角。这是清晨，风很强劲。一叶小帆绝望地鼓着，有气无力地后仰着。这只小船以其很浅的吃水，在这片危险的水域的所有暗礁之间，以一个生物的灵活性穿行而过，他在这船上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我有三只狗：“拽住它”、“抓住它”和“绝不”。“拽住它”和“抓住它”是普通的小捕鼠犬，当它们单独在那儿的时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还有“绝不”呢。“绝不”是一个杂种，看上去，即使经过几百年精心的训练，对它也不起作用。“绝不”是一个吉卜赛种。

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本来是很多的，可是为了抗拒饥饿，很多时间我都得强迫自己以睡眠度过）都用于“绝不”了。在一张雷卡米叶夫人式床上[38]。这件家具是怎么跑到我这个阁楼上来的，我就知道了，也许它本来是要搬到一个废物室去的，却偶然地（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了）留在了我的房间里。

“绝不”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我实际上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在它的面前我却装出另一副样子。它在房间里东奔西跑，有时窜到椅子上，用牙齿撕扯我给它的香肠块，最后用爪子把肠子向我弹来，然后又开始了它的东奔西跑。

A：您所着手的，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件非常艰巨和危险的事情。当然也不能过高估计，因为世上还有更艰巨和更危险的事，而且也许就在人们根本没有估计到的地方而天真又毫无准备地着手去干的事。这真的是我的看法，但我当然并不想以此看法阻止你去实践这些计划，也不想贬低这些计划。绝不是这个意思。你的事业要求付出很大的力量，也值得付出大力。可是你感到自己有这种力量吗？

B：不，我不能这么说。我体内感觉得到的是空虚，而没有力量。

我穿过南门驰入城内。有一家大客栈就建在门旁，这就是我打算过夜的地方。我把我的驴骡牵入了畜厩，那里几乎已经塞满了骑坐牲口，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小空地。然后我便爬上诸多阁廊中的一个，打开我的被子，躺下睡觉。

可爱的蛇，你干吗离得那么远，过来，再近一点，行了，就待在那儿。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界限的。你不承认任何界限，我又怎么让你听命呢？那将是个艰巨的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你盘起身来。我说的是盘起来，可你却展开了来。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你显然听不懂。但我说得很明白啊：盘起来！不对，你没有明白。我用棍子指点给你看。你得先盘成一个大的圆圈，然后在里面紧挨着再盘上第二个，如此以往。如果说你现在还仰着小脑袋，那么待会儿你将随着我吹起的笛子的旋律慢慢地垂下去，我停止演奏时，你也就静下来，届时你的脑袋将正好处于最里面那圈。

我被带到我的马那儿。我仍然十分虚弱。我看见了那头干瘦、在生命的高烧中颤抖着的牲口。

“这不是我的马。”当早晨客栈的佣工把一匹马牵到我的面前时，我说。

“您的马是今夜我们的马厩里唯一的一匹。”这个佣工对我微笑着，或者我要说是低头倔犟地冲我微笑着说道。

“不对，”我说，“这不是我的马。”背囊从我的手中掉落到地上，我转过身去，向楼上我那刚离开的房间走去。

第六本八开本笔记

我真应该事先了解一下，这个楼梯是怎么一回事，这里存在着哪些关系，人们在这里将会遇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应付。你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楼梯，我自我安慰道，报纸上和书籍中成天东拉西扯，无所不谈。可是关于这座楼梯却是只字未见。当然，我自言自语道，也有可能你阅读时不够仔细。你经常注意力分散，整段整段地跳过，有时甚至读个标题就完事，也许什么地方提到了这座楼梯，而你正好没读着。而你现在正需要这一段内容。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思索这段反驳的独白。这时我好像想了起来，可能有一次在一本儿童读物中读到过这么一座类似的楼梯。那里似乎没说几句，也许只是提到了它的存在，而这对我是毫无用处的。

当那只在耗子世界比所有其他耗子都更受宠的小耗子一天夜里在看

到一块熏板肉时，陷入捕鼠烙铁之下，以一声尖叫结束了它的生命，周围所有待在自己洞里的耗子全部止不住颤抖战栗起来，它们控制不住地眨着眼睛互相一个一个地扫视下来，尾巴毫无意义地在地面上不停地扫来扫去。然后它们迟疑地，一个推着一个钻了出来，大家都往那死亡地点走去。这只可爱的小耗子就躺在那里，铁块压在后颈上，粉红色的小腿缩了进去，这个本来满可以得到一小块熏板肉的可爱的孱弱躯体僵硬了。父母站在一边，注视着它们孩子的残躯。

一个冬日下午，在发生了许多生意上恼人的事之后，我忽然觉得（每个生意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辰）生出了对生意的反感，以至我决定现在就打烊，尽管冬日的光线还那么亮，现在还是大白天。这种自行其是的决定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年轻的公爵刚刚接掌政府，在通常的大赦之前，先去走访一个监狱。不出人们意料，他的问题中也包括了在这座监狱中待得最长的人。这是一个谋杀了妻子的人，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已经度过了二十三年。公爵想看看他，人们便带他到那个牢房去，为安全起见，今天给这个犯人上了镣铐。

我晚上回到家里时，看到一个很大的，大得异常的蛋。它差不多跟桌子一样高，鼓得圆圆的。它轻轻地来回晃动。我感到很好奇，把它夹在两腿中间，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剖成两半。它已经孕育完成。蛋壳皱巴巴地碎了开来，从里面跳出一只鸟，它像只鹤，还没有羽毛，用它那太短了一些的翅膀拍击着空气。“你到我们的世界里来想要干什么？”我很想问问它，我在它面前蹲了下去，注视着它害怕地眨动着的眼睛。可是它离开了我，沿着墙边跳着，不时扑打着翅膀，好像脚痛似的。“人人互相帮助。”我想道。于是从桌上打开我的晚餐，向那只鸟招招手，它这时正用它的鸟喙捅着我的几本书。它马上就来到了我这儿，显然已经有点习惯了，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开始发着鸣叫声的呼吸嗅我放在它面前的肠块，可是刚刚啄起来，又扔了下去。“我犯了个错误，”我想，“当然了，刚从蛋里蹦出来，怎么能马上就吃肠子呢。这里需要有女人提供经验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想看看是否能从外部看出它想吃什么。“如果它是来自鹤的家族，”我想起来了，“那么它一定会喜欢鱼的。甚至要我去给它弄鱼来我也干。当然不是白干了。我的收入允许我养一只家鸟的。如果我做出这样的牺牲，我就要求它做出同样价值的具有维持生命意义的生活服务。他是一只鹤，那么等它长大了，被我的鱼养肥

了，它就能载我到南国去。我早就想到那儿去旅游了，但由于没有鹤的翅膀我至今只能搁下这个愿望。”我立即取来纸和墨水，把它的鸟喙蘸上墨水，挥喙写道（这整个过程中这只鸟都没有反抗）：“我，像鹤的鸟，在此保证，在你用鱼、青蛙和蚯蚓把我喂养到能飞之时的前提下（后两样东西我是因为想到它们很便宜而加上去的），让你乘坐在我的背上飞往南国。”然后我把鸟喙擦干净，把这张纸又拿到它眼前放了一会儿，才折叠起来，放入皮夹子中。接着，我马上动身去买鱼；这回我不得不付出高价，但那小贩对我说，今后将始终给我准备好价格低廉的臭鱼和足够的蚯蚓。也许南国之行不至于太贵。看到这只鸟那么爱吃我带来的东西，我很高兴。只听它格格响着把鱼吞了下去，填满了浅红色的肚子。日复一日，与人类的孩子没法比，这只鸟很快地生长着。尽管臭鱼那令人无法忍受的味道不再离开我的房间，不断地发现鸟粪并清除掉也不是易事，再说寒冷的冬天和煤的涨价不允许我进行必不可少的通风——可是一旦春天到来，我在轻盈的空气中游向灿烂的南方，那该多美。翅膀长了起来，铺上了羽毛，肌肉开始结实，是开始进行飞行练习的时候了。可惜没有鹤的母亲在场，如果这只鸟不太情愿，我的教授水平肯定是不够的。但它显然看出来了，它必须用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最大的努力来填补我教学水平的不足。我们开始练滑翔了。我跳起来，它就跟在后面，我张开双臂跳下去，它便振动翅膀往下落。后来我们越过桌子，再后来我们越过大棚，可是所有的练习都得有系统地重复很多遍。

折磨之幽灵

折磨之幽灵住在林中，在一个早就无人居住的远古的小屋里。走进进去，只能闻到一股无法逐去的陈腐味，别的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比最小的耗子更小，即使挨得很近也看不见他，这个折磨幽灵就这么缩在一个角落里。什么也发现不了，只能通过空洞的窗孔听见树林平静的歛动声。这里是多么的寂寞，你又怎么会喜欢这里的。你要在那角落里睡觉。为什么不在林子里，那里毕竟还有风的自然流动。大概就因为你既然已经在这里了，一个小屋给了你安全感，尽管门早就从门枢上脱落、腐烂。而你还在空中摸索着，好像想把门关上，然后你便躺了下去。

我终于从桌旁跳了起来，一拳把灯打得粉碎。马上就有个仆人拎着提灯走了进来，弯下腰，为我扶着敞开的门。我冲出房门，跑下楼梯，那仆人紧跟在我后面。下面第二个仆人给我披上了一件皮袄；由于我看上去浑身无力，他又把剩下的一件也给我披上了，还把皮袄的领子给我

竖了起来，把脖子前的扣子给我扣上。这是有必要的，这寒冷真是足以杀死人。我登上正在等待的宽敞的雪橇，用许多被子盖得暖暖的，在清脆的铃声出发了。“弗利德里希。”我听到从角落里传来细语声。“你在这儿，阿尔玛。”我说着把裹在厚厚的手套中的右手伸给她。再说了几句重聚愉快之类的话，我们就都住了口，因为飞快的驰行令人呼吸为之夺。当我们在一家旅店门口停下来时，我在迷迷糊糊中已经忘却了身边女伴的存在。车门前站着店主，他的两边站着我的仆人，大家都伸直了脖子等候我的什么命令。可我只是弯下腰去，喊道：“你们站在这儿干吗，继续走，继续走，这里不停！”我用我在身边找到的一根棍子捅了捅车夫。

第七本八开本笔记

牢不可破的梦

她沿着乡间大路奔跑，我没看着她，我只是感觉到她是怎么在跑动中晃动着，她的纱巾怎样地飞扬，她的脚怎样地抬起，我坐在田野边缘，凝视着小溪中的水。她穿过一个个村庄，孩子们站在门洞里，看着她跑来，又看着她的背影远去。

破碎的梦

以前一个公爵心血来潮地规定，陵墓中必须在石棺旁设一名守卫。有理智的人们曾表达过反对意见，但最后人们感到这位公爵处处受气，便成全了他这件小事。上世纪一场战争中受伤致残的一个鰥夫，三个儿子的父亲要求获得这个岗位。他受到了录用，由一名上了年纪的宫廷官吏陪着到这陵墓中去。一个洗衣妇跟在他们后面，捧着给这守卫用的各种各样东西。尽管这个残疾人拄着拐杖，可一直到笔直通往陵墓的林荫道那儿，他仍能一步不落地跟上宫廷官吏。接下来他就有些不行了，一边轻轻地咳嗽着，一边开始揉起左腿来。“怎么了，弗利德里希？”同洗衣妇一起走在前面的宫廷守卫回过头来看着他问道。“我腿上有点疼，”残疾人苦笑着说，“麻烦稍等一会儿，一般很快就会过去的。”

祖父讲的故事

我在可敬的公爵雷沃五世时代曾经在弗利德里希公园里的陵墓中当过守卫。当然我不是马上就成为陵墓守卫的。我对作为公爵牛奶场听差第一次送牛奶到陵墓守卫那儿去的那段事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个晚上。“好家伙，”我想，“到陵墓守卫那儿去。”有谁知道陵墓是怎么回事吗？我当过陵墓守卫，那么我应该知道，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而你们呢，你们现在在听我讲故事，到最后你们会发现，即使你们认为自己知道陵墓是怎么回事，可是最后不得不承认，你们不再知道了。可当时我根本没有多想，只是为被派到陵墓守卫那儿去而感到自豪。于是我捧着牛奶桶，在雾中穿过通往弗利德里希公园的草地上的路，向陵墓飞奔。在金色的铁栅门前，我拍去衣服上的灰尘，擦了擦靴子，把溅在桶边的牛奶抹去，然后按响了门铃，把额头贴在铁栅门上，紧张地等待着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小丘上的灌木丛中似乎是守卫者的小屋所在，一

道灯光从一扇打了开来的小门中透了出来。在我报了来历并出示奶桶作为证明之后，一位很老的女人把大门打开了。然后，她要我走在前面，可是和她一样慢，那是很不舒服的，因为她始终牢牢地在后面拉着我，而且在这段短短的路上就停了两次，为的是喘喘气。在小丘上房门旁的一张石凳上坐着个巨人般的男人，他搁着腿，两臂交叉在胸前，脑袋往后仰，目光凝注在眼前一片挡住一切视线的灌木丛上。我不由自主地以疑惑的目光看了看老妇人。“这是那个土耳其奴隶，”她说，“你不知道吗？”我摇了摇头，又看了这个男人一遍，尤其是他那高高的羔羊皮帽，接着我被老妇人拉进了屋里。在一个小房间里一张整整齐齐堆着书的桌旁坐着个穿着睡衣、满脸胡子的老先生，他从灯罩的底下注视着我。我当然就以为是走错了路，于是转过身，想要走出这个小房间，可是老妇人挡住了我的去路，她对那位先生说：“新来的送奶小伙子。”“过来，小宝贝。”这位先生笑着说。然后我在他那张桌旁一张小板凳上坐了下来，他把脸凑得离我的脸很近。可惜我由于他们对我好而得意忘形地话多起来。

在阁楼上

孩子们有个秘密。在阁楼上，在一个成年人已经走不过去的堆满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破烂货的很深的角落里，律师的儿子汉斯发现了一个陌生人。他坐在一个竖起来靠在墙边上的木箱上面。当他看到汉斯的时候，他的脸上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惊讶的表情，只有麻木。他以清澈的目光迎着汉斯的目光。一顶用羔羊皮制作的很大的帽子盖住了他的脑袋的很大一部分。一副强有力的一字胡向两边翘出。他身上套着一件褐色的宽大的大衣，用一条特别宽的，让人想起马的套具的皮带束着。腿上佩着一把不长的弯形军刀，刀鞘闪着微弱的光。两脚插在装有马刺的靴子里，一只脚搁在一个倒着的酒瓶上，另一只脚直立着，脚跟和马刺插在木头上。当他慢慢伸出手向汉斯抓来的时候，汉斯喊道：“滚开！”转过头跑向阁楼较新的那部分，跑得远远的，直到晾在那儿的湿衣服碰在他的脸上。然后他却又马上走了回去。那个陌生人带着一点轻蔑噙着下唇坐在那儿，一动也没动。汉斯慢慢地向前走，试探他之所以不动是不是一个阴谋。可是这个陌生人看来真的没有什么恶意，放松地坐在那儿，放松得让人几乎觉察不到他在点头。于是汉斯终于敢把将他和这陌生人隔开的最后一道障碍，一块炉子挡板摊开，走得离他很近，最后甚至敢去碰他。“你身上灰那么大！”他吃惊地说着，赶紧缩回已经弄黑了的手。“是的，都是灰。”那陌生人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发音是那么

怪，以至话音落地之后汉斯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叫汉斯，律师的儿子。你是谁？”“原来这样，”陌生人说，“我也是一个汉斯，我叫汉斯·施拉格，是巴登州的猎人，从涅卡河畔^[39]的阔斯伽腾来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是猎人？你曾打过猎？”“喔，你还是个小孩子，”陌生人说，“你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嘴咧得那么大？”这个毛病也是当律师的父亲给他指出过的，可是对一个说话几乎让人听不懂的猎人来说，在他面前咧大了嘴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种责备由他说出来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在汉斯和他的父亲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在他母亲去世后便激烈地爆发了。汉斯去了国外，偶然碰到一个不起眼的职位，他就心不在焉地接受了下来。他避开了与父亲的一切联系，无论是信件，还是通过熟人，避得是如此成功，以致他通过律师关于指定他为所有遗产继承人的来信，才得知父亲在他离开两年后心脏病发作死去的消息。当邮差从教堂那边走过来时，汉斯正站在他被雇为助手的那家毛巾店的橱窗后面，看着这座乡村小镇雨中的环形广场。邮差把信交给女店主后，转身就走。女店主是个动作笨拙、永远心怀不满的人，她当时正坐在一个高高的软椅上。门帘铃铛的袅袅尾音引起了汉斯的注意，他转过目光，正看见女店主把她那长满汗毛、用黑色的毛巾裹得严严实实的脸凑得离信封很近。在这种情况下，汉斯总是觉得她的舌头马上会耷拉出来，她将不再阅读，而开始像狗一样地舔起信封来。门帘铃铛仍在发出微弱的响声，女店主开口说道：“这里有一封您的信。”“不可能。”汉斯说道，身子都不离开窗口。“您是个古怪的人，汉斯，”这女人说，“这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您的名字。”从信里看，汉斯虽然被规定为唯一的继承人，可是又有那么多的债务和遗赠，他粗粗地估算一下便发现，除了父母的那栋房子外，他将什么也得不到。这可真是不多：一个陈旧的简单的单层建筑物，可是这幢房子对汉斯来说却有着很大的意义，而且，在父亲死后，异乡已没有什么可使他留恋的东西了，再说处理遗产急需他到场。于是他立即辞去了工作，这很简单，然后便踏上了归途。

当汉斯的车子在父母的房子前停下时，是12月的一个夜晚，已经很晚了。等待着他的管家由他的女儿扶着走出门来，这是个孱弱的老人，从汉斯的祖父时起就在这儿效劳了。他们互相致了问候，但并不很热烈，因为这位管家从汉斯小时候起在他的眼里就是个头脑简单的暴君，他接近管家时心里那种卑微的感觉使他十分窝囊。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跟在他后面提着他的行李走在陡峭的楼梯上的管家女儿说，他父亲的收

入将丝毫不受遗赠的影响，一点都不变。管家女儿含着泪表示了感谢，她承认，这样她父亲最担心的事就解决了，为此她父亲在慈悲的老主人死后一直睡不着觉。这声感谢才使汉斯意识到，这笔遗产已经给他带来了多少麻烦，并将继续造成麻烦。这就使他更加对他即将独自待在他那熟悉的小房间而感到事先的高兴，出于这种感觉，他温柔地抚摩了一下在他身边掠过的那只猫，这是他进门后见到的第一个不曾伴有不快的回忆的东西。可现在汉斯没有被带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而他在信里明明白白地要求他们把那房间收拾好的，却被带进了他父亲以前的卧室。他问道，为什么会这样。由于提行李而仍在呼呼直喘的姑娘站在他的面前，在这两年里她长高了，也强壮了，她的目光清澈得令人注目。她请求原谅。她说，在汉斯的房间里现在住着他的叔叔台奥多尔，他们不想打扰这位老先生，再说这间房间更大，也更舒服。——叔叔台奥多尔在这儿的消息对汉斯来说还是个新闻。

第八本八开本笔记

我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信任我的马车夫。当我们来到一道旁边和上面慢慢鼓起的墙边，停下车来，然后沿着墙边行驶，抚摸着这墙壁时，半天没说话的车夫开了口：“这是一个前额。”

我们布下了一张小小的渔网，在海边盖了一栋小屋。

陌生人往往认识我。不久前我在一次短途旅行中，在一个挤满了人的车厢里简直无法提着我的提包挤过去。这时在一个隔间的半阴暗中有个我显然从未见过的人招呼我，并给我腾出一个座位来。

将劳动视为乐事，对心理学家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对过多的心理学感到恶心。如果一个人有着健壮的腿并获准进入心理学领域，那么他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横七竖八随意地走一通，而走得很远很远，这是任何其他领域里都办不到的。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我站在一块荒芜的土地上。为什么我没有被放在一块好一点的土地上，这我就知道了。是因为我不够分量吗？不能这么说。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我有更富有的灌木丛土地上长了出来。

我在下面的叙述中不打算提供数字和统计资料；这个任务还是让犹太剧历史学家去做吧。我的意图非常简单：提供几页对犹太剧的回忆，关于其剧作、其演员、其观众，就像我在10年多的时间中所看到、所学习、所亲身经历的那样。或者换句话说，揭开幕布，展示伤口。只有在认识了毛病之后才能找到药方，也许从而能创造出真正的犹太剧来。

对于住在华沙的我那虔诚的沙西教派的父母来说，戏剧当然是“trefe”^[41]的，只不过是“chaser”^[42]而已。只有在普林节^[43]的时候有戏剧上演。这时堂兄沙斯科尔就在他的黄胡子上粘上一副大黑胡子，把长袖长袍反过来穿，扮演一个快乐的犹太商人——那时我的眼睛简直就粘在他的身上了。在所有堂兄弟中，他是最喜爱的一个，他的榜样使我一直跃跃欲试。刚到8岁，我就在cheder^[44]里像堂兄沙斯科尔那样演起戏来。每当Rebbe^[45]走开，戏剧就开演了，我是团长，导演，总而言之集一切于一身，过后挨Rebbe揍得最厉害的也是我。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Rebbe打了我，而我们每天都想出新的剧作来。整个一年无非就是希望和祈祷：普林节快来，让我再看看堂兄沙斯科尔是怎么化装的。一旦我长大了，我也要像堂兄沙斯科尔那样，在每个普林节上化装，唱歌，跳舞，我下定了决心。

至于人们除了普林节之外也化装，而且还有许多像堂兄沙斯科尔那样的艺术家，那我就丝毫知道了。直到有一天，我才从伊斯鲁艾尔·费尔德谢尔的儿子那儿听说，真的有那样的剧院，人们在那儿表演，唱歌，化了装，而且每天都有，而不是只在普林节，他父亲有一回还带他到剧院里去过。这个新闻对我来说，我当时10岁左右，简直就是电击。一种暗暗的从来没有过的渴望抓攫住了我。我数着我还有多少天能长大，最终能亲眼去看这种戏剧。那时我还不知道，戏剧是一种禁止的和有罪的东西。

很快我便得知，市政厅对面是“大剧院”，那是全华沙，甚至全世界最美的剧院。从那时起，每当我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那外表我便感到目为之夺。可是，当我有一次问家里人，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剧院里去时，他们对我大吼起来：犹太人的孩子绝不能关心戏剧的事；那是不允许的；戏剧是异教徒和罪恶之徒的东西。这个答复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什么都不再问，可是内心里再也平静不下来，我非常担心，我是否已经犯下了这种罪，而且等我长大了以后，我是否会忍不住到剧院里去。

当我在一次Jom Kippur[46]过后的晚上同两个堂兄弟坐车经过大剧院时，剧院街上挤满了人，这时我的眼睛盯在那“不干净的”剧院上再也挪不开了。堂兄马吉尔便问我：“你是不是也想到那上面去？”我没吭声。也许他不喜欢我的沉默，于是又补充道：“现在，小家伙，那里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上天保佑！在Jom Kippur后的晚上即使是最坏的犹太人也不到剧院去。”从他的话里我听出的却是，虽然在神圣的Jom Kippur之后没有犹太人到剧院里去，可是在全年平常的夜晚肯定就有许多犹太人到那儿去。

在我的14年生涯中我是第一次到大剧院里去。尽管我对那个国家的语言所学甚少，可是我还是能够读懂广告，有一天我在广告牌上读到，当时在上演胡格诺教徒的故事。关于胡格诺教派，在“Klaus”里人们也提到过，而且剧作者也是个叫“麦耳·贝尔”的犹太人。于是我自己批准了自己，买了一张票，在那天晚上便生平第一次进入了剧院。

至于我那次看到了什么，感觉如何，不在这里叙述的范围之内，只有一点得说一下：我确切地认识到，那儿的人唱得比堂兄沙斯克好，化妆得也比他美得多。还有一件令我惊讶的事：胡格诺教徒的芭蕾音乐是我早就熟悉的，人们星期五晚上在“Klaus”中不就是就着这些曲子唱 Lecho Dodi的吗？我当时无法对自己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在大剧院里上演在“Klaus”里已经唱了那么久的东西。

从那时起我成了歌剧院里的常客。只不过我不能忘记，每一次演出前要去买一个假领子和一副袖口，回家路上便扔到垃圾桶里去。这些东西不能让我的父母看见。当我享受着《威廉·退尔》和《阿依达》时，我的父母毫不怀疑地相信我正坐在“Klaus”中，面对大开本的犹太圣典，研读着这神圣的读物。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得知，也有一个犹太剧院。尽管我很想去，我却没有这个胆量，因为那很快就會在父母面前暴露的。但到大剧院去看歌剧却是常事，后来我也去波兰话剧剧院。在后者我第一次看到了《强盗》。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在没有歌声和音乐的情况下，竟然也能演出那么美的戏剧来，这我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奇怪的是我对弗兰茨并没有坏印象，我很想能演他的角色，而不是卡尔那个角色。

在“Klaus”的同学中我是唯一敢到剧院去的。除此之外，我们这些“Klaus”的男孩子用所有“开明的”书喂饱了自己，那时我首次读了莎士

比亚、席勒、拜伦勋爵。伊地绪语文学作品我则只能得到那些来自美国的半德语、半伊地绪语的伟大的侦探小说。

过了没多久，由于我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华沙有一家犹太剧院，难道我就不去看吗？我决定冒此风险，用所有积蓄买了票，于是我踏入了犹太剧院。

这一经历整个地改变了我。还在演出开始前我已经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那种”的感觉。尤其是没有穿燕尾服的先生们，没有穿敞胸服装的女士们，没有波兰语，没有俄语，只有各种各样的犹太人，身着长装的，身着短衣的，夫人和姑娘们，全是平民打扮。人们大声地、无拘无束地说着母语，穿着小长袍的我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毫无羞愧感。

那天演出的是一个六场十幕滑稽剧，有唱有跳，剧名叫《来自舒莫尔的Baal-Tschuwa》，不像在波兰剧院中那样8点准时开演，而是在10点后才开始，结束时已是半夜过后。恋人和阴谋家说着“标准德语”，而非常惊讶，像我这样对德语一窍不通的人竟然能够那么出色地听懂标准的德语。只有滑稽演员和女高音演员说的是伊地绪语。

总的来说，我对这种戏的满意程度比歌剧、话剧和轻歌剧加起来还多。因为，第一，这毕竟是伊地绪语，虽然是德语—伊地绪语，但总是伊地绪语，而且是一种比日常生活中更好、更美的伊地绪语；第二，这里什么都有了：戏剧，悲剧，歌唱，喜剧，舞蹈，一切全凑在了一起，真正的生活！由于激动，我通宵不曾入眠，我的心对我说，有一天我要在犹太艺术的殿堂中服务，我要成为一名犹太演员。

可是第二天下午父亲把所有孩子都赶到隔壁房间里去，只让妈妈和我留下。我直觉地认识到，这里正在酝酿一场针对我的“Kasche”。父亲不再坐下来，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手捏着黑胡子，不对我说话，而只对母亲说：“应该让你知道，他一天比一天坏了，昨天有人在犹太剧院里看到了他。”母亲惊慌失措地捏着双手，父亲的脸色特别苍白，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的心抽紧了，像个被判刑的人似地坐在那儿，忠实虔诚的父母这种痛苦的模样使我非常难受。今天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我说了什么，我只记得，在过了令人窒息的几分钟后，父亲把他那黑色的大眼睛投在我的脸上，说道：“孩子，记住，这会把您引得很远，很远。”他说得没错。

酒店里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人了。老板想要打烊，请我付钱。“那里还坐着一个人呢。”我没好气地说。因为我知道是该走的时候了，可是我没有兴趣离开，或者说，没兴趣到任何地方去。“这就难了，”老板说，“我跟那人说的话互相不懂。您能帮助我吗？”“哈¹罗。”我通过空握的双手之间喊道，可是那人一动不动，仍然静静地从一边斜睨着他的啤酒杯。

当我按响门铃时，已是深夜时分。过了很久，看门人，显然从庭院的深处，才走了过来，打开了门。

“先生有请。”仆人弯着腰说道，毫无声音地一把拉开了高大的玻璃门。伯爵以半似飞翔的步子从他靠着打开着的窗口的写字台那儿向我跑来。我们四目相对，伯爵呆板的目光使我感到陌生。

我在一堵墙前面躺在地上，痛得打滚，恨不得钻进潮湿的地底下。一个猎人站在我面前，一只脚轻轻地踏着我的骶骨。“一头强壮的家伙。”他对赶牲口者说道。后者剪开了我的领子和上衣，摸摸我的身躯。对我已经厌倦，而又在寻找新的刺激的猎犬们毫无意义地向墙上扑去。马车来了，我的手和腿都被捆了起来，扔到了后座上那位先生的身边，以至我的头和胳膊都搁在了车的外面。车行走得十分顺畅，口干舌燥的我张着嘴吸入扬起的尘土，不时感觉到那位先生愉快地在我的小腿肚上抓一把。

我肩上负担着什么？什么样的幽灵悬在我的四周？

那是个暴风雨之夜，我看见一个小魔鬼从灌木丛中爬出来。

门碰上了，我与他四目相对。

灯炸了开来，一个陌生人提着一盏新的灯走了进来，我站了起来，全家都跟着我站了起来，我们向他问候，可他根本没有注意。

强盗把我捆了起来，我就躺在首领的火堆旁。

荒凉的原野，荒凉的地面，雾后月亮那苍白的绿。

他离开了这座房子，来到了街上，一匹马在等候着他，一个仆人扶着马蹬，马蹄声在荒芜中回响。

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

在同学中我是笨的，但不是最笨的。有些老师经常对我父母和我说的却是后一点，但他们这么说仅仅是出自许多人的狂想，这些人认为要是敢于做出如此极端的判断，他们便占有了半个世界。

但人们普遍地真的认为我是笨的，他们拿得出有力的证据。假如有一个陌生人一开始对我印象不坏，并把这种印象告诉别人的话，那么他就会从人家向他提供的这种证据中得到教训。

为此我经常生气，有时也哭泣。这是我当时在时代的潮流中感到不安和对未来的潮流感到失望的唯一时刻。当然不安和失望那时只是理论上的，只要投入一项工作，我的心就安稳了，失望就消失了，简直像一个从幕后奔上舞台的演员，在离舞台中心很远的地方停顿了片刻，双手（比如说）放在额前，而这时激情（这马上就会成为必要的）在他心中不断高涨起来，尽管他眯着眼睛咬破嘴唇，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激情。半消半留的不安感推起了正在上升的激情，激情又增强着不安感。一种新的不安不可遏制地形成了，包围了二者，也包围了我们。所以跟陌生人认识使我感到厌烦。只要有些人沿着鼻梁那样看着我，就好像从一个小屋子里用望远镜眺望大海，或甚至是眺望群山和空荡荡的天空那样，我就会不安起来。那时会出现可笑的论断，统计学上的谎言，地理上的牛头不对马嘴，既禁止又荒唐的错误学说，或者聪明的政治观点，对现实事件的值得注意的看法，几乎使说话者和听众同样惊讶的值得称道的奇想，而一切由目光、由抓住桌缘的动作或者忽然从沙发中跳起来的行为得到证实。一旦开始这样的场面，他们便停止了长时间地、严厉地看着我们的举动。因为出于他们自己的习惯姿势，他们的上身不是向前就是向后弯曲。有些人忘了顾及自己的服装（或者腿部在膝盖处折成两段，全靠脚尖来支撑身体的重量，或者全力把上衣皱巴巴地压在胸口），其他人则没有忘记保持服装的整齐，许多人的手指紧紧抓着一个夹鼻眼镜，一把扇子，一支铅笔，一个长柄眼镜，一支香烟，而大多数人，即使他们有着坚实的皮肤，却止不住脸上冒出汗来。他们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滑落，就像一只举起的胳膊又放了下去一样。

于是我被遗忘在我的自然状态之中，我可以选择待在这儿，听他们聊天，或是离开这里，躺到床上去，后者总是使我高兴的，因为，由于

我是害羞的，所以老是犯困。这时就像舞会中间的一次长时间休息，这时只有很少的人决定离去，大多数人在四面八方站着或坐着，而乐手们，此时没人想到他们的存在，在某个地方养精蓄锐，以准备继续演奏。只不过这里并不是那样安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发觉了现在是休息时间，因为在大厅里同时举办着好几个舞会。我能走吗？如果这时有个人由于我，由于一个回忆，由于其他许多事，从根本上说由于关于我的一切而激动起来，哪怕只是轻微的激动，而从一开始就把这激动表现得那么激烈，或许是与一个故事相连接，或许是在一个爱国思想激励下，那我该怎么办呢？他的眼睛，甚至他那在衣服笼罩中的全身为此而昏暗下来，谈话为此而中断……〔此处缺2页〕

通过这一切我感觉到心中的畏惧，对一位先生的畏惧，我曾把手毫无感觉地伸给他，要不是一个也许是他朋友的人叫了他的名，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姓名。最后，我几小时之久与他面对面地坐着，绝对平静，只是有点疲乏，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尽管他的目光很少有只对着我看的时候。

不妨设想一下这个情景，有几次我的目光迎着他的目光，无所事事的我（谁也没有想过我会有什么可干的）试图较长时间地注视他那好看的蓝色的眼睛，除非……这样便在精神上离开了这个聚会。如果这一尝试不能成功，那么它与尝试本身一样，什么也说明不了。没错，我没能成功，一开始我就表现了我的无能为力，以后也一刻都无法掩饰。当然，一个笨拙的滑冰者不也是这样吗，他的两只脚各想奔向一个方向，而双脚都想离开冰面。如果有个能干的……（缺）而一个聪明人，可他既不是走在这一百个人的前面，也不是在旁边或后面，以致人们一眼就能发现他，而是走在这些人的中间，以致人们只有从一个高处才能看到他，即使那样，人们看见的也只是他如何溜掉。我的父亲就是这么评价我的。他是在我的祖国的政界中很有声望、很有成就的一个人物。我是偶然听到这个评语的，那时我好像是17岁，当时正坐在敞着门的房间里阅读我的印第安人手册。这些话在那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记住了它，但它没给我留下丝毫印象。大多数情况就是如此，一般的评价对年轻人自己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无论他们是始终不曾离开过自己的心理地界，或者是被抛回到了自己的心理地界之中，他们总感到他们的实质是响亮而强壮的，就像军团音乐那样。他们感到，这一般的评语有着他们所不知道的前提和意图，以致从任何方面都是无法深究的；就像是散步者在一个岛上的一个池塘中间，那儿既没有船也没有桥，他听到了音

乐，可是人们听不到他的呼声。

在此我并不是想要攻击年轻人的逻辑……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就我所知，人们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在努力消除人的独特性。这样会减轻教育工作的负担，但也会减轻孩子们生活的分量。当然在这之前，孩子们还得被迫经历痛苦，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晚上正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小说时，一种单单针对他的训诫不可能使他明白他必须中断读书去睡觉的道理。假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说，时间太晚了，眼睛会看坏的，明天早晨会睡过头，很晚也起不来的，这个蠢故事是不值得这么读的。这样我虽然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我之所以不表示反对，也仅仅是因为这一切训诫连值得考虑的边儿都没有达到。因为一切都是无限的，或者是不确定的，所以也等于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不存在太晚的问题；我的视力是无限的，因此不会看坏；甚至夜也是无限的，因此不必担心早上起床的问题；而我对书不是根据蠢或者聪明来区分的，而是根据它是不是吸引我，而这一本是吸引我的。当然我那时不会这么说，结果是：我讨厌去请求允许我继续读下去，而决定在不允许的情况下我行我素。这是我的独特性。人们用关掉煤气灯而让我待在黑暗中的举动压制了我的独特性；人们解释说：大家都睡了，所以你也必须睡觉去。看到这情况，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尽管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谁都不像孩子们有那么多改革的愿望。尽管这种压制从某些方面看并不算错，但这事像其他任何类似的情况一样，化成了激励的力量，强调这种情况的普遍性不可能磨钝这力量。从而我相信，正是在那个晚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读书了。当时，对我来说用所谓普遍现象的说法并不能驳倒这一点。当我看到人们不相信我对读书具有不可克服的欲望时，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只是渐渐地，在很久以后，也许已经在这欲望减弱了的时候，我才认为，许多人也曾有过同样的读书欲，但都被自己克服了。不过当时我只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悲伤地去睡觉，憎恨开始滋长起来。这憎恨决定了我在家庭中的生活，从某一方面讲，它从此成了我一生的基调。这禁止读书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其影响是很深的。人们不承认我的独特性，但由于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十分敏感和警惕，于是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最后的判决。既然人们对我这种外露的独特性都做了判决，那么我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的命运就更糟糕了，我掩藏着它们，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到其中有些微

不合理之处。比如我有时没有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晚上就读起书来了。这作为对义务的耽误来看恐怕是很不好的，但不应就此对我做出绝对性的评判，而应作有分析的评判。作有分析的批评时应该看到，这种忽视义务并不比长时间的阅读糟糕，特别是由于我对学校和对权威的畏惧使这种忽视义务的行动本身大受限制。由于读书而没有准备的某些作业，第二天一早或者在学校里我会利用当时很好的记忆力很快补上的。问题是，我长时间读书的独特性所遭到的判决，现在通过我自己的手段延伸到那掩藏着的忽视义务的独特性上去了，结果使我的心情压抑不堪。那情形就好像某个人用一根鞭子打人，但不把人打痛，只是碰一碰以示警告，而他自己却把鞭子解开，把一个个尖头对准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刺进其内心并搅动，而那只陌生的手还一直静静地握着鞭柄。如果说，即便在那时我还没有这么厉害地惩罚过自己，那么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从我的独特性中从来没有引出那种真实的好处：最后能具备持续的自信心。显示独特性的后果反而是：要么我恨压制者，要么我把这独特性视为乌有。这两种后果从自欺欺人的角度看也联系得起来。但是我如果那时只掩藏着一种独特性，那么后果是：我恨我自己或者恨我的命运，把我自己看成坏种或者可诅咒的人。这两类独特性的关系多年来表面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越走近为我敞开的生活之门，那些外露的独特性就越增加。但这并没有使我得到解脱，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人们是永远不可能坦白一切的。甚至往昔那些看上去似乎彻底坦白出来的事情，后来也显示出还有根子留在内心深处。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的松懈整个心灵结构的行动中，只要出现一种暗藏的独特性就足以深深地震撼我，使我到处都抓不住可以靠一靠的东西，使一切适应环境的努力付诸东流。即使我什么秘密也不保留，把一切都抛得远远的，从而得以干净清爽地立于世间，过去的混乱也马上会重新回到我的胸中，塞满我的心胸。因为照我的看法，那些秘密不然不能完全被认识清楚，被正确地评价，因而通过普遍化的方式又回到我的身上来，重新占据我的心灵。这不是错觉，而只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至少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它。比如说，有一个人向他的朋友承认说，他是吝啬的，那么他在此刻，在这个他寄托了评判权的朋友面前似乎就从吝啬中解脱了出来。此刻这朋友将采取什么态度也是无所谓的，不管他否认这种吝啬的存在也好，或者建议怎么摆脱吝啬也好，或者甚至为吝啬辩护也好。甚至即使这朋友由于他这一坦白而宣布结束与他的友谊，也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倒是，这人也许并不是作为悔过者，但作为诚实的罪

人向公众说出了他的秘密，并希望通过此举能重新夺回那美好的和——这是最重要的——自由的童年时代。但他夺得的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愚蠢和以后长期的痛苦。因为在这吝啬人和朋友之间，在桌子上的某个地方放着钱，这吝啬人必须把钱搂过来，而且伸出手去的动作越来越快，在半道上那坦白的作用固然越来越弱，但还不失为一种解脱；在半道以后就不然了，情况就反过来了，那坦白就仅仅照亮着那只向前伸动着的手。坦白的作用只有在行动前或行动后才可能是有效的。行动本身不允许任何东西与它并存，对于那只正在搂钱的手是没有言语或悔过可以解脱的。要么必须把这行动，即把那只手消灭掉，要么必须处在吝啬之中……

强调独特性——绝望。

我从未听说常规是什么。

恶成半圆形地包围着你，就像眉毛围着眼睛那样，使你安歇下来。在你睡眠的时候，它则在你的上方守护着，但丝毫也不可向你靠近。

做出判断的思想饱受痛苦的折磨，在加强痛苦和一无所助的情况下上升。就好像是在终于将烧成灰烬的房子里，建筑学上的基本问题才首次提了出来。

死亡我是可以做到的，忍受痛苦却做不到；通过逃避痛苦的尝试我反而明显地加强了它；我可以顺从于死亡，却不能顺从于痛苦，我缺乏这种心灵运动，就像是一切都装好了，把已经系紧了的皮带痛苦地又一次系紧，而车却不启动。最糟糕的，就是这非致命的痛苦。

追求水平线，我说：“事情并不那么坏，大家都是这样的。”这却使事情更糟。

这是我所受教育的必然错误，我不知道此外我还能怎么做。

也许，追求水平线是正确的，可是这样深入的具体化却使一切生活可能性化为乌有。

有许多人在等待。一个在黑夜中无法看到尽头的人群。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显然要提出某些特定的要求。我将倾听他们的要求，然后做出回答。可是我不到外面平台上去；而且即使想去，我也根本做不到。在

冬天，平台的门是锁上的，钥匙又不在身边。可是窗前我也不去。我不想看任何人，不想让任何景象搅乱我的思维，我就坐在写字台边，这就是我的位置，把脑袋埋在双手之中，这就是我的姿势。

住房中有一扇门我至今没有注意到。它开在卧室中与邻房相连接的那道墙上。我从来没有为它动过脑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实际上它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虽然它的下半部被床挡住了，可它远远高出床，几乎高出一扇门，甚至一扇大门的高度。昨天它被打开了。当时我正在餐室里，与卧室间还隔着一个房间。因为去吃午饭的时间比平时晚了许多，屋里已经没人了，只有女佣人还在厨房干活。这时从卧室那儿传来了那噪音，我赶紧跑过去，正看见那扇门被慢慢地打了开来，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床推向一边。我喊道：“谁？想干什么？当心！注意！”期待这一队强壮的男人涌将进来。可是进来的只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门缝刚够他通过，他就钻了进来，友好地向我问候。

闻所未闻，闻所未闻。

每天夜里，当我从塔那儿沿着水边走来时，你知道那柔韧而昏暗的水的身躯在提灯的光下是怎样缓慢地蠕动的吗？那就像是我提着灯在一个睡着的人上方从头到脚照一遍，他仅仅由于光照在身上而伸展和转动身躯，却并不醒来。

午夜时分总可以在河边碰到我，要不就是夜班，我正朝监狱走去，要不就是日班，我正在回家路上。这个机会被利用了一次。那天，我在工作得筋疲力尽后，怀着对B，一个同事的无法忍受的、简直令我窒息的愤怒回家去，这是由于工作中的一个事件，这事我以后还会说到的。我转过身去，看了看监狱塔楼上那溢出灯光的小窗，B现在正坐在那窗后吃晚餐，我仿佛看见他两腿间夹着罗姆酒瓶，有一瞬间我感到看见他就在我面前大模大样地坐着，没错，我都闻到了他的气味，但我终于吐了口唾沫，继续走我的路。

河中传来一个响亮的呼声。

我的妹妹对我保守着一个秘密。她有一本小年历，这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我才得到的，因为我认识那位给了我们每个人这么一本年历的先生，给我的时间比她早多了，为了我的缘故他才把年历带来了。她把她的秘密写在了、或者夹在了这本年历中，又把年历锁在了

她那可上锁的笔盒里，而钥匙.....

有人拽了拽我的衣服，可我把他给甩开了。

没完没了。

在一个招魂会议上，有个新的幽灵来报到，下面就是与他的一段对话：

幽灵：对不起。

发言人：你是谁？

幽灵：对不起。

发言人：你要干什么？

幽灵：离开。

发言人：可你还刚到这儿。

幽灵：这是个误会。

发言人：不，这不是误会。你来了，就留在这里。

幽灵：我忽然不舒服了。

发言人：很厉害吗？

幽灵：很厉害。

发言人：身体上？

幽灵：身体上？

发言人：你用问题来回答问题，这是不对的。我们有惩罚你的办法，好好答话吧，要不然我们马上就开除你。

幽灵：马上吗？

发言人：马上。

幽灵：一分钟后？

发言人：别装得这么可怜。我们将开除你，如果我们……

那是乡间一个傍晚。我坐在我的阁楼里关着的窗后注视着那个牧牛人。他站在刚割过草的田野上，嘴里叼着烟锅，手杖插在地里，好像对在近处远处深沉的寂静中平静地吃着草的牲口漠不关心似的。这时响起了敲打窗户的声音，我从沉醉中惊醒，镇静了一下，大声说：“没什么，是风在撼动窗户。”当敲打声再次响起时，我说：“我知道，那只不过是风。”但在第三次敲打时响起了一个请求放他进来的声音。“那确实只是风。”我说着拿来放在箱子上的灯，点燃了它，把窗帘也放了下来。这时整个窗子开始颤抖，一种卑屈的、无言的哀求。

你在抱怨什么，孤独的灵魂？为何你振翅围着生命的屋子飞翔？为什么你不向属于你的远方张望，却在这儿为了你陌生的东西奋斗？宁可要屋顶上活的鸽子，而不要在手中挣扎着的半死的麻雀。

高尚的梦，把你的大衣披在这孩子身上吧。

来了两个士兵，抓住了我。我挣扎着，可他们抓得很紧。他们把我押到他们的主人那儿，那是个军官。他的制服是多么的花！我说：“你们想要干什么？我是个老百姓。”那军官微笑着说：“你是个老百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抓你。军队拥有对一切的权力。”

对杂耍的评价。

在杂耍生产的领域内即使仅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做出哪怕是接近于正确的评价也是非常困难的。有着长时间生活经验的最好的专家都在这方面失败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铁血国王的经历。

观景台下的斜坡。

看，他是怎么走路的，这位大衣在身后甩出长折的先生，手里拿着个公文包，脑袋上没戴帽子，眼镜的金丝挂在耳朵上，在这阳光灿烂的上午，在这五月一日，走在绿阴中陡峭的路上。

鲤鱼巷。

这个容貌丑陋的年轻人在晚上，一个人，一个粗线条的、强壮的、

有反抗性的天性。

两位老先生在鲁道菲奴姆，平静的、长长的、有光彩的故事，女人们跟在后面。

1916年8月20日。这蠢事又突然跃到了我的身上，每当对我的健康状况的信任有所增加时，这种情况总会发生，前天拜访慕尔斯坦因博士之后的情况就是如此。

保持纯洁

老单身

我保持纯洁

我凝聚着我的所有力量

只对我自己负有责任

没有忧虑。集中精力工作。

结了婚

丈夫

纯洁吗？

你脱离了一切联系，变成一个傻瓜，任意飞往任何方向，其实根本就动弹不了，我从人的生命的血液循环中抓取一切我所能触及的力量。

于是更执著于自身的愚昧（格

利尔帕策、福楼拜）。

由于我的力量增长，我能承担的也增加了。这里有一定的实情。

猎人的小屋离伐木工人的小屋不远。12个伐木工人住在那儿，由于现在雪很厚，他们正在准备将伐下的木材在白天用雪橇滑到山谷里去。工作量很大，可是只要给他们足够的啤酒喝，这些伐木工人就不觉得工作太多。但他们只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啤酒桶，而这些啤酒要他们在一星期里匀着喝，这是不可能的。每当猎人晚上到他们这里来时，他们就向他诉苦。“你们确实很困难。”猎人说。他们的诉苦使他深感情同。

猎人的小屋孤孤单单地立于山林中。他和他的5条狗在那儿度过冬

天。可是这个国度中的冬天是多么漫长啊！差不多可以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冬天度过的。

这个猎人心情很好，他不缺任何重要的东西，无须为缺这少那抱怨，他甚至认为自己的装备太富裕了。“假如有个猎人到我这儿来，”他想，“假如他看到我的设施和储备，他就会结束打猎生涯。可是这儿的生活难道不也是一种结束吗？这儿没有猎人。”

他向他的狗走去，它们在角落里睡觉，下面铺着毯子，上面盖着毯子。这是猎犬的睡眠。它们并没有睡，它们等待着去打猎。只不过看上去它们像是在睡而已。

彼得有个未婚妻住在邻村。一天晚上他去找她，有许多事要商量，因为过一个礼拜就要举行婚礼了。商谈进行得很成功，一切都如他所愿地得到了安排。将近10点时，他嘴里叼着烟袋，心满意足地回家去。对这条他十分熟悉的路他根本没在意。忽然，他在一片小树林里吓了一跳，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看见了两只闪着金光的眼睛，一个声音说道：“我是狼。”“你想要干什么？”彼得说，由于紧张，他张开胳膊站着，一只手攥着烟斗，另一只手攥着手杖。“要你，”狼说，“我找吃的找了一整天了。”“求求你，狼，”彼得说，“今天放过我吧，过一个礼拜就是我的婚礼，让我经历这一天吧。”“这可亏了，”狼说，“等待能给我什么好处呢？”“过后你可以吃我们俩，我和我的妻子。”彼得说。“婚礼前又有什么呢？”狼说，“在那之前我可也不能饿肚子啊。现在我已经对饥饿感到厌恶了，如果我不能马上得到什么，即使不情愿，我现在也得吃了你。”“求你了，”彼得说，“跟我来，我住得不远，这个礼拜我将拿兔子喂你。”“我至少还得得到一头羊。”“好的，一头羊”还有5只鸡。”

城门前没有人，门拱下也没有人。我踏着扫得干干净净的石子路走过去。透过城墙上的一个方孔可以看到守门人小房间里面的情景。里面没有人。这虽然很奇怪，可是对我有好处，因为我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我所有的财产就是一件皮上装和一根手杖。

我今天在船长的船舱里跟他谈了话。我抱怨我的同船游客。我说，这根本就不能是客船，同船的游客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最坏的流氓。我的妻子几乎不敢走出她的船舱，但即使在紧锁着的门后她仍然感到不安全，我只能待在她身边。

树林里开始了一场赛跑。那儿挤满了动物。我试着整顿秩序。

夜晚已经降临，它那清凉的呼吸向我们迎面扑来，它的清凉令人精神爽朗，它的迟暮却又令人疲倦。我们在古老的塔边一个板凳上坐了下来。“全都是白费力气，”你说，“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松口气的时候了，而这里正是合适的地方。”

她在睡着。我不叫醒她。为什么你不叫醒她？这是我的不幸和我的幸运。我不幸的是，我不能叫醒她，我的脚不能踩上她的房屋那滚烫的门槛，我不认识到她家去的路，我不知道那条路所在的方向，我离她越来越远，无力地像一片叶子被秋风吹离它的树，再说，我从来没有在那棵树上待过，是秋风中的一片叶子不错，但不来自任何树。——我是幸运的，我没有叫醒她。如果她从铺位上站起来，如果我从铺位上站起来，像一头狮子从它的铺位上站起来，而我的吼叫闯进我自己战战兢兢的耳朵里，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向我在公路上碰到的一位漫步者询问，是否在这7个海后面是7个沙漠，在7个沙漠后面是7座大山，而城堡就在那第七座山上……

攀登。瑟奈^[47]。那是一只小松鼠，那是一只小松鼠，一只粗野的一口能咬开核桃的家伙，一个跳跃者，攀登者，它那浓密的大尾巴在树林里是出了名的了。这只松鼠，这只松鼠永远在旅行，永远在寻觅，它不能谈一谈它的经历，不是因为它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它一点时间都没有。

一个院落保卫战即景

这是一道很普通的、密丝合缝的木栅栏，还不到一人高。后面站着三个男人，人们可以看到他们那从栅栏上方露出的脸，中间那人最高大，另外两个人比他矮了不止一个头，紧紧地挨着他，这是一个战斗小组。这三个男人保卫着这道栅栏，或不如说是保卫着由这个栅栏围起来的整个大院。还有其他男人在场，但他们并不直接参加防卫。有一个坐在院子中间的一张小桌子旁边；由于天热，他脱下了上身的军服，搭在椅背上。他面前有一些小纸条，他在那上面以又大又宽、花费很多墨水的字体书写着。他不时抬眼看一下用图钉固定在前面桌缘上的一张小图，这是这个院子的一个平面图，这个男人，他就是指挥官，正根据这张图来布置防卫。有时他欠起身来，看看那三个保卫者和栅栏外空旷的

原野。凡是能看见的景象，他也便归入他的防卫安排中去。他的工作速度很急很快，这正是这紧张的形势所要求的。一个光着脚的小伙子在一边玩着沙堆，写完了一些，指挥官叫他，他就把那些纸条送走。每一回指挥官总是先用军服把他那被湿沙弄脏了的手擦干净，然后才把小条子交给他。把沙弄湿的水是从一个圆木桶中溅出来的，一个男人在这木桶中洗着军衣，他还拴了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栅栏上，一头系在一棵孤零零地立在院子中央的细弱的菩提树上。洗完的衣服就挂在这根绳子上晾干。现在指挥官把他那浸透了汗水，已经粘在身上的衬衣忽然从头顶上脱了出来，简短地喊了一声便扔给了这个站在圆木桶边的男人，这人便从绳子上拿下一件已经干了的衬衣递给他的上司。离木桶不远的树阴下，一个年轻人在椅子上晃悠着，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眼睛茫然地看着天空和飞翔的鸟，边练习用军号吹奏军队的信号。这比其他一切都更有必要，可是有时指挥官受不了了，他就头也不抬地挥挥手，要那吹军号的停下来。当这动作不起作用时，他才转过身去，冲着他吼叫，然后院子里便恢复了片刻的安静，直到这个军号手重新开始，只是试试音，轻轻地吹起来，吹顺了，这军号声又渐渐恢复到了原来的音量。山墙上的窗户里，窗帘已经放了下来，这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因为房子这一面所有的窗户都以种种方式遮盖了起来，这是为了不让敌人看见里面的景象和防止敌人的攻击。可是在这道窗帘后面趴着承租人的女儿，她悄悄地俯瞰着号手，军号声使她如此着迷，以致她有时闭上眼睛，手放在胸口，陶醉在号声之中。本来她的任务是在后房的大房间里监督丫头们拉亚麻线的工作，可是传到那里的号声已经很微弱，不能使她满足，只能不断地唤起她的渴望，她再也忍不住，便悄悄地穿过这空荡荡的沉闷的房子，溜到了这个楼顶房间里。有时她把身子探出去一点，看看她的父亲是否还坐在那里干活，还是已经去后面检查雇工们的工作了，如果是那样，那么她也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没有，他还坐在房门前的石阶上，吧吧地吸着他的烟斗，削着木瓦，一大堆完工的和半完工的木瓦以及原料堆放在他四周。可惜这栋房子和房顶将受到战斗的破坏，所以必须未雨绸缪。房门边上的那个窗户被木板钉得严严实实，从那里透出烟和嘈杂声，那是厨房的所在，承租人的妻子刚和军厨们一起做完了午饭。那个大灶不够用，于是又支了两个锅炉。但现在发现，就这样也还是不够用：在这位指挥官心中，喂饱这支队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于是决定，再加上第三个锅炉。由于它有点损坏，所以现在正由一个人在房子冲花园的那边焊接这个锅炉。他本想在房前干这个活，可是指挥官受不了铁锤敲打的声音，所以不得不又把这大家伙

滚到后面去。厨师们急不可耐，不断派人去看这锅炉是否已经修补好，可是它总是没好，还传话说，今天午饭是无论如何都别想指望它了，只能将就一下。午饭首先给指挥官端了去。尽管他多次，而且十分严肃地吩咐，不得给他开小灶，可是主妇仍然无法下决心就给他上和其他人一样的伙食，她也不信任其他人的服务，自己穿上了一条白色的围裙，把盛着浓汁鸡汤的盘子放在一个银托盘上，送到院子里指挥官那儿去，因为不能指望他中断工作，到房子里来吃饭。当他看见女主人亲自送饭来，立刻非常礼貌地站了起来，却不得不对她说，他没有时间吃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平静的心情。女主人微垂着头，仰视的眼睛里饱含泪花，请求他，终于使指挥官——他还一直站在那儿——微笑着从始终还端在女主人手中的盘子里舀了满满一勺子汤。这也就做到了极度的有礼，指挥官弯了弯腰，又坐下工作起来，他确实几乎没有发现，女主人还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叹着气回到厨房里去。但是士兵们的胃口可就大不一样了。厨房窗户的缝隙里刚露出厨师那张满脸大胡子的脸，吹出一个表示午饭开始发放的口哨，四面八方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活跃得超出了令指挥官高兴的程度。两个士兵从一个木棚里拽出了一辆手推车，这辆车其实就是由一个大桶组成的，从厨房的缝里，汤被哗哗地灌入这个大桶，这是准备给那些不能离开岗位的人送去的。小车首先推到了栅栏边的防守者那儿，即使没有指挥官用手指做出的信号，人们也会这么做的，因为现在这三个人处于面对敌人的最前线，这一点任何人都懂得尊重，也许比指挥官还更懂得这一点。可是指挥官关心的是加快给他们发放午饭的速度，尽可能缩短吃饭造成的防守工作中断的时间，因为他看到，这三个平时堪称楷模的士兵现在关注得更多的不是栅栏外的空场，而是院子里和那辆小车。他们很快就从小车中得到了他们的伙食，然后小车沿着栅栏推去，因为在栅栏边每隔20步便蹲着三个士兵，他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像那第一批三个人一样，站起来，出现在敌人的面前。这时在厨房的缝前，后备的士兵们排起了长队，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盘子。号手也走了过来，令现在正回到丫头们那儿去的承租人女儿失望，从椅子底下抽出了盘子，而把军号塞进了椅子底下。菩提树树梢上发出了沙沙的动静，因为那里坐着一个士兵，他的任务是通过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尽管他的工作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但他至少暂时被拉汤车的给忘了。更使他痛苦的是，一些士兵，那些什么也不用干的后备人员，为了更好地享受午餐，纷纷在树干旁坐了下来，而汤的蒸汽和香味直扑他的鼻子。叫喊他可不敢，为了引起注意，他在树杈中间发出动静，多次把望远镜从树叶中往下敲打。全是白费劲。他属于小车供应

的对象，所以只能等小车一圈转完后到他这里来。这段时间当然是很长的，因为这个院子很大，每三个人一组的共有40个岗位需要供应，当这辆车由筋疲力尽的士兵终于拉到菩提树下来时，桶里剩下的已经很少，尤其是肉块几乎都光了。剩下的这些这个侦察兵当然也愿意接受，可是在下面的人用一根带钩的棍子把盘子递给他后，他的脚却从树干上滑了一下，正好踩在为他效劳的那人脸上，这就是他表示感谢。不难理解，这人气愤万状，让他的伙伴把他托上树去。一眨眼他就上了树，于是上面展开了一场下面看不着的战斗，这场战斗仅通过树枝的晃动，粗重的喘息和树叶的纷飞表达出来。最后望远镜掉落在地上，上面便立即安静了下来。幸亏指挥官一点都没有发现这回事，他正忙于别的事务，外面原野上似乎有了一些动静。那个士兵悄悄地爬下了树，彬彬有礼地把望远镜递了上去，一切便又恢复了正常，甚至汤也没有洒掉多少。因为在战斗之前侦察兵已经把盘子固定在了树梢上一个风吹不动的地方。

我现在又开始写下我所听到的事，人们透露给我的事。但那不是作为我必须保守的秘密透露给我的，实际上直接透露了给我的只是那个声音，那个说话的声音，其他的不是秘密，还不如说是糟粕；而那些在干活时向四下飞去的，是可以被告知的事，是乞求公布的事，因为在孤独的情况下，在给予它以生命的东西消逝之后，它没有力量保持沉默。

可是我听到了下面这件事：

在南波希米亚某处一片高地上的树林里，那儿离一条河约两公里，有一个小房子，如果不是树林挡住了视线，从这里也许也能看到。那里住着一个老头。年龄应带给他的外表的尊严在他身上看不到踪影。他个子矮小，一条腿是直的，另一条严重地向外弯曲。脸盘很小，可是到处长着白色的、黄色的、个别地方也有些黑色的胡子，鼻子扁平，趴在有点凸起的上唇上，几乎已与上唇结成了一体，睫毛长长地垂在小小的……

人们说有种野兽除了死亡之外什么其他的愿望都没有，其实它们连这种愿望都没有，而是死亡有需要它们的愿望，而它们听从摆布，其实它们连听从摆布都谈不上，而是倒在河边的沙滩上，再也不起来。我很像这么一种野兽，我周围也有同族的兄弟们，可是在这些国度中，混乱是那么的严重，日日夜夜，兽群起伏波动，而兄弟们便随波逐流。在这里，人们把这种卷着走的情况叫做“扶他一把”，这种帮助在这儿随时都能得到；对于没有原因而倒下，从而一动不动的，人们畏之如魔鬼，这

是由于先例，由于可能将由它身上发出的臭味。当然，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一个，十个，一群可能会躺倒不动，可是什么也不会发生，蓬勃的生命仍在延续，阁楼上仍然铺满了旗帜，从来就没有卷起来过，这个手摇风琴里只有一个辘子，可是自身内的永恒摇动着摇柄。但是恐惧依然存在！这些家伙怎么能永远受得了心中自己的敌人的存在呢，即使这敌人就这样处于昏迷状态。由于这昏迷的敌人的缘故，他们……

“怎么样？”这位先生一边微笑着看着我，一边挪动着他的领带。这景象我的目光还能忍受得住，但过了一会儿我还是主动地微微侧转点身子，越来越全神贯注地盯着桌面看，好像那儿开启了一个洞口，且越来越深，把我的目光往下拽去。这时我说：“您想考核我，但并不能证明您有这资格。”这回他大笑“我的存在就是我的资格，我坐在这儿就是我的资格，我的提问就是我的资格，我的资格就是，您理解我。”“好吧，”我说，“权且算是这么回事。”“那么我就要考核您了，”他说，“现在我请您端着椅子退回去一点，您这样使我感到很挤。我还要请您不要看两边，而看着我的眼睛，也许对我来说，看着您比听您的回答更重要。”我照他的要求做了之后，他便开始了：“我是什么人？”“我的考官。”我说。“没错，”他说，“我还是什么人？”“我的叔叔。”我说。“您的叔叔，”他叫了起来，“回答得太棒了。”“是我的叔叔，”我强调地说，“不是什么更好的东西。”

我站在我房间外的阳台上。这里很高，我数了一下窗的行列，这里是第七层。下面是一片草坪，是个三面被围得很小的空地，这里想必是巴黎。我走进了房间，让阳台门敞开着，那好像还只是三月或四月，可是那天天很热。一个屋角放着一张非常轻巧的小写字台，我一只手就可以把它举起来在空中挥舞。但现在我却坐了下来，墨水和笔都是现成的，我想写一张明信片。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一张明信片在身边，便伸手到口袋里去摸，这时我听到了鸟鸣，转过头去，我发现阳台上贴着墙边挂着一个鸟笼。我立即又走了出去，为了看到这只鸟，我不得不踮起脚尖。这是一只金丝雀。这个所有物的发现使我十分高兴。我把那塞在两根铁条中间的绿色的色拉菜叶推了进去，让小鸟啄食。然后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搓了搓手，把身子欠出栏杆。空地那头的一个楼顶房间里，好像有个人在用观剧镜观察我，也许因为我是一个新的房客吧，这可真够小市民的，但这也许是个病人，而对他来说窗外的景象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由于我毕竟在口袋里找到了一张明信片，我就进房去写信了，但明信片上不是巴黎的景色，而是一幅叫做晚祷的画，画着一个宁静的

湖，前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芦苇，湖中间有只小船，船上坐着一个抱着个孩子的母亲。

我们玩“堵路”游戏，先确定一段路，一个人防守，另一个人要跨过去。进攻者蒙上了眼睛，防守者只有一个方式可以阻止对手跨越，那就是在他跨越的那一瞬间碰到他的胳膊；事先或是事后碰到胳膊都算他输。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人一定会认为，进攻是很困难的，而防守很容易，实际上完全相反，或至少应该说有进攻才干的人比有防守才干的人多。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能够防守，而他几乎从不失手。我经常观察他，这几乎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他不用怎么奔跑，而总是站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也跑不好，因为他脚有点瘸，但平时他也不是个活跃的角色，其他人在防守的时候总是紧张地弯着腰，东张西望，而他淡蓝色的眼睛却总是像平时一样平静。这么一个防守者意味着什么，只有在身为进攻者的时候才能体会到。

我爱她，但不能跟她说话，我总是窥伺着，为的是不碰到她。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围着，他们的矛尖是向外的。无论何时，只要我想要接近，我就会撞在矛尖上，受了伤，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

这姑娘对此没有罪责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或不如说，我知道她是没有的。前面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我也是被全副武装的人围着的，而他们的矛尖是向内的，也就是说是对着我的。当我想要冲到那姑娘那里去时，我首先会撞在我的武士们的矛尖上，在这儿就已是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儿，即使我能够到达，将已是浑身鲜血，失去了知觉。

那姑娘始终是一个人待在那里吗？

不，另一个人到了她的身边，轻而易举，毫无阻拦。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筋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他们俩进行第一次接吻时两张脸靠拢而穿过的空气。

两个男人坐在一张粗工制作的桌子旁。一盏油灯挂在他们上方。这是个远离我的家乡的地方。

“我在你们的手中。”我说。

“不，”其中一个说，他的身子坐得笔直，左手痉挛般地抓着他的大胡子，“你是自由的，所以你完了。”

“那么我可以走了？”我问。

“是的。”这个人说。然后他对他的邻座咬起耳朵来，同时亲切地抚摩着他的手。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身子骨也还挺直，而且很强壮……

通往花园的是个极其低矮的小门，比玩槌球游戏时插在地上的拱门高不了多少。所以我们不能并肩走到花园里去，而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爬进去。玛丽还给我添乱，正在我的肩膀几乎嵌在门拱里的时候，她竟开始拉起我的脚来。我终于挤了过去，玛丽也令人惊讶地过来了，当然还是靠了我的帮助。我们过于全神贯注了，以致我们完全没有发现，主人显然从一开始就站在附近观看着我们了。玛丽很狼狈，因为她的轻盈的衣服在爬过来时弄得皱巴巴乱糟糟的。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补救了，因为主人已经在欢迎我们，热情地摇着我的手，并轻轻地拍了拍玛丽的脸颊。我想不起来了，玛丽有多大，可能她是个小孩子，因为人家用这样的方式欢迎她，但我肯定也大不了多少。一个仆人奔了过去，几乎可以说是飞了过去，左手扶在屁股上，高举着的右手托着装得高高的一个盘子，里面装的东西我在这么快的速度中无法分辨，我只看到长长的带子或者是叶子或者是水藻在盘子周围垂下来，在这佣人的身后飞舞着。我让玛丽注意这个仆人，她对我点了点头，可是没像我所想象的那么惊讶。本来这是她第一次进入大社交圈子，她来自一个狭窄的小市民圈子里，按理说她的感觉应该像一个一直住在平原上的人，幕布突然拉开，他发现他正置身于大山的脚下。但在地面对主人的行为中一点都找不到这种感觉，她平静地听着主人的欢迎言词，同时缓缓地戴上我昨天给她买的那副灰色的手套。实际上我对她能够这样通过考试是很高兴的。然后主人请我们跟着他走，我们走向刚才那仆人消失的方向，主人始终领先一步，但总是对我们半侧着身子。

这是谁？是谁在码头上的树下走着？是谁完全失败了？是谁不再能

得救？草在水的墓上滋长着？梦来了，它们顺流漂了过来，沿着码头堤墙边的一个梯子爬了上来。人们止了步，跟它们聊了起来，它们知道一些事，只是不知道它们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秋日傍晚的天气很温和。它们向河流转过身去，举起胳膊。为什么它们要举起胳膊，而不是把我们拥入怀中？

你总是在门边转来转去的，大踏步地走进来嘛。里面有两个男人坐在一张粗工制作的桌子旁等待着你。他们正在就你的犹豫的原因交换意见。这是两个穿着中世纪骑士服装的男人。

他很强壮，而且越来越强壮。看来他是靠别人的钱在过日子。完全可以把他跟野外的一只野兽联想起来，晚上单独地，慢慢地，若有所思地，摇摇晃晃地向饮水槽走去。他的目光是阴暗的，经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的目光看似在注视某物，其实并非如此。阻碍他的不是精神分散或事务繁忙，而是一定程度的迟钝。这是一对醉汉的眼睛，但他显然不是醉汉。也许他遭遇了什么不公平的事，使他变得孤独，也许他总是遭遇不公平的事。好像是那种难以言传的不公平的事，即年轻人经常感觉自己遭到的那种，但年轻人最终会把它抛开，只要他们还有这么做的力量。但他当然已经老了，虽然也许不像看上去那么老，以他那迟钝的形象，那几乎令人讨厌的、往下延伸的满脸皱纹和那把背心鼓得高高的肚子。

这是第一铲，这是第一铲，

松散的泥土在我的脚前粉碎，

一个铃响了，一扇门颤抖，

.....

这是一个政治集会。奇怪的是，大多数大会都是在这个盖满马厩的场地上举行，在河岸旁。人的声音几乎无法从河流的咆哮中透出来。尽管我就坐在码头护墙上，离演说者很近（他们在一个由方石砌成的四方形的台基上居高临下地讲话），但我听明白的很少。当然我早就知道他们要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意见都一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一致的场面了，我也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这事情太清楚了，不知道说过了多少遍，始终像第一天那么清楚。这两样，一致性和清晰性让人胸闷，思维力被一致性和清晰性堵住了。有时我宁可只去听河流的

声音，别的什么也不要听。

如果我今天就我的朋友和我同他的关系作一番总结，在那些众多的人眼里这一举动将是一次毫无希望的助跑，是人们在长长的一生中经常跑的那种，接下来的跳跃，根本就不知道是向前跳入生活之中还是跳出生活之外。但这是毫无希望的，因而是毫无危险的。

我在青春初期就已经认识了他。他比我大7岁或8岁，但这本来不算小的年龄差距并没有显示出其意义，今天甚至是我看上去比他岁数大，他自己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这是逐渐发生的。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刚从学校出来，那是个阴暗的冬日下午，我是在上国民小学一年级的一个小男孩。当我拐过一个街角时，我看见了他，他身体强壮、敦实，长着一张骨盘大而又肉团团的脸，他那时和现在长得完全不一样，他的身体从童年至今已经变得简直像换了个人。

他通过手里的绳子使劲拽着一只幼小畏缩的狗。我站了下来，看着他，不是出于幸灾乐祸的心理，而只是出于好奇，我那时是个很好奇的人，对一切都有兴趣。可是我的观看却使他不高兴了，他说：“管你自己的事吧，笨蛋。”

有的人说他懒惰，有的人说他对工作有畏惧感。后一种说法是对他正确的判断。他是对工作有畏惧感。当他开始干一件工作时，他会产生一个不得不离开家园者的感觉。不是不值得爱的家园，但毕竟是一个习惯的、熟悉的、安全的地方。这个工作会把他引向何方呢？他感到自己被拽着走，就像一只幼小的胆怯的狗被人拽着走过大城市的一条街道。使他紧张的不是喧哗的噪音；假如他能听到这噪音，并能区别其组成部分，那么他马上就会需要这些声音。可是他听不到它，被人拽着从噪音中穿过，他却一无所闻。只有一种特殊的寂静，似乎从所有方向冲着 他，倾听着他，一种想要由他滋养的寂静，只有它是他能听见的。这是可怕的，既紧张又乏味，几乎难以令人忍受。他会走多远？两、三步而已，不会更远了。然后他便厌倦了此行，跌跌撞撞地回家园去，回到那灰色的、不值得爱的家园。这使他对一切工作无不痛恨。

他把自己锁在了第二个房间里，我敲了门，摇了门，他默不做声。他对我生了气，他不想再理睬我。我把桌子移到窗前，准备写一封信，

就是为了这封信我们大吵了一顿。这些争吵是多么小市民，我们必须靠得多么的近，才能发现这类争吵的素材，任何第三者都会无法理解，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任何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一致的，其实我们也确实是一致的。

这是写给一个姑娘的信，我在信里向她告别，这是理智而正确的。没有比这更理智更正确的了。特别是，如果设想一下我写的是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信，就会发觉写这封信是多么正确了，一封内容相反的信将是可怕的和不可能的。也许我不如把这封信写出来。在锁上的门边读给他听，那么他将不得不认为我是对的。当然了，他认为我是对的，他也认为这封告别信是正确的，但他对我是生气的。大多数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对我是怀有敌意的，但却又无可奈何；每当他以他平静的眼睛看着我时，就好像是要求我解释他的敌意。“你这家伙，”我想，“你想要我干什么？你已经把我改变了多少！”像以往一样，我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又敲了一遍。没有回答，可是我发现，这回门是开着的，但房间里是空的，他走了，这就是他喜欢用的给我的惩罚方式，在这种争吵后他就一走了之，几天几夜地不回来。

我在死人那儿做客。这是个宽敞整洁的墓穴，有几个棺材已经停放在这里，可是还有许多空地，有两个棺材开着盖儿，里面看上去像是睡觉的人刚离开的乱糟糟的床。一张写字台放在靠边上的地方，所以我没有马上就看到，一个身体壮实的男人坐在写字台后面。他右手拿着一支笔，好像他刚才还在写什么而现在正好停了下来似的，左手在背心前玩弄着一根闪闪发光的表链，脑袋低垂在表链上。一个女佣人在扫地，其实根本没什么可扫的。

不知出于哪门子的好奇心，我扯了一下那把她的脸完全裹住的头巾。这回我看清了她。这是个我一度认识的犹太姑娘。她长着一张饱满而很白的脸，细窄的深色的眼睛。她从把她弄得像个老妇人似的破布中向我露出笑脸，我说：“你们在演喜剧吧？”“是的，”她说，“有那么一点。你真是内行！”可是接下来她指了指坐在写字台边的那个男人，说：“你现在先到那里去向他问好，他是这里的主人。在你向他问过好之前，按理说我是不能跟你讲话的。”“他到底是什么人？”我轻轻地问。“一个法国贵族，”她说，“他叫德·波尔坦。”“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问。“这我不知道，”她说，“这里是一团糟。我们在等一个能整顿秩序的。你就是这个人吗？”“不，不。”我说。“这是很理智的，”她

说，“现在还是到那位先生那儿去吧。”

于是我走了过去，鞠了个躬。由于他不抬头，我只能看到他乱七八糟的白头发，我道了晚安，可是他仍然一动不动，一只小猫沿着桌子边缘跑，它显然是从他的怀里窜出来的，而现在又回到了那里去。也许他根本没在看着表链，而是在往桌子底下看着。我正想解释，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可这时我那个熟人扯了扯我的上衣，说道：“这已经够了。”

我对此很满意，我向她转过身去，我们挽着胳膊在这墓穴里走动起来。那把扫帚老是碍手碍脚的。“把这扫帚扔了。”我说。“不行，求你了，”她说，“让我拿着它吧。在这里扫地一点都不费劲，你一定已经发现了，对不对？这对我有些好处，我可不愿意放弃这些好处。你打算留在这里吗？”她转开了话题。“为了你的缘故我愿意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说。我们现在身子紧挨着，就像是一对情人。“留下吧，留下吧，”她说，“我是多么想你啊。这里不像你可能担心的那么坏。周围怎么样对我们俩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会，我们的胳膊互相松了开来，现在我们拥抱在一起了。我们走在干道上，左右两边都是棺材，这个墓穴非常之大，至少非常的长。这里虽然是昏暗的，但还不是伸手不见五指，这儿有一种微弱的光，在我们所到之处比别处更亮一些，在我们身边形成了一个光圈。她忽然说道：“来，我给你看我的棺材。”这使我惊讶。“你没有死啊。”我说。“没有，”她说，“可是我得承认，我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所以我对能够来到这里感到特别高兴。很短的时间里你就能明白一切，现在你可能已经比我看得清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有个棺材。”我们向右拐进一条岔道，也是在两列棺材之间。这里的整个结构使我想起一个我曾经见过的很大的藏酒地窖。在这条路上我们还经过了一条很小的，几乎不到一米宽的小溪，水流湍急。然后我们很快就到了这位姑娘的棺材旁。里面放着绣着精美的花边的枕头。这姑娘坐了进去，引我下去，与其说是用手指，不如说是用目光。“亲爱的姑娘，”我说，把她的头巾揭了下来，手停留在她松软的头发上，“我还不能待在你这儿。这墓穴里还有一个人，我必须跟他谈谈。你愿意帮我去找他吗？”“你必须跟他说话？这地方可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她说。“但我不是这里的人。”“你觉得你还是要离开这里吗？”“没错。”我说。“那么就更应该浪费时间了。”她说。接着她在枕头底下寻找起来，从那里拿出一件衬衣来，“这是我的丧服，”她说着从下面递给我，“可是我不穿它。”

我踏入了这座房子，关上了我身后那间上了的大门中的小门。穿过长长的拱形走廊，可看见一个修理得十分整齐的院中花园，中间有个花圃。我的左前方是一道玻璃，里面坐着门房，他一手支撑着前额，正弯着腰读一份报纸。在一块玻璃上贴着一大张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的画，把门房挡住了一些，我走近了一些，那无疑是一个意大利小城市，画面的一大部分让一条充满野味的山中小河及其造成的瀑布给占了，两岸的小城房子被挤在了画面的边缘。

我向门房致了问候，指着那张画说：“一幅美丽的图画，我去过意大利，这个小城市叫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三楼的孩子们乘我不在的时候把它贴在了这里，想要惹我发火。您想要什么？”他接下来问道。

我们间发生了一次小争执。卡尔断言，他肯定把那小观剧镜还给了我，尽管他很想要它，拿在手里也转来转去地玩了不少时间，也许甚至还借了几天，但肯定还给了我。我则把当时的情况给他又描述了一遍，提到了那条发生这件事的小街，那个我们刚刚经过的位于修道院对面的饭店，描述了一番他当时是怎么一开始想要买下这个观剧镜，然后又怎么提出种种东西来要跟我交换，然后还提出过要我送给他。“你为什么把它拿走？”我埋怨地说。“亲爱的约瑟夫，”他说，“这一切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尽管我坚信我是还给了你的，但是即使你当时送给了我，现在为什么还要为此这样地折磨你自己和我呢？你在这里就非需要这个观剧镜不可吗？还是失去了它对你的生活有大得不得了的影响？”“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说，“我只是为你那时把那个观剧镜拿走而感到难过。那是我得到的一个礼品，它给了我莫大的快乐，它外面镀了一些金，你记得吗？又是那么小，随时可以往口袋里一塞。此外镜片特别尖锐，通过它看上去比一些大观剧镜还要清楚。”

我站在大厅的门旁，在离我很远的后壁旁是国王的卧床。一个温柔、年轻、体态轻盈的修女在他身边忙着，把枕头放正，把一张放着各种饮料的小桌子推过去，从中为国王挑选饮料，胳膊肘下还夹着一本书。国王没有生病，否则他就回到卧室中去了。但他必须躺下，某种激动的事把他给抛在了床上，把他敏感的心带入了不安之中。一个仆人刚刚禀报了公主和她丈夫的到来，所以修女中断了朗读。我感到很困窘，因为现在也许将要听到亲密的谈话。但由于我已经身在此地，而谁也没有给我离开的任务，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因为我的微不足道而被忘记了，我便认为我有义务留在这里，只是退到了大厅最远的角落里。国王

近处的墙上的一道小门被打开了，公主和驸马一先一后弯着腰走了进来，进厅后，公主挽住驸马的胳膊，联成一体地走到国王面前。

“我不能再干下去了。”驸马说。“你在婚礼前庄严地接受了这个义务。”国王说。“我知道，”驸马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再干下去了。”“为什么不能？”国王问道。“那外面的空气我无法呼吸，”驸马说，“我无法忍受那儿的喧哗，我不是不会头晕的人，在那高处我感到难受，简而言之，我再也不能干下去了。”“最后一点还有点意义，当然是坏意义，”国王说，“其余全是借口。我女儿的意思怎样？”“驸马说得有理，”公主说，“他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是个负担，对他对我都是个负担。你可能没有好好地设身处地想一下，父亲。他必须始终准备着，实际上大约一周才发生一次，但他必须始终准备着。它会在最不可思议的时辰。比如我们坐在一个小小的社交场合中进餐，人们多少忘却一些烦恼，感到天真的高兴。这时守卫闯了进来，呼喊驸马，这时当然一切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他必须脱下身上的衣服，钻进那套窄小的、规定得死死的、花得令人讨厌的、简直像小丑的、几乎被剥夺了尊严的制服中去，然后这可怜的飞快地向外跑去。于是聚会星散，客人纷纷离开。也幸亏如此，因为当驸马回来时，他已经没有力量讲话，没有力量容忍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在他的身边，有时他的力量只够他跨进门来，然后他就倒在了地毯上。父亲，难道有可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吗？”“妇人之见，”国王说，“我不为此奇怪，可是你，驸马，现在我明白了，居然听了妇人之见来向我推辞义务，这使我难受。”

这就是这个区域，五米长，五米宽，也就是说不大，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自己的土地。是谁划定的？没人知道详情。有一回来了个陌生人，身上有好多革具，衣服上、腰带、斜挎带、皮带夹和口袋全是。他从一个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来，在上面记了几笔什么，然后问道：“楼长在哪儿？”楼长走上前去。这栋房子的一半人在他身后围成了一个大的半圆，那时我是个小男孩，大概是5岁吧，一切我都听见看见了，但如果不是在很久以后人们详细地告诉我，我至今也不会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叙述是很难理解的，还不如我当时更集中点注意力的好，尽管如此，别人的事后叙述还是使我自己不清晰的回忆获得了活跃的生命力，以致我今天仿佛还看见那陌生人用怎样的严厉的目光审视着楼长的。“你所要求的不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东西，”陌生人说，“你明白吗？”

尤其在文科中学的头几个学期里我是很差的。我母亲是个沉默寡言

的骄傲的女人，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控制自己不平静的天性，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个折磨。她对我的能力有着广阔的幻想，但由于不好意思她从未向任何人承认过这一点，所以她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让她来谈论和强调这点，正由于这样，我的不争气对她就更加痛苦，而这是无法以沉默来掩盖的，事实本身就承认了它，何况还有讨厌的一大堆证人，也就是所有的老师和同学。我对她来说成了个可悲的谜。她不惩罚我，她不责骂我；我并不是特别不勤奋，这她是看到的。最初她认为全体老师在对我搞阴谋，这个想法她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弃过，可是转到另一个中学后我的成绩甚至更糟，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她对老师们的敌意的想法，但是她对我的相信却始终没有动摇。然而我在她悲哀的询问的目光下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我没有野心，如果我没有不及格，我便满意了，如果我不及格了，那么便构成一个全年无法摆脱的威胁……

在这座城市里建筑从来就没有停息的时候。不是为了扩大这座城市，它已经满足需求了，很长时间以来它的边界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甚至可以说这儿对扩大城市有一种畏惧，人们宁可限制自己的天地，改造广场和花园，在老房子上加层，可事实上这种新的建筑劳动根本就不是持续的建筑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的部分，暂且这么表达吧：不如说是加固已存在的建筑物。并不是说以前建得比今天差，所以不得不不断地修改以前的错误之处。一定的疏忽大意在我们这儿是司空见惯的，很难区别什么是轻率，什么是迟钝烦躁造成的，但是恰恰在建筑方面疏忽大意的表现特别罕见。我们生活在一个采石业特别发达的国度，建筑物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石头，甚至包括大理石在内，建筑中人可能会疏忽的地方，自然会由这种材料的坚定性和固执性加以更正。而且在建筑方面没有时代的差别，这儿自古以来就贯穿着同样的建筑规则，即使说这些规则由于本国人民的特性而没有始终得到严格的重视，它却始终没有变化，对最早的建筑和最新的建筑一视同仁。比如在城前的罗姆山上有片废墟，这是一栋乡间房舍的残留，据说是在一千多年前盖的。一个富有的、随着年龄变老而性格变得孤僻的商人让人在这儿盖了这栋房子，他死后不久房子就倒了，因为在我们这里很难找到什么人愿意住到离城那么远的地方去。几百年来，这个建筑便付诸摧毁的力量，它的工作无疑比建筑工人做得更细腻。如果如今在一个安宁的星期天到那山上去，穿过山坡上的灌木丛几乎不必担心会碰到什么人，到山上观察这片废墟，所看见的无非是几段基墙，最高的还不到一人高，然后在某处可以看到一根折成了几段的精细的柱子，由悠悠时间的压力给埋进了坚硬的土里，上面长满了几乎呈黑色的老藤，一个塑像的毫无价值的躯干在

闪光，与其说是看出来的，不如说是猜出来的。这就是一切了，此外只有两三堆长成了一团的像岩石般坚硬的破碎石片，山坡上不时有几个埋在了土里的石头。其他一切都已被人搬走。可是现在仍能从布局上看出，传说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个面积很大的，宫殿般的建筑，在那荆棘丛生、几乎走不过去、一碰就会刺破手脚的地方，原先是个漂亮的花园，它以它的树木和台阶远远超出了那栋房子的寿命。

我在一个树林里完全地迷了路，不可理解地迷了路，因为就在不久前我虽然不是走在一条路上，但就在那条路附近，始终可以看见那条路。那条路失踪了，一切寻找它的企图统统宣告失败。我在一个树根上坐了下来，想要好好考虑一下目前的处境，我的精神集中不起来，总是想着一些其他的事而不去想最重要的事，思路总是在该忧虑的问题旁边擦身而过。接着我周围挂满了的黄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摘下一些来吃。

我住在艾特霍费尔旅馆，叫阿尔比安——艾特霍费尔或是曲普里安——艾特霍费尔或者别的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可能我也不可能再找到它，尽管这是个很大的旅馆，而且设施和服务都特别出色。我再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我几乎每天都要换房间，尽管我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星期挂零；所以我经常忘了房间号，当我白天或者晚上回去时，总是不得不向服务台姑娘询问我的房间号。当然，所有与我有关的房间都在同一楼层，而且都在同一条走道上。那儿房间并不多，我还不至于迷失方向。也许只有这条走道是用于旅馆用途的，而其他房间则用于出租和别的目的？我想不起来了，也许那时我也不知道，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事。但不可思议的是，这栋房子却用间隔挺远地固定在墙上的、不很耀眼、散发着微弱的红光的好大的金属字母标出了旅馆这个词和所有者的名字。要不就是那儿只标着所有者的名字，而没有标出旅馆的字样？这有可能，如果是这样，许多事情就好解释了。可是今天从模糊的记忆出发，更大程度上我仍然宁可认定，“旅馆”的字样是标明在那儿的。许多军官在这旅馆中来来往往。我当然多半整天在城里，有许多事要干，许多东西要看，所以没有很多时间来观察旅馆生活，但是军官是我经常在那儿见到的。旁边有个军营，实际上那并不是在旁边，那个旅馆和军营之间的连接是另外一种关系，既比在旁边松散，又比在旁边紧密。今天这不再是那么容易描述的了，其实，那时可能就不容易，尽管这种不明白有时给我造成了困难。这么说吧，有时候，当我离开大城市的喧哗回去时，不能马上找到旅馆的入口。不错，旅馆的入口好像很小，也许

（如果真是这样，当然就很奇怪了）根本就没有旅馆本身的入口，当人们要进入旅馆时，必须通过饭店的门。那么权且算是这么回事吧。可是连那饭店的门我也并不是总能找到的。有时，当我以为是站在旅馆门口时，实际上却是站在军营门口，虽然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广场，比旅馆门前安静，清洁，可以说是死寂和高洁，但两者确实是会搞错的。必须转过一个街角，才能到达旅馆门前。但是我现在觉得，有时候，当然仅仅是有时候，情况又不同了：从那个广场出发，比如在一个走同一条路的军官的帮助下，马上就能找到旅馆的门，而且不是别的门，另一扇门，而恰恰就是那同一扇门，也就是构成饭店入口的那扇狭窄的、里面有一道漂亮的、白色的、镶着条子的门帘挡着的特别高的门。而这旅馆和军营是两幢截然不同的建筑，这旅馆有着通常的旅馆风格，当然有一点银行的特点，而军营则是一座罗马式的小宫殿，低矮而宽广。这座军营从存在已解释了不断有军官出现这一现象，但我却从未见过士兵的队列。我已经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得知这座似乎是宫殿的建筑是军营的。同这军营打交道的机会我倒是经常有的，刚才已经提到过，也就是我气恼地寻找着旅馆的门，在那宁静的广场上团团转的时候。可是一旦我到了楼上那走道里，我就感到安全了。在那里我觉得很亲切。暗自庆幸能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找到这么一个舒适的地方。

凶狠的人，你为什么谴责我？我不认识你，现在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你说你给我钱，让我到这家店里去帮你买糖？不，这肯定是个误会，你没有给过我钱。你是不是把我跟我的同学弗里茨搞错了？可是他长得跟我并不像啊。你说你要到学校去告诉我的老师，这我可不怕。他知道我的为人，不会相信你的说法的。而我的父母不会把你要求的钱给你的，为什么要给你呢？我什么也没有从你这儿得到过。如果他们要给你什么，我就会请求他们别那么干。现在还不让我走吗？不行，你不能跟着我，要不然我就告诉警察。哈，警察那儿你不想去……

离开这儿，千万离开这儿！你不必告诉我将我引向何处。哪儿是你的手？在黑暗中我摸不着它。假如我抓住了你的手，我相信，你就不会再甩开我。你听见了我的话吗？你到底是不是还在这房间里？也许你根本不在这儿。是什么又能把你吸引到这北方的冰和雾中来，这本来不该有人迹的地方的？你不在这儿。你避开了这个地方。而我则站在这里，判断着你是否在这儿。

那些腿瘸的人相信他们离飞的时候不远了，甚于腿好的人。有些迹

象是为他们的观点说话的，那么不是这些迹象又是为什么说话的呢？

可怜的孤独的房子！你这儿是否从来就没有人住过？没有有关的传说流传下来。没有人研究你的历史。你里面是多么的寒冷。如果说曾经有人住过你这儿，那么居住的痕迹可以说是无法理解地、出色地给抹掉了。

我把我的理智埋在了手里。我愉快地、理直气壮地扛着脑袋，可是手却疲惫地下垂着，理智把它向地面拽去。看看这只皮肤坚硬、血管直贯、高耸、掌纹密布、具备五指的小手，为能把理智搭救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容器中去可真是不错。特别有利的是，我有两只手。我像在儿童游戏中那样问道：我理智在哪只手中？没人猜得出，因为我能通过掌纹在一瞬间把理智从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中去。

又一次，又一次，发配到遥远的地方，发配到遥远的地方。群山，沙漠，遥远的大地是长途跋涉的去处。

我是一只猎犬。我的名字是卡罗。我恨一切人，一切事物。我恨我的主人，那个猎人，尽管他，这个靠不住的人，并没有被我恨的资格。

梦呓般的，花在高高的茎上低垂。暮霭环绕着它。

没有阳台，只是由一扇门取代了窗，在这四层楼上直接通往户外。在现在这个春夜中，它正敞开着。一个大学生读着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每当走到那扇门那儿，他总要把鞋跟在那个门槛上来回摩擦，就好像人们快速地在留在半夜享用的甜食上舔着那样。

丰富多彩性在我们生活着的一个瞬间的丰富多彩中丰富多彩地转动着。而这个瞬间始终没有到头，看吧！

远远地，远远地行进着世界史，你心灵的世界史。

永远不会，你永远不会再回到城市中，永远不会还有大钟在你头顶上方轰鸣。

说说看，你在那个世界过得怎么样？

关于我的状况的问话，我以违反世俗的态度给予坦率而实际的回答。我过得很好，因为同以前不同，我生活在一个大社交圈子里，生活

在众多的关系之中，有能力通过我的知识、通过回答向我身边挤来的人群的问题给我自己带来满足，至少可以说，他们总是像第一次那样狂热地向我涌来。而我也反复地说：来吧，我永远为你们效劳。尽管我并不是始终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但这也也许根本就没有必要。我的存在对你们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言语也是重要的，它们能强调我的存在。我这个估计肯定错不了，所以我听由自己在我的回答之中漂浮，希望能以此给你们带来快乐。

你的答复中有些地方我们不太明白，你能否从头给我们解释一遍？

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这些彬彬有礼的人，你们这些孩子，尽管问吧，问吧！

你说到一个大社交圈子，而你在那里活动，那到底是个什么社交圈子？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自己。就是你们这个一起吃饭的小社交圈子，在另一个城市里有另外一个，诸如此类许多城市里都有。

你把这称为：社内活动。但是且慢，你说过，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克里胡贝尔。你真的是吗？

不错，我是的。

原来如此，你作为我们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们，而我们，由于我们不能忘记你的损失，出于我们的心理要求把你拽到这里来，免去了你前来的艰难。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的，当然是的。

可是你过的曾是那样孤独的生活，我们不相信你在我们的城市之外还会有朋友或者熟人。你在那些城市里到底拜访的是什么人，又是谁把你叫到他们中间去的呢？

我们把船靠上了岸。我登上了陆地，这是一个小码头，一个小地方。有些人在大理石地砖上逛来逛去，我跟他们搭话，可是却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这无疑是一种意大利方言。我把我的舵手叫了过来，他懂意大利语，可是他也听不懂这里的人说的话，他否认这是意大利语。但说实在的，我对此一点都不在乎，我唯一的愿望是在无穷无尽的航海

中好歹休息一下，而对此目的来说，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一样好。我又到船上去了一次，做出必要的安排。我让所有的人暂时留在船上，只要舵手陪着我，我离开坚实的土地已经太久了，除了对它的渴望之外，我对它也怀有一定的、无法摆脱的畏惧，所以我要舵手陪着我。我也到底下的女舱里去了一下。我的太太正在那里喂我们最小的男孩吃奶。我抚摩了一下她那柔和、发热的脸，把我的意图告诉了她。她抬起头来给了我一个赞同的微笑。

我不得不继续纠缠您^[48]，尽管我很想避免。这种纠缠是从我对《施威格尔》的急不可耐的抗议开始的——那不是抗议，我还没有走得那么远，那只是一种抗拒——现在又卷土重来了。那天晚上的谈话事后沉重地压在我心上，通宵达旦，倘若不是第二天早晨有件偶然的事把我的注意力引开了些，那么我一定会马上就给您写信的。

从一开始我就看到那么一场谈话向我走来，从门一打开就开始了，糟透了，它几乎打消了我对您的来访的一切喜悦之情。那天晚上使我痛苦得翻来覆去的是，关于《施威格尔》其实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啰唆了一通；当您就一些细节进行辩解时（讲得很出色，出乎我意料，完全符合实情），我只是表现出执拗的劲头来。但您的辩解却不能说服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根本不可能被说服的，在想到细节前很久我就已是如此。假如说，尽管如此，我却无法把我的指责说得明白易懂（甚至我自己都无法理解），那么原因仅仅存在于我的弱点之中，这种弱点不仅反映在思维和言谈中，而且表现为一种醒着进入昏迷状态的现象。比如说，我试图说一些反对这个剧作的话，但从第二句话开始就出现了由问题组成的昏迷状态，如：“你在说些什么？关于什么？这是什么，是文学吗？它从何处来？有何益处？多么成问题的东西！在这个成问题上还得加上你的申辩的成问题，于是长成了一个怪物。你怎么会走上这些高贵而毫无用处的道路的？对此值得提出严肃的问题，给予严肃的答复吗？也许是值得的，但不是由你提问和解答，这是更高的君主的事。快退回去吧！”而这个退回去意味着，我立刻进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无论反驳者的帮助或其他任何人的帮助都不能把我引导出去。您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似乎一无所知，尽管您写过《镜中人》。当然，即使在休息状态中，我也举手赞成那个插话者的意见，您有时对他太严厉了，他只不过是风，嬉弄着空气中的物体，延长着落叶的生命。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完全保持沉默，试着说说《施威格尔》中什

么东西使我反感。

首先我感到那里遮着一层纱幕，从而将《施威格尔》降格成为无疑是可悲的孤独体；而这整个剧作中的现实条件却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如果有人在叙述一个童话，那么所有的人都明白，他把自己托付给了陌生的势力，而对当今的法庭一概置之度外，但在这个剧中人们却体会不到这点。这个剧想要唤起这么个印象：正是今天，正是这个晚上，施威格尔的情况偶然地而非有意识地发生了。而这一事件，比如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邻舍中也同样会发生。对这个剧的这种意图我却不能相信。如果说，在这个围绕着施威格尔耸立着的奥地利天主教城市中，在其他房子里也住着人，那么每幢房子里住着的必然都是施威格尔，而不是其他人。剧中其他人物也没有自己的住所，他们同施威格尔住在一起，是他的伴随现象。施威格尔和安娜甚至没有可能引证何处存在一对幸福的夫妻，这一点被诚实地默认了，也许他们所要做的事一般说来无实现之可能，也许剧中无人有力量来反驳这一点。多瑙河船上的那么多孩子来自何处是个谜。那么为什么是这么个小城市，为什么是奥地利，在剧中沦落的孤独体为什么是这些？

但是您还要把这孤独现象弄得更孤独。好像您如何将它孤独化都不过分似的。您虚构了杀害儿童的故事。我认为这是对一代人的痛苦的侮辱。谁在这里除了心理学外无话可说，那就不要插嘴。与心理学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乐事，我尽可能跟它保持距离远一点，但它至少像这一代人一样存在着。犹太民族的痛苦和欢乐与其所属的“[腊希注疏](#)”^[49]几乎同时是与生俱来的。这里同样如此。

我前一阵在M.那儿是为了同K.做一次交谈。这本来并不是非常急迫的事，本来可以通过书面方式圆满解决的，当然要慢一点，但因为事情不急，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可是机会凑巧，我正好有空闲时间，又有兴趣尽快地、简单地跟K.把事情谈清楚，而且我还不认识K.，曾经有人向我建议去拜访他一次，于是我便很快地做出了到他那儿去的决定，可惜未能事先确认我这次在M.那儿是否能碰到K.，也没有时间让我去确认这件事了。

K.果然不在家。他几乎从来不离开家，M.那儿的人告诉我，他是个特别守家的人，可也正因为如此有许多事情堆积了起来，这些事情的地点虽然都在M.的周围，可毕竟需要到现场去谈，这些欠下的旅行早晚总是要进行的，而K.偏偏在我到达的前一天情绪非常坏，他的姐姐半

叹气、半微笑着告诉我，不得不让人套上马车，踏上了他伟大的征途。为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免受旅行的折磨，K.决定这次转一大圈，把所有需要处理的事都处理完，什么问题也不遗留，甚至将来会威胁到他的旅行，只要做得到，就也这次一并解决了，为此他把参加一个侄女的婚礼都包括在了这次旅行的项目之中。至于K.什么时候能回来，则是无法断定的，尽管这只是在M.的较大范围之内旅行，可是旅行的计划十分庞大。再说K.这个人一旦踏上旅途就吃不准了。也许他在各个村庄里度过一个或者两个晚上后对旅行产生了极度厌恶的情绪，从而再急的事也置之不顾，中断旅行，今天或明天就回到家里来。但同样可能的是，他终于动了起来，换了个环境使他感到满意，围绕在他身边的许多朋友和亲戚甚至迫使他必要的旅行时间大大延长，因为从根本上说他是个爱说话的快乐的人，喜欢置身于大社交场合，人们为他通过真诚的工作获得的声誉而庆幸他的到来，尤其在有些村庄里他将会得到热烈的欢迎。此外，他有能力通过他亲临的影响和他对人的认识，几句话就把身在远处时怎么费力也无法解决的事给解决了。如果他发现了这样的成就，他当然会对进一步的成就产生愿望，而这也延长了他的旅行。

（第二稿）K.果然不在家。我是在他的店里听说的，然后我马上到他的住处去，想把事情打听得明白一些。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这应该说是个相当宽敞的住处，至少女佣让我踏入的第一个房间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这几乎是个大厅，但又布置得像个居室，而根本没有塞满庸俗的小玩意，所有的家具都保持着合适的间隔，放得整洁而又一目了然，一切给人以整体感，一切让人感觉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家族传统。而通过闪烁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的下一个房间看上去也差不多。没多久，K.的姐姐就出现在那个房间里，她飞快地，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围上了一条折叠着的白色的围裙，然后走进了我所在的房间。这是个年纪比较大的、虚弱的小个子女人，非常客气和给人以好感，她对我的到来和她弟弟的出门正好很不巧地撞在一起表示非常的遗憾。他正好是昨天走的，她琢磨来琢磨去的，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帮助她，当然她也想立即通知她的弟弟，可是这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正在附近较大范围内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只打算进行短短几天的生意旅行，他根据临时需要而确定路线，所以没有留下一定的地址。她微笑着补充道，这也符合弟弟的脾气，他就是喜欢每隔一段时间，在断绝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尽情驱马行驶一番。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

共同的是这个“一切”。

承认，必要的承认，兀然洞开的门，世界出现在房子里面，而其昏暗的反照至今仍卧在户外。

关于世界上有畏惧、悲哀和荒凉，他是懂的，但对于他来说也只不过是太明确的、一般的、仅及于表面的感觉而已。其他一切感觉他一概否认，他认为我们称之为感觉的只不过是表象、童话和经验与记忆的反照而已。

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真正的事件绝不可能为我们的感觉所达到，更别说超过了。我们只是在以自然性质的无法理解的高速度走过的真正的事件之前或者之后经历它们，它们是梦幻般的、仅仅局限于我们心中的虚构。我们处于午夜的寂静之中，然而只需我们向东方或西方转过身去，我们经历的便是日出和日落。

微弱的生命力、误会的教育和单身生活造就了怀疑论者，但并非必然；为了拯救怀疑，有些怀疑论者便走上了结婚的道路，至少在精神上，于是便获得了信仰。

一个秋日夜晚，在小街树下的昏暗中。我问你，而你不回答。要是你能回答我，要是你的嘴唇张开，死的眼睛复活而为我而说的话在空中回荡！

门开了，绿色的龙进入房间里，精力充沛，两边圆滚滚的，没有足，用整个下部向前挪动。我表示欢迎，请它全身进来。他遗憾地说，它太长了，所以没法办到。于是不得不让门就这么开着，这是够难堪的。它半不好意思、半带点狡猾地微笑着，又说道：“由于你的渴望的感召，我从远方爬了过来，我身体下面都已完全擦伤了。可是我情愿。我乐意前来，乐意让你看看我。”

在沉重的打击下，灯光向下照去，把那朝四面八方逃逸的织物撕成碎片，毫不留情地穿透那张残留的、大网眼的空网子。下面，大地像被逮住的动物颤抖着，一动不动地站着。在相互的魔力下，两者互相注视着。而第三者，害怕被碰上，躲到了一边。

有一回我折断了腿，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经历。

半轮残月，一片枫叶，两支焰火。

从我的父亲那儿，我只继承了一个小小的银质佐料罐。

当战斗开始，五个全副武装的人从斜坡跳到路上来时，我从车底下钻了过去，借着黑透了的夜色向树林跑去。

那是晚饭以后，我们还坐在桌子旁边，父亲靠在他的靠背椅上，那是我所见过的同类家具中最大的一个，半睡半醒地吸着烟斗，母亲在补我的一条裤子，弯着腰工作，对其他一切都不在意，而叔叔坐得笔直，冲着灯光，鼻子上支着单眼镜，在读报纸。我整个下午都在街上玩，吃完晚饭才想起一份作业没做，我拿来了本子和书，可是却太困了，只剩下在本子封面上画蛇行曲线的力气，脑袋越垂越低，差不多就快趴在我的本子上了，而大人们都把我给忘了。这时艾德加来了，他是邻居的一个男孩，他本来应该早就上床睡觉了，他悄无声息地从门里走了进来，奇怪的是，我透过门看见的不是我们那灰暗的前厅，而是照在辽阔的冬景上的明亮的月亮。“来，汉斯，”艾德加说，“老师在外面雪橇上等你。没有老师的帮助你怎么做这作业啊？”“他会帮我吗？”我问。“对，”艾德加说，“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他刚才到库么卢去了，坐雪橇使他情绪特别的好，这时他不会拒绝任何请求的。”“我的父母会同意我去吗？”“他们又不会问你……”

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作业，我担心干不了。而且现在已很晚了，我开始得太迟，整个下午都在街上玩掉了，本来父亲也许可以帮我一把，可是我瞒住了他，现在大家都睡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我的本子面前。“谁能帮助我呢？”我轻声说。“我。”一个陌生人说道。他在我右边桌子的窄面那儿慢慢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就像那些当事人来到我当律师的父亲面前时那样，在他的写字台前弯着腰坐下来，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两条腿却直直地伸向屋子中央。我差点跳了起来，可是发现这是我的老师，他当然能够最好地完成这个作业，因为这本来就是 he 布置的。对我的这个想法，他热情地或高傲地或嘲笑地点了点头，到底是怎么个含义我可是猜不出来。但是这真的是我的老师吗？从外面和整体上看是一点都没错，可是再仔细观察一下细节，就有点疑问了。比如他有着我的老师的胡子，那坚硬的、稀疏的、翘起的、黑褐色的、覆盖了整个上唇和下巴的长胡子。可是当我弯着腰向他凑近一点时，就觉得这

胡子给人一种人工弄上去的印象，尽管这个所谓的老师也弯下腰来向我凑近，以手托着他的胡子让我检查，仍然不能消除我的怀疑。

梦的主人，伟大的伊沙哈尔坐在镜子前，背紧挨着镜面，脑袋后仰，深深地陷进了镜子中。这时海尔玛纳来了，这位暮霭的主人，他沉入了伊沙哈尔的胸脯，最后完全消失在其中。

在我们的城市中只有我们自己，这座被人遗忘的小城市卧在崇山峻岭中，几乎无法找到。只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到我们山上来，就是它也不时被无路可通的、光秃秃的巨石隔断，只有当地人才能找到其延续部分。

该我忏悔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一切忧虑烟消云散，透过半开着的教堂门可以看见那片广场，愉快地、安静地、没有任何太阳斑点的颤动展现在那里。我只能想起最近一段时间里有过烦恼，我要想出它那可恶的根源，但却不可能，我想不起任何烦恼，想不起任何在我身上的根子。神父的问题我几乎听不懂，当然那些话我是懂的，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没法听出这些话语与我的一丁半点关系。有些问题我请他再重复一遍，可是仍然无济于事，它们就像是似乎我认识的熟人，但记忆力却没法帮我想起它们到底是什么人。

暴风，树叶的疯狂，沉重的门，在那上面轻轻的敲击，迎纳世界，引入客人。对他们如何的喋喋不休感到无比惊讶，奇怪的嘴，没法看得惯向后看着工作，锤击接着锤击，工程师们已经来了吗？没有，不知受到了什么阻碍，经理招待他们，于是发出了一声欢呼，年轻人这时正在小溪里玩水，一个老人愣在一边看着这一切多么活跃，多么芬芳。可是这超凡的神仙般的青春，为了感受它，高贵的围着桌上的油灯振翅的蚊子，特别是我那小个子的、极小极小的、像稻草人似的、蹲在椅子上从而拔高了自己的同桌……

我们的经理是个年轻人，他有着宏伟的计划，他不断地催促我们，他所用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任何人对他来说都一样宝贵。他有能力在任何一个不足道的、我们连看都不会看上一眼的人身上泡上一整天，他会跟他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搂着他，膝盖抵着膝盖，把他的耳朵全部包了下来，这时任何人都无法干扰他，于是他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的头儿总是远离职工，有时我们整天整天的看不到他，他就是

在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虽然也在商店营业区里，但有一人的高度的毛玻璃挡着，不仅穿过商店，而且从房内走道那头也可以进入这间办公室。他的回避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图，他自己也并不感到与我们有隔阂，但这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觉得督促职工特别勤奋地去工作既无必要又无用处。谁要是不是通过自己的理智去竭尽全力地干，那么在他看来谁就不是一个好帮手，谁就无法在一个平静地运作着，然而充分利用着一切机会的商店中站住脚，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配待在这里，以至他不会等待被解雇，而会主动辞职。这事会发生得很快，从而既不会给商店，也不会给这个职工带来多大的伤害。当然这么一种关系在商业世界中并不常见，但在我们的头儿那儿却表现得十分明显。

保持冷静；与狂热所向往的地方保持遥远的距离；认识潮流并因而逆流游泳；出于被卷着走的快感而逆流游泳。

这是一家小商店，但却十分繁忙。小街那儿没有入口，必须通过一条过道，穿过一个小院子，才能到达商店门前，门上挂着一块写着店主名字的小板。这是一家服装店，那里出售成衣，但更多的是未经加工的布料。对于一个第一次进入这家商店的局外人来说几乎难以置信，这里卖掉了多少衣服和布料，或者，由于人们无法得知生意的准确结果，应该说，这里以何等规模和热情在做着生意。刚才已经说过，街旁没有进入商店的直接入口，但还不仅如此，在院子里也看不到顾客的到来，可是店里却挤满了人，不断看得到新人的到来和旧人的消失，也不知到哪儿去了。虽然也有宽大的靠墙货架，但绝大多数货架是围绕着立柱安置的，这些立柱顶着许多凌乱的小圆拱。由于这种布置，从任何一处也无法确切得知店里有多少人，从立柱后面不断转出新面孔来，而频频的点头、活跃的手势、人丛中的碎步急行、供选择而摊放着的货物的沙沙响、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和争议，即使只涉及一个售货员和一个顾客，却总像是整个商店都卷了进去，这一切把这里的繁忙景象渲染得超出了现实。角落里有个木板隔开的小间，很宽，但不高，仅够人在里面坐下，这是账房。木板墙显得十分结实，门极小，窗免去了，只有一个窥视窗，却是里外都蒙上了布。尽管如此，在外面这样大的噪音中账房里居然还有人能静得下心来从事书面工作，仍是令人惊讶的。有时，挂在门里的深色的帘子被掀了起来，于是人们便看见一个矮小的账房职员的身子填满了门洞，耳朵上夹着笔，一手遮在眼睛上方，好奇地或者出于职责地观察着店里的混乱。可是这时间很短，他马上就缩了回去，人们还来不及哪怕只向账房里面投上一瞥，门帘已经飞快地落了下来。账房

的商店收款处之间有某种联系。后者设在店门旁，由一个年轻姑娘管理。她不像想象中那样有许多工作。不是所有的人都付现钱，其实只有极少的人这么支付，显然有其他结账手段。

用树枝把梦扎起来。孩子们围着圈跳舞。弯下腰去的父亲发出的警告。在膝盖上把木柴掰成两半。半昏迷状态，苍白的，倚在棚屋的墙上，求助地仰望天空。院子里的一个小水洼。破破烂烂的农具在那后面。一条直泻而又曲里拐弯地挂在山坡上的小径。有时下雨，有时又出太阳。一只巴儿狗蹿了出来，扛棺材的往后退了几步。

我想到那个城市去已经很久很久了。那是个充满生气的大城市，好几千人在那里生活，每个陌生人都可以进去。

下述军事命令是林荫道上秋天的落叶中找到的，无从得知它出自谁的手，是给谁的：

今天夜里开始进攻。至今的一切，防御、撤退、逃跑、分散……

一个不完整的形象穿过林荫道，一件雨衣的碎片，一条腿，一顶帽子的前檐，匆匆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的雨。

朋友们站在岸边。那个将划着小船把我送上大船的人提起我的箱子准备放到小船上去。我认识这个人已有好多年了，他走路时总是深深地弯着腰，不知什么痛苦把这个本来巨人般的强壮汉子给弄弯了。

是谁打扰了你？是什么使你的心失去了平衡？是什么在你的门把上摸索？什么从街道上呼喊你，最终却没有进入这敞开着的门？啊，正是那个你打扰的人，是那个你使他失去心理平衡的人，是你在他的门把上摸索的那个人，是你在街上呼喊他，却又不走进他敞开的门的那个人。

他们走入了敞开的大门，我们向他们迎面走去。我们交换了最新的消息。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这辆车已经完全无法使用。右前轮没有，于是右后轮由于过于吃重而变形，车辕断了，它的一段搁在车顶上。

人们给我们带来一个小旧橱。邻居从一个远亲那儿继承了它，作为唯一的遗赠。他以各种办法试过，可就是打不开它，最终便送到我的技师这儿来了。这个任务真不容易。不仅找不到钥匙，而且连锁都无从发

现。要不就是哪儿有个秘密的机制，只有一个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人才能解开它，要不就是这个橱根本就不能打开，而只能砸开，这当然再容易不过了。

沃姆柏格先生，小城公民学校的老师，在火车站迎接我们。他是开发那个洞穴为任务的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个小小个子、好动、强壮程度中等的先生，长着一副在一定程度上疏淡得快要消失的黄色的尖胡子。车子还没停下，沃姆柏格已经站在我们这节车厢的踏板上了，我们中第一个人还没下车，他已经开始了简短的欢迎词。他显然想要完成通常的所有欢迎程序，可是他所代表的事业的重要性使一切程序统统变得多余和可笑。

活跃的伙伴们沿河下驶。一个星期天的渔人。生活的无以复加的充实。打碎它们！死水中的木头。贪婪地卷着的浪。激起渴望。

跑啊，跑啊。从一条侧街向外看去。高大的房子，一座更高得多的教堂。

这座城市的特点是它的空空荡荡。比如这宽广的环城路广场[50]永远空无一人。穿越广场的电车永远空无一人，它们的铃声响亮地、清脆地响着，表达着从瞬间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的心情。从环城路广场开始，穿过许多屋宇向一条遥远的街道延伸的集市永远空无一人。咖啡馆设在室外、排列在集市入口处两边的许多桌子旁没有一个顾客就座。广场中央那古老的教堂的大门大大敞开着，但没有任何人进出。通往大门的大理石台阶竭尽全力把落在其上的阳光反射回去。

这是我古老的故乡城市，我缓缓地、蹒跚着游荡在她的街巷之中。

又是跟同一个巨人进行的同样的搏斗。当然，他没有搏斗，只有我在搏斗，他只俯卧在我的身上，就像一个佣工趴在饭店桌子上那样，在我的胸脯上叉着胳膊，把下巴压在我的胳膊上。我能顶得住这个负担吗？

穿过城中的雾。在一条狭窄的小巷中，小巷的一侧是由爬满常春藤的墙构成的。

我站在我以前的老师面前。他对我微笑着，说道：“怎样了？从我把你开除到现在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要不是我对我所有的学生有着非人

可及的记忆力，我根本就认不出你来。可我现在确实认出了你，你是我的学生。可你为什么又回来呢？”

这是我亲爱的故乡城市，我又回来了。我是个富有的市民，在老城有栋房子，临着河流。那是栋两层楼的老房子，有两个大院子。我拥有一个车辆制造工场，在那两个院子里从早到晚不停地响着锯和锤打的声音。可是在位于房子前部的居室中却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那里非常寂静，那个三面为房子所围，仅一面敞开着面向河流的空场总是空无一人。那些居室都铺有地板，面积很大，被窗帘遮得略嫌暗了些，那儿立着古旧家具，我很喜欢裹着棉睡衣在这些房间中走来走去。

什么也不是，光的残余从言词中横穿而过。

锻炼得十分结实的身子懂得它的任务。我越来越愿意照料这个动物。褐色眼睛中的光泽对我表示感谢。我们是一条心的。

我在此明确声明：关于我的说法，凡是认为我是成为一匹马的心灵朋友的第一个人的，都是错误的。奇怪的是，如此荒唐的论断居然能够传播和被人相信；更奇怪的是，人们如此轻率地接受了它，传播它，相信它，头都不摇一下就让它成为了事实。这里一个秘密，研究它要比研究我事实上所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更有吸引力。我所做过的只不过是：我有一年时间同一匹马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人同他所爱的、而他的爱又为之拒绝了的姑娘生活在一起那样，如果没有任何外在障碍阻挡他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我的那匹马艾雷沃诺尔和我自己关在了一个马厩里，只有在去教书的时候才离开这个与它共同生活的场所，因为我毕竟要为我们俩的生计赚些收入。可惜这教书的事每天总要持续五到六个小时，完全不能排除，在我这么长时间不在会导致我一切的努力付诸东流。那些先生我经常徒劳地请求对我的事业给予支持，要是他们能拿出哪怕一点儿钱来，为此我愿意做出任何牺牲，要是他们能够献出一束燕麦，让我能塞进这匹马的牙齿之中，要是这些先生能听我述说就好了。

一只猫抓住了一只老鼠。“你现在想要干什么？”老鼠问道，“你的眼睛好可怕。”“噢，”猫说，“我的眼睛总是这样的。你会习惯的。”“我宁可走开，”老鼠说，“我的孩子们在等着我。”“你的孩子们在等？”猫说，“那么就走吧，越快越好。我本来只是想问你个把问题。”“那就请问吧，时间确实已经不早了。”

一个棺材完工了，木匠把它装上了手推车，打算送到棺材铺去。从横街走来一位老先生，在棺材前站了下来，用手杖在上面划了一下，同木匠开始了一番关于棺材工业的小小的对话。一位拎着买菜包的妇人沿着主要街道走过来，碰了这位先生一下，接着认出他是个老相识，于是也站了一会儿。助手从工场里走出来，有几个关于他手头上的活儿的问题要问师傅。工场上方的一扇窗户中露出了木匠老婆，手中抱着最小的孩子，木匠开始远远地逗他的孩子，那位先生和提着买菜包的妇人也微笑着抬头看着。一只麻雀幻想着在这里找到什么吃的，飞落在棺材上，在那儿跳上跳下。一只狗在嗅着手推车的轮子。

这时忽然从里面猛烈地敲响了棺材盖。那只鸟飞了起来，害怕地在车子上空盘旋。狗狂叫起来，它是所有在场者中最激动的，好像是为失职而感到绝望似的。那位先生和那位妇人蹦到了一边，摊开着手等待着。那助手出于一个突然的决定，一下跃到棺材旁，坐在了那儿，他好像觉得坐在这个位置上不像看着棺材打开，敲击者钻出来那么可怕。也许他已经为这匆忙的举动感到后悔，但既然他已经坐在了上面，他就不敢再爬下来了，师傅怎么赶也赶他不下来。上面窗口的女人可能也听到了敲击声，但却无法判断来自何处，至少根本不可能想到这声音来自棺材里，所以她完全理解不了下面的进程，惊讶地注视着。一个警察，在一种无以名状的心理要求的驱使下，又在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的阻止下，犹豫不决地慢慢踱了过来。

这时盖子被大力推开，那助手滑到了一边，一个短促的、异口同声的尖叫从所有的人口中发出，窗口里的女人消失了，显然她正抱着孩子顺着楼梯飞奔下来。

寻找他，要有尖头的羽毛^[51]，脑袋强壮，卡着的脖子四处张望，静静地从你的位置上出发。你是个忠实的仆人，从你的阵地的界限内看，在你的阵地的界限内你是一个主人，你的大腿粗壮，胸膛宽阔，当你开始寻觅的时候，脖子微微下倾。从遥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你，就像一个村庄中的教堂塔尖，人们从遥远的地方，越过山冈和山谷，在各条原野的道路上向你走去。

这就是那使我健康的食品。精致的菜肴，做得精致。从我的房子的窗子望出去，我看见运送食品的人，长长的一溜，他们经常堵塞而停顿，这时每个人都把篮子放在身前，以防它受到损害。他们也不时向我仰望，友好地，有些是着迷的。

这就是我赖以繁盛的营养。这就是那从我年轻的根部上升的甜汁。

我从桌边一跃而出，酒杯还握在手中，我追逐着那个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出现在我面前的敌人。

当他越狱逃跑，进入树林里，迷失了道路时，天色已经昏暗。林边有幢房子。一幢城市房子，完全照城市里的样子盖的，有一个城市或城郊风味的挑楼，有个围着铁栅的屋前小花园，窗后都挂着精致的窗纱。一幢城市房子，却位于无边的寂寞孤独之中。这是个冬日的晚上，野外的空气是很冷的。但这不是野外，这里有城市的交通，角上有一辆电车在拐弯，可是这确实不是城里，因为这辆电车没开，而是很久很久以来就停在这里了，永远保持着这个姿势，好像它正在街角拐弯似的。它很久很久以来就是空的，而且根本就不是电车，是一辆有四个轮子的车子，在透过薄雾朦胧地倾泻而下的月光中说它像什么它就像什么。这里铺着城市里的柏油路，地面像柏油路一样，标准的平滑的柏油路面，但这只是迷蒙的树影在积雪的公路上漂浮。

看那年轻的波尔歇尔怎样费劲地想要进入我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令人感动还是害怕或是恶心。他总是疯疯癫癫的，干什么事都不成，他的家抛弃了他，只给他勉强够他活的一点东西吃，他成天闲逛，尤其喜欢在沼泽地里逛。有时他一连几天几夜地躺在他家的一个角落里，接下来又好几个晚上不回来。

我最近苦于这个村子里的傻子的纠缠。他的傻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这对我的影响不比其他任何人的更多。

下面花园门那儿又发生了什么了？我从窗子里看出去，没错，又是他。

当你想要有人引你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时，你会先去找一个共同的熟人，请求他帮个忙。如果你一个都找不到，你会忍耐，等待一个有利的机会[52]。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地方，这种机会是不会没有的。如果今天没有，那么明天一定会有。如果不出现这样的机会，那么你也不至于就这样动摇了世界的支柱。假如一个家庭能不在乎没有你，那么你至少不会更在乎没有这个家庭。

这些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只有K.无法理解。最近他心血来潮，想要闯入我们的地主家庭去，却不是通过社交的路线，而是愣干。也许他觉得通常的那条路太迂回漫长，这是对的，可是他想要走的那条路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此并不想夸大我们的地主的作用。他是个善于理解人的、勤劳的、值得尊敬的人，但也仅此而已。K.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呢？他想被雇佣在地主庄园里吗？不，他没有这种想法，他自己是富有的，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是爱上了地主的女儿吗？不，不，他跟这种怀疑丝毫沾不上边。

房管局进行了干涉，这里有那么多官方规定，不知我们忽视了其中哪一条，情况表明，我们必须把我们住房中的一间让给再租人，这情况尽管不是很清楚，但是假如我们早一点在局里报了那间有问题的房间，同时对出租义务提出异议，那么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希望的，但现在我们却背上了忽视官方规定的罪名，对此的惩罚是：不得再对局里的安排提出异议。这是件令人不快的事。而更令人不快的是，现在该局有权把任意一个房客塞给我们。不过我们希望，至少对此还能采取一些反措施。我们有个表侄在这里的大学里学法学，他的父母，我们似乎很近、其实很远的远亲，住在一个小村镇里，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们。当这小伙子刚进入首都的时候，曾来拜访我们，这是个孱弱、畏怯、近视的小伙子，背有点儿驼，拘束的言谈举止让人感到不舒服。他的实质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可是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一直钻透到他的实质里去。这么一个小伙子，这么一株茎干细长、战战兢兢的小苗苗需要人们付出无穷无尽的观察和照料，这我们可承受不了，所以还不如什么也不为他做，让他离得远远的。我们可以用钱和建议稍稍给他一点支持，这我们也做到了，但我们不允许他再到我们这儿来做毫无意义的访问。但现在由于局里的来函，我们又想起了这个小伙子。他住在北面的哪个区里，住得肯定够可怜的，而他的伙食肯定不够用来维持这个不善于生活的小躯体。要是我们让他住到这里来怎么样？并非仅仅出于同情，要是出于同情我们早就该这么做了；并非仅仅出于同情，可也不能把这说成是我们不容置疑的功绩。只要我们能够向房管局下命令前的最后一刻，在一个拿着凭证坚持其居住权的任意一个我们丝毫不认识的人闯入之前让我们的小侄子得以保护我们的权益，我们就再满足不过了。据我们打听下来，这事还是相当有可能成的。如果能够向房管局表明一个穷学生本来就是住在这里的，如果能够证明，如果这个学生失去了居住这个房间的权利，他失去的将不仅是一个房间，而几乎是他全部的生存可能；如果最终能够（这个侄子不会拒绝在我们施展这个小手段方面帮我

们一把的，我们将去做工作）让人相信，他至少以前有一段时间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住过，只不过由于考试的准备时间特别长，所以他到农村他的父母那儿去住了一段时间——假如这一切能够成功，那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现在赶紧开车去争取这个侄子。在五层楼上，在一个寒冷的面对内院的房间里，他穿着冬装，正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踱来踱去地学习着。他身上和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肮脏和混乱，让人不得不把口袋里房管局的通知捏成一团，来再次说服自己，这么做确实是有必要的。

新鲜的充实。突突涌出的水。暴风雨般的、平和的、高大的、舒展的成长。幸福的绿洲。一夜咆哮之后的清晨。与天空胸贴胸。和平，和解，沉醉。

创造性的。前进！沿着道路过来！对我发表言论！让我发表言论！判决！杀戮！

合唱。——我们笑得痛快。我们年轻，日子美好，走廊上高大的窗户外面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鲜花盛开的花园。有时那在我们背后走来走去的仆人会说一句话，要我们安静一些。我们几乎没有看见他，我们几乎听不明白他的话，只有他那在石砖上空空作响的脚步声使我察觉他遥远的警告的声音。

我们说不上来，我们是否有去看看一个神秘画家的心理要求。情况是，一种自来就轻微地、难以察觉地存在着的心理要求，在注意力日益集中的情况下几乎就要消失了，而只是通过随之马上就出现的现实才又留在了属于它的位置上，就是这样，我们很久以来就怀着那么一种难以察觉的好奇心，想要看见那些女人中的一个，她们出自内心的、然而却是陌生的力量画着一朵高于月亮的花，然后是深海植物，然后是留着巨大的发型、戴着头盔的变形的头颅，完全与本来面目不一样。

1920年9月15日。让他大为惊讶的是，你往你的嘴里塞的不是吃的东西，而是想把尽可能多的匕首捏成一束塞进去，尽你的嘴的容量。

疾病怀着难以捉摸的意图蹲在树叶下。如果你弯下腰去看它，而它发现被你发现了，它就会蹦起来，这个瘦小沉默的坏蛋，它不想被你压碎，而想受到你的滋养。

这是一份委任状。根据我的个性，我只能接受一份委任状，即无人

给我的那份。我生活在这个矛盾中，我永远只能生活在一个矛盾中。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如此，因为人们活着死去，死着生活。这就好比一个马戏场由帆布围着，任何人如果不在这帆布圈子里，就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有人帆布上找到了一个孔，那他就能在外面看。当然，这是第二个当然，通过这么一个孔人们多半只能看见立席中的观众的背脊。当然，这是第三个当然，音乐还是能够听到的，还有野兽的吼叫。直到人们最终由于惊恐而昏厥过去，倒在警察的胳膊上——那警察例行公事地在马戏场外转圈，仅仅轻轻地在你肩上拍了一下，提醒你如此紧张的窥视是不正当的，且没有付钱。

人的力量并不是作为一支乐队设计的。倒不如说，这里必须让所有的乐器都奏起来，无休无止，竭尽一切力量。这不是为人类的耳朵准备的，而每一个乐器希望能够使自己得以表现所需要的音乐晚会的一定长度，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

1920年9月16日。有时似乎是：你得到了一个任务，具有完成它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力量（不太多，不太少，尽管你必须保持它，但又不必为之担惊受怕），你有足够的可以操纵的时间，工作的旺盛意志你也有。那么阻止这一巨大的任务成功完成的障碍又是什么呢？不要为寻找障碍耗费时间，也许一个都不存在。

1920年9月17日。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路的，只是彷徨而已。

我所承受的责任的压力从来不外乎其他人的存在、目光和判断所给予我的。

1920年9月21日。

兀现的一些残余。

在月光中的阳台下幸福地分解了的四肢。

背景中有一些树叶，

黑黝黝好似发丝。

某个东西新鲜而美丽，在一次沉船时进入了水中，被卷带着，好多年无可奈何，最终瓦解了。

马戏场里今天将上演一出大型哑剧，一出水中哑剧，整个场子将沉入水中，波赛冬将带着他的随从在水下追逐，奥德赛的船将会出现，而塞壬们将会唱起歌来，然后维纳斯将赤裸裸地从波涛中升起，从这里开始将转化成在一个现代的家庭澡盆里的生活描述。经理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可还始终是个腰板挺直的马戏骑手，他保证这出哑剧会大获成功。成功也是非常必要的，去年情况很糟，一些失败的旅行造成了重大的亏损。现在人们来到了这座小城市。

一些人来到我这儿，请求为他们建造一座城市。我说，他们人太少了，有一幢房子就足够容纳他们，我不会为他们建造城市的。可他们却说，还有其他人要来，其中还有夫妻，他们将会生儿育女，而且也不需要一下子建成这座城市，只需先定下轮廓，然后逐步逐步地搞。我问他们想把城市建在哪里，他们说，这就把地点指给我看。我们沿着河边，一直走到一个相当高的、河岸那边十分陡峭，而其他方向平缓下降的非常宽广的高地上。他们说想把城市建在这上面。那上面只稀稀拉拉地长着野草，没有树木，这我是满意的，可我觉得河岸那边的坡度太陡了，我提请他们注意这一点。他们却说，这没有什么害处，城市可在其他方向的坡上扩展，会有足够的通往水边的口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找到制伏这陡崖的办法的，无论如何这不至于构成阻止在这个地方建造城市的障碍。再说他们年轻力壮，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这陡坡上爬上爬下，他们立刻就要示范给我看。他们真的这么干了；他们的身躯像壁虎似地在岩石缝中晃悠着往上蹿去，一会儿就到了上面。我也爬了上去，我问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儿建造城市。对于防卫来说这地方不太合适，只有朝河的那边堪称有天然的屏障，而恰恰那边是最不需要防卫的，那儿反而需要随时可以轻易退走的条件；从其他所有方向则都能毫不费劲地来到这个高地上，所以由于其广阔的延伸而难以防御。此外，这里土壤是否肥沃尚未经过检查，依赖于下面的平原，靠马车运输来维持供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始终是危险的，更别说在不太平的年代中了。而且这上面是否能找到足够的饮用水还没有确定，他们指给我看的那个小水源看来不足为凭。

“你累了，”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你不想建这座城市。”“我是累了。”我说着在水源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们把一块毛巾浸入水中，然后给我擦脸，我谢了他们。接着我说，我想要一个人在这高地上走走，便离开了他们；我转了很长时间；等我回到那儿，天已经黑了；大家都躺在水源边睡觉；天上开始下起小雨来。

第二天早晨我又问了一遍昨天的那个问题；他们未能一下子理解，我怎么会早晨重复晚上的问题。但接着他们还是对我说，他们无法将他们选择这个地方的理由确切地告诉我，是世代传下来的话题，建议选择这个地方的。上辈子的人就想要在此建城市了，但出于某些同样不曾传得很清楚的原因才未能着手。无论如何他们不是由于心血来潮而到这个地方来的，恰恰相反，他们并不十分喜欢这个地方，而且我所说的那些反驳理由他们自己也已经发现了，并承认那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偏偏有那先辈的遗命，谁不听从遗命，就将被消灭。所以他们觉得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还要犹豫，而不是昨天就开始建城。

我决定离开，沿着陡坡向河边爬下去。可他们中有一个醒了，叫醒了其他人，于是他们便站到了崖边来，这时我刚爬到一半，他们请求我，喊我。我又爬了回来，他们帮着把我拉上去。这回我答应了给他们建这座城市。他们很感激，没完没了地向我阐述他们的心情，还纷纷吻我。

一个农民在公路上拦住了我，请求我跟他到他家里去，他说，也许我能够帮助他，他同妻子发生了争执，这场争执使他生活得十分痛苦。他还有几个好动而脑子单纯的孩子，他们只会毫不懂事地往什么地方一站，要不就干脆跟你捣乱。我说，我愿意跟他去，但是实在是没有把握，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是否能帮得上他什么忙，孩子们我也许可以引导他们去干些什么，可是在他的老婆面前我可能会束手无策，因为老婆好斗的根源一般因丈夫的品质而来，由于他不想争执，他一定已经做出了改变自己的努力，但既然他都没有成功，那么我又能干什么呢？我顶多能把他老婆的好斗嗜好引到我身上来。这段话我与其说是对他讲，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可我接下来明确地问他，我如果为此做出努力，他将给我什么报酬。他说，这都好商量，只要我能起到一点作用，我就可以要什么就拿走什么。听了这话，我停下了脚步，我说，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不能满意，必须明确地商定，他每个月给我什么。他对我要求月薪感到惊讶。我对他的惊讶感到惊讶。难道他认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里处理好两个人该欠一辈子的账吗？难道他认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后背上一小麻袋豌豆作为给我的酬劳，感激地吻他的手，用我的破布裹住自己，然后继续在冰冷的公路上漫游下去吗？不行！这个农民低着头，一声不吭地，但却是紧张地听着。事实上，我说，我将长时间地待在他那儿，以求找到可以给事情带来改善的下手之处，然后我将不得不待更长的时间，以求尽可能把事情安排妥当，然后我就老了，疲倦了，将根本就不

再离开，而是在那儿休养，享受他们大家的感激。

“这是不可能的，”农民说，“那样你就赖在我的房子里不走了，而最后还会把我赶走。这样我在我已经够重的负担上还得加上最重的一个。”“没有相互信任我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我说，“我不是也把我的信任给予你了吗？我需要的只是你的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你是完全可以撕毁的。在我照你的愿望把事情处理好之后，你可能会不顾任何承诺而把我撵走。”农民看着我说道：“你不会让我把你撵走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把我想成什么样都行，可是别忘了，我是像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那样友好地这么对你说的，即使你不带我去，你家里的情况你也忍受不了多久的。你怎么跟这个女人和这些孩子一起生活下去？如果你不敢马上带我到你家里去，那还不如放弃你的房子和你将会进一步面临的照料义务，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流浪，我不会记恨你的不信任的。”“我不是个自由的人，”农民说，“我跟我的老婆已经一起过了15年了，那日子是难受的，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尽管如此，我在做出一切使她变得能让人忍受的尝试之前还是不能离开她走我的。正在这时我在公路上看到了你，当时我就想，我可以跟你一起做最后一次伟大的尝试。跟我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我要的并不多，”我说，“我不想趁你之危。你可以始终把我当成雇工，我会干很多活，对你会很有用的。可是我不想成为和别的雇工一样的雇工，你不能命令我，必须是让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工作，这回干这个，下回干那个，然后又什么都不干，完全凭我的兴趣。你可以请求我干一个活，但不能纠缠不休；当你发现我不想干这个活时，你就得认了。钱我不需要，可是就像我现在穿着的外衣、内衣和靴子，在需要的时候必须给我换新的；如果在村子里买不到这些东西，你就得进城去买。可是我对这些现在并不担心，我现在穿着的几年里还坏不了。雇工通常的伙食对我来说没问题，不过我每天得有肉吃。”“每天吗？”他立刻插嘴道，好像他对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意见似的。“每天。”我说。“你的牙很特别，”他说，以此对我的奇怪愿望表示谅解，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嘴里去摸我的牙齿，“那么尖利，”他说，“简直和狗牙差不多。”“一句话，每天我都有肉吃，”我说，“啤酒和烧酒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这要求可是多了一点，”他说，“我喝得很多。”“那更好，”我说，“但是你可以限制你自己，那么我也可以限制我自己。可能您只不过因为家里的不幸才喝得那么多。”“不，”他说，“这扯得上吗？那么你可以得到和我一样多的酒，我们一起喝。”“不，”我说，“我不会跟任何人一起吃饭和喝酒的。我将永远一个人吃饭和喝酒。”“一个人？”农民惊讶地问道，“我心里已经在

反对你的愿望了。”“那实际上并不多，”我说，“差不多就这些了。只有油还是我需要的，用来点一盏小油灯，它将通宵地在我身边点燃着。这盏小油灯就在我的包里，一盏很小的小灯，用油很少的。这本来根本不值一提，我提到它只不过想要把话说得全一点，以免今后出现争执，在报酬方面我受不了任何争执。如果有人拒绝我们约定的事，那么我这个平时很好说话的人会变得很可怕的，咱们丑话说在头里。如果欠我的东西不给我，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就有本事在你睡着的时候在你的头顶上把房子点着。如果你不拒绝我们约定的这些，甚至不时出于爱再给我一些小礼物，也可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我对你将是忠实的，有恒心的，并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很有用的。除了我所说的以外，我不再要求别的了，只有在8月24日，我的命名日得给我5升装的一小桶罗姆酒。”“5升！”农民叫了起来，双手握在了一起。“没错，5升，”我说，“这并不多。你肯定想要降低我的份额。可是我已经限制了我的需求，当然是为你考虑，因为如果有第三者在边听着，我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在第三者面前我不可能这样对你说话。谁也不能知道我们今天谈的话。再说，也没人会相信。”可是这农民说道：“你还是走你的吧。我将一个人回去，自己试着跟老婆和解。最近我打她打得很多，现在我要稍微减少一些，她也许会因此而感激我的，孩子们我也打得很多，我总是从马厩里拿来鞭子揍他们，我将稍稍抑制一点，可能情况会好一点。当然我已经经常停止，可是情况并没有改善。可是你所要求的我没办法承受，即使我也许能够承受，不，经济上承受不了的，不，不可能，每天有肉，5升罗姆酒，就算是可能的，我的老婆也不会答应，如果她不同意，我就不能干。”“那谈判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呢？”我说。……

我坐在包厢里，旁边坐着我的妻子。正在演出一出紧张的戏，主题是嫉妒，这时，在一个金碧辉煌的、由立柱围着的大厅里，一个男人正在他那缓缓向出口移步的妻子身后举起匕首。我们紧张得趴在了胸墙上，我感觉到我妻子的鬓发拂在我的太阳穴上。这时我们忽然吓得缩回了身子，胸墙上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我们以为是铺着天鹅绒的胸墙却原来是一个细高个子男人的背脊，他正好和胸墙的宽度一样，到刚才为止一直肚子朝下地趴在那儿，而现在正慢慢地转身，好像在寻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我的妻子颤抖着贴着我。他的脸离我很近，比我的手掌还窄，干净得可怕，像个蜡像，长着黑色的尖胡子。“你为什么要吓唬我们？”我喊道，“你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对不起！”这人说，“我是您的妻子的一个崇拜者，感觉到她的胳膊肘支在我身上使我十分幸福。”“艾米尔，我求你，保护我！”我的妻子叫道。“我也叫艾米尔，”那人说道，

他的脑袋支在一只手上，躺在那儿就像躺在一张舒适的卧床上似的，“到我这儿来，甜美的小人儿。”“无赖，”我说，“再敢说一句，我就让您摔到下面观众席上去。”大概我觉得他肯定还会说话，我就动手把他往下推去，但这并不容易，他好像是牢牢属于胸墙的一部分似的，好像是安装在了胸墙里，我想把他翻个个儿，但却办不到。他只是微笑着，说道：“省省吧，你这小笨蛋，别过早把力气都用尽了，斗争还刚刚开始，结果只能是您的妻子满足我的渴望。”“绝不！”我的妻子叫道，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求你了，马上把他推下去。”“我不行，”我喊道，“你也看到了我是多么卖力，可是这里肯定有个什么花招，就是办不到。”“噢，天哪，噢，天哪，”我的妻子痛苦地叫着，“我怎么办呢？”“安静点，”我说，“我求你了，你的激动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计划，我要用我的刀把这里的天鹅绒割开，然后连同这个家伙一起掀到底下去。”可是我这时却找不到我的刀了。“你知道我的刀在哪里吗？”我问道，“是不是让我给落在存衣处的大衣里了？”我差点就要往存衣处跑去了，这时我的妻子使我恢复了理智。“你现在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艾米尔。”她叫道。“可是我没有刀怎么办？”我回头喊道。“拿我的。”她说，用颤抖的手指在她的小口袋里寻找，当然她找出来的无非是那把一丁点儿小的贝壳小刀。

一个棘手的任务，用脚尖走过一根当桥用的腐朽的木头，脚下什么也没有，先用脚把将要行走的土地聚集拢来。无非是在下方水面上看见的自己的倒影上行走，用脚维持世界，双手在上方空中痉挛，想帮助挺住这一努力。

在教堂前的台阶上跪着一个牧师，他把到他这儿来的信徒们的所有请求和诉苦都转化成祈祷，其实不如说他并不转化什么，而只是大声地、多次复述人们对他讲过的话。比如，有个商人来到他这儿，诉苦说，他今天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他就此破产了。他话音甫落，跪在台阶上的牧师便将双手平放在上面一级台阶上，祈祷时身子前后摆动：“A.今天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他就此破产了。A.今天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他就此破产了……”

我们是5个朋友。有一回，我们先后从一栋房子里出来，首先出来一个人，在门边站住了，接着第二个人从门里走了出来，其实应该说是滑了出来，像水银球一般轻盈地滑了出来，在离第一个不远的地方站定了，接着是第三个，接着是第四个，接着是第五个。终于，我们大家站

成了一排。我们引起了行人的注意，他们指着我们说道：“这5个人是刚刚从这栋房子里出来的。”从此我们就生活在一起，要不是有个第六者老想插进来，这本来是一种平静的生活。他并没有对我们非礼，可我们觉得他烦人，这就够了。为什么他愣要挤到这不要他的圈子中来呢？我们不认识他，因而也不想接受他。我们5个人以前互相也不认识，老实说，现在我们互相也不认识，可是在我们这5个人这儿可以做到和可以容忍的，在这第六者身上就是不能做到，不能容忍。再说我们是5个，而不想成为6个。而且这种始终相处在一起的意义何在呢？就我们5个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既然已经在一起了，那就这样好了，可我们不要一种新的结合，这恰恰是建筑在我们的经验的基础上的。但是怎样向这第六者教诲这一切呢？长篇大论的解释将几乎相当于把他吸进我们的圈子，所以我们干脆什么也不解释，反正就是不吸收他。不管他嘴嘟得多高，我们总是用胳膊肘把他推开，可是无论我们怎样把他推走，他总还是照来不误。

就像人们有时不用抬头看那阴云密布的天空那样，从景色的色调上便已经可以感觉到，虽然阳光还没有破云而出，可是阴霾正在松动，即将挪开，于是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而没有任何证据便可断定，马上就会是遍地阳光。

我站着把小船划进了一个小港口，那里空空荡荡的，在一个角落里停着两条挂帆的小舟，其他地方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小船。我轻而易举地为我的小船找到了一个停靠的地方，从那儿上了岸。这只是一个小港口，但有着结实的堤墙，维持得很好。

有一些小舟在水面上滑过。我呼喊其中一艘。一个高大的白胡子的老头是船上的领班。我在上岸的台阶上犹豫了一会儿，他微笑着，我边注视着他边踏上了他的船。他向小船的头上指了指，我便在那里坐了下来。但我马上就蹦了起来，说道：“你们这里有大蝙蝠。”因为有大翅膀在我的头上掠过。“放心吧。”他说。同时已经开始操作起那根桨来，我们一下子就被推离了岸边，我差不多是被摔回到了我的板凳上。我没有告诉这位领班我要到哪里去，而只是问他是否知道，从他的点头上可以得出结论，他是知道的。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解脱，我伸开腿，把脑袋靠在后面，可是仍盯着这个领班看着，一边琢磨：“他知道你要到哪里去，这个脑壳后面知道这一点。他把桨往海里打，只是为了把你送到那里去的。你从那么多船里正好叫的就是他，当时上船前居然还犹豫不

决。”于是我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在我看不见那人时至少还想听到他的声音，于是我问他：“像你那么大的年龄一定不想再工作了。你难道没有孩子吗？”“就你一个，”他说，“你是我唯一的孩子。只为了你我才走这一趟，然后我就把这艘船卖了，然后就不再干活了。”“你们这儿把乘客称为孩子吗？”我问道。“是的，”他说，“这是这里的风俗。而乘客把我们称为父亲。”“这可真够奇怪的，”我说，“那么母亲在哪里呢？”“在那儿，”他说，“在船舱里。”我直起身子，看到设在小船中间船舱的圆形小窗里伸出一只手来向我致意，可见那里露出了一张用一条三角黑头巾裹着的强壮的妇女的脸。“是母亲吗？”我微笑着问道。“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她说。“可是你看上去比父亲要年轻得多。”我说。“是的，”她说，“是年轻得多，他可以当我的祖父，而你可以当我的丈夫。”“你知道吗，”我说，“当人们单独在夜里行舟，忽然出现了一个女人，是那么的令人惊讶。”

我在一个湖上划船。这是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圆拱形的洞穴里，可是这里是明亮的，从上方苍白泛蓝的石头里泻下匀和的、明晰的光。尽管这里感觉不到一点儿风，但浪却很高，可是不至于对我的虽小然而结实的船带来什么威胁。我平静地从浪中划过，可是却几乎没有去想划船的事，我全心全意地以我所有的力量吮吸着笼罩这里的寂静，这是一种我一生中从未体味过的寂静。这就像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水果，却是所有水果中最有营养的一种，我闭上眼睛，吞食而下。当然并不是毫无干扰的，寂静仍然是完美的，可始终有一种干扰在威胁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抑制着喧哗，可是它就在门外，充满了爆发的渴望。我把目光向它移去，它并不在那里，我从套子里抽出一把桨，站在摇摇晃晃的船上，以这把桨向虚无中威胁着。仍然是一片寂静，我继续划船前行。

我们在滑溜溜的地上奔跑，有时有人滑倒在地，有时有人眼看就要摔倒，这时必须由另一个人帮他一把，但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同样脚跟不稳。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座人们称之为膝盖的小山丘下，但尽管它不高，我们却没法爬上去。一次又一次地滑下来，我们都绝望了，看来我们只能绕道而行，因为爬不上去，可是这也许同样是不可能的，却又危险得多，因为一次尝试的失败在此将意味着失足堕落和结束一切。为了避免互相干扰，我们决定各试一个方向。我走了过去，慢慢挪步到崖边，我看到，这里根本就没有道路的影子，没有任何可以立足下手之地，一切都将毫无停顿地坠入深谷。我坚信，从这儿是绝对过不去的，假如那边也不比这儿（这只有看试探的结果了），那我们俩显然就完

了。可我们必须一闯，因为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我们后面驱逐性地耸立着被人们称为脚趾的五座不可逾越的山峰。我再一次分别观察了一下地势，那段其实并不长，但却不可逾越的距离，然后闭上了双眼（睁着眼睛只能给我带来坏处），下定决心不再睁开，除非出现不可思议的事，而我竟然到达了那边。然后我让我的身子向一侧缓缓地倒下去，差不多像梦中那样，倒在地面后，便开始向前挪动。我把双臂朝左右两边尽可能远地伸出，这样覆盖和仿佛包容了我身边尽可能多的土地好像能给我一点平衡，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点安慰。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这土地确实能给我某种帮助，它是平滑的，没有任何可以着手之处。可这不是冰冷的土地，有一种热力从它那儿向我涌来，从我这儿又向他涌去，这里有一种联系，但并不是通过手和脚造成的，可它存在着，毫不动摇地存在着。

人的根本弱点不在于他不能胜利，而在于他不懂得利用胜利。青春战胜一切，战胜原始欺骗、隐藏的魔障，可没有人在那儿适时地捕捉住那些胜利，使之变成活生生的东西，等到有这人出现，青春已经过去。老年不敢再去碰一下那个胜利，而新的青年则由于马上就要受到新一轮进攻而痛苦，想要获得自己的胜利。于是魔鬼虽然不断地被战胜，但从来未能被消灭。

永远持怀疑态度的是人，他们认为，除了那个原始大欺骗以外，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一个专门针对他们的小欺骗，这就好像是，当一出爱情剧在舞台上上演时，那女演员除了装出对她的情人的一副笑容外，还有一个暗藏的专献给楼座最后一排的一个特定观众的笑容。愚蠢的自以为是。你除了欺骗外难道还认识的什么吗？倘若有朝一日欺骗被消灭，你就不能再向那里看，或者你将变成盐柱。

我在城里作为学徒进入一家商店去工作时，我是15岁。要有个地方愿意要我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的成绩单还过得去，可我个子太小，过于虚弱。头儿坐在一个窄小的没有窗户的账房里，在一盏亮得耀眼的灯后坐在他的写字台边，他一条胳膊勾在椅子的后背上，大拇指牢牢地插在背心口袋里，头尽可能离我远些地靠在椅子上，下巴抵在胸前，审视着我，认为我不合格：“你太弱了，”他摇着头说，“没法扛包裹，我只需要一个能扛重包裹的小伙子。”“我会努力的，”我说，“而且我还会变壮的。”我终于被一家铁器商店录用了，其实完全是出于同情心。这是一家光线阴暗、门面在院子里的小商店，而我要肩负的担子对

于我的力量来说又太重，但我为得到一份工作而十分满意。

“那伟大的游泳家来了！那伟大的游泳家来了！”人们呼喊。我从安特卫普奥运会回来，我在那儿拼出了一个游泳世界纪录。我站在家乡城市火车站前的台阶上，这城市在哪儿呢？俯瞰着暮霭中模糊不清的攒动着的人头。一个让我顺手摸了一下脸蛋的姑娘利索地给我套上了一条绶带，上面用一种外语写着：献给奥运会冠军。一辆汽车开了上来，几位先生把我拥入车内，有两位也坐了进来，市长和另一个人。我们马上就进入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当我步入时，楼厅上一个合唱团唱了起来，这里聚集着的几百个客人都站了起来，有节奏地喊着一个什么口号，我没听清他们喊的是什么。我的左边坐着一位部长，不知道为什么，介绍他的那个词竟会使我如此惊恐，我用毫无顾忌的目光打量着他，但马上就醒悟过来。右边坐着市长夫人，一个胖女人，我觉得她身上，尤其是胸脯以上，插满了玫瑰花和鸵鸟毛。我对面坐着一个胖男人，脸色白得引人注目，介绍他的名字时我没注意，他把两个胳膊肘都支在桌子上——人们给他留的地方特别大——茫然注视着前方，一声不吭。他的左右两边坐着两个漂亮的金发姑娘，她们很快乐，有着说不完的话，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尽管灯光十分充足，但其他客人我都看不太清，也许是因为一切都在运动吧，服务人员来回穿梭，菜端上桌子，杯子举了起来，也许是灯光过亮地照着一切吧。此外还有一种秩序混乱，唯一的一种秩序混乱，即有些客人，尤其是女士们，背朝着桌子坐着，而且不是椅背位于桌子和背脊之间，而是背脊几乎碰到了桌子。我把这现象指给我对面的两位姑娘看，可是本来话那么多的这两位这回却什么也没说，而只是长时间地微笑着看着我。有人摇响了铃，服务员们的身形顿时在座位之间凝住了，对面那胖子站了起来，开始发表讲话。这人为什么这样悲伤？他一边讲话，一边用手帕擦着脸，这本来是无所谓的，像他这么胖，厅里这么热，再加上讲话的用劲，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清楚地发现，这是个骗人的幌子，是用于掩饰他擦去眼泪的动作的。他老是看着我，但却仿佛他看的不是我，而是我敞开的坟墓。他讲完后，当然我就得站起来，也讲一番话。我正好有一种讲话的冲动，因为有些事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或许也在别的地方做出公开的、坦率的澄清，于是我说开了：

尊敬的与会者！我不得不承认，我获得了一项世界纪录，但你们如果问我，我是怎么得到它的，我却无法给予你们满意的答复。其实我根本不会游泳。我一直想学，可始终没有机会。那么怎么会把我从祖国送到奥运会去的呢？这个问题也是我正在研究的。首先我必须肯定一点，

我在这儿并不是在我的祖国，尽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可这儿说的话我仍是一句也听不懂。那么你们会想，最大的可能是搞错人了，可是并没有搞错人，我是得到了世界纪录，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我的名字就是你们称呼我的这个，到这里为止一切都没错；可是从这里开始一切都不对了，我不是在我的家乡，我不认识你们，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还有一点也许虽然不能确切地，但总之是能够否认搞错了人的理由：我听不懂你们的话我没觉得有什么关系，听不懂我的话你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关系。从我前面那位尊敬的发言者的讲话中我相信我只明白了一点，即这篇讲话是极其伤感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不仅已经足够了，而且太多了。我到这里后所参加的所有谈话的进程大体上都是如此。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回到我的世界纪录上吧。

一篇小说片断

房子的入口处站着两个男人，他们似乎穿得非常随便，他们身上的大多数穿着是些破布。肮脏，破烂，一条条破布耷拉着，但有些又保护得非常好。其中一人有着个新的高领子，系着一条丝绸领带，另一人穿着一条南京裤，裁得很宽松，往下渐细，在靴子上方小心翼翼地卷了起来。他们在聊天，把门给挡住了。这时来了一个人，像是一个中年乡村牧师，个子高大，结实，脖子粗壮，恰好在他两条僵硬的腿上来回晃动。他想要进去，他到这里来是为了一件急事。可是这两个人守着门，其中一人从他的裤子里掏出一块系着长长的金链的表来（那似乎是由若干连接在一起的链条构成的），一看还不到9点，而10点前是不能让任何人进去的。牧师很着急，可是这两个人又聊开了。牧师看了他们一会儿，似乎意识到再请求也是白费口舌，他已经往外走了几步，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又折转身来。这两位先生是否知道他要到谁那儿去呢？他是到他姐姐蕾贝卡·措法尔那儿去，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跟她的女仆一起住在三楼。守门的这两位果然不知道这回事，现在他们不再反对牧师进去了，当他从他们之间穿过时，他们甚至还向他鞠了个躬。到了过道里，牧师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没想到能这么容易地骗过这两个人。他回头瞥了一眼，他惊讶地看到，这两个守卫正手挽手地离去，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他的缘故才站在这里的吗？就牧师所见，这种可能并不能完全排除。他整个转过身去，街上现在热闹了一些，不时有个行人向这走道里看一眼，使牧师感到刺激的是，房门的两翼敞开得多大，这么大的敞开给人以一种紧张感，好像这门是为了最终猛烈地碰合在一起作准备的。这时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阿诺尔德。”声音

从楼梯那儿传来，这是个尖细的、使足了劲的声音，紧接着就有一根手指轻轻地敲在他背上。一个弯着腰的老妇人站在那儿，一个深绿色、大网眼的织物裹住了她的全身，好像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颗孤零零地立在她嘴里的长而细的牙齿在看着他。

快出发，快出发，我们纵马穿过夜色。这是个黑暗的夜晚，无星无月，比一般无星无月的夜晚更黑暗。我们负有一个重要的委托，由我们的领导装在一封铅封的信中带在身边。由于担心会让领导人失散了，我们中不时有个人给马加几鞭，上前面去摸摸看领导是否还在那儿。有一回，正好是我去摸索时，发现领导已经不在。我们没怎么太惊慌失措，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提心吊胆。于是我们决定返回。

这座城市像个太阳，所有的光集聚在中间的一个圈子里，使人为之炫目，人们迷失方向，人们找不到街道和房子，一旦进入这里，人们就再也不会出现；在一个较大的圈子里，还是很狭窄拥挤，但不再有源源不断涌出的光，这里有昏暗的小巷，暗藏的通道，甚至有一些小广场，卧在朦胧和清凉之中；再外面的一个更大的圈子里，这里的光线已是那么的分散，以致人们必须去寻找它，庞大的城市笼罩在冷灰色的色调中；再往外就是宽广的原野了，光线暗淡，一派深秋色彩，光秃秃的，从来不见哪怕一点儿来自空中的光一闪而过。

这城市里始终是凌晨，几乎还没有开始的早晨，天空呈现一片呆板的、几乎不见空隙的灰色，街道空旷、洁净、寂静，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个没拴好的窗扇在缓缓地晃动着，不知什么地方有块从某个阳台垂到最底层的布的底端在飘动，不知什么地方有个窗帘在一扇敞开着的窗里轻轻地沙沙响，此外就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有一回人们把一只老虎带到著名的驯兽师布尔松那儿，他要以此表现他驯兽的能力。大驯兽笼有一个大厅那么大，位于远离城市的一大片棚屋群中，人们把关着老虎的小笼子推到了这个大笼子里，然后看守者就退了下去，因为布尔松每回第一次与一头野兽接触时都希望没有旁人在场。老虎静静地躺在那儿，它刚被喂得饱饱的。它打了个小小的哈欠，疲倦地看了一眼新的周围环境，马上就睡着了。

在我们的古籍中有一份这么写道：

一些人诅咒生命，并因而把不出生或者战胜生命看成是最大的或唯

一无欺的幸福，他们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对生命的判决……

从我们民族的古代历史中有关于可怕的刑罚的传说流传下来。但这并不能用来为当今的刑罚体制辩护。

一个人怀疑皇帝是上帝的化身，他说，皇帝理所当然地是我们最高的主人，他不怀疑皇帝是上帝派来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只是怀疑上帝化身一说。这些话当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假如海浪把一滴水抛到岸上，对海洋永恒的波浪运动并无影响，而且不如说这是波浪运动本身所规定的。

一个人被带到了皇帝所在城市的一个法官面前，他否认皇帝是神的化身。士兵们把他从他的家乡押到这里用了足足几个星期，他累得几乎无法坐着，两颊深陷，并且……

人们羞于说，那位皇家军队上校是靠什么统治我们这座小山城的。我们如果想要动手，马上就能解除他那几个士兵的武装，即使他能够召唤援兵来（他哪能召唤呢？），那也几天、几个星期都来不了。也就是说，他的处境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顺从，可他既不通过残暴手段来迫使我们，也不通过献殷勤来拉拢我们顺从。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容忍这令人憎恶的统治存在下去呢？毫无疑问：仅仅由于他的目光。当人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一个世纪前这是我们这儿的长老们的议事厅），他一身戎装坐在写字台旁，手里握着钢笔。他不喜欢客套或甚至演戏，他不会继续写下去，让来访者干等着，而总是立即中断工作，身子靠回到椅背上去，当然钢笔仍然攥在手里。于是，他便以这斜倚着的姿势，左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来访者。来访的请求者的印象是，上校看着的不仅仅是他这个短暂地从人丛中冒出来的陌生人，否则上校为什么要这样仔细地、长时间地、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呢？再说，这也不是一种尖锐的、有穿透力的目光，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浮动的、然而却又绝不移开的眼光，这是一种人们观察远处一群人移动时的那种目光。不间断地伴随着这种长时间的目光的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会儿像是嘲讽，一会儿又像是恍恍惚惚地沉浸在回忆之中。

一个转折。答复等待时机地、战战兢兢地、满怀希望地回避着问题，在它那冷若冰霜的脸上拼命寻找着机会，通过最没有意义的途径（也就是尽可能避而不答的途径）跟随在问题的后面。

一个秋日夜晩，天气晴朗而微凉。一个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的动作、服饰和轮廓全都模糊不清，一出来就想向右拐去。女房东穿着一件宽敞的女式旧大衣，倚在一根门柱上，对他悄悄地说了些什么。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却摇了摇头，继续向前走去。穿过电车轨道时，他由于没注意而挡住了电车的路，于是电车从他身上压了过去。疼痛使他的脸和浑身的肌肉都抽紧了，以致电车过去后，几乎无法使缩小了的脸和抽紧了的肌肉再松开。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看见在下一站有个姑娘下了车，转过身来招手，往回跑了几步，又停下了脚步，重新钻入了电车。当他经过一个教堂时，台阶上站着一个牧师，向他伸出手来，身子弯得那么靠前，几乎有一个跟斗栽下来的危险。但他没有去握那只手，他对传教士历来反感，那些孩子也使他恼火，他们在台阶上就像在一个游戏场上那样窜来窜去，互相喊着粗话，这些话的意思他们当然并不懂，他们只是吸收，因为没什么更好的东西——他把他上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继续走他的路。

在教堂前的台阶上，孩子们像在一个游戏场上一样跑来跑去，互相喊着粗话，这些话他们当然并不懂，他们只是吸收，就像婴儿吮吸棒头糖那样。一个教士走了出来，他把身后的僧衣撸平，在一个台阶上坐了下来。他想要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因为他们的叫喊在教堂里都能听见。可是他只能不时局部地做到这点，他把一个孩子拽到身边，那一群孩子却总是抓不住，他们仍然毫不考虑他的存在而继续玩耍着。他看不出这场游戏玩的是什么，即使努力从最遥远的孩子意识出发去看也看得出来。就像往地上拍的球一样，他们不知疲倦地，似乎也毫不费力地在所有台阶上蹦跳着，互相之间除了那些呼喊外不存在任何联系，这令人感到乏味，催人入眠。在昏昏入睡之际他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小姑娘，把她前面的衣服稍稍打开了一些——为此她开玩笑地轻轻打了他一个耳光——在那儿他看见了一个信号，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正是想到了的信号，于是他叫了一声“啊”，推开了这个孩子，喊了一声呸，吐出口水来，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十字，急忙向教堂里跑去。在门口他和一个年轻的女人撞在了一起，她赤着脚，穿着一条镶着白色图案的红裙子，一件白色的、衬衫式的、前面不经意地敞开着的胸衣，棕色的头发随便地盘着。“你是什么人？”他叫道，他的声音里还含着孩子们给他带来的激动。“你的妻子爱密丽尔。”她轻轻地说，慢慢地靠在他的胸口。他不再做声，倾听着她的心跳。

这是个平常的日子；它向我露出了牙齿，我也被牙齿给缠住了，无

法脱身；我不知道它们是靠什么缠住我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咬合；我看到的也不是整齐的两排牙齿，而只是这儿几个，那儿几个。我想要抓住它们，从它们上面翻越出去，可就是办不到。

你来得太晚了，刚才他还在这儿，秋天他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那昏暗的无边际的原野吸引着他，他有点乌鸦的气质。你若想见他，那就飞到原野上去，他一定在那里。

你说我应该继续往下走，可我已经在很深的深处了，如果非要那样不可，那我宁可留在这儿。这是什么样的空间啊！也许已经是最深的地方。但我愿意待在这里，但求别强迫我继续走下去。

在这个形象面前我一筹莫展，她坐在桌边，看着桌面。我围绕着她转圈，感到被她扼住了脖子。第三个人在围着我转圈，感到被我扼住了脖子。第四个人在围绕着第三个人转圈，感到被他扼住了脖子。就这样一直延伸开去，直到星星的运动，以至更远。一切都感觉到颈部的被扼。

这是什么地方？我认不出来。那里一切互相呼应，一切柔和地互相融合。我知道这地方存在于某处，我甚至能看见它，可是我不知道它在哪儿，我也无法接近它。

用最强的光能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目光前它会变得牢固，在更弱的目光前它会获得拳头，在再弱的目光前它会害羞，因而把敢于注视它的人打得粉碎。

那是一个小池塘，我们在那儿饮水，肚子和胸部贴着地，由于狂饮的疲惫，前肢无力地浸泡在水中。可我们必须马上回去，考虑问题最多的那位忽然一跃而起，叫道：“回去啦，弟兄们！”于是我们便往回跑。“你们上哪儿去呀？”他们问我们。“在小树林里。”“不对，你们在小池塘那儿。”“不，我们没在那儿。”“你们身上还滴着水哪，骗子！”

鞭子挥舞起来了。我们在长长的充满月光的走廊里猛跑，不时有一个挨上鞭子，疼得一蹦好高。到了先祖廊那儿，追逐结束了，人们带上了门，把我们单独关在这儿。我们大家依然十分口渴，便互相舔着毛皮上和脸上的水，有时沾上舌尖的不是水，而是血，那来自鞭挞的伤口。

只要一句话。只要一个请求。只要空气的一个运动。只要一个你还

活着并在等待的证明。不，没有请求，只有一个呼吸；没有呼吸，只有一个准备；没有准备，只有一个思想；没有思想，只有平静的睡眠。

仍然是坐在那张忏悔椅中。我知道他将如何安慰，我知道他将承认什么。这是些小事，隐蔽的生意，从早到晚的噪音。

我把我的所有归在一起。这很少，可却是轮廓鲜明的、实实在在的、立即能使每个人为之信服的东西。这是六至七件，我说六到七件，是因为里面六件毫无疑问地仅仅属于我，第七件原来也曾属于一个朋友，但他在好多年前离开了这座城市，从此不见踪迹。因此也可以说第七件也是属于我的。尽管这些东西十分独特，可是他们并没有多大价值。

这控告是毫无意义的（他抱怨的是谁），这欢呼是可笑的（窗上的五彩缤纷而已）。显然他只不过想成为第一的祈祷者。但接下来这犹太属性就显得不正派了，接下来他在控告时只需终其一生地反复说：“我——狗，我——狗……”便足够了，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他的。然而沉默不仅足以导致幸福，而且是唯一的可能。

“这不是光秃秃的墙，而是压成墙状的最甜美的生活，一串又一串紧挨着的葡萄。”“我不信。”“尝尝看。”“由于不相信，我不会去尝的。”“那就沉沦吧！”“我不是说过，面对这堵墙的光秃秃，人们必将沉沦吗？”

我像其他人一样会游泳，只是我的记性比别人好，就是忘不了以前的不会游泳。由于我不能忘记，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到头来我还是不会游泳。

再往这座坟墓上放一块小首饰。它已经得到了够多的装饰了吗？是的，可是由于这些东西从我的手中出去得是那么容易……

这就是那个拖着毛茸茸的尾巴的动物，一条长达好几米的尾巴，就像狐狸那样的。我很想把这尾巴抓到手里，可是办不到，这动物老是动个不停，尾巴老是甩来甩去。它像一只袋鼠，但它那几乎像人一样扁平的、椭圆形的小脸上无特点可言，只有它的牙齿颇有表达力，无论是遮掩着还是龇咧着。有时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动物想要训练我，要不然它为什么总是在我下手去抓的时候把尾巴抽开，然后又静静地等着，直到我再度受到诱惑，它又一次跳走呢？

预感到有人要来，我便瑟缩在一个屋角，把长沙发横在我的前面。现在如果有人进来，一定会认为我神经不正常，可是真的走进来的这个人却没有这样认为。他从他的长筒靴中抽出他的驯狗鞭子，在他周身一个劲儿地挥舞，跳起来，又叉开两腿落在地上，喊着：“从角落里出来！还想躲多久？”

一辆载尸车在国土上游荡，车上装着一具尸体，但却没有在公墓前卸下，马车夫喝醉了，他以为他赶着的是一辆载客马车，但是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他却忘记了。他赶着车穿过一个个村庄，在一家家酒馆前停下，当醉意中偶尔闪现对前往目的地的忧虑时，他希望在什么地方能够有一些好人把所有必要的信息告诉他。就这样，有一次他停在“金鸡酒家”门口，要了一份烤猪排……

我看到远处有一座城市，这就是你说的那座吗？

有可能，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辨认出那里是一座城市的。你指给我看后，我才看到那里的有些东西，但我看到的也只不过是雾中一些朦胧的轮廓而已。

喔，没错，我是看见了，那是一座山，山上有一个城堡，山坡上是一片像村落似的房子。

那就是那座城市了，你说对了，它本来就只是一个大村庄。

我不断地迷失方向。这是一条林中小路，可是十分容易辨认，只有在上空看得见一线天空，其他地方全都是林木茂密，一片昏黑。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断地、绝望地迷失着方向，而且，一旦我离开这条路一步，便意味着深入林中一千步，绝对的孤独，我真恨不得倒下去，永远不再爬起来。

“你总是说到死，但又不死去。”

“我确实将要死去。我只是在唱我的终了歌。一首歌长一点，另一首短一点。区别总是只差几句话。”

一个守卫！一个守卫！你在守卫什么？是谁派你来的？比那躺在石头底下，刚刚醒来的蛙墙水虱，你只多一样东西，那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厌恶。

你尽管使劲让蛀墙水虱理解你吧。一旦你告诉水虱应该怎么回答关于它的工作的意义的问题，你就等于是剿灭了水虱一族。

生活是一种持续的引开，它甚至不让你去想，它是从什么地方被引开的。

奇怪的是连最保守的人也能使自己的追求达到极致。

有些苦行僧是贪得无厌者，他们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绝食，想以此达到以下目的：

1.有一个声音说：够了，你斋戒得够了，现在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吃东西了，而这不算做你吃东西。

2.这同一个声音要同时说：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在压力下奉了那么长时间的斋了，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怀着快乐来奉斋，这将比食物更甜美（同时你也将真的吃东西）。

3.这同一个声音要同时说：你战胜了世界，我给你解除它，解除吃和斋戒（可是你将同时既斋戒又吃东西）。

同时，那个从不间断对这些苦行僧说话的声音也在回响：尽管你斋戒不彻底，可是你有良好的意志，而这就够了。

你说，你对此不能理解。但你还是不妨试着去理解它，把它称为疾病吧。这是心理分析学家们自以为发现了的许多病理现象之一。我不把这称为疾病，而将心理分析学的治疗学部分视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误区。所有这些所谓的疾病，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可悲，都是信念实体，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在某一块母亲之土上扎下的根；同样，心理分析学认为宗教的起源也无非在于单个的人的“疾病”之中。当然今天没有宗教的共同体，分支不计其数，而多半又局限于单个的人，可是这种看法也许跟受现实局限的视野有关。这种在真实的土地上的扎根也许并不是人的单个的财产，其实质是有先例的，而其后还将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改造其实质（也包括其肉体）。难道要对此进行治疗吗？

就我的情况而言可以设想三个圈子，最里面的A.圈，然后是B.圈，然后是C.圈。核心的A.向B.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自我折磨，这样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他要自暴自弃，为什么他不能生活下去。（从这个意

义上看，比如说狄奥根尼^[53]不是毛病很重吗？我们中有谁在亚历山大辉煌的目光下会不感到幸福呢？狄奥根尼却玩命地求他让出阳光来。这个桶里装满了幽灵。）C.，这个行动者，不再得到任何解释，B.仅仅是可怕地向他下达命令；C.在严厉的压力下行动，可是与其说出于理解，不如说是出于害怕，他满怀信任，他相信A.向B.解释了一切，而B.正确地理解了一切。

我坐在一个水手酒店门外的一张桌子旁，我前方几步就是那个小码头。这时天色已近黄昏。一艘笨拙的渔船在近处驶过，从唯一的舷窗中有灯光透出，甲板上有一人正在拨弄着帆，这时他停了下来，看着我。

“能带上我吗？”我喊道。他清楚地点了点头。我一下子就蹦了起来，小桌子摇晃不已，咖啡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又问了一遍：“回答我！你能不能带上我？”“行。”他抬起头来拖长了声音答道。

“靠岸！”我喊道，“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我提上你的箱子吗？”走了过来的酒店主人问道。“不，”我说，我心中涌起厌恶，我看着店家，好像他侮辱了我似的，“你不会愿意去把我的箱子拿来的。”……

“你们为什么还没有用上机器设备？”我问道。“这个工作太细致了，机器干不了。”工头说。他坐在一个像粮仓似的大型木建筑的角落里一张小桌子旁。从昏暗的高处垂下的一根电线上挂着一盏光线特别亮的灯，距离桌面特别近，以致工头的脑袋都快碰到了灯上。桌上放着工资表，工头正在核对。

“我一定打扰你了。”我说。“不，”工头漫不经心地说，“可是你看到了，我还有工作要干。”“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我叫来呢？”我说，“要我到这树林子深处来干什么呢？”“省省你的问题吧。”工头说，他几乎没听我在说什么。但他接下来发现了这是不礼貌的，抬起头来，笑着对我说：“这是我们这里的口头禅。我们这里问题多得快溢出来了。可是工作和回答问题同时进行是做不到的。谁懂得用眼睛看，就没有问的必要。而且，如果你对技术有兴趣，在这里能得到足够的乐趣。霍拉茨！”他向房子里的暗处喊道，从那里只能听到一两把锯子吱吱嘎嘎的声音。

一个年轻人出现在灯光中，似乎有一点不情愿的样子，我觉得。“这位先生，”工头用钢笔指着我，“在我们这里过夜。明天他将看看我们的

企业。给他吃的，然后带他到他睡觉的地方去。听明白我的话了吗？”霍拉茨点了点头，他看来听觉不太好，至少从他听工头说话时把头往下伸过去可以看出。

“你从来不从这口井的深处提水。”

“什么水？什么井？”

“是谁在问？”

“静默。”

“是什么静默？”

我的渴望是远古的时代，

我的渴望是当前，

我的渴望是未来，

我带着这一切在路边警卫小屋中死去，

一口直立的棺材，从来就是

属于国家的一件财物。

我以此度过了我的一生：

克制自己，勿去打碎它。

我的一生就是在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中度过的。

你必须用脑袋顶穿墙。顶穿它并不难，因为它是一张薄薄的纸做的。困难的是，不要被已经画在墙上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去顶的启示所迷惑。那会引诱你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是不停地在顶穿它吗？”

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有些人感觉到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可是没有人知道。我执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说我有点儿漫不经心，可是不多。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斗争得比其他人多，大多数人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就像在做梦时挥手赶走某个现象那样，可我确实是挺身而出，经过对如何充分利用我所有的力量的考虑而斗争着。为什么我

会从这看上去闹哄哄、可是一涉及这方面就静得让人害怕的人丛中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会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来呢？为什么我现在会列在头号敌人表上呢？我不知道。过另一种生活让我感到没有生活的价值。战争史上把这种人称为天生的战士。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并不渴望胜利，并不是作为斗争的斗争给我带来快意，它只是作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给我带来快意。作为这么一种东西它给我的快意比我实际上能够享受到的多，比我能够奉献的多，也许我将不是在战斗中，而是在这种快意之中沉沦。

这些是些陌生人，却又是我自己的人。他们刚得到释放，在被释放者的那种无知觉状态中滔滔不绝，有那么点儿陶醉，没有片刻时间来互相重新认识。他们互相说话时就像是一个主人对另一个主人那样，每个人都对另一个人强调其自由和权力。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改变，观念还是那些，动作和目光也同以前一样。当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无法抓住它，如果我说是被释放状态，那只能是一种应付性的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感觉到自己是被释放的人呢？所有的圈子和支派网络都保留了下来，每一个人和全体之间的紧张状况未受到破坏，每个人都仍然在他的位置上，都准备投入交代给他的斗争之中，你还要想问他想干什么吗？与以前的区别究竟在何处呢？我像一只狗似地围着他们嗅了半天，却仍然找不到那个区别。

当野外工人晚上收工回家去时，他们在路面斜坡上看到一个缩成一团的老人。他半睁着眼睛在打瞌睡。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喝醉了，可他并没有喝醉。看上去，也不像生病了，也不是受着饥饿的折磨，也不是受了伤而筋疲力尽，至少他对所有这些问题一概报以摇头。“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人们终于问道。“我是一个大将军。”他头也不抬地说道。“原来如此，”人们说，“原来这就是你的痛苦。”“不，”他说，“我真的是的。”“没错，”人们说，“要不然你又能是谁呢？”“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他说，“我是上将。”“你瞧，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是想提醒你，在这儿夜里会冻坏的，所以你应该离开这儿。”“我走不了，再说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你为什么走不了？”“我走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是我能走，我在那一瞬间又将成为位于我的军队中的将军。”“他们把你扔了出来？”“扔一个将军？不，我是掉了下来。”“从哪儿掉下来？”“从天上。”“从那上面？”“对。”“你的军队在那上面？”“不。可是你们问得太多了。走你们的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巩固。在店里我们有5个人，会计是个忧郁的人，他像个青蛙似的趴在主账簿上，绝对安静，只有吃力的呼吸有节奏地把他的身体抬起抬落。再就是那个伙计，这是个有着运动员般宽阔胸脯的小个子，只要一只手撑在案子上，他就能轻巧而姿态美妙地一跃而过，只是他的脸色在这时显得很严肃，严厉地巡视四周。我们还有个女店员，一个老小姐，纤细温柔，衣服合体，大多数时候她的脑袋总歪在一边，以她那大嘴薄唇微笑着。我这个小学徒除了拿着抹布在案子上东按一下西按一下外，没别的要做的。当我们的小姐把她那长而弱的、干燥的、木头颜色的手漫不经心地搁在案板上时，我经常想要去抚摩它，甚至去吻它；或者，这是最理想的，把我的脸放在那个好地方，不时地改变一下位置，以便能保持舒服的姿势，而且每一边脸颊都能享受到这只手。可是这从来没有发生过，每当我靠近这位小姐，她总是偏偏就伸出这只手，给我指出一个新的工作任务，要不就是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要不就是在梯子上方。后者尤其不舒服，因为那上面由我们用来照明的煤气火焰散发出来的热令人难以忍受，而且我也不是不会头晕的人。在那里，我经常感到恶心，有时我以要打扫得特别干净为理由，把头伸到一个格子里去，哭上一小会儿；或者，在没有人往上看的时候，我就对下面的小姐发出一通无声的言论，对她大加谴责。虽然我知道，她远远没有决定的权力，无论在这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可是我总是莫名所以地相信，如果她想要这种权力，那么她就会得到，并且对我有利地使用之。可是她不要这种权力，她甚至不利用她本身拥有的权力。比如，她是店员中唯一能让那店仆稍微听点话的人，这个店仆是个特别爱自行其是的人，当然了，他是店里资格最老的，老经理那时他就在这里干了，他参加过这里的许多事，而我们这些人对此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他从这一切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他对一切都比其他人更懂，比如他认为自己能够不是跟会计差不多，而是更好得多地做账，能比那伙计更好地伺候顾客，等等。他说，他仅仅是出于自愿接受了店仆的位置，因为其他任何人，甚至没有能力的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于是这个以前不见得有多强壮，而现在无非是一堆废肉的人便以手推车、箱子和包裹折磨了自己整整40年。他是自愿接受这个工作的，可是人们忘记了这点，新的时期接踵而至，人们不再承认他，店里，在他的周围发生了许多巨大的错误，人们却没让他插手，于是他不得不咽下绝望，同时仍然被束缚在他的沉重的工作上。

他把脑袋转到了一边去，在这样露出的脖子上有个伤口，在火热的血和肉中沸腾着，这是一个闪电击出来的，这个闪电现在仍然持续着。

躺在床上，膝盖微微抬起，在被子的折皱中躺着，显得像一个公共建筑门前台阶旁的一尊石像那样庞大，在活生生地涌流不息的人群中凝固着，却又与这个人群有一种遥远的、由于其遥远而无法描述的关系。

在一个国度中，人们只对一个神群顶礼膜拜，人们称这一群神为：咬紧的牙关。我昨天到了他们的神殿中。一个教士在门外台阶上迎接我。在人们进入那里之前，要进行一种入门仪式，方式是，教士让来人低下脑袋，用其坚硬的指尖迅速在他的脖子往下后划一下。接下来人们就进入了前堂，这里堆满了祭品。前院和神坛所有人都可去，但最里面那间只允许教士和不信神的人进入。“你将看不到许多东西，”教士说，“可是你可以跟我来。”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生活的圈子有多大：一方面人类在其所记得的历史中，始终在言论的洪流中漂浮，而另一方面，只有在人们想要撒谎的那个地方，才有可能发表言论。

坦白和撒谎是一回事。为了能够坦白，人们便编造谎言。人们所是的，是无法表达的，因为这就是人们本身；人们所能够转述的，只是人们所不是的，也就是谎言。只有在大合唱中才可能有一定的真话。

那是一个商店学徒夜校，学徒们得到了一些小算术作业，要求他们现在用书面完成。可是从所有的板凳上发出巨大的噪声，任何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静下心来计算。最安静的是讲台上的老师，他是个瘦瘦的年轻大学生，他拼命使自己相信，学生们正在做作业，因此他可以进行自己的学习，他用大拇指堵着耳朵进行着。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夜校的督学。那些年轻人马上闭上了嘴，尽其一下子放弃所有有趣话题的力量，老师也把课本压在了他自己的本子上。督学还是个年轻人，比那大学生年纪大不了多少，他以疲倦的、显然有点近视的眼睛扫视着课堂。然后他登上了讲台，拿起课本，不是为了打开它，而是为了亮出下面压着的本子，接着他示意老师坐下来，他自己也在半挨着老师、半对着他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于是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全班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后排还站了起来，为了能看得清楚些。

督学：看来这里什么也没在学。我在楼下都听到了这里的噪声。

老师：班里有几个非常不听话的年轻人，可是其他人在做他们的算术作业。

督学：不对，没有人在做作业，您坐在上面学习罗马法律，别的事情也不可能做。

老师：是的，我利用班级里做作业的时间来学习，我想以此减少一点今夜的劳动量，白天我一点没有学习的时间。

督学：好吧，听上去您是无辜的，可是我们要进一步看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这里是什么学校？

老师：商人公会学徒夜校。

督学：这是一个高等学校还是初等学校？

老师：一个初等学校。

督学：也许是最初等的之一？

老师：是的，是最初等的之一。

督学：对了，这是最初等的之一。它比大众学校更低，因为在教材不是重复大众学校的教材的情况下（当然这是值得尊敬的），这里涉及的便是最最初级的东西。所以我们大家，学生、老师和我——督学，都在工作，或者说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义务在最初级的学校之一中工作。这大概是不光彩的吧？

老师：不，没有一种学习是不光彩的。再说这学校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通道。

督学：那么对于您来说呢？

老师：对我来说其实也是的。

.....

这不是牢房，因为第四面的墙完全不存在。当然，如果设想一下，这一面的墙也是砌好了的，或者有可能砌好，那将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我所处的这个空间深仅一米，只比我高一点，简直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石头棺材。只不过它暂时没有被砌死，我可以自由地把双手伸出去，如果我抓住顶上的一个铁钩子，我还能小心地探出头去，当然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小间离地面有多高。它好像很高很高，至少我

目力所及的下方只见灰蒙蒙的雾气，向左，向右，向远方望去，都是这种情景，只有上空似乎雾气不那么浓。这种景观就像在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从一个塔上望出去那样。

我感到疲倦，便在边上坐了下来，让双脚自由地下垂。讨厌的是，我偏偏赤裸着身子，要不然我就能把内外衣物一件一件地打上结连接起来，一头固定在上面那钩子上，缘着另一头就能在小间外面往下坠落一大段距离，或许能探出点什么名堂来。话又说回来了，幸亏我没有这么干，因为我必然会怀着不安的心情去着手，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最好还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干。这个小间空空荡荡，由光秃秃的墙壁围绕着，偏偏后地面上有两个洞。位于一个角上的洞是用于解手的，而在另一个角上的洞前放着一块面包，一个拧上了盖子的盛着水的木桶，我的食物就是从那儿塞进来的。

我本来对蛇并没有反感或甚至畏惧。直到现在，畏惧才事后潜入我心中。从我的状况看这也许是必然的。首先，在这整座城市里，除了展览馆或者个别商店里，根本就没有蛇，可是我的房间里它们却无处不在。事情是这么开始的，晚上我坐在我的桌边写一封信。我没有墨水瓶，而用一个大瓶子以代之。我刚要把笔再次伸进去，却看见一个小而柔的扁平脑袋在瓶颈里探起。它的身体在瓶子里下垂。下部消失在激烈运动着的墨水中。这很奇怪，可是我马上停止了凝视，因为当我想到，这可能会是一条毒蛇，因为它的舌头吞吐得很让人怀疑，而且有个吓人的三色的星……

情况并非是：你被埋在了矿井里，大量的岩石块把你与世界及其光线隔离了开来；而是：你在外面，想要突破到被埋在里面的人那儿去，面对着岩石块你感到晕眩，世界及其光线使你更加眩晕。而你想要救的那个人随时都可能窒息，所以你不得不发疯一样地干，而他实际上永远不会窒息，所以你永远也不能停止工作。

一个小聚会在柱子擎起的屋顶下的平台上进行。走下三级台阶就是花园。天上正是满月，这是个六月的夜晚。大家都很快活，我们对一切发笑；当远处有一只狗叫起来，我们就为之大笑。

“我们的路走得没错吗？”我问我们的导游，一个希腊犹太人。在火炬的光照中，他向我转过他那苍白、柔和、悲伤的脸来。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路上，对他似乎完全是无所谓的。我们怎么会找他做我们的导游

的呢？到现在为止，他没有领我们穿过罗马时代的地下墓穴，而只是默不做声地跟着我们，无论我们往哪儿走。我站了下来等着，直到我们这一小队人全部聚集在一起。我问，是否有人掉队，没有任何人掉队。我对此不得不感到满意，因为这里面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在异乡，我们互相拥挤着跟着导游向地下墓穴走下去，这时我才开始试着与他们结识。

我有一把强有力的锤子，但我没法用它，因为它的把烧得火红。

许多人绕开西奈山而行。他们的话听不清楚，他们不是滔滔不绝，就是叫喊着，要不就是沉默不语。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沿着一条宽阔的、平整的新建的路笔直往下走，这条路能够使他们的脚步变大变快。

写作乃祈祷的形式。

屈劳和布拉格的区别。那时我斗争得难道还不够吗？

难道他斗争得不够吗？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便已经成为了失败者；这点他是知道的，他坦率地说：只要我停止工作，我就完了。那么他开始工作是个错误吗？几乎谈不上。

他以为自己塑造了一座塑像，可实际上他始终在击打着同一个刻痕。出于固执，或更多地是出于绝望。

精神的沙漠。你以前和你以后的日子的骆驼队的尸体。

什么都没有，只是图像，仅此而已，彻底的忘怀。

在那沙漠旅店中从来就无觉可睡，那里没有任何人睡觉；可是人们既然不在那里睡觉，那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为了让驮人驮物的牲口得以休息。这只是一个地方，一个极小的绿洲，可是这片绿洲完全为这家旅店所覆盖，这家旅店是极大的。一个陌生人的要想摸清那儿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儿的建筑方式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比如，人们跨入第一个院子，看到前面有两个相距十米左右的圆拱门通往第二个院子，穿过一个圆拱，进入的不是想象中的另一个大院子，而是一个四周围墙高耸入云的阴暗的小空场。在很高的地方才看得到有光线透出的内阳台。这时人们认为一定是走错了，想要回到第一个院子里去，但凑巧走的不是刚才进来时通过的那个圆拱，而是第二个圆拱。可这回人们来到的不是第一个院子，而是另一个更大得多的院

子，充满了喧哗、音乐和牲口的吼叫。这么看来是走错了，于是人们又回到那个昏暗的空场去，穿过第一个门拱；可是没用，人们又回到了第二个广场上，必须穿过几个院子，才能到达第一个院子，实际上离开那里只不过几步路。令人不快的是，第一个院子始终挤满了人，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看上去几乎让人认为，这第一个院子里住的是长期的房客，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住着的只有骆驼队，谁又愿意和能够在这一片污秽和噪声中生活呢？这片小绿洲所能提供的无非是水，而它距离那些较大的绿洲都很远，常年地生活在这里是谁都办不到的，除非这家旅店的主人和他的雇员，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和听到过他们，尽管我到那里去过几次了。也很难设想，如果这里有一个店主，他竟会允许那里日日夜夜充满这样混乱的情景，甚至暴力行为。我倒是有这么一种印象，那里统治着的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骆驼队，然后其他骆驼队按其强大的程度依次往下排列。当然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一切。比如入口的大门一般是锁死的，给来或去的骆驼队打开这道门，每回都几乎像节日一般，这个过程是通过繁琐的方法实现的。骆驼商队经常在外面炎炎烈日下站了几个小时，人们才给他们开门。这虽然明显是一种专横行为，可是根本就找不到原因何在。于是人们站在外面，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这座陈旧的大门的门框。围着门有两三排吹着号的天使的浮雕；正好在门拱上，天使的一把号往下探出很长一段。进门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地牵着牲口绕过这把号，以免撞上它，很奇怪，整个建筑是这样的破败，这一美妙的艺术品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损坏，甚至连那些在门外等了那么久，从而怒火填膺的人也没有破坏了它。也许原因在于……

这是一种位于布景中的生活。天很亮，这是野外的一个早晨，然后马上就黑了下来，已经进入了夜晚。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骗局，可是只要人们还站在台上，就必须适应于它。只有向后突破是可以的，如果人们还有足够的力量的话，割开幕布，在画出的天空的破布中穿过，越过一些破板烂木，逃入真实的狭窄的黑暗的潮湿的小巷中去，这里尽管由于距离剧院很近而被称为剧院巷，但却是真实的，并具有真实所应有的一切深度。

“你要用这段弯曲的树根吹奏笛子吗？”

“我本来不会想到这个主意的，但由于你希望这样，所以我愿意这么做。”

“我希望这样？”

“是的，你看到了我的手就自言自语说，任何木头都不会抗拒，都会按照我的意愿发声。”

“你说得对。”

一条鱼在中段水流中游动，胆怯而喜悦地向下看着，那里可以缩紧身躯在深深的泥中动弹，然后胆怯而喜悦地向上看，那里可以在高高的水层中伸展胸襟。

晚上他猛地带上了他的商店的门，像去一个歌厅似地向上奔去。

你不停地往前跑，拍打着空气的浪花，双手垂在两边犹如鱼鳍，在急速运动的半睡眠状态中你的目光掠过你所经过的一切，但这时也得停下来，等车子从你面前驶过。可是你一旦定下身来，以你目光的力量让根长得又深又广——什么也无法将你铲除，这实际上不是根，而仅仅是你凝注的目光的力量——，然后你也将看到不变的昏暗的远方，从那里除了那辆车外不会有别的东西到来，它的车轮滚滚向你驶来，越来越大，在到达你面前的瞬间，它将充斥整个世界，你陷入它温暖的怀抱，就像个孩子窝在旅游车的软垫中一般，它穿过暴风雨和深夜向前驶去。

你们不能将一幅画……

一小群人晚上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喝着茶聚会。一只鸟围绕着他们飞，一只乌鸦，它啄着姑娘们的头发，把尖嘴插入杯子中。他们根本不去管它，唱着，笑着，于是它变得更胆大了……

吃力。“给孩子们教课。”人们对我说。这个小房间里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被挤到墙上，看上去让人害怕，他们当然要抗拒，把其他人往外推，于是人群始终不断地处于运动之中。只有一些个子高出一截的孩子，不必对其他孩子害怕，只有他们静静地站在后墙边，看着我。

鞭挞先生们聚在一起，这是些强壮而不流于肥胖的先生，时刻准备着。他们被称为鞭挞先生，可是鞭子攥在他们手中，站在豪华大厅后壁那里的许多镜子前面和中间。我携着未婚妻步入大厅，这是婚礼时辰。亲戚们从我们对面的一扇窄门中走了出来，旋转着走上前来，里边有许多女人，她们的左边走着矮小的男人们，一色身着礼服，扣子扣得高高

的，迈着碎步。有些亲戚出于对我的未婚妻的惊讶抬起手来，但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寂静。

在一个星期天散步时，我出城后走得很远，大大超出了原先的打算。在一个高地上立着一棵年代久远，弯曲得很厉害，但并不高大的橡树。它不知为什么会使我想起，现在该是往回走的时候了。这时暮色已经很深。我站在这棵橡树前，抚摩着坚硬的树皮，发现了两个刻在上面的名字。我读了一遍，但没去记住它，我已经不想往前走下去了，可是一种孩子气的执拗却让我至少驻足在这里，为了不要回去。人们有时就会处于这类力量的魔力之中，这种魔力是很容易突破的，这无非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对你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可是这天是星期天，没有什么事情会被耽误，我也已经累了，所以就干什么都不所谓了。这时我认出一个名字是约瑟夫，它使我想起当年一个同名的同学来。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小个子，也许是班里男生中个子最小的，有几年他就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他长得很丑，尽管我们那时还不太懂得评价美丑，而更懂得评价力量和灵巧（这两点他都具备），已经觉得他很丑了。

我们跑到房子前。那里站着一个拿着手风琴的乞丐。他穿着一件长袍似的衣服，底下千丝万缕，就好像那块布料当初不是从布匹上裁下来，而是愣使劲扯断了似的。这似乎是造成这个乞丐迷惘的神色的原因之一，这神色就像是睡得正香时被叫醒，怎么努力也摸不着头绪那样。好像他不断地睡着，又不断地重新被人叫醒。

我们这些孩子不敢对他说话，像平时那样请一个乞丐唱一首歌。他不断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们，就像他虽然发现了我们在他的面前，可是始终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认出我们来。

我们一直等到父亲到来。他在后面的工场里，穿过长长的走廊用了不少时间。“你是什么人？”他在隔壁房间里大声而严厉地问道，他的目光显得不太高兴，也许他对我们在这个乞丐面前的表现不满意，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干，无论如何还没有坏了事。我们变得更安静了。整个环境本来就特别安静，只有我们房子前的菩提树在沙沙响。

“我从意大利来。”这乞丐说。可是这不像是回答问题，而像是在认罪，就像是他认出我们的父亲是他的主人似的。他把手风琴贴在胸前，仿佛这是保护他的……

他用上牙紧紧地咬住下唇，目注前方，一动不动。“你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的生意不算太好，可也并不糟糕。再说，即使破了产——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你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出路，你又年轻又健康，学过经济学，人很能干，需要你操心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母亲，所以我请求你振作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大白天把我叫来，又为什么这个样子坐着？”接着出现了小小的间歇，这时我坐在窗台上，他坐在屋子中央一把椅子上。他终于开口了：“好吧，我这就都告诉你。你所说的全都没错，可是你想想：从昨天开始雨一直下个不停，大概是从下午5点开始的吧，”他看了看表，“昨天开始下雨，而今天都4点了，还一直在下。这本来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的事。但是平时街上下雨，屋子里不下，这回好像全颠倒了。你看看窗外，看看，下面是干的，对不对？好吧。可这里的水位不断地上涨着。它爱涨就涨吧。这很糟糕，但我能够忍受。只要想开一点，这事还是可以忍受的，我只不过连同我的椅子漂得高一点，整个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所有东西都在漂，只不过我漂得更高一点。可是雨点在我头上的敲打使我无法忍受。这看上去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偏偏这件小事是我无法忍受的，或者不如说，这我也许甚至也能够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仅仅是我的束手无策。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我戴上一顶帽子，我撑开一把雨伞，我把一块木板顶在头上，全都是白费力气，不是这场雨穿透一切，就是在帽子下，雨伞下，木板下又下起了一场新的雨，雨点的敲击力丝毫不减。”

我站在矿山工程师面前，在他的面前。这是个搭在寸草不长的、泥泞的、匆匆填平的地上的木棚。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悬在写字台中央上方。“您打算做工？”工程师问道，他的左侧额角用手支着，右手拿着一支笔，搁在一张纸上，这不是问题，他只是自言自语。这是个弱质的年轻男子，中等以下身材，他一定是非常疲倦，双眼看来是天生的又小又窄，可是看上去像是他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们完全撑开。“您坐吧。”然后他说道。可是这里只有一个一侧撬开了的木箱，人们是从那里把小机器部件取出来的。我在这个箱子上坐了下来。现在他的身子完全离开了写字台，只有右手仍然保持原来姿势放在那里，身体的其他部分已靠回到椅背上，左手插在了裤子口袋里，他就这样看着我。“谁让你来的？”他问道。“我在一本专业杂志上读到，这里要人。”我说。“原来这样，”他微笑着说，“您是读到了这么一段东西。可是您是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开始的。”“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这意思就是，”他说，“这里不要任何人。如果不要任何人，那么也就不会要您。”“当然，当然，”我说着生气地站了起来，“要知道这一

点，我根本就没有坐下来的必要。”可是接下来我想了想，问道：“我不能在这里过夜呢？外面在下雨，而村子到这里有一个小时的路。”“我这里没有客房。”工程师说。“我不能待在这办公室里吗？”“我在这里工作，而且就在那里，”他指了指一个角落，“睡觉。”那里确实放着被子，下面垫了一些干草，可是那里还堆着那么多看不清是什么的东西，主要是工具，以致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那是睡觉的地方来。

……让我把他扶起来。我照办了，他说：“我正在旅行，您别打扰我，解开您的衬衣，把我靠近您的身体。”我又照办了，他迈出了一大步，便消失在我体内，就像消失在一栋房子里。我伸展身躯，好像受到了挤压似的，几乎晕了过去，我撂下铲子，走回家去。在家里，一些男人坐在桌边，就着同一个大盘子在吃东西，那两个女人分别在灶台和涮洗桶旁。我一进门就开始述说我碰到的事情，边说边跌坐在门边的一个凳子上，所有人都站到了我的身边。人们到附近的庄园去叫一个阅历丰富的老头儿。在人们等待他的时候，孩子们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们互相伸出手来，手指相交……

这是一条河流，一片混沌的水，它非常地急迫，然而又似昏昏欲睡，过于有规则，推着低低的、无声的浪向前翻滚。

一位骑手驰骋在林中小道上，他的前面跑着一条狗。他的后面跟着几只鹅，由一个小姑娘用枝条驱赶着。尽管从前面的狗到后面的小姑娘，大家都在尽快地向前赶路，但速度并不是很快，每一位都能轻而易举地跟上。此外，两边的树也在跟着跑，好像总有点不太情愿，疲惫不堪的样子，这些老掉牙的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撵上了小姑娘，这是个游泳运动员，他以强有力的动作游着，脑袋深深地埋在水里，因为水在他的四周波涛起伏，而且无论他怎么游，水总是跟着他流动。接着是一个木匠，他得送一张桌子上门，他把桌子扛在背上，前面那两条桌腿牢牢地攥在手中。跟在他后面的是沙皇的信使，他由于在林中碰到这么多人而十分不高兴，他不时伸长脖子向前张望，看看前面何处是尽头，为什么大家都行进得这么慢，慢得令人讨厌，可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他可以超过前面的木匠，可又怎么通过围绕着游泳运动员的那一片水呢。奇怪的是，跟上信使的是沙皇本人，这是个还算年轻的人，蓄着黄色的山羊胡子，长着线条柔和的圆圆的脸，表露出对生活的愉快心情。这种泱泱大国的缺点在此暴露了出来，沙皇认得他的信使，可信使不认得他的沙皇，沙皇正在借此短距离的散步散散心，可向前走的速度并不比他的

信使慢，他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把邮件送去的。

我跑过了第一个守卫的身边。过后我害怕了，我又跑了回去，对这个守卫说：“我从这里跑了过去，那时你正好转过身去。”守卫注视着前方，默然不语。“我当然不应该这么做的。”我说。守卫仍然不吭声。“你的沉默是不是意味着允许我通行？”^[54]

这里请来两个脱谷者，他们拿着脱谷连枷站在昏暗的谷仓里。“过来。”他们说道。我被放在了脱谷场上。农民倚门而立，一半身子在内，一半身子在外。

牲口夺过主人的鞭子，自己鞭打自己，想要由此成为主人，却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是由主人鞭子上新打的一个结造成的。

人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一旦兴奋起来，从整个图像上看，就好像是在这片沼泽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只小青蛙跳入了绿色的水中。

只要有一个人有能力到达距离真实只有一句话的地方，那么每个人（我也处于这个咒语之中）都能超越真实一百句话之遥。

说实在的，我对这一切并不在意。我躺在角落里，看着，就像人们躺着能看的那样，听着，能听懂多少就听多少，此外，几个月来我就一直生活在暮霭之中，等待着夜色降临。而我的狱友就不同了，这是个不屈不挠的人，曾经是个上尉。我能体会到他的思想观念。他认为，他的处境就像一个北极探险家，被冰雪封在了某个地方，可是一定会得救的，其实应该说，已经得救了，就像人们在关于北极探险的书中可以读到的那样。现在便出现了如下矛盾：他将得救，这一点与他的意志是无关的，仅通过他那无往不胜的身份的分量，他就将得救，可是他能否抱着这样的愿望呢？他有没有这个愿望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总会得救，可是他是否应该抱有这个愿望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个似乎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使他一刻也无法平静下来，他苦苦思索着答案，把它摊开在我的面前，我们一起讨论它。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提出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我们根本不谈及拯救本身。要想自救好像光靠他那把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小锤子就足够了，这是一把只能把钉子钉入画板中去的那种小锤子，更重的活它就干不了了，但他对它也不抱希望，只不过拥有这把锤子这一点使他兴奋不已。有时他跪在我的面前，把这把已经看了千万遍的锤子捧在我眼皮底下，要不就是把我的手抓过去，摊平在地

上，一根根手指挨个砸过去。他明白，用这把锤子他连墙上的土屑都别想砸下一丁点儿来，但他也不作此想，他只不过有时持着这把锤子轻轻地在墙上刮过，就好像这样可以发出信号，指示庞大的、等待着的救援机器开始动作似的。事实上不可能正好是这么回事，拯救行动将根据它自己的时间表开始，跟锤子毫无关系，但它确实是某种东西，某种抓得着的东西，某种保障，某种吻得着的东西，而拯救行动是永远吻不着的。

我对他的问题的答复十分简单：“不，不应该盼望得救。”我不想阐述一般的法律，那是狱卒的事。我仅仅就我自己而言。拿我来说，如果我置身于自由之中，就比如将要到来的拯救会带给我们的那种自由，我将几乎无法忍受，或者说，我真的无法忍受，因为我现在坐在监牢之中。当然，我并非追求监牢生活，而只是笼统地希望离开一切，也许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先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再说。可是那儿的空气是能够呼吸的吗？我是否会像在这监牢里一样不至于窒息而死呢？这么看来，我即使追求监牢生活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时会有两个狱卒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打扑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减轻刑罚的方式。他们多半是傍晚时来，这时我总是有点轻烧，眼睛睁不大开，只是蒙蒙眈眈地看见他们坐在他们带进来的大油灯旁。如果连狱卒们都爱待在这儿，这到底还是牢房吗？可是这种想法并不能使我永远陶醉，囚徒的阶级觉悟很快就会在我的心中苏醒，他们混到囚徒中来意欲何为？他们待在这儿是令我高兴的，有这些强有力的汉子在场，我感到自己有了安全保障，我感到我通过他们而被抬举起来，超越了自己，但我不愿意这样，我想要张开嘴，通过我呼吸的力量，而不是别的什么，把他们吹出牢房去。

当然，人们可以说，被囚使这位上尉精神失常了。他的思想圈子限制得那么小，以致连一个思想都已容纳不下。看来他已经把拯救的问题想完了，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尾巴，仅够用于痉挛地支撑着他不倒下来，但就是这个尾巴有时也被他甩开了，当然他又会伸长脖子去咬住它，然后便满怀幸福和自豪喘息不已。可我并不因此而比他高明，在方法上也许还可以这么说，在某些无关紧要的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其他方面就无从谈起了。

一个雨天。你站在一个水潭的镜面前。不疲倦，不悲伤，没有深思的样子，你只是带着你所有的地球重力站在那里等人。这时你听见了一

个声音，仅仅它的音调，还没听明白其中的言词，已经使你笑了起来。“跟我来。”那声音说。可是周围什么人也沒有，你又跟谁走呢？“我就来，”你说，“可是我看不见你。”接下来你就什么也听不着了。可是这时你等的那个男人来了，这是个身材高大、强壮的人，小眼睛，浓眉毛，胖乎乎有点下垂的脸颊，下巴上的胡子。你觉得好像你肯定见过他。你当然曾经见过他，因为他是你生意上的朋友，你跟他约好了在这里碰头，谈一件生意上的说来话长的前景难测的事情。可是尽管他就站在你的面前，从他那顶老戴的帽子的边缘慢慢地滴下雨水来，可是你还是费了很大劲儿才认出他来。不知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你，你想要把它推开，你想要与这个人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因此抓住了他的胳膊。可是你马上就松开了手，你在发抖，你刚才碰到的是什么？你看着你的手，尽管你什么也看不见，你还是感到恶心，直想吐。你想出了一句道歉的话，也许这什么也不是，因为你说的時候已经把它给忘了。你走开了，笔直向一道房子的墙壁走去——这个人在你的身后喊，也许是一个警告，你挥了挥手——墙壁在你的面前打了开来，一个仆人高举着一盏手提灯，你跟在他的后面。可是他没有把你带到任何住房里去，而是带到了一个药房里。

这是一个大药店，里面有一道高高的半圆形的墙，墙上嵌着几百个一模一样的抽屉。这里也有许多顾客，大多数人手上拿着长长的棍子，他们用这棍子敲打某一个抽屉，就表示要里面的东西。接着店员便爬上去取顾客所要的东西，他们向上爬的动作飞快，可是动作的幅度非常之小，人们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往哪里爬，人们擦拭眼睛之后，仍然看不清楚。这也许只是供人娱乐的节目，要不就是售货员天生如此，不管怎么说，他们身后有浓密的大尾巴从裤子上长出来，就像松鼠的那样，可是要长得多，在往上爬的时候这些尾巴随着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颤动。由于店里的顾客不断地挤来挤去，以致这家商店与街道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人们只能看见一扇关着的小窗，它的右侧可能是通往街道的主要通道所在。透过这扇窗户可以看见三个人，他们完全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以致人们甚至说不出，在他们身后，这条街道上挤满了人还是空空荡荡的。人们主要看到的是一个男人，他吸引了人们大半目光。在他的两边各站着一个女人，可是人们几乎觉察不到她们的存在，因为她们或者是弯着腰或者是蹲了下去或者是正在朝着那个男人那儿倒下去，她们完全成了次要的。相反，那个男人本身有着一一种女人的气质。他很强壮，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脸庞宽大，鼻子下陷，就好像是这个鼻子刚刚被压下去，而两个鼻孔正在为保持它们的通道而辗转挣扎

着，脸颊上布着生动的色彩。他不断地在朝药房里看，动着嘴唇，一会儿向左弯下身子，一会儿又向右，仿佛在寻找店里什么东西。店里也有个男人十分引人注目，他既不要什么，也不为别人服务，挺直了身子在店里走来走去，试图一目了然地看清一切，以两个手指按着不安的下唇，不时看看怀表。他显然是店主，顾客们互相指点着他，他很容易辨认，无数薄薄的、圆圆的、长长的皮带既不太紧，又不太松地纵横交错地缠满了他的上身。一个大约10岁的金发男孩拽着他的衣角，有时也抓住皮带，他请求了什么，而药店主没有同意。这时门铃响了。它为什么响呢？那么多顾客进进出出，它都没有响过，可是现在却响起来了。人群从门边往里退，好像人们事先知道它会响的，甚至好像人们知道得比他们所承认的更多。现在人们终于能看见那个两扇的大玻璃门了。外面是一条狭窄无人的街道，整齐地铺着地砖。这是一个阴雨的日子，可是现在还没有下雨。一位先生刚才从街道过来，推开了门，牵动了门铃，可是现在他又怀疑自己走错了，他退了回去，看了一遍商店招牌，对，没错，于是他又走了进来。他是医生赫罗迪亚斯，人群中每个人都知道。左手插在裤兜里，他向现在独自站在空空荡荡的门内空地上的药店主走去。甚至那个男孩也留在人群那儿，当然是在第一排，睁大着他那蓝色的大眼睛朝那里看着。赫罗迪亚斯说话时有一种微笑的、思索似的方式，脑袋后仰，即使在他自己说话的时候，也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正在倾听着。而实际上他精神总是十分地分散，有些话必须对他说两遍，而要挤到他的身边去也很不容易，他似乎对有人在朝他那儿挤也在发出微笑。一个医生又怎么会不认识药房呢，可是他却四处张望，好像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似的，对那些长着尾巴的售货员他摇了摇头。然后他向药店主走去，在齐肩高的地方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的身子转过来，接着他们俩紧挨着通过往后退让的人丛向药房深处走去。男孩走在他们的前面，不断羞怯地回头看。他们走到柜台后一道布帘前，男孩为他们掀开布帘，然后他们穿过化验室，最后走到一道小门前，由于男孩不敢打开，便由医生打开了这道门。到现在为止一直紧跟在后面的人群有跟进这个房间的危险。可是在这期间挤到了最前面的售货员们转过了身来，无须店主下令，挡住了人群。这是几个年轻人，强壮，但也聪明；他们缓缓地、一声不吭地把人群往后推，这人群其实也并没有打扰的意思，只是身不由己地被后面的人不断地往前推过来了而已。但是一个反动运动开始了。这是那个和两个女人在一起的男人造成的，他离开了那个靠窗的位置，进入了店内，现在想要比其他人走得更靠前。由于人们对这个地方有所顾忌而能够容让，他便成功了。他穿过了售货员，与其说

是用两个胳膊肘，不如说他是用两道迅速的目光把他们给推到一边去的，他带着他的两个女人已经来到了那几位先生身后，他通过他们两个脑袋之间的空隙（他的身材比他们两人高大）向昏暗的屋子里看去。“是谁来了？”一个女人虚弱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别说话，是医生。”药店主回答说，他们走进了房间。谁也没想过把灯打开。医生离开了药店主，独自一人向床边走去。那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靠在病人脚边的床柱边，像靠在一个栏杆上似的。药店主不敢往前走，男孩现在又靠在了他的身边。医生感到受到那三个陌生人的干扰。“你们是什么人？”他问道，出于对病人的考虑而把声音放得很低。“邻居。”那个男人说。“你们想要干什么？”“我们想要，”这男人说道，他的声音比医生响得多……

〔《下等检察官》残篇〕

……追逐畸形人的行动已经让人厌倦，如果真要追逐，那么区法官就是第一个目标。但是为他而恼火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下等检察官也没有对他恼火，他所气愤的仅仅是把这么一个人放到区检察官这一位置上来的愚蠢行为。居然要靠这种愚蠢来维护正义。就下等检察官个人的情况而言，他仅仅担任这么低的职务是令人遗憾的，按照他本身的追求也许让他当上高级检察官都不过分。他应该当上高得多的检察官，以便他能把他目睹的一切愚蠢行为统统有效地送到审判席上去。在控告检察官的时候他将真的不会往下走到低处来，在他那高高的原告席上他将根本就看不到那法官。当然他将在周围造成一种特别好的秩序，以致那个法官在这么好的秩序中无法坚持让他在还没人碰到他的时候就开始膝盖颤抖，最后倒在地上。然后也许就会把这个下等检察官提出的诉讼案从封闭的行政法庭转到公开的法庭大厅中去。这时下等检察官不用再亲自参加，利用更高的权力他突破了束缚他的锁链，而自己君临法庭。他设想，会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他耳边悄悄地说：“现在该是你心满意足的时候了。”于是审判开始了。站在被告席上的行政法院陪审员们当然会撒谎，咬着牙撒谎，他们将以只有法庭的人一旦自己被控告时的撒谎方式撒谎。但是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出色，事实将把一切谎言抖搂出来，自由地、符合实情地在听众面前逐步展开。那里有许多听众，坐在大厅的三面，只有法官席是空着的，人们找不到任何法官，法官们则在平时被告站立的小圈子里挤成一堆，试着面对空着的法官席接受审判。只有公众的原告，即原先的下等检察官，理所当然地在这场，在他以往的位置上。他比以往平静，只是不时地点一下头，一切进展得犹如钟表一般有条不紊。直到现在，在一切书面宣读、证人证言、辩论程序、判决协商和决

断理由都过去了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个案子居然简单得不可思议。事情本身发生在15年前。下等检察官当时在京城里生活，他被承认是个能干的法律工作者，受到上司的钟爱，甚至已经有希望马上就赶在众多的争夺者前面成为这里的第十个检察官。第二检察官表示出对他的特殊好感，甚至在并非不很重要的案子里也作为他的代理。就这样，在一个侮辱国王案中他也代替第二检察官出场。一个店员，一个并非没有文化的，政治上十分活跃的人，在一家酒店里喝得半醉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说出了侮辱国王的语言。一个好像醉得更厉害的坐在邻桌的顾客做了举报，他在醉意中好像认为这样他将做出一件大好事，于是立刻跑去找警察，幸福地微笑着同一个警察一起回到酒店里，把这人交给了警察。后来他当然便坚持他的陈述，虽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最主要的部分，此外，这一侮辱国王言论必然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彻底否定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当时说的话却无法准确无误地得到确定，大多数人认为，被告当时手里拿着酒杯，指着贴在墙上的一幅国王画像说道：“你这个高高在上的无赖！”这一侮辱的严重性只是由于被告当时头脑不清楚的情况而得到了减轻，同时也由于他是把这一侮辱与一句歌词“只要小灯还在燃烧”联系在一起说的，从而使这一叫喊的意义变得朦胧。对于这个叫喊和这首歌的联系几乎每个证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举报人甚至认为是另一个人，而不是被告唱的这首歌。使案情加重的是被告的政治活动，它非常使人相信，即使被告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也会出于绝对的信念说出这种话来的。下等检察官记得非常清楚（他经常回顾这些事情），他当时几乎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接下这个案子的，这并不仅仅因为处理一个国王侮辱案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而且也因为他恨透了这个被告和他的事业。他谈不上有什么旗帜鲜明的政治观念，可是却是十分的保守，他在这方面几乎趋于天真，这样的下等检察官肯定还有一些。他相信，如果大家都平静地、充满信任地与国王和政府心心相系，就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可能；在这种事情中是站在还是跪在国王面前，在他看来都是无所谓的；信任越多，事情就越好办，信任越多，人们就会越是倾向于自然的思想，而免于卑躬屈膝。这种值得追求的状态受到从这个被告的思想窝里钻出来的那一群人的阻碍而难以实现，他们来自某个下层世界，以他们的叫喊把顺从的人民组成的结实的团体崩散。这里面站着一个追求政治目的的人，值得尊敬的店员职务对他来说是根本就不够的，也许由于他从这个工作中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酒资，他长着个巨大的下颚，该下颚在强壮的面部肌肉带动下做出的运动同样是巨大的，他是个天生的大众演说家，他甚至对预审

庭的法官大喊大叫，而这个法官可惜是个神经质的、好激动的人。下等检察官出于对此案的兴趣经常参加预审，这辩论过程简直就是一场无间断的争吵。这一回预审法官跳了起来，下一回被告跳了起来，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发出雷霆般的吼叫。这对于预审的结果当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当下等检察官面临在这一预审的基础上建筑他的起诉的任务时，他必须付出许多劳动和思维，以便使之无懈可击。他整夜整夜地干，然而却是干得心甘情愿。那时是一个个美好的春夜。下等检察官住在底层，房前有个两步宽的小花园。每当下等检察官工作疲劳了，或者滚滚而来的思维需要安静和集中时，他便越过窗口，爬到小花园里，在那里来回踱步，或者闭上眼睛，靠在花园铁栅栏上。他当时对自己抓得很紧，整个起诉他搞了几遍有些部分甚至十遍二十遍。此外，为主审准备的材料多得几乎令人无法参透。“上帝保佑，让我能够理解和使用这一切材料。”在那些夜晚中这是他经常发出的请求。他对起诉的准备工作在他自己看来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谈得上是已经完成了的。所以，当第二检察官在仔细审阅了他的起诉文件后还给他时对他做出了夸奖时，他没有把这夸奖看成是报酬，而看成是鼓励。当然，这个夸奖是很重的，而且来自一个严肃的、话不多的人。下等检察官在他以后的呈文中经常提到这个夸奖，当然并不能使第二检察官回忆起他说过这段话。这话是这么说的：“这个本子，我亲爱的同事，不仅包含起诉，而且从所有的人的前景出发看包含着将您提为第十个检察官的任命。”当下等检察官谦虚地保持沉默时，第二检察官又补充道：“相信我。”当下等检察官前往主审庭时，他脚步坚定，心情平静。大厅里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熟悉这一诉讼的所有细节和关系。辩护律师不危险，下等检察官认识他，这是个老是叫喊，但脑子却不够敏锐的小个子。那天他甚至没有什么斗志，他辩护，是因为他必须辩护，因为这关系到他的党的一个成员，因为也许会有机会发表长篇大论，因为党报对此比较关心，可是使他的委托人脱身而出的希望他根本就没抱。下等检察官还记得，在庭议开始前他怀着一个勉强压下去的微笑看着那个律师。那律师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他本来就没有这种能力，他在他的桌上把一切扔得乱七八糟的；从他的文本中撕下纸来，像一阵风似地马上又在上边写上了几句话，在桌下，他不停地顿着他的小脚，他无时不在无意识地摸他的秃顶，好像在那里寻找什么伤口似的。在下等检察官眼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对手。庭议一开始，他马上蹦了起来，以难听的、带呼哨声的声音提出申请，要求将庭议以公议形式举行，这时下等检察官几乎是迟钝地站了起来。一切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深思熟虑，好像是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加入到属于他一

个人的事业中来，一件按照其性质可以自己进行的事情，不需要法官，不需要辩护律师，不需要被告。他对辩护律师的申请表示同意，他的举动跟律师的举动一样出人意料。可是他对他的举动做出了解释，在他解释的时候，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不是那么多眼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好像要把他拉过去似的，那么人们简直会以为他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厅里自言自语。他得到了人们的信服，这一点他马上就发现了。法官们伸长了脖子，惊讶地互相看着，辩护律师僵直地靠在他的椅子上，好像这下等检察官是刚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被告巨大的牙齿在紧张中互相摩擦，拥挤的听众各自攥着手。他们发现，有一个人把这个多多少少与他们有点关系的事情夺了过去，使之成为他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财产。每个人都相信，可以经历一场小小的侮辱国王事件诉讼，可是现在他们却听到，下等检察官在第一个申请提出后就已经只用几句话把这一侮辱事件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

我从一道边门走了进去，畏畏缩缩的，我不知道情况会是怎样，我个子小而弱，我担心地沿着我的西服往下看，这里光线相当地暗，一段空区以外的东西就已经看不见了，地面上覆盖着草，我开始怀疑是否走对了地方。如果我是从主门进来的，也许就不会有怀疑，可是我是从边门进来的；也许还不如走回去看看门上写着什么，但我相信，门上好像没有字。这时我看见远处露出微弱的银色的光，这给了我信心，我朝着这个方向走去。那是一张桌子，中间放着一盏蜡烛，周围坐着三个打牌的人。“我没走错地方吧？”我问道，“我要到三个打牌的人那儿去。”“那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人说，说话时目光也不离开牌。

树林仿佛在月光中呼吸着，一会儿它收缩起来，变得很小，挤成一堆，树木高耸，一会儿它舒展胸臆，顺着所有的山坡向下展开，成了低矮的灌木，连这都谈不上，成了朦胧的、遥远的影像。

A：“坦率一些！你什么时候还能像今天这样，在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知心朋友陪伴下畅饮啤酒呢？坦率地告诉我，你的强力何在？”

B：“我有强力吗？你所设想的是什么样的强力？”

A：“你想要避而不答。你这不诚实的家伙。也许你的强力就存在于你的不诚实中。”

B：“我的强力！也许就因为我坐在这家小酒馆里，碰到了一个小同

学，他坐到了我的桌边来，于是我便成了强有力的了。”

A：“那么我换一种方式问你。你认为你是强有力的吗？这回你得老老实实回答，要不我马上就站起来，回家去。你认为你是强有力的吗？”

B：“不错，我认为我是强有力的。”

A：“你瞧。”

B：“可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事，任何人都看不到一星半点这种强大力量的痕迹，一点影子都见不着，就连我也见不着。”

A：“可你却认为你是强有力的。那么为什么你会认为自己是强有力的呢？”

B：“我认为我是强有力的，这么说不完全正确。这是夸大其词。就像现在这样苍老地、颓丧地、肮脏地坐在这里的我，并没有认为我是强有力的。那种我相信其存在着的强力并非由我在施加，而是其他人，而这些其他人听我的。这当然只能使我感到十分羞愧，而不能带给我丝毫自豪感。也许我是他们的仆人，他们出于大东主的游戏心理把我视为高于他们的主人，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还不算糟糕，因为一切仅仅是假象。但也许我真的注定是高于他们的主人，那么我这个可怜的、无可救药的老家伙该怎么办呢？我要把杯子从桌子上拿起来，够到嘴边都没法让自己不哆嗦，那么现在我又怎么能够统制得大江大河或者大海呢？”

A：“你看，你是多么强有力，而你却想要瞒着。可是大伙儿都认识你。就算你老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也没用，这儿的老主顾都认得你。”

B：“那倒也是，老主顾们认得许多人，知道许多事，我只听到他们谈话的很小一部分，可我听到的却是我得到的唯一的金玉良言和信心。”

A：“这话怎么说？难道你是根据你在这里听到的话来统制的吗？”

B：“不，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你难道也是那些认为我在统制着的人中间的一个？”

A：“刚才是你自己这么说的。”

B：“我说过这种话了吗？不，我只是说，我认为我是强大的，可是

我并不能操纵这种强力。我不能操纵它，是因为，尽管我的助手们已经来了，可是还没有到他们的岗位上去，而且永远也不会到那里去的。这是些轻浮的人，尽在他们不该去的地方转来转去，他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一切我都得同意，得不断地向他们点头。这样我难道还没有权利说我不是强有力的吗？别把我再看成不坦率的人啦。”

“你的势力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

“你认为我是有势力的吗？”

“我认为你非常有势力，几乎同样令我敬佩的是你施展你的势力时所表现的保留态度，不自私，或者说你在对自己施加这种势力的时候所表现的果断和坚决。你不仅对外谨慎，而且你甚至斗争自己。对你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不想问，这是你自己的财产，我只想问你的势力是从何而来的。我之所以有问这事的权利，我认为是因为我看出了这种势力，至今为止许多人都没能看出，我已经感觉到它的威胁（由于你的自我抑制，它今天还没有走得更远），感觉到其不可抗拒。”

“你的问题我可以很容易地回答：我的势力是建筑在我的两个女人身上的。”

“在你的女人们身上？”

“是的，你不是认识她们的吗？”

“你说的是那两个我昨天在你的厨房里看见的女人？”

“是的。”

“那两个胖女人？”

“是的。”

“这两个女人。我几乎没有注意她们。她们看上去，对不起，像两个女厨子。可是她们不太干净，穿得很随便。”

“对，那就是她们。”

“嗨，你说什么，我总是马上就相信的，只是比起我不知道那两个女人的时候，我现在对你更不理解了。”

“可是这不是谜，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我将试着向你叙述。我跟这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你在厨房里看见了她们，可是她们是很少做饭的，吃的多半是从对面饭店里取来的，这回采西去取，下回就是阿尔巴去取。谁也不反对在家做饭，但这太困难，因为这样她们俩互相不能容忍，我这是说，她们俩相处得非常好，但必须是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比如她们可以几个小时平静地挨着躺在狭窄的长沙发上而不睡，就她们胖的程度而言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可是在干活方面她们互相不能容忍，马上就会爆发争吵，从争吵又发展成揪打。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她们对理智的话是很愿意接受的），尽可能少干活。而且这也符合她们的天性。她们相信已经把房间打扫得特别干净了，而实际上房间里却是特别的脏，以致我踏上门槛就感到恶心，可是只要我走了进去，我也就很容易适应了。

“只要不干活，就不会有任何争吵，尤其是嫉妒对她们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嫉妒又从何而来呢？我几乎无法把她们俩区分开来。也许阿尔巴的鼻子和嘴唇比采西更像黑人的，可是有时我又觉得恰恰相反。也许采西的头发比阿尔巴少一点，阿尔巴的头发本来就已经少得超过了允许的程度了，可是我会对此注意吗？我始终是无法把她俩区分开来。

“我工作完后也是晚上才回到家里，白天只有在礼拜天我才能较长时间地看到她们。我总是很晚回到家里，因为在工作后我总喜欢一个人东游西逛。为了节约，我们晚上不点灯。我真的没有这笔钱，养这两个女人已经用去了我所有的收入，她们有着毫不间断地吃东西的能力。晚上我在黑暗的住处前按响门铃，然后听到这两个女人气喘吁吁地向门边跑来。采西或者阿尔巴说：‘是他。’然后这两人气喘得更厉害了。如果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他非害怕不可。

“然后她们打开了门，而我惯于开个玩笑，门刚开了一道缝，我就钻了进去，同时搂住两个人的脖子。‘你。’一个人说。这意思是：‘你是这么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两个人都用低沉的滚动喉音笑了起来。从这时开始她们只知道跟我纠缠，要不是我抽出一只手来关上门，这道门整个晚上都会开着。

“接下来总是穿过会客室，这是只有几步远却要花上一刻钟的路，这段路上她们几乎是抬着我走。在度过不容易的一天后我真的是累了，我一会儿把脑袋搁在采西的肩膀上，一会儿搁在阿尔巴的肩膀上。俩人都几乎是一丝不挂，只穿着衬衫，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也是这样的，

只有在预告说有客人要来的时候，比如最近你来的那一次，她们才穿上几件褴褛肮脏的破衣服。

“然后我们进入我的房间，她们总是把我推进去，而她们则待在外面，然后关上门。这是一个游戏，因为这时她们为谁先进入而开始了斗争。这不是什么嫉妒，不是真正的斗争，只是游戏而已。我听见她们互相给予的轻而响亮的击打声、喘息声，现在这已经是意味着真正的呼吸困难，不时交换的一两句话。最终我自己把门打开，她们一下子就冲了进来，热烈，穿着撕碎的衬衣，带着呼吸中刺鼻的气味。然后我们倒在地毯上，于是一切渐渐地静了下来。”

“喂，你怎么不说下去了？”

“我忘了上下文了。刚才是怎么说的？你问我的所谓势力来自什么地方，而我说到这两个女人。没错，就是从这两个女人那儿产生了我的势力。”

“仅仅产生于与她们的同居吗？”

“产生于同居。”

“你变得这么沉默寡言。”

“你看到了，我的势力是有局限的。有某种力量在命令我沉默。再见。”

马绊了一下，前腿弯曲倒地，骑手被甩了出去。两个在某处树阴下闲逛的男人走出了林子，观察这个摔下来的人。他们觉得一切都有点可疑，这阳光，这匹现在又站起来的马，这个骑手，那个受到这事故吸引而忽然从对面冒出来的人。他们慢慢地走近，闷闷不乐地嘟着嘴，用他们伸到自己胸前敞开的衬衣处的手迟疑地在脖子和胸口来回地抚摩。

这是众多城市中的一座城市，过去的它比现在要大，可是现在也是够瞧的了。

市长签署了一些文件，然后靠回到椅子背上，拿着一把剪刀在手里玩弄，倾听着外面老广场上的午钟声，他对出于恭敬而站得笔直、几乎有点高傲地出于恭敬而站在写字台前的秘书说：“您发现了吗，这城市里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您还年轻，应该去看一看。”

在一个新月之夜我从附近一个村庄回家去，这是一段很近的路，一条笔直的、完全为月光所笼罩的公路，地上的任何小东西都能看得比白天清楚。我已经到了离那条小白桦林荫道不远的地方，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我们村庄的小桥，这时我看见在离我仅几步之遥的地方（我是不是在做梦，要不我怎么会以前没有见过呢）有一个小棚，用木头和布搭起来的一个很小的，而且特别低矮的帐篷，人在里面根本没法坐直身子。它是全封闭的，即使我在它周围来回地走，伸手去摸，也仍然找不到任何缝隙。在农村能够见到一些东西，从中也可以学会轻易地对陌生的东西做出判断，可是这个帐篷怎么会来到这里，这又是干什么用的，我却无法理解了。

一个年轻的像吉普赛人的女人在一个由弹簧床和被子做成的祭坛前整理好一个柔软的睡觉地方。她光着脚丫子，穿着一条镶着白花边的红裙子，一件白色的、衬衫似的、前面不经意地敞开着的内衣，褐色的头发随意地盘在顶上。祭坛上放着一个洗涤盆。

桌上放着一大块面包。父亲拿着一把刀走了过来，想要把它切成两半。可是，尽管这把刀又重又快，这面包既不太软也不太硬，刀却怎么也切不进去。我们这群孩子惊讶地仰着脑袋看着父亲。他说：“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难道办成功一件事不比办不成一件事更怪吗？睡觉去，也许我到头来会成功的。”

我们躺下睡觉了，可是不时地，在夜间的不同时辰，我们中间总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从床上坐起来，伸长脖子，窥探父亲的动静。每回总是看到他，这个身着长外套的高大的男人，仍然架着弓步，试着把刀子摁到面包里去。当我们清晨起来时，父亲刚刚把刀放下，他说：“你们看，我还是没有成功，这事情就是这么难。”我们想要表现自己，也都来试一试，他也允许我们试，但我们几乎没法子把这把刀、这把被父亲攥得火热滚烫的刀子拿起来，只能勉强地使它翘起来。父亲笑着说：“放下吧，现在我要进城去，晚上我还要试着把它切开。我就不信会让一个面包给耍了。最终它一定会让人把它切开的，只不过它有反抗的权利，那就让它反抗吧。”可是当他说完这番话，这个面包忽然开始收缩，就像一个下定决心面对一切的人的嘴巴那样收缩，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面包。

我磨快了镰刀，开始割。许许多多，暗黑色的一片片在我面前倒下，我从它们中间走过去，不知道那是什么。村子里有警告的喊声传

来，可我把它当成了鼓励的喊叫声，因此仍然向前走去。我走到一座小木桥边，活干完了，我把镰刀交给了等在那儿的一个男子，他一只手伸出来接过镰刀，另一只手像对一个孩子那样摸了一下我的脸。走到桥中间，我开始怀疑起来，我走的路到底对不对，于是我向灰暗中大声喊叫，但没有任何人回答我。我便走回到岸边来，想向那个男子打听，可是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他说，“你连我都没能认出来，而我正胸贴胸地站在你的面前。你还怎么走下去呢，因为你连面对面站在你面前的我都没能认出来。”

“你说得对，”我说，“我也这么对我说，可是因为我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我便停留在这里。”

“我也一样。”他说。

“而我在这一点上并不比你逊色，”我说，“所以对你来说同样可以说，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

我在沼泽林的当中派了一个哨兵。但现在一切都空了，没有回答我的呼喊，这哨兵走失了，我不得不安排一个新的哨兵。我注视着那个人骨骼突出的、红润的脸。“前一个哨兵跑丢了，”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个荒凉的引诱哨兵这种事是会发生的。你得小心在意了！”他笔挺地站在我的面前，像阅兵时那样。我补充道：“假如你听任引诱，那只会给你带来伤害。你会在沼泽中沉没，而我会马上在这里安排一个新的哨兵，如果他又不忠实，就再换个新的，就这样循环往复，无穷无尽。即使我赢不了，至少我也不会输。”

我的父亲把我带到校长那儿。这地方看来好大。我们穿过了一个大厅般的房间，全都是空空荡荡的。一个佣工也找不到，于是我们只管毫无顾忌地向前走，所有的门也全都是开着的。忽然我们吓了一跳，缩回了脚步，这个我们像刚才穿过所有房间时一样匆匆走进去的房间是布置成一个工作室的，尽管没几件家具，长沙发上还躺着一个人。我根据以前见过的照片认了出来，他就是校长；他不站起来，却要我们走近一点。他闭着眼睛听着我父亲为我们不礼貌地闯入校长室表示的道歉，然后他问道，我们想要干什么。我也对此感到好奇，所以我们俩，我和校长都看着我父亲。父亲说，他很想让他现在已经18岁的儿子……

他向窗外看去。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11月。他觉得尽管每个月都有它特殊的地方，可是11月更加上一层特殊。当然暂时什么也看不到，只见雪雨交加。但这也许只是表面现象，而表面现象总是给人以假象，因为人类总是作为总体去适应一切，而人们总是根据对人类的总体印象去判断，因此永远也不能得出世界得到了改变的结论。可是由于人本身是一个人，他认识自己的适应能力，并能从它出发判断事物，所以还是能够知道一些事情，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比如下面的交通不是停滞的，而是带着咬紧牙关的、不知疲倦的、无法接近的优越性从街的这头到街的那头不停地运动着。

这个病人独自躺了好几个小时，烧退了一些，他不时地可以打个小盹，醒着时，由于体弱无法动弹，他便看着天花板，不得不与许多思想进行斗争。他的思维好像完全是由防御组成的，他所开始想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厌烦或痛苦，他耗费着他的力量，以便窒息他的思想。

现在一定已经是晚上了，尽管天已黑了很久，因为现在是11月，这时门打开了，女房东潜了进来，想要把电灯打开，医生跟在她的后面。病人感到很惊讶，他的病居然是那么的轻，或者说病对他的攻击是那么的轻，因为他能非常清楚地认出进来的是什么人，他们的所有他所知道的细节全都没有漏过，甚至那些平时使他产生空虚感和恶心的细节也没有发生任何夸张，一切都跟以往一样。

……甩掉，平时平静地忍受，喝醉时却反抗之。当然，我不会把这种情况下得知的隐私公诸报端，可是我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篇文章的轮廓，我在这篇文章里要写的是，在所有人的形象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的地方，尤其是在体育中，流氓们必会蜂拥而至，毫无顾忌，根本不抬头看主角，而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弯着腰，寻找他自己能得到的好处，顶多说一句，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算是道歉。

……然后在K.面前出现了一片平原，远处，在一个小山丘的蓝色中，几乎看不清的地方，有一座房子，这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可是这一直持续到晚上，白天有许多次这目标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晚上，他在已经是漆黑的乡间道路上突然发现小山丘就在他的面前。“这就是我的房子，”他对自己说，“一座状况可怜的小房子，但这是我的房子，而在几个月后它将会改变面目的。”他穿过草地向山丘上走去。门开着，其实它根本就没法关起来，因为门的一翼已经没有了。一只刚才坐在门槛上的猫大叫着跑开，猫一般不这么叫的。楼梯左右两边的两个房间的门开

着，有几件近于腐朽的家具，再就是空荡荡的了。可是从上面，从楼梯上方那由于黑暗而已经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颤抖的、近于呼噜声的问话传来，问是谁来了。K.一大步跨上了三级楼梯，这梯级中间断了，奇怪的是断处看上去是新的，好像是今天或昨天才发生的事，他向上走去。上面的房间门也是敞开的……

我从她身边跑开。我沿着山坡往下跑。长得高高的草碍手碍脚。她站在上面的树旁看着我跑。

这里让人难以忍受。昨天我跟叶里霍谈了。他缩在一个角落里读报。我说：“叶里霍，您会投我的票吗？”他只是摇了摇头，自管读他的报。我说：“我要您那一票跟其他任何一票都不同。我当然已经肯定得不到足够的票数，我的失败已经是注定了的。可是……”

我有一回也曾位于竞选的潮流中间。但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一个候选人接受我做竞选期间的文书工作。当然我对这一切的回忆已经是非常模糊的了。

你在建筑什么？——我想挖一条通道。必须有所进展，我上面的位置太高了。

我们在挖巴贝尔的竖井[55]。

他留下只有横横竖竖画下的三道。他是怎样地沉浸在他的工作中的，他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沉浸在里面。

一根草茎？有的人抓住水面上铅笔画的一道。这能托得住人吗？作为淹死的人他梦着如何得救。

死亡必将把他从生活中端出来，就像人们把残疾人从轮椅里端出来那样。他是那样稳当而沉重地坐在生活中，就像残疾人坐在轮椅中那样。

准备接受死亡的到来的人们，他们躺在地上，他们靠在家具上，他们的牙齿在打架，他们从上到下地摸着墙壁，同时身子不动地方。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想要在一月的一个晚上，在大型聚会纷纷举办的時候去拜访他最好的朋友。他要给他看一本书，一本他正在读的书，对这本书他也曾对他说过许多。这是一本很不好懂的书，关于国民经济史

的梗概，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读得下去，就像一篇评论文章很形象地说的，作者把他的题材就像父亲抱着孩子般地紧紧抱在怀里，骑在马上赶夜路。尽管难读，可是它对大学生还是很有诱惑力；每当他突破一段上下关联的内容，他便感到是打了一个大胜仗；不仅是那直接道出的观点，而且其周围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比一般的读物更有启发，更有根据，更经得起辩驳。在到他的朋友家去的路上，他有几回在路灯下停下脚步，在由朦胧的雪遮得更昏暗的灯光下读上几句。超过他的理解能力的莫大的忧虑使他感到压抑，当前的是理解了，可是在他前面的任务却是模糊的，无边际的，只有他的力量可与之相比，他同样感到他的力量还没有响应他的号召到来。

写作无法成功。所以产生了写自传性调查的计划。不是传记，而是调查和找出尽可能小的部件。我要由此建设自己，就像一个人，他的住房不安全，就在这栋房子旁边再建一栋安全的，可能的话，仍利用旧材料。当然，如果在建了一半的时候他的力量耗尽了，这时他不再拥有一栋虽然不安全但毕竟是完整的房子，却面对着一栋摧毁了一半的和一栋建了一半的，那就等于是一无所有了。接下来的无非是疯狂，比如在两栋房子之间跳哥萨克舞，这个哥萨克将用他的靴跟不断地刨起土来，甩到一边，直到在他下面形成他的坟墓。

孩子们的轻率令人难以理解。从我房间的窗子看出去，我看着一个小型公园。这是一个城内小花园，简直可以说是个肮脏的没人管的空地，枯萎的灌木丛把它与马路隔开。孩子们在那里玩耍，以往是这样，今天下午也是这样。

“我怎么会来到这里的？”我叫道。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由柔和的电灯光照明了的大厅，我在沿着它的墙边踱步。这里虽然有一些门，可是一旦打开它们，人们就面临着一道黑暗光滑的岩石墙，它笔直地向上和向两边通向不可知的远处。这里没有出路。只有一扇门通向旁边一个房间，那里的景象给人以较大的希望，可是跟打开其他门时所看到的几乎同样令人感到陌生。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公爵房间，主色调是红色和金色，那里有好几个齐墙高的镜子和一盏大吊灯。但这还不是一切。

我不用再回去，牢房被炸毁了，我活动活动身子骨，我感受着我的躯体。

我命令把我的马从马厩里牵出来。我的仆人没听懂。我自己走到马

厩里去，安上马鞍，跨上了马。我听见远处传来号声，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一无所知，甚至什么也没听到。他在大门边拦住了我，问道：“主人，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只想离开这里，只知道要离开这里，不断地拉开与这里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的。”“那么你是知道你的目的的了？”他问我。“不错，”我回答道，“我已经说过了：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的。”“你没带干粮。”他说。“我根本不需要，”我说，“这旅途非常漫长，假如我在途中得不到吃的，那我非饿死不可。带多少干粮都救不了我。幸亏这是一次真正长得不得了的旅行。”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地头。一根木杆斜斜地插在土里，顶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坑道”。我应该是到了目的地了，我猜测着，环顾四周。距我立足之地仅几步路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爬满绿藤的小木房，我听到那儿传来轻轻的盘碟碰击声。我走了过去，把脑袋从低矮的口子里探了进去，在里面的黑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但仍然问候里面的人，并问道：“您知道这地板门由谁管的吗？”“我自己，为您效劳，”一个友好的声音说道，“我这就来。”现在我渐渐习惯了黑暗，辨认出了里面的人们，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三个额头几乎够不着桌面的孩子，一个拥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坐在小木屋深处的那个男人想马上就站起来，挤出来，那女人却恳求他先把饭吃完了，他指了指我，她又说，我会友好地等一会儿，而且会赏脸，同他们一起吃这顿可怜的午餐。而我呢，我真是恨透了自己，竟然会跑到这鬼地方来，把一个快乐的星期天搅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不得不说：“遗憾，遗憾，亲爱的夫人，可惜我不能接受邀请，因为我必须在此时此刻，确确实实就在此时此刻让人把我放下去。”“好极了，”那女人说，“偏偏挑个星期天，而且还是吃午饭的时候，世上的人真是不可捉摸。这种无休无止的苦役实在是没法说。”“您别这样嚷嚷，”我说，“我不是出于恶意要求您的丈夫这么做的，假如我知道这事该怎么做，我早就自己干了。”“别听这女人的，”那个男人说道，他这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旁，边说边拽着我走，“您别指望女人有理智。”

这是一个狭窄、低矮的圆拱形的通道，墙壁上刷着雪白的石灰，我站在它的入口处，它斜斜地通向深处。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走进去，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两只脚在入口前长着的稀稀拉拉的草上来回地蹭。这时有位先生经过这里，这无疑是偶然的，他的背有点驼，可人却是够横的，因为他一上来就想跟我攀谈。“上哪儿去，小家伙？”他问我。“现在

还哪儿都不去，”我边说边看着他那乐呵呵而又高傲的脸，即使没有那单眼镜，这张脸也已经够高傲的了，“现在还哪儿都不去，我正在考虑呢。”

“奇怪！”狗说道，它用手抹着额头。“我刚才是在什么地方跑了半天呢，先是穿过市场广场，然后穿过一条山隘向山丘上跑，然后在高地上纵横跑了好几遍，然后跌下山来，然后在公路上跑了一段，然后向右拐跑到小溪，然后沿着白桦树列跑，然后从教堂旁边跑过，而现在到了这里。为什么会这样？我都绝望了。又能够回到这里真是幸运。我害怕这种毫无目的的胡跑，害怕那些大而荒凉的空间，我在那里是怎样一个可怜的、无助的、弱小的、别人根本就找不到的狗。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我离开这里，这个院子里是我的地方，这里是我的小屋，这里有我的锁链，以防止有时会发生的想咬人的现象，这里什么都有，包括充足的食物。你说说看。我永远不会自愿地离开这个地方，我在这里感到过得很舒服，对我的地位感到自豪，当我看到其他牲口的时候，一阵舒服的、然而确实是有根据的优越感便会渗透到我全身骨头里去。可是有别的哪个动物像我这样毫无意义地跑开的吗？一个都没有，那只猫不能算，那个柔软的、长着爪子的东西，那个没人要，没人想的家伙，她有她的秘密，我对此毫不关心，她在上班的时候到处跑，可也只是在这座房子的区域里。我是唯一开过小差的一个，这肯定会在什么时候使我失去我高贵的地位。幸亏今天好像没有人发现，可是主人的儿子理查德最近就此说过一个看法。那是个星期天，理查德坐在板凳上抽烟，我躺在他的脚边，脸颊贴在土地上。‘凯撒，’他说，‘你这只不忠实的坏狗，你今天早晨到什么地方去了？清晨5点我找过你，这时候你还应该在放哨，可是院子里哪都找不到你。直到6点一刻你才回来。这是严重的失职，你知道吗？’就这么又被发现了一回。我站了起来，坐到他的身边，用一只胳膊搂着他说道：‘亲爱的理查德，这回再原谅我一次，不要说出去。我很痛心，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我哭得伤心极了，出于许许多多原因，出于对我自己的绝望，出于对惩罚的害怕，出于对理查德平静的脸色的感动，出于对当场没有惩罚的工具的高兴，我哭得是那么伤心，以致泪水沾湿了理查德的上衣，以致他把我甩开，命令我趴下。当时我是保证了要改正，而今天又重复了同样的事情，我甚至比那回离开的时间更长。当然，我保证改正是发自内心的。而这不是我的过错……”

与牢房的墙壁斗争。

不分胜负。

这是一次美妙而效果很好的表演。马术，我们称之为梦的马术。我们表演这个节目已有多多年，发明这一骑术的人早已死去，死于肺病。可是他的这一发明留了下来，我们始终还没有发现把它从节目表中删掉的理由，尤其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无法模仿它，它是不可模仿的，尽管初看上去这令人无法理解。我们习惯于把它放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作为整个晚间表演的压轴戏它是不合适的，它不是什么令人目眩的，什么值得品味的，不是供人们在回家的路上津津乐道的节目，整个结尾的时候应该有特别精彩的东西上演，某种即使最粗糙的头脑也忘记不了的，整个晚上都无法忘记的东西，而这个马术不是这种节目，可是它适合于……[56]

一个我许多年没有见过的朋友说是要回到我们这座城市，他故乡的城市中来了，我有20年以上没有见过他了，只是有时很偶然地听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有时隔了好几年才听到一次。由于他在这里已经没有亲戚，而在朋友中我是跟他最亲近的，我准备腾出一间房间来给他住，并为他能够接受我的邀请而感到高兴。我挖空思想把这房间里的布置弄得完善起来，我试着回忆他的特点，他有时候，尤其在我们一起在假期出门旅行时说过的特别的愿望，试着回忆他对周围的东西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试着想象他青年时房间里布置的细节，从所有这些回忆的试图中我没有想到任何可以使我的房间给他宾至如归感觉的布置。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人口众多的家庭，贫困和噪音和争吵是他住房中的标志。我对那位于厨房旁边的房间还记忆犹新，有时我们能够单独地（这当然是很少有的机会）弯着腰聚在一起，而这时他家里的其他人正在旁边的厨房里争吵，争吵在这里是家常便饭。这是个昏暗的小房间，聚着永远不散的咖啡气味，因为通往更昏暗的厨房的门无论日夜都是开着的。我们在那里坐在窗边玩象棋，这扇窗外面是一道环绕整个院子一圈的长阳台。这副象棋缺两个子，我们不得不用裤子纽扣来代替，每当我们把所代表的那两个子搞混的时候，就会出现麻烦，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代替，所以始终这样玩。阳台外隔壁住着一个装饰品商人，一个风趣的、然而又是性子急躁的人，长着长长的唇须，他的手老是像吹笛子似地在胡子上东按一下西按一下。当这个人晚上回家时，他必须经过我们的窗口，这时他总要停下来，把上身探进我们的房间里来，看着我们。他几乎永远对我们的技术不满意，对我和对我的朋友都一样，一会儿给他、一会儿给我支着儿，然后干脆自己抓起棋子来，走出下一步，而我

们只能听其自然，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把他的这一步改掉，他就把我们抬起来的手打掉。我们对此容忍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下棋比我们下得好，没有好得很多，但毕竟我们可以从他这儿学到一点；可是有一回，天色已经昏暗，当他向我们弯下腰来，把整个棋盘端到窗台上，以便他能够更好地观察棋局，这时我站了起来，当时我正处于明显的优势，认为他的粗暴插手会破坏棋局，怀着一个受到委屈的男孩的愤怒冲动站了起来，指责他扰乱了我们下棋。他瞥了我们一眼，又端起棋盘，以嘲笑的、表示愿意效劳的夸张姿态又放回了原处，转身走开了，从此再也不理睬我们。只是，每当他从窗外经过时，他眼睛不向我们看，总是不屑地把手一挥。一开始我们把这视为我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但后来我们便为失去了他的指点、他的风趣、他全部身心的投入而感到遗憾。我们渐渐下得少了，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很快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东西。我们开始集邮，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俩共同拥有一本集邮簿意味着一种亲密得几乎不可理解的友谊。这本集邮簿总是由我保管一个晚上，然后在他那里放一个晚上。这种共同的拥有本身已经是很难维持的事情，而我的朋友根本不能进入我的住处，因为我的父母不允许，这就使事情更难办了。这个禁令本身并不是针对他的，我的父母几乎不认识他，而是针对他的父母、针对他的家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事情也许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但在其表现形式上却令人有些大惑不解：结果是我每天到我的朋友那里去，如果这个朋友可以到我们家来，我也许就不会如此深地陷入那个家庭蒸汽缭绕的氛围之中。在我的父母那儿占主导地位的往往不是理解，而是粗暴，不仅对我是如此，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就以此事而言，他们觉得这一禁令达到了惩罚我的朋友的家庭，使之失去身价的目的。在这方面我的母亲比父亲更积极。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使我也一起遭罪，使我的朋友的朋友出于自然的反击心理而嘲笑地、轻蔑地对待我，我的父母当然就不知道了，他们在这方面根本就不关心我，而且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也不会怎么在乎的。我当然是在后来回顾时才做出这样的判断的，而当时我们作为两个朋友，对事情的状况心满意足，地球上事情的不完美还不曾迫近到我们的身边。每天把集邮簿带来带去是麻烦的，可是……

有歌声从一家小酒馆里传出来，一扇窗开着，没有挂上钩子，在那里晃来晃去。这是一栋小小的平房，周围是一片空旷，这里已经离城相当远了。这时来了一位迟来的客人，悄悄地走来。他穿着一套紧身的衣服，像在一片漆黑之中向前摸索，其实这时月光十分明亮，他侧耳在窗前倾听，然后摇了摇头，弄不懂，这么美妙的歌声怎么会从这么一家酒

馆中传出来，他双手一按窗台，背向跃了上去，可是他够不小心的了，竟然没能在窗台上坐住，而是一下子掉进了屋里，但跌得并不深，因为有一张桌子紧挨着窗放着。酒杯飞落在地上，坐在桌旁的两个男人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两脚还悬在窗外的新客人又从窗子里扔了出去。他掉在了柔软的草丛中，一个翻身就站了起来，再度侧耳倾听，可是歌声已经停止了。

那地方叫塔慕尔。那里非常潮湿。

在塔慕尔的犹太教堂里生活着一只大小和形状都像紫貂的动物。

塔慕尔的犹太教堂是一座简朴无华的低矮的建筑，建于上世纪末。尽管这个教堂很小，但却完全够用了，因为这个教区也很小，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小。现在教区已经开始为维修教堂的费用犯愁了，有些人甚至公开扬言，只要有一个小祈祷室就足够用于为上帝效劳了。

在我们的犹太教堂里生活着一只像紫貂般大小的动物。人们经常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它，它允许人们走到距离它顶多两米的地方。它的毛色是一种淡青色。它的毛皮还没有人摸过，这根本谈都不用谈，人们几乎要认为，它的毛皮的真实颜色是看不出来的，也许能够看见的颜色只是沾在毛上的灰尘和泥浆的颜色，这种颜色也确实像教堂内抹的灰浆颜色，只是淡一点而已。撇开它的畏怯不谈，这是一个非常安静和安分的动物。如果不是它经常被赶开，它也许几乎不会更换地方，它最爱待的地方是女人室的网格栅栏，它喜欢带着显而易见的满足感抓住网格，探入脑袋，观察下面的祈祷室，这个勇敢的位置好像使它感到快乐，但是教堂仆人有个任务，就是不让它待在栅栏那儿，它可能会习惯于这个位置，可是由于那些害怕它的女人而不能允许它待在那里。为什么她们会害怕它就不清楚了。当然，第一眼看上去它是令人生畏的，尤其是那长脖子，三角脸，几乎呈水平状突出的上排牙，上唇上那一溜长长的、盖过牙齿的、显然很坚硬的、浅色的鬃毛，这一切是令人生畏的，可是人们很快就能看出，这一切看上去可怕的现象是毫无危险的。尤其是它总是避开人，比森林里的动物更胆小，而且看上去只受到这座建筑的约束，而它整个的不幸显然是：这座建筑物恰恰是一个犹太教堂，也就是说有时会很热闹。如果人们能够跟这个动物对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安慰它说，我们这座山区小城的教区一年小于一年，现在要筹集维修教堂的资金都困难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后，这座教堂变成了一个粮仓或类似的场所，于是这个动物便得到了它现在痛苦地渴望

着的安宁。

当然害怕这个动物的只是女人，男人早就无所谓了，一代人把它指给另一代人看，人们不断地看到它，最后人们看都不看它一眼了，甚至第一次见到它的孩子们也不会感到惊奇。它成了这座犹太教堂的家畜，为什么这座教堂不能有一个独特的、别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家畜呢？要不是那些女人，人们几乎要忘记了这个动物的存在。但即使是女人们对这个动物也并没有真正的畏惧，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老是害怕这么一个动物也就太离奇了。虽然她们以此为自己辩护：这个动物会跑到离她们比离男人们近得多的地方来，而这也是事实。它不敢下来到男人们的跟前，男人们从来不能看见它出现在地面上。当人们不让它趴在女人室的栅栏上的时候，它多半就待在栅栏对面墙上同样高度的地方。那里的墙壁有一条狭窄的突棱，顶多也就两指宽，这条突棱环绕着教堂的三面，这个动物有时在这条突棱上跑来跑去，但大多数时候它总是静静地蹲在面向女人们的一个地方。它能如此轻巧地利用这条如此狭窄的道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它在那上面尽头处折转方向的方式是值得一看的。这已经是一个很老的动物了，可是它仍然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最勇敢的空翻来，而且从来就没有失手过，它在空中转身，然后再沿着原路往回跑。当然，如果人们见过几次，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老是盯着看。其实使女人们躁动的既不是畏惧也不是好奇心，如果她们沉浸在祈祷中，她们可以完全忘却这个动物的存在，虔诚的女人们也确实如此，而其他女人，这却是大多数，她们总是想要引起人们对她们的注意，而这个动物就是一个受到她们欢迎的借口。如果她们能够的话，如果她们有这个胆量，她们就会把这个动物吸引得更近一些，以便能够更充分地受到惊吓。但实际上这个动物根本不会向她们靠拢，如果它不受到攻击，它对她们同对男人们一样漠不关心，它最希望也许是始终生活在隐蔽的状态中，就像它在教堂开放的时间之外所过的那种生活，显然在某一个洞穴中，一个我们还不曾发现的洞穴。只有在祈祷开始后，它才出现，被噪音所惊醒。它是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是想要保持警惕，是想要保持自由之身，以便随时可以逃跑吗？它是出于恐惧而跑了出来，出于恐惧开始它的胡闹，而不敢退回去，直到对上帝的礼仪结束。它喜欢待在高处当然是因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栅栏上和墙壁突起处最有利于它的奔跑，但它绝不是总是在那两个地方，有时它也跑到距离男人们更近的低处来。约柜^[57]的幕布由一根闪亮的黄铜杆支撑着，这看来对这个动物有吸引力，它经常悄悄地潜到那里，但那里总是安静的，即使它离约柜很近，人们也不会说它带来了干扰，它以它那闪闪发亮的、总

是张开着、也许没有睫毛的眼睛似乎在看着教民们，其实它谁也没看，而只是迎着它感到威胁着它的危险。

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到不久以前，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不比我们的女人们更好理解。有什么危险值得它害怕的？谁又企图动它了？它难道不是从很多年来一直自顾自地平安生活着吗？男人们不关心它的存在，大多数女人好像会为失去它而感到惆怅。而且它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一个动物，所以根本就没有敌人。这一点从年复一年的历程中已经能看得出来。对上帝的礼仪连同它的噪音也许对于这个动物是可怕的，但它每天以有限的规模重复着，在节日扩大规模，总是保持着规律，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这个胆小的动物应该可以习惯于这种环境的，尤其是当它看到，这不是来自追逐者的噪音，而只是一种它根本不懂的噪音时。可它仍然害怕。这是出于对早已过去的时代的回忆，或是对未来时代的预感？也许这个动物比每次汇集在教堂里的三代人知道得更多？

人们说，很多年前，人们确实尝试过把这个动物撵走。这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情，但更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有据可查的是，人们当时从宗教法的角度探讨过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容忍这么一个动物待在上帝的殿堂里。人们请诸多著名的拉比做出鉴定，观点是不统一的，大多数认为应该把它赶走，重新为教堂举办开张仪式。但是从远处发号施令是容易的，在实际上却不可能抓住这个动物，所以也不可能把它撵走。因为只有抓住它，送到遥远的地方，才有一定的把握可以说是摆脱了它。

许多年前，人们说，人们真的尝试过把这个动物撵走。教堂仆人回忆说，他的祖父，当时也是教堂仆人，特别喜欢述说这一段往事。这个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听说摆脱不了这个动物的事了，他特别善于爬高，于是他的虚荣心膨胀了，在一个光线明亮的上午，这时整个教堂所有的角落都为阳光所笼罩，他悄悄地溜进了教堂，带着一根绳子、一个弹弓和一根曲棍。

我误入了一片无法通过的荆棘丛中，只能大声叫喊公园管理员。他马上就来了，但却无法穿过荆棘走到我身边来。“您是怎么跑到这片荆棘丛当中去的？”他喊道，“您不能沿着同一条路走出来吗？”“不可能，”我喊道，“我再也找不到那条路了。我刚才一边想着事一边平静地走着，突然就发现我在这个地方了，就好像是我走到这里来了以后，荆棘丛才长了出来。我再也走不出去了，我完了。”“您像个孩子，”管理员说，“您首先沿着一条禁止通行的路，愣穿过从来没人走过的树丛，然后您就叫

起苦来。但您并不是在一个原始森林里，而是在一个公园里，人们会把您弄出来的。”“可是一个公园里根本不该有这样的树丛，”我说，“而且人们又能怎样救我呢？谁也进不来。如果人们要试试看的话，那就抓紧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在这里过夜我可受不了，而且我已经给荆棘刮得遍体鳞伤，我的夹鼻眼镜又掉了下去，再也找不到了，没有眼镜我简直就是半个瞎子。”“这一切都很有道理，”管理员说，“可是您还是得忍耐一会儿，我总得先去把工人找来，让他们开出一条路来，而且在这之前还得获得公园主任的批准。稍稍拿出点耐心和男子汉气概来，好不好？”

有一个先生来到了我们这儿，这人我是经常见到的，可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重视。他和父母一起走进卧室，他们完全被他的言论给俘虏了，进去后神不守舍地带上了房门。我想要跟进去，可是女厨师弗丽达挡了我的驾，我当然是拳打脚踢，号啕大哭，可是弗丽达是我见过的女厨师中强壮的一个，她懂得怎么用强有力的握力压住我的手，使我离她的身子一定的距离，使我的脚踢不着她。然后我便无计可施了，只能破口大骂。“你是个雌老虎，”我喊道，“不害臊，你是个姑娘，可是活像个雌老虎。”可是什么话也没法使她激动，她是个心平如水的、几乎有点伤感的姑娘。直到母亲走出卧室，到厨房里去拿点什么东西时，她才放开了我。我拽着母亲的衣角，“那位先生想要干什么？”我问。“噢，没什么，”她说，她吻了我，“他只是要我们出门去。”这下我可乐坏了，因为我们假期里老是去的那个村子可比城里美多了。可是母亲却对我说，我不能去，我必须上学，现在不是假期，再说现在冬天快要来了，所以他们也不是到村子里去，而是到另一座城市去，比那村子可远多了。当她看到我惊恐的样子，马上改口说，不是的，那城市不是更远，而是比那村子近得多。她看出我不太相信，便把我领到窗前，说道，那座城市真的很近，从窗子里看出去差不多就可以看得到。可这话不对，至少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不对，除了总是看到的那些，下面那狭窄的街道和对面那座教堂，别的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然后她放开我，跑进了厨房，端了一杯水出来，挥了挥手，示意又想向我扑来的弗丽达走开，推着我走进了卧室。父亲疲惫地坐在椅子上，已经伸出手要那杯水了。当他看见我时，他微笑起来，问我，我对他们出门去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很想一起去。但他却说，我还太小，而这是一次十分辛苦的旅行。我问，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又为什么非去不可呢？父亲指了指那位先生。那位先生的上衣扣子是金色的，他正用手绢擦着其中一个。我请求他让我的父母留在家，因为，假如他们走了，我就得跟弗丽达单独在一起了，可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

一辆金色的车子的轮子在滚动，在石子路上吱吱嘎嘎叫着停了下来。一位姑娘想要下车，她的脚已经踏在踏板上了，这时她看见了我，便又缩回了车里。

有一个需要耐心的玩具。这东西比怀表大不了多少，没有任何出人意表之处。在涂上了红褐色漆的木板面上，刻了几道涂成蓝色的小槽，都通向一个小圆窝。要通过倾斜和摇动让那同样是蓝色的弹子先滚入其中一条小槽，然后滚入圆窝。一旦弹子进了圆窝，游戏便结束了；想要重新开始，就要把弹子重新从圆窝里晃出来。这一切都笼罩在一块挺厚的圆拱形的玻璃之下。这个练耐心的玩具可以揣在口袋里带走，随时随地都可以掏出来玩。

当这颗弹子闲着无事时，那么它多半就背着手在那高原上逛来逛去，避开那些个小槽。它的观点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它在那些小径中受的折磨已经够多的了，所以在闲着的时候，它有足够的理由在自由的平地上休憩。有时它习惯地抬起头来看看那笼罩在上方的圆拱形玻璃，但并没有辨认上方什么东西的意图。它走路的步子迈得很大，于是它声称，它不是为了那些小径而生就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小径差一点就容不下它了，但再想一想就又觉得毫无道理了，因为事实上它被制作得恰好与那些小径相合，当然这些小径对于它来说谈不上舒服，否则这就不能算是练耐心的游戏了。

我被允许进入一个不相识的人的花园。入口处有些障碍需要克服，当最终一个人半欠着身子从一张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把一个用大头针穿着的深绿色的牌子插在我的衣扣里。“这一定是一个勋章。”我开玩笑地说。可是这个人只是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好像是要安慰我——可是为什么要安慰我呢？——我们用一个目光就说明白了，现在我可以进去了。走了几步后我却想起，我还没有付过钱。我想走回去，可这时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灰黄色的粗料子旅行大衣的女士正站在桌子旁边点着桌子上的一堆小硬币。“这是您的。”这个男人好像发现了我的问题，在弯着腰的女士上方冲着我喊道。“我的？”我不相信地问道，回过头去看了看，是不是他是在对我身后的什么人在说。“总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一位先生说道。他从草地那头走来，在我的面前穿过，又继续在草地上走他的路。他说：“是您的。不是给您的又是给谁的？这里一个人为另一个人付钱。”我对他给的这个不情愿的答复表示了感谢，但我提请这位先生注意，我没有给任何人付过钱。“您应该为谁付钱？”这位先生

边说边走远了。我无论如何得等那位女士过来，向她把事情搞清楚，可是她走上了另一条路，她的大衣沙沙作响，在她强壮的身后温柔地飘动着浅蓝色的帽纱。“您喜欢伊莎贝拉。”一个在我身边的散步者说，他同样凝视着这位女士的背影。过了一会儿他才又说道：“那是伊莎贝拉。”

那是伊莎贝拉，一匹灰斑白马，一匹老马。在人群里我还真认不出它来，它变成了一位女士。最近我们在一个花园里举行的慈善大宴上相遇。那儿靠边的地方有一片小树林，包围着一片绿阴凉爽的草地，若干条小径穿过这小树林，有时待在那儿是很舒服的。这个花园我以前来过，所以当我对那儿的社交感到厌烦时，我就拐进了那片小树林。刚刚走到树阴下，我便看到一位高大的女士从另一边向我迎面走来。她的高大几乎令我目瞪口呆，尽管周围没有其他人可以拿来跟她比较，可是我毫不怀疑，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没有一个人不比她矮好几个头。在第一眼看到她时我几乎认为任谁都要比她低无数个头，可当我走近了些，我的心情便平静了下来，原来是伊莎贝拉，我的老朋友！“你是怎么跑出马厩来的？”“噢，这并不难，我只不过由于主人的仁慈才仍然被留在那儿，我的日子过去了。我对我的主人解释说，我与其毫无用处地待在马厩里，还不如趁我还有力量，出去看一眼世界，我这么对主人说了后，他就理解了，找出一些已故的人的衣服，还帮我穿上，然后说了一些美好的祝愿，就让我走了。”“你多漂亮啊！”我说，这话不完全诚实，但也不完全是谎言。

这只犹太教堂动物——塞利希曼和格劳巴特——问题已经严重了吗？——建筑工人。

丽丝贝特·塞利希曼和弗兰茨·格劳巴特的婚礼准备得特别细。

对不起，我忽然精神分散了。你告诉我关于你订婚的事，这是世界上最令人高兴的消息了，可我却忽然无动于衷了，似乎在想完全不搭界的其他什么事情。但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无动于衷，我是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老故事，我曾是目击者，但始终非常安全地亲身经历过，我的投入程度比对惩罚我的事情还深。这是事情本身决定的，那时人们不可能漠不关心地经历，即使只来得及看到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片衣角。

牢房看守想要打开大铁门，可是锁生了锈，这个老年人的力量不够，助手必须上去帮忙，但他做了个怀疑的表情，并不是由于生锈的锁。

英雄们被放出了监狱，他们笨拙地排成一队，囚禁使他们丧失了许多灵活。我的朋友，看守长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英雄名单，这是他公文包里唯一的一份文书材料，我这么说丝毫不带恶意，这毕竟不是聘用书记员。他走上前去，一个一个地叫英雄们的名字，然后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里划掉。我坐在他的写字台的一头，同他一起注视着这队英雄行列。

堂·吉珂德不得不移居国外，整个西班牙都在笑他，他在那里已经待不下去。他穿过法国南部，不时碰到一些好人，同他们交上朋友，在严冬当中千辛万苦、衣食不全地穿越了阿尔卑斯山，然后穿过上意大利的低地平原，在那里他却感到不舒服，最后他来到了米兰。

在M.统治下的农庄里，用一个所谓鼓动者的做法证明很有成效。当然，在别的地方要想模仿这个做法，卓有成效地设立这么个位置，只有在找到像M.手下这个人同样出色地适合这种工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是公爵自己发现他的。在收割开始之前，公爵拄着拐杖沿着公路穿过村子。他并不老，可是由于腿病而已经多年不得不借助于拐杖了，他的腿病现在还不严重，但是医生们担心会变得危险。公爵慢慢地走着，不时支着手杖站一会儿，考虑如何最有效地分配收割工作——他是个非常务实的有着干实事的快感的地主——他不断想到这个问题，尽管工资涨得不可思议，劳动力却总是不够。其实不如说，如果这些劳动力真愿意干活，就像他们本来应该做的那样和农民们在自己的田野里干的那样，现有的劳动力本来是应该过剩的，可是在贵族的土地上可惜根本做不到那么一回事。当他气愤地再想一遍这个他已经想过很多次的问题时，他的病腿表现得比平时更痛苦，这时他在一座半倒塌的小屋门槛上发现了一个小伙子，这小子引起他的注意的是，他显然已有20岁，但却光着脚，衣衫褴褛肮脏，就像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学生。

大洋蒸汽轮最下面的船舱贯穿整条船，它是完全空着的，当然它几乎不到一米高。轮船的设计要求有这么个空间。当然它并不是完全空着的，它是老鼠们的天地。

我自来对我自己有一种怀疑。但它只是偶尔浮现，短暂地，然后很长时间间歇，足以让人忘了它。再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现象，在别人那儿同样会发生，在别人那儿并不意味着什么严重的事情，就像对镜子里自己的脸感到吃惊，或者就像在街上忽然经过一面镜子时，对自己的后脑勺或全身形象的吃惊。

我自来对我自己有一种怀疑，就像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对他的养父母的那种怀疑，即使人们细心地注意让他相信养父母是他的亲生父母。那儿总有一种怀疑存在，即使养父母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温柔和耐心一点都不少。这种怀疑也许只不过在很长的间歇时间后出现短暂的瞬间，在一些偶然的小事上表现出来，但它毕竟是活的，没有消失，而是在积聚力量，在适当的时候从微不足道的不快一跃而起，成为庞大、野蛮、凶恶的，没有任何束缚的怀疑，冲动地把怀疑者和受怀疑者的一切统统摧毁。我感觉得到它的蠕动，就像怀孕者感觉到肚子里孩子的蠕动那样，而且我知道，它真正降生的时候就是我的末日。万岁，美丽的怀疑，伟大强悍的上帝，让我死去吧，让我这个生下你的人，这个你让他生下你的人死去吧。

我叫卡尔穆斯，这不是罕见的名字，但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它老是我思考。“什么？”我对自己说，“你叫卡尔穆斯？没错吗？”有许多叫卡尔穆斯的人，即使只在大亲戚圈子里找也能找到许多，他们通过他们的存在赋予这个本身毫无意义的名字以很好的意义。他们作为卡尔穆斯而生，将作为同样的人在和平中死去，至少就给予这个名字的和平而言。

一个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大学生对艾伯尔费德的马事件非常感兴趣，关于这个问题问世的所有印刷品他都仔细地读过，思索过，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做出尝试，而从一开始就以与他的前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且依他看来无法比拟地正确得多地去着手。当然他的资金不足以让他大规模地去尝试，假如他为了实验而买下的第一匹马就是固执倔强的，而这要在紧张地工作了好几个礼拜后才会得到证实，那么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法再进行新的试验。但他对此并不太害怕，因为按照他的方法也许所有倔强都将能够得到制伏。不管怎么说，出于他特别谨慎的天性，他在计算他有能力支出的耗费和他拿得出的资金方面是非常有计划的。他学习期间用于维持清淡的生活的钱至今是由他的父母每个月不间断地寄来的，他们是乡下的穷商人，对这一财政资助他不打算放弃，尽管他将不得不放弃他的父母在远方寄予莫大希望的学业，如果他要踏入他现在正打算踏入的这个新领域，并取得充满希望的巨大成功的话。要使他的父母理解这一工作并给予资助，是不可设想的，所以他将不得不对父母隐瞒，让他们以为他仍然在继续他至今在进行着的学业，尽管这种作假对他来说是十分痛苦的。这种对父母的欺骗只是他为了这一事业所要做出的许多牺牲中的一个。要保持对那估计这个工作所需要

的很高的费用的支出能力，光靠父母那笔钱是不够的。因此，这个大学生打算把他至今用于学习的白天大半时间用于私人授课。夜晚的大半时间却得用于他本身的这件工作。并不仅仅是不利的外在情况迫使这个大学生选择夜间来对马授课，而且他要在给马授课中奉行的一些原则使他选择夜晚时间，出于各种原因。照他看来，哪怕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转移马儿的注意力也会对授课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害。而夜晚在这方面有充分的保证。人和动物在夜里醒来和工作时所产生的那种敏感，是他的计划中明确要求的。他不像其他专家那样害怕马的野性，相反，他还要求有这种野性，他甚至想要造就它，但不是通过鞭子，而是通过他不间断的在场和不间断的授课。他认为，在正确的给马上课过程中不需要零星的进展，最近不少马匹爱好者对这种零星的进展夸耀不已，而他认为这要不是教育者幻想的产物，就是，这就更糟糕，永远不会取得普遍的进展的最明确不过的信号。他自己将特别留神不让零星进展式教育状况出现，他的前人对达到马对某些算术问题的反应便以为取得了什么成就，从而沾沾自喜，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这就像在对儿童的教育中不管儿童对整个人类是否瞎的、聋的、无感觉的，而只顾一个劲地向孩子灌输一加一。这一切是那么的笨，其他马教育者的错误有时使他感到耀眼得可怕，以致他甚至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因为，一个单独的人，而且还是个没有经验的人，在一种没有得到实践检验的、然而确是深刻的并特别热烈的信念驱使下前进，要对一切专家证明是他有理，似乎是不可能的。

回过头来看蒙德利律师的暴死，首先能够确认的事实经过是：一天早晨将近四点半的时候，那是个美好的六月清晨，这时天已经很亮了，蒙德利太太从她四层楼上的居室中跑出来，在楼梯栏杆上弯下腰，张开臂膀叫喊，显然想要让整个房子里的人出来帮忙：“我的丈夫被谋杀了！老天啊！老天啊！我的好丈夫被人谋杀了！”第一个看到蒙德利夫人和听见她的叫喊的是一个面包房小伙计，他正好在这个时候，两手提着装小面包的篮子，走在通往三楼的最后一段楼梯上。也是他在第一次审讯时断言，他牢牢记住了蒙德利太太叫喊的每一个字。可是在他后来面对蒙德利太太的时候，他却收回了自己的诺言，声明说，他可能会搞错蒙德利太太说的话，因为在第一个瞬间他被这个女人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这当然是很可能的，因为在过了这几周后，他在描述这个事件的时候还是那么的激动，以致他用手和脚的过分的动作陪伴着他的述说，使听众至少能够产生一种接近于他心中的那种感受的印象。根据他的陈述，蒙德利太太当时从门里跑了出来，他根本没有发觉门是怎么打开

的，因此他相信门本来就是开着的，她一下子扯开了痉挛地握在脑袋上方的双手，飞快地奔向楼梯。她只穿着夜衣，系着一块灰色的布，这块布甚至未能把她的上身全部遮掩住。她的头发是散开的，一部分垂在脸前，这也是使她的叫喊模糊不清的原因之一。在她奔向楼梯时，她刚看见这个面包房伙计，就用颤抖的手把他一把拽了上来，跑到他的身后，把他作为一个掩体向前推，牢牢地搂着他的肩膀。在匆忙中小伙子根本就没有想到把装面包的篮子在什么地方放一下，于是整个过程中就没有脱手。他们便这样以快速然而很小的步子向女人的房门走去，这女人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把他越搂越紧，他们跨过了门槛，在昏暗而窄小的会客室里往前走。这女人的脸不时从小伙子的左边或者右边露出来，她似乎在等待着某种东西，某种马上就会出现的东西。有时她把小伙子往回拽，好像不可能再往前走了，但接下来她又以整个身体把他往前推。这女人用一只手打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门，而另一只手牢牢地从后面抓住小伙子的脖子。她看了看地板，墙壁，屋顶，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便让那道门开着，更坚决地向第二道门走去，仍然把小伙子推在前面。第二道门早就大敞着的。刚进去时看得到的只有两张并列的床。房间里光线很暗，因为沉重的窗帘拉得很紧，只有狭小的缝隙中透出一点儿白昼的光。在进门后的第一张床旁的床头柜上有一小段残存的蜡烛在燃烧。这张床上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另一张床上。现在轮到小伙子不愿往前走了，可是这个女人用拳头和膝盖把他往前赶。在一次审讯时人们问他，为什么他会迟疑，是否害怕将会在床上看到的情景。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害怕，当时也没有害怕，但当时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躲在房间里，会突然地跳出来。对于这个他无法描述的“东西”，他要等它出来了才往前走。但由于这个女人如此急于到第二张床那里去，他终于让了步。

一块好大的做旗子的布覆在我的身上，我吃力地爬了出来。我发现我站在一个高地上，举目看去，草地和光秃秃的岩石互相交替着。同样的高地波浪似的向四面八方起伏，可以望得很远，只有西面正在下沉的太阳的雾霭和光芒使一切形状变得模糊。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我的长官，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腿支着胳膊肘顶在膝盖上，睡着。

《里夏德和萨姆埃尔》草稿^[58]

萨姆埃尔至少彻头彻尾地知道里夏德所有表面的意图和能力，但由于他习惯于细致入微地，不留缝隙地思考问题，所以里夏德的言论中只要出现一点至少不完全在意料之中的不规则的东西，就会使他感到惊讶，使他陷入沉思。这一友谊中使里夏德感到难受的是，萨姆埃尔从来不需要他那没有公开表达出来的支持，因而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在他那方面也从来不让里夏德感觉到他可以提供什么支持，所以任何时候也不能容忍在这个友谊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他那自己也没有认识到的原则是：比如说，在朋友身上人们感到敬佩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在朋友身上感到的，而是在一个同时代人身上都可以感到的，因此友谊必须在所有区别下面的深处开始。这使里夏德感到委屈，他经常很想能听命于萨姆埃尔，经常想向他表明，他是多么出色的一个人，可是只有在他能够看到萨姆埃尔会允许他一刻不停地说下去时才会开始这么做。无论如何，他在萨姆埃尔造成的这么一种关系中得到了一种值得怀疑的好处：由于意识到自己至今得以表面保持着的独立性，他可以居于萨姆埃尔之上，看着萨变小，当然他只能在内心中向萨提出要求，实际上他很想求萨向他提出要求。比如至少在萨姆埃尔的意识中，他对里夏德的钱的需要与他们的友谊没有任何关系，但对里夏德来说这种观念本身表现了一种值得钦佩的东西，因为萨姆埃尔这种对他的钱的需要一方面使他感到尴尬，另一方面使他变得很有价值，而两者都存在于这一友谊之中。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里夏德因为有过多的无把握感而思维缓慢，但他对萨姆埃尔的看法却要比萨对他的看法来得正确，这也是由于萨姆埃尔以他很强的联想能力，总是把通过最短的捷径所得的看法认为有绝对的把握，而等他观察的对象变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所以萨姆埃尔在两人的关系中才是真正的顾左右而言他者和退避者。他不断地削弱这一友谊，而里夏德不断地加强之，于是这一友谊不断地改变着力量对比，奇怪地然而又理所当然地朝着萨姆埃尔的方向推移，在特雷萨，里夏德由于舒适而过于疲倦，而萨姆埃尔过于强大，他可以做到一切，甚至把里夏德包围起来，这时友谊的进程便停顿了下来。到了巴黎，终于出现了萨姆埃尔预见到了，而里夏德根本没有想到的因而致命的冲突，导致这一友谊最终结束。尽管那么一种相互关系表面上看不像会有发生这种恶性变化的可能，里夏德是这一友谊中的有意人，至少一直到特雷萨时还是如此，因为他是怀着一种已经充分建立起了友谊的感觉，当然这是一

种错误的感觉踏上旅途的，而萨姆埃尔是怀着一种刚刚开始（当然这个阶段已经持续了很久）、然而真正的友谊踏上旅途的。这么一来，里夏德在旅途中越来越封闭自己，变得几乎漫不经心，目光总是只看到事物的一半，而亲密关系的感受却又特别的强烈；萨姆埃尔则相反，他能够也必须从他真实的内心出发（这是他的本质和他的友谊对他的要求），也就是说受到两方面的推动而迅速又正确地看问题，经常可以说得托着里夏德走。尽管里夏德对他的友谊有着那么充分的意识（到特雷萨之前），每一件小事都迫使他恢复这种意识，而且对此可以随时发表解释，显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他自己更谈不上有此要求，因为他那变化着的友谊那些一目了然的现象已经够他对付的了；可是他，对伴随着旅游的一切抱着怀疑态度，难以忍受旅馆的更换，对那些在家时于他来说也许根本不难理解的事物的联系不能理解，经常非常严肃，但绝不是出于厌倦，甚至不是出于希望萨姆埃尔在他的脸颊上拍一下的愿望，对音乐和女人怀着强烈的要求。萨姆埃尔只会法语，里夏德会法语和意大利语。于是他在意大利，尽管他们俩谁也不是故意的，只要需要问讯，就处于一种类似萨姆埃尔仆人的地位，虽然里夏德明白，其实这个角色是颠倒了的。而且萨姆埃尔法语很好，而里夏德两种语言都不太好。

致一个当局的呈文 [59]

来函我立即以一封明信片做了答复，虽然不是口头的，因为我病得很重。这张明信片也寄到了地方，因为过了一些日子后我从可敬的税务局收到一封询问的信，问我寄那张明信片去是什么意思，一个于1922年9月25日，Rp38/21，提出的要求该局并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为了不使这件对于可敬的税务局来说也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更加复杂化，我没有答复第二封问函，再说邮费也使我心疼；如果对这份XXX发出的照会该局不再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可以满意了。但由于11月3日的照会旧事重提，甚至对早已做出正确的答复的我威胁说要加以惩罚，请允许我重新告诉贵局，自从保尔·赫尔曼加入布拉格第一石棉厂这家公司后，再也没有其他股东加入，而这家公司从1917年3月起已不复存在。但愿这次我的答复能送到主管的部门手中。

假死 [60]

谁曾经假死过，他能够叙述些可怕的事情，可是死后是怎么样的，这他可说不上来，他实际上不比其他离死亡更近一些，从根本上看他只是“经历”了某种特别的事，平凡的生活从而变得对他更加珍贵。这同任何人经历了某种特别的事是类似的。以摩西为例，他在西奈山上无疑经历了某种特别的事，他没有屈从于这特别的事，就像一个假死者不吭声地躺在棺材里那样，他却从山上逃了下来，他当然就有了珍贵的故事可讲，并且从此比以前更甚地爱着他逃到他们身边去的人们，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他们，或许可以说，是出于感谢。从两者那儿，也就是说从回来的假死者那儿和回来的摩西那儿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可是关键性的却无法从他们那儿得知，因为他们也不曾得知。如果他们得知了，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但我们也根本就不想得知。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上得到考证：有时我们会希望在保证可以回来的情况下，在“往来自由”的前提下经历假死者的经历或摩西的经历，我们甚至盼望死亡，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活着躺在棺材里或在西奈山上，毫无回来的可能留在那里……

（这一现象本身与对死亡的恐惧有关……）

《他》补遗 [61]

他找到了阿希米德支点，却用来对付自己，显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他才可以找到它。

1920年1月14日。自己他认识，其他人他相信，这个矛盾把他的一切锯成碎片。

他既非勇敢亦非轻率。但他也不是胆怯的人。一种自由的生活不会使他感到害怕。现在他没有得到这么一种生活，然而这点同样产生忧虑，他本来就对自己没有任何忧虑。可是却有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某人，为他，而且仅仅为他怀着从不间断的、巨大的忧虑。这个某人与他相关的忧虑，尤其是这种忧虑的不间断性，在寂静的时刻有时会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头疼。

他散居在其他民族的人海中。他的元素，一支自由生活的游牧民族，遍布全世界。只是由于他的房间属于世界，他才会有时望一眼远方的世界。他又怎样为世界承担责任呢？这还能算是责任吗？

他的居室有一扇奇怪的门，它一旦碰上了，就再也打不开，而必须把它抬起来。所以他从来就不锁门，相反，他还把一个木块塞在总是半开着的门里，以使它不会关上。这么一来他的居处当然就什么舒适也谈不上了。他的邻居虽然是可靠的，但他仍然不得不把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手提包里，无论到哪儿都带着，当他躺在他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时，实际上就像是躺在走道里，夏天有闷热的风，冬天有冰冷的风从那儿吹入。

一切事情，甚至最普通的事，比如在饭店里得到招呼，他也必须借助于警察的力量才能迫使人家为他做到。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一切乐趣。

他有许多法官，他们像一支坐在一棵树的树枝上的小鸟的军队。他们的声音乱成一团，级别和主管范围的问题根本就搞不清楚，位置也不断地变动。有的还能认得出来，比如其中那个认为人只要有一次转向善的方面，他便得救了，他认为，这样的表现不必考虑过去，甚至不必考虑将来如何。假如对于进入善的解释不是非常严格的话，这种观点必然会诱使人走向恶。而这种解释确实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法官还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个符合这种标准的过渡案例。但却有一大堆候选人成天围绕在他的周围，这是有点喋喋不休的一群人，总是模仿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们总是听他……

1920年2月2日。他想起一幅描写一个夏天的星期日中的台姆瑟河景象的画。河面上一溜排满了小船，等待一个闸门的开启。所有船上都是快乐的年轻人，穿着薄薄的浅色的衣裳，他们几乎是躺着，任由热风和从水里透出的凉爽摆弄。由于这一切共同点，他们的交往便不再局限在每一只船上，玩笑和笑声在船与船之间交流着。

于是他设想，他自己站在岸旁的一片草地上（画面上几乎看不出岸在哪里，整个画面为众多的小船所充斥着）。他观察着这个节庆的场面，这并不是节庆，但可以这么形容。他当然有着想要参加进去的强烈愿望，他心里充满了渴望，但他不得不承认，他是被排斥在外面的人，他不可能适应这个环境，这需要有巨大的准备工作，要求他不仅在这个

星期天，而且许多年来都要到这里来。但即使这儿的时间能够停顿下来，他也还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他的整个出身、教育、体格训练都必须从头开始。

他距离这些郊游者就是这样的遥远，但却又是那么的近，这是更难理解的一点。他们跟他一样都是人，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会根本不存在于他们身上，如果能够彻底地研究一下他们，那么必然会发现，那种控制着他并把他排除在水上行舟之外的感觉同样存在于他们的心中，当然这种感觉还远远不能控制他们，而是只能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龇牙咧嘴。

我的牢房——我的堡垒。

“有一定的重力阻挠着他不让他起来，这是一种在一切情况下都有保障的感觉，仿佛感觉到一个为他准备好了，而且只为属于他的窝；可是又有一种不安阻挠着他静静地躺下，它把他从窝里赶走，阻挠他的是良心，是不间断地跳动的心，是对死亡的恐惧和战胜死亡的愿望。这一切不让他躺下，于是他又起来了。这种起来和躺下和一些在这些过程中所作的偶然的、匆匆的、古怪的观察便构成了他的生活。”

“你的描述是绝望的，但仅仅是就其分析而言，可这种分析有着根本上的错误。虽然确如你所说，人总是起来，躺下，再起来，不断重复，但同时，并且更真实得多的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体的，飞行中含有休息，休息中含有飞行。二者在每一个单体中重新合而为一。而每一个单体中的联合，每一个单体中的联合的联合，如此这般地进行下去，直到，嗯，直到真正的生活，那时候，即使这种描述也仍然还是假的，也许比你的描述还要迷人。在这一带周围就是没有一条通向生活的道路，而显然从生活方面必定有过一条通向这里的道路。我们就这样迷乱。”

关于伊地绪语的演讲 [\[62\]](#)

在这些东犹太诗人朗诵他们的诗歌之前我想要告诉你们，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懂得的俚语要比你们自己认为懂得的多得多。

我本身不对今天晚上将对你们产生的效果担忧，可是我希望这种效

果马上就能够变得自由自在，如果它有这个资格的话。可是只要你们中间有些人始终还害怕会听不懂俚语，这在你们的脸上几乎都能看出，这样的效果就不会产生。我说的根本不包括那些对俚语不屑一顾的人。可是对俚语的害怕，一种带着一定的抗拒心理的害怕从根本上说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以谨慎的眼光瞥一眼，我们会看到，我们西欧的关系是那么的秩序井然；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生活在一种愉快的和睦中，互相理解，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没有别人而过得下去；如果我们喜欢这样的话，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同样能够互相理解。从这么一个秩序出发，谁又能懂得这么一种混乱的俚语，谁又有此兴趣呢？

俚语是欧洲最年轻的语言，只有四百年历史，实际上更要年轻得多。它还没有形成那么一种我们所需要的清晰的语言形态。它的表达是短而迅速的。

它没有语法。爱好者尝试着写它的语法，可是俚语不断被人说出；它永远没有平静的时候。人民不愿意把它交给语法专家们。

它完全由外来语组成。可是这些外来语并不在它里面安歇，而总是保持着接受它们时那种匆忙和活跃。民族的迁移在俚语中贯穿着发生，从这头跑到那头。所有这一切德语的、希伯来语的、法语的、英语的、南斯拉夫语的、荷兰语的、罗马尼亚语的，甚至拉丁语的因素在俚语中为好奇和轻率所左右着，要把这么一种语言捏在一起，本身就需要力量。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过把俚语变成一种世界语言，尽管它本身是很接近这一点的。只有地痞语言喜欢从它里面吸取，因为它不需要很多语言中的互相联系，而只要个别的单词。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俚语很久以来一直是一种被歧视的语言。

可是在这种语言杂乱的喧嚣中却又有众所周知的语言法则在起作用。俚语开头的时候是产生于中古高地德语向新高地德语转化的时期。那时有可以选择的一些形式，中古德语取了其中一种，俚语取了另外一种。或者是俚语像新德语一样理所当然地发展着中古德语。比如俚语中的mir seien（我们是）同样从中古德语中的sin发展过来，却比新德语中的wir sind发展得更自然。或者俚语不顾新德语的发展而保留中古德语的特色。进入了聚居区中的东西，不是那样容易消失的。于是诸如Kerzlach、Bluendlach、Liedbach这样一些形式便保留了下来。

然后俚语的方言又涌入了这个任意和法则所构成的语言混合体。是的，整个俚语就是方言组成的，连书面语言也不例外，尽管人们对书写方式在绝大部分中是求同的。

凭上述的一切，我想我可能已经使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暂时给你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俚语中的话你们将一句也听不懂。

你们不要指望我们做出关于这些作品的解释来帮助你们理解。如果你们连俚语都没法听懂，临时的任何解释都帮不了你们的忙。你们顶多能够听懂解释，从而发现你们将面临一种难懂的语言。这将是一切。我比如可以告诉你们：

略韦先生现在将要，确实如此，朗诵三首诗歌。首先读罗森费尔德的Die Gririe. Grine就是绿色的，就是嫩头青，就是刚刚踏上美洲土地的新来户。在这首诗里，一小伙这样的犹太移居者背着他们肮脏的行李走在纽约的一条大街上。自然聚集起了一群围观者，跟在他们后面取笑。为这幅景象所激动的诗人越出了这个街头场面，谈到了犹太人和人类。人们会产生这么个印象：这一群移居者在诗人发表讲话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其实他们在很远的地方，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第二首诗是弗路格的作品，叫《沙和星星》。这是对一个圣经中的预言的一个苦涩的诠释。那个预言说，我们将像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星。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像沙一样受到了践踏，星星的命运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

第三首是弗里施曼的作品，叫《夜深沉》。一对情侣在夜里遇上了一位到教堂去的虔诚的学者。他们吓坏了，怕他会检举他们，后来他们又互相安慰。

现在你们看到了，这样的解释是毫无作用的。

由于这些解释的限制，你们将在朗诵时寻找你们已经知道了的东西，而真正存在于其中的东西将被视而不见。幸亏每个掌握了德语的人都有听懂俚语的能力。因为，如果站在一个当然是非常遥远的地方看，俚语最外层的可理解性是由德语构成的；这是德语在这方面优于地球上任何语言的地方。但德语也公平合理地有它不如其他一切语言的地方。这就是，俚语是无法翻译成德语的。俚语和德语之间的联系太柔弱，太

重要，以致如果把它引回到德语中去，它马上就会被撕成碎片，换句话说，回去的将不是俚语，而只是一个躯壳。把俚语比如说翻译成法语可以把它介绍给法国人，但如果把它翻译成德语便将毁灭它。比如toit不是tot（死），bluet绝不是blut（血）。

可是并不是只有站在德语这个遥远的地方，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才能够懂得俚语；你们可以更走近一步。至少在还不太久之前出现了德国犹太人让人感到亲切的交际语言，由于他们有的生活在城市里，有的在乡村，有的更多在西部，有的在东部而有所区别，这种语言就像是俚语前的台阶，对有的人来说因而近一些，对另一些人来说则略远些，存在着各种色调。由此可见，俚语的历史发展同样可以在历史的深处和现实的表层找到踪迹。

假如你们再想一下，在你们身上除了有现成的知识外，还有力量在活动，以及力量的结合体，那么你们就会走到离俚语很近的地方了，这些力量或结合体使你们有能力以感觉来理解俚语。只有在这里解释者才能够帮助你们，他能使你们安心，使你们不再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并使你们能够意识到，你们不能再抱怨说你们不懂俚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次抱怨都会使理解往后退一步。可是如果你们保持寂静，那么你们会忽然置身于俚语之中。一旦你们懂得了俚语——俚语是一切，是言词，是犹太音调，是这个东部犹太演员自身的本质——那么你们就将再也认不出你们先前的不安来。那时你们就将感受到俚语真实的统一性，这感受将是那么强烈，以致你们将产生恐惧，不再是对俚语，而是对自己。如果没有俚语将赋予你们的自信，它会顶住这种恐惧，并且比它更强大，那么你们光靠自己将会受不了这种恐惧。尽你们的能力享受它吧！如果它以后消失了，明天或再往后（一个朗诵晚会又怎么可能永远留在记忆中呢！），那么我要在此祝愿你们把恐惧一并忘掉。因为我们并不想惩罚你们。

一篇正式演讲^[63]

这个选择非常值得欢迎。一个人因此而踏上了一个理想地属于他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则得到了对它来说是必要的人。

马尔施纳尔博士无穷无尽的工作劲头给予了他以从事如此广泛而又繁杂的工作的能力，这个工作一个人一般是很难胜任的，因为一般人总

是只能看全这个工作的一部分。马尔施纳尔博士不仅亲自参加了公司的改善工作，而且多年作为公司的秘书，这便是他至今影响所及的范围。这使他对公司的整个机构认识得更加深刻全面；他以广泛的律师知识和能力为公司服务；专业科学圈子里所认识和重视的他则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作者；他对近年来的社会立法（尤其是产品责任法）的草案施加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作为演讲家，他出现在大型国际保险会议上，在布拉格的一系列演讲厅里我们也听到他以始终令人满意的、迅速使人了然的答复来回答有普遍重要性和现实性的保险问题；作为讲师，他在技术大学里利用他那互相促进完善的知识和经验给学习的青年人为日益变得急迫的社会保险问题打好基础；他在技术大学创设了保险技术课，他特别适合于这个课程，因为他也是保险数学的专家；他的教育学天才去年在布拉格商学院的保险课程上也曾向更广泛的圈子显示过，他被任命为国家考试委员会的成员，表明他的这方面才干受到了公众的承认。我们归纳起来说：他是一个在他的专业的所有领域里非常有益、非常坚韧地工作过和工作着的人，是一个与我们时代的各代人都有着活跃的专业联系的人。

这一切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把马尔施纳尔博士作为一个专家置于一种辉煌的灯光下，以致在波希米亚显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并列在他的身边，顺便补充一下，如果没有一定的勇气的话。

从马尔施纳尔博士现在得到的这个如此责任重大、众目所睹、管理如此复杂的一个企业的岗位看，他的科学的和社会的工作的人性一面更为重要。

他至今没有迈出过一步无诚实的务实精神伴随的步子；公开的处事成了他的需要；从他的自身意识出发，他执著追求的只是工作的出色；他唯一的野心是达到他所需要的效果面；他的不偏不倚、他的公正是不可动摇的，公司的职员今后将意识到，恰恰得到他作为领导是多么的幸福；知道他的文章、他的职业工作、他的为人的将会为他对工人处境的强烈的活生生的感情所感动，工人们将在他的身上找到一个朋友，但却不可忽视法律和当前的经济状况给予他的努力的界限；他从来不许诺，他把许诺的事让给了别人（那些需要做出许诺而且有足够的时间来许诺的人），可是真正的工作他总是自己做，悄无声息地，没有吸引公众注意的任何动机，只是无尽地苛求自己；在这方面他也是没有对手的，当然科学的领域在这里也许得除外；如果他有对手的话，那只能是一群不

幸的对手。

保险公司董事会在各种极其不同的影响的旋涡中忠实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而达成了这一幸运的选择，它因此而应该得到普遍的感谢：政府的，企业家们的，工人的和职员们的。

对保险公司的抱怨多年来越积越多，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后它将做出出色的工作，在今天的法律范围内有可能进行人们所要求的和有益的改革的地方，改革就将出现。

[1]* 这组箴言是卡夫卡生前自己从笔记中选出来的，他做了誊清并编了号，但未加总标题。这个标题为马克斯·勃罗德所加。文中以*号起首的段落是被卡夫卡画掉，但未从中抽去的。——译者

[2]文中“*”是原作者加上的，为了保持全书原貌，特予保留。——译者

[3]达达尼亚海峡的旧称。——编者

[4]文中的“某人”和“第二个某人”似指一个人心中的两种力量。——编者

[5]可能指亚当、夏娃对上帝的欺骗。——译者

[6]原文无104条。——译者

[7]* 在卡夫卡的遗物中有八本蓝色的八开笔记本，相当于德国中学里用的那种字母练习本。其中的内容正好填补了四开笔记本中的空白，因为在四开笔记本中从1917年11月至1919年中什么也没写。——译者

[8]这两个缩写字母表示的是“尊敬的维格勒”。保尔·维格勒在一次大战期间曾编辑过贝多芬书信集和叔本华的一个集子。——译者

[9]歌德作品，郭沫若曾译作《赫尔曼与窦绿台》。——编者

[10]指路德维希·利希特所著《一个德国画家的生平回忆》。——译者

[11]* 这个本子里包含一些已发表的小说，如《猎手格拉库斯》、《为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等，原编者未再收入这本书中。——译者

[12]1917年10月，由马丁·布德编辑的复国主义刊物《犹太人》刊载了卡夫卡的小说《豺和阿拉伯人》，同年11月刊登了《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译者

[13]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水妖。——译者

[14]奥特拉是卡夫卡最小的妹妹。T.估计指日记（Tagebuch）。——译者

[15]《圣经》中提到的一座未建成的塔。——译者

[16]汉斯·布吕尔，著名的仇犹主义作家，后来成为纳粹的先驱者之一。塔格尔后来以费迪南特·布鲁克纳的名字写作。卡夫卡在日记中对这两个作家都曾提到过。——译者

[17]弥赛亚，犹太教教义中的复国救主，也指基督教教义中的耶稣。——译者

[18]卡夫卡当时在读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美妙的珍品》是当时的一份刊物。——译者

[19]指奥地利作家恩斯特·魏斯（Ernst Weiss，1884—1940年，自杀），表现主义剧作家和小说家，卡夫卡的朋友。——编者

[20]约瑟夫·科尔纳，德国浪漫派的著名研究者；V.梅尔，可能是卡夫卡的一个同事。——译者

[21]普弗尔，卡夫卡的上司，普利布拉姆，卡夫卡的老同学。——译者

[22]指卡夫卡正在阅读的荷兰画家梵高的书信。——编者

[23]那时卡夫卡仍处于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的状态。——译者

[24]指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编者

[25]指卡夫卡与菲莉斯·鲍威尔第二次解除婚约。——编者

[26]从这里开始记的是1918年。——编者

[27]鲍姆，指诗人奥斯卡·鲍姆，他是卡夫卡的好友。——编者

[28]奥特拉，卡夫卡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妹妹。——编者

[29]“某人”和“第二个某人”似指一个人心中的两种力量。——译者

[30]卡夫卡把创作看作虚荣心的表现，而忘我在他是一种最佳创作状态。——编者。

[31]卡夫卡仍住在屈劳，偶尔去一次布拉格以争取延长病假。——译者

[32]指库尔特·沃尔夫，他是卡夫卡最早一些作品的出版者。——译者

[33]暗指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著作《瞬间》。——编者

[34]这可能是卡夫卡的笔误。“直觉”应为“意图”。菲利克斯·维尔池在1918年发表了散文《经历和意图》，卡夫卡的评论当针对此而发。——译者

[35]这段和以下六段是针对克尔恺郭尔的《畏惧和战栗》而发的。再以下两段是对克氏的批评。——译者

[36]卡夫卡在原稿中曾用第一人称，后才改为亚伯拉罕。——译者

[37]指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译者

[38]雷卡米叶夫人（1777—1849年），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女作家，曾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以组织文化政治沙龙而著称，大卫等人绘有她的画像，斜倚在一张半躺半靠的床上，此床因此而得名。——编者

[39]巴登州位于德国西南，涅卡河是流经该州的一条河流。——编者

[40]* 犹太剧演员伊萨克·略维连续好几个晚上给卡夫卡讲他的故事。卡夫卡把它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整理。除了在这八开笔记本里的记录外，在他的四开笔记本里也有所记载。而且还留下了誊清的稿件。卡夫卡尽可能尊重叙述者原来的风格。卡的意图主要是帮助略维度

过他当时所处的危机。——译者

[41]犹太语：支离破碎。——译者

[42]犹太语：蠢猪。——译者

[43]犹太教的一个节日。——译者

[44]犹太语：小学。——译者

[45]犹太教会学校中的教师。——译者

[46]犹太教的斋戒节。——译者

[47]伊地绪语的音译，意即松鼠。——译者

[48]这一篇是给韦尔弗的一封信的草稿，信中谈的是韦尔弗的剧作《施威格尔》。——编者

[49]腊希（1040—1150年），犹太学者，他编纂的犹太教希伯来语注疏和巴比伦塔木德注疏被公认为典籍。——译者

[50]米兰的主要广场，梦幻性的。——编者

[51]这里请注意一下卡夫卡的笔法：他扔掉了一个用熟了、写钝了的笔尖，在笔管上换上一个“尖尖的羽毛”。——编者

[52]这是长篇小说《城堡》的一段试笔。——附在笔记本中的一页上，写的年份是1920。——编者

[53]狄奥根尼（公元前400—约前328或前323年），古希腊哲学家，犬儒主义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编者

[54]这是小说《在法的门前》的又一稿本。——译者

[55]巴贝尔（Babel），传说中和《圣经》提及的古巴比伦的“通天塔”，塔是往上筑的，而这里是往下挖；塔和井成了两个方向相反的物象和行动方向，这是一种悖谬现象，是卡夫卡惯于采用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法。——编者

[56]紧接这一段记的是《饥饿艺术家》，由此可以推断，以上“散页

笔记”中写下的作品产生于1922年春以前。——编者

[57]宗教用语，犹太人用以珍藏刻有摩西《十诫》的石块的柜子。
——编者

[58]* 这一篇和以下两篇看来写于晚期，勃罗德将它们作为“外遗”编入《乡村婚事》一书。——编者

[59]* 这是卡夫卡给布拉格奇茨科夫区税务局一封回信的草稿，草稿背面就是该税务局于1922年11月3日给卡夫卡的信，其中称：如不对该局的信做出答复，该局“将上报布拉格区财政署，并要求采取对违反规定的惩罚”。这一年卡夫卡正在写《城堡》，此信颇有《城堡》的味道。
——编者

[60]* 这则箴言同柏林的其他卡夫卡原稿一起被盖世太保没收。当时的捷克驻德使馆新闻专员霍夫曼进行了努力，仍未被收回。但这一段箴言的抄件却被哈勒先生保留了下来。——编者

[61]* 从这一段直到“我们就是这样地陷入了迷惘。”勃罗德曾作为《他》的补遗编入了他的《乡村婚事》一书。这里则把它们与《他》衔接在一起。——编者

[62]* 这是1912年2月8日卡夫卡在其朋友、东犹太话剧演员略维朗诵会前在布拉格犹太人市政厅发表的讲话。该篇和下一篇在勃罗德编的《乡村婚事》一书中作为补遗刊出，鉴于它们产生的时间较早，特作如是编排。——编者

[63]* 这是卡夫卡以全体职员的名义，祝贺他所在部门的主任晋升为劳工事故保险公司的总裁时所作的演讲。卡夫卡很钦佩他这位领导。
——编者

谈话录

赵登荣 译

译本序

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作家日常的言论由别人记录成书而成为名著者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说得准。但在提及这类书籍的时候，其中有一本大概谁都不会忽略的，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的“诗中圣哲”，他的言论被人们视为至理名言是不难理解的。但无独有偶，同属于德语文学的另一部谈话录，即由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谈话录》30多年来正随着谈话者的名字蜚声国际文坛，而且在《歌德谈话录》新译本（选编）在我国出版仅仅13年之后的1991年，其首译本也已在我国问世。如同《歌德谈话录》体现着作者在“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晚年，亦即在他思想最成熟阶段的智慧的结晶一样，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也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纵览”了一遍世界，即思考了一辈子人生真谛后的产物，全面反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或思想火花，人们现在经常引用的一些卡夫卡的著名观点，许多都出自这部书。可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则尽管有他那许多半自传性的长短篇小说和大量书信、日记，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就不如现在这样全面而丰富。因此这部书的诞生和存在进一步加强着人们对德语作家的这一印象：作家兼哲人的品格。

或许有人会问：在谈论《卡夫卡谈话录》的时候，难道有必要与《歌德谈话录》相联系吗？难道前者的重要性堪与后者相提并论吗？这样的疑问如果出自于一个对卡夫卡还不甚了解的读者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卡夫卡是有所了解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要义有所领悟的，那么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性的回答。诚然，卡夫卡的年寿只有歌德

的一半，而且作为业余作家，就知识之渊博、产品之丰富而言，他确实是与歌德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凡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作家存在的特殊价值，主要的并不取决于其知识积累的程度和作品的多寡，而取决于他对时代的独特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看他对他的时代的某种潜精神的洞见，并通过文学手段对之做了预言性的、启示性的表达。无疑，歌德作为德国古典文学鼎盛时期的代表，他在这方面的造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作品不仅是属于他的时代，而且也是开启未来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汲取不尽他那丰富文学遗产中的艺术养料。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于是，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一跃而为现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1]并被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的色彩，成为本世纪国际文坛爆出的最大的冷门。有人甚至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堪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2]如果说，这些评价，不过是些专家、学者的看法，那么，1985年西欧五个X学大国英、法、德、意、西的诸家重要报纸联合举办的“已故十大欧洲作家”评选的结果，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看法的普遍性和群众性。根据那次评选揭晓的名单看，卡夫卡被排在“十大”的第五位：

但丁、塞凡提斯之下，而在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莫里哀、乔埃斯、狄更斯之上。当然，有时候时代是会错爱一个人的，那么，就由历史去做最后结论吧。但在历史做出最后结论以前，我们把两者作这样的比较，该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在我们把德国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师相联系的时候，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卡夫卡作为以“反传统”出名的“现代派之父”，他不仅不反歌德这位最重要的德国古典作家，相反，他是歌德的最热烈的崇拜者。在他大量的书信、日记中，被提及得最多的是歌德，在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一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卡夫卡之所以推崇歌德，主要认为歌德的作品有一种“持久性的艺术”。应当指出的是，卡夫卡崇拜歌德并不是表现在把歌德单纯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而是把歌德的杰出之处例如艺术的“持久性”切切实实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了，无怪乎他那些生前并未激起普遍反响的作品，具有那么大的“后劲”，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广大的地域。这一事实说明，卡夫卡是歌德艺术遗产的最好的继承者。但歌德的艺术之所以具有“持久性”，关键性的一点是强调自己的创造。对于这一艺术要旨卡夫卡也牢牢把握住了。在1912年2月8日的日记里，他单独记下歌德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我对创造的兴趣是无止境的。”显然，卡夫卡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其说停留在被动的接受上，毋宁说表现在对它的精神的把握。如果说，卡夫卡不跳出前人的雷池，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关心当代人的根本命运，并善于相应地捕捉时代的新的审美信息，那么，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能打动今天的读者的心灵的。可见，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创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只懂得依样画葫芦地继承前人、仿效别人的作家是不会有前途的。卡夫卡在这方面与歌德是一脉相通的。

当然，《卡夫卡谈话录》能不能像《歌德谈话录》那样保持不朽的恒定值，这主要看书中的价值容量。卡夫卡在这本《谈话录》中十分广泛的问题，政治、哲学、文学、美学、宗教、伦理等无所不包，而且每每有精辟的见解。例如人们经常引用以说明他的基本政治观点的那句话“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就是出自这本书，而卡夫卡的这一思想与他在长篇小说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以及卡夫卡的共产党员朋友、诗人鲁道夫·富克斯指出的“卡夫卡是个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的论断是一致的。又如，卡夫卡是写“异化”出名的，但他的小说和书信、日记中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哲学意义上的“异化”这个概念，而他在《谈话录》中有些表达却是与这个概念相联系的：“生活的传送带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在另一处他谈到人被群体运动所左右而使自己的意志失灵的情况，等等。再如，卡夫卡作为一个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和开拓者，他的作品是以表现方法的奇特著称的。这一现象源于他独特的美学思想，而这方面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见解，大多见之于这本书中。如他认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是文献和见证”。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在于设法“给别人装上另一种眼睛”。这就是艺术应帮助人们透过生活的表象去发现它的真实本质，而“照相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表层”。这里的“照相”就是“写实”的同义词，他认为按照生活表面去写实，是不可能发现真正的真实的。因此在他看来，“电影是铁制的百叶窗”。这就是说，实录的作品是妨碍人们认识真实的。于是他提出：“作家的任务是预言性的。”这就为他作品中那种象征性、譬喻性的写法提供了注脚。卡夫卡的最大传奇故事之一当推他晚年的焚稿奇念，通过这本《谈话录》我们可以窥察到他的这一念头的内心秘密。像很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卡夫卡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在书中他赞赏“中国彩色木刻艺术的清、纯、真”，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他着迷于中国古代成语、譬喻、幽默故事；他赞赏《道德经》、《南华经》，尤其被老子思想所“陶醉”；他以拥有《论语》、《中庸》、《列子》等书籍为自豪，认为“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等等。书中还有一系列格言式的警句，这里就无法一一尽述了。当然由于卡夫卡思维的悖论习惯，他的有些见解不大好理解，这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就总体而言，书中的许多见解都是颇具新鲜感的。

《卡夫卡谈话录》是根据追忆记述的，那么它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如何呢？二次大战以后，1947年，本书记述者雅诺施曾将手稿送给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过目，勃罗德阅后十分高兴，充分肯定了内容的可靠性，并在尔后为卡夫卡写的传记里做了详尽的记叙，他写道：

“卡夫卡的外部特征，他的讲话方式，他的特别富有表达性的、习惯于借助手势的柔和方式，以及类似于音容笑貌那样的东西，得到了最鲜明的再现。我觉得，仿佛我的朋友突然又醒过来了，并正走进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讲话，见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安详地看着我，感觉到他那静谧的、痛苦的微笑，我感到被他的智慧攫住并受到感动。”

在另一处勃罗德继续写道：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

勃罗德还利用卡夫卡晚年的生活伴侣多拉·迪曼特听他朗读后的反应来验证他的判断。他说：

“她立即就被吸引住了，并认出这是卡夫卡的那确凿无误的风格和他的一切通过雅诺施所保留下来的思维方式。她感到这本书是她与卡夫卡的真切的重逢并引起心灵震撼。”

无疑，这本书将同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一样，不仅成为卡夫卡本人思想、人格和创作的“文献和见证”，而且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献和见证。

本书最后一节附录《对话》与雅诺施记录的谈话录无关。那是卡夫卡晚年病危期间，由于喉头结核说话困难，不得不借助笔头与人交谈。这几页文字不仅让我们知道卡夫卡最后在病榻上忍受痛苦，顽强与死神斗争的动人事迹，而且让我们看到在他的伟大生命行将熄灭的时候，他依然流露着对生活的酷爱。就在他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饥饿艺术家”的时候，他校完了他最后一本小说集《饥饿艺术家》，此时他不禁泪流满面——那是他的灵与肉不期而遇的结果。

叶廷芳

1995年

本书的历史 [3]

我的这本回忆录初版于1951年，我原取名为《卡夫卡对我说》，出版社负责人改为《卡夫卡谈话录》。读者、报纸与广播台的书评家以及职业文学批评家立即对我的文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此后的岁月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浓厚了。我的这本平淡无奇的书变成了被严肃评价的文学性研究资料。因此，在《卡夫卡谈话录》德文本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出了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南斯拉夫文、西班牙文译本，甚至出了日文译本。

于是我收到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书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一一作答。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对那些难于回答的问题，我可以避而不答，但是，在与从世界各国到布拉格的卡夫卡崇拜者的越来越多的谈话中，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常常只好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诉讼》、《美国》和《城堡》不像对我那样只是书名；他们大多对这些书进行过真正的研究。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对这些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的来访者，我不能这样说。即使说了，他们也肯定不会正确地理解我。这一点在一位年轻的、富有才气的布拉格文学研究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身上得到了证实：我试着向她讲真话时，她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就弗兰茨·卡夫卡这一文学现象写过一篇内容广泛的博士论文。她那撮圆的嘴巴和瞪得滚圆的黑眼睛无言地、然而却十分清楚地告诉我：“这可太荒唐了。”但对我来说，我对卡夫卡过世后出版的遗作其实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而略知一二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任何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青年时的困惑迷惘，随后几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对幸福的种种设想的破灭，一切权利的突然被剥夺和由此而引起的日益加剧的内心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绝，充满忧伤、提心吊胆的忧郁日子，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紧紧地胶着在耐心地忍受命运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身上。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至今还像多年以前一样，一直是我整个人的保护外壳。他是以他的善良、宽容、坦诚促

进和保护我的自身在冷风凄雨中发展的人。他是认识和感情的基础，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怕的洪流中，我仍站在这坚实的基础上。

除了自己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历的力量以外，对他的书籍进行解释的各种尝试能给我什么呢？只能是密封的感情与思想罐头。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是如此伟大，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

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住在布拉格民族街。我的小房间的笨重难看的暖气上放着橄榄绿手风琴，上面有一个石棉衬底的木制书架，卡夫卡的书就放在这个书架上。我有时取下这本书，有时取下那本书，读那么几句或者几页，但每次我的眼睛很快就感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血液在颈动脉里有力地跳动，我不得不把刚拿下的书迅速放回书架上。读他的书是与往日留下的、珍藏在我心里的、依然非常清晰的印象和回忆相违背的，当时，我的心完全被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以及他对我说的话所占据、所迷醉，他的话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敢于在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并进而评价和把握自我方面有意识地迈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我害怕失去继续活在我心中的“我的”卡夫卡博士的形象，直到现在，每当我感到在害怕与绝望的旋涡里快要沉没时，他的形象作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和生活榜样就给我新的力量，使我镇静。

我担心，阅读他的遗作会使我不祥地疏远我的卡夫卡博士，从而失去我青年时代令我十分陶醉的经历所具有的经常催人振奋的推动力。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卡夫卡对我并不是抽象的、超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对我是一种深刻体验的，因而又完全是现实的私人宗教的偶像，这种私人宗教的影响却超出了纯粹个人的事务，它的精神使我得以对付某些荒唐的、笼罩着毁灭阴影的局面。

我所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和《致米伦娜》的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坚定的伦

理责任感的宣告者。他是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忙于公务的职员，但是，在他那看似平凡的公务生涯中却闪耀着最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对神和真理的包容大地的渴念的无望余火。

对我来说，弗兰茨·卡夫卡是最后的，也许是最伟大的——因为离我们最近——人类信仰与思想的宣告者之一。

在我和他相处的年月里就已经风烛残年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唤醒了我的感情和思想。他是精神上最伟大的人物，因而也是对我青年时代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一个真正的、为真理和人生价值而苦苦斗争的人，我目睹了他为生存所进行的顽强斗争。他的脸部表情，他的轻声话语和大声咳嗽，他那又高又瘦的身躯和那双纤手的优美动作，他那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中的忧郁和光彩，他常用这双眼睛的光芒强调他的看法，他的人格永恒的无与伦比的、因而永不再现的东西，他的外在的与内在的气质，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心里颤抖，像在我的岁月的各种通道和峡谷里回荡的回声，不断地以清晰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这种回声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越清晰。

我的卡夫卡博士不是我们时代文字记载中迟早要失去光辉的形象，而是始终活着的、起着典范作用的人，是一束光，它的温暖和不断增强的光亮从我的青年到现在一直陪伴着我，像指引我保持善良和真正的人性的可靠的指南针那样，忠实地陪伴着我来到迅速临近的死亡的门槛。

我的卡夫卡博士是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基本经历，是一种又甜又涩的、调动我的所有生存力量的振动，是生长脊椎。我在与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相处的日子里，主要通过认真记日记的方法设法促进它的生长。我首先记下他的言论。至于产生这些言论的情况，则概略做了记载。我觉得这些情况不重要。我只看“我的”卡夫卡博士。他是思想焰火，其他的一切都在它的影子里消失。这当然也影响我的记载的语言和形式，这种影响在我的日记里不像在专门记录里那样大，我把那些专门记录记载在我看作我的经常性的“思想库”的厚厚的灰色记录本里。

在这个本子里，我非常杂乱地储存了引语、诗歌、小块剪报、文学计划和奇思妙想、轶事、小故事，我一时想到的事情以及从三教九流那里听来的事情，首先是卡夫卡对各种不同的事情和事件的议论。您可以从这个“思想库”里取材，编出一本可观的惊人的格言集。但是，把相关的文字机械地收集在一起，并不能编就这样一本集子，因为我常常把这

些不同警句的出处和如何产生的材料略而不记。今天看来，我的“思想库”只是零星地、随便地记录下来的各种阅读和对话时的片断材料的大杂烩，我也许只在记录的当时才确切知道这些材料产生的背景情况。

这一点，我在弗兰茨·卡夫卡逝世后两年就清楚，当时我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高原的斯塔拉里斯市捷克正统天主教徒、政论家和出版商约瑟夫·弗洛里昂家逗留了几天，和他及在他的家庭集体中生活的弗拉那神甫讨论弗兰茨·卡夫卡和现代文化的各种发展可能，我们整整讨论了几个下午和晚上。

应弗洛里昂的要求，我从日记和“思想库”的毫无文学色彩的记载中编了一本语言上大家都能懂的言论集，约瑟夫·弗洛里昂想用捷克文出版这个集子。这件事没有成功，因为我的感情与思想和弗洛里昂的正教思想无法取得一致。于是我就只好离开了。我开始了在不同的人、城市、价值观和职业之间不安地进行摸索的漫长时期。在这过程中，无数新的体验冲刷了我青年时期的感情与思想经历。卡夫卡博士的图像苍白淡漠了。我离开了我青年时代的精神上的根本经历，因而也就离开了我自己，离开了只保留给我一个人的、发展我独特的现实的各种可能性。就像那些写得很工整的回忆和记录连同那本厚厚的灰色“思想库”笔记本放在我的书柜里旧的乐谱、乐曲初稿、图画和剪报下面“闲居”那样，我与卡夫卡博士相处的日子留下的情景和话语也沉没在对幸福和生活真谛的各种杂乱无章的错误的想象中。后来，在战争和暴力的高压下，我才开始清理我的思想。《变形记》中的昆虫生活和《在流放地》中的冷酷无情的行刑机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的装订工当时在我的卡夫卡早期小说集上绘制的燃烧的荆棘丛，“我的”卡夫卡博士多年以前试图只把它看作必须摒弃的夜魔的世界观和信仰浮现在我的脑际，弗兰茨·卡夫卡的地狱突然变成我的日常体验的普通的组成部分。

我曾与我的朋友、著名的布拉格音乐家格奥尔格·瓦霍弗斯及他的妻子雅娜谈论强烈地触动我的心灵的世界气氛的转变。他们认为，我对弗兰茨·卡夫卡的回忆不属于我一个人。

“一个人从酸甜苦辣的经历中榨出的经验之酒是属于大家的，”雅娜说，“因此应该用语言的盘子把酒传递给大家。”

我的朋友也赞同她的看法。他说：“你一定得把这些谈话整理出版。你是卡夫卡的见证人，你也许掌握着理解他的内心本质的重要钥匙。”

听了他们的话，我回答道，我不了解他的全部作品；我当时并没有把他当作诗人与他来往，而只是把他当作我父亲的同事。对此回答，我朋友的妻子却火冒三丈。她一边在空中挥舞双手，一边嚷道：“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对全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作品要求一个人全身心地投进去。这一点在你们的谈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法学博士卡夫卡和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之间并没有把他们分割开的隔音水泥墙。这一点，在他和你进行的谈话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出来。你和他的谈话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因此，你不能把这些谈话据为己有，不公之于众。”

对此，我无言以对。

我从柜子里取出我的记录，交给我朋友的妻子打字誊清，因为当时（1947年）我在臭名昭著的布拉格潘克拉克监狱无端地受了14个月监禁之后，精神受了打击，身体十分虚弱。

约哈娜·瓦霍弗斯^[4]没有花几天时间，就一式三份打完了我的稿子，并作了注释。她没有问我一声，就于1947年3月21日通过布拉格邮政总局把稿子寄往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马克斯·勃罗德。然而过了几星期后，我朋友的妻子没有得到回音，心中十分不安，她又把一份复写稿寄给斯德哥尔摩她的伯父埃米尔·科萨克，一位印刷专家。从斯德哥尔摩也没有回音。于是我决定把我的书提供给属于玛丽·S·罗森贝格夫人的一家犹太小书社，罗森贝格夫人住在纽约西100区72街。她很快复了信，并于1947年9月10日来到布拉格，从国家手里买了大批被没收的德语旧书运回美国。对我的书稿《卡夫卡对我说》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只表示了礼节性的兴趣。但对我这样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受了百般折磨的拘留犯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别的人对我的信都不做答复。我抱着一丝出版的希望，把最后一份打字稿给了罗森贝格夫人，而没有向她要收条，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份稿子。

雅娜·瓦霍弗斯把我的回忆录称为卡夫卡资料集，现在这本资料集无声无息了。我试图把我的回忆录当做一次失败的、因而毫无意义的文字尝试忘掉它。然而到了1949年圣诞节时我收到了一封落款日期为1947年12月14日的信，信是卡夫卡的忠实朋友和知己马克斯·勃罗德寄来的，他在信里谈了对我的稿子的看法。他指出了注释中的几个小错误，在总体上则把我的书称作一本“很好的、很有启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书”，他将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奔走。

他在信的结尾说：“最后，我要再次对您说，您的记录使我感到很高兴，它使我难忘的朋友的某些重要特征——其中一部分增加了新的细节——又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令人十分感动。请告诉我您贵体如何？”

这是在担惊受怕和蒙受耻辱的漫长岁月后听到的第一句亲切的、给我刚刚萌发的自我意识以力量的话语，这句话由“我的”卡夫卡博士所敬重的、以他的安静而又恳切的方式喜欢的人说出来，对我的效果就更加强烈。

我于1950年1月5日给马克斯·勃罗德博士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写道：“您的信对我是一件很好的圣诞礼物。您当然可以在附录里（雅娜·瓦霍弗斯以阿尔玛·乌尔斯的笔名写的注释）按您的意见改动和更正。我为此非常感谢您。我并不把我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书看作文学作品，而是看作资料：它不外是一个见证人的陈述，和我青年时代的环境气氛的一次清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在信的结尾，我给马克斯·勃罗德博士对我的书进行必要修改的权利。对勃罗德博士亲切的话语，我报之以完全的信任，待到书籍出版——合同和修改稿我从未见过——我对他的信任受了一次令人非常沮丧的打击。原稿的很大一部分在书里不见了，包括不少我非常看重的地方，因为这些材料反映了《变形记》和《在流放地》的充满梦幻的作者迄今为止未显露的反叛精神，他的坚定地反官僚主义的态度，他的呻吟，在他办公室的烟雾工厂里不时出现的苦涩的绝望情绪，他对布拉格历史的深切关注，他对语言的双关字义充满幻想的执著追求，他对假社会主义的党魁的辛辣讽刺，他对任何一种政治幻想的现实目光，他的略带阴森味道的幽默和他的有力的、批判性的处事态度。

所有这一切在1951年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书里几乎都被删去了，我的书成了没有头没有四肢的躯干，一个残疾的躯体，一尊可怜的残体，看到它，我的心就抽搐。这是一本蒙上眼罩的书，一条因乱砍乱削而变得模糊朦胧的地平线，一张疲乏的、露出犬齿的歪嘴，一个遭受阉割的废物。

马克斯·勃罗德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我的记录要以这种侮辱卡夫卡其人的、歪曲的形式出版？

难道我的质朴无华的回忆组成的斑驳图像妨碍了某个我不知道的文化纲领？

难道我的卡夫卡博士与他的遗作的编选者所希望的不同？

他为什么删去揭示卡夫卡属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迄今鲜为人知的根源的段落？

难道马克斯·勃罗德真像布拉格左倾杂志《青年犹大》的共产党发行者恩斯特·科尔曼1920年在一份传单中所说的是一个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为什么在我的记录里到处乱删？谁讨厌这些东西？

我越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越在我的脑子里萦回。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最简单的也许是给马克斯·勃罗德写封信。然而，正是这一点我不能做。勃罗德曾为出版我的书而奔走，我为此应该感谢他，而且我曾授权他作某些删节和修改。我现在无法抗议。我只能紧闭嘴巴。可是，在这方面我没有一丁点儿天赋。我不高兴的时候，很难掩饰我的情绪。这次我的书被搞得断了胳膊缺了腿，我也是这样。我沉默，我后退，但我嘟哝，而且常常很响[5]。

听见我发牢骚的人从他们的兴趣出发做出了反应。

来自罗马（路德维希街16号）的意大利记者内里奥·米努索离开布拉格前不久由年轻的捷克记者扬·帕里克介绍与我见面。他对我说：“您是最后一个在布拉格还活着的认识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人。您应该把您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告诉大家。每个细节都可能是一把钥匙。您不能沉默，使他罩上一层迷雾。”

我大为震惊。我把卡夫卡看作我们时代最深沉、最痛苦的精神冲突的耀眼烽火，难道我要让这样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让这样一束指引方向的光蒙上一层雾霭？——我无言以对。我承认，当内里奥·米努索和他的朋友们突然动身前往机场时，我是多么高兴。

我书里的漏洞并不是我造成的。它来到我手里时已经是缺头断肢的躯体。我很愿补全它，但我没有办法。三份打字稿都没有了。我没有副本，我的日记在我无辜坐监时被我的妻子烧掉了。那么那本“思想

库”呢？我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对过去的事，我怎么能理清脉络呢？

我和杰出的卡夫卡传记作者克劳斯·瓦根巴赫通过几个月的书信，在布拉格一连几天一起追寻《变形记》和《在流放地》作者的足迹。他对我说：“您一定得把您知道的有关卡夫卡的事情写下来。时间不多了，过不了多久，就再也没有人能回忆当时的情况了。”

瓦根巴赫的话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身体虚弱、随时会死这一事实。他说得对，我该怎么办？是否该对马克斯·勃罗德博士和《卡夫卡谈话录》这一不完全的版本表示怨恨不满？

克劳斯·瓦根巴赫是勃罗德的熟人，是s·费舍尔出版社的编辑之一。我以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为借口，谢绝了克劳斯·瓦根巴赫愿意帮忙的表示。那借口是什么，我今天已经记不起了。

但是，我内心的痛苦并不因此而有些许减轻。相反，这本缺头断肢的书给我造成了精神创伤。我是重要的见证人，却不能作证。我感到很内疚。于是，我很自然地向许多人求教，但是，当一个人处在一种触及到最隐秘的生命之根的痛苦中时，他总是孤独的，别人帮不了忙。他们说的话全都是隔靴搔痒——倘若他们没有真正的、不拘俗套的爱我的话。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和奥地利文学学会的秘书沃尔夫冈·克劳斯博士一起坐在已经关门的安静的墓地里，坐在弗兰茨·卡夫卡墓旁。他对我说，我应该把我的回忆写下来出版。他说：“没有地方规定，您除了那本获得成功的《卡夫卡谈话录》外，就不能出版您自己关于您熟悉的这位布拉格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

对他的看法我没有说什么。在这位叫人喜爱的维也纳文学研究者面前，我不能说，弗兰茨·卡夫卡对我来说不是文学研究的材料，而是悄悄形成的个人宗教的灰烬。对我来说，弗兰茨·卡夫卡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轻松愉快的文学事情，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信仰楷模和生活典范。

到现在为止，知道这一点的人当然只有少数几个，因此，许多外国出版公司纷纷找我，向我提出各种不同的出版要求。比如慕尼黑的金德勒出版社就要求我找出我的资料箱，帮助他们出版一本有关步卡夫卡后尘的人的书。我于1961年5月25日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事情很清楚，我没有必要的材料和条件。我既没有未经删节的《卡夫卡对我说》原稿的复印件，也没有旧的“思想库”记录本。况且，即便我找到丢失的

灰皮记录本，我也很难回忆起那些言论是怎样产生的。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很可能会把某条记录误安到弗兰茨·卡夫卡头上，而按照实际情况，这条记录是从现在已经遗忘的某本阅读材料中摘引出来的。

我还能做什么见证呢？我不能胡乱想出点什么，给世界某地的某些猎取新闻细节的猎手端上几盘轶事佳肴。我的每一句话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尽量精确的证词上。就连这样的证词也被误解。

一次，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尔南多·吉亚玛特奥到布拉格为意大利电视台拍摄关于卡夫卡和布拉格的一个短片。我带他走过管道状的、黑暗的房子通道，当卡尔大桥的高塔和布拉格宫殿的侧影突然从雾霭中出现在面前时，他对我说：“您是一位作家。”

“您是一位作家，”他又说了一遍，“对您说来，卡夫卡是您在青年时代遇见的不寻常的人。”“这话不错，”我说，“他是一位先知。弗兰茨·卡夫卡不是生活在布拉格。布拉格只是跳板。弗兰茨·卡夫卡生活在神圣的殿堂里。”

因此，我觉得丢了我的回忆录是一种过失，是一个严重的过错。

巴黎克拉维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露茜·乌尔里奇在布拉格逗留期间，我曾把我的上述想法告诉她。她对我说：“请您安静。卡夫卡是预言家。您记下了他的声音。预言家的声音不能湮没。您其余的谈话片断一定能找到。弗兰茨·卡夫卡不是一般的文学事情。卡夫卡的声音是给我们时代所有人的重要讯息。您的卡夫卡谈话录一定能不加删改地全部出版。”

我们在文策尔广场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漫步。露茜夫人的声音充满炽热的信念。我感觉到这种信念，但我不相信她的话。对我来说，她的热情只是一种姿态。我的谈话录的原稿和复写稿都没有了，不会出现什么奇迹把稿子送回来。我觉得很难受。我感到我就要因糖尿病而昏厥过去。我的呼吸很急促，背上渗出了冷汗。露茜夫人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回市郊我住了很长时间的房子。

她告别时对我说：“您不能垮下去。正像卡夫卡说的那样，绝望是最大的罪过之一。您一定要相信公正和仁慈，然后一切都会变好。好事常常穿着灾祸的外衣来到我们身旁。”

露茜夫人说得对，但这一点是我很久以后体验到的。在我和露茜夫

人谈话时看到和经历的是，我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处在重重困难之中，毫无出路，这种情况不是由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外部情况，而是由事情和人自身的内部魔力所造成的。

和露茜·乌尔里奇夫人谈话后，我在可怕的重压下生活了好几个月，我做了种种努力都摆脱不了这种重压。我一天比一天昏聩。我的妻子海伦妮长期重病后去世了。不久，我女儿安娜骑摩托车出事丧生，我未能参加她的葬礼，我妻子的丧葬费我也只付了一部分，因为我的一切生计都已断绝。我作为社外编辑和译者为之工作的一家有名的布拉格出版社女经理自杀身亡。出版社新领导不肯承认主要是口头委托的任务。整整干了一年，没有得到一分钱，当我对这种不公正待遇进行抵制时，我非但没有得到钱，还被切断了所有活计。与此同时，我在德国书籍市场上与几个纳粹分子发生了冲突，他们施展诡计，破坏我的一本书的出版。我在这本书里突出描写了种族迫害引起的心灵上和精神上的后果，写了遭受种族迫害的人把爵士音乐当做他们争取心理解脱的手段。因为我不仅了解黑人音乐，而且熟悉特雷亚市[6]隔离区里年轻犹太人的“音响面包”，我多年的朋友、作曲家埃米尔·路德维克忘我地支持他们。

这些事实当然不合昔日为种族干部、而今摇身一变成为干练的民主主义者的人的胃口，他们用非常卑鄙的手段破坏我的《死亡布鲁士舞曲》一书的出版，当我进行抵制时，我的《相逢在布拉格》一书也被压下，没有再版，此书第一版在此以前几个星期销售一空，美国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苏联利沃夫俄罗斯大学向莱比锡的保尔·李斯特出版社要书，均一无所获。

我由于坚定的、人道主义的、与对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怀念密不可分的思想而毫无法律根据地受到迫害，被逼到了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他们封住我的嘴巴，企图剥夺我从事活动的一切手段，以此加速我的内耗，摧毁我。

他们的阴谋几乎得逞。我长期病魔缠身，心灵备受煎熬，现在又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为日常衣食操劳，因而我的新陈代谢功能受了影响，失去了平衡。我心灵上和肉体上都衰颓了。其结果是，我逐渐陷入外部与内心的孤独中，这种孤独感没有使我的内心变得冷酷漠然起来，相反，使我产生了一种任人摆布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心情越来越烦躁不安。

与我交好的医生诊断，我很容易受各种疾病的感染。我几乎高烧不退，离不开病床。除了身体的衰败，智力的逐渐衰退也显现出来。我迄今为止的非凡的记忆力出现了漏洞。我转瞬之间就忘记已经定型的动作和日常小事。我的生活似乎没有价值了。我已经成为加缪、贝克特^[7]和其他荒诞派大师的写作对象了。我只有一种前景：死。我要安详地、悄然地等待死亡。我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一切都井井有条。由于得到许多好人无私的帮助和关怀，我得以坚持到现在，我不愿给他们留下债务和混乱。于是我又回到我在民族街的老住宅，我妻子去世后，我很少到这里来，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我想找出留在这里的图画、衣服、瓷器和其他东西送人。翻了约半小时后，桌子上堆了一大堆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我找一只箱子。房间里没有箱子。先前，我在厕所的杂物架上看到过几个硬纸板货箱。我从那里搬过来一个磨损得很破旧的大纸箱。箱里装满了各种衣料布头、毛衣针和发黄的裁剪图案。我把箱子里的东西全倒到地上。最下面有一本约翰·斯特劳斯的华尔兹乐谱，而乐谱下面竟是我的灰皮旧笔记本“思想库”。斯特劳斯华尔兹乐谱中夹着打字纸，那正是我的《卡夫卡谈话录》删节段落的原稿。我不禁坐下读起来。

马克斯·勃罗德博士在我的书里并没有随意乱删。他一段都没有删。我冤枉了他许多年。错误在于我什么都不当回事儿的偷闲作风。较之远者，我对近者给予了更多的信任。约哈娜·瓦霍弗斯因为焦急——自然是好意——没有把全部打字稿寄给马克斯·勃罗德。这就是事情的原委。这些打字稿怎么会夹到乐谱本里，装到箱子里，我不清楚。不过现在这也不重要了。露茜·乌尔里奇夫人说得不错。她说得太对了。她的热忱并不是姿态。像冤枉了马克斯·勃罗德那样，我也对不住她，因而也对不住自己。预言家的声音是不会湮没的。这一点，露茜夫人早已看到并且说过。

因此，在整理我一生遗留给后世的東西时，第一桩事只能是补充有关卡夫卡的见证材料，但这不是结束，不是坠落彼岸，而是开始，是归返。不仅对我，而且对许多默默无闻地工作、为美好的明天努力的人，都是如此。

正如善良忠诚的马克斯·勃罗德博士所说，我的卡夫卡博士是指路人，因此，我在这里写下的公开忏悔和谢罪的文字不是终结，而是一扇敞开的门，一片希望，一次呼吸，给我们这些虚弱的人身上——在我们经历了恐惧与失望的种种折磨后——还活着、尚未被摧毁的东西带来新

的力量。

古斯塔夫·雅诺施

1968年

谈话录

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看他一次。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看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层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把它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干吗站着？”他停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为何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有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你读了诗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要称之为愚蠢。”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17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我怎么不能读你的诗？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的诗作？有几首诗我甚至很喜欢。我很想听听行家们的评论。所以我用速记抄下了你的诗，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你抄了哪些诗？”

“所有的诗，”父亲回答，“我不仅尊重我理解的东西。我让人判断的不是我的鉴赏力，而是你的诗。因此我抄了所有的诗，交给卡夫卡博士评价。”

“卡夫卡博士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他。”

“他是马克斯·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马克斯·勃罗德的书《蒂肖·布拉赫^[8]走向上帝的路》就是献给他的。”

“那他就是《变形记》的作者，”我高喊起来，“这篇小说妙极了！你认识他？”

父亲点点头。“他在我们的法律处工作。”

“他对我写的东西怎么说？”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原想，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后来他请我把你介绍给他。我跟他说了，你今天去。”

“这就是你说的去看人的事，是吧？”

“是的，就是去看他。”

父亲带我走到三楼，我们走进一间布置得很好的大办公室。房间里两张办公桌并排放在一起，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他一头黑发向后背着，大鼻子，窄窄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嘴唇微微苦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个孩子啦。”他说，连句问候也没有。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递过手来。“在我面前你不用害羞。我也交一大笔电费。”他笑起来，我的胆怯消失了。

他就是神秘的甲虫萨姆沙^[9]的作者，我心中想道。我看见面前站的是个普通的平民，不禁有些失望。

“您的诗里还有许多喧闹，”父亲走出办公室后，弗兰茨·卡夫卡说，“这是青年人的进发症，他们生命力过于旺盛，甚至这种喧闹也是美的，虽然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喧闹妨碍表达，但是我不是批评家。我不能很快变成什么，然后又很快回到我自身中，精确地测量距离。我已经说过，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

“不是法官？”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微微一笑，“我虽然是法庭工作人员，但我不熟悉法官。也许我只是个小小的法庭杂役。我没有什么明确固定的任务。”卡夫卡笑了。我跟他一起笑，虽然我不懂他的话。“只有痛苦是确定的，”他严肃地说，“你在什么时候写作？”

我没有想到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道：“晚上，夜里。白天很少写。白天我不能写。”

“白天是个大魔术师。”

“亮光妨碍我写，工厂、房子、对面的窗户都妨碍我。最主要的是光，光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监禁的处境。”

难道他自己不也是《变形记》中的不幸的甲虫吗？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我很高兴，这时门开了，我父亲走了进来。

卡夫卡浓眉大眼，眼睛是灰色的。他褐色的脸生动活泼。他用表情传言。

只要他能用脸部肌肉的运动代替话语，他就这样做。微笑，皱眉，皱起前额，努出嘴唇或撮尖嘴唇，这些都是他代替说话的动作。

弗兰茨·卡夫卡喜欢手势，因此他轻易不用手势。他的手不是伴随谈话的辅助手段，而仿佛是独立的动作语言的话语，是一种交际手段，绝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有目的的意念表达。

十指交叉，手掌摊开放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上身舒适而又紧张地后靠在椅子上，脑袋前倾，双肩微耸，把手放在胸口——这就是他有节制地使用的表达手段的一小部分，他在做这些动作时总露出请求原谅的微笑，仿佛他要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做游戏，不过我希望，我的游戏能让你们喜欢。而且，而且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因公事认识的，”父亲回答，“我设计了卡片柜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做的模型。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下午下班后，在卡罗琳娜塔尔的波德布拉德街科恩霍伊泽木匠家‘干几个钟头’。从那时起我们就常谈私事。后来我把你的诗给了他，我们就成了熟人。”

“为什么不是朋友？”

父亲摇摇头：“要交朋友嘛，他太胆怯，太内向了。”

我第二次去看卡夫卡时问他：“您还到卡罗琳娜塔尔的木匠家去吗？”

“这您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

“不去了，我早就不去了。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去。身体陛下不许。”

“这一点我能想象。在尘土飞扬的作坊里工作不是什么舒服的事。”

“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

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晚上您一定很累。”

“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您把一切都留在这里？”

“为了到安全优美的地方找到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把一切留在这里。您知道作家保尔·阿德勒吗？”

“我只知道他的《魔笛》^[10]一书。”

“他在布拉格，和妻子儿女在一起。”

“他职业是什么？”

“他没有职业。他只有使命。他带着妻子儿女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他是个自由人，自由作家。在他身边，我总感到良心不安，我就这样让我的生命在办公室里窒息而死。”

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14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11]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

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街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我记不清到弗兰茨·卡夫卡的办公室去了多少次。有一点我却记得很清楚：一天下班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内，我打开工伤保险公司三楼他办公室的门，看到了他的身体姿势。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头向后仰，两腿前伸，双手放松地放在桌面上。弗拉的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稍稍体现了他现在的姿态。弗拉的画和弗兰茨·卡夫卡的身体姿势极为相似，但这纯粹是外在形式相似，而内心却极为不同。

弗拉描绘的读者被什么东西征服了，而卡夫卡的姿势表达了一种主动的、因而是胜利的献身。薄薄的嘴唇四周漾着一丝笑意，这种微笑与其说是自身高兴的流露，毋宁说是某种遥远的、陌生的、欢愉的、令人感动的余晖反射。他的眼睛总是稍稍从下往上看人。弗兰茨·卡夫卡姿态奇特，仿佛他要为他又瘦又高的身躯表示歉意似的。他那整个形象似乎想说：“对不起，我是微不足道的。倘若您对我视而不见，您就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

他用一种微弱的、模糊的男中音说话，他的声音虽然在力度与高度方面从不离开中区，却非常优美悦耳。他的声音、表情、眼神，全都透出理解与善良的安详之光。

他说捷克语和德语，不过更多的是德语。他的德语音调刚硬，类似捷克人说德语时带的口音，但这只是微小的、大约的类似，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我所想的德语的捷克口音是刺耳的，语言听起来是破碎的。卡夫卡的语言却从未给我留下这种印象。他的语言由于内部的张力而显得有棱有角：每个字都是一块石头。他的语言的刚硬是由追求精确得当地表达的渴望造成的，因此，他的语言的这一特点不是由被动的群体特点，而是由主动的个人性格决定的。

他的语言像他的手。他有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手掌很宽，手指纤细，平滑的指甲形状像铁锹，指节和节骨外鼓，但同时又显得很纤柔。

每当我回想起卡夫卡的声音、他的微笑和他的手时，我总想起父亲的一段评说。他说：“这是与胆怯的纤细弱小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对这种力量来说，一切细小的就正是最重的。”

弗兰茨·卡夫卡工作的办公室是一间中等大小、相当高的、同时又让人感到憋闷的房间，房间的外观让人想起一所相当不错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办公室的当之无愧的雅致。房间有两扇磨得很光亮的黑色双翼门。从一扇门，人们可以从黑暗的、放满高高的档案柜的、散发出烟味和尘土气味的走廊走进卡夫卡的办公室。另一扇门安在从入口处看是右侧墙壁的中间，通向工伤保险公司正楼二层的各办公室。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这扇门几乎从未开过。来访者和本公司职员通常只用通走廊的门。他们敲敲门，弗兰茨·卡夫卡回答一声简短的、并不太响的“请”字，而他的同事则傲慢地、没有好声气地喊一声“进来！”

他的同事企图用这种语调让来访者在门口就意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这种语调符合他的总是紧蹙的黄眉毛，稀疏的尿黄色头发上直通后脖子的笔直的中分线，结着黑色宽领带的高高的衣领，扣得紧紧的背心以及微微突出的水蓝色鹅眼睛。这位同事多年来就坐在卡夫卡的对面。

我现在还记得，弗兰茨·卡夫卡听到他的同事这一声粗暴的“进来”，总要微微打战。他仿佛缩成了一团，用明显的怀疑目光从下面看着对方，好像他片刻之间就要挨打似的。即使他的同事用和蔼的声音对他说话，他也是取这种态度。我看见，卡夫卡在同事特雷默尔面前总感到不自在。

因此，我进了保险公司，来到他身边时立刻就问他：“有他在场的时

候我们能说话吗？他也许是个搬弄是非的人？”

卡夫卡博士摇摇头：“我想不是的，不过那些像他那样总担心失去自己职位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是会做坏事的。”

“您怕他？”

卡夫卡很不自在地微微一笑：“刽子手总是名声不好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一个诚实的、按照公务条例得到丰厚薪水的公务员就是一个刽子手。为什么在每一个诚实的公务员身上就不会隐藏着一个刽子手呢？”

“公务员们可不杀人啊！”

“怎么不杀！”卡夫卡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答道：“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

听了他的话，我只点了一下头，因为我已经明白，卡夫卡博士想用刚才这一番一般化的言论代替对他的同事的明确的性格刻画。他要掩盖多年来存在于他和他最邻近的同事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特雷默尔博士似乎知道卡夫卡对他的反感，因此，他跟卡夫卡说话时——无论公事私事——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主人的语气，同时薄嘴唇四周总是露出一丝老于世故的嘲弄的微笑。因为，哼，卡夫卡博士和他的主要是年轻的客人，尤其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

特雷默尔的脸部表情清楚地告诉我他的想法：“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您，公司的法律顾问，就像和同一等级的人那样和这些微不足道的下等人谈话，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说话，有时甚至还让他们教训自己？”

卡夫卡的最邻近的同事并不掩盖他对卡夫卡以及他的私人客人的反感。当着客人的面，他不得不有所克制，因此——至少是我走进办公室时——他总离开房间。这时，卡夫卡博士通常都非常明显地松了口气。他露出微笑，但是他骗不了我。特雷默尔对他是一种折磨，因此我有一次对他说：“跟这样一个同事在一起生活真难。”

但是卡夫卡博士举起手，有力地挥了一下，表示不同意我的看

法：“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

我回了一句：“也许他只想拿它炫耀自己。”

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而您却压根儿不喜欢他。您只是想用赞扬掩盖您的反感罢了。”

听了我的话，卡夫卡的眼睛闪出光芒。他把下唇向里抿了抿，我补充我的说明：“他对您是完全不同的异类。您把他看作是笼子里的异类动物。”

这时，卡夫卡博士几乎是恼怒地直瞪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因克制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轻声说：“您错了。在笼子里的不是特雷默尔，而是我。”

“这说得通，这种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不仅仅在这里的办公室，而是到处都是笼子。”他把攥紧的右手放到胸口上，“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我们默然地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看了足足几秒钟。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我父亲走进房间。紧张气氛消失了，大家说些无关紧要的事，但卡夫卡的话“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依然使我感到心在瑟瑟颤抖。不仅仅是那一天，后来许多星期、许多个月都是这样。它像在小事情的灰烬中一直闪烁的余光，很久很久以后——我想是1922年春天或夏天——这余火突然像上蹿的火焰那样熊熊燃烧起来。

当时我常与大学生巴赫拉赫来往。就我所知，他只对三样东西感兴趣：音乐、英语和数学。就这一点，他有一次对我说：“音乐，这是心灵的鸣响，是内心世界的最直接的声音。英语相当于世界性的金钱帝国。在这里数学也起作用。不过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数学高耸在粗俗的数字力学的王国之上。它是一切合理秩序的接近于形而上学的根。”

我总是专注地听他的宏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使他很高兴，为此，他常常给我带来杂志、书籍和戏票。因此，当他有一次递给我一本崭新的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我今天给你带来一点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是一本英文书，书名叫《妻子变狐记》，大卫·加尼特^[12]著。

“你要我读这本书？”我失望地问，“你知道我不会英文。”

“这我知道。我并不是拿来给你读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这本书可以为我的话作证。你十分钦佩的卡夫卡博士名扬世界了。他的作品被模仿这一事实就是证明。加尼特的这本书就是《变形记》的仿制品。”

“剽窃？”

巴赫拉赫举起双手表示否定：“不，我没有这样说。加尼特的书只是出发点相同。一个女人变成了一只狐狸。一个人变成一只动物。”

“你能把书借给我吗？”

“当然可以，就为这个我才把书带来的。你可以给卡夫卡看。”

第二天我到卡夫卡家找他，这一天他不在办公室。顺便提一句，这是我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到弗兰茨·卡夫卡的家里拜访他。一个瘦瘦的、穿着黑衣服的女人给我开门。炯炯有神的灰蓝色眼睛，嘴巴的形态和稍稍隆起的鼻子表明她是卡夫卡的母亲。

我说我是卡夫卡博士的一位同事的儿子，问她能不能和他说一会儿话，她说：“他躺在床上。我去问问。”

她让我在楼梯间等着，过了几分钟她回来。她脸上露出喜色，即使不说，我也能感觉到她的喜悦。

“您来看他，他很高兴，他甚至要了点吃的。不过请您不要待久了。他很累，他睡不着觉。”

我答应马上就走。卡夫卡的母亲带我走过一间管道状的前厅和一间摆着深褐色家具的大房间，来到一间狭窄的房间里，弗兰茨·卡夫卡盖着一条套着白被套的薄薄的鸭绒被，躺在一张简朴的床上。

他微笑着和我握手，随便做了个手势，让我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请坐。我大概说不了多少话。请原谅。”

“我这么突然来拜访您，应该我请您原谅，”我说，“可是我觉得事情

确实很重要，我要给您看一样东西。”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方法时，他疲惫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卡夫卡的母亲走进房间。“您喝点什么？”

我站起身，“谢谢，我不想再打扰了。”

卡夫卡太太看着她儿子。他高高抬起下巴，闭着眼睛。

我说：“我只想送这本书。”

弗兰茨·卡夫卡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说：“我要读一读这本书。也许我下个星期就能上办公室去了。我到时把书带去。”他和我握了握手，闭上了眼睛。

第二个星期他没有来办公室。10天或是14天以后，我才有机会从办公室陪他回家。他给我书，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铁栅栏后面，所以现在写动物的书这么多。这表达了对自己的、自然的生活的渴望，而人的自然生活才是人生，可是这一点人们看不见。人们不愿看见这一点。人的生存太艰辛了，所以人们至少想在想象中把它抛却。”

我继续发展他的思想：“这类似法国大革命前的那个运动。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归返自然。”

“不错！”卡夫卡点点头，“不过今天人们走得更远了。人们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人类回归到动物，这比人的生活要简单得多。他们混在兽群里，穿过城市的街道去工作，去槽边吃食，去消遣娱乐。这是精确地算计好的生活，像在公事房里一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和规章制度。人们害怕自由和责任，因此人们宁可在自己做的铁栅栏里窒息而死。”

第一次和弗兰茨·卡夫卡会面后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第一次和他散步。

在办公室里他对我说，四点钟我到老城环形道的胡斯^[13]纪念碑前等他，他要归还我借给他的一本写着诗的笔记本。

我按约定时间来到约定地点，可是弗兰茨·卡夫卡却整整一小时后才来。

他表示歉意：“我从来不能遵守约定的时间，我总是迟到。我很想掌握好时间，我有遵守约会的真诚的良好愿望，但客观情况或者我的身体状况总是一再地打碎我的愿望，以此表明我的虚弱，这也许是我的病根。”

我们顺着老城环形道漫步。

卡夫卡说，我的诗有几首可以发表。他要把这几首诗给奥托·佩克^[14]。“我已经和他说过这件事。”他说。

我请求他不要发表这些诗。

卡夫卡站住了。“您写诗难道不是为了发表？”

“不是。这些诗只是习作，非常简单的习作，我写这些诗只想证明我并不十分笨。”

我们继续散步。弗兰茨·卡夫卡向我介绍了他父母的店铺和房子。

“这么说他们很富。”我说。

弗兰茨·卡夫卡抿了抿嘴。“什么是财富？对于甲，一件旧衬衫就是一笔财富，而乙有一千万元还是贫穷的。财富是完全相对的东西，不能使人满足的东西。从根本上说，只有一种特殊情况。财富意味着对占有物的依附，人们不得不通过新的占有物、通过新的依附关系保护他的占有物不致丧失。这只是一种物化的不安全感。但是，这是属于我父母的，不属于我。”

我和弗兰茨·卡夫卡的第一次散步是这样结束的：我们漫步回到金斯基宫时，从悬挂着商店招牌“赫尔曼·卡夫卡商行”的店铺里走出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他穿着深色大衣，戴着漂亮的帽子。他在离我们五步远的地方停住了，等着我们。我们走近了三步，那男子高声说道：“弗兰茨，回家。空气很潮湿

卡夫卡压低声音对我说：“我的父亲。他总为我担忧，常常露出一副暴力的面孔。再见，有空来我家坐坐。”

我点了点头。卡夫卡没有跟我握手就走了[15]。

几天以后，我按照事先的约定，下午五点钟时在他父母的店铺前等卡夫卡博士。我们原打算到格拉达[16]散步，可是卡夫卡博士身感不适，他呼吸困难。于是我们只慢慢穿过老城环形道，经过尼克拉斯教堂，拐进鲤鱼胡同，绕过市政厅来到小环形道。在卡尔弗书店的橱窗前，我们停住了。

为了看清书脊上的书名，我的脑袋交替着向左右两边转动。卡夫卡开心地笑了：“您看来也是个书迷，脑袋围着书转的。”

“是的，您说得不错。我想，没有书我不能生活。对我来说，书就是世界。”

卡夫卡博士皱了皱眉：“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验生活。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正好相反，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哲学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鸚鵡学舌者。”

他大笑起来，结果使他沉浊地大咳了一阵。咳嗽停息后，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是真话。您刚才听见了，也看到了。别人打两下喷嚏的事，我就得用我的肺来证实。”这话让我产生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我问他：“您是不是着凉了？您是不是发烧了？”

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微微一笑：“不……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冷而烧成灰烬。”

他用手绢擦去额上的汗。他薄薄的嘴唇紧紧地闭着，两边嘴角深陷，他的脸色蜡黄。

他向我伸过手来。“再见。”

我说不出一句话。

我到办公室看弗兰茨·卡夫卡时，他刚从邮局收到他的小说《在流放地》的样书。

卡夫卡知道邮包的内容，他打开灰色的邮包。当他看见黑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他的小说时，他显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关上，把书递给我。

“您肯定想看看这本书。”

我对他微微一笑，打开书，大略看了一下文字与纸张，就把书还给他，因为我感觉到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

“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那您为什么让人发表？”

“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17]，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

稍停片刻，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坐在办公桌后面，脸色发青，双手无力地下垂，头向一边微侧。我看他身体不好，就想说声对不起退出房间，可是他叫住了我。

“请您留下。您来我很高兴，给我讲点什么。”

我明白，他想以此摆脱沮丧的心绪。于是我马上开始讲起来，给他

讲许多我听来的或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我给他讲述我和我父母所住的郊区街道里三教九流的故事，让肥胖的店主、房东、我的几个同学在他身旁行进而过，给他讲古老的卡罗琳娜塔尔区的伏尔塔瓦河^[18]码头以及各个少年团伙之间激烈的斗殴，他们打架时互相投掷地上到处都是的马粪——真是可怕的炮弹。

“呸！”卡夫卡博士呸了一声。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在办公室里也常常要洗手的。他做了个怪脸，像小精灵的假面具，既含有厌恶，又流露出快乐。沮丧的心绪消失了，我现在可以谈展览会、音乐会以及我一天到晚不离手的书籍了。我吞了那么多书，卡夫卡博士一再地感到惊讶。

“您真是个了不起的废纸存放处！您晚上做什么？睡觉怎么样？”

“我睡得又死又稳，”我很自信地说，“我的良心到第二天早晨才叫醒我，而且非常有规律，好像我脑子里安装了闹钟似的。”

“梦呢，您也做梦吗？”

我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有时醒来后回想起一两个梦中的图像，但很快就消失了。我很少记住梦，而记住的也往往是些乱七八糟的蠢事。比如前天。”

“您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我来到一家大百货商场。我和一个不认识的人一起走过摆着自行车、农用车和火车头的大厅，我的同伴说：‘这里我买不到我想要的新帽子。’我尖刻地说：‘您买新帽子干吗？您最好还是买一张新的、更加可爱一点的脸吧。’我本想气他，可是他仍然很平静。‘这话不错，’他说，‘那我们还得往上走，到别的售货部去。’他立刻向一座很宽的转梯跑去。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一个亮着蓝绿色灯光的大厅里，里面像大成衣店那样，在无数的衣架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大衣、上衣、女装、男装，衣服里套着各式各样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无头躯体，四肢无力地下垂着，看到这一情景，我吃了一惊，低声地对我的同伴说：‘这可全是无头尸体啊！’而我的同伴却大笑起来：‘无稽之谈！您对生意一窍不通。这不是尸体，而是新的待运的人。脑袋会给他们安上。’说着，他向前指了指光线稍暗的走廊。那里，两个戴眼镜的老护士抬着一副担架向一个高出地面的站台走去，站台上挂着牌子，上写‘裁缝铺——禁止入内’。两

个护士迈着小步，小心地前行，因此我能看清她们抬的是什么。那是一位男子，支着身侧卧在担架上，像休息的白奴。他穿着黑色漆皮鞋，条纹裤，灰黑色燕尾服，我父亲在节日时通常也穿这种燕尾服。”

“担架上的人让您想起您的父亲？”

“不，我根本没有看见他的脸。他的头包着白纱布，埋在背心的开口处。他包得严严实实，像个重伤号，可是他似乎身体很好。他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银柄黑手杖，卖弄似地在空中挥舞。另一只手按着戴在包着纱布的头上、总向旁边滑的军帽，我哥哥几年前当奥地利炮兵时^[19]，星期天就戴这种帽子。我记起这件事，而且正是这种回忆使我拐进走廊，我想搞清楚担架上的男子到底是谁，可是，两个护士和担架突然不见了，我站在一张有许多墨水污点的小写字台前，桌子后面坐着您的同事特雷默尔博士。然后，突然冒出两个穿长长的白色麻料大衣的男子，一左一右站在我身旁。可是我知道，他们是乔装成医院杂役的警察，大衣里带着军刀和手枪。”

卡夫卡博士叹了口气：“唉，他们让您害怕了吧，是不是？”

“是的，”我点点头承认，“我很害怕。对他们两个倒不太怕，怕的是特雷默尔博士。他嘲弄地对我笑笑，一边玩着一把闪着银光的小纸刀，一边呵斥我：‘您的脸不是您的。您不是您冒充的那个人。我们要好好修整一下。我们要把你偷来的脸皮从骨头上揭下来。’他说话时用小刀在空中做了几个切割的动作。我害怕起来，向四周找我的同伴，可他已经不见了。特雷默尔博士又嚷开了：‘您别费心了！您跑不了啦！’这话让我火冒三丈。我向他嚷道：‘您要干什么，您这坐办公室的贱胚！我父亲地位比您高。我不怕您的刀。’这几句话说中了，特雷默尔博士脸色铁青。他跳起来喊道：‘这是一把手术刀。我叫您领教领教。带下去！’那两个乔装的警察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噩梦。”

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淡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梦常常使人眼花

缭乱，把他奉承得美不可言。”

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20]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21]时，我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叙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难道老年就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吗？”

“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

“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

“《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22]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老人。”

另外一次，当我给卡夫卡博士讲述一件青年犯罪案时，我们又谈起了《司炉》这篇小说。

我问他，16岁的卡尔·罗斯曼这个形象是不是按某个模特儿塑造的。

弗兰茨·卡夫卡回答：“我有很多模特儿，我又没有模特儿。不过这些都已成为过去。”

“年轻的罗斯曼和司炉这两个形象都那么栩栩如生。”我说。

卡夫卡的脸色又阴沉下来，“这只是副产品，我不描绘人，我只讲故事。这是图像，只是图像而已。”

“那么肯定有模型。图像的前提是观看。”

卡夫卡微微一笑：“人们拍照，是为了把那些事从意识中赶出去。我的故事就类似闭上眼睛。”

讨论他的书总是非常简短。

“我读了《判决》。”

“您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您说得对。”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F.[23]’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

卡夫卡窘迫地笑了笑。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他又说了一遍，眼睛直视远方。

“可是您却写下来了。”

“我只是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了对幽灵的抵御。”

我在爱尔波根结识的朋友、来自法尔肯瑙[24]附近的阿尔特萨特的阿尔弗雷德·坎普非常赞赏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他把作者称为“一个新的、更深刻的、因而更珍贵的埃德加·爱伦·坡”[25]。有一次，我们在老城环形道上散步时，我向弗兰茨·卡夫卡讲起他的这位新的崇拜者，我的话既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也没有得到他的理解。相反，卡夫卡的脸部表情告诉我，谈论他的书让他感到不快，但我充满探奇猎胜之心，就顾

不及审慎克制了。

“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两个名字都是五个字母。萨姆沙中S的位置与卡夫卡中的K相同。字母A^[26].....”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

“这我不明白。”

“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这在体面人家当然不常见。”

“您看，我不体面到什么程度？”

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

“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他简短地向我告别。我把他赶走了？我感到惭愧。

我们有14天没有见面了。我告诉他我在这期间吞下了哪些书。卡夫卡笑着说：“我们比较容易从生活中制造出许多书，而从书里则引不出多少生活。”

“所以可以说，文学是一种很坏的储存手段。”

他笑了，点点头。

弗兰茨·卡夫卡和我常常一起开怀大笑，倘若可以把这种笑叫做大笑的话。我没有记住声音，只记得他用以表达他的愉快的姿态。按照笑的刺激的强弱，他把头或快或慢地向后仰，稍稍张开宽大的嘴巴，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好像他的脸对着阳光似的。有时，他把手放到桌面上，耸起肩膀，向里抿紧下唇，缩起身体，闭上眼睛，好像洗澡时有人突然

向他泼冷水似的。

有一次我看见他这种姿态，给他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大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

“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很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防御谁？”

“当然防御我自己。”

可是墙是朝向外界的，”我说，“它是朝外的抵御。”

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

10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潮湿日子。工伤保险公司的走廊里亮着灯。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像一个幽暗的洞穴。他躬着身坐在办公桌前面。桌子上摊着一张八开灰白色办公纸。他手里拿着一支长长的黄铅笔。我走近卡夫卡博士时，他把铅笔放到纸上，纸上草草画着几个古怪的人物。

“您在画画？”

卡夫卡歉意地微微一笑：“不，随便乱涂而已。”

“我可以看看吗？您知道，我对图画很感兴趣。”

“这可不是可以让人看的图画。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别人无法辨认的象形文字。”

说着，他就拿起那张纸，用两只手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办公桌旁边的废纸篓里。

“我画的人空间比例不对。他们没有自己的视野。我试图画下这些人物的轮廓，但他们的透视是在纸的前面，在铅笔未削尖的那一头上——在我心里！”他伸手到废纸篓里拿出他刚扔进去的纸团，把它展开，撕成碎片，使劲扔进废纸篓。他画画时我出其不意地进去的情形有过好几次，每次，他都把他称为胡乱涂画的东西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或者迅速放进办公桌中间那个抽屉。对他来说，他的画完全是私人的事，比他写的文章更秘密，更不能外传。这自然使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大，而在弗兰茨·卡夫卡面前我不得不有意遮掩。我做出我根本没有看见他匆忙推开图画的样子，但是，这种掩饰总造成一点压抑的紧张的气氛，不管是听他讲话，还是我说话，我总不能像以往那样自在，那时，我便竭力去想他并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这种变化没有逃过卡夫卡博士的眼睛，他看见了我神情郁闷，因此，当我有一天在他作画时走进他办公室时，他把画页推到我面前，避开我的目光说：“您看我涂画的东西好了。继续唤起您心中得不到满足的好奇心，从而迫使你掩饰，这没有意思。请您别生我的气。”

我无言以对。我觉得像做什么坏事被人当场抓住一样。起先，我很想把画从桌子上推回去，但我控制住了自己，转过头，从侧面看着那张纸，纸上画着许多寥寥几笔勾画出动作的很小的速写，那些小人或跑动，或击剑，或在地上爬行，或蹲在地上。

我很失望。“这有什么啊！您真的用不着在我面前把它们藏起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画嘛。”

卡夫卡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它们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无关紧要。这些画是一种久远的、深深地扎根于心中的热情的痕迹，因此我企图把它们掩藏起来。”

我又看了一遍画着小人的画纸，“我不懂您的话，博士先生。热情表现在哪里？”

卡夫卡宽厚地微微一笑。“这热情当然不在纸上。纸上画的只是痕迹。热情在我心里。我以前一直渴望会画画。我希望观察，把观察到的东西画下来。这是我的热情。”

“您过去学过画画？”

“不。我只是力图用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观察到的事物固定下来。我的画不是绘画，而只是一种个人的符号文字。”卡夫卡会心地一笑，“我还一直被囚在埃及。我还没有跨过红海[27]。”

我笑了笑说：“过了红海，首先见到的是沙漠。”

卡夫卡点点头说：“是的，圣经里是这么写的，而且生活里就是如此。”他用手顶住桌子边缘，把身体靠回到椅子上，他这样舒展着身子，神情急切地看着天花板。

“虚假的、通过外部措施去争取的假自由是一个错误，是混乱，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这是自然的事，因为凡是具有真正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

“一个条件？”我疑惑地问。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定义。

“这可真是个怪论！”我脱口喊道。

卡夫卡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说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的火花一定要跨越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跳向另一极，以便我们在闪电的火光中看见世界片刻。”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我用手指了指画着画的纸，轻声问道：“那么这些小人，他们在哪里？”

“他们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卡夫卡说。他把画满图画的纸放进桌子抽屉，用听起来很随便的声调说道：“我的乱涂乱画是原始魔力的不断重复而不断失败的尝试。”我不知所云地看着他。其时，我肯定做了一个叫人好笑的怪脸，因为卡夫卡的嘴角抽搐了几下。显然他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他抬起手挡住嘴巴，轻轻咳了几声，说：“人类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画。爱斯基摩人在他们要烧掉的木头上画上几条表示水浪的线条。这是具有魔力的火之画，他们不断用

火石摩擦，唤醒它的生命之火。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要通过我的画了结我所看见的那些人物。不过我画的人物形象不会着火。也许我用的材料不对。也许我的铅笔性质不对头。也许是我自己不具备必要的性质，只是我一个人不具备必要的性质。”

“这是可能的，”我附和他的看法，力图做出嘲弄的微笑。“况且您到底不是爱斯基摩人，博士先生。”

“这自然不错，我不是爱斯基摩人，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其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裸体的。”他撮起嘴唇，“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穿的衣服正合适。您说呢？”

我说：“谢谢您这番话。我宁可挨冻。”

“我也是，”卡夫卡博士大声说，用手指了指暖气片，上面一只椭圆形铁碗里的水冒着蒸汽，“我们既不要自己的裘皮大衣，也不要借来的。我们宁可保留我们的舒适的冰雪荒漠。”我们两人都笑了：卡夫卡博士为掩盖我的不懂而笑，我笑，则是为了接受他的不言而喻的好意。

我激动地来到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里。

“发生了什么事？您的脸色那么苍白。”

“一会儿就好了，”我费力地挤出几句话，力图露出笑意，“有人把我看成酒鬼，而我不是。”

“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卡夫卡博士断然地说，嘴唇微微掀起。“这是人类交往中古老的错误。常新的是由这个错误造成的痛苦。”他从桌上拿起一件卷宗，对我说：“您在这里安静地坐一会儿。我到隔壁办件事。我很快就回来。要不要我把门锁上，不让人进来打搅您？”

“不用，谢谢。我一会儿就会好的。”

卡夫卡离开房间。我向后靠到椅背上。

我当时患一种头痛病，不定期地发作，因而无法预见间隔时间多

长，痛起来很厉害，病因是脸部神经——三叉神经——过分敏感。不到一个钟头以前，在我来工伤保险公司的路上，这种头痛病又发作了一次。我不得不在火车站附近佛罗伦萨广场上靠到广告牌上，耐心地忍受疼痛。病痛的高峰是冒虚汗，外加一阵呕吐。呕吐过后，病情就开始减轻。我一分钟一分钟地好起来，但我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广告牌旁边，我的两条腿在发抖。

从我身边走过的人厌恶地看着我，我觉得他们充满了蔑视。一位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对陪伴她的年轻一些的女人说：“你看那个人！年纪轻轻的就像老酒鬼那样烂醉如泥。简直是猪猡！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我想向那女人说明我的情况，可是我说不出一句话。我的喉咙像被绳子绑住了似的。我还没有振作起来，两个女人就转过下一个街角不见了，于是我慢慢向工伤保险公司走去。我走上楼梯时，两腿还发软，但卡夫卡的声音像补药那样给了我力量，而且屋里这么安静，没有一点声响刺激，所以过了几分钟，这次发作的最后一点痕迹就消失了。

卡夫卡博士回到屋里时，我向他讲了在佛罗伦萨广场发生的事情。讲到结尾时我说：“这个女人，我真该把她顶回去，骂她一通，可我一句话没有说！我是个可怜的软骨头。”

卡夫卡博士却摇了摇头。“您别这样做！您不知道，沉默包含了多少力量。咄咄逼人的进攻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诡计，人们常常用它在自己 and 世界面前遮掩弱点。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急躁粗暴。他通常因此而丧失了人的尊严。”

卡夫卡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杂志，放到我面前。那是文学刊物《树干》德文版第4年第21期。

他对我说：“第1页上有四首诗。有一首特别令人感动。这首诗的标题是《谦恭》。”

诗是这样的：

我越长越矮，越长越小，

变成人间最矮小的人。

清晨我来到阳光下的草地，

伸手采撷最小的花朵，

脸颊贴近花朵轻声耳语：

我的孩子，你无衣无鞋，

托着晶莹闪亮的露珠一颗，

蓝天把手支撑在你的身上。

为了不让它的大厦

坍塌。[\[28\]](#)

我低声说：“这是诗。”

“对，”卡夫卡说，“这是诗——包着友谊与爱情的文学外衣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蓬乱丛生的蓟草，还是挺拔优美的棕榈，我们大家都支撑着我们头上的苍穹，免得这个大厦，我们世界的大厦坍塌。对许多事情，我们也许只有视而不见才能接近它们。您别去想今天在街上遇到的事情了，那女人搞错了。从一切迹象看，她不会区别印象和现实，这是一种缺陷。那女人是贫穷的，她的感情是错乱的，谁知道这个女人在细微末节的小事情上已经多少次碰得头破血流？”他抚摩了一下我像镇纸一样放在我面前的刊物上的手，笑着说：“从印象到认识的道路常常是非常艰难遥远的，而许多人只不过是软弱的漫游者。倘若他们像撞在墙上那样，在我们身上撞了个趔趄，我们只能原谅他们。”

有一个熟人曾向我借过几次小笔的钱，当我不再能借给他钱时，他给我写了一封粗暴的、充满污言秽语的信。自高自大的猴子、公牛[\[29\]](#)白痴，这是几顶最小的帽子。

我把信给卡夫卡博士看，他好像拿一件危险品那样，用指尖把它放到最远的桌边上。

他说：“咒骂是可怕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封信就像一处冒烟的、发出刺鼻气味、让人眼睛难受的火灾现场。每一句骂人的话都是对人类最大的发明——语言的破坏。谁骂人，谁就在辱骂灵魂。咒骂就是谋杀仁慈，但一个不会正确地斟酌字句的人也会犯这种谋杀行为，因为说话就是斟酌并明确地加以区分。话语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

我问：“我是否让律师给那个人写封信？您看如何？”

卡夫卡使劲儿摇摇头。“不！那有什么用？他反正不会考虑这种警告的。即使他会这样做，您也别理他。他信里的公牛迟早会向他猛烈攻击的。一个人逃脱不了他放到世界上来的妖魔。坏事总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有一次，我走进弗兰茨·卡夫卡办公室时他正在看雷克拉姆丛书^[30]的广告书目。

“我醉心于书名，”卡夫卡说，“书籍是一种麻醉剂。”我打开我的公文包，让他看里头装的东西。“那我是吃大麻的人，博士先生。”

卡夫卡很惊讶：“全都是些新书！”

我把书全倒到他的办公桌上，卡夫卡一本接一本地拿起来翻看，不时地读一小段，然后把书递给我。

他把书全看了一遍后问我：“这些书你全都要读？”

我点点头。

卡夫卡抿了抿嘴唇：“您何苦读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熄灭。您应该多读古书。古典文学，歌德。古的东西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那么创作呢？”

“创作改变生活，有时候比这更糟。”

敲门声。我父亲走进办公室。“我的儿子又在打搅您了。”卡夫卡笑了：“哪里！我们在谈论妖魔鬼怪。”

现在回忆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和卡夫卡交往中一点不照顾和体谅他：我常常不通报，只要时间对我合适，就闯进他的办公室，但他总是微笑着，伸开手臂欢迎我。虽然我每次都问：“我是不是打搅您了？”他却总是摇摇头，或者打个手势，表示不碍事。

只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解释：“有人突然来访时产生被打扰的感觉，这

是表示虚弱的可靠信号，是遇到意外事情时的逃遁。人们爬回到所谓的个人小天地里，因为他们缺乏对付世界的力量。人们逃避奇迹而去约束自我。这是撤退。生活就是与其他事物共处，是对话。人们不能逃避这种对话。您随时可以来找我，什么时候来都行。”

卡夫卡注意到了我睡眠不足。我如实地告诉他，我文思喷涌，一直写到天亮。

卡夫卡把他那双木雕似的大手放到桌面上，慢条斯理地说：“您能这样顺利地把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这是很大的幸福。”

“简直像醉了一样。我还没有看看我都写了什么。”

“当然，我明白。写下来的文字只不过是经历的渣滓。”

我的朋友恩斯特·雷德勒^[31]用浅蓝墨水在手工制作的装璜美观的纸上写诗。我给卡夫卡讲了这件事。

卡夫卡说：“这是对的。每个魔术师都有自己的仪式。比如说，海顿^[32]只有戴着洒有扑粉的假发时才作曲。写作也是一种召魔法术。”

阿尔弗雷德·坎普送给我一本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埃德加·爱伦·坡中短篇小说集》。这是三本小说集的合订本。我把这本近几个星期以来随身携带的小书给卡夫卡博士看。他翻了翻书，看了看目录，然后问道：“您知道他的生活吗？”

“我只知道坎普告诉我的那一点，据说爱伦·坡是个名声很坏的酒鬼。”

卡夫卡皱起了眉头。“坡有病，他是个穷人，面对世界无力自卫，因此他借酒逃遁。对他来说，想象只是一根拐杖。他写了许多阴森可怕的故事，目的在于熟悉世界，适应世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在想象中不像在现实中有那么多狼窝。”

“您深入地研究过坡？”

“没有。其实他写的东西我读得很少，但是我了解他的逃遁之路，熟悉他的梦幻。大家写的总是一样的东西。比方说这本书吧，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

卡夫卡说着打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拿出一本灰蓝色布封面的书递给我：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33]。

“斯蒂文森患有肺病，”在我匆匆浏览扉页和目录时，卡夫卡对我说，“于是他迁到南太平洋。他住在那里的一个岛上，然而他看不见岛上的东西。他生活的世界对他只是幼稚的海盗梦的舞台，想象的跳板。”

我把书放到桌子上，冲着书点了一下头说：“我浏览了一下，我的初步印象是，他也描写南太平洋的大海、人和热带植物。”

“对，而且很深入详细。”

“那么说，他的书里也反映了一点现实。”

“当然，”卡夫卡接着说，“梦里总有许多未加工的白天的经验。”

我小心地说：“人们也许正好在梦里力图摆脱对经验的罪责感。您说是吧？”

“是的，就是这样，”卡夫卡点头说，“现在是塑造世界和人的最强大的力量，它到处起作用。正因为如此，它有现实力量，谁也不能逃脱它。梦只是一条弯道，人们最后总是回到离他最近的经验世界。斯蒂文森回到他的南太平洋岛，我则……”他停住了。

“您则回到这里的办公室和老城环形道的家里。”我说出他没有说完的话。

“您说得不错。”卡夫卡轻声说。

这时，卡夫卡脸上突然露出忧虑的神情，我不禁喃喃地表示道歉：“请原谅我的放肆，博士先生。我太莽撞了。这是我的弱点。”

“相反，”卡夫卡说，“这是一种力量。在您身上，印象比别人更快地凝聚成语言。我无须原谅您什么。”

我反驳道：“不，我应该请您原谅。我很不礼貌。”卡夫卡把左臂抬到肩膀的高度，又无力地垂下，脸上露出迷人的笑意：“这完全是正常的。您还不属于世界。您还不是僵化的风俗习惯这个世界的成员，因此，您的语言——倘若我们回到斯蒂文森的南太平洋岛屿——还是一把

锋利的、尚未磨损的丛林砍刀。您要注意别砍歪了，别砍断自己的手脚。除了谋杀，这是对生命最可怕的犯罪。”

和我一起夏天在游泳学校学游泳、冬天在溜冰场溜冰的小伙子中有一个名叫莱奥·魏斯柯普夫的。他戴眼镜，淡黄色的头发，细长的个子，脸圆圆的红红的，像个女孩子。他父亲在彼得广场有一个办事处，在化工产品的批发方面充当经纪人，因此可以说，莱奥·魏斯柯普夫属于“中上”资产阶级。他总是穿得潇洒得体，但并不给人浮华的印象。他的举止也和衣着一样，他在谈话时总是很克制，彬彬有礼。他从不败坏大家的谈兴或游兴，但在他身边，我们从来没有温暖亲切的感觉。他在场好像就有一个减热器在起作用，因此，我的朋友恩斯特·雷德勒称这个比我们小几岁的莱奥·魏斯柯普夫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说：“他那么随和亲切，是为了躲避我们。他在我们面前把自己包起来。”

“他干吗要这样做？”我问。

我的朋友耸耸肩：“这我不知道，我只是这么感觉。”

“就因为你不喜欢他吧，”我说，“别的还有什么？”

“是这样，”恩斯特·雷德勒承认，“我的反感纯属感情。莱奥·魏斯柯普夫和我们不一样。在他和我们之间存在着某些捉摸不透的东西，他也许有什么嗜好。他也许染上了什么隐秘的

我讥讽地说：“也许你是个傻瓜。”

我的朋友本来很容易发火，这次却非常平静：“我们两人总有一个是傻瓜，不是他就是我，以后会清楚的。”

我们关于莱奥·魏斯柯普夫的谈话到此就结束了。

两天以后，我们听说——我已记不得是怎么听说的，是听谁说的——莱奥·魏斯柯普夫死了。是自杀，服了氰化钾。有人说，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已婚女人。这是否真的是他自杀的唯一动机，我们没有听说。雷德勒表示怀疑。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弗兰茨·卡夫卡博士听。他闭着眼睛听我讲。我讲完后，他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对我说：“这是一件捉摸不透的事情。人只有在爱情中和临死时才意识到自己。也许你的

熟人所爱的女人让他大失所望。也许她只把他当做一时的玩具。也许他认为，得不到他热爱的女人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也许他要以死向她表示他对她的敬重。也许在她离开他以后，他要向她表明，他现在对自己只剩下了支配权而没有所有权了。您懂我的话吗？”

“我懂。”我说。

卡夫卡继续说道：“一个人只能扔掉他确确实实占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自杀看作是过分到荒唐程度的利己主义，一种自以为有权动用上帝权力的利己主义，而实际上却根本谈不上任何权力，因为这里原本就没有力量。自杀者只是由于无能而自杀。他什么能力也没有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他现在去拿他占有的最后一点东西。要做到这一点，他不需要任何力量。只要绝望，放弃一切希望就足够了，这不是什么冒险。延续，献身于生活，表面上看似乎无忧无虑地一天一天过日子，这才是冒风险的勇敢行为。”

卡夫卡几次要求我，让他看几篇我的“不押韵的蹩脚货”——这是我对自已写的东西的称呼。于是，我在日记里找出合适的段落，凑成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取名为《深不可测的瞬间》，交给了卡夫卡。

几个月以后，当他准备去塔特兰斯克·玛特莱里疗养院疗养时，他才把手稿还给我。

他就此机会对我说：“您的作品非常清新。您谈得更多的是事情在您身上唤起的印象，而不是事件和事物本身。这是抒情诗。您在抚摩世界，而不是去把握世界。”

“那我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

卡夫卡抓住我的手。“我没有这样说。这些小故事对您肯定具有某种价值。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个人的文献材料。不过艺术……”

“不过这还不是艺术。”我苦涩地补充道。

“这还不是艺术，”卡夫卡肯定地说，“这种印象和感情的表达不过是对世界的小心翼翼的摸索。眼睛还没有睡醒。但是这很快就会过去，摸索地伸出去的手也许会缩回来，仿佛它触到了火。您也许会大喊起来，结结巴巴地乱说一通，或者咬紧牙关，睁大眼睛。不过，这一切都只是

言论罢了。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要到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去看他。可约会的前一天，我父亲给我带来一期柏林《行动》周刊^[34]，里面夹着一张卡夫卡博士的字条，他告诉我他下星期才到办公室去。我按这个时间到他那里时，我们问候以后他马上就问我：“您能看清我的笔迹吗？”

“能看清，很好看。您的笔体非常流畅，像波纹线。”

卡夫卡在桌面上摊开手掌，脸上露出苦涩的表情说：“那是往地上降落的绳索的纹线。我的字母是绳圈。”

我想冲淡卡夫卡表现出来的沮丧情绪，就笑眯眯地说：“那是套索。”

卡夫卡无言地点点头。

我继续说俏皮话：“您要用套索抓什么？”

卡夫卡微微耸了耸肩回答：“我不知道。也许我要到达我的弱点的洪流早已卷着我从旁经过的看不见的海岸。”

弗兰茨·卡夫卡给我看一张文学调查表，我想，这次调查是奥托·佩克为《布拉格新闻》的星期日文学副刊组织举办的。卡夫卡用食指指着“关于未来的文学活动，您有什么计划？”这个问题，微笑着说：“真荒谬，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不理解地看着他。

“人们能够预言，心脏在下一段时间里会怎么跳动吗？不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笔只是心脏振动仪上的石笔。就像地震，我们可以测量记录，但是无法预报。”

我走进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我进去时，他正要离开。

“您要走？”

“只出去一会儿，往上走两层到您父亲的科里去。请您坐下等我。我很快就回来。您也许可以看看这本新杂志。昨天才送来的。”

这是在柏林出版的一份有代表性的大刊物的第一期。刊物名叫《马

尔叙阿斯》[35]。发行人是特奥多尔·塔格尔[36]。里面有图书预告，在计划出版的新书中有一本弗兰茨·韦尔夫的《理论文集》。

韦尔夫是卡夫卡的朋友，因此他回来后我就问他，他是否知道这件事。

“知道，”卡夫卡简短地说，“韦尔夫曾对马克斯说，这是发行人的杜撰。”

“他能这样做吗？这可是撒谎呀。”

“这是文学，”卡夫卡博士笑着说，“逃避现实。”

“那么说文学创作是谎言啰？”

“不。创作是浓缩，是精华。文学则是溶解，是减轻无意识的生活的享乐品，是麻醉剂。”

“创作呢？”

“创作恰恰相反。它唤醒人们。”

“那么创作倾向于宗教。”

“我不想这样说，但它肯定倾向于祈祷。”

有一次，我和卡夫卡博士一起上青年广场的弗兰齐斯卡教堂。我们一进门就看见一位老妇人在一幅幽暗的圣坊画像前虔诚热烈地祷告。我们离开教堂后卡夫卡博士对我说：“祈祷和艺术是感情强烈的意志行为。人们要超越正常存在的各种表现意志的可能性，将它们加以升华。艺术就像祈祷一样，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祈祷就是跃入消逝与产生之间的改变一切的弧光中，完全融进弧光中，把它无法估量的光包容到自己的生存这张极易破碎的小摇篮里。”

卡夫卡博士对城市的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具有广博的知识，我对此常常感到十分惊奇。他不仅了解宫殿和教堂，连老城最不起眼的过道、楼房他也熟悉。即使许多房子的标记已经不挂在门口，而挂在波里斯的市立博物馆，他也知道它们古老的名字。卡夫卡博士能从老房子的墙上看

出城市的历史。他带领我穿过狭窄的胡同，进入老布拉格房子狭小的、漏斗状的内院，他把这种院子称为接光盂。在老卡尔桥附近，他带我穿过一条巴洛克式过道，一个四周围绕着文艺复兴风格拱廊的巴掌大的小院子，一条黑暗的、管状的地下通道，来到一家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的小客栈，店名叫“观星客栈”，因为约翰内斯·开普勒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并于1609年在这洞穴一样的黑暗阁楼里写成了他著名的、大大超越了当时的科学成果的《天文学新发现》一书。

卡夫卡博士热爱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的古老的胡同、庭院、宫殿和教堂。我给他带到办公室的每一本介绍和研究布拉格古老事物的书，他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喜悦地翻看。他的眼睛珍爱地看着这些出版物，双手抚摩着书页，虽然在我把书放到他桌子上以前，他早就看过这些书。他像欣喜若狂的收藏家那样，眼睛里放射出喜悦的光芒，然而他又和收藏家完全不同。对他来说，古老的事物不是凝固成历史的、收藏家收集的对象，而是充满活力的认识工具，通往今天的桥梁。

这是我有一次和卡夫卡博士一起从工伤保险公司去老城环形道的路上，在泰因霍夫斜对面的雅各布教堂停下谈话时得到的认识。

“您知道这个教堂吗？”卡夫卡问我。

“知道。不过很肤浅。我只知道这个教堂属于旁边的弗朗西斯修道院，就这么多。”

“教堂里有一条铁链，上面挂着一只手，您肯定看见过吧？”

“是的，看见过好几次呢。”

“是不是一起去看看这只手？”

“好的。”

我们走进教堂，教堂有左中右三堂，是布拉格最长的教堂之一。左侧一进门的地方，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条长长的铁链，链子上挂着一根熏黑的、残留着干枯的肌肉和筋的骨头，按它的形状，这根骨头可能是一个人的下臂的遗骨。听说是1400年或30年战争^[37]后不久从一个盗贼身上砍下来挂在这个教堂里作为“永久纪念”的。

据古老的编年史和不断更新的口头传说，这件可怕的事情的过程大

致是这样的：

雅各布教堂两侧有许多小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有一尊圣马利亚的木雕塑像，塑像上挂满了一串串金币和银币。一个退役的雇佣兵看到这笔财富眼馋手痒难熬，就藏到一间忏悔室里，等到教堂关了门，他从藏身的地方出来，走到祭坛前面，登上教堂司事点祭坛蜡烛常用的凳子，伸出手，想摘下塑像上的金银首饰，但他的手变僵硬了。这个第一次潜入教堂的窃贼以为塑像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他使出全身力气，想把手抽回来，可是一点没有用。第二天早上，教堂司事发现他筋疲力尽地站在凳子上，就叫来了修道士。祭坛前很快聚集了一群祈祷的人，祭坛上的圣母像还一直紧紧抓住脸色苍白、惊恐万分的窃贼，市长和布拉格老城的几个元老也在人群里。教堂司事和修道士想方设法想把窃贼的手从塑像上拽下来，他们也没能成功。于是市长叫来刽子手，他只一刀就把窃贼的下臂砍断了。这时，“塑像也松了手”。下臂掉到了地上。人们包扎好窃贼的伤口，几天以后，他因企图盗窃教堂财物罪被判多年监禁，刑满后，他加入方济各会当杂役。人们把砍下的手绑到教堂里老城市议员绍勒·绍伦巴赫墓碑旁的铁链上。在旁边的柱子上挂了一块反映这次事件的简朴的图画，并有一段分别用拉丁文、德文和捷克文书写的说明性文字。

卡夫卡博士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儿干枯的手臂，扫了一眼描述这次奇迹的小木板，向出口走去。我跟着他。

到了外面，我说：“这是可怕的。圣母奇迹当然只是强直性痉挛。”

“但这种痉挛是怎样引起的呢？”卡夫卡问我。

我说：“也许是由于某种突然产生的内心顾虑。盗贼渴望得到圣母装饰，被这种欲望掩盖的宗教感情突然被他的盗窃行为震醒了。他的宗教感情比他设想的要强烈得多，因而他的手僵硬了。”

“对！”卡夫卡点了点头，他的手挽住了我的胳膊，“对于神圣的东西的渴望，伴随而来的对亵渎圣物的羞怯以及人所具有的正义感，这一切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人违背这些东西，它们就在他身上顽强反抗。它们是道德上的调节力量，因此，一个人要在世界上进行某项犯罪行为，他总是先要压垮自己身上的这些力量。要犯罪，总是要先在心灵上肢解自己。那个要偷塑像上装饰品的盗贼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

他的手僵硬了。它是被自己的正义感麻痹的。对他来说，刽子手的那一刀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可怕。相反，惊恐和痛苦给他带来的是解脱。灵魂的肢解为刽子手对他肉体上的伤害所取代。这样，这个连木偶也不能偷一次的可怜的退役雇佣兵就从良心的痉挛中解放了出来。他可以继续做人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继续往前走。走到泰因霍夫和老城环形道之间的狭窄小胡同中间时，卡夫卡突然站住问我：“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雅各布教堂里发生的小偷的故事今天是不是还可能发生？”我坦率地回答，探询地看着弗兰茨·卡夫卡。他只皱了皱眉。走了两三步后他说：“我想几乎不可能发生。今天，对上帝的思念和对罪孽的惧怕大大地淡薄了。我们陷在骄傲自大的泥淖中。战争就是证明，战争使大批大批的人失去人性，麻痹了人的道德力量，从而麻痹了人自身，使他多年不能清醒。我想，今天，盗窃教堂的人是不会发作强直性痉挛的。倘若发生这种情况，人们不会砍去盗贼的半只胳膊，而是截去他完全不合时宜的道德想象力，把他送进疯人院。在那里，人们会用分析的方法消除他表现为歇斯底里的痉挛症的过时的道德感情冲动。”

我冷笑了一声说：“教堂盗贼会变成隐蔽的俄狄浦斯恐惧症或恐母症的牺牲品。他会想方设法盗窃圣母像。”

“当然！”卡夫卡点点头，“没有罪孽，没有对上帝的思念。一切都是世俗的，实用的。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彼岸，因此我们生活在良心普遍僵冻的状态中。表面上，一切超验的冲突都消失了，然而大家都像雅各布教堂里的木雕像那样保卫自己。我们一动不动，我们只是站在这里，甚至都不是站着。大多数人是被恐惧这种污泥胶着在廉价原则的东摇西晃的椅子上，这就是全部生活实际。就说我吧，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各种案卷资料，摆出庄重严肃的神态，企图以此掩盖我对整个工伤保险公司的反感，然后您来了。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雅各布教堂，观看砍下的手臂，谈论时代的道德痉挛症，我走进我父母的商店，吃点东西，然后给几个到期不还的欠债人写客气的催债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世界井然有序。我们只是像教堂里的木雕塑像那样僵硬呆板。不过没有祭坛。”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再见。”

我们——卡夫卡博士和我——穿过策尔特纳街走向老城环形道。我们听见从远处传来大批人群的喧闹声和歌声；到了“白孔雀楼”，我们被

一支拥过来的游行队伍挤到了墙根。

“这是国际歌的力量。”我笑笑说，可是卡夫卡的脸却阴沉了下来。

“你耳朵聋了？您没有听见他们唱什么？他们唱的都是旧奥地利的民族主义歌曲。”

我反驳道：“那他们扛的红旗是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只不过是旧货色新包装。”弗兰茨·卡夫卡说。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进我们身后的房子，穿过光线暗淡的院子和一条不长的过道，经过一座刷成白色的楼梯来到狭窄的格姆森胡同，从这里穿过艾森胡同来到宽阔的骑士大街，这里一点也听不见游行队伍的声音了。

“我受不了这类高声喧闹的街头骚乱。”卡夫卡舒了口气说，“这类骚乱里潜伏着新的、摆脱了上帝的宗教战争的恐怖，它们以旗帜、歌声和音乐开始，以抢劫和流血告终。”

我反对他的看法：“这不符合事实。布拉格现在几乎天天有游行，每次游行都很平静，很有秩序。只有在香肠作坊里的血肠里才有血。”

“在这里，事情只不过发展得慢一些而已。不过这不要紧。很快就会发生的。”

卡夫卡晃了几次抬起的手，以表示他的疑虑，接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实相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个恶的时代。人们说的是‘国际主义’这个词，指的却是‘人性’，即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表示的主要是个地理概念。概念像去了核仁的空胡桃壳那样被推过来推过去。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谁这样做了？”

“我们大家都在这样做！拔根的事我们都参加了。”

“可是总得有一个人是推动力吧？”我固执地说，“这个人是谁？您想的是谁？”

“我谁也不想！既不想推动者，也不想被推动者。我只看发生的事

件。人是完全次要的。而且——哪个批评家能正确地评价表演者的表演成果？因为他和表演者一起在舞台上。没有观察距离，因此一切都没有把握，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下陷的谎言和幻想的泥淖里，那里降生了许多残酷的怪物，它们冲着记者的物镜友好地微笑，同时却已经像践踏讨厌的昆虫那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对此该说些什么。

我们默默地走过梅兰特里希街，经过旧市政厅大钟，朝老城环形道和巴黎大街交叉口卡夫卡博士家的房子走去。

我们来到胡斯纪念碑附近时，卡夫卡说：“一切都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人名副其实。比如我现在回家，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际上，我在走进一座专门为我建立的监狱，而这座监狱完全像一幢普通的民宅，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把它看成监狱，因而就更糟糕更残酷。任何越狱的企图都没有了。倘若不存在看得见的镣铐，人们也就无法打碎镣铐。监禁被组织得很好，完全像普通的、并不过分舒适的日常生活。一切似乎都是用坚固的材料造成的，似乎很稳固，而实际上却是一架电梯，人们在电梯里向深渊冲下去。我们看不见深渊，但只要闭上眼睛，我们就听见深渊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啸声。”

给弗兰茨·卡夫卡看一个以圣经为题材的剧本提纲。

“您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不知道。我喜欢这材料。可是至于加工……我现在觉得，要扩展并完成这个提纲就像裁剪工作。”

卡夫卡把手稿递还给我，“您说得对。只有出生的东西才有生命。别的一切都是空的：文学没有存在的权力。”

我给卡夫卡博士带去一本捷克文法国宗教诗歌选[38]。

卡夫卡翻了一会儿书，然后小心地从桌面上把书推还给我。

“这类文学是精巧的奢侈品，我不喜欢。在这里，宗教被彻底地变成审美的东西。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手段变成了刺激手段，变成了像贵重的窗帘、图画、雕花家具、真正的波斯地毯那样摆阔气的装饰品。这类文

学的宗教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您说得对，”我赞同他的看法，“由于战争，在信仰方面也有了代用品。这就是这一类文学。诗人像用彩色流行领带那样用上帝的思想打扮自己。”

卡夫卡博士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其实那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脖套。就像人们常常把超然存在当做逃遁一样。”

在我的那本《乡村医生》^[39]第4页黄色衬页上写有这么一段文字：“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现在记不得这段话记的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格言，还是我根据某次谈话所做的归纳。

我从恩斯特·雷德勒同学那里得到一本表现派诗选，书名为《人类的微光——新作交响曲》^[40]。

我父亲常看我的读物。他看了这本书后对我说：“这不是诗。这是语言肉饼。”

我反驳道：“你太夸张了。新的诗要用新的语言。”

“这话是对的，”我父亲点点头，“每年春天都长新草，但这些草我们无法消化。这是语言铁丝网，这本书我还要再看一遍。”

几天以后，我到工伤保险公司我父亲那里去，顺便先到三楼看卡夫卡博士。他问候以后，把表现派诗选放到我面前，用责备的口吻说：“您为什么拿这本书让您父亲担惊受怕？您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诚实的人，他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是，拿合乎逻辑的语言手段的堕落玩弄戏耍，他是不懂的。”

“按您的看法，这是本坏书喽？”

“我没有这样说。”

“这本书是一盘骗人的语言凉拌菜？”

“不。相反，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黏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使之冷却冻结。”

“可是他们总是表现出热烈的感情之火！”

“只是用语言罢了。这不过类似库式疗法[41]。”

“这是欺骗，”我火了，“那些人是自欺欺人。”

“那又怎么样？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吗？”——他的脸表现出同情、耐心和原谅的迷人表情，“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些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摧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和尊严。这一点，您在这本您父亲借给我的书里看得很清楚。诗人像冻僵的孩子那样呻吟哀诉，或者像疯狂的偶像崇拜者那样狂热地尖声怪叫，他们越不相信在其面前跳舞的偶像，就越加厉害地扭曲他们的语言和肢体。”

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坎普从埃格尔河畔的阿尔特萨特来到布拉格，准备继续上大学，我陪他逛街道、宫殿、博物馆和教堂，让他熟悉我非常喜爱的城市。有一次散步时，阿尔弗雷德突然对我说：“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装饰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用它们掩盖各种不同的事物的实用性，使人忘记功能性的东西，从而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不具目的的美使人产生一种自由的感情。装饰艺术是一种训练方法，文明开化的人用这种方法向自己身上的类人猿进攻。”阿尔弗雷德的话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回家后把他的话记了下来，后来逐字逐句地讲给弗兰茨·卡夫卡听，他半闭着眼睛听我讲。我当时一点不知道，他在此以前早就写了《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内容就是一只猴子如何“变人”，因此，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时，我相当失望。他说：“您的朋友讲得很对。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我笑了笑说：“总留下一截以前的猴子尾巴。”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人们很难对付自我。他们渴望与需要克服的那个阶段划清界线，于是不断产生言过其实的概念，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形成新的假象，而这恰恰最清楚地表达了追求真理的欲望。人们只在悲剧的模糊镜子里发现自己。不过这也已经成为过去。”

“猴子死了！”我莽撞地喊了一声。

然而卡夫卡却非常柔和地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说：“哪里！死亡完全是人类的事情。每个人都要死，而猴子则在整个人的族类中生存下去。‘我’无非是由过去的事情构成的樊笼，四周爬满了经久不变的未来梦幻。”

他到乡下短时间看望了他的妹夫，回到布拉格后，我向他问候：“我们又回到家了。”

卡夫卡伤感地微微一笑。

“家？我住在父母那里。如此而已。我有一间自己的小房间，但这不是家，只不过是一处可以掩盖我内心不安的避难所，而掩盖的结果则是陷入更大的不安。”

近午，我来到卡夫卡博士办公室。

他站在关着的窗户前。他两只手抬起，支撑在窗台上。他旁边两步远的地方站着S，一位身材矮胖的职员，一双小眼睛总是湿乎乎的，大鼻子显得有些滑稽，脸颊上血脉红红的，发红的大胡子非常蓬乱。我走进时，S正忧虑地问道：“您是否知道我们处将怎样调整？”

“不知道。”卡夫卡博士说，向我点了点头表示欢迎，示意我到办公桌旁的客人椅子上就座。他接着说：“我只知道一点，这次调整将把原先的一切完全打乱。不过您不要害怕！您既不会高升，也不会下降。最后一切都将保持原状。”

那职员喘着粗气问：“您是说，博士先生，我的功劳他们又不算了？”

“是的，这有可能。”卡夫卡坐到办公桌旁，“经理部自然不会贬低自

己的作用！要是那样岂不荒唐。”

S.涨红了脸，“真卑鄙！太不公平了！真该一把火烧了整座楼。”

卡夫卡博士弓起了背，从下面关切地看着S.，轻声说：“您大概不想填死您收入的来源吧！难道……？”

“不，”S.歉然回答，“我不是这个意思。您了解我，博士先生。我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可是这鬼地方没有一点儿安全感，调整来调整去的，简直让我受不了。我只能发泄出来。可是我只不过说说而已……”

可是卡夫卡打断了他的话：“这一点恰恰是危险的。语言是行动的开路先锋，是引起大火的火星。”

“我不是这个意思。”惊慌的职员担保说。

“这是您说的，”卡夫卡笑咪咪地回答道，“可您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也许我们已经坐在火药桶上，这火药桶会实现您的愿望。”

“这我不信。”

“为什么不信？您看窗外！火药已经向前迈进，会将我们的工伤保险公司和周围的所有机构全部炸毁。”

那职员在下巴前交叉起他的又短又粗的指头：“您言过其实了，博士先生。街道不危险，国家是强大的。”

“是的，”卡夫卡点了点头，“国家的力量建立在人们的惯性和需要安静这两点上，但是，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样，您今天的咒骂就会变成普遍有效的贬低人的准则，因为言辞是符咒。这种符咒在人的脑子里留下指纹，瞬息之间指纹就能变成历史的足迹。说什么话，我们都得注意。”

“不错，您说得对，博士先生，您说得对。”S不知所措地告辞走了。

他带上门以后，我大笑起来。

卡夫卡博士目光犀利地看了我一眼：“您为什么笑？”

“这可怜人太可笑了。他根本没有听懂您的话。”

“假如一个人不理解别人，那他不是可笑，而是孤苦伶仃，十分可怜。”

我企图辩护：“您刚才是在开玩笑吧！”

卡夫卡博士慢慢地摇摇头，表示否定：“不！我对S.说的话是非常严肃的。今天，调整的梦幻在全世界游荡。各种各样的事都可能发生。您理解我吗？”

“我懂，”我轻轻地说，我感到热血涌上我的脸颊，“我没有感情，太不懂事了。请您原谅。”

卡夫卡博士却头往后一扬，轻声地扑哧一笑，然后，他用安慰的口吻对我说：“现在可是您——用——您的话说有些可笑了。”我后悔地低下头看着地面：“是，我是条可怜虫。”我站起身。

“您要干什么？您坐下！”我坐下后，他飞快地打开抽屉。“我今天给您带来了一大包各种各样的杂志。”他笑了，我更觉得羞愧了，但我依然坐着。

此后，我还两次看见许多职员来找卡夫卡博士，为行将进行的调整向他摸底，但卡夫卡博士却没有确切的情况可以奉告，这让他感到很压抑，因为同事们以为他不是他们的朋友，而只是保险公司忠顺的雇员，因此，有几位职员就对法律顾问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我在卡夫卡博士处碰见过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名叫M.的，就是其中一个。他用一种无所谓的、然而却流露出隐恨和不满的口吻说：“那好吧，您不言语，这是自然的。公司的法律代表不能反对经理部。他只能紧闭嘴巴。对不起，博士先生，原谅我这么真诚，打搅了。”

M.点了一下头就走了。

卡夫卡的脸像木雕一样一动不动。他闭上了眼睛。

“真是个狂妄的粗人。”我恨恨地说了一句。

“他不狂妄，”卡夫卡用阴沉而忧伤的眼睛看着我，轻声说，“他只是害怕，因此不能公正地待人接物。害怕失去饭碗，这种恐惧心理败坏了人的性格。生活就是这样。”

我嘟囔道：“对不起，我可羞于过这样的生活。”

“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是在生活，”卡夫卡非常平静地说，“他们就像珊瑚附在礁石上那样，只是附在生活上，而且这些人比那些原始生物还可怜得多：他们没有能抵御波涛的坚固的岩石，也没有自己的石灰质外壳；他们只分泌腐蚀性的黏液，使自己更加软弱、更加孤独，因为这种黏液把他们和其他人完全隔离开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什么呢？”

弗兰茨·卡夫卡伸开双臂，又让它们像瘫痪的翅膀那样无可奈何地垂下。“大海滋生了这些不是十全十美的生物，人们是否该因此而反对大海？反对大海，也就是反对自己的生活，因为人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可怜的珊瑚，所以，我们只能拿出耐心，无言地吞下往上涌的强烈的黏液。这是我们不致为人和自己感到羞愧而能做的一切。”

在法律处的办公室里，靠窗放着两张边框没有什么雕饰的黑色大办公桌，长的一面靠在一起。从门口看，左边的桌子是卡夫卡博士的，坐在他对面的是特雷默尔博士，他很像从前的奥匈帝国外交部长莱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42]。卡夫卡的这位同事对此颇感骄傲。他留着长胡子，梳着长发型，高领，系宽领带，在领带上别金别针，穿小开口背心，说话时操一种优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语调，以突出他与部长的酷似。这使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们很不喜欢他。他们私下都叫他“败落的司法伯爵”。据我父亲说，这个绰号是一个名叫阿洛伊斯·古特林先生起的。就我今天记忆所及，他是个身材矮小、穿着讲究的职员，一头黑发梳得整整齐齐。

古特林写诗，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也写剧本，他的剧本从未上演过。他十分钦佩里查德·瓦格纳[43]，欣赏古日耳曼诗的韵律，不喜欢特雷默尔博士，因为卡夫卡的这位最直接的同事毫不隐讳地把古特林自己出版的文学产品《熊熊燃烧的火焰》称做“满脸胡子的中等阶层诗”，说诗里胡诌的无非是统治者扔下的古日耳曼市侩唯心论。

使特雷默尔感到自负的除了他与贝希托尔德伯爵长得极为相似以外，还有他那鲜明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看见他的桌子上常常堆着恩斯特·赫克尔[44]、查理·达尔文、威廉·伯尔舍[45]和恩斯特·马赫[46]的书，所以，有一次我去拜访卡夫卡博士时，古特林先生坐在办公桌旁，手里拿着一本大开本黑封皮书，读出书脊上烫金书名《达尔文：物种起源》，就毫不足怪了。他叹了口气。

“瞧，伯爵先生到猴子那里找他的祖先。”他一边说，一边眨了眨眼，想取得卡夫卡博士的赞同，但卡夫卡博士却有力地摇了摇头，淡淡地说：“我看，这一点当前并不紧迫，现在的问题不是祖先，而是后裔。”

“这怎么讲？”古特林把书放到桌子上，“特雷默尔可是个光棍！”

“我不是说特雷默尔，而是说整个人类大家庭，”卡夫卡一边说，一边在胸前交叉起他瘦削的手指，“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世界上很快就只有成批生产的机器人了。”

古特林微微一笑：“您太夸大了，博士先生，这是幻想。”他无可奈何地看看卡夫卡博士，又看看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把目光留在卡夫卡博士的鼻根上，嘟哝了几句：“这类似您的《变形记》。这种事情我懂，我自己也是诗人嘛。”

卡夫卡点点头：“是的，您是这样的人。”

古特林举起双手表示有所保留：“只是业余的，至于正业，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职员。所以我现在只好走了。”他告辞了我们，走出了办公室。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在他走后，我用一种忧伤失望的语气问他：“您真把他看作诗人？”

卡夫卡眼睛里闪出淡绿色的小火星。他会心地微微一笑：“是的，我指的是字面意义。他是个包得紧紧的人，是个密不透风的人^[47]。”

我笑了：“头脑不开窍！”

卡夫卡举起双手表示反对，仿佛他要把我的笑声向我推回来似的。他说：“我没有这样说。他是密不透风的，现实无法进入他的身体。他与现实完全隔绝。”

“用什么隔绝？”

“用一堆陈旧的言词和想法。这些东西比厚厚的装甲铁板还坚固。人就掩藏在它们背后，对时代的变化视而不见，所以，空话是恶的坚强堡垒，是一切热情与愚蠢的最持久的保鲜剂。”

卡夫卡整理桌子上的纸张。我默默地看着他，心里再一次回味他刚才说的这番话，我的手指则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放在我面前的、我进来时古特林拿在手里的那本书。

卡夫卡博士看见我摸书，就说：“这本书是特雷默尔博士的。请把它放到他桌子上。要是他发现书不在他桌子上，就会很恼火地盯着您看。”。

我一边把书放回他的桌子，一边问：“他对这些东西真的感兴趣？”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他在研究自然史、生物学和化学。他要深入创造物的最微小的构成部分的力学，探求生命的意义结构。但是，这自然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这种办法找到的意义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是一滴水珠中的天空，一幅因我们轻微颤动而错位模糊的图画。”

“您认为，博士先生，我们永远不能获得真理？”

卡夫卡默然。他眯起眼睛，变得阴沉了。他那突出的喉结上下动了几次。他看了一会儿支撑在桌子上的指尖，然后轻声说：“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

我缠住不放：“我们能理解它吗？”

“我们时刻在体验它，”卡夫卡说，声音里隐含着些许不安，“我们给予它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流动。它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获得它的全貌。我们真正能理解的是神秘，是黑暗。上帝寓于神秘之中，黑暗之中。而这很好，因为没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那样做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儿子废黜父亲，因此，上帝必须隐藏在黑暗中。因为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就攻击包围着神性的黑暗。他把大火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它后退，但它继续延续下去。消逝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

和卡夫卡博士在码头上。满载的煤车从铁路旱桥上隆隆而过。

我告诉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所住的街道（在卡罗琳娜塔尔区）的小伙子们到齐斯卡山郊游，在铁路向上升高的拐弯处，他们跳上缓慢行驶的货车，从敞开的煤车上往下扒煤，然后跳下车，把煤搂到一起，装进带去的口袋背回家。我的一个同学名叫卡勒尔·本达，斜眼，是一位劳苦一辈子的女佣人的儿子，他跳车时被卷到轮下，碾得粉碎。

卡夫卡问：“您亲眼看见了？”

“没有，我只是听小伙子说的。”

“您没有参加小伙子的偷煤活动？”

“那倒参加了，我跟着他们的煤队去了几次。不过我只是旁观者。我没有偷煤。我家里有的是煤。我和男孩们去齐斯卡山时，总是坐在一旁，或在灌木丛后面，或在树下，远远地看他们偷煤。这种事常常很紧张。”

“争取人生必需的温暖总是非常紧张的，”卡夫卡说，特别强调了从我的叙述中借用的那些话语，“这里关系到生与死的抉择，因此人们不能只当旁观者。灌木丛或树木都不能保护我们。生活不是齐斯卡山。每个人都可能跌到轮下。弱者、贫者比有足够燃料的强者、富者更早。可以说，弱者常常在被轮子碾轧以前就垮了。”

我点点头：“这一点千真万确。小本达好几次在灌木丛里坐在我旁边。眼泪从他脸颊上淌下来。他害怕。他本不想偷煤，可是别的孩子都笑他，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时，母亲曾用地毯拍揍了他几次，他这才去偷。”

“您说对了！”卡夫卡博士挥了一下手，大声说道，“您的同学小本达不是被货车碾碎的，而是早就被没有爱、没有温暖的环境碾碎了。通向灾难的道路比最后的结局还坏，而且也只能这样，没有别的可能。跳车扒车这类暴烈行为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他们扒下的那点煤很快就烧光，这时他们又冻得浑身发抖。他们再一次跳车所需要的力量就会一天比一天小，而摔倒的危险则在增大，所以倒不如去行乞。也许会有人扔给他们几块煤……”

“对，这样做不错，”我打断了他的话，“煤队开始时的行为就类似乞讨。男孩子们站在铁道旁，求铁路职工给他们一点煤。通常，铁路职工

扔给他们几块煤。他们没有遇到好心肠的职工时，才跳车。”

卡夫卡博士又点了点头：“事情就是这样。只有毫无希望、什么也得不到时，这些孩子们才去冒险跳车。我仿佛看见他们就在我面前，无望把他们驱赶到轮下。”

我们默默地往前走。卡夫卡博士瞥了一眼迅速变暗的河流，然后他说起别的事。

晚饭后，我向我父亲报告那天下午我和卡夫卡博士谈话的情况。他说：“卡夫卡博士是人格化的耐心和善良。我不记得公司里因为他而产生过什么冲突纷争，但他的随和并不表示软弱和贪图安逸。相反，他的随和的特点是，他以他对别人的极其精确、公正和充满谅解的态度使他周围的人不由自主地采取同样的态度。人们顺着他的意思说话，倘若他们很难和他持同一种看法，他们宁可不说，而不去反驳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卡夫卡常常发表完全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与常规相左的看法。保险公司的人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理解他，但是大家都喜欢他。对他们说来，他是个奇特的圣者。对许多公司以外的人，他也是圣者。不久以前，一位被工地升降机压断了左腿的辅助工就曾说过‘他不是律师，他是圣徒’的话。按规定，这位辅助工只能从我们公司得到很小一笔抚恤金。他递交了一份申诉书，从法律上看，申诉书表述得不正确。倘若在最后时刻，没有一位布拉格著名的律师去拜访这位年迈的辅助工，很内行地帮他修改申诉书，加以补充，那么老头子肯定打输。那位律师没有拿残疾的老人一分钱，帮他打赢了官司。我后来知道，是卡夫卡博士替他请了这位律师并支付酬金，还亲自为他出谋划策，以便自己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法律代理人，在与老工人的诉讼中体面地败诉。”

我听得津津有味，我的父亲却露出愁容。他说：“卡夫卡博士这样处理事情，不只这一桩。同事中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人钦佩他，也有的说他无能。”

“那你呢？”我打断父亲的话，“你在这件事上持什么态度？”

我父亲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对卡夫卡博士能采取什么态度？对我来说，他远不只是个同事。我喜欢他，因此，我对这些仗义行为非常忧虑。”他表情忧郁，端起面前的咖啡杯。

我后来听说，在卡夫卡博士进行这些“仗义行为”时，我父亲曾多次

给予大力协助，他确实不仅仅是卡夫卡博士的同事，在许多情况下是他的“同谋”。

他喝了咖啡，放下咖啡杯后说：“博爱常常是十分冒险的事，因此它是最大的美德之一。卡夫卡博士是犹太人，但是他却比我们办公室的那些可爱善良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更具有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在他面前，他们迟早会感到羞愧的。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做出某种卑鄙的行为。人常常用更大的错误掩盖他的某个错误。某个职员被抓住什么把柄时，很容易以‘卡夫卡式的正义行为’为自己开脱，所以，卡夫卡博士在博爱方面要小心谨慎些才是。你把这意思告诉他。”

两天以后，我陪卡夫卡回家，在路上我给他讲了我父亲的话。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做了如下说明：“情况并不完全像您父亲所看的那样。基督教的博爱和犹太教之间不存在对立。相反，博爱是犹太人的伦理成果。基督是给全世界带来治疗福音的犹太人，此外，每一种价值——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与冒险相联系。因为每种价值都要求考验。至于说到他人的羞愧感，您父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激怒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鬼蜮魍魉的时代，只能极其隐秘地行善和主持公道，仿佛那是违法的。战争和革命没有消逝。相反，由于我们的感情僵化冷漠，战争和革命之火更加炽热强烈了。”

我不喜欢卡夫卡的语调，于是我说：“据此说来，就像圣经里所描写的，我们是在炼狱里喽！”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我们还在那里，这是个奇迹。”

我摇摇头：“不是奇迹，博士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不相信世界的毁灭。”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是您的责任。您还年轻。不相信明天的青年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

“信仰什么？”

“相信一切事物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我给卡夫卡讲述了我在新德意志剧院看过的分别由瓦尔特·哈森克勒

弗尔和阿图尔·施尼茨勒写的两出风格迥异的独幕剧的演出情况[48]。

“演出不协调，”我在结束我的讲述时说，“一个是表现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两者互相渗透。大概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

“这是可能的，”卡夫卡说，“布拉格德语剧院的情况很困难。从总体上看，这些困难是财政和人事上种种依附关系的巨大综合体，他们没有相应的大量观众。这是个没有基础的金字塔。演员听命于导演，导演受制于剧院经理，而剧院领导又向剧院协会委员会负责。这是一条缺少聚合环节的链条。这里没有具有真正德意志民族特性的东西，因此没有可靠的、常年不断的观众。坐在包厢和池座前排的说德语的犹太人并不是德国人，而专程来到布拉格、坐在楼座和两厢回廊的德国大学生只是外来力量的前哨，他们是敌人，而不是观众。在这种条件下，人们自然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文艺创作，力量都消耗在次要的事情上了。剩下的只是几乎永远达不到预期的良好效果的努力和劳苦，因此我不进剧院。太可悲了。”

当时，德意志剧院正上演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的戏剧《儿子》[49]。

弗兰茨·卡夫卡说：“儿子造老子的反，这是文学中的古老题材，一个更古老的世界问题。就这个题材写过许多戏剧和悲剧，但在现实中，这是喜剧材料。爱尔兰人辛格[50]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儿子是个爱吹牛的年轻人，他夸口说他打死了父亲。这时他老子来了，使这位要打倒父亲权威的年轻人出尽了洋相。”

“据我看来，您在这场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斗争持怀疑态度。”我说。

卡夫卡微微一笑，“但是我的怀疑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斗争实际上只是一场虚假的斗争。”

“怎么，虚假的斗争？”

“老年是青年的未来，他们迟早要变老的。为什么要斗争？为了更快地变老？更迅速地死亡？”这时进来一位职员，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维也纳宫廷演员道夫·希尔德克劳特[51]来到布拉格访问演出，主演

我和卡夫卡谈论此事。

“鲁道夫·希尔德克劳特是一位公认的大演员，”弗兰茨·卡夫卡说，“但是他是伟大的犹太演员吗？我看，这大可怀疑。希尔德克劳特扮演犹太戏剧里的犹太人角色，但他不完全是用犹太语为犹太人演出，而是用德语为每一个人演出，因此他不是纯粹的犹太演员。他是个边缘人物，是使人们能窥见犹太人的内部生活的中介人。他虽然没有澄清犹太人的生活，却开阔了非犹太人的视野。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那些用犹太语为犹太人演出的可怜的犹太演员。他们用他们的艺术吹走了依附在犹太人本质上的外来生活的沉积物，在公众面前显示出了隐蔽的、被人遗忘了的犹太人面貌，从而增强了处在时代旋涡中的人们力量。”

我讲述了战争快结束时，我在盖斯广场的萨沃依小咖啡馆看了两场犹太巡回剧团的演出。卡夫卡听后十分惊讶。

“您怎么到那里去的？”

“跟我母亲一起。她在波兰呆过很长一段时间。”

“您觉得戏演得怎么样？”

我耸耸肩：“我只记得，他们的话我几乎一点不懂。他们说的是行话，但我母亲很喜欢那些演员。”

卡夫卡看着远处：“我认识萨沃依咖啡馆的犹太演员。这是大约10年前的事了。他们的语言我听起来也很困难。后来我发现，我懂的犹太德语比我预想的要多。”[53]

“我母亲说一口流利的犹太德语。”我骄傲地说，然后给他讲了我童年时的一段往事。我6岁时跟母亲到普泽米色尔市犹太人居住区的施瓦茨街。我看见从古老的房子和幽暗的杂货铺里跑出许多男子和女人，吻我母亲的手和裙裾，又哭又笑，大声喊着：“我们的好太太！我们的好太太！”我后来听说，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时期，我母亲在家里藏过许多犹太人。

我讲完后，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想跑到隔离区的可怜的犹太人那里，吻他们的衣裙，而不说一句话。如果他们能默默地容忍我在他们身

边，我就非常高兴了。”

“您如此孤独？”我问。

卡夫卡点点头。

“像卡斯帕尔·豪泽尔^[54]一样孤独？”我又加了一句。

卡夫卡笑了：“比卡斯帕尔·豪泽尔还糟得多。我——像弗兰茨·卡夫卡一样孤独。”

我和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坎普常常在一起散步。一次，当我们穿过布拉格老城的几条狭窄的街道和通道房子，来到现代化的城壕时，坎普对我说：“布拉格是一座悲剧性城市。这一点从建筑上就能看出：中世纪的和近代的各种形式几乎毫无过渡形式就互相交错在一起。这样，一排排房屋就具有某种浮动的、梦幻的色彩。布拉格是一座表现派城市。房屋、街道、宫殿、教堂、博物馆、剧院、桥梁、工厂、塔楼、简陋的出租楼房，这一切都是一种深沉的内部运动的石化了的痕迹。布拉格的城徽图案里有一只铁拳，一只砸烂使人窒息的城墙和铁栅栏的铁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城市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潜藏着一种强烈的生活意志，它要打碎旧的形式，不断地巩固新的生活，但是恰好在这里已经潜伏着毁灭的种子。暴力导致新的暴力。越来越发达的技术将粉碎那只铁拳。现在已经可以闻到一股废墟味道。”

我回家后，在日记里记下了坎普的话，想第二天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里念给卡夫卡博士听。

他专注地听我朗读。当我合上日记本，把它放进膝盖上的公文包里时，他把下唇往里抿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慢慢往前俯身，把两臂舒服地放在办公桌上，他脸上的紧张神情消失了。他谨慎地轻声说：“您朋友的话本身就已经是一只铁拳。我可以想象，您在他们中间是多么震惊。我和我的朋友也常有这种情况。他们口若悬河，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我反思。”

他用他特有的方式轻轻地笑了笑，好像纸张轻轻的刷刷声。他把头往后一扬，目光对着天花板，说：“不仅是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表现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

“为什么？难道我们在破坏秩序？我们是和平的破坏者？”我提问时有些吵架的语调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不由自主地弯起大拇指，放到唇边，力图从卡夫卡的眼光中探究出他对我的发作的反应，但他只凝视着远方，然而却对我的问题的每个字都做出了非常精确的反应。他说：“是的，我们是秩序与和平的破坏者。这是我们的原罪。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上，我们不仅要作为族类死亡和复归，我们每人都要作为单个的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欢愉的生活。这是反而使我们失去生活的一种反抗。”

“这我不懂，”我非常坦率地说，“我们愿意活着，不愿意死，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罪过？”

我的声音里有些许嘲讽的味道，但卡夫卡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很平静地说：“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运动，永远地周而复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

我打断他的话：“可是他对此没有过错，命运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怎么能是一种罪过？”

听了我的话，卡夫卡慢慢向我转过脸。我看见他灰色的大眼睛：他目光阴沉，令人捉摸不透。他的神情非常平静深沉。只有微微向外突出的下唇颤动了一会儿。也许只是颤动的一点点迹象？

他问我：“难道您要向上帝抗议？”

我看着地面。屋内静寂无声。

然后，弗兰茨·卡夫卡说：“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也许只有死亡才给人以自由。这一点谁知道？”

一次，我们顺着老城环形道散步时谈论起马克斯·勃罗德的剧作《伪造者》。我跟卡夫卡讲了我对如何导演该剧的设想。我们正好谈到一位女人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情况的地方。我的意见是，舞台上的人物看见女人上场时要慢慢后退，但卡夫卡不同意我的看法。

“所有的人都应该像遭雷击那样迅速后退。”他说。

“这样太戏剧化了。”我反驳。

但弗兰茨·卡夫卡摇了摇头：“就应该这样，演员应该戏剧化。他的感情和言行必须比观众的感情和言行更强烈，才能在观众身上达到预期的效果。要使戏剧对生活产生影响，它就必须比日常生活更强烈、更紧张。这是重力法则。射击时必须比目标瞄得更高更远。”

布拉格等级剧院上演恩斯特·魏斯[55]的革命戏剧《坦雅》。魏斯是马克斯·勃罗德的朋友之一。

当我向卡夫卡讲述我所看的演出情况时，他说：“最美的是梦见坦雅孩子的一场戏。在戏剧把不现实的事情变为现实时，它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最强烈。这时，舞台就成了灵魂潜望镜，从内部照亮了现实。”

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56]的一位亲戚，我的同学格奥尔格·克劳斯借给我两本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57]的书，一本是《炮火》，一本是《光明》。

这两本书我是为卡夫卡借的。他看后说：“炮火，战争的图像，符合真实情况。光明则只是梦想标题。战争把我们推进了扭曲变形的镜子组成的迷宫。我们在一个个假象之间跌跌撞撞，我们是被假预言家和江湖医生搞得晕头转向的牺牲品，他们用廉价的幸福药方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像通过一道道窄门那样通过一面面镜子，从一个地牢跌进另一个地牢。”

坦率地说，卡夫卡说的话，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不想让人看出我是个理解能力低下的人，于是就用提问掩饰自己：“什么东西使我们陷入这种处境？又是什么使我们无法脱身？难道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走上通往这镜厅的道路？是什么引导我们这样做？”

“我们巨大无比的贪欲和虚荣，我们的权力意志的罪孽。我们争夺并没有真实价值的价值，结果，我们就漫不经心地毁坏了我们整个人类生活所系的事物。这是丑化我们、杀害我们的迷惘。”

有一次我到劳工工伤事故保险公司时带去了卡西米尔·埃德施米特[58]的《双头女神》。埃德施米特在第二章《台奥多尔·多伊布勒和抽象

派》中也评论了弗兰茨·卡夫卡。

“您知道这本书吗？”我问。

弗兰茨·卡夫卡点点头：“有人向我提过。”

“您有什么评价，博士先生？”

卡夫卡耸了耸肩，用右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按埃德施米特的看法，我好像是个设计师。其实我只是个平庸拙劣的描图师。埃德施米特断言，我把奇迹融进了普通的事情之中，这当然是他的一大错误。普通的东西本身就是奇迹！我只是把它描画下来而已。就像照明人员照亮了遮暗的舞台那样，我也可能稍许照亮了一点这些普通事情，然而这一点并不正确。在现实中，舞台并没有遮暗。现实舞台充满阳光。于是人们闭上眼睛，看不到多少东西。”

“在直观形象和现实之间常常存在令人痛苦的差异。”我接了一句。

卡夫卡点点头。

“一切都在斗争，都在搏斗。只有每天都必定能征服爱情与生活的人才会得到它们。”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露出讥讽的微笑，轻声说：“这是歌德说的。”

“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

他点了一下头：“关系到我们人的事情，歌德几乎都说到了。”

“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坎普对我说，奥斯瓦尔德·施彭勒^[59]完全是从歌德的《浮士德》一书中汲取了思想，形成他的《西方的没落》的理论的。”

“这是完全可能的，”弗兰茨·卡夫卡说，“许多所谓的科学家把作家的世界移植到另一个科学的层次上，从而获得荣誉，被人看重。”

我父亲对任何一种木制品都有狂热的兴趣。他在阁楼有一间小小的木工场，那里有一个刨床，一把真正的小型圆锯。他时刻梦想着能买一

台木工车床。他有一个相交多年、钦佩之至的朋友。这位朋友名叫扬·车尔尼，是税务员，但这只是他的谋生职业。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意大利提琴制作工匠的秘密。为了深入他们的艺术，他在业余时间研究了多年古老的意大利、德国和捷克提琴的漆、木质、空间容积和结构。他学习化学、历史和声学。他收藏了数量可观的弦乐器、专门的电气测量仪器，不用说，他有一个装备有两台木工车床及其他设备的木工场，那两台车床令我父亲十分眼羡。因此他下班后常常去车尔尼家，有一次他把我也带去了，醉心的提琴制作者要试用他的一把新作，让我为他钢琴伴奏。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况，那是五月初，下着雨。车尔尼当时的地址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提琴实验室”的气氛——我父亲常称车尔尼的住宅为“提琴实验室”——则非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刚走进车尔尼的住宅时的印象是，这是一所小小的、井然有序的职员住宅，但这只是假象，假象后面隐藏着一个特殊的炼金术士的巢穴。住宅主人的生活兴趣一分为二，这一点在住宅的安排上就表现出来了。

狭窄的、过道似的前厅左侧是一间小厨房，厨房旁边是相当阴暗的起居室。这里是车尔尼先生和妻子阿格娜丝小资产者生活的舞台，但前厅的另一侧则是耗尽他精力和心血的、热情得以驰骋的场所：一间刷成白色的大房间，墙上挂着稀奇古怪的图表、曲线图表和几把小提琴，安在墙上的长架子上摆着许多化学试管、罐子、灯具、测量仪器和装着毛笔的大钵。架子旁边是两扇窗户，窗户前放着一张刨床，旁边是一架黑色大钢琴。左侧墙边放着两张车床，一个高高的、放着各种各样文件夹的架子，一张放着煤气灶的小桌子。桌子对面，在房门的右侧，蒙满灰尘的铁制衣架上挂着几件肮脏的画家工作服，几条破旧的、溅上许多颜料的深色裤子，一顶蒙着灰尘、褪成灰褐色的圆顶便礼帽。衣架旁边的墙上堆着一摞长短不一的窄板。呛鼻的油味、烟味和胶合剂味道充满了整个房间，把我的鼻子刺激得痒痒的，可是我父亲的眼睛却放出兴奋的光彩。他说：“这是真正的工场，对吧？你看这车床！”

我只哼了一声。

然后我们走进起居室兼卧室，里面放着罩着绿色丝绒罩面的家具，一张圆桌子，两张棺槨状的单人床。车尔尼太太端上加惯奶油的咖啡和一块高高的蛋黄色蛋糕。咖啡有一股煤油味，而香草味的蛋糕在牙齿之

间发出沙子或玻璃纸那样的沙沙声，但是这也许只是我的感觉，因为提琴实验室给我的印象太强烈，把我完全征服了。

为了摆脱这个印象，我事后写了一个取名为《宁静的音乐》的故事。故事的依据是车尔尼在我们访问他时所说的一段话。

他说：“生活就是忍受运动和进行运动，但是，只有一部分运动表现为空间的变化。我们忍受的运动中，更大的一部分并不表现为位置的变化。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处在振动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发出声音，但我们只听见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听不见血液的循环、死亡、我们身体组织的生长，听不见化学过程发出的声音，但是，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脑纤维、神经纤维、肌肉纤维的细小的细胞都充满无声的声音。它们随着我们周围的事情一起振动。音乐的力量就建立在这一基点上。我们用音乐能引起更深沉的感情的振动。为此我们利用乐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它们所具有的发音能力。就是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音量和音色，而是隐蔽的声音性质，音乐刺激用以触击神经的强度。这是每一种乐器和每一个乐器制造者的首要问题。他必须设法使他的乐器具有尽可能高的音强。就是说，他必须制造出能把一般情况下听不见、感觉不到的振动提高到人的意识中的乐器，因此，乐器制造者的问题是使安静复苏，使之具有生气。他必须把隐蔽的声音从安静中分离出来。”

我以这些思想为基点，写了一篇乐器制造者的幻想故事，这位乐器工匠用新的乐器向听者传递了完全新的、超出迄今为止的一切理解力的、充满乐趣的刺激，它们的强度提高到了痛苦的程度，这种痛苦撕裂了听者的神经，使发明者过了一段时间后发了疯。

我把故事带给卡夫卡博士看。过了几天，他笑了笑对我说：“我知道您所写的声音魔力。我和您父亲到车尔尼先生家去过几次。我们在那里刨了几块木板，为此他允许我们用车床做几样小东西。车尔尼先生向我们讲解了他的关于安静具有音乐潜能的理论，让我们看了他的奇特的新制小提琴，在提琴狭窄的侧面开了几个音孔。他还给我们演奏了一会儿，可我一点也不懂。就我现在记忆所及，这些新提琴发出脆裂的金属声。这是车尔尼的乐器唯一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我告诉了他我的感觉。我的话大概使他不悦，因为他对我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友好了。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

“您对车尔尼的安静理论怎么看？”

“这不是新东西。就像X射线那样，自然也有人耳听不见的声波。我想，有一个法国人——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昆虫能通过我们人听不见的声波互相沟通。我们接收外界信息的范围为什么不能扩大？人不是石头。他也具有变化的能力。一块矿物碎裂，熔化，凝聚成规则的晶体。人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且也是他自己的杰作，是不断突破现有界线、使迄今为止仍蒙在黑暗中的东西变得明晰可见的魔鬼。”

“照您的看法，车尔尼需要认真对待？”

“当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特有的追求幸福的需要。至于这是天才的阐释还是古怪的孤僻，只有时间才能决定。”

“博士先生，您以为时间是公正的吗？”我怀疑地问，“时间是两面神，它有两副面孔。”

“它甚至有两重底，”卡夫卡笑着说，“它是延续，对衰落的抵御，它与未来的可能性相联系，与期待新的延续的希望相联系，它是变化，是赋予每个现象以自觉存在的变化。”

我来到卡夫卡办公室里。我带着克里斯蒂安·莫尔根斯泰恩^[60]的《绞刑架之歌》。

“您读过他的严肃诗歌吗？”卡夫卡问我，“比如《时间与永恒》、《等级》？”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他写严肃诗歌。”

“莫尔根斯泰恩是极其严肃的诗人。他的诗太严肃了，以致他不得不写《绞刑架之歌》，以逃避自己过分的严肃。”

布拉格的德语诗人约翰内斯·乌厄齐策尔^[61]收集并出版他的不满20岁就死了的诗。

我问弗兰茨·卡夫卡是否认识这位已故的诗人。我记不起他是怎样回答的，但最后一段话我却记得：“他是非常不幸的年轻人，他在咖啡馆的百岁犹太人之间消磨时光，死于他们中间。他除此还能做什么？咖啡馆是这个时期犹太人的地下墓穴。没有光，没有爱。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忍

受的。”

我在格奥尔格·特拉克尔^[62]的诗里第一次看到1828年在纽伦堡出现的神秘的弃儿卡斯帕尔·豪泽尔的名字。后来，吕迪亚·霍尔茨纳尔^[63]借给我雅各布·瓦塞尔曼的长篇小说《卡斯帕尔·豪泽尔或心的惰性》。

提起卡斯帕尔·豪泽尔，弗兰茨·卡夫卡对我说：“瓦塞尔曼的卡斯帕尔·豪泽尔早就不是弃儿了。他现在有合法身份，进入了世界，在警察局注了册，成了纳税人。自然，他已经改了名字。他现在名叫雅各布·瓦塞尔曼，是德国小说家，有别墅寓所。暗地里他也患有心脏惰性症，让他感到内疚。他以这种内疚为题材写了稿酬丰厚的小说，这样也就一切都井井有条了。”

我父亲喜欢阿尔滕贝格^[64]的散文诗。每当他在报上发现这样一首小诗，他就剪下来，夹到一个特别的纸夹里很好地保存起来。

我把这件事告诉弗兰茨·卡夫卡时，他微微一笑，身体向前一弯，把交叉的双手夹在两膝之间，用很轻的声音说：“这太好了。非常好。我一向喜欢您的父亲。乍一看，他好像很淡漠冷静。别人会想，他只是个既严肃又能干的职员，但是，只要进一步了解他，就会透过假象，发现他充满了令人感到亲切的人性。您父亲知识渊博，又感情丰富，所以他喜欢文学。彼得·阿尔滕贝格确实是个诗人。他的小故事反映了他的整个人生。他迈出的每一步，他做的每一个举动，都证实了他的言语的真实性。彼得·阿尔滕贝格是发现和描写小事的天才，是个罕见的理想主义者，到处都能发现世界的美好之处，就像人们在咖啡馆的烟灰缸里发现烟头一样。”

古斯塔夫·迈林克^[65]的长篇小说《戈伦》^[66]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最成功的德语小说。弗兰茨·卡夫卡向我谈了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他说：“老布拉格犹太城的气氛写得妙极了。”

“您还在回忆老犹太区？”

“其实我已经快完了。不过……”卡夫卡用左手做了个手势，仿佛说：“这又有什么用？”他微微一笑，好像说：“什么用也没有。”

他接着说道：“那些幽暗的角落、神秘的过道、模糊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馆和关闭的餐馆依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穿越新城宽阔

街道，然而，我们的步伐和目光却是迟疑的。我们好像在贫困的老胡同里那样，内心仍在颤抖。我们的心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卫生条件的改善。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不卫生的老犹太城比我们周围的清洁卫生的新城更现实。我们清醒地穿过梦境：我们自己只不过是过去的岁月的一个幽灵。”

我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列昂·布鲁阿^[67]所著《穷人的血》一书的捷文译本。

弗兰茨·卡夫卡对我找到的书很感兴趣。他说：“我读过列昂·布鲁阿一本反对反犹太主义的书，书名是《向犹太人致敬》。书里，犹太人像贫穷的亲戚，得到了一个基督徒的保护。写得很有意思，而且——布鲁阿会骂人。这是非同寻常的。布鲁阿有一团火，让人想起先知的火一样的激情。我要说：他比他们骂得好得多。这很好解释，他的火是由现代的种种垃圾废料培植起来的。”

弗兰茨·卡夫卡送给我卡尔·达拉哥^[68]写索伦·克尔恺郭尔^[69]的一本小书。他对我说：“克尔恺郭尔的问题是，对于存在，不是从审美上去享受，就是从伦理上去感受，然而我却觉得，这里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这种非此即彼只存在于克尔恺郭尔的头脑里。实际上，只有通过顺从的伦理感受才能从审美上享受存在，但是，这只是我一时的个人看法，在做进一步的考察后，我也许会放弃这个看法。”

有几次，我和汉斯·克劳斯^[70]一起到弗兰茨·卡夫卡那里拜访。我虽然在学校里就认识汉斯·克劳斯，但以前我和他并不熟，因为他比我大几岁，而且，他当时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写了不少诗和小说。

与他相比，我只是个未成年的小学生，可我觉得，弗兰茨·卡夫卡对我说话时要比对克劳斯和蔼友善。我一方面为此感到高兴，同时又为自己害羞。

“难道你对卡夫卡博士来说只是个孩子？”我问自己，但马上就又自我安慰起来，“你这样说自己大概只是因为他对我比对克劳斯友好和蔼。”

我心里总不能平静。于是，有一次当我陪卡夫卡从办公室到老城环形道散步时，我就问他：“博士先生，您以为我爱虚荣吗？”

卡夫卡很惊讶，“您怎么会产生这个问题？”

“我觉得您对我比对克劳斯和葛亲切。这让我高兴，让我很高兴。但同时我对自己说，这也许只是虚荣心作祟的缘故。”

卡夫卡挽住我的胳膊：“您是个孩子。”

我的下巴颤抖起来：“您看，博士先生，我一直这样想，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傻孩子，您才对我这么亲切。”

“对我来说，您是个年轻人，”弗兰茨·卡夫卡说，“您有别人已经失去的各种前景。其他人离您这么近，使您不得不非常仔细地观察自己，免得消失于人群之中。我对您肯定比对克劳斯亲切。我和您说话，就等于和我的过去说话。这时当然必须亲切和蔼，况且您比克劳斯年轻，您需要更多的理解和爱抚。”

从这天起，我和克劳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几乎成了朋友。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文友：医生鲁道夫·阿尔特舒尔^[71]和建筑师康斯坦丁·阿纳^[72]，后者用汉斯·蒂纳·康东的笔名发表诗作。

我们互相拜访，一起去剧院看戏，郊游，互相借书，讨论，互相钦佩。

这样就产生了“抗议”小团体。该团体在莫扎特厅举办自己的朗诵晚会。

我们也想为听众朗诵一些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但他严厉禁止我们这样做。

“你们疯了，”他对我说，“抗议还要向警察申报，得到他们批准！可笑可悲。这比真正的反抗还糟糕，因为这只是一场佯装的风暴。我压根儿不是新教徒^[73]。我容忍一切，耐心地忍受一切，只是这种公开登台露面，我不愿接受。”

我赶紧解释，我与阿尔特舒尔、克劳斯以及阿纳没有共同之处。我们的团体解体了。对我来说，卡夫卡比我自己的虚荣心更亲近。

几个月以后，我和汉斯·克劳斯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我向卡夫卡讲述这次冲突时，他静静地听我讲，然后耸了耸肩膀说：“您想从我这里讨

主意。我可不是个好顾问。对我来说，每个建议归根到底都只是背叛，是胆怯地逃避未来，而未来是检验我们的现在的标准。害怕检验的只能是内心有愧的人。不能完成他现在的任务的人就是内心有愧的人，但是谁能确切地知道他的任务？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内心有愧，他总想尽快入睡，摆脱这种负疚之感。”我接着说，约翰·贝歇尔[74]在一首诗里称睡眠是死神的友好拜访。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很对。我的失眠也许就是害怕我欠了他性命的来访者。”

诗人汉斯·克劳斯送给我一本小书——附有奥斯卡·科柯施卡[75]的12幅插图的阿尔伯特·埃伦斯泰因的《图布奇》。卡夫卡在我这里看到了这本书，我把书借给他，下一次我到办公室看望他时，他把书还给了我。他说：“薄薄的一本小书，带来那么多喧闹。《人在呼喊》，您看过这本书吗？”

“没有。”

“我记得，这是阿尔伯特·埃伦斯泰因的一本诗集的书名[76]。”

“看来您对他很了解。”

“了解？”卡夫卡说，否定地耸了耸肩，“我们永远不会了解活着的人。现在就是改变和变化。阿尔伯特·埃伦斯泰因是这个时代的族类的一分子。他是个悬在空中的呐喊的孩子。”

“您怎么看科柯施卡的插图？”

“我看不懂。图画一词从画图、描画、标明派生而来。这些画向我表明的只是画家内心的巨大混乱。”

“我在鲁道夫纪念馆的表现派画展上看到了他的描画布拉格的巨大油画。”

卡夫卡把放在桌子上的左手翻成手掌朝上，说：“是那幅中间有尼克拉斯教堂的绿色圆顶的巨幅图画？”

“是的，我指的就是那幅。”

卡夫卡低下了头：“在那幅画上，房顶飞跑了。圆顶成了风中的雨伞。整个城市飞起来，飞跑了。但布拉格却依然屹立在那里，尽管它有

许多内部矛盾冲突。这正是布拉格奇妙的地方。”

我为约翰内斯·施拉夫[77]诗集《春天》里的两首诗谱了曲。我抄录了一份寄给词作者。约翰内斯·施拉夫给我写了一封书法精美的长信，表示感谢。我让弗兰茨·卡夫卡看了这封信。

卡夫卡一边笑着，一边在桌子上把信递回给我。“施拉夫非常令人感动。我和马克斯·勃罗德在魏玛时曾去拜访过他。他那时一点不想谈文学艺术。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怎样推翻现行的太阳系理论。”

“不久前我看见过他的一本厚厚的书，他在书中宣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78]。”

“这正是他当时的思想。他想通过他对太阳黑子的特殊解释，让我们信服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小市民住宅的窗边，让我借助陈旧的学生用望远镜观看太阳。”

“你们当时笑了。”

“哪里！他敢于用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这样一件可笑东西反对科学和宇宙，这件事既滑稽可笑，又令人感动，我们几乎要相信他了。”

“什么事情阻碍了你们这样做？”

“可以说是咖啡。咖啡太坏了，我们只好告辞离开。”

我讲了一个雷曼[79]写的很有趣的故事：莱比锡的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早上8点钟拒绝了泰戈尔的译本，两个小时后，又匆匆派出版社编辑赶往邮政总局索要退回的手稿，因为他在报上读到泰戈尔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他拒绝译稿真是有些奇怪，”弗兰茨·卡夫卡慢条斯理地说，“泰戈尔离库尔特·沃尔夫并不远嘛。印度——莱比锡，这种距离是表面的。实际上，泰戈尔只是个穿着伪装的德国人。”

“也许是个首席教师？”

“首席教师？”卡夫卡重复了一遍，把紧闭的嘴唇的嘴角向下抿了一下，慢慢地摇了摇头，“不是首席教师，但他可能是个萨克逊人，和里查

德·瓦格纳[80]一样。”

“穿粗呢大衣的神秘主义？”

“差不多吧。”

我们都大笑起来。

我借给卡夫卡一本印度宗教书《薄伽梵歌》[81]的德译本。

卡夫卡说：“印度宗教文献既吸引我，又使我反感。它们像毒品那样，既有诱人的东西，又有吓人的东西，所有这些瑜伽师和魔术师都不是以其对自由的炽烈之爱，而是以其对生活的无情憎恨控制与自然密切联系的生活。印度的宗教修身活动盖源于深不可测的悲观思想。”

我向他提起叔本华对印度宗教哲学的兴趣。

卡夫卡说：“叔本华是语言艺术家。从这里产生了他的思想。仅从语言考虑，我们就一定得读他的作品。”

卡夫卡看见我有一本米夏埃尔·马勒斯[82]的薄薄的诗集时笑了。他说：“我认识他。他是个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布拉格日报把他当做怪物而容忍他。”

“他们对捷克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真对待？”

卡夫卡窘困地微微一笑：“这很难。这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非常亲切可爱，使得别人不得不相信他们的每一句话，但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性格，我们又不能相信，他们真能成为他们所宣称的世界破坏者。”

“您认识他们本人？”

“有所认识。他们是些很可爱的、很有趣的人。”

几天以后，我听说了他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的某些细节。

我和卡夫卡博士一起散步。我们从老城环形道拐入盖斯特街，经过慈悲兄弟教堂到了伏尔塔瓦河，然后向左拐，穿过议会前广场，沿克罗茨赫伦街走向卡尔大桥，从那里拐入卡尔街，返回老城环形道。

我们散步时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行人，他们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在艾吉蒂街和卡尔街交接口的街角上，我们几乎和两个那一号女人^[83]相撞。一个圆脸，擦了很多白粉，红红的头发在头上盘了个鸟窝形发髻；另一个身材稍矮些，尖尖的耗子脸，外表像吉普赛女人那样有些邋遢。

我们避到墙边，但即便我们不避，她们也不会注意到我们。她们专心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一件事情。

“他抓住我的脖子，把我轰出门来。”黑发女人愤愤地说。

红发女人得意地说：“我说什么来着？你不能到那家馆子里去！”

“荒唐！老城咖啡馆^[84]和任何一家大众酒馆一样，谁都进得！”

“可不是你去的地方！你不能进去。因为你狠狠地打过胖爱玛！”

“那是她自找的，这只猪！”

“她是个臭娘儿们，可是咖啡馆的看门人是她老子，所以他把你轰出来了。”

“他真是个拉瓦荷尔，您瞧瞧，他怎样一把抓住我……”

两个女人走进一所过道房子，不见了。

“您听见了她用的那个词了吗？”卡夫卡问我。

“您是指拉瓦荷尔？”

“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当然！拉瓦荷尔是布拉格的粗话。意思是爱动武的人，好斗的家伙，粗人。”

“对，”卡夫卡点点头，“这个词指的是这个意思，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可它原本是法国人的一个姓，音译成捷克文后，逐渐变成了表示某种性质的捷文名词。”

“就像所罗门和希罗德^[85]？”

“对，差不多，”卡夫卡说，“拉瓦荷尔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原

名是弗兰茨·奥古斯丁·柯尼希斯泰恩。他不喜欢这个德国名字。于是他采用母亲的名字，按法文读成拉瓦舒尔。但布拉格普通的报纸读者却按拼音读成拉瓦荷尔。很长一段时间，报纸经常登载有关他的文章。”

“这是什么时候？”

“1891年和1894年之间。当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的捷克文家庭教师每天领着我穿过老城环形道，沿泰因街经过肉市去学校。放学时，她通常又在校门口等我，但有时她来晚了，或者提前放学，这时我总是非常高兴，我就加入我们班那些调皮鬼的队伍，跟着他们向不会碰见家庭女教师的相反的方向跑进羊市胡同，到了那里通常总要打斗一通。”

“您总是不参加的吧？”我不由自主地用坚信的语气爆出了这么一句，因为我无法想象卡夫卡博士当学生时能和其他人一起打群架。

可是卡夫卡博士笑了，头往后一扬说：“您问我是否参加了这些群架？虽然我没有打架的经验，心底里也害怕，但我总是挤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向我的同学表明，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而且我也不想站在一旁，被人看成是个软弱的犹太男孩。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能使他们信服，我通常都是挨揍。结果，我总是哭肿了眼，满身泥污地回家，衣服掉了扣，领子被撕得粉碎。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

卡夫卡博士在舒伯特楼巴洛克式门口旁的小环形道上停下脚步，点了一下头，示意我看对面那排房子中显得突出的中世纪式米努塔楼，这幢楼紧靠着把老城环形道和小环形道分开的市政厅。“我父母住在楼上，但他们只是晚上才在家里，白天他们在店里。他们把家务交给了厨娘和我的家庭女教师。每当我打完架，又脏又破，哭着回家时，她们总是很激动不安。女教师来回绞着手，哭着威胁说，她要把我的过错报告我的父母，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相反，她和厨娘一起尽快地消除掉我身上打架留下的痕迹。这时，厨娘嘟嘟哝哝地说了几次这样一句话：‘你是拉瓦荷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她却只是说：‘你就是这种人，你是真正的拉瓦荷尔！’这样，她就把我归入了我自己也不清楚的某一类人中了。她使我成了某个神奇秘密的组成部分，这秘密让我感到害怕。我是拉瓦荷尔！这个字眼像可怕的符咒那样震慑住了我，

使我紧张得无法忍受。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一天晚上趁父母在起居室里打牌的机会，我问他们什么是拉瓦荷尔。父亲连头也没有抬，继续

看着牌说：‘拉瓦荷尔是罪犯，杀人凶手。’我当时肯定非常吃惊，很难看，因为母亲很担心地问我：‘你从哪儿听来的？’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厨娘认出了我是个罪犯，这种意识使我舌头发硬，说不出话来。母亲探询似地看着我的脸。她把牌放到桌子上，准备审问我，可是父亲还想继续打牌，就粗声粗气地说：‘还能从哪儿听来？不是在学校里就是在街上呗！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这些家伙。’我母亲接着说：‘可不，对这帮歹徒谈论得太凶了。’这时，父亲啪的一声打出一张牌，和啦。趁这当儿，我愕然地溜出了房间。第二天早上我发起烧来。请来的医生诊断为喉炎，他给我开了药。女教师拿着药方去药店买药时，厨娘坐到了我床上。她是个又高又胖的好心肠女人，我们都叫她安娜太太。她抚摩着我放在被子上的手说：‘别害怕，就会好的。’我却把手抽回，放进被子，问她：‘为什么我是罪犯？’厨娘瞪圆了眼睛，说：‘罪犯？谁说的？’‘您！就是您说的！’我？’安娜太太把拳头放在隆起的胸前，生气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可我说：‘这一点不假，您把我叫做拉瓦荷尔。这是罪犯，我父亲这么说的。’听了这话，安娜太太在头上把双手合在一起，哈哈笑着解释：‘哈，拉瓦荷尔，这我说过。可是我这么说一点恶意也没有。拉瓦荷尔——大家都这么说说而已。我当时一点也不想侮辱你。’她抚摩我的脸颊，安慰我。我却扭过头，冲着墙。不一会儿，女教师买了药回来了。我们再也没有提过拉瓦荷尔这个名字，但它却像一根刺那样留在我身上，或者说像一根断了的钉子尖在我身上移动。喉炎好了，但我依然是遭了内伤的病人，是个拉瓦荷尔。从外表上看，什么也没有变。家里人还像从前那样对待我，但是我知道，我是个被开除的人，是罪犯，简言之，是个拉瓦荷尔。这改变了我的整个态度。我不再参加男孩子的打架斗殴，我每次都乖乖地跟着女教师回家。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原来是个拉瓦荷尔。”

“这可真叫荒唐！”我脱口而出，“时间肯定把这些东西冲得一干二净。”

“完全相反！”卡夫卡苦笑着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种毫无根据的负罪感更牢固地黏附在我的灵魂里，正因为它没有真实的理由，所以不管悔恨也好，还是弥补也好，都无法消除这种负罪感，因此，即便我后来似乎早就忘了厨娘那件事，也听说了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我依然还是拉瓦荷尔。”

“您研究了拉瓦荷尔的一生？”

“是的！而且不仅仅研究了他的一生，还研究了其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生平。我深入探究了葛德文[86]、蒲鲁东、斯蒂纳[87]巴库宁、克鲁泡特金、塔克尔[88]和托尔斯泰的生活和观点，参加了许多不同的社团和集会，为此事花了不少钱和时间。1910年，我参加了捷克无政府主义者在卡罗琳娜塔尔的‘大炮十字架’餐馆[89]举行的集会，在这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俱乐部伪装成曼陀林俱乐部。马克斯·勃罗德陪我去参加了几次这些聚会，其实他对会议并无兴趣。他把它们看作青年人的某种政治上的迷惘。对我来说，这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在追寻拉瓦荷尔的行踪。这些活动使我后来与埃里希·米萨姆[90]、阿图尔·霍里彻尔[91]以及维也纳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格罗斯曼发生了关系，后者自称皮埃尔·拉莫，出版《共同富裕》杂志。他们都企图不借助上帝的仁慈实现人间幸福。我理解他们。然而……”卡夫卡抬起双臂，又像折断的翅膀那样无可奈何地垂下，“我不能再和他们并肩前进了。我依然和马克斯·勃罗德、弗利克斯·韦尔奇和奥斯卡·鲍姆[92]在一起。他们离我更近。”

他站住了。我们已经到了他住的房子前。他沉思着对我笑了一二秒钟，然后轻轻地说：“和我一样，所有犹太人都是被开除出社会的拉瓦荷尔。我现在依然感觉到在我回家的路上，那些恶少加之于我的拳打脚踢，但是我不再去斗殴了。我已经没有年轻人的力量。保护我的家庭女教师呢？这我也没有了。”

他跟我握手。“已经很晚了。晚安。”

我给卡夫卡带去新的一期《火炬》杂志（由卡尔·克劳斯在维也纳出版）。

“他把新闻记者批得妙极了，”他一边翻，一边说，“只有狡猾的偷猎人才能是这样一个严厉的护林人。”

“卡尔·克劳斯揭露维也纳国家剧院的戏剧顾问格奥尔格·库尔卡是剽窃者[93]。您对此怎么看？”

“这有什么。这只是大脑皮层里的小错误，如此而已。”

我们谈论阿尔弗雷德·波尔加[94]经常发表在《布拉格日报》上的优美隽永的小文章。

卡夫卡说：“阿尔弗雷德·波尔加写得那样轻松自然，我们读他的文

章仿佛觉得他在和我们亲切交谈，不知不觉地受了影响和教育。轻松淡雅的形式包含着一个坚定无畏的意志。波尔加是市侩王国里一个小小的、然而却是很有才干的马加贝厄[95]。”

弗兰茨·卡夫卡还给我弗朗斯·亚默诗集[96]时说：“他非常质朴、幸福、强大。对他来说，生活不是发生在黑夜的事件。他根本不知道何为黑暗。他和他的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强有力的的大手的保护之中。他就像孩子称呼家里人那样，用‘你’称呼可爱的上帝。因此他永远年轻。”

吕迪亚·霍尔茨纳尔送我一本阿尔弗雷德·德布林[97]描写中国的小说《王伦三跳》。我把书给卡夫卡看，他说：“这是当前德国小说家中的新星。他的作品，除了这第一本书以外，我只读过几篇短篇小说和一本奇特的爱情小说《黑色帘幕》。德布林给我的印象是，他仿佛要把看得见的世界理解为非常不完全的东西，他不得不用他创造性的笔加以补充。这只是我的印象。您好好阅读的话，也会得到这种看法的。”

弗兰茨·卡夫卡既然这么说了，我就找了书，读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小说《黑色帘幕——关于言论和偶然事件的小说》。

我和卡夫卡谈起这本书，他说：“我不懂这本书。几件我们不知道其因果关系的事件发生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偶然，但是，没有原因就没有世界，所以说，偶然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世界中，而只在这里……”卡夫卡用左手碰了碰前额，“偶然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有限的感觉中。它们是我们认识的局限性的反映。反对偶然的斗争始终是一场反对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可能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但是这本书里丝毫没有这种内容。”

“那么说，您对德布林感到失望？”

“我只是对自己失望。我期待得到的东西也许是他不愿给的。我的固执的期待使我迷惘朦胧，以致我在阅读时整段整页地跳过去，最后整本书都跳了过去，所以对这本书我说不出什么。我是个很坏的读者。”

弗兰茨·卡夫卡看见我有一本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谋杀黄花植物》[98]时说：“把肉食文化方面的一个日常概念和娇美的花名联系在一起，听起来真奇怪。”

《布拉格新闻》的星期日版连载了弗兰茨·布莱[99]的文章《文学大

动物园》。作者把许多作家和诗人写成鱼、鸟、鼯鼠、兔子等等。关于卡夫卡，他说他是一只以苦根为食物的特别的鸟。

我询问卡夫卡对弗兰茨·布莱的看法。

“他是马克斯·勃罗德多年的好朋友，”他笑着说，“布莱很聪明，很诙谐。我们和他在一起时总是很快乐。世界文学穿着衬裤从我们桌旁列队经过。布莱比他写的还要聪明伟大。这也很自然，因为这只是信手写下的消遣性东西。从脑袋到笔的路比从脑袋到舌头的路长得多、难得多。在诉诸文字时，有些东西就失去了。弗兰茨·布莱是迷了路来到德国的东方轶事作家。”

卡夫卡看见我有一本约翰内斯·R·贝歇尔的诗集时说：“我不懂这些诗。诗里充斥了喧闹，挤满了词句，使人无法摆脱自己。诗句没有成为桥梁，而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人们不断撞到形式上，根本无法突进内容。语句在这里并没有凝聚成语言。那是叫喊，如此而已。”

卡夫卡博士让我看放在他桌子上的两张传单。一张由“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士兵全国委员会”拟写，致全民族的；另一张署名为“捷克社会民主党左翼”，号召“工人阶级举行大规模的五月游行”。

卡夫卡博士问我：“您对此怎么看？”

我很窘地沉默不语，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两张传单。

卡夫卡知道我不说话的原因，就不等我回答，自己解释道：“这两张出自两个政治上对立的阵营的传单有共同的地方。它们的接收对象都是不现实的。民族和工人阶级都是抽象的概括，教条概念，模糊的现象，只有通过语言行为才能把握。这两个概念只是作为语言新词汇才是真实的。它们的生命存在于说话中，存在于人的内部世界，而不在人的外部世界。真实的只能是具体的、真实的人，是上帝置于我们面前挡住去路、我们直接受其影响的人。”

我接过话茬儿：“如同司炉被置于年轻的卡尔·罗斯曼面前，挡住他去路一样^[100]。”

“是这样，”卡夫卡点点头，“如同每一个具体的人那样，这是外界的使者。抽象的东西只是自己的热情的歪曲图像，是从内部世界的地牢里

出来的鬼怪。”

我得到了切斯特顿^[101]的两本书《正教》和《名叫星期四的人》。卡夫卡说：“他写得那么诙谐有趣，我们几乎要相信，他找到了天主。”

“那么说，对您来说，笑是虔敬的一个标志？”

“不是永远如此，可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时代，我们必须快乐。这是义务。船上乐队在下沉的‘泰坦尼克’^[102]号上一直演奏到沉没。人们以此挖掉绝望的根基。”

“可是痉挛性快乐比公开承认的悲伤还要可悲得多。”

“这话很对，但是悲伤是绝望的，而这里的问题是前景，希望，前进。危险只在于短暂的有限的片刻。过了这一时刻就是深渊。克服了深渊，一切就都不同了。关键就在这一片刻，它决定一生。”

我们谈论波德莱尔^[103]。

“创作是疾病，”弗兰茨·卡夫卡说，“但是退掉热度，人还不能康复。相反！烈火能净化灵魂，照亮道路。”

我借给卡夫卡博士马克西姆·高尔基所著《回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捷文译本。

“高尔基刻画了一个人的性格，而没有发表他的评价，这真令人感动。我很想读一读他写列宁的书。”

“高尔基已经发表了列宁回忆录？”

“不，还没有，但我想，他肯定会发表的。列宁和高尔基是朋友。对于任何事物，高尔基都只通过他的笔观察，感受。这一点，从这些写托尔斯泰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来。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他的器官。”

我引了格鲁塞曼论《群魔》作者的一本书^[104]中的一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流血的童话。”卡夫卡听后说：“没有不流血的童话。每个童话都来自血液和恐惧的深处。这是所有童话共同的地方。表面是不同的。北方童话不像非洲黑人童话那样有许多想象中的动物，但是核心、渴求的深度是相同的。”

后来，他推荐我阅读弗罗贝尼乌斯编选的非洲民间故事和童话集[105]。

海因利希·海涅。

卡夫卡：“一个不幸的人。德国人过去和现在都责备他有犹太味，其实他是德国人，而且是个与犹太人传统和作风有矛盾的小小的德国人。这正是他身上典型的犹太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我父亲订了许多德文和捷克文报纸和杂志。其中有一份《维也纳皇冠报》，这是一份廉价趣味小报，第一版上常登载一些生动有趣的钢笔画，使我非常着迷。

这里可以看到大公爵，着火的饭馆，皇帝阅兵式，刚刚投入使用的策佩林[106]飞艇的空袭，从马上摔下的哥萨克，苏格兰风笛演奏者，谋杀和破门入室镜头，裤子烫得笔挺、小胡子上翘、冲入着火的房子的救险者，手执手枪和佩带军刀的警察，获奖的狗和马，戴着像水果盘子一样的帽子、插着羽毛的女士，还有许多其他耸人听闻的画面，所有这些画揭开了隐蔽的时代面目。

我把皇冠报上我感兴趣的第一版收集起来，到1918年夏天请人装订成一本，加上彩色大理石花纹封面。我很自豪地把这本书放在书架上。3年以后，我们在谈论一个现代作家时——名字我已记不得了——卡夫卡博士顺便发表了如下看法：一个作家的色彩音调总“取决于他青年时代的祭坛画”。这时我笑起来说：“我的祭坛画是皇冠报提供给我的。”

下一次见面时，我把装订好的第一版带给卡夫卡博士看。卡夫卡很感兴趣地翻看着，眯起眼睛观看女士们头上的水果盘和花盘，翻到俄国革命镜头时多看了一会儿，而看到一个维也纳妓女在床上被肢解了的尸体时，他摇了摇头，非常震惊地说：“呸，多么不堪入目！”

我说：“这是图画大拼盘——五花八门又充满矛盾，就像生活本身一样。”

然而卡夫卡却摇摇头回答：“不对，这不对。这些画与其说是揭露，毋宁说是掩盖。它们不是通向一切矛盾互相取得协调一致的深处。这里，对某一件事的描绘只是赚钱的手段。在这层意义上，皇冠报的画比过去集市上拉洋片的粗俗的木刻画还露骨，还卑劣。那些木刻画还给人

某种想象的刺激，人们借助这种想象可以超脱自己。这些报纸则不这样做。它们折断了想象力的翅膀。这是很自然的。图画技术越完善，我们的眼睛就越弱。仪器麻痹了器官，光学、声学、交通，无不如此。由于战争，美国来到了欧洲。大陆互相交错到了一起。一点火星在瞬息之间就把人的声音传遍了地球。我们不再生活在狭窄有限的空间，而是生活在一颗小小的、无望的星球上，被亿万个大大小小的世界所包围。宇宙像喉咙那样张开。在它的喉管里，我们一天一天地失去我们个人的行动自由。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们连走出自己的院子也一定得有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行了。世界变成了隔离区。”

我小心地说：“这是不是有些夸张？”

卡夫卡摇摇头：“不，一点不夸张。这一点我已经在这里的劳工工伤保险公司里看到了。世界向我们敞开，但我们却被赶进了纸张堆成的狭窄深谷中。保险的只有我们目前坐着的椅子。我们按照尺子的直线生活，虽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迷宫。办公桌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107]可是我们不是古典英雄，因此，尽管受苦，我们只是悲喜剧人物。”

在谈论莱昂哈德·弗兰克的《人性本善》[108]一书时，弗兰茨·卡夫卡说：“大多数人本不坏。人们说话行动，而不去设想自己的言行的后果，这样他们就变坏了，变得有罪了。他们是梦游者，不是坏蛋。”

卡夫卡情绪很好。

“您容光焕发。”我说。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只是借来的光。亲切的话语的余晖。一个好朋友，路德维希·哈尔特[109]到了布拉格。”

“就是那位将在产品交易所朗诵的朗诵家？”

“是，就是这位路德维希·哈尔特。您认识他？”

“不，我不认识他。我只是在报纸的广告里看见过。再说，我对这种朗诵不感兴趣。”

“路德维希·哈尔特一定会使您感兴趣的。他不是个傲慢杂耍家。路德维希·哈尔特是语言的仆人。他唤醒了沉没在旧习的灰尘下的文学作品，赋予它生命。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您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是在10年前由马克斯介绍认识他的。第一次见面，我就听了他一个晚上。他具有很大的魅力。那么自如、洒脱、有力。他是北方什么地方的人，典型的犹太人，但他一点没有陌生人的味道。我第一次见到他就仿佛他是个老朋友似的。他简直是个魔术师。”

“为什么说是个魔术师？”

“这我也不知道。他能唤起一种强烈的自由的感觉，因此他是个魔术师。我们一起去听他的朗诵，我负责搞票。”

在哈尔特朗诵前，我们在产品交易所大楼的阶梯上遇见了诗人鲁道夫·福克斯^[110]。我们和他一起站在前面入口附近。卡夫卡专注地听艺术家朗诵，但他脸上显出忧郁不乐的神情。我发现，他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到节目上。

休息时，鲁道夫·福克斯离开了一会儿，我趁机问道：“您是不是觉得不好受，博士先生？”

卡夫卡蹙起眉毛：“我难道和别人不一样？我身上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

“那倒不。只是您有些异样。”

卡夫卡抿紧了嘴唇笑了笑。“用身体不适作托辞其实很容易。可惜这种情况并不存在。我身上只感到一种极度的疲乏和空虚，一旦我被什么东西吸引陶醉，我就产生这种疲乏空虚。也许我没有想象力。一切事物都飘然离去，只留下灰色的、毫无慰藉的牢笼。”

我不理解他的话的全部意义，但是鲁道夫·福克斯回来了，使我无法提问。朗诵结束后，我就向卡夫卡告辞，他和福克斯·韦尔奇、勃罗德夫人以及其他一起等着哈尔特。

第二天我到办公室看弗兰茨·卡夫卡。他相当沉默寡言，根本不谈在产品交易所的朗诵晚会。后来，我说起我读过鲁道夫·福克斯的诗集《商队》和奥托卡·布莱齐那颂歌的译本时，他才活跃了一点，并说：“鲁道夫·福克斯是个非常恭顺的读者，他不仅把每一本好书，而且把诗人的每一句真诚的话都高高地置于自己谦恭的心灵之上。所以他是个优秀的翻

译家、不轻易落笔的作者。他的《商队》介绍了外国作品的财富。他是语言的仆人。”

至于路德维希·哈尔特，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

我父亲送我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作为生日礼物。

弗兰茨·卡夫卡告诉我，特拉克尔为了逃避可怕的战争，服毒自杀了[111]。

“这是以死开小差。”我说。

“他的想象力太强了，”卡夫卡说，“因此他不能忍受主要由于极度缺少想象而产生的战争。”

我病了10天，卧床在家，没有去上学。我父亲给我带来卡夫卡博士的衷心问候和一本岛屿出版社出版的彩色封面书籍：阿图尔·叔本华的《论写作和风格》。

我痊愈后过了几天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看望卡夫卡博士。他情绪非常好。我对他说，我生了这场病后好像比以前强壮了，这时他脸上露出一丝迷人的微笑。

“这是很自然的事，”他说，“您在与死神的一次遭遇战中获胜了，这使人强壮。”

“人的一生只是通向死亡的道路。”我说。

弗兰茨·卡夫卡严肃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垂下眼，看着桌面，说：“对健康的人来说，生就是对人必有一死这种意识的无意识的、没有明言的逃遁。疾病总是警告，同时又是较量，因此，疾病、痛苦、病痛也是虔诚的极重要的源泉。”

“这话怎么讲？”我问。

卡夫卡微笑着说：“犹太人的虔诚。我受我的家庭、我的民族的影响，他们的生命比个人的长，但这也不过是约束死亡的企图而已。这只是一种愿望，但是人们并不能因此而获得认识。相反，非常自私的小我通过这个愿望把自己置于寻求真理的自我之上。”

“您在读什么？”卡夫卡问。

“《塔什干——面包丰富的城市》^[112]作者是……”

他没有让我说完，“这本书妙极了。我不久前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读了这本书。”

“我看，这本书与其说是艺术品，倒不如说是文献。”我说。

“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都是文献和见证。”卡夫卡严肃地说，“一个民族有书里所描写的那样的男孩子太好了，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这也许并不取决于单个的人。”

“相反！材料的性质是由原子中的电子数决定的。群体的水平取决于每个个体的意识。”

我走进卡夫卡博士办公室时，他正在清理办公桌。桌子的右边放着高高的一堆书籍、杂志和公文，桌子边放一把为来访客人预备的椅子。卡夫卡博士隔着书堆向我示意：“我从我的纸牢里向您致意。”

“我是不是打搅您了？”

“哪里！一点不碍事，请坐。”

我在为客人预备的椅子上坐下，说：“这真是公文之林了，您完全被它埋住，看不见了。”

我听见卡夫卡博士哈哈笑了一声，然后说：“那就一切都妥帖了。写下来的东西照亮了世界，而让写作者消失在黑暗中。好，不说它了！”

他拉出中间的抽屉，打开两边的小抽屉，把书籍杂志等塞到抽屉里。

我想帮他整理。当我给他递过去一个公文夹时，他却摇摇头：“您不用管了。要是您帮忙，我们会非常偶然地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那将是个不幸。那样我就会突然陷入困境。我会因此失去对每一个职员的良好都很重要的借口：妨碍我完成交给我的工作的不是我缺少办公意识，而是我的办公桌凌乱无比。如果那样，就是一个可怕的发现，我一定得避免这种发现。因此我一定要小心地保持我办公桌的凌乱。”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把中间的抽屉砰的一声推进桌子，用低沉夸张的阴谋家的语调说：“我抱怨办公室和我周围的环境杂乱无章，这只是我企图掩盖我的生活无所寄托、逃避周围的人那惩戒而好奇的目光的妙计。实际上，只有杂乱无章，我才能生活，唯其凌乱无比，我才窃得最后一点点个人自由。”

我陪卡夫卡离开办公室回家。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的秋日。卡夫卡在阶梯上对我说，遇上这种天气，他在街上大概说不了话。

“没有关系，”我答道，“我们会互相理解的。”

但是，我们刚跨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大门，卡夫卡就突然弯下身子，猛烈地摇晃起来，画了一个大大的罗马十字，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卡夫卡看着我惊讶的脸色大笑起来，走回大楼对我说：“我刚才说了句捷克文Sakramenská velká zima！[113]弯腰表示震慑我的巨力，颤抖是表示寒冷的古老方式，而十字就是圣礼。”

出于某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原因，我不喜欢卡夫卡的这种开朗情绪，于是就说：“画十字不等于圣礼。”

他把手放到我的肩上：“只要心诚，不仅每个符号，就连每个最细小的动作都是神圣的。”

1919年我曾和在布鲁克斯附近的上格奥根塔尔当铁路职工的哥哥汉斯漫游了厄尔茨山区[114]我向卡夫卡讲述了山区里花边织工和玩具工匠的贫困生活。我在讲述结束时说：“贸易和工业，卫生和食品供应，所有这一切都糟透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毁的世界里。”

卡夫卡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把下唇向里抿紧，用牙齿按摩了一会下唇，然后很确定地说：“这话不对。倘若一切都已毁坏，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但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把我们引到这里的道路已经消失。因此，迄今为止的一切前景也都破灭了。我们只能毫无希望地滑下去。您向窗外瞥一眼就看到世界。人们往哪里跑？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无法认清事情的意义关联。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评价不能正确地交错吻合。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一切都像破帆

船的索具那样嘎吱作响。您和哥哥看到的贫穷只是某种深重得多的苦难的表面现象。”

卡夫卡博士直视我的眼睛，仿佛担心地问我：“您懂我的话吗？我不是把您搞乱了？”于是我赶紧提了一个问题：“您指的是社会的不公正？”

但卡夫卡绷紧了脸，叫人捉摸不透。他说：“我指的是公正的衰落。我们大家都参与其中。我们感觉到它。许多人甚至知道它，但谁也不愿承认我们生活在不公之中，因此我们发明遁词。我们谈论社会的、心灵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种种不公，为的是美化那唯一的罪责，我们自己的罪责。不公这个词是什么含思？‘不公’是‘我们的公正’这几个字的连写[115]。只对我一个人适用的公正是暴力准则，是不公。社会不公这个名称只是无数掩盖真相的手段之一。”

我摇摇头：“博士先生，我不能同意您的话。我看见了厄尔茨山区的苦难。那些工厂……”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工厂只是增加利润的机构。这里我们只起次要作用。最重要的是金钱和机器，人只是增加资本的老式工具，是历史的残余物，人在科学上极有限的能力很快就会被能思想的机器人所取代。”

我轻蔑地叹了口气说：“唉，这是H.G.威尔斯[116]所喜爱的幻想。”

卡夫卡用坚定的声音说：“不，这不是空想，而是现在就在我们面前露出苗头的未来。”

卡夫卡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定信徒。

我们第一次谈论这个题目是在我1920年春天到农村短暂逗留后回到布拉格的时候。当时，我到卡夫卡的办公室看望他。他情绪很好，很健谈，而且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我的突然来访确实很高兴。

“我认为您在遥远的远方，而实际上您就在跟前。您不喜欢赫鲁默茨[117]？”

“喜欢，不过……”

“不过这里更美，是吧？”卡夫卡脸带笑容说。

“这您知道，家总归是家。这到底不一样。”

“在家里总是不一样的，”弗兰茨·卡夫卡目光蒙眬地说，“倘若人们自觉地生活，清醒地意识到他为其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老家总是不断地具有新意。究其根本，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是生活的真谛。”

“没有自由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我说。

弗兰茨·卡夫卡看着我，仿佛要说“慢着，慢着”。他苦笑了一下说：“这话似乎很有说服力，以致我们几乎相信它，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要难得多。自由是生。不自由总是致命的，但是死也与生一样真实。严重的是我们听凭生和死两者的摆布。”

“因此您把一个民族的依附关系看作死亡的征象。1913年的捷克人不像1920年的捷克人那样有生气，因而也就更坏。”

“我可不这样说，”卡夫卡反对我的看法，“我们不能将1913年的捷克人与1920年的捷克人这样截然分开。现在的捷克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他们可能会好得多。”

“您这话我不太懂。”

“我无法对您讲得更清楚了，也许我在这件事上对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我是犹太人。”

“为什么，这与犹太人有什么关系？”

“我们刚才谈论1913年和1920年的捷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历史题目，而谈到历史题目，我要这样说，一个现代的犹太人的缺点马上就显露出来。”

我也许露出了十分迷惑不解的神情，因为从卡夫卡的声音和身体姿势判断，此刻他关注的主要不是所谈的事情本身，而在于我是否理解。他身体前倾，轻声地然而非常清楚地说：“今天，犹太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历史，即时间上的英雄故乡。他们渴望得到一个空间上的小小的、通常的家。越来越多的犹太青年回到巴勒斯坦。这是回到自身，追寻自己的根，回到生长之地。故乡巴勒斯坦对犹太人来说是必要的目的地，而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人来说出发地。”

“类似机场那样的地方。”

弗兰茨·卡夫卡把头侧向左肩：“您以为能飞行吗？我仿佛看见了过于偏离基础、偏离自己的力源的飞行。我从未听说过，一只雏鹰只凭对遨游水中的鲤鱼的坚持不懈的观察就能学会真正的飞翔。”

和卡夫卡博士沿伏尔塔瓦河散步，走向民族剧院。从那里走到护城河，向左经过矿工街和艾森胡同回到老城环形道。在路上我们遇见了和我同窗几年的弗兰茨·P，他是个优秀生和“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匆匆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过去。然后，我向卡夫卡博士讲述了我们这帮调皮捣蛋的学生怎样不喜欢P，怎样找茬儿痛打他。

最后我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后来和P和解了，甚至站在他一边反对其他孩子。”

“结局如何？”卡夫卡很客观地问我。

“我看结局是好的，”我答道，“起先双方都打得鼻青脸肿，但时间不久，那些小子们就看到，他们不能随便打我们，拿我们开心，于是他们就停止了敌对行动。”

“这么看来，进攻力量与防御力量是势均力敌的。”卡夫卡博士说。

我点点头：“是这样，他们避开我们。”

卡夫卡博士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笑声，然后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迫使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许是我们能取得的最大胜利。因为我们不能期待彻底消灭恶势力。彻底消灭恶只能是荒唐的梦想，非但不能削弱恶，相反只能增强恶的力量，使它更快地发生作用，因为有了这种幻想，人们就会看不见恶的真实存在，把现实编织成自己的、充满迷惑人的愿望的想象。”

我们在卡夫卡家门口停住脚步。他仰起头，看着房屋的门面墙问我：“您知道到我住的地方要走多少级？”

“不知道。”

卡夫卡从我头上看着远处：“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数过。我不能这样做。假如我知道精确的级数，那么，我因为呼吸困难，也许每登一

级都会吓得往后倒退。”他笑了笑，“最好还是面对疾苦，面对自己，逐渐使疾苦明朗，显现出来。”

卡夫卡博士严肃地看着我的脸。过了一二分钟，他移开目光说：“摧毁恶的梦幻只是一种因失去信仰而产生的变成画面的绝望感。”

由马萨里克^[118]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于1920年4月宣布举行第一次议会和参议院选举后，各党派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竞选斗争，谁都不能不闻不问。竞选斗争也成了我们的话题，因为卡夫卡的多年好友马克斯·勃罗德作为捷克复国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件事轰动了一时，因为大家只知道勃罗德是批评家、小说家和文化学家，而不是实际政治家。因此，大家对他发表在复国报纸《自卫》上的文章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我父亲则认为，勃罗德的党几乎不可能获得一个选区所需要的票数。在一定意义上，卡夫卡博士也同意这个看法。他说：“勃罗德和他的政界朋友相信，复国党肯定能在东斯洛伐克城市艾帕杰斯获得必要的票数。”

“您也这样看吗，博士先生？”

“说心里话，我不这样看。勃罗德认为那里存在复国主义者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依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战后，在艾帕杰斯有过一个只存在几天的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政府，主要因为得不到当地犹太人的支持而垮台。马克斯从这里得出复国党有发展前景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像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艾帕杰斯的犹太人并没有民族意识，他们只有陈旧的宗族意识。他们只是内心是犹太人，而外表上，他们大多适应执政的合法政权。因此，艾帕杰斯犹太人不支持匆促拼凑起来的苏维埃政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的根源不在于犹太民族主义，而主要在于犹太人依附强者的需要。我曾力图让马克斯·勃罗德明白这一点。但他不理解我。他不懂得，在复国主义中表现出来的犹太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防御。所以，布拉格复国主义党报就叫《自卫》。犹太民族主义无非是严厉地由外部迫使在严寒的夜晚穿越沙漠的商队聚拢在一起。这支商队不想占领什么。它只想到达一个有坚固篱笆围绕的家园，在那里，商队的男男女女有自由生活、发展自己的可能。犹太人渴望有一个家园，这种渴望不是那种从根本上说，无论在内心还是在世界上都是没有家园的、因而愤怒地掠夺他人家园的进攻性民族主义，因为这种进攻性民族主义——还是从根本上看——没有能力使世界消除荒凉。”

“您指的是德国人？”

卡夫卡不做声了；他轻轻咳了几声，用手挡住嘴巴，疲乏地说：“我指的是一切掠夺成性的族类，他们摧毁和洗劫世界，他们并不能因此扩大他们的统治范围，而只是束缚了他们的人性。与此相比，复国运动只是回到自己的人类法则的艰辛摸索。”

我在贝格斯泰因的一幢很大的角楼里寻找犹太工人协会“工人复国协会”^[119]的会场。当我在幽暗的院子里碰见一群人，向他们打听时，我非但没有得到答复，反而挨了几记耳光，我只好立刻逃走。我叫来警察时，院子里自然连人影也没有了。警察恼火地问我：“您找这些犹太人干什么？您可不是犹太人吧。”

我摇摇头：“不是，我不是犹太人。”

“您看，”这位法律的卫士得意地说，“果然不错。您找这些贱坯子干什么？您应该庆幸只挨了几记耳光呢，现在回家吧。正经人不跟犹太人来往。”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几天以后，我向卡夫卡讲了这件事。

“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反犹主义也在增长，”他说，“犹太人的自省被看作对周围世界的否定。这样就产生了自卑感，人们很容易通过仇恨的发作使这种自卑感消失。当然，从长远看，这样做什么好处也没有。这是人每次犯错的根源，他选择的不是看起来很难达到的道德价值，而是显而易见的毫无价值的东西。”

“也许人只能这样做。”我说。

卡夫卡猛烈地摇摇头：“不。人可以不这样做。原罪就是他有这种自由的证明。”

在谈论东欧犹太人小说集^[120]时，弗兰茨·卡夫卡说：“佩雷斯·阿施和其他东方犹太人作家一向只写民间小说。这是正确的。犹太民族性不仅是信仰的事情，而首先是一个由信仰决定的群体的生活实践的事情。”

我从友人莱奥·雷德勒那里得到一本带有插图的米开朗基罗传记。我把书带给弗兰茨·卡夫卡看。他看了好一会儿画着摩西坐像的那幅画，然后说：“这不是领袖。这是个法官，严厉的法官。归根结底，人只能通过

严厉无情的判决才能领导。”

我汗淋淋的到游泳学校游泳。结果我得了轻度肺炎。

当我又能外出时，我到保险公司拜访卡夫卡博士。他向我问好以后，用责备的口吻说：“您怎么不克制一些。疾病是一个警告。您对自己要多多保重。健康不是可以任意支配的个人财产。它只是借来的财富，是一种恩惠。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没有健康经济学。”

“他们满身汗水往水里跳。”我笑着说。

卡夫卡点点头：“是这样，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这就引发了疾病的警告信号。责任通常在于人们自己。但他们看不到这一点。相反，责任在生活。于是他们跑去找医务律师^[121]，以便制止生活之恶。其实，疾病根本不是恶，而是警告信号，生活的助手。”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地面。

看到这情景，卡夫卡问我：“什么地方不中您的意？只管说出来。”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博士先生，正是您经常和疾病打交道，说起疾病来怎么这样客气，真叫人奇怪。”

“这一点不奇怪，”卡夫卡猛地做了个手势，大声说，“这很自然。我是个十分高傲的人，我不愿充分感受生存的重力。我是相当富有的父母的唯一儿子。我想，生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疾病一再地向我预示了我的柔弱，充分显示了生的奇迹。”

“这么说，疾病原是一种恩惠。”

“是的，它给我们提供了经受考验的可能性。”

当他向我讲述德国和法国之行时，谈到了马克斯·勃罗德：“这几次旅行加深了我们的友谊。这是很自然的事。到了陌生的环境，我们更加看清了我们有许多相通相近的地方。我想，这就是关于犹太人的犹太机智的根。因为我们一起旅行，所以对各自的对方，比别人看得更清楚。”

在码头上散步。

我问Diaspora这个字的意义。卡夫卡说，这是希腊文，意为犹太人

散居各地，希伯来文为Galut。

他说：“犹太人像种子那样分散到了各地。就像种子吸收周围的养料，储存起来，促进自己的生长那样，犹太民族命中注定的任务是吸收人类的各种各样力量，加以净化，加以提高。摩西始终是现实的。就像阿比拉姆和达旦高喊‘我们不上去！’反抗摩西那样，现在的世界用反犹聒噪抵制他们。为了不致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人们冲进了种族的动物学的黑暗深渊。他们打犹太人，也就是杀‘人’。”

“犹太人和德国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谈到卡勒尔·克拉玛尔博士[\[122\]](#)时卡夫卡说，“他们都有进取心，能干，勤劳，都遭受其他民族的憎恨。犹太人和德国人都是被放逐的人。”

“也许正是由于他们有那些品质，他们才遭人憎恨。”我说。

但卡夫卡摇摇头：“哪里！这里的原因要深刻得多。归根结底是宗教原因。这在犹太人那里很清楚。至于德国人，人们还看得不甚清楚，因为他们的庙宇还没有被摧毁。但这种事将来会发生的。”

“为什么？”我对他的话感到惊讶，“德国人可不是神权统治的人民。他们在自己的庙宇里并没有本民族的上帝。”

“人们普遍这么看，可实际情况并不这样，”卡夫卡说，“德国人有上帝，这上帝能让钢铁生长。他们的庙宇是普鲁士总参谋部。”

我们都大笑起来，弗兰茨·卡夫卡却坚持说，他这么说是非常严肃的，只是因为我笑了他才笑的，他是受了感染才笑的。

我从劳工工伤保险公司陪卡夫卡博士回家。我们这次不走策尔特纳胡同，而是越过护城河。然后，我们谈论一位擅长写作幻想小说和故事的、成绩卓著的奥地利作家新近推出的一部中篇小说集。

“他具有非凡的虚构才能。”我钦佩地说。

卡夫卡却只抿了抿嘴唇说：“虚构比发现容易。把极其丰富多彩的现实表现出来恐怕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种种样样的日常面孔像神秘的蝗群在人们身边掠过。”

我们现在站在布鲁克尔胡同和果子巷交接的街角，他沉思地看了一会儿文策尔广场那边熙熙攘攘的人群。然后他说：“您看，什么人不在那里相遇？每一张脸都是一个碉堡。而另一方面，消失得最快的又莫过于人脸。”

我笑了笑说：“跳蚤和苍蝇很难得到。”

“是的，走吧。”卡夫卡点点头，转过身，沿着布鲁克尔胡同大步走下去。

我们到少年广场看方济各会的“雪中圣马利亚”教堂。这个教堂的礼拜堂是布拉格最高的礼拜堂。使卡夫卡感兴趣的是名字。幸好我能给他解释这个教堂名称的出典，我以前曾在这里听过几次古老的捷克教会音

乐演奏会，有机会了解了教堂的许多情况。

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公元4世纪时，罗马有一个很虔诚的富豪做了一个梦，圣母在梦里托付他，在第二天有雪的地方为她建造一个教堂。当时是公元352年盛夏，天气炎热无比，您想怎么会下雪？这真是个荒唐的梦，可后来果然应验了，第二天早上，罗马的埃斯科利努斯山白雪皑皑。那位罗马人——我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就在这座山上建了第一座“雪中圣马利亚”教堂。

布拉格方济各会“雪中圣马利亚”教堂主祭坛上的画，画的就是导致在罗马建立教堂的托梦故事。

我一边让卡夫卡博士看画，一边说：“教堂的名字源于这个传奇故事。”卡夫卡博士说：“我原先不知道这一点。我只知道后来的编年史家的记载。按照他们的记述，这个教堂在15世纪是激进的胡斯派^[123]的重要中心。”

我们继续往前走。卡夫卡的脸上闪出一丝笑意，但片刻之间笑意消失，嘴角只留下一道严峻的皱纹。他说：“奇迹与暴力只是无信仰的两极。人们消极地期待出现指路福音，为此耗尽了精力，而福音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恰恰由于期待太高，我们把福音拒之于门外；或者人们急不可耐地抛弃一切期待，在罪恶的杀戮中度过他的一生。两者都是错误的。”

我问：“怎样做是对的？”

“这才是对的，”卡夫卡不假思索地说，一边指了指门口附近跪在一个小祭坛前面的一位老年妇女，“祈祷。”

他挽住我的胳膊，轻轻地把我拉出教堂门外。当我们来到前院时，他说：“祈祷、艺术、科学研究工作，这是从同一个火源升起的三朵不同的火焰。人们要超越此时此刻存在的表示个人意志的各种可能，越过自己的小我的界线。祈祷和艺术只是伸向黑暗的手。人们为了馈赠自己而乞讨。”

“那么科学呢？”

“和祈祷一样，科学也是一只乞求之手。人们扑向消逝与形成之间黑

暗的弧光中，以便把存在纳入小我的摇篮。科学、艺术和祈祷都这样做。因此，沉浸于自身并不是沉落到无意识之中，而是把模糊地预感到的东西提升到明亮的意识表层。”

卡夫卡博士、我父亲和我三人站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窗边。街上，某团体的成员穿着艳丽的民间服装，擎着旗帜，吹吹打打地向前行进。

我说这些人干吗还总是穿上这些封建农奴的老服装？这些东西不早过时了吗？”

“您看，它不还活着吗？”我父亲说，“这是很古老的民间传统。”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是偶像崇拜。”

“您是指民族主义？”我问。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这也是宗教代用品。这里行进的每个人都扛着一个偶像。从外面看，这偶像非常小巧轻便，是人们晚上坐在桌边舒舒服服喝啤酒时，用惧怕和出风头的欲望拼装起来的。尽管如此，我们大家都要吃这些稻草人的苦头，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些用啤酒、口水和报纸做成的肮脏小怪物更馋嘴的了。”

弗兰茨·卡夫卡给我讲了布拉格犹太诗人奥斯卡·鲍姆的一件事。奥斯卡·鲍姆小时候在德语国民学校上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德意志族学生和捷克族学生通常总要打架。一次打群架时，有人用木枪狠狠打在奥斯卡·鲍姆的眼睛上，结果，他的视网膜脱落，失去了视力。

“犹太人奥斯卡·鲍姆是作为德国人失去视力的，”弗兰茨·卡夫卡说，“其实他从来不是德国人，别人也从未承认他是德国人。也许奥斯卡只是所谓的布拉格德国犹太人的可悲象征。”

我们谈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关系。我说，把捷克史译成德文出版会有利于两个民族之间更好的了解。

卡夫卡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否定我的看法。他说：“这没有用。谁会读这类东西？只有捷克人和犹太人。德意志人肯定不读，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理解，不愿阅读。他们只想占有，只想统治，而理解通常只能是占有和统治的一种障碍。不认识他人，就能更好地压迫他

人。这时没有良心的谴责。正因如此，没有人了解犹太人的历史。”

我反驳他的话：“这不对。小学一、二年级就教圣经历史，这是犹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卡夫卡苦笑道：“是这么回事！犹太人的历史蒙上了童话色彩，人一旦长大，就把它和童年一起抛进遗忘的角落。”

我和朋友莱奥·雷德勒一起在共和国广场上，当我看见弗兰茨·卡夫卡突然向我走来时，我就向我的朋友告辞。

“我从特施诺夫就跟在你们后面，”他寒暄了几句后这样说，“你们谈得非常入神。”

“莱奥向我解释了泰勒主义和工业中的劳动分工。”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博士先生，您是不是想到了人被奴役？”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样严重的恶行只能产生被恶所奴役的结果。这是很自然的事。一切造物中最崇高的、最少触及的部分——时间——被压进了肮脏的商务利益的网里。这样，不仅仅是创造，而首先是创造的组成部分的人被玷污，被侮辱。这样一种泰勒化的生活是可怕的诅咒，其结果只能是以饥饿和贫困取代希望得到的财富和利润。这是迈向……”

“迈向世界毁灭。”我接着他说。弗兰茨·卡夫卡摇摇头。

“要是能很肯定地这样说倒也好了。可实际上没有一点东西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我们只能呼喊、磕巴、喘息。生活的流水线把一个人载向某个地方，人们不知道被载向何方。人与其说是生物，还不如说是事物、物件。”

卡夫卡突然停住脚步，伸出手：“您看！这里，这里！您看见了
吗？”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雅各布街，从一座房子里跑出一只一团毛似的小狗，越过我们前面的路，消失在寺庙街的街角。

“一只可爱的小狗。”我说。

“一只狗？”卡夫卡疑惑地问，慢慢迈开了脚步。

“是一只幼小的小狗。您没有看见？”

“我看见了。可那是狗吗？”

“是一只卷毛狗。”

“卷毛狗。可能是一只狗，但也可能只是一个信号。我们犹太人有时会可悲地弄错事情。”

“我们看见的只是一只狗。”我说。

“要是那样倒也好，”卡夫卡点点头，“可是这个‘只是’适用于需要它的人。对甲来说是垃圾或狗，对乙来说是信号。”

“短篇小说《父亲的忧虑》中的奥得拉迪克^[124]。”我说。

卡夫卡却没有接我的话茬儿，而是顺着他的话题说了一句结束语：“事情总是超出预计。”

我们默默地穿过泰因霍夫。在泰因教堂旁门前我说：“布鲁阿写过这样的话，犹太人的悲剧性罪责在于他们没有认出弥赛亚^[125]。”

“情况也许真是这样，”卡夫卡说，“他们也许真的没有认出他。可是，一个上帝允许发生他的造物认不出他的事情，他是多么残酷。倘若孩子们不能正确地思考和说话，那么总是父亲来到他们身边。不过这这不是街上谈话的题材，而且我也到了。”

卡夫卡朝他父亲的商店点了点头，跟我握手告别，然后快步走进金斯基宫。

我得到了一份神甫联合会的杂志，里面有一篇关于爱尔兰神甫法瑟斯·弗拉纳根1917年在内布拉斯加^[126]的奥马哈市附近建立的儿童城的报道。

卡夫卡读了文章后说：“我们所有的城市和工厂都是通过这些迷途的孩子的劳动建立起来的，他们因服从他人而找到了自由。”

和卡夫卡散步，走过卡尔桥，经过克莱茵赛特纳桥头塔楼，穿过萨

克森街到大修道院院长广场。从那里穿过普罗科皮乌斯街到蛋市——今天叫克莱茵赛特纳集市广场——走上布拉迪斯拉发街，穿过约翰纳斯山的宽阔阶梯走向斯波纳街。然后往下走到克莱茵赛特纳环形道，再到电车道。

卡夫卡给我解释桥上的雕像，让我注意各种细部，指给我看古老的房子图形、门、窗框和钳工制品。在卡尔桥上，他伸出右手指着马利亚雕像后面叉开手指捂着鼻子的石制小天使说：“他摆出一副样子，好像天上有臭气似的。对天使这样的天上造物，地上的一切都冒着臭味。”

“可天使前面的雕像是圣母像啊。”我说。

“正是！”卡夫卡大声说道，“没有比做母亲更世俗，因而更高耸于地面之上的东西了。由于经受了降生的痛苦，一线新的希望之光，一个新的幸福的可能性被种植到了人间的尘土里

我默默不语。

我们在蛋市上经过舒博恩宫时，卡夫卡说：“这不是城市。这是时间大洋裂开的洋底，布满了熄灭的梦幻和热情的乱石堆。我们可以像在潜水钟罩里那样，在这些乱石堆之间散步。在这里很有趣，但人们慢慢地透不过气来，和所有潜水者一样，他不得不上来，否则他的血液就会突进肺脏。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我后来不得不离开。这里太远了。”

“是太远了，”我点点头，“这里和内城的交通很不方便。得先走过老石桥，穿过许多弯弯曲曲的胡同。这里没有直达路线。”

卡夫卡停了一会儿。然后，他接着我的话提了一个问题，他立刻自己做了回答。他说：“对我们来说，在什么地方有这样一条直达路线？只有梦才是直达道路，而梦只能引向迷途。”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卡夫卡博士。从克莱茵赛特纳通向波里斯的工伤保险公司的路怎么会和梦有关系？

为了掩盖我心中的迷惑，我轻声说：“乘电车也不能顺利前进，也得换车，通常都要很长时间才能换上合适的车。”

卡夫卡博士似乎根本没有听我讲话。他下巴前伸，两手插在单薄的灰大衣的口袋里，快步走下斯波纳街，于是我只好小跑起来，免得被他

甩下，要知道，我的个子只到他肩膀。到了克莱茵赛特纳环形道，卡夫卡自己才意识到他走得急了一些。

他在电车站上停下脚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您看，我仿佛要摆脱您似的。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不要紧，”我用手绢擦了擦汗涔涔的脖子说，“下山时总是要走快些的。”

可是卡夫卡博士不同意我的话。“不对，不对！原因不仅仅在山。我自己身上还有一个倾斜的平原。我像一个球那样向安静滚去。这是一个弱点，有了这个弱点，一个人很容易失去镇静。”

“不要紧的，没有那么糟。”我又说了一遍，可是他却只是摇摇头。

他越过我，朝托马斯街入口看去。他继续轻声地说着，听起来就像提高了声音的自言自语：“这些老房子里的宁静就像一包炸药，炸毁了所有内心的堤坝。我们的双腿跑下山，而声音则一个字一个字地构筑起一座图画之山。内外之间的界线消失了。人们穿过街道，就像沿着黑沉沉的时间废水的渠道顺流而下。他倾听自己的声音，觉得听见了某些特别聪明、特别诙谐有趣的事情。实际上，那只是对自我贬值的拼命掩饰。人们——可以说——轻蔑地审视自己。他只是还没有伸手到口袋里，掏出纸笔，给自己写一封匿名信。”

托马斯街入口处出现了一辆慢慢行驶的电车。

卡夫卡像从睡眠中醒来那样，一惊而起。他说：“我们的车来了。我们可以上车了。”他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

弗兰茨·卡夫卡翻阅我带到他办公室的一本书：阿尔方斯·帕库著《俄国革命的精神》。

“您想看这本书吗？”我问。

“谢谢，”卡夫卡把书递给我说，“我没有时间。太可惜了。俄国人试图建立一个完全公正的世界。这是一件宗教事情。”

“可是布尔什维克是反对宗教的。”

“它这样做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宗教。干涉，起义，封锁，这是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将席卷全世界的大规模的、残酷的宗教战争的小小前奏。”

我们遇见了一大群举着旗子去参加集会的工人。卡夫卡发表他的看法：“这些人那样自信，情绪那样好。他们控制了街道，以为就控制了世界。其实他们错了。秘书、官员、职业政治家已经在他们后面窥视，他们全是现代苏丹，工人是在为他们开辟上台的道路。”

“您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我看见了这种力量，群众的不成形的、似乎无法驾驭的力量，他们渴望被驯服，被塑造。每一场真正革命的运动结束时都出现一个拿破仑·波拿巴。”

“您不相信俄国革命会继续扩大？”

卡夫卡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洪水越向四周扩大，水就越浅，越浑。革命蒸发了，只留下新官僚体制的泥浆。束缚人类使其受苦的镣铐是办公纸做的。”

人们无需有特别锐利的目光，就能看到，公务员生活对卡夫卡博士是一种折磨。

他常常脸色灰黄，弯着腰，缩着身，坐在光洁的大办公桌后面。要是有人问起他的起居情况，他总是做出高兴的样子回答：“谢谢，我很好。”

这种抵御是有意掩饰真情，是与卡夫卡博士的为人根本不相称的，因为按照我父亲和我也认识的几个他的同事的话，在整个保险公司再也找不出比法律处处长更爱真理、更热衷于公正的人了。

我父亲说，卡夫卡曾经几次对他这样说：“倘若没有每个人都理解、因而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真理，那么每种秩序都只是粗野的暴力，都是迟早要在真理需求的压力下四分五裂的笼子。”

我父亲和他的同事把卡夫卡对真理的热爱看成是高度发展的伦理意志的显示；实际上——按卡夫卡自己的话——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我最初几次拜访卡夫卡博士时，听到他的名言警句，我总是惊讶

地问他：“这确实是真的吗？”开始卡夫卡博士总是点点头作为回答。我认识他较长时间后依然用这个问题表示我的惊讶时，他有一次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请您别提这个问题了。您这一句话就一再地把我暴露在我自己面前。我看见了我的无能。因为说谎是一种艺术，如同其他任何一种艺术一样，它要求人使出全部力量。人们必须完全献身于它，必须自己先相信它，才能用它说服别人。说谎需要火一样的热情。这样，它披露的东西比掩盖的还要多。这我做不到。所以我只有一个隐身所——真理。”

他微微张开嘴，发出一阵哧哧的笑声。我也跟着他笑起来。然而，我的笑只是尴尬的笑。因为在心底，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在迄今为止与卡夫卡的交往中，我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多么表面肤浅。何况，卡夫卡不久前还对我说过：“语言是我们身上不可摧毁的东西的外表，比我们更长寿的衣服。”

我已经记不清我当时是怎样摆脱羞愧之旋涡的，只有一点记得很清楚：从那一天起，我比较注意我说的话了。不仅与卡夫卡交往如此，与其他人接触也这样。这样做增强了我的接受力。我学习更好地看和听。这样，我的世界变得更深刻更复杂了，但又没有变得更冷更远。相反，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他们一再地使我惊讶，这样，我的生活更丰富、更有价值了。我激动欣喜，时间过得十分愉快充实。我不再是一个小小的、无足轻重的职员之子，而是为世界和自己的道德标准争斗的人，一个小小的为人和上帝争斗的斗士。这一点我要归功于卡夫卡博士。因此，我敬佩他，尊敬他。他引导我深入地体验生活，我感到，通过这种体验，我一天天长大，内心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善良。因此，当时对我来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在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里和他坐在一起，或者和他在布拉格的街道、花园、过道里漫步，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他讲话。

当时——我承认——只有一件小事让我不自在。这就是那句“谢谢，我很好。”难道卡夫卡感到那么凄苦和孤独，不得不用这句老话逃避好奇心的进袭？

是不是抵御那些拜访他的、令人厌烦的人？把他们推挡回去？这是不是也是针对我的？

我想到这一点就不好受，就害怕。所以我后来再也没有问过他健康

状况怎样。每当有人当着我的面提出这样的问题，听见卡夫卡装出自然的样子说谎时，我就深感不安。在这种场合，我就不能平静。我坐在椅子上，不安地晃来晃去，摆弄上衣纽扣，来回拽自己的指甲，拿起一张报纸或一本书，或者干脆打起哈欠来。

卡夫卡博士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做了仔细思考，因为有一次他突然自己向我解释了我所了解的他的唯一谎言的理由，这事发生在哪一年，我已记不得了，不过那天阳光灿烂，大概是个明媚的夏日。

我们漫步穿过位于今天的火车站下面的市立公园，在小池子的铁栏杆边站了很久。一群有棕色纹和黑白绿三色的鸭子在池子幽暗的水面上嬉戏，我们旁边站着一些妇女和孩子，他们从一个银白色大胡子垂到椭圆形食品框上的跛足老头子那里买来小面包和咸味面棒，掰碎了扔给那些嘎嘎叫着游来游去的鸭子。我们看了他们好一会儿。

卡夫卡问我：“您说，他们谁更快乐，是鸭子还是孩子？”

我回答：“我想是鸭子。它们得到了食物，即继续生存的材料。”

“那孩子们呢，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卡夫卡责备地看着我，“快乐是人的心灵的养料。没有它，整个生命就只是死亡。”

他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去，同时慢慢地对我说：“我现在还记得，我小时候，每当我的家庭女教师威胁说，为了惩罚我的不听话，她不带我到市立公园去看鸭子时，我总是绝望地哭起来，在餐室里退到碗橱和衣柜之间黑暗的角落。当时在柜子后面，我第一次听见我的心脏在胸中可怕地跳动。从小环形道走到市立公园从一开始就是一桩巨大的冒险活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女教师的那双手套。她戴着褐色的、已经开始变硬的羔羊皮手套，拉着我的手。后来，她买了一副新的钩织手套，可是不喜欢新手套，我喜欢旧的褐色羔羊皮手套。接触到这副手套时，我的背上总产生一种战栗的快感。因此，每次散步前我都恳求他：‘阿姨，请您戴那副旧羔羊皮手套。戴着它拉我的手就像抚摩。’我第一次这样恳求她时，她哈哈笑着说：‘你真会享受！’当时我是个会享受的人。我拉着阿姨的手，在市立公园里喂鸭子时是多么高兴，多么兴致勃勃啊，后来我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兴致和欢愉。”

卡夫卡沉默不语了。

我们经过一条很短的联结通道来到一条与公园外面的大道平行的侧道上，道路两侧是茂密的灌木和稀疏的树木，所以，我们能看见对面当时很豪华高雅的马利亚大街房子的上半部分。

在侧道上，我们从一条长条椅旁走过，长椅上坐着两男一女，看样子是乞丐。

边上那位男子灰白头发乱蓬蓬的，戴一顶有凹坑鼓包的圆顶硬礼帽，一张蓝紫色的酒鬼脸。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头，剥开烟纸，弄出烟丝，把烟丝塞进放在膝上的一只肮脏的亚麻布口袋里。

他旁边坐着一个晒得黑黑的老年妇女，她穿一件绿色丝绒裙子和一件油迹斑斑的黑色男上衣。她头上松松地包一块灰褐色的印花布头巾，遮住了她的全部头发。她张开嘴巴，露出黄色大牙，她正往嘴里塞一块半块砖头大小的糕点呢。

离她三掌的地方坐着一个干瘪老头子，他上身前倾，头戴一顶褪了色的绿猎手帽，帽子往后推到了脖子上，鼻子上架一副很大的老式金属丝眼镜，我们经过长椅时，他的眼镜三次滑到了显得略短的鼻子尖上，他每次都用干枯的食指做出机械的动作，把眼镜扶好。他膝盖上摊着一块红蓝格子的手绢，上面放着硬币，他正在按大小分类。

我们经过时，听见了他们三个人的几句谈话，这些话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乞丐。那女人嘴里塞满了糕点，把头转向戴眼镜的人，问他：“今天怎么样？”

“还行，还行。”老头子回答。

“谢天谢地，”那个从烟头积聚烟丝的人赞许地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在埃茅斯修道院得到了两碗汤。”

女人美滋滋地微笑着，向后靠到椅背上。“在卡尔广场，我给一个护士看手相，预言她有美好前程，她给了我一个克朗，两块点心。”

“真是大丰收！”两个男人同时在我们背后喊道。

我们走了几步后，卡夫卡问我：“喂，您怎么看？我们也像他们三个那样幸福吗？”

“我想，比不上他们。”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我们肯定没有过一天这样的好日子。”

“我也这么看！”我一边笑一边大声说，“我们在人行道上没有得到烟，在卡尔广场上也没有得到点心。不过我们也没有给谁预言过有美好前程。”

“您在开玩笑，”卡夫卡嘟哝道，“我说的可是当真的。幸福并不取决于财产。幸福只是定向问题。这就是说，幸福者看不见现实的黑暗边缘。他的生命之感压过了死亡意识的不断捶打的木蠹虫。人们忘记了，人不是走，而是倒下。人像麻木了一样。因此，要是有人问我们的健康状况，那是不正派的行为。这样做乏味得很，就像一个苹果向另一个苹果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那些螫了您，爬进您体内的虫子怎么样了？’或者如同一根草茎问另一根草茎：‘您如何枯萎？您如何腐烂？’这样做如何？”

“那太令人恶心了。”我不禁脱口而出。

“这不，您也明白了。”卡夫卡说，头往上扬起，脖子上的肌肉像拉紧的绳子那样暴起，“询问健康状况的问题加强了一个人心中觉得自己在消亡的意识，面对这种消亡，我这样一个病人显得特别软弱无力。”

我听见他用鼻子深深地吸气。“也许情况没有那么糟，”我讷讷地说，“您不该去想您的病。”

“我自己也这样对自己说，但是这正表示我想到了病。我无法忘掉它。我没有办法把它赶出我的意识。我缺少体面的工作。”

“怎么？”我有些生气地反问道，“您在保险公司不是有个很好的岗位，大家不是都很尊敬您吗？”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这不是工作，而是腐烂。每一种真正积极的、目标明确的、使一个人感到充实的生活都具有火一样奋发向上的劲头和光彩。而我在做什么？我坐在办公室里。这是个冒着臭气、折磨人的工场，里头没有一点幸福感。于是，我就非常平静地欺骗那些询问我的健康状况的人，而不像被判刑的人那样干脆置之不理，扭过头去，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判刑的人。”

我在父亲陪伴下，去听了一次由马克思主义大学生联合会[127]在希伯纳街社会民主党人民大厦的罗莎厅举行的关于俄国局势的报告。我后来向弗兰茨·卡夫卡谈了这次报告的内容。

我讲完后，弗兰茨·卡夫卡说：“我对政治一点不懂。这当然是个缺点，我很愿意克服它。可是我的错误太多了！离我最近的事总是越来越远离我，逃向远方。我很敬佩马克斯·勃罗德，他对错综复杂的政治了如指掌。他常常给我讲很多时事。我就像现在听您讲话那样，专心地听他讲话，然而，我却无法深入到事情中去。”

“是不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您误解了。您讲得很清楚。错误在我身上。在我看来，战争、俄国革命以及全世界的贫困就像恶的洪流。那是一场洪水。战争打开了混乱的闸门。人类生活的一切外部援救机构都崩溃了。历史事件不再由个人，而只是由群体所承载。我们被挤过来推过去，被扫到一边。我们忍受着历史。”

“您是说，人不再是世界的共同创造者？”

卡夫卡稍稍晃动了几次上身。他说：“您又误解我了。我说的正相反：人自动抛却了他对世界承担的责任，不再参与世界活动。”

“这不可能。您没有看见工人党的成长？群众的积极性？”（我的这几句话是关于俄国局势的报告和我父亲对之发表的看法的回响。）

“原因就在这里，”弗兰茨·卡夫卡说，“运动剥夺了我们观看的可能性。我们的意识受到了限制。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还活着，却失去了知觉。”

“您是说，人变得不负责任了？”

弗兰茨·卡夫卡苦笑了一下：“我们大家都这样生活，仿佛我们都是独裁者。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乞丐。”

“这会有什么结果？”

卡夫卡耸了耸肩，看着窗外：“回答只是愿望和许诺。但这并不安全可靠。”

“但是，倘若没有安全，那么全部生活又是什么呢？”

“是沉沦，也许是罪愆。”

“什么是罪愆？”

卡夫卡用舌尖润了润下唇，然后回答：“什么是罪愆……我们认识这个词，知道它的用法，但是我们失去了感觉和认识。也许这已经是罚入地狱，被上帝所抛弃，是毫无意义的事。”

我父亲走进房间，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们告辞时，卡夫卡博士突然用道歉的口吻对我说：“您别去想我对您说的话。”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对我来说，卡夫卡是老师和忏悔神父。所以我忧郁地问他：“为什么？您说这些话可是很认真的。”

他露出一丝笑容。“正因为这个缘故。我的严肃认真会像毒药一样，对您产生作用。您还年轻。”

这话伤了我的心。我说：“年轻可不是缺陷。因此，我一直能思想。”

“我看，我们今天真的不能互相理解了。不过这很好。误解能保护您，不受我的坏的悲观主义的影响，这种悲观主义是一种罪过。”

1921年圣诞节，父亲送了我一本书：《人类的解放——古今自由思想录》^[128]。

大约在1923年春天，我把这本内容丰富的书带给弗兰茨·卡夫卡看，里头的两幅画他看了很长时间，一幅是阿诺尔德·伯克林^[129]的《战争》，另一幅是W.W.魏列施恰金^[130]的《头颅塔》。

“说真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被真正地描绘过，”卡夫卡说，“通常只描绘了局部现象或结局，比如这幅《头颅塔》。而战争的真正可怕的东西是一切现存的安全和习俗的解体。兽性的、肉体的东西压倒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使它窒息而死。就像癌症。人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几小时，而只活几个瞬间。其实，连这几个瞬间他也不是活着。他只是意识

到这些瞬间。他只是生存。”

“这是因临近死亡引起的。”我说。

“这里的原因是知道并害怕死亡。”

“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谁充分理解了生活，谁就不怕死亡。害怕死亡是生活不充实的结果。是不忠的表现。”

我们谈论战后众多的国际会议。弗兰茨·卡夫卡说：“这些重大的政治会晤的水平相当于通常的咖啡馆晤谈。人们讲得很多很响，目的在于尽量少说。这是喧闹的沉默。真正真实有趣的东西是隐藏在背后、一字不提的交易。”

“按照您的看法，新闻界不为真理服务。”

卡夫卡的嘴角抽动了一下，露出一丝苦笑：“真理属于生活中少数几件真正伟大的、宝贵的、无法用金钱买的事情。人只能作为馈赠得到它，如同爱情或美丽。报纸则是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

“这么说，报纸旨在使人类愚蠢^啰。”我害怕地说。

卡夫卡笑起来，得意地向前突出下巴：“不，不！一切，甚至谎言，都为真理服务。影子不能熄灭太阳。”

弗兰茨·卡夫卡对报纸持怀疑态度。他每次看见我收到各种报纸的包裹时，总是微微一笑。

有一次他说：“‘葬身于报纸之中’这句话反映了真实情况。报纸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块石头挨一块，一个脏疙瘩挨一个。那是一堆土，一堆沙。意义在哪里？看见历史是事件的堆砌，这毫无意义。而重要的是事件的意义。这意义我们在报纸上是找不到的，只能在信仰里，在表面的、偶然的東西的客观化中得到。”

记不得是什么场合了，卡夫卡博士一次说，读报是一种文明恶习：“读报像抽烟：人们不得不向压迫者支付他自己的中毒费用。”

卡夫卡博士不抽烟，至少这是我的印象，可是他是个报纸杂志的热

情读者。他桌子上总是放着许许多多德文、捷文期刊，有时还有法文期刊，他在谈话中常常对里面的报道发表看法。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有一次看见一张照着许多长腿舞女的照片时，不由自主地评论起意大利法西斯。

这次谈话大约在1922年10月或11月。卡夫卡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在维也纳出版的大型戏剧杂志，里头有关于巴黎和柏林最新舞剧的报道，并附了几张照片。

“这是舞蹈演员？”我扫了一眼排成一系列的舞蹈演员，笨嘴笨舌地问。“不，这是士兵，”卡夫卡答道，“这种舞蹈是伪装的阅兵式。”

我不解地看着卡夫卡博士。他进一步解释道：“普鲁士的正步走和舞女的舞蹈目的相同。两者都压制个性。无论士兵还是舞女都不再是自由的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被束缚的零件，他们按照一个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完全陌生的命令活动。因此，他们是所有指挥官的理想对象。人们无需解释什么，塑造什么。一句简短的命令就够了。士兵和舞女们像木偶一样行进。这就使本身无足轻重的指挥官显得很重要，很了不起。您看，他就在这里！”卡夫卡从办公桌中间那个抽屉里拿出一期《星期》杂志，翻开，指着墨索里尼的照片说：“您看，此人长一张驯兽者的方形大嘴，哗众取宠者的玻璃假眼给人以严肃深邃的印象。总而言之，他是这些只有作为群体才起作用的、不关心政治的政治舞女们真正的游艺场老板。您看，就是这些人！”

他翻到下一页，那里有一张照片，照的是一群咧着嘴狞笑的“进军罗马”的参与者。“您没有看见这些人的脸？他们非常快乐，因为他们无需思想，他们坚信，在罗马，肥缺美差和丰盛的宴席已经等着他们。墨索里尼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渣滓，他们伸出爪子去端他们自己无法盛满的碗盏。”

我来到卡夫卡的办公室。屋里一个人没有。卷宗开着，盘里放着两个梨，桌子上摊着几张报纸，这表明，他在楼里。我在办公桌旁的客座椅里坐下，拿起《布拉格日报》读起来。过了一会儿，卡夫卡回来了。

“您等了好久了？”

“不久。我读报了。”我给他看登着《国际联盟会议》文章的报纸。

卡夫卡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国际联盟！这真的是各国人民的联盟吗？我看，国际联盟这个名称只是一个新的斗争场所的伪装而已。”

“您是说，国际联盟不是和平组织？”

“国际联盟是使斗争局限在局部地区的组织。战争在继续进行，只是使用了另外的手段。商人的银行代替了成师的士兵。财政金融的战斗取代了工业的战争潜力。国际联盟不是各国人民的联盟，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的转运地。”

我提请弗兰茨·卡夫卡注意关于赔款问题的一篇长文。他对报纸看也不看，向外伸了一下下唇说：“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都非常简单。真正困难、真正无法解决的是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述的问题，因为它们是以全部生活的难题为其内容的。”

我们谈论一篇评述欧洲和平前景暗淡的报纸文章。

“和约最终达成了。”我说。

“没有最终的东西，”弗兰茨·卡夫卡说，“按照亚伯拉罕·林肯的观点，只要没有取得公正的解决，就不能说最终解决。”

“那什么时候能最终解决呢？”我问。

卡夫卡耸了耸肩膀：“谁能知道这一点？人不是神。历史是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的错误和英雄业绩构成的。我们向河里扔进一块石头，水面就产生一圈圈波纹。大多数人活着，却没有意识到超越个人的责任，我想，这就是不幸的核心。”

“您对马克斯·赫尔茨^[131]事件怎么看？”我问。

卡夫卡耸耸肩：“我们能通过恶达到善吗？与命运抗衡的力量实际上是一种虚弱。献身与忍受要强得多。但是，德赛得侯爵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

“德赛得侯爵？”我感到很奇怪。

“是的，”弗兰茨·卡夫卡点点头，“您曾经借过我德赛得侯爵传记，他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庇护人。”

“这恐怕不是。”

“噢，是这样的。德赛得侯爵只能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生活的欢乐，正像富人的奢侈生活以穷人的贫困难为代价。”

为了掩饰我的失败，我伸手到公文包里取出几张梵高画面的复制品。

卡夫卡很高兴。“这个以暗紫色黑夜为背景的咖啡庭院漂亮极了，”他说，“其他几张画也很漂亮。不过这个咖啡馆的庭院让我着迷。您看过他的素描吗？”

“没有。”

“太可惜了。这些素描在《疯人院书简》一书里。也许您以后什么时候会看到这本书。我真希望我会画画。事实上我也常常试着画两张。可是没有什么成果。纯粹是个人的画，连我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后也不知道画的意义何在了。”

我给卡夫卡看一家维也纳周刊的纪念专号，专号刊载了近50年最重大事件的图片[132]。

“这是历史。”我说。

卡夫卡抿了一下嘴唇：“哪里！历史比这些旧画还要可笑的多，因为历史大多由公务活动所构成。”

这次谈话后过了两天，我来到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时，他手里拿着一个卷宗正要离开房间。我想走，他却叫住了我。

“我马上就回来。”他一边说，一边给我推过那把来客坐的椅子。“您先翻翻报纸。”说着，他向我推过几份德文和捷克文报纸。

我拿起报纸，看了看大字标题，浏览了一篇关于庭审的报道和几则简短的舞台消息，这几则消息其实不过是戏剧预告。我翻到另一版。体育消息栏是一部侦探小说的连载。我读了两三段，卡夫卡就回来了。他瞥了一眼我读的报纸说：“我看，强盗和侦探在为您做伴。”

我很快把报纸放回桌上。“我只是随便翻了一下这篇蹩脚货。”

“您把让发行人挣了大钱的文学叫做蹩脚货？”卡夫卡假装生气的样子向我发问，然后坐到桌旁，不等我回答，继续说道：“这是一种重要的商品。侦探小说是一种麻醉剂，会改变一切生活中的比例，因而使世界颠倒。侦探小说总是揭露隐藏在非同寻常的事件背后的秘密，而在生活中，情况恰好相反。秘密不是隐藏在背后。相后，它赤裸裸地显露在我们眼前。秘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此我们看不见它。日常的事情是最伟大的强盗小说。每分每秒，我们都经过千百具尸体，经历千百种罪行，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倘若除了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感到意外吃惊的话，那么我们有一种非常奇妙的镇静剂——侦探小说，它把生活的每一个秘密都描写成该受到惩罚的例外现象。用易卜生的话说，它是社会的支柱，是冷酷的非道德所穿的浆洗得又白又挺的衬衣，这种非道德标榜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文明。”

我给卡夫卡讲我的梦：马萨里克总统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在码头上散步。我仔细地看他的胡子、夹鼻眼镜、交叉在背后的手臂、宽大敞开的冬大衣。

弗兰茨·卡夫卡微笑了。他说：“您的梦符合马萨里克的品格。和国家首脑这样随便相遇是很容易发生的。马萨里克深孚众望，几乎不需要权力的外部象征。他不说教，所以显得平易近人。”然后我给他讲了国家民主党在卡罗琳娜塔尔举行的一次集会的经过，集会的主要发言人是财政部长A·拉辛博士。

“他是个老练的斗士，”卡夫卡说，“和德国人斗是他的拿手好戏，其实，他是在可恨的德国当权者和无权无势的捷克百姓之间更接近前者的那些人的代言人

“为什么？”

“山峰互相看见。蜷缩在山峰影子里的洼地和小山谷互相之间则一无所知，尽管它们通常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1922年英国逮捕印度国大党头号人物圣雄甘地时，弗兰茨·卡夫卡说：“现在很清楚了，甘地的运动一定会胜利。监禁甘地会给他的党以更大的推动。因为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者的利益集团。大河变成了小水坑，一切关于未来的美好思想都在这水坑里破灭。

因为思想如同世界上一切具有超人价值的东西一样，只能以人的牺牲为生。”

我在卡夫卡的办公桌上发现一张反对外交部长贝内斯的传单——“净化”^[133]。

弗兰茨·卡夫卡说：“贝内斯博士被指责积聚财富。这种指责是蹩脚的。贝内斯博士非常能干。按他的性格和联系，他完全能成为大富。他可以出售袜子和废纸。他经营什么东西是非常次要的。他是商界的大人物。这对他和其他人是关键的一点。因此，就其风格来说，这些辱骂是正确的，政治上却是很不得体的。他们向一个人攻击，却没有击中他的行为。”

1920年选举前夕，捷克社会民主党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里散发了一本竞选小册子，小册子介绍了社会民主党首要候选人的生平，登载了他们的照片。

我在卡夫卡博士办公室粗粗翻了一下这本小册子。我问他：“博士先生，所有这些都长着一张贪吃的市侩脸，您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卡夫卡博士冷冷地说，把竞选小册子扔进了字纸篓，“因为他们是发阶级斗争的战争财的人。”

劳工工伤保险公司要在组织管理方面进行某些变动^[134]。我父亲正忙着写关于这件事的研究报告。吃午饭时，他在报纸的白边上做了些笔记，晚上他就关在餐室里写。

我给卡夫卡讲起这件事时，他微微一笑。他说：“您父亲是个可爱的老小孩。不过，所有相信改革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看不见，世界上只有旧事物死亡，新事情诞生，世界面貌才会有所改变。有的东西衰亡，有的东西崛起。这只改变万花筒中玻璃碎片的组成。只有很小的孩子才想，他们完全改变了整个玩具。”

我父亲谈起弗兰茨·卡夫卡始终很谨慎。从他的言谈方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父亲在观察卡夫卡博士，却总是有不完全理解他的感觉。

相反，弗兰茨·卡夫卡不仅尊重我的父亲，而且还非常理解他。

“您父亲多才多艺，一次又一次让我感到惊奇，”他有一次这么说，“对他来说，事情是那样的真实。他感到一切都那么近，那么熟悉亲切。他肯定是个非常虔诚的人，否则，他对世界上似乎最最简单的事情怎么能那样熟悉了解。”

我告诉他，我父亲在业务时间怎样做木工和钳工活。我带着幽默的夸张描述了他的热心，他的手工工人的虚荣心。

弗兰茨·卡夫卡不喜欢我讲述的方式。他皱起眉毛，下唇向前突出，严肃地看着我说：“您别笑！您别装出您没有看见美好事物的样子。您只是在掩饰您的自豪感。因为您为您父亲感到自豪。而这种自豪感是正当的。他是那样的富有成果，因为他一点不爱虚荣。这个事实使您感到难为情。您笑，因为您不能和您父亲一起做木工，做钳工，您感到遗憾。您的微笑是什么？是没有哭出来的眼泪。”

“我读了韦尔弗的剧本《镜中人》。[\[135\]](#)”

“我早就知道这个剧本，”卡夫卡说，“韦尔弗向我们朗诵过两次不同的段落。语言很美，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不甚理解所写的内容。韦尔弗是个厚壁桶。从外界来的各种不同的机械振动比桶内装的发酵的东西更容易使它发出声响。”

“他在写一部篇幅宏大的音乐小说，是真的吗？”我问。

卡夫卡点点头：“是的。他早就在写这部长篇小说了。是写威尔第和瓦格纳的。只要他到布拉格来，他肯定会给我们朗诵一些章节[\[136\]](#)。”

“您讲这些话时脸色阴郁，您是不是不喜欢韦尔弗？”我说。

“哪里！我很喜欢他的，”卡夫卡热烈地说，“我上中学时就认识他了。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韦尔弗和我四个人常常一起远足郊游。他是年纪最小的，因而也许是最严肃的。他充满青春活力。他给我们朗诵他的诗。我们躺在草地上，眯着眼睛看太阳。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仅仅因为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就不得不喜欢韦尔弗，就像喜欢那段时间的其他同伴一样。”

“您却显得伤心。”我说。

卡夫卡微微一笑，仿佛要道歉似的：“美好的回忆搀进忧伤味道更

好。其实我并不忧伤，而是追求享受。”

“这是弗兰茨·布莱^[137]的苦根。”

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但我们只笑了片刻。弗兰茨·卡夫卡很快又严肃起来。

“实际情况当然完全不是这样，”他说，“每当我想起，我一点不理解我的莫逆之交的爱，一点不懂音乐时，我总感到有些许又苦又甜的悲伤。这只是一丝微风，死神的一口清气。它瞬即消逝。然而，我却看清楚了，连那些最亲近的人离我也是多么遥远，这样，我脸上就露出恼怒的表情，这一点您一定要原谅我。”

“要我原谅您？您对我又没有做什么。相反，我缠着问您，倒要请您原谅呢。”

卡夫卡笑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把责任扩大到您身上。我要迷住您。”

卡夫卡打开办公桌抽屉，递给我一本岛屿出版社出的彩色封面小册子。

《沙漠神父和僧侣故事集》^[138]，我大声地读出书名。

“这本书很有趣，很动人，”卡夫卡说，“我很消遣了一阵。僧侣在沙漠中；沙漠却不在他们心中。这是音乐！这本书您不用还我。”

弗兰茨·卡夫卡能用一两句话迅速阐明有争议的事情。而他从来不花什么力气，表现自己才气横溢甚至妙趣横生。无论他说什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总是那样简单、自然、不言而喻。达到这种效果不是靠某种特别的遣词造句的方式、表情或语调。卡夫卡的整个人对听者产生影响。他很平静。同时，他活泼的眼睛放射出光芒，每当我在谈话中提到音乐或他的创作活动时，他就露出无可奈何的尴尬神态，眨眼睛示意。

“对我来说，音乐就像大海，”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感动，入迷，佩服，钦佩，但同时又害怕，异常害怕它的辽阔无垠。因为我是个蹩脚水手。马克斯·勃罗德则完全不同。他能头朝下跳进哗哗流淌的洪水。他是个获奖游泳运动员。”

“马克斯·勃罗德是音乐爱好者？”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懂音乐。至少维特斯拉夫·诺瓦克[139]这么说。”

“您认识诺瓦克？”

卡夫卡点点头：“一面之交。诺瓦克以及其他许多捷克作曲家和音乐家常来马克斯家。他们很喜欢他，他也喜欢他们。只要能做到，他谁都帮助。这就是马克斯。”

“马克斯·勃罗德博士捷克语说得很好？”

“好极了，我真羡慕他。您看……”他打开办公桌边上的一个抽屉，“这里有两年完整的《我们的语言》[140]杂志。我在读这本杂志，在努力钻研。可惜，我这份杂志不全。我很想搞到已经出版的每一期杂志。语言是故乡的有声的呼吸。可是我是个严重的哮喘病人，因为我既不懂捷克文，又不懂希伯来语。两种语言我都学。但这好像梦似的。我们在外面怎么能找到应来自内心的东西呢？”

卡夫卡关上办公桌旁边的抽屉：“从我诞生的犹太城卡普芬街到故乡的路无限遥远！”

“我出生在斯洛伐克南部。”我说了这么一句，因为他的眼神深深感动了我。

卡夫卡却慢慢摇起头来：“从犹太城到泰因教堂的路要远得多。我来自另一个世界。”

一天下午——我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了——我们从老城环形道穿过巴黎街，漫步走向伏尔塔瓦河，卡夫卡博士突然在老犹太教堂对面停下，完全不顾先前和我进行的谈话，说道：“您看见犹太教堂了？周围的建筑都比它高。在这些现代房屋中间，它完全是个老式的外来异物，显得格格不入。一切犹太人的东西都这样。这是引起敌对的紧张关系的原因，这种紧张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发展为摩擦、斗争。按我的看法，隔离区起先是一种缓和矛盾的手段。犹太人周围的世界想从身上除去外来异物，用隔离墙缓和紧张关系。”

我打断他的话：“这当然荒唐至极。用隔离墙只是更增加了互相疏远的成分。隔离墙拆除了，反犹主义却依然存在。”

“隔离墙移到了内心，”卡夫卡博士说，“犹太教堂现在已经低于街道。然而人们还将继续干下去。他们将消灭犹太人，企图以此摧毁犹太教堂。”

“不可能，这我不相信，”我大声喊道，“谁能做到这一点？”

卡夫卡冲我转过脸，脸色阴沉，眼睛无光。

“捷克人不是反犹主义者，”我说，“他们不会受人诱惑，迫害犹太人的。他们不是吸毒者，不是吸食傲慢思想的人。”

“这话是对的，”卡夫卡博士说，同时又踱起步来，“因为捷克人自己就只是强者生活圈里的一个小小的外来异物。人们已经几次想扼杀他们的灵魂。照这些人的意愿，捷克语言和捷克人民都该从地球上消失。但是，从地球的尘土中产生的东西，人们不可能用暴力消灭。一切造物 and 事物的原始种子总是留在地上。尘土是永恒的。”

卡夫卡紧闭的嘴巴发出一声不可捉摸的声响。我不知道这是一声短暂的嘟哝，还是一片格格的笑声。我探询地看着他的脸。但这时，他转变了话题，谈起我的集邮册。

在另一个场合，当我们谈起为捷克语的纯洁而努力的人时，他说：“捷克语的最大困难在于怎样把它和其他语言正确地分离开来。捷克语是年轻语言，因此必须细心地加以保护。”

“音乐产生新的、更加细腻、更加复杂、因而更加危险的刺激，”弗兰茨·卡夫卡有一次这样说，“而文学则要澄清纷乱复杂的刺激，把它上升为意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音乐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而文学则压制感官生活，把它引到更高的层次。”

我力图给卡夫卡讲清我刚读过的一个剧本的思想内容。

“您说的这一切在剧本里都说了？”他问。

“不，”我回答，“作者对这些事情做了形象描绘。”

他点了一下头：“这是正确的。只是‘说’某件事，那是太少了。我们必须‘体验’那些事情。这里，语言是重要的中间人，是媒介，是生动活泼的东西。但是，人们不能只把它当成手段来对待，人们必须体验它，

忍受它。语言是一位永恒的情人。”

他对一本表现派诗人的选集^[141]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我们谈论柏拉图的理想的国家法。我曾在欧根·迪得里希出版社出版的柏拉图文集中阅读这些文章。

我反对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他的国家共同体之外。

卡夫卡说：“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原状。”

我们有一次经过护城河时，在诺伊格鲍尔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张小小的黑白布告，邀请感兴趣者去听通神论学者鲁道夫·施泰纳^[142]的报告。

卡夫卡问我是否认识他。

“不认识，”我说，“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父亲认为他是个秘教阐释家，为富人制造他们喜欢的宗教代用品。”

卡夫卡博士默不做声。看来他在思考我对他说的话。我们拐进赫伦街时，他谈了他的看法：“代用宗教这个概念太可怕了。我这样说并不是指这样的东西不存在。事实正相反，世上存在着一系列代用宗教，它们每一种都是专门的异端邪说。”

“您怎样区别正确与妄想？”

“通过实践。神话只有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才变得真实，产生效用，否则它只能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幻想游戏。因此，每一个神话都是与礼拜仪式的使用说明联系在一起。宗教程序被简化了，但是它不是简单的东西。它要求牺牲。人们首先得放弃一部分舒适生活。这不合那些日子过得很好的人。因此，他们寻找舒适的代用品。在这一点，您父亲的话是对的。然而，真的能为某种真理的基础找到代用品吗？”

“不能！”我赞同他的看法，“那是引人走上迷途。”

“当然是这样！正像空气对身体不可替代那样，真理对灵魂来说也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对身体来说，自然也是不可替代的。”他脸上露出笑容，“在创造中不存在劳动分工。整体与个别总是同时进行，同样重要。划分为专门领域是人的发明，人为整体的大海、为昨天、今天和明天所吓倒。通神学，对思想内涵的热爱不外乎是对整体的渴念追求。人们在找路。”

“施泰纳指出了这条道路？”我问道，“他是预言家还是江湖骗子？”

“我不知道，”卡夫卡博士回答，“我对他不清楚。他是个非常能说会道、机智敏捷的人。不过这种性格也是骗子的本领之一。我不是说施泰纳是骗子。但也不是不可能。骗子总是企图用简便的方法解决复杂困难的问题。施泰纳研究的问题是一切问题中最困难的。那是意识与存在之间的一条黑暗的裂缝，有限的水珠和无限的大海之间的张力。我想，这里只有歌德的态度是正确的。人们必须在尊重不可认识的东西的同时，把一切可以认识的东西加以整理和吸收。对我们来说，最小的事和最大的事一样，都必定是亲近的，有价值的。”

“这也是施泰纳的观点吗？”

卡夫卡耸了耸肩说：“我不知道。但是，这也许不是他的过错，而是我的过错。施泰纳对我太远了。我无法进一步了解他。我把自己包得太紧了。”

我笑起来说：“您是一只蝴蝶蛹！”

“是的，”卡夫卡严肃地点点头，“我包在一层铁硬的茧壳里，别指望能从这茧里飞出一只蛾来。但这也只是我的错误，或者说，这是反复发生的无望的罪孽。”

“那么您写的东西呢？”

“那只是些习作，是些无用的碎纸片。”

我们到了邮政总局对面的街角。卡夫卡和我握手：“对不起，我和勃罗德约好了！”说完，他就迈着大步跨过行车道。

我陪卡夫卡从办公室回家。在老城环形道他父母家门口，我们意想不到地遇见费利克斯·韦尔奇、马克斯·勃罗德和他的妻子。大家互相说了

几句话，约好晚上去看奥斯卡·鲍姆。

卡夫卡的朋友离开以后，他突然想起，我是第一次和勃罗德的妻子相遇。他说：“我没有介绍您，非常抱歉。”

“这没有关系，”我说，“我倒有时间好好看她了。”

“您喜欢她吗？”卡夫卡问我。

“她的蓝眼睛漂亮极了。”我说。

卡夫卡很惊讶：“您马上就注意到了？”

“我研究眼睛。眼睛告诉我的比言语还多。”我得意地说。

但弗兰茨·卡夫卡却没有听我讲话。他严肃地看着别处。

“所有我的朋友都有一双奇妙的眼睛，”他说，“他们眼睛中的光是我生活在其中的黑暗地牢唯一的亮光。不过，这也只是人造光。”

他笑了，跟我握手后就走进了房子。

卡夫卡患失眠症。提起失眠，他说：“在失眠背后，也许只隐藏着对死亡的巨大恐惧。我也许害怕，灵魂在睡眠时离开我就再也回不来了。也许失眠只是对罪恶的清醒意识，害怕迅速受审判的可能性。也许失眠本身就已经是罪过。也许，失眠是对自然的东西的反抗。”

我说，失眠是一种病。

卡夫卡回答：“罪恶是任何一种疾病的根。这是死亡的原因。”

我和卡夫卡参观在护城河边的展览厅举行的法国画展。那里展出了毕加索的画：立体派静物画，玫瑰色的大脚女人。

“这是位肆意变形的画家。”我这么评论说。

“我不这么认为，”卡夫卡说，“他只是记下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的各种畸形而已。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和钟表一样，有时也会‘走快’。”

1921年春，布拉格安装了两台在国外发明的自动照相器，这照相器能在一张相纸上摄下一个人的——我记得是——16种或更多不同的脸部

表情。

我拿着一组这样的照片去找卡夫卡博士，兴冲冲地对他说：“我们花几个克朗，就能从各个方面拍下照片，这自动机器名叫‘认识你自己’。”

“您是想说‘错认你自己’吧！”卡夫卡博士说，脸上漾起一丝笑意。

我表示不同意：“为什么？照相可不骗人！”

“这是谁告诉您的？”卡夫卡博士把头侧向一边，“照相把目光引向表层。这样，它通常就模糊了隐蔽的本质，这本质只是像一丝光、一片影子那样，通过事情的特征影影绰绰地透射出来。即使用最好的透镜，我们也看不清它，无法把握它。我们只能用感觉去摸索。难道您以为，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魔术师怀着惴惴不安的渴望和希望所面对的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一再往后退却的现实，我们只要按几下这架廉价机器的键钮就能把握？我很怀疑。这架自动照相器不是复杂的人眼，而只是简化得无以复加的苍蝇之眼。”

我带去构成派绘画的照片。

卡夫卡说：“这一切只是奇妙的美国，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魔幻国家的梦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越来越变成无比狭隘的国度。”

我们观看格奥尔格·格罗兹的政治画集[\[143\]](#)。

“这是仇恨。”我说。

卡夫卡奇特地微微一笑。他停了一会儿说：“这是失望的青年。这种仇恨是由于不可能爱而产生的。表现力来自某种特定的弱点。这是这些画中绝望和暴行的根源。此外，我曾在一本年鉴里读到过格罗兹的诗。”

卡夫卡指着画说：“这是画下来的文学。”

对于那些对他来说不是事实的声音符号，而是独立的、不可辩驳的真理的概念的狭隘的字义，弗兰茨·卡夫卡有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其强烈程度使人想起狂热的犹太教教典主义者的倔强固执。

“字必须加以精确的界定，”他有一次这么说，“否则，我们会跌进完全意想不到的深谷。我们爬不上削得光光的石阶，反而会陷在烂泥淖

里。”

因此，最使卡夫卡博士生气恼火的就是不精确的、模糊的、不负责任地说出的话语。在这种场合，他的声音有时会变得又尖又硬，而这在他身上是非常异常的事情。引发这种情况的常常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毫不重要的字眼或者一件在其他人看来无足轻重的小事。

一次我到他办公室时，他正惘然若失地凝视着放在他桌子上的一本褐色封面的大书。我向他问候，他只点了一下头作答，然后马上诉说起来：“您看，他们在我桌子上都放了什么东西！”

我朝桌面看了一眼说：“一本书！”

听了我的回答，卡夫卡却变得不耐烦起来。“是，一本书！实际上他却只是一样空洞无物的玩意儿。这是一本人造革封面书，然而既没有一点艺术的痕迹，也没有一点皮革的影子^[144]。全部是纸。而内容呢？您自己瞧瞧！”

他翻开书。我看见空白的、黄灰色办公用纸。

“里头什么也没有！”卡夫卡博士激动地说。

“人们是不是要用这本书向我暗示什么？这本不是书的书意味着什么？我只是到隔壁房间里去了几分钟。我回来时，这玩意儿就放在桌子上了。”

我谨慎地说：“这东西也许不是给您的。就我所知，档案室的迪内尔·塞德尔搞装订。您给他打个电话。也许是他把这本书给什么人的。”

卡夫卡采纳了我的建议，给塞德尔打了个电话。他这才听说，人造革封面的本子是塞德尔放在桌上，给特雷默尔博士的。卡夫卡的同事有时让人为他装订这种空白纸本子，用来作私人摘记。

这使卡夫卡博士放了心。他又开手指，把手放在桌面上，出神地看了一会儿我放到特雷默尔博士桌上的人造革封面本子。然后，他慢慢地向我转过脸，像一个又小又腼腆的学生那样微笑着，轻声对我说：“您会觉得我的态度疯疯癫癫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害怕一切假象。‘仿佛、似乎’永远是恶的圈套。这您到处都会看见。最叫人讨厌的莫过于把一切活动都转变为反面的假象。”

我不知道，在旧奥匈帝国电影业是怎么组织的。在捷克第一共和国，只有得到特别电影许可证才能办电影院。而这种许可证原则上不发给自然人，而只发给“爱国法人”，如消防队、体操协会以及“其他公益组织”，这些组织通常又把许可证租给资本雄厚的企业，收取固定金额或红利的一部分。

因此，电影营业许可证等于一张有价证券，其汇率和收益在捷克第一共和国一年一年提高，因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贫乏生活以后，各阶层广大人民的娱乐需要大大提高，因而电影观众的数量大大增加。这样，电影营业许可证的所有者就从许可证的租用者那里得到一大笔钱，各个团体的管理人尝到了甜头，增强了虚荣心，坚持永远将他们的公益团体或爱国团体的名字作为租用他们的营业许可证的电影院的名字。

这样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捷克“雄鹰”体操协会在全国城乡的所有电影院都叫“雄鹰”。捷克雇佣军团士兵联合会把他们的许可证租给了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旁的电影院，他们为了纪念军团在俄国的行动，把他们的电影院命名为“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的电影院则叫“人民电影院”。

除了这些很容易理解的电影院名字外，在捷克第一共和国有许多名字奇特的电影院。比如，某重要工业中心的最大电影院名叫“卫生”。因为它的许可证是属于红十字会的。许多人不知道这一点。相反，当时在全共和国，人们都知道“卫生”是一家疝带^[145]厂的文字招牌。所以，爱打趣的人常常把红十字会的电影院叫做“急救电影院”或“绷带电影院”。

全世界电影院名字方面最荒唐的大概要算布拉格齐斯科夫工人区一家小电影院门口上的名字了。上面写着“盲人电影院”，因为电影院专利属于盲人福利会。

我给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讲起这些情况时，他先是瞪大了眼睛，然后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以前从没有听他这样笑过，以后也从未听说过。

他笑过以后说：“盲人电影院！其实所有电影院都应叫这个名字。看这些银幕画面，人们只能变成现实盲。您觉得这个盲人电影院怎么样？”

“我在那里工作。”我答道，并告诉他我是怎么到那里工作的。

“盲人电影院”在齐斯科夫一间以前的旧仓库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捷克移民买下仓库，把它改建为很简陋的电影院。周围的居民看不上这家电影院，只叫它“仓库电影院”。电影院代替不了像样的剧院，而只是简单破旧的文化饲料槽，附近的人常常只穿着便鞋，不戴衬衣领就进电影院，一边看，一边用粗鲁的语言评头品足。

每场演出时，电影院主人都戴一顶圆顶大礼帽，坐在乐队旁，每每听到这些评头品足的议论，就感到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于是他扯起嗓子嚷两句，以示抗议。

倘若这时还有人从黑暗的大厅里朝他说什么，他就带着两个强壮的引座员冲进观众座，抓住喧哗者，把他拉到门口，他通常都是一边拉，一边吼道：“出去！我们不是下等酒馆，而是剧院。您喋喋不休地讲话，就是侮辱安静文明地看电影的所有人。所以请您出去！我说得对不对？”

他这问题是向观众说的，观众像古典齐诵队一样一齐喊起来：“对！轰出去！揍他！安静！继续放映！”

粗鲁的喧闹者在音乐伴奏下被赶出了电影放映厅，因为他们争吵期间，小小的影院乐队继续演奏着。每个演奏员在受聘时，都明确承担这样的义务。在争吵和把某个喧闹者赶出影院时继续演奏是协商好的工作条件之一，在其他方面，这里的工作条件也不特别有利。

在工作日，“盲人电影院”只放映一场晚场，星期天和节假日才放映三场。演奏员按演奏的场次取得报酬，因此收入不高。所以，在“盲人电影院”演奏的不是职业演员，而是从事各种职业的业余演员。他们把演奏当成舒适的兼职。演员中有我以前的同学奥尔达·S，白天，他在文策尔广场附近一家小药品杂货铺站柜台，晚上到齐斯科夫“仓库电影院”当第二小提琴手，演奏进行曲、轻歌剧乐曲、间奏曲、歌剧集锦、华尔兹以及其他乐曲。

这个小乐队的风琴手是一个好喝酒的老教师，有一次在排演时——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他突然中风，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小乐队没有可代替风琴手的木管乐器手。这时奥尔达叫我去帮忙。我具有所需要的演奏技能，院方马上就和我签订了合同，这样，我就在“仓库电影院”演奏了一段时间木管乐器。

我演出一场挣20克朗，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用第一个

星期的工资请装订工为我把卡夫卡的三个短篇——《变形记》、《判决》和《司炉》——装订成一本深褐色皮革封面的合订本，装订工在封面上烫了一丛荆棘，在荆棘下面加了线条流畅的烫金名字“弗兰茨·卡夫卡”。

我给卡夫卡博士讲“仓库电影院”时，这本书就在我膝盖上的皮包里。我拿出皮面精装书，自豪地递给弗兰茨·卡夫卡。

“这是什么？”他惊讶地问。

“这是我第一个星期的工资。”

“这不可惜吗？”

卡夫卡的眼睑颤动了几下。他的嘴扭歪了。他看了几秒钟烫金名字，粗粗翻了翻书，就把书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很明显，他生气了。

我正要问他，他什么地方不喜欢时，他咳嗽起来。

他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捂住嘴，咳过一阵以后，他把手绢放进口袋，起身走到他背后的洗手池，洗了手。他一边擦手一边对我说：“您对我评价过高了。您的信任让我感到沉重。”

他坐到办公桌边，两手按着太阳穴说：“我不是燃烧的荆棘丛。我不是火焰。”

我打断他的话：“您不能这样说。这是不公正的。比如对我来说，您是火、热、光。”

“不！不！”他一边摇头，一边反驳说，“您错了。我这些随便涂写的东西不值得订成皮面精装书。这只是我个人的噩梦。根本不该印出来。这些东西该烧掉、毁掉。是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我激动起来，我不由自主地要反驳他：“这些话是谁告诉您的？您怎么能这样说？您能看见未来？您刚才跟我说的，都是主观感觉。您所谓随便涂写的东西，到明天也许是世界的重要声音。这一点谁能未卜先知？”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卡夫卡凝视着桌面。他抿紧嘴角，形成两条皱纹。

我态度太激烈了，不觉有些羞愧，于是我用解释的口吻平静地说：“您还记得参观毕加索画展时您说的话吗？”

卡夫卡不解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道：“您当时说，艺术是一面镜子，像一只没有调准的钟表那样走快了。您写的东西在今天的‘盲人电影院’里也许只是明天的一面镜子。”

“请您别说这个了。”卡夫卡双手捂住眼睛，痛苦地说。

我向他道歉：“请原谅。我并不想惹您生气。我怎么这样蠢。”

“不，不，您不蠢！”卡夫卡的手依然捂着脸，来回晃着上身，“您说得不错，您的话肯定不错。因此，我恐怕什么也不能了结。我害怕真理。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做？”他猛地把手从眼睛上拿开，握成拳头支撑到桌子上，身体前倾，压低声音说：“如果我们帮不了什么忙，我们就只能沉默。谁也不允许用自己的绝望去恶化病人的状况。因此，我的全部拙笔都该毁掉。我不是光。我只是在自己的荆棘丛里迷了路。我是死胡同。”

卡夫卡靠到椅背上。他的手无力地从桌面上滑下。他闭上了眼睛。

“这我不相信，”我自信地说，马上又安慰地说：“即使真的是死胡同，那么向人们指出死胡同也是一大功绩。肯定还有别的人也走您这条路。”

听了我这几句话，卡夫卡只是慢慢地摇摇头：“不，不……我太虚弱、太累了。”

我感到我们之间气氛有些紧张。为了缓和气氛，我轻声地说：“您最好放弃这里的工作。”

卡夫卡点点头：“是的，我应该这样做。我本想在办公桌后躲藏起来，然而，办公桌却使我更加虚弱。”说到这里，卡夫卡非常痛苦地笑了笑，笑，“办公桌变成了一座盲人电影院。”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

这时，我听见身后响起了敲门声，非常高兴。

我带了在诺伊格鲍尔书店买的几本新书，让卡夫卡看。

卡夫卡一边翻看格奥尔格·格罗兹的一本画册，一边说：“这是资本的古老面貌——戴礼帽的胖男子坐在穷人的金钱上。”

“这只是一个比喻。”我说。

卡夫卡皱起了眉头。“您说‘只是’！在人的朦胧意识中，比喻变成了现实的反映，这当然是错误的。可是这已经是迷误了。”

“您是说，博士先生，这幅画是错的？”

“我不想这样说。这画既对又错。只有一个方面是对的，至于它把局部宣布为全景则是错的。戴礼帽的胖男子骑在穷人的脖子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胖男子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完全对了。胖男子是在某特定的制度范围内统治穷人的。但他并不是制度本身。他甚至不是制度的统治者。相反，胖男子也戴着画上没有画出的镣铐。这幅画是不完全的。因此不是好画。资本主义是一系列从里向外、从外向里、从上向下、从下向上的依附关系的体系。一切事物都具有依附性，一切都受制约束缚。资本主义是世界和灵魂的一种状况。”

“那么要是您来画，您将如何描画它？”

卡夫卡耸耸肩，忧伤地笑了笑：“我不知道。我们犹太人原本不是画家。我们不能静止地描绘事物。我们总是看见各种事物在流动、运动、变化。我们是小说家。”

这时进来一个职员，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离开办公室后，我想继续谈论刚才已经开始的十分有趣的话题。卡夫卡却说：“不谈这个了。一个小说家不能谈论叙述。他要么叙述，要么沉默。这就是一切。他的世界要么在他身上发出声响，要么在沉默中沉沦。我的世界正在消失。我已经燃尽了。”

我让卡夫卡看我的朋友符拉季米尔·西克拉^[146]为我画的肖像。他看了画高兴极了。他说了几次这样两句话：“这幅画美极了。它真实极了。”

“您是说，这幅画像照片那样逼真？”

“您想哪儿去了！最能欺骗您的莫过于照片。而真实是心灵的事。而心，只能用艺术才能接近。”

“真正的现实总是非现实的，”弗兰茨·卡夫卡说，“您看看中国彩色木刻的清、纯、真。能这样说话，真是一种本事！”

卡夫卡博士不仅钦佩古老的中国绘画和木刻艺术，他读过德国汉学家卫礼贤^[147]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书籍，这些书里的成语、比喻和风趣的故事也让他着迷。

有一次，我把老子的《道德经》的第一本捷文译本带到保险公司，就这个机会，我发现了卡夫卡对中国的兴趣。卡夫卡饶有兴味地翻阅了一会儿纸张很差的书，然后把它放到桌子上说：“我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过道家学说，只要有译本，我都看了。耶那的迪得里希斯出版社^[148]出版的这方面的所有德文译本我差不多都有。”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打开办公桌边上的抽屉，从里头拿出5本有黑色装饰图案的黄色精装书籍，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

我一本一本拿起这些书：孔子《论语》、《中庸》，老子《道德经》，《列子》，庄子《南华经》。

我把书放回到桌子上，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是的，”卡夫卡博士点点头，“德国人做事很认真。无论什么，他们都要把它办成博物馆。这5本书还只是整个文库的一半。”

“其他5本您以后还会得到？”

“不，这几本就够了。这是一个大海，人们很容易在这大海里沉没。在孔子的《论语》里，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东西越来越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却仍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就停止了玻璃球游戏。这些书中，只有一本我算马马虎虎读

懂了，这就是《南华经》。”

卡夫卡拿起署有庄子名字的书，翻了一会儿说：“有几段我画了线。比如这儿：‘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我想，这是一切宗教和人生哲理的根本问题、首要问题。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把握事物和时间的内在关联，认识自身，深入自己的形成与消亡过程。这里，再下面几行，我画了整整一段。”

他把打开的书递给我，书翻在第167页，他用铅笔画了4道线，框住了下面这段话：“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猗韦氏之圃，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人乎！圣人处物不伤物^[149]。”

我把打开的书递给卡夫卡博士，看着他，期待他做一番评论。他却无言地合上书，把它和其他书一起放回办公桌的抽屉里，于是我压低声音说：“我不懂这段话。说老实话，这些话对我太深了。”

卡夫卡愣了一会儿。他稍稍歪着头，静静地看了我片刻，然后慢慢地说：“这是正常的。真理总是深渊。就像在游泳学校那样，人们必须敢于从狭窄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摇晃的跳板上往下跳，沉到水底，然后为了边笑边呼吸空气，又漂浮到现在显得加倍明亮的事物的表面。”

卡夫卡博士像幸福的夏日垂钓者那样露出笑容。要不是我父亲来了，他肯定会给我解释用铅笔框住的这一段话。我父亲来接我，让我去做几件事。我只能希望，卡夫卡博士以后会再次谈论中国古代哲学家这个题目。

我总相信会有这种可能性。为了加强这种信念，我买了对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非常昂贵的庄子的书，用铅笔画出卡夫卡提到过的那一段落。连续几个星期，我总是把书放在皮包里随身带着，因为我想万一谈起庄子来，我就能马上拿出书来。可是卡夫卡博士再也没有提起过《南华经》。于是，我把这本做了很大牺牲买来的译本放到书架上。

但是，卡夫卡博士尽管没有谈，看来却仍在研究道家问题。今天还在我藏书中的两本小书——克拉邦德译的《老子格言》和菲德勒译的《老子道德经》德译本证明了这一点。我是从卡夫卡博士那里得到这两

本书的，当我问起菲德勒译本的发行人古斯塔夫·维内肯时，他为难地耸了耸肩。

然后他说：“他是德国候鸟协会[150]的创立者和主要发言人。古斯塔夫·维内肯和他的朋友想逃避我们这个机器世界的进逼。他们求助于自然和人类最古老的思想财富。正像您在这里看见的那样，我们到中国古老文献的译本里探求现实，而不去耐心地阅读自己的生活和责任的原文。对他们来说，前天似乎比今天更容易理解。而实际上，不论何时何地，真理都不可能像在自己生活的时刻那样易于被人接近和理解。只有在此时此地，人们才能获得真理，或失去真理。遮掩真理的只是显现的东西，只是外表。我们必须冲破外表。然后一切就都清楚了。”

卡夫卡博士微微一笑，我则蹙起眉头问道：“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如何行动？有可靠的指导吗？”

“没有，没有这样的指导，”卡夫卡博士摇摇头回答，“通向真理的道路没有时刻表。这里需要的是耐心献身的冒险勇气。开方子本身就是一种倒退，就是怀疑，因而也就是歧路的开端。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必须耐心地、毫不惧怕地接受一切。人是注定生，而不是注定死的。”

当他讲了这一番很严肃的话语后，又用捷克语和德语随便说出下面几句话时，他脸上掠过一丝迷人的、狡黠的微笑：“害怕森林的人不能到森林里去。可是我们大家都在森林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自己的不足。人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论卡夫卡博士。我父亲称他为坚定的孤僻者。他说：“卡夫卡博士很想自己做自己吃的面包，自己揉面自己烤。他也很想自己做衣服。他忍受不了做好的成衣。他怀疑现成的成语。传统习俗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思想制服和语言制服，被他当做侮辱人格的囚犯隔离沟而拒绝。卡夫卡博士是个坚定的平民，是不能与他人一起分担生活重负的人。他独自一人行进。他自觉自愿孤独的。这是他身上特别有战斗性的地方。”

几天以后，在卡夫卡博士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小事，证实了我父亲的话。

一长列穿着崭新军服、扛着明晃晃枪支的士兵在工伤保险公司外面

行进，旗帜飘扬，军号嘹亮。卡夫卡博士、我父亲和我站在开着的窗户旁。我父亲在拍照片，他要从不同角度拍下这行进的队伍。他担心拍不好，白费劲。

卡夫卡博士看着我父亲，轻轻笑了一声，这笑是什么意思不可捉摸。

我父亲看到这一点后说：“我已经用了12张底片了。我想，12张中也许会有几张好的。”

“可惜这些材料了，”卡夫卡博士说，“这套把戏太无聊了。”

“为什么？”我父亲惊讶地问。

“因为没有什么新东西。”卡夫卡博士回答，然后走向办公桌，“实际上，所有军队都只有一句座右铭：为所有在我们后面坐在收款处和办公桌边的人，前进！现代军队没有人类的真正理想作为他们的目标，而是背叛了一切人性。”

我父亲被这番话所震惊，低头看着地下，说不出一句话。当卡夫卡博士在办公桌边坐下时，他才缓过来，说，“您是反叛者，博士先生。”

“可惜是，”卡夫卡说，“我陷进了迄今为止最耗精力、而又几乎无望的造反之中。”

“反对谁？”我父亲问。

“反对我自己，”卡夫卡博士半闭着眼睛说，然后靠回到圈手椅里，“反对自己的狭隘和惰性。其实就是反对这张办公桌，反对我坐的椅子。”

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微笑着。

我父亲也想跟卡夫卡那样，露出笑容，但是他没有做到。他的嘴唇两侧皱起了两道细细的愁苦的皱纹，眼睑在颤动。

卡夫卡博士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递给我父亲几件公文。他对公文做了一些客观说明，想以此消除我父亲的不快情绪。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我父亲亲切地微笑着，和我一起离开了办公室。可是在走廊上还

没走几步，他就突然说：“这下你看清了！”

“看清了什么？”我问。

“他的本质！他就是这样，”我父亲说，“他几句话就能让一个人在自己面前出尽洋相。这时人们觉得自己像一个用空话填塞的稻草人。他说得对。我们不能生他的气。东拍西照的，纯属荒唐无稽之举。我真想把底片盒里的东西曝光，毁掉。”

我们一起观看登载在激进刊物《六月》上的约瑟夫·恰佩克^[151]的亚麻油毡版画。

“画的表现形式我有些不理解。”我说。

“那您也就不理解内容，”弗兰茨·卡夫卡说，“形式不是内容的外在表现，而是它的刺激，是通向内容的大门和道路。这种刺激发生了作用，隐蔽的背景也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批重要的美国电影和查理·卓别林的滑稽短片在布拉格放映时，当时尚年轻的影迷、今天的电影导演路德维希·文克利克给了我整整一包美国电影杂志和几张卓别林在滑稽短片中的剧照。

我把照片带给卡夫卡博士看。他赞赏这些照片，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

“您了解卓别林？”我问。

“很粗浅，”卡夫卡回答，“我看过一两部他的滑稽片。”

他很严肃、很专注地观看我放到他面前的照片，然后沉思地说：“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埋头工作的人。他对卑劣庸俗的不可改变感到绝望，在他的眼睛里，这种绝望的火焰在冒烟，然而他不投降。如同每个真正的幽默家，他有一副猛兽的利齿。他用他的利齿向世界进攻。他完全以他独特的方式进攻。他虽然搽白脸、涂黑眼圈，却不是伤感的丑角，也不是尖刻的批评家。卓别林是技术大师。他是机器世界中的人，在这个世界中，他的大多数同胞都没有必要的感情和思想工具，用以真正掌握赋予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想象。于是卓别林就开始工作。就像牙科医生制造假牙那样，他制造假幻想。这就是他的电影。一切电影都是假幻

想。”

“送给我这些照片的朋友说，电影交换站将放映整套卓别林滑稽片。您是不是和我一起去？文克利克一定会带我们进去的。”

“不去，谢谢，还是不去的好，”卡夫卡摇摇头说，“快乐对我来说是一件过于严肃的事情。我会像一个完全卸了装的小丑那样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弗兰茨·卡夫卡送给我几期《燃烧炉》杂志，里面登载着台奥多尔·黑克尔的文章、克尔恺郭尔译作以及卡尔·达拉哥论乔万尼·塞冈第尼^[152]的论文。

这些文章唤起了我对南阿尔卑斯山画家的兴趣。因此，我的朋友、青年演员弗兰茨·雷德勒送给我塞冈第尼的《论文书信集》时，我非常高兴。

我把书带给卡夫卡看，并让他特别注意让我喜欢的下述段落：“艺术不是那种存在于我们身外的真理。那样一种艺术没有、并且不可能有艺术的价值；它是、并且只能是对自然的盲目模仿，就是说是物质自然的简单再现。然而，物质必须用精神进行加工，才能上升为永恒的艺术。”

弗兰茨·卡夫卡把书从桌面上递给我，凝视了一会儿空中，然后转向我说：“物质必须用精神进行加工。这是什么？这就是体验，不外乎体验和把握体验的东西。重要的是这一点。”

每次我告诉弗兰茨·卡夫卡我去看过电影时，他总露出惊讶的神情。当他有一次又改变了他的脸部表情时，我就问他：“您是不是不喜欢电影？”

卡夫卡沉思片刻后回答：“其实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电影自然是一件了不起的玩具。但是我不能忍受，也许我的气质‘太重视觉’了。我是个眼睛人。而电影却妨碍观看。快速的运动和场景的快速变换迫使人经常地漏看。不是目光制伏图像，而是图像制伏目光。图像冲淹了意识。电影意味着使迄今为止裸露的眼睛穿上了制服。”

“这是一种可怕的看法，”我说，“一句捷克谚语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电影是铁制百叶窗。”

几天以后我又提起上述话题。我说：“电影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比新闻还强大得多。女售货员、帽店女店主、女裁缝等等等都是同一副面孔，都是巴巴拉·拉玛尔、玛丽·毕克馥和皮埃尔·怀特^[153]的面孔。”

“这是很自然的。对美的渴望使女人们成了女演员。真实的生活只是作家梦幻的反照。现代作家的琴弦是没有尽头的赛璐珞片子。”

我们谈论一家巴黎杂志的调查，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年轻艺术吗？

我说提出有没有年轻艺术的问题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只有艺术和庸俗艺术之分。这种庸俗艺术常常戴上各种主义和时髦的伪装。”

弗兰茨·卡夫卡说：“问题的重点不在中心词‘艺术’上，而在修饰词‘年轻’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们怀疑是否存在艺术青年。今天确实很难想象存在这样自由的、无忧无虑的青年。这些年恐怖的洪水淹没了一切，孩子们也没有幸免。污浊与青年也许是互相排斥的。然而今天的青年在何处？他们与污浊交好，关系那么亲密。人们认识污浊的力量，但是他们忘记了青年的力量。因此他们怀疑青年本身。而没有青年的自信的陶醉，又能算什么艺术？”

弗兰茨·卡夫卡伸出手臂，然后又像瘫了似地把手垂到膝上。

“青年是虚弱的。外界的压力十分强大。一面抵御，同时又要献身，这样就产生了痉挛，扭曲了脸。青年艺术家的语言更多的是掩盖，而不是揭示。”

我告诉他，我在吕迪亚·霍尔茨纳尔家遇见的青年艺术家通常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

弗兰茨·卡夫卡点点头。“是这样。许多人到这时候才去弥补他们的青年时代。到这时，他们才做强盗游戏和印第安人游戏。当然他们不是拿着弓箭截断市立公园的道路。不是这样的！他们坐在电影院里，观看惊险电影。如此而已。黑暗的电影院是他们被耽误的青年时代的简易幻灯机。”

在谈论年轻作家时，弗兰茨·卡夫卡说：“我羡慕青年。”

我对他说：“您还不老嘛。”

卡夫卡微笑着说：“我与犹太民族一样老，像永恒的犹太人一样老。”

我从一边看着他。他把胳膊放到我的肩上。“看您吃惊的样子。这只是说个笑话的可怜尝试。不过，我确实羡慕青年。一个人年纪越大，他的视线就越宽。但是他的生活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一次仰视，一次呼气。在这个时刻，人也许能通观他的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给卡夫卡博士带去布拉格捷文杂志《六月》的一期专号，上面登着纪尧姆·阿波里耐^[154]的长诗《区域》的译文。不过卡夫卡博士已经读过这首诗。

他说：“译文发表后我立即就读了。我也读过法文原文。这首诗收在诗集《醇酒集》^[155]里。这本诗集和福楼拜书信集的廉价新版书是我在战后得到的头两本法国书。”

我问道：“您印象如何？”

“什么印象？是指阿波里耐的诗还是恰佩克的译文？”卡夫卡把问题表述得更加精确。

“两者，”我加以说明，并马上发表了我的看法：“我完全被迷住了。”

“这我可以想象，”卡夫卡说，“诗和译文的语言都是杰作。”

这话让我兴奋起来。我的“发现”得到了卡夫卡博士的赞同，使我非常高兴。于是我滔滔不绝地谈起我的快乐，并说明我欣喜的原因。我引了诗歌开头的诗行，阿波里耐把埃菲尔铁塔当做一群咩咩叫的汽车羊群的女牧羊人与她攀谈，我谈起了他提到的布拉格犹太人市政厅上标着希伯来文钟点符号的大钟，引了描写格拉达的威茨教堂^[156]里文策尔礼拜堂的镶着玛瑙和孔雀石的墙壁的诗文，最后，我对阿波里耐作品的评价达到了顶峰：“这首诗是横贯在埃菲尔铁塔和威茨大教堂之间的抒情彩虹，这条彩虹怀抱着我们时代的整个色彩斑斓的现象世界。”

“是的，”卡夫卡博士点点头说，“这首诗确实是一件艺术品。阿波里

耐把他的视觉体验归纳成了某种类似幻觉的东西。他是一位能手。”

最后一个句子有一种奇特的双关意味。在字面上的钦佩之外，我感到他有一种没有说出、然而却让人清楚地感觉得到的保留态度，他的保留态度使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某种共鸣。

“一位能手？”我慢慢地说，“这个词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卡夫卡坦率地、而且在我看来又是轻松地说，“我反对任何一种熟巧。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个作家能超脱事物吗？不能！他被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世界紧紧抓住，就像上帝被他所创造的造物紧紧抓住一样。为了摆脱它，他把它从身上分离出来。这不是熟巧行为。这是一次诞生，一次生命的繁殖，与其他任何一种诞生一样。您听说过，妇女是降生孩子的能手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诞生和熟巧两字合不到一起。”

“当然合不到一起，”卡夫卡博士点点头，“没有熟练的分娩。只有困难的分娩或顺利的分娩，无论哪种情况，分娩都是痛苦的。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这一点您从阿波里耐的诗里也可看出来。他把他的种种空间经历凝聚成一个超人的时间幻觉。阿波里耐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部文字电影，它是使读者产生轻松愉快的图像的骗子。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耍花招的人，只有逗乐的人才这样做。作家总是力图把他的幻觉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为此，他采用看似平淡、而读者非常熟悉的语言。比如这里，您就能看到。”

卡夫卡博士说着，就从办公桌上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灰绿色纸板封面小书，放到我面前。“这是克莱斯特^[157]的小说，”他说，“这是真正的创作。语言非常清楚。您在这里找不到矫饰的语言，看不到装腔作势。克莱斯特不是骗子，不是逗趣者。他的一生是在人和命运之间幻影似的紧张关系的压力下度过的，他用明确无误的、大家普遍理解的语言照亮并记述了这种紧张关系。他要让他的幻景变成大家都能达到的经验财富。他为此而努力，却不耍言语游戏，不作评论，不施用诱惑。在克莱斯特身上，谦虚、理解和耐心变成任何一次分娩的成功所需要的力量。因此，我反复阅读克莱斯特的作品。艺术不是瞬即消逝的惊愕，而是长期起作用的典范。这一点，您从克莱斯特的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这里是现代德语语言艺术的根。”

德国达达主义^[158]领袖里夏德·希尔森贝克在布拉格做了一个报告。我写了一份报告。我把手稿带给卡夫卡。

卡夫卡看了报告后说：“您的报告不该叫达达，而应叫度度。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的巨大渴求。从根本上说，这是渴望生长，渴望自己的小我的扩展，渴望群体。人们从伤感的小我的孤独中逃到天真的愚蠢行为的喧闹中。这是自愿的、因而是有趣的癫狂。但这是疯癫。——倘若人们失去自身，他还能找到他人吗？他人——这就是极其深刻的世界——只是悄悄地吐露心曲。而他们安静下来的唯一目的则是：举起食指，指责人家说‘你，你^[159]！’”

我事后烧掉了手稿。

我写了一篇评论奥斯卡·鲍姆长篇小说《通向不可能之事的门》的文章。卡夫卡把我的文章交给弗利克斯·韦尔奇，后者在《自卫》杂志的副刊上把文章登了出来。几天以后，我在卡夫卡办公室里遇见一位名叫古特林的职员，他立刻分析起我的文章来。

他自然是持否定的看法。在他看来，我的文章和鲍姆的小说都是“一个病态人物的达达主义表现”。

我没有吱声。

但是，当他第五次重复上述观点时，卡夫卡插话了：“假如说达达主义是病态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外部征兆。如此而已。但是，孤立地压制疾病的外化表现，并不能消灭疾病。相反，这样做情况只能更糟。一个向体内生长扩散的肿瘤比几个体表肿瘤要危险得多。要真正治愈疾病，就必须铲除引起病变的根源。这样，由痉挛引起的畸变就自行消失。”

古特林没有回答。

这时进来另一位职员，争论就结束了。办公室里只剩我和卡夫卡两人时，我问道：“您也认为，我评论鲍姆小说的文章是达达主义的？”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话从哪里说起？我对您的文章一句话没有说。”

“我请您……”

卡夫卡做了个轻蔑的手势：“这可不是评论！就像小男孩挥舞玩具刀那样，批评者挥舞‘达达主义’这个词。他要炫耀他的可怕的武器，因为他很清楚，他的武器其实不过是玩具。我们只要向他伸出一把真正的大刀，就足以让男孩子安静下来，因为他担心搞坏他的玩具。”

“您原来没有谈鲍姆和我的文章，而是谈达达主义。”

“是这样，我察看大刀。”

“不过您把达达主义看成是病症。”我说。

“达达主义是一种残疾，”弗兰茨·卡夫卡非常严肃地说，“精神脊柱已经断裂。信仰已经破灭。”

“什么是信仰？”

“有信仰的人无法给信仰下定义，没有信仰的人下的定义则笼罩着被嫌弃的影子。因此，信徒不能说，非信徒不应该说。先知一向只说信仰的支撑点，从来不说信仰本身。”

“这些支撑点说明了信仰，信仰则闭口不谈自己。”

“情形就是这样。”

“那基督呢？”

卡夫卡垂下头：“这是一条明亮的深渊。人们必须闭上眼睛，免得掉下去。马克斯·勃罗德在写一本名为《异教、基督教、犹太教》^[160]的巨著。通过与这本书的对话，我也许会搞明白一点我自身。”

“您对这本书抱这么大的期望？”

“不只是对这本书寄予期望，而首先寄希望于每一片刻。我尽力使自己成为接受恩惠的真正候补人。我等待，我观看。恩惠也许来，也许不来。也许，这种既平静又不平静的期待就是恩惠的使者，甚或恩惠本身。我不知道。然而这并不使我感到不安。在这期间，我已经和我的无知交了朋友。”我们在谈话中讨论了各不同教派的优点和缺陷。我力图从卡夫卡嘴里听到他本人的解释。但是我没有成功。

弗兰茨·卡夫卡说：“上帝只能每个人自己去理解。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和他的上帝，都有他自己的辩护人和法官。神父和礼拜只是心灵的已经倦怠的体验和拐杖。”

有一次，卡夫卡在我皮包的书里看见一本侦探小说。他说：“您读这些东西不必害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其实也是一部侦探小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呢？那也是一出侦探戏。中心情节是：一个秘密逐渐被揭开。但是，还有比真理更大的秘密吗？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

“但什么是真理？”

卡夫卡沉默了片刻，然后淘气地笑起来：“看样子好像您抓住了我一句空话。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真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所需要、而又不可能从某个人那里得到或买到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内心一次又一次地生产真理，否则他就会枯萎。没有真理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真理也许就是生活本身。”

卡夫卡博士送给我一本一厘米厚的袖珍本书：美国人瓦尔特·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161\]](#)。

他对我说：“诗译得并不特别好。有些地方甚至文句不通。不过读了这些诗至少可以对诗人有一个印象，他是最重要的现代诗歌形式倡导者之一。我们可以把他的无韵诗看作阿尔诺·霍尔茨[\[162\]](#)、埃米尔·弗尔赫伦、保罗·克洛代尔[\[163\]](#)以及捷克诗人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伊曼[\[164\]](#)的自由格律诗的榜样。”

听到这里，我赶紧说，按照布拉格官方文学理论界的看法，为捷克文学打开世界之窗的雅罗斯拉夫·弗希利基多年以前就把惠特曼的《草叶集》当做奇特的语言实验译成了捷克文。

“这我知道，”卡夫卡博士说，“惠特曼诗歌的形式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其实，惠特曼的意义在别的地方。他把对自然和与之明显对立的文明的观察融合成唯一的、令人陶醉的生活感受，因为他经常看到眼前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他说：‘生活是死亡留下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因此他把他的整颗心献给每一片草叶。所以他很早就令我神往。我钦佩他在艺术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和谐一致。在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我们今天的机器世界的巨大力量因而被真正调动起来时，瓦尔特·惠特曼当了

病人的护理员。他做的事，我们今天实际上每个人都应该做。他帮助弱者、病人、失败者。他确实是个基督徒，因而是——尤其是与我们犹太人非常亲近的——人性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您非常了解他的作品？”

“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的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地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

我给弗兰茨·卡夫卡看莱奥·雷德勒送给我的奥斯卡·王尔德^[165]的论文集《目标》的德译本。他翻了翻书说：“这些文章闪光诱人，就像毒品闪光诱人一样。”

“您不喜欢这本书？”

“我没有这样说。相反，它很容易让人喜欢。这也是这本书的一大危险。它拿真理做游戏，所以是危险的。因为拿真理做游戏就是拿生活做游戏。”

“您是说，没有真理就没有真正的生活？”

弗兰茨·卡夫卡默不做声地点点头。稍停片刻后，他说：“说谎常常只是害怕的表现，害怕被真理压死。这是自身卑微的投影，是人们害怕的罪孽的投影。”

有一次我到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里，看见他皱着眉头站在办公桌旁。他向我诉说：“我是个完全无能的职员。我不能干净利落地处理一件公文。一切都在我这里耽搁住了。”

“我一点也没有看到嘛，”我说，“您的办公桌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桌子倒是干净的，”卡夫卡博士回答，在桌旁坐下，“每件公文我都尽快处理，尽快往下传。然而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了结。我在思想上继续跟着公文，从一个处到另一个处，从一张办公桌到另一张办公桌，沿着一条手的链条，直至收件人。我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冲破我办公室的四堵白墙。然而我的视野不是更宽广，反而缩小了。我也跟着缩小了。”他露出一丝苦笑，“我是一块破烂，甚至连破烂都不是。我不是滚到轮下，而是滚到一只小小的齿轮下，在这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黏黏糊

糊的职员蜂房里，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

我打断他的话：“就像我父亲所说的，一句话，职员生活是狗过的生活。”

“不错，”卡夫卡博士点点头，“可是我不向人乱吠乱叫，我也不咬人。您知道，我是个素食者。素食者靠自己的肉为生。”

我们两人都大笑起来，几乎没有听见外面的敲门声。一个职员走了进来。

我向卡夫卡讲述了我和父亲去文策尔广场附近的方济各修道院的情况。

弗兰茨·卡夫卡说：“这其实就是自选家庭联合体。为了得到解救，人自愿限制自我，抛弃最高最现实的财富——他自己。他想通过外部的约束得到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服从法律的意义。”

“可是，假如有人对法律没有认识，他怎样到达自由？”我问。

“人们会用殴打向他宣布法律。人们折磨他，鞭打他，直至他有所认识。”

“您是说，或迟或早，每个人都必定获得正确的认识？”

“我没有这样说。我刚才说的不是认识，而是作为目的的自由。认识只是道路……”

“完成目的的道路？那么说，生活只不过是一件任务，一项使命？”

卡夫卡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事情就是这样。人无法通观自己。他处在黑暗中。”

有一次我到卡夫卡博士那里时，他和我父亲站在窗边。他们转过身，略微点了点头，算是对我的问候的回答。

卡夫卡博士接着马上问我的父亲：“您在当兵的那段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了这样的经验，士兵比平民百姓还过得好，是不是？”

“是的，”我父亲点点头，“部队的食品供应不像老百姓那样紧张。比

起老百姓，人们更关心士兵。”

“这很清楚，”卡夫卡博士一边说，一边沉思地揉搓着刮得光光的下巴，“士兵身上有钱。他们是国家投资的载体，必须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是专门家。而老百姓只是人，国家在他们身上要尽量少花钱。”

“是这样，”我父亲叹了口气，“这一点在伤寒病隔离房看得非常清楚。谢天谢地，这种可怕的事已经过去了。”

“它还没有过去，”卡夫卡博士一边轻轻地说，一边走向办公桌，在那里站住，低下头，“恐怖在积聚力量，以便东山再起。”

“您估计还会有新的战争？”我父亲瞪大了眼睛问。

卡夫卡博士不语。

“这不可能！”我父亲激动地举起手，大声喊道，“不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

“为什么不可能？”卡夫卡博士轻声说道，两眼直视我父亲的眼睛，“您表达的只是一种愿望。难道您能坚定地说，这场战争是最后一场战争？”

我父亲不说话。我看见他的眼睑在颤动。

卡夫卡博士坐下，在桌面上交叉起瘦骨嶙峋的手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我不能这样说，”我父亲终于说，“您说得对，这只是愿望。”

“当人们陷在没到脖子的烂泥坑里时，有这种愿望是很清楚的事，”卡夫卡博士说，却并没有看着我的父亲，“我们生活在人口通货膨胀的时代。人们消灭比士兵和大炮便宜的平民百姓而赚钱。”

我父亲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大多数人都反对。”

“这不起作用，”卡夫卡博士沮丧地说，“多数人不做决定。他们总是做人家的命令他们做的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逆流而上的某个个人。不过，现在这样的个人也没有了。他由于追求舒适而消灭了自己。衬衣比

上衣离一个人更近。这样，我们将在自己的污垢中毁灭。如果我们不马上扔掉道德脏衣，我们每个人都将可怜地死去。”

弗兰茨·卡夫卡是第一个严肃对待我的精神生活、像对成年人那样跟我说话、因而增强了我的自我意识的人。他对我的兴趣是给我的一件厚礼。这一点我始终很清楚。有一次，我向他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

“我是不是抢夺了您的时间？我太蠢了。您给我的是这么多，而我却一点没有给您。”

听了这几句话，卡夫卡却很不好意思：“哪里，哪里！”他宽慰我，“您是个孩子。您不是强盗。我赠送给您我的时间，这些时间其实不属于我，而是属于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我们共同从保险公司偷窃我的时间。这可妙极了！其次，您也不蠢。您别说这种话了，这种话只能迫使我表白，献身于您的青春，了解您的青春，这使我非常高兴。”

我和卡夫卡在码头边散步。我告诉他，我病了一场，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写剧本《索尔》。

卡夫卡对我的文学习作很感兴趣。我想采用三部分构成的梯级舞台上演这个剧本。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台面表现三个精神世界：下面是老百姓的街道或开阔的空场，在它上面是王宫或某个人的宅邸，最上面是宗教世俗权力的庙宇，隐身者的声音威严地说话。

“这是一座金字塔，塔尖消失在云层里，”弗兰茨·卡夫卡说，“重心呢？这个剧本的世界的重心在什么地方？”

“在下面的人民群众中，”我答道，“尽管有这些个体形象，这依然是一出无名群体的戏。”

弗兰茨·卡夫卡扬起浓眉，稍稍向前突出下唇，用舌尖润了润嘴唇。他不看我。他说：“您的出发点的前提是错误的。无名就是没有名字。但是，犹太民族从来不是没有名字的。相反，它是上帝的优选民族，如果这个民族坚持实现律法^[166]的话，它就不会沉沦到无名的、因而愚蠢平庸的乌合之众的低级阶段。只有背离造型的律法，人类才变成灰色的、无形的、因而无名的乌合之众。而那时也就没有上下之分，生活就趋于平庸，无非就是生存；没有剧本，没有斗争，而只有材料的损耗，只有衰落。但是，这不是圣经和犹太的世界。”

我为自己辩护：“我的问题不是犹太和圣经。对我来说，圣经材料只是表现今天的群众的手段。”

卡夫卡摇摇头：“问题就在这里！您要做的是不对的。您不能把生活搞成死亡的比喻。那样做是罪孽。”

“您把什么叫做罪孽？”

“逃避自己的使命是罪孽。误解、不耐烦、懒散是罪孽。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

“写作就是引导。”我说。

“正确的话引导，错误的话诱骗，”卡夫卡说，“圣经被叫做圣书不是偶然的。它是犹太人民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昨天的东西，而完全是今天的东西。而在您的剧本里，这声音被处理成历史上用木乃伊保存下来的事实，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想把今天的群众搬上舞台。他们和圣经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您的剧本的核心。圣经的人民是个人通过一条律法联合在一起。今天的群众则抵制任何联合。他们因为内心没有律法而各奔东西。这是他们无休止的运动的推动力。群众迈着快步，穿过时间奔跑急走。奔向何方？他们从什么地方来？谁也不知道。他们越向前迈进，就越达不到目的。他们无益地消耗了他们的精力。他们想，他们在走。其实，他们在原地踏步，跌进了虚空之中。如此而已。人在这里失去了故乡。”

“您怎么解释民族主义的增长？”我问。

“这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正确，”弗兰茨·卡夫卡回答，“人总是追求他没有的东西。各国人民共同的技术进步越来越使他们失去民族特性。因此他们追求民族特性。现代民族主义是抵御文明进攻的运动。这一点在犹太人身上看得最清楚。如果他们在周围世界感到舒适，感到如鱼得水，也就不会有犹太复国主义。所以说，是周围世界的压力使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面貌。我们回家，我们寻根。”

“您坚信，犹太复国主义是唯一的正确道路？”

卡夫卡尴尬地微笑起来：“道路是否正确，总是只有到目的地才能看

清。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在走。我们在运动，就是说，我们活着。我们周围反犹主义在增长，但这不坏。犹太教法典说，我们犹太人像橄榄那样被砸碎，就是做出了我们最大的贡献。”

我说：“我想，世界进步工人运动将不允许反犹主义的进一步扩张。”

弗兰茨·卡夫卡却忧伤地垂下头。他说：“您错了。我想，反犹主义也将波及工人运动。这一点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可以看到。它是工人运动的一个结果。它本应充满进步的光明精神。它现在情况如何？保险公司现在是文牍主义者的黑窝，我是里头唯一的摆样子的犹太人。”

“这可太可怜了。”

“是的，人太可怜了。因为他在不断增加的群众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越来越孤独。”

我们谈论抽烟。

我说：“我认识的大多数小伙子为了造成自己已经成人的错觉而抽烟。这种荒唐事，我从来没有跟着干过。”

“这一点您得感谢您父亲。”卡夫卡博士说。

“是的，”我赞同他的看法，“就像我父亲那样，人们无须模仿成年人的愚蠢习惯，就能成为成年人。”

卡夫卡举起手，在空中晃了晃说：“而反过来，谁要是让周围的坏思想坏习惯牵着鼻子走，谁就是不自尊。没有自尊就没有道德，没有秩序，没有坚贞，没有促进生活的温暖。这样，一个人会像一堆牛粪那样分崩离析。他只能对那些蛆虫和昆虫有点用处。”

我到弗兰茨·卡夫卡的办公室。他倦怠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垂着手，闭着眼。

他笑眯眯地向我伸出手：“我昨天晚上过得坏透了。”

“您去看过医生？”

他撮尖嘴巴。“医生……”他手心朝上抬起手，然后又垂下，“人们无

法逃脱自己。这是命运。我们唯一可能做的是，在冷眼旁观中忘却命运在拿我们戏耍。”

住在齐斯科夫区耶塞尼乌斯街的斯瓦特克太太上午在我父亲家当佣人，下午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当清洁工。她几次看见我和她认得的弗兰茨·卡夫卡在一起，所以有一天她向我讲起卡夫卡。

“卡夫卡博士是个很正派的先生。他跟别的人完全不一样。这从他怎样给别人东西上就能看出来。别的人把东西塞到你手里，那东西仿佛刺你一样。他们不是给，而是贬低你，侮辱你。有时，我真想把小费扔掉。而卡夫卡给人东西时总让人高兴。比如说他上午没有吃完的葡萄。别的人吃剩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卡夫卡则不同，他总是把葡萄或其他水果整理得好好的，放在一个盘子里。我走进办公室时，他只是那么随便说一句，说我也许用得着这些水果。可不是吗，卡夫卡待我不像老清洁工。他是个很正派的先生。”斯瓦特克太太说得不错，卡夫卡掌握馈赠的艺术。他从来不说：“您把这东西拿去，我送给您。”他给我一本书或一本杂志时，总是只说这么一句：“您不用再还我了。”

我们谈论N.。我说N.笨。卡夫卡说：“笨是人之常情。许多聪明人并不聪慧，归根结底并不是聪明人。他们因为害怕自己碌碌无为而变得不合情理。”

有一次一个职员来找卡夫卡，他说话有些粗鲁。

办公室里只剩我们两人时，我问：“这是什么人？”

“这是N.博士。”卡夫卡说。

“真是个粗人。”我说。

“哪里！他只不过习惯不同。也许他听说过，流氓无赖用文雅的举止跻身社交场合，广交朋友，所以他不穿燕尾服，套上粗麻袋。如此而已。”

卡夫卡博士的办公桌上放着许多信函、照片和旅游广告。

看见我询问的目光，他解释说，他想到一个小小的山区疗养院住些日子。“我不想进大的康复工厂，”他说，“我想到有医生照料的家庭膳宿公寓。我不要豪华舒适。”

“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是位置和山区清新的空气。”我说。

“这也重要。”卡夫卡博士点点头，“不过最宝贵的恐怕还是我不得不至少暂时地抛却旧习惯的锁链，被迫面对因回忆而大放异彩的世界橱窗，盘点我那大大减轻了的生活钱袋。不管人们前往何处，人们总是追踪着他自己的被误解的本性。”

秋天很潮湿，严寒的冬天又早早来临，这加重了卡夫卡的病。

我到他办公室时，他的桌子空着。“他发烧了，”坐在第二张桌子旁的特雷默尔博士对我说，“也许我们见不着他了。”

我很忧伤地回家去。他的桌子空了好几个星期。

然而有一天，弗兰茨·卡夫卡又来到了办公室。他脸色苍白，腰背微弯，脸上堆着笑意。他疲惫地轻声对我说，他只是来交接几份案卷，从办公桌里取几件私人材料的。他的身体情况很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去高塔特里山^[167]一家疗养院。

“这好极了，”我说，“如果您有这种机会，就尽快去吧。”

弗兰茨·卡夫卡忧伤地笑笑。

“这正是最耗人最棘手的事情。生活中有种种可能性，而在一切可能性中反映出来的只是自身存在的一种无法逃脱的不可能性。”说着，他一阵痉挛的干咳，但很快就压下去了。

我们相视而笑。“您看，”我说，“一切都会好的。”

“会好的，”弗兰茨·卡夫卡慢慢地说，“我对什么事情都说同意。这样，痛苦就变成了魔术，还有死亡，它只是甜蜜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他动身去塔特里山的疗养院前，我向他告别。我说：“您一定会休养好，健康地回来。未来会弥补一切。一切都会改变的。”

卡夫卡笑笑，把右手食指放到胸前：“未来已经在我身上。改变只是隐蔽的伤口的外露而已。”

我不耐烦了：“如果您不相信会康复，为什么还要去疗养院？”

卡夫卡在桌子上俯下身来：“每个被告都想方设法推迟判决。”

我和女友海伦妮·斯拉维切克从赫鲁梅茨来到布拉格。我们去我父亲的办公室，向他报告我们已经到达。我们在楼梯上碰见弗兰茨·卡夫卡。我向他介绍海伦妮。

两天以后他对我说：“女人是陷阱，从各方面窥视着人，想拉他就范。如果人们自愿跳进陷阱，她们就失去任何危险。但是，如果人们慢慢习惯，因而制伏了这个陷阱，那么，所有女性的捕兽铁爪又会重新张开。”

第二天，当我一个人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时，我问卡夫卡博士：“博士先生，您觉得海伦妮怎么样？”

他把脑袋往左一歪，说道：“这是完全次要的。她是您的女友。您肯定被迷住了。爱情嘛，就像任何一种魔术，一切都只取决于一个字。‘一个’女人这个范围广泛的不确定的名称必定让位于界定精确的‘这个’女人的名称。类别概念必定成为命运之力。然后，一切就都妥帖了。”

在谈论布拉格团体“工人复国党”的领导人时，我们谈起了该团体无可争辩的首屈一指的演说家，从前的演员鲁道夫·K.。当我提到美男子鲁迪^[168]在女人中获得的成功时，卡夫卡博士说：“对女人来说，这种男人的幸福是摧毁她们生活的不幸。如同每一个单方面的、建立在他人弱点和痛苦之上的幸福，这种幸福是深重的罪孽。沐浴在虚假幸福的光照之中的人最终必定会在某个荒凉的角落被自己的惧怕和利己欲窒息而死。”

年轻的F·W因爱情挫折而自杀。我们谈论此事。卡夫卡说：“什么是爱？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的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爱就像运输工具那样毫无问题。成问题的只是驾驭者、乘客和公路。”

我向他讲起我的中学同学W.。他14岁时被他的法语女教师诱奸，从此，他害怕所有年轻姑娘，甚至害怕自己的姐姐，于是不得不请心理分析专家帕策尔博士给他治疗。

“爱情总要带来无法真正治愈的创伤，因为爱情总是在污秽的伴随中出现，”卡夫卡说，“只有情人的意志才能导致爱情和污秽的分离。而像您的年轻朋友这样尚未自理的人在爱情中还没有自己的意志，所以，他

就被污秽的东西所污染。他是未成熟时的迷惘的牺牲品。这样就会产生严重的损害。一个男子的痛苦表情常常只是凝固了的儿童的迷惘。”

有一次散步时，我谈起了我的女友海伦妮。这时弗兰茨·卡夫卡说：“在相爱的时刻，人不仅对自己负有责任，而且对他人也负有责任。这时，他处于某种陶醉状态，这种陶醉状态减弱了他的判断力。人的自我的内容比此刻的意识的有限视野要大。意识只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每做一次决定，人们就给他的整个自我规定了方向。这就导致误解的最通常、最严重的冲突。”

在议论C.时，卡夫卡说：“感官性这个词的词干是感觉，感官。这有非常确定的意义。人只有通过他的感官才能感受认识。自然，这条路也连着危险。人们会把手段置于目的之上。这时，人们得到的只能是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认识的感官享受。”

我记得，我曾注意到弗兰茨·卡夫卡非常喜爱讽刺性文字游戏，对语言有独具特色的想象。可是在我的笔记里只有一条这种记载。

有一次我告诉他，中学四年级曾为借奥托·尤利乌斯·比尔鲍姆^[169]的长篇小说《杜鹃王子》一事争吵得不亦乐乎。

“那些放荡不羁行为的描写对我们很有诱惑力。”我说。

“放荡鬼，”卡夫卡说，“这个字眼总让我想起荒漠、堕落。放荡鬼在荒漠浪荡。”

“女人是荒漠。”我说。

卡夫卡耸耸肩：“也许是。欲念之泉是他的寂寞之泉。他喝得越多就越清醒。最后他再也解不了渴了，于是他喝酒，而不能从干渴中得到解脱。这就是放荡鬼。”

在波里斯的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旧大楼对面是刷成棕黄色的老旅店“金鸡旅店”。住在这幢单层房子里的主要是那种在旅馆前来回走动等客的女人。

一次，我在保险公司前等卡夫卡博士，他来到我面前说：“我在上面看见您很专注地观看姑娘队列。”

我觉得脸红了，就说：“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女人。我只是对她们的顾客感到好奇。”

卡夫卡从侧面看着我，然后正视前方，过了一会儿对我说：“捷克语很深沉坦诚。把这类女人叫做鬼火简直太贴切了。那些想就着这点闪烁不定的沼气火星取暖的人该有多可怜、多孤独，冻得多厉害啊。他们肯定非常贫穷无望，人们只要看他们一眼就会伤了他们。所以最好不要看他们。可是扭转脑袋又会被看作是看不起他们的表示。难啊……通向爱的路总是穿越泥污和贫穷。而蔑视道路又会很容易导致目的的丧失。因此，人们只能顺从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路。也许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到达目的地。”

有一次我到办公室找卡夫卡博士时，他正在研读各种捷克法律。他用厌烦的手势把那些材料一把扔进从办公桌抽出的抽屉里，叹了口气。

我说：“读这些东西很无聊，是吧？”

“不仅无聊，而且令人讨厌！”卡夫卡博士说，“对于立法者，人不外是罪犯和胆小鬼，他们的行为只取决于暴力威胁和惧怕。然而，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短视的，因而也是危险的——首先对立法者自己。”

“为什么首先对立法者？”

“因为人们在内心脱离了他们。由于蔑视人，立法者创立的不是秩序，而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可见的混乱状态。”

“这一点我不很懂。”

“这道理很简单，”卡夫卡博士说，把身子舒适地靠到椅背上，“由于全球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单个人集成了一个巨大的人群。然而，每个群体的性质都取决于其最小的组成部分的结构和内部运动。这也适用于作为群体的人。因此，我们要给予每个人以信任，以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必须给他自信心和希望，从而真正给他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工作、生活，才不会感到包围我们的法律机器是侮辱人格的畜圈。”

我到波里斯弗兰茨·卡夫卡办公室拜望他的时候，我父母的婚姻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家里经常争吵，使我不得安宁。我向他诉说此事，并坦率地告诉他，这种吵闹不休的环境是我从事文学尝试的根本原因。

“假如家里情况不是这样，我也许不会写作，”我说，“我想摆脱他们的吵闹，不想听见我周围和我内心的声音，于是我就写作。就像有人用钢丝锯做各种小玩意儿，以消磨晚上无聊的时光那样，我拼凑句子，拼凑文章，这样我就有理由一个人躲在一边，与困扰我的环境隔绝。”

“这很对，”卡夫卡说，“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福楼拜^[170]在一封信里写道，他的小说是一块岩石，他紧紧抓住它，免得掉进周围世界的漩涡之中。”

“我虽然也叫古斯塔夫，但不是福楼拜。”我笑着说。

“灵魂保健的技术不是某几个人的专利。倘若福楼拜的名字您听着不合适，我可以告诉您我自己的情况。我有一段时间也曾像您这样做过。只是我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我胡写乱涂，以此逃避我自己，而最后又抓住了我自己。我无法逃脱自己。”

我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了我和弗兰茨·卡夫卡谈话时的话题。

我说：“我忍受不了所谓的家庭生活。”

“这可不好，”卡夫卡关切地说，“如果您只是观察家庭生活会怎么样？这样，家里人会以为您和他们一起生活，而您也得到了安宁。再说这情况也有一部分是真的。您会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和他们一起生活。事情就是这样。您在家庭圈子之外，脸朝家庭，这就够了。也许您还会不时地在他们的眼里发现您自己的图像——就像园子里的玻璃球上的小画那样。”

“您建议我做的纯粹是精神杂技。”我说。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杂技。这种杂技很危险，因为人们通常根本看不见它。不过，玩这种杂技不会折断脖颈，而只会折断灵魂。人不会因此而死，他会成为功绩卓著的生活残疾人而继续活下去。”

“您能不能举什么人做例子？”

“我举不出谁做例子。只有在例外情况才能举例子。而那些所谓聪明人通常都只是些生活受创伤的人。他们是多数，他们容不得对他们不利的例子。”

有一次，我又抱怨家里争吵不和睦时，卡夫卡说：“您别生气激动。请您保持安静。安静是有力量的表现。但人们也可以通过安静得到力量。这就是两极法则。所以请您保持安静。静心忍耐使人自由，甚至让人视死如归。”

家里吵得不可开交。母亲越来越妒忌吃醋，对父亲纠缠不休。她与比她年轻14岁的丈夫一比，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这样，她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因丈夫的贬损而变得更加强烈。她怀疑他对她不忠，可是又找不到确凿证据，于是她就怀疑他虚伪无比，诡计多端。她这种感情每每表现为敌视的目光、冷酷无情的话语以及越来越多的贬人损人的小动作。

饭没有做好，父亲爱吃的饭菜从食谱上消失了；父亲从办公室回来时，房子里乱七八糟的，开着的窗户里窗帘乱飘；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桶脏水；房间里，被子褥子乱堆一气；主妇不在；女佣人得到额外假期休假去了。父亲在这样一个他觉得生疏不快的环境里不知所措。开始时，他只是轻声抱怨两句，后来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越吵越厉害。

有一次，他们从头天下午一直吵到第二天上午，夜里只休息了一小会儿。他们吵架后，我又羞又恼，心里乱糟糟地去找卡夫卡博士。他静静地听我因激动而结巴的讲述。然后他锁好办公桌，把钥匙放到裤兜里，站起来说：“您知道吗？我对办公室不感兴趣，您对一切使您感到压抑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组成二重唱，散步去吧。我们得透透空气。”

到了楼前，他用手挽住我的胳膊，笑了笑对我说：“我们到以前的王城散散步。正派的浪荡子通常都先喝一杯葡萄酒或香槟酒再去闲逛。可惜我们两人都不是容易满足的麻醉品消费者。我们需要更为复杂的麻醉剂。好，我们到安德烈书店去。”

“我可只有几个克朗。”我轻声说。

“我也是，”卡夫卡博士随便挥了一下手说，“我在那里认识一位叫戴米的先生，他会关照我们的。”

卡夫卡博士果然没有说错。出生于罗斯托克^[171]的戴米先生爱上了布拉格城，在火药库旁开了一间小书店，他是书业的行家里手，很快就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他在黑色柜台上给我们放了一大摞新旧书籍。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戴米先生给我们看了哪些书。我只记得卡夫卡博士给他自己和给我买了什么书，怎样概括这些书的特点。

卡夫卡博士给我买了查理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保尔·高更[172]的《从前和后来》和阿图尔·兰坡[173]的《生活与诗》。

狄更斯的书是我自己选的，这本书是我藏书中缺少的这位作家的少数几本书之一。卡夫卡博士同意我的选择。

他说：“狄更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可以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我企图效法的榜样。您喜爱的卡尔·罗斯曼是大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174]的远房亲戚。”

“博士先生，狄更斯让您入迷的是什么东西？”

卡夫卡不假思索就回答：“他对事物的掌握，他在外界和内心之间保持的平衡，他对世界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出色而又简单的描写，他的非常自然的匀称。当今大部分画家和作家缺少这些东西。比如说，您在这两位法国人身上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说着就把上面提到的高更和兰坡的那两本书塞给我。他自己买了古斯塔夫·福楼拜的3本《日记》。他说：“福楼拜的日记非常重要，非常有趣。我早已有这几本日记了。我现在再买一套给奥斯卡·鲍姆。”

我想拎两个包，可是卡夫卡博士不让我这样做：“不，不，不行。您不能提我的陶醉材料。在陶醉和死亡两件事上，我们不能让别人代替自己。”

我反驳他：“如果您是鲍姆买的，那么这几本书就不是您的陶醉材料。因此我可以拿。”

可是卡夫卡却使劲摇头：“不，不！这不行！使我陶醉的正是馈赠。这是最最精心安排的陶醉。我不让别人为我服务，从而失去这种陶醉。”

我们每人夹着一包书，一起越过护城河，走上文策尔广场，经过圣文策尔骑马雕像（左手）和新德意志剧院（右手），来到市立公园，然后，我们在布莱导街边的小摊上喝了一杯牛奶，在建有人造瀑布的小鸭池边逗留了片刻，过了鸭池，我们沿着一条上坡路走向电车站，乘车前往城堡。

路上，卡夫卡博士谈了他对给我买的那几本书（除了《大卫·科波菲尔》）的作者的看法。

他说：“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和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每一个画家、作家、剧作家和诗人都必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其结果自然是现存各因素的不同混合。对于画家保尔·高更来说，现实只是运用形式与颜色创作独特艺术品的马戏团高架。而兰坡则用语言做同样的事，而且超出了言词本身。他把元音变成颜色。通过这种声音与颜色的变换魔术，他接近了原始部族的神秘的宗教实践活动。他们怀着恐惧与不安，跪拜在各种各样木制或石制偶像前。然而由于进步，材料减价了。我们使自己成了偶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恐惧的阴影更强烈地钳制我们，折磨我们。”

卡夫卡博士沉思地看着窗外。

后来我曾试图重新挑起他已经论及的关于现代偶像崇拜的话题，不过没有成功。对于我在这方面向他提出的暗示和问题，卡夫卡博士没有做出反应。

我们离开格拉达北侧的电车站，走了一小段路，跨过马利亚壕堑和斯陶普桥，穿过城堡的两个院子，经过瑞典宫和眺望台，穿过旧市政厅胡同，来到罗勒托街和罗勒托广场。到了这里，卡夫卡博士觉得很乏，我们就又登上了电车。

来到老城环形道，离他家不远时，他说：“您家里的争吵不仅折磨您，您的父母更深受其害。异化使您的父母互相疏远，分道扬镳，他们由此而失去许多我们人所拥有的宝贵东西，失去了很多生活内容和生活的意义。这样，就像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您的父母在心灵上是残疾的。今天，大多数人在感觉和想象这两方面是残废者。因此，您不能把您的父母推回去。您必须像对盲人和瘸子那样引领他们，搀扶他们。”

“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绝望地问道。

“用您的爱。”

“倘若他们两个人都打我呢？”

“是的，正是这时您要表现出爱。您要用您的平静、您的宽容和耐

心，一句话，用您的爱唤醒您父母身上已经处于消亡中的东西。不管他们怎么打，怎么不公，您都要爱他们，重新引领他们恢复公正，恢复自尊。因为什么叫不公？不公就是健康状况不佳，迷途，摔倒，在尘土中爬行，不符合人的尊严的姿势。您必须像对待两个迷途的人那样，用您的爱把您的父母扶起扶正。您一定要这样做。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否则我们就不是人。您不能因为痛苦而谴责他们。”

他用手轻轻抚摩了一下我的左脸颊：“再见，古斯蒂^[175]！”说完，他转过身，走进房子黑暗的玻璃门。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像我父母一样叫我古斯蒂，而且用手……我还感觉到他手指尖的温柔的触摸。但是我后背一阵战栗，突然打起喷嚏来，仿佛我感冒了一样，我慢慢举步，跨过老城环形道，走向黑暗的艾森胡同，我的下巴一直在微微颤抖。

我告诉卡夫卡，我父亲不同意我学音乐。

“您乖乖地服从吗？”他问。

“哪里！”我答道，“我有自己的头脑。”

卡夫卡很严肃地看着我。“通过自己的头脑最容易失去自己的头脑，”他说，“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您学音乐。正好相反！只有经受理智考验的热情才有力度和深度

“音乐可不是热情，而是艺术。”我说。

卡夫卡却笑笑：“每一种艺术后面都有热情。于是您为您的音乐而受苦，而斗争。于是您不屈从于父命，因为您爱音乐及与之相关联的东西甚于爱自己的父母。而在艺术中，情况总是这样。人们为了获得生活，就得抛弃生活。”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到了要离婚的地步时，我对卡夫卡说，我要离家出走了。

弗兰茨·卡夫卡慢慢地点头。“这是痛苦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坚定地跨进事情的对立面，有些事情才能达到。人们不得不走向远方，去寻找已经离开的故乡。”

当我告诉他，我要当音乐家，夜里去演奏时，他说：“这样做非常有益于健康。而且，您脱离了人的集体。夜晚变成您的白天，而人的白天变成梦幻。您会变成周围世界的对立体，而您自己不觉察。您现在年轻，不会觉察什么，可是几年以后，您就会面对自己的空虚而闭上眼睛，您会失去直视的力量，周围世界会将您淹没。”

在法院第一次审理我父母的离婚案以后，我去看望弗兰茨·卡夫卡。我当时很激动，很痛苦，因此态度不公正。

我诉了一番苦以后，卡夫卡说：“您要冷静耐心。您尽管让坏事发生好了。您不要逃避。相反，您要仔细观看。您要用主动的理解代替被动地接受刺激。这样您就会应付这些事情。人只有经过自己的微小才能达到高尚。”

当我们一次在一个晴朗的秋日下午，慢慢走过落满秋叶的园子时，卡夫卡博士对我说：“耐心是应付任何情况的巧妙办法。人们必须和一切事物一起共振，热衷于一切事物，同时又必须平静耐心。不能弯曲，不能折裂。只能克服，始于自我克服的克服。人们不能逃避这一点。逃离这条轨道就是崩溃。人们必须耐心地吸收一切，耐心地成长。胆怯的自我的界线只有用爱才能突破。人们必须在我们周围沙沙作响的枯萎死亡的树叶背后看见幼嫩鲜亮的春绿，耐心等待。耐心是实现一切梦想的唯一、真正的基础。”

这是卡夫卡博士的生活准则，他坚持不懈而又耐心宽容地力图把他的生活准则灌输到我身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次微笑、他的大眼睛的每一次眨动、他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长年累月的全部工作使我坚信这条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正像我从父亲那里听说的那样，卡夫卡博士在波里斯7号的烟雾工厂的光滑铮亮的办公桌后面坐了整整14年，差不多一代人平均年龄的一半。他1908年7月30日进入保险公司当职员，1922年7月1日以高级秘书的身份申请退休，离开保险公司。

为卡夫卡的办公室和我们家在卡罗琳娜塔尔的住宅打扫卫生的斯瓦特克太太对我说：“卡夫卡博士像一只小耗子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地消失了。他在保险公司悄悄地生活了许多年，又悄悄地走了。我不知道，是谁清理了他的桌子。在柜子里只挂着一件卡夫卡博士很薄的灰色

备用大衣，突然下起雨来时，他就穿这件大衣。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带过雨伞。一位仆人拿走了大衣。我不知道，他是把大衣送给了卡夫卡博士还是自己留下了。我用水和肥皂清洗了空空的柜子。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长条形的旧玻璃碟子，里面有两支铅笔和一支钢笔。旁边放着一个很漂亮的金蓝色茶杯，一个配套的小盘子。特雷默尔博士看见我收拾，就对我说：“把这些玻璃碎片都弄走！玻璃碟子是卡夫卡博士的工作用具，那杯子是他常用来喝奶的，有时也用它喝茶。”于是，我就把特雷默尔博士称为玻璃碎片的東西带回了家里。”

我在斯瓦特克太太家的厨房里坐在她对面。她走向刷成白色的碗橱。拿出卡夫卡博士留下的“碎片”，用一块清洁巾仔仔细细地把它们擦干净，然后很谨慎地放到我面前。

“您把这些东西拿走吧，少爷！我知道，您很喜欢卡夫卡博士。您用不着对我讲什么。在您真正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很帮忙，对您很好的。我想，这些他用过的东西您会很好保存的。”

情况自然如此。不管我处于什么情况，搬了多少次家，这只小小的瓷杯一直陪伴着我。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我羞于用我的嘴唇去接触弗兰茨·卡夫卡用过的杯子。

每当我看见斯瓦特克太太送给我的金蓝色杯子时，我就不禁想起卡夫卡博士在一次夜色朦胧时穿越雨水汪汪的泰因霍夫的路上对我说的话：“生活大不可测，深不可测，就像我们头上的星空。人只能从他自己的生活这个小窥孔向里窥望。而他感觉到的要比看见的多。因此，他首先必须保持窥视孔的清洁纯净。”

我是不是始终这样做了？

我不知道……我想，只有像卡夫卡博士这样的醉心于真理的圣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1924年夏天我在上格奥根塔尔，住在布吕克斯家。6月20日星期五，不错，1924年6月20日星期五，我接到我的朋友、画家埃里希·希尔特从布拉格发来的一封信。

他写道：“我刚刚从《日报》编辑部得知，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于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基尔林的一家小小的私人疗养所去世。1924年6月11

日星期三，他被安葬在布拉格斯特拉施尼茨犹太人公墓[176]。”

我仰望挂在我床头上面墙上的我父亲的一幅小小的画像。1924年5月14日，他自愿结束了生命。

21天以后，6月3日，卡夫卡走了。

21天以后……

21天……

21……

再过这么多年，我青年时代敏锐的感觉和精神视野崩溃了。

[1]这是德国著名文艺评论家汉斯·迈耶尔1979年在北京大学讲演时的论断。——编者

[2]奥登：《卡夫卡问题-K的寻求》，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6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编者

[3]* 这是本书作者古斯塔夫·雅诺施在该书出版时写的前言。古斯塔夫·雅诺施（Gustav Janovch）1903年生于多瑙河支流德拉河畔的马尔堡（1918年归南斯拉夫，南名为马里博尔，邻近奥地利），在布拉格长大，先后在布拉格、埃尔博根和维也纳上大学。他创作轻音乐，著有以音乐和音乐家为题材的书籍多种，因而在家乡颇享盛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1968年在布拉格逝世。——编者

[4]即雅娜。——译者

[5]很久以后才知道，我这样猜疑是冤枉马克斯·勃罗德。——作者

[6]捷克城市，捷名为特雷津，1941—1945年希特勒曾在此建立集中营。——译者

[7]加缪（1913—1960年），法国作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贝克特（1906—1989年），爱尔兰作家，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8]布拉赫（1546—1601年）丹麦著名天文学家。勃罗德的《蒂肖·

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出版于1916年，扉页题词为“献给我的朋友弗兰茨·卡夫卡”。——译者

[9]《变形记》主人公。——译者

[10]保尔·阿德勒（1878—1946年），他的长篇小说《魔笛》出版于1916年。——作者

[11]路德维希·温德尔（1889—1946年），小说家、剧作家，1928年前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日报当编辑。他的长篇小说《犹太管风琴》出版于1922年。——作者

[12]大卫·加尼特（1892—？年），英国小说家和批评家。他的长篇小说《妻子变狐记》出版于1922年，德译本出版于1952年。——作者

[13]胡斯（约1372—1415年），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译者

[14]奥托·佩克（1887—1940年），日报《布拉格新闻》编辑，以翻译捷克语作品闻名。——作者

[15]当时，卡夫卡父亲的店在老城环形道的金斯基宫内；卡夫卡和父母住在巴黎街和老城环形道交叉口的—座房子里。——作者

[16]格拉达，布拉格的古城堡和城区名，旧皇宫所在地。——译者

[17]韦尔奇（1884—1964年），哲学家和政论家，是布拉格复国主义周报《自卫》的主编。——作者

[18]捷克西部河流，流经布拉格。——译者

[19]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捷克属奥匈帝国。——译者

[20]《司炉》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第一章。——译者

[21]密伦娜·耶森斯卡（1895—1944年），是一个将卡夫卡小说译成捷克文的译者。关于她和卡夫卡的关系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密伦娜书信集》，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1952年。——作者

[22]卡尔·罗斯曼，《司炉》中的人物。——译者

[23] F.为菲利斯·鲍威尔（1887—1960年），弗兰茨·卡夫卡曾两次（1914和1917年）与她订婚。题词背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菲利斯书信及订婚期的其他书信》，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1967年。——作者

[24] 捷克西部城市，1945年起捷名为索科洛夫。——译者

[25] 爱伦·坡（1809—1849年），美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译者

[26] 萨姆沙德文为Samsa，卡夫卡德文为Kafka。——译者

[27] 圣经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上帝选召摩西带领同胞出离埃及，跨过红海，来到西奈，摆脱奴隶生活。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译者

[28] 该诗为捷克诗人基里·福尔克所写，1920年9月发表于《树干》第4年第21期。——作者

[29] 意为笨蛋。——译者

[30] 雷克拉姆出版社为德国一家著名出版社，成立于1828年。——译者

[31] 恩斯特·雷德勒（1904—？年），写作抒情诗，某些诗作曾在《青年犹大》上发表。——作者

[32] 海顿（1732—1809年），奥地利作曲家。——译者

[33] 斯蒂文森（1850—1894年），英国小说家，除《金银岛》外，主要作品还有《新天方夜谭》、《化身博士》等。——译者

[34] 为政治、文学、艺术周刊。——作者

[35] 希腊神话中狄奥尼索斯的伴随者之一。与阿波罗比赛吹笛失败，被阿波罗绑在树上剥了皮。——译者

[36] 特奥多尔·塔格尔（1891—1958年），1923年在柏林创办文艺复兴剧院，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移居美国，1951年定居巴黎。——作者

[37]1618—1648年在欧洲以德国为主要战场、延续30年的国际性战争。一方为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另一方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战争以后者失败告终。——译者

[38]该书是约瑟夫·弗洛里昂主编的不定期丛刊“Nova et Vetera”的一本。卡夫卡的《变形记》的第一篇捷克译文和第一幅卡夫卡木刻像也在该丛刊发表。——作者

[39]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译者

[40]该书由库尔特·品图斯编选。1919年柏林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作者

[41]爱弥尔·库（1857—1926年），法国药剂师和医师，创立了一种以自我暗示为基础的疗法，被称为库式疗法，在二十年代曾获得广泛重视。——作者

[42]贝希托尔德伯爵（1863—1942年），1912—1915年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长——译者

[43]瓦格纳（1813—1883年），德国音乐家、作家，主要从事歌剧创作。——译者

[44]赫克尔（1872—1945年），德国自然科学家，进一步发展了物种起源学说。——译者

[45]伯尔舍（1861—1939年），德国作家。——译者

[46]马赫（1838—1916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译者

[47]德文中Dichter意为诗人、作家，ein dichter Mensch意为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人，Dichter与dichter同音异义。——译者

[48]指哈森克勒弗尔的《救命恩人》和施尼茨勒的《绿鹦鹉》。——作者

[49]该剧在1920年及其后一段时间里是一部相当流行的德国表现主

义戏剧。——原作者

[50]辛格（1871—1909年），爱尔兰剧作家，著有悲剧、喜剧多种。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即为描写儿子反抗父亲的喜剧。——译者

[51]希尔德克劳特（1862—1930年），著名演员，曾为在汉堡、维也纳、纽约等地上演近代犹太德语剧作家的戏剧而奔走。——作者

[52]阿施（1880-1942年），波兰出生的美籍小说家和戏剧家，用犹太德语写作以犹太人为题材的作品。《复仇之神》写于1907年。——译者

[53]关于卡夫卡和犹太德语演员剧团的关系，参见《卡夫卡日记》、《卡夫卡致菲利斯》和马克斯·勃罗德著《弗兰茨·卡夫卡》——作者

[54]豪泽尔，德国作家瓦塞尔曼（1873—1934年）的长篇小说《卡斯帕尔·豪泽尔或心的惰性》中的主人公。——译者

[55]魏斯（1884—1940年），医生、作家。——作者

[56]马勒（1868—1911年），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译者

[57]巴比塞（1874—1935年），法国社会主义作家，长篇小说《炮火》发表于1916年，《光明》发表于1919年。——作者

[58]埃德施米特（1890—1966年），表现主义作家、理论家，他的《双头女神——文学与现代论文集》1920年在柏林出版，其中第二章提到了卡夫卡。——译者

[59]施彭勒（1880—1930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者。——译者

[60]莫尔根斯泰恩（1871—1914年），德国诗人，主要创作抒情诗和箴言诗。——译者

[61]乌厄齐策尔（1896—？年），曾任德国驻布拉格公使馆的新闻专员。他写作诗歌和文化论文。——作者

[62]特拉克尔（1887—1914年），奥地利诗人，著有诗集《塞巴斯蒂安在梦中》、《寂寞者的秋天》等，是德语文学中重要的表现主义诗人。——译者

[63]霍尔茨纳尔在布拉格有一所私人学校。德国、捷克和外国文人、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常到他家里聚会。他的兄弟卡尔·霍尔茨纳尔是后来成为表现主义作家的弗兰茨·韦尔弗的家庭教师。——作者

[64]阿尔滕贝格（1859—1919年），意象派诗人，擅长短小的散文艺术形式。——译者

[65]迈林克（1868—1932年），奥地利作家。——译者

[66]戈伦，本为犹太民间传说中用黏土烧成的会说话的假人。——译者

[67]布鲁阿（1846—1917年），法国作家。在作品中宣布邪恶世界的毁灭和上帝王国的到来。《穷人的血》一书发表于1909年，捷文译本发表于1911年。《向犹太人致敬》一书则发表于1892年。——作者

[68]达拉哥（1869—1949年），诗人、哲学家。他的小册子《克尔恺郭尔的基督徒》于1922年在因斯布鲁克出版。——作者

[69]克尔恺郭尔（1813—1855年），丹麦哲学家。他的思想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主要著作有《非此即彼》、《恐惧与战栗》、《人生道路的阶段》等。——译者

[70]克劳斯在许多报刊杂志发表小说和诗歌；1930年他的一个剧本在布拉格新德意志剧院首演。——译者

[71]阿尔特舒尔，当时布拉格著名的神经医生。——作者

[72]阿纳于1920年用汉斯·蒂纳·康东的笔名出版了诗集《生与雾》。——作者

[73]新教徒一词原意为“抗议者”，因新教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议态度，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称为“抗议宗”或“抗罗宗”。——译者

[74]贝歇尔（1891—1958年），德国作家、诗人，希特勒上台后流亡苏联，战后回到苏占区，曾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长。《致睡眠》一诗发表于1918年。——译者

[75]科柯施卡（1886—1980年），奥地利著名表现主义画家、雕塑家和作家。——译者

[76]埃伦斯泰因的《图布奇》一书于1919年作为岛屿丛书之一出版；卡夫卡提到的《人在呼喊》一书于1916年在莱比锡出版。——作者

[77]施拉夫（1862—1941年），德国作家，与霍尔茨等人开创了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译者

[78]施拉夫曾研究过多年地球中心说问题。他这方面的第一本书《帕拉斯曼教授和太阳黑子现象》出版于1914年，莱比锡。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地球中心这一事实为太阳黑子现象的直接结论》（1925年，莱比锡）和《以地球中心说解决宇宙问题》（1927年，魏玛）。——作者

[79]雷曼（1889—1969年），德国作家。——译者

[80]里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德国作曲家，生于莱比锡。莱比锡属于萨克逊州。瓦格纳常穿粗呢大衣。——译者

[81]古代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个片断。——译者

[82]指1920年马勒斯自己印刷的诗集《我从边线来》。——作者

[83]指妓女。——译者

[84]当时颇有名的夜总会，二十年代关闭。——作者

[85]所罗门，约公元前965—前925年时以色列和犹太国王；希罗德，公元前37—前4年时犹太国王。——译者

[86]葛德文（1756—1836年），英国作家、社会思想家。——译者

[87]斯蒂纳（1806—1856年），德国哲学家，主张唯我论，无政府主义的前驱者。——译者

[88]塔克尔（1854—1939年），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著作译者。——译者

[89]“大炮十字架”餐馆在二十世纪初是捷克无政府主义者聚会的场所，在捷克反军国主义的《青年同盟》一案中曾起过重要作用。马克斯·勃罗德和卡夫卡都曾参加在该餐馆举行的集会。——作者

[90]米萨姆（1878—1934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诗人、剧作家。——作者

[91]霍里彻尔（1869—1941年），奥地利印象派作家。——作者

[92]鲍姆（1883—1941年），作家，双目失明后当音乐教师。主要写作自传体作品，重要的有：《岸边生涯——今天的盲人生活》《黑暗中的生活》等。——作者

[93]格奥尔格·库尔卡曾将让·保尔的《美学入门》中的一部分稍作变动，作为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国家剧院报》上。——作者

[94]波尔加（1875—1955年），评论家。——作者

[95]马加贝厄，古代犹太祭司家族。——译者

[96]指恩斯特·斯塔特勒尔编译的弗朗斯·亚默诗选《恭顺的祈祷》，1913年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弗朗斯·亚默（1868—1938年），法国诗人。——作者

[97]德布林（1878—1957年），德国小说家。《王伦三跳》（1915年）和《黑色帘幕》（1919年）由柏林弗舍尔出版社出版。——作者

[98]德布林著《谋杀黄花植物及其他小说》，1913年在慕尼黑和莱比锡出版。黄花植物指蒲公英、毛茛等。——译者

[99]布莱（1871—1942年），《文学与藏书》杂志的创办者和发行人，翻译家。——作者

[100]罗斯曼，卡夫卡长篇小说《失踪者》中的主人公。——译者

[101]切斯特顿（1874—1936年），英国作家，写作诗歌、政论、

侦探小说。他在政治上是自由党员，在宗教上是天主教徒。——译者

[102]英国豪华游轮，1912年撞上冰山沉没。——译者

[103]波德莱尔（1821—1867年），法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恶之花》、《散文诗集》等。——译者

[104]米夏埃尔·格鲁塞曼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哲学丛书之一，1921年由慕尼黑罗塞尔出版社出版。——作者

[105]弗罗贝尼乌斯编选的《亚特兰蒂斯——非洲民间童话和民间创作》12卷于1921—1928年在慕尼黑出版。亚特兰蒂斯是传说中沉于海底的岛国名。——作者

[106]策佩林（1838—1917年），德国工程师和企业家，制造了世界第一架有实用价值的飞艇。——译者

[107]普洛克路斯忒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开设黑店，拦劫行人，将投宿旅客一律安置在一张床上，将身高者截其足，将身矮者拉长，以适应床铺长度。喻指强求一切事物适应一个模式。——译者

[108]弗兰克（1882—1961年），德国小说家，1933—1955年流亡国外。他的中篇小说集《人性本善》在第一次大战结束前（1918年）在苏黎世和莱比锡由拉舍尔出版社出版，一次大战结束后成为德国和平运动的宣言书。——译者

[109]哈尔特（1886—1947年）。——作者

[110]福克斯（1890—1942年），布拉格H.梅尔茜出版社负责人之一。他于191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流星》，1918年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商队》。该出版社也曾出版福克斯译的布莱齐那等人的诗作。——作者

[111]特拉克尔1912年起在奥地利军队中任药剂师，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使他几乎神经错乱，于同年服毒自杀。另见313页注①——译者

[112]亚历山大·涅弗罗所著《塔什干——面包丰富的城市》的德译本1921年由柏林马立克出版社出版。——作者

[113]意为“他妈的真冷！”Sakmmenska意为“圣事，圣礼”，同时又有“该死！见鬼！”的意思。——译者

[114]厄尔茨山脉位于德捷边境。——译者

[115]德文“不公”一词为Ungerechtigkeit，“我们的公正”为unsere Gerechtigkeit。——译者

[116]威尔斯（1866—1946年），英国作家，写作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科幻小说，如《时代机器》。——译者

[117]即作者逗留过的农村。——译者

[118]马萨里克（1850—1937年），原为布拉格大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致力于捷克复国运动。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后，四次当选为总统。——译者

[119]复国运动内部犹太工人党的名称。该党产生于波兰和俄国，试图把复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结合起来。——译者

[120]指阿图尔·朗茨贝格编选的集子《隔离区之书——犹太隔离区优秀小说选》。该书1921年由本亚明出版社出版。——作者

[121]指医生。——译者

[122]卡勒尔·克拉玛尔（1860—1937年），1894年当选为青年捷克党议员，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理。——作者

[123]十五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约1372—1415年）追随者的统称。该派反对德意志封建主和天主教会对于捷克的压迫，要求宗教改革，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等。——译者

[124]卡夫卡《乡村医生》集中短篇小说《父亲的忧虑》中描写的一种现象的名字。参见列昂·布鲁阿的《向犹太人致敬》一书。参见列昂·布鲁阿的《向犹太人致敬》一书。——作者

[125]弥赛亚，原意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封立君主、祭司时，常举行在受封者头上敷膏油的仪式，故君王等人有“受膏者”之称。犹太国

衰亡以后，犹太人相信上帝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弥赛亚成为犹太人想象中的“复国救主”的专称。——译者

[126]美国中部平原的州。——译者

[127]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织，该党分裂后，该会加入共产党。
——译者

[128]此书由伊格纳茨·耶索弗主编，1921年由柏林波格德意志出版社出版。——作者

[129]伯克林（1827—1901年），瑞士画家，擅长风景画，也画人物。代表作有《死岛》、《希腊神话》等。——译者。

[130]魏列施恰金（1842—1904年），俄国军事画家。代表作有《1877—1878年俄土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等。——译者

[131]赫尔茨，1921年中德起义领袖。他在德国国界以外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逮捕。捷克政府拒绝把他引渡给德国。——作者

[132]指《维也纳画刊》的纪念专号。——作者

[133]传单是由A.V.弗里斯拟写印发的。捷克共和国成立后，弗里斯想出任驻墨西哥公使，但他的要求被贝内斯拒绝。这样就产生了这场论战。——作者

[134]卡夫卡为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将要进行的改革所写的专题报告现仍保存在该公司。——作者

[135]韦尔夫（1890—1945年），奥地利作家，生于布拉格。他的剧本《镜中人》1920年由慕尼黑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译者

[136]卡夫卡提到的这部小说名为《威尔第——歌剧的小说》，1924年由维也纳保尔·索尔内出版社出版。——作者

[137]布莱（1871—1942年），奥地利作家、政论家、翻译家。作为富家子弟，他既有闲情逸致，又有资金，从事既扬名又毁誉的事：既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又创办多家有影响、但不盈利的杂志，让有才华的年轻人如卡夫卡、瓦尔泽、穆齐尔等在这些杂志发表作品。雅诺施所

说“这（享受生活）是弗兰茨·布莱的苦根”当与此相关。——译者

[138]该书由约翰内斯·比勒编选，1919年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
——作者

[139]诺瓦克（1870—1949年），捷克现代著名音乐家。——译者

[140]研究捷克语的杂志，主编米罗斯拉夫·哈勒教授。——作者

[141]指诗选《人类之黄昏》。——作者

[142]施泰纳（1861—1925年），人智学创立者，不时到布拉格活动，受到各德意志—犹太小组的支持和赞助。——作者

[143]指格罗兹的画集《统治阶级的脸谱》，柏林马立克出版社出版。——作者

[144]德文“人造革”一词由Kunst和Leder两个词构成，Kunst意为“艺术”“人工制品”，Leder意为皮革。——译者

[145]治疗疝气的带状医疗用品，用它托住脱出的小肠或使其复位，以改善症状，减轻患者的病痛。现在已不再使用。——译者

[146]西克拉，生于1903年，捷克现代画家，美术学院教授。——作者

[147]卫礼贤（1873—1930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原名理查德·威廉，1897年来华传教，取名卫希圣，字礼贤。翻译了多种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书籍，如《论语》、《道德经》、《孟子》、《大学》、《易经》、《庄子的南华真经》等，另有研究中国文化、哲学的专著多种。
——译者

[148]该出版社曾出版卫礼贤翻译的十卷本《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库》，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宗教、哲学、自然哲学、道教及其派别等。
——作者

[149]见《庄子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译者

[150]1901年创立的德国青年徒步旅行奖励会。——译者

[151] 恰佩克（1887—1945年），捷克画家，并与他的弟弟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年）一起写了一系列很成功的书。——作者

[152] 塞冈第尼（1858—1899年），意大利画家。他的《论文书信集》由他的遗孀整理出版。——作者

[153] 巴巴拉·拉玛尔（1896—1926年），玛丽·毕克馥（1892—1979年），皮埃尔·怀特（1889—1938年），均为20世纪初叶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译者

[154] 阿波里耐（1880—1918年），法国现代主义诗人，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产生过影响。——译者

[155] 阿波里耐的《醇酒集》1913年出版，是诗人的代表作。卡勒尔·恰佩克的译文登载在1919年2月6日布拉格《六月》杂志上。——作者

[156] 哥特式教堂，建于14世纪。——译者

[157] 克莱斯特（1777—1811年），德国剧作家、小说家。重要作品有剧本《破瓮记》、《洪堡王子》，小说《米歇尔·科尔哈斯》等。——译者

[158]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现代文艺流派。达达运动的宗旨在于反对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反对一切传统，反对一切常规。“达达”两字作为文艺运动的旗号，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译者

[159] 德文的“你，你”发音为“度，度”。——译者

[160] 勃罗德所著《异教、基督教、犹太教》一书1922年由慕尼黑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作者

[161] 惠特曼（1819—1892年），美国诗人。《草叶集》第1版1855年问世。1871年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民主远景》。——作者

[162] 霍尔茨（1863—1929年），德国作家、诗人，著有诗集《时代的书》、《幻想者》和短篇小说集《哈姆莱特爸爸》等。——译者

[163] 克洛代尔（1868—1955年），法国诗人、剧作家、外交家。

诗歌代表作有《五大颂歌》和《三重唱歌词》。——译者

[164]诺伊曼（1875—1947年），捷克诗人。捷共党员。他办的《六月》等刊物在捷克当时文化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很大影响。——译者

[165]王尔德（1854—1900年），英国作家、诗人。《目标》包括《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说谎的堕落》、《羽毛笔、画笔和毒汁》、《假面具的真理》等文，由韦特海默翻译，载柏林环球出版社1918年版《王尔德十二卷集》第六卷。——作者

[166]按犹太教传说，《圣经·旧约》的前五卷是上帝通过摩西所宣布的“律法”，故称此五卷为《律法书》。五卷书中有些部分详细记载各项律法条文。——译者

[167]塔特里山是喀尔巴阡山脉的最高部分，分高塔特里山和低塔特里山。高塔特里山在波捷边境，低塔特里山在捷境。山区有多处疗养地。——译者

[168]鲁迪，鲁道夫的爱称。——译者

[169]该书全名为《杜鹃王子——一个放荡鬼的生平、事迹、观点和地狱之行》（三卷），1906—1907年由慕尼黑格奥尔格·米勒出版社出版。——作者

[170]福楼拜，全名为古斯塔夫·福楼拜。——译者

[171]德国城市，濒临波罗的海。——译者

[172]高更（1848—1903年），法国著名画家。代表作为《雅各及天使》、《塔希提妇女》等。——译者

[173]兰坡（1854—1891年），法国诗人，著有《巴黎战歌》、《醉舟》和《灵光篇》等。——译者

[174]大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中的人物。——译者

[175]古斯蒂，古斯塔夫的昵称。——译者

[176]弗兰茨·卡夫卡和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1854—1931年）、

他的母亲尤丽叶·卡夫卡（1856—1934年）一起安葬在该基地的同一个墓里。——作者

附录

对话^[1]

肺癆的概念：中间是一块磨光的石头，旁边是锯子，剩下的都是空虚乏味的废料。

[描绘]

因为我几个小时没有使用喉头，它就疼成这样？

我总是感到内急。

您没有听说过俾斯麦的医生施威尼格吗？他的医术介于学院医学与纯粹个人发明的自然疗法之间，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跟俾斯麦合不来，因为他太能吃，还是个酒鬼。

少量的堵塞和持续的压迫证明，那里一定存在着一个阻挠彻底清理的障碍物，在封住伤口之前，应该先除掉这个障碍。

今天的某一张报纸上有一条关于如何照料采摘下来的花的出色介绍，它们那样干渴，再来一份这样的报。

斜过来，这几乎是我的主意，为了让它们多喝点水，去掉叶子。

来点水，这药片卡在黏液里，像玻璃渣子一样。

要不是那些面条煮得这样软，我根本就吃不下去，所有的东西，包括啤酒都会刺疼我。

旅行与冒险图书馆

莱比锡布洛克豪斯出版社

阿图尔·贝尔格27号，长春岛。

我已经从这个图书馆借过几本书，大多是从伟大作品中为年轻人做出的摘要，非常好。零售书店里一定买得到，比如雷歇纳（格拉本），

但是海勒就没有，你得有个灵敏的嗅觉，当然，在这样的大热天没法要求你们的鼻子。您稍待，衣服就会到了。

可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愚蠢的观察。我开始吃饭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从我的喉头落了下去，我立即觉得非常自由，并开始想象一切可能的奇迹，然而它转瞬即逝。

请相信，我总有一天敢吞下一大口水的。

也许少一点更容易吞咽。

我特别想要那些芍药花，因为它们那么娇弱。

还有阳光下的紫丁香。

问一问，有没有好一点的矿泉水，只是出于兴趣。

您有点时间吗？请您浇浇这些芍药花。

博士先生，您对葡萄酒内行吗？您喝过隔年的酒吗？

就算是目前这种情况，如果我有可能痊愈，起码也得几个星期。

请您看一下，芍药花是不是碰到了花瓶的底。为这个才把它们放进瓶里的。

一只鸟钻进了房间里。

好建议：在葡萄酒里放一片柠檬。

不能去小溪里洗澡，空气浴也不行。

有一次闹着玩我喝过矿泉水。

也许我还能坚持8天，但愿，两者的差别这样细微。

我乐意顺从他，特别是愉快的时候。喝完汽水，再告诉我，你的母亲是怎样喝醉的，只有水，疼了很久，干渴。但是以前，她得到好水的时候，她很高兴。

她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别的病，使她暂时中断喝酒吗？

你看见那些锻工场^[2]的书了吗？

R.^[3]某人学习旅行。享受国家奖学金6周。

中间的三分之一删去。

疼痛会中止一段时间吗？我是说，较长的一段时间？

请您注意，别让我对着您咳嗽。

锻工场信件。

我使你们受苦了，真是胡闹。

俾斯麦也有过一个自己的医生，也使他吃过苦。

那医生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害怕这东西比什么都更甚，宁可只要这种药物，其他的都免去；今天午后——可是一切都不是实在的——药片起作用了，如果不算那种没完没了的烧灼感，比打针强多了。药片化了以后烧灼得厉害，我受不了。它的明显的好处在于，打针以后也会引起的那种疼痛，在这里感觉要麻木得多，食物流经的伤口好像被稍稍盖住了一点似的。我只想描述药的作用。这只是我今天上午感觉到的，也可能全都是错的。

总是害怕。

当然这样使我更感到疼痛，因为你们对我这么好，从这点上讲，医院实在是个好地方。

他们把我旁边的那人杀死了，每个助理医师都冲了过去，可是没问出什么来。

他们让他带着41度的肺炎到处乱跑。真是妙得很，夜里所有助理医师都上了床，只留下神父和他的伙伴。他不必忏悔。在临终涂油之后又轮到了神父。

今天的谈话使我很紧张。

我这么伤心，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进食努力毫无用处。

这儿，现在，我这样子还用力写它。

他们现在才把材料寄给我。

我们看得明明白白，药魔们是怎样一个为另一个开辟道路的。

糟糕的东西就让它糟糕吧，不然的话将会更糟。

你知道吉斯许伯尔吗？在卡尔温泉旁边 泉水 森林。

假使没有题目，总该有一点谈资吧。

您还要熬多少年？我还能坚持多久，如果你熬下去的话？

现在我想读它。

那会使我过分激动，也许，我非得重新经历一番。

为什么我们从不进啤酒店遥远的路

酒——美兰啤酒蚊子

如果有片刻的安宁，我会很高兴。

[描绘。（意大利与西西里）]

湖水不须入海。

牛奶很好，但是很可怕，又是这么晚了，但这完全不是我的责任。
这是很常见的抱怨。

糟糕的是，我连一杯水都没有喝成，我的要求已经有些让人厌烦了。

还有关于吉斯许伯尔的美妙的回忆，比如卡尔温泉秀丽的林中小空地。

如果那是真的，非常可能——我现在吃进的食物不足以使我恢复健康，那么一切都没有希望，更不要说伤口了。

因为疼痛和咳嗽，我现在这种饮食状态也持续不了多久。

父亲对特快邮件既喜欢又恼恨。

您看这紫丁香，比清晨还要新鲜。

得告诉这姑娘当心玻璃，她有时候光着脚就来了。

那让我们喝酒吧。

我不喜欢这样，工作太多了；要求的知识太多了。室内的花要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照料。

我中毒太深，身体已经辨不出真正的水果了。

酸奶我可以在容器中吃，这样也很好，就是吃不干净，可是因为我只吃一点点，最好还是全都搅和在一起，给我往杯子里盛一点儿。

没有水我咽不下去这些。酸奶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热度这么高的人都够了。它随着天气变化，天热的时候好一些，稠一些，天热的时候更好，没有那么软，比较结实。

别让蚂蚁把它吃光。

我们一起去花园酒家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

那好像是半睡中的一个约会。有人许诺，我可以睡过那些噪音，不过我得为此答应别的事情，我答应了，可是忘记了是什么。

它〔苍蝇〕不能吃，也就没有疼痛。它想再回来吗？

总是说“暂时”，我自己也会用这个词。我们说起咽喉的时候，好像它总是有所好转，这可不是实情。

气氛当然也起作用，比如说令人激动的话题。

我怎么能这么久没有R呢？

现在我正幻想，R在门口，我得给他送个暗号，表示我这边一切就绪，可我同时也知道，你（多拉）在阳台上，我不愿让我的暗号打扰你。事情真难办。

即使我所有的病都真的有所好转，那种致聋的药物也绝不会让我恢

复。

谁打电话来了？是不是马克斯？

没完没了的痰，又多又容易，早晨还是疼，晕头晕脑的时候，我心里觉得，说不定为这个还会得个什么诺贝尔奖呢。

所以人们喜欢小水妖

我们该买一本这方面的小书，必须了解清楚这件事

现在花暂时够了。

给我看看阿格拉娅，把它跟别的花放在一起太刺眼了。

赤花山楂太不显眼，太暗了。

多点水。水果

如果我吃得够多，你总是随便夸我一通，今天我又吃得多，你却指责起我来，你以前夸得就没有道理。

永恒的春天在哪里？

报纸上不是说：绿色透明的壳？

昨天黄昏还有一只蜜蜂饮过那朵白丁香。

剪得斜一点，它就可以碰到底部了。

我很愿意就着蜂巢吃它，这大概只在秋天才有，另外，浅色的漂亮蜂巢也很难得。

人没法子获得一阵黄金雨么？

他今天还没有喝过水。我们这儿过的日子，在维也纳的森林里是不可能的。

我今天或许可以试一试冷冻的东西。

忠诚的艾克特——善良睿智的、父亲一般的守护神。

当初您来时，在床上还比较容易，我甚至没喝过一次啤酒，当然有蜜饯、水果、果汁、水，果汁、水果、蜜饯、水，果汁、水果、蜜饯、水，汽水、苹果酒、水果、水。

美极了，是不是？紫丁香——它濒死时还在喝，简直是狂饮。

没有这回事，濒死的人还在喝。

即使它结了疤——请您原谅这些令人恶心的问题，可您是我的医生，对吗？——也要经年之久，我也得等那么长的时间才可能无痛进食。

修辞学的问题。

这样的酒量还不够资格跟我父亲到平民游泳学校的啤酒馆去。

早年在威尼斯 里瓦 德森查诺 还有独自在诺德尔尼，黑尔高兰德 西格费里德大叔。

我本该与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去东海边，但是我因为消瘦和别的恐惧，没敢去。

只要还值得去理解我。她就这么无所不在。她不漂亮，但是很苗条，据说（马克斯的姐姐，她的女友）她一直保持了高贵的体态。

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额上一会儿，让我鼓起勇气。

这种报每周来两次，每次三份。

每个肢体都像一个人一样觉得累。

为什么我在医院里没试过啤酒

汽水 一切都这么没有界线

助手们又没有帮忙便离去了。

文珂 译

[1]* 这是卡夫卡晚年生命垂危期间，因患喉头结核，说话困难，不得不借助笔头与人交谈而留下的文献。——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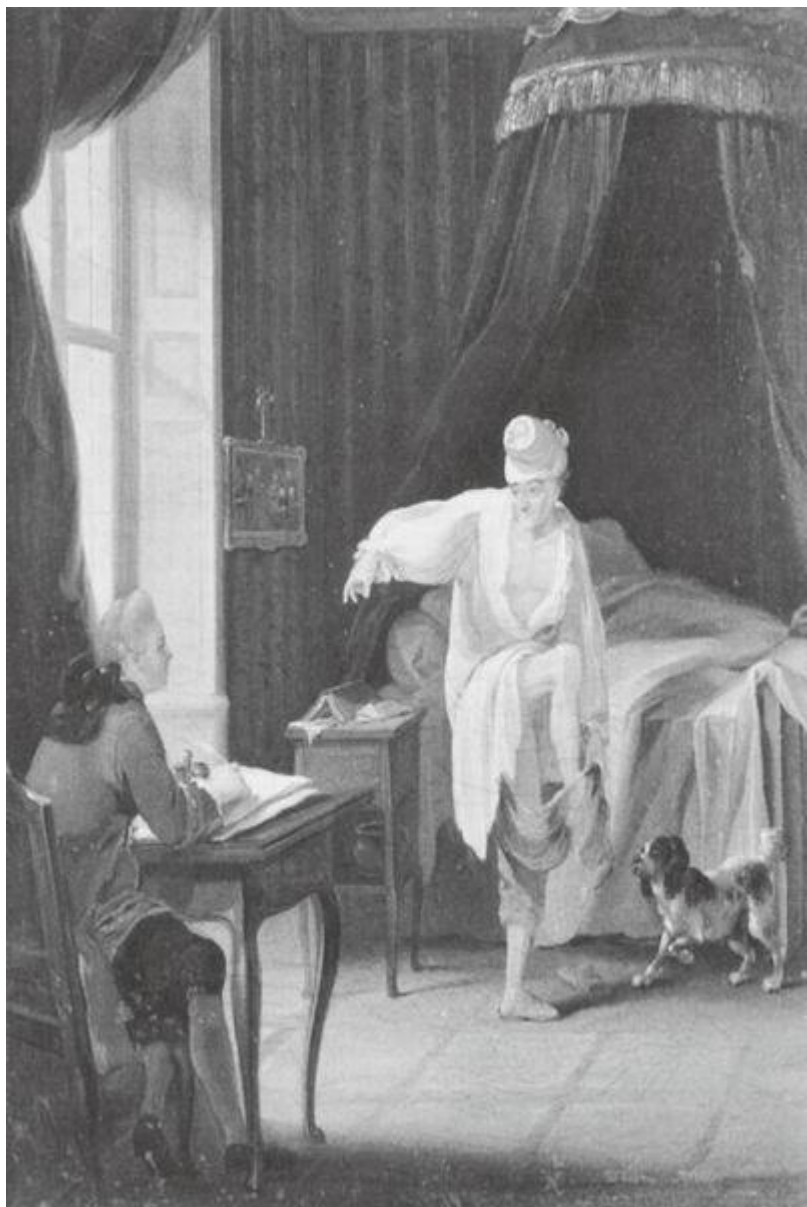
[2]出版社名，当时正在出版卡夫卡的最后一本短篇集《饥饿艺术家》，因此给作者寄了一些该社出的其他书籍供他阅读。——编者

[3]R.指卡夫卡的朋友、青年医生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他悉心护理病危中的卡夫卡，直到最后一息。——编者

第五卷 日记（1910-1923）



卡夫卡开始就职于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时（1908）的护照照片



这幅以伏尔泰为主角的绘画引起卡夫卡巨大兴趣，在日记中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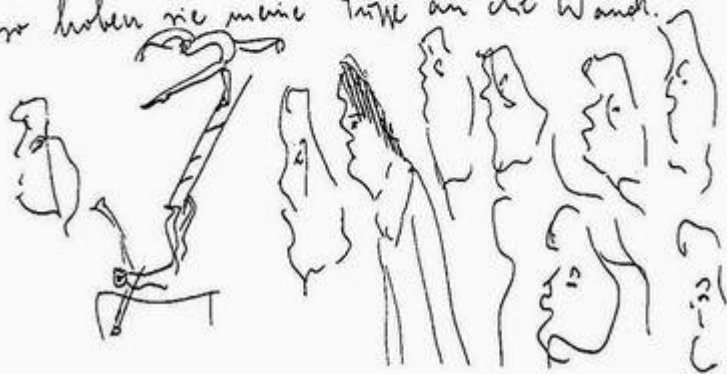


这幅以拿破仑为主角的绘画卡夫卡极为赞赏，在日记中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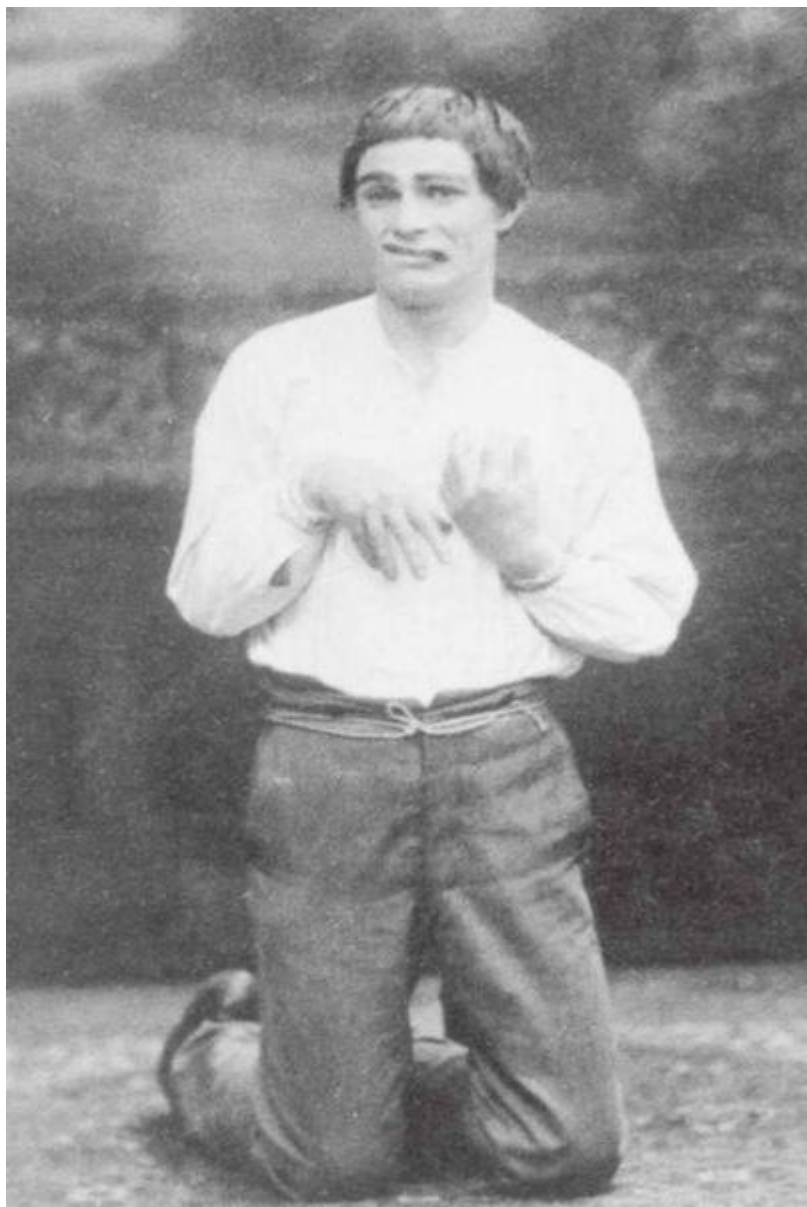


女舞蹈家E.埃杜阿多瓦，卡夫卡在日记中对她的描写长达好几页

Aber jeden Tag soll zumindest eine Zeile
gegen mich gerichtet werden wie man die
Fernrohre jetzt gegen den Kometen richtet. Und
Wenn ich dann einmal vor seinem fester erscheinen
würde hergeschafft von seinem fester so wie ich
z. B. letzte Weihnachten gewesen bin und vor
ich so weit war, dass ich mich nur noch gerade
fassen konnte und vor ich, wirklich auf
der letzten Stufe meiner Leiter schien, die
aber ruhig auf dem Boden stand und an
der Wand. Aber was für ein Boden, was für
eine Wand! Und doch fiel jene Leiter nicht,
so drückten sie mein Fingernagel an den Boden,
so hoben sie meine Fingernagel an die Wand.



卡夫卡最初日记手稿中的一页（1910年）



1911年至1912年犹太人伊地绪语剧团来布拉格进行客串演出对卡夫卡是一件大事。他兴致勃勃看了许多出戏，还跟有的演员成了朋友，这位《野人》一剧的扮演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叫伊察克·洛韦。1912年卡夫卡还为他组织了一个“东伊地绪语朗诵晚会”，并以一席关于伊地绪语的演讲作为开场白。布拉格的犹太爱国主义报纸对此作了报道

An jeden Sonn- und Feiertag auch Nachmittags-
vorstellung um 4 Uhr.

Herrmanns Café-Restaurant „Savoy“

Prag, Ziegenplatz.

Regie S. Klug.

Original-jüdische Gesellschaft aus Lemberg.

Heute literarisch-dramatischer Abend.

Zum Schluß:

15864

Der wilde Mensch

von Gordon. Titelrolle: M. J. Löwy.

Anfang gegen 9 Uhr. 15805 Anfang gegen 9 Uhr.



伊地緒語剧团的主要女演员



伊地绪语演员伊察克·洛韦，是该剧团剧作家



1912年卡夫卡与M.勃罗德去德国古典作家圣地魏玛作了一周的旅游。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整整一礼拜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图为歌德故居，歌德故居上标的Stein's Haus系双关语：Stein作为德语名词，石头的意思；作为人名，是歌德在宫廷任职期间的红颜知己；Haus是住宅，故标上Stein's Haus，乃谐趣也



图为魏玛的席勒故居



歌德的工作室，其左边窗子旁的斜面“柜子”为歌德的写字台，他习惯于站着写字，以保持精神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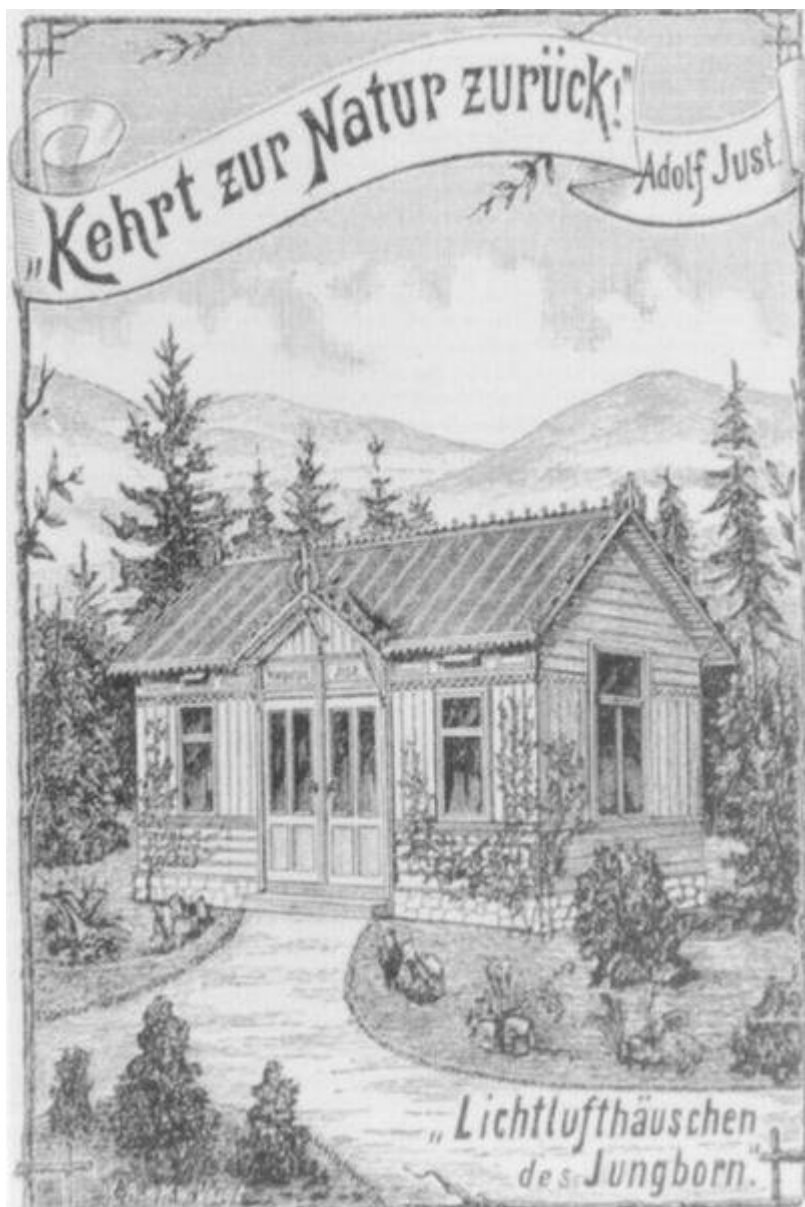
上图是卡夫卡与勃罗德下榻的饭店。

下图的照片是当时卡夫卡与歌德故居总管的女儿在聊天



上图是歌德在魏玛的早期故居

下图是卡夫卡对此“绿色小屋”的速写



卡夫卡于1912年在德国中部的疗养胜地哈尔茨山区的容波恩游览了三周。这里有合乎自然生活方式的设施：裸体文化、喷泉、玩黏土、素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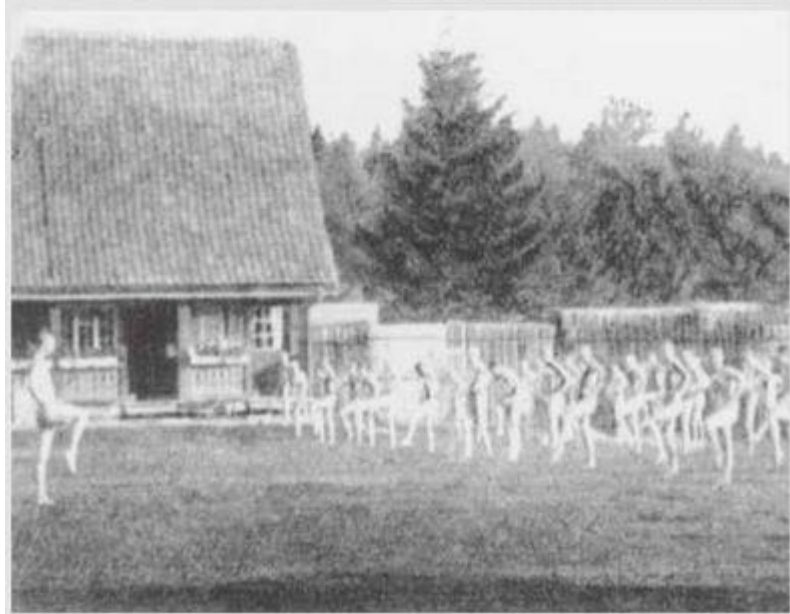
上图为卡夫卡所欣赏的明亮透气小屋



容波恩景观



戴旧钢盔的警察在容波恩的裸体文化区



在容波恩的裸体文化区

上图是玩球

下图是早操



卡夫卡所赞赏的达尔克洛茨舞蹈学校的表演：《反响与自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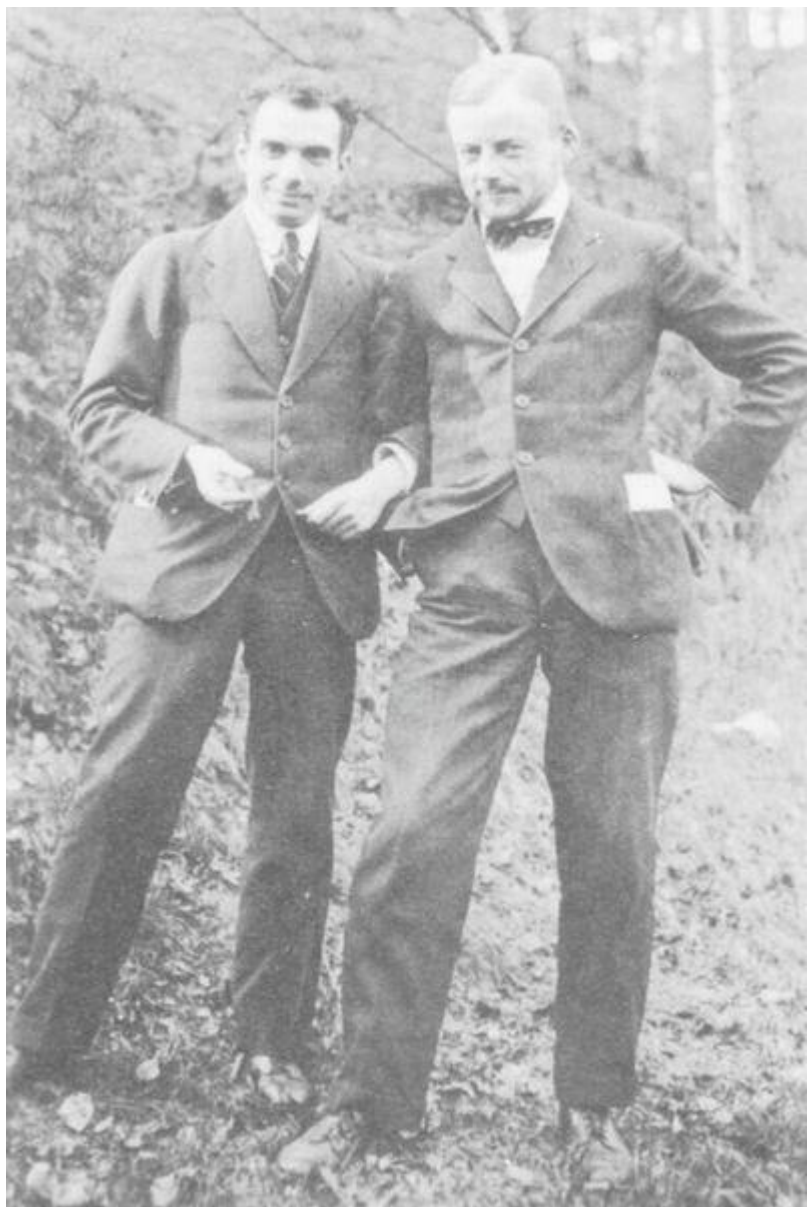
1913年1月卡夫卡（右）参加了他二妹瓦莉与约瑟夫·波拉克的婚礼



卡夫卡大妹艾莉一家与父母的合影



布拉格尼克拉斯大街36号（左边拐角处），卡夫卡住宅位于其最高层



最早出版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右），左为表现主义著名诗人瓦尔特·哈森克萊弗，也是卡夫卡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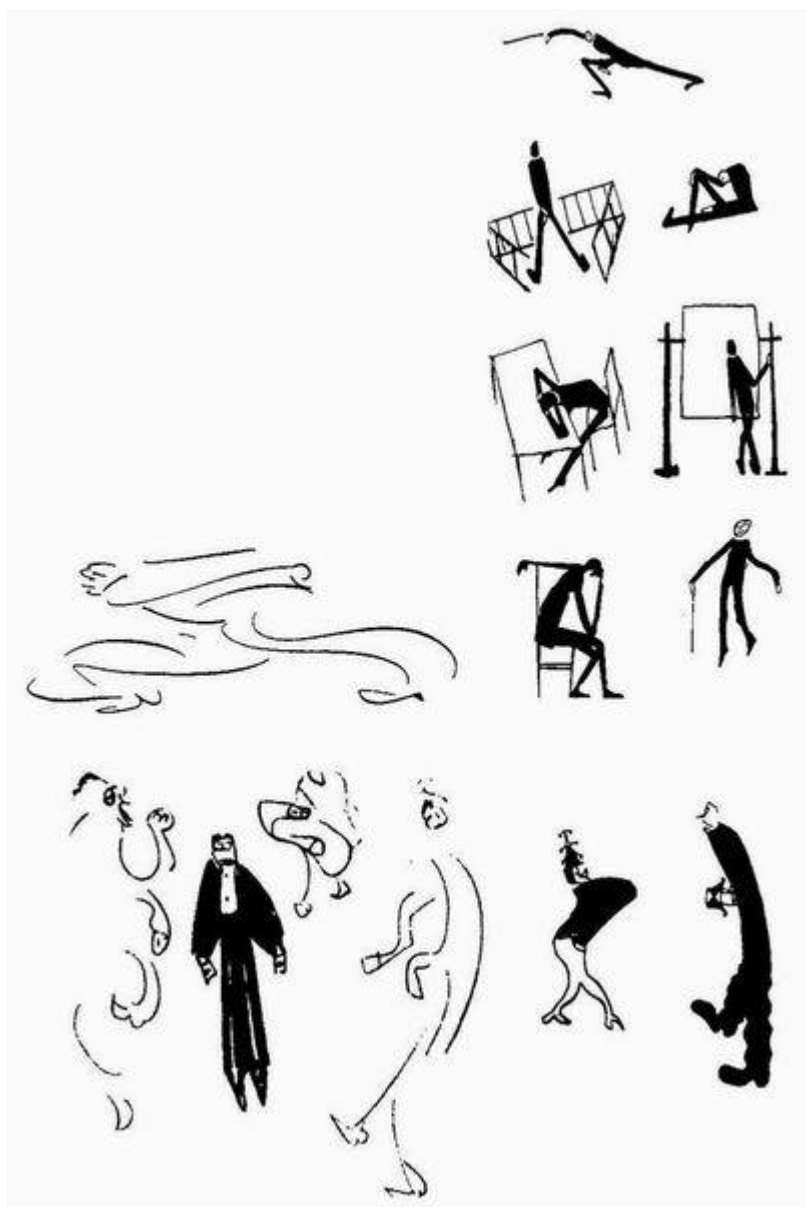


上图是出版卡夫卡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莱比锡德意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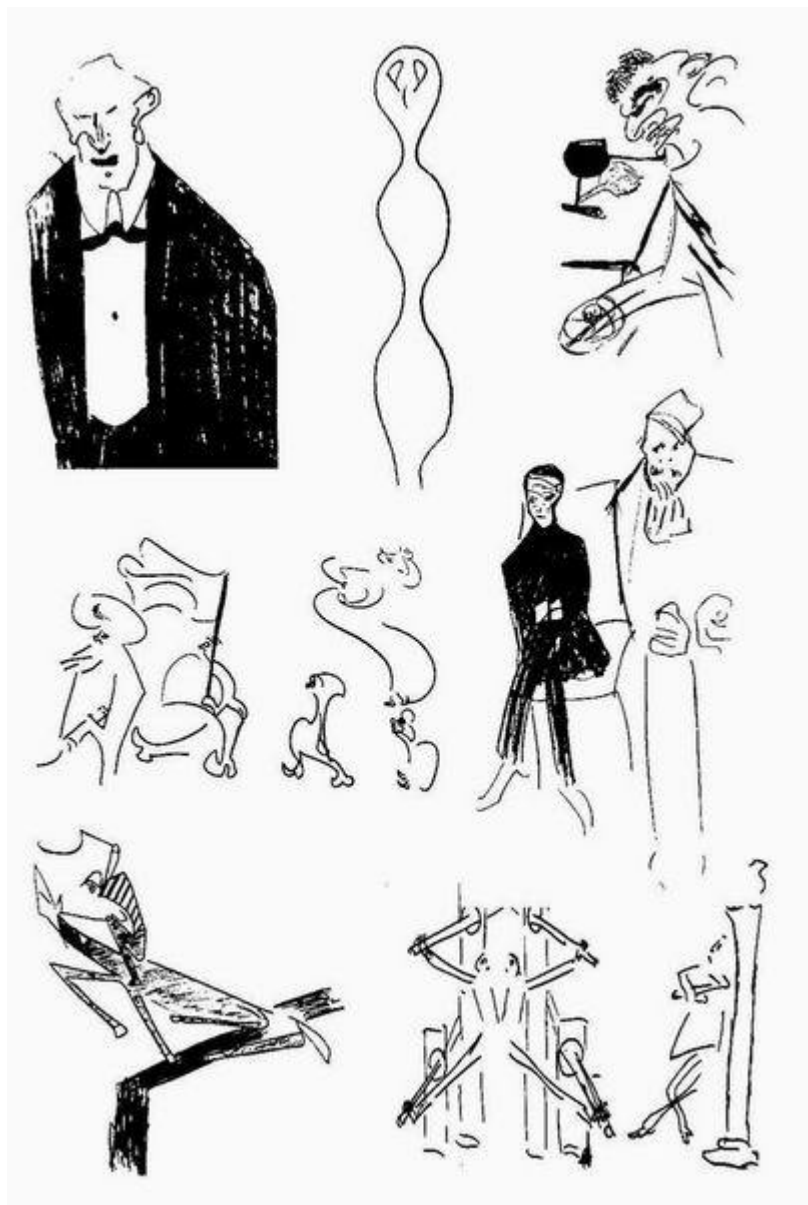
下图是表现主义运动三巨头：（左起）哈森克萊弗、韦尔夫、库尔特·品图斯。其中韦尔夫是卡夫卡的好友，亦是表现主义运动的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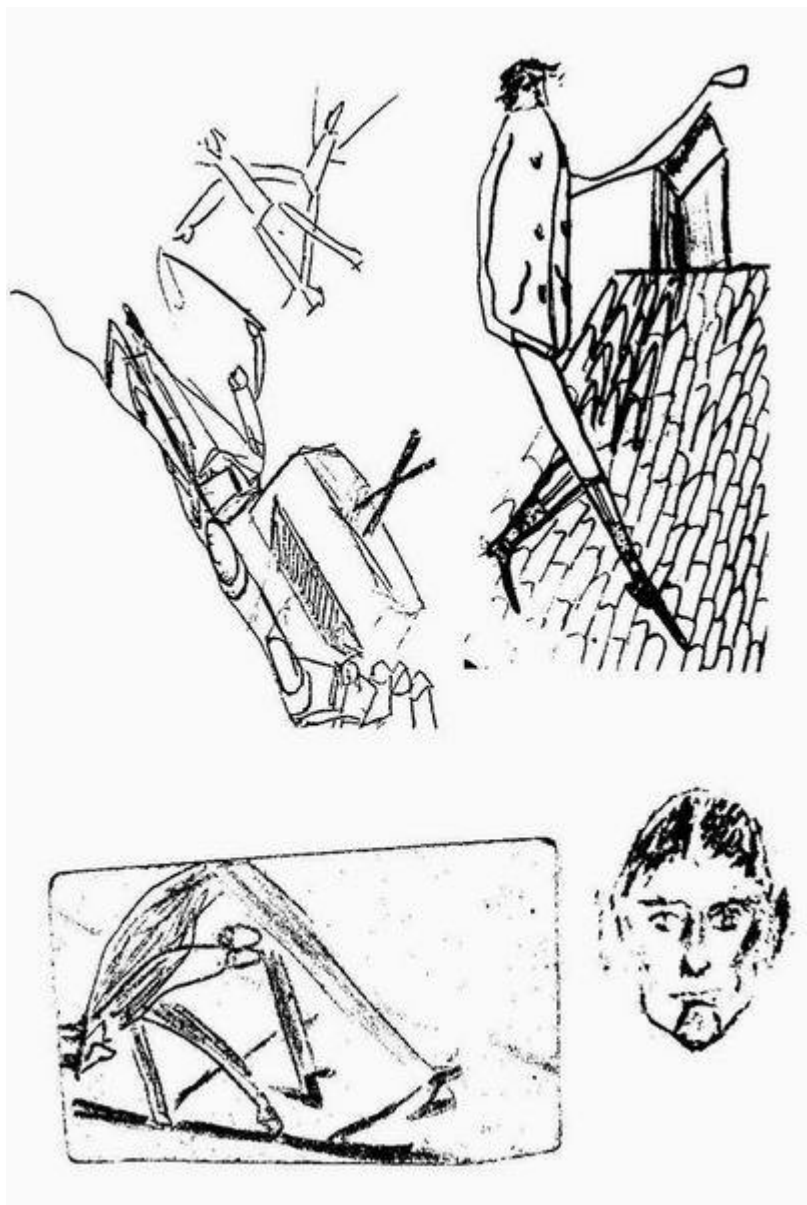
出版卡夫卡作品最主要的出版家库尔特·沃尔夫和他的夫人



据马克斯·勃罗德称，在大学年代卡夫卡就喜欢画画，这页和下两页刊登的大多就是这个时期画的



据马克斯·勃罗德称，在大学年代卡夫卡就喜欢画画，这页和上页刊登的大多就是这个时期画的



据马克斯·勃罗德称，在大学年代卡夫卡就喜欢画画，这页和上两页刊登的大多就是这个时期画的



卡夫卡在办公室使用的打字机，牌号为OLIVER（英文：脚踏铁锤）



上左为防噪器。右为金属甲壳虫。

下为当时奥地利发行的币值为1000克朗的货币



在巴黎的卡普契诺大道上，一辆三套公共马车发生事故后卡夫卡在日记中用了好几页描写这起事故

编者前言

卡夫卡为了“解放”他的“庞大的内心世界”，使用了多种书写形式或文学体裁，其中日记是他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就字数而言，它不如他的小说、书信，但就重要性而言，它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毋庸置疑，日记是表达内心世界的最便捷的形式。所以卡夫卡说：“日记的问题是总体的问题。”他认为，“在日记中人们找得到这样的证明：人们本身就生活在那不堪忍受的处境中，四下张望，记下观察。”对于卡夫卡来说，“观察”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而思考对他来说是没有终期的，所以他的记录就不可能有间隙。因此，不写日记他是忍受不了的，“不写日记我就感到怅然”。

在卡夫卡的大量日记中，我们听见的是一个洞见人类生存危机的痛苦灵魂的呐喊，一个“榨干”自己的血肉以奉献文学事业的艺术殉难者的誓言。其心之诚，言之切，读来令人感动，又令人深思。这是一个哲人和艺术家的心路历程的实录。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时代风云在一个智者身上引起的剧烈震颤，看到现代艺术诞生的艰难过程，因此它是一部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

在这部日记中，有许多篇幅被作者用来记载创作动机轮廓性构思以至故事情节，有的已经是完整的短篇作品。同时，我们看到许多梦境记录，说明卡夫卡对梦的素材的重视。这些对于研究卡夫卡的创作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日记中还有很多篇幅涉及作者的社会关系、伦常关系，特别是他与菲莉斯长达5年之久、一波三折的恋爱史。这些记载非常有助于我们解开他的悲剧性的婚姻之谜。同样，那些有关他的创作的甘苦和自我评价的言论以及有关他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描述，都有助于人们揭开他的短寿之谜和毁稿奇念。

因此，当我们阅读卡夫卡这部篇幅浩瀚的“内心独白”，这部历13年之久的心灵发展史时，就像作者阅读其他那些不同凡响的人物的日记一样“激动不已”。

卡夫卡的日记原为马克斯·勃罗德所编，这里是根据法兰克福/M·费

歇尔袖珍本出版社1984年的版本译出的，其中有两个短篇小说即《回忆卡尔达铁路》和《村子里的诱惑》分别抽出，编入《短篇小说集》。译文中的脚注除注明者外，均为原书的编者注。

叶廷芳

1995年秋

日记(1910-1923)

孙龙生 译

1910年

列车开过的时候，旁边的看客们惊呆了。

“每当他问起我的时候。”字音从句子里跑出来，像一个球在草原上迅速飞去。

他的严肃令我转过身去。脑袋埋在衣领里，头发整齐地排列在头顶周围，一动不动，下面双颊的肌肉紧绷在它们原来的位置。

怎么还在这座林子里呢？这座林子还真够大的。可是我的目光几乎还没达到十步远的地方，我又停住了，又被那无聊的对话引过去了。

在这座黑暗的林子里，在这块柔软而潮湿的土地上，我只有靠着他白色的衣领去认路径了。

我在梦中请了女舞蹈家埃德华多娃^[1]，可是她还想为克萨尔达斯^[2]跳一次。她有一条长长的影子，或者说，在下颌边角和下巴中部的脸部中间有一道光带。这时，正好来了一个人，带着一种浅薄奸诈令人讨厌的动作，告诉她，列车马上就开。从她听到这个消息的表情里，我非常明白，她再也不会跳舞了。“我是一个非常坏的女人，不是吗？”她说。“噢，不是的，”我说，“这不会的。”我随便地转了一个方向走了。之前，我曾向她询问在她腰带上插那么多鲜花的事。她说：“这些花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的。”我在想，这些新鲜的花插在这根腰带上，而且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给这位埃德华多娃舞蹈家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舞蹈家埃德华多娃是个音乐爱好者，她到哪里都由两个小提琴手陪同，就是乘电车也是这样，她让他们演奏好多曲子。因为没有那种禁令，如果琴拉得好，车里的乘客又感到舒适，而且不用花一分钱，这就是说，拉完琴后也不向每个人去收钱，为什么不可以在电车里演奏呢？当然开始的时候，人们有点儿惊奇，过不了一会儿，谁都觉得那是不合

适的。可是在整个旅途中，在吹过的强劲的风里，在狭窄的甬道里，音乐却是那么悦耳。

舞蹈家埃德华多娃在外面并不像在舞台上那么漂亮。苍白的肤色，一对将皮肤绷得那么紧以致使脸上几乎没有较明显表情的颧骨，那个大鼻子却似从一低凹处突起，但人们绝不可以此来逗乐——比如测测鼻尖硬度，或者轻轻地抓住鼻梁扭来扭去，同时说道：“现在你得跟着来了吧。”她身材肥宽，腰肢颇高，穿一条裙褶过多的裙子——我要喜欢的话——她看上去像是我的一个婶婶，一位年纪较大的妇女，许多人的年纪较大的婶婶看上去都那么相似。可是对于这个缺陷，除了一双修美的天足之外，在平时的埃德华多娃身上根本没有别的补偿了，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引人追慕、惊异或者哪怕是一点儿注意的了。而且我也真的常常看到埃德华多娃受到冷漠的对待，就连那些很会交际的、十分世故的先生们也不能掩盖这种冷漠，尽管他们在这方面自然是花了不少精力。面对这样一位有名的舞蹈家，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埃德华多娃呀。

我耳边感觉清新、旷野、凉爽、滋润，好像一片叶子。

我写这个完全决定于对我身体和我身体未来的绝望。

如果这种绝望果是这样注定了的，这样与其对象连结在一起的，像是被一个掩护撤退并为此粉身碎骨的士兵这样制止了的，那么，它不是真正的绝望。那种真正的绝望立刻而且总是超越了自己的目标（在这个逗号的地方表明，只有第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你绝望了？

是吗？你是绝望了？

你跑开？你想躲起来？

作家在谈论臭味。

穿白衣服的缝衣女工在大雨中受淋^[3]。

在我五个月的一段生活中，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对此也许是满意了，对我来说，这种状态是没有力量可以取代的，尽管大家或许对此是有责任的。终于，在这五个月之后，我突然心血来潮，又一次要跟自己说话。当我真的问自己的时候，我总还是有问必答，这个时候，总能从我这个稻草堆里拍打出一些东西来，这五个月来，我便是这样一个稻草

堆，而且它的命运看上去应该是，在夏天里被点燃，而且旁观的人还没来得及眨一下眼睛，它已迅速地化为灰烬。这个命运却偏偏让我遭遇了！不过，这真应该十倍地在我身上发生的，因为我从不后悔这个不幸的时期。我的处境不是不幸，但却也不是幸运，不是冷漠，不是虚弱，不是疲惫，更不是别的兴趣，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的莫名其妙，大概跟我的无能写作有关。我相信我能理解这种无能之感，但却不明白它的根源。就是说，我突然想起来的一切事情都不是从根本上进入我的脑海的，而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半途闯入的。那么，谁不妨去试一试将这些东西抓住，试试去抓一棵草，并且死死地去抓住这棵刚刚开始从茎秆半当中长出来的草。有些人大概能这么做，比如日本的杂技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攀爬，这梯子不是架在地上，而是支撑在一个半躺着的人高抬的脚掌上，不是靠在墙上，而只是悬在空中。我不会这一套，再说我也没有那双支撑我的梯子的脚掌。这当然不是所有的一切，而且这样的一种质问还不能让我开口。但是每天至少有一行文字是针对着我的，就如有人用望远镜对着那颗彗星一样。可是我真有那么一次出现在那个句子面前，被那个句子吸引过去。比如说就像我在去年圣诞节的那个样子，在这期间我竟然达到这种程度，我还刚刚能控制住自己，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登上了我的梯子上的最高一级，不过这架梯子是稳稳地立在地上的，依靠在墙上的。可是那是什么样子的地呀，什么样子的墙呀！不管怎么说，这架梯子却没有倒下，我的双脚就这样将它压在地面上，我的双脚就这样将它抵靠在墙上。

比如说，我今天有过三次傲慢的举止，面对一位售票员，面对一位站在我前面的人，这么说，仅仅是两个人，但他们使我痛苦得如胃痛发作。也许放肆狂妄是从每一个人方面表现出来的，就好像正是从我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一样。那我就决不再胆怯，就会准备悄悄地去战斗，而最令人恼火的是：没有人注意到，我也将在陪伴我的人面前的傲慢当作是一种傲慢，而且肯定当作是一种傲慢，作出那样必须要负责任的一本正经的脸部表情来；但最糟糕的是，我的一个熟人根本不将这种傲慢看作是一种性格的表示，而是作为性格的本身看待，要我注意我的傲慢，并对它表示赞赏。我为什么不保持本分呢？不过，我现在自问：看啦，人世让你去争斗，售票员、站在前面的人显得平静无事，当你走开的时候，站在前面的人甚至还向你致意，但这毫无意义。在你离去的时候，你什么也没有得到，可是你在你的圈子里会有什么遗憾呢？对这段讲话，我只回答，就是我也宁愿在朋友的圈子里打架，也不在外面自己去打架，可是这个朋友圈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呀，有一段时间我看见

这个圈子是在地球上，就像和石灰一样一起飞溅了，可是现在它只是在我面前如此地飘来飘去，后来连飘也不飘了。

5月17日到18日的短夜。和布赖、他的夫人和他的孩子在一起。我从自身中走了出来，暂时地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像一只小猫随便发出的哀号，但总还是叫了。

不知多少天又是无声地过去了，今天是5月18日。我甚至连每天将这支蘸水钢笔杆、这段木头抓在手中的决心也没有。我已经知道，我没有这个决心。我划船、骑马、游泳、晒日光浴。因此，我的小腿肚良好，大腿也不错，肚子也可以了，可是我的胸部已经损耗非常，要是我的头转到后颈……

星期日，1910年7月19日，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可怜的生活。

我要是思考这些话，那么，我必须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是呀，我并不是在远离的地方，或许是群山的废墟上受教育的呀，对此，我也许确实不能提出什么谴责来。危险的是，我过去的所有老师都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我也许愿意，而且最喜欢作那个小小的废墟的居民，被太阳烧焦，这个太阳那时也许在瓦砾之间从各个方面照在我温和的常春藤上，即使我一开始在我良好本性的压力下也许是孱弱的，这种性格可能以野草的力量在我身上猛长。

我要是思考这些话，那么，我必须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这谴责涉及着不少人，如我的双亲、一些亲戚、我们家中的一些来客、形形色色的作家、一位专门指定的整年送我去学校的厨娘、一群教师（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必须要把他们紧紧地拉在一起，不然的话我会有时候忘记其中的一位，正因为我将他们捆扎得这样紧，这个一群又有些部分离散了）、一位学校的督察、慢慢行走的过路行人。简而言之，这个谴责像一把匕首迂回地穿刺着社会，而且没有人，我重复一遍，遗憾没有人肯定，这匕首的尖端会不突然地在前面、后面或旁边出现。我不想听对这个谴责的回答，因为我已经听到过太多的回答，而且因为我在这些绝大部分的回答中也遭到了反驳，我将这些回答一并牵扯到我的谴责中，而且我马上声明，我的教育和这些反驳在颇多的方面狠狠地伤害了我。

我常常考虑这些事情，尔后我总得说，我的教育在诸多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这谴责是对着一群人的，自然，他们在这里是站在一起的，就像在旧的群像中一样。他们不知道相互干些什么，他们连垂下眼皮也想不起来，而且也不敢在希望面前发出微笑。这里有我的双亲、一些亲戚、一些教师、一位专门指定的厨娘、一些来自舞蹈课的姑娘、一些过去来我们家的客人、一些作家、一位游泳教练、一位剧场的引座员、一位学校的督察，还有一些我在街道上只碰到过一次的人，以及其他一些我已无法再回忆起来的人，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我根本就没在意过他们的说教，不管怎么说，当时我就总是心不在焉。总之，这些人是如此之多，使我不得不注意，不要把一个人说上两次。我对他们所有的人说出了我的谴责，以此将他们互相公之于众，但却不容忍反驳。因为我确实已经忍受够了那些反驳，而且因为我在这些绝大多数的反驳中遭到反驳，我不能有别的选择，只好也把这些反驳纳入我的谴责，并且声明，除了我的教育外，这些反驳在诸多方面也大大地伤害了我。

有人大概希望我在一个什么比较远的地方受教育？不，我就是在烦嚣的城市中受的教育。比如说，不是在山里的废墟中或者在海边。我的双亲和他们的一伙直到现在还受到我的谴责，而且感到无望了。如今，他们将这谴责轻松地推置一边，而且发出微笑，因为我从他们那里抽走了我的手抵住了我的额头。我在想：“我要是废墟中的小民该多好啊，静静地谛听寒鸦的鸣叫，任头上飞过它们的影子，月亮下的寒意，即使我在我良好的性格的压力下一开始就有那么一点儿孱弱，这个性格肯定随着野草的力量在我身上成长，被那个在废石堆之间从四面八方照在我这常春藤架子上的太阳烧焦了。”

有人说，而我们也乐于相信，处在危险中的男人就是对漂亮的陌生女人也不屑一顾；如果他们在从失火的剧院里逃出来的时候遇到这些女人们的阻碍，他们就会用头和手、用膝和肘将她们推到墙边。这个时候，我们那些健谈的女人们顿时鸦雀无声，她们无边无际的言谈被粗暴地呵断，原来舒展的眉毛抬得高高的，呼吸带动的大腿和臀部的运动也骤然停止，因恐惧而自然闭上的嘴巴里流进了比平时更多的空气，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微微鼓起。

“你，”我说，并用膝盖轻轻地顶了他一下（在突然讲话的时候，从嘴唇喷出来的少许唾液——不好的标记——飞向我），“没有睡着！”

“我没睡着，”他回答，并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摇摇头，“我要是睡着

了，我怎么能看护你呢？而我能不这样吗？你当时在教堂前并没有因此紧紧抓住我呀？是呀，那已经很久了，我们知道这个，就把表放在口袋里吧。”

“现在已经太晚了。”我说道。我必须作出一点儿微笑，为了掩饰它，我努力地朝房子里看去。

“这真使你这么高兴么？你就喜欢上去，非常喜欢？可是你说说，我不会吃了你的。看，要是你认为上面比下面这儿对你更好，那就马上去，马上，不要顾我。我的看法，就是一个随便行人的看法，就是，你不一会儿将又要下来，而且那会很不错的。如果一个人随便怎样站在这里，你绝不会看到他的脸，他却挽起你的胳膊，在附近的一家酒店里用葡萄酒使你振奋起来，然后把你领到他的房间，这个房间虽是那么简陋，但倒是有几块玻璃将自己与夜色隔开，以这种看法，你暂且可以吹吹口哨。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可以把你跟我说过的这些再跟别人说说，这里下面对我们不好。是的，对我们来说甚至是糟糕透顶，但如今再也不会有人帮助我了，虽然我这里处在排水沟的地方，雨水涌积，或者我在上面枝形吊灯之下用同样的嘴巴去饮香槟酒，它对我没有区别。另外，我在这两件事情之间真的没有什么选择。是啊，对我来说，还从没发生过那种让人注意的事情，这又怎么能在对我来说必要的礼仪的建筑下发生呢？在这种礼仪下我只能继续地爬行，比一只臭虫好不了多少。可是你，谁知道，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肚子里藏着。你有勇气，至少你相信有这个勇气，试一试吧，你究竟敢于做什么——人们常常是从门旁佣人的脸上已经看清了自己，要是他注意的话。”

“要是我真的肯定知道你对我是真诚的话，我就早在上面待着了。我怎么只能说出你是否对我真诚的话来呢？你现在看着我，好像我就是一个小孩子，他什么也帮不了我，他只能把事情弄得更坏。但也许你想把事情弄得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也忍受不了街上的空气，这样，我就已经属于上面的社会了。要是我留神的话，这会使我的咽喉发痒，果不其然，我咳嗽了。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上面将会是怎样的呢？在我拖着另一只脚之前，我将要踏进大厅的那只脚已经变了。”

“你是对的，我对你不是真诚的。”

“我是想离开，想上楼梯，即使一定要来个倒栽葱的话。我期望社会给我我所没有的一切，首先是调动我所有的力量，这样一种激化对我的

力量来说是不够的，就好像这样的激化是这位街头单身汉的唯一的希望。这位单身汉如果以他的、当然是破损的身体坚持住的话，如果吃上几顿饭的话，如果避开别人的影响的话，他就已经满足了，简而言之，他要在这个正在解体的世界上保持住尽可能多的东西。但他要花强力去寻找他失去的东西，不管是变化了、虚弱了，也不管看上去只是要再次去得到的他早先的财富（而且这是绝大多数情况）。他的生命说来是一条自我残害的生命，它只剩下了啃食自己肉体的牙齿和给自己的牙齿啃食的肉体。因为没有核心、没有职业、没有爱情、没有家庭、没有年金，就是说，没有一般面对世界，自然只是尝试地保持住自己的位置，不以庞大的整套财富在某种程度上使世界惊愕，人们也就不能防护眼前毁灭性的损失。这个衣服单薄、变着花样乞讨、有着苟延残喘的双腿和租金高得可怕的住房、以前被粉碎了的、这次经过长时间又重新唤起生命的单身汉用双臂将这一切抱在一起，不过总得失去他的两件东西，如果有运气捕捉住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的话。当然这里有着真理，不是任何地方都这样清楚显示出来的真理。因为谁真的作为完善的市民出现，那就是说驾一艘船在海上行驶，前面浪花在飞溅，后面留下航道的轨迹，那就是说对周围产生了许多作用，完全不同于在几块木板上的男人漂在波浪中，这波浪互相冲撞着，而且向这里压迫过来——他，这位先生和市民，处于不算小的危险中。因为他和他的所有并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两样东西，而如果谁要击溃这种联系，谁也就同时击溃他自己。我们和我们的熟人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完全是被遮掩着的，比如我现在被我的职业、我想象出来的或者是真正的痛苦、文学的偏好等等所遮掩。可是正是我无时无刻，而且太强烈地感到我的缘由，我就连差不多的满意也不可能了。我只需要15分钟不断去感觉这种缘由，恶毒的世事就像水流进正将淹死人的口中一样流进我的嘴里。

“在我和这个单身汉之间眼前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我还能思念在乡村的我的青年时代，而且也许能将自己抛回到那个地方，如果我想这么做，当然也许是以以后，如果我的状况确实需要的话。可是单身汉在自己面前什么也没有，因而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在眼前是没有区别，可是单身汉只有这个眼前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那个时代，因为没有什么能像那个时代被如此地毁灭。在那个时代，他错过了这些，当他不断地感觉他的缘由的时候，就好像人们突然发现他的身体上有一个脓疮，这个脓疮是迄今我们身体上最后的脓疮。是呀，甚至于还不是最后的脓疮，因为它好像还没有生存，我们身体上与生俱来的（这个东西）现在比所有的东西还多。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以我们整个的身体专心致志于我们双

手的工作，专心致志于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专心致志于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专心致志于我们双脚迈出的步子，这样，我们就会突然完全地转向对立的方面，就像山区里的风向标。

“如今不说昔时的离去，不管在这个最后的去向里怎样，因为只有离去才能保住他立在脚尖之上，只有脚尖能保住他立于世界。他没有这样，而是像冬天里有些地方的小孩躺在雪地里挨冻一样地躺下了。他和这些孩子，他们知道，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躺下了，或者不论用什么方式屈服了；他们知道，他们本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这些，可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在如今与他们一起在旷野或在城市里发生的变化之后，他们将会忘记每一个早先的过错和每一种束缚，他们会在新的适合自己的环境里活动，就似乎这是他们的第一环境，但是忘记在这里不是准确的用词。这个人的记忆和他的想象力一样都没受到什么损害，但就是群山也不能移动它们；这个人已经不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已经不在我们的人类之中，他常常饿得虚弱不堪。属于他的只是那眼前的一刻，永不中断的那个不幸的一刻，接着而来的并不是恢复的那一刻的光亮，他有的总只是一种东西：他的痛苦，而在这世界的整个圈子中就是没有能以医学自居的第二种东西。他所有的只是他双脚需要的那么多的地面，他所有的只是他双手盖住的那么多的支点，就是说比变化多端的空中飞人表演者还少得可怜，因为在这些表演者的下面还张有一张罗网。

“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留住我们另一些人，留住我们。因而我们耗费了几乎所有的我们的空间和我们那么多的职业，以让它们在平衡中浮沉。未来在容量上先有的一切，过去在重量上取代了，而在它们的终点，这两者是不再有区别的了。最早的青年时代会在将来变得光辉的，就像未来，而未来的结束本来就已经与我们全部的叹息有了经验，未来的结束就是过去。这个圈子几乎就这样封闭起来了，我们沿着它的边缘行走。那么，这个圈子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但它只是在我们能抓住它的那么长的时间里属于我们。我们现在仅仅向一旁移动了一下，在不论怎样的一种自我忘怀的状态中，在一种漫不经心中，一种恐怖中，一种惊异中，一种疲惫中，那么，我们已经失去了它的空间。我们从来就是将自己付于时间的长河，现在我们退却了，过去的弄潮儿，当今的闲散人，是毫无希望了。我们是法律之外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些，可是每个人都按法律对待我们。

“你现在可不必想我。你怎么也拿我与你作比较呢？我待在这个城

市里已超过20年了。你只要好好地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呀？我在这里度过了20个春夏秋冬呀。’——这时，他在我们的头顶上摇晃着握得松松的拳头。——‘这里的树不断地往上长了20年之久，在它们下面人们会是多么的渺小啊。你知道，在这许多的夜晚，在这些所有的住房里，人们有时候躺在这个墙边，有时候躺在那个墙边，这样，窗户便围着这个人转。在这些早晨，人们从窗口望去，从床边拉来沙发椅，坐上椅子喝咖啡。在这些晚上，人们支起胳膊，以手托腮。是呀，但愿这完全不是所有的一切！如果人们接受一些新的、就如这里每天在街道上都看得见的习惯该多好啊。——现在你大概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是在抱怨这些？可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抱怨这些，没有什么会允许我这么做的。我只有去散步，因此，这已足够了，在这方面，世界上还没有我不可以散步的地方。现在看上去竟又是如此了，好像我在为此自负。’”

“由此可见我是轻松的。我也许肯定不会在这这里的房子前面站着的。”

“你不要在这里拿我跟你作比较，也别让我把你弄得晕头转向。你毕竟是一个成熟的人，你反正像看上去的那样，在这个城市里是颇孤独的。”

是的，快轮到我了。在这个城市里我这个要保护的生命看来已经解体了。在最初的日子里，我的感觉是美好的，因为这个解体是作为神化而发生的，在这个神化的时刻，所有维持住我们生命的一切，都从我们身上飞走了，但正在飞走的时候，这一切还用它人道的光辉最后一次地照耀我们。我就这样站立在我的单身汉面前，因此他可能非常地爱我，可是他并不明白为什么。偶尔，他的说话好像是说明，他熟悉、他知道面对的是谁，因此他对一切都那么随意。不，那不是这样的。还不如说他是用这种方法去迎合每一个人，因为他只能作为隐居者或寄生虫而活着。他只是无奈的隐居者，一旦通过他不知道的力量，这种无奈就被克服，他已经像一个尽可能死皮赖脸活着的寄生虫。在世界上，他当然是无可救药了，而且人们会从他的举止里想到一具溺死者的尸体，被某种水流冲上水面，撞到一位精疲力竭的游泳人，将双手放在游泳人的身上，并欲死死地抓住。尸体不会变活的，甚至也没人营救，但它却能把这个精疲力竭的游泳人拖下水。

11月6日。Ch.夫人谈论缪塞[4]。犹太女子接吻出声的习惯。理解法语要有各种准备，并越过名人轶事的疑难；应该继续活在心中的、在全

部名人轶事废墟上的、在我们的眼前熄灭了法语光辉的那个结束语即将来临，到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太专心了，懂法语的那些人在结束前就走掉了，因为他们已经听够了，另一些人还远远没有听够。大厅的声响效果，与其说有利于传达演讲的话声，还不如说更有利于传出包厢里的咳嗽声；晚上在拉赫尔那里用餐，她朗诵拉辛[5]的《费德尔》，书就放在他们之间的桌上，顺便说一下，这张桌子上什么都有。

克劳德尔[6]领事，眼睛里闪出光亮，那张宽脸吸收了这束光亮，并将它反射出来。他老是想告辞，他即使很容易地与个别人告别了，可是对整体来说却不行了，因为，他若与一个人告别，就会有另一个人站过来，已经告别过的人又会在这另一个人之后接踵而来。演讲台上有几排座位是给乐队的。所有的嘈杂声互相干扰着。侍者从走廊走出。客人们在他们的房间里。一架钢琴，一个远处的弦乐队，最终一声锤击，一阵互相的争吵，争吵的地方错综复杂，但却令人刺激。在一处包厢里，一位夫人耳环上的钻石几乎不断地发出各种闪光。在柜台旁边站着一圈法国人，他们都是穿黑色衣服的年轻人。有一个人在向别人致意，鞠了一个很深的躬，他的双眼都快接近地面了，同时他微笑得很有力气。不过他只是在姑娘们面前做这些动作，他对男人们却是毫不掩饰地直接朝脸上看去，严肃地闭着嘴，并以此将前一种致意作为一种也许是可笑的、但不管怎么说绝对是绝对必要的礼节。

11月7日。维格勒[7]作关于赫贝尔[8]的演讲。他坐在一间现代化房间里的有布景的舞台上，好像他的情人为了最终开始这场戏而从一扇门跳了进来。不，他是在讲演。赫贝尔的饥饿。赫贝尔与伊丽莎·伦辛的复杂关系。他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位老处女教师，这个女人抽烟、吸鼻烟、打人、对正派人想入非非。他哪儿都去（海德堡、慕尼黑、巴黎），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目的。最初是一位教堂督察的仆人，与楼梯下的车夫睡在一张床上。

尤利乌斯·施诺尔·冯·卡罗尔斯菲尔德——弗里德里希·奥利维埃画像，他在一山坡上作画，他在那里是多么美、多么严肃（一顶高帽子像一顶被压扁的小丑的帽子，有遮盖到脸的斜窄边，披散着波浪的长发，眼睛紧盯着他的画，双手显得稳重，画板放在双膝上，一只脚在斜坡上微微下滑）。啊，不，这是弗里德里希·奥利维埃，是施诺尔画的。

11月15日，10点。我不会让我自己累着。我要跳进我的小说里，即使这会划破我的脸孔。

11月16日，12点。我读《伊菲格尼在陶里斯》[9]。除了个别明显缺漏的地方外，这里面从一个纯真的孩子的嘴里说出的干巴巴的德语着实令人吃惊不小。在读的时候，每一个字在朗诵者的面前都被诗行抬到了高处，在那里它沐浴在一条也许是窄窄的，但却是强烈的光线中。

11月27日。伯恩哈德·凯勒曼[10]朗诵。“我笔端没印出的一些东西”，他就这么开始了。看上去是一个可爱的人，直立的头发几乎灰白了，脸面光滑，显然在刮胡子上花了一番工夫，尖尖的鼻子，颧骨下面的两颊肌肉常常像一束波浪上上下下地动。他是一位有着好职位的中等水平的作家（有一个人走出走廊咳嗽，并向四周看看，是不是那里没有人），也是一位诚实的人，他要朗诵他允诺了的东西，但听众却不让。由于对第一个精神病院的故事感到可怕，由于对朗诵的方式感到无聊，由于对故事情节感到并不怎么紧张，不断有人稀稀拉拉地离去，还装出一副好像去听隔壁朗诵的热忱的样子。当他朗诵到故事最初的三分之一之后喝一点儿矿泉水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走掉了。他大吃一惊。“马上就完了”，他索性撒了个谎。当他说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似乎有人鼓掌，鼓掌声是从一个坐在所有站立者中间的人发出的，他好像是在为自己鼓掌。可是凯勒曼这时还想继续念另一个故事，可能还要长。面对这些人要离去，他只是张了一下嘴。在他被劝说之后，他终于说道：“我还很想朗诵一个小小的童话，它只需要15分钟。我现在休息5分钟。”有些人留下来，接着他朗诵了一则童话，它理所当然地使得每一个人都从大厅最靠边的地方穿越过全部听众往外跑。

12月15日。我简直不相信我从我目前的、至今已经持续了几乎一年的状况中得出的结论，我的状况竟非常地严重。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说，这不是新的状况。我本来的看法当然是这个状况是新的，我曾经有过这类似的想法，但这样一种状况还没有过。我现在就像是石头人，我像是我自己的墓碑。这不是对在特殊或一般情况中的怀疑或相信、爱情或厌恶、勇敢或恐惧来说的空白，只是存在着一种模糊的希望，但并不比墓碑上的碑文更好。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几乎没有一个与另一个相适应的，我听见辅音如何像破锣似的互相摩擦作响，而元音就像展览会上的黑人和着这种响声在歌唱。我的疑惑围着每一个字转圈圈，我先看到的是疑惑，尔后才看见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根本看不见我发现的那个字。说起来，这或许还不是最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以后也许一定能发现那些词句，他们能够将尸体的气味朝着一个方向吹去，使这种气味不致一下子向我和读者迎面扑来。如果我坐到写字台前去，我并

不会比一个在车水马龙的歌剧院广场中央跌倒而摔断双腿的人感觉得更舒服。所有的车辆尽管发出噪音，它们却是默默地从各个方向驶来，又向各个方向驶去，那个男人的疼痛使得交通秩序如此井然，连警察也望尘莫及，车辆也许不必掉头，疼痛已使那个男人闭上了双眼，也使广场和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了。这些喧嚣的生活使他痛苦，因为他毕竟是交通的一个障碍，可是空寂虚无也不见得好多少，因为它将他原来的痛苦也释放出来了。

12月16日。我不会再丢下日记。在这里我必须紧紧地抓住自己，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做到这些。我喜欢要说出这幸福的感觉，这种幸福的感觉有时好像恰恰就在现在充满在我的心中，它确实是冒着气泡并发出嘶嘶声的东西，它带着轻微而舒适的颤动整个地充满我的内心，它使我相信这些能力，但对于这种能力的存在我却无时无刻，包括现在不能完全肯定地确信了。

赫贝尔称赞尤斯蒂努斯·凯尔纳的《旅行的阴影》：“几乎不存在这样一种作品，没有人认识它。”

W.弗雷德的《孤寂的街道》这样一些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一个在零星小事里竟做出出色事情的人，在这里以一种如此可怜的方法将他的天才扩展成为一部小说的大作，使人感到恶心，即使人们忘不了去佩服那种在滥用自己天赋中的精力。

我在小说、剧本等等的作品里读到那种被追踪的次要人物。这种息息相关的感觉，我现在就有！在《比绍夫斯堡的处女们》^[11]（是不是这么叫的？）中，说到两个女裁缝，她们用一整块的白色织物为新娘制作婚纱。这两个姑娘怎样呢？她们住在哪里？她们干了些什么呢？她们不可能一起裁剪这块料子，而只能在外边的诺亚方舟前面淋着倾盆大雨，被淹得奄奄一息，最终只好将她们的面孔紧贴在一个船舱的窗户上，使得下层的旅客刹那间看到一个什么黑色的东西。

12月17日。蔡诺随随便便地说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不是根本没有什么静止的。是的，飞行的箭是静止着的。

如果法国人按他们的本性是德国人该多好啊，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被德国人羡慕至极。

我将那么多的东西搁置一边，并用笔划去，几乎是所有的尤其是我

在今年写好的东西。这不管怎么说也非常地妨碍我写作。是啊，这是一座山，它更是我过去任何时候所写东西的五倍，它已经通过它的数量将我所写的一切在我的笔下从我身边远远地拉到它那里去了。

12月18日。我将那些信（当然是那些大概可能没有什么重要内容的信，像刚才的那一封）没有拆开地搁置了一段时间，其原因只是懦弱和胆怯。这胆怯随着一封信的打开而迟疑不决，就如它迟疑不决地去打开一个房间的门。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可能迫不及待地等着我，如果这也许不是肯定的话，我也许还能将丢在一旁的信件从头至尾更好地解释一番。也就是假定说，我是一个细致认真的人，我必须这样试着尽可能地扩展所有牵涉到这封信的内容，同时已经慢慢地将这封信打开，慢慢地而且多次地读着这封信，并作长时间的思考。用许多方案来准备誊清稿，而最终还是迟疑不决地寄出去了。这一切全由我来处理，只是刚好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却是不自然地拖延着这些，我长时间地不打开信，让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它却不断地寄到我这里来，我不断地收到它，但并不将它拿过来。

晚上，11点半。我如果没有从办公室里解放出来，我简直就失望了，这只是在于，如果坚持将头抬得高高的，我就不致被淹死。这将会是多么沉重啊，这肯定要从身上花出怎样的力气来啊。这从下面的事已经表现出来，我今天没有遵守我的新的时间分配，从8点到晚上11点坐在写字台旁，我甚至目前并不把这种事情看做是如此大的不幸，我赶快地写下这几行，只是为上床睡觉。

12月19日。已经开始在办公室里工作。下午在马克斯那里。

读了一点儿歌德的日记。那遥远的地方已经静静地记录下了这样的生活，这些日记燃烧着火焰。一切事情的发生过程是那么清晰，使它们神秘起来。如此，就像一座公园的栅栏让眼睛得到了宁静，在观察远处草坪的时候却将我们置于了不适当的敬畏之中。

正好，我已婚的姐姐第一次来看我们。

12月20日。我以什么来原谅昨天写的关于歌德的说明呢（这说明几乎是那样不真实就像由它描述出来的感觉，因为真实的感受被我的姐姐驱散了）？什么也没有。我用来原谅我今天什么也没写呢？什么也没有。特别是我的身体状况不是最坏的。我的耳朵里经常有一种呼

唤：“你来吧，看不见的审判官！”

为使这些虚假的、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历史里跑出来的地方最终让我安静下来，我写出两点：“他的呼吸就像对一个梦境的叹息，在这个梦境里的不幸要比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不幸更容易忍受，以致使平常的呼吸已经变成满足的叹息。”

“现在我从高处看他那么自由，就像人们俯瞰一场小小的有耐心的游戏，对这种游戏人们会对自己说：那是在做什么呀，我不能将这些小球弄进洞穴里去，一切都是属于我的呀，这玻璃、这镇定自若、这些小球体，还有这里的什么；所有的技巧，我都能简单地将它们装进口袋里。”

12月21日。从米夏依尔·库斯明的《阿历山大大帝的事迹》里择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个孩子，他的上半身死了，下部分还活着。孩子的尸体有着两只缓慢活动着的红红的小腿。”

“两个有麻风病的国王高格和马高格，他们靠蠕虫和苍蝇活命，他将这两个国王赶进开裂的岩石里，并用所罗门的印将他们封在里面，直至这个世界结束。”

“石头河，石头在有水的地方滚滚地咆哮着，沿沙溪流去。这些沙溪三天朝南方流去，三天朝北方流去。”

“亚马逊族女战士，烧去右胸的女子们，头发短短的，穿着男人式样的鞋。”

“鳄鱼用它们的尿烧毁树木。”

我曾在鲍姆^[12]那里待过，听过如此美好的事情。我一直是体弱的，有那种约束的感觉，同时还有别的。如果人们失去约束的话，也许会更为恶劣。

12月22日。我今天竟然不敢谴责我自己。向这个空空如也的白天喊去，这也许会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回响。

12月24日。现在我更加仔细地察看我的写字桌，并认识到，在这张

写字桌上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这里处处放着那么多东西，构成一幅失去平衡的、绝对不能容纳那些横七竖八东西的杂乱无章的画面。在通常的情况下，任何乱七八糟的场面里总能容忍那些乱放的东西。看那块绿色的布料上也是乱得很，要多乱有多乱，这也可以说是旧剧院的正厅中间或后排座位的情况。但从站立的地方……

〔明日接下去写〕

12月25日。……从桌子装饰下面敞开的格洞里冒出了装订成册的旧报纸、目录、风景画片、信件。这些所有的册页，有的部分已撕碎了，有的部分翻开着，形式如露天的阶梯，这种不值一提的状况毁坏了一切。正厅里少数可称为大件的东西以最显眼的姿态矗立在那里，好像剧院里容许这些事情似的：商人可以在观众厅里清理他们的商业书籍，木匠可以锤锤打打，军官可以挥动军刀，神职人员可以在那里向心灵做祷告，学者可以据他的理解侃侃而谈，政治家可以向市民作滔滔不绝的讲话，热恋者可以在那里情不自禁地亲吻，等等。唯有在我的写字桌上当正正地放着一面刮胡子用的圆镜子，就像人在刮胡子用它的时候那样；刷衣服的刷子刷毛面朝上地放在桌子上；小皮夹子放在那里明显是为了我要付钱准备的；钥匙串里露出一把钥匙，是工作完时用的；领带还有一部分缠在脱下衣服的领子周围。那个最近处较高的、被旁边已经锁上的小抽屉挤得紧紧的饰板隔成的空间倒不如说是一个废物间。这么说吧，就好像是观众大厅里的低低的楼座，实际就是剧院里最显而易见的地方，是为最下等人、为那些老花花公子保留的地方，他们身边的保镖可以从里到外地进出，为那些粗野的汉子们保留的地方，他们可以将他们的一双脚挂在楼座的边上。人们只能是匆匆地一看，没法统计有这么多个孩子的家庭，他们正在这里整理可怜的孩子们的房间里的垃圾（这已经闯进了剧院的正厅）。在黑暗的背景里坐着不少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当灯光照进去的时候，人们才有幸看见他们，等等。在这个格子里放着不少废旧的纸张，我若是有个纸篓的话，我会早将它们扔进去的。一些已经折断了笔尖的铅笔，一只空的火柴盒，一只出自卡尔斯巴德的镇纸，一杆带边框的尺子——尺子边缘凹凸不平，要是用它来画一条公路的话，就实在太糟糕了——还有许多领扣，磨损了的刮胡刀附件（世界上没有放这些东西的地方），领夹，还有一个重重的铁镇纸。在这格子的另一边——

可怜，可怜，可是感觉良好。那是在午夜，这时我很舒适地醒了，

这也许在白天我根本什么也没写的情况下才是可原谅的。燃烧着的白炽灯，安静的住处，外面的黑暗，清醒状态的最后时刻，它们给我权利去写作，不管那是最可怜的。我赶紧地利用这个权利，我也就是这个权利了。

12月26日。两天半里，我——自然不是完全地——孑然一身，这是本来的我，现在我已经就这样在路上了，即使没有变化。独处的时候有一种永远也不会失灵的超越我自己的力量。我内心的东西跑出来了（暂时只是表面的），我准备将更深的东西挖掘出来。我内心中一种小小的秩序开始形成，我不再需要什么，因为杂乱无章伴随着平庸之才乃是最可恨的东西。

12月27日。我的力量连写成一个句子都不够。是呀，如果这涉及要说的话，如果写下一个单词，这就足够了，而且如果人们能在安详的意识中转过身去，完全用自己来充实这个单词就好了。

我这个下午因睡觉耽误了部分时间。在清醒的时候我躺在沙发上，思考着我青年时代的一些爱情经历，自己生气地搁浅在一个错过的机会上（那个时候我有点儿着凉，躺在床上，我的家庭女教师给我朗诵《克莱奏鸣曲》，她同时理解地享受着我的激动），把素食的晚餐放在自己面前，对我的消化表示满意，可是担心，是不是我的目光足够我全部的生命。

12月28日。如果我有几个小时表现了人的举止行为，就如今天和马克思在一起，后来在鲍姆那里，我在去睡觉前就已经傲慢起来了。

1911年

1月3日。“喂。”我说，于是用膝盖轻轻地顶了他一下。“我想告辞了。”在突然说话的时候，嘴里向我飞出少许唾液，这是不好的标记。

“你可是早就考虑这个了。”他说着，离开墙壁，伸展四肢。

“不，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

“那你在思考什么呢？”

“我最后还为社会准备了一点点东西。你要做到你能够做到的那样的努力，你不会理解这一点的。我这个来自省城的随随便便的人，人们每时每刻都可以用那些如在火车站前成百上千地站在一起追逐某个班次列车的人中的一个与之交换。”

1月4日。勋赫尔的《信念与故乡》。

在我周围参观画廊的人用潮湿的手指擦拭着眼睛。

1月6日。“喂，”我说着，便用膝盖瞄准着轻轻地顶了他一下，“现在我可走了。如果你想一起看看这个的话，就把眼睛睁开。”

“是这样吗？”他问道。同时睁大眼睛，目光直对着我，可是那目光还是那么微弱，我完全可以一晃胳膊就能将它挡回去。“你真的要走吗？我怎么办呢？我不能抓住你。如果我能这样做的话，那我也不应这么做。因此，我只想向你弄清你的感觉，依照什么样的感觉你才能被我拦住呢。”他随即露出一脸低级仆人的模样，这些仆人用这样的嘴脸可以在一个一般有秩序的国家里使有体面的孩子顺从或害怕。

1月7日。N.的妹妹，她那样地热恋她的未婚夫，以至她想作出这般安排来，分别与每一个来访者讲话，因为人们在个别人面前能更好地讲述和重复有关他的爱情。

就像通过魔术一般（因为既不是外部的、也不是内部的情况阻碍着我，这种情况现在比过去一年来更为令人愉快），我在整个自由自在的一天被阻于写作，这天正是星期天。对于不幸生命的一些新认识使我领悟，并感慰藉，我就是这样的生命。

1月12日。在这些天里，我没有写下许多关于我的事情，部分是出于懒惰（我现在白天睡得那么多那么死，我在睡觉的时候身体更加重了），但部分也是因为害怕泄露我的自白。这种害怕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种自白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地通过写作确定下来，那就是，如果它能够在最大的完整性中，直到在所有次要的结果中，并以完全的真实性发生的话。毕竟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我对此无论如何是无能为力的——那么，记录下来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意图，并以被确定下来东西的优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取代那种只是一般感受到的东西，那就是，正确的感觉消逝，而同时，这种记录下来的东西的无价值性很晚才被认识。

几天前，莱奥尼·弗里蓬演出小型舞剧《维也纳城市》。一堆扎起来的鬃曲形状的发型，不怎么样的紧身胸衣，非常陈旧的衣服，但由于运用悲剧动作，显得很漂亮，眼皮露出疲劳，长腿作弓箭步，手臂沿着躯体作娴熟的伸展。在含糊的地方挺直脖颈所表现的含义。唱的是：卢浮宫里的纽扣收藏。

席勒像，是沙多夫于1804年在柏林画的，那时他在柏林很受尊敬。人们无法能比在这个鼻子上更为有力地抓住这张脸了。鼻中隔由于在工作时有摸鼻子的习惯而有点拖下来，刮过的脸孔可能使这个和蔼可亲的、面颊有点凹陷的人显得老态龙钟。

1月14日。贝拉特的小说《夫妻》。许多糟糕的犹太人的东西。一种突然的、千篇一律的、滑稽的、做作的出现，例如大家都兴高采烈，可是有一个在场的人却不高兴。或者，这时来了一位斯特恩先生（我们从小说的开头到结束就已经认识了这位先生）。就是在哈姆孙那里也有类似的情形，可是在那里这是如此地理所当然，就像是木头里的结节，但在这里却是渗透到小说的情节里去了，就像是一种时兴的药滴进了糖里。——毫无缘由地抓一些离奇的用语，例如：他尽力地关心她的头发，尽力地，而且一再尽力地。——有些人，并没给他们照上新的光辉，他们便顺利地出场了，那么顺利，以致连一段段的错误也无关紧要了。次要人物不无慰藉。

1月17日。马克斯给我朗诵《告别青年时代》的第一幕。我怎么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去想起这个的呢？在我找到我身上真正的感觉之前，我肯定要找上一年的时间，而且应该在很晚的晚上坐在咖啡馆里，受着一种糟糕透顶的消化胡乱的折磨，对于一部如此伟大的作品，不管怎么

说，总可以有理由留坐在我的沙发椅上的。

1月19日。因为我看来彻底地完了——去年我每天醒着的时间连五分钟都不到——我每天想我要么肯定离大地而去，要么，即使我不能在这里面看到最微薄的希望，我一定要重新从小孩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我外表上对此要比那个时候显得更为轻松。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几乎还没有一点儿的预感去努力于那种每个字都跟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我应该将其吐之于我的胸口的、令我着迷得离开我的座位的描述。我带着怎样的悲痛（不过与现在的悲痛无法作比）开始了呀！何等的冷酷从我写的东西里整天追逐着我呀！危险是多么大，而且它的作用很少中断，以致我根本感觉不到那种冷酷，这当然完全不会使我的不幸减少许多。

有一次我构思一部小说，在小说中，两个兄弟斗来斗去，他们中的一个去了美国，而另一个则待在欧洲一处的监狱里。我只是有时候开始写上几行，可是这使我马上感到疲乏。有一次，在星期天的下午，当我们去看过祖父母并在那里吃过总是用奶油涂过一般的而又特别软的面包之后，我又这样写上一些关于我设想的监狱。我现在可以这么做了，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自负这么做的，我在桌布上将纸移来移去，敲着铅笔，在灯下向四周环顾，想吸引谁来将我写的东西拿走看一下，并对我表示赞赏。在这几行里主要是写监狱的走廊，首先是那里的安静和寒冷；对于留下来的兄弟还说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好兄弟。我大概曾对我所描写的东西失去价值有过瞬间的感觉，可是我在那个下午之前对这种感觉从没有过多地注意，如果我处在我已习惯的亲戚中（我害怕得如此厉害，使得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情况中让我感到一半的幸福），坐在熟悉的房间里圆桌的周围，而且我不能忘了，我是个年轻人，有责任在这个目前不受干扰的环境里成长为大人。一位喜欢笑出声来的叔叔终于从我这里取走了那页纸，因为我只是微微地捏着它。他仓促地看了一下，又交给了我，甚至连笑声都没有，只是对着另一些用目光追着他的人说，“一般的胡说八道”，对我却什么也没说。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仍像早先那样匍匐在我那页没用的纸上，可是我却真实地感觉到挨一棒子被赶出了这个集体。叔叔的判决带着已经几乎是现实的意义一再地在我心中回荡，在这个家庭感情里，我本人就已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冰冷的空间，我一定要用一把火来温暖这个空间，这火正是我要去寻找的。

2月19日。像我今天想从床上爬起来一样，我一下子晕倒了。这个

原因非常简单，我工作完全超负荷了。不是办公室的工作，而是我的其他的工作。在这方面来说，办公室的工作所占的部分是无辜的，比如如果我不一定非要去的的话，我可以安逸地为我的工作活着，不一定要在那里度过这每天的六个小时，特别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时候，这些时间令我精神痛苦。您无法想象，因为我被我的事情塞得满满的。最终，是呀，我明白了这一点，这只是废话，我感到歉疚，办公室对我有着最清楚、最正当的要求。只是，它对我来说正好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从这双重生活里出来的路大概唯有精神错乱了。我是在美好的晨光里写这些的，何况，如果这些不是那样的真实，如果我不像一个儿子那样爱您，我也许肯定不会写这些。

另外，我们明天肯定又会在一起，我去办公室，我会在那里首先听到的是，您要把我从您的部门除去。

2月19日。那是我灵感的一种特殊表现。在这灵感里，我这个最幸福和最不幸福的人现在深夜两点去睡觉（她大约会留着，如果我只一味地沉入如此的想象，因为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了），这表现就是，我能做一切事情，不只是某种一定的工作。如果我无选择地写上一个句子，例如：“他从窗口望去”，这样，它已经是完全的了。

“你还要长久地留在这里吗？”我问。在突然的谈话中，从嘴里喷出的少许唾液——不好的标记——飞到我这里。

“打扰你了？如果这打扰了你或可能妨碍你上去的话，我立刻就走，不然的话，我还愿意留着，因为我累了。”

但最后他还是可以满意的，我认识他越清楚，他总是会更加地满意。因为他认识我显然也越来越清楚，他一定能将我和我所有的知识一起放进口袋里。否则这到底该怎么解释呢？我还逗留在街头，好像在我面前没有房子，而只是火。要是人们进入一个社交圈子，那么，他很简单地踏进这房子，登楼梯而上，几乎觉察不到，他的思想是那么激烈地活跃着。只有这样，他的行动确实实才是违心的，而且是反对这个社交圈子的。[13]

2月20日。《卢采娜》中的梅拉·马尔丝。一位诙谐的悲剧女演员，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像悲剧女演员们有时在舞台前展示自己那样在一种反转的舞台上登场的。在上场的时候，她的脸孔显得疲惫，自然又平、又

空、又老，像这样的面孔，对所有自觉的演员来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开端。她说话很尖刻，她的动作也是如此，从完全弯曲的大拇指开始，这只大拇指好像顶替了骨头而有着强烈的渴求。灯光的转换和周围表演的肌肉的增强，使她的鼻子赋有特别变化的能力。且不管她那永远闪光的动作和语言，她的尖刻仍然是温柔的。

小城里也有供散步者散步的小环境。

在游玩场所，我身旁的有朝气的、纯洁的、穿着整齐的年轻人，使我回忆起我的青年时代，而且也因此给我一个倒胃口的印象。^[14]

克莱斯特^[15]年轻时代的信，22岁的时候。放弃军职。在家中有入问：“那究竟什么样的为面包的科学，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呢？你可以在法学和国民经学之间选择，但你在宫廷里有靠山吗？”我开始有点发窘地作了否定，但接着越来越感到骄傲地解释道，我如果也有靠山的话，我要去指望它就一定会以我现在的理解感到羞愧。有人微笑，我感觉到，我过于仓促了。这样的实话，人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说不出的。

2月21日。我在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好像我有了第二次生命完全是确凿无疑的。就如我，比方说忘怀了那次在巴黎的糟糕的逗留，而后来我又努力地去了那里一趟。在这种情况下，看看投在街道路面上的被明显分开的光亮与阴影的部分。

瞬息之间，我感到浑身禁锢在甲壳之中。

例如手臂的肌肉离我是多么遥远啊。

马尔克·亨利、德尔瓦德在观众中通过空空的大厅产生的悲剧感觉增强了严肃歌曲的效果，却伤害了娱乐的观众。亨利在说开场白的时候，德瓦尔德正在一幅大幕的后面，她并不知道，这幅幕布被灯光照得通亮，她整理了一下头发。——W.是举办人，他出现在观众稀稀拉拉的晚会上，留着阿西利亚人的胡子，这胡子通常是乌黑的，现在看上去为灰、黑相间。——好吧，让这样的温度高上去吧，这要持续24个小时，不会这么久的。——许多豪华的衣服，布列塔尼人的服式，最里面的衬裙是最长的衬裙，使人从遥远处就可以计算出这种富有。最初，德瓦尔德穿一身裁剪宽肥的绿衣裳陪着，而且瑟缩着，因为有人要省去一个陪伴的人。——巴黎街道的喊叫声。报童忽而消失。——有人跟我说话，我还没作一次深呼吸，我就走了。——德瓦尔德是可笑的，她带着老处

女的微笑，德国小型歌舞场上的一个老处女。她从幕后拿来一条红色的披肩披上，她革命了。用同等坚韧的、而不是切碎的声音朗诵道滕代[16]的诗。只有在开始时她坐在钢琴旁边才像个女性，显得可爱。在唱《在巴蒂格诺勒》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到巴黎就在我的喉咙口。巴蒂格诺勒应该退休了，还有它的大城市里的浪人。布鲁昂为每一个市区作歌。

城市的世界

奥斯卡·M.，一个年龄较大的大学生——如果人们走近去看他，就会在他的一双眼睛前面感到恐惧——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正飘大雪的时候站立在一个空地上，穿一身冬衣，还加上一件冬天的外套，脖子围一条围巾，头上戴一顶皮帽。他沉思地眨着双眼。他那样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竟使他有一次拿下帽子，用它曲髻的毛在自己的脸上蹭来蹭去。最终，他好像作出了一个决定，用一个舞蹈的转身动作走向回家的路。

当他打开他父母亲卧室的门时，他看见他父亲正坐在一张空桌的前面，他父亲那张挂满赘肉的脸修饰得光光的。父亲将脸转向门，还没等奥斯卡的脚伸进房间，就开口了：“终于来了，停住，我请你站在门那里，我就要跟你发这样的火，我无法控制住自己。”

“可是父亲。”奥斯卡说，在讲话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自己是怎样跑来的。

“静一下，”父亲叫住他，并站了起来，身子竟把一扇窗户挡住了，“我叫你安静。丢开你那个‘可是’，明白吗？”这时，他用双手抓住桌子，向奥斯卡挪近了一步，“我实在再也无法忍受你游手好闲的生活了。我是一个老人。我想从你身上得到一种老年的慰藉，可是，对我来说，你比我所有的疾病还要可恶。唉，竟生了这样一个儿子，懒惰、奢侈、狠毒，而且（我为什么不应该跟你坦率地说这些哩）愚蠢，你是要用这些表现将老父亲逼进坟墓啊。”这时，父亲突然不做声了，但他的脸在动，好像还在说话。

“亲爱的父亲，”奥斯卡说着，并小心地走向门，“请平静一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今天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它会使我成为一个实干的人，就像你所希望的那样。”

“什么样的想法？”父亲问，同时看着房间的一个角落。

“请信任我，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会把一切跟你讲清楚的。在我内心深处，我曾一直是一个好儿子，我只是无法从外部表现出来。我是那么痛苦，我已经无法使你高兴，我只好对你发脾气了。可是现在请让我还是散一会儿步去，好让我把思路弄得更为清晰。”

这位父亲起先坐在桌边处，渐渐注意起来，现在站了起来。“我不相信，你现在讲的这些有什么意思，我宁愿把它当作是废话。但你毕竟是我的儿子。——你准时来，我们在家吃晚饭。然后，你可以说你的事情了。”

“这小小的信任已经使我满足，我从心里对此感谢。但这毕竟不能以我的眼光去看，我已经完全从事了一种严肃的事业。”

“我暂时什么也看不见，”父亲说，“不过，这可能是我的罪过，因为我从来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你的。”同时，如他往来的习惯那样，用有节奏的敲桌面的声音来引人注意，时间是怎样流逝的。“但最主要的是，我对你完全失去了信任，奥斯卡。如果我对你大声吼叫了——像你来时那样，我已经跟你吼叫过了，不是吗？——我如此做不是希望你会因此改好，我这么做只是想着你可怜而善良的母亲。她现在大概还没有直截了当地为你感到悲痛，可是为防止这种悲痛所作的努力正慢慢地化为乌有，因为她相信，无论如何，那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不能用你的承诺吸引我的话，我也许出于对自己的考虑就不再回想这些事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女仆正进来看炉子里的火。她几乎没有离开房间，奥斯卡大声说道：“可是，父亲！我也没有预料到的。如果我也许只是突然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我们就说，那是我博士论文的想法，我把博士论文搁在我的箱子里已经10年了。它需要的想法如盐那么多。也许不是这样，我从散步跑回家中，就如今天发生的那样，并说了‘父亲，我幸运地突然有了这个和这个想法’这才是可能的吧。如果你接着用你令人敬畏的声音将刚才的指责劈头盖脸地向我泼来，那我突如其来的想法会一下子消逝，我就得马上随便怎样抱歉一下，或不作任何抱歉地走开了。现在正相反！你说的反对我的一切，都有助于我思想，这个思想并没停下来，它不断强烈地充满我的脑袋。我要走了，因为在单独的情况下，我才能给它理出头绪来。”他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呼吸的时候吞咽了一下。

“在你脑子里的，也可能是一团乱七八糟的琐事，”父亲瞪大眼睛说

道，“我已经相信，它把你紧紧缠住了。可是如果有什么出色的事情竟然走到你的脑子里的话，那么过了一夜它又会离你而去的。我太知道你了。”

奥斯卡转过头去，好像有人抓着他脖子。“现在放了我吧，你没有必要把我钻透了。唯一的可能性是，你能准确地预言我的最后结局，这种可能真不应该诱使你打扰我好好地思考。也许我的过去给你这样的权利，但你不该利用它。”

“这个时候，你最好看看，你的摇摆不定是多么厉害，如果它逼使你如此跟我说话的话。”

“没有什么逼迫我，”奥斯卡说，并缩了一下脖子。他也完全凑近到桌边，让人无法知道他在跟谁说话。“我所说的话，都是出于对你的敬畏，甚至是出于对你的爱而说的，就如你以后也会看到的那样，因为在我的决定里对你和妈妈的考虑占着绝大的成分。”

“那我现在就要感谢你了，”父亲说，“你的母亲和我在那个适当的时刻对此还有能力，那也许是非常不可能的了。”

“父亲，请让未来还是去睡它应该睡的觉去吧！要是人们提前去唤醒它的话，那人们得到的却是一个睡过头的当代。还得要你的儿子跟你说这个吗！我也不曾想要你信服，而只是想要告诉你新的消息，你必须承认，这至少让我成功了。”

“现在，奥斯卡，从根本上说，让我惊异的只还有一点：你为什么不早经常带着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朝我这里跑呢？是这件事情那么适合你迄今的本性？不是，事实上，那是因为我的严厉。”

“是呀，你也许会把我劈成两半，而不听我说？我跑到这里来，天知道，原是为尽快地让你高兴。不过当我的计划还没有完善的时候，我是无法向你透露任何东西的。你为什么要惩罚我的好意哩，而且还要从我这里得到解释呢？这种解释还可能损害我计划的出台。”

“别说了，我根本不想知道什么。但我得很快地回答你，因为你已退到门口了，显然有些很急的事要办，现在我的情绪比早先还要沮丧，因此，我请你——如果你这么坚持的话，我也只能袖起手来了——至少也别跟你母亲说什么有关你的想法。该让我停下来了。”

“这样跟我说话的人，那不是我的父亲，”奥斯卡叫起来了，他已将他的手臂放在了门把手上。“这是中午先跟你说一下的事情，或者说，你是我现在在我父亲的房间里第一次遇到的一个陌生人。我真正的父亲——”奥斯卡张着嘴巴沉默了一会儿，“他真该拥抱我的，他该把母亲叫来。你做了什么，父亲？”

“我想，你更应该与你真正的父亲一起吃晚饭，那才会更加令人高兴哩。”

“他也会来的，他是一定要来的，而且母亲也一定得来。这个弗兰茨，我现在就叫他。就这样。”接着，奥斯卡用肩膀挤一下微启的门，就好像他打算去挤压这扇门似的。

来到弗兰茨的住所，他向矮小的女房东欠了欠身子，说道：“工程师先生正睡着觉，我知道，这没关系，”他不顾那位对他的来访不满的女房东在前厅徒劳地走来走去，竟打开了那扇玻璃门。这扇门就像有一处敏感的地方被抓住似的，在他的手里颤栗。他也不顾还几乎没有看房间里面的情况，就叫了起来：“弗兰茨，起来。我需要你专家的主意，可是我在你的房间里受不了，我们一定要作一小会儿的散步，你也必须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快点吧。”

“很愿意，”工程师从长沙发上传出说话的声音，“那么，首先做什么？起身、吃晚饭、散步、给出主意？有些事情我也不要听了。”

“首先是不开玩笑，弗兰茨。这是最重要的，我把这个忘了。”

“我马上让你满意。但得要起身呀！——也许我起身一次还不如到你那里吃两次晚饭哩。”

“你现在就起来！不要顶嘴。”奥斯卡从前面抓住这个弱小男子的衣服，将他拽起来。

“你真是粗暴，你知道吗？真佩服，我这样从长沙发上拉扯过你一次吗？”他用两个小指拭着还没睁开的眼睛。

“可是，弗兰茨，”奥斯卡的脸已变了形，“穿上你的衣服。我可不是傻瓜，会无缘无故地叫醒你。”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睡觉的。我昨天晚上加班了，直到今天中午才来

睡觉，而且也是因为你的缘故——”

“怎么说？”

“啊哈，什么，你这么少地顾及我，我已经生气了。这不是第一次呀。当然，你是一个自由的大学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幸运的。可是人们在这时候必须要有所顾忌，真见鬼！我虽是你的朋友，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剥夺了我的职业呀。”他指出这一点，还摇晃着他那双张开的手。

“按你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我会肯定相信你没有睡足？”奥斯卡说着，就坐到了一根床栏杆上。他从那里看着工程师，好像他比刚才有了更多一些时间。

“你究竟想要我干什么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你为什么要把我弄醒？”工程师问道，并使劲地搓着那山羊胡子下面的脖子，在一觉醒来之后，他顿时感觉到了他身上胡子跟脖子较近的关系。

“我想要你干什么，”奥斯卡轻声说道，并用脚后跟踩了一下床，“很少。我在前屋已经跟你说了：你穿衣服。”

“如果你，奥斯卡，想用此来表明，我对你的新鲜事很少感兴趣，那你完全说对了。”

“那好吧，要将你放进去的那把火将完全算在那个新鲜事的账上，我们的友谊不会搅和进去。情况越来越清楚了，我不需要清楚的答复，这会挡住你的眼睛。可是如果你要找领子和领带的话，它们就在那里的椅子上。”

“谢谢，”工程师说，并开始系上领子和领带，“我简直可以信赖你了。”

3月26日。鲁道夫·施泰纳博士在柏林要作神学报告。雄辩的效果：敌对的人们愉快地讨论不同的看法。听者对这种强烈的敌对状况感到吃惊，听者陷入担心，完全浸在这些不同的看法里，好像除此而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听者现在认为一种辩驳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们更满足于对捍卫能力粗略的说明。此外，这样的雄辩效果正适应了虔诚心境的准则。——继续不断地看着面前的手掌——错过最后的结束。一般来说，

在讲演的人那里说出来的句子都从它那个大的开头字母开始的，句子所经之处转弯抹角，走得那么遥远，超出听者之外，又以最后的结束点回到讲演人身边。但要是错过了这一点，那么，再也把握不住的句子就直接随整个呼吸向听者吹去。

罗斯和克劳斯以前的讲演。

我们现在几乎习惯了在西欧的短篇小说里，立刻从描写之中或描写之外去寻找而且找到犹太问题的解决，只要这些小说与一些小群犹太人有关的话。但在《犹太女人》^[17]里却看不出这样一种解决来，甚至连推测也推测不出来，因为正是那些与这样一些问题打交道的人在小说中站得离中心点较远。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已经较快地转变过来了，这样，我们虽然能更为清楚地观察他们，但却再也找不到机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有关他们奋斗志向的稳妥答案。果断地说，我们从这里面认识到这种短篇小说的一种不足，而且感觉到对这样一种指摘有更多的理由。当今天自从犬儒主义存在以来，这种解决的可能性是那么清楚地围绕在犹太问题的周围，以致作家为了找到适应他的小说那种解决的可能性，最终只能走出几步。

但这种不足还出自另一种原因。《犹太女人》缺少非犹太读者，缺少那些受人尊敬的、对立的人。他们在别的短篇小说里引出有关犹太人的话题，对他们来说，这是深入到一种惊奇、怀疑、忌妒、恐怖的领域，最终，最终被置于自信的境地。不管怎么说，这个话题正是在他们的面前才能在它整个持续的过程中确立起来。我们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另一种解释犹太群众的方法，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不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引用这种感觉，它一般来说至少是处在一种思潮之中。如此，在意大利的一条人行道上，那蜥蜴的抽搐在我们的脚前令我们非同寻常地高兴，我们不断想俯下身去，但我们看见它们在一个商人那里被成百条地放在一只大玻璃瓶里爬来爬去，人们一般会习惯地放进黄瓜，这样我们就不知所措了。

两种不足融汇成第三种不足。《犹太女人》可能缺少那个最前面的青少年人，他通常在小说中将最好的东西吸引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在一种美好激进的思潮里逼进犹太圈子的边缘。正是这一点不让我们理解，这部小说可以缺少这样的年轻人，这里我们预料一个比我们见到的错误还要多的错误。

3月28日。画家P.—卡林，他夫人，上部两只宽大的前门牙，这使那张大的，更确切地说是平的脸孔显得更尖细了。内廷参事B.夫人，作曲家的母亲，岁月将这位母亲的骨架雕刻得如此明显，使她至少在坐着的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男人。

没有出席的学生们是那样地需要施泰纳博士。——在演讲时，没有价值的人是那样地拥挤着他。这是求知欲？但他们有那样的必要吗？看来是这样。——睡上两个小时。自从有人给他停过一次电后，他身边总带着一支蜡烛。——他站得离耶稣挺近。——他在慕尼黑上演过他的剧本（那时，你可以研究上一年的时间也不会弄懂它的意思），他设计过服装，写过音乐。——他教过一位化学家。——洛维·西蒙，巴黎的肥皂商，奎蒙赛从他那里得到过最好的商业忠告，他将他的作品翻译成法文，因此这位“宫”廷参事夫人在她笔记本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人们怎样获得较高级世界的知识[18]？在巴黎的S.洛维那里。”

有位通神论学者，65岁，身体非常健壮，在维也纳共济会。过去他曾是一位脑满肠肥的豪饮者，他不断地信神，又不断地怀疑。这应该是非常有趣的。如有一次在布达佩斯的一次大会期间，他于一个月份的晚上在布罗克斯山上吃晚饭的时候，施泰纳博士出乎意料地来到这个圈子，他出于恐惧，拿着带把手的啤酒杯子，躲在一只啤酒桶的后边（尽管施泰纳博士并没为此发脾气）。

他大概不是当今最伟大的思想研究家，但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将神学与科学统一起来。因此他也知道一切。——有一次有一位植物学家、一位神秘的大师，来到他家乡的村庄。这位大师使他大彻大悟。——我将要探访施泰纳博士，由太太为我安排，以作起始的回忆。——当一种流感在这位太太这里露出苗头的时候，太太的医生向施泰纳博士询问了一种药剂，给太太开了那剂药，太太很快就康复了。——一位法国女人向他用“*Au revoir*”[19]告别。她在她的后面握手。两个月后，她死了。还有一种类似的事情在慕尼黑发生。——一位慕尼黑医生用施泰纳博士指定的颜料治好病。他还将病人送进绘画陈列馆，并附上处方，要在一张指定的画前全神贯注半个小时或更长一些时间。

大西洋世界的没落，鬼魂的没落，以及现在由于利己主义表现的没落。——我们生活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只要阿利曼[20]的力量不越来越大，施泰纳博士的尝试就会成功。——他喝两升杏仁奶，并吃长在高处的果子。——他用思维方式与他的不在场的学生交往，他将这些思维

方式传递给他们，而不用在他们出生后继续与他们打交道。不过这些不在场的学生不久就会自耗而尽，他必须再造他们。

F.夫人：“我的记忆力很坏。”

施泰纳博士：“您别吃鸡蛋。”

我拜访施泰纳博士。

一位女人已在那里等着（在荣曼街上的维多利亚旅馆上面二层楼），她却急忙请我在她之前进去。我们等着，女秘书来了，她用空话敷衍着我们。在走廊里就那么一瞥，我看见了他。他马上张开手臂朝我们走来。那位女子解释说，我是第一个到的。我立即随他而去，他将我引进他的房间。他在讲演的那天晚上穿的那件像狐皮似的黑色皇袍（不是狐皮，而只是通过它的纯黑色才闪闪发光），现在在白日的光线下（下午3点钟），竟斑斑点点可见，尤其是背部和肩膀部积满了尘土。

在他的房间里，我寻找我无法感觉到的谦恭，并为我的帽子寻找到一个可笑的地方，我将它放在了一个系靴子的小木头架上。桌子放在中央，我坐下，目光朝着窗户，他坐在桌子的左边。桌子上的纸都画有图样，这使人回忆起那些关于神秘生理学的讲演。《自然哲学年鉴》这本小册子盖住了一小堆书籍，看来，这些书籍也是到处放置。只是人们不能在这里到处看，因为他总是企图用他的目光来阻挡别人。但如果他有时候并没这么做，那么，别人就得注意收回自己的目光。他开始说些无关紧要的句子：您就是那位卡夫卡博士？您早已研究过通神学了吗？

但我推出自己已准备好的讲话：我觉得，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是在奋力地奔向通神学，可是同时我在它的面前却有着最大的恐惧。就是说，我害怕从它那里会有一种新的混乱，它对我来说会很糟糕，因为我目前的不幸也正包括了这种混乱。这种混乱如下：我的幸运，我的能力与不管用什么方式利用的每一种可能性，从来都在文学方面的事业中。在这里我当然经历了一些（不太多的）情况，这些情况，据我看与您博士先生，描绘的预见的情况很相近。在这样的状况中，我完全陷在每一种突如其来的想法中，但我也使这每一种突如其来的想法充满了内容。而且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感觉自己不仅达到了我自己的边缘，而且也达到了人的边缘。只要热情冷却下来，大约像预言家所特有的那样，也就缺少了那种状况，即使不完全是那样的话。我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不是在那种状态中写出我工作中最好的东西。——那么，我也不能完全地献身于这样的文学事业，如肯定那样，而且从各种原因来说都是否定的。除了我家庭的情况之外，我已经由于我工作的缓慢进展和这种工作的特殊性质而不能靠文学生活；此外，还有我的健康状况和我的性格阻碍我为一种处在最顺利状况中不能把握的生命献身。我因此成了一个社会保险机构里的职员。现在，这两种职业从不互相容忍，并容许一种共同的幸福。一个里面的最小的幸福成了第二个里面的最大的不幸。如果我在头天晚上写出了好东西，第二天我就在办公室里烧掉，并什么也干不出来了。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厉害。在办公室里，外表上我符合我的职责，但却不能满足我内心的职责，而且那个未实现的内心的职责变成了一种不幸，这不幸不再因我而起。我现在应该将通神学作为第三种职责引进这两种永远也平衡不了的努力里去？难道它不会从两方面受到妨碍，或者本身受到这两者的妨害吗？我已经成了当前如此不幸的人了吗？这三者会引往一个结果吗？我来这里，博士先生，向您询问这个，因为我预感到，如果您以为我在这方面有能力的话，我也可以真的为此承担起责任来。

他听得十分专注，也不直接地，哪怕是微微地向我看一下，完全沉浸在我的话语里。他不时地点着头，他好像将此看作是一种增强全神贯注的辅助剂。在开始的时候，一阵暗暗伤风的感觉妨碍了他，鼻涕从鼻子里流出，他不停用手帕堵擦鼻子，用一个手指掏着两个鼻孔。

5月27日。今天是你的生日，但我甚至连一本寻常的书也没送你。因为这也许只是表象，基本上我连送书给你的能力也没有。只因为我是那么地需要今天瞬间地待在你的身边，哪怕只是用那一张卡片，我写，而且只因此而开始了悲叹，好让你马上认出我来。

8月15日。这时间现在在消逝，而且在这时间里我写不出一句话来，它却因此对我曾是那么重要。因为我在布拉格、柯尼斯萨尔和采诺希芝中断了游泳学业，为我的身体而羞愧。就像后来一样，我现在以28岁的年龄追补我的教育，在一种赛跑中，人们会称这为迟到的起点。这样一种不幸的损害大概并不存在于人们不会取胜。这种最后的不幸其实只是那种现在还看得出的、清晰、健康的、后来却变得模糊不清的、无边无际发展的不幸的核心。这不幸驱使一个人进入圈子的内部，而这个人却应该围着这个圈子跑。此外，我在我身边的这段小部分也颇幸福的时间里也发现过许多别的东西，并想在以后的几天里将它写出来。

8月20日。我有着这样不幸的信仰，就是我没有时间去干最微不足道的舒适的工作，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去为一个故事，将我向世界的各个方向伸展，像我一定要去做的那样。但我后来又相信，我的旅行还不如告吹，我会更好地理解一下，如果我因为写了一点儿东西而感到松弛了的话，那么，我会再试一下的。

我在看见他的时候，就预感到这些劳累，为我的缘故，他将这些劳累承担在自己身上。大概只是因为他疲倦了，这些劳累现在给了他沉着自信。我也许并不满足于一种小小的紧张，欺骗也许成功了，大概还是现在才成功的。我要为自己辩护吗？我虽然执拗地站在这里、这座房子前面，但我同样固执地迟疑不决地往上走。我等待着，直至客人唱着歌来接我？[\[21\]](#)

我读了有关狄更斯的东西。那是多么地难懂，一个局外人可能理解它，从故事一开始人们就在自身里经历了一个故事，从遥远的一点直到行驶过来的由钢铁、煤炭和蒸气组成的火车头。但就是到现在也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故事，而且还被这个故事驱使着，而且也有这样的时间让它驱使，在自身的推动下从它那里驶出，不管它向哪里撞去，也不管人们将它引往何处。

我不能理解这个，甚至也不相信这个。我有时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文字里，在这个文字的变音里（上面说的“撞”字），我，比如说，在一瞬间丢失了我无用的脑袋。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我的鱼一般感觉的开始和结束。

8月24日。和熟人坐在露天咖啡馆的桌边，看见一位妇女坐在旁边的桌旁。她刚来不久，在高大的胸脯下起伏着粗沉的呼吸，散发着热气的褐色脸孔显得光彩照人，她斜着身回过头来，一条明显的胡须印痕可见，她向上转动眼睛，她有时几乎就是这样地看她丈夫。她丈夫这时正在她旁边读一份有插图的报纸，就好像有人让他相信，在他夫人旁边的人在咖啡屋里最多能读读报纸，而决不能读一份杂志。一会儿，她肥胖的身体使她醒悟过来，她稍稍地挪动了身子离开桌边。

8月26日。明日我应该去意大利。现在是晚上，父亲由于激动不能入睡，因为他完全被商务的烦恼和他的因此而引起的疾病困扰着。他心口上蒙着一块黑布，恶心，缺氧，呻吟着走来走去，母亲在恐惧中寻找着新的慰藉。他从来都是那么有精力，他曾不理睬一切，而现在——我

说，有关商业的困扰还可能持续25年，以后一切肯定会好起来的。他唉叹地走着，来来回回地摇着头。这很清楚，在他看来，他的担心不会通过我们而减少，甚至也不会轻松，但即使从我们这里看来不行了，可是还有一些悲观的信念藏在我们最好的愿望里，那就是，他必须关心他的家庭……从频频的打哈欠中，或从他平时那种并不令人厌恶的抠鼻子动作中，父亲对他的状况发出了一种小小的、几乎是复苏的安慰，尽管他在他健康的时候一般不做这些动作。奥特拉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可怜的母亲请求明日去房东那里。

利用每年夏天或秋天的短期休假作一次共同的旅行，这已经成了罗伯特、萨穆埃尔、马克斯和弗兰茨这四位朋友的习惯了。在通常的年代里，他们的友谊绝大部分表现在每个星期的晚上，他们四人聚集在一起，绝大多数是在萨穆埃尔那里。他是最富有者，拥有一间较大的房间。他们在一起互相讲述各种不同的事情，也有节制地喝些啤酒。他们有时候聊至半夜，分手时也完不了，因为罗伯特是一个团体的秘书，萨穆埃尔是一家商业办公室雇员，马克斯是国家官员，弗兰茨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们每一个人肯定要迫不及待地讲述一个星期中他们的职业所经历的几乎所有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对另外三个人来说，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没有烦琐的解释也是理解不了的。但他们在一起首先出现的是这些职业的不同之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向其他人一再描述他自己的职业，而这些描述总不能被其他人从根本上理解。他们只是些懦弱之人，但正因为如此，出于美好的友情，这些描述总一再地受到欢迎。

相反，很少讲述女人的故事。即使从萨穆埃尔个人来说，他在他们身旁找到了趣味的所在，那么，他会小心翼翼要求，聊天由他的需要来安排，这个时候，那位取啤酒的老女仆常常会作为一种提醒出现在他面前。在这样的晚上笑声是那么多。马克斯在回家的路上说道，这种永恒的大笑本来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人们会因此而把所有严肃的事情忘记了，可是正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忍受严肃的事情。在人们大笑的时候，人们想，对待严肃的事情还有足够的时间。这是不对的。因为严肃的事情自然向人们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而且那可是很明显的，人们在朋友的圈子里比独自一个人更有能力满足那些更大的要求。人们应该在办公室里大笑，可是人们在那里不能这么做。这个意见是针对罗伯特的，罗伯特在他的、由于他而变得年轻的艺术团体里做了许多事情，同时在旧的团体里发现了不少滑稽的事情，他将这些滑稽的事情讲给他的朋友听了。

在他开始讲的时候，朋友们就离开了他们的位子，站到他跟前，或坐在桌子上，并发出大笑，特别是马克斯和弗兰茨，他们把自己忘得如此一干二净，使得萨穆埃尔把所有的啤酒杯子拿到桌子的一边去。他们要是讲得累了，马克斯就会突然有了新的劲头，坐到钢琴的前面，并演奏起来。这时，罗伯特和萨穆埃尔就会凑到他旁边，坐在那张小凳子上，弗兰茨却相反，他对音乐一窍不通，独自在桌旁翻看萨穆埃尔收集的风景卡片，或者是看报。如果这些人晚上热了起来，他们就可以走到窗口，打开窗户，将手放在背上，向下面的胡同看去，他们绝不受那些稀稀疏疏的人来人往的影响而在聊天的话题里迷失方向。只是有时候，有一个人回到桌边，喝上一口啤酒，或者指着下面小酒店前面坐着的两个姑娘髻曲的发型，或者指着天上的月亮，它会使他们微微一惊，直至弗兰茨终于说，现在凉了，该把窗户关上了。

夏季里，他们有时在一国家公园里相遇，坐在极为边缘地方的桌旁，那里比较阴暗些，他们互相举杯祝酒。在交谈中，他们将头凑得很近，几乎没有发觉远处的那个吹管乐队。后来，他们手臂挽着手臂，迈着相同的步子，穿过草地，走回家中。走在边上的两个人转动着小手杖，或者向着灌木林打去。罗伯特要他们唱歌，最后却是他独个儿唱起来。这对四个人来说都不错，当中的第二个人感觉到在这里所受的照料特别可靠。

在这样一个晚上，弗兰茨说话了，并把与他邻近的两个人拉得更靠近自己。在一起待着，这是多美的事啊。可是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只是在一个星期里聚会一次，这事一定很容易安排，如果不是经常的话，那至少每星期应该互相见面两次。大家都表示同意，就连第四个人也同意，他只是从外部不太清楚地听到弗兰茨轻声的说话。这样一种欢娱有时候肯定要花去每一个人的小小的精力。弗兰茨看上去好像给大家做了不受欢迎的讲话而受到了惩罚似的，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话。但他并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如果真的有一次有一个人没能出席的话，那么，这实在是一种遗憾，他可能在下一次聚会的时候被安慰一下。可是另外几个人也许一定要放弃这次的互相聚会，三个人是不够的呀，如果一定要那样的话，那么，两个人也行吗？“当然，当然，”所有的人说道。在旁边的萨穆埃尔分离了出来，紧紧走在其他三个人的前面，因为他们互相挤得太紧了。后来，他好像觉得别扭，他还是喜欢挽着其他人一起走。

罗伯特作一建议：“我们每个星期在一起学意大利语。我们决定学习

意大利语，因为我们在前一年去过意大利的一些小地方。我们在那里看到，我们的意大利语只够问路用的，你们想起那次我们在乡村的葡萄园迷路的情况了吗？对此，被问的人也费了极大的力气。如果我们今年还去意大利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习意大利语。在一起学习，这不是最好的事吗？”

“不，”马克斯说，“我们在一起什么也学不了，这个我知道得很清楚，就像你，萨穆埃尔，赞同一起学习一样。”

“当然！”萨穆埃尔说，“我们在一起学习一定会很好，我总只是遗憾，我们在小学学习的时候不在一起。你们知道吗？我们互相认识才两年啊。”他向前弯了弯身子，看了看另外三个人。他们都放慢了脚步，松开了挽着的手臂。

“我们在一起还从未学会什么东西，”弗兰茨说，“我很喜欢这样。我什么也不想学。但如果我们一定要学意大利语，那么，每个人自己学比较好。”

“我不懂了，”萨穆埃尔说，“最先是你提出要我们每个星期在一起，现在你又不想这样了。”

“去你的，”马克斯说，“我和弗兰茨只是想，我们在一起不要被学习打扰；我们的学习不要由于我们在一起而受到干扰，没有别的意思。”

“是这样的。”弗兰茨说。

“可是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了，”马克斯说，“现在是6月，我们想9月动身。”

“正因为这样，我想，我们在一起学习。”罗伯特说，朝两个反对他的人瞪着大眼睛。要是有人反驳他的话，他的脖子转动得特别灵活。

我想，我描写他是对的，但那只是近似，得由日记去更正。

这好像在于友谊的本质，追逐它就如影子一般——一个人会欢迎它，另一个人表示惋惜，第三个人根本没有发现……

9月26日。画家库宾推荐用类古灵作泻药。那是一种捣碎的海藻，它会在肠子里膨胀，使人发抖，就产生机械的效果。这种药有别于其他

泻药的那种不健康的化学的效果，那些药只能粉碎粪便，让它们附着在肠壁上。

他带着汉姆孙一起来到朗根附近。他（汉姆孙）无端地发出狞笑。在说话的时候，他还没中止狞笑，就把脚抬起来放在膝盖上，从桌上拿来一把大的裁纸刀，转着圈儿将他裤子上的流絮刮掉。他穿着破旧，但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处比较有价值的细微地方，比如说领带。

慕尼黑一处艺术家公寓的故事，画家和兽医就住在那里（兽医学校就在附近）。这个地方显得非常破旧，可是连对面房子的窗户也租出去了，因为从这些窗户看上去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视野。为满足这些观察者的需要，有时候一位公寓的房客跳上窗框，摆出一副猴子的样子，用勺子在汤盘子里舀汤吃。

假古董的制造者用射击霰弹的办法来伪造一种好像是剥蚀风化的现象，他指着一张桌子说道：现在我们还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喝三次咖啡，然后就可以把它送进因斯布鲁克博物馆。

库宾其人很强壮，但他的脸部表情有点儿单调，他是在用一种同样紧张的肌肉去描绘各种不同事物的。每一次他坐着、站起，只穿一套西服或外套，看上去显得年龄不同，个头不同，强壮也不同了。

9月27日。昨天在文策尔广场遇见两位姑娘，目光在一个姑娘身上留得太久。在这同一时间里，恰恰是另一位姑娘，如后展示的那样，她穿一件家中穿的，柔软、皱褶、宽大、前部稍稍敞开的棕色大衣，柔嫩的脖子，妩媚的鼻子，美丽的不知名的发型。——老年男子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吊着的裤子坐在观景楼上。他吹着口哨，当我朝他看的时候，他就停止了吹口哨；我的目光移开的时候，他又开始吹上了；最终，他在我看他的时候也吹上了。——美丽的大纽扣，漂亮地装饰在一位姑娘衣服袖子的下方。这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显出美来，它好像盘旋在美国式的靴子之上。我极少能成功地利用哪怕是一点点的美的东西，但这不令人注意的纽扣和那位一无所知的女裁缝却成功了。——女小说家在去观景楼的路上，她活泼的眼睛脱离瞬间的词语而满足地通观她的故事，直至它的结束。——一位健壮的姑娘有力地偏转着她的脖子。

9月29日。歌德的日记。一个不写日记的人，对待日记会采取一种错误的态度。比如说，当他在歌德日记里读到：“1797年1月11日，整天

在家里忙于各种不同的整理工作。”比如，在他看来，他本人在一天中还没有做过这么少的事情。

歌德对旅行的考察跟今天的这种考察是有区别的。因为当时的考察是从一辆邮车上进行的，由于栏杆的角度变化缓慢，进展比较简单，而且非常容易被不认识那些地区的人追随着。出现于脑海的是一种幽静的、死板的风景思维。因为呈现在车上客人眼前的这些地区没有受到损害，有着天成的品性，就是那些公路比起铁路来，把大地裁剪得更自然，公路对铁路来说，就像天然河流跟人工运河一样。这样，在考察者那里不需要什么强力行为，他可以不用花什么力气就能有条不紊。因此很少有瞬间的观察，绝大多数只是在内部的空间。在这空间里，某些人会马上对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人无拘无束地雀跃起来，比如在海德堡的那些奥地利军官们。而在维森海姆的男人们却不一样，他们站立的地方更接近风景画面，“他们穿蓝色长服，而且用编织的花朵来装饰白色的马甲”（根据记忆摘引）。他写下了许多有关沙夫豪森的莱茵瀑布，其中有用较大字母写的：“激动的思想”。

卢来娜小歌舞场。鲁齐厄国王展出古代发式的照片。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她有时候颇为成功地使用了从下部抬高的鼻子、上举的手臂和所有手指的转动。毛巾似的面孔。——隆根（画家彼特曼）诙谐的表演。一种显然是没有趣味的效果，可是如此没有趣味是没能想到的，因为并不是每天晚上都有这种表演，特别是因为在它的创造之际就那么没有趣味，因而产生不了那种也许会省却整个人多次出现的恰到好处的模式。漂亮丑角的跳跃，他越过一张椅子，跳入侧面布景的空处。这全部的场景让人想到一种私人聚会场合里的表演，在这里，人们出于欢乐的需要，会向一种劳累而无意义的表演喝彩，想用频频鼓掌来弥补表演的不足，以得到一点儿顺心的、令人舒服的东西。歌唱家法夏塔。他表演得那么糟，使人在看见他的时候感到迷惘。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强壮的男子，他毕竟还是用一种肯定只有我才明白的野兽的力量抓住了半途才专心致志的观众的注意力。

格林保姆只是用看上去像是对他的生存感到绝望的表演来创造效果。

奥迪丝，女舞蹈家。死板的臀部。实在没有一点儿肉感。红色的膝部只适合《春之情》的舞蹈。

9月30日。（前日H.H.）那位姑娘在隔壁房间里。我躺在沙发床上，在接近半睡的状态中听见她的声音。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穿得特别多，不仅是裹在她的衣服里，而且也裹在整个的隔壁房间里，只有我在浴场上见过的她那生就的、赤露的、浑圆的、健壮而神秘的肩膀比得上她的衣服。瞬间，她在我面前好像雾气腾腾，整个隔壁房间里充满了她的雾气。随后，她站立在灰色的紧身围腰裙里，围裙的下部离身体那么远，人可以坐在上面，这样说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骑在上面。

还说库宾。他有这样的习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用赞同的音调重复别人说的最后几句话，即使是为此准备好的自己的讲话表明，他与别人并不完全一致。令人生厌。——在听他的许多故事的时候，人们可以忘记他是怎样可敬的。人们会突然回忆起这一点，而且觉得害怕。说到这样一件事，我们要进去的一家酒馆是很危险的。他说，那时候他没去那里。我问他，是不是他害怕了，他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挽着我：“当然，我年轻，我还有好多的打算。”

整个晚上他总是不停地说话，我认为被我的和他的恶劣情绪弄得太严肃了。将近半夜，我的手从桌上垂下来，他看见我的一段手臂，并叫了起来：“啊，您真的是病了。”从这时起，他对我迁就多了，即使很晚了，他也阻止那些想劝说我的其他人去睡觉。当我们已经分手的时候，他还从远处向我嚷道：“类古灵！”

图霍尔斯基和斯察弗兰斯基。他们低声说着柏林土语，说这些土语时，嗓子需要由“nich”构成间歇。第一个是完全与21岁相符的人。开始他不急不慢，有力地挥动散步用的手杖，最后慎重地消遣，并对他自己的写作成果不屑一顾，那挥动的手杖抬举着他的肩膀，显出青春的朝气。他想成为辩护人，看到的只是不多的障碍，同时还看到扫除这些障碍的可能性。他清亮的声音在最初滔滔不绝讲了半小时后，男人的嗓音似乎变得有点像少女似的了——怀疑自己做出这种姿态的能力，但他企盼从较多的世界经验中得到这种姿态——最终对一种转化为世界悲痛的事情感到害怕，就如他在他的倾向里上了年纪的柏林犹太人那里发现的事情一样，当然他暂时对此还毫无察觉。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斯察弗兰斯基，伯恩哈德的学生，在作画和观察的时候做鬼脸，这鬼脸跟画的内容有关系。这使我回忆起，我对我的分内事有着强大的变化能力，没有人发现这个。像经常一样，我必须仿效马克斯的样子。昨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本可以作为旁观者与图霍尔斯基调换一下。这

个陌生的生命然后一定会在我身上那么清晰而又看不出来，就像隐藏在变形图画中的东西一样，别人要是不知道它就藏在这幅画里的话，那他永远也不会在这幅画里找到它一点儿的痕迹。在这种变化里，我十分愿意相信自己眼睛本身的模糊不清。

10月1日。晚上，旧貌新颜的犹太教堂。科尔·尼德尔[22]。交易所里沸腾的嘈杂声。在前厅的钱罐上印着题词：“在抚平恶意中默默捐款。”里面像教堂一样。三个虔诚的、显然是东方的犹太人，穿着短袜。他们在祈祷书前弯着腰，把祈祷的长袍顶披在头上，尽量地使自己变小。有两个人哭了，只是受了节日气氛的感动？一个人大约只露出他用满是皱褶的粗麻布草率遮挡住的痛苦的眼睛，让脸又立即靠近了书上的经文。这语句原本不是或主要是唱诵的，但在这语句后面跟着来的是从那如头发那么细的继续编织成的话语里抽出的阿拉伯风格的线条。那位小青年，没有一点儿整体的概念，也没有辨别方向的能力，耳朵里乱哄哄的，挤在拥挤的人群里，也被人推挤着。这位看上去像是店员，在祈祷的时候迅速地颤动了一下，这只是作为一种尽可能强有力的、大概也是去理解那不可理解的对每一个字重读的尝试吧，同时噪音得到了保护，此外，这噪音在嘈杂声里不会有清楚的高声的重读。妓院老板的家庭。在平卡斯犹太教堂，我被犹太人的一切弄得大伤元气。

大前天。一个女子，犹太女子，瘦长脸，更确切地说，脸长在狭长的面颊里了，但披着一头波浪起伏膨胀宽松的头发。三扇小门从那座建筑的里面通向大厅。客人们像待在舞台上的警卫室里一样。桌子上的饮料几乎没被动过。那位平脸的女子穿着有棱有角的衣服，这衣服最先在下端的贴边里开始运动起来。有些人在这里穿得就像为儿童剧场表演的木偶，这木偶好像是从圣诞集市上买来的，被贴上褶边和金箔，松松地缝上，这样，人们可以一口气将它们分开，然后在手指里变得粉碎。女老板有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但令人讨厌的底衬无疑拉得太紧，明显下塌的鼻子，它的走向跟耷拉着的胸部和僵硬的腹部处在某种几何级数的关系中。她正埋怨着自己的头痛，引起这头痛的原因是：今天星期六，热闹非凡，没有意思。

关于库宾、关于汉姆孙的故事是可疑的。这样的故事，人们也许会从他的作品中几千次地作为经历过的事情来叙述。

关于歌德，“激动的思想”仅仅是莱茵瀑布激起的思想。人们从一封给席勒的信里看到这一点。——偶然的瞬间观察“穿木鞋孩子的响板旋

律”产生一种如此的效果，受大家如此的欢迎，真是不能想象某个人会将这种观察作为自己原本的思想来感受，即使他从来也没有读到过这个说明。

10月2日。失眠的夜。这已是几天来的第三天。我好好地入睡了，但一个小时候我醒了，就好像我把头放在了一个错误的窟窿里。我完全处在清醒的状态，我感到根本没有睡，或感到只是睡在一张薄薄的毛皮下，我面临着如何重新入睡的状态，而且感觉到被睡意顶了回来。从现在开始直到早晨5点，整夜就这样待着，我虽然睡着，但不一会儿好多的梦同时把我弄醒。严格地说，我是睡在我的旁边，同时，我自己不得不跟梦纠缠在一起。5点左右，睡觉的最后痕迹已消磨尽了，我只做梦，有什么比清醒更为费力的呢？简而言之，我整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那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在真正入睡之前片刻所处的状态。当我醒时，所有的梦境聚集在我的周围，但我回避去思考这些梦境。拂晓的时候，我躺在床垫上叹息，因为这一夜，一切希望都过去了。我思想着那些长夜，在这些长夜尽时，我从沉睡中爬起来，醒来后，我就觉得好像曾被封闭在果壳里一样。

今天夜里的一个可怕现象是出现一个瞎眼的小孩，好像是我莱特梅利兹的婶婶的女儿。顺便说一下，她并没有女儿，只有几个儿子，有一个儿子有一次把脚摔断了。这个孩子与博士妻子的女儿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这女儿是我不久前见到过的，她正走在路上，从一个可爱的小孩变成了一个胖胖的、穿着利落的小姑娘。这个瞎眼的或者说视力很弱的小孩，两只眼睛罩着一副眼镜，左眼离玻璃镜颇远，是奶白色的，呈圆形突出在前面，右眼凹进去，由一个紧贴眼眶的眼镜片遮盖着。为了使镜片与视力配合恰当，那就必须运用一种把柄来代替往常用的那种架在耳朵上回过来的眼镜腿，这个把柄的头部无法固定在别的什么地方，只有固定在面颊骨上。这样，就从这个镜片向面颊挂下一根细细的小棒，这根细棒消失在那打穿了的肉里，直至顶到骨头的地方为止，同时拉出一根新的金属丝棒，并在耳朵上回过去。

我相信，失眠只是因为我写东西的缘故。因为我写得那么少，那么糟糕，我却是被这种小小的激动而变得敏感起来。我觉得我对晚上特别反感，但在早晨我又感到有更多的痛苦。我感到接近了撕裂我的更大发作的可能性，这种发作可能使我有能力做所有的事情。而且，我在这一般的震动中得不到宁静，这一般的震动就在我自身之中，我没有时间对

它下指令。这震动最终只是一种压抑的、克制的和谐，这和谐被释放出来，完全将我充满，甚至还将我拉进辽阔的境地，然后再将我充实。但现在对我来说，这种在微弱希望旁边的状况只能引起损害，因为我的生命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去忍受目前的这种大杂烩。在白天帮助我的是看得见的世界，在夜间我的生命却不受阻碍地将我剪切得粉碎。在这时，我总是想着巴黎，在巴黎被包围的时代，以及后来直至公社。对当时巴黎人来说，那些陌生的北部和东部城郊的居民，在好多个月的时间里，确切地说，时时刻刻地接连不断地穿过四通八达的街道，就像时钟的指针向着巴黎的中心移动。

我的慰藉是——我现在带着这种慰藉躺下——我如此长的时间没有写作了，因此这种写作还不能安排进我目前的状况中，可是这个在一些有阳刚之气的男子那里肯定至少暂时成功了。

我今天如此虚弱，可是我却还是给我的老板讲述了这个孩子的故事。——我现在回忆起来，梦中的那副眼镜出自我的母亲，她晚上坐在我的旁边，玩牌的时候，她从夹鼻眼镜下面很不舒服地朝我看。我已经回忆不起早先曾见过她的这副夹鼻眼镜，它甚至也是右边的镜片比左边的镜片离眼睛更近。

10月3日。同样的夜晚，只是更难入睡。在入睡时，一种垂直走向的疼痛在脑袋里越过鼻根，就像来自一道挤压得很厉害的抬头纹。为尽快地沉静下去，我将双臂交叉起来，把双手搁在肩上，使我那样直躺着，像一个满负荷的士兵，我认为这是入睡的好办法。这又是我的梦魇的力量，这些梦境在我入睡前已经笼罩了清醒的状态，它们不让我睡觉。我的富有诗意能力的意识在晚上和早晨是不能忽视的，我感觉到自己，一直到生命的基础都松动了，只要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能从自己身上拿起来。诱发出这样的力量，使我回忆起我与B.的关系，可是人们是不让这样的力量工作的。它就是在这里涌流而出，也不允许释放出去，而只可在反撞力中毁灭，只是因为它在这里涉及——就是这个区别——比较充满神秘的力量和我的最后的东西。

在约瑟夫广场，一辆大旅游车里载着紧紧挨坐在一起的一家人从我身边驶过，汽车后面一阵风带着汽油味从巴黎扑向我的面孔。

在办公室口授给本地区一主要团体的一则较长的通告。在快完成的结束处，我停住了。我能看见的尽是打字小姐K.。从她的习性来看，她

显得特别活泼。她移动一下椅子，咳嗽几声，手指在桌上跳来跳去地打字，而且就这样地将整个房间的注意力引到我的不幸上来。搜索突如其来的想法现在也有了这样的价值：它会使她安静，而且它越是有价值，越是让人难以寻找。终于，我得到了“严厉谴责”这个词和与此有关的句子，但还是带着厌恶和羞耻之心把这一切留在口中，就好像那是生肉，是从我身上切下的肉。（这使我花费了如此的辛劳）我终于讲出了这些，却留下了极大的恐惧。在我身上已经为一种诗意的工作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这样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美妙的溶解，是一种真正的变成有生命的过程，可是我在这这里的办公室里却必须因如此一段公文而割弃一个如此幸运的有能力的身体上的一块肉。

10月4日。我不安，并怀有恶意。昨日入睡前，我左上方的头部里冒着闪烁的、但却是凉凉的小火苗。我的左眼上方感到了一种压力。如果我的思想集中到这里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我就是在办公室里也是不能忍受的，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在一个月里会是没有什么事要做的。可是，我在办公室里干事大多凭自己的责任感，我确实感到安宁，如果我保证能让我的老板满意的话，何况我并不感到我的发病是一种可怕的发作。昨日晚上，我还有意识地闷声不吭地干了一些事，我做了散步，读了狄更斯的东西，然后觉得舒服多了，丢掉了悲哀的力量。我曾把这悲哀看作是有道理的，即使在我看来有点儿被推挤到遥远的地方，我希望从这里得到一个较好的睡眠。睡眠是有点儿深了，可是还不够，而且常常中断。我自我安慰地说，我虽然又压制了我身上出现的激烈的运动，但我不想如早先总是在这样的时间之后一样从自己的手中放弃我自己，而是，我想留在清楚意识那种运动遗留下的疼痛感觉中，这是我早先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大概这样就能找到一种潜藏在我身上的坚韧性。

将近黄昏，黑暗笼罩住我房间里的长沙发。人们为什么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识别一种颜色，然后，在具有决定性的理解转变之后，很快地对这种颜色越来越深信不疑。如果说前厅的光线和厨房间的那个光线同时从外部对玻璃门产生作用的话，那么，为使这种可靠的印象不失去效果，淡绿色的，或更确切地说，绿色的光片，几乎若薄片完全倾洒而下。如果说在前厅的光暗淡，只有厨房的光仍然存在的话，那么，接近厨房的光片变成了深蓝色，其他的光变成带有白色的蓝色，如此的白色，使得全部的图画在毛玻璃上（具有艺术风格的罂粟花头、藤蔓，各种各样的四角形和花叶）融合了。

由马路上和桥上的电灯光抛到下面墙上和屋顶上的光和阴影是没有规则的，互相交错地覆盖着，有的部分毁灭了，很难识别。恰恰在下面装置的电力弧光灯和在装修这房间的时候，根本没有采纳适合家庭妇女对此的考虑，就如我的房间在这个时间里从沙发看去没有自己房间照明一样。

在下面行驶着的电车投上屋顶的光辉带有白色，似雾霭，而且机械地断断续续地沿途投向一面墙上和屋顶上，在边缘的地方断碎了。——在清新的马路照明下，在它全部反光的闪烁中，地球仪立在上面蒙有一层淡绿颜色的存放要洗衣服的箱子上，在它拱圆形的上方有一点亮点，从外表看，对它来说似乎光线太强，尽管光线在它的光滑表面闪过，更确切地说，它变成了带褐色的颜色，像皮制的苹果，留在那里。——来自前厅的光线发出了一片大面积的光亮，照在床上面的墙上，这光亮从床头一端出发在一条摇荡的路线中被限制住了，这时刻，它把床压低了，将昏暗的床栏加宽了，将床上面的天花板抬高了。

10月5日。几天以来，我第一次不得安宁，即使在写这些之前。我对我的姐姐发怒，她走进我的房间，并拿一本书坐在桌边。我企盼着有一个小小的机会来临，以发泄这个愤怒。她终于从柜子上取来一张名片，并用它在牙齿之间拨来拨去。从这愤怒里留下给我的只是脑袋里浓烈的烟雾，带着发出的愤怒和开始出现的轻松与自信，我开始写作。

昨天晚上在萨沃伊咖啡馆。那里是犹太人的社会。克卢格夫人是“具男性气质的女口技演员”。穿长袍，黑色短裤，白色长筒袜，一件从黑色马甲露出的薄纱的白色衬衣，衬衣在脖子前面由一个线制的纽扣系着，然后卷折在一个宽松的长长露出的领子里。在有一头女人头发的脑袋上，有一顶暗色的没有边沿的小便帽，再上面是一顶大而软的、带有高高向上卷曲边沿的帽子，要是必要的话，她丈夫也戴这顶帽子。——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和她丈夫描写的是什么样的人物。我要是向某个人说明这些人物，又不想向这个人承认我的无知，我会看到，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全教区的仆人，是犹太教堂的职员，是闻名的懒汉，是由教区养着的人。不管怎样从宗教方面的原因来说，他们是有特权的乞讨者，这些人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正好与教区生活的中心靠得非常近，由于无所事事却又十分留意的东游西荡，他们知道很多歌曲，完全知悉所有教区成员的状况，可是也由于他们与各行各业的生活脱离了关系，有关这些方面的知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是一种特殊、纯粹形式上的

犹太人，他们只是生活在宗教里，在这种生活里，不花劳累，不要理解，没有苦恼。他们每一个看上去像是一个傻瓜，一个贵族的犹太人被害，他们就立即大笑，向一个叛逆者出卖自己。当被揭露的谋杀者服毒自杀，并呼唤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跳起舞来，狂喜地将双手放在络腮胡子旁边。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们十分地轻贱，一有什么压力就朝地上一躺，很为敏感，他们干巴的脸马上就能大哭起来（他们痛哭起来脸相怪异），可是一旦压力过去，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的重量，便立即往高处蹦跳起来。

因此，他们肯定要为一段严肃的戏剧十分担心，如会拉丁文的人写的《改变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常常踮起脚尖把两腿呈现在舞台前面的空间，总是以大人物出现，他们不去理解这戏剧中令人激动的地方，反而将其弄得支离破碎。现在，这段严肃的戏剧是在非常完整的、以各种可能的即兴表演表现的、由一致的感情维系起来的话语中展开的，即使这情节只是在舞台的幕后进行，它总还是保留了它自己的意义。早先常常是两个穿长袍的人被压在下面，这正适合他们的特性。任凭他们伸展手臂，手指发出响声，人们只是从后面看到那个凶手，他服毒，将手伸向他本来显得太宽的领子，摇摇晃晃地朝门走去。

曲调拉得颇长，身体随着旋律运动。由于演奏的曲调节拍有长有短，音乐通过臀部的摇摆，在静静的呼吸中，手臂上下的伸展，手掌与额头的接近，以及小心翼翼避免的接触，这一切表现出与旋律相应的最好效果，它有点儿使人想起捷克的民间舞蹈施拉帕克。

在有些歌曲里，在“犹太人的孩子般大笑”的致词中，站在舞台上的那位女子，因为是犹太女人，她的顾盼将我们这些观众吸引到她的身上，因为我们这些观众也是犹太人，不用对基督徒表示渴望或好奇，我的脸颊就发生了一阵战栗。那位政府的代表，大概除了一个仆役和两个在舞台左边站着的女佣外，是大厅里的唯一的基督徒，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患有面部肌肉颤抖症，特别是脸的左半部，当然也强烈地蔓延到右边，这张脸上的肌肉几乎是以难以觉察的飞快速度有规律地收缩和恢复原状的，我觉得如钟表的秒针走动那样短暂。这种颤动在越过左眼的时候，便几乎消逝了。在这张已经完全颓唐的脸上，由于这种抽搐，新产生的小而鲜嫩的肌肉在发展着。

详细询问、召唤或解释犹太法典的旋律：空气进入一根管道，拿起这根管道，为此，对着这个被问的人，从稍远处一个一般来说很为可

观、在弯曲处却显得不起眼的大螺丝开始转动。

10月6日。两个老年人坐在舞台边长桌顶端的地方，其中一个用双臂撑在桌上，只有他的脸高高地向右转向舞台，他那张虚肿红色的脸和一堆没有规则的四角形纠缠的胡子，将他的年龄可怜地隐瞒起来了。而另一个正好对着舞台，他那张由于他的年龄而变得干瘪的脸被桌子阻隔，他只是由左胳膊依着桌边，他的右胳膊在空间保持着弯曲，为更好地享受这旋律，他的一双脚尖追随着这一旋律而动，短烟斗在他的右边也随着节奏微微下垂。“两个老活鬼，就这样一块唱吗？”一位妇女一会儿向这个，一会儿向那个老人叫着，微微地俯着身子，并向前伸着手臂作驱赶状。

这种旋律很能抓住每一个突然跳起来的人，拥抱住他所有热情，而不是将这热情撕裂。有人就是不相信，就是这样的旋律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热情。因为那两个穿长袍的人匆匆地赶着唱歌的节拍，对他们来说，躯体就好像是按它自身的需要而伸展的。在唱歌的时候，两手折叠在一起，显然表现出人进入角色的最良好的惬意感。——老板的孩子们在一个角落与克卢格夫人一起在舞台上，在涉及孩子内容时，就跟着唱起来，这个旋律充满在两个掀起的嘴唇之间的嘴巴里。

这段戏的内容：赛德曼，一个富有的犹太人，显然是因为他罪恶的直觉越来越明显，出于这种目的，他要求接受洗礼。在20年前，他就毒害了他的妻子，那时他妻子并没强制自己接受洗礼。自此之后，他努力地去忘掉那些隐语，这些隐语在他的讲话中自然并不是有意带出来的，特别在开始，为了引起听众注意，而且因为在要发生的情节之前还有些时间，因而这种隐语常常在所有的犹太风范面前引起很大的厌恶。他将他的女儿许配给军官德拉戈米洛夫，而她却爱着她的表哥——年轻的埃德尔曼。在一个大场景中，她用不常用的、腰部显得很不自然的冷漠态度站着，向她的父亲解释道，她严格遵守犹太人的风习，而且她用一种对强加于她的强制的轻蔑大笑来结束整整的一幕。（这出戏中的基督徒是赛德曼的一位正直的波兰籍仆人，他后来在揭露他的主人方面做出了贡献。他的正直首先是因为，必须收集围绕在赛德曼身边的对立的東西。这出戏除了描写军官的过错外，很少再涉及他，因为他作为出身高贵的基督徒，无人对他感兴趣。同样还有一位后来登场的基督徒总统，最后还有一位基督徒仆人，他的凶恶并没超越他地位的要求和两个穿长袍人的滑稽角色，尽管马克斯称他是一个大屠杀者。）但德拉戈米洛夫

不论出自什么样的原因只能结婚，如果老埃德尔曼所掌握住的他的转变实现的话。可是老埃德尔曼并没有递过这转变的信息，尽管他正要动身去巴勒斯坦，也尽管赛德曼想给现金支付路费。女儿对这位热恋的军官显得自负，而且夸耀自己的犹太民族，尽管她已受过洗礼，这位军官知道没有别的办法，软摊着胳膊与双手，求救地看着这位父亲。女儿逃往埃德尔曼身边，她想与自己的心上人结婚，即便是暂时秘密地结婚。因为一个犹太人按世俗观念不能与一个基督徒结婚。显然，没有她父亲的同意，她是不能改皈犹太教的。这位父亲很快看出，没有手段一切均会失去，他表面上为这个婚姻祝福。大家都原谅他，并开始那么地爱上了他，就好像他们大家过去犯了错误似的，甚至连老埃德尔曼竟然也有了如此感觉，尽管他知道赛德曼毒死了他的妹妹。（这个漏洞大概是由于一处省略而引起的，但也可能由于这出戏主要是在口头上从一个演戏剧团传到另一个演戏剧团的缘故。）由于这种和解，赛德曼首先达到了与德拉戈米洛夫的交换，因为，“你知道，”他说，“我不想让这位德拉戈米洛夫说有关犹太人的坏话。”而埃德尔曼白白地将她让给了他，然后赛德曼将老埃德尔曼叫到幕后的门帘处，据说是让他看什么东西，就从后面向他插进一把刀子，穿过睡袍刺进背部。（在和解与谋杀之间，赛德曼曾离开了舞台一段时间，是为思考这个阴谋，并去买了这把刀子。）他想用这手段来将这位年轻的埃德尔曼送上绞刑架，因为嫌疑肯定会落在埃德尔曼的身上，而且他的女儿对德拉戈米洛夫来说就是自由的了。他逃走了，老埃德尔曼躺在门帘的后面。女儿披着新娘的婚纱出现了，挽着年轻的埃德尔曼的胳膊，他穿着祈祷服。遗憾的是，如他们见到的一样，父亲没有出现。赛德曼来了，看上去对看到这一对新婚夫妇感到幸福，这时一个人出现了，也许是德拉戈米洛夫自己，也许仅仅是一个演员，其实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侦探，而且声称，必须要搜查家中，因为“在这家中，他的生命不安全”。赛德曼：“孩子，你们不要担心，这自然是一个错误，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将会弄清楚的。”埃德尔曼的尸体找到了，年轻的埃德尔曼被他的恋人拖拽着，他被捕了。赛德曼以极大的耐心和不时插进来的有力的说明指导着整整的一幕。（是的，是的，非常好。但这是不对的。是的，这已经是不错的了。当然，当然。）那两位穿长袍的人，他们应该如何法庭前证明老埃德尔曼和年轻的埃德尔曼之间所谓多年的仇恨呢？他们进展得很困难，而且有不少误解。终于，他们在一个即兴的法庭场景排练中出现，而且宣称，赛德曼委托了他们，以以下的思路描述这件事情——直至他们终于是那么专注地进入那种仇恨之中，以至他们甚至——赛德曼再也无法阻止他们

——能够指出，谋杀是怎样发生的，丈夫是怎样借助一个新月状小面包将妻子刺倒的。这当然又是节外生枝了。尽管如此，赛德曼对这两个人勉强同意，并希望他们两人帮助此官司有一个好的结局。也许不用讲任何话，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上帝在这里代替畏缩的写作者为虔诚的听众进行干涉了，而且失去理智地打击这个凶恶者。

在最后一幕里仍然是那位永恒的德拉戈米洛夫的演员作为主法官坐在那里（这里也表现了对基督徒的轻蔑，一个犹太演员可以足足演上三个基督徒的角色，即使他饰演这些人物很糟糕，也无伤大雅），在他旁边的是作为辩护人的有着浓密头发和髭须的人，人们很快就认出来，这是赛德曼的女儿。人们虽然马上认出了她，但由于好长时间想到的是德拉戈米洛夫，而把她看作是演员的替身。直到临近这一幕的一半，人们才看到，为了救她的心上人，她换了装束。两个穿长袍的人应该各自作证，可是这对他们来说很艰难，因为他们做戏做得太远了。他们也不懂法官的标准德语，辩护人自然帮忙，如果情况太尴尬的话，他也就不得不向他低声耳语。随后，赛德曼来了，他早就已经企图通过拉扯衣服来指挥这两个穿长袍的人了。通过他流利的有准备的演说，通过他理智的举止，通过他跟法官的准确的谈话，他给早先的证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印象与我们知道他的情况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对照。他的述说实在没有内容，遗憾的是他对整个事情经过知道得很少。现在要看最后一位见证人了。他是仆人，对此并不完全清楚知道，实际是赛德曼的控诉人。他看到赛德曼去买刀了，他知道，赛德曼在关键时刻曾在埃德尔曼身边，他最终知道，赛德曼仇恨犹太人，特别恨埃德尔曼，并想将其替换。两个穿长袍的人跳起来，而且很高兴地表示能确证这所有的事情。赛德曼抗拒着，变成了有点不知所措的失态的正人君子。这时提到他的女儿。她在哪里？当然是在家中，他是对的。不，她不是这样做的，辩护人断定，并想证明这一点，她转向墙壁，拿下假发，转身朝向惊愕的赛德曼，露出是他女儿的真相，即使她去掉了髭须，上嘴唇的纯白色好像还是留下了一种惩罚的印象。为逃脱尘世的正义，赛德曼拿出了毒药，他承认自己干的坏事，可是他根本不是向人，而是向他现在信仰的犹太上帝承认。这个时候弹钢琴的演员奏出一段旋律，那两个穿长袍的人觉得被这旋律感动，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在幕后站着联合起来的那对新婚夫妇，他们，特别是严肃的新郎，按古老的犹太教堂习惯的旋律唱了起来。

两个穿长袍的首先登场。他们拿着为犹太寺院募款用的盒子来到赛

德曼的房间，环顾四周，感到不舒服，便互相看了一眼，指手划脚地沿着门柱走动，没有发现正统犹太人挂的那种经典羊皮纸纸轴，在别的门上也没有。他们却不信，爬到各个门旁的高处，一再地拍打着门柱的上方，发出敲击声，像逮苍蝇一样，一会儿登高，一会爬下，可惜这一切都白费劲。直到现在他们也没说一句话。

克卢格夫人和去年的W.夫人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克卢格夫人也许有着一点儿比较柔弱和单纯的性格，因此她显得漂亮与体面。这位W.夫人永远是那样诙谐，可是她常常用她的大屁股碰撞与她同台演出的演员。此外，她身旁还有一个不怎么样的女歌者，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新人。

“女口技演员”本来是一个错误的称呼。由于她罩在长袍里，她的身体都被遗忘了。只是因为她肩膀的抽搐和背部的转动，这就像是在跳蚤咬时发生的那样，这才使人想起她的身体。袖子尽管不长，但不时地朝上卷一段，为此，观众对这位做出那么多表演，并用解释犹太法典的方式说话的女人，期盼着莫大的轻松，并专心致志地注意着剧情的发展。

很想看一场大的犹太戏剧，可是这种演出可能在这个小人物和不清楚的排练中受到了损害。我还想认识犹太文学，显然，一种不间断的民族地位的斗争成了这种文学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斗争决定了每一部作品。自然，一种地位并不是文学，在通常的情况下也不是被压迫人民的文学。这大概在斗争的年代也在其他的民族那里发生。民族斗争的文学出现，其他的、较远产生的作品，由于受到观众的鼓舞，才在这种意义上获得民族的外装，例如《被出卖的新娘》。但在这里看来，只有第一种类的作品经受住考验，而且是持久的。

看一看那个演员像我们一样默默期待的简单的舞台。因为那个有着三面墙壁、椅子和桌子的舞台一定要满足于所有剧情的需要。我们并不期望从舞台本身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以我们全部力量期望更多的是演员，因此，我们毫不反抗那从空墙后传来的歌唱的吸引，歌唱激发了人们的想象。

10月9日。要是我到了40岁，那么，我大概将会与一个有副前翘的、稍稍由上唇暴露出上齿来的老姑娘结婚。曾在巴黎和伦敦待过的K.小姐嘴里的上门牙，就像人们在膝盖间交叉的双腿一样，互相推挤着。但我几乎到不了40岁。对此，比如说内心的紧张就表现出来了，这紧张常常布满我左半个脑袋，摸上去就像有一种内部麻痹的感觉。如果我不

去顾及烦恼，只是想观看的话，那给我的印象就像在学生教科书里看见的脑袋横截面图一样，或者像在活尸体上无痛的解剖一样，那把刀持续不断地，带点冷漠而又小心翼翼地，常常停着不动，尔后又回过来，有时静静地放着、紧紧挨着还在工作的局部大脑的如叶子一般薄的外壳。

今天夜间的梦，我本人早不以为它是美丽的，除了那个由两个相反的注解组成的小小滑稽场景之外，它带来了那种巨大的梦的喜悦，可是我已经将它忘了。

我走着——是不是一开始马克斯就在场，我不知道了——穿行在第二、三层楼高度的长长的屋群，就像人们在列车的通道上从一个车厢穿行到另一个车厢一样。我走得很快，大概也是因为房子有时是那么容易倒塌的缘故，人们就得赶紧加快速度。房屋之间的门并没完全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排非常巨大的房间，但人们不仅可认出各个住宅的不同，而且也可看出房子的不同来。我穿过的大概只是搁有床铺的房间。只有一种典型的床留在我的记忆里了，这张床放靠在我左方旁边的黑暗的、或者说是肮脏的、大约如天花板一样的斜墙边，床上的用品层次不高，上面的被子原来只是一块粗糙的麻巾，而且被睡在这里的人用脚踏踏得不成样子，一个角垂挂下来。在这个许多人正躺在床上时候我穿过他们的房间。我感到害羞，因此，我踮起脚尖跨着大步走过。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以此来表示，我只是迫不得已穿过这里的，一切都尽量地表现出体贴、轻微，让我的通行完全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我在同样的房间里从不转过头去，要么只看临街的右边，要么只看墙壁左边的地方。

这一系列住宅常常被青楼所中断，尽管我好像是因为它的缘故才穿行这条路的，可是我在通过它的时候特别快，使得我除了它的存在之外什么也没注意到。所有住宅的最后一个房间又是一家青楼，我在这里留下来了。对着我踏进门的墙，也就是这一系列住房最后的墙，要么是玻璃做的，要么干脆是打通了的，我要是再走下去也许会摔下去。很可能是，墙是打通了的，在地板的边缘躺着妓女。我看到，地上有两个妓女，有一个，脑袋有一点儿垂过边缘耷拉在自由的空气里。左边是一垛坚固的墙壁，它对面的墙右边是不完善的，人们朝下看是一座院子，但看不清它的地面，一座年久失修的灰色楼梯通往下面的好多地方。这房间里的灯关掉之后，天花板就像与在其他房间里的一样。

我主要跟脑袋耷拉下来的妓女待在一起。马克斯跟躺在她左边的妓

女在一起。我摸着她的腿，然后停在那里，有节奏地压她的大腿。我的欢娱兴致是那样高，我不免感到惊奇，人们一定为这种正好是最美丽的欢娱什么也还没有支付。我相信，我（而且是我独自一人）欺骗了世界。然后，妓女依着静躺着的腿抬起她的上身，将背转向我。令我恐惧的是，她的背上布满了带着苍白边缘、被火漆烫红的大圈圈和在这些大圈圈之间喷射出来的红色的溃痕。我现在才发现，她的身体上全是这些印痕，我的大拇指在她的腿股上就触摸过这样的斑痕，这些红色的块块在我的手指上留下了像是破碎图戳的印记。

我退到一些男人们中间，他们像是在靠近楼梯出口处的墙边等待着，在这阶梯上倒颇有人来来往往。他们那样等待着，就像乡下的男人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拥挤在集市上一样。因此这里也是星期天，这里也有滑稽的场面。有一个男子走出，在他面前，我和马克斯感到害怕是有原因的，这个男子后来走上楼梯，向我走来，而这时候，我和马克斯带着恐惧，等待着他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可怕的威胁，原来他向我提出一个幼稚得可笑的问题。我后来就站在那里，并关切地看着马克斯在这个酒店里没有恐惧地随意地坐在左边的地上，吃着一盘稠稠的土豆汤。在汤里土豆看上去是个大圆球，有一个特别大。他用调羹挤压这只土豆，也许是用两个调羹搅进汤里，或只是让它滚来滚去。

10月10日。给《泰契—博登巴赫报》写一篇赞同和反对教育机构的辩论文章。

昨日晚上在墓地上，有三个在排练后出来的女演员向我迎面走来。要很快看出这三个女子的美来是很不容易的，何况还想看看跟在她们后面迈着潇洒的、令人鼓舞的演员步伐走来的两个男演员哩。这两个男子超越了女演员们，其中左边的一位男子有着一张年轻的胖脸，他们身体强壮，都披着敞开的外套，足足地表现了这两个男子的性格。左边的男子走在人行道上，右边的男子走在下面的车行道上。左边的男子高高地抓着他的帽子，将所有五个手指全伸进去，把帽子顶得高高的，并叫道（右边的男子现在才想起来）：再见！晚安！但在这两个男子先超越这几个女子，然后道别的同时，这几个被致意的女子，以走向车行道最近的那位女子为首（她看上去身体最孱弱，个头最高，但也是最年轻、最美丽的女子），她们完全不为所动，只用轻轻的致意回答过去，几乎没有中断她们选定的话题，继续走她们的路。这全部的过程在一瞬间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强有力的证明，那就是这里的戏剧环境是优越的，而

且是领导有方的。

前天在萨沃伊咖啡馆里的犹太人那里。法伊曼的《赛义德之夜》。有时候，我们（对此的意识在这一刹那掠过我的头脑）只是因此而不插手这样的情节，那就是因为我们太激动，而不是因为我们仅仅是观众。

10月12日。昨天在马克斯那里写了巴黎日记。在半暗的骑士胡同，肥胖、热情的R.穿着秋天的服装。我们只是在她穿夏天的衬衣和薄薄的蓝色小夹克衫的时候认识她的，一个姑娘穿这种衣服，外表并不是完全无可指摘的，总之，与其说是裸露的，还不如说是更为令人不愉快。这时候，格外明显的是她那张没有血色脸上的那只坚挺的鼻子，人们也许要用手在她的脸颊上摁上好长的时间，脸上才出现一点儿红色来，浓密的淡黄色的绒毛集中在面颊和上嘴唇上，铁路上的尘埃在鼻子和面颊之间飘去，衬衣上有些地方露出隐隐的白色。今天我们却是满怀尊敬地跟着她跑，当我因为没有刮脸，以及一直不修边幅的外表，而不得不在斐迪南大街（连接两条街道）前的过道房屋出口处与她分手时，我才感到了对她倾心的一些小小的撞击。而当我想为什么的时候，我总只是跟自己说：因为她穿得那么热烈。

10月13日。我的上司秃顶处绷紧的头皮向他额头上可爱的皱纹的过渡是没有艺术性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很容易加以仿制的大自然的弱点，纸币却不能这么去做。

我以为对R.的描写是不成功的，但我相信，或者我前天对R.的印象肯定是不那么不完全，以至这个描写正好适应这个印象，或者甚至超越了这个印象，这个时候，这个描写肯定会更好的。因为当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一瞬间想起了这个描写，它悄悄地取代了原来的印象，而且我认为，我昨天才见到这位R.的，再说马克斯也不在场，如此我还要准备给他讲述有关她的情况，也正好如我自己在这里对她描写的一样。

昨天晚上在马路的安全岛上，没有找到我的同事，我马上离去。我在外衣里做了一些令人注意的动作，手里拿着压扁的软帽子，因为外面冷，而这里有喝啤酒的人、抽烟的人，还有军乐团里吹管呼吸的热气。这个乐队的水平并不很高，也不可能是那样的，因为这个大厅的档次就颇低。这个乐队占满了大厅的一个尽头，直至旁边的墙壁。乐队的这些人就像装配好似地被推进了这个大厅的尽头。我后来有点儿失去了这种

拥挤状态的印象，因为靠近乐队的位子比较空，大厅的中间才挤满了人。

K.博士好饶舌。在弗兰茨—约瑟夫火车站后面和他转了两个小时后，有时请他离开我，我不耐烦地交叉着双手，尽量地少听他的罗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人在他的职业里作出了好成绩，在他沉浸于叙述他职业经历的时候，肯定会变得神经错乱。他的能干使他意识到，从每一个故事里都能引出联系来，而且这种联系越来越多，他掌握一切，因为他经历过这一切。他肯定在匆忙中，以及考虑到我的关系，而隐瞒了许多东西。我也通过提问打断他一些说话，而且也用此方法将他引到别的方面，以此向他指出，他也大大地掌握我本人的思想。他的为人在绝大多数的故事里起着一个出色的作用，他只是暗示这种作用，由此，在他看来，没说出的内容意义还要重大。现在他对我对他的赞赏却是那么深信不疑，使他也能为之叹息。因为在他的不幸中，在他的辛劳中，在他的怀疑中，他本人是值得赞赏，他的敌人也是能干的人，而且也值得叙述一番。在一家有四个律师助理和两个主管人员的律师事务所里有一件争执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中，他独自地面对这家事务所，经过了几个星期与六位律师的白天谈话。他们中口才最好的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法学家，他就站在他对面——这是由最高法庭安排的，它的判决似乎不怎么样，而且互相矛盾。我用告别的声调说到这个法庭辩护的可能，当时他出具证明，这个法庭不可能接受辩护的，人们不得不到处走动，我马上对这个法庭的丑行感到吃惊。他接着解释道，为什么一定会这样呢，法庭负担加重了，为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吧，我必须离去，那么，撤销判决的法院更好些，行政法庭还要好，为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了，他就以我自己的事情作尝试。我由于这事情才到他这儿来（建立工厂），而且我们早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他希望随意地用这种方式抓住我，再将我吸引到他的故事里去。这时，我说了几句话，但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着重地伸手告别，这样，我感到自由了。

顺便提一下，他的讲述很好。在他的叙说里，加入了书面语句，还带着活泼演说的清晰陈述，就如人们常常在那些肥胖的、黑黑的，看起来很健康的、中等身材的、因不停吸烟而兴奋起来的犹太人那里遇到的那样。法庭的述语打断了这种演说，法律的条文被罗列出来，这些众多的条文似乎指向遥远的境地。每一个故事都从头开始发展，赞同的演说和反对的演说都得到发挥，而且因个人的插话而实际上变得动摇，也许没有人想到次要的事情先被提出来，然后附带地提提，再放置一边（“一

个男子，他如何称呼，那是无关紧要的事”——），听众个个被吸引过来，探询、打听，同时旁边的故事变得更多。有时候，听者甚至在一个根本不能使他感兴趣的故事面前被询问，当然是毫无收益，只为建立起随便什么样的临时关系，听者插进来的说明不是立即，而是过一会儿进入正确的位置，但恰好在刚刚讲述的过程中，这也许是令人恼怒的（库宾），这实际上是对听者的阿谀奉承，而且将听者引进这故事中，因为这给了他一种完全特殊的权利——在这里作为听众。

10月14日。昨日晚上在萨沃伊看阿·戈尔德法登的《苏拉米特》。本来是一部歌剧，不过每一个演唱的片断都为轻歌剧。在我看来，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事表明了一种固执的、匆忙的，也是由于错误的原因变得热门起来的、在一种部分是偶然的思潮中割断欧洲艺术的艺术家的追求。

故事是这样的：一位英雄救活了一位在沙漠里迷路（“我们祈求你伟大的、强有力的上帝”），并由于干渴的痛苦而坠入一个地下蓄水池的姑娘。他们在泉水和一只红眼睛的沙漠之猫的召唤之下发誓互相忠诚（“我的可靠的心上人，我的最亲爱的人，我的宝贝，在沙漠里找到了”）。这位姑娘，苏拉米特（Ts.夫人），被阿卜索隆的粗野的仆人辛吉坦（P.）带回到贝特莱恩她的父亲马诺阿赫（Ts.）那里，而阿卜索隆（K.）还要作一次耶路撒冷的旅行；但他在耶路撒冷热恋上了当地一位富有的姑娘阿维盖尔（K.夫人），他忘记了苏拉米特，并与阿维盖尔结了婚。苏拉米特在贝特莱恩的家中等待着这位情人。“很多人都去耶路撒冷，一去就不回头。”“他，这个高贵的家伙，想不忠实于我！”通过绝望的爆发，她获得了一种寄托一切的自信心，为了不必结婚并能等待下去，她决定装疯。“我的意志如铁，我把心筑成堡垒。”她现在整年整年地装疯卖傻，也在这疯狂中悲哀地吵吵闹闹地享受她对那位情人的回忆。大家也不得不容忍这一切，因为她的疯癫只涉及沙漠、泉水和猫。由于她装疯卖傻，她一下子赶走了三个来求婚的人，对这三个人，马诺阿赫只有用抓阄的方法来让他们和平竞争。他们是：约尔·盖多尼（U.），“我是最强大的犹太英雄”，一位地主叫阿维达诺夫（R.P.）和那位大腹便便的纳坦（洛维）。纳坦觉得自己超于所有人之上，“把她嫁给我吧，我会随她而死的。”阿卜索隆是不幸的，他的一个孩子被沙漠的猫咬死了，第二个掉进了泉水。他在回想自己的罪孽，向阿维盖尔承认了一切。“节制你的眼泪吧。”“你别说了，将我的心劈开吧。”“可惜我说一切都没有用了。”一些思维圈子围绕着这两个人形成并消逝。阿卜索隆应该回到苏拉米特身

边而离开阿维盖尔？苏拉米特也得到了拉赫莫奈，最终阿维盖尔让他离去。马诺阿赫在贝特莱恩埋怨他的女儿：“哎呀，我的晚年多悲惨啊。”她用他的嗓音安慰阿卜索隆：“父亲，我以后会把其他的事都跟你说的。”阿维盖尔沉浸在耶路撒冷的葡萄园里，作为辩解，阿卜索隆只剩下他英雄的业绩了。

演出结束，我们还盼着演员洛维出场，我想在这布满尘雾的场景里欣赏他。像通常那样，他应该做如此的“广告”：“亲爱的观众，我以我们全体的名义感谢你们到这里来，并衷心地邀请你们来看明天的演出，在明天的演出里将有闻名世界的××大师的××作品。再见！”挥动手里的帽子离去。

可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而是幕布紧闭了好一会儿，然后又试探般地拉开了一段空隙，而且时间持续颇长。最后幕布还是被宽宽地拉开了，当中有一个钮结将幕布紧束在一起，我们看到洛维从那后面迈步走向舞台的前面，脸朝着我们观众，用双手抵抗着从下面向他袭击的某个人，直到整个帷幕突然随着它上部金属丝固定好的地方一起被洛维扯了下来。他想有一个支撑点，洛维在我们眼前支持不住而屈膝俯身，被饰演野人的P.抓住，P.也保持着弯曲的身子，用头从戏台一旁将洛维朝下撞去。好多人从大厅的侧翼围拢来。“把幕拉起来！”有人在几乎完全暴露的舞台上喊叫着，Ts.夫人站在舞台上，带着一张苍白的苏拉米特的面孔，显得那么遗憾，小个儿的仆役们站在桌子上、沙发上，将幕拉至一半的高度，老板在设法安慰那位官方的代表。这位官方代表唯一的想法只是离开这里，但他被老板的安慰留下来了，人们听到Ts.夫人在帷幕后面的说话声：“现在我们要从舞台上向观众宣讲道德……”犹太人公务员联合组织《未来》已承担了明天晚上的指导，而且在今天的演出前已经召开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全体大会。它现在决定，由于这个偶然事故，在半个小时内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联合组织的一位捷克成员预言，由于他们这种胡闹的表现，这些演员会全部毁灭的。这个时候，人们突然看见洛维，他就像消失了一样，被仆役R.用双手，可能也用双膝推向一扇门的地方。他可能被扔了出去。这个仆役，不管早晚，在每一个客人面前，在我们面前也一样，像一条狗，用狗般的嘴巴……这嘴巴就长在他那张被旁边卑微的皱褶锁紧的大嘴上。

10月16日。昨日，疲劳的星期天。全体人员向父亲辞职。因为他能说会道，为人热情，由于他的疾病，他高大的身材和早先的强壮，他的

经验，他的聪明，他在一般的和私人的会谈中战败几乎所有的人。一位重要的雇员F.想延长到星期一的时间，因为他给了我们业务负责人的话，这位业务负责人退出去，而且要把全部人员吸引到他正在建立的新企业里去。星期天会计不停地写，他也许不可能留下，R.让他不要失言。

我乘车到契兹科夫那里。他的年轻的夫人，圆圆的面颊，长长的脸，还有一只小而粗犷的鼻子，这鼻子永远也不会使捷克人的面孔消沉。她穿一件显得过长的、很宽松的、有花的图案装饰的、有斑纹点点的晨裙。这裙子特别长，特别宽松，是因为她的动作特别匆急，比如向我致意，最后做点装饰性的事情，如把纪念册当正正地放在桌上，好让她丈夫拿到，便很快离去。这位丈夫有着类似的、大约也是从这位他非常依赖的夫人那里学来的、急匆匆的、前俯的上身晃动得十分厉害同时下身明显不动的动作。这是一个十多年来就认识了、常常见到的、却很少被注意的人的印象，现在却突然出现在眼前。我用我的捷克语劝说越少结果（是呀，他已经与R.签署一个合同，只是他在星期六晚上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才如此的惊愕，不提合同之事），他的脸就越是像猫。我在将近结束之际，装着有一点颇惬意的感觉，就这样用有点拉长的面孔和眯起的双眼，默默地在房间里向四周看去，就像在搜索一些难以言说的具有暗示作用的东西。但我还幸运，当我看到没有多少效果的时候，我没有用新的语调去谈到他，我必须重新开始打断他的讲话。交谈由此引出，在胡同的另一端住着另一位T.，在门的附近，谈话以他对我在寒冷中穿轻柔服装感到惊奇而结束。这对我开始的希望和最终的失败颇有典型意义。但我答应他下午去父亲那里。我的理由有些地方太抽象，太拘泥于形式了。错误是没将女人叫进房间里来。

为了保住这位雇员，我下午去拉多廷。因此，我失去了与我常常思念的洛维在一起的机会。在车厢里，那位老妇人有着几乎还是年轻人的那种绷得颇紧的皮肤，尖鼻子。是青春在鼻子尖上结束？是死神在那里开始出现？打着嗝的旅客朝下运动着脖子，毗着嘴巴，表明他们在判断着车的行驶，旅客的组成，座位的顺序，车厢里的温度，当然也判断着我放在膝盖上的、而且不时有些人盯着看的小册子《潘神》^[23]（因为总还是有些事情在车厢里是他们不可能预料到的）。这在他们看来，是无可指责的，理所当然的，没有嫌疑的，同时，他们还相信，所有这一切也可能令人非常不愉快。

我在H.先生家院子里来来去去走动，一条狗将一只爪子放在我脚尖上，我摇晃着脚尖。有小孩、有鸡，有时还有成年人。一位有时在院子旁边走道上俯着身子或躲在门后的小姑娘对我颇有兴趣。我不知道，在她的目光里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冷漠的，害羞的，年轻的，或苍老的，狂妄的或是可亲近的，双手搁在前面还是后面，感觉冷还是热，是兽恋追求者还是商人，是H.的朋友还是乞求者，是会议的参加者——他们有时候在一个不中断的弯道上从会场到厕所——有优越感的，或者由于我轻薄的服装而显得可笑的，是犹太人或者是基督徒，等等。我走来走去，擤鼻子，不时地读着《潘神》，我好像没有表情似的突然地看了她一眼，尔后又胆怯地将目光避开院边的道路，朝着家禽看去，接受了一个男子的致意，穿过会场的窗户看着转向一位演说者的那些男子平淡乏味的、歪歪斜斜的、一张挨着一张的脸孔，这些脸孔为演说增添了效果。H.先生不时从会议中出来，他对介绍给我们公司的那位雇员有着影响，我请求他利用这影响，为我们服务。他深褐色的胡子长满了面颊和下巴，黑黑的眼睛，眼睛与胡子之间表现了面颊的阴暗色调。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对他曾有过一个烘焙咖啡者的想象，这使我把他塑造得比他本人更为神秘、更为男子汉。

10月17日。我什么事情都干不出来，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我心里却是那样紧迫。要是整天自由自在，以及这个早晨在我心中的不安要是能伸延至中午，直至晚上能精疲力竭的话，然后我就能睡觉了。但对于这种不安来说，最多只在朦胧的黄昏停留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变得有些浓烈起来，后来又变得压抑起来，最终又为我无益而有害地打开夜色。我会长时间地忍受它么？而且，忍受它有没有一个目的呢，我究竟会不会得到时间呢？

如果我想这段趣闻，拿破仑在埃尔富特的宫廷宴会上讲道：当我还仅仅是第五军团中尉的时候……（王族成员眼看先后走进来，拿破仑发现，并纠正了自己），当我还有幸，仅仅是个中尉……由于稍稍地与他人一同感觉到的、不自然地侵入到我身内的骄傲，我脖子上的血管膨胀起来。

继续在拉多廷：后来我独自一人在草地走来走去，颇有寒意，然后在敞开的窗户里认识了和我一起转身向房屋这一边的小姑娘——

10月20日。18日在马克斯那里。有关巴黎的事写得很糟，根本没

有进入到原来的被描绘的郊外中去，这种描绘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放开欲经历一下那景色的脚步。我在昨天众多的调查后，也感到昏昏沉沉，昨天与洛维的讲演一起结束了。在这一天里，我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心绪，我与马克斯接他从加布隆兹来的母亲，和他们一起到咖啡馆，然后在马克斯那里，他为我表演《佩尔特的姑娘》中一种吉卜赛人的舞蹈。这舞蹈在书中占了好几页，在一种单调的踢踏声中，只有臀部的动作占了很大的比重，脸部的表情变化缓慢而显得热情。直至后来将近结束的时候，那种诱人的发自内心的疯狂来得既短暂又迟晚，颤动身体，驾驭身体，浓缩旋律。这种旋律一会儿高昂，一会儿深沉（人们听出了特别怨恨的沉闷的声调），最后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结束动作。开始的时候，在整体中，那一种强烈表现吉卜赛人文化相似的地方令人无法丢弃，大概是因为一个在舞蹈中如此疯狂的民族也只是在朋友面前安静地表现自己。第一个舞蹈留下了伟大的真实的印象。后来，我在拿破仑的《格言》中浏览。人们在瞬间里是多么容易地感觉到拿破仑本人的一小部分惊人的想象啊！后来，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心潮澎湃，在围着我转动的这些家具的中心，我不能忍受我的任何想象，它们错杂无序，又若怀胎，如一团乱麻，渐渐膨胀起来，从我的痛苦和忧虑中飞过，尽可能地占据许多空间。可是不管我的容量如何，我变得十分神经质，我进入演讲大厅。比如，从我怎样坐的姿态中，从我是确确实实坐着的姿态中，我也许立即认识到自己是作为听众坐在那里的状况。

洛维读肖勒姆·阿莱星的幽默小品，然后读佩雷兹的故事，比阿利克的一首诗（诗人只是在这里为宣扬他为研究犹太人的未来而利用基希内夫大屠杀的材料写成的诗，他才放下架子，从希伯来文改写成通俗的语言，他还将他早先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诗亲自译成通俗语），读罗申费尔德的《灯下的售货女郎》。对着演员自然而反复睁大的那双眼睛，现在却一下子停住了，扬起的眉毛成了一个半圆的框框。整个朗诵表现了完全的真实。他举起右臂，显得那么虚弱；他移动着好像要掉下来似的夹鼻眼镜，它在那只鼻子上是那样地不合适；他将腿伸在桌子下面的那种姿态，使得联系大腿与小腿之间的那些瘦弱的骨头在活动中显得特别；他的背部看上去疲惫而可怜地弯曲着。因为面对统一而单调的脊背，观察者在判断中是不会被蒙骗的，这就像是通过眼睛，面颊的凹凸，或者通过每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去观察面孔一样，即使脸上布满了短髭也一样。在演讲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我感觉到我聚集了所有的能力，我因此而向我的姐妹诉苦，在家里甚至向母亲诉苦。

因为工厂的事去K.博士那里。那种不严重的理论上的芥蒂肯定会在缔约者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书上出现。就像我用眼睛在H.这位博士转过去的脸上搜寻一样，这种芥蒂在这两个人之间一定会更多，否则他们不会如通常那样去通盘思考他们对方的情况，因此而去碰碰每一个细小的地方。——K.博士的习惯是在房间里成对角线地走来走去，上身紧张地、如在沙龙里一样地朝前晃动，同时叙说着什么。他常常是在走完一个对角线之后，便将他抽的烟灰抖落进房间中分别放着的三个烟灰缸中的一个里。

今日早上在N.N.公司。经理用背支撑在靠背椅的一旁，为他那东方犹太人的手势取得空间和依靠。这是双手和面部表情的综合表演与互相竞争的最佳状态。他有时候将这两者联系起来，为此，他不是盯着他的双手，就是为了使听者舒服而将双手保持在面部附近。他说话的声音如庙宇里的旋律，特别是在列举更多的论点的时候，他将这种旋律从一个指头引向另一个指头，就像跳越管风琴的各个音栓一样。我后来在墓地旁遇见了父亲和Pr.先生，这位先生竟举起手来，让袖子落下一点儿（可是他并不想让袖子落下来），在墓地中央用露出来的手和叉开的手指做着强有力的螺旋运动。

我大概是病了。从昨天起我的身体到处发痒。下午我的脸发起热来，显出各种不同的颜色，使我在修剪毛发的时候感到害怕。那位常常能看见我和我镜中形象的助手会在我身上看出一种大病来的迹象。胃和嘴巴之间的联系部分受阻，一枚如金币大小的盖子不是不时地上升，就是停在下面，然后逐渐扩大，布满胸口表面，轻轻地迫压着向上放射。

继续待在拉多廷。我曾邀请她下来。第一次的回答是严肃的，直到现在她还带着使唤的女仆，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还那么咯咯地笑，并作出娇媚之态。从我们熟识的那一刻开始，她也许从未敢有这样的做法。后来，我们常常在一起大笑，全不顾我在楼下她在楼上开着窗户而感到的寒冷。她将胸脯压在交叉的双臂上，支着屈曲的膝盖，将整个身体靠在窗栏上。她16岁，将我看作是十五六岁的小伙子^[24]，通过我们整个的交谈也不能改变她的这种看法。她的小鼻子有些倾斜，因而在面颊上抛下一条不寻常的影子，当然这条影子并不能帮助我去重新认识她。她不是来自拉多廷，而是来自库赫勒（布拉格的下一站），这个她怎么也不想让人忘记。后来，我与那个即使我没出差也会留在我们公司里的雇员在从拉多廷伸出的公路的黑暗里散步。在一边是一家水泥厂曾堆积过

石灰的荒凉之地，古老的风车诉说着一棵被旋风从大地连根拔起的白杨树，先是斜横在土地里，然后是逐渐地暴露出它全部的根须。这位雇员的面孔：生面团似的、红色的肉附着在强健的骨头上，看上去疲惫不堪，然而在它的四周却是强壮有力的。一点儿也不要为我们在这一带一起散步惊异。在一片广大的、被一家工厂慎重买进的、暂时闲置在一旁的、位于居民区中央的、当然也只是由部分被电灯光强烈照射的工厂大楼包围的土地上方，是一团洗练的月亮，充满光线的、因而若云一般的烟雾从一柱烟囱里冒出。列车发出信号，在长长的交叉在这块土地上的、违背着工厂意愿的、任居民践踏的路旁，穿梭的老鼠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在整体的但却是极少的描写中，我要把那些诸多有力的例子归功于这个人。

星期一，我和洛维在国家剧院看《杜布罗夫尼卡三部曲》。剧本和表演是令人绝望的。第一幕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种烟囱式钟的悦耳的响声，迷人的法国女人们在窗前唱马赛曲，这支逐渐消逝的歌曲受到刚入场的人们一再欢迎。一会儿声音又高了起来，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姑娘拖着她的影子，穿过了那条夕阳照在剧场正厅前排座位留下来的光带；第二幕留下来的只是一位姑娘柔美的脖颈，它从暗红色衣服遮盖的肩膀延伸至小小的脑袋，显得亭亭玉立；从第三幕中留下的是压扁了的皇帝的外衣，暗色的令人产生幻想的坎肩连着黄金横穿起来的怀表链子，那是早先侯爵的一位年迈的、身体弯曲的后代用的。更多的就没有了。座位票是颇贵的，作为糟糕的行善者，我在这里扔出了钞票，而他却是处在困苦之中；终于，他比我更觉得有点儿无聊。简而言之，我又一次证明了那种所有的我独自开始的行动所具有的不幸。在我自己曾与这种不幸不可分地结为一体的时候，所有过去的不幸的事情朝我这儿涌来，所有未来的不幸又将我朝下拉。我每次几乎完全是独立的，我都把这一切作为难得的事情而完全轻松地承受下来，而且甚至第一次感觉到在剧院里我的脑袋是一个观众的脑袋，从靠背椅和身体聚集的黑暗中腾升到一种特别的光辉里去，而不以这个剧本和这个演出糟糕的诱因为转移。

第二个例子：昨天晚上在马利恩街，我灵活地向我的两位小姨子同时伸出两只手，就好像那是两只右手，我成了双重人。

10月21日。一个相反的例子：我不能长时间地朝着我顶头上司的眼睛看，如果他跟我商谈办公室里的事情的话（今天说的是卡片的索

引)。并没有一种轻微的苦涩违背我的意愿进入我的目光，这种轻微的苦涩不是排挤我的目光就是排挤他的目光。因为他对内心深处一无所知，放任那飘忽不定、经常不断的目光，使每个人都失去了兴趣。但他又马上收回这目光，因为他将整个过程只看作是他眼睛瞬间的疲乏。我越来越坚强地抵御着，我也因此加快我交叉目光的频率，最喜欢看的还是沿他的鼻子和它落在面颊上的影子，要坚持住朝向他方向的脸，这常常需要紧闭的嘴巴中牙齿和舌头的帮助——如果必须要那样的话，我尽管低下眼睛，但绝不低于他的领带。当他的眼睛转开，而我紧紧地而且毫无顾忌地追着他的时候，我则马上集中了最锐利的目光。

犹太演员们。契西克夫人嘴巴附近的面颊显得凸起。部分是因为饥饿、分娩、旅途劳累与演出引起的面颊消瘦，它们必须要为她那张原先肯定是笨拙的大嘴在演出时运动而伸展。演苏拉米特时，她总是要拔去遮盖她面颊的毛发，这样一来，她的脸看上去有时像一张早先时代的少女的脸。她有一个大骨架、中等强壮的身体，并将腰身束得紧紧的。她在行走的时候微微地表现出一些庄重来，因为她有这样的习惯：抬起她的长臂，然后伸展，然后慢慢地动起来。特别在她唱犹太民族歌曲时，大大的臀部发出微微的摇晃，并不时地运动着随臀部弯曲的手臂，空空的两手就像是在嬉戏一只慢慢飞着的气球。

10月22日。昨天在犹太人那里。夏尔坎斯基的《科尔·尼德尔》是部颇糟的剧本，它却有一个不错的诙谐的写信场景，还有并排站着的恋人虔诚地用交叉的双手做祷告。皈依异端裁判所大审讯官靠着约柜前的帷幕，他登上台阶，停立在那里，歪着脑袋，嘴唇贴着帷幕，将祈祷书保持在他发出啞啞声响的牙齿前面。在第四个晚上，我第一次为得到一个丰富的印象而明显地感到无能为力。对此，我要归咎于我们的大团体，以及我妹妹在用饭时的来访。尽管如此，我也许可以不那么虚弱。由于我对契西克夫人的爱，我的行为有点可怜，她也只是因为马克斯才坐在我的旁边。我又可以上楼了，现在已经好多了。

契西克夫人（我是那么喜欢写这个名字）就是在桌边吃烤鹅的时候也喜欢偏侧她的头。如果人们先仔细地沿着面颊看去，然后再分别地品味各个部分，你这时肯定不用先抬眼皮，因为它们都已经抬起来了，同时，透出的那一束浅蓝色的光诱使你跃跃欲试，人们相信随着目光而来到她的眼皮之下。从她众多地道的戏剧中，她有时推出拳头，转动手臂，手臂拉着裹住身体藏在裙褶里的长衣裙的后襟，分开的手指放在胸

上，因为失去艺术性的吼叫是令人不满足的。她的表演并不丰富，用可怕的目光看着她的表演对手，在小小的舞台上寻觅着一条出路，温柔的嗓子在直线的、短暂的上升中只有借助于较大的内部共鸣，不用使劲，就显出英雄的形象，欢快通过她舒展开的面庞，越过高高额头，直至头发，渗透进她的全身。在独唱的时候，她自得其乐，不用再增添新的手段，逼得观众去关心她整个的身体，没有更多的了。这是全部的真实情况，因此可以确信，人们不能从她那里夺去哪怕是最微小的效果，她是独立于表演的，也是独立于我们的。

我们对这些演员有着同情，这同情是非常善意的，是不要获取什么的，而且也绝对不用得到感谢和光彩的，这同情本来只是对许多可贵的努力，以及主要是对我们的悲哀命运的同情。因此，这同情也是那种过分坚强的表现，因为它从表面上是在寻求陌生人们的支持，而实际上是我们的一部分。不管怎样，但它与演员们总是联系得那么紧密，使我现在怎么也不能摆脱他们。因为我认识到，这同情正更为固执地与他们连结在一起。

契西克夫人肌肉发达的面颊上显出令人注目的光泽，显出她那种有点儿没成形的小姑娘形象。

和洛维及我的妹妹散步三个小时。

10月23日。演员们又一次令我可怕地用他们目前的情况向我证实，我至今写下的有关他们绝大部分的事情全是错误的。错误在于，我是在用一成不变的爱（就是在我写这些时候的现在，这些也会是错误的），正在变换着的力量去写有关他们的事，而且这种变换着的力量并不正确地、响亮地敲击在这些真正演员的身上，而是沉闷地陷于这种爱上了。这种爱对这种力量永远不满，并欲通过它对它的遏制来保护演员们。

契西克与洛维之间的争论。契：埃德尔斯塔特是最伟大的犹太作家。他是崇高的。罗申费尔德当然也是一个大作家，但不是最伟大的。洛维：契是位社会主义者，那是因为埃德尔斯塔特写了社会主义诗篇（他是伦敦的一家社会—犹太报纸的编辑），因此，契将他看作是最伟大的作家。但埃德尔斯塔特是谁呢，他的党知道他，此外没有人知道，但世界认识罗申费尔德。——契：这不取决于认识。埃德尔斯塔特所做的一切都是崇高的。——洛：我也详细地了解他。例如《自杀者》就很好。——契：什么有助于争论呢？我们无法统一。我明日再讲我的

意见，你也一样。——洛：我后天讲。

戈尔德法登，结过婚，是个挥金如土的人，也陷入极大的困境。约百个剧本。作了不少剽窃来的礼拜仪式上用的旋律，有民间味。全民族都唱这些曲子。工作时的裁缝（被改编了），女仆，等等。

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穿衣服，如契西克夫人所说，人们肯定会发生争吵。演员激动地从表演场地下来，都把自己看成是最伟大的演员。例如，他们在这里互相踩一下脚，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不仅要争执一番，而且还大动干戈，弄得大家精疲力竭。所以，在华沙这种地方就曾有过75个单独的小更衣室，每一间里都有照明设备。

6点钟时，在他们的咖啡馆里我碰到按两个敌对的小组围坐在两张桌子周围的演员们。在契西克夫人小组的那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佩雷兹的书，洛维正将它合上，走过来跟我一起离去。

直到20岁的时候，洛维还是一个被法国人骂的德国佬，当时，他还在学习，用的是他颇富有的父亲的钱。那时候有一个同龄年轻人的社团，一到星期六，这些年轻人就在一家偏僻的酒馆里聚会，并穿着犹太人的长袍抽烟，要不就是违反假日戒规犯错误。

“伟大的山鹰”，从纽约来的最有名的犹太演员，是个百万富翁。戈尔汀为他写了《疯狂的人》，洛维请他来卡尔斯巴德，倒不是为了演出，因为在他面前他也许没有勇气在这个设备极差的舞台上演出。——只是布景，而不是那些人们不能在上面活动的可怜的舞台。我们怎样去演《疯狂的人》哩！这里人们需要一个卧式长沙发。在莱比锡的水晶宫殿里，那里可是辉煌灿烂的。窗户可以开，太阳照进来，剧本里还需要一个国王的宝座，行了，这有了一个宝座，我穿过人群朝他走去，真是一个国王。在这里应该是非常容易演出的，在这里，所有的东西会使一个人迷惑。

10月24日。母亲整天操劳，有时候兴高采烈，有时候闷闷不乐，这种情绪是很自然的。她并不根据自己的状况，哪怕是些许的需要，她的声音很亮，对平时的谈话来说太高了，但如果有人悲愁，过些时间她偶然知道了，她会去做一些善事。自较长一段时间来，我总埋怨，我虽然有病，但从没有一种逼着我躺在床上的特别的病。这种想法绝大部分肯定是因为，我知道，比如说，要是母亲从有灯光的卧室来到昏暗的病室

时，她会怎样地安慰我，或者是晚上，当白昼开始单调地向黑夜过渡的时候，从忙碌中回来，带着她的关切，并迅速地将一切安排停当，再一次让那么迟晚的一天开始，并使病人高兴起来，我想在这同时能帮她一把。我也许希望再得到这些，可能是我后来虚弱的缘故，因此，我确信母亲所做的一切事情，以毫不含糊的年龄上的享受能力，也许能拥有天真的欢乐。昨天我突然想起，我只是因此而不那么爱我的母亲，就如她应该得到的、我能够做到的那种爱，因为德国的语言在这方面妨碍了我。犹太的母亲不是“母亲”，母亲这种称呼使她有点滑稽（不是本人，因为我们是在德国），我们给一位犹太妇女的称呼叫德语母亲，但忘记了那种越来越难以深入到感情里去的矛盾。“母亲”对犹太人来说，特别德国味，这除了基督的光辉外，还包含着基督的冷漠，因此，它不仅使用母亲相称的犹太妇女滑稽，而且也令人陌生。妈妈也许是个比较好的称呼，只要人们不在这个称呼里想到“母亲”的含义。我相信，也只有对犹太人居住区的回忆还保持住犹太的家庭，就是父亲这个词也远远不是犹太父亲的含义。

傻里傻气、说谎达到可笑地步的L.参事，出乎意料地不请自来，他迫不及待地询问我的病情。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或者说大概根本就没有这样亲密地交谈过。这时，我感觉到，我的还从来没有被他如此仔细端详的面孔，对他来说敞开了虚假的、表现糟糕的、但不管怎么说令他吃惊的一面。对我来说，我是看不出的。我对他认识得太清楚了。

10月26日。星期四。洛维昨天整个下午都在朗诵戈尔汀的《上帝·人·魔鬼》和他自己在巴黎的日记片断。前天，我看演出戈尔汀的《疯狂的人》。所以说戈尔汀要比会拉丁文的夏尔坎斯基、法伊曼等人好得多，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条理，以及在这个条理里的更多的合乎逻辑的东西。为此，这里再不完全是其他剧本里的那种生硬的、一次性的即兴表演的犹太人特性的东西。在表演这种犹太人特性东西的时候，发出的噪声是沉闷的，因而刻画细节就更少了。自然也有观众做出让步的，而且有时候人们相信还必须踮起脚尖，为越过从纽约来看戏的犹太人的头看这出戏（疯狂的人的形象，塞尔德夫人的全部故事），但更糟的是对不论哪一种熟悉的艺术也作出明显的让步。例如，在《疯狂的人》中，情节变化了整整一幕，由于考虑到这位疯狂的人讲了一些在人性上模糊不清、但在文学上却是那么粗野的话，竟让人闭上了眼睛，在《上帝·人·魔鬼》里的那位老姑娘也是如此。《疯狂的人》的部分情节非常大胆。一位年轻的寡妇与一个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的老头结婚，

同时马上与她的情人弗拉基米尔·沃罗拜契克通奸。这两个人就这样毁了这整个的家庭，施默尔（彼佩斯）不得不拿出所有的钱，不久便病了。最大的儿子（克卢格）是个大学生，离家出走，阿历山大成了赌徒、酒鬼，丽丝（契西克）成了女佣，勒美赫（洛维）是个傻瓜，对塞尔德夫人的仇恨，是因为她取代了母亲的位置；又对她爱，是因为她是靠近他的第一个年轻女人。这两者把他带进了一种荒谬的疯狂境地，发展得如此之远的情节随着勒美赫对塞尔德的谋杀而解决了。所有的其他人让观众停留在一种未完的、无可奈何的回忆中。对这个女人和她的情人的杜撰是一种没有人寻求他自己看法的杜撰，这种杜撰给予我的是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自信。

戏剧节目单给人留下暗示的印象。人们从这里获悉的不仅是那些名字，而且还有一些更多的东西，但也就只是这么多了。比如在这里最善意的、最勇敢的公众肯定知道了一个受到他们裁判的家庭。施默尔·莱布利希是一个“富有的商人”，但却没有说，他年老多病，是一个可笑的喜欢女人的人，一位坏父亲，一个不虔诚的鳏夫。他在他夫人忌日的那天结婚。这所有的说明要比戏剧节目单上的正确得多，因为到戏剧的结束，他已不再富有，因为塞尔德将他搜刮得一干二净，他也几乎不再是一位商人，因为他疏懒了他的事业。西蒙在戏剧节目单上是“一个大学生”，实际上颇为模糊，就像我们知道的许多遥远熟人的儿子一样。阿历山大是一个没有性格的年轻男子，也只是叫“阿历山大”而已，关于“丽丝”这个深居简出的姑娘，人们也只知道，她叫“丽丝”而已。勒美赫可惜是“一个白痴”，因为这是有点儿无法隐瞒的事情。弗拉基米尔·沃罗拜契克只是“塞尔德的情人”，但不是家庭的破坏者，不是酒鬼、赌棍，不是放荡的人，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不是寄生虫。他戴着这顶“塞尔德情人”的帽子，虽有许多表露，但读到有关他的举止，人们能说的却少得可怜。此外，情节的发生地是在俄国，这些勉强搜集在一起的人物分散在一片广阔的地区，或者说集中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小的、不被人注意的点上，简单地说，这个剧本里发生的事是不可能的，观众得不到什么可看的内容。

尽管如此，这出戏开始演了。剧作者明显地花了很大的力气。许多事情出现了，这些事情不依赖于戏剧节目单的力量，但却带着极大的自信与它贴近。人们只相信鞭打、抢劫、殴斗、捅肩、昏倒、砍头、残废、穿着俄国翻口靴子跳舞、女人的裙子飘得高高的舞蹈、沙发床上的翻滚，这些都是事实，在这里反驳是无助于事的。甚至连留下回忆的、

令身临其境的观众激动的高潮也不缺少，这让人们认识到，戏剧节目单暗示的印象是一个错误的印象，这印象只能在演出之后才能构成，但现在已是不正确的了，也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印象只能在一种厌烦的袖手旁观的处境中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对诚恳下判断的人来说，在演出之后于节目单与演出之间应该说不再有什么被允许的东西可看的了。

从第一个笔画开始就带着绝望写东西，因为今天玩牌的人特别吵闹，我不得不坐在普通桌旁。那位O.女士张口大笑，站起来，又坐下去，越过桌子跟我说话。我为完成这个不幸而写得如此糟糕，我不得不想起洛维美好的、用一气呵成的感情写成的巴黎回忆。它是出自于独立的火焰，而我肯定主要是因为时间是那么少，至少现在几乎完全受着马克斯·勃罗德的影响，这有时候为了丰富一下内容仍不免使我对他的工作扫兴。因为我感到慰藉的是我在写关于肖[25]的自传评论，尽管这里面本来就包含着与慰藉相对立的东西：当孩童的时候，他在一家都柏林的房地产代理人的办事处当学徒。他一下子放弃了这位置，去了伦敦，并成了作家。在从1876年至1885年的最初9年里，他总共挣了140克朗。“但尽管我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年轻人，我的家庭处在恶劣的境遇中，我并没投入生活的斗争，我却让我的母亲投入到生活的斗争中去了，让自己靠着她来养活。对我的父亲来说，我不是帮手，相反，我却是依赖着他。”最终使我感到了少许的慰藉。他在伦敦自由自在度过的年华对我来说已经过去，可能的幸运变为越来越不可能实现的幸运，我过着一种可怕的替补式的生活。我十分胆小而可怜地只对肖追踪到这么远，我给我的父母朗诵了这个地方。这种可能发生的生活是怎样带着钢铁的色彩、带着绷紧的钢棒和薄薄的黑暗在我的眼前闪光啊！

10月27日。洛维叙述的故事和日记：我们的女士如何地使他感到恐惧，植物园的老虎如何地侵袭他，那是绝望了的人与希望着的人的一种描述，他贪婪地饱食了绝望与希望，就如他虔诚的父亲询问他一样，他能不能在这个星期六散步，他现在是不是有时间读现代的书，他是不是可以在斋戒日吃东西，而他却必须在星期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而且禁食日子比每一个宗教规定的日子还多。当他啃着一块黑面包穿过胡同散步的时候，从远处看，他好像是在吃巧克力。帽子工厂里的情况和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个社会主义者，这位社会主义者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完全不像自己那样工作的资产阶级分子，比如洛维用的就是那双细嫩的手在工作的。这位社会主义者在星期日感到无聊，他将生活鄙视为享乐。他收到了一封信，可是他自己不念，嘲讽地请洛维为他念。

在俄国的每一个犹太人聚居区都有犹太人的净水，我将它想象为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有一定规模的水池，有由犹太法师布置和监督的设施。这种净水只是要洗去心灵的尘世龌龊，因此，它的外部状态是不重要的，它是一种象征，因此它可能是脏的、是臭的，即使如此，但它还是完成了它的任务。妇女来到这里，为消除月经期的污秽，写经的经师来到这里，是为在写一段经文最后的句子之前洗去所有邪恶的思想。

规矩是：醒了之后，马上将手指三次浸入水中，因为罪恶的魔鬼在夜里会栖身于第二个和第三个手指节上。合理的解释是：应是防止手指马上碰到脸上，因为在睡觉和做梦的时候，手指会不由自主地接触身体的各个部位，如腋下、屁股、性器官等地方。

后台的更衣室那么狭窄，要是一个人偶然在舞台的门帘后面站在镜子之前，而第二个人想从他身旁走过，那么，他就得撩起幕布违心地向观众展示那么一会儿。

迷信：人们要是从一只不满的杯子里喝饮料，罪恶的魔鬼就会得到进入人体的入口。

演员在演出后出现在我面前，我会感到多么受伤害啊，我是多么害怕用一句话去轻抚他们啊！我多么愿意匆匆地握一下他们的手后迅速离去，就好像我生气而且不满似的，因为我是那样地不可能说出我真正的印象。所有的人，除了马克斯之外，对我来说都是虚假的。马克斯安详地说着一些没有内容的事情。但虚假的是那个打听荒唐细节的人，虚假的是那个给演员的说明予以一个诙谐答复的人，虚假的是那个嘲讽的人，虚假的是那个开始解析他的各种各样印象的人。所有这一群全是无赖，他们准确无误地挤缩到观众大厅的深处，在现在很晚的夜里爬起来了，而且又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离正确的东西相去甚远。）

10月28日。我虽然有一种类似的感觉，但在我看来在那天晚上上演的剧本远不是完美的。但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应该在这些演员面前表示特别的敬畏。谁知道在印象上的那些小小的、即使是不少的漏洞，谁承担它们的责任呢？契西克夫人有一次踩在了自己衣服的镶边上，在她那紧身的民族服装里摇晃了好一会儿，像一根硕大的圆柱。有一次还说错了话，为了让舌头镇静一下，便做了个强烈的动作将身子转向后墙，尽管如此，动作与说话还是露出了明显的脱节；这使我感到迷惑，但这并没阻止她那面颊骨上面掠过的一丝惊慌，这是我一直在听她说话的声音

时感觉到的。可是别的熟人们得出的印象比我的要不纯洁得多，他们在我看来应比我有更大的敬畏，因为我认为他们的敬畏比我的更有极大的效果，也因此我有双倍的理由诅咒他们的举止。

马克斯的《剧院》中的《戏剧的绝对真实性》。如果有一种梦般的真实特性，对此，这个表达也适合“绝对真实性”。这个真实性越是梦般地自吹自擂，人们就得越发冷静地去抓住这个真实性，这道出了如下的基本准则：

戏剧的本质在于一种不足，这是个命题。

（舞台上的）戏剧要比小说更有创造性，因为我看到的一切，后者我们却只能读到。

这只是表面的，因为在小说里，作者只能给我展示最重要的东西，在戏剧中我们相对地看到了所有的东西，演员、布景，因此不只是最主要的东西，而且是更少的东西。因此，在小说的意义上来说，最好的戏剧也许就应该是一种完全失去激情的。例如哲学的戏剧，它是由坐着的演员在一个随意的房间布景里朗诵而完成的表演。

可是最好的戏剧是那种在时间与空间里给出最多激动的戏剧，它摆脱所有的朗诵要求，将自己集中在说话上，集中在独白时的思想上，集中在事件发生的基点上，用激情来控制其他的一切，将自己抬在一个由演员、画家、导演扛着的招牌上，一味地追逐它最外部的灵感。

这种结论的错误：它没有阐明就更换观点，它看事物一会儿从写字间出发，一会儿从观点出发。观众并不是在作者的意义里的所有一切，演出使作者本人吃惊（10月29日，星期天），可是他的剧本里就是那样包括了所有的细节，不断地从这个细节移向那个细节，只是因为作者将所有的细节搜集在讲话之中，他给了它们戏剧性的分量与威力。因此，戏剧在它最高的发展中陷入了一种过分人性化的境地，再把这种人性化拉扯下来，变成大家可以接受的东西。演员的任务就是，他放松分配给他的角色，分析这个角色，承担起浮动在自己全身的角色。戏剧就是盘旋在空中，但不是那个被风暴托起的屋顶，而是整个一座大楼，它的墙基被一种在今天还与癫狂很为相近的力量从大地里拖拽上来。

有时候看上去，戏剧就在天幕之上，演员们从天幕取下一条条带子，他们在表演时，将带子的一端抓在手中或围绕在身上，而只是有时候有一条难以解开的带子将一个演员吊在高处，令观众吃惊非小。

我今天梦见一头像一只灵^提的驴，它在各种动作中表现得很克制。我仔细地观察它，我知道这是极少的现象，但只是为保留住对它的回忆。我是不喜欢它那长长的、同样形式的、细瘦的像人脚那样的足的。我用刚从一位苏黎世的妇人（这一切都是在苏黎世发生的）那里得来的新鲜、碧绿的柏枝喂它，它不吃，只是用鼻子在柏枝旁嗅了一下；但当我后来将这些树枝放到一张桌子上时，它当着我的面将那些树枝吃得精光精光，只剩下几乎认不出了的栗子似的一粒小核。后来谈到，这头驴还从来没有用四肢走过路，而总是像人一样地保持着直立，并展示它的银光闪闪的胸脯和小肚子。可是这根本不是确切的。

此外，我梦见了一个英国人，我是在一个类似那个在苏黎世的医疗大军的集会上认识他的。那里的座位就像学校里的一样，就是在写字板下面有一个敞开的桌斗，当我把手伸进去要收拾一下什么的时候，我惊奇了，人们在旅途上结成友谊是多么容易啊。我指的显然是这位不久便朝我走来的英国人。他穿着鲜明、宽松的衣服，显出很好的气质，只是在后面的上臂部不是衣服料子，而是牢牢缝制在上面的什么，那是一种灰色的、有点像挂着的、被撕成一条条的、如蜘蛛穿刺点绘的料子，这种料子不仅使人想起马裤的皮垫，也使人想到缝纫女、女店员、女雇员的护袖。他的脸也像是用一块灰色的料子遮盖的，这块料子对着嘴巴、眼睛，也许还有鼻子的部分，裁剪得十分巧妙。但这种料子是新的、粗糙的，更确切地说是法兰绒之类的料子，非常挺韧、柔软，产自于有名的英国厂家。这一切都令我那么中意，我急于要与这个人相识。他也想邀请我去他家，可是我后天必须离去，这事就告吹了。在他离开集会之前，他还穿了几件显然是很适用的衣裳，他将衣服的纽扣扣上之后，这衣服便使他显得完全不显眼了。尽管他无法请我去他家了，他便要我和他一同上街走走。我跟着他，我们在集会酒店对面的人行道角边停下来，我站在下边，他站在上面，在一席谈话之后，我们又感觉到邀请之事怎么也不行了。

后来我梦见马克斯·奥托^[26]和我有这样的习惯，即先把我们的箱子送往火车站。这个时候，我们拿着衬衣穿过主厅走向离我们远远的箱子。尽管这看来是一般的习惯，却没有在我们身边保持住，特别是因为我们在火车驶入前的一会儿才开始收拾行李。所以我自然是着急了，而且几乎没有希望再能赶上火车，怎么还能得到好位置哩？

尽管咖啡馆的老主顾和职员们都喜欢那些演员，但他们却不能在盛

气凌人的印象中保持尊重，而且将这些演员蔑视为完全如历史上的穷光蛋、游荡者，是与犹太人一伙的人。如此，那位酒馆的职员要把洛维扔出大厅。正当这位契西克在演出《疯狂的人》时在她同情的激动中想给演员们带来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位过去曾是青楼跑堂的、现在却是靠妓女生活的开门人，也居然用大声喊叫来盖住小契西克的声音。当我前天陪洛维回到咖啡馆的时候，当他给我朗诵戈尔汀的《埃利塞·本·舍维亚》第一幕之后，那个家伙（那家伙斜着眼睛，在弯曲的尖鼻子和嘴巴之间有一凹坑，从这凹坑里竖起一串小胡子）朝他叫喊：“过来，白痴。（暗指他在《疯狂的人》中的角色）我们等着哩。今天你来了，你怎么真的赢不了他呢？连一位火炮志愿兵也来了，看这里。”他指向一个遮蔽着的咖啡屋的圆盘，好像那位志愿兵就坐在这圆盘的后面。洛维用手擦一下额头：“从埃利塞·本·舍维亚到这个人。”

今天在观看窄而陡的木楼梯的时候，我是那么着迷。很早时候，而且好多次以来，我就有兴致地从我的窗口观看从三个角剪截的那个阶梯石栏，这个阶梯从右边由采希桥向下引向码头高地，坡很陡，这座桥就好像只是给人以一种迅速的暗示。现在我朝上越过河面看到堤坡上的引梯，它一直延伸到水边。它一直是在那里的，只是在秋天和冬天它前面的游泳学校停办了才显露出来，四周是褐色大树下的暗色草地，人们也只能在空隙间看见它。

洛维：四位犹太朋友在年纪大的时候都成了伟大的犹太经文的学者，但每个人都有着自已特殊的命运。一个变得神经错乱，一个死了，埃利塞经师在40岁的时候成了自由思想者，只有他们中年纪最大的阿基巴得到了全面的知识，他40岁的时候才开始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埃利塞的学生是迈尔经师，他是一位虔诚的男子。他是那样的虔诚，就是自由思想者的课也不会对他有任何损害。如他所说，他吃果核，将果壳扔得远远的。有一次，星期六，埃利塞骑马散步，迈尔经师就徒步跟着。迈尔手里还捧着经书，自然是只能走上两千步，因为人们在星期六不可以再走下去了。这里，从散步中产生出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和反驳。“回到你的人民那里去吧。”迈尔经师说。埃利塞玩弄词句地拒绝了。

10月30日。我几乎一直有这样的愿望，如果我一旦觉得我的胃很不错，我就会用吃食在我身上堆积起那可怕的冒险想象来。特别是在熟肉铺前面，我满足了这个愿望。我要是看见一根香肠，一张纸条上标明是一种陈年的坚硬的家用香肠，在我的想象中，我就会用全副的牙齿啃

它，并很快地、有规律地、放肆地吞咽进去，像一部机器。这件事本身在想象中立即导致的绝望加剧了我的匆忙。我将肋条肉长长的肉皮不经咀嚼地塞进嘴里，穿过肠胃，然后又从后面将它们拽出来，我将肮脏的食品店吃得一干二净，用鲜鱼、黄瓜和所有不好的、陈年的、味道浓烈的食品将我装满。糖果像冰雹一样从白铁皮罐子里泼洒进我的身体。就这样，我不仅享受了我的健康状态，而且也享受了一种没有疼痛的并且马上就过去的苦难。

这是我的老习惯，那就是不让纯净的印象——不管它们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只要它们达到了最高的纯净境界——惬意地走遍我的全身，而是用新的、意想不到的、微弱的印象将它们搅混，并将它们驱逐。这并不是要伤害我自己的凶恶企图，而是在忍受那种印象的纯净中表现出来的虚弱。但那种印象的纯净性与其说没有被承认，还不如说是在内心的静谧处由新的印象随意呼唤出来的，而不是那些也许是唯独正确的纯净印象自己显露出来，而是求救别的力量去支持它。

例如，我在星期六晚上听了T.[27]小姐的那部好的中篇小说后就是这样，这部小说更多的是属于马克斯的，至少是在较大的篇幅里，比自身更多的补充内容是属于他的。然后我也听了鲍姆的优秀剧本《竞争》，在这个剧本里，人们能够明显看到在创作中和在效果上的那种不断涌现的戏剧力量，就像在一件活生生的手工艺制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在倾听了这两部创作之后，我是那样地折服了，我多少天以来颇为空白了的内心毫无准备地被如此沉重的悲哀充实了，以至我在回家的路上跟马克斯解释道，从《罗贝尔特和萨穆埃尔》这部作品中恐怕什么也做不成。对于这个解释，无论我还是马克斯都得要有点儿勇气。后来的谈话使我有了一点儿心乱了，因为《罗贝尔特和萨穆埃尔》在当时远远不是我主要关心的事，因此我并没找到给马克斯不同看法的正确答案。但当我后来独自待着的时候，当我的悲哀干扰通过交谈中断的时候，当对马克斯目前状况时时感到慰藉中止的时候，我的失望竟走到如此地步，它开始瓦解我的思想（这时候，在我吃好晚饭休息的时候，洛维来到我的住处，他打断了我的思绪，从7点到10点我兴奋不已）。我在家中并不去期待继续发生的事情，我杂乱无章地读着两册《行动》，读了一点儿《恶运》[28]，最后还读了我的巴黎手记。我躺在床上，真的比早先满意了一些，但仍然顽拗。几天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那是当我从一次散步中，带着他那个为我的目标而鼓舞的力量，回到洛维的清晰的模仿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读书，在家中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直至精疲力

竭。

10月31日。尽管我今天有时候读着菲舍尔的目录、《因塞尔年鉴》、《评论》，可是我颇为清楚那些所有的东西，它们不是死死地被吸收了，就是浮光掠影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虽说是浮光掠影，但却防御着任意的伤害。今天晚上，如果我不一定再要与洛维出去的话，我会有足够自信的。

今天中午，由于一位妹妹的缘故，有一位女婚姻介绍人在我家，出自一些复杂的原因，在她的面前我感到一种抬不起眼睛来的窘态。这个女人穿了一件衣服，年龄、破旧和龌龊给这件衣服蒙上了一层浅灰色的闪光。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她将双手保持在腹部。她斜睨着眼睛，看来要将她搁在一边是更加困难了。当我不得不朝我的父亲看去时，他问了我一些有关那个被介绍的年轻男子的情况。对此，我的窘态又因此而减轻了，因为我把手午饭端在自己的面前了，我没有了窘态，全神贯注地忙于从我的三个盘子里制造出一种混合的佳肴来。我开始只是匆匆地看了她一眼，在她的脸上有着那么深的皱纹，这使我想到动物在看这样人的脸的时候肯定会带着那种不可理解的惊讶。她身体上显得令人注目的地方是从她脸上伸出的那只小鼻子，它在有点凸起的末端显得特别棱角分明。

在星期日下午，我刚巧走在三个妇女的前面踏进马克斯的家门。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二间房子，我可以在那里干点事情，那些在我后面走着的妇女们还可能看见我在星期日下午为干一件事、谈一次话拐进一家大门，她们拘谨地、匆匆地、唯是破例地从这个方面去推测着这件事。这肯定好久不是这样的了。

特别是在大声朗诵的时候，我带着入神的乐趣读威廉·舍弗尔的中篇小说，对我来说就好像用一根连接的线牵引着舌头。我昨天下午一开始没能很好地容忍瓦莉，但当我在她面前收起《恶运》的时候，她已经读了一会儿了，而且肯定是受了这个故事的很大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我喜欢上她了，并亲昵地抚摸了她。

为了忘掉我的父亲又一次称我是个坏儿子这件事，我给自己写下这些。无论是为了压制我，还是假装地为拯救我，他没有特殊的理由在一些亲戚面前叫马克斯是一个“疯狂暴躁的人”。当洛维昨天在我房间里的时候，他带着嘲讽的神情晃动着身体，歪斜着嘴巴，谈论那些进入屋子的陌生人。谁会对一个陌生人感兴趣呢？人们去建立如此无益的关系有何用呢？等等。我也许不应该将这些写下来的，因为我恰恰把自己写进了对我父亲的仇恨中了。对这种仇恨，他今天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了。至少由于洛维的缘故，这种仇恨与我作为我父亲的见解写下来的东西比较是太过分了，而且还要升级，我也不堪去回忆昨天父亲的行为举止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原本的凶恶。

11月1日。今天开始如饥似渴地、幸运地读格雷茨的《犹太教历史》。因为我对此的要求远远地超过了朗读，这对我来说，首先比我想的还要陌生，而且，为通过静思来聚集我身上的犹太特性，有些地方我必须遵守。将近结尾处，在新占领的迦南建立的第一个不完善的居民点和有关人民英雄（约书亚、裁判官、伊利斯）不完全的可靠的传说已经紧紧抓住了我。

昨天晚上与克卢格夫人告别。我们，我和洛维，沿着车厢跑，并看见克卢格夫人从最后一节车厢关着的窗子里的昏暗中朝外看。她还在车厢里迅速地朝我们伸出胳膊，站了起来，打开窗户，她在里面披着敞开的宽大外衣站了好一会儿，直至与她对面的那位神秘的克卢格先生立起身来，他只能是苦涩地张着大大的嘴巴，不过很快地、就好像是永远地又闭上了。我曾经有过15分钟与克卢格先生待在一起，只是很少讲话，而且大概也只看了两眼。一般在轻柔缠绵的交谈中，我是离不开克卢格夫人的眼睛的。她完全为我目前的状况克制着，但在她的想象中，这种克制比实际更为厉害。在她转向洛维一再叫着“喂，洛维”时，其实她是在向我说话，如果说因为她丈夫有时只让她的右肩靠着窗户而压着她衣服和被风吹鼓起来外衣的时候她推她丈夫的话，那是她在用这种方式来努力地给我一个无言的信号。

在我想象中的第一个印象是，我对她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的愉快。正确的印象大约是，她极少要我一起唱歌，如果她问我一些什么，我可惜总是那么没有什么念头地回答错了（“您懂这个吗？”我说：“懂。”但她想要的回答是“不懂”，为了再回答，“我也不懂”），她第二次没将她的风景明信片给我。我偏爱契西克夫人，我想给她献花而伤害了克卢格夫人。但对我博士学位的尊重导致了这种反感，这种尊重并不因为我幼稚的外表而受到妨碍，倒不如说因此而更受尊重了。这尊重如此威严，它从它虽然是经常的，但完全不是特别加重语气的致词“您知道，博士先生”中听起来有这样的感觉。我一半是无意识地表示遗憾，获取这样的致词少得可怜，并又问自己，我是不是不需要从每个人那里得到完全一样的致词。可是这个时候，我被她作为人那样地尊重，而我却更是以观众身份出现的。当她唱歌的时候，我就容光焕发；当她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整个时间都大笑不止，并看着她，我跟着一起唱那个旋律，说着那些台词；在一些演出后我向她致谢；因此，她自然又很好地容忍了我。但如果她以这种感觉跟我交谈，我就会发窘，这肯定使她带着那颗心又回到她当初的厌恶中去，并自持在那里。她就肯定会越发努力地将我当观

众来回报，她很喜欢做这些事，因为她是一个爱虚荣的演员和一位好心肠的妇女。

特别是当她在上边车厢窗户里沉默的时候，她用一种因尴尬和狡黠而入迷的嘴巴和眯起的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在从嘴巴处伸出的皱纹之上流着泪水。她一定相信我爱上她了，这也是真实的，她用那种目光传递给我那种唯一的满足，这是她作为有经验的却年轻的贤妻良母能够给予一位她想象的博士的满足。那种目光是那样迫切，并被这样的话语如“这里有如此可爱的客人，特别是个别的”支撑着，我只有自卫，在那些瞬间，我朝她的丈夫看去。在我将他们两人作比较时，我对此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奇，他们一起从我们这儿离去，可是只顾关心我们，他们却没有互相看一眼。洛维问他们是不是得到了好位置，“对，这里有空。”克卢格夫人回答，并向车厢里边匆匆看了一眼，车厢里的空气被丈夫的抽烟污染了。我们谈到她的孩子，他们为爱他们而离开的；他们有四个孩子，三个是男孩，最大的9岁，他们已经18个月没见到他们了。当一个男子在附近迅速登上车厢的时候，看来列车就要启动了，我们赶快告别，互相伸出手来，我拿下帽子，然后将它放于胸前，像人们在列车开动的时候那样，我们往后退，人们以此来表明，所有一切都过去了，人们已经承受住了这些。可是列车并没有开，我们便又走近去，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她打听了我的姐妹们。突然，列车慢慢地开动了。克卢格夫人拿出手绢准备示意，我说要给她写信，她大声地问我是不是知道她的地址，可是她已经离得太远了，我无法用说话来答她，我就向洛维指指，意思说，我可以从他那里知道地址。好吧，她向我和洛维点头，并让手绢在空中飘起来，我举起帽子，一开始并不那么自在，后来，她越走越远，我也就越来越无拘束了。

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我有了这样的印象，那趟列车根本没有开走，而只是在车站行驶了一小段距离，为给我们作表演，后来便消逝了。当天晚上，在半睡的状态中，克卢格夫人在我面前不自然地显得矮小了，几乎腿也没有了，扭拧着双手，脸孔也变形了，好像是她遇到了极大的不幸。

今天下午，孤寂的痛苦来到我的全身是那么铺天盖地、那么强烈，使我发现，我通过这个写作得到的以及我真的并不是为这个目的而支配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消耗殆尽。

克卢格先生一旦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人们会注意到，他和他夫人的

首饰是怎样消失在当铺里。在临离开时，他又慢慢地将它们赎出来。

哲学家门德尔松夫人喜爱的句子：在全世界的面前我是多么不舒服啊！

与克卢格夫人告别时最重要的印象之一是，我总是不得不相信，作为一个平常的市民阶层的女人，她用强大的威力坚持在真正的人的使命高度之下，只需一步之跃，只需要闯开大门，只需要一线打开的光亮，就成了演员，并使我折服。她确实也是站在上面，而我站在下面，就如在剧院里一样。——她16岁就结婚了，现在已26岁。

11月2日。今天一早，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又感到想象这把刀子在我心里转动的欢乐。

在报纸上，在交谈中，在办公室里，常常是语言的气势，然后是从目前的一个弱点中产生的、对已经是属于未来时刻的突然的、越发强烈的醒悟的希望，或者是坚强的自信本身，或者是唯一的漫不经心，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当代的、人们无论如何要将之转嫁给未来的印象，或者是当代的真诚的欢呼表明未来的每一种涣散都是有道理的意见，或者对在经过一两次冲撞中间发掘出来的、使嘴巴张到它最大限度的、又极快而且是不自然地让它闭上的句子的欢乐，或者是一个果敢追求清晰判断的可能性的轨迹，或者是给本来应该结束的演说继续下去的努力，或者是匆匆忙忙地、如果必要的话匍匐地离开题目的要求，或者是为其沉重的呼吸寻找一条出路的绝望，或者是对一种没有阴影的光明的渴求——所有这一切都可能误入这样的句子：“我刚刚结束的这本书是我至今读到的最美好的书”或“是如此的美，我还从没有读到过哩”。

为证实我所写的和我所想的有关他们的一切是错误的，那些演员们（除了克卢格先生和夫人）又留在这里了，就如我昨天晚上碰到的洛维向我叙说的那样；谁知道，是否他们不是出自同样的原因于今天又离去了，因为洛维没有在工作地方报到，尽管他答应过要来的。

11月3日。为证明我写入的这两件事均是错误的一个证明，这个证明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洛维昨天晚上自己来了，而且打断了我的写作。

N.的习惯是用同样的噪音重复所有的事情。他向某人叙述他公司的故事，虽然不带那么多的细节，因为这些细节本身也许会最终地结束这

个故事，但毕竟还是用一种缓慢的以及唯有因此而彻底的方式来转述，当然这种转述没有别的意思，因此用原故事的结尾也就解决了。一会儿的时间就随着别的事情过去了，他突然找到朝他的故事过渡的地方，并又将它从它陈旧的形式里，几乎没有补充地、但也几乎不加剔除地取出来，带着一个牵着一根暗暗缚在他背上的带子在房间里转的人的善意。这个时候特别喜欢他的是我的双亲，因而他们感觉到他的习惯比他们发现的强得多。这正投其所好，他们，首先是我的母亲，不知不觉地给了他重复的机会。要是在一个晚上对于重复一个故事的时刻不合适的话，在场的母亲就问，而且带着一种好奇，当然，正如人们估计的那样，这种好奇在刚问了的问题之后是停不下来的。已经很晚了，在那些已经重复过的、靠自己的力量再无法讲下去的故事后面，母亲还一本正经地带着问题追着问。N的习惯确是如此一种支配人的习惯，它常常有着完全为本身辩驳的力量。没有人能够用一种如此有规律似的重复来向单独的家庭成员叙述一个基本上与大家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要在各房间围绕着一个人物而不断增大的家庭圈里当着众多的人都在场的时候讲述的，这种讲述几乎常常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我是唯一知道N.习惯的人，而且我也是绝大多数的时候第一个听这个故事的人，这种多次的重复带给我的也只是证明一种观察的小小的欢乐而已。

妒忌我那么喜欢的鲍姆一个所谓的成就。在这里，感觉到在身軀里有一个线团，这线团迅速地松开，洒出无穷无尽的长线，他将这些长线从我身軀的边缘紧紧地拉到他自己那里。

洛维。我父亲谈论他时说：“谁与狗一起躺在床上，谁就和臭虫一起起身。”我无法克制自己，说了一些语无伦次的话。接着，父亲显得特别安静（当然是在一阵非同寻常的大停顿之后）地说：“你知道，我是不可以激动的，我必须保重自己。我还要为这样一些事情操心吗？我正是厌倦了这些激动，完全地厌倦了。好吧，别让我说这些了。”我说：“我在努力地克制自己，而且在父亲身边就如总是在如此极端的时刻，我感觉到一种智慧的存在，我从这种智慧里只能得到一次呼吸。”

洛维的祖父去世，他曾是一个慷慨大方的男子汉，懂得好多语言，曾深入俄国内地作过多次旅行，他有一次星期六在也卡特利诺斯拉夫的一个神奇的经师那里拒绝吃饭，因为那位经师儿子的长头发和彩色围巾让他怀疑这家的虔诚。

床架在房间的中央，蜡烛夹子是从朋友和亲戚那里借来的，房间里

烛光闪闪，且充满了蜡烛的烟雾。大约有40个男子整天围守在他床旁，为安慰这位虔诚的死者。他在临终时还清楚地意识到，在准确的时刻将手放在胸口上，开始背诵这个时刻规定的经文。在他痛苦的时候和在他死后，祖母在聚集着女人们的隔壁房间不停地大哭，可是在他咽气的时候，她却那么安详，因为这是一种尽力为正在死去的人赶走死神的戒律。“他带着自己的祷告去了。”许多人为这样虔诚一生而死去的他称羨不已。

逾越节。富有的犹太人社团租一家面包房，它的成员们为这个家族的头脑们调制所谓18分钟发酵的面包而承担起所有的工作：取水、和面、揉面、裁切、打孔。

11月5日。昨天从7点起和洛维一起朗读《巴尔·科赫巴》、他父亲的信后睡觉。晚上在鲍姆那里。我想写东西，可是额头上老在发颤。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处在整个住宅的喧闹的中心。我听见所有的门的撞击声，透过这种噪声，给我留下的只是那些在所有门之间穿行的人的脚步声，我还听到厨房灶门关闭的声音。父亲冲开我房间的门，穿着拖沓的睡衣，从旁边房间的炉子里抓一把灰。瓦莉糊里糊涂地发问，穿过前屋就像穿过一条巴黎的胡同，她喊叫着，父亲的帽子是不是揩擦过了，那是我熟悉的咝咝声，然后是提高嗓门回答的喊叫。卧室的门把手被转开了，像从有黏膜炎的脖子里发出的声音那么嘈杂，然后门随着一个女子噪音的短促歌唱而越开越大，但又随着男子沉重而猛烈的冲击声关上了，这声音听起来肆无忌惮到了极点。父亲走开了。现在，由两只金丝雀的叫声领头，响起了比较柔和的、分散的、失望的噪声。很早以前我就想到这件事，在金丝雀那里会使我突然重新想起，我是不是不应该将门打开一条小缝，如蛇一样匍匐进旁边的房间，就这样在地上向我的妹妹和鲍姆请求安静。^[29]

昨天晚上，当马克斯在鲍姆那里朗诵我的有关汽车小故事的时候，我感到了苦涩。我拒绝了一切，我对着这个故事将下巴死死地压在胸口上。这个故事里的零乱的句子带着许多空当，都可以将两只手伸进去了；一个句子听起来很响亮，一个句子却又低沉下去，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句子与另一个句子交替，就像舌头摩擦着被蛀空的、或者是假的牙齿；一个句子带着那么佞屈聱牙的音调，使整个故事陷进一种令人郁闷、令人惊异的境地；那是一种对马克斯睡眠朦胧的模仿（题材被蒸过了——被烧过了），显得摇摇晃晃，有时候看来就像前一刻钟里舞蹈

的一条路线。我为自己解释，我的时间和安静太少了，无法从我的身上发掘出我发挥全部才能的可能性。因而总只是表现出断断续续的初步尝试，比如，这种扯得零乱的起始贯穿了整个的汽车的故事。我要是有一天能够写出一整部较大的东西来，从头到尾都构思得那么好，那么，这个故事也可能永远不会彻底地从我这里解脱，而我可以静静地，睁大眼睛，作为一个健康故事的亲戚倾听它的朗诵。但这样的话，故事的每个小段就会如无家可归一样打转，并将我驱赶到对立的方向去。——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话，我对此还是高兴的。

戈尔德法登的《巴尔·科赫巴》上演。全大厅和舞台上发出对这出戏的错误评论。

我给契西克夫人带去一束花，并挂上一张名片，上面写有“由衷的感谢”，我等待着能够将花递给她的那个时刻。可是演出开始得迟了，我听说契西克夫人主要的那场戏是在第四幕，在焦急与害怕——花儿可能会凋谢——的面前，已经到第三场的时候（已经是11点钟），我让招待打开花的包装，并将它放在一张桌子上的一边。这时，炊事人员和一些脏兮兮的本地主顾一个一个地向花束凑过来，闻着花的芳香，我只能担着心，怒视着他们，别无他法。她出现的主要一场是在监狱。我喜欢契西克夫人，并内心催促她的演出快点结束。终于，在我分神没注意的时候，这一幕结束了，招待人员递上花束，契西克夫人在闭上的幕间接受了献花，在幕布的一条小缝间，弯了弯腰，便没再回来。没有人发现我的爱情，当人们几乎还没有发现花束的时候，我真想向大众表明这种爱，这会对契西克夫人是多么宝贵啊。这时两点已经过去，大家都疲倦了，有些观众早已经离去了，我倒是挺高兴在他们背后扔去玻璃杯。

来自我们公司的监察员、一个基督徒P.跟我在一起。一般来说，我是喜欢他的，现在他却打扰了我。我的担心是花，而不是他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他对剧本的理解并不怎么好，而我却没有时间、兴趣和能力去硬劲地帮助他，他认为也不需要这个帮助。最后，我在他的面前感到羞愧，我没有很好地照应他。他也打扰了我与马克斯的来往，甚至通过回忆提醒我，我过去曾喜欢他，以后还要喜欢他，他对我今天的举止也不会见怪的。

可是不只是我受到干扰。马克斯为他在报纸上的赞许文章而感到有责任。这对由贝尔格曼^[30]陪同的犹太人来说是太迟了。巴尔·科赫巴社团成员因为这出戏剧的名字的缘故已经到场了，而且不得不感到失望。

因为我只是从这戏中认识巴尔·科赫巴的，我也许不这样称这个社团。在大厅的后面，有两个女店员穿着少女的晚装带着自己的情人，她们在演出死去的那一场时被大声呼喊后才不得不安静下来。最终不少人在街上大为恼火地指着那个大场地，说他们从舞台上看到的東西太少了。

舞台上缺少克卢格一家人。——可笑的跑龙套角色。“野蛮的犹太人”，如洛维所说。顺便说一下，出差的人也是得不到报酬的。他们必须做的绝大部分只是隐藏或享受他们的大笑，如果他们一般认为那些事情是不错的话。一个戴着金黄色胡须圆脸蛋的人，在他面前人们几乎会控制不住大笑，他因为那个贴上的颤动的络腮胡子使他的面颊在没有设计的大笑中受到不舒服的限制，因而他在大笑时由于这种不自然而显得特别滑稽。第二个人只是想怎么笑就怎么笑，而且笑了颇长时间。当洛维唱着死的时候，当他转向那两个年纪最大的人的胳膊里的时候，当他应该慢慢地用减弱的歌唱声滑到地上的时候，他们在他的背后将头伸在一起，为躲过观众（如他们认为的）而最后一次地大笑不止。昨天当我在吃午饭时回忆起此事的时候，我还大笑不止哩。

契西克夫人一定要在监狱里拿下探望她的喝醉了的罗马总督（年轻的彼佩斯）的头盔，然后戴到自己的头上。当她取下它的时候，一条压缩着的毛巾掉落了出来，这显然是彼佩斯塞进去的，因为头盔将他的头压得太紧了。尽管他知道，他的头盔要在舞台上被取下来，可是他忘了他的醉态，斥责地看着契西克夫人。

美的地方：如契西克夫人转到了罗马士兵（她当然一开始不得不将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因为他们显然不敢碰她）手下，这个时候，三个人的动作通过他们的担心和技巧，几乎，当然仅仅是几乎，随着歌唱的旋律而动；在这支歌里她宣告了米赛亚的出现，歌声没有停下，只是由于她的威力，竖琴的演奏通过小提琴弓弦的上下运动表现出来；在监狱里，由于经常有脚步声逼近，她因而中断了她悲伤的歌唱，加快地奔向磨盘，一边唱着劳动者的歌，一边转动着磨盘。然后又离开那里唱她原来的歌，一会儿又跑向这个磨盘，就像在睡觉中唱的一样。当帕普斯来看望她时，她的嘴巴张开得就像眯起的眼睛，说得更确切些，她的嘴角在自动启开的时候使人想起眼角。——不管她罩白色的面纱还是罩黑色的面纱都是那么美丽。

重新在她身上看到一些熟悉的动作：手压在不算很好看的紧身围腰的深处，在嘲讽时颤动肩膀和臀部，特别是当她背向被嘲讽的对象时。

她就像一个家庭的母亲，指挥着整个的表演。她给所有的演员暗暗的提示，但自己却从来也不停顿下来；她教那些跑龙套的角色，有时请求他们，如果必要的话，最终还得推他们一把；她要是不在舞台上，那她清亮的声音便是混杂在舞台上的柔弱的合唱声音中了；她守住西班牙墙（这在最后一幕里代表一座城堡），不然跑龙套的演员很可能已将它撞倒十次。

我曾希望用这束花使我对她的爱恋得到些许满足，可是这完全无济于事。这只有通过书信或洞房才是可能的。我不写这个，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或许常常将告诫写下来的好。

11月7日。星期二。昨天演员们和契西克夫人终于离开了。我晚上陪着洛维去咖啡屋，但我却等在外面，不想进去，不想看见契西克夫人。但当我来来去去走动时，我看见她开门和洛维走出来，我迎着他们打招呼，并在车行道上与她相遇。契西克夫人自然是用她那发音漂亮的辞藻来感谢我送的那束鲜花，她也许到现在才知道那束鲜花是我送的。这个撒谎的洛维原来什么也没跟她讲。我为她担心，因为她只穿了一件质地轻薄色泽深的短袖上装，我请她——我也许马上就要触到她，让她——走进咖啡屋，使她不要着凉。不会的，她说，她不会着凉，她有一条方围中，说着便稍稍地举起围巾，让我看，随后将围巾紧紧地围住胸口。我可不能跟她说，我原本不是为她感到担忧的，而只是高兴地找到了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里我可以享受我的爱。因此我又跟她说，我也许是感到担忧。

在这个时间里，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彼佩斯先生也走了出来，这表明，他们不一定去布尔诺，如洛维让我相信的那样，更为确切地说，彼佩斯甚至作出决定去纽伦堡。这也许是最好的事，在那里也许很容易得到一间大厅，那里的犹太居民区也大，接着去莱比锡和柏林也很适意。另外，他们也许整天商量着这些事情。洛维直到四点才睡觉，她也许干脆就等着，这就误了布尔诺七点半那趟的列车。在这种理由下，我们进了酒馆，坐到一张桌子旁。我与契西克夫人正对面。我或许非常喜欢显示自己，这就其本身来说倒是不难的，我要是知道一些列车往来的路线、区别出火车的站头、在纽伦堡和布尔诺之间做出抉择，但首先能盖住彼佩斯的声音那该多好啊。彼佩斯像他演巴尔·科赫巴的表现一样，他十分理智地，即使是没有目的地用喊叫声，用一种非常迅速的、不容打断的、对我来说至少在那个时候是颇为不可理解的、强度适中的废话

来对抗洛维。现在我不去显示自己，我把整个身体沉沉地塞在沙发椅里，一会儿看彼佩斯，一会儿看洛维，只是在这过程中有时候碰上契西克夫人的眼睛，如果她只用一瞥来回答我的说话的话（例如由于彼佩斯激动的缘故，她肯定只会对我微笑），我就会朝别处看去。这不是毫无意义的。在我们之间不可能有关于彼佩斯激动的微笑的。为此，面对她的面孔我是太严肃了，因为这严肃我觉得完全疲倦了。如果我想对什么事情发出大笑的话，我能超越过她的肩膀看到一个胖胖的、在巴尔·科赫巴里饰演总督夫人的女人，但我本来也不是严肃地看她的。这也许就叫我爱上了她。甚至在我后面的完全无辜的彼佩斯一定看出了这一点。这也许真是没有听说过的。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般来说，人们把我看作是18岁的青年，当着萨沃伊咖啡屋里晚上客人们的面，在四周站着的招待员的圈子里，在围坐在桌边的演员面前，向一位30岁的女人——几乎谁都认为她不漂亮，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和一个8岁，她的丈夫就坐在她旁边，而且她还是正派和俭朴的楷模——向这位女子宣说他的爱情，他完全陷入这爱中了——现在这本该比较值得注意的事情来临了，这也许是无人再注意到的事了——立即放弃这个女人，如果她年轻和未婚的话，他自己会那样放弃她吗？我应该感谢呢？或者是，我应该诅咒呢？尽管面对所有的不幸，我还能感觉到爱情，一种非尘世的爱情，当然还是属于尘世的事物。

契西克夫人昨天是美丽的。那双小手天生的、舒服的美，轻巧的指尖的美，扁平的前臂的美，这前臂长在那里显得那么完美，当然那异乎寻常的裸露景象并不让人去想其身体的其余部分。分成两层波浪的、被煤气灯照得光亮的头发。右边的嘴角稍稍有点不光洁的皮肤。她的嘴巴逐渐张开，就像是发出孩童般怨诉似的，上面和下面形成柔和的弯曲，人们在想，这个将语句中元音的光辉扩散出来的、并用舌尖保持住语句纯洁轮廓美丽的构词，能发出空前绝后的清脆声音，并惊叹它的持久不逝。她凹进去的额头显得苍白。我不喜欢我现在才发现的涂抹的粉，但如果这白色、这层浅浅的悬浮在皮肤上的有点儿混浊的奶色面纱是源于脂粉的话，那就应该全都涂上脂粉。她喜欢将两个手指放在右嘴角旁，可能她还把指尖放进嘴里，我并没有清楚地看见这些手指，但这看上去就是那样，就好像她将一根牙签放到被蛀空的牙里，并让它在那里插了一刻钟。

11月8日。我整个下午为工厂的事待在博士（律师）那里。

因为那位姑娘手挽着她情人的手走着，只是因此，她才安详地顾盼四周。

在N.那里的女雇员使我想起一年半之前在巴黎的奥德翁里扮演马内特·萨罗蒙的女演员。至少是在她坐着的时候，一对柔软的、与其说是高耸的还不如说更为宽阔的、被羊毛质地的料子挤压的乳房，一张到嘴部是宽阔的、但又迅速变窄的脸孔。在一种光滑的发式里，自然的髻曲有点儿显不出来了。在强健的身体里表现出热情和安详。这种回忆在我脑子里增强着，正如我现在发现的一样。我还想起，她毫不松劲地工作着（在她的打字机上，键棒如飞——奥利菲尔型号打字机——就如旧时代的毛衣针），走来走去也是如此，在半个小时里几乎不说几句话，就好像她将马内特·萨罗蒙保持在自己的心里。

当我在博士那里等着的时候，我看着这样一位打字的小姐。我在想，乍一看她的脸显得多么沉重啊。特别是那一种互相拉开的、几乎是同样长短披在头上四周的凸起的发型跟看上去极长的笔直的鼻子的关系使人困惑。这位正念着文件中一段文字的姑娘突然转身，她差点发现我在观察她。我在想，我在这位姑娘面前是陌生的，我好像用小手指触了她的裙子一下。

当博士念到协议中一个与我未来可能出现的妻子和可能出现的孩子有关的地方时，我发现我对面的一张桌子外带两把椅子和一把较小些的椅子围着他。当我想我绝不可能让自己、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去坐这些或任意的三张椅子的时候，我从一切的开始得到的便是对那种幸福的如此绝望的渴求。我在这个被激怒的行动里向博士提出在这长时间朗读中我所持有的唯一的问题，这个问题马上暴露出我对这个刚念完的协议中一个较大部分内容的完全误解。

继续告别：我注意着彼佩斯，因为我从他那里感到了压抑，最主要是对他牙齿暗色被穿刺过的末端凹痕。最终我突然有了一半的奇想：“为什么要在—辆列车里走得那么遥远直至纽伦堡的地方呢？”我在问，“为什么不在一个较小的站头去演出一两场呢？”“你认识这样的站头吗？”契西克夫人问，但绝不是那么尖刻，就如我写的一样，她用如此的提问来逼我去看她。她的整个的越过桌子才看得清楚的身体、浑圆的肩膀、后背和胸脯是柔软的，尽管在舞台上穿着欧洲衣服而身体显得瘦骨嶙峋、近乎生硬。我可笑地说出彼尔申这个地方，旁边的当地客人很有理智地说出提泼利兹。契西克先生也许是同意任何一个站头，他只相信小规模

的行动，契西克夫人也一样，但他们缺少互相理解，此外，她向周围打听行程的费用。他们常常这样说：啊，你要是挣到生活费，就足够了。她的女孩用面颊摩擦她的膀子，她肯定没有感觉到。但对成年人来说，就会产生这样幼稚的信念，对孩子来说，在他双亲的身边，即使他们是游荡的演员，绝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而且在世间真正的关心不会挨得那么近的，而是只存在于成年人的面部深处。我很赞同去提泼利兹，因为我可以为他们写一封给P.博士的介绍信，这样，我就可以为契西克夫人效劳了。在彼佩斯持异议的情况下，他自己为三个可能选择的城市做阉，并热忱地主持了这场抓阉，结果是提泼利兹被列为第三。我走到旁边的桌子去，激动地动手写介绍信。我托词告退，我说我必须回家了解一下P.博士的详细地址，这自然是没有必要，而且家里人也不知道这个地址。我发窘地握了一下这位夫人的手，并抚摸了一下她女儿的额头，在这同时洛维却做好了陪我的准备。

11月9日。前天做了梦：大声喧哗的剧院，我一会儿在上面的顶层楼座，一会儿在舞台上。有一位姑娘，我是在几个月前喜欢上的，她也在这里表演，当她可怕地紧依在一个椅背上的时候，她柔软的身体紧缠着。我从顶层楼座向这位女扮男装的姑娘示意，我的陪伴却不喜欢她。有一幕，布景是那样大，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没有舞台，没有观众厅，没有黑暗，没有舞台前沿的脚灯灯光；更多的是所有的观众一大群一大群地出现在场景里，这场景表现了这个旧城市市民的环形路，这大概是从尼克拉斯大街的街口看出来的。尽管人们因此而根本不可能看见市政厅大钟前广场和小环形道，但通过舞台地面短距离的转动与缓慢的摇晃，人们就能够，比如说从金斯基皇宫角度出发，眺望这个小环形路。至于什么地方可能展示全部的舞台布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这个布景已经在如此完美的状况中出现在那里了，也许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布景的某个部分而惋惜流泪，正如我意识到的，这个布景是这整个大地上至今从未见过的最美的舞台布景。照明是由阴暗的秋天的云来调节的，受到遮挡的太阳的光线分散在广场东南角这一扇或那一扇玻璃窗里闪烁。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自然的大小，而不是在最微小的地方去显露的情况下制作的，这就造成了一种逼真的印象。有几扇窗被适度的风吹得张开或关闭，由于房屋高大，人们也许听不到一点儿响声。广场向下倾斜得厉害，路面几乎是黑色的，咖啡色的教堂耸立在适当的地方，在教堂前面却是一座小的皇宫，在它的前院，除了布局在广场上巨大纪念碑旁的某些东西外，一切均是秩序井然地聚集在那里。圣母柱，我本人也从没见过的市政厅前的古井，尼克拉斯教堂前的泉井和一个用厚木板条围

钉成的栅栏，现在人们已经在这里为胡斯纪念碑挖地基。

用形象来表现——人们常常在观众大厅里忘记，那只是以形象来表现的，正如在舞台上和在布景前一样——一个皇家的节日和一次革命。一次那么大的革命，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满广场，这次革命在布拉格大概还从来没有过。人们显然只是因为舞台布景的缘故才将这次革命移至布拉格，它本来是属于巴黎之后的一次革命。人们一开始从这个节目里并看不出什么来，不管怎么说，宫廷成了庆典的场所，就在这个时候，革命爆发了，人民冲进皇宫，我本人也正越过前院那眼泉井的凸起处跑到空旷的地方，回到皇宫对朝廷的人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了。这时，从铁胡同开来的宫廷车队如此迅速疾驶而至，它们不得不在驶进宫廷之前的远处就开始刹车，死死不转了的车轮在石头铺成的路面上滑行。那些车子是在人民庆典和游行的时候见到的那种车子，车上挂着栩栩如生的画像，这些画像是平面的，用花编制的花环围绕着，另外，从车板四周挂下一条彩布遮住了车轮。人们越发明白了这些车子在急驶中引起的恐怖。这些马在驶入之前就受惊了，它们像没有知觉似的在从铁胡同到宫殿的弧形路线上拖着这些车子。正在这时，许多人从我身旁涌向广场，绝大多数是我在街上认识的观众，他们大概是刚刚赶到。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位熟悉的姑娘，但我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身旁走着一位年轻潇洒身穿一件黄褐色小方格双排扣大衣的男子，右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他们走向尼克拉斯大街。从这个时刻起我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席勒在什么地方说过：主要的事情是（或者类似于）将“感情转变成性格”。

11月11日。星期六。昨天整个下午都待在马克斯那里。确定了《丑图之美》的文章的次序。没有良好的感觉。但后来马克斯却是非常地喜欢我，或者在我看来只是因为我后来那么清楚地知道我那微薄的贡献。不，他真是更加喜欢我了。他还想将我的布雷齐亚收入这本书。我心中所有的善良感觉对此进行着抵御。我今天应该与他去布尔诺。我身上所有丑恶和柔弱的东西使我克制着。因为我不能相信我明天真会写出一些好东西来。

一群姑娘穿着工作裙，臀部裹得特别紧。有个姑娘今日上午就在洛维一温特尔伯格公司，在这位姑娘身上，那块只是紧紧系在臀上的围裙的布条并不像往常那样分布得体，而是互相随便地重叠着。她那样的裹法就像是裹在襁褓里的婴孩。就如我往往是无意识地从襁褓中的婴孩那

里得到的那种感觉印象一样，这些孩子就这样被挤压到他们的襁褓中和床上，用带子紧紧地捆上，就如完全为满足一种快乐似的。

爱迪生在一次美国记者招待会上叙述了他穿过波希米亚的旅行。按他的看法，波希米亚在某种程度上较高的发展（在城市近郊有宽阔的街道，房子前面有小花园，在乡村公路上行驶，人们会看到不少正在建设中的工厂）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即捷克人大量地涌向美国，从那里归来的某些捷克人又从那里带回来新的追求。

不管怎样，一旦我认识到，我肯定要去消除那些弊端的（例如我已婚的妹妹从外表看过的是满意的生活，但在我看来却是没有慰藉的生活），我对这些弊端不会听之任之，在一瞬间里，我便失去了手臂肌肉的感觉。

我将试图逐渐地把我心中所有的确凿无疑的东西，稍后把值得相信的东西，再后把可能的东西等等汇集起来。无可怀疑的是我身上的那种对书籍的欲求，倒不是真正想占有或阅读这些书籍，更多的是想见到它们，在一个书商陈列的书籍中让我相信这些书籍的库存。如果在什么地方出现同一本书的许多样本，那么，这每一种样本都会令我高兴不已。这种欲求就好像是从胃里产生的，这种欲求就好像是被引入歧途的食欲。我占有的那些书籍很少令我高兴，相反，我姐妹们的书籍却使我兴奋。占有书籍的渴望是一个无法比拟的较小的欲望，这几乎是一种错误。

11月12日。星期日。昨天里彻平演讲会：鲁道尔菲奴姆的《拿破仑传奇》。大厅显得颇空。就如考验演讲人的举止一样，在从进口的小门到演讲桌子的路上放置了一架大钢琴。做演讲的人走进来瞥了一下听众，想从最短的路走到他的桌边，因此先走向近处的钢琴，他大吃一惊，立即往回走，并轻轻地绕开这架钢琴，也不再朝听众看去。他在结束演说的兴奋和热烈的掌声中，自然早就忘了这架钢琴，因为在演说的时候人们不再注意它了。他想尽可能地推迟些时间将背转向听众，他将双手放在胸前，并向一旁显得有教养地踱了几步，当然也稍稍地碰到了钢琴，他要再走向无阻无碍的地方，那他就必须踮起脚尖微微躬起背部。里彻平至少是这样做了。

他是一位强壮高大有腰身的50岁的人。死板的在四周围形成漩涡的发式（如道得兹）不是被破坏了，而是颇为牢固地压在头顶上。像在所

有上了年纪的南方人那里看到的一样，他们有一只肥大的鼻子和一副他们独有的宽而有皱纹的面孔，从他们的鼻孔能掀出一股强大的风，就像马嘴里喷出的气息。面对他们，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不再是必须超越、但还会长时间继续下去的他们面孔的最终状态。他的脸孔也使我想起在一撮当然很自然长出来的胡须后面一位年老的意大利女人的面孔。

在他的后面升高着的音乐指挥台新涂上的浅灰色一开始就让人迷惑。白色的毛发牢牢地贴在这种颜色上，让人看不出轮廓来。当他回过头低下去的时候，颜色便动起来了，他的脑袋几乎沉浸在这颜色里。刚到演讲的中间，当注意力完全集中的时候，骚扰停止了，特别是当他在朗诵时那穿着黑色衣服的高大身躯站立起来并用晃动的双手引出诗句并驱散这浅灰颜色的时候。——开始，他觉得尴尬，他那么使劲地朝各个方向鞠躬。在讲述一位他现在还认识的、身上有57处伤口的拿破仑士兵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家伙上身那多种多样的颜色，只有彩色画派的大家如他在场的朋友穆夏才能模仿的。

我注意到，他怀着激动的步子走过我身旁，穿越过人群走向讲台。我不去想我的痛苦和担心。我挤进我坐的靠背椅的左角，自然是挤进去听演讲，交叉的双手放在双膝之间。我感觉到了里彻平对我的影响，肯定就像大卫国王将一位年轻的姑娘放到床上那样感觉到的影响。我甚至有着拿破仑那样一种轻松的幻象，他也是在一种同情的幻想中从进口的小门走出来的，不管他可能是从讲台的木板那里，或可能是从管风琴那里走出来。他压倒了在这一时刻密密麻麻挤满人的整个大厅。我真的离他非常近，我曾经，也许确实从没有怀疑过他的影响。我许是注意到他走近时的每一处可笑的地方，就像在里彻平身上也一样，但这样的观察不打破我该多好啊。我作为孩子对此是多么冷淡啊！我常常希望，我站立在皇帝的对面，向他指出他的无效应性。而这不是勇敢，只是冷淡。

他朗诵诗歌就如在法庭上演讲。他敲击在桌子上就像是战场上无力的旁观者，他挥动伸长的胳膊，让卫兵穿过大厅中央作一通道，“皇帝！”他只是以高举的、变成了旗帜的手臂喊道，他得到的是一种重复的生硬的回响，这回响穿过下面呼喊着的人群。在描绘一个战役场面时，一只小脚不知在什么地方踩踏了一下地面，人们跟踪而视，那原来是他的脚，这只脚极少有这样的胆量。但这并没有干扰他。——在朗诵《步兵》时，他用吉拉德·德·内瓦尔的译文朗诵，并特别为此感到自豪，但掌声极少。

在他年轻的时候，拿破仑的坟墓每年打开一次，伤员排着队被领着走过这里，他们看到了那张涂有防腐剂的面孔。看上一眼，与其说是崇敬，还不如说是恐惧，因为这张脸发出了难闻的气味，而且变绿了。后来虽然打开坟墓的做法取消了，但里彻平还在他的叔祖父的膀臂上见到过这张脸，他的叔祖父在非洲服过役，而且，指挥官专门让人为他打开过那座坟墓。

他早就提前宣告过，他要朗诵一首诗（他有着一种可靠的记忆，在极为激动的时刻，这种记忆就肯定会出现），他评论这首诗，将要朗诵的诗句在这些讲话中已经造成了一阵小小的地震。在朗诵第一首诗的时候，他甚至说，他要用他全部的火来朗诵这首诗，事实真是这样。

在朗诵最后一首诗之后，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昂了，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些诗句（维克多·雨果的诗句）。他慢慢地站起身来，按着诗句的韵律再也坐不下来了。他用他散文般的最后的威力来接受和保持这种伟大的诗歌朗诵运动。他在结束的时候发誓，即使在千年之后，他尸体的每粒尘埃如果有知觉的话，他将准备追随拿破仑的呼唤。

他用那迅速的连续不断的吐气连着短促的呼吸说道，法语本身会坚持住这种天真的即兴演说，永远也不会被撕碎，他谈到那些美化日常生活的诗人，谈论他的如一个诗人幻想的幻想（闭着眼睛），谈论他的若一个诗人的幻觉的幻觉（勉强地向着遥远处睁开眼）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时候也闭上眼睛，然后慢慢地睁开，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伸出来。——他服过兵役，他叔叔在非洲，他的祖父在拿破仑的麾下，他甚至还唱了两句战争的歌词。——11月12日。我今天获悉，这个家伙62岁。

11月14日。星期二。昨日在马克斯那里。他从布尔诺演讲回来。

下午睡着了。包住没有疼痛的脑瓜的坚固的脑壳好像深深地钻到里面去了，而且在光和肌肉的自由游戏中将大脑的一部分留在了外面。

在一个寒冷的笼罩着黄色光线的秋天的早晨醒来。穿过几乎是关着的窗户，看见有人在倒下之前还在玻璃窗前滑动，那人摊开双臂，拱起腹部，蜷缩起双腿，就像古时候扑在船上前舱的形象。

做未婚男子看来如此令人厌烦。作为老年人在沉重地维护尊严之下请求接纳进一个与大家共度时光的晚间聚会，他手里拿着吃的东西回到家中，不能以平静的自信懒洋洋地去期待任何人的来访，只能将疲倦或不愉快赠送给每个人。在家门前告别的时候，绝不能与他夫人挤上楼梯。要是病了，要是他能从躺着的地方坐起来的话，他只有从他的窗户向远处眺望中得到慰藉。在他的房间里只有边门，它们通往陌生的房屋，难免要对他的亲戚感觉陌生。跟这些亲戚也只能通过婚姻的方式来保持亲密的关系，首先是通过他双亲的结合，然后，如果这种结合的作用消逝了，就肯定要让自己的、他人的孩子惊叹，一定不要重蹈覆辙：我没有家庭，一个人是成不了家庭的，永远有一种没有变化的年龄感，按照在我们年轻时回忆中的一个或两个单身汉形象来在外表和举止里完善自己。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人们容易在这当中犯这样的错误，就是非常竭力地为自己扩大未来的苦难。目光必须要远远地超越这种苦难，而且不再回头，实际上人们在今天和以后都是独立的，只要有着一个躯体，一个真正的脑袋。当然也得有一个好用手去支撑的额头。

现在试为《理查德和萨穆埃尔》的导言打草稿。

11月15日。昨天晚上我带着一种预感拉过床上的被子，躺了下来，我又明白了我所有的能力，就好像我将它们攥在手中似的；它们紧绷在我的胸口上，它们燃烧着我的脑袋。有一小会儿，我安慰自己不要为了工作而起来，我重复着：“这不会健康的，这不会健康的。”而且想用几乎是比较清晰的意图让睡眠掠过我的脑海。我总想着一顶带檐的帽子，为保护自己，我要用强有力的手将这顶帽子压在我的额头上。我昨天到底失去了多少啊，血液是怎样蜷缩在狭窄的脑子里的，我对所有的事都有能力，只是为力量所阻挠，这种力量对我单纯的生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在这里却浪费掉了。

肯定的是，所有我预先在良好感觉中一个字一个字或甚至于只是顺便地、但用强调的语句杜撰出来的事情，一到写字桌上试图写下来的时候，就变得干巴巴、颠三倒四、僵化、谨小慎微，使整盘受到妨碍，最终看上去漏洞百出，尽管关于最初的杜撰什么也没被忘掉。当然这大部分在于，我在起义的时代没有用纸杜撰那些好东西。我渴求起义，尽管我很渴求，但更多的却是害怕，后来成果是极其丰富的，但我又不得不放弃。我只是按照偶然的事件，又不假思索地从这河流里取出来，自然是信手取来，可是这些获取的东西在经过斟字酌句写下来的时候跟过去

的丰富成果一比就什么也没有了。这获取来的东西只在丰富的成果里才是活生生的，我没有能力将这丰富的成果拿出来，因此，这种截取的办法是不好的，而且被扰乱了，因为它的诱惑力没有任何用处了。

11月16日。今日中午入睡，我怎么也入睡不了，一个蜡制的女人的上身压着我。她的脸孔在我的脸孔上方向后弯过去，她的左下臂压着我的胸口。

三夜没有入睡，在想做一点儿事情的最小的尝试中，我的力气马上就耗尽了。

从一本旧笔记里读到：“现在是晚上，在我从6点不到的时刻起学习好了之后，我注意到，我的左手怎样在片刻的时间里出于同情而用手指抓住右手。”^[32]

11月18日。昨日在工厂。乘电车回，坐在一个角落，伸着双腿，看着外面的人，商店点亮的广告灯，可通行的高架桥围墙，不时出现的后背和面孔，从近郊商业街引出的一条公路上没有什么人类的设施，只是赶回家的人在行走，火车站地段那种剪切一样的、印入暗处的电灯光，一家煤气工厂的不高的、完全翻修一新的烟囱，一则关于德·特雷维尔女歌星巡回演出的广告，这广告占据了一直延伸到公墓附近的一条街道，从这个地方开始，我又从田园的寒意回到城市住宅里的一般的温暖。人们将陌生的城市当作事实来忍受，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看不透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如我们不能看透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们一定要作比较的话，那他就不能保护住自己。但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没有道德上的，甚至也没有心理上的价值，最终人们也常常可以放弃这种比较，因为太大的生活条件的差异不让我们去作这样的比较。

我们故乡城市的近郊对我们来说虽然也是陌生的，但这里却值得去比较一番。半个小时的散步路程向我们一再地证明，这里生活着的人一部分在我们的城里，一部分在可怜的、阴暗的、像一座大山隘布满皱褶的边缘，尽管他们都有一个那么大的共同利益的圈子，而一般在城市之外的人群里却没有。因此，当我踏上城郊的时候，总是带着那种恐惧、孤独、同情、好奇、骄傲、旅行的欢乐、男子的气概混在一起的感觉，而回来的时候，特别是从契兹科夫回来的时候，却是满怀喜悦、严肃和沉静。

11月19日。星期天。梦：在剧院。上演施尼茨勒的《广袤的土地》，由乌蒂茨[33]改编。我坐在完全靠前的长凳上，我以为是第一条长凳，可是最后才发现，那是第二条长凳。长凳的靠背却与舞台相背，这样，看观众大厅倒是方便，可是看舞台就只能转过身去了。作者就在附近，我无法克制我对这部显然已经知道的戏剧的不好的评论，但要补充一下，第三幕应该是诙谐的。关于这个“应该”，我想再说几句，如果说一些好的地方，我不熟悉这个剧本，因而不得不靠听来的说法。为此，我再一次重复一下这个说明，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我，可是也并不被他人所注意。在我的四周是一大群拥挤的人群，他们好像全都是穿着冬天的服装来的，因而将这些场所挤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我并没向旁边的人、后面的人看一眼，他们却朝着我说话，向我指着那些新来到的人，说出一连串的名字。我特别被拥挤着穿过椅子空隙的一对夫妇吸引住了，因为这位夫人有着一个深黄的、男人一样的鼻子，此外，她穿的是男人的衣服，人们不论多远都能在拥挤的人群里看到高出人一头的这位夫人。在我旁边站着的是不引人注目的演员洛维，似是而非，而且做了激动的讲话。在讲话中“原理”这个词重复出现，我不断期待着“比较点”这个词的出现，但却没出现。在一个二等包厢里，实际就是在顶层楼座的一个角落，里面站着的是基施家的一位三儿子，后面一位坐着的是母亲，他正向着剧场讲话，穿着一件漂亮的皇帝服装，两侧是张开的。洛维的讲话与这个讲话有关系。此外，基施出现在高高幕布上面的一个地方，并说道，这里坐着的是德意志的基施，他指的这个人是我的同学[34]，学过德国语言文学。

舞台要比观众大厅深一些。朝下一看，人们将下巴搁在椅背上。布景主要布置在舞台中央的两根短而粗的柱子之间。一次请客的宴会出现了，参加的有姑娘们和年轻的男子。令我少见的是，那些留下来的姑娘们用平平的、绝大多数是蓝色的、在整个长椅的上方移来移去的大帽子遮住了视线。因为尽管随着演出开始，坐在第一排长椅上的许多人都离开了座位，显然是去舞台的后面了。可是我特别清楚地看到了舞台上一个10岁到15岁的小家伙。他的头发干燥，剪了个直分的发型。他甚至连正确地将餐巾放在他的上臂上都不知道，他不得不因此而朝下面看去，在这出戏里他应该演一个花花公子。通过这种观察，我对这出戏不再有信心。舞台上的宴会期望着新来者，他们是从第一排观众行列里来到台上的。这出戏也没有很好地排练过。这时，正好来了一位女演员哈克尔伯格，一位男演员倚在圈椅里，很善交际地用“哈克尔——”向她打招呼，他现在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并作了纠正。现在又来了一位姑娘，我

认识她（我相信，她叫弗兰克尔），她正从我的位子旁边跨越椅背，她的后背完全裸露，皮肤很不清洁，右胯上部甚至出现被抓破的血痕，有门把手那么大小。但后来，当她转向舞台以纯洁的面孔出现的时候，她演得非常好。这时，一位唱着歌的骑士骑着马从远处急驶而来，一架钢琴模仿着马蹄的声音，人们听到越来越近的狂热的歌唱。最后，我也看到了这位唱歌的人，他为了给这歌声造成一种自然的匆匆而近的感觉，从上面沿着顶层楼座跑向舞台。他还没有到达舞台，也还没有将歌唱完，他在匆促的速度和喊叫的歌声里却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钢琴也无法更为清晰地模仿出撞击在石头上的马蹄声来了。因此这两者都停止了，歌唱者平静地唱着走来，他只是将自己装扮得那么矮小，唯有他的脑袋露出顶层楼座的护栏，让人们不那么清楚地看着他。

随着第一幕结束，幕布还没有落下，而且整个剧场还是黑洞洞的。在舞台上两个评论者坐在地上，背靠着布景并在写着什么。一位戏剧顾问或者是导演有着一口金黄色的尖胡须，他跳上舞台，迅速地伸出一只手做一个指示，另一只手上有一粒葡萄，那是早先放在宴会桌上的果盘里的，他这时将它放进嘴里去了。

我又转向观众大厅，看见它用一只简单的煤油灯笼照明，就像街道上伸出去的枝形路灯，当然现在显得非常暗淡。突然，是不纯净的煤油，或者是有毛病的灯芯引起的，灯火从这个灯笼里冒出来，火星大片地溅落在观众群里。他们还弄不清眼前是怎么回事，就变成了黑土地般的一群。这时从这群人里站出来一位先生，愣头愣脑地走向靠近他们的灯笼，显然想办好这件事。他先朝上看着灯笼，就这样挨着它站了一会儿，而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时，他又安静地走回他的位子，沉沉地坐了下去。我跟他换了个位置，将面孔朝向黑洞洞的地方。

我和马克斯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是那样地欣赏他的文字，如果这些文字作为对我的参与和每一个其他的人来说都是难以达到的全部东西放在我面前的话，那么，每一个他为《理查德和萨穆埃尔》写的字句都得跟我这方面做出的违心的让步有关系。就是今天也仍然有不少有关写书方面的小的争论。我对这种让步从内心深处感到痛苦，至少今天就是这样。

今天晚上，我的内心又充满忧心忡忡的被抑制的能力。

11月20日。一幅图画之梦，好像是英格雷斯的画。姑娘们在森林里

在上千面的镜子里，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年轻的妇女……相似地分成一群一群的，轻盈地牵拉着，像在剧院的戏幕前面。在图画的右边，一组女郎较为紧密地待在一起，朝左面坐着，或躺在一根巨大的树枝上，或躺在一根飘着的带子上，或以自己的力量在一个正向着天空慢慢腾升的链环上飘动着。这时，她们不仅对着观众映照自己，而且还离他们而去，变得朦朦胧胧，反复显现；眼睛在细小的地方失去的东西，在丰富中得到了。但在前面站着的是一位没有受到镜像影响的裸体姑娘，她支撑着一条腿，臀部显得突出。这里，英格雷斯的绘画艺术应该得到赞赏，只是本来带着快乐情绪的我感觉到，太多的真实的裸露对触摸这位姑娘的感觉来说也是多余的。从一处被她遮盖住的地方闪出一道浅淡的黄白色的光线。

我肯定讨厌反命题。反命题虽然来得突然，但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它存在于非常近的地方；如果它是无意识的话，那么，它只是处于极边缘的地方。它虽然产生出透彻性、丰富性、完美性，但唯是如此才像活车轮[35]中的一个形象。我们在圈子里来回地追逐我们的小小的突发的奇想，不管它可能是多么地不同，是多么不细致入微，就像被水浸泡得膨胀起来一样。它在一个人的手下扩展着，开始希望到没有限制的地方，最终却是较为适中的、总是同样大小的范围。它自己往回滚动着，是不能伸展的。它提供一个依据，它是木头里的洞穴，是静止的冲锋前进，就如我指出过的一样，它把反命题拉到自己身上来。但愿它只是把一切都拉到自己的身上，而且是永远的。

为这剧本准备的：英语教师魏斯，他有一副挺括的肩膀，双手有力地插在口袋里，穿件褶折绷得颇紧的淡黄色上装。有一天晚上他在文策尔广场越过车行道，踏着矫健的步子，刚刚赶上原来还停着的而已经响起铃声的电车，离开了我们。

E.安娜！

A.抬头望着：嗯。

E.来一下。

A.迈着稳重大步：你想说什么？

E.我想跟你说，这些时间里我对你不满意。

A.可是.....

E.就是这样。

A.那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呀，埃米尔。

E.就那么快？你竟不问问原因？

A.我认识她。

E.是这样吗？

A.这吃的不合你胃口。

E.很快站起来，大声地：你知道吗，库尔特今天晚上走，或者，你不知道这件事？

A.内心迷惑地：知道啊，可惜他走了，所以你肯定不会叫我过来了。

11月21日。我从前孩童时代的保姆，今天在短短的时间里第二次到我们这里，是为来看我。她的脸是深黄色的，鼻端棱角分明，面颊上还有一颗我当时非常喜欢的痣。第一次她来时，我不在家，这一次她来时，我想休息一下，睡一觉，便佯装不在家。她为什么将我教得这样坏，我可是听话的，她现在当然在前屋跟厨娘和女仆说着我性情安静、顺从。她为什么不利用我这些，为我准备一个较好的未来？她是已婚的女人，或者寡妇，她有孩子，她能说会道，使我无法入睡。她想，我是28岁的美好年华的健壮的大男子汉，很喜欢回忆我的年轻时代，而且知道究竟什么才对我有用。可是我现在就躺在这里的长沙发上，一脚踏在世界之外，正好适合睡觉，睡意不想来，如果它来了，也只是擦身而过，我由于疲惫而感到关节疼痛，我干瘦的身体由于激动而颤抖，我不能清楚地知道这激动的原因，脑子里在惊异地闪动。这个时候有三位妇女站在我的门前，一个称赞我过去是怎样怎样，两个称赞我现在如何如何。厨娘说，她认为：我会同样地不用走什么弯路就到天堂了。原来是这样。

洛维：犹太教法典里的一位拉比有着在这种情况下非常虔诚的原则，即不从每个人那里接受任何东西，甚至是一杯水。但现在碰到的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拉比想结识他，并请他吃饭。要拒绝这样一个

人物的邀请，那是不可能的。第一位拉比因而沮丧地上了路。可是因为他的原则是如此强而有力，一座山移在了这两位拉比之间。

安娜坐在桌边读报纸。

卡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走到窗户那里就站住了，并朝外看，他甚至一下子打开了内窗。

安娜：请把窗户关上，外面都结冰了。

卡尔关上窗户：我们正好有着不同的忧虑。

11月22日。安娜：你可是染上了一个坏习惯，埃米尔，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习惯。你能把每件小事都联起来，并用它来帮忙在我身上寻找不好的性格。

卡尔摩擦着手指：因为你不体贴人，因为你根本不可理解。

肯定的是，我身体的状况构成我前进的一个主要阻碍。有了这样一个身体，什么目的也达不到。我将不得不习惯它那接连不断的失败。从最近那些乱做梦、但几乎没有一瞬能连续入睡的夜晚以来，我今天很早就这么没有连贯性，除了额头，其他什么也没感觉到。看到一种半途忍受的状况远远地超出了眼前的情形，我宁愿一下子在喧闹的死亡准备面前手里拿着文卷蜷缩在走廊的水泥板上。我的身躯对它的虚弱来说是太长了，它没有哪怕将够产生一种大有裨益的热量的脂肪来维持体内的火势，它没有脂肪，思想能从脂肪那里得到营养去满足日常之必需而不伤害整体。孱弱的心脏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常常刺痛我，它怎么能将血液推向这么长的双腿呢？膝盖也许承担了不少的工作，它只是用老态龙钟的力量灌进冰凉的下肢。但现今上面又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我等待着，这时下面也分散了一些精力。由于身体的长度，一切都被拽得支离破碎。这个时候，它能做什么呢？因为它也许为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拥有太少力量，即使它倾其所有。

从洛维给他父亲的信中摘出：如果我来华沙，我将穿着我的欧洲服装在你们当中走来走去，“就像眼前的一只蜘蛛，就像新婚夫妇群中的悲伤者”。

洛维叙说一位结了婚的朋友，他生活在波斯汀，是华沙附近的一个

小城，他在他进步的志趣里感到孤独，因而觉得不幸。“波斯汀，它是个大城市吗？”——“这么大。”他向我伸出张开的手。这手上戴着一只粗糙的黄褐色手套，介绍着一处荒凉的地方。

11月23日。21日，克莱斯特逝世一百周年的那天，克莱斯特家人在他的墓地上放了一个花圈，上面写道：“献给他们家族的最优秀者。”

我以我的生活方式将依赖于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今天晚上要比过去一个星期睡得好一些，今天下午甚至更好，我甚至有一种昏昏欲睡之感，接着便是在中等水平上的入睡，因此我担心，好好写作的机会会少些了。我感觉到，某种能力较深地打进了体内，我为所有惊奇的事做着准备，这就是说，我已经看见了它们。

11月24日。《施希特》（这是一个学习屠宰技艺的人），戈尔汀的剧本。里面有犹太教经典的语录，例如：

如果一位大学者在晚上或在夜里犯了罪过，这样，人们不可在早晨去谴责他，因为以他丰富的学识，他肯定已经深感后悔。

如果有人偷了一头牛，那么他必须偿还两头；如果有人屠宰了那只偷来的牛，那么他必须偿还四头牛；但如果有人屠宰了一头牛犊，那么他只需偿还三头牛。因为人们认为，他一定要将这头牛犊牵走，那他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这种看法也决定如下的惩罚，如果有人将这头牛犊不费吹灰之力就弄走了的话。

正派的坏思想。昨天晚上我感到特别的痛苦。我的胃又变坏了，我吃力地写东西。在咖啡屋（这里开始很安静，肯定是我们所珍惜的，但后来变得热闹起来，让我们无法安静）我努力地听了洛维的朗诵，我的可悲的下一个未来在我看来，不值得进入它的境界，我孤零零地穿过斐迪南大街。这个时候，在贝尔格斯坦的出口处，想到较后的未来的思想又出现于我的脑际。我这个从一个废物间里拽出来的躯体怎能承担这个思想呢？在犹太教经典里也说道：一个男人没有女人不是一个人。面对这样的思想，在这个晚上我无所他求，而是对自己说道：“现在你们来吧，坏思想。现在，因为我是虚弱的，而且胃也坏了，正好你们现在自己去深思熟虑。你们的目的是在于那些使你们感到愉快的事情。你们害羞了，再来另一次，如果我更为有力的话，不要这样利用我的处境。”而事实上，也不用期待其他的证明，他们就退缩了，慢慢地散开了，而且在我继续的、当然是不过分的幸福的散步中再也不打扰我了。但他们显然忘了，如果他们尊重我所有不好状况的话，他们很少会轮上的。

由于从剧院开过来的一辆汽车的汽油味，我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了。朝我的方向走过来的剧院观众显得多清晰啊。他们最后用几个动作将他们的大衣和挂在身上的望远镜整整，一种美好的家庭生活在等待着（虽然它只是由一支烛光照耀着，可是在睡觉前如此是很不错的），不论他们从剧场回家显得多机灵，但终是居次要地位的人物。戏幕在他们面前最后落下，所有的门已经在他们后面打开，他们在开始之前或在第一幕的时候曾通过这些门，由于某种可笑的担心而傲慢地进场。

11月25日。整个下午在咖啡城说服M.在一项声明上签字。他只是我们这里的店员，也就是说不必进行保险，而且父亲也许没有义务为他的保险增补一大笔钱。他答应我，星期一将这份声明寄到公司。我用一口流利的捷克语讲话，我有修养地请求原谅，特别是我的错误。我从他那里感觉到，如果不是可爱的话，那么就是可敬。但到了星期一他什么也没寄来，而且他也不在布拉格，而是溜之大吉了。

晚上无神地待在鲍姆那里，没有马克斯。朗诵《丑恶的东西》，是一个没有整理好的故事，第一章更多的是一个故事的大本营。

11月26日。上午和下午，直至5点，与马克斯弄《理查德和萨穆埃尔》。后来去N.那里，他是林茨的一位收藏家，是库宾介绍的，50岁，长得非常高大，有如钟塔一般的动作。他如果较长时间沉默不语的话，别人就低下了头，因为他完全沉默，同时，他说着话的时候又不完全地在说话，他的生活由搜集和性交组成。

搜集：他是从搜集邮票开始的，转而搜集版画刻印艺术品，后来什么都搜集，最后他看到这些从来没有整理好的收藏没有什么用处，他便只收藏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稍后又收藏下奥地利州和南巴伐利亚的徒步朝圣者们的纪念章和图片。这些纪念章和图片分别按每次的朝圣重新整理，从资料和艺术角度来说，绝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但它们常常包含着一些令人愉快的描述。他现在开始努力发表这些东西，而且，他是第一次对这些东西、对它们的系统化确立自己的观点。自然，以前收藏这些东西的收藏家们很恼火，他们疏忽了发表这些东西，但后来也不得不表示满意。现在他已经是公认的有关朝圣纪念章方面的行家，鉴定和评估这类纪念章的请求来自各个地方，他的话真是一锤定音。此外，他还收集别的东西，一条少女的腰带是他的骄傲。这条腰带，还有他收集的所有的护身符，已在德累斯顿的卫生保健展览会上展出（他现在正在那里，并已将所有的展品打包托运）。还有一柄漂亮的法尔肯斯坦人的

骑士宝剑。他是以一种不怎么样的、只是通过收藏才明白的态度来对待艺术的。

他从格拉夫饭店的咖啡厅将我们领往他的炉火烧得过热的房间里。他坐在床上，我们围着他坐在两张椅子上，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宁静的聚会。他第一个问题是：“您是收藏家吗？”“不，只是个可怜的爱好者。”“这没关系。”他抽出皮夹子，有点拘谨地向我扔来藏书票，有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其中有一张他最近写的一本叫《石头王国的魔幻与迷信》书的说明。他已经写了不少东西，特别是关于“艺术中的母性”，他认为怀孕的身体是最美的身体，它对他来说也是最适意的……他还写了有关护身符的文章。他在维也纳的一些博物馆里也有一席之地，他领导过地处多瑙河河口的布赖拉的挖掘工作，发明了一种以他命名的捆绑出土花瓶的工艺。他是13家学者团体和博物馆的成员，他已经将他的收藏品赠送给纽伦堡的博物馆，他在写字桌边常常坐到夜里一两点钟，早晨8点又坐到了那里。他让我们一定要在一位女友的题词留念册里写些什么。他将这本纪念册带在身边上路，就是为把它写满。马克斯写了一节复杂的诗句，N.先生欲将它译为一句成语：“雨过天晴”。在这之前他用生硬的嗓音朗诵了一下。我写的是“小小的灵魂在舞蹈中跳跃”，等等。

他又念上了，我帮助他念，最后他说：“是一种波斯的旋律？这究竟怎么说呢？是加泽拉诗体[36]？不是？”这时，我们不能表示同意，而他认为是什么，我们也猜不出来。最后他引了吕克特的三行节诗体[37]。是呀，他认为就是三行节诗体。这当然也不是。好吧，不过它有某种动听的乐音。

他是哈尔贝的朋友，他喜欢谈论哈尔贝，我们却更愿意谈布莱。关于布莱却聊得不多，他在慕尼黑文学界由于文学上的伤风败俗而受到蔑视，他的妻子是牙医，有一个受欢迎的艺术室，并养活他，她已经和他离婚。他的女儿16岁，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是慕尼黑最任性的女郎。在施特恩海姆的《裤子》里——N.与哈尔贝在剧院里——布莱饰演一位逐渐衰老的追求享乐的人。当第二天N.碰上他的时候，N.说道：“博士先生，您昨天演的是布莱博士。”“怎么？怎么？”他发窘了，“我演的是那位，是那位呀。”——在离开的时候他还调整了一下炉火。

摘自犹太教经典：如果一位学者去相亲，他就应该带上一个未受教

育的男人，因为他太沉浸于他的学问了，他也许注意不到重要的东西。

围绕着华沙的电话线和电报线通过贿赂延伸成为一个完整的圈子，在犹太法典的意义上说，这个圈子从城市构成了一个确定了界线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大院，这样，也使得这位最虔诚的人星期六能够在这个圈子里活动，将一些小东西（如手帕）带在身边。

在卡西迪姆^[38]的社会，他们愉快地谈论着犹太教经典里的问题。议论要么停下来，要么有人不参加，要么用歌声来做补偿。旋律是随便产生的，听起来是一种调子，家庭成员也被叫进来，和他们一起温习和讨论。一位神奇的拉比，他常常产生幻觉，在一次这样的议论中，他突然将面孔埋在放于桌上的胳膊中，在这样的沉默中保持了3个小时。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哭了，并演唱了一支全新的有趣的军队进行曲。这就是死神陪一位在一个遥远的俄国城市于这个时候刚刚死去的神奇拉比去天堂时用的旋律。

按照犹太教的神秘教义，虔诚的教徒在星期五都得到一个全新的、完全是上天的、比较温顺的灵魂，它在他们身上一直逗留到星期六的晚上。

在星期五的晚上，庙宇的两位天使陪每一位虔诚的教徒回家；家里的主人站在游戏室里欢迎这两位天使；天使只作短时间的滞留。

教育姑娘们，她们成长的现实，对世界法则的适应，对我来说总是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以后，她们不会再那么没有希望地避开一个只是匆匆认识她们并很想匆匆与她们交谈的人，他们已经在那里稍稍停立一会儿，尽管那儿并不是房间的处所。在这种地方，人们想拥有她们，不必再用目光、威胁或爱情的力量去抓住她们；如果她们转过身去，也是慢慢地做着这些动作。她们不想因此伤害感情，于是她们越来越稳得住。人们跟她们说什么话，一句也丢不了，她们倾听着整个问题，人们不必急急匆匆，她们回答提出的问题非常清楚，还很风趣。是啊，她们发问时甚至自动地仰起脸，一次小小的交谈对她们来说不是不堪忍受的。她们在刚刚工作的时候是不会让一个旁观者打断的，而且很少顾及那位旁观者，但他尽可以较长时间地看着她们，只有穿衣服时她们才隐退出来。这是少有的时刻，在这一刻人们可能心神不定。此外，人们可一定不要满街乱跑，在家门口截取或等待一种偶然的幸福，尽管人们已经知道，他并没有能力强迫那种幸福。

尽管这些重大的变化随她们一起发生，但那些事却并不少见，就是她们在一次不期而遇时带着一种悲伤的表情朝我们走来，将摊开的手放在我们的手上，以缓慢的动作，像一个有业务往来的朋友似的，邀请我们进入住宅。她们在隔壁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迈着沉重的步子；但当我们进入到那里，她们一方面出于渴求，另一方面出于固执，便蹲在窗龛[39]里读起报来，绝不看我们一眼。

11月30日。在三天的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写成。

12月3日。我现在读了舍费尔的《卡尔·施陶费尔的人生历程·热情编年史》中的一段，被那种伟大的、只是在这个时刻钻进我被谛听的内心的印象弄得那么拘束与着迷。正在这个时候，我被腐蚀的胃强加给我的饥饿和自由的星期日那种通常的激动驱使得如此之远，使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写东西，就像人们在遇到外来的、即由外部事物强加的激动的时候只能通过严格控制用手臂来自助一样。

未婚男子的不幸对周围的世界来说，不管是表面上的或者是事实上的，都是那么容易被言中，使得他无论如何也要去诅咒他的决定，如果他出于对秘密的乐趣而成为未婚男子的话。他出外四处走动时，虽然穿着扣得好好的上衣，双手插在高高的上衣口袋里，双肘显得尖尖的，帽子深深地遮着脸，一种虚假的、生来就有的微笑应该是保护嘴巴的，就像夹鼻眼镜保护眼睛一样，裤子较瘦，显出细腿的美来。但每个人都知道，在他的周围是怎样的状况啊，他可以承受他受到的无数痛苦。他从内心深处感到冷漠，他用他那双重面孔更为悲哀的另一面朝这内心深处看去。他不停地迁居，期待着合法性。他与那些活着的人离开得越远，对他来说感到足够的空间也就越小。最可恶的嘲弄就是，他还必须如一个有意识的、但又不能将他的意识表达出来的奴隶一样为那些活着的人工作。而另外一些人，不论他们一生躺在病床上，还是不得不被死神打倒，也不论由于自己的衰落而早已倒下很长时间，他们却可以向他们可爱的健康的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亲戚求助。他，这位未婚男子，显然是由于自己的意志而安于生活中的这个越来越小的空间，他死了，棺材对他正合适。

我最近向我的姐妹朗诵默里克的自传，开头就已经不错，继续下去就更好，而最终，我重叠着指尖，用平静的声音压制着体内的阻碍，为我的嗓子创造一种越来越广阔的前景。最终，围绕在我的整个房间里的，除了我的声音之外，什么也容纳不下了。直到后来下班回来的双亲

按门铃为止。

入睡之前，我感觉到了我身躯上轻飘飘的胳膊之下拳头的重量。

12月8日。星期五，长久不写东西了，只是这一次差不多是由于满意的缘故，因为我自己结束了《理查德和萨穆埃尔》的第一章，我特别认为，在车厢中睡觉的开头描写是成功的。还有，我相信，有什么东西在我这里形成，这东西与那种席勒式的将冲动转变成为性格的东西十分相近。我必须越过我内心深处的一切阻碍写下这个。

与洛维散步至地方长官的官邸，我称它为齐翁斯堡。入口的大门与天空的色彩很清晰地交相辉映。

另一次散步去赫茨岛。谈到契西克夫人，人们在柏林怎样出于同情将她接入社交圈，最先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穿戴古老的弗兰克衣帽的二重唱演员。他念了一封从华沙的来信，一位年轻的华沙犹太人在信中抱怨犹太剧院的衰落，信上写道，他宁愿去“诺沃斯蒂”——波兰小歌剧院——，也不去犹太人的剧院，因为它那可怜的装潢、有伤风化的内容、“发了霉的”唱段，等等，都令人无法忍受。人们脑子想的只是，一部犹太轻歌剧的主要效果在于，歌剧中的主要女歌手带着一群小孩在后面穿过观众向舞台行进。所有的人都带着经书的小册子，唱着：经文是最好的东西。

朝着在《罗贝尔特和萨穆埃尔》里出现了关于赫拉钦和风景区里的宫殿的那些古怪的地方作了美妙而孤独的散步。在内鲁达街上有一块牌子写着：裁缝安娜·克里左娃，在法国由公爵遗孀阿伦伯格，即阿伦伯格公主支持学成。——在第一座宫廷的庭院中央我站住了，我注视着宫廷看守的戒备状态。

马克斯不满意我写的最后部分。肯定是因为，他认为它们对整体来说不合适，但也可能认为，它们本身就不怎么样。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提醒我不要写得那么长，并把这样写作的效果看作是有点如透明胶的效果。

为了能够和年轻的姑娘谈话，我要和年纪较大的人接近。从他们那里发出的轻微的干扰振奋了我的谈话，这种对我的要求对我来说马上使我的情绪沮丧；我没有考虑过的从我心里讲出来的话，可能对那些年纪较大的人来说总还是适合的，如果它对姑娘没有价值的话；我从年纪较

大的人那里可以获得许多帮助，如果必要的话。

H.小姐让我忆起B1.夫人，只是她的鼻子在长度、微微的双重的弯曲及某种程度的瘦削方面看上去像B1.夫人的那只变坏了的鼻子。但从前她脸上也有一块外表上几乎没有理由存在的黑痣，它只可能是由一种有力的性格砍进皮肤里去的。宽阔的后背，肥硕的女人后背显出极为晚暮的样子！沉重的身体在剪裁得体的衣服里变苗条了，还是由于这件瘦削的衣服的缘故，这沉重的身体显得轻浮了。在交谈中的窘境过后，一种随便的抬头意味着找到了一条出路。我在这次交谈中并没有躺在地上，也没有认为我的内心已经死去，但也许我只是从外部去看自己，我也许对我的举止无法做别的解释。和新认识的一些人进行一种自由的交谈我早就不行了，因为性欲愿望的存在无意识地阻碍着我，而现在阻碍我的却是它的有意识的缺乏。

在公路边的明沟处遇见契西克夫妇。她穿着她在《疯狂的人》里穿过的少女的衣服。如果我当时在明沟处见她，并加以细细地分析，她就变得难以想象了。（我只是约略地看了她一下，因为我怕她的目光，我没有向她致意，自然也没被她看见，我也没敢立即转过身去。）她的个子比从前更小，左臀部不再瞬间地突起，而总是翘在那里，她的右腿变得弯曲了，她将脖子与头部靠近她丈夫的动作非常匆急，她想用朝一边伸出的、屈曲的右手臂挽住她丈夫。她丈夫戴着可爱的、前面有低低的帽檐的太阳帽。当我转过身去的时候，他们离去了。我推测他们进咖啡中心去了，我在沟的另一边等了一小会儿，又过片刻，我幸运地看见他们朝窗户走去。当他们坐到桌边，我只看到她那顶用蓝色天鹅绒罩住的纸板做成的帽子的边缘。

后来我在梦中待在一座很窄、不太高、玻璃穹顶的穿堂的风子里，它类似于原始的意大利图画上的那种不能通行的联络处所，从远处看，也像我们在巴黎见过的一种过道房屋，它是小地方街道拐弯的过渡。只是巴黎的那种过道房屋更宽大，而且充塞了买卖的人群，这里却是四壁空空，看上去几乎没有两个人并排行走的位置，可是确实有人在里面行走了，就如我带着契西克夫人，然后令人吃惊地出现了许多位置，我们并不惊异。在我与契西克夫人向一个出口处走去的时候，朝着一位可能是观察全景的人走去的时候，以及契西克夫人因为某种过错（可能是嗜酒）请求原谅，并请求我不要相信诽谤她的人的时候，契西克先生正在过道房屋的另一端抽打一条浑身黄毛乱蓬蓬的瑞士雪山救人犬，这条犬

用后爪立在他的对面。这情景很不清楚，是不是契西克只是跟狗逗着玩，并由于它而丢下老婆；或者，是不是他自己被这条狗狠狠地攻击了；或者，是不是他最终想阻止这条狗靠近我们。

和L.在码头。我感到一阵轻微的、整个身体被压抑的没有力气的袭击，我熬过去了，但过了一小会我看着他就像回忆那早已忘记了的事情一样。

即使我撇开所有其他的障碍（身体的状况、双亲、性格）不说，我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很有道理的辩解：那就是我尽管如此却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文学上。

我现在有而且下午已经有过一个大的愿望，写出完全出自我内心的全部恐惧不安的状态，这种状态正像是来自深处，进入纸的深处，或者是那样地将它写下来，使我能够将这个写下来的东西完全并入我的身上。这不是艺术家的愿望。当今天洛维说到有关他的不满以及有关他对剧团所做的一切觉得无所谓的时候，我解释这种状况仅只是怀乡的表现，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是为他做这种解释的，尽管我将它说出来了，但却是将它留给自己的，短暂享受一下它，以慰藉我自己的悲哀。

12月9日。施陶费尔—伯恩说：“创作甜美的东西掩盖了它绝对的价值。”

如果人们静静地停留在一本带信件和回忆录的书上，不管是哪一个人的书，这里说的是卡尔·施陶费尔—伯恩的书，如果人们不是出于自己的力量将这个人拉到自己的身边，因为属于这种情况的毕竟是艺术，而且艺术本身就是愉悦的，而是听之任之地——谁只要不进行反抗，这种情况就马上会在他身上发生——由招来的那位陌生人将自己拽走，并让自己做了他的亲戚，以后就不再有什么特殊的東西了。如果人们合上书又回到自己身上来，如果人们在这样的远足和这样的休整之后在他的新认识的、重新松动的、从遥远处观察了一个时辰的自己的本性里又有了更好的感觉，并带着比较自由的脑袋留下的话。——以后，它才能使我们惊奇，不管其生动性，那种陌生的生活情况被一成不变地记述在书中，根据我们的经验，虽然我们认为已经知道，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要比那种对这个生活经历的描绘离这个生活经历更远的了，比如说对一位朋友死亡的悲哀。但对我们这些人合适的东西，对陌生人就并不是那样了。如果我们因为用我们的写信不能满足自己的感情的话，——在这

里自然有许多从层次上说两方面都模糊的东西——如果在我们最佳状态中一再出现的那种表达肯定对我们本身有帮助的话，如“无法描绘的”、“不可言状的”，或者一种“多么悲伤”、“多么美丽”，接着紧跟它们的便是一种很快拆碎的用 α β 连词带出的从句，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值得为此付出才智去冷静而认真地理解那些陌生的报道，跟自己写信比，至少在这个范围里，我们就缺少这种冷静与认真。对于那种视情况而定一下子注意到前面放着的信或将它捏皱了的感觉，我们是处在那个一无所知状态中，正是这种无知变成了理解，因为我们被迫抓住这里放着的这封信，只是相信这里面所说的东西，就是说找到了已经完全表达出来的东西，只要这一种完美的表达是合理的，从这里就显然地看到了进入最赋有人性境界的道路。如此，例如卡尔·施陶费尔的信件只是包含着关于一个艺术家短促一生的报道……〔中断〕

12月10日。星期日。我得去看望我的妹妹和她的小家伙。当前天夜里一点钟我母亲从我妹妹那里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小家伙出生的消息。我父亲穿着睡衣，穿过房间，将我唤醒。女仆和姐妹们传递这个出生消息的样子，就好像这个孩子不仅是生出来了，而且也好像这个孩子已经过着一种高贵的生活，并有了一块墓地似的。

12月13日。由于疲乏没写东西，轮流着躺在暖屋子和冷房间里的长沙发上，带着有病的双腿和令我讨厌的梦。一只狗躺在我身上，它的一只爪子靠近我的脸，为此我醒了，但有一阵子不敢睁开眼睛看它。

《獭皮》是部有缺陷的、没有升华就逐渐转弱的剧本。警察局长的那场戏是虚假的。莱辛剧院的勒曼的表演是动人的。他蹲下的时候，就将裙子夹在两腿之间。群众流露出沉思的目光。举起两只张开的手，互相交叉在面孔左边的前面，像是为自动地减弱否认的或者是竭力申明的噪音的威力。其他人的表演是没有经过琢磨的、粗糙的。喜剧演员狂妄放肆是违背这部剧本的（扯一把锯子，变换帽子）。我反应冷淡，没有兴致。回到家中，但当坐下的时候，我不禁赞叹地想道，真有那么多人花一个晚上去承担那么多的激动（有的人喊叫，有的人行窃，有的人被偷，有的人被打扰，有的人拼命鼓掌，有的人被冷落），只要你眯起双眼看一看，在这部戏剧里有那么多的乱糟糟的人的声音和喊叫混杂在一起啊。还有不少美丽的姑娘。有一位姑娘，皮肤光滑，圆圆的面颊，头上梳着高高的发型，有一双孤独的、有些肿胀的眼睛。——在戏剧中好看的地方是沃尔芬同时作为女小偷和作为聪明、进步、民主人士的真

诚朋友出现的。作为听众，一只进行自卫的公鸡肯定觉得已经被认出来了。——可悲的平行的四幕。第一幕中被偷，第二幕是法庭，第三幕和第四幕也是法庭。

《裁缝乡长》在犹太人中上演。没有契西克夫妇，却出现两个新的可怕的人：利卜戈尔德夫妇。那是里希特的糟糕的剧本。开头是莫里哀式的，那位好炫耀的乡长身上系着挂表。利卜戈尔德读不了，她丈夫得与她一起探讨。

这几乎是一种风习，一位喜剧演员与一位严肃的女郎，一位严肃的男子与一位快乐的女子结婚，一般说只是带着结了婚的，或者是有亲戚关系的女人。——就如有一次半夜里，那位钢琴演奏员，大概是一位单身汉，手里拿着琴谱悄悄地穿出门去。

合唱团举行的勃拉姆斯音乐会。我的缺乏音乐天赋主要表现在，我不能整体地去享受音乐，只是有时候在我心中产生一种效果，而这种效果很少是一种音乐上的效果。听过的音乐自然地竖起了一道围住我的长城，对我来说，唯一持久的音乐影响便是，我是那样地被禁锢着，与自由是不一样的。

在文学面前如在音乐面前如此的恭敬，在观众中是没有的。姑娘们在唱着，许多人只是由于旋律张开嘴巴，一位身材笨拙的姑娘在唱歌的时候急速地转动着脑袋。

在一个包厢里坐着三位神职人员。当中的那位戴着小红帽，带着安详与威严倾听着，无动于衷而显得沉重，但并不僵化；右边的那位沉沉地坐在座位里，他有一副尖尖的、呆板的、多皱纹的面孔；左边的那位将他的脸斜斜地支在半张开的拳头上。——演奏的是《悲哀序曲》（我只是听到缓慢的、庄重的、一会儿迈到这里一会儿迈到那里的脚步声。大有教益的是，觉出了各自演奏组合之间的音乐过渡，并能用耳朵检验到这种过渡。指挥的发型起到破坏作用）。歌德的《铭记》、席勒的《内尼》、《命运女神颂歌》、《凯旋之歌》。唱歌的女子们高高地站在有低矮栏杆的阳台旁边，这阳台像是早期意大利的建筑。

尽管我有一段时间站立在常常向我袭来的文学里，可是我三天来除了一般的幸福要求之外，就没有感到那种对文学的根本愿望，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样，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把洛维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朋

友，现在我三天没见到他便微微感到遗憾。

当我在一段长时间之后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我就像从空虚的空气中去抓词句。如果抓住了一个词，然后就写上这一个词，所有的工作又重新开始。

12月14日。我父亲中午指责我，因为我不关心工厂的事。我解释，我是参与了，因为我期望获益，但我不可能一起工作，如果我坐在办公室里的话。父亲继续骂，我站在靠窗处，一声不吭。但到了晚上，我突然发觉了从这个中午谈话中产生的思想，我可能对我目前的位置很满意，并只是一味地保护自己，好为文学获得所有的时间。我好不容易较为贴近地观察了这种思想，它不再令人奇怪，已经习以为常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对自己否认能将所有的时间用于文学。这种信念当然出自一种瞬间的状况，但信念比瞬间的状况强有力得多。我想着马克斯也像想着一个陌生人一样，尽管他今天在柏林有一场激动人心的讲演和开幕式晚会；我现在突然想起，只是在我晚上散步时渐渐地临近陶西格小姐[40]住宅的时候，我才想到了他。

和洛维在下面的河边散步。从伊丽莎白桥支起的、里面由一盏电灯照明的桥拱的那一根墩柱旁边发射出来的光线之间显得漆黑一团，看上去就像工厂的一竖烟囱，在它上面朝向天空布满阴暗的影子一般的楔子就像冒出的烟。明显围成的一圈绿色的光面洒向桥的一边。

在朗诵威廉·舍弗尔的《贝多芬和一对恋人》时，与朗诵的故事毫无关系的各种思想（想到晚宴，想到正等着的洛维）非常清晰地通过我的脑子，就是今天这个极少美妙的朗诵也没打扰我。

12月16日。星期日中午12点。用睡觉和看报来虚度了中午的时间。害怕结束对布拉格日报的批评。对写作这样的恐惧总是表现在，我还没有坐到桌边，就偶然杜撰出要写的文字开头的句子，这些句子马上便显得用不上了，干巴巴，在结尾之前就中断了，并用这些刺眼的不连贯的句子展现出一个令人沮丧的前景。

基督教集市上的古老艺术。立在一根横杆上的两只澳洲白鸚拖着一颗星。错误是：预言一位姑娘得到一位女性的恋人。——一位男子用诗句兜售假花：这是皮制的一朵玫瑰花。

年轻的彼佩斯在唱歌。独特的手势表演，右前臂在关节处来来去去

地做着（九柱戏般的）游戏，半张开的手继续微微地张开，然后又蜷缩起来。汗珠布满他的脸上，特别是上嘴唇上，就像是玻璃碴儿。一件扣子松了的护胸隐隐地藏在外面的马甲里。

热烈的幽灵就待在正歌唱着的克卢格夫人嘴巴中柔嫩的红色里。

巴黎的犹太人街道，罗西埃路，里弗利路支路。

如果一种不正常的、它本身包含着贫乏的、与纯粹不安的存在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的心态，突然促成一件暂时有局限的，因而必然是强而有力的工作的话，促成自身发展的话，促成发表意见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种苦涩的回报。在这个回报里，一种由于只是用所有不是训练有素的力量能去承受的获取而产生的骄傲，一种对突然逃逸的学识——因为这学识与其说是固有的还不如说是预感的，所以它特别容易游动——的小小的回顾，最后是四周的仇恨和钦佩，全都混杂在一起了。

昨天入睡前，我绘画般地想象一个本身与山丘相似的在空中隔开的人群，这人群在绘画技术上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是一下子臆造出来的，轻易可行的。一群人围集在一张桌子的周围，地面的伸展要比人的圈子辽阔得多，我用强而有力的目光在所有的人中暂时只看到穿古装的年轻人。他将左臂支撑在桌子上，手松弛地贴在面孔上，面孔嬉戏地朝着一个人，这个人满怀忧虑，或者对他疑惑地弯下身子。他的身体，特别是右腿，带着一种年轻人的漫不经心伸展着，说他是坐着，还不如说是躺着。两对清晰的限制住那双腿的线条交织在一起，并稍稍地跟身体的边线连结起来。在这些线条之间，灰白色的衣服以微弱的立体感隆凸起来。出于对这种美丽绘画的惊讶，它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种紧张，我相信这是同一类型的而且是持续的紧张。由此，要是什么时候我想从这里能够将铅笔拿在手中勾勒的话，我肯定会强迫自己跳出这混沌的状态，对这绘画进行一番更为周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当然马上感觉到，我所想象的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一小组灰白色的瓷器。

在过渡的时间里，对我来说就是上个星期，至少还有这一时刻，常常有一种悲哀的，但平静的、对我失去感觉的惊异袭击我。通过一个空洞的空间我被所有的事物隔开，我甚至无法渴求到这个空间的边界。

现在是晚上，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思想变得更自由了，我也许对有些事情有能力了，我必须去民族剧院看《希波达米》，弗尔克利基的首次

演出。

星期日从来没有比工作日对我更有益，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通过特殊的分配将我一切的习惯搅乱，而我需要多余的自由时间，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差不多地安排一下自己。

不管怎样，在这个将我从办公室工作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也许将马上满足我写一部自传的愿望。我也许必须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将如此重要的改变作为我前面暂时的目标，以能左右大堆发生的事情。但将另一个突出的改变作为这种本身如此可怕得难以相信的改变，我还没能预见到。但写自传倒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因为它的进行那么容易，就如记下众多的梦境，而且还可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巨大的、永远影响着我的成果，这成果也许对每一个其他人的理解和感情都有所收益。

12月18日。前天看《希波达米》。可怜的剧本，没有思想没有缘由地在希腊神话中四处乱走。戏剧说明书上的克瓦彼尔的论文，它在字里行间说出了在整个演出中的明显的观点，一个好的戏剧导演（但在这里无非是模仿莱因哈特而已）可能把一部伟大的戏剧表演艺术作品搞糟了。这一切都得为一位大约只是跑了些许地方而来的捷克人悲哀了。——在休息的时候，地方长官通过包厢开着的小门从走道里吸着空气。——作为阴影唤出的死人阿克索哈，她很快消失了，因为她作为不久前刚刚死去的女人一看到世界便又太深地感觉到了她旧有人的苦难。

我是不守时间的，因为我没有感觉到等待的痛苦。我像一头牛等待着。也就是说，如果我感觉到我瞬间存在的一种即使是很不稳定的目标，我在我虚弱的时候是那么空虚，由于这一眼前的目标的缘故，我也愿忍受一切。如果我要是恋爱了，那时候我能做什么呢？多少年之前，我在环形道的凉亭下等待得多久啊，直至M.走过，即使她还挽着她的恋人走过。部分是出于疏懒，部分是出于对等待痛苦的无知，我错过约定会面的时间，但部分也是为了新的复杂的目标，重新不踏实地寻找那些我与之有约的人们，也就是说可能要长期不定地等待下去。我在孩提时代，对等待有着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恐惧，人们也许会从中得出结论，我注定就已经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但我已经预感到我的未来。

我处在良好状态的时候，没有时间，也不容许自己去过那种天生的放荡不羁的生活；相反，我处在糟糕状态的时候，却有着更多有关这方面的需要，比这种状态要求的还多。如今我忍受着这样的一种状况，就

如我可以按日记计算出来那样，从9日起，几乎有10天了。昨天我又一次脑袋火辣辣地躺上床，并想自己欢乐一番，这种糟糕的时间过去了，我又已经担起心来，我会睡得不好。但这已过去，我睡得颇好，可是醒来却不好。

12月19日。昨天是拉泰纳的《大卫的提琴》。被驱逐的兄弟，一位有艺术天赋的小提琴手，他出现了，就如在我最初的中学时代的梦中一样，变得富有归来。但最先试图穿着乞丐的衣服，双脚围裹上一包碎布，就若一个铲雪人。他那些从来没有从故乡来过的亲戚：他的诚实可怜的女儿，富有的兄弟，这位兄弟没有将这位可怜的女孩嫁给自己的儿子为妻，却不管自己的年纪，想为自己找一位年轻的太太。后来这位归来者揭穿了自己的秘密，他撩开了高贵的上衣，在这衣服下面的一条横系着的绶带上挂着欧洲各国君主的勋章。他用小提琴的演奏和歌唱使所有的亲戚和他们的家属全变成了好人，也使他们的关系正常起来。

契西克夫人又来演出了。昨日，她的身段比她的脸漂亮，这张脸比以前消瘦多了，使额头显得太令人注目，一讲话额头上就出现皱纹。变得圆浑美丽、中等强健的硕大身体在昨天并不属于她的脸孔，她使我模糊地忆起双重天性来，如美人鱼，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当她后来站在我面前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像我在那些没有怜悯之心的观众圈子里谈论一尊雕塑，她的脸已经变形，皮肤已不那么洁净，涂满了脂粉，在深蓝色的短袖上衣上还有一处污点。

克卢格夫人站在她的旁边，并观察着我。韦尔奇小姐从右边观察我，我说了我能说的一切愚蠢的话。我就这样不停地向契西克夫人询问，她为什么要去德累斯顿，尽管我知道，她与其他的人吵翻了并因此而离走，所以这个话题也就令她难堪了。最终令我更为尴尬的，只是我一点儿也想不起别的什么话题来。当我与克卢格夫人讲话而契西克夫人插进来的时候，我才向克卢格夫人说了声“对不起！”便转身向着契西克夫人，就好像我是在想，从现在起我要和契西克夫人一起度过我的一生。当我后来与契西克夫人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爱意根本没有抓住她，而她只是一会儿较近、一会儿较远地绕几下就飞走了。她一点儿也安静不下来。

利卜戈尔德夫人演一个年轻的男子，穿一件紧紧箍住怀孕身体的衣服。因为她没有跟随她的父亲（洛维），他把她上身压在一张沙发椅上，并打了她的屁股，罩着屁股的那条裤子绷得非常紧。洛维后来说，

他带着她就像带着一只老鼠那样不愿意。但她从前面看是漂亮的，只是从侧影看她的鼻子的走向太长、太尖，而且猛然地下行。

我到10点左右才去散步。在这之前我已作过一次散步，忍受了微微的精神上的烦躁，在剧院占了一个位子，那正是在演出的时候，在独唱演员们欲朝我唱着走来的时候。我还错过了克卢格夫人的演唱，她那总是充满活力的歌唱无非就是要检验一下世界的坚固性，这也是我所需要的。

今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偶然与母亲谈到孩子和结婚的事，只是那么几句话，但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清楚地注意到，我的母亲对我的设想是何等的不切实际和天真啊。她将我看作是一个健康的年轻男子，这个男子只是有一点儿患了幻觉症，有一点儿病而已。这种病态的幻觉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结婚和生孩子自然而然地就会使这种病态彻底消除。然后，那种对文学的兴趣大概也会回到对有所造诣的人来说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来。对我的职业或对工厂或对那些刚刚来到我手中事情的兴趣将理所当然不受骚扰地增大。因而这种最微不足道的、没有预感就感觉到的理由并不是向着那种持续不断的对我未来的绝望说的；对于还没有走得那么深的暂时的绝望，那么，理由是，如果我相信胃又一次发病，或者，如果我因为写东西太多而不能睡觉。解决的可能性有成百上千。看来最可能的是，我突然热恋上一位姑娘，并不再想摆脱她。那么，我将会看到人们怎样好好地看待我，而且也不会去阻碍我。但如果我是一个单身汉，像在马德里的叔叔那样，那也不会是幸事，因为我从我的聪颖中已经知道安排自己。

12月23日。星期六。当看到我全部的、引往一个令所有的亲戚和熟人感到陌生的错误方向的生活方式时，那种担忧出现了，而且由我的父亲说出来了，那就是，从我身上将会出现一位第二个鲁道夫叔叔，也就是说，是新成长起来的家庭的白痴，对另一个时代需要来说有些改变了的白痴。那么，从现在起我就能感到，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对这种意见的矛盾随着日月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小，母亲收集了所有要说的话，什么话在赞同我的时候说，什么话是在反对鲁道夫叔叔的时候说，而且还增强了说话的语气，这就像一个楔子嵌进了我们两人的想象中间。

前天在工厂里。晚上在马克斯家，画家诺瓦克正在那里为马克斯作石版画。我知道，在他们面前我不能自制，我说不出是，也说不出不是。马克斯提出一些已经形成的看法，对此，我的思想转来转去，却没

有结果。最终我习惯了这些单独的画页，至少将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发出的惊讶丢在一边，觉得下巴是圆的，一张脸是压扁的，上身如披盔甲，他看上去倒不如说好像在日常便服里面穿着一件很大的燕尾衬衣。与此相反，画家提出了一些不在第一阶段上的和不在第二阶段上的理解，而且只是通过这样的手法来减弱这种理解的意义，即他正是对着我们述说这一点的，我们在他的内心表现出来的时候却谈论那最廉价的荒唐。他断言，艺术家感觉到的、当然是有意识的任务，就是将这个被画的人物接受进他自己的艺术形式中去。

为达到这一点，他首先用彩色制作一幅肖像速写，这幅速写也放在我们的面前，在暗淡的色彩中它表现出一种真实的、极为显明的纯粹的相似来（这种极大的显明性，直到现在我才能够承认），并被马克斯称为最好的肖像画。因为这幅画除了他的眼睛和嘴巴逼真之外，还画出了那高贵的深邃的表情特色，这种表情特色的效果通过暗淡的色彩准确地被增强了。如果人们对此有所注意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否认这一点的。完成这幅速写之后，画家就在家中着手于他的石印图画工作，一幅一幅地变化着，同时他努力地追求着不断远离自然的表现，但在这同时不仅不损害他自己的艺术形式，而且一根线条一根线条地向这种形式推进。这样，比如说耳廓便失去了它的人所有的弯曲和细微的边缘，成了一个较深的半圆的漩涡围绕着一个小小的黑洞。马克斯的那个从耳朵起就已经形成的瘦骨嶙峋的下巴失去了它单一的边界，这个边界看上去是那么不可缺少，而且从旧的真实的距离中产生一种新的真实，对观察者来说是那么少见。头发松散成稳重的分明的轮廓，看得出是人的头发，好像画家也否认了这一点。

在画家们要求我们理解这些变化的时候，他只是极快地，但带着骄傲地指出，在这些画页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是那个由于它影响着所有后来的东西产生的效果而偶然发现的东西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一个脑袋旁边有一条细细的灰白色的咖啡液斑从上而下贯穿这幅画的整个画面，它是添加上的，有考虑的，而且并不损害全部的比例，所以不必再将它去掉。在另一幅画面的左角上是一大团分散的几乎不引人注目的蓝色画点的斑迹；这斑迹也是故意画上的，是由于从它那儿掠过这幅图画洒下的小小光线的缘故，然后画家在这种光线里继续工作。现在，他最后的目标是，首先将嘴巴，然后将鼻子放到变换中去。在嘴巴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还不够，对此马克斯抱怨说，用这种方法这石版画离那好看的彩色速写越来越远，根据这意见，他指

出，石版画会再和彩色速写接近的，这完全是肯定的。

不管怎么说，不可忽视的是稳重，画家带着这种稳重在交谈的每一时刻都在相信他的灵感没有预见到的地方，而且只有这种自信使他的艺术劳动带着最好的合理性成为一种几乎是科学的工作。——买了两幅石版画：《卖苹果的姑娘》和《散步》。

写日记的人的一种优点在于：他对变化有着冷静清晰的意识，他无时无刻不面临这种变化。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也相信、预料并承认这些变化，但如果这取决于从这样一种承认中获得希望或宁静的话，那他就总要否认这些变化。在日记中人们找得到这样的证明：人们本身就生活在今天看来是不堪忍受的处境里，环顾四周，记下观察的感受，这就是说执笔的右手像今天一样地移动着，今天我们虽然通过通观各种可能性对当时的状况变得更为聪明了，但因而更有必要去确认我们当时在纯粹无知的情况下却仍然不懈追求的那个无所畏惧的精神。

由于韦尔弗的诗，昨天整个下午我的脑袋像充满了蒸气。我在一瞬间感到了恐惧，欢欣振奋会将我不停地扯到荒唐的境地。

昨天晚上跟韦尔奇^[41]进行了痛苦的交谈。我的目光如受惊一般在他的脸上和脖子上转来转去有一个小时那么久。有一回，就在一种由于激动、虚弱和失去思想而引起的脸部扭曲中，我肯定知道，我是否要在没有继续伤害我们关系的情况下退出房间。在外面、在似乎要下雨的、完全适合默默行走的天气里，我呼吸着，然后满意地在“东方”前面等了M.一个小时。慢慢地看着手表，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这样的等待，对我来说，和躺在长沙发上伸展双腿，将双手放进裤袋里，几乎是一样的舒服。（在半睡的状态中，我相信，双手不会再插在裤袋里，而好像是成了拳头放在大腿的上面了。）

12月24日。星期日。昨天在鲍姆那里很愉快。我是和韦尔奇一起在那里的。马克斯在布莱斯劳。我感觉自由自在，能够将每一个动作做到它的结束，我回答问题，也倾听别人说话，行为恰当，我还大声嚷嚷。还有一次我说了一句蠢话，它不是主要的，一会儿就被冲走了。与韦尔奇在回家的路上也是在雨中；一路上不管水洼、风寒，对我来说雨过去得那么快，就好像我们乘车一般。分别的时候，倒使我们两人遗憾起来。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害怕，如果不是害怕，也是那么不舒服。如果我的父亲像他作为商人常常做的那样，说到关于最后或月底的事，因为我并不好奇，而如果我也问一下，由于思想缓慢，不可能对回答进行迅速的整理，而且因为常常是一种一下子出现的微微活动着的好奇心已经满足了提问和回答，也不再要求对事物的一种理解力，如此，“最后”的表达对我来说成了一个不痛快的秘密。由于好好地注意听，“月底”的表达为这个秘密让出了位置，即使从来也不是在这样强烈的意义里。这个如此长期令人担心害怕的最后从来也没有被克服干净，这也是很糟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特殊的标志，也没有特别引人注意，就过去了——我发觉得太晚，因为它总是在大约30天之后来到——第一天就是这么幸运地来了，人们又开始谈论最后了，当然不是带着特殊的惊恐，但这在没有对其他不可理解的东西进行检验的情况下便被放下了。

当我昨天中午去W.那里，我听到了他妹妹的声音，她向我致意，但我没看见她本人，直到她柔弱的身影离开放在我前面的摇椅。

今天上午我的外甥切割包皮。一个罗圈腿的小个子男人，名叫奥斯特利兹，他已经做过2800个切割包皮的手术，他做这件事非常熟练。那是一种因此而复杂化了的手术，那就是小男孩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由他的祖父抱在怀里，做手术的人不是严肃认真、专心致志，而是必须要做祷告。首先，小男孩被捆扎起来，不得动弹，只露出阴茎，然后放上一只穿洞的金属盘子，精确地算好切面，再后就用一把几乎是很平常的刀，类似吃鱼时用的餐刀，便开始切割起来。在场的人可以见到流血和鲜红的肉，这个割包皮的人用他那长钉子般的颤抖的手指快速地操作，不知从哪儿拉来一块像手套的手指一样的皮，盖在伤口上。不一会儿，一切都好了，男孩子几乎没哭一声。这时，还有一次小小的祈祷。在祈祷的时候，割包皮的人喝着葡萄酒，同时用他还没有洗净血迹的手指蘸上一点儿葡萄酒点到孩子的嘴唇上。在场的人做着祈祷：“他如今已经进入这个人生社团，这样，他就应该获得经律的知识，获得美满的婚姻，从事良好的职业。”

在今天正餐上最后一道甜点心时，我听到那个割包皮人的陪同在做祈祷，除了祖父及外祖父，所有在场的人都在之前用人们完全不可理解的语言做了预先的祈祷，如梦般地或者说无聊地度过了这些时间。我看到了我面前的正处于一个明显的不可忽略的过渡的西欧犹太人的风习文化，这些直接被涉及的人并不对此感到担心，而是作为适逢其时的过渡

人挑起了托付给他们的担子。这种在其最后结束中完成的宗教仪式已经在它目前的执行中包含了一种如此无可争辩的纯粹历史的性质。看来，只耗费掉中午的那一段很短的时间是必要的，是为了引起在场人的历史兴趣，使他们知道关于早先古老的割包皮仪式和在割包皮时半歌唱着的祈祷词。

洛维，我几乎每天晚上让他等半个小时，他昨天告诉我：一些天来，在等待的时候我总是仰头朝您的窗户看去。开始我看到那里有灯光，如果我如平常一样，提前时间去了，这时我以为，您还有工作。后来，这灯光熄灭了，旁边的房间还有灯光，您是在吃晚饭；后来，你的房间里灯又亮了，您是在刷牙；然后灯灭了，您已经走到了楼梯上，可是后来灯又亮了。

12月25日。我通过洛维知道有关华沙目前犹太人文学方面的知识，以及我通过自己部分观察了解的有关目前捷克文学方面的事情，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文学工作的许多优势——有才智的人的运动，在外部生活中常常是无所事事的以及不断分解着的民族意识的统一结合；民族通过一种文学为自己和面对敌对的周围世界保持着骄傲和保留，书写一个民族的日记，写这种日记与写历史完全是两码事，作为它的结果，出现一种更快的、在诸多方面一直经受了考验的发展，详细记述广阔的公开生活中美丽的精神世界，牵制住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因素，这些因素只是在由于怠惰才能产生危害的地方马上发生作用；通过发行杂志构成的、总是听命于整体的民众组合，将民族的注意力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并只在反射中吸收异邦的东西。对从事文学人物的尊敬，持续不断唤醒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将文学中的事件采纳到政治的忧患中去；使父亲们与儿子们之间的对立改善，并有商讨的可能性；在一种虽然是痛苦的，但却值得谅解的和畅所欲言的方式中去暴露民族的错误；培植一个活跃的，因此也是自觉的图书行业和对书的渴求——所有这一切效果通过一种文学就能够发挥出来。这种文学正在一种事实上还是一般的范围里发展着，但由于缺少重要的天才，它才有着这种假象。这样一种文学的活跃甚至比天才济济的文学的活跃更为厉害，因为，这里没有作家，在作家的天才面前，至少有许多怀疑者不得不保持沉默，文学争论在最大程度上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合理性。没有被天才突破的文学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缺陷来，由此，无关痛痒的东西就可能收缩起来。文学对专心致志的要求因而变得越来越紧迫。个别作家的独立性自然只是在民族的范围之内受到更好的保护。缺少极大诱惑力的民族楷模

完全妨碍了那些没有能耐的人接近文学。但即使微弱的能耐也不足以让正要占统治地位的作家们不明朗的特色影响，或者去引进陌生文学的成果，或者去模仿已经引进的陌生文学。这些，人们已经从这个例子中认识了，那就是在一个富有伟大天才的文学里，如在德国文学里，那些最坏的作家们用他们的模仿固守本土不放。在上面提到的流派里一种从个别来说是坏文学的创造力和令人喜悦的力量表现得特别有影响，如果以此开始去从文学历史的角度列出已故作家名单的话。他们不可否认的当时和当代的影响就这样地成了事实，竟使得它可以用他们的创作来替换。人们谈的是关于后者，而指的却是前者。但那些影响是不容忘记的，创作当然是影响不了记忆的，因而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重新回忆。文学历史展现的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值得信赖的程序段，日常的鉴赏对它可能只有极少的危害。

一个小民族的记忆力并不比一个大民族的记忆力弱多少，因而它领悟这些现存的材料更为彻底。虽然专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比较少，但文学是文学史的事情并不亚于是人民的事情，因此，即使不是完美无缺的，文学还是得到了可靠的保护。这种在一个小民族内部民族意识对每一个个别人提出的要求就是，每一个人必须不时地准备熟悉分摊到他身上的那部分文学，去承担它，去维护它，而且要不顾一切地去维护它，即使他不熟悉和未承担这部分。

古代文字有许多解释，面对残缺不全的资料，要将这种解释向前推进，必须要有毅力，这种毅力只是由于担心人们也许会太轻而易举地将它推进到底，或者由于敬畏——人们会越过敬畏而达成妥协——受到压制。一切都在规矩矩矩的范围里发生着，只是在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态中工作，这种心态永远消除不了，而且毫无倦意，并通过一只灵巧的手的抬举而加宽了好几里远。但最终，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态不仅阻碍了向前远望，而且也阻碍了深入理解，因此，所有这一切解释都成了泡影。

因为缺少与此有关联的人，与此有关联的文学事件也就被遗忘了。（某个个别事件被逼到深处，是为能从高处去观察它，或者将它举到高处，以便人们能够在它的侧面上方去判断它。错了。）如果这种个别事件也常常用冷静去周密思考的话，人们却是达不到它的边界，这事件在这些边界处与那些类似的事件有关系，人们最先到达的是面对政治的边界。是的，人们甚至渴求更早地看见这条边界，要是它在那里存在的话，然而这些纠集在一起的边界常常是到处都能发现。空间的狭小，还

有对单一与千篇一律的顾虑，最后还有这样的考虑，即由于文学内在的独立性，与政治的外在联系并无损害，这些便导致了文学因而在内流传，并紧紧地抓住政治口号。

在文学上处理一个小题目，一般能找到欢乐。这种题目只可以那么大，一种小小的振奋便可能在这些题目旁消耗殆尽，而且还要准备对付论战的可能与保留。文学上思索出来的诃骂言词滚来滚去，在较强烈的气氛中翱翔。至于在伟大文学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以及构成一个不是不可缺少的楼房的地下酒馆的东西，在这里就是在青天白日下发生的，这就使那里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合流，这里引来的至少是所有人的生与死的抉择。

关于小型文学特点的模式

在这里或那里，不管怎么说有着褒义的影响，这里在个别意义上来说甚至有更好的效果。

1.活泼性

a) 争论

b) 流派

c) 杂志

2.轻松性

a) 无原则性

b) 小题目

c) 轻松象征的形成

d) 无用的废物

3.普及性

a) 与政治的关系

b) 文学故事

c) 对文学的信念，文学的立法由文学完成。

如果人们在各个环节里已经感受到这种有益快乐的生活，这是难以改变的。

俄国割包皮的风习。在整座住宅里，所有的门上都挂着不少手掌大小、上面有犹太教神秘教义符号的牌子，是为了在分娩和行割礼之间的时间里保护母亲不受恶魔的侵害。这个时候恶魔对母亲和孩子说可能特别危险，因为这时他们的身体是完全敞开的，就是说为所有的恶魔打开了方便的入口，还因为如果孩子不入社团，他就不能对抗恶魔。为使母亲一刻也不独自待着，因此为她请了一个女护理来抵抗恶魔，还利用在生孩子后的除了星期五的七天内，让10个到15个孩子，或者更多，在将近晚上的时候在临时代课老师的带领下先到母亲的床上，在那里背诵“以色列信条”，然后给他们吃甜食。这些无辜的5岁至8岁的孩童在黄昏时刻最能逼住恶魔，能特别有效地挡住它们。星期五举办一个特殊的节日，总而言之，在这一个星期里好多的招待宴席接连不断。在举行割礼的前一天，恶魔变得疯狂无比，因此在那个最后的夜里人们要通宵保持清醒，直到第二天早晨都要有人守在这位母亲的身边。在目前，常常要有超过百位的亲戚和朋友参加这样的割礼。在场的人中最有声望的人可以抱着孩子。行割礼的人干这件事情是不收钱的，这种人大部分是酒徒，因为像他这样忙的人是不能参加各种节日宴席的，因而只在下面喝一点儿烧酒。所以所有这些行割礼人的鼻子都是红的，并从嘴里散发出酒味。如规定的那样，这些行割礼的人在做完切割手术之后，还用他们那张嘴吮吸小孩带血的阴茎。然后用木粉敷在阴茎上，大约三天后就渐渐痊愈了。

一种严肃的家庭生活对犹太人，当然特别是对俄国的犹太人来说，并不是那么非常普遍和典型的，因为家庭生活毕竟也能在基督徒那里找到，对犹太人这种家庭生活有妨害的却是，女人是绝不能学习犹太经典的，这样，当男人想和客人们谈论他们学习过的犹太经典，也就是他的生活中主要事情的时候，女人们只有退进旁边的房间，如果一定不肯退——那么，对她们来说还要奇特，她们常常是一有机会就聚集在一起，除非是祷告，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议论神事，或者绝大部分是议论宗教方面的庆典宴席，在这种宴席上也只是非常有节制地喝些烧酒。她们便严格地按规定分别避离而去。

歌德用他作品的威力也许阻止了德意志语言的发展。如果说在这期

间散文也常常与他疏远的话，那么，正如目前一样，它现在又终于带着较强烈的渴求回到他那里去了，而且本身也吸收了不少古老的、在歌德那里发现的，但与他并没有什么关系的短语，为是欣赏这些短语的无限从属性的完美光彩。

我希伯来文叫阿姆舍尔，像我母系方面我母亲祖父的叫法，他留在我母亲的记忆里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并有学问的人，有着长长的白胡子，他死的时候，我母亲才6岁。据她回忆，她是怎样紧紧抓住尸体的脚趾，并同时苦苦地请求原谅可能对祖父犯下的过错。她还回忆起祖父的布满四壁的许多藏书。他每天在河里洗澡，冬天也一样。为了洗澡，他先在冰上凿一个洞，然后跳下洞去洗澡。我曾祖母早死于伤寒。从她死后开始，祖母变得郁郁寡欢，跟谁也不说话。有一次，那是她女儿死了一年之后，她出外散步，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人们从易北河捞上她的尸体。比祖父还要有学问的一个人就是母亲的曾祖父，他在基督徒中和犹太人中有同样的威望。在一次大火灾中，由于他的虔诚而出现奇迹，火舌跳过了他家房屋，未受一点损害，而四周的房屋全烧成了一片废墟。他们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改信基督，并成了医生。除了母亲的祖父外，所有的儿子都去世了。祖父有一个儿子，母亲把他看作是疯癫的魔鬼叔叔，还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外祖母。

对着窗户跑，穿过裂成碎片的木头和玻璃，用了所有的力量之后，虚弱地越过了窗下的墙。

12月26日。又睡得不好，已经是第三夜了。这样，我在一种需要帮助的状态中度过了三天的假期，在这三天里我想写东西，它应该对我整年有所帮助。在圣诞节晚上和洛维朝着斯特恩散步。昨天看《布吕马勒或华沙的珍珠》，因为她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忠诚，布吕马勒被作者在标题中用荣誉的称号“华沙的珍珠”称赞了。首先，契西克夫人露出来的高高而秀美的脖子就说明了她的脸型，克卢格夫人在歌唱一种稳定柔顺的旋律时，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珠。在我看来，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歌曲本身，超出了剧院，超出了全部观众的关心，当然也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观众们沉浸在这个旋律之中。目光透过后面的门帘进入演员的化妆室，正好落在克卢格夫人身上，她站在那里，身穿白衬裙，短袖衬衫。我对观众感情缺乏自信，因此竭力从内心深处掀起他们的热情。昨天我以潇洒大方亲切的举止与T.小姐及她的陪同交谈。这是我良好性情在昨天、还有在星期六就已经感觉到的自由，尽管我从远处并不需要这么

做，我仍然出于某种程度上对世界的顺从和一种傲慢的谦虚使用了一些表面上显得令人尴尬的语句和动作。我是独自与母亲在一起的，对此，我觉得轻松与美好。

在今天很容易作为古老事物去想象的一些事情的例子：乞讨的残疾人走在通往林荫大道和郊游地方的路上，夜里没有照明的空间和桥式的交叉路。

看了《诗与真》中那些地方的概要，这些地方用没有固定的特点给人留下一种特别强烈的、在本质上与原来被描绘的事物没有关联的、逼真的印象，例如激起少年歌德的想象，他是怎样地好奇，穿得阔气，可爱、活泼地闯入所有熟悉的人那里，只是为了眼看和耳听那些应该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因为我现在正翻阅这本书，没能找到这一些地方，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清楚的，而且包含着一种不是偶然就能超越的逼真性。我必须等待着，直至我什么时候好好地读上一遍，然后在那些确切的地方作些停留。

当父亲针对同时代人，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境遇而不停旁敲侧击讲述他年轻时代所忍受的苦难的时候，听起来真不是滋味。没有人否认，他冬天曾由于没有足够的衣服腿上的伤口裸露出来，他经常挨饿，他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冬天很早的早晨不得不推着小车穿过村子——只允许将这实实在在的事实与以后的实际事实作一比较，我是没有遭受过这一切的苦难，他对此是理解不了的，但绝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比他更为幸福，他不能因为那腿上的这些伤疤而感到自负。他每次一开始就认为，并断言，我不能认识到他当时的苦难，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同样的苦难，正因此我最终必须要无限地感激他。他要是不断地讲述他的青年时代和他的双亲，我会是多么喜欢地去倾听啊，可是这一切都要在吹嘘和吵骂的声调中去听着，那是痛苦的。他一再地用双手敲击着什么东西说道：“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没有人受过这些罪！今天有一个孩子懂得这个吗？！”今天，又和来探望我们的尤丽叶婶婶说了这些类似的内容。她和父亲方面的所有亲戚一样也有着一张特大的脸盘，一双眼睛由于一种极其微小的干扰而放错了位置，或染上了颜色。她10岁时就出外帮人做饭，那个时候，她不得不顶着严寒穿着湿衣服在外奔走，腿上的皮肤开裂，衣服上结了一层冰霜，直到晚上上床才烘干。

12月27日。一个不应该有孩子的不幸的人将自己可怕地禁锢在自己

的不幸中。哪儿也没有一个更新的希望，哪儿也没有得到幸运之星帮助的希望。他必须带着这种不幸去走自己的路，要是他的圈子兜完了，就得知足，并不要继续纠缠这个不幸，而应该去试试，他遭受的这种不幸是不是在较长的一段路上因换了一种身体与时间的情况会丢失，或竟而会带来好运。

我在写作时时而有的这种错误感觉容在这幅图景里阐述一下，一个人在两个地洞前面等待着一种幻象的出现，它只可以从靠右的那个洞里出来。但这个洞正好是在一个模糊不清的盖子下面，而从左边的洞里一个幻象接着一个幻象升起，这些幻象企图把目光吸引到它们那里，最终毫不费力地用它们不断增长的身躯达到这个目的，这身躯最后甚至将真正的洞口遮盖住了，尽管人们十分想阻止这个行动。可是现在，如果人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人们是不想这么做的——，人们已经在依赖这些幻象了，但它们由于它们的短暂——它们的力量在纯粹的显现中消耗掉了——并不能使一个人满足，这种幻象如果出于虚弱而凝固的话，人们就会向上，向各个方向驱赶它们，只是为将其他的幻象引上来，因为一个幻象的持久的外貌是无法忍受的，而且也因为存在着希望，在错误的幻象精疲力竭之后，真正的幻象终将来临。上面所说的图景是多么虚弱啊！一种没有关联的假设像一块厚板插在了实际的感觉和对比的描写之间。

12月28日。这种烦恼，是工厂给我带来的烦恼。当有人指定我下午将去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为什么就去了呢？现在没有人用强力逼迫我，但父亲却是用斥责、卡尔用沉默和我的负罪意识来逼迫我。我对工厂一无所知，今天很早的时候，我在专门事务委员会参观时，我就毫无用处地、像挨打似的闲站着。我为自己否认要去工厂企业所有部门的可能性。如果这通过所有参观者^罗唆提问和无休止纠缠而成功的话，那会达到什么呢？我知道，带着这种知识我会什么实际的事情也做不了，我只适合于干些表面的业务，我的上司坦率的思想是给这表面的业务添点盐，加点真正好成就的声誉。可是通过这种为工厂无意义耗费的努力，我会在另一个方面夺去我将下午的一些时间用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这肯定会导致我生存的全部毁灭，我的生存本来就越来越受到限制了。

今天下午在一个出口处的几步远的地方，我看见一些绝对自负的委员会成员，他们上午使我那么恐惧，现在正朝我走来，或者与我相遇。

12月29日。歌德那里的那些逼真的地方。第265页：“因此我将我

的朋友拉进森林。”

歌德，307页：“现在在这些时刻里，我除了医学和自然历史之外根本没有听见其他的讲话，而且我的想象力被引到了一块完全是另一样的天地。”

由于无可辩驳的丰富回忆，力量在增长。一股独立的尾流^[42]向我们的航船转向而去，随着效果的增加，我们力量的意识也在提高，这效果本身也不断在增强。

即使结束一篇小文章也有相当的困难，并不因为我们的感觉对一部戏剧的结束要求是一团火，而事实上一直到目前为止的内容并没能从自己本身产生出一团火来。更为确切地说，这样的困难产生于，就是最短的文章要求作者一种自我满足和一种自我遗失，从这种自我遗失中进入平日的空间，没有强有力的决断和外在的激励是困难的。这样的话，人们还不如在文章圆满结束，可以无声无语在之前被不安驱使的时候溜掉哩，然后从外部直接用双手完成结尾，这双手不仅是在工作，而且还必须紧抓不放。

12月30日。我的模仿欲完全不是什么戏剧表演方面的事，对它来说首先缺少统一性。在其全部内涵中的粗野的东西，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征，我是完全无能为力去模仿的，类似的尝试总使我失败，它们违拗了我的天性。相反，去模仿粗野表明的细节，我有着一种决然的冲动，它催逼我去模仿用散步的手杖去操纵某些人，他们双手的举止，手指的运动，我能不费劲地去做这些。但正是这毫不费力、这种模仿的饥渴使我远离了演员，因为这种不花力气的对立面在于，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在模仿。只有我本人的满意的或常常是勉强的承认向我展示了这种成功。但远远超出这种外部模仿的还是内在的模仿，它常常是那样令人信服和强而有力，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根本没有地方去观察和发觉这种模仿，只有在回忆里我才发现它。但在这里这种模仿也是那么完美，并用一跳和一落取代了我自己，这种模仿在显然是能做得到的前提下在舞台上也许是无法忍受的。不能让观众期望太多的极端的表演。如果一位演员按规定要打另一位演员，在一种感官的巨大冲击下激动起来，真的打起来了，另一位演员由于疼痛大叫起来，这时，观众必然大吃一惊，并急忙从中调解。但像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发生的事情，却在这种不重要的情况下发生了无数次。坏演员的本质并不存在于他模仿得微不足道，更确切地说在于，他由于缺乏修养、经验和气质而模仿了错误的行为。但他本质

的错误是，他没有遵守表演的界限而做了太强烈的模仿。舞台所要求于他们的那个朦胧的想象驱使他这么做，即使观众相信，这一位或那一位演员不怎么样。因为他干巴巴地闲站在那里，用手指尖玩弄着他口袋的边缘，不合礼仪地用手顶着臀部，偷偷地去倾听提台词的人提示。不管怎么说，时辰也许会彻底地变化，他却还是保持着一种内心不安的严肃，这样，就是这么一位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的演员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他模仿得太强烈，如果他只是按他的意思去做这些话。

12月31日。正因为他的能力是如此有限，他担心做的事比全部的要少得多。如果他的能力并不是完全不行，而是不想暴露，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及他的意愿同时出现的时候，供他使用的技巧可能少得可怜，还不如他的全部能力哩。（自由的、不顾及正厅中央和后排座位里留心察看的人而进行着的、按纯感觉到扮演的需要控制了了的……）〔中断〕

早晨，我对写作感觉是那样清新，但这时完全妨碍我的是我下午要为马克斯朗诵的设想。这也表明我对友谊是多么的无能，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在这种意义里的友谊完全是可能的。因为这里一种友谊不打破日常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如此，它的一堆表现不断地飘走，它的核心没有受到伤害地留下了。它从那没有受到伤害的核心里自然又重新发展，但因为这样一种发展需要时间，而且也不是每一种期待到的发展都能成功，当然除个人情绪的变化外，它永远也不能在最后一次破裂的地方再接起来。由此，在从深处建立起来的友谊中，在每一个新的相遇之前肯定都要产生一种焦虑不安，它不一定如此厉害到被感觉出来，但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干扰说话交谈和行为举止。人们清醒地感到惊讶，特别是因为人们不明白这个原因或不堪相信这个原因。到这时，我应该怎样给马克斯朗诵，或者在写下后面东西的时候，我全在想，我将要给他朗诵。

此外打扰我的是，我今天一早因此而翻阅着这本日记，看看我能给马克斯朗诵些什么。这时，我在掂量这一点的时候，既没有感到迄今写好东西特别有价值，也没有感到一定要直截了当地把它们扔掉。我的评价介于这两者之间，更接近于第一种看法，但我肯定不是按写好东西的价值而不管我的虚弱认为自己精疲力竭了。我写好的这堆东西的内容还是将我从自己写作的源头引开，因而对以后的时刻来说几乎是不可挽回的了，因为注意力在同样的河道里在一定程度上顺流而下地消失了。

在我有时相信我在整个文科中学时代和早些时候特别能作敏锐思

维，以及只是由于后来我的记忆力减弱在今天再不能合理评价这一点的时候，我又一次地如此认识到，我的不好的记忆力只是在阿谀我，我在思想上表现得非常懒惰，至少在那些本身无关紧要的，但后果严重的事情中。如此，我自然是在回忆，我在文科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那个时候我大概很容易疲乏——与贝尔格曼在一种要么是内心中发现的或者是模仿他的犹太经典的方式去争论有关上帝和他的前景，即使不很详尽。我当时很喜欢以在一本基督教杂志——我想是《基督世界》——里找到的主题为出发点。在这个主题里，一座钟和世界，制钟人和上帝互相面对面而立，制钟人的存在应该证明了上帝的那个存在。按照我的意见，我能面对贝尔格曼很巧妙地驳斥了这一点，虽然这辩驳理论在我心中并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而我必须要安静下来，为运用它而组织一番，就如玩一种耐心的游戏。这样的辩论是当我们绕着市政厅塔楼走的时候进行的。因为我们两人曾在几年前互相回忆过这件事，所以我记得相当清楚。

但在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出色的时候——不同于那种对我要有出色的期望，何况对于从事这种工作和因而产生效果的欢乐并不将我向这方面引导——，我只是由于没有足够强有力的思索才容忍我总是穿着不怎么样的衣服来去走动，这些衣服是我双亲从个别的裁缝店那里交替为我缝制的，最早是一位在努斯勒的裁缝做的。我当然注意到，我出外行走特别穿得不好，这是非常无关紧要的事，而且也只用一只眼睛去看待此事。如果别人穿得好的话，过了多少年我也没有想到要在我的衣服上去寻找我可怜外表的原因。因为在当时我已经在预感中比在实际中更多地开始轻蔑自己，我深信，衣服就我而言只是接纳这个当初如木板僵直的、后来挂着皱褶的外貌而已。我根本不想穿新衣服，因为如果我外表已经丑陋，我至少要让它感到舒适些，我也想避免将新服装的丑陋展示给这个已经习惯了旧服装的世界。我长期以来坚持拒绝母亲常要让我人为我做这类新衣服。她以成年人的双眼自然能看出这种新的与旧的衣服之间的区别，当我不得不在我双亲证实之下，想到没有什么会对我的外貌感兴趣的时候，这种拒绝从这方面来说却对我产生了反作用。

1912年

1月2日。因此，在我的态度中，我对不好的衣服听之任之，走在街上，佝着背，斜着肩，双手和双臂不知所措。我害怕照镜子，因为它会在一种我认为不可避免的丑陋中照出我来，而且这丑陋不可能全部按真实反映出来。我要是真有那样的外貌，我肯定会引起更大的震动。在星期日散步时，我忍受了母亲在我后背上温柔的推搡和许多太抽象的提醒和预言，我无法将这些跟我当时眼前的担心挂起钩来，最主要的是，我缺少哪怕只是微微地为实际的未来预先操心一下的能力。我和我的思想停留在眼前的事物和它们目前的状况之中，不是出于彻底性或过分坚守的兴趣，而是出于悲哀和恐惧。只要它不引起思想上的软弱，出于悲哀，因为当今对我来说是那么可悲，我相信，在这个当代充满幸福之前，我是不可能离开它的。出于恐惧，因为我是多么害怕眼前迈出最小的步子啊，我认为在我轻蔑而幼稚可笑出场的时候，我带着严肃的责任感去评判伟大的具有男子气概的未来是不值得的。这个未来对我来说是多么地不可能出现啊。在我看来，每一个小小的前进就像是一种欺骗，最近的东西是够不着的。

与真正的进步相比，我更容易承认奇迹，但我太冷淡，而听任奇迹和真正的进步在它们各自的范围内存在。因此我能够在入睡前长时间地想着，有一天我将作为一个富翁坐着四匹马拉的车子驶进犹太人的城市，下一个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解放一位被无理殴打的漂亮姑娘，并坐着我的车子继续驶去，但不感染那种大概只有靠着不健康的性欲而活着的玩乐信念，并确信，我不会通过这一年的最终考试。这要是成功的话，我将不会在下一个年级里继续读下去，如果这也许会由于骗局而避免的话，我在高级中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最后非栽不可。此外，在什么样的时刻无关紧要，我完全肯定会使由于我表面上顺序渐进而被弄得昏昏欲睡的双亲大吃一惊，而且由于突然领悟一个闻所未闻的无能一下子使其他的世界惊异不已。因为我从来只是将我的无能——只是极少将我薄弱的文学工作——看作是指向未来的路标，一种再三考虑未来的做法从来没有给我带来好处，它只是继续网织眼前的悲哀。如果我想的话，我虽然可以挺直地走路，但它使我疲倦，而且我也不可能认识到，一种佝偻的姿态会在未来对我有什么伤害。如果我会有一个未来的话，那么，我的感觉是这样的，那就是所有的一切自己会走向正常。一种如此的原则不是因为它包含着对一种未来的信任——这种未来的存在当然是不可

相信的——才被选择的，更为确切地说，它只是有着使我的生活轻松的目的。如此的走路、穿衣、洗漱、读书，首先是将自己关在家中，好像这使我最少花力气，好像不需要多少勇气。如果我超出了这个范围，这样，我只是走上了可笑的路途。

有一次，看来没有一件黑色的节日礼服可能是过不去了，特别是在是否要参加一种舞蹈课的问题上，我也面临着决断。那位来自努斯勒的裁缝被叫来商量裁剪这件衣服。像往常一样，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总是优柔寡断，我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害怕，由于这种详细询问不仅会被拽进一种不舒适的紧接着的事情中去，而且更有甚者是被拽进更为糟糕的下一个问题中去。所以我不想做黑色礼服，当有人在陌生人面前指出我没有黑色礼服而使我羞愧的时候，我容忍了。别人建议穿燕尾服，但我将燕尾服看作是一种可怕的革命。人们最后读到了这点，但永远不能作出决定，最终我们统一在没有燕尾的晚礼服上了，由于它与一般的男式西服上装相似，看来使我能够接受。但当我听说，还要裁出西式西服坎肩，而且还得穿一件上浆的硬衬衫时，我几乎对我的力量变得有信心了，因为这样一种穿法必须拒绝。我不想要这种式样的西服上装，如果一定要的话，那就是一件用丝绸做衬垫的，而且是高高的紧闭式的西服上装。这样一种西服式样使这位裁缝很不明白，但他说道，我所设想的这样一种西服里的什么衬垫，那可能不是一种舞蹈礼服。好吧，它就算不是舞蹈礼服，我也根本不想跳舞。这长时间也没定下来，对此，我只想要做这件描述过的西服上装。当我后来一直羞愧地躲避，没有说明、没有愿望地听任量体裁剪并试穿时，裁缝在理解上就更加产生惊疑了。由于母亲催逼，我别无他法，只有如此尴尬地与他一起越过旧城的环形路，去一家有旧衣服的橱窗，我在早些时候就已经看到过这样一件并不使人感到为难的西服上装摊开在这个橱窗里，并认为对我是很合适的。但遗憾的是这件衣服已被拿出橱窗了。当然在商店里面他怎么努力地看也弄不明白。我可不敢进到商店的里面，只是为看看那件西服上装。这样，我们早就意见不一地回来了。但对我来说，这件未来的西服上装由于这种办法的无效已该诅咒，至少我要把这些翻来覆去说法的气恼变成借口，随便定做一件什么小玩意，并为这件西服上装敷衍几句，将这位裁缝打发走了，给我留下的是在母亲责备下的疲惫不堪，并永远地——这一切对我来说永远地过去了——与姑娘们、与衣着入时的举止和跳舞时的交谈无缘了。从我在这方面同时感到的快乐里使我觉得痛苦，除此而外，我害怕在裁缝面前被取笑的景象。迄今，他的顾客里还没有一个这样的顾客哩。

1月3日。读了《新周报》里的许多文章。小说《赤裸裸的男人》^[43]开始，总的说有点太乏清晰。霍普特曼的《加布里尔·席林的逃跑》。人的教养。不论好与坏均大有教益。

除夕。我打算下午给马克斯朗诵日记中的东西，我高兴地盼望着，却并未完成此事。我们的感觉并不一致，我预料这个下午在他身上会表现出精打细算的小气和匆忙，他几乎不是我的朋友，但不管怎么说还是那样远远地牵制着我，使得我在一再徒劳地翻阅本子的时候总看到他的一双眼睛，总是同样的页码在飞过，并觉得这种翻来翻去确实讨厌。从这种互相紧张的关系出发来共同工作，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在互相对抗的情况下完成的《理查德和萨穆埃尔》的这个方面只是马克斯能量的一个证明，否则会是糟糕的。除夕在卡达。不是那么坏，因为韦尔奇、基施以及还有一个人掺进了新鲜的血液。最终，我还是找到了马克斯，当然只是在那个社交场合的边缘。在路边拥挤的人群里，我还没看他一眼，就握了他的手，并自豪地直接走回家中，紧紧地挟着我的三个笔记本，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在回忆里一样。

火焰在胡同里一座新建筑前的一只坩埚四周像牛草一样往上蹿。

在我身上一种对写作全力以赴的专心致志已经看得出来了。当它在我的体内各组织中变得清晰的时候，这写作就是我生命的最有用的方向，一切都向那里拥挤而去，让所有的集中于性的欢乐的、吃和喝的欢乐的、哲学思考的欢乐的、最最多的便是音乐的欢乐的能力全都腾空了。我向着所有这些方向而变瘦了。这是必要的，因为从它的整体来说我的全部力量是那么微不足道，它们只是聚集起来才差不多能够为写作的目的服务。我自然不是独立地和有意识地发现这个目的的，它本身就存在，但这是从根本上来讲，现在只是受到办公室事情的阻碍。但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为这些事情而伤心，而使我不能容忍情人，我几乎完全如理解音乐那样去理解爱情，而且不得不用表面的一飞而过的效果来欢娱自己。为欢庆除夕，在吃晚饭时，我吃了细卷雅葱和菠菜，喝了四分之一的克莱斯，而且没能于星期日到马克斯那里参加他哲学文章的朗诵；所有这一切事物的平衡是显而易见的。我只有将办公室的事情从这个团体抛出去，为开始我真正的生命，因为我的发展如今已经完成，以及就我能够看到的而言，我已经再没有什么去牺牲的了，在我真正的生命中，我的面孔最终会随着我工作的进展而在自然的法则中衰老。

一种交谈有时会突然改变话题，最初详细地谈论着内心最深处存在

的担忧，然后，恰恰不是谈话本身的中断，自然也不是由于谈话本身发展需要，便讨论起他们将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下再一次见面，以及到那个时候必须考虑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这次谈话还以一次握手结束的话，这样，人们就会带着瞬间的对我们生活纯粹而牢固结构的信仰和尊敬而各奔东西。

在一部自传里，在那些按事实来说应该用“有一次”的地方，却大量地用了“经常”两字，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们总是知道，回忆来自模糊，这模糊被“有一次”这个词炸得粉碎，而虽然有“经常”这个词，但也没有得到保护，但至少在写自传的人看来。这模糊得到了保存，并让他越过局部，而这些局部大概在他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但却是对他在他的回忆中即使用一种感知再也接触不到的那些事情的一种补偿。

1月4日。只是因为我爱虚荣，我非常喜欢在我的姐妹面前朗诵（例如，我今天就因此很晚才写东西）。不是我相信，我会在朗诵中取得什么重要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支配我的只是将我使劲逼近我所朗诵好作品的欲望，如此，我和她们取得一致，并不是通过我的功劳，而是在于通过我的朗诵激起的对无意义的地方产生的我的姐妹倾听着的注意力，因此我也在爱虚荣掩盖着效果这个原因下参与这部作品本身产生的各种影响。所以，我在姐妹们面前朗读实际上也是值得赞赏的，我用一种我感觉到特别的准确性来充实某些加重的地方。后来，不仅仅是我，而且还有我的姐妹们，都非常地嘉奖了一番。

可是我如果在勃罗德或者鲍姆或者其他人的面前朗读的话，我的朗读会因为我需要称赞而肯定对他们每一个人绝无益处，即使他们每一个人对我其他的朗诵优点一无所知。就在这里，我看到听者坚持将我与我朗读的内容分开，按照我的感觉，期待不到听众的支持，不变得可笑，我不可能将自己与朗读的内容全都联系起来的。我以声音围着必须要朗诵的句子飞翔，试图闯入某些地方，因为人们想做到这一点，但打算做到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别人根本不期待从我这里得到这个。那么，人们到底想什么呢？没有虚荣心，宁静而远远地朗诵，如果需要我的热情的话，那我就得要热情起来，这个，我不可能做到，尽管我相信必须要忍受这些，并要对此感到知足。在别人的面前比在我的姐妹面前朗诵得糟糕，正表现出我这次应该是不对的爱虚荣之心。当我感觉到感情上受到伤害的时候，如果有人在这朗诵的内容里有所指责的话，我会脸红，并想迅速地继续读下去；如果我已经一下子开始了朗读的话，就好像我要

特别努力地没完没了地朗读下去，那是不知不觉地在渴求。在长时间朗读的过程中，至少在我的内心中将产生那种与朗读内容一致的爱虚荣的错误感觉，在这个时候我忘了，我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瞬间的力量。从我的感情出发，对全体清醒的听众施加影响，而在家中总是姐妹们在听，她们开始就是要随意更换内容的。

1月5日。两天来我察觉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冷淡和漠不关心，我想什么时候如此就什么时候如此。昨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我觉得路上的每一个小小的嘈杂声响，每一束射向我的目光，每一幅橱窗里的照片，都比我重要。

单调。历史。

如果有人晚上最终决定留在家中，他已经穿上晚服，在用餐之后，坐在灯下的桌旁，准备做那个工作或那个游戏，结束之后，习惯地去睡觉。如果外面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天气，它理所当然要把人留在家中了，要是他现在静静地在桌边坐得太久的话，一下子离开肯定不仅会引起父亲的不高兴，而且还要引起所有人的惊异。如果这个时候楼梯上也是一片黑暗，家中的大门是关着的，以及，如果他这个时候不顾一切地在一种突然出现的不快的情绪中站起身来，换上衣服，马上穿上上街的衣，宣称一定要出去一下，不一会儿也作一告别，就在这极快的速度之后，他也快速地关上房门，以此来打断大家对他离去的议论，他相信这或多或少留下了不愉快。当他在街上用四肢重新找回自己的时候，这四肢以特有的灵活在回报着这种没有料到的自由，这是他为它们创造的自由。如果他感觉到用这样一种决心在自己身上激起了所有决断的能力；如果他以比一般更为重大的意义去认识他有着比需要更多的力量去轻易地引来并承受最快的变化，他独自泰然自若地在理解和宁静中、在这样的乐趣中成长着，那么，他这个晚上如此彻底地走出他的家庭，他怎么不能更加一把劲以最遥远的旅行来达到这一点呢？而且他就已经有了一个经历，他只能称这个经历是俄国式的，因为他认为对欧洲来说，那里是最孤独的地方。如果他在这个较迟的晚上要寻找一位朋友，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那么这会更有意思。[\[44\]](#)

韦尔奇被邀请出席克卢格夫人的义演。洛维头疼得厉害，看上去露出了严重头疼的痛苦表情，依在下面的街道旁等着我，绝望地用右手撑着额头，抵在一面房墙上。我向韦尔奇指着，韦尔奇从长沙发上起来伸出窗口去看。我相信这是第一次在我的生活中以这种轻佻的方式从窗

口去观看下面街道上的一件就在我身边遇到的事情。就其本身来说福尔摩斯侦探这样的观察对我倒是相宜的。

1月6日。昨天看法伊曼的《总督》。我失去了对这些片断中犹太人风俗的印象能力，因为它们太雷同了，而且变成一种为个别有力的爆发而引以为荣的悲叹。在最初的一些片断中，我可能想到要陷入到一种犹太味的东西中去，在这里面会有着我身上的东西的起源，它会朝着我发展，并将因此而在我的笨拙的犹太气味里启迪我，带领我继续走下去。可是并非如此，这源头在我听得越多的情况下竟离我而去。人自然是留下来了，而且我还要与他们交往。

克卢格夫人义演，因此唱了几个新歌，还进行了一些新的诙谐的表演。可是只是在她刚上台唱歌时，我完全处在她的印象之中，后来，我与她目光的每个细小部分都处在最牢固的联系中，还有与她唱歌时伸展的手臂和弹出声音来的手指，与她卷得紧紧密密的两鬓上的头发，与她那件平坦而雅洁的衬在坎肩里面的薄薄的衬衫，与她那片在享受诙谐表演获得的效果时曾经噘起的下嘴唇（“你们听吧，我会所有的语言，但用依地语说。”），与她那丰腴而可爱的双脚。这双脚穿着白色的直至下面脚跟的长筒袜，最后被鞋挡住了。因为她昨天唱了新的歌曲，损害了她给我的主要影响，这影响在于，这里有一人出台亮相，他找出了一些笑话和歌曲，他的气质和他所有的力量将这些幽默的笑话和歌曲表演到最完美的境地。因为演出成功了，一切也就达到了；而且我们很高兴这位先生经常来影响我们，当然——在这方面，大概所有的听众都与我一致——我们不会被不断重复那些总是同样的歌曲所迷惑。我们会赞成把它作为聚会的辅助手段，正如大厅的灯光变暗一样，而从这位夫人的角度看，我们会在这里面认识到无所畏惧和自我意识，这些正是我们所寻找的。当新歌曲因此而出现的时候，它们并没有给克卢格夫人展示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因为过去的那些歌曲已经那么完美地完成了它们本身的使命，所以当这些歌曲要求作为歌曲被重视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当它们因此而使克卢格夫人分心的时候，但同时表现出她本人在这些歌曲中并不感到舒服，部分是因为不合适，部分是因为过分夸张了脸部表情和各种动作，人们的心情不得不变得恶劣起来，留下来的只是由此得到的安慰，即由于她早先决不动摇的真实性而趋于完美的表演。人们怎么也无法抹去对她的回忆，即使是在看到她目前形象的时候也并不受影响。

1月7日。遗憾契西克夫人总有角色，这些角色只展现了实质的精髓，她总是演一些受到一次打击变得不幸、被嘲弄、受侮辱、在感情上受伤害的妇女和姑娘，但上帝并没有赐予她们时间在自然的规则中发展她们的本性。在突然出现的自然威力面前，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能做出怎样的成就，她就用这种威力去表演那些角色，这些角色也只有在表演中才达到顶点，而在写成的剧本里相反，由于他们要求的丰富性，仅仅是影射而已。——她的一个重要的令人战栗的动作来自有些僵持的、抽搐的臀部。她的小女儿好像就有一个完全僵硬的臀部。——如果演员们互相拥抱时，他们都互相紧紧地按住对方的假发。

当我最近跟洛维上楼进他房间他要给我读他写给华沙作家诺姆伯格信的时候，我们在楼梯的平台处碰到了契西克夫妇。他们提着演《科尔尼德尔》的服装道具，就像用棉纸包着的犹太人在逾越节吃的那种面包似的，上楼朝他们房间走去。我手扶着栏杆，并费劲地说了几句话。她的大嘴巴离我面前那么近，在令人惊异的，却是自然的形状里动了几下。这种交谈由于我的愧疚而即将变得没有希望，因为经过我的努力，仓促地表达了全部的爱和忠诚，我只是断定，剧团的事业不景气了，她全部的保留节目已经山穷水尽了，他们可能不再长期留下了，对他们来说布拉格犹太人没有兴趣的表现是不可理喻的。我星期一——她请我——应该去看看《赛义德之夜》，尽管我已经看过。那么，我将又会听到她唱那首我特别喜爱的歌（bore Isroel）了，就如她在一次回忆过去的时候发现的那样。

“耶席韦”就是犹太教法典的高等学府，在波兰和俄国，许多犹太人聚居区都坚持办这样的学校。花费并不太多，因为这些学校绝大多数都办在古老的废弃不用的建筑里，在这建筑里除了学生的教室和寝室之外，便是一般为教区服务的领导者和他助手的住所。学生不交学费，轮流在教区的居民家吃饭。尽管这种学校建立在最严格的信仰基础之上，但它们恰恰是背叛与进步的发源地，因为年轻人都从远处聚集到这里来，而且正是这些贫穷的、有能力的人才渴求离开家庭——因为这里管理并不太严格，年轻人在这里互相帮助，重要的学习部分是在一起研讨，艰深的地方就互相解释——因为学生们所来自的不同地方的虔诚信仰都是一致的，它不需要互相解说。同时，被压制的进步，视各种不同地方的情况而定，在极为不同的各种方式中上升与下落。这么一来，这里总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此外，因为总是有这个或那个被禁止的进步文学落到个别人的手里，这些文字在耶席韦里从各个方面汇集起来，并

在这里发生影响。每一个占有这些文字的人不仅继续传递这些文章，而且还传递他自己的火焰——由于这些原因和它们紧接着产生的后果，在最后的一段时期里从这学校里走出了不少进步诗人、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学者。因此，一方面这些学校有着严格信仰的声誉一落千丈，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先期意识进步的年轻人不断涌向这些学校。

奥斯特罗的耶席韦是一所著名的犹太教法典高等学府。奥斯特罗是个小地方，距华沙8个小时的火车路程。整个奥斯特罗本来只是一段非常短的公路装饰，洛维说它的形状如一条手杖。当有一次一位伯爵坐着一辆四匹马拉的旅游车在奥斯特罗作停留的时候，前面的两匹马和车子的尾部都已经不在奥斯特罗的土地上了。

洛维大约在14岁当家中的生活逼得他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决定去奥斯特罗。当他将近黄昏离开克劳斯时，正好父亲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匆匆地跟他说，以后他将去看他，必须要和他谈谈。因为这里显然除了谴责，什么也没有可以期待的了。洛维直接离开克劳斯，不带行李，穿了一件较好的犹太人长袍。那是星期六的晚上，带着他一直揣在身上的全部的钱来到火车站，乘上10点的列车去奥斯特罗，早晨7点左右就到那里了。他直接步行到耶席韦，他到那里并没引起轰动，因为谁都可以进一所耶席韦，并不需要通过什么特别的录取条件。引人注意的只是，他恰恰是在这个时间里——那是夏天——到这里上学，这是不常见的，还因为他穿了一件好的长袍。但别人不一会儿便习惯了，因为这些青年人很快就熟了，在一种我们无法明白的威力里，他们通过他们犹太民族的东西互相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在学习中，他显得很出色，因为他从家里就带去了不少知识。他很愿意与陌生的青年人聊天，特别是当大家获悉他带的钞票，便都围上来建议他买这买那。有一个要卖给他“日子票”的人使他感到特别惊讶。在“日子票”上画着供穷大学生的免费午餐，它们所以能成为可出售的物品，因为教区里提供免费午餐的成员并不管人物的声望而只想做一件上帝所喜欢的事情而已，至于谁坐到这里用午餐，对他们来说都一样。如果一个大学生特别机灵的话，他便可能成功地弄到一天两顿免费午餐。他完全能够承受这双倍的午餐，更何况这些午餐并不是那么丰盛，人们自然就可以吃了一家，再带着颇大的享受去吃第二家。往往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天虽然挤满了两顿午餐，可是别的日子里却是空空如也。尽管如此，每一个人自然还是那么高兴，如果他找到机会，有利可图地会将这样一种不计其数的午餐卖掉。如果有一个像洛维那样的人在夏天来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正是免费午餐早已发放

完了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也只能通过用钱买的办法来得到这免费午餐，因为一开始许多免费午餐就被那些投机者霸占了。

耶席韦里的晚上是无法忍受的。所有的窗户虽然都开着，可是夜里很热，臭味和闷热一点儿也没有从房间里排出去。那些没有了原来床位的大学生不脱衣服，他们就在他们最后坐的地方，和着汗湿的衣服躺倒在那里睡起觉来。到处都有跳蚤。到了早晨醒来，每个人都只是略略地用水沾湿一下手和脸，便又开始学习。他们绝大部分是在一起学习，一般是两个人用一本书。辩论往往将更多的人连结在一个圈子里。那位校长只是偶尔解释一下最难的地方。尽管洛维后来——他在奥斯特罗待了十天，但吃和睡都在旅馆——找到两个与他志趣相投的朋友（人们互相寻找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一开始人们总是要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思想品质和信赖的程度），可是他还是非常愿意再回家，因为他习惯于一种有规律的生活，而且在乡思的痛苦面前他也坚持不住了。

在大房间里是玩牌的喧哗，后来是和平时一样的、从父亲那里发出的就如他今天一样健康的、没有什么连贯性的大声聊天的嘈杂声。这些谈话只表现出一种不拘礼节吵闹的小小的紧张。仆人房间的门完全开着，里面睡着小菲利斯^[45]。在另一边是我的房间，我睡在这里。考虑到我的年纪这房间的门是关着的。此外，通过开着的门表明，家里的人还常常想看看菲利斯，而我与他们已经有着某种距离。

昨天在鲍姆那里。施特罗勃尔应该来的。鲍姆念一篇小品文《关于民歌》，不怎么样。然后念一章《命运的游戏与严肃》，很好。我显得冷淡，情绪很糟，得不出整体纯粹的印象。在雨中回家的路上，马克斯向我讲述目前《伊尔马·波拉克》的计划。我无法承认我的状态，因为马克斯从来没有正确地看到这点。我不得不因此而不坦率起来，这最终使我扫兴。我是那么易于伤感，使得我宁愿跟马克斯说话，如果他的面孔布上了阴影，尽管后来我的面孔能轻而易举地表现出明朗来，但后来这部小说的神秘的结尾越过一切阻碍感动了我。在告别后回家的路上我后悔与他们不会交际的虚伪和痛苦。我打算编一本有关我与马克斯关系的小册子。没有写下的内容在一个人的眼前闪烁，视觉上的偶然事件决定着全盘的评价。

我躺在长沙发上，在我两边的房间里大声说话的声音，左边只有女人的声音，右边更多的是男人的声音。我有这样的印象，那是粗野的、黑人一般的、平静不下来的动物，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他

们好像为使空气运动才说话，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抬起脸孔，并追随着他们说出来的话语。

对我来说，这个安静的下雨的星期日就这样过去了。我坐在卧室里，安静地待着，并不决定写什么，例如前天我也许已经想把我是什么的一切内容倾注到这写作中去，我现在好长一段时间目瞪口呆地凝视我的手指。我相信，这个星期全受歌德影响了，这种影响的力量正已耗尽，因此而变得无用了。

从罗申费尔德的一首描绘海上风暴的诗中摘出的句子：“灵魂上下扑腾，躯体在战栗。”洛维在引用的时候，额头和鼻根部的皮肤在抽搐，就如人们只相信手才会抽搐的那样。遇到感人的地方，他欲让别人了解它们，他自己越来越向我们靠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本人变得高大了，他的目光更亮了。他只是稍微地向前走，眼睛睁得大大的，用无所事事的左手拽着紧扣的外衣，将摊开的大大的右手朝我们伸来。如果我们还没有理解的话，那我们应该承认他受感动的情景，并向他说明这种被描写的幸是可能的。

我得裸体站在阿舍尔画家面前作圣塞巴斯蒂安^[46]的模特儿。

如果我现在在晚上回到我的亲戚那里去，因为我不再写什么我所高兴的东西，我对他们比对我来说更为陌生、可鄙、无益。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感觉（它不会被如此清楚的观察欺骗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大家都尊重我、爱护我。

1月24日。星期三。我如此长的时间没写东西，是由于下列原因：我跟我的上司生气，通过一封心平气和的信才将此事澄清；在工厂的次数越来越多；读派因的《德国犹太人文学史》，有500页，而且读得入了神，带着如此的透彻，快速和欢乐在读类似书籍中还从来没有过；现在我读弗罗默的《犹太风俗解析》；最后我与犹太演员们有许多事要做，为他们写了不少信件，我在犹太复国主义协会那里坚持征询波希米亚的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是否需要剧团的客串演出，我写了必要的通告并让复印出来；我又一次看了《苏拉米特》，还看了一遍里希特的《赫尔采勒·梅吉歇斯》，出席了巴尔—科赫巴社团的民歌晚会，前天看施密特波恩的《格莱辛伯爵》。

民歌晚会。纳坦·比恩鲍姆博士做演讲。东方犹太人的习惯，在讲话

停顿的地方，以“我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或只用“我尊敬的人们”来补充。讲话在开始时的重复使比恩鲍姆博士变得可笑起来。但我对洛维认识到如此程度，我相信，往往在一般东方犹太人的讲话里出现的常用语，如“我多么伤心”或“这不是”或“这应该有好多要说的”，它们并不是来掩饰自己的狼狈的，而是作为全新的源泉涌进对东方犹太人的气质来说总是极难固定在那里的演讲的大河里了。在比恩鲍姆那里却不是这样。

1月26日。韦尔奇先生的背朝着朗诵的人，整个大厅一片宁静，倾听着不怎么样的诗朗诵。——比恩鲍姆：他的发型将长头发显眼地从上面披盖到脖颈下面，脖子有时突然被头发暴露出来或自己显露出来，都是那么笔直。大大弯曲的、并不太窄的，但却是向着旁边的显得宽而平的鼻子，这鼻子看上去首先由于跟大胡子形成的妙不可言的比例而给人以美的感觉。——歌唱家戈拉宁。平和的、甜蜜的、美妙的、倨傲而又显示宽容的、把脸转向一边或低往深处而长时坚持着的、皱起鼻子表现得有些尖锐的微笑，但这微笑也只能属于嘴巴的技巧而已。

1月31日。没有写什么。韦尔奇给我带来有关歌德的书籍，这些书引起了不能集中思想、什么地方也应用不了的激动。计划写一篇论文《歌德惊人的实质》，害怕我现在为自己引来的晚上两个小时的散步。

2月4日。三天前看韦德京德的《大地之神》。韦德京德和他妻子蒂利一同演出。她嗓音清晰而咄咄逼人，有一张瘦削的弯月形的脸。在静静地站立时小腿向旁边支出去。这出戏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让人们安静地、自信地走回家去。极为牢固建立起来的东西与留下陌生的东西矛盾着的印象。

当我当时去剧院时，我觉得舒服。我感觉我的内心如蜜一般甜，不断地一口一口地啜饮着。这在剧院里立即消逝了。顺便提一下前一次剧院的晚上：由帕伦贝尔格演出《奥尔孚斯在冥府》^[47]。演出那么糟糕，掌声与大笑声在我座位周围如此地此起彼伏，使得我只知用这个办法来解脱，即在第二幕之后我便离去，把这一切喧嚣变成了寂静。

前天为洛维的客串演出向特劳特瑙写了善意的信。每读一次这封信便使我平静，并使我精力充沛，这信里非同寻常地说出了没有说出来的有关我心中的所有善意。

我以贯注我全身的勤奋来读关于歌德的书（歌德的谈话，学生时代，与歌德在一起的时刻，歌德在法兰克福），而且这勤奋妨碍我作任何的写作。

商人S.，32岁，无宗教信仰，学哲学的，他对美术感兴趣的程度，也只局限于他文章涉及的部分。生得圆头圆脑，黑眼睛，显示活力的小胡子，敦实的个子。几年来一直是从9点学习到夜里1点。出生于斯坦尼斯瑙，希伯来语和行语专家。与一位只是由于非常圆的脸型而给人以愚笨印象的女子结婚。

两天来我冰冷地对待洛维。他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否认。

在剧院最高楼座于《大地之神》演出的幕间与陶西格小姐进行平静、谦让的谈话。人们要达到一次良好的交谈，必须认真地将手更为深入地、轻轻地、懒洋洋地推进要商谈的题目，然后将它举到令人吃惊的高度。否则人们就折断自己的手指，除了痛苦，便什么也不去想。

老一套：晚间散步。发明快速步行。进入美妙而黑暗的房间。

陶西格小姐讲述她新故事中的一个场景，在这个故事中有一次一位名声不好的姑娘进入缝纫学校。这是给其他姑娘的印象。我以为，她们会同情那些能够清醒地感觉到在自己身中的那种走向坏名誉的能力和乐趣，并因此同时能直接想象到那是意味着陷入到一种什么样的不幸。

一个星期前泰尔哈伯博士在犹太人市议会节日大厅做关于德国犹太人没落的演讲。这种没落是不可阻挡的了，因为最初犹太人聚集在城市里，犹太人的乡村教区消失了。追逐利润使他们精疲力竭。婚姻只是为考虑供养新娘而体现出来。两个孩子的体系。其次：混种。第三：洗礼。

滑稽的场景。当埃伦菲尔斯博士交叉起双手，互相挤压着，他变得越来越美。灯光下，他光秃的脑袋在一种飘忽的轮廓里为他从上面划出了一条界线。他的嗓音浑厚，就像在一种乐器上不时地调换音色，信赖地向着集会大众微笑，为着混合的种族说话。

2月5日。星期一。我由于劳累，也就放弃了读《诗与真》。我的外表是坚硬的，内心是冰冷的。当我今天去F.博士那里的时候，情况就好像我们如两只球撞到了一块，这一只将那一只撞回去了，而这一只本身

也失去控制地滚走了，尽管我们都慢慢地思考着走到一起。我问他，他是不是累了。他不累。我为什么问？我是累了，我回答，并坐了下来。

昨天与洛维在咖啡城，我又出现一次小小的失去力气的状态。我越过一张报纸向下弯着身子，为了瞒过他。

歌德美丽的全身黑色侧影像。在看这个整体的侧身像时，也同时产生了一种令人厌恶的印象，因为这样一种阶段的超越是出于可能想象之外的，这个阶段只是包含在整体里，外表看来是偶然的。笔直的姿态，下垂的手臂，细长的脖子，弯曲的双膝。

由于我的虚弱无力而引起的急躁和悲哀，特别地靠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双眼的未来前景而苟延着，这未来就是那样为我准备的。那是些什么样的夜晚啊，散步、躺在床上和长沙发上的绝望（2月7日），我所面临的事情比我已经克服了的还要糟得多！

昨日在工厂。女工们穿着令她们难以忍受的肮脏不堪的松松垮垮的衣服，像是刚睡醒似地那样披头散发，她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不断发出噪声的传动装置和分散的、虽然是自动的、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停下来的机器，面部表情木然。她们好像不是人，没有人向她们打招呼，要是有人冲撞了她们，也不道歉一声，别人叫她们干什么，她们就干什么，她们干完事便又立即回到机器房。别人对她们颐指气使，她们俯首帖耳地干活。她们穿着衬裙站在那里，受着最小头目的任意摆布，她们从不从容不迫地冷静地去理会这些小头目，她们只是用目光和鞠躬去默默忍受和顺从。可是一到6点钟，她们便互相呼叫，将围在脖子上、缠在头发上的布解开，用刷子刷去身上的灰土。她们在厂房里将这把刷子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有的还不耐烦地喊叫，催促前一个加快速度。她们将衣裙从头顶拉去脱掉，然后将双手洗得要有多干净有多干净——这样，她们终于成了妇女，尽管脸色苍白，牙齿不好，她们能够微笑，摇晃身体，人们再不可去冲撞她们，盯着她们或藐视她们。如果她们道一声晚安，别人就得为她们让路，靠到油迹斑斑的箱旁，将帽子拿在手中。有一位女子帮我们拿起冬大衣准备为我们穿上的时候，我们便不知如何承受了。

2月8日。歌德：我创作的兴致是无止境的。

我变得越来越神经过敏、虚弱无力，而且失去了一大部分前几年我

引以为骄傲的宁静。我今天收到鲍姆寄来的明信片，他在上面写道，他不能为东方犹太人晚会做演讲了，我不得不相信，我得承担起这件事来，我完全不顾无法控制的痉挛，小小的火焰是怎样沿着我身体的脉搏跳动的啊；我坐着，我的膝盖在桌下抽搐，我必须交替地压住双手。我要做一次好的演讲，这是肯定的，在这个晚上，上升到极端的不安自然要集中在我的身上，再不会有其他的不安的空间了，讲话径直从我的嘴里发出去，就像出自一根火枪筒。但可能发生的是，随后我便倒下，不管怎么说，不会熬太长时间。身体是这么虚弱！甚至这些语句也是在这种虚弱影响的状况下写成的。

昨天晚上在鲍姆和洛维那里，我活起来了。最近洛维在鲍姆那里翻译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希伯来故事《眼睛》。

2月13日。我开始为洛维的演讲会写讲稿。演讲会就在星期天，16点。我不会有更多的时间作准备了，只是因为几天来一种不断的激动逼进着我，我在原来开始的半途撤回，只想为自己写下几句话，然后，稍稍地进行下去，将我放在公众之前。冷和热随着句子中的字词的变换而在我身体里交替着，我梦见旋律一般的高潮和低落，我读歌德的句子，就好像用整个身体走遍了那些重读音节的地方。

2月25日。从今天起抓住日记！定时地写！不放弃！即使不能得到精神与肉体上的拯救，那么，我想无论什么时刻它也是值得的。这个晚上我在家中的桌旁显得完全冷漠淡然，右手放在我旁边正玩着牌的妹妹坐的椅子扶手上，左手无力地放在怀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打算弄清楚我的不幸，但没有成功。

我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写什么东西了，因为1912年2月18日我在犹太人市议会的节日大厅里举办了一个洛维演讲晚会。在这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有关行话的开场演讲。两个星期来，我一直生活在担心之中，因为我不能将这个演讲整理出个眉目来。在演讲前的晚上我竟突然成功了。

做演讲的准备：与巴尔—科赫巴社团磋商，编制节目程序、入场券，排列座位号码，准备钢琴（托因比大厅）的钥匙，加高讲台，以及钢琴演奏员、服装道具、门票销售、报纸报道、警方事务以及文化机关的审查。

我去了一些地方，跟一些人谈话，或者给一些人写信。大致是：与马克斯，与在我这里的施梅尔勒，与一开始承担然后拒绝举办这次演讲会的鲍姆，在为此定下这样一个晚上的过程中又与鲍姆重新商定，他第二天又打电报来推翻此事。与胡戈·赫尔曼博士和莱奥·赫尔曼在阿尔科咖啡馆，经常与罗伯特·韦尔奇在他的住处，与B1.博士（白费精力）、H.博士、F1.博士谈关于门票销售，拜访T.小姐，在阿菲克·耶胡达的演讲（埃伦特罗伊经师耶利米的忠诚和他的时代，在愉快的聚会中后来做了个小小的不成功的关于洛维的讲话），在教师W.那里（然后在咖啡馆，然后散步，从12点到1点，他站在我家门前活泼得像一个动物，不让我进去）。关于大厅的事，去卡尔·B博士那里，两次去霍伊瓦格广场的L.家里，几次去奥托·彼克那里，去银行，因为钢琴钥匙，出席托因比报告会，去见R.先生和St.教师，然后在St.教师的住处拿到钥匙，并又送回去，因为讲台的事去见市议会的勤杂工和仆人，因为付款事去市议会文书处（两次），因为销售事在“保护桌面”展览会上见Fr.夫人。写信给T.小姐，给一位奥托·K1（没有效果），给“日报”（没有效果），给洛维（“我将不能做演讲，请您救我！”）。

激动：由于演讲，一夜辗转反侧，热得睡不着。仇恨B.博士，害怕韦尔奇（他什么也不能卖）、阿菲克·耶胡达，在报纸中出现的报道情况不是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在办公室里心不在焉，讲台并没到，票子销售得不多。票子的颜色使我感到刺激，演讲必须中断，因为演奏钢琴的人将乐谱忘在家中了，一大堆对洛维的冷漠，几乎是厌恶。

有益：喜欢上洛维，并信任他，在我做演讲的时候出现的骄傲的、超凡的意识（无情地对着观众，缺乏训练妨碍我自由地做出令人兴奋的动作），强有力的声音，不费劲的记忆，赞赏，但首先是威力，用这种威力，我大声地、肯定地、坚决地、无可指责地、不可阻挡地、明察秋毫地、几乎是不屑一顾地压制了市议会的三个工作人员的无赖行为，没按他们要求的12个克郎给，而只给了6克郎，而且还俨然是一个伟大的主人。这时候表现出来的我所喜欢并信赖的力量，能保持住该多好啊。（当时我的父母并不在场。）

其他：索菲因岛上的赫尔德尔联合会学院。比厄随着演讲开始便把手插进裤袋。那些随己意行动的人的那种在一切迷惑之下觉得满意的面孔。霍夫曼斯塔用嗓子的假声朗诵。从紧贴在脑袋上的耳朵开始收集起来的形象。维申塔尔。美丽的跳舞场地，例如在一种向后倒在地上的

动作里显示自然的体重。

托因比大厅留下的印象。

犹太复国主义的大会。布卢门菲尔德。犹太复国主义世界组织的秘书。

在我的自我思考中，从近一个时期来，一种新的增强着的力量出现了，我现在才刚刚认识到这个力量，因为在上个星期我简直溶化在悲哀和无用的面前了。

处在阿尔科咖啡馆里的年轻人当中，我有种交替变化的感觉。

2月26日。自我意识越来越好。心跳接近了愿望。煤气灯在我的上方发出啾啾声。

我打开了家门，看看，是不是天气能诱人去作一次散步。蓝天是不可否认的，但大片透过蓝光的灰色云块带着盖状的弯曲边缘飘下，好像人们站在附近森林覆盖的山坡上才能测出来。尽管这样，街道上还是有许多出来散步的人。小孩的车子由母亲的手牢牢地把握着。这里或那里有一辆马车停在人群里等待着，直至马匹拉上车要走前人们才离去。在这期间，驾车的人微微向前看着，安详地抓着颤动的缰绳，什么小事都不忽略，对所有的东西都要掂量一会儿，在准确的刹那间给车子以最后的动力。即使空间如此少，孩子们照跑不误。行走的姑娘们穿着轻薄的衣服，臀部像邮票涂上颜色一样那么显眼，挽着年轻男子的手臂，在她们的喉咙里压低的旋律在她们双腿的舞步里表现出来了。有的全家亲密地集合在一起，有时也分散成了一个长长的队，这样，回过头去便一下子发现后面伸出的手臂，示意的双手，昵称名字的呼喊，这就将丢失的成员联系住了。独处的男人们试图将自己禁锢得更紧，他们将双手插在口袋里。这是狭隘的愚蠢。起初，我站在住所大门的里边，然后倚着门，较为平静地在一旁看着。有衣服掠过我的身边，有一次我抓住了一条带子，它是一位姑娘的衣服后面的装饰，被手拉得逐渐掉下来；当我有一次只是为了恭维而抚摸了一位姑娘的肩膀，跟着来的行人打了一下我的手指。我马上便将他拉到一扇门上门闩的门的后面，我的谴责是抬起双手，从眼角射出目光，向他走近一步，从他那里后退一步。我只是一推让他离去，他是幸运的了。从这时起我当然也常常将一些人叫到我这里来，用一个手指示意就足够了，或一种迅速而无论在什

么地方也不犹疑的目光。

在一种毫不费劲就能入睡的状态中，我写了这个毫无用处的、不成熟的东西。

今天我给洛维写信。我在这里给他写下了这些信，因为我希望用它们得到一些东西：

亲爱的朋友

2月27日。我没有时间将这些信写上两次。

昨天晚上10点钟，我迈着悲哀的步子走下采尔特纳街道。在赫斯帽子商店附近，有一个年轻男子在我前面斜线方向三步之遥站立着，这情况也让我站住了。他取下帽子，然后向我跑来。最初我吃惊地后退，最先想到的是，他是不是想知道去火车站的路，但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后来我以为，他是在亲密地向我走近，并从下面看着我的面孔，因为我变得高大了；他大概想要钱，或者还有更为麻烦的事情。我糊里糊涂的倾听与他糊里糊涂的讲话交织在一起了。“您是法学家，是吧？博士？我能不能请您在这个时候给我一个忠告？我现在有一件事，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出于小心、一般的怀疑和顾虑，我可能担心出丑，我否认自己是法学家，但准备给他一个忠告，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开始叙述，使我挺有兴趣；为了增加信任感，我要求他，还不如边走边跟我说，他愿意陪我，不对，倒不如说是我陪着他走，我并没有一定的路线。

他是一位良好的朗诵者，早先他远远没有如现在这样的好，现在他已经可以模仿凯因茨，没人分辨出他来。人们会说，他只是模仿他，但他付出了许多自己的东西。他虽然个子小，但表情、记忆、登台，一切一切他都有。在服役时期在外边的米罗韦茨军营里，他朗诵，一位同伴唱歌，他们消遣得很不错。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最爱朗诵德梅尔热情轻佻的诗歌，例如有关新娘的诗，它想象了新娘之夜的场景。如果他朗诵了这首诗，它就特别给姑娘们留下一个巨大的印象。那是理所当然的。他将这本德梅尔装帧得非常漂亮，包上了红色的皮面。（他用朝下移动的双手描绘着。）当然重要的不在于一本书的装帧。除此而外，他非常喜欢朗诵里迪穆斯。不，这完全不矛盾，他已经在这里起了调和的作用，在这个时候，他说些他突然想起的事情，他把观众当作了傻瓜。

后来在他的节目里他还提到《普罗米修斯》。他这时对任何人都无恐惧之感，也不害怕莫瓦西，莫瓦西喝酒，他不喝酒。最后他很喜欢朗诵斯威特·马顿，这是北方的一位新作家，很好。那是些诸如此类的箴言诗和短小的格言。特别是那些有关拿破仑的诗很不错，但也有其他的有关别的大人物的。不，他还不能朗诵这些诗，他还没有学过这些，还没有完全读过，只有她婶婶近来给他朗诵过，而且这同样使他那么喜欢。

他想带着这个节目公开登台，并愿意为《妇女进步》报献上一台朗诵晚会。本来他想先朗诵拉格尔洛弗的《庄园的故事》，而且还为审查的目的借用《妇女进步》报女头头杜莱格·沃德男斯基的故事。她说，这个故事也许很不错，但太长，不适合朗诵。他翻阅了一下，确实太长，特别是因为在这计划的朗诵晚会上还有他的兄弟要演奏钢琴。这位兄弟21岁，是一个很可爱的年轻艺术家，他在柏林的高等音乐学府学过两年（那已是4年前），但是完全堕落地回来了。堕落也许谈不上，但那位供他吃食的女人迷恋上了他。他后来讲述到，他常常演奏得太累了，因为他必须要经常不断地在这个提供吃食的盒子上来回驰骋。

因为这个庄园故事不合适，人们统一于另外的节目：德梅尔、里迪穆斯、《普罗米修斯》和斯威特·马顿。为了一开始就向杜莱格夫人显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给她带去一篇文章《生命的乐趣》的手稿，这是他今年夏天写好的。他是在避暑的时候写成的，白天速记，晚上修改、润色、誊清，对此本来没花太多的工作，他终于成功了。他要将它借给我，如果我想看的话。这虽是为大众而写的，是有针对性的，但里面有很不错的思想，而且像人们所说，这是“贝塔姆特”（抬起下巴发出尖刻的大笑）。我自然可以在这里的电灯光下翻阅（那是在要求青年人不要悲伤，是呀，我们有大自然，有自由，有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有鲜花、昆虫等等）。那时杜莱格说，她现在正好没有时间去读它，但他可以将它借给她，她要在几天之后把它还给他。他已经怀疑，并不想将它留下，他辩护地说：“比如，您看，杜莱格夫人，我为什么将它留下呢？这些只是些平庸乏味的语言，那是写好了，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必须将它留下。这是星期五。

2月28日。星期天早晨在洗漱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还没有读过“日报”。他打开报纸，一下子翻到了消遣副刊的第一页。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映入他的眼帘——《孩童创作家》，他读了前面几行——由于高兴而开始哭起来。那是他的文章，从一个字一个字看，就是他写的文

章。就是说报纸第一次登出他的文章，他跑到母亲那里说了这件事。太高兴了！这位老夫人，她患了糖尿病，父亲跟她离了婚，并打赢了这场官司，因此而感到自豪。一个儿子成了名人，现在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作家！在开始的激动之后，他在思考这件事情了。这篇文章到底是怎样跑到这份报纸上的？没有他的同意？没有署作者的名字？他没有得到稿酬？这肯定是一种对信任的滥用，是一种欺骗。这个女人真是一个魔鬼。女人们没有灵魂，默哈默德（经常重复地）说。人们很容易想象到，它是怎样成为剽窃作品的。哪里有一篇好文章，哪里就有人马上弄到这样的一篇文章。那就是这位杜夫人去“日报”社，和一位编辑坐在一起，两个人极度兴奋，而且着手改头换面。当然它必须要经过加工，因为第一，人们不能第一眼就看出这是剽窃的作品；第二，32页长的文章对报纸来说是太多了。

我问，他是否想给我指出那些完全相同的地方，因为这些也许使我特别感兴趣，而且我只有在这之后才能为他的举止提出忠告。他就开始念他的文章，翻开另一处地方，浏览着，没找到，却终于说道，这一切均是抄袭的。例如报纸上这样说：孩子的灵魂是一片没有被描绘的叶子，“没有被描绘的叶子”在他的文章里也有。或者“被叫作”这个表达方式也是抄袭的，一般人怎么会用这个“被叫作”的词呢。但他无法对逐个的地方作比较。虽然所有地方均是抄袭的，但进行了遮掩，次序作了另外的安排，对内容作了压缩，而且还掺进了小小的外来的配料。

我大声地念念报纸上引人注目的地方。这在文章中出现了吗？没有。这个呢？没有。可是这正是做了手脚的地方。在核心的地方，所有的，所有的内容全是抄袭的。可是证据，我担心，证据变得困难起来了。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借助于一位机敏的律师，为此，律师就在这里了（他企盼这种证据就如企盼一种全新的、与这件事完全分割开的任务一样，并且为他深信这个任务定会完成而感自豪）。

这是他的文章，人们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得出，它在两天里就印出来了。不然会延续六个星期，若一部被采纳了的稿件送到印刷厂之前。但这里当然需要加快速度，他不想发生意外，为此两天的时间就够了。

此外，报纸上的文章叫《孩童创作家》。这跟他有着明显的关系，另外它也是一种讥刺。“孩童”指的就是他，因为人们过去叫他为“孩童”，是“愚蠢”的意思（他只是在服役期间真是这样，他服役一年半），现在人们想以这个题目表明，他，一个孩童，完成了像这篇文章如此好

的东西。他虽然证明了自己是作家，但同时又是愚蠢的，因为他是那样地容易被欺骗。在第一段落里说到的孩童是乡村的一位表妹，她目前住在他母亲身边。

但这种剽窃通过下面的情况特别令人信服地被证实了，这个情况当然是他经过较长时间考虑之后想起的：《孩童作家》登在消遣增刊的第一版上，第三版上却是某一位“菲尔德斯坦”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名字显然是假名。现在人们不必去读整个故事，浏览一下第一行人们马上明白，这里的拉格尔洛弗是以一种厚颜无耻的手段模仿出来的。全部的故事将这种模仿表现得更为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位菲尔德斯坦女子，或者不管她叫什么，是杜莱格创造出来的，她在那里读过他带去的这个《庄园的故事》，她用这阅读的内容写成了那个故事。就是说这两个女人，一个在消遣增刊的第一版上，另一个在第三版上利用了他。当然每一个也都可以由自己驱使去阅读、去模仿拉格尔洛弗，但在这里他的影响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星期一中午，银行一下班，他自然去杜莱格夫人那里。她只将住房的门开了一条缝，显得十分害怕：“可是，莱希曼先生，您为什么中午来呢？我丈夫正睡着觉哩。我现在不能让您进来。”——“杜莱格夫人，您一定得让我进去。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她看到我一脸的严肃，便让我进去了。丈夫一定是不在家。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看见那张桌子上放着我的手稿，我马上思考起来。“杜莱格夫人，您拿我的手稿做了些什么。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将它交给了《日报》，您得到了多少稿酬？”她颤抖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她一点儿也不明白它怎么会跑到了报纸里去的。“我要控告，杜莱格夫人。”我说，半诙谐地，但确实是这样的，她注意着我的真正的声音，而且我整个的时间都在重复着这词组，“我要控告，杜莱格夫人”，同时走到让她注意到我的态度的地方，在告辞时我还站在门边说了多次。是啊，我非常理解她的恐惧。如果我将此事公之于众或起诉她，那她会是不可想象的，她肯定会被开除出《妇女进步》等等。

我从她那里直接去《日报》，并让叫出洛夫编辑来。他走出来脸色完全苍白，几乎不能举步了。尽管如此，我不想立即讲我的事，并想先考他一下。我就问他：“洛夫先生，您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员吗？”（因为我知道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成员。）“不。”他说。我够明白的了，他肯定想在我面前伪装。现在我问到了我文章的事。又是不可靠的谈话。他

什么也不知道，他跟消遣增刊没有瓜葛，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将叫来有关的编辑。“魏特曼先生，请来一下。”他叫道，并显出高兴的样子走了。魏特曼来了，脸色也完全苍白。我问：“您是消遣增刊的编辑？”他说：“是。”我只说“我要控告”就走了。

在银行里我马上给《波希米亚》打电话。我想委托它将这个故事公开。电话没有正常接通。您知道为什么？日报编辑部就在中心邮局附近，这个时候，《日报》的人很容易随意地控制、阻截和接通所有的电话。事实上我在电话筒里不断听到不清晰的低声耳语的声音，显然是日报编辑的声音。是的，他们有着一种巨大的利益，他们不让这电话联系上。这时我听到（当然完全不清楚）其中一个人如何地说服电话小姐不要接通这个电话。在同一个时候，另外的人却已经跟《波希米亚》联系上了，并想以此来骚扰接受我的这个故事。“小姐，”我朝话筒里叫着，“要是您不立即接通电话，我要告到邮局经理那里。”银行的同事们在周围大笑，他们听见了我那么有力地与电话小姐的讲话。我的电话终于接通了。“请您叫一下基施编辑。我有一件极重要的事要与《波希米亚》讲，它要是不接受的话，我就马上去另一家报纸。时间很紧。”因为基施不在，我挂了电话，什么也没透露。

晚上我去《波希米亚》，找到了基施编辑。我向他叙述了这个故事，但他不想发表。他说：“《波希米亚》不能做这样的事，这也许是件轰动的丑闻，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胆量，因为我们是依附于别人的。您将它交给一位律师，这是最好的办法。”

“当我从《波希米亚》出来，我就碰上了您，并向您请教办法。”

“我劝您和平地解决此事。”

“我也想过了，这也许更好。是呀，她是一个女人。女人是没有灵魂的，默哈默德说得对，求得谅解倒也是更人道、更为歌德风范。”

“当然。那您也别放弃那个朗诵晚会，不然它会失去这个机会的。”

“但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您明天离去，并宣称，您这一次要承受这无意的结果了。”

“这很好。我会真的这么做的。”

“因此，您也一定不要放弃复仇。您索性在别的什么地方印出这篇文章，然后将它配上一句美好的题词，送给杜莱格夫人。”

“这将是最好的惩罚。我要让它印在《德意志晚报》上。这报纸会接受我这篇文章的，那我就不担心了。我干脆不要稿酬。”

后来我们谈到关于他的演员天才。我认为，他应该再进修一下。“是的，您是正确的。但在什么地方？您大概知道，能在什么地方学习这些？”我说：“这难说，我很不精通这方面的事。”他说：“这没关系。我去问问基施。他是新闻记者，而且有不少关系。他已经善意地劝说过我。我会直截了当地给他打电话，省得他和我走许多路，从他那里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对杜莱格夫人，您就那样去做，我是怎样向您建议的？”

“是的，我只是忘了您怎么建议我的？”我重复了我的建议。

“好吧，我会这样去做的。”他走进科尔索咖啡馆，我回家，带着与一个十足的蠢人交谈的经历，感到神清气爽。我几乎没有笑出声来，而是完完全全的清醒。

这是令人忧伤的、只有在商号招牌上用的“原”^[48]字。

3月2日。谁来向我证实这样的真实或可能性，即我只是由于我文学方面的使命而在别的方面却是毫无兴趣，因而是冷酷无情的。

3月3日。2月28日在莫瓦西那里。违背本性的目光。他好像安详地坐着，可能将交叉的双手搁在双膝之间，眼睛朝着随意放在他前面的那本书，向我们传来的声音却带着一种跑步人的喘息。

厅堂的音响效果很好。每一句话发出后都余音缭绕，或者还稍有鼻息的回响，而且一切声响都会逐渐增大，好像邻近早就有其他交谈的声音留下余波，随着临时给他安置的设备渐渐增强，并将我们包围起来。——在这里人们可以观察到自己嗓子的才能。正如这厅堂为莫瓦西的声音工作一样，他的嗓音也在为我们的嗓音工作。非同寻常的艺术诀窍与给人的惊异之处是，人们必须要往地面上看，自然人们永远不会做这些的：歌唱某些独特的诗句马上开始，例如：“睡吧，米尔雅姆，我的孩子。”声音在旋律中四处乱窜；又迅速地发出五月之歌的音节，好像只是

舌尖插在了诗句之间；十一月之风的分字法，是将“风”字挤压下去，并使它向上时再发出风嘘声音。——要是人们朝厅堂的天花板看一下，人们就会感到被诗句抬到了高处。

歌德的诗对朗诵者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因此，人们不可能竟会在朗诵的时候放掉一个错误，因为每一首诗都为一个大旨而作。——当他后来在增加一首莎士比亚的《雨颂》而笔直站立起来的时候，一种极大的效果产生：他丢开了书本，将手帕紧绷在手中，再揉压在一起，眼里放射出光芒。——面颊是圆圆的，面孔却是有棱有角。柔软的头发，不停地用柔软的手部动作去抚摸。人们读到有关于他的热烈的评论，在我们看来只有在第一次倾听的时候才对他有作用，后来他卷入其中，而且并不能唤起完美无缺的印象。

这种将书放在前面坐着朗诵的方式有点让人回忆起一种不动嘴唇的说话技巧，听起来声音好像是从腹部发出来的。这位看上去没有参与的艺术家用我们那样地坐着，我们在他下俯的面孔上有时几乎看不到嘴部的运动，他让诗句代替他在他头部的上方传出声音来。——尽管有这么多的旋律可以倾听，噪音的控制就好像水上的一叶轻舟，本来诗句的旋律是听不到的。——有些词语被声音溶解了，它们被处理得那么柔和，它们一跃而起，跟人的声音不再有什么关系，直至以后这个声音迫不得已发出任意一个尖锐的子音，将这个词送到尘世，到终止。

后来与奥特拉、陶西格小姐、鲍姆夫妇和彼克散步，走过伊丽莎白桥、码头、克莱因赛特、拉德茨基咖啡馆、斯坦纳桥、卡尔胡同。看起来我的兴致正浓，对我可没有什么太多的指责了。

3月5日。这些气鼓鼓的医生！业务上固执，医疗上那么无知，他们就像学校的年轻人那样站在病人的床前。如果他们没有了那股业务上的固执，我真该有力气去创立一个自然医疗协会。K.医生因为在我妹妹耳朵周围乱捅，造成了她耳鼓膜穿孔并转为中耳炎；女仆在生火炉时跌倒，医生极快对着这位女仆作出诊断，说是由于吃坏了胃和充血而引起的，第二天她又摔倒了，而且还有高烧，医生将她从左翻到右，从右翻到左，发现是狭心症，便迅速离去，为在以后的时刻不让人指责他。他竟然敢说那是因为“这位女仆下流行为引起强烈反应”的话，这倒是真的，他对人已习以为常，人的身体状况需要他的医术，并通过这医术显示出来，但他知道得并不多，只是由于这个乡下姑娘体格强壮而感到受侮辱。

昨天在鲍姆那里。朗诵《魔鬼》。总体上给人不友好的印象。带着再良好不过的情绪往上走到鲍姆家。

星期日。在“大陆”与玩牌的人在一起。之前与克拉梅尔看《新闻记者》，只看了一幕半。在波尔茨那里看得出许多乐趣是被迫的，当然也产生一点儿真正的、温柔的乐趣来。在剧院前，在第二幕之后的休息时间里遇到陶西格小姐。我跑到更衣室，拿着轻飘飘的大衣回来，陪她回家。

3月8日。前天因为工厂的事受到指责。一个小时后躺在长沙发上想着从——窗户——跳出去。

昨天哈登演讲出于《戏剧》，显然全是即兴的发言，我的情绪颇好，因此我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空空如也地找到他的。开头就不错：“在这个时刻，我们在这里为讨论戏剧聚集到一起来了，这个时候，在欧洲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所有剧院里的幕布都拉开了，戏剧的场景在观众面前暴露无遗。”在他前面齐胸的高度有一只白炽灯缚在一个架子上，可以活动，灯光照着他衬衫的前胸，就像照在卖内衣床单的橱窗里。在讲演的过程中，这只白炽灯的转动，使灯光不停地变化。他足尖在舞蹈，显得更为高大，就好像围绕着即兴才能在使劲。系紧的裤子吊在腹股沟，穿一件像钉在木偶上的短短的礼服。几乎是努力装出来的严肃的面孔，有时候像一位老妇人，有时候像拿破仑。额头上泛起苍白的颜色，像戴上的假发那样。

通读了一些旧稿。所有的力量都是属于去忍受这个的。人们必须忍受这个不幸，要是人们在一种只有在全盘中才能成功的工作中中断下来的话，这对我来说至今一直在发生着，人们一定要在通读的时候，即使不是靠着旧有的力量，经历更多的这种不幸。

今日在洗澡的时候，我相信自己已经感觉到了旧有的力量，它好像在长长的间歇时间里没有被使用过。

3月10日。他在伊塞尔山区的一个小地方待了整整一个夏天，为了恢复肺部健康。在这里他引诱了一位姑娘。有时候得肺病的人会变得怎么样啊？那位姑娘是他房东的女儿，她在劳动之余的晚上喜欢与他一起散步，有一次在短短的说服尝试之后，他不可理喻地将她推倒在河边的草地上，他占有了她，她当时由于害怕而瘫痪了似的直躺在那里。之

后，他不得不用手从河里取来水，将它洒在她脸上，只希望她活过来。“小尤丽，啊，小尤丽！”他喊道，无数次地向她俯下身去。他准备为他的过错承担一切责任，努力地使自己变得可以理解，他的处境是多么艰难啊！他不深思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位躺在他面前的单纯的姑娘呼吸又正常了，只是由于恐惧和羞怯，还闭着双眼，更不能顾及他了——这个身强力壮的男子用足尖就能将这个姑娘踢到一边。她是虚弱的，微不足道的，在她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到了明天还会有什么影响吗？每一个对这两个人作比较的人肯定不会做如此决断，河流静静地在草地和田园之间伸向远处的山里，阳光只是照耀着对岸的斜坡，最后的云块在纯净的傍晚的天空下匆匆飘走。

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干。我用这种方式将自己变成了精灵。即使只有虚弱，我也只是在“今后必须……”这个地方参与了，主要是在“倾洒”的地方。在风景的描写里，我相信在一瞬间里看到一点儿准确的东西。

就这样从我这里，从所有人那里离去。隔壁房间里的嘈杂声。

3月11日。昨天不能忍受。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出席晚宴？这也许挺美。

朗诵家莱希曼白天和我们谈话之后去疯人院。

今日烧了许多旧的令人厌恶的草稿。

3月12日。在匆匆行驶的电车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个角落，面颊挨着玻璃窗，右臂沿着扶手伸展。身穿一件敞开的、鼓鼓囊囊的外套，他用审视的目光朝着长时间空无人坐的长条凳上看去。他今日订婚，什么其他的事都不想。他感觉到在当新郎的时候真的被举起，在这种感觉中有时匆匆地朝着车子的顶板看一眼。当售票员给他车票的时候，他在当啷响的硬币中很快找出一枚合适的钱币，眨眼间便搁在了售票员的手中，并伸出两个剪刀似的手指夹住了车票。他与电车之间没有确切的联系，如果不登平台、爬阶梯，他出现在街道上，在步行的时候用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他走的路，那也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地方。

只有那件鼓鼓囊囊的外套被保留下来，所有其他的均是捏造。

3月16日。星期六。又高兴起来了。我控制住了自己，像飞落的

球，人们在它飞落的时候抓住了它。早晨，我今天开始一件较大的工作，这应该不是被迫的，而是随我的能力安排的。只要我能够做的话，我不会放弃这个工作的。宁愿失眠，总比那样混沌度日子好。

卢采娜小型歌舞剧场。一些年轻人每人都唱一支歌。如果人们感觉清新并专门倾听，那么，倒不如说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的演唱人们会想起在我们生活里的歌词带来的结果，当这种生活能够因为有造诣的歌唱家的演唱而产生的时候。因为诗句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能由歌唱家去增强，诗句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并与甚至连漆皮靴也没有的歌唱家一起折磨我们。歌唱家的手并不想从膝盖处离去，如果它必须离去的话，那就更表示了它的厌恶感，这种厌恶之感尽可能迅速地被抛向长凳，为是让人尽可能少地看到那一堆堆他不得不为此做出的不熟练的小动作。

用风景照相卡片的方式表现春天里爱情场景。使观众既感动又害羞的忠实的表演。——法蒂妮查。维也纳的女歌唱家。甜蜜而充满内容的的笑，使人回忆起哈姆西。一张面孔带着许多不重要的、绝大部分也是太刺眼的细节，一哭起来便凑到一起，因而也得到了弥补。当她站在舞台前沿并朝着无动于衷的观众大笑的时候，人们肯定会说那种对观众所拥有的没有效果的优势应该属于她。——骑士们用飘忽的磷火、树枝、蝴蝶、纸火、骷髅跳着笨拙的舞蹈。——四位扭动腰肢的姑娘，其中一位特别漂亮，但没有一张戏剧单上有她的名字。她在观众大厅的最右侧。当她忙碌地甩胳膊的时候，当她细长的双腿和柔嫩而可爱的骨骼在极为有感情的无声运动中的时候，当她不按速度跳的时候，当她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却在她的忙碌中停下来的时候，她的脸上表现出的是怎样的一种微笑啊！她跟其他人的扭曲的微笑形成了对照，她的脸和头发跟她瘦削的身材比较显得蓬蓬勃勃，她向着音乐演奏家们叫道“慢些”，当然也是代表她的姐妹们。她们的舞蹈教师是一位年轻的、穿着引人注目的瘦男子，他站在音乐演奏家们后边，用一只手指挥着节奏，音乐家们不看他，跳舞的姑娘们也不看他，而他的目光是朝向观众厅的。他叫瓦尔内博尔德，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男子汉，脾气火爆，易激动。在他的动作里有时不乏诙谐，诙谐的力量抬高了他的身价。在节目宣布之后，他是怎样地迈着大步赶快地朝钢琴走去啊。

读了《随军画家的生活》。满意地朗诵了福楼拜的作品。

有必要用感叹号来谈谈女舞蹈演员。因为人们是那样地模仿她们的动作，因为人们还停留在那个旋律之中，思想还沉浸在享受中没被打

断，因为后来的行动总是留在句子的结束，并继续产生良好的效果。

3月17日。这些天我读了施托塞尔的《朝霞》。

星期日马克斯的音乐会。我几乎是无意识地在倾听。从现在起我在听音乐的时候不再感到无聊了。我想我也无法穿透这个以音乐在我周围形成的捉摸不透的圈子，如我早些时候徒劳无益所做的那样；我也在小心翼翼地逾越着这个圈子，这点我也许大约能做到，然而还是静静地停留在我的在狭隘中发展着并逐渐静止了的思想里，受着干扰的自我观察并没能进入这个缓慢拥挤的人群。——（马克斯的）美丽的“魔圈”在有些地方看上去好像打开了女歌唱家的心扉。

歌德，痛苦中的慰藉。众多的上帝，无穷无尽的上帝赐予他心爱的子民一切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无穷无尽的欢乐，所有的无穷无尽的痛苦，所有的。——我在母亲面前表现出来的无能，面对陶西格小姐表现出来的无能，以及对所有的人表现出来的无能，然后在“大陆”，再后在街上。

星期一看闹剧《马姆采尔·尼托歇》。一个法国字在一种悲哀的德意志式的想象范围内产生的良好的效果。穿着显眼衣服的寄宿女学生在花园的铁栏杆后面伸着胳膊跑动。——夜间的龙骑兵团的操练场。军官们在后面的军营大楼里的一个要走上几级台阶才能到达的大厅里举行告别会。马姆采尔·尼托歇来了。显得可爱而轻盈，她来参加这个告别会。这位姑娘会做些什么呢？早晨在女子学校，晚上为一位不能来的小歌剧女演员赶场，夜里在龙骑兵团的军营里。

今日下午因为痛苦的疲乏，在长沙发上度过。

3月18日。只要别人需要，我是明智的，我是时刻准备去死的，但不是因为我担心托付我要做的一切事情，而是因为有关这些事情我什么也没做，而且也不能希望任何时候做一点儿有关这方面的事。

3月22日。（我将前几天的日子写错了。）鲍姆在阅览大厅朗诵。格·夫，19岁，下个星期结婚，深色的、无可指责的瘦削面孔，圆拱形的鼻翼。一个时期来她总是戴着猎人式的帽子，穿一身猎装。那种深绿色的光辉也映照在她的脸上。沿着面颊下来的一缕一缕的头发，好像与沿着面颊生长的新头发聚集一起，更如一束轻柔的长毛发的闪光洒在完全被黑暗遮盖的脸上。她微微地将两肘的尖部支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在

文策尔广场来一个热情洋溢的、完全轻松的结束的鞠躬。转过穿得粗糙、显得瘦削可怜的身体，直立着腰身。我看她比我想象的还要古怪。

3月24日。昨日是星期日。克里斯蒂安·埃伦菲尔斯的《星际新娘》。——在凝视中失神，面对漫无头绪的生硬的关系，面对三对熟悉的夫妇，却跟我有良好的关系。——那位有病的军官在戏剧里出现。有病的躯体裹在绷紧的对健康有益并表现出果敢的制服里。

上午有着美好的情绪，在马克斯那里待了两个小时。

我母亲在隔壁房间里与L.夫妇聊天。他们谈论虱子、跳蚤和鸡眼（L.先生每个指头上有六个鸡眼），人们容易看出，这样的谈话根本不会出现什么进展。这是一些又会被双方忘记的消息，而且现在已经没有责任感地在一种自我忘却的情况中进行着。但正是因此，因为如此这般的交谈没有使人入迷的内容是不堪想象的，这种交谈就展现出空空荡荡的空间，如果人们要想留在这里，那么，这空间里只能塞满了沉思和美好的梦幻。

3月25日。隔壁房间里扫帚扫地毯的声音听起来像一阵阵急动的长裙曳声。

3月26日。只是不要过高估价我写了的东西，因此，我就实现不了将这些变成必须要写的东西。

3月27日。星期一我在街上抓住一个男孩的脖子，他和别人将一只大球朝一位没有防备的、在他们前面走路的女仆身上抛去，这只球正好从姑娘的身后飞过。我怒不可遏地扼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到一边，臭骂了他一顿，然后继续走路，但完全看不见那位姑娘了。人们完全忘了她凡世的存在，因为人们如此完全地被愤怒充塞，并可以相信，人们有时候同样被更为美好的感情充塞得满满的。

3月28日。从芳塔夫人朗诵《柏林印象》中，格里尔巴策根本不想参加一个聚会，因为他知道，他很要好的赫贝尔也会去那里。“他将又要盘问我对上帝的看法，而如果我不知道说些什么的话，他会变得粗暴无礼。”——我表现出惊愕的表情。

3月29日。在浴室旁边的欢乐。——逐渐地看清楚。几个下午我都是与毛发度过的。

4月1日。一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在写作中几乎完全地不成功。为什么？我在上个星期经历各种情绪，在它们的影响面前，写作在保持着；但我害怕写有关方面的事。

4月3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上午办公室，下午工厂，现在房间里时左时右的叫声，后来从《哈姆雷特》那里接来妹妹——而我已经明白，我没有瞬间去做点什么事了。

4月8日。耶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彻底看清了他本人。他的能力的容量可能像一只小球。将最大的没落作为有点儿司空见惯的东西来承受，这样，这其中还会留下一点弹性。

渴求一下子沉沉睡去，但却更加睡不着。超感觉的需求只是死亡的需求。

我今天在哈斯面前说话是多么别扭呀，因为他称赞了马克斯和我的游记，为是至少因此而使我赏识这个没有切中游记实质的称赞，或为在晕晕乎乎中或在哈斯的可爱的谎言中继续这个游记骗得的或虚构的效果，我试图消除他的谎言。

5月6日。11点钟。几天来第一次写东西完全失败。有着一一种被考验的男子的感觉。

不久前的梦：我与父亲在行驶着的穿过柏林的电车里。无数有规律的直立的、被刷上两种颜色的、顶上秃秃没有树叶的栏木呈现出大都市的景象。除此而外，全是空空荡荡，但这些紧挨着的栏木都是那么高大。我们来到一个大门前，不知不觉，我们下了车，穿过大门进去，在大门后陡然升起一座高墙，我父亲几乎是跳跃着登墙而上，一双腿在这时飞了起来，他身轻如燕。这里面肯定也表现了某些冷酷无情，他一点儿也不帮助我，我只有极为吃力地走着，我用上我全部的四肢，好多次又滑下来，又朝上走，就好像在我身下的墙变得越来越陡。同时令我难堪的是（墙）被人的粪尿覆盖着，使得我的胸部首当其冲地沾上了粪块。

我斜着脸看着这些，用手在上面行进。当我终于到达上面，我的父亲已经从一座大楼里面走出来，他立即飞快地拥抱住我的脖子，吻我。他穿一件在回忆中我很熟悉的老式的里面经过精心衬垫的帝国短上装。“这个冯·莱登医生！真是一位优秀的人物。”他不停地叫着，但他根

本没有将他作为医生而是作为值得结交的人来拜访的。我有一点害怕，我也要一定去他那里，但没要求我去。在我后边的左侧，在一间严格用纯玻璃墙围着的房间里看见一个男子背着我坐着，看上去这个人是教授的秘书，我父亲事实上只是跟他谈话，而并没有跟那位教授本人交谈，但不知他用什么方式通过这位秘书了解了这位教授具体的长处，使得他无论从哪个方面对这位教授的评判是那么有根有据，就好像他亲自和教授谈过话似的。

莱辛剧场：《老鼠》。

给彼克信，因为我没给他写过信。给马克斯寄明信片，出于对《阿诺尔德·比尔》^[49]的兴奋。

5月9日。昨天晚上与彼克在咖啡馆。我是怎样地面对一切的不安紧抓住我的小说^[50]，完全像一座纪念碑的形象，它朝着遥远的地方望去，并依附在岩石块上。

今天家里是个没有慰藉的晚上。妹夫为工厂需要钱，父亲因为妹妹、因为商务和他的心脏而激动，我不幸的第二个妹妹，超越所有人的不幸的母亲，以及我和我的没完没了的抄写。

5月22日。昨天与马克斯一起度过美妙的晚上。如果说我喜欢自己的话，那我更强烈地喜欢他。《卢采娜》。拉歇尔德的《拉莫特夫人》。《一个春天早晨的梦》。那位快乐的女士坐在包厢里。那位野性十足的女性生有一只粗野的鼻子，一张满是灰尘的脸，一副从来不是袒胸领口里挤出来的肩膀，被拽来拽去的后背，她穿一件简单的、涂上白粉的蓝色上衣，戴一只总让人看得见的击剑手套，因为她大多数是将右手放在挨着她坐的快乐的母亲的右大腿上，或竖起指尖。发辫在耳朵上方摆动，不是最干净的浅蓝色带子拖在脑后，前面的头发形成薄薄的、但却稠密的一束围盖住额头。那件大衣质地轻柔、暖和，皱褶颇多，被任意揉搓地挂在那里，显得不修边幅，好像表明她在交易所里与人商谈什么似的。

5月23日。昨天：在我们后面，一位男子由于烦闷从椅子上跌下来。——拉歇尔德的比较：那些喜欢太阳并向其他人要求欢乐的人就像是喝醉酒的人，他们夜里从参加的婚礼出来，逼着朝他们走过来的人为不认识的新娘祝福干杯。

寄给韦尔奇信，我对他用“你”^[51]相称。昨天因为工厂事给阿尔弗雷德叔叔写了一封亲切的信。前天给洛维写了信。

现在晚上，由于无聊，我先后三次进浴室洗手。

一个小姑娘，甩着两条小辫子，露着脑袋，穿一件宽松的白点小红衫，光着腿和脚，一只手提着小篮子，另一只手提着小箱子，在国家剧院附近正忐忑忐忑地横穿车行道。

《拉莫特夫人》中开始的背部表演是按照这个原则：业余演员的后背在同样的情况下要与一位好演员的后背一样的美丽。这些人多认真！

前几天大卫·特里奇作关于在巴勒斯坦殖民化的精彩报告。

5月25日。微弱的速度，不多的血液。

5月27日。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寒冷的天气，与马克斯和韦尔奇郊游，并不美。晚上去咖啡馆，韦尔夫给我《从天堂来访》。

尼克拉斯大街的一部分和整座桥上的行人都惊异地转向一条狂吠的犬，它正追逐着救护公司的一辆汽车跑。最终这条狗突然停止狂吠，转过身来，并表现出是一条寻常陌生狗的样子，它觉得追逐车辆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了。

6月1日。什么也没写。

6月2日。几乎什么也没写。

昨天索柯普博士在下院作关于美国的报告（内布拉斯加州的捷克人，在美国的所有官员都被选了，每一位必须属于三个党派——共和、民主、社会——中的一个党派。罗斯福的竞选集会，罗斯福用他手中的玻璃杯威胁一位提出异议的农场主，街头演说家身边带着一只小箱子作讲台）。然后春天的节日，遇到保尔·基施，讲述他的博士论文《赫贝尔和捷克人》。

6月6日。星期四。像在奔驰的两匹马中的一匹马由于奔跑而自顾自地低着脑袋，抖动着全部的鬃毛，然后竖起脑袋，这时看上去才恢复正常，又开始奔跑，而实际奔驰并没有中断过。

我现在读福楼拜的信：“我的小说是我依附着的岩石，我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类似于我5月9日给自己记下的内容。

没有重量、没有骨头、没有身体，两个小时长的时间走街穿巷，思考着我下午在写作时克服了什么。

6月7日。心情不好，今日什么也没写。明天没有时间。

7月6日，星期一[52]。开了一点儿头。还睡过了头一会儿。在这些完全陌生的人群里也感到孤单。

7月9日。这么久没写什么东西了。早晨开始了。不然，我又会进入一种逐渐膨胀、阻挡不了的不满境地，其实我已经处在这种境地了。神经过敏又犯了。但如果我能做些事情的话，那我能在没有迷信的预防措施情况下做这些事情。

魔鬼的发明。如果我们心中只有魔鬼的话，那不可能是一个，因为我们毕竟曾经安宁地，就如和上帝在一起和谐地、没有矛盾地、没有顾虑地、对我们的幕后操纵者毫不怀疑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他的面孔不会使我们恐惧，因为对于魔鬼的表现，我们会在某种机敏的情况下看他的时候，也保持着足够的聪明，宁愿牺牲一只手，用它来遮掩住他的脸孔。如果只是唯一的魔鬼拥有了我们，静静地、不受干扰地全盘掌握我们整个的本性，而且保持着瞬间的有支配权的自由，那么，他也会有足够的力量将我们一种人的生命长期地如此高高地超越上帝的精神而保持在我们的体内，而且耀武扬威地声称，我们看不到他的闪光，自然也不会感到不安。只是成群的魔鬼才能构成我们尘世的不幸。他们为什么不互相杀光，只剩下一个呢？或者他们为什么不隶属于一个伟大的魔鬼呢？这两者在魔鬼原则的意义上说，也许最为彻底地欺骗了我们。全部的魔鬼为我们拥有这种极大的细心究竟有什么用呢？如果缺乏统一性的话，魔鬼肯定远远要比上帝关心一个人的毛发的脱落，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毛发对魔鬼来说是无望的，上帝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有许多魔鬼的话，我们就只好无法进入舒适的境地了。

8月7日。长时间的劳累。终于写信给马克斯说，我不能将剩余下的一小段誊得清清楚楚，并不想强迫自己，因此将不出版此书[53]。

8月8日。为暂时的满足作完了《拙劣的骗子》，并为它用了一种正常精神状态中最后的气力。12点钟，我怎么能睡觉呢？

8月9日。激动的夜。——昨天女仆在楼梯上跟那个小男孩说：“你抓住我的裙子！”

我朗诵《可怜的游吟诗人》，若从灵感流淌出来一样。——在这个故事里可以领悟到格里尔巴策的阳刚之气。如他敢于一切，但什么也不敢。因为只有真真实实的存在已经存在于他的心中，这种真真实实的存在本身将在矛盾着瞬间印象中在决定的时刻表明其作为真实的存在是正确的。稳稳地驾驭自己，缓慢的步子却什么也没耽误。如果必要的话，不是更早地，而是立即地作好准备，因为他看到一切都早已来临。

8月10日。什么也没写。在工厂里，并在发动机车间里呼吸了两个小时的汽油味。在发动机前的车间领班和司炉充满了活力，发动机由于一种寻找不到的原因而发动不起来。真是蹩脚的工厂！

8月11日。什么也没写，什么也没写。出版这本小书使我失去了多么多的时间啊，而且因为这本小书的出版，我在读旧日写的东西的时候又产生了多少有损害的、可笑的自我意识啊。唯有这件事打扰了我的写作，然而在现实中我什么也没有达到，干扰是如此的最好证明。无论如何，我现在一定要在这本书出版之后阻止自己更多地参与杂志和评论，如果我对那些玩意儿并不满意的话，我只是专注于真实的事。我已经变得如何笨拙了啊！早些时候，我只要对眼前的倾向说上一句反对的话，我也已经向另一个方面飞去，现在我只是看着自己，我还保持着自己的样子。

8月14日。写信给罗沃尔特。

尊敬的罗沃尔特先生！

我这里呈上您要看的小小的散文，它可能已经够上一本书了。在我为这个目的编辑的时候，有时候在我的责任心的慰藉和在您那些美好的书籍中有我这一本书的欲望之间作出选择。我当然不总是纯然地作出决定。但现在，我当然也许是幸运的，如果这事情仅仅使您满意到要将其付印的话。最终，经过极大努力和最大限度的理解，这当中有些不好的地方在第一眼是看不出来的。传布得最广作家的个性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用完全特殊的方法遮盖他的坏处。

您的忠诚的

8月15日。无收益的一天。睡过了一天，狼狈不堪。在老城的圆形场地上庆祝圣母节。男人用一种像是从地窟窿里钻出来的声音，对F.B. [54]——在写上这个名字之前是怎样的一种窘态啊——想得很多。昨天看《波兰经济》[55]。——现在O.背诵了歌德的诗。她是用一种真实的

感觉去挑选的。《泪中的慰藉》、《致洛特》、《致维特》、《致月亮》。

我又读了旧日记，这些东西倒并没妨碍我。我只是如我可能的那样无理智地活着。但31页文字的出版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有责任的，负有更多责任的当然是我的虚弱，它听任这样的状态对我产生影响，我没有烧得全身打颤，我坐在那里思考着，怎样尽可能冒犯地将这一切表达出来。但我那可怕的宁静打断了我的创造力，我好奇地注视着，我会怎样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我不让自己与自己碰撞，我对右边的路径也毫无所知，就是说，那会变得怎样呢？我这一大团身躯是在我这狭窄的路上拼命奔跑？——那么我至少能掉过头去。——我可是做到了这一点。

8月16日。在办公室、在家中什么都没干。在魏玛的日记里写了几页。

晚上，由于我外甥的吃饭事，我可怜的母亲在呻吟。

8月20日。两个小家伙，都穿蓝上衣，大些的穿的上衣颜色较浅，另一个稍小的穿的颜色较深些，每一个小家伙手臂里都抱满了干草，越过我窗户前面的大学建筑场地，这场地部分地方长满了野草。他们拖着这些干草上一个斜坡，整个景象对眼前来说是那样惬意。

今日一早，看见一辆两侧有栅栏的马车，前面是一匹高大的瘦马。它们都作了最大的努力向一个斜坡上爬着，拖延了好长时间，旁边的人都看到了车马倾斜得厉害。那匹马微微抬起前腿，朝一旁向上伸着脑袋。上面是车夫的鞭子。

如果罗沃尔特将稿子寄回，我又会将一切束之高阁，就好像这事情不曾发生一样，这么一来，我只能像早先一样那么不幸了。

F.B.小姐。当我8月13日到勃罗德那里，她坐在桌边，就像一个女仆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根本没有好奇地想明白她是谁，而是马上对她感到满意起来。她的空空荡荡明显地衬着一张骨头突出的脸庞。她露出脖子，披着短上衣，看上去全是家庭的便装，尽管她完全不像她后来表现的那样。（我对她有点儿陌生感，是因为我走到离她身体太近的地方。当然，我现在陷入了怎样的一种处境呀，对所有一切好的东西从整体来说都是陌生的，此外，我还不信任这些东西。如果今天在马克斯这里那些文学方面的信息不使我很分神的话，我还想写写有关这个布伦克尔特

的故事。她肯定不是瘦长的，但她一定击中了我。）几乎摔坏了的鼻子，淡黄色的、有点僵硬而没有吸引力的头发，强而有力的下巴。在我正要坐下的时候，我第一次较为仔细地地看着她，当我坐下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评判。好像……〔中断〕

8月21日。不停地读伦茨，我从他那里为自己——我当时就是如此的情况——取来了意识。

不满意的景象是一条街道，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从他所在的那块地方抬起脚来离去。

8月30日。整个时间没做什么事。从西班牙来的叔叔来访。上个星期六韦尔弗在阿尔科朗诵《生活之歌》和《牺牲》。真是一个非凡的人。但我看着他的眼睛，一晚上我都没离开过他的目光。

我要调整一下枕头都很困难，我真是不安。当我今日下午躺在床上，有人将钥匙在门锁中迅速转动的时候，我一瞬间觉得这些门锁在整个身体上就如在一个化装舞会，在短窄的过道房间里一会这儿一会那儿有一门锁被打开或被锁上了。

《米罗瓦》杂志对当今的爱情和自我们祖父母一代以来爱情的变化举办了民意测验。一位女演员回答：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棒地相爱过。

在倾听了韦尔弗的朗诵之后我怎样地被击碎和被振奋的呀！好像我后来简直是粗野地、也竟没有偏差地躺倒在L.的公司里。

这个月里头头不在，本来是可以很好利用一下的，可是不用自我辩解（将书寄给罗沃尔特，叔叔来访），我将这个月的时间闲混掉了，睡觉睡掉了。今日下午我还以梦般的谅解在床上舒展了三个小时。

9月4日。来自西班牙的叔叔。他的上衣款式。他对周围产生的效果。他性格特征的细节。——他飘过前面的房间走进厕所。同时对一谈话并没给予回答。——结果人们不去评判一种逐渐进行的交替，而去评判引人注目的许多瞬间，那就会一天天变得温和起来。

9月5日。我问他：人们应该怎样将这些联系起来呢？如你最近说的，你不满意，如人们一再看到的那样（而且，我想，这就如同找到了

头绪所特有的那种生硬所表明的那样)，你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了头绪。他回答道，好像这在我的记忆里溶解了，“在单一的情况下我是满意的，在整体上还远远不行。”我常在一座小小的法国式供膳食的公寓里吃晚饭，那里显得高雅，而且价格昂贵。例如一个双人间对退休人员来说，每天要付50法郎。比如我就坐在法国使馆秘书与西班牙炮兵将军之间，在我对面坐着一位海军部的高级官员和某一位伯爵。我对这些人都很熟悉，我向他们大家致意，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说一句话，因为我正陷入了自己的情绪里，直到我再一次告别致意。然后我独自一人走上街，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晚上应该做什么用。我走回家中，遗憾自己没有结婚。当然这个想法一下子又消失了，要么是我的思想已经结束，要么这思想还在进行，但有时候它又出现了。

9月8日。星期日上午。昨天给席勒博士寄信。

下午，母亲在旁边一群女人中间与孩子们玩耍是怎样地大声嚷嚷并将我赶出房间的啊。不要哭！不要哭等等。这是他的！这是他的！等等。两个大家伙！等等。他不要这个！……啊呀！啊呀！……你觉得在维也纳怎么样，多尔菲？那里好玩吗？……我请您只要看看他那双手。

9月11日。大前天晚上与乌蒂茨在一起。

一个梦：我待在一个由长方石砌成的伸展到海里的突出的地方。某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和在我在一起，而我的意识是那样强烈，使得我几乎无法知道他们，当然也就无法跟他们讲话了。我能忆起的只是一位在身旁坐着的人抬起的膝盖。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我一次偶然站起身来，我才看到我的左边和我后面的右侧是广阔的、清澈的大海，海上有许多排列整齐的战舰。右边是纽约，我们是在纽约港。天空是灰白色的，但一般来说还是光亮的。我转过身，自由地享受着从各方面来的空气，在我的那片地方走来走去，为能看到全部的景色。对着纽约，目光稍稍转向深处，对着大海，目光便抬向高处。这时我也注意到，水在我们身旁激起高高的波浪，一种极为繁忙的外轮往来在这大海上进行着，在记忆里我觉得，长长的树干木头代替了我们的木筏，这些木头扎在一起成为一个巨大的圆捆，在航行时总是以横截面按波浪的高度或大部分或小部分露出水面，同时也按其长度在水中滚动。我坐着，将双脚收到身边，因为兴奋而颤动，因为惬意而简直要把自己埋进了大地。我说道：这真的要比在巴黎林荫大道上的人来人往还要有意思。

9月12日。晚上L.博士在我们家。又是一位巴勒斯坦的司机。他在设计实践前一年参加了律师职务的考试，并带着1200克郎（两个星期）开往巴勒斯坦，原是想在巴勒斯坦官场找一个位置。所有这些巴勒斯坦司机（B.博士、K.博士）都垂下了眼皮，感觉到被听众弄得眼花缭乱，伸出手指在桌上移来移去，变化着声音，发出微弱的微笑，并保持着带点儿嘲弄的微笑。——K.博士叙述了他的学生是大国沙文主义者，嘴上不停地挂着麦喀比^[56]，并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我发现，我是这么喜欢并善意地给席勒博士写信哩，因为B.小姐在布雷斯劳待过，这当然已经是两星期之前的事。她的气味却还留在空气中，早些时候，我曾多次想通过席勒博士给她寄去鲜花。

9月15日。我的妹妹瓦莉订婚。

由于虚弱的

缘故

我们用新的力量

攀登，

神秘的主

在等待，

直至孩子们

精疲力竭。

兄弟姐妹之间的爱——父母之间的爱的重复。

独特的自传作家的预感。

让这部天才的作品在我们的周围产生影响的那个洞穴是将它的星星之光放进去的好地方，因而那激励是从这天才中来的激励，是普遍存在的激励，是不仅仅驱使人们去模仿的激励。

9月18日。办公室里H.昨日的故事。敲石头的人在公路上向他苦苦求得一只青蛙，死死地抓住它的脚，然后咬了三口，首先将那颗小脑袋，其次将它的躯干，最终将它的四足全部吞下。最棒的是将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猫打死：用关门的方法挤压它的脖子，拉扯它的尾巴。——他

厌恶那些有害的小动物。在服兵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鼻子有点儿痒痒，他在睡梦中将手抓过去，并一下子便将一个什么玩意儿捏碎了，后来才发现那个玩意儿就是臭虫，一整天，他身上都散发着这臭虫的味儿。

有四个人共享了一只烤制得相当出色的猫肉，但只有三人明白他们吃的是什么。吃过之后，这三人开始发出喵喵的叫声，但第四个人不愿相信，直至别人将血淋淋的猫皮拿给他看，他才相信，可是没能来得及跑出去，就全吐出来了，而且大病了两个星期。

敲石头的人除了面包，别的什么也不吃，其他就是偶尔得到些水果或者是活物，除了烧酒，别的什么也不喝。他睡在砖场的仓库里。有一次在黄昏的时候，这位H.在田野里遇上一个人。“站住，”这个人开口说，“或——”H.开玩笑地站住了。“把你的香烟给我。”这家伙继续说。H.给了他一支烟。“再给我一支！”“噢，你还要一支？”H.问他，为防不测，握住了左手上多节的手杖准备着，同时用右手给他脸上一个巴掌，打得他手上的香烟也掉了。这个家伙又胆小又虚弱，一溜烟地跑了。

昨天与L.博士在B.那里。——雷布·多维德尔的歌曲。雷布·多维德尔是瓦西尔科夫人，今天去塔尔内。在瓦西科夫与塔尔内之间有没有一个城市无关紧要，在瓦西科夫正流着泪的时候，到了塔尔内已经愉快地唱起歌来了。

9月19日。P.检票员叙述他13岁时，口袋里放了70枚十字币，由一位同伴陪同出外旅行的情况。当他们晚上来到一家旅馆时，那里正发生一件酗酒的事，那是为市长退役归来举行的庆祝会，他脚边的地上已经放着了50只空了的啤酒瓶。到处弥漫着烟斗的烟雾，发出啤酒的味儿。有两个年轻人站在墙边，喝得醉醺醺的市长回忆着他在军队里到处是按部就班的情形，他走向这两个小伙子，并威胁说他们是逃兵，让人强制将他们送回家，不管小伙子如何解释，他坚持认为他们是逃兵。年轻人怕得浑身打颤，掏出了他们身上的学生证明，并说出一些便宜的学生食堂，一位半醉的老师直瞧着，并没有去帮忙。他们没有得到对他们命运的明确决断，被迫一起喝酒，他们倒挺满意，白白地喝了如此多的好啤酒，这是他们用自己所拥有的几个钱绝不可能得到的赐予。他们喝得肚子鼓鼓的，后来就躺倒了，直到深夜，最后一批客人离去，他们就被安排睡在一间不通空气的房间里，身子下面铺的是一层薄薄的稻草，睡得完全像主人一般。只是到了凌晨4点钟，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仆拿着扫

帚走来，声称没有时间了，差点将他们扫进晨雾里去，如果他们不自动逃走的话。这个房间在稍稍清扫后，有人将两大罐满满的咖啡放到桌上，当他们用调羹在咖啡中搅动时，随着时间流逝，咖啡表面不断出现大的、暗色的、浑圆的东西。他们以为，这些东西待一会儿就会清楚的，便胃口不错地喝了起来。在喝到一半的时候，暗色的东西让他们吓了一跳，他们求救于女仆。他们这时才发现，这黑色的玩意儿原来是鹅血，是前一天吃东西时剩在罐子里的，有人在早晨还没睡醒的状态中一下子将咖啡倒在了罐子里。这两个小伙子立即跑出去，将全部的东西呕吐在了最近的那只小罐子里了。后来他们被叫到教士的面前，教士从宗教方面作了短时间的检验之后，断定他们是两个好小伙子，让女厨师给他们端来一盆汤，随之用宗教的祝福与他们告别。作为由神职人员领导的中学住宿学生，他们几乎在所有他们去过的教区里都能喝到这样的汤，受到这样的款待。

9月20日。昨天给洛维和陶西格小姐寄信，今日给B.小姐和马克斯寄信。

9月23日。《裁判》这个故事是我在22日夜至23日，即从晚上10点至早晨6点，一口气写成的。由于长时间坐着的缘故，我几乎无法将僵直的腿从桌子下面抽出来。当故事情节在我面前展开的时候，当我在一处水域中前进的时候，我正处于极度的努力与欢乐之中。在这个夜里，我好多次地忍受着背部的沉重。好像一切都说不出来了，像是为一切、为最陌生的突如其来的想法准备的一场大火，在这大火中它们消逝，又再生。窗前逐渐变蓝，一辆马车驶过，有两个汉子过桥而去。在两点的时候我最后一次朝钟看去，当女仆第一次穿过前屋的时候，我正写下最后一句。熄灯，同时天已亮了。微微地觉得心痛。半夜时疲倦消失。战栗地踏入姐妹们的房间。朗诵。在女仆面前说“我一直写到现在”之前伸展着全身。没有动过的床铺就好像是刚刚搬进来似的。我确凿无疑地相信，随着这部小说的写作，我正处在写作糟糕的低谷之中。只有如此，只有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用如此彻底将生活与心灵公之于众的方法，才能写出东西来。上午躺在床上，不停地睁着眼睛，还有许多在写作的时候一起出现的感情，比如欢乐，我已为马克斯的《阿尔卡迪亚》有了一些美好的设想，当然还想到弗洛伊德，想到《阿诺尔德·比尔》的一处地方，想到韦尔弗的《里辛》一处地方，自然也想到我的《城市世界》。

古斯塔夫·布伦克尔特是一位有着规律习性的简朴之人。他不爱没有

必要的浪费，对那些嗜好如此浪费之人有着毫不动摇的评判。尽管他是一个单身男子，他还是在他熟悉的人的婚姻大事中完全准确地说出一些有决定性的话语，但有些人对他说话的合理也许只有怀疑，他也许对他们也就不怎么样了。他习惯于迂回地说出他的意见，并不直接顶回倾听意见的人，他的意见正好不适合这些人。到处都有欣赏他的人，他们承认他，他们容忍他，最后还有那些不想知道有关他的一切的人。只要人们正常地去观察一下的话，那么，每一个人，就连最微不足道的人也一样，都会构成一个转动到这里和那里圈子的中心，在古斯塔夫·布伦克尔特这样一个基本特别喜欢结交的人身上怎么会是另一种样子呢？

在第35个年头，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与一对名叫斯特朗的年轻夫妇来往特别频繁。对那位用夫人的钱开了家家具店的斯特朗先生来说，结识布伦克尔特有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因为布伦克尔特在够上结婚年龄的年轻人中有着一大群他认识的人，他们或早或晚一定会想着为自己弄一套新式家具，而且从一般习惯来说，他们也不会忽略布伦克尔特忠告的。“我牢牢地握着他们的缰绳，”布伦克尔特总习惯这样说。

9月25日。我用强力克制自己去写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感到头部充血，毫无作用地流过。这是怎样的损害啊！——昨天在鲍姆那里朗诵，在鲍姆家中有我的妹妹、玛尔塔、带着两个儿子（一个1岁的志愿者）的布罗赫夫人博士。在将近结束的时候，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诚实地在脸前挥动，我的眼里噙着泪水。这个故事的无可怀疑性被证实了。——今天晚上我从写作中被拉走。国家剧院里架设起电影摄影机。包厢。O.小姐，有一次神职人员追逐她。她回到家，吓得通身都被冷汗湿透。但泽科尔纳的一生。一群马。那匹白马。火药的烟雾。吕左夫的野外狩猎。

1913年

2月11日。核校《裁判》的时候，我写出了目前拥有的这个故事里我所清楚的一切关系。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故事就像是合乎规律地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秽混浊的孩子，只有我能用手伸向这个躯体。此外，我对下面写的颇有兴致：

这位朋友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联系，他们是之间最大的共同的地方。格奥尔格独自坐在窗边，狂喜地在这共同点里不断翻腾，他相信父

亲就包含于自身之中，他将一切悲哀的沉思，都看作是安宁的。现在，故事的发展表明，从这共同点，从这位朋友身上，父亲突现出来，并作为对立面在格奥尔格面前出现了。通过其他较小的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通过爱情，母亲的依靠，通过对她的忠诚的回忆，通过父亲本来为商务获得的那些顾客，这位父亲的力度也得到了增强。格奥尔格什么也没有；新娘，在故事中只是通过与这位朋友的关系，也就是与这个共同点的关系而活着。正因为新婚典礼还没来到，她不能踏进这个维系着父亲和儿子的血缘的圈子里，一下子便被父亲赶走了。这个共同之处全堆积在父亲的周围。格奥尔格只觉得它是陌生的东西，独立变化的东西，从没有足够地受他维护的东西，是带有俄国革命影响的东西，只是因为他除了看到这位父亲之外，自己什么也没有。这个判决如此强烈地影响着他，这个判决使他完全不理这位父亲了。

格奥尔格这个字如此之多，就像弗兰茨。在本德曼这个字里，“曼”只是为故事中所有还不知道的可能性而给“本德”采取的一种加强的做法。本德的拼写像卡夫卡一样多，元音e的重复如在卡夫卡中的同样位置的元音a。

弗里达的拼写也如菲莉斯一样多，它们有着同样开头的字母拼写，勃兰登菲尔德开头的字母与鲍姆的开头字母一样，而且与“菲尔德”这个字在意思里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关系。大约甚至对柏林的想法也不是没有影响，对勃兰登堡边界的回忆大概也有作用。

2月12日。我在描写这位在异邦他乡朋友的时候，多次地想到了施托伊尔。现在，大约在这个故事之后的三个月，我偶然与他走到一起，他向我叙述道，他在三个月之前已经订婚了。

昨日我在韦尔奇那里朗读了这个故事之后，这位老韦尔奇出去了，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特别夸赞故事中那些形象的描绘。他伸展着一只手说道：“我看到这位父亲就在我的面前。”同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在朗读时他坐过的现在空了的沙发椅。

妹妹说：“那就是我的住房。”我对此吃惊不小，她怎么误解了这个地点，而且还说：“这样的话，父亲只能住在厕所里了。”

2月28日。恩斯特·利曼在一个秋天下雨的早晨因商务出差来到孔坦蒂诺佩尔，按他的习惯——他已经第十次踏上这个旅途了——暂不管自

己有什么别的事情，先驱车穿过空寂的街道，直去旅馆，按惯例在旅馆里舒适地住下来。天气几乎变凉了，喷洒的雨钻进了车里，他讨厌这个坏天气。在今年的全部商务差旅中，这个坏天气一直追逐着他，他将车窗摇至高处，依在一个角落，欲在他前面大约一刻钟的路程上睡上一觉。可是因为这段路正好通往商业区，他无法宁静，沿街商贩的叫喊声，载重车辆的车轮滚动声，还有其他的、不仔细琢磨不知从哪儿出来的嘈杂声，例如一群人的鼓掌声，这些声音肯定会干扰他熟睡的。

在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等待他的是一种令人不舒适的震惊。利曼在旅途上大概读到过在斯塔姆布尔最近发生的那场大火，他习惯住过的金斯顿饭店几乎完全烧成平地。这位车夫当然清楚这件事，可是他完全漫不经心地面对这位乘客，并完成了乘客的委托，默默地将利曼送到了饭店失火后的现场。这时车夫平静地从驾驶台上下来，如果利曼不拍一下他的肩膀的话，他就会把利曼的箱子卸下来了，车夫后来自然不再去管箱子事，但行动显得那么缓慢，好像没有睡醒似的，也好像不是利曼不让他那么做的，而是他自己改变了决定。饭店的底层部分保存下来了，由于上面均有板条相隔，还可将就住人。一则用土耳其文和法文写成的通知上说，饭店将会在短期内比过去重建得更美、更现代化。这些说法的唯一表现是三个临时工在工作，他们用铲子和锄头朝一边堆积瓦砾和垃圾，再用一个小手推车将它们运走。

不难看出，在这个废墟里住着一部分由于饭店被烧而没有工作的饭店人员。当利曼乘的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一位穿着黑色小礼服、系着一条火红色领带的先生立即小跑地走了出来，向这位闷闷不乐的利曼叙述当时失火的情况，利曼倾听着。这位先生在说话的同时，手指在卷绕着他长而稀的胡子的末端，只是在向利曼指出火势从哪里发出，它是怎么蔓延，最终是怎么总爆发的时候，他的手指才离开一下胡子。利曼在他讲述这整个过程的时候，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地面，他的手也没离开过车门的把手。他正想招呼车夫说出他该去的另一个饭店名字时，这位穿小礼服的男子举臂请求他不要去别的饭店，让他就在这个饭店里坚持住下去，在这里他会很满意的。这当然只是一种虚妄的说法，而且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利曼是这里的老客人。利曼在朝门里和窗里看的时候，也再没有认出这里的一个男的或女的服务员，如此，他作为一个珍爱自己习惯的人问道，他目前究竟应该怎么坚持留在这座已烧毁的饭店里。现在他知道了——对于这种推测他不得不无意地发出了微笑——为饭店里的早先的客人，当然只是为这些客人，都准备了私人住宅中漂亮的房间，

利曼只得下令，他将立即离去，除非住房就在附近，他不能浪费时间，出钱是要令人愉快，这里却只是一种凑合的替代办法，即使在饮食方面按维也纳食谱，在服务方面比早先在某些方面还不足的金斯顿饭店可能更好、更细致，那也是特别低级。

“谢谢，”利曼说，同时进了车子，“我在孔坦蒂诺佩尔只呆五天，在这些时间里我不会去住在一家私人住宅里的。不，我要去一家饭店。但如果我明年再来，您的饭店又修建好了的话，我当然在您这里下车。请原谅！”利曼正欲关上车门，门的把手这时却已被饭店的人抓住了。“先生！”这个人说着，并朝着车上的利曼看去。

“开车！”利曼叫道，匆匆关门，给车夫命令：“去皇家饭店。”可是，是不是车夫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是车夫在等待着关车门，不管怎么说，他坐在驾驶台上像一座雕塑。饭店的那个人却还是紧紧抓住车门，他甚至还招呼一个同事快过来，同时抑制住激动，让他来帮忙。他特别想招来随便哪一位姑娘，嘴里不停地叫着：“菲妮！快来，菲妮！菲妮到底到哪里去了？”站在窗口和门里的人都朝里看去，他们此起彼伏地叫着，人们看得见他们在窗里边跑过去，大家都在找菲妮。

利曼本来是可以用力将挡着他车子去路的、而且显然只有在饥饿的时候才能在这种行为举止里有如此勇气的这个人推离门边的——这个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怎么也不敢朝利曼看——可是利曼在他的旅途上经历的倒霉事够多的了，他不会不知道，在这陌生的地方，不管自己怎么有理，也要避免把事情闹大，那是何等重要。因此他又一次心平气和地下了车，暂时丢开那个使劲抓住门的人，不假思索地走向车夫，向车夫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又一次向他强调了迅速离开这里的命令，然后走向车门旁边的那个人，抓住那个人的手，看上去用的是一般的握力，但在关节里暗暗地用了那么大的力量压着那只手，使得那个叫喊“菲妮”的人几乎跳起来，并随即松开了抓住车门把手的手指，这叫声同时也是这个人感到疼痛的结果与爆发。

“她已经来了！她已经来了！”这是从各个窗户发出的叫声。那是一位大笑着的姑娘，双手还贴在刚刚做好的发型上，半倾斜着脑袋，从房子里出来跑往这辆车子。“快！到车里去！雨下大了。”她嚷道，同时抓住利曼的肩膀，将自己的脸孔紧挨着他的脸孔。“我叫菲妮。”接着她轻声地说，并将双手沿着他的肩膀抚摸。

“是呀，你对我倒真是不坏，”利曼嘟哝着，微笑地看了一下这位姑娘，“遗憾的是，我不再是年轻人了，我不能陷进这不稳定的冒险里。”“这肯定是一个错误，小姐，”他说着就转身走向车子，“我既没请您来，我也不想与您一起离开。”他又从车上补充道，“您不要再费心了。”

可是菲妮的一只脚已经踏上车子的踏板，两臂交叉在胸前说道：“您为什么不让我为您介绍一处住所呢？”他忍受了在这里所受纠缠的疲劳，向外朝她躬身道：“请您不要再用无济于事的问题阻拦我了！我去饭店，到此为止吧。请您把脚从踏板上移开，不然您会危险的。车夫，开车！”——“停住！”可是小姐叫道，并马上认起真来，想跃进车里。利曼摇着头站起来，用他敦实的身体堵住整个车门。这位姑娘又用头又用膝盖地想把他推开，车子开始在劣质的弹簧上摇荡起来，利曼无法稳住自己。“您究竟为什么不带上我呢？您究竟为什么不带着我走呢？”姑娘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利曼肯定不用对她实施暴力就能成功地将这位自然是有力气的姑娘挤走，如果不是那位穿小礼服的男子用一种跳跃的步子赶过来从后面支撑住菲妮的话。那位穿小礼服的男子被菲妮替代了来之后，好像一直保持着安详的样子，这时当他看到菲妮摇摇欲坠了，才忍不住使劲地将这位姑娘托进车里。不管怎么说，利曼毕竟是出于委婉的自我保护。这位姑娘感觉有了这种支持之后，她还真的挤进车里，将也可以从外面关上的车门拉紧，自言自语似的说：“现在总算成了。”便先是约略地整一下她的短上衣，然后较为彻底地理了一下她的发型。“这真是没见过。”利曼说道，便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与他相对而坐的就是这位姑娘了。

5月2日。继续写日记变得十分必要的了。我不稳定的脑袋，F.在办公室里精力的衰退，身体上的无能，这些妨碍了写作，而内心却需要它。

妹夫明天要开往恰尔特科夫进行武器训练，瓦莉走在妹夫后面，从我们的门出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这种跟在他身后的婚姻的认可是一种安排，人们对这种安排归根结底是忍受的。

园丁女儿的故事前天在工作中打断了我。我，想通过工作来治愈我的神经衰弱的这个我，肯定听说，这位小姐的哥哥在两个月前28岁年纪

的时候受到了忧郁的侵袭，他名叫吉恩，本来是园丁，是老德沃尔斯基的有希望的接班人，而且已经是花园的占有者了。在夏季他还是相当不错的，尽管他有着隐居者的性格，但他至少必须与顾客打交道。到冬天就不一样了，他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他的恋人是一位女公务员——尤尔德妮丝——一位同类，忧郁型的姑娘。他们常常一起去公墓。

在隐语想象中产生的巨大威胁。不管怎么说，有点儿魔术般的东西在音乐的共鸣中通过它的活动抓住了我。我已经忘记了这些。

我今天跟母亲说，我要在圣灵降临节去柏林，并笨拙地大笑起来。“你为什么大笑？”母亲说（在一些其他的说明中，其中包括“是要考验一下，与谁去永结连理”，但我否认这一切，便用诸如此类的解释“没什么”等等）。“出于尴尬。”我说，而且是高兴地在这件事情里终于说出了一点儿真实的东西。

昨天见到了B.女士，她安详、满足、率真、清澈，尽管近几年她完成了向老年妇女的过渡，那种当时已经显得累赘的丰腴竟一下子达到了索然无味的肥胖的边缘，而且在下巴处——只要往下巴处稍稍看上一眼——须毛丛生，稠密的地方已经打起髻来了。

5月3日。我内在的存在出现可怕的不稳定状态。

我是怎样地解开坎肩，向B.先生展示我身上的斑疹，我是怎样示意他去旁边的房间？

丈夫被一根木桩——人们不知道这木桩来自何处——从后面击中，打倒，刺穿。他躺在地上，抬起头，伸展双臂，表示不满。后来，他也已经能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会儿。他除了怎么被击中之外，什么也叙述不出来，他指着那个大约的方位，按他的看法，木桩是从那个方向来的。这种不停的同样说法已经使妻子累了，再说丈夫又一再地朝另一个方向指去。

5月4日。不断地设想有一把长长的切熏肉的刀，它能最快地、有着自动规律地从一旁向我插进来，切割成十分薄的片片，在迅速切割的时候，这些横断片几乎滚动地飞走了。

在一个很早的清晨，街道的远近左右还空空荡荡。在一条主要大街上，一个还赤着脚、只穿着睡衣睡裤的男子打开了一家出租公寓的大

门。他紧抓住两扇门扇，做着深呼吸。“你这不幸，你这该死的不幸。”他说着，目光好像先沿着大街平静地扫去，然后越过一座一座的房子。

绝望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却没有地方接纳。

5月24日。与彼克散步。

自负，因为我认为《司炉》是那么好。晚上我在双亲面前朗诵了它，在极为违心倾听着的父亲面前朗诵的时候，没有一个比我更好的批评家了。在显然难以达到深处的前面有许多浅显的地方。

6月5日。内在的优越性从活着的作者和跟在其作品后面的作者那里引出一般的文学作品。这是不时髦的原来意识。

洛维，逾越边界的故事。

6月21日。从所有的方面来看，我承受着这样的恐惧。在医生那里的检查，当他顷刻间向我推挤的时候，我感到身体空虚不堪。他在我的身体里轻蔑而无可辩驳地发表空洞的讲话。

在我的脑袋里有着庞大的世界，但如何解放我自己和解放它，而不撕成碎片呢？宁愿上千次地撕成碎片，也不要将它阻拦或埋葬在我的体内，我就是为此而生存在这里的，这我完全清楚。

一个大个子男人穿一件拖到脚上的大衣，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将近5点钟的时候，他用拳头擂击一间小茅屋的门，这茅屋坐落在光秃的山丘附近。他每用拳头擂击一下之后，便贴耳倾听一下，茅屋里静悄悄。

7月1日。宁愿没有意识的孤独。只是面对着我自己。大概在里瓦会这样。

大前天与《大战船》的作者魏斯^[57]在一起。他是犹太医生，一种典型的离你最近的西欧犹太人，人们因此马上感到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基督徒的优点，他们在交往中会不断拥有并享受那种自来熟的感觉，比如信基督的捷克人在一群信基督的捷克人中。

一对旅行结婚的情侣从赛克塞饭店走出来。那是下午。将明信片片

扔进信筒。压皱的衣服，软弱无力的步履，混沌的、不冷不热的下午。第一眼看去很少有几张有性格的面孔。

伏尔加河畔雅罗斯拉弗尔的罗曼诺夫300年庆典的图画。沙皇、公主闷闷不乐地站在太阳光里，只有一位柔媚、纤弱、不很年轻的女子靠着太阳伞，目光微微向前探视。皇位继承人踩在那个身材魁梧的光头哥萨克手臂上。——另一幅图画上，在远处，早已走过的男子们在致敬。

图画上的百万富翁在“金子的奴隶”影院里。简直把他实录下来了。安详、缓慢、目标清晰的动作，必要时加快些步伐。手臂的颤动。富有，养尊处优，昏昏欲睡，但他是怎样地像一个奴隶跳起来，审视着森林小酒馆那间关押他的房间的啊！

7月2日。为一位23岁的马丽·阿布拉罕的诉讼报道而啜泣。她因为灾难和饥饿将她的将近9个月的孩子巴巴拉勒死，用的是一条男人的领带。她曾用它做袜带，后来解开用它勒死孩子。完全是机械的故事。

我用火在我妹妹的浴室表演一幅滑稽的如电影摄像机的图像。我为什么永远不能面对陌生人做这个呢？

我也许永远不会与一个和我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一年之久的姑娘结婚。

7月3日。通过结婚拓宽和提高生存的能力。这是说教箴言，但我几乎早就知道它的意义。

如果我说些什么，它便马上失去，最终失去重要性；如果我将它写下来，它也总会失去，但有时候便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

小金弹子似的带子围在一个褐色的脖子上。

7月19日。四个武装的男子从一所房子里出来。每人身前都持着一根垂直的长戟。有一个男子时时转过脸去看那人是否已经来到，他们站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缘故。这是很早的早晨，街道上还空无一人。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来吧！——我们不想这样，别管我们。

内部的耗费是为此做出的！音乐从咖啡屋里传出来，如此地进入一个人的耳朵。埃尔莎·B叙述的一箭之遥的远处变得清晰了。

一个女人坐在绕线杆旁，一位男子顶着一把插在剑鞘里的剑（他将剑鞘随意地拿在手中），门开了。

男子：他来过这里！

女子：谁？你们想干什么？

男子：盗马贼。他躲在这里。不要否认！他晃动着剑。

女子：举起绕线杆自卫。没有人来这里。别缠我！

7月20日。下面的河面上浮着许多船，渔翁甩起钓竿，那是一个阴霾的日子。有几个小伙子交叉着双腿倚在码头栏杆旁。

当人们站起身来举起香槟酒杯祝贺他们离去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了，双亲与一些参加婚礼的客人一直陪到他们上车。

7月21日。不要怀疑。对你不怀疑也不要怀疑。如果一切看来已经完结，那时还会有新的力量出来的，这就是说，你活着。这力量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这里一切就完结了，而且是彻底地完了。

我不能睡觉。只有梦，没有睡。今天我在梦中发明了一种为坡度较大的公园用的新交通工具。人拿一根树枝，不用太粗壮，将它斜撑在地上，另一端抓在手里，尽量轻轻地像坐在女式马鞍上一样坐在上面，然后整个树枝有间歇地自然向下坡滑行。因为人坐在树枝上，便一起跟随着行动起来，在加足速度的滑行中，人坐在富有弹性的木头上惬意地摇晃。这里当然也有一种利用树枝朝上坡行进的可能性。这主要的优点，除了整个装置简单之外，还在于这个树枝如它本身一样，匀细、灵活、可放下、可举起，可随意地穿过任何地方，包括那些一个人独自难以通过的地方。

我的脖子套上了绳索，被拖拽着穿过一座房子底楼的窗户，而且好像是被一个不留心的人肆无忌惮地往上拉，穿过了所有的屋顶、家具、房墙和阁楼，浑身流着血，全身被撕碎了，直至上面的屋顶上出现那副空空的套索，它将我刚刚在冲破屋顶瓦片时残余部分也丢弃了。

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在最不肯定的状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是内心中的一组滑轮。一只小钩子向前推进，任何地方都是隐蔽

的，人们第一眼几乎看不出来，而整个机械已在运动。屈从于一种抓不住的力量，就如时钟屈从时间那样，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喀嚓声，所有的环节一个挨着一个地按它规定的节奏发出声响。

收集了所有赞成和反对我结婚的说法：

1.没有能力独自承担生活，大约不是没有能力生活，完全相反，甚至未必是真实的，我懂得与一个人生活，但我没有能力。我自己生活的冲击，我本人的各种要求，时间与年纪不饶人，模糊不清的写作冲动，失眠，接近于神经错乱的状态——我是没有能力独自去承担这一切的。也许，我当然要补充。与F.结合会给我的生存以更多的抵抗力。

2.一切都让我去作同样的思考。每一个诙谐就登在滑稽的小报里，回忆福楼拜和格里尔巴策，看到我双亲为夜间准备放在床上的长睡衣，马克斯的婚姻。昨天我姐姐说：“所有（我们熟悉的）结了婚的人都是幸福的，我不理解。”这种说法也让我思考，我又害怕了。

3.我必须常常独自一人。我所取得的就只是一种单独状态的成就。

4.所有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事，我都仇视，交谈使我感到无聊（即使这交谈与文学有关），访问也使我感到无聊，我的亲戚的痛苦和欢乐使我感到无聊，直透心灵深处。交谈夺取了我思考的一切，重要性、严肃和真实。

5.害怕结合、害怕流去。以后我永远不再是独自一人了。

6.我在我的姐妹们面前与在其他一些人面前相比，常常完全是换了一个人，过去尤其如此。无所畏惧、暴露无遗、坚强有力、令人吃惊、容易激动，这些也只有在我写作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如果我有妻子介绍，我在所有人面前也能这样该多好啊！那么，这不就夺去我的写作了么？这绝对不成，这绝对不成！

7.大概会有那么一天，我也许能真的独自放弃我的职责。结婚，那就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在我们的班级里——阿马利恩高级中学的文科班里，有个小伙子叫弗里德里希·古斯，我们大家都非常恨他。如果我们早进教室，并看到他坐在炉子旁他自己的位置上，我们几乎无法理解，他能一下子振作起来

再来学校。但我说得不够确切。我们不仅恨他，我们恨所有的人。我们是一种可怕的联合。有一次，农村学校的督察来校听课——那是一节地理课，教授描绘着，将眼睛转向黑板或窗户，像所有我们的教授，描绘着莫雷阿半岛……〔中断〕

这是开学的日子，那是将近晚上的时刻。高级中学的教授们正坐在会议室里，研究着学生的名单，旁边放着新的教科书，还讲述他们假期旅游的事。

我可怜的人！

对马只有着实实在在地抽上一鞭子，慢慢给它一个踢马刺，然后一下子将之抽出，现在再用所有的力气将之刺进肉里。

是怎样的灾难啊！

我们疯了？我们在夜晚跑步穿过花园，还摇动着树枝。

我驾着一艘船驶进一个小小的自然港湾。

在我中学学习期间，我有时习惯于去拜访一位大约叫约瑟夫·马克的人，他是我去世的父亲的一位朋友。当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中断〕

胡戈·赛弗尔特上中学的时候习惯于有时拜访一位名叫约瑟夫·基曼的老年独身男子，这男子跟胡戈死去的父亲很要好。当胡戈出乎意料地马上到国外去接替一个职务而离开家乡一些年的时候，这种拜访便突然中断了。当他后来又回国的时候，他虽打算去拜访这位老人，可是找不出机会来。也许这样一种拜访对于他改变了的观点来说并不适合，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穿过基曼住的街道。是呀，不管他从没有看见他依在窗旁，大概他也没有被他瞧见，总之，他疏忽了这种拜访。

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虚弱。自我毁灭，一束地狱的火焰涌急的尖部穿过地面。

7月23日。和菲利克斯在罗斯托克。女人们爆炸的性欲。她们自然的不纯洁性。与那个小伦兴的游戏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看一眼一位肥胖的女人，她蜷缩在一张藤椅里，将一只脚明显地向后移，随便地在缝制着什么东西，并跟一位老年女人——也许是一位老处女，从嘴巴的

一边看上去她的假牙总是显得特别大——聊天。怀孕的女人，精力充沛并机智。她的后面有着划分成的平坦的平面，好像经过认真琢磨似的。在小露台上的生活。正如我完全冷冰冰地将这个小女子抱在怀里一样，我也没有完全幸福地超越这冷冰冰的寒意。在“寂静的山谷”里攀登。

透过商店打开的门看，一位白铁工匠不断地用铁锤敲击着，如何幼稚地坐着工作。

罗斯科夫的《魔鬼的故事》：在现在的卡利布族人那里。“在夜里工作的人”被尊为世界的创造者。

8月13日。现在大概一切都完了，我昨日的信是最后一封信。这许是绝对正确的。我将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她将遭受什么样的痛苦——这与可能产生的共同的痛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要慢慢集中自己的精力，她要结婚，这是活着的人的唯一出路。我们两人不可能为我们俩打开一条通往山崖的路，我们为此哭泣了一年并苦恼了一年，这就足够了。她将从我这些最后的信里看出这一点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一定会和她结婚的。因为我太虚弱了，我反对她那关于我们共同幸福的看法，而且不能不完成她认为可以完成的一些事情，只要这事与我有关。

昨天晚上站在星空之下的观景台上。

8月14日。遇上了相反的事实。收到三封信。我无法抵御那最后的一封信。我喜欢她，如果我对此有能力的话，但爱情在恐惧和自谴中被扼杀而埋葬了。

从《判决》中得出的结论正适合我的情况。我要将这个故事直接地归功于她了。格奥尔格就是毁灭在新娘的手中的。

性交是对在一起幸福的惩罚。尽可能禁欲地生活，比一个单身男子还要禁欲，这对我来说是承受婚姻的唯一可能。可是她呢？

尽管如此，我们，我和F.，也许完全是平等的，也许我们有相同的未来和可能性，我也许不准备结婚，我已经慢慢地将她的命运推进了死胡同，但这便使我担负起不可逃避的、而且也完全有点儿无法估计的义务。某一种人关系的秘密法则在这里起作用了。

给双亲写信使我很为难，特别是因为在特别不利的状态中写出来的

一种思想好长时间并没有改变。今天我却是暂且成功，至少在里面不存在不真实的东西，而且对双亲来说也是可以读的，可以理解的。

8月15日。在床上的痛苦直至早晨，在窗户的裂缝中看到了唯一的解决。母亲来到床前，问我是不是寄走了那封信，问那是不是我的老生常谈。我说，那也许是老生常谈，不过更为尖锐。她说，她不理解我。我回答，她当然不理解我，而且大概还不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后来她问我，我是不是要给阿尔弗雷德叔叔写信，他理应得到我写给他的信。我问，他从何说起应该得到我的信。他打了电话，他写了信，他对你也很不错。“这些只是表面的东西，”我说，“他对我来说非常陌生，他完全误解了我，他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和需要的是什么，我跟他毫无关系。”“那就是说没有人理解你了，”母亲说，“看来我对你来说也是陌生的，父亲也是。那就是我们大家都只是想到你的坏的方面。”“当然，你们大家对我都是陌生的，有的只是血缘的亲近，但它却没有表现出来。当然你们不是想到我坏的方面。”

通过这一点和通过一些其他的自我观察，我被引往这样的看法中去了，在我的变得越来越明显的坚定性和深信不疑之中存在着不少可能性，那就是不管一切而能在婚姻中生存，而且这婚姻甚至会导向一种对我的情绪大有裨益的发展。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信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已经在窗棱上抓住了这个信念。

我将和所有的人隔离开来，直至失去意识。和所有的人一起与我为敌，不跟任何人交谈。

有着一双神秘、严肃目光眼睛的男子，他肩膀上搭着一堆旧大衣。

雷奥波尔德·S.一位高大强壮的男子，笨拙、拖沓的动作，松松垮垮的、多皱褶的、黑白方格的衣服，急匆匆走进门里右边的大房间，击着双手，并叫道：菲莉斯！菲莉斯！等待着呼喊的结果，不一会儿，他便急匆匆地走向当中的门，他又呼喊着“菲莉斯”，并将这道门打开。

菲莉斯·S.通过左边的门出现，在门边站住，一位穿着厨裙的40岁的女人：我在这里，雷奥。你最近怎么变得神经质了？你究竟想干什么？

雷奥波尔德猛地一下转身去，然后停住，并咬了一下嘴唇：啊，在这里！你过来呀！他走向长沙发。

菲莉斯无动于衷：快说！你想干什么？我要去厨房了。

雷奥波尔德离开长沙发：甭提厨房！过来呀！我要跟你说些重要的事情，很值得的。你来呀！

菲莉斯慢慢地走去，将裙子的挂带往上拉一拉：说吧，究竟什么事那么重要？如果你把我当傻瓜，我会生气的，我是认真的。在他面前站住。

雷奥波尔德：那你坐下嘛！

菲莉斯：如果我不想坐呢？

雷奥波尔德：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要你一定挨近我。

菲莉斯：我已经坐下了。

8月21日。我今天得到克尔凯郭尔^[58]的《里希特选集》。如我知道的，他的情况与我的情况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非常类似，至少他处在这个世界的同一边。我确认他像一个朋友。我给父亲草拟了下面的信，如果我有力气的话，我想明天将它寄出去。

您延长对我请求的答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一位父亲面对每一位请求者都会这么做的，这当然根本不是引起这封信的原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它让我怀有更大的希望去静静地评价这封信。但我写这封信是出自这样的恐惧，即您的延长或您的考虑有着更多的普遍的理由，似乎也是必然的，那不是出自我第一封信的那个能够暴露我的唯一的地方。那么，这就是那个说到有关我不能忍受职务的事。

您大概略过了这句话，但您这就不应该了。您应该的是，更为加倍地询问清楚，然后我就得给您下面的清楚而简短的回答。我的职务令我不能忍受，因为它与我的唯一的渴求、我唯一的职业——那就是文学——是相矛盾的。因为我除了文学，什么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如此，我的职务永远也不可能将我拉到自己身边，但它大概能将我完全摧毁，我已离此不远了。最糟糕的神经过敏状态无休止地控制着我，今年围绕着我的和您女儿未来的担心和烦恼彻底地表明我已失去抵抗能力。您可能要问，我为什么没放弃这个职务，而且为什么不试图靠文学的工作养活自己哩——我没有那种能力。我只能对此作出这种可怜的回答，我对此没有力量，如果我全面掌握了我的状况，我自然将会迅

速毁灭的，倒不如在这个职务中毁灭算了。

现在您将我提到您的女儿面前，她是一位健康、活泼、自然、强壮的姑娘。不论多少次，我也在大约五百多封信中重复了这一点，也不论多少次，她用一种自然是无力解释的“不”来慰藉我——而留下的真实是，她肯定会随我一起变得不幸，我对此是能看得出来的。我不仅通过我自己的外部状况，而且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本性表现，我是一个封闭的、沉默寡言的、不爱交际的、怨天尤人的人，但并不能将这些说成是对我的不幸，因为那只是我的目标的反射。从我生活在家中的生活方式里至少可以得出这些结论来。现在，我生活在家庭里，生活在最好的、最可爱的人当中，但陌生得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在近几年里，我每天和母亲说话平均不到20个字，与父亲，在某些时候顶多只是互换几句问候的话。与我的那些已经结了婚的姐姐和姐夫们，我根本不说什么，倒并不是跟他们生气。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跟他们实在是没有多少话要说。所有那些不是文学的东西，令我无聊，我仇视那些东西，是因为它们打扰我、妨碍我，哪怕只是些假想的事。对于家庭生活来说，我缺乏任何想象，除了在最佳情况下的观察者的想象。我没有亲戚间的感情，我在拜访中看到的简直就是针对我的幸灾乐祸。

一种婚姻也许不能够改变我，同样，我的职务也不能够改变我。

8月30日。我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拯救？到底会有多少的不真实一起被冲上岸来，对此我毫无所知。如果真正的联系像真正的告别一样，同样是由那些不真实交织起来的，那么我一定是做对了。在我自己的身上就有着没有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看得见的欺骗。有限的圈子是纯洁的。

10月14日。这条小街上的一边砌起一座教堂公墓的墙，在另一边砌起一座带有阳台的小房子。这座房子里住着退休的官员弗里德里希·蒙克和他的姐姐伊丽莎白。

一群马冲出围篱。

两个朋友早晨骑马出游。

“魔鬼，把我从这神经错乱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一位年老的商人叫道。晚上由于疲倦躺倒在长沙发上，现在深夜只好集中全力艰难地爬起身来。有人重重地敲着门。“进来，进来，外面是谁呀！”他叫道。

10月15日。我大概又阻拦住了自己，我大概又悄悄地跑了一段较短的距离，又克制住了我在孤独中的绝望。但头仍在痛，失眠在继续。现在的存在只是为了斗争或者还有更多的事情，我没有选择。

在里瓦的停留对我来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第一次理解了一位基督的姑娘，而且几乎完全生活在她影响的圈子里。我没有能力为这个记忆写下一些有影响的东西。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健康，我宁愿让我的虚弱为我保持住一个迟钝、清新、空空的脑袋，如果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被挤到边上说的话。但这种状况对我来说，也几乎只是缓慢地、隐隐约约地逼近，此外，要让这种逼近加快到来，也许必须要一把早先将我击碎的榔头。

给恩斯特·魏斯写信的尝试失败。昨天在床上的时候，这封信在我的脑子里已经煮熟了。

坐在一辆电车的角落，将大衣披在身上。

G.教授正在里瓦旅游。他有一只使人忆起死亡的德意志一波希米亚的鼻子，一副肿胀血红鼓起的面颊装配在一张没有血色的瘦削的脸上，周围是金黄色的胡须。他很能吃喝，舔着未剥皮的半截香肠，认真地啜饮温热的啤酒，鼻子周围冒着汗珠。这是一种通过最贪欲的目光和嗅觉引起的令人作呕的举止。

这房子已经锁上了。在二层楼上的两扇窗户里还亮着灯光，还有四层楼的一扇窗户里也有灯光。一辆车子停在楼房的前面。一个年轻的男子出现在四层楼的窗户旁，他打开窗户，并朝下面的街道看去，外面月光如银。

那是一个很晚的夜间，这位大学生完全没有了继续工作的兴趣，何况这也根本没有必要了，因为他在最近几个星期里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大概可以小歇一下，限制一下夜间的工作。他合上了书籍和笔记本，整理一下桌子上所有的东西，并想脱衣服去睡觉。但他突然朝窗户外面看去，当他发现了那满月的光辉时，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这个美丽的秋夜再去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可能的话，再在什么地方弄杯黑咖啡来振奋一下。他关了灯，拿起帽子，打开朝厨房去的门。一般来说，这对他完全无所谓，那就是他必须要穿过厨房外出，不过这种不舒服却使他的房间房租便宜非常。可是有时候，如果厨房有特别的嘈杂

声，或者，像今天晚上，已经很晚了还想外出，那倒是令人讨厌的。

没有慰藉。今日下午半睡着。痛苦最终却不得不使我的脑袋爆炸了，而且两边的太阳穴也是如此。我在这种想象中所看到的，原来是一个射击的伤口，围绕着这口子的是掀起的有着锐利棱角的边缘，就如一只被野蛮敲裂开来的金属罐。

忘不了克鲁泡特金^[59]！

10月20日。早晨有想象不出的悲哀。晚上读雅科布松的《雅科布松事件》。唤醒这种力量，做出自己的决定，带着兴致把脚插在准确的地方。他坐在自己的体内，就像一位熟练的划船运动员坐在自己的船上，或者是任何一只船上。我想给他写信。

我没写信，却去散步了，所有接受了的感情通过我与遇到哈斯的谈话而消失了。女人们使我激动，现在我在家里读《变形记》，觉得它并不怎么样。我大概是无望的了，今日早晨的悲哀又来，我无能为力再对抗它，它夺取了我的每一个希望。我没有一次有兴趣去写一篇日记，大约是因为这里面缺的东西已经太多，大约是因为我看来肯定不得不只是继续地描写一半的情节，大约是因为写作本身就为我的悲哀做出了贡献。

我很喜欢写童话，（我为什么如此地仇视这个字？）W.可能喜欢童话，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她将童话放在桌下，休息时朗读，当她发现疗养院的大夫已经在她的身后站了一个时辰并盯着她看的时候，她的脸红得可怕。有时候，实际是她叙述时持续的激动（我害怕，像我注意到的，在自我回忆时那种简直是肉体上表现出来的努力、痛苦，在这痛苦之中，思绪空荡的空间慢慢地开启，或者说，也只是刚刚有点儿拱起），所有的人都在抵御写成了的东西。要是我知道，她的戒律在里面起作用，对她是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的（我是在努力地、几乎是不用费力地抓住了这一点），那我也许会满意的，但这不是什么别的，而是无能。此外，我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我今日晚上在一段长距离的路上考虑了这些，通过与W.的结识，我失去了与这位俄国女人的欢乐，她也许会让我夜里进入她的房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她的房间与我的房间斜错着。我晚上与W.的交往是这样的，我用一种敲击的语言敲击我的位于她房间下面房间的屋顶，听她的回答，然后将身子探出窗外，向她问候；有时从她那里得到祝福，有时去抓一根挂下来的带子，我们从没有彻底

地交谈过；有时我坐在窗框上约一个小时，听上面她每走一步的脚步声，将每一个偶然的敲击错误地理解为互通的信号，倾听她的咳嗽，听她入睡前的唱歌。

10月21日。丢失的一天。访问林霍弗尔工厂。埃伦菲尔斯讨论会。在韦尔奇那里，下午用餐，散步，现在10点钟在这里。我不停地想着那只黑甲虫^[60]，但却写不了。

在渔村的一个小港口里，一只小船整装待发。穿一条扎脚灯笼裤的男子在监工。两个水兵正扛着麻袋和箱子径直走向登岸桥，在那里有一个大个子的男子，双腿叉开，接过所有的东西，再将这些东西交给从黑洞洞的船内向他伸出来的不知是哪个人的双手。在占据了港口一隅大方石上半躺着的五个男子，朝着各个方向吹着他们烟斗里冒出的烟。穿扎脚灯笼裤的男子时不时地朝他们走去，说上几句话，并敲敲他们的膝盖。他们通常在一块石头背后提出一个酒桶，它是放在那里的阴凉处保存着的，一杯混浊的红色葡萄酒在这几个人的手中传递着。

10月22日。太晚了，悲伤和爱情的甜蜜。在船上任由她含笑地注视着，这是最美的船。只是一直有死的愿望，而还在坚持，单单这本身就是爱。

昨日的观察。对我来说适合的处境是：倾听两个人的一次谈话，这两个人在讨论一件跟他们关系很近的事，而我对这件事有的只是极为遥远的同情，除此而外，这同情完全是无私的。

10月26日。全家人围坐着吃晚饭。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我看到了热带的夜晚。

“我究竟是谁？”我训斥我自己。我从长沙发上站起来，我本来躺在这长沙发上将膝盖抬得高高的，后来又直起身子坐着。从楼梯间直接通往我房间的门开了，一个低着面孔、带着审视目光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在这个狭窄的房间里可能容许的情况下，他围绕着长沙发走了一个弓形的路线，在窗户旁边角落的黑暗处站住了。我想看一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走过去，并抓住这个人的手臂。这是一个活人。他微笑着向上——比我个子小点——朝我看着，漫不经心地打招呼，并说“您只管审查我吧”，这样的漫不经心也许应该使我相信了。尽管如此，我仍是前面抓住他的坎肩，后面抓住他的上衣，使劲地抖动他的身体。他那根

好看的金黄色表链突然引起我的注意，我抓住它，并将它硬扯了下来，固定它的那个纽扣孔被撕裂了。他忍受着，低首只是看着那被扯坏的地方，无可奈何地紧紧抓住已经撕裂了的孔眼里的坎肩纽扣。“你干什么？”他终于说话了，并让我看他的坎肩。“不许动！”我威胁地说。

我开始在房间里兜圈子，每当我经过这个人的身边，我总要向他举起拳头。他根本不朝我看，而是只顾整理他的坎肩。我感到非常自在，我的呼吸变得异乎寻常，我的胸部在衣服里只感觉到一种巨人般升起的阻碍。

已经多少个月了，一位年轻的书记员威廉·门茨一直想与那位有规律似的在早晨去办公室的路上一条很长的街道上有时在这个地方或有时在那个地方总碰得上的姑娘讲几句话。他已经忍受了这种只是停留在企图上的做法——他很少有决心去面对女人们，何况是一个在时间上不利的早晨，要与一个匆忙赶路的姑娘说话——这巧事却发生了，他在一个晚上——那是在圣诞节的时间里——看见了那位姑娘在自己的不远的地方走路。“小姐，”他开口了。她转过脸，认识这位总是在早晨遇到的男子，她并没停下，只是将目光稍稍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下，因为门茨再也没有讲什么话，她就又接着往前走去。他们走在一条被照得通亮的街道上，人群如潮。在没有引起人注意的情况下，门茨非常近地跟在她的身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门茨并不想插进来说几句什么适当的话，但他也不想就这么陌生地面对这位姑娘，因为他要将某种如此严肃地开了头的气氛继续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竟敢于拉扯姑娘上衣的下摆，这位姑娘容忍了这种举动，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11月6日。这突如其来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它早就存在了！我竟能够像一个在半途上昂首阔步的人那样进出所有的门。我只是不知道，我是不是想这么做。

我们不想告诉双亲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事情，我们每天晚上9点后都聚在一起，我和两个表兄弟，在一处公墓的铁栏旁，那个地方有一处小小的高地，可以好好地眺望一番。

公墓铁栏的左边是一块大大的长满青草的空旷的广场。

11月17日。梦。在一条上坡的路上，大约是在上坡的中段，主要是在可通行车辆的道上，从下边看，由左边开始，那里是垃圾或是变得死

板的泥土，它们向右边的方向由于脱落而变得越来越低凹，而在左边它们却高得像一个篱笆的寨栏那样立在那里。我走在右边，这里的路毫无阻碍，我看见在一辆三轮车上一个男子从下面向我驶来，好像是直接对着障碍冲去似的。这位男子像是一个没有眼睛的人，至少他的两只眼睛看上去像两个模糊不清的洞穴。三轮车行驶不稳，显得松松垮垮、摇摇晃晃，但却没有噪声，几乎是过分沉寂、过分轻飘了。我在最后的一刹抓住了这个人，让他停下来，就好像他是这辆车子的把手似的，车子来了个急刹车，我马上走过去。这个时候这个人朝我倒下，我一下子变得高大无比，将他保持在他身不由己的姿势中。就在这个时候，这辆车子开始像没有主人似地倒退着开动起来。尽管是缓慢的，但也把我带走了。我们驶过一辆两侧有栏杆的马车，车上拥挤着好多人，他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年轻的开路者，他戴着一顶浅灰色的卷边的帽子。我从好远的地方已经看清了这位年轻人，我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但他却回避地走开了，而且挤进了人群。后来，在这辆马车的后面有一个人朝我走来——三轮车继续不停地前行，我不得不交叉着双腿低低蹲下去——那个人帮了我的忙，但我已经记不起他来，我只知道这一点，那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现在像是隐蔽在一块绷得很紧的黑色布料后面，我应该尊重他的这种隐蔽举动。

11月18日。我又将要写作了，但在这个时候我对我的写作有着多么多的怀疑呀。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无知的人。这种人，他如果不是被迫的话，他不会有任何自己的贡献，而且几乎看不到这种压力；他也许进了学校，也许刚好能蹲在一座狗舍里，如果有人将饲料放在了它的面前，它就跳出来，如果它将饲料吞食完了，它就又跳回去。

在一个被太阳照得炽热的院场上，两只狗从相反的方向迎头跑着。我为给BI小姐的信的开头苦恼着。

11月19日。读日记使我感动。是我在当代一点儿也没有安全感的缘故？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虚构。别人的每一个评论，每一次偶然的目光相遇，即使是已经遗忘了的事情，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这一切都会在我的内心里翻向另一边。每当我只感觉到生活暴力的时候，我就越是感到不安全。我感到毫无意义的空虚。我真的像一只夜间在山区迷失的羔羊，或者像一只跟在这只羔羊后面跑的羔羊，是那樣的无望，而且也没有力气去悲痛了。

我有意穿过有妓女来往的街道。从她们身边走过令我感到诱惑，那种与一个妓女同走的可能性是遥远的，但毕竟是存在的。这是下流的行为么？但我不知道什么更好的东西了，这样的溜达在我看来基本是无辜的，几乎不会使我后悔的。我只喜欢胖胖的、穿着旧式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要挂着不同饰物的衣服而显得丰满且年纪较大的女子，有一个女人大概已经认出了我。我今日下午碰到过她，她没有穿那种职业的服装，没有戴帽子，头发还紧贴在头上，工作服式的上装像厨娘的衣服，随意挎着一只包，大约是要去洗衣妇那里。也许没有人能从她那里发现某些诱人的地方，只有我。我们相互间匆匆地看了几眼。现在已晚，这个时候天气也变冷了，我看她穿一件贴身的黄褐色大衣，站在窄窄的、从采尔特纳街拐弯的街道另一边，那里有林荫路。我向她回望了两次，她也接过了我的目光，可是我后来还是离她而去。

没有把握自然来自于对F的想法。

11月20日。去了电影院。流了眼泪。看了电影《罗罗特》。那位善良的牧师。那辆小自行车。双亲的和解。没有节制的聊天。先是悲剧电影《船坞里的不幸》，然后是开心的《最终孤零零》。我完全空空如也，毫无意义，驶过的电车有着更多的活生生的意义。

11月21日。梦：法国某部，四个男子围坐在一张桌旁举行一个讨论会。我回忆起坐在右边的那个男子，从侧面看，他有一张压得平平的脸，黄色的皮肤，一只奇长而笔直的鹰钩鼻子（由于脸孔扁平，鹰钩特别明显），黑而浓密的小胡子在嘴上形成一个拱形。

可怜的观察当然又是来自一种虚构，它最下面的末端不知飘荡在空处的什么地方。当我从写字桌上将墨水瓶拿到卧室，我感到了在我身上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坚定性，如此就像一座大楼的棱角在雾中呈现，不一会儿又消失了。我并不觉得自己无望了，在我的心中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它是不依赖于人的，当然也不依赖于F。如现在，如果我从这儿离去，那就像一个人一下子跑到田野去了。

这个预言，这个为这些例子而作的预言，这种注定了的恐惧是可笑的。这就是那些当然存在于那样想象中的虚构，在这样的想象中唯有那些虚构在统治着，只是这些虚构总是在差不多到达活生生表面的时候，却一下子被淹没了。谁要是魔术般的手的话，他就会将它藏到机械里去，那么，上千把的刀也不能将它粉碎和驱散。

我追逐着虚构。我来到一个房间里，并发现它在一个角落闪着白光而纵横交错地走着。

11月24日。前天晚上在马克斯那里，他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对我来说，他已经经常如此，现在我对他也是这样了。昨天晚上我索性躺上床了。

将近早晨的梦：我坐在疗养院花园里的长桌旁，那里甚至已是桌子顶头的地方，这样竟使我在梦里看见了自己的后背。那是一个混沌的日子，我肯定已进行了一次郊游，我在一辆汽车里，汽车在斜坡上向前行驶，不久便到达目的地。有人正要将饭菜端到桌上，这时候我看见一个女侍者，一位年轻、柔媚的姑娘，迈着十分轻松或者说十分摇晃的步子，穿一件秋天树叶颜色的衣服，穿过作为疗养院建筑的前部分的圆柱大厅，下着台阶朝花园这里走来。我还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但她表现出了向我询问的样子，并欲弄清我是不是她要找的人。她确实给我带来一封信。我想，这不可能是我等待的那封信，那是一封很薄的信，信封上是陌生的轻淡而不稳定的书法。我打开信，掏出一大叠薄薄的写满了字的纸，当然所有纸上写的均是陌生的字迹。我开始读信，一页一页地翻阅，并认识到，这肯定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显然是F.的最小的妹妹写的。我带着强烈的渴求开始念起来，这个时候，坐在我右边的人，我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好像是一个孩子，目光越过我的手臂朝着我的信看着。我叫起来：“别看！”餐桌周围神经质的人们开始颤抖起来，我似乎遭到了一种不幸。我试着很快用几句话来请求大家原谅，以马上能再继续去读这封信。我又俯下身看我的信，这个时候我绝对地醒了，好像是被我自己的叫声弄醒的。我在清醒的意识里强制自己再入睡境，这种情况真的又展现出来了，我还很快地读了信上的两三行模糊不清的字，对于这些字我什么也没记住，同时在继续的睡境里也失去了这个梦。

一位年纪大、长得魁梧的商人正上楼去他的住房，他膝部弯曲，举步维艰，他的手并不是在抓住楼梯的栏杆，而是在使劲地压住它。在房门前，在有铁栅栏的玻璃门前，如往常一样，他正欲从裤袋掏出钥匙串，这时，他注意到在一个阴暗的角落站着一位年轻人，这年轻人正向他鞠躬。

“您是谁？您要干什么？”商人问，还呻吟着努力地往上去。“您是梅斯纳商人吗？”年轻人问。“是。”商人回答。

“那我就告诉您一个消息，我是谁，在这里本来是不重要的，因为我本人完全没有参与此事，我只是个传递消息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凯特，是一个大学生。”“噢，”梅斯纳说着思考了一小会儿，“那么，什么消息？”他后来问道。

“我们还是到房间里说这些好，”大学生说，“这是一件并不是在楼梯上能了结的事。”

“我也许不知道，我一定要得到这样一种消息。”梅斯纳说，同时向旁边看了一下地上。

“这是可能的。”大学生说。

“还有，”梅斯纳说，“现在是夜里11点多钟了，没有人会在这里听我们说话的。”

“不，”大学生回答，“我不可能在这里说的。”

“可是我”，梅斯纳说，“在深夜里不接待客人”。同时他那么用力地将钥匙捅进锁孔里，使得钥匙串上另外的一些钥匙不停发出叮当的响声。

“我从8点开始就在这里等了，我等了3个小时。”大学生说。

“这只能证明，这个消息对您是重要的，而我不需要什么消息。每一个对我来说可以不听的消息就是收益。我并不好奇，您只有走吧，走吧。”他抓住这位大学生的薄薄的大衣，并推开一段小小的距离。然后他稍微地启开房间的门，从房间里涌出一股浓浓的暖气进入走道。“那不是一条商业的消息？”他后来问道，他已经站到了打开的门里。

“这也不能在这里说。”大学生说。

“那我只能跟您说晚安了。”梅斯纳说着，走进自己的房间，用钥匙关上了门，拧开了床上的电灯，在有着不少利口酒的小壁橱旁倒了一杯酒，一口喝完，还咂舌作声，并开始脱衣服。正当他依靠着高高的枕头，想读一份报纸的时候，他好像听见有人轻轻地敲着门。他将报纸放到被子上，交叉着双臂倾听着。真的又有敲门的声音，而且非常非常地轻，声音简直就出自门的下端。“真是一个纠缠不休的猴子。”梅斯纳大笑。当敲门声停止，他又将报纸拿到跟前。可是过一会儿敲门声更厉害

了，而且是直接朝门上敲击发出的砰砰声。好像是孩子的游戏，敲击点分散在整个门上的各个部位，就这样不断敲击着，一会儿在门下部敲击在木头上发出沉闷的声音，一会儿在门上部敲击在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声音。梅斯纳摇着脑袋想，“我一定得起来了。”“我没法给房东打电话，因为电话机在那一边的前屋里，也许我得叫醒老板娘到那里去。除了我亲手将这个年轻人推下楼梯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拉了一下头上的毡帽，卷起被子，分开双手，将自己挪至床边，将一双脚缓慢地踩地在上，并穿上塞有填充物的高帮室内鞋。“啊，现在，”他想，咬着上嘴唇，死死地盯着门，“现在又静下来了。但我必须要它彻底地安静。”他自言自语着，并从一个架子上取下一根带有牛角把手的手杖，他抓住手杖的中央，朝门走去。

“外面还有人吗？”他站在锁着的门边问。

“有，”有人回答道，“请您为我开下门。”“我开。”梅斯纳说，开了门，手持手杖出现在门前。

“不要打我！”大学生警告地说，并向后退了一步。

“那就滚吧！”梅斯纳说着，用食指指着楼梯的方向。“可我不能走。”大学生说着，那么出乎意料地跑向梅斯纳……〔中断〕

11月27日。我必须停下来，倒不是直接为了摆脱。我并不感到自己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危险，我感到的是自己的孤立无援，像个局外人似的。但那种引起我最微不足道写作的坚定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我昨天在散步的时候用目光通观着一切！

那是开大门女房东的孩子。裹着一块旧的女人头巾，有着一副苍白、呆板且肉乎乎的脸。这孩子就这样在夜里由女房东带到大门口。

女房东的长卷毛狗坐在下面一级台阶上，倾听着我在四层楼开始的踩踏声，当我走近它的身边，它就看着我，当我继续走下去，它就追着我。有一种信赖状态的舒适感，因为它并不觉得我可怕，并将我包括在这座房子及其响动声里。

图像：船上的年轻人在经过赤道时的洗礼。水兵们在闲荡。向着各个方向和高处逆行的船为他们提供坐下的机会。依靠在船梯上的那些大个子水兵用有力的圆肩膀一步一步地挤向船体，看着下面的奇景。

12月4日。长大成人，但年纪轻轻便死去，或者甚至于自杀，这从外部看来是可怕的。在彻底的、也许在继续发展的范围里有着某种意义的迷惘中离去，没有希望或只带着唯一的希望，这种在极大期待的范围之内生命中现象的出现将被视为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我现在也许就是处在这种境遇里。死亡无非就是这一种无有奉献给那一种无有，但这对感觉来说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怎么能够有意识地只是把自己当做一种无奉献给那种无呢？这种无不仅是一种空无所有的无，而且也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无，它的虚无只是在它的不可理解里存在。

男人们的圈子，这些男人分别是主人和仆人。有着劳动锻炼出来的在生动的颜色里闪烁着光辉的面孔。那位主人坐着，仆人将吃食放在盘子上送给他。在两人之间再没有更大的差别，再没有其他更为有价值的差别了，例如，在一个通过了无数麻烦合作和生活在伦敦的英国人与一个其时独自在暴风雨中驾着船在海上航行的拉伯兰人之间的差别。当然仆人可以——这也只是可能——成为主人，但这个问题，也许可能得到解答，在这里却不成为问题，因为这涉及对瞬间关系的瞬间评价。

被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最好交往和最顺从的人，有时候即使从某种感觉程度上去怀疑的人类的统一性，也在完美的、不断发现总体的和单独的人类发展的共同性中，从另一个方面向每一个人的展示，或者说看上去本身在展示，即使是在个别人的最封闭的感觉中。

对愚蠢的恐惧。在每一种直接追求的、将所有其他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的感觉中去看这种愚蠢。那么，什么是不愚蠢呢？不愚蠢就是，在门槛前入口的一旁若乞丐似地站着，倒下，变腐烂。但P.和O.是令人作呕的傻瓜。世上肯定有愚蠢的行为，这种愚蠢行为比它的体现者更为厉害。这些小傻瓜在他们各种愚蠢行为中互相表现出的紧张神态大概就是令人作呕的地方。但基督在法利赛人^[61]看来不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中吗？

神奇的、完全充满矛盾的想象，有一个人，比如他在夜里3点死去，旋即在将近晨曦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的生命。在看得见的人类的东西与所有另一种东西之间存在着怎样不相容的东西啊！从一种秘密中接着出现的总是一种怎样更大的秘密呀！在最初的瞬间，人类的算术家就被弄得精疲力竭，人们也许肯定是本来就害怕走出房屋。

12月5日。我是怎样对我的母亲发怒的呀！我一定要开始跟她谈

谈，我已经发怒了，几乎喊叫起来。

O.痛苦起来了，而我却不相信她正痛苦着；她会痛苦，我不相信这与我较好的理解相悖；我不相信这一点，为的是不必站在她一边，可是我也许做不到，因为我也对她发火了。

我看F.是表面的，至少有时候这样，只是一些数不清的小小的个别地方。因此，她的形象同时是那么清晰、单纯、本真、轮廓性、透明。

12月8日。魏斯小说中的虚构。消除它的力量，做这件事的义务。我几乎否认经验。我要安静，一步一步地，或者奔跑，但不是料想到的蝗虫的飞跃。

12月9日。魏斯的《大战船》。当故事的情节开始时，效果减弱。世界被战胜了，我们睁大眼睛旁观。因此，我们可以镇静地转过身去，并继续活下去。

憎恨面对积极的自我观察。心灵的解释，诸如：我昨天曾是如此，因此之故，我今天是如此，因而就这样。这是不真实的，不是因为这样和不是因为这样因而也就不是如此和如此。静静地忍受，不要鲁莽，像人们所必须地那样生活，不要奴性十足地四处奔跑。

我在灌木林里睡着了。一阵响声将我惊醒，我发现我的手里有一本书，我早先读过这本书。我扔下它，跳了起来。那时刚刚是午后，我所在的小小的高地前面，伸展着一大片低处的平地，有村庄、水塘和高高的芦苇似的灌木丛。我将双手放在臀部，用眼睛看清了一切，并同时谛听着那种响声。

12月10日。人不能不想到那些发现。

督察主任有一副笑逐颜开的、年轻的、奸猾的、松弛的面孔，我在他那里还从没有看到过这副面孔，只是今天在那一瞬间，当我给他朗读博士论文偶然抬头看他一眼的时候才注意到它。这时，他突然抬起肩膀，将右手插进裤袋，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人。

注意并判断所有的事态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些所有的事态影响到瞬间的情绪，甚至在情绪中发生作用。最终也在判断中发生作用，因此，那样说昨天我感觉坚强，今天我却绝望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区别只

是证明，人们情愿让自己受影响，并尽量地与自己隔绝，躲藏在偏见和幻想的后面，过一种做作的生活。就像一个人有一次待在小酒馆的一个角落，足足地被一小杯烧酒淹没，只是与自己一个，与喧闹虚伪无法证实的想象和梦境交谈。

将近半夜，一个身穿紧瘦、无光泽、灰色方格大衣的年轻人正在对着那间演小歌剧厅的楼梯上往下走，他衣服上还稍稍沾有几片雪花。他在账房的桌边付了款，桌子后面的半睡半醒的小姐被吓了一跳，并用黑色的大眼睛直视着他，他站了一小会儿，俯看一下那个在他脚下还有三级台阶的厅堂。

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去国家火车站，今天，因为下雨，我在厅堂那里来来回回走了半个小时。那个小伙子不断地吃着从自动售货机取出的甜食。他将手伸进口袋，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零钱，漫不经心地扔进洞里，吃东西的时候，还读着上面的说明文字，吃的东西掉下几块，他将它们从肮脏的地上拣起来，又直接放进嘴里。——那位安静地靠着窗口咀嚼着什么的男子与一位妇人、一位亲戚在亲密地交谈。

12月11日。在托因比大厅读了《米夏埃尔·科尔哈斯》的开始部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不成功。选择得不好，朗诵得不好，最终是在文章里毫无意义地游来游去。典型的听众。第一排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有一位不停地将帽子小心翼翼地扔在地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想以此来打发他无辜的无聊。因为他个子太小，无法从坐席上做这件事，他总是耍少许地从坐椅上滑下来。朗读的人显得粗野、糟糕、不仔细、不理解。下午的时候我已在要朗读的欲望面前颤抖了，几乎不能闭上嘴巴。

真的不需要撞击，只是拉回最后使用在我身上的力量，而我进入了将我撕成碎片的绝望。当我今天设想我在朗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时，我在问自己，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安静呢？它在什么地方会是有道理的呢？而我只能说，那只是一种出自于它本身缘故的安静，一种不可理解的恩赐，否则什么也不是。

12月12日。早上，在相当程度上我是非常清爽地起床了。

昨天在回家的路上，那位身穿灰色衣服的小伙子在一群小伙子旁边并排奔跑，捶击自己的大腿，且另一只手抓住另一个小伙子，并发出喊

叫声——颇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无法忘记这情景：“今天真是太棒了。”

我带着这种清爽，今天按照有一点儿改变了的日程安排，大约6点左右走向街道。可笑的观察，我什么时候才会根除这个哩。

我刚刚在镜子里仔细地观看我自己，这对我来说在面孔上——当然只是在我后面晚上的照明和光源，本来也只有耳朵边缘的绒毛被照出来——作细致的探讨，要我现在按自己的认识探讨更好。一副清晰的、明显是有教养的、几乎是完全受到约束的面孔。黑色的毛发，眉毛和眼窝像从其余的期待着的人群里透出的生命。目光仍然炯炯有神，没有憔悴的痕迹，但这目光也并不单纯，更确切地说，有力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只是在观察，因为我正在观察自己，并想让自己害怕。

12月13日。昨日长时间没有入睡。F.终于有了这个计划，而我因为入睡得并不稳，我请魏斯带一封给她的信到办公室，在这封信里什么也没写下去，只是一定要得到她的消息或者有关她的消息，因此派出了魏斯，好让他给我写有关她情况的信。在此际，魏斯坐在她的写字桌边，直到她读完这封信，魏斯弯了一下腰，因为他没受到别的委托，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得到答复便走了。

官员团体的讨论晚会。我主持这个会。滑稽的自我感觉的源泉。我开场白的这句话：“我不得不带着这个讨论会开始了的遗憾来主持今晚上的讨论会。”就是说我没有及时知道这个会议，因此没有准备。

12月14日。贝尔曼^[62]朗诵。没有什么，但带着一种感染性的自我满足感去朗诵的。姑娘似的面孔有点甲状腺肿。几乎在说出每一个句子之前，面孔上肌肉的抽缩都是一样的。就像打喷嚏的情况。一个有关圣诞节夜市的诗节出现在今天日报的他的文章里。

先生，为您的小家伙们买下它吧，好让他们大笑而不流出眼泪。

引用了肖的话：“我是一个坐得太久、胆怯的市民。”

在办公室里写了给F.的信。

当我上午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遇到从讨论会出来的与F.长得相似的姑娘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在瞬息之间，我不知道这位姑娘是谁，但只注

意到，她虽然与F.相似，但并不是F.。可是除此而外，还有更多与F.有联系的东西，也就是这种联系，即是我在讨论会上从她的目光里更多想到F.的那种联系。

现在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地方，使我忆起我的《不幸的存在》。

12月15日。给魏斯博士和阿尔弗雷德叔叔的信。没接到电话。

读了《我们1870/71的年轻人》。带着压抑的叹息又读到了胜利的和鼓舞人心的场面。安安静静做父亲，安安静静与他儿子交谈。然后他可不必用玩具的小锤敲击在心脏的地方。

“你已经给叔叔写信了吗？”母亲问我，正如我早就准备幸灾乐祸等待着似的。她也早就害怕地观察着我。从诸多原因看，她第一是不敢问我，第二是不敢在父亲面前问我，最终还是担心地问了，因为她看到我正想出去。当我从后面走过她的坐椅的时候，她目光离开纸牌朝上看了一下，带着一种早已没有过的、不管怎样对这个瞬间来说重新活跃起来的动作，将面孔转向我，并问了这个问题，目光只是朝上一瞥而过，还胆怯地微笑了一下。就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她已经感到受了屈辱。

12月16日。“天使们狂喜得如雷般的吼叫。”

我在韦尔奇那里坐在摇椅上，谈论关于我们生活的杂乱无章，他总还是怀着某种信心（“人们一定要想到那个不可能的东西”），我却没有这种信心，我看着我的手指，处在我内在空无的代理人的感觉之中。这种空无是独一无二的，却也并不过分。

12月17日。给W.的委托信。正朝外溢，可是只是一只放在冷炉子上面的锅。

朗诵贝尔格曼《摩西和当代》。完美的印象。——不管怎么说我对此没做什么。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交叉着实实在在的路，没有引向下段的距离，而且已经走过的那一段距离也马上消失了。这样的路有无数条，或者只有一条，人们不能对此下断语，因为无法一目了然。我就在那个地方，我不能离去。我不会抱怨自己。我痛苦并不过分，因为我遭受的痛苦并不是互相关联着的，它不是聚积在一起的，至少我暂时感

觉不到这一点，我巨大的痛苦远远地处在一种我大约应得的痛苦之下。

一个男子的侧面黑影像，这个男子向高处半举起或用各种姿势举起手臂对着浓密的雾走了进去。

在犹太风俗中产生了美好而有力的分离。人们有了位置，人们更好地看到自己，也更好地评判自己。

我累了，我去睡觉。这在那里大概是明显的了。做了许多有关这些的梦。

B1.错误的信。

12月19日。F.的信。美丽的早晨。感觉到血热。

12月20日。没有信。

一副平和面孔的效果，一次平静讲话的作用，特别是一个陌生的、还没有被看透的人的面孔和讲话。从一个人的嘴巴里发出了上帝的声音。

一个老人于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浓雾中穿过街道，外面是刺骨的寒冷，街道上空无一人。没有人从他身边走过，只是有时他看到远处雾稀的地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或者一位穿着皮衣或戴着头巾的女人。没有谁关心他，他只是想去访问一位朋友，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去这位朋友那里了，这位朋友现在正让一位女仆来接他。

当梅斯纳商人房间的房门发出轻轻叩击声时，那已经是子夜后好长时间了。他总是在将近早晨的时候入睡，现在肯定醒不了了，直到他醒来的时候，还习惯于腹部朝下趴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伸展一下胳膊，将双手交缠在头上。这时，他立即听到了敲门声。“是谁？”他问道。一阵听不懂的嘟哝，回答的声音比敲门的声音还轻。“门是开着的。”他说，并拧开了电灯。一个身材弱小戴着大头巾的女人进来了。

1914年

1月2日。与魏斯博士友好地度过了许多时间。

1月4日。我们在沙子里挖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槽，很舒服地待在里面。夜晚我们一起滚在了这长方形槽的中间，父亲用树棍做架，并在上面扔一些灌木枝条，遮盖住这个槽。在大风暴和野兽面前，我们是绝对安全的。当这些木棍下面变得完全黑暗的时候，我们常常战战兢兢地叫着“爸爸”，可是父亲还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我们从缝隙中看到了他的脚，他滑行到我们的面前，轻轻地摸摸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感觉到了他的手的时候，我们感到了慰藉，后来我们就一起入睡了。除了双亲，我们是五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在这个长方形的槽里，我们觉得太狭窄了。但如果我们在夜里不互相挨得这样近的话，我们会害怕的。

1月5日。下午。歌德的父亲在昏昏沉沉中死去。在他最后生病的时间里，歌德正写着《伊菲格尼》。

“将这个婆娘弄回家去，她喝醉了。”不知哪一位宫廷官员向歌德指着克里斯蒂安说道。

那位像他母亲一样酗酒的奥古斯特总是放荡地与女人们混在一起。

父亲出于社交的考虑，指定这位不讨人喜欢的奥蒂利为他的妻子。

沃尔夫是外交家和作家。

瓦尔特尔是音乐家，没能通过考试。成月地退隐在有小花园的房子里；沙皇皇后想看儿时：

“请告诉皇后，我不是野兽。”

“我的健康与其说靠铁，还不如说靠铅。”

沃尔夫浅陋的没有成绩的文字工作。

顶楼房间里的老人聚会。80岁的奥蒂利，50岁的沃尔夫，以及老年朋友们。

在如此极端的状况下，他们才注意到，他们每个人从本身来说都无可挽救地失落了，只有在观察别人和统治着他们以及所有人的法则的时候才能得到慰藉。沃尔夫从外表看是怎样随和呀，或者呼之即来，开朗，勇气十足，工作起来井然有序——他的内心却又是怎样地克制和无动于衷啊。

为什么楚克契人^[63]不从他们可怕的土地上迁徙出来呢？跟他们当今的生活相比，跟他们目前的愿望相比，他们也许在什么地方都会生活得更好。但他们不能这么做，所有一切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那些发生的事情是可能的。

一位来自较大邻城的葡萄酒商人在F.小城建一个酒店。他在环形广场上的一所房子里租了一间小圆屋，墙上画上了东方风味的装饰画，屋内安置了几乎已经不再用的割毛制品的家具。

1月6日。迪尔赛：《经历和诗创作》。对人类的爱，对由人类造就的所有形式的最高敬意，在最合适的观察位置上的一种静悄悄的后退。路德年轻时的文字，“来自一个看不见世界的强大影子，为谋杀和血腥所吸引，进入到这看得见的世界”。——帕斯卡尔。^[64]

为A.给其岳母的信。L.^[65]吻了那位男老师。

1月8日。凡特朗诵。《金首领》：“他撂倒敌人就像撂倒一只桶。”

不安定、枯燥、安逸，一切都将在这里面消逝。

我有什么与犹太人是共同的呢？我几乎没有一点儿东西与自己是共同的，我应该完全静静地为我能呼吸、能在一个角落里待着而感到满意。

描述难以解释的感觉。A.：自从这事情发生以来，看到女人就使我痛苦，但这大概不是性的激动，也不是纯粹的悲哀，它只是使我难受。在我对丽丝尔有信心之前，也是这样的情况。

1月12日。昨日：奥蒂利不正当的恋爱关系、年轻的英国人。——托尔斯泰的订婚，一个温柔、暴躁、压抑、充满预感的年轻人留下的清晰印象。身穿深色和深蓝色衣裳，很漂亮。

在咖啡馆里的姑娘。紧瘦的裙子，白色的、宽松的、镶皮的丝绸上衣，裸露的脖子，出自同样丝绸料子的戴在头上极为合适的灰色的帽子，她有一张在呼吸时永远运动着的、丰满的、大笑的面孔，友好的双眼当然显得有点儿矫揉造作。在想F.时我的面孔变得热起来。

回家的路，清澈的夜，在我心中只是模糊清晰的意识，这意识走得那么远，有着无遮无拦的不断延伸着的极大清晰度。

尼古拉，文学方面的信件。

对我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然，这些可能性是被压在什么样的石头下面啊？

飞快地前行，在马上——

年轻时代的无意义。恐惧青年时代，恐惧无意义，恐惧不近人情的生活无意义的出现。

台尔海姆[66]：“他具有那种心灵生活的自由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变换的生活环境里总是通过全新的方面令人吃惊不已，就像真正诗人的创造所具有的那种灵活性。”

1月19日。在办公室的恐惧随着自我意识而交替变化着，否则会有信心的。对《变形记》有很大反感。不可读的结尾。不完美几乎直至根本。如果我当时未受商务旅行打扰的话，它会变得更好的。

1月23日。高级督察B.叙述一个与他友好相处过的退了役的上校，他完全开着窗户睡觉：“在夜里是很舒服的，关着就不舒服了，到了早晨我不得不除去放在窗边的无靠背沙发上的积雪，然后就开始刮胡子。”

图尔海姆伯爵夫人的回忆录：

母亲：“特别是拉辛适合您温柔的举止。我常常听说，她是如何地向上帝祈祷，愿上帝让他永远安宁。”

肯定的是，他（舒沃罗夫）在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拉索莫夫斯基伯爵设的盛大宴会上像一个非常贪吃的人猛吃着桌上的佳肴，根本不等别人动刀叉。他要是吃饱了，站起身来便走，让客人们单独待着。

按一幅版画描绘的一位柔弱的、坚定的、迂腐的老人。

“这对你说不一定”，母亲糟糕的安慰。最坏的是，我在这个瞬间几乎不需要更好的安慰。在这里面我是受伤的，而且还受着伤害，但有规律的、微弱变换的、半忙碌最后时日的生活紧拉着我（办公室里有关“企业”的工作，A.对他未婚妻的操心，奥特拉的犹太复国主义，姑娘在朗诵萨尔滕及席尔德克劳特作品时的享受，朗读图尔海姆的回忆录，给魏斯和洛维的信，校对《变形记》），并给我某种程度的坚定性和希望。

1月24日。拿破仑时代：城堡是怎样拥挤啊，所有的人都那么匆匆地“享受短短和平时期的欢乐”。“另一方面，女人们在这似箭的光阴中给这些欢乐施加着她们的影响，她们真不想丢失这些时间，那个时期的爱情在较高的热情和更大的献身中表演出来了。”——“在今天，一个虚弱的时刻再也找不到什么托词了。”

没有精力给B1.小姐写上几行字，已经有两封信没有回答了，今天收到第三封信。我对什么也理解得不正确，我虽然意志坚定，但觉思想空乏。最近，当我又一次在有规律的时辰里走出电梯时，我突然想起，我的生活，随着它的时日越来越深地朝着细微末节里千篇一律化，跟惩罚性的作业十分相似，被惩罚的学生必须要按他的错误十倍、百倍地写下常常是同样的，至少是重复的没有意思的句子，不过在我这里所说的一种惩罚只是：“那么寻常，就如你忍受的那样。”

A.不能安静下来。不管他对我的信任，不管他想从我这里得到建议，我在谈话中获悉的大约总只是那些最坏而孤立的东西，同时我总不得不尽量压下那突然的惊愕，也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感觉，他肯定不是将对这种可怕的陈述无动于衷看作是冷冰冰态度，就是将它看作是极大的安慰。这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我知道的接吻故事如下，部分是通过几个星期分开的阶段：一位老师吻了她——他在他的房间里——他多次地吻她——她按时来到他的房间里，因为她为A.的母亲做了一件手工活，而且教师那里的灯光很好——她听任老师吻她——他早先就向她表达过爱情——她还是不顾一切地与他一起散步——想送他一个圣诞礼物——她有一次写道，我遇到了一点儿不舒服的事，但什么也没留下。

A.以下面的方式盘问了她：那是怎么一回事？我想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件事。他只是吻你吗？是经常这样吗？去哪儿了？他没有压在你身上吗？他触摸你了吗？他想脱你的衣服了吗？

回答：我坐在长沙发上正做着手工活，他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后来他走过来，朝我旁边坐下，并吻我，我推开他退到沙发的靠垫上，并把头埋在垫子上。除了接吻什么也没发生。

在提问题的时候她曾说：“你只是在想什么呀？我是一个姑娘。”

现在我突然想起，我给魏斯博士的信是这样写的，他完全可以让F.看这封信。如果他今天做了这件事，并因此而推迟了他的回答，会怎么办呢？

1月26日。我无法将图尔海姆的回忆录念下去，它也构成过我最近时日的快乐。给B1.小姐的信现在在路上了。这种事是怎样的纠缠着我，并使我忧心忡忡啊。双亲在同一张桌子上打牌。

双亲和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星期日坐在桌边。母亲正好站起来，用长柄勺在大肚形汤罐里舀汤，分给每个人，突然整个桌子抬起，桌布飘起，平放着的手都滑了下来，汤里夹带的肉丸子溜进了父亲的怀里。

现在我几乎骂起了母亲，因为她将埃莉[67]的《凶恶的无辜》藏了起来，本来我昨天就想将它交给埃莉的。“给我放下这些书，否则我什么也没有了。”我真的怒不可遏地讲了这些话。

图尔海姆父亲去世：“紧接着走进来的医生们发现脉搏太弱，留给病人活命的时辰更为少了。我的上帝，那就是他们谈论我的父亲——只有几个小时残喘的时间，然后他就得死去。”

1月28日。朗诵关于卢尔德[68]奇迹。自由思想的医生，有力、强壮的全副牙齿，巨大的欢乐就是从嘴里滚滚流出话语。“现在，德国的彻底性与真诚性结成一条战线来对抗异族的江湖医生，是时候了。”《愚蠢的送信人》报纸的叫卖人。“今天晚上的治愈是确凿无疑的了！”——讨论：“我是一个简单的邮政官员，其他什么也不是。”——“世界饭店”。——在出门的时候想起F.，产生了没完没了的悲哀。通过思考逐渐感到了安慰。

寄出给B1.的信并魏斯的《大战船》。

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前，一位用纸牌占卜的女人告诉A.的妹妹，她的

哥哥订婚了，而且他的未婚妻欺骗了他。他当时发怒地撇开了这样的说法。我说：“为什么只是当时？就是今天这也错了，就像当时一样，她可是没有欺骗过你。”他说：“不是吧，她没有欺骗过吗？”

2月2日。A.女朋友给未婚妻写的妓女式的信。“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就像当时，忏悔的说教把我们束缚在它的影响之下的时候。”“你为什么在布拉格那么克制，与其在大的方面发泄，还不如在小的方面发泄。”我突然有了好的想法，根据我的信念解释对未婚妻有利的信。

昨日A.在施卢克瑙。整天同她坐在房间里，不停地询问她，手里拿着装有全部信件 of 包（这是他唯一的提包）。他没有获得什么新鲜的东西，在离开前的一个小时他问：“在接吻的时候想熄灯了吗？”他获悉使他感到失去慰藉的新消息，那就是W.在（第二次）接吻的时候熄了灯。W.在桌子的一边画画，L.坐在另一边（在W.的房间里，晚上11点钟）朗读《阿斯摩斯·赛姆佩尔》。这个时候W.站起来，向柜子走去，为取什么东西（L.想是一个圆规，A.认为是一只避孕套），然后灯就突然地熄了，他用吻来突然袭击她，她对着长沙发跌下去，他抓住她的肩膀，同时说着：“吻我吧！”

L.在另一种情况下说：“W.非常笨拙。”另一次说：“我没吻他。”又有一次说，“我想是躺在你的怀里。”

A.说道：“我必须要搞清楚”（他想让她去医生那里检查），“如果我以后在洞房花烛之夜获悉她是撒了谎会怎样呢？她大概只是因为他使用了避孕套因此而显得安详的吧。”

卢尔德：向奇迹的信仰攻击，也就是向宗教攻击。他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权利到处反对宗教、宗教仪式的行列，反对忏悔，反对肮脏的行为，因为这不能证实，祈祷是否有所帮助。卡尔斯巴德^[69]比起卢尔德来是一个更大的欺骗，而卢尔德有其优势，人们会由于内心最深处的信仰而去。这跟在手术、注射、用药方面的固执看法是怎样的关系呢？

可是司空见惯的是：为重病的游子而设的大医院；不干净的浸礼堂；期待专列的担架；医生委员会；山上巨大交叉的炽热灯光；教皇每年征收300万。神父带着圣体显示匣走过，一个女子从她的尸架上叫起来：“我没有病！”她的骨结核病仍然没有变化。

门开成一条缝。一只左轮手枪显现出来，还有一只隐蔽的手臂。

图尔海姆II35，28，37：没有比爱情更甜蜜的东西了，没有比卖弄风情更有趣的事情了；45，48：犹太人。

2月10日。散步后的11点钟。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为什么？

1. 马克斯说，我是安详的。

2. 菲力克斯将要结婚（跟他生过气）。

3. 如果F. 还是不喜欢我的话，我就独自待着。

4. X. 夫人的邀请，我考虑着，将怎样向她自我介绍。

我偶然地走上与平时方向相反的那条路，那就是凯滕斯特格、赫拉钦、卡尔桥。今天从相反的方面走，我觉得有点儿轻松，否则我真的要跌倒在这条路上了。

2月11日。粗粗读了一遍迪尔赛的《歌德传》，狂热的印象，丢开它，人们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点着，在烈火中毁灭。或者是追随而去，即使人们没有听说什么戒律。他坐在空空荡荡的房间中央的沙发上，看着镶木地板。听那在山中的狭路上大叫“前进”的声音，从岩石之间的所有支路上听到有几个人在大叫，并看着他们显露出来。

2月13日。昨天在X. 夫人那里。安详而有力，有一种无可指责的、贯穿全身的、渗透的、用目光、双手和双脚训练有素的力量。坦诚、直率的目光。我的记忆里总浮现着她那顶来自早先的难看、硕大、庄重、用鸵鸟毛作饰物的复兴时代的帽子，要是我不认识她本人的话，我会厌恶她的。当她勿急地欲达到一个叙述目的的时候，就会把皮手笼压在身体上，并发出一阵抽搐。A和B是她的孩子。

在目光中，在叙述时的忘我中，在完全的投入中，在这小而有生命力的身体中，还有在生硬而低沉的声音中，常使人想到W.。在谈到美丽的衣服和帽子的时候，在她的身子上却看不到这些样式。

目光从窗户越过河流，在交谈中的许多地方，我全说错了，表现出毫无意义的目光。对她说的东西我一窍不通，翻来覆去地做着简单的说明，尽管她并没显出疲倦，而我必须看到，她是怎样在倾听的啊，她下

意识地抚摩着那个小孩子。

梦：在柏林，穿过街道，朝她家走去，安详幸福的意识，我虽然还没去过她的家，但我可能很容易想去那里，而且将一定会去那里。我看着这条两旁有房子的街道，在一家白色房屋旁写着这样的字，大概是“北方豪华大厅”（昨日在报纸上读到过），不过梦里补充了“柏林W”。我问一位和蔼可亲的红鼻子老警察，这位警察穿一种公仆的制服，我得到了十分详尽的答复。他甚至为我指示了远处一个小草坪设施的扶手栏杆，如果我从旁边走过去的话，为安全的缘故，我可以扶着这个栏杆，然后便是一些涉及电车、地铁等等的忠告。我不能再走下去了，我大概知道，我低估了这段距离，便害怕地发问：“这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可是这位老者答道：“我到那里只要6分钟。”多么令人高兴！不知姓名的人、一个影子、一个同伴总是在陪伴着我，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真的没有时间转过身去，向一旁转过身去。

我在柏林随便地住在一家供膳食的公寓里，房间很小，在这所公寓里住的好像全是年轻的波兰犹太人。我倒出一杯水。有一个人不停地在打字机旁打着字，有人向他请求什么，他连头也不回，没搞到柏林的地图，我不停地看一个人手中的一本书，类似于地形图。又一再地发现，里面是另一些内容，是柏林学校的分布图，一种税收统计数字或是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本来不想相信这个，但那个人毫不怀疑地微笑着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2月14日。比如，如果我自杀，显然是F.最近的态度所诱使，别人自然完全是没有责任的。我自己在半睡眠的状态中已经设想过一次这样的场景，也许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我在预先看到结束的情况下，将这封信放在口袋里，来到她的住处，作为求婚者被拒绝，我就将这封信放到桌上，走向阳台，被从各方面赶来的人抓住，我挣脱了，这个时候一只一只手不得不停止了动作，我就会越过阳台的栏杆。在这封信里写着，我虽然由于F.的缘故跳下去，但对我来说即使接受求婚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是属于下面的，我没有别的补偿。F.是我为之表明心迹的意外的女人，我没有她无法生活，我不得不跳下去，我也许——F.知道这一点——也没有能力与她一起生活。为什么不为此利用今天的夜晚呢？我已经感觉到了今天学生家长晚会的讲话出现在我面前，他们谈论生活和生活条件的创造——可是我抱着这样的想象，完全缠绕在生活里了。我不会做这个事，我完全是冰冷的，我是悲哀的，围着脖子的

衬衣压迫着我，我真见鬼，我在雾霭中忍无可忍。

2月15日。对我来说，在回首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候显得多么长啊。我昨天下午去剪了头发，然后给B1.写信，再后来在马克斯那里待了一会儿，那是新住宅。然而L.W.旁边的家长晚会，然后（在电车里遇到）鲍姆，然后在归途上马克斯埋怨我沉默不语。然后，自杀的狂想；然后，姐妹们从家长晚会归来，无能为力报告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直到10点钟上床，睡不着，痛苦，还是痛苦。没有信，这里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给B1.的信投到弗兰茨—约瑟夫铁路局，下午G.在莫尔达乌旁散步，在他的住处朗诵，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母亲在吃奶油面包和摊摆纸牌，独自转悠了两个小时，决定星期五去柏林，遇见科尔[70]，和姐夫、姐姐们在家，然后在韦尔奇那里谈论订婚（J.K.熄灭的蜡烛），然后在家中试图用沉默来从母亲那里引出同情和帮助。现在姐姐叙说俱乐部晚会，时针已经指在12点3刻上了。

为慰藉激动的母亲，我在韦尔奇那里说道：“是呀，我通过这次婚姻也失去了菲莉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朋友不是朋友。”菲莉斯没说什么，自然也不能说什么，他甚至连想也没想要说什么。

这个小册子以F.开始，它使我在1913年5月2日头脑不安宁，我也可以以这个开始结束这个小册子，如果我用一个更为糟糕的字来代替“不安宁”的话。

2月16日。没有收益的一天。我所有唯一的欢乐就是由昨天建立起来的对较好睡眠的希望。

我像平常一样，结束业务之后晚上回家，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人在窥视我，有人从盖因茨梅尔住宅的所有的三扇窗户里向我热情地打招呼，我想上去。

2月22日。尽管我也许没有睡好，脑袋的左上方由于不安而疼痛，可是还是可以有一块较大整体安静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将一切忘掉，而只去体会我的善良。

2月23日。我动身了。穆西尔[71]的信，使我高兴，也使我悲哀，因为我什么也没有。

一个年轻人骑一匹漂亮的马从一座别墅的大门出来。

当祖母死的时候，只有那位看护士偶然在她身边。护士说，祖母在临近死亡的一刹那曾从枕头上微微抬起身，给人的印象是她好像是在找谁，尔后，她便安静地躺回去，死了。

毫无疑问，我处在一种完全被包围着的顾虑中，当然，我还没有完全与这顾虑融为一体，但我注意到了眼前它的引诱，而且它可能爆炸。现在有两个办法，要么结婚，要么去柏林，后者比较稳妥，前者直接说来更为诱惑。

我潜入水底，马上觉得自己找到了头绪。一小群浮上去的人飘过去，并在绿色中消失了。在水的喧嚣中钟形物被涌来涌去。——虚假的。

3月9日。伦塞走了几步，穿过半暗的走道，打开吃饭房间那扇裱糊的小门，几乎没看一眼就向着吵吵嚷嚷的人群说道：“请你们稍稍安静些，我有一位客人。我请你们体谅。”当他又进入他的房间，并听到无所变化喧闹的时候，他停了一会儿，想再次走过去，却又改变了主意，仍旧回到自己的房间。在窗户旁边站着一位大约18岁的青年，朝下面的院子看去。“已经安静多了。”当伦塞进来的时候，他说道，并对伦塞翘起了他的长鼻子和一双深陷的眼睛。“根本没有安静多少，”伦塞说，喝了一口放在桌上杯里的啤酒，“在这里你甭想安静。不过小伙子，你必须习惯这些。”

我累了，我一定要通过睡觉来恢复一下，不然的话，我在哪一方面也没有希望了。要维持自己，需要多少的艰辛啊！竖立一座纪念碑却不用花费如此多的力气。

一般理由：在F.身上我已经输了。

伦塞是一位大学生，正坐在院子里的自己小房间里学习。女佣来通报，一个年轻人要找伦塞。伦塞问，他叫什么名字？女佣不知道。

我在这里忘不了F.，因此也不会结婚。这完全肯定了吗？

是啊，我能对此作出判断，我将近31岁，认识F.几乎有两年了，肯定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但除此而外，我在这里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使我已经无法忘却，即使F.对我没有如此的意思。我所在的地方，我生活中的单调、有规律、懒散和依赖性注定要与我牢牢

连在一起。此外，我有一种比平时更多追求舒适和偏好依赖的生活习性，而且这一切危害之事不因为我而变本加厉。我也终于变得衰老了，要作诸多的改变越来越难。从这所有的一切里，我却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不幸，这个不幸也许旷日持久、无可指望的了；如果我真的忍受了这些话，我也许要在薪金的梯子上和在年月的时辰里艰难地跋涉，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悲伤、越来越孤独。

可是你想到过要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吗？

我要是结了婚的话，公职人员的生活对我来说也许会是不错的。它也许在面对社交、女人、写作各个方面给我提供一个良好的后盾，不要求太多的牺牲，不用在另一个方面变成懒散和依赖，因为，作为结了婚的男人，我也许不害怕这些了。但作为单身男子，我不可能过完这样的生活。

可是你是可以结婚的呀？

那时我不可能结婚，我身内的一切都起来反叛，尽管我一直非常地爱F。这主要考虑到我的写作，是写作阻止了我，因为我认为写作的工作会由于婚姻而受到损害，我想我是做对了。由于单身汉的生活方式，婚姻已经在我现在的这种生活里面毁灭了。我已经一年之久没写什么东西了，我可能也将继续写不了什么，在脑袋里我什么也没有，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要作为这一思想保留。再说这一思想已将我咬碎，我当时已经无法衡量这一切。另外，在我的至少是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养成的依赖性中，我对一切事情都迟疑不决，一开始什么事情也干不出来，在这里也是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放弃所有的得到F的希望呢？

我已经尝试了忍受所有的屈辱。在动物园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说‘是’呀，尽管你认为你对我的感情还不够一种婚姻的感情，我对你的爱却是深得足够弥补这种不足了，而且也强大得足以将一切承担在自己身上。”F看上去是由于我的性格而感到不安，在一段很长时间的通信过程中，我引起了她对我这种性格的惧怕。我说：“我爱你足以使我放掉可能会打扰你的一切。我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即使在我们关系最亲热的时候，我已经常常有这样的预感，而且通过一些小事情，常常有这样的理由的恐惧，F并不非常爱我，不是用所有的她能够付出的那种爱的

力量，像我现在可以承认的一样，因为一切都必须要弄明白。如今，F.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不是没有我的协助。我几乎担心，F.甚至在我前两次的访问之后就对我怀有某种的厌恶，尽管我们表面还是互相亲切友好，互相用你相称，胳膊挽着胳膊行走。作为最后对她的回忆，我得到的是她做出的完全敌意的怪脸，当我在她家的走廊上并没有满足于吻她的手套，而是急速张开嘴巴吻了她的手。如今她对我的两封信还没有作出回答，尽管她答应过要保持准时的遥远的通信，只是通过电话答应写信，但这种承诺并没有得到实践。是呀，她甚至对我的母亲也没有作过一次回答。毫无怀疑，通信许是已经没有指望了。

这些本来都是应该永远不说的。从F.来看，好像你过去的态度也是没有指望的？

这有点不一样。我一直承认，我对她的爱是坦然的，表面上最后的分手好像是在夏天，我从没有掩饰这种残酷。我对我的这种态度是有理由的，如果不同意，这种理由当然可以讨论。F.有的只是完全没有足够的爱的理由。不管怎么说，我也许可以等待，那是没错的。但我不能抱着双倍的失望去等待啊：一方面看着F.不断地在我面前消失，此外，自己又陷入越来越厉害的无能境地，不管怎样也无法拯救自己。这也许是我不能用自己本人去做尝试的最大的冒险行动。不论或者是因为这也许最最适合我身上藏着的极大的恶劣的力量。“人们永远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面对不堪忍受目前一种处境的论据。

那么你现在想干什么？

从布拉格离去。面对这种我曾经遇到的最强烈的人的伤害，而我现在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来甩掉它。

离开职务？

是的，从上述的意义来说，职务是不堪忍受事情的一部分。保险、为生命的继续所做的打算、丰润的收入、不是完全集中所有的力量——这些只是让我作为单身男子什么也干不了的事情，是变成烦恼的事情。

你现在想做什么？

我可以一下子回答所有这样的问题，我如此说道：我没有什么冒险的，每一天和每个最微不足道的成绩都是一种礼物，我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会是善意的。但我也可以更清楚地回答：作为奥地利的法学者，从严肃的意义上说，我又完全不是法学者，我没有对我来说所需要的未来；我也许能够在这个方面为我取得最好的东西，在我的地位上我是拥有它，但我可以不需要它。另外，对这种本身完全不可能的情况来说，即我想从我的已经具有的法学知识中获取点什么，只有两个城市要考虑的：布拉格和维也纳，前者，我必须从这里离去；后者，我仇恨这个城市，而且我在这个城市里肯定不会幸福，因为我已经深信它的必然性而离去。那么，我不宜待在奥地利，而且因为我没有语言的天才，只能是很糟糕地进行着体力的和商务的工作，至少先去德国，从那里去柏林，那里有维持自己的最大的可能性。

在那里，我也可以在新闻工作中最好地、最直接地利用我的写作能力，并能找到一个对我来说差不多的相应收入。是不是我会进而对我赋有灵感的工作有能力，对此，我现在也无法肯定地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我相信我肯定知道这一点，我会从将在柏林的这种独立的、自由的处境里（不论从另外的角度看是多么地艰难）获得我现在还有能力驾驭的唯一幸福的感觉。

但你是爱讲究的。

不，我需要一个房间和素淡的膳食，别的几乎什么也不要。

你不是由于F.的缘故才去的吧？

不，我选择柏林只是出于上述的原因，当然我爱那里由于F.的缘故，是由于想象中间绕着F.的圈子的缘故，这是我所不能左右的。也可能我将在柏林与F.见面，如果说这个会面将帮助我从我的血液中将F.排除出去，那就更好了，那么这又是柏林的优点。

你身体好吗？

不，心脏、睡眠、消化都不好。

一间租赁的小房间，晨昏的时刻，杂乱无章。

大学生躺在床上，面壁而卧。有敲门声。又静下来。敲门声越来越剧烈。大学生恐惧地坐起来，朝门看去。进来。

女佣，柔弱的姑娘：早上好。

大学生：您要干什么？现在是夜里呀。

女佣：请原谅。一位先生找您。

大学生：找我？（停顿）胡扯！他在什么地方？

女佣：他在厨房里等着。

大学生：他是什么样子的？

女佣微笑：噢，还是个小伙子，他不是很帅，我相信，他是犹太人。

大学生：他喜欢在夜里到我这里来？还有，我不需要您对我的客人评头论足，您听见了吧。让他进来。快些。

大学生塞满了放在床边沙发椅子上的烟斗，并点火吸了起来。

克莱佩站在门口看着大学生，大学生眼睛对着房间的天花板，安详地微微朝前吹着烟。（小而笔直的，但却很长的、有点儿朝斜向转动的尖鼻子，暗色的脸部颜色，深陷的眼睛，长长的手臂。）

大学生：要多长时间？请到床这边来，请说您想做什么。您是谁？想干什么？快！快！

克莱佩慢慢地走到床边，并欲在走路的时候用手势来解释什么事情。在说话的时候，他借助于脖子来抬、压眉毛：我也是来自乌尔芬豪森。

大学生：原来如此？好，很好。您为什么不待在那里呢？

克莱佩：请您想一想！那是我们两人的故乡城市，多美啊，可是那是一张可怜的网络。

3月15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棺材后面，大学生们想负担起他的枷锁。他死于工人住宅区，一座租赁公寓的四层楼。

有一次在冬天的早晨将近5点钟的时候，还没穿好衣服的女佣来通报这位大学生说来了一位客人。“什么？究竟怎么样了？”这位大学生还睡眠惺忪地问，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持着从女佣那里借来的点亮的蜡烛进来了，他一只手举起蜡烛，为的是更清楚地看到这位大学生，

另一只手拿着帽子下沉得几乎垂到了地上，他的手臂还真长。

除了期待，什么也没有了，永远的孤立无援。

3月17日。在房间里坐在双亲的身边，两个小时长的时间在翻杂志，有时只是略略地看看，基本上只是在等待，直到10点钟我能躺到床上去睡觉为止。

3月27日。一般是在没有多少不同的情况下度过时光。

哈斯匆匆向船走去，跑过码头栈桥，登上甲板，坐在一个角落，双手捂住面孔，从现在起他再不用顾虑任何人了。船上铃声响起来了，许多人从他身边跑过，远远地，好像在船的另一端，一个人在大声地唱歌。

船员将要收起跳板，这个时候有一辆小黑车正向这里驶来，车夫在老远处大叫，肯定是用九牛二虎之力才使那匹受惊的马停了下来，一位年轻人从车上跳下，吻了一下一位白胡子的老先生，老先生在车顶之下弯着身体，年轻人提着一只小手提箱跑着步上了马上就要离岸的船。

大约是夜里3点钟，但那是在夏天，天色已经半亮了。这个时候，在冯·格鲁申霍夫先生的马厩里，他的五匹马法莫斯、格拉萨弗、图尔内门托、罗西那和布拉班特都醒了。由于夜里闷热，马厩的门只是半开着，两个看马人背靠在稻草上睡着了，苍蝇不时地在他们张开的嘴巴上方飞来飞去，毫无障碍。格拉萨弗就趾高气扬地站在两个看马人的上方，俯视着这两个人的面孔，并准备着在他们稍有惊醒迹象的时候用蹄子踹他们。其他的四匹马就在此时轻松地跳跃两下，便一匹接一匹地离开了马厩，最后格拉萨弗去追它们。

安娜透过玻璃门看到房客房间里黑乎乎的，为夜晚整理一下床铺，她走了进去，扭开电灯开关。可是大学生半躺地坐在长沙发上，并朝她微笑。她请求原谅，并想走出去。但大学生客气地说，她可以留下，并不要管他。她留下，干她的工作，并不时地从旁边朝大学生投去目光。

4月5日。如果可能的话，便去柏林，成为独立的人，一天一天地生活，有时也挨饿，但可以让他的全部力量涌现出来，而不必在这里惜力，或更确切地说，将自己变为一无所有！如果F.想这样的话，也许会

帮助我！

4月8日。昨天显得无力，也只写了一个字，今天并没有好转。谁拯救我？在我的身上的深处，几乎看不到紧张。我像是一座活的格状结构，是一扇固定着的、却又要倒下的栅栏。

今日与韦尔夫在咖啡馆。从咖啡馆桌旁的远处看，他外貌怎样呢？蜷缩着身体，半躺地坐在木椅上，从侧影看美丽的面孔压在自己的身体上，由于丰满（不是原来的肥胖）而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对周围一切完全不闻不问，没有教养而又无懈可击。挂着的眼镜由于它的不一致性而为人们追踪那副面孔柔美的轮廓线条提供了方便。

5月6日。看来双亲已经为F.和我找到了一所美好的住宅，我毫无收益地将整整一个美好的下午东游西荡掉了。他们是不是在一种由他们悉心照料的幸福生活之后还会将我放进坟墓。

一个名叫冯·格里塞瑙的贵族先生有一个车夫叫约瑟夫，大概没有一个其他的雇主能容忍这样一个车夫的了。这车夫住在底层一间挨着门房房间里，因为肥胖和喘息而无法攀登楼梯。他唯一的事情就是驾马车，但也只是在特殊的时候，大约有高贵的客人，才动用他，否则他就整天、整个星期地躺在一张靠窗户的沙发床上，用他那双小小的、深陷在脂肪里的、眨巴眨巴极快的眼睛从窗口看着那些……树木。〔中断〕

车夫约瑟夫躺在沙发床上，他起来只是为从一张小桌上取一块带有鲑鱼的奶油面包，然后又回到床上去，迟缓地啃着面包。他那两只又大又圆的鼻孔艰难地吸着空气，有时候为了获取足够的空气，他不得不暂停咀嚼，将嘴巴张开。他那硕大的肚皮在薄薄多褶的深蓝色衣服下面不断颤悠。

窗子是开着的，通过窗子可看到一棵金合欢和一块空场地。那是一扇楼房底层的矮窗，约瑟夫可以在他的沙发床上透过窗户看到一切，别人也可以从外面看见他。这当然令人尴尬，但他必须住在这么低的地方，至少这半年以来，由于他的脂肪增加得十分厉害，再也不能爬楼梯了。当他得到这间挨着门的房间的时候，他热泪盈眶地吻了雇主冯·格里塞瑙先生的双手，还紧紧握了这双手，但现在他认识到这个房间的缺陷了——永远地被监视，与令人不快的看门人的邻居关系，大门口车道与场地上的喧闹，与其他雇工遥远的距离，以及因此而出现的陌生与冷落

——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到了这所有的缺陷，事实上他也打算要向主人提出请求迁进他原先住的房间。特别自从主人订婚以来，那么多新雇来的小伙子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有什么用呢？他们真的可以背着他这位被使用完了的、又是那么独特的人上下楼梯的呀。

订婚庆典。庆典结束，客人们从桌边站起来，所有的窗户打开了，那是6月的一个美好温暖的晚上。新娘被女友和要好的熟人包围着，其他人分成一小群一小群地待在一起，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新郎独自一人倚在阳台的进口处，向外面观望。

过了一些时间，新娘的母亲看见了他，向他走去，并说道：“你就这样独自站在这里？你不去奥尔加那里？你们吵架了？”“不，”新郎回答，“我们没有吵过架。”“既然如此”，这位夫人说道，“那就到你的新娘那里去！你的举止已经显得令人注目了。”

纯是公式的东西太可怕了。

这位女房东是一位柔弱的寡妇，穿一身黑色的衣服，裙子正往下落，她站在这座空住宅中一间较中央的房间里。四周完全静悄悄，钟也不发出声响，街道上寂静无声，这个女人有意选择了这么安静的胡同，因为她想有好的男房客和那些要求安静的人来这里，他们是最好的房客。

5月27日。母亲与姐妹在柏林。晚上我将与父亲独自待在一起。我相信，他害怕上楼来。我应该和他玩牌吗？（我觉得这“K”难看，他们几乎令我作呕，我却要写写他们，他们很能反映我的性格特征呢。）当我触摸F的时候，父亲会怎样表示呢？

在一个秋日的下午，那匹白马第一次出现在A城的一条大而不很热闹的马路上。它从一家的过道走出来，在这家的院子里有一家运输公司占着一个大面积的仓库，所以经常有驾车的牲口进出，有时也有单独一匹马从房子的走道出来，因此，这匹白马就不引人注目了，但它不属于运输公司的马匹。在大门前用绳索在紧紧捆扎一包货物的工人发现了这匹马，他在工作的时候抬起头来看着，并朝院子里望去，瞧瞧会不会有车夫马上跟上来。可是没有人出现，这匹马几乎还没有踏上人行道，它已经用两只有力的后腿站立起来，从石子路上打出了几点火星，在一瞬间几乎近于摔倒，但它马上控制住了，然后不快不慢地沿着在这个黄昏

时刻几乎完全空荡了的大街小跑而去。那位工人还在咒骂他所认为的那个疏忽的车夫，向着院子里喊叫了几个名字，倒是出来了几个人，可是当他们马上认出这是一匹他们没有见过的马的时候，他们只是稍稍露出惊异神色，并排地停立在大门口了。只是过了一小会儿，有几个人明白过来，他们向着这匹马跑了一段路，可是怎么也看不到这匹马的脸，便又立即回来了。

这匹马此时已经毫无阻碍地跑到城外的大路上。这匹非同一般的独自跑步的马倒是为这条大街增添了生气。它那不快的步子并没惊吓任何人，它也从没离开过车行道，也从没离开过规定的马路边上；如果因为一辆横穿马路的大马车过来而必须要停下的话，它就乖乖地停下；如果小心翼翼的车夫驾住它的笼头的话，它倒可能不会那么俯首帖耳地听话的。不管怎么说，这当然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景象，这里和那里不时有人停下微笑地观看这匹马。一辆驶过的啤酒车上的一位车夫开玩笑地用鞭子抽了这匹马一下，它虽然受惊，用前腿朝上踢了一下，但并没有加快步伐。

一位警察正好看到了这个情况，便走向这匹马，而这匹马正在这一瞬间想朝另一个方向跑去，警察抓住了它的缰绳（这匹马虽然没有非常强壮的体格，但还是作为载重马匹套着笼头的），并十分温和地说道：“停一下，你究竟要朝哪儿跑？”他紧紧地牵着它，在车行道那里停了一个时候，他想，主人一定会马上跟上这匹跑丢的马的。

有意思，却不令人信服，血流稀薄，离心脏太远。我脑子里还有好看的场景，但是打住了。昨天在入睡之前，这匹白马第二次出现在我面前。我有这样的印象，好像这匹马是从转向墙壁的脑袋里出来的，好像越过我身体而离去，并从床上跳下，后来就消失不见了。可惜，这后者通过上面的开头是不容辩驳的了。

如果我一点儿也没弄错的话，我走得越来越近。那就好像在某一个森林空地有着心灵上的斗争。我进入森林，什么也没找到，出于虚弱，马上又钻出来，常常是当我离开森林的时候，我听到，或者我认为听见了每次斗争武器的叮当之声，斗士的目光可能穿过森林的阴暗之处在寻找我，但我知道得只是那么少，而且是些他们虚幻的东西。

倾盆大雨。你面对大雨而立，让铁的光束穿透你的身体，在欲冲走你的水中滑行，但要坚持住，这样坚持地等待着那不知何时突然涌来的

太阳。

女房东扔掉裙子，勿急地穿过所有的房间。她是一位高大冷漠的女人，她突出的下颚令男房客们吓了一跳。他们跑下楼梯，她从窗户里盯着他们，他们在跑的时候设法遮着自己的脸。有一次来了一位小个子房客，一个结实矮小的年轻人，他总是将双手放在衣服的口袋里。这大概是他的习惯，但也可能是他想掩饰那双手的颤抖。

“年轻人，”这女人说话了，将下颚朝前突起，“您想在这里住？”

“是的。”年轻人说，头从下往上抽搐着。

“您在这里会很舒服的。”女人说，将他引往一只靠背椅子。在这个时候她注意到，他裤子上有一个斑点，她在他的旁边跪了下去，并开始用指甲去清除这个污斑。“您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孩子。”女人说。

“那是一个老斑点。”

“那么，您也正是一个老不爱干净的小孩。”

“拿开您的手，”他突然说，并真的推开了那只手，“您这双手是多么可怕呀，”后来他说道，抓住她的手翻转着，“上面全是黑的，下面是苍白的，但也是够黑的。”——他深入到她宽大的袖子里——“您的手臂上甚至还长了一些毛。”

“您把我弄痒痒了。”她说。

“因为我喜欢您。我不懂，别人为什么要说您是丑陋的？别人就是这么说的。但我现在看到，这完全是不正确的。”

他立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还跪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手。

不知出自什么原因，这使他变得更疯狂了，他跳了一下，又拿起了她的手。

“啊，这样一个女人，”然后他说道，并轻轻掠了一下她长而瘦削的面颊，“住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也许会给我带来欢乐，这必须要便宜。您不可接纳别的房客，您必须对我忠诚。我比您年轻得多，因此我可以要求忠诚。您必须要好好做饭。我习惯于吃好东西，我从来不戒掉

我的这些习惯。”

你们这些猪继续跳你们的舞吧，我要为此做点什么呢？

但这比我在去年所写的一切更为真实。这大概与放松关节有关。我将可以再写一次。

一个星期来，我隔壁房间的邻居每天晚上来与我搏斗。我不认识他，而且到现在也没和他说过话。我们只是交换了一些喊叫，人们并不能将它称之为“谈话”。随着“那就是说”这个口头语便开始了争斗，有时候，一个人抓住另一个人，嘴巴里骂着“流氓”，“现在”伴随着闪电般的一击，“停止”意味着结束，但他还是不停地争斗一小会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甚至还从门口处一下子跳回到房间里，并推我一下使我跌倒。然后他从自己房间里对着墙壁向我呼叫晚安。如果我想彻底结束这种相识的话，那我也许必须要解租我的房间，因为堵门是无济于事的。有一次我把门堵住了，因为我要看书，但我的邻居用锄头将门一劈为二。他只要一下子抓住了个什么东西，就绝对难以放弃了，而我也险些被这把锄头弄伤。

我知道怎么让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因为他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来，在这个时候，我就做些轻松的、如必要的话立即可以中断的工作。比如，整理一下箱子，或者写点什么，或者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我必须作如此的安排，当他还几乎没有出现在门口，我就得将一切放在一边，马上关上箱子，搁下笔，抛开书。他就是想斗一斗，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要是感到有力的话，我就稍稍地刺激刺激他，先是装着试图回避他。我在桌下钻过去，将椅子扔到他的脚前，我从远处向他眨眼睛，与一个陌生的人开着如此完全一厢情愿的玩笑，这些自然是乏味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一下子碰在一起打了起来。显然，他是一个大学生，学习了一整天，想在晚上睡觉之前再做些快速的运动。如此，他从这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敌人，如果人们不顾及幸运转换的话，我大概是我们两者中较为强大者与较为灵活者。但他是个毅力比较持久的人。

5月28日。我后天去柏林。虽然失眠、头痛和忧虑，与从前相比，我大概还是处于一种较好的状态。

有一次他带来一位姑娘。我正向她致意，并没朝他看，他跳起来冲向我，使劲将我抬到高处。“我抗议！”我喊道，并举起手。“别说

话。”他悄悄地朝我的耳朵说道。我发现，他是无论如何，也要在姑娘面前取胜，让自己风光一下。

我因此叫嚷起来，将脑袋转向姑娘说道：“他跟我说‘别说话’。”

“噢，下流的家伙。”这人轻轻地叹息道，并在我身上用完了所有的力气。他还不断地把我拖向长沙发，将我放平，跪在我的背上，等待着再说什么，他说：“那你就躺在这里吧。”

我想说：“你应该再试一下。”但刚说出第一个字，他就那么用力地将我的面孔压在枕头上，我不得不沉默了。“那现在，”姑娘说话了，她坐在我的桌旁，看到了那里放着的刚开了头的一封信，“我们还不走吗？他正开始写一封信。”

“我们要是走了，他也不会继续写。你来一下，不妨抓一下大腿，他颤抖得像一头有病的牲口。”“我说，让他去吧，过来。”这个家伙很不情愿地从我身上爬下来。我原可以现在就痛打他一顿，因为我现在已经休息过了，而为了将我压在底下，他已经绷紧了全身的肌肉。他颤抖过，却以为我也颤抖，而且他甚至仍然不断在颤抖。我可让他占了上风，因为这位姑娘在场。

“您大概对这场争斗已经得出您的判断了吧？”我朝这位姑娘说道，并微微一躬身子从他身边走过，坐到自己桌边，继续写那封信。“究竟谁在颤抖？”在我还没有开始写字的时候，我反问道，并且抓着笔僵直地举在空中，来证明我没有发抖。当我已经在写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门口，我向它们短促地叫了声再见，用脚稍稍踢蹬了一下，至少是我表示一下送行，这也许是这两个人应得的。

5月29日。早晨去柏林。那是一个我所感觉到的神经质的或者是真正的、可靠的混合物？那许是怎样的呢？要是人们一下子得到了写作的知识，就没有什么不能击中的、没有什么会沉没的，但也只有很少一些东西在极高处能显得突出，这是不是正确的呢？那也许是和F.婚姻的曙色？这是离奇的、对我来说当然在回忆中并不陌生的状况。

和彼克长时间地站在大门前。只是在想，我怎样才能马上走开，因为我晚上要吃的草莓上面已为我准备好了。我现在所写的有关他的一切事情，是一种卑劣的事情，因为我不让他看到任何有关的描写，或者，我满足于他没看到它。但如果我与他一起走的话，我对他的本性有一种

共同的犯罪感，这样的话，我所说的有关他的事，同样也就是说着有关我的事，即使人们去掉那种存在于这样一种注解中矫揉造作的成分。

我在筹划。我独自发呆地看着，为不使眼睛离开我正看进去的那个幻想万花筒的幻想窥视孔。我将善意的和自私的企图搅个透混，那善意的企图在彩色中变得模糊了，它因此而转到了那毫无遮掩的自私上去了。我邀请天和地参加我的计划，但我忘不了那些从每一条旁边的街道里出来并能够更好地利用我这些暂时计划的小人物们。当然，刚开始总是刚开始，我在这里还处在悲痛中，但在我的后面已经驶来我计划的巨车，车上的第一个小平台在我的脚下移动，裸体的姑娘们就像站在来自各个较好地方的狂欢节车上，从我的背后将我拉上阶梯，我飘忽着，抬起手示意安静。玫瑰花的枝条就在我的旁边，香火缭绕，月桂花环放了下来，人们把花撒在我面前和我的头顶上，两个像是方石块做成的号手吹着喇叭，小民们排列在领队的后面一群一群地奔过来，空旷的、闪闪发光的、裁切得很直的露天场地变阴暗了，场地充满了活力，挤满了人。我感觉到了人类努力的极限，出自自己的冲动和突然出现的灵敏，我在我的高度上施展着一个许多年前我就欣赏的蛇人技艺，我慢慢地向后弯着身子——天正要开裂，欲为我明显的显露提供空间，可是它又不动了——将头和上身穿过我的两腿之间，渐渐地又作为直立的人再生。那曾经是给予人的最后的升华？这好像是这样的，因为我已经从所有深处的、巨大的躺在我身下大地的大门看到长角的小鬼纷纷上涌，超过了所有人，它们脚下中央的一切都破碎了，它们的小尾巴将一切擦拭得干干净净，已经有五个魔鬼的尾巴擦了我的脸，地面变软，我先是一只脚，然后是另一只脚下沉了，姑娘们的叫声追着我至深处，我垂直地下沉到这深处，通过一个坑道，它的直径正好是我身体的直径，但却是深不见底。这种永无止境的状况并不诱使人去作出特殊的成就，我所做的一切也许是小事一桩，我毫无意义地掉落下去，而且这是最好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弟的信谈关于监狱生活。

6月6日。从柏林回，束缚得像一个罪犯。要是有人用真的链条将我拴在一隅，将警察叫到我的面前，只是通过这种方法让我在一旁看着，这也许还不是令人生气的事。然而这是我的订婚，所有的人都尽力地将我引向生活，可是这并没有达到容忍像我这样的人的目的。至少F.是所有人当中的一个，当然完全有正当的权利，何况她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对别人来说只是现象，对她来说却是威胁。

我们在家中一刻也不能忍受这个。我们知道，也许有人要来找我们，但即使是晚上，我们也要离去。我们的城市被山丘包围，我们在这些山丘上攀登着。如果我们在朝下跑，从一棵树摇荡到另一棵树的时候，我们便使所有的树都抖动起来。

晚上商店关门前不久在商店的表现：双手放在裤袋里，稍稍弯着身子，从窟窿的深处越过敞开的大门向广场看去。围着斜面桌后面的那些职员无精打采的动作，他们没有力气地捆着一捆东西，无意识地打扫一些盒子上的灰土，一层一层地往上堆着废包装纸。

一个熟人来与我交谈，我简直要躺倒在他身上，我是那么沉重。他提出下面的看法：有些人说这个，而我却说是与这个相反的那个。他列举了他看法的理由，我摇晃着。我双手放在裤子口袋里，就仿佛它们是掉进去的，但却是那么松弛，好像我不得不将口袋轻轻翻起，双手又很快地掉了出来似的。

我关了商店的门。职员们，陌生的人，各自手里拿着帽子散去。那是6月的一个晚上，虽已8点钟了，天色还亮。我无兴趣散步，我从没有兴趣去散步，但也不想回家。当我的最后一个学徒蜷缩在角落的时候，我就坐在关了门的商店前面的地上。

一个熟人和他的夫人路过这里，看见我坐在地上。“看，是谁坐在这里啊？”他说。他们站住了，这个男子微微地推我一下，尽管我一开始就在静静地看着他。

“我的天，您到底为什么这般地坐在这里？”这位年轻的夫人问。

“我要经营我的商店，”我说，“进行得并不特别坏，即使有不足之处，我也能完全履行我的义务。但我承担不了那么多的操心，我不能控制那些职员，我不会与顾客们交谈。我甚至明天就不想再开这个商店了，这所有的一切大概都考虑了。”我看到这位男子怎样地试着安慰他的夫人，他将她的手放在他的两手之间。

“那好呀，”他说，“您想放弃您的商店？您不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我们也——”他朝他夫人看去——“将比您还不犹豫地放弃我们的商店，一旦我们的财产足够我们需要的话——但愿马上实现。商店给我们的愉快像给您的一样少得可怜，这个您可以相信我们。但您为什么坐在地上呢？”

“我应该去哪里呢？”我说。我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问我。那是他们感觉到的同情、惊异，还有尴尬，但我是完完全全没有能力再去帮助他们呀。

那已经是子夜后的时刻了。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一封信，我非常重视这封信，因为我希望通过这封信在国外得到一个好职位。这封信是写给一位熟人的，在10年未见面之后，现在偶然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又联系上了，我想同时让他理解到，我的故乡的一切是怎样地逼迫着我，我是如何地没有其他广泛的良好关系，我的近况怎样，我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市政厅官员布鲁德尔在晚上将近9点的时候才从他的官邸回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的妻子正紧抱着女儿在家的大门等着他。“事情怎么样？”她问。“很不好，”布鲁德尔说，“先到家里，等一会儿我全告诉你。”布鲁德尔几乎还没踏进家中，便堵住了大门口。“女佣在哪里？”他问。“在厨房，”妻子说。“那好，走！”在宽大、低矮的卧室里立地灯亮了，他们都坐好，布鲁德尔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人全在撤退。在鲁姆多夫附近的战斗，如我从市政府传递的准确的消息中看出的一样，完全对我们不利。部队的绝大多数已经离开城市。现在还保着密，是为了不使城市笼罩在漫无边际的恐惧之中。我以为这并不是完全明智的，也许更好的是坦率地讲出真情。但我的职责要求我沉默。当然告诉你真情，是没有人能阻止我的。另外，大家也明白正确的结果，人们会到处注意到这一点。所有的房子关得紧紧的，凡是能藏的东西全藏起来了。”

一些市政厅的官员站在议会厅一扇窗户石头护墙旁边，看着下面的广场。部队后卫正在那里等待着撤走的命令。那是些年轻高大面颊红红的小伙子，他们一个个紧紧地抓着来回走动的马的缰绳。他们的前面是两个骑着马的军官在缓慢地走来走去。很明显，他们是在等待一个消息。他们不时地派出骑兵，这一骑兵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圆形广场的一条陡斜的上坡支路上，可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回来。

布鲁德尔官员走向窗户边的一群人，他是一个虽还年轻却长满络腮胡子的男子。因为他的级别较高，并由于他的才能，他有着特殊的威仪，所以全体人员都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让他站到护墙的前面。“这就是结束，”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广场说道，“啊，这是太显而易见了。”

“就是说您相信了，议员先生，”一位年轻的高傲自大的人说道，这

个年轻人尽管看到布鲁德尔走来了，但他丝毫也没挪动位置，而且仍像现在如此近地站立在布鲁德尔身旁，使得他们无法互相看到对方的面孔，“那你就相信，这场战斗是失败了？”

“完全肯定，这是不容置疑的。私下里说，我们打得糟透了。我们必须要为过去的各种罪过忏悔。现在自然是没有时间说这些，现在应该是每人为自己担心。是的，我们正面临彻底的解体，今天晚上客人可能就要在这里出现。大概他们连到晚上都等不及，而是半个小时之后就会来到这里。”

村子里的诱惑^[72]

那是子夜时分，五个男子抓住我，第六个人越过他们，也举手抓我。“放开”，我嚷道，并转着圈子，六个人全倒下了。我感觉掌握了一种什么样的法则，在作最后的努力时知道了，这种努力会有成就的。我看到，那些男人举着手臂逃回去，我看透了，他们一定会在最后一刻一起向我扑过来，我转身朝着家里的大门——我紧挨着门前站着——打开完全自动并以极快速度弹开的门锁，逃上黑暗的楼梯。

在上面最高一层，我的母亲手拿一支蜡烛站在敞开的卧室门里。“当心，当心，”我在下一层一边叫一边走上来，“他们在追我。”

“谁啊？是谁啊？”我母亲问道，“到底是谁敢追你，我的孩子。”

“六个大人。”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认识他们？”母亲问。

“不，是不认识的人。”我说。

“他们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

“我几乎没有看清他们，一个是络腮大胡子，一个是手指上戴着好大的戒指，一个是系着一条红色的腰带，一个是裤子的膝盖处撕破了，一个是只睁着一只眼睛，最后一个是龇着牙。”

“现在别再想这些了，”母亲说，“进你的房间去，躺下睡吧，我铺好床了。”母亲，这位老年妇女，已经不受任何活物攻击了，在那张不知觉地重复着80年愚蠢嘴巴周围透出一种狡黠的表情。“现在睡觉？”我叫

道……〔中断〕

6月12日。库宾。黄色的脸孔，平平的头顶上待着少许的头发，眼睛里时时放射着激励的光芒。

沃尔夫斯凯尔，半盲，视网膜脱离，一定要防止跌倒或碰撞，否则的话，眼睛的晶体就会掉落下来，以后一切就都完了。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把书放在紧靠眼睛的地方，从眼角处去捕捉字母。曾与梅尔希奥尔·莱希特在印度待过，得过痢疾，他什么都吃，在街上看到的每种布满尘土的水果，他都往嘴里送。

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地方，P.将一具女尸的一条银质贞操腰带弄断，并把那些挖出女尸的工人推到一边，向他们解释道，他在这里看到一件值钱的小东西，他想拿走作纪念，以此来使工人们放心，他将腰带解开，从骨架上扯下。要是他在乡村的教堂发现一本珍贵的《圣经》，或一幅图像，或一页乐谱，他想占有它们，那么，他想要什么，他就将它们从书里、从墙上、从圣坛上扯下，作为回敬，放下两个赫勒[73]，便觉安慰了。——对胖女人的偏爱。他为占有过的每一个女人都拍过照片。他向每个来访者展示这堆照片。他坐在沙发的一角，来访者坐在另一角，和他的距离颇远。P.根本不用朝那边看去，便总能知道，别人已经看到哪一张照片了，并为此作出他的说明：这是个老寡妇，这是两个匈牙利的女仆，等等。——关于库宾：“是啊，库宾大师，您正是在腾升的时候，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在10年、20年之后，您会获得如巴罗斯[74]的地位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一位女画家的信。

社会生活在圈子里进行着，唯有尝过痛苦滋味的人才互相理解。他们根据他们痛苦的性质组成一个圈子，并互相支持。他们沿着他们圈子的内部边缘轻声走动，互相谦让，或在拥挤中互相轻柔地推移。每一个人都劝说另一个人，希望反过来对自己也产生影响，或者，后来便出现热烈的场面，都直接地享受着这种反射过来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只有他自己的痛苦所给予的经验，尽管这样，人们还是在这些同病相怜者当中听到闻所未闻的各种各类的经验交流。“你是这样的，”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道，“不用埋怨，感谢上帝，你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你也许会陷进这种或那种不幸中，遭到这种或那种侮辱。”那么，这个人是从哪儿知道这个的？这种说法表明，他跟诉说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属

于同一个圈子，他需要的安慰也是同一种类的。在相同的圈子里，人们知道的事情也总是相同的，那里没有安慰者超过被安慰者的一种思想情绪。他们的交谈因而只是想象力的总结，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愿望的汇流。有时候，一个人朝地上看，而另一个人则盯着飞鸟，他们的交往就是在这样不同的情况里进行的。有时候，他们统一在信仰之中，两个人头挨着头地向高处无限的远处望去。只有他们共同低下脑袋，相同的锤子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对他们处境的认识便显而易见的了。

6月14日。我迈着安详的步伐，就在同一时刻，我的脑袋发颤，一条稍稍掠过头顶的树枝让我极不愉快。我感到宁静，在我内心里怀着对其他人的信赖，但无论如何还是到了错误的终点。

6月19日。最近几天颇兴奋。由W.博士传给我的安静。他为我承担烦恼。今天当我4点钟从深睡中醒来的时候，它们很早便侵袭了我。彼斯特科沃·迪瓦德罗 [75]。吕温斯坦。现在，索伊卡粗野刺激的小说。恐惧。确信F.的必要性。

奥特拉和我，我们多么愤怒地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双亲的坟墓，里面也埋葬着儿子 [76]（波拉克，商业学士）。

6月25日。从很早的早晨到现在的黄昏时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窗户是开着的，那是一个温暖的日子。狭窄街道的喧闹声不断地钻进来，在我转圈子的时候，通过观察，我已经熟悉了房间里的每件小东西。我的目光扫视了所有的墙壁，我探究了地毯的式样和它时代的痕迹，直到最后的分岔口。我好多次用手一拈一拈地量了中央的桌子。我常常齙着牙对着我女房东已死丈夫的画像。将近晚上，我走向窗户，坐在低低的窗台上。这个时候，我第一次从一个位置静静察看房间的内部和上面的天花板。终于，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那么多次被我震动的房间终于开始微动起来了。这开始于白色的、用少许石膏装饰围绕的天花板的边缘。不大的灰浆块脱落，不时地以有分量的一击，偶然般地落在地上。我伸出手去，也有几块落在我手上，我也不用紧张地转身，就将它们从头顶上扔到街道上去。这上面的断裂处还没有牵连到一大片，但人们至少已经可以随意地造型。可是我放弃了这样的游戏，现在一种青紫色开始混进白色之中，它正是从天花板由白色驻足而且完全泛着白光的中央出发的，上面那可怜的电灯就镶嵌在这中央的地方。彩色，或者是一种光线，不断在撞击中涌向现在正在变暗的边缘。人们

根本就不再注意那个像是在一个非常细心运用工具压力下脱落的灰浆。

这个时候，黄的、金黄的色彩从旁边涌进这个紫的颜色里。但房间的天花板根本没有显现出五彩缤纷，彩色只是以某种方式使天花板变得透明，好像在它的上面有东西在晃动，想穿透下来，人们几乎已经看到了那里的这种活动的影子，一只手臂伸了出来，一支银剑正不时地飘动。那是针对我的，这毫无疑问；这种将使我自由的现象正酝酿着。我跳上桌子，以做好一切准备，我扯下电灯和黄铜杆，将它们抛在地上，然后跳下来，将桌子从房中央推到墙边。凡是要掉下来的东西都可以静静地在地毯上安顿下来，并向我发出必要的信号。我几乎还没做完这些事情，天花板真的裂开了。从很高的地方，我没有精确地估算过这高度，在半暗中慢慢地降下一个天使，披青紫色薄布，系着金丝绒，有一对白色的闪着丝光的翅膀，用举起的手臂伸展着宝剑以保持全身的平衡。“啊，一位天使！”我在想，“他整天在我上方飞翔，而我对此毫无信仰，也居然对此毫无所知。现在他要跟我说话了。”我低下目光。但当我再抬起目光时，天使虽然还在那里，而且挂在天花板下颇深的地方，这个天花板又合上了，可不再是生动的天使，而只是一个船体的水上部分涂了彩色的木头造型，就好像在水兵的酒吧里一样挂在天花板上，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剑的把手装饰是为放蜡烛并接住流下的蜡烛油用的。我已经扯下了电灯，我不想待在黑暗里，那里还有一支蜡烛，这样，我便登上一张椅子，将这支蜡烛放进剑把手装饰里，点亮蜡烛，然后在天使微弱的光照下一直坐到夜里。

6月20日。赫勒劳、莱比锡，与彼克在一起。我表现可怕。既不能问，也不能回答，也不能活动，只是干瞪着眼睛。一个为船队招揽生意的男子，一对正吃着香肠的托马斯胖夫妇，我们住在他们家，是普雷舍尔将我们引到那里的，托马斯夫人、赫格纳、芳特尔和夫人、阿德勒、阿内莉丝夫人和孩子、K.博士夫人、P.小姐、芳特尔夫人的妹妹、K、门德尔松（兄弟的孩子、阿尔彼努姆、恩格尔林格、斐希滕那德尔巴德）、瓦尔德申克、“纳图拉”、沃尔夫、哈斯，在阿德勒的花园朗诵《纳西塞斯》^[77]，参观达尔克罗策建筑，晚上在瓦尔德申克、布格拉——可怕伴着可怕。

没成功的：没找到“纳图拉”，跑遍了斯特罗弗大街，乘错了赫勒劳的电车，在瓦尔德申克没有房间；我忘了让E.在那里给我打电话，因此转回去了；再没有遇到芳特尔；在日内瓦的达尔克罗策；第二天很晚到

瓦尔德申克（F.徒劳地打了电话）；决定不去柏林，而是去莱比锡；没有意思的旅途；乘错了客车；沃尔夫正驶往柏林；拉斯克学生占着韦尔夫；参观展览会没意思；最终结束时在“阿尔科”毫无意义地提醒彼克有关一个旧有的过错。

7月1日。太累。

7月5日。一定要承受并造成这样的痛苦！

7月23日。在饭店里的法庭。在德罗舍克的旅途。F的面孔。她把双手插进头发，打着哈欠。她突然振奋地站起来，说起思想好了的、长时深藏的、怀有敌意的事情。在返回的路上与B1.[78]小姐同行。饭店里的房间，对面墙上反射过来的炎热。炎热还来自拱形的石头墙，它包括了向深处走向的房间窗户，另外还有上午的太阳。机敏的服务生几乎全是东方犹太人。院子里的嘈杂状况，就像是在一家工厂里一样。难闻的气味。臭虫。艰难地下决心将它碾碎。房间的女仆惊奇：哪儿也没有臭虫啊，只是有一次一位客人在走廊里发现一只。

在双亲那里。母亲偶然落泪。我诉说着教训。父亲从各个方面正确地理解了这些。他是因为我的缘故专程从马尔莫乘夜车赶来，只穿件衬衣坐着。他们承认我正确的观点，什么也不说，或者不让说太多的反对我的意见。简直完全是无辜的。B1.小姐表面上的过错。

晚上在椴树阴下独自坐在一张椅子上。身体上的疼痛。悲伤的监督员。面对众多的人，将票证放在手里翻来翻去，只有接到款后才将票子给出去。动作看上去是慢吞吞的，但他管理这一摊子事十分准确，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无法逃来逃去，他肯定想将好多人记在脑子里。在观察这些人的时候，我总这样想：他怎么进入这个职务的？他付了多少钱？他明天会在哪里？他到老年时会怎样呢？他住在哪里？睡觉之前他将胳膊伸在哪个角落？我也能干这事情吗？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所有一切都处于躯体的疼痛之下。可怕的、沉重的痛苦之夜，可是对它几乎没有回忆。

在贝尔弗德尔饭店，在斯特拉劳桥旁与E.[79]在一起。她还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外出，或希望这么做。喝了葡萄酒。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船向格林瑙、向施魏尔陶起航。许多人。音乐。E.安慰我，而我并没有悲伤，这就是说，我毫无掩饰地为自己悲哀，这里面并无慰藉。她送给我

《哥特式房间》，给我讲述许多事情（我什么也不知道），特别是她在公司里怎样面对一个年纪大的恶毒的白发女伙伴而成功的。她最愿意离开柏林，她想自己有一番事业。她喜欢安静。她在塞布尼茨的时候，常常是整个星期天都睡觉。她也能高高兴兴地玩。——对岸的海军建筑。在那里兄弟已经租了一套房子。

双亲和婶婶为什么向我作如此的示意？为什么F.坐在饭店里一动不动，尽管一切都已明朗？她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你等着吧，但一定要在星期二出差。”要由我去等待成就？也许没有什么是比较自然的。没有什么（被走到窗边的魏斯博士打断）……
〔中断〕

7月27日。第二天再没去双亲那里。只是让骑车人送去告别的信。信的内容是不诚实的，卖弄的。“不要对我留下坏的印象。”像是刑场上的讲话。

两次在斯特拉劳岸边的游泳学校。许多犹太人。淡青色的面孔，强壮的体魄，粗野的奔跑。晚上在“阿斯卡尼施大厦”的花园里，吃了特劳特曼村的饭和一只桃子。一个喝着葡萄酒的人瞧着我，看我怎样试着用刀子切这只小而不熟的桃子。我没有切成功，在那个老头的目光中，我害羞了，干脆不切桃子而翻阅起《飞翔周刊》，翻了十次。我在等着，他是不是不想转过身去了。最终，我使尽浑身力气，不顾他的观察，用嘴巴去啃那只完全没有汁水的可爱的桃子。在我旁边的凉亭里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先生，他什么也不关心，只是在专注地挑选烤肉和冰桶里的葡萄酒。最后他点燃了一支颇大的香烟，我越过《飞翔周刊》在观看着他。

离开雷尔特火车站。只穿衬衣的瑞典人。那位健壮的姑娘手臂上戴了许多银手镯。夜里在布痕转车。吕贝克。可怕的饭店射击场。过分臃肿的墙壁，床单下全是要洗的脏物，没人管理的房屋，一个小跑堂是唯一被使唤的人。出于对房间的恐惧，我还是走向花园，坐在那里，旁边放一瓶哈尔茨的碳酸矿泉水。对面是一个喝啤酒的驼背人和一个抽着烟的瘦削的、没有血色的年轻人。我竟然睡着了，可是马上被太阳照醒了，太阳光通过大窗户直接照在我的脸上。窗户向着铁道路基，不停地传来列车的隆隆声。在迁入特拉弗旁的帝王饭店后，这才得到解脱，也感到舒适。

驶向特拉弗河口。浴场——家庭浴场。河滨的景致。下午埋在沙中，赤裸裸的双脚，显得有伤风化。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像是美国人。从所有的膳宿公寓和饭店前面走过，却没去吃午饭。在疗养院的林荫下坐着，倾听宴会音乐。

沿着吕贝克的城墙的小路散步，一位悲伤孤独的男子坐在一条长凳上。运动场上的勃勃生机。寂静的广场，所有的门前面的人都待在阶梯上和石头上。从窗户向外看到的早晨。从一艘帆船上卸下木头。W.博士站在火车站旁边。不断出现与洛维相似的地方。由于格莱星多夫而没有了作决断的能力。在汉萨农家场地用餐。“脸红的少女”。采购晚餐。和格莱星多夫通电话。驶往马里恩利斯特。一个穿雨衣戴帽子的青年男子神秘地消失，在从瓦格尔罗埃塞到马里恩利斯特的车里又神秘地出现。

7月28日。荒僻的地方、可怜的房屋、没有果品和蔬菜的糟糕的进食、W.和H.之间的争吵留下的绝望的第一个印象。决定第二天离去。改期通告。留下。朗诵《袭击》，我没有能力去倾听、去共同享受、去评判。W.讲话中即兴的内容，这对我来说是无法达到的东西。那个在花园中央写东西的男子，有一张胖胖的脸，一双黑色的眼睛，一头油光可鉴的向后梳理的头发。呆滞的目光，或左或右地眨着眼睛。孩子们像苍蝇一样不感兴趣地围坐在他的桌边。——我无能为力去思考、观察、确定、回忆、讲话、共同经历，这种无能为力变得越来越厉害，我发愣，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的无能为力在办公室中表现得甚至更为厉害。我如果不在一种工作中拯救自己的话，我是毫无希望的了。到那时我会清楚地知道这个吗？我在人前害怕得躲藏起来，不是因为我要静静地生活，而是想安静地走向毁灭。我想着我们，我和E.从电车到雷尔特火车站的那段距离。没有人说话，我脑子里没有别的，我只是想，对我来说每一步就是获取。而E.对我有偏爱，甚至不可理解地相信我，尽管她在法庭上见过我，我甚至有时感觉到这种对我相信的效果，自然不用完全去相信这种感觉。几个月来，我面对人群第一次感觉到我内在的生机，是面对着车厢里的那位瑞士女郎，那是从柏林返回的路上。她使我想起G.W.，有一次她甚至叫道：孩子们！——她头疼，那是血液在折磨着她。丑陋的，没有保养的小小的躯体，从巴黎一家百货商店买来便宜的劣质衣服，夏天出现脸上的雀斑。一双小脚，尽管身体小而笨拙，但却并没完全失去了控制，圆圆而结实的两腮，生动的、永远闪亮的目光。

住在我隔壁的那对犹太夫妇是一对年轻人，这两人腼腆而谦逊，女

的是鹰钩鼻，身体瘦削，男的有点斜视，脸色苍白，显得敦实、肥胖，他夜里还有点咳嗽。他们走路常常是一前一后。他们房间里那张床显得破烂。

一对丹麦夫妇，男的穿一件规规矩矩的西服上装，女的皮肤被太阳晒成棕褐色，面孔显得瘦弱而粗糙，常常是沉默寡语，有时候他们并排而坐，两副面孔歪斜着就像并列地放在有凹凸花纹的石头上。

那位年轻人还颇美，不断地在吸香烟，放肆地、挑衅地、惊慕地、揶揄地、鄙视地看着H，这些所有的成分都包含在一束目光里。有时候他根本不去注意她，一句话不说地向她要香烟。不一会儿他又从远处敬她一支。他穿着一条撕破的裤子。如果有人想要痛揍他一顿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在今年夏天这么做，到明年夏天，他已经要自己打自己了。他抓所有的女仆，抚摸她们的手臂，但并不屈就，也不发窘，而是像一位少尉，考虑到他在某些方面的暂时幼稚的表现，他可能现在比以后更有胆量。他在吃一种蛹的时候是如何使劲地用刀砍它的脑袋啊！

劳西尔，还有四对夫妇，在大厅的灯光下听留声机，当每一组曲放完之后，就有一个舞者赶快走向留声机，放进一张新唱片。这节奏对先生们所行之舞步特别合适，轻松、严肃。那位欢乐的人，面色红润的人、社交界的名人，他那件隆起的硬挺的衬衫使他那宽高的胸怀显得更高——那位表情漠然者，肤色苍白，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与所有的人都戏谑打趣；大腹便便；透亮的轻飘飘的衬衫；各种不同的语言；阅读《未来》——拖儿带女的家庭里威严的父亲，人们从他们沉重的呼唤和孩子们的肚子认得出这样的家庭；他和他的妻子（和她跳舞的时候，他显出了骑士的风度）示范性地坐在孩子的桌边，他和全家人当然是最有力地占据了这张桌子。这位是无可指责的，爱干净的，值得信赖的，在纯然的一本正经、谦逊和男子气概面前，他的面孔几乎透出了愠怒。他演奏钢琴。这个巨人般的德国人，四四方方的脸上留着伤疤，他的厚厚的嘴唇在说话的时候是那样温和地重叠在一起。他的妻子有一张北方的、硬线条与友好的面孔，有意显示娇美的步履，故意地摆动那沉甸甸的臀部。从吕贝克来的女人有着一双闪光的眼睛。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名叫乔治，有点像没有目标的蝴蝶落在了完全陌生的人群里。然后他用幼稚可笑的话语问一些无头无脑的问题。例如我们坐下，校改《奋斗》。他突然出现，提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深信不疑的、大声的，其他的孩子也跑了过去。——这位硬朗的老先生，他的外貌看上去就像那些

上了年纪的高贵北方人长的长脑袋一样。如果这里周围不再有美丽年轻的长脑袋出现的话，那就说明衰退，让人认不出来了。

7月29日。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淡黄色头发，长得像理查德·施特劳斯，微笑、克制、机敏；另一个是深色头发，穿得整洁，温柔而坚毅，过于灵活，说话有咝咝的声音。两个人都会享受，不断地饮葡萄酒、咖啡、啤酒、烧酒，还不停地吸烟，他们的房间在我的对面，堆满了法文书籍，多数是在美好天气的时候在发出霉味的写字间里写东西。

约瑟夫·K.是一位富商的儿子，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父亲大吵了一场之后——父亲谴责了他那种乌七八糟的生活，并要求他立即停止那种生活——没有一定的目标，只是在完全不稳定的情绪中带着疲乏进入商会的房子。这房子四周没有建筑，就在港口附近。门房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约瑟夫没有致意，匆匆地看了门房一眼。“这些不会说话的下属做出别人需要他们做的一切，”他想，“我想，他是在用不相宜的目光在观察我，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他又一次还是没有致意地转向这位门房；这位门房却把脑袋转向街道，仰视那被云遮盖住的天空。

我完全无计可施。还在一瞬间之前，我已经明白应该做什么事情的。上司伸长一只手臂将我推到公司的门处。在两个斜面桌子后边站着我的同事们，所谓的朋友们，他们将可怖的面孔埋在黑暗中以遮掩脸上的表情。

“出去，”上司叫起来，“窃贼！出去！我说出去！”“这不是真实的，”我叫了100次，“我没有偷东西！这是一个误会，或是一个诬陷！请您不要碰我！我要控告您！还有法庭嘛！我不走，我像一个儿子为您服务了5年，现在我被当作窃贼对待。我没有偷过东西，天呀，您听着，我没偷过东西。”

“没话好说的。”上司说，“您走吧！”我们已经来到玻璃门旁，一个学徒抢先跑去勿急地打开玻璃门，当然在这个偏远的马路上这种钻心的响声使我更为接近了这些事实，我站在门旁，将两个手臂搁在身后，屏住呼吸，尽量安静地说道：“我要拿我的帽子。”

“帽子您可以拿。”上司说，走回几步，从正在斜面桌前晃动的店伙计格拉斯曼那里取来帽子，并将帽子想扔给我，但用劲过头，这顶帽子从我身旁一直飞到车行道上。

“这顶帽子现在属于您了。”我说，并外出走上街道。这时，我没了主意。我是偷了，我从收款箱里拿了一张5古登的钱票，为的是晚上能与索菲去剧院，可是她根本不想去剧院。其实三天内就要发薪了，然后我也许就有了自己的钞票，可是我却荒唐地犯了这种偷窃行为，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账房的玻璃窗旁，窗后就坐着上司，他正盯着我哩。“小偷！”他叫起来，并从账房跳出来。“我没偷。”这是我的第一句话，但我的手里却拿着5个古登的钱票，钱箱是打开着的。

有关旅游的笔记记在另一个本子里了。开始了一些失败的工作，但我不松懈，尽管失眠、头痛、一般的无能为力，那是我在我的体内为此聚积起来的最后生命力量。我作了观察，我不是因为为了安静的生活，而是为了能安静地死去才躲避着人。如今我却要进行自卫了，趁我上司不在的时候，我有一个月的时间。

7月30日。我由于在别人的商店里做事弄得精疲力竭而自己开了一间小纸张店。因为我只是小本经营，我不得不用现金支付一切……〔中断〕

我寻求主意，我并不固执。如果我静静地用抽搐变形的面孔和热得发亮的两颊笑着看某一个不了解此事而给我出点儿主意的人的时候，那也不是固执。那是紧张、那是准备接受，那是缺乏固执的病态表现而已。

“进步”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对他手下的属员总是极为不满。如今是每一个经理都对他的属下不满意，职员们与经理们的差别太大了，以致仅仅是通过经理方面的指示和职员方面的服从这种差别是无法保持平衡了。只有双方的仇恨影响着这种平稳，并使整个企业弄得没棱没角了。

“进步”保险公司的总经理鲍茨看着这个站在他写字桌前面的、要在这个公司谋求一个工作位置的人，当然有时也读着这个人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几张纸上的文字内容。

“您的个子很高呀，”他说，“这看得出来，但您拿手的是什么？在我们这里干活的人不只是能贴邮票，要干更多的事，但他们恰恰不必去干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这里都已经自动化了。在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一半是管理者，他们必须做那些极端负责的工作，您感觉能胜任吗？您有一个特别的脑袋，您的前额长得多么朝后，多么独特。您的最

后一个职业究竟是什么呢？怎么？您一年来没有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肺炎？是这样？那么，这是很不受欢迎的，怎么？我们只能要健康的人。在您被录用前，您一定要到医生那里检查一下。您已经康复了？是这样？当然，这是可能的。您讲话大声一点！您的呖声弄得我很烦躁。这里，我也看出，您已经结婚了，有四个孩子，而一年来您没有工作。好吧，喂！您妻子是洗衣服的吗？是这样。那么，好吧。因为您现在要在这里待着，您得马上去医生那里检查一下，这里的人会领您去的。但您却不能得出结论，认为您已被录用了，即使医生作出的鉴定是有利的。完全不是。不管怎么说，您会得到一份书面通知。为坦诚故，我想即刻告诉您：您并不使我完全满意。我们需要的完全是另一种工作人员。不过，不管怎么说，您得去检查身体。您请走吧，请走吧。在这里请求是没有用的。我没有权利恩赐什么。您想干任何工作。这当然。每个人都想这样。这并不是特别的标价。这只表明，您对自己的估价是如何的低呀。现在我说最后一次：您走吧，您别缠得我太久。说得确实不少了。”

鲍茨不得不用手敲桌子，让人将这个男子带出经理房间。

7月31日。我没有时间。这是一般的活动。K.和P.被召集来了。现在我得到了独处的报酬。这毕竟还不是一种报酬，独处只带来惩罚。至少，我很少受所有的痛苦感染，而且比早先更为坚决。下午我将一定要待在工厂里，我将不住在家中，因为E.带着两个孩子迁居到我们这里来了。但我肯定要不顾这一切地写东西，这是我维持自己生存的斗争。

8月1日。陪K.到车行道。亲戚围在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乘车到瓦莉那里去。

8月2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

8月3日。独自待在我姐姐的住所。这住所的位置比我的房间还深，在旁边的一条胡同里，因此，邻居家大声说话的声音就像在下面的门前，还有吹管之声。除此而外，倒是个十全十美的幽静所在。没有渴求的已婚少妇开门。在一个月里我真应该结了婚的。一句痛苦的话：你怎么想它的，你就怎么有它。我痛苦地紧紧贴着墙边站着，恐惧地低下目光，看着挤压的手，带着一种将旧的忘掉的新的痛苦认出了自己弯曲的抓住你的那只手，它用一种力量，一种为美好的工作从未有过的力量。我抬起头，又感觉到了第一次的痛苦，又低下目光，就这样不停地上上

下下。

8月4日。在我为自己租下这所住宅的时候，我与房东签署了可能是一个文件的东西。这文件上说，我有责任交出两年或甚至6年的租金。现在他从这个协议出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是愚蠢，或者说是普遍的、已成定局的顺从。滑进河里。这种下滑对我来说真是如愿以偿，因为它使我想到了“拖延”。

8月6日。炮兵越过坟地。鲜花，神圣的欢呼，可怕的、没有表情的、惊愕的、神情专注的、黑色的和有双黑色眼睛的面孔。

我没有恢复，反而更有点失常了。一只空空的容器，还完整却已经成了碎片，或者说，已经是碎片，却还保持着完整。充满谎言、仇恨和忌妒。充满无能为力、愚蠢、理解迟钝。充满懒惰、脆弱、无自卫能力。31岁的年纪。我看见奥特拉的图画上两个经济学者。年轻有朝气的人，他们知道一点儿，并有足够的力量，在那些必然会进行某种反抗的人中运用这一点。——一个遛着美丽的马匹，另一个躺在草地上，在一般不动的、绝对值得信任的面孔上，将舌头伸在两唇之间作游戏。

我在我身上发现的无非是狭隘、优柔寡断，对好战者的忌妒、仇恨，我以不可抑制的热情愿这些人得到所有坏的报应。

从文学角度来看，我的命运很简单。为描绘我梦一般的内心生活的意识将所有别的东西逼到了次要的位置，而且它们以一种可怕的方法变得枯萎，而且不断地枯萎。那个时候，什么别的东西都不能使我感到满意。但如今我的力量对于那样的描绘是完全无法估量的，它也许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它也许再一次地降临到我身上，我的生活状态对它来说当然是不利的。我就是这样地摇摆着，不停地飞向山尖，但几乎没有一刻能将我留在上面。其他人也在摇摆，但是在下面的地段，还花着更为强大的力量；他们在上面跌下来，同类的人扶住了他们，这些同类人为了这个目的走到他们的身旁。而我在上面摇晃着，遗憾的是死不了，但却留下死亡永恒的痛苦。

爱国游行。市长讲话。然后消失，然后出现，德语的呼喊：“我们亲爱的君主万岁，万岁！”我带着凶狠的目光站在一旁。这种游行是一种令人反感而伴随着战争的现象之一。从犹太商界人士出发，一点儿是德国的，一点儿是捷克的，虽然自己承认了这些，但从来没能像现在如此大

声地叫出来。他们当然也拉来一些人，他们组织得不错。照例每晚重复，星期日早晨两次。

8月7日。即使人们不必有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但却是显而易见的有自己特色的能力，但他对待每一个人仍按自己的方法。“从宾茨来的L。”将手杖伸到这里，为是引人注目，却吓我一跳。

在游泳学校迈着坚实的步伐。

昨天和今天写了四页，困难地向超越琐碎小事进发。

这位非凡的斯特林堡^[80]，这样的愤怒，这些在拳击中赢得的篇页。

从对面酒店里传出的合唱。——我正走向窗户，睡觉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全部的合唱声音通过开着的玻璃门传来。以一个姑娘的声音定调。那是无可指责的爱情歌曲。我渴望来一位警察，他正好来了，他在门前站了一小会儿，侧耳倾听。然后叫道：“老板！”姑娘的声音：“阿达尔伯特。”一个穿裤子和衬衫的男子从一个角落跳出来。“把门关上！谁要听这嘈杂的声音？”“噢，请，噢，请！”老板说，做出柔顺迎合的动作，就好像与一位女子打交道，先关上身后的门，然后开开这门溜出来，又关上。警察（他的行为，特别是他的冲冲怒气，不可理解，因为唱歌的声音并不干扰他，而只有给他无聊的职务增加一些甜蜜的味道）走了。歌唱者们也失去了唱歌的兴致。

8月11日。想象我留在巴黎，手臂挽着手臂，和叔叔紧挨着，一起走过巴黎。

8月12日。完全没有睡觉。下午3个小时没睡着，昏昏沉沉地躺在长沙发上，到了夜里，情况类似，但这并不能阻碍我。

8月15日。一些天来我在写东西^[81]，我想坚持下去。我今天可没有像我两年前那样，完全躲进避风港，慢慢地钻进工作里去。我时时有一个想法，我的有规律的、空空荡荡的、精神错乱的单身汉般的生活是有其道理的。我可以又一次和自己对话，这样，我就不会呆呆地凝视到那个完全虚无的境界里去了。对我来说，只是在这条路上有了一种改善而已。

8月21日。今天是最强有力的，带着如此的希望开始，又被全部三个故事抛回来。这个俄国的故事只能按《诉讼》去加工大概是正确的。在这个可笑的显然只是依靠机械幻想的希望里，我又开始了《诉讼》。——这不是完全没用的。

8月29日。一章的结束没有成功，我几乎将不会开始另外一个已很不错的章节，或者，不如说完全肯定要将不那么美好的章节继续下去，到那时，我也许会在夜里成功。我不会离开自己的，我完全是独自一人。

8月30日。寒冷与空荡。我对我能力的极限太有感觉了，如果我不是完全受感动的话，这种极限无疑只是收缩了。而且我相信我在受感动的情况下，被牵进这种收缩了的极限，然而我并没感觉到，因为我自己处在被感动之中。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极限里还是有生活的空间，对此，我大概会利用这种极限，直至鄙夷的程度。

两个四分之三的夜晚。对面一个孩子哭泣。在同一个房间里，一个男子突然说起话来，那么近，就好像他在我的窗户前面。“我想宁愿飞出窗户，也比长期地听着好。”他还发出了有点儿神经质的低沉的吼叫，女人只是默默用啾啾的声音，把孩子再次带入睡境。

9月1日。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写了几乎不到两页。我今天倒退得非常厉害，尽管我睡得不错。但我知道，我不能屈从，如果我想越过已经被我剩余的生活方式所遏制的写作最内在的痛苦而进入较大的、大概正等待着我的自由的话。旧有的迟钝还没有彻底离我而去，如我注意到的那样，心冷大约将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对屈辱无所畏惧，这可能同样意味着失去希望和给予希望。

9月13日。又是几乎不到两页。首先我想，是对于奥地利失败的悲哀和对未来的恐惧（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可笑的，同时也是不光彩的恐惧）会特别阻碍我写作。不是这个，只是一种迟钝的状况，它总常常出现，也必然总常常被克服掉。对于悲哀本身，在写作之外是有足够时间的。与战争紧密联系的思路处在各个方向都吞噬我的那种痛苦之中，这情况类似由于F引起的旧烦恼。我没有能力承受烦恼，而我大概生来就要在烦恼中毁灭。如果我变得极为虚弱的话——而这肯定不会延

续很久——大概最微不足道的烦恼就足够使我分崩离析。在这种展望里，我自然也能找到尽可能长地推延不幸的可能性。我虽然运用了一种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变弱本性的所有力量去稍稍针对一下由于F.缘故产生的烦恼，但我当时只是在开始的阶段得到了写作的巨大帮助，我现在再也不愿意让人从我这里夺走它了。

10月7日。为了使这部小说往前进展，我占用了一个星期的假期。直至今日——星期三夜里。星期一我的假期结束——没有成功。我写得不多，而且内容贫乏。其实在上个星期我就已经处在下坡路了，但这会变得如此之糟糕，是我未能预料的。难道这三天已经宣告结束我不值得为没有办公室而生活的状况苦恼吗？

10月15日。14天的好好的工作，一部分，完全理解我的处境。——今天星期四（我的假期星期一结束，我继续占用一个星期的假期）。B1.小姐的信。我不知道，由此开始的是什麼，我知道，那是那么肯定的，即我独自一人留着（如果我根本不留着，那什麼是完全不肯定的哩），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F.（在她的凝视中，我想到的是我的厌恶，她跳舞时所带有的那种严肃、低垂的目光，或者她在“阿斯卡尼饭店”刚刚离开时用手伸向鼻子和头发里的情形，以及无数次完全陌生的眼光），但尽管这一切，那无限的诱惑仍旧出现，我整个晚上都在与这封信捉迷藏，工作停了下来，尽管我（正处于痛苦的头疼之中，我有这样的头痛毛病已经整整一星期了）感觉到对她是有能力的。我还是从记忆中写下了这封信，我把它写给B1.小姐：

那是一次特殊的会面，格雷特小姐，我今天刚刚收到您的信。我不想提他怎么来会面这事了，这只涉及我和我今天夜里大约3点光景躺在床上时候所进行的思考。（自杀，给马克斯的信写了许多委托。）

您的信非常使我吃惊。我吃惊的不是您给我写信。您为什么不应该给我写信呢？您虽然写道，我仇恨您，但那不是确实的。如果您仇恨所有的人，我不仇恨您，并不仅仅因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您虽然在“阿斯卡尼饭店”作为法官坐在我的上方，这对您来说是令人厌恶的，对我，对所有的人来说——但这只是从外表看来是这样，实际上我是坐在您的位置上，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是在那个地方。

您完全把F.估计错了，我不是为编出细节说这个的。我不可能想出细节来——而我的想象力已经在这个圈子里转了很多次，所以我信赖它——我说，我不可能想出细节来，这细节也许能使我相信，您并没有迷惑。您所暗示的这一点，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使我不幸地想到，F.是由于某种不可理解的原因而可能自己误会了，但这也是可能的。

我总是将您的同情看作是真实的，而且对自己本人来说是毫无顾忌的。就是写最后这封信，对您来说也是不容易的。我为此衷心感谢您。为此该做什么呢？这封信看上去是坚定的，

但只是因为我怕难为情，因为我认为对此没有责任，因为我害怕不坚定，大约不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有这件事，我甚至没有想要其他的什么。如果她不回答的话，这对我们大家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但是她会回答的，而且我会等待着她的回答。

.....[83]

假期的第.....天。夜里两点半钟，几乎什么也没有.....读过，感到并不怎么样。两类不同的.....失败。办公室和.....走向毁灭的工厂的.....就在我面前。但我.....没有了克制。我最强有力的依靠是.....方式想到F，尽管我在昨天的信里拒绝了任何一种接触的尝试。我现在和F没有任何实际联系地（此外还和E通信）相安无事地生活着。做梦梦见F，就像梦见一个死人，好像她永远不会再活过来，而现在，因为我有了一个向她接近的可能性，她又成了整体的中心。她也许打扰了我的工作，当我在最近时间里想到她的时候，她却是怎样地像一个较为陌生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啊，而我曾经是和她在一起待过的呀。这时我只有对自己说，这种完全特别的陌生是有其道理的，F.是作为某一个其他的人向我走得越来越远，或者甚至是别人使她向我走得这么近的。

稍稍浏览了这本日记，得到了一种如此生活结构的预感。

10月21日。四天来几乎没干什么工作，总是只花一个小时，只写几行字，但睡得较好，因而几乎没有了头疼的毛病。没有得到B1.的回答，明日是最后的可能。

10月25日。工作几乎完全停了。写了的东西看来不是什么独创的东西，而是过去良好工作的反射。B1.的回答来了，因为这个答复让我完全狐疑不决了。思想那么平庸，我根本不能将它写下来。昨日的悲哀。当奥特拉跟着我走向楼梯，讲述一张风景卡片的时候，.....并想得到我的任意的回答〔我能〕说什么呢？由于悲哀，我完全无能为力.....我只有用肩膀作出表示.....彼克的故事，不管个别的优点，W.....今日报纸上的福克斯的诗。

11月1日。昨日好长时间之后继续写了颇为不错的一段，今日却又几乎没写什么，自我假期开始以来的14天几乎全付之东流了。

今天是星期日，有部分时间是美丽的。在考泰克的绿草地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防卫文字。在城堡和军团司令部站岗。图恩宫殿里的泉井。——整天的自鸣得意。现在却是工作上的失灵，甚至不止一次的失灵，我看出走向她的任务和道路，我可能不得不去冲破某种薄薄的障碍，可是无法做到这个。——纠缠于对F.的想象。

11月3日。下午给E.的信，通读了彼克《盲目的客人》的故事，并记下修改处，读了一点儿斯特林堡的东西，然后并没睡觉，8点半在家

里，10点返回。出于对已经开始出现的头疼的恐惧，而且也因为我夜里睡得很少，再也不做什么工作，部分还因为我害怕，把昨日写好的一处可以忍受的地方毁坏。自8月的第4日起，我就什么也没写。罪过是这些信，我要试试完全不写信，或只写极短的信。我现在是多么地有偏见啊，又怎样地辗转反侧啊！昨日晚上出现极其幸福的状况，在我读了几行詹姆士的东西后，我本来与他没有什么瓜葛，可是他的法语给了我那么强烈的影响，这里说到在一位友善的诗人那里所作的一次拜访。

11月4日。P.[84]回来，大叫大嚷，非常激动，无法控制。鼯鼠的故事，鼯鼠在地下面的壕沟里钻洞，他将它看作是从那儿离开的上天的指示。他几乎还没离开，一颗子弹击中一个士兵，这个士兵正朝他那里爬过来，一下子却倒在了鼯鼠的身上。——他的上尉。有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如何被捕的。第二天别人在森林里找到了他，但他身上已一丝不挂，是被刺刀刺穿的。他大概身上带着钱，有人想搜身把钱拿走，但他像“所有的军官”一样，不愿意让人碰他。——当P.在铁道的路上遇见他的长官（过去他是极端地、可笑地尊敬他）的时候，他是怎样穿得笔挺、洒了香水、挂着观剧用的望远镜去剧场的呀，他愤怒、激动得几乎哭了。一个月之后，他自己得到这位长官送给他的一张票，也这样风光了一次。他去看《背信弃义的艾克哈特》，是一出喜剧。——有一次在萨彼哈侯爵的宫殿里睡着了，有一次就近在正开着火的奥地利炮兵连前面，他当时正在那里的后备队。有一次在一间农民的小屋里，里面有两张床，分左右两边，都靠着墙，均有两个妇女睡着，一个小姑娘睡在炉子后边，八个士兵睡在地板上。——对士兵的惩罚。

11月12日。双亲期待着孩子们的感谢（甚至还有这样的双亲，他们要求得到这种感谢）就像是放高利贷者，他们很喜欢拿这种资本去冒险，只要他们有利可得。

11月24日。昨日在织布胡同，那里向加里西亚难民发放床单和衣服。马克斯、勃罗德太太[85]、卡伊姆·那格尔先生在一起，那格尔先生通达、忍耐、友善、认真、健谈、诙谐，值得信赖。这些人水泄不通地挤满在他们的圈子里，人们认为，在世界的整个圈子里，一切都一定会使他们成功的，但这恰恰也属于他们的完美境界，他们超越不出他们的圈子。

从塔尔诺来的聪明、活泼、自豪而谦逊的卡内吉塞尔太太，她只想要两床被子，而且要好看的，但她只得了尽管是马克斯赞助的，但却是

旧的、脏的被子，而那些新的好被子放在一间分隔开的房间里，这间屋子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为较为体面的人保留的。因为她用这些东西只是两天，她的床上用品不久将从维也纳运来，所以别人不想给她好的东西，而且还因为霍乱传染的危险，用过的物品不可以再收回的缘故。

卢斯蒂格太太带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孩子和一个调皮捣蛋、自信机敏的小妹妹。她寻找孩子衣服那么久，直到勃罗德太太向她叫喊起来：“您现在把这个拿走吧，要么您什么也别拿了。”但卢斯蒂格回答的叫喊声更高，最后还用了一个粗野的、动作颇大的手势嚷道：“做善事要比所有这些破抹布有价值多了。”

11月25日。空空如也的绝望，无法站立，只是在满足于痛苦的时候我才能站住。

11月30日。我不能写下去了。我已经处在最终的边缘，在它的前面，我大概又应该成年地坐着，也许然后开始一个新的、又是没有结束就搁在那里的故事。这样的命运追逐着我，我又变得冰冷、无聊，只有对彻底宁静的那种衰老的爱还留着，就像某一种完全与人分离了的动物，我已经又摇晃着脖子，并欲试一试，在这个间歇期里再次得到F。我也真的要作这样的尝试，如果在我面前出现的厌恶感觉并不妨碍我那么做的话。

12月2日。下午和马克斯及彼克在韦尔弗那里。朗诵了《在流放地》，不是完全不满意，最终找出那些明显不过的不可抹去的错误。韦尔弗〔朗读〕诗和《埃斯特尔，波斯女王》的两幕，这两幕使人神往，但我很容易被弄得眼花缭乱。马克斯对这剧本并不完全满意，他提出的比较和分析搅乱了我，这样，我就无法在整体中去抓住记忆中的这个剧本，就像在倾听的时候，我遭到了袭击。这令人想到说粗话的演员。W.的美丽的姐妹们也在，最大的依在椅旁，常常从旁边对着镜子看，这一切全部地映射到我的眼睛里去了，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指着别在她上装中央的胸针。那上装是一件经过修剪的深蓝色女上装，上面还配了不少薄纱。重复地叙述剧院中的一个场面：在上演《阴谋与爱情》的时候，那些军官们好多次互相间大声叫嚷这句话：“施佩克巴赫表演了！”他们用这个来指依偎在一个包厢墙边的军官。

白天的结果已经出现在韦尔弗面前：继续工作下去。令人沮丧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累了，而且还有头疼，上午在办公室就已经

有头疼的征兆了。不管失眠和办公室的情况，一定要继续工作下去，这一定要成为可能。

今夜的梦。在威廉大帝的皇宫里。美妙的风景。一间房间，就好像在普鲁士大帝弗里德里希·威廉第一的“吸烟俱乐部”里面。与马蒂尔德·塞拉夫会面。可惜全部都忘记了。

12月5日。一封E.的信，谈她家里的情况。如果说我把自己理解为此家庭毁灭的话，那么，我对这个家庭关系就有了一致的感觉。这是唯一有机的、能顺利克服一切惊愕的解释，这也是目前从我的角度出发和这个家庭存在着的唯一联系。因为从感情上说，我与她是完全分隔的，当然也许并不比和整个世界分隔得更加彻底。（在黑暗的冬夜里，一根无用的木棒浅浅地插在大平原边缘的一块挖掘得颇深的田野里，这木棒上面覆盖着雪和霜，这就是我在这个关系中存在的图像。）只是这毁灭在起着作用。是我使F.不幸的，是我削弱了她们的现在那么急需的抵抗力的，是我促使了父亲的死亡，是我使F.和E.分离，最终也是我使E.变得不幸，从各方面的预兆来看，这样的不幸还得发展。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我是紧张的，而且我是注定要为此推波助澜的。我绞尽脑汁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她认为这封信是平静的；他“呼吸如此多的平静”，她是这样表达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排除，她是出自于纤柔的感情，出自于珍惜，出自于对我的忧虑，才这么说的。我在这整个事件之内受到了足够的惩罚，我对这个家庭的立场就已经是足够的惩罚了。我还忍受了这样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从没有从这当中恢复过来（我的睡眠、我的记忆、我的思维力、我的抵抗最微小烦恼的能力，都无可救药地减弱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似乎就像是受了长年牢狱之苦后的那种同样的后果），但眼前我通过对这个家庭的关系遭受的痛苦少多了，不管怎么说，要比F.或者E.少多了。不过还有些痛苦存在于这之中，即我现在应该和E.作一圣诞旅行，而F.大约却要留在柏林。

12月8日。长时间以来昨日第一次处于毫不怀疑能进行良好工作的状态之中，可是只写了母亲章节的第一页。因为我已经几乎两夜没有完全入睡，因为在早晨就已经出现了头痛，而且因为我对来临的白天有着极大的恐惧。我又看到了所有写出来的不连续的片断和不是在夜里绝大部分的时间里（或甚至至于整夜）写出来的东西均是质量较差的，由于我的生活境遇，我肯定只能写出这种质量较差的东西来。

12月9日。和芝加哥来的E.K.在一起。他几乎是令人感动的。他描

绘了他安逸的生活。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半待在观察台的房子里。在针织品部门审查发寄的情况。每星期15美元。14天的休假，其中一个星期带薪，5年之后，全部的14天休假都有工薪。有一段时间，针织品部门里事情不多，他就在自行车部门临时帮忙。每天售出300辆自行车。一个批发公司里有一万个职员。只用发寄商品价目表的方法来招揽顾客。美国人喜欢更换职务，夏季里，他们根本不想工作，但他不喜欢更换工作，他看不到这样做的好处，在这个时候人们就失去了时间和金钱。他到现在只干过两个职务，在每个职务中干5年，如果他回去的话——他的假期没有限定的日子——他还将进入同样的工作，别人可能一直需要他，当然也可以不需要他。晚上他绝大多数待在家中，和熟人玩玩牌，聚会一下，有时候花上一个小时去电影院消遣，夏日里出外散步，星期天到海上游览。他在结婚上小心翼翼，尽管他已经是34岁的年纪了。因为美国的女人结婚常常只是为了离婚，这对她们来说很方便，对男人来说却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

12月13日。我没有去工作——我只写了一页（传说的注释）——却念了写完的章节，并感到它们中有的部分是不错的。我总有这样的意识，每一种满意的和幸运的感觉，例如特别是我面对传说的感觉，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虽然，永不得休息，这种代价肯定要在以后付出的。

不久前在菲力克斯那里。回家的路上我跟马克斯说，在痛苦不是太大的前提下，我躺在将死之人的床上会非常满意的。我忘了补充，并且后来故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即我写了最好的东西能够在这种能力中满意地死去，自有它的道理。在所有这些好的以及极为令人信服的地方，总是牵涉到某人死了，他感到非常艰难，在这里面对他来说存在着一种不公正，至少是一种严酷，而对读者来说，至少是我的看法，这是令人感动的。但对这个相信躺在临死之人床上能够满意的我来说，如此的描绘暗地里是一种赌博，我是高兴在死去的过程中死去，因而以打小算盘的方法利用读者集中于死亡的注意力。与读者相比，我的理解要清楚得多，从读者角度来说，我认为，他会在临死之人的床上发出怨诉，而我的怨诉因此而尽可能地完全了，也不像真的怨诉那样突然地中断，而是有一个美而纯的过程。这就像我当着母亲不停埋怨我尝受到的痛苦那样，但这痛苦并不像埋怨本身让人相信的那么大。在母亲面前我毕竟不需要像在读者面前那么多的艺术铺张啊。

12月14日。工作可怜地向前爬行，大概是在它最重要的地方，在那

里，那里多么需要一个良宵佳夜。

下午在鲍姆那里。他在给一个戴眼镜的脸色苍白的小姑娘上钢琴课。小男孩静静地坐在厨房的半暗处，漫不经心地拿着某个不认识的东西在戏耍，给人以很惬意的印象。特别是那位大个子女仆在一个桶式容器里洗东西时手的动作。

写作中的失败，没有意义的导向。

12月19日。昨天几乎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写了《乡村教师》，但我害怕写到超过1点3刻的时间。这害怕是有道理的，我几乎根本不睡觉，大约只是做了三个短暂的梦，然后在办公室里处于相应的状态。昨天因为工厂的事而受到父亲谴责：“你把我牵进去了。”然后回家，静静地写了三个小时，意识到我的责任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没有如父亲所说的那么大。今日，星期六，我没去吃晚饭，部分是由于害怕父亲，部分是为了充分利用夜里的时间工作，但我只写了一页，而且不是非常好的一页。

每一部中篇小说的开头都是可笑的。这个新的、还没有完善的、到处都感觉得到的有机整体的组织能够在世界上成熟的组织里存在下来看来是没有希望的，它就像每个成熟了的组织一样，都在努力地封闭自己。诚然人们这时忘记了，如果中篇小说是合情合理的，它本身就承担着它那完善的组织，即使它还没有完全展开；因此，在一部中篇小说开始之前，在这方面就产生绝望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父母肯定会在婴儿的面前绝望，因为他们没想到过他们会生出这可怜的、特别可笑的小生命。诚然，人们从来不知道，是否人们感觉到的绝望是合理的绝望，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绝望。但这种考虑可以产生某种程度的坚持，缺乏这种经验已经对我有过损害。

12月20日。马克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异议，他让太多的精神病患者出场了。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些人不是精神病患者。给这个病患者加以标签无非是一种特性描述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非常柔和的和非常有用的手段。例如，人们肯定在背地不断地以最大的固执去说一个人，说他头脑简单，是个白痴，如果他本身就包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影，他简直就达到了他最高的效果。他的性格的描绘在这方面大约就有了如朋友中辱骂语言的意义。如果说他们说“你是个笨蛋”的话，他们指的并不是，这另一个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他们自己因为这种友情而

受到屈辱，而绝大部分因为如果这不只是诙谐的话，那它自然是一种愿望没完没了的混合。那么，例如这位卡拉马索夫的父亲完全不是傻瓜，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几乎与伊凡势均力敌的、当然的凶恶之人，而且不管怎么说，要比诸如他的被叙述者视为无可争议的表弟或在他面前如此崇高的地主外甥聪明得多。

12月23日。读了几页赫尔岑〔书中〕的《伦敦的雾》，根本不知所云，却是走出了那位完全无意识的人，坚定、自我折磨、自我克制，而又万念俱灰。

12月26日。与马克斯夫妇在庫滕堡。我是怎样计算这自由的四天时光的呀，我考虑了究竟有多少时间能正确地运用，可是现在大概是失算了。今天晚上几乎什么也没写，大概再也不能将《乡村教师》继续下去了，我最近曾为它工作过一个星期，我当然也许花过三个无事的夜晚润色它，除去表面的错误，现在它尽管还几乎处在开始的状况，但它本身已经有着两个不可治愈的错误，此外也是没有活力的。——新的白天时间分配从现在开始！更好地利用时间！为在这里找到解脱，我在这里埋怨？解脱不会从这个本子里出现的，如果我身在床上的话，它就会来到了，它会使我来个背朝上，使我躺得舒舒服服、轻轻松松，不亦乐乎，别的解脱是不会出现的了。

在庫滕堡莫拉维茨饭店，喝得醉醺醺的家仆，上面的光照笼罩着的小庭院。那位士兵模糊的部分倚靠在庭院楼房二层楼的扶栏。提供给我的房间，窗户朝向一条昏暗的没有窗子的走廊。红色的长沙发，幽幽的烛光。雅各的教堂，虔诚的士兵，姑娘们合唱的嗓音。

12月27日。一位商人深受不幸之迫害。他承受这不幸已久，但最终他认为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不幸了，便去一位懂法律的专家那里讨教。他求他出点子，并想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来击退这个不幸，或者使自己有力量去忍受这个不幸。这位法律专家一直在翻阅自己面前放着的文件，并专心研究着。他接待每个来请求出主意的人，总习惯有这样的话：“我正读到有关你的情况。”这时他用手指指着面前书页的一处地方。这位商人对这个习惯有所耳闻，但并不喜欢这个习惯。这位法律专家虽然借此马上说出了帮助请求人的可能，而且使这个人摆脱被一种在神秘中起作用的、向谁也无法倾诉的、不为任何人所同情的痛苦袭击的恐惧，但这种断言的不可信程度却是太大了，它甚至曾使这位商人早先就不想到这位法律专家这里来。现在他还在那里踌躇不前，停立在打

开的门里。

12月31日。从8月以来就工作上了，一般说不少，而且也不坏，但既不是在前者的关系上，也不是在后者的关系上，我的能力都一直到了极限，这也许像是肯定了的一样，特别是因为从所有的预兆来看（失眠、头疼、心衰），我的能力不会延续太久。我写了下列没有完成的东西：《诉讼》、《卡尔达车站的回忆》、《乡村教师》、《检察官》和一些较小篇幅的开头。完成的一些东西只是：《在流刑营》和一章《销声匿迹的人》，这两种是在14天的假期里写完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作出这一概览来，这对我来说完全不合适！

1915年

1月4日。我有极大的兴致开始一个新的故事，不松劲。一切都是无益的。如果我不能通过好多的夜追逐这些故事的话，它们就爆发出来，然后消失，现在的这个《检察官》就是这样。明天我去工厂，按P的印象，我必须每天下午去，因而一切都停下了。对工厂的想法就是我延续的赎罪日。

1月6日。我暂时放弃《乡村教师》和《检察官》，但也几乎没有能力继续《诉讼》。脑子里想着来自伦堡的小姐。任何一种幸运的承诺，好似对一种永恒生命的希望。从某一种距离来看，这些希望就停留在那里，人们却不敢靠近。

1月17日。昨天第一次在工厂口授信件。没有价值的工作（一个小时），但不是没有满足。在可怕的下午之前，头疼不断，使我不得不将手不停地抚摸自己的脑袋（在阿尔科咖啡馆的状况）。躺在家中长沙发上，心口疼痛。

读奥特拉给E的信。我真的压制过她，而且是肆无忌惮地，出自于漫不经心和无能为力。在这里面，E是正确的。所幸奥特拉是如此有力，使她独自在一个陌生城市里立即从我这里恢复过来。她有多少与人交往的能力因为我的过错而没有得到发挥啊。她写道，她在柏林感到不幸。不是真的！

看得出，我完全没有充分利用8月以来的时间。利用下午多睡以继续工作到深夜的不断尝试的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最初的14天之

后，我已经能够发现，我的神经不允许我1点之后去睡觉，以后我根本再也无法入睡，第二天白天便会变得无法忍受，而且是我自己在毁灭自己。我下午躺的时间太长，而夜里工作起来极少超过一个小时，但最早总是在11点左右开始。这是错误的。我必须于8点或9点开始，夜里当然是最好的时间（休假），但它对我来说却是不可得的。

星期六我将要看到F。如果她不爱我，我活该。我相信今天认识到了，在一切方面，因而也在写作中，我的极限是多么窄小啊。要是人们认识到他的极限是非常强劲的话，那他肯定要爆炸的。这大约就是奥特拉的信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最近的时间里我是非常自得的，我对F.有许多为我辩护的异议和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将它们写下来，今天我也许做不了这件事。

斯特林堡《黑色的旗帜》。关于来自远处的影响：你一定会感觉到，其他人是怎样地反对你的举止，而他们并不表现出这种反对来。你在孤寂中感觉到一种悄悄的愉快，而你却莫名其妙，为什么？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想到你的友善，友善地谈论着你。

1月18日。在工厂里以同样的方式无益地工作到6点半，读啊，口授啊，听别人说啊，写东西啊。之后便是同样毫无意义的满足。头疼，睡眠不好。没有能力去干较长时间的精力集中的工作。在野外的时间也太少。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我害怕毁灭那些旧的故事。现在我面前组列着四五个故事，就像在演出开始的时候，立在马戏团老板舒曼前面的那些马匹。

1月19日。如果我一定要去工厂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能写。我相信，这是我现在感觉到在工作时的一种特别没有能力的表现，就像我在“盖内拉利”^[86]工作时那样没有能力。尽管我的内心是那么地不感兴趣，只要可能的话，直接地迫近谋生的生活便会夺取我任何的纵览能力，就好像我走在山隘的一条狭路上，在那里我还要低下我的脑袋。例如，今天在报纸上登着关于瑞典地方表明的态度，按这个态度，不管三国部队的威胁，中立一定要得到保护。在结束的地方说道：三国部队将在斯德哥尔摩遇到极大阻力。今天，它到底是怎么样了，我几乎完全听之任之。3天前我也许从心底里感觉到，一个斯德哥尔摩的幽灵在这里说话，“三国部队的威胁”、“中立”、“关于瑞典地方”，只是在一定的形式里从人们只能着眼睛享受而永远不能用手指触摸到的空气中捏成一个形象。

我跟两个朋友约好星期日作一次郊游，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睡过了聚会的时间。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从来是遵守时间的，对此吃惊非小，他们来到我的住处，站立了一个时辰，然后登梯而上，敲我的门。我吓了一跳，便从床上爬起，什么也不顾，专心一致地尽快作些准备。当我后来完全穿好衣服踏出门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表现出了明显的恐惧，并在我面前往后退。“你的脑袋后面是什么东西？”他们叫起来。我在醒来之后就已经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在妨碍着我将头转到后面去，我立即用手摸向这个障碍物。正当我在我的脑袋后面抓住一把剑的剑柄的时候，这些朋友们喊道：“小心，别伤着你！”朋友们走近来审视着我，把我领到房间里衣柜的镜子前面，脱去我上身的衣服。一把带着十字形把柄的旧而长的骑士宝剑插在我的背部，只露出剑柄，竟然有这等事，剑刃不可思议地插在皮和肉之间，但却没有造成伤害。而且在脖子处插入的地方也毫无伤痕，朋友们证实，那里的确连一点儿血迹都没有。当朋友们登上椅子，慢慢地、一毫米一毫米地将这把剑朝外抽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血跟着流出来，而且脖子上原来裂开的地方吻合得连裂缝的痕迹也都没有了。“这是你的剑，”朋友们大笑道，并把剑送给我。我用双手掂量着这把剑，那是一件贵重的武器，十字军东征的人可能用过这把剑。古代骑士们在梦中放荡不羁、不负责任地舞剑，将剑戳进无辜的入睡者身上，谁能忍受得住哩！只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最初大概是在活活的人体上滑动的，而且还因为忠实的朋友们站在了门后，并敲门做好了帮助的准备，所以才没有导致严重的伤害。

1月20日。写作结束。它什么时候再召唤我呢？我在怎样糟糕的状况下与F.会面啊！随着写作的放弃，马上便出现思想上的迟钝，在自己为会面无能为力作准备的同时，我也几乎未能摆脱上个星期对此的重要想法。但愿我仅此一次地在这里享受可设想的收益：改善睡眠。

《黑色的旗帜》。我在读的时候，感觉是多么不好，我是怎样怀着恶意和多病的体质观察的啊。看来我是不能深入到世界去了，我只能安静地躺着、接受着，在我的内心，被接受的东西展开着，然后静静地呈现出来。

1月24日。和F.在博登巴赫。我相信，我们在那个时候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我既不敢对她，也不敢在关键时刻对自己说出这一点来。如此，我又毫无意义地用话来敷衍她，每一天都使我变老，变得骨瘦如柴。如果我试图去领会她一方面痛苦，一方面又安详、快活的时候，我

旧有的头疼就又出现。通过许多书信，我们互相间不可能再烦恼，最好，这次的会面作为某种偶然的事情而忽略过去；或者我也许相信，我将在这里使自己自由起来，靠写作生活，去国外或别的什么地方，同时在那里和F.一起悄悄地生活？是呀，我们也就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改变。每个人都悄悄地对自己说出这一点，另一个人却毫不动摇、毫无同情之心。我绝对不会从我幻想的生活的要求中退让一步，它只是为我的工作而设计的。她对着所有默默无言的请求毫无表情，她想要的是一般的東西，舒适的住宅，对工厂的兴趣，丰富的吃食，从晚上11点开始的睡眠，有供暖的房间，她将我25年来走快一个半小时的时钟校正到与现在时间分秒不差。她坚持得很对，也许还要继续正确地坚持下去，当我向招待说“您拿过报纸来，等到念完再说”的时候，如果她指责我，她是正确的，而当她说到预想的住宅布置方面的“个人特色”（让人听起来无非就是嘎吱嘎吱的声音）时，我什么也纠正不了。她说我的两个姐姐是“乏味”的，她根本不询问最小的妹妹，她对我的工作几乎避而不谈，漠不关心。这是一个方面。

我如往常一样，无能为力和空虚无聊，而且照道理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什么别的事情，更甭说这样的问题，某个人也只是有兴趣用小手指来摸索我，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紧接着用那种冰冷的气息吹向这三种不同的人。赫勒劳人，博登巴赫的R.家庭和F.

F.说：“我们一起待在这里多棒啊。”我默默无语，就好像我的听力在这声感叹中失灵了。我们孤独地在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围绕着我的只是无聊和绝望。我们也没有好好地互相看上一眼，在这个时刻我的呼吸倒是自由的。对一个所爱的女人的甜蜜感觉，如在楚克曼特和里瓦，除了在信中之外，我对F.从来没有过，有的只是无限的钦佩、恭顺、同情、绝望和自卑。我也在她的面前朗诵过，句子混乱得令人厌恶，跟这位女听者毫无联系，她闭着眼睛躺在长沙发上，不出声地承受着。一个不冷不热的请求，是否可以拿走和抄下一份手稿，在读看门人故事的时候引起了较大的注意和欣赏。这时我才明白了这个故事的意義，她也正确理解了这个故事，然后我们用一些粗略的注释进入这个故事，我就开了头。

我在和别人讲话时遇到的困难对其他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这当然是有其原因的。因为我的思想，或更为确切地说，我思想的内容，完全是模模糊糊的，因为我身在其中，走多远只是由我决定，我不受任何干

扰地、有时自我满足地歇着，因为一种人之间的交谈需要变得热烈，需要不断加强，需要持续的关联性，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是没有的。没有人会和我一起腾云驾雾的，即使他想这么做，那么我也不能将云雾从我的额头驱散，它在两人之间溶化了，什么也不是了。F.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路去博登巴赫，花气力办了护照，不得不在一个不眠之夜之后忍受我，甚至还要倾听一阵朗读，而这一切均是胡扯。她是不是像我一样感到这些也是如此之类的痛苦？当然不会的，同样的敏感程度岂不成了前提，可是她却没有负罪的感觉。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曾经被人认为是正确的：每个人都爱另一个人，就像这另一个人一样。但也如此像他一样，他相信，不能和他一起生活。

这样的组合：W.博士欲使我相信，F.是可恨的；F.欲使我相信，W.是可恨的。我相信这两个人，而且爱这两个人，并为此而努力。

1月29日。又试图写东西，几乎没有效果。最近两天10点钟左右就很快去睡觉，好像已经好长时间不这样了。白天的时候有自由的感觉，一半的自得，增强了在办公室里的适用性，与人讲话的可能性。——现在是剧烈的膝部疼痛。

1月30日。原来的无能为力。几乎有10天之久中断了写作，而且已经将之抛到九霄云外。又面临着巨大的努力奋斗。必须要专心一意地潜到水下，要比面对一个人下沉的那个东西更快地沉下去。

2月7日。彻底的停顿，无限的痛苦。

在自我认识的某种情况下，及在一般对观察有利的附随现象中，肯定会周期性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人们发现自己是令人厌恶的。善的每一种尺度——但愿对此的看法还是那样不同——会显得太大了。人们会认识到，人们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可怜的隐念的老鼠洞，根本没有什么行为会是逃脱这些隐念的。这些隐念会是那样的龌龊，以致人们在自我观察的状态中也不想对它们作周密的思考，而只是让自己从远处去看这些隐念就足够了。在这些隐念中，大约不单单涉及自私自利的动机，自私自利这东西在这些隐念面前会作为善与美的理想出现。人们将要发现的这种龌龊，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将存在，人们会认识到，人们是充满了这个精神负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通过这个精神负担毫无认

识地或者是过分善良地看透而又离去。这种肮脏将是人们要发现的最下层的地面，这最下层的地面大约将不包含火山的熔岩，而是污物。它是最下层的東西，也会是最上层的東西，而且怀疑自我观察会立刻变得那么虚弱，那么沾沾自喜，就像一头猪在臭水中晃晃悠悠。

2月9日。昨天和今天写了一点儿东西。狗的故事。

现在念了开头的地方，它是可恨的，而且引起了头疼。不顾一切的真实性的，一条在沙滩上还喘息着的鱼是凶恶的、死板的、机械的。我写《布法和白居易》是很早的时候了。如果那两个因素——最鲜明的是在《司炉》和《在流刑营》中——不统一起来，我就完了。但这种统一的前景存在吗？

最终接受了一间房间，它在比莱克胡同的同一座房子里。

2月10日。第一个晚上。邻居和女房东聊了数个小时之久。两个人轻声轻语地交谈着，女房东几乎是无声的，但却越来越生气。已经进行了两天的写作中断了，谁知道要多长时间。完完全全的绝望。在每一处的住地都是这样的吗？在每一个城市、在每个女房东那里等待我的都是这样一种可笑的、一定是致命的灾难么？我那个董事会的两个房间在寺院里。但那是那样毫无意义，我会立刻绝望，宁愿去找寻办法——不，那是不违背我的性格的，我身上还有着某种坚韧的犹太人的东西，这大多数只是在另一个方面有所帮助。

2月14日。俄罗斯有着无尽的吸引力。比果戈理的三匹马拉的雪橇还要美的是一条黄水滔滔的望不到尽头的大河图画，这里的水面无处不泛起波浪，但不是那种太大的波浪。岸边空旷荒芜的原野，折断的弯曲的野草。虚无控制了这里，更确切地说，一切都熄灭了。

圣西门主义。

2月15日。一切都停顿了。时间的分配既糟糕又无规律。住的地方毁灭了我的一切。今天又听了年轻女佣的法文课。

2月16日。感到茫无头绪。好像我拥有的一切都跑走了，而如果它们都回来了，好像也几乎并不使我感到满足。

2月22日。在每个方面都无能为力，而且是彻底的。

2月25日。在几天不停的头痛之后，终于感到少许自由，有些自信了。我如果是一个陌生人，他在观察我和我生命的进程，我也许不得不说，所有一切都肯定在无益中结束，在连续不断的疑虑中耗尽，只是在自我痛苦中才更富创造力，我希望作为参与者。

3月1日。在几个星期的准备和恐惧之后，以极大的气力宣布了解约，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是的，那是很平静的，我只是没有好好地工作过，因此，我既没有足足地尝试一下安静的滋味，也没有足足地尝试一下不安的滋味。我想自己受受折磨，想不断地改变我的处境，我相信，我自己明白，我的拯救在于改变，我还相信，通过这小小的改变，便可以为我可能所需要的巨大改变作准备，但我在半睡眠中，在激起一切理智力量的情况下，正做着另一种改变。我大概更换了一处在许多方面更坏的住宅。至少今天也许是我能真正好好工作的第一（或第二）个日子，如果我没有非常剧烈头痛的话。我迅速地写了一页。

3月11日。时间是怎样过去的，又已经10天过去了，而我什么也没有达到，我没有深入。有时候写成一页，但我无法坚持，第二天我就没有力气了。

东、西方犹太人在一个晚会上。对当地犹太人来说，东方犹太人是遭鄙视的，这种鄙视是有根据的。就如东方犹太人明白这种鄙视的原因一样，西方犹太人却不明白，例如母亲试图用这种可怕的超越一切荒谬事物的理解来对付他们。就连马克斯，他的讲话也没有充分的东西，显得内容贫乏，一会解开外衣，一会儿扣上外衣，但这里有善良的和最好的意志。某一位W.却是相反，一件可怜的外衣全扣得好好的，一条已经脏得不能再脏的衣领，出席在这庄重的场合，大声喊叫着是与不是，是与不是。嘴巴四周布满了一种魔鬼的、令人不舒服的微笑，年轻的脸上有不少皱纹，手臂的动作粗野而又不知所措。那位最好的却是个小个子，他完全是在训练，用尖尖的、无能力升高的声音，一只手放在裤袋里，另一只朝着听众挥去，不停地发问，并立即论证那个正需要论证的事情。一副金丝雀的嗓子，如金银丝编织的演说说得全场云苦雾罩，令人感到折磨的痛苦。还有脑袋的甩动。我若是木制一般，是被推至大厅中央的衣服架子，但我希望这样。

3月13日。晚上：6点钟躺在长沙发上。大约8点钟睡了，已经无力起身，等待着时钟敲钟点的声音，可是在迷迷糊糊中什么也没听见。9点钟起来了，不再回家去吃晚饭，也没去马克斯那里，他那里今天晚上

有一个聚会。原因：没有胃口，害怕很晚归来，但最重要的还是想，我昨天什么也没写，越来越疏远它，而且陷于失去所有在最近半年里花了极大艰辛而获得的一切的危险。为此提供一下这个证明，我写了可怜的一页半的一个新的、最终抛弃了的故事，然后在一个当然是由没有兴致的胃的状况引起的绝望中读赫尔岑的作品，为是在不管怎样的情况下让他来继续引导我。他最初婚姻年代的幸福、惊异，看来将我置进一种如此的幸福中去，他的圈子里的伟大生活，别林斯基、巴枯宁整天价裹着毛皮待在床上。

有时候是快要撕裂感觉不幸的存在状况和同时确信这种状况的必然性，以及确信一个通过每次对不幸忍受而转变成的目标的必然性（现在受到对赫尔岑回忆的影响，但也是枉然）。

3月14日。一个上午：直到11点半还躺在床上。思想混乱，思想缓慢地形成并以不可信的形式固定下来。下午阅读（果戈理，关于抒情的论文），晚上散步，带着部分上午坚守住的，但并不可信的思想。在考泰克绿草地里坐着，布拉格最美的地方。鸟儿在歌唱，宫殿里的画廊。古树上挂着去年的枝叶，半明半暗。后来奥特拉与D.一起走来。

3月17日。受到噪声骚扰。一间美丽的、比在比莱克胡同里那间亲切得多的房间。我是那么喜欢这里美丽的远景——泰因教堂，但我却已经习惯了下面车辆的巨大噪声。可是在下午却不能习惯这些噪声。厨房和走道不时会发出一阵噼啪声。在我上面的地板上，昨天有一个球体的东西在不停地滚动，像是在玩游戏，不清楚什么目的，然后是下面的弹钢琴声。昨天晚上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安静的，稍稍地充满希望地写了一点儿东西（《检察官》），今天兴致勃勃开始的时候，突然有许多人在旁边或我的下面聊天，说话那么大声，此起彼伏，就好像在我的四周盘旋。稍稍与噪声抗争了一下，然后带着完全摧毁了的神经躺在长沙发上，10点之后寂静无声，但已不可能再去工作了。

3月23日。连写一行字也无能为力。我昨天十分惬意地待在考泰克绿草地上，今天也十分惬意地坐在卡尔广场上，手里拿着斯特林堡的《在海边》。今天在房间里也十分舒适。空得像海岸边的一只贝壳，准备着被一脚踩碎。

3月25日。昨天马克斯演说《宗教与民族》。引用犹太教法典。东方犹太人。伦堡的女子。那位将自己同化于虔诚信徒的西方犹太人耳朵

里塞了棉花塞子。施泰德勒是一位社会主义者，长长的、闪光的、修剪得十分显明的头发，就像东方犹太女人偏执着迷的那种式样。东方犹太人的群体围着炉子。G.穿着长袍，这是不言而喻的犹太生活。我思想困惑。

4月9日。住地的烦恼。无边无际。有几个晚上工作得不错。我要是在夜里工作该多好啊！今天的吵闹声妨碍了睡眠、工作和一切。

4月14日。加里西亚姑娘们的荷马史诗课。她们穿绿色上衣，面孔表情敏锐、严肃；如果她发问，她就举起手臂，呈直角状；向前走时，动作匆忙；如果她发问而没得到回答时，她就觉得难为情，便将面孔转向一边。那位穿绿衣服的强大年轻的姑娘坐在缝纫机旁。

4月27日。与我的姐姐在纳基·米哈利。无能力与人生活、交谈，完全沉陷在自己身上，想的也是我自己。迟钝、思想不集中、忧心忡忡。我没什么要诉说的，从来没有，也从不对任何人诉说。——乘车去维也纳。那位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评判的、在旅途上富有经验的维也纳人，是个大个子，两腿交叠，读着《阿兹·埃斯特》；乐于助人，就像埃莉和我（在这方面以同样的方法窥视着）看出的那样，但也是拘谨的。我说：“您在旅行中多有经验呀！”（他知道所有我所需要的铁路网络，尽管后来表明，这些说法当然不是完全正确，他认识维也纳的所有电车路线，给了我在布达佩斯打电话的忠告，他知道运送行李的各种手续，他清楚，如果人们将提包一起带进计程车的车厢里，就少付些钱）——他对此毫无回答，而是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坐着。那位姑娘来自契兹科夫，健谈，但很少能插进话来，可惜的是身体没有发育好，有点贫血，而且再也无可能发展。那位来自德累斯顿的老太太有着一副俾斯麦的面孔，后来她承认自己是维也纳人。一位肥胖的维也纳妇女，是《时报》一位编辑的妻子，有很多报纸方面的知识，谈吐清晰。引起我最大反感的是，她绝大多数拥护我的看法。我大多数情况下默默无语，不知道说什么，在这个圈子里战争怎么也引不起从我这方面来说有值得告诉别人的意见。维也纳—布达佩斯。两个波兰人，少尉和夫人，马上就要下车，在窗口悄悄说话，他们脸色苍白，并不那么年轻了，两颊几乎是凹进去的，常常将手放在被衣服裹得紧紧的臀部上，烟抽得很多。两个匈牙利犹太人，一个靠窗户，好像是矿工，用肩膀支撑着另一个睡着的人的脑袋。大约从5点开始的整个早晨就交谈着有关商业方面的事情，算账，传阅文件，从一只手提包里掏出各种各样商品的样品。我对面是一位匈

牙利的少尉，在睡觉中一副空荡荡的、丑恶的面孔，张着嘴巴，滑稽的鼻子，早先当他回答有关布达佩斯情况的时候，倒是热情了一阵子，双眼闪闪发光，说话生机勃勃，好像整个的人都投入到这个说话的声音中去了。车厢里的另一边是来自比斯特利茨的犹太人，他们是回家的，一个男子领着几个妇女。他们获悉，科罗斯·梅索民用通航刚刚被封锁。他们必须要在车里坐上20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他们讲到一个男子，他在拉道茨留到俄国人已经来到的时候，他没有别的可能，就只好坐上最后驶过的奥地利大炮车逃跑。布达佩斯。关于与纳基·米哈利交通联系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所不相信的糟糕说法，后来被证实为确切的。在车站的匈牙利骑兵，穿着系绳的毛皮上衣，扬起脚，就如一匹耀武扬威的马。和一位离去的太太告别。他潇洒地与她聊天，而且说个不停，如果不通过话语，就通过舞蹈动作和手握剑柄的姿态。由于害怕列车可能会预先开走，他好几次将她领上车厢的台阶，手几乎贴近她的腋下。他，中等身材，有一副健壮的大牙，毛皮上衣的裁剪和腰部的突出使他看上去有点像女人。他朝着各个方向频频发出微笑，一种完全没有意识的、无意义的微笑，仅仅是证明他本性理所当然的、几乎是军官的尊严所要求的完整和持久的和谐。

一对含泪告别的老年夫妇。无意义地重复着无数次的接吻，就像人们在绝望的时候，并不知道绝望，不断地将香烟放在嘴上吸。这是不顾周围环境的家庭内的情景，这样的事在所有的卧室中才如此发生。他们的面部表情根本不可能被人注意，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老太太留了下来，人们比较清楚地看见她的脸，有人想更为清楚地看看，什么表情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对某种小小的、同样不引人注目的丑陋的回忆，大概是红鼻子，或者是一些麻点。那老年男子有一把灰色的大髭须，大大的鼻子和不折不扣的麻点。斗篷和手杖。尽管他很激动，但克制得很好。在悲伤的痛苦中抓住这位老太太的下巴，这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魔法呀，最终他们哭着看着对方的脸。他们对这件事不是这么认为的，但人们会对此作这样的解释：甚至于这个可怜的小小的幸福，就像这两个老人之间的联系一样，被战争破坏了。

那巨人般的德国军官踏着大步行进，身上挂着各种各样小的武器装备，先穿过车站，然后穿过列车。由于衣服绷得紧紧的，身材又高大，他看上去挺直，走动起来几乎令人吃惊；为一下子能把所有的部位都捕捉住，人们把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他结实的腰部、宽阔的后背、高挑的身材。

在车厢里有两个匈牙利犹太女子，母亲和女儿。两人挺像，母亲显得雍容高贵，女儿却是可怜的，但有着自我意识的多余的存在。母亲——经过好好地修饰的大脸盘，不光洁的皮肤，蓝色的衣服，可怜的胸脯上罩着白色上衣的镶饰。

红十字护士。十分沉着而坚毅。旅行对她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整体的自我满足的家庭。她像父亲那样吸烟，并在走道上走来走去，她像一个男孩一样跳到长凳上，从她的旅行袋里取一些东西，她像一位母亲那样小心翼翼地切肉和面包、剥橘子，实在像她本身那样的俊俏姑娘一样，她在对面的长凳上展示她那双美丽的小脚、黄色的靴子和结实的双腿上的黄色长筒袜。她一点儿也不拒绝别人与她攀谈，甚至于自己就开始发问起来，询问她看到的远处的山，她给我导游指南，让我在地图上寻找这座山。我毫无兴致地躺在我的那个角落，尽管她令我好喜欢，但要问她是怎样想到这些的时候，那种违愿之感在我心里堆积着。强壮棕色的面孔看不出一定的年龄来，粗糙的皮肤，圆拱形的下唇，旅行的装束，里面穿的是女看护的制服，柔软的便帽随意地压在牢固的髻发上。因为她没有被问及，她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叙说起来。如我后来知道的那样，她完全不令我姐姐欢喜，我姐姐却微微地支持着她。她驶向萨托拉里亚·乌伊赫尔，在那里她将知道下一个决定，她最喜爱的是在那个有最多事情要做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时间过得最快（我姐姐从中得出结论，她是不幸的，我认为这推测是不正确的）。人们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有一个人在睡觉中打鼾令人难以忍受，别人将他弄醒，请他顾及一下其他的病人，他答应了，可是他几乎还没有躺回去，那可怕的鼾声就却又已经响起来了。这是非常滑稽的。其他的病人将拖鞋朝他扔过去，他躺在房间的角落，因而是一个不可能不击中的目标。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病人，否则就达不到目的，是、是，不、不，只是不容有商量余地的。这里，我对此作了一个愚蠢的，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特性的、阿谀奉承的、狡猾的、次要方面的、不涉及个人的、漠不关心的、不真实的、从远处的、从某一个最后的病态的秉性得来的，此外是早先晚上受到斯特林堡剧本演出影响的注解，那一定要使妇女们感到舒适，才可能如此地对待男人们。她未听见这个说法，或是不理会这个说法。我的姐姐自然完全理解它的含意，并大笑起来。又讲了一个一点儿也不想死去的破伤风病人。

那位匈牙利站长后来带着他的小男孩上车了，这位护士给这男孩一个橘子，小男孩接过这橘子。后来她又给他一块杏仁果糖，并把这块糖

送到他嘴边，但他迟疑了。我说：他可能不相信。这位护士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非常可爱。

窗前的蒂萨河和博德罗格河流淌着早春的巨流。海的景色。野鸭群。盛产托考伊甜酒的群山。在布达佩斯突然于耕作过的田原之间升起了半圆状的加固的阵地。铁丝网作障碍，经过细心填塞的用长凳架起来的顶盖，一律如此。对我来说莫名其妙的表达是：“因地制宜。”对这个地带的认识是属于一种四足类的本能。

在乌伊赫尔肮脏的饭店，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用得不能再用了。晚上用的桌子上还有最后一批睡觉人的烟灰。床只是表面上罩得很整齐。试图在分队司令部，后在后勤司令部要求得到乘坐军用列车的允许。这两个部均设在舒适的房间里，特别是后者的房间。军方与官方之间的对立。对写字工作倒是有正确的估价：一张桌子上有墨水、有笔。阳台门和窗户都开着。舒适的沙发床。在院子阳台上的一间用布帘隔开的屋里发出餐具的碰撞声。点心端了上来。有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尉——拉开布帘，看看是谁等在这里。“人们必须挣工资”，他说着这句话的时候停止了吃点心，并朝我走来。顺便说一下，我什么也没得到，尽管我还得回家一次，也为取我第二个身份证。只是将军方同意第二日乘用邮政列车写到我的证件上，这同意完全是多余的。

车站附近是乡村式的，环形广场一片荒芜（科苏特纪念碑、放吉卜赛音乐的咖啡屋、糕点甜食店、体面的鞋业商店，《阿兹·埃斯特》的叫卖声，一位骄傲的独臂士兵做着夸张的动作走来走去，一种表示德国胜利的粗野的彩色印刷品包围了四周空间，当然是被仔细地审查过。每当我在24个小时内的时辰里走过的时候，总遇到P.），一个比较纯然的市郊，晚上在咖啡馆里，纯一色的平民百姓、乌伊赫尔的居民，简朴但陌生的、部分是可疑的人群。可疑倒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的不可理解。一个军中的神父独自念着报纸。——上午这位年轻英俊的德国士兵在旅馆里。他让人端来了许多菜，吸着一支粗粗的雪茄，然后写些什么。锐利、严肃，但一双眼睛却是年轻的，按时刮得光滑的面孔显得格外清晰。我后来又一次见过他在一个人的面前敬礼，但不知是在哪里了。

5月3日。彻头彻尾的冷漠与迟钝。一眼枯干的水井，水在无法达到的深处和不知详情的深处。虚无，虚无。我不懂斯特林堡在《破裂》中的生活；他称之为美丽的东西，放到对我的关系中，就令我反感了。一

封给F的信，错了，没法寄出。有什么使我为一种过去或未来坚持住呢？当今是阴森恐怖的，我不是坐在桌旁，而是在围着它转。虚无，虚无。荒芜，无聊，不，不是无聊，只是荒芜，无意义，衰弱。昨天去多布里科维兹[87]。

5月4日。状况好转，因为我读了斯特林堡的《破裂》。我不是为了读它而读它，而是为了躺在他的胸怀里。他像我像一个孩子一样托持在他左手臂上，我坐在那里像坐在一尊雕像上。我有10次陷于滑下去的危险，但在第11次尝试中我牢牢地坐上了，我有了安全感，而且有着宽广的视野。

对别人跟我的关系作出了许多思考。我所喜欢的是这样少，这里没有人对我有着一般的理解。有一个有这种理解的人，比如一个妻子，这就是说在各方面有了依靠，有了上帝。奥特拉理解一些，甚至许多，马克斯、菲力克斯理解一些，有些人如E.只是懂得个别的，而且是带着十分厌恶的感情去理解这个个别的，F.大概什么也不知道。在这里，在有着不可否认的内在关系的这里，这自然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我有时候认为，她不用知道这点，她就理解我了，例如那个时候，当她在地铁站旁期待着我的时候，我无可忍耐地渴求见她的时候，我在狂热中只是想快点到她那里，我在上面盼着她，想跑向她的身边，她悄悄地抓住我的手。

5月5日。什么也没有做，昏昏沉沉、轻微疼痛的脑袋。下午在考泰克绿草地上读了斯特林堡，他给我营养。

长腿、黑眼睛、黄皮肤、单纯的姑娘，调皮捣蛋而活泼。她看到一位将帽子拿在手中的小女友。“你有两个脑袋？”这个女友马上理解了那个从本身来说很平淡的、但通过这个小小人物的嗓子和完全的投入而显得生动起来的玩笑。她大笑地把这句话讲给她走了几步就碰到的另一个小女孩：“她问我，是不是我有两个脑袋！”

早上遇到R.小姐[88]，竟然滑到丑陋的深渊，一个男子不会有如此变化的。臃肿的身躯，就像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旧的上衣，是我见过的，她的上衣里面穿的是什么，倒是没见过，好像令人疑惑，也许只是衬衫；在这种情况下碰上她，对她来说不言而喻是令人吃惊的，但她不去掩饰发窘的地方，而做了一点错误事情，她是怎样带着愧疚的意识去抓向外衣的领口，将上衣拉正。上唇上浓浓的汗毛，但只聚在一处地方，

给人以十分丑陋的印象。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她的，毫无疑问，在她丑陋的形象里，她有美丽的微笑，但一双美丽的眼睛受到整体变丑的损害。再说，我们由于地域相隔，我当然不理解她，可是相反，她对她从我这里得到的最初的表面印象表示满足。她极纯真地请求给她一张面包票[89]。

晚上念了一章《新基督徒》[90]。

年老的父亲和不年轻的女儿。他聪慧、尖胡须，稍稍弯曲的腰，背靠一根小棒。她，阔鼻子、强有力的下颚，圆圆的但有破疙瘩的面孔，宽肥的臀部，转动困难。“您说我看上去难看，其实我看上去可不难看。”

5月14日。从所有有规律的写作走出来，多多地待在自由的天地里。和St.小姐散步去特罗雅，和R.小姐、她的妹妹菲力克斯、夫人及奥特拉去多布里科维兹、卡斯塔利塞，就如戴着一种刑具行走。今日在泰因胡同举行礼拜仪式，然后是在织布胡同，再后是民众食堂。今天读了《司炉》中的旧章。今天从表面上看我没有足够（已经不足了）的力量。担忧，因为心脏瓣膜病而不适用了。

5月27日。伴随着最后记入的许多不幸走向毁灭，就这样无意义地、没有必要地毁灭。

9月13日。父亲生日前夕，新的日记，这是没有像往常那样必要，我不必让自己不安宁，我已足够不安宁了。可是为什么目的，它什么时候出现，一颗心脏、一颗并不完全健康的的心脏怎么能承受那么多的恶劣的情绪和那么多的不断牵扯着的要求呢？

精神涣散，记忆减弱、愚蠢。

9月14日。和马克斯及朗格尔于星期六在神法师那里。契兹科夫、哈兰托瓦·乌利塞。人行道上和台阶上有许多孩子。一家旅馆。上面全部黑暗，摸黑儿向前伸出双手走了几步。一间房间露出苍白昏暗的灯光，灰白色的墙壁，几个小个子的妇女和姑娘，白色的头巾，没有神色的面孔，围着圈站着，动作不大。无白色的印象。再一个房间。全部是黑的，满是已婚的男人和年轻人。大声的祈祷。我们挤在一个角落。我们还没有稍微地环顾四周，祈祷已经结束了，房间逐渐空了，一个角落房间有两面墙壁，各有两扇窗户。我们被挤往一张桌子，在法师的右边，

我们抵抗着。“你们可也是犹太人。”最有力的如父亲般的本性构成了法师的性格。“所有的法师外表看上去都是粗野的。”朗格尔说。这位法师穿着丝绸长袍，里面的裤子已经明显可见，头发盖上了鼻梁。他不停地将用毛皮镶边的帽子推来推去。虽龌龊，但纯正，是个强烈想着自己特性的人。他抓抓胡须，用手擤鼻涕朝地板上甩，用手指抓饭菜——但如果他将手放在桌上一小会儿的话，人们看到皮肤的白色，就如人们相信只有在孩童时代的想象中看到过的一种类似的白色。那个时候双亲当然也是纯洁的。

9月16日。我看见波兰犹太人朝科尔·尼德尔去的景象。那个小男孩在祈祷大衣的双臂之下，从他的父亲的身旁跑来。不去庙宇的自杀。

打开《圣经》。关于不公证的裁判官，就是说我寻找我的看法，或者说至少是我在我自身中迄今发现了的看法。顺便说一下，这并没有意义，显然，我永远不会在这样的事情里被操纵的，在我的面前飘动的不是圣经的书页。

刺进去的最有效的部位看来是在颈项与下巴之间。人们抬起下巴，将刀子插进绷紧的肌肉。但这个部位好像只有在想象中有用。人们期待从那里看到血流如注，并且戳破筋腱和骨头的网状结构，就像人们在被烤火鸡大腿里看到的类似的东西。

读了《弗尔斯特·弗莱克在俄国》。拿破仑回到博罗迪诺战场。那里有修道院，它被炸毁。

9月28日。完全地无所事事。马尔赛林·德·马尔博将军回忆录和霍尔茨豪森的《1812年德国人的苦难》。

埋怨毫无意义。作为对此的回答是在脑袋里扎刺。

一个小男孩躺在浴缸里。这是第一次洗澡，按他的旧想法，在洗澡的时候，不管是母亲还是女仆都不能在场。为了符合从隔壁房间不时向他喊叫的母亲命令，他草草地用海绵擦了擦身子，然后伸了伸身子，在热水里享受着不动的状态。煤气的火焰有规律地发出滋滋的响声。在隔壁的房间里已经长时间没有声音，大概母亲已经走远。

为什么这样问是毫无意义的？怨尤就是：发问，等待，直至有了回答。但自己本人并不能产生回答的发问永远得不到回答，在提问题的人

和回答问题的人之间并无距离。

这不是要逾越的距离，因此提问与等待是毫无意义。

9月29日。各种不同的模糊决定。它们使我成功。偶然在裴迪南大街瞥见一幅跟此毫无关系的图画，一幅不怎么样的速写湿壁画。下面是一句捷克的警句，大约是：失去理智的人为了姑娘的缘故离开这杯子，你将马上得到教训而回来。

糟糕的可怜睡眠，早上折磨人的头痛，但白天是较为舒坦的。

许多梦。马尔施纳经理和彼米斯克雇员交替出现。红红的坚实的面颊，黑黑的狡黠的胡须，与此一样的浓密的任性的头发。

早些时候我想：没有什么会弄死你，这个坚硬清晰简直是空空如也的脑袋，你从来不会无意识地或在痛苦中紧蹙双眼，皱起眉头，用双手抽动，你总是会表现它们的气度。

福廷布拉斯怎么能说，哈姆雷特经受住了最高国王的考验哩。

下午并没能妨碍我去读昨天写好的东西，读“昨天的肮脏”，再说并无危害。

9月30日。如愿以偿，菲力克斯没有听马克斯的。然后在菲力克斯那里。

罗斯曼^[91]和K.^[92]，无辜者和有罪的人，最终两个人以不同的惩罚方式被处死，那个无辜者与其说被打倒，还不如说被用手稍稍轻轻地推到了一边。

10月1日。马尔赛林·德·马尔博回忆录第3卷。波罗茨克一贝莱西那一莱比锡一滑铁卢。

10月6日。神经过敏的各种形式。我相信，喧闹声再也不能打扰我。固然，我现在没工作。固然，人们将他的坟墓挖得越深，那就会变得越寂静；越少恐惧，就越寂静。

朗格尔的叙述。

人们应该比服从上帝更要服从一个扎迪克^[93]。巴尔舍姆有一次跟

他的一位最得意的学生说，他应该接受洗礼。这位学生接受了洗礼，受到了尊敬，成了主教。这个时候，巴尔舍姆让他到自己这里来一下，并允许他回到犹太教来。他真的又来了，并为他的罪过作了巨大的忏悔。为此，巴尔舍姆解释了这个命令，这个学生由于他优异的品质会受到凶恶严厉的侵袭。洗礼有着这样的目的，就是将凶恶引开。巴尔舍姆将学生完全置身于凶恶当中去，这位学生并没有将步子迈出罪恶，而是按命令走步，对凶恶来说，看来这里是不再有什么工作可做。

每一百年出现一位最高的扎迪克，一位哈多尔扎迪克。他肯定不是太有名气，他不是神奇法师，但却是最高的法师。巴尔舍姆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哈多尔扎迪克，更确切地说他是德罗霍比茨一个无足轻重的商人。这人听说，巴尔舍姆像其他扎迪克一样能做这样的事，如写护身符，这人也怀疑，这位巴尔舍姆是萨巴泰·茨维的信徒，并将这个名字写到护身符上。因此，在没有亲自见到他的情况下，这个人就从远处剥夺了他的权力，出示了护身符，巴尔舍姆立刻知道他的那些护身符失去效力——但他从不写别的什么，就将他自己的名字写到护身符上——过了一些时间，他也获悉，这个德罗霍比茨人是这事的根源。有一次当这位德罗霍比茨人进入巴尔舍姆的城市，——那是星期一——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巴尔舍姆让他因睡觉而耽误了一天的时间，因此，这位德罗霍比茨人在计算时间时总是落后一天。星期五晚上——他想，这也许是星期四——他要乘车回家，以在家中度过假日。这个时候，他看见人们朝庙宇里走，他发觉了错误。他决定留在这里，并亲自去巴尔舍姆那里。巴尔舍姆已经在下午交代他的妻子，安排一顿30人吃的饭。德罗霍比茨人已经做过祷告，他来到之后便立即坐下去吃饭，并在短时间内将30人的饭吃得精光。然而他并没饱，还要增添吃的。巴尔舍姆说：“我已经预料到一个头等的天使，但我还没有对一个二等的天使有所准备。”他立即将家中所有能吃的食物拿出来，但还是不够。

巴尔舍姆不是哈多尔扎迪克，但他还要高。他的见证人就是哈多尔自己。就是说这位哈多尔有一天晚上来到巴尔舍姆未来的妻子还作为姑娘时住的地方。他是这位姑娘双亲家里的客人。在他上阁楼去睡觉之前，他要一支蜡烛，但家里没有。他就只有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上阁楼，可是当这位姑娘后来从庭院向上看时，那上面明亮得如同节日一般，灯火辉煌。这个时候她明白了，他是一个特殊的客人，她请他将她娶为妻子。她能这样请求，因为这里面表现了她更高的使命，她已经认清了这个客人。但这位哈多尔扎迪克却说：“你的使命是嫁给一个更高的

人。”这就证明巴尔舍姆比一个哈多尔扎迪克更为高级。

10月7日。昨天长时间与R.小姐待在饭店的前厅。睡眠不好，头痛。

一瘸一拐的人吓坏了格尔蒂[94]。

昨天在奈克拉斯大街上，一匹摔倒了马膝部流血不止。我向别的地方看去，不由自主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个鬼脸。

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粉碎了吗？我消沉了吗？几乎所有的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点（寒冷、迟钝、精神状态、心不在焉、职务上的无能力、头痛、失眠），几乎只有希望是相反的。

11月3日。在最近时间里看了许多东西，头痛比较少了。多次与R.小姐一起散步。和她去看《他和他的姐妹》，由吉拉迪演出。（您究竟有没有天才？——请允许我插进来并为您回答：噢是啊，噢，是啊。）在城市的阅览室里。在她的双亲那里看到了这份校样。

两个神奇的姐妹埃斯特和蒂尔卡，就如同闪光和熄灭两个对立的事物。蒂尔卡特别美丽，橄榄棕色的皮肤、下垂的呈半圆形的眼皮，像深沉的亚细亚人。两个人肩上都围着披肩。她们都是中等身材，更确切地说身材娇小，一个坐在长沙发的圆坐垫上，蒂尔卡在一个角落的某一个说不清楚的座位上，大概是箱盒上。在半睡中长时间地看着埃斯特，按我的印象，她好像带着那种对所有精神上事物所拥有的那种热情死死咬在一根绳结里，她像一个钟锤（忆起一个电影院的广告牌）在空空的空间里有力地摆来摆去。

两位L.。小者是个魔鬼般的女教师，我也在半睡中看了她好久，她在跳舞中显得如何的疯狂啊！她在一种哥萨克风格似的但轻飘飘的舞蹈中，在一条稍稍倾斜的、深褐色的、躺在昏暗光线中显得坑坑洼洼的砖结构的路面上上下下翻飞。

11月4日。忆起布累细亚的那个角落，在那里，在类似的路面上，在光亮的白天，我给孩子们分钱。回忆起在维罗那的一座教堂，在那个地方我完全是孤零零的，只是在一个寻求欢乐的旅游者义务的轻松压力下和在一个一无所获中正消逝着人的沉重压力下，我违愿地出现了。我看见一个超过真人大小的矮人，他蜷曲在圣水盆下，我稍稍闲逛了一

下，坐下来，又同样违愿地走出去，好像外面又是一座同样的教堂，大门挨着大门。

最近，不少犹太人从国家火车站离走，有两个男子带着一个口袋。这位父亲将他所带的家什都分摊给他的许多孩子，连最小的也有份，这样，他便可以更快地走上月台。那位抱着一个婴儿坐在箱子上的强壮、健康、已经没了形状的年轻妇女与围着她站的熟人正交谈得热火朝天。

11月5日。下午激动的状态。始于考虑，我是不是应该买，以及买多少战争债券。为交代必要的委托，两次去公司，两次回来，并没进出。狂热地计算着利息，然后请母亲买上1000克朗的债券，又将数额提高到2000克朗。在这个时候，这件事露出来了，即我根本不知有一张属于我的大约3000克朗的存款，而当我知道这存款时，也没有使我感动。只是由于战争债券引起的怀疑进入了我的脑子，而且在长达大约半个小时的通过最热闹胡同的散步中也没中断。我感觉自己直接参加了战争，我思考着，自然是根据我的知识，完全一般地思考着经济的远景，提高和减低那总有一天将会归我所有的利息，等等。但这个激动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思绪被引往到写作上去了，我对此感觉有能力，无非想拥有写作的可能性。我在考虑，在以后的时间里能为此安排怎样的夜晚，在心痛的情况下越过石桥，感觉那已经那么熟悉的消耗殆尽的、不可能爆发出来的火的不幸。为了榨干和抚慰自己，我杜撰出这样的格言：“亲爱的朋友，把你的一切倾泻出来吧。”不断地按一种特别的旋律歌唱它，我不停地将一块手帕在口袋压进、放开，像一支风笛伴着这个歌唱。

11月6日。在战壕前和战壕里观众如蚁群般运动的景象^[95]。

在奥斯卡·波拉克^[96]的母亲那里。他姐姐的良好印象。此外会有我在他面前不屈服的那一个人吗？这大概就是格林贝尔格^[97]，按我的看法，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而从我所不能接受的原因来说，他几乎被普遍地低估了：如果有人把我推到这样的选择面前，即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必须马上毁灭（考虑到他本身，那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他得了一种远远走在前面的肺结核），但这依赖于我的决定。这应该是谁，那么我将会可笑地去找这个问题直到这个理论问题提出的最表面的边缘，因为这个不寻常的更为有价值的格林贝尔格一定要活下来，就是格林贝尔格也会赞同我的。在最近的无法控制的时刻里，就如其他每一个人很早就已经那么做一样，我当然将要杜撰对我有利的证据。这样的证据，它们却会由于它们的粗鲁、空洞虚伪而激怒了我，直至令人呕吐。这最后

的时刻当然现在也出现了，在这个时刻没有人强加给我选择，那是那样的时刻，我欲在挡住各种转移的、外部的影响情况下考验自己。

11月19日。无所裨益度过的时日，在等待中消耗了力气，尽管什么事也没做，头部里却还是飘忽和钻心般的疼痛。

给韦尔夫信。回答。

在M.—T.[98]夫人处，对所有的事物失去抵抗能力。在马克斯那里尖刻的交谈，到第二天早晨还对此感到厌恶。

和F.、R.及埃斯特尔小姐在一起。

在阿尔特—诺伊—犹太教堂听犹太教法典演讲。与耶特勒斯博士[99]一起回家。对个别有争议性的问题有很大兴趣。

对寒冷，对所有事物的感伤。现在，晚上9点半，隔壁的房间有人在墙壁上敲钉子。

11月21日。完完全全无所裨益。星期日。夜间特别睡不着。到11点45分躺在床上沐浴在阳光里。散步。吃午饭。读报，翻阅旧目录。在希贝尔纳胡同、城市公园、文策尔广场、裴迪南大街散步，然后走向波多尔。疲倦延长了两个小时。有时感到剧烈的，有一次简直是火烧般的头痛。吃了晚饭。现在待在家中。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从上面睁着双眼俯视这个呢？

12月25日。为了使自己入睡这个特殊的目的打开日记。但看到最近刚刚偶然写入的内容，我能想象得出从最近三到四年里所记入的同样内容的东西上千次。我无意义地耗尽了自己，也许是为能够写作而内心感到幸福，我没写。我再也摆脱不了头疼病，我确实和自己一起变成了沙漠。

昨天坦诚地和我的上司谈了话，因为我通过谈话的决定和不后退的誓言，竟使我在昨天的夜里睡眠不安了两小时。我向我的上司摆出了四种可能性：1.一切继续的事情像在上一个最讨厌的受折磨的星期一样留着，结束伤害、精神错乱及其他什么；2.休假，我不想休，出于某种义务的感觉，但这也许无助于事；3.解约通知，我现在不行，因为我双亲和工厂的缘故；4.只有留在军队里服务。回答：这位上司想和我一起作

一个星期休假和造血疗养。他自己可能病得颇重。如果我也去，这部门也许成了孤儿。

进行了坦诚的讲话，第一次用“解约通知”这个词几乎正式地震荡了疗养院的空气。

尽管这一切，今日几乎没有睡过觉。

这一直是主要的恐惧：要是我1912年离去，完全占据所有的力量。以清晰的头脑，不为压制活生生的力量的劳累所啃噬，该多好啊！

和朗格尔一起，他在13天后才能读马克斯的书。他要是在圣诞节读了该多好啊，这个时候，人们按旧的习俗，在圣诞节就可以不读希伯来经，但这一次圣诞节正好是星期六。但13天后是俄罗斯圣诞节，他会在那个时候读的。人们应该按刚从第70年开始的中世纪的传统、按刚从第40年开始的一种较为和缓的观点从事美丽的文学或其他世俗的知识。医学是人们可以从事的唯一科学。今天也不从事于医学了，因为它与其他的科学联系得太紧密了。——人们坐在抽水马桶上决不可想希伯来经文，因而人们倒可以在那里读世俗的书。一位非常虔诚的布拉格人，一位确凿无疑的K，他知道很多世俗的东西，这一切都是他在马桶上学习来的。

1916年

4月19日。他想开开通往走道的门，但是门开不开。他上下看了看，没有找到阻碍。门也并没有锁着，钥匙在里边，也许有人正想从外面锁门，也许钥匙被捅出去了。到底谁会锁住这门呢？他用膝盖顶门，毛玻璃发出了响声，可是门仍然死死地关着。只好看着吧。

他回到房间，走上阳台，朝下面大街看去。但他还没有用过他的思想去领会下面平常的下午生活。他又回到门前，并欲再一次开门的时候，可是如今不用试着去开门，门立即自然开了，几乎不需要施加一点儿压力，从阳台吹来的穿堂风到来之前，门便一下飞开了；就像有人开玩笑，让一个孩子触摸门把手，而这时实际上有一个较大些的人将这把手压住了，所以他像这个孩子一样毫不费劲地踏进了走道。

我要为自己准备三个星期的时间。这叫虐待吗？

不久前梦见：我们住在康梯嫩塔尔咖啡馆附近的壕沟上。从海伦胡同拐出一个军团，朝着国家车站的方向开去。我的父亲说：“要是人们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他一定要看看这样的场面。”（他穿着菲力克斯的褐色睡衣，整个形象是这两者的混合）摇摇晃晃地上了窗户，向外伸出手臂，试图站在很宽且极低的窗下的墙台上。我抓住他，将他固定在两根小链条上，让睡衣的带子穿过这两根小链条。他恶狠狠地继续朝外伸，我竭力地积聚了我全身的力量抓住他。我在想，如果我能用绳索将我的双脚缚在某一处特别牢固的地方，以不致被父亲一起拉下去，这该有多好呀。为设法做到这个，我当然至少得放开父亲一小会儿的时间，但这是不可能的。睡眠——完全是我的睡眠——无法承受这全部的紧张状况，我醒了。

4月20日。在走道上，女房东拿着一封信向他走来。他审视着的不是那封信，而是这位老夫人的面孔，在这段时间里，他打开信。然后他念起来：“极为尊敬的先生，几天以来，您就住在我的对门。那种与要好的老熟人酷似使您让我注意起来。如果您能让我高兴的话，今天下午请您来看我。顺致问候

路易丝·哈尔卡。”

“好吧。”他不仅对着站在他面前的女房东，而且也对着这封信说道。这是一次受欢迎的机会，在这个城市里作一次也许是有用处的结交，他在这个城市里还非常陌生。

“您认识哈尔卡夫人？”女房东问道，这时他正把手伸向帽子。

“不。”他探询地说。

“那个带信来的姑娘是她的女仆。”女房东像是道歉似的说道。

“这是可能的。”他说，不耐烦有关这种参与，便赶快走出房间。

“她是一个寡妇。”女房东还没跨出门槛，又把这句话吹进他的耳朵里。

一个梦：两群男人互相殴斗。我所属的这一群抓获了一个敌人，一个巨人般的裸体男人。我们五个人抓住他，一个人抓头，其他人各抓手臂和双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刀子刺穿他，我们赶紧问周围谁有刀子，没有人有一把刀。但由于某种原因，为不失时间，而且附近有一个炉子，这个炉子的炉门是铸铁的，特别大，而且烧得通红，我们把这个男人拖过去，将他的一只脚贴近炉门，直至它开始冒烟，然后又将它抽回来，让它将烟雾蒸发完，马上再重新让它贴近炉门。我们不断重复地干着这件事情，直到我不但惊恐得出一身汗，而且还真的牙齿抖得格格作响地醒了。

汉斯和阿玛利亚是屠夫的两个孩子，正在图书馆书库的墙边玩铅球，那是一座巨大而古老的如堡垒般的石头建筑，它有两排装有牢固栅栏的窗户远远地延伸在河岸边。汉斯在推球前，细心地瞄准着，侧视着铅球、路线和地沟，阿玛利亚蹲在地沟旁，不耐烦地用小拳头敲击着地面。可是他们俩突然丢下铅球，慢慢地站起来，看着最近的那扇书库的窗户。他们听到一阵噪声，就像有人在试图擦干净由许多玻璃组成的窗户一块模糊阴暗的小玻璃一样，但没有成功。现在这一块玻璃破碎了，一张瘦削的看上去没有缘由微笑的面孔不清晰地出现在那个小小的四角形里，那大约是一个男子，那人说道：“来呀，孩子们，来呀，你们已经看到书库了吗？”

两个孩子摇头，阿玛利亚激动地仰头朝这个男子看，汉斯却是向后看，看看附近是否有人，可是他只看到一个人，那个人对什么都冷漠置

之，只是弯着背沿码头的栏杆推着一辆装得很沉重的车子。“然后你们就真的会大吃一惊。”这个男子说，而且十分热心，好像他必须要通过热心来克服不利的状况，那就是用墙、栅栏和窗户将他和这两个孩分开的状况。“就得现在来，这是最好的时刻。”“我们怎么进来呀？”阿玛利亚说。“我会给你们指门的，”男子说，“只要跟着我，我现在向右走，我会敲响每一扇窗户的。”

阿玛利亚点头，跑到下一扇窗户，那里真的有敲击的声音，接着的那些窗户都是这样。可是在阿玛利亚听从这位陌生男人并不动脑子跟着他跑的时候，而汉斯只是跟在后面慢慢地走。他情绪并不好，去看看书库是他至今从来也没想过的事情，但肯定是非常渴望的事情，但是不是通过随便一个陌生人的邀请就真的允许进去，还完全没有得到证实。宁愿这不是真实的，如果这是允许的话，那么父亲肯定早已经有一次把他领到那里去了，因为他不仅就住在附近，而且还广泛认识方圆四周的那些向他致意的并带着敬意对待他的所有人。现在汉斯突然想起，那就是这位陌生人也肯定知道这一点，为证实这一点，他跟着阿玛利亚跑起来，并赶上了她，这时她和与她一起的那个男子停在一扇如同在地下的铁门附近。那像一扇大的炉门，那个男子又在最后一扇窗子上打掉一块小玻璃，说道：“这里是门，等一会儿，我去打开里面的门。”

“您认识我们的父亲吗？”汉斯马上问道，可是那张面孔已经不见，而汉斯不得不带着这个问题等待着。这时他们听见，好像里面的门真的被打开了。起先插钥匙的声音几乎听不见，然后附近好多门发生了越来越响越来越响的声音。这里被打通的厚厚的墙体好像是被许多紧紧挨在一起的门所代替了。终于最后一道通往里面的门也开了，为了能朝里面看去，两个孩子趴在地上，在那里那个男子的脸还是处在半暗的光线中。“所有的门都开了，那就进来吧！只是快点，快点。”他用一只胳膊将许多门板压在墙上。

阿玛利亚由于在门前等了一会儿，好像稍稍有些意识到了。她现在退到汉斯的后边，她不想第一个进去，她把他推到前面，因为她很想和他一起进入书库。汉斯离门开着的地方非常近了，他感到了从门开处扑过来的清凉气息，他还不进去，不想到这个陌生人的跟前，不想到那个可能会关上的许多门的后面，不想进入这个凉气逼人的古老低矮的房子里。只是因为他这里正处在门开处的前面，他问：“您认识我们的父亲吗？”

“不认识，”这个男子回答，“可是你们快进来呀，我不能老是开着这些门呀。”

“他不认识我们的父亲。”汉斯跟阿玛利亚说，并站了起来；他好像轻松了，这时他自然是不会进去的了。

“不，我认识他，”这个男子说，在门开处继续将脑袋朝前伸，“我当然认识他，那位屠宰师傅，他是桥附近的大屠户，我有时候去他那里买肉，你们相信吧，如果我不知道你们的家庭，我会允许你们进书库吗？”

“你为什么一开始说了你不认识他？”汉斯问道，双手放在口袋里，已经完全朝书库背过身去。

“因为我这样的情况下不愿讲好多的话。先进来吧，然后我们可以什么都讲。顺便说一下，你这个小家伙完全可以不必进来，相反，如果你带着这种没有教养举止留在外边的话，我便更乐意不过了。但你的妹妹，她倒是更为明理些，她来是会受欢迎的。”他向阿玛利亚伸出手去。

当阿玛利亚把她的手伸近这只陌生的手，但还没有抓住它的时候，她说话了：“汉斯，你为什么不想进去了？”汉斯在得到这个男子的最后回答后，也无法清楚地提出他厌恶的原因来，他只是轻轻地跟阿玛利亚说：“他有点生气了。”这个陌生人真的生气了，不仅仅是在讲话的时候，而且在他不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为什么生气呢？”阿玛利亚问，她想在汉斯和这个陌生人之间调和一下。

“阿玛利亚，我回答你，”这个陌生人说，“我呼吸非常困难，那是由于没完没了地待在这潮湿的书库的原因，我也不会让你们长时间地待在这里面，但在这里待一会儿肯定非常有趣的

“我去，”阿玛利亚说，并大笑起来，她已经完全获得了胜利，“但，”她后来补充道，“汉斯也要一起进去。”

“当然，”这个陌生人说，用上身向前跳着抓住了完全惊愕的汉斯的双手，并用尽全力将汉斯拉进洞里。“这里可以进去，我亲爱的汉斯，”他说着，就拖着这位使劲抗争并同时大声喊叫的汉斯，根本不顾汉斯的衣袖被那些门的尖棱撕成了碎片。

“玛利，”汉斯突然叫道——他的双脚已经被拖进洞口，尽管奋力反

抗，但速度还是那么迅速——“玛利，叫爸爸去，叫爸爸去，我可能回不去了，他那么使劲地拉我。”可是玛利被这陌生人粗野拖拽弄得完全不知所措，此外还有点负罪感，因为是她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这种恶行，可是，就如她从最初开始所表现的那样，最后她还显得十分好奇，并没有跑开，而是紧紧抓住汉斯的双脚……〔中断〕

这位经师在做一个陶俑自然是很快传开了。他的房子及所有房间所有的门都是敞开的，里面没有什么看得见的东西，这却是为大家所不能立即知道的。一些学生或者邻居或者陌生人总是来这房子的台阶上上下下地走来走去，朝所有的房间里看去，如果他们正好在什么地方没碰见这位经师本人，他们便随意地到处走动。有一次他们在一个洗涤桶里发现一大团红色黏土。

这位经师在他家的房子里给予所有人的这种自由，实在是惯坏了他们，使得他们毫无顾忌地触摸这些黏土。这黏土是坚硬的，在使劲下压的时候手指几乎染上了颜色，它的味道——这些好奇的人肯定要用舌头舔它一下的——是苦涩的。经师将它保存在这里的洗涤桶里做什么，令人不可理解。

苦啊，苦啊，这是主要的话。我是怎样想将一个飘忽的故事从碎片中焊接起来呀？

一缕缕微弱的灰白色烟雾不断从烟囱里轻轻地飘去。

经师卷起袖子像是一个洗衣妇站在洗涤桶前面揉搓着黏土，这时它已显现出人形的粗糙轮廓。经师一直用双眼牢牢地注视整个造型，即使他只是在加工着一个小小的细节，比如一个手指的指节。尽管这个形象看来就要成功地显示出人的形状来，经师却表现得像一个发怒的人，不断朝前伸出下颚，不停地翻转着嘴唇。当他在准备好的水桶里湿一下双手的时候，他那么粗野地将双手撞击进去，使水竟然四溅到光秃秃的拱形天花板上了。

5月11日。前天。就这样将信交给经理。要么将来请个长假，如果战争在秋季结束的话；不过没有薪金，要么取消索赔，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也许有一半已经是谎言了，如果我马上请了个长假的话，那是为了应付拒绝解雇的情况，也许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我解约了的话。这两者我都不敢，因此全是谎言。

今天没有效果的谈判。经理认为，我想勒取3个星期的通常假期，这并不能弥补我要求的补偿，因此他爽快地答应了，看来在信之前已对此决定下来。他根本没谈及服兵役的事情，好像信里也没有。我如果提这个，他就不理睬。他觉得没有薪金的长假显然是可笑的，他提及此事是小心翼翼的。他催我马上休这3个星期的假期，像大家一样，作为外行的精神病医生说些无足轻重的话。我也许没有像他那样承担责任，他的位置当然很可能弄出病来。早先他也是干了多少的工作啊，那是当他准备考律师职务，同时在公司里服务的时候。9个月里每天干11个小时，然后才有了这重要的区别。不管怎样，我当时对我的位置肯定有过恐惧吗？但他也许有过这样的恐惧。他在公司里也许还有那样的敌人，他们不择手段地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砍断他“生命的树枝”，将他扔进废铁堆里去。

他谨慎地不提及我写的东西。

我，虚弱的，尽管我看到这几乎关系到我的一生。但我坚持，我想去服役，而且3个星期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因此他推迟谈判，也许他只是不那么友好和富有同情心！

我将坚持下面的意思：我要服役，顺从这个忍耐了两年的愿望；出于各种各样的并不涉及我本人的考虑，如果我得到一个长假的话，我也许会提前安排它。但这从职务上和军务上的考虑大概是不可能的。我所理解的长假期——上司羞于启口，病人说不出口——是半年或整整一年。我不想要薪金，因为这不涉及一种器质性的无疑是确定了病。

这一切均是谎言的继续，但在效果上接近真实，如果我坚持留着的话。

6月2日。不顾一切的头痛、失眠、头发花白、绝望而与姑娘们在一起，那是怎样地误入歧途啊。我算算：自夏天以来至少是6个。我无法抗拒，如果我不顺从的话，我的舌头确实就会从嘴里被拉出来，欣赏一位值得欣赏的女子，直至欣赏得精疲力竭地去爱她。对这所有的6个，我几乎只有内心的歉疚，但有一个通过别人谴责了我。

取自N.索德尔布罗姆，乌普萨拉大主教的《上帝信仰的形成》，完全是科学的，没有个人的或宗教的参与。

梅赛最早的神灵：他是怎样用皮鞭将牲畜从天上赶进第一座畜栏

的。

一些澳大利亚部落的最早神灵：他是作为强而有力的巫师从西方来的，他造人、牲畜、大树、河流、山岭，引来神圣的礼仪庆典，并决定一个被指定的其他部族成员应从哪一个部族接受他的妇女。他做完这些事情就走了。后来的巫师们可以借助一棵树或一根绳子爬上去找他，并从他那里取来力量。

在其他那里：他们在开拓性的浪游中到达这里或那里的时候便首次跳起神圣的舞蹈，举行各种礼仪庆典。

在其他的地方：人在很早的时候，用死的牲畜来举行礼仪庆典。神圣的仪式上当然也出现了这些所需要的东西。

在海边附近的比姆比加有两个男子，他们在很早的时候浪游到此，在这里开拓了泉水、森林和礼仪庆典。

6月19日。忘记了一切。窗户开着。房间空空。只有风吹过。人们见到的只是空空荡荡，人们在所有的角落寻找，可是没有找到它。

和奥特拉在一起。她是由英语女教师接来的。越过码头、石桥，短短的一段小路，一座新桥，回家。卡尔大桥上激动人心的神圣塑像。引人注目的夏季晚上的灯光照在夜间空荡的桥上。

关于马克斯解放的欢乐。我相信可能性，而且我这时还看到了现实性。现在对我来说又没有了。

他们听见了我主上帝的声音，他在花园里走动，因为白天已经变得清凉。

安息吧亚当和夏娃。

我主上帝创造亚当，并给他的女人用皮子做衣服让她穿上。

上帝对人的家庭的愤怒。

两棵树，

没有道理的禁令，

惩罚所有的（蛇、女人和男人），

优待该因，上帝通过谈话仍然激怒该因。

人想通过我的精神不再使自己受到惩罚。

在同一时刻人们开始用上帝的名义布道。

而在这时候他过着神的生活，上帝将他驱逐，再也没看到他。

7月3日。第一天和F在马利恩巴特，门挨着门，两人都有钥匙。

三座房子互相对峙，构成一个小小的庭院，在这庭院里堆物的棚子里安插了两个作坊，在一个角落放着高高的一堆小箱子。在一个特别的暴风骤雨之夜——风席卷着浓密的雨水越过这些房屋中最低的屋顶狠狠地吹进棚子里，还正在屋顶小楼坐着看书的一位大学生听到棚子里传来一阵强烈的悲叹声音。他突然离座起立，侧耳倾听，但那里没声音了，听一阵子仍然没有声音。“大概是一种错觉吧。”大学生自言自语地说着，又开始读起书来。“不是错觉。”在一小会儿之后，书里的字母竟然就是这样组合的。“错觉。”他重复着，并且食指按着变得不安的字行，沿着食指的指向读下去。

7月4日。被关在一个四方的板条栅栏里，这个栅栏连一步见方都得不到，我醒了。有类似的围栏，羊群夜间关在里面，但并不如此窄小。太阳的光线直接照射着我，为保护脑袋，我将它压近胸部，弯着脊背蹲在那里。

你是做什么的？我是痛苦的。我将两块小木板对着太阳穴旋转。

7月5日。一起生活的劳累。为陌生、同情、肉欲、胆怯、空虚所迫，而只有在深深的底处，大约是一条细细的小溪，才值得被叫做爱，对探索来说是不充足的，如在一瞬间的瞬间里闪现一下而已。

可怜的F。

7月6日。不幸的夜。没有可能与F生活，无法忍受与任何一个人一起生活。不是为此惋惜，惋惜那种不可能不独自的生活。但还有惋惜的荒唐，顺从以及最终理解。从地上站起来，将你缚在书上。就又回来了，失眠头痛，从高高的窗户跳下去，但掉在了被雨水湿透而变软的土

地上，撞击在这地面上还不至于死去。闭着眼睛没完地打滚，显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只看旧约全书——对此还没有什么说的。

梦见H.博士坐在他写字桌后边，同时随意依靠着并向前弓着身子，水亮水亮的眼睛，他在慢慢地、仔细地以他的方式开辟着一条清晰的思路，我自己在梦中几乎没听到他说些什么话，只是跟着那些发出话语慢条斯理的动作。我后来也与他的妻子在一起，她拿着许多行李，令我惊异地耍弄我的手指，她袖子里的一块厚厚的毡絮被扯了出来，她的胳膊填塞在这袖子的最小部分，这袖子里装满了草莓。

卡尔极少担心被嘲笑。这是些什么样的年轻人啊，他们知道些什么。美国人光滑的脸上只有两三道皱纹，但这些皱纹深深地或鼓鼓地刻在额头上或鼻子和嘴巴的一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确认他们的种类，说实在槌击他们石头般的额头就够了。他们知道什么……〔中断〕

一个人重病躺在床上。医生坐在被推到床边的小桌边，他观察着病人，病人也看着他。“没办法了。”病人说，不是作为提问，而是作为回答。医生稍稍打开放在小桌子边缘上的一本大的医药书，略略从远处朝里看去，在合上书的时候说道：“办法来自布莱根茨。”当病人努力地紧蹙双眉时，医生补充道：“布莱根茨在福拉尔堡。”“这好远啊！”病人说。

用你的胳膊抱住我，这是深渊。带我进入深渊，你现在拒绝了，那么，今后呢？

抓住我，抓住我，愚蠢与痛苦的混合。

黑人们从矮树丛林来。他们围着用银链子环绕的木栓急速地跳起舞来。牧师坐在一旁，将一根小木棒举过锣面。天空阴云密布，但没下雨，静悄悄的。

除了穿着颤动的大衣，我还从来没有与一位夫人交上朋友，后来还在里瓦的那位瑞士女子认识。第一个是一位夫人，我一无所知；第二个是一个孩子，我完完全全被弄糊涂了。

7月13日。那就敞开你的内心。人走了出来，呼吸空气和宁静。

那是一处矿泉疗养地的一家咖啡店。下午下了雨，没有客人来这里。雨慢慢地停了，将近黄昏天才晴朗，女服务员们开始擦干桌子。老板站在门拱下，远望着来客。实际上已经有一个人走上林间小路。他肩上披着一块有长长流苏的花格呢子毛毯，脑袋向着胸口微微耷拉，每跨一步的时候，那只伸出的手将手杖远远地定在离自己好远的地上。

7月14日。以撒在亚比米勒面前否认自己的妻子，就像从前亚伯拉罕否认自己的妻子一样。

在基拉尔的水井的相争。重复一节诗句。

雅各的罪孽。以撒的注定命运。

在模糊的感觉里一只钟敲响。

倾听这声音，如果你进入这房间。[100]

7月15日。他在森林里寻求帮助，几乎是跳着通过了前面的山，匆匆地赶往他遇到的小溪的泉源。他用双手击着空中，用鼻子和嘴巴喘气。

7月19日。

做梦与哭泣吧，可怜的家族，

找不到路径，失去了路径。

痛苦啊！是你晚上的致意，痛苦啊！早晨。

我不想要什么东西，只是想

从深渊伸出的双手里救出自己。

它将我这个无能力的人向下拖拽，

我重重地倒在了这双摊开了的手里。

在群山的远处响着滔滔不绝的

慢条斯理讲话的声音。我们倾听着。

啊，地狱的鬼怪戴上

遮掩住的怪脸，紧紧压住自己的身躯。

长长的队列，长长的队列没有结束。

特别的法院惯例，被判死刑的人在他的房间里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由刽子手刺死。他坐在桌边，写完他的信，信中写道：“尊敬的情侣，尊敬的天使，你们在哪里飘荡，对我尘世的手来说，一无所知，难以置信……〔中断〕

7月20日。从邻居的一个烟囱里飞出一只小鸟，它紧紧抓住烟囱的边缘，向着附近环顾一下，振振翅膀，飞走了。不是一只寻常的鸟，它从烟囱里飞了起来。从第二层楼的一扇窗子里，一个姑娘仰头望着天空，看着这鸟儿高高地翱翔，她叫起来：“它在那儿飞哩，快，它在那儿飞哩。”这时已经有两个孩子挤在她的旁边，也要看这只鸟儿。

你同情我吧，我本身的各种角落都是有罪孽的。但我有的并不完全是可鄙的天赋，小小的良好的能力，我消耗了这些能力，我是个在父母生前没分得财产的人，现在临近结束，正好是在一个表面看来一切对我会转往好的方面的时候。我不想挤进失败者行列。我知道，这是一种可笑的自负，在未来以及甚而至于眼前，都是一种可笑的自负，这种自负是由此表明的，但只要我活着一天，那么，我也就有活着人的那种自负，而这活着的生命是不可笑的，那么，它的不可避免要发表的看法也是不可笑的了。——可怜的论证！

如果我被判决，那么，我不仅被判结束，而且到被判结束的时候，我也要抵抗。

在我即将离去的那个星期天下午，你好像要帮助我，我希望着，直到今日仍是空空希望。

不管我埋怨什么，那是没有信念，当然没有真正的痛苦，好像一只无望船的锚摇荡在能够给以固定的深处之上，离这个深处还有好大一段距离。

只是给我夜间的安静吧——幼稚的抱怨。

7月21日。他们喊叫。天气美好。我们起身，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们集合在房屋前面。路上静悄悄的，就像每天清晨一样。一位年轻的面包师放下篮子朝我们看着。大家都紧紧地挨着朝楼梯下跑，所有六层楼的居民都混合在一起了，我自己在帮着那位一层楼的到

现在还将那件外衣拖在身后的商人穿上外衣。这位商人带领我，这是没错的，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大家中绝大部分人筛选出来的。一开始，他将我们组成一群，要那些最不安分的人安静下来，他拿过那个银行职员不停挥动的帽子，将它扔到马路另一边，每一个孩子都由一个成年人牵着手。

7月22日。特别的法庭惯例，被判死刑的人在他的单人牢房由刽子手刺死，别的人可以不在场。他坐在桌旁，结束他写的信或结束他最后的一顿饭。有人敲门，是刽子手来了。“你完事了吗？”他问。他的提问和指令从内容和程序对他来说都是有规定的，他不能对此稍有偏差。被判死刑的人先是从他的位置上跳起，又坐下，在那里发呆，或者将面孔埋在双手上。当刽子手得不到回答的时候，他在木板床上打开自己的器械箱，选出各种短剑，逐处地检查它们的刀刃，使其达到完好的程度。天色已经很暗，他提一个小灯笼，将它点亮。被判死刑的人悄悄地将脑袋转向刽子手，当他看到他在干什么的时候，他毛骨悚然起来，他又回过身去，什么也不再想看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片刻后刽子手说话了。

“准备好了，”被判刑的人喊着问道，并跳起来，现在却完全直接地看着刽子手，“你不要处死我，你不要把我放在这木板床上将我刺死，你是一个人吗？你可以带着帮凶在法官们面前将我处死，但不是在这里单人的牢房里，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这个时候刽子手俯身在器械箱子上沉默着，被判刑的人接着说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刽子手还是静静地待着，被判刑的人又说：“正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才用了这种特别的法庭惯例。这个形式还应该保持下去，但死刑再也不能执行了。你要把我带到另一个监狱去，我也许会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但他们将不会处死我的。”刽子手松动了一下棉套里的一把新的短剑，说道：“你想的大概是童话，童话里有一个佣人接受委托，丢弃一个孩子，但他不仅没有完成这件事，而且宁愿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个鞋匠去当学徒了。这是一个童话，但这里却不是童话。”

8月21日。参加集会。“所有超越有关本性美丽的话语对于生命的原始威力来说均失去效用。”（反对一夫一妻制的论文）

8月27日。在令人毛骨悚然的两天两夜之后，得出总结性的看法：由于你的偏好、吝啬、优柔寡断、斤斤计较、未雨绸缪等等职务上的恶习，你没将那张给F.的明信片寄走。你也许没有废了它，那是可能的，

我承认，这是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一种业绩，一个飞跃？不是。这个业绩你已经完成了好几次，没有什么改进的。我不想对此作解释，你当然可以解释所有的过去，因为你根本没想到要敢于冒一种未来的风险，你无法事先对它作出解释，它正是不可能之所在。什么是责任感，以及作为责任感也许是很值得尊敬的东西，这归根到底是职业精神、是孩子气的品质、是从父亲那里来的那种病态的意志。改善这个，为此工作，这直接就在你的手边。就是说，别珍惜你自己（此外有损于你所爱的F.的人的生命），因为珍惜是不可能的，外表上的珍惜将你今天几乎弄得趋于毁灭。那不仅仅涉及F.、婚姻、孩子、责任等等的珍惜，而且也涉及你所蜷伏在那里的职位的珍惜，还涉及你所进出的、养活不了你自己的糟糕的住房。就是这一切，那就到这里停下吧。人们可能自己保重自己，人们无法预计什么。你不知道有关你在什么方面对你来说更好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夜间，靠着你的大脑和心脏在你的身上展开了一场两个同等有价值同等强而有力的主题之间的斗争，在两方面均有忧虑，就是说不可能算计的。留下的是什么呢？你不要跑到这样的战场去受屈辱，在这样的战场上确实没有顾及到你的战斗，你所感觉到的无非就是可怕斗士的撞击。你就振作起来吧，改善你自己，离开那职业的气息，开始看看，你究竟是谁，而不要去算计你应该成为什么。即将来临的任务是肯定的：成为士兵。丢掉那种没有意义的错误，你提出这些比较，大约是和福楼拜、齐克加德、格里尔巴策比较，这是彻头彻尾的小孩行为。作为算计链条上的环节，这些榜样当然是需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全盘的算计是适用的。从一开始就将他们逐个地放进比较里去是没有用的。福楼拜、齐克加德完全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他们有着的一往无前的意志，这不是算计，而是行动。在你身上却是这些算计的一种永久的后果，四年里的巨大的波浪起伏。与格里尔巴策作比也许是对的，但格里尔巴策对你来说好像是不值得模仿，一个倒霉的榜样，未来的人应该感谢他，因为他为他们而遭受苦难。

10月8日。福斯特：将对在学生时代生活中存在人的关系处理作为课堂的题目。

大人物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教育。我们用我们也相信、但并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相信的托词把那些无拘无束的到处嬉戏的人拉进我们自己的房里。（谁不喜欢是一个高尚的人呢？关上门。）

马克斯和莫里茨解释和斗争中可笑的东西。

恶习发泄的价值，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的，它在于这些恶习在它们整个力量和范围之内出现，而且变得明显起来，即使人们在共同在场的恼怒状况下只看到这种恶习的一个小小的闪动。人们学习水兵的生活不是通过在水坑里的练习，人们大概即使通过在小水坑里进行过量的练习也无能力变成水兵。

10月16日。在胡司信徒作为一种联合基础提交给天主教信徒的四个条件中，也包括了所有的深重罪孽，比如“吃荤、酗酒、贪欲、说谎、作伪证、放高利贷、接受忏悔和祈祷的一个铜板”，都应该以死作惩罚。一个党派甚至想让每一个个别人都知道给予他执行死的惩罚的权利，一当他看到不管是谁沾染了上述的任何一种罪孽。

我首先用理解和愿望在它的冷漠轮廓中去认识未来，尔后，受这个轮廓的拉扯和推撞，渐渐地走进这个同样未来的真实中，这是可能的吗？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意志，用自己的手在我们的身上挥动鞭子。

10月18日。摘自一封信^[101]：

这不是那么简单，我会容易地忍受你对母亲、双亲、鲜花、新年和同桌吃饭的客人所说的看法。你说，对你来说，“在你的家里和你的全家坐在桌旁，也不是最大的舒适”。说的这个意思自然只是你的意见，完全准确地说，没有顾及到，这是不是使我高兴，或是不高兴。那么，这并没使我高兴。但你要是写了有关这些方面的相反的看法，那当然会使我更为扫兴。请你尽可能清楚地告诉我，这种不舒适感对你来说会出现在何处？而且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了它的原因？只有我合适，我们是常常说到这些事，但在这里要抓住哪怕是一点儿正确的东西是困难的。

在老生常谈的话语里——因此用一个与真实不完全相适应的艰难的词来说——我大概可以如此改写我的态度：我，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非独立的我，有着对独立、自主的无限要求，对自由的无限向往。我宁愿戴上眼罩，一路走到头，也不愿家乡的人群围着我转，并分散我的目光。因此，我对我的双亲或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那么容易地成为一块飞到我双脚前的泥土。所有的并不是我为自己创造的，或者是经过努力取得的联系，即使是与我这个我的部分相违背的联系是没有价值的，它妨碍我的走路，我仇视它，或者接近于仇视它。路是长的，力量是小

的，对这样的仇视有着极充分的缘由。可是我如今是来自我的双亲，我和他们以及姐妹们有着血缘的联系，在平常的生活中，以及由于不可避免的偏执左右着我特别的意向，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但在尊敬这一点方面，基本上比我知道的还多。有这么一次，我也带着我的仇视追踪着这个，注视着家中的那张双人床，用旧的床上用品，细心放着的衬衣，这足以使我激怒到呕吐的地步，简直能使我内脏翻到外面来。这就是，好像我最终没有出生，好像我从来就是在这间沉闷的房间里从这种沉闷的生活中来到这个世界的，好像一定要在那里为我不断得到证实，好像与这些令人作呕的事情，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在部分上有着如此难以解开的联系，它至少还羁绊着我想跑的双脚，这双脚还泡在最初的没有形状的奶糕糊糊里哩。这是一次。

另外一次，我又知道，这就是我的双亲，他们是我本人这个生命体的必然的、不断给予力量的组成部分，这个生命体不仅仅是作为阻碍为我所有，而且也作为生命体为我所有。后来我想如此地拥有他们，就像人们想拥有最好的东西那样。从此后，使尽幸灾乐祸、顽拗、淘气、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招数，可是在他们面前却仍是发抖，而且说实在今天我干着这些事情，因为人的本性难移啊。而他们，一方面是父亲，另一方面是母亲，又必然地将我的意志几乎摧毁，后来我要他们也尊重地看待这种意志。我被他们欺骗了，可是却没有被逼疯，又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就只是仇视，除了仇视就什么也没有了，（奥特拉在我看来有时候是这样，就像我想有的遥远的地方一个母亲：纯洁、真实、诚挚、有条理，谦恭而自豪、敏感而不失分寸、献身而又独立、羞怯而又有勇气，确确实实地兼而有之。我提及奥特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却也有我母亲的影子，自然是完全难以识别的。）我要她也尊重地看待这个。

你属于我，我将你留在我这里，自开始、并一再地、也许直至永远，我不能相信，在某一个童话里围绕着某一个女人的斗争会比在我的心目中围绕着你的斗争更为频繁、更为绝望。那么，你就属于我，因此，我跟你亲戚的关系与我跟我亲戚的关系类似。不过不管在好与恶中都是极为冷淡的。他们所给予的是一种阻碍我的联系（阻碍我，即使我从不应该跟他们说一个字），而他们从上面的意义来说是不配的。我如此坦诚地跟你说话，就像跟我自己说话一样，你对此不要见怪，也不要从中寻找傲慢，这傲慢至少不在那个你也许要寻找它的地方。

要是你现在在这里，坐在我双亲的桌旁，那么，在我双亲的心目中

针对我的那种与我为敌的敌意所覆盖的攻击面积变得更加大了。我与整个家庭的联系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非常大的联系（但它不是这样，而且不可能是这样），我对他们来说我是这个行列里的人，行列中的一个位置就是旁边的卧室（但我不是行列里的人），针对我的反抗，他们相信，肯定会在你的身上得到一种协助（他们并没得到它），他们的丑恶和卑劣有增无已，因为这在我的眼里应该优越于一个较大人物的。

如果对此来说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对你的说明不高兴呢？因为我的的确确站在我的家庭前面，不停地在这个圈子里挥舞刀子，为不断并同时伤害和保护这个家庭，让我在这里面完全地代表你，而你不要在这个意义上用你的家庭来代表我。最亲爱的，这样的牺牲对你来说不沉重么？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会以此来使你轻松的，那就是我不得不凭着我的本性从你那儿夺过这个来，如果你不拿出来的话。但如果你将此拿出来，那你就为我做了不少事。我会在一至二天内故意地不给你写信，这样好让你可以不受我干扰地考虑和回答。作为回答——我对你的信任是那么地大——唯一的一个字也就足够了。

10月30日。两个男子在房里谈论一匹马，一位马夫正抚摩着这匹马的臀部。“我已经，”年纪较大的一位说道，白头发，微微地眯着一只眼睛，轻轻地咬着下唇，“我已经一个星期没看见阿特罗了，对马匹的记忆，即使作了最大的努力，也只是一个不稳定的记忆。我现在还记着阿特罗的某些地方，它在我的想象中肯定是存在的。我现在说的是整个印象，个别的地方只有我现在发现它身上这里或那里的肌肉松弛的情况下才能肯定。您看这儿，这儿。”他探究地晃动斜着的脑袋，用双手摸索着空中。

1917年

4月6日^[102]。在小港口里，除了渔船，照例只有停着两条供给海上交通用的载客汽船，今天还躺着一艘平底小舟。一艘沉重的旧船，船身比较低矮，但却非常凸起，被弄得很脏，好像完全被污水浇过，黄色的外沿好像还朝下滴着这种污水。桅杆高得令人不可理解，这桅杆的三分之一处折断了，有皱褶的粗糙的黄褐色帆布纵横交叉地紧绷在木杆之间，修补抵御不了阵风。我长时间惊愕地看着它，等待着，会有某一个人出现在甲板上，没有人出现。在我旁边有一个工人坐在码头堤岸上。“这艘船是谁的？”我问，“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它。”“它每两三年来这

里一次”，这人说道，“是猎人格拉克丘斯的。”

7月29日。内廷小丑。关于内廷小丑的论文。

内廷小丑这个阶层的伟大时代大概已经过去了，而且再也不会来了，一切都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我还是尽情地享受了内廷小丑的风仪，也愿它现在从人类的占有中消失。

我总是坐在车间的深处，完全在黑暗之中，人们在那里有时候一定要猜得出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但他为了一块坏钻石还是挨了师傅的一击。

我们的国王并不奢侈，谁要是没有从图画上识别出他来，那也许永远认识不到作为国王的他来。他的西服缝制得不怎么样，不是在我们的作坊里做的，而且料子的质地很薄，上衣总是解着纽扣，有时候翘起，有时候被压皱了，臃肿的帽子，粗糙沉重的靴子，漫不经心大大咧咧的手臂动作，一张坚毅的面孔上有一只大而直的男人的鼻子，小胡子显得不长，神秘的有些过分锐利的眼睛，有力而匀称的脖子。有一次在路过的时候，他在我们作坊的门前站住了，右手上指门梁，他问道：“弗兰茨在这里吗？”他认识所有人的名字，我从昏暗的角落挤着穿过伙伴们。“来吧！”他注视了片刻后说道。“他迁到宫殿里去”，他朝着师傅说。

7月30日。K.小姐，引诱。本性没随这引诱同去。嘴唇张开与闭合，伸展、掀起、绽开，就好像手指在那里隐蔽地做着示范。那种突然的、大约是神经质的、但被运用得有条不紊的、总是令人震惊的动作，如整整膝盖上的裙子，改变一下位置。对话没有多少话语，没有多少思想，没有任何需要别人的支持，主要是通过头部的动作，手的摆弄，各种不同的间歇，目光的生动，紧急的时候将小拳头攥成球状。

他挣脱她的圈子。雾气吹拂着他。一块圆圆的森林空地。凤凰岛出现在灌木林里。一只不断往一张看不见的面孔上打着十字的手。清凉连绵的雨，一阵很快消逝的歌唱，像是来自起伏的胸腔。

一个无用的人。一位朋友？如果我想现在就开始做些他占有的事，那么，自然只是在最有利的判断中，留下的是他的与我的声音相比有点儿更加低沉的声音。如果我叫道“获救了”，我以为，我好像是鲁滨逊，并叫着“获救了”，他用他低沉的声音重复这句话。如果我是科拉赫，并

叫着“完蛋了”，他也会马上在这个时候用低沉的声音重复这个，总是将这把低音提琴带在身边逐渐地令人疲倦，而它自己在这件事上一点也不开窍，它只是重复，因为它必须做这种事，别的就什么也不会了。有时候在一个假期里，大约在公园的凉亭，我如果有时间转向这个本人东西的话，我就与它商量，我怎样才能从它那里将自己解放出来。

7月31日。忘记了是坐在一节火车的车厢里，就像是在家里一样生活，突然记起，感觉到火车向前推动的力量，旅行的人显得更自由、更潇洒、更勿急，无所事事地被带往目的地，天真地感受这些，成为妇女们的宠儿，在窗户不断的诱惑之下他们站到那里，不时地将一只手伸出，放在窗台板上。裁剪得更刺目的景象：忘记了，人们已经忘了，一下子成了一个在疾驶列车里独自旅行的孩子，他的周围是在急速颤抖的火车车厢，他一点儿也不惊异，车身就如出自变戏法的人的手。

8月1日。在室内游泳池O.博士的老布拉格的故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03]在大学时代所作的反对富翁的疯狂讲话，为此大家都嘲笑过他。后来他结婚而富有，并销声匿迹。——还是小伙子的时候，O.博士从阿姆舍尔堡来到布拉格进入中学，住在一位犹太家庭教授的家中，教授的妻子在一家旧货店当店员，吃食由一位厨师派人送来。每天5点半，O.就被叫醒作祈祷。——他为他所有年轻的姐妹们的教育操心，花去了许多精力，也带来了自信与满意。一位后来成为经济顾问并早就退休下来（一位大利己主义者）的A.博士有一次劝他离开，躲避起来，在他的一帮人面前干脆逃跑，否则他们将会使他毁灭。

8月2日。有的人寻找的这个人绝大多数就住在附近。这不用直截了当地解释，人们以后一定要将它作为实际的经验来接受。这种实际经验是有着如此深刻的原因，以致人们不可能去阻止它，即使人们对此有所准备。这是因为人们对要寻找的这个邻居一无所知。就是说，人们既不知道，他找的是他，也不知道他就住在旁边，所以他在旁边住得完全安之若素了。人们自然认识到像这样一般的实际经验，要是人们不时地有意识地牢记它的话，至少是没有害处的。我来讲一个这样的故事……

〔中断〕

帕斯卡尔在上帝出现前作了大整顿，但这不得不留下一点比……〔一个字无法辨认〕人的怀疑还要深的胆怯怀疑，人虽然用神奇的刀，但也用制香肠人的那种平静而伤了自己。这平静是一辆舞台上的凯旋车，是有人，自然得承认工人们辛苦与绝望，用绳子将这车子从远处拉

上舞台。

8月3日。我又一次大声地朝世界喊叫，然后便有人用布团将我的嘴巴死死地堵住，捆起双手和双脚，并用一块布蒙上我的眼睛。我多次被推来推去，我被拉起直立站住，又被放平躺下，如此重复多次，有人一阵一阵地拉我的双腿，我由于疼痛而反抗。有人竟让我安静了片刻，但后来有人用什么有点尖的尖锐物器深深地戳我，迅速地在这里一下那里一下，来刺激那些地方。

几年来我坐在大路的交叉口，可是明天，因为那位新皇帝要来，我就得离开我的位置。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也出于反感，混迹在发生于我周围的虚无之中。我也早已停止了乞求；那些长时间来已经走过的人出于习惯、忠实、熟悉向我施赠，新来的人却是效仿前面的榜样。我将一只小篮子放在我的旁边，每一个人扔进他自己觉得合适的那么多钱币。恰恰正是因为我并不关心任何人，而且在马路的闹声中和荒诞中保持着冷静的目光和安详的灵魂，我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懂得涉及我本人、我的地位、我的合理要求的一切。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应有什么争论，这里唯有我的意见能引起重视。一位警察，自然对我是很熟悉的，但我却同样自然是从来没有注意过他，因此当他今日早晨站在我旁边说道：“明日皇帝要来，你明日是不敢到这里来了？”我用这问题回答：“你多大年纪了？”

8月4日。文学，作为题目来说，是一种那么强有力的语言浓缩，它——大约从一开始就有着目的在里面——也渐渐地从本身表现出一种思想的浓缩，这种思想浓缩选择了正确的远景，让这个题材远远地落在了那个目标的前面，远远地落在了一旁。

虚无的嘈杂锣鼓声。

A.我想求教你？

B.为什么正好是我？

A.我相信你。

B.为什么？

A.我在社交聚会中已经见过你好多次。在我们的社交聚会中，最终

总是跟建议有关。我们对此是一致的。不管是怎样一个社交聚会，不管是人们在一起演戏或饮茶或引证智慧的见解，或者是想帮助穷苦的人，这些都得靠建议。没有在父母生前分得财产的人是如此众多！还有，看来那些在如此的集会上提建议的人，只是用声音来提建议，想用心提建议的是他们本人。他们在寻求建议的人中有着与他们相貌极其相似的人，他们特别地注目于他。但他首先不满意地走了，厌恶地离去，并将那个提建议者从自己身后拉过来，到另一个集会去作同样的表演。

B.是这样的？

A.是的，你也看到这个了。这也不是什么业绩，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个，它的请求是如此越来越迫切。

8月5日。下午与奥斯卡在拉德索维茨。悲伤、虚弱，常常作出努力，为了至少要抓住核心问题。

8月6日。

A.我对你不满意。

B.我不用问为什么，我知道这个。

A.还有？

B.我没有能力。我什么也不能改变。耸耸肩膀，歪歪嘴巴，其他我便不行了。

A.我要把你领到我的主人那里。你想去吗？

B.我怕羞。他会怎么样对待我呀？马上去主人那里？这轻率了吧？

A.由我承担责任。我领着你，来吧！

他们越过一条走道。A.敲着一扇门。

人们听到“进来”的叫声。B.想逃跑，但A.抓住了他，就这样他们一起进去。

C.这位先生是谁？

A.我想——跪在他脚下，跪在他脚下。

这位旅行者感到太疲倦了，以致他无法在这里再指挥或再做些什么事，他从口袋里只拉出一块布巾，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将它塞进远处的桶里。他将布巾紧贴在额头，躺在了沟坑的旁边。司令员派出两个接他的人就这样找到了他。当他们跟他说话的时候，就像精力恢复了一样，他跳了起来。他将手搁在心口上说道：“我想做一个无赖，如果我允许这样做的话。”但他后来逐字地吞咽了这句话，并开始匍匐地在四周打转。只是有的时候他跳起来，努力地挣脱，将自己擦在两人中的一个人的脖子上，流泪地叫道：“这一切为什么是针对我的！”便又赶紧走上他的岗位。

就好像使这位旅行者意识到一切，紧接而来的只是他和死者的事情，他用一个手势把这个士兵和这位被判刑者打发走，他们踌躇不前，他向他们后面投了一块石头，他们还不停地相劝，这个时候，他朝他们跑去，用拳头捶击他们。

“怎么？”这位旅行者突然说道。是有什么给忘了？一句具有决定性的话？一个操枪的动作？一个用手帮忙的动作？谁能插进这纷乱之中？凶恶的热带空气见鬼去吧，你从我这儿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判断力留在了北方的家中。

“为蛇开路！”有人叫喊。“为这位伟大的太太开路！”“我们准备好了”，叫喊的回答，“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这些开路先锋，经常被赞誉的石头敲击者，在灌木林中向前进军。“开动！”我们的总是快快活活的司令叫道，“开动！你们这些蛇的饲料！”我们紧接着举起锤子，几里长的倾注全力的敲击声开始响成一片。不允许稍有休息，只可以交换一下手臂。有人通知，我们的蛇晚上就要来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石头都必须敲成粉末，哪怕是最小的小石子，我们的蛇也忍受不了。什么地方去找到一条像这样敏感的蛇呢？这也正好是一条独一无二的蛇，由于我们的工作，她变得无比的考究，因此也已经长得完全无与伦比了。我们理解这个，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她还一直称自己为蛇。至少她应该一直称自己为夫人，尽管她作为夫人当然也是无与伦比的。但这并不是我们关心的所在，我们的事情是将石头敲成粉末。

将灯举高，你到前面！你们其他人轻轻地跟在我后面！大家排成一行！要安静！这没什么。不要害怕。我负责任。我把你们带出去。

8月9日。这位旅行者作了一个没有定规的手势，丢开他所作的努力，将这两人又从尸体边推开，向他们指着他们应该立即去的营地。他们开怀大笑地表示，他们逐渐地理解了这个命令，这位被判刑的人将他那张涂了多层油脂的脸压向这位旅行者的手，那位士兵用右手敲着——他左手挥动着武器——旅行者的肩膀，所有这三个人现在是息息相关了。

旅行者不得不强制着向他袭来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出一种完善的秩序来。他变得疲惫不堪，并且放弃了现在就埋葬这具尸体的计划。现在还是炎热正盛的时候——只是为了不致陷入脑晕的状态，这位旅行者不想向着太阳抬起脑袋——这位军官突然一声不吭了，对面那两个人用陌生的目光凝视着他，由于军官的死，他与这两个人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最终也失去了那种直截了当的反驳，在这里能听到军官什么样的意见啊，——所有这些——旅行者再不能长时间地站立，瘫坐在藤椅上。要是他的船通过这没有路径的沙被推到他这里来接走他该多好啊——这也许是最美的了。他像是在登高，他好像只站在台阶上对这位军官残酷处死被判刑者作了斥责。“我将到家说说这件事。”他好像还提高嗓门说这句话，以使船长和水手听到，他们从上面新奇地俯身在船边栏杆上。“处死了？”这位军官好像接着理直气壮地问道。“他不是在这里吗？”他好像说道，并指着旅行者的那个提箱子的人。这的确确实是那个被判刑的人，正如这位旅行者通过对面仔仔细细观望和细致考察所证明的。“我得承认。”旅行者不得不说，而且也乐意说。“一种变戏法人的手段？”他又问道。“不，”军官说，“这是您方面的错误，我被处死了，如您命令的那样。”现在船长和水手更为注意地倾听着？而且全都在看着，军官现在怎样地抚摸他的额头，并怎样地从炸裂的额头里拨出一根弯曲而凸示出来的毒刺。

已经是最后较大的战斗时刻，这是美国政府必须要与印第安人进行的战斗。进入到最广深的印第安人区域的军事工事——也是最坚固的工事——由萨姆松将军指挥，他在这里已多次受到表彰，并受到民众与士兵坚定不移的信任。“萨姆松将军”的呼叫声对一个单独的印第安人来说，几乎像一支猎枪那样有那么多价值。

一天早晨巡逻队在森林里抓住一个年轻人，根据这位极少亲自管事将军的命令，他们将年轻人带到总部。因为将军正与边区的农场主讨论着事情，这个陌生人就先被带到副官奥特威中尉那里。

“萨姆松将军！”我叫道，并迷迷糊糊地后退了一步。他这时正走出高高的丛林来到这里。“安静！”他说着，并指指自己的身后。一队大约有10个人的随从人员踉踉跄跄地跟在他的后面。

“不，放开我！不，放开我！”我不停地沿着胡同这样叫着，他们也一直不停地侵袭我，不停地从旁边或越过我的肩膀将怪兽般的爪拳砸在我的胸上。

9月15日^[104]。只要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性，你就有可能作一个开始。不要失去这种可能性，你将不可避免从你身上浮起齙龅，如果你要闯入的话。但你不要在这里面翻动。如果说肺部的创伤像你断言的那样只是一种象征的话，是创伤的象征，它的发炎称之为F.，它的深度称之为自我辩解，仅是如此而已，那么，医生的忠告（光、空气、安静）也是象征。抓住这个象征。

噢，美丽的时刻，杰出的文本，野草丛生的花园。你从房子里出来转弯，幸运女神迎着你驱上花园的路径。

壮丽的现象，帝国的王侯。

村庄的广场，献给了夜色。小人物的才智，动物的优势。女人们。——以最大的独立自由牵着牛群越过广场。我的沙发放在大地上。

9月18日。一切粉碎了。

9月19日。马伦卡两次把“非常欢迎，米歇罗卡站，身体状况好极了，弗兰茨”的条子带往弗罗豪，因为无法寄出，还因为，在她到达之前不久邮局便关门了。代替这电报，我写了一封告别信，并又一次压下了猛烈开始的痛苦。当然告别信有着多种含义，一如我的看法。

这是创伤的年龄，比它的深度还长，比它的增生还多，这些包括了疼痛。又不断地在同一个伤口治疗，这是邪恶。

脆弱任性的无意义的本性——一份电报草草写出了它，一封信振作了它，使它有了生气，信之后的寂静使它木然。

猫跟山羊戏耍。山羊与之相似的：波兰犹太人，S.叔叔、E.W.、I.。

管家H。（他今天下午没有吃饭，也没有打招呼就走了，问题是，他明天是否来）、小姐、马伦卡的各种不同的、却类似的很难接近的性格。基本上对他们来说天地狭小，就像栏圈里的牲畜，要是别人要他们做点事，他们便会令人惊叹地跟着。这种情况在这里只是因此而更加难办，因为他们看上去在瞬间的时候是那样容易接近，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使我总不理解的是，每一个会写的人都可能在痛苦中将痛苦具体化，比如说，这竟使我在不幸中，也许还能带着焦灼不幸的脑袋坐着，并用文字来告诉某人。我是不幸的。是的，我还能超越这些，用各种不同的好像与不幸没什么关系的过分华丽的辞藻，视天才而定，对此作简单或者反命题，或者用整个联想的交响乐队来作幻想。然而那并不是谎言，也止不住痛苦，简单而直截了当地说是那个时刻力量的剩余，在这剩余中，痛苦却是明显地用尽我生命基础的所有力量，痛苦已经将这个基础抓伤。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剩余呢？

昨天给马克斯的信。骗人的、空洞的、耍花招的在屈劳一个星期。

在和平中你没有向前进，在战争中你流血了。

梦见韦尔弗。他讲述，他现在正逗留的下奥地利州，偶然在街道上稍微地碰撞了一个男子，紧接着这个人就可怕地向他谩骂。有些话我都忘了，我只知道那话里面出现了“野蛮人”（是从世界大战中来），最后还用了“您这个无产者土耳其”作结束。一种有趣的构词：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方言说法，“土耳其人”这个骂人的话显然还是古代土耳其战争及围攻维也纳的时候流传下来的，新的骂人话“无产者”就指这个。这十足地表明了骂人的人的天真和愚昧，因为今天不管是“无产者”还是“土耳其人”其实都不是骂人的话了。

9月21日。菲莉斯·鲍威尔到这里来看我，行了30小时的旅程，我要坚决地阻挠她就好了。正如我想象的一样，她忍受着极度的不幸，实质上是由于我的罪过。我自己并不知道克制自己，我完全失去了感情，同样也失去了帮助，想到的是我的某些舒适受到了干扰，作为容忍，我就演点儿滑稽剧了。在一些小事上她是不对的，不对在维护她的所谓的或者说也是实际的权利，从整体来说，她是一个无辜的被判重刑的人；我做了这错事，她却因此而受刑，我除此之外还操作了这刑具。——这日子就随她的离去（车车载着她和奥特拉围绕着池塘行驶，我抄了条笔直

的近路，又一次地走近她）和一次头痛（耍花招人的世俗余渣）而结束了。

梦见父亲。——那是小小的一群听众（芳塔夫人表明了其中的特点），在这群听众面前父亲第一次公开了一种社会改革的想法。这对他来说是因为，这些挑选出来的、特别是按他的看法挑选出来的听众要负责宣传这个想法。表面上他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非常谦虚，他只是要求这群人，到他们结识了大家之后，让他们将那些对他们感兴趣人的地址告诉他，这些人可能会被邀请参加公开的、以后将要举行的集会。我的父亲跟所有的这些人还从来没有过关系，因此他对待他们十分认真，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西服，极为详细地陈述了这个想法，而且带着各种各样的半瓶醋的标记。那群听众尽管完全没有准备过一个讲演，但他们马上认识到，这里带着稀有的傲慢说出来的只是一个已经用旧了的、早已详细讨论过的思想。人们让父亲感觉到了这一点。但父亲期待着反对的意见，他带着极大的自信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毫无价值的，可是这种反对意见看来是经常不断地诱惑过他本人，他带着高雅而苦涩的微笑更加着重地阐述他的事情。当他结束演讲时，人们听到一般人在愤愤地低语，说他无法使人信服他想法的稀有性与可用性。许多人对此并不感兴趣。有时总会有一个人出现，此人出于乐于助人之心，也许是因为跟我相识，而向他说出了一些地址。我的父亲完全不为那一般人的情绪所动，收拾起演讲稿纸，准备将一小堆白色的纸条拿到面前，以记下这些为数不多的地址。我只听见一个内廷参事（迂腐的人）斯特里察诺夫斯基的名字或者类似人的名字。——后来我看见父亲坐在地上，并靠着长沙发，像他和菲利克斯^[105]游戏的那个样子。我吃惊地问他在干什么，他在思考他的想法。

9月22日。没有什么事情。

9月25日。通向森林的路。你根本没有改变它，就已经毁坏了全部。你想怎样再将它拼合起来呢？还为此最伟大工作绵延不断的思想留下什么样的力量呢？

塔格尔的《新家族》，可怜的、自吹自擂的、机灵的、有经验的，有的地方写得不错，那种半瓶醋的晃荡，有点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他有什么样的权利炫耀呢？基本上像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如此可怜。结核病患者有孩子并不是绝对的罪恶，福楼拜的父亲有结核病。选择：对孩子来说，不是肺吹出笛声（这是对音乐说的非常美丽地表达，这么说是因为

医生将耳朵贴到胸部)或是成为福楼拜。在没人处讨论这个时候,父亲颤抖了。

我对如《乡村医生》这样的工作还能感到暂时的满足,前提是,我又成功地做出一点儿这样的东西(很不可能的)。但幸运只能是,如果我能把世界捧进纯洁、真实、永恒的境界。

我们用打了结而整整闲置了五年的鞭子相互抽打。

9月28日。和F.对话的基本轮廓。

我:这么远我就带来这个。

F.:我这么远就带来这个。

我:这么远我带来了你。

F.:这是真的。

我真欲把自己交托于死亡。一种信念的残余。回到父亲身边。伟大的和解之日。

自给F.的一封信,大约是最后(10月1日)一封了。如果我考察一下有关自己的最终目的,那结果就是,我根本不是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去适应一个最高的法院,而是极为矛盾地,全面地观察到整个人和动物的群体,认识到他们基本的爱好、愿望、道德理想,将他们送回到简单的法规上去,并在这个方向尽快地发展下去,让自己变得令所有的人都完全满意,以至我可以不失掉一般的爱而最终作为唯一没有被烹炸的罪人将包含在我身上的卑劣坦然地显露在众人的眼前。总而言之,这对我来说只是取决于人的法庭,不管怎么说我想欺骗这个法庭,当然没有欺骗行为。

10月8日。在这期间:F.埋怨的信,G.、B.以一封信来威胁。没有慰藉的状态(四肢酸痛)。喂羊,被老鼠打了洞的田园,采挖土豆(“风吹进我们的屁股”)。采摘野蔷薇果子,农民F.(七个小姑娘,一个小的,甜甜的目光,肩上的小白兔),房间里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天主教式陵墓里”的图像,农民K.(孔武有力,从容地讲述他家政的世俗故事,但友好、善良)。对农民的一般印象:高尚的人,他们钻入农业拯救自己,他们在那里那么明智地谦恭地进行他们的劳作,致使他们完美无缺

地顺应着整体，并免受任何波动和心灵疾病的伤害，直到他们进入极乐世界。真正的大地上的公民。

年轻人晚上越过高处广袤的田野追赶着四处逃散的牛群，在那里不停地使劲将一只不听话的小公牛拉转身来。

狄更斯的《考伯菲尔德》（《司炉》是不折不扣的对狄更斯的模仿，还有计划了的小说）。箱子的故事，讨人喜欢的人和有魅力的人，低贱的工作，庄园里的情人，龌龊的房子，以及其他，但最主要的是方法。我的企图是，就像我现在看到的，写一部狄更斯式的小说，只是增多一点我取自时辰较尖锐的光亮和从我自己身上显露出来的微光。狄更斯的财富和毫无顾虑有力的倾泻，但因此而产生令人恐惧失去力量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他只是疲乏地将已经得到的东西搅得乱七八糟。无意义的整体印象是可怕的，由于我的偏爱和通过我的模仿行为的教训，我当然避免了一种不懂艺术人的做法。在被感情淹没的格调之后是冷酷。这种粗鲁性格的蠢材在艺术上，在每一个人那里都被赶回去，而没有这种蠢材，狄更斯也许不可能哪怕只是一次迅捷地攀登上他的历史。（瓦尔瑟在云山雾罩引用抽象玄学家时与他的内在联系。）

10月9日。在农民卢夫特纳那里。很大的门厅，全部如剧场似的。他神经质地嘻嘻哈哈、敲击桌子，抬手臂，耸肩膀，举啤酒杯，像一个华伦斯坦家族。在身旁的妻子是一老妪，他10年前作为她的奴隶跟她结婚。他喜爱打猎，疏懒家政。圈里有两匹高头大马，从马圈的窗户射进来的短暂阳光照着它们巨大的身材。

10月14日。一位18岁的小伙子走过来与我们告别，他明日去服役：“我明天去服兵役，我来向您告假。”

10月15日。晚上在去向奥伯克累的道路上；离去是因为那位厨师和两位匈牙利士兵坐在厨房里。

远看到黄昏中奥特拉的窗户，对面是一座房子，它后面是一片空旷的原野。

K.和夫人走在他们的田野上，走在对着我窗户的斜坡上。

10月21日。天气很好，风和日丽，温暖。

当远处已经有一个人走下来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狗都胡乱地狂吠起来，但有些狗，大概不是最好的看门狗，它们是理智的动物，它们静静地接近这个陌生人，嗅嗅他的身体，发现可疑的味道时才狂叫起来。

11月6日。完完全全没有能力。

11月10日。十分重要的事情，我至今还没写进去，我的两只手臂里还流淌着血液。等着做的工作多极了。

梦见在塔格里阿门托的战斗：一处平原，那里没有河流，许多激动的观众拥挤着，看情况而定，时刻准备前进或后退。人们很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前面是高原，高原的边缘交替地出现空当，长满了高大的灌木。在高原的上部和它的那一边，奥地利人在战斗。人们处在紧张状态；事态会变得怎么样呢？在此期间，有的人显然是为了休息，他们看到从黑暗坡地上个别矮小灌木丛后面冒出一个或两个在射击的意大利人。但这并没什么意思，我们当然稍稍地跑动了一下。然后又是高原上的事情：奥地利人沿着空无一人的边缘跑，突然在灌木林后边站住，然后又跑。情况显然不好，也变得不可理解，怎么能在什么时候好起来呢？因为人们毕竟也只是一个人啊，他们又怎么能去制服有着自卫意志的人呢？大大的绝望，普遍的逃跑成为必然。这时候出现一个普鲁士少校，他在整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观看了这场战斗，但他现在是怎样平静地踏进这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空间的呀，他是一个新的人物。他把左右手的各两个手指伸进嘴里吹起哨声来，就像人们对一只狗吹的那样，但却是可爱的。这是给他部属的信号，他们在不远处等待，而现在正在进军。那是普鲁士近卫军，都是年轻安详的人，不太多，大约只有一个连，他们好像都是军官，至少他们都佩带军刀，制服是深色的。他们现在正以短促的步伐慢慢密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并不时地朝我们看看，这种不言而喻的死亡行走同时是感人的、令人振奋的、保证着胜利的。由于这些人插手而得救，我醒了。

1919年

6月27日。新的日记，本来只是因为我读了旧的。一些理由和打算，现在，11点3刻，无法再确定。

6月30日。来到了里格尔公园。与尤丽叶·沃里切克小姐^[106]一起在茉莉花丛旁走来走去。虚构与真实，虚构在叹息之中，真实在束缚之

中，在信赖之中、在安全之中。不安宁的心。

7月6日。同样的思想、渴求、恐惧经常不断。但却比以往更安详，这样，好像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我感觉到了这个发展遥远的战栗。说得太多了。

12月5日。又被这可怕的、长长的、窄窄的裂缝撕碎，这裂缝原来只有在梦里才能被抑制。从自己的意志来说，这在清醒的时候自然是永远不行的。

12月8日。星期一、星期五去大树花园，在饭店里，在画廊。痛苦和欢乐、罪恶和无辜，就像两只难分难解互相交叠的手，人们要割断他们就必须要穿过皮肉、血液和骨头。

12月9日。许多埃勒绍伊斯^[107]。可是我转向哪里，那里黑浪就向我扑来。

12月11日。星期四。寒冷。在里格尔公园与J.默默相对。在壕沟里的引诱。这一切太难了。我没有作足够的准备。这在一种精神的意义上说是这样的，正如贝克教师在26年前并没有发觉那是预言的玩笑所说的：“请您让他还是进五年级吧，他太弱了，过分往前赶，以后会造成恶果的。”事实上我就是这样成长的，就如窜得太快太高的，而且是被遗忘的秧苗，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娇嫩的造型，遇上一阵风就做出躲避的动作；如果人们愿意的话，甚至在这种动作中发现一些感人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就像在埃勒绍伊斯身上和他在春天进入城市的办事旅程上一样。在这里人们完全不可低估他，埃勒绍伊斯不是也能成为这本书的主人公吗？甚至他还可能成为汉姆孙的青年。

1920年

1月6日。他所做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特别新的。如果他没有生活的清新，那么它便列于自身价值的后面，他知道这点，无可避免的有些东西来自地狱的泥坑。但这清新蒙骗了他，让他忘记了它，或者让他满不在乎地对待它，或者虽然看穿，但没有痛苦。今天无疑就是这个今天的日子，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前进的步伐开始继续前进了。

1月9日。生活的迷信、基本准则和可能性：道德的地狱通过罪恶的

天堂而获得。是这样容易？是这样龌龊？是这样不可能？迷信是简单的。

一部分段式的剧本是从他的后脑勺裁剪出来的。借着太阳整个世界都在向里瞧。这使他烦躁不安，这让他偏离工作，他也生气，有人正好让他离开戏剧。

这不是对一种彻底解放预言的辩驳，如果监禁第二天仍然没有改变或者甚至变本加厉，或者即使着重声明，监禁永不停止。所有这一切更可能是最终解放必要的前提[108]。

1921年

10月15日。大约在一个星期前将所有的日记交给了M.[109]比较自由一点点了？不。我是不是还有能力记一种有特性的日记？它不管怎么说将是另一种样子，更确切地说，会存在，它会怕羞地藏起来；它将绝对不存在，比如关于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很令我思考的哈尔特，我只能尽最大努力作了一些笔记。就是这样，好像我已经早就写出了有关他的一切，或者，这同样的情况是，好像我不再活着。我也许大约能写关于M.的事情，但也不是出自随便的决定，这也许是过分针对我的，我不再需要像从前有一次那样将这一些事情烦琐地弄明白，我在这方面并不像从前那样如此健忘，我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记忆，因此也就是失眠。

10月16日。星期天。一种持续不断开始的不幸，有关这方面的错觉是，一切只是一个开始，而且甚至于不是一个开始，其他人的愚蠢行为，他们不知道这一点，比如踢足球，为是最终有一次“获得成绩”，他们将自己的愚蠢行为埋葬在自己的心底，就像是埋葬在一口棺材里。其他人的愚蠢行为，这些人在这里相信看到了一口真的棺材，也就是一口人们可以抬运、开启、毁坏、更换的棺材。

在公园北面的年轻女人们之间，没有妒忌。同她们共享她们的幸福，也太幻想了，我深知自己对于这种幸福太虚弱了，说明还有着足够的判断力。至于相信我看得透我的和她们的状况，这是够愚蠢的了。不够愚蠢的是，这里有一个极小的缺口，风吹过她们，并且妨碍了这完美的共鸣。

如果我有作一个田径运动员的伟大愿望的话，那么，这大概会是这

样，就像如果我想进入天空，并可能在那里如此绝望，如在这里一样。

如果我的道具服装也还是那么可怜，“在同样的情况下”（特别考虑到意志懦弱），甚至是大地上最可怜的话，那么我必须，当然以我自己的想法，设法连同它一起达到最好的境界，而这是空洞诡辩的说法，人们对此也许只能达到一种境界，而这样一种境界因此也就是最好的境界，这也许就是绝望。

10月17日。在我没有学到什么有益的东西背后，在我使自己——这是有关系的——身体上也变得衰落背后，可能有着一个打算。我曾想毫不分心地坚持住，不为一个有用的和健康的男人生活的乐趣而分心。似乎疾病和绝望同样不会令我分心！

我或许能用各种方法使这个思想得到完善，并且因此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结束这种思想，但我不敢这么做，我不相信——至少是在今天或者在更多的日子之后——会有对我有利的解决。

我并不羡慕个别的夫妻，我只是羡慕所有的夫妻——即使我只羡慕一对夫妻，我其实是羡慕整个婚姻在无穷无尽、多姿多彩中的幸福，在一种独特婚姻的幸福中，我本人即使在良好的情况下还可能会绝望。

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我的内心世界相似，我总还是能够想象得出诸如此类的人来；但不断地有隐蔽的乌鸦围绕他的头脑就像围绕着我的头脑飞翔这件事，我却怎么也不能想象。

多少年来的历程中我自身的有系统的毁坏是惊人的，就像一座堤岸慢慢发展着破裂，是一种充满愿望的活动。已经实现了这一使命的精神现在肯定在庆祝胜利了，它却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呢？但它许是以它的想法自己还没走到尽头，因此而不能想到其他的什么。

10月18日。永恒的童年时期，又是一种生命的呼唤。

那是非常好想象的，生命的壮丽是围绕着每个人并总是在它完全的充实中准备着的，但却是遮蔽着的，在深处，看不见，在很远的地方。但它并不是敌视地、不是勉强地、不是没有感觉地存在那里。如果人们用正确的话语、正确的名字呼唤它，那它就来到你的面前。这是魔术的实质，这魔术不是创造，而是呼喊。

10月19日。荒漠之路的本质。一个人，他作为他组织的人民领袖走这条路，带着对发生事件的剩余（更多就不堪设想了）的意识。他一生里有着为了迦南^[110]的预感，他在死前才想要看看这块土地，那是不可信的。这最后的希望可能只有这样描写的意义，一种怎样不完美的瞬间就是人的生命，不完美，是因为这生命的本身可能是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的，可是它得出的结果不是别的什么，无非是一瞬间。不是因为他的生命太短促，摩西才不去迦南的，而是因为那是一个人的生命。摩西五书的这种结尾和《情感教育》的结尾场景有相似之处。

某一个人，他的生命并没有生机勃勃便完结了，他需要一只手去稍稍地击退对他命运的绝望——这种发生很不完美——但他却能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之下看到的东西，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到的东西更为异样，以及更多，可是他在生前已经死了，而且是那种真正的幸存者。在这里，前提是，他不需要两只手和比他所有更多的东西去与绝望斗争。

10月20日。下午是朗格尔，后来是马克斯朗诵《弗兰兹》。

刚刚在一种抽搐、短暂的睡眠状态中，在极度的幸福之中，一个梦抽搐地紧抓住我。一个头绪众多的梦，包含着成千的同时一下子变得清晰的关系，剩下来的几乎算不上是对基本感觉的回忆：

我的兄弟犯了罪，我相信是杀了人，我和别的人参与了这个罪行，惩罚、死亡、拯救从远处愈来愈近，它有力地逼近了，人们从许多征兆中注意到它不可阻挡地走近。我相信，是我的姐姐在不断地预示这种征兆，我总是用疯狂的呼喊来欢呼这些征兆，这种疯狂随着这些征兆的走近而高涨。我单独的呼喊、简短的句子，我相信由于它们的明白易懂而永远不能忘掉，但现在却一句也记不清楚了。不能只是喊叫而已，因为说话花去了我巨大的精力，在我说出一句话前，我必须得鼓起腮帮子，同时还得歪着嘴巴，就像是处在牙痛的状况下。这种幸福在于，惩罚下来了，我是那么随便地、深信不疑地和幸运地欢迎它，这肯定是一种感动上帝的景象，我也感到了上帝的这种感动，几乎直到流出眼泪。

10月21日。踏进这所房子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告诉他：“等着，直到我来领你！”这样，他一直蒙着尘土待在房子前，尽管大概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像撒拉将要说的那样）。

一切都是幻想，家庭、办公室、朋友、街道，全是幻想，较远或较

近的幻想。女人。但最近的真实只是，你将你的脑袋对着一间没有窗户没有门的小房间的墙挤压过去。

10月22日。一位内行，一位专家，一个人，他知道他那部分的东西，一种知识，然而它是不能介绍的，但幸运的是好像也没有人需要这知识。

10月23日。下午。巴勒斯坦电影。

10月25日。昨日艾伦斯坦。

双亲在打牌；我独自坐在那里，完全地陌生；父亲说，我应该一起玩牌，或至少看着；我不知怎么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种从童年时期开始多次重复的拒绝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共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公开的生活通过这种邀请使我变得容易接近，别人要求我作为参加进去的努力，我也许不行，但也过得去，这种玩耍也许看来使我并不太感到无聊——尽管如此，我拒绝了。如果人们在此之后评判的话，我是不对的，如果我埋怨，生活的电流从来没有触及过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布拉格，从来没有被推到运动中去，或者做一件手工，以及这样一类的事——我大概总是拒绝这种建议，同样如玩耍的邀请。只有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才获得青睐，法律研究、办公室，再后来的一些无意义的补充，如少量的花园工作，木匠活儿及类似的事，这些补充可以这么理解为像一个男子汉的行为举止，这位男子将那位可怜的乞丐踢出门外，然后独自装成行善好施人的样子，将布施的东西从自己的右手交到自己的左手。

我总是拒绝，大概是由于一般的以及特别是由于意志的懦弱，比较地说，我认识到这一点是很晚了。我早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为这样的拒绝是一个良好的表示（受到我所寄于自己一般的巨大希望的引诱），今天留下来的也只有那种美好理解的残渣了。

10月29日。最近有一个晚上我真的参与了，我为母亲记分。但这并没有产生接近，而即使有一种接近的迹象，那它也被疲倦、无聊，为失去时间的悲哀堆压下去了。在孤独和共同之间的边界土地上，我极少越雷池半步，我在这块土地上甚至要比在孤独本身中移居得还多。在比较中属于此类的鲁滨逊小岛是一块多么生机勃勃的美丽土地啊。

10月30日。下午剧院，帕伦堡。

我对（我不想说《吝啬者》的描写或虚构）这为了这位吝啬者本人的内心的能力，只有一种较快的断然的一弹也许是必要的，整个乐队看来是迷人的，在那里指挥棒应该超越指挥台。

完全失去帮助的感觉。

什么与这些富于表情、照射眼睛的躯体的联系比与任何一种东西、大约是你手中的笔的联系更为紧密呢？大概你有着它们的本性？但你没有它们的本性，所以你才提出了这个问题。

人的躯体这种固定的划分是可怕的。

值得注意而猜不透的是没有沉没和默默的表现，这逼近荒谬：“对我的部分来说的我也许早已经毫无希望了。”我的部分的我。

11月1日。韦尔弗的《山羊之歌》。

在不尊敬它的法则情况下自由拥有一个世界。承担法律。这种忠诚于法律的幸福。

但只将法律加于这世界是不可能的，不然一切都停留在老地方，那个新的立法倒应该是自由自在的了。这也许不是法律，而是专断独裁、反抗、自我判决。

11月2日。模糊的希望，模糊的信任。

一个没完没了的阴霾的星期天下午，耗尽着整个年头。一个包括着多少年的下午，在空荡的街道上交替的绝望和在沙发床上的安慰。有时候对着几乎不停飘过的、没有色彩的、毫无意义的云惊异不已。“你为一个伟大的星期一而告结束！”——“大概地说，但星期天永不会结束的。”

11月3日。呐喊。

11月7日。无法逃避自我观察的责任：如果我被其他的人观察，我自然也必须要观察自己，如果我不被别人观察，那我就必须更仔细地观察自己。

每个与我为敌的人，或者我不屑一顾或令其难堪的人，都应该羡慕他能摆脱我所持有的那种轻松（前提大概是，那并不涉及生命；当有一

次在F.那里看来要涉及生命的时候，要摆脱我，那是不轻松的，自然是我年轻，并且有力量，我的愿望也是有力量的）。

12月1日。M.在四天访问之后，明天将离去。这是在众多痛苦日子里较为安静的四天。从这里直到那里有着一段长长的路程，我对她的启程并不感到悲伤，并不从根本上感到悲伤，我由于她的离去而无限地悲伤。无疑悲伤并不是最坏的东西。

12月2日。在双亲的房间里写信。衰落的样子是无法想象的。——最近设想，我作为小孩被父亲制服，并且由于虚荣心就是不能离开这个战场，穿过所有的年月，尽管我一再地被制服。——总是M.，或者不是M.，但一个原则，黑暗中的一丝光线。

12月6日。从一封信中摘出：“在这个悲哀的冬天我就靠着这个为自己取暖。”这种隐喻是众多隐喻中的一个，它让我对写东西不抱希望。写东西没有独立性，依靠那位给生火的女佣，依靠在炉旁取暖的猫，当然也依靠那位可怜的取暖老人。所有这些都是独立的、有自身规律的日常事务，只有写作是无助的，不存在于自身，是玩笑，是绝望。

两个孩子独自待在家里，爬进一只大箱子，箱盖自动盖上了，他们打不开箱盖，窒息而死。

12月20日。许多东西潜入思想。

我从深睡中恐惧地惊醒。在房间中央，一个陌生男子在烛火下坐在一张小小的桌旁。他坐在半暗中显得宽阔而沉重，解开纽扣的冬衣使他显得更加宽大。

更好地深思熟虑：

当妻子抚摸他额头的时候：“这多美啊。”拉贝正死去。

祖父，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巴大笑地看着他的孙子。

那不可否认是某种程度的幸福，可以安静地写下来：“窒息而死是难以想象的可怕。”当然是难以想象的，如此的话，那也许没有什么可记下的了。

12月3日。又对《那斯·斯考迪克》[\[111\]](#)着迷。《伊凡·伊里奇》

1922年

1月16日。在上个星期，就像一次崩溃，那么全面，就像大约在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没有经历过一种另外的情况。看来一切都结束了，而且就是今天看上去也还不是另外的样子。人们可以用两个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它，大概也应该同时这样去理解：

第一，崩溃，没有可能睡觉，没有可能醒来，没有可能忍受生活，更清楚地说，没有可能忍受连续不断的生活。钟表是不一致的，内心的时钟以一种魔鬼的或异常的或不管怎么说非人的方法在追逐着，外部的时钟断断续续走着它寻常的路。除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分开，还有什么别的会发生呢？他们分开或以一种可怕的方法至少被撕得四分五裂。内部进程的疯狂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看得最清楚的原因是自我观察，它不让想象停息，赶起每一个想象，为的是以后再作为新的自我观察的想象继续追逐。

第二，这追逐的方向来自人类。孤独历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强加于我的，我曾部分地寻找过的——可是这跟强制相比也是另一回事——现在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达到了极点。它引往何方呢？它可能导致精神错乱，这看来是最无法反驳的，对此，再没有什么可以说出来的了，这个追逐穿过我的身体，并将我撕碎。或者，但我能够——我能够？——不管它只是最微小的部分，但我能够保持住自己，让自己承担这种追逐。然后我到哪里去呢？“追逐”只是一种幻象，我也可以说是“对最后尘世极限的冲击”，虽然这冲击来自下面，来自人，而且可以用从上面朝下向我袭来冲击的幻象来取代它，因为这世界是一种幻象。

这整个的文学就是对极限的冲击，如果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在这个期间出现的话，这种文学也许可能容易发展为一种新的神秘学说，一种犹太教的神秘教义。有关的征兆出现了，自然这里要求着一位多么不可理解的天才啊，这天才重新将他的根插进古老的世纪，或重新创造这古老的世纪，并不是用这一切耗尽自己的精力，而是现在才开始卖力气。

1月17日。几乎没有别的。

1月18日。那一点儿的寂静，为此G.来到，解脱或是变坏，随人所

想。

一瞬间的思想：你满意吧，学着（学着，40岁的人）在这瞬间安静（可是，你曾经能够做到这点的）。是的，在瞬间，在这个可怕的瞬间。它可怕，只是对未来的害怕使他感到可怕。而回首当然也是如此。你带着这个性别的馈赠做了些什么呢？它失败了，人们最终会说，这将是一切。但它能够成功该多好啊。当然，一件小事情，而且根本看不出来，将它决定了。你对此有何感受呢？它在世界历史上的那些最大的战役里均是这样的，小事情决定着小事情。

M.是对的：恐惧是不幸，但因此，勇敢并不是幸福，而是无所畏惧，而不是勇敢，勇敢大概需要的东西比力量（在我们的班上大约只有两个勇敢的犹太人，而这两个人还在中学期间或以后不久就被枪杀了）更多，也就是说不是勇敢，而是无所畏惧，安详的、目光坦然的、忍受一切的无所畏惧。不要把你逼上虚无，但你不逼着自己，对此来说也不见得不是不幸，或者对此来说，你必须强制你自己，如果你应该做那件事的话，那么那种强制的可能就不会不断贪婪地在周围跑动了。当然，它永远不是那样清晰的，或者相反，它总是那么清晰，例如性紧迫着我，使我日夜痛苦，我必须克服恐惧和害羞，大约还有悲伤，为使性感到满足，但另一方面那也是肯定的，我也许会马上在没有恐惧和悲伤的情况下利用一个既快速又捷径的乐于呈献的机会；然后，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之后，留下的是克服不了的法律恐惧等等（但也无法戏弄克服的思想），大概就只有利用这个机会（但并不埋怨，如果这机会没出现的话）。当然，在“事实”和“机会”之间有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将这个“机会”引导过来；吸引过来，是一种实践，遗憾的是，我不仅仅在这里，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遵循这种实践。在“法律”里几乎没有针对这种事说些什么，尽管这种“吸引”看上去与“玩弄克服的思想”可疑的地方相似，特别是如果它是通过无用的方法实现的，而这里面并没有安详的、目光坦然的无所畏惧痕迹。尽管在“字面上”与“法律”一致，正因此它才是令人厌恶的，而且肯定是应该避免的事情。当然，强制就属于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这方面的事，而我却没有结束这样的事情。

1月19日。昨天的那些论断在今天是什么意思呢？这同样与昨天意思一样吗？只是血液在法律巨大石头之间的流淌中渗漏出来是真的吗？

没有结束的、深沉的、温暖的、解脱的幸福，坐到他孩子的篮子旁边，面对着母亲。

这里面也有一点儿这样的感觉。这跟你再没有什么关系，除非你需要这个。与此相反，没有孩子的感觉，这总视你而定，不管你要还是不要，每一时刻直至结束，每一个令神经变态的时刻，这经常是视你而定，而且没有结果。西绪弗斯^[113]是一个单身汉。

不是什么可恶的事情；你跨出了门槛，一切都不错。一个另样的世界，而你一定不说。

两个问题^[114]：

从一些我羞于提出的小事情中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最近有人来访虽然可爱，而且像往常一样骄傲，但却也有些疲倦，有一点儿被逼无奈，如病人的来访。这种印象正确吗？

你在这些日记里找到了对我有决定性的东西吗？

1月20日。有一点儿较为安静，这就像是必然的。几乎不是有一点儿较为安静，而几乎是太安静了。就好像我只是发现了我自己的真感觉，如果我忍受不了不幸的话，这大约也是正确的。

紧抓着领子，拖拽地穿过街道，撞进门里，这就是如此机械，实际上这里有反作用力，只是围绕着一件小事——这种包含着生活和烦恼的小事——比那件小事的粗野少多了。我是这两者的牺牲品。

这个“太安静”。这样就像——不管什么形式身体的，身体上作为多年来痛苦的结果（信任！信任！）——正在平静创造生活的可能性对我是封闭的，从根本上说就是创造着生活，因为痛苦的状况全部对我来说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我封闭的、针对一切而封闭的痛苦，什么也越不出它的范围。

裸体躯干雕像：从侧面看，从长筒袜上端的边缘向上看去，是膝盖、大腿、臀部，它们属于一位神秘的女人。

是对农村的渴求？那不肯定。农村撞击着渴求，没有结束的渴求。

关于我的事，M.是对的：“一切都是美妙的，而且是公正的，只是对我的。”是公正的，我说，并指出，我最少有这样的信任。或者是我连这个信任也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想这个“公正”，生活面对高声的说服力在自身里没有为公正和不公正留下位置。如此，就像你在绝望的死亡

的时辰不能去冥思苦想公正和不公正一样，在绝望的生活中也不能那么做的。箭头完完全全合适它所戳破的伤口，这就够了。

对此，一点儿也没提到一个一般的有关在我这一代的评判。

1月21日。那还不是太安静。突然在剧院里，面对弗罗勒斯坦监狱，深渊大开。所有的，歌唱家、音乐观众、邻座，一切都比深渊还遥远。

据我所知，没有人的任务曾是如此繁重。人们也许可以说：那不是任务，连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也不是，甚至也不是不可能本身，那是虚无，那也不是像一个不生育女人希望如此多的孩子，但那是我在里面呼吸的空气，如果我应该呼吸的话。

我在半夜后入睡，在5点钟左右醒来，这是不寻常的成绩，不寻常的幸福，此外，我还是睡意蒙眬的。可是这个幸福是我的不幸，因为现在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抵抗的思想：你没有获取如此多的幸福，所有的复仇天神都朝我冲下来，我看见他们发怒的首领粗暴地分开手指，在上面可怕地向我敲击着。两个小时的激动，直到7点钟，不仅消耗尽了这个获得的睡眠，而且使我整个白天颤抖和不安。

没有先祖、没有婚姻、没有后代，有着野蛮先祖、婚姻和后代的乐趣。全部向我伸出手：先祖、婚姻和后代，但对我太遥远了。

对一切来说有着人工的、可怜的补偿，为了先祖、婚姻和后代。在抽搐中人们创造这种补偿，如果人们在抽搐的时候没有毁灭了的话，他便在这种补偿的无慰藉中毁灭。

1月22日。夜的决断。

有关《回忆中的单身汉》方面的注解是有眼光的，当然是在非常有利的前提下的眼光。与O.R.[115]的相似，但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惊愕不已：两者都沉默寡言（我更少语），两者都依靠着双亲（我靠得更多），与父亲敌视，受母亲之爱（他更是注定与父亲一起过可怕的生活，当然父亲也注定与他一起生活），两者都胆怯腼腆、过分谦虚（他更多些），两者看上去都是高尚善良的人，关于这一点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据我所知在他身上也找不到许多（将羞怯、谦虚、恐惧作为高尚和善良赞许，因为他并不反对自己膨胀的情欲），两者先是患疑心病，

后来真的病了，两者作为世界上无所事事的人养得还颇好（他，因为他是一个较小的无所事事的人，保养要糟糕得多，对此，人们至今还可作比较），两者都是公务员（他是更好的公务员），两者都最单调地活着，没有青春到结束的发展，外表保持得比青春更好，两者都近乎精神错乱，他，远离犹太人，有着巨大的勇气，有着巨大的跳跃力（从这一点人们可以测量出精神错乱危险程度），在教堂被拯救，直到结束才保持着松散的关系，这为人们所能看到的，他本人大概已经多年没有保持这种状态了。跟他有利或没利方面的区别是，他有的艺术天赋比我的要少一些，就是说在青年时期原可以选择一条较好的路，也不必有什么雄心，也不会如此阴阳颠倒了。他是不是围绕着女人（跟自己）进行了斗争，我不知道，我从他那里读到的一个故事说明了这个，当我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人们也讲述一些同样的内容。我对他知道得太少太少，我又不敢询问有关他的事。此外，我轻率地写有关他的内容到这里为止，就像写关于一个活着的人。他不是善良的，这也不是真实的，我在他那里没有发现有关吝啬、妒忌、仇恨、贪欲的表现；为了能自己帮助自己，他大概是太微不足道了。他跟我比起来要无辜得没法说了，这里不能比较。他在某些个别的地方是我的漫画像，但实质上我是他的漫画像。

1月23日。不安又袭来。从哪里来的？来自于某种思想，这些思想很快被忘却了，但不安却没被遗忘而留下来了。一点儿也不是我能够说出它们出现的地方的那些思想，比如一个人走在一条草地的小路上，这条路从阿尔特——诺伊犹太教堂旁边伸过。有的不安来自某种程度的惬意，这种惬意有时候战战兢兢地、远远地走近。不安也来自，夜间的决定只是夜间的决定。不安出自，我的生命至今还是静止不动的前进，最多是在此种意义上的一个发展，就像一只正在变空的、正在衰败的牙齿所经历的那种不安。这不是我这方面所存在的最微不足道的、不管怎样证明是有效的生活方式；而是这样的，就好像我和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被赐予了这个圆的中心点，就好像我和其他的每个人一样必须要走的确定了的活动半径，然后拉出一个美丽的圆圈。可是我不是这样，却总是沿着这半径起跑，又不得不立即中断这个起跑（例如：钢琴、小提琴、语言、日耳曼语言学、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希伯来语、花匠、木匠、文学、结婚尝试、自己的住宅）。在这个幻想圆圈的中心点凝视从这儿开始的无数半径，这里对一个新尝试来说再也没有位置了，没有位置就是年纪大、神经衰落，而再没有尝试就意味着完结。如果我有一次将半径比往常引长了一小段，大约是在学法律的时候，或者是在订婚的时候，那么，围绕着这一段的一切不是更好，而是更坏。

要是M.讲述有关夜的内容是不够的。忍受着症状吧，不要埋怨症状，爬进痛苦中去。

内心的不安。

1月24日。在办公室里的年轻和年老已婚男人的幸福。我却是难以达到的，而且如果我能达到的话，我会无法忍受的，而我对那唯一的事情有着令自己厌烦的天性。

出生之前的犹豫不决。如果有一种灵魂的漫游，那么，我还不是在最低的阶段。我的生命就是这出生之前的犹豫不决。

站得稳稳的。我不想以一定的方式发展，我要站在另一个位置上，这实际上就是那种“要去——另一个——星球的——想法”，这也许对我是足够了，紧紧地挨着我的身边站着，这也许对我足够了，能够把这个我所站立的位置当作另一个位置来抓住。

发展是简单的。当我还是满意的时候，我想到了不满意，并用我能达到的时间和传统的一切手段将自己推入不满意，然后我才想到能够回来。因而我总是不满意，对我的满意也不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在繁多的分类学那里，真实能够从喜剧中出现。我精神上的失败是随着幼稚的、自然是幼稚意识的嬉戏开始的。例如我让面部的肌肉做作地抽搐，我将交叉的双臂置于脑后越过壕沟。幼稚——令人反感的却是成功的游戏（这与写作的发展类似，遗憾只是这种发展在后来停顿了）。如果用这种方式将这种不幸逼过来是可能的话，那么，一切都应是可逼来的了。发展看上去是那么厉害的反驳我，并且是那么非常地不适合我作为如此思考的本性，我没有办法承认，我的不幸最初开始在内心深处是必然的，它们可能有过这种必然性，但不是内在的必然性，它们像苍蝇一样地飞来，并且也许像它们被驱赶那么容易。

在彼岸的不幸也许是同样巨大，可能还更巨大（由于我的虚弱），我的确有过这种不幸的经验，当我将操纵杆重新挪动位置的时候，这操纵杆便在某种程度上随时辰而颤抖，但我为什么后来通过对彼岸的渴求来增加这种待在彼岸的不幸呢？

悲伤是有原因的，依赖于这种原因，总处于危险境地。没有出路。第一次是如何地轻松，这一次是如何地沉重。那位暴君是如何孤立无援地看着我：“你把我领到那里去？”尽管如此，却不得安静；早晨的希望

在下午被埋葬了。在爱情中去忍受一种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肯定没有人能够有这种生活。如果其他人走向这个边缘——而已经走到了这里，倒是令人同情的——他们就摆脱掉，我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对我来说，也好像我根本没有走到那里，而是已经在孩童的时候向那里挤，并被用链条锁住了，只是不幸的意识逐渐地萌发，不幸本身结束了，这需要的只是一种锐利的目光，而不是先知的目光才能看到它。

早晨我想到：“你的确可以按这种方式生活，现在只是当心女人干扰这种生活。”在女人的面前保护这种生活，可是女人们已经隐藏在这个“按——这种——方式”中了。

说你已经离我而去，也许是很不合理的；我离去了，而且是暂时令人难以忍受地离去却是真实的。

就是在“决定”的意义上说我也有权利对我的处境无限地绝望。

1月27日。施平德勒磨坊。独立于用笨拙混合起来双架雪橇的、破碎箱子的、摇晃桌子的、糟糕光线不幸的必然性，独立于下午在饭店不可能得到安宁的不幸的必然性，诸如此类等等。这是不可能达到的，通过人们对此的疏忽，因为这是不可以被疏忽的，这只有通过引来新的力量才能达到。这里自然有令人惊异的事情，最是失去安慰的人必须承认这点，根据经验一些东西可能出自虚无，从那个衰颓的猪圈里可能爬出牵着马匹的车夫[116]。

在乘雪橇时的脱落的力量。人们不能像一个体操运动员倒立那样地安排一种生活。

值得注意的、充满神秘的、大约危险的、大约解脱的写作的慰藉：从杀人犯行列里、行为观察中跳出去。行为观察，通过一种较高级的观察方法的产生，一种较高的，而不是较为尖锐的方法，而且越是较高级的，从“行列”出发，越是无法达到，那这方法就越是独立的，就越是遵循运动本身的法则，它的道路就越发令人难以估量，就越发令人高兴，就越发升高了。

尽管我给饭店清楚地写下了我的名字，也尽管他们已经两次地给我写对了，可是下面的牌子上却是约瑟夫·K.[117]。我应该向他们澄清或者应该让他们向我弄清楚。

1月28日。有一点儿失去知觉，乘雪橇滑雪的疲倦，还有武器，极少使用过，我是如此困难地面对这些武器，因为我不知道使用它们的欢乐，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并没学过。我不仅仅是“由于父亲的过错”没有学过使用这种武器，而且也因为我要破坏“安静”，想打破“平衡”，因此在那边不可以让某一个人新生出来，如果我在这边努力将他埋葬的话。当然我也在这里走向“过错”，因为我为什么要从这个世界出来呢？因为“他”不让我在这个世界、在他的世界生活。我现在当然不可以这么清楚地对此作出评判，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这另一个世界里的居民，这另一个世界与平常世界的关系就如荒漠与耕地的关系（我现在从迦南浪游出来已是40岁了，看来是作为外国人归来，我自然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这是将它作为父亲的遗产带着的——也是最小的人物和最胆怯的人，而且只有借助那里的特殊的组织才能生活。根据这个组织，在那里也有为最卑贱人做出飞快的提高，当然也有颀森大海的波涛冲击）。尽管如此，我肯定是不可想象的吗？我是肯定找到了来这里的路了吗？我要是能不因“放逐”在那里，并由于受拒绝的牵连被压死在这里的边界上多好啊？不是由于父亲的权力，驱逐才如此强而有力，使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对抗它（不是我）？当然，这如颠倒了荒漠之地移动，随着不断地接近荒漠之地和天真的希望（特别是有关女人方面的）：“我大约还留在迦南。”而在这期间我在荒漠之地待了很长时间，而且只是绝望的幻景，特别是在那些时辰，在那些时辰里我在那里也是所有人中最可怜的，而迦南肯定是作为唯一的希望之土存在的，因为对人来说没有一块第三的土地。

1月29日。晚上雪中路上遇到的袭击。总是好多的想象混杂一起，大约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情势是可怕的，单独在这里的施平德勒磨坊，另外在一条孤寂的路上，人们在这条黑暗中覆盖着白雪的路上不停地摔倒，另外是一条没有意义的没有凡世目的的路（通向桥？为什么通向那里？反正我连一次也没有到达过那里），此外我在那个地方也孤寂（我不能将这位医生看作是人类自己的助手，我不应得到他给我的服务，其实我与他只是稿酬的关系），我没有能力与某一人结识，我没有能力承受一种结识的关系，实际在一种生机勃勃的社交圈子里我充满了没完没了的惊叹（在饭店这里自然不是非常热闹，我并不想走得那么远去说，我是这个热闹的原因，大约作为“有着太大影子的人”，但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太大，我带着新的惊叹去看有些人的抵抗能力，可是，“尽管如此”，也还是处在这个影子之中，正是还要在它里面生存；但这里还有其他的東西添加进来，对此还应说说），或者在双亲面前带

着他们的孩子。此外，不仅这里是如此孤寂，而且，总而言之，在布拉格，我的“故乡”也是那么孤寂，虽然不是被人所遗弃，这也许不是最坏的事情，我也许可能跟在他们后面跑，只要我活着。从我来说是处于跟人发生的关系之中，从我的力量来说是处在跟人发生的关系之中，我喜欢活着的人，但我不能爱，我是离得太远了，我被驱逐，因为我毕竟是人，而且根要求营养，我在那里“下面”（或者上面）有我的代理人，可怜的不令人满意的演员，他们只是因此而能让我满意（当然，他们完全不令我满意，因此我才那么孤寂），因为我的另外的根主要营养来自另外的空气，当然这些根也是可怜的，但毕竟更有生活的能力。

这点导致了想象的混合。如果那真只是如此，就如它能出现在雪中的路上一样，那么是可怕的，那么我也许就没有希望了，这不要作为一种威胁，不要作为立即处决来理解。但是我在别的什么地方，只有人类世界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在一瞬间里它能让人忘掉一切。但是我的世界的吸引力也是大的，那些爱我的人爱着我，因为我“孤寂”，虽然大概不是作为魏斯的真空，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我在一块另样的大地上在幸福的时光里拥有着我在这里完全缺乏的活动自由。

如果，例如M.突然地来到这里，那也许是可怕的。虽然表面上我的态度比较地说也许是顿生光辉。我也许作为人群中的一个人感到荣幸，我也许得到更多的只是生硬的话语，我也许坐在（当然不会像现在挺直，因为我独自坐着，我现在也东倒西歪地坐着）演员团体的桌旁，我也许是H.博士，社会的外表几乎是门第相当的，——但我也许坠落到一个我不能在里面生活的世界。留下的只是要解的谜，为什么我在马利恩巴特的14天是幸福的，以及为什么我因此，当然是在充满痛苦的冲破边界之后，大概也是和M.在一起能变成这样呢？但也许比在马利恩巴特要困难多多了，思想体系更牢固了，经验更增加了。早先是一根正要折断的带子，现在却已是一座墙或者是一座山岭，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一座坟墓。

1月30日。等着肺炎吗？因为母亲的缘故，以及在她的面前，在父亲的面前，在经理的面前和在所有的人面前相比，对这种疾病的恐惧并不是那么厉害。这里看上去是明显的，有两个世界存在着，面对这疾病我是如此无知，如此没有关系，如此忧心忡忡，大概就像面对饭店服务员。但另外对我来说这样的分开是非常肯定的，在它的确定无疑中会是危险的、悲哀的和太专制式的。难道我是住在另一个世界？我敢说这

个来吗？

如果某一个人说：“究竟是什么牵挂着我的生活呢？只是由于我的家庭缘故，我才不想死。”但这个家庭正是生活的代表，这么说，他却不想因为生活的缘故而留在生活之中。如今，凡牵涉到母亲的那些事对我来说也似乎是重要的，但要在最后的时刻。但那是否令我为此感激和感动呢？感激和感动，因为我看到，她是怎样用一种对她的年纪来说是无穷无尽的力量竭力平衡我对生活失去的关系。感激也是生活。

1月31日。这也许意味着，我由于母亲的缘故而活着。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即使我过去比现在的这个想法也许多得多，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生命的使者，如果通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通过这种委托与他连结起来的话。

否定的事情独自不能满足，如果他还那么强大的话，就如我在我不幸的时辰相信的那样。因为如果我只是登最小的台阶，不管我处在如何的一种、哪怕是极有问题的安全之中，我伸展着自己的身体，等待着，直至这否定的事情出现——大约不是迫着我的——而是这小的台阶将我拽了下来。因此这是一种反抗的本能，它不容忍为我制造最微小的持久的舒适，例如在这双人床还没放好之前，它就将这双人床打碎了。

2月1日。虚无。只有疲倦。赶车人的幸福，他每天晚上均是如此，如我今天认为的那样，而且还有许多更为美丽的经历。夜晚大概是在炉子上。人比早晨更为纯洁，在疲倦入睡之前的时间是魔鬼的真正纯洁的时间，一切都被驱散了，只是随前行的夜来临，他们才走近，到了早晨，他们全聚集在那里，即使是面目全非了。现在他们白日的驱散又在健康人中间开始了。

用原始的目光来看，原本的、无可反驳的、没有受到什么（除了殉道者、为一个人牺牲外）阻碍的真理只是身体的痛苦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痛苦的上帝是当初宗教的主要上帝（而大概是稍后期的宗教）。属于每个病人的是他家中的上帝，属于肺部患病的人的是窒息的上帝。如果人们还在可怕的联合之前就不对他感兴趣的话，人们怎么可能忍受他的临近呢？

2月2日。上午在去塔嫩斯坦路上的战斗，在滑雪跳跃比赛观众里的战斗。这位小个子快活的B.绝对无辜地不知怎么被我的魔鬼遮盖住了，

至少对我眼睛来说，特别是放在前面的那条腿穿着一只灰色的卷起来的长筒袜，那没有目的扫向四周的目光，那没有目标的说话。这个时期我突然想起——但这已经是不自然的了——他在傍晚的时候要陪我回家。

这个“战斗”也许会在学会一种手工时最可怕。

通过这“战斗”得到的可能，是最大的否定威力。使它在精神错乱和稳定之间的决定近在咫尺。

与人在一起的幸福。

2月3日。失眠，几乎是彻底的；被梦折磨着，如此就像这些梦境刻进我的身体，刻进一种令人厌恶的物质。

一种虚弱，一种缺乏是明显的，但难以描绘，那是一种恐惧、克制、饶舌、冷漠的混合，我想用此来改变一点儿明确的东西，一组有关虚弱的东西，它们在一个特殊的方面是一种唯一的具有明显特征的虚弱（它不与那些大的恶习，如说谎、空虚等等，相混淆）。这种虚弱不仅没让我精神错乱，却还阻碍我每一次的发展。对于它没让我精神错乱，我是注意保护这虚弱的，出于对精神错乱的恐惧，我牺牲了发展，而我无疑在这个等级上丢失了这桩事业，这个等级不论什么事业。如果不是困意参与进来，并以它夜以继日的工作推倒妨碍的一切，并且铺平道路，那么只有精神错乱再一次接受我，因为我不想要人们想要就能达到的发展。

2月4日。在绝望的寒冷之中，变形的脸孔，不可理解的其他人。

M.关于与人聊天的幸福说些什么，不必完全去理解它的真实性（这也有一种有道理的悲哀的高傲）。聊天怎样能使其他人比我更高兴呢！可能太迟，而且在奇特的弯路上回到人那里去。

2月5日。逃离他们。随便一种灵巧的跳跃。在家里寂静房间里的灯光之下。说这些是欠考虑的。她在森林里呼喊，就好像有人点上灯，为他们指路。

2月6日。有一个人于巴黎、布鲁塞尔、伦敦、利物浦在一条巴西的轮船上服务过。这条船在亚马逊河上曾向秘鲁的边境航行，战争中他颇为轻松地忍受了7个教区里冬季战役的可怕痛苦，因为他从孩童起就适

应了辛劳。在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感到安慰。这种慰藉不仅存在于这样快乐的感觉中，即用第一等级的这些成绩同时也必然在第二等级上获得许多东西，必须从痉挛的拳头里抢出许多东西，那就是说这是可能的。

2月7日。被K.和H.保护和消耗。

2月8日。被两者滥用，可是——我虽然也许不能如此生活，而且那也不是生活，那是一场拔河。在这游戏中，另外的人不断的工作，取得胜利，可是从没有将我争取过去，但那是一场平静的晕眩，类似于过去在W.那里的情况。

2月9日。两天失去了，但同样的花在了为入国籍的事情上了。

2月10日。失眠，绝没有跟人有一点儿的关系，除了由他们自己造成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在这一瞬间使我确信，就像他们所做的一切。

G.的新进攻。这比以往任何事情都更清楚，即我被极强大的敌人从左右方向攻击的时候，既不能从右方面也不能从左方面逃跑，只有向前进，即使在生的后面是饥饿的野兽，路会把你引往可食的食物、可呼吸的空气、自由的生之希望。你领着众多人，高大的前敌总司令，领着这些绝望者穿过群山里的被雪覆盖无人发现的逶迤小路。是谁给你的力量？谁给你清澈的眼光？

这位司令站在将要倒塌的茅屋窗边，用张得大大的眼睛注视着外面在雪地上和模糊的月光下从旁边行进部队的行列。有时候他觉得好像有某一个士兵走出行列在窗边停住，将面孔贴在玻璃上，匆匆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前进。尽管那里的士兵老是在换，但他总觉得就是那同一个士兵，有着一张坚硬骨架的面孔，厚实的面颊，圆圆的眼睛，粗糙的黄皮肤，而且总是在他离去的时候整理一下腰带，耸耸肩膀，挥动一下腿，就又随着后面没有变化前进部队的步伐走了。这位司令不想再继续容忍这个把戏了，暗中守候着下一个士兵，在他面前把窗户打开，并抓住了这个士兵的前胸。“你进来。”司令说道，并让他爬进窗子。司令将他赶到前面的角落，站在他面前问道：“你是谁？”“没什么。”士兵恐惧地说。“这等一下再说，”司令说，“你为什么朝里看？”“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还在这里。”

2月12日。我总是遇到拒绝的形象，不是那个说“我不爱你”的她，而是说这些话的她，“你不可能爱我，你是那么地想做到这点，你不幸地

爱着我的爱情，而我的爱情却不爱你。”因此，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体会“我爱你”这句话了，我只是体会到等待着的寂静了，这寂静被我的“我爱你”打断了，多不该啊，我只是体会到了这一点，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乘雪橇滑雪时的恐惧，在光滑的雪地行走的胆怯，我今天读到一个小故事，又将这长长的没有遮蔽而不断逼近的思想引出来。是不是不只是那极度的自私，围绕着我的恐惧，虽然不是围绕一个较高的我的恐惧，而是围绕着我平庸的舒适的恐惧，是我衰落的原因，如此确凿无疑，使我从我自己的身上送出了报复者（一个特别的我：右——手——不——知道——左——手——干——什么）。在我的办公处总是指望，就好像我的生活明天才开始，可是我现在就完了。

2月13日。完全倾心服务的可能性。

2月14日。驾驶我舒适感的力量，我的昏厥没有舒适感。我不认识任何人，在这里也许两个人是那么高大。因此，我建造的一切都是易变的，不能持久的，房间的女佣早就忘了给我弄来热水，将我的世界搞得阴阳颠倒。与此同时，这种舒适感一直追踪我，而且不仅夺去了我的力量，去忍受别的事情，并且也夺去了创造舒适感本身的那种力量，这种舒适感要么在我身边自己消除，或者我通过乞求、哭泣、放弃更为重要的事情来达到它。

2月15日。在我的下面有小声的歌唱，在走道上有轻轻的敲门声，而一切都无望了。

2月16日。冰川裂隙的历史。

2月18日。剧院经理，他基本上必须自己去创造一切，第一他甚至必须要创造演员。他不接待一个观众，他忙于重要的剧院工作。那是什么呢？他给一个未来的演员更换尿布。

2月19日。众多的希望？

2月20日。觉察不到的生命，显而易见的失败。

2月25日。一封信。

2月26日。我承认这点——我向谁承认呢？向信？——在我的身上

有希望，很近的希望，我还没有认识到的希望；但只能找到通往它们的路，如果我找到了这条路，冒着风险！这意味着很多，有希望，这甚至意味着，从一个无赖可以变成一个正派的人，一个在正直中感到幸福的人。

在最后时刻你半睡眠中的幻想。

2月27日。下午糟糕的睡眠，一切都变了，苦难又逼近躯体。

2月28日。目光射向塔顶，朝向蓝天。安详地。

3月1日。《理查三世》。无力。

3月5日。三天躺在床上。一小群人站在床前。骤变。逃避。彻底的失败。总是关在房间里的世界历史。

3月6日。新的严重和困倦。

3月7日。昨日最糟的晚上，这样，就好像一切都完了。

3月9日。但这只是困倦，可今天是从额头上驱下汗珠的新的袭击。这也许就好像人们自己在自己的身边窒息？如果通过紧迫的自我观察，人们涌向世界所穿过的洞口太小了，或者是完全关上了？我从那儿到洞口是不远的，一条回流的河，这大部分长时间以来已经发生。

利用攻击者的马作自己的坐骑。唯一的可能性。但这要求怎样的力量和灵活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灌木的生命。妒忌幸福的，取之不竭的，却是明显从困境（并不异于我）出发工作着的，但总是在满足着敌人所有要求的大自然。而且是那么轻松，那么有音乐性。

早先，如果我有了痛苦，并且痛苦消逝了，我是幸福的；现在我只是感到轻松，但有这种苦涩的感觉：“又只是恢复健康，便什么也不是了。”

帮助不知在什么地方等待着赶牲口的人驾驭我而去。

3月13日。纯粹的感觉和对它缘由的清晰。孩子们的目光，特别是一位端庄的小姑娘（行走，黑色的短发），以及另一位小姑娘（金黄色

的头发，不清楚的表情，不清晰的微笑），令人高兴的音乐，行进的步伐。一个在困境中人的感觉，援助出现了，但他并不高兴，因为他获救了——他根本没获救——而是因为新的年轻人来了，满怀信心地、有准备地接受这个战斗，虽然对有关即将面临的是什麼一无所知，但那是在一种并不让旁观者失望、而将他带至欣赏、欢乐、流泪境地的无知状态之中。仇恨战斗所针对的事物也掺和进来（但很少犹太的感觉，如我相信的那样）。

3月15日。异议取自这部作品：大众化，虽然带着欢乐——和魔法，就像他从危险旁边走过（布吕埃尔^[118]）。

逃进一块被占领的土地，便马上感到不堪忍受，因为人们无法逃往任何地方去。

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迫在街道上转来转去，并跟人交谈。

3月20日。吃晚饭时聊到凶手和绞刑，莫名其妙的在静悄悄呼吸着胸腔中的每个恐惧。在已经完成和已经策划好的谋杀之间有莫名其妙的区别。

3月22日。下午。梦见面颊上的溃疡。不停颤动的在一般生活和表面上真实可怕之间的界限。

3月24日。怎样地等待啊！例如在去医生那里的路上，在那里是如此常见。

3月29日。在大河里。

4月4日。从内心的苦难到一个场景的路也许是多遥远啊，如庭院中的路，而归去的路却是多么短促啊。因为人们如今就在故乡，他不能再离去了。

4月6日。两天以来就已经预感到了，昨日一场逃跑，继续的追逐，敌人的强大力量。机会之一：跟母亲的谈话，未来的玩笑。——筹划了给密伦娜的信。

三位复仇女神。逃进小树林。密伦娜。

4月7日。展览会上的两幅图画和两个硬陶土塑成的人像。

童话里的公主（库宾），光着身子躺在长沙发上，目光朝着打开的窗子，强烈拥进来的景致，以它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由自在的空气就像在施温德的画面上一样。

裸体的小姑娘（布鲁德尔），德意志波希米亚风光，她以她的、对每一个其他的人来说是不可接近的优雅，深深地感动着一个正在爱着的人，高贵、自信、妩媚。

彼契：坐着的农家姑娘，一只脚在下面，享受着恬静，弯曲着的节骨；站着的少女，右臂在腹部之上围绕着身躯，左手支着下巴托住脑袋，鼻子平平，脸孔带着憨厚而忧郁独特的表情。

施托姆的信。

4月10日。走向地狱的五条引句：

1.“在窗户的背后是最肮脏的事情。”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是天使般纯洁美丽，要么坚决，要么不注意地（较多的情况）默默承认。

2.“你必须占有每一个姑娘！”不是像登徒子那般，而是如魔鬼的说法“性欲的标记”。

3.“你不可占有这位姑娘！”因此你也不可以做那事情。天上的摩尔根纳^[119]仙女在地狱。

4.“一切都只是生计之所需。”因为你有这生计之所需，你才满意。

5.“生计之所需是一切。”你怎么可能拥有一切呢？因此你连这个生计之所需也拥有不了。

在年轻的时候，我（如果我不是用暴力遇上性的事情的话，这事情也许会搁很长时间的）在性的事情方面是那么无辜，并那么不感兴趣，就如今天大概在相对论那里一样。只是一些小事情（但也是刚刚在清楚教训之后的小事情）曾经引起我的注意，大约是，正是那些在我看来在街上显得最美的和穿得最美的女人才可能是坏女人。

永远年轻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没有其他的阻碍，自我观察使它变为不可能。

4月13日。马克斯的悲伤。上午在他的办公室。

下午在泰因教堂前面（复活节星期天）。

年轻的小姑娘，18岁，从侧面匆匆地看了一下她的鼻子、头形、金黄色的头发，她从教堂走出来。

4月16日。马克斯的悲伤。和他一起散步。他星期二动身。

4月27日。昨日马卡比姑娘在《自我防卫》^[120]打电话：“我来帮助你。”清纯热情的嗓音和语言。

紧接着M.打开门。

5月8日。用犁的工作。他深深地钻入自己，并轻松地行驶而去，或者他只是划伤土地，或者他空空地用拉高的微不足道的犁头引驶，有它或没有它，无关紧要。

工作结束，就像一处没治好的伤口能愈合一样。

如果别人沉默，以及有人为保持住这场交谈的表面而欲取代别人，就去模仿，就是讽刺地去模仿，这也叫进行了一场交谈么？

M.在这里待过，再也不来了。大概是聪明和正直，但也许还有一个可能性，我们两个守着这个可能性关闭的门，这个门却并不自动打开，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没有打开这扇门，因为它独自是不会开的。

5月12日。《传道者》。不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样子，在这当中有一次一种瞬间减慢着变化力动人的外貌。

出自《朝圣者卡马尼塔》、出自吠陀^[121]。恰如，噢，可敬的人，一个男子汉，他们将他蒙住眼睛从甘特哈勒的乡村带过来，然后丢放在荒野，驱向东方或者北方或者南方，因为他是被包扎着眼睛带来的，而且被包扎着眼睛放走的；但在某一个人将他的绷带拿掉后，并跟他说道：“从那儿出去，甘特哈勒人住在那里，从那儿走出去。”从村庄到村庄，继续地走下去，接受着教训，理智地回到甘特哈勒人那里。还有一个男子，在这个人世间找到了一个老师，他逐渐意识到：“我将注定要这么长期地在这世界上流浪，直到我被拯救，然后我才能回到故乡。”

就在那个地方：“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还在自己的躯体内，人与上帝都看到他，但当他的躯体瓦解在死亡中之后，人与上帝就再也看不见他了。而看着一切的大自然也再看不到他，他灼瞎了大自然的眼睛，他在罪恶中消失了。”

5月19日。两个人的时候，他感觉比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还要孤独。如果他与两人中的某一人在一起的时候，这第二个人就会抓住他，而他无助地任他摆布。如果他独自一人，虽然整个人类都要逮住他，但无数伸出的手臂纵横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就没有人找到他了。

5月20日。在旧城环形大道上的共济会成员。每一个演说和学说可能的真实性。

那个短小的、脏兮兮的、赤脚的小姑娘，穿着小衬衣，头发飘动着。

5月23日。关于某一个人这样说是不对的，他获得这个是容易的，他没遭到什么苦难；比较正确的是他是这样，他不可能遭遇到什么；最正确的他遭遇过一切，但一切均在共同的仅仅一次出现的瞬间，还有什么能在他的身上发生呢？因为苦难的变化在现实中，或者通过它绝对的命令已经完全地精疲力竭（两个年老的英国妇女在坦因^[122]那里）。

6月5日。迈塞尔贝克^[123]的葬礼。

对《缀补的工作》表现的天才。

6月16日。在说到这本书时，除了无法克服的布吕埃尔思想上和幻景中的力量造成的困难外，人们还因此而陷入一种困难的境地，人们几乎在每一条简短的评语中奇怪地容易受到嫌疑，人们想嘲弄地将这本书的思想搁在一边。即使人们像我一样由于这本书离开虚无比离开嘲讽更远，人们仍会受到这种嫌疑。这种讨论的困难在一种又是布吕埃尔不能克服的困难中有着一个对立面，他称自己为一个没有仇恨的排斥犹太人者。客观而公正的，他确实就是这样的，但几乎在每一个评论中他很容易引起嫌疑，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敌人，不论是在幸福的仇恨中，还是在不幸的爱情中。这些困难就像大自然的现实一样互相对立地存在着，这是必然要对它们加以注意的，好让人们在仔细思考这本书的时候不遇到这些错误，并从开始就不使自己无能为力地继续深入下去。

从数量上归纳，根据经验，按布吕埃尔来说，人们不可以反驳犹太教，这股古老的排斥犹太主义的波浪面对犹太教不可能掀起来，人们可以如此地反驳所有其他的民族，犹太人这个被精选的民族可不行，犹太人有资格将可以逐条地回答所有排斥犹太人者的每一个谴责。布吕埃尔提供了一个诸如此类的个别谴责及其回答的自然是十分粗略的梗概。

倘若这种认识涉及犹太人，而如果不是涉及其他民族，那是深刻而实在的。布吕埃尔从这个认识里得出两条结论，一条整体的和一条不完整的……〔中断〕

6月23日。普拉那[124]。

6月27日。攻击。昨天带狗散步。赛德勒要塞。森林出口处的教堂林荫大道，它几乎产生一个房间隐秘的感觉。丈夫和妻子从田野归来。在衰颓院子的破旧房门口里的姑娘，无辜而目不转睛的畜生的目光，好像是在同她的胸乳搏斗。戴眼镜的男人，驾着那辆装着沉甸甸饲料的小车，不很年轻，发育有点儿畸形，虽然如此，但由于努力仍然保持挺直，穿着长筒靴子，女人拿着镰刀，一会儿并排，一会儿一前一后。

9月26日。两个月没有写日记了，随之中断而来的好时光，这个好时光要归功于奥特拉。一些天来又出现虚脱。它出现的第一天在森林里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

11月14日。晚上37.6℃，37.7℃。坐在写字台旁。什么也没完成，几乎上不了街道。不能假仁假义，埋怨疾病。

12月18日。整个时间都躺在床上。昨日读《不是——就是》[125]。

1923年

6月12日。最后一些可怕的时间，无以数计，几乎是连续不断。散步、黑夜、白日，对一切都无能为力，除了对痛苦。

却仍然，不是“却仍然”，你看着我如此恐惧和紧张，在我面前的那张风景卡片上的克里察诺夫斯卡亚。

在写下东西的时候，感到越来越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字，在精灵的手里翻转——这种手的翻转是它独特的运动——变成了

矛，反过来又刺向说话的人。像这样的一种短评完全是特殊的，而且如此永无止境。安慰也许只是：不管你想或是不想，这发生了。而你想到的是什么，只是看不出有多少帮助。比安慰更多的是：你也有武器。

[1]与当时“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布拉格“德意志剧院”演出有关。

[2]德国化了的匈牙利人。

[3]见12月16日日记中对豪普特曼的《比绍夫斯堡的处女们》的评论。

[4]法国浪漫主义诗人（1810—1857年）。

[5]17世纪后半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最有代表性的作家（1639—1699年）。

[6]诗人，当时是法国驻布拉格领事。卡夫卡并不认识他。

[7]翻译家、作家，曾在柏林、布拉格做编辑，死于1949年。

[8]德国著名剧作家、抒情诗人（1813—1863年）。

[9]歌德的作品。

[10]德国小说家（1879—1951年）。

[11]豪普特曼（1862—1946年）的喜剧。

[12]盲诗人，卡夫卡的好友之一，死于1940年德国占领的布拉格。

[13]这最后一段是卡夫卡划掉了的。

[14]卡夫卡对1910年巴黎旅行的回忆。

[15]德国戏剧家、小说家（1777—1811年）。——译者

[16]德国抒情诗人、小说家（1867—1918年）。——译者

[17]1911年出版的小说，出版者为马克斯·勃罗德。

[18]此句是鲁道夫·施泰纳的一本书的标题。

[19]法语，再见之意。——译者

[20]波斯恶魔名，即黑暗之神。——译者

[21]这段文字属1910年7月至1911年2月之间叙述的部分。

[22]赎罪日前夕开始的祈祷。

[23]希腊神话中主宰森林畜牧之神。——译者

[24]卡夫卡当时实际年龄是28岁。

[25]萧伯纳。——译者

[26]马克斯·勃罗德的兄弟，诗人。

[27]马克斯曾与埃尔莎·陶西格（即T.小姐，后与马克斯结婚）小姐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就是后面说的《理查德和萨穆埃尔》。

[28]威廉·舍弗尔的小说，卡夫卡原来很尊重这位作家，可惜这位作家后来同情纳粹了。

[29]这一段，卡夫卡曾去掉第一句，作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以《巨大的喧嚣》为题在《赫尔德尔》刊物上发表。

[30]在耶路撒冷一大学任哲学教授。

[31]此篇在卡夫卡第一本书《观察》中作了更改和缩写。

[32]此段与法学考试前的学习有关。

[33]哲学家，大学教授。卡夫卡在文科中学时代的同学。

[34]指艾贡·埃尔温·基施的兄弟保尔·基施。

[35]一种玩具。

[36]东方民族的一种诗体，由一些对句构成，全诗用同一韵脚。
——译者

[37]意大利民歌的一种形式，由三个诗行组成一个诗段，第一行与

第三行押韵。——译者

[38]18世纪东欧犹太人发起的宗教运动。——译者

[39]厚墙的窗洞。

[40]马克斯·勃罗德的妻子。

[41]哲学家菲力克斯·韦尔奇。

[42]航行船只后面水面上形成的水流，也称航迹。

[43]埃米尔·施特劳斯的小说。

[44]见《突然的散步》。

[45]卡夫卡的外甥。

[46]天主教圣徒，为弓箭所射死而殉教。——译者

[47]奥尔孚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

[48]如：托马斯公司原为海因茨公司。

[49]马克斯·勃罗德的小说。

[50]指卡夫卡的小说《失踪者》。

[51]德文中用“你”相称，表示关系亲近。——译者

[52]这期间（6月28日至7月29日）卡夫卡去魏玛和哈尔茨作度假旅游。

[53]指《观察》，1913年初出版。

[54]卡夫卡两天前认识的菲莉斯·鲍威尔小姐。

[55]马克斯·温特尔菲尔德的一部小歌剧的标题。

[56]一种犹太战士的种族名。

[57]恩斯特·魏斯，小说家、剧作家，1933年流亡法国，德国占领巴

黎时自杀。

[58]丹麦哲学家（1813—1855年）。

[59]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她的回忆录是卡夫卡爱读的一本书。

[60]指《变形记》。

[61]伪善者。——译者

[62]著名的新闻记者阿诺尔德·霍尔里格尔。

[63]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民族。——译者

[64]布莱塞·帕斯卡尔（1623—166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译者

[65]后文中提到的丽丝尔，A.的未婚妻。

[66]莱辛剧本《明娜·冯·巴尔赫姆》中的人物。

[67]卡夫卡的姐姐。所说的书是奥斯卡·鲍姆的小说。

[68]法国地名。——译者

[69]波西米亚之城名，在德国东南部，以矿泉疗养著名。——译者

[70]捷克作家、历史学家。

[71]奥地利小说家，其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享有国际声誉。
——译者

[72]这段内容为一些年后小说《城堡》的写作准备。——原注。已编入第一卷即《短篇小说集》，此略。——编者

[73]旧时的银币名。

[74]这里讽刺P.无知地将名画家阿尔弗雷德·库宾与当时黄色书插图作者马尔吉斯·巴罗斯作比。

[75]布拉格市郊的一家剧院。

[76]这里也预言了卡夫卡后来葬在他双亲的墓地。

[77]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78]F.（菲莉斯·鲍威尔）的朋友格雷特·勃洛赫。

[79]指埃尔娜·鲍威尔，她与菲莉斯·鲍威尔是姐妹。

[80]瑞典戏剧家、小说家（1849—1912年）。——译者

[81]指小说《诉讼》。

[82]这篇小说已编入第一卷《短篇小说集》，此略。——编者

[83]有几页被撕，……下面是某些不全部分。

[84]约瑟夫·波拉克，瓦莉的丈夫，卡夫卡的姐夫，从前线回来。

[85]马克斯·勃罗德的母亲。

[86]保险公司名，卡夫卡最初工作的地方。

[87]在布拉格附近。

[88]1911年去苏黎世偶然结识的一位小姐。

[89]战争年代或困难时期购买面包的票证。

[90]马克斯·勃罗德未完成的小说。

[91]小说《失踪者》中的人物。

[92]小说《诉讼》中的人物。

[93]18世纪产生的东欧犹太人教派的法师。——译者

[94]卡夫卡的外甥女，埃莉的女儿。

[95]红十字组织在布拉格附近为市民参观提供的标准战壕样式。

[96]卡夫卡的青年朋友。

[97]来自华沙，是个年轻的逃兵，很有才智，与勃罗德等交往甚密，战争中死于肺结核。

[98]卡夫卡曾作过关于他访问M.—T.夫人的诙谐报道，他后来后悔那种不怀恶意的嘲讽。

[99]出身于布拉格虔诚家族的犹太教法典学者。

[100]这里暗示亚伯拉罕为燔祭献其子以撒的故事。

[101]给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102]1916年10月30日后到1917年4月6日前的日记记在另外的大本子里，那里包含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片断、反思等，几乎与每天的事情无关。

[103]布拉格的诗人。

[104]这期间，卡夫卡首次查出肺结核，决定与菲莉斯·鲍威尔解除婚约，迁往奥特拉住处（离卡尔斯巴德50公里）度假。卡夫卡于1917年9月12日开始这次旅行。

[105]卡夫卡的外甥，埃莉的儿子。

[106]卡夫卡第二个未婚妻，卡夫卡与她的关系只持续了半年。

[107]卡夫卡当时正读汉姆孙的小说《大地的祝福》，他很喜欢并欣赏这位诗人。

[108]后面许多页均被作者撕掉销毁。

[109]即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捷克女作家，1939年死于集中营。

[110]巴勒斯坦及叙利亚沿海地区名。

[111]捷克先锋运动杂志。

[112]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

[113]希腊传说中的暴君，死后被宙斯处罚推石上山，当推至山顶，石头又滚下，于是再推，如此循环不息。——译者

[114]写给密伦娜·耶申斯卡。

[115]卡夫卡的舅舅，卡夫卡母亲的一位兄弟。

[116]引自《乡村医生》。

[117]是卡夫卡小说《诉讼》中主人公，写于1914—1915年，在卡夫卡生前并未发表。

[118]《赛塞西奥·尤达伊卡》的作者。

[119]法国古代传说中的仙女。——译者

[120]布拉格的犹太复国主义周报。

[121]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译者

[122]法国历史学家。

[123]捷克著名雕塑家。

[124]卡夫卡在奥特拉疗养的地方。

[125]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作品。

旅游日记

孙龙生 译

弗里德兰、赖兴贝格^[1]之旅

1911年1月、2月

我也许得整夜忙于复写，在我面前有着那么多的东西，但那只是不清纯的东西。据我回忆在我早先用一种转变，一种小小的、就本身而言还是令我幸运的转变能够逃避它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威力通过我而得到这些东西的呢！

车厢里赖兴贝格的犹太人一开始只是用小声的喊叫越过快车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快车是按车票的票价而定的。在这个时间里一个干瘦的旅行者——人称他为不可靠的人——狼吞虎咽地啃着火腿、面包和两根香肠，他用一把刀子切穿香肠的外皮，直至他最终将所有的残余和废纸扔到暖气管后边的长凳下面。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以那种没有必要的、令我那么同情的，但徒然模仿的热情和匆促朝着我翻动着两份晚报。他长着一对招风耳、有点宽平的鼻子，并用有力的双手揩拭着头发和面孔，将自己整干净些，这也是我所不能这样做的。

在我对面一位细声细语的、听力很弱的先生，留着山羊胡子，并不暴露真面貌，先是用一种轻蔑的表情对着这位赖兴贝格犹太人悄悄地嘲笑，这个时候，我一直带着一些反感，但出自一种不知怎么的尊敬，在领悟之后，便通过目光参与进去了。后来清楚，这位读星期一报的人，正吃着什么东西，在一个站头买了葡萄酒，并照我的样子一口一口地喝，实在没有多少价值。

还有一位年轻且红红面颊的小伙子，他一直在读着《趣事报》，而且毫无顾忌地用手将报纸扯起来，并将它最终用那种一直令我钦佩的闲散人的认真折叠起来，就好像那是一块丝绸，使劲地压紧，从里面压角，从外面固定，叩击着平面，塞进胸前的口袋里。大概他到家还要读吧。他在什么地方下车的，我不得而知。

在弗里德兰的饭店。大大的客厅。我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稣，那里大

概根本没有。——没有抽水马桶，暴风雪是从下面上来的。有一段时间，我是唯一的客人。左右附近绝大多数的婚礼都在饭店里举行。我记不清了，有一次早晨在婚礼之后我朝大厅里看了一眼。在门厅和走道里到处都很冷。我的房间在房子进口的上面；每当我看到底层的时候，寒冷马上向我袭来。在我房间的前面是一种门厅式的次等房间；那里桌子上的花瓶里插着两束从一次婚礼中留下来的花。关窗户不用把手，而是通过上下的钩子。现在我突然想起，我曾听到过音乐，只是一小会儿。客人的房间里没有钢琴，可能是在那种举行婚礼的房间里有。每当我关上窗户的时候，我看到在另一边的市场上有一家精美的食品店。取暖用大木块。那房间里的女仆有着一张大嘴，有一次尽管寒冷她还是露着脖子和部分酥胸；一会儿拒人于千里之外，一会儿令人吃惊地表现出亲密，我总是马上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而且像绝大多数在所有友好的人面前那样窘促不安。当我为了下午和晚上的工作而配上了一只较强光度的白炽灯时，她在取暖时看到了这个，她表现得很高兴。“是的，用早先的灯光，人们也许无法工作。”她说。“在这种光亮里也不能工作。”我在几次大声说话之后说道。我觉得她是怎样的发窘，可惜总是表现在嘴上。别的都不知道了，只是说出我早已经背熟了的见解，电灯光不仅太刺眼，而且也太弱。她继续默默地在那里取暖。直至当我说“此外我只点过早先的灯，越来越亮”，她有点儿笑了，我们看法相同。

相反，我会这样一些事情：我总将她当小姐对待，她对此也适应了；有一次我在一般不是通常的时间回家，我看见她在寒冷的门厅洗地板。这个时候我一点也不费劲地通过问候和取暖的邀请，使她毫不感到难为情。

从拉斯佩瑙到弗里德兰的归途上，在我旁边的是那位僵直得像死一般的人，胡子从张开的嘴巴上面耷拉下来，而当我向他询问车站时，他便友好地转向我，给了我清楚的解答。

弗里德兰的宫殿，可以从好多的角度去看它：在平地上看，从一座桥上看，从公园里去看，从脱落了叶子的树木之间去看，从森林里的高大冷杉之间去看。这座令人吃惊的重叠建筑的宫殿，如果人们踏进宫里，就会觉得它长期没有整修了，因为深色的常青藤、灰黑色的城墙、白皑皑的积雪、覆盖在山坡上的蓝灰色的冰，增加了它的多姿多彩。这座宫殿正好不是建筑在一座宽阔的山峰上，而是由陡峭山峰改建的。我沿着车行道朝上走，并不断地朝下滑，而那个看门人，我后来在上面又

碰到了他，他很轻松地跨着两级阶梯走上去了。从一块尖状而突出的小场地上远眺，一切尽收眼底，随处都长着常青藤。城墙旁有一个阶梯在一半的高度突然中断，荒废吊桥的链条垂挂在钩子上。

美丽的公园。因为它是坐落在梯田式的山坡上，当然还有下面的部分围绕着一泓水池，水池旁树木错落有致，人们完全无法想象它夏天的风采。在冰冷的水里游弋着两只天鹅，有一只将它的脖子和脑袋伸进水里。我跟着两个小姑娘，她们一直不安而好奇地环顾地朝我这个不安的人、好奇的人、此外还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看。我让她们领着，沿山越过一座桥，一片草地，在一条铁路路堤之下穿过一间令人惊奇的、由树林的坡地和铁路路堤构成的圆形小屋，继续向高处进入一座似乎并不马上就能走到尽头的森林。就好像我对这座森林深感兴趣似的，那两位姑娘先是放慢了脚步，后来她们走得快些了，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一块高高的山地，随着强劲的风，我们竟被吹得后退了好几步。

皇帝的景观。在弗里德兰唯一的享受。如果说我在这里并没有惬意的舒适感，因为我对如此美好的安排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就像是我在那里遇上似的，穿着沾满雪的靴子进来了，现在，坐在望远镜前，只是用脚尖触及地毯。我忘记了这个景观的安排，我有好一阵子害怕，一定要从这个椅子走向另一个椅子。一个老者坐在灯下的小桌子旁边，读着一本《世界画报》，他掌管一切。过了一会儿，有人为我表演一种阿里斯通。后来还来了两个年纪较大的女子，坐到了我的右边，后来又有一个坐到了我的左边。布累细亚，克累莫那，维罗那。里面的人像蜡像，脚掌牢固在石子路里。墓碑：一个穿着长拖裙曳过低低台阶的夫人轻轻地开着门，同时还回过头来看着什么。一个家庭：最前面，一个少年在看书，一只手靠着太阳穴，右边一个小孩拉着一张没弦的弓。英雄铁托·施佩里纪念碑：在风中，披在躯体上的衣服凄凉而热烈地拂拭着，穿一件上装，戴一顶宽扁的帽子。这些形象比在电影里更生动，因为他们的目光有着现实的安详。电影给人留下的是人物动作的不安，目光的安详看来更为重要。大教堂的光滑的地板令人咋舌。为什么在这个方式里没有运动和立体镜的统一？写着“彼尔申·维勒尔”的广告牌，来自布累细亚^[2]，很有名。在单是叙述的高度和景观的观望点之间的距离要比在最近的观望点和真实的观望点之间的距离大得多。克累莫那古老的铁器市场。如果我想在结束时跟那位老先生说，这使我多么地满意，我不敢这么做。看完下一个景点。从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开放。

我在书店的陈列橱里发现了丢勒^[3]联盟中的《文学指南》。决定买下它，后来又改变了这个主意，紧接着又回去，在此期间，我白天一有空便常常停立在橱窗前面。这书店在我看来是那么孤零零的，书是那么孤零零的，我只有在这里感觉到世界与弗里德兰的内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那么单薄。但如每一种孤独又为我制造出热情一样，这么说，我也极快地感觉到这个书店的幸运。有一次我走了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因为那里的人们不需要科学方面的著作，这里的书架看上去比在城里的书店里几乎更有文学气氛。一位老夫人坐在一只绿色罩子的白炽灯下。刚打开的四五本《艺术保护者》使我回忆起来，那时间是月初。这个妇女拒绝我的帮忙，将这本她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书从陈列的地方抽出来，将它交到我的手上。她惊奇我在结了冰的玻璃后面发现了这本书（其实我早就见过了），并开始商业簿里寻找价钱，因为她不清楚这个，而且她丈夫已走了。我说我过会儿晚上再来（那时正是下午5点钟），但我没有信守我的诺言。

赖兴贝格。

对于那些人要在晚上迅速在一个小城市里匆匆走一下的人的真正意图，人们根本莫名其妙。如果他们住在城外，那么他们必须乘电车，因为路程太远了。如果他们就是住在本地，那么路程自然是不远的，没有理由要迅速地走一下呀。人一伸出腿就能与这个环形的广场相遇，它对一个村庄来说并不太大，而且它的市政厅由于其令人吃惊的范围使这个广场变得更小了（市政厅以它的影子就足以将这个广场遮盖住了），而人们并不想从市政厅的大小来相信这个小小的广场，而且要用广场的狭小来说明有关它的范围的第一印象。

一位警察知道工人疾病保险机构的地址，另一位却不知道这机构的办事处在什么地方，第三位竟连约翰内斯大街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解释的，他们才上岗不久。为一个地址，我不得不走向一个警察亭，那里有很多警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休息，他们都穿着制服，它们的美、新和色彩令人惊异，因为人们一般在街上到处见到的只是深色的冬大衣。

在狭窄的胡同里只能铺单一的轨道，因为到火车站的电车走另外的街道，而不是从火车站来的那条道。从火车站穿过维也纳大街，我在那里住进了橡树饭店，通过舒克尔大街到火车站。

三次去剧院。《大海和爱情的波浪》。我坐二楼的楼座，一位出色的演员扮演瑙克勒罗斯引起了格外的轰动，我的眼睛里多次充满了泪水，就这样到第一幕结束，英雄和利昂德的眼睛还没有能互相分开。英雄踏出教堂的门，通过这扇门人们看到的東西，不是别的，而可能是一只冰箱。在第二幕里森林像在早先的精装本里一样，一直伸至核心，藤本植物从这棵树攀缠到另一棵上。到处长满了苔藓，呈现一片深绿。钟楼房间背景的墙在《杜德尔萨克先生》^[4]里以后的一个晚上又回来了。从第三幕起是剧本的低潮，就好像是有一个敌人从后面来似的。

卢加诺—巴黎—埃伦巴赫之旅

1911年8月、9月

1911年8月26日启程。中午。不好的想法：同时交替描写旅途和内心涉及这个旅行的看法。这种做法的不可能性被一辆驶过载着农民妇女的车子证实了。英雄的农妇（特尔斐^[5]女预言家）。一个闪烁着眼睛的农妇躺在一个开怀大笑的农妇怀里。通过对马克斯致意的描述，也许是人为的仇视进入了描写。

一位姑娘，后来的阿丽丝·R.，在比尔森上车。在行程中订咖啡要贴一张绿色的小字条在窗户上让老板知道。但人们一定不要用条子去取咖啡，而且也拿不到。我先没有看见她，因为她坐在我的旁边。第一个共同的事实：她包好的帽子朝马克斯身上飞下。这一下子，好多的帽子重重地通过车厢的门进来了，又轻轻地通过大窗子出去了。——马克斯看来打断了后来描述的可能性，他作为已婚的男子，为了消除危险，必须说点儿什么，在这当中他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却突出了教训人的东西，而且有点儿讨厌。——“无可指摘的”、“开火”、“加速0.5”、“及时的”。办公室里最小的小鸟（在办公室里更换帽子，钉上新月状的钩子），我们的玩笑用她将要在慕尼黑写信的明信片从苏黎世寄到她的办公室，明信片上是这样说的：“预先说过的话可惜应验了……错误的列车……现在在苏黎世……失去了两天的郊游。”她的兴奋。但她希望我们这些正直的人，什么也不用再写了。慕尼黑的汽车。阴雨、迅速的行驶（20分钟），地下室住房往外看的景色，导游喊叫着看不清楚的名胜古迹的名字，空气力学原理在潮湿的沥青上发出的沙沙声响就像机器在电影摄影机中发出的响声，最清楚的是四季不挂窗帘的窗户，灯光在沥青上的反射与在河里一样。

在慕尼黑火车站的一个“盥洗室”里洗双手和脸。

将箱子留在车厢里。将阿丽丝安排在一个车厢里，这里面一位夫人肯定比我们还更为害怕，这位夫人表示愿意保护她，这举动被热烈地接受。可疑的。

马克斯在车厢睡觉。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神秘兮兮地大笑不止。有一次是出于马克斯不让他坐（他四肢伸展得过分了）他为此而大笑，即他要利用一瞬间的时间，彻底宣泄一下他自己。马克斯穿着有披肩的大衣端坐不动，另一位身强力壮的法国人抽很多烟。夜里用餐。三个瑞士人闯入，一个吸着烟。后来在另外两个下车后留下来的那一个，先是轻描淡写，直到将近早晨的时候才说清楚自己。菩登湖^[6]。像从码头上看去那样轻盈。——第一个早晨时光里的瑞士兀立在那里。我将马克斯从凝视一座（桥的画稿）桥的时候唤醒，并因此给我留下了对瑞士的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尽管我已经长时间地是透过从内在到外部的朦胧去看它的。在圣，加伦，那种没有胡同结构直立、自成一体的房子给人留下了印象。——温特图尔。——在符腾堡照得通亮的别墅，男子在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扒在屋顶阳台的栏杆上。通向书房的门开着。——已经醒来的牛待在睡着的瑞士。——架电话线的电线杆，挂衣钩的横截面。——苍茫的高山牧场在太阳升起时候的景象。对有如监狱的卡姆火车站建筑的回忆，卡姆的题词用严肃的圣经阐述。窗户的装饰看来虽然显得可怜，但仍违反规定。在大房子的两扇互相隔离得很远的窗子里，那里映着一棵大树，这里映着一棵小树，彼此在风中摆动。

在温特图尔火车站的流浪汉一手拿着小棍棒，一手插在裤袋里，嘴里还唱着歌曲。

在窗子里的疑问：苏黎世这个瑞士的第一大城市会是怎样由那些单独的房屋建筑构成的呢？

别墅里繁忙的商业活动。

夜间，在林荫道的火车站，歌唱不断。

爱国主义统计：一个在平面上被东拉西拖的瑞士的面积。

外国的巧克力商店。

苏黎世。

从最后回忆的一些互相交错走向的火车站里突现出来的火车站——（马克斯将这看作是占有中的A + X）[7]。

外国军队留下的历史印象。在自身的——反对军国主义的论证中缺少这种印象。

在火车站保卫苏黎世。我们害怕武器的射击，如果它们开火的话。

买了苏黎世的地图。

在一座桥上走去、又走回，是因为有关洗冷水澡、热水澡和早餐时间安排没有决定的缘故。

利马特方向，乌兰尼亚天文台。

主要交通干线，电车上乘客稀少，在一家意大利的男子时髦用品商店橱窗里显眼的地方，衣领堆成了金字塔。

只有艺术家的广告牌（疗养宾馆、维干德的《马里格那诺》会演，叶尔莫里的音乐）。

一家百货公司的扩建。最好的广告。全体居民终年注视着。（杜法伊尔。）送信人穿着接近南方和西方带有帽子的风衣看上去像穿着睡衣似的，将小箱子拿到自己的面前，把信件整理得就像圣诞节市场上的“信袋”，层层叠叠堆得好高。湖面的景色。想象作为这里的居民而具有强烈的星期日感觉。湖泊保持着清新的空气，没有建筑的施工。骑马人。被惊走的马。有教育意义的题词，泉边大约是利百加的浮雕。题词和浮雕在流动的水被强力吹起的玻璃似的形状上面显得格外宁静。

旧城：狭窄陡峭的街道，一个穿蓝上衣的男子正困难地往下跑。在山间的小道之上。

回忆起受到交通威胁的在巴黎圣·罗歇前面的厕所。

在没有酒的饭馆里用早餐。黄油像蛋黄。《苏黎世报》。

明斯特大教堂，是旧还是新？男人们站在一旁。教堂的差役给我们指点三个较好的位置。我们跟着他，因为那是我们走出的方向。当我们

已经走到出口的时候，他还以为我们找不到位置，便横穿教堂朝我们走来。我们互相推挤着走出去，大笑不止。

马克斯：交杂的语言溶解了民族的困难。沙文主义者也无法知其所以然了。

苏黎世浴场：只是男人的浴场。一个挨着一个。瑞士语言：是用铅浇铸的德语。有些地方没有小房间，在挂衣钩前脱光衣服的共和国体制的自由，同样也有游泳教练的自由。用一个水龙头就把那个满满的日光浴池水放得一干二净。这腾空的做法比语言不可理解不是没有道理的。跳水者：他用在栏杆上叉开的双脚先跳到跳板上，以此来提高推动力。——建立一个浴场要在较长期的使用中才能做出评估。没有游泳课。任何一个蓄长发的疗养行家都表现孤独。低矮的湖岸。

军官交际团的露天音乐会。在听众中有一个带着同伴的作家，他在了一本小横线笔记本上写着东西，在一个节目结束后，被他的同伴拉走了。

没有犹太人。马克斯：犹太人躲避这种大的活动。开始是意大利枪队进行曲。结束：爱国进行曲。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在布拉格没有露天音乐会（卢森堡公园），按马克斯的意思是共和体制的。

凯勒^[8]的房间被阻隔了。交通办公室。阴暗街道后面的光亮的房屋。利马特河右岸的阶梯房屋。闪烁着蓝白颜色的百叶窗。慢慢行进的士兵是些警察。音乐厅。找不到而且也没找到综合性技术学校。市政厅。在二楼用午餐。迈伦的葡萄酒。（消毒过的葡萄酒）一位卢塞恩的女招待向我们说去那里的列车。用西米、菜豆、烘烤过的土豆和柠檬奶酪做成的豌豆羹。——整洁的、如工艺美术品那样的房屋。大约3点钟启程绕着湖去卢塞恩。空无人烟的、阴暗的、多山道森林的祖格湖的湖岸分布在许多沙嘴上。美国的景象。在旅途上讨厌与还没见过的国家作比较。在卢塞恩的火车站上看，景色全收眼底。火车站的右边是施卡廷——林克。我们走向仆人，并叫起来：“葡萄树。”这个饭店是在众多的饭店之中，就如这些仆人在众多的仆人当中一样。桥（按马克斯的说法）像在苏黎世那样将湖从河里分开。那些为德国字样辩护的德国居民在哪里呢？疗养大厅。苏黎世的那些明显的（德国的）瑞士人看来并不是管理饭店的天才，他们在这里的那种情况消失了，饭店老板也许竟然是法国人了。对面是空空荡荡的气球大厅。难以想象飞船能滑翔进去。

滚圆的形式，柏林式的外观。水果。夜晚湖滩供散步的林荫道树下的黑暗。带着女人们或女仆人的男主人。湖面上摇荡着游船，水底清晰可见。饭店里微笑的女招待、大笑的少女将客人不断引往上面的房间。严肃的、红面颊的房间女仆人。小小梯形房子。房间里上了锁的、安装在墙内的箱子。从房间到外面去是兴高采烈的。我是多喜欢在吃饭时吃水果啊。戈特哈德饭店，穿着瑞士装饰的姑娘们。糖水杏子，迈伦的葡萄酒。两个年纪较大的女人和一位先生谈论着人老色衰的话题。在卢塞恩发现娱乐厅。一种法国式的前厅。两张长桌。描写真正的名胜古迹是丑恶的，因为它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在看管的人面前进行。在每张桌子旁有一个宣传者在中央，两边各一个看守员。

最高赌注5个法郎。“瑞士人被请求给外国人以优先权，因为这种赌博是为客人们聊天而定的。”

一张桌子有炮，一张桌子有马。收赌金的人穿着皇帝的衣服。“先生们，你们出牌吧！”“牌在这里了。”“你们的牌都出来了。”“都在这里了。”“全都完了。”——收赌金的人拿着装着木柄的镀镍耙子。他们用这个耙子能做到：将钞票钩到自己身边，接住那些人扔向赢家方位的钞票。多种不同的收赌金人影响着赢的机会，更确切地说只有一个人欢喜那个收赌金的人，那就是赢钱的人。因为共同决定参赌而激动，我在大厅里却感到孤独。钞票（10个法郎）在一个柔软舒适的平面里消失了。失去10个法郎使人感到还要继续赌下去的一种太微弱的诱惑，可是只是作为诱惑。对一切的愤怒。白天因赌博而延伸了。

星期一，8月28日。穿着长筒靴的人在墙边用早餐。二等轮船。早晨的卢塞恩。饭店丑陋的外观。一对夫妇念着从家里寄来的信，其中有一段报纸上有关意大利流行霍乱的内容。人们也只有从湖上航行的高度上看到美丽的住地。山变换着它的美姿。维茨瑙，利吉铁道。透过树叶看湖给我以南方的印象。穿过祖格湖间突然出现的平原使人惊奇不已。故乡般的森林。这条铁道修建于1875年，是在古老的《关于陆地与海洋》里查阅到的。历史上英国的土地，远程的管道。远处的少女，修道士的圆形房屋，晃动炽热的空气使图像也动了起来。蒂特利放下的手掌。一块雪原切成的圆形面包。从上从下去评估高度都是错误的。对阿尔兹—戈尔道火车站的地势是倾斜还是平坦的争论无法断定。旅馆当日规定的饭菜。瑞士女人坐在大厅里。严肃，出口便很厉害，这已在隔壁的火车厢里见识过。英国的小姑娘正启程离去，嘴里的每颗牙齿都长得

一样。法兰西的小姑娘登上邻近的车厢，伸出手臂说我们挤满的车厢是不“满”的，并催她父亲上车，她纯洁外表看上去像女仆年长的小姐，用胳膊肘子捅我的臀部。马克斯右边老太太的英语多数是用牙齿讲出来的，我们为此在寻找一个伯爵领地的名字。旅途上经过：维茨瑙—弗吕埃伦、格尔绍、低凹的沼泽地、矿泉（按饭店称呼）、席勒斯坦、台尔沙洲、被错过的吕特里、阿克森大街上的两座凉廊（马克斯在这里有好多想象，因为人们在照片上总看到这两个凉廊）、乌尔纳盆地、弗吕埃伦。施特尔嫩饭店。

星期二，8月29日。这个美丽的房间带有阳台。令人愉快。太受群山的阻隔。一个男子和两个少女，穿着防雨大衣，前后相随地走着，穿过大厅，手里拿着山地手杖。当他们走到台阶的时候，由于女侍者的询问而停住了。他们道谢，他们已经知道得清清楚楚。对有关他们山地游览的另一个问题的回答：“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厅里，在我看来他们好像来自《杜德尔萨克先生》，台阶上，在马克斯看来他们好像来自易卜生，后来我也这样看。忘了被盯着的人。在铁路上人们获悉，明天甚至有一位老太太去热那亚。年轻人拿着瑞士的旗子。卢塞恩湖上的浴场。成双成对的游人。救生圈。阿克森大街上散步的人，最美的海水浴，因为人们能随心所欲地为自己安排。渔妇们穿着淡黄色的衣服。登上戈特哈德铁路的车。我们的河流里流的是掺有牛奶的水。匈牙利的花。厚厚的嘴唇，从后背到臀部异国情调的线条。在匈牙利人那里的美男子，在意大利将葡萄皮吐在地上，但在南方不见了。在火车站上耶稣教团的总监穿着特有的衣服。出乎意料的意大利，小酒店前面随意摆设的桌子，一位年轻男子穿着彩色衣服，他不能克制自己，辞行的女人们的各种手姿（模仿着一种拧掐的动作）。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粉红色的房屋，高处有黑色的模糊不清的字迹。不久，这种意大利的东西便消失了。或者说瑞士核心的东西出现了。在火车站门卫的小房里的妇女们，回忆起战斗。提契诺事件，到处一阵一阵地出事。德国的卢加诺。喧嚣的剑术角力学校。新建的通邮。贝尔菲尔德饭店。疗养大楼的音乐会。没有水果。

8月30日。从4点到晚上11点和马克斯坐在一张桌旁，先在花园里，后在阅览室，然后在我的房间里。上午洗澡，寄信。

8月31日。雪山如钟的指针似的出现在利吉山区。

星期五，9月1日。10点5分从古格里尔莫，台尔市区离去。——车

上和船里千篇一律的相似的后座。船上盖棚布的支架就像牛奶车上的一样。——船每一次装载货物都如开始一次战斗。

旅途上没有箱子，双手空空，为了守住脑袋。——甘德里亚：一幢房子在另一幢房子的后面露出来，内阳台用彩色的布装饰，无法鸟瞰，有街道，也没有街道。S.马尔加里塔的停泊处有喷泉。在奥里亚的别墅里有12棵柏树。人们不可能、也不敢在奥里亚设想一幢房子，它的前面是一片有希腊式圆柱的坡地——烧毁的房屋确是在燃烧时烧去的。马梅特：中世纪的魔术般帽子戴在一座钟楼上。驴好早就沿着港口旁边的林荫小道走着。奥斯特诺。妇女圈子里的牧师。特别不懂的叫喊声。有些句子更是无法理解。在厕所后面窗户里的孩子。看到蜥蜴在墙边爬动令人不舒服。塞基[9]的落发。驶过载满士兵的车子和化装成水兵的饭店仆

人。

卡尔罗塔—伊莱克斯。石橡树，剥去皮的小动物。西番莲：物理上平衡的工艺。竹子。用老者头发绑扎的棕榈树干。黄杨（桃金娘树）。芦荟。雪松（一种被它树枝交缠的落叶松）。挂着的松懈无声的钟（倒挂金钟）。智利棕榈。法国梧桐。仙人掌。玉兰树（撕不碎的叶子）。澳大利亚的棕榈。娇美的月桂树。穹顶式的杜鹃花。桉树：光秃秃的树干。柠檬树。纸莎草：三棱形状的秆，上面如灯心草状。自我相缠的紫藤，巨大的梧桐树。香蕉树。

孩子们在梅那吉奥登岸桥上，父亲，为其孩子们而骄傲的妻子的身体。

在驶过的车里是互相紧挨着的意大利年轻人。

政治家们半张着嘴巴（卡尔罗塔别墅）。

一位法国女子跟我婶婶的嗓音一样，在一把草制的带有密密边絮的阳伞下面，在一个小日记本上写着关于蒙塔涅[10]等等的內容。——船上黑皮肤的男子站在轮胎的框子里，低身在舵上。税收官在眺望着，并迅速地搜索一只小篮子，好像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礼物似的。在波尔累察—梅那吉奥列车里的意大利人。每一句针对一个人讲的意大利话传进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巨大空间里，经过长长的时间，它在探试着，被理解了，或者是没被理解；那种特有的确不准的意大利语面对意大利的稳定性是无法保持下去的，而且不管是懂或是不懂，容易不被

理会。——从梅那吉奥往回开列车的幽默，令人愉快的交谈素材。——由石头造的船屋连着别墅前面大街那一边的梯地和装饰。大宗的古董买卖，船主：小本生意。——征税的小船（有关内莫船长的故事和《通过太阳世界的旅行》）。

9月2日。星期六。在小汽艇上脸部的颤抖。撩起百叶窗前的帘子（棕色带有白色的边饰）。蜜蜂在蜂蜜里。上身显得粗短而孤独的女人是语言老师，那位标准的先生穿着提得高高的裤子。他的下臂在桌子上挥动，好像手不是在握刀和叉而是要抓住靠背椅上的末端。孩子们看着自己有气无力的火焰：再来一次——滋滋——伸举手臂。小汽艇上不舒服的旅游。共同参与的動作太大了。要感觉新鲜空气，要自由地浏览周围的风光，那是太低矮了，接近了伙夫的位置了。卡斯塔格诺那和甘德里亚之间的浴场，正好在我们住的地方。走过去的一群：男人、牛和女人。女子在叙说着什么。黑色的缠头布，宽松的衣服。——蜥蜴的心跳。一位先生精力的消耗：很晚还在阅览室服务，同时有啤酒、葡萄酒、菲尔内特-布兰卡，风景明信片，轻轻的叹息。老板的小孩听他母亲的劝告吻我，并道晚安，而我早先并没跟他讲过话。令我舒适。——甘德里亚：地下室的阶梯和走廊代替了街道。一个小男孩被打，好多被拍击的床发出的沉闷声响。爬满常青藤的房屋。在甘德里亚，缝衣女坐在没有百叶窗、窗帘和窗玻璃的窗边。我们支撑着先后上了从浴场广场到甘德里亚的路，我们是那么疲惫。在一艘黑色小汽艇后面是一列节日装饰的船队。年轻的男人们在观赏着图画，有跪着的，有在甘德里亚的跳板上蹲着的，有位先生穿一身白衣裤，是个惹姑娘们注意的快乐人，跟我们像是自来熟。——在波尔累察。晚上在码头上。一位已经被忘记了满脸胡子的法国人在威廉—退尔纪念碑处将他的古怪又带进了记忆。这座纪念碑安有一种自来水管式的排水管，这管道由矿石里制取的黄铜做成。

9月3日。星期天。一位镶金牙的德国人，描写他的人即使在其他印象不清楚的情况下也能紧抓住他的特征。他在11点3刻还买到了张进入游泳场的票，尽管游泳场12点不让进入，到了里面游泳指导马上用听不懂的、因而有点严厉的意大利语让他注意到这一点。听了这种意大利语，令他在他的母语里也不知所措了。这位德国人结结巴巴地问，那为什么售票处的人卖给他票，并埋怨那个人卖票给他，还提出，他完全可以不再卖给我票的呀。人们从意大利语的回答里听出，他几乎有一刻钟的洗澡及穿衣服的时间呀。哭出了眼泪。——坐在湖上的圆桶里。贝尔

菲德尔饭店：“对老板的一切都表示赞赏，但饮食方面很不怎么样。”

9月4日。霍乱的消息，交通办公室，《科里勒·德拉·赛拉》，北德运输公司，《柏林日报》，房间女佣带来一个柏林医生的消息。视人群的划分和本人的身体状况而定，这些消息的一般特性也随之改变，在离开卢加诺去普罗托·色雷西奥的时候，是1点零5分，那还是颇为有利的。——在风中瞬间出现的对巴黎的热情，这风吹起了9月3日在我们面前抛锚的“埃克塞尔西奥尔”，随着这风我们朝一条长凳跑去。在卢加诺湖之上的桥上应该还有一些做广告牌的地方出租……

星期五。这三个家伙从船首处驱赶我们，大概是开船的人必须要自由地注视前面的光线，然后拉出一条长凳来，自己坐上了。我真的想唱起来了。

星期五。那位意大利人建议我们到都林（展览）旅游，我们向他点头同意。在他的面前，我们握了手，重申了我们共同的决定，不惜代价去都林。降价的票令人称赞。骑自行车的人在普罗托·色雷西奥一所房子的平台上兜圈子。鞭子不是皮做的，它只有一个由马鬃做的小尾巴。行驶着的骑车人用一根绳子拉着马在他旁边小跑。

米兰：向导在一家铺子里被遗忘了。后来回来，而且被偷了。在梅尔坎蒂饭店吃了苹果卷。保健的点心。福萨蒂剧院。所有的帽子和扇子都在动。一个小孩在高处大笑。节目用一张广告的纸条贴出来。在男子乐队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女人。胆小鬼。——因格累索——乐队待在一块平地上，连着观众厅。兰西亚的广告，作了沙龙天花板的一处装饰。后墙壁的所有窗户都开着。高大强壮的演员戴着轻轻涂上一小点娇嫩的鼻孔套，它们的黑色特别显眼，使向后弯曲的面孔在光线中变得模糊了。脖子又长又细的姑娘踏着碎步、伸缩着僵直的肘部，跑出房间，与长脖子相适应的高高的鞋跟向人们预告她的到来。过高评价大笑的影响，因为从不可理解的严肃存在到大笑要比从知道内情的严肃存在更遥远。每件家具的意义。一般的情况都是在两件家具上有五个门。一位描眉涂眼的姑娘，她那双眼睛闪闪发光，这光也照亮了下面的鼻子和嘴巴。包厢里的男子在大笑的时候，竟露出了后面的金牙，后来这样子还保持了一段时间。以其他的方式不可能达到的舞台和观众大厅之间的统一，就像这是为了针对不懂语言的观众形成的那种统一。

年轻的意大利女郎有一张一般的犹太人的面孔，这张面孔从侧面看

又变为非犹太形象。当她起身，双手伸向阳台栏杆，只让人看她瘦削身体的时候，她并没伸展手臂和肩膀，当她将手臂伸向窗柱的时候，当她用双手抓住一根窗柱的时候，就像站在一棵大树旁享受通风的滋味。她读着一本侦探小册子，她的小弟弟向她请求了好久也没要来这本书。在她旁边的父亲有一只很明显的鹰钩鼻子，而她的鼻子却是平和柔美的，因而那弯曲的线条更表现了犹太人的特色。她常常好奇地朝我看，看看我是不是不愿意、或者最终还是停止了我那讨厌的目光。我旁边是一位肥胖而高大散发着香气的夫人，她用扇子将她洒的香水味扇散于空气中。她那么多的肉忍受不了这浅浅的河水，她马上用脚趾登上高处。我在她旁边感到干瘪。——在行李舱里，煤气火焰的钢板罩子形状如姑娘平平的帽子。房子的下面支着各种各样的栅栏。在通往斯卡拉拱形建筑下面，我们寻找这座著名歌剧院，当我们出来走上广场的时候，面对那简朴的刮得干干净净的门面，我们后来对这种误解便也不感到惊奇了。

这种伸向城市中心繁忙的交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称赞，我站在大教堂的广场上看到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围绕着菲托里奥·埃马努埃尔纪念碑慢慢行驶的电车，我转过身去，寻找饭店。

我对两个房间之间的联系很高兴，这联系是由一种双重门产生的。每人都可打开一扇门。马克斯认为这也适合已婚夫妇。——先是将一个思想写下来，然后朗读，并不是朗读着的时候写，因为后来只有在内心中产生的东西形成了，而还要继续写下去的东西却逃脱了。——在大教堂广场上的一个咖啡小桌旁，谈到假死和心刺。马勒也要求过心刺。这个在米兰逗留的计划时间在这个尽管出自我这方面的小小反对的谈话中大大减少了。——大教堂的许多尖顶令人感到厌烦。——决定性的发展是去巴黎，在卢加诺经过“埃克塞尔西奥尔”的时刻，去米兰旅行，完全不是出于自己意愿去购买经普罗托·色雷西奥到米兰的票的，从米兰去巴黎是出自对霍乱的恐惧，并出自对这种恐惧抵偿的要求。另外，算了一下这个旅行在经济上和时间上的优点。

I. 里米尼—热那亚—内尔菲（布拉格）。

II. 北部意大利湖泊，米兰—热那亚（布拉格）。

（摇摆于罗卡尔诺和卢加诺之间）。

III. 略去马吉奥莱，卢加诺、米兰，城市游览直至波伦亚。

IV.卢加诺—巴黎。

V.卢加诺—米兰（几日）—马吉奥莱。

VI.在米兰直接去巴黎（也许封泰布罗）。

VII.在施特莱萨下车。

以此这次旅行第一次有一个好的回顾和展望，这个旅行太长了，因此被拦腰截住。我还从来没见过像我在画廊里见过的这么小的人。马克斯说，画廊只是那么高，就如人们在野外看房子一样。我用一个被忘了的借口否认，就好像我总一直是在为这个画廊说话。它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它并不挡住视线，因此，也由于它的高度，它看来矮小，但也承受了这个任务，它构成一个十字形，可以让空气自由地通过。从大教堂的屋顶上看去，面对画廊的人看上去变大了。我完全无法以画廊对此感到自慰，即我并没有看到古罗马的遗迹。在走廊深处青楼横幅的标题：阿尔·维罗·艾登。与街道强有力的交通联系绝大多数是通过个别的街道形成的。在附近狭窄街道里来来去去，这些狭窄的街道是非常不错的，虽狭窄，但两边均有不少人行道。有一次我们从一条狭窄的街道看到另一条直角拐弯的街道上有一幢房屋，在最后的楼房里，一个女子倚窗而立。总之我当时是轻松的，并且感觉到，总是处在这样的情绪之中，感到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重。少女讲她们的法语就像少妇一样，米兰的啤酒闻上去像啤酒，尝起来却像葡萄酒。马克斯只是在写东西的时候才对已写好的东西表示遗憾，以后却从不如此了。马克斯出于害怕带一只猫在阅览室散步。

这姑娘坐在椅子上，在互相交叉的双腿上部和腹部，透明衣服里无疑是不拘礼节的。当她站立起来的时候，就如面纱后面的舞台布景，露出了一段最终可以忍受的少女的身体来。法国女郎，对于最后的眼光来说，她的甜美首先展示在圆润而细腻的、闲聊时亲切的屈膝之中。一个像指挥官似的纪念碑的形象，她将刚挣来的钱推进长筒袜里。——那位白发老人将双手重叠地放在一只膝盖上。——门口的那位女子，凶狠的面孔是西班牙型的，把双手搁在臀部的做法是西班牙式的，她将自己的身体伸展在一种丝绸制成的防护紧身衣里。我们那里，在青楼里的德国姑娘使客人们在片刻间疏远了她们的国家，这里的法国姑娘也是这么做的。她们大概没有足够的有关本国状况的知识。——为冰镇饮料而受到惩罚的热情，一杯格莱纳迪内，在剧院两杯阿朗细阿特，在科尔索·埃马

努埃尔旁边酒吧里一杯阿朗细阿特，在画廊的咖啡屋里一杯索尔贝特，一瓶法国梯也里矿泉水。我垂头丧气地去睡觉，由床出发进入了一幅突出的、全方位的、有立体感的意大利城市的图像，它是通过旁边前沿的一扇有点儿向外凸起的窗户产生的。毫无慰藉地醒来，感到干燥迫击着咽喉及所有的肠壁。——警卫人员不像官员那样打扮得那么优美，他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一只手里拿着一只脱下的线手套，另一只手里拿着小小的棍棒。

9月5日。在斯卡拉广场上的商业银行。从家里来的几封信。——给上司写的明信片。——赞叹着进入如在卡德那比亚棕色门帘之间的大教堂。——要求提供一张大教堂的建筑图，因为大教堂四周就是一种纯建筑艺术的描绘，绝大多数地方没有长凳，柱子上有不多的立式雕像，只是在远处的墙上有些阴暗的图片，个别参观者站在地板上将其作为衡量自己身材的各种标准或自己走动时伸展的标准。——宏伟壮丽，但令人极快地想到画廊的景象。——没有责任感，游览不作笔记，自己去生活。不可能有同样形式时日消逝的致死感觉。——登上教堂的屋顶。一位走在前面的意大利年轻人使我们的攀登轻松了许多，他哼着一支小曲，并想将上衣脱去，他从缝隙朝外看。透过它的只是太阳的光线，他不断地拍打着号码机，上面显示出走了多少级台阶的数字。——从前面的屋顶画廊远眺。下面电车的机械装置已经腐蚀，只是在通过轨道的拐弯处它们才滚动得那么孱弱。从我们的地点看去，一位售票员赶紧斜着身朝下压向他的电车，旋即又跳上去。——有一个男子形状的喷水嘴，从它里面取出了脊柱和脑子，使得雨水有一条通道。——在每一扇彩色的大窗户上，占优势的便是在某种图画中不断再现的一件衣服的颜色。——马克斯说：火车站是一家玩具商店的橱窗里，铁轨封闭成圆形，并不通往任何地方，这就是米兰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在这个橱窗里，那种连着大教堂火车站的组合也许是在努力地展示这个地方的丰富多姿的图景。从大教堂的后门，人们正好仰看到一座教堂屋顶的大钟。——马克斯说：去古罗马要塞的路通过它的外貌而省却了。——福萨蒂剧院。——到施特莱萨的旅程。在满载的车厢里睡着了的人如浮雕一般。热恋的一对。——下午在施特莱萨。

9月6日。星期三。变得恼怒，晚上找了好多家饭店。

9月7日。星期四。浴场洗澡，信件，离去。——在公众场所睡觉。

9月8日。星期五。旅行。意大利夫妇，自称萨卢斯的夫人。牧师。

美国人。两个法国小女孩屁股上肉长得多了些，蒙特鲁。双腿一步一步地走在宽阔的巴黎街道上。——在床柱的边缘处洗脚。夏季饭店的小夜灯。——协和广场设计将魅力引至遥远处，目光是那么容易发现这遥远之处，只要这目光是在寻找它。

佛罗伦萨画派（15世纪）：苹果写生。——丁托列托：苏姗娜。——西蒙那·马尔蒂尼（1284—1344年）：耶稣·基督步行到卡尔费勒（西埃那画派）。——曼坦那（1431—1506年）：罪恶的智慧胜利（威尼斯画派）。——提香（1477—1576年）：宗教评议年会。——拉斐尔：阿波罗和马尔西阿斯。——委拉斯开兹（1599—1660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普四世肖像。——雅各布·约尔丹内斯（1593—1678年）：饭后音乐会。——鲁本斯：凯尔梅塞。[11]

宠儿的糖果，广场小巷。——穿着晨衣洗衣服的女人。——广场小巷，如此地狭窄，使得它终日都处在阴影中。当然，有一排房屋完全被太阳照着，这种在光照中的差别很接近互相紧挨着的房子。——士兵的津贴，匿名的公司。上千的资本，歌剧院大街。——罗贝尔特·萨穆埃尔。——大使：咚咚的击鼓声伴随着在双3的信号中开始的吹奏乐，在此之前这击鼓的棍棒在欧式的动作中还正有生气地挥动着，而且四周是那样安静。——里昂火车站。挖土工人裤子背带的代用品是围住身体的多彩的绶带，这些绶带在这里有着庄重的意义，同时也显示出民主来了。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睡过头了，在车上，整个上午，我都纠缠于这件事了。注意，人们并不把这些照看儿童的姑娘们看作是家庭女教师。——拉法吉1668年5月17日攻占萨林。在后面，一位穿红衣服的人骑着一匹白色的马，一位穿深色衣服的人骑着一匹深色的马，他们正从背景里被围的一座城市中出来休息，在他们骑马出来的时候，迎着他们的是正将来临的一场大雷雨。——1786年6月23日路易十六游瑟堡。载着路德维希的船，他伸出手指向瑟堡，给站在他后面的廷臣一个说明，首先是朝着一个将手搁在胸前的人，这艘船将由每边三行驾着连在一起的船桨的船员驶向陆地。穿着轻盈衣服的妇女们跃动地迎向他们，一个男子透过望远镜看着。车子在岸上等着。别的船上的人正纷纷踏着跳板登岸，有一个人正在那里被往前拉。——1809年7月5日夜至6日，拿破仑宿营在瓦格拉姆战场的营地。拿破仑独自坐着，将一只腿搁在低矮的桌子上。他后面是正冒着烟的篝火。他的右腿的影子和桌脚、椅子脚的影子在前面辐射般地围绕在他身边。寂静的月亮。远处围成半圈的将军们看着火，也看着他。

独特的平面景象：衬衫，尤其是洗涤的衣服，饭店里的餐巾，糖，巨大车轮，每辆车前后套着马匹，塞纳河上的平面汽艇，阳台将房子横向切开，并加宽了这些房屋平面的横截面，平面宽大的壁炉，折叠的报纸。

有线条的巴黎：从平面的壁炉伸出去的高而细的烟囱装饰着许多小花盆形状的东西——那些极无声响的煤气枝形灯——百叶窗的横线条，在城郊有些房子的墙壁上留着有线条的痕迹——我们在里弗里大街看到的屋顶上的细边框——巨大宫殿的有线条的玻璃屋顶——商店用线条分割的窗户——阳台的栏杆——用线条构成的艾菲尔铁塔——我们对面阳台门的旁边和当中的边框都表现出较强的线条效果——露天放的椅子和咖啡馆用的小桌子，它们的脚就是线条——开放的公园里涂有金尖的栅栏。

在大笑的时候，一瓶格莱纳迪内多么轻易地通过鼻子走掉了（喜剧歌剧院前面的酒吧）。

月台票，这种对家庭生活放肆的侵犯是为人所不知道的。

独自与一个夫人待在阅览室里，当她朝别的什么地方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介绍算是白费了。她认为我所指的外面正下着的雨还要使天气继续闷热下去。她将卡片放在一本摊着的书的后边，正努力地看这本书，脑袋支撑在握成拳形的手上，这只手里大概还有上百张没有用过的两面印花的小卡片。在我旁边，背朝着我的一位年纪大的穿黑色衣服的男士在读着《慕尼黑最新消息》。外面大雨倾泻如注。——与一位犹太金匠同行。他来自克劳考，大约20多岁，曾在美国呆过两年半，现在巴黎已经生活了两个月，但只找到14天的工作。工资低微（每天只有10个法郎），工作的地方也极糟糕。如果一个人新来到一个城市，他不知道他的工作价值多少。在阿姆斯特丹的美好生活。喧闹的克劳考人。人们每天都知道在克劳考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因为总有一个到那里去，或者总有一个从那里来。整条长长的街道上的人都只是讲波兰语。在纽约收入是巨大的，因为所有的女孩在那里挣许多钱，并能将自己打扮一番。巴黎为此不能与之匹敌，走上林荫大道的第一步就表现出了这一点。他之所以从纽约离开，是因为他的同胞在这里，并且因为他们给他写了信：我们在克劳考生活，而且也挣钱，你到底还要在美国留多长时间呢？完全正确。为瑞士人的生活欢欣鼓舞，这肯定会成为非常强大的人。如果他们是这样地在大地上生活，并发展畜牧经济的话。河流！可

是主要的事情是，人们在起身之后要向流水走去。他有着长长而曲髻的头发，只是有时候用手指梳理一下，眼睛炯炯有神，鼻子缓缓弯曲，脸颊上的两个酒窝，美式裁剪的西服，破旧的衬衫，悬斜的短袜，他的箱子不大，但他提着它下车的时候就像提着一个重物。他的德语由于英语的重音和用法而令人无所适从，那些行话就不必提了，英语的色彩是那么的强烈。在一夜的行车之后，仍旧是那么活跃。“您是奥地利人？是呀，您也有一条雨领子。所有的奥地利人都有这个。”我出示袖子证明，那不是领子，而是一件大衣。他继续坚持，所有的奥地利人都有领子。他们就是那样围上它的。他这个时候又转向第三个人，并向他指出，他们是怎样做的。他做出那个样子，就好像他将什么缚在了后面的衬衫领子上。他用整个的身体点头，为了看一下，它是否固定住了，然后将这个什么东西先拉过右臂然后拉到左臂，最终将自己全包上，如人们看到的，直至他恰感到舒适温暖为止。尽管他坐着，腿部的动作却在表示，一个奥地利人在这样一种领子里可以怎样轻松、完全没有顾虑地走动呀。在这里几乎完全没有嘲弄，它说明了一个人的更多经历，如他作了多次旅行看到了不少事情。当然混杂了一点天真烂漫。

我在疗养院的昏暗的小花园里散步。晨操伴着一支“神奇角笛”的曲子，它是由一个人看着谱子用铜管乐器吹奏的。

秘书每年冬天要徒步旅行，去布达佩斯，法国南部，意大利。赤脚，只是靠生的素食品（粗面粉面包、无花果、海枣）。和另外两个人在尼察附近住了两个星期，而绝大部分情况下赤裸裸一人待在一所孤零零的房子里。胖胖的小姑娘，不时地抠抠鼻孔，显得聪颖，但并不特别可爱，一只没有前途的鼻子，她叫瓦尔特劳特，一位小姐说她有着一种闪光的东西。

饭厅里的圆柱，我在观赏的时候（高大、光辉、完全是大理石的），对这些柱子感到吃惊了，为此，我在一艘小汽艇上摆渡的时候，我诅咒了，因为这些圆柱完全是百姓家的那种用砖头建成的柱子，上面粗糙地镌刻着大理石图形。

一个男子对着我窗户的梨树下与一个我看不清楚的楼底层的姑娘在愉快地谈话。

舒适的感觉，这个时候医生正不断地听我的心脏，总是想把身体摆弄成另一个样，也不能说清楚什么。他摸心脏附近的时间特别长，好像

几乎没有了思想。

夜间车厢里女人们在争吵，他们将车厢里的灯光遮住了。躺着的法国女人在黑暗处大叫起来，而被她的双脚挤到墙边、法语讲得很糟的年纪较大的妇女竟不知所措。按法国女人的意思，她应该离开这个位置，将她的许多行李挪到另一边，挪到后座去，好让自己在这里伸展开来。从我的车厢里出去的希腊医生用蹩脚可是很清晰的、好像是基于德语基础的法语着重地指出法国女人的不对。我叫来列车员，他将她们分开了。

又跟那位夫人在一起，此外，她还是一个写东西的傻瓜。她身边带着一只写东西的书包，里面有许多信纸、卡片、自来水笔、铅笔，这总的说来对我是很亲切的、很令人鼓舞的。

现在这里像是在一个家庭里。外面下着雨，母亲摊开卡片，儿子写。通常没有别人在房间里。因为她的年龄，也许我也能叫她母亲。

尽管我表面上厌恶“伤寒”这个词，我却将它看作是真实的，通过自然疗法和与此有关而产生一种新的伤寒，比如菲伦贝格先生所代表的伤寒，我当然只是肤浅地认识这位先生。这些人皮肤细腻，脑袋颇小，看上去过分爱干净，带着一二种小小的不属于他们的独特细节（在F.先生身上表现为缺牙齿，腹部突出他们长得干瘦，就好像这种干瘦跟它躯体的素质配套似的，这叫压迫脂肪，治疗他们的健康。如果说这也许是一种病的话，或者至少也许是一种功绩（我不对此加以谴责），有着一种如此强行实施的健康感觉带来的所有其他的恶果。

在画廊里的喜剧歌剧院。第一排有一位先生穿着小礼服，戴着大礼帽，最后一行中有一个男子穿着衬衫（他还将这衬衫朝前卷，以露出胸膛），准备爬上床去。

吹鼓手，我也许把他看成了一位有趣而幸福的人了（因为他是活泼的，并有着敏锐的思想，他的脸腮上长满了粗短的金黄色的胡须，双颊红润，眼睛碧蓝，穿着实际），今天在谈到有关他的消化系统疾病时两个眼睛鼓得大大地、直看着我，然后东倒西歪地朝田野里走去。

瑞士的民族争吵。比尔，这个在几年前完全是一个德国式的城市，由于法国钟表匠的迁入而处在变成法国式城市的危险中。提契诺州，这个唯一的意大利州想脱离瑞士。有一个叫“收复领土党”^[12]。意大利人在

七个名额的联邦议会里没有代表，也许他们在他们的小小数字里（大约18万人）至少在议会里获得九个名额。但人们并不想改变这个数字。戈特哈德铁路^[13]是德国的企业，为德国官方所有，他们在贝林佐纳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现在，因为它已经国有化了，意大利人要有意大利官员，并取消德国学校，而只有州政府能够决定学校的性质。全部的居民：三分之二德国人，三分之一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有病的希腊医生，他半夜里用咳嗽将我赶出车厢，他说，他只能吃羊肉。因为他一定要在维也纳过夜，他请我给他写下这句话的德文来表达。

虽然下着雨，后来我完全一人待着，我的不幸只是越来越现实了。在餐厅里大伙儿一块玩，我因为无能力而没有参加这些玩耍。是呀，尽管如此，我最终只是写了不怎么样的东西，可是，对这种所有器官的孤独我既感觉不到丑陋，也感觉不到侮辱；既感觉不到悲伤的成分，也感觉不到痛苦的成分——好像我只是由骨头组成。这个时候，我相信我感觉到了我堵塞肠子的上部区段有了一点儿胃口。那位用一只锡杯给自己取牛奶的夫人，在她又进入卡片工作前，走回来问我：“您到底是在写什么东西？观察体会？日记？”而且她也知道，她不会听懂我的回答，她便紧接着问道：“您是大学生吗？”我没有想到她的重听，便回答道：“不是，但我当过大学生。”同时，她已经又摆弄着卡片。我带着这句话孤零零地待着，由于这句话的分量的驱使，还看了她片刻的时间。

我们两个男人和六七个瑞士女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当我只是在盘子空了时候，或者出于无聊而环顾大厅四周的时候，那距离最远的菜盘就在女人们（我一股脑儿叫她们太太与小姐）的手中端起，并迅速地递过来，我只说谢谢，而且什么也不想要了，便从同样的路上慢慢地往回走。

弗朗西斯克·萨尔赛的《被围困的巴黎》：1870年7月19日宣战。一些时日名声一落千丈。——书本身变换着特征，同时它在描绘着巴黎变换着的特征。——同样的事物毁誉参半。失败之后巴黎的寂静，一会儿是法兰西的鲁莽轻率，一会儿是法兰西的抵抗能力。——色当共和后的9月4日——工人和国家卫队在梯子上用锤子敲打国家建筑上的N——还是在宣布共和后的八个昼夜，热情如此高涨，竟没有多少人为解放工作。——德国人向前推进。——巴黎人的诙谐：麦克—马洪在色当被抓住了，巴泽内降献了梅斯，最终，这两支军队实行了它们的联合。——

指令破坏近郊——三个月不通消息。——巴黎从来没有像在包围开始时候那样一种胃口哩。甘贝塔组织了省的起义。有一次幸运地得到了他的一封信。但他并不说那所有烧毁的详尽数字，他只是写了，巴黎的抵抗力量受到全世界的敬仰。——梯也尔游览宫廷。——颠狂的俱乐部集会。特里亚特中学的一次妇女集会。“妇女们面对敌人应该怎样保卫她们的荣誉？”用上帝的手指或氢氰酸的手指。那是一种用橡胶

般的物质做成的管套，妇女们将它套在手上。如果一个德国士兵来了的话，那就伸给他一只手，他就被刺穿，鲜血喷溅。——学院用气球送出一位学者去阿尔及尔研究日蚀。——人们吃去年的栗子、苗圃菜园中的家畜。——直至最后一天，人们还能在几个饭厅里吃到所有的东西。——这位名叫霍夫的中士由于他普鲁士的装束，作为他父亲的复仇者已变得如此闻名，他曾消失不见，并被视为一位间谍。——军队的状况：有个别的前哨人员亲密地与德国人同饮。——路易斯·布兰克将德国人与学习过技术的马希康人^[14]作比较。——1月5日开始轰炸。并不多。如果人们听到榴弹的轰击，那就接受命令卧倒。街上的年轻人，也有成年人，站到水洼的地方，并不时地叫喊“小心炮弹”。——有一段时间，在巴黎的夏泽将军成了希望，他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失败了。人们当时也并不知道他有名气的理由，尽管如此，在巴黎的热情如此强大，致使萨尔赛还在写他这本书的时候就在心中感觉到了对夏泽的一种模糊而没有道理的敬仰。——来自当时巴黎的一日：林荫大道上风日和丽。散步的人悠然自得，对着市政府的地方变了，那里是公社社员的暴动，有许多死人、军队、过分行动。在左岸，普鲁士的榴弹发出响声。码头和桥上都是静悄悄的。回到法兰西剧院。观众们刚看完《费加罗的婚礼》演出出来。晚报也刚刚上市，这些观众成群地围聚在报亭周围，孩子们在爱丽舍宫前的场地上玩耍，星期日的散步者们新奇地朝一个连的骑兵们观看，这些骑兵们吹着号骑马而过。——在一封给母亲的德文信中：“你想象不到巴黎有多大，而且那些巴黎人都是些奇怪的人，整日价吵吵嚷嚷。”——巴黎两个星期没有熟食可吃。——到一月底，四个半月的包围结束。

在车厢里老年妇女友好交往。关于老太太遭车压的故事，她们在旅途上的方法：从不吃酱汁调料，取出肉来，在车子行驶的时候闭上眼睛，但同时……去果物贮藏室吃东西，没有坚硬的牛肉，请男士将一个人领过街道，樱桃是最酸涩的水果，拯救老年妇女。

在米兰火车站的泰国人车厢。

列车里一对年轻的夫妇去施特莱萨，还有一个去巴黎的人。一位丈夫只是不安静地在接吻，他在从窗户朝外看的时候，只见其肩膀对着那女子的脸颊。当他因为热而脱去上衣并闭上眼睛的时候，她好像在更为仔细地瞧着他。她并不可爱，只有稀疏的曲髻头发遮住面孔。可是另一个女子戴着面纱，一只眼睛常常被面纱上的一个蓝色斑点遮住，她的鼻子好像一下子被切断似的，嘴边的皱折自然是青春的皱折，好像是为显示她的青春活力。当她沉下脸的时候，她的双眼游来荡去，就像我在我们那些戴眼镜的人那里看到过的那样。

所有的法国人都在努力地与人接触，至少是在这个时刻纠正那些人讲的糟糕的法语。

脸刮得并不干净的年轻牧师和在展示着几十包风景卡片的游行者，牧师在评论着这些卡片。我朝他看去，也因为有一点儿热的影响，我看得那么专注，以致我的靴子后跟完全踩在他的风衣上。“没关系。”他说道，而且不停地，并不断用意大利语“Ah”表现出强有力的呼吸。

坐在车子里，对饭店的选择没有肯定的决断，看来我们也只好任由车子漫无目的地驶去，一会儿驶进一条附近的街道，然后又让车子返回到原来的方向。整个上午来往于哈伦附近的里弗里大街。

我第一次走上我的阳台，环顾四周，就好像我正在守卫这个房间，而同时，因晚上行车的疲惫不堪使我不知道，我是否将能够明日整整一天跑到街上去，特别如我现在从上面看到的那些还没有我出现的街道那样。

巴黎的误解开始。马克斯走上来进入我的饭店房间，见我还没有完事，并正洗着脸，他便为此发怒，可是我早已说过，我们只稍稍洗一下，便立即出去。因为我以为稍稍洗一洗只是排除了将整个身体洗一洗的概念，为此便认为正是洗洗脸面，而且正好还没洗完脸，所以我不理解他的谴责，并继续地洗脸，虽然并不像过去那么仔细。在这个时候，马克斯穿着他经过夜间行车满是龋龋的衣服坐到我的床上等着。他有着这样的习惯，而且现在也将它显示出来了，即他在谴责别人的时候就假惺惺地紧缩住嘴巴，当然也包括整个面孔，就好像他想以此一方面加速对他谴责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好像表示，只有他刚刚作出的令人讨厌

的面孔没有让他给我一记耳光。在我逼使他作出违背他本性的这种虚伪之举里面，还有着一种特有的、看来是他后来针对我的谴责。如果他默默无语，并将他的面孔朝向相反的方向，从这种令人讨厌的感觉中恢复过来，就是说从嘴巴的表情离去，从各个方面绷紧自己，这效果自然要比最初的面孔强得多。我对此表示理解（在巴黎也是如此），我又是由于疲劳而重新陷入自我的境地，这样面孔的影响根本涉及不到我。我为什么后来能在我的痛苦中如此有力，直截了当地说，由于完全彻底的无动于衷，我便能够在毫无负疚的感觉中当他的面表示歉意。这在当时使他感到安慰，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以致他带着我踏上阳台，议论风光，首先，这风光是多么地有巴黎味道啊。我其实只看到马克斯是多么地清新，他肯定是多么地适合任何一个模样的巴黎，这点我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就像他现在从他后面阴暗的房间走出来，一年来第一次在阳光下踏上一个巴黎的阳台，并对此有着庄重的意识，而遗憾的却是我明显地比在马克斯来到之前片刻，我最初走上阳台的时候更为疲乏。我在巴黎的疲惫是不能通过充足的睡眠，而只能通过离去来消除。有时候我认为这甚至就是巴黎的一种特性。

我写了这些根本毫无恶意，可是它又在每一个词语上跟踪着我。

我最初对比亚德咖啡馆反感，因为我相信人们在那里只能喝到黑咖啡。事实是，那里也有牛奶，即使还有些不怎么样的海绵状的烤制糕饼。这几乎是我为巴黎想起的唯一的改进，就是人们应该在这样的咖啡馆里做些更好的糕饼。后来，在用早饭之前，这时马克斯已经坐下，我想到去旁边的街道 **溜溜**，找找水果。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总是先吃一点东西，好让马克斯不太吃惊。我们在凡尔赛蒸汽铁路车站附近的一家不错的咖啡馆里作了这种成功的尝试，将从一家糕点店买来的苹果卷和杏仁排在一个倚着门朝我们看的店员眼下吃光。我们将这个也在比亚德咖啡馆作了介绍，并觉得，人们除了享受纯美的糕点外，还明显地享受这种咖啡的原有的优越品性，也就是享受在颇为空荡的酒店里的那种完全不为人所注意的东西，良好的服务，接近柜台后面的和总是敞开的店门前面的那所有的人。只是人们一定得接受这样的事实，即由于直接从街道上走来的，在柜台边挤来挤去的来访者很多，地板要常常清扫，而且也不必顾忌不重视客人的习惯。

观察在凡尔赛蒸汽铁路站路段的一些小酒吧，看上去对一对年轻夫妇来说开这样的一个酒吧，同时过上一种优越的、有意思的、没有风险

的、只是在一定的日常时间里花些精力的生活，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于在林荫道上，在楔形的房屋地区尖端的两条街道之间，也有如此的酒吧在旁边的阴暗处延伸出来。

客人们围坐在城郊旅馆小桌子的四周，他们的衬衣上满是石灰。

晚上，在普罗索尼埃林荫道上，一个妇女推着卖书的小车叫喊着：“翻翻吧，我的先生们翻一下吧，找一下这里所有的书，卖书喽。”她并不逼着谁去购买，也不讨厌地朝谁看去，她在她的喊声中能立即说出围站着的人手中拿的那本书的价钱。她好像只是要求人们快点翻阅，快点儿将书从手中传递出去，这是人们能够理解的。要是人们注意看的话，比如不时地有一个人，就拿我来说吧，慢慢地拿起一本书，稍稍地翻翻里面，慢慢地将它放回原处，终于慢慢地离去。这种认真地叫出这些书的价钱，这些书的不正经程度又是那么可笑，使得人们首先在整个观众的眼睛里难以设想做出一个要买的决定。

在店前面买一本书要比在里面花去更多更多做出决定的力气，因为这种选择在偶然面对出售的书籍时本来只是一种自由的考虑。

坐在爱丽舍场地上的两张互相背靠的椅子上。许多孩子还在黄昏中玩耍，他们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以致在这黄昏中已经无法清楚地看见他们在沙中划出的线条了。

封闭的游泳池，外面有着一一种在记忆中是土耳其效果的涂色。下午的时候，它被照耀得呈铁灰色，因为太阳光只是透过上面绷紧的布的缝隙在一个角落以零星光线照射进去，使得下面的池水变黑暗了。大大的空间。在一角有一个酒吧。游泳教师们这边那边地沿着水池疲于奔命地来往于顾客之间。他们在一旁的更衣室前面逼近顾客，并用不懂的或固执的讲话来讨一种隔离金。在这样不懂的语言里的一种要求对我好像是不引人注目地提出来的。大桥浴场。在角落的台阶上站着用肥皂彻底洗身的人，他们周围的肥皂水并不活动。人们通过空隙向河流流过的什么地方看去，那是蒸汽。这种可怜的游泳取乐，就好像两个人与一个年老的豪饮者聊天，这位老者从这面墙壁被推开，却又碰到了对面的墙壁。开设在地下室的酒店冒出蒸汽。漂亮的绿色公园长凳。有许多德国味。在一所游泳学校里，水上挂下一根随意作体育锻炼用的有结的绳子。我们打听巴尔扎克博物馆，一位漂亮的年轻人头发吹得飘起，还显得湿湿的，他向我们解释，我们指的是格雷芬博物馆（一处蜡像陈列馆）。他

殷勤地让人打开他的更衣室，取出一张小旅游指南（大概是一家旅馆的新年礼物），但在上面找不到巴尔扎克博物馆。我们的内心已经在不停地感谢了，因为我们预料到这一点了，而且也赶忙地劝阻寻找这地方了。布丹那里也没有。

喜剧歌剧院的一位肥胖的检票员从颇高处朝下向我们收了一些小费。我想原因在于，我们手里拿着剧场的票子大约一步一步先后跟得太紧地朝上走，我打算以后晚上在有这些检票员的喜剧院里当面拒绝给这种小费，而现在我在胖女人和自己面前羞怯地给出了大把的小费，所有的其他人却竟然没有小费地走了进来。我在喜剧院里也说出了这句话，我按我的看法称小费为“不是绝对必要的东西”，可是又一定得付，当这一次那位较瘦的检票员抱怨管理处没给她报酬的时候，她把面孔斜到了肩膀。

开始是擦靴子的场景。陪着站岗的孩子们用同样的步伐走下阶梯。草率演奏序曲留下的印象，使得迟到的人轻松而入。因为人们一般只是习惯听轻歌剧。这种演出安排再朴实也没有了。昏昏欲睡的跑龙套的人，像我在巴黎看过的所有演出中一样，在我们那里生动性常常是糟糕地被抑制了。为第一幕《卡门》准备的驴，在狭窄街道里的剧院入口前面被剧院的人以及大约是街上的观众围住了，驴在等待入口处的小门打开。我在露天阶梯上几乎是明知故犯地买了一张错误百出的节目单，就像那些在所有剧院前面出售的节目单一样。一位芭蕾女主角在走私集团的小酒馆里为《卡门》跳舞。她无声的身体在卡门的歌声中是怎样随着韵律运动的呀。接着是卡门的舞蹈，由于她的功绩，在迄今的表演中，卡门变得更加地美了。看得出，她好像在演出前极快地从芭蕾女主角身上吸取了一些教训。她倚着桌子，倾听某个人讲话，并在绿色裙子下面让双脚作相对表演，脚灯灯光将它们的后跟照得雪白。

一个没有写过日记的人面对一本日记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见解。比如，如果这个人在读歌德的日记，这个人在1797年1月11日整天在家中“忙于各种各样的整理工作”，那么，在这个人看来，他本人还从来没有做过如此之少的事情。

在最后一幕，我们已经太疲倦了（我对倒数第二幕就已经是这样了）。我们离去，坐进了喜剧院对面的一个酒吧，在这里马克斯由于疲倦用苏打水喷我，而我由于笑得太疲倦，失去控制，让石榴汁呛了鼻子。在这个时候，最后一幕大约开始，我们漫步走回家去。受剧院里的

炎热之后，走上这个广场使我舒服多了，在剧院里我用敞开的衬衫扇走胸前的热气；夜的空气，坐在露天里，将一双腿一直伸到一个城市广场的外面去，被照得通亮的大剧院的外表，以及那些咖啡屋旁边的光线足够照到这个小小的广场了，特别是照向它的地面，一直照到那些小桌子的下面，像照向一个房间。

在前厅的那位先生跟两位太太聊天，他穿一件燕尾服，有点不合身，如果它不是新的话，不会在这里穿。单片眼镜放下了又拿起来。要是谈话停止的时候，他就心神不定地用手杖叩击着。如果他不时地带着手臂的抽搐站起来的话，就好像他每时每刻都有着用他的手臂领那两位太太穿过人群的企图似的。干瘪损耗着脸部的皮肤。

德国语言的特性，在不掌握它而且大部分也不想掌握它的那些外国人的嘴巴里，变得美起来。就我所观察到的法国人而言，我们永远不能看到，他们会对我们在法语中的错误感到高兴，或者即使在听觉上发现这些错误，就连我们也如此，只能微微说出法文语言感觉来的我们的法语……〔这里中断〕

从我的角度看，幸福的厨师和招待们，他们在一般的吃食之后吃沙拉、菜豆和土豆，在大碗里将它们混合起来，尽管给他们端来许多，他们只从每种蔬菜里取少许，从远处看外表上是这样，就像我们那里的厨师和招待一样。——招待的嘴巴和小胡子漂亮地紧凑在一起，他在一天中，根据我的看法只是因此才为我服务，那就是我疲惫不堪、行动笨拙、失去思维、使人讨厌，并因此而不能给自己弄吃的东西的时候，这时，他几乎不看这些东西就给我端来吃了。

在塞巴斯托波尔林荫道边的杜瓦尔笼罩着一片黄昏。三个客人分散地坐在酒店里。女招待互相小声地说话。钱箱还是空的。我要了一杯酸牛奶，后来又要了一杯。那位女招待悄悄地将它拿来，酒店里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也增加了这宁静的气氛，她怕影响我在这里享受那份饮料，便悄悄地将我那位置上为晚饭准备的餐具取走。一位如此娴静的女子对我的痛苦感觉竟能这么容忍与理解，这使我感到非常舒服。

在里歇里欧大街上可笑的饭店里。里面挤满了人。玻璃镜子前面可恶的烟雾景象。有规律排列的挂满帽子的衣钩板像树林。桌子之间有扶栏的风格。不机灵的外国人误以为那里是扶栏似的框架，肯定也镶着玻璃，人们厚着脸皮朝玻璃看去，似乎在里面看到了远处客人的影子，并

且通过对视看到，认识了那些真实的面孔——人们感觉到，这些在一个挨着一个的桌子之间的扶栏正是更多地为了拉近客人们的距离而设的。

在卢浮宫里我从一张长凳歇到另一张长凳。漏歇了一个长凳，就感到疼痛。——在卡累沙龙里的拥挤，激动的情绪，分群地站着，就好像蒙娜丽莎刚被偷走似的。——图画前面的横杠倒是令人舒服的东西，人们可以倚着它们，特别是在原始厅里。——和马克斯看他喜欢的图画，这是一种精神的压力，因为我太疲倦了，更何况要费神地看。——举目欣赏地瞧。——一位高大年轻的英国女郎多有力啊，她和她的伴侣在最长的大厅里从一端走向另一端。

马克斯的样子就像在街灯下在阿里斯蒂德前面读《费德尔》，并因为小小的压力而眼睛受到妨害。他为什么从来不跟着我？——可惜我还从中得到好处，因为他在去剧院的路上将他在街道上从《费德尔》里读的东西全部讲给我听了，他读那书的时候我正吃晚饭。路不长，马克斯努力地将所有的一切全给我讲了，当然我这方面也付出了努力。前厅有许多军人。士兵们按军规维持着从售票处几米远的地方挤回来的观众，让他们朝前走。

在我们的行列里好像有个喝彩的女子。她的喝彩好像是按着在我们后面最后一排忙于喝彩的领队人的棒子向上敲击的节拍进行的。她拍着手，心不在焉地将面孔前倾得那么远，使她在鼓掌结束的时候，还惊异而关心地看着她那开了孔的手套的掌面。如果必要的话，鼓掌马上就会再起。但啪啪声最终真的自动响起，而且完全不是喝彩的女子了。

面对剧院观众必须要看的戏剧，大家有着同样的感觉，为阻止第一幕结束，整排的人站立起来。——这五幕都是一个布景，这更增加了严肃性，尽管它只是用纸做成，要比一种用木头和石头更替的布景更为结实。

一组对着大海和蓝天耸立的圆柱，它的高处长满了攀藤的植物。有着委罗内塞以及克劳德·罗伦斯盛宴的直接影响。

希波吕特斯^[15]的那张不管是闭上的，还是张着的，或是大开的嘴巴，显然都表现出安详的弧形来。

奥埃诺内很容易陷入持续的姿态，有一次别人鼓励她将腿紧紧地用布缠上，将手臂举高，安详地握成拳头，朗诵一节诗句。许多人慢慢地

用手遮住面孔。主要人物的顾问脸色苍白。

对费德尔扮演者的不满意，使我回忆起我对法国国家剧院成员拉歇尔的满足，我曾有段时间总是看她的东西。在如此令人惊异地观看的时候，如在第一场，希波吕特斯身边握着那张不动的有男人一般高的弓，带着向教师吐露真情的目的，将那安详骄傲的目光投向观众，像背诵节目的诗句一样朗诵他那首诗。我像平时一样已经早有这种当然很孱弱的印象，这是第一次发生的事，而且就是这第一次的成功的赞赏便掺杂进我其余的赞赏中了。

布局合理的青楼。整座房子大窗户上干净的百叶窗都垂着。在门房的房间里不是男人，而是穿着正派的女人，她可能在家里到处都会出现。我在布拉格的时候就常常匆匆地注意过青楼的那种有男子气概的女子性格，这种情况在这里更为清楚。一位女性的看门人开动信号装置，把我们拦回到她的房间里，因为她被告知，正好有客人走下楼梯。上面两个可敬的女子，（为什么两个？）她们接待我们，扭开隔壁房间里的电灯，在这房间里有几个姑娘坐在暗处或半暗处，形成四分之三的圆（我们的来到将它补充成一个圈）。在这个圈子里她们以直立的、总想突出她们优点的姿势围住我们站着，被选中的女子迈大步站到前面，她用夫人般的手的姿势邀请着我，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被拉到门口，她是那么地迅速。在那里更为仔细地看清楚这位姑娘是不容易的，因为她们太多了，她们眨眼示意，主要是站得太近。人们也许必须要睁大眼睛，当然这要练习。在回忆中，我其实只要了正好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姑娘。她的牙齿有缺陷，她伸挺着自己的身体，用手在下腹紧紧地揪住自己的衣服，立刻并迅速地睁开、闭上那双大眼睛和那张大嘴巴。她金黄的头发被扯乱了。她身材瘦削，在这种场合里表现出恐惧，却没忘不摘下帽子。人们必须要把手从帽檐处挣脱。孤独的、长长的、没有意思的归家之路。

卢浮宫开门前聚集着许多观众。姑娘们坐在高高的圆柱之间，有的读着导游手册，有的写着风景明信片。

米罗的维纳斯，她的样子在最慢转动的时候迅速而惊人地变化着。遗憾的是作了一个勉强的说明（关于腰身和外衣），但也作了一些真实的说明，为对她的回忆我真必须要有一个雕塑的复制品，特别是有关于此，弯曲的左膝是怎样参与决定各方面的外貌的，但有的时候只是显得很孱弱。这个勉强的说明是：人们在期待，在中断的外衣上部的身体马

上充满青春活力，但身体首先变得还要胖些。那件下落的、由膝部挽着的衣服。

博尔盖西的击剑者，他前部的外貌，不是主要的外貌，因为他使看者朝后退，是一个分散的外貌。但从后面看那个脚首先着地，那惊异的目光在这里沿着立得牢牢的腿，并防卫地越过不停颤动的背部飞向朝前举起的手臂和剑。

梅特罗当时在我看来很空，特别是当我将之与那次旅途相比的时候。我那时有病，而且是独自一人飞快地旅行。除了参观，梅特罗的外表也置于星期日的影之下。最突出的是墙阴暗的钢铁之色。列车员将车厢的门推开又关上，进进出出地工作着，表明那是星期日下午的工作。车子慢慢地行进在转车的那段长长的路上。旅客们那种不自然的漠然表情变得越来越明显，他们就带着这种漠然忍受着在梅特罗里的旅程。背向玻璃门，一些人在远离歌剧院的不知名的站头下车，让人感觉出了一种变化无常的情绪。在这些站头虽然有着电灯的照明，但变化着的白日的光线肯定让人注目，特别是当人们刚下车的时候，人们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那下午的光线，紧临变暗的前夕。车驶进空荡的太子港的终点站，许多逐渐看得清楚的管道，向弯道望去，诸多列车在如此之长的直线行驶之后必须要在这一唯一的弯道行驶。在铁路上穿行隧道更是令人不愉快，（这里）没有压迫感的痕迹，旅客感觉到的是看不见的群山压力下的压迫感。这也不能说是远离人群，而是一种城市的设施，例如像水管里的水。在下车时往旁跳一下，然后接着是更为有力的挺进。这是在同一高度上下车。绝大多数孤零零的小写字间均装有电话，信号装置指挥着这里的运转。马克斯总想朝里面看。当我乘梅特罗在生活中第一次从蒙特马特尔驶往宽阔的林荫大道的时候，梅特罗的噪声是可怕的。一般说这噪声并不讨厌，甚至增加了快速的舒服安静的感觉。杜博内特的广告是非常适合那些伤感的和无所事事的旅客去读、去期待以及去观看的。因为人们无论在付款的时候，还是在上下车的时候都不必说话。由于它对一个满怀期待而陌生的弱者来说是那么容易理解，梅特罗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为自己创造了信念，准确而迅速地一起闯进了巴黎的本质。

人们可以认出陌生的外来者，他们在梅特罗的阶梯最后一级的平台上已经表现得不再熟悉，他们已经不知所措地不像巴黎人那样没有过渡地就进入了街道的人流。到走出来的时候才慢慢地将现实与地图吻合起

来，这时我们到了这个广场，我们现在随着上来的人群走着，没有地图的引导，好像从来不是徒步或坐车来到似的。

回忆在绿化场地上的散步总是很美的，那里还是那么晴朗，令人高兴。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天气不是迅速地变暗，走路的步伐和环顾是由这些变化和疲劳所决定着的。乘坐在宽大光滑的马路上行驶的汽车是紧张的。小花园的饭店里穿着红色衣服的乐队在汽车的噪声中演奏，根本听不到它的声音，他们拨弄着乐器只是为享受临近四周的环境。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巴黎人互相牵着手。烧过的草地是土色的。露出衬衣袖子的男人们和他们的家人待在大树下面的昏暗中，这里早就已经禁止入内了。这里最令人注目的是缺少犹太人。回头向小小的蒸汽铁路看，它看上去是从一个旋转木马处展开而离去的。那是通向海洋的路。我对第一眼看到这片湖的最强烈的回忆是，它像一个男子躬着的脊背，这个男子朝着我们上了船，在绷紧的布棚顶下俯着身子，将船票递给我们。大约是由于我对船票和我无能的担心，我逼这位男子作出解释，这艘船是不是绕湖行驶或者是摆渡到岛上，是不是有停船的地方。因而我是那样地盯着他看，使我有时候只看见他本人弯着背盖住了湖面，而见不到船身。有许多穿着夏日服装的人待在登岸的地方。船上的划船手并不熟练。湖岸低矮，没有栏杆。缓慢的行驶使我回忆起早些年前每个星期天独自所作的散步。从水中抽出双脚放在船底板上。在听到我们说捷克话时，那些游客们惊异不已，竟然和这样的外来人坐在一条船上。在两岸的斜坡上有许多人，有打进地里的树桩，摊开的报纸，带着女儿的男人平躺在草地里，很少有笑声；低矮的东岸，在我们那里早已取消了用互相连接在一起弯曲的小木条做成的路障，一条野狗在草地上奔跑，认真工作着的划船手们和一个姑娘在那条沉重的船上。我让马克斯特别孤单地在昏暗中，在一家咖啡园喝着一杯石榴汁。此地只有一条马路通过，它很快又与另一条不知名的路交叉。汽车和其他车辆从这个昏暗的交叉处驶向更为荒凉的去处。一排大铁栅栏大概是属于消费税务局的。可是是开着的，可让每个人通过。在附近的人们看到月神公园刺目的光线，这光线增加了这半昏暗中的杂乱无章。这么多的灯光，如此的空荡。在去月神公园的路上和回到马克斯那里去的时候，我大约绊倒五次。

9月11日。星期一。浇上沥青的铺石路面上汽车是比较容易驾驶的，但停车却比较困难。特别是少数人坐在驾驶盘旁，他利用马路的宽阔，美丽的白天，轻便的汽车，他以他的驾驶知识，作一次小小的商业旅行，并同时在十字路口如此地驾车拐弯，就像徒步行人步行在人行道

上。有一辆这样的汽车正要驶进一条小街道，还没出这个大广场就碰上一辆三轮车。汽车灵巧地停住，并未碰着多少，严格地说只是擦了一下，可是三轮车停下来了，而且前面的轮子似乎弯曲了。面包师的助手在这辆属于这家公司的车子上刚刚还无忧无虑地跟着那个三个轮子所特有的笨拙的摇晃一起并驾齐驱哩。他走下车来，碰上也刚从汽车里下来的司机，谴责司机，这种谴责出于对一个汽车拥有者的尊敬而不能遏止。这时首先是要弄清楚，怎么会产生这种意外事情的。小汽车的主人用举高的手掌描述着这辆开过来的汽车，那个时候他看到这辆三轮车横向朝他开来，换过右手，并通过来回的挥动警告三轮车，显出一脸的担心，因为什么样的汽车才能在这段距离里刹住车啊。三轮车会看清这些吗？它会让这辆汽车优先行驶吗？不，那已经太晚了，左手放弃了警告，双手联合起来造成了这不幸的碰撞，膝盖一弯便支持不住观看那最后的一刹那了。这一幕就发生了，那辆静静立在那里的扭曲了的三轮车已经在为继续描述这事件提供了帮助。而面包师的助手没能顺利地敌过对手。第一，那位开汽车的人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活泼的男人；第二，他到现在已坐进了汽车里，让自己休息；第三，他从汽车的高度确实将事情的全过程看得更为清楚。在此期间，有些人围拢过来并站在那里，这好像是开汽车的人描述此事经过的功劳，这些人不是朝他围成个圈子，而更多的站在他的前面。这个时候交通肯定堵塞了，因为这群人拥挤在这里，另外，这些人按照开汽车的人的想法移来移去。如此，比如所有的人一会儿挤向三轮车，为是仔细地去看一下说得那么多的被撞的损失情况。开汽车的人认为这损失并不厉害（有些人并不高声地发表议论，表示站在他的一边），尽管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朝那里看去，而是来来去去地走着，一会儿上车，一会儿下车看着每一个人。有一个想要喊叫的人要为三轮车说话，可是开汽车的人并不要喊叫；但他得到一个新出现的陌生男子的很好的、很响亮的回答；如果人们没有弄错的话，他是开汽车人的同伴。有些时候一些听众肯定要在一起大笑，但总是随着新的实质性的说法而安静下来。现在在开汽车的人和面包师助手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分歧，开汽车的人看到自己被一小群友善的人包围着，是他令这些人信服的，面包师助手慢慢地停止了他那单调的手臂的伸展，提出谴责，是呀，开汽车的人并不否认他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损坏，两方面都有责任，也就是说谁也没有责任，这些事情就正好出现了，等等。简而言之，这种事情最终会流于尴尬的结局，那些已经在讨论着修理三轮车价钱的观众的声音也许肯定是在提出要求，人们也许不去回想很可能有人叫来警察这件事了。陷入了对开汽车的人来说越来越不利地

位的面包师助手被他请去叫警察，并将其三轮车托付给开汽车的人保护。这不是怀着险恶的用心，因为他没有必要去为自己组成一个派别，他在对手不在场的情况下也不会停止他的叙述，因为人们在吸着烟的时候谈话更好一些，他抽出一支烟来。他口袋里有一个烟盒。先将新来者、穿制服的人，即使也是一些经商的人，有次序地引往汽车那方向，后引向三轮车方向，然后再叙说这些细节。他要是从人群中听到一个站在后面人的异议，他就踮起脚尖回答他，以能看到那个人的脸。这表明这件事就变得麻烦了，使那些人在汽车和三轮车之间走来走去，因此汽车被开到人行道上，开进小街道里去。整个的三轮车停在那里，驾驶员查看着这车子。就像吸取有关汽车行驶困难的教训似的，一辆大公共汽车停在了场地的中间。人们在发动机旁的前面忙碌着。第一批弯下腰围着车子的人是那些下车的乘客，他们恰如其分地感到了他们身边的关系。在这期间，开汽车的人也稍稍参与了整理，并使劲将三轮车推上人行道。这事情渐渐失去了公众的兴趣。新来的人肯定已经在议论，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开汽车的人带着一些有见证人价值的老观众退了回去，并与他们低声地说着话。但在这个时候那位可怜的年轻人在什么地方转悠呢？人们终于看见他在远处，好像他领着警察开始横穿到这个场地来。人们不是没有耐心，兴趣马上重新活跃起来。许多新的围观者出现了，他们将廉价地尽情享受一下作记录的情形。开汽车的人挣脱了他那群人，向着警察走去，这位警察立即以由那些在场的人通过半个小时的等待形成的同样的安详接受此事件。没有多长时间的调查，记录便开始了。这位警察以一个建筑工人那样快的速度从他的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纸，记下有关人的姓名，面包师的商号，并走过去，为做得仔细，他一边写着一边围绕着这辆三轮车。那些在场的人无意识地无知地希望这个事件通过这位警察而有一个很快的实质性的结果，兴趣便转入到记录内容中的某些细节。记录偶尔停下来。警察将记录弄得有点儿零乱，可还是努力地将它制作出来了，在瞬间的时刻里，他既不听也不看别的什么东西。他已经开始了在那张表格纸上的一个他也许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开始写过的地方填写了。但现在这事件就是发生了，他对此的惊异常常重新表现出来。他不得不一再地翻转这叠纸，为相信这不怎么样的开始的记录。可是因为他马上放弃了这不好的开头，并又在别的地方开始写上了，如果这一栏完了的话，没有大的翻动和调查，他就无法知道，他该在什么地方正确地接下去写。这个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安静与那个刚才由围观的参与者独自达到的安静简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

魏玛—荣波恩之旅

1912年6月28日至7月20日

6月28日。星期五。从国家火车站启程。在一起不错。索科尔恩拖延了列车的启程。脱去衣服，整个身体都躺在了长凳上了。易北河岸。别墅的环境很美，好似湖岸。德累斯顿，到处都是充足的新鲜货物。尽善尽美的服务，从容投入的话语。建筑物的牢固的外观，归功于使用水泥的技术，可是举美国的例子来说，它的效果就不是这样的。通常是寂静的、由千回百转的漩涡形成的有大理石般纹路的易北河的流水。

莱比锡。和我们的仆役交谈。奥佩尔斯饭店。半新的火车站。旧火车站美丽的废墟。公共房间。从4点钟起就躺下，马克斯因为外面的吵闹声不得不将窗户关上。好响的嘈杂声。凭听觉一辆车后面拖着另一辆车。由于路面上铺的沥青，马走起来听上去像是赛马的声音。马渐渐远去，马声消逝，街道和广场上又传来明显的电车的响声。晚上在莱比锡。马克斯地貌学上的直觉，我失望的表现。对此，我断定是王侯建筑转角上的悬楼，后来被导游所证实。一个施工现场夜间还在工作，大概是奥尔巴赫酒家。对莱比锡无法消除的不满。诱人的东方咖啡馆。“鸽棚”啤酒馆。行动迟缓的长胡子的啤酒之父。他的妻子给倒酒。两个健壮高大的女儿作招待。带抽屉的桌子。大木头里装着利喜滕海因出产的啤酒。要是人们打开盖子，就会闻到一股异味香气。一位虚弱的本地客人，红而瘦削的面颊，有褶皱的鼻子，和一大群人坐在一起，后来独自一人退出来。那位姑娘手里拿着啤酒杯在朝他看。12年前死去的本地客人的画像，这客人来这里14年的时间。他举着杯子，在他后面是一副骨架。莱比锡有许多很有联系能力的大学生。许多人戴单片眼镜。

6月29日。星期六。用早餐。那位先生星期六没有在一张汇款单的收据上签字。散步，马克斯去罗沃尔特。图书行业博览会。在众多书籍面前我不能自制。这座出版社建筑楼区的古色古香的街道，虽然路是笔直的，房屋是较新的，而且也是没有装饰的。公开的阅览大厅。在“妈妈”那里有午餐供应。不好。威廉酒馆，在一个院子里的光照朦胧的小酒店。罗沃尔特，小伙子，红脸蛋，鼻子与脸颊之间静立的汗珠，刚从臀部开始活动。巴塞维茨伯爵，《犹大》的作者，身材高大，容易激动，干枯的面容，做着腰身运动，经过良好的治疗强壮起来的身体。哈森克萊弗^[16]，一张小小的脸上就有着许多阴影和光亮，也闪烁着淡青色。

这三个人都在挥动着棍棒和手臂。所有白天的午饭都在酒馆里吃。大而宽的葡萄酒杯上放有几片柠檬。品图斯[17]，《柏林日报》的通讯记者，胖胖的身材，平平的面孔，后来在法兰西咖啡屋里校对着那篇打字机打下来的评论文章《那不勒斯的约翰娜》（前一天晚上首次公演）。法兰西咖啡馆。罗沃尔特颇为认真地向我要求写一本书。出版者们本人的职责和他们每天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在出版社里。

5点钟启程去魏玛。车厢里那位年龄较大的小姐。

深色的皮肤。圆圆乎乎的下巴和面颊。好像长筒袜的接缝处绕着她的腿转，她用报纸盖着自己的脸，而我们看着这双腿。魏玛到了。在她戴上了一顶大而旧的帽子之后，也在那里下了车。我后来又见过她一次，那是当我从市场广场去歌德故居访问的时候。去凯姆尼丘斯饭店的路是长长的。几乎失掉了勇气。寻找浴场。马克斯应该睡在一个无窗的洞穴里。吉希贝尔格旁边的露天浴场。天鹅湖。夜间步行去歌德故居。一眼便认出来了。全部是棕黄的颜色。我们整个过去的经历都在有感觉的参与这一瞬间的印象。没有住人的房间的窗户是阴暗的。明亮的朱诺[18]半身像。触摸墙壁。所有房间里微垂白色的窗帘。十四扇临街道的窗户。挂在前面的链子。没有介绍全部的图画。不平的场地、水井，接着这向上伸展场地房子的建筑线是支离破碎的。那些黑暗的、稍有点长的窗户涂上了褐黄色。从本身来说这是魏玛最引人注目的平民住宅。

30日。星期日。上午。席勒故居。长得畸形的女人，她走到前面，并用几句话，主要是通过这种语气，请求原谅这现在的纪念。在阶梯上克利奥[19]掌握写日记。1859年11月10日一百周年诞辰庆典的图画，房子是经过装修并加宽了的。意大利的外观，贝拉吉奥，歌德的礼品。一点儿不像人的髻发，又黄又干。像兽类的鬃毛。毛利亚·帕夫洛夫娜，柔媚的颈脖，脸并不宽，一双大眼睛。各种不同的席勒体姿。一个作家住处的良好的布局。等候室，接待厅，写字间，深凹的卧室。尤诺特夫人，他的女儿，与他长得相像。《小经验育成大树苗》，他父亲的书。

歌德故居。应酬房间。匆匆瞥了一眼写作和睡觉的房间。悲哀地回忆着死去祖父的景象。这个花园自歌德死后花草自然不断生长，使他的工作房间变得阴暗的欧洲山毛榉。

当我们已经坐在楼梯间下面的时候，她带着她的小妹妹从我们身边跑过。一只善于赛跑的狗的石膏模子，它立在楼梯间的下面，在我的回

忆中，它一起属于这种奔跑。后来我们又在朱诺的房间里看到她，再后来是在从花园中的小屋朝外看的时候见到她。我相信我还常常听见她的脚步声和她的说话声。两株石竹穿到了阳台的栏杆。进入花园太晚了。人们向上看到她站在阳台上。直到后来她才带着一位年轻男子下来。在擦身而过的时候，我感谢她注意到在花园里的我们。我们还没有离去。母亲来了，花园里人来人往。她站立在玫瑰灌木丛旁。我走过去，被马克斯碰了一下，得知那是去蒂福尔特远行。我也去。她带着父母一起去。她提到一个旅店，从这家旅店人们可以观看到歌德故居的门。她从门口出来，我跑了过去，我向大家介绍，得到同去的允许，可是又跑回来了。后来这一家来了，可是不见了父亲。我想去亲近，不，他们刚去咖啡馆，我应该等着父亲后去。她说，我应该4点钟的时候进这个房子。和马克斯告别后，我去接父亲。在大门前与车夫交谈。与父亲离去。谈有关西里西亚大公、歌德、国家博物馆、照相和绘画，以及这个神经过敏的年代。停在他们正喝咖啡的屋子前面。他跑上去，把大家叫到凸肚窗前，因为他要给他们拍照片。出于神经紧张，和一个小姑娘玩球，和几个男子离去。我们前面有两个女人，在她们前面有三个小姑娘。一条狗在我们之间跑来跑去。蒂福尔特的城堡。与三位姑娘参观。她知道许多事情，在歌德故居也是，而且更出色。在一些维特画像前的解释。冯·歌赫豪森小姐的房间。用砖墙堵上的门。仿制的毛线帽子。后来与双亲动身。在公园拍了两次照。一次是在一座桥上，这可能拍坏了。没有自然的关系，完全交上了朋友，最终走上回去的路。文献中有关布莱斯劳的狂欢节趣事的故事。在房前的告别。我在赛芬街兜着圈子站立。在这期间马克斯睡了。晚上三次不可理解的会面。她和她的女友。我们第一次陪着她们。晚上我可以在6点钟以后随意来到花园。现在她们必须回家。然后又在为决斗而设的圆场地上会面。她们与一个年轻的男子讲话，与其说友好，还不如说充满敌意。这个时候我们一直陪她们到了歌德广场，但她们为什么不留在家中呢？她们该赶快回家的呀。可是，显然她们根本不是被这位年轻的男子追逐或是她们有意地遇上这个男子，她们却为什么现在跑出席勒大街，沿小阶梯而下，来到一旁的偏僻的场地呢？她们在十步的距离处与那年轻的男子讲了几句话，好像拒绝了他的陪伴之后，她们为什么又在那里转过身来，独自跑回来呢？是我们打扰了她们？我们只是用简短的问候从她们身边走过？后来我们慢慢返回，当我们来到歌德广场的时候，她们已经又从另一条街上跑出来，显然很恐惧，几乎碰到我们的手。出于小心，我们都转一下身子。但她们还是绕道而去。

7月1日。星期一。路边的花园小屋。在这屋子前面的草地上画画。在歇息的座位上背诵了这节诗。箱式的床。睡觉。院子里的鸚鵡叫着“格雷特”^[20]。徒劳地去了她学习针线活儿的那条埃尔富特林荫大道。洗澡。

7月2日。星期二。歌德故居。复折屋顶阁楼。在房东那里看到照片。围站着的孩子。有关照片的谈话。不断留意着一个与她交谈的机会。她和一个女友去做针线活儿。我们留下。

下午参观李斯特故居。高超艺术家。老太太保莉妮从5点到8点看李斯特的东西，然后去教堂，再后第二次睡觉，从11点起参观，马克斯在浴场，我去取照片，先碰上她，与她一起来到大门前。这位父亲将照片拿给我看，我带着照片架子，最后我必须走了。她毫无意义且没有用处地在父亲的背后向我微笑。悲伤的。突然想起要将这些照片放大。走进药房。因为底片的缘故，又回到歌德故居。她从窗口看见我，并打开了窗户。——多次与格雷特见面。吃草莓，在维特公园前面的一场音乐会。她那宽松衣服里令人激动的身体。从“俄国宫廷”来的身材高大的军官。各种各样的制服。穿着深色衣服、身材细长的人、身体强壮的人。——在偏僻街道里的打架斗殴。“你肯定是个最美丽的臭东西！”许多人站在窗户旁边。离去的家庭，一个醉汉，一位老太太背着背篓，两个小伙子跟着。

令我着急的是我必须马上离去。发现《蒂沃里》。墙边的桌子叫“侧阳台”。这位年纪大的身材如蛇般的太太，她的丈夫以耍魔术挣钱。那些女性的德语老师。

7月3日。星期三。歌德故居。应该在花园里留影。没看到她，我得去接她。她的动作总是那么颤抖，要是有人跟她说话，她便颤动起来。开始拍照。我们两个坐在长凳上。马克斯指着那位男子，应该怎样做。她给我一个第二天的约会。奥廷根透过窗户看，并不让我们拍照。我们两个刚刚站在相机旁。我们就不拍了！那个时候这位母亲还是友好的。

除了学校和不付费的人外，一年里有三万人来这里。——浴疗，真挚，孩子们安静的摔跤比赛。

下午在大公爵的图书馆。特里佩尔——半身雕像^[21]。对领导者的称赞。非常熟悉的大公爵。坚实的下巴，有力的嘴唇，手插在紧扣的上

衣里。大卫〔德·安格尔斯〕的歌德半身塑像，向后竖立的头发，硕大而紧绷的面孔。格鲁克。用生命浇铸而成。用管子做成的嘴巴里有许多孔洞，他曾通过这些孔洞呼吸。歌德的工作室。通过一道门，人们立即就踏进施泰因夫人的花园。由一个罪犯用一棵巨大的橡树做成的那个楼梯，上面没有一枚钉子。

在花园里和这位木匠的儿子弗里茨·文斯基散步。他作了一番严肃的讲话。在讲话的时候，他用一根树枝向灌木打去。他也要成为木匠，并将徒步漫游，现在他可以纵情地享受铁路的交通了，再也不用像他父亲那个时代去漫游了，为了做外地人的导游，人们也许必须要掌握各种各样的语言，那就是说不是在学校里学习这些语言，而是要买有关这方面的书。他知道有关公园的知识，不是从学校里学来的，就是从导游那里听来的。导游的说法与一般的情况不一定符合。例如这座罗马式的房子无非就是，这门是为供应商们而定的。

树皮做成的小屋。莎士比亚纪念碑。在卡尔广场上找周围的孩子。关于海军的谈话。孩子们的严肃。谈到有关船只的沉没。孩子们的优越性。一只球的允诺。分饼干。花园音乐会演奏《卡门》。完全沉浸在这音乐里了。

7月4日。星期四。歌德故居。用大声的允诺来确证约会。她大门处朝外看。我们在场的时候，她就朝外看了，这解释是虚假的。我还问了一下：“下雨也见？”“是的。”

马克斯去耶拿见迪德里希斯。我去君侯的陵墓。和军官们一起。歌德的灵柩上金色的桂冠花环，是1885年布拉格的德国妇女捐赠的。公墓上所有的人又被重新找到了。歌德一家的墓地。瓦尔特·冯·歌德1818年4月9日生于魏玛，1885年4月15日死于莱比锡，“歌德家族随他而断宗，这个家族的名字却永垂千古”，卡萝莉内·法尔克夫人的碑文：“在上帝召唤去她自己的七个孩子的时候，她成了陌生的孩子们的一位母亲。上帝将抹去她双眼里的全部泪水。”夏洛特·冯·施泰因：1742—1827。

浴场。下午没有睡觉，为是不让这不稳定的天气从眼里溜过，她并没有来赴约。

看见马克斯在床上穿衣服。两人都不幸，要是人们能将痛苦从窗口发出去该多好呀。

晚上希勒和他母亲在一起。——我从桌边跑开，因为我相信看得见她。欺骗。后来大家全在歌德故居前。向她问候。

7月5日。星期五。徒劳地去歌德故居。——歌德——席勒——文
献。伦茨的信件。1830年8月28日法兰克福市民给歌德的信：

“古老迈恩城市的一些市民，长期以来就习惯在这里手握杯子向8月28日致意，他们将会赞扬上天的宠爱，使他们可以在这个自由城市的市区欢迎这一天带来的这位非凡的法兰克福人。

因为这可是一年一年地停留在希望、期待和愿望之中，如此，他们就在此期间越过森林和田野、边区和关口，将这个闪光的奖杯递向幸福的伊尔姆斯塔特，并请求她尊敬的同胞的宠爱，可以在思想中与他们共同碰杯和歌唱：

如果你将赦免

降赐给你的忠诚，

如果我们想要不断地

追求你的目光的示意，

让我们与半明半暗隔绝

并在全善全美中

果断地生活。

1757年崇高的奶奶！……”

耶路撒冷写给克斯特纳：“我可以敬请阁下慷慨解囊作一次拟定的旅行吗？”

密克农之歌，没有一笔一画。

取了照片。送去。到处闲站着，无所事事。六张照片只交了三张。正好这些还是比较差的，希望房东为证明自己的能力而重新拍摄。毫无这种迹象。

浴场。直接在那里去埃尔富特大街。马克斯去用午餐。她带着两个女友来。我将她叫出来。是呀，她昨天不得不提前十分钟离去，直至现在才从她的女友那里获知我昨天的等待。她也曾因为舞蹈课而生过气。她肯定不爱我，但尊敬我。我给她那盒用一颗小心和链子缠绕的巧克力，并陪她走了一段路。来来去去的一些有关约会的话。明天11点钟在歌德故居前。这不能只是一种托词，她可是得要做饭，而后出现在歌德的故居前面！但我还是接受了。沮丧的接受。我走向饭店，在躺在床上的马克斯旁边坐了一小会儿。

下午去贝尔菲德尔。席勒和母亲。在车上通过一条独特林荫大道的美丽行程。令人吃惊的宫殿布局，这宫殿包括一个主要的部分和四周旁边的整洁的房屋，所有的建筑都显得低矮，颜色柔美。在中央是一眼低矮的喷泉。举目前望魏玛。大公爵已经好几年不在这里待着了。他是位猎手，而这里没有猎场。迎面走过来的那位安详的仆人有着一张刮得光滑的有棱角的面孔。可怜的样子，大约像所有活动在这统治之下的老百姓一样。家畜的悲哀。马利亚·帕夫洛夫娜，卡尔·奥古斯特大公爵的儿媳，马利亚·菲多洛夫娜和被绞死的保尔皇帝的女儿。许多是俄国式的。薄墙隔扇，附凿上金属丝的铜容器，在它们之间浇铸了彩釉。饰有天圆穹顶的卧室。在还可住人的房间里挂有照片，表现出唯一的现代化。好像它们也表现了令人觉察不到的井然有序！歌德的房间，一间较小的棱角分明的房间。几幅奥塞尔的天花板图画，被修整得面目全非。有许多中国式的东西。“黑暗的宫女房间”。有两排观众席的露天剧场。互相挨着的有扶手长凳的车辆，背靠背，太太们坐在里面，同时，温文尔雅的男子在她们旁边骑马作陪。这辆重重的车子，曾是马利亚·帕夫洛夫娜和她的丈夫作结婚旅行二十六天的用车，由三匹马拉着，从彼得堡到魏玛。露天剧场和公园是由歌德设计的。

晚上去保尔·恩斯特^[22]那里。在街上有两个姑娘打听作家保尔·恩斯特的住处。她们先沉思地看着我们，然后一位碰碰另一位，好像她想让她想想一个正好使我突然想不起来的名字。她们指的是维尔登布鲁赫？然后另一个姑娘向我们询问。——保尔·恩斯特。嘴巴上面留髭，下面蓄尖形胡须。紧抓住沙发椅的扶手或膝盖。即使在激动（由于他是批评家）的时候也不离开。住在海角。好像他的全家都住满了这一座别墅。一碗泛着鱼腥味的鱼应该端上楼，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又被带回厨房了。——帕特尔·埃克斯佩迪图斯·施米特进来，我曾经有一次在饭店的楼梯上撞见过他。他研究着奥托—路德维希一版本的文献。他想把土耳其

的一种水烟筒引进文献。他咒骂一份叫《虔诚的毒蛙》的报纸，因为这报纸攻击了由他出版的《神圣的传说》。

7月6日。星期六。——去约翰内斯·施拉夫^[23]那里。那位年纪大的长得与他相似的姐姐接待我们。他不在家。我们晚上又去。

和格雷特作了一个小时的散步。她的来到好像得到了母亲的允许，她还在街上通过窗户和母亲说话。玫瑰色的衣服，我的心上人。为晚上的盛大舞会感到不安。跟她没有丝毫的关系。扯断的、又一再开始了的谈话。有时候走得特别快，然后又走得特别慢。努力地、不惜代价地挑明此事，好像我们没用线穿在一起。是什么驱使我们共同穿过公园的呢？难道只是我的固执？

将近晚上在施拉夫那里。之前去看格雷特。她站在稍稍打开的厨房门前，穿着那件之前穿了好长时间的被赞扬的舞衣。这衣服完全不如她平时穿的衣服那么美。哭得甚为红肿的双眼，显然是因为她的主要舞蹈伙伴，他已经给她带来了过多的忧愁。我是永远地告别了。她不知道这一点，要是她知道了这点，她什么也不会会在意的。一位拿着玫瑰的女子还打断了一下这小小的告别，街道上到处是上舞蹈课的男男女女。

施拉夫。他并不住在阁楼的房间，好像是恩斯特和他闹翻了，还想说服我们。活跃的男子，强壮的上身被一件紧紧扣着的上衣裹着。只是一双眼睛神经质地闪动，是病态的。他主要谈论天文和他的地球中心说的系统。所有其他的，文学、批评、绘画，他还那样地留恋它们，是因为他扔不掉它们。一切都将于圣诞节决定。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的胜利。马克斯说，他对天文的情况类似于歌德对光学的情况。“类似”，他答道，不断地把手击在桌子上，“但顺利得多了，因为我为自己拥有着无可争辩的事实。”他那个小望远镜价值400马克。他完全不用它去做他的发现，他也不用数学。他的生活充满了幸福。他的工作范围是无边无际的，因为他的发现有一天被承认，将会在所有的方面（宗教、伦理学、美学等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他首先有责任去探研这种发现。当我们来到的时候，他正在将庆祝他50岁生日时的那些讲话贴在一本大书里。“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做得都那么温和。”

事先与保尔·恩斯特在韦比希特散步。他鄙视我们这个时代，鄙视豪普特曼、瓦塞尔曼、托马斯·曼。不顾我们可能发表的意见，豪普特曼被置于不在话下的地位，被称之为一个涂鸦者，这句话在他说了好长的时

间之后人们才理解。其他便含含糊糊针对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种族等等的观点而发，在所有的的事情中令人注意的一点是，他是一位尽一切努力很好利用他整个时代的人。——如果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枯燥而机械的“是，是”响彻在空间的空隙之间。有一次竟走得那么远，使我再也无法相信。

7月7日。27，在哈勒扛行李人的号码。——现在7点半，在格莱姆纪念碑附近，倒在了已经找了很长时间的长凳上。如果我是一个孩子的话，我肯定会被人送走，我的腿是那样地疼痛。——在和你告别之后，我还没有长时间地感到过孤零。而后来又变得如此低沉，以致这孤零也不存在了。——哈勒，小小的莱比锡。这里的和哈勒的这些教堂尖顶群是通过上面高耸入云的小木桥联系起来的。——我已经感觉到你不会立即，而是以后才会读到这些东西，这种感觉已经使我那样的没有把握。自行车俱乐部正在哈勒的市场组织一次远足。困难地去独自观看一个城市，或者只是观看一条街道。

中午的美味素食。跟其他旅店老板的区别是，这种素食主义的东西正好无法准确评价这位素食主义的老板。恐惧心使人们从旁边向一个人靠近。

从哈勒与四个布拉格犹太人同行：两个可爱有趣年纪较大身体强壮的男子，一位与K.博士相似，另一位与我父亲相似，只是更为矮小些，其他是一个身弱的被炎热打蔫的年轻丈夫和他的令人讨厌的可身材却不错的年轻妻子，她的面孔不知出自哪个家庭。她在读一本伊达·鲍·埃德的三马克的乌尔施泰因的小说，题目倒是颇卓绝，叫《在天堂的片刻》，大约是乌尔施泰因杜撰的。她的丈夫问她，这本书怎么样。但她刚开始读。“到现在我还不能说什么哩。”一位不错的法国人有着干燥的皮肤和美丽的分布在面颊和下巴上的微白而淡黄色的胡须，他在这所有走在前面的四人中显出令人注意的和蔼。

铁路饭店，下面的房间挨着马路，前面有个小小的花园。进城的路。一座完完全全古老的城市。从建筑式样看来是比较久远的建筑风格。阳台到处拐弯，填塞物下沉或凸起，整体还留存着，随着时间推移，也只有极少部分塌落，因此它还是比较牢固的。绝大多数窗户的中间板条也都加固了。有人将肩膀靠着它们，孩子们围着它们转动。在一条深深的过道里的第一级阶梯上坐着伸胳膊伸腿的身强力壮的女佣，她们穿的是星期日的服装。龙的道路。猫的计划。在公园里与小姑娘坐在

一条长凳上，我们将这凳子当作女孩针对男孩的长凳来保卫了。波兰犹太人。孩子们向他们喊着伊兹希，并不想在他们之后立即坐到长凳上去。

犹太人的小客栈N.N.是用希伯来文刻上的。这是一座荒废的、如宫殿式的建筑，有着大型的楼梯结构，它从街道露天凸起。我走在一个犹太人的后面，他从客栈出来，我跟他打招呼。9点后，我想知道一些有关教区的事。什么也没有获悉。我对他太有疑虑了。他不停地看我的双脚。但我也犹太人呀。我这才可能在N.N.住下的呀。——不，我已经有一个住处。——原来如此。——他突然朝我走近。我是不是没有在一个星期前去舒彭斯台特。在他家门前我们互相告别，他是幸福的，他摆脱了我，我并没发问，他还是告诉了我，去犹太教堂如何走。

穿着睡袍的人们站在门阶上。陈旧的、没有意义的题词。在这些街道、广场、花园的长凳上、小溪的岸上都想了一遍，要怎么不幸，就怎么不幸。谁要哭的话，那星期天就到这里来。晚上来来回回地走了5个小时之后，我待在一处小花园前梯田上的旅店里。在邻近的桌旁有许多住客围着一个年轻的、外表打扮得像寡妇的活泼的女人。面颊过分的瘦削。分开而蓬起的发型。

7月8日。我的房子叫“露特”。布置得实用。四扇小窗，四扇大窗，一扇门。颇为寂静。只是远处有人在踢足球，鸟儿使劲地鸣唱，几个裸体的人静静地躺在我的门前。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没穿泳裤。多美妙的自由。在公园里、阅览室等地方，人们看得到漂亮肥胖的小脚。

7月9日。在三面敞开的茅屋里睡得颇香。我可以像一位房主倚在门上。在夜间任何时候起来，我总听得到老鼠和鸟儿的声音，老鼠和鸟儿在茅屋的草地里唧唧啾啾或振翅扑打，有个人身上长有金钱豹般的斑点。昨天晚上有关衣服的演讲。中国女子把脚变成畸形，就为了有一个大屁股。

这位医生，早先是个军官，他大笑时看上去矫揉造作、疯疯癫癫、带着哭腔、俗不可耐，走起路来却充满活力。是个奉行伊朗新生活规条[24]的人。一副为严肃而创造的面孔。面修刮得挺光，嘴唇互相叠压着。他从门诊室走出来，有人从他身边走过。“请进！”他朝着那个人大笑。他禁止我吃水果，但有一个条件，即我必须不追随他。我是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听听他的演说，演说是打印出来的，我应该探讨这些事

情，形成我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对他采取态度。

从他昨天的演讲里：“如果人们自己的脚尖完全畸形，并绷紧这个足尖，同时进行深呼吸，这样，随着时辰的流逝，人们就能将它弄直。”在一定的练习之后性器官就会增强。从行为举止的规则中：“夜间的空气浴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如果这对我适合的话，我索性从床上轻轻下来，走向我茅屋前面的草地上），只是人们不应太受月光的照射，这是有害的。”人们可以完全不去洗我们现在穿的衣服！

今天一早：洗漱，做15分钟米勒早操，集体锻炼的体操（我叫穿着泳裤的男子），唱一些教堂的圣歌，在大圈子里玩球。两个英俊的瑞典小伙子有着长长的腿。从戈斯拉尔来的一个军乐队举行音乐会。下午翻草。晚上我的胃坏得那么厉害，使我烦恼得不想举步。一个瑞典老头和几个小姑娘在玩捉迷藏游戏，而且是那么地投入，有一次在玩的过程中不禁叫道：“等等，我要给你们隔开达达尼尔海峡。”他指的是两处灌木丛之间的通道。当一个年纪大的、并不漂亮的保姆走过时说道：“这可是能敲的东西吗？”（背部是黑色的、白点的衣服）信任是持续不断的无缘无故的需要。因此要观察每一个人，是不是可能与他待在一起，或者他有没有为自己提供一个机会。

7月10日。脚扭伤。疼痛。装运绿色饲料。下午与一个非常年轻的来自瑙海姆的中学教师向伊尔森堡散步。明年大约去维克斯多夫。男女同校，自然疗法，男女同居，欢乐，由他带领的小姑娘们和男孩们远行的故事。大雷雨，所有人都湿透了，不得不在最近的赫尔贝尔格的一个房间里将全身衣服脱下。

由于脚的肿胀，夜间发烧。路过的兔子发出嘈杂声。当我夜里起来的时候在我门前的草地上坐着三只这样的兔子。我梦见，我听见歌德在侃侃而谈，带着一种无尽的自由和专断。

7月11日。和一位叫弗里德里希·施的博士谈话，他是位布雷斯劳市政官员，曾长期待在巴黎，学习城市规划。他习惯于在一家饭店里观察皇宫的庭院。他早先曾住在天文台附近的一家饭店。一次夜里在隔壁的房间里住着一对热恋的男女。那位女子幸福得不顾羞耻地发出叫声。当他通过墙壁表示愿意效劳去请一位医生时，那女子才安静下来，他也可以入睡了。

我的两个朋友打扰了我，他们从我的茅屋边走过，这个时候他们总在我门旁小站一会儿，或短短地聊上几句，或邀请我参加散步。但我也只是为此感谢一下他们。

在《基督新教教会报》里，1912年7月，写到有关在爪哇的使命：“就反对传教士附带的行医活动来说，他们在大范围里进行着这种活动，确实有道理让人提出异议，不过，这另一方面又是他们传教的主要辅助手段，是不可缺少的。”

有时候我有些轻微的、表面的厌恶之感，如果绝大多数当然是在一些距离的远处，我看到那些完全裸体的人慢慢地在树林之间走过的话，这并不能使他们跑得更好。现在有一个完全不认识的裸体者站立在我的门旁，并慢吞吞地而且友好地问我，我住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家，对此却深信不疑。他们也这样让人听不到声音地走来。有时候有一个人突然站在这里，你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也不喜欢那些裸体跳草堆的年纪大的男子汉们。

晚上向着施塔佩尔堡散步。和两个我互相介绍认识并接待的人。废墟。10点钟归来。在我茅屋前草地上的两个草堆之间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些裸着身体的人，他们在远处消逝了。在夜间，当我通过草地去厕所，有三个人睡在草地里。

7月12日。施博士的叙说。一年在旅途上。后来在草地里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蓝眼睛的老阿道夫·尤斯特，他用泥土治疗一切病症，并在禁止我吃水果的医生面前警告我。上帝和《圣经》是由《基督教徒联盟》的成员保卫，作为直接所需要的证据，他朗诵了一首旧约的诗篇。我的施博士以他的无神论出了洋相。外来词幻想、自我暗示对他毫无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人问道，为什么美国人过得那么好，尽管他们在每说第二句话时都要诅咒一番。在所有的话语里是不能将他们真正的观点确定下来的，尽管他们活跃地参与了。这一位，他那样惊慌失措地谈论布卢门塔克，而且简直像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那样克制。这位来自《基督教徒联盟》的人带着一个漂亮的小男孩，中午就吃从小纸袋里拿出来的樱桃和干面包，其他便是整天躺在草地上，翻阅着自己面前的三本圣经，并做着笔记。他这三年来才走上这正派的道路。施博士的荷兰油画速写。9号木桥。

装运干草。——在埃卡尔广场旁。

两姐妹都是小姑娘。一个是面孔瘦削、漫不经心的样子，上下重叠在一起的动人的双唇，柔媚地朝向尖处伸展的鼻子，没有完全睁开的清澈的眼睛。聪颖从一张面孔里闪出光辉，我已经激动地看了她好几分钟。在我看她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向我吹来。她的更为女性的小妹妹挡住了我的目光。一位新到达的冷漠的小姐，身体柔软，瘦得像一根皮带。裙子、胸衣和衬衫，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行走的姿态！

晚上与施博士（43岁）在草地上散步。完全赤条条。没有羞耻。当我晚上从写字间出来的时候，闻到一股香气。

7月13日。摘樱桃，卢茨给我朗诵金克尔的《灵魂》。吃饭后，我一直在读圣经中的一章，在这里每个房间都有一本圣经。晚上孩子们在玩耍。那位小苏姗·冯·普特卡默尔才9岁，穿一条玫瑰色的小裤子。

7月14日。带着小篮子，在梯子上摘樱桃。在树林里爬到上面的高处。上午在埃卡尔广场边做礼拜仪式。安布罗兹赞美歌。下午两个朋友派去伊尔森堡。

我躺在草地里，这时候，那位来自《基督教徒联盟》的人（长而美好的身体，晒得变褐的皮肤，尖尖的胡须，幸运的外表）从他学习的地方走进更衣室，我用眼睛莫名其妙地追踪他，但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地方，却朝我走来。我闭上双眼，但他已在作自我介绍：H.兰德弗尔梅塞尔，而且给了我四篇小文章，作为星期天读物。在离去的时候他还说到《珍珠》和《谴责》，他想以此来暗示，我不应将这些文章让施博士看。这些文章是：《遗失的儿子》、《买通或不再是我的（对无信仰的信仰者）》附一些小故事，《为什么有学问的人不相信圣经？》以及《自由万岁！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稍稍读了一下，然后走到他那里，并试图通过我对他的尊敬，向他解释清楚，为什么眼前看不到对我的恩赐。为此，他跟我说了一个半小时（将近结束，一位穿麻布衣服瘦削的、白发、红鼻子的老者也参加进来，向我们作一些不清楚的说明），每一句话都运用得那么美，只有出于那种真实性才能这样的运用。那位不幸的歌德，他使如此多的人感到不幸。许多故事。比如当他，H.，在他家中亵渎上帝的时候，他不让父亲用这个字。“但愿你父亲，对此感到吃惊，并由于恐惧而不再说话，我是对的。”就像父亲在垂危的卧榻上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看着我，我临近了恩赐。——就像我本人打断了他所有的论证，并让他求教于那个内心的声音。不错的效果。

7月15日。读了库内曼的《席勒》。这位先生，他总是将一张给妻子的明信片放在口袋里，是为防一种不幸而应急的。——访问露特，——我读《席勒》。不远处一位裸体的老先生躺在草地上，头部上方撑着一把雨伞。

一开始穿着白色衣服的冷淡的小姐现在换上了褐色的和蓝色的衣服，而且她面孔皮肤的颜色在这些颜色的影响下如此清晰地变化着，好像有着严格规定似的。

柏拉图的《国家》。——为施博士立着的样本。——福楼拜书里的那页谈关于卖淫的内容。——裸露的身体明显地留下了个别的总印象。

一个梦境：空气浴的社团借着一场殴斗而自己毁灭。在分成两组的社团互相打趣之后，有一个人从一个组里跳出来，并朝着其他人喊道：“鲁斯特隆和卡斯特隆！”其他人说：“怎么？鲁斯特隆和卡斯特隆？”这一个说：“当然。”殴斗开始。

7月16日。库内曼。——古伊德·冯·吉尔豪森先生，退役上尉，为《致我的剑》等作词并谱曲。一位漂亮的男子。出于对他高贵的尊敬，我不敢抬头朝他看去，我浑身冒出汗来（我们都赤身裸体），我说话的声音太轻，他的有印章的戒指。——瑞典年轻人的致意。那位年纪较大红头发的人带着沉重呼吸讲话成了一种习惯。——我穿了衣服在公园里和一个穿了衣服的人说话。错过哈尔茨堡的远行。——晚上。在施塔佩尔堡举行民间射击比赛。同施博士和一位柏林理发大师在一起。那块缓缓向着施塔佩尔堡的布格贝尔格上升的、由古老的椴树引伸的、又被一段铁路路基不恰当切断的大平原。那间射击的小房子，从房子里向外射击。老农民将纪录登记进射击簿里。三个墩子用妇女的头布盖着，头布从后面挂下来。这是古老的、说不清楚的风习。一些穿着破旧蓝色、继承而得的长袍，是由最纯良的亚麻制成，价值15马克。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支枪。一种前膛枪。人们的印象是，这些所有的人都由于田园的工作而不知什么部位变得弯曲了，特别是当他们站成两排的时候。有些老领队戴着圆柱帽佩着军刀。还有马尾巴和别的一些象征，先引起骚动，然后乐队奏乐，更大的骚动，随之寂静无声，然后鼓声和哨声又齐鸣，又是更大的骚动，终于三面旗子扯进最后的鼓声和哨声，最后的骚动。命令、出发。年纪大的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黑色的帽子，有一点儿压抑的面孔，不太长的遮盖住面孔周围的细密如丝的漂亮白髭须。先前的射击冠军也戴着一顶圆柱形的帽子，一条与门房人似的绶带绕着身体，绶

带上缝着一块纯金属的小牌子，在这每块牌子上都刻上一年里的射击冠军的名字，用的是相应的手工符号（面包师的下面就是一块圆面包，以此类推）。队伍在音乐中伴着灰尘行进，浓云密布的天空变幻着大自然的色调。有一位同行的士兵是射击手，还在役，样子像木偶，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民众大军与农民战争。我们跟着他们穿过街道。他们一忽儿越来越近，一忽儿越来越远，因为他们要在某些射击选手附近停下来，作些表演，并接受一些招待。在将近队伍的尽头，灰尘均匀地散去。最后的几个人看得最清楚。他们的踪影暂时在我们眼前完全消失了。那位高高的农民胸部稍稍下陷，他有一张不可更改的面孔，穿着翻口的靴子，衣服好像是皮制的，他好像拘泥地从大门的门柱处被替换了下来。站在他前面的三个女人，一个站在另一个前面。中等身材的那个女人显得神秘而美丽。两位妇女站在对面农家院落的大门旁边。有两株硕大的树长在两家院落里，它们超越宽大的马路连在一起。早先的射击冠军房子旁边大大的射击靶。

跳舞的场地，分为两部分，从当中划开，在一间有两排位置的棚屋里是乐队。暂时还空空荡荡的，小姑娘们从光滑的木板上下滑（休息的、说着话的弈棋人打扰了我的写作）。我给他们提供我的“柠檬汽水”，他们喝了，年纪最大的女孩先喝。缺少一种真正交往的语言。我问她们是不是吃过晚饭了，完全不懂，施博士问她们是不是已经用了晚餐，开始明白（他说得不清楚，喘息得太多），直至理发师问她们大吃了一顿没有，她们才回答。我给她们订了第二次柠檬水，她们不想再要了，但她们想玩旋转木马游戏，我带着6个小姑娘（6岁到13岁），她们围着我，一同奔向旋转木马。在路边我称赞了那位坐上旋转木马的姑娘，这旋转木马是她父母的。我们都坐下，在一辆马车里打转。小女友们围在我身边，有一个坐在我的膝上，拥挤的小姑娘想共享我的钞票，出乎我的意料，被我的人推开了。东道主的女孩掌握着钱数，让我不给外来者付钱。要是别人有兴趣的话，我准备再转一下，东道主的女孩却说这已经玩够了，她想到甜食品的货棚去。愚笨和好奇的我将她们领往（欧洲节日市集上的）抽彩轮盘。她们极为纯朴地对待我的钞票。然后到了甜食货棚。一个有着大量储存的货棚，那些货物那么干净、整齐，就像在一个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一样。这里有许多便宜的东西，也像我们那里的市场。然后我们回到跳舞场。我感觉到这些姑娘们的经历比感觉我的送礼更为强烈。她们现在又喝上了柠檬汽水，并表示谢意，年纪最大的为大家，每一个小姑娘都为自己表示谢意。跳舞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离去了，这时已经10点3刻了。

那位不停说话的理发师。30岁，一副有棱有角的胡须，髭须被拔掉了。追在姑娘们的后面，但很爱他的妻子，他妻子在家经营商店，不能出门旅行，因为她肥胖，又忍受不了这样的旅途。就说那次去里克斯多夫吧，她不得不两次下电车，为稍稍地走上一段路，好休歇一下。她不需要假期。如果她能睡上几次较长的觉，就已经感到满意了。他对她忠诚，在她那里他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一个理发师受到的种种引诱。这位年轻的饭店女郎。瑞典女人，她对所有的东西都得付更多的钱。他从一位波西米亚的名叫普德尔博特尔的犹太人那里买头发。他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到他那里，还要求出版《前进》，他说：“如果您要求这个的话，那我就不叫唤您了。”但最终还是让步了。他曾作为“年轻人”（助手）在戈尔利茨待过。他是有组织的玩九柱戏者。一个星期前他出席了在不论瑞克举行的玩九柱戏者大会。大约有2万有组织的德国玩九柱戏者。在四条荣誉的九柱戏球道上，三天的大会一直延续到夜里。但人们无法说出，哪一位是德国最好的玩九柱戏者。

当我晚上走进我的棚屋里，我没找到火柴，隔壁的棚屋借给了我火柴，并照着桌子下面，是不是火柴可能掉在下面了。那里没有火柴，却发现了那只玻璃杯。后来发现，凉鞋在壁挂的镜子后面，火柴在一扇窗户板上，手镜挂在一个突出的尖角上。夜壶放在橱柜架上，《情感教育》放在枕下，一个衣钩在麻布的下面，我的旅行墨水瓶和一块弄湿了的抹布放在床上。这一切都是为了惩罚，因为我没去哈尔茨堡。

7月19日。下雨。我躺在床上，屋顶上是雨点的敲击声，那样的声音，就好像是敲在胸口上。在突出屋顶的边缘，机械的雨滴看上去像光线，它们一行行横向沿着一条路点燃。然后，它们落下。突然有一个白发老人，像一头野兽在草地上追逐，他在进行雨的淋浴。水滴在夜里发出敲击声。人们像是坐在提琴的共鸣箱里。早晨跑步，脚下是柔软的土地。

7月20日。上午和施博士在森林里。红色的地面和从它这里扩展出来的光辉。树干像是在向上盘旋。长满宽平叶子的山毛榉树枝在飘动。

下午，从施塔佩尔堡来了一支化装游行的队伍。那个跟化装成熊的踏着舞步的男子在一起的庞然大物。他摇动着他的大腿和后背。游行的队伍在乐队的后面穿过花园。观众们跑着越过草地，穿过灌木丛。那位小汉斯·埃佩，他是怎样看到他们的呀。瓦尔特·埃佩站在邮筒上。那些男人用窗帘将自己完全遮盖起来，化装成女人。当他们与厨娘跳舞，并沉

涵于这位看来并不熟悉的化装的厨娘的时候，样子是不正派的。

上午施博士朗诵《教育》第一章。下午与他散步。他讲述他的女朋友。他是一位金星的朋友、巴卢舍克的朋友、勃兰登堡的朋友、波彭贝尔格的朋友。他晚上在棚屋里和衣躺在床上，悲痛得可怕。和波林格尔小姐的第一次交谈，但她已经知道了她该知道的有关我的一切。她是从《来自士的里亚的十二人》认识布拉格的。淡黄的头发，22岁，外表看上去只有17岁，总是关心着她那位患重听的母亲，订了婚，而且会撒娇。

中午，那位如皮带似的瑞典寡妇W.妇人离程。在她一般的衣服外面只是罩一件灰色的小夹克，头戴一顶装饰有小面纱的灰色小帽子。在这个框架里，她那张棕色的脸变得非常柔媚，只有距离和装饰决定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的印象。她的行囊是一只旅行背包，除了一件长睡衣之外，里面便什么也没有了。她就是这样不停地旅行，从埃及来，到慕尼黑去。

今日下午，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这里的许多人令我热了起来，有些人对我如此地感兴趣。——冯·吉尔豪森先生的一首歌里唱道：“你知道吗，可爱的妈妈你是那么地亲切。”

晚上在施塔佩尔堡跳舞。这个节日延续了四天，几乎都不工作。我们看见那位新的射击冠军，而且还在他的背上看到了19世纪开始的那位射击冠军的名字。两个跳舞场地都挤满了人。在大厅的四周前前后后站着一对一对的情人。每一对只是在每一刻钟里跳一次短短的舞。绝大多数人默不做声，当然不是因为发窘，或者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原因，而是简单得很，就是喜欢默不做声，一位喝得醉醺醺的人站在边上，他认识所有的姑娘，他抓她们，或者，至少是在伸展着要去拥抱的手臂。那些跳着舞的人绝不互相碰撞。喧闹声足以穿过音乐和下面桌边坐着的人和卖酒柜台旁站着的人的喊叫声。我们长时间徒然地绕着圈子走动（我和施博士我在和一位姑娘攀谈。她在外面就已经引起我注意，那时她在和两个女友吃着哈尔伯施塔特的涂上芥末的小香肠。她穿一件白色的短上衣，上面有延伸到手臂和肩膀的花卉作衬。她可爱而忧郁地倾斜着面孔，她因此而将上身稍稍地压低，而使得短上衣鼓起来。那只小翘鼻子在她倾斜的姿态中更增加了悲哀。无法选择的红棕色盖去整个面孔。她刚从舞场走下两级台阶的时候，我跟她讲起话来。我们正好对面走着，她转回去。我们跳舞。她叫奥格斯特·A.，来自沃尔芬比特尔，一年半来

在阿彭罗达的一家克劳德的企业里工作。我的古怪特别的名字就是在多次教别人说的时候也不懂，而且后来也记不住。她是个孤儿，在10月1日进入一处修道院。她跟她的女朋友还没说到过这些。她在4月就想说了，可是她的克制不让她说。她进修道院是因为她有过糟糕的经历。她不能讲述这些。我们在舞厅前的月光下走来走去，我的小女友们不久前还盯着我和我的“未婚夫”。她虽然悲伤，但仍很喜欢跳舞，当我后来将她让给施博士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她是搞野外工作的。她必须要在10点钟回家。

7月22日。G.小姐是女教师，有一张年轻、清新的猫头鹰似的脸孔，充满了活跃的、紧张的表情。身体显得懒散。埃佩先生是来自不伦瑞克私立学校的校长。他是使我输的人。他拥有占优势的、必要时如火一样的、思考周密的、音乐一般的、即使表现为摇摆的讲话。动人的面孔，但更为动人的是几乎长满整个面部的络腮胡子和山羊胡子。过分拘谨的走路姿态。当他与我同时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时，我与他是斜对面。一种静静咀嚼的聚会。他东一句西一句地抛出话语。可是仍然静悄悄，就是那么静悄悄的。但如果一个较远距离的人说一句话，他就马上抓住他，但并不使劲，而是在自说自语，好像是在跟人家说话，并像是偶然被别人倾听去了，同时还看着他正剥着皮的西红柿。除了那些感到耻辱的人和如我那样蔑视的人，大家都集中了注意力。他并不取笑任何人，而是让每个人发表的意见围着他的话题转。如果一点儿也无动静，那他就在撬开干果的时候唱了起来，或者在吃生菜、水果的时候不得不频频地用手帮忙（桌上放了很多盘子，人们可以随意混用最终，他让所有的人纷纷参与他的事情，他借口要记下所有的佳肴，并一定要将这个内容寄给他妻子。几天来，在他说到他的妻子令我们十分高兴之后，有关她的新的故事又传开了。她患忧郁症，必须要进一家疗养院，但如果她定下了八个星期的合同，带一位女看护一起来等等，她才能被接纳，如他算出来以及后来在桌上当众算出来一样，全部费用要超过1100马克。花费这么多钱的事情是要考虑的，大家都在考虑。一些天以后，我们听说这位妻子要来了，大约这家疗养院令她很满意。在吃饭的时候，他得到了消息，这位妻子带着她的两个男孩来了，并等着他。他还是稳稳地吃到了结束，虽然在这种吃饭的时候根本没有结束一说，因为所有的食物都同时放在桌上。这位妻子年轻体胖，只是在衣服里才显示出来的腰身，聪明的蓝眼睛，梳理得高高的金黄色头发，对烹调、市场行情非常清楚。在吃早饭的时候——他们一家还没来到桌边——他在剥干果的时候跟G.小姐和我说：他的妻子患了忧郁症，涉及肾脏，她的消化也

不好，犯了旷野恐怖症，要到夜里近5点时才能入睡，然后早晨8点被唤醒，“发起怒来自然凄怆”，而且“变得狂躁无比”。她的内心陷入极大的紊乱，并且还有严重的哮喘。她的父亲在疯人院死去。

[1] 弗里德兰和赖兴贝格均是捷克波希米亚地名。——译者

[2] 对1909年去里瓦、布累细亚旅行的回忆。

[3] 德国画家（1471—1528年）。

[4] 弗利茨·格林鲍姆和海因茨·莱歇尔特的一部轻歌剧。——译者

[5] 希腊城名，阿波罗神殿所在地。——译者

[6] 德国南部与瑞士交界的湖泊，旅游胜地。

[7] 暗示模糊不清事物的理论。

[8] 瑞士德语作家（1819—1890年）。

[9]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译者

[10] 法国的一个山区。——译者

[11] 以上为卢浮宫的绘画。

[12] 1878年意大利人所组的党，其目的是归并一切操意大利语而受治于他国政府统治的意大利邻境。——译者

[13] 自瑞士茵梦湖经戈特哈德隧道至基阿沙，接意大利边境，1882年通车，1921年改为电动。——译者

[14] 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译者

[15] 拉辛的《费德尔》中的人物。

[16] 德国表现主义运动时期的作家。——译者

[17] 德国表现主义运动中的著名理论家。——译者

[18] 罗马神话中的女神。——译者

[19]历史女神，九艺术女神之一。——译者

[20]歌德故居看门人漂亮的小女儿格雷特·奥廷根。

[21]萨克森—魏玛和埃森纳赫大公卡尔·奥古斯特的塑像。

[22]德国新古典主义诗人，小说家（1866—1933年）。

[23]德国小说家、戏剧家（1862—1941年）。

[24]如忌荤等。

译后记

一摞誊清的卡夫卡日记译稿，最终搁在了案头，我稍稍地舒了一口气。然而脑子却还没有从那耗去我不少精力的梦境里解脱出来。

我过去没有接触过卡夫卡的东西。当80年代，卡夫卡的名字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时候，我只是读过他的一个原文短篇《在法的门前》（《Vor dem Gesetz》），当时，我只是觉得卡夫卡的手笔不凡。一个渴求进入“法律”的恐惧、张望、等待的乡下人，以及那个重重守卫、道道铁门、深不可测的“法律”，竟在一篇大约不足二千字的文章里表现得那么令人压抑、透不过气来，那么令人不寒而栗。那个时候，也只是赞叹一番，仅此而已。

后来，当代研究卡夫卡的热潮此起彼伏，我仍然没有想到要接触这位作家的东西。

如今，竟没想到由我来翻译这位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全集中日记部分，并在中国出版。

我深感荣幸的同时，也感到翻译卡夫卡日记并不像翻译有故事情节的小说那样，是件较为轻松（自然是相对而言）的事情。时代的陌生、语言的艰涩、思维的跳跃，曾使我颇有畏惧之感，然而我固有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令我对此义不容辞。

卡夫卡是一位极有争议的世界级大作家。但他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是无与伦比的。他还是一位有着跨世纪机缘的伟大作家，现在，也正是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也正是世界与中国都在呼唤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候，出版《卡夫卡全集》便更具有另一番意味了。

卡夫卡在世仅41年，然而他抽象、隐晦、荒诞、离奇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那个独特的世界，至今还在牵动着成千上万人的思维。卡夫卡的作品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还在向人们揭示着什么，阐述着什么。他是西方世界“异化”的揭示者，是现代审美意识的阐述者。他对世界文学（至少是欧美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年前，欧洲在一次大规模评选近二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作家的结果中，卡夫卡以绝对多数在10位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名单中榜上有名。卡夫卡41年短暂的生命因此而

得到延续，他对整个人类的影响，也许会从一个世纪延伸到另一个世纪。然而，他生前并未获得如此的殊荣。

不管怎么说，达到这样荣誉、这样高层次的伟大作家，其内心必然是复杂的，其思想必然是深邃的。然而从外表看，卡夫卡的一生，平淡无奇，生活极为单调，经历也颇平凡，一生默默无闻，性格内向，孤独懦弱，精神抑郁，疾病缠身，体质虚弱。就在这短暂的一生里，他以复杂的内心、深邃的思想，不断地汲取前人的营养，孜孜不倦地艰苦地攀登着艺术高峰，为西方文学开拓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艺术道路，在写实主义文学领域里挖掘了一种特异的艺术表现手法，最终被尊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

对这样一位大作家来说，其日记更是他本人敞开心扉、倾吐胸臆、实录深邃思想的重要地方了。毋庸置疑，日记里有作家对世界、对人生的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对人生痛苦的各种感受，对性格懦弱、精神抑郁、疾病缠身和内心孤独的体验，对文学的酷爱，以及在婚恋中的矛盾与挣扎，充塞了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他几乎是呕心沥血地将这一切用那支勤奋的笔吐诉在纸上。日记里有时候也许记上他构思的一篇小说的开头，或某个人物的设计……

换言之，是不是可以说，卡夫卡的作品，包括日记，是一高档次的人生五味瓶，当然，只是甜的含量少了些。

我想，无论读卡夫卡的什么作品，是需要花时间用心去品尝、去体味的。也是不是因为卡夫卡唯恐世人不理解他那深邃的思想，或者是他认为自己没有达到圣灵的至善至美，才嘱咐挚友将他全部作品“付之一炬”？这么说，只有卡夫卡自己知道怎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想见他生前拼命写作不是在刻意追求一顶文学大师的桂冠，而只是为吐诉自己的内心，只是在画为自己辨识的“象形文字”。他的日记自然就更是如此，这除了给后世人，尤其是跨世纪的今人，留下某种启迪之外，恐怕翻译卡夫卡日记之难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跋涉在卡夫卡自怨自艾的人生旅途中，终于将这位大作家在产生过世界上最杰出哲学家的语言里吟哦的痛苦而深邃的思想糅合在从来包容天地万物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里，从而完成了《卡夫卡全集》中日记部分的翻译。自知没有金刚钻，却接下了这般的瓷器活。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译文传达的只是卡夫卡精髓之一二。但愿这部拙译对读者

和卡夫卡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卡夫卡、研究卡夫卡、挖掘卡夫卡有所裨益。

拙译中肯定会有不少缺点和谬误，请读者与专家们多多原谅，并不吝批评与指正。

孙龙生

1995.9 北京

第六卷 书信（1900-1921）



1921年，38岁的卡夫卡



尤莉叶·沃里采克（一战期间照片），卡夫卡于1919年1月在施居德尔旅馆与之认识，几个月后与之订婚，因门第不当遭卡夫卡父亲反对而解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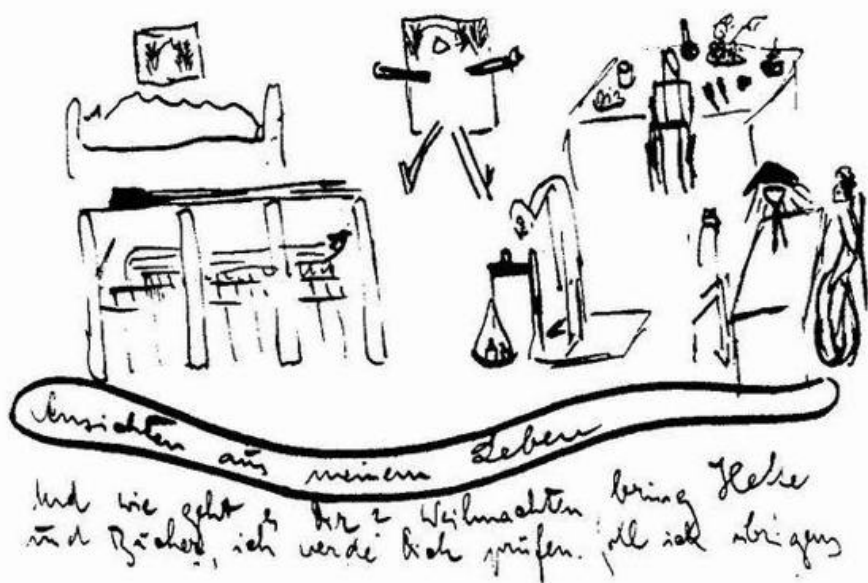
尤莉叶于30年代初嫁给一个姓魏尔纳的军人。这幅合影的左边是她姐姐凯特奈特尔，1919年11月卡夫卡曾写给她内容广泛的“说明信”，解释解约的理由



卡夫卡在薛莱森认识的一位女性朋友叫艾斯纳·闵彻。卡夫卡对她的农业计划给予咨询



艾斯纳·闵彻于1920年夏寄自己的照片给卡夫卡表示问候



卡夫卡从薛莱森写给他小妹奥特拉的明信片（1918年12月）



上图是卡夫卡所住的名为施居德尔的旅馆，其前面的阳台属于卡夫卡的房间。1918年至1919年的冬天，卡夫卡在这里遇到了他第二个订婚对象——尤莉叶·沃里采克，并于1919年11月写下《致父亲》这封著名的长信

下图是位于易北河岸的里包赫的王宫



30岁出头的卡夫卡标准照。照片上的德文草字为“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Jelise Famer

上图是从布拉格到达柏林的火车站

下图是草字为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的亲笔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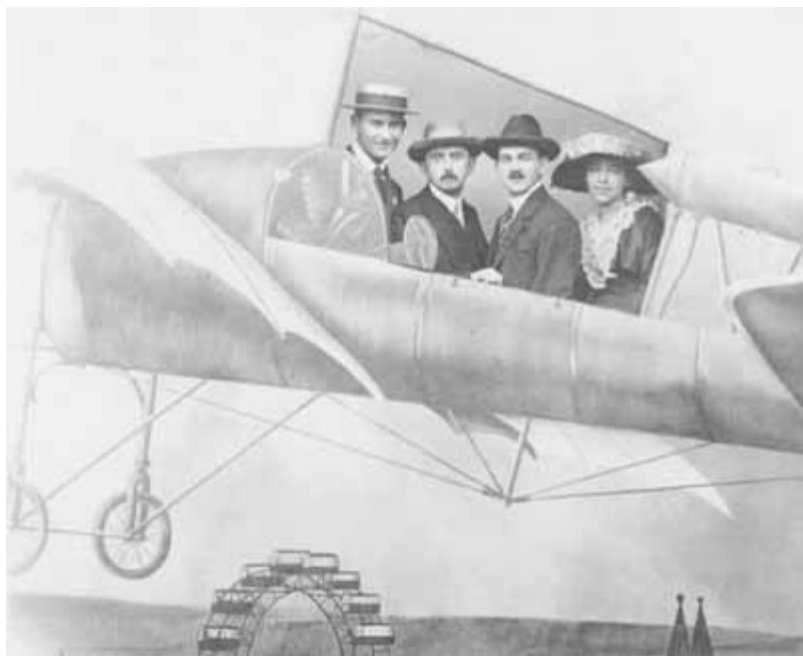
上图是菲莉斯·鲍威尔（左）和她的三个兄弟姐妹：费雷、艾尔娜与伊丽莎白

下图的建筑位于曼尔多瓦河的对岸



上图是布拉格附近的果树学院，位于曼尔多瓦河的对岸。卡夫卡在那里的树园工作到1913年，后来经常作为园丁去那里

下图是河对岸的高坡，是卡夫卡最喜爱的地方之一



卡夫卡于1913年秋和他的三位同事乘飞机去维也纳参加国际拯救和事故防范大会，并为他的上司起草了大会发言稿



国际拯救和事故防范大会的会场



威尼斯。卡夫卡参加国际拯救和事故防范大会后即前往威尼斯



离开威尼斯后，卡夫卡经过维罗纳和德森扎诺去里瓦观光。图为卡夫卡在维罗纳参观过的圣·阿那斯塔西亚教学楼内部



上图是卡夫卡乘坐的经德森扎诺去里瓦的轮船

下图是加尔达湖畔的德森扎诺；居民的大多数已聚集起来迎接保险事务所的副秘书卡夫卡博士的莅临



布拉格旧城环城路，左边是尼可拉斯教堂，右边是奥佩尔特家园，在其顶层是1913年11月以来的卡夫卡一家的住宅



上图是通向莫尔道河的尼可拉斯大街，左侧是议会大厦，右侧是奥佩尔特家园

下图是从卡夫卡房间看上去，左边是尼可拉斯大街，右边是尼可拉斯教堂（当时称俄罗斯教堂）。“从我的窗子向前看去，我看到了俄罗斯教堂的两个巨大的塔顶。”



父母的高钟，家庭财产留下来的仅有的物件之一



卡夫卡和他最心爱的三妹奥特拉在澳佩尔家园前的合影，约1914年



奥佩尔特家园的大门（今摄）

Die Verlobung ihrer Kinder **Felice und Franz** zeigen ergebenst an
Carl Bauer und Frau Anna **Hermann Kafka und Frau Julie.**
geh. **Danziger.** **Prag, Altstädterring 6.**
Berlin-Charlottenburg,
Wilmerdorferstrasse 73.

Felice Bauer
Dr. Franz Kafka
Verlobte.

Berlin, im April 1914.

Empfangstag Pfingstmontag, 1. Juni.



上图是卡夫卡和菲莉斯双方父母在《柏林日报》上刊登的儿女订婚广告

下图是卡夫卡于1914年6月光顾的德累斯顿附近的“德意志工场”，那是第一批现代家具厂之一。卡夫卡认为它是“最佳”并且是“最简单”的家具厂，而菲莉斯则主张以“厚重的家具”为首选，“像你我家庭等级的其他家庭所做的那样。”



上图是“德意志工场”的一种居室模式下图是鲍威尔家住宅一瞥（柏林夏洛特堡威尔杰斯道夫大街73号，左边拐角处）



卡夫卡（右）和恩斯特·魏斯在沙滩上



1911年至1912年时期的卡夫卡标准照

编者前言

写作对于卡夫卡来说是一种“灵魂的自救”，是一种内在表达的需要，所以他是不注重体裁选择的，于是书信成了他常用的一种表达形式，而且是一种他所喜爱的形式。因为“书信能使我愉快、感动，使我崇敬、欣赏”。同时，也出于他对友谊的真诚，出于对世态万象钻研的执着和认真。不难想象，像他的其他创作一样，他的千余封信件，多半都是在灯下、在深夜里写下的，是用睡眠和健康换来的。读着这些书信，让人看到一个思想者那痛苦的，但又是灼热的、坚韧的、不倦追求的灵魂，真的令人感动。

被保留下来的卡夫卡的全部书信，就篇幅而言，约占卡夫卡全部出版文字的一半，至少150余万字，这不禁使我们对卡夫卡的那些众多的收信者产生了由衷的钦佩和敬意，他们在卡夫卡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竟保留了他那么多信件，仿佛他们早已预感到这些信件的未来命运和价值。尤其值得赞美和感谢的是那两位忠实的情人——菲莉斯·鲍威尔和密伦娜·耶森斯卡，在她们与卡夫卡的恋情先后熄灭以后，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对方的这些真实的感情记录，使其成为宝贵的历史文献。这不啻是人类良知的胜利。

在卡夫卡的书信中，情书和家书约占三分之二。本卷收集的是除情书和家书以外的所有1900—1921年之间致友人的书信，1922—1924年之间致友人的书信则由于各卷厚薄与分量的原因，移至本全集第7卷之前。在他所有致友人书信中，包括致他最亲密的终身至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书信，我们从中看到的依然是那灼热而跃动的灵魂。它们无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本卷包含的全部书信均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欧洲人习惯于把写信的日期和地点放在信前，这里则按中国人的习惯一概放在最后。但卡夫卡写信，特别是写给好友的信往往都不写日期和地点，马克斯·勃罗德编的原书均按发信或到信的邮戳来判断，并用方括弧标明，这里亦照此编辑。文内注释，凡未注明谁注的，均为原编者所注。

叶廷芳

1995年秋

书信(1900-1921)

叶廷芳 黎奇 赵乾龙谢建文 何敏 译

1900年

1.致谢尔玛·柯恩^[1]

册子里的留念何其多！

它们是用作留念的，好像言语会思念似的！

其实言语是蹩脚的登山者和拙劣的矿工。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来！

但是有一种怀念是真实的，它温柔地掠过一切值得回忆的东西，仿佛用手轻轻抚过。然而如果从这片灰烬中蹿起火苗，炽热而强劲，而你呆呆地凝视着，犹如为神奇的魔术所迷住，那么就……

可是却不能以笨拙的手和粗糙的工具来写这种纯洁的怀念，只能将它写在这些洁白、简朴的纸面上。这就是我在1900年9月4日所做的事。

弗兰茨·卡夫卡

〔1900年9月4日〕^[2]

1902年

2.致奥斯卡·波拉克^[3]

星期六与你同行时，我即已明白我们需要的是什麼。但我直到今天才在信中告诉你，因为这种东西必须让它躺着，舒展自如。当我们互相谈话时言语是硬邦邦的，越过它们就像走过铺得很差的石子路面。最纤巧的东西会因此而生出粗大的脚来，而我们却无可奈何。我们俩几乎是互相挡着道，我使劲从你身旁挤过去，而你——我不敢说，而你——

当我们的话题不是铺路石或《艺术卫士》^[4]时，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都穿着化装舞会的服装，戴着面具，做着笨拙的手势（尤其是我，真的），于是我们会忽然变得忧伤、疲惫。你同别人在一起曾经像同我在一起一样疲惫吗？你偏偏经常患病。接着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但我一筹莫展，什么也说不出，而你病一好或稍好些便口若悬河，于是一些痉挛的、愚蠢的话脱口而出，然后我沉默了，你沉默了，你累了，我也累了，最后归于一片内心的悔恨，连握手也失去了意义。但是谁也不愿把这番感受告诉对方，或是出于害羞，或是出于畏惧，或是——你看，我们互相害怕，或者是我——

我明白，假如有人在一座丑恶的大墙前面站了几年，而这座墙毫无坍塌颓落之意，这个人就会感到疲乏。但这堵墙是为它自己担忧，为花园担忧（如果有一个花园），而你却怒火中烧，打哈欠，头疼，不知何去何从。

你一定已经发现，每当我们隔了较长一段时间后见面，我们总会感到失望、厌烦，直到我们习惯于这种厌烦。我们必须不停地说话，以便遮掩哈欠。

.....

我忽然害怕你会一点都读不懂这封信，它说的尽是什么呀？没有修饰、面纱和肉瘤，当我们俩谈话时，会感到话题的阻力，我们想这么说，却无法这么说，而说出来的话却引起互相误解，甚至被忽略，甚至遭嘲笑（我说，蜂蜜很甜。可我说得很轻，或者很蠢，或者词不达意，而你说，今天天气真好。这么一来，话题就糟糕地转变了）。由于我们不停地尝试，却从不能成功，于是我们就变得疲倦、不满、嘴尖舌利。如果我们试着书面交流，事情就会比谈话时容易办到——我们可以毫无羞怯心地谈论铺路石和《艺术卫士》，因为更重要的话题不用说就能明白。这封信的目的亦即在此。这是一种出于妒忌心的招数吗？

我不知道，这最后一页你是否也会读到，所以我把这种古怪的想法也涂写在下面，尽管它本不该写入信中的。

我们交谈了三年之久，在有些事情上已经无法区分你的和我的。我经常说不出哪些是你的想法，哪些是我的，你的感受大概也是这样吧？你同那位姑娘交往，我是非常高兴的。瞧你的吧，她对我来说是无关紧

要的。但是你经常同她交谈，并不是仅仅为了交谈而交谈。于是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跟她到什么地方去，这里或那里或罗斯托克^[5]，而我则待在家里，坐在写字台旁。你同她谈着谈着，话说到一半会突然跳出一个人来，鞠一个躬，这个人就是我。我说着未经雕琢的话语，露出四四方方的面容。这个景象只持续短暂的一瞬，接着你又说了下去。我在家里坐在写字台旁打哈欠。我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会分手吗？这不奇怪吗？我们是敌人吗？我很爱你。

〔1902年2月4日于布拉格〕

3.致奥斯卡·波拉克

如果一个人穿上七里靴，飞遍全世界，从波希米亚森林飞到图林根森林，那么抓住他，哪怕只扯住他大衣的一个衣角，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他也许不会因此生气，现在将信寄到伊尔梅瑙也为时太晚。但是有封信将在魏玛——你终究也要去那里吧？——等候你。信里塞满稀奇古怪的东西，甚至放在那里的时间长了，东西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再见。

你的 弗兰茨

〔到达利博赫的邮戳：1902.8.12〕

4.致奥斯卡·波拉克

我坐在漂亮的书桌旁。你不了解它。你又怎么了解它呢？这可是一张有真正资产阶级思想的、给人教育的书桌。在写字人通常放膝盖的地方，书桌伸出两块吓死人的木头尖儿。这可得注意了。如果静坐不动，小心翼翼，写点真正资产阶级的事，那倒舒服。但是，一旦心情激动，身体哪怕只稍微震颤，那么木头尖儿势必刺入膝盖，疼痛万分。要是你在此地，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膝盖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地方。这就等于告诉我：“别写些激动的话语，写的时候身体别颤动。”

我就这样坐在漂亮的书桌旁，给你写了第二封信。你知道，一封信就好比一头带头羊，我立即一连写了20封。

哎，门突然开了。谁不敲门就进来了。

一个无礼貌的家伙。噢，一个很可爱的客人。你的明信片。这是我在这里收到的第一张明信片。我读了无数次，直到我完全了解信的内容为止，甚至了解了言外之意。这时才停止读信，将我刚写的信撕掉。信撕碎了，扔掉了。

当然，我读到信里写得很多、又很不好读的一点，这就是：你怀着一肚子恶意的批评，跑遍那个地方，这是决不应该做的。

但是在我看来，你写的关于歌德国家博物馆的文章是大错特错了。你傲慢自大，带着教训人们的想法走进来，立即开始就名字吹毛求疵。当然“博物馆”的名字是好的，但是“国家”我觉得更好，但绝不是你所写的什么枯燥无味和亵渎神圣之类，而是最好最好的反讽。因为你关于工作室——你那最神圣的地方——的一席话只是傲慢态度和训人想法的体现，只是少得可怜的日耳曼语言文学，见它的鬼去吧[6]。

在魔鬼那里，把工作室布置整齐，然后把它布置成一个“国家”“博物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任何一个木匠和裱糊匠——如果他是真正懂得尊重歌德的脱靴器的话——都能干得了，任何赞美之词都是值得的。

可是你知道最神圣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能从歌德那里得到的东西，纪念品……他那独自走遍这块地方的足迹……如果留下了足迹的话。现在讲一个笑话，十分精彩，上帝听了也得痛哭失声，整个地狱听了笑得抽筋。我们永远不会有陌生人的最神圣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这是一个笑话，十分精彩的笑话。在肖特克[7]公园这块十分小的地方，我曾给你讲了这个笑话。你既没有哭，也没有笑，你既不是可爱的上帝，也不是凶恶的魔鬼。

你身上只有恶意的批评（败坏了图林根的名誉），这里人人见了都要趋避的二等魔鬼。我倒愿意对你有好处，向你讲述稀奇古怪的故事，多远的距离……上帝保佑，被弗兰茨·卡夫卡越过了。

不管我待在哪里，魔鬼都跟着我。我躺在葡萄园的围墙上，越过田野，放眼望去，也许在山后遥远处看到或听到了一些可爱的东西，那么你准保能相信，突然在围墙后面有人站起身来，庄重地说话，架子十足地表达自己中肯的见解，认为美丽的风景需要坚决地治理。他在一本深入研究的专著或一首可爱的田园诗里详细阐述了他的方案，证明他的方

案确实可行。我只能反对，这是不够的。……你不要以为这一切在折磨我。我给你写信，说过悠闲自在，田园空气，白天耀眼的阳光。舅舅从马德里来到我这里，为了他，我还在布拉格。在他到达这里之前，我有个奇妙的、非常奇妙的想法，请他——不，不是请——是问他，他是否能帮助我，他是否能带我去能助我一臂之力的地方。“那好吧，我谨慎地开始干吧。”没有必要向你详叙此事。虽然他平常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但是他开始一本正经地对我讲，安慰我说：“好吧，好吧，就这么定了，甬争了。”我立即沉默不语，我本不想说的。为了他，我待在布拉格。在这两天里，虽然我成天守着他，我也不再谈起此事。今晚他走了，我也将去利博赫一周，然后去特里施一周，再回布拉格，然后去慕尼黑上大学学习。为什么你做鬼脸呢？是的，我一定去学习。我究竟为什么要全对你讲呢？也许，这是无望的。为什么人都有自己两只脚呢？为什么我给你写这些呢？目的是使你知道，我是怎样为了生活在外奔波，那辆寒碜的邮车如何颠颠簸簸地从利博赫到道巴的。你一定得同情地并有耐心地读这封信。

你的 弗兰茨

由于我平常不给人写信，如果你向某人谈起我这封无限长的信，我会不愉快的。你可别向人谈及。如果你愿回信，那再好不过了。那么你还可以在一周内寄到老地址：利博赫——温迪施鲍尔。以后寄布拉格，策尔特纳街3号。

〔邮戳：1902.8.24—布拉格〕

5.致奥斯卡·波拉克

我在这里度过的是一段美妙的时日，这你或许已经发现了。而我是需要这么一段美妙的时光的：在葡萄园的围墙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凝望浓云，它们不打算离开这里，或飞往辽阔的原野上空。如果一道彩虹映入眼帘，原野会显得更辽阔，要不我坐在花园里给孩子们（尤其是一个6岁的金发小女孩，夫人们说，她真可爱）讲童话故事或用沙土堆城堡或玩捉迷藏或雕刻桌子——上帝可以作证，这类事我从来就做不好。真是美妙的时光，不是吗？

不然我就穿过田野，田野现在是一片褐色和凄凉，尽管天不好，但

西斜的太阳还是露出脸来，并把我长长的影子（对，是我长长的影子，也许我会通过它进入天国）投在犁沟上，于是留在田里的犁铧也闪烁着银光。你发现夏末的影子是如何在翻挖过的、深色的泥土上起舞，如何形体生动地起舞的吗？你发现大地是如何向正在吃草的母牛鼓起，如何亲切地鼓起吗？你发现沉甸甸、黑黝黝的泥土是如何在纤巧的手指中粉碎，如何庄严地粉碎的吗？

〔1902年秋〕

6.致奥斯卡·波拉克

布拉格没有放开我们俩。这个老太婆有钩爪，我们只得顺从。我想，我们在维泽拉德和赫拉德申不得不用两页纸放上一把火，然后有可能离开。也许你考虑此事，直到狂欢节。

你已经读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不了解害羞高个子纷乱复杂的故事和他心中的诡诈。因为这个故事是新的，很难叙述。

害羞的高个子在一座古老的村庄里躲藏起来，藏在低矮的小房子和狭窄的小胡同之间。胡同之狭窄，若有两人一起走，必须友好地擦身而过。房屋之低矮，若害羞的高个子从草墩上挺直身子，他那大方脑袋就伸出天花板外，不必专心去看，他就能低头看见草房的屋顶。

他心中诡诈。他住在一座大城市里，每晚喝得酩酊大醉，大发酒疯。这就是城市的幸福。城市是什么样子，他心中有数。这就是诡诈人的幸福。

圣诞节前有一次，高个子低着头，坐在窗户旁。在房间里他的小腿没有地方放，他就把小腿伸出窗外舒展一下，在那里两条腿愉快地晃动。他用不灵巧的瘦长的食指，给农民织毛袜。他那双灰眼睛几乎瞄着织毛衣的针，因为天已黑了。

有人敲木板门。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诡诈的人。高个子咧着嘴。客人微笑着。高个子开始害羞。他因个儿高而感到不好意思，因织毛袜和自己的斗室小房感到难为情。尽管如此，他仍然脸不红，仍如以前一样，脸呈柠檬黄色。他困难羞赧地移动皮包骨的小腿，羞答答地向客人伸过手去。他的手伸过整个房间，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友好的话，又埋头

织毛袜。

那心中诡诈的人坐在面粉袋上微笑着，高个子也微笑着。他那双眼睛窘得眯缝着眼，望着客人那闪闪发光的背心上的纽扣。客人转动眼球，向高处望，嘴里说着话。这是些英国绅士，穿着漆布鞋，打着英国领结，纽扣闪闪发光。若悄悄问他们：“你知道他们是什么血统吗？”有个人便立即回答：“知道，我有英国领结。”绅士们刚在外面说了说，他们就踮着脚。他们个儿高大，然后跳着舞步到高个子身边去，疼痛地攀着他的身子，吃力地塞住他的耳朵。

这时，高个子不耐烦了，鼻子嗅着室内空气。天哪，空气怎么这样臭，有霉味，不通风呀！

这位客人还不停地叙说自己，谈纽扣、城市、自己的种种感觉，五花八门。他一边讲，一边用他那尖尖的拐杖戳高个子的肚子。高个子身子发抖，发出狞笑。那心中诡诈的人停止了动作，满意地微笑着。高个子狞笑着，矫揉造作地引领客人去木门口，他们在那里握手。

高个子又孤单一人了。他哭起来，用袜子擦眼泪。他的心使他痛苦，他有苦无处说。但是一些问题缠绕着他，从腿上升到心灵。

为什么他来我这里？因为我个儿高？不，因为……？

我哭是出于同情自己还是同情他？

我到底是爱他，还是恨他？

是上帝派他来的，还是魔鬼派他来的？

一连串的问号使害羞的高个子窒息。

他又在织毛袜。他差一点被织袜子的针戳着眼睛，因为天更黑了。就请你在狂欢节前考虑一下。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902.12.20—布拉格〕

1903年

7.致奥斯卡·波拉克

也许聪明的做法是，我先不写这封信，直到看见你，知道了这两个月给你带来什么变化再说，因为我相信，夏天的这几个月是给我带来最明显变化的时光。再说我在这个夏天连一张你的明信片也没有收到，而且半年来没同你说说过一句话，而为此本来是值得我作一番努力的。所以结果很可能是，我这封信被寄给了一个陌生人，他对这种唐突感到恼火；或者寄给了一个死人，他无法读它；或是寄给了一个智者，他把它嘲笑一番。但我必须写这封信，因此我不再等到我发现不能写这封信的时候。

因为我有求于你，不是像你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友谊或信任，不，仅仅出于自私，仅仅出于自私。

也许你早就发现，我是怀着蓝色的希望踏入这个夏季的，也许你在远方早已发现我想从这个夏季中得到什么，我告诉你，我想把我自以为内心所有的东西（我并不相信我拥有这些）一口气扬起。你只能从远方察觉这一点，而我愿为你与我同在而吻你的手，因为我如果与一个紧闭着嘴生气的人同行，我会感到毛骨悚然，但他其实并未生气。

夏天使我的嘴唇稍稍松弛了一些——我变得更健康了——（今天我不太舒服），我强壮了一些，我广泛交往，我能同女人们谈话了——有必要借此机会说出这一切——这个夏季并未给我带来任何奇迹。

但现在有一种力量把我的两片嘴唇完全掰开了，也许是轻轻地，不，是使劲地掰开。一个站在树后的人轻轻对我说：“没有别人你什么也干不了。”但我现在却含意深刻、结构精巧地写道：“隐居是令人讨厌的，等于把自己的蛋公然向大家展示，让太阳来孵它；宁可啃生活，这比嚼自己的舌头强；人们推崇鼯鼠和它的方式，但却不会把它视为他的神圣。”那个人已从树后走出来，他对我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是夏季的一个奇迹吗？”

（听听吧，听听一封狡猾的信的一段聪明的引言。为什么说它是聪明的呢？一个从未乞讨过的人写一封乞讨信，他在一大段引言中用长吁短叹的语言来描绘一条通往这个认识的艰难道路：不乞讨是一种恶癖。）

你啊，你懂得一个人独自拉着一辆装满了熟睡的人的黄色邮车在漫长夜中行进的感觉吗？这个人是忧伤的，眼角挂着几颗泪珠，慢慢吃力地从一块里程碑走向遥远的下一块里程碑，他躬着脊背，不得不老是抬起头来看着公路前方，但公路上除了夜色，一无所有。妈的，如果有管邮号，非把车里那帮家伙全吹醒不可。

你啊，现在你如果不疲倦，可以开始听正文了。

我将为你准备一堆东西，那是我至今写下的一切，关于我自己或他人的。那将是很全的，只有那些玩儿的东西[8]不收在内（你看，不幸之魔很早就骑在我的脖子上了）。再就是，我已不再有的；再就是，即使就承上启下的意义而言我也认为毫无价值的；再就是那些计划，因为它们对一些人来说是所拥有的土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无根基的流沙；再就是，连对你都不能出示的，因为，倘若一个人赤裸裸地站着，无论如何乞求，仍免不了为另一个人的手所触摸，他会不寒而栗的。此外，近半年来我几乎什么都没写。除开这些我不知还剩下多少，我将把它们奉献给你，只要你来信说一声“好的”，或者答应我对你的要求。

这是特殊的事情，尽管我在表达这些事时非常笨拙（非常没有经验），但你也许已经明白，是应该怀着喜悦在此期待呢，还是应该简单干脆地点燃火刑的柴垛。我甚至不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因为这也必然是强人所难。我所希望的是某种更容易又更困难的事，我希望你读一读这些字纸，无足轻重也罢，令人厌恶也罢，因为那里边确也有无足轻重的和令人反感的東西。因为（这便是我这个愿望的由来）我最喜爱的和本身最坚挺的东西在太阳底下也是冷冰冰的，而我知道，若有一双陌生人的眼睛望着它们，会使一切变得温暖起来，生动起来。我说的只是温暖起来和生动起来，因为这些词更接近上帝，因为有此一说：“自成一体的感觉是辉煌的，但反馈的感觉力量更大。”

何必费这么多口舌呢，我摘下一块肉（因为能给你的不止这些，而我还将给你——真的），从我的心中摘取一块肉，用一些写满字的纸张干干净净地包好交给你。

[1903?] 9.6

8.致奥斯卡·波拉克

亲爱的奥斯卡：

对于你离开这儿，我也许是高兴的。这就像人们看到有人爬到月亮上去，以便从那儿往回看时的那种高兴心情。因为这种被人从这样一个高度和远处观察的意识使人们多多少少放下心来，由于在天文台里听不到月球上的笑声，所以不必担心自己的动作和言谈以及愿望过于滑稽或荒唐。

.....

.....我们像林中迷路的孩子一样孤独。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什么是我心中的痛苦，而我又知道什么是你的痛苦呢？假如我跪倒在你面前，哭着倾诉，你又能了解多少我的情况呢？无非就像某人向你倾诉地狱里是酷热、可怕的时候，你从中所获得的对地狱的了解一样。仅为此缘故，我们面对面站立时就应该互相敬畏，互相思虑，互相挚爱，就像站在地狱入口处那样。

.....假如有人，比如说你，死去一段时间，就有这么一个好处，所有人际关系（当人们身在其中时，它们必然会变得模糊）会突然处于一种善良的或凶狠的光线照耀下，显得清清楚楚。在劫后余生者身上也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

在所有年轻人中我实际上只跟你讲过话，如果说我也同别人谈过话，那也只不过是顺便的，或者为你的缘故，或者通过你或者与你有关。除了其他好处，你对我来说也有点像一扇窗，我透过这扇窗可以俯瞰大街小巷。只有我一个人时可办不到，尽管我个子挺高，但还够不着窗台。

现在情况当然就不同了。我现在也同别人讲话，比同你谈时嘴舌笨拙些，但相对而言比较无拘无束，而我完全出乎意外地看到，在这种时候你就站在我的面前。在这座对你是陌生的城市中，有一些相当聪明的人，你在他们心目中是值得崇敬的对象。而我的虚荣心使我为此感到高兴。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性格内向还是因为你看上去内向，还是故意这么表现，还是让人这么感觉，还是真的给人以这种印象，反正有些人认为你撇下了他们，其实说到底你只是撇下了那个姑娘。

你的信是半悲半喜的。你没有到那小伙子那儿去，而是去了原野、森林。但你看到了她，我们只不过稍稍见识过她的春天和夏天，但对她的秋天，她的冬天，我们知道得太少，就像我们对我们心中的上帝所知道的那么少一样。

今天是星期日，不断有商贩从温策尔广场走下来，穿过格拉本，在星期日的寂静中呼喊。我相信他们红色的丁香花、他们愚蠢的犹太人面孔和他们的叫喊是某种充满意义的事物，就好像是一个孩子想上天，因为人家没把板凳拿给他而大呼小叫，但他实际上根本不想上天。而其他人走在格拉本，对商贩的举止报以微笑，因为他们自己不懂得如何消受星期天，假如我有勇气并且不陪着笑，我真想给他们一顿耳光。但是在你们宫殿中^[9]，你可以尽情地笑，因为就像你在信中写到的那样，那里的天空离大地很近。

我在读费希纳尔、艾卡特^[10]。有的书让人觉得就像是在自己的宫殿中打开陌生的大厅之门的钥匙。

我想要为你朗诵的和将要寄给你的东西是《孩子与城市》一书中的若干篇章，这本书我自己手头也是零散不全的。要寄给你，我就必须给它加上标题，而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将随每封信寄几页给你（如果看不到明显的进展，那么我对此的兴趣会马上丧失了），然后你可将它们连贯起来读。第一篇将随下一封信寄出。

此外，已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写了。我的处境是：上帝不愿我写，然而我偏要写，我必须写。这是永恒的拉锯战，而最终上帝毕竟更强大，这里边的不幸之多超出你的想象。我心中那么多力量被拴在了桩子上，这个桩子也许会长成一棵绿色的树，如果将这些力量解开，或许会于我于国有益。但是靠抱怨是震不掉挂在脖子上的磨盘的，尤其是，假如本人喜欢这些磨盘的话。

附上一些诗句。请在心情好的时候阅读。

今天这日子阴冷难过。

云朵凝结着。

风儿是拽着的绳索。

人群凝结着。

脚步踏出金属声响，

石头一路震荡，

目光停留的地方

是辽阔的湖水白茫茫。

在这古老的小城里立着些

小小的浅色的圣诞小屋，

它们的五彩玻璃窗俯瞰着

积雪覆盖的小广场。

在这月光蒙蒙的场地上

有一个人静静地踏雪前行。

他那硕大的身影被风扬起

高出四周的小屋之上。

在昏暗的桥上走过去的人们

经过圣人身边

和他们微弱的小灯。

在灰暗的空中飘过去的云层

经过教堂旁边

和它们那朦胧的塔影。

在方形的栏杆旁倚立着的某君

望着黄昏的水流

双手凭着古老的石头。

你的 弗兰茨

〔1903年11月9日〕

9.致奥斯卡·波拉克

亲爱的奥斯卡：

……早晨来信附言还冷静，到晚上简直疯狂至极了。你没有给这个女人帮助，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也许不弄虚作假的人也会这么做的。但是反常的是，你曾对此深思熟虑并且现在还喜欢这种深思熟虑和这种对立，你还喜欢解剖自己。你长时间地抨击自己任何短暂的感情，结果，一个人倒是只活一小时，但对这一小时还得思考一百年。当然，也许我根本活不到那时候。我曾在某个地方记下狂妄的话，说我的生活节奏要很快，证据是：“我爱上一位女郎，曾有一段漫长得惊人的罗曼史”，那时我心情十分空虚，于是记上：“我生活节奏要很快。”好像一个坐在窗帘后面的孩子，拿着画册，有时听到透过窗子缝隙从胡同里传来的声音，没事了，再去看宝贵的画册。——对比之下，我总是宽容自己。

[1903年]

10.致奥斯卡·波拉克

不，在你到来之前，我还是要给你写封信。假如互相写信，就像有根绳子连接着；一旦停止写信，绳子就断了。哪怕只是一根细线，我也要迅速地、应急地把它连接起来。

这幅图画是昨天晚上抓住我的心灵的。人只有调动浑身的力量，友爱地互相帮助，才能在面临地狱般的深渊时，使自己保持在勉强的高度，尽管那深渊是他们所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之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要低一段，那就够糟了；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与其他人捆在一起。我猜想姑娘们一定是悬在我们上方，因为她们是那么轻，因此我们必须给姑娘们以爱，因此姑娘们应当给我们以爱。

够了，够了，我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提笔给你写信，因为一写起来会一发不可收，而找不到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也不再向你叙述慕尼黑的事了，尽管我有那么多话要写。此外，我在异乡完全无法写东西。在异乡，所有词汇四处流散，我无法把它们抓拢来凑成句子，而一切新的事物都施加着压力，使人无法抗拒，使人看不到它们的边际。

这回你要亲自来了。既然我马上就能同你交谈了，我可不愿坐在这写字台旁看整个星期天下午——从两点开始我就坐在这里了，而现在是5点。我是多么高兴。你将带来清冷的空气，使所有昏昏沉沉的脑袋感觉舒适。我是多么高兴。再见。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903.12.21—布拉格〕

1904年

11.致马克斯·勃罗德^[11]

亲爱的马克斯：

特别是由于我昨天未到学校去，看来我有必要给你写信，以便说明我未同你们去参加晚上化装舞会的原因，虽然我曾答应也许要去的。

请原谅。我本想去快活一下，同你和普里布拉姆^[12]共度一晚的，因为我想，如果你为目前处境所迫，作出过于详细的解释——你在几种情况下这么作过——而他出于合乎情理的、几乎对艺术之外的一切都有全面了解，作出相应的解释，那么必定会建立很好的小团体的。

但是，在我想到这点之前，我忘记了你参加的那个小团体。它给一个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因为它一半依附于你，一半独立。就它依附于你而论，它处在你周围，好比是一块灵敏的山地，发出广阔的回声，这使听众大吃一惊。听众的眼睛安详地注视着身前的对象，而背部却挨揍了。特别是当背部不是非常敏感的时候，二者就必定失去感觉能力。

但是就独立而言，小集团给你更多损害，因为它歪曲了你的形象。你因它显得不端正。你在听众面前不能自圆其说，幸好朋友们始终坚持，这才救了你的驾。友好的群众只有群策群力时才对革命有帮助。如果是力量分散的小规模起义，那就会化为泡影。情况是这样，你想显示你的装饰画《晨景》并把它作为背景，但是，你的朋友们认为，此时《狼沟》更合适，可作为《狼沟》插页的背景。当然两幅画都是你画的，每个观众都能认得，但是在《晨景》的草原上阴影多么凝重，田野

上空飞翔着令人憎恶的小鸟。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你觉得这种景色很少见，但是有时确实有的（现在我还不完全了解这一点），你说：“在福楼拜身上有着关于事实的纯粹奇想，你知道，没有内心的升华。”我怎能丑化你呢？我是偶尔引用你说的话：“维特多美啊。”我说：“如果我们想说真话的话，那里就有许多内心的升华。”这是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解释，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说，我不愿对你做任何坏事，我只想给听众讲讲你的圆脸之类的话。因为友好的迹象往往可能是不再考虑朋友的要求。但是在这期间听众感到悲哀，变得厌倦了。

我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我感到更悲哀。我没有同你一起度过昨天晚上，你不原谅我，似乎你不原谅我写这封信。问你好。

你的 弗兰茨·卡

我还没有将信寄走，再读了一遍，觉得信写得不清楚。我本想说：你非常幸运的是，在疲累之时就可以马虎从事，全靠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不用自己朝所追求的方向迈一步，正是这一点显示出你在交际场合——我在普君处是这样想的——不是像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够了。

〔1903年或1904年〕

12.致奥斯卡·波拉克

晚上十点半。

我把马尔克·奥雷尔的书推到一边，我很难将它推到一边。我认为，没有他，我活不下去，因为在马尔克·奥雷尔的书里读到的两三句名言使人更镇定和更紧张，虽然整本书只是叙述一个人，他说话机智，固执己见，眼光远大，想使自己成为一个镇定自若的、坚强不屈的、正直的人。如果人们不断地听到他自言自语：“安静，别管闲事，让热情随风去吧，坚定不移，做一个好皇帝！”那么，必定对他不信任。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固然是好，但是用漂亮话装饰打扮自己，直到成为一个人心中所希望的人，那就更好。

你在上封信里提出不公正的指摘。如果有人向我伸出冷冰冰的手，这对我倒好，但是他挽着我的手，这使我难为情和不可理解。你以为这

是因为少见吗？不对，这不是真的。在许多人身上有什么特别，你知道吗？他们是没有什么，他们不能显示出什么特别之处，连他们的眼睛都显示不出特别之处，这就是他们身上的特别之处。所有这些人都是那个人的兄弟，他在城里东游西逛，不擅长什么，说不出一句合乎情理的话，不会跳舞，不会笑，但总是双手发颤地提着一个密封的盒子。现在一个谈话人问他：“您那么小心翼翼地提着盒子，盒子里装的什么呢？”那个人垂下头，不安地说：“虽然我不擅长什么，这是实情，虽然我也说不出一句合乎情理的话，我也不会跳舞，我也不会笑，但是在这个看上去密封得很好的盒子里装的是什麼，我不能说，不，我不说。”在他回答之后，所有参加谈话的人很自然地散去，但是他们之中仍有些人有某种好奇心，有点急切心情，他们总是问个不停：“密封的盒子里究竟装的什么东西？”为了弄清究竟，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去找那个人，但是他滴水不漏。于是，好奇者，这种好奇者不能长期忍受下去，急切心情松弛了，谁也憋不住总不笑，他们总是带着惶惶不安的心情，注意这个不起眼的、密封的盒子。后来，我们让那个穷人具有差不多好的鉴赏力，他也许终于自己笑了，虽然只是嘴咧了一下。现在不是好奇，而是冷漠、疏远、怜悯，甚至比冷漠和疏远更坏。谈话的人比以前人数减少了。他们现在问道：“您那么小心翼翼地提着盒子，盒子里究竟装的什么呢？也许是一件宝贝，还是一份圣母领报节礼物？好吧，您尽管打开吧，我们二者都要，您也尽管关上，反正我们也相信您。”这时突然一人大声尖叫，那个男人惊恐地望了望，原来是他自己尖叫。他死后，人们在盒子里找到两颗乳牙。

〔1904年1月10日〕

13.致奥斯卡·波拉克

亲爱的奥斯卡：

你给我写了一封亲切的信，对这样的信应该马上答复，要么就干脆不答复。而现在已经过了14天，我却还没有给你写信，这本来是不可原谅的，不过我有理由：第一，我想给你写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因为我觉得这封回信比以前写给你的信都要重要（可惜我没有及时这么做）；第二，我一口气读完了赫贝尔^[13]的日记（近1800页），以前我总是抽读一些，因此总感到没有味道。可这回我前后连起来读，一开始完全是消遣性的，但后来终于产生了这么一种感觉，就好像我成了穴居

人。刚开始时为了好玩把一块大石头在洞口翻来翻去，但当这块大石头挡住了洞内的光线，堵住了空气时，我不禁慌了，使出奇怪的狠劲，想要把这大石头推开。但这时大石头重了十倍，而这个人必须在恐惧中使出浑身的力量，才有可能重见阳光，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这些天我根本无力拿笔，因为看着这么一种生活天衣无缝地不断向上高耸，高得用望远镜几乎都看不见顶，良心就平静不下来。可是良心上如果有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倒是有益的，这样它每挨一口咬都会更加敏感。我认为，只应该去读那些咬人的和刺人的书。如果我们读一本书，它不能在我们脑门上猛击一掌，使我们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或者像你信中所说的，读了能使我们愉快？上帝，没有书，我们也未必不愉快，而那种使我们愉快的书必要时我们自己都能写出来。我们需要的书是那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有如遭到一种不幸，这种不幸要能使我们非常痛苦，就像一个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的死亡一样，就像我们被驱赶到了大森林里，远离所有的人一样，就像一种自杀一样，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我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你是愉快的啊，你的信闪耀着愉快的光辉。我想，以前你只是由于交际方面的失败有过不愉快，这很自然，在阴影中是晒不着太阳的。但是你不会相信我对你的愉快是有过错的。极而言之不妨打个这样的比方：一个智者对自己的智慧一无所知，他跟一个傻子见面了，并同他说了一会儿话，谈的似乎是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当谈话结束，傻子要回家了——他住在一个鸽子笼里——那智者突然拥抱他，吻他，叫道：“谢谢，谢谢，谢谢。”为什么呢？因为傻子竟然傻到这种地步：使得智者看到了他的智慧。

我觉得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而必须请求你的谅解似的。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的 弗兰茨

〔1904年1月27日〕

14.致马克斯·勃罗德

夏初很容易轻松愉快。人们有一颗热烈的心，身体还过得去，相当向往未来的生活。人们期待着东方的奇闻怪事，再度用可笑的鞠躬和摇

头晃脑的讲话来否认这怪事，这场动人的游戏使人愉快和发抖。人们坐在堆得乱七八糟的床上用品里，看着钟表，它显示着时近中午。我们正用适当浅淡的颜色和正在扩展的远处能见度绘制晚景。我们高兴得把手都搓红了。因为我们晚上的影子变长了，变得那么美丽了。我们装饰打扮，内心里希望这种打扮将成为我们的天性。如果有人问我们打算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会习惯于在春天伸开双手作为回答，过一会儿双手放下，仿佛根本没有必要发誓做某些事情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失望，那么，虽然我们感到痛苦，但是仍然像满足了我们的日常祈祷一样，祝愿从外表上最宽容地保持我们生活的正确性。

但是我们并不失望，这个季节有尾无头，使我们处于十分陌生和自然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送掉我们的性命。

我们形式上被风任意带走，如果我们在气流中无法理解，试图用说话安慰自己，将纤细的指头压在膝盖上，那不是没有开玩笑的意味。当我们以前彬彬有礼到一定程度，不想知道人们是否对我们了解的时候，现在我们想知道，我们力图了解某种弱点，当然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仿佛我们要努力抓住在我们面前慢慢奔跑的小孩子。我们像一只鼯鼠打地洞，满身黑茸茸的毛，从我们打的沙洞里钻出来，伸出可怜的小红脚，怪可怜的。

散步时，我的狗逮住一只鼯鼠。它想跑过大街。狗再三追它，仍然让它跑掉了，因为狗还小，胆小怕事。起初我觉得它很好玩，鼯鼠惊慌失措，特别使我感到愉快。它拼命往前跑，在大街坚硬的地面找洞又找不着。忽然间，狗跳过来，又伸爪子打它，它尖叫起来，吱吱地大叫。这时我出现了——不，我没有出现。这使我失望，只因为那天我耷拉着头，晚上我惊奇地注意到，我的下颚埋进我的胸部。但是第二天我的头又昂然抬起来，一个少女穿着一件洁白的连衣裙，并且爱上我了。她失恋了，我未能成功地安慰她，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另一天，下午短时间午睡过后，我睁开眼睛，还未完全清醒，我就听到母亲从阳台上用自然的声调向楼下问道：“您在干什么？”一个妇女从庭院里答道：“我在院子里吃点心。”人们知道怎样安排生活，其技巧使我感到惊异。另一天，由于痛苦加剧，我对阴天的刺激感到高兴。接着一周多风，或者说是两周或两周以上多风。我爱上了一个女人。人们在旅店里跳了一次舞，我没有去。我心情忧郁，我很蠢，我在田间小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这里

路坡很陡。那时候我在拜伦日记里读了这一段（因为书已包裹好，我将这一段抄好附来）：“一周来我没出房门一步，三天来，我每天抽出三小时同师傅在开着窗子的图书馆里练击剑，以便使我们精神平静下来。”紧接着夏天结束了，我感觉到天冷了，是答复夏日来信的时候了，我的笔写了一些，就此搁笔。

你的 弗兰茨·卡

〔1904年〕8月28日〔布拉格〕

15.致马克斯·勃罗德

请等一下。10点半我肯定来这里。你要知道，我已忘记今天是星期五，普里布拉姆不让我走。但是我一定来。

你的 弗兰茨·卡

〔明信片，约1904年〕

1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昨天你肯定去了卡巴莱剧院。我很遗憾。因为我9点半下了意大利语课赶到那里时，全都结束了。

我母亲被华尔兹舞摇昏了头，模糊地记得你说过，你今天将来我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让我今天去你那儿更好些，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开了刀的老太太，晚上我们经常为她奔波。请答复。因我寄给你卢坎[14]的作品，更应友好地复信。

你的 弗兰茨

〔1904年？〕

17.致马克斯·勃罗德

我感到奇怪，你关于托尼欧·克勒格尔没有写片言只字。但我对自己说过：“如果我收到他的信，他知道我会多么高兴。关于托尼欧·克勒格尔必须写一点。显然他给我写过信，但是有意外事件，大暴雨，地震，信件丢失了。”我又立即对这个意念很恼火。因为我没有写信的兴致，必须对一封也许未写的信作答，我便对此破口大骂。我开始写道：收到你的信，我心乱如麻，不知道是否该去你那里，送花给你。但是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做，一方面出于疏忽，另一方面我担心做蠢事，因为我从迈出的步子中前进了一点，现在像雨天一样悲哀。

但是你的信写得很好。因为如果有人向我说了一种真情实况，我觉得这是狂妄。他教训我，贬低我，预料我提出反证有困难，而他自己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他肯定地认为他的真理无懈可击。如果对某人说有偏见的话，那是多么讲究礼节、心直口快和令人感动，如果申述理由，甚至再三为偏见提供论据，那就更令人感动了。

也许你也写同你的故事《游深红色地方》^[15]相似的故事。以前我也构思过这个广为传播的类似故事，然后又读了《托尼欧·克勒格尔》。因为《托尼欧·克勒格尔》的新颖之处不在于找到这种矛盾（谢天谢地，我绝不相信这种矛盾，这是吓人的矛盾），而在于本来有益的（《游深红色地方》书的作者）对矛盾事物的爱。

如果我假定你就这些事写了文章，那么我不理解为什么你的信十分惊惶失措和喘不过气来（也许我只记得你星期日上午是如此）。请你稍安毋躁。

这封信也将丢失就好了。

你的 弗兰茨·卡

信写好后忘了两天才寄发。

[1904年]

1905年

18.致马克斯·勃罗德

由于你经历了我根本没有参与的好事情，所以你绝不可对我生气。特别是由于我必须在恶劣天气时思考，想到会见在咖啡店进行，也由于你在施特芳·格奥尔格处已平安地度过了一些时间。现在11点，天气晴朗，没有人安慰我。

你的 弗·卡

〔邮戳：1905.5.4—布拉格〕

1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勃：

如果我待在布拉格，我准保早给你写信了。但是我很轻佻，在西里西亚的一所疗养院已经是第4周了。我生活在许多人和女人之中，变得相当活跃了。

弗兰茨·卡

〔邮戳：1905.8.24〕

〔明信片：到达楚克曼特尔〕

1906年

2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本当还在考试期间就给你写信的，因为肯定的是，你救了我3个月的命，让我学别的，而不再学财政学。只是一大堆纸条救了我，因为这样一来，马克斯把我看作他自己的镜子，它甚至有着奥地利的有趣的色彩。尽管在他讲了半年的一大堆纸条中有偏见，我却只记得很少的一些纸条。但是我们确实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其他人虽然知识不渊博，但也很有趣。致衷心问候！

你的 弗·卡

普里布拉姆很好。

〔邮戳：1906.3.16—布拉格〕

2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因为我这么久没去你那里（我们商店搬家，搬运大木箱，打扫干净，小姑娘，很少学习，你的书[16]，少女们，麦考利的书《克莱夫勋爵》[17]，整个情况就是如此），我这么久没见到你，今天我来，免得你失望，因为我以为你过生日，《幸运儿》[18]改得非常好。你会很好地接待我的。

你的 弗兰茨·卡

〔大概是1906年5月〕

2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因为我现在要学习（不要怜悯我，这是对多余之事的多余一举），白天我脱掉破衣服，穿上日常便服很费劲，因此我不得不像夜行性动物那样生活。我想抽一个晚上再见到你一次，也许明天星期三或者在你以前愿意的时间。——顺便说说，我之所以首先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知道你的身体是否好，因为星期一你总是还要到你的博士那里去。

弗兰茨

〔邮戳：1906.5.29—布拉格〕

2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长时间销声匿迹了，现在再度露面，虽然还呼吸困难。首先告诉

你一个简单的消息，即关于你们的住房消息，“宝石”旅社离疗养院有2分钟路程，差不多在树林里有一间房，每周为5古尔登^[19]。单人房间并供给好的膳宿，每月为45古尔登。从第18天起也许更便宜。在疗养院的一栋房子，即旅社的附属建筑物里，房间每周为7—8古尔登。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906.8.13—楚克曼特尔〕

2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那很有趣的表兄从巴拉圭来。我以前向你提到过他。他这次欧洲之行，在布拉格盘桓数日，恰值你面临国家考试。今天他在回程途中又抵达布拉格。他本想于今晚立即起程。因我想将他介绍给你，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留住，他将于明早才动身。我很高兴，今晚接你去与他会晤。

你的 弗兰茨

〔管状明信片，邮戳：1906.12.11—布拉格〕

2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们何时去印度舞女那里？如果这位小个儿的小姐走了，她的阿姨目前比她的才艺更强。

弗兰茨

〔1906？〕12.16

1907年

2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乐于先给你写信，然后睡觉。已是凌晨4点。

昨天我读了《当代》周刊，当然心情不安，因为我进入了社会，在《当代》上发表的文章据说已为人所传颂。

现在是狂欢节，道地的狂欢节，也是最盛大的狂欢节。好，我在今年冬天跳了舞。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认识到我的名字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必然性。如果认识到了的话，他就必须立即读第一段和注意到关系句子走运的地方。然后他就会找到一组名单，它的结尾是迈林克（显然这是一只缩成一团的刺猬）。这组名单不可能在句子开头，如果下面的句子还应该生气的。因此一个以开口元音结尾的名字（这里嵌入的）意味着拯救那些句子的生命。我在这方面的功绩是微不足道的。

悲哀的只是——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意图——以后出版什么，现在我觉得已成为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因为初登文坛的温柔态度将会受到完全的损害。我永远不会找到能与将我的名字写在你的句子里所具有的效果相匹敌的效果。

当然，这在今天只是次要的考虑，我更多地是寻求我进入现在著名人物交际圈子的可靠性，因为我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和地理爱好者。我以为，我在这里只能很少指望德国。因为有多少人以同样紧张的心情读一篇评论，一直读到最后一段呢？这不是著名。但是在外国的德意志人那里，情况就不同了，例如在濒临波罗的海的各省，在美洲，甚至在德国的殖民地，情况就更好些，因为孤独的德意志人读杂志是通读不漏的。我出名的中心是达累斯萨拉姆、乌济济、温得和克。但是，正是要安慰这些迅速感兴趣的人（具体地说：农场主，士兵），你本该在括号里还写上一句：“人们一定会忘记这个名字。”

吻你，考试在即。

你的 弗兰茨

〔1907年2月12日—布拉格〕

2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更安心地研究歌德吧！肯定歌德没有写“歌德从来没有这样做”，在大门前他在最后时刻连自己的生日都没有承认，对吗？我请求你原谅！相反，你本可以以后写歌德，因为我从没有这么做。我本来也没有这样做（生日与其说令人漠不关心，不如说确实更令人恼火），要不是恰巧碰上这样的情况：好像充分预料到似的，紧接着提到23岁生日，（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多么巨大的年龄！）这使我在次日获得了一个星期日的奇迹。这就是一个星期日。

请你说说，你为什么总是对这两章恼火？你同我一起感到幸运的是，你在写一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把其他的东西暂时搁置起来吧。

你的 弗兰茨

〔大概写于1907年5月〕

2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在愉快的郊游之后，昨晚回到家里，见到你的信。虽然我疲惫不堪，我仍然读了信，但感到困惑不解。因为我看出你优柔寡断，在向我提出要求的地方，你踌躇不决。我躺下了，由于在往日的千种小事上半喜半疑，因而十分疲倦。我不能违背世人的决心，因此，我决不会试图使你改变看法。

你的情况和我的完全不同，因此，如果我在读“我决心不接受”那段话时，像在读一篇战斗报道一样，吓得不能立即读下去，那就没有意义。但是我很快对一切泰然处之，在这里每件事情都有说也说不完的优点和缺点。

我对自己说：你需要多活动，你在这方面的需要是肯定无疑的，虽然不可理解。一年来，森林作为你散步的目标似乎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终于不是差不多肯定，你在市法院实习年给自己提供一个文学阵地，这

将使其他一切都成为不必要。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会像一个疯子跑到科莫陶去，但是我不需要活动，特别是因为我无能搞什么活动，虽然一座森林也许不会使我满足，但是我——这很明显——在法院实习年却一事无成。

一旦胜任某一门职业，这门职业就难不倒人。我担心我在上班时——实际上仅6小时——会不停地出洋相。我看见你信上说，你相信我有能力干类似的工作，你现在认为我一切都能干的。

商务和晚间的安慰则相反。要是通过安慰就能幸福，该多好啊！要获得幸福就需要一点点幸福呀！

不，如果到10月份止我的希望没有什么改善，我将在商学院攻读中学毕业课程，学习法语和英语，还学西班牙语。如果你愿意同我一起学，那才好哩。如果你在学习方面反对我，我会不耐烦的。那样一来，我舅舅就不得不在西班牙给我们找工作，不然，我们就会去南美，或者去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

我暂时留在这里，可以住到8月25日。我常常骑摩托车，洗澡，一丝不挂地长时间躺在池塘边的草地上，我同一位痴恋的少女逛公园直到半夜。我把草地上的干草铺在周围，建起一座旋转木马，大树帮我们躲过了大雷雨，奶牛和山羊吃过草后，晚上被赶回家。我经常打台球，散步，喝啤酒，也进寺庙。但绝大部分时间——我在这里6天——我是同两个小姑娘一起度过的，她们是大学生，聪明伶俐，很信仰社会主义，她们必须咬住牙，才能不勉强地利用任何机会说出信仰，说出原则。一个姑娘叫A.，另一个叫H.W.[20]，个子小，她的脸颊总是红润润的，眼睛很近视，戴上眼镜的动作很美。今夜我梦见了她那缩短了的小腿，间接地辨认出一个姑娘的美丽，我爱上她了。明天我将向她们宣读《实验》[21]中的作品。这是我身边除了斯汤达尔和《闪烁》[22]之外唯一的书。

要是我身边也有《紫晶》多好啊，我就会给你抄几首诗，可是我把它放在家中的书箱里了，钥匙在身边，以免让人发现存折。家里谁也不知道我有存折，存折对我来说决定着我在家里的地位。如果你在8月25日前没有时间的话，我将派人把钥匙送给你。

可怜的青年人，现在我只有感谢你为说服你的出版社社长，使他相

信我的画的优质而付出的辛劳了。

现在炎热，下午我将在林中跳舞。

请代我问候你的家人！

你的 弗兰茨

〔附马克斯·勃罗德的几首诗的抄本〕

〔1907年8月中—特里施〕

2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不写信给我，说你在科莫陶身体如何，而你却问我身体如何，我怎样度过夏天的。这不好，因为不公平。埃尔茨山景色也许很美，甚至超过了绿桌布。如果旅费不贵，我本想拜访你的。你找到了一个人，他有我以前的笔迹，那倒是可能的。不过，现在我的笔迹不同了，我只是在给你写信时记得已成过去的笔法。星期天你来吗？你来，我会很高兴的。

你的 弗兰茨·卡

〔明信片邮戳：1907.8.28—布拉格〕

30.致海德维希·W. [23]

你，亲爱的，我感到疲劳，也许有点不舒服。现在我开始工作了，并试图通过在办公室里给你写信，使办公室变得亲切一些。而围绕我的一切都臣服于你。桌子几乎热恋似的紧贴着纸，笔卧在大拇指和食指的凹处，像个甘愿效劳的孩子，而钟敲打着，犹如一只小鸟。

然而我却觉得我是在一场战争中给你写信，或者是处在一些难以想象的事件中，它们之间的联系太离奇，而它们的速度忽快忽慢，极难捉摸。卷入了最烦人的工作，我忍受着……

晚上11点

现在漫长的一天过去了，它有这么一个开端和这么一个结束，尽管它是不配有这样的开端和结束的。但实际上，从我的写作被打断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现在我的左边是敞开的窗户，星星在窗外闪烁，我还是接着上面那个想好了而没有写完的句子写下去。

……我忍受着头疼，就这样从一个坚决的决定到另一个同样坚决的，然而截然相反的决定。而所有这些决定都生气勃勃，都会迸发出希望的和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的火花，这种后果之令人困惑比起那些决定之令人困惑还要叫人气恼。我像子弹一般从一个决定飞向另一个，汇聚起来的激动来自我的斗争中的士兵、旁观者、子弹和将军，这种激动令我浑身颤抖。

但你却要我根本别牵挂你，要我让感情作一番长途散步而变得既疲乏又满足，而你自己却不断地自寻烦恼，为了冬天可能会冷的缘故，在夏天就给自己穿上裘皮大衣。

此外，我没有社交活动，没有分散愁绪的机会；我整夜整夜待在小阳台上，俯瞰着河流，我甚至不阅读工人报纸，我也不是一个好人。几年前我写过这么一首诗：

在黄昏的夕阳下

我们曲着背坐在

板凳上，四周绿草如茵。

我们的胳膊无力地下垂着，

我们的眼睛忧伤地眨动着。

行人穿着各色衣服，

在石子路上摇晃着漫步，

头顶是广大的天空，

它从远山伸向更远的山巅；

山外有山天外还有天。

所以我连你所要求的对人的那种兴趣都没有。

你该看见了，我是一个可笑的人；如果你有点喜欢我，那无非是怜

恼，属于我的份下的是畏惧。信中的相会是多么虚妄，就像波涛拍岸，就像远隔重洋的两个人。笔从所有字母的斜坡上滑下来，就这样结束了，天气很凉，我该钻进我那空被窝了。

你的 弗兰茨

〔1907年8月29日—布拉格〕

31.致海德维希·W.

尽管如此，亲爱的，这封信到晚了。你写什么，你是深思熟虑过的。以前我决不能硬着头皮写信，这不是因为我夜里端坐在床上，也不是因为我在长沙发上和衣而卧和在白天比应该的次数更多地回家。一直拖到今天晚上我才想给你提笔写信。但是事前我在开着的抽屉里取了几张纸，找到了你的信。信早就到了，但是有人掸去了信上的灰尘，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信藏到抽屉里。

我想，写信就像河水拍岸，但是我不是指听河水拍岸的声音。

你请坐，让我安静一下，让你望着我，而不是看着我的字母。

你想象一下，A君收到X君的信，X君试图在每封信里否定A君的存在。他振振有词地提出很难到手的证据，再加以贬斥，直弄得A君几乎下不来台，甚至证据中的不足之处也使他哭哭啼啼。X君的一切意图首先被掩饰住。他只说，他认为A君相当不幸，他有这个印象，对细节他一无所知。他顺便安慰A君几句。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一定不会感到惊奇，因为A君是一个不满足的人，Y君和Z君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终于承认，他有理由不满。他们望着他，看着他的情况，一定不会反驳他。如果人们真正观察他的情况，就必定会说，A君不够满足，因为如果他彻底地调查自己的情况，正如X君所做的那样，他就没法活下去。现在X君不再安慰他。A君看到，睁开双眼看到，X君是最好的人，他给我写这样的信，天晓得，除了要谋害我，他还想做什么。他最近还生活得多么好，为了使我免于痛苦，他不想暴露自己，而是忘记了点着的灯是普照四壁的。

尼尔斯·吕内说，用沙子建不成幸福宫。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谈论流沙的人就不对吗？见到沙子的人并不

在宫里，沙子流向何方？

我现在怎么办？我将怎样集中力量呢？我也在特里施，同你一起走过广场，有人爱上我，我还收到了这封信，正在读信，几乎读不懂，现在我必须告别，握住你的手，然后离开，向大桥走去，消逝。啊，这就够了。

我在布拉格没有给你买什么东西，因为我从10月1日起很可能在维也纳。请原谅。

你的 弗兰茨·卡

〔1907年〕9月初〔布拉格〕

32.致海德维希·W.

亲爱的姑娘：

又到深夜了，我才能写信。时已秋天，天凉了。但是你那封好信使我感到周身温暖。你穿上洁白的衣服，又加上你的同情心，使你显得最美丽。但是衣服掩盖这个腼腆的姑娘太多了，衣服本身太被人羡慕了，也使人痛苦。我真想拥有你，甚至你的信就是精巧美观的壁纸，洁白而亲切，这意味着你正坐在草地上的某个地方或者在散步。为了抓住和留住你，才不得不捅穿它。

但是正是现在，当一切应该变好，我已经亲吻你的嘴唇，这是未来一切幸福的开始的时候，正当我想拜访你和待在你那里的时候，你不客气地对我说永别，然后走了。我要是将我的双亲留在这里就好了，还有几个朋友和我必须惦记的其他事情。现在你还将待在这座该死的城市，在我看来，我一定不可能迫使自己穿过多条小街小巷去火车站。但是维也纳对我比起布拉格对你更必要。我将在出口学院学习一年，完全埋头在一篇非常吃力的论文中，不过我对此满意。你得把我读报的时间再推迟一点，因为我还要去散步，必须给你写信。否则我决不会得到快乐。

我总是乐于参加你的聚会的，你得给我比上一次茶话会更多的机会。因为那里还有许多对我很重要的事情，你对此未写片言只字。你几点钟来？什么时候离开？你穿得怎样，在哪间房吃过饭，你是否笑过和

跳过舞，你对谁看了一刻钟之久？最后你累了，睡得好吗？你怎么写的信，并截留了属于我的一封信——这是最恶劣的行为。在这新年天气好的日子，仅这一点就使我心情沉重，你同母亲和祖母走过石子路，跨过两级台阶和石板，去寺院了。这时你未考虑到，无望比希望需要更多的勇气，如果出于热情可能有这样的勇气，正在转变方向的风就能给勇气最有利的方向。我最衷心地吻你。

你的 弗兰茨

〔1907年9月初—布拉格〕

33.致海德维希·W.

最亲爱的：

他们把我的墨水拿走了，已经睡觉了。请允许用铅笔给你写信，以便我拥有的一切都与你共享。要是你独守这间空房，天花板上只有两只苍蝇嗡嗡叫，房间里有点玻璃杯，那么我就能靠你十分近，我的脖子挨着你的脖子。

我很不幸，直陷入精神混乱。有几种小病，有点发烧，有点失落感，这使我卧床了两天。于是我给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当然，在这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在窗下墙上撕毁了这封信，因为你这个可怜人，爱情使你够激动的了。可不是吗？你在深夜哭了好几个钟头，而我披着星光，穿街过巷地到处转，以便为你作一切准备，到头来，你却觉得我们住的街道相距是远是近，或者住在外省，都无所谓。我们的一切多么千差万别。星期四凌晨我肯定待在火车站，然后当天下午（火车不是在两点半，而是3点到达火车站，迟到了半小时）你在特里施瑟瑟发抖，然后写了那封信。我在星期五收到了这封信。我除了躺到床上，不知道能做什么更好的事情。这倒不坏，因为我不坐起来，就能从床上看到望景台，绿茵的山坡。

结果，我们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跳起了四对舞，未真正鞠躬就不彼此聚在一起了，虽然我们还愿意这样做。但是终究还必须跳圆舞的。

我身体很不好。我不知道情况将会如何。现在我一大早起床，看到美好的一天开始，那么这是可以忍受的，但是以后……

我闭上眼睛，吻你。

你的 弗兰茨

〔1907年9月初于布拉格〕

34.致海德维希·W.

亲爱的：

你住在特里施引人注目，因此，我今天在地球仪上你在特里施城的住处涂上一个红点，想必你不会感到惊奇。今天下雨，我将地球仪取下并涂上红点。

你在特里施哭了，以前没有哭过。你现在参加妇女茶话会，你说你在那里未被人看到，你结上了一条我完全不知道的丝腰带。你在那里写了一封信，没有寄发。你在哪里写的这封信？大概是用铅笔，放在膝盖上或靠在墙上、布景上写的吧？在前厅里写信，灯光够亮吗？我不是好奇，举例说吧，如果我想知道阿加特小姐同谁跳舞了，那是好奇。如果是这样，我这样问是不合适的，你不给我回信是对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你虽然通过其他人，同特里施的所有的人建立了某种直接的关系，甚至与旅馆的仆人或者与看守农田的警卫，你在他看守的田里偷萝卜。你吩咐他们干什么，被他们逼哭了，不管怎么说，这些情况你都要写信告诉我呀，就像一个人在流放时——我还不认识一个流亡者——想知道家乡重大变化的消息一样，他几乎不能读到什么消息，因为很不幸，那里没发生什么变化，幸运的是，现在知道了一些消息。这里可以说，我对你护理的病人没有同情。

明天对我作出最后的决定吧，但是这封信是不耐烦的，一旦我写上“亲爱的”三个字，这封信就有了生命，不愿再等待。如果你以为追求理想的利益适合我的天性，因为有足够的理由说：疏忽了实际利益，那么你就误以为我可爱了。

我知道你必须离开维也纳，但是我同样要离开布拉格，当然我们可以好好地例如在巴黎度过今年。不过，照下面去做也是对的：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开始做什么。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我们将没有必要非聚

在一起不可，对吗？

我请求你，将你在布拉格的前途详细写信给我，也许我一定能为此作准备哩。我乐于这样做。

你的 弗兰茨

〔1907〕9.15〔布拉格〕

35.致海德维希·W.

亲爱的：

你错怪我了。我不知道，对某人稍微有点厌恶是否就必须错怪他。我将无法说服你，但是我根本没有讥讽。我想知道的一切事情，你已经写信告诉了我。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情况就是这样。正是你称之为讥讽的这些话，只不过是这几天可以抚摩你的速度。这里是否谈得上农田警卫，还是谈得上巴黎，这几乎是次要的问题。

我这封信早晨又中断了，现在已过子夜，疲劳得很，但继续写信。

是的，已下了决心，但今天才下决心。其他的人只是很少时候下决心的，然后在很长时间享受下决心后的愉快。我却是不停顿地下决心，次数之多，活像一个拳击师，只是我以后不会打拳击，这是实话。此外，这只是看来如此，我的事情但愿即将得到相应的结局。

我留在布拉格，很可能在几周以后在一家保险公司谋得一个职位。这几周我将必须不停地钻研保险业务，在那里是很有趣的。其他的一切我将等你来时才能对你说。当然我必须小心谨慎，决不能使现在捉弄我的天命变得神经质。你不可将此事告诉任何人，连对我的舅父都不要说。

你何时来呢？关于住房和费用你未写清楚。你知道，我愿意帮助你，但你未说，信纸空了一截。我帮助你的诚意未变小，但我对你说过，我的熟人可惜不多，我在哪里询问，都是白搭，因为别人要的是工作多年的女教师。至少我将在星期天让《日报》和《波希米亚报》登一则广告：

“一个青年女子，高中毕业后，先在维也纳、后在布拉格上大学，学习法语、英语、哲学和教育学，欲寻找教育儿童的教师工作，根据迄今的教学成果，自信能充当此任。或者可当朗诵员和陪客聊天的小姐。”

我从行政管理处取来了杂志。我想将特里施作为邮件存邮局待领的地址，也许下周你已到布拉格了。

当然我还将继续为你找工作，因为人不可过于自信。祝你像我一样在布拉格凑巧交好运。

你的 弗兰茨

〔1907〕9.19〔布拉格〕

3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现在情况就是如此。其他的人曾偶尔下决心，在这期间他们欣赏自己的决定。但是我经常像一个拳击师那样下决心，但是我不会拳击。

是的，我待在布拉格。

最近我很可能在这里谋得一个职位（完全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只是为了不使工作单位的上司神经质，我没有写下详细情况，我也不会这样做。

我将为你感到高兴。

你的 弗兰茨

〔1907年9月22日—布拉格〕

37.致海德维希·W.

亲爱的：

你的信令人奇怪地晚上来了，因此只好赶紧写这封回信，以便你及时收到它。

我突然想到，舅舅应该给妈妈写信。这个想法很好，人们只可以指摘我，说我没有亲自去。

你又想离开我，或者以此威胁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呆在布拉格，这足以破坏你的计划吗？请你来吧，正好在你的信到来之前来，我想，如果我们总是在星期天上午一起读那本法文书，那多好啊！我现在有时候读这本书（现在我很少有时间），这本书是用支离破碎的法语写的，我多么爱读它，来吧，我求你了。

你认为，我高兴替你做的事，你都要付钱，这个看法使我高兴。我附寄的广告版（为的是使你看看这些广告显得多么笨拙和差劲）倒是不重要，而我昨天夜里向你祝酒付的香槟酒酒账——你至今未注意到——我将叫人给你送去。

现在使你生气和疲劳的种种小事只是第一次很糟，第二次已被预料到了，因此倒有趣。只是转半个圈需要勇气。来吧。

你的 弗兰茨

〔1907〕9.24〔布拉格〕

38.致海德维希·W.

你看到的，亲爱的，这总还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成功。

我拆开这些信，因为我想，我可能帮你打听。现在这一封看来是一个靠得住的犹太人写的，我将打听这是些什么人，至少我会给他们写信的。

另一封信有点像小说。你应该用特定的代号（我会翻译的）写信，在什么条件下能同一位21岁小姐用德语谈话，每周三次，或许在散步的时候。为了愉快，你一定会回信的。

但是两件事要快办。我不相信还会有什么信件寄来，至少我们将在今后几天再登广告。

最衷心地问候你，向你妈妈问好。别忘记来。

你的 弗兰茨

3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为了迅速给你复信，我在街上给你写的信。你为什么借这么一本坏书供你闲暇时间看，你的记忆力真好。我总是星期五来。我对手术一无所知。我只问（因此我只在明信片上写），为什么亲爱的上帝惩罚德国、布莱和我们？我一定在晚上6点一刻来。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07.10.8—布拉格〕

40.致海德维希·W.

现在我应该给你写信，再划上褐色线，因为已关门睡觉的人有墨水，爱上你的铅笔可以立即找到。亲爱的，亲爱的，秋中时节出现夏天天气，多美呀！这多好呀！如果人们在体内不能保持平衡，要忍受季节的变化，那是困难的。亲爱的，亲爱的，我从办公室回家的路值得一叙，特别是这条路是我唯一值得一叙的事。我总是6点一刻匆匆忙忙地从办公楼大门出来，后悔浪费一刻钟，向右转弯，走过文策尔广场，向下去，然后碰到一位熟人，他陪我走，向我讲述了几件有趣的事。我回到家里，打开房门。你的信在这儿。我读你的信，好像一个因走田间路疲劳不堪，现在来到了树林里。虽然我迷了路，但是我因此不再害怕。但愿每天这样结束。

〔1907〕10.8

亲爱的孩子，那么迅速地过去几个夜晚之后，又是一个晚上。收到你的信后，心情激动，显然得用墨水写回信。

我的生活现在没有条理。当然我有一个工作岗位，工薪微薄，80克朗，工作8—9小时，时间非常长。在办公室之外的时间我就像头野兽，猛吃一顿。由于我至今未完全习惯，将我的日常生活限制到6小时，此外我还要学习意大利语，在室外度过这些美好日子的夜晚，因此我在闲

暇时间竟然忙忙碌碌，抽不出多少时间来休息。

现在我在办公室里。我在普通保险公司工作。我总希望有一天自己在遥远的地方，坐在一把安乐椅上，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向外望，看那长满甜菜的田野，或者回教徒的公墓，而那家保险公司的业务使我很感兴趣。但是，我目前的工作使我悲哀。有时候，搁下那里的笔，那倒是舒服的，也许可以想象一下，我把你的手绞在一起，用一只手搂着你，现在知道，我不会放开你的，即使我的手关节被拧掉了，也不会放开你的。再见。

你的 弗兰茨

〔1907年10月初—布拉格〕

4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最早在10点半或11点才能来，因为有人要在那里检查我的身体。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我将一直不幸，就我来说，对不幸一笑置之，他们只是出于公众利益，心情愉快地检查我的身体。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07.10.26—布拉格〕

42.致海德维希·W.

亲爱的姑娘：

如果说我没有立即回信，请原谅。但我仍然不懂得好好利用这几个小时，因为当时我想，马上就到午夜了（即现在）。别以为是好天气使我怠慢了你，是笔使我怠慢了你，亲爱的。可是你的问题我将全部回答。

我是否会马上走，调得远远的，这我不知道，一年内几乎不可能，最理想的是能够离开社交圈，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对工作本身的抱怨并不像对拖泥带水的时间的惰性的抱怨那么强烈。也就是说，办公时间是无法切割的整体，在最后半小时里仍能像在第一个半小时中那样感觉到8小时的压力。这就像在一次夜以继日的火车旅行途中，最终乘客变得非常胆怯，他既不去想火车司机操纵机车的工作，也不再去想山峦起伏的或平坦的原野，而是始终把表拿在手中，把一切全都归诸于表上的时间。

我在学意大利语，因为我第一站肯定是到特里斯特。

最初几天我在那种敏感的人眼中一定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也确实如此，我觉得自己低了一头；在25岁之前连片刻的时间都没有懒散过的人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因为我相信，赚的钱带不到坟墓里去，而懒散掉的时光却是会被带去的。

我8点到办公室，7点半上路。

无缘无故快乐的人？所有有一个类似职业的人都是如此。他们跃向快乐的跳板是上班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可惜我同这种人并无来往。

《艾洛特斯》即将以《一个恋人的道路》为题出版，但没有我设计的扉页，该页被认为是无法翻印的。

你说那位年轻作家写的东西是有趣的，只是你夸大了我们之间的相似性。我只不过偶尔顺便地试图穿着好一点，可是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已经做到了这点；正是这些人善于保养指甲，有的还涂指甲油。他能说一口漂亮的法语，这便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了，而他能同你来往，则是个该死的区别。

那首诗我读了，由于你给了我评判权，所以我说，里面有许多自豪感，但我认为，这种自豪感可惜过于形影孤单了。总体而言，我感到这是对值得钦佩的同时代人一种天真的，因而是令人喜爱的钦佩之情的表达。这就是我的评语。但考虑到捧在你可爱的双手中的天平对外在平衡的过分敏感，我在此奉上一份拙劣的、似乎已有一年寿命的小东西[24]，应由他在同样的条件下加以评判。（你不愿说出他的名字和其他任何情况，对吗？）如果他对此大加嘲笑，我会非常高兴的。完事后你把这纸寄还给我，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

现在我已答复了你的一切问题，并超过了；现在该我行使权力了。

你在信中对我谈及的你的情况，是这样模糊，你自己一定也感觉到了。是因为我的责任，使你受到别人的折磨呢，还是你自己在折磨自己，而别人只不过是没帮助你？“一个深得我好感的人”，“双方都应该让步”。在这座于我模糊不清的大城市维也纳，我能看得见的只有你，而我现在看来都有点帮不了你的忙。钟声悲哀地敲响了1点，还不允许我结束这封信吗？

你的 弗兰茨

〔约1907年11月于布拉格〕

43.致海德维希·W.

疲劳，但是顺从和感谢。我感谢你。可不是，现在万事顺遂。从秋至冬的过渡时期常常如此。由于现在是冬天，我们坐在一间房里（情况确实如此），我们每人各靠一堵墙，彼此相距有点远，但这是古怪的，不必如此。

什么故事，你了解多少人，散步和计划。我不知道任何故事，没有看见任何人，每天我都散步，急匆匆地穿过4条小巷。我已经拐过街角，越过一个广场，对种种计划太厌倦了。也许我将冻僵了的手指尖向上（我未戴手套）渐渐触到木箱去投信，以后你在布拉格将有一个可爱的写信人，从我的手里得到一笔宝贵的财产。因此，在我像牛马一样生活的时候，我不得不双倍地请你原谅我使你不得安宁。

老天哪，我为什么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呢？！你一定会生气，或者只是感到不安。请原谅我。请你也反对我的懒惰，或者如你所谓的亲切一点的说法。但是这不仅是懒惰，还有恐惧，对写作的普遍恐惧。写作这个令人奇怪的工作，现在是必不可少的，是我全部的不幸。但是首先，只应该经常通过某种活动使令人颤抖的事情趋于平静。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关系不属于这类事情。

尽管如此，我早已给你写信了，而不是把开始写的信一点一点地收集在一起，但是我现在十分突然地走到一群人之中。军官、柏林人、法国人、画家、歌唱家，这群人十分愉快地夺去了我晚上好几个小时，例如昨天夜里，我没给一个管弦乐队一点小费，而是借给它的指挥一本书。诸如此类。人们忘记了，时间过得快，失去了几天时间，因此应该

同意。亲爱的，向你致以问候和感谢。

你的 弗兰茨

〔1907年11月—布拉格〕12点

4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见到你们很高兴。我说了些不谨慎的话，在我离开你们以后，我才开始突然感到对后果的担心。可不是吗，你看，不是没有发生什么事吗？

我的父亲应该在魏斯贝格先生处为博伊姆尔^[25]先生所用，这一点
坚

持不变。他也可以叫我，虽然不很愉快，但是我请求你，他绝不应该说我不满意，我将放弃这个工作，我得到邮局的一份工作之类，这样说，我会非常痛苦的，因为魏斯贝格先生不费吹灰之力把我送进了保险公司，这在我早些时候找工作绝望之后是多么合适。我对这家公司的规模之大很高兴，我非常感谢他。他在这家公司也为我作了某种程度的担保，在魏斯贝格先生在场时，上司已经立即发话说，只要我被接受（当时还根本没有把握），我就将永远留在公司，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点头同意。当然，如果我在邮局得到一个工作（是否能得到，现在还十分可疑），也一定要作出这种说明的。不过目前我想不用指尖伤害我过去的天命。

你的 弗兰茨

〔1907年底于布拉格〕

45.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终于对这整个城市有了感情。在您的房间里我就感到痛苦，因为您在那里拼命学习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谢天谢地！

您的 弗兰茨·卡

1908年

46.致马克斯·勃罗德

我请求你，亲爱的，亲爱的马克斯，即使你以前想将今晚移作他用，也请你等我一下，以免我从剧院接人，不必乘胶皮自行车去，不必坐在咖啡屋的阳台上，不必去酒吧，不必看那件条子衣服。要是你每天晚上给我时间就好了！

〔邮戳：1908年1月11日—布拉格〕

47.致海德维希·W.

亲爱的：

现在我忽然置身于办公室内的打字机音乐中，匆匆忙忙地打着，夹带着优雅的错误。我早就应该对你的来信表示感谢了，但这会儿已经又迟了。可是我相信，你在这方面已经永远地原谅了我，因为如果我身体情况正常，我早就写了——这由来已久，但当时并不急迫——否则回信就慢。无论在你的信中你对我是多么热情，你却忘了为我的那种恨不得一头扎入任何一处马路里而不再拔出来的劲头恭维一番。我迄今为止都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时有间歇，因为在寻常的年头造一顶轿子并不困难，坐在轿子里，可以感觉到由善的精灵们抬着穿过大街。假如何时（我本想继续这么写下去，但已到8点一刻，我得回家了），假如何时一根木头断了，即使是刮风下雨，坐轿人反正是被扔在了乡村公路上，一筹莫展，远离想要前往的幽灵般的城市。请允许我把这类故事蒙在头上，就像一个病人把床单和被子一股脑儿地盖在身上一样。

上面这段早就写好，而今天又收到了你的来信，亲爱的。

现在第三封信可以开始写了，三封信中也许总有一封会使这个激动的、过度紧张的孩子平静下来。不是吗，我们现在走到蓝、褐、黑的三封信的旗帜下，一起说出这句话，注意每一个词都说得恰如其分：“这生活是令人恶心的。”不错，它是令人恶心的，但在两个人同时讲时，程度

就不那么严重了。因为一旦甲爆发的感情波及乙，即为后者所阻，不再扩展，而人们一定这么说：“这‘令人恶心的生活’她讲得多好，边讲还边跺脚。”这个世界是可悲的，但却是一种泛出红光的可悲，有生气的可悲，离幸福难道还远吗？

你知道吗？我度过了可恶的一周，办公室里事情多得做不完，也许从现在起将一直这样了，不错，人要对得起他的坟墓，再加上别的事，以后我会告诉你的，简而言之，人们把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撵来撵去，由于我根本不是野兽，所以我会多么劳累就可想而知了。上星期我名副其实地属于我居住的这条街，我把它称为“自杀者的助跑街”，因为这条街坦坦荡荡地通向河边，那里将建一座桥，在对岸由山丘和花园构成的百乐宫下面将挖一条隧道，工程完毕后就可以走出这条街，过桥，然后在百乐宫下面散步。但目前立着的只有桥的架构，这条街仅通到河边。但这一切只是开玩笑，因为无论何时，过桥走上百乐宫总比投河进天堂要美妙些。

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要学的东西是稀奇古怪的，即使没有人哪怕对你说一句责备的话，你也会紧张不安。可是你瞧，无论如何你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你有一个目的，它不会离开你，它就像一个姑娘，即使你抗拒，她仍然会给你带来幸福；而我将永远是一个响陀螺，顶多使走近我的人的耳膜感到一阵痛苦，仅此而已。

我很高兴在你的信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这一点你自己马上就不得不承认，因为本周在我们这里只有一个节日，另一个日子一定是下奥地利〔州〕的独家幸福；在这方面你不能同我争论，因为我记住了5月初以前的所有节日。在所有其他方面你都有权利同我争论，或者更糟的是，你甚至可以拒不同我争论，但我在此顺便请求你别这么干。

你的 弗兰茨

〔约1908年初于布拉格〕

4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有一个多么不利的开头的字母！即使我愿意，用我的钢笔杆也不

能给他做什么好事。

但是我很忙，这里有阳光，因此我在这个空办公室得到了一个几乎好极了的主意，实现它极其便宜。我们可以不按原计划从星期一到星期二去过夜生活，而是去过一次美丽的晨生活，在5点或5点半在玛丽雕像旁会面——在女人像旁我们不能缺少女人——然后去特罗卡德罗或库赫尔巴德或埃尔多拉多^[26]。然后我们可以在摩尔道河畔花园里喝咖啡，或者也靠在约茨的肩上。两者都可取。因为在特罗卡德罗酒店，我们谁也不会怪罪谁，百万富翁和更富有的人在早晨6点钟也没有钱，我们这样来，会被所有其余酒店抢光的，现在不得不去咖啡店了，因为我们需要喝一点咖啡，只是因为我们过去是百万富翁——或者我们现在还是，谁知道早晨是不是——我们能付第二杯咖啡钱。

你看到的，办这种事你只需要一个空钱包，我能够借钱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是，如果你办这种事的勇气太小，太不吝啬，毅力太小，那么你就不必写信给我，星期一9点碰面好了。如果你不同意，就请立即给我写张明信片，提出你的条件。

〔普通保险公司的信头，

邮戳：1908.3.29—布拉格〕

4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有两本书和一块小石头送给你。我一直努力为你的生日找到点礼物。这礼物不能因对它漠不关心而改变。丢失、腐烂和遗忘。在我冥思苦想了几个月以后，我又只知道送书了。但是送书也有难处。一方不感兴趣，另一方又更有兴趣，只有我的信念把我引向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我的信念在我身上不起决定性作用。最后我还是改变了想法，手里拿了一本书使我抑制不住兴趣。有一次我故意忘记你的生日，以为这比送本书还好些，但是其实不好。因此我现在送给你这块小石头，只要我们活着，我将总是送给你小石头。如果你口袋里放着它，它将保卫你，如果你把它放在抽屉里，它也将不是无用之物。如果你把它扔掉，那也是最好的。因为你知道，马克斯，我对你的爱胜过于我。我心中对你的爱胜过蕴藏在我心中的爱。如果爱在我这个不可靠的人身上也有一个坏

的支撑点，那么爱在这块小石头上会得到一个用巨岩建造的住房，爱就藏在沙伦胡同[27]石子路的石缝中吧。我对你的爱长时间来拯救了我，次数比你知道的还多，正是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不了解自己，我完全清醒时也仿佛感到自己只是在半醒半睡状态，对自己了解极少，还正是这时候，我好像同黑衣隐士们一起到处转悠。正好将这样一块石头扔向世界，将安全与不安全分开。书却相反！一本书开始使你厌烦，书不因此不存在，或者你的孩子撕毁它，或者像瓦尔译的书，你得到它时，它已经支离破碎了。相反，石头不可能使你厌烦，这样一块石头也不可能毁灭，过若干年以后，你也不可能忘掉它，因为你没有义务记起它，你毕竟也永远不能最终地失掉它，因为你在第一条最好的石子路上又能找到它，它正是最好的石子。即使我更多地赞美它，也不会损害它，因为通过赞美造成损害，只能是由于受赞美者被赞美压得粉碎，受到损害或被压坏。但是这个小石子呢？一句话，我为你找到了这个最好不过的生日礼物，转给你并吻你，谨表谢意。

你的 弗兰茨

〔约1908年5月于布拉格〕

5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谢谢你。请你一定原谅我这个不幸的人，我没有早些时候感谢你，星期日上午和下午开始，我完全徒劳无益地、非常徒劳无益地谋职，但是只是由于我的体态才谋到一个职位。又一个下午我待在祖父那里，但是常常抓住空闲时间，当然傍晚在亲爱的H[28]的床旁沙发上，她盖着红被子敲打她的身体。晚上同另外的人看展览，夜间去酒吧，5点半到家。由于我第一次看见你的书[29]，我为此再次感谢你。我只读了几页，我已经熟悉这本书。这里多么吵闹，闹得要命。

你的 弗兰茨

〔普通保险公司信头〕

〔1908年6月9日于布拉格〕

5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真诚地感谢你。只是我仍然不明真相，这比你的教导更清楚。从你的教导中我确信认清的唯一事情是：我们还必须长时间地经常地一起看电影、机器间和日本歌妓，然后我们将不仅为我们，而且为世人了解这些东西。但是星期一我不行，而从星期二起每天可以去看。我期待着你，星期二4点钟。

〔明信片邮戳：1908.8.22—布拉格〕

5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现在5点，6个小时工作疲劳厌倦，喝杯牛奶下肚，这还有顺带的意义。但是此外，此外还有一些什么？早、中、晚三餐吃得很好，住在旅店房间里。我喜欢住旅店房间，在旅店房间我立即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真是比在家还好。

我星期四下午来。

你的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08.9.2—特岑〕

53.致马克斯·勃罗德

当时我躺在床上直到12点，下午不见好。前一天夜里就患病了。我现在在捷尔诺契克，这不值得引人注意。但愿你们身体比我好。

弗·卡

〔明信片邮戳：1908.9.9—捷尔诺契克〕

5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坐在游廊屋顶下，前面开始下雨，我保护双脚，将脚从冰冷的砖地放到桌子的横木上，只是用手写字。我在写信，我感到很幸福，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我会高兴的，因为你在森林里有些东西，我若躺在沼泽地，可能将思考好几年。再见，我一会儿就来。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1908年9月于波希米亚森林施皮茨贝格〕

5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现在是午夜12点半，也就是说通常不是写信的时间，即使像今天这样炎热的夜晚也不例外。甚至连夜蛾都不飞到灯下来呢。

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幸福的8天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4天了，我是这样地孤单。任何人都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第一点的结果，只有你的书使我感到舒服，我现在终于正式地在读它了。我已很久不曾这样无法解释地深深陷在不快之中了。我读着这本书时，就紧紧抓住它不放，尽管它本身也根本没有帮助不幸者之意。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要去找一个只是友善地抚摸我的人，所以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她太老了，已经不会产生忧郁之情，她只是感到遗憾（虽然她并不为此惊讶），因为人们对妓女不像对一种情爱关系那样亲切。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安慰我。

〔1908年9月于布拉格〕

5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多么喜欢星期二很快到来。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要是你能立即回答我就好了。例如8个人坐成一圈谈话，什么时候和怎样发言，以免

被认为沉默不语。天哪，这可不是随意发生的，如果一个人简直像印第安人一样不参与此事的话。要是我早点问你就好了！

又：我爸爸没有买阳台作“交际”场所。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1908年10月25日—布拉格〕

57.致奥斯卡·鲍姆

尊敬的鲍姆先生：

您的书出版（我还没有读它，我渴望去读）和您昨天的邀请使我很愉快，我非常感谢。当然我会来的。如果我带来一本书而又想宣读不很少的话，请不要认为我忘恩负义。

如果我们不是星期一，而是星期三来，正如马克斯给您写信所说的那样，但愿这对您不是不合适的。

我吻您可爱的夫人的手。

您的 弗·卡夫卡

1908.11.6〔布拉格〕

5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据报纸报导，似乎你万事顺遂，因此我当然祝贺你，我和大家。我说过，虽然我不知道幸福在哪里，但是，有人将使你有可能取得类似的想法，对此我一定高兴。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1908年11月21日—布拉格〕

5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我今天去你那里的话（今天去不成，我正要明天去），我早就请求你安排了（正如我现在所做的那样，因为这样出人意料不会有什么意义），怎样安排都可以，但不是恶意地安排我不必明天晚上去。因为我今天清晨洗脸前认识到，两年来我绝望了，只有多多少少地限制这种绝望才能决定目前情绪的性质。我现在在咖啡馆里，读了几篇好文章，身体已康复，因此不像以前在家里那样有信心地写作。但是这并不相反地证明，两年来我在早起时没有对往事的回忆，这种回忆对我这个有力量安慰人的人会有足够力量的安慰。

弗兰茨

我绝不会到任何地方去。

〔明信片邮戳：1908.12.10—布拉格〕

6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还必须在明天之前为狄德罗的书^[30]感谢你。我真需要这样的愉快。一个人着手去进行愉快的事时，就总会有愉快。但是，一个人走得越远，他周围的愉快就结束得越快。

我最近读了关于卡斯纳和其他一些书，抄录了下列句子：

从来没有我们见过、听到过或者哪怕只是感觉到的事物，虽然还没有人尝试过，但这些事物未得到证实。尽管人们未看见这些事物进行的方向，但是仍然跟在这些东西后面立即跑来了。未等触及这些事物，未曾陷进这些事物之中，人们就抓住了它们。人们拿着衣服，家庭纪念品和带着种种社会关系陷入其中，就好像落入只是道路上一块暗处的阴沟里。

这确实是一个问候你的机会，祝你工作一帆风顺。

你的 弗兰茨

1908.12.15〔布拉格〕

61.致埃尔莎·陶西格

请您不要害怕，我只是想及时地提醒您（像我以前所做的那样，我尽可能晚地提醒您，以免您忘记），您今晚要同您妹妹一起去“东方”电影院。

我再写信也是多余的，甚至还缩小了上封信的意义。但是我仍然感到做这多余之事比做这差不多必要之事更容易。我承认，我总让这件差不多必要之事使人痛苦。我可以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当然的。

因为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已经做完了这完全必要的事（这件事当然必须总是立即做完的，否则我们怎能有精力去看电影——请您别忘记今天晚上去电影院——去做体操和洗淋浴，去独居，去吃好苹果、去睡觉，如果已睡足了的话，就去一醉方休，去回忆某些往事，如果天黑了的话，在冬天去洗个热水澡，还去干什么，只有天知道）。我以为，那时候我们将高兴，正因为那么高兴，刚把多余的事做完，所以恰好把这差不多必要之事搁下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在傍晚以后我在您的住所知道了，给您写信对我来说差不多是必要的。我最终地耽误了此事，因为在最近一次电影放映以后——您必须分清这一点——那封信仍然差不多必要，但是这种顺带的必要性已成过去，不过当然是朝着另一个比多余之事所处的那个方向简直更无价值的方向。

您最近对我说，要我给您写信，好给您看看我的笔迹，这时您立即给我做必要之事的各种前提条件，从而把做多余之事的条件交到我手里。

然而您说那封差不多必要的信不坏。您必定怀疑，这件必要之事总会发生，多余之事大部分会发生，这件差不多必要之事至少在我这里只是少见的，因此，若去掉任何关联，可以说，这差不多必要之事可能变得不那么有趣。

很遗憾，我写了那封信，因为很遗憾，您嘲笑那封信，不过我——您一定要相信我——根本不想说什么反对您嘲笑的话，也根本不想——例如说——反对《彬彬有礼的卫兵》或者《好喝酒的宪兵》。今天将使您发笑。

〔1908年12月28日—布拉格〕

6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不，我谢谢你，这不行，最好不去。

（顺便说一句。我4点钟才收到你的明信片，我已打算去你那里。我睡了一觉，现在6点一刻起床，如果想睡的话，还会睡过头一会儿的）。

你们那里有许多客人，谁对你说的，他们想见我，哪怕只是忍受一下也要我去，结果，4天来我一醒来，就以今天能睡一觉来自慰。如果我去的话，我们虽然首先会喝茶，但是准保不会去读《圣徒安东尼乌斯》^[31]，更不可能去读《幸福的人》^[32]。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比《幸福的人》更重要的读物了，因此我特别真诚地祝愿你新年幸福。请你不再熬夜和开夜车。再见，亲爱的马克斯，代我向你全家恭贺新年，在又要我去旁听时，写信给我。

你的 弗兰茨

1908.12.31〔布拉格〕

6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不想让人在明天，星期三晚上从我这里将你接走。你也一定会辞别普里布拉姆。这样做你就好了。星期六夜间我失去知觉，现在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你不知道此事，当然这也得怪我好久没有参加交往。但是不仅这一点，如果我参加了，那会有帮助的。当时我也在“伦敦”酒吧，在约什和马尔契^[33]。但是星期天我又复原了。我去看《海军中将》^[34]。我认为，如果要写剧本的话，人们只能在小歌剧院学习。即使将来在台上对这剧本不感兴趣，剧本无出路，乐队指挥在下边可以开

始做点什么。在海湾后面各种型号的大炮交叉发射，男高音歌手的双臂和双腿就是武器和旗帜，四角响起了女合唱队员的大笑声，演员扮演水手穿的服装也漂亮极了。

顺便说说，如果你愿意明天来并写封信告诉我的话，我也将给你看看我的新大衣，如果做好了而我们又一起赏月的话。

〔1908年于布拉格〕

1909年

64.致海德维希·W.

尊敬的小姐：

信都在这里，我也将今天的明信片附上，您的信我再没有片言只字了。

因此我可以对您说，如果您允许我同您谈话，您会使我愉快的。认为这是谎言，这是您的权利，但是这个谎言有几分太大了，因此您不可以相信它，于是未表示任何友好。此外，正是认为这是谎言的这一看法必定鼓励您同我谈话，但我不想说，允许同我谈话可能会使我愉快，否则，这可能促使您拒绝谈话。

此外，没有任何考虑能逼迫您（我高兴，请您别忘记这一点）。您可能担心讨厌或无聊，也许您明天就要乘车离开，也可能您根本不读这封信。

我已邀请您明天中午到我们这里来。我不是您接受邀请的障碍，我总是两点一刻到家，如果我听到您要来，我将呆到3点半离开。此外，如果先来了，人们不会感到奇怪的。

弗·卡夫卡

1909.1.7〔布拉格〕

6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昨天在B君处，由于你的过错和美丽的夜，我起得晚了，我十分疲倦，头脑迟钝，昏昏欲睡。天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挺不住了。我将睡一觉，将近6点钟去。晚上我想去普菲布拉姆处学习，不仅因为我需要我有点感兴趣的东西，我现在必须真正帮助P君办点急事，也由于一件邮件[35]，我总想见到他。也许这对他不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总会有点帮助的。在我看来，你最近变得神经质了，尽管我不能理解你。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09.1.13—布拉格〕

6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向你讲过《波希米亚》的事，你记得吗？我现在觉得很有些信心。如果拒绝，那会令我遗憾的，不管是由于拒绝，还是由于事情本身。因此，我想尽一切力量，保证成功，我不能赞成，说这个“想尽一切力量”只意味着“请帮助我”。我大约四五点来，我以为，明天星期五下午我去你那里。全部过程顶多一刻钟，现在这就算给你很多时间了。我知道，但请你原谅，因为我不能原谅自己。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09.1.21—布拉格〕

6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今天晚上我不能来了。你真不知道吗？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杂剧院消遣消遣，看看三个被骗的人的小聚会。有怀疑吗？我星期四去你那里时，我最初是想抛开痛苦，去邮局向你祝贺。因为在这件事上产生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须早下决心。邮局这个没有雄心的机关是唯一适合你的单位。一周后你就会得到很多钱，不再想找高职位了，那时就万

事顺遂了。请你别再怀疑。此外，我将还债，你又会得到钱的。

我星期一6点来。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09.3.13—布拉格〕

68.致海德维希·W.

亲爱的小姐：

您写那封信的时候，您大概处于心绪不好但非持久的状态。您独处时写信，也许您不是完全没有用意的。这些用意当然无始无终。如果一个人有时独坐，从外表看，独处是不好的，但是在内心里独处也能给人几分安慰。当然必须学习，但不应该这样度过时间，如果甚至还吓得发抖，那就太可怕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人们以后会相信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人自杀未遂，落得终身残废。一个人只一瞬间就完了，又必须立即开始，在这种学习中掌握这可悲世界的中心。对我来说，身体在冬天越来越糟。在冬天吃完饭就必须点灯，拉下窗帘，无条件地坐到桌旁，被不幸之事弄得头晕目眩。及至起立，必须大声喊叫，还高举手臂作为飞走的信号。我的上帝。一个脾气好的熟人接着来了，为了我，谈了一些关于冰场的情况。他叫一个人来，把门关了10次。春天和夏天的情况可不同了。门窗都敞开着，在学习的房间和打网球的庭院，阳光同样明媚，空气一样新鲜。他不再在自己房间里四壁之内像在地狱里一样到处转了，而是像生气勃勃的人在两壁之间工作。这是在该死的人身上还保留的巨大区别。人们一定能消除这种区别。如果我能做到，您一定能做到的。在目前情况下我只能尽力而为。您想从我这里知道点什么呢。克拉尔小姐的情况是一个童话，不管美不美，我都不知道。我母亲下周动手术，父亲的健康越来越走下坡路，我祖父今天严重晕倒，不省人事了，我也不健康。

您的 弗兰茨·卡

〔1909年4月中—布拉格〕

6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是的，我昨天晚上没能来。在我们家里简直是爆发了一场战斗，父亲病更重了，祖父晕倒在商店里。

今晚6点暮色降临之际，我在窗边读了《石头，不是人》^[36]。它以讨好的方式把我引出了人的生活圈，它不是罪孽，不是跳跃，而是不加掩饰地从生活中摘取的片断，尽管摘取的面并不广，但其中的每一个步子都迈得合情合理。读者相信，只要紧紧拥抱这首诗，就能怀着拥抱的喜悦比真实还更真实地从不幸中脱身而出，而且自己丝毫不使劲。

昨天我们讨论了汉姆生的一篇小说^[37]，我当时讲了故事梗概，讲到那个人如何在旅馆门前搭错了车，但这不是主要内容。关键内容是，在某个饭店的一张桌旁，他坐在他所爱的一个姑娘身边。在这家饭店的另一张桌旁坐着个年轻人，他也爱着这位姑娘。通过某种手段他把年轻人招呼到了他的桌边。年轻人在姑娘身边坐下，而这个男人则站了起来，当然是隔了一会儿。他好像是扶着椅子背，把话说得尽可能真诚，“伙计们——我很遗憾——您，伊丽莎白小姐，今天又把我完全迷上了，但我已经发现，我还是得不到您。——这对我来说是个谜——”在这最后一个句子中，这篇故事在读者面前自我毁灭了，或至少是变得晦暗不明了，不对，是缩小了，离远了，以致，如果读者不愿失去它的话，就不得不跟着它闯入显而易见的陷阱之中。——如果你身体不适，马上来信告诉我。

你的 弗兰茨

〔1909年4月中旬—布拉格〕

7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在走下坡路。就我现在所能知道的，手术顺利地过去了。我谢谢你。但是你知道，我是暂时如此。我陪W君从阿尔莫伊犹太寺院走到大桥，这位收税员对我说，我又开始发病了，病不特别大，有小小的抵抗力就够了。但是我不能获得抵抗力。我还认为能海阔天空地大谈自己是一种愉快。

再见。

你的 弗兰茨

是的，星期四见，然后我一定要去看望母亲。

〔明信片邮戳：1909.4.21—布拉格〕

7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由于你近来各方面都很好，你将会轻易地原谅我没有遵守两项本身完全无价值的诺言。我太累了，我累得宁愿立即下定决心，对任何事情都不思考是否可行。星期天情况也如此。如果情况要想根本改善，上面[38]的情况不会迅速改善。昨天夜餐后，我本想在长沙发上躺着睡一刻钟，10点就被父亲闹醒好几次，关灯直到一点半钟，然后转到床上去睡。如果昨晚等候你打扰你了，我感到很遗憾。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09.5.8—布拉格〕

72.致马克斯·勃罗德 [39]

亲爱的马克斯：

我今晚收到了你的明信片。这可是不可理解呀！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此事？是卡兰德拉关心小实习生的工作，还是曾一度被帮过忙的高层人士现在自愿地去干呢？这件事当然出人意料，但是不必害怕。你那有点放荡的生活要停止，上午你要比以前放勤快点，大多数下午你搞写作，这终究是你和我们的大事。总的来说，这只关系到即将来临的夏天几个月，我以为在夏季干不了什么工作。因此你每天下午和傍晚都无人打扰，虽然你有更多的时间，但是你不可以再要求。你现在也显然得到了法定的假期。法令的效力依然存在，因此，这一位小姐暂时会有点令人憎恶的。天哪！

你的 弗兰茨

7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快点，因为我是这么困。我竟感到困！我不知道，在这之前的一瞬间我做了什么，至于在这之后的一瞬间我将做什么和现在我正在做什么，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用了一刻钟时间来解决一支区施工队的问题^[40]，然后突然头脑清醒了，立刻把一个我找了很久的、我所需要的和尚未用过的文件夹清除到一边去。而椅子上像这样待处理的文件堆了一大堆，我即使把眼睛瞪得再圆，也不能一瞥即把这一大堆东西都收入眼底。

可是你的多布里柯维奇^[41]就不同了。这简直完全是新鲜的。只是第一段至少就当前的情况而言也有点不真实。“一切吐着芬芳”云云，在此你走入了一个尚不存在的故事的深处。“一个伟大的地方的沉寂”云云，我觉得这个故事中的两个朋友并没有说过这话；即使把他们撕成碎片，他们也没说过这种话。再如“这个夜晚的别墅”。

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写得很好，写得真实，朝里看犹如看着夜的诞生。我最喜欢的是：“他还想找一块小石头，可是找不到。我们快步走去”云云。

据我看，我交给你的那部长篇小说^[42]是对我的诅咒。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假如里面缺几页（我知道确是如此），那么就一切正常了，要比我撕掉几页作用更大。放理智些。这个姑娘说明不了什么。只要她的胳膊还搭在你的腰间、背后或颈后，那么在这炎热的天气中，她也许会心血来潮地喜欢一切，或者不喜欢一切。但是同我非常熟悉的这部小说的中心部分相比，这些又算得上什么呢？这中心部分具有强大的力量，我在非常沮丧的时辰会感到它依然留存在我体内什么地方。但现在不再谈这个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发现我真想永远写下去，无非为了不办公。可是我不能这样。

弗兰茨

[1909年7月初于布拉格]

74.致奥斯卡·鲍姆^[43]

亲爱的鲍姆先生：

不，不，我完全不是无所事事。您如果这样猜测，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人们闲着的时候，便无法很好地想象工作是怎么回事，而且在乡间的炎热中，劳动和闲散有着懒洋洋地合为一体的趋势。但我之非常忙碌却无妨，因为我只能说，我喜欢在乡间生活，在那里人好像置身于天堂，这一点我有时在星期天试过，这一点您和您可爱的夫人现在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

至于结束语^[44]不想结束，本来是件大好事。您应该听任这个结束语在太阳底下自由伸展，您应以一张晒得黑黑的脸来向读者告别。我说这话有一部分是出于自私，因为诸如“您不会就此写个长篇小说”这么个结尾使我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如果在这么一个故事收尾时有一些人聚在一起，开怀大笑，那将是美的，很美。但不能这样，对于这么一个平静地堆积起来的故事，这不是正确的笑话，这会猛地一下把故事的一小部分推回到一片不健康的黑暗中去。这个读者^[45]对您干了些什么！他是个好人，至少现在还算好人。

您的明信片中最使我愉快的是您提到了“懊悔”，因为懊悔只能意味着对别的工作的兴致，您实际上是懂得这一点的。但您还是休息一小段时间为好，这是您应得的权利。我也不要求您写封长信来，因为一切都比写信好，比如躺在草地上吃草就比写信好；但收到信又是件十分美好的事情，更别说在城市里了。

祝您和您可爱的夫人愉快！

您的 弗兰茨·卡夫卡

〔1909.7.8—布拉格〕

7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不是因为事情本身必须刻不容缓地说一下，而是因为对你的问询总

要回答。对回答的答复来说，昨天的途径已经变得太短了（不是“昨天”，是夜间2点一刻）。你说她爱我。为什么这样？是开玩笑，还是精神不振的人一本正经？她爱我，她未想到问：我同谁到过施特肖维茨，我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在任何一天郊游，等等。在酒吧里也许没有足够的时间，但在郊游时有时间，您想干什么，任何回答对于她都是够好的。但是在表面上可以反驳一切，在下一个地方那里却根本不能试图反驳。我在D处害怕见到韦尔奇，我对她说了此事，然后她也立即害怕起来，我怕遇到韦尔奇。由此产生一幅简单的几何图画。她支持我，这是最大的友好，我和她的关系不可能发展，除非同爱情一点不沾边。因为她完全是另一类人。当然我根本用不着卷入这种多角形，她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现在我给自己完全争到了睡眠的时间。

你的 弗兰茨

〔邮戳日期：1909.7.15—布拉格〕

7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为了立即纠正，我胃里都胀气了。要是胃是一个人的话，都会想哭的，对吗？胃胀的原因不是无可指责的，如果是无可指责的话，就像第一次了。胃里总有点理想化的胀气。如果所有其他的痛苦集中在同一处地方，我不会抱怨胃不胀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09.7.19—布拉格〕

77.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正在想着中午收到的你的来信，并深感惊讶，我这次怎么会一反常态，没有帮你走到她的身边；我正研究着，该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你，

如果我是你的母亲，想得出安慰的方法就好了（中午一份草莓加放糖过多的酸乳脂，下午被撵到介于慕尼柯维奇和施特兰席茨间的森林中去睡觉，晚上一升普索尔啤酒）；正当此时，你的明信片来了，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最好的一条是：那位歌星小姐有14天之久没碰那部长篇小说，因为即使是最好的长篇小说也无法忍受同一个姑娘从里边和从外边不停地压着它。至于另一位姑娘可以松口气了，也是好消息，因为她由于那一位而备受痛苦折磨，自己却意识不到，这种折磨于她既不是论功行赏，也不是论罪受罚。

从你的信中我不得不接受这消息：星期四我得到鲍姆[46]家去，从你的明信片中我欣慰地看到不是非去不可的可能性，因为我在星期四仍将像星期一那样没有这种能力。他的长篇小说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如果我能从我的事务中脱身，对我来说没有比星期四到他那儿去更好的了，可是假如我又不能去，还望他和他的夫人别生气。因为我得干什么样的事！除了我的其他工作外，在我的4支区施工队中，人们像喝醉了似的从脚手架上往下掉，跌进机器中，所有的房梁翻了个个儿，所有的斜坡松散开来，所有的梯子滑掉了，人们递上去的东西，会掉下来，人们一旦扔下去什么东西，自己便也往那上面坠落。为了瓷器厂的年轻姑娘们，我脑袋都疼了，她们不断地捧着堆成塔的瓷器摔倒在楼梯上[47]。星期一我处理了也许是最糟糕的事情。差点忘了，星期三，即明天，如果有空，你在将近8点时到商店里来找我，同我讨论诺瓦克[48]。

假如你同意，我们从大吃大喝中省下钱来做个流动奖杯，至少保留到你的长篇小说完成之后。现在让我再钻到文件中去吧。

你的 弗兰茨

〔1909年夏于布拉格〕

7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昨晚无事。要是有人一晚上编像我昨天这样的故事就好了，那样我就会考虑我是否应该带你去里瓦。请你别费心思了。当然不是您，也不是别人，而是运气，如果可以把它叫做运气的话！

你的 弗兰茨

〔1909年8月—布拉格〕

7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今晚我不能来了。直到今天中午我还以为，我的家人下午3点来，我然后费点劲，但是一定来。现在我的家人7点才来，他们刚来我就离开，引起轩然大波会不可想象。如果你明晚在家并有时间，我就明晚去。这很好。如果你不行，我没有理由生气。——是的，去旅行。我们要星期二才能动身，你一定会对此满意的，我可能将与一个星期一才能来的人告别。

你的 弗兰茨

〔1909年8月底于布拉格〕

8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来访》^[49]我先是在星期六去办公室途中读了一遍，这样怀着好奇心、匆匆忙忙地读完后，我觉得许多地方烧得太热了一些，局部甚至烤糊了。但当我昨天晚上一遍又一遍地重读时，我看到在这许多地方的这种喧嚣声中，核心事物保持着平静和正确，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享受。尤其是那关于宴会的故事，关于去布耶怎么走和再往下又怎么走的问题。那告别，对于一个哪怕只不过了解得稍欠全面的读者来说，这种激情也会像是来得过于突然，一下蒙住他的眼睛，使他一无所见。这有什么关系呢？

再见！

弗兰茨

我星期三来，值得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去参加凯斯特兰案^[50]的庭审。

8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请你不要对我生气，我无别法。F·博士[51]已经几乎开始指责我，尽管还不能多加指责我，顶多因为星期天我没能去，星期一我当然由于别的原因在办公室，但是还是说我把他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撂下不管。今天我已开始去办了。但是只要我觉得没有因此热起来，我就完不成。我应该因此热起来，不可参加《圣安东的诱惑》的朗读会，因此明天不可以去你那里。是的，再过几个下午之后的星期六，像今天一样，我可能下午有空去看你，但是你会没有时间。此外，新的谈话会即将来临。劳赫贝格[52]将举行保险工作研讨会。鲍姆已向我宣读了这本长篇小说精彩的一小段。

〔明信片邮戳：1909年10月13日—布拉格〕

82.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鲍姆先生：

这封信我是12点在大陆[53]写的，这是今天星期六第一个安静场所。这是多好的一本书啊，虽在人们预料之中，可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在他那一本正经的外貌中也显现出写这本书的意图。因此，您可以完全原谅出版商。这本书是违背他的天性，也许是违背他的意愿的。现在世人只应伸开双臂，抱住可爱的孩子们。要人们相信这一点，就只能这么做。

〔1909年底于布拉格〕

8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好在已接近年底，我们明天晚上来布拉格。我已另有想法。我感到

全部时间都不合适。从早晨喝牛奶到晚上漱口，都忙着将被保险的企业排队的事。好吧，你在书桌上有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你在工作。

你的 弗兰茨

〔风光明信片邮戳：1909.12.21—皮尔森〕

84.致艾斯纳经理^[54]

亲爱的艾斯纳先生：

感谢您寄来的邮件，我的专业培训反正好不了。瓦尔瑟^[55]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他，我只知道《巩腾的雅各布》，这是本好书。其他书我没有读过，这一部分是您的过错，因为您没有听我的建议去买《塔纳家的兄弟姐妹们》。西蒙，我相信是那《兄弟姐妹》一书中的一个人。他不是东奔西跑，快活到了极点，但最终一事无成，不过是读者的娱乐对象而已。这是一种很糟的经历，但只有坏的经历给世界以光亮，这亮光正是一个虽不完美，但堪称好的作家所想要创造的，可惜他必须付出任何代价。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人也都是到处奔波的，我可以向您说出几个人来，我自己完全可以包括在内。但他们得不到命运的任何奖赏，而只有相当好的小说中所产生的那种光照效应才给他们以奖赏。可以说，比起一般人这是些缓慢地从上一代中脱胎出来的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有规律的跳跃跟上时代的有规律的跳跃。但若有谁在一次行进中掉了队，他将永远也追不上队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掉队的步子也会产生一种表象，以至人们想要打赌，这不是人的步子，但打赌的人会输的。您不妨想想跑道上奔马的目光，如果留神它的眼睛，会发现一匹跨越障碍的马的目光所显露的无疑是出色的、现实的、真实的竞赛本质。看台上的一致，活的观众的一致，特定季节中周围环境的一致，等等，还有乐队演奏的最后一曲华尔兹和人们今日多么喜欢演奏这一乐曲。但如果我的马掉头往回走，不想跳越，绕过障碍，跑出场子，到场地中间撒欢，甚至把我甩下来，那么也许证明大家的观察是非常成功的。观众席上不断出现缺口，有的飞起来，有的落下去，无数只手来回游动，仿佛一阵阵风在吹拂，一阵阵雨落在我身上，很可能使得有些观众感到在下雨，从而赞同我像只虫一样躺在草地上。这总能证明点什么吧？^[56]

〔约写于1909年于布拉格〕

8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又过去几天了！但是我不想动笔，只要费点劲，这几天我本来真能写些东西的。今天6点半我乘车去加布隆茨。从加布隆茨到约翰尼斯贝格，然后去格伦岑多夫。现在我去马费斯多夫，然后去赖兴贝格，再去雷希利茨，傍晚去鲁帕斯多夫后返回。

〔风光明信片：1909年—马费斯多夫〕

8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你立即来一下“阿尔科”^[57]，那会怎么样呢？时间不长，上帝保佑，你知道只有我高兴。邮车运送局在那里。仁慈的夫人，勃罗德先生，劳驾，就让马克斯去吧。

弗兰茨·卡

〔约是1909年于布拉格〕

1910年

8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在每写十行就要受十次惊的办公室里，什么也干不成。）我当时说过：谁对你的长篇小说^[58]予以肯定——它伟大的躯体这般朝气蓬勃地向上生长，必将使许多人眼花缭乱，同时又使他们垂头丧气——谁肯定你的长篇小说——肯定在此意味着以人们所能有的一切爱来领会它——谁肯定你的长篇小说，必然在整个这段时间中产生一种不断增长的愿望，希望看到一种解决方法，就像你在朗读过的半章中打算采取的那种。但他必然会觉得这种解决方法正好标志着小说最危险的发展方向

——不是对小说危险，而只是对他与小说之间精神上的联系危险——而正如他确然感觉到的，这种解决方法将在快要跌出界限之处发生，长篇小说在那里还刚刚来得及得到它不得不要求做到的，但读者也能得到这东西，小说还不愿意强迫自己去放弃这样的机会。只能设想这些可能实行的解决方法是你有权利做的事，因而你竭尽全力向小说的内核突破，但这些解决方法仍然在远处威胁着小说。以后如果把这部长篇小说与一座哥特式教堂相比，那将是一个不坏的比较，当然只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是个不坏的比较：在那些辩证的章节中每一段都在其他各段中得到证实，它们全都托起那一段：前一段所负载的，也是后一段所要求的。最亲爱的马克斯，你是多么愉快，你到〔小说〕结束时才会真正幸福，届时我们大家全都因你而幸福。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910.1.5于布拉格〕

8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为了我不忘记此事——令姊星期一要来布拉格，若她晚来，你必须今天再写信给我，如果你星期一对我说，当然时间还来得及。星期一我要空腹，就我的感情说，要将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排出来。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0.1.29—布拉格〕

8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将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未写信——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0.2.18—布拉格〕

90.致马克斯·勃罗德

马克斯：

我不去唱歌。现在4点钟，我在办公室里写作，明天下午我还写，今晚、明晚等等。我也不能去骑马。恰好《米勒法》^[59]这本书仍在我处。再见！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0.3.12于布拉格〕

9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不要因给我寄快件而花费大量的钱。你写信告诉我说，你不能在6点5分坐上弗兰茨—约瑟夫的火车，可你必须这样做！我们将在6点5分乘火车去乌兰，7点15分动身去达夫勒，我们10点在那里的勒德雷尔餐馆吃辣椒，12点在施特肖维茨吃午饭，2点至3点半我们穿过树林到急流处，到处转转。7点我们乘轮船去布拉格。你不要再犹豫了，5点45分上火车吧。

顺便问一下：你能写张快件明信片告诉我，你想去多布里肖维茨还是想去别的地方？〔附用沾水笔画的图〕这是苏内肯的笔，它不属于历史。

〔邮戳：1910.3.12于布拉格〕

9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从你的明信片中看不出你是否收到了我的明信片，我也给鲍姆写了信，结果，我整天不能控制自己。最近我不写信了，因为《米勒法》正好还在我这里。即使这种体操我也不能做。我的背部关节疼痛，往下直疼到骶骨、小腿，也许由于不能入地，而往上疼到手臂。此外，预期今天提高工资的，结果未成，下个月也不会提高，而是要等到人人厌倦，对提高工资吐口唾沫以后。亲爱的马克斯，这篇中篇小说^[60]使我最高兴，因此我从家里拿出来了。明天将近7点钟（现在是6点，我还在办公室），我去你那里（也因为《波希米亚》的事）。你一定给我看那些诗。那将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再见！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0.3.18于布拉格〕

9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本该知道，现实主义者^[61]只有在他们完蛋之后才会停止的，赫尔本博士在10点15分以后才完蛋。那时我去了施托克豪斯街，认准鲍姆家的窗户有灯光以后，便回家去了。我当时还要上楼去吗？我多么需要睡眠。你也许不知道，一天半以前我除了喝一口茶以外，已经禁食了。关于斯莫洛娃^[62]，《卡斯日报》^[63]报道说：“她那柔和纯正的声音听起来当然令人愉快。”这是该报在明显地和愉快地察觉到早已预想到的晚会的缺点之后所作的评论。

〔明信片：大概是1910.3.—布拉格〕

9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这不叫写得快，那么意见当然接近一致。就请把这份稿子寄给马特拉斯，《德意志劳动》月刊当然会使马尔施纳^[64]高兴的，不过我担心，这也特别难发表。至少你必须写信给马特拉斯，要他尽快答复，不管成不成。他当然可以随意修改，如果他高兴，也可以重新写，不过他的义务是将这本书发表一点（你要对他讲）。谢谢。

你的 弗兰茨

〔1910年4月于布拉格〕

9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中午才收到你的明信片。星期六我才能去拜访。我的上帝，过誉了！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0.5.11—布拉格〕

96.致马克斯·勃罗德

趴在一捆禾把上躺一会儿并把脸藏在里面，尽管如此，这并不坏！

弗兰茨

〔风光明信片邮戳：1910.8.22—扎茨〕

9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首先要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你的床真有点神经质。其次，请你明天再一个人去见那位法国女人，因为我的加布隆茨事情^[65]越来越严重（这项通知已见报，登载到竞选呼吁书《流氓和无赖》的报上以及救世军^[66]的通告上）。总之，这将会怎么样呢？在这张纸条上我说不清楚。与其说必须成功，不如说我很恐惧不安。

〔1910年9月于布拉格〕

98.致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顺利到达了。只因我被大家看作一种不大可能的现象，我很苍白。我把医生骂了个痛快。结果，一阵小小的头晕迫使我倒在他的长沙发上。躺在那里时，真奇怪，我还很像一个女孩子那样，力图用手指整理自己的裙子。此外，医生对我向后看感到大吃一惊。5个新的脓肿倒是不那么严重，比这更糟的是有皮疹，它需要长时间治疗，而且使人现在和将来感到真正的痛苦。我的想法（当然我未向医生透露）是，我的这些皮疹是国际性的橡皮膏（布拉格的，纽伦堡的，特别是巴黎的橡皮膏）造成的。下午我坐在家里，像待在坟墓里一样（我不能到处走动，因为缠着绷带，疼痛使我不能静坐，治疗时更疼）。只有上午我必须忍着疼痛，到办公室去。明天我去见你们的父母。在布拉格的第一夜我尽做梦，通宵达旦（乱梦频频，编织得好像巴黎新建筑周围的脚手架），梦见我睡在一幢大房子里。大房子里只有出租马车，大客车，公共汽车

等等，它们拥挤地并排驶过，上上下下都有汽车行驶，口说心想的只是运费表、通讯录、转车、小费、皮雷尔管理处、伪钞等等。由于做梦，我不能睡觉，也不能按部就班地搞清必要的问题，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忍受住做梦的痛苦。我心里嘀咕。他们把我这个在旅行后那么迫切需要休息的人安排在这样一幢房子里住宿，而同时我心目中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扬言要防备法国医生（他们穿着扣上纽扣的工作服），承认这一夜有必要。——这些医生会说：请吧，不管我是否偷了你们的钱，你们把你们的钱数一遍，根据我的当然不完全无疑的账单我花钱很少，看上去我好像一天到晚在巴黎借洗伤口度日似的。

呸，又痛起来了。对你们和对我来说，都是该我回来的时候了。

你们的 弗兰茨

〔邮戳：1910.10.20于布拉格〕

99.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不同的是，在巴黎有人被骗了，这里有人骗我，我简直笑不出声来。星期六我刚下火车，就去小剧场，有人大量购买剧票，今天我去看《阿纳托尔》。但是，只有这里素菜馆的饭菜好。餐馆有点阴暗，我吃羽衣甘蓝拼荷包蛋（最贵的菜），虽不在高楼大厦，但在这里已心满意足。我只听见我的肚子说，目前当然还不坏，但是明天会怎样呢？这里是没有什么油水，甚至连小费也被禁止。没有小面包，只有大面包。正好给我端来了麦糝团子浇覆盆子汁。但我还想要浇乳脂的生菜。此外，醋栗酒好喝，草莓叶茶将放到最后喝。

再见！

〔风光明信片邮戳：1910.12.4于柏林〕

10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这是一间陈设很好的写字间，可不是吗？地上只摆着5件家具和它们的影子。写字台上灯光很强，至少不利于健康。旁边的桌子上摆着酒瓶，取用方便，从写字台俯身过去就能取到。脚平放在桌下的垫子上，不是踩到地上。如果要画画，那么放桌子的地方可以摆画架。

你的 弗兰茨

〔风光明信片（法兰克福工作室的歌德自画像）邮戳：1910.12.9于柏林〕

101.致奥斯卡·鲍姆

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并向小勒奥^[67]赠送这个对手。放在房里，他不必害怕它，这我知道的，他倒应该通过这个对手变得更自信。

你们的 弗兰茨·卡

〔风光明信片邮戳：1910.12.9于柏林〕

102.致马克斯·勃罗德

马克斯：

我看了哈姆雷特的演出，或者正确地说，听了巴塞尔曼的演出。整整一刻钟我看到，唉，另一个人的面孔，我不时地从舞台向一个包厢看去，以便使心情平静下来。

你的 弗兰茨

〔风光明信片邮戳：1910.12.9于柏林〕

10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为了不必再谈论这个星期，我首先再重复一下你已经知道的事，这么点一下你就能意识到一切。——这个星期一切对于我是这么顺当，就我的情况而言这是空前的，从一切迹象看，以后几乎不可能重现这样的

好光景。到柏林去了一段时间，现在已到这里，如此轻松地站在我的日常环境中，以致假如我的天性允许，我会像一头野兽般无拘无束地表现一番的。对办公室我是从昨天晚上才开始害怕的，一下子那么怕，恨不得躲到桌子底下去。但连我自己也不真的这么认为，因为这不是自发的畏惧。——同我的父母（他们现在既健康又满足）我几乎从未争吵过。只有当父亲在晚间很晚的时候看到我还俯在写字台上时，他才会发火，因为他认为太用功了。——我比几个月前要健康得多，至少在本周初是如此。蔬菜和水果是这么好、这么平静地被我吸收了，仿佛有一个专为本周准备的幸福的机遇在喂我。——我家中几乎完全平静。婚礼^[68]已经过去，正在消化新的亲戚关系。平常不时会听到这儿一位小姐的弹钢琴声，她现在看来是出门几周了。——而所有这些好处处于秋末的现在赋予了我，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自己浑身是劲，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

12月17日：

前天的死尸讲演没有结束。从它的角度看，我发现除了种种不幸外，现在又加上了一种：我显然没有能力把一种悲伤的、完全有根据的感情保持几天。不，我没有这种能力。我已单独在此坐了8天，我的感觉来去匆匆，感到我在飞翔。我干脆把自己灌醉，在这种时候，哪怕酒气熏天也不是奇迹。两天来情况有所变化，变得更糟了。父亲身体不适，待在家里。左边刚结束早餐的喧哗，右边就开始了中午的嘈杂，到处都有门被推开，就像有人在纷纷破墙而入一样。一切不幸的核心依然存在。我无法写作；我没有写下一行我自己认可的文字；相反，我把巴黎之行以后所写的一切（不多）全部划掉了。我的整个身子都在警告我注意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在让我写下之前，都要先向四面八方张望一番。句子在我面前裂成碎片，我看到了它们的内部，但却必须马上停笔。

附上的中篇小说的一段，是我前天誊清的，今随信寄上。它已经是够老的了，肯定不是无可挑剔的，但它很好地满足了这个故事的初步意图。

今天晚上我还是不来，我要保持孤独到星期一早晨前的最后一刻。让孤独亦步亦趋地伴随着我，是一种使我浑身发热的愉快，是一种健康的愉快，因为它在我心中引起那种通常的不安，而这种不安是唯一有可能造就平衡的因素。倘能继续如此，我将可以直视每个人的眼睛，比如说在你面前，我在柏林之行以前，甚至，在巴黎都不能对你直视。这你

已经发现了。我是这么喜欢你，但却不能直视你的眼睛。——我将带几篇我的小说来，而你也许有你的烦恼。我明天能在办公室收到你的一封谈你的事的明信片吗？你的妹妹我也尚未问候过，这事我将在星期一去做。

你的 弗兰茨

〔1910年12月15日和17日于布拉格〕

10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不想打扰你，也不想让你久等。我来，由于5点钟不能来，争取明天5点来，你没有任何责任。今天5点15分我被委任为博士。是的，你不了解我的一切痛苦（脚的大拇指脱臼）。

弗

〔大概是1910年—布拉格〕

10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来信收到。我的腿受伤，已经伸开四肢躺在长沙发上。看上去情况不妙，特别是脚肿得好高，但是不很痛。已缠好绷带，有好转。我不知道，我的腿星期六是否能好。如果能去旅行，那么星期六我的伤就好了，你可以相信我，因为我〔信至此处中断〕

〔劳工事故保险公司的信头，推测是1910年—布拉格〕

1911年

10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星期一我将去弗里德兰。今天情况表明，我明天必须去看牙医。因此不到6点我去那里。克莱斯特在我身上吹气就像吹一个老猪尿泡一样。为了事情不变糟，因为我已有预感，我现在就去。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1.1.27于布拉格〕

107.致马克斯·勃罗德

宫殿被爬满的常春藤堵住了，柱廊里常春藤爬了一半高。只有吊桥像那些小摆设，桥的铁链和电线不用担心，因为那正是小摆设，尽管以前在所有这些小摆设上付出了血汗。你不必相信下面的那个红屋顶。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弗里德兰宫殿）邮戳：1911.2.1〕

108.致马克斯·勃罗德

当你听到有人在做一件平静的、通常在全世界都有可能的工作，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度过时光之时，你也能像我一样对那个地方作出最好的想象吗？我表示，一方面不离开这个地方，但另一方面，也不会把任何一点典型的東西撕扯开，因此整体将原封不动地保留。我到过皇帝的观景台，看了布雷齐亚、曼图亚和克雷莫纳。大教堂的光滑地板那才叫人有口皆碑哩！

弗兰茨·卡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1.2.2—弗里德兰〕

109.致奥斯卡·鲍姆

今天我在诺伊施塔特，站在一棵雪松旁边。在大街上，裤子未翻卷起来，整个裤腿插进雪里。将裤腿卷起来时，地上的雪深没及膝。在这里我可是碰到了好运气。谨致

1911.2.25于弗里德兰

11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有几件新奇的事：许多人听到在居民院子里有乌鸦歌唱；宫廷马车的乘客，你们要下车，由于弹力大，必须牢牢抓住车身。今天我在回来途中，看见一只鸭子站在河边水里。我是和一个女人乘车的，她看上去很像《白女奴》中的女奴贩子等等。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1.2.25格罗陶〕

111.致索菲·勃罗德^[69]

亲爱的索菲小姐：

我向您推荐A.K.格林的长篇小说《复仇的日子》以充实您新设的家庭藏书室。今天火车上一个坐在我对面的人在读这本书。它的书名难道不是充满了意义吗？“日子”是一根旗杆，第一个“der”^[70]是下面的底座，第二个“der”是系在上面的绳子，“复仇”^②即使不是黑色的，也是一面深色的旗帜，其中“e”之向“u”的曲折是由一阵不疾不徐的风（尤其是词尾的“ng”削弱了它）引起的。——在我看来这情景与我正相符合，即使在为您效劳的旅途中，我也是那么疲倦。假如我下次拜访时您获得了复仇的日子^[71]，我当然会感到非常自豪的。

弗兰茨·K

〔1911年2月26日于莱辛贝格〕

11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你明天来的话，劳驾，请给我带来《许佩里昂》^[72]。

我想把它借给埃斯纳。他的《评论》好几期又堆放在我这里。如果我在最后归还时能附上一些也许使他感兴趣的东西，我的良心会舒服些。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1.3.2—布拉格〕

11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谢谢你。我知道这个东西值多少钱。这向来如此。他的错误像他的好处一样深深地铭记在我心里。但是有关系到世人的更重要的事情：年纪不对头。急件处在10点前收到我的明信片，下午不可能不投邮。你作为邮政官员也有责任。

你的 弗兰茨·卡

114.致马克斯·勃罗德

在这里的奥伊宾山上坐着200多个令人讨厌的客人，相对地说，我写这张风景明信片还像一个南国的人。但是只有明信片，还没有写文章。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1.4.23于茨陶〕

11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今天你过生日，但我连一本普通的书都没有送给你。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真是没有可能送书给你。只因我有急事要办，今天我只有一刻时间，只能让你收到这张明信片，于是我写了。之所以开头就诉苦，是为了让你立即了解我的苦衷。

1911.5.27〔布拉格〕

11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你要求我在这里写那个故事，那么显而易见你对疗养院的生活是一无所知；而我答应要写，则是一定要把我所熟悉的疗养院的生活以某种方法忘掉。因为这里的一天充塞着种种安排，比如洗澡、按摩、体操等，再就是这些活动之前的准备阶段的寂静和之后的恢复阶段的寂静。吃饭占的时间倒不多，因为由苹果酱、土豆泥、蔬菜汁、水果汁等组成的伙食能够非常迅速地、完全可以不为人察觉地、甚至可以充满享受地流到肚子里去，只不过被粗面包、蛋饼、布丁，尤其是核桃稍稍耽搁一下。而晚上，特别是因为现在阴雨连绵，大伙处得非常融洽，可以听留声机消遣，女士们和先生们分席而坐，就像在苏黎世大教堂中那样。在放喧闹的歌曲时（比如社会主义者进行曲），喇叭就更直接地对着先生们，在出现柔和的或听得特别清晰的曲子时，先生们便向女士们那边走去，待一曲终了再回到原处，个别情况下有的人就一直留在了那里。也可以是（如果你要检查一下这个句子在语法上是否正确，就必须把这一页翻过去），一个柏林的小号手吹得我心旷神怡，或者某个来自山区的、站立不稳的先生朗诵一出方言剧，不是罗塞格尔的，而是阿赫莱特纳^[73]的作品，而最感人的莫过于一个给人亲切感的人忘我地朗诵他自己撰写的幽默的诗体小说了，而我则一如既往地热泪盈眶。你会说，这些活动我不一定都参加。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首先必须为这种休养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带来的好处表示某种谢意（你想想，我在巴黎那个晚上刚吃了那个东西，而今天才第三天，后果已经消除）；其次，这里的客人已是如此少，想要故意地避开人至少是办不到的。再就是照明条件相当差，我根本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单独写作，即使写这封信也使我两眼发花。

当然，当我在内心感觉到写作的冲动时，那些障碍自然就根本不存在了。这种冲动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要隔相当长的一段间歇才会发生一次，比如在施特雷萨那个时刻，那时我感觉自己俨然是一个拳头，指甲掐入了肉里——无法以别的语言表达。我只需不拘礼节，吃完饭马上起

身离开，像一个奇特的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楼梯走进我的房间，把椅子放在桌子上，借着装在屋顶上的昏暗的电灯泡的光线写作。

假如我现在想一想，照你的看法——我不想说照你的榜样——只要表面上产生一点写作的愿望，就该去写。那么不管你是否知道疗养院内是怎么回事，你对我的要求归根到底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无论我怎么为自己开脱，一切确实仍然该归咎于我；或者说，剩下的归不到我头上的只有见解上的小差别和能力上的大差别。现在只是星期天晚上，我还有一天半时间，尽管这个阅览室（现在终于只剩我一人了）的钟走得出奇地快。

除健康外，我在这里的生活无疑在一点上是于我有益的：这里的观众主要由中产阶级的中年瑞士妇女构成，这些人所显示的人种学观念最温和、最微弱。发现了这一点，就值得紧紧抓住她们不放。还有我对她们的德语的无知，我相信，在她们观察我时也帮了我一把，因为这么一来她们就更紧密地同我在一起了。这样比透过火车车窗收入眼帘的东西多，尽管那里的物体实际上是同样的。用简明的语言来说，在评论瑞士时，我宁可依据麦耶尔，而不依据凯勒或瓦尔瑟[74]。

为了你的战争专栏，我在巴黎把一本书的书名连同简介都抄了下来[75]：“阿图尔·布什：《明日战争中胜利的法国》。这位老作者、军事指挥官展示了这一前景，一旦法国遭受袭击，它将进行必胜无疑的自卫。”这段话我是在圣德尼大街一家书店前作为德国文字间谍抄下来的。但愿它对你有用。如果你的集邮者与你的关系不如我的集邮者与我之亲密，就请为我保存这个信封。

你的 弗兰茨

〔1911年9月17日于瑞士厄伦巴赫疗养院〕

117.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鲍姆先生：

马克斯一定已经向您叙述过我们的旅行见闻了，它是那么多姿多彩，以至我没有时间去想家了。但现在我的休养结束了，我的病魔有一个已开始瓦解，它使目睹此状的其他几个病魔感到惊讶，现在全世界都

认为我又该到办公室去了，所以我在昨天那冷雨淅淅的晚上，敞着窗，盖着薄薄的被子，却感到暖和。

1911.9.19于厄伦巴赫

11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们可正赶上了正在上演戈尔登法登的剧本《苏拉米特》^[76]！我乐意浪费一张票，以便告诉你，你已经读过的东西。我仅希望你也给我写了信。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1.10.12—布拉格〕

11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明天又不能来。天知道我晚上能否来。如果我6点未去找你，我就直接去报告会。如果我未去报告会，我就去鲁道夫纽姆接你。很遗憾，你不在家，不然，尽管我的波希米亚语教师正在等待我，我也可以很乐意地读几首诗的。《孩子们，永远是一个球》仍在我耳际回响。工作吧，亲爱的马克斯，工作吧！

你的 弗

〔大概是1911年于布拉格〕

1912年

12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叔父的钱找不到了，我曾暗自伤心，现在我在家里从我上衣胸前里面的口袋里找到了。你先前说，他通过邮政储蓄所汇走了，这给我一个印象：手里的这个信封不再有效。请代我再次感谢你父母，我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他们把晚会[77]搞成了。我能去你那里参加什么晚会呢？我好久没见你的影子了。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2.2.19—布拉格〕

12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昨天刚回到家里。我想起在《不幸的人》里有一些小的但是令人讨厌的打印错误，现在我已在样书里改过来，你那里已有一份。由于这些错误使我烦恼，请你将那本书立即寄还给我。你将得到改正了错误的书。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大概是1912年初于布拉格〕

12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反复考虑了这件事[78]，来自你那方面的抱怨似乎对我很不利。别抱怨了！那时，容忍这桩事的可能性就会继续存在，我会这么做的，你不会。被指控比指控人好。由于你对他深恶痛绝，你可能把他叫作骗子。如果他不让步，你在波希米亚报上发表声明之后就有权这么做。我认为，最好，你向各报寄去一项声明作为广告刊登，例如：“我获悉，有人到处指给人看一封匿名信，信里指责他在我举办音乐会期间的无耻行径，并说我写了或唆使人写了这封信。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向法院提出这件诉讼案。比起另一次散布流言蜚语来，这件事对我来说似乎太微不足道。因此我只限于公开声明：那封信既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唆使的，也不是在我知情的情况下写的。”至少我不能认为这整个事情是

坏事。只有你昨天的脸色吓了我一跳。

弗兰茨

〔1912年3月底于布拉格〕

12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的书[79]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快乐！当我昨晚在家中翻阅时已经感受到了。你叙述的那次火车旅行在书里明晰地显示了出来。你担心场面太寂静，但生活正是这样的，可以说，无论日夜都是如此。一切事物一个挨一个地向上挪到阿诺尔德那儿，又同他一起重新回来，一切都很自然，没有丝毫强加的音乐。该书无疑是一次总结，同时是与《杀死死人》[80]的衔接，自上而下的衔接。吻你。

你的 弗兰茨

〔1912年5月7日—布拉格〕

124.致父母亲

亲爱的父母亲和妹妹们：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魏玛，住在一家宁静、漂亮的饭店里，可望见一座庭院，生活、观赏均令人满意。要是我得到你们的消息就好了！

你们的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歌德灵寝室）。

邮戳：1912.6.30—魏玛〕

125.致马克斯·勃罗德

德国这些诗人生活过得多好啊！胡同里房子有16扇窗户。如果整座房子都有孩子，凭我的文学史感觉，这十之八九是格莱姆故居。

〔风景明信片（哈尔伯施塔特的格莱姆故居）。

邮戳：1912.7.7—哈尔伯施塔特〕

12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在办公室里向你第一次问早安，你不要太在乎。多么愉快我也说不上，尽管这个城市古老得不可思议。我坐在鱼市上空的一个阳台上，跷着二郎腿，以便尽量消除腿的疲劳。

问候大家！

你的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2.7.7—哈尔伯施塔特〕

12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这里寄上的是我的日记。你将看到，由于它仅仅是指定限于我自己看的，有些地方我说了点谎话。毫无办法。无论如何，说这些谎话决不是故意的，倒不如说它们是发自我内心最深处的自然，我本应该怀着敬意俯视的。我很喜欢这里，这种独立性真叫棒，而可怜的身躯获得了一种对美国的预感。当一个人走在田野小径上，草鞋踩在一个过路的老农民的翻口靴子旁，这人是不会产生特别自豪的感觉的，但如果单独在林中或躺在草地上，那就美了。只是一时尚未由此获得写作的欲望；如果它正在向我走来，那它至少还没有到达哈尔茨山这儿，也许它刚到魏玛。我刚给她写了三张风景明信片。

顺祝健康并向大家问好！

你的 弗兰茨

〔1912年7月9日〕

〔笺头：哈尔茨山容波恩疗养院，施塔卜尔堡邮局〕

最亲爱的马克斯：

由于你的来信在我双手中燃烧着快乐的火焰，我立即给你回信。你的诗将成为我的陋室的饰物，假如我在夜间醒来——这是常有的事，因为我对草中、树间、空气里的杂声尚未适应——我将就着烛光阅读。也许我将来能把它背下来，那时如果我正昏头昏脑地坐着啃我的坚果，就能用它把我解脱出来，即使仅仅在感觉上如此。它是纯洁的（只有“沉甸甸葡萄串”给两行之间带来了一种肯定多余的因素，还有待于你把手伸进去掏出来），但除此之外，在此之前，你已定下把它作为专为我写的，对不对？也许你是送给我的，不让印出来的，因为，你知道吗？融为一体是我最梦寐以求的，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

那个出色的、聪明的、能干的罗沃尔特[81]！离开吧，马克斯，离开容克尔吧，带上你的一切或可能多的东西。它使你留步，但我不相信它使你留恋，你是走在一条大道上，但注定是要抛头露面的。那些克莱斯特轶闻的文体选择恰如其分，通过这种平淡的文体，可以更好地倾听《感情的高度》的嘈杂声。

关于年鉴和《毕利希》你只字未提。罗沃尔特平白地接受了《概念》吗？他想要出我的书，对我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从这里能给他写信吗？我真不知道该给他写什么。

如果办公室使你感到一些苦恼，算不得什么，它的功能本来是这样的，不能要求它别的任何东西了。可以要求的是，近期内罗沃尔特或别的什么人前来，把你从办公室里拽走。但他只能让你依然留在布拉格，而你也应该有留在那里的愿望！这里的景色已经美起来了，但我却在伤感，我够没用的了。这不见得是永恒的，我知道，但它还远远不能使我振奋起来写东西。这部长篇小说[82]是这么宏大，仿佛是按天空的大小设计似的（亦像今天一样无色彩飘浮不定），我在写第一个句子时就乱了阵脚。至于我还不会被以往写的东西完全吓倒，这我已经说过，这点体会昨天给了我很多好处。

我的住房却给我带来了许多享受。这儿的地面总是覆盖着青草，这是我作弄的。昨天在进入睡乡之前我甚至认为听到了女人的声音。如果

不熟悉赤脚踏在青草上的声音，那么躺在床上时若有人跑过去，听起来就像一头水牛疾速跑过。割草我总是学不好。

再见，问候大家！

你的 弗兰茨

1912.7.10—容波恩

12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究竟谁要求你给我写信呀！我高兴给你写信，密切你我之间的联系（当然我也想到韦尔茨和鲍姆，我不会单独给他们写信）。我必须多次重申，好找到特别的办法。难道此外还要阻止你吗？在我来到布拉格以前，你将会向我宣读你那简短的日记中有关声明的地方，我会完全满意的。就经常给我寄一张小明信片吧，以免我那么信任地歌唱我的信。

你认为基施纳小姐愚蠢。但是她给我写了两张明信片，至少来自德语地区的天空之下。我逐字抄录如下：

尊敬的卡夫卡博士先生！

承您寄来亲切的明信片和友好纪念品，请允许我表示非常感谢。在舞会上我玩了个痛快，早晨4点半才同父母回家。星期天在梯福福特也玩得很好。您问我得到您的信是否愉快，我只能回答：听到您的消息，我和我父母非常愉快。我多么高兴地坐在庭院的小亭旁想念您。您身体怎样？但愿很好。我和我父母衷心祝您身体健康，并致友好的问候。

玛加蕾特·基施纳

只有签名是模仿的。怎么样？我首先想到，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文学。如果说，我不是不使她感到愉快，那么我这个人在她眼里就像一个铁一样无所谓了。但是她为什么如我所愿地写信呢？把姑娘同信联系起来，那会是真的吗？你的明信片未提到年鉴。关于韦尔茨，我请你简告他的消息。为我抚摩他！谨向陶西格小姐和鲍姆的家人致以问候！

你的 弗兰茨

不少于7页日记。

13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相信我从你的信中发现，你并不特别愉快。你缺少什么呢？你在建造诺亚方舟，不断有所进展，以至它在我的想象中是那么美。我请求你把概要寄给我；此外，你在罗沃尔特那里的位置已经十分稳固。至于利索厄尔骂你，显然动不了你一根毫毛。你也许妒忌我吧？

我的主要痛苦是我吃得太多。我像塞香肠那样填肚子，在草地上打滚，在阳光下肚子鼓起来。我怀着把自己养胖的傻主意，并由此开始全面改善我的形象，就好像后者或前者都有可能似的。疗养院的好作用显示了出来：尽管吃得很杂，但并未搞坏我的胃，它只不过变得迟钝了而已。我的涂鸦比在布拉格进展得慢，恐怕与这不无关系。相反，或者更确切地说，昨天和今天还悟到了一些关于我的写作价值低下的认识，我担心这些认识是不会消失的。但没关系。要我停止写作是办不到的，这是一种乐趣啊，它透彻全身，及至骨髓，永不泯灭。

那本年鉴在你手头吗？我不想称它为《阿卡迪亚》，至今只有酒馆这么叫。但这个名字一旦确立很可能会是充满魅力的。

你星期天晚上为什么独自坐在卢浮宫内？你为什么不去舍雷森的鲍姆那儿？那里对你可能更合适些。

我会给韦尔奇写信的，但你还是在他那儿为我说一句好话。这也许就是他姐姐最近得的那种病。

再见，亲爱的马克斯，不要悲伤。确实可以这么说，我所过的生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适用于避开悲伤，绕道而行，但我一千倍地宁可直蹈悲伤，正如我几乎每天晚上在写作室内所做的那样，在写作室我多半单独地、只字不写地空坐一个半小时。这是容波恩^[83]的一种思想，对我来说，它比它的基本思想更重要：在写作室内不准讲话。当然还有一道命令或一种迷信：9点必须关窗。然后可以在那里继续待下去，到将近10点时为止。但9点时分会走来一位姑娘——有时我觉得我从8点开始就在等待这个女人了——她把窗子都关上。姑娘的胳膊短，我必须助她一

臂之力。当大夫在演讲厅内作报告时（每周三次），这里特别安静。面临这两种享受时，我选择寂静，尽管我也很想去听报告。上次他解释道：腹部呼吸有助于性器官的生长和激发，这就是为什么主要靠腹部呼吸的歌剧女演员们那么不正经的原因所在。但正是这些人也有可能被迫直接以胸部呼吸。你就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吧！也请问候大家。

你的 弗兰茨

〔1912年7月17日于容波恩〕

131.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在经受了长期折磨后我停笔了。我没有能力，今后一段时间内几乎也不会有能力把这些剩下的小文章^[84]修改完善。由于我现在做不到（但在将来情况好转时无疑是能做到的），你就真的想建议我明知故犯地把一些拙劣的东西拿出来付印？而你竟把理由摆得那么充足，老天爷。这种东西印出后会引起我自己反感的，就像《许佩里翁》上的对话^[85]那样。至今已用打字机打好的那些篇或许不够凑成一本书，但即使是不付印和更糟的事，也还远远没有这种该死的自作自受这么恶劣吧？这些小文章中有些地方我得请成千上万的顾问来解决；但我如果不拿出来，那么除了你我之外不需要其他人，而我也就满意了。接受我的想法吧！这种不自然的创作和思索已经骚扰了我一段时间，给我带来了不必要的烦恼。只有当一个人躺在临死的床上时，才可能一任拙劣的东西永远拙劣下去。告诉我，你认为我说得对，或至少告诉我，你不会因此而生我的气；这样就可免去我良心上的负担，使我对你这方面也放下心来，从而使我能开始写点别的。

你的 弗兰茨

〔1912年7月于哈尔茨山的容波恩〕

132.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们又在玩不幸的孩童游戏了吗？一个人手指另一个人，念出他的旧诗句。你目前对自己的看法基于一种哲学情绪，我对我的坏看法则不是一般的坏看法。这种看法毋宁说包含着唯一的优点，自从我在我的生活进程中对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后，我从来，从来不用去怀疑它，它给我心中带来秩序，并使我这个遇到看不到底的东西时会马上垮掉的人保持足够的镇静。我们俩挨得够近的了，足以看到对方的观念的根据。我在一些地方获得了成功，我对这感到的愉快你也许认为是过分的——但如果不是这样，难道我会握笔在手吗？我从来不是一个为了某件事不惜任何代价的人。但关键就在这里。我所写的东西是在一个温水浴池中写出来的，那些真正的作家永远身历其境的地狱我不曾经历过。只有个别例外，这些例外之强大也许没有止境，但由于它们的独特性，由于它们仅以弱小的力量嬉戏着，所以我把它们排除在上述论断之外。

我在这里也写东西，当然很少，既有哀怨也有欢乐；虔诚的女人们就是这样向上帝祈祷的，在《圣经》的故事中上帝却是另一种偶像。至于我现在还远远不到把正在写的东西拿给你看的时候，马克斯，你必须理解，即使仅仅出于对我的友情而盲目地理解也行。我写的这一小段一小段东西与其说是连着的不如说是挨着的，今后长时期内还将这样发展下去，直到进入梦寐以求的那个境地；之后，在到达了我视为目标的那个时刻时，将不是一切变得轻快易写，更大的可能性是，到那个时刻前一直拿不定主意的我，在那时会干脆失去头脑。因此只有在第一稿完成之后才能加以谈论。

你没有让人把方舟^[86]用打字机打下来吗？你能否送给我一份副本呢？对它的成功难道不需要说几句话吗？

韦尔奇还躺在床上吗？都是这件事使他病的！我不给他写信，不给他写信。请对T小姐和韦尔奇，如果方便，也请对鲍姆夫妇说，我爱他们大家。但爱与写信毫无关系。告诉他们，这种方式（指间接问候）比三封真正的信更好，更容易被亲切地接受。你想做的就能做到。

在写我们共同的故事^[87]方面，除了个别段落外，只有星期天坐在你旁边这点使我愉快（当然突如其来的绝望未计算在内），而这种愉快一下子就能吸引住我把这继续写下去。但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即使只是关于尤利西斯的。

我不具备一点儿组织才能，所以我想不出该给这本年鉴起个什么名

字。但别忘了，在构思题目上，即便是寻常的，甚至蹩脚的题目，通过现实的不可捉摸的影响，也会产生出好作用的。

别说任何反对合群的话！我就是为了寻找人群而来到这里的，并为我至少没有在这一点上自欺欺人而感到满意。我在布拉格却是如何生活的！这样向往人群的要求我是有的，但它变成了恐惧；如果这种要求得到满足，只有在度假期间才会给我以舒适感；我这个人肯定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此外，你没有仔细看我开列的时间表，8点以前我写得不多，而8点以后什么都不写，尽管在这段时间我感到最解放。关于这个我本来还要报导，但我恰恰在今天这个日子里特别愚蠢地用玩球、打扑克和东坐西坐以及躺在花园中虚度了时光。郊游我根本不参加！看来，我根本看不到布罗肯峰的危险性非常大。假如你知道这短暂的时间是怎么消逝的，不知会作何感想！它如果像流水般清澈地逝去就好了，但它是像油一般逝去的。

我星期六下午离开这里（但很想在这之前再收到一张你的明信片），星期天在德累斯顿停留，晚上赴布拉格。我仅仅由于非常显而易见的懦弱而不取道魏玛。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附有母亲的亲笔问候和三张照片。在三张中她展示了三种姿势。这些照片比起以前的照片来不知要清晰多少倍，她多美！而我驶往德累斯顿，权当非如此不可，我将去参观动物园，我是属于那里的！

弗兰茨

〔1912年7月22日于容波恩〕

133.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实在不知道我明天星期日是否去你那里，顶多撒个谎，因为我害怕你。像你在你动身前的晚上写的一首诗，我受不了。我现在总是按时睡觉，直睡到8点1刻。我也真正给人一个任务：在今天7点叫醒我。他也在7点叫醒我了，我在8点1刻最终醒来时模模糊糊地记起此事。但是这次叫醒我没有比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令人恼怒的梦更打扰我了（例如我昨天拼命同保尔·恩斯特谈话，接连不断地谈，他很想菲列克斯的父亲。他每天从早晨起写两个故事）。两天以来，我也没有收到信。

你对我的两张明信片和一封信也没有回复。虽然二者不难加以说明，但是我仍然提出来，因为我正是对我的不准时好好地致歉。

〔由卡夫卡的妹妹奥特拉口授记录。〕

约为1912年下半年〕

13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早安！昨天我受小姐的影响，整理那些稿子。因此轻易发生了某种蠢事，也许只能私下谈论的可笑的次序。请你再检查一下，万分感谢。我欠你的情太多了。

稿件里也有许多小错误。现在我刚读第一遍清样就见到不少。还有标点！不过也许校对清样还有时间。只是在这篇儿童故事里应当将“你们必须成什么样子？”这句话删掉，在这句话之前的“真正”二字后面应加上问号。

〔1912年8月14日〕

135.致恩斯特·罗沃尔特^[88]

尊敬的罗沃尔特先生：

兹寄上一组短小品，望审阅，它们庶几能集成一本小册子^[89]。当我为此目的把它们收集在一起时，有时我既希望让我的责任感得到宽慰，又怀着希望在你们美丽的书籍中有一本我的书的贪欲，在两者间左右为难。当然我并非总是作出完全纯洁的抉择的。现在我却只求这些东西能使您满意，能够付印。不管怎么说，即使极其熟悉，极其理解，也不会一眼就看到这些东西的劣处。作家最普遍的个性表现于每个人都以完全独特的方式掩盖自己的劣处。

手稿随后另作邮包寄奉。

您忠实的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136.致罗沃尔特出版社

尊敬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本月4日的友好来信。由于我大约能想象一下发表这种第一篇小论文在业务上的可能性，因此我乐于同意您向我本人提出的条件。尽可能限制您的风险的这种条件一定对我也是最好的条件。在您的出版社里我看到许多书，我对这些书太敬佩了，我不会因此书提出建议进行干预。我只请求印最大的字体，在那些您出书的种种打算中，大字体是可能的。如有可能用暗色的纸，大约用出版《克莱斯特轶事集》那种纸，装订深色纸板，那么这对我是很合适的，当然又只能在不干扰您以前的计划的前提下才可行。

我愉快地期待着您今后的消息。

您忠实的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笺头：劳工事故保险公司，1912年9月7日于布拉格〕

137.致埃尔莎·陶西格

亲爱的小姐：

非常感谢。这正是南方。在读这本日记时，我的血液开始沸腾，虽然按其性质还很微弱。

请您只写一句话给我：我何时何地能够见到您，我也乐意去。我只是不想出乎您的意料，出乎意料的拜访不会愉快。如果我们将一起去老舅处，那会怎么样呢？由于马克斯离开我们大家了，我们确实需要在一起。

您忠实的 弗兰茨·卡

1912.9.18于布拉格

138.致费利克斯·韦尔奇和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幸福的人：

在办公室上班时间里给你们写信，使我愉快但很烦躁不安。如果我不打字机就能写信的话，我不会在这里写信的。但是这种愉快太大了。如果心情通常不完全够，手指尖总是在的。我必须假定这使你很感兴趣，因为我这样急于给你写信。

马克斯，谢谢你的日记本。你的小姐那么可爱，立即把它送给我，同时寄来你的第一张明信片。我也同样谢谢你，坦率地说，我同样请求有一个约会，为此我曾建议——用你的话说——在“你舅父的房子里”，以便我们三个孤单的人聚集在一起。

你不可以停止记日记！如果你们记日记并寄给我，那会更好些。如果我们在妒忌中滚动，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我已从几页日记中领略到一些南国生活，你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大概根本不会想起坐在双座马车里的意大利人。他们曾给我深刻的印象。

马克斯，昨晚我在你父母处。你父亲当然在一个协会里。我深感力量太弱，不能取出放在你兄弟处的你的信件。根据消息〔用打字机打的信件到此中断〕

在这引人入胜之处我的信被打断了。全国锯木厂厂主联合会的一位代表来了。同样是为了给你们印象的缘故，这个中断处将永远保留着。

祝你们生活愉快！

问候聚斯兰德先生。

你的 弗兰茨

我妹妹瓦莉星期六订了婚。你们使她愉快，不写信，写张明信片祝贺她吧。你们从哪儿得知这个消息的？

〔笺头：劳工事故保险公司〕1912年9月20日于布拉格

139.致罗沃尔特出版社

尊敬的先生们：

我冒昧地给您随信寄回这份签了名的合同表，至为感谢。我之所以犹豫了几天，因为我想同时给您寄去《突然的散步》这篇稿子的更好文本。第一段目前的结尾有一处不合我的心意。可惜我还没有完全改好，过几天肯定给您寄去。

还有一个请求，合同里没有提到出版日期。我也并非轻视此事。当然我很乐于知道，您打算何时出版这本书。劳驾您有便写信告我。

你们真诚忠实的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笺头：劳工事故保险公司〕1912年9月25日于布拉格

140.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你究竟呆在何处？我想睡在沙发上等待你，但是我既没有入睡，你也没有来。现在我必须回家，我想明天上午一定见到你。我在办公室待到12点钟。我不想说，要你到那里来找我或接我，但我总是希望能早点见到你，也许你能安排你的计划。但是至少我要到12点以后才能去找你。如果你能在家，那时我将带你在阳光下散步。鲍小姐叫我问候你，我乐于将我的嘴借给她。

弗兰茨

〔1912年秋于布拉格〕

14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在这里寄给你第二章，但是我不去。这是自从星期六以来我度过的唯一好时辰。我不能去，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也许我晚上去拜访

你。

你的 弗兰茨

〔1912年秋于布拉格〕

142.致罗沃尔特出版社

尊敬的先生们：

随信寄上《突然的散步》一稿的修改语句，劳驾您，请插入上次寄去的手稿里。

同时我请求您及早告诉我不久前曾打听过的出版日期。您打算何时出版《观察》一书，盼尽快答复。

您真诚忠实的 弗·卡夫卡博士

〔笺头：劳工事故保险公司，1912年10月6日于布拉格〕

143.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在我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凌晨好好地写了一通之后——我可以写个通宵，然后接着白天接着夜晚再接着白天，直至飘飘飞去——而今天本也可好好地写一通——甚至写完了一页，其实只是昨天那十页呼吸动作的完成——我却由于下述原因不得不停下来：我的妹夫，那个工厂主今天早晨出差去了，而陶醉在幸福中的我几乎对此毫无察觉，这次出差将持续十天至两周。在这段时间中工厂实际上交给了技师一个人，而没有任何雇主会对现在工厂里正在进展的完全是骗人的经济形势表示怀疑，更别说像我父亲这种神经质的人了。而且我也这样认为，虽然不是出于金钱上的担忧，而是出于耳目闭塞的良心上的不安。在我的想象中也不可能有任何人，会对我父亲的忧惧之合理性表示怀疑，尽管我也不能忘了。我丝毫没有看出，为什么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技师在我妹夫不在时就不会引导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他在技术上和组织能力上比我妹夫不知高明多少，简直是天差地别，再说我们是人而不是小偷。

而且除了技师外还有我妹夫的弟弟在那里，虽说他除了生意经外一窍不通，可真正谈起生意经来他也是个半吊子，但他毕竟是能干、勤奋、专注的，我觉得可以称他为跳跃动物。当然他必须长时间待在办公室里，还要经营代理处业务，为此要用半天时间在城里奔波，这样留给工厂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我最近曾向你声称，外界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扰我的写作（这当然不是自夸，而是自慰），那时我只想到，母亲几乎每天晚上向我唠叨，我总该抽个时间到厂里去看看，以宽慰父亲，而父亲则以目光或婉转的措辞说得更严肃。这些请求和谴责虽说就其绝大部分而言不能归咎于荒唐，因为对妹夫进行监督会给他的心情和工厂带来好处；但是我——这里包含着那种唠叨的无法克服的荒唐性——即使在我的处境最好时也不可能去干那种监督别人的事。

但对于未来的两周说来，却不是这么回事，这两周中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任何两只眼睛——是我的也好，别人的也好——在工厂里转悠。至于这个要求恰恰对我提出，没有什么可反驳的理由，因为在大家看来，我在这家工厂的建立上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份责任我有一半是在梦中承担下来的——再说也没有其他人能到工厂里去，因为父母的生意现在正处于旺季（在这新的店铺里，生意似乎也好些了），因此对他们本来就不能抱什么希望，比如母亲今天就没有回来吃午饭。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了这老一套的抱怨，除了暗示我对造成父亲的痛苦和得病的责任外，也把妹夫离开和工厂完全无人看管的新理由端了出来，而以往总是站在我一边的妹妹也怀着最近由我传给她的感觉，同时怀着巨大的不理解，当着母亲的面离我而去，而苦涩——我不知道是否仅仅是苦汁——在我全身流动，这时我看得一清二楚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可能性：像平时上床之后从窗口跳出去，或者在未来的14天中每天到工厂和妹夫的办公室去。第一种选择使我有可能会抛开所有责任，包括对这受到干扰的写作和对被抛下的工厂的责任；第二种选择肯定将打断我的写作——一场延续14个夜晚的睡眠是没法一挥手就从眼前抹去的——只给我留下憧憬：如果我有足够的意志和希望，在14天后或许能接着今天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并没有跳下去，而把这封信当成绝命书来写的诱惑力也不很强（我对它的灵感朝别处逸去了）。我在窗前站了很久，脸贴在玻璃上，好多次觉得这个念头挺合适：通过我的坠落把桥上的养路费征收员吓一

跳。然而我始终这样感觉到：凭着往路面上撞得粉身碎骨的决心，并不能使我钻入关键性的深处。我还感到，继续活着固然将面临写作的中断——即使仅仅一点，只不过就中断而言——但不会像死亡那么彻底。而且在小说[90]的开头部分和它的后续部分之间，两周内我将恰恰在那个工厂里，恰恰在得到满足的父母面前，活动在我的小说的内核之中，并生活在其中。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也许并不是为了征求裁决而把这一切向你展示的，因为你不可能对此作出裁决，但由于我坚决地下了决心，不写永别信就跳下去——最终人总会疲乏的——我当初是这么想的，但现在又应该作为居民退入我的房间了，因此要给你写一封长长的再见信，这便是它了。现在再给你个吻，祝你晚安，期待着明天成为工厂头目，一如对我的要求。

你的 弗兰茨

〔1912.10.星期二12点半〕

然而即便在现在，早晨，我也不能隐瞒，我恨他们所有的人，我想，在这14天中我将几乎不可能向他们道一声问候。但是这种恨——矛头又冲着我来了——更多地将在窗外了结，而不是躺在床上。我现在远不如夜间那么拿得稳主意。

〔1912年10月8日于布拉格〕

14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昨天完全忘记了一件大事：我们的电话。你根本不能想象，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它，至少在14天前我上次在工厂的时候，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过电话（我经常在办公室里）。你知道，我也想尽可能地限制人们为一件不成功的事辩解。事实上我还根本没有认识到失败的可能性，而我在我妹夫们的脸上开始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了。

你的 弗兰茨

〔1912年秋于布拉格〕

145.致罗沃尔特出版社

尊敬的先生：

劳驾您寄来清样，当然太好了。我不能匆促地赞同付印，应该作充分地介绍。我衷心地感谢您对这本小册子表示的关心。

但愿清样的页码不是最终的页码，因为《公路上的孩子们》应是第一篇。我未寄去目录，这正是我的过错。糟糕的是，我根本不能弥补这个过错了，因为除了开头一篇和最后一篇《不幸》以外，书稿中排的顺序我看不合适。

《突然的散步》修改稿想必收妥了吧？

弗·卡夫卡博士 谨上

〔1912年10月18日于布拉格〕

〔笺头：工人事故保险公司〕

14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在长时间之后我再一次单独见你和谈话，为什么这个人夹在我们之间呢？你说，是因为在我的通信里提到过他，他就对我感兴趣了。但是我觉得，他不适合于在我累得要死的时候把我从床上拖出去。因此，我在9点钟才去阿尔科，得悉你们早已离开了。我转身回家。你现
在不工作吗？我感到悲哀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你周围聚集了如此之多的阻力，你必须大挥手臂才能廓清你周围的地方。《赫尔德之页》
[\[91\]](#)刊登的你的诗很好。星期五我就去。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2年11月7日于布拉格〕

147.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信是在床上口述的，出于懒惰，并使这封在床上酝酿出来的信不动窝就落在纸上。）我只想告诉你，星期天我不去鲍姆家朗读了。目前整个小说（《美国》）还是飘摇不定。昨天我强行写完了第六章，强行导致粗糙和拙劣：两个本该在里面出现的人物被我压缩掉了。在我写作的全部时间里，他们跟在我后面跑着，由于他们本来是应该在小说里举起胳膊，握起拳头的，于是他们的动作就冲着我来了。他们自始至终比我写下的内容更有活力。今天我又罢笔了，不是因为我不想写，而是因为我又一次过于茫然地扫视着。仍然没收到柏林那儿来的片纸只字，可又有哪个傻瓜会有所期待呢？你在那里已经把话说到了头，可谓道尽你的仁慈、理解和感受，但即使在那里是一个天使取代你对着电话讲话，他也同样无法同我的恶毒的信分庭抗礼。瞧吧，星期天一家柏林花店的听差还将传递一封没有抬头和署名的信。为使我自己摆脱折磨，我把第三章约略重读了一遍，我发现，必须拥有与我所有的力量完全不同的一些力量，才能把这糟透了的事补救一二。但是即使是这些力量，只怕也还不足以促使我在当前的处境下把这一章朗读给你们听。可我自然又不能跳过这一章，看来你只能做两件好事来处理我收回许诺的举动了。第一件是，别生我的气；第二件是，自己朗读。

再见，我还要同我的书记员奥特拉^[92]去散步；她傍晚从商店里来^[93]，我现在像老爷一样躺在床上向她口述，而且还判处她保持沉默，因为她在记录过程中提出，她也想插几句话。这类信的美妙之处在于，在结尾时往前看它们会变得不真实。现在我比开始写这封信时轻松多了。

你的 弗兰茨

1912.11.13—〔布拉格〕

148.致韦利·哈斯^[94]

亲爱的哈斯先生：

我当然接受赫尔德联合会的邀请，我对朗诵甚至感到乐趣无穷。我将朗读《阿卡迪亚》上的故事^[95]大约还不到半个小时。观众是些什么人？还有谁朗诵？整个朗诵会将进行多久？穿日常便服行吗？（最后这

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但其他问题请您给我以答复。

致最衷心的问候！

F.卡夫卡博士

1912.11.25—〔布拉格〕

149.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了我昨天的信。现在无论如何，信中对大事的描述在今天已经是错误的，一切都变得不可想象的好了。

弗兰茨

〔1912年年底〕

150.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鲍姆先生：

星期一马克斯必须参加一位同事的告别会。我必须力图利用一件事情同我父亲和解。我还将向您叙说这件事情。好吧，我们下星期一将一举两得。

祝您

生活愉快！

弗·卡夫卡

〔风景明信片，大概写于1912年〕

1913年

151.致埃尔莎和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

我不需要守夜人。我自己就是防止昏昏欲睡、晚间漫游和受冷挨冻的一个守夜人。你们在那里经常晒太阳吗？请你们为我在夏天或秋天挑选一个地方，在那里吃素，一直健康，即使单身一人也不感到孤独，即使一个木头人也能理解意大利的文化等等，总之，挑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地方。我很想念你们。祝你们生活愉快。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3.2.4—布拉格。〕

来信寄蒙特卡洛〕

152.致埃尔莎和马克斯·勃罗德

几天前我才获悉，你们将呆18天才走。多长的时间！这简直没有尽头。你们至少记日记吧？如果你们至今没有记过日记，那么今天你们就朝海边走去，坐在海边，对迄今的旅行一起作一番描述，从早晨写到晚上。我对你们说，你们将必须经受得住同我们的斗争，如果你们现在未经受斗争的话。你们快来！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3.2.14—布拉格。〕

来信寄德圣拉斐尔〕

153.致格特鲁德·梯伯格

尊敬的小姐：

现在我不能去卡尔门，我今天下午值班。在这之前我打电话时忘记了此事，在电话机前我总是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再次感谢您的友好。此外，记起一次大概有缺点的演出，而抹掉了对一次好演出的记忆，这经济合算吗？衷心地问候您和您妹妹。

〔明信片邮戳：1913.2.20—布拉格〕

154.致出版家库尔特·沃尔夫^[96]

尊敬的出版家先生：

现将给《阿卡迪亚》杂志的校样通过邮局寄还。我感到幸运的是，您给我寄来了第二份校样，因为在第61页上印刷错误大得吓人：“未婚妻”错成了“胸部”。至为感谢。

弗·卡夫卡博士 谨上

1912.^[97]3.8〔布拉格〕

155.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请您不要相信韦尔弗！他对这个故事^[98]一无所知。等我叫人将稿子誊写清楚后，当然乐意寄给您。

弗·卡夫卡 谨上

〔衷心地问候保尔·策希；附上伊尔塞·拉克尔·许勒的一幅画，签名：阿毕盖尔·巴西勒乌斯三世〕

〔明信片邮戳：1913.3.25，夏洛滕堡〕

15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简单地说，我像我本来的样子，最好不要让人在任何地方见到我，在没有足够的说明时（我怎能为此作出足够的说明呢），这不会显得太愚蠢，那么这会是正确的答复。如果我不到哪里去的话，我通常至少守在办公室里。今天却相反，我知道，要是我只凭兴趣办事就好

了。现在没有许多障碍，没有比我向经理跪下求饶请他不要出于人道主义（我看不到别的理由，外界今天更幸运地看到别的理由），把我赶出去更好的了。可以想象一下，例如，我四肢伸开地躺在地上，活像一块被切割的烤肉，慢慢地用一只手将这块肉送到角落里喂狗。这样的想象现在是我头脑的日常食品。昨天我将这总的记忆写了寄往柏林。她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我十分清楚地掘开她以前幸福地、同整个世界协调一致地生活过的土地。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本想今天去的，只是我今天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我去努斯勒，将试一试在一个种菜人的一块坡地上参加下午劳动。那么我明天去，马克斯。

弗兰茨

1913.4.3〔布拉格〕

157.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暮色苍茫之际我才收到您的如此热情的来信。当然即便我竭尽全力，也不可能使稿子在星期天之前到达您的手中，尽管与其造成不愿为您效劳的印象，还不如把未曾完善的东西寄出可减轻些心理负担。虽然我看不出这些稿子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意义上意味着为您效劳。但不知所以然更促使我寄出。长篇小说的第一章^[99]我也一定马上付邮，这之前我已将它大部分誊清。星期一或星期二它就将抵达莱比锡。至于它能否独立发表，我不知道；在它上面虽然看不出后面那完全失败的500页的痕迹，但它毕竟没有充分地自成体系；它是残篇，并将永远是残篇，这一前景赋予了这一章以最大的独立性。我手头的另一篇故事《变形记》还压根儿没有动笔抄写，因为近来一切都阻止着我着手于文字和产生对文学的乐趣。但这篇故事我也将让人抄出，尽快寄上。以后这两篇加上阿卡迪亚^[100]上的《判决》可以合成一本很好的书，可冠以《儿子们》的书名。

为您的热情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您旅途愉快！

您忠实的 弗兰茨·卡夫卡

158.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最真诚地感谢您友好的来信。关于将《司炉》收入《末日审判》^[101]的条件我非常乐意地表示完全同意。我只有一个请求，实际上我在上一封信中已经提出过了。《司炉》、《变形记》（篇幅相当于《司炉》的一倍半）和《判决》无论外表还是内蕴都是相通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其实更应该说是秘密的联系。希望能将它们收在一本比方叫作《儿子们》的书中，以表达这种联系。我不会放弃这个希望。撇开在《末日审判》中发表《司炉》不谈，是否有可能在任何您认为合适又不太遥远的时候将它同另外两个故事一并收入一书中？是否有可能以某种措辞写下有关此事的许诺，写进现在关于《司炉》的合同中？这三个故事的统一性在我心中的分量与它们中间某一个的自身统一性是一样的。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拜上

1913.4.11〔布拉格〕

159.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我已经担心我要求太多了。劳驾您让步，不要真正地相信，我的请求是否有内在的理由。最衷心地感谢您。

弗·卡夫卡博士谨上

〔1913年4月20日于布拉格〕

160.致格特鲁德·梯伯格^[102]

兹向格特鲁德·梯伯格小姐致以衷心的问候并进一言：“闭着的嘴里飞不进苍蝇。”（梅里美的《卡门》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谚语在这本书里

尚未得到体现。所以它里面尽是苍蝇。最好永远合着它。

F.卡夫卡

〔约于1913年春〕

161.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今随信将《司炉》校样寄回，请您无论如何将第二次清样寄来。正如您看到的那样，虽然只需小改，但是错误很多，因此这次校正不可能全部解决。无论何时我收到第二次清样，我将立即校好寄回。寄回后，我连封里扉页都看不到了，对吗？我非常关心，至少在扉页上，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在《司炉》标题下有一个副标题《片断》。

弗·卡夫卡博士谨上

〔1913年4月24日于布拉格〕

162.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明天我必须乘车去奥西格，还必须做准备，想马上去睡觉。谈谈我在柏林干了些什么，无论如何将不会太晚的。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3.5.14—布拉格〕

163.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为您的邮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在经济效益上我当然不能对《末日审判》说三道四，我觉得它办得很漂亮。

当我刚看到我书中的那幅画[103]时，我吓了一跳，因为它首先否认了描绘最现代的纽约的我；第二，它比小说优势大，因为它作用于小说前面，而且图画又比散文更集中；第三，它太美了。如果这不是一幅旧画，满可以说它出自库宾[104]的手笔。但现在我已经早就容忍了它，甚至非常为您以此给我以突然袭击而庆幸，因为假如您事先问了我，我也许不能下此决心，从而痛失这幅美丽的画。我觉得我的书通过这幅画大大丰富了，而在画与书之间，强与弱的地位已经交换。顺便问一下，这画来自何处？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您忠实的 F.卡夫卡

1913.5.25〔布拉格〕

在此我预订一本未装订的《丑画的美》[105]、五本装订好的《司炉》，以后望寄三本《阿卡迪亚》来。

16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你不去日报社，那篇文章[106]就丢失了。至少这是我的印象。谢谢，谢谢。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3.5.31—布拉格〕

165.致莉塞·韦尔奇[107]

仁慈的小姐：

这可能只是一个错误。您对略维没有什么过错，账早已结了，完全对，我不能再收钱，必须将马克寄还。因此请您别生我的气。如果根据您的错误看法，您仍然认为对略维（在这件事情上我同他看法一致）负有义务，那么请您用下面的方式解决，我同时给您寄一本小书，请您笑纳。我早就高兴这么做，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尽管我担心现在也

不是适当的机会，也不是合适的书，现在我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尽管有此局限性，但这使我愉快。谨致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卡夫卡谨上

〔1913年6月5日于布拉格〕

16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昨天告别时的大笑一定最后给你一个印象，似乎我是一个可怕的人。但是同时，我以前和现在知道，正是对你不需要表示真正的态度。尽管如此，我必须说（尽管与其对你不如说对我而言），昨天我指出的，此外只有你、我和奥特拉以此形式所了解的（但是我对你们也本该忍住不说），当然只是巴比伦塔^[108]内部某一层的入口，上面和下面的是什，巴比伦人根本不知道。即使我想用这只在这方面训练有素的手把这么多东西带回家（我怎能轻易这么做），那也毕竟太过分了。情况一直是这样，可怕——也根本不可怕。笑意味着什么，何必5分钟后又寄来明信片。一定有坏人，有坏人作怪。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3？）8.29—布拉格〕

16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失眠得厉害，手不可以放在眼眉旁，否则热得吓人。文学和代表大会，统统滚蛋，如果这将是有趣的话。

向大家问好！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3.9.9—维也纳^[109]〕

168.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愉快少，义务多，更多的是厌倦，失眠，头痛。我就这么生活着。
我不得不望着雨落向旅馆的庭院，现在刚刚安静10分钟。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3.9.10—维也纳〕

16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没有能力上下连贯地写出应该是上下连贯的事情。维也纳的那些日子我恨不得把它们从我的生活中拔掉，而且是连根拔掉。那是一场无用的追逐，很难想象有比这次大会更无用的事情。在这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我像是一个参加全然不相干的活动的人一般坐在那里，当然有些事使我感到憋闷，使我注意力分散（现在正有个小伙子和一个英俊的尖头船导航人透过玻璃窗往里看），虽然没有像对面楼座上那位小姐那样向与会代表投掷纸团，可我也够绝望的了。对那个文学集团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只有两次同他们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人都使我赞叹，但除了当时正在维也纳的那个讲话果断坚决的施托辛格^[110]和再次显得亲切可爱的恩·魏斯外，从根本上说，我一个都不喜欢。对你谈论得很多，也许正当你在吉洪式地想象着这些人的时候，这里围绕着一张桌子偶然地坐到一起的人竟全是你的好朋友，他们中间不断有人怀着对你的某本书的欣赏，激动地讲起话来。我并不是说这有任何价值，我说的仅仅是当时的情况。这些我以后还能详细告诉你。假如谁提出异议，那是因为情况太明显了，因为这些迟钝的眼睛过于曲解你了。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在威尼斯。如果我不是这么举止不便和悲哀该多好，我没有能够使我在威尼斯面前自持的力量。它是多么美，在我们那儿人们多么严重地低估了它！我将在这里多待些时间，比原定的要长。我只身一人是舒服的。文学已很久没有向我表明任何好的兆头了，但当它把P.留在维也纳之际，它又想起了我。我历来的经验告诉我，我只能同你一起去旅行，或者只身一人，后者比前者糟得多，但事实如此。

向大家问好！

弗兰茨

〔1913.9.16—威尼斯〕

170.致奥斯卡·鲍姆

现在，至少只要出太阳，我就住在海边一个木板小棚里，一块长跳板伸向海里，但是我利用它作卧铺。整个设施有其好处，由于就我一个人，我在那里辗转反侧，渐渐地光着身子睡了。

衷心地问候大家！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3.9.24—里瓦〕

17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收到了你的两张明信片，但一直没有回信的力量。不答复有一种作用，即使周围保持寂静，我最希望的是沉入寂静里面，再也不出来。我是多么需要孤独啊，任何谈话都会严重地玷污我！在疗养院里我是一言不发的，吃饭时我坐在一位将军（他也一言不发，但一旦当他决定要讲话，话总是说得很聪明，至少高于所有其他人）和一个看上去像意大利人的小个子瑞士女人中间，这个女人嗓音低沉，她为有这样的邻座而不高兴。——我刚发现，我不仅不能讲话，而且也不能写东西，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讲，但它们互相冲突，或背道而驰。14天来我也确实几乎什么都没写，不记日记，不写信，日子过得越平淡越好。我没把握，但我相信，假如不是今天在船上（我去了马尔切辛纳）有个人同我讲了话，假如我没有答应他晚上去巴伐利亚院落，那么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写信，而是在集市广场上。

除此之外，我完全过着有理智的生活，也在疗养自己，从星期二以来我还每天洗澡。只要这唯一的一个方面松开我，只要我不必老是想

它，只要不至于有时候（多半是在我早晨起床时）它像一个动物似地蜷成一团落在我的头上，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一切已十分清楚明了，14天来已经不再发生。我不得不说，我办不到，而我也确实办不到。但为什么突然无缘无故地，直接由对此的思念引起我心头再度的不安，一如在布拉格那段最糟的时期里那样？可是我现在不能写下，我心里完全明白的事情和始终可怕地现实地盘桓着的东西，如果面前没有信纸的话。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我实际上只是游览着一个又一个的山洞。你也许会认为是孤独和不言不语给了这种想法以巨大的力量。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对孤独的需求是一种自发的因素，我渴望孤独。对一次蜜月旅行的设想会使我心惊肉跳，每当我看到一对蜜月旅行的伴侣，无论我认识还是不认识，都会使我感到不舒服；而要想使我自己产生恶心的感觉，我只需设想一下我用一只胳膊搂着一个女人的后腰的情景即可。你瞧瞧——可尽管如此，尽管这件事本已结束，我不再写信，也不再收到片纸只字——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我仍无法脱身。在假想中，各种不可能因素完全像在现实中一样紧挨着。同她[111]在一起我无法生活，没有她我也无法生活。只要抓住这一点，我迄今至少部分掩盖着的存在便一下子暴露无遗。我这人应该在皮鞭的抽打下被赶到沙漠里去。

你不知道，在这一切中间，你的那些明信片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快乐。比如提荷[112]在进展（我不相信它曾经卡住），比如莱茵哈德[113]对《告别》[114]感兴趣。如果我想从我所处的深渊中出发驱散你的紧张不安，将显得很可笑，这你会自己解决，而且会很快，很彻底。问候你可爱的夫人和费利克斯[115]（这封信也算写给他的，我不能另写了，但也不要求得到任何信息，无论是你的还是他的）。

弗兰茨

〔1913年9月28日于哈同根疗养院〕

172.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不，费利克斯，情况不会变好的，我这儿什么也不会改观。有时我相信我已不在人世，而是在地狱边缘徘徊。你认为负罪意识对我是一种帮助，一种解脱。不对，我之所以怀着负罪意识，仅仅因为它对于我的

本性来说是懊悔的最美形式。但却不必仔细看它，负罪意识只是一种回溯愿望。但它几乎还没有成为这么一种东西，自由、解脱和相对满足的感觉已油然升起，比悔恨可怕得多，远远超越了一切悔恨。现在是晚上，我收到了马克斯的来信。你知道这回事吗？我该做些什么？也许是不回信的好，当然，这是唯一可能的。

但是将来会怎样，这由纸牌算命运。几个晚上之前我们6个人曾坐在一起，一个年轻、很富有、很漂亮的俄罗斯女人由于厌倦和绝望，拿出牌来给大家算命，因为漂亮的人在不漂亮的人中比反过来的情况失去得更多。具体地说，根据不同的算法给每人发两次牌。结果是各种各样，当然大多数是可笑的或半认真的，即使人们相信它，终究是完全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有些完全肯定的内容，大家可以检查，根据两种算法检查，结果都一致。一位小姐的星象是，她将变成老处女。我的几个星象都不同，哪怕只是接近的结果都没有。所有有人头像的牌都尽可能地离我而去，被移向边缘，甚至这些靠边的有人头像的牌有一次只有两张，有一次我相信根本就没有。事实上我周围不断地转着“烦恼”、“财富”和“雄心”的牌，这些牌除了“爱情”之外都表明是几张抽象的牌。

从一切迹象来看，一直相信纸牌算命是无意义的，但是通过纸牌，或者通过一种随意性的外表偶然现象来说明某种糊里糊涂、乱无头绪的想象力，却有内在的道理。我在这里当然不谈我的牌对我的影响，而是对他人的影响。我可能根据影响来审查这一点，看看这位小姐的星象（将成为老处女）对我发生了什么影响。她是这里一位十分可爱的少女，也许除了发型之外，她的外貌丝毫没有流露出将来会变成老处女的迹象。我对这个姑娘并无先入之见，但我从一开始就对此感到惋惜，这不是为了她的现在，而显然是为了她的将来。自从现在算了命以来，我完全不怀疑她必将变成老处女。费利克斯，你的情况也许比我的更复杂，但是更不现实。这种情况的最后的、事实上总是最痛苦的后果确实只是无法实现的理论。你努力去解决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就目力所及，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对你或对任何人有利。我的不幸超过你何止十万八千里啊！要是我有一线希望能帮助我就好了，我就会牢牢抓住疗养院入口的门柱，不必离开。

弗兰茨

〔笺头：封·哈同根博士，疗养院兼水疗院，

173.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我听说，大约14天前（除了在我了解的《新自由报》上登载了关于《司炉》的评论外）还有另一家维也纳报纸，我以为是《维也纳汇报》，登载了一篇评论。如果您了解的话，劳驾请您告诉我报纸的名字、期数和日期。

顺致

崇高的敬意！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19〕13.10.15〔布拉格〕

174.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我今天收到了彩色的书[116]。首先至为感谢。大约10天前我向贵社提出过一个小小的请求，但是，照我现在看来，地址未变。至今我未收到复信。我听说，大约二三周前在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我不是指《新自由报》登载的评论，这我了解）登载了一篇关于《司炉》的评论，我以为是《维也纳汇报》。如果贵社了解此事，我请求贵社告知该报名字、期数和日期。此外，据说最近几天《柏林交易所信使报》也登了一篇评论。也请顺便告知该报的有关期数。最后，我请您叫人给我寄一份未装订的《观察和了解》。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谨上

1913年10月23日于布拉格

175.致莉塞·韦尔奇

亲爱的仁慈的小姐：

我多次地感谢您和您父母的友好邀请。当然我会很高兴地赴约。但是同样当然的是，我进房间时，您必须给我显出一副特别友好的面容，您也当然能显露这样的笑容的，因此您不会对我生气，否则，我进房间后立即出来，当然我要吃晚餐后才来。

弗·卡夫卡谨上

〔19〕13.12.29〔布拉格〕

17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对你的幸福表示高兴，对你们大家的幸福表示高兴。遗憾的是，这并没有使你们更健谈一些。但是情况是这样，我赞同你的意见。人在旅行时，不想写，人在幸福时，也不想写。防止这样就是防止幸福。亲爱的马克斯，你就安安静静地洗澡吧。

由于你没有给我寄来印象深刻的日内瓦湖风景明信片，我想起你时，只好完全依靠我的地理知识了。当然，这些知识一般来说是精通的，但是在细节上又只是依靠优越的普遍知识了。你在里瓦去湖里游游泳，去博罗美群岛的一个岛——岛叫什么名字？——在草地上读我寄去的信，对吗？这是一封写得漂亮的信，对吗？你已经从笔迹认出了写信人。

再见。

弗兰茨·卡上

〔大概是1913年〕

1914年

17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坐在家，牙疼，头痛，现在我已在这最阴暗的过热的房间里一张桌子角旁坐了半小时，此前靠在火炉旁半小时，此前在靠背椅上躺了半小时，此前在靠背椅和火炉之间来回走了半小时，现在我终于摆脱束缚，离开了。马克斯，要是真的以你的名义，我不会下决心给你写信，我本不能点燃煤气的。你想将《提荷》^[117]敬献给我，这是长时间来第一次直接关系到我的欢乐。这样的献词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我（尽管只是表面，但是这种表面的某种侧光真正使我温暖）被拉扯上去，并被附着在比我更生气勃勃的《提荷》上。我与这个故事会有多大关系呀！但是我多么乐于把它作为我表面的财产！马克斯，你不该总是为我做好事。

你这样容易理解哈斯^[118]的工作吗？直到理解每个外来词吗？如果他证实你的普遍看法，那么因此可能受到震惊的菲克尔（他肯定不这样写）会采取什么态度呢？

你本不该将我的通讯处给穆西尔^[119]。他要干什么？他能干什么？有人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吗？他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的牙疼。我已经牙疼3天了，不断地加剧（昨天我去看医生，他没有找到什么）。今天我才肯定地得知是哪颗牙疼。医生当然有责任。是一颗补过的牙里在封的铅下面疼。天晓得，在封住的地方多疼呀，我下面的甲状腺也肿了。

早晨我刚去芳塔^[120]，我并不乐于去。你不想写信告诉我，你下什么时候能给我朗读些东西吗？我在想，我现在可以——关于《提荷》——发号施令。

弗兰茨

〔19〕14.2.6〔布拉格〕

178.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如果您将《观察》的清样寄到下述地址：弗兰蒂切克·朗格^[121]，布

拉格皇家葡萄园679号，我会非常感激您的。朗格是主要月刊《文艺月刊》的编辑，他想从本书中登载几篇译文。也许能劳驾您将所登译文寄给我。

顺致

崇高的敬意！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19〕14.4.22〔布拉格〕

179.致莉塞·韦尔奇

仁慈的小姐：

十分感谢您衷心的祝愿。我也衷心地祝愿您柏林的工作顺利。但是您也必须让我同您携手合作。您一定看到，您正在做我老早就想做的事情。从我家里去，很好，到柏林去就更妙了。您真的要使我愉快，十分肯定地约定在那里同您会见吗？圣灵降临节我将在那里，您也在哪里吗？也许还将与一直住在那里的魏斯先生晤面，这对您合适吗？从6月1日起我的一个熟人也将到那里。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柏林人，较长时间外出后又长期待在柏林），我觉得您也会喜欢她的，正如我觉得她实在可爱一样。

请您别忘记给我写几句话，我请求您了。谨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忠实的 弗·卡夫卡

〔19〕14.4.27〔布拉格〕

180.致莉塞·韦尔奇

亲爱的小姐：

一个大拇指被割破，妨碍我用以前可读的字体给您写复信。谢谢您的友好来信。您迅速地习惯了，这并不令人奇怪。即使没有朋友，也十分肯定您会成功的。即使您否认，但离开家还是极好的。只有局外人目

前能对此作出评论。生活美好的人必须相信他的评论，即使他还不能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刚碰到这个问题。

最初我曾考虑，您将立即去一个大圈子的人群中，这根本不合适，您同这群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联系，联系重要的事情，以致您几乎没有时间，至少没有必要，尽管同陌生人见面会带来某些小的麻烦。最近您大概要花费力气（当然是完全正常的）同一些必要的熟人交谈。要不是我已认识到这一点，我很可能也不会在大拇指流血之时给您写信了。

尽管如此，如您有可能，我仍然很乐意在圣灵降临节见到您。但是，如果您不在布拉格，您大概会作某种郊游，即使您那时不在柏林也行。我可以在圣灵降临节前一天（星期六）去，呆到星期二下午。可以给您打电话吧？大概最好的办法是，圣灵降临节上午我给您打电话并问您。

谨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卡夫卡

〔19〕14.5.18〔布拉格〕

181.致莉塞·韦尔奇

亲爱的小姐：

现在我又回到布拉格，在这里和在那里都没有见到您，因为我那天晚上没有空，此外我希望能在柏林看看您的新生活，我又回到柏林，并于星期二下午离开了。我这样来回奔波，直弄得精疲力竭，因此连电话也没有力气打了。要是我真的拜访了您，您就会看见我是什么模样了。算了，不再说这些了。

您信里说：“我已学到了一些东西，等等”。这个说明似乎承认我正确，我祝贺您迁居。也许您在外国人身上学得不多，但是只要原来一点都没有，那么这“不多”就是非常多了。如果一个人的眼睛看事物没有适当的角度，那么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有超人的东西。但是一个布拉格姑娘在第一个月观察一个柏林女子，有什么超人之处呢？这倒是值得研究的，体验的，也许被人嘲笑的。我不知道我又在谈一个布拉格姑娘，也

许我谈谈写这封信的伟大老人会更合适些。

向您谨致

衷心的问候，祝您愉快！

弗兰茨·卡夫卡

〔19〕14.6.6〔布拉格〕

182.致吉查克·略韦^[122]

亲爱的略韦：

您的来信虽然提醒我，怎么这么晚才回信，但它更使我为您能想到我而高兴，我处在极度的迷惘和忙碌中，尽管这些因素无论对我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会带来很大好处的。

此外有个新闻，我订婚了，并觉得我这样是做了件好事和必要的事。当然，世界上可疑之事何其多，即使最好的事情在疑虑面前也会变得捉摸不定。

您还一直在痛苦中煎熬，找不到出路，这是可悲的。您偏偏在匈牙利待了那么长时间，是奇怪的，但当然有些糟糕的原因。我觉得，当我们在布拉格晚上东游西荡时，我们俩似乎信心都很强。当时我想，您一定会突破牢笼的，而且是一蹴而就。我必须告诉您，我从未放弃对您的希望。您容易绝望，也容易幸福，在绝望中望您能想到这一点。为了应付今后的好时光，您应该多多保重。您现在的经历似乎是相当糟的，看上去糟透了，您别再用损坏身体来进一步恶化这一点了。

我很想听听关于您和您的朋友们的详细情况。您这回不去卡尔斯巴德吗？

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K 上

〔1914年6、7月间于布拉格〕

183.致奥特拉·卡夫卡

亲爱的奥特拉：

昨夜我未能写成信，只好今天在想睡觉之前匆匆写几句。你想一想，你写的明信片使我目前一个早晨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是真正的摩擦，因此我们要在你认为合适的时机争吵一番。不，我平常晚上没有人。当然我是从柏林给你写信的。现在无需对此事和关于我自己说什么肯定的话。我写的不同于我说的，我说的不同于我想的，我想的不同于我应该想的，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无穷。

弗兰茨

向全家问好！这封信你既不必给人看，也不必到处放。最好你撕毁成碎片，从阳台向院子里的鸡群撒去，我对鸡群不保密。

〔19〕14.7.10

184.致阿尔弗雷德·库宾

尊敬的库宾先生：

收到您的明信片，非常感谢。这张明信片到达我手里时，我还不是完全闲极无聊，因此，我至今还没有回复。现在我正在波罗的海边来回航行。这时您肯定在您幽雅的住所里埋首工作。也许我能再一次说说您这些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

弗·卡夫卡上

〔明信片邮戳：1914.7.22〕

185.致费利克斯和马克斯

亲爱的马克斯、亲爱的费利克斯：

我的信写晚了，对吗？现在告诉你们，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婚

约解除了[123]，是在柏林解除的，我去了三天，大家是我的好朋友，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此外我清楚地知道，这么做是最佳办法，所以面对这件事（它的必要性是那么明显）我不像人们想的那样不安。更糟的事却发生在其他方面。事后我去了吕贝克，在特拉弗蒙德游了泳，在吕贝克等候了魏斯博士的来访，他是专程前来这个丹麦海滨浴场[124]的，而我也为此取消了去格列申多夫的初衷，改道来到这里。这是片相当荒凉的海滩，有一些真是十分奇特的丹麦人。我放弃了导致婚约失败的固执，几乎光是吃肉，结果很难受，度过了难受的长夜后，早晨我张着嘴，感到这具受到自己折磨和惩罚的躯体犹如一头陌生的蠢猪躺在我的床上。在这里我丝毫得不到休养，但能散开心头郁闷。W.博士是同他的女友到这里来的。星期六夜里我一定会回布拉格。

向所有夫人和未婚妻问候！

弗兰茨

〔笺头：玛丽吕斯特·奥斯特索海滨浴场，

1914年7月末〕

186.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我听说，你和你的娇妻因我未探望你们差一点病倒。如果这是真事，那么你们就不对了。我外出未归不打扰你们度蜜月，不仅因此，而且也由于我总是处于睡眠不足状态，我很忙，此外我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在里格尔公园后面很远的地方。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将这些书寄去而不是送去，我希望这些书对你们有好处，应该摆在你们的住所里，因此我担心选得不好。

不幸的是，我总是在挑选以后才开始说我的心里话。

致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名片，1914年9月于布拉格〕

1915年

18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请你再忍耐到星期一。如果到那时不能在某地[125]爬出来——怎么能办成，我当然想不出办法来——我就必须付款。衷心问候你和夫人！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5.1.13—布拉格〕

18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不能早些时候办完。1点15分前上床，但不睡，也不特别疲劳。

这里是手稿[126]。我想到在布莱[127]不再在《白色书页》[128]的时候，是否能试一试将这个故事登载到白报纸上。何时登载，是明年还是后年，于我完全一样。我未带冯塔诺的书，在旅途中读这本书，我觉得太可怕了。那么等你们回来吧。相反，我带了西贝尔。你们读吧，哭吧！

马克斯，如果你在德国某地看到法国报纸，就请买下，并带给我！我出钱。

最后请你不要忘记，你在柏林和图林根森林之间作出选择。在柏林只有柏林，但在图林根森林《新基督徒》[129]可能有进展，甚至现在正处在它从下面上来的关键时刻。

谨祝

生活愉快！

弗兰茨

189.致恩斯特·非格尔^[130]

亲爱的非格尔先生：

要不是我的脑袋的状况阻止了我（当然自从它长得难以想象的时候以来就没有好过，在今后长得难以想象的过程中也不会好），我也许早就给您写信了。那些诗我读了多次，从而（我相信）对您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它们对我很有诱惑力，有的地方甚至紧紧抓住了我的心。奇特的是这些诗里面希望和绝望互相混合并且不可穿透，但这种混合具有某种不断强化着的东西。读每一首诗时，我几乎都希望亲耳聆听您的声音。您来吧，无论何时都行，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好了，我在两点前总是在那里，只有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我才会离开。您要考虑到我出于知识不足的原因对诗歌所取的保留态度。

致最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明信片邮戳：1915.9.18—布拉格〕

190.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迈耶先生〕

尊敬的先生：^[131]

非常感谢您上个月11日的来信。您说的事，尤其是关于布莱和施特恩海姆^[132]的事，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多方面的愉快。如果我能知道冯塔纳奖金^[133]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一定能回答您的那些问题（这些实际上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变形记》已经付排）。从您的来信，尤其从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看来，事情好像是这样的：施特恩海姆得到了这个奖，但他要把这笔钱赠送给什么人，也许是给我。尽管这么做非常高尚，但这么一来就出现了关于需要的问题，不过不是对两者——奖和钱——的需要，而仅仅是对钱是否需要。根据我的感觉，问题也不在于受惠者是否有朝一日会需要这笔钱，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奖或它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当然很重要（如果不占有

一部分奖而白得这笔钱，那我根本不能接受），但我相信我没有权利接受，因为我目前根本没有必要的需求。您的来信中唯一与我的观点相反的是：“通过冯塔纳奖人们的注意力将会”云云。无论如何，这事让人捉摸不透，您若能稍加澄清，我将感激不尽。

关于您所建议的事，我完全听您的。我的愿望本来是出一本规模大一些的小说集（大体上包括《阿卡迪亚》上那篇小说^[134]，《变形记》和另一篇小说^[135]，统一用个书名《惩罚》），沃尔夫先生以前也曾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意，但在当前的情况下照您的意图办可能更好些。对于《观察》的再版我也完全同意。

《变形记》的校样附上。遗憾的是，印刷不同于《拿破仑》^[136]，尽管我可能认为寄来《拿破仑》是同样印刷《变形记》的一种许诺。然而《拿破仑》的封面明亮好看，一目了然，而《变形记》的封面（我以为用同样大的字型）色暗、局促。如果还可以修改的话，那会很合我的心意的。

我不知道《当代》丛书以后诸卷如何装订，《司炉》装订得不好看。这是某种模仿，至少过些时候可能几乎违背意愿地看到它。我想请求出一卷本。

很遗憾，上周您未能来。也许您不久能来。若您能来，我会很高兴的。

致衷心的问候！

弗·卡夫卡 谨上

《白色书页》十月号我能得到5份吗？我需要它们。

沃尔夫先生曾给我寄来了一些关于《司炉》的评论。如果您需要一些评论，我可以寄去。

附校样。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1915年10月15日于布拉格

191.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先生：

十分感谢您寄来的18日的信，《拿破仑传》以及我所要求的白报纸。

尽管我相信您对这个问题的全部判断，但我对冯塔纳奖金事件仍然不清楚。当然列昂哈德·弗兰克列入了候选名单（他大概不可能第二次获奖）。似乎又由此表明，这只是关系到钱的分配。尽管如此，我再度根据您的建议，向施特恩海姆写了信。人们没有得到有关某个人的直接消息。给这个人写信和感谢他，而不详细知道为什么，这是不十分容易的事。

我当然同意一卷本《拿破仑传》。也许以前的合订本是以这种方式装订的吧？

我随信附上校样。我也乐于赶快搞完，但是有些日子不可能节省出校对必需的零碎时间。

也寄上评论。寄给我的所谓全部的评论集并不完全。就我所知，缺少了《柏林晨邮报》、《维也纳汇报》、《奥地利评论》、《新评论》的评论。可惜我没有这些报纸的评论。最重要的评论至少是1914年8月号《评论》中穆西尔的评论，最友好的评论是H.J.雅各布的评论，已附来。《柏林日报》上马克斯·勃罗德和埃伦施泰因写的关于《观察》的最友好的评论，我也没有。

您建议我感谢施特恩海姆，然而我不必感谢布莱吗？布莱的地址呢？

《年鉴》里一篇小稿子《在法的门前》以及《变形记》的前几页校样您大概收到了吧。

谨致衷心的问候！

弗·卡夫卡

〔19〕15年10月20日于布拉格

尊敬的先生：

您最近来信说，奥托玛尔·施塔克^[137]将为《变形记》设计封面。我产生了小小的恐惧。但就我从《拿破仑》上对这位艺术家的认识而言，这种恐惧也许是多余的，我是说，由于施塔克真的要动笔了，于是我想这样的问题，他会不会去画那个甲虫本身？别画那个，千万别画那个！我不是想限制他的权力范围，而仅仅是根据我对这个故事显然是更深的理解提出请求的。这个甲虫本身是不可画出的。即使作为远景也不行。如果这样的意图并不存在，因而我的请求变得可笑——那倒巴不得。若能转告并强调我的请求，我将十分感谢。假如允许我对插图提建议，那么我会选择诸如这样的画面：父母和商务代理人站在关闭的门前，或者更好的是，父母和妹妹在灯光明亮的房间里，而通向一片黑暗的旁边那个房间的门敞开着。

您一定已经收到所有的校完的清样和评论文章了吧。此致最良好的祝愿！

弗兰茨·卡夫卡

〔19〕15年10月25日于布拉格

1916年

19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现在我在马林巴德给你写信。我们分手后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显得太漫长了，假如我每天写东西，都会是搞不清的乱七八糟的一团。只有临离开前的那几天，享受着将离开办公室的喜悦，头脑从未有过那样轻松自如，几乎每项工作都能胜任，留下的是堪称楷模的秩序。如果这次离开是永远的告别，我愿意在临离开前连续口授6个小时，然后跪在地上把楼梯全部擦洗一遍，从地板到地下室，以此方式向每一级楼梯表示我对让我离开的感激之情。但是第二天就头疼得麻木了，小舅子的婚礼，使我到星期天上午还不得不留在布拉格，整个仪式完全是模仿童话；那几乎是读神的婚礼致词，“以色列，你的帐篷多美”，还有其他类似的话。与白天的心情呼应配合的还有一个可怕的梦，其奇特之处在于，梦

里没有出现任何可怕的事，只是与熟人在街上一次寻常的相遇。细节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相信，你根本就没有出现。可怕之处表现在我面对那些熟人中的一个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这种梦我也许还从来没有做过。——然后在马林巴德很高兴，F.[138]在火车站接我。尽管如此，却在一间丑恶的面向庭院的房间内度过了绝望的一夜。再说你知道我的第一夜〔在外〕总是个绝望之夜。星期一迁入一间特别漂亮的房间，现在住的面积不小于在“巴尔莫拉尔宫”中的住房。我将在这间房间里试着熬过这个假期，已开始进行至今尚未完全见效的对付头疼的斗争。F.和我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弗兰茨

〔两张明信片，邮戳：1916.7.5—玛丽恩温泉〕

19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在特普尔几个小时。在田间，从头脑和黑夜的精神错乱中摆脱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人呀！我是什么样的人呀！把她和我折磨死了。

弗兰茨

〔明信片〕〔1916〕7月8日〔特普尔〕

19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来信收到，非常感谢。《每日评论》中的批评简直令人吃惊。《提荷》以怎样的广度带走了世界！这是在我们这里书店中被推荐的销售最多的第一本书。我只是在圣经中读到一点点，此外未读什么。但是我们到处转了很多次，这里雨水多，太阳少。奇怪，今天例如在特普尔，天气恶劣，令人极其绝望，昨天和前些时候也如此，今天下午却是一个云淡风轻、天气晴和的下午。当然云未消失，云怎能消失呢？下次详告。请将奥托的地址告我。我需要一张诺瓦克的画作为我父母送的结婚礼

物。价值100—200克朗即可。劳驾，你能介绍一下吗？他卖得这么便宜吗？我明天写信。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7.9—玛丽恩温泉〕

196.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为什么不回信？对你这个准时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你手上又在写什么东西吧？但是那时你妻子是在家的；我从她那里总相信（而不相信我的面颊），她同我意气相投，现在她也不写信来。有阳台的房间还等着，但是不能等太久。〔下面是F.B.处地址〕

致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7.11—玛丽恩温泉〕

197.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不能一拖再拖了，今天将详尽地给你回信，因为我昨天晚上（或者说实际上是前天，因为明天我还要陪她去弗兰茨巴德）同F.在一起。

用铅笔写明信片的那个上午（我是在大厅里写的，那是个美妙的地方，有那么点能使人心神分散和神经质的魅力），看来是一连串可怕的白天的终结（其间有许多过渡，只是我未能理解），而这些白天是在更可怕的夜晚中培育出来的。我真的觉得老鼠已经钻进了它最后一个洞穴。但由于情况不可能比这更糟了，所以现在开始变好了。一度捆绑着我的绳索至少是松动了，我找到了一些头绪，本来一直把双手伸向绝对空虚的空间求援的她又开始帮助我了，我同她一起进入了某种我从未见

过的人际关系状态，这种状态可与我们关系最佳时期中两个写信者之间那种状态相提并论。除了两次例外，一次在楚克曼特尔（但在那里她是一个女人，而我是个毛头小伙子）；一次在里瓦（但在那里她是半个孩子，而我完全忘乎所以，处于全方位的病态之中），我实际上从未同一个女人产生过亲密无间的感情。但现在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亲切目光，再也无法封闭自己了。有些我想永远保存的东西已经撕裂（没有任何局部的，而都是整体的），而我知道，从这道裂缝中冒出的不幸已远远超出一次人生所能承受的程度，但这种不幸不是招惹来的，而是强加的。我没有抗拒的权利，更不能自己动手使没有发生的事情发生，以便能看到一些情况。我根本不了解她，除了其他疑虑外，当时阻止了我的正是对那个女性写信者的真实面目的畏惧；当她在房间里向我迎面走来，准备接受订婚吻之时，一阵寒颤流过我全身；与我父母一起进行的订婚之行每走一步对我都是一次酷刑；没有任何事情比婚前同F.单独相处更令我害怕的了。现在不同了，情况良好。我们的协定简约道来就是，战争结束后马上结婚，在柏林近郊搞两三个房间，每人都在经济上自管自。F.将像从前一样继续工作，至于我，现在还没法说。如果想要把这种关系表达得更形象化一些，大体如此，两个房间，大体上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在一间里，F.很早起床，离家，晚上疲乏地倒在床上；在另一间里放着一张长沙发，我躺在上面，靠牛奶和蜂蜜度日。在这里躺着个不道德的男人，伸展四肢（就像那著名的箴言所说的）。尽管如此——这么一来就有了安宁、明确性，因而有了生活的可能性（回过头来看，这是些强有力的词，几乎不可能长时间地由一支柔弱的笔写下来）。

我暂时不会给沃尔夫[139]去信，事情没那么急，他也不会那么急。从后天起我将是一个人了，届时我将（到下周前我都有时间）略加修改——我想说的话星期三只说了一半，而现在是星期五了。我在此期间同F.去了弗兰茨巴德，跟母亲和瓦莉[140]在一起，现在F.走了，剩下我一个人。自从在台普勒度过的那个上午以来，一直是美妙、轻松的时日，我本来不相信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中间当然也有种种阴影，但美妙和轻松占了上风，甚至在我母亲面前亦如此，而这是十分不同寻常的，其不同寻常的程度竟令我感到强烈的恐惧。怎么说呢——

在这儿的旅馆里，人们跟我开了个不愉快的玩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差错，把我的房间出租了，却把F.的房间给了我，一间不很安静的房间，左右两边都是双人客房，普通的门，没有窗，只有阳台，但我

几乎不想去花力气找房子。尽管如此，电梯门现在已被碰上，有人迈着沉重的脚步在找他的房间。

关于沃尔夫，我暂时不去信，先出一个包括三个中篇的集子，而其中有两篇已经发表过，不见得有好处。我最好是保持沉默，直到能拿出什么新的、完整的东西来。如果拿不出来，那我宁可永远保持沉默。

日报上那篇文章——请想想，老天爷，枢密官！——我随信寄上，请为我保存。它是非常友好的，由于它在一个出乎意外的时刻偶然地放在“艾格兰德”咖啡馆中我们坐过的那张桌上，其友好性更进了一层。现在两边太阳穴真的顶不住了。它真是天赐的清凉油。为此我真该感谢那位枢密官先生，也许我真会去致谢的。

对你的文集我不同意，但能理解，为此我寄两张照片给你。奇怪的是，二者都在倾听，观察者站在梯子上听，研究者俯在书上听（人们现在正踏着沉重的步子在我这单薄的门外走过！当然孩子是不会干扰研究者的）。

9000至14000册！向你祝贺，马克斯。也就是说大世界在伸手要。尤其在弗兰茨巴德，《提荷》摆在了所有书架上。在我昨天偶然读到的每日新闻上，一个叫格赛留斯的在宣传这本书。你能把那篇周报评论文章寄给我吗？

我再重复一遍两个请求，奥托和图片出售介绍所的地址。但还有第三个请求。你能否寄一份犹太人居留所的介绍资料给F.（技术工场，柏林O—27，马库斯大街52号）^[141]，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她很愿一读。

我知道，你对《里查德和萨穆埃尔》总有一种偏爱。那是些美妙的时光，但为什么也必须是好的文学作品呢？^[142]

你在干什么？你从下星期二起将回到布拉格吗？这封信当然可以给菲莉斯看，但不能给夫人们看。

你的 弗兰茨

〔1916年7月中旬玛丽恩温泉〕

19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谢谢你告诉我消息。消息在一个头痛的日子到达，我至少在这里怎么也没有预料到有这一天。尽管如此，我仍然立即跑到埃森去。

我将描述全部情况，我不能说，比人们见到的多。但是我认为，人们只能见到最细小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当然是很典型的。在最愚蠢的人面前也要讲真话。单用肉眼在真情实况那里看不到比鸡毛蒜皮更多的东西。

首先，朗格^[143]找不到了。那里有一些大楼小屋都挤在一座小山丘上，它们属于同一个房主。这个小山通过一些半地下的台阶和暗道通到各个房子，将它们连成一片。房子的命名容易混淆，金殿，金碗，金钥匙，有些房子有两个名字，前面一个，后面又一个，以后又叫某某餐馆，同原来的房子名字不一样。第一次跑去，结果未通过。当然以后公布了规章，这是一个小小的、按层次排列的村庄，镶嵌着两栋漂亮的大楼，民族饭店和佛罗里达饭店。金钥匙是最寒酸的。但是在那里也找不到朗格。以后有个姑娘才记起一些年轻人来，他们住在阁楼上。我寻找这个布拉格烧酒商的儿子，然后就可以找到他了。据说，他很可能在佛罗里达饭店克莱因先生处。我去到那里时，他刚出门了。

他说了什么，现在我不想写，我只想写我所见到的情况。

每天晚上7点半或8点，拉比乘车兜风。他慢慢驶入树林，几个追随者跟着他步行。他在树林里一般已确定的地点下车，然后同追随者一道，天黑前在林中小道上来回散步。在祈祷时间，将近10点，他乘车回家。

我是7点半待在他住的民族饭店前面。朗格在等候我。以前在雨季雨下得特大。也许在近14天，正是在这个时刻没有下过雨。朗格硬说，雨一定会停的，但是雨未停，反而下得更大了。朗格叙说，他外出时只下过一次雨，而且到达树林时雨就停了。这次雨却不停。

我们坐在楼下一间房里，见到一个犹太人拿着一个苏打水空瓶从屋里跑出来。朗格说，他在为拉比取水。我们跟着他去。拉比规定，他要从鲁道夫泉取水，可惜他不知道泉在何处。我们在下雨时有点迷路。我

们遇到的一位先生给我们指了路，但又说，所有泉水处7点关门。管打水的人说：“泉水处怎能关闭呢？”我们跑去。事实上，鲁道夫泉已经关闭了。有人从远处已经看见了。尽管如此，我们走近时，确实未关闭。朗格说：“那么你从阿姆布罗伊乌斯泉取水吧，它总是开着的。”取水人很同意，我们跑去。事实上还有女人在那里洗酒杯。打水人不好意思地走近台阶，转动手里已经装了一些雨水的瓶子。妇女们愤怒地拒绝他打水，当然这个泉也从7点起关闭了。我们就这样回来了。在归途中我们碰到了两个犹太人，以前我就注意到他们。他们俩像一对情侣并排走着，友好地对望和微笑着，其中一个将手深深插进后面的口袋里，另一个是城里人。他们臂挽着臂。我们讲这个水泉关闭的故事，这两个人不能理解。打水人现在也不理解，这三个人撇开我们，又向阿姆布罗伊乌斯泉走去。我们继续去民族饭店，打水人又赶上并超过我们。他气急败坏地向我们喊道，泉真的关闭了。

为了不被雨淋，我们想进入饭店的走道。这时朗格回来跳到一边。拉比来了。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住他，在他前面一切必须畅通无阻。总是止住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经常出其不意地转身就走。在人群中迅速闪避是不容易的。（在房间里情况就更糟，人群拥挤，连拉比本人也陷入危险之中。据说他最后大喊大叫：“你们是虔诚教徒？你们是凶手。”）这种礼仪使得一切都很庄重，拉比形式上对众人的做法负责（实际上没有去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他左右两边都是人）。这群人再三重新安排，给他让出走道。

他看上去像我小时候在多雷——明希豪森里见过的苏丹。但不是化装的，是真的苏丹，不仅是苏丹，而且是父亲，小学教师，文科中学教授等等。他的背影，放在腰部的手的样子，阔背转动的样子，这一切都给人信任。在这一群人的心目中也有我充分预料到的安详、幸福的信任。

他是中等个，相当肥胖，但是行动不笨。长长的白胡子，两鬓特别长的髻发（他也喜爱别人的长髻发，谁有髻发，他就同谁意气相投。他赞扬两个孩子长得漂亮，父亲用双手摸摸孩子。但是他只认为髻发美）。一只眼睛瞎了，神情呆滞。嘴歪斜，显得既像嘲笑又像亲切。他穿一件丝制长袖长袍。前面敞开着，身上围一条粗腰带。戴一顶皮帽，这帽子使他的身高增高很多。他穿着白袜子，朗格说，他穿白裤子。

在离开房子前，他将银白色拐杖换成雨伞（这里经常大雨倾盆，到

现在10点半还没有停)。散步(第一次没有乘车外出,显然他不想让人们冒雨跟着去树林)现在开始了。大约有10个犹太人在他身后和身旁。有一个人拄着银白色拐杖,端着拉比也许想坐的安乐椅,有一个人拿着他将擦干椅子的抹布,有一个人(施勒辛格,一个来自普拉斯堡^[144]的犹太富翁)拿着一瓶鲁道夫矿泉水。他显然在一个商店里买的。因此,这4个狗腿子起着特别的作用,即同胞,职工,秘书。朗格声称,这4个人中的头是一个完全特别的流氓,他的大肚皮,他的虚荣,他的斜视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不许因此谴责他。狗腿子们全都变坏了,人们不可能忍受拉比经常地在近处,而不受到损害。这是更深刻的意义和不断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忍受这种日常生活。

这次散步缓慢,但一直向前。

拉比起初步履艰难。他的右腿有点不灵便,开始他咳嗽不止。随从毕恭毕敬地站在他周围。但是过了一会儿,似乎没有外部的障碍,参观大概开始了,每时每刻都能使队伍停下来。他参观一切,特别是建筑物,丢得精光的小东西使他感兴趣,他提许多问题,使自己注意许多东西,他的态度的特点是惊羨和好奇。总的来说,这是围绕不重要的讲话和问题的庄严,也许更幼稚和更高兴一些,至少这种庄严将随从的一切的思想顺利地压低到同一水平。朗格寻求或预测着一切更深的含义。我相信,这更深的意义就是缺少这一种,我认为这大概够了。这完全是上帝的恩赐,而没有在基础不够时必须保持的荒谬可笑。

下一栋房子是梭鲈研究所。它高出于石堤上的马路,屋前有一个围有栅栏的院子。拉比注意到建筑的某些东西,他对院子感兴趣。他问道,这是怎样一个院子?像总督在皇帝面前一样,如果遇到类似情况,施勒辛格(希伯来语称“西纳”)会采取类似行动,怒气冲冲地走上通往院子的台阶,在上面根本不停留,而是立即怒火直冒地又下来了(一切都淋着瓢泼大雨),说道(当然他一开始就从下面看清了),这只是一个私人院子,属于梭鲈研究所。

拉比再仔细看了看院子以后,转过身来。我们去新浴室。在我们最初去的楼房后面,蒸汽浴的管道向深处走。拉比俯身栏杆,不厌其烦地在管道旁观看,就管道交换意见。

这栋楼是以一种随便的、无法识别的混合式样建成的。最下面一排窗子是拱顶式的,但是用砖砌的拱顶,在拱顶有兽头装饰。全部拱和兽

头都千篇一律，尽管如此，拉比差不多在6个拱形窗子前都停住脚步，特别看了一下横面，观看，比较，评论，更确切地说，是远观近看。

我们在街角拐弯，现在正站在大楼正面。大楼给他印象很深。楼门口上方写有金字“新浴池”。他念了几个字，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否这是唯一的浴池，浴池建有多久了，等等。他多次用东犹太人的特别惊奇的语气说：“好漂亮的楼。”

他早已多次观察了屋檐水槽，现在我们回到大楼跟前（我们已经过大楼正面，转到街对面）。他自己绕道去屋檐水槽处，水槽顺着房屋突出部的角度向下走。使他高兴的是，水怎样在水槽里滴下去，他倾听着，顺着管子往上看，摸摸管子，让设施说明。〔这封信到此信纸中间中断〕

〔笺首二玛丽恩温泉，巴尔摩拉尔和奥斯博尔纳宫。

1916年7月中〕

199.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如果你写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也真是要添加一个要求。我会去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至少第二天不是这样。只是病仍然未好。相反地，我觉得很不舒适，头痛，头痛呀！（朗格会说，两个德国人^[145]通信）。是的，朗格在这里，现在这里完全是犹太世界的一种中心点，因为贝尔策·拉比在这里。我已经两次跟着他晚间去散步。他独自付从卡尔斯巴德至马林巴德的车费。弗兰琴斯巴德的树就是逍遥宫，你知道吗？向你和你的家人致以

衷心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7.19—玛丽恩温泉〕

200.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亲爱的迈耶先生：

旅行一回来，就看到了您上月10日的来信和书籍。对此谨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感谢。

关于出书问题我同您的看法一样，尽管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比您更绝对些。我认为，等到我能够奉献出一个完整的新的作品之时再予出版，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也许我不如闭口不语。而我当前确实没有这样的作品，并且觉得我的健康状况远未好到有能克服这儿的其他障碍来写一部好作品。近来我虚度了三四年时间（使事情更糟的是，这种虚度丝毫不失体面），而现在尝到酸涩的苦果了。还有别的因素压在我身上。您热情地建议我去莱比锡休假，但我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响应。在四年、三年，甚至两年前，就我的处境和健康而言，我还可以也应该这么做。现在我只有耐心等待，等把唯一也许还能帮我一把的药品拿到手中。这药品即是，少量的旅游，多多的休息和自由。

在此之前我奉献不出较大的作品，所以只剩下这个问题（从我的角度出发我会给以否定的回答的），现在将题为《惩罚》的这几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刑营》）发表是否有好处。如果您认为，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有较大的作品为后继，还是这么做好，那么我也完全相信您那肯定是我强的眼光。

致最亲切的问候！并代向沃尔夫先生致意！

F.卡夫卡敬上

1916年7月28日于布拉格

201.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迈耶先生：

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有涉及我的说明。我从中看到，您也放弃了出版中篇小说集的想法。我使您在目前情况下有完全的权利，因为您会把卖的、您想要的那本书同这本书保存起来。相反地，我会完全同意将《末日审判》小说集中的《在流刑营》取出来，以后不仅将《在

流刑营》，而且将《阿卡迪亚》里的《判决》，即将每篇小说都收进一本自己的小书里。后一种出版对我来说比出中篇小说集有利。就是说，每篇小说都可视为独立成篇，有其特别的效果。如果您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请先登载《判决》，我比别人更关心这一篇。《在流刑营》可以放在后面的任何地方。当然，《判决》短，但并不比《艾塞》或《苏林》短多少。《蝙蝠》的印刷页也许超过30页，《在流刑营》超过70页。

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卡夫卡 谨上

1916年8月10日于布拉格

202.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迈耶先生：

我们的信件显然互相交错了。言归正传，把《判决》和《在流刑营》放在一本小册子中出版不合我的本意，我宁可看到一本规模更大些的。沃尔夫先生在《司炉》出版前后答应过出这么本大些的书，但我现在可以放弃这个要求，只请求给《判决》出个单行本。《判决》是我特别重视的，它虽短小，但它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更是诗，它需要留有更大空处，给它多留空处也不是不值得的。

致最亲切的问候！

F.卡夫卡敬上

〔明信片〕1916年8月14日于布拉格

203.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根据贵社上月15日热情的来信的要求，我把为何提出单独印行《判决》和《在流刑营》两个本子的原因归纳如下：

当初，根本没有说起过在《末日审判》上发表的事，话题是关于出

一本名为《惩罚》的小说集（《判决》、《变形记》、《在流刑营》），沃尔夫先生很早以前就向我展示了这一前景。这几篇小说构成一定的整体。尽管一本小说集要比《末日审判》中的小册子拥有更可观的地位，但如果有可能给《判决》出一本单独的小册子，我十分愿意放弃出版小说集的要求。

至于是否可将《判决》和《在流刑营》收在同一本《末日审判》小册子中发表，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即使根据你们来信中说的规模，《在流刑营》本身就足以构成一本小册子。我想补充说明的仅仅是，按我的感觉，在《判决》和《在流刑营》之间会产生一种惊人的联系；《变形记》无论如何可以居间调停；没有它的调停，那真不啻是将两个陌生的脑袋强行扭拢来撞在一起。

为单独印行《判决》说话，我以为有如下理由：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叙事的，不如说是抒情诗，因此它需要周围留有完全自由的空间，那样它才能发挥。它也是我最心爱的作品，所以（如果有可能）让它有朝一日独立于世间，是我一直怀着的愿望。由于现在排除了出那小说集的可能，应该说正是最佳机会。顺便提一下，由于《在流刑营》不会马上在《末日审判》系列中发表，我便有可能把它提供给《白色书页》。但这事确实只是顺便说说，因为我认为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让《判决》单独发表。

出版技术上的困难真是不可克服的吗！我承认，用巨型字体印刷不太合适，只要用蝙蝠字体印刷就完全可以印出30页来，再说远远不是所有《末日审判》的小册子都有32页，比如《艾塞》只有26页，还有其他我手头正好没有的小册子也是如此，比如哈森克莱弗和哈尔德柯普夫的书都只有寥寥数页。

所以我认为，印单行本这个忙贵社是完全能帮的（我会把这一举动完全视为热情的帮忙）。

致崇高的敬意！

F.卡夫卡 敬上

1916年8月19日于布拉格

尊敬的迈耶先生：

依我拙见，比如说它们将会大大丰富《末日审判》，它们将把一个新的中低音带入许多富有时代精神的声音之中。我还觉得怀格尔尚具有其他强大的、我们还远远不曾得知的能力。这里寄上的诗歌只是一个计划结集的、也已够得上一个集子的选本，那集子里的诗还有几乎同样数量的未被入选，本打算以第一首诗《喂，我们在衰老》为题。如果您在作出最后决定前还想看其他一些诗，我可以马上寄给您。

致最热烈的问候！

弗·卡夫卡 顿首

〔19〕16.9.30〔布拉格〕

205.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库尔特·沃尔夫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再一次向站在我们身边的您^[146]致以问候，尽管现在距离的远近不是什么关键因素。您对我的稿子^[147]的亲切评语使我非常受用。您对于我的作品中的难受性的意见与我的看法完全一致，我对我至今写出的似乎所有作品都抱着这种观点。您看看好了，没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沾上这种难受性的是多么少！在解释最近这篇小说时我只想补充一点，不仅它是难受的，更甚者是我们共同时代和我的独特的时代，它们同样是非常难受的，过去是，现在也是，而我的独特的时代甚至比大家共同的时代难受期更长。如果我能继续写作，或不如说，如果我的处境和状况全都咬紧它们嘴唇里的牙齿，勉强允许我从事我所渴望的写作，谁知道我在这条道上已经陷得多么深了，然而，它们根本没有这么做。像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等待安宁的时候，届时我将至少能在表面上把自己作为无可置疑的同时代人加以描述。至于这故事不应收入《末日审判》，我也完全赞同。当时也不能拿到戈尔茨演讲厅去。11月我想在那里朗诵，但愿也能在那里朗诵。您为这本小说集提供出版机会，是非常热情的，然而我相信（尤其由于现在《判决》承蒙您的热情友好单独出版了），这么一本小说集只有在一部新的、更大的作品问世前后出版才有意义，也就是说现在还不合适。我觉得在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里的有关话语中也能看到这种观点。大约一周前我把恩斯特·怀格

尔的一些诗歌（他是画家弗利茨·怀格尔的弟弟，这位画家的东西包括给格奥尔格·米勒、陀思妥耶夫斯基画的插图）寄给了迈耶先生，现在有机会让您在莱比锡也读到这些诗，我很高兴。也许出版社有可能以什么方式发表这些美丽的诗歌，不必马上就发表，当然能“马上”是求之不得的。初读这些诗也许会误以为它们同前后的诗页有各种重复关系，但只要读下去，那么我认为读者一定会从整体的统一性中发现，那些小的重复衔接确实小，但那些大的衔接在褒意上确实大，犹如一片大火中的火苗。这就是我的感觉。

弗兰茨·卡夫卡

〔19〕16.10.11于布拉格

206.致西格弗里德·略韦博士

当然只去马林巴德！在狄亚娜霍夫餐馆吃早餐（甜牛奶，鸡蛋，蜂蜜，黄油），在马克斯塔尔迅速吃早餐（酸牛奶），在尼普顿餐馆吃午餐，由服务员米勒结账，去水果商那里吃水果，打个盹，在狄亚娜霍夫餐馆用盘子吃牛奶（预订好的！），在马克斯塔尔喝酸奶，去尼普顿餐馆吃夜宵，然后在市立公园坐下，数一数他的钱，去买糕点，然后写上几行字，睡一夜，仿佛将21夜的觉合在一起睡，睡得那么香甜。

这一切在雨天比晴天做起来似乎更好一些，因为在雨天散步不会来打扰，在遥远的咖啡园里总是缺某些东西，例如在阿尔姆咖啡馆缺牛奶，在尼姆罗德咖啡馆缺黄油，在所有的咖啡馆都缺面包，一般来说面包总是应该不断地端来的。

我不必买报纸。在狄亚娜霍夫有刚出版的柏林日报，在市政厅阅览室里其他的报纸（没有杂志），每家住馆至少订了一份马林巴德的日报的晚间新闻版。

在犹太人胡同入口处有水果卖，特别便宜，但不是正宗。

我个人宁愿住你记下的在林泉附近的房屋，这不仅因为我在那里住过，狄亚娜霍夫餐馆就在附近，而且其他的房屋群都可能坐南朝北。尼普顿餐馆值得推荐的菜谱是：什锦蔬菜，艾门塔尔干酪^[148]，皇帝肉^[149]，生蛋拼青豌豆。

如果你要晚上工作，你就住带阳台的房间（不要离邻居的阳台太近），夜间可以把灯移到阳台上，你们就有两个房间，在阳台上特别安静。

在去马克斯塔尔的路上有好水果（这是我在宁静的夜里在阳台上想出来的）。如果你有某种不舒服或其他什么，你可去市政厅找“孜孜不倦的新闻部主任”弗里茨·施瓦帕赫尔，他建立了一个暂驻马林巴德的记者协会。

今天写到这里。你们去吧。想到你们在那里作某种代表，我感到十分愉快。

〔1916年〕

1917年

20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昨天我本想祝贺你们新年，但是这不行。我看见你那样安详、聚精会神地阅读，然后打开提包，拿出纸张，写字，向你拜年对我来说不成问题，但我不可以打扰你。当然，你旁边放着一个杯子，通往点灯的起居室的门半开半掩。我只是说，如果你是在开始喝咖啡来提神，或者你妻子出来，那么我也许可以去祝贺了。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当你妻子最后出来，你津津有味地吃什么东西，开始与她谈话时，我当然羞于从远处眺望，因此未能证实你中断工作的时间是长是短，所以我未去成。下次见。

致亲切的问候！

顺便说一句，报纸上有好消息。

弗兰茨

〔邮政明信片邮戳：1917.1.2—布拉格〕

尊敬的科尔维尔先生：

现在我得到您的诗了，非常感谢。我对它们的到来本已不抱希望了，我为此感到惋惜，因为它们在我这很快就会忘却一切细节的记忆力中留下了强烈的总体印象，我很想重温一遍。这一点我现在可以通过这三首诗做到了，尤其是《飘》[151]，它最有力地重新唤起我在慕尼黑获得的印象。在那里，我是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读这些诗的。我把我的故事[152]当成旅行车辆带到那里去，那座城市除了是个与朋友会面的地方和恶劣的青春时代回忆场所外，与我毫无关系可言。我在那里朗读了我的肮脏的故事，语调神态完全是漠然的，没有任何空炉膛比这更冷的了。然后是与陌生的人相聚，这在此地是很少的事。这些人中的普尔沃有一段时间甚至使我着迷，我当时觉得您很普通，没有对您产生特别的兴趣，但第二天在咖啡馆里，我对您叙述您的生活、您的写作和计划时的满足神情感到惊讶，您所复述的一篇散文作品使我手足无措，最后我伸手接过了您的诗歌（这一举动与我在慕尼黑时的整个心理状态居然一点不沾边）。这些诗中有些诗行如隆隆鼓声击着我的大脑。它们是这样纯洁，这样清白无罪，来自纯洁的呼吸中，我真想把我在慕尼黑的所作所为全部用它们来洗涤一遍。其中许多内容我现在又领略到了。但愿您能记得我并继续寄些作品来。

致最诚挚的问候！

卡夫卡 敬上

〔19〕16年[153]1月3日于布拉格

尊敬的科尔维尔先生：

我最近病了，现在还没好，我的胃不听话。否则我早就给您写信并为您寄来的邮件表示感谢了，您的邮件给我带来了愉快。我敢说，以后您若不时寄一些来，每一次都会给我带来愉快的。这是些充满安慰力量的诗，全都是安慰之歌。您看来只有一只手伸在黑暗中，也许是为了不

至于完全脱离大地；而全身其他部位全部充满光亮，美好而真实的光亮。正由于您有这一特点，所以有时候很明显地出现的一种冷冰冰的感情转折使我难以接受，这种转变好像是在秋千架上（即使不是最高的秋千架）完成的，而不是在心中；这种转变是无懈可击的，但对于您来说恰恰是很不合适的。比如这种转折就充满了那首本来朝着最高的真实性进发的安慰之歌，就像是在那里架上了两根巨大的支撑梁。再比如《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中的一部分也是这样，读这首诗的一些诗句，心情显然是往下沉的。依我看，一个强有力的相对的例证是那首秋之歌，它整体飘逸，因而有庄重感。

您在出版社那儿老是碰壁，这并不使我惊讶，您既不使人惊愕，也不使人恐惧，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从长远看人们将无法抗拒这些诗的力量。所以我也不相信（我不知道您将用以反驳我的也许更有力的理由是什么）真有什么人恰恰与您过不去，应该说，如果不相信有这种敌意（若相信有这种敌意，就会满怀忧愤），同样能够理解初期的困难。至于库尔特·沃尔夫那儿，我当然将尽力去了解您想要知道的一切。不是直接打听，因为我与他的交往是微不足道的，无影响力可言，但是可通过我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去交涉。望来信告知具体情况，最好讲明具体该问些什么或干些什么，以什么方式为好。

致最诚挚的问候！

弗兰茨·卡夫卡 顿首

〔19〕16.1.31，布拉格

3

尊敬的科尔维尔先生！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诗歌新作。如果我没有搞错，那么这真的是一些新作。与先前相比许多新的世界敞开了。您的王国是多么广阔啊！

沃尔夫让步的消息使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从长远看有价值的东西是不会为他的见识所忽略的，而且从不正确的否定到正确的肯定的过程在他那儿不会太长的。假如您关于敌意阴谋的估计是正确的，这个过程也许甚至是很短的。

最诚挚地问候您和索沫费尔德博士先生！

209.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上月20日我寄给贵社一张挂号明信片，证实我收到了1917年《观察》一书的账单，并请你将约95马克汇给菲莉斯·鲍威尔小姐，地址：柏林O—27，马库斯大街52号，技术工场。同时我询问，将是否和怎样结算《司炉》和《判决》第二版的版税。

至今我未得到贵社对我这张明信片的答复，上述那位小姐也没有收到这笔钱。后者之所以令人为难，是因为我在当时寄明信片时也给了汇款地址。现在我请贵社劳驾看看我的明信片。

此致敬礼！

弗·卡夫卡博士

〔19〕17.3.14，布拉格

210.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你做得很好，我愿你无限快乐。平常我去有困难，但星期天我也许去。我不该把奥斯卡带去吗？很遗憾，我不知道我第二天是活着，还是头晕。头晕的可能性更大。我去时将给你带去《评论》杂志上海曼的一篇优秀的、关于选举法的政治文章，它艰深难懂，也许在你的帮助下可以理解。

衷心地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弗兰茨

〔19〕17年夏于布拉格

211.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库尔特·沃尔夫先生：

我非常高兴，又直接听到了您的消息。今年冬天（当然已经又过去了）我轻松一些。这个时期可用的一些文章我现在寄给您，共13篇散文[154]。这远不是我想寄给您的全部。

致衷心问候！

弗·卡夫卡敬上

1917年7月7日于布拉格

212.致伊尔玛·韦尔奇夫人

亲爱的伊尔玛夫人：

您的信在我们动身以后（我们星期三中午动身）才到达，我现在才收到。我虽然昨天清晨到达，但是今天中午才到商店里，我表妹将信在那里收妥。因此迟复。

当时在我到您那里之后不久，我就在妹妹住所找到了这个口袋。口袋不幸丢失，我也痛惜。我从您那里一直跑到已经翻遍的住所。跪在地上找遍了每块地方，终于发现这口袋放在一口箱子下安然无恙，被压扁了。当然我为此成绩特别引为自豪，因此最好立即去那里。但是那时我必须首先告知家里，而在家又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耽搁，下星期一我们要动身。通知您的事再三被推迟。我本不想写信，因为我原想亲自去找您。终于我没有写，因为写信也太晚了。我又请马克斯将此事转告您。此外他对我说，您长得跟我的未婚妻一模一样，我根本不当真相信，口袋可能留在您那里了。我也多次对您说过，尽管真是如此。我的未婚妻相信，口袋在离开您的住所时还有的，我本来只是出于不想耽误的正式原因来查询的。

这也许就是我的申辩。话够多了，也许甚至太啰唆了。要不是您的信到了，我几乎会感到冤枉的。既然您显然还要继续想到那个小口袋，也许甚至还找它，那么所有这些申辩当然不足，我不得不转而恳求您决不要因此扫了我找到口袋的兴，怪我疏忽而对我生气。尽管在口袋里有900克朗（这说明我的第一次通知很迅速），这也会是给拾得者的一笔

非常高的报偿，我本该为此给走运拾得者支付报偿费的。您现在不用付了。

致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19〕17.7.20〔布拉格〕

213.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库尔特·沃尔夫先生：

您给这些稿子以这么好的评价，给了我一定的信心。如果说您认为现在出版这些小散文（当然也许还要加上两小篇，已收入你们的年书中的《法律门前》和这次随信寄上的《梦》）是正确的，那么我非常赞同。至于出版的形式，完全由您定，目前我对酬劳多少也完全不在乎。这一点当然将随着战争的结束完全改变。我将放弃我的工作岗位（放弃这一岗位是我最大的愿望），将要结婚，离开布拉格，也许迁往柏林。我现在这么想，届时我也不能完全靠文学劳动的收入来过日子，尽管如此，我或深居于我身上的那个公务员（两者是一回事）对那个时候怀着一种心情抑郁的恐惧。我只希望您，尊敬的沃尔夫先生，届时别完全抛弃我，当然前提是，我值得您留恋。现在您若说一句话，对于我将十分重要，尽管今天和未来还存在种种不安定因素。

致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上

1917年7月27日于布拉格

214.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库尔特·沃尔夫先生：

为了在您休假期间不再次打扰您，我今天才对您上次来信表示感谢。在信中您对我的担心说的话完全是友好的，目前对我来说完全够出一本书了。

新书名我建议用《乡村医生》，副题《小说》。目录我想大约这样排：

新律师

乡村医生

铁桶骑士

在画廊

往事一页

法律门前

豺狗和阿拉伯人

访矿山

下一个村庄

一道圣旨

家父的忧虑

十一个儿子

兄弟谋杀

梦

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

致亲切的问候！

弗·卡夫卡顿首

1917年8月20日于布拉格

215.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您关于《乡村医生》的美妙建议真是再好不过了。若是从我个人利益出发，我没有胆量写下那些字，无论面对我，面对您，面对这件事，

但由于是您自己向我提供的，我欣然接受。大概也是用《观察》那种美丽的开本吧？

在《在流刑营》上也许有误解。我从未发自内心地希望能发表这篇小说。结尾前的两三页是粗制滥造的，它们的存在指出了一个更深处的贫乏，不知何处有条蛀虫，它把故事的饱满实体也噬空了。您提出以与《乡村医生》一样的方式出版这个故事，当然是非常吸引人的，它的诱惑力几乎使我不战而降——尽管如此，我请求您（至少目前）不要出版这个故事。但您如果站在我的位置上，而这篇故事像看着我那样看着您，那么您在的这一请求中将找不到特别坚定的因素。不过，假如我的力量还能坚持一会儿，您将能得到我的比《在流刑营》更好的作品。

从下周起我的通讯地址是：

屈劳，波希米亚的弗略瑙邮局。

由多年头疼和失眠引发的疾病突然爆发出来了。这几乎是一种轻松。我将到农村去较长一段时间，应该说是我必须去。

致衷心的问候！

F.卡夫卡 敬上

1917年9月4日于布拉格

216.致马克斯·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马克斯：

给你和费利克斯一封复写的信，为我母亲作第一次解释是惊人的容易。我顺便简单地说一句，我也许目前不会租住房，我感到很不适，有些神经质，宁愿试图得到更长的休假，然后去O.处。由于她那无限的愿望，几乎明确地要给我随便多长的假期（如果这取决于她的话），她在我的解释中没有找到丝毫可疑之处，至少目前是如此，父亲的情况也一样。因此我请求你，如果你对某人谈起此事的话（当然，此事本身不是秘密，我的身体状况是，一侧肺结核扩大了，另一侧缩小了），或者说，如果已经谈了，请求您补充说明一下，即使我父母在谈话中要求某人谈此事，他也不要在我父母面前谈什么。如果容易做到暂时消除父母

之忱，那么确实应该一试。

马克斯，我再次谢谢你（没有复写）。我去了，确实很好。若没有你，那肯定办不成[155]。此外，你在那里说，我很轻浮。相反，我太精打细算，《圣经》已预言了这些人的命运。但是我不诉苦，今天比以前更不大诉苦。我也预言了自己的命运。你记得《乡村医生》中的流血伤口吗？今天F的信到了，语气平静、友好，没有任何补充，完全像我在多少梦中所见到她的那样。现在难以给她写信了。

1917年9月5日〔布拉格〕

21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第一天我没有写东西，因为我太满意了；我也不打算夸大其词，尽管我是应该这么做的，这样能给恶魔以提示。但今天一切都带有自然色彩，内在的孱弱出现了（不是那疾病，目前我对这疾病还是一无所知）。从对面的庭院里传来一阵阵诺亚方舟汇集的叫喊声，一个永远敲打铁皮的白铁工[156]敲打铁皮，我毫无胃口，但吃得太多，没有晚上的灯光，等等。但是善还是远远多于恶，就我现在观察得到的而言，奥特拉真的让我坐在她的羽翼上，载我穿过这充满艰难的世界；这个房间（虽然朝向是东北）棒极了，通风、暖和，房内几乎是一片寂静；我应该食用的一切都很充足而且高质量地布满我的四周（只是嘴唇抽搐着不愿进食，我每次换环境的头几天总是这样），还有自由。尤其是自由。

当然这里还存在着创伤，其象征仅是肺部创伤[157]。马克斯，从你在走廊里讲的最后几句话看，你误解了，但我可能也误解了，而对这类事情（在你的内部事务中同样如此）根本就不存在理解，因为事情不能一览无遗，这巨大的、不停生长发展的载体是那样千疮百孔，不断地活动着。不幸，不幸，这不幸同时只不过是自己的本质，一旦这不幸的结被解开（这种事也许只有女人有耐心做），你我都将崩溃。

我现在对结核的态度，就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裙边的态度，抓着不放。如果这种疾病来自母亲那儿，事态将更明确，那么母亲将以她无穷的细腻来进行这种服务，不管是否理解这件事情。我不断寻找着这疾病的产生原因，因为这病并不是我力争得来的。有时我觉得大脑和肺在不

为我所知的情况下取得了相互的信任。“这样下去不行”，大脑这么说，五年后肺宣布站在大脑一边。

但我可以这样说，以这种形式来理解这件事同样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初步的认识。这是那个楼梯的第一层，我站在楼梯上方，而作为我的（差不多是拿破仑一般的）人生存在的报酬和意义，婚床在我面前缓缓展开。但它不会展开的，而我的足迹不会越过科西嘉岛，这是肯定无疑的。

以上不是在屈劳产生的认识，它们产生于火车途中。在那段路上，我给你看过的那张写的有字的明信片是我的行李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在这里我当然也不会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向大家转达我的问候，尤其向你那位来自塔尔图弗的女子。她的眼光不错，但过于集中了，她只看到核心；追踪观察那些遁离核心的辐射现象，这于她就过于艰难了。

弗兰茨 敬上

〔1917年9月中旬于屈劳〕

218.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我不能去，不能听。此外，一个病人也绝不能到处乱跑的。

在这里我暂时很满意。我开始过新生活，但不是没有信心。昨天第一次吃午餐时，坐在我桌子旁边的一个人与我形成对照。一个真正的漫游者。他年已62岁，10年来一直在漫游。长着红胡子大帝似的大胡子，脸上干净，气色红润。从桌边往前看去，活像一个退休的高级官员。10年来他除短时间工休以外，一直行乞度日。例如，去年整个冬天他漫游，就穿着现在穿的这身衣服（只有一件马甲，现在他觉得太热，在这期间卖掉了），没有得严重的风湿病，也没有其他的疾病。只是近年来他感到头脑有点混乱。他常常无缘无故地悲伤起来，对一切失去了兴趣。然后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我问他，信仰上帝是否能帮助他。不，这不能帮助他，相反，因此产生期望，接着而来的是悲伤。人们被教导

说，要对上帝虔诚，然后就老是有这样的思想。然而大不幸就是他没有结婚。忧愁吗？他要是以后也有忧愁倒好了，他头脑里首先想到有一个家，膝下有子，享受天伦之乐，过着安逸的生活。他几次有机会结婚，但是他母亲（在他52岁时去世）总劝他不要结婚。两个姊妹和父亲（他同他们一起在埃格兰德开一家小店）也劝他不要结婚。大家都劝阻他，他也就失去兴趣了。他不结婚，就开始喝酒，至今还喝酒。现在他去漫游，常常找到了好人。在波希米亚，例如在莱帕，几年前有一次一个律师（也是博士，但同我相反[158]，已经毕业）给了他一顿午餐和2克朗。在苏劳，他几天前到我妹妹家来过，现在是第二次来，没有要什么。他漫游无特定的计划（虽然他有一张地图，但是地图上看不到村庄），因此他常常是在县里转。人们是否每次又认出他来，他也无所谓。

他有一个真正的不浪费时间的职业。他刚吃完最后一口饭（通过问话，他已不讨厌我了，但是我们多半是相对无言地坐着，由于发窘，我只好暗暗地将食物吞下去），就起身走了。你们寄给我们啤酒制作配方，好吗？以便我们能给客人一点好吃的东西。也许以后也可以给你们搞些吃的[159]。

致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上面的住房我不要。我目前不需要住房，将来说不准。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住房似乎也太大，位置太低，太靠街道和工场，太令人忧郁。

〔1917年9月中旬于屈劳〕

21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像你一样拥有这种细微的直觉！犹如一只鹰寻求着安宁，我飞翔在上空，笔直地扑入这个房间，对面是一架钢琴，我野蛮地击打着琴键，然后弹奏起来。这显然是这片方圆广阔的土地上唯一的一架钢琴。但我掀翻了它，作为对这儿给我的许多好处的报答，可惜只是象征性的。

我们的通信可以很简单，我写我的，你写你的，这样便构成了答复、裁决、安慰、绝望，愿意是什么便是什么。这是一把刀，我们的脖子，可怜的鸽子的脖子，在刀锋上，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另一边被割断。然而割得如此缓慢，如此激动人心，鲜血流得如此少，心脏被折磨得如此凶，两个心脏都这样被折磨着。

道德在这场合也许是最后的因素，或者不如说连最后的也不是，鲜血是第一的和第二的和最后的，事关此事有多少激情，用多少时间才足以把心壁敲得薄薄的；我还是说，在肺不是挡在心的前面的前提下。

F.用几行字宣告将要到来，我不去抓她，她是不同凡响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抓她，但抓不住她。我围着她跑，朝她吠叫，像一只神经质的狗对着一尊塑像。或者用一幅相反的、但同样真实的图画来表示，我看着她，就像一只被堵住了嘴的动物看着一个在他的房间里平静地生活着的人。一半真话，千分之一真话。真实的只有，F.也许会来。

这么多因素挤压着我，我找不到出路。我想一直待在这里的愿望是错误的希望。自我欺骗吗？我是说，在农村，远离铁路，靠近那不可磨灭的夜晚，它（夜晚）姗姗降临，而没有任何人或物对它作出任何抗拒。如果是自我欺骗，那么我的血会诱使我成为我的舅舅的新的体现。他是乡村医生，有时我（怀着满腔的、最真挚的同情）称他为“唧唧喳喳者”，因为从他那与众不同的窄小的咽喉里会源源冒出尖声尖气的、单身汉所特有的、鸟一般的幽默话来，他的幽默可谓从不离身。他便这样生活在乡间，谁也赶不走，心满意足，就像有点陶然的疯癫使人心满意足那样，并认为这是生活的旋律。假如对农村的向往不是自我欺骗，便是好事一桩。但以我34岁的年龄、极成问题的肺和更成问题的人际关系，还能等到这一天吗？成为乡村医生的可能性更大；你要求得证明，马上就有父亲的诅咒为证；我的与父亲搏斗的希望是一幅绚丽的夜景。

你对那篇小说的构思（我们且撇开搏斗的双方）与我的愿望完全相符。那篇小说具有伟大的前景。但那无论如何写得过于轻率的头两章在这些构思面前站得住脚吗？根据我的感觉是绝对不行的。你所写的那三页算是什么呢？它们对整体起什么决定作用呢？提荷遭到驳斥使你感到痛苦吗？凡是真理都是驳不倒的，所以他也驳不倒，只是也许会被战胜。但正像所有军事报道者所写的，这不是从来都是最佳的进攻方式吗！起立，跳跃，战胜对方。这是面对巨大的堡垒时必须不停地反复进行的过程，直至在全集的最后一卷中幸福而疲乏地倒下，或（这是最不

利的情况)是长跪不起。

这些话并无悲伤之意。我实质上也并不哀伤。我同奥特拉过着小小的美满的婚姻生活^[160]；不是建立在通常的汹涌的洪流性质上的那种婚姻，而是一条稍有些弯曲、基本直线奔腾的河流。我们的家务管理得十分漂亮，我希望，如果你们来到这里，定会喜欢的。我将为你们，为费利克斯和奥斯卡留下一些东西，这不容易，因为这里吃的东西不多，而众多的家内食客都有优先索取权。但总能留下一些的，只是必须自己去取。

是的，还得谈谈我的病。没有发烧，抵达时体重为61.5公斤，到来后肯定有所增加。天气很好。我常躺着晒太阳。目前不想去瑞士，关于那个地方，你要听只能听到去年的消息。一切顺利！愿从天上降下一场令人安慰的雨！

弗兰茨

如果你需要一个写信代笔人，我完全可以把我的打字员小姐借给你。

你一定已经收到我的一封信了吧。邮程为3—4天。

〔1917年9月中旬于屈劳〕

220.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收到啤酒配方，非常感谢。我们即将品尝啤酒，寻找用它陶醉的地方。如果人们想得到某些重要东西的话，就必须陶醉。对这里的需要来说，一切都相当丰富，但是为了多积累，这就不够了，特别是在像我这样的寄生虫（我在第一周体重增加了1公斤，天平是这么显示的）在这里住下的时候。但是我一定为你们，费利克斯和马克斯，积蓄一些。我同布拉格的联系当然全断了，特别是那位大供货商。任何一张广告都在他头上飘荡，因此他不得不躲在黑暗中一些时候。

也许马克斯对你们讲过，我对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很满意。当然，这里也没有你特别问起的安静。我将停止追求生活中的安宁。我的房间虽

然在一幢寂静的房子里，但是对面存放有波西米亚西北部唯一的钢琴，在一个大庭院里，动物的叫声一个高过一个。几乎本地所有的畜力车一清早都从我的房间前面经过。鹅群都从那里跑向池塘。但是最糟的是某处的两个敲击者，一个敲木头，一个敲金属，特别是前者不知疲倦，他使劲地敲，他劳累过度，但是我一点不同情他。我从早晨6点听他敲木头，如果他真的停一会儿，那只是为了让敲金属的人也敲一会儿。

尽管如此，尽管还有些其他的情况，我仍然不去布拉格，根本不去。谨向你和亲爱的夫人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你们想必收到了我的信吧？通信在这里不仅慢（从布拉格寄一封信要三四天才能到达），而且不保险。

〔1917年9月中旬于屈劳〕

221.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你记得，你是怎样看你走到了楼梯上打算旅行的最后愿望吗？如果你认为这是考验，我担心我经受不住。考验不能锻炼我，我但愿在我的地方不得到打击，而是跑开，消失在打击之下。我不能结婚，难道因此我应感谢吗？那样的话，我会立即变成我现在逐渐变成的样子——疯狂。休养的间歇期越来越短，在这间歇期里，不是我，而是另一种东西积聚了力量。

终于我可能注意到的古怪事情是，所有的人都对我非常好，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愿立即舍己救人，为我作出各种牺牲。我由此得出一般的人性的结论，感到因此受到更多的压抑。但是这很可能不正确，他们完全只是属于那些完全不能帮助人的人。一种特别的嗅觉向他们显示了这种情况。马克斯，也除了你，许多人（不是所有的人）很好，有牺牲精神，但是你也正在不停地向世人付出什么，这是一笔地地道道的交易（因此你也能本着人道精神来处理我几乎不可捉摸的事情）。但是我不付出什么，至少不付给这些人。

随信附来父亲雅诺维茨的信，至少是令人高兴的，他很可能得到友好的复信。这封信是现在才能寄给我的。请问候费利克斯和奥斯卡。究竟怎样将信送达巴勒斯坦呀！

弗兰茨

〔1917年大约9月中旬于屈劳〕

22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邮件收到，非常感谢。那位姑娘的信（我在奥特拉房间里，现在老鼠正无耻地吵嚷不休）远不是最好的。这种审慎，安宁，优势，世俗，这是好极了的和可怕的女性——最近我会把一切寄还给你。在风景明信片上我把我的窗子画了个框框，奥特拉的房子坐落在有标记的那棵树后面。不过，实际上一切更好些，在现在的阳光中就更好了。

弗兰茨

F.的电报下午刚到。

〔附言〕我们将去火车站接您，甚至用车接。否则，您根据弗兰茨的示意图去怀格尔先生的住所，而不来我们这里。在您到达时，您自己会见到我们的房子的。我不作标记了。

奥特拉·卡夫卡

〔风景明信片（屈劳），1917年9月中旬〕

22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这似乎是一个误解。我们邀请了你，也就是你们，让你们到这里来，以免你们带走这里不多的东西。如果略提一下这种东西的话，那么只应该是诱惑。我觉得主要困难似乎在于获得休假。但是正是这个困难你最容易解决。两个人都有睡觉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却没有很多机会，

对于局部的需要和去旅行的病人来说暂时够了，甚至有某种盈余。但是只容许渐渐减少，并且减得很少。至少将为您节省一些。

迁居前我真紧张，在许许多多的微不足道的东西面前我无能为力。我不喜欢茶疗，但是也许我再也说不上有什么保健品能治疗我的肺病。只有这一个，即一件西服上衣，是这种疗养所需要的，它后面的口袋可以放个暖水瓶，但露出半截。

是去哪个俱乐部的请柬呢？去犹太人俱乐部的？如果你将作一个公开的报告并及时地作了预告，你就会有听众，甚至有专从地方来的旁听者，当然前提条件是可以将他们运来。

无疑，目前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的体重第一周增加了1公斤。我感到疾病起初与其像魔鬼，不如说像守护天使。但是很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先是一件事物中有魔性，也许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时，其中表面的天使性显得最糟。

米尔施泰因博士的信昨天来了（此前我刚写信告诉他，说我曾在P.教授[161]处，还附上专家鉴定书副本），信上说，您肯定能期望好转（！），但是只有在较长时间之后才能察觉出是否好转。

于是，由于他的鉴定，我的前景渐渐黯淡了。根据第一次检查，我几乎完全健康，据第二次检查，我的身体甚至更好。以后患轻微左侧气管炎，再晚些时候检查，“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地说，左右两肺患肺结核，但在布拉格将会很快治愈。现在我终于肯定有好转的期望。仿佛他本想用自己的阔背挡住支持他的死亡天使，现在他逐渐挪向一边。两侧也（可惜）吓不倒我。

我在这里的生活美极了，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好天气中是这样。我虽然没有阳光明媚的房间，但有一片阳光充足的空地可躺着晒太阳。我拥有的是一个高地，甚至不如说是一块小小的高原，位于一片广阔的半圆形盆地的中间。我躺在那儿犹如国王，四周的群山大体上与我身下的平地高度相同。由于附近环境十分有利，几乎没有任何人能看到我，就我的躺椅的复杂拼搭法和我的半裸状态而言，这一点是很舒服的。只有极少几次，我的高原边上冒出几个反对我的脑袋来，他们叫道：“从凳子上爬下来！”由于他们说的是方言，所以其他喊话虽然可能更激烈，但我就听不懂了。也许我会变成乡下傻子的，我今天看见这么一个，他看来住

在邻近的一个村庄里，已经上了年纪。

我的房间不像这块场地这么好，没什么阳光，也不安静。但布置得不错，会使你们满意的，因为你们将睡在那里。我完全可以睡在另一个房间里，比如昨天F.在这里，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为F.的缘故我想提一个类似向图书馆管理员提的那种请求，你是知道我们那由来已久的“bis”争论[162]的。这回我误解了她的意思。她认为，“bis”虽可用作连词，但只能用以表明“直到”的意思。因此，比如就不能讲：“bis你来，我将给你五百公斤面粉。”（别激动，这只是一个说明语法的例子）你能否查一下格林[163]（那些例句我已经忘了）或其他书，然后确定F.是否言之有理。这件事对于表明我在她面前既是人间的狗又是地狱的狗的双重地位的性质，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还有一个与此并不矛盾的请求：在威廉·施台克爾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中的病态干扰（手淫和同性恋）》[164]第二卷中，名字可能略有出入（你是知道这个维也纳人的，他到处用弗洛伊德来装潢自己的门面），有五行谈到《变形记》。你如果有这本书，那就帮个忙，把那段话抄下给我。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还有个请求，但这是最后一个，我在这里几乎只读捷克语和法语（的书），而且几乎只读自传或书信，当然是印得相当不错的版本。这类书你能每种寄一本给我吗？选择权完全交给你了。这类书几乎都是对我非常有用的，除非是过分单一的军事的、政治的或外交的内容。可供选择的捷克语书籍也许特别少，而且我已读过这类书中也许是最好的一本，即波契娜·涅姆科娃[165]的书信选，它所含有的人对人的认识是取之不尽的。

你的政治书现在怎样了？[166]

致以热烈的问候！

弗兰茨

我产生了这么个想法，浪漫主义的爱情生活（故事）也不错。但上述那两类书更重要。如果需要保证金，你就先帮我垫一下。那四册书（石桥和布拉格）你一定已经收到了。——一旦你告诉我书已买好，会有人到我们的商店里去取的，然后我会收到一个纸包，有人不时给我寄

这类纸包的。

奥特拉从昨天以来一直在布拉格，否则，她也早写信了。

前一页删去的话是我疏忽了的一个问题的开头，因为里面有些话会引起专家过多的不文雅的好奇心。现在我承认身体情况已有好转。我可以问一句，你对罗伯特·韦尔奇的情况了解什么吗？

〔1917年9月22日于屈劳〕

224.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第一次读你的信，觉得信里有一种柏林的弦外之音，第二次读的时候却已乐停曲止了。这就是你。我总是想，病好要时间，时间到了病就好。但是你总希望，我作了检测抽样，现在我一定是绝对不发烧了，没有波动曲线了。但是在第一周的数据出来之后，教授也暂时失去了对此事的兴趣。——早晨吃冷牛奶。教授说过（在辩解时我的记忆将庄严地作证），牛奶要么喝冷的，要么喝热的。由于天气暖和，喝冷牛奶不要紧，何况我已习惯于喝冷牛奶，通常喝半升冷牛奶，顶多喝1/4升热的。——未煮开的牛奶，未解决的争端。你认为，巴西人增强了体质，我认为，事情不是能用数字计算的，未煮开的牛奶更有力量。我不是固执己见，也喝煮开的牛奶，一旦天气变冷，我将只喝热奶或酸奶。——没有餐间问题。只是在开始时期，在进行喂食以前，或者在我根本不想吃饭的时候，才不分餐。否则，上午和下午各饮1/4升酸奶。我不能吃更多次。（一般来说）生活够悲哀了。——没有睡眠疗法？我每天大约睡8小时。虽然不是睡在特制的躺椅上，而是躺在一个装置上，但这比我躺过的许多躺椅更舒适。这是一张古老的宽软垫椅，前面有两个凳子。这种组装好极了，至少现在我不需要盖被。因为穿得暖暖的吗？我是躺在阳光里。遗憾的是，也不能脱裤子，近日来这条裤子是我唯一的裤子。一张真的躺椅就摆在路上。——去看医生。我究竟什么时候说过，我将不去看医生？我不乐于去，但我会去的。——施尼策医生未答复。——你认为，我太难判断这个病对前途的影响吗？不，我怎么能判断呢？病的现状我觉得很轻，在这里感情是最大的关键。如果说，我曾这样说过，那只是一种空洞的感情，我在穷的时候富于感情，换句话

说，这说的是病，而不是说我的病，因为我为此请求过他们。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只能完全信任地献身于死亡。

你说得对，是否优柔寡断或是别的什么，这只取决于前景。优柔寡断的人也总是新手。没有老手优柔寡断的，因为优柔寡断总是浪费了时间。你未看清我的情况，这既古怪，又可爱。我谈F也许更合适得多，即使如此，这种完全是终生造成的情况也不会消失。另一方面，我根本不相信此说，我若处于你的位置，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处于自己和你的情况，都会像现在外面狂吠的狗一样无能为力。我只有靠我身上的小小的热量能帮助，此外什么也没有。

我读过一些东西，但是这同你相比，不值一提。最好的是司汤达的一件轶闻，它可能也登在《教育》刊物上。他是巴黎的青年人，无所事事，好奇，悲伤，对巴黎和一切不满。他住在一个亲戚家。那位亲戚的熟人圈子中有一位已婚妇女，她有时对他很友好。有一次她邀请他，同她和她的情侣一道去卢浮宫。（是卢浮宫？我表示怀疑。只是某一个这样的宫。）他们去了，他们从卢浮宫出来时，大雨滂沱，到处是泥泞。回家的路很远，必须乘车。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肯一起乘车，独自一人步行回去。他几乎掉下泪来，他想到，他本可以不回自己的房间，而去拜访住在附近胡同的这个女人。他完全心不在焉地上车了。当然他发现这个女人同其情侣做爱的场面。女人惊呼：“天哪，您为什么不跟着一起上车呢？”司汤达跑出去。——此外，他懂得如何过好的生活和面向生活。

弗兰茨

最近请您先写信。

〔1917年9月底于屈劳〕

22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收到你的第二个印刷品邮包是完全偶然的，邮差把它随手放在了一个农民那里。这里的邮件传递很不安全，包括我的信件传递在内（我们这个传递点连火车站都不是，这也许也是原因之一），你把印刷件编上

号是很好的，丢失的邮件通过追询可以索回。这批邮件倘若丢失将是特别遗憾的事。刊登在《犹太回声》[167]上的查西迪[168]教徒的小说也许不是其中最好的，但无论我对其中每一篇的具体看法如何，所有这些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能使我马上产生、并永远拥有宾至如归之感的犹太属性的东西。而在读其他的那些小说时，我只是被风吹了进去，又一阵风把我吹了出来。我想暂时把这些小说留在这儿，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你为什么拒绝了犹太出版社的请求，甚至拒绝了J.博士的请求？这当然是个大要求，而你当前的状况是个借口，但这些足以说明你拒绝的理由吗？你不想把文章凑拢来，是因为一切时间都得用于《艾丝特》[169]吗？

略韦[170]从布达佩斯一个疗养院中给我写来了信，他要在那里待三个月。他给我寄来了给《犹太人》杂志[171]写的文章的开头部分。我觉得它是很有用的，但当然还需要在文法上做一番小小的加工，需要一只极其温柔的手。我将在最近用打字机把它打下来（很短），由你去评判。试举几例困难情况：在波兰戏剧观众眼中他同那种犹太戏剧有区别；穿燕尾服的先生们和被忽略的女士们，这不能说是更加出色，德意志语言可不这么说。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当追求表面效果的演出者的语言摇摆于伊地语和德语之间而更多地偏向于德语时，则他们的表象就显得更加光彩夺目。我要是有你那样的翻译才能就好了！

弗兰茨

山鹑给你一些，给费利克斯一些。祝胃口好。

〔1917年9月底于屈劳〕

226.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到这里来旅行简单得惊人。你先乘车到米歇洛布。即早晨7时从国家火车站乘快车，9时过后即到这里，或者2时乘客车，晚5时半到达。根据电报来理解，我们用马去接你，大约半小时后到达屈劳。这次旅行也可以当做一日郊游（晚10时前到达布拉格），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因

为我房间里有两张非常好的床，你来后，我睡另一间房。如果装一个火炉，这间房好得可以作我的常住住宅。事前会储存足够的牛奶等食品，甚至准备一点可以携带的食物。

尽管如此，我挖空心思也猜不到你们来。在第一周，也许也还在第二周，情况不同于我原来想请你们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我迄今未请你们每个人来拜访，那只是因为在我看来，你们都来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邮局在这里示人以一个坏脾气的不可靠青年的形象，一封信要走漫长的路（屈劳——布拉格——屈劳要8天，甚至还不止8天），才能把那么紧急的消息送到。但是现在，在第三周，这里情况将会不同，我不知道是否应该邀请你们来。对我来说，屈劳当然依旧是老样子，我打算在这里将牙咬紧，使得人们首先必须战胜我的满口牙齿，然后才能将我带走（不，这言过其实了，我写这封信时，我不了解整个情况）。至少我觉得这里好，此外有一些可能没有人喜欢的东西，尽管你们愿意，你们自己也不喜欢，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也许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其中”，而只是我自己。因此我请你们，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对你们说，像以前我向你们乞求过的那样，几乎那么真诚地请求你们，你们现在不要来。

当然，这同我愿意医治的病无关。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体是否比以前好，就是说，我的身体像以前一样好，迄今为止我没有痛苦。若有，也容易忍受和抑制住。也许正是这一点可能引起嫌疑，以为我也许真没有痛苦。我看上去很好，使得我母亲（星期天她在这里）在火车站都没有认出我（顺便说一说，我父母对我患病一无所知，如果你们偶尔同他们在一起，可得说话谨慎）。14天后我的体重增加了1.5公斤（明天将第三次称体重）。我睡眠每天很不相同，但一般来说不是最糟的。顺便说一句，我不久就来（我说的“不久”指的是“本月底”，我已成为时间的主宰）布拉格，你们一定能亲自检查一切，好的和坏的。

你们很友好，给我们寄来了新的药方，这使我们很不好意思。这件事也经历了屈劳的发展。首先是狂喜，缺少软木塞和软木塞机器似乎是一个完全不重要的障碍。接着狂喜消失了，给我留下一个信念，软木塞和软木塞机将绝对买不到。现在你们来信说，你们也能封瓶子了。这可能又使这件事有了一点生气。但是现在店里业务很忙，奥特拉有了长期的好极了的工作。

我的一大忧虑（当然只是在睡椅上做梦才表露出来）是，我怎么能

设法给你们搞点吃的。可惜得到的很少。我们靠这一点东西过活，没有鸡、牛，也没有足够的谷物。此外，我们得到黄油和鸡蛋，布拉格的家庭都在叫喊要这些东西。你们要野味吗？目前我为你们搞了4公斤好面粉，将给你们。最迟我回布拉格时，你们便能得到。我知道，在下一个冬天的黑暗中，这只是一线光辉。

〔1917年10月初于屈劳〕

227.致埃尔莎和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埃尔莎太太：

您不能说出《卢采娜》的意义，您感到奇怪吗？您肯定会对此感到高兴。那里发生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会在人类的窗台下发生。如果有人在那上面待的时间太长，必定会掉下来，掉下来倒好了，可以掉进房间里，也可以掉到室外空地上。这完全是一个极端，w.持此看法。在照片上他是解除武装的，他还作吐痰状，正如他的嘴唇部位在照片和实际上显示的那样。您将表面的微笑解释错了。此外，他不完全是无与伦比的，像您以为的那样。我根本不想骂他，将他同猪相比。但是他性格古怪、果断、忘我、欢乐和不属于职位上的特点，却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倒是真能与猪相比。您像w.一样在近处那么详细观察过猪吗？这令人惊奇。一个人的面貌，脸上下嘴唇超过下颌往下翻，上唇在不损害眼窝和鼻孔的情况下，直翻卷到额头上。这样一副嘴脸，岂不真是地上的猪？这本身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猪，也是古怪样子，猪也不是这个样儿。但是您必须相信我，我现在多次见过这种猪。更古怪的是，猪拱土。据认为，如果用脚试试可疑之处，或者嗅一嗅，或者在紧急情况下贴近嗅一下，就足以证实了。不，这一切他觉得都不够，而猪根本不会这样做的，而会立即用嘴使劲往里拱。要是拱进某种令人恶心的东西——在我周围堆放着我朋友的东西，山羊和鹅的粪便——那可由于幸运连气都喘不出来了。这首先使我记起W.。猪身上不脏，甚至很可爱（当然，友好并不等于有胃口）。猪有一双漂亮的显得温柔的蹄子，总是用一股强劲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正是他那最宝贵的器官，嘴，是绝对的猪的嘴。

亲爱的埃尔莎太太，您见到的，我们在屈劳也有自己的《卢采娜》，如果我能给您寄去我们的小猪的大腿来答谢W.的照片，我会高兴的。但是第一小猪不属于我，第二尽管小猪过着好生活，但体重长得

慢，因此，为了供我们（奥特拉和我）娱乐，我们还不能宰它。

我在所有的动物之间，身体相当好。今天下午我喂了山羊。在我的住地有一些灌木，最好吃的叶子长得太高，山羊够不着，我给山羊将树枝压下来。这些山羊表面上完全是犹太人类型，大多数是医生，但是也有接近律师之处，波兰犹太人，个别的年轻姑娘。特别是给我治病的医生W.博士，在他们之中很有代表性。由3名医生组成的会诊小组，即我喂养的山羊，对我很满意。他们为了被挤奶，晚上几乎什么也不干。他们的日子和我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平安结束。

您不要因提到面粉而怪不好意思。我真正的痛苦正是我不能为您搞到点重要的东西，虽然放灵巧一些这是可以办到的。

致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卡上

我将信又读了一遍，原来这不是给一个女人的信。责任在W.，而不在我。

亲爱的马克斯，收到《养女》[\[172\]](#)一书，非常感谢。这将是明天在躺椅上的消遣品。特别是作者的消息。此外，像我现在读它时一样，福楼拜的父亲也患肺结核。这也许就是当时许多年私下谈论的问题，孩子的肺部是否有笛音（我建议用这个词替代“噤咄音”），或者说，福楼拜是否有肺病。你为格林贝格[\[173\]](#)做什么，我觉得很合适。如果成功，也将有多么快乐。你的中篇小说没有新消息吗？你最近一定收到了我的两封信吧。10月底我将去布拉格。

弗兰茨

上周，即9月28日已出版《自卫》[\[174\]](#)。

〔1917年10月初于屈劳〕

22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问我的病吗？我私下告诉你，我几乎感觉不到什么。我不发烧，

咳嗽不多，没有疼痛感。呼吸短促倒是确实的，但在躺着和坐着时感觉不到，走路时或干什么活的时候有轻微迹象，我的呼吸比以前快一倍，这算不上了不起的痛苦。我产生了这么一种看法，我患的结核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不是一种值得冠以某种特殊名称的病，而从它的意义上看仅仅是暂时还无法评估的死亡的萌芽。三周中我的体重增加了2.5公斤，这就给今后的死尸搬运增加了难度。

关于费利克斯的那些好消息使我高兴，即使已经过时，它们总还能使人在平均观察或总体远眺时得到些宽慰；对他来说，这也许弊多于利。——14天前我给他写过信，尚未得到回音。他不会是在生我的气吧？倘若我在想到我的疾病时同时想到，人们不会对这么一个病人生气的，那么我这个人就够次的了。

你问长篇小说新的一段。是全新的一段还是你尚未朗诵给我听过的一些部分的修改？——如果你认为第一章是合适的，那么一定是的。——这句话我听上去多么奇怪，“我现在看到了摆在我面前的问题。”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怪就怪在在我看来是那么不可理解，而在你心中又是那么真挚动情。这是真正的斗争，值得以生死为代价，去拼搏，问题仅仅在于能否赢得胜利。人们至少看到了对手，最起码看到了天空中他的光芒。在我试图这么来思考时，我觉得自己宛若在母腹中尚未出世，即使是黑暗的东西，我也是在黑暗中追逐。

还没完。你对下面那段出色的自白怎么看？那是我从给F的一封信中抄下来的。这段话满可以算作一篇像样的墓志铭：

“只要检验一下我的最终目标，就会发现，实际上我并不追求成为一个好人，合乎最高法庭的规范，而是完全相反。综览整个人类和动物群体，认清他们的根本爱好、愿望和道德理想，并尽可能快地使我朝着让所有人满意的方向发展，而且（这里出现了飞跃）使人们满意到这种程度，在不失去大家对我的爱的情况下，我最终可以作为唯一不下油锅的罪人，在所有人的睽睽目光下公开展现我内心的卑鄙。总而言之，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人类和兽类的法庭，而且我还将欺骗这个法庭，当然是没有欺骗的欺骗。”

从这个自白的中心点也许可以导出各种结论和推理。

《耶努发》我已收到。阅读是音乐。歌词和乐曲提供了实质性内

容。但你把它像巨人那样搬进了德语中。你那生命的呼吸是怎样不断在重复的啊！

我可以顺便提一些小问题吗？主要是这些，难道能够离开“创造”吗？“你看，这样人家就会爱你？”这不是那种我们从小就听惯了的我们非德语的母亲们说的话吗？“人的理智——落入水中”是人为的德语。“胆怯的热情”——放在这里合适吗？法官的两句话我不理解，“假如我能得到雪茄……”和“在没有这些学者先生的情况下我看着（是“站着”之误吧？）……”结尾处的“愿意”与这伟大的一段有点不谐调。——应该让人读到的是更好一些的歌词，这种歌词在捷克语原文中也不是很好的。“狰狞的死亡”我宁可留给莱欣贝格[175]，你也提到，第二段的结尾被改糟了，但我好像记得，你译这个地方时花了特别大的力气，而且你的手稿中的译文是相似的（也许你是把它作为异文的）。——是否应该给“教堂女司事”一词写个按语，解释一下含义？

下次再谈谢勒[176]。——我渴望读到布吕厄[177]的作品。——我没写东西。我的意志并不要我写作。假如我能像蝙蝠那样靠挖洞逃生，我一定会去挖洞的。

弗兰茨

关于格罗斯[178]、韦尔弗[179]和那家刊物你什么消息都没听到吗？你的科莫托尔-台普利茨之行如何？

你对奥特拉的画一句未提，她为能寄给你是那么自豪（以求能以此为她辩护），所以那封信是挂号寄出的。

〔1917年10月初于屈劳〕

229.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你不坏，这很好，但是为了能看清真面目，识破“欺骗”伎俩，这也不能安慰欺骗者。此外，在这件事情上还可以说一些话补充一下，但是对你没有必要。（顺便说一说，在好天气之后，我今天感到那么迟钝，使得我宁可写信之事搁下。）你的教学包罗万象，令人吃惊。至于学

生倒不令人惊异。这一点我早就预言过，他们甚至催我不要太慢，但是你那方面令人惊异。什么自我克制、不发脾气、精神集中、胸中有数，真正志同道合，或者说句大话，男子气需要参与这些事，留在他们那里，使他们在真正最强大的逆风时转向对自己精神有利，事实上你这样做了，虽然你不想这样做。这一点说出来，我自己将在这方面更舒服。

现在你大概还能够将孩子们的闹声作为对教学的欢呼声加以忍受。闹声必定随着秋天日益来临而消失，正如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欢呼的一样，鹅逐渐被关起来，车不再经过田野，铁匠只许在工场干活，儿童们将留在家里，只有家犬不停止狂吠和歌唱，而你的家门前一定早已静寂无声，女学生们一定安安静静地凝视着你。

你的身体比较好（注意，你暗中心疼疝子，要用碘酒治它），我的身体未变坏，体重现在增加了3.5公斤，算是正常。从生病的原因来看，我不是固执己见的，但是在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掌握原始病历档案的时候，我就坚持己见了。我听到甚至最早受牵连的肺部也正式表示同意。

关于痊愈问题，你当然有道理，首先痊愈的意志是必要的。当然我有痊愈的意志，若坦率无隐地说，我也有相反的意志。这是一种特别的（随便怎么说）传染病，与我迄今患的任何病都大不相同。正如一个幸运的爱者所说：“以前的一切都是欺骗，现在我才爱它。”

谢谢关于“bis”的解释。只有那个例句对我是有用的，“bis我们重聚，你才借给我”。这句话的意思只能是“直到我们重聚，你才借给我”。而不是“你应该一直借给我，直到我们……”这重意思光从例句本身是看不出来的。

在书的问题上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主要是想读捷克语原版或法语原版书，而不是译文。而且这套丛书我也是知道的，其印刷质量太差（至少拉柯维恰那本是如此）。这里的光线一点不比城里好。我的窗是朝北的。法语书我当然有的是，如果捷克语的书没有其他什么，那我也宁肯要类似的，但却是有科学性的莱西特丛书。

总的说来我书读得不多，乡间生活对我十分适宜。要是想消除所有不舒服的感觉，住在一个按照新的原则建立的动物园中——在那里，所有的动物都享有充分的自由——那么可以说，没有比住在一个村子里更自由的了。这是精神上的自由，周围世界和历史世界的压抑在这里是最

少的。不能把这种生活同一座小城市里的生活混为一谈，那里的生活也许也是可怕的。我真想永远生活在这里。下下个礼拜我可能去布拉格，这于我是很不舒服的。

衷心问候你和夫人。时间已是12点，我弄到这么晚已有三四天了，这无论对我的健康外观，还是对已经很少的煤油储备来说都是不好的。或对任何其他事情来说都是如此！但这是特别吸引人的，只有这么一个动因，没有别的。

弗兰茨

〔1917年10月初于屈劳〕

23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真是一直感到惊讶不已，你竟为了我和其他人把“不幸中之幸”这句话装在心里，而且不是对某一最表面的现象的确认或叹惜或作为提醒，而是作为责备。你难道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这当然同时包含了“幸福中之不幸”之意，它也许是打在该隐^[180]额头上的印记。假如一个人在“不幸中幸福”，这首先便意味着，他已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前进的能力。此外还意味着，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已倾塌或正在倒坍，已经没有任何声音还能不间断地传到他的耳边，他因此也不再能真诚地听从任何声音。在我身上情况可没这么糟，至少还没有这么糟；幸福和不幸都击中过我的心；但就我的一般情况看，你无疑是有道理的，就当前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情况看也是这样，只是你应该换一种语调来讲。

与你同这种“幸福”的关系相似的是我同“肯定的悲哀”的另一种伴随现象的关系，也就是说同自我感觉良好的关系。没有它，另一个几乎不会出现。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最近一次是在读了曼发表在新周报上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文章之后^[181]。曼是我渴望读其作品的作家中的一个。这篇文章也是一份绝妙的食物，但由于里面漂着好多（随便比喻一下）萨鲁斯^[182]的髻发，所以我宁可欣赏，而不去吃它。我觉得，当一个人悲哀之际，为了进一步强化对世界的悲哀印象，他应该像女人们浴后那样伸展一下四肢。

科莫陶我当然要去的。别误解我对造访的畏惧。我不希望什么人经过一段长途旅行，付出了昂贵的钱钞，踏入这里的秋色，踏入这里（对于陌生人）荒凉的村落，踏入这（对于陌生人）必然是乱七八糟的管理状态，踏入这儿许多小小的不舒适甚至不愉快，仅仅为了来拜访我；而我是时而感到无聊（这对于我还不是最糟的情状），时而过敏，时而为一封将收到或迟迟收不到或逼近的信而惶恐，时而通过一封他写的信而平静下来，时而为自己和他的不舒适而担忧，时而心绪恶劣地把自己唾弃为最讨厌的人，如此等等，就像那只长髻毛狗围着浮士德绕圈子那样。如果你能有机会路过这里，不是专为我而来，而是为拜访科莫陶人，那是再理想不过了。此外，到屈劳来访几；乎不可能，除非你能在星期天及时离开科莫陶（我目前对列车时刻表只约略知道一些），以便

在中午赶到屈劳。这样你们就可以在星期天晚上从容地前往布拉格，在这里留宿不怎么好，因为你们星期一大早就得启程（假如你打算中午到布拉格），而且因为这个时候很难提供车辆，因为现在马在田里有许多活要干！此外，可能我会同你们一起回布拉格，一个人我几乎做不到，只要想到办公室里那些友好的来信，特别是想到我将在办公室向大家露面的情状，我便不寒而栗。

我考虑这么安排，星期六我在米歇罗卜上你们这趟列车，星期天我们一起去屈劳，晚上一起回布拉格。

你提出的有恢复健康之必要的理由是美妙的，但却是个乌托邦。你交给我的任务也许可以由一个飞翔在我父母婚床上的天使完成，或者更好的说法是，飞翔在我的民族的婚床上的天使，前提是，我有一个民族。

对那部长篇小说表示我最好的祝愿。你提到的短短几句话看上去意味着一项伟大的工程。这部长篇小说的贡献将是，在布拉格虽有办公室的重压，但在另一方面我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心理平衡。

衷心地问候你和夫人。我并未感染上歌舞餐厅的那种情绪，也从未感受到这种情绪。她呢？对我来说歌舞餐厅从现在开始已不存在。假如“情绪大炮”发射了，我拿着玩具枪从肺部爬出，又能爬到哪里去呢？这种状态早就存在了。

弗兰茨

请及时写信给我，告诉我星期天什么时候K.（科莫陶）的事情能完，以便让我知道我们是否到屈劳来，要不要车子来接我们，我该怎样收拾我的行李。

〔1917年10月12日于屈劳〕

231.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简单谈谈你的讲座给我留下的印象的一个证明，今天的一个梦。这真了不起。我不是指我的睡眠（它恰恰是很糟糕的，近来都是这样，我

想减轻体重，而那位教授却把我从屈劳带走——我该怎样才是呢？）），也不是指那个梦，而是指梦中你的行为。

我们在街上相遇，我显然是刚到布拉格，见到你非常高兴，当然，我觉得你瘦得有点怪，神经质，有一种教授般的迷惘气质（你是那样矫揉造作，麻木不仁地抓着你的表链）。你告诉我，你这是到大学去，去讲一堂课。我说，我非常非常愿意一起去，但我必须到店里去一下，我们站的地方正好是在店的前面（大约在朗根街头上，大饭店对过）。你答应在外面等我。但当我在里面时，你考虑了一下，给我写了一封信。至于我是怎么收到它的，我已想不起来，但那封信的字迹至今仍历历在目。信中有这么一段：课将于3点开始，你不能再等下去了，你的听众中也有索尔教授[183]，你不能由于迟到而得罪他，许多姑娘和妇女主要是为了他才到你这里来的，如果他不来，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同他一样不来。所以你必须赶去。

我也马上就赶往学校，在一个类似前厅的地方碰到了你。在厅的前方那片无人管理的空旷原野上一个打球的姑娘问你，你现在打算干什么。你说你现在要讲授一堂课，并一一说了将在那里朗读什么，两个作家，作品和章节号。那姑娘很有学问，我只记住了赫西奥德[184]这个名字。至于第二个作家，我只知道他叫品达[185]，名字相似，但名气小得多，我感到纳闷，为什么你不“至少”朗读品达呢。

当我们走进去时，课已开始，你显然已讲完开场白，然后走出来看我来了没有。讲坛上坐着一个身高体壮、像结过婚的、长得并不漂亮、身穿着黑色衣服、大鼻子、黑眼睛的姑娘，她在翻译赫西奥德。我一句都听不懂。现在我想起来了（甚至在梦中我都不知道，那是奥斯卡的妹妹，只不过瘦一点，高得多）。

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作家（显然想起了你所说的楚克坎德尔[186]的梦），我把我的无知与这姑娘极丰富的知识相比，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可怜啊，可怜！”

我没有看见索尔教授，但许多女士在场。我前面隔着一块板凳（这些女士引人注目地背对讲坛）坐着G.夫人，她晃动着长长的鬃发，她旁边坐着一位女士，你说她是霍尔茨娜小姐[187]（但她是那么年轻）。在我们前面那排，你指给我看另一位类似的学校女主人，她住在黑伦街。所有这些人都在听你的课。我还看到其他一些人，在另一边坐着奥特

拉，在此之前我刚同他为你课争论过（她不想来，但现在她为了使我满意毕竟来了，而且来得很快）。

到处在谈论赫西奥德，连那些光聊天不听课的人也不例外。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位朗诵女士在我们进来时展颜微笑，由于听众表示理解，她的笑居然就止不住了。但同时她并未耽误正确地翻译和解释。

当她翻译完毕，轮到你开始继续讲下去时，我向你俯过身去，想同你一起读，但使我惊讶万分的是，你面前只放着一本翻得破旧不堪的、肮脏的雷克拉姆版本，这就是说，希腊原文（哦，尊贵的上帝！）在你“腹中”。这句话是从你上一封信中得来的。现在，也许由于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再跟上你的讲授，于是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你的表情变得有点像我以前一个同学（这是个我很喜欢的人，他是开枪自杀的；我现在想起来了，他同那朗读的女学生也有一点相似之处），你变了。然后另一堂课开始了，这是一堂音乐讲座，讲得不那么详尽，主讲的是个黑发、红脸的小个子年轻人。他长得像我的一个远亲，那位远亲（这对于我同音乐的关系有象征性）是搞化学的，好像神经失常了。

以上就是那个梦的内容，还远远没有资格代表那个讲座。现在我又要去躺下了，去做个也许更强烈的讲座梦。

弗兰茨

〔1917年10月中旬于屈劳〕

23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我不能使其他一切打扰减少的话，我尽量少地打扰你。

我有《行动》杂志的这一期，其他几期也还有，我以后将一次带给你。每次邮件都使我十分愉快。对《拉德茨基之行》^[188]的印象当然不如当年你几乎像念诗一般地朗读它的时候那样强烈。但是此外也缺乏一点东西。是由于删节造成的？这不可能是好的。仇恨在狂喜之后上升了，但是没有见到仇恨扩大。也许给反命题转折的空间不够宽广，也许一颗心的空间不够。

特韦勒斯[189]的小品文很可能是写给库[190]的（顺便说一下，最近库写了关于韦尔弗的相当糟的俏皮话），作为温存体贴的表示。捉摸不透的是他写这种文章时的精神状态。我坐在这个谜一般的桌旁，就在他旁边。我特别注意到，歌德“也不是石头做的”[191]，最痛苦的却是他的全部大概都是为了这个老妇人[192]。她曾认为，她写了一本关于封·施泰因夫人的心情忧郁的书，在这里显示出，她显然泪流满面，一天到晚都忙着歌德的裤子。

科莫陶委员会给我的布拉格之行增加了一些困难，尽管如此，我当然会去布拉格的，我目前让奥特拉去，以便她审视“水怎样停住”，然后我月底去。

《自卫》周刊的社论，从迅速的眼光，抗议的力量和大胆来看，几乎出自你的手笔。只有几段妨碍我确认是你写的。大概是赫尔曼写的吧？

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1917年10月中于屈劳〕

23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我未选择出给你写信的日子，但是我今天又（如果不总是这样的话）这样沮丧、笨拙，过去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更是这样。现在在共进夜餐之后，奥特拉在布拉格，我现在不是这样了，情绪更低沉了。此外我觉得，在今天的大扫除之后（为此我表示非常感谢），圆柱形灯罩下部出了一个窟窿，漏风，甚至在我用小木片挡住小洞之后，灯火仍然摇曳。也许正是这一切适合于写信。

乡村生活是美好的，将来仍然是这样。奥特拉的房子在环形广场，我从窗子看得见，我见到在广场的另一边又有一间小屋，屋后是旷野。无论如何，喘息一下总好些。至于我，虽然我无论如何都在喘息，至少身体上喘息，但是若换个地方，我会接近窒息的。当然，我从正反两面经

验得知，多年来这我能忍受住的。

我同这里人们的关系不密切。这根本不再是人间生活。例如今天晚上我在漆黑的村道上遇见两个人。是男人，女人，孩子？我不知道。他们问候我，我很感谢。他们也许从我的大衣轮廓辨别出我来。即使有光线我也大概不知道他们是谁，至少我从声音辨别不出来。这在说方言土语的人那里似乎根本不可能。在他们放我过去以后，有一个人回转身来喊道：“赫尔曼先生（我的妹夫的名字，我把它接受过来了），您有香烟吗？”我说：“可惜没有。”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就是孤独者的话语和错误，我希望自己像现在的情况那样，没有爱好。

我自以为懂得你说的“相反的意愿的闯入”是什么意思。这属于该死的心理学的理论范畴，你不喜欢它，但是你被它迷住了（我大概也被迷住了）。关于大自然的种种理论都像它的姊妹心理学一样有错误。但是这不触及下面的问题，世界是否从某一点上说可以治愈。

我说过，我喜欢听施尼策的报告。你说的关于施尼策的话是很正确的，但是人们容易低估这些人。他是质朴的，因此非常诚挚，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作为演说家、作家，甚至作为思想家，不仅像你所说的那样不复杂，而且简直笨拙。你坐到他对面去，看看他，找个地方能看清他的全貌，也包括他的效果，试图有一会儿工夫接近于他照准的方向。他不是那么简单地可以解决的。

我的《这本书》也许是真有价值的，我也想读它，它放在天上的书架的某个地方。但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让人给自己送这本书庆祝她自己的生日（也许对她的曾孙说的：“我个儿小，我的礼物小……”），因此克勒门梭的家庭激动起来，枢密官未伸食指就让人催促作出决定性的决断（此外有种情况无疑地证明此事对他有更大的蔑视），这一切太过分了，这是个错误。

我对枢密官之所以总是特别的尊敬，不是因为我——就我的记忆所及——同他很合不来，而是因为他与其他人不同，他们总是十分重视烦琐小事。站在讲台上，他只是一个用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轮廓的、干净利落的人。因此必定城府很深，无论如何人们得向他的主要意图屈服。

三门课程吗？半日工作周对他们真的合适吗？这太多了，这几乎足以充实文科中学教授的生活了。马克斯对此说什么？你向老女中学生提

出的作报告的倡议也许有点非教育性，即真正恐吓性。她们以姑娘们的毅力，把你正是从你当时的巨人形象挤压成了“青年德意志”。这个“青年德意志”对你也不总是陌生的，正如你在被挤压时所呻吟的那样。顺便说一说，《青年德意志》杂志将于下月创刊，由德意志剧院出版，由科恩费尔德主编。

《人》虽然有点长发，有点不顺从，但是也许是件好东西。你根本未提到它。

向你和夫人多多致意！

弗兰茨

〔1917年10月中或月底于屈劳〕

〔旁注〕不容许沃尔夫吓唬你。他必须客气点。并非一切都碰撞你！他可能不会加以区别。

23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27日去科莫陶，科莫陶人出尔反尔当然够折腾人了，大概把你折腾得最厉害，对我也一样。说实话，你若不去科莫陶，我仍然不会去布拉格的，最早也得14天之后去。不仅这里的生活有价值，而且与生活有关的东西都有价值，由于旅行我失去了它们。此外，我最近——甚至在最舒适的时候——完全无胃口。如果我变瘦了，教授把我从屈劳这个最好的地方带走，那会怎么样呢？这是忧虑，是见到你，同你谈话，闭口不谈的喜中之忧。还有一点，为了治牙，我将在布拉格必须至少停留3天，也不得不去办公室谈谈。至少会从自由进+奴隶和悲哀状态。

现在你的科莫陶之行大概确定了吧？如果不去，你给我拍个电报。我不想单枪匹马去，除非我想在那里听到你的情况，我想一定会在那里同你一起看到你以前生活的痕迹的^[193]。

弗兰茨

〔明信片，1917年10月22日于屈劳〕

亲爱的奥斯卡：

我当然不能给马施纳写信。一个季度和更长时间他没有听到我一点消息了。他觉得在我的事情上像一个痛苦的王国，他只有付钱和忍耐[194]。但是幸而没有必要给他写信。“全国返乡战士救济中心”执委会波里奇七世是秘书F.博士（他是该机构中第一个碎裂的犹太人，我是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碎裂的犹太人），是一个优秀人物，爱管这件事，乐于听取差不多可以完成的请求。我刚才写信将实情告诉他。这大概够了，如果你在9点和1点之间亲自去该中心见他，那就好了，我无论如何要当着他的面解雇你。我之所以特别向你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在我看来8000克朗对一般的普通战争受害者的救济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巨款，如果作些口头解释肯定会有益的。

为了使你对F.博士至少有大略的了解，我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他是四分之三个捷克人，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母语为德语（你当然同他讲地道的德语，我也总是这样），度过了困难的青年时代，也曾是克拉尔·封·福西申的秘书，他对文学本无什么兴趣，现在四五十岁娶了一位捷克打字小姐，他的岳父是一个穷木匠。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可与之十分坦率地谈话并且能谈得十分投机的人。如果你顺便说一句赞扬的话，说他如何献身自己的事业，那么你就能使他愉快，你没说真话。此外，他也许将向你挑战，甚至违背己愿地指出你的小小的缺点。但是你不要呆在他那里太久，他很忙，你在谈话时忘记了，以后又后悔忘记了。特别是P.为他妹妹的担心将使他感动。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也许会带你去见战争致盲者救济科科长。这位科长（但并未亲手处理此事）是构思者，T.博士（他不是博士，但这样称呼他）当然很不一样。他经历过战争，五官端正匀称，面色苍白，消瘦，中等个儿，脸上布有深深的皱纹，说话很慢，发出格格声，但所说的话多半不能证明大的停顿、重音和绷紧嘴唇是有道理的。因此，整个说来他的说话是吓人的，根据我的经验，这并没有很多意义，他是一个十分好的和令人愉快的人，当然人们必须适应他的速度。

在提到我的时候，他的邻居副秘书K.先生（为了说清楚，我再写一遍：K.这是真名实姓，并非你捏造的名字）也许介入谈话，他是最亲

密的同事，因此我简直爱他（F.博士不爱他），因此你逐步受到3个朋友的包围，但愿他们将把P.先生的一切引向好处。

虽然我在这里几乎不会有自己的避暑住所，但我很遗憾，避暑住所没有可能。克尔恺郭尔^[195]是照耀在我几乎不可企及的地区上空的一颗明星，我感到高兴的是，你现在将读他的著作，我只知道《恐惧和颤抖》一书。你不想将手稿中的克拉斯蒂克^[196]寄给我或我们？你在这里有3个忠实的读者和这类人。谨向你和你可爱的夫人致衷心的问候。

〔1917年10月或11月于屈劳〕

23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今天我们有客人来，非常有违我的意愿，是那位办公室的小姐（怎么说呢，是奥特拉邀请她来的），但除此之外还带来了一位，是个办公室先生（你也许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夜间同什么客人一起经过码头，我当时向一对行人转过身去，那就是这两个人），他实际上是个出色的、使我感到舒服和兴趣的人（信天主教，离过婚），但毕竟是一次突然袭击，别说以这种方式，即使是事先通报的来访也足以构成突然袭击了。我适应不了这类事情，在漫长的整整一天中，我在这位姑娘面前表现了短暂的嫉妒、强烈的不自在感、孤寂感（我淡淡地建议她同这个人结婚），直至陷入彻底的空虚无聊，而又隐忍着一种恶劣的复杂感情；告别时仍有些伤感，毫无意思，只是突然想起胃部的某种事情或其他什么。总而言之，这是个和所有来客日一样的来客日子，也就是说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是一种单调的学说，但可惜人们不能时常重温它。

我说这些仅仅为了一件事，一件与我们的谈话有关的事，即“短暂的嫉妒”。这是一天中唯一良好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中我有了个对手，在其他时间中这是“空寂的战场”，几乎是个大斜坡。

我什么都不寄到法兰克福去^[197]，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我操心的事；我寄文章去，将仅仅是出于虚荣心；我不寄文章去，也是虚荣心，但不仅仅是虚荣心，还有别的稍好一点的因素。我能寄去的那些作品实际上在我眼中毫无意义，我看重的只是我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刻。一个女演员本该找到更有效的东西来发挥她的长处，而我的作品只能使她或快

或慢地跌入虚空;之中，难道要她在一次晚会的一个片刻把这些作品从一片虚空中抬高起来吗？那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呼吸困难和咳嗽。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我自布拉格以来也比以前注意多了。确实有这种可能，我在别的什么地方会更多地躺在室外，呼吸更有利于健康的空气，还有其他好处，但是——而这对于我的神经状况很重要，神经状况又对我的肺部很重要——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这儿，在我妹妹这儿感到这样舒适，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么少的干扰因素（这里只有来访者的干扰除外，但即使是这些来访，也由于其稀少，而融入平静的生活之中，不至于留下多少痕迹），在任何地方都得怀着更多的固执、肝火和不耐烦来忍受家务和旅馆的管理。我妹妹身上有一种陌生的因素，是这类因素中我最容易适应的一种（施克尔曾说我与许多患有同样疾病的人都怀有“生性的恐惧”，我确实有这种恐惧，但即使不把它同“围绕灵魂拯救的恐惧”等同起来，我也觉得它是很自然的，总是存在这么一种希望，有朝一日人们会需要“他的个性”，由于要用它，就必须把它放在随手可取的地方）。在任何地方我站在某个于我陌生的因素后面，都不如站在我妹妹后面那么稳。在这里我能适应，对躺在地上的父亲我能适应（我也很想适应站着的父亲，但却做不到）。

你给我朗诵了长篇小说中的三段。第一段音乐性，第三段强烈的清晰性，都使我感到是好兆头（第一段中那些真正“犹太性质的地方”给眼睛带来了一些不舒适感），就好像在黑暗的大厅里，在不同的情景下，所有灯光都迅速地打开和关上。事实上只有在第二段面前我才顿住了，但并非出于你提到的那些借口。在你的犹太观念中，滚球戏是一种犹太式的游戏吗？犹太性质顶多存在于，卢特玩了另一种游戏，但问题却不在于玩的是什么游戏。如果这种游戏的严肃性是一种对自身和心上人的折磨，那么我能理解它；如果这种严肃性是一种同卢特和你的生活状况无直接关系的独立的信念，那么它就是一种毫无希望的信念，凭这种信念实际上只能在梦中见到巴勒斯坦（这种梦确实会出现）。这实际上几乎是一种战争游戏，建筑在著名的突破思想上，堪称兴登堡意识。也许是我误解了你，但如果不存在不计其数的解放途径，如果不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存在各种途径，那么也许一条途径也没有。可是我确实误解了你。这种游戏将会不断重复，随着一时的失误失去的仅仅是一时，而不是一切时刻。但这一点必须讲清楚，就是仅仅从护士般的细心出发也必须讲清楚。

今天收到了沃尔夫寄来的出版102本《观察》的账单16/17，令人吃惊地多，但他没有寄来你保证会有的账单，《乡村医生》的账单也没有。

附上你的营养义务声明，你把它夹在书里而忘了。马克斯，还望你不间断地寄《犹太周刊》[198]来。——14天后奥特拉将前往布拉格为我申请退休事宜。

〔1917年11月初于屈劳〕

23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如果我当时在剧院里，你一定跟着去的，我相信，你对苏劳有很好的印象。但是第二天上午我还有些事要做。然后我在马克斯处。你那真要找的人不在，缺乏机会作必要的谈话，前一天拍发的电报妨碍我再待下去，牙医拔掉的一颗牙齿使我的思想高度集中，我在布拉格也没有下决心的力量，于是照原来的做，我独自一人走了。我没有失望，又寻获了苏劳。这值得称赞。照理说，现在不是我吃坏胃的时候。我未看表，不知什么时候房子周围未预料到的喧哗又起来了，妨碍对我的情况作偶尔的修正（当然根据合乎情理的意图）。我刚从头开始，从布拉格把许多糟糕的事带到这个地方来，因此我必须总是计算。在某种意义上说，农业的思想在这里将总是有益的。

有时候我想到在你的住所的生活，它同这里的生活形成截然的对照。这使我感到惊异。你以前的住房已经是生活丰富，而这套住房达到孵化的温度。但是你必须要有怎样的精神独立性，从平衡来看，他必须组织得多么周到，使得你不仅不受损害，正如我必须向大家说的那样，而且你在室内能够通行无阻，活动自如，你接受这种生活，虽然不是作为你自己的生活，但是作为对你友好的一个因素。也许马克斯说得对，他把你捧得那么高，以致你只能看见尖顶，而看不到大废墟的地底。但是有人确实想说出警告，不能说服，因而一直处于可恶的飘浮之中。

我的布拉格之行除了他事之外，是为了你的半封信而来。简而言之，此外我只请求两件事，即：第一，与此有关的是，在你的伦理学目前出现的发展面前，你犹豫不决。第二，那些课程（青年德意志）情况怎样了？那些课程可也属于你的生活的半受强迫的魔鬼！

〔1917年11月初于屈劳〕

〔边注〕现在你大概常去听《乌拉尼亚》杂志组织的报告了吧？——沃尔夫没有复信。

23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暂时只写这张明信片，证实收到了你的明信片、信和印刷品（《犹太评论》、《行动》、《自卫》增刊）。你的信和明信片是今天13日才收到的，令人不可理解，不过这没有关系。对你的信的高兴与时间无关。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帮助高个子。这个公司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接近的。只是为了我的愉快才叫人刺杀公司经理的，这会意味着新上任者的请求，星期六不必上班——我不愿意这样。那两个待在那里的犹太人怎样（通过第三个犹太人的帮助）进来的，这真不可理解，这不能再发生。但是也许在我们的商店有可能，如果人们能在父亲面前对此负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的话。如果你想在那里停留一下，并同母亲、妹妹或表妹谈话，我会告知的。但是高个子身强力壮，为什么他不去找某个犹太佃户呢？“向弗兰茨舅舅问好”，这说得很漂亮，但是很温和。舅母不可能打她外甥爱的人。

弗兰茨

奥特拉认为在我们这里接待L.是不可能的，她对父亲和商店认识得更好。

〔明信片邮戳：1917.11.13—屈劳〕

23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的所作所为是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我在城里，在家庭里，在职业、社会、爱情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它放在第一位），现有的

或争取建立的人民大家庭，在这一切方面我未经受考验，而这一点是我周围的人谁都没有遭遇过的。这基本上是幼稚的看法（《没有人像我这样平庸》），这种看法自相矛盾，以后又导致新的痛苦。但是在这种关系上（这里不再指共同性或自我谴责，而是指公开的内部的未受考验的事实）这种看法迄今一直是，并且将仍然是真诚的。我不想夸耀自己伴随未经历过的这种生活而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在回顾时与必须顶住的事实压力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在各个小的阶段向来如此），痛苦毕竟太大了，简直令人忍受不了。换句话说，如果痛苦不太大，那么它至少太无意义。（对生活的阴暗面也许可以问一问它的意义。）也许从童年时代以来摆在面前的下一条出路不是自杀，而是想自杀的念头。我的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可以想象到的怯懦使我没有自杀，而只是考虑到这样结束一生未免毫无意义。我想：“你一事无成，就想自杀吗？你怎么能敢起这样的念头呢？你可以自杀。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你不必自杀，等等。”以后我又渐渐地有了新的看法，不再想到自杀。如果我撇开那些令人迷惘的希望，幸福的孤独状况，夸大其词的虚荣心（我只有活着能忍受痛苦时，才能偶尔做到“撇开”），思路明确，那么我面临的情况是，悲惨地生活，悲惨地死去。“仿佛活下去是耻辱”，这大概是《审判》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束语。

我现在看见一条新的、以前完全被认为不可能的出路，用我自己的力量（肺结核不属于“我的力量”）本来找不到这条出路的。我只见到它，我相信只见到它，我还没有走这条路。它在于，它一定会在于，我不仅私下承认，不仅通过旁白，而且光明正大地，通过我的行动承认我未能在这里经受考验。为此目的，我就非下定十足的决心，描绘出我昔日生活的轮廓不可。直接的后果一定是，我集中精力，不把精力耗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使眼光开阔。这就会是我的意图，即使这意图实现了——它不能实现的——它本身也不会有什么“钦佩的价值”，只不过做了些顺理成章的事。如果你认为有钦佩价值，就会使我感到虚荣，使我飘飘然，尽管我知道得更清楚。真可惜呀！如果艺术家自我吹嘘，那么本来就一无所有的一座纸房子必定倒塌（幸而作了错误的对比）。

如果这里有完全不同的一双眼睛，我会看到你的道路。你要考验自己，就要保存自己。你能够团结反对的力量，我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我们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将在于，我们俩一起“走”，迄今为止我感到我太经常地成为你的负担。

你所谓的“嫌疑”，在我看来，似乎有时候只不过是你的精力过剩的游戏。你的精力还不完全集中，又搞文学，又搞犹太复国主义，现在合二为一，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种意义上说，那才是一个“有根有据的嫌疑”哩。

我当然同意你的夫人宣读这个故事[199]，对举行朗诵会则根本不同意。反对的理由与反对法兰克福的集会相同。你有理由反对。我，也许还有富克斯[200]和怀格尔（地址：《联盟报》）也有权利沉默，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

你对《戴盟》[201]的态度如何？请将韦尔弗的地址写给我。如果在我看来一份杂志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吸引人（当然目前每份杂志都如此），那么这是格罗斯博士的杂志，因为在我看来这份杂志至少每个晚上从某种个人组合的火焰中走出来。也许一份杂志不再能成为一种个人彼此约束的追求的标志。而《戴蒙》呢？从这份杂志上我只认得《多瑙河流域》[202]编辑的照片。

如果我现在加上一句，说我在一些时候以前在梦里给韦尔弗一个吻，我就坠入布吕尔的书[203]中。这使我情绪激动，因此我不得不暂停阅读两天之久。此外，这同一切心理分析有共同之处，即这在最初一瞬间惊人地吃饱了，但是人们一会儿以后又像原来一样饿了。从心理分析上“当然”很容易说明，紧急压抑。

现在还有，健康状况好极了（连教授也不谈南方），宣布访问好极了，对礼物的看法很值得怀疑，不久受到驳斥。

弗兰茨

不，现在还要反驳，因为反驳太令人信服了。我们“送礼”只是为了我们愉快，确切地说，是为了你们感情上和物资上的损失。因为如果我们不“送礼”，而是去卖，我们当然会寄去比现在更多的东西。你们通过这里和布拉格的价格差，赚得远比“礼物”价值更多的钱，并得到更多的食品。但是我们现在不这样做。我们损害你们，毫无顾忌地“送礼”，因为这使我们愉快。因此请你们包涵。我们只寄一点点，并且越来越少。

〔1917年11月中旬于屈劳〕

亲爱的埃尔莎太太：

确实如此！不过请您不要在报上提及片言只字^[204]。无论您选择什么，这都是小东西，它也许适合于作礼物，否则不可提及。如果在文中有一些脏的地方，请您不要删掉；如果真想弄干净，那会是无底洞。谢天谢地！您从“感情的高度”读这首歌读得那么好。也许您朗诵的声音与乐曲相互交融。请您用配乐诗一试，尽管我不喜欢。这次您一个人朗读吗？

致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明信片，1917年11月中旬于屈劳〕

241.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屈劳的第一大错误是，夜里闹鼠灾，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本人未受触动，我的头发不比昨天的白，但是这确实是恐怖的世界。以前我有时候（我必须随时中断写作，你将会知道原因的）在夜里听到轻咬的声音，有一次我甚至吓得发抖起来了。我查看，声音又立即停止了。但这次是一次暴动，这是多么可怕的不出声的闹翻天的东西呀！两点钟我被床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闹醒了，从此时起一直闹到天明。老鼠跳到煤箱子上，又从煤箱子上跳下来，在房间里跑对角线，转圆圈，咬木头，安静时吱吱叫，同时总有静的感觉，好像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人民需要夜间在家干活一样。为了思想上拯救自己，我确定了主要的闹声在火炉旁边，房间的长度把我同火炉分开。但是闹声到处有，一旦某处一大堆东西一股脑儿掉下来，那就再糟不过了。我完全孤立无援地站着，我的整个身体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支持。我不敢点灯，唯一的是我试图吓唬老鼠的几声尖叫。一夜就这样过去了，早晨我由于恶心和悲哀而起不了床，在床上直呆到一点。我竖耳静听，听到有一个不知疲倦的东西整个上午在箱子里工作，直到这一夜结束，或者准备下一夜再干。我心里向来恨猫。现在我捉了一只猫放在我房间里。猫经常想跳到我的膝上（打断我的写字），我得赶走它。猫拉屎拉尿，我不得不叫底层的女仆上来打扫。猫又老实，躺在炉边不动，一只早已醒来的老鼠显然在窗子边乱

抓。今天可把我搞惨了，家里的面包全都一股老鼠尿的骚味，薰得人头晕。

此外，我昨天晚上睡觉时，我已经没有把握。我本想给你写信，也写了两封信的两页纸，但是未能写完，我总觉得这算不了什么大事。也许正因为你在你的信开头未认真地谈你的情况，在不能开玩笑的地方开了玩笑。凭你那股轻佻劲儿，你肯定不会变老的。我想，你以前一定处于同样的情况。“轻佻的理论”不可能与“坚定不移的信念”并列，它根本排除后者，同后者并列的是“思想尖端”，思想尖端又排除轻佻的理论，结果，仅仅只有思想尖端留存下来，甚至连思想尖端也未留下来，因为光思想尖端自己不可能从本身中转动出来。因此你幸而被完全排除了，你幸而存在着，这就是美。此外，你必定感到惊讶，把它惊羨为思想上的成就，因而与马克斯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此外你也不是真正对的（真怪，老鼠预察到了一些情况，敢于跳到箱子后面的暗处！现在它坐在箱子旁，守卫着。我怎能轻松呢！），你相信一个鼠窝主，使得你的住房富有生气和因为“房间太多时间太少”而受到打扰（令人敬佩地不打扰你的人除外）。你的时间正像（例如）厅室里的地毯。如果在那里有时间，时间就像地毯一样美丽，像家庭和睦一样好。但是将来的时间应该保持不变，对你和大家都一样。

我现在看到，我询问伦理学本来是书面讲授之后的一个请求，我将把这个讲授作为怪事取消了。当然我今后不知从何着手去处理你对信念、恩赐和与马克斯或者甚至与我的争论。

我的健康状况相当好，如果害怕老鼠不会引发肺结核的话。

1918年中等强国的军事纲领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给我解除职务确定的最后日期是1918年1月1日。兴登堡来到这里太晚了。

向你和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自从丢失袖珍本故事书以来我在你夫人处再没丢失什么东西）。

弗兰茨

〔1917年11月中旬于屈劳〕

亲爱的马克斯：

空时间很多，奇怪的是，写信的时间却没有。推算一下，自从闹鼠害以来（你也许已经听说了。写作因此长期中断，不得不画一个盒子和一个钵），我根本就没有房间。我只能同猫一起勉强在那里过夜。但是坐在那里的篮子后面，听窗旁窸窸窣窣响（听到爪子抓得响），我对此没有兴趣，但是猫可有兴趣哩！它是极其天真活泼的动物。在我写字读书的时候，它监视着，保持着警惕，跳到我的膝上，或者及时地躲起来，捕杀自己的东西。它做事很拖沓。简而言之，我也不喜欢同猫单独在一起，如果有人在，就会差不多失去任何痛苦，否则，在猫面前脱衣，做体操，上床睡觉，已够讨人厌了。

我妹妹的房间是一个很舒适的房间，它仍然属于我。也许跨进房间，第一次扫视房内（底层，格子窗，破碎的墙）会感到恐怖，但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如果晚上想写字，那么在共同房间里写的机会当然很少。白天很短，如果在床上早餐，晚起床，在底层房间差不多两点钟就天黑了。白天充其量不过3小时，如果天上不是浓云密布，白天更短，在冬天白天就更短了。因此我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窗旁读书。想在两次天黑之间从书中看到点什么的这段时间（在这期间洪韦德也清扫皮亚夫三角洲，从蒂罗尔方向进行攻击，占领雅法，接待汉特克，曼讲课取得了很大成功，埃西格根本没有成功，列宁不叫译德布鲁姆，而叫乌里扬诺夫等等），我不想用这段时间写东西，我几乎不想写，天已经黑了，只模模糊糊地见到外面池塘里的鹅。这些鹅（我要描述的话，可描述一大篇）很令人讨厌，如果同这些鹅打交道还不更讨人厌的话（今天一只宰了的肥鹅放在外面的碗里，看上去像死去的阿姨）。

但是没有时间。否则，这会得到证明，并且仍将证明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我并不总是知道这一点的。但这是我的错误。我也总是认清我的错误，甚至还在片刻之前我还未犯错误的时候。要是我坚持老原则——我的时间是晚上和夜间——的话，那就会更糟，特别是因为白天工作有困难。由于白天不行，根本不能写作，虽然不会担心老鼠扰乱晚上和夜间掌灯时的宁静，也不是以得到这样的宁静为目标，上午的空闲时间待在床上睡觉（早晨猫刚走开，柜子后面某个地方就开始抓起来了。我的听觉经过千锤百炼也灵敏了，也同样变得更不可靠了。我用手指在麻布上摩擦了几下，我不能完全肯定我是否听到有老鼠。但是老鼠不是幻觉，晚上猫跑来时肚子瘪瘪的，而早晨肚子鼓鼓地走了），读了

一会儿书（现在读克尔凯郭尔），傍晚在村道上散步，满足于一人独处，只想生活越来越充实，表面上任何诉苦都是不必要的，除非低声下气地接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受到陌生工作的包围，而我虽然没有明显的病症，但是外表上无能做任何巨大的工作。最近我曾试图只在菜园做些轻微的工作，以后感到强壮多了。

奥特拉现在布拉格，也许她将带给我关于维也纳晚会更详细的消息。你在会议厅里可能没有比青春更好的东西。我对青年有类似的信任，尽管我对我的青春根本没有信任，要是我在青年时代，作为一个无前途的、只是年轻的青年人挣到了信任就好了。能够证明这种信任，那该多好啊！例如你最近在科莫陶就获得过信任，那时我深受感动（你写信谈过此事）。

弗兰茨

我现在注意到，我昨天晚上太容易和太不加思索地看到了一切，看到了我内心的情况。

第5包邮件（《评论》、《希勒》、《马尔西亚斯》^[205]）到了。

奥斯卡在做什么？我没有给他写信，他没有给我寄答应给的长篇小说。但是奥斯卡新年会来这里待几天。

有件新闻，整天上午我竖起耳朵，现在我在门旁看到一个新洞。这里也有老鼠。猫今天不舒服，不断地呕吐。

〔1917年11月24日于屈劳〕

243.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我没有写信，你没有把答应给的小说寄来。这是表面现象，此外这里没有任何变化，但愿你那边也没有变化。

屈劳依旧很美，只是变成冬天景色了。窗前的鹅塘有时结了冰。儿童们可好溜冰了。我那在夜间被暴风雨吹到池塘里去的帽子在早晨一定差不多开始冻上了。老鼠显示出可怕的本领，你根本不可能向它隐藏住

任何东西。我总是晚间在环形广场把猫抱在怀里带回家，用这只猫赶走一些老鼠，但是昨天又在烤面包炉旁发现一只大老鼠。它很可能还从来没有进过卧室，在我那里闹翻天，我不得不从邻室里唤来猫。由于我无能调教好猫，怕它跳到床上，一直将猫关在邻室的。这个好动物从一只不知装什么东西的盒子里高高兴兴地蹦了出来，这个提盒至少肯定不是用来让猫睡觉用的，它属于我的女仆。猫一过来，就安静了。其他的新闻是，一只鹅哽死了，狐狸长了疥癣，一群母山羊围着一头公山羊（据说是那头特别好看的小山羊，一头母山羊曾到过公山羊处，突然想起来，又从我们的房子跑很远的路到公山羊那里去，然后又跑回来），那头猪据说即将被宰掉。

这就是简而言之的生死观，你将在新年完全接近它。我的态度将如何，我知道但还不肯定。根据教授上月的意见，我本来必须上班的，虽然我从有产者的观点来看肯定不健康（此外我感到健康状况几乎未变好）。如果我至少最近免除上班（这正是我的整个愿望），那么我将这样做，12月底我至少要到布拉格来，因为我的休职将在1月1日结束，我必须表态。既然人们大概没有兴趣供给我膳食，而我在这里得自己做饭，那么他们十之八九将把我打发走（也许我还将得到除委员会健康的理智之外的帮助）。那时候就又得急匆匆地赶回屈劳，你就能够如愿以偿地同我一起乘车走了。主要地对我而言，那是上策。至于你，在不考虑我的命运的情况下，你至少到这里来。奥特拉高兴极了。床和猫都会准备好的，雪和森林本来就有的。

那部长篇小说呢？

向你、夫人和孩子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1917年11月底12月初于屈劳〕

244.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马克斯已经对奥特拉讲过，你的情况不错，而你的信也违背你的意志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啊，每天读三四本书，即使老是那

几本。令人惊讶的当然不是数量，而是其中显示出的求索的韧性。我也读书，与你相比当然几乎谈不上是读书，但我只能喜欢那些与我的天性非常接近的书，那些接近得几乎要碰到我的书，其他一切都在我身边匆匆路过，而我的寻求能力是很差的。

假如你能告诉我哪里有一本印刷精美的可以买到的奥古斯提努斯[206]的《自白》（这本书的名字是不会搞错的），我就去订购一本。培拉吉乌斯[207]是谁？我读到过许多关于培拉吉主义的文字，但一点都没记住，是某种天主教异端学说吗？假如你也读麦蒙尼德斯[208]，那么《所罗门·麦蒙的一生》也许会帮助你（了解他）（由弗罗沫编写，格奥尔格·米勒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本身就是本好书，是一个幽灵般在东西方犹太教派间跑来跑去的人的特别耀眼的自述。再就是其中为麦蒙尼德斯的学院画出了轮廓，作者觉得自己是他的精神上的后代。但也许你对这本书比我更熟悉。

你为你进入了宗教领域而感到惊奇吗？你当初建立你的伦理学时（这是我对它唯一自以为确实知道的一点）是没有基础的，但现在你也许发现了，它是有基础的。这难道很奇怪吗？老鼠我可以用猫来赶走，但我又用什么来赶走猫呢？你以为你没有对付老鼠的办法吗？当然，你也没有对付吃人者的办法。但是如果它们夜间在每口箱子下面爬出来，用牙齿啃咬，你一定不能忍受的。此外，我现在在散步时也观察田鼠，锻炼自己。田鼠不坏，但是房间不是农田，睡眠不是散步。

但是这里再没有吹喇叭——也没有吹你的喇叭——和总是闹翻天的孩子们。自从鹅塘封冻以来，甚至在百步以外，孩子们也都变文静了，再没有那么厉害地打扰我了。

有一项请求，这里一个富裕农民（也许是最富的农民）的女儿，她是相当愉快的、大约18岁的姑娘，将去布拉格一个季度。目的是，学习捷克语，继续弹钢琴，上家政学校——这也许是主要目的——没有达到可以详细描述的那种高度，因为她在这里的态度就此而论有点绝望，例如说，由于她的能力，她受的教堂教育，她在这里没有资格相同的女朋友。她也不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一个引人注目的基督教姑娘能用什么方式使自己像一个犹太少女。我说这一切只根据人们的表面印象，我本人同她说过几乎不到50句话。

在这件事情上我之所以请你出个主意，因为我不了解自己，你却认

识那么多的捷克人。这些捷克人也许很乐意将这样一个只要有碗饭吃的姑娘接到家里，能够真正给她一点她所希望得到的好处。但是请尽快出主意。

我接替工作使我没有忧虑。此外，还有些东西受公司敦促，也肯定是多此一举。再说，也许没有忧虑，但是这个想法使我考虑到我同公司的关系，最近必须对此作出决定。如果按教授的意见行事，我本该坐在办公室里了。

致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1917年12月初于屈劳〕

24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今天才复信，也刚告诉你关于房间、灯光和老鼠的情况，这只是凑巧。但是这与神经质和城乡交流无关。我在老鼠面前的表现，是十分的恐惧。找到恐惧从何而来，是心理分析学家的事。我不是心理分析学家。诚然，我的恐惧像老鼠等有害动物的恐惧一样，都与这些动物出乎意料的、不请自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几分沉默的、顽强的、鬼鬼祟祟的出现相关。我总感觉到，老鼠在墙周围挖掘了千百次，并在那里伺机等待属于它们的夜间。由于它身体小，远离我们，因而更不大可能受到攻击。特别是体小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恐惧因素。例如想象一下，有一种动物，长相完全像猪，自得其乐，体小又像老鼠，从地上的一个洞里喘着气钻出来。这是惊人的想象。

几天来我找到了一条相当好的、虽然只是权宜之计的出路。我让猫在夜间待在隔壁的空房间，从而防止弄脏我的房间（困难的是，在这方面同一个动物达成谅解。这似乎是误解，因为猫由于挨打和各种其他的宣传教育，知道拉屎拉尿是不受人喜欢的，必须仔细挑选大小便的地点。猫怎样做呢？例如它选一个黑暗的地方，向我证明它的忠实，此外，当然也是为了它自己的舒适。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偶尔是我的拖鞋的里面。这样的误会像夜间和需要那么多）和可能跳到我床上。

我倒是得到了安宁。让猫进来就糟了。最近几夜也安静，至少没有明显的鼠灾迹象。如果我自己承担一部分猫的任务，竖起耳朵，瞪大眼睛，坐在床上或躬腰谛听，当然对睡眠不利。幸好仅仅第一夜是如此情况，现在已好转。

我回想起你曾多次向我讲起的特别陷阱。这些陷阱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了，我也希望它们不再出现。陷阱还在引诱老鼠，只是要灭绝它们，将它们打死。猫却是用自己的存在将老鼠赶走，也许甚至通过投放毒物，因此这也是不可完全轻视的。有猫的第一夜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在大闹鼠灾之夜以后。有了猫，虽然还不是完全“寂静无声”，但是再没有老鼠跑来跑去了。猫坐着，由于老鼠被迫改换地方而脸色阴沉。猫坐在火炉旁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但是神气十足，俨然像一个教师在场，老鼠只是在鼠洞里吱吱地叫几声。

你给我写信很少谈你的情况，我以老鼠之事报复。

你写道：“我等着死亡。”幸而你的有意识的思想和你的行动不完全合拍。究竟谁感到自己未“生病，有负疚感，晕眩，在同自己的任务搏斗，甚而以自杀为任务呢？谁能拯救人而自己同时不被拯救呢？”雅纳切克（顺便说一句，我妹妹为他的信请求你）也在布拉格他举行音乐会那天到处转。此外，你并不痛苦，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会另外写那篇犹太教法典小说，正义者在哭泣，因为他们曾以为留下了许多痛苦，现在看到，与他们现在的状态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但是非正义者呢？他们有这样的痛苦吗？

我上上那封信你未回复片言只字，也未寄来韦尔弗的地址，因此请你现在必须将我的信送交韦尔弗本人。《开端》^[209]的邀请大概是你发起的吧？

弗兰茨

〔1917年12月初于屈劳〕

24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一个好行动，这是这里的第一条新闻。我得到消息后上床，脑子里尽转悠着我早晨的幻想。最近我收到两个邮件，今天收到第二件，包括《犹太评论》、《泛理想》^[210]（一种与此事无关的恐怖杂志）、《舞台》（与《艺术家》^[211]竞争的报纸），洛维特目录（也许我可以保留），《行动》、《药丸》、《阿尔兹贝塔》（雅纳切克提到的莱比锡首场演出大概是弄错了，他指的是德累斯顿的演出吧？《胡德布尼评论》^[212]上怎么登的？）等等。你可以赠送，我们不行。黄油商店没有使这里得到满足，用一张钞票封不住想亲吻的嘴（在一首令人讨厌的歌停顿时，我刚在厨房里听到惊呼：“老鼠死了！”）马克斯，我有一个请求：《多瑙河流域》邀请我去，带上科尔纳^[213]的摘抄本。我必须答复。但是复信不可能寄到编辑部，特别是顾及到请柬上印的附注。方塔太太当然有K君的私人地址。若有可能，劳驾你代我将复信送去，但是要快点。

你将不去看德累斯顿的彩排吗？

弗兰茨

〔明信片，1917年12月初于屈劳〕

24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有误会，除第一夜因老鼠闹得凶以外，没有因老鼠而闹得彻夜不眠。一般来说，我睡觉也许不很好。但是平均起来，至少等于在布拉格睡眠最好的时间。《火眼》也只意味着，我试图使猫眼能看清躲在暗处的老鼠，但未成功。现在这一切至少在目前是多余之举，因为猫以前撒在地毯和长沙发上的沙子几乎全收集在一个提盒里了。如果同一个动物取得了一致意见，真好极了。它就像一个很有教养的小孩，在取到牛奶以后，走向提盒，钻进去，躬着背，因为提盒太小，它做它必须做的事。这件事使我目前没有担心。“无鼠的疗养院”，“无鼠”同时意味着“无猫”，当然是一个豪言壮语。但是也不那么伟大，因为“疗养院”这个字眼小，所以我不乐于进去。我的健康状况同样良好：外观令人满意，有可能，比在布拉格咳得更少。咳嗽大概有几天了，我未注意这些，这些天我不咳嗽，当然还可能有气短，就是说，在我过通常失业生活时根本未

出现气短，除非我在走路时同人谈话，不然在散步时也根本不气短的。——这一定是太累了。但是这是整个状态的伴随现象，我将此事告诉教授，他也对此生气，米尔施泰因博士也生气。我不知道为什么疗养院问题现在应该决定，这个问题不决定，但公司的问题将要决定，因为如果我现在去找教授，他会整个冬天把我送进公司的。但是我不去，或者非常犹豫不决，因此从管理处的窗子望过去，将显出不去的样子。不过这首先不是愉快的事，因为他们对我真友好，有些事不可能使某些人理解，特别是某些人的某些事不能理解。

第二个误会是，由于我怀疑你真生病了，所以我不想安慰你。因为我确实看见了你生病，我怎能怀疑呢？我之所以比你更坚决地站在你那边，是因为我感觉到你的尊严，人的尊严因你生病很痛苦而受到威胁。当然，在更安静的时候容易作出判断，你将会同样做的。但是将以前的我同现在的你作一比较，确实必须加以区别。如果我以前绝望，那是不负责任。我生病和我病中痛苦是一回事。此外我几乎没有什么。但是你的情况不同。在你的情况下，不是可以，而是决不可以有这样强大的攻击，致使你在攻击面前退缩不前，像你现在所做的那样，也像你似乎要做的那样，似乎要为自己去做的那样。这是我的看法，这使我不去安慰你，而只是我的信念。

我不认为，除了我说过微不足道的不肯定的意见之外，我能给你更重要的建议。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当然还很乐意在你的办公室同你在一起待几个小时，那儿特别美，我曾经属于你，但这只会有快乐，不管被宣读的作品的好坏，但是不会有决定性的建议，不会有在个别情况下可用的建议。我决不能给你这样的建议，现在由于别的原因不能。我相信，只有根据越来越孤立无助的自控教育学的精神才能作出这样的建议。我想起弗尔斯特^[214]的一个例子（当然记得很不清楚），这个例子表明，怎样能正确无误地使一个孩子相信，不仅每个成年人在进房间时必须关门，而且一定要这个孩子关门。——这是一个任务，面对它我会束手无策，但是面对它我把束手无策看作是正确的。诚然，对关门的能力吹毛求疵是困难的，但这是无意义的。因此我想说一句，也许可能提出建议，但是最好不转移注意力。——马克斯，你至少同样未能使我意识到你活着，我有你，你的信来了，在这方面给我安宁。此外，我知道，你有长篇小说的成功，你决不能为此成功辩解的。

〔旁注〕由于《开端》杂志的邀请，我之所以问，是因为否则我不能解释，人们从何处得知我在屈劳的地址的。你能对他们说清楚吗？由于我的布拉格之行，请及时写信告我何时你去德累斯顿。

248.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虽然今后几天我将到你那里去，但是我还必须写这封信，因为你写信谈到，我对你的来访的唯一疑虑（且不谈我最初在屈劳的时候，那时正在顺利发展的某些习惯也许能使人相信有必要完全独处）是，也许你不喜欢屈劳、我或者其他什么——当然奥特拉试图劝说我。如果这里有什么使你得到某种愉快的话，那么我将——这是肯定的——给你双倍的欢乐。我们现在不必谈这些。

我写的关于老鼠的情况，当然只是开玩笑。直到你听见真正有老鼠的时候，那才会当真。我不相信，作家和音乐家睡觉能受得住老鼠的打扰，没有一颗他们的心不是专受恐惧的侵袭，不受恶心和悲伤的侵袭。但这也只是开玩笑，因为多亏有猫，长时间来我听不到什么可疑的声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将在布拉格没有猫，必定到处听到老鼠的声音。此外，马克斯现在使我注意一个陷阱，能一下捕捉40只老鼠（我不知道是猛地一下还是慢慢地去捉）。猫已经订购了，将在我这里感觉舒适。你将在它的保护之下。

这在目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重要的东西是，例如屈劳的交通形式，根据这些形式，不是一个女仆，而是一位小姐狼吞虎咽地吃鹅，等等。我们将口头讨论这些，也讨论尚未寄来的长篇小说，我一定将它取来，然后我们三人一起阅读。

〔1917年12月中旬于屈劳〕

249.致约瑟夫·科尔纳^[215]

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曾经那么友好地到办公室来，找我谈D.[216]的事，当时我说，我会寄一篇文章给您，但却什么也没有寄（不过您答应把您关于阿尔尼姆[217]的文章寄给我，结果也没有寄来）。后来您的文章在D.上发表了，文中关于我的部分赞美堆积得超出了能想象到的界限，使我沉醉在虚荣的狂喜中，同时我又产生了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为我竟将您如此诱入歧途而害怕。而现在又收到了您的聘请。

请允许我说句坦率的话，D.在我看来是个无可救药的骗子，它可以把最优秀的人们吸引到它的周围，其中的文学人士（他们身上无疑会发生这种情况）本来完全可以用最好的意图和力量加以引导的——如果源头老是不断涌出新的不纯来，那么就无法化不纯为纯。我这么说并无反对奥地利之意，并无反对军国主义、战争之意，并不是D.中有什么东西吓着了我。我厌恶的是那种独特的混合思想，一种极其罪恶的混合思想，而这个刊物就是这种混合思想煮出来的产物。

尊敬的博士先生，我给您写这些并非出自狂妄。从布拉格平民的生活中或甚至从我的农村休养中出发（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月了，有病在身，但并没有为之惋惜的必要），您的看法就会同我一样的。作为工作人员，当然仅仅是被迫地作为工作人员，您必须把它看成委托您办理的意识形态上的事情，予以严肃对待，您不应该眼睛光盯着那份杂志，而要盯着您借以为那杂志工作的自己的良好的意志。

从我自身出发看只有三个因素可使我考虑合作事宜：

第一是想到您是编辑。但恰恰这一点会使我望而却步，因为我不愿将来在回忆中想起您就想起这个事实，我不像以往那样自愿行事，而是为了您的缘故参加了某种明显不真实的事业；还有一点是必须考虑到的，您当然不会由于我不来而使您的刊物蒙受损失的，因为这份聘请书只是出于您对我独特的友情，而不是其他什么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想到这一合作也许对我的服役问题[218]会有某种益处。但这个问题已不存在，因为我有病在身。

第三个因素是对一定的收入的考虑。但目前我不缺收入，将来我也不打算以此方式来获取收入。

以上这几点在一定情况下是足以成为促使我参加合作的理由的，但它们在这里却都不成立。

尊敬的博士先生，现在您应该把您的阿尔尼姆论文寄给我（我记得您说过您只有一份，但我很快就会寄还给您的），以此表明虽然您对我这里的言论持异议，但您并没有真的生气。那样我会非常欣慰的。

致衷心的问候！

F.卡夫卡 敬上

〔1917年12月17日于屈劳〕

250.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你要能来该多好！因为你记住，作为避难处（不是作为目的地，无论我还是屈劳都不是目的地），在屈劳的我本身和我所拥有的一切，“连同人和耗子”^[219]全都属于你。

我不相信那种愤怒对于写作是必要的，而对于写作必要的避难愿望已经通过习以为常的肋骨旧疮和由此而来的流放命运得到表达。

我简直不能相信，为一位姑娘找个工作位置会这么难，这种困难显然成了你的诅咒的一部分（为了不造成错觉，你把这个诅咒表达得十分生动）。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寻找一下，因为我可能后天就将前往布拉格。就我的愿望而言，我会拖到以后才来，但这回是F.要来了。

同沃尔夫签订合同使我很高兴。

弗兰茨

〔1917年12月中旬于屈劳〕

25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早就想为《埃斯特尔》感谢你，但是她正好在我心情最坏的日子到来（现在也有这种情况），迄今为止我在屈劳还从来没有这样坏的心

情。这是心情不安，像波涛起伏，只要不终止写作，心情就不会平静下来。但这与你的痛苦有些不同。因为除我之外，没有人被牵连进去，除非心情不安不再可以感觉到，也许这得渐渐才能停止，但愿如此。

你的事业在我几乎预料不到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仍然相信，这里的决定既不来自右边，也不来自左边，将不来自妇女。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无论在这里在那里都一定爱见你，这里的消极面将你赶过去，那里的消极面又把你赶过来。也许你可能选择鲁特，但在这两个女人之间你没有这样做，仿佛你能够这样做，或者仿佛是你所要求的，或者仿佛是你的事。哭似乎不需你选择地点，你在这里为那个女人哭泣，在那里为这个女人哭泣，或者即使不肯定某个地方，你的心情大概也绝不会平静。要不是能把这说成你完全被驱逐出这个圈子就好了。当然这种解释太过于带有我的标志。

这个女人在做超人之事吗？是的。也许只有超人之事，但这也是当然过分了。

《埃斯特尔》我在火车上给奥特拉念过（也是一种呼吸运动，不是吗？）。总的来说，对布拉格的印象得到了证实，就是说，序幕的大部分令人惊羨，几乎全部属于哈曼，——一个真正大的停顿，由于大停顿我把拿着的纸扯碎了，主要是因为停顿。我们的小姐今天在弗洛奥，现在晚上给我带来了邮件，否则我得明天才能收到它了。你的礼物过重，印刷品、明信片，对此无话可说（韦尔夫总是这样说，如果你在那里说我的好话，那么采取任何方式都行），然后是报纸和《自卫》，我的最高学监的一封长信（我同他有很友好的联系，他也在这里访问），最后，这里有中断，F.的一封信，她表明她来过圣诞节，尽管我们事前对这样的旅行的无意义乃至恶意似乎取得过一致意见。由于各种不值得列举的原因，尽管我要在圣诞节之后才回布拉格，很可能我将在本周六傍晚时来。

再回转话题，谈谈《埃斯特尔》。

第二幕写得好，使我深受感动。我也赞赏犹太人的整个部分。你知道的，对小东西的种种厌恶依然存在，因为我能够为自己提出论证。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预先知道，我将读这个剧本时，情绪与布拉格非常不安的心情不同，但是结果是，我认为我对剧本理解得不大好，同

时我更多地明白了剧本的重要性。我指的是，我以前也理解剧本的重要，正如人们抓着把柄一样，作为艺术品，我以前没有抓住它，我对剧本的理解不够。也许根本的困难在于，剧本里必然有些不真实的东西，因为三个角色哈曼、国王和埃斯特尔实际上只是一个，即人为的和艺术的三位一体。它通过多个相互交错，产生这样的前提，紧张、鸟瞰、结论，这些对于心灵的历史来说，只是部分的，即使也许大部分是真实的，或者真正无条件必要的。举一个例子，正由于我未完全理解，当然是一个错误的例子，哈曼和埃斯特尔同时，在同一个晚上跳起来，完全像一些傀儡隐藏在里面。在整个剧中（例如在最后一幕的绝望中我在列举我的职位时忘记了绝望），哈曼坐在国王的宴席旁，这也很美，很不人道。但是他们真的今晚才来吗？国王的生活已经渡过了一个重要的时期，他犯过罪，痛苦过，压抑过自己，确实输了。也许这一切比现在发生的事更深一层，也许从最高层来看完全相同，无论如何，没有哈曼和埃斯特尔，这是不可能的。再三进洞几乎暗示，国王怎样在第一幕就已经认识和了解全剧的发生地点，仿佛是过去的一个老戏。在最后一幕的告别谈话中有某种捉摸不透的成分，它比剧情本身更耐人寻味和被人说三道四。但是在这些场的前提中说得太少的事情，以后在第二幕的数千年历史中又出现了。由此得出结论，我以为艺术作品甚至肯定日益加强、很难接近的错误道路，我不能走错误道路，这些错误道路在我看清楚之时，我内心中就会有某种东西拒绝去走，因为它们是给艺术带来牺牲和你的损害的道路。我的意思是，由于你的损害以及你的长篇小说中的什么（你最近曾谈起过），产生了你的性格中的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对其他部分表示惋惜和安慰。也许这里出现了艺术与真实人性之间的有害的对立。在那里要求有某种艺术家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将你，例如国王——其实对国王这个角色早已决定了——引导到底，此外让你触及未来，或者将你（例如说）带到这样的地步：埃斯特尔确实扛起了世界，在剧本的生活中渺小和无知——她必须是怎样的人，在剧本的视角中这又怎样跟着得到别的意思——她在哈曼旁边走着，她，依然未变，由于杀死哈曼，在本质上发生了改变），但这里只有决定性的生活。

写得太晚和太多。我们即将再见。关于这些事，我当然会写得多说得的少的。

弗兰茨

〔1917年12月18—19日于屈劳〕

〔边注〕陷阱已经设好。——是的，《开端》即富克斯的地址，他只写信给我谈到“坏的开端”，他曾叫人邀请我去那里。我早已有向那些人——因为我喜欢传阅——真诚地表示不参加。

252.致埃尔莎·勃罗德

亲爱的埃尔莎：

这是瞬间写成的信，在第二瞬间信未写成，在第三瞬间信未寄走。因此信基本上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对您根本上富有的人性的了解。

亲爱的埃尔莎太太，如果我们想谈谈马克斯的情况，我们必须首先在同一层次，只有作为马克斯的朋友才能相互谈话，只能作为朋友交谈，其他一切放在外面，即使您在瞬间的错误中，想到那里去握我的手，我也不敢去抓的。

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既不是他的医生，也不是他的老师，也不是他的法官，而只是他身旁喜欢他的人。我认为，作为这样的人，我们，如果作为整体的话，不可以通过建议、耳语、暗示影响他，而只能通过直接产生的结果，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爱情、善意、克制和友谊，才能影响他。您也这样影响过他，我常常见到这种情况很感动，但是您当然也不仅仅这样做，就是说，很少像所有的人，因为如我上面所说，这只是指目标。甚至最近（我相信您也将会在场）我也试图提出建议，也许这不是您所说的那种建议，但不会违背您的意思，至少违背我的意愿。这种建议是在马克斯的强迫下作出的，在他那样强迫下，您当然得不停地出场，提出非常非常之多的建议，直到精疲力竭为止。这一点我了解得很清楚，这里我毫无保留地说我了解。但是真情实况确实是：虽然在看到他一瘸一拐地走过石头路、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应该拦阻他，但是，如果不能做完全不大可能的事，那么就不可以通过冲撞阻止他跑入人们认为是他痛苦的境地。在这里想给他提出建议，大概等于说，我想因此谴责他，说他作为我的朋友，没有最早地陷入得肺结核的境地。

由于这个信念，我认识到您的信的错误。我再说一遍，我并不认为这些错误是您的错误，因此我也不可以保留您的信，将信退回。这些错误是：您出于爱情而诉苦，您有爱的真正机会。您找个说情的人，并且恰好把坚定不移的马克斯作为最强有力的说情的人。您把一件也许遥远

的次要事情看成是大事（或者至少让别人注意到您的眼光），您困惑不解，心安理得地成为现在这样子，结果耽误了时间。

您现在可以想一想您的信的语调：“别人处境困难，背诵几条原则很容易。”您是对的。我一想到您，这种感情就使我感到羞耻。但是，难道由于羞耻就该沉默不语，甚至撒谎吗？特别是在我们在关心马克思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时候。

弗兰茨·卡

〔1917年12月19日于屈劳〕

253.致马克思·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思：

这里的许多手稿（我唯一的一份）请交给你夫人，不要给任何人看。请你叫人从库贝尔赖特和“旧报纸”上给我搞一份抄件，费用记在我账上，然后将抄件寄给我。我需要将抄件给科恩费尔德。

长篇小说我不能附上。为什么旧事重提呢？只是因为我迄今未烧掉它们吗？（不，正好F的一封信到了，她很感谢你给她的《埃斯特尔》，她问是否应该向你表示感谢。）在我即将来之前，但愿我能来。取消这样“甚至”艺术上不成功作品的意义何在？在于人们希望从这些作品中能拼凑成我的整体，如果我处于困境，我将能捶某个上诉法院的胸脯。我知道，从那里得不到援助是不可能的。我拿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难道不能帮助我的人还要损害我吗？如果知道这一点，那又会怎么样呢？本书耗尽了 my 财力，否则我不早说我带纸来了。

离昨天晚上还只有很短的时间。对我这个未经历真正痛苦的人来说，这件事大概是这样的：你的夫人写的主要谴责我的信比起你的信来，也许触及到更重要的东西。

时间太晚了，我还必须去办公室。我很快会从屈劳给你写信的，也许今天不同你们谈话为好。

弗兰茨

还有一个请求：请你将征兵站的空白表格给我寄来，我相信，明年1月必须服兵役的。

〔1917年12月底于布拉格〕

1918年

254.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在6至8度的寒天开窗睡觉，早晨，罐子里的水表层已结冰，砸碎后，将水倒进脸盆，水又结成冰，就用这冰水擦洗，当然是赤身裸体。8天后居然还没感冒，先前我可是习惯于日夜守着取暖炉的——这一点，现在你得向我学习。真好，能一连8天待在图书馆里。日后面谈，我还会向你们讲述更多的趣事哩。向奥斯卡致以最衷心的问候。伊尔玛太太，这儿也有钢琴！上述一切均由疗养院主人和主要病人确证无误。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1918年1月初于屈劳〕

25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今天我只是奥斯卡的秘书，没有责任一身轻。

“你可以确定在哪一天给我和费利克斯朗读这部小说的结尾。弗兰茨告诉我，结尾部分孕育着希望的美，使我比早先更好奇。我星期天来，也就是说从星期一起，我每晚都准备着。你和费利克斯商定后，也许能写张明信片给我。如果你没有可能效法我，我根本不想告诉你这儿的天气是多么地晴和美好。”我（正是我，弗兰茨，最近将更多地给你写信）不久前在朗读特略尔奇的文章^[220]时忽然想到，这部小说建设性的结尾本来就比我原来设想的要简单和详细。就是说，建一座教堂和一所疗养院，几乎肯定无疑会建成的，拆得快，建得快。

我们和奥斯卡在一起很愉快。

弗兰茨

〔明信片，1918年1月初于屈劳〕

25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奥斯卡在这儿期间，我没有给你写信，因为第一，我太习惯于孤独（不是寂静，是孤独），以至几乎不能写作；第二，他不久将亲自从屈劳给你写信。在某些方面，我更了解他了，可惜我的能力不足以给这种清醒的认识经常不断地勾勒出一副清晰的面孔。你对奥斯卡的判断在整体上无疑比我正确，可在细节上你似乎弄错了。——这部小说的许多地方是奇特的，迄今为止，利用奥斯卡改变了的工作方法，我看到了太多表面上的东西，其实不是表面上的，确切地说那是真相，可它触及了那极度紧张、却太狭窄的范畴，由此产生了疲倦、错误、虚弱、呐喊。如果屈劳对他稍有帮助，我会非常高兴，为他也为我高兴，虽然我对此很怀疑。你是否来信谈谈这事。

对寄来的《笔记》、行动和表格，我表示感谢；这次我能把《笔记》送给F.吗？

我们的最后一晚过得不愉快，从那以后我很想得到你的消息。那一晚过得不愉快，是因为我（天生来就是无助的，可是这对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无助地看着你，对此又几乎不能忍受，尽管我试图把这种无助对自己解释为：当这辆老牛破车第一次摇晃着活动起来时，不能立刻找到恰当的步伐。你说着令人不安的事情时，也那样令人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当时，在我看来，以另一种方式与此相应地，你妻子比你更有理得多，就像为区分其他事物，妇女们从根本上或许就更有理。对你不适合结婚的指责，至少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听上去是真的。如果你反驳说，这正是你的痛苦，她的回答仍是，因为这痛苦不是她的，你就无权把你的痛苦变成她的。你只回答，这是她的事情，正因为她是女人。因此事情就又提交给一个那么高等的法院，该法院不判决，而是让审判重新开始。

她，我和她（不，我不想和你妻子联系得如此紧密，对这事，或许她的看法不同，）认为，你的“不适合结婚”之处在于，虽然你需要婚姻，可只是部分地需要，同时你的其他天性在拉扯你，也借此拉扯作为丈夫的你，而后者根本不喜欢这样，正因为如此，婚姻的基础遭到破坏。当然，你整个地结了婚，可是用和上述分裂人格相符的长远眼光来看，你先迫使人由远视变成斜视，这样即使结了婚，也是无益的。例如，你和你妻子结了婚，可是文学与她并存甚至高于她的存在。再比如，假使你和另一个人结婚，可是与她并存和高于她存在的是巴勒斯坦。这种情况即使必要，也不可能。与此相反，一位真正的丈夫——理论上可以这样概括——虽然应该在他妻子身上与世界结合，但不是把值得与之结合的世界看得远离他妻子，而是通过世界看到他的妻子。任何别的情形都是女人的痛苦，但是，对男人的拯救或拯救的可能性，也许并不少于那种理想婚姻。

弗兰茨

〔1918年1月中旬，星期天于屈劳〕

25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但愿那事办妥了。我，一个病人，怀抱着你将使我复活的希望，竭尽全力赶到你的办公室，而你已离去，我伤心欲绝。旁边一位先生板着脸，对我很严厉。若那事真办妥了，但愿对此能起反作用。

这儿固然有很多更好的事情可以做，但几乎都得本人亲自到场才行。你不能为此抽空来几天吗？住的地方会有的。我妹妹，她不久前见过你，说你气色不好。来这里待几天，也许对你会有些益处。这邀请对你妻子当然也有效。只是目前我还想不起适合她的住处，不过，也许会找到的。就这样吧？

弗兰茨 敬上

罗伯特·韦尔奇好吗？

〔1918年元月于屈劳〕

亲爱的奥斯卡：

首先感谢你绝妙的礼物。当我考虑到除了听我和R先生（我很乐意向他转告你的消息，可我不明白它的意思）谈话的愉悦外，你从这场美妙、忘我的钢琴演奏中什么也没得到；与此相反，我看到奥特拉从箱子里取出这两件礼物时的意外惊喜，我就感到有趣。——于是我（一再地）认为，这世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特别是覆盆子汁，每一滴都是纯粹的享受；因为贪心不足，在不耐烦地用软木塞塞瓶子时，我差点把东西糟蹋了。还好奥特拉及时救住，她每天都大度地抢救诸如此类的事。这果汁还有一点好处，因为有些珍贵，它甚至诱人渴饮它。我现在想喝就喝，只因为它就在这里，而且让我感念一桩善行。

这儿还是那样，什么也没变，只是你离开了。你若再来，一切将和从前完全一样，你只需来就行。也许主要是为了回避幸运儿的名声吧，我最近几天比以往忧郁些，可这也只不过是又一段时期的轮回吧。

你真幸运，没有见到老鼠。大约你走后三天——我没有再带着那只雄猫。夜里我被嘈杂声惊醒，开始我还以为是那只猫呢，可马上就明白了，是一只老鼠。它像个不知羞耻的小孩，在那儿玩弄捕鼠器，它小心翼翼地扯下那块肥肉，这时，活门噼里啪啦地翻转，可就是开得不够宽，没有捉住老鼠。马克斯信以为真，诚心推荐的这个捕鼠器与其说是为老鼠设的陷阱，不如说是闹钟。另外，第二天夜里，另一个捕鼠器里的肉也被偷走。我希望，你别以为是我自己迷迷糊糊地悄悄溜到餐具柜底下，取出了那块肉。顺便说一下，最近几天又安静下来了。

西西里来的女歌手说日记[221]的坏话。这奇怪吗？还是没有心肝、缺乏理解力呢？没心肝的是把这本书给她用来讨论，这同给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个女人刚刚在他的窗下打过网球，浑身还热腾腾的，突然就走进日记的世界，她会说什么呢？此外，“保守主义总是损害艺术”，这几乎引自我们读过的日记。克拉斯蒂克怎么会和你一起到布拉格的？那本戏剧史的书怎样了？沃尔夫写了吗？你睡眠怎样？

向你和你太太致以衷心的问候！

25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的信这次（一开始又无视我那些消息，我可说过多次，并清楚地感觉到）对我特别重要，因我最近遇到了两三件倒霉事，也许只是一件。这些事严重地扩大了我固有的困惑，打个比方说，好像我从人文中学的最高年级降到了公立学校的一年级，只因某个教师以他的理由判我不及格。为使你正确理解我，我要说，这些事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不幸，我重视它们好的一面，为它们感到高兴，而且也这样做了。可是在“某种程度”的范围内，它们仍是有好有坏。

其中主要的一件是奥斯卡的来访。在他逗留期间，我对事情的本质没有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了解，也许只有一点，一小点，在最后一天。可在这儿，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平常的、不值得深究的对某种弱点或疲劳的感觉，这感觉在两人之间比在一人身上表现得更充分。最初几天，我们对奥斯卡的不幸想昏了头，之后的整个星期却都很快活，或许太快活了。另外，根据经验，我比哪位熟人都更容易感到疲倦。可是在此本不值一提，反倒有可能传开去。我想，《旧约》受难记中纯粹历史性的东西肯定也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

就是奥斯卡的不幸也不完全属于此列。可你问及此事，而我到目前为止只不过随便提了一下，因为不久前，这件事不仅是作为秘密，更是作为自白倾吐给我的；因为我更不希望，在你即将与奥斯卡第一次晤面前，就对他有先入之见；还因为说到底，在这种情况下，你总是很接近事情真相，故也不必非得我来说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认为这件不幸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目前，这可真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要是仔细考虑，远不止这些。第一，由于一系列经过屡次深思熟虑的原因，他不能忍受和他妻子的婚姻。我相信，事情可能是，他结婚7年了，可是有5年不和。第二，屈从于婚姻。如果有人问起，尽管他总是首先谈到他妻子的局限性（顺便提一下，她在性方面能完全适应他，而他认为她在可能的限度内仍是很可爱的），可指的却是婚姻的局限性。这里肯定剩下一点无法解决，例如对中篇小说的一次独特尝试，这是他和一群熟识的女人们某次就各自的婚姻顺序的主题进行的，最后总是得出完全不可能的

结论。第三，他也许会离开他妻子。这使他极度不安。尽管他知道，分道扬镳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犹豫延宕将使他永不得安宁，并相信有充足的内因和外因，来实施这种自认为是残酷无情的行为。可是面对他儿子，即使不是真的出于父爱，他也不必承担罪责。总的说来，他的几乎不能被分担的巨大痛苦，特别是他对幽明两间的无尽幻想（我们睡在同一间屋子里，用魔鬼换取病原菌），使他完全属于阿斯科纳斯^[222]一类人，像他一样与我们西方犹太人时代密切相连。在这层意义上，即在社会思想的意义上，这部小说是一个伟大的公开宣言，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它对更广阔的领域产生影响，其本来意义将会显示出来。该小说也许只是一个声明，只限于反映时代，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最初几夜我们谈论这部小说就像对待一部人们用来证明种种事实的历史文献。我们也这样对待《诺尔内皮格》，可惜那时它没怎么触动我。至于我对奥斯卡事件的态度，就是这样，至少是有意的，很简单，动摇不定。由于内在的、但也许是出于有偏见的果断，对他的犹豫不决，当我相信听到的是“行”和“不行”，并且我的任务就是相信所听到的时，我也说“行”和“不行”，这就足以对他施加好的或坏的影响，对此，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另外，不管我的意图如何，起了一半作用的是屈劳和到那时为止，这里听命于我的那些东西，还有我给他朗读过的特略尔奇和托尔斯泰。

尽管如此，日后我才觉察到，这些事情对我产生了一种反作用。他的来访作为一次考试，我算是通过了，可事后——事过境迁之后，却落了榜。最近，我写信给奥斯卡说，很难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共度了整整一周后，他离我们而去。这是真的，即使只涉及我，可也只是和那一周的共同生活有关，此外，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了。和这个可亲的人相处，还一直使我的心情压抑。并不是说，我承受着他的痛苦，或他唤起了我自己的某个切身的痛苦，而是几乎完全抽象的，他的思维方式，他走投无路的处境，他的直到最近被证实为无法解决的矛盾，他对自己所作的那些没有意义、开罪于人、不断复现他自己、彼此重叠上升（从你小说中学来的专门用语）又混乱不堪的辅助性设想，——这一切汇集于我，就像一潭死水经过一周而成活水。曾同一个人在异己的魔鬼中并肩而行，而这个人与其说是它们的中心人物，不如说是它们真正的主人，为了不屈服于他，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需要何等巨大的力量和过往的孤独啊。

这儿，我稍夸张了些，无疑加上了别的东西，可基本上是实情。另

外，部分地归功于这次来访的后果是，在奥斯卡启程前的那个黄昏，我已急切地开始阅读《非此即彼》，而现在在读奥斯卡寄来的布伯的最近一批书，丑恶的、令人作呕的书，三本一个样。它们和《非此即彼》都是特意用尖得不能再尖的笔正确而精细地写就的（几乎整个卡斯纳大量地、不停地向一个来自于它的人涌去），可是它们导向绝望，像在紧张阅读时常会发生的那样。人们面对它们时，会不自觉地感到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书，就是最健康的肺也会喘不过气来。当然，或许需要详尽的解释，只是我一向的健康允许我这么说。这些书，只有当人们确实胜过它们一筹时，才能写，才能读。可是如此一来，它们的丑恶便从我的手底下长出来。

在你的事上，你并未使我信服。你是否误解我，使得我们竟不知道，在某一点上，我们大约是一致的？我并没说，你是为了文学和你妻子结婚的，而是尽管你钟爱文学，你还是结了婚，并通过缔结一个文学的“理智婚姻”（根据你的意思）来试图使人忘却这个“尽管”，因为你也必须出于真诚的理由结婚。正是因为你不能以一颗完全的新郎之心去结婚，所以便把“理智动机”带入婚姻。就是现在，我的处境似乎也与此相似。在我看来，你不是在这两个女人之间，而是在婚姻和非婚姻之间摇摆不定。女人应该使这种摇摆固定下来，而不伤害两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这是你对“引路人”的要求。可是，且不说矛盾到底是否能一举解决，单说这种解决恐怕根本不是女人的任务，而是你的责任，试图推卸责任是某种形式的过失。

在一定程度上，过失也在继续，你不再称为过失，或者确切地说，即使是过失，也是好意。无疑，你有一副软心肠，可是在这里，没有机会得到证明。这种情形就好比当一个外科医生（不是面对因病而有错的生物，而是面对原则感到良心责备）在勇敢地纵横交错地开刀、扎针后，这会儿由于心肠软，也由于要与这个重要病例永久告别的悲哀（“我妻子真应该，不中断第二性的精神和我的关系……”），而犹豫着迈出最后一步，也许会治好，也许会导致久病不愈，也许会致死，可无论如何是决定性的一步。

我对《沉钟》^[223]不熟悉，可是在你说了那些后，便把剧中的矛盾冲突看作你的，可是只受到剧中两个人的吸引，因为山顶的仙女不是人。

奥尔加^[224]吗？你没有按她本应有的性格发展来塑造她，而是有意

识地使她成为伊雷妮的对立面，作为她的救星。

可是下述问题除外，这儿的事在你眼里无疑是：“在厄洛斯^[225]身上，平静、绝对的安宁”是非同寻常之事，这似乎已被事实驳倒，而你却不加反驳地予以接受。只有当你用不那么高贵的名义称呼它时，人们才会怀疑。但是——这儿我又回到我的看法上来——正因为你这么称呼它，就更有可能出现另一个矛盾。

韦弗尔的话，肯定只是随口说的，他还没有被造得那么特别，以至于会在别人绝望的地方感到愤怒。可是，他悄悄地引诗的瞬间为证，却是独特的，与我、与你、与所有人一样，需要为自己辩护时，好像这儿真有什么可引以为证，且更不愿试着把目光从这儿挪开。此外，兄弟般的、背信弃义的，也意味着“只有空虚的日子难以忍受”，无法调和那种恼怒。

弗兰茨

附上《御使》^[226]，谢谢《笔记》。

〔1918年元月中、下旬于屈劳〕

260.致约瑟夫·科尔纳

尊敬的博士先生：

我没有想到《多瑙河流域》竟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快乐。昨天早晨，我在半梦半醒状态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是我能收到这篇阿尔尼姆论文和一封这样或那样说的信，会怎样怎样。然后它真的来了。非常感谢。

您对奥斯卡·鲍姆的见解完全正确。事情越多他越高兴。另外——尽管这可能已与您的编辑领域无关——难道费利克斯·韦尔奇（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就不可能应邀参加合作吗？就他而言，可与他开展多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对D.将是有益无损的。最近他将在沃尔夫那儿出版《有机的民主》一书，还参加了希勒尔《目的》第二卷的写作。这些东西与D.自然是无关的，但还有其他一些。

阿尔尼姆论文非常温柔和真实。并不是每只手都能这样坚持到底

的，没有爱和深刻的见地肯定做不到这点。那里有逃避工作和战争欲的某种奇妙的表现，它〔战争〕年复一年全副武装地站在门后，未曾越雷池一步。引语的排列对那种思想起了有力的辩护作用，但又避免露出一副律师相。关于真理不只有两重，而是有三重的思想引起的烦恼是根本性的斗争。这三重是：献身是必要的，珍重自身更必要，而比后者更必要的是自我牺牲。阿尔尼姆也未能超越这一思想逻辑，他的自我观念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我把那同婚姻作的比较改写了一下，当然是在他的思路启发下：“战争犹如婚姻，是可悲的，但不同于单身汉所害怕的。”

这篇文章有个错误（而这一点引出了您关于沃尔夫的问题），它的内容太广博，这样的内容当然是无法包容在其中的。——当然并不是就毫无希望了，但困难是有的，尤其在现在这时候。纸张是那么紧缺，而沃尔夫又忙于那么多非出版社事务，而且又正值他一心只想着他的新工程《新精神》。我现在同他没有联系，我最近的一封要求他迅速答复的信寄出约有4个月，至今未有回音。但可能性还是有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沃尔夫本身是搞文学史的（我记得他是英塞尔出版社那套麦尔克[227]文集的主编和波恩研究文集中一篇关于奥伊伦贝格[228]的文章的撰稿人），所以可以从历史学方面着手与他谈论问题，甚至像阿尔尼姆这样的似乎是面很广的对象也不例外。出全集看来他一定会拒绝的。这他也承担不了，但也许可以出个书信集，加上序言。他最近不是出了棱茨[229]的书信集吗？紧跟着再出这么个集子也许能办到。您不妨读一下这本书信集，我深深为之吸引，然后您写一篇文章登在《多瑙河流域》上，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好（也更有价值的）与沃尔夫谈判的开端了。无论如何总是要写出东西来，这样一个淹没在作家大海中的出版家才会侧耳倾听。要是能够成功，我将非常高兴。

致最衷心的祝愿！

卡夫卡博士 上

〔1918年1月底于屈劳〕

261.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顺寄回校正稿，恳请注意下列各事项：这本书应由15篇短篇小说组成，我已在前不久的一封信里向你们说明过其顺序，到底怎样，眼下我已记不得了。不管怎样，《乡村医生》不是第一篇，而是第二篇；第一篇是《新律师》。请无论如何按当时拟好的顺序编排这本书。此外，请在最前面插入一页，题写献词：“献给我的父亲”。书名的清样我还没收到，书名应为：

乡村医生

短篇小说集

此致

崇高的敬意！

卡夫卡博士

请将棱茨书信集寄给我，按给作家的优惠价由我付账。

〔1918年1月27日于屈劳〕

26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对你的事，只要你不给我回信，我就还是只说：我也相信妇女的引导才能，一如女人在原罪中所表现出的，对此，人们像大多数时候一样不知感谢。例如，你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引你越过她的身体走向另一个女人，在此意义上，她也是引路人。她引导你后，又抓住你，这属于另一范畴，也许这样，她以后更能引导。你说，真正的性生活的深层已对我关闭。你是对的，我也相信是这样。所以，我也避免评价你的事情中的这一部分，或者呢，仅限于确定，你认为是圣洁的那把火，没有足够的力量烧毁那些我容易理解的阻力。我不明白，为什么得像你那样解释但丁事件。可是即使是那样，至少照它发展到目前的状况，他的事也完全不同你的：她死了，弃他而去；你却是迫不得已放弃她，以此让她死去。另外，但丁也以自己的方式舍弃了她，并自愿和另一女人结婚，这是与你的解释不相符的。

可是尽管来吧，来驳倒我的看法。只是你须事先及时拍电报来，好让我们接你，也免得你来访时正赶上我离去（如果事不如意，我不得不回布拉格上班的话，大约在2月中旬）。据说我那位妹夫2月初来，我也不希望你和他碰上，就我现在所想到的，这可以毫无困难地避开，因为他肯定不会星期天来，而你可能会。由此可见，只要你事先拍电报来，整个2月全无障碍，要是奥特拉在这里的话（她在布拉格，约在星期一去探望你，肯定会因为你去外地演讲而不遇），为诱惑你来，她有数不够（对她而言够了）诱人的名堂。若你肯定不能在星期六早上动身的话（这种情况下倒宁愿星期五下午就启程），那么星期六两点钟后在国营火车站乘车，至5点半钟到达米克罗普，我们驾着马车在那儿等你。（现在作这次旅行，只用一个星期天不够，因为从1月1日起，早班快车不再停靠米克罗普站。）

非常感谢你寄来大量的印刷品和手稿副本（顺便提一下，既然我已找到另一出路，至少是对种庄稼来说，我不需要这个了^[230]），也谢谢你让沃尔夫记起了我。这事通过你比由我自己出面要愉快得多（前提是没有使你不愉快），因为如果他对什么不感兴趣的话，他就能开诚布公地说出来，而他一向是有话不直说的（至少这是我的印象），至少不在信里说，当面谈则坦率些。我已收到那本书的清样。

既然奥特拉不可能见到你，那她星期一中午就回这儿来。承作家协会（由“鹅毛笔”形成）告知，一家“奥地利早报”未经授权刊载了《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一文，该协会想获准，为我追索30马克的酬金（将近30%的回扣）。我该同意吗？这20马克当然是受欢迎的，例如，可以用来继续研究克尔恺郭尔。可是这家协会名声不好，“追索”也难听，而这家报纸可能是那家犹太人报纸。那么我该怎么办？另外，你能通过魏契克转告我报纸的期号吗？（当是12月或1月的某个星期天）

因为我没有一个可与之分享快乐的人，为此对你的感谢是一句话，它出自一篇为弗兰肯施泰因疗养院呼吁的文章。一位大工业家，韦尔特尔·冯·阿图尔先生在该院的第一次董事会上作了一大篇讲话，显然希望把它印出来，并供协会作传单用。这篇讲话比类似的东西好一些，用语比较清新、纯洁，等等。结尾那段是我前不久在布拉格加上的。这像是又在鼓励他做些修改和补充，在印好的文章里，我现在还读到这些：“多年置身于实际生活中，我的人生观——没有受任何理论的影响——逐渐归结为：保持健康，勤劳并富有成效地工作，为自己和家庭，以正当方式

挣得某些财富，将使人类得到现世的满足。”

〔邮戳：1918年1月28日于屈劳〕

〔边注〕马克斯，请问一下普凡菲尔特^[231]，怎么区别卢宾纳版和米勒版的托尔斯泰日记^[232]。

26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衷心感谢你，当然也感谢菲尔特^[233]。这样真是太好了。即使没有所有这些帮助，这事也会成功的。我曾提出愿意帮忙，并明确表示，不大相信帮得上忙，以后也还会这么说，可是甚至当事情失败的时候，仍然有一道虚构的慈善的光环笼罩着我。这谎言从何而来？

听不到你的演讲，对我而言真是一大憾事，更何况是在你对最重要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你不能设法让我也分享吗？比方说，对第一次演讲《文学与宗教》，你没有哪怕是一个可读的草稿或概要吗？

你从风景明信片上所看到的屈劳的特点都是对的。秩序存在于这儿的每天、每季里，而人们也能适应，这真不错。就是教堂，也有些意义。最近我听了一次布道，官腔官调，天真幼稚，所讲的引自《圣经》卢卡斯2，41—52，这儿说明了三个信条：1.父母不应该让孩子们在外面雪地里玩，而应带他们来教堂（你们瞧，这些空着的长椅！）；2.父母应该这样照顾他们的孩子，就像圣父圣母照顾他们的孩子那样（这儿指的可是孩童时的耶稣，对他，人们本不必操心）；3.孩子们应该这么虔诚地和他们的父母说话，就像耶稣和他的父母说话那样。因为天气很冷，这就是一切，可是总的来说还算有那么点威力。例如昨天举行的葬礼，死者是邻村的一个穷汉，那村子比屈劳还穷，可是葬礼极隆重，在雪地里的大市场上没法更隆重了。由于一道沟渠贯穿半个市场，灵车不能马上开往教堂，而必须围着鹅塘绕一大圈。参加葬礼的客人，即全部村邻，早就站在教堂门边，而灵车还一直在慢慢地绕它的圈子。它前边是一个小小的教堂唱诗班，正规地带着吹奏乐器，冻得缩成一团；后边是安闲地骑着耕马的消防队（我们的管家也在其中）。我则躺在窗前的躺椅上，恰恰是作为教堂附近的居民，把这一切看成对我的劝诫。

致以衷心的问候！祝演讲成功！

弗兰茨

〔1918年2月初于屈劳〕

264.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衷心地感谢您告知的消息和棱茨书信集这么好的礼物。这本书，我早就想要，甚至还在我知道您有意出版之前，因此它对我来说倍加珍贵。

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卡夫卡

〔1918年2月初于屈劳〕

265.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我有很多时间，在这点上你是对的，可是真正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的时间，却没有。你若那么想，就高估了我。一天天飞逝而去，倘若我在某一天——像有时会发生的那样——相信失去了一切，而为了追求那一切曾耗尽了过去的所有日子，那时，时间就过去得更快了。可是这些，你同样非常了解，也可以克服，而很多自由的时间却没有。

当然，你现在特别忙碌，这点我比你看得更清楚。没有哪个机构的庇护，而是独力承担自己的责任，每个星期走到人前，那些人坚持要从我这儿听到实质性的东西，而你自己也从各方面给予他们这种权利，——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几乎具有宗教意味。我曾梦见过你做报告的情形，现在仍记忆犹新。不过，你的报告内容是关于植物学的（请把这话告知克劳斯教授^[234]），你对听众讲解类似蒲公英的某一种花，确切地说，是蒲公英属的几种花；所提供的是些罕见的、巨大的标本，一个

比一个高，从讲台直到天花板；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只凭自己的两只手做到这些的。然后，从背景深处（刚才那儿是些戴着假面具的人，这是一种可怕的恶习，这种情况几乎每晚都要重复几次，这是对人的一种考验，因为假面人为了不暴露自己而沉默着，物主似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而人得让他们高兴，让他们平静下来），也可能是从花自身射出一束光，使得花儿闪闪发亮。对听众我也进行了观察，可是给忘了。

重要的事情，即报告本身，你根本没有提及，而我已是为此请求过你，不过，现在大概是不可能的。一旦你结束那些报告，请把完整的手稿寄给我。若在此之前，你能做些诸如此类的事，就别耽搁。

据说，我往奥斯卡耳朵里灌的那些东西，这个可怜人已尽可能都捎到屈劳来了。我很愿意知道，他过得怎样，不过，我可能下周就回布拉格（因为服兵役的事，如果免不掉的话）。从马克斯那儿，最近收到一封格外平静的信。

我上司的儿子是因疏忽而出的错。虽然我受到感激，可似乎总有点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被忽视了。这个年轻人对事情的结局很伤心，只好自慰道：他之所以被解雇，只不过是因他属于最后的一批人。

眼下，我自信是完全健康的，除了一个不肯痊愈的大拇指外，那是在园子里挖地时划破的。我很虚弱，体力不及最小的农村姑娘。虽然以前也是这样，可是面对田地更觉羞耻，而因此失去了干农活的兴趣，也令人伤心。在这段弯路上，得出和以前一样的结论：我宁愿坐在窗前的靠背椅上读书，或者竟连书也不读。

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1918年2月初于屈劳〕

26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最近这封信显得相当平静，不需要帮助，而另一方面又是如此不安。因为积攒了过量的工作（对此，我没有亲身体会可与之比较），故

我宁愿不马上回信，免得在哪方面打扰了你。另外，若公司的回信下周前就到的话，下周我就回布拉格。我还得服兵役，那时我们也可以谈谈你信中没有提到的、对我而言特别重要的两件事情：有关奥斯卡的消息和你来访的事（好像你压根儿没收到我上封信似的）。

但丁的诗很美，可是从表面看，他的诗别具一格。只有在总的方面你才能和他媲美。人们是多么容易或多么必要在那儿与他相比！最近我在读一封伍尔悉尼茨基的信。我想是在利沃诺，一个贫困的、衣衫褴褛的手艺人流着泪给他吟诵但丁的诗句。

柯尼斯堡接受上演^[235]无疑是一大成就，因为这可是最早的文学实验舞台之一啊，它现在将上演你最重要的剧本。这真使我高兴。

我们将谈论所有其他的事情。至少，在屈劳，人们不用为我担心。有人（不知名的作者）为屈劳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写了一节诗，给我的，除了韵脚不够理想，还算令人安慰：

博士是个好男人，

主会怜惜帮助他。

致以诚挚的问候！

弗兰茨

〔1918年2月中旬于屈劳〕

26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尽管天气这么好，我还是马上写回信。你误会了我的沉默，不是出于对你的考虑，如果是那样，那我宁可用不答复的方式来表达，这回是出于我的无能。在这一大段时间中我写了三封信的开头，可又都撂下了。原因是无能，但不能错误地理解成“退化”。那是“我的事”，可以经过极大的努力说出来（这件简单的事我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办到，这同那既幸福又不幸地随波逐流的克尔恺郭尔是不同的，他能那般奇妙地驾驭不可驾驭的飞艇，尽管这事本来与他毫无关系，而根据他的思想

也是办不到这事的，而是否办得到也是无所谓），但不能传达。可是这么一来，我实际上也失去了说出来的能力。沉默也属于这片土地。当我离开布拉格到这里来的时候，正是它的用武之地（经过最近这次旅程，我到达这里时像是喝得酩酊大醉；仿佛我到屈劳来的目的是醒酒，而在我酒快要醒的时候，就总是马上又坐车前往布拉格，以求在这里在酒未醒之际又把自己灌得大醉），但当我在这里待了相当一段时间后，这里仍是它的用武之地，总是如此。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情况：我的世界通过寂静变得越来越贫穷；我总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的不幸。我没有足够的肺部力量（这是象征的具体寄托）来把世界的多姿多彩吸入我体内，而我的眼睛告诉我，世界显然是多姿多彩的。现在我不再作这种努力，它被排斥在我日常的日程安排之外，而日子并未因此而变得更昏暗。可是我现在比那时更难以说出那些话来，而凡是我所说的，却几乎都违背我的意愿。

在克尔恺郭尔身上我也许真的搞错了。当我读着你评论他的文字时，我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点。事实正如你所说的：他的婚姻实现问题是他的主要方面，这个主要方面不断被抬高，甚至进入他的意识之中。我在他的《非此即彼》、《恐惧和颤栗》、《重复》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后两本书我是在这两周内读的，我已订购《阶段论》），但我真的把它给忘了——尽管现在克尔恺郭尔老是出现在我头脑中，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干别的什么事，总是不能够完全脱离与他的联系。我读了那本小册子《克尔恺郭尔同“她”的关系》（英塞尔出版社^[236]——这本书就在此地，我将把它寄给你，但它谈不上有什么重要性，有待今后加以摧毁），之后觉得我与他有“身体上的”相似之处，这种感觉现在完全消失了。他从一个邻居变成了一颗明星，这里表达的既是我的钦佩，也是我产生同感时的某种寒冷。除此之外，我不敢说什么肯定的话。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几本书外，我只读过他最后那本《瞬间》。这两本书（《非此即彼》和《瞬间》）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镜片，透过它们可以向前或向后，当然也可同时朝两个方向探索他的一生。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仅仅从反面角度来认识他，比如在《恐惧和颤栗》中（这本书你现在好像正在读），他的正面思想扩大得巨大无比。只有当出现某个人（一个普通的舵手）时，只有当有人认为（我就是这么看的）这种正面思想升得太高的时候，这种扩大才会停止。他看不到普通的人（但奇怪的是，他却非常懂得如何与普通人攀谈），却把巨大的亚伯拉罕画入云端。但不能因此而从反面来理解他（顶多只能把他最初几本书的术语看成是反面的），谁又能说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应该说是他的忧郁。此外，关于

完美的爱情和婚姻，你们在《非此即彼》一书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使A没有能力建立与B的完美的婚姻的原因，仅仅是由于没有完美的爱情。但阅读那第一本书《非此即彼》，至今还总是引起我的反感。

对奥斯卡的过敏我是这样理解的（有一点先要说明一下：不应该把他和某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硬捏合在一起，而那另一个人至少在他眼中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他感到非常痛苦（被逼着去做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不对的事情），而他不愿停留在自我折磨上，因而也给了你一点折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能理解他，而且不认为这些事情是无足轻重的。

从皮克^[237]那里我幸运地尚未收到任何东西。即使收到来信，对那要求可能也会愉快地予以拒绝。拒绝的诱惑力不会把我引入歧途，但力量确实很大。对你这种诱惑力是不会起作用的（我从莱斯出版社那儿得到一封友好的约稿信，而从沃尔夫那儿第一次清样寄出后却毫无信息）。

李卜施托克对你的评论是令人讨厌的怒火爆发，其文笔的可厌也同耶奴发（刊物）上的其他批评文章不同。据我的感觉，答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他的忙，通过这答复，读者才意识到，原来对这玩意儿也可以讨论。

祝你在德国一切顺利，旅途愉快！

你的 弗兰茨

请代向费利克斯和奥斯卡问好，我不知道能否很快给他们去信。

关于卢宾讷出版的托尔斯泰日记，你问过普凡菲尔特了吗？

你说的奔波、操劳指什么？

同（保险）公司的关系仍然是我的痛苦。我能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

非常感谢那两个邮件，你对我非常好，只是别谈论“变化、退化”。

〔1918年3月初于屈劳〕

亲爱的马克斯：

在德累斯顿竟会如愿以偿，实在出乎意料；在那儿他们怎么会这么理解的？我指的是那些演员、戏剧人员。出人意料而又美好。在那儿见到父母的愉快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你的夫人没有同往吗？总之那是些美好的日子，他们的好意也许能够暂时补偿一下意志自由的损失。我说得这么随便，是因为我那把一切都视为荒漠的眼光永远不能像你那么聚精会神地去捕捉位于地平线某一点上的意志自由这个概念。再说，你在这里也能保持意志自由，或者至少不会失去它。因为你在目前不拒绝把此事作为恩赐来接受，即使作为恩赐接受了，却并不予以重视。我们是不会失去这种意志自由的。你可知道，通过多年兢兢业业的工作你已经把什么带入了光芒无限的运动之中了吗？我说的是你，不是我自己。

谢谢你在沃尔夫那儿介绍我。自从我决定把这本书[238]题献给我的父亲后，我非常希望它能马上出版。我并不是想借此求得父亲的谅解，敌意的根子从这儿是拔不出来的，但这样我至少做了一件事，虽说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但毕竟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下。由于沃尔夫把我拒之门外，不答复我，什么也不寄给我，但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所以我想把手稿寄给莱斯[239]，他友好地告诉我，有事可以找他。我给沃尔夫写了一封最后通牒信，但至今也还没有回信。可是这期间，约十天前又来了一份新的校样，我已经告诉过莱斯不要再寄来了。难道我应该把它寄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吗？这期间也来了一封保尔·卡西尔[240]的邀请信。他是怎么得到我在屈劳的地址的？

也许你同阿德勒[241]也讨论过克尔恺郭尔？现在我对他已不再那么熟悉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读那些旧书了（由于天气好，我老在园子里劳动）。《阶段论》还没有到。你提到“彻底自首”，显然你同我一样感到摆脱不了他的术语以及他发现概念的威力。包括他那“辩证”的概念，或者那个“无限性骑士”和“信仰骑士”的区分的概念，或者甚至包括“运动”这一概念。这个概念会把人们直接送入认识的幸福境界，而且还要更进一步。这些都是他首创的吗？也许多少受到点谢林或者恩格尔（他写了很多反对这两个人的东西）的影响吧？

译者的态度显然是可耻的。我想，他只在《非此即彼》上承认“考虑到”作者的“青年时代而作了改动”，那么在《阶段论》的翻译中也是这样的啰嗦？这是令人讨厌的，特别是在感到对这些书无法真正理解的时候。但译者的德语还不算太坏，在《跋》中有时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说

明，这是由于从克尔恺郭尔那儿射出那么多的光线，因此所有的深处都能被照到一些。但出版社本来是根本不必为了挖掘这些“深处”而翻译克尔恺郭尔的。

在他的出版物中（《阶段论》我没有读过，但从这书名的意义上看，他所有的书都具有自我表白的性质），我看不出同他的主要意图有什么根本的矛盾。它们是不清晰的，尽管他在以后的发展中会有一种清晰性，但这也只是他的精神、悲哀和信仰混杂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他的同时代人一定比我们感觉得更清楚。除此之外，他的自我表白的书都是假托的，其假托性几乎渗透纸背。这些书尽管充满了自我表白，但总的来说都可以看成是诱惑者迷惑人的信件，在云雾中写成。假如这一切并非如此，那么它们就应该通过时间的缓和作用使这位未婚妻松口气，并使她摆脱那现在正空转着的，至少说只在折磨着她的影子的刑具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即使至今一直耐心忍受了那些几乎每年都问世的出版物的“乏味性”的折磨，也是值得的。她作为克尔恺郭尔的方法（为使别人听不见而叫喊，在别人可能听得见的时候用错误的方法叫喊）正确性的最佳见证人，几乎是像小羊羔一样清白无辜。在此克尔恺郭尔也许获得了某种与他的意愿相反的东西，或者说获得了他的另一条道路上的副产品。

对于克尔恺郭尔的宗教观我不如你那样看得特别清晰，这种清晰性对我也是具有诱惑力的。克尔恺郭尔一句话都不必说，仅他的立场本身似乎就已经在反驳你了。因为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与神的力量是不能由任何外人来加以评论的，也许可以说，甚至连耶稣自己都无权判断他的那位后继者已经走了多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尔恺郭尔来说是个末日审判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世界灭亡后才能答复（假如还有必要答复的话）。所以宗教关系目前的外观是没有意义的。宗教关系本身当然想要显示出来，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因此正处于努力之中的人为了拯救自己心中的神的力量，必须把自己置于反对这个世界的位置上；或者同样道理，神的力量为了拯救自己把人置于反对这个世界的位置上。这样世界就不得不被克尔恺郭尔，也被你所强制，这儿更多地被你，那儿更多地被他，这只是你们处在这被强制的世界的哪一面的问题了。下面这段话并非摘自《犹太教法典》：“一个带着某些原始素质的人来了，他不说‘应该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个世界（人们像刺鱼那样自由地通过了这个信号），’而说‘不管这世界是什么样，我反正保持我的原始性，我不想根据世界的良好现状去改变这一原始性。’”话音未落，整个存在中就发

生了变化。就像童话一样，一句话说完，着魔百年的宫殿打开了，一切又都恢复了生命。这就形成了完全由注意力组成的存在。天使们有事干了，他们好奇地看着，他们正在从事的这件事会因此发生什么变化。在另一方面，阴郁可怖的妖魔们原来长时间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啃手指，现在也都一跃而起，舒展肢体，因为，他们说：‘在此，在我们等了很久的地方，有一些事可干了。’等等。”

关于自我折磨之神：“我具备基督教提出的前提（超过一般程度的苦难和特殊性质的罪过），我在基督教中找到了避难所。但要威严地直接向其他人宣读教义，我却办不到，因为我没有能力把这些前提搬出来。”

关于欢乐（在观察耶稣始终是健康的这一点上）：“身心完全健康地过一种真正的精神生活是没有一个人能办到的。”

你说，他不能算个范例，你认为他不是最后一个范例。当然，没有一个人是范例。

弗兰茨

〔1918年3月末于屈劳〕

26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的信竟是那样的官样文章吗？克尔恺郭尔有时候是难于理解的，与我联系起来看就容易理解了。此外要考虑到，现在到了以某种方式向村子告别的时候了。人们在布拉格推行着人力所及的最佳政策（前提是，那里还要我），沉默、忍耐、付钱、等待。这是不容易忍受的，而我下个月也许又将成为布拉格的公务员了。

谢谢你附来的信件。皮克的信并不属于那些战争恶果之列。不妨想想，我不曾读到过的你的上一封信还牵着他的手呢，而且正是那些最基本的想法有些模糊不清，而对他来说本来不应该是弄不清楚的。此外，我反复遇到这种情况：通过作品来检验作家，和谐的，便好；有一种美感上或音调上的不和谐，同样是好的；但若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不和谐，那就不好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原则是否可行，我很想否定它，但我觉得

它对于一个由有活力的思想支配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个世界上，艺术对我来说占有前所未有的位置，那是它应得的。（刚才我带着一头牦驴到一个叫沙布的村子去找一头牡驴，现在房间里已经太冷，而园子里那弄了一半的黄瓜畦中却仍很温暖。奥特拉刚搞来的山羊粪直冲我鼻子。）我的意思是：虽说分析是那种原则存在的前提，但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对这个原则进行分析的。我们始终是完整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写下什么东西，并不意味着抛出一个月亮，以便让人们到那里去探索它的起源，而是意味着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搬到了月亮上去，一成不变地搬上去，我们在那里一如在这里的我们。行进的速度可能会有千百种差异，而事实上一种都没有。地球在把月亮抛离后自身更坚实了，但我们却由于一个月亮上的家乡而迷失了自我，不是彻底迷失，世上没有彻底的东西，但终是迷失了。所以我也无法与你共同感受作品上所表现的意志和感觉间的差异（或许仅仅在正名方面能感到一些。此外，为了缩小范围，我只是就我自己而言，也许扯得太远了，但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别的视野）。意志和感觉，一切始终确实是活的，什么都是不可分离的（奇怪，我不知不觉中作出了与你相似的结论）。唯一可以办到的分离——与家乡的分离是已经完成了的，评论家闭着眼睛便能加以确认，但绝不可能就其差异作出评价（这些差异与分离的无穷性相比也是完全不足称道的）。有的评论玩弄着真真假假的概念，在作品中寻找着不存在的作家的意志和感觉。这种评论一概毫无意义，而且只能这么来解释：评论也失去了家乡，而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我自然相信，它们失去了自己意识到的家乡。

在柯尼斯堡对戏剧和观众还要进行一次检验。愿马克斯带着我一切良好的祝愿前去。

弗兰茨

你提到的艾伦菲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你能把这本书借给我吗？顺便说一下，我订的书一本都没有来，没有人送来。

〔1918年4月初于屈劳〕

270.致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

尊敬的乌尔齐迪尔先生：

非常感谢您友好的邀请和寄来的杂志[242]，但是我没有任何可供出版的东西，请至少暂时不要考虑我的合作。

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卡夫卡

〔1918年春于布拉格〕

271.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写这封信，只是为了恢复文字交谈。这是寄自屈劳的最后一个问候，下一个在布拉格。对你，我无需道歉。你一定已明白，或至少已猜到，我是沉默寡言的人，对此，我也并不懂得更多。对我而言，安静不是为了写作，也不是为了说话。我非常想念你，不只是因为《和平》与《评论》[243]。再见！

弗兰茨

〔1918年5、6月间于屈劳〕

272.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如果我这次休养有什么好的事值得写，我早就给你写信了。无论是开玩笑还是严肃地说，它在医学上都是没有希望的。你想听听外行的诊断吗？肉体的疾病在此只是精神的疾病的溢堤泛滥而已。现在如果要把它逼回河床中去，脑袋当然就要反抗，因为正是它在痛苦不堪的情况下抛出肺病的，而现在正当它迫不及待要抛出其他疾病之际，却要把肺病逼回去，它怎么受得了呢？如果要从脑袋这儿做起，先把它治好，那就必须拥有家具搬运工那么大的力气。而由于上述原因，我永远不可能获得那么大的力气。所以情况只能一如既往。以前我一直有一种愚蠢的观点，但对于处在自我医疗头几年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即我认为，我在某一具体阶段只是出于这种或那种偶然的原因而不能好好复

原；但现在我知道了，这种抗治疗的原因是永远黏附在我身上的。

除此之外，这里是非常美丽的，这晴雨交替的6月也不例外，柔和芬芳的风不停地抚摸着，尽管它是那么清白，它却为不能助人恢复健康而请求原谅。

马克斯信中谈到了你朗诵的故事，我非常高兴将在6月底与你重聚。

向夫人、孩子和妹妹问好！

你的 弗兰茨

我发现自己刚才滑入了太深的忧郁之中，现在情绪已不再那么坏了。

〔1918年6月于屈劳〕

27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利克斯：

今夏的一大收获，费利克斯，我将再也不去疗养院了。现在，我确实害起病来，可我再也不去疗养院了。一切都颠倒了。你妹妹今天走，我本想拿着花在公路上等她的车，可是在园丁那里耽搁得太久，错过了。现在只好用这些花装饰我的房间。

向你和你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约写于1918年秋于鲁姆堡〕

27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谢谢你的来信和审慎。你的希伯来语不错，开头有几个错误。若这样继续学下去，就不会再出错了。我什么也没学，只在力图取得地产，

除了整天在园子里劳动，也不想要别的什么。我把你对那部小说的看法抄给了W.博士，想让他稍微（不太厉害地）高兴一下。他很看重你的评价。

下下个星期一再会。请代问费利克斯和奥斯卡好。

你的 弗兰茨

〔风景明信片，邮戳：1918.9.27（土尔瑙）〕

275.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根据和那位冷静的房东小姐的会谈以及自己的经验，首先得出结论：在那一带几乎找不到住的地方，因为森林旅馆不是已经关闭就是根本没开过张，反正都关着门。在那儿完全不可能找到住处（除非有极密切的私人关系），即使设法找到，你妹妹于深秋或冬季到那里，也会感到十分荒凉的。另外，据说那些旅馆物资匮乏（相当缺煤），而土尔瑙这边多少还能筹到一些。

这些考虑使我马上想到我住的旅馆，房东小姐至少没有劝阻我。这家旅馆的优点是：管理良好，清洁干净，我认为烹调也是一流的。缺点就不只是这一家独有的了，只有肉菜（虽然这些菜适合不同口味应有尽有）和蛋；极少有其他东西，连青菜也吃不上。

虽然提供上好的肥皂和香烟，可到现在我连一丁点儿牛奶和黄油也没得到，各种法子都用尽了。在这方面，女人当然要机灵些。小镇提供的面包很差，还会更差，我根本受不了。

森林很美，可与马林巴德的森林相媲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美丽的、令人振奋的景色。

土尔瑙还有一妙处：美味的苹果和梨。我相信，你妹妹的捷克语不是很好，这固然会给在这儿的逗留造成些许困难，可是在旅馆里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儿，很多客人来自波希米亚北部，读的是赖兴贝格报、布拉格日报和《时代》，递上来的菜单也是德语的。

价格（不过是目前）：房间3克朗，土豆酱牛肉4.5克朗，酸白菜烧猪肉丸11克朗，烤小牛肉7—9克朗，李子丸（特殊例外）4克朗，土豆炒蛋6克朗等等。

若逗留时间长些，也许能优惠点。第一天，房东大叫大笑地拒绝给我优惠价，不过我们已经和解了。

这大概就是全部情况了。不过接下来，我还会到处看看。

致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写在单独的一张纸上〕

亲爱的费利克斯，补充一点：土尔瑙附近的卡察诺夫有一所旅馆——寄宿学校，它为了取得公众的好感等等，在我们这里贴出令人惊异的布告。今天下午，我去了，从土尔瑙走去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一幢漂亮的、大开间的房子，周围环绕着草木茂盛的小山丘，房子进深不太大，窗户朝南。一个新来的人，一个男人，租赁了它。人们可以和他谈话，他显得很有抱负，可到现在为止，他在那里似乎没做什么比贴布告更伟大的事。房子给人一种冷寂的印象，只有喝的，没有吃的。他解释说，他妻子还没到那里，她还在他以前租用的旅馆里，不过两周后就来，那时他就能具体谈谈伙食及价格问题。但是，他现在就已表示，到时可以接纳你妹妹。这件事无疑极不可靠，还有待详细核实。

有关土尔瑙更详细的情况，将口头告知，我暂时还不知道，你妹妹到底过得怎样？

星期六或星期天，我就已在布拉格了。我也许星期天下午去你那里，或者你星期一到我办公室来。

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1918年9月于土尔瑙〕

276.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衷心感谢你们告诉我的消息。如果我对你们关于该书印刷一事的说明没有理解错，那么意味着我将不会收到清样。这是遗憾的。你们告知的书内篇目顺序是正确的，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错误：该书应以《新律师》为首篇，而你们所列的第一篇《谋杀》应完全删除，因为它同此后那个篇名说得无误的《弑兄》只有微弱的区别。全书的题词“献给我的父亲”请你们别忘了印上，随信寄上《一场梦》的稿子。

致崇高的致意！

卡夫卡博士

〔1918年10月1日于布拉格〕

277.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库尔特·沃尔夫先生：

几乎是在久病卧床后写出第一笔时，就衷心感谢您友好的来函。关于出版《在流刑营》事宜，我很愿意同意您的计划。手稿我已收到，删掉了一小段，今天又寄回了出版社。

致

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博士 敬上

〔1918年11月11日于布拉格〕

278.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我同时用快件给贵社寄去《在流刑营》手稿和一封信。我的地址是：布拉格，7号信箱。

致

崇高的敬意！

卡夫卡博士

〔明信片，1918年11月11日于布拉格〕

279.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贵社显然由于疏忽把给我的信寄到了屈劳。这是不对的，这些信经多次转寄，几乎是碰巧才落到我手里。我的地址是：布拉格，7号信箱。

随信寄去《在流刑营》的手稿，我已稍加删削。有关出版事宜，我完全同意库尔特·沃尔夫先生的计划。

提请贵社注意，在以“铁棒”结尾的那段（手稿28页）之后须留出一段较大的空白，其中可填入小星号或其他的什么。

致

崇高的敬意！

卡夫卡博士

〔1918年11月于布拉格〕

28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本想上个星期天就出发的，可是星期六发烧，不得不躺到床上去。整个星期就这样半躺半坐地度过。我明天动身。马克斯，请帮个忙！如你在附信中看到的，手稿没到沃尔夫那里。我在同一天给沃尔夫寄去明信片 and 手稿连同一封信（附上的单据是证明）。明信片（沃尔夫称之为信）到了，手稿没到。两样都是寄的快件。你愿意替我要求赔偿吗？我从来就不知道怎么对付邮局。对付新国立邮局压根就摸不着门道。非常感谢你，再见！对希伯来语有疑问的地方，我也许会从舍列森寄一份问题清单给你。这不会增加你很多工作，你只需用一个字或摇一下头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就希伯来语进行交流。

弗兰茨上

〔1918年11月于布拉格〕

28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很遗憾，前不久没有在家里碰到你。顺便说一下，我不久将回去，也许就在圣诞节，元月初肯定已回去。这里没有屈劳那么好，当然也不坏，和各处一样富有教育意义。另外，价钱便宜得惊人。每天6个法郎（按照报上登的维也纳现在通行的汇率，1克朗=10ctm.）。附上问题清单，我几乎啥也没学。白天很短，煤油短缺，很多时候我躺在户外。我甚至连我的书也没读，只看看从图书参考室（里面也有《提荷·布拉赫》）带来的迈斯纳的《我的生平》^[244]。这是一本特别生动和坦率的书，随处可见亲身经历的烙印，叙述了很多政治文学界的名人轶事，它们发生在围绕着上个世纪中心的整个波希米亚-德语-法语-英语世界，政治上具有令人瞩目的现实意义。

再见！请代我向你夫人、费利克斯和奥斯卡问好！你向邮局要求赔偿了吗？

弗兰茨

〔1918年12月初于舍列森的施蒂德尔公寓〕

〔附上两页信纸的问题，它们涉及希伯来语语法，其中有许多希伯来语文字。〕

282.致奥特拉·卡夫卡

〔一张明信片上有6小幅卡夫卡的素描〕

我的生活图景。

你好吗？圣诞节带笔记本和书回来，我要考考你。另外，我该回布拉格吗？我在这过得很好，和在屈劳一样，只是价钱稍便宜些。我想在这里呆4个星期，但愿在圣诞节能健康而快乐地回布拉格。

多保重！

弗兰茨

〔1918年12月于舍列森〕

283.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这件事将不予办理，但将受到重视。另外，我的皮夹子里早就放着一张寄给你的名片，可用来办类似的、简单的事情（在钱的事情上当然也一样）。暂时我们还住在这里，你有关联盟^[245]的文章太精彩了。读的时候，我高兴得做鬼脸。它坚定、真实、透明，富有创见、温柔，此外还强烈地吸引人。——涉及伦理上个体的有机统一，据我的经验，这种统一的起因比它自身还要糟糕；这种统一在伦理上绝大部分只以内心保留为滋养。——可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也许除开两种人，一种完全在边缘地带游荡，随即倒下，而另一种是超人，能把整个社会都揽到自己狭隘的胸中。所有其他的人毫无例外都是社会的，只不过，他们须用不同的力量克服不同的困难。这点也应在文章中起作用，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判决，但至少构成一个判决的事实情况。——对可能会由事实而产生的误解似乎也不应完全回避，例如（很典型地）在人民

协会里坐着许多卓越的社会的人、在姑娘俱乐部里则少一些这样的事实。——可是我会经常不断地以这篇文章为准则。若你也完全照此构思你的新书[246]就好了！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8.12.16—舍列森〕

28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坚不可摧的你，疾病也来作弄你。你现在已能起床了。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我母亲没给我写信，没有人告诉我。写三两句话给我说说你的情况。我发烧时，你对于我似生命的保证。但愿你至少仍在当心轻微的后遗症，我感冒好后也有点后遗症的。无论如何，你病倒了约一个多礼拜。你妻子身体还好吗？你是否应到乡下休养一下？很遗憾，邀请你到这儿来有些不便，不过万不得已时来也行，因为我在被照顾方面有经验，应该也能好好地照顾你。我在考虑，是否应让我母亲去你那里，她是否会打扰你，也可能她在家根本见不到你，因你可能已在犹太国民议会里工作了。也许我只打发小姐[247]去你那里。

再会！早点来信！请代问费利克斯和奥斯卡好！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8.12.17—舍列森〕

1919年

285.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这个冬天接下来的日子你怎么过呢？这事好像分配得很不公平，我这已是第二个冬天待在乡下了。而你呢，在屈劳如此愉快的你，却又待在布拉格的风雪严寒里。这时我没有构思悲剧[248]，一部也没有，更没

有一部可与你的[249]相比。关于你那部戏或至少是它的命运，我倒很想听听。

另外，我相信，我不久就得回去，大约10天后，除非这儿的大夫劝我别那么作。我不想说，这儿没屈劳那么好，但难对付些。我现在已是第二次来，可在我熟悉这儿之前，也许还得来十次，而每次都重新开始。在屈劳曾是那么轻松。当然，那时我的健康状况要好些。

这儿房子里还存留着对你的记忆，或者呢，其实是记着你的男孩子。邮递员（你们在他那住过）的一只小尖嘴狗忍受不住莱奥的折磨，由施蒂德尔小姐买下，即救下了。那只尖嘴狗早就不在了，可是你作为儿子的父亲将不会被忘记。刚才，楼底下的狗狂吠，它们每天夜里都为那只狗向我报仇，可是也不是很有关系。内心的狗对睡眠危害更大。

衷心问候你及你家人！

弗兰茨

〔1919年初于舍列森〕

28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前不久我梦到了你。这梦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是我常做的梦：我随手拿起一根小棍，或者只不过折断一根树枝，斜斜的朝地上一点，然后坐上去，就像巫婆骑着扫帚，或者，只不过倚靠着它，像有些人在巷子里散步倚着拐杖——这就足以让我跳起来，慢慢地，低低地，最后远远地飞了起来，上山，下山，随我的意。若飞得精疲力竭了，我只需再朝地上点一下，就又能接着飞。这就是我多次梦到的，可是这一次，不知怎么的，你在场，注视着这一切，或者是在等我，那情形仿佛有时候身在鲁道夫公园。而现在我总是一再地伤害你，或至少是支配你。虽然只是些小事，一次我弄丢了一根你的小铁棒，而不得不向你坦白，另一次是由于我在飞行，而让你久等。可不，都是些小事——不可思议的是，你以怎样的善良、耐心和平静容忍这一切。要么——梦以这种思考结束——是你坚信，尽管我看上去过得很轻松，实际上日子挺艰难；要么至少是你坚持这么认为，并以此解释我一向费解的态度。

你甚至没有用丝毫的抱怨干扰这夜间的欢乐。

总的来说，我白天过得也不坏，至少是涉及肺时。没有发烧，也没有呼吸急促，咳得越来越少。相反，妨碍我的是胃。

你什么时候去瑞士？

致以衷心的问候！

请代问菲莉斯和韦尔奇好！

弗兰茨

〔1919年1月于舍列森〕

28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是在怎样设法战胜你的使命啊！这使命讲着一种如此美丽、清晰、响亮，又回声四起的语言。那些人又会说什么呢，他们的使命只是嗫嚅着，或根本就缄口不言。

当你还在梦中为你的思想^[250]受苦时，我正乘着三驾马车去拉普岛。今夜就是这样，确切地说，我还没走，只是三驾马车给套上了。车的横轴是一根巨大的兽骨，马车夫对三驾马车给我作了一通技术上相当有见地的、也很奇特的解释。我不想在这儿一字不漏地重复它的冗长。与此同时，我母亲的家乡口音混进了他的北方腔调，她本人或许只是她的声音在评价或解说这个男子的民族服装，说他的裤子是邦迪公司用纸质织物制作的。这梦显然利用了记忆中前一天的事件，因为这儿也有个犹太姑娘，也谈到了纸质织物和一家邦迪公司。

这位犹太姑娘^[251]还年轻，但愿只有点小毛病。既平凡又奇特；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非德国人。喜欢看电影、听轻歌剧和看喜剧，喜欢涂脂抹粉戴面纱，掌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俚语粗话，总的来说很无知，乐而少悲——她大约就是这样。若要详尽描述她的民族特性，只能说，她属于混血种族。此外，她的心灵勇敢、诚实、忘我——这么多特征集于一身，身体上无疑不是没

有美感，可是如此微不足道，就像一只对着我的灯光飞来的蚊子。她在长相和其他方面像布洛赫小姐，想起后者，你也许心怀厌恶。你也许能为她借给我《犹太复国主义之第三阶段》^[252]一书，或别的你认为正确的书吗？她读不懂它的，它也不会引起她的兴趣，我更不会为此逼迫她——可是尽管如此。

我没有很多时间，这点你得相信我。日子几乎不够用。现在是11点1刻。我独自一人躺在阳台上，面对山上的树林，这耗去了我大部分的时光。

我的健康情形不差，虽然肠胃功能紊乱。就是神经或人们这么称呼的那东西，也应该更有抵抗力了，它在我看来犹如面对着第二个人。接纳体力的一个新人、特别是他的痛苦，首先是他领导的斗争。关于这斗争，我相信比这陌生人的自己知道得更多，——这一切完全与生育行为相对应。

再见！请代问费利克斯和奥斯卡好！

弗兰茨

《自卫》已收到，你的短评《巴勒斯坦根本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邮戳：1919.2.6—舍列森〕

28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至今，我甚至还没为那本好书向你表示过感谢呢。在这本书的精神里活一阵子，真令人愉快。青春的记忆和感觉对于我来说渗透了一切事情，这个优点或缺点我还保留着。

就是那位小姐也让我感谢你，她认真地读了这本书，理解独特，虽然是用一种特别的少女瞬间领会的方式。此外，对犹太复国主义，她也并不是像我开始想的那样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在战争中牺牲的未婚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她的姐姐去听犹太人作的报告，她最好的女友在职工会工作，“不错过马克斯·勃罗德的每一次讲演”。

至于我，我的日子过得很愉快（粗略算来，我在过去5年里也没有最近几周笑得多了），可是这也是段艰难的日子。那么，暂时我还得熬着，但我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另外，这段日子，起码是在它的现实性上，过几天也就到头了。如果公司承认本地医生的证明的话，我也许还在此多待些时。

最初的，我认为生活最初的明显错误是如此奇特。它们也许应该被分类，而不是受审查，因为它们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但是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犯错误。我忽然想起一次赛跑，不管这次比赛是否当真，每个参赛者都坚信，他将赢得这场比赛。在取得生活的财富时，这种情形也是可能出现的。可是尽管看上去每个人都有信仰，为什么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呢？因为非信仰不是在“信仰”里，而是在使用的“比赛规则”里表现出来的。虽然某人似乎坚信他会赢，但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取胜，即他在第一排栏架前突然离开跑道，并且再也不返回。裁判清楚，这个男子不会赢，至少在这个层次上赢不了。看着这个人怎样从一开始就极其严肃地打算逃跑，肯定是很富有教育意义的。——祝你写作[\[253\]](#)顺利！并有很多时间！

弗兰茨

〔1919年〕3月2日〔舍列森〕

289.致马克斯·勃罗德

我亲爱的马克斯：

对塔诺夫斯卡一案[\[254\]](#)我不明白，相反却很理解维格勒的看法，可是更重要的是汉德尔的判断，因为从他那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你说为我准备了两首诗，这个消息给我的安慰比你知道的要多。我倒是很需要安慰。现在胃痛和你想要的东西开始得正是时候，而且来得这么猛烈，正适合于一个通过做米勒体操而变得强壮的人。整个下午，虽然很长，我却只是躺在沙发上，肚子里只有点代替午餐的茶。睡了一刻钟后，什么也没干，只是一个劲儿地生气，天为什么还不肯黑。这样，到了将近4点半的时候，光线发生了不停的变化，可是后来天完全黑下来了，也不合意。算了吧，马克斯，不要再抱怨姑娘们了，要么她们用来使你痛苦的痛苦是一种有益的痛苦；要么不是这样，那你就会保护自己，丢掉

痛苦，得到力量。可我呢？所有我所有的东西，都反对过我；所有反对过我的东西，已不再为我所有。例如——这只是一个纯粹的例子——当我的胃使我疼痛时，它就真的不再是我的胃了，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和一个有意要痛打我的陌生人没有分别。所有的事情可不都是这样？我只是由尖刺组成，它们深深扎入我的身体，于是我想要用力反抗，可是这只不过让尖刺更好地扎进去。有时候，我想说，上帝知道，既然给我造成痛苦的纯粹是紧迫性，而它又根本不能让我接受这种痛苦，我怎么还会感觉到痛苦呢？可是我得经常说，我也知道，实际上我感觉不到痛苦，我真的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没有痛苦的人。因此，我躺在沙发上时不曾痛苦，不曾对到了时间就停止的光亮生气，对黑暗也同样如此。可是，亲爱的马克斯，即使你不愿意，在这点上，你也必须相信我，一切在这个下午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如果我是我就好了）不得不按照严格的程序一一感受到所有那些痛苦。从今天起，我不停地让人劝阻我：最好是开一枪。干脆开一枪，把自己从不在其位的职位上打掉。好吧，这似乎是胆怯。即使在一种情况下只能有胆怯，胆怯无疑还是胆怯。这一种情况在这儿是一种处境，一种无论如何必须打破的处境，可是还没有人用胆怯打破过它，勇气只是把它变成无谓的忙乱。那么就继续瞎忙吧，你不要担心。

〔1919年春？〕

290.致约瑟夫·科尔纳

尊敬的教授先生：

非常感谢您。这样的研究是如此的平和并带来安宁，特别是因为导言很温柔，又站在男人一边，我真想接着往下读。不过贝蒂娜看上去也像一个化了装的、困惑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年轻男人，而且我不明白，这个幸福的婚姻和7个孩子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孩子们以后的生活道路还会顺利的话，那真是个奇迹。

另外，单行本中删掉了这篇文章中有关野兽的大腿和类似的猎获物的绝大部分，很遗憾。

致以友好的问候！

卡夫卡 敬上

291，致J.W.（？）的父母

〔片断〕

……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是如何得到证实和传播的，都好像是在诽谤我，使我显得可鄙、可笑。但是无论怎样解释，在这方面它是真实的，我给最纯洁最善良的J带来这么多痛苦，与此相比，任何仅仅来自社会的处罚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相信这两个假设是真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请让我们在一起吧，越过我所有的弱点，我们感觉彼此休戚相关。抱着一些希望，我打算2月份去慕尼黑，大约待三个月。J也一直想离开布拉格，或许她也能去慕尼黑。我们将见识另一片天地，有些东西或许自身会发生些变化，或许将改变某些弱点、某些恐惧，至少是改变它们的形式和它们的方向。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总而言之，我觉得，最后好像还是说了太多不雅和不愉快的事。请你们耐心些，不是宽容，而是耐心和专心，以便你们尽可能地不漏掉什么，也不对任何东西穿凿附会。

你们忠实的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19〕19年11月24日

292.致M.E. [255]

亲爱的闵策小姐：

既然小姐和闵策不协调，那么我称您：亲爱的闵策，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当然照片也使我高兴，可是主要是因为您是我曾认为的那种人，值得信赖，守信用，善良。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对照片我也能说实话，它们正如一个好人的真实写照那样，显示出某些人们很感激的东西，或许人们用自己的眼睛也没能发现的东西。您是位惊人的演员，或者更确切地说，您具有一个演员或舞蹈家的惊人素质。您神一样的傲慢（高雅意义上的），承受得住各种目光的打量，既中看又耐看。这

点，我倒不曾想到过。可是，恐怕您的这种素质在摄影师——一个平时可能极出色的人——那儿，没有得到很好的、明智的把握。照片上好的东西，很清楚是您本人，例如，第一张，他照得有点像施尼茨勒·阿纳托尔；第二张，把您照得弱不禁风；第三张有些像韦德金德^[256]；最后第四张则是（第一个晚上的）克列奥帕特拉。可这儿的前提条件是，您不是费恩·安德娜^[257]。他就这样把各种东西混在一起，而且在每个地方，无疑都有点道理，可是根据我的感觉，总体上他从未真正掌握这些东西。我并不是想借此说，您应该回避这样的摄影，我坚信，它丝毫也损伤不了您的心灵。可是面对这些事情，您得时刻保持着怀疑，就像您面对您笔记本中的达恩^[258]和鲍姆巴赫^[259]面对多愁善感、谎言和矫揉造作所应保持的怀疑一样，因为您在本质上比这一切要好得多。而且毫无疑问，您将越过这一切，就像越过通往圣泉的冰封的道路。在那条路上，很多其他的人要么因为愚蠢而倒下，要么因为多愁善感而绊跤。我坚持认为，您来霍尔茨明德^[260]是件大好事，那可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啊，而且没有特普利茨^[261]的红色背景。

那么，照片可由我保存了，不是吗，因为信里没有相反的命令。请再来信，特别是当您变换了地址时。拥有一个好朋友，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坏事。

再会，闵策！请代我向那儿所有的人致以衷心的问候，特别是小姐^[262]！

卡夫卡 上

星期六〔1919/20年冬于布拉格〕

1920年

293.致M.E.

亲爱的闵策：

您上一封信我倒是收到了，当然也因它而感到高兴，常常想着它，想着您。可是——我也不很清楚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未给您回信。也许是因为它显得如此独立，根本不需要帮助，甚至不需要回复。

今天的信不一样了。这么不安吗？这可真糟糕。可是顺便说一下，就是在舍列森时，您的不安里就包含着一些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和深信不疑的东西。人们为您担忧，可是也不希望您有别的样子。这就是我的态度，而亲戚们，他们就是愿意这样想，也不容易做到。可以理解，他们只会担心。我记不清，您是否对我讲过，父亲（且不谈管理企业和照料病人）对您有多么满意，您是否让他担心，他对您的未来是怎么考虑的等等。这些定会使我感兴趣。可是我相信，您谈起过父亲勃然大怒的情景。

真可惜，您放弃了学习计划，我不完全明白是为什么。如您所说，您已被霍尔茨明德录取。此外，霍尔茨明德也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仅仅在波希米亚北部就有好几所类似的学校。您作为实习生也许会想去一座农庄，那么，看来您一直都还是严肃地对待学习计划的。我知道眼下没有别的可能，但类似的可能性总还是存在的。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您自己不是说过，格罗斯普里森有个专业可能会录取您吗？——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结果吗？那么，我们还将共同考虑这个问题。

在舍列森和那以后的时间您是怎么度过的？同沃尔夫在一起，再就是在原野中到处奔跑？这样倒不错，但却太少了或太多了些。一个人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是好事，但又会变成坏事。大多数结局都是这样的：结果变成被自己的梦所追逐。正如您所写的，世界是广大、辽阔的，但绝不比人们在自己心中造就的它大一丝一毫。您现在眼中世界的无边无际，除了是一颗勇敢的心的真理外，也是十九年年华的幻景。这一点您用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很容易地得到验证，在您眼里四十这个年龄同样是无边无际的，但您的整个周围环境将会向您表明，您所幻想的无边无际并未包含在这个年龄中。

您在卡尔斯巴德干什么呢？您已恢复健康了吗？我想，在卡尔斯巴德也有施蒂德尔小姐的一个亲戚，她对我讲过这亲戚的许多好话。您认识她吗？我也许一个月后去梅诺拉。您本人去过梅诺拉吗？

致

衷心的问！

弗·卡夫卡 上

〔1920年1、2月间于布拉格〕

亲爱的闵策：

不，我并不想夺去您对生命的无穷性的信念（这种无穷性也是存在的，只是不是就通常的意义而言），也无法从您那儿夺去，因为您实际上并不拥有它。我是说：并未有意识地拥有它。要我对此说三道四，那么我只想说：相信您自己，相信您的更好的自我吧。当然，闵策作为低着脑袋的垂柳有时也是很美的，至少（大约估算一下）比闵策—克列奥帕特拉漂亮十倍^[263]。

奇怪的是，在您的信中“美妙的时辰”和“愚蠢”挨得这么近。它们不是同义的，而应该是相反的。用“美妙”来修饰时辰，这时辰中人们应比平时好，而“愚蠢”则是另一种时辰，那时人们比平时坏。“美妙的时辰”是用忧郁的情绪所买不到的，相反，“美妙的时辰”还能给一切灰暗的将来以光明。而为“愚蠢”，人们是必须付学费的，而且马上就付，尽管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用左手干着“蠢事”，同时右手不停地付学费，直到付不出为止。而蠢事当然人们都在干，亲爱的闵策，人们干得多么多，多么多啊！人们干蠢事干得忙不过来，以致没法偷闲去干别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有理由对此听之任之，而您肯定也不会听之任之的，否则您就不是我的亲爱的小闵策了。

那同您达成一致而您也同他达成一致的叔叔是谁？

为什么您对在格斯普利申当实习生的可能性一字不提？附上一则广告，我也是18岁时经常在一家犹太刊物上看到它。您不妨写封挂号信寄给：“伊蒙霍夫（黑尼·罗森塔尔），德意志帝国，德骚，马克^[264]”。我相信，那儿离柏林不远，我亲耳听到过人家称赞那儿。

您在霍尔茨明德那儿的事具体怎样？

您在卡尔斯巴德干什么？无所事事是“蠢事”中最大的，但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消除的一种。您读些什么？

我把您的哪些愿望忘记了？但总不会是我的照片吧。照片我是故意不寄的。闵策，如果我的眼睛在您的记忆中真的清晰、年轻、镇静，那么就让它们待在您那儿吧，那么它们在您那里的状况比在我这里好，因

为在这里它们是相当阴沉的，越发不安，在36岁的坦率中轻微地晃动着。照片中这些虽未表现出来，但这张照片却因此而更没必要寄上了。如果我的眼睛哪一天变得美一些，纯洁一些，那么您会收到一张照片的，但那样的话又没有必要了，因为那样它们就会以纯洁的人眼所具有的力量一直追随您到卡尔斯巴德，径直看见您的心。而现在它们只是吃力地在您的正直的、因而可爱的信上爬来爬去，不知所终。

致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上

〔1920年2月于布拉格〕

295.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我什么也没忘记，但是当我去年12月就要去休假时，受了点风寒。医生给我作了全身检查，当他听说我要去慕尼黑时，极力劝阻，相反建议我去梅诺拉或类似的地方。我得承认他说得对，我的健康状况不稳定，因此虽说一次这样的休假只会对我有益，但我将不能自由而安全地度过。既然不能去慕尼黑休假，那么我宁愿什么地方都不去——完全闲着，等着体重增加——就待在此地。我也宁愿不给您，库尔特·沃尔夫先生回信，因为前不久我试图让您甚至对我的牛奶需求量感兴趣（实际上我是想一开始就把尽可能多的事实订进计划里），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大做解释的必要呢？

这样，我唯一想做的这次健康休假是不能成行了——也许以后会让我补上——但是在这冬春之交，一次养病休假却势在必行。既然我已定下去巴伐利亚州，就让人给我寄了一张凯因岑巴德疗养院（在帕滕基兴附近）的广告来。可是就在今天我从慢吞吞的几乎不情愿提供咨询的管理处得到消息说，要到了月底才会有一个空房间，似乎晚了点。其实，我现在既不需要疗养院，也不需要治疗，相反，倒不如说这二者弊大于利。可是阳光、空气、土地和素食这一切，在这个季节，除开波希米亚，我只能在疗养院谋得。那么，尊敬的沃尔夫先生，在这方面您能给我出个主意吗？我会心怀感激地接受的，不然的话，我大约在3月底去凯因岑巴德。

致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弗·卡夫卡 谨上

〔1920年2月于布拉格〕

296.致M.E.

亲爱的闵策：

首先对您上学的事，我和您同样高兴。您夸大了在学校里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我认为：如果您去上学，这会是一个极好的开端，对您自己也是这样。首先，有您叔叔，也就是说来自于家庭的鼓励，这使您能有良好的心境，其次齐格勒博士^[265]的推荐在学校里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最后这可是——我这么猜测——一所犹太学校，会特别令这个眼下还有点动摇不定的孩子（只不过是一个称呼，比通常的称呼多些奉承意味）感到舒畅。

那么，在卡尔斯巴德过得就这么样？那当然。至于“整个俊俏的容貌”，我几乎什么也没看见。青春当然总是美的，人们梦想着未来，或激发着别人的梦，或干脆说人们自身就是一个梦，这怎么会不美呢？但这是一种所有青春共有的美，人们是没有权利把它占为己有的。可是，“整个俊俏的容貌”在您那儿，指的是别的东西，而我没有注意到。发型和手臂像蛇一样的扭动虽然引起了我的注目，可是这一半是滑稽，一半是古怪，还有一半（闵策位于自然法则之外，由3个“一半”组成）甚至是不漂亮，过两天就会忘记的。可是她如此轻视的这个“否则”正在逐渐证实自己是某种实质性的东西。闵策，威胁着我的划线部分应该感觉到年轻，并未击中我。我并不是抱怨自己老了，而是相反，或者什么也不抱怨更好。您可知道，老年人的眼睛会变得远视，我说起过远视的缺陷。

我很可能不去梅诺拉了，太贵了点，也许去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区。我相信，我的头更喜欢北方，而我的肺则喜欢南方。由于在我的头太难过时，往往是肺作出牺牲，所以我的头出于某种感激，也逐渐产生了去南方的渴望。

至于照片，就算了吧，闵策，因为人们在黑暗中（我指的是当人们彼此看不见对方的时候）互相听得更清楚。而我们是想好好倾听对方

的。因此，如果我们现在在布拉格，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相见的
话，将会好得多，我是当真的。

可是被学校录取之事，我是首先得知的人之一，这使我深感荣幸。

致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上

〔1920年2月于布拉格〕

297.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沃尔夫先生：

现在出乎意料地从凯因岑巴德来了一封电报，疗养院通知我，说早些时候的消息不算数了，他们在3月初给我预留了一个房间。这使我很高兴，就好像征服了一个难以驾驭的人。可是此外这也许是件好事，我的状况本来就容不得过多的耽搁。而且在年初这段还较冷的日子，我若待在某个疗养院里，也许更是件好事。也许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去处。无论如何，我请您，尊敬的沃尔夫先生，暂时不要再为我的事费心，并请确信我对您所有友好举动所表示的衷心感谢。

弗·卡夫卡 谨上

〔1920年2月于布拉格〕

298.致M.E.

亲爱的闵策：

这样的信肯定可以寄，而且尤其可以寄。其他更连贯的、不这么零散的信，常会违愿地掩盖某件主要的事。这样一封内容零碎的、由几个片断组成的信什么也掩盖不了。一个人能看到多少，其实只取决于其洞察力。这样一封信是如此亲密，好像人们在一所共同的房子里，虽然被一千个房间隔开，它们的门却依序敞开，因此人们在最后一个房间看到了您，尽管肯定只是很小和很模糊的身影。人们这时所看到的闵策，既不显得很美，也不很有趣，也不很好。

此外，闵策，您（或者干脆是这样，如果人们利用过的话）像一个小小的犹太教经师那样感觉敏锐、坚持真理。当然，这个必要的立足点是不能在学校里被灌入的，您必须在我心中拥有它。您也许会在心里找到它，这似乎是很容易想象的。虽然闵策外表看上去这么清楚明白，可她的内心世界，就像每个人一样，是无边无际的，真诚寻找的一切都可在那里找到。

我面前放着一份带有图片的关于“阿勒姆园艺学校”的报告。现在那儿富丽堂皇，我过下一个生日时，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变成19岁和去阿勒姆——就是您的西蒙学校。另外，这所女子园艺学校是在战争快结束时才开设的，在那之前只有一所男子园艺学校和一所女子家政学校。这也许会增大您被录取的希望。但愿不久就梦想成真！

卡夫卡 上

〔1920年2月于布拉格〕

29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昨天我被这篇短篇小说和它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思想紧紧抓住，我耽搁了奥特拉的科隆之事^[266]，没有像我预计的那样去谈。我对科隆的兴趣胜于斯洛伐克和巴黎。这事若能办成，我将更满意地离去。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做些什么以促成此事。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对你说这件事。也许在勒维小姐那儿说句好话，或做点类似的事就够了。我暗自许愿，为国家基金献上一千克朗，这也许算不上是对命运的真正收买，因为我想以此为奥特拉换来的不过是辛苦和劳作的可能性。这件事对奥特拉的巨大吸引力比事情本身更使我高兴。要是真的能成就好了。

弗兰茨

〔1920年（约）3月于布拉格〕

300.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谢谢你的耐心。可是上个星期我思想特别不集中，而且我想仔细地做这件事，也即读两遍，因此就拖了这么长时间。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小地方，我当即更正在长条校样上，对这些更正你当然得复校一下。与此相反，我相信没有放过一个印刷错误。其他的小问题和建议我记在另附的纸上。其相应的位置，你可从长条校样边缘处作的记号上找到。

这可能都是些小毛病，我不敢对你、对这本书提出更重大的问题。作为宗教书籍[267]——比我以前想的要丰富得多——现在及将来对我都意味深长。

新的校样出来，请别忘了我。

弗兰茨 上

〔1920年春〕

〔信后附有一张清单，上面列着约40个修改建议和问题〕

301.致M.E.

亲爱的闵策：

我生病躺在床上，依照改不掉的老习惯，发着低烧。而您又来信告知，在阿勒姆未被录取。那些人总还可以为您找到一个小位置的吧，看来他们不知道，您可以把自己缩得有多小。这期间，我也听说了别的犹太学校，例如科隆附近的奥普拉登。可是那儿也已满员。就是在4月开始的下一学年，也只有隐约的希望。可是关于这事，我也许会获悉更确切的消息。伊门霍夫呢——还是叫别的什么——根本没有答复吗？那么现在在格罗斯普里森实习——关于在格罗斯普里森的情况您固执地闭口不谈——明年去阿勒姆不可行吗？为什么呢？眼下，特普利茨风行在女帽上插戴植物状饰品，这不过是一种价值不大的、不很令人愉快的代用品。我不能容忍我从未见过的特普利茨。它正是您的家乡。对一个不管因何种原因而不得安宁的人（即使他愿意低估某些完全不属于家乡的东西）来说，家乡寄寓着回忆、悲伤、琐屑之事、羞耻和诱惑，而且还是一处滥用各种力量的地方。

家乡思想上的狭隘，导致您这么对立地看待他人和自己，确切地说，是别的姑娘和自己。对立肯定存在着，因为世界正是由于它的混乱才和您的头脑有亲缘关系，但是像您弄得那么简单——这儿是其他姑娘，那儿是我——这一刀无疑切不下去。可恶的特普利茨。

我的病状耽搁了写信。此外，这按说不是病，但也绝对不是健康，而是属于那组疾病。它们似乎待在某个地方，可它们的起因不在那里。因此，对这些病，医生比往常更加束手无策。无疑，病的是肺，但又不是肺。我可能还是去梅诺拉，或者到月亮上去，那儿根本没有空气，这样，我的肺就可以彻底休息了。

照片给了我很大的快乐，首先因为它们是信任的明显标志，您借给我的，对您来说是和父亲的照片一样珍贵的东西。翻印时，自然会失去某些东西，这只是一张二手照片。可是有些东西，相信还能清楚地看出，一个漂亮的额头，柔嫩的太阳穴，活力，一个异常艰难的生命。奇怪的是两手不自然的姿势。

这个孩子很出众。身体充满动物般的美，像一只北冰洋大块浮冰上的海豹，脸孔却具有人类的美。顺便说一下，更富女孩子气质，眼睛会说话，嘴形饱满。确实令人欣慰，不管他是自己的孩子，是侄子，或者竟是姑姑的孩子。可就是在特普利茨，您也不应让自己被这两只最美丽的小手紧紧抓住。

卡夫卡 上

〔1920年3月于布拉格〕

302.致M.E.

可怜的闵策：

怪可怜见的闵策，我不想怪罪任何人，大概没有人故意这样做。可是人们显然想把您留在家里，而您把您的旅行准备工作显然正是委托给了这些人。他们不想做这次旅行，正因为如此，他们或许没有做能做到的一切。可是为什么学校方面不能办妥入境许可呢？而且如果校方不能取得入境许可（但至少希望，一旦您到了那里，就能获准留下来），为什么不至少给您写封信呢？凭这样的一封信可向领事馆证明：您，比方

说为了一个讲座或一次考试，想在那停留两三天。对两三天的逗留，即使没有入境许可，您肯定也能得到签证。您若误了三四天的课，倒是没有关系。我现在将不再一味屈服了，就是说，若我处在您的位置，我会让步，或早就让步了。对这么沉重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老亲戚的重炮攻击，我是顶不住的，但您不是胆小的兔子，闵策。

当然，其他的——您瞧，闵策，我也了解这种痛苦，大家都了解，能化解的只是极少数人，可我也许以一种极有限的方式了解得比别人少，而您则多得多。所以，在这件事上，我根本不想和您作比较。我非常尊重您的痛苦，像对每个陌生人的痛苦一样。可是有一点，您也许弄错了，每个人心里都有咬啮着他的魔鬼，破坏夜间的安宁，这说不上好坏，这就是生活，谁没有它，谁就不是活人。那么，您心里诅咒的是您的生活。这魔鬼是那种您已获得的材料（而且归根到底是一种奇妙的材料），现在您应该用它做成点什么。如果您在农村劳动过，那么据我所知，这不是逃避，而是您把您的魔鬼赶到那儿去了，一如人们某一日把一头至今只养在特普利茨巷子里的牛赶到更好的牧场上去。布拉格卡尔桥上的一座圣徒雕像下有一幅浮雕，可说明您的故事。这位圣徒在那里种一块田，犁上套着一个魔鬼。它虽然还很愤怒（也即过渡阶段。只要不是魔鬼也满意，就不是完全的胜利），龇牙咧嘴，偏着头，用凶恶的眼光睥睨着它的主人，拼命卷紧尾巴，可它到底被架上了轭具。那么，闵策，您不是圣徒，也不应是圣徒。如果您所有的魔鬼都来拉犁的话，这完全没有必要，或许还是令人遗憾和悲伤的事。不过，对大部分魔鬼来说，拉犁是好事，而且是您利用它们做的大好事。不说这些了，因为只是在我看来是这样，——您的心灵正在追求这些。

您写道，如果那两个求爱者“不是那么不讨人喜欢”，您也许会结婚的，以求获得“安宁和家室”，您还把自己同您的母亲作比较。这里就有矛盾了，您的母亲有“安宁和家室”吗？“安宁和家室”也许是不能够简单地在疲惫状态下作为一种礼物接受下来的，而是必须去赢得的。必须是某种可以称为“我的杰作”的东西。假如在温暖的房间里所有的角落都坐着您的魔鬼，一个不缺，他们全体变得日益强大，其目的是使您变得日益虚弱，那么这又算什么“家室”呢？

可是，我不是无条件地坚持后一种看法的，也许完全是因为您执拗地畏惧婚姻，所以那两人在您看来才不讨人喜欢。再说，我相信，您在某一点上肯定和您母亲不同。一个自己的孩子会对您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也许能拯救您。您不信吗？

另外，面对您的信，还有一点使我感到安慰：您有时候肯定还能——不要否认这个，闵策——像当时在游廊上那样欢笑（在阳台上，听上去不再那么响亮）。

卡夫卡 上

〔1920年3月于布拉格〕

303.致库尔特·沃尔夫

尊敬的库尔特·沃尔夫先生：

巴伐利亚仍难企及。房间已订好，可是没有巴伐利亚区的入境许可就不能给我较长时间作疗养院逗留的签证。我打了个电报到凯因岑巴德，希望那边能为我办理。但回电给我的不是批准，而是告知，从本月15日起停办外国人入境手续，我得向区主管机构申办，这样无非是递交一份申请书，以便四周后能得到不同意的批件。这我可受不了，我将集中所有的钱到梅诺拉去，说穿了不太愿意，因为那里虽说对我的肺更好些，但我的脑袋想去的是巴伐利亚，而它指挥着我的肺病，自然理当如此。

致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上

您提到符腾堡地区的舍恩贝格疗养院，可这大概不是完整的地址。

〔1920年3月底于布拉格〕

304.致M.E.

亲爱的闵策：

这张照片真棒，值500个克列奥帕特拉，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沉思的（此外有点互不相同的）眼睛，沉思的嘴，沉思的面颊，一切都在沉思。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也确实有那么多引人深思的事情。我童年

时，我们家有一小套莎士比亚的女人们的画片，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记得是波契亚）是我特别喜欢的。这张照片使我想起那早已忘却了的姑娘，她留的也是短发。

我明天去梅诺拉。和您的意见（这其实不是意见，而是一颗善良的心的表白）相反，我一个人去就是最好的了，但在这儿，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还会长久地不好。

我将从梅诺拉给您写信。除照片外，您信里最好的消息是：您还没有放弃阿勒姆。您的目光从特普利茨挪开而投向波希米亚——萨克森的瑞士，或许照片上您的面部神情正是借此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张照片看上去是用于旅游身份证明的。

顺祝

一切安好！

卡夫卡

〔1920年4月初于布拉格〕

305.致马克斯·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马克斯：

这是在我的新房子的第一个晚上，房间看上去相当不错。寻找、决定、特别是告别旧房间（它似乎是脚下唯一稳当的地方，我却踢开了它，就因为几个里拉，和其他种种琐事，它们只有在境况较稳定时才会再有价值）的烦恼，所有这些烦恼，新房间当然抵偿不了，其实这也不必要。烦恼过去了，可它们的根子却留了下来，（说不定在哪一天）它会比这里所有的植物长得更茂盛。

我在阳台上写信，晚上7点半（夏令时间）多少还有点凉。阳台伸入一座花园，伸得似乎太深了点。我也许更喜欢有一定的高度（可是只有有了一千个这样的阳台，而且一个不少时，才找得到一个高的），而客观上，这也没什么缺点，因为太阳直到傍晚6点还暖暖地照着，满眼美丽的新绿，鸟儿和壁虎都来到我面前。

在这之前，我住在旅馆里。那是这儿的第一批旅馆之一，也许竟是第一所，因为其他同等级别的旅馆还未开放。客人中有几个高贵的意大利人，还有几个外来者，剩下的大半是犹太人，一部分受过洗，改变了信仰（但是，在一个改宗的犹太人身上，寄生着何等丑恶的犹太人的势力啊，直至临近爆裂，只有在信基督教的母亲所生的信基督教的孩子身上才能平息下来）。例如，那里有一个土耳其——犹太血统的地毯商（我和他用我那点希伯来语交谈了几句），一副土耳其人的外形，僵化、平和，和君士坦丁堡的犹太教大法师是好朋友。奇怪的是他认为大法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再就是一位布拉格犹太人，至颠覆时止，一直是德国皇室和梅斯坦斯卡·贝泽塔组织的（秘密）成员，现在只是随着职位的升迁，离开了军官俱乐部（此处涂改得完全无法辨认——勃罗德注），并立即把他儿子转入一所捷克中学。“他现在既不能会德语，也不能会捷克语，只能大喊大叫”。当然啦，他忏悔后，参加了选举。可是这一切根本没给他打上什么烙印，没有从远处触动他的要害之处。这是一位好心、活跃、诙谐、热情的老先生。

在我现在所住的膳宿公寓（我是偶然找到它的，经过种种长时间无奈的寻找，我偶然拉响了它的门铃。我现在忽然想起，当时是复活节星期一，一位去做礼拜的女人六神无主地在巷子里向我高声喊道：“路德是个魔鬼！”我没有理会前不久别人给我的警告。）的社交圈子里，全是些德国基督徒。引人注目的有：几个老太太，再就是一位将军（是退役的或现役的，反正都一样）和一个同样情形的上校。这是两个聪明、受欢迎的人物。我请求在共用的餐厅里给我一张单独使用的餐桌，我看到公寓对另外类似的情况也提供服务的，素食者因为数不多而惹人注目，这样首先可以细细地咀嚼，单独用餐当然更保险。这自然很奇怪，特别是事实表明，严格地说，只有我一个人单独用餐。后来，我提请女主人注意这事，但她宽解道：她对“仔细咀嚼”也了解一点，并且希望我长胖。可是今天，我走进餐厅的时候（将军还没到），上校那么诚恳地一再劝请我同桌进餐，我只好让步。如此一来，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交谈几句后，就显出我是布拉格人。将军（坐在我对面）和上校两人都熟悉布拉格。捷克人？不是。那就正视着这忠诚的德国军人的眼睛说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人吧。不知是谁说的：“德国波希米亚人。”另一位说：“混蛋。”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大家接着吃饭，可是将军灵敏的、在奥地利军队里受过科学训练的耳朵不满意，饭后他又开始怀疑我的德语声调。顺便说一下，也许眼睛比耳朵更怀疑。这时我便能试着说明我的犹太民族问题。他现在虽然在科学上满意了，可是在人性上并不称心。与此同

时，也许是偶然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听到这场谈话，但是也许有某种关联吧，全体人员都起身离去（不管怎么说，昨天他们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我听见了动静的，因为我的房门就紧挨着饭厅）。就是将军也很不安，可他还是出于礼貌，在迈着大步急急离开这儿之前，以某种方式结束了这次简短的谈话。在人情上，这样也使我不很满意，我为什么非得让他们烦恼？另外，这也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虽然不那么可笑地独坐，但也还是自顾自地待着，条件是人们不会臆想出什么处罚。另外，我这会儿要去喝牛奶、睡觉了。再见！

弗兰茨 上

亲爱的费利克斯：

你也需要我这些小小的新闻吧。说到阳光，我从来就没信过，根本从未相信过，这会儿一直是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可这点也不真实，到现在（这会儿是星期四晚上）为止，这样的天气有一天半了，即使是这样，也出奇地凉爽宜人。此外也下雨，还有点冷。在离布拉格如此近的地方，还能期望别的什么吗？不过，植物使人发生错觉，这样的天气，布拉格的小水坑几乎还结着冰，而这儿，我的阳台上，百花却渐次开放。祝一切顺利！请向女士们和奥斯卡问好。

弗兰茨 上

能把《自卫》寄给我吗？（载有你的大作的那期我已读过了。）

〔1920年4月10日于美兰〕

306.致M.E.

从温暖的南方致以衷心的问候。温暖是因为生着炉子，我几乎靠在它上面。尽管如此，这儿仍很美，因为离布拉格至少有两步之遥（用头量和用脚量不一样）。万一有阿勒姆的新消息，请来信。我的地址为：南蒂罗尔，梅诺拉——翁特迈斯，奥托堡公寓。

卡夫卡 谨上

〔风景明信片，1920年4月于美兰〕

30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你的消息，已经好长时间了。当然是我的错，因为第一封信不知怎么给弄丢了后，我是可以寄去第二封的。或者相反，我也许不能好好地做这事，因为在这里虽说过得很舒适，体重增加，只是像通常一样日夜忍受着焦虑魔鬼的折磨，可是要最准确的告知我的生活情形却只有什么也不写才能办到。而你大概——并不一定是我的反面——由于大量的工作没有选择的可能性，这对写作来说是必要的。可是你气色不错，这是母亲写信来告诉我的。她的信使我摆脱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为选举而过度工作以及对选举的失望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

另外，我倒也听到一点你的消息。我的医生约瑟夫·科恩博士（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到这儿来的途中看见你在慕尼黑下车，这使我很惊奇，尤其是考虑到选举的时间。直到他又一次带来慕尼黑剧院骚乱事件^[268]的消息。奥罗斯明该听到这一切了吧！

这封雅诺维茨的挂号信，我是昨天收到的，随信附上；若附上的我的复信在你看来还过得去，就把它寄走，否则我当然很愿意按照你的愿望修改。可整个这事竟酿成了一场耐力游戏，只有当他或我们骂起人来时，才能得到意见一致的解决办法。我们若不想变得粗俗，那还是表示满意较好些。

请代我衷心问候费利克斯、奥斯卡以及太太们，特别是埃尔莎太太。

弗兰茨 上

〔1920年4月底于美兰〕

308.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谢谢你寄来的明信片 and 《自卫》杂志。我想看《自卫》，真是已把它当作来自你的消息。我根本没想过，你该特意给我写信。你的工作效

率，特别是你对此已表现出的勇气，我难以理解。面对自己，你是以怎样的优势、镇静和忠诚去做这一切的啊。关于明信片上提到的你个人的痛苦，我在字里行间搜寻着，可是没有觉察出一丝一毫。这样办杂志，表明在世时就已光彩照人。此外，对政治策略，我几乎评价不了。

不久前，在本地面包师霍尔茨格坦那里，我看见几册《自卫》放在店堂的桌子上，一个小伙子向女主人借杂志。他们谈的主要是报纸的事情，我没有机会插嘴。不管怎样，我大吃了一惊，当即就想写信告诉你，有关对《自卫》的传播所进行的有趣观察。可惜给耽误了，而现在已太迟。因为我得知，原来那几册杂志本是我的，我借给了医生--位布拉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之前，我还借给了一位布拉格的老妇人）。医生把杂志忘在了面包师那里，不复再得。

前不久，我本想寄给你一份当地的天主教报纸，上面有一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社论文章，可是当时又觉得太无聊了。社论评论一本在维也纳出版的书^[269]，即维希特尔论犹太复国主义和共济会主义的书。根据该书，犹太复国主义是由共济会主义创造的，在布尔什维主义里已开始走向兴盛，以破坏一切现世的东西、建立犹太人的世界统治为目的。这一切是在第一次巴塞尔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虽然对外是磋商各种荒谬的事务（为了得到世界组织的表面同意），对内却只是商讨实现世界统治的方法。幸好秘密议定书被偷了一份出来，由俄国大学者尼卢斯^[270]（社论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再次明确地补充说明“他确有其人，是一名俄国大学者”）出版。议定书“复国（会议成员自己这么称呼）的方法”中某些地方被引用，它们和这篇社论一样既愚蠢又恐怖。

你告知的有关朗格（我让人多次谢过他）的消息使我很高兴。我知道，这绝大部分是孩子气的快乐，可是我享有它，毫不羞愧。这个孩子显然没有得到满足，攀着岁月的梯子往上爬，直到头晕起来。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如果不失眠的话。可是我常常失眠，而且很严重。也许是山区空气引起的，也许是别的什么。确实，我既不很喜欢在山区也不很喜欢在海边生活，这对我是过于英勇的行为。这只不过是玩笑话，可失眠是真的。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还要待几周，或者搬到博岑附近去。

衷心问候马克斯、奥斯卡和女士们，还有你的父母和兄弟。伟大的时代不是很快就要来到吗？祝勇敢的女性一切顺利。

〔1920年4至5月间于美兰〕

309.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非常感谢。慕尼黑与我想象的相似，那些细节很奇怪。这是可以理解的，犹太人也许损毁不了德国的未来，但是人们可以设想，德国的现在会被他们毁坏。他们一直迫使德国接受某些东西，而德国也许已慢慢地用它的方式向这些东西走去，可是面对它们，德国却持反对态度，因为它们来自外人。一场极其徒劳无益的活动，反犹太主义及与之相关联的一切，德国都归功于犹太人。

至于我这儿的小圈子，矛盾早已平息。当时我夸大了些，其他人也同样。例如，将军现在对我比对别人和气些，顺便说一下，这并没有让我吃惊，因为毫无疑问我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好品质（很遗憾，仅此一点得益于所有其他的人）。我能够出色地、真诚而愉快地倾听。这肯定是在家庭里逐渐养成的习惯。例如，我的一位上了年岁的姑妈即使心里想着别的事，脸上也是一副专注倾听的神情：张着嘴，微微笑，睁大眼睛，不断地点头和无法模仿的伸脖子的动作——不仅表示谦恭，而且想减轻别人，也减轻了别人措词的困难。那么我——不是自夸，赋予所有这些以真理和生命——有着姑妈的脸，她的脸很大，可还一直包容着我的。将军对这些可解释得不对，他因此认为我是个孩子。例如前不久他说出他的猜测：我有一个漂亮的图书室，可是立刻考虑到我还年轻，纠正道：我大概正开始为自己建立一个图书室。尽管人们用不着为我考虑过多，在餐桌上，反犹太主义还是表现出它典型的清白无辜。一位上校对我私下表示怀疑将军（从各方面来说，这对他都是不公正的）是一个“愚蠢的”反犹太主义者。人们谈论着犹太人的卑鄙无耻和胆小怯懦的行为（战争制造了许多机会，也引起了可怕的事情。例如，一个生病的东部犹太人在上战场的前夜向12个犹太人的眼睛里注射淋病病毒，这可能吗？），同时，他们的笑声里带有某种程度的赞赏，过后又来向我道歉。只对犹太人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一点也不肯原谅，恨不得把他们淹死在汤里，剁碎用油煎。可也不是没有例外，例如这儿有一位工厂主，来自肯普腾（那儿也有过一个维持了几天的、不流血

的、非犹太人的苏维埃政府），在朗道尔、托勒和其他人之间，他分辨得很清楚，关于列文的叙述也使人敬佩。

要是我能睡觉的话，我的健康情形可谓好极了。虽然体重增加了，但失眠频频向我袭来，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失眠可能有各种原因，其中之一也许是同维也纳的通信[271]。她是一团我从未见过的生机勃勃的烈焰，尽管如此，却只为他而燃烧。燃烧时极其温柔、勇敢、聪颖。她牺牲一切，或者若她愿意，通过牺牲赢得了一切。而能激起这团火的又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呢？

由于失眠，我也许会比允许的期限提前些回去。我不大可能去慕尼黑，即使出版社对我很感兴趣，也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兴趣。

衷心地问候你、你妻子和大家，特别是奥斯卡，我还没给他写信。尽管不存在障碍，但要写内容非公开不可的信[272]，我还难以决定。

你的 弗

〔1920年5月初于美兰〕

310.致M.E.

亲爱的闵策小姐：

今天才收到转寄来的您的信，连附件也没收到，它在布拉格等着我，我将再次使它复苏。万一我还没有说过这话，那么今天就说：您可爱而善良。今天我在上面的这座宫殿[273]里，许多内阳台并未让我忆起舍列森的阳台，它们稍稍富丽些。人们从远处看不到这两座小别墅，看到的只是奥尔特勒山。至少，有一个内阳台，满月的晚上大概也有年老的骑士在那儿坐过。祝一切顺利！特别祝你在阿勒姆一切顺利。

卡夫卡

我寄上这张画片，因为它表现的显然是梅塔[274]下的最后一窝幼崽。

〔两张明信片。1920年春于美兰〕

311.致马克斯·勃罗德

谢谢，马克斯，你的来信使我十分愉快。那个故事也讲得正是时候，我足足读了十遍，足足为它颤抖了十次，而且用你的原话复述了它。

但我们之间的区别是存在的。你看，马克斯，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你有一座庞大的堡垒，被不幸围成了一个包围圈，但你在最里面，或者在你喜欢待的什么地方，你工作着，在受干扰、不平静的情况下工作着，但毕竟是在工作；而我在燃烧自己，我突然间变得一无所有，只有几根横梁，倘若我不用脑袋顶住它们，它们就会倒塌下来，而现在贫困者的一切都在燃烧。我这是在抱怨吗？我现在不抱怨，是我的外表在抱怨。而我做的是对得起别人的，我心中有数。

第二条消息当然是使我愉快的，它在我那时候已部分产生。自那以来，我对这个人做了最恶劣的事，而且也许用了最恶劣的手段。就像一个林业工人在砍一棵树（但他是接到了命令）^[275]。你瞧，马克斯，我还在羞愧呢。

我很愿意5月间与你相聚，我非常高兴地期待着与你见面。

你的信中只有一个地方不和谐。即你谈到恢复健康的那段。不，一个月来已经谈不上这个问题了。再说你还写过《加林纳岛》。

弗兰茨 上

向你夫人问好。

你是否碰巧知道奥特拉的情况？她很少给我来信。7月中旬将是她的婚礼。

我会给奥斯卡去信的，但我该写些什么呢？因为我只有一件事可写。

〔1920年6月于美兰〕

312.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非常感谢。不，我没有读过《世界舞台》[276]。如果能够，请你为我保存它。可是《自卫》又没来，第一次寄来后（我为此谢过你的）就再也没来了。又偏偏是现在，根据报上一则有关贝督因人[277]的消息，巴勒斯坦正涨大水。也许角落里的装订工人的小书桌也已被打碎了。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也请问候奥斯卡。我月底回去。

弗兰茨 上

〔明信片邮戳：1920.6.12—美兰〕

313.致M.E.

亲爱的闵策：

您不说，这一切我究竟该从哪里得知呢。您现在在一个农场，而秋天到阿勒姆！如果您深思过，您就能给我最大的快乐，而且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当一个人疲惫憔悴、睡眠不足而径直（也不完全这么糟）往办公室去的时候，这种快乐也许会使他精神焕发、充满信心。而能带来这种快乐的除了您的信和小照，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我当然用不着夸大其词，您虽然称谓是女助手（多妙的词！今天一个人还只是个普通人，明天就是女助手了），可这也许只是某种消夏和使自己有用的方式（这可不是怀疑，而只是还一直感到惊奇：您本应该办到这么简单又可根本不容易的事的）。可是随后我在照片上读到：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您还一直在那里，这可真了不起。您也已经能捉住一只小猪了，虽然还有点费劲，可是抓得很牢，而且您也有做这事的、黑得发亮的、有力的胳膊。不，我对肥料车上的闵策可比对黄金御座上的克莱奥帕特拉要喜欢得多。

对阿勒姆，您肯定用不着害怕。在那里的生活也许将不像您现在的这么自由（您怎么利用您的业余时间？），可毕竟是陌生的土地，陌生的人群，新鲜的事物和新的目标。刚开始受点约束，这简直算得上是好事，否则，人们会走向虚无的。也许在特普利茨的所谓自由，更确切地

说是一种束缚，是被最最短的链条捆住了手脚，是错把昏厥当作了自由。您能从那儿挣脱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您肯定已恢复健康、不再背痛了吧。现在读您的信时，我忽然想起，前不久，我看到过施特朗斯基先生，还有一次见到了科皮兰斯基，可是非常匆忙、模糊，像做梦似的，我记不清是在哪里了。两人看上去气色都不太好。我的情况还勉强凑合，梅诺拉对我的健康毫无助益。这就是“内在的敌人”，它消耗着我，不容许任何实质性的康复。要是能把它当作一头活猪捉到怀里就好了，可是谁又能把它从内心深处带上来呢？这可不是抱怨；对此抱怨意味着抱怨生活本身，那显得很愚蠢。

致衷心的问候，再一次感谢您。

卡夫卡 上

另外，闵策，您别以为，我现在根据照片一点也不能想象米尔斯奥的情形。大约是这样：平坦，南面是缓缓的斜坡。富于腐殖质的黑色黏土性土壤，混合着石灰和沙子。底土是砂质黏土。玄武岩地层。不很大，耕地不到60公顷，种植小麦、大麦、甜菜和玉米。约42栋房屋，约268位村民（包括闵策）。做礼拜得到布龙讷村去。

根据一张这么小的照片了解这么多，足够了。不是吗？而且根本没有合适的时间四下环顾，因为一位农妇的审视的目光——她期待地望着天——挡住了人们的视线。

〔1920年夏于布拉格〕

31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如果你非常懒惰的话，那一定是好天气时的一件碰巧的事。这事若搁在我身上可没什么特别的，我总是很懒。在乡下，在布拉格，一直都是，甚至在我忙的时候也多半是懒的，因为这种忙碌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感激地躺着晒太阳的一条懒狗。

就在星期一，我一口气读完了《异教》，《歌中之歌》^[278]还没读，因为从那时起是学游泳的好天气。这一章显而易见内容丰富，同时

开门见山、构思精巧，常常一再地让我吃惊。尽管我预料到了这些，因为这本《异教》部分地是你的精神故乡，尽管你并不总是想要它。妙极了，我曾是你加利茨的女学生^[279]，当然是从来不加以批评的，读的时候还常常悄悄地握你的手，并常常挽住你的胳膊。

同时我根本不能说我同意你，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也许我只是公开地支持你对《异教》的私下赞同。总而言之，在你说出心里话的地方，我都与你很接近；在你开始论战的地方，我也常常获得论战的兴致（当然，尽我所能）。

也就是说，按你的意思我不相信异教。例如，希腊人对某种二元论就很精通，否则，命运和许多其他东西又曾有过什么意义呢？不过正是那些特别谦恭的人——宗教意义上的，是路德教派的一支。他们必须远离自身来考虑这关键的神性，整个神的世界不过是抓住凡人身上关键东西的一种手段，好比人的呼吸要有空气。一种伟大的国民教育方法，它吸引住了人类的目光，虽不如犹太法典深刻，但也许更民主（这里几乎没有领袖和宗教创始人）；也许更自由（它牢牢地抓着，可是我不知道，它用什么抓）；也许更谦卑（因为注视众神的世界只让人意识到：神不是我们，我们连神也不是，那么，我们会是什么？）。也许人们这样将最接近你的观点，如果说：从理论上说，完满的尘世的幸福是可能的，即相信起决定作用的神性，而不是努力达到神性。这种幸福的可能性是渎神的，也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希腊人也许比很多其他的人更接近这种可能性。可即使这样也还不是你指的异教。而你也并没有证明，希腊人的心灵是绝望的，只是证实了，如果你是希腊人的话，你会绝望。这当然支持了你，我的观点，可就在这里也并不完全。

事实上，人们在这一章里读到三点：你的乐观，在这里一直不动摇，而在上一章里我还没有感到；再就是你令人激动地集中抨击希腊文化；最后是希腊文化静静的自我辩护，当然实际上也是你进行的。

前天，在索菲岛和回家的路上，我和你妻子谈了较长时间。她很高兴，如她所说，虽然朝思暮想，但高兴。你内弟订婚的故事虽然稍许使她有些不安，但无疑也有点使她感到鼓舞，正如这样的事情常会引起的那样，我在自己身上也曾体会到的。

阿贝勒斯那里很长时间没有消息来。我已担心事情失败了，可昨天下午他的回信来了，相当友好。顺便说一下，这事要归咎于勒维特出版

社。因为阿贝勒斯于8月2日去度假了，把事情移交给他的朋友——奥恩施泰因博士——勒维特出版社的编辑，事情将会像他许诺的那样，“受到认真的处理”。关于钱，他只字不提，那么大概是在勒维特领。同时，他请我通知你，今年的年鉴不出版了。他不知道你现在的地址，他很重视给你“这个大忙人及时解除他乐于助人的许诺”。因为或许你太太须为年鉴抄些东西，所以今天傍晚时我已去过她那里，可她不在家，我只好给她留了张条告知此事。

我的情况嘛，还凑合。当然还有时间给维也纳回信。前不久奥托·皮克在我这里，他提到一位英国人——他想把《大众国王》^[280]从德语译成英语，用于在美国演出。就写到这里吧，现在我上床睡觉了。我听见：你睡得那么香。为你的睡眠祝福。

弗兰茨

星期五〔邮戳：1920.8.7—布拉格〕

315.致埃尔莎·勃罗德

亲爱的埃尔莎太太：

很遗憾，看门人没有见到您。正在通报。我只想告诉您，根据奥托·阿贝勒斯的一封信，犹太民族年历今年不出版，也就是说您什么也不用抄写和寄出。

致衷心问候。

弗 上

〔1920年8月7日于布拉格〕

316.致M.E.

亲爱的闵策：

您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真的，我收到您的明信片 and 现在收到您的信的这些日子比其他日子都要美好。这快乐几乎同您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我首先高兴的是某个人会突破重重困难（您的困难本身并不很大，

但相对而言却大极了)成功地离开特普利策。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您这种类型的人来说是可怕的,我觉得比您现在所理解的更可怕。一个人能够从那里闯出来,进入一个无疑要大得多的世界,我很高兴。这确实给这个人大大增加了生活的勇气。而这个人恰恰是您,同时我在最遥远的地方,在最不相干的角落里能够分享这一成果,自然又加强了这一快乐。

现在您已经在那里了,即使您在静默中(也许不能这么说)对阿勒姆[281]的许多事不满意。您确实说得对,那地方有什么特别好呢?这是一种西方犹太人的事,所有这些事确实多半行将崩溃,也许您自己会将一根大梁从阿勒姆扛到巴勒斯坦去,不,这不是开玩笑,当然也不是一本正经的话。

不管阿勒姆怎么样,反正您在那儿已经开始认识到(您的信的每一页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个世界,首先是精神世界要比特普利策—卡尔斯巴德—布拉格这个该诅咒的三角地带要大得多。这个生动的认识是个收获,为它冻僵了也值得。要是能得到一个炉子当然更好。(这个炉子的故事真的使我很吃惊,也许只要我还穿着睡衣坐在烧暖了的房子里,面对着比我的胃口多十倍的食物,我对阿勒姆的有些事确实就不能完全理解。)(这字迹也使我不能马上理解一切。在阿勒姆您的字写得那么小。显然是在床上写的,使信的内容不能马上进入意识,这封信如此激烈而健康。)

果戈理、哈菲斯[282]、李太白,这虽然是个有点偶然性的选择(后者显然见之于贝特格或者克拉邦特的译本中,它们并不很好。中国诗有个非常好的小译本[283],但我估计已经售罄了,新版还一直没有出,是海尔曼编译的,皮佩尔出版社的《果壳》丛书之一。我有一次把它借给了什么人,就再也没有收回来了),但无论如何比达恩[284]和鲍姆巴赫[285]的舍列森回忆录要好得多。假如有时间读书的话,您可以借一套(每个图书馆都有)莉莉·布劳恩[286]的《一个女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厚厚两大册,您可以浏览一遍,没有别的办法。我记得,在您这样的年龄她也已经独立生活了,怀着她那个阶级的道德观(这么一种道德观是骗人的,但一旦离开它,内心意识又会使人处于黑暗之中)。她经历了许多苦难,但她像一个好斗的天使一样闯了过来。

当然她生活在她的民族中。您对此会说什么我不认为是决定性的,但我不相信,远远不相信,您会去爱每一个犹太人,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者有二十个抑或一百个犹太姑娘围着您。我不相信这会给您以民

族支撑力，但也许这会给您带来对可能发生的事的预感。可以说：女人也许不太需要民族感，但男人需要它，因此女人也会为他和他们的儿子们而需要它的，大致如此。

您所说的关于当园丁的前途我没有完全弄懂，我希望听您谈得详细一点。您写的那些住宅区是什么样的？学校里都是犹太女人吗？老师也是犹太人吗？您根本不提小伙子们。汉诺威有多远？可以随便去吗？（另外，这种犹太民族观是多么高傲地俯视着德国人，这我觉得太过分了。德国也不光是汉诺威。）

当很多人聚集在您的屋子里时（那些姑娘年龄多大？），我很愿意在那儿坐一会儿（为什么您在信中要提那种商品说明书？），也许就坐在那炉子上（因为我怕冷），听你们说话，一起聊天，一起笑（尽我的可能）。目前我却要在两周后到东奥地利的一个疗养院去，不过我的日子还过得去。那是愉快的斗争！

卡夫卡 上

〔1920年11至12月于布拉格〕

317.致马克斯·勃罗德

你真是太好了，马克斯，我要马上为此感谢你。我在楼上你太太那里，把玩着这张小纸条——格里门施泰因的居留许可证，觉得这是你送给我的一件了不起的礼物。虽然我不去那里，但不想让这事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不去那里，是因为我不能战胜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被战胜了。不管从哪方面说，改变旅行方向都绝非易事。好在此事现在已经过去了。我去塔特拉斯克的马特利阿里（福尔贝格尔浴场管理处），至少是暂时去。若那儿不好，就转到离那里约有一小时路程的斯冲塔格斯疗养院（即诺维·斯莫科维奇）去。我18日启程，这之前还想在布拉格见见你，可别让我等得太久。

你太太，正如她习惯于以她独特的、有时动人的方式，通过作判断与人分享甘苦，对这次旅行讲了很多，叙述机智，悲喜交加。从评论中我得到这样的印象：这次演出[287]很成功，没有受你意图的干扰。看来《埃斯特尔》为这次成功做了奇特的准备工作。

我将从塔特拉写信给你。另外，奥特拉和我同行，并在那里停留几天。

祝一切顺利！

衷心问候你姐姐、姐夫和特亚。

弗兰茨

〔邮戳：1920.12.13—布拉格〕

318.致M.E.

亲爱的闵策：

刚好在启程前收到您的信。多么奇怪的事情！您刚一上船，船就下沉。可是这事说得很含糊，至少从您的暗示里，我没完全明白。什么是波罗的海计划？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可是您真勇敢，这样也很好。请您多保重，并让我继续从我的躺椅出发跟踪您。上次忘了问：您现在已完全恢复健康了吗？

致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上

〔风景明信片：1920年12月底于玛特利亚里〕

31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以为，读你的信时我不激动吗？即使有人供给我天下的财富，让我过豪华的生活，我也不会得到。但不是因为我不会顺从，而是因为我出于贪婪在往下跳的时候会将自己摔死。如果有什么东西使我不能去柏林的话，那不是极度的虚弱和贫困。贫病交加阻碍了我得到“供给”，但从来也不会阻碍我因“供给”而死。如果可能，我会攥紧双拳出发的，你不了解我的野心。

你的情况不同，你有能力（我真的看到了你的力量，正如你借口看到的柏林的生命力一样）。在作出对我来说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肯定的决定的时候，你没有让步。在这方面，你的决定对我而言是十分肯定和令人信服的。如果现在决定不去柏林了，我也会同样赞许你的决定的。另外，你信上压根儿没谈移居柏林之事。柏林的引诱力也很奇特，是那儿的紧张生活吸引着你，而你似乎感到，你在布拉格的生活不可能采取柏林方式加快节奏，而必须整个地变成柏林的生活方式才行。可是，也许你在柏林根本没有听到什么前往柏林的命令，而只是听到：离开布拉格。

若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我不明白所谓的戏剧事件是怎么回事。柏林人和我一样读了剧评；你亲自讲了话；各种各样的剧目都上演了，难道在《伪造者》面前被吓得打退堂鼓吗？

F.没有去听你的讲座吗？或许由于她的处境？在柏林而没有见F.，我私下觉得有些不合适，尽管我遇到这事当然也会这样做的。

〔因为F.，我对这个城市的爱犹如一名不幸的统帅，他征服不了它，但“尽管如此”它却变得伟大了——她已有幸成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你不曾得到有关第一个孩子的消息吗？〕

至于我，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好去处。说它好，是因为就人们所想要的而言，它还具有疗养院的外部特征，可它却不是疗养院。说它不是疗养院，是因为它也接收游客、猎人或随便什么人，没有过分的奢侈，只需吃了多少东西，就付多少钱。可它又是一座疗养院，因为这儿有一个医生，可以进行新鲜空气卧疗法，还有可口的饭菜、上等牛奶和鲜奶油。位于塔特拉——洛姆尼茨后面两公里处，也就是说，离大洛姆尼茨山峰还近两公里，该疗养院的海拔高度也有900米。是个好医生吗？是的，他是个专家。我要成了专家就好了。对他来说，世界多么简单啊！我胃部的虚弱、失眠、焦躁不安，简而言之，我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都归因于肺病。在病症还不明显之前，病就一直隐藏在胃部和神经的虚弱里。某些肺病——这个我也相信——的病症根本不明显表现出来。他既如此明白世界的痛苦，相应地，也总在一个小皮包里——不比一个国家基金会赠送的存钱罐大——随身带着救世的妙方。如果有人需要，他就给人打一针，收费12个克朗。他也确实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生：英俊健壮，红光满面。他很爱他年轻的妻子（显然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出奇地聪明，他根本不能谈起她，正因为是自

己的孩子，他不想显得自负。他天天来我这里，这样做没什么意义，可也不是不愉快。

总而言之，若我能在身体和精神上（特别是在同一地点）坚持治疗几个月的话，我将大大接近健康。可也许这是个错误的结论，只不过意味着：如果我健康，那么我会变得健康。第一周，我的体重增加了1.60公斤。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在那一周里我还像头狮子似的攻击这种疗法。

这儿约有30名常住客人，我以为大多数都不是犹太人，而是地道的匈牙利人，可他们大部分却正是犹太人，包括算账的服务员。我话说得很少，也只会和少数几个人谈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人的恐惧心理，可也因为我认为这样（一个对人感到恐惧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是对的。这儿只有一个人可以交谈，他从卡绍来，25岁，牙齿畸形，一只眼弱视、多数时候紧闭着，胃永远消化不良，神经质，也只会讲匈牙利语，到这儿后才学的德语，听不出一丝斯洛伐克腔——真是个小可爱的小伙子。在东部犹太人看来是招人喜欢的。惯于讽刺、焦躁不安、喜怒无常、自信可也贫困。一切事情在他看来都“有趣，有趣”，但所表示的并不是这个词的通常意义，而大约是“事情紧急，事情紧急”。他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回忆起童年，有很多希伯来的影响，研究过塔尔默得和舒尔汗·阿鲁赫[288]。“有趣，有趣”。可几乎忘记所有的事。他参加每一个集会，听你讲话，谈起卡绍就乐不可支。他也见过朗格创建米斯拉基小组。

但愿柏林在事后还能使你一切顺利，来信谈谈这事。或者你根本不去斯洛伐克旅行？你有次谈起的小说写成了吗？

请代我问候你妻子和大家好。为格里门施泰因的居留许可证，我曾写信到柏林的埃韦书店谢你。在我看来，这事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桩非常特别的善举。

弗兰茨 上

〔邮戳：1920.12.31—玛特利亚里〕

320.致莱奥·鲍姆[289]

亲爱的莱奥：

先前我病了，所以直到现在才能从你至爱的双亲那里收集有关你的消息。我很高兴，你一切均好。虽然我从未怀疑过，事情（暂且不谈明显的、次要的、须用男子气概加以忍受的弊端）会有好的结局。不过，这事经常给我制造困难：和我的嫉妒作斗争。现在我正想试用“可怕的”硝酸银，但是不行。博努斯已在给你上课了吗？多年前，我怀着极大的敬意，读过他登在《艺术卫士》上的若干文章。现在这张图片告诉你，在丢勒时代就已有露天学校。这一只松鼠刚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个食物包裹，同伴装腔作势地转过身去，却回眸睇视。第一只松鼠也相应地忙着。

致诚挚的问候！祝一切如意！

卡夫卡 上

〔风景明信片（“丢勒的松鼠”）1920年〕

1921年

321.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最近三天我不很适合为玛特利亚里辩护，或者更不适合写信。有一件小事可告。一个客人，一个年轻人，有病，但是快活，在我阳台下面唱着歌，或者在我楼上的阳台上和一个朋友（那位卡绍人，顺便说一下，他对我关怀备至，像母亲对孩子一般）聊天——于是这件小事发生了。我蜷缩在我的躺椅上，几乎要抽搐起来，心脏承受不住了，每个字都钻入太阳穴，神经损伤的后果使我夜不成眠。我想今天就离开，去斯莫科维奇。我很不情愿去，因为这儿的一切都适合我，就是我的房间也很安静，我隔壁、楼下和楼上都没人住；我听到无偏见的人谈论斯莫科维奇，证实了我的反感（周围没有森林，这儿绝对美多了。两年前全都洒上西可朗^[290]，别墅和阳台紧挨着市区一条多尘的繁华大道），尽管如此，我当然还是不得不去。可是人们现在调整了一下，从明天起大概可以保证我的安静：一位安静的女士将取代楼上的两位朋友。如果不是这样，无疑我会走的。另外过一阵子，我也肯定离开，仅仅出于我“自然的”不安。

我提到这一切，首先是因为，我受够了这些，好像组成世界的除了我上面的阳台和它的喧闹外没有别的；其次是为了向你表明，你对玛特利亚里的指责多么没有道理，因为阳台上的喧闹（重病病人的咳嗽声，门铃的声音！）在人满为患的疗养院还要强烈得多，不仅来自上面，而且来自四面八方。我也压根不能认可另一个对玛特利亚里的指责（除非你是指我的房间算不上很时髦，可这也不是指责）；第三是为了说明我目前的心境。我有些怀念旧奥地利。有时候这样子也很快意，傍晚时分在暖气充足的房间里，躺在沙发上，嘴里含着体温计，牛奶罐放在身边，享受着某种宁静，可只是某一种，不是自己心灵的宁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不知道，特劳特瑙区法院的问题是必要的，维也纳的王位开始动摇，一位制造假牙的技工，也就是他，在楼上的阳台上压低声音研究着，而整个帝国，确实是整个，突然一下子燃烧起来。

可是这些没完没了的事情就此打住吧。

我不相信，在那件主要事情上，我们像你描述的那样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我愿意这样概括：你想要不可能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的就是不可能的。也许我只在你下面一级，但在同一楼层。你认为可能的即是可实现的。你结了婚，没有孩子，不是因为你无能，而是你不想要。我希望，你也将会得到孩子。你爱着又被爱，不仅在婚姻里，可是你不满足，因为你想要不可能的东西。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能实现这种可能性，不过这道闪电击中了我，比击中你早了一步，还在可能性实现之前。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但几乎谈不上是本质区别。

例如，柏林的经历对我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与一名女仆有关，这肯定不会降低你的身份，相反正表明，你是多么严肃地对待这种关系。这个姑娘表面上离柏林使你迷醉的东西很远，你往常经历的一切，本来会压制她。尽管如此，她却能由于你接受这种关系的严肃态度而如此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本色。但是——现在请不要对我下面说的生气，这或许是愚蠢和错误的，或许我误会了你信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或许这期间发生的事情会驳倒我——你如此认真地对待你和这个姑娘的关系，对姑娘本人也一样认真吗？这是不是说，人们不十分认真对待的东西，是想非常认真地去爱的东西，也正是想要的不可能的东西？好比一个人，他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又后退了一步，可是却违背每个事实依据自称向前迈两步，因为他正好迈了两步，不比两步更少。与此同时，我并未考虑你说到的这个姑娘的意见，这和你认真倒还可能相一致。可是你怎么会

一点也没想到你对这个姑娘意味着什么呢。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客人，一个犹太人，喜欢这漂亮女佣的成百人中的一位，而且是这姑娘能相信其具备一夜真诚的人（假使他连这种真诚也没有）。可除此之外，到底还能再有什么呢？一种超越国界的爱情？通信？期待一个传奇般的2月？你需要的就是这种彻底的自我消磨？你对这种关系保持的忠诚（这一点我非常理解，确实是真正的忠诚），你也称之为是对这个姑娘的忠诚吗？这难道不是控制另一个人的不可能的事吗？这件事里的不幸自然是惊人的，这个我从远处可以看到，但是把你驱赶到这件不可能的事情中的力量——也可能只是渴望的力量——很大，如果你失败而归，它也不会消失，而是给你勇气和力量去迎接每个新日子。

你说不理解我的立场。其实我的立场很简单，至少最近是这样。你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你假设我的态度中有些同情或温柔的东西，可是这些你都不能找到。在这件事上，我对你的态度大约像一个考糟了八次的最低年级学生面对一个最高年级的学生，后者正面临着不可能的事——高级中学毕业考试。我能料想到你的挣扎。可是你，如果你看到我这个高个子为了一道小小的乘法题而犯难，你会不理解的。“八年！”你想到，“这肯定是一个极缜密的人。他一直在做。可即使他再缜密，现在也该做好了。所以我真搞不懂他。”可是也许我根本就缺乏数学理解力，或者仅仅出于无力的恐惧而没有撒谎，或者——最可能的——我可能出于恐惧失去了那种理解力，这一切你都没有想到。可这不是别的，正是最普通的恐惧，死之恐惧。就像一个人抗拒不了诱惑，游到海里去，满怀喜悦和庄严感。“现在你是人，是一个伟大的游泳家”，突然，没有太多的诱因，他直起身子，只看到天和海。波涛中只有他小小的脑袋，他感到一种极度的恐惧，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必须回去，哪怕肺部撕裂。就是这样。

好吧，再来把你和我不幸——或者最好不比较我的，出于体谅——与过去的伟大时期相比较。唯一真正的不幸是女人的不育，可即使她们没有生育能力，人们还迫使她们生育。此种意义上的不育——必要的话，以我为重点——我根本未见到。每个母腹都可养育，而且无益地对着世界冷笑。若一个人把他的脸藏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是为了在这种冷笑前保护自己，而是不让人看见自己的脸。其次，和父亲斗，意义不是很大，他只不过是兄长，也是一个失败的儿子。他只是可怜地、充满嫉妒地尽力使他的弟弟在决战中动摇。可这也取得了成效。——现在可真是天昏地暗，就像为对付最后的渎神的言辞所必需的那

样。

弗兰茨

〔1921年1月13日于玛特利亚里〕

〔边注〕你是否有施赖伯文章[291]的复印件，能寄给我吗？我将很快寄回去。

你也该有诗歌[292]的新校样吧？或许又是大开本的书？

请代我问候费利克斯和奥斯卡。我安静下来时，就给他们去信。我又读了一遍你对玛特利亚里说的那些话，并认识到，唯一还应给你的答复是：[293]你了解斯洛伐克，但不了解塔特拉。这儿可是布达佩斯人的避暑胜地，清洁干净，饭菜一流。我承认，对我们来说，一个德国或奥地利的疗养院也许会舒适些，可这只是最初几天的感觉，很快就会适应，另外这也是我的一个长处，你却想动摇我的这一优点（它们原本就已经动摇的了）。

我对这事和你要求的一样认真，马克斯，我认为反命题甚至更糟。这不是生或死，而是生或生的四分之一，呼吸或张着嘴大口喘气，慢慢（不比延续一个真实的生命快许多）发烧至死。我既这么看待这件事，你就能相信，为了中途朝好的方面转化，我将不会放弃我所能做的任何事。可是为什么医生应该——？我还在第一次读你的信时，就吓得试图用铅笔把那个相关的句子涂得无法辨认。他最后说的可一点也不蠢，肯定不比别人说的更蠢。甚至像《圣经》上说的，谁不能完全呼吸创造性的生命气息，谁就肯定浑身是病。

不吃肉，我的病也能治好，这点已被证实。在屈劳，我几乎没有吃肉；在美兰，由于我气色极佳，最初两周后，人们就认不出我来了。但是后来，这个敌人进行干扰了，肉食挡不住他，素食也吸引不了他，总之他来了。

我在这里恢复得很好，如果不是这里与M.不相干的某些东西也起了干扰作用的话，我还继续待下去。

由于父母的缘故，现在也因为你，最后也因为我（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可能是一致的），我感到遗憾，没有一开始就去斯莫科维奇。既然我现在已在这里了，我为什么要冒险作一次不利的交换，四个星期不到

又离开这里呢？这里大家都尽力给我一切我需要的东西。

322.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再补充一下，以便你明白，“敌人”是如何出现的。这无疑是内在的法则，但是看上去却几乎像是根据外在法则安排的。也许你作为对身体不感兴趣的人，会更理解这事。

我远未克服阳台上不幸事件的影响。虽然现在上面的阳台很安静，但是我的耳朵因恐惧而变得灵敏。现在听得见一切，甚至听得见那个制造假牙的技工的声音，尽管他和我隔着四个窗户和一层楼。

〔接着是一张房间位置的简图〕

即使他也是犹太人，谦逊地问好，并且肯定没有恶意，但他对我也绝对是“陌生的魔鬼”。他的声音使我的心脏感到不舒服。这声音乏力，艰难地移动着，其实很轻微，但依旧破壁而来。我已说过，我得先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一切暂时都对我有干扰。有时我几乎觉得，干扰我的就是生活本身。其他的一切怎么会打扰我呢？

昨天发生了下面这件事：这里除了一位我还从未见过的病人，只有一位卧床不起的病人，捷克人，住在我阳台下面。他患有肺结核和喉头结核（“生或死”之外的其他变体之一）。因为他的病，也因为除他外这里只有两个捷克人，可这两人并不关心他，所以他感到孤独。我和他只不过在走道上匆匆交谈过两回，他让女佣请我去看他一下。他和气，安静，约有50岁，是两个成年男孩的父亲。为了用短时间解决这事，我在快吃晚饭时去他那里。他请我晚饭后再去一小会儿。然后他给我讲他的病，把那面小镜子拿给我看，有太阳的时候，他得用小镜子照喉咙深处，好照见溃疡。又指给我看那面大镜子，为了能把那面小镜子摆到适当的位置，他自己用大镜子朝喉咙里照。然后给我看一张溃疡图（顺便提一下，他的溃疡是三个月前第一次出现的），然后简短地谈了一下他的家庭。他已有一个星期没得到家里的消息，因此很担心。我注意地听着，偶尔提个问题，不得不把镜子和溃疡图拿到手里。“离眼睛近点。”他说，当时我把镜子拿得离我远远的。最后，没有特别的承上启下

的过程，我就问自己（以前有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总是一开始就提这个问题）：“要是你现在晕过去，会怎样呢？”我就看见昏厥像一道波浪向我盖过来。在最后一刻，我还牢牢地保持着知觉，至少我这么认为。可是没人帮忙，我是怎么从房间里出来的，却无法想象。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说了什么。对我而言，一切静悄悄的。我终于镇静下来，谈起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的事情，用来解释为什么我摇摇晃晃地走到他的阳台上，并冒着严寒坐在栏杆上。在那里我甚至能说，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没能问候一声就从房间里走出去了。我扶着走廊墙壁和夹楼的一个沙发走到我的房间。

我本想为这名男子做点好事，结果却做了很坏的事。正如我早上听到的，他因为我彻夜未眠。尽管如此，我也不能责备自己，相反地，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昏厥。人们在那张床上看到的，比处决糟糕得多，那本身就是受刑。刑罚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从疾病那里偷看来的。可是这样的刑罚没有一个人胆敢施予，在这儿是长年受刑，为不让受刑过程进行得太快而故意停顿停顿——最特别的是——受刑者出于自己的意志、出于可怜的内心愿望而强迫自己延长受刑期。整个悲惨的病榻生活，发烧，呼吸急促，服药和痛苦而危险的（动作稍一不慎，他就会灼伤自己）照镜子，都不过是通过延缓最后必令他窒息而死的溃疡的生长，使这种悲惨的生活、发烧等等能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罢了。亲戚们、医生和来访者，为了能没有传染危险地看望和安慰这个受刑者，为了使和平静下来，并鼓励他接受进一步的受难，而在这个没有燃烧、但渐渐炽热的柴垛上正式搭起了脚手架。然后他们在房间里满怀恐怖地洗脸，像我一样。

我虽然也几乎未睡，但我有两个安慰者。首先是剧烈的心痛，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施刑者，可他宽厚得多，因为快得多。然后做了好多梦，最后梦到：我的左边坐着一个孩子，穿着小衬衣（是不是我自己的孩子，至少根据我对梦的回忆，不是很确定，可这并未打扰我），右边是米伦娜，两个人都搂着我，我给他们讲一个关于我的皮夹子的故事。我把皮夹子弄丢了，又找到了，可是还没有打开，也就不知道钱是否还在里面。不过即使钱丢了，也没关系，只要他们俩在我身边就行。——早晨我还有的幸福感，现在当然再也感觉不到了。

这是梦，可事实是，我在三周前（在许多类似的信后，这一封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满足了我迫切的需要，即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作一

个了结)只请求这一恩赐:不再写信,并阻止我们在任何时候相见。

另外,这一周我又长胖了,四周内总共长了3.4公斤。请代我向费利克斯和奥斯卡。奥斯卡的西西里之行有点收获吗?他们两人在做什么?露特呢?

傍晚在阳台上,光线不是很好。

这封信搁了几天,也许因为我还想记下最近可能会“发生”的事。也没什么太糟的事。

收到你今天的信后,我为我对你和那姑娘说的话感到羞愧。若我结了婚,对我妻子也做了同样性质的事,我会——夸张地说(但是不比以这个为前提更夸张)——走到角落里自杀的。可你却原谅了我,根本没提及这事。的确,你在上上封信中说得太笼统了,但我本应该对你的笼统提法的认识不同于我的所作所为。尽管如此,我对此的基本感情却没变,只是不再这么愚蠢、简单地加以证明了。

也许我谈论自己的时候,更接近这种感情。你的信不在手边(要取的话,我得从厚厚的包装中爬出去才行),可是我相信,你说,如果这种追求完美的品格使我不可能得到女人的话,那么同样地,也使所有其他的东西成为不可能,饮食,办公室等等。

这是对的。虽然追求完美只是我难解的戈尔迪大结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在这里,每个部分也就是整体,因此你说的是对的。但这种不可能性确实存在,只是饮食等等的不可能性,不像结婚的不可能性那样引人注目。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一下:我们俩都有身体上的障碍。你出色地克服了它。在我思考这事的时候,对面山坡上有滑雪者在练习。这不是人们在这儿通常看到的旅店里的客人或从附近棚屋来的士兵(当然他们给人的印象已够深刻的了。他们在公路上平稳滑行,从上往下冲,从下向上挺进),而是从洛姆尼茨来的三个陌生人。他们或许还称不上是艺术家,可他们滑得多么出色啊!一个高个子打头,两个小个子紧随其后。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山坡、沟渠和斜面。他们掠过这个地段,像你在纸上写字一样。虽然下坡风驰电掣,要快得多,可上坡至少也是迅疾如飞。他们在下坡时所表现的,我不知道是否确实是特勒马克旋转[294](是这么称呼的吗?),但如梦一般美妙,健康的人就这样从

清醒滑入梦中。他们就这样，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我的爱有一部分也是为此）滑行了约一刻钟，然后上了公路，朝洛姆尼茨方向冲下去（只能这样表达）。

我注视着他们，想着你，你就是这样克服了身体上的障碍。

而我相反——我本想接着写的。

又是几个难熬的夜晚。最初两夜是由于偶然的、暂时的“一夜之因”，其余的则是因为一个脓肿。这脓肿长在骶骨正中，害得我白天不能躺，夜里不能睡。这只是些小事，如果没有类似的事接踵而至，我会很容易恢复过来的。我提及此事，只是为了表明，如果有随便一个什么人，想阻止我体重和力量的增加（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我只注意到体重的增加，五周内增长了4.2公斤），那他是能牢牢控制我的。

今天我放弃继续比较，马克斯，我太累了，这事也太烦琐。随着时间的流逝，材料有如烟海，又如此零散，因此，我如果还打算作比较的话，必然会夸夸其谈。

你是否该来？你当然应该来，如果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就可能的话。可是我看这事不可能，除非你做一次斯洛伐克之行。从你信中似乎可看出，你想把这事和柏林之行联系起来，也许经过奥得堡。不，这太费神了，千万别这么做，就是为我也别做，这会让我承担太多的责任。或者，你能至少停留三天以上，权作你的休养？

我几乎又想从上一点开始讲起，就这么饶舌。你在“害怕什么”几个字下面划了线。怕许多东西，可就尘世这个层面来说，首先怕的是，我在体力上和精神上不足以承担一个陌生人的重担；只要我们几乎是一体的，这就仅仅是一个正在探索的恐惧，即“怎么？我们真的应几乎成为一体吗？”这个恐惧。然后，如果这个恐惧完成了它的任务，那它就变成了一个直至最后深渊都深信不疑的、不容反驳的、不堪忍受的恐惧。不，关于这事，今天什么也不再说了，说得太多了。

你提到戴默尔的信，我只知道12月份那一期上的几封，充满丈夫（人的一半）气概。

我还得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你写道：“为什么对爱情比对生活中其他的事情更害怕？”就在这句之前写着：“在爱情里，我最快、最多地经历

了断断续续的神性。”这两个句子放在一块，就好像你想说：“为什么不是像害怕那个正在燃烧的荆棘丛那样害怕每个荆棘丛？”

是这样的，好像我的人生任务就在于占有一座房屋。——就是它也未完工。休息、疲倦、轻微发烧（也许是因为脓肿）持续了几天。外面是猛烈的暴风雪。现在好一些了，虽然今天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干扰。但愿这干扰无关紧要，而让我能通过单纯的记录来加以压制。一个新的邻桌，一位老小姐，难看地扑着粉，还洒香水，也许患有重病，神经紊乱，社交场合多嘴多舌，作为捷克人有些依赖我，而且未对着我的那只耳朵听觉迟钝（现在这里还有几个捷克人，可他们将要离开）。我有一个武器，但愿它能保护我。她今天，不是当着我的面，称文科夫报[295]是她最喜爱的报纸，特别喜欢它的社论。对此，我着迷般地想了一整夜。（另外，她从斯莫科维奇来，在许多疗养院呆过，只极度赞赏其中的一家——格里门施泰因，可它从3月份起就卖给国家了。）狡猾的方法也许是一直窥伺着，直到她说了什么不可能收回的话时，再加以辩驳。关于格里门施泰因，她说：主人是个犹太人，可他经营得好极了。这恐怕还不够。

另外，马克斯，在我写了这许多之后，你可不要相信，我患了迫害狂想症。我由经验得知，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着的。如果我不是坐在上面我的马鞍上，那么，那儿坐着的就只能是迫害者。

可是现在我要结束了（否则你启程前收不到这封信），尽管我没有说我本想说的话，更没有间接地经过我找到通往你的道路。通往你的这条路对我来说，至少刚开始时，是明暗相间的。这倒真是一个不高明作家的典型。必须告知的东西像一条沉重的海蛇躺在作家的臂弯，无论他向哪里摸索，都没有尽头，即使抓住了什么，他也无力承受。而他除此之外还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好了，即吃过晚饭回到安静的房间，由于纯粹的邻桌关系引起的不愉快后果，身体几乎发起抖来。

与此同时，在写整个这封信的过程中，我主要想的是那两种变体。第一种在我看来不可能，报纸，阿尔登的日报，不可能，主要编辑人员不可能，工作负担（或许你不是唯一的音乐制作人？）太重，政治立场（这样一家报纸的每位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看法）太鲜明。做这事，整体来看有失你的身份。唯一的好处可能是收入高。可是第二种，为什么这会不可能呢？政府为了什么付账？政府完全是临时凑成的，处于极为紧急的状态中，唯其如此，它有时也做了些了不起的事。这也许是些诸

如此类的事，也许只是对你所做之事、对你也许（从这点来看，不是存在着官僚机构的束缚？那么一年到头都不会催逼你做类似的事了）将做的事情所表示的感谢。另外，这样的事不只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些都是战争期间新闻界报道产生的好的影响。

奇怪——我得补充这点，即使不是立即有说服力，你迁居柏林的决定也有些可信性。——奇怪，你犹豫不决，是否把你的整个职业方面的力量（我指的是你想在这里确定干什么工作）献给犹太复国主义。

附上的一篇文章，我曾很快地一口气连着读了多遍，写得如此出色（除了几处小小的、支支吾吾的、有关公函的、不必要的藻饰外），可这应是指控吗？也许不是？它应该很准确地击中柏林？并非每个大城市都是如此，至少西方的大城市不是这样。在这些城市里，使“生活”轻松愉快的习俗，必要时会变得更有力和更具约束力。

你提到你的小说和犹太教神秘教义有联系。真的有联系吗？

诗歌我昨天收到了。你想到了我。请代我问候费利克斯和奥斯卡。他们也不应忘了我，即使我没写信。

此外，大约一周前，我又收到了一封M.的信，最后一封信。她很坚强，没有变化（大约是你所指的那层含义）。你也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人，可是不对，妇女们不这样谈论你。不，在某种意义上，你面对妇女也是（我特别推崇这一点）恒定不变的。

〔1921年元月底于玛特利亚里〕

323.致M.E.

亲爱的闵策：

日常工作（类似温室工作）令人厌倦。最后一杯牛奶还未喝完，体温最后一次还没有量，温度计插在嘴里，我躺在长沙发上。闵策，您在广阔的世界上哪个地方乱转？我相信，如果您是一个男人，您会成为鲁滨逊或航海家辛德巴德，儿童们会读关于您的书的。

您怎样离开阿勒姆的？是好还是坏？那里的园艺学校不存在了吗？

您现在的公司接受您作为没有培训的学徒？管两年膳宿（聘用在哪里）？

这还有些不清楚。但是此外，您做的工作似乎很出色，勇敢而骄傲。您的来信由两封信组成，一封是愉快的长信，一封是悲伤的短信，仅这一点已表明，您是在用自己的双脚走路，因为这个世界通常的进程就像在特普利策的大街小巷中所发生的那样，既不是快乐的也不是悲哀的，而是，无论它看上去是快乐的还是悲哀的，它永远只是一种混浊不清的、不可捉摸的混合体。

您的信正好在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的最后一天到来。我还在阳台上读信，这个阳台完全像在舍列森的阳台，只是它完全靠近雪山，更简陋和更破旧一些。我在那里读信，为您的幸福而高兴，为您的忧伤而不完全不高兴。我把脚放进脚笼里，您跟着去布罗肯山（几年前我在布罗肯山脚下待了几周，是在容波恩疗养院。也许您经过那里，它离哈尔茨堡不远。我曾在那里待了几周，尽管我完全健康，却没有去过布罗肯山。我不知道为什么。那里有一个人曾在一个温暖的夜里赤身裸体地登山，他只把大衣捆在背上。但是我宁愿在我的破茅屋里睡一个甜蜜的觉。漫游者当时还刚出世，或者已有几岁，也许是一个多少有点老实的女学生）。

这是最后的好日子，以后就越来越糟了。各种各样的病，最后感冒和卧床不起。暴风一连刮了三周后稍有停息。现在天气已经变好，天地安泰。

亲爱的闵策，写信又停顿了许多天。我身体不完全好，但是也不完全坏，只是有一点疲劳，抬不起手来写信。也许风暴是原因，再三刮暴风。树林里像波罗的海一样，涛声大作。但是现在几天来天气转好，白天有大太阳，晚上有霜冻，如果不戴耳罩，在外面转，耳朵就会开始发烧，即使离家只200米远，就可能回不了家，也许就留在外面了。

闵策，您工作那么多吗？您受得了吗？在布拉格果树研究所我同许多园艺工人在一起，他们谈到自己的经验。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商业果园里工作最多。于是我来到最大的波希米亚商业果园（马舍克、土瑙），那里情况根本不坏，那里主要是苗圃，除了春秋运送树苗的时间，人们甚至过很好的生活。但是这个企业已经有点走下坡路，与德国的精心经营相差十万八千里。

书吗？您有时间读非园艺书籍？我叫人给您送一本小书去吗？送去，您在那里过着上一世纪波罗的海这个小地方的生活，真妙。不久我将再给您写信。要有勇气！闵策，勇气！

您的 卡夫卡

〔1921年1月-2月于玛特利亚里〕[\[296\]](#)

〔旁注〕“如果医生做得对”，这意味着什么。

32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按你在柯舍尔的地址给你寄去了一封长得无穷无尽的信，但它应该于2月1日才寄到。你还会收到它的，但如果收不到，也无所谓，正如它没有结尾一样，它也没有中间部分，只有开头。我可以马上从头写起，但是柏林会怎么处理它呢？

这封信由于信中所列举的各种障碍而耽搁了。最新的障碍还不在于此，我寄信时才对此有所了解。就是说，我感冒了，或者确切地说，我没有感冒，我不知道什么具体原因使我得了感冒。坏天气，已经14天几乎未停止的暴风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我扔到了床上。我躺了4天，今天还躺着，直到晚上我才起床。还不坏，这是预料到的卧床。我只咳嗽，吐痰，我没有不正常的发烧，医生今天在仔细听诊肺部以后说，肺部没有什么新情况，肺部比几天前的情况好。我毕竟因此疲倦，第五周末体重已增加4.20公斤，明天肯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只会是同样情况。尽管疲惫不堪、障碍重重，可我暂时不想诉苦。迄今为止6周内发生的一切已集中到一起并且捏得紧紧的，还够不上在梅诺拉三天三夜的效果。

星期三

昨晚我受到了打扰，但是出于友好。有一个21岁的医学大学生来了，他是布达佩斯犹太人，很有志气，聪明，也很爱文学，此外，外表上尽管粗鲁，整个形象类似韦尔夫，天生一副医生气质，好交际，反犹太复国主义，耶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领袖。他还在9点以后从豪普特村到这儿来，以便给我（几乎不必要的）外敷。他对我特别友好，这显然出于你的名字的影响，他很了解你的名字。当然，你可能来的消息在他和卡绍人那里引起了轰动。

我在布拉格写的那封信里谈到这种可能性时写道：如果你来，我会很高兴的。但是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还去斯洛伐克，或者你可能为自己较长时间休养而来。此外可作为特别的旅行，不管是从布拉格出发，还是从布吕恩出发（你似乎暗示，这会同柏林之行结合起来），请

不要从奥得贝格或从一个遥远的小地方启程，这样做会将太多的责任强加于我。

要是到柏林就令人愉快了！如果我写了一些关于德梅尔的信的坏事，那么这肯定同你无关。爱一个女人，不受恐惧惊扰，至少能对付恐惧，此外占有这个女人作妻子，这就是我不可能得到的幸福，因此我（从阶级斗争来看）恨这种幸福。我也只了解12月号上的信件。

为什么要对生活的充实怀有一半空洞的畏惧呢？这种充实存在于你的书中，在时间和女人各呈异姿的那地方，在开头那几首诗中尤其强烈。在《吻》中，你表达得那么雄健有力，这几乎是从未有过的。我其实刚开始读这本书，以明亮的目光读着。这是几周来第一个美好的日子，是不躺在床上的第一个日子，它从现在开始了。

假如你能来，能带一本犹太教神秘教义的著作来吗？（我估计是希伯来语的。）

F. 上

〔1921年2月初于玛特利亚里〕

325.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认为，不会再有信来。两周后我去。那时候我也许能根据你的信作口头答复。

这封信在许多地方使我很伤心。当我得到这封信时，我的头脑简直爆发似的对信作了回答，但是我未去写信。有几封信摆在这里等着答复（今天还没有答复）。我最近写信谈到的那位布达佩斯人几乎完全需要我一段时间，特别是疲劳越来越厉害，我躺在睡椅上几小时之久，蒙眬睡去，好像小时候在我的外祖父母处惊奇地望着他。我现在身体不好，虽然医生说，肺部的病已减轻了一半，但是我会说，病情加倍地坏，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咳嗽，从来没有这样呼吸困难，从来没有这样虚弱。我不否认，要是在布拉格还会更坏得多。但是如果我考虑，除了各种障碍，客观情况这次够有利的，那么我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还能使健康

状况变好一些。

但是这样说，认为这十分重要，这是愚蠢和无用的。如果是小的咳嗽发作，只能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咳嗽减轻了，可能人与人不一样，本该如此。天黑了，还将点燃蜡烛，蜡烛烧完了，就在黑暗中静坐。正因为在父亲家里有许多套住房，不该喧哗的。

离开这里，我很高兴。也许我在一个月之前就该离开了，但我很难动，我从许多人那里了解了那么多的不可理解的友谊，因此，如果我的休假还持续更长时间，我会在这里待得更久，何况现在天气变得好极了。在树林中的新鲜空气卧疗室里，我可以光着上身躺几次，在我的阳台上曾一丝不挂地躺过。

通过上述解释，你可能认为我不认真疗养。相反，我对疗养极其认真。我甚至强忍着吃肉，其克制力比别人更大。错误在于，我迄今为止没有在肺病病人中生活，原来还没有盯着去看病，在这里才看病。不过，在梅诺拉大概有使病情好一些的最后机会。——现在终究可以畅谈个够了，我写了这些，以免在布拉格再谈此事。

你写信谈到萨洛莫·莫尔肖^[297]，仿佛我已经听说过关于他的事。在本季度我确实耽误了许多时间。

再见！

弗兰茨

维克尔斯多夫的传阅信正是个好题目。这封埃西格的信我以前凑巧在一份报上读过了。“那么喜欢在人心里发痒的小眼睛”愿意把这封信作为特别令人厌恶的例子给你送去。当然，根本上令人讨厌的只是现在发表这封信，再者，蛆虫已经把写信人吃光了。

〔1921年3月初于玛特利亚里〕

32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但愿你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收到我昨天的信。昨天的信无效，我也根

本没写明，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躺在长沙发上，吃得累倒了。我没有胃口，吃饭简直是折磨，脸上冒出汗来，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满盘菜肴就害怕。我14天来吃了许多肉，因为一位不大能干的男厨师替代了对我有好感的女厨师。吃肉又引发了痔疮，我日日夜夜疼痛剧烈。于是我写了这封信。但是这封信是不合适的。因为虽然咳嗽加剧，呼吸困难，有时候显得更厉害，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医生的诊断，现在却说我的体重增加了，体温也有利。我们即将相见，竟写出这样夸大其辞的信来！谁在向人伸出手呢？

弗 上

〔1921年3月初于玛特利亚里〕

327.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请你办一件很大的差事，而且必须立即去办。我愿意仍然待在这里，不是恰恰在这里，而是在塔特拉，十之八九在波利安卡的古尔博士疗养院。有人向我赞美它，当然，这个疗养院也就比玛特利亚里更贵些。

我想留下出于下述理由：

1.这里的这位博士威胁我说：如果我现在去布拉格的话，我的身体可能完全崩溃。他向我许诺：如果我一直留到秋天，就能接近痊愈，然后每年有6周假期，足够游逛山水，以便留住我不放。两种预言都夸大其辞，第二个预言比第一个尤甚。至少，他每天早晨都用各种方式折磨我一通，显出父亲般的友好的关怀。虽然我知道，他的预言从任何角度去看都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他知道我想迁徙波利安卡，那么这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2.家里人都请求我留下，其理由比他们自己知道的还多。自从我在这里生活在肺病病人中间以来，我确信，虽然对健康人没有传染的可能性，但是这里只有树林里的伐木工人或者厨房里的女佣（她们用手将这些病人盘子里的残羹剩汁倒掉，我简直不敢坐在她们对面），但是我们之中大概没有一个人进城。坐在（例如）一个喉病病人（肺病病人的近

亲、更可悲的兄弟) 对面会感到多么讨厌! 这个病人现在坐在你对面, 友好和善, 肺病病人睁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望着你, 同时对着你的脸咳嗽, 伸开手指接吐出的带肺结核的痰液脓血, 那多么令人恶心! 但是我会安坐在家里, 像一个“好叔叔”坐在孩子们之间, 那就不十分糟了。

3.也许我会在布拉格十分好地度过春天和夏天, 至少克拉尔博士写信建议我来。现在他似乎在父母面前又回到这个建议(这种摇摆不定因我的写作方式摇摆不定而来)。如果正如这位博士所说, 身体真正变好, 那么, 突然在半路上作出决定性的事情, 也许会更正确些。在天气暖和的时候, 除了住在高山上, 还有哪个地方是我更好的安身之所呢? (波利安卡山高1100米以上) 我知道何处安身更好, 在一个村庄搞轻微的劳动, 这要好一些, 但我不知道这个村庄在哪里。

4.但是关键是我的主观状态。当然还有无限多的恶化可能性。我的主观状态不好, 咳嗽、呼吸困难, 都比以前加剧, 在冬季更厉害。那是一个困难的冬天, 寒冷且不讲, 而且狂风暴雪不停。呼吸困难有时几乎要命。现在风和日丽, 当然情况转好。我现在对你说: 如果我的主观意见有道理, 那么, 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什么事, 无关紧要。——不, 我在这里搞错了, 我的工作发生什么事, 更不是无关紧要, 我特别需要工作岗位, 如果我将接近于健康, 我反而不大需要工作岗位。

我的休假将于3月20日结束。我该怎么办, 我考虑太久了。完全出于害怕和疑虑, 我一直等到现在, 等到最后几天, 延长假期的请求几乎成为不体面的讹诈。因为事态本来的程序本当是我先征询经理的意见, 然后根据回答提出申请, 然后将这份申请报告呈交管理委员会, 等等。办这一切手续当然为时太晚了, 不可能打什么书面报告了, 只能用口头请求将讹诈缓和一下。我可能去布拉格, 但我该浪费时间吗? 那么我可以请奥特拉前去, 但是她处于那种状态, 我怎该请她去办呢? 我不想将全部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她讲明, 如同向你讲明一样。那么只剩下你了, 马克斯, 我将包袱加在你的身上。这项请求是, 你拿上我附来的医生证明, 尽快地去找我的经理奥德斯特齐尔博士(我下午才拿到医生证明, 但愿像我们讨论过的情况那样), 最好上午将近11点就去。说什么, 你当然知道得比我好得多, 我只想说, 我怎样想的, 大概是。

我无疑能去办公室(旁白: 也能去上班, 干我在那里的工作), 但是不等我来, 也正是我, 无疑地在秋天我又必须离去, 又会处于比去年秋天更坏一点的状态。如果我呆4至6个月的话, 医生认为我会有长期工

作能力。因此我请求延长假期，先大约给2个月，然后我又将寄去一份详细的医生鉴定书。我请求给假（尽管可以给假）并且工资付给全部、四分之三或一半，只是不应该完全无薪水。更不能指望退休。此外，也可以将这半年挪前而取消退休。批准这种有限的假期甚至对我是一种便利，因为我非常清楚，我是从公司给的假期中得到了什么。我现在请假的方式肯定不合适，只好这样来辩解：我至今犹豫不决，反复考虑，因此现在才同经理详细谈过。我也知道，首先必须送交申请报告等。不过也许可以让我补交一份申请报告，前提是：有把握可以指望得到批准，让我留在这里，而不必要我在20日去上班。如果这不可能，我至少过些时候能回布拉格。

大概可以说这些，然后你，马克斯，给我拍个电报：“留在那里”或者“回来”。

再谈一些关于经理的事。他是一个很好的和蔼可亲的人，对我特别好，当然政治因素也起了作用，因为他可以对德国人说，他们对他们中的一个人特别好，但实际上这却只是一个犹太人。

关于薪水问题，请别疏忽了，也不要提到我父亲的财富，因为第一，十之八九不存在财富；第二，肯定不是给我的。

我强调我的做法不对，因为经理很关心他的正确，关心保持他的权威。

这次谈话肯定会被转移到泛泛而谈，具体说是他转移的，你也是一个。你也许能使他高兴——不是为了贿赂他，我丝毫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感到对他确实负有很大的义务，顺带地提到，我多次谈到他简直有创造性的口才，只是通过他才体会到活生生的捷克语令人钦佩。也许你不会十分注意到这一点。自从他任经理以来，这种力量在他的讲话中几乎失去了，官僚主义使它在讲话里抬不起头来。他必须说得太多。此外，他是社会学家和教授，但是你一定不知道此事。当然你可以随便说德语或捷克语。

这也是一个任务。当我想到你在百忙之中还给你添麻烦，我实在——请相信我——过意不去。但是我已疑虑重重，必定要找个地方突破。马克斯，你必将受累。请原谅我。

再者，奥特拉从亲身体会中引导出类似的教训，那是不可能的。事

前向我们打听一下为好。

也许在你看来，我对办公室太谨小慎微了。不对，请想一想，办公室对我的病完全没有责任。此外，办公室不仅因我生病吃了亏，而且在其5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损害。办公室甚至还宁愿支持我，而不让我糊糊涂涂地混日子。

我要是留在这里，也许能见到你来这里，那真好。

多多问候你夫人和费利克斯及其夫人、奥斯卡及其夫人。

〔1921年3月中旬于玛特利亚里〕

328.致M.E.

每天您发烧醒来，这是什么样的“低烧”？用体温计量过？是真正发烧吗？在阿勒姆有一个校医，您同他谈过话吗？同在巴特的医生谈过吗？我不知道，也未去问，自从见到那张推粪车的照片以来，我就非常相信您很健康，您在那里身强力壮，比在舍列森时健康得多了。您在舍列森大致是健康的，您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气喘吁吁。您似乎到了那里。现在发低烧？但是没有低烧，只有令人讨厌的发烧。“浪费生命越早越美，您写得越好”。您想怎么样，也许就怎么样。但是请您相信我，由于发烧，生命被浪费掉了，生活过得不“美”，也不“更早”。我在这里不是住原来的疗养院。在疗养院，这种印象可能更强烈。但是在这里我也看到，我环顾四周，没有什么更美更快的浪费，人们不浪费，人们被浪费。人们可能以您的青春妙龄巧妙地反对浪费。您必须这样做。条件是：根本会有进攻，这我不知道，也不想相信。但是如果真正发烧，正常体温37℃或高一些（用口表量），那么您必须立即去看医生。这确实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跟鲁滨逊去吧，至少暂时跟他去，自己也成为鲁滨逊。在他发烧被一只船接走，在家刚恢复健康以后，他又离家出走，又成为鲁滨逊。在他的书里，他删掉了这一章，因为他感到羞耻，他至少为自己的健康忧心忡忡，大个儿的鲁滨逊大概要变成小个儿的闵策了。

此外，闵策，您是对的。如果我认为您现在的生活很美，那是夸大其辞。但是结果一样。哲学家叔本华对这个问题在某个地方下过评语，我在这里只能顺便复述一下。它的大意是这样的：“觉得生活美的那些人

表面上很容易证明这一点。他们大概需要从一个阳台显示一个世界。无论如何，在晴天或阴天，世界总会是那样，生活总是美的。这地方不管多样还是单调，它总是美的。人民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个人的生活，不论生活难易，它总是古怪和美丽的。但是用什么来证明呢？如果世界不比西洋镜更大，那么只有世界是真正无限美的，然而可惜它不是西洋镜，而这个美的世界上的美的生活，在每一瞬间的每个细节上都为人所经历。这时候，这就不再是美的，而只是艰辛。”叔本华大概说了这些。如果运用到您的情况下，这就会是：生活虽美而古怪，有着了不起的外表，闵策在那寒冷的北方自己谋生糊口，在苦日子的晚上，裹着粗羊毛毯，躺在草袋里，旁边的李斯尔已经睡了，外面大雪纷飞，潮湿而寒冷。明天又是一个苦日子——这一切从一个塔特拉的别墅阳台上看都是美的。

但是晚上望着身边的煤油灯，生活根本不美，几乎想要哭起来。

在如此类似的情况下，我当时想继续写下去。然而我被打断了，这次不是被暴风雨和卧床所打断，相反，现在是整整7天，天天大太阳，我赤身裸体躺在树林里，紧靠着很深的积雪，不穿大衣行走，更自由自在地呼吸。但是病人用痛苦的呻吟打断我，仿佛我能够帮助他们似的。这些事情使我想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小故事：有一次，格里尔帕策[298]受到邀请参加一个社交会，他将在会上与黑贝尔[299]晤面。但是格里尔帕策不肯去，因为“黑贝尔总盘问我关于上帝的事，我不能告诉他什么，他就生气”。

在这期间您的第二封信来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比以前快乐一些，尽管手受了伤。（用园艺工作用的小刀干活可不容易。我总是宁愿伤了树，而不使自己受伤的。如果我用刀割了自己，别人会安慰我说：“这块笨肉何必不切掉呢”。）您去博士那里吧。他大概不仅只看你的手的。51公斤，不重，不重。

至于波罗的海浴场，诚然，它们很漂亮。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过顶西边的一个浴场：特拉维明德浴场。在那里我悲伤了。那天好热，漫不经心地跟着浴场的人到处转。这大概是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而现在去，闵策，这会完全违反我们的约定（且不谈其他一切），根据约定，我们决不要彼此相见的。当然，正如您梦想当鲁滨逊一样，这“绝不是”夸大其辞。我祝您有一个大的花园和蔚蓝的天和去南方。

亲爱的闵策，自从上次约会以来，多少天过去了。我无法数天数，至今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不清楚。大概没有发生什么事，例如，我记不得在整个时间读过一本特别的书。相反，也许我时常处于一种完全神志昏迷状态，似乎我作为小孩子依偎在祖父母的怀里惊奇地望着他。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好多天。没有时间去写信，我不得不逼着自己给父母和您写张明信片。我觉得似乎我应该努力越过整个德国，向您伸去手，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此外，对我来说，拖延时间的结果是，我本想于3月20日到达布拉格的，现在我将在这里待更长时间。这里这位博士百般地威胁我，如果我走，他祝我一切顺利，如果我留下，那么我还将待些时候。但是我不想待在阳台上或躺在林间新鲜空气卧疗室（大雪已将森林封锁），而宁愿在某个地方的庭院里“汗流满面”地劳动，因为我们肯定要这样做的，不干活，实际上能体会到的。您干活吧，祝您身体健康！这大概在许多方面不美，生活不美又该怎么办？这可是遭到厄运，避免厄运要糟得多。

但愿在您劳动时头顶的太阳如此明媚，正如我躺着时的阳光一样（两天以来我每天下午都赤身裸体地躺在我的阳台上，像一个小孩子一丝不挂地躺在一个失明的伟大母亲面前）。波罗的海的海滨浴场真美，当然，我更想在您自己的花园里见到您（尽管这个花园在南方某一个湖边，我也一定会不畏艰辛地去加尔达湖或马乔列湖），同您的丈夫和孩子们，他们排成一排，这比最好看的牧羊犬不知好看多少。此外，为什么一定到一个欧洲的湖？基内雷特湖或梯贝里阿斯湖也很美。附来的剪报——根据其重要性读破了——稍有论及此事。

冯塔纳^[300]的这本小书也许使您对波罗的海的生活失望。也许人们必须对冯塔纳另眼相看，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回忆录，特别是他的信。我尤其不清楚，我在哪里找到了波罗的海的这种有特点的生活，是在他的回忆录里还是在他的某一本小说里？此外，我也不肯定知道这本长篇小说的名字，是《塞西勒》还是《不可挽回》，还是其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我要回布拉格后才能证实。

4月份过生日吗？但您可根本不是像4月天那样反复无常的人，您怎么出生在4月呢？生日是几号？

随信附上合同。它听起来很聪明，不像我担心的那样可怕。我想即

将听到一些关于发烧的消息。

卡夫卡 上

〔1921年3月底于玛特利亚里〕

32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的身体过去不很好，现在仍然不好，消化不良。要么是因吃肉所致，要么还有别的原因。几天之后才会有结果，然后我写信详细告诉你。你当然给我写了信，但总只是谈我，而不谈你自己，你的工作、旅行，还有莱比锡、菲利斯和奥斯卡。几天后我写信。祝你身体好。请代我向你夫人问好。我突然想到，我离开布拉格好久了。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21.3.31—玛特利亚里〕

330.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你有安静的环境，能忍受紧张，你的中篇小说^[301]一定作为生活本身的好孩子生出来，怎能不成功呢？一切都多么理智地服从你，在局里也一样。在以前的局里你是一个懒惰的公务员，因为你在局外的工作无效，充其量可以容忍和纵容。但是这次你的工作是大事，先给你在局里干的工作以本来应有的、其他公务员达不到的价值。因此，你在工作方面仍然很勤劳，即使你在那里无所事事。最后，特别是你怎样真正用强有力的手操办你的婚事，去莱比锡旁边并穿越过去，把你放在二者之间，由现实的力量去说服人，即使不理解也罢。祝你在你艰难、崇高、骄傲的道路上一切顺利！

我吗？如果她们并排站队，传来关于你、费利克斯和奥斯卡的消息，我作一下比较，似乎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的森林里迷了路，到处乱走。

日子又在疲惫不堪、无所事事、凝望云天、也生闷气中过去了。你们都提升到男人的水平，这是真情。结婚之事在这里不知不觉地未定下来，也许有历史发展的生活命运和无历史发展的生活命运。有时候我介绍自己是一个匿名的希腊人，不想去特洛亚而去特洛亚。他在那里还没有环顾，就已经处于人声鼎沸之中，连群神自己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已经挂在特洛亚的一辆战车上，并在城周围被拖着走。荷马还好长时间未开始唱歌，但是他睁着一双玻璃眼睛，躺在那里，如果不是躺在特洛亚的尘土里，也是躺在睡椅的软垫上。为什么呢？赫库巴对他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但是海伦也不是关键性的。正如被上帝召唤、驱逐、保护、斗争的其他希腊人一样，他被父亲一脚踢了出去。在父亲的诅咒下，他战斗过，幸而还有其他希腊人，否则，世界史会被局限在父亲住宅的两间房和他们之间的门槛里。

我写信说的病是卡他性肠炎，像我这样还从未患过此病的人很少有。我确信，这是肠结核（我了解肠结核是什么，我承认，菲莉斯的表兄死于肠结核）。有一天我发烧，40℃，但是，我相信没有损失就过去了。体重减轻也将得到弥补。我曾写的那个受刑的男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显然半是有意，半是偶然，他在行驶着的快车上从两个车厢之间掉了下去，掉到缓冲器之间。他几乎神志昏迷地离开了这里。每天清晨，他作短距离散步，没有表、信袋和行李，然后将散步转移到电车，继而乘轻便摩托车、快车，方向全是去布拉格。复活节探亲，但是他又改变了方向，跳下去了。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有过失，对他的自杀没有过错，但对他最近绝望有责任。每个人都怕他，怕这个很爱交际的人。我们在沉船之时，都会无所顾忌地服从最有强权的人物。我把医生、护士和室内清洁女工排除在外。在这方面我非常尊敬他们。以后又来了一个类似的病人，但是已经走了。

在一份偶然到我手中的布拉格日报上（一份《麦里施—奥斯特劳尔—图里斯特报》到达这里要几天时间，我们本来不会彼此交谈的，他经常友好地给我送来一堆报纸，他在这里读报，对我说：“在为犹太文化而斗争。”）我读到，哈斯娶了雅米拉。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总是很信任哈斯，但是世人将对此感到惊异。你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吗？

你写信谈到也许能让人给我找一份工作，你太好了，读到这个消息令人也很愉快，然而其实不是为我找的。如果我有3个愿望吹了，我会在疏忽上述欲望的情况下表示希望：接近痊愈（这是医生们说的，但我

未觉出有痊愈的迹象。近年来我也多少次去疗养过，在疗养3个月后，我远比现在为好，在3个月内转好的，肯定是天气而不是肺部。当然，不可忘记我以前对整个身体的疑心现在汇集在肺部），然后去国外。去一个南方的国家（不一定是巴勒斯坦，在第一个月我读了很多圣经章节，因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买一件小小的工艺品。这就是说，希望不算多，连妻儿均未列在愿望之内。

〔1921年4月中旬于玛特利亚里〕

331.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在我得到这本书以后，我在这一天立即读了两遍，几乎读了三篇，然后立即借出去了，以便被快速传阅。在我读过以后，我第四次读它，现在又借走了，如此匆忙。但这可以理解，因为这本书多么生动。如果人们在暗处呆了一些时候，然后看到这样的生活，那么会一拥而入。这不是真正的讣告^[302]。这是你们俩之间的婚礼，既生动，又忧伤，甚至绝望，正如那些结婚的人举行的婚礼一样，旁观的人高高兴兴，张大眼睛，心扑扑跳。要是旁观而自己这时不结婚，甚至独守空房也可以，那就好了。这种生动场面由于只有你作了报道而更增异彩。强者生存，这声音虽然如此柔弱，以致你的声音未压住死者的声音，而是他能参加谈话，使人能听见他的无声语言，甚至能用手捂住你的嘴，以便在他觉得有必要的地方压低你的声音。这真妙极了。尽管如此，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这本书献给读者的意志，读者尽管受内心力量的支配，也会有很大的意志自由——但是又只有生者（全世界说话的人）对死者而言有着活人的生命，这情况有如一块墓碑，它也是生命的支柱。很可能你觉得不重要的地方却最直接地抓住我，例如这段话：“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这里站着这个男子，忠实的人，不变心的人，眼睛总是睁着，泉水不会干涸。这个男子——我表达得似是而非，不过开门见山——不能理解这可以理解的事情。

以上是昨天写的。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今天收到了M.的来信，她不要我告诉你什么，因为她向你承诺过不给我写信的。我先说这一点，就算作在同M.的关系上，仿佛我没有对你说过什么。我知道，马克斯，有你这个朋友，多么幸福。

不过，我必须写信向你谈这封信的事。原因如下：M.写信说她病了，患肺病，在我们一起来之前，她就有这个病，但当时病情轻微，完全不重要，一害怕，病有时候就真来了。据说现在病情加重。她身体强壮，生命力强，我的想象力不够，想象不出M.病成什么样了。你也听说过有关她的别的消息。至少她给她父亲写过信，她父亲很友好。她来布拉格，一定住在他那里，然后去意大利（她父亲建议她去塔特拉，她拒绝了，现在仲春去意大利吗？）。她将住在她父亲那儿，是很奇怪的。如果他们和解了，她丈夫在哪里呢？

但是由于这一切，我不会写信给你谈这件事。当然这只关系到我。问题是，你要告诉我关于M.何时在布拉格逗留（你将大概知道的）和她待多久的情况，以便我不在那个时候去布拉格。你告诉我，也许M.确实要去塔特拉，我好及时从这里前往。因为见次面并不会意味着绝望达到揪扯头发的地步，而是她在自己脑袋和大脑里抓出了道道伤痕。

如果你满足了我这个请求，你就不要再说些什么你不理解我了。在较长时间以前，我就想写信告诉你此事。我太厌烦了，我大概也多次暗示过此事。对你来说，这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但是我还没有粗略地说出来。事情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最早的故事之一就是写这个的。当然是友好的。这是患阳痿病。根据生命力，应该有能力满足，根据我的生命力我没有得到能力，或者说，这种能力逃离了我。当然处于使局外人（此外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不可理解，为什么还要拯救。但是人并不总是出走来找自己的。灰也是这样。风把烧的一堆灰吹掉，但是灰未吹走，来拯救自己。

在房门还关着的时候，我不谈幸福的、在这方面幸福的童年时代。在房门后面，法院在商议（这位无门不入的陪审官之父从那时以来已出来好久了），以后的情况是：有一半姑娘的身体引诱我，我寄予希望的那个姑娘的身体根本不诱人。只要她（F）摆脱我，或者只要我们是一个人（M），这只是来自远方的威胁，说远也根本不远。一旦发生任何一件小事，就完全破裂。为了我的尊严，为了我的高傲，显然我（虽然他看上去还如此恭顺，是一个点头哈腰的犹太人！）只能爱高高在我之上、我够不到的东西。

这大概是整体的核心，当然长得非常大，大到“吓死人”的整体的核心。并非一切都是这个核心的上层建筑，而肯定是下层建筑。

在关系破裂后，情况可吓人。我不能谈此事。只谈一点：你在帝国饭店搞错了。你认为兴高采烈，其实是牙齿打仗。幸福只是夺走黑夜的4个白天的碎片，这些碎片硬是撕不破，已经锁在抽屉里了。幸福是这个成就之后的叹息。

现在我在这里又得到她的信，信里只要求一条不用回答的消息。在我后面是一个绞尽脑汁的下午，在我前面是一个夜晚，但是这将不会再来。消息到不了我这里，因此我必须心满意足。我的力量处于令人欢欣雀跃的状态。除了痛苦，还有耻辱。这情况好像拿破仑对召唤他去俄罗斯的魔鬼说过的：“我现在没办法，我还得喝晚上的牛奶。”这也好像他在魔鬼问“这将持续很长时间吗”时说：“是的，我必须仔细品尝它。”

现在你明白了吗？

〔1921年4月中旬于玛特利亚里〕

33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最近的一封信（关于写信人和关于M.），你难道没有收到吗？可能他写错了地址。如果一个陌生人得到此信，这就令我遗憾了。

多谢小品文，巴黎日记。你不知道，这使我多么高兴。否则，你就会把你出的书全给我寄来了。连在《自卫》上没有发表的，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例如《牛》那篇文章（有点凶猛，有点高声，有点着急，但读来愉快），我只了解第二部分。你多次写论拉辛^[303]这样的批评文章吗？（也真妙，你怎么在读第一栏时睡着了，而在读最后一栏醒来时生气地说，读者这么少。也奇怪，你怎么绝处逢生，竟然高兴地在这座古墓上寻找拉辛的遗物，这真不可能，因为这样一来你会陷入四面来风，无法躲到一边去幻想你在那里如何如何好。）

也感谢你关于那位药剂师的一席话。他当之无愧，他也许必须在城外停留更长时间，直到秋天。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病。他身材高大，身强力壮，肩宽背阔，脸上红润，满头金发。他穿上长袍，几乎太魁梧了。他没有病痛，不咳嗽，只是有时体温升高。在我从外表上将他介绍一番（在床上，穿着衬衣、头发蓬乱、有着一副青年小伙子的面孔，好

像霍夫曼的儿童小说中的铜版画，同时面容严肃、紧张，又如在梦中，简直美极了），我请求为他做两件事。第一件，你大概从你的经验出发，可以毫不费劲地回答。关于支持或提供生活的方便。他在布拉格能指望什么呢？他有两项建议：一项未被采纳的建议是由布达佩斯的一位犹太教经师向犹太教经师施瓦茨提出的；一项很好的建议是由布达佩斯的教育团体向布拉格人提出来的，得到了犹太教经师埃德尔施泰因特别热心的支持。他是这位经师的学生。当然我是担心，任何来布拉格的外国人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时候，如果他将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籍（他也许能办到，他有一个不使人怀疑的名字克罗普斯托克，他的早已故去的父亲出生在斯洛伐克），这会意味着他得到上大学许可的方便，他昔日的生活也将是一大便利。

你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体温有利，发烧极少。甚至 36.9°C 也远不是每天都达到的。这一切都是用口表测试的。口的温度比腋下高 0.2°C ：至 0.3°C 。如果没有太多的变动，可以说体温几乎正常，但是我多半躺着。咳嗽、吐痰、气喘都已减弱，但这是自从气候转好以来才减弱的，与其说肺部转好，不如说是气候变好。我的体重约增加6.5公斤。令人生气的是，除了肺病和忧郁之外，我不是连续两天完全健康。我完全不轻视你的建议。但是这里谁也不知道洛奇草药膏。漂亮、温柔、高个儿、金发碧眼的洛姆尼茨的药剂师打量我，看看我是否愚弄她。其实，为了消遣，每个人都可能为自己捏造一个可笑的名字，问一问是否有这种药膏。嗯，克拉尔博士同意，我舅舅反对，这里的博士同意，斯莫科维奇的宗塔格博士反对，在这次会诊中我却唱反调。马克斯，特别是当你在本书里也提出警告的时候，你对此不能提出什么非议。关于注射防疫针的文章我以前已读过了。奥斯特劳晨报是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收到的唯一报纸，我也读医学副刊，报上的部分文章显然是由一个幽默作家写的（顺便提一下，这个副刊也是这里我很喜爱的一位医生的专业读物）。文章里列有一般的人工统计，这些统计与自然疗法的反对派相比无关紧要。医药能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医治疾病创伤，因此自然疗法只有受蔑视。也可以相信，肺结核能受到限制，任何病最终会受到限制。治病等于战争。任何战争都有结束的时候，任何战争也都有不能停止的时候。结核病有自己的部位，在肺部也有，像世界大战在最后通牒中有其根源。只有一种病治不了，这一种病被医药盲目医治，犹如一头动物被赶入无边无际的森林。不过，我没有疏忽你的建议。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333.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这么看来你还没有忘记我。我差点要为我没有给你写信而责备你了。但在这里的笼罩一切的无所事事中，写作对于我几乎是一种行动，几乎是一种新生，一种在世界上的新的奔波劳碌，但紧随着这阵劳碌而来的必然又是躺椅，这是不可抗拒的——于是人们被吓退了。但我这么说并不是想给人以一种印象：我在这里寻找理由。不，完全不是这样。

我几乎未听到你的消息，只读到你在魏宁格作的报告，（仍然没有公开出版的手稿？没有这篇文章的校样？）听到关于提出批评的谣传，此外没有听到什么。我总是用我的嘴完全向马克斯述说我的事，几乎不给他机会写别人的事。无论从那时以来的这些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你大概到舍列森去过几次吧？做了多少工作，勒奥可能几乎一直在大学。在躺椅上很难确定时间。我以为已经过了4个月了，但是理智地想一想，已经许多年过去了。

人也总算变得相当老了。例如说，现在一个布达佩斯小姑娘也离开了。（她曾叫阿兰卡，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叫这个名字，每两人中就有一人叫伊龙卡，这都是漂亮的名字，有些人还叫克拉里卡，每个人都只是在谈话时叫名字：“你好吗，阿兰卡？”）这个布达佩斯姑娘都走了，她不很漂亮，在有点歪斜的脸颊上嵌着一双不无缺陷的眼睛，厚大的鼻子，但年轻，她正值妙龄啊！一切都与这美丽的体型相配。她快快乐乐，敞开心扉，人人都爱恋她，我故意同她疏远，不向她作自我介绍，她待在这里大约3个月了，我没有直接同她谈过话，这在这么小的社交圈子里是很不简单的。最后一天吃早餐（午餐和夜餐我单独在我房间用餐），她来找我，开始用她那不地道的匈牙利式德语讲了较长时间的话：“博士先生，我不揣冒昧地向您告别”，等等，正如人们向一位年老的达官显贵说话，脸红而不安。我吓得双膝直发抖。

我又高兴读这本书，这是出于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控制的原因。这本书是你的书中最喜爱的一本。在书里生活，非常好，暖和，好像在一间房的角落，被人遗忘了，现在回味发生的一切，更觉味道浓烈。可惜

我不得不把书借出去，不过明天就收回。我的邻座，这次是伊龙卡，她见到了这本书，请求我无论如何借给她，显然她一生还从未读过这么好的书。她的美丽在于那柔嫩、几乎透明的皮肤。当时我真想看看她高兴地阅读你的书时是什么样子。

最衷心地问候你、夫人、孩子和姊妹。

弗兰茨 上

〔1921年春于玛特利亚里〕

33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仍然不可理解？这很古怪，但是更好，因为这是错误的，作为个别事件，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把这个扩大到整个生活，那是错误的。

（扩大吗？因而模糊不清吗？我不知道。）你将同M.谈话，我将永不会有幸福。如果你对她谈起我，等于谈到一个死人。我认为，这关系到我的“在外地”，我的“治外法权”。最近埃伦施泰因到我这里时对我说，M.的生活向我伸出了手，我有了在生死之间的选择。这真说得有些太好了（不是从M.的角度说的，而是从我的角度说的）。但是本质上是真的，只是愚蠢，以致他似乎相信我有选择的能力。如果还有德尔菲的神谕[304]，我本可以问询和答复的：“生死之间的选择吗？你怎能犹豫不决呢？”

你总是写信谈如何成为健康的人。这对我来说却不可能（不仅从肺部来说，而且从其他一切来看，例如最近又有动乱不安的浪潮向我袭来，最小的噪声也使我失眠、痛苦，在空无一物的空中硬是产生噪声。关于这一点我真是一言难尽。白天夜晚被弄得精疲力竭，像今天夜晚一样，一小群魔鬼聚集一处，夜半之时在我房前快快活活地谈话。晚上从基督教的社会团体的大会回家来的职员们都是些无辜的好人。没有人会像魔鬼一样戴面具），这是不可能的。只有这具不情愿活着的身体以及大脑，听到这些话感到吃惊，现在又违背己愿地勉强活着，不情愿地活下去。他不能吃，有一个脓肿的伤口，昨天去掉了绷带，在伤口愈合之前，需要打大绷带一个月之久（这位快乐的博士当然手头给予帮助：注射砷剂。我很感谢），这是不可能的，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你写信谈到姑娘们，没有一个姑娘留我在这里。（特别是照片上的那些姑娘，她们也走了几个月了。）任何一个姑娘都不能把我留在某个地方。女人有着古怪而少有的锐利的眼光。她们只注意到，人们是否喜欢她们，人们是否同情她们，最后，人们是否向她们寻求怜悯。这就是全部，一般来说，这也就够了。

我本来只同医生打交道，其他一切都只是顺带的事。有人想了解我的什么，他对医生说去。我想了解某个人的什么，我也对医生说。尽管如此，我并不孤独，这根本不是孤独，是半愉快的生活，在一个极其友好的人们的交际圈子里过着表面上半愉快的生活。当然，我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淹死，谁也不必救我。她们也那么友好，不会去淹死。有些友好也有十分清楚的原因：例如，我给了许多小费（比较多，这也够公平了），这也是必要的，因为酒店服务员最近给他在布达佩斯的妻子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说，他在12位客人中根据他们给的小费多少而采取不同的对待：“12个客人可以留下，其余的滚蛋。”他开始点其他人的名，并连祷式地加上说明：“亲爱的G.太太（顺便说说，她真是一位亲爱的、年轻仁慈的、来自齐普斯的农家妇女）见鬼去吧等等。”我不在其中。如果叫我滚蛋，那肯定完全不是由于小费少的缘故。

这么说，奥斯卡真是在《新闻报》工作，不是在《晚报》了？在这家报纸，就可以对他提出建议？他放弃了上课？你能给我寄一期载有奥斯卡的文章的报纸吗？我还没有见到这家报纸。保尔·阿德勒也在那里？费利克斯呢？这样的事情总有一些的。情绪高涨了？这抓着他的核心了吗？其实，迄今为止情况不是这样。根本上说，他毕竟还住在罗马，只是在亚洲边界在同野蛮人战斗。事态更糟了？孩子呢？现在会有夏天住房？祝生活愉快。

弗兰茨

〔1921年5月初于玛特利亚里〕

335.致奥特拉·达维多娃

亲爱的奥特拉和维鲁斯卡（？母亲写的名字是这样，究竟名字怎样写？薇拉，还是维拉，或叫科帕尔夫人的女儿？命名出于什么考虑？就不管它吧！）：

福贝格尔夫人 为其兄弟（集邮家）需要：

100 枚	2 赫勒的快信邮票	
100 枚	80 赫勒的邮票	} 带胡斯像
100 枚	90 赫勒的邮票	

请从我的钱里扣除给你的钱。他将会付给我钱的。这些邮票5月底失效，因此必须立即买来，据说只有在布拉格才能买到。

如果这条路对你们两个太难了（骑童车怎么能向上驶入邮政大厅呢？你有一辆漂亮车？W.太太有点嫉妒呢？），那么也许佩帕能这么做（他不去巴黎吗？），那时候你也能呈交附来的布吕纳的利多韦·诺维尼的小品文给人评论的。如果他认为这件事情好，当然他也还要同克拉尔博士谈的。他也许还能打听到在哪里得到医疗船的床位和整个费用有多高。你们不能立即告诉他，小品文可惜登载在4月1日那期上。那一期文章很严肃，这里一个穷病人把文章交给了这位博士去发表评论。他给我把评论带来了，要我通读一遍，因为他不懂捷克语。我当时患卡他性肠炎，身体虚弱，我相信我真正读了一两个小时。

这是外部原因。此外，我本想给你写得最长，但是我太累了，或者说太懒了，或者只是太难了。这几乎不能区别。我也总有一些小事，例如现在又有一个来势凶猛的脓肿，我得与之斗争。你们俩动作十分敏捷，这使我高兴。但是你们不应该太敏捷。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农家妇女，中等病情，当然愉快和可爱，穿着深色服装，芭蕾舞裙子婆娑多姿，漂亮迷人。她受到婆婆的支持，总是下大力去工作，尽管那里的医生总是警告她。医生说：

必须保护青年妇女。

像保护金橄榄一样。

这句话虽然不完全理解，但是很显而易见，因此我也谨慎持重地去寻找新途径。

总之，找一条通向经理的新路将是必要的。这是为了磨嘴皮。5月20日休假到期。（他真的是从批准假期的角度谅解你的吗？）以后怎么

办？然后我到哪里去？我大约在6月底以前还留在这里，这是次要的考虑。（自从据我看因吃肉而患卡他性肠炎以来，已作了这样的安排：一位小姐在厨房里——我想是这样——花了大部分时间挖空心思去想能给我做什么吃的。吃早餐时想到建议我中午吃什么，下午吃点心时想到晚餐吃什么。最后这位小姐从窗户外望，梦想她的家乡布达佩斯。然后她突然说：“我真是翘首以待，急于知道晚上的生菜是否合您的口味。”）

我又怎能再要求休假呢？在哪里可以看到尽头？很难。也许要求假期付半薪？请求给这样的病假容易吗？如果我能够对自己和别人说，这个病大概因公司而起或恶化了，也许容易请假，但是它的反面是真实的，是公司阻止了病情恶化。真难办，而我一定要请假。我当然能出示一个证明，这是很简单的。喂，你的意见呢？

但是你决不能以为我在这里一直在这么思考。昨天（例如说）我笑嘻嘻地度过了半个下午，具体地说，不是哈哈大笑，而是带着一种深有感触的、可爱的笑。可惜这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这里有一位总参谋部上尉，他被分派到木棚医院里工作。他像许多军官一样，住在下面。因为木棚上面太脏，他叫人从上面给他打饭。只要下大雪，他就去滑雪，直到山顶附近，经常是单枪匹马，几乎胆大包天。现在他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管绘图和画水彩画，另一个吹笛子。每天前者定时在室外画画与绘图，后者在自己的小房间吹笛子。上尉显然总是独自一人（只要他在绘图，他似乎乐于容忍地望着）。我当然很敬畏他，迄今我同他谈话几乎不到5次，只有当他从老远喊我，或者出乎意料地在某处碰到的时候。如果我在画画时遇见他，我会对他恭维几句，事情也并不真正糟，是好的或很好的业余工作。我看，这就是全部，仍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确实这样说的，我知道，不可能说出整体的实质。也许我试图描述他的样子：如果他在村道上散步，总是昂首阔步，愉快地缓缓地走着，总是抬头望着洛姆尼茨山峰，大衣在风中摆动，他看上去就大约像席勒。如果有人在他附近，望着这干瘪的、多皱纹的脸（有一部分是吹笛子起的皱纹），像木头那样的淡黄色，脖子和身体也是像把干柴，这时他就想起西略雷利^[305]画中的死人。我以为这是大师的名画之一，她们在那里怎样从坟墓中爬上来。他还有第三种类似性。他想入非非，头脑里出现许多观念。

不，太大了，我是指内心方面。一句话，他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医生把一篇评论寄给了一份匈牙利报纸，我则寄给一份德国报纸，一切都

秘密行事。他拿着一份报纸走向酒店服务员，以便服务员为他翻译。对于他来说，这太复杂了，因此他毫无恶意地带领这位上尉去医生处，说他将翻译得最好。医生正好躺在床上，稍微有些发烧。我去拜访他，谈话就此开始，但是够厌烦了。我不说这些，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再者，为了又接上前面的话题，你决不能认为我一直在笑，其实不是。

我现在附上陶西格的账单。此外有一段给艾莉，关系到费利克斯，对你的账单来说，十年后再考虑。这不算太长，在睡椅上从左向右翻个身，看看表，十年就过去了。只有在运动之中，才会觉得时间长。

我当然让人再非常特别地问候艾莉和瓦莉。你怎样看此事？我让人问候她们，因为问候容易，给她们写信难。因为写信难吗？根本不难。我让人问候她们，因为她们是我亲爱的妹妹，我不专门给她们写信，是因为我在给你写信。最后你会说，我也让人只问候你的女儿，因为写信困难呀。其实写信不比其他一切困难更容易一些。

祝你和你的家人生活愉快。

请代我问候小姐。

弗

〔1921年5月初于玛特利亚里〕

336.致约瑟夫·达维德博士

亲爱的佩帕：

你写得真好，真好呀！现在我还只塞进了几个小错误，一般来说，信里难免没有一点错误的，请原谅，我的经理也将在你的信里找到错误。如果我将每封信里找到错误，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在信里有适当数目的错误。

我力图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我几乎得不到一份报纸，我连《论坛》也读不到。我既不知道共产党人干什么，也不知道德国人说什么，我只听到马扎尔人说什么，但我听不懂。可惜他们说很多，要是说得

少一些，我会高兴的。佩帕，为什么一首诗未使你疲劳？为什么一首新诗使你疲劳？霍拉兹已经写了许多好诗，我们才读了一首半诗，此外读了你的一首诗，这首诗我有了。这里附近有一个小的军人门诊部，傍晚军人沿街都是，只有这些“豹”，总是“他们转身”。捷克士兵也不是最坏的，他们滑雪，大笑，像孩子们一样大喊大叫，当然是像有军人声音的孩子们。但是那里也有几个匈牙利士兵在场。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向这些“豹”学习了五句话，显然他失去了理智。无论他在哪里出现，他就在哪里吼叫这首歌。周围美丽的群山和森林都那么严肃地望着这一切，仿佛这一切使他们喜欢。

但是这一切并不坏，每天只有一小会儿安静。在这方面，家里魔鬼般的喧闹声更坏得多。不过，这也可以克服。我不想诉苦。这里有塔特拉，扎比内地区的群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许任何地方都没有。

请代我问候你的父母和姊妹。民族剧院停演了，这是怎么回事？

弗 上

你的信是用捷克语写的，已由主编翻译过来了。

〔大约1921年5月于玛特利亚里〕

337.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的罪过太大了。我从你那儿得到了那么多，你为我做了那么多，而我僵直地、静静地躺在这儿，直到内心最深处都受到邻舍那个男人的折磨。他在隔壁那几间屋里砌炉子，每天（包括休息日）早晨5点就开始用锤子干活，又是唱歌，又是吹口哨，不停顿地持续到晚上7点，然后出门一会儿，9点前回来睡觉。我也在9点前上床，但却睡不着，因为别人的时间表不是这样的，而我就像父亲在玛特利亚里期间那样，直到房内最后一个尖声高叫的姑娘上了床才能入睡。当然，影响我的并不单单是那个男人（今天中午，尽管我竭力制止——我这么个躺在躺椅上逐渐腐烂的人有什么资格禁止一个出色的工人干他想干的事呢？——那寄宿姑娘还是禁止了他吹口哨，于是他除了有时忘乎所以外，几乎完全不吹口哨，但不停地锤打着，而且也许在诅咒我，可是说老实话，这样我

毕竟感到舒服了一些），何时他停下来，这里的每一个生物都打算，并有能力接替他，他们会这么做，也确实这么做了。但影响我的不仅仅是这里的噪声，而且还包括这个世界的噪声，而且不仅是这种噪声，还有我自己的无噪声。

除了长时期睡眠不足以外，在同M.会面之前我不想给你写信。每当我写信讲关于她的事时，我总是不知不觉地陷入谎言之中。我——虽然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不想影响你。现在你已经看见她了。她用什么方式同她父亲和解，我无法了解。对此你大概也一无所知。我自信知道，她看上去不坏。斯特尔巴处于塔特拉的对面一端（最高的地方，但不是原来的疗养院）。请原谅我，我在此把什么东西强加于你了。此事的发生，原因在于我一见到她当时的信就未加考虑地激动起来，当然，我也请你考虑过。她会立即向你谈她那封信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但是她没有权利要求我对那封信闭口不谈。关于那封多余的信你写了什么，关于“不再用此方式转交”似乎意味着她不再想知道我的消息（我说过，我陷入撒谎之中）。“当面评价”，这是作为局外人对这种性格的姑娘首先必须明白的主要东西。你尝出虚伪的味道，我未能尝出来，尽管我倾听着。在这方面，我对这种评价的真实内容未夸大其辞，这些评价不是固定的，一句话可以使评价平息下来。我不想成为由这样一个舵手驾的船，但是评价是勇敢的、伟大的、引导人去见诸神，至少去奥林匹亚山。

我也不相信我曾对你讲过关于M.对你夫人的关系方面的一些话。M.的这个评价也时常受到限制并且几乎被取消了。我记不起来她同莉斯尔·贝尔的关系，但大概记得M.的一句评语。根据这句评语来看，她曾同哈斯和你夫人在一起，你夫人谈起过你，M.对这种点头哈腰、一味奉承的做法显出深恶痛绝。马克斯，在这里不要这么严厉地对待M.，这是一个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案子。你试一试把你夫人的女朋友们扳起指数数一遍，哪些是你认为无可怀疑的女朋友，也许你将会找到你夫人根本蔑视的那些女朋友。我就可以作为某个人宣布无罪了。在某种社交的、社会的意义上（正是在对你夫人的孤独化有决定性的意义上），我同你夫人非常类似（但这不意味着相近）。类似到这样的程度：匆匆一瞥，可以说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以为，这种类似根本不只是今天造成的，而且包括了原来的天性。我们本来就是善良的、有上进心的，但是有某些缺点的孩子。现在，在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差别，虽然用科学的肉眼看不出来，但至少是事实。这种差别很小，小到微不足道，但是它足以

使我（如果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社会材料的话）亲近某个（例如M.）声称恨你夫人的人。当然，你夫人由于结了婚，比我先大胆地深入生活，没有人会想到用我的生活态度来衡量我的价值。如果有此想法，那是不可信的。

M.也许同斯塔查和解了。这个说法在半年里被重复了一两次。斯塔查也总是对我投来锐利的目光，在第一次遇见时，她立即说，我是不可靠的。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桃色故事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更正确点说，印象简直太深刻了。如果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例如说：她非常漂亮，他不英俊，他爱她，她爱他，她不忠实，他服毒自杀——这一切千篇一律、令人深信不疑，言者热情洋溢，结果，在我的心中只会无可挽回地升腾起一种危险的、表面上只是孩童般的、实际上破坏生活的感情。

我本想说：这一切使我〔原文至此中断〕

这是度过14天受刑期后的第一个比较平静的日子。我在这里度过的是一种一定程度上堪称世外生活的日子，它本身并不比别的类型的生活差，没有理由为之抱怨。但如果世界像盗墓人那样把脑袋探入这世外生活，冲着里面大喊大叫，如果我失去了自制力，我就真的会一头撞在历来只是虚掩着的通往疯狂的门上。只需一件小事即可将我引入这种状态，比如在我的阳台下面，有个年轻的不太虔诚的匈牙利犹太人卧在躺椅上，脸向着我，四肢舒展，一只手遮在头上，另一只手深深插在裤子门襟里，一整天快乐地哼着教堂歌曲，这就足够了。（这是怎么样一个民族啊！）有一丁点儿这类事情就够了，而其他事情会迅猛地跟着涌来。我躺在我的阳台上犹如躺在一个鼓里，人们在上面和下面，从四面八方击打着它，我再也不相信地球表面上还有平静的所在。我醒不了，睡不着，即使偶然有一次出现安宁，我也照样睡不着，因为我的精神已被摧毁。我也不能写作，而你责备我，但我甚至都不能阅读了。可我在三天前（通过医生的指点）找到了一片美丽的、离此不太远的林中草地，它实际上是一座夹在两条小溪中的岛屿，那里是安静的。在那里度过三个下午后（上午那里当然是被士兵们占领着的），我的健康大大恢复，以致我今天甚至能够在那儿小睡一会儿；今天我通过给你写这封信对此表示庆祝。

你去波罗的海海滨？去哪儿？最近我读到关于许多风景优美、价格便宜的波罗的海海滨浴场的消息。蒂索、沙尔波伊茨、内斯特、哈夫克

鲁格、蒂门多弗尔海滩、宁多夫，都可考虑，每天只30—40马克。你同谁去？同夫人，一个人，还是同其他人？有时候我也想去波罗的海，但是多半是梦想，而不是切合实际的想法。

你妹妹给我写了一封友好的信。我收到了药膏。我得到它很高兴。冬天痛苦不堪（现在空气浴保护着我），如果药膏真有强效和阻止疖子扩展，那么这药膏能轻易成为所谓人类的苦难，因为用药膏不能减少，只会增加地狱看门犬狗头的数目。

对前面之事我还想说几句。我觉得所有这些桃色故事是可笑的、狂妄的、装模作样的，与这里说的可悲的肉体相比，非常可笑。她们玩自己的游戏，关我个屁事。

我在这里早晨也同一位姑娘在树林里散步一两次。散步总是有效的。至于饮食，可称得上国王的宴席。食物丰盛，令人鼓腹。根本没有出什么事，几乎未看一眼。这位姑娘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什么。也没有什么，风波早已过去了。完全谈不上形势很有利，也不会再起风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奇迹，如果〔信至此中断〕

[旁注]我暂时寄出这封信，明天再续。

我给你写信，这么支离破碎，失眠——不是当前的原因，只是以前时候的遗产——不容许干什么别的。

收到电报，谢谢。

〔1921年5月底6月初于玛特利亚里〕

338.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请你不要设置“不写信的围墙”，不要有这样的围墙。我写信给马克斯，也给你，马克斯写信给我，你给我寄《自卫》，你也写信的。对你来说……我不能抄出这句话，很遗憾，你的文章里当然没有痕迹，那么在你的思想里也没有。

《自卫》在这里征求了新订户，我已登记了名字。这里的医生勒奥

波尔德·施特雷林格博士，地址是：塔特兰斯克/玛特利亚里，塔特兰斯卡——洛姆尼卡邮局。从下一期起，让《自卫》杂志社给他寄来。现在我只能向他借几期看看。他高兴死了，这使我惊讶，因为在我看来，我以前一直干完全不同的事。

衷心地问候你、夫人和孩子！

弗 上

〔邮戳：1921.6.5—玛特利亚里〕

33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在病房，依旧失眠，眼睛依旧发热，太阳穴发胀。

……从这个角度看，我从来不相信，但是感到惊异、恐惧，满脑子装着诸如草地上有蚊子之类的问题。大约在我旁边有这朵花的地方，它不完全健康，朝着太阳抬起了头。谁不这样抬头呢？由于它的根和浆汁遭到折磨，充满说不出的忧愁。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仍然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它只传达出这方面很含糊的、非常不清楚的信息。它现在却不能弯下腰，不能触地和沉思，而必须仿效兄弟们，挺起身子，她也这样挺着，但是累了。

我可能想到另一个亚伯拉罕^[306]。当然他不会把此事带到犹太教祖先那里，根本不会去见这个旧衣商。他愿意像一个侍者那样，立即乐意完成受害者的要求，但他未实现牺牲，因为他未能离家出走，他是必不可少的，经济界需要他。还有些东西要经常安排。房子没有完成，他的房子未完成，他就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走掉。《圣经》也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圣经》说：“他订购自己的房子。”亚伯拉罕实际上早已有万贯家财。如果他没有房子，他在哪里抚养孩子，把屠刀塞在哪根屋梁里？

另一天：对这个亚伯拉罕作了很多沉思之后，这些老故事现在不值得一谈了。特别是真正的亚伯拉罕不值一谈。他早已有了一切，从童年起就被带走了。我看不到这段跳跃。如果他早已有了一切，并且被引导到更高的地方，现在必定从他身上至少表面上夺走了一些东西。这是合乎逻辑的，并且没有跳跃。另外，上面的亚伯拉罕们站在自己的工地

上，现在突然要去莫里亚山。也许他们还没有一个儿子，应该把他去献祭。这是不可能的。萨拉有道理，她笑了。只是仍然有嫌疑，这些人是否故意不将房子完工——举一个很大的例子——把脸藏到有魔力的三部曲里，以便不必抬头，就能看见远处的青山。

还有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想完全正确地牺牲的人，他对整个事业一般有正确的信念，但是不能认为他就是那个讨厌的老人，他的孩子就是那个肮脏的男孩。他不缺少真正的信念。他有这个信念，只要他能相信就是他，他会十分镇定地献牲。他担心他虽然作为亚伯拉罕与儿子骑马出去，但是在路上会变成堂吉诃德。如果世人当时见到这样子，一定会对亚伯拉罕感到吃惊的。但是，他担心世人见到这光景会笑死的。但这不是他担心的那种可笑——当然他也担心可笑，特别是他跟着一起笑——他主要担心这种可笑将使他变得更老、更讨厌，使他的儿子更脏，更不值得被召唤回来。一个不召自来的亚伯拉罕！这仿佛是在年终庆祝时应该得奖金的优秀学生，在充满期望的寂静中这个最坏的学生由于听错，从自己肮脏的最末座位上跑出来，全班哄堂大笑。也许根本不是听错，他的名字真的被叫了，根据教师的想法，奖励优秀学生同时就是对劣等生的惩罚。

真是可怕的事情——够了。

他们抱怨这孤独的幸福。孤独的不幸又如何呢？——说真的，这几乎是成双的。

从赫勒劳没有来什么消息。这使我忧郁。如果赫克纳想一想，他本来能立即寄一张明信片来的，告诉我他在沉思。我们对赫勒劳的希望
[307]无法实现。

卡 上

〔1921年6月—玛特利亚里〕

340.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几天前我把续稿搁在一旁，因为我突然想到你是否会对我生气。当

时我写信时，我没有想得那么深远，在理论上这也是对你的夫人的深深的敬意，这恐怕比我在生活中敢于向她致的敬意还深得多。但是我以后想到有这种可能，现在情况幸而不是这样。当然，我的例子是错误的，M.甚至仇恨几乎所有的犹太女人，也许文学也起了作用。但是你举的反面例子苍白无力，这种“基督教”的友谊充分利用了人种学的刺激，这种友谊该怎样深化，首先我没有那么想强调其反面，即缺少友谊。因此理论留存，犹如箭留在我的肉里那么牢固。

写到此为止？这么幸运？我对此一无所知，到此为止，算了吧。即使在波罗的海旁边我也对此一无所知。现在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只知道同你一起走。我不能完全沉默，也不能开诚布公地说，因为这毕竟是一种病人运输。如果我在这方面试图处于你的位置，我就会看到，如果我健康的话，肺病会立即大大地损害我的健康，这不仅因为毕竟存在传染的可能，而且主要由于这种慢性病很脏，脸色和肺病之间的矛盾不明朗，一切都不干净。看见别人吐痰，我就恶心。我自己也没有我应该备有的痰盂。但是现在，所有这些疑虑这里都有。医生绝对禁止我去北部的某个海滨，他也没有兴趣在夏天把我留在这里。相反，他也允许我离开，我想去哪些树林就去哪些树林，但是不许我去海滨。此外我也可以去海滨，但是应该冬天去内维。情况就是这样。我已经很高兴，将对你、对旅行、对世界、对海涛的喧嚣感到愉快。草原四周溪水潺潺，树木飒飒，这也令人安慰，但是这并不可靠。军队来了，而现在永远离开了那里，他们从林间草地中建造一座旅舍，那时候，小溪、树林与军人一起喧闹。这是他们之中的一个精灵，一个恶魔。我试图离开这里，如你所建议的那样。然而除了在心中，又在哪个别的地方有可能安宁？例如我昨天在塔赖卡，在群山中的一幢旅舍里。这里山高1300米以上，荒凉而优美。我有大批人保护，人们愿为我尽心尽力，尽管宾客盈门，人们仍然为我烧菜，比这里好得多。

上面这些已成往事。那里比这里更闹，有旅客的喧哗，有吉普赛人的音乐。我又留在这里，一动不动，好像我生了根，当然我不会在此扎根的。我主要是对公司提心吊胆（一般来说我并没有考虑这许多），只要我还没有离开公司。我不在屈劳，但是在那里情况变了，我在那里也变了，那位老督察官还抓住我一会儿。我欠公司的债是非常大的，不可数的，只会越来越大，对公司来说，也没有改变的其他可能性。现在，我习惯于这样解决问题，我让自己被这些问题累垮，也许我在这里也这样做。

对摘出的几段我根本不感谢你。任何人身上都有幸福和信心以及它们轻易操作的手。奥斯卡的论文多么晦涩，拐弯抹角，读起来时常很费劲，特别是在某种社会意义方面不够味，但是总的来说，他也称得上是不屈不挠的人。费利克斯忽略了我，《自卫》一连几期都没寄给我；这里的医生勒奥波尔德·施特雷林格博士也忽略了我，我作为新订户向他报告过，他至今还没有收到它。

相当长时间以前我读过克劳斯的《文学》^[308]，你一定知道它吧？根据当初的印象（这一印象自那以后当然减弱了许多），我觉得它特别切中要害，箭箭直射人的心灵深处。在这个德语犹太文学的小天地中他确实占有统治地位，或说得更准确些，他所代表的原则占有统治地位，他令人甘心情愿地服从这个原则，以致他本人甚至与这原则混为一体了，而别人也接受了这一混合。我相信我分辨得十分清楚，这本书中哪些是幽默成分（当然那是些出色的幽默）？哪些是值得怜悯的、可怜的成分？再就是哪些是真实？那里至少有着像我的正在写的手一样的真实，并且有着如此清晰、如此令人惧怕的本人的肉体的质感。其中的幽默主要是一种以犹太德语讲话，像这样讲犹太德语，除克劳斯外无人办得到，尽管在这个德语犹太世界中几乎没有任何人除了讲犹太德语外还会别的什么。从最广义上来看（也必须从这种程度的广义上看），讲犹太德语是一种不得不拿过来的东西，即以喧哗或悄悄的或自我折磨的狂妄态度把一种别人的所有物拿过来，这种拿不是一种争取，而是通过（比较）仓促的抓攫而偷来的。即使没有丝毫语言错误能够被证实，这个别人的所有物仍然是那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当然这里任何事物都能通过良心在后悔的时辰一声轻轻的呼唤而能证实。我说这些并无反对讲犹太德语之意，犹太德语本身甚至是美妙的，它是书面德语和形态语言的一种有机结合（这话是多么形象化：Worauf herauf hat er Talent？^[309]或者这句伸直胳膊，仰起下巴说出的话，请您相信！或这句令听者双膝使劲对擦的话：“er schreibt über wem？”^[310]），它也是一种细腻语感的产物。这种语感认识到，在德语中，只有方言或最个性化的标准德语才是真正活着的，而其他的，所谓语言的中层仅仅是灰烬而已，只有通过活跃非凡的犹太人的手里面乱掏一气，它才会产生一种生命的假象。无论有趣还是可怕，事实便是如此。但犹太人为何会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那个方向去呢？德语文学早在犹太人获得自由之前便已存在，而且十分光辉灿烂。据我看，它一般首先不逊于今日之丰富多彩，也许今日甚至倒是失去了许多昔日的丰富性。而这二者与犹太属性间存在着联系，与年轻一代犹太人同其犹太属性的关系之间存在着联系，与这一

代人可怕的内心状态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一点克劳斯认识得尤其清楚，或说得更正确些。以他来衡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如这个轻歌剧[311]中的祖父，他[312]与他的不同仅仅在于：他并非光会讲oi[313]也写枯燥的诗歌（他这么做是有一定的权力的，就像叔本华略怀着点快乐，生活在那始终为他所认识到的向地狱坠落的过程中的那种权力）。

在这方面，比心理学更令我折服的是，与有些人引以为精神食粮的那种恋父情结相关联的不是那无辜的父亲，而是父亲的犹太属性。离开犹太属性，多半会受到父亲们含糊的首肯（这种含糊是令人气恼的），是大多数开始以德语写作的人所希望的，他们想要如此，但他们的后腿仍然粘连在父亲的犹太属性上，而前腿又探不到新的地面。对此的绝望成了他们灵感的来源。

这种灵感同其他任何一种同样值得尊敬，但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一些可悲的特性：首先，尽管它表面上像是德语文学，但实际上成不了德语文学，这便是他们的绝望的导火线。他们生活在三种不可能性中间（我只是随便地称之为语言上的不可能性，这么称是最简便的，但它们也完全可以被称为别的什么不写之不可能、用德语写之不可能、用其他语言写之不可能。几乎可以加上第四种不可能性，即写之不可能（因为这种绝望不是某种可以通过写作得到安慰的东西，它是生活和写作的敌人，写作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就像一个准备上吊自尽的人写下遗嘱以应急一样——这是一种可以持续一生的应急措施），所以说这是一种从所有方面看来都不可能的文学，一种吉卜赛文学，它把德国孩子从摇篮中偷出，匆匆忙忙地安置一下，因为总得有个人去绳索上跳舞（但这甚至不是那德国孩子，这什么都是，人们只不过说，有人在跳舞）……

[314]

〔马克斯·勃罗德的上封信附有一张问题单，

由弗兰茨·卡夫卡填好退回〕

问题单

体重增加？

8 公斤

总重量？

65 公斤以上

肺部客观诊断？

医生保密，据说有利

体温？

一般不发烧

呼吸？

不好，在寒夜几乎像冬天一样

签名：

使我难堪的唯一问题

341.致奥特拉·达维多娃

我第一次郊游。

我立即认出了薇拉，费劲地认出你，我只立即看出你的骄傲^[315]。我看她长得更大了。她根本不去取明信片。看来她有一副坦率诚实的面容。我以为世上没有比坦率、真诚和可靠更好的东西了。

你的

〔明信片邮戳：1921.8.8—玛特利亚里〕

342.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是的，我曾经发烧，已卧床一周。未感冒，由于肺病发烧，我无法防御。除了咳嗽，现在病已好，因此我还获得了最近几个星期天。我也没有一下子挣脱玛特利亚里疗养院（重要的不是玛特利亚里，而是运动），而是逐步地，以符合我的方式离开这里。周末我大概到布拉格，然后我立即去找你。但愿你不在卡尔斯巴德。

你的

〔明信片，邮戳：21.8.23—马特利亚里〕

343.致埃莉·赫尔曼

亲爱的埃莉：

我本来等待一封不大拒绝的信，至少是一封愉快的坚决的信。你未认识到幸福吗？你认识到有更好的教育可能？有更激进的、个人举办的、也许更重要的学校，例如维克斯多夫；有更圆滑的、异样的、从这里不能评断的遥远的外国学校；有血统更近的、也许更重要的巴勒斯坦的学校。但是在附近和不大有风险的、在赫勒劳之外的地方大概没有学校。因为他10岁差几个月，太年轻吗？7岁上学，有3年学龄前教育。对于成年人生活、结婚、死亡来说，可能是太年轻了，但是对于温和的、不强迫的、一切顺利的教育来说也太年轻吗？10岁虽小，但是在某种情况下算是高龄，10年没有身体锻炼，没有身体保护，生活舒适。尤其在舒适生活中，没有眼、耳、手的训练（收电梯钱在外），关在成年人的笼子里，成年人基本上（就普通生活而论）只会向孩子发脾气。这样的10年并不少。当然，在菲莉斯家，10年不能算坏，他是一个身强力壮、安静、聪明、快乐的人。这10年是在布拉格度过的。特别是不想受孩子们打扰，这种思想正好在布拉格富裕的犹太人中起作用，我当然不是指个别人，而是指几乎可以用手抓住的这种普遍思想，因每个人的气质不同，这种思想在每个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你身上怎么样，在我身上也一样，都有这种卑鄙的、肮脏的、温和的、耀眼的思想。能够拯救孩子，使他们不要有这种思想，这是多么的幸福！

弗

〔1921年秋〕

344.致埃莉·赫尔曼

亲爱的埃莉：

不对，这不是毅力，既不能让人吓唬你（这样做，仿佛我可以用毅力强迫你干些违背己意的事情），也不能让人鼓励你（这样做，仿佛我能用毅力来替换你缺乏的、送走菲莉斯的意志，你乐于有而又缺乏的意志）。这不是毅力，充其量是言语上的毅力。这种毅力也将停止，甚至已经停止，这不是毅力。你感到惊人的好，但是解释不正确，而你写

道，你也想从“我们的环境”出来，因此（因此！）不能送走菲莉斯。这就更不是毅力，你想跳出我们的环境，依靠菲莉斯做到这一点，二者是好的，也有可能。养儿防老，理论上我不懂得怎么会有无孩子的人，但是怎样想实现“出去”？正是通过这种环境的典型行动，通过贪心（我不将他托出去），通过绝望（没有他我怎么办），通过失望（他将不再是我的儿子），通过自我欺骗，通过借口，通过美化弱点，通过美化“环境”（“使生活可以忍受”，“承担责任”，“甚至从远处能举出这种母亲的例子”，等等），我要是你的话，这一切当然是“好上加好”。

从这个“启蒙教育”故事中，除了故事中美和感人之外，还读出下列之事：第一，你来得太晚了。第二，菲莉斯没有带着布拉格青年的故事去你那里。第三，关于薇拉，他未询问你，而是审问你，因为他拥有青年人的解释。第四，你可能把这解释当然只用作抽象之物，即爱情。这不好（喜鹊故事的优点是它的相当远的现实性，此外无法审查），更糟的是，将这种抽象性与这个青年人觉得令人惊异得可怕现实性相提并论。好，你没有撒谎，此外，他也没有隐瞒什么。第五，你的评语很好。一个人想干什么，就什么都能干出来，干可笑的事和坏事。可惜这样做不仅能通过言语，而且还通过行动，干得不好好事看上去类似最坏的事，以致鱼目混珠。那么你的评语中有什么保持未变呢？这个布吕克斯青年在他的圈子里没有权利吗？第六，后来你在你的解释和那个青年的解释之间建立了联系，你做得怎样，将使我感兴趣。但这本身并不难。每个人迫不得已时在生活中都会这么做的。我不谈妇女，但是这个布吕克斯青年在所有男人中到处转，只有这个青年那里的团体，不论以何种方式表示态度，都至少因害怕凌驾于他头上的东西和求知欲而受到尊崇。因此，我站在青年这边反对男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反对你的启蒙教育。因为只有青年是坚定不移的真理探索者和无所顾忌的传播者。由于他缺乏知识和经验，人们可以信任他。由于他内心中蕴藏着共同性，他会感觉到他缺少什么，这一认识将接近正确，因为他是别人的血液中的血。

请看（例如）这两个男孩，他们教训了我。他们知道今天肯定不比昨天多，但是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有着特别统一的一贯的性格。他们一个从右边，一个从左边，同时教训了我。右边那个心情愉快，父亲般的、善于交际、爱笑，以后在各种年龄的男人那里，也在我这里我都听到他的笑声（诚然也有一种爽朗的笑，另有一种对事物的嘲笑，但我还未听到过这种笑）。左边那个是就事论事的、理论性的，这令人讨厌

得多。两个人都早已结婚，一直待在布拉格。右边那个已经被从梅毒到无知摧毁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左边这个是性病教授与消灭性病协会创始人和主席。我不想将他们互相贬低。此外他们大概不是朋友，当时他们只是偶尔为了教训走到了一起。

但是比较起来，这一切相当不重要。你的启蒙教育和对这个青年的启蒙教育都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只是他自己将如何决定，如果他的身体开始活动的话，在这方面我未考虑某些行动或疏忽，而是想到将引导他的思想。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超人的上等天资起作用，他一定会自己决定他的生活到那时为止是怎样的情况。如果他的生活厌倦了，身心交瘁，在大城市受到过度刺激，失去信念，闲极无聊，那么他会做出相应的决定。而你把整个时间（这在时间和精神上都是不可能的）都花在他后面，时时刻刻出于一片爱心地告诫他。例如说，你连表面上最容易的事（即防止无聊这个万恶之源）都做不了。这一点你自己已经承认，我也在任何情况下都见到他。这些情况在这方面是令人绝望的，必定一年一年地恶化和危险，因为这对他和对你而言都变得面目全非。童年时代这些情况已经模糊，人在迫不得已时可能做些相反的事。但是正是这些情况（在精神意义上）逐渐显出百无聊赖和尽兴消遣。他读书，学习音乐，踢足球，这一切不必要，但是能够包含惊人的无聊和无领导。无论他本人还是别人都不能辨别，但是后果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921年秋〕

345.致艾莉·赫尔曼 [316]

.....[317]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伟大的证人（是伟大证人中的一个），但我在此只是摘抄他的话，正是由于他是伟大的，再就是因为我昨天正好读到这些话，而不是因为我竟敢持同样的见解。斯威夫特在描述格利佛的小人国之行时（那里的环境大受褒扬）说：“父母和孩子们的相互义务的概念与我们的概念完全不同。由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联系像所有动物一样，依据的是自然法则，于是他们干脆声称男人和女人仅仅是为了这个原因而结合的；对孩子们的爱也照此类推；所以他们不愿承认，一个孩子由于是父母所生，就应该对父母尽义务。由于人类在受苦受难，这种尽义务就谈不上是行善了；再说父母们也并不想做什么善事，而总是在卿卿我我的相聚中想着全然不相干的事情。从这一结论和其他一些结论出发，他们认为，在所有人中，把孩子们的教育托付给父

母是最不妥当的。”他这话的意思显然同你对“人”和“儿子”的区分是一样的：一个将会成为人的孩子应该尽可能从他表现出的兽性，从纯粹的动物状态中摆脱出来。

你自己承认，你的犹豫中有自私的成分。但是即使从自私看，这不也是一种颠倒了的自私吗？比如说，你不愿把冬装放到皮革工场去保养一个夏天，因为你觉得这些衣服到你秋季取回时会使你内心中感到陌生；假如你自己保管这些东西，它们当然将在秋天完全地、从内在因素到外表全都属于你，但却会被蟑螂啃啮得支离破碎。（我这么说毫无恶意，真的没有，这只是个例子，一个相近的例子。）……

我就是这样看你的疑虑的，我能够完全认可的只有一个你没有提到的反驳理由。也许你是这么想的。即：在我甚至没有能力向自己提出如何获得自己的孩子的建议的情况下，我对其他人的孩子的教育说三道四又能有什么价值呢？这个论据是无法反驳的，完全符合我的情况。但尽管它是那么出色，我却相信，与其说它针对的是我的建议，不如说是针对我的。不要为我的建议是从我这儿来的而惩罚它。

〔1921年秋〕

346.致艾莉·赫尔曼

……你所强调的（孩子们不必为他们的存在而感激父母）不是斯威夫特的主要意思，任何人也不会用如此简短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思想。重点在结束语上，“在所有人中，把孩子们的教育托付给父母是最不妥当的”。当然这一论点和引出这句话的例证讲得太简短了，所以我想试着把它更详尽地向你解释一番。不过我要重申一遍，那一切都只是斯威夫特的观点（他还是一家之父呢），我的观点虽然与此相近，但我却不敢讲得这么肯定。

斯威夫特的意思是：

每个典型的家庭首先展示的只是一种动物关系，可以说是一个单一的生物结构，一个单一的血液循环系统。因此当它各自为政时，它不能超越自身，它不能从自身中造就出一个新人来，如果它试图通过家庭教育来做到这点，那就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乱伦。

所以说，家庭是个生物结构，但却是个特别复杂和不平衡的生物结构，像任何生物结构一样，它不停息地追求着平衡。这种对父母和孩子间的平衡的追求（父母之间的平衡不是这里探讨的问题）被称为教育。为什么它会得到这么个称号，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看不到真正教育的任何踪影，看不到一个正在长大成人的孩子的能力得到平静的、带着无私爱心的展现，也看不到对独立发展平静的宽容。看得见的只是多少年来注定要面临最强烈的不平衡状态的生物结构吸引着人们多半在高度紧张地试图为它制造平衡。这个生物结构可以称为家庭动物，以示与个人动物的区别。

立即公正地在这个家庭动物体内制造平衡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公正的平衡才是真正的平衡，只有它才能存在下去），其原因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不平等差距，即多少年来父母对孩子表现的强得吓人的威势。因此，在孩子处在童年时代时，父母认为自己是唯一有权力代表家庭的，不仅对外如此，而且在家庭内部的精神结构上也是如此。这样他们就一步步地剥夺了孩子的个人权利，使他们没有能力让这种权利发挥好作用。这是个不幸，它以后对父母的打击将并不比对孩子的打击少多少。

真正的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人类的事业，而后者则是家庭的事业。在人类中，每个人都有其一席之地，或至少有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末日的可能；在父母搂在怀里的家庭中却只有几个确定的人有一席之地，他们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此外还必须符合父母的命令。如果他们不能符合，他们将不是被驱逐出去（要能那样倒是很好，但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一个生物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遭到咒骂或折磨，或两者兼而有之。这种折磨不是肉体上的，不是依照希腊传说中那古老的父母样板的（像克罗诺斯吃他的儿子，——他是最正直的父亲），但也许克罗诺斯正是出于对他的孩子们的同情才舍弃通常的方法，采用自己的方法的。

父母的自私——这是真正的父母感情——是没有边际的。在教育意义上父母最大的爱也比花钱请的教育者的最小的爱更自私。这是必然的。父母并非自由地面对孩子们，不像一个成人对一个孩子的那种关系，孩子毕竟是自己的骨肉——更复杂的是，那是父母双方的骨肉。比如当一个父亲“进行教育”时（母亲也同样），他会在孩子身上找到他自己身上的毛病，那正是他所恨而又无法消除的。现在他肯定希望能消除

它，因为他自信对这个孱弱的孩子的控制力量比对他自己的强，于是他不等孩子长大成人，就狂暴地对准孩子插下手去。或者，比方说他震惊地发现，他一度视为自己的出色方面、并认为是家庭中（家庭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居然在孩子身上不存在，于是他便开始使劲地把这个因素敲进孩子的脑袋里去，他确实成功了，但同时却失败了，因为他这么一来也把孩子打得粉碎。或者，比如他在孩子身上发现了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存在于他的妻子身上时是为他所爱的，但存在于孩子身上（他总是把自己同孩子混为一谈，所有父母都是这样的）却为他所憎恶，比如他非常爱他妻子的天蓝色眼睛，但如果他自己的眼睛突然变成天蓝色的，他就会极端地讨厌它们。或者，比方说他在孩子身上发现了他身上所有的、为他所爱或渴望他自己能有的、认为是家庭必不可少的因素，那么孩子身上出现的其他因素于他全然无足轻重了，他在孩子身上只看到他所爱的方面，他迷恋于他之所爱，卑躬屈膝地甘愿为仆为奴，他用爱磨损着孩子。

这是父母从自私自利生出的两种教育方法，各种层次一应俱全的暴君相和奴才相。暴君相可以表现得非常温柔，（“你必须相信我，因为我是你的母亲！”）而奴才相可以表现得非常骄傲。（“你是我的儿子，因此我要把你造就成我的救星。”）但这是两种可怕的教育方法，两种反教育法，只能用来把孩子重新踩回他所钻出来的地底下去。

父母对孩子只抱有动物的、无意义的、不断把自己同孩子搞混的爱，而教育者对孩子所抱有的则是尊重，这点与前者相比在教育意义上要强得多，即使没有爱也并无影响。我重申一遍，在教育意义上，因为我把父母的爱说成是动物的、无意义的，本身并不是贬义的评价，如同教育者那充满意义的、有创造精神的评价一样，它同样具有一种无法捉摸的神秘性；只是从教育的角度看，这个评价还真是贬得远远不够。N.把自己称作母鸡是很有道理的，每个母亲从根本上说都是母鸡，谁若不是，那就是个女神或也许是一个生病的动物。但这只母鸡N.却不是希望由母鸡们，而是由人来教育孩子，她认为自己不能单独教育孩子。

我再说一遍，斯威夫特并不是想抹去父母之爱的光彩，有时他甚至认为父母之爱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孩子不受父母之爱的影响。不知哪首诗里写过一位母亲从狮子的爪子下拯救她的孩子的故事，但难道这个孩子就不应该也保护自己不受她的手之害吗？难道她这么做就得不到奖

赏，或者不如说，得不到获得奖赏的可能性吗？在另一首载在教科书中的诗里（你一定知道这首诗的）叙述一个游子故事，他离家多年后回到故乡的村庄，除了母亲外谁都没认出他来：“母亲的眼睛毕竟认出他来。”这是真正的母爱奇迹，这里表达了一个伟大的道理，但实际上只是半个，还应该补充一点：如果儿子一直留在家，那么她绝不会认出他来。每天同儿子坐在一起使儿子在她眼里变得完全无法辨认，这样就会出现同诗中截然相反的局面，任何其他人都比她更容易认出他来。（当然这样她也根本不需要认出他，因为不存在他回到她身边的问题）你也许会说，那个游子是在11岁后才步入世界的，可我确切地知道，他那时离10周岁还差几个月，或换句话说，并不是母亲贪婪地想要承担责任，贪婪地想要分担快乐，也许更糟的是，还想分担痛苦。（他什么都不能完全拥有！）并不是母亲导演了这出戏的全过程，基于对儿子的信任（不信任是布拉格的特产，此外，信任和不信任从后果上看同样是有风险的，但不信任从其自身看也是危险的），以求有朝一日得到儿子的拯救，并果然通过她的儿子的回归而得救了（也许从一开始她所遭遇的危险就并非大得不可思议，因为她不是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女人，而是来自施蒂利亚^[318]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那么该怎么办呢？照斯威夫特之意，应该让孩子们离开父母，也就是说，那个“家庭动物”所需要的平衡首先应该以下述办法获得：通过接走孩子，把最终的平衡推迟一段时间，直到这些孩子在不依赖父母的情况下，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力量上都与他们平起平坐，毫不逊色，这样真正的、相亲相爱的平衡的时刻就到来了。这种平衡你称之为“得救”，而其他人则称之为“孩子们的感恩表现”，并认为是十分罕见的。

此外，斯威夫特懂得要划出一定的界限，他认为接走穷苦人的孩子并不是非常必要的。在穷人那儿，从一定程度上说，世界、劳动、生活自己会无法阻止地闯入茅屋之中（比如当基督在半敞的茅屋中诞生之际，整个世界都来到了那儿，包括牧人们和来自东方的智者），使摆设豪华的家庭房间中那种沉闷的、充满毒素的、摧残儿童的空气无法生成。

当然斯威夫特也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父母也能成为出色的教育者，但只是对别人的孩子。我大体上就是这样理解斯威夫特的这段言论的。

〔1921年秋〕

亲爱的罗伯特：

旅行很愉快。我提及此事，只是因为发生了许多奇妙的、相互牵连的偶然性事件，这些事件使我搞到了一个好座位。列车挤得水泄不通。起初乘客还到处坐在箱子上，以后几乎无立脚之地。据说，在乌鲁特基加了两节空车厢，在那里会有座位。在乌鲁特基我下了车，跑向这两节车厢，全挤满了，此外有旧的脏车厢。我又跑回我的车厢，一下子找不到，便上了另一个车厢。这也无所谓，全挤满了人。在这个车厢里人挤人，其中有3个女人挤到墙边。她们从洛姆尼茨乘车去布拉格，其中一个女教师，我在玛特拉匆匆见过她一面，当时她将在别处没有座位的G.工程师带引到我的桌子旁。现在在车厢里我给她们搞了一些小的服务。这位女教师同老年妇女和女教师联合起来，以疯狂的劲头，决定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走，给自己强占一个座位。事实上她在偏远的一等车厢找到一个座位，由于某种偶然性，在那里也还有一个座位空着，现在两个女人有了座位，第三个女人也同她们一起走的。于是在那个车厢立即发生下面的事：在余下的4个旅客中有两个铁路低级职员之类，他们费尽唇舌，说服了售票员（因为他们自己只要求二等车厢），说这个车厢就是二等车厢，在特殊情况下售票员有这种变动权。他终于同意。但是要求乘一等车厢的其他旅客因此受到伤害，要求乘空着的一等车厢。售票员给了他们车票。这样一来就有了两个座位空着。一个给第三个女人，另一个给我（因为女人们想要为服务表示感谢）。她们喊我穿过挤满人的走道。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她们不仅不知道我的姓名，而且这个女教师根本记不起（事后证明）什么时候她们第一次同我谈过话。至少我听到她们怎样叫我。我走过去，正好售票员将一个大大“2”字贴到玻璃门上。在旅行食品中最好的是桃子，好极了的桃子。

布拉格有些变化，例如一个年老的、脾气古怪的叔叔死了。他是几个月前去世的。几天前我从玛特拉给他寄去了第一张明信片。即将再见。致亲切的问候。

事情立即表明，我通过亲戚与明策教授有很好的联系。如果存在这种聘任的可能，一定会为您找到个职位的，如果我及时地开始作准备（例如现在为费伯尔作准备）的话。请您给我只寄某些文件，教授的信等等。

也许我还要去德国一家疗养院3个月。祝你万事顺利，并感谢你的祝福。

你们的 卡

〔1921年9月2日于布拉格〕

348.致M.E.

亲爱的闵策：

只是急于回信。我现在才收到您的两封信，因为我至今呆在玛特利亚里，邮件未转给我。您什么时候来？我将在这期间想尽各种方法打听。但是闵策，如果您来的话，请您不要对我这封信感到意外，我遇到意外事件就受不了。长期患病损害了我的神经。现在靠墙放的小柜子把我吓了一跳，何况是个大人闵策，一个女工，突然之间进来。因此，闵策，请你先来封信，告诉我，我们何时何地能相见。

希望即将再见！

您的 卡夫卡

〔1921年9月初于布拉格〕

349.致M.E.

亲爱的闵策：

您9月中旬来，很好（9月底10月初我大概又将离开布拉格）。13日或14日是我父亲的生日，也许您能避免在这时候来，如果避不开，您也可以在这两天来。您任何时候来成都欢迎。如果您任何一个周日上午来，我将几乎不可能在火车站接你（因为我的公司的许多救济工作，我至少必须在写字台旁坐几周）。然后您正好从火车站到我的办公室（波里茨7号）来“自我介绍”，我在那里直呆到2点。守门人会叫我下来的。可惜您本周不来，否则，您能睡在我小妹妹那里（她丈夫本周出外旅行，她住在像我住的那样的房子里），以免由于持续不断的旅行而劳累过度，您本来也能在卡尔斯巴德看看大会的。

但是请您至少事先来封信，告诉我您什么时候来，到哪个火车站，几点钟。（您曾在布拉格有一个友好的家庭，现在没有了么？）

祝一切顺利！

您的 卡

〔1921年9月初于布拉格〕

35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还没有证实您的挂号信……

我同皮克谈过，他甚至知道我给赫格纳的信。赫格纳——人们不能预料——对一种好的、但使别人有点神经质的习惯，如果不是说“是”，也必定完全沉默。此外他对皮克说过：卡夫卡写信给我，说我要聘他的一位朋友在印刷厂工作一年。我该怎么答复呢？提了这个反问，我们的事情算办完了。正如皮克所说，霍尔茨曼根本不害怕，甚至受到衷心欢迎。也许您已经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

我的健康状况不很好。要是我从办公室回来不马上上床躺着并留在那里，我就不能经受住了。头几天我没有上班，便自食其果了。那天天气还很好，我也累得连手都举不起来，不能把明信片寄往玛特拉。请您向大家问好。

在福楼拜的日记中我读到这么一段美妙的逸闻：有一天，夏多布里昂同一些朋友到戈布湖去（比利牛斯山脉中一个幽静的山间湖泊），大家坐在我（福楼拜等）吃过早饭的那条凳子上吃东西，美丽的湖光山色使大伙儿如痴如醉。“我愿永远在这里生活。”夏多布里昂说。“噢，您会在这里厌倦得要死的。”他们中一位女士说。“什么话，”诗人笑道，“厌倦是我的家常便饭。”使我愉快的倒不是这个故事的智慧火花（就这点而言它并不算突出），而是那种快活，是这个男子的那种堪称庄严的愉悦。

祝一切顺利！

〔1921年9月初于布拉格〕

35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这究竟怎么回事？你说，我根本没有写信吗？两封信和一张明信片，绝不可能全丢了……我疲软无力，这里的人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恩斯特·魏斯刚好来过这里，并不凶恶，而是亲切友好，总的来说也比以前温柔。他只是由于自己的意志，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和非常健康。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像任何人通常那样生病。

多多问候！

卡 上

〔明信片邮戳：1921.9.7—布拉格〕

35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只是暂时作答，以后星期一我将更详细地复信。首先我对这封信还有点犹豫不定，然后我再三思考，最后我同马克斯（他早已在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已在几天前闭幕。他在那里没有呆到大会结束）和奥特拉商议……今天——据说这还不是最终日期——我会由于担心城市，建议至少抓住贝朗利格特的可能性，如果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就试图使之成为可能，当然是在冬天。10月中旬之前的几天当然就没有价值了。如果不可能的是B.或斯莫科维奇（这个英国的工厂主？），那么据我所知，也许只有布拉格留存下来，因为即使可能，也不能在几天之后取得诺尔达赫，如果能取得它，那么大概布拉格能更轻易地……我目前身体很好，晚上6点刚量的体温是36.8℃。

卡 上

〔1921年9月中旬于布拉格〕

353.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事情没这么严重，只是不好。我肯定会去的，可能去格贝尔斯多夫，那儿似乎不比玛特拉贵。或许我更乐意继续往前走，去某个地方，比方说莱茵河畔或汉堡。但我未得到真正的回复。体温虽未超过 37.3°C ，但每天都过了 37°C 。

您写信为何不谈一点自己的事？健康，斯莫科维奇，推荐信，奥斯湖，诸如此类。

伊龙卡寄来了巧克力。她真是太好了。她像个小封臣似地寄来了贡物，对那事什么也不敢说。她是多么文静哦，在我记忆中变得更文静了。

.....

最近雅瑙赫在这里，只待了一天。他从乡间来。他已致信表明态度，说他一点也不生气，尤其是您的信，给了他莫大的快乐。他到我办公室里，又哭、又笑、又叫，给我带来一堆书，说是要我读。继而他又带来了苹果，最后带来了他的情人，一位小巧、友善的女子，森林管理员的女儿。他住在外头，与这女子的父母同住。他自称很快乐，但有时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即非常迷惘，而且他看上去气色也不佳。他想办高级中学毕业考试讲座，又想学医（“因为这是份安静、朴实的工作”）或学法律（“因为这会引他步入政坛”）。是什么魔鬼烧起了这把火呢？

霍尔茨曼会在海德堡念书吗？这么说他不在赫克纳那里？遗憾。那么他部分已属于斯特凡·格奥尔格，后者人不坏，但很严厉。

那些玛特拉人在干什么？首先是格劳伯在干什么？他的波普拉德计划怎么样了？慕尼黑研究院是怎么回复的？斯齐奈已在那里了吗？

衷心问候您！

K

〔1921年9月中旬于布拉格〕

35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我正想着玛特拉（而且没有别的明信片），所以寄了张从玛特拉带出来的明信片。我未发电报，因为我没找到任何下楼的人，而且电梯坏了，因为我的信想必已寄达，因为我甚至羞于打电报谈我的健康，打电报很贵，因为在最挑剔的医生面前略有点夸张地抱怨，要得到许可而又不遭致惩罚（那么我可在谁面前申诉呢？），最终还因为那封信摆在那儿。但信直至谈及健康状况的地方被弄得无可辨认时方能寄走。

K

〔风景明信片（玛特拉）邮戳：1921.9.16—布拉格〕

35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感冒演变成了厉害的咳嗽。今天我未去办公室上班，虽然明天可望去，但现在恰巧来了封电报，是波莫瑞那名女园丁（她也一点都不生气）拍的。电报中女园丁说明天到，只待一天。我无论如何得集中精力接待一番。另外，她这人友好、亲切、有耐心。她想得到一个主意，不过那些好主意悬在星星之间——因此那儿是如此的黑暗——该怎么将它们取下来呢？巴尔也许会成功，这令我高兴。在这方面，我几乎不能从马克斯那里得到什么，他现在很忙并受着折磨……

我不能去海边度假。从哪里弄钱呢？即便想“弄”钱，我也没法弄。大海对我来说也太遥远。出于健康原因我欲去天涯海角，由于生病的缘故至多只想花10小时。

斯齐奈身体好吗？

请代为问候格劳伯！

卡

〔明信片邮戳：1921.9.23—布拉格〕

356.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离去教授那儿，我还有几天时间，这很好。波莫瑞那位女园丁的客访，相当顺利地过去了，而且时间也颇短。但现在却发生了一件大一点的事，即那名写信的女士（您认识她笔锋奇突而又有规则的字迹）到了布拉格，从此开始了无眠之夜。

如果伊雷妮小姐作您上封信中那种理解，那就好，这样便只剩下对齐普斯那位丈夫的悲伤了，但她过去对他可能太温柔了。我非常高兴她走了出来。这就像掷骰子，起初似乎是您的学生赫勒瑙会赢，接着是我外甥有望取胜，继而是您（加上作为随从的我），跟着又是霍尔茨曼，最终倒是伊雷妮小姐胜了赌局。我们根本不知道，她也在一起玩。从德累斯顿来的电报到了吗？

您的表妹在柏林呆的时间较长吗？她在那儿画画么？

我不会去巴尔那里的，罗伯特。我本可以长时间待在塔特拉，但重又回到了布拉格，我当时好像感觉到又染上我自己的、留在了塔特拉（我没有因此少患病）的病。我现在又想别的什么地方染上病。医生们也想让我去一家正规的、能进行搓擦与湿敷治疗、具备石英灯并能提供较好膳食的疗养院。格贝尔斯多夫疗养院并不比玛特拉贵。但即使去那地方，也让我高兴不起来。我们的日内瓦湖计划可是最佳方案。

奇妙的是意志力怎样同疾病做游戏。但同意志力做游戏又是何等可怕啊。两天来我几乎不咳了，这或许并不那么奇怪，但我差不多也不吐痰了，而过去我曾吐过大量的痰。不过，我倒更愿意正儿八经地咳嗽，而不是患上“气胸”。

《自卫》与《议会报》，我也未收到，与您一样的遭遇。您不来玛特拉吗？

斯齐奈究竟是不是得了肺病？他要去哪儿，去下施梅克斯吗？（哦，对了，下施梅克斯，那里不是肺病疗养地吗？）G.女士如何？伊龙卡小姐去了什么地方？

〔1921年9月底于布拉格〕

35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今天只谈伊雷妮小姐的事。我到过皮克那里，他什么也不知道……。但保罗·阿德勒在那儿，很热心，尔后他在一次集会（我自然不得不参加）上给我写了两封信，现随信附来。他是个杰出的人。我倒未料到他在在这方面也很出色。两封信中的一封是写给德雷尔教授的。德雷尔是艺术学院的教授，约45岁，很友好，同他夫人一样。他还是那两封信中提及的格罗斯（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朋友。如果德累斯顿A魏森豪斯胡同7号这地址不确切，那么在艺术学院至少是可打听到详细地址的。虽然也可去学院探访德雷尔教授本人，但上他家里要好些，因为这样伊雷妮可马上结识他夫人，从而得到那种女性的庇护。我与格奥尔格·封·门德尔松有一面之交。他肯定记不得我了，但我却忘不了他。他是个高高大大的、具有北方人外表特征的人。他有张小小的、极富活力的、鸟似的面孔。他的性格，他短促而不连贯的谈吐，他那种似乎拒绝任何可能的事情的态度，都让人害怕，不过有一点肯定不必害怕，即他这人无恶意，至少在平素的态度中无恶意，而且绝对可靠。他在德国工艺美术界占据着中心位置，在赫勒瑙开了间工艺品制作室。从各方面看，他可能都属于工艺美术界的“内行”。

由于收到了这两封信（信中除了其可爱之处外，自然也有各种可能的胡说八道。因为伊雷妮小姐的缘故，也许不必理睬这类具有良好意图的胡扯，正如我做的那样），所以我认为目前只考虑德累斯顿是最正确的。伊雷妮小姐在那里会有机会的，或是在一所小型的、私人办的学校学习，或是在一所工艺美术学校自学，视具体情况而定吧。此外，德累斯顿这城市漂亮、舒适，首先是环境极卫生（比慕尼黑干净得多，花园城市的味道浓多了），而且离家乡最近。

所以我只往德累斯顿寄了申请。得不到回信或得到的只是拒绝的回复，这没关系，推荐信会起弥补作用的。如果来的是有利的答复，那么

便可用点什么在德累斯顿的新朋友们面前证明证明自己了。因此，其他申请书所需的费用与邮票，我暂时夹在副刊中给您寄回来了。往德累斯顿寄申请时我附了30克朗；10克朗我觉得太少了。我之所以给您写信，是因为我认为胡恩斯多夫在邮政上不怎么可靠。或许伊雷妮小姐也已在玛特拉。

衷心问候您和伊雷妮小姐！

K

为了让伊雷妮小姐对那名写信人略有了解，我在此附上一篇关于他的评价。到底是不是胡恩斯多夫邮局？电报也到了。

[在单独的信纸上]

现在我“私下里”还对您讲几句，只要事情仅涉及投寄申请这种无望的试验，那么我会产生兴趣的，不过只是从远处看才产生兴趣，就好比一个人（比方说尤莱斯·费尔内）看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船上嬉闹时会产生兴趣一样。人们对自己说，轮船不会意外地挣脱开去而往外漂，例如往大洋里漂，但最不可能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所以，这也同样有趣。不过现在由于情况变严重了，由于我自己也给扯了进去，因此便不再有趣。您信中的看法我认为不正确，但慕尼黑那位校长的评价可能是对的。然而，这评价也并非决定性的，即使此处根本发现不了充满活力的人才——而且这似乎更多的是针对我鉴别人的能力而非针对我“外行”的眼睛而言的。如果事情本身不是那样糟糕，那么，学校的教育、老师的影响和自己心灵的绝望也许有些用处，但这一切只在少年时代能起点作用，在伊雷妮小姐这样的年龄便无甚效果了。的确，她在齐普斯原始森林那儿生活了很长时间（从德累斯顿那些先生头脑的灵活性这角度看好像是如此），这种温柔的笨拙、羞涩，在人际、艺术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缺少经验，具有一定的物质价值。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将起强烈的影响作用，毕竟存在的某种坚强的人是会懂得如何忍受这一影响，而不会产生什么损害的。但可惜，因为年龄的缘故，这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就这样将她推出去，会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恰巧是现在，在能通过婚姻自我拯救的这几年内，她要在国外待着，并会认识到，自救的希望也是徒然的。她将带着羞愧归来。直到目前她才看到，一切的确是白费了。一想到她在去德累斯顿途中将路经此地，我将见到她（此外我身体虚弱得没法带她浏览市容）并不得不做出仿佛我有信心的样子，我便

感到颓丧。当我想象到，艺术学院那名教授、善良的萨克森人说：“那么，亲爱的小姐，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作品吧。”并且他夫人也站在一旁时，我眼下就想因为对世界的恐惧而爬到地洞里去，尽管以后我在地点上将远远避开那种场面。推荐信写得漂亮，但将其撕个粉碎却更妙。

昨天我还参加了一个集会，同大家一起听一个新的年轻女子的朗诵（顺便说一下，她的艺术前途并不比伊雷妮小姐好多少，她在莱因哈特门下学习），然后我因心灵的虚弱又去了咖啡馆，再带着颤抖的神经回家，我现在连人们的目光也受不了了（不是出于敌视人类，而是人们的眼光，他们的在场，他们的就座和朝我注视，这一切我都受不了），连续咳了几小时，直到黎明时分才入睡，真恨不得一下子从生命中游了出去，由于看上去那路段很短，这样做我看似乎并不难。

我要过一两天才去明策那里。

为什么伊雷妮小姐不上园艺学校呢？这样岂不更好？另外，德累斯顿或许也有诸如此类的学校。

刚才我发现，伊雷妮小姐不是我想象的那样28岁，而是26岁，这个小细节说不定会给人一点儿希望。

没有发电报！我并未连续几小时地咳嗽，而是连续几小时地失眠且同时稍有咳嗽。

〔1921年9、10月间于布拉格〕

35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按说该到了。我不理解为何杳无音讯。直到星期四，我都非常忙，其实这样的忙碌还比不上思想活动，而后将复归宁静。比起我初受惊吓诚惶诚恐之时，我的身体情况要好些，但危险仍在并升级了……

衷心问候您！

〔补白〕伊雷妮小姐待在哪儿？

〔卡夫卡未填写附寄的一张调查表。表中列有克罗普施托克预先拟出的栏目，例如“体温，咳嗽等”〕

〔两张明信片，邮戳：1921.10.3〕星期天〔布拉格〕

359.致路德维希·哈尔特^[319]

尊敬的哈尔特先生：

我下午6时到达下面的布劳恩施特恩。之所以来这么晚，且隔了一会儿就走了，是因为我想节省我不多的气力，好星期三晚上一定来。我当然不能假设，您刚巧在这一偶然确定的时刻可抽出空来。如果您没时间，那就以信函形式寄我处，我会去门房打听的。假使我星期二再也不能以这种方式见到您，那么，我唯有一事相求，即如果可能，如果能劳您大驾，那就请将那则关于克莱斯特的轶事收入节目单，可以吗？

卡夫卡 叩上

〔用铅笔写的附言〕

尊敬的哈尔特先生，您的信刚到，那个晚上肯定是最恰当的，但我不敢在这样的雨天连续两晚外出。所以我想尝试着6点钟与您见面。如果不成，我试试8点半来，不过鉴于这种情况，6点钟我仍将在门房那儿留张字条。弄得多复杂啊！请您别为此而生我的气。

〔1921年10月初于布拉格〕

36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请别生气，或者，请你别那么不安。我也不安，但与您不同。局面很清楚，众神在戏弄我俩，不过在您那里是那些神，在我这里又是另外一些神，我们得尽人类的努力试着去协调这点，我不能对那件主要的事情谈很多，对我自己来说，它也锁在胸中的黑暗处，它可能位于肺病

旁，同在一张病床上。星期四或星期五我将又是一人独处，到时我或许会给您写信谈那事，但也不会详谈，没人（包括我在内）能了解其详情。我当然需要一名值得钦佩的朗诵者（但是这里没有），在我这里待几天。我现在有点忙，对我来说，一点儿可惜就算很多了。

卡 上

〔明信片邮戳：1921.10.4—布拉格〕

36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这不行，我妹妹在那儿。一本新护照要花191克朗。不过，且撇开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价码（是为无价值的东西付钱）不谈，他们还不想签发新护照呢。说是旧护照尚好，他们曾有过烂得多的护照云云。但将护照中的页码缝上是不对的，不过这也没关系。此外，他们为保险起见在每页都加盖了图章。更多的东西就得不到了，仅此而已。我们本是可以道出真情的，但这么一来同样也得付一大笔钱。

伊雷妮小姐昨天在此。我对那事的怀疑并未消除。这是荒唐的行为，荒唐至极，甚至连一旁注视也不妙。如果事情半途完满了结，我会欣喜发狂的，我将不单是在个别事情上被驳倒，而且我的整个世界观都会受到影响。今天中午伊雷妮小姐乘车走了，也许上午她还曾同哈尔特在一起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一封推荐信呢。——整体上我是很为自己打算的，这看上去就好像我今天想依了自己的梦想，报名参加10岁男童组成的斯考茨剧团似的。

伊雷妮小姐几乎不知道讲点您的事。她也未讲巴尔的任何事，未讲玛特拉的任何事，未讲G.夫人的任何事。——不过，她自然是温柔可爱的。我不想以我粗略的评价谈这问题。

我已得到些许安宁，但因为前几日的劳顿，现在很疲倦。至于整体的健康状况，还不是太糟。

祝万事顺遂！

您的 K

36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事情拖延了一天，现在已过去。哈尔特眼下还在这里，他许多方面值得钦佩，某些方面显得很可爱。他星期二走，然后就安静了。近几日我白天几乎未躺过，但也不算太累，不过咳得厉害。明天我将去一家捷克疗养院看看。格贝尔斯多夫11月底才有空房，而且他们反对吃素。关于巴尔，想必终于肯定下来了吧？伊雷妮小姐情况如何？

您可能感到痛苦吧，罗伯特。痛苦是自然的，但您可将责任推给别人。不过，如果您愿意，那就不应将责任推给任何人，这样便更好。何等自由、美妙的生活呵！

您的 K

〔明信片邮戳：1921.10.8—布拉格〕

363.致M.E.

懒汉与女工[320]

亲爱的闵策：

我隐匿已久，我高高兴兴地拿出了您美丽的小照，干脆插进了镜框。我还拜读了您的两张明信片 and 那封信，觉得您仿佛坐在长沙发前向我絮絮而谈。另外，我还接待了几次让人激动不安、精疲力竭的客访，有时也在床上躺躺。未得片刻的闲暇，这是因为接待工作，因为疲劳。不过我也知道，我今天或明天写信，这在您我之间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因为甚至某一方不写信，我们也不会烦躁，两人都清楚对方是极坚定的人。——荷兰之行告吹了吗？遗憾啊遗憾。——我在布拉格还要待一阵子。

最衷心地问候您和那些女友！

我妹妹（她让我代她向您衷心致意）的地址：布拉格，老城区环行路6号，奥蒂莉厄·达维德。

〔风景明信片邮戳：1921.10.11—布拉格〕

36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您总对我不满意。这对我不可能有益处。我还是玛特拉时的我，可您当时并没有总对我不满呀，无疑是共同生活做好事似地抹去了那些界线。从整个事情中似可得出结论，当您完全识破了我的花招时，就根本不愿再与我打交道了。

将我同您的表妹比，这点时时威胁着我，让我觉得总有根鞭子要抽到身上来。除了您本人，我与您表妹肯定没有半点十分重要的共同之处。早年当我干了某桩表面上显得愚蠢的事、但实际上是从某一原则性错误中得出结论时，父亲便常说：“十足的鲁道夫。”他是在拿我同在他看来极为可笑的我母亲的一位继兄相比。我这舅舅是个让人猜不透的、过于友好、过于谦虚、孤独但几乎又算得上饶舌的人。其实我和他几乎没什么共同处，与我父亲这位评论者倒是有。但令人痛苦地一再重复这种比较，几乎属于体质方面的困难，我现在准备不惜代价避开那条我以前根本不曾想过的道路。最后，父亲的说服力或他的咒骂（随便说吧），这一切促使我至少靠拢了我的舅父。

整个关于气胸的故事，不过是玩笑而已。我在忙活其他事，而不是我的肺。肺已领会这一玩笑的合理性，有那么一会儿比较安静。从那时起，肺重又得到了补偿。

您一人独处，当然不好啦，尽管我不能说得那么坚定。您在学习吗？体温如何？

伊龙卡的消息您什么也不知道吗？那么加尔贡太太的情况呢？斯齐奈得了肺病，这可能么？

万事顺遂！

您说哪本书我曾答应给您？

〔1921年10月中旬于布拉格〕

36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在此寄上护照。我又病了一场，所以这事又拖延了，但愿您马上能用上它。就您的情况而言，最糟的事不是疾病（尽管发烧是可悲的和不可理解的），而是疾病与那有时涌上您心头的沉重的绝望感的共同来临。绝望是从虚无中、从青春中、从犹太教中、从这个世界共同的苦难中来的。只有这一经验能给日常生活带来安慰。有时候人们又会从无底的深渊中脱身而出，尽管这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卡夫卡 上

〔1921年10月于布拉格〕

366.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那封信我也许未全懂。信中是不是说，尽管那名教授——据我的记忆——几乎已答应您留在塔特拉，那些英国人却未给您钱在塔特拉疗养？您现在想即刻来布拉格、投入城市的怀抱吗？在某个暖和的下午穿越内城区，而且还是慢慢地走，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身处一间久不通风的房中，甚至连推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里常住吗？住解剖室吗？在冬天，住在生了炉子的、不通风的房间里吗？就这样不经过什么过渡而立即从那纯净的山区空气中来吗？您是否认为您想马上过来？……

那个姑娘的信写得漂亮，既漂亮又可恶。信中发出的是夜间诱惑人的歌声。女妖们也是这么唱的。唱什么如果别人认为她们想诱人，那是冤枉了她们。她们知道自己有利爪而无生育的子宫，所以大声抱怨。他们不可能认为，抱怨声听起来很美妙。

因此您可以相信姑娘的那些信。谁是赫迪，我根本不清楚。可怜的格劳伯！不过，这也许能加速有利的发展进程。那姑娘其实应关怀他，并采取反抗父亲的态度，同时抛开她自己对那件主要事情的顾虑，如此等等。

自那时起，《自卫》仍未出版。《议会报》有时寄给我，有时寄往玛特拉。不过，直到最近一期（或许也几乎不能引起您的兴趣。报上谈的是如何精耕细作土地的建议），也不值得一读，全是对谈话所做的枯燥的摘录。

孩子们使我高兴。例如昨天，倒数第二个外甥女（我有一次让您看过她的照片）坐在地上，我站在她面前。她突然因为完全没法弄清的原因怕起我来，便朝我父亲跑去。父亲只得将她放在膝盖上坐着。当时她满眼含泪，发着抖。但由于她非常温顺、柔弱、友好，所以她（此时因有外公手臂揽着而情绪稍有安定）仍然回答了所有问题，例如，我是弗兰茨舅舅，我很勇敢，她很喜欢我，如此等等。不过，她依旧抖个不停，而且是因为害怕而发抖。

致以衷心的问候！

卡 上

〔1921年11月于布拉格〕

36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那种恐惧现在已渐渐停止，但曾很严重。讨厌的是体温问题。难道没有特别的原因？您躺卧的时间至少有夏天那么多吗？您在玛特拉弄个位置疗养的事如何了？……

我收到了伊雷妮小姐在见习期前写的一封信。看来那儿的人对她很不错。哈尔特给她介绍的两位姑娘似乎也与她交上了朋友，虽然哈尔特——正如他私下里对我说的那样——在此事上对这两名成长道路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上热情洋溢的俄罗斯犹太小姐期望不高。但愿照惯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人已无可救药，可大家都去帮扶（您知道《强盗》

吗？对那名可以救助的男人，只有伟大的勇士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众人却将精力用在了无可挽救的人身上）。要是伊雷妮小姐情况正常该有多好啊！信中可看出她激动不安。

您读过《布拉格晚报》上发表的《山羊之歌》^[321]吗？剧本妙趣横生。好一场同波涛的搏斗！那名伟大的游泳者总是一再出现。明天我该去看他，但我不会去的。

星期一我给您寄《自卫》来。如果您因为以前常常轻视它而现在对它生出了些许渴望，那也不打紧。我还将寄教科书来。

至于又一次疗养的事，尚无从谈起。那名医生与大多数医生一样，极为幼稚可笑。后来我对他们颇有好感。不过这点关键在于，他们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他们能办到的事。而且尽的努力愈小，便愈令人感动。但他们有时也会让人感到意外。

祝万事顺遂！

请您代为问候格劳伯和斯齐奈！

卡 上

〔1921年11月于布拉格〕

36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哟！伊雷妮小姐居然被录取了。这样一个姑娘。26年里（看来根据她的资质）除了对一张拙劣的风景明信片所作的拙劣的模仿外，未从事过其他艺术活动；除了豪普特曼·霍卢普展出的业余画作^[322]外，不曾看过其他画展；除了萨菲尔的报告外，没有听过他人的报告；除了《喀尔巴阡山邮报》外，再未读过别的报纸——这样一个姑娘居然被录取了。她还写些不无细腻之处的、半含喜悦的信，还是一名看来很重要的女士的女友。这真是奇迹的奇迹，而且是由您变戏法变出来的。在这令人悲伤的冬季，我以此来暖和自己。

卡 上

36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您叔叔的故事很奇特，好像是由帕伦贝格表演的。从您信中可感到那房内的空气。但后来情况怎样，您未写信告诉我，只谈了些关于公民的事。

选择职业的问题——嗯，您不想当医生，想干点别的——自我对您略有了解以来，就从不曾想过。您说当医生只是为有钱人服务，这可能错了。对中欧，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对已开始令人高兴地拼命往您视野内挤的巴勒斯坦^[323]来说肯定就不正确。当医生也是一种体力劳动。而半拉子职业，即不正儿八经从事的职业，不管它是体力型的还是脑力型的，都是可恶的。不过，所从事的职业，不论它是体力型的、还是脑力型的，只要是理解人类的，那么便是美好的。认识到这点非常容易，寻找那条能通过去的、有效的途径却非常困难。但对您来说，并没有这么艰难，因为您是医生。谁要是去巴勒斯坦，先应被磨成尘土才行，这话主要是针对普通的法律研究者而言的，因为巴勒斯坦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这类研究者。我与一位布拉格人有泛泛之交，他就是在学过数年法律之后放弃了专业，改当钳工学徒的（换职业的同时，他结了婚，还生了个小男孩）。现在他都快出徒了，今年春天去了巴勒斯坦。在这种情况下换职业，的确通常如此，即未受高等教育者学徒期为3年，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达6年或6年以上。此外，最近我参观了一个徒工制作展览。从徒工们（虽然未受高等教育）学习一两年后完成的所有手工艺品来看，可发现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很奇怪的是您的表妹未呆在柏林。不过，这意味着您可作为一个相当自由的人品味柏林的生活。您表妹如此轻松地离开了柏林，说明她很有本事或者表明她没什么本领。而另一点，即她未从塔特拉路过且不想同我谈谈，也不足为怪，并不使我感到惊奇。

如果您没有贝格曼的《雅夫内与耶路撒冷》^[324]，我就寄一本给您。

您眼下的生活如何？在做什么？我尚未重访我的堂兄。我也开始踮

身于那些没有时间的人中了。白天的时间很精确地作了划分，用来躺卧、散步以及做诸如此类的事。我连阅读的时间与气力都没有。曾有几日不发烧，而现在体温又上升了。医生只给我开了药茶。他的话假使我未理解错，那么，这茶当含有硅酸。而且医生说，他曾在某处（但愿不是在幽默杂志上）读到过，硅酸能促进创伤愈合。您或许也可试试这茶。如果我上楼去我的住所，我就为您抄下处方。此刻我在妹妹的房间。我的卧室未生炉子，犹如冰冷的地狱。

衷心问候您、格劳伯和施泰因贝格！

K 上

您给我写信谈谈伊龙卡和加尔贡太太的情况吧。想必您已收到我的一封信和那本教程。

〔1921年12月初于布拉格〕

37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在对伊龙卡作的评价中，您是不是略有点夸张？她受到外界的压抑，谨小慎微，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具备健全的神经系统，以便按他人的评价行事。但愿她有这一神经系统。假如她的确十分柔弱，就不能创造英雄业绩，而是自认和向他人承认那种悲伤。可惜她就有这种柔弱。另外她听从了她父亲的意见，我并不认为这绝对是悲剧。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不一定总对；但假使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那倒可能总有道理。此外，婚姻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是桩相当不错的喜事，只是要经受住订婚期的考验。我在致伊龙卡的一封信中，曾试图增强她在这方面的信心。您是否知道一点有关她的新消息？您在信中为何只字不提加尔贡太太？

伊龙卡的事，您夸大其词了；我则对伊雷妮的评价欠分寸。我出于高兴而夸张地认为，这样一个孩子特有的梦想，至少根据其形式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存在，而且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的质朴，并因此而存在这么大的勇气和这么多的机会。但我们不必如此纠缠细节，虽然恰恰是这些细微处使我高兴。克劳斯与科柯施卡等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在德累斯顿达

圈子里天天提到这几个名字，次数是如此的多，就好像玛特拉那儿谈论洛姆尼茨的首脑人物。不过，至多是在与下述情况相同的含义上提起这些人，即如果一个人有时不能强迫自己去认定山区永恒的单调很美妙，那么，这种单调是会让人绝望的。那些“创造奇迹的”信（罗伯特！）是指3张用铅笔写的便笺。信中我向伊龙卡和我自己表达了祝贺之意。

我目前的状况不比冬天在玛特拉时糟，虽然体温的正常与体重的保持不如在玛特拉时好，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恶化的情况，肯定没有。韦尔弗在这里的时候，我身体可能比现在要差一点，但那不是大夫对我施行禁令的原因。大夫主要是反对我去找泽墨林，他这人很粗暴。他尤其反对任何持续的、暴力性的变动，另外还反对中断他的治疗工作。不过，与此种态度有点相矛盾的是，他一月底将携家小去斯平德尔米勒（位于巨人山），想带我同行，但只待两周。

您读过《布拉格晚报》上发表的、厄普顿·辛克莱所写的关于亚伯拉姆博士的文章吗？我认为这是个玩笑，但别人却不这么看。

.....

您的事情仍无起色，部分是因为我的马虎，但部分程度上我也没有责任。起初是我堂兄（他妻子与闵策有亲戚关系）把这事接过去了，可他一直在生病，现在病得厉害起来了。于是我从他那儿取来证件，并将其交给了费利克斯·韦尔奇。也许星期天我能听到一点消息。

卡 上

请您代向格劳伯、斯齐奈和施泰因贝格致意。霍尔茨曼情况如何？他将格奥尔格的作品寄给您了吗？

在我给您寄来的报纸中，有份《改革报》，上面载有一篇介绍X线疗法的文章。如果文章中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还请您给我来信时顺便谈几句。报刊已装入包裹内，我不想再拆开了。

〔1921年12月于布拉格〕

37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手头上有的、关于亚伯拉姆事件的证明材料并不十分可靠。我妹妹只同鲁道夫·富克斯谈起过此事，后者对她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即所谓亚伯拉姆主义，是上了书的。我不相信富克斯是在开玩笑。他在哪儿听说过亚伯拉姆主义，是不是在编辑部，我不清楚。我本人除了同马克斯（有时也同奥斯卡和费利克斯）和我的医生谈起过外，未对任何人提起此事。这两人对亚伯拉姆主义一无所知，不过，他们也未读那篇文章。（您能告诉我是哪期报纸登载的吗？）我的医生（我不得不抛开信——其中对他多有饶舌——第一次的起首部分，他对此事有责任）比我年轻，人很热情，对癌症也特有兴趣，曾在听了我的叙述后向我出示了一本他正在研读的关于放射性的书，但对亚伯拉姆毫无了解。

您的自责是因亚伯拉姆而起的！这样的事，这样的信仰，一直使世界回避着我。如果这类罪孽的产生真是非同寻常的、个别的、极为可怕的事，那我就不仅仅只是不理解这个世界了。这点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类罪孽是别的材料做成的，与我的不同。对我来说，此种罪孽不过是生活洪流（我在上面行进，如果不被淹死，便感到高兴）中的一个水滴而已。它被突出强调，在我看来与下述情形无异，就好像某人研究伦敦的废水，结果在废水中发现了唯一一只死老鼠，于是便据此得出结论，说“伦敦一定是座极令人作呕的城市”。

因为工作材料而生的恐惧可能永远只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停顿。人之被闷死，一般不是因为缺少氧气，而是因为缺乏肺活动能力。

对亚伯拉姆事件您解释得非常好。只是我不懂电子，连其名字也不懂。

《改革报》无疑是张很可笑的报纸，但其可笑处并不能减损那件事的价值，相反只能起增益作用。这家报纸与其他诸如此类的小报的追求，也许比起送报人要显得富于生气些。而且，这些报纸在此种半明半暗的状况中只是在等待其时机的到来。

祝万事如意！

卡 上

您的健康与工作如何？为何总未提及加尔贡太太？

〔1921年12月与1922年1月间于布拉格〕

闵策，您没有忘记我，使我非常高兴。不过，我并不认为您的明信片是对我长久沉默的原谅——原谅是容易的——而将其看作是对我特殊情况的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对我清楚的了解，而是一种理智的忍耐。哦，这的确让我高兴。您比那时（您最后一次给我写信时，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回答）快乐些了吗？我现在考虑问题常要碰上这个范围。

衷心问候您！

卡 上

〔风景明信片（施皮茨韦格的《新郎》）。〕

1921年与1922年间之冬于布拉格〕

[1]* 卡夫卡年轻时随全家在罗茨托克度假期间，曾住在谢尔玛·柯恩家。这是他为这位年轻女友题在纪念册中的赠言，亦是现存的（已发表的）卡夫卡文献中时间最早的一篇，写于1900年9月4日。

[2]卡夫卡的信件，尤其是写给要好朋友的，经常不写具体日期。以下凡是方括弧里注明的日期多数为作者好友原编者马克斯·勃罗德所加。
——编者

[3]* 奥斯卡·波拉克（1883—1915年），卡夫卡中学时期的同学，卡夫卡上大学后仍同他保持友谊。波拉克以后成为艺术史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4]1887年创刊的一种文艺刊物。

[5]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别墅区。

[6]卡夫卡本想在慕尼黑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终未如愿。后改学法律，故如此说。

[7]索菲·肖特克（1868—1914年），霍恩格公爵夫人，与奥地利皇太子弗朗茨·费迪南德结婚后，因门第不配，与其夫双双被杀。

[8]指卡夫卡的早期作品，具体不详。

[9]指位于齐第列克的上施图德尼克宫。波拉克在那里找到了家庭教师的职业。

[10]费希纳尔（1801—1887年），德国自然科学、哲学家，心理物理学的创始人；麦斯特·艾卡特（1260—1327年），德国神秘教徒，著名的牧师。

[11]* 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1884—1968年），卡夫卡在大学年代与他相识，结为终身知交。是卡夫卡文学遗产的保管者和全集编纂者。1939年以后他定居以色列，直到逝世。——编者

[12]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卡夫卡的中学和大学同学。

[13]克·弗·赫贝尔（1813—1863年），德国著名戏剧家和作家。

[14]卢坎·封·萨摩沙塔（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讽刺作家，擅长运用对话和书信形式写讽刺文章。

[15]1909年柏林出版的小说。

[16]《杀死死人！》，斯图加特，1906年。

[17]托马斯·B·麦考利勋爵著的《克莱夫勋爵》，列入当时发行很广的英、法作家《丛书》。

[18]勃罗德当时写了几年而未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曾考虑为《千种娱乐》。

[19]德国及邻国14至19世纪使用的金币和银币。

[20]A.可能指阿加特。后者指海德薇希·魏勒。

[21]卡夫卡的早期中篇小说集，1907年斯图加特版。其中有一篇名叫《卡里拉岛》。

[22]弗兰茨·布莱出版的两本杂志之一（1907年）。另一本杂志是下文中的《紫晶》（1906年）。

[23]* 海德薇希·魏勒，卡夫卡去捷克的特里施城的舅舅家消暑时认识的姑娘，曾保持过一段通讯联系。

[24]指小短篇《相遇》，后来卡夫卡以《拒绝》为题收入他的第一本书《观察》中。

[25]卡夫卡青年时代的朋友，几个月后死去。

[26]均为酒店名。

[27]卡夫卡曾在此住过。

[28]可能指卡夫卡的女友海德维希·魏勒。

[29]书名是《诺尔内皮格宫》，斯图加特，1908年。

[30]指《拉谟的侄儿》。

[31]法国名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年）的小说《圣安东的诱惑》（1874年）。

[32]卡夫卡写的短篇散文。

[33]均为酒吧。

[34]卡尔·米洛支尔的小歌剧。

[35]指给马克斯·勃罗德的邮件。

[36]估计是马克斯·勃罗德的作品，载《波希米亚》1904年4月11日版。

[37]克·汉姆生（1859—1952年），挪威作家。信中提到的小说，所指不详。

[38]卡夫卡用“上面”一词，常指他“父亲”。

[39]* 由于邮局局长卡兰德拉给勃罗德分配额外工作，卡夫卡给勃罗德写了这封慰问信。

[40]1908年起卡夫卡开始在一家劳工事故保险公司工作，负责处理各种事故的保险、善后等事宜。

[41]这是布拉格附近的一个村庄，勃罗德在名为《乡间马戏团》的

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与卡夫卡同游该村的经历。

[42]估计指卡夫卡的第一部断片性长篇小说《乡村婚事》。

[43]* 布拉格的盲人作家（1883—1941年），卡夫卡的好友。常与卡夫卡、勃罗德、韦尔奇聚会。

[44]指鲍姆的长篇小说《在黑暗中生活》的结束语。

[45]这是卡夫卡自谓。

[46]奥斯卡·鲍姆，布拉格的盲人作家，卡夫卡和勃罗德的好朋友。

[47]卡夫卡非常关心工人的安全利益，在保险公司里满怀激情地撰写了许多呼吁关心工人劳保的公文。

[48]诺瓦克，画家。“商店”指卡夫卡父母经营的商店。

[49]柯曼维勒描述福楼拜的侄女一次来访的文章，全名是《布拉格的一次来访》，载《波希米亚》1909年，第278期。

[50]这是一起当时发生在布拉格的诈骗案。

[51]弗莱斯曼，卡夫卡的顶头上司，曾试图多次鼓励卡夫卡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52]布拉格大学的管理法学家。

[53]咖啡馆。

[54]* “普通保险公司”的负责人之一，是个很有文化修养并爱好文学的人，很器重卡夫卡。

[55]瑞士作家、诗人（1878—1956年），《巩腾的雅各布》和《塔纳家的兄弟姐妹们》都是他的长篇小说。

[56]原信到此中断。

[57]希伯纳街上的一个文学艺术家咖啡馆。

[58]指勃罗德写了多年而未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曾考虑题名为

《娱乐万千》。

[59]根据丹麦体操教师米勒（1866—1938年）的规定作体操。
——译者

[60]卡夫卡的小说《一场战斗纪实》。

[61]指捷克的现实主义党党员。

[62]西比尔·斯莫洛娃，年轻美貌的女话剧演员。

[63]当时的议员、现实主义党党员马扎吕克创办。卡夫卡对该报评论抱很大的保留态度。

[64]《德意志劳动》月刊是当时在布拉格出版的官方刊物，马特拉斯任编辑。卡夫卡要为其上司、劳工事故保险公司经理马尔施纳出版一本保险技术方面的书奔走并撰写书评。

[65]指卡夫卡给劳工事故保险公司作报告之事。

[66]基督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英国人布斯创立。

[67]德语Leo是豹的意思，卡夫卡赠送了小豹（玩具），故称对手。

[68]指卡夫卡妹妹埃莉的婚礼。

[69]* 马克斯·勃罗德的妹妹。

[70]第一个“der”是“日子”的冠词，中文不译出。第二个“der”是“日子”前的“的”字。②“复仇”的德文是Vergeltung，下文的“e”、“u”、“ng”都是该词的组成部分。

[71]这儿的“复仇的日子”卡夫卡未用书名号，这是幽默的一语双关。

[72]1908—1910年间出版的双月刊。出版人是弗兰茨·布莱和卡尔·施特恩海姆。

[73]巴伐利亚乡土文学作家。

[74]康·费·麦耶尔（1825—1898年），瑞士作家，以写历史小说著称；戈凯勒（1819—1890年），瑞士作家，德语作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著有长篇小说《绿衣亨利》等；罗·瓦尔瑟（1878—1956年），瑞士作家。

[75]以下这段话原文为法文。

[76]亚伯拉罕·戈尔登法登（1840—1908年），伊地语剧作家。

[77]指一个东犹太演员的报告晚会。整个安排归功于卡夫卡。

[78]指1912年3月17日举行音乐会后出现的诽谤，当时勃罗德接受了卡夫卡提出的忠告。

[79]指阿·贝尔著《一个犹太人的命运》，1912年柏林版。

[80]指勃罗德的长篇小说，1906年施图加特版。

[81]开办同名出版社的德国出版家的名字。

[82]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亦名《美国》）。

[83]容波恩是中欧哈尔茨山中的一个地名，可能因人名而来，是个疗养胜地。

[84]指后来集成《观察》一书的一些小说。

[85]指发表在《许佩里翁》1909年第8期上的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与祈祷者的对话》。许佩里翁原是希腊神话中的人名，后成为19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同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这里指当时捷克的一家同名杂志。

[86]指勃罗德的作品《诺亚方舟》。

[87]指卡夫卡与勃罗德合写的小说《里查德和萨姆埃尔》。

[88]* 恩·罗沃尔特是罗沃尔特出版社的老板。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观察》最早即由该社出版。

[89]即《观察》。

[90]指写长篇小说《美国》。

[91]由威利·哈斯出版的文学杂志。该刊也登载过卡夫卡的作品。

[92]卡夫卡的小妹妹。

[93]指卡夫卡父母的商店。

[94]* 韦利·哈斯，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的朋友。二次大战期间，密伦娜在被捕入法西斯集中营前夕，曾将卡夫卡生前写给她的大量爱情书信原稿交他保管，后他受马克斯·勃罗德的委托，将这些书信编纂成《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一书。

[95]指发表在《阿卡迪亚》年鉴上的短篇小说《判决》。

[96]* 库·沃尔夫是同名出版社的老板，1912年9月以前曾与罗沃尔特合办罗沃尔特出版社，1913年2月起，自己另立出版商号。该出版社在卡夫卡生前出版他的作品最多。

[97]卡夫卡弄错了日期，应为1913年。

[98]指《变形记》。

[99]长篇小说指《失踪者》，卡夫卡最喜欢第一章，曾以《司炉》（一译《火伕》）为题单独发表。

[100]《阿卡迪亚》系一家刊物。卡夫卡最得意的短篇小说《判决》最初即是在这家杂志上问世的。

[101]《末日审判》是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的丛书。《司炉》作为其中第三本出版。

[102]* 格·梯伯格是卡夫卡的希伯来语老师弗里德里希·梯伯格的妹妹。这段话是写在赠给她的《观察》初版本上的题词。

[103]《司炉》的封面装帧采用了一幅19世纪的钢版画，画面是纽约港。这幅画是根据韦尔弗的建议采用的。

[104]奥地利画家（1887—1959年），因给霍夫曼、豪夫、艾伦·坡等人的作品画插图而出名。

[105]指马·勃罗德的著作《论丑画的美——关于当代浪漫的袖珍指南》，1913年发表于莱比锡。

[106]卡夫卡代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写的一篇文章。

[107]* 政治作家罗伯特·韦尔奇之妹，后来是贝多芬研究者和出版商西格蒙德·卡楚尔森之妻。

[108]基督教《圣经》中的通天塔。

[109]卡夫卡在回里瓦途中在此作了短暂停留。

[110]布拉格作家，后活动于维也纳、苏黎世等地，1954年逝世。

[111]指菲莉斯·鲍威尔。

[112]指勃罗德写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提荷·布拉赫走向上帝的道路》，1916年在莱比锡出版。

[113]指马·莱茵哈德（1873—1943年），奥地利著名话剧导演、演员。

[114]指三幕喜剧《告别青春》，作者当为勃罗德。1912年在柏林发表。

[115]即费利克斯·韦尔奇。

[116]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年鉴。

[117]指勃罗德的《提荷·布拉赫走向上帝的道路》一书。

[118]指韦利·哈斯，《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原稿的保存者和编纂者。

[119]罗伯特·穆西尔（1880—1942年），奥地利作家。

[120]布拉格药店主夫人，她资助文学小组，卡夫卡也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

[121]布拉格戏剧家。

[122]* 卡夫卡结识了一个犹太剧团，与不少演员成了朋友，其中与他交情最深的是吉查克·略韦。

[123]指与菲莉斯·鲍威尔第一次解除婚约。

[124]指玛丽吕斯特·奥斯特索海滨浴场。

[125]显然指从大学图书馆借的一本书，费利斯·韦尔奇是该馆馆员。

[126]指《变形记》。

[127]弗·布莱（1871—1842年），奥地利作家。

[128]指1913年9月起在莱比锡出版的一个月刊。

[129]马克斯·勃罗德拟写的长篇小说。

[130]* 布拉格诗人。他后来怀着对可怜的老百姓的同情经常在《布拉格日报》上撰写审判报道，因而名声大振。

[131]这里的“先生”是单数，这封信和后面致这家出版社的一些信件都是写给出版社襄理格奥尔格·亨利希·迈耶的。

[132]卡·施特恩海姆（1878—1942年），德国作家。

[133]施特恩海姆把当年获得的冯塔纳奖金让给了他素不相识，但十分崇敬的卡夫卡。布莱在其中也起了作用。

[134]指《判决》。

[135]指《在流刑营》。

[136]卡尔·施特恩海姆的小说集。

[137]版画家，常为书籍绘制插图，下文提到的《拿破仑》一书的封面装帧即出自他之手。

[138]指菲莉斯·鲍威尔。

[139]指库尔特·沃尔夫，同名出版社的负责人。

[140] 卡夫卡的妹妹。

[141] 在卡夫卡鼓动下，菲莉斯参加了柏林犹太人居留所的工作。该所后来发展成设在巴勒斯坦的儿童村。

[142] 卡夫卡对与勃罗德合写的小说《理查德和萨穆埃尔》总是不满意。

[143] 指勃罗德和卡夫卡的共同朋友格奥尔格·莫尔德采·朗格，他出生在布拉格，犹太人，用德语和捷克语写作，1939逃难，1943年去世。

[144] 现名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首都。

[145] 原文为Datscher，查无此字，可能是将Deutscher说错。

[14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夫一直在前线。

[147] 指小说《在流刑营》。

[148] 瑞士首都伯尔尼附近艾门塔尔产的干酪，色浅黄，味如干果，世界驰名。——译者

[149] 菜名，一种地方风味——烧牛肉。

[150] * 德国诗人。卡夫卡1916年11月在慕尼黑一家书店里朗诵《在流刑营》时与他认识。

[151] 这首诗和其他诗发表在诗集《升华》上，慕尼黑1918年出版。

[152] 卡夫卡当时应邀赴慕尼黑朗诵《在流刑营》。

[153] 卡夫卡把年代写错了，应为1917年。他在慕尼黑的朗诵1916年11月才举行（还可参阅他于1916年10月11日致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下一封信的时间也相应为1917年1月31日。

[154] 以后收在集子《乡村医生》里。

[155] 指卡夫卡求医之事。这封信第一次证实卡夫卡患肺结核，不

得不离职休养，旋即解除婚约。他长时间住在他妹妹奥特拉居住的屈劳村。信中O.处即指奥特拉住处。

[156]原文Klempfner，查无此字，疑为Klempner（白铁工）之误。
——译者

[157]指他的肺结核开始发病。

[158]卡夫卡常这么说以自嘲，其实他于1906年6月已获法学博士学位。

[159]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最后一个冬天，卡夫卡从乡间给他城里的朋友们搞些食品。

[160]四兄妹中，卡夫卡与小妹妹奥特拉关系最好。这里是卡夫卡的幽默之笔。

[161]指皮克教授，他是第一个发现卡夫卡患肺结核的医生。

[162]由于卡夫卡生活在位于捷克语大海中的德语孤岛上，他所用的德语在语法上是有些毛病的。这里关于“bis”（直到）的用法，菲莉斯（F.）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捷克境内德语区的语言独特性（缺乏生气，不能同步发展……）对卡夫卡语言风格的独特性也不无贡献。

[163]指雅可布·格林（1785—1863年，格林兄弟之一）所编撰的《德语辞典》。

[164]威廉·施台克尔是弗洛伊德的弟子。该书出版于1917年。

[165]捷克女作家，代表作为《好祖母》。

[166]指韦尔奇的《有机的民主》，莱比锡1918年出版。

[167]1914年创刊的一家刊物。

[168]查西迪教派（Chassidismus），1750年在乌克兰兴起的一种犹太宗教运动。该教派比传统的犹太教更强调对大自然和世界的愉悦之情，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169]指话剧《一个女王艾丝特》，估计作者是勃罗德，1918年发

表。

[170]略韦是犹太话剧演员，卡夫卡与这些处于底层的犹太艺人建立了亲密的友情，其中与略韦的友谊最深。

[171]是一种月刊，由马丁·布贝尔1916年3月创刊。

[172]勃罗德翻译的雅纳切克的歌剧《耶努发》。

[173]亚伯拉罕·格林贝格，希伯来作家，华沙难民，死在布拉格。

[174]费利克斯·韦尔奇主编的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的周刊，卡夫卡是积极的读者。

[175]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乐队指挥。勃罗德埋怨他把他译的歌词改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

[176]哲学家马克斯·谢勒。

[177]作家汉斯·布吕厄。

[178]维也纳的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奥托·格罗斯。

[179]卡夫卡的密友、著名表现主义作家、理论家。

[180]《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曾打死了他的弟弟亚伯尔。

[181]指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他于1917年10月在《新评论》上发表了《巴勒斯坦》一文。

[182]布拉格新浪漫主义作家胡果·萨鲁斯。

[183]文学史家英·索尔。

[184]公元前700年左右古希腊的诗人。

[185]公元前518—前446年的古希腊诗人。

[186]布拉格大学的国民经济学教授。

[187]布拉格一所女子学院的院长。

[188]马克斯·勃罗德的文章，载《行动》1917年9月。

[189]H.特韦勒斯用笔名博普为布拉格日报写稿。

[190]安东·库，维也纳的小品文作家。

[191]施泰因夫人是歌德的情妇，比歌德大七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姓Stein在德语中有石头之意。此处一语双关。

[192]女作家伊达·博伊·埃德的书名是《夏绿蒂·封·施泰因的殉难试为其辩解》，斯图加特，1916年。

[193]指勃罗德当国家公务员时那段不愉快的生活。勃罗德在科莫陶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的讲话促成了他同卡夫卡的会晤。

[194]卡夫卡一再延长病假，后来退休。奥斯卡·鲍姆为战争致盲者奔走。卡夫卡为此提出建议。

[195]丹麦哲学家（1813—1855年），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

[196]长篇小说《通向不可能的大门》中的主人公，1919年慕尼黑版。

[197]当时将在法兰克福举办一次作品朗诵会，勃罗德建议卡夫卡寄些作品去参加。

[198]1896年创办的刊物，先后由汉斯·克略狄尔和罗伯特·韦尔奇出任主编。

[199]指《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

[200]诗人鲁多尔夫·富克斯。

[201]1918年2月创办的双月刊。

[202]月刊，1917年10月由卡尔·穆特出版。

[203]汉斯·布吕尔，著有《色情在男人社会中的作用》，1917年耶拿版。

[204]指埃尔莎宣读卡夫卡的作品《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

[205]双月刊，1917年秋特奥多尔·塔格尔出版。

[206]基督教神学家（354—432年）。

[207]培拉吉乌斯（400年左右）是英国僧人，以他命名的培拉吉主义不承认原罪和上帝的仁慈的必要性。

[208]犹太教的神学家（1135—1204年）。

[209]自1917年底起由奥托·施奈德和路德维希·乌尔曼出版的传单。

[210]全称《霍尔茨阿普费尔的泛理想》第一部，1917年伯尔尼出版。

[211]马戏图、各种舞台、乐团指挥和舞蹈团的中央机关报，1883年创刊。

[212]捷克的月刊。

[213]约瑟夫·科尔纳博士，德国浪漫派作家施莱格尔遗著的出版人。

[214]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德国教育家与和平主义者。

[215]* 作家，曾整理出版德国浪漫派理论奠基者施莱格尔（1767—1845年）的遗著，编写了《目录学手册》。

[216]可能指《戴盟》月刊。

[217]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之一（1781—1831年）。

[218]当指若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便可免服兵役。

[219]“连同人和耗子”是经卡夫卡略加改动的一句德语成语。原成语为“连同房子和耗子”，意为“一切”。

[220]恩斯特·特略尔奇的《路德和新教教会》，载1917年10月《新评论》。

[221]列夫·托尔斯泰的日记。

[222]马克斯·勃罗德的小说《伟大的勇气》中的人物。该书于1920年在慕尼黑出版。

[223]德国自然主义作家盖哈尔特·霍普特曼的童话剧。

[224]奥尔加及下文的伊雷妮，是马克斯·勃罗德的小说《犹太女人》中的两个人物。

[225]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译者

[226]全名为《皇帝的御使》。

[227]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作家（1741—1791年）。

[228]德国作家（1876—1949年）。

[229]当指J.M.R.梭茨（1752—1792年），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作家。

[230]卡夫卡一直以写作为唯一的寄托和快乐。而现在他住在妹妹的农庄里，呼吸着新鲜空气，干着农活，喜欢上了农村生活，即他所讲的另一出路。——译者

[231]《行动》杂志主编。

[232]路德维希·卢宾纳，出版《列夫·托尔斯泰日记选，1895—1899年》，苏黎世，1918年。《列夫·托尔斯泰日记》，经W·契尔特考授权同意的完整六卷本，慕尼黑（由格奥尔格·米勒出版），1917年始。

[233]常在阿尔科咖啡馆聚会的圈中人。

[234]布拉格的哲学教授。对信中提及的政治、文学讲演，他曾当面嘲讽他以前的学生费利克斯·韦尔奇；这儿，卡夫卡建议甚至连植物学讲座也向他报告。

[235]指《埃斯特尔女王》的首演。

[236]卡夫卡记错了，该书是斯图加特的A.容克尔出版社于1905年

出版的。

[237]奥·皮克，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布拉格新闻报》的编辑。

[238]指小说集《乡村医生》，包括《乡村医生》等14篇短篇小说。

[239]莱斯可能也是沃尔夫出版社的一个工作人员。

[240]德国出版商和艺术品商人（1871—1926年）。

[241]布拉格作家。

[242]已提到过的表现主义杂志《人》，由约·乌尔齐迪尔编辑。

[243]1918年4月，费·韦尔奇在《新评论》杂志发表《器官的民主》一文。

[244]阿尔弗雷德·冯·迈斯纳著的《我的生平》，1884年特申版。迈斯纳（1822—1885年），奥地利诗人、小说家，曾在巴黎生活并与海涅及法国作家贝朗瑞、巴尔扎克等人交往，回忆录《我的生平》中提供了许多有关海涅晚年的史料。——译者

[245]《我们的文学家和联盟》，载1916年10月《犹太人》。

[246]正在写作中的《异教·基督教·犹太教》。

[247]卡夫卡父母家里有位女管家，她帮助教养了所有的4个孩子，后来被视作可靠的人而留在了家里，对卡夫卡总是充满了真正的同情。她出生于一个捷克-犹太人家庭，除了捷克语，我从未听过她说别的话。人们总只称她为“小姐”。

[248]指《守墓人》，奥斯卡·鲍姆于1918年1月在屈劳逗留期间，卡夫卡曾与他谈过。

[249]奥斯卡·鲍姆的戏剧《奇迹》，1920年柏林版。

[250]和一个梦有关，梦里，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灾难折磨着我。那时，巴勒斯坦的局势很严峻。

[251]尤丽叶·沃里切克小姐，后来卡夫卡曾与之订婚。随后又解除了婚约，主要是因为卡夫卡的父亲反对的缘故。

[252]系马克斯·勃罗德所著。

[253]大约指戏剧《伪造者》。

[254]指在当时引起轰动的指控塔诺夫斯卡伯爵夫人谋杀案。保罗·维格勒是著名的文学史家和随笔作家；维利·汉德尔是剧评家，写有离奇而出色的长篇小说《火焰》。两人都曾任布拉格德语报纸《波希米亚》的编辑，为期不长。估计卡夫卡在这份报纸上读到过关于上述那件轰动一时的诉讼案的报道。

[255]* 一切迹象表明，女收信人同多拉·格里特在回忆录结尾部分提到的“年轻小姐”是同一个人，书里写道：“他告诫、恳请、教导她，将来要献身于工作，并寄望于工作和效率的提高。”卡夫卡在波希米亚西北部的小村庄舍列森与闵策·E结识，卡夫卡曾多次访问那个村子。这里涉及的是卡夫卡于1919—1920年冬在施蒂德尔公寓的逗留，当时闵策·E久病后，也在那里休养，以求康复。

[256]德国剧作家（1864—1918年）。——译者

[257]当时很有名气的女电影演员。

[258]德国作家（1834—1912年）。——译者

[259]德国诗人、小说家（1840—1905年）。——译者

[260]一所农业培训学校。

[261]M.E.出身于特普利茨一个生活条件优裕的家庭。——译者

[262]指施蒂德尔小姐，公寓老板，客人们通常称她为“Gnu”（德语，意为“角马”）。

[263]此话较费解，据估计：“闵策”（Minze）意为薄荷，故作为植物与垂柳（意为“垂头丧气的人”）并提，意思是“柔情依依的闵策”；与后面的“闵策-克列奥帕特拉”（意为女王闵策——高傲的闵策）相对。克列奥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年）是埃及女王，罗马皇帝恺撒的情妇和

盟友。

[264]伊蒙霍夫在德骚城附近，是个旅游胜地，有个著名学府。“马克”是“区”的意思。

[265]齐格勒博士是卡尔斯巴德镇的犹太教经师，著名的传道士和宗教作家。

[266]卡夫卡的妹妹奥特拉想报名上科隆的巴勒斯坦农业预备学校，卡夫卡热情支持。

[267]费利克斯·韦尔奇所著的《神恩与自由》，从宗教与伦理学角度研究创造意志问题。1920年慕尼黑版。

[268]马克斯·勃罗德的独幕剧《感情的高度》（奥罗斯明）在慕尼黑被观众喝倒彩。

[269]弗里德里希·维希特尔的《共济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斯巴达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汉堡和维也纳，1920年。

[270]这份报告最初引自S.尼卢斯的一本书，后来被O.弗里德里希和H.施特拉克证实是伪造的。

[271]这是卡夫卡第一次提到密伦娜·耶申斯卡女士。

[272]盲人作家奥斯卡·鲍姆需要别人给他朗读信件。

[273]指蒂罗尔宫。

[274]明信片上的图案为一个狗之家；舍列森施蒂德尔公寓的狗叫“梅塔”。

[275]这里有三行被卡夫卡涂得无法辨认。

[276]指德国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1890—1935年）的《在流刑营》一文。载《世界舞台》，1920年6月3日。

[277]指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游牧和半游牧的阿拉伯人。——译者

[278]《歌中之歌》为《异教·基督教·犹太教》一书中的一章。

[279]回忆勃罗德在战争期间给逃难儿童办学习班的情形。只要有可能，卡夫卡都去旁听。

[280]阿尔诺·德沃夏克著五幕戏剧《大众国王》，由马克斯·勃罗德译成德语。1914年莱比锡版。

[281]闵策当时住在那里。

[282]波斯诗人（1326—1390年）。

[283]哈汉斯·海尔曼编译的《公元前十二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1905年在慕尼黑出版。

[284]德国历史学家和作家（1834—1912年）。

[285]德国作家（1840—1905年）。

[286]德国社会民主党妇女运动的领袖（1865—1916年）。

[287]指《伪造者》在柯尼斯堡国家剧院的首演。

[288]两人于1564年系统编排约瑟夫·卡罗的犹太宗教法典和犹太法律的纲要。

[289]* 系奥斯卡·鲍姆的儿子。

[290]一种含氰酸的杀虫剂。——译者

[291]阿道夫·施赖伯的《一个音乐家的命运》。柏林，1921年。

[292]《爱之书》，慕尼黑，1921年。

[293]〔后面又补充〕此外，我的计划（背着公司），比你想象的要宏伟得多。在这儿呆到3月份，在斯莫科维奇呆到5月，整个夏天住在格里门施泰因，至于整个秋天嘛——我还不知道。（卡夫卡）

[294]滑雪时改变方向或停止前进的旋转。——译者

[295]代表捷克大地主利益的报纸，有时候不隐瞒反犹太主义的倾

向。

[296]从上封信起有好几封信都未署名。——译者

[297]《虚伪的弥赛亚》一剧中的反面角色。

[298]奥地利剧作家（1791—1872年）。——译者

[299]德国剧作家（1813—1863年）。——译者

[300]德国小说家（1819—1898年）。——译者

[301]指长篇小说《弗兰兹或一种二等爱情》，慕尼黑，1921年。

[302]指勃罗德的朋友、天才的音乐家阿道夫·施赖贝尔在柏林万湖自杀之事。

[303]法国戏剧家（1639—1699年）。——译者

[304]德尔菲是希腊雅典西北120公里的村庄。有阿波罗神殿。据神话传说，通过抽签向阿波罗询问神的指示，即神谕。

[305]指《末日审判》，奥尔维托大教堂中的弗雷斯科。

[306]指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著作《恐惧与战栗》中的人物。

[307]卡夫卡试图在赫勒劳的赫克纳印刷厂为克罗普斯托克谋一职位，但未成功。

[308]即《文学或人们将看到的》，奥地利作家、文艺评论家卡尔·克劳斯（1874—1939年）于1921年所作的一出轻歌剧。

[309]这似乎是一句不太符合德语语言习惯的话，直译或可译为：“他的天才是踏着什么东西站上来的？”意为：“他哪来什么天才？”——译者

[310]这句话的后半句在德语语法上是错的，第三格“wem”应为第四格的wen代替。意为“他在写东西，关于谁？”用前者则成了“他在写东西。在谁的上面写？”——译者

[311]指克劳斯的轻歌剧《文学》。

[312]指克劳斯。

[313]读“噢伊”，估计为“噢”或“噢厄”（“eu”）的方言化。

[314]原信在此中断。

[315]指奥特拉的女孩薇拉。

[316]* 卡夫卡的大妹妹，结婚后姓赫尔曼。

[317]原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落。信中的空缺处都是当时摘抄时留下的，已无法将它补全了。

[318]奥地利东南部一个地区，现为一个州。这是根据英文转译的通用名称，按德文直译应为施泰尔马克。——译者

[319]* 出色的朗诵家。他常读卡夫卡的散文。

[320]该标题源出阿勒斯一幅题为《秋日》的画。画中图景是雨中的田野上一农妇赶着鹅群回家，一个小男孩在放风筝，等等。卡夫卡以“懒汉与女工”为标题，是取幽默之意。译者疑“懒汉”为卡夫卡之自况，而“女工”指闵策·艾斯纳。——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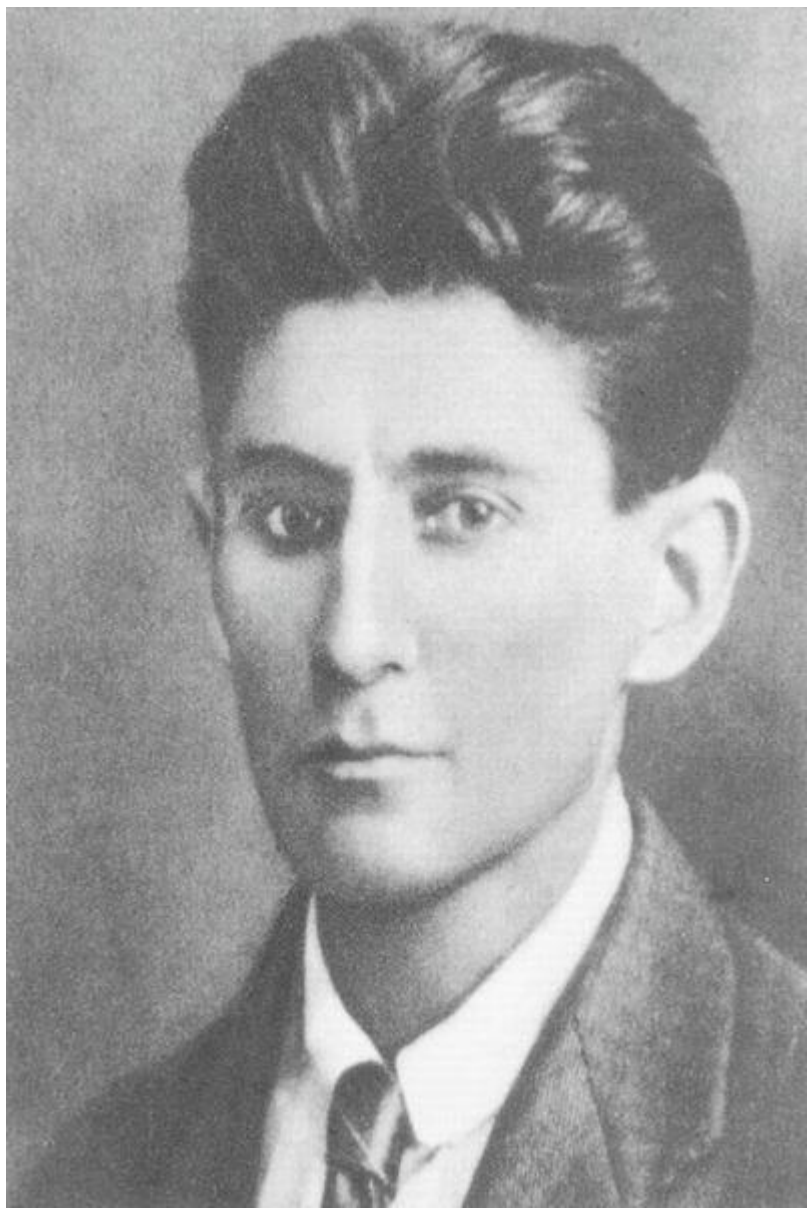
[321]弗兰茨·韦尔弗的剧作，1922年于慕尼黑出版单行本。

[322]据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的陈述，霍卢普与萨菲尔是齐普斯地区的名流。卡夫卡曾撰一短文评论霍卢普这名捷克斯洛伐克职业军官展出的他业余创作的乡村风光画。

[323]卡夫卡的犹太复国主义态度，此外还通过他将巴勒斯坦视为每个犹太人理所当然的活动场所这点体现出来。

[324]胡戈·贝格曼的论文集，1919年于柏林出版。

第七卷 书信（1922-1924）家书



约1917年的卡夫卡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奥地利新兵



布拉格“通往金色梭子鱼”之家，长街18号，自1915年3月起，卡夫卡第一次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时年31岁



1913年7月卡夫卡在北波西米亚的卢姆堡附近的弗兰克施坦疗养院呆了两周。自1917年5月起这家疗养院在卡夫卡所支持并鼓吹的一个协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战士和人民神经治疗所”。故此卡夫卡此后也经常来卢姆堡。

上图是该疗养院今貌（1982）

下图是疗养院的学会活动室



卡夫卡母亲和二妹瓦莉1917年在弗兰岑斯巴德浴场



上图是卡夫卡家庭照，左起：瓦莉、母亲、父亲及外甥费利克斯，右一为艾莉

下图是弗兰岑斯巴德浴场的疗养花园



Abende für Neue Literatur

im Kunst-Jahen Hans Goltz, Bräunerstr. 8

V. Abend.

Freitag, den 10. November, abende 8 Uhr

Max Brod Franz Kafka

Gedichte

Tropische Münchhausiade

gelesen von Dr. Franz Kafka.

Karten zu Mk. 10.00, 5.00, 2.00 u. 1.00 einschl. Steuer u.
Garderobe in der Buchhandlung Hans Goltz, Bräunerstrasse 8
Telephon 0661. 1

!!4798

上图是举办“新文学晚会”的汉斯·戈尔兹书店

下图是马克斯·勃罗德与卡夫卡联名举办的这次朗诵晚会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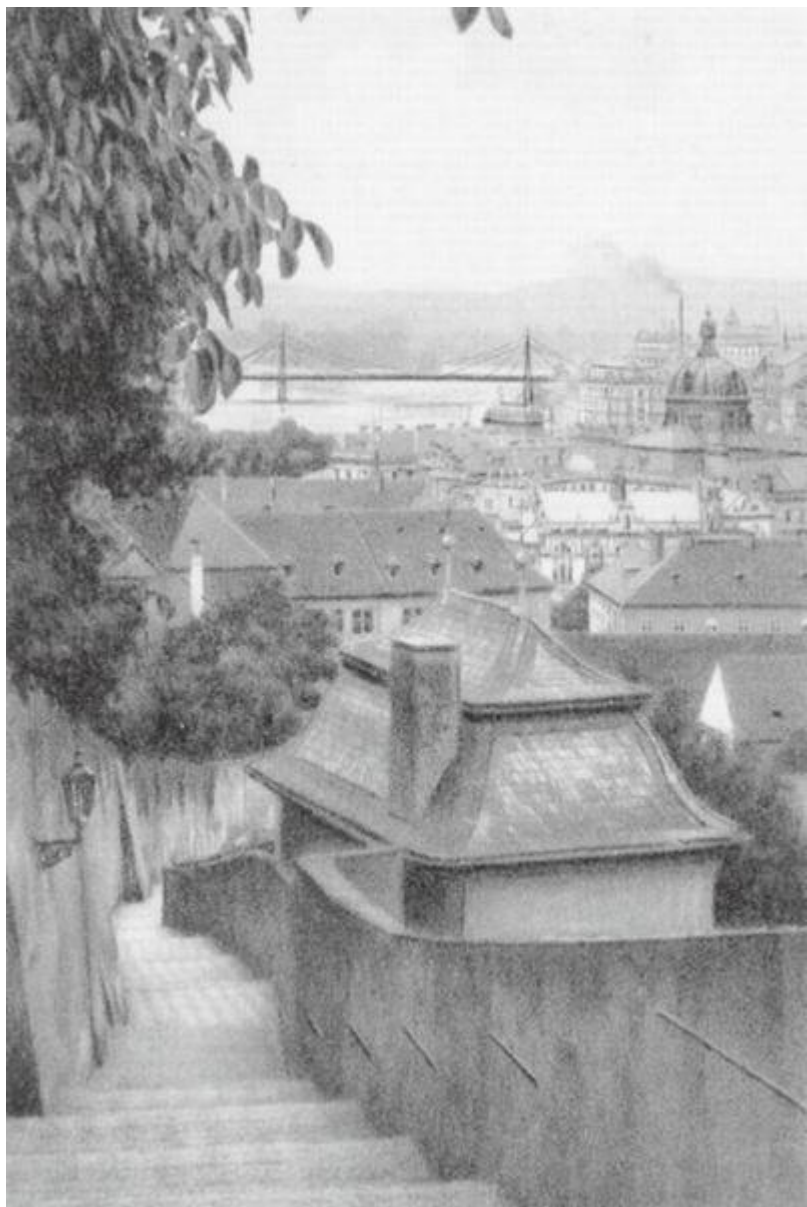
卡夫卡与菲莉斯当时住的“巴伐利亚宫”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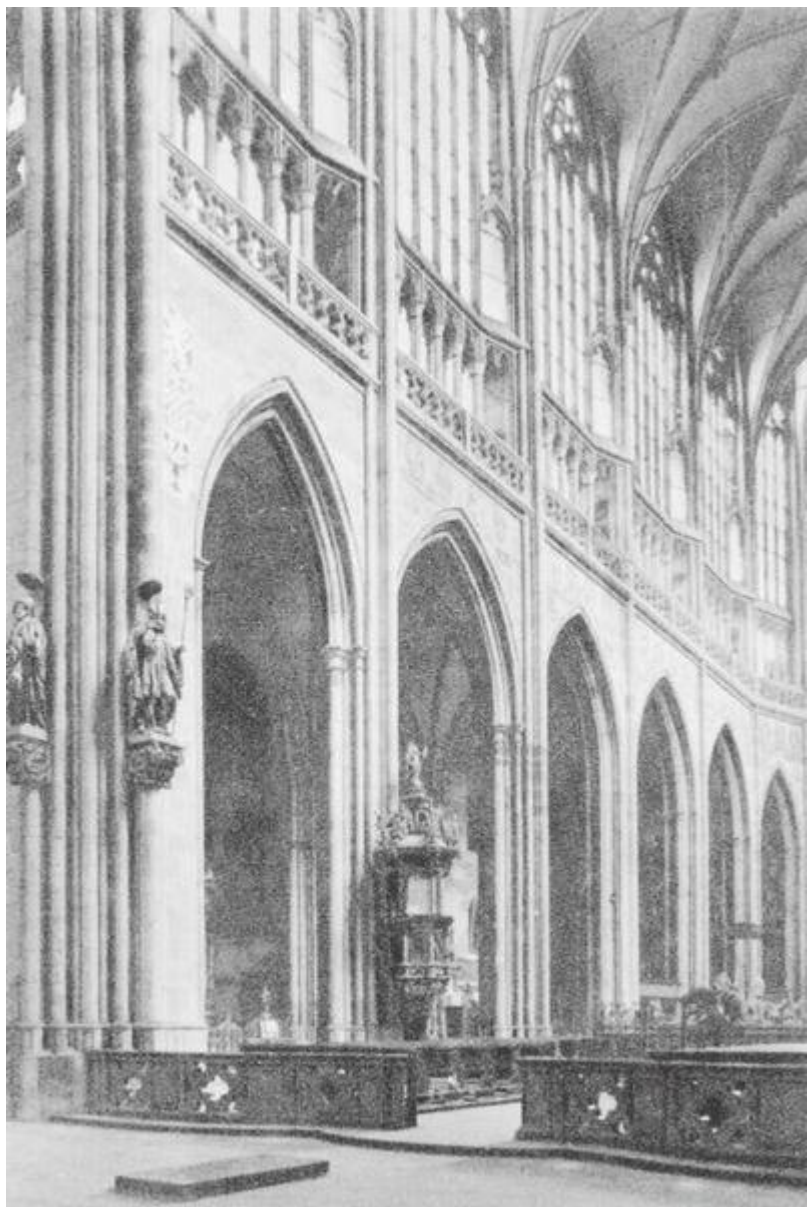
卡夫卡和他的小妹奥特拉经常光顾的巧特公园的观景宫



卡夫卡小妹奥特拉于1916年的画像



位于哈拉庆高地上的旧宫步道：“每当子夜时分，经过旧宫步道下行去城里，美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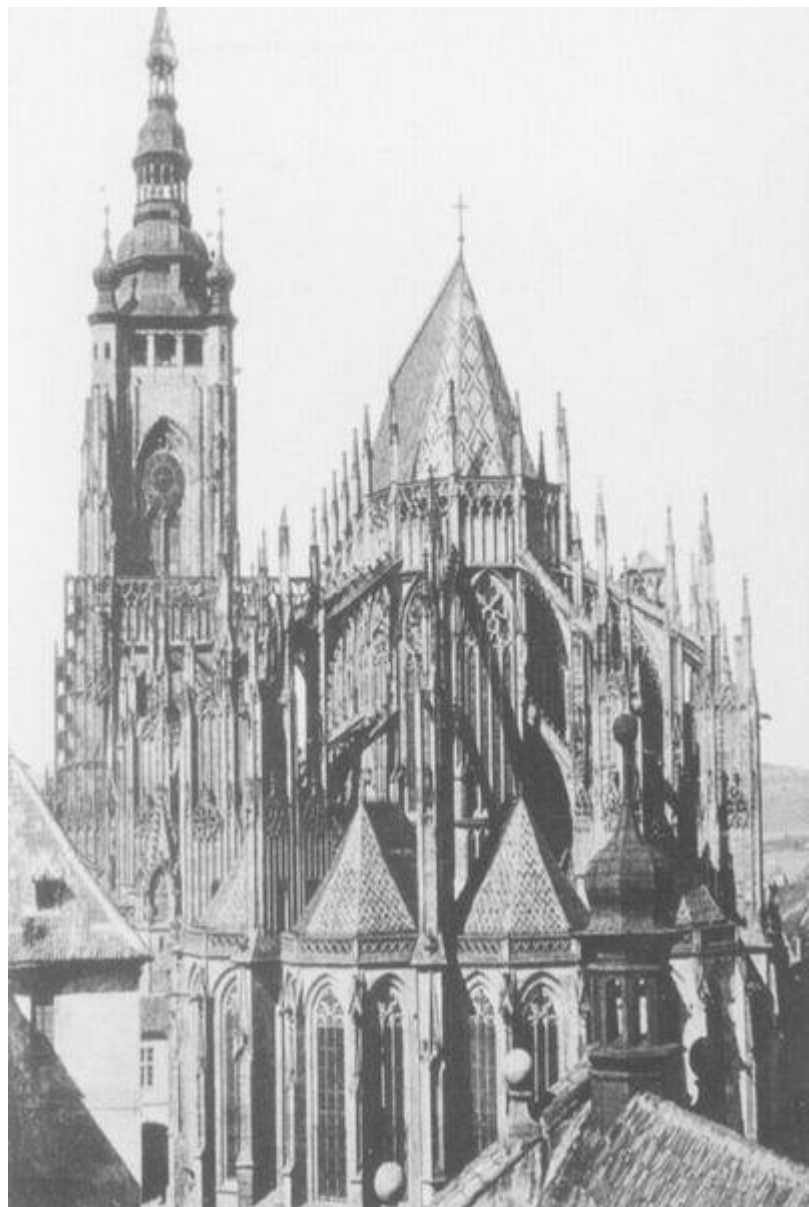


维茨大教堂内景（哥特式建筑）



上图是从城堡边缘看施特拉夫修道院

下图是位于哈拉庆下半坡的薛波恩宫。1917年3月卡夫卡从长街迁到这里。
1917年初他在这里开始咳血



维茨大教堂



奥特拉（左）与她的表妹伊尔玛在屈劳



卡夫卡与他的小妹奥特拉在屈劳



上图是屈劳全貌

下图是屈劳市场；教堂右边被树木遮去一半的地方系卡夫卡住处，原房舍已不在。“那是波希米亚西北部唯一有钢琴的房子。”（卡夫卡的臆想）



屈劳的收获季节：左起第五个是卡夫卡的大妹艾莉；右一是她的男孩费利克斯

HERMANN KAFKA

PRAG I,
ALTSTADTERRING No. 16
Palais Kinsky.

GALANTERIEWAREN EN BROS.

Sachverständiger des k. k. Landes- als Strafgerichtes.

Postsparkassen-Karte No. 2131.
TELEFON No. 181.

PRAG, den 23/I

1914

Meine lieben Kinder!



Ich habe Euch heute geschrieben
um Euch, daß Ihr meinen Brief
erhalten werdet. Besonders auch um
Euch zu sagen, insbesondere ob Ihr gekommen
seid. Gute Nacht ich Euch, Euer
Gedanke & Liebe & sagt, daß ich
alles gut pfunden habe.

Ich grüße Euch alle in der
Liebe und bleibe Euer Vater
Mutter Julie

母亲寄给在屈劳的卡夫卡和奥特拉的信

plagen פִּגְלָה

Plage Pest פִּגְלָה

menschlich מְשִׁיכִי

Pflicht
Verpflichtung
im Gegenteil פְּחִיל

Gefühl פִּחַל

Wert פִּחַל

Umarmung
Voraussetzung פְּחִיל



奥特拉在屈劳的照片



卡夫卡照片，从一幅合影中抽出加以放大而成



上图是屈劳村全景；见之于一张由卡夫卡和奥特拉寄给马克斯·勃罗德的明信片；

下图是屈劳村的主要入口处



上图是一帧合影，右起：卡夫卡、他的女秘书尤莉叶·凯撒（她于1917年11月前来看望卡夫卡）、小妹奥特拉、表妹伊尔玛、本村的助手马伦卡

下图是同一拨人员的合影；只是少了卡夫卡（显然由他拍照了），多了尤莉叶的新郎奥古斯特·考帕尔（刚才他拍上一张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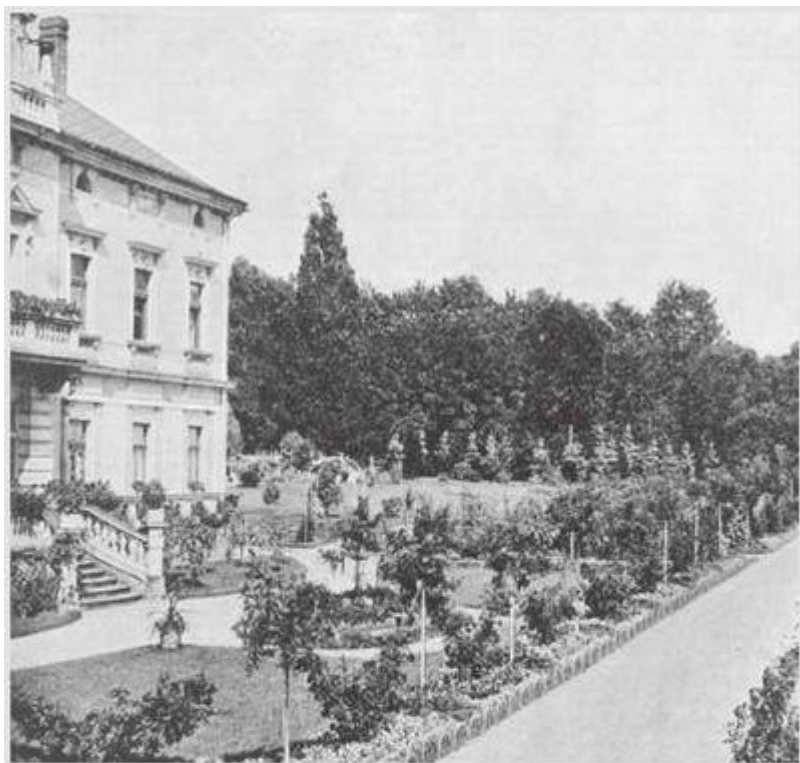
屈劳村的一对农民夫妇（从后来的墓碑拍的照片）



通向上克利村的马路，是卡夫卡最喜欢散步的一条路



从河谷的另一边眺望施居德尔旅馆



1918年9月卡夫卡住在图尔璃，并参与马舍克的园艺活动，“这是波希米亚最大的商业性园艺场，主要是树木学校，当然已经是在走下坡路了。”（上下二图）

编者前言

这一卷包括第6卷移来的1922—1924年之间致友人的书信外，主要收集的是卡夫卡的家书。卡夫卡的家书，由于特殊原因，分三个部分刊载。

卡夫卡文学遗产的保管者和整理者在收集他的遗作的过程中，最困难、历时最长的当推他的家书了。直到1954年，马克斯·勃罗德在他第二次编完卡夫卡的全集后，仍留下一大遗憾：卡夫卡的家书依然是个空白。但很快，60年代初卡夫卡研究界就获得了重大进展，终于发现了一大批卡夫卡的家书，连明信片一共120封，其中101封是致他最心爱的小妹妹奥特拉的，9封是致父母亲的，其余的主要是致他的小妹夫和另外两个大妹妹的。这些珍贵资料经过卡夫卡研究专家H.宾德尔和K.瓦根巴赫的悉心编纂，于80年代初与读者见面。但阅读这些书信仍令读者感到困惑，这批跨越15年时间（1909—1924年）的书信，其中致父母亲的几乎平均两年才有一封。卡夫卡纵使与父亲关系不是很谐调，但与母亲的关系始终是正常的。尤为蹊跷的是整个1922年连一封致家属的书简都没有。尽管这一年卡夫卡集中精力写《城堡》，但也不至于一封家书也不写，须知他是个勤于写信的人，事实上他这一年给其他友人的信件就不少。5年以后的1986年，卡夫卡家书之谜又一条谜底被揭开：一家布拉格的旧书店收购到又一批卡夫卡家书的原稿，一共32封，全部是致父母亲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明信片，时间从1922年7月下旬至1924年6月2日，即作者离开人世（6月3日）的前夕。这样卡夫卡家书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得到相当程度的弥补。当笔者获得这一消息时，曾欣喜万分，急切地期待着这一宝贵文献的出版。1991年编者在德国考察期间，到处购买此书而不得。一年半前当接受出版社委托负责编纂卡夫卡中译本全集时，这一著作的空缺成了一块不小的心病。今年2月，意外收到德国友人莫格博格·韦伯夫人给编者寄来的这本卡夫卡致父母的家书，真是如获至宝。韦伯夫人一向关心笔者的卡夫卡研究，经常为笔者留意有关出版消息，并寄赠笔者十分急需的书籍。她的这一友好举动，为编者顺利完成《卡夫卡全集》的编纂任务起到了“及时雨”的作用。

当然卡夫卡家书的收集并未达到完满的程度，他给他两位大妹妹的信绝不会只有这么两封；1922年以前给他父母的信也不会这么少，

1922年的全部家书更不可能只有一封……这方面还有待于新的发现和突破。

照理，上述两组不同时期发现的书信应当按时间顺序互相穿插成一个整体。但考虑到二者有不同的历史命运，又有不同的重点（一个绝大多数是致奥特拉的，一个是专致父母亲的），为保持其不同的历史面貌和特点，特予分别成辑。

众所周知，卡夫卡还于1919年写过一封未到达收信者手里的长信《致父亲》。这与其说是一封家信，毋宁说是一篇政论，一篇有关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论文，一篇向过时了的价值观念宣战的檄文。其观点之鲜明、文笔之犀利，为一般书信所没有。它反映了时代转型期两代人之间精神上、思想上的隔阂之深，这也正是本世纪头20年表现主义运动中人们普遍关心的主题。与不少表现主义作家一样，卡夫卡在小说中强烈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这封长信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用书信体写的一篇创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无怪乎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而遭到拒绝后，他就再也没有采取别的途径让父亲读到它，也没有因此把它撕毁。看来，收信人是否能读到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留下这样一篇文献，而这是符合作者的观点的。他认为，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是“文献和见证”。鉴于这样的理由，编者没有把这封超级长信与一般意义上的家书等量齐观，而让它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入集。

卡夫卡信件的落款大多很简单，往往不写时间、地点，这里译出的时间、地点都是原编者根据邮戳判断的，并一律用方括号标明。但它们在原件中就像一般的欧洲人所习惯的那样，都放在信的正文的前面右侧，如果是注明明信片的，都放在左侧。这里则根据汉语的信件款式，一律将它们移至签名之后；注明明信片的则放到最后。

本卷的注释方式与原版不同，一律采用篇末注。注释的内容除注明者外，均为原编者所为。其中《致奥特拉和其他亲属》的原编者为哈特穆特·宾德尔与克劳斯·瓦根巴赫；《致父母亲》的原编者为约瑟夫·切尔马克和马丁·斯瓦托斯；《致父亲》译自《卡夫卡手册》，原编者为海因茨·波里策。三本书根据的都是德国法兰克福/M.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分别于1981、1993和1981年出版的版本。

书信（1922-1924）

叶廷芳 黎奇 谢建文 译

1922年

373.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又是一封责备信，我是这么理解的（那种德语——但这不是不理解的原因——与以前相比有点特别，倒不是不正确，完全不是，但却是特别，就好像您很少同讲德语的人待在一起似的），您非得不断地责备我吗？我加在自己头上的责备难道还不够多吗？在这方面我还需要别人帮我一把吗？但我当然是需要有人帮我一把的。其实您是有道理的，我在一次不断恶化的真实的沉船事故中拼命找着一根虚幻的横梁，以致我也许对其他一切的干扰只有生气。尤其是信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来信，信件能使我愉快、感动，使我崇敬欣赏，但以前我觉得它们的数量比我所需要的多得多，太多了，使得我现在不再能把它们视为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我没有被书信所欺骗，但我用书信欺骗着自己，整堆信件最终被付之一炬时会产生一种温暖，而在此之前好几年，我实际上已经用这种温暖在温暖着自己了……

马克斯的长篇小说^[1]对于我有着重大的意义。可惜我不能把有些内容（比如那个间谍故事、那个青春时代的日记的故事）从您的眼皮底下抽掉，让您能够看到这本书的深处。至少在我看来，这些故事是妨碍这一点的，但对于这部长篇小说，它们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它的弱点。您不妨花一番力气透过它们去看实质，这是值得的。

对《山羊之歌》您只字未提。

您也许收到了有关钱币的调查报告吧。

明天我要寄几本杂志来，《火灾星》^[2]我只收到了第1期。星期五我去斯平德尔米勒，呆14天。但愿这段日子比近来无眠的3周好过。在

过去的3周中，事情发展到了极限。这种极限我在玛特拉尚未遇到过。

您将怎样设计您的未来？我还没有找到住房，不过，据马克斯（数天前在伊姆卡做过一场报告）讲，在伊姆卡附近，可寻到为大学生们而设的、美妙、安静、舒适的消闲处与书房，及躺卧场所和浴室等等，但无过夜的住所。

祝您生活愉快！请代向格劳伯尔致以衷心的问候！

卡上

〔1922年1月底于布拉格〕

37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在斯平德尔米勒，环境绝妙。头几天还好，可现在失眠了，失眠以至于绝望。不然，我可滑雪、登山。山够高，且陡，但不会对身体有特别的损害。我未注意温度计。奥特拉也许已写信告诉您下学期什么时候开学。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山区生活、荒凉的山区生活后，您现在又投身于城市的怀抱了！

卡上

〔明信片：1922年1月底一斯平德尔米勒〕

375.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这里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远胜于玛特拉；在我的第二印象中，此地的精灵们苏醒过来。但我很满意，这儿太妙了。若能保持这样子，我会康复的。我已乘雪橇滑过雪啦，或许甚至还会尝试一回滑雪板滑雪。祝生活愉快！近段日子你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期盼着从杉道来的消息。

你的

37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你不能来此逗留几日，非常遗憾。不然，如果走运，我们可整日爬山、乘雪橇滑雪（也许还可用滑雪板滑雪？迄今我已滑出了五步呢！）和写作；尤其是通过写作，我们会得到期望的结局，一个宁静的结局，并很快会到来的。难道你不想这样么？我现在的情形有如身处文科中学，老师来回踱步，全班同学做完功课回家去了，只我一人还在费力地继续增加我数学作业中的根本性错误，而让好心的老师等待。当然，这一点像所有对老师犯下的罪过一样，也会造成恶果。

到现在为止，我已度过五个美妙的夜晚，但第六夜、第七夜很糟，我的假身份露馅了。

你的

〔明信片邮戳：1922.2.8—斯平德尔米勒〕

377.致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3]

尊敬的乌尔齐迪尔先生：

衷心感谢您寄来的书^[4]它在实质内容上，但也在结构上使我感到很像伊万·伊里奇^[5]！首先是韦尔弗的非常简单而又非常可怕的真实性的（那可怕的“愉快的欺骗欲”），再就这位年轻人之死，那持续了三天三夜的喊叫，事实上人们什么声音都没听到，等到能听见时，人们实际上已经走出几个房间的距离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再就是您那笔力雄健、并因而带来很多安慰的编后语。假如不是它来得太迟（这是安慰的天性所决定的），在死刑执行后才来，人们当然宁可把自己痛打一顿。伊万·伊里奇的经历也不外乎如此，只不过在《遗著》中更清楚，因为每一个阶段都特别地人格化了。

致衷心的问候！

〔1922年2月17日于斯平德尔米勒〕

378.致M.E.

自某日光浴场衷心问候！卡夫卡

亲爱的闵策：

我是从布拉格给您写信的。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毛病不在肺上，而在神经方面。您的信，我最近才收到，因为信都寄到了办公室，而我又许久未去那儿了。

祝你一切顺利！

卡夫卡上

〔风景明信片“巨人山之冬”。

邮戳：1922.2.22—维也纳〕

37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偏巧在斯平德尔米勒多待了几天，那儿的事情也不想再写了。这阵子白天人很倦，一到家就来了那封电报，是母亲的回电，所以字句与往日不同。接着收到了皮克（我对他恼火，或者他生我的气，他对我的了解，不过是前天我俩在一条巷子里擦身而过）的电报，继而是那些信函，这一切在我是一种折磨人的羞愧，还望见谅。今天上午护照退回来了，我即刻去交涉，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么简单的。他们对我说，这护照已延至一本护照所能有的最长有效期，该申请签发一份新的了，而且为此需要一张新照片。我并不是说，某个手握权柄的人或者一名外交官也办不成护照延期一事，只是要告诉您，我因您的布达佩斯之行、因直达列车、因您的窘困而作的一番申诉，听起来只是亲切友好，但未起通常的作用。因此，罗伯特，您还得寄张照片来。您没有贫困证明书么？疗养院的结账单上写些什么？您为何附上这账单？

衷心问候！

您的 卡夫卡

〔邮戳：1922.2.23—布拉格〕

38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这根本算不得什么，稍稍细察一下您信中的真实内涵，一切即刻就有转机。您恰恰只应知道，您是在给患精神错乱的人中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写信（医学毋庸置疑的一项功绩，便是引入了“神经衰弱”这一令人宽慰的概念来替代“精神错乱”一词，不过，因此给治疗造成了困难，此外还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身体虚弱与疾病导致精神错乱，还是更确切地说，身体虚弱与疾病即为精神错乱的一个阶段，意味着人准备走向不洁魂灵的安息与快乐之所），而且，别人如果不承认这点（但在其他情况下，基本上够了），便是在折磨他。——今天在护照办理处，我什么也未办成，尽管去那儿比上次早，但那地方挤满了人，我让人草草打发走了。明天我要早点儿去。至于免费，希望不大，我妹妹，如她所述，上次已试过一回，结果只是徒然。您不必给我寄贫困证明书了，寄一张照片来，挑张神态俨然如贵族公子、如某个卢登道夫少爷的照片吧。

致

最诚挚的问候！

卡上

〔明信片，邮戳：1922.3.1—布拉格〕

38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很久没写信了，我知道，但我必须首先让您有时在来信中既亲切又恶狠狠地在在我心中造成的羞惭有时间消失。

我始终感到最奇怪的是，您不时抱怨您在人们眼里（您称之为“亲切的好人们”）的地位。我还觉得“亲切的好人”这话很像您自己的写照。但由于我读到的是已经写下的，而又不是我写的这几个词，它使我感到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可笑的，这是一种献给人类的生日祝词，含有许多掩去言辞本身的阴谋诡计。

现在您的第三封信已经寄到，有那么多问题没有答复，我对那些答案一无所知，只感到疲倦。我只能说，您来吧，走出那把您油都晒干的玛特拉，走入人群中，走入您远远超出您自己的论断、能够非常出色地应付、引导和使之兴奋起来的人群中吧。您将会很快认识到，在您的信中，在您手底下的信中形成的、在玛特拉时还不存在的幽灵也许就是我，而它又是吓得我拔腿逃遁，吓得我永远沉默的东西（并非它本身是可怕的，但与我联系起来就是如此）；您将毫无痛苦地认识到，它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整颗心埋葬在自己体内的、用别人的钥匙把自己锁在屋里的人。但这个人有目可视，他将对您迈出的每一步深感高兴，对您与冲击着您的世界的巨大冲突深感高兴。别的情况吗？为了拯救我不受人们称之为“神经”的那东西之苦，一段时间来我开始写点东西，大约从晚上7点开始坐在桌旁，但这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像一个在世界大战中用指甲挖出来的掩体，下个月连这也得停下来，办公室的日子将开始了。

祝您在布达佩斯旅行愉快！

向伊龙卡问好！不管怎么样，情况终是可悲的。那些不良的壮举：解除婚约，放弃，抗拒父母意志——做得是这么少，而禁锢了那么多。

卡

我有些书，我很想把它们借给您读，但邮寄太麻烦，且有风险，因为它们不是我的。

〔1922年春于布拉格〕

38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译作我已交给费利克斯，可他不知道是否该把译作带上。据说布拉格日报上刊登了类似的作品，只是没有这么多有趣的细节。不管怎么说，应当感谢费利克斯。

我刚给一位小姐写了封信，这是很长一段时日以来所写的第一封信，但谈的内容只是一项恳求，恳请她停止令我绝望的钢琴弹奏。在这地球上，我所要的那份深深的安宁，是不存在的。至少，我想有一年时间藏身于我的创作，不与任何人说话。那种最微不足道的琐事在损害我。

办公室工作月底才开始。但医生现在提出了异议，我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不过，依我的感觉，肺部经受春天，不如秋、冬顺遂。

伊雷妮小姐在这儿。她明显变年轻了，变漂亮了（除了她用以盖住秀发的塔特拉便帽，在玛特拉，她也总戴顶我以为难看的白帽子，这次则是顶灰色的。这些我可不敢给她讲）。她可能不太喜欢我有时昏昏然的疲乏状态。但我对她则有一份喜爱，内心里对您的行动表示祝贺。

怎样安排您在这里的住宿呢？我一直还未能找到解决办法。但愿宿处有望。

您的 卡

附寄的评论也许会引起您的兴趣。不过，评论尚不能撩起人阅读该书的兴致，至少在我是如此。

〔1922年5、6月间于布拉格〕

38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已惬意地安顿下来，这自然多亏了奥特拉^[6]贡献出来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舒适设备。不过，即便没有这些设备，此地也很好，“就我迄今为止所见”（因为说话不可“说错”），这儿比任何消夏处都安静，“如此等等”。起先，在途中我曾对乡村有过怯意。城里按说应无甚可看，去布吕厄么？可只是在城里才有点儿看头，因为从火车车窗前掠过的一切，要么是墓地，要么就全是——如果可能的话——从尸身上长出来的

东西，而城市充满活力，与此截然不同。但第二天这里就相当好了；与乡村打交道，感觉是奇特的。我坐快车来，喧声响处，货车大概到了。它头一天没来，第二天才到。下午睡不成觉，姑以思考打发时光。我在想，于新建筑物旁你在怎样写《弗兰齐》。祝你创作顺利，让那河流奔腾吧。——在办公室里我发现了一封已来一月半之久、很友好且令人极感羞愧的信。我的自我判决包含两个观点，一点在于自我判决是事实。如果我能从沃尔夫的抽屉里取出那个令人作呕的小故事^[7]并将其从他的记忆中抹去，那么，这种自我判决作为事实会使我感到高兴的。他的信在我看来是不易懂的。另一点则在于自我判决不可避免，方法策略也不可避免，同时这么作比方说会令沃尔夫无法做到同意我的自我判决，而且他的不赞同不是出于他在我面前肯定不必采用的虚伪态度，而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我总是对此惊讶不已，例如抄写员吧，他的自我判决照样包括有事实和不可避免地也要讲究方法这两点，可他不是在事实上（事实未带来成果，事实仅毁灭被毁者）而是在方法上未取得成效。之所以如此，许是因为实际的困境妨碍了他，致使此类蛛网效果不得产生。

这是何等细致的探究哦！有些事情，唯有审核者才可深思。且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这封信吧：“我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你的

〔两张明信片，寄到邮戳：1922.6.26—普拉纳和卢茨尼茨〕

38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多亏了您的帮助，旅行才非常顺利，只是同车厢的那位小姐，因为我对您未能同行（您刚开始似乎想一起走来着）所表示的失望，而不能原谅自己。我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奥特拉让我衷心问候您。她对我的照顾不亚于对薇拉的操心，真是够多的了。但普拉纳的人与动物生气勃勃，所以也免不了喧嚷。喧闹声将我从睡眠中惊醒，使我头脑一片混沌。不然这儿是很美的，森林、河流与花园美极了。有副耳塞，至少起点安慰作用；将它塞入耳内，今早虽未能挡住一名农家小伙子礼拜日吹出的圆号声，但也促使他最终停止了吹奏。为什么一个人的欢娱每每

总得干扰另一个人的欢悦呢？奥特拉同孩子和女佣一道，将我的“挨桌座”也从她那有两扇窗户的、到目前为止算是大的、温暖的房间推到了一间凉爽的小屋里，而我则端坐于大房间，为一多口之家的快乐而受罪。那家人几乎是在我窗下翻晒干草，他们制造着无恶意的噪声。

您过得怎样？

卡上

〔明信片，邮戳：1922.6.26—普拉纳〕

385.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假如我没有搞错，你也许已经在舍列森了吧？我记得有一次你称7月为工作月。但愿它成为非凡的月份！当时我真不愿同你分手，而且我那时在剧院里还做了件蠢事，把台本借给你了。这一行动使我达到两个目标：你不再关心我的问题；我再也收不回这本台本。但那天晚上的活动是美好的，对吗？剧本[8]比演出更美吗？比如这个场面，外面响起了雪橇的铃声，迅速地又得到两个情妇的克拉斯塔可夫本来已几乎忘了启程的事，铃声提醒了他，他急忙带着那两个女人夺门而出。这个场面犹如扔到犹太人口边的诱饵。也就是说，犹太人几乎不可能不带伤感地去想象这个情景，甚至不可能不带伤感地加以复述。如果我说“外面响起了雪橇的铃声”，听上去是伤感的，马克斯的评论也是伤感的，但剧本却毫无伤感的痕迹。——我在这里过得还可以，要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噪音该多好！但愿你在舍列森觉察不到这个问题。——祝你和夫人以及孩子一切顺利安好！

你的F

〔明信片，1922年6月末于普拉纳〕

386.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如果你写信来，我打算报名，于7月20日左右离开此地。我已拿到护照。新的护照发放改革令人惊异，官僚机构所能做到的办事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产生于人类天性之本源（与我相比，官僚机构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机构都更贴近这个本源）的办事效率的提高，对自个儿摸索前行的解释来说，是实现不了的。不然描述那些细节便太冗长乏味了，也就是对你来说太冗长乏味了。在官僚机构楼梯上拥挤的人群中，你用不了两小时就会因机构的新型运转方式而感到愉快的，而且，在领取护照，回答某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时，你已在真正的深深的敬畏中（还有在通常的畏惧中，不过自然也在那种深深的敬畏中）发抖。

哦，不要将我相忘于盖奥尔根塔尔，但你们也别在找住所时太累了。如果找不到住所，在我则是个伤心的消息，但也不是什么不幸事，只要这世界每月的索价不超过1000克朗，那么，世界对一个退休的公职人员还是敞开着怀抱的。

〔1922年6月底于普拉纳〕

38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从你的信找出忧郁情绪的实质并不容易。你告诉的细节几乎不够。首先，那部中篇小说还在，难道这不足以证明自己的生活么（不，这不够）？但靠那部中篇小说生活难道不够么？靠中篇小说生活够了，够了，足以让人愉快地生活，安享用六匹马拉的马车。那么其他的事情呢？E写信没规律，但如果仅此而已，如果内容无可指摘呢？罗森海姆的信是德赖马斯肯出版社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不是吗？因此也得从外交上纠正。是可怕的消息吗？你认为与拉特瑙谋杀案有点不同？令人费解的是，别人竟让他活这么久。两个月前布拉格就谣传他被杀了。明策尔教授散布这个谣言，传闻极为可信，它完全属于犹太人和德国人的遭遇，在你的书中已有详细描述。不过，这里说得太多了，事情已大大超出我的视野。即便是我的窗子这么大一圈视界，对我来说也太大了。

我现在获悉政治消息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布拉格晚报，这实在是出类拔萃的形式。但愿不要令我生气地寄来另一种报纸供我吞食。如果只读

这份报纸，那么对世界形势所获悉的就像通过新自由报的报道对战争时期情况所获悉的那样。根据这份晚报的介绍，现在整个世界就像当初的战争一样平静，还等人们产生忧虑，它已经为人抹去了。现在我才看到了这份报纸上你的文章的真正立场。先设想一个前提，有人读你的文章。在这前提下，你找不到比这份报纸更好的环境了，前后那些页中没有任何捣乱因素插入你的话语中，你周围一片寂静。而在这里读这些文章，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同你接触的方式。我读这里的文章是根据情绪而定的，我觉得斯美塔纳和斯特林堡写得感情过于克制，但“哲学”^[9]则既清楚又出色。我觉得，所谓“哲学”的症结其实就是犹太人的问题综合体，这一综合体产生于这么一种混乱现象：与事实相反，当地人让人觉得太陌生；与真实情况相反，犹太人让人觉得过于亲近，以致人们无论对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正确地、平衡地对待。这问题在乡村更加突出，在这里，素不相识的人也有互相问候的时候，但只是一些人这么做。如果有个年长的、令人起敬的人肩上扛着把大斧子在公路上走过你身边，那么无论你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回头追上去补致问候。

假使环境安宁，此地会是很美的，可一天只有数小时的安静，这就远远不够了。没有“作曲小屋”，但奥特拉对我照顾极其周到（她让我代为问候你。在她正为一个做得不太成功的蛋糕而悲伤时，你的问候给了她很大的安慰）。例如今天就是个不幸的日子。一名劈柴人为房东太太劈了一整天木柴。他用手臂和头脑忍受了一整天的东西（这点叫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用耳朵却根本不能忍受，甚至带上耳塞也不行（效果也不是很差）。将耳塞塞入耳内，虽然听到的噪音与以前一样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脑袋已轻微麻木，受到感觉不灵敏的保护，嗯，现在感觉不到什么了。孩子们的吵闹和其他噪声也置若罔闻了。而且今天我得换几天房。我至今住着的这间房很漂亮，宽敞而明亮，有两扇窗子，视野开阔，但不像旅馆，室内设备十分简陋，可说是“空空如也”。

这样喧闹不休的日子我还将度过一些天，一些天是肯定的，也许会有很多天。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的感觉是自己被逐出了这个世界，不是像以往那样被逐出一步之遥，而是成千上万步远。——凯瑟尔^[10]的来信（我没有答复他，为了列出毫无前景的以非德语发表的作品显得太小家子气）当然是使我高兴的（需要和虚荣心是多么善于舔这种事情的手啊），但他并非不为我的方法所动。那篇小说^[11]也是过得去的，我这里说的是寄给沃尔夫的那篇，一个无偏见的人对它的价值是不会怀疑的。

向你和两位女士问候。也问候费利克斯，可惜我未能与他道别。

你的

〔据寄到邮戳的日期：1922.6.30—普拉纳〕

〔旁注〕据说普赖索瓦^[12]太太住在这里。我很有兴趣同她谈谈，但对这样一次行动，同样也很感恐惧与不安。她也许极高傲，也许与我一样，对每一次打扰都感到绝望。不，我不想同她谈话。

你将怎样答复凯瑟尔呢？豪普特曼与你如此接近，你是不可能拒绝写文章评价他的。

38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非常感谢您给我寄报纸来，但没有寄来的必要，晚报我每天都收到，这是一份内容充实的报纸，并通过马克斯的文章充实得无以复加，那长篇小说摘要我至少有时也能收到。我倒是想请求您，如果有新的一期《火炬》^[13]出来（它已经很久没出了），如果不太贵，您读完后寄给我，我不想错过这份一切善的和恶的欲望的甜食。——《什赛修·尤代卡》^[14]，您信里谈到的是它吧？如果您这么做，我将很高兴，如果德语不行，那么就用匈牙利语。我无能为力；倘我试着这么做，我的手马上就会沉重地垂下，尽管我当然像所有人那样或许想对此谈些什么。在我的血液中或许会有一个犹太法典学者的成分。但它不能给我以充分的鼓舞，所以我向您求助。您不一定非拒绝不可，我需要的只不过是呼唤的回答。有朝一日能在德国的、但并不完全陌生的草地上以犹太方式放牧牲畜，一定会很有吸引力，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卡

〔1922年6月30日于普拉纳〕

38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在这点上，您当然完全有权利，如果别的事以这种专制的方式让您忙个不停，那么，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占得一席之地，您和所有其他人就只得照着办了。按我的提议，我也不想要求您参加一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竞赛，比方说加入巨人与大卫王之间的争斗，而只是敦促您从旁观察巨人，确定力量的对比，知己知彼，以逸待劳，作一项永远能做的工作，不用花时间，您总是处于高兴得要命的清醒状态。在此种状态中，一切必然显示出代表性。批评家表态对此大概也不合适。此外由基督教社会报出面吗？关于马克斯作品的翻译问题，您得到了答复吗？

奇怪的是，性格如此内向的姑娘居然写了这么一封长长的信。我无法想象出她的样子。

感谢您寄来布拉格的报刊。我不需要那部在晚报上刊载的长篇小说，您要读吗？

妹妹肯定会在赫勒劳停留的，也许今天到那儿，诺伊施泰特尔太太已回信给她。

奥斯卡未寄来只言片语，他沉浸在他那图林根的幸福中，把我忘了。

卡上

〔1922年7月初于普拉纳〕

390.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你们可真是善良、精确、能替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你为我准备的一切，你给我提的所有建议，样样必要，而且妙极。我来你处，不一定刚好就在15号，但大抵在20号之前。我自己甚至也乐意于早点启程呢，因为我马德里的舅舅说好了8月份要来，只是未定下具体日期，所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8月20号左右（他通常要呆2周）我得回布拉格会他。至于7月15号至20号之间，抵达你处的确切日期，我还会发电报告告诉你们的，如果能劳驾你们，除此种种之外还代为同女房东接洽。另

外，出于其他原因，将行期定在15—20日之间，对我来说也是很适合的，因为这段时间奥特拉有客人来，——顺便提一下，她这里相当美——住处也许就要挤一点了，而这以后，月底我可能会过来，奥特拉很可能要呆到9月末。

必要的事与不必要的事，我在此乱写一气，也许你觉察到了。这有其或好或坏的原因。除了其他所有驱使我前往盖奥尔根塔尔的原因（与你、与你们一起小住一阵子的快乐），在你工作时陪伴你左右，享受一小段在苏劳时的那种美妙时光（那段时光，连同我当时的一切，已离我远去）；见一点世面，让自己确信，世界上其他什么地方还有可呼吸的空气（即便为了我的肺）——这一认识虽不能让世界因此而变得宽广些，但却能使任何一个痛苦的渴求平静下来。除了这一切，在我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促使我乘车前往的原因，即我的恐惧。这种恐惧你定然能以某种方式加以想象，但到不了它的深层，在这方面你太大胆了。坦率地说，我对旅行有种极度的恐惧，当然并不是恰好因为这次旅行，而且绝非仅仅因为旅行，而是害怕任何变动；变动愈大，恐惧愈甚，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我仅把自己限制在极微小的变动之中——这一点自然不为生活许可——而最终，我房内一张桌子挪动所引起的恐惧的程度，也不亚于去盖奥尔根塔尔旅行。此外，不单是去盖奥尔根塔尔的旅行可怕，而且从那里启程也令人恐惧。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原因则只能是对死的恐惧了。部分原因在于害怕引起众神对我的关注；如果我在房间内继续生活下去，那么，日子会按部就班地、一日复一日地消磨，我自然也该由人来照料了，但事情已在进行之中，众神只是不假思索地手持缰绳，这样的巧妙，巧妙处在于叫人觉察不到。如果说我的摇篮旁站着一位仙女，这仙女便是“退休金”。而现在竟要离开这一美妙的进程，携着行李，头顶广袤的天空，信步走向火车站，让世界陷入动荡之中，却对此浑然不觉，只知自己内心的那份激动，哦，可怕。但假使这情形定会出现，我将——想必不会持续太久——把生活忘个一干二净。——那么日期就定在15—20日之间。向所有人问候。谢谢你太太的女秘书。——假若我还将在同一个晚上抵达盖奥尔根塔尔，可就太妙了。这或许是“盖奥尔根塔尔小镇”？

你的 弗兰茨

〔1922年7月4日于普拉纳〕

亲爱的马克斯：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在普拉纳的第一夜），我虽然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但也许比平时，甚至比你自已能更好地理解你的信，不过我也可能言过其实，把信理解偏了，因为你的情况毕竟与我的不同，虽然它也不真实，但比我的要接近真实些。我最近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知道，我本来是应该去盖奥尔根塔尔的，我毫无不去的理由；如果说我曾经说过，去那里的作家太多，那么这也许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感，但并不是认真地把它作为不去的理由，不过卖个关子而已，相反，我钦佩近处的每一位作家（因此我也曾想去普拉索凡，我也劝阻了你夫人到那里去）。我虽然钦佩每一个人，但特别钦佩作家，尤其是平时跟我本人不熟悉的作家，我觉得不好想象，在这个空气新鲜而令人恐怖的帝国，他怎么能把生活安排得如此惬意，他在那里怎么能把经济安排得这样井井有条；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作家我觉得是令人愉快的，至少与他们本人接触时是这样，例如，温德^[15]就是一个。再说这对于我来说甚至是特别愉快的，事情与我毫不相干，我满可以袖手旁观，而且无须担心只有我一个，通常我就可以得到我所喜爱而他对我也很好的奥斯卡的支持。我又将见到一角新的世界，相隔8年我又将见到德国了。这是合理而健康的事。这里，在奥特拉家里固然很好，特别是现在，我又回到了原来的房间。但正巧在月底和下个月从妹夫老家要来客人，房间会变得挤一点，假如我走掉而又能再回来，那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奥特拉一直要到9月底才离开。因此，这里在理智和感情上都没有感到不足的地方。这次旅行之理想是没有说的了。昨天收到一封奥斯卡写来的十分亲切而详细的信，说为我找到了一间幽静、漂亮、带阳台的房间，室内有躺椅，窗外有花园，伙食很好，房租每天150马克。我把它要下就是了，或者倒不如说我事先就已经要下它了，因为我曾跟他说过，要是找到这一类房间，我肯定来。

可现在怎么样呢？首先讲讲很一般的情况吧，我惧怕旅行，这在最近几天，在奥斯卡这封给我带来愉快的信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了。但我并不是惧怕旅行本身，我确实也已经到这里来了（自然只有两小时，而去那边是十二小时），乘那么一趟车本身就使我感到无聊，别的倒无所谓。这不是像大家谈到的密西尔贝克^[16]所写的那种旅行之

惧，他想乘车去意大利，到本尼肖^[17]就不得不折回了。不是怕盖奥尔根塔尔，要是去那里的话，用不着过一个晚上我马上就会习惯的。也不是由于意志薄弱，意志薄弱只有当理智把所有不大可能的事情都作了精确的估计，想要下决心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这里所面临的是一种“边界事件”，在这种场合理智真的能够作出估计，而得出的结论总是我应该去。倒不如说我惧怕的是变化，惧怕由于一种对我来说是大的行动而把众神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

今天夜间失眠，当我在痛苦的睡眠中对一切进行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又意识到那在最近十分平静的时间里几乎被我忘掉的念头，即我生活在一种多么虚弱的、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土地上，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从这黑暗之中，那种黑暗的暴力任意地肆虐，摧残着我的生命，而不顾我的结结巴巴。写作维持着我，但这样说岂不是更正确些：写作维持着这一种生活。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活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但自然这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尽管我不写作，但我是作家（事实是这样），而一个不再写作的作家显然是一种向疯狂挑战的胡作妄为。但是，作家生活的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美妙报偿。但是报偿什么呢？这一夜我像上了儿童启蒙课似的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报偿这种不惜屈尊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偿这种给被缚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上面的光天日之下写小说时却对此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许还有另一种写作，但我只知道这一种。每逢夜深人静，恐惧袭来，使我不能入睡时，我经历的就是这一种。而在这场合，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是沾沾自喜和享受欲在作怪，即在自己和别人形象的周围不停地拨弄翻掘并以此为乐，而且越搞名堂越多，于是就有了一整套沾沾自喜的体系了。天真的人有时暗暗希望：“我恨不得死去，看看人家是怎样哭我的。”一个这样的作家持续不断地实现着这一愿望，他正在死亡（或者说他不是活着），不停地哭泣。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死亡恐惧，但它不必以死亡恐惧表现出来，而是能以惧怕变化、惧怕盖奥尔根塔尔的面貌出现。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这样讲，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为了活就必须要有女人、孩子、田地和牲畜。为了活需要的仅仅是放弃自我享受；搬进房子，不是为了赞赏它和装饰它。对此不妨这样说，命运交给大家了，却没有任何人接到过它。但为什么人们尔后要懊悔，为什么要懊悔个不停呢？是为

了使自己更美，更有欣赏价值吗？也可以这样说。但除此以外，为什么我在这样的不眠之夜里得出的结论始终是：我能活而不活。第二个主要理由——也许只有一种理由，现在这两种理由我不大分得开——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作为作家的我当然马上就要死去，因为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只有在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这是作家。但我自己却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活过，我始终是黏土，我没有把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是利用它来照亮我的尸首。”那将是一种独特的殡仪，作家，也就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把这具旧尸首，这具自古以来的尸首交给坟墓。在彻底的忘我（不是清醒，而是忘我才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情况下用所有感觉器官来享受这种殡仪，或者说想要叙述这种殡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地道的作家。不过这事不会再发生了。但是为什么我只讲真正的死？在生活中它和生是同一回事。我以作家的舒适姿势坐在这里，准备写一切美好的事情，不得不无所事事地思考着——因为除了写作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的真实的“我”，这个可怜的、毫无防卫能力的“我”（作家的存在是反对灵魂的证据，因为灵魂确实已经公开地把真实的“我”给抛弃了，但“我”仅仅变成了作家，而没有继续陪伴灵魂；难道与“我”的分裂能把灵魂弄得这样虚弱？），如何由于某个原因，去盖奥尔根塔尔一次小小的旅行^[18]（我不敢让它站立，它用这种方式站得也不对），被魔鬼搓拧，鞭打，差点儿被磨掉。我，没有在家的我怎么能不大吃一惊，房子突然“崩溃”了；难道我知道了在它“崩溃”以前发生了什么，因而移居国外，并把房子让给了所有恶的势力？

昨天我给奥斯卡写了一封信，虽然提到我的恐惧，但我答应去那里，信还没有发出，因为当时正值夜间。也许我还要等一夜，如果等不及，我得抄一遍。然后下决心：不再离开波希米亚^[19]远行了，今后我只局限在布拉格，然后局限在我的房间里，然后只局限在我的床上，然后只局限在身子躺着的那点儿地方，然后就没有什么可局限了。然后也许我能够自愿——、一切取决于自愿和欢乐——放弃写作的幸福。

为了用作家方式强调这全部故事（不是我在强调，而是事物本身在这样做），我还得说，在我对旅行的惧怕中，甚至有这样的考虑在起作用，将至少有那么几天时间把我与写字台隔开。这一可笑的考虑其实是

有几点理由的，因为作家的生存真的是依赖于写字台的，只要他不想摆脱疯狂，他就绝不能离开写字台，他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住。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

前天我偶然去火车站（我的妹夫想启程，后未走），一列直达维也纳的快车偶然停在这里，因为它要等开往布拉格的快车，你的夫人偶然到那里，喜出望外，我们谈了几分钟，她谈到了那篇小说的结尾。

倘若我去盖奥尔根塔尔，十天以后我就回到布拉格了，我将幸福地躺在你的长沙发上，听你朗读。但我不去……

我已经打电话回绝奥斯卡给我物色的房间了，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制服我的激动。昨天给他写的第一封信我就觉得似曾相识，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给F[20]写信的。

〔1922年7月5日于普拉纳〕

392.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附上的这封信，是昨天即7月4日收到你信后即刻写成的。与实际情况相比，它在两方面有所减弱，一则为前来盖奥尔根塔尔的喜悦，二则为那份恐惧。此两者极相矛盾，若要纳入同一封信内，便只得作番淡化处理。去邮局寄信，遇上奥特拉。她建议，最好将抵达的日期定下来。这使我明白过来。因身上未带铅笔，于是又把信带回了家。可我一直激动不已，接着就像我曾担心的那样，整夜失眠。这是在普拉纳无眠的第一夜。到15日差不多还有十个晚上，即使是我打算立刻动身，那么也仍有三四个晚上要过，而这点我将受不了，所以我不能启程。情况就是如此，这无疑让人没法理解。今天我为马克斯写了篇这方面的论文——还在我知道是否该给你发电报之前——我不想以此打扰你，不是为了我给你造成的一切损害，还有一点，在此传播也不好。本质相似的东西，我亲身经历过，数量相似的东西则还没有。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可怕的提高，它意味着，例如意味着，我再也不可以自波希米亚外出远游。明

天可能来一项新的限制，后天另一项，一周后则是最后一项。想想这些吧，你们也许会原谅我。如果霍恩太太规定我交罚金，我会马上寄来的，这么做于我也许是一种安慰。

祝生活愉快！

你们的 弗

我今天给你们发了这样一封电报，可惜无法前来，信随后到。

奥特拉试图将恐惧的原因部分归结为（她也不敢在更大程度上归结为）体质虚弱。这是一种极温和的解释。想想看，去年我身体也许更差，可去了讨厌的塔特拉（结果我也没法从那里挣脱开），而眼下的体虚亦起因于精神上的衰弱。

〔1922年7月5日于普拉纳〕

39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关于我这里的喧闹，你之所言，大体正确，不过我采纳了你的观点，它成了我数个辅助性结构中的一个，已变为较大支架中的一分子（我靠这些结构与支架搭建我那惨兮兮的棚屋），但世界拥挤，一个被消除的噪声刚消失，即让另一个新的、尚待消除的噪音替代，这序列永无尽头。可这只不过是基本正确，想以此来回复你所列举的事情，恐怕是瞎折腾或行径卑劣。同时，这噪音——不在于描述的方式，而在于客观事实——对所有对你感兴趣、在此显得软弱与无助、害怕担当睁眼看世界的责任、相反却因此而肩负一副更沉重担子的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是一声尖利的谴责。噪音也有一点迷人的麻醉作用。当我——幸好偶有两个房间可供选用——坐在其中某间房内，而且正如你抱怨的那样，是面对锯木厂而坐的时候，锯木厂发出的噪声有时尚可忍受，但圆盘锯一转（这段日子就在持续不断地工作），便直逼得你诅咒生活。假使我就坐在这倒霉的房中，却也无法离去。虽然可去、也必须去（因为噪声不堪忍受）隔壁房间，但我不能换房，只来回走动。而且我断定另一间房内也不安静，其窗前必有小孩玩耍。这便是我的处境。我总盼着圆盘锯突然停转，就像有一次曾发生过的那样。与厂里的会计我有一面之

交，这点甚至也给了我一线希望。虽然他不知他们的圆盘锯在干扰我，对我也不关心，况且他根本就是难以接近的人，而且即使是坦率之至，如果圆盘锯工作是为他们赚钱，他也不会让它停转，但是，我依旧绝望地眺望窗外，心里挂念着他。要么我就怀想马勒尔。他在一个什么地方的消夏生活曾有过一番描述，说他那时很健康，睡眠也极佳，说他如何每日5时半即在户外沐浴，然后跑步去他森林中的“作曲小屋”（屋内已为他备有早点），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午后1点，而一根根日后在锯木厂内制造出如许噪音的树，则静悄悄地簇拥在他周围，为之抵挡噪声。（接着呢，他下午睡觉，自4点钟起方与家人一道生活，而他的夫人，只是极少数情况下才有这份好运气，即他晚上吐露点儿他早晨的工作）但我却要讲讲这家锯木厂。我一个人摆脱不了它，非得等我妹妹来了才行。她舍弃自己的舒适，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给我清出了另一间房（当然也不是什么“作曲小屋”，不过我现在不想谈此事），于是，我得以一时摆脱锯木厂的噪声。所以，别人也该为你换个安静的房间才是。

你的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卓尔不群。起初我把它放在手中转来转去，为收到它而欣喜不已。匆匆扫了一眼，只看到两个地方：一处为伦理学方面的东西，另一处为“小露特了不起”。我当然很满意^①。但我也收到过你另外的一些信件，大抵是谈学生家长晚会，或是谈拉特劳（你读过H.写的、关于拉特劳的小品文吗？一向不犯错的人，弄出了一篇令人惊异的无聊作品。在这篇嘲弄性文字中，一名提交申请的人，讲述他遭杀害的行善者的故事。读后叫人下意识地产生此种印象，即这位以不相上下的嘲讽口吻谈论一位死者的叙述者，至少他自己某种程度上肯定死了。此外，整体上的高潮处在于自嘲，因为如果H.指望拉特劳会说“我们拉特劳人是役马”，那么我同样也坚信，H.还会在什么地方写上“我这条下级编辑的乏走狗”。同时，我不愿给H.带来痛苦，我自己无疑也以同样的趣味描写过这类故事，并要糟糕得多，只不过未曾发表罢了。之所以如此，或许仅仅是因为写得糟多了）。

我恐怕还有几件事要说、要问。这么做与此有关联，即我——思忖！——出于“恐惧”不去德国，尽管我已请奥斯卡在那里为我张罗一间房，而且他令人高兴地办了，办得很出色。这不是对旅行的恐惧，事情还要严重些，是一种普遍的恐惧。

致以衷心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代问你夫人和孩子好！

〔1922年7月初于普拉纳〕

394.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刚才我在四处乱走，要么就是呆坐，犹如笼中一只绝望的困兽。到处都是敌人，这间房前有孩子玩耍，那间房前也有小孩嬉闹。我正想走开，恰好安静下来（或许只那么一会儿），于是我能给你写信了。你不要以为，普拉纳十全十美或近乎十全十美，也不要以为这便是我在此逗留的主因。虽然住所本身，就其居家的安宁而言，布置得富于创造性，房间设施尽可使用，且极细心的奥特拉也在保持这种宁静（我们隔墙而居，白天和晚上我却未受她、她的孩子与女仆丝毫的干扰），但昨天，比方说下午，却有群孩子在我窗前嬉耍。我眼皮底下的是一帮顽童；稍远些的左前方，则是些文雅的孩子，看上去也可爱。然而，两群小孩制造的噪音却是等量齐观的。我因此而不得不起床来，心怀绝望地走出住处，在太阳穴疼痛不已的情况下穿行于田野、森林，完全绝望了，直如夜游神一般。晚上我在平静中怀着希望躺下，三点半却被弄醒，再也未能入眠。附近那家平日并不特别扰人的车站，不停顿地装载着木头，不时要发出锤击声，不过声音轻柔且有间歇。而今天早晨，一清早就响起了敲击声。我不知道会不会总是如此。这响声划破静谧的清晨，回旋于睡眠不足之人的脑际，听起来与白天迥异。糟透了。一大早我便起了床，其实，根据太阳穴疼痛不止的状态，绝无起床的理由。但同时我还交了大大的好运。这几天，约有200名布拉格来的小学生安顿在此。那噪声地狱般地嘈杂，真是人类的灾难。我就弄不懂，人们在有噪音的地方——这种地方是居民点最大、最重要的部分——何以没有发病，而从自己的房子里逃入森林。更确切地说，他们似应逃得相当远才是，因为这类美丽的森林，其边缘地带整个儿被污染了。总体来看，我们至今还未受此干扰，但每时每刻都可能带来种种意外，比方说已发生的某些小意外，而且有时候，我像个可怜的罪犯（我是罪人）逡巡地、满怀期望地向窗外张望。对悦耳的噪声，我也在失去任何感觉，且几乎弄不懂，人怎么会单是为了热闹而去剧院聚会。唯有那些评论，你现在写下的、

那些特精彩的评论，或是这里可读到的那些特精彩的评论，我才有希望能理解。一个人的所知，如果仅止于印出来的文字，那他准以为，在这里他从夜晚和工作日晚上的幽静中浮上来，独自一人，怀着内心的喜悦，欣欣然于眼前的洁净与耳旁的清静，在剧院内乱跑一气，同时又不断地、严格地探索一个持续地制造生命的秘密。一篇精彩的有关基拉泽克的研究报告，或者哪怕只是这样一篇令人感到喜悦的小文章，例如论“钾碱与珍珠母”^[21]（那天晚上一切都安妥了吗？），或者是论“夏季舞台”^[22]一文。（尽管其中关于长椅的一小段并非偶而是原则上地对我产生了几分干扰。不知我们在这篇文章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一点分歧，难道是我在此缺少某种眼力或判断力？）

我的情况，你讲得对。它向外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安慰，有时候又是一种绝望，因为事实表明，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渗透进来，我觉得一切依旧保存完好。这片黑暗，只我一人不得不看，但也绝不是总得看，那日之后的第二天就已不再看了。可我知道，黑暗在那儿，等着我，每当——嗯，每当我看不清自己的时候。你对一切解释得何等透辟、正确啊，如果你这样邀我去柏林，我定将启程，可能还会同鲍姆一道走，假使我俩立刻离开布拉格的话。但是事实上我不能去。我身体虚弱也仍需考虑，奥特拉就考虑到了这一点；这个持外币旅行的人很讨厌，他只是因为旅费低才乘车去的；此外对骚乱也不无理由担心——引起骚乱的原因很多，可只有一个原因，我相信孩提时曾在什么地方亲眼目睹过，这就是大头针的尺寸问题。我现在明白，没有什么比那件事更无意味的了。

你问写作进行得怎样？（这事在这里低水平地发展着，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再就是不断地受到噪声的伤害）也许我的声明与你所了解的方面全然不符，我对你这么说只是为了使你与我的写作尽可能地接近。你我之间的差别显然是，当我哪一天（我不太清楚我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不是通过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事情而获得幸福，而恰恰在写作上无能为力时，那么车还没有开就会倾覆，因为对写作的渴望无论在哪里都大大重于其他。但凭这一点尚不足以刻画出根本的、天生的、可敬的作家特性。我离开了家，必须不断地给家里写信，哪怕家里的一切早就被洪水永远地卷走了也得写。这种写作就其整体而言不是别的，而是鲁滨逊插在海岛的制高点上的旗帜。

再向你诉诉苦，让我自己宽解一下吧，今早3点半又在安装装卸平

台，又是锤击声、树木的滚动声与装卸工的呼喊声。昨天早上8点，这一切本已最终完结，但今天货车又运来了一车货，因此至今大都算得上美好的上午很可能又会响起噪声。为了打发空闲时光，如今我要推动绞盘走上百步左右。绞盘多数时候静静地躺着，或是由不需吆喝、明白事理的马儿拉着走，可今天套的是几头牦牛，它们每走一步都得让你吆喝、让你咒骂“该死的无赖”。这日子怎么过呢？

哦，万湖[23]别墅，马克斯！给我订个安静的阁楼间（远离琴房）吧，我要闭门不出，让别人压根儿不会注意到我在那里。

但目前只是这痛苦挥之不去，袭扰不断。原因何在呢？挖空心思也想不出来。但如果说我说的话，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切安慰的手段均无作用。不过，你一面痛苦不堪，同时却又梦想万湖。那怎么可能呢？[24]（该文妙极了，我又读了一遍——撇开全部的忧郁——把忧伤撇在睡乡之外——古老的俄罗斯宫殿——舞女——溺死在湖中——这就是全部内容）——近几日，情况想必又发生了根本性好转。（嗨，刚才有个男孩在我窗下叫嚷。车站上的铁链正丁零当啷地响，只有那些牦牛在休息。这将是难挨的上午，天气凉了，不然，阳光的温暖能使我免遭孩子们的吵闹。今天我或许有气力动身去盖奥尔根塔尔。当然^啰，这次身体上遭的罪，你是从未经受过的，哪怕你否认也罢。因为这些身体上的痛苦，我不能原谅E.，即便她对此并无责任。单是因为由你确定的那种因果关系，我已无法宽宥她了。

我也收到了费利克斯的一封抱怨信。我以为，他最易得到我们所有人的帮助，可没人帮助他。

你收到了我的明信片吗？那部中篇小说你还能放在布拉格吗？你写了论豪普特曼的文章没有？

祝万事顺遂，更顺遂！

弗

〔又及〕克罗普施托克的消息，你是否知道点儿？他已有一阵子未写信来了。因为对我的回复不满意，不给我写信完全可以理解。

家长晚会（从气氛融洽这一点上看）开得如何？我妹妹讲得怎样？学校明年能招到学生吗[25]？——适才奥特拉带给我消息，说她把孩子

们打发走了（没人要求她这么做，我根本没有促使她去关注这点，此外，她在下面院子里的厨房中几乎不可能听到孩子们的吵嚷），而且孩子们——这是群乖孩子——也极愿离去。仍在安设装卸平台，睡眠依然不足，头脑不清醒，时间已相当晚，一天白费了。多亏奥特拉的关怀，才让人好过点。——不，恰恰是些不服管束的淘气鬼，因为那位女房东、那位姑妈属下的一群，正在我窗前。你问森林么？森林是美丽的。那里能寻得宁静，却找不到“作曲小屋”。傍晚时分，小鸟的聒噪声减弱了的时候（若处在马勒尔的位置，我也许会受鸟声干扰的），去林中（顺便提一下，里面树木纷繁）走走，这儿那儿不时有鸟儿惊恐地唧啾（别人或许以为，鸟儿是怕我，其实是它们对夜幕的降临不安），且在林边视野开阔的地方拣张椅子坐坐（可这里多数时候有布拉格来的孩子们嬉游，极嘈杂），真是妙绝，不过，这一刻也只是在你经历了一个安宁的夜、一个静静的白昼之后才有。

〔1922年7月12日于普拉纳〕

39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情况正是如此，我仍在普拉纳，待在这儿未动，尽管奥斯卡关怀备至，已为我在盖奥尔根塔尔觅得一间看起来很漂亮的房间。因为恐惧，不是对旅行的恐惧，而是一种普遍的恐惧，我未能启程，只发了份电报，留了下来。尽管就我的情况而言，这里不安宁（通常情况下此处很美），弄得我脑袋里乱哄哄的，但我还是留在此地。这样我就没了逃遁之处，总不能钻到地底下去。

您近况何如？讨论会开得怎样？同赫尔曼告别了吗？（半年的账单2700克朗，支付父亲的赡养费1900克朗。至于说到我的肺，治疗也并非收效甚微。）

我和奥特拉衷心问候您！

卡上

〔明信片，1922年7月中旬于普拉纳〕

亲爱的奥斯卡：

今天只讲几句话，表面上看我是在为我的未能启程辩解，但现在的情况表明，我根本就不可能来你们这里。按第一项计划，我该15号动身前来，可14号下午我在普拉纳就接到了一封电报，说我父亲在弗兰岑斯巴德身患重病，已送往布拉格。我立即赶往布拉格。父亲14日晚便动了手术。可能不是什么恶疾，不是器官上的毛病，是脐疝或诸如此类的原因（我没敢问医生，他们即便告诉我，我也不懂）引起的肠疾，但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一次很大的手术。70岁的人了，身体已被如上所说的，或许与疼痛有关联的疾病弄得衰弱，此外心脏也不好，可到今日，手术过去两天之后，情况却好极了。

我还想谈谈我的未能成行。我曾仔细研究你的明信片，研究每一句话，研究每一句话后的隐念。看了一遍，又看一遍，明信片特亲切，且给我莫大的安慰。但后来——我没能研究完，因为得去布拉格——我有时候顿住了，尤其是在“关怀性进攻”字样处。奥斯卡，你怎敢用这样一个词呢？好一个“关怀性进攻”，（我甚至不会写这个词，恐怕它应写成“qu”吧？）借此我日日爬到你上面来，扰你工作，企图向你苦苦求得最便宜的铁路交通，心中暗生期望：只要我问得够经常，也许仅乘电车也能去盖奥尔根塔尔。那么，“关怀性进攻”可以休矣！你以为，只是普拉纳的美景留住了我，使我不能前来，哦，别以此来误解我的痛苦。普拉纳的确景色宜人，可我寻求美中的安宁，而我在虚拟的盖奥尔根塔尔之行前后，度过的是段充斥噪音的日子，以至我诅咒起生活来，并过了好多天，才摆脱对噪音的恐惧，才消除那种守候（从未落空）噪音的心理定势，才平复脑海中的纷乱、太阳穴处的疼痛。但接着呢，奥特拉这个最细心的人儿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其效力重又减弱，而且新的、可怕的噪音已在那里等候。——今天就谈到这里。祝你和你们一切安好！

霍恩太太为何沉默？

卡上

〔1922年7月16日于布拉格〕

最亲爱的马克斯：

昨天上午我没时间来你处，我必须离去，这种无规律的生活叫人受够了（谈到有规律的生活，普拉纳自然不及布拉格，但那只是因为噪音，绝不是别的什么。这一点我不得不反复提及，以便让“上头”无法否认我的观点），尽管如此，我或许会留下来，如果发现父亲在什么地方尚且需要我的话。但昨天却根本不是这种情形。他对我的好感一天一天（不，第二天他对我最有好感，但接着，好感却持续）减弱了，昨天，他设法使我尽快离开房间，而把母亲强留在身边。即便到目前为止，一切如此顺利地发展下去，可对母亲来说，现在开始的却是一段特殊的、新的、耗人精力的痛苦时日。因为父亲处在可怕的回忆的压力下，迄今仍把躺在床上休息视为享受，而眼下，卧床于他，却成了巨大的痛苦。（他背上有个伤疤，一直弄得他几乎没法长时间躺卧，事情发展到他那胖大的身躯每换一次卧姿都会发生困难，况且，他有心脏病，绷带又大，咳嗽时伤口还疼，最主要的是他精神不稳，自己生出些无可奈何的、阴暗的情绪来。）这种痛苦，依我看已超过以往所有的折磨，目前，在他整体的健康状况已发生好转的情况下，则开始向外喷涌。昨天，在那位朝门外走去，我为了不起的护士小姐身后，他做了个手势。手势换成他的话只能是“畜生”二字。他这种状态，其糟糕透顶也许只我一人彻底明了。最好情况下，它尚要延续10天。凡可推给母亲的事，也都尽行推过去了。十昼夜的守护啊！现在母亲就面临这任务！

所以说我没有时间上你家去，但即使有时间，我也未必会去，因为只要我想到你可能已经读了我的本子^[26]，我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这个我把你的中篇小说还给你后斗胆寄上的本子，我知道，是有资格被写下来，却没有资格被阅读的。你的小说是那么完美，那么纯洁，那么底气十足，那么年轻。这是个祭品，它的云烟可入地在上方缭绕。正由于它于我是这么珍贵，所以我请求你，把那开头，不光是最前面那一段，而是到教授家那儿为止，和最后那一部分重新推敲一下。至少在不识小说全貌的人眼里，那开头部分像是在悠来荡去，举措不定，仿佛在寻找可供舒适地休养，但有害于整体的构思支线，这些支线在整体中确实被彻底地拒绝了，但在开头阶段却在一闪一闪。那结尾却拖得太长，使读者喘不上气来，以致一时迷失了注视的方向。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那书

信体，这个体裁已经使我信服。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小说该怎样用我对“作家”的观念来解释，但我对此毫不担心，并为这小说已经存在而欢欣鼓舞。但我的观点昨天得到了印证，我在旅馆中读了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一本小册子《施笃姆[27]回忆录》。他拜访莫里克[28]。这两个好德国人在斯图加特，一起坐在寂静的环境中，谈论德国文学。莫里克先朗读了《莫扎特赴布拉格途中》（莫里克的朋友哈特劳普对这小说已很熟悉，但仍然“怀着似乎难以抑制的崇拜激情倾听着朗诵。当朗诵暂停时，他朝我喊道‘求求您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时值1855年，他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哈特劳普是牧师），然后他们也谈到了海涅。这本回忆录中已经提到过海涅。施笃姆认为，歌德的《浮士德》和海涅的《歌集》这两本奇书是德国文学巍然屹立的两大支柱。在莫里克心目中海涅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莫里克所拥有并向施笃姆出示的少数几份他认为非常珍贵的手迹中，也包括“海涅一首涂改极多的诗”。尽管如此，莫里克对海涅的评语却别有见地，尽管他这段话只是一种普遍观念的重复，并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我对作家的看法和我的想法的极好的、始终神秘的总结，但在另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普遍观念：“他完全称得上是个诗人，”莫里克说，“但让我同他在一起过一刻钟都受不了，由于他的整个本质的欺骗性。”不妨把犹太教圣典的论述拿过来对照一下！

你的

〔又及〕你说，你因替晚报撰稿需要素材的问题而陷入困境。我倒知道一点东西，很值得一用，即为雕刻家巴勒克写点什么。而且是在最近。你可知道科林的胡斯纪念碑？它留给你的印象也是如此独特和雄伟吗？

〔1922年7月20日于普拉纳〕

39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您不必为这一似乎是失败的结局如此绝望。（这一失败我的目力当然无法洞穿，但可以用我的方式来感受）如果我们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么这种失败引起的绝望就会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仅仅是走在一条通往第二条道路的路上，而第二条又通向第三条，等等。正确的那条

路离我们还远着呢，也许根本就走不到。我们完全处在一种捉摸不定的状态中，但也处在一种美不胜收的五彩缤纷中，所以希望的实现，尤其是诸如此类的希望的实现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指望的、但总是有可能发生的奇迹。

至于我，寂静，我需要的是寂静。但遗憾的是，我连您在那儿是否真的拥有寂静也不敢相信，至少我会把那喷泉的水源关掉。而那阻止我踏上旅途的恐惧，我知之已久，它比我更活跃，这是能够得到证实的——再说我也全无出门的可能，我父亲动了手术（脐疝加肠梗阻），那是大约十天前，手术做得非常出色。——马克斯谈到您最近那次来访时，比以前更真诚，更无保留。

K

如果不是日日夜夜戴着耳塞子，简直没法过下去。

〔1922年7月24日于普拉纳〕

399.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已是晚上9时1刻，此时提笔差不多是太晚了些，但白天常显得太短，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吵闹（因为一天之中，只有他们停止喧嚷时留下的空隙方可利用），部分原因是我体虚、漫不经心。对此奥特拉说，我得让自己再退一次休才行。

但这是些小事。可你受着怎样的折磨啊。一种何等伟大的、不为任何东西所迷惑的、甚至那部中篇小说也不能使之平静的想象力在反对着你哟！你也准备收回的《家庭会议》，我可是未能全懂。E.与你的关系在家庭中不是什么新闻，三姐妹和那位姊夫都是有意或无意争取过来的，于是，就只剩下那位父亲了，或许还有那位兄弟。就你的叙述给我的教益而言，小说从远处看仅像那位莱比锡小姐几乎算不上很成功的一个小诡计。此种诡计，从这方面来看，我是颇能积极地投入想象的。

柏林那位女士的信，我倒是乐意读的，现在你看看，她果真回信了。又像前不久那样健谈、可信并诱人继续写下去吗？“真诚、正派的

人”，一方面是从那部中篇小说中援引的预料到的引语，另一方面则是邀人去真正地观察那位正派之士；一点儿自我折磨，当然把可理解的恐惧除外——你把他塑造得那么高大，高大得已超出小说中矿工的境界——妨碍了你那么做。

我不很清楚，你是否已收到我上一封信。你根本未提及那部中篇小说——为了在报上发表的它的片段，也为了那些释义，我深深感谢你。它们也许会吸引我写篇关于中篇小说的评论，只是如何动笔，我现在尚无周密的设想。——不是莫里克——不久前我在安德烈那里翻阅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最近一段时期[29]的文学史（冯·奥托、冯·德尔·莱恩著或名字类似的什么人写的吧）；发觉文学史取温和的、德国式的态度，内中傲慢的语气似乎是作者个人的财产，而不属于他的立场范畴。

晨7时3刻，孩子们（〔补充〕接着被奥特拉赶走了）就来了。昨天非常安静，可现在他们这么快便待在这儿了。起初只有两个小孩和一辆两侧有栅栏的童车，可这就够了。他们是我的“家庭会议”，如果我——从房间中央即可看到他们——断定，他们在那儿，我便觉得，自己仿佛举着一块石头，似乎在那边看到了不言而喻的东西、期待却又惧怕的东西，见到了鼠妇、海蟑螂之类以及黑夜中所有游走与蛰伏之物。不过，此乃视觉上的幻象。孩子们并不是夜游神之类，更确切地说，是他们在游戏中从我头上举起了那块石头，且朝我这里面也“赏赐”了一眼。孩子们和“家庭会议”压根儿不是最糟糕之处，两者都可能是生搬硬套。糟糕之处（孩子们对此没有责任，而且，糟糕之处也许使他们与其说是显得可怕，倒不如说是可爱）在于，孩子们是生活的最后一站。不管他们是通过其噪音表面上令人惊恐，还是通过其安静表面上叫人高兴，在他们背后，开始的是奥塞罗预言的大混乱。在此，我们从另一方面陷入了作家式的疑问。这也许可能。我不知道，一个控制着大混乱的人已开始写作，他所写的东西将是神圣的典籍。或者，他在爱；他的爱将是爱情，而不是对大混乱的恐惧。小莉丝错了，不过只错在术语上，在一个有序的世界里，诗人才开始写作。阅读《安娜》（而且我早就盼着一读），是不是表明你写了一点评论豪普特曼的文章？——想你现在也该在读“庆祝复活节”了，或许正处旅途中？

关于文学史，我当时仅有一分钟浏览那部文学史。仔细读一读，或许有趣味。它似乎是《什赛修·尤代卡》的伴奏乐。令人惊奇的是，一名极易产生偏见的读者，凭借一部文学史，在一分钟之内，居然能对种种

事情漂亮地进行排列归纳。在“我们的国家”这一章出现的、知名且肯定清白的作家中，约有一半按地区划分，而德国的财富，对犹太人的每次行动来说，都是不可企及的。如果瓦塞尔曼日复一日地凌晨4时即起，一辈子只在纽伦堡地区埋头耕田，那么，文学史是不会回答他的，他无疑只会得到风中各种美妙的低吟轻唱，而非它的回答。这不是书中的名单，所以，我可能仅有一次发现，书内并非不友好地提到了你，那是在对隆斯的一部长篇小说和《提荷》进行比较的时候。《提荷》备受人尊崇，又有过多的方言。我甚至得到了赞美，不过只有一半，即“弗兰茨·科夫卡”中的“弗兰茨”，领受了这份荣光。显然应为“弗里德里希·科夫卡”，据说他写了一部好剧本。

比勒克你也未提及，我倒是乐意将他安顿在你的臂弯里。我想到他时，向来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不得不承认，的确是《论坛》上一篇谈其他问题的小品文（我想是查卢普尼写的）中的一个观点，才又使我终于想起了他。平常之作如扎龙的“胡斯”，或蹩脚的作品如苏哈达的《帕拉基》，被光荣地列出来，相反，比勒克对某个兹什卡纪念碑或科门斯基纪念碑所作的绝对无与伦比的设计，却依然束之高阁，这份耻辱和布拉格与波希米亚故意的、愚蠢的贫困化，假使有可能洗净和清除，那可是无量功德，而且，官方的报纸会是办事时真正的动机。至于犹太人的手是否适于实施这些设计，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没有别的手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不过，我相信你的手能干成所有的事。你对那部长篇小说的评价，令我惭愧，也让我高兴，正如我使薇拉既高兴又羞愧一样。薇拉摇摇晃晃地学步，小屁股儿意外地跌坐在地上，我就说：“Je ta Vera ale sikovni”^[30]——这个时候，她又喜又羞。虽然她现在绝对懂得了我的意思（因为她后来感觉到她不幸屁股着地了），但我逗弄她时的呼喊对她具有这么强的控制力，以至她开心地笑起来，并确信她刚才完成了一件艺术品，即“真正的就座”。

相反，韦尔奇先生^[31]递过来的话，不大令人信服。我父亲先验性地认定，一个人只好赞扬和爱自己的儿子。但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因由让“他眼睛闪光”呢？！一个不能结婚的、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39岁便退了休，只搞古怪的写作。写作之所求，不过是拯救自己的灵魂或者消灾免祸。而且他心肠硬，疏于信仰，甚至连做祷告以拯救灵魂也不干。还有肺病。此外，依父亲极正确的看法，病是他第一次有那么一阵子离开儿童寝室，在没有任何独立行事能力的情况下，为自己在舍恩博尔恩宫挑选了那间不卫生的房间时闹下的。这就是父亲热情洋溢谈论的

儿子！

费利克斯在干什么？他没有再给我复信。

弗

〔1922年7月底于普拉纳〕

40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这下可好了。如果当时我压根儿不担这份心就好了（因为不写信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我也不能说是有什么好事，原因在于我不写信的兴致那时几乎不是由某个较好的乐趣引发的。而在您身上，则似乎是由某个较好的乐趣引发的。但愿如此），那么，在伊姆卡用过餐的大学生中，学年末爆发伤寒，内有某些学生将病菌（据称至发病需4周）携入度假地，——报上的这则报道就不会没完没了地折磨我了。现在嘛，我们未遭伤寒的侵袭。为此，得将自己保存起来，以进行您预示的斗争。斗争顺利！安享宁静，森林的清新与无人的清静！我过得还——尽管有干扰——可以。您可能收到了我的明信片吧？内中我写了我父亲做手术的事。

卡上

〔1922年7月底于普拉纳〕

401.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行前匆匆致意（只要楼下的女房东、她的外甥与外甥女允许）。且按你的顺序写来：

比勒克我非常高兴，你真的想试试我仅敢当作一个本属空幻的愿望表达出来（更进一步的作为我力不能及）的东西。我认为，对雅纳切克来说，这是一场事关斗争等级的斗争；按我的理解（我差点写成了：对德赖富斯来说），并不是比勒克而是雕塑艺术本身和人们的眼福是斗争

的雅纳切克或德赖富斯（因为据说比勒克的情况大抵还过得去，那文章写道，他有工作，一尊名为“盲人”的小雕像的第七份复制品已被人订购，他也并非默默无闻，在那篇文章中——总的看来是研究国家对艺术的投入问题——他甚至被称为“velikan”^[32]。对他来说，“伟人”的声名不会是斗争的意义，也不会减低斗争的价值）。在这件事上，我的确总是只想着科林的胡斯纪念碑（倒不是那么想念现代美术馆中的雕像和威塞拉德公墓内的墓碑。我毕竟更想念胡斯而不是在我记忆中已渐次模糊的、人们以前在比勒克那儿见过的难以理解的木刻小玩意和版画作品），正如一个人从小巷里出来，眼前横陈着巨大的广场，广场边上排有许多小屋，广场中央耸立着胡斯纪念碑，这一切，在雪中，在夏日，总是构成一个令人窒息的、不可理解的、因而看上去专横独断的、且在任何时刻重又会受到这只有力的手逼迫并将观看者本身也包括在内的统一体。魏玛的歌德纪念馆，受流逝时光之赐福，也许收到了某种类似的效果，但为纪念馆的设计者斗争，却唯有艰难可言，而且，设计者房子的门总是紧闭不开。

不过，了解胡斯纪念碑建立的过程该是很有意思的；据我的记忆（曾听我已故的表兄作过描述），整个城市代表机构，建纪念碑前即表反对，事后则更是强烈，这种态度可能延续到今天都未变。

中篇小说可惜，我未能读到定稿本。

小莉丝无疑比M.易懂得多。姑娘们大抵是这般模样，上小学时我们就知道了；但有一点却也未能见解，她们应该被人爱，且会因此而令人费解。

费利克斯这位巫术—精神病科医生不真实，但F.的确会得到最美丽的东西。——他为什么不能接受《犹太人》呢？这可是妙事一桩啊。此妙事不成，那可太让人伤心了。暂时的工作量无疑比《自卫》小，但即便一样大，他或许也能胜任（此时我假设，《犹太人》如果过去能由赫彭海姆编辑出版，那么现在也就可由布拉格编辑出版了），而且那种态度有代表性，不过，给他的工作要比《自卫》给的少得多。漂亮的《自卫》也许的确处在危险中，在爱泼斯坦间隔时代，人们就发现了这点。对那个间隔时代，人们记忆中保存的大抵只是：“俄罗斯Chaluz^[33]出现了”，《自卫》不能兼做，应像费利克斯那样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就我而言，想让我去补《犹太人》杂志的空缺，可惜只是玩笑，或是半睡眠状态中突然生出的念头。像我这样对事物极端无知，与他人毫

无往来，脚底下没有一寸坚实的犹太人的土地，怎么可以考虑诸如此类的事呢？哦，不，不成。

霍普特曼晚报上那篇文章极精彩。我还很高兴地盼着读《新评论》上的论文^[34]呢。只是不知除了利用爱无法控制的权力外，你是怎么能将约琳德和安娜（据你的复述）联系在一起的。约琳德与安娜全然不同，同时她也易懂些、神秘些。安娜清清楚楚地堕落了，其动机谜一般地费解，堕落却毋庸置疑。她最为神秘之处是自我审判和自我惩罚。她的这个秘密，在一定程度上比约琳德的秘密让我好懂些，但我凭借的不是才智，而是我的要求。相反，约琳德未干任何坏事。如果做了的话，她也同样会像安娜那样以她自己的方式承认的，可她没有任何东西要招认，她什么也不能招认。当然啦，在这件事上，依她的天性——人们也许本可以对堕落前的安娜也这么评价的——让她自己确信无疑地说“我犯了错”，似乎也不可能。她的谜或许正在于此。但这个谜在某种程度上却无法解开，因为约琳德未做任何坏事。人们几乎已走上这样一条道，即只是实地里去寻找她的情人（这么做让人困惑不解）。情人将他的弱点——这弱点无可否认地存在，产生的根由在于他未能结束同那名机械师的来往。这就不单是一时的弱点了，而且还成了其他弱点的预示。所以，当他能够了断这种关系的时候，他或许又会为一种新的、同样干扰他的关系腾出位置来——夸大到使整个世界天昏地暗的程度。约琳德的纯洁，几乎像那名机械师一样，干扰了他，纯洁在这里难以达到。正如今你此外也肯定谈到过的那样，他死板地追求着约琳德身上没有的东西。对此，约琳德相反却只是还以闭门羹。当他使约琳德发生动摇的时候，他使她也极感痛苦，因为她无法给予他并不具备的东西。可他当然不能放松追求，因为他想要她闭锁着的東西，而她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无论是他还是任何人都不能了解到一点儿东西，哪怕是尽最大的努力、接受最大的教训。

到米斯德罗伊后，我兴许会给你写信的，但不会给E.写。这也许是闹剧，她可能也这么看。相反，如果我写信，就给你写，好让你能出示这信，这样一来，就绝不是闹剧了。顺便提一下，眼下寄往德国的邮件走得很慢。

祝生活愉快！

请你从柏林和米斯德罗伊各寄一张明信片。

〔又及〕比勒克事件比雅纳切克事件引人注目。第一，那时奥地利还控制着波希米亚的局势；第二，雅纳切克的确无半点声名，至少在波希米亚地区如此，但比勒克却很有名，很受尊重，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他每晚如何在他那老式的别墅花园里的10棵树间散步。

〔寄到邮戳：1922.7.31—普拉纳〕

402.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在布拉格差不多待了4天，现在重又回到这儿相当安宁的环境中来了。在城里住几天，在乡村过上几个月，这样分配在我也许还合适。夏季在城里停留4天，时间的确很长，如果再长一点，恐怕就几乎挡不住，比方说挡不住城中那些半裸妇人的诱惑了。只是到夏天的时候，才可真正大量地看到她们令人惊奇的肉体。这是一种轻盈的、饱含水分的、温柔肿胀着的、只可保持数日之鲜的肉体。实际上，肉体能延续很久，但这只是人生短暂的一种表现。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衰弱，因为他那只存一时的、已塑就的丰润（可这丰润，一如格利佛发现的那样——对这点我大多不信——会由于汗水、脂肪、毛孔和茸毛而受毁损）而几乎不敢触摸这样的肉体，人的生命将会何其短促啊；假使这样的肉体能经历人生的大半旅程，人的生命将会何其短暂啊。

在这儿的小镇，女人们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此处虽然也有许多避暑的人，例如，一个极标致、极丰腴的金发女郎，有点儿像男人穿马甲那样，每走几步就不得不挺挺身子，以便把肚腹和胸脯弄妥当，她穿得像只漂亮的毒蘑菇，散发出来的气味——弄得人支撑不住——犹如上好的可食蕈（我自然根本不认识这女人，也几乎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但这些消夏客自可不必理会，他们要么滑稽可笑，要么冷漠，不过，本地的女人，大多数我倒是欣赏的。她们从不玉体半裸，虽然着衣几乎不超过一件，穿戴却总是那般周正。她们很老很老的时候才发胖，只是偶有个把年轻的姑娘体态丰满（晚上我常从一处半塌的院落旁过，比方说那儿就有个做粗活的女佣，间或站在厩舍门内，拘谨地摆弄她的两只乳罩）。可妇人们的干瘦干瘦，这是一种你只是从远处或许能爱上的干

瘦。女人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危险，但很了不起。这是一种别样的干瘦，产生于风吹、雨淋、劳作、忧虑与分娩，却绝不是都市的痛苦，而是宁静的、诚实的欢乐。我们旁边住着一家人，他们无疑压根儿算不上 Vesely[35]。这主妇32岁，生有7个孩子，其中5个男孩。那位父亲在磨坊做工，多数时候要上夜班。他们夫妇敬重我。如奥特拉所言，那位丈夫看上去像巴勒斯坦农民，嗯，有这种可能，你瞧他：中等身材，脸色略显苍白，不过苍白是那捧黑黑的大髭须（你曾写到过会耗人精气的胡须中的一种）衬出来的；而且寡言少语，举手投足迟迟疑疑，这也许不是一种沉静，如果可以说他畏怯的话。那位妻子，属干瘦一类，永远年轻，也永远苍老，一双蓝眼睛，快乐笑时显出满脸的皱纹，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拖带着这一群孩子（一个男孩在塔博尔上中学）生活下去，自然也就没完没了地经受着痛苦。有一次我同她说话，觉得几乎像同她结了婚似的，因为孩子们在窗前玩耍，弄得我也痛苦不堪，不过，她现在也护着我，让我免遭喧闹声的干扰。当然啦，这么做不容易，因为那位父亲白天常得睡觉，孩子们便只好从屋子里出来，而除了我窗前的一片空地外，他们几乎无处可去。这儿是个绿草满径的路段和一块围着篱笆、立着几棵树的草坪。草坪是那位父亲为他的山羊买下的。有天上午，他想在那里睡觉，起初仰卧着，手臂枕在头下。我坐在桌边，不时朝他望去，眼睛几乎无法从他身上挪开，别的什么事也没法干了。我俩都需要安静，这是我们的共同点，可也是唯一的共同点。假使我能为了他而牺牲我这份宁静，我倒是很乐意的。此外，这里不够安宁，别人家的孩子在闹。他翻转身子，想把脸埋在手掌里睡觉，但这不可能。于是他立起身，回家去了。

马克斯，据我逐步的了解，我是在给你讲些一点也引不起你兴味的故事。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讲点什么，好同你保持某种联系，因为我是很沮丧、很无趣地从布拉格回来的。本来我根本打算给你写信。虽然对于噪音和都市的不幸——正如你在那儿生活的情形一样——来说，写上几封信也许是合适的，但当你在北方风平浪静的大海边时，我不想打扰你。你上一次从布拉格寄来的明信片，也强化了我这一念头。然而现在，由于我已自布拉格归来，因为不断受折磨的父亲（或许终究会痊愈，一周来他天天散散步，但疼痛、不适、不安、恐惧仍缠着他）而有些悲伤，因为极勇敢、精神上极坚强、但护理父亲却弄得自己的健康日渐受损的母亲而伤心，因为其他一些次要得多、但简直更扰人的事情而伤感。所以我（由于我目前处在自我毁灭状态）也想念你，今天我就梦见了你，梦到了你种种的事情，可只有一件还记得，就是你从

窗口往外望，瘦得吓人，脸盘俨然一个三角形。由于一切是这么个情状（我也因为这几天“反常的”生活而从相当平静的心态中发生了动摇，而且立即就看到我脚前的那条路——如果迄今为止那是条路的话——中断了），因此我给你写信，也顾不得外在的考虑与内在的困难了。你最近在布拉格，总在急切地等候莱比锡的来信（有时则盼着某一封比以前的信更令人痛苦的信的到来）——就依你这种方式，你看上去很可能便是我梦中的模样，除非你像我衷心祝愿的那样，度假时已略有恢复。哦，这有可能，因为你眼下已不再遭受信函不断的折磨，相反却享受着源源不断的、生气勃勃的消息所带来的快乐。我当然乐意问候S.小姐，但我不能。对她我了解得越来越少了。据你对她的描述，我将她视作美妙的女友，此外认为她是那部中篇小说中虽令人费解但从来无可指责的女神，最终她还是那个在做着毁灭你的工作、“同时却又否认有此种意图”的写信人。这里存在太多矛盾处，由此产生的不是荡妇。我不清楚，谁走在你身边，而且我不能向她致意。

祝你生活愉快，健康归来！

弗

〔1922年8月初于普拉纳〕

40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要归拢我认为比你理解得清楚的事，尔后再理顺我还未弄懂的事。也许情况会表明，对那些抑或可能的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懂，因为事情繁杂，距离又遥远，加之我还担心着你。你的状况比你承认的或许还要糟。从这一切里面只能产生一幅模糊的图景。

首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强调W的优点。也许是为了（安安静静写信已不可能。雷雨降临，我妹夫来了，有点孤零零地。他坐在我桌旁。是我的桌子吗？不，是他的桌子。他把漂亮的房间让给我住，三口之家却挤在一间斗室——当然将那间大厨房除外——里睡觉。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善举。头几天房间不是这么分配的时候，我妹夫早晨能美美地舒展着四肢躺在他床上，而且他住过的那间房，在别墅中算是最美的，睡醒觉后，从床上向外望，即有一片开阔的视野，比方说远处的

森林什么的，可几天后，他却睡在那间斗室里，看到的是邻居家的院子和锯木厂的烟囱。——一想起这些，我尤其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善行。提起这一切，是为了——不，目的暂且不表）——可就你而言，W.绝对没有优势，但是为了极度地折磨大家，天平在必要的时候，至少在目前似乎已如此细心地称出净重。W无优势可言。他不能结婚，不能给人帮助，不能使E.成为母亲。不然，如果有能力，他早就这么做了，而且预示出他比你粗暴得多。那么，就别谈高尚的动机或邪恶的动机吧。他爱E，你也爱E，谁将在此作出决断呢？因为连E.也不能完全决断。他外表潇洒，具有青春的魅力，甚至能诱惑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你美化他时，这样的赞词很多。在甚至连犹太教也不能那么沉重地压着你时，尤其如此。但你看来要具备多得多的优势和更持久的东西。你给人男性的爱、男性的帮助，并能不停顿地时而给人梦幻、时而给人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真实。什么会让你在这方面丧失信心呢？看来不是你那场争斗的前景，而是争斗本身及其种种变故。在那事上你当然有权力；我可决不能忍受那种事，它最轻微的暗示也不能忍受，但你容忍了多少我躲避或在躲避我的事啊。这里我或许高估了你。对你的能力，我不具备哪怕是勉强算得上明智的判断力。

第二点，E在撒谎，漫无边际地撒谎。那点儿事，的确更多的是她窘困而不是她好说谎的证明。而且看起来这也是一种事后的说谎。例如她声称，她跟他说话不以“你”相称（这点不假），但紧接着她同他说话确实用“你”字，有时候也是受了那声称的诱惑，且现在不能够收回她自己的话。这点我无论如何没料到，而且一直弄不懂。我也不理解，你怎么会谈到自感侮辱这一点。毕竟是她的房子倒塌了，是她在请求你，作为男人和帮手，不管用什么方式作点补偿。她完全逃到你那里去了，至少你待在她身边时是如此。她不顾你的恳求写下的那封信，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秉承的不过是你的意图，做得都过头了，就像你寄给我的、痛苦却也真实的明信片。

且略去一切使问题复杂化的次要情况吧。那件事有太多的枝枝蔓蔓。我这样看它的基本构架你想从一种不见减轻的贫困中得到不可能的东西，这也许还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这种东西许多人想得，但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挤得更靠前。你已逼近目标，只是接近而已，还未紧靠上去，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东西。于是你为这种“接近而非紧靠”受苦，你不得不忍受煎熬。不可能的东西尚有更高的形式。冯·格莱兴伯爵[36]也尝试过一点不可能的东西——对如何达到预定目标这个问题，或

许连坟墓也答不上来——但不像你的目标那样不可能。他未将她留在东方，而是越过地中海与她结成了姻缘。不过，即使他违愿地与第一位妻子结了婚，也仍可以同他那个她结为同心。如此一来，在她一边是思念或空虚或缺少安慰或魔鬼米策；在他一边成了感激与慰藉，成了对他第一次婚姻的绝望。但此处却不是这回事，你没有绝望，你妻子甚至在为你减轻艰难生活的压力。然而，我以为，如果你想避免自我毁灭（当我想到，你也得往家里写信时，我在发抖），那么，你别无他途可走，只有去试试那件叫人害怕的事（不过，与你近几年遭受的痛苦比，暂时还只是表面的可怕），真的携E.回布拉格。或者，如果出于种种考虑这么做太难堪，那么就带你妻子去柏林，移居柏林，而且公开地，至少在你们三人中间公开地三个人一起生活。然后呢，以前种种不好的东西（说不定会有新的、未知的不幸与不快靠拢来）差不多都可勾销了：对W.的恐惧，对未来的不安（击败W.后，这份不安还是存在的），对你妻子的担心，和因为想到子孙后代而产生的忧虑。甚至你的生活在经济上也会宽松些呢（因为在柏林供养E.的费用也许将使过去的经济负担增加10倍）。只是我会在布拉格失去你。那你又何不在为你身边的两名女士备下安乐窝的柏林给我也留个位置？随便什么地方都行。

暂且我倒是很乐意看到你度完这地狱般的假后完好地归来的。

F

〔又及〕你妻子让她同意那项计划，也许根本就不会困难到令人绝望的地步。眼下我在布拉格同费利克斯谈起此事，他认为，你妻子不可能未得半点风声（也就是说，她在相当快乐地忍耐）。我也突然想到了施托姆的那封信，有次她曾欣欣然地指给我看。

〔1922年8月16日于普拉纳〕

404.致E.S.

衷心感谢您的明信片与来信。它们一点也未使我感到意外，对我来说，似乎这根本不是第一封信。您的消息，我多有耳闻；您的芳名，于我也是如此熟悉。只是不曾亲眼见过您。仅有耳闻，究竟不够，而且这个不够，也并不是总能感觉到的。您是这么生动地隐现在马克斯的描述中，对这点我在很大程度上也该知足了，因为医生不允许我去波罗的

海。

不过，我倒是很乐意同您一聚，因为云天相隔，虽然书信往来如此频繁，究竟未能面谈，容易产生误解。即便是书信，在此与其说是在帮忙，倒不如说是在起损害作用。因此，您亲切的来信，就预示着这样一种本身不可避免的误解。远方的脸庞，甚至只是从照片上识得的面影，在人的想象中容易形成恶毒与仇视这样的印象。我也叫弗兰茨，弗兰茨似乎与无赖相去不远，连我自己一时也差点相信了。可实际上——一个重视马克思的生活与工作的人，怎能生您的气呢？他对您除了深深的感激外，又怎会有另外的态度？马克思的生活与工作维系于这样一种喜悦，即您在生活并焕发出勃勃生机，想将他从您身边挤走，也就是说想将他赶出工作、赶出生活。难道由此产生的、您与马克思和我三人之间的一致，就一定不是完美的一致？时光当然在流转，就像上次旅行前的那些日子一样，但那副图景，正是那副给了他生活的图景，颠倒了过来，似乎要将生活从他身边夺走。我不敢介入直接的诱因，自然也看到，眼前有许多无意义的自我折磨。这种自我折磨，只可通过他最珍贵的、受威胁的人儿的困苦加以解释——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您——尊敬的小姐，那时见过或在类似的场合见过他，——但实际上您永远不可能见到他的模样，他的模样保留在我心目中。在您那儿，马克思总能得到安慰，遭受损害，仅两三天功夫便吓人地瘦下来，而且睁着一双因失眠而疲乏的眼睛，对一切漠然视之，只是对一样东西，对引起他痛苦的东西充满热忱。尽管如此，他仍以他的精力、将来决不会离他而去的精力继续工作，就这样继续毁灭他自己。如果您能看到这一点，尊敬的小姐，据我对您的了解，您肯定不会对我的作为满意的。我仅能静静地、束手无策地坐在他身旁，让同样的痛苦折磨我自己，而您比之我，呆在马克思身边的时间更多，给他的帮助与安慰会更大。非常遗憾，这样的时刻您不在他身边，而且，您肯定不会再给我写信了。

此乃对您亲切来信的回复。此外，我有责任（根据我听到的消息）报道与F小姐在咖啡馆的相聚；同时据我所闻，我有责任不报道这次会面，而巧妙地让人向我口授关于马克思的报道。由于这两项责任联系不到一起去，所以，尊敬的小姐，当有人说咖啡馆的会面是我一生中最无意义的事件之一，对这样的评语您一定满足了吧。

〔信的草稿。1922年8月于普拉纳〕

40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曾在布拉格逗留几日。眼下在普拉纳收到您的明信片。我也许还会在这儿呆上一月。我不得不偶尔去趟布拉格，以认识普拉纳的价值，或者说，这样一来才更透彻地认识它的价值。只是我并非总有力气去赞赏这价值。是否该来布拉格，您在犹豫么？不管怎样，您应到城里来，这点是肯定的。我逃避城市，只因为我对付不了它，只因为我在那里经历我几次很平常的会面，交谈和观光弄得我几乎昏厥。尽管如此，10月和11月我或许会住在布拉格，尔后呢，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是很乐意去乡下的一个舅舅那儿。为了能对您的未来谈点什么，我该知道，他们给您提了些什么建议。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是在许多情况下，布拉格才是您最好的去处。马克斯已回到布拉格，他的地址是勃雷肖瓦大街8号——请您来信告知我那些建议。

卡

〔1922年9月5日于普拉纳〕

40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即便我未去德国，也别说是“真正的直觉”引导了我，是因为一点别的事。重返普拉纳差不多已有一周。这一周我过得不太开心（因为我看来得永远地撂下那个城堡故事了，自赴布拉格一周前发生那次“崩溃”^[37]以来，再也无法衔接，尽管在普拉纳写下的篇章并不完全像你读过的那么差），不太开心，却很平静，我甚至长胖了。当我与奥特拉单独在一起、没有妹夫与客人们在场的时候，我觉得最安静。昨天下午，又很安静，我打房东太太的厨房旁过，与她说了一会儿话，这房东是个叫人摸不透的人物。以前她对我们只表面上显得友好，实际上却冷淡、怀有恶意，且为人阴险，可近来对我们却变得坦率、真诚、友善起来，完全没法解释。我俩开始交谈，谈狗，谈天气，谈我的气色（jak jste prisel, mel jste smrtelnou barvu）^[38]。她说一个什么鬼怪对我吹了邪气。其目的在于吹嘘，这里使我感到很舒坦，我最好还是留在此

地，唯一妨碍我留下来的原因，只是客找里的饭食问题。她还发现我也许感到害怕——这话听起来可笑，我表示不能接受。继而出现了一点新情况，是我完全未料到的，即她说，根据我们之间的整个关系（她也是个富有的女人），她愿意给我提供饭食，提供多长时间都行，只要我愿意，并谈起了细节问题，诸如晚饭之类。我极高兴地感谢她的提议，一切就这么定了吧，整个冬天我都会留在这里的。我再次表示感谢，然后走开。而紧接着，我正爬楼梯往我房里走，便发生了“崩溃”，这在普拉纳已是第四次了（第一次发生在一个孩子们吵吵嚷嚷的白天，第二次正值奥斯卡的信来，第三次恰逢奥特拉已于9月1日移居布拉格、而我还得在普拉纳待呆一个月、还得在客找里吃饭的时候）。这种状况表面看是个什么样子，你也知道，就不必细述了，但你应想想你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人已在寻求，怎样才能晕过去。首先我知道，我将不能睡觉，睡眠之力会把心脏咬下来。瞧，现在我失眠啦，我早就尝到了失眠的真正滋味。我在受苦，就像昨晚失眠时那样。于是我走出户外，一心只想着，一种巨大的恐惧在折磨我，而且在我较清醒的时刻，还会产生对这种恐惧的恐惧。在一个十字路口，意外地遇见了奥特拉。我曾很偶然地在同一个地方碰到过她。其时她带着我给奥斯卡的复信。这回的情况比上次好一点。奥特拉将会说些什么，这可是太重要了。如果她对那项计划仅略表赞同，那么，至少有几天我会无情地遭受失望情绪的折磨。因为我自己，就我自己而言，对那项计划没有一丁点儿异议。更确切地说，那项计划是对一个大大的心愿的满足，即我独自一个人安静地待在这个极惬意的地方，静度秋日与冬天，让人照料得好好的，而且花费不多。究竟有哪一点会遭到反对呢？无非是恐惧呀什么的，可这不是反对的理由。如果奥特拉不表示异议，因此我将不得不为了那项计划而同自己作斗争。这是一场反正肯定不会以我留下来而告终的毁灭性斗争。哦，幸亏奥特拉立即说，我不能留下来，这里空气太阴冷，还有雾什么的。紧张因此得以消除，我可以坦白了。虽然由于接受房东太太的建议而仍有困难存在，但依奥特拉看来困难很小，不过我却觉得很大，因为整个事情的范围在我眼里大得很。暂时我至少安心了一点，或者更确切地说，理智在这件事情上起了作用。我自己心情不平静，理智使我回想起太多的事情，这一切现在从我自己的脑海里出现，栩栩如生。我的心情不是用一个词可以安抚得了的，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行。于是，我像其他晚上那样，独自一人到森林中去。待在暗暗的森林里，是我最畅快的时刻。但这次我只感到可怕。整晚惊恐不安，于是一夜无眠。早晨在花园里、在阳光下，奥特拉在我面前同房东太太偶然

谈到我的恐惧，我插了几句，而颇令我惊奇（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力）的是，这桩在别处能震撼世界的事，经她们几句匆忙的交谈一梳理，即告解决——此时此刻，我的恐惧才稍有减少。两个巨人般的女人谈天的时候，我站在那儿就像格利佛一样。情况看起来甚至表明，房东太太并不那么认真地把她自己的建议当回事儿，可我还整天瞪着一双眼窝深陷的眼睛呢。

现在情况怎样？我想来想去，只能归结为一点。你说，我应该尝试着去做更大的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有关情况的数字统计，我也满可以在我的鼠洞中检验自己的力量。而归结出那一点是，对彻底的寂寞的惧怕。如果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便是彻底寂寞的。我不能同这里的人交谈；如果我这么做了，也只能加深寂寞。我隐隐约约地懂得对寂寞的恐惧是怎么回事，这种恐惧并不仅仅是针对被冷落的寂寞的，并不仅仅是惧怕身在人群中的寂寞，比如按我初到玛特利亚里时或在斯平德尔米勒那几天所感受到的，对此我不想详谈。那么这寂寞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寂寞是我唯一的目标，是我最大的放松，我的可能性。如果说我是在“设置”我的生活，那么我始终考虑着如何在生活中把寂寞设置得舒适些。尽管我如此爱它，但同时又非常怕它。而为维护寂寞而担惊受怕要容易理解得多，这种恐惧同样实力强大，与前者旗鼓相当，而且招之即来（孩子们一叫喊，当奥斯卡的信一到来，“崩溃”就发生了）；而对那迂回曲折的中间道路的恐惧甚至更容易理解，这种恐惧还是这三者中最弱的。在那两种恐惧中间我将被碾得粉碎——而第三种只有在发现我打算逃跑时才插手——而且会有一个高大的磨坊主跟在我后面，嘴里骂骂咧咧，说干了那么多活儿也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东西来。无论如何，像我改变了信仰的舅舅所过那种生活令我毛骨悚然，尽管这种生活现成地放在我的道路上，当然不是作为追求目标，但他也不曾把它作为目标，只是在最近这堕落的时期内才去追求的。此外我还有个独特的地方，我在空的寓所内感觉舒适，但不是在四壁徒立的寓所中，而是在那种充满了对人的怀念并准备迎候今后的生活的房间里，是摆设完备的夫妻卧室、儿童住室、厨房，是那些早晨有给别人的信件投入信箱、给别人的报纸插入门缝的寓所。只是真正的住户永远不能来，否则我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就像最近那次那样。好了，这就是那个“崩溃的故事”。

你的好消息，令我高兴。大前天收到你的信，我还能高兴，今天也慢慢有力气高兴了。现在我还不会一道儿去柏林。奥特拉则几乎只是为

了我的缘故而留下来再待一个月。我眼下该动身吗？（你为什么要10月30日走？）我也想去那里看首场演出。两次乘车旅行，在我看来太了不起啦。至于E，她可是恨我呢。我简直怕碰上她。就你而言，我的影响力——如果有一份影响的话——由于那个秘密，至少是增强了，就好像我已露面、出现在你身边一般。

施派尔^[39]作品中的什么东西叫我不喜欢，你自己说说吧。学校的庄园，早年的克里丝蒂纳及布兰奇写得很美，脱开了最冷酷的意味，但接着他的手垂了下来，搞得人读时几乎都跟不上。当然也还有几处很值得尊敬的地方，我就不再恭维了。另一方面，后来的衰落在书的前半部已有预示，例如，在无拘束地描述同学们性格的地方，或是在“引言”处。如果一个人在11月的夜晚为了比较西藏与德国的宁静而开窗，那么，我们最好是替他再把窗子关上。这里是施托姆式情调的夸张。

“安娜”也让我略感压抑，至少带给我的愉悦不多。此外，这小说我几乎读了两遍，一遍为我自己，一遍为奥特拉，给她读了16章。书的结构，人物风趣、生动的对话，书中的许多地方，都是极出色的，但书的整体，是怎样一股洪流啊！除了尤斯特外，没有一个人物是为我而存在的。此时，我根本没想到那种十足的可笑和有失体面的滑稽，例如未想到从不曾生、从不曾死、总被人从他的墓穴陷阱里硬拖出来的埃尔温（我们只能笑着读他的故事），也没想到特亚或是那位祖母。但是，几乎所有别的人也都那样，人们会因为他的贫穷生活而在某种程度视之为非生存者。你不喜欢安娜，而喜欢E，你因为E而不喜欢安娜，而喜欢E。则还是因为E，连安娜也不能阻止你。我最喜欢的是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成员，就像你描述时那么绝对——不是反对他们的教派：“在他们眼中，不可否认的、有种不寻常的光芒在闪烁，深邃而友好。”

祝你在柏林万事顺利！

弗

〔寄到邮戳：1922.9.11—普拉纳〕

40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笔握在手中几乎不习惯了，我已很久不写信。这次促使我试着动动笔的原因是够重要的了。毫无疑问，我要建议您在柏林度过冬季学期，而且是出于如下考虑，这样一次能在柏林无忧无虑地生活并能随自己的心意工作的机会极为难得，所以千万不要舍弃。（施泰因费斯特博士替您支付什么？是份礼品吗？）

换个学习的地点，这种“冒险”您能轻易地通过；要利用这次重要的、内在的机会！

布拉格的价值是成问题的，除了那一切明显地属于个人性质的东西外，布拉格也还有某种特别有诱惑力的东西，这点我是能够理解的，我觉得那是幽灵们身上的一点天真的痕迹。但这种天真同幼稚、小气、无知觉混合得难以分辨，这对外来人虽谈不上是最危险的因素之一，但总是一种危险。如果人们是从柏林来的，那么他们会发现布拉格比柏林有用，这一点据我知道还没有任何地方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做到过。无论如何，布拉格是抵抗柏林的药物，柏林是抵抗布拉格的药物；由于西方犹太人身罹疾病并靠吃药活命，所以他们如果是在这个圈子里活动，就不可能越过柏林。我总是这样认为的，但我没有力量从病床上伸出手去要这种药物。我不公正地试图通过把它看成一种药物来降低它的价值。今天柏林所展示的还要多一些，我觉得，在那里比在布拉格能更清楚地眺望巴勒斯坦。

至于马克斯，今年冬天与他保持联系，在柏林简直比在布拉格来得便当，因为出于某种原因，柏林现在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您或许也能帮上他的忙，这在他是非常珍贵的。（此外，他在那儿也有首场演出，我说不定会去看的。）

我，嗯，至于我，除了在我舅父处（在梅伦。那地方离布拉格简直比柏林离布拉格还远）住几周外，将会待在布拉格，因为我的思想搬不动。让您在什么地方为我安排住宿，对我来说，可真是个很令人开心的念头。——这一切只适合冬天。也许在柏林过上一冬就够了。（您的表妹不也想在柏林过冬吗？）尔后您作为一名能对两城市进行比较的旅人回到布拉格（如果您到时还有这种兴致并未先选中一所南德的大学的话）。您的资助人自5月份起呆在布拉格，从这点来看，上述安排也是恰当的。——我也认为，整个事情的前提，是您健康方面自感舒适，否则，您是不会考虑这些计划的。——从马克斯和费利克斯那里，您不难得到如何在柏林生活的劝告；从我这里则可得到恩斯特·魏斯的指点，如

果您愿意。尽管有施泰因费斯特博士的钱，但您仍应接受这位阔先生的帮助，根据魏斯博士的一篇报道，一万马克几乎是不够用的。

在您去柏林的途中，我们可在布拉格会面（10月1日我肯定已在那里），再谈谈必要的事。伊雷妮小姐又去德累斯顿了吗？格劳伯尔在哪里？在洛姆尼茨吗？请您代我问候他！那么施齐奈呢？——当然啦，我的小外甥女不会来赫勒劳。毕竟我已达到目的，妹妹同妹夫，还有孩子们留在了赫勒劳，但正是这一阶段性胜利，让我失去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全部希望。诺伊施泰特尔太太把人吓坏了，她为人阴险，恰好在这天伤风了。脸上起脓包的诺伊施泰特尔先生，那个英国人、一位临时代课的女教师，一名达尔克罗策的女学生，虽然很高兴，但敌不过感冒；学生们在郊游，这是星期天。情况同样如此，妹妹无力作决定。我不能为此而生她的气。几个月以来我就想乘车作一次10分钟的游郊，可这不会成功的。

一切顺利！

卡上

〔1922年9月于普拉纳〕

408.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谢谢你的来信。信是从普拉纳转过来的（自星期一起，我便在布拉格）。我曾很担心，你会生我的气，现在仍有这种担心，因为面对这样一场演出，观众是无法好好待着的，除非他在费力地思考，我的身体与这场可怕的演出间有多远的距离。最近几天我要来。在普拉纳的时候，我过得相当好，只是受了数得着的几次干扰，最后我才因为要离开那儿而几乎高兴起来。对那些嗜睡者来说，还有什么比冬天待在那里更妙的呢？我不属于那群人，在那儿获得自由的自然精灵中间过冬会受不了的。而你，被开音乐会的旺季留住了的你，最好是过来待上几天。

祝莱奥幸福！他的父母真该受到赞美！就这么成长起来，而且变得健康、强壮、机灵、肉体上有经验，同时还为多数姑娘所注目！你可从马克斯手上借施派尔的《四季忧伤》。小说描写的是一座学校庄园。与

此相对，我想说：“我该死。”我的教育，其实全是在孤独的、冰冷或过热的男孩子睡的床上进行的。这虽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但说一说让人高兴。

衷心问候您、您太太和妹妹！

F

1922年9月21日

40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就说几句话，那位小姐等着呢。根据伊雷妮小姐的报告，我有种印象，即真正严重的情况已过去。因此医院便不再在考虑之列了。但如果您指望从医院得到治疗，以期病情有最低限度的减轻，我们还是可以试一试的（您在家中得到的照顾，肯定很不周到）。这绝不是什么求人帮忙的拜访。我会去我同事那儿的，让他以很骄傲的方式促成此事……那么，您表表态吧。今天我从赫尔曼大夫那里得了答复，但他讲得很简短含糊，说是轻微的感冒。明天我再去找他。

烧到多少度？详谈。

昨天伊雷妮小姐在这里时，我已给您回信。但事情因为发烧的问题，已变得比以前更无关紧要了。答案就在我这里。

万事如意！

您需要什么，就坦率地讲吧！

卡

〔1922年秋于布拉格〕

410.致M.E.

亲爱的闵策：

您的信给我以巨大的快乐，因为信中表明，您未屈从那些我自信已认识到了的和我肯定还不知晓的困难，并继续过着您独立而无畏的生活。我当然要接受那份邀请^[40]。怎么可能却之不受呢？想想看，您做东，还有那儿的安宁、森林和花园！但我换换地方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身体倒不是那么难动，而是精神上有些问题。例如夏天的时候，我本要去图林根看几个朋友的，结果却未能成行，尽管我身体相当好。真是难说清。不过，去卡塞尔也许能成。此外，我要问，那儿是一处怎样的别墅？环境如何？是一处商业性园圃吗？或者只是所退休住宅？抑或又不是这样？您不可能一个人住在那里，又是同些什么人住在一起？在施蒂夫特^[41]的《研究》中有一篇故事叫《姐妹俩》，说的是一个姑娘的杰出的园艺劳动成绩。您读过这篇故事吗？奇怪的是故事发生在加尔达湖^[42]畔，我记得有一次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说起过它。这看来是有些人梦中的追求。

忏悔。为了能听取忏悔而有所选择，这固然是一项难免的严肃责任，但只是请您别指望。当人们向他忏悔时，那他一定是个怎样怎样的人，且可望从他那里得到一点什么。向某个人忏悔，或者对着风儿喊出您的忏悔，通常是一回事，即使那可怜的、薄弱的意志可能是如此善良。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整天无所事事地闲荡，却又要去倾听另一个人心中的困惑，此时他除了说“可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一切如此”外，还能说些什么呢！这类话的确是种安慰，可也仅此而已。不过，亲爱的闵策，如果您的心里很闷，就写吧。在我这里，直到我的气力用到了尽头的时候，您肯定都能得到敬重与同感。

您问及我的病，它并不像站在病房门外的人想象的那么糟，但这座建筑物确实有些裂缝，不过现在已好些了，两个月前甚至一度相当不错。这是一种有些乱的战争状态。如果把这种疾病看成一支战斗部队，那么它就是世界上最听话的生物，它的眼睛只盯着指挥部，那里发出什么命令，它就照办，但上面那些人对应该作何决断往往把握不定，此外还经常出现误解现象。把指挥部和部队分开的作法应该停止了。

祝您安康，亲爱的闵策，并祝您旅途和其他一切顺利！

卡

〔1922年秋于布拉格〕

411.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非常感谢那两本书，尤其感谢您对我的问候（我已诚恳作复）。

借此机会，我想象前几次那样，请您预先记下，我的地址不再是波里克7号，已改为“布拉格，老城区环行路6号”。这不仅仅是一个因其他原因而使我感到不舒服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函件。函件总是寄往波里克7号，转到我手中通常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要晚数月之久。那两本书也晚到了。因此我以最友好的态度请求您注意这一地址的变动。

我从第三方偶然得知，《变形记》、《判决》已译成匈牙利文，刊登在卡绍1922年的《泽巴德扎克报》上，且《杀兄》也在卡绍由《卡赛纳普洛》1922年复活节那一期刊出了。译者为生活在柏林的匈牙利作家桑多尔·马赖。您知道这事吗？此外，我请您无论如何为一位我很熟悉的名叫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的匈牙利文学家保留将我的作品译成匈牙利文的权利。他肯定会译得很出色的。

顺致

崇高的敬意！

弗兰茨·卡夫卡

〔寄到邮戳：1922.10.21—布拉格〕

41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您到底什么时候能去掉涂上的颜色，看看真正的我，看看我昏沉沉躺在长沙发上的模样！一群管道工风雨中爬上我对面那座俄罗斯教堂最大的钟楼顶，边劳动边唱歌。透过敞着的窗户，我惊奇地注视着他们，就像看史前时代的巨人。如果我是同代人，那他们不是史前时代的巨人，又能是什么！我不写信的原因正在此。或者还有一个因由，就是我劝说您时的软弱无能。

非常感谢。凭借小小的帮助，我有时慢慢地从匈牙利的黑暗中发掘出这位伟人^[43]，但大量错误的概念肯定在一旁起了协助作用，主要是那些错误的类比法。这样一篇译文，有点儿让人联想到亡灵们对巫师极度的无能所作的抱怨。这里则是读者和翻译者在相互联系和沟通这一点上的无能。但那篇散文比较清楚，读者可从近一点的距离看那位伟人。有些地方我不懂，但整体能理解，真让人——在这种情况下总如此——高兴，为此而高兴，即他过去在这里，现在在这里，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总与他相近——也就是说“与任何人都不相近”，因此，在这点上也相近。那些译诗显然很粗陋，只是这儿那儿有个把词，或许还有个别音调，尚差强人意。为确定译作与原诗间的关系，我以我与那些管道工之间的关系作为标准。

对那位编者，您有点不公正。这与他获得的利润有什么关系？如果寄生生活的产生是公开的、正当的，是由于天生的才干，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我们有什么理由表示反对？我们不也是寄生虫么？难道寄生虫不是我们的指挥者？此外，两人聚会的情景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可促进人的认识。这两人，一个说得这么多，一个是如此的沉默。至少对我来说，后记里头也有新消息。

幸好我的生活近来非常单调。只有马克斯偶尔来坐坐。韦尔弗也来过一趟，为的是邀我去塞墨林。这当然很叫人高兴，但医生不允，到底还是客人在我这里留了4天。这便是全部情况。

不久就是我到玛特拉并结识一名年轻而富有的胖绅士，还参加了他的周年纪念日。这位绅士暖暖地坐在美人儿中间，读着《新自由报》上的圣诞特刊。

祝您生活愉快！

您的 K

您的快信来了。看来您要认识我，除了通过仇恨（我的态度最终一定会引起您的仇恨）外，别无他途。

请您代向格劳伯尔问好！

加尔贡太太在做什么？

伊龙卡小姐不久前给我写了封信。

[1922年11月22日于布拉格]

41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这封信主要是给你通个信息，因为韦尔弗将会去你那里，再就是希望在思想上得到你的安慰。

昨天韦尔弗和皮克一起来我这里，他们的来访平时总给我带来莫大的欢乐，这回却使我陷入绝望。W.[44]知道我看过《施威格》，我感到我将不得不谈到它。如果只是一般的不喜欢，完全可以设法避而不谈，但这个剧对我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休戚相关，使我产生了极端厌恶的感觉，我丝毫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向韦尔弗表露这种感觉，而且我自己对反感的原因也不完全清楚，因为就这剧作我内心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思辨意识，而只有摆脱它的愿望。如果说，我在霍普特曼[45]的“安娜”面前听力麻木了，那么我在这个安娜和围着她转的鼠王面前则是听力好到痛苦的地步了；只有这两种听力现象互相间存在联系。倘若要我今天把反感的原因加以归纳，那么大体如下：施威格和安娜（当然包括他们周围的人：可怕的刈草人、教授、讲师）不是人（在离他们远一些的人中：合作者、社会民主党人中才产生了一点虚假的生命）。为了使这一点能为人接受，他们发明了一种将他们的地狱表象神化的传奇——那个精神病故事。但根据他们的本质，他们只能发明某种像他们一样非人的东西，于是反而使观众的恐惧增加了一倍。由于还把这一切表现得似乎是清白无辜的，并避开所有从旁边投来的目光，这种目光恐怕更增长了十倍。

你说我该怎么对韦尔弗说呢？我赞赏韦尔弗，甚至在这个剧作中也欣赏他。当然，在这里欣赏的只是，他竟有力量跋涉过这么一片淤泥地。我对这个剧的感觉是一种隐私，我觉得它好像是为我一个人写的。他是怀着动人的友情到我这儿来的，而在相隔数年后相会，我却用这种没有头绪的、理不出头绪的批评来接待他。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通过一通唠叨，从心里驱出了一些厌恶情绪。可是我整个晚上、整个夜里痛苦地回想着这一苦果。而且我兴许也伤害了皮克，由于沉浸在激动之

中，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而且是在皮克走后我才谈到这个剧作的）。

我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

祝您

生活中和舞台上一切顺利！

弗

〔1922年12月于布拉格〕

414.致弗兰茨·韦尔弗^[46]

亲爱的韦尔弗：

我知道，在您上次来访时我作出了那样的举止后，您是不会再来了。如果不是写信于我渐渐变得艰难，就像讲话于我那样，如果不是甚至寄信都变得艰难起来（因为我已经给您写完了一封信），那么我一定已经给您去过信了。重提旧账是没有用处的；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能抛弃不断为他过去的可悲行为辩护和开脱的习惯，那么他又怎能成得了什么气侯呢？只有这一点，韦尔弗，您自己一定也知道，如果事情牵涉的仅仅是一般的不快，那么也许比较容易说清楚，而且说不说也没有多大关系了，那样我完全可以对此闭口不谈。但那是一种震惊，很难把这种感觉解释清楚。当事人也许只是不愉快，但看上去是那么固执、倔头倔脑、不服帖。您无疑是一代人的一个领袖，这不是奉承，这话不可能作为溜须拍马的话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走在沼泽地中的这个社会有些人是能够引导的。所以您也不光是领袖，而兼有更多素质（您在给勃兰德遗作写的出色的前言中说过类似的话，那篇前言除了“愉快的欺骗欲”外全部是出色的），人们怀着狂热的期待心情注视着您的道路。而这回却出了这么个剧作。它可以拥有一切优点，从剧场效果到最高境界，但它归根结蒂意味着退出领导地位，这里面甚至无领导地位可言，有的倒不如说是对一代人的背叛，是把他们的苦恼遮盖起来，加以轶事化，亦即剥去其尊严。

我现在又像当时那样开始唠叨起来了，却没有思考和表达关键问题

的能力。只能如此。如果不是我的关注，我对您的最自私的关注是那么强烈，我甚至连唠叨都不会。

现在该谈到那起邀请了。如果能把它作为文件拿在手里，它看上去就会更了不起、更真实。障碍是疾病，医生（他又一次坚决不同意我去塞墨林^[47]，但反对早春去威尼斯的意向并不坚决），当然还有钱（我要每月收入上千克朗才有可能应付），但它们根本不是主要障碍。从四肢伸展躺在布拉格的床上到直立着在马库斯广场^[48]上散步，这两者间的距离太远了，只有幻想才勉强能够跨越这段距离，但这还只是一般而言的；此外还有比如产生这么一种想象，我同许多人一起在威尼斯吃午饭（我只能一个人吃饭），这种想象甚至把幻想也吓跑了。但不管怎么说，我手里攥着邀请信，对您表示万分感谢。

也许我能在1月份见到您，祝您安康！

卡夫卡

〔1922年12月于布拉格〕

415.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近两晚我低烧37.7℃。白天则热度低，或者说不发烧。但不管怎么说，我不敢外出。祝您柏林的斗争和其他事情顺利。衷心问候那几位我一直未能听到其描述旅行见闻的旅人。

你的 弗

请别为我买歌德的作品了，一则我没钱，所有的钱都要用在医生身上，而且还不够；二则也没地方放书；三则我毕竟已有5卷歌德的作品，虽然不成套。

〔估计写于1922年12月〕

41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来不了，7点钟得吃饭，否则会根本睡不着，针药的威胁起作用了。此外正好今天（每天如此）我有点不轻松的事要做。

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在进行训练的古罗马斗士。这斗士不知道别人想在他身上得到什么，但结束别人要他完成的训练后，或许有场大搏斗。在全罗马城面前进行的大搏斗等着他。

〔可能写于1922年〕

417.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你别来！我有点发烧，正躺在床上，我未报知蒂伯格博士^[49]，如果你认为必要，可否不做此事？我这就给你寄两期《警卫》和一期《自由》来，关于《自由》的名称问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两种不同看法（笔记和诗）。

衷心问候你！

弗兰茨

〔可能写于1922年〕

41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请不要在这事上理解偏了。情况让我觉得，仿佛我讲过我们的那位小姐想下午去剧院似的。错啦。晚场票也是受欢迎的，甚至可能更受欢迎些。

F.

〔可能写于1922年〕

419.致M.E.

亲爱的闵策：

我自己几乎都不能相信，直到今天才对那些给我带来如此快乐的鲜花，才对住所的安慰，才对您催促我去卡塞尔的提醒表示谢意。近段日子极不安宁。母亲很突然地、极为急迫地需要动次大手术。尽管万分紧迫，但因为一种中途冒出来却与手术有干系的病，而做不得手术。于是，经历一系列最令人痛苦的手术后，又只好日复一日地将手术后延。可怕的医学，可怕人类的可怕的发明。

等这一切过去后，我再写信。您可是将您的地址寄来呀，或者，地址写“卡塞尔附近的威廉山”就够了！

一切顺利！

卡夫卡上

嗯，甚至把这几行字都漏了，它们到达特普利茨，也许会晚一些。昨天动了那次极严重的手术。

〔1922/23年冬于布拉格〕

1923年

420.致奥斯卡·鲍姆

你们这些可爱的人，请接受我的祝贺。你们这些坏蛋，为什么不及时告知我生日庆祝会^[50]呢？我与马克斯和费利克斯，会面的机会也很少。那消息是前几天偶然得知的。庆祝会已改期于16日举行，我昨天才知道。难道要我一辈子都记着（改期的事也未及时告知我，不过，你们没责任），庆祝会只是在星期六才会举行吗？昨天我冷得发抖，没法外出，未能更详细地打听。如此这般，一切在没有我参加的情况下发生了。那些书也是未加选择的，是偶然的。庆祝会就其实际规模而言已超出我的想象。只有我参加庆祝活动不取决于日期和准备工作的情况。

祝生活愉快！也许我到底会到你们这里来一趟。

弗

如果莱奥不喜欢或不了解其中的某些书，他可在卡尔夫那儿调换。比方说在这套丛书中[51]，可找到相当不错的书，诸如：深海探险，达尔文的著作，斯文·赫丁的作品，南山的书；或者，在一套类似的[52]、由布罗克出版社出版的、在卡尔夫那里也有存书的丛书中，或许也能发现一点他中意的东西。

〔1923年1月中旬于布拉格〕

421.致M.E.

亲爱的闵策：

我的上一封信，他们在特普利茨可能再也收不到了。信中述及我母亲的一次大手术。现在她已做了手术，现在似乎慢慢地、极缓慢地恢复过来了。

这件事和其他事妨碍了我早点给您写信。而其间您真的就呆在您寒冷的园圃里。这很艰难，闵策。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是一次完全绝望的、犹太人的行动，但据我看来，其绝望中自有辉煌处（此外，事情也许决不至于如此绝望，而像今天我在经历了一个就我的情况来说也显得非比寻常的、毁灭性的失眠之夜后所感到的那样）。我们不能拒绝这样一种想象，即一个孩子在戏耍时孤零零地玩着某一种闻所未闻的爬沙发游戏或者诸如此类的游戏，可那位已完全被忘却的父亲在一旁瞧着，且一切比它呈现出来的样子安全得多。这位父亲可能就是，比方说就是犹太人。另外，您会希伯来语吗？或者您至少曾开始学习希伯来文？您的未婚夫是犹太人吗？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吗？

其实，在这整个行动中，使我忧虑的只是身体上的疲倦，您有时在信中提及的疲倦。这是某种疾病的征兆吗？或者只是，或者绝大部分是那种不足为虑的、通过甜美的睡眠（我享受不到）即可消除的疲倦？

如果我精神状态好转，我会再写信的。

祝您安康！

这点也许有助于解释那种令您费解的、凭自身的力量不能产生的、对冷漠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反抗。

〔1923年1/2月于布拉格〕

422.致M.E.

亲爱的闵策：

真是一个美好的、大大的惊喜！太出人意料了！可这又是世界上最顺理成章的、最合情理的、最理所应当的事。在此惊喜时刻，有一大堆问题要问，写都写不过来了。在布拉格见到您，我会很高兴的。请您代为问候您的未婚夫！祝您在这个大变动中保持愉快和身体的强健！

卡上

〔1923年3月于布拉格〕

423.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只能答复以前的信。例如您最近的一封信就是出于恐惧的动机，或是因为急不可耐，或是因为下述评语：“……不能坚持住，即使最多由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评语里，确实没有丝毫真实性。姑且不谈这点。但首先是因为恐惧。这是对一种暂时——我根本不谈未来——不可分的、被强调的、已表达出来（我把私下的协议除外）的关系的恐惧，是对具备所有密不可分的圣礼的、面对天空堂皇而坐的关系的恐惧。对我来说，同男人建立联系之不可能，一如同女人建立联系。人处在漫游过程和乞讨状态中，要这么伟大的东西干什么？每一分钟都有避不开的、可让人狂喜地加以利用以进行最无耻的自我吹嘘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其他的机遇？此外，损失也许并不像它有时显现出来的那样巨大。假如我们能感觉到某种东西例如方法上的共同点，那么这里面就有了足够的联系，其他东西则可托付给星星。

所有这类恐惧，您向我打听得如此详细，好像与您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只与我相干。假使这儿通过忏悔或诸如此类的仪式可达到什么，那么我自己也许应承受这种恐惧。难道恐惧就有那么一点儿甚至如此奇特

的东西么？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德意志犹太人，身患疾病，在已恶化的个人状况下生活——这一切形成化学力。我愿凭借这类化学力立即将黄金变成砾石，或者将您的信变作我的信，并保留这种权力。

〔1923年3月底于布拉格〕

42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也许书面答复这封信比较好。

信整体上包括我以前已知的事，和您可以随意翻过来看的事。但翻过来看也跳不出这个圈子，事情仍然是您对物质失望了，并在您自己和我面前声称，您已对关系失望。对您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痛苦，而且还是一种您给我带来的巨大痛苦。您肯定快要发现这个错误了，但目前看来，到那一步尚需一些时日。这一发现也不会带来拯救，就像在此只会发现失望一样。一个人发掘得愈深，失望也就愈大。

如果您在玛特拉与布拉格之间弄出如此深刻的区别来，那您就错了。在玛特拉，您同样一直为失望情绪所笼罩，那儿的“高山”确也不是天国所在的高山。

就……〔此处一词被涂掉，无法辨认〕方面的评语而言，这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我在此事上怎么会错了呢？当您在第三者（也许只是对此完全不感兴趣的伊雷妮小姐）面前惬意地大声讲述我因为饶舌而将之作为巨大的秘密对您吐露的事情时，当我试图制止您、而您却仍带着微笑、兴致勃勃地复述时——我怎么会错了呢，我不懂。

不过，在谈关于悲伤的问题时，您讲得对。这虽然是个不诚实的、令人尴尬的问题，但为什么偏巧该是我不可以提这类尴尬的问题呢？这些尴尬问题难道是为我发明出来的？

所谓“不平等”的表现是，一听到主人的脚步声，我们这些绝望的老鼠就向四下里逃窜，比如逃到女人那儿去，您投奔某人，我投奔文学，当然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自己留心选择避难所，选择独特的女人们，等等。这便是那不平等。

我得承认，在玛特拉和布拉格的我是有区别的。在饱受疯狂年代鞭

答以后，我又开始写作了，而这种写作是以一种对于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来说最残酷的方式进行的（残酷的程度闻所未闻，对此我一点都不想谈），对我来说这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一如狂想之于疯子一样重要（如果他失去了它，他就会发疯），或如妊娠之于女人一样重要。正如我在此反复强调的，这同写作的价值毫无关系，这种价值我了解得太清楚了，写作对我的价值我同样了解得太清楚了……所以我怀着战战兢兢的恐惧抱住写作，用身躯挡住一切干扰，我所抱住的其实不仅是写作，还包括与此相关的孤独。比如我昨天说，您不要在星期天晚上来，而是到星期一才来，您问了两遍：“那么晚上不行^罗？”那么我至少在您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必须回答，我说：“您好好休息吧。”这话是百分之百的谎言，因为我想看的其实是我的孤独。

所以，这一区别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玛特拉相比较而言的，否则，就没有区别了。当然^罗，这也并不是指此地的我不像在玛特拉时的我那样“无力”（一如您准确的表述）这一区别。

这里附上的信，是我晚上凭着相当坚韧的毅力写下的。在那个半为失眠、半是惊梦的夜晚，我还打好了另一封信的腹稿，但眼下在明亮的白天，这信却又显得不合时宜了。唯有一点可取，您书信的真与美，您目光的真与美，无论如何应得到我以我的真与丑作出的回答。这件事我也一直在做。口头上和书面上，自躺在躺椅上的第一个下午起，自寄往伊格洛的第一封信起，一直在做。您不相信我（而我信任您），这正是最让人痛苦的地方，或者还有更令人不快的事。您既相信我又不相信我，既用信任敲打我，又用不信任打击我，至少是不断地用“您为什么就是您现在的样子”这一事关要害的问题追问并点燃我。

此外，您信中有条消息，联想起您在博士面前结巴的情状，才使我明白过来，但我不信。在我俩的交谈和书信中，有一点历来是确定不变的，即您不能在布达佩斯念大学。主因有三：您应入世；您在您表妹身边没法生活；尤其是那儿的政治局势堪忧。几乎在所有来信中，您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就在您上一次要我代办护照的信中，还这么说来着。您说，普雷斯堡市政当局的居留证无论如何要换成新护照，因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滞留在匈牙利不出来便意味着死亡。（虽然我觉得您夸大其词了，但这至少足以说明，您老早即认定，布达佩斯作为上学的地方，于您应排除在外。）在最近一封自布达佩斯寄来的信中，您又重申，您在表妹身边没法生活。因此，选择布达佩斯不可能，这点我肯定。但至于

我，是不必考虑的，除非事情牵扯到在布达佩斯之外的地方挑选大学，才可谈到我。我认为，您考虑到我的情况和别的事情而选择布拉格，是正确的，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只能是在布达佩斯上学不可能。不过，不要因为顾及我而认定不可能。在这件事上，您昨天的来信会引起一种变化。在这件事上，您错了。

〔1923年3月底于布拉格〕

42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定然误解了您。几天来我在等您的回信，所以没有再写信。您不是说过，为了看12号帕伦贝格的演出，您一定会来这儿的么？现在演出推迟了，推至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可您仍未来布拉格，我不能像我期待的那样，在您的保护下去剧院在站位上看戏了。尽管如此，您在那儿时间呆长一些，当然很好，这一点清楚地由您两封信间的区别表现出来了。由于所有感到惊异的先生们的大门没有立即打开，您便失望了。主要的事情是贝格曼已来布拉格，他要呆4周，您会见到他的。与他在一起，既激动人心又有吸引力。——盼着的那封希伯来文信未到，所以我也仍未写信。——代向所有该问候的人致意。薇拉在我房间里等着问候的消息，因为她还不知道能以书信问候呢。而且她还以为您在我这里。——包裹到了。谢谢。

〔明信片，邮戳：1923.4.中旬一布拉格〕

426.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万一我因脑部的状况最近几天不能来，那也不打紧，这里是信的译文：“The Workersbank Ltd.[53]Jaffa-Tel Awiw-P.O.B.27（这是邮政专用信箱），信的编号：2485。——贝格曼博士写信给我们，说E.W.已对他许诺，她有意于工人银行的股票，将向您的熟人们售股。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您记起您的许诺并请您通告，您是否需要从我处索取资料或宣传材料。您希望得到的一切东西，将立即寄来。我们会为此事操心

的。而且我们将从这里尽自己的所能支持您的工作，只要您告知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复函为盼，顺致崇高的敬意——”

我留下这信作几天的宣传。对我的一个妹夫（他否认巴勒斯坦）来说，纸写笔载的东西是最有力的证据。我想用这封信试试看。

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 上

1923.6.12

427.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我还在同一个晚上怀着恐惧、一种在野兽炯炯的目光前感到的恐惧，把它^[54]通读了一遍，它仿佛朝沙发移了过来，这些事我们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但谁又有本事做呢？几年前我曾无力地试过一回，结果非但未摸到写字台前，反倒爬到了沙发底下。在沙发底下总是能找到我的。在你的故事中，第二个意欲和解的、温柔的谜，给人以慰藉。不过，这太弱了，以致起不到调解作用。没有对希望的前瞻，只有对其失败的展望。人情味不足，也太不真实，不然，我会觉得很美的，这柔柔的一圈正在蔓延的火。

故事的开头，我认为从外部看显得太不安宁了些，而且旅馆味太浓，侦探小说味太过。但该不该设计成另外一副样子，这也很难说。或许开篇这么写恰恰很有必要。至少别人从他房间旁走过去和野性能在那里平息下来、化为一片宁静这几处写得极出色。如果我不是怀疑你对这类开头有种偏好，如果我只是因为这种怀疑而非其他缘故便对这儿的必要性略有疑问的话，那么我可能也既不会感到又不会注意到这一批评的。

多谢了！

弗 上

〔1923年夏〕

428.致马克斯·勃罗德

她是迷人的。她是那样全神贯注地注意你，她的任何动机都牵涉到你。一辆波罗的海列车，你也许在里面，有些地方她曾同你一块儿游览过。过了一会儿我才理解，她为什么让自己描述“Hradschin”。[55]她总是一个劲地反复讲这样的话：“很奇怪的是，一个人怎么会接受他所爱的人的观点，哪怕这些观点与自己历来的见解相左。”确实非常纯朴，爽直而且真挚，孩子般可爱的真挚。我曾同她乘车去埃伯斯瓦尔德参观普阿的犹太儿童夏令营地，可埃米的家神占了上风，我们便在贝尔瑙停住了。最使她开心的是那儿的一个鹳巢，那是她很快发现的，快得不可思议。她对我很好。——我在这里还过得去，头几天跟往常一样。犹太民族疗养院的一个夏令营地，那些健康、快乐、蓝眼睛的孩子使我感到高兴。

衷心问候你和你夫人！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23.7.10日—波罗的海米里茨浴场〕

42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作那次旅行和去柏林，费了我些力气，但这一切努力换来了甜蜜的结果，借此我得以一时摆脱开那些幽灵。我简直看到，人怎样在拐角处消失，而幽灵们又怎样彷徨无计地站在那里。不过时间并不长，那些猎狗似乎已发现踪迹。——大海在头几天很令人喜悦。希伯来文比在布拉格时学得少多了。这儿有个柏林犹太民族疗养院的夏令营地，里面有许多讲希伯来语的人，而且还有健康、快乐的孩子们。这是对普阿的夏令营地的一种替代，那儿我未去成。当时我不知道，埃伯斯瓦尔德离柏林差不多有两小时路程，所以下午才去（不是一个人去的），而后半路在贝尔瑙停了下来，并从那里给普阿写了信。我只在柏林待了一天，疲倦，且有点发烧。

衷心问候您！

代向朋友们、熟人们问安！

弗

〔明信片，邮戳：1923.7.13—米里茨〕

430.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我未收到您提及的本月12日的询问信。之所以如此，看来是因为这信也像您上次的明信片一样仍寄到“波里克7号”去了，尽管我已多次致函出版社，不要将信寄到“波里克7号”，而只往“布拉格，老城区环行路6号/III”寄。《饥饿艺术家》去年已在《新评论》10月号或11月号上刊载。

顺致崇高的敬意！

卡夫卡博士

〔明信片，邮戳：1923.7.13—米里茨〕

431.致胡戈·贝格曼

亲爱的胡戈^[56]：

多谢你的问候和祝愿。这是我从巴勒斯坦收到的第一封希伯来文信。信中的祝愿也许有巨大的力量。为检验我的活动能力，在卧床多年、头痛数载之后，我作了一次小小的旅行，来到了波罗的海边。不管怎么说，这次旅行于我是幸福的。离我阳台50步，是柏林犹太民族疗养院的一处夏令营地。透过树林，我可看见孩子们在玩耍。一群快乐、健康、热情的孩子。一群因西犹太人而免遭柏林之祸的东犹太人。半数的日日夜夜，这里的房舍、森林和海滩间，都充满了歌声。如果我身在孩子们中间，我是不会快乐的，但我站在幸福的门槛前。

祝生活愉快，

代我问候你勇敢的母亲和你的孩子们！

你的 弗兰茨

〔1923年7月于米里茨〕

432.致埃尔泽·贝格曼

亲爱的埃尔泽夫人：

这次为日后长途旅行作准备的小尝试，我挺过来了，感觉既不很坏，也并非荣耀得很。为长途旅行作准备而进行的尝试，比之为大的旅行作铺垫的尝试，毕竟还是差了点。——您就不能暂别那花园而来海边随便什么地方住住么？在我不曾与之谋面的十年里，大海的确变得更美丽、更多姿多彩、更生动活泼、更年轻了。但更使我感到高兴的，还是柏林犹太民族疗养院的一处夏令营和营中健康、快乐的孩子们。孩子们让我心里暖融融的。今天我将与他们欢度“国王晚会”^[57]，我相信，这是我平生第一遭。

祝您生活愉快并请代向小家伙们问好！

卡

〔1923年7月13日于米里茨〕

433.致埃尔泽·贝格曼

亲爱的埃尔泽夫人：

不单是了解隔几日便有变动的邮资价目单时存在的困难，拖延了写信的事。我知道，我现在肯定不能乘车旅行——我怎能乘车呢——但轮船带着您的信严格按照规定地泊在我房间的门槛前，您站在那儿，询问我，如此这般地询问我，这就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了。此外，您自己——研究古怪的事情是那么切近，不可思议的切近——部分地道出了对您那个问题的答案。假定诸如此类的什么事，对我来说尤其是可行的，那么，现在就会变得不像是真正的巴勒斯坦之行了，完全不是了——此外，不管会变成什么样子，眼下我都不能来，因为刚好您谈及那桩蠢而又蠢的事情的挂号信到了。第一点，如果当时我知道，那本书对您确有某种价值，那么我也许不会想到写信时提书的事，简直还会有骄傲与快乐的心境呢，因为书随您漂洋过海去巴勒斯坦了。第二点，假使说起这儿（这里的环境有点像花园）时不是大加赞颂，那么，我压根儿就想不起那本书来。第三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母亲可能也会像我期望的那样

去做，可惜的确没有这么做。在这件事上恶劣的做法，肯定不是针对您个人的，请您相信这一点，而是针对那份“巴勒斯坦危险”的。让我们就此抛开此事吧，但也并不是没有请求。我请求，您使用书的时候，能从书上看到愉快，让该书以它前任拥有者的名义通过愉快来为您效劳，尽管您千真万确已从前任拥有者手中买下了这本书。

让我们把话题引回来，这会变得不像是巴勒斯坦之行，从精神这层意义上来谈，反而有点像一名私吞了许多钱款的出纳员的美国之行。而且，如果同您一起作了这次巴勒斯坦之行的话，那么这件事精神上的犯罪，还会大大加重。不，我因此而不可以去巴勒斯坦，即便我能够这么做——我再重复一遍。况且您还补充道：“所有的位置已为人占去。”而现在，诱惑重又开始了，回答也还是“绝对的不可能”。事情就是这样。哦，多令人悲伤，可这归根到底又是很正确的。把希望留待将来吧！您很善良，不要打扰这个希望吧。

祝您生活愉快！请为我而保持健康！

卡上

〔1923年7月于米里茨〕

43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罗伯特：

这又是怎么回事？包裹（您怎么将它寄到普阿那里去了？那是老地址）和注释（我正考虑是否该买一本呢）于昨日寄到，但不见您的消息。是塔特拉沉重的气氛又让您感到压抑么？是那儿学希伯来文不可能？我相信居民点的力量，或者说得更确切点，相信人的无能。其实也没什么可告知的，但要指出的、要共同经历的东西却不少。为了使这点成为可能，我最近梦起您来了。哦，夏令营，夏令营，这些年轻人。罗伯特，您把布拉格于您的价值、您将那儿认识的个别的人于您的价值，夸大到什么程度了哟。人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别于彼处的我们。明年您应将您的生活设计成另一副样子，也许该离开布拉格，比如去柏林那些肮脏的犹太人胡同住住。——就我而言，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在睡觉、偷懒。今天这个糟糕的夜晚，只是偶尔有些许曙色从夏令营的房舍那边透过来。

代为问候格劳伯尔和其他人！

弗

〔明信片，邮戳：1923.7.24—米里茨〕

43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明天写信，今天只寄上普阿暂时的、可明天将有变动的地址，
即：米里茨，犹太民族疗养院。

一切顺利！

弗

〔通信地址，再加上用希伯来文表达的问候和“普阿”这一签名〕

〔风景明信片，邮戳：1923.8.2—米里茨〕

436.致蒂勒·勒斯勒尔^[58]

我亲爱的蒂勒：

邮局把你的信弄颠倒了，第二封信中午到，而第一封晚上才来。晚上这封信，我是在海滩上接到的。当时多拉也在我身旁，我们正在读一点儿希伯来文。那是很久以来第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这样晴和的天气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孩子们吵吵嚷嚷的。我不能坐到我的沙滩篷椅上去，因为妹夫坐在那儿处治玩足球弄伤了脚趾，于是我站着看你的信。与此同时，菲莉斯试图用石块击中我身后立着的一根桩，那些石块有的从我头上飞过，有的落在我周围，有的击中了我，但我依然平静地读你的信。我很高兴，你想念我们；同时也欣喜地发现，你远没有，至少根据我此刻的感觉，远没有因为离开我们而失去您以为会失去的那么多的东西。这里已不像以前那样令我满意了。我拿不准，事情的起因是否仅是我个人的疲惫、失眠和头痛。可为什么这些因素以前产生的影响要小些呢？或许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得过久。有些人，只有出外旅行，才有找到家的感觉。这便是从表面上来看的事情的全部。犹太民族疗养

院的所有人对我很好，比我能对他们所表露的好多了，尤其是多拉（我与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真是个好心的人儿，但我觉得疗养院已不像过去那样让人看得分明。某件看得见的小事，在我看来，已对它的形象有所损害，另一些看不见的细微处，则在继续起损害作用。我作为客人、作为陌生人、作为一个疲倦的客人，没有机会说话，不可能得到那种“分明”，所以我失望了。到目前为止，我每晚都待在那儿，但今天晚上，尽管是“国王晚会”，正如我担心的那样，我不会过去了。

因此呢，对我妹妹（她丈夫来接她了）不是等到10号才离开这里，而要提前几天走，我也并非很不满意。我将同他们一道走，这样要舒服些、便宜点，主要是因为我不愿一人留在此地。如果不是太疲劳，我会在柏林呆上一、两天的，那就一定来看你，不过，即使我不在柏林停留而即刻继续启程去马林巴德浴场我父母处（以便能花一天时间也去一趟卡尔斯巴德浴场。遗憾啦，这样见到的就会不是蒂勒而只是上司先生了），我们不久也会见面的，因为我希望过一阵子就再来柏林。

最近我这里有客人，是个很好的女友，巴勒斯坦人，我曾对你提起过她。她是与弗丽达·贝尔（她以前就认识我这位女友）同时来的，住在俱乐部。客人很快就走了。在此逗留的时间不到一天，但她的自信、她的沉静的愉悦，却化作一种鼓舞力量，留了下来。你该在柏林与她认识认识。

你把碗写成“Schaale”^[59]，很逗，据我看，这就像人们把“问题”当隐语来写一样。是的，碗也应是一个向你提出的问题，即：“蒂勒，你，你到底啥时候让我玉碎？”

为了那只从你那里谋得的花瓶，我有时得与房东3岁的女儿克里斯特尔较劲。她是这里家家开放的花儿中的一朵，娇小、金发、白肤，还有红润的脸颊。她什么时候来都想拿我那个花瓶。她借口想看阳台上有一个鸟窝，闯将进来，人还没有挨近桌子，手便伸向了花瓶。她并不拐什么弯儿，也不多费口舌，只一个劲地反复嚷嚷：花瓶！花瓶！她坚持要求她这份天经地义的权利，因为世界是属于她的，更何况这只花瓶？花瓶可能惧怕孩子残酷的手，但它是不必害怕的，有我总在一旁护着呢，我绝不会把它交出来的。

请代向疗养院我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向比内问好。如果不是我心存虚荣，也想用希伯来文、用我自然要稍逊一筹的希伯来文作复，感谢她

用漂亮的希伯来文写成的信，假使我在眼下所处的不安中，找到了那本供学习希伯来文之用的文集，那么，我早就给比内写信了。

我所有的亲戚，也让我代向你、特别是向孩子们衷心问候！你中午那封信到的时候，费利克斯与格蒂为谁可以先读信的问题，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呢。到底谁先谁后？难下断语。费利克斯说她年长些，而且信也是她从邮差手上拿回来的；格蒂提出的理由则是她与你的友谊比菲莉斯与你的友情更深。可惜后来是武力起了决断作用，格蒂便以她独有的、卓异的方式噘起了嘴巴。——你听到了格里克的什么消息吗？这其实是我对你最后一个完全清晰的记忆。演奏钢琴时的情景，站在那里身子微弓、脸上略带扫兴表情的模样以及听音乐时你那种谦恭的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但愿你总能保持这种姿态！祝生活愉快！

卡上

声音么？医生么？我约过两周才去布拉格，在那儿的地址是：老城区，环行路6号3楼。

〔1923年8月3日于米里茨〕

43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我亲爱的罗伯特：

依自己的经验我绝对不懂，也根本没机会懂，一个平日快快活活、大体上无忧无虑的人，会仅仅因为肺病而死亡。关于格劳伯尔您真的没弄错？事情真的到了这一步，正如他总在声言的那样，没人愿意相信他？更兼这夏季多雨，“塔特拉”房子破旧，群山无情，问题严重啊！对他，对您，莫不是如此。

对您的病情，我不担忧。您吃饭漫不经心，着了凉也漫不经心，这就容易出事了，而且没什么预兆。

我头痛，睡眠不好，尤其是在近几天。我的脑子很久未轻松过了，当初赐我睡眠的夏令营地，现在又夺走了我的睡眠，但将来也许会还之于我，这真是一种活跃的关系。

星期一上午我们离开此地，不过，假如我能一人留下来，我可能就

不走了。在夏令营地，我不过是个客人，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不能单靠营地而生活。甚至连明确的客人身份也谈不上，这使我痛苦。之所以连明确的客人身份也谈不上，是因为一种个人的关系同公共的关系杂糅在一起。但即使在营地生活可能会有一些扰人的细节问题，即便依靠营地不是为维持生活，我认为我在米里茨和在米里茨之外的地方最重要的东西，也仍是柏林犹太民族疗养院的夏令营地。

我要在柏林停留一两天。如果不太累，就作次冒险，去卡尔斯巴德浴场待上一天。也就是说，自柏林经卡尔斯巴德浴场，而去布拉格。这趟旅行或许不是很贵。“冒险”从概念上谈之所以不像在我的术语中那样看上去了不得，是因为我已习惯于这么想，即乘车去马林巴德浴场我父母处。但我父母因忍受不了那儿恶劣的气候，早已去布拉格，我到那里也见不到他们。所以呢，绕道卡尔斯巴德浴场而非直奔布拉格，对我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算是一次小冒险。这情形有点儿像俄国皇帝也不可以任意改变其旅行计划一样，因为只有在预先安排的路线上旅行，才能确保他免遭突袭。我的生活状况也并不是就不好。

将来去布拉格吗？我不知道。您有兴致移居柏林吗？靠近一点，紧挨着犹太人^[60]住下？

有没有一种人们称之肺尖卡他的病？

请您代向该接受问候者问候！

卡

〔1923年8月初于米里茨〕

43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久已不闻你任何真正的消息。此刻在重逢之前的数日，我坐在柏林一家旅馆的院子里给你写信，并在旅馆中继续住下去，便是为了在我将手伸给你之前同你建立起某种物质上的联系。你沉浸在波罗的海度假时的那段时光里。你情况如何？至于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怎样。但我至少感觉到，仅仅一天的孤独所产生的坏影响几乎每隔一小时便变得更严重

些了。我绝不是一人独处，例如昨晚就与3个东犹太女友同看《强盗》^[61]。这场演出我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感到累得慌。我几乎不可能去艾米那儿，身体太虚了，加之弄不清艾米对我是怎么想的，如此种种，我便对一切生出恐惧来，更兼柏林在持续不断地威吓我。后天我可能会来你处。代为问候你夫人、费利克斯和奥斯卡。我未听到他们半点音讯。突然有个念头跃出脑际，也许你正出席代表大会，我根本会不着你。果真如此，那么对你快乐，对我是悲伤。

弗

〔1923年8月8日于柏林〕

439.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那桩事^[62]就这么过去了。罗伯特，您可能遭受了些什么呢？他又是一番怎样的经历？奇怪啊，那会儿在玛特拉最快活（当然也未作其他比较）的两个人，倒是先死了。真正去研究这类事也不可能，只要你还腰板直直地坐在桌边，心脏尚以一种勉强可忍受的节奏在搏动。《马吉特》^[63]一书中有个极出色的故事便谈到了这方面的事。故事围绕一根只有在极度的恐惧中方能见到的血管而展开。——我已离开卡尔斯巴德浴场，现在舍列森，住奥特拉处。普阿的地址：柏林W57号，维多利亚疗养院2楼，施泰因墨茨大街16号。马克斯在布拉格。关于柏林的情况，我会写信告诉您的。如果那儿的情况不是越来越糟，那该多好啊！——祝您生活愉快！好好休息！代向大家问安！

弗

〔明信片，邮戳：1923.8.27—舍列森〕

44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很乐意听你谈一点你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情况。我读了那则描述回归的、忧郁的笔记。但愿它体现的不是你情绪的主色调，我自己没什么好谈的，只是在费尽心力增一点儿体重——我来这里时，只有54.5公斤，还从来不曾这样轻过——但几乎不成，阻力太多，唉，真是一场搏

斗。这地方我觉得相当不错，到目前为止，气候也还相宜，但想必我是那些阻力宝贵的财产，为了我，阻力们魔鬼一般地彼此厮杀，或者，它们本身就是魔鬼。

生活愉快！代问费利克斯和奥斯卡！

F

〔明信片，邮戳：1923.8.29—舍列森〕

44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不信毁灭。可惜你有时候看问题同我一样，不过幸好你一向具备决断力。怎么是毁灭呢？最强有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道就这么依赖外在的事物？如果艾米眼下暂时处于最糟糕的时期，要做照顾孩子的保姆，那么，这固然令人悲伤，可也不是毁灭啊。你谈到愤怒的时候，所采用的说话方式，与你本人和你的事都不相符。议论那些你比我有把握的事，我这么做很蠢。我脑子的确笨，考虑问题也动摇不定，所以，能说出下面有点把握的话来，我很高兴。如果某个孩子用纸牌叠的房子因为一个成年人挪动桌子摇摇欲倒，那么孩子会生气的。但房子的倒塌，不是因为桌子挪动了，而是因为房子是纸牌搭成的。即使桌子被劈成木柴，真正的房子也是不会倒的，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别的基础。这便是如此理所当然的、如此美妙的事情。——我已给E.寄了两张明信片。下星期五上午我来你处。你什么时候去柏林？现在车费多贵？

请代为问候费利克斯和奥斯卡！

〔明信片，邮戳：1923.9.6—舍列森〕

442.致卡尔·塞利希^[64]

尊敬的先生：

我要在乡下逗留几天，您的信是别人转寄来的。对您友好的约稿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遗憾的是我现在无法参加这套丛书。以前写的东西

是完全无用的，我不能拿给任何人看；近来我却被远远推离了写作。但请您为我保留机会，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我会来找您的。

我记得您两年前来过信，请原谅我的旧罪。我当时的状况糟透了，以致我都不能给您写回信。

正如我对您的第一封来信那样，我也无法满足您的第二次要求，这两次要求是互相关联的，而且不仅仅是外部的联系。要满足这些要求，至少必须有一定的承担责任的力量，而这正是我目前所缺少的。此外我也只能提出一些您所熟悉的名字^[65]。

您亲切的信得到的收获很少，对不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于信。

致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卡夫卡 敬上

〔1923年9月于舍列森〕

443.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为您弄免费就餐证难道真的办不成？这可就严重了，看来我们得采取点措施才行。我无论如何会同马克思谈谈的。那篇关于卡琳蒂的故事当时在报上发表了吗？——本学期您就该去柏林的，这点我只是在第一次为犹太民族疗养院陶醉时想到过。在目前的情势下再去柏林，恐怕太难了，但以后还是应加以考虑的。这种孤独的布拉格生活，您不能再下去了。咖啡馆里读点文学作品，与室友作点儿争论，任你我之间悲伤和希望融合成的苦涩浸淫，同马克思保持些许往来，这一切太少了，或者，也不是太少。但如果我这个布拉格人也认为，这一切比其实际的情形糟多了，那么，它们就不是好养料。即使算不得太少，以我从犹太民族疗养院得来的印象来衡量，这一切也仍是令人沮丧的。巴勒斯坦可能去不成了，但鉴于柏林的前景，这也绝不是什么急迫的事。不过现在柏林亦难以成行了（我体温升高，还有其他毛病），而且，将去巴勒斯坦的旅行缩减为舍列森之行，也存在危险。但愿至少舍列森之行能实现！

但愿最终成行的不单是从老城区环行路到我卧室的电梯之旅。我母亲去了巴黎。

F

〔明信片，邮戳：1923.9.13—舍列森〕

44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星期五我可能还不会来。本想给父亲庆贺生日去的，但事情太美了，我指的是天气，而非体温的升高。于是我留下未走。遗憾啊，我没让晚报径寄此处，所以收到晚报很迟，而且报纸不全。博尔夏特美滋滋的，你瞧，他安享着你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又是如此的有力。

祝生活愉快！

弗

克罗普施托克写道：我现在又收到晚报了，而且，等待报纸，盼望马克斯的文章，就像祈盼着同一位久不谋面的挚友不期而遇。

〔明信片，邮戳：1923.9.13—舍列森〕

445.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外在事物不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等雄辩，我确不曾为之，虽然回忆我的对立面于我倒是一种乐趣。可这次我不仅谈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谈了最强有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不谈最强有力的外在事物诸如痛苦与折磨，而只谈马克斯下跌；我谈的不是随便某个人，而是你；不是影响的消除，而是“毁灭”的避免。马克斯，请继续承认这一切吧，请别生我的气。至于我，体重略有增加，外表看几乎觉察不到，但每天却可看到某种较大的缺陷，正如克劳斯所说，雨在破屋里慢慢往下滴。昨天有位老人在我面前站定，问：“您身子骨不太结实吧？”后来，我们自然也谈到了犹太人。他在一所犹太人别墅做园丁，是

那种良善之人，但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胆小怕事。此乃犹太人的天性。而后，他到树林里去了，为的是再捡满满一背篓干柴。我则开始数自己的脉搏，脉搏每分钟远远超过110次。

祝你工作顺利！

弗

〔明信片，邮戳：1923.9.14—舍列森〕

446.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如果在此后的12个小时内没有什么大的阻碍自那阴暗的潜伏区迎面向我扑来，明天我就去柏林，但只待几天。假使您过这边来，到时我或许也已回到布拉格。同马克斯只匆匆谈了几句。他今天（星期六）去柏林了。说不定我在那里能见到他。我现在可以想起来的事，只是我受两份杂志之请，即受《诗与散文》（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发行人为黑塞尔）与哈—奥黑尔的《帐篷》（维尔纳1区，克里斯蒂纳胡同4号；发行人为赫夫利希）之请，向其推荐优秀的青年作家。您有无兴趣？

祝您生活愉快！

我当然有点儿不安。

弗

〔明信片，邮戳：1923.9.23—布拉格〕

447.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那么我现在是身在此地了。确凿的东西自然还没有说。我在这儿已同马克斯谈过了。晚报就别提啦。匈牙利编辑无所作为地坐在编辑部里，相反——这到底要好得多——马克斯则准备而且也肯定有能力，在

学生食堂为您弄到免费就餐证。他很乐意办此事。您到后应立即去找他。此外，您是否知道闵策患了重病？说是肠癌？至少我母亲对我这么讲过。

等这里的情况——我指个人的情况——廓清后，再详细函告，或者，如可能便口头解释。您收到我自布拉格寄的明信片没有？

〔明信片，邮戳：1923.9.26，柏林—施特格利茨，米盖尔大街8号〕

448.致奥斯卡·鲍姆

亲爱的奥斯卡：

我最近在布拉格待过一天半，但没去你那里，尽管非常想见你们一面。我到柏林来了，已安顿数日，这一极大胆的行动，我是怎么可能完成的哟！就我的情况而言，此次行动大胆之极，回顾既往的历史，方可找到几桩能与之比肩的事例，例如拿破仑远征俄罗斯。暂时的情况很一般，一如往日。近段日子你也许会来柏林吧？（来看雕刻家戏剧！）或者，你的课程会拖住你？对于你的课程，我还不知道，是该感到悲伤呢，还是应平心静气地忍受。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家人！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任务而来柏林的话——

弗

〔明信片，邮戳：1923.9.26，柏林—施特格利茨〕

44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昨天星期四，她在我这里。这是我首次社交活动，即所谓“暖房之庆”。因为是首次，所以就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但紧接着我又不知道部分地加以纠正。她的确亲切而体贴人地忽略了这些错误，不过，得便的时候你也许可解释解释，作些弥补工作。首先，我就这么简单地用电话

邀她5点钟来，礼节上一点也不正规，而且当时打电话，除了她的笑声外，可惜什么都听不清，于是这种不正规的意味愈发浓厚了。其次，尽管我身体处于一般性虚弱状态，但如果我当时知道，她的公寓允许别人进去，“暖房之庆”或许能办得好一些，可我以为不能进去，因为7月份是这样的。再次，她带了些花来，我却没有备花。此外，这也许算不得错误，就是多拉在这里，多拉也认为搞次庆祝活动完全有必要。最糟的一点无疑是，艾米来时我正睡觉，唯一一次客人来时在睡觉。除了上述的不足外，我觉得一切还过得去。她看上去有些不安、烦躁，几乎劳累过度，但很坚强，且极思念亲友。我们说好了星期天参加犹太感恩节。这是次冒险，

对我如此，对她亦如此。我可能不会去吧。

万事顺遂！

弗

〔明信片，邮戳：1923.9.28，柏林—施特格利茨〕

450.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正等待艾米。上午我们要在这美丽的地带作次小小的散步。星期下午，我在她那里又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真叫我惭愧啊，总犯同样的错误！但主因是，我大约在动物园附近下车时，喘不过气来了，开始咳嗽，比平常咳得还厉害。我看到这座城市所有的威胁都联合起来对付我，我也试图在这户外保护自己免遭价格问题所带来的、实际的痛苦。人们极力帮助我摆脱此等实际的痛苦，但这座城市不容我摆脱。比如昨天，我就犯了一次严重的“支付幻想”病。我现在对你忧虑的理解，比以前深刻多了。你真是个可怜的、可爱的、不知疲倦的、坚定不移的人啦！我房间的月租金，原为28克朗，9月份已过70，10月份则至少要180。我也很清楚，艾米需要慰藉，但我觉得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比较大胆、比较有力，而且，俯就你的“最后的玫瑰”时，也是幸福的。——另外她今天没来，打电话取消了约会，说是明天来。她很可爱——其间我通读了《施台格利茨汇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天避而不做的事。糟糕啊糟糕，但那报纸里面，却存在与德国命运相连的正义，就像

你我相互倚恃，彼此需要那样。

还有：可惜你未能使母亲平静下来。

弗

〔明信片，邮戳：1923.10.2，柏林—施特格利茨〕

451.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已多日不见艾米。有次曾同她一块儿呆在植物园里，我俩相处不错。看上去她已不那么焦虑，又变得坚强了。自那以后，气候恶劣，施台格利茨再也激不起人散步的兴致，我对城市重又害怕起来。昨天是星期天，艾米来电话，说她略感不适。另外，我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咳嗽，咳得并不厉害，恼火的是咳的次数多。一个晚上都在咳。我星期天躺在床上，现在不咳了。也许我今天能了解点艾米的情况。——关于我的时间安排，还没什么好谈的，日子就这么悄悄地、无所事事地过去了。此外，魏斯博士在我处，昨天我第一次与他谈了谈。他人很活跃，易激动，是那种强者的易激动，既愤世嫉俗，又愉快自得，甚至颇有成就（与扮演塔恩雅的贝格纳开办演员剧团）。我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对他表示了这么一个希望，即或许在你的布拉格评论丛刊上，接着也要登载《纳阿尔》^[66]吧，但他不信。——克罗普施托克的身体情况想必很糟。他认为自己“堕落”了，因此不敢去找你。但他的文章使我心中充满一种常新的快乐，那种在读他的故事时所怀有的越来越深的敬畏之情，重又给了我一部分正失去的尊严。

最衷心地问候你！

代向费利克斯和奥斯卡致意！

弗

〔明信片，邮戳：1923.10.8，柏林—施特格利茨〕

452.致卡尔·塞利希

尊敬的先生：

现在我能给您呈献一点东西了，您看了或许会高兴的。您肯定知道恩斯特·魏斯这个名字，可能也读过他的某些作品。其作品《铁链锁住的野兽》、《纳阿尔》、《德莫能之星》、《阿图阿》）新颖，即使难懂，但有时对我具有极强烈的感染力。除上述叙事作品外，他还写成了一本论文集，想以»Credo quia absurdum[67]«这一书名出版。据我的感觉，这些论文具备其叙事作品的优点，却又摆脱了其叙事作品的自我封闭。

这里推荐两篇论文，作为样品《歌德之完美》和用作书名的论文»Credo quia absurdum«。此外，为了让您对他目前的创作有个概念，且呈上长篇小说《丹尼尔》的第一章。

下面是拟结集的几篇论文[68]的标题：

莫扎特，东方大师；

艺术中的宁静：现实性；

鲁本斯之生平；

道米耶[69]

《麦克佩斯》[70]简评；

语法的天才；

卢梭；

新小说；

塞万提斯；

论语言；

和平、教育与政治。

您关于出版该论文集的意见，请写信告诉我，或者，同时直接告知作者本人（恩斯特·魏斯，柏林W30号，诺伦多夫大街22a），这样也许

更好。附寄的3篇作品，作者有急用，您读后无论如何请寄回。

谨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卡夫卡 谨上

〔1923年秋于柏林—施特格利茨〕

453.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多谢你寄来《自卫》。我待在此地的时间比预计的长，所以，渴盼着这份杂志。我还没到莉泽那里去。白天太短，我觉得比在布拉格时过得更快，所幸它们的流逝要悄然得多。白天飞快地消隐，的确令人悲伤。这与时代的情形一样。如果人有一次从时代巨轮中抽出了手，那么，时代巨轮便会从他身边飞驰而过，此时此刻，人再也找不到可以放手的地方了。我活动的范围，几乎不出最贴近住所的环境。周遭的环境的确美妙，我住的这条小巷，大抵处于后半城区。小巷后面，散落着一座座花园和别墅。而花园，那是些古老的、花木繁茂的花园。在暖和的夜晚，散发出浓烈的芳香，为我别处之未闻。再往后还有那巨大的植物园，离我住处一刻钟的路程，更远处便是森林，所隔的距离花不了半个小时，但我还没去过。我这个小小移居者四周的景色是美丽的。——费利克斯，还有一个请求：如果能办到，就对可怜的陈普施托克略作些关照（比如介绍工作）吧。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家人！

弗

〔明信片，邮戳：1923.10.9，柏林—施特格利茨〕

45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艾米可能已告诉你，我不想回布拉格，现在不想，也许两个月之后回吧。你的担忧是没有道理的，我不读报，迄今还未感觉到时代的恶果

对我身体的影响。我活着。就饭菜而言，做得很精细，同在布拉格时一样精细。天气不好时，我便待在房间里，偶尔提及的咳嗽，也没再犯。严重些的事当然是夜之幽灵最近找上了我，但这也不能成为回布拉格的理由。如果我注定要做幽灵的牺牲品，那么，我也宁可在这而不是在布拉格，但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更何况，我不久就会见到你！劳驾你给我带一手提包过冬的衣物来。手提包是会作为你随身的行李托运的，你把凭单交给行李托运处就行了。只是在博登巴赫要为手提包辛苦一下。您愿办么？我同艾米会过几次面，觉得她又变愉快、强健了。每次与布拉格方面通电话后，她显得尤为精神。

弗

艾米的三篇文章，给了我巨大的快乐。

〔明信片，寄达邮戳：1923.10.16，柏林—施特格利茨〕

45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Frydek^[71]是一条好出路。我很高兴您找到了这条出路。什么时候考试？——谈谈我几点多余的忧虑，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有可能，我便很乐意在此过冬。如果我的情况在历史上属于新鲜事，那么，我的忧虑就是有根据的了，但我们并不缺少先行者，例如哥伦布，也没有航行几天便立即掉转船头。——至于我的饮食，我没有在大型的社交场合用餐，而只有暗感羞愧的机会。此外，施台格利茨这儿的生活安宁，孩子们看上去很健康；乞丐并不强讨硬要，使人惊恐；早年的富裕时期留下的底子，依旧厚实，从相反的意义谈，就是令人惭愧。但对内城区，我不感兴趣，只去过三回。波茨坦广场，就是施台格利茨区议会前的广场。我觉得那儿仍过于嘈杂，所幸一离开广场便可潜入静寂的林荫路了。

一切顺利！

F.

我已给马克斯和费利克斯写信，您去找他们吧！

456.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现在什么都不写，这是真的，但原因不在我有什么需要隐瞒（只要隐瞒不是我谋生的职业），也不是因为我会向你要求亲密的时刻。有时我感到，自我俩一起在上意大利游湖以来，就再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时刻。（这事说起来，有某种意义，因为我们那时曾有过也许不值得怀念、但的确纯真的纯洁，接受了或好或坏委托的邪恶势力，而他们轻而易举地摸到了入口，闯进入口而无比高兴。）如果我不写信，那么首先能追究出来的便是“策略上的”原因，这差不多成了我近年来的通例。我不相信文字和信，不相信自己的话和信。我想同人们分享我的感情，但不与玩弄文字、读信时直吐舌头的幽灵分享。对信函我尤其不信。为了将书信安全送达收信人手中，封好信封就成——这种想法比较奇怪。此外，这儿战争年代的书信检查机构，富于教益地造就了具有特别的勇敢精神和讽刺性坦诚的幽灵时代。

但我也写一点儿东西（前面我有几句话忘了讲，有时我觉得，艺术的本质与艺术的存在，单是从这类“战略上的考虑”入手，便可加以解释。艺术使人对人说真话成为可能），因为我在继续过我在布拉格时的生活、在继续干我在布拉格时做的、过去仅略有提及的“工作”（这么做于我是必然的事）。你也应想到，我在此地的生活，半具乡村风味，既没有处在真实之柏林残酷无情的压力下，又没有处在其教育的压力下。这也是能把人惯坏的。一次同你一道访约斯蒂，一次在艾米那里，一次和普阿在一起，一次去韦特海姆处让他为我照相，一次是为了取钱，一次是为了察看一间寓所——这无疑是我近4周内全部的柏林之游。出游归来，我几乎次次感到愁闷，但同时又深感住在施台格利茨庆幸！我的“波茨坦广场”，就是施台格利茨区议会广场。那里只有两三路电车开行，那里少有交通往来，那里是乌尔施泰因的分公司、莫塞的分店、舍尔的分行。从那儿张贴的第一批报纸中，我吸吮我勉强可以忍受、但偶尔（正巧前厅里有人在谈论巷战）也一时忍耐不了的毒汁，继而离开这一公众场所，如果还有气力，便让自己隐入秋日寂静的林荫路。我住的街道位于后半城区，再往前走，一切便化为花园与别墅的宁静。这儿的每一条街，都是花园中漫步的幽径，或可能如此。

我白天的时光也很短，虽然9时左右就起了床，但不时躺卧，尤其是在下午。我很需要躺卧。此外还读点儿希伯来文，主要是看布伦纳 [72] 的一部长篇小说，但读起来很艰难。尽管存在种种困难，迄今我还是读了30页，不过，这也算不得是一项可以此为自己辩白的成绩，如果有人要求我就最近4周的活动作个解释的话。

星期二。那本书作为长篇小说，不太令人满意。我一向敬重布伦纳，也弄不清楚是为什么。其原因或许在于：耳闻的东西与想象的成分糅合在一起了，总有人谈起布伦纳的悲哀。是说“巴勒斯坦的悲哀”么？

我们还是谈谈柏林的悲哀吧，因为它离得很近。正在这时，电话打断了我，是艾米。她本应星期天来，可惜未到。此外，她有客访，也许这给她解了闷。客人一名是米里茨来的相熟的小青年，一名是柏林来的年轻画家，这两位英俊后生均具迷人的魅力。我非常希望这次客访能驱除艾米心头的阴云，目前她正深深地陷在白日的激动与爱的纠葛中，另外（你别以为我在经常举办社交聚会。只很偶然地办过这么一次。人前我感到害怕，与在布拉格时无异）她没来，受了凉。昨天我们通了电话。她激动不安。柏林的激动（对总罢工的恐惧，兑换货币的困难。但似乎刚好只在动物园那儿，也许只是昨天，才出现兑换困难，比方说今天，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兑换时就根本不存在拥挤现象），柏林的激动与布拉格的痛苦（我只能说马克斯对9号的事略有提及）搅和在一起了，而且柏林的激动的确具有传染性，通完电话后，我夜里还在同这些激动斗个不停。但至少她已答应今晚过来。我希望自己今晚之前能积蓄足够的力量，好安慰她。然而，这时她打来电话，声称来不了，因为她很激动。可真正的原因显然只有一个，即你旅行的日期，其他的原因不过是陪衬而已。她不承认婚礼是起阻碍作用的原因，“难道他为了消遣也要让别人心碎么”？我想，在布拉格的时候，我在类似的场合便听到过类似的话。哦，可怜而可爱的马克斯！幸福却又不幸的马克斯！如果你觉得能给我什么建议，能在艾米这里用上，那就尽管提吧，我肯定照办。目前我自己没有任何办法。我问她，明天能否去她那儿，她答，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在家（一切说得很亲切、很坦率），早上她要花一小时摆弄音乐，下午将去一个“也发了疯”的女友（她曾对我提起过这位女友）处，最后我们终于约定，明天两人再通话。这就是全部内容，大致如此。

星期三。恰巧9点钟，我又与艾米用电话交谈了。情况似乎好多

了，今晚与你约好的通话，预先起了安慰作用。今晚她可能来。新通话，新变化！她让人传话，说她中午就过来。我总在想，爱情和音乐无疑提高了艾米的精神境界，但同时又毁了她。怎么会这样？艾米以前在困苦的日子里过得极坚强，而今天，在一种尽管柏林这里存在种种恐怖，但生活表面上看来要宽松得多的环境中，却为外在事物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很理解她后一种痛苦，比她本人还要深刻得多，但她从前艰苦的生活，我可能忍受不了。

针对你提的问题再谈几句，我已能讲一点希伯来语。此外想去达莱姆那所著名的、离我住处不到一刻钟路程的园艺学校听课。有个听课者（巴勒斯坦人，迪亚曼特的一个熟人）告诉了我一些消息，他本想以此鼓励我，相反却把我吓退了。上实践课，我身体太弱；上理论课，我又过于急躁；白天太短；天气不好时我不能出门，于是听课的事就放在一边了。

布拉格我肯定是要来的，旅费也罢，劳累也罢，单是为了同你相聚、为了到底见上费利克斯和奥斯卡一面（在致艾米的一封信中，对奥斯卡有句极糟糕的评语。这仅仅是带情绪的评价呢还是事实？）也要来。但奥特拉劝我不来，最后母亲也拦我。没上布拉格做客，这样也好。但愿我在此能尽可能长地住下去。

你的弗

因为你兄弟婚礼的事，你得给我出个主意。

代我问候妹妹和妹夫！

为了过冬的衣物，我能耐心等到11月份。

你目前在写什么？长篇小说么？

〔明信片，寄达邮戳：1923.10.25，柏林—施特格利茨〕

457.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我已收到结算单。您要寄些书来，这令我非常高兴。在书的选择

上，我可否施加影响？现在我暂住柏林（柏林，施台格利茨区，米克韦尔大街8号莫里茨·赫尔曼家），这也许会使邮寄方便些吧？

顺致崇高的敬意！

弗兰茨·卡夫卡

〔明信片，寄达邮戳：1923.10.26，柏林—施特格利茨〕

458.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但愿自我俩布拉格匆匆一晤（此外，马克斯给我来信说，有一次曾与您擦身而过，您气色不坏。我念起您来，就总想着这一点）后，您安宁地生活在那儿的朋友们中间。或许化学也仍给希伯来文留下了一点时间。我在希伯来文方面进展甚缓。假期和在舍列森的那段生活，让我忘了许多学习上的事，忘得最多的是那种按时的、令人绝望的学习。我待在柏林已4周，布伦纳的一部长篇小说读了32页，也就是一天一页。小说名为《徒劳与失败》^[73]，您就解解这道化学分子式吧。这是一部对我来说各方面都显得很难且不太令人满意的作品，阅读时普阿曾两次帮助我，可现在我差不多有两周未见到她了。——那些在此可能展开的活动中，有一项失败了，但它几乎还未处在能够失败的阶段。离我住处不远的达莱姆，有所著名的园艺学校，我想上，但一名在那里听课的巴勒斯坦人告诉了我一些消息，把我吓退了，本来他是想给我鼓鼓劲的。上园艺实践课，我身体太虚弱；上理论课嘛，又太焦躁。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得往其他方向排遣了。

寄来的黄油大包裹，完好无损，多谢。

您母亲和兄弟身体可好？

请您代为问候施泰因贝格！

〔明信片，邮戳：1923.10.25，柏林—施特格利茨〕

459.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只就你的明信片讲几句，我的信你肯定是收到了的。星期三中午，艾米在我这里，我其实是用面包把她逗过来的。面包在施台格利茨好买，但星期二在柏林却难购，并非真的缺货，而是由于其他捉摸不透的、在此地目前状况下每天新产生的原因作怪（此外，只有星期二一天买不到面包。艾米买面包也不是留给自己吃，而是要送给她妹妹）。艾米激动不安，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在我住所时的兴高采烈和欢笑。不过，将她的激动仅归咎于柏林的状况，是不行的。激动与柏林状况之间的联系，只能从这层意义上来谈，即一天的面包短缺与兑换货币时存在的唯一的一次困难，两者所产生的影响，打开了那扇通向其他所有痛苦的门。这些“其他的痛苦”难遇，但碰上第一种痛苦却并不稀奇。另外，对一切事情我都可找到勉强的借口，唯独在一种情况下，即在她说她其实已放弃了一切的时候，在她说你每4周即便只来两天她也心满意足了的时候借口难寻。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尤其是在她又补了这么一句话（要是在温克勒尔那会儿，如果必要，或只是有益，或这么做单是为了让她高兴，你也会应她的请求，或者仅因为她一句话、一个暗示而不顾重重困难即刻奔过来的）的时候，我真是无言以对。她现在所要求的，就是你到她身边来。对她这项请求，当然也可以冠冕堂皇地作答，但在此种情况下不合适。

然而，这一切在眼下已不再是现实的问题。同你通话后，艾米给我来了电话，语调愉快，洋溢着欢乐。她说，一切安好，真有点“再生”的感觉——这表述更恰当、更强烈。我认为，她情绪上发生的转变，主要应归因于她为演员剧团聘用——无论如何都是妙事一桩，简直是对人的一种解脱——这件事。不过据你的明信片来看，我觉得，把她的痛苦归结到你身上，对“再生”的实现也起了很大作用。布拉格或奥西格计划，我以为不妥当，而且很危险，只在工作 and 音乐领域是一种解救。外部的情况迄今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大体上也许不佳吧，但就细部而论肯定不是如此。例如我在此生活，就饭食而言，到目前为止与在布拉格时完全一样。当然黄油是别人寄来的，但柏林也可买到。为了让你对此间的物价有个概念，且举个例子吧。打电话那天，我刚巧在城里弗里德里希大街一家素菜馆吃了顿午饭（我一般总在家吃饭，从入住此地以来，这是第二次上餐馆）。我和D点的饭菜是：菠菜拼荷包蛋和土豆（味道妙极了，是用上好的黄油炒的，单是那份量就让人满意），切成小段的蔬菜，加苹果酱和糖水李子的面条（对那道菠菜的赞词可照搬在

此)，番茄色拉，小面包，外加一道糖煮李子。所有饭菜连同昂贵的饮料费，约计8克朗，不算贵。这也许是个例外，是受了证券行情中的种种偶然的影响。物价的确上涨得很厉害，除了吃饭外，想买点其他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但正如众人所言，饭菜柏林还是有的，而且相当不错。这方面你就不必担心了。

代为问候费利克斯和奥斯卡，替我讲句吉利话！也许今天我会和艾米上剧院，看由克勒普费尔主演的《人民公敌》。到目前为止，我晚上还未离家外出过。

〔寄到邮戳：1923.10.27，柏林—施特格利茨〕

46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是星期三上午收到的来信。如果您星期五想拿到小说，我们——我和邮局就得赶紧了。此外，读您的译作，我所得到的绝对只是欢乐。您手头有的译稿，尽管寄过来吧，我觉得作品本身相当不错，只是在读K的短篇小说[74]时，我多半有种附带印象（令人不快），仿佛这想法（本身还可以）总是最后一种想法似的，就好像那个可怜的人交出了他最后一枚十字币，别人攥着这硬币却还要看他那空空的衣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财富可是无可置疑的。——您译得很好。仅提几点意见，标题正确，但似乎不够有力，干脆这么译，“无头脑”或“没有头脑”。我会选择schlepperi[75]一词；ziehen[76]也含有痛苦的意思，该词比较古怪；bewegen[77]或许没有这种痛苦的意味——这一整体：“移动”和“留下痕迹”太容易使人想到爬行的毛虫了。“上等衣料的布料”——听起来不坏，但“衣料”和“布料”是一回事。

这是什么？是Glaubender[78]么？

其他意见我已写在您的译稿中。

我已收到克劳斯的那本书[79]。书印装漂亮，令人喜爱，邮寄也费了您不少的钱。这书即便只是《末日》[80]的袍衣，也是很有趣的，平常我读得很少，只看点希伯来文。不看书，不读报，也不看杂志，哦，不，《自卫》我还是看的。您为什么不寄几本《自卫》来呢？这杂志您

很容易买到。我原以为，您11月1日是想来布拉格的。是啊，维也纳很美。在柏林待一段时间后我们再移居维也纳，怎么样？

我只与极少数几个人来往。同魏斯博士谈过一回话，但5周末见普阿了。她彻底销声匿迹了，我去的明信片，一张也未回。

我的健康状况一般。

11月15日我将迁入附近的一间新寓所。地址马上寄来。

祝您生活愉快！您的梦想和工作一切顺利！

弗上

Schecholu chischalon是两个名词，我也不全懂。不管怎么说吧，这两词试图表达“不幸”这一整体概念。Schechol从字面上讲，是“无子女”的意思，那么，也许是指“无繁殖能力”、“无生育能力”、“徒然的努力”。而kischalon^[81]字面意义是“踉跄”、“跌倒”。

〔1923年10月于柏林—施特格利茨〕

46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不要夸大柏林的事。我来此地，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暂时并未接踵而至，那么，我们就不要用颂词惊动他们了。当然也不排斥这种可能性，即物价的飞涨——暂时还未出现，但如果物价以同样不知疲倦的精神继续涨下去，则可能发生——会将我赶出柏林。迄今为止，我觉得外部条件尚好，他人得到的照顾，不会比我强。——《克拉里萨的半颗心》^[82]，您又搞了个新译本，这事刺痛了我。剧作从前的译本可是很出色的了，为什么还要译一次，尤其是现在？因为我——或许是一种错觉，但即便如此，也是一种强烈的错觉——在您最近的来信中感到了这么一份渴望，此外还感到了这样一种向自己的工作冲击的力量，而在过去，我从不曾有此种感觉。也许这根本不是坏事，如果您在通过博士学位口试后能重又逃向寂静。尽管如此，正如我在《自卫》杂志中读到的那样，偏偏今年布拉格那儿计划组织大量的希伯来语活动。参加这类活动，在柏林我得坐上几小时的车，而在布拉

格，也许从家里出门走上百步即可，但这百步的距离却是不可企及的遥远。

弗上

〔明信片，邮戳：1923.10.31，柏林—施特格利茨〕

462.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即使我知道艾米会做什么，我也要等到明天才写信告诉你，虽然由于双方毕竟极为情愿，我理当相信调解起来很容易，但事情难办，非常之困难。有些地方我也不是全懂。每4周过来一次，似乎太贵了，但在博登巴赫待上两周好像还要贵得多。我一时也闹不明白，怎么偏巧是博登巴赫能起到镇脑安神的作用。晚秋时节去一个陌生的乡间小镇，独自一人在那里住下，没有工作，没有熟人，整个心思全放在布拉格来人所作的匆匆探望上，而末了却又要再次回到柏林——假设回到柏林是造成所有痛苦的根由来。所以，最后的决定现在尚未形成。我呢，则到明天给你写信。

弗

我得知，克罗普施托克又搞了一个《克拉里萨的半颗心》的新（！）译本，将要寄给4个代办处。

〔明信片，邮戳：1923.10.31，柏林—施特格利茨〕

463.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听艾米说，你不久会来。正如我在第二封信和那张明信片中所说，我也只能认为这么做正确。现在嘛，关于其他一切与此相关联的事情，就不必再写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见面。另外，今天我精神状态也不佳，肯定是为一件非同小可的事——11月15日我将换住处——付出的精力太多了。这次搬迁，在我看来很有好处。（搬迁的事，房东太太11月15日

才可能知道。坐在她的家具中间写信，告诉你这个消息，我简直都感到害怕了。她那些家具正越过我的肩头看信呢。但那些家具，至少个别家具，部分程度上站在我一边。）至于遗产，那可真是一派流言，但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却是这流言已散布开来，因为埃尔泽·贝格曼给我的信中也提到了此事。事实是，遗产总额约计60万克朗，除母亲外，3个舅舅也有继承权。事情若这么简单，那还好，但遗憾的是，遗产牵涉的主要对象为法国政府、西班牙政府、巴黎与马德里的公证人和律师。

关于女友的事，你说得也许对。有那么一两次，在这样的地方，女友自谈话中一闪而过。此外，艾米对这女友除了好感外，还有一种极强烈的我们只应给予支持的反感。在你对未来忧心忡忡的时候，你忘了，你现在也应从沃尔夫那里得到价值稳定的货币。另外，沃尔夫想必真的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同艾米一道看戏，暂时成了泡影。物价的上涨，的确令人难以置信。有两家剧院曾在我考虑之列，一家是莱辛剧院（上演《心醉神迷》[\[83\]](#)，由科尔特纳和格达·米勒主演），一家是席勒剧院（上演《人民公敌》，由克勒普费尔主演）。第一家票价极贵，第二家的门票几天之内即已售完。如此一来，不管天气怎样，我都不能去了。

祝生活愉快！但愿卢加诺的太阳再次照耀着我们（不管清白还是有罪）！

弗

〔寄到邮戳：1923.11.2，柏林—施特格利茨〕

464.致瓦莉·波拉克[\[84\]](#)

亲爱的瓦莉：

桌子位于炉子旁边，我刚离开炉子旁的位置，因为那里烧得太热了，即使那永远冰冷的背脊也已经热得受不了。我的煤油灯燃烧得好极了，它既是制灯本领的杰作，也是购买本领的杰作（它是由一些部分凑集起来做成的，也是一次买来的，当然不是我干的，我怎么会这个本事呢！这是个有着如同茶杯大小的燃烧底座的灯，结构巧妙，无须取下内外罩即可点燃。其实它只有一个毛病，即没有煤油就不会燃烧，但这

一点我们也同样办不到)，我就这样坐了下来，把你那封已经收到那么久的、亲切的信拿过来读。钟嘀嘀嗒嗒地响着，但甚至对钟的嘀嗒声我也已经习惯，很少听到它，而且一般在做特别值得嘉许的事情时听得见它。它——这只钟——同我有着某种个人关系，房间里其他一些东西也是这样。只不过它们现在，自从我辞职以来（不如说自从我被辞退以来。这本是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复杂的、足可写几页纸的事件），有一部分开始不理我了，尤其是那本日历，关于它表达的意思我已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谈到过。最近它像是整个变了，要不它就是完全把心事封闭起来，比如当人们迫切需要听它的意见，到它那儿去询问时，它只说一个词：宗教改革纪念日。这个词也许有深刻的含义，但又有谁知道呢？要不它就是取刻薄的讥嘲态度，比如最近我读到一篇东西，它引起了我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想法很好，或者说很有意义，以致我兴冲冲地去问日历的看法（只有碰到这类偶然的机会它才在一天当中随便哪个时辰作出回答，而不是在人们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死板地撕下它的一页时回答），它说，“有时一只瞎了眼的母鸡也能找到东西”云云。另一次当我对用煤账单感到震惊时，它说：“幸福和满足是生命的光辉。”这里边除了嘲笑外，还有一种轻蔑的麻木不仁。它不耐烦了，再也无法忍受我将离去这一现实了，但也许只不过是它不想使我在告别时太难过，也许在我搬走那天的那页日历后面有一页我再也看不到的日历，上面写着这类话，“这一定符合上帝的意志”云云。不，不能把对自己的日记的看法全部写下来，“它只不过是个人”。

如果我想以这种方式向你描述我接触的所有事情，那自然会没完没了，还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我的社交活动非常活跃似的。其实我周围一片沉寂，顺便提一下，也绝不是太安宁。对于柏林的骚乱和激昂，我知之甚少，当然，对于骚乱还是相对了解得稍多一些。此外，佩帕知道柏林人被问及“身体可好”时会怎么回答。哦，是的，他肯定知道。你们比我更了解柏林所有的情况。对于骚乱的危险，说上几句完全过时的话，实际上仍有现实意义，如说：“糟透了。”而且，一个人兴奋地讲述莱比锡的体操表演会：“真壮观啦，七万五千名体操运动员步入赛场的场面！”而另一个人则慢条斯理地计算着说：“哼，这究竟算得了什么，三个半和平运动员！”

情况何如？（“情况何如”，在这里可不是开玩笑。但愿没发生什么令人悲伤的事。）你读过那位年轻教师在《自卫》上发表的文章吗？精辟的文章，勤奋的作者！我还听说，阿恩施泰因身体很好，毛特讷小姐

对整套巴勒斯坦体操作了一番改造。你不要因阿舍尔曼老人的生意意识而生他的气。拖着他那一家子人，漂洋过海地来到巴勒斯坦，毕竟非比寻常啊！他这种人能做出如此多的事情来，真是奇迹，与芦苇海的海上奇观别无二致。

多谢玛丽安妮和洛特的来信。好生奇怪的是，她俩的字迹摆在一起比较，体现出来的也许不是她们性格上的差异，而简直是身体上的不同。至少她们最近的来信给我这种印象。玛丽安妮问：她生活中的什么内容尤使我感兴趣？哦，我想知道：她在读什么，是否还跳舞（在犹太民族疗养院这里，所有女孩子在学节奏舞，当然是免费），是不是依旧戴眼镜。安妮·G要我代问洛特好。一个漂亮可爱、聪明的孩子（即洛特，但也指安妮）！安妮学希伯来语很是勤奋，差不多可阅读了，而且能唱一首新歌。洛特也进步了么？

现在真该是睡觉的时候了。在你们那里，我差不多待了整整一晚。从施托克豪斯胡同到米克韦尔大街，路程这么远。

祝你们生活愉快！

.....

〔1923年11月于柏林—施特格利茨〕

465.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想简要描述一下事情在我脑海中是个什么样子。今天，我头脑受了一点震动，当然是由于多种原因。描述所取的材料主要出自我昨天即星期四与艾米的一次交谈。艾米大约7至10点在我这里，正是你的信寄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不想在她面前拆开信。

在这点上，你无疑说得对。如果柏林眼下的局势与去年大致相仿，生活轻松，机遇很多，并有快意的消遣，等等，那么，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么一次“爆发”了。但不是因为火山中没有火，所以只好另寻出路。这也许会带来安宁的日子，但肯定不会持久，因为存在着一种各类痛苦介入其间的核心痛苦。这种痛苦在不同的时候——甚至处在你当代的、

看来占优势的影响下——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但它的存在依然如故。对此人们可采取这种态度，即满足于表面的和平。这或许的确也很好，因为在这暂时的和平之后，经历预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种种事情，有那么一天最终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今天的柏林不能实现暂时的和平，即使你做出超人的努力，遗憾的是你似乎真在这么做。由于柏林未能赢得暂时的和平，所以大家应给予支持，这一支持说不定就是你每4周过来一趟。它提供的养料可能比最好的邮包供应的还要好。你不应为最近一次“爆发”另寻直接的原因。两周前那要求不过是你来柏林而已，到现在才有如此惊人的升级。所以，我也认为，你本人施加影响力，才能重新限制那个要求。正是怀着这一希望，我昨天才提出那条于你也许感到可怕、在我看来却是使人解脱的建议，即你们在眼下这段日子就不要再来往信件、互通电话地折磨自己了，干脆将一切托付给四目相对的会面，这样才有望再次求得“暂时的和平”。

艾米目前的主体要求之所以如此苛刻，马克斯，我感到与你有深刻的联系。但也不仅仅是忌妒，虽然这忌妒正如你所写的，也并非“不理智”。不单是嫉妒——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我这么讲，是为了在此特殊的、隐蔽的、令人困惑不解的痛苦中接近你——而且也是理解上的不可能性，就像你那方面不可能加以解释一样。但你不能认为，你说“只是责任感让我维持着婚姻”，便已驳倒艾米。她知道从不容辩驳的事实入手来回复你的话，而且是从明摆着的事实入手！恰恰不单是什么“责任感”的问题，但目前话也只能这么说。不过你别指望以此驳斥什么。

另外呢，艾米看上去精神相当不错，也许仍处在她自己所说的、那次“令人高兴”的电话交谈（想必为你后来的那封信全抵消了吧）的影响之下。她排练获得成功，而且还有希望在一教堂音乐会上参加合唱。因此她留给我的整体印象绝不是绝望，只是有时会发生突然的“爆发”。这种爆发要么表现为关于“责任”的疑问，要么体现为一种担忧，即担心你如果来这里的话会施加影响并起麻醉作用。

不久前我的确给母亲写过信，说你将来柏林。我现在收回这个消息。但即使收回，这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我可能搞错了。如果你能带上那些东西——无论怎么安排，都是负担——就请带来。但也不是非要不可，不然，我恐怕也能另找机会将它们弄来。假使能带，把行李凭单交车站行李托运处就成。请写我现在的地址。不过，我或许会及时将新

址（自11月15号起生效）寄给你，好让行李箱为了简便起见而即刻送过来。但比这一切都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马上就要重逢了。

弗

〔寄到邮戳：1923.11.5，柏林—施特格利茨〕

466.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非常感谢您10月29日的明信片 and 出版目录。采取这种方式可不行。目录中列有许多诱人的好书，这些书大多很贵。我不知道该作一个怎样的“恰当的选择”。所以请您明说，邮书来您原指望从我这里得到多少金马克。我将据此即刻挑选。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弗兰茨·卡夫卡

我现在的地址：柏林，施特格利茨区，格绿内瓦尔德大街13号，塞弗尔特先生处。

〔明信片，寄达邮戳：1923.11.19—柏林〕

467.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多谢你定期寄杂志来，多谢你在柏林给予我们关怀。杂志之类，也许让你甚感为难了吧。另外我换了住处，请将我的地址改为：柏林—施台格利茨，格龙内瓦尔德大街13号，塞弗尔特先生处。还有一件事：请写信告诉我，我欠多少钱，我马上通知我妹妹付清。请停寄我的《布拉格样品》，如果你还未这么做。尽管物价在飞涨，我可能还是会在柏林待些时日。我一直未去你亲戚那里，其实我是很乐意去的，但在这个季节，在白昼很短的时候，来来回回地奔走，于我太困难了。我一周两次，而且仅在天气晴好之时，走那么一小段路，上一所大学听犹太教法典讲座。这已是我最近的行止了。

最衷心地问候你、你的家人和鲍姆一家！

弗上

〔明信片，邮戳：1923.11.18，柏林—施特格利茨〕

468.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近段日子，我的时间和精力很多都用在身上。母亲将晚报上的评论寄给了我。这是些多么漂亮、新鲜、生动的东西呵，要不断地稳住地位。——今天奥特拉在这里。我觉得她对看到的一切都满意。至于你，我没什么担忧。——我现在有钱，本周将给艾米400克朗。你们新的汇款方法是怎样经受考验的？——我没生病，只是像那盏小灯的灯光略有颤动而已。到目前为止，通常我的身体并不坏。但这种“颤动”使我未能去艾米的剧团，不幸的是多拉那天也不太舒服。不过《圣诞节》这剧本或许会重演。——你对柏林相聚会有的种种毛病所作的分析，与实情相符。但这也是我自己的毛病。更多的是我的毛病，而不是柏林的毛病。请你继续为我们保持对更美好事物的希望吧！另外，我有种感觉：你现在的的生活——除了你复杂的、由于其英勇却又变简单了的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干扰外——自由自在而且稳定（以前任何时候几乎未曾有过），那些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替我稍稍抚摩一下费利克斯和奥斯卡。——祝你万事顺遂！

多拉真诚问候你！

弗

〔明信片，邮戳：1923.11.25，柏林—施特格利茨〕

469.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迈耶先生：

你们热情的明信片寄来后又过去了一段时间，从我未能及时回信中你们可以发现，我们日子过得是多么艰难。在当今的情况下，得以从一

大批书名中挑选书籍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事件，太伟大了。

选中的是以下这些书（我对自己加以限制，对装帧昂贵的、尤其是那些一次性读物，我只要硬面平装本就行了）：

荷尔德林 ^①	诗歌
霍尔提 ^②	诗歌
艾兴多夫 ^③	诗歌
巴赫霍芬	日本木刻
弗歇尔	中国风光

① 德国诗人（1770—1843年）。

② 德国诗人（1748—1776年）。

③ 德国诗人、作家（1788—1857年）。

培尔琴斯基	中国神祇	
西默尔	伦勃朗	
高更 ^①	此前此后	
沙米索 ^②	施雷米尔	
毕尔格尔 ^③	明希豪森	
一本	汉姆逊 ^④ 的书	
卡夫卡	司炉 1 本	} 1 至 2 本
	观察	
	变形记	
	乡村医生	
	在流刑营	

① 法国画家（1848—1903年）。

② 法裔德国作家（1781—1838年），代表作为《彼得·施雷米尔奇遇记》。

③ 德国作家（1747—1794年），代表作为《明希豪森历险记》。

④ 挪威现代作家（1859—1952年）。

这就是我的索书单。尽管作了很大努力，结果还是太多了；但即使再试选十遍，结果也不会有所改观，所以就这么发出吧。

致最热诚的感谢和问候！

卡夫卡上

〔1923年11月末于柏林—施特格利茨〕

470.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已很久未写信。对我来说，存在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极度的疲劳。这情形好比一个人刚刚（作为退休官员）在外地荒野艰苦奋斗过一番，而且，更困难的是，根本就是在野蛮的世界中搏过一回。激动（激动不安的时候，我用你的小品文证明了自己从事写作的不幸）可能已过去，且当时就已过去，因为正如艾米告诉我的，你随后一天就收到了一张友好的、请求原谅的明信片。所以，我也不再为那事而心情沉重了。现在我完全理解了为钱而生的忧虑，只是在共同经历并误解11月份那场你当时比我解释得清楚多了的危机后，弄不清楚你为什么会因为12月危机（表现为嫉妒和电话交谈困难等等）而失去自制，仿佛这场危机本质上与11月危机（由于你们的相聚而得以如此圆满解决，以致创下了一个适宜于所有时代的先例）有什么不同似的。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有任何一项委托任务且不太担心我这方面存在干出蠢事的危险，那就别忘了我。——那篇关于你剧本的评论是什么意思？剧本上演了？我不读（因为物价上涨）报，星期日刊也舍弃了（反正从房东太太那里可非常及时了解新税方面的情况），所以，我对外界的了解，比在布拉格时少多了。因此，我乐意了解，比如了解一点穆西尔的剧本《文岑茨》^[85]的情况。对剧本我除了标题外，别无所知。标题还是剧本首次上演很久之后，我在去那所大学听犹太教法典讲座的途中（即在我的外部世界之行

中)从剧院节目单上看到的。但这确实不是什么根本性的痛苦。此外，你不能为了你的剧本而同菲尔特尔或布莱联系联系么？他们算得上是我们的朋友。——我早就该给奥斯卡写信了（因为他在《新评论》上发表的那个短篇），但事情尚在进行之中，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多拉向你问好！她正为那篇评克里卡的文章而陶醉呢。

〔明信片，邮戳：1923.12.17，柏林—施特格利茨〕

471.致奥斯卡·鲍姆

我亲爱的奥斯卡：

你找了个多蹩脚的律师啊！他良好的愿望又有何用？水平如此之低，他只能坏事。从你那里得到一项委托、一项前景这么广阔的委托，我心花怒放，真的心花怒放。但我自己不会跑去打电话（究竟是怎么了哦！去打电话！而电话就放在我桌上），不过会竭尽全力向别的某个人挤过去的。两次电话均未通，我认为这是对方无疑比较狡猾的信号，便写了一封信，由一个很好的熟人送过去，原本设想这样一来K.将不得不口头上作出让步。谁知他更狡猾，溜到隔壁房间里，弄了封口授的信回来。“这令他深感遗憾，——但有出特刊和编辑上的困难——迄今不可能——不过有个新观点冒了出来（我到今天也不知道，它是否与你的小说相关），他很乐意同我谈谈这个观点，要我去找他或给他打电话。”这是一种下意识的狡猾，因为两点我都不可能做到。我还要狡猾一些，又通过我的熟人送去了第二封信。信中说明我没法去找他或打电话，并万分迫切地请求他同我的熟人详谈对你小说的看法。但两人狡猾到一块儿去了。针对这第二封信，他说，他一周内将来我处。他开脱了责任，因为他没来。下周我要再次（也就是说，又不是我本人）向他询问小说的事。对此他会说，他到圣诞节后才能来，至于小说嘛，绝对已采用，但刊出时间，他就什么也说不上来了——一个如此伟大的事件介入世界发展的进程，却怎么显得如此温和、而未引起最细微变化的呢？真怪！奥斯卡，亲爱的人，请别生我的气！

最衷心地问候你和你的家人！

47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首先按照您罗伯特的方式写信，但比您提的问题更为重要。食堂如何？牙齿如何？翻译如何？通常情况下的收入如何？房间如何？考试如何？这些暂且够了吧。至于我，罗伯特，您可不要以为，我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即任何时候都有自由和气力，去作报道或者也只是写写信。为什么不能这么认为呢，因为存在许多深渊，人不知不觉间便陷了下去，在最好的情况下，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又爬上来。这不是可以描写的处境。——您想进Iwriah，很好。也许不单是听希伯来语课，而且还要听犹太教法典讲座。（每周一次！您不会全懂的。可这又有什么坏处呢？您将从远处听它。它除了是远方来的消息外，还能是什么呢？）开设犹太教法典讲座的那所大学，对我来说，是荒蛮的柏林城中和我内心荒芜的地区内的一片安宁之地。（我刚被人问及健康状况，而且，关于我这颗脑袋，我能够说的只是，它让人“按雄狮的模样修饰”了一番。）那里有所房子，整幢楼内全是一间间漂亮的教室，还有巨大的图书馆，宁静宜人。供暖充足，学生亦不多，而且什么都免费。但我不是正式的听课者，只是在那所师范学校听课，且只听一位老师的课，就是他的课，也只听了一点点，以至于所有的辉煌最终差不多重又烟消云散。不过，即使我算不得学生，那学校也依然存在，而且漂亮。其实一点都不漂亮，倒可以说是奇特，奇特到怪诞，更进一层，奇特到难以想象的温柔（即整体的自由主义革新精神和科学精神）。学校的事就此打住。——您将见到普阿，很好。而后我也许能听到她的一些消息。她几个月以来一直未给我来信。我究竟对她做了什么坏事呢？——万事顺遂！

另一名听课者也想寄上一份问候。

〔多拉的问候及其签名〕

弗

〔明信片，邮戳：1923.12.19，柏林—施特格利茨〕

473.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尊敬的出版社：

在本月4日信中您告诉我，寄给我的书已在邮路上。可现在差不多过了4周，我仍然什么也未收到。是否能劳驾您查一查，看邮寄出了什么问题。

顺致

崇高的敬意！

弗兰茨·卡夫卡

柏林，施特格利茨区，格绿内瓦尔德大街13号（塞弗尔特处）

〔明信片，邮戳：1923.12.31，柏林—施特格利茨〕

1924年

474.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未写信，首先是因为我病了（高烧，寒战。这类继发病，诊治一次即要160克朗，后经多拉交涉，减为一半。不管怎么说，自那以后，我对生病产生了10倍的恐惧。在犹太医院，一张二等床位每天要价64克朗，还只是床铺钱和伙食费，也就是说医护费与医生的诊费均不在内）；其次因为我认为你去柯尼斯堡会途经柏林的。另外，当时艾米也说，你3周内会来这儿，以便在她进行应试朗诵时与她待在一起。而且，当这一想法落空了的时候（柯尼斯堡之行怎么告吹了呢？《本特巴尔特》^[86]未受到人们的欢迎，应当还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吧。这剧本我眼下总算想读一读了。《克拉里萨的半颗心》起初亦遭冷遇，可应该说它为第二部剧作开辟了道路吧），当此事成为过去，你的柏林之行远远延期，以至于旁人为艾米——我不知道，她这次将会是什么态度——叹息的时候，我没有因消化方面的疾病等所致的轻度神志模糊而写信。但现在，你的明信片唤醒了我。在艾米那里，我当然会竭尽全力、使出浑身招数，试着去解释一切的。尽管这位老妇看来既风趣又固执，也不缺乏对阴谋诡计的了解，她的敌意至少意味着一点什么。这于我有帮助，

但对我也有某些损害，其实我高兴地盼望着争取艾米并了解她演出方面的情况呢。做到这两点，对我来说，并不像探究喉、胸、舌、鼻和额的秘密那样，完全实现不了，但我的话会因此而失去意义，如果说它通常具有某种意义的话。不过，主要障碍在我的健康方面，比方说今天，本来约好了与艾米通电话的，可我不能打起精神走到那间冰冷的房里去，因为我发烧 37.7°C ，卧床不起。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我常发烧，但不引发其他病症。天气的骤变可能也是发烧的原因之一。明天大概会退烧。发烧毕竟严重限制了我的活动自由。此外，医生诊费单上用闪闪发光的字母写出的数字在我床的上方飘荡。但我明天上午也许会进城，去那所大学，且能在艾米处停留一下。常在这样的天气把她硬拉出来——她似乎略有点感冒——也不妥。此外，我有个计划，就是可能介绍艾米认识我曾对你讲到过的、名叫米迪娅·皮内斯的女士。她是名朗诵者，将来柏林待几天，要在诺伊曼版画陈列室作场报告（她能凭记忆讲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隐居者的生活经历），可能会来看我。与这名女士结识，或许可对艾米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皮内斯还是名语言教师，一个年轻姑娘。我当然很乐意听艾米朗诵，早就诚心诚意地求她了（单是为了在相隔很长时间后听听歌德的诗，我就求她了），只是外在条件作梗，迄今未成。这外在条件也包括：我们2月1日被人作为付不起房租的穷困的外国人赶出那间极漂亮的寓所。回忆回忆“温暖的、饱足的波希米亚”，你说得对，但这样不好，可人就是有点儿顽固。舍列森是毫无考虑余地的，舍列森就是布拉格。此外，我40年都曾享有温暖和饱足，那结果对其他尝试来说不具备诱惑力。舍列森在我或许在我们看来也未免太小，而且，我对“学习”也不太习惯了。除此之外，这绝不是什么问题，而仅是没有基础的表面上的快乐。但附近有那么一个对事情了解几分的男人，在我便是某种鼓舞。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是与男人有关而不是与事情相涉。不管怎么说，在舍列森住下来不可能，但也许真的——看了你的意见，我突然想到——可去波希米亚或梅诺拉的某个镇，对此我将考虑考虑。如果体质不是这么弱，也许简直能画下这种情景呢：左边多拉撑托着他；右边则有那名男士搀扶；他的脖颈比方说可由随便某一个“细小而潦草的字”支撑；假使脚下的土地现在得到加固，他前面的深渊得以填平，他头顶盘旋的猛禽被猎尽，从他头上飞掠的风暴被止息。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那么，则或许有那么一点儿可能性。我也想到过维也纳，但旅费至少得花一千克朗（反正我掠尽了我态度十分迷人的父母，新近又掠尽了我的几个妹妹）。此外，途经布拉格，而且是去无把握的地方，这样太冒险。因此，在这里再待上一阵子，也许极

明智。除了柏林那些严重的缺点外，毕竟还可收到一种令人高兴的、教育方面的效果。以后我说不定会同艾米一道离开此地。——祝万事顺遂！尤其祝那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顺遂！我听说，你终于又想捡起那个长篇了。

弗上

谢谢那个装有救济品的包裹。我们有点羞于将包裹留下自用，包裹的内容也不太诱人，虽然值得奉上所有的赞词。多拉让人烤了个大蛋糕送到她去年曾做过缝纫的犹太孤儿院去了。对那些过着压抑的、没有欢乐的生活的孩子来说，蛋糕之类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了。为了不让邮寄之事再这么烦扰你，我将我妹妹艾莉的几个地址寄给了你。这些地址当全可寄达。

最近卡茨内尔松及其夫人在我处。莉泽太太说，她母亲圣诞节在博登巴赫见到过你，还问你是否在这里。我说不在。卡茨内尔松仿佛受了你的提示一般，随即敏捷地答道：“他可能去茨维考啦。”这时我觉得，他简直令人生疑。

多拉在布雷斯劳时对曼弗雷德·格奥尔格（他现在柏林）很了解，她急于想听听你对他所作的几句评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认识他的。假使我没犯糊涂的话，评论你的那篇文章，是收在他那本随笔集子[87]里的。

你写的那篇评论韦尔弗的剧作《施威格尔》的文章，很漂亮、很鼓舞人、很能给人力量，值得多读几遍。可为什么是英勇的呢？倒不如说是会享受的。不，是英勇的，是英勇的享受。但愿真正会享受的人不全是苹果中的虫！

剧本《波伊雷特》[88]写得美，美啊！我们姑且只谈这些文章，即可断定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作家呵！论穆佐尔格斯基的那篇文章，我不知读过多少遍（但文章的名字总写不上来）！大抵是做小孩时读的，那时的我，扶着礼堂门的门闩，观看里面举行的一次盛大的、陌生的庆典活动。

你知道魏斯的《考验》[89]吗？我数周前得到该书，现在读了一遍半。小说极妙，比其他所有作品还妙，它想做到高度个人化，且不想在循环往复上做文章。我压根儿还未感谢魏斯，这样的负担我心头还压

着几个。你写了评《纳阿尔》的文章吗？这可稍稍减轻一点我的内疚。

请代我衷心问候费利克斯和奥斯卡（我没有听到凯瑟尔的其他消息，可能再也不会听到他的消息了）。

你是否知道一点克罗普施托克的情况？晚报上发表他的什么文章没有？

〔1924年1月中旬于柏林—施特格利茨〕

47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原以为您仍在B那里，直等到马克斯来信才得知，您现在已到了布拉格。马克斯还谈到了您发表的、对此我一无所知的4篇译作。您也不再寄译作给我审读了。是谁夺走了这项工作？其间伊雷妮曾来我处，她讲过一点您的情况。您圣诞节时在她面前提及的、以良好成绩通过的考试，是次什么考试？我未到米迪娅那儿去，晚上差不多总发烧。而“另一名学生”则每逢此良机必去无疑，他让米迪娅给迷住了。至于我，可谈的不多。一种朦朦胧胧的生活，如果不直截了当地观察，从中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眼下我们正为住所发愁。住房多得很，但富丽堂皇的，房租之昂贵，我们不可想象。而剩下的，又值得怀疑。要是能多挣点儿钱就好！但对一个睡到日上三竿的人，这儿是没有谁会给他什么工作的。我的一位熟人，是个年轻的画家，现在谋到了一份美差，为此我有时还妒忌他呢。他做街头书商，上午10点左右进入摊位，一直待到日暮时分。时下的气温已是零下10度或10度以上。圣诞节那阵子，他日挣十马克，如今则为三四马克。

〔明信片，邮戳：1924.1.26，柏林—施特格利茨〕

476.致费利克斯·韦尔奇

亲爱的费利克斯：

本来我只在搬迁时才给你写信（这是因为担心《自卫》^[90]什么

时候会不来了。它现在总是来得那么准时，堪称在准点和内容上是忠实者中之最忠实者），但现在通信具有活跃的特性了。2月1日我的地址是（下一期就得寄到那里了）：柏林策伦多夫区，海德街25—26号，布瑟博士夫人家。我也许做得不对（我一开始就为此而受到了高得可怕的租金的惩罚，对于这套住房根本不算太贵，但对于我事实上是难以支付的），竟然搬进了一位已故作家的房子，这位作家是卡尔·布瑟博士（1918年去世），至少如果他还活着他会我憎恶的。你也许还记得他每个月发表在费尔哈根和克拉辛的月刊上的综合评论吧？尽管如此，我还是搬了进去。反正世界上到处是危险，虽然这回从不可知的危险的阴影中又出现了这些特殊的阴影，也是不足为奇的。此外，奇怪的是，甚至在这么一神情况下也产生了一定的乡情，这种感觉使这座房子具有诱惑力。当然诱惑力的产生仅仅由于我作为贫困的付不起钱的外国人，把我从居住至今的美丽的寓所赶了出来。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家人！

〔明信片，邮戳：1924年1月28日于柏林〕

477.致莉瑟·卡茨内尔松

亲爱的莉瑟太太：

我将那份对您的寄赠所表示的谢意立即同那种对我的小女书商的回忆联系在一起，请别生气。当行善者，是如此的美妙，又是如此的容易。（只要请某人打个电话，尔后再让人请卡茨内尔松博士在书商那儿打探一下）而且因为这般的容易，所以，行善者便无意停止行善，并折磨那些让自己受折磨的旁人。不过，如果卡茨内尔松博士是如此的友好，并告诉我最近一次打探（他曾愿意帮忙）的结果，那么我现在答应，这次停止行善。不管怎么说，我衷心感谢你俩。

代为问候您的家人！

我的地址，自2月1日起是：柏林—策伦多夫，海德大街25—26号，布塞女博士处。

〔明信片，1924年1月底于柏林—施特格利茨〕

478.致路德维希·哈尔特

我亲爱的路德维希·哈尔特：

多谢您的电报。“在盖斯特尔礼堂”^[91]您读了这词，也就是说在那里读了这词，您并没有不理解。虽然我离柏林这么远，但也并未远到不收到电报就不知道那些讲座的地步，只是遗憾啊遗憾，我不能前来。不单是因为今天下午我带着我所操持的庞大家政的所有杂物换了住所（迁居还算容易，这多亏了R.F.小姐好心好意地帮着搬运），而主要是因为 I 病了，发烧。在柏林整整4个月，晚上就没出过门。不过，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后，我能否在策伦多夫这儿见您一面呢？明晚会有一位叫多拉·迪阿曼特的小姐过来同您谈谈有无这种可能性。

祝您生活愉快！为您的晚会祝福！

卡

〔1924年2月初于柏林—策伦多夫〕

479.致路德维希·哈尔特

亲爱的路德维希·哈尔特：

刚才我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门房将哈尔特是否到了这个问题理解错了，结果喊哈尔特本人来听电话。由于想到哈尔特有作报告之前睡觉的习惯（这可是事实），所以更将这不幸放大了，我继而又以哈尔特对什么都不会起干扰作用这一点（可是还要真实些哟）来安慰自己。甚至在报告会结束之际，也不愿受一封饶舌的信的打扰。不过，现在就简要地说一说吧：我不能前来，生了病，已于昨天通过一名报告会的女听众送了一封信过去，表达了谢绝之意。您能否出来一趟，好让我相隔这么久之后见上您一面？您在这里不会看到很愉快的场面，但至少多拉·迪阿曼特小姐，那名带信人，在同您商谈策伦多夫之行有无可能这一问题上，拥有全权和更大的代理权。策伦多夫之行可能么？

弗上

〔1924年2月初于柏林—策伦多夫〕

480.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我亲爱的罗伯特：

这不成，我不能写信，几乎不能写信感谢您的一切〔例如我几天前，或者为了不掩盖真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几天前才收到的极好的巧克力，再加上《火炬》杂志。我利用《火炬》每晚狂欢。这种活动您已熟知，它让人筋疲力尽。有次狂欢，是在我舅舅^[92]和多拉如醉如痴（可能与我的心醉神迷不同）地听克劳斯的一次讲课的时候〕，而且礼物所占的分量还是最小的。两封起了头的信和一张明信片，早已在房间内的什么地方闲荡，您绝不会得到它们了。前不久我找您上上次的来信，未找着，而眼下却在—本希伯来文书中发现了。是我把信夹在书里，因为这书我每天要读一点，但近来则有一月不曾开卷。不去那所大学听犹太教法典讲座，时间还不止一月。这儿户外的景色的确很美，但我可能不得不离去。太遗憾啦，您身体也不太好。这就得不到补偿了。我不理解您靠什么生活，至少S.要付钱吧？有学生食堂的饭票吗？您推掉了给D.的那份委托，很不恰当。委托任务让我们高兴。——尽管有种种烦恼（如果我们温柔地对待柔弱），您的健康看来至少不是太坏。有了这底子，身体就可好起来。

祝您生活愉快！

弗上

〔1924年2月29日于柏林—策伦多夫〕

481.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不，别作旅行，别干这么莽撞的事。不作旅行，我们也会相逢的，以一种更沉静的、与虚弱的体质相称的方式相聚。也许——其实我们在认真考虑此事——我们不久会来布拉格，如果维也纳森林疗养院被纳入了考虑之列，那么一定来。我抗拒疗养院，也抗拒退休，但这又起什么作用呢！因为我反抗不了发烧的热度。38℃成了家常便饭，整个晚上和半个夜晚都发烧。尽管如此，在其他情况下，躺在这儿的游廊上，看太

阳怎样工作，是很美的事呢。太阳在从事两项就难易程度而言如此不同的工作：唤起我，投入自然的生活；唤醒我身旁的桦树（桦树似乎处于领先地位），奔向自然的生活。我很不情愿离开此地，但也不能完全打消去疗养院的念头，因为我由于发烧已数周足不出户，虽然躺着时自以为足够强壮。不过，任何旅行，在迈出第一步前，便染上了美妙无比的色彩。有时候我想：将自己埋葬于疗养院，在那里安宁度日，也绝不是很不舒服的事。一想到甚至在这几个月温暖的、为自由而预订的日子里，人也会失去自由，便又感到很恶心。但继而又是持续数小时的晨咳与夜咳，且差不多每天要吐满满一小瓶，——这一切又在将我往疗养院推。可接着呢，又有一种恐惧、一种对疗养院那儿可怕的进食义务所产生的恐惧，涌上心头。

您最近的一封来信，现在已寄到我手中。这么说，您同意我的观点了。或者只是出于被迫？我很高兴，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不再简单地将我舅舅视为“冷漠的人”。“冷漠”怎么会是简单的呢？这可能永远只是一种可从历史角度加以解释的现象，所以，“冷漠”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另外，使他显得冷漠的原因，或许在于他履行职责并保守着“未婚男子的秘密”。

我想起您关于那个生病的女孩的描述来了。在她的梦中，不是也出现了亚伯拉罕吗？读霍利策尔^[93]的回忆录时，我常想到您。这些回忆录发表在《新评论》上，其第二、第三部续篇我读过。虽然可确定您与霍利策尔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正如匈牙利和与我们大家有共同之处的犹太文化的关系一样，但我乐意坚持地方特色，且觉得从地方特色中可认识到的东西，比地方特色所表露的东西要多。此外，霍利策尔认为，他身上压根儿不具备匈牙利人的气质，自己只是个德国人。这样的布达佩斯人，您可是几乎未谈到过。在霍利策尔的回忆录中，韦莱纳的出现，哈门苏恩的露面非常妙。霍利策尔倾诉犹太人的痛苦时采用的特殊方式，令他本人和读者同感羞愧。这种情形，就正如人们在一次社交聚会上连续几小时探讨某一痛苦的多种因素，继而一致断定这些因素无可救治，而此时，在这一切完结之后，却有那么一个人，从角落里站起来，开始悲诉适才别人已探讨过的痛苦，而且诉得漂亮，诉得坦率，直至发展成荒诞不经的倾诉。尽管如此，人们感到还会继续倾诉下去。

为增加乐趣，我还深入研究并一再重新阅读描写青年时代的“文学性”回忆录和朗根出版社出版目录的说明，因为它们取之不尽，因为他们

述及的那些书，我大多得不到，而且大多也懂不了。巴黎和文学的光辉，是霍利策尔长篇小说的书名。我以为这种光辉曾多年笼罩在霍利策尔的头顶。而现在，这位正变得衰老的人出于自愿，倾诉起整个时代的困苦来了。那时他是不幸的，但人们会想：如果有人也曾如此不幸，那么此人也会以这种方式尝试一下的。另外，哈门苏恩在那里解释——看来只是为了安慰我，才编排出这等事，但手法笨拙，编得相当粗糙——说什么巴黎的冬天把他折磨得很惨，肺病重又复发，他应北上，去挪威一家小规模的季节疗养院，而且，巴黎的物价简直太贵。

达沃斯来的意外礼物，刚寄到我手中。这一切是多么艰难呵。为了我自己，我该要从别人那里榨取怎样惊人的款项！而您，罗伯特，对一千克朗都还不满意。您真是个爱挑剔的、独立不羁的、自由自在的贵族老爷！

我们不久可能会见面。舅父建议我从这里直接去因斯布鲁克，但今天我向他解释了我更愿意途经布拉格去维也纳的理由。也许他会同意我的主张。

〔1924年3月初于柏林—策伦多夫〕

482.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只谈医学方面的事，其余的一切写起来太烦琐。不过，医学——它唯一的优点——方面的事很简单，令我高兴。对付发烧，是每日3支氨基比林剂；治疗咳嗽，用的是咳速平，可惜未起作用，于是又服了麻醉糖丸。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用药除了咳速平外，还包括阿托品。主要问题可能在喉头上。从医生的言谈中的确未得到任何肯定的东西，因为谈到喉头结核时每个人都采用了一种谨慎、回避、呆滞的谈话方式。但是，“后面有肿块”、“浸润”、“不是恶性的”、“还不能肯定地说”，这些话与剧烈的疼痛联系在一起，大概足以说明问题了。除此之外，这儿房间舒适，是个美丽的地方。我没有觉察到一点儿保护方面的事。尚无机会提起气胸的问题。鉴于我的整体状况很糟（连冬衣在内体重为49公斤），所以气胸也在不考虑之列。——我根本未与其他住户来往，就待在床上，说话也只能低低的（病情发展得多快呵，大概是在到达布拉格

后的第三天，首次开始隐隐约约地出现说话困难的征候）。阳台与阳台之间，似乎有个巨大的叽叽喳喳闲聊的窝，不过暂时未打扰我。

〔明信片，邮戳：1924.4.7，下奥地利州，奥尔特曼，维也纳森林疗养院〕

483.致马克斯·勃罗德

亲爱的马克斯：

医治花钱，可能要花一大笔钱。约瑟芬^[94]想必能帮点忙，不会有其他出入的。请将小说交给奥托·皮克吧。（他当然可从《观察》中选点儿东西印刷。他想印什么就印什么。）如果他收下了小说，那么，请你等到以后再将小说寄给“施密德出版社”；如果他不收，则立即寄去。至于我本人，问题显然在喉部。多拉待在我身边。

代为问候你太太、费利克斯和奥斯卡！

弗

〔从多拉·迪芒的附言中可看出，病人的病情很严重。〕

〔明信片，邮戳：1924.4.9—维也纳森林疗养院〕

484.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亲爱的罗伯特：

我将换地方医治，去维也纳9区拉扎雷特巷14号M.哈耶克博士教授的大学诊所。喉头肿得厉害，不能进食，必须（有人这么对我讲）向神经注射乙醇，可能还得做切除手术。因此，我要在维也纳呆几周。

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

我害怕您的可待因。今天我不单是消耗了一小瓶酒，而且还服用了0.03克可待因。“喉咙里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问护士，护士坦率地

说：“像在巫婆熬魔汤的厨房中一样。”

〔明信片，邮戳：1924.4.13—维也纳森林疗养院〕

485.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

不要莽撞，不要突然作维也纳之行。您知道我害怕莽撞行为，可您总是一犯再犯。自从离开那个林木繁茂的、沉闷的、无助的（但环境优美的）疗养院后，我的健康有所好转，诊所里的医治工作（除了细节问题外）在我身上收到了很好的疗效，吞咽疼痛和烧灼感减轻了些，迄今尚未向神经注射乙醇，只向喉头注射了几针薄荷脑油。如果中间不发生什么特别的不幸，星期六我想去下奥地利州克洛斯特新堡附近的、由霍夫曼博士主持的基尔林疗养院。

〔明信片，邮戳：1924.4.18—维也纳〕

486.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刚收到你的来信，这信使我极为高兴。似乎我已好久没见到你的片言只字了。首先请原谅为了我的缘故而在你周围制造的书信和电报的噪音。噪音大部分不必要，它是由我脆弱的神经系统引起的（我吹的牛皮多大呵！今天我没来由地哭了好几回，我邻居夜里死了），但也是由恶劣、压抑的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引发的。要是已勉强接受喉头结核这一事实，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我的健康状况还算过得去。目前我又能吞咽了，而且住在医院里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相反从某些方面看，还是一种馈赠。从你的信中，我了解了关于韦尔弗的另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他拜访了一位与他有交情的、也曾同教授谈过话的女医生。他将他朋友坦特勒尔教授的地址也告诉了我，并给我寄来了长篇小说^[95]（我渴望读到那本为我挑选的书）和玫瑰。虽然我曾让你请求他别来（因为对病人来说，此处非常不错，但就来访者而言，这儿是十分难受的，而且，如果访客真来了，病人也会觉得这里恶心的），但从他的一张明信片来看，他今天似乎仍想来我处，尔后晚上去威尼斯。我现在就

同多拉去基尔林。

为了文学方面所有艰难的交易，我要衷心感谢你。你为我干得多出色呵！

祝万事顺遂！祝你生活中的一切平安如意！

弗

我的地址，多拉写给父母时，也许未弄确切，应为：下奥地利州，克洛斯特新堡附近基尔林疗养院，霍夫曼博士处。

〔估计为1924年4月20日于基尔林〕

487.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你对我多好啊！我要感谢你近几周为我所做的一切！治疗情况奥特拉会写信告诉你的。我身体很虚，但在这里受到了相当好的照料。我们迄今仍未请坦特勒尔帮忙。通过他也许能在环境优美的格里门施泰因找到空床位或便宜的床位，但我现在不能动身旅行。去那里说不定也有坏处呢。最近我要致信布劳博士^[96]，感谢他的推荐信，不是吗？我很喜欢赠阅本，只是未收到。迄今我收到了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期，别的未见，复活节那期也仍未收到。地址不确，有一次写的是“基堡”。如果行得通，或许能劳驾他们将复活节那期^[97]也给我寄来。你寄赠的星期四、星期五两期，尤其是星期五这一期，给了我巨大的快乐。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那些书，仿佛是专为我预定的。我并未真正地读（不过，韦尔弗的长篇小说，我在读，进展甚缓，但经常在读），这么做太累。人一疲倦，我的眼睛就自然而然地合上，但读读书刊使我高兴。

祝你生活愉快，我善良的、亲爱的马克斯！

弗

〔明信片，邮戳：1924.4.28—基尔林〕

488.致马克斯·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

书已寄到，看上去真是好极了：耀眼的黄色、红色再配上些许黑色，很迷人，而且免费。看来是陶贝勒斯公司^[98]的礼物。——当时一定是残存在体内的乙醇（我现在每天要注射一两针乙醇，因此两针交叉，体内总有残存的乙醇）使我产生了醉意，所以我（为多拉的纯洁所催动）才直率而放肆地请求你帮忙“弄到”那本书。在你来访（我曾渴盼你的来访，可此次来访就这么令人沮丧地过去了）的时候，要是注射一支强劲的乙醇就好了，这样我看上去就会像样些。但那也不是个糟糕的特殊日子。你不应认为那是个糟糕的特殊日子，它不过是比以前糟糕罢了。时光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流逝，发烧也就这么继续下去（现在罗伯特试图用氨基比林给我退烧）。除了这些和其他一些要抱怨的事外，自然也有几桩开心的小事，不过一一告知不可能，或者留待你日后某次来访（上次来访被我弄得很扫兴）时再讲吧。

祝生活愉快！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代为问候费利克斯和奥斯卡！

弗

〔明信片，邮戳：1924.5.20—基尔林〕

[1]指M.勃罗德的《弗兰兹或一种二等爱情》，慕尼黑1921年出版。

[2]指《火灾星。创作、批评与版画艺术之页》，由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发行。

[3]布拉格的德语作家。

[4]指乌尔齐迪尔编的《卡尔·勃兰德——一个青年的遗著》，勃兰德是1918年去世的布拉格青年作家。

[5]指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

[6]卡夫卡又到了妹妹奥特拉处。这次是在捷克乡村逗留。

[7]指《第一个痛苦》。卡夫卡1922年5月将其交给库尔特·沃尔夫于《守护神》上刊载。

[8]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9]这里指勃罗德的三篇文章：评论斯美塔纳的《秘密》（载《布拉格晚报》1922年6月23日）、评论斯特林堡的戏剧《女王克里丝汀》的“凶狠的女人”（载1922年6月22日）和《问候的哲学》（载1922年6月26日）。

[10]指《新周报》编辑鲁道夫·凯瑟尔。他的来信谈的是打算发表卡夫卡小说《饥饿艺术家》的问题。

[11]指《饥饿艺术家》。

[12]指加布里勒·普赖索瓦。雅纳泽克曾根据她的剧作为自己的歌剧《耶努发》写脚本。

[13]由卡尔·克劳斯主办的一个刊物。

[14]汉斯·布吕厄的《什赛修·尤代卡》一书是卡夫卡十分喜爱的（1922年出版）。

[15]用德语写作的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马鞭》、《王位继承人》等。

[16]捷克雕刻家（1848—1922年）。

[17]捷克地名，离布拉格不远。

[18]这里有几句话卡夫卡写得无法辨读。

[19]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地区的旧称，广义指整个捷克地区，狭义仅指南北摩拉维亚以外的捷克区，这里是捷克的德语地区，为卡夫卡的故乡。

[20]指卡夫卡原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

[21]载于1922年6月28日《布拉格晚报》。

[22]指Smichover夏季舞台。该文载于1922年7月6日《布拉格晚报》。

[23] 柏林市众多湖泊的一个，风景美丽，为旅游胜地之一。——译者

[24] 此处为一篇评论文章，评的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在捷克国家剧院上演的情况，文章刊于1922年7月11日《布拉格晚报》。

[25] 指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新建的一所“犹太人学校”。——在该校举行的家长晚会上，卡夫卡的二妹瓦莉作了重要发言。发言的精神实质与卡夫卡完全相合。

[26] 指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的手稿。

[27] 德国小说家（1817—1888年）。

[28] 德国诗人、小说家（1804—1875年）。

[29] 指《新时期德国文学创作》，弗里德里希·冯·德尔·莱恩著，1922年于耶拿出版。

[30] 意即“薇拉真灵巧”。

[31] 指费利克斯·韦尔奇之父。他曾对马克斯·勃罗德说，卡夫卡的父亲谈起弗兰茨时脸带骄傲、眼睛在闪光。勃罗德将此消息写信告诉了卡夫卡。

[32] 意即“伟人”。

[33] 意即“工兵”。

[34] 勃罗德所写《论格哈特·霍普特曼作品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刊于《新评论》1922年11月号上。

[35] 意即“快乐的”。

[36] 指威廉·施密特邦的剧作《冯·格莱兴伯爵》。剧本1908年于柏林出版。

[37] 指卡夫卡因肺结核而大吐血。——译者

[38] “您来的时候，脸如死灰。”

[39]此处指威廉·施派尔的长篇小说《四季忧伤》，该书于1922年在柏林出版。

[40]闵策·艾斯纳邀请卡夫卡去卡塞尔旁的威廉山，到她的别墅玩。

[41]奥地利作家（1805—1868年）。

[42]意大利最大的湖泊。

[43]指匈牙利抒情诗人安德烈亚斯·阿丢。卡夫卡通过克罗普施托克与之相识。

[44]即弗·韦尔夫（1890—1945年），奥地利著名作家、诗人、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卡夫卡的朋友。《施威格》是他的三幕悲剧，1922年问世。

[45]德国剧作家（1862—1946年）。

[46]卡夫卡的这封信，估计没有发出。

[47]奥地利一个山地滑雪地区。

[48]威尼斯一个广场。

[49]指卡夫卡的希伯来语老师弗里德里希·蒂柏格尔。

[50]指奥斯卡·鲍姆之子莱奥13岁的生日庆祝活动。

[51]指乔治·韦斯特曼出版社出版的、供学生与家庭阅读的科学丛书。

[52]指“旅行与探险”丛书。

[53]“工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指奥斯卡·鲍姆的中篇小说《巨兽》。卡夫卡想促使《新评论》杂志刊用该小说。

[55]捷语。意即“城堡”、“宫殿”，也是布拉格的市区。——译者

[56]胡戈·贝格曼，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学，后为设在耶路撒冷的希

伯来大学的教授。

[57]安息日的前夜。犹太教徒以星期六作为休息日。

[58]卡夫卡在柏林犹太民族疗养院米里茨夏令营地结识了这名16岁的姑娘。

[59]错别字。德文中“碗”一词应为“Schale”。——译者

[60]这里很可能是指“柏林犹太民族疗养院”。

[61]德国诗人、戏剧家席勒在“狂飙突进”时期的剧作。

[62]指克鲁普施托克的病友格劳伯尔博士之死。

[63]指《伟大的马吉特和他的继承人》一书。该书为马丁·布贝尔所著，1921年在法兰克福出版。

[64]瑞士作家、诗人、评论家。当时他在维也纳的E.P.塔尔出版社任编辑。他写信给卡夫卡，请他提供一部不曾发表过的作品，收入他主编的丛书《十二本书》中出版。该丛书一个月出一本，收入的多为名家名作，如黑塞、茨威格等。

[65]塞利希除要求卡夫卡提供自己的作品外，还希望能介绍其他青年作家。

[66]长篇小说，为恩斯特所著《铁链锁住的野兽》的第二部。1922年于柏林出版。

[67]拉丁文，意即“因为荒谬，所以我信”。

[68]这几篇论文几乎都被收入1928年柏林出版的文集《不会失去的东西》中。

[69]法国19世纪画家（1808—1879年）。

[70]为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所作悲剧之一。——译者

[71]捷语，“寂静”之意。

[72]巴勒斯坦工人运动重要的诗人，用希伯来语写作。

[73]原文为希伯来文。

[74]指卡琳蒂的幽默短篇，由克罗普施托克自匈牙利文译为德文。

[75]德文动词，意为“拖，拉”。——译者

[76]德文动词，意为“拖，拉，拽；移动”。——译者

[77]德文动词，意为“挪动，搬动，使活动；活动”。——译者

[78]德文动名词，意为“正在信仰的人”。——译者

[79]指卡尔·克劳斯的著作《世界毁灭于作祟的巫术》，该书1922年于维也纳出版。

[80]指卡尔·克劳斯的五幕悲剧《人类的末日》，1922年维也纳出版。

[81]uchischalon读作kischalon。——译者

[82]三幕喜剧，马克斯·勃罗德著，1923年慕尼黑出版。

[83]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一部剧作。

[84]卡夫卡的二妹。

[85]《文岑茨和名人们的女友》，罗伯特·穆西尔著，三幕喜剧，1924年于柏林出版。

[86]指《本特巴尔特诉讼案》，舞台剧，1924年于慕尼黑出版。

[87]指《德国文学中的犹太人。关于当代作家的短评》。该书1922年于柏林由古斯塔夫·克罗扬克尔出版。

[88]剧本，刊于1923年12月7日《布拉格晚报》。

[89]长篇小说，恩斯特·魏斯著，1923年于柏林出版。

[90]一份德国犹太人办的刊物。

[91]电报上就是这样写的，但正确的词应为“迈斯特尔礼堂”。

[92]指西格弗里德·略维，特里施的乡村医生，为卡夫卡的病而来柏林。

[93]小说家、小品文作者、游记作家。所著《一名反叛者的生涯》，1924年于柏林出版。

[94]指卡夫卡最后一部短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

[95]指弗兰茨·威尔弗的歌剧小说《威尔第》，1924年于柏林出版。

[96]西格蒙德·布劳博士，《布拉格晚报》当时的主编，卡夫卡早期的赏识者之一。

[97]我刚从家里收到复活节这一期，寄送似乎已恢复正常。——作者

[98]当时布拉格的一家书店。

致奥特拉和其他亲属（1909—1924）

王建政 译

1909年

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在店里要勤奋工作，使我能无牵挂地安心度假。代向亲爱的父母问候。

你的 弗兰茨

马克斯·勃罗德

〔邮戳：09.9.7—里瓦〕

〔风景明信片：加尔答湖风光，里瓦海滩皇宫饭店远眺〕

1909年9月的里瓦（加尔答湖）之行，是卡夫卡任“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所”职员后首次度假。在里瓦期间，他并不住在（高贵的）“海滩饭店”，而是住在郊外的小旅馆“百老汇”。马克斯·勃罗德曾经描写过这段假期：“卡夫卡、弟弟奥特和我在波纳勒大街下方的小型游泳场‘圣母浴场’里面度过了最悠闲的几个小时。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来到里瓦时，再也找不到那些充分沐浴阳光的灰色躺板，只看见几条熠熠反光的蜥蜴在草径上爬行，一道道草径从尘土飞扬的车行大路旁通向浴场的冷酷宁静。”（见勃罗德所著《弗兰茨·卡夫卡》第91页，并参考瓦根巴赫所著《卡夫卡》第59页的插图和本书第17号信的注解）

店里：至迟自1909年起，奥特拉在父母的店中帮忙。这家店铺在1912年秋天之前一直位于策特纳大街12号（参见瓦根巴赫《卡夫卡》第26页的插图）。卡夫卡在1913年初致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奥特拉在我们的店里工作；她早晨八点一刻开门时就上班了（父亲九点半才去），一直待到中午。中午有人给她送饭。然后，她要到下午4点或5点才回家。赶上销售旺季，她会工作到店里打烊。”（《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287页）参阅第13和14号信的注解。

2.致奥特拉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你的 弗兰茨

〔邮戳：09.9.22〕

〔风景明信片：波希米亚小瑞士杰钦，羊圈一瞥〕

我星期四下午到，约于3时抵国家火车站。

星期四：奥特拉当天下午休息（参见宾德尔所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21页），因此能够去车站接她哥哥。

国家火车站：今布拉格中央火车站，出站口位于哈韦利捷克街，进站口位于许贝尔纳街。

3.致奥特拉

我又会给你带礼物回来。

弗兰茨

〔1909年秋—马费尔多夫〕

〔风景明信片：马费尔多夫〕

通信时间系根据马克斯·勃罗德的推算所确定，当时他也收到了朋友卡夫卡从马费尔多夫寄出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上的全文如下：“亲爱的马克斯，我又度过了几天！不过我不想描写它。在这些天里，要是想真正写点什么，那可非得费点劲才行。——今天6点半出发去雅布洛内茨，再从雅布洛内茨去约翰内斯贝格，现在正乘车前往马费尔多夫，然后去赖兴贝格，再去罗赫利茨，傍晚经鲁佩斯多夫回家。”（《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76页）

作为“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所”的法律工作人员，卡夫卡出差的任务是监督事故预防工作、提出因企业主逃税的法律诉讼、审核企业对“危险级别”的划分（以便考量事故预防保险金的额度）。

4.致奥特拉

尊敬的小姐：

我身在此地的圣诞节庆之中，但心中唯一的喜悦是回忆与您在那些小型舞会上共同度过的时刻。您是否已收到我的尼古拉礼物？您的玩具娃娃放在我的心上。

您忠诚的 阿尔帕德

〔邮戳：09.12.20—比尔森〕〔风景明信片：比尔森，以色列教堂〕

卡夫卡于1909年12月21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张风景明信片，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太好了，终于快熬到头了。我们明天晚上回布拉格。我的想法有所不同。对我来说，整个假期很糟糕。从早晨喝的牛奶到晚上刷牙，通通都要列出保险级别，这哪里是疗养呀！”

尼古拉礼物：孩子们通常在尼古拉日（12月6日）得到的小礼物。

阿尔帕德：公元849年起的匈牙利大侯爵，卒于公元907年。他是阿尔帕德王朝的奠基者，匈牙利的民族英雄。通常将其划归司法人物（卡夫卡可能以此自喻）。

1910年

5.致奥特拉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弗兰茨

〔邮戳：10.10.16—巴黎〕

〔风景明信片：巴黎〕

1910年卡夫卡与马克斯和奥特·勃罗德兄弟一同去巴黎度假，他因长了一个疖子而不得不提前四周返回。他对此次“失败的旅行”自我安慰道：“很快还会再去。”（《卡夫卡日记1910—1923》第43页）

1911年

6.致埃莉和卡尔·赫尔曼

只是无法乘雪橇，因为太贵了。我想，不乘一次就白来了，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雪哟！

衷心问候！

你们的 弗兰茨·K

〔邮戳：11.2.4—弗里德兰〕

〔风景明信片：弗里德兰，古堡〕

大妹埃莉于前一年的12月结婚，搬进布拉格的住宅。此信是卡夫卡自1911年1月30日（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87页）至大约2月中旬的出差途中所写。

7.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生病。多加保重，穿暖衣服！这张明信片会给你带去山地气息。

另外，我会给你带去礼物，作为对你生病的慰问。

你们的 弗兰茨

〔邮戳：1911年2月第2周—弗里德兰〕

〔风景明信片：弗里德兰，古堡〕

卡夫卡在他的旅行日记中记述了弗里德兰古堡：“远观古堡的可能性很多：从平原上，从桥边，从公园里，从枯叶已经脱落的树木间，或从林中巨大冷杉树间望去。”

8.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听了一定会感兴趣的：我在画面对过的骏马旅馆要了一份烤小牛肉配土豆和越橘，然后又吃了一份煎鸡蛋饼，然后还喝了一小瓶苹果酒。吃饭时，许多肉显然嚼不烂，我把一部分喂了猫，一部分只能献给大地。后来，女招待坐到我身边，我们谈起了《大海和爱情的波浪》。晚上，我们不约而同地去看这出戏。这是一场悲剧。

〔邮戳：11.2.25—克拉切奥〕

〔风景明信片：克拉切奥，集市广场〕

1911年2月底，卡夫卡出差去北波希米亚，从而再度路过弗里德兰。

悲剧：卡夫卡在日记中描写了观看格里伯尔泽所著这场戏剧的观感：“……我几次热泪盈眶，比如当第一场幕终海罗斯与伦德斯四目相对、难舍难分时。”（《卡夫卡日记1910—1923》第596页）

9.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这一次我一定会给你带礼物，因为你在我临行的那天晚上哭了。

弗兰茨

〔邮戳：11.5.（约2日）—瓦恩斯多夫〕

〔风景明信片：瓦恩斯多夫，改良餐馆〕

瓦恩斯多夫之行（公干）使卡夫卡结识了自然疗法宣教士（Naturheilapostel）施尼茨尔。马克斯·勃罗德在1911年5月4/5日的日记中写道：“……卡夫卡叙述了花园城市瓦恩斯多夫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谈到了一个‘神奇者’——自然疗法使者，这是位富有的工厂主。他对卡夫卡进行体检时，只从侧面和正面看了他的颈部，就断言他的脊髓中有问题，几乎已经抵达脑髓，其结果将导致生活习惯颠倒。他建议采取以下治疗方法：开着窗户睡觉，沐浴日光，在花园中干点活，参加自然疗法协会的活动，订阅该协会——确切地说是工厂主本人所出版的杂志。他的观点与医生、药物、疫苗学相悖，以素食主义的立场解释圣经……”（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97页，参阅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232页、第673条注解）卡夫卡显然是受这次交谈的影响而成为素食者。（参阅卡夫卡著《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15页）

10.致奥特拉

弗吕伦被群山环绕。人们俯首而座，鼻子几乎钻到蜂蜜中去了。

弗兰茨

马克斯·勃罗德

〔邮戳：11.8.29—弗吕伦〕

〔风景明信片：瑞士四周湖，阿克森大街，远眺布里斯滕山〕

这帧明信片系卡夫卡与马克斯·勃罗德于1911年8月26日至9月13日一同度假时所发。度假路线为苏黎世—卢塞恩—卢加诺—米兰—斯特雷扎—巴黎。之后，卡夫卡单独在苏黎世附近的埃尔伦巴赫自然疗养地度过了一周。他在1911年8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四周湖畔弗吕伦“明星”旅馆：“这是个带阳台的漂亮房间，令人神怡。四周的群山封锁了天边的美景。”

11.致奥特拉和瓦莉·卡夫卡

你们应当让母亲写信，而不应包办代劳。这可不是件好事。——昨

天我们在四周湖，今天来到了卢加诺湖，准备待上一阵子。——地址照旧。

弗兰茨

D.勃罗德

〔1911年8月30日—卢加诺〕

〔风景明信片：卢加诺湖，地理全景画面〕

从《卡夫卡日记1910—1923》第606页中得知，邮戳为8月31日的这张明信片实际上肯定是前一天所写。尽管收信人只写奥特拉，但从称呼中看出，卡夫卡此信同时也是写给大姐瓦莉的。

四周湖：卡夫卡在旅行日记中这样描写过它：“这是最美好的一次嬉水，因为置身其中便会产生出如鱼得水的感觉。”（《卡夫卡日记》第606页）为了解历史背景，亦可参阅勃罗德关于早年结识卡夫卡时的回忆：“当时，卡夫卡和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想法：如果没有通过游泳切身经历碧水清波给肉体带来的生动感受，就不能认为自己已经占有这一自然风光。因此，我们后来穿越了全瑞士，在每一个能够到达的湖域中均要演练我们的游泳艺术。”（《好斗的一生1884—1968》1969年出版于慕尼黑、柏林、维也纳三地，见第23页）

地址：在卢加诺时住在“百老汇旅馆”。

D.勃罗德：从笔迹看即为马克斯·勃罗德。

12.致奥特拉

奥特拉你要详细告诉我！亲爱的母亲来信后发生过许多新鲜事，我对这些细节都很感兴趣。作为酬谢，我会寄给你许多漂亮的明信片。

弗兰茨·K

马克斯·勃罗德

〔邮戳：11.9.6—斯特雷扎〕

〔风景明信片：斯特雷扎，马乔列湖〕

13.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不是我应该原谅你，而是你原谅我。并不是因为我在信中提到的责怪，因为那些嗔语还是温和的；而是因为我内心对你的咒骂，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没有守信用。但是，由于你对自己的疏忽作了解释，尽管遗憾的是说得还不够具体，可是毕竟我是在同一个整天累得要死的姑娘谈话，怎么能够随便光火呢？所以，不排除我在物价如此昂贵的时代仍会给你带一些漂亮礼物的可能性。

弗兰茨

〔邮戳：11.9.13—巴黎〕

〔风景明信片：凡尔赛公园〕

在对待马克斯的态度上，你不够谨慎，尽管你不是生他的气。我担心他不会给你寄明信片，不过他让我向你问候。

衷心问候！

马克斯·勃罗德

在自1910年秋以来一直向往的巴黎之行的最后一天写了这封信。此行始于9月8日（《卡夫卡日记》第653页），卡夫卡在巴黎也参观了凡尔赛宫（《卡夫卡日记》第618和719页）。

1912年

14.致尤丽叶、赫尔曼、瓦莉和奥特拉·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和妹妹们：

我们愉快地来到了魏玛，住在一个宁静的漂亮旅馆里，从房间里可以看到花园（总共才2马克），我们对住房和外景都很满意。我多么想得到你们的消息！

你们的 弗兰茨

〔邮戳：12.6.30—魏玛〕

〔风景明信片：歌德后期故居〕

原文引自《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94页（参阅出版报告）。卡夫卡与勃罗德6月29日抵魏玛（《卡夫卡日记》第653页），7月7日离去。

一个宁静的漂亮旅馆：系指“开姆尼茨旅馆”。

15.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当然会给你写信，而且很愿意。我把冯·施泰因女士的故居寄给你，我们昨晚在这栋小楼前的井边坐了很久。

你的 弗兰茨

顺致最良好的问候！

马克斯·勃罗德

〔邮戳：12.7.3—魏玛〕

〔风景明信片：魏玛，施泰因故居〕

衷心问候韦尔纳小姐。

韦尔纳小姐：玛丽·韦尔纳，一位只会说捷语，对赫尔曼·卡夫卡十分忠诚的女仆，在赫尔曼婚后不久即进了卡夫卡家，后任卡夫卡妹妹们的家庭教师（参阅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26页）。^[1]

1913年

16.致奥特拉

奥特拉：

临行前还有一点时间，衷心问候！别生我的气，我既没有时间，也定不下心来。

弗兰茨

〔邮戳：13.3.25—柏林〕

〔风景明信片：电影女皇德莉娅·吉尔〕

1913年3月23日，卡夫卡第一次去柏林看望他日后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他们是前一年

8月13日在布拉格结识的。两天后，他经莱比锡回到家乡。

17.致奥特拉

奥特拉别生我的气，我之所以写信这么少，你知道么，我一路上心不在焉，比任何时候都懒得写信。不过现在我已经安静地在疗养院里休息，会给你写，或者确切地说给你写明信片，因为像以往一样，没有多少可以写的东西。那一点点事不值得写信，以后我会在浴室里亲口说给你听。另外请你帮个忙：到陶斯西买一本《1913年图书》，这是本书目，别处买不到，我怕回去后卖完了，我又很喜欢这本书。向全家问候！

弗兰茨

〔邮戳：13.11.24—里瓦〕

〔连续书写的两张明信片：维吉利奥、加尔答湖；加尔答湖、加尔答岛和巴尔多山〕

我已经很久没有你们的消息了。

1913年9月6日，卡夫卡与他的上司马尔施纳所长前往维也纳参加“国际救生防灾会议”，而后他又参加了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当月14日，他经的里雅斯特前往威尼斯小住数日，继而经维罗纳和德森查诺（加尔答湖）抵达冯·哈尔通恩医生疗养院，在那里从9月22日住到10月13日。关于此次度假的意义，可参见H.宾德尔所著《格雷丘斯猎人》。关于卡夫卡的创作方式和诗情画意般的地形描写手法，参见德国席勒协会第15册年鉴（1971）第375页。

心不在焉：卡夫卡在威尼斯给马克斯·勃罗德写信说：“我现在无法集中精力写一点有系统的东西。维也纳的几天遭遇，我真想把它从我的一生中抹去，并且连根除去……总而言之，有些事让我感到窒息，使我心不在焉。”（《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120页）

那一点点事不值得写信：暗示与“瑞士姑娘”G.W.的不期相遇（参阅《卡夫卡日记1910—1923》第324页）。

浴室：兄妹们在父母住宅（尼克拉斯大街36号）中传统约会的地点（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19页、《卡夫卡日记》第309页）。

陶斯西：该公司的全称为“陶斯西&陶斯西学术性旧书店和图书、艺术、乐器行”，位于施坦德剧院和老城环行大道之间的埃森大街8号，在布拉格属一流大公司。

卡夫卡“非常喜欢看出版目录和出版社年鉴（小岛、菲舍尔、乔治·米勒、A.朗根等出版社），将干巴巴的书名变为无限幻想的出发点”（勃罗德语，见《卡夫卡书信集》第519页，参阅第479页）。当人们了解到他的这一嗜好时，对他的愿望就容易理解了。信中提到的是（寺院出版社）带有插图、厚达248页的圣诞节目录，卡夫卡早在年前即仔细阅读过此书（参阅《致菲

18.致奥特拉

今天我到过歌德历过险的马尔切西纳，如果你读过《意大利之行》，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了。你应当马上读一读这本日记。看房人带我去看歌德写生过的地方，可是它与日记中的记载不太吻合，于是我们的意见没有吻合，就像我们之间的意大利语难以沟通一样。

问候全家！

弗兰茨

〔1913年9月28日—里瓦〕

〔风景明信片：里瓦，港口和阿波纳拉塔楼〕

明信片上的邮戳日期是13.11[2]、29，实际书写日期出自《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121页。

马尔切西纳：里瓦附近的一个加尔答湖东岸小城。歌德在1786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在对那座半倒塌的斯卡里格古堡（13/14世纪）的塔楼写生时，被一群聚集起来的居民怀疑为奥地利的间谍。后经在几位有身份的官员面前极力辩白，才澄清了这一危险的疑窦。

日记：因为歌德的日记（这里称之为《意大利之行》，卡夫卡当时随身携带着它）有意识地只作了简单记载，并没有提及写生的地点，所以该日记中对这次历险的描述可能导致人们对歌德写生地点的不同判断。

意大利语：当卡夫卡进入（的里雅斯特）“普遍保险公司”驻布拉格代表处后，于1907年秋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48页和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67页）。

19.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告诉亲爱的父母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来信，我明天将给他们详细回信。天知道，时间过得多么快！母亲告诉我说你会给我来信。你不会来信的，不过如果你想写信，劝你还是别写，因为写信太难了。

弗兰茨 问候全家

〔邮戳：13.10.2—里瓦〕

关于明信片的画面，卡夫卡在威尼斯大约从1913年9月15日待到19日。

写信太难了：卡夫卡在9月28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即已写道：“我刚刚发现，自己不仅不能说话，而且不能写信了。我想对你说很多话，但是串不成句子，或者离题太远。大约14天以来，我也确实什么也没有写过，没写日记，没有写信。时间流逝得越快越好。”（《卡夫卡书信集》第121页）

1914年

20.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在试图努力入睡之前匆匆写上几个字。昨天夜里这一努力完全失败了。想想看，你的明信片此刻有多大力量！它使我绝望的早晨又变得可以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安抚。如果你同意，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照此行事。不，晚间我身边没有其他人。柏林的事我当然会写信告诉你，但是现在关于那件事和我本人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与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想的不同，我想的与应有的想法不同，于是一步步走向极端的黑暗。

弗兰茨

〔14.7.10—布拉格〕

问候全家！这封信不要给别人看，也不要到处乱放。最好把它撕碎了从帕夫拉捷上丢给院子里的鸡群——我对它们从不保密。

从《卡夫卡书信集》第130页中看出，此信显然是寄往拉德索维奇的（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07页和第611页），即卡夫卡家在那些年里的夏季住所。

帕夫拉捷：从意大利语“parvologgia”译成捷语，尔后在德语中借用的名词。系指许多布拉格旧房庭院内侧的长廊阳台。在捷克口语中，“pavlač”亦可指通常的阳台；信中乃是幽默的戏称。

2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最衷心地问候你。我的近况比较好。每天都是同样的好天气，在同一个美丽的海滩上洗同样的澡。不过，几乎只吃肉，吃腻了。其他一切我星期一告诉你，星期天我回家。今天我还给父母写了信。邮差在等我。再见。

F.

〔邮戳：14.7.21—韦格勒瑟〕

〔风景明信片：东海岸浴场玛丽利斯特〕

7月13日，卡夫卡从柏林去特拉弗明德，因为他打算在格来森多夫（波尼策湖）度假。但是，当他第二天在吕贝克邂逅居住在柏林的作家朋友恩斯特·魏恩（参阅《卡夫卡日记》第348页）后，魏恩劝他坚决地跟菲莉斯·鲍威尔结束婚姻关系（参见《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476页），于是他与魏恩及其女友拉埃尔·赞沙拉当即于7月14日来到丹麦东海岸浴场玛丽利斯特。他在那里逗留到当月26日。他在那里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茨写信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此外，我很清楚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明显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所以我冷静地面对这件事，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不安……我放弃了这份以牺牲我的婚约为代价的固执。我几乎只吃肉，吃得恶心了。连续几夜张着嘴睡觉，早晨躺在床上，受尽折磨的乏软身体如同一摊不属于自己的烂泥。这里根本不可能得到休息，每天总是神不守舍。”（《卡夫卡书信集》第131页，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11页）

韦格勒瑟：盖瑟附近的一个火车站。

22.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因为我知道，如果像以往这样继续生活下去，整个这件事妨碍你们的幸福和我的幸福（实际上我们的幸福是一致的），所以我对柏林的了断深陷难以自己的歉疚。你们知道，我大概从来没有给你们带来过真正巨大的痛苦，但这次解除婚约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痛苦，而我此刻身在远方难以作出估价。然而，我更没有给你们带来过真正持久的快乐，因为，请相信我，我甚至从未能够给自己创造过持久的快乐。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你最容易悟出个中缘由，因为你正是我自小模仿的偶像，尽管你不赞成这一点。你有时对我讲述，你当初的境遇是多么的糟糕。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尊心和满足感的良好教育吗？你不认为我过去的境遇太优越吗？何况你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迄今为止，我是在缺乏自主、格外舒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你不认为这个环境对我的个性磨炼不利吗？尽管那些关心我的人无不对我的环境称心满意。当然，有一些人到处注意保护自己的自主权利。但是，我并不属于这一种人。诚然，也有一些人从不失去自己的依赖性。慎思之，我究竟是否属于后一

种人？对我来说，似乎每一次尝试都不令人遗憾。以我的年龄，再来做这样的尝试为时晚矣？——这种借口也无法成立。我比自己的外表更加年轻。缺乏自主的唯一好处在于永葆青春。但是，只有当结束依赖的时候，才会获得新生。

然而，我在办公室里永远得不到新生，在布拉格根本不可能得到。这里的一切，使我这种实际上正在追求依赖的人得以继续现状。一切都那么现成地摆在身边。对我来说，办公室显得过于厌倦，常常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然而，实际上却很清闲。基于这个原因，我的收入超过了我的需要。有什么用？为谁挣的？我将在薪水梯子上继续攀升。有什么意义？这个工作不适合我，除了工资以外它无法给我带来一点点独立自主。我为什么不撇掉它？如果我辞职离开布拉格，没有任何风险便可赢得一切。我毫无风险，因为布拉格的生活不会把我导向任何美好的目标。我有时将自己与R.舅舅聊以对比，结果发现我的道路距他并不太远——如果我仍留在布拉格。预计我的钱和利会比他多，但信仰却比他少，因此我将会不太满意。更多的区别几乎不会有。——此外，我可以赢得布拉格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说，我可以成为一个自信而冷静的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作为真正的、优秀的工作的报酬，我可以获得真正生气勃勃和持续满足的感觉。一个这样的人也可以以更加完美的形象站在你们面前——这一点并非微不足道的收获。你们将拥有这样的一个儿子：他的个别行为也许不能令你们赞许，但他在总体上可以令你们满意，因为你们肯定能够这样说：“他干了他能干的事。”今天，你们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事实。

我的计划设想是：我有5000克朗，这笔钱足够我在德国的柏林或慕尼黑生活两年，即使没有任何金钱收入亦无妨。这两年时间可以用于文学创作，使我干出一番事业。而在布拉格，置身于内心的松弛与外界透明、饱满和千篇一律的干扰之间，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我的文学创作，则可以使我在两年之后用自己的收入生活。尽管这听起来这么微不足道，但那种生活将与我现在于布拉格、未来仍可能在斯地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你们会反对我的想法，认为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由此能力构成的谋生可能性。是的，不排除此种可能性。但是，有一点可供商榷：我已经31岁，这样的年纪已不可能作此错估，否则所有的估计都可能是不现实的；还有一点可供商榷：我现在已经写过一点东西，尽管为数很少，而这点东西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最终还有一点不足为据，即我完全不懒惰，要求亦不高，因此即使此种愿望落空仍可找

到彼种谋生可能性，无论如何不会向你们提任何要求，因为那将无论对我自己还是你们都会产生出比目前布拉格生活更甚的不快，那将是绝对难以容忍的。

就我的立场而言，对此似已看得很透彻。我现在迫切希望知道你们的想法。因为，尽管我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抉择，若错失实施计划时机便是错失某种关键性的良机——但是，对我来说，你们的意见当然十分重要。

顺致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兰茨

〔1914年7月—玛丽利斯特〕

原文引自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31—133页。此封残信中的一些想法可在5年后所写的《致父亲》的信中再现（甚至个别具体说法都一样）。卡夫卡信中所提到的计划，是他企图从布拉格脱身的许多计划之一。

缺乏自主：参阅1914年3月9日的日记中较长篇幅的剖白（《卡夫卡日记》第364页），其中一些章节即为此信的草稿。

我的收入超过了我的需要：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30页和633页。

R.舅舅：指鲁道夫·略维（母亲的继兄弟），是KOSIER啤酒厂的会计，卡夫卡舅舅中最引人注目、最内向的一位。据卡夫卡描写，他是一位单身汉，逐渐转变为“越来越难以揣摩、过于热情、过于谦虚、孤独却又几乎饶舌的人”（《卡夫卡书信集》第361页，参阅415页；《卡夫卡日记》第199页和第558页）。

尽管这听起来这么微不足道：这个计划显然始于1912年（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89页和《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535页）。

23.致奥特拉

再一次问候你，奥特拉——问候来自我和——请自己看吧

仔细看看吧，经常想着点柏林！

最衷心的问候，埃纳

〔邮戳：14.7.26—夏洛特堡〕

〔风景明信片：波茨坦，无忧宫，伏尔泰室〕

卡夫卡从玛丽利斯特返回布拉格的途中经过柏林（1914年7月25至26日），与菲莉斯的妹妹埃纳相会。卡夫卡与埃纳之间特别容易沟通（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11页）。

1915年

24.致奥特拉

这当然是一番美意；但是我昨天本来并没有想过要迁居。拥有自己的一隅本属基本人权，我乐于见到你拥有更多的一切。我所想的并没有一定之规，只是事后回想时才会把凌乱的思绪组合在一起：从店里被轰出来，为了你我该上哪里去？你不断邀请我去看你的房间，而你自己却从来没到过我的房间；还有怎样把我那间脏兮兮的旧储藏室腾空，以及你都不太清楚的其他事情。你总是责怪我很少关心你的事（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而你自己成天在店里忙碌。我承认这也是某种抵消。

〔1915年2月/3月—布拉格〕

〔战地军邮通信卡〕

日期的推算根据是，卡夫卡直至1915年2月才在父母住宅外租了自己的一个房间（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63页）。

一隅：系指一只柜子。

25.致奥特拉

多多问候。吻你（旧时的回忆）。

弗兰茨

〔邮戳：1915.4.25—哈特万〕

〔风景明信片：布达佩斯，议会大厦〕

我多么想继续旅行下去！

多多问候

问候孩子们、伊尔玛和小姐

卡夫卡妹妹埃莉同往瑙杰米哈利旅行，埃莉是去探望丈夫（驻在那里的士兵）（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68页）。

伊尔玛：赫尔曼·卡夫卡的一个侄女（弟弟路德维希的女儿），名叫伊尔玛·施泰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赫尔曼的店里帮工，但不住在他家；她是奥特拉最要好的女友。参阅卡夫卡著《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勃罗德整理）第194页。

小姐：韦尔纳小姐。

26.致奥特拉

我正在考虑和盘算：我是不是应该给她带点礼物回去？

F.

〔邮戳：1915年4月27日—维也纳〕

〔风景明信片：维也纳，威廉皇帝环行大道〕

明信片的出版年代印的是1913年，卡夫卡所署的地址是老城环行大道6号，这是他1913年11月搬进去的住房（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479页），但直至4月底从匈牙利经维也纳（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36页）返回后才进住，因此判断，邮戳所补充的年份和月份是最有可能的实际时间。

27.致奥特拉

衷心问候你！

F.卡夫卡

〔1915.5.16—乌瓦利〕

〔风景明信片：乌瓦利；画面是卡夫卡的一幅幽默画：“奥特拉的午间小点心”〕

此信写在奥特拉致她日后丈夫约瑟夫·达维德的明信片上，卡夫卡很可能迟于1915年3月与他相识（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67页）。卡夫卡的幽默画显然是因妹妹在明信片信文中的一段话激发的灵感：“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现在坐在旅馆里，高兴地等待着将要端来的东西。在此衷心地多多致以问候。现在才11点钟，奥特拉。”（因为布拉格的午饭时间迟至下午，人们在

10至11点之间进食餐间点心，即所谓的午间小点心）

卡夫卡与奥特拉一同出游主要集中在1915和1916年（参阅本书后附的年代表）。

28.致奥特拉

问候你。弗兰茨

和菲莉斯

致以友好的问候。埃纳·施泰努茨

致以最友好的问候。格蕾特·勃洛赫

弗兰茨

〔邮戳：15.5.24—埃德蒙德峡谷〕

〔风景明信片：波希米亚小瑞士，埃德蒙德峡谷〕

格蕾特·勃洛赫：菲莉斯的女友，她是大约在10个月前柏林“阿斯卡尼庄园”旅馆里那次不愉快的谈话过程中的主要参加者（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496页、611页、617页和620页）。

埃纳：菲莉斯的妹妹，当时已经出嫁。

1916年

29.致奥特拉

福格尔沙拉向你问候。

〔邮戳：16.5.13—卡尔温泉〕

〔风景明信片：卡尔温泉，特劳特魏恩旅馆〕

这张明信片与第30号明信片，是前往卡尔温泉和马里恩温泉出差途中所写——卡夫卡于1916年4月9日携奥特拉到过卡尔温泉。

福格尔沙拉（原文Vogelrsalat的判读没有把握，第二个“a”又似“z”）：是奥地利口语中对野苣荬沙拉或农家沙拉的发音；此处戏喻素食。

30.致奥特拉

并以当地陌生的方式致意。

〔邮戳：16.5.15—马里恩温泉〕

〔风景明信片：马里恩温泉，阿尔姆咖啡馆的露天餐园〕

31.致奥特拉

多么自负哟！我可没有丁点儿理由发火。如果连支配星期六的一点儿自由也没有，那这里就成了真正的地狱了——这里本来只是名叫前庭地狱而已。我不想去卡尔施泰因，因为我不知道你在那里跟谁在一起，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烦恼已经够大的了，不想再把这烦恼带着上路。再说，当你在卡尔施泰因与圣约翰之间的树林中藏身时，天气总是在下雨。这两码事都不是我的过错。

〔1916年5月28日—布拉格〕

奥特拉把这封信夹在她1916年5月28日晚寄给男友约瑟夫·达维德的信中。她在信中写道：“这个弗兰茨把一封信放在我的桌上，我把它寄给你，我相信，来自卡尔施泰因的明信片会使我感到高兴。”

卡尔施泰因：卡尔四世修建的古堡，位于布拉格西南28公里的贝劳恩山谷中，是卡夫卡 and 朋友们最喜爱的远足景点（参阅勃罗德著《好斗的一生1884—1968》第23页）。

我的烦恼：卡夫卡在这一天写信对菲莉斯说：“五天来绞尽脑汁，其劳累程度已经很久没有过了。”（《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58页）

32.致奥特拉

我亲爱的奥特拉：

要是还有新鲜事，我还会详细写信告诉你；要是没有更新鲜的事，我们就会于下个星期二在肖特克公园里再作叙述。今天只告诉你一点：我的感觉比原来想象的好得多，也许F的感觉也超过她的想象。现在让

她自己告诉你吧。我不想去埃森施泰因。F.明天走，然后我得看看自己的脑袋（今天也有点疼）是否还能运转。待在这儿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我已习惯这里的一切，感觉良好。我们还是明年再去那但愿自由的世界。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6.7.12—马里恩温泉〕

〔连续书写的两张风景明信片：马里恩温泉，巴尔默拉尔和奥斯本宫饭店，奥斯本宫入口和饭店花园景致〕

你能不能到这里来玩几天？

亲爱的奥特拉，你要是能来就最好了。这里真的太棒了。至于我们的身体怎样，感觉如何棒，你自己可以判断的，因为我们明天将去看你的妈妈。

衷心问候你，菲莉斯

尽管卡夫卡作为免服兵役者没有权利享受正常的暑假（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56页），但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52页和第659页），以致1916年7月前往马里恩温泉的“巴尔默拉尔宫”旅馆休养。休养时间从当月3日持续到24日；当时与他已经重归于好的菲莉斯（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63页和《卡夫卡日记》第502页），在他身边待到13日。他直到1922年还在日记中写道，他“在马里恩温泉度过了幸福的14天”（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67页）。

肖特克公园：从布拉格老城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的一个公园，是最高城堡军事长官肖特克（OberstburggrafChotek）于1826至1834年之间下令辟建的。这是卡夫卡兄妹在布拉格城中最喜欢逗留的地点。详见宾德尔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37页。

埃森施泰因：这张明信片所署的地址是：“埃森施泰因市场，塞德尔旅馆”。此地处于波希米亚大森林地区，奥特拉在这里度过了7月份的上半个月。

我们明天将去看你的妈妈：奥特拉7月15日致信达维德：“弗兰茨和菲莉斯曾经从马里恩温泉去看望母亲，他们一起给我来了信。在此之前，我已接到弗兰茨的两张明信片，看起来环境很安宁。”（尤丽叶·卡夫卡自7月12日携瓦莉在弗兰岑温泉疗养，她丈夫至迟已于当天回到布拉格）卡夫卡也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主调是美丽和轻松，包括母亲也在场的时候，这一切真的是格外美好。”（《卡夫卡书信集》第140页）

33.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写信不多，我知道信越少叙述时越要详尽。

多多问候。

弗兰茨

〔邮戳：16.7.23—马里恩温泉〕

〔风景明信片：马里恩温泉，乌齐希咖啡馆〕

最美好的问候，伊尔玛·韦尔茨

问候你，爱您的老韦尔茨您的老教师F.韦尔茨也问候您

保尔·韦尔茨

卡夫卡显然把朋友费利克斯·韦尔茨家当作宿营地（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38页和《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69页）。

伊尔玛·韦尔茨：自1914年起成为费利克斯的妻子。

老韦尔茨：费利克斯的父亲，与卡夫卡兄妹亦熟识；例如，卡夫卡曾于1913年2月11日在韦尔茨家朗读了《判决》，当时奥特拉也在场旁听（参阅《卡夫卡日记》第297页）；1913年1月8日，老韦尔茨曾给卡夫卡讲过“关于早先犹太城布拉格的许多古老、美丽的故事”（《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236页）。

老教师：大概是指费利克斯曾经授过课的文学和哲学短训班（可能是在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妇女俱乐部”内所办，奥特拉是该组织成员）。

保尔·韦尔茨：费利克斯的弟弟。

34.致奥特拉

赠我的女房东。

〔1916年11月24—布拉格〕

奥特拉在1916年11月24日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弗兰茨今后说不定会在美泉宫内得到一套住房。但是，他今天的状况却显得没有保障，几天后他会住进我的斗室。我很高兴，因为房间一直空闲着毕竟是件憾事。晚上他刚把一本书放在我的桌上，里面写了‘赠我的女房东’。”自1916年11月26日至次年8月底，卡夫卡一直住在位于炼丹师小巷22号的这间房内，此请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50页、宾德尔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们》第424页和瓦根巴赫所出版的《卡夫卡1883—1924》第80页的插图。

35.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请把这封信装进信封送给总监察官欧根·普福尔先生。如果可能的话，立即送去！否则他会以为我睡过了头，是事后编出来的谎话（实际上是我事先编出来的）。这是一个借口，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昨晚我在上边写得太久，大约写到2点半，后来一分钟也没有睡着。尽管如此，我的心境良好，只想在床上躺到10点左右。这并不是因为晚一点起床情绪更好或想再睡一会儿，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办公室里的上午不至于那么长，我（作为说谎者）在办公室里总是需要请求原谅。我在上面写得并不好，也不多，但我知道能够早一点回家就很高兴，宁可上面多待一会儿。对第二天的恐惧破坏了我的所有情绪，同时或许又强迫我振奋情绪；在冥冥中，谁能看透其中的差异呢！

好吧，快把请假信送去！

弗兰茨

〔1916年12月一布拉格〕

灯油已经燃尽最后一滴。

写信日期的判断：不可能是1916年12月8日之前，因为卡夫卡在这一天之前至迟10点离开“上面”炼丹师小巷的房间（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7页）。可能是此后的几周内，因为他通常都要在那里写到深夜（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5页和第751页）。此外，卡夫卡约在该月中旬两次提到他的创作情况，与上文的推算日期基本吻合（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6页）。

因卡夫卡自1915年3月起单独住在朗格大街自己的房内，不再住在父母家中（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29页），所以他只能用书面方式委托奥特拉在清晨把请假信送到上司那里。

1917年

36.致奥特拉

首先祝大家新年幸福。然后，请奥特拉帮我买星期一晨报和维尔纳朗诵会的票（官员照顾：预约者取票权可以保留到星期二。如果星期三

再买票是否更为有利？），关于食品的事，不必为我太操心。我每天晚上的食品都吃不完，只是精神上的胃口大得不得了。——除夕夜我已庆祝过，半夜起床开亮落地灯迎接新年。杯中见不到灼热之物。

弗兰茨

〔1917年1月1日—布拉格〕

信中提到的是路德维希·维尔纳博士的报告会，时间是1917年1月7日，星期天，地点是布拉格的“新剧院”。报告会的高潮是荷马史诗的朗诵：“伊利亚特的最后歌咏，里克托尔的葬礼，这部不朽作品以其完全无法遏止的力量冲击着听众的感官，维尔纳是一位理想的荷马史诗咏者，他使一切完美的印象进一步得到加深：以其出色得体的表演、宽阔额头连同那灰白色的鬓发、令人肃然起敬的神情手势；时而论说，时而反驳，时而绘声绘色，时而悲以哀诉，将他溶入奇妙无穷的艺术境界。”（《布拉格日报》1917年1月8日第3版）

大家：卡夫卡此处指的是伊尔玛和鲁岑卡。

星期一晨报：进步的自由报，是布拉格星期一早晨出版的唯一报纸。

37.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这里的一切暂时还算有秩序，但谁知道能保持多久；一时倒也不至于一团糟，因为你整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说不定，很可能一切都已经在悄悄地松弛懈怠，而我却全然不知。我指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自你去后，鹿坑里刮起一阵大风沙，也许是一种偶然，也许是一种故意。昨天我睡在宫内，当我走进房内时，火已经熄灭，很冷。噢，我突然想起，这是她走后的第一晚，我已经若有所失。不过，后来我取来所有报纸和手稿，过了好一会儿才生出一片美丽的火焰。当我今天把这一切告诉鲁岑卡时，她说我的错误是没有劈一些碎木片，否则马上就能点着火。接着我狡辩说：“可是当时没有刀呀！”她不依不饶：“我常常用餐刀。”难怪餐刀老是脏兮兮的，还有豁口。不过我毕竟学会了一点：生火必须有碎木片。宫内的土地已经被她修整好，看来你没有忘记叮嘱她。为此，明天我要打听一下，哪一本是种菜的最佳指导书；当然，书里不会教怎样在雪地里种菜吧。

另外，有人告诉我说，父亲昨天对我表示了特殊关心。鲁德尔·赫尔曼（信不要乱放）中午很友好地告别，因为他要乘车去比利茨。为这件

事，家里闹了一出丑剧。父亲利用这个机会大骂一通，近亲远戚中几乎没有一人幸免。比如骂别人是骗子，大家都应该向他啐唾沫（呸！）等等。因为鲁德尔说不会介意父亲的谩骂。父亲也数落起自己的儿子来：Hallunke。因为父亲的形象必须高大起来。鲁向他走去，高举双手，满脸通红。鲁该走了，他在门槛上又想停住脚，但母亲把他一把推了出去。这场友好的告别遂告结束。因为父亲和鲁都是好人，也许今天都已经忘掉了这一切。但是，他们并不会阻止这样的表演在下一个场合重复下去。当我回到家时，风波已要平息，为了补偿他对我的过于关心，父亲说了一句：“To jeradlo、Od 12 ti se to musvait。”

我只是还想劝你不要来信太多。如果你想一般性地介绍你的工作情况，最好给父母或伊尔玛或我轮流来信，这样对大家都好。

弗兰茨

〔1917.4.19—布拉格〕

此信的收信地址是苏劳（西北波希米亚的萨茨附近），即奥特拉（自4月中旬起）经营其姐夫卡尔·赫尔曼（大姐埃莉的丈夫）的农庄所在地（姐夫已应征入伍）。

在卡夫卡的支持下，奥特拉决定不再在父亲的店内帮工，而去从事农业。经过几个月与父亲的争论终于得以遂愿（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28页）。

鹿坑：位于赫拉德钦南部的要塞深坑（以前人们称之为野兽洞穴），现已长满了金合欢。从炼丹师小巷的小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到鹿坑：“厨房有一个大窗户朝向鹿坑，除鸟鸣外基本上什么也听不见。”（奥特拉1917年3月10日致达维德的信）

宫内：自1917年3月初，卡夫卡在赫拉德钦附近的美景宫内租了一套两间的住房（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9页和第771页以及瓦根巴赫出版的《卡夫卡1883—1924》第81页插图）。

若有所失：以前由奥特拉关心和照顾哥哥的外部生活环境：“我每天中午来，把窗户打开，掏出炉灰，点燃炉火……只要我在房内，就一直让一扇窗开着，因为火炉毕竟还是有一点烟味。我是为弗兰茨生火，因为他想下午来。”（奥特拉1916年11月27日致达维德的信）

鲁岑卡：一位小个子、驼背的捷克女花工，奥特拉试图在精神上鼓舞她，在自己走后让她接替照管卡夫卡的两间住房：“弗兰茨的住房里面很漂亮，他对住房和鲁岑卡都很满意。他总是很尊重她，只要她来唤醒他，他马上就起床。出于对我和他的友好情感，她把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弗兰茨有了她几乎可以把我忘记。”（奥特拉1917年3月1日致达维德的信，亦请参阅《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12页）

鲁德尔·赫尔曼：卡尔·赫尔曼的兄弟。

To jeradlo……：捷语“这是吃的，12点烧的，必须热一下。”（参阅《乡村婚事》第172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397页）

38.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如果你不给或少给我写信，不必感到自责。否则，我会感到不安。相反，如果你不直接写信向卡尔报告情况，而是像这次一样把信首先寄到布拉格来，使我们了解你的工作情况，那我当然感到高兴。你信中所叙述的一切，以我现有的农业知识来作评价的话，均为理智之举。你想把一部分园子围上篱笆，换了我或埃莉或任何一个人，很可能都会有这个想法，同你一样的想法。此外，必须买一匹马吗？几头母牛或公牛不够吗？我认为，有一阵子不再适宜军役的军马，比如俄国的猎获马匹会便宜些；你们那里不知道这个情况吗？鲁岑卡提了许多建议，不过下封信再写吧。抬起头来——就像我们小巷里的居民常提醒的那样！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7.4.22—布拉格〕

这是卡夫卡在大姐埃莉致奥特拉（寄往苏劳）信上的附言。

像这次一样：奥特拉第一封报告情况的信通过卡夫卡转给正在当兵的卡尔·赫尔曼。

想法：埃莉曾经写道：“很遗憾，你没能如愿建起篱笆。围一小块园子会那么贵吗？”

一匹马：奥特拉1917年11月11日在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马的情况良好，尤其那匹新马状况良好……我对它们操了很多心。也许你以为我会从‘饲料站’得到一些饲料，实际上那里的饲料并不可靠。”

抬起头来：隐喻炼丹师小巷那些中世纪小房的矮门。奥特拉当时的心情不好，因为她的行为给父母带来了忧虑。埃莉因而写信安慰她：“你的信我们念给父亲听了。只要我们在父亲那里敢于这样做，这是对你最有利的证据。他没有对信说一个不满意的字眼，他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字眼。他已经骂够了，没有什么可骂的了。他很固执，太固执了。”

39.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必须马上回你的信。我曾经感到自己已经被你完全遗弃不管，每次想到未来（我总是不断地设想未来）时对自己说：她将听任我潦倒下去。然而，即使撇开你今天的信不说，我的这种想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你用上面的那所房子给我带来了一个较好的时期，甚至在我（因美好的时光和因之而来的睡眠困难）遗憾地放弃上面的写作时，你今天仍在支持我。当然有许多可抱怨的事，但现在已比前些年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改善。当我能够概括总结的时候，我一定会详作叙述。我也许在星期日回去，不过当然只是“很可能”。不要来我这儿！费利克斯夫妇早就急着一起回去，我也许会和他们同行，马克斯几乎不可能去。

弗兰茨

〔邮戳：17.5.15—邮政明信片〕

给我带来了一个较好的时期：据传说，卡夫卡在1916年11月之前的两年内几乎没写任何东西；在炼丹师小巷中写作的几个月，是文学创作的最丰硕时期之一。自1916年12月至1917年4月所写的众多散文和其他残篇保留至今，其中几乎包括《乡村医生》卷中的所有短篇小说。

我也许在星期日回去：然而，卡夫卡的这个愿望既未在5月20日，也未在27日实现，因为伊尔玛在当月21日致奥特拉的信中写道：“弗兰茨有这个愿望，但不强烈——即星期日回去。但他说，他曾答应与韦尔夫夫妇同行，所以必须与他们一起去。我星期去看他时对他说，叫他推迟归期。”

40.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小救济站，另有关于特施的事宜相嘱：

1.已悉希普曼先生为索普尔准备的服装获得确认，此事很好。他亦应为特施照此办理，并将确认书寄我。

2.特施因家境贫困，据某一新法要求每月特殊补助约48克朗。须提出补助申请，并填写在附表中。嘱主任先生为特施填表，应于第3页上，而后寄至波德沙姆区总队。

索普尔服装事作如下处理：索普尔从这里马上得到300克朗，此外致函波德沙姆救济站（勒斯勒老师），请他依其职责从该站资金中支付索普尔购衣尚需的100克朗（主任报价为400克朗）。索普尔本人亦可向勒斯勒先生提出请求。

顺致问候 弗兰茨

〔约1917年6月20日—布拉格〕

我与特施在布拉格的首次相遇情况如下：星期日晚，我与马克斯及

其夫人沿百老汇山坡上行，远远看见一个士兵坐在人工石径上，没穿袜子，裤腿卷得高高的，一只衣袖空荡荡，耳后有一个大肿块。“又是一个兵”，我边说边把目光移向别处。当我与他擦身而过时，我才转过身去：他是特施。我真的非常高兴。

书信日期系根据第42号信推算。卡夫卡去苏劳看望奥特拉之行必定在此信之前。

一个幸运的情况使得特施事件的背景得到几分明朗。根据马克斯·勃罗德在《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中第445页未全部发表的一张字条，与卡夫卡遗物（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得到的原件相比较，判明这是他根据奥特拉的叙述赞成向这位士兵提供补助的笔录，因为其中提到，这位孤儿除有一位生活在维也纳的姐妹和奥伯克莱的舅舅弗兰茨·菲舍尔外，近亲中还有一位生活在萨茨的屠夫约瑟夫·特施。在谈到这位不适于服兵役者时这样写道：“他刚刚能跑到陶土坑，很不正常，所以他未被征召，况且他的年龄也不须参军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执意要当兵。写写算算他不行，独立从事牲畜、蔬菜交易根本不用想，因此连乡里都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不过，也许可以想象他能帮亲戚买牲畜，比如把买到的牲畜接过来，赶回去等等。可以想象，他也能以这种方式从事蔬菜交易，推着小车取菜运菜等等。但是，完全不可能从事任何独立性的事务。亲戚们很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于是只能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

奥特拉致达维德的两封信（1918年7月29日和1918年7月18日）中，有一封提到的士兵很有可能即是特施。根据此信内容，一向对社会底层充满兴趣，不断投向其中的奥特拉（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598页和《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188页）希望通过向哥哥介绍此人，将其召到身边从事轻农业劳动。

百老汇山坡：位于赫拉钦以东的鲁道夫王储公园（今称LetenskeSadý）。

波德沙姆：苏劳的县城。

4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会办理此事的，但想提前知道你何时需要这两个人力。你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日期了吧。此外，情况有那么严重吗？比去年严重多了——而我认为，去年的那种情况本不应发生。凯泽小姐告诉我，我曾经对她说无法忍受她；尽管如此，她当然还是会去的，而且十分乐意。她在星期六去了一次后，对你还能记得她感到很高兴。现在她去波希米亚森林了，度几天假。至于母亲，当然像你所说的的那样颇受斑疹之苦，不过医生说不要紧的。父亲身体棒棒地回来了。

顺致问候，代向小姐问候！

〔邮戳：17.6.24—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你何时需要这两个人力：奥特拉要求寻找帮助收割的人力。

比去年严重多了：系指奥特拉在苏劳面临的经济困难，参阅《卡夫卡和她的妹妹奥特拉》第441页和母亲1917年12月致奥特拉和弗兰茨的一封信——信中请小女儿告诉她食物价格，因为她要女儿在苏劳为布拉格的家庭成员购买粮食：“农庄打粮并不多。你无法为我们供粮。如果你天晓得非要吃自己的老本，那是另一回事，我会接受你的粮食的。”

凯泽小姐：卡夫卡在“工人事故保险所”的女秘书。

身体棒棒地回来了：从弗兰岑温泉疗养回来（疗养是从5月27日开始的）。

42.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但愿秘书小姐昨天已把我写给你的明信片投出去。我在信上也提到，让你现在立即告诉我，男人们何时去为宜。

此信补充有关勒斯勒的事务：尚缺乡政府的介绍信，现附上，须请乡政府签章，而后寄回我处。索普尔尚未收到钱，我知道钱会在近日内寄达。

祝你好！

弗兰茨

〔1917年6月25日—布拉格〕

在我看来，母亲的病情正在好转。

别忘了特施，现只需将表格替他交给主任。

43.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我早就该写信了（寄自布达佩斯的明信片收到了吗？），见闻很多。此行总的说来感觉尚可，但毕竟算不上是休养和信使之行。像每次旅行一样，首先我能睡得好，还在布拉格待了几天，但是现在几乎又不可能了。多么希望秋天和冬天早点来到（这对你来说无所谓，因为你要去维也纳），多么希望与去年情景相似！明天我不回来，但9月底回来10天，如果你认为这样安排妥当的话。也许我该去萨尔茨卡默古特？越远越好。不过，那样一来就会晚了一些，我直到9月8日才能离开。——最后一次辞职（至少是我听说的最后一次）确实有些令人钦佩。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向你和伊尔玛致以问候！

弗兰茨

〔邮戳：17.7.28—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寄自布达佩斯：卡夫卡自1917年7月初起与菲莉斯二度恋爱，并同她一起经布达佩斯前往阿拉德探望她的妹妹；他独自经维也纳回布拉格（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70页）。

你要去维也纳：奥特拉当时可能计划去克洛斯特新堡庄园学校，以补充自己欠缺的农业基础知识。

最后一次辞职：奥特拉在1917年11月14日致达维德的信中谈到了当时她与父亲的关系：“父亲再也不骂我了，也许只是我这样感觉而已。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他不要骂我，希望他忘掉我曾在店里干过，希望他完全忘记我。我希望父亲多注视我，以同样的温柔方式。母亲给我们写来美好的信，她人好，仁慈，也赢得了许多爱。”奥特拉8月8日写道：“就在我刚刚走向他的当口，父亲……把我的辞职信从店中丢出来。晚上，他对自己的所有孩子，尤其是哥哥和我，表示了十分的不满意。”

44.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请写信告诉我，啤酒花的收获结束了吗？然后，我会写信详细介绍我的假期情况。现在，我不想用其他事情来干扰你的啤酒花。

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弗兰茨

啤酒花的收获：奥特拉8月5日致达维德的信中说：“我现在主要需要的是收割啤酒花的器械，萨茨和附近其他地方都买不到。我想，星期四就该开始收获了，所以必须认真考虑从哪儿去找器械。我突然想起，或许可以去布拉格一天。”

45.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有四种可能性：湖畔沃尔夫冈（美丽而陌生的风光，但路途遥远、饮食不好），拉德索维奇（有美丽的森林、尚可的饮食，但过于熟悉，缺乏陌生感，过于舒适），朗茨克龙（完全不熟悉，据说很美，据说饮食可口，但据称是我上司的地盘，此外也有公务上的不方便之处），最后是苏劳（不陌生，原本不太漂亮，但你在那里，还有牛奶）。可是我到现在还没休假，也不再想同所长提这件事，上一次布达佩斯之行他就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不过，申请休假是有充分理由的。大约三周前，我在夜里咯过一次肺血。当时大约是凌晨4点，我突然醒来，奇怪地发现嘴里含着许多唾液，吐出来后点灯一看，很惊讶，是一团血。于是，开始咯个不停。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咯”这个字，我认为这是描写喉部流出血液的准确表达。我以为这下子止不住了。应该怎样堵住它呢？我一直没敢张口。我起床后在房内转圈，走到窗边望出去，而后又走向床边，接着咯血。血终于止住了，我重新入睡，比很久以来都睡得香。第二天（在办公室内）去找米尔施泰因大夫。支气管炎，开了药方；让我喝三瓶药水；一个月后再来；如果再咯血，马上来。第二天夜里又咯血，但量少了些。又去找大夫，当时我已经不喜欢他了。具体细节不赘，否则太长了。结果是三种可能：第一，医生说急性感冒，我否定了。八月天说我感冒？我不可能感冒，最多是这套住房让人感冒，这套冰冷、发霉、散发着怪味的住房。第二，肺结核。大夫暂时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说看着吧，所有大城市人都会感染结核病，他还说肺炎卡他没什么了不起的（这话听起来就像你说母猪，他就说下猪仔那么自然），一针结核霉素病就好了。第三，我刚刚暗示此种可能性，我被自然而然地否定了。然而这是唯一正确的可能性，况且与第二种可能性相一致。最近，我重新陷入极其严重的老空想之中。另外，在连续5年的痛苦中，去年冬天是迄今最长时间的中断。这是我肩负的，确

切地说是我受命的最重大之斗争；也是一个胜利（因为我居然敢于设想婚事，F.也许只是这场斗争中优秀准则的代表人物）。我认为，一场以尚能承受的失血为代价的胜利，可以在我私人的世界史上注下略具拿破仑色彩的一页。目前看来，我不得不在斗争中以这种方式宣告失败。事实上，就像是吹散了阴霾一般。我当夜4点睡得比较好，尽管好不了多少，但主要是头不疼了，完全不疼了，而我当时已经对头痛苦无良方了。我想，咯血的原因是：没完没了的失眠，头疼，发烧，紧张，使我虚弱到很容易就感染上肺结核。凑巧当时我也不必给F.去信，因为我的两封长信——其中一封有章节不太悦耳、几乎刺耳——至今没有得到回音。

这就是精神病症加上肺结核造成的现状。此外，我昨天又去看过大夫。这回他较快地找到了肺部杂音（我的咳嗽已经持续了一阵子），更加坚决地否定了肺结核的可能性，称我已经过了患这种病的年龄。由于我要求确诊（百分之百的确切当然不可能），他总算同意本周照X光片，并化验血痰。我已经交出了宫内的住房，米希洛瓦把我们辞掉了，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不过还是这样好，也许我本来就不应该住在这潮湿的小房子里。关于我咯血的事，我只告诉了十分同情我的伊尔玛，家里其他人并不知道。大夫说现在没有一点点传染的危险。——我该回来吗？也许下星期四早晨？待上8至10天？

〔邮戳：17.8.29—布拉格〕

咯：捷文Chrlen，卡夫卡称赞这个字的象声化表达质量。《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12页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这套冰冷、发霉、散发着怪味的住房：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由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没有把握，‘导致了所有可能的疑心病’，加上结婚意愿的巨大冲动……使血痰从肺部咯出，对此美景宫的住房也可能负有足够的责任。”（《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205页，《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401页亦有类似叙述）

很容易就感染：“有时，大脑和肺脏似乎不通过我就相互沟通。大脑说：‘这样下去不行了。’于是肺脏在5年后宣布挺身而出。”（《卡夫卡书信集》第161页，参阅《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13页）

精神病症：卡夫卡在致菲莉斯的信中谈到过同样的关联：“你是我的人体法院，我体内相互斗争的两位，一是好人，一是坏人……血，即好人……流了出来，企图赢得你，但却对坏人有利。而坏人所在之处，非常可能或比较可能难以用自身的力量找到决定性的防御生力军，而好人却为坏人提供了这支生力军。换言之，我认为此病从根本上来讲并非肺结核，而是我精神上的全面崩溃。”（《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56页）

米希洛瓦：弗兰蒂斯卡·索弗洛瓦（生于1870年），洛普科维茨宫内的洗衣女工兼厨房女

工，后与邻居博胡米尔·米希尔结婚，成为22号的女主人，将其租给奥特拉。在原本属于她的房子（20号）里，住着来自卡尔温泉的克诺尔博士（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5页），成为卡夫卡的紧邻；原房主直至1917年5月才搬进去住。参阅《卡夫卡1883—1924》第80页的插图。

46.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已经搬家了。最后一次关上宫内的窗户，锁上门，多么像走向死亡。在今天的生活中，自那天早晨咯血以来第一次开始头疼。你的卧室根本不算是卧室。我这样说不是反对厨房，不是反对院子——尽管今天是星期天，6点半就开始有噪声了。此外，也没有听见猫叫，只能听见厨房里的钟摆声。我指的主要是洗澡间。根据我的计算，那里开了三次灯，由于难以理解的用途放了三次水，加上洗澡间门是开着的，我听得见父亲的咳嗽声。可怜的父亲，可怜的母亲，可怜的弗兰茨。每一次开灯前一小时我都会因为害怕而醒来，开灯后两小时内因为惊吓而难以入睡，三三见九，便是一夜的九小时。不过肺部好些了。开着窗盖一条薄被就够了，原先那里半掩着窗睡在远处床上还须两条被子加一床羽绒被。我的咳嗽大概也少了。你一定要回来呀！

弗兰茨

〔邮戳：17.9.2—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搬家：卡夫卡交出美泉宫内的住房，重新搬回老城环形大道6号的父母家。因为那里没有他的房间，所以他住进了洗澡间旁边的幺妹卧室。后来的几年，包括他常常卧病不起的时候，均住在这里。奥特拉1918/1919年冬天根本不在布拉格，1920年7月中旬结婚后有了自己的住房。

47.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已经好些了，洗澡间比较安静。不过，一到6点一切都结束了；隔壁的眼皮一打开，噪声就把我吵醒了（“打开眼皮”这个词组一定是过去一位敏感的德国人发明的）。上边百老汇大街的那栋房子，先是

从外观上看了看，相当不错，两层小楼，对面是费德尔与皮森妇女用品工厂，但今天有人告诉我，部分驶往集市广场的马车从门前通过。这意味着，我将从一个集市广场搬到另一个集市广场。多困难呀！

不过，你的房间确实很美。我已经把它充实了，不是用物件，而是用我自己，以致你如果回来时，几乎无法冲进来。你不感到遗憾吗？今天我还要去看医生，然后我会写信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来。大概是周末，届时我会给你发电报。

弗兰茨

〔邮戳：17.9.3—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地址将写上奥特拉，而不是F。

上边百老汇大街的那栋房：从母亲1917年10月寄往苏劳的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当时仍在寻找住房，以取代美泉宫和炼丹师小巷那两套已不再属于他的住处。费德尔与皮森妇女用品工厂位于布拉格7区奥弗内卡大街9号，即高级住宅区Bubenec，那里的德裔犹太居民比例较高。

48.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昨天我又去了他那里，他比以前明确了一些，但最仍保留着他的或所有医生的特点，这些特点来自必然的无知。由于我的问题十分固执，必定要知道一切，于是他要么重复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要么在重要问题上自相矛盾，既不想承认这个，也不想承认那个。总之：针尖对麦芒。然而，直到现在也不说是肺的问题，而说是气管。谨慎是必要的，可是危险并不存在（由于年龄关系），也没有作任何预言。医嘱：多吃饭，多通空气，不服药——因为胃敏感；每天夜里腋下罨敷，每月检查一次；如果数月后仍不好转，他或许（废话）会给我注射结核霉素以“尽我的一切可能”。去南部（这是回答我的问题）疗养固然好，但并无必要；去农村亦然。——也许我可以递交退休申请？他认为完全具备充分理由；后天我将同我的上司谈这件事（明天他有一个重要会议，我先告诉他这个念头）。

此外，我现在经常想起工匠诗歌里的诗句——“我本应把他视为正人

君子”或类似的句子。我的意思是，在这场疾病中无疑存在着公道，这是一个公正的打击，而我却没有感觉到这是一记打击，而是视为与晚年平均遭遇相比完全甜蜜可人的命运，它是公正的，但又是那么粗鲁、那么世俗、那么单一，就这样打击到最为舒适的所在。我原本相信必定还有另一条出路。

这张明信片昨天没有寄出。一夜之间又有了变化。在马克斯的催促下，去找过教授。他的说法总的来讲是一致的。但要求我一定要去农村疗养。明天我去申请退休或3个月假期，你会接收我吗？有困难吗？这件事并不容易。

弗兰茨

〔1917年9月4/5日—布拉格〕

〔连续书写的两张邮政明信片〕

卡夫卡首先于9月4日写到最后第二段的结尾，这一段已经写在他标有“2”的明信片上，而后他把第1张明信片单独寄出（邮戳：布拉格—17.9.4.）。次日，他在第2张上补充结尾（对比信中“明天”与先此所写的“后天”二字，并参阅第49号信），并在两段文字之间划了一道横线以资区别。第2张明信片的邮戳注明是9月5日。

比以前明确了一些：参阅第45、96号信和《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24页（“医生们很笨，毋宁说……他们的自负太令人可笑”）以及卡夫卡1917年9月22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描写了米尔施泰因大夫的诊断：“第一次检查后我几乎已经完全康复，第二次检查后甚至更好，后来左边支气管轻度发炎，再后来，‘毫不缩小也不扩大事实’，右侧和左侧肺结核。这种病在布拉格很快就可以完全治愈，现在终于可以指望一下子好转了。他似乎是想用他那宽阔的脊背挡住他身后的死神，似乎是他挤向一旁。二者都吓不住我（很遗憾？）。”（《卡夫卡书信集》第168页；最后一次诊断是在卡夫卡将皮克教授的鉴定交给医生后，医生用书面作出的。参阅第49号信）

我的上司：每当卡夫卡使用这一称谓时，均指保险所监察处长、总监察官欧根·普福尔（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214页和第649页），该处是1910年由保险技术处、企业清理机构和监督处合并而成。普福尔对卡夫卡的才能十分惊讶（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1页和《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96页），卡夫卡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通常在他离开期间代理他。（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43、161、337页和本书第49号信的注解）

诗句：在里夏德·瓦格纳所著《工匠诗歌》第二幕第四场中，埃娃说汉思·萨克斯徒劳地企图窃听有关她的最终结果，诗云：

你们一无所知？你们一言不发？哟！朋友萨克斯，

现在我真的看清：倒霉的不是瓦克斯。

我本应把你们视为正人君子。

此情亦可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44页。

去找过教授：弗里德尔·皮克（即戈特弗里德）是布拉格德意志大学喉科研究所所长、内科教授。勃罗德当年在日记中记载道：“9月4日。下午同卡夫卡访弗里德尔·皮克教授。查清病情耗费了这么长时间。确诊为肺炎卡他。必须休三个月假。有结核危险。”（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44页，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70页）

49.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我已经开始谈这件事，当然免不了要重新演一出伤感的喜剧，因为这种惺惺对我而言在每次告别时都难以避免。我没有直截了当地要求退休（虽然是骗人的，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诚实的），而是开始说些我不想利用保险所之类的话。当然效果是有的，人们现在肯定不会让我退休（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不会轻易批准）。尽管我还不知道所长的意见——我明天才去找他谈，但休假肯定会获准。教授的鉴定（无须对他的话作太大的修饰，他的字本身就具有另一种权威）有如一张永远有效的旅游护照。——母亲以及父亲那里，我把申请休假的理由说成是神经过于紧张。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总是希望我多休假，所以不会产生怀疑。

〔邮戳：17.9.6—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伤感的喜剧：参阅卡夫卡1917年9月9日致菲莉斯的信：“我本来提出想退休，但人们从我的利益考虑，认为不应该准许我退休。那种带有某种伤感的告别喜剧，是我屡试不爽的习惯作法，这一次自然也不会失灵，其效果与我的请求恰有相悖：我仍是所里的积极分子，并获准休假。”（《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53页，参阅第656页以及《卡夫卡日记》第532页）

所长的意见：指的是市政委员罗伯特·马尔施纳博士（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501页），卡夫卡对他的组织才能和工作能量十分钦佩（参阅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148、279页，《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426页、454页），他见到卡夫卡时也常常“出人意料地十分友好”（《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03页）。9月6日这天，卡夫卡只同欧根·普福尔谈了话。

教授的鉴定：皮克的鉴定中写道：“您肯定能够指望康复，但必须经过较长时间定期检查。”（《卡夫卡书信集》第168页）

理由是神经紧张：卡夫卡在9月9日致菲莉斯的信中写道：“我当然没把这件事的原委当作秘密来处理，但整个过程中我却瞒着父母亲。我本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当我试图迂回着告诉母亲时，我感到有点紧张，于是要求请长假，而她毫无怀疑地绝对相信了这件事（从她的角度来说，总是毫无止境地情愿对我任何微小的休假暗示作出反应，任我无限期地休假疗养）。这件事就这样瞒下了，而且暂时也没让父亲知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54页）

50.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信上说只为我作了8天假期的准备，而我现在至少要死死缠住你3个月，甚至星期二或星期三就要来到。这样一来，会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变化？会不会影响你秋天的计划？我今天到所长那里去了。我相信，终于可以在结核病的紧锣密鼓中走出保险所了。不是退休。当然是休假，而且不用申请。他让我不必感到心情沉重，心情沉重的应该是他们，因为我是一个宝贵的人才，云云。我听着这些话，眼睛望着墙上的杰作，世界开始旋转。是这么回事：每当我新到一个地方，便会在墙上贴一些并不勾引食欲的作品。当然，算不上是直接的关照，因为我是以积极分子的身份休假。苏劳这一阵子以来见到过一位积极分子光临吗？

弗兰茨

〔邮戳：17.9.7—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快为送信人准备好给我的信！

大的变化：奥特拉在9月12日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哥哥今晚来到我这里，大概要住较长一段时间。他有3个月的假期，在苏劳要住到不想住为止。能够邀请客人来往，已经算是某种成就。我同他很要好。我的经济状况好多了，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一个宝贵的人才：普福尔对卡夫卡的评价是：“勤奋而不知疲倦，富有抱负，是一位出色的人才。卡夫卡博士是一位极为勤奋的劳动者，拥有超群的才能和突出的责任感。”（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149页）

5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手头没有别的明信片。我极有可能于星期三晨启程。马克斯现已开始反对我前往苏劳，他还要跟教授谈谈呢。他的理由大约如下：应该采取最佳方案，即去瑞士、梅拉诺或类似的地方。——教授之所以同意我去苏劳，是因为他觉得我很穷——可是那里没有医生呀，要是突然恶化了怎么办？我毕竟已经吐过血了呀，等等。——教授的同意是有条件的，我必须作砭疗法，可我不会遵命的——要是下雨天，而又没有散步用的长廊，我会怎么办？等等。至于我对这些理由的答复，我会当面告诉你的。此外，这些理由也许与必要的健康考虑自相矛盾，因为他会严重破坏我那自由自在的长假。

弗兰茨

〔邮戳：17.9.8—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手头没有别的明信片：因为卡夫卡通知奥特拉的内容写在下述信文的上端：“亲爱的奥斯卡，我很快会给你打电话。今天他没有供货，还是星期六来货：熏肉59，牛油28，黄油42。你们想要点什么？衷心问候！弗兰茨。”苏劳的农民们有时向布拉格的卡夫卡家及其朋友出售食品，作为从城里购物的付费或交换。这些食品再由卡夫卡家人或父母店里的职员带进首都（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63页和第175页）。卡夫卡在此信中向盲人奥斯卡·鲍姆询问，是否需要上述物品。

52.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今天写信是为了一件完全不太可能的事：我星期三早晨不能来苏劳了（当然不是取消此行）。在马克斯的强迫下，我明天早晨同他一起再去教授那里，他想向教授陈述自己的理由。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想先去苏劳。此外，我一切均好，只是过量食谱使我感到沮丧。我将给施尼策尔去信，也许他会劝我节食。令人伤心的矛盾，没有必要的进食，内在的疾病仍然肆意横行。——埃莉今天到，我将听听你对整个安排有何看法。F.已经来过几封信，那么坚定、可靠、平静，不像以往那样耿耿于怀。而我的回答是打击。

弗兰茨

我将给施尼策尔去信：即第9号信注解中提到的那位瓦恩斯多夫的厂主和自然疗法医生。此人没有答复卡夫卡的询问（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71页）。尽管如此，卡夫卡依然是他学说的崇拜者。他在1917年10月致费利克斯·韦尔茨的信中提到了施尼策尔：“……人们很容易低估这样的人。他非常质朴，因而十分伟大而正直，因而毫不具备演说家、作家甚至思想家的那种复杂与愚蠢。但是，当你坐在他对面，注意观察他，试图看透他、了解他的能量、接近他的视线时，他却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卡夫卡书信集》第187页）

F.：即菲莉斯·鲍威尔。

53.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邮差只能带去这封信：本来，我既没有兴趣写信，也没有平静的心境（在费利克斯的喧闹声中和格尔蒂安详的注视下），但主要原因是时间有限——这里的时间对我来说确实很紧张——很难写得出什么东西来。例如，前5天内我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我曾经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情绪相当低下，但后来的事态表明，从根本上说这样做是对的，我根本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具体细节以后再说。

与F.在一起的日子很糟糕（除了我们尚未谈到正事的第一天），最后一天上午我哭了，掉的泪超过了儿童时代以后的总量。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尚有任何一点怀疑，那就更糟糕了，或者根本就不可思议。我没有怀疑这一点。这样做有失公允，但它无悖于行为的正确性；尤其是当我看到她接受这一事实时的安详与宽容，更深信不疑。

她走后那天下午，我又去找过教授。他旅行去了，星期一或星期三才能回来，我之所以必须在这里待这么久，这也是一个原因。无奈，我立即又去找米尔施泰因大夫。尽管我比以往咳嗽得更厉害、喘气更急促，但他连胸音都没有听一下。他的诊断既让人不满，又令人感到宽慰（反正X光照片当然能反映真实病情）。也许因为他对我的特殊友好，他竟然以道德的依据劝我要求退休。当我接着他的话题告诉他，我已经不再想结婚时，他特别地表扬了我。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暂时不结婚，还是永远不结婚，但我没有问他（关于解除婚约的原因，对外我只称是健

康缘故，对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我今天去了办公室，谈判开始了；结果会怎样，我不得而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丝毫没有疑虑。

然而，我对奥斯卡的去留却有些顾虑。我现在很难带着他；除了你和马克斯外，也很难跟别人谈这件事。当然，这只是过渡时期，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但是，我想留在农村，而且独自一人。再说，你会增加一位客人，而奥斯卡又不会捷语，这肯定会带来困难。此外，我的感觉是自己已经被出租，或者确切地说，我感觉正在经历一个柔和的过渡期。如果以为今后可能发生那些明显使我失落或悲伤的事，那你就想错了——权且不提我的想法，结果可能恰恰相反。现在的一切，以及未来似将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最佳的选择，正循着我的道路，居于正确的所在。你根本不必为此多虑。（再说，我并不孤独，因为我这里收到了一封情书，但我又是孤独的，因为我没有用爱情来回答它）

还是回到奥斯卡的话题上吧。他看上去情绪不好，急切需要一个答复；他随时都有自卑感，以至于随时作好了心理准备，只要我一说行期，他可以在一小时之内，而后直至下星期五之前，随时可以动身。请来信告知你的想法。另外，我应当给赫尔曼先生、法伊格尔女士，即赫尔曼夫人的女儿带些什么？此外还应给谁带什么？

今天是我感觉到这个城市存在的第一天。在这些中间，不可能有好事发生；尽管如此，还是祝他们一切都好。

弗兰茨

〔1917年12月28日—布拉格〕

代我向客人小姐、我们的小姐、托尼和赫尔曼先生问好。

费利克斯：埃莉与卡尔·赫尔曼的儿子，颇受赫尔曼·卡夫卡的宠爱；格尔蒂是他的妹妹。

与F.在一起的日子很糟糕：12月底，卡夫卡在布拉格住了几天。菲莉斯于12月25至27日探望过他；这是他们第二次、亦即最后一次解除婚约。马克斯·勃罗德曾对此作过如下描述：“……弗兰茨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刚刚去车站送走F.，脸色苍白，神情冷酷严肃。可是，他突然哭了起来……卡夫卡……直接走进我的工作间，不管我正在工作，坐在我办公桌旁的椅子上，这张椅子通常是给申请者、退休者、被指控者们准备的。他坐在这里哭，抽泣着说：‘发生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太可怕了吗？’泪水从他的脸颊流下，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失态，这样失去控制。”（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47页）

对外只称是健康缘故：卡夫卡当时对马克斯·勃罗德说：“需要我做的事，靠我自己无法做到。要看透这件事的根本。这位西部犹太人没能看破红尘，所以没有权利结婚。在此时此地，不存在婚姻之可能。除非他对这件事毫无兴趣，就像是对商人毫无兴趣一样。”（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47页）

谈判开始了：卡夫卡在1917年9月要求退休未能遂愿后（参阅第49和50号信），现在再次作出努力，但结果只是假期延长到1918年4月底。早在1917年11月23日，奥特拉就在信中记述了他为哥哥的事找卡夫卡的业务上司欧根·普福尔谈话的情况：“以前我找过哥哥的上司，他坚决不肯放卡夫卡退休，但同意他在乡下多住些日子，也许可以延长到病情明朗化为止。他带夫人来到了我们苏劳。”（致达维德的信，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93页和第208页以及本书第55号信）

关于奥斯卡：奥斯卡·鲍姆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文学朋友之一，这位盲人大约于1918年1月6日至13日在苏劳卡夫卡处做客。他于1929年发表了回忆与卡夫卡共同度过岁月的若干文章，这些文章可在马克斯·勃罗德所编著《布拉格的圈子内》一书中找到。（斯图加特、柏林、科隆、美因茨〔1966〕，第130页，亦请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22页以及本书第73号信的注解）

赫尔曼先生：农场的工头，奥特拉与他有隔阂，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30页和奥特拉1917年11月8日致达维德的信：“根本不可能改变一个老人的各种习惯。他比以前好些了，但我跟他仍然难以相处。”法伊格尔夫女士：卡夫卡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鲍威尔·F（七姑娘，小个子，甜甜的目光，肩膀上画有一只小白兔）。”（《卡夫卡日记》第535页；根据手稿看出她的身份）

客人小姐：这位只会说捷语的“客人小姐”即指约瑟夫·达维德的妹妹埃莉，卡夫卡于1918年4月底与她相识。

我们的小姐：给奥特拉当帮手的玛克德·马伦卡（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29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210页）。

托尼：很可能是当时在农场帮工的另一个女工。

54.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现在是星期日上午，在厨房内，匆匆写上几句有关鲍姆的话。

并不是想阻止他的旅行；若不想伤害他，现在根本不可能成行。我所带来的小小牺牲（实际上完全不仅仅是牺牲），与我近期内所得到的善待相比，非常微不足道。总之，我并不想阻止这次旅行，而是想向你友好地通报一件不愉快的事：

昨天晚上又爆发了一阵巨大的噪声，尽管历时很短，还是老一套（从玛尔塔的滑雪动作、特露德的曼陀林琴演奏，过渡到叔叔的跺脚声

——他几周来一直拖着两条不幸的伤腿卧病在床)。这个发疯的女儿，离开了不幸的父母；那里现在还能有什么工作？只有收入丰厚，才会有人那么轻易地在农村生活；不过，她总会挨饿的，会有真正的烦恼的，等等。为了不忘记，一并告诉你，也说了一些你的好话（让我感到忌妒）：像个铁姑娘之类的评语。这一切当然是间接针对我来的，从言语中听出潜台词，即我支持了这位不正常的姑娘，或我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等等（对此，我以并不粗暴的方式，或至少没有吼叫着作了反驳：不正常的人并不是最坏的人，因为正常的并非都是好的。比如世界大战被视为是正常的）——母亲今天早晨来过一趟（似乎有某种内心忧虑，从她的举止看来，并非与我有关；据小姐说，她14天以来吃饭很少，但我看她脸色并不特别难看），问我那边究竟还有什么活儿，为什么你不回来（罗伯特一家现在已到布拉格，要住3个月）；如果你不回来，为什么需要雇两个姑娘，费用是不是太高了，云云。我尽力作了委婉的回答。

这一番谈话的结果，使我的眼睛擦亮了几分，意识到你或我面对这样的忧虑和谴责是有理的；只要父母执意认为我们是“离开”，认为我们是“发疯”，我们就一直站在理上。因为，我们既没离开他们，也没有做出不可理喻或疯狂不堪的事，而只是以足够正当的目的干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干的事，没有人找得到我们言行不端之处（无须别人为我们开脱）。父亲只有在一点上真正有权力批评，即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轻松。在他看来，除了忍饥挨饿、囊中羞涩、或许还有疾病缠身以外，别的都算不上是考验。他认为，我们尚未经受过上述无疑十分严峻的考验，因此推导出他的权力——禁止我们一切自由言论。其中确有真实之处，由于它的真实，因而也是善美之处。只要我们一日不放弃他在排除饥饿、维持生计方面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们在他面前就会感到拘束羞怯；即使我们外表上不事流露，但内心中必须有隶属于他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已经不止是一位父亲，不止是一位并不可爱的父亲。

再转回奥斯卡来访的话题上去：

我们邀请奥斯卡到一个陌生的农场，我在这里也不过是一位被人容忍的客人而已。父亲当然绝不会同意的。目前，我在外表上并不顺从，仍然住在外边，还带着奥斯卡，我自食其力，也很乐意地为奥斯卡效这一份微薄之劳，但要承受父亲的威胁，他对“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干活”等等毫不理解，固执于成见，以致我在卡尔（他1月初可能回来）面前只能十分尴尬地扶着奥斯卡无言以对。

由于我暂时无法克服更大的困难，所以我必须先克服眼下的困难。
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一切。

由于所里的关系，我不得不在这里多住几天。因为，我直到星期二才有机会同所长首次谈话。

我很愿意知道你对这封信的看法，一个字即可。但愿我在布拉格还能等到你的信。

问候小姐、托尼、赫尔曼。

弗兰茨

〔邮戳：17.12.30—布拉格〕

这封信刚才已经装进信封，现在我还想问母亲有什么担忧之事。我自己倒是担忧父亲毫不顾忌地把一切都告诉她。

玛尔塔：也许是卡夫卡那位漂亮、摩登、善解人意、谦虚的表妹（《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244和249页上提到过她）。

罗伯特：律师罗伯特·卡夫卡博士，是生活在布拉格的弗兰茨的堂兄（科林出身的费利普·卡夫卡之子），在卡夫卡病逝之前数年便死于脾脏病（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第180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403页）。

把一切都告诉她：卡夫卡起初没有把休假的真正原因告诉父母（参阅第49号信的注解）。11月22日，父亲首先了解到实情。1917年11月23日，奥特拉从布拉格致信达维德：“父亲对我那么好，对一切都那么宽容，以致我不得不担心自己本没有资格受到这种善待。我昨天回家后，急忙趁母亲正在厨房之机告诉她，哥哥为什么会得到这次假期。我本来的想法是，因为父亲并不知情，时间久了可能会生气，责怪弗兰茨这么长时间游手好闲。我没有想到，这个消息给他带来这样的印象。他很担心，我只好一个劲地劝解他，并向他保证哥哥在苏劳应有尽有，不存在任何危险。”

1918年

55.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这样的话我爱听，这很好。我不知道何时能回来，所长总是制造困难，今天我去找过教授，也许我真的太健康了，以致不得不经受申请退

休的严重考验。如果别无他途，我只好这样走下去。为了奥斯卡，也许我将给你发电报。不过，你能否悄悄地在布拉格过一夜？我将努力避免这样做。我的第二封信，打乱了洗澡间内快乐母亲的幻想。我有时想起那件内衣，因为它已经补好了。所以，如果有人再次缝补它，肯定是由于它后来又被撕破了。如果我执意要退休，就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件内衣。此外——我迄今很好地度过了布拉格的岁月，这给人以希望。

弗兰茨

〔邮戳：18.1.2—布拉格〕

〔风景明信片：魏玛，歌德故居，卧室〕

太健康了：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04页（1917年12月初）：“按教授的说法，我现在本应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

悄悄地在布拉格过一夜：自1918年1月1日以后，已不可能乘火车当天往返于首都之间。由于卡夫卡的未来尚未明确，他不得不在布拉格住很久。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求奥特拉悄悄地回到布拉格，把整装待发的盲人作家奥斯卡·鲍姆送往苏劳（参阅第54号信）。1月13日，奥特拉又把奥斯卡从苏劳送回了家（参阅《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98页）。

56.致奥特拉

……我们也算是在真正地生活，换言之，我与你在一起生活胜过其他任何人，我甚至都不愿意须臾瞥一眼旁人，尤其是那些并非真正地生活，而是把某些屈辱视为几乎难以躲避的命运引颈忍受者。这样做也许并不是一种帮助，而是一种消磨，如同牙刷套、镜子，特别是良好意愿的消磨。我们之间即存在着良好意愿，我对你的关心胜过任何人。

弗兰茨

〔邮戳：18.3.4—布拉格〕

此信系在布拉格所写，第一部分已失落。

我与你在一起生活胜过其他任何人：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65页（“与奥特拉一同生活犹如一对美满小夫妻”）、《卡夫卡与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21页、《卡夫卡1883—1924》第83页之插图、本书第24、72号信、第65号信的注解、奥特拉1918年4月27日致达维德的信。奥特拉的信中写道：“我同哥哥重归于好了，我很高兴，我们之间已不再有芥蒂。”

57.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本来没什么可写的，因为我还没有适应环境（你的房间已经适应，但对这个城市还没有适应）。呼吸比以前糟糕了，但也许是因为我走路太快（现在已经好些了）。睡觉很糟糕，开始几天内几乎没有清醒过，不过这只是过渡而已——除此之外，我认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对搬家这件事从根本上感到后悔。不过，我倒是很想再见到你，扯扯你的耳朵。我曾经在埃莉身上试过，她的耳朵不完全对味。

弗兰茨

〔1918年5月5日—布拉格〕

代我衷心问候格雷施尔小姐，还有达维德小姐，当然还包括赫尔曼先生。关于田园之事，我提不出什么新点子来，只有附件中提到的粪肥肥田建议。自从我今天偶然来到苗圃后面的几个小菜园后，我已经不再为我们的园子感到自豪（但毫无半点不喜欢之意）。我们的成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每个人都在这样做。那片小菜园大约是我们园子的一半大，大多数菜园照管得不错，许多菜园称得上十分出色。——对了，关于那个计划：从不幸的胡萝卜1.开始，2.红萝卜，3.洋葱、生菜，4.菠菜、水萝卜，5.植物，6.豌豆，7.洋葱（1排肉片，2排洋葱片，中间是大蒜和水萝卜）——不，写不下去了，连我自己也搞糊涂了，不过你一定看得明白。

我们通过卡尔带去490克朗，其中我的380克朗，母亲110克朗。这是根据你附来的清单数额，剩余3克朗归你。

总监察官先生有一个请求：他将在本月内乘车前往米歇洛普。能否在接到电报通知后往火车上给他送60—90个鸡蛋？

这是在母亲致奥特拉的信（由卡尔·赫尔曼代交）上附笔。5月2日，卡夫卡重新开始去“工人事故保险所”上班。

扯耳朵：参阅第86和97号信。

格雷施尔小姐：可能是《卡夫卡书信集》第204页上描写的那位村姑。

达维德小姐：此间，奥特拉已与未婚夫的妹妹埃拉·达维德相好。她在1918年4月27日致约瑟夫·达维德的信中有道：“我喜欢她，不仅因为她是你的妹妹；如果我仅有一份这样的爱情，也许我会有几分担心，但是有了她这样的友情，我感到很美好、很高兴。”

苗圃：卡夫卡高度评价的这个苗圃设施位于布拉格至德累斯顿的铁路线旁，园内种植有一百多种植物（分别用牌子标明树名）（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39页、《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558页和第571页）。

不再为我们的园子感到自豪：卡夫卡在苏劳时对这个田园负有特殊的责任感，经常在园内劳动：“那里很漂亮，我今天同哥哥一起在那里干活，从1点干到晚上8点，几乎已经天黑。我们种了菜苗，我还翻了两畦地。”（奥特拉1918年4月27日致达维德的信，并请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01、233、237和240页）作为此类劳动的继续，卡夫卡于夏天在布拉格郊区特罗雅帮着干一些田园轻活。

58.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相信，为阿尔宾·巴特尔提供的帮助至少已经准备就绪。我回到布拉格后，立即写信告诉了他，这里没有关于他的证明文件，所以一时还难以办妥，但我们会帮助他的。昨天，我让人通知他于星期六（18日）前往萨茨接受体检，我们的一位官员将在场，他肯定可以帮助巴特尔办好一些手续。可是，今天我又收到了5月初寄给B的一封信，被以无法投递为由退回。这就是说，B在苏劳给我的地址“萨茨畜生商贩莱奥波尔德·格拉泽尔代转”不够详细（也许我们的官员能够找到他）。很遗憾。如果他再来，你问他一下详细地址。——我们星期天等过你，埃莉说你肯定会来。别的没有什么新鲜事了。这里的生活比苏劳艰难一些，但这没有理由阻止我作出入乡随俗的尝试。

衷心问候你和小姐！

弗兰茨

〔邮戳：约1918.5.14/15—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此信的日期系根据信中内容推测。此事的原委亦可参阅第40号信的注解。

59.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请把我的停职报告寄给我。我可能要去休假，所以用得着它。另外，我不久前去看过教授，他认为肺很好。你要的资料还没找到，现在只有关于园林方面的，不过我会找到的。你已经找到一些了吗？

衷心问候！

弗兰茨

〔1918年8月底—布拉格〕

日期根据第60号信推算。此信可能是通过父母店中的一位职员转交的。

资料：因为奥特拉打算辞掉苏劳的工作，去上一所农业学校，所以卡夫卡努力为她搜集有关农业教育院校的资料。见第60号信。

60.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谢谢你寄来的停职报告。我本来只是想用那封电报来激励你；我当然知道你现在很不安宁，但是告别苏劳总是要承受这一切的。不过，关于学校的事可不要过于躁虑，因为选择余地很大，也许并不在乎一锤定音。只要想学习，天下无处不能学；临急尚可求助书籍，书中自有一切必要的知识。我到处写了一些信，到处问了问，目前暂时拥有以下资料：有关艾斯格鲁普和克洛斯特新堡两所园林学校的材料（后一所较理想，人们可以在那里学到非常多的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学成，还可以选择旁听生身份——这些大概是此类学校的一个优点——尽管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毕业证书，但这并不那么重要，批准入学和各科考试成绩对你来说已经足够）。此外，我还有一大堆有关捷克家政学校的材料，这些学校多与农业学校有关联，需要亲自过目才能选择合适的学校。你最好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有关真正的农业学校，我只给布斯魏斯、利卜魏尔达、弗里德兰去过信。布斯魏斯的家政学校（不管你怎么强调找的是农业学校，他们的理解总是首推家政教育，因为事关一位姑娘的求学。于是，布斯魏斯只有家政学校给我回了信），今年冬天根本不开学，因为缺乏食品和煤。这类必需品不能不考虑，因此亲自参观一下是必要的。利卜魏尔达—特森和弗里德兰都没有回信。通过一个熟人，我在一位有名的专家那里了解了利卜魏尔达学院的情况，这所学校虽然很好，但招生前提是要受过中等教育。现在确有一名女生在该校学习（也许那里也有旁听课程）。除了利卜魏尔达以外，这位专家还推荐了弗里德兰，那里有一个两年制的训练班，一年内就可以修完所有课程，这也算是供你选择的一种可能性吧。另外，也搞到了一些有关这个训练班的材料，并不是通过那位专家，而是总监察官，此人认识训练班的主管。如果你决定不去维也纳，且不论缺乏农业经营学校，你的决定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去维也纳意味着你要面临全新的环境，倒不如先去弗里德兰（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个令人注目的美丽而悲伤之城，我曾在那里逗留过14天），同那里的人谈谈再作计议。也许他们在此期间还会给我来

信。考虑到全部费用，你最好一个字也不告诉父亲，我很愿意承担费用，反正钱已经越来越不值钱了。我会把钱转到你的户头上，算是你未来学业的第一笔押金。

我可能在家住到星期天，然后很可能启程去图尔瑙；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导游，我可以奉陪。你越早从苏劳解脱——毕竟你已经做出了决定，当然应当光荣离开——越有利于你在新学年前有时间到处看看。

如果你搬家，不要忘了我的报纸。也许可以从邮局寄来。

祝你快乐，衷心问候全家！

弗兰茨

〔邮戳：18.9.8—布拉格〕

小姐将干什么去？亲爱的奥特拉：

一点补遗，弗里德兰回信了，我把校长的答复函件现抄写一份附上。一共是两所学校：冬季学校（两个冬季班，每年从11月初至3月底，不过那些“已有长年实践经验的贫穷农民”亦可只上其中一个班）和家政学校（这个学校今年变得令人疑虑了）。如果你来布拉格时我已经启程，你会在你——我的房间里找到所有材料。我不在期间可能寄到的信件和资料，可以到凯瑟小姐和克莱因先生（他也认识那些有关人员，也许能去州管理委员会里催办）的办公室去取。

我刚刚接到一项重要任务：你把所有能够搞到的兔子和山鸡统统邮寄给总监察官！如果价钱不算太高，吕夫特纳先生从总监察官先生那里不仅可以得到每一只的报酬，而且还能得到一些烟品（烟叶、雪茄、香烟、弗吉尼亚雪茄，随他想要什么）。

再见！

弗兰茨

亲爱的奥特拉：

还有第二点补遗：特森学院来了回信。从某种意义上讲，学院当然比弗里德兰的冬季学校好多了，但它具有高等院校的特点，要求高多了。现在取决于你有没有自信，还要取决于你是否会被录取。虽然不是

作为正式的学员——我认为，对女生来说也根本不可能……但是非正式学员也有文化程度问题，我觉得你不必要做此尝试。正常情况下，特森—利卜魏尔德的学制为3年，非正式学员则当然视其爱好、勤奋和课程选择而有所缩短。院长在信中向我打听你的文化程度，我根据附信中的内容作了回答，并提出弗里奇秘书先生作为证明人（他是一个州律师），他恰巧正在州委员会作学院的专题报告，可以对你的录取拥有参与决策权。

我相信，你将会主要在弗里德兰和特森这两个院校中作出选择。你最好先都看一看这两所院校。

再见！

弗兰茨

关于学校的事：在考虑了很多计划（参阅本书后附的年代表）之后，奥特拉又发奇想，打算在维也纳附近的克洛斯特新堡上园林学校（参阅第43号信）。

弗里德兰：参阅第7和8号信的注解。奥特拉后来在该地的冬季学校求学，从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她一举通过了两年课时的毕业考试（见1918年11月16日致达维德的信）。

去图尔瑙：后来卡夫卡于9月下半月在该地疗养。

在你—我的房内：参阅第46号信的注解。

凯瑟小姐和克莱因先生的办公室：参阅第61号信。

吕夫特纳先生：是苏劳的一位农民，他虽然疏于农田经营，然而却是一位狂热的打猎者（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36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173页）。

6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很遗憾，我没能见到你。请你今天去找一下K.小姐。因为，K.先生今天给我亮了一封信，他也许要将这封信寄给她，在信中接受她的辞呈。

尽管如此，他似乎仍以沉默的方式请求你今天去看望她。从他的叙述听来，当然有些言过其实，又似乎非常在理。人在失去控制、情绪亢奋时总是感到自己在理。而她，则过于惧怕任何专制，她觉得专制无处

不在，认为他行为专制的唯一目的是想凌驾于她之上。你最好去看望她一下。

我并不认为走访一下会有特殊的实际效果，昨天他叙述过后已经发生了不少事。不过，去一趟至少是一种在他与她之间制造某种和睦气氛的努力。

F.

〔1918年10月上半月—布拉格〕

信中系指卡夫卡的女秘书凯瑟与一位办公室同事之间的关系；从第60号信的内容中可以推论，那位同事很可能就是克莱因先生。参阅第68号信。

卡夫卡早在1917年6月底就曾向妹妹说过，他的“打字小姐”将要来苏芳访他（《卡夫卡日记》第76页；从手稿判断，K.=凯瑟；亦请参阅第41号信），凯瑟迟至11月份才成行。卡夫卡当时致信马克斯·勃罗德说：“我们今天来了一位客人，完全违背我的意愿。这位办公室小姐（是奥特拉把她请来的）还带来了一位办公室先生（你大概还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送某些客人路过码头，当一对男女走过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就是这一对），一位本来很出色、我也感到很不错、很有意思的男人（天主教徒，已离异）。这是一个意外。尽管是事先通报的来访，但仍然令人感到意外。我难以承受这样的意外，心中油然而生出一丝妒忌、一份巨大的不快、一种在姑娘面前的束手无策（我半心半意地劝她嫁给他）。漫长的一整天，我的感受逐渐糟糕到乏味透顶，更甭说心中那种可恼的第三者感觉。”（《卡夫卡书信集》第190页）当奥特拉后来于11月23日来到卡夫卡的办公地点时，她看望了凯瑟，凯瑟当时送了她一件小礼物（见奥特拉当天致达维德的信）。卡夫卡于12月17日从苏芳给这位姑娘写了信（参阅《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95页），其目的也许是：在他自己最终解除婚约之际，他对她的问题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次年，很可能进入了卡夫卡所描写的危机时期。由于卡夫卡届时已回办公室上班，而奥特拉与此同时也肯定在布拉格，所以此信的书写时间只能是在10月前半月。

62.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的身体状况相当过得去，每天上午不卧床，但还没有外出，也许今天，也许明天，要外出走走。

我知道你的处境并不容易。挨饿，没有自己的房间，想回布拉格，还得学那么多教材，这确是一个考验，能够经受住它当然很了不起。苏芳的环境对你和你的目标而言有利得多。现在，在最初几天里你还没有通观一切，但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究竟是否能够赢得别人的钦佩。如果学习或身体状况不堪，你当然可以打退堂鼓。诚然，那就意味着素食主

义的一场败仗，因为“老农民们”是能在客居他乡时出色地自我保养的。此外，只要包裹一寄到，便是一剂救命良方。我很乐意定期给你邮寄面粉，这可是必备品。

弗里德兰的洗劫风引起本地的反感，尤其是《布拉格日报》报道的风格令人反感。由于弗里德兰以往那么平静，从未发生过令人憎恶之事，所以导言中即把这场骚乱描写成“可怕的”事件。无论如何，人们扛走了你的食糖以及其他可能的食品，使你在那一天内没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一点终归是可恶的。父母亲现在已经平静了。

总之，亲爱的奥特拉，学习或回家，健康或回家。如你能坚持下去，我会感到惊讶；如你回家来，我会安慰你。

还有一点：不要在课本里夹太多的信件。如果你坐在学校高位置上，信会掉出来，人家捡走了便会在班级里传阅。

再见！

弗兰茨

〔邮戳：18.11.11—布拉格〕

代我向胡普女士问候。

我的身体状况相当过得去：10月14日，卡夫卡染上当时传播全欧洲的西班牙感冒，险些丧生；奥特拉替他向办公室写了书面请假条（参阅J.Louzil著《卡夫卡》第70页）。她还于当天致信达维德谈到哥哥：“他病了，中午高烧几乎达到41度。母亲哭了一整天，我尽力劝慰她，但我自己并不这么担心。我只是在远离家人时为别人担忧，但是如果我在他身边，就会有某种把握，相信病会好的。医生来看过哥哥，作了检查，并安慰母亲。”11月2日之后，奥特拉又回到弗里德兰（参阅第60号信的注解）。当月7日，母亲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弗兰茨病情相当好转，当然他还很虚弱，常常头疼。我们今天把卧室通了通风，洗刷了一通，弗兰茨坐在就餐间的长沙发上，但他很想再上床去。”

挨饿：在哥哥的影响下，奥特拉也成了素食主义者（参阅第65和80号信），尽管这在战后的营养条件下十分困难。

想回布拉格：奥特拉于1919年1月6日致信达维德：“请相信我，每当我想起自己又回到了弗里德兰，要同你分手不知道多长时间，无论明天还是后天都见不到你，总是感到太难了，不知道如何打发时光。”（参阅第68、69号信和年代表）关于奥特拉的这一思想，亦可参阅第68号信的注解。

“老农民们”：参阅第60号信。

弗里德兰的洗劫风：卡夫卡信中影射的报道中，有下列内容：

“弗里德兰的洗劫风。弗里德兰星期五成为一场骚乱的战场，蜂拥而至的人群冲破了警察队伍的阻拦。上午，宫廷巷的E.哈默施拉克商人的店前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冲进仓库，抢走了为弗里德兰全区储藏的食糖，以及所有袋装食盐、果酱、瓶装牛奶和面粉。账本和文书亦被窃走，甚至连窗户也被撬开。银柜和其他储钱容器均被破坏，钱被掳去。当仓库洗劫一空后，人群又向私人地窖出击。晌午时分，人群聚集到主人巷豪普特商人的店前，企图行抢。赖兴贝格打电话求救。”（1918年11月9日《布拉格日报》第261号刊，第2版）

学习或回家：母亲于1918年11月14日向弗里德兰发来一信：“弗兰茨也给你寄了一封信，可是你还没回信。如果你没有饭吃，干脆放弃一切回家来。我们大家都盼着见到你。你还是住你的小屋，因为现在到处都住满了。我和你爸睡在诺瓦克的隔壁房间，我把我们原先的卧室腾出来给弗兰茨，那里很舒适，而且也很安静。”从尤丽叶11月20日的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奥特拉很可能没好气地接受了母亲的建议。

63.致奥特拉

几位朋友衷心问候你。

弗兰茨

〔邮戳：1918年11月27日—布拉格〕

〔风景明信片：布拉格，赫拉德钦，斯特拉霍沃修道院〕

我的问候最为衷心伊尔玛

最美好的问候来自你的母亲

多多问候你，你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jetnkdo Tsrdenpozdravuje , ale toh Ti ted jetannechci prozraditi.

Mnoho pozdravu zasla Maria wernerov

根据第65号信推算出这张明信片的书写日期。信中最后两句捷克问候语分别意为：“还有一人衷心问候你，但我现在还不想透露姓名”和“玛丽亚·魏尔纳寄语问候”。亦请参阅第15号信和该信的影印件（插图第13号）。

64.致奥特拉

你好吗？圣诞节把作业本和课本都带来，我要考考你。我需要来一趟布拉格吗？这里的生活与苏劳一样好，只是略微便宜一些，每天6法朗（现在维也纳的比价是1克朗=10生丁）。我打算在这里住四周，但

很愿意回布拉格过圣诞节。

多多问候。

弗兰茨

〔1918年12月初—舍莱森〕

〔邮政明信片，上有卡夫卡的画作，题为：《我生活中的一景》〕

明信片交给总监察官了吗？

这张明信片的内容已经略有删减，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47页和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78页插图。第64至75号信均系在舍莱森所写。自11月30日起，卡夫卡住在那里的施蒂德尔膳宿公寓中（参阅第70号信）疗养（参阅第62号信的注解）。母亲在1918年12月1日致奥特拉的信中提到了他的这次休假：“我真的是在为弗兰茨的旅行做准备：发电报，去他的办公室，此外还为他准备各种用具，没有时间写这封信……昨天我同弗兰茨一起乘车去舍莱森……他现在是在那里的唯一住客，每天付费60克朗。”

65.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这可真糟糕，如果一张小小的明信片就干扰了你的学习，那么要是写一大堆信呢？再说，这张明信片主要是针对那位神经质的教授。关于那天晚上的事，你也有其他消息来源。根据我的感觉，那天晚上过得相当轻松和自然，没有人显得有压力。今天晚上，星期三，据母亲来信说有一个新的大聚会。我圣诞节回来，我现在一切很好，尽管仍有一点呼吸虚弱、心脏跳动过速。——F.小姐的问候给我带来了很大喜悦。自从你来信作过介绍后——加上我当时略有一点低烧——我对她有了一个较好的印象。另外，也许可以请她帮个忙，在你下一张明信片上简单介绍几句有关你的进步程度。——“寻找食品”是什么意思？遗憾的是，我的桌上倒是可以找到一些食品。不过，除此之外我可以作以下选择：

这张图又可以破坏你的一堂课。

弗兰茨

〔1918年12月11日—舍莱森〕

〔邮政明信片〕

日期推算：1918年的12月11日是星期三，卡夫卡的父母于这一天期待着约瑟夫·达维德的来访。母亲曾于12月9日致函弗里德兰：“星期三我们很可能有一位贵客，你可以猜一猜是谁。”卡夫卡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大聚会”，是因为奥特拉的未婚夫刚于11月27日在卡夫卡处做过客。奥特拉于1918年12月2日致函达维德，称她于11月30日收到哥哥的一张明信片，上有母亲和父亲的签名。此信写于星期三，即11月27日。奥特拉在信中写道：“……请不要因此而生我的气：我感到惊讶，尤其是对家里的来信感到吃惊，它使我既不高兴也不平静。我没想到事情发展这么快，父母会邀请你去。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你把整个事件看作是相距遥远而带有某种身不由己的性质，如果我在家肯定不会像在这里看书时那样心情沉重。直到今天，我的心情仍不能像在你身边时那样平静……也许这只是一感觉，即在家人对此一无所知时，我的整个时光过得那么轻松，现在我无法习惯这一切。”此信不仅解释了第61号信——因为奥特拉指的正是这张明信片——也说明了卡夫卡所指的“其他消息来源”（达维德的信件）。

F.小姐的问候：弗莱施曼小姐，她是农业冬季学校除奥特拉以外的唯一女生。当弗莱施曼小姐1919年初无法回到弗里德兰时，奥特拉在给达维德的信中写道：“很高兴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我赞赏这种自由……F.对我很好，人很坦诚，十分难得，我很欣赏她对我的态度。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给了我全部的友谊。但是，正是因为我同她十分友好，所以占去了我的自由。如果她现在回来，我们将会重新调整彼此的关系，除了上学以外，我可能只想同她一起待一个小时。如果我单独学习，效果就会改善；如果独自一人或只同最亲密的人在一起，如伊尔玛和哥哥，那么我的自由时间就真的自由了。”（1919年1月14日的信）

卡夫卡的小画：可能是一张自我解嘲画，即毫无食欲地坐在桌旁。

1919年

66.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2月1日凌晨5时左右我突然惊醒，听见你在房门外喊“弗兰茨”，声音很柔，但我听得很清楚。我马上应了一声，但什么动静也没有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的 弗兰茨

〔1919年2月1日—舍莱森〕

〔邮政明信片〕

67.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晚上，也许还会出现，但我担心梦中见到的不是你。

关于你的来信，我稍后再回；今天只谈你委托的演讲训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紧迫。

依我之见，如果你认为“我自己的脑袋里可产生不出任何有用的思想来”，似乎这是演讲训练的前提中最为不幸的精神状态。这是彻头彻尾错误的。你根本还没有做任何这样的尝试，所以犹豫不决；你要勇敢地跳出自己的阴影——一些类似的顾虑都是十分自然的想法——你会出色地迈出阴影，尽管这种不可能性貌似在理。

我认为，主要有两类演讲题目比较适合你，即完全有关个人的题目和十分具有普遍性的题目，而与此同时第一类中当然亦包含有普遍性，第二类中亦包含有个性。我之所以作此划分，只是为了让你大致有个初步概念，你可据此自行选出适合于你的题目。

选择纯个人题目的做法堪为嘉褒，首先因为它的题材最为丰富与大胆。而这类题目又不甚困难，因为它不需以研究、而是以思索为前提；这类题目却又最为困难，因为它要求演讲者具有几乎超出人类自然界限的委婉、谨恭和实事求是（很可能还有其他要求，而我一时想不起来）。

譬如以弗里德兰学校为素材的“男生堆里的女生”，便是这样的一个题目。你可以把自己的切身经验，或把F.作为候补人物原型，将女生的经验加以叙述，从中得出各种结论，对你自己进行辩护或指责，分清善与恶，寻找理论依据以增强第一个观点的说服力、驳回第二个观点，等等。从时间上衡量，这将是普遍允许女生上大学之后第一学年内第一位女生的演讲报告。其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允许女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做法很可能将普遍延续和推广开去。弗斯特尔可以在演讲报告方面帮助你。

这种类型的第二个题目较为困难些，仍然可以你校为素材选题“学生与老师”。内容是你作为女生的经历，论述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某种沟通与和解。也就是说，列举你自己以及据你观察其他学生对课堂教学的积极评价，哪些方法上乘，哪些较好，哪些不尽如人意，以及学生们如何作出反应，如何对上乘的、较好的和不太好的方法作出不同的反应。尽量多举事实，尽量客观真实，尽量少自以为是。

第三个题目不太困难，并且具有个性：“我在农场经营中的学前实践经验”，即苏劳经验。例如：你为什么离开城市，接管农场时的经营水平如何，你犯过哪些错误，你缺乏哪些书本知识，不缺乏哪些知识，你对农民的哪些方面感到惊讶，哪些并不惊讶，你现在如何重新看待这些惊讶之处，你同下属打交道时积累了哪些经验，哪些方面你应付自如，哪些方面颇感棘手，你交出农场时的经营水平如何。

然后是一些既不完全具有个性又不具十分普遍性的中性题目。我个人以为这类题目最不足取，因为演讲者很容易流于泛泛空谈，却又不难于自我辩护。你建议的弗斯特尔题目均属此列，也包括那些有关犹太民族的虽然无穷无尽、却又较少普遍性的题目，而你肯定是想回避这一命题的（“我总是想着令妹的婚姻大事”，马克斯今天来信对我说）。此外还有一个绝妙的题目：“非自立农民毕业生的前途。”因为，它将涉及职业介绍、广告体制、考试制度、住宅互助社等问题。由于准备演讲报告必然会征求老师的意见，且可借阅有关这方面的书籍，等等，所以你便有一个好机会作一次专业咨询，同老师们，也许还有校长（你似乎曾对他作过一个正确的评价）就你自己的未来坦率地谈一谈。

最后是普遍性的题目，也许只能是关于书籍的报告。对此，我首先推荐的是达马施克的《土地改革》，这本书你那里肯定能找到。

无论如何，准备这样一个报告需要许多时间，即使报告篇幅很小亦然。你应当尽量推一推报告的时间，并来信告诉我准备的进展情况。

祝一切顺利！

弗兰茨

〔邮戳19.2.5—里博赫〕

演讲训练：奥特拉1919年2月16日致函达维德：“14天后，我得在学校里作一个报告。也许我今天下午就要开始动笔了。”参阅《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28页。

弗斯特尔：系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弗斯特尔所著《青年指南——父母、教师和神职人员读物》，印数41000—45000，1909年柏林版。由于菲莉斯·鲍威尔的工作关系，卡夫卡在柏林犹太人民之家见到了这本书，但他始终与书中提出的教育原则保持相当距离（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01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208页）。卡夫卡在选题建议中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12页：“弗斯特尔：将学校生活中包含的人际关系，作为课程的组成部分来对待。”）。

尽量少自以为是：卡夫卡认为自以为是是乃妹的主要弱点之一（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

你对农民的哪些方面感到惊讶：奥特拉在1918年3月15日致达维德的信中谈到了里德尔一家：“他是我们村最优秀的农民。每当我同他谈话时，总会有所收获；每当我遇到他时，就会感到愉快。他儿子正在休假，跟父亲一起劳动，母亲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家庭妇女。他们全家十分勤奋，所以农场经营得十分漂亮。”

你现在如何重新看待这些惊讶之处：参阅第57号信。

同下属打交道：参阅第53号信的注解。

你肯定想回避有关犹太民族的题目：奥特拉的男友约瑟夫·达维德博士是捷克人、基督教徒，因而具有犹太民族主义思想的马克斯·勃罗德会有上述表述。

达马施克的《土地改革》：阿道夫·达马施克所著《土地改革》于1902年在耶拿出版。这本书（《克服社会贫困的原则与历史认识》）当时出了许多版，广为流传。

68.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首先，我从你这封信的信封上看出，你的簿记编号重新就绪了。上一封信，亦即17号，显然是弄错了户头。这种错误本不应出现。

你对演讲报告的描述，与我设想的相去不远。我的感觉是，似乎报告人就在现场那么自然。我认为，你选题选得好，现在也应该努力去做。你的信中，付诸实施的决心似在游动，颇无把握，使人感到随时有可能溺水而终。如果你付诸行动，我会为你感到自豪。如果你真的去做，定会成功。当然，你必须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其中大部分可以在散步过程中圆满完成。作为演讲报告的榜样，你不必从学校的演讲训练中寻找，而应从报告协会的演讲中得益，因为你校的协会似乎确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说它出色到也能介绍职业？这倒并非如此。（顺便插一句：这个带引号的“并非”很有意思，显然是你那“用铅笔书写”方式的翻版，正如我以前从你的书信中找到的这类用法一样，你令人注目地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重复使用，尽管你的德语相当不错。你的重复中尤其不同寻常之处，并不在于它几乎刻意表达的内容，而在于包含着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只是难以察觉的底蕴。本来我是在你最后一封信中才发现这是译自捷文，且译得相当正确〔而不像以前有一次，D先生的父亲谈起某一个人，把他同这个人的关系译成“na přá tetsk é noze stoj”〕，但德文很难容纳它，至少是我这半拉子德意志人这样评价它。）

报纸上的广告显然不太好，它完全破坏了我的世界观。如今，按照常识一个助理的职位相当体面，也就是说助理对这个世界而言是必不可缺的。然而，他却找不到工作。我们所里的一件事也说明了这一点。据我所知，我们所的两位公务员原先是助理（罗梅奥和另一位出色的男子），两人都为自己成为公务员而感到高兴，而即使从称呼的习惯来看，原本将助理换称公务员都会令人抱怨的呀。相反，情夫的助手被视为很逗乐的人物，迄今仍叫助理。最后有一点与此无关的：应当找到《土地改革》。（达马施克的这本书你们那里有吗？）

——刚才我在阳台上听到了一段农民的对话，这段对白也会让父亲感兴趣的。一位农民正在从一个坑里刨萝卜。一个熟人从旁边的小路上走过，此人显然不太爱说话。农民向他问候，熟人想不受干扰地从旁走过，友好地回了一声：“嗯哼。”但是，农民从背后喊住他，说他这里有很精美的酸菜。熟人没听明白，转过身来，快快不乐地问道：“嗯哼？”农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熟人这回听明白了，“嗯哼”了一声，勉强地笑了笑。接着，他没说什么话，再次“嗯哼”一声道别，然后走了。

——阳台上可以听到许多新鲜事。

你想怎样寻找职业？为什么非要事先告诉母亲？我不太明白这一点。你有时出于其他原因前往布拉格同母亲叙谈，这些我都能够理解。即使有人说父亲心情一直很好，也足以为一个重要理由，尤其因为这很可能只是骗骗你而已。我至少要在这里再待三周，只要我的新假期没有用完，我就不回布拉格。你至少应当在布拉格走访一遍你为学校的事找过的那些人，例如克莱因先生，此人可能可以向你介绍楚莱格先生，然后还有总监察官先生（Smichow ~~Zizka~~ 小巷30号），然后还有你的农业顾问朋友。

那本书很吸引人，但不要寄给我。前8至10天我收不到，三周后我可能回布拉格，再说我现在时间尤其紧张。此外，我现在并不期待从书本上学到什么，学校里可以学得更多些，从贫困中学到的东西最多。前提是要尚有余力、尚有与贫困搏斗之必要性。不过，请你把这本书给我留在布拉格。这本书比《犁》精彩吗？是不是因为出色的学生读过的书，都是出色的书籍？

你居然还没有忘掉马克斯的意见，我确感惊讶。这并不是离奇的评论，而是很自然的表述，你自己也曾上千次地这样直言快语。你也知道自己喜欢独出心裁地干事，你也知道独出心裁地干好一件事尤其困难。

你永远不要忘记干这件难事所应承担的责任，你应当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自信地踏出行列的，即如达维德毅然弃甲退役一样。你应保持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将此事导向任一美好的结局。届时，你所做的一切——最后以一个拙劣的幽默结尾——，将超过你嫁10个犹太人！

弗兰茨

〔邮戳：19.2.20〕

你的簿记编号：卡夫卡所指的是，奥特拉错把给达维德信件的编号用在致卡夫卡信件的信封背面。

报告协会的演讲：弗里德兰的农业冬季学校为驻地附近的农民举办各种讲座，奥特拉常去旁听。

这个带引号的“并非”：卡夫卡将“不见得”改为“并非”。关于奥特拉的写信风格，参阅《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30页。

“用铅笔书写”：参阅本书“编者的后话”和母亲一封未注明日期的致奥特拉、弗兰茨的信。母亲在信中对自己用铅笔书写表示歉意：“原因是店里有很多工作。本来应该把你放在第一位。奥特拉别怪我，我在此道歉。”

D先生：系指约瑟夫·达维德的父亲；那句捷语的德文原意是：“友好相处”；卡夫卡认为，这句德文成语的捷文直译是错误的，是十分蹩脚的转译。

嗯哼（Awua）：舍莱森地区的德国农民使用的方言，在发音标准的城市人卡夫卡听来显然十分费解（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69页和第187页）。信中提到父亲会对这段对话感兴趣，这当然是一种讽刺口吻（参阅第88号信的结尾和《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188页，文中证明赫尔曼·卡夫卡对一般老百姓绝无兴趣）。

我不太明白这一点：奥特拉在1919年2月16日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我肯定会去布拉格；母亲回信说，我应该回去。那位小姐写信说，父亲现在一直很愉快，他不会再生我的气了。所以，在我开始寻找职业之前，必须先告诉母亲。我很高兴，舅舅也对我们的事感兴趣。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些了。但我不敢相信我们会很快成功，所以我认为有必要立即找到一份职业。此外，我在布拉格有很多事要干，我那里需要各种东西。”奥特拉有一个理由未让达维德知道，即她的在场可能会妨碍他准备考试。参阅第69、71、54号信和第38号信的注解。

克莱因先生：参阅第61号信的注解。

现在时间尤其紧张：这句话和后面一段话的背景是，卡夫卡于1919年初在舍莱森认识了尤丽叶·沃利泽克，他想于当年秋天与她结婚。参阅瓦根巴赫所著《卡夫卡的第二个情人尤丽叶·沃利泽克》一文，收于J.博尔恩等所编《卡夫卡研讨会论文集》1965年柏林版第39页，并参阅本书第75号信的注解。

马克斯的意见：母亲曾于1918年12月1日以类似的含义谈到过达维德：“他给我们留下了最佳印象，但我无法否认，他使我们感到陌生，我们必须首先习惯他的交际方式。他诚然是一个很听话、很聪明的人，可是父亲有很多想法，首先他薪水较低，而后是宗教问题，但愿一切

都会好起来。我们并无他求，只是希望见到你幸福。”（参阅第72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捷克民族主义者发起的反犹太主义活动（达维德肯定也属于这一倾向，参阅第90号信的注解）自然使这些关系变得复杂化。（参阅第62号和91号信、《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244页和第248页，以及奥特拉1918年10月14日致达维德的信。她在信中写道：“犹太人，也就是说一部分或大部分犹太人可能现在做了不该做的事，但肯定不应该怪罪所有犹太人，这一点你也肯定明白。我不想让你只拿我作例外，对此我不可能满意。”）

69.致奥特拉

奥特拉：

我怎么会反对此行呢？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随时整装待发的意愿十分可取。只是我根本不喜欢那些理由，因为没有一条站得住脚。你现在没有职业，怎样去跟母亲谈职业呢？除非你对母亲说，你不想找职业。然而，你是想找职业的。也许确实不想？在我看来，父亲的情绪也是个奇怪的理由，尤其因为它是那位小姐观察的结果。父亲对她一向很友好，背着她却会发火打雷，不管门关着还是开着。至于生命是短暂的这一理由，与其说是对旅行的辩解，毋宁说是对旅行的驳斥。这就是你的一些理由。如果你说，你的旅行是基于见到大家或某个人的喜悦，我当然不会对此行有任何反对意见；如果你能够保证，此行的行前喜悦、旅行辛劳和事后的想念丝毫不会影响到你的演讲准备，那我就更没话可说了。

你似乎对校长观察得很透彻。不过，根据你的结论，对那次谈话似乎真的不必抱太多幻想。跟这种人打交道，与其正式地谈话，不如旁敲侧击地点一下你要谈的正事，不过不要一次道破，而要25次地渐进，均在他最始料不及的时机。当然，成功的主要前提是他是否能够帮助，无论他有没有意愿。

这里现在也很热，天气很好。现在傍晚时分，我坐在内阳台上，没盖任何东西。中午开着窗用餐，沐浴着阳光。窗户底下，那两条狗麦塔和罗尔夫企望着我在上边施舍剩饭，那神情有如人群在老城区等待着耶稣使徒出现一般。

最近我又间接地梦到过你。我在一辆婴儿车旁逗一位小孩，胖胖的、白白的、红红的（是所里一位职员的孩子），我问她姓什么，她说：赫拉瓦塔（所里另一位职员的姓）。“那么叫什么名字呢？”我接着问。“奥特拉。”我惊讶地说：“这可跟我妹妹的名字完全一样呀！她也叫

奥特拉，也称得上是赫拉瓦塔。”我这话并没有恶意，更多的是自豪。

关于马克斯的话，我所想的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意见，而是考虑到所有意见的总合及其共同的原因。他不过是认为（他也许是在抱怨犹太民族失去了一份子，抱怨你失去了犹太民族，抱怨未来，这一点我看得不太清楚，且把它撇开不谈）你干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一件相当严重的事，而你在内心方面毫无顾忌、十分轻松，以致忽视了另一方面的不同寻常的感情。但我不这样认为，因此也没有理由作此抱怨。

代我向布拉格的所有人致以问候，并请向因我写信太少或未曾写信而负疚的各位恰如其分地个别致歉。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9.2.24—里博赫〕

然而，你是想找职业的：“没有一事物是索然无味的，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可以作此判断，即我所选择、所希望的这个职业是可能实现的，似乎也许是我从各方面看都令人愉快的唯一选择。我只是有几分担忧，担心得不到这个职业；我毫不怀疑，这个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令我满意的。”（奥特拉1919年1月14日致达维德的信）

校长：奥特拉1919年1月12日致函达维德，称她因求职问题曾打算找校长谈话，但直至当月21日尚未实现这个计划。（“他很忙，安静不下来，我不想用我的事来打扰他。”）她在3月8日写道：“我找过了校长，再次发现这是个错误，不应当去信任他。他很愿意许诺，但很容易食言。”

坐在内阳台上：参阅瓦根巴赫著《弗兰茨·卡夫卡的证书和图片资料》（Reihbek版，1964年）中舍莱森施蒂德尔膳宿公寓插图第115页。第64号信上的画作“我生活中的一景”左下方描绘了带有顶廊的内阳台。画中的女人为奥尔加·施蒂德尔。

耶稣使徒：布拉格老城区市政大楼塔楼上由日历和时针组成的天文钟顶端有两个小窗户，每天12时窗户打开后走出12位耶稣使徒偶像。

赫拉瓦塔：意为“固执的”。

70.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星期日2点至3点之间，奥尔加·施蒂德尔小姐将在她布拉格拉德茨基广场旁的家中等你。你越准时越好，越准时越相宜。她可以为你介绍两个就职机会，当然没有任何把握。一个可能性是她的姨家，姨夫刚刚去

世，一大家子基业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农庄。为了使施蒂德尔小姐的推荐信更具说服力，我建议她同你当面谈一谈。你要详细告诉她你的能力和愿望。——当然，现在不能完全排除施蒂德尔小姐星期日尚未抵达布拉格的可能性。那样的话，你的这段短路就算是白走了，施蒂德尔小姐如果没同你谈话，她会写信给你的。你星期一大概已经离开布拉格，否则你可以在星期一再去一趟施蒂德尔家打听消息。星期日无论如何要去！

代向全家问候，并祝一切顺利。

弗兰茨

〔邮戳：19.2.27—里博赫〕

〔邮政明信片〕

这张明信片是寄往布拉格的。

奥尔加·施蒂德尔：舍莱森膳宿公寓的房主，卡夫卡当时住在那里，后来又于1919年11月在那里疗养（参阅第73号信）。她曾与多拉·格里特联名写了《小忆弗兰茨·卡夫卡》一文（刊载于1931年2月27日的《波希米亚德意志报》上，转载于勃罗德著《卡夫卡传》一书第396至371页），宾德尔所著《重新审视卡夫卡》一书（海德堡1975年版）第3章第6a节中作了具体叙述。

7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劳驾你把家里的事情略告一二。在星期二的最近一封信里，母亲以出奇的口气写到了她的激动心情和父亲更加激动的心情，使我意识到其中肯定还有更多的隐情。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你也在家待了特别长的时间，直到星期三才启程。——我寄给你的改革报是否已经收到？衷心问候你。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9.3.6捷克—德意志布罗德〕

〔邮政明信片〕

家里的事情：主要是指父母对奥特拉结婚计划的态度（参阅第68和72号信的注解）。尽管母亲早在1918年12月底就“几乎已经提出”要在伯希米亚森林为女儿和未来的女婿买一所农庄（奥特拉1918年12月27日致达维德的信），但此后几天内可能就发生了父母与幼女之间迄今最严重的一系列争吵。尤丽叶·卡夫卡于1919年1月9日致函弗里德兰：“我很高兴，因为你认识到

这一次做了许多不合我们心意的事。”奥特拉也于当月21日致达维德的信中提到了父母亲：“我为这件事感到难过，因为我对他们不够好。当然，也许没有别的可能性，但我本意是想很好地处理这件事，所以不应当如此冲动。我的去信，母亲每封必回，她对我已经不生气了。”在24日那天，她还想在信中问母亲，“问她是否至少同意我”去布拉格看望他们。参阅第38号信的注解。

在家待了特别长的时间：从2月28日持续到3月5日。

72.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我们不是在唱对台戏，而是在同台演出、并肩联袂。不过，正因为我们之间如此抵近，所以并非能够时时察觉到对方的想法，难以分辨对方究竟意在出击还是安抚。出击与安抚的意愿也确实是在互为转变。譬如，我的“夸夸其谈”本意并不是针对你，而是以你的名义针对那些“不确定和看不透的东西”。你可以从自己的信中看出，确实已有一个答案，尽管从本质上看这个答案并“不确定”。事情毕竟就是如此。

我看出你有点不安（并非十分不安），正值考试期间往来穿梭，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甚至宁可错过一班火车。依我之见，只有你有此强烈愿望，才可能错过火车——由于这些原因，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的目的有二：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你现在在考试的特殊时期面临过大的外部困难，我想以这个问题将外部困难化解到无碍大局的程度，人们不应听任那些对内心造成伤害的外部困难，否则无异于被困难所窒息。譬如，如果父亲把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视为不幸，他必然亦把缺乏经济基础视为严重的、内心的、根本的损害，别无其他想法。但是，我们对此的看法迥异，至少现在如此。此其一。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上述假设并不符合过去的事实——现在是否符合事实，你我都不知道——我则想以这个问题表明，你没有权力在这方面感到不安和不耐烦。因为，“看不透的东西”，亦即你自己本身，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以我的凡夫俗眼来看，你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一只强有力的、健康的、年轻的手中，其理想程度达到了人们能够想象的最佳点。

你说得对，“夸夸其谈”并不好。但是，所幸现在并没有人达到“夸夸其谈”的程度，没有人能够做出最终、最终的决定。我记得，拉斯科尔尼可夫有一次曾经抱怨预审法官的“夸夸其谈”。你知道，预审法官几乎已经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友好地聊天聊了几个星期，突然有一次从一则笑

话中预审法官认定拉斯科尔尼可夫有罪。本来只可能是提问题而已，但由于他“几乎”爱上了拉，所以指责他有罪。拉想，这回彻底完蛋了。然而，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恰恰相反，事态刚刚开始发展。只是预审的题目，法官与拉之间共同的话题，亦即拉斯科尔尼可夫问题，给双方带来了一束自由的、解脱的光芒。顺便说一下，我在此处篡改了小说的原意。——不过，我们仍可以在考试结束后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那时候再谈更好一些。现在，请你用一张明信片的寥寥数行字来回答有关学习和思想的问题。

弗兰茨

〔1919年3月中旬—舍莱森〕

日期推算：奥特拉在弗里德兰的考试时间是3月份；奥特拉在1919年3月18日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考试仍在继续，都不难。”

该信的背面用捷文写了如下内容：

阁下！

有人对我说，我也许可以从您的庄园定期购买牛奶。每天我需要3升奶，愿出每升2克朗的价钱。请您通知我，是否有可能每天转让我这个数量的牛奶，开价多少。

卡夫卡似在为施蒂德尔小姐草拟一份致舍莱森某位只会说捷语的农民的订购申请书。

因为我们之间如此抵近：参阅第56号信的注解。

外部困难：除了计划中的婚姻外，主要还包括职业前景糟糕：“目前我暂时没有工作，希望也不大，但是结局一定是理想的。”（奥特拉1919年3月18日致达维德的信，亦请参阅本书第68号信）

拉斯科尔尼可夫：卡夫卡援引F.M.多斯托耶夫斯基所著长篇小说《罗迪欧·拉斯科尔尼可夫》（《罪孽与赎罪》）第6部第2章中的一个场面。这是一部两本卷的小说，1908年由Piper出版社（慕尼黑和莱比锡）出版（见第2卷第293页，亦参阅本书第91号信）。卡夫卡之所以利用这本俄国小说进行劝解，也许由于拉斯科尔尼可夫与妹妹的关系也发生过严重的危机。

73.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像以往一样，我让你决定奥斯卡是否应该来。我有一些小小的顾虑，当然这些顾虑几乎都是围绕我自己，也就是说并不高尚。此外，如

果只是以为3天的假期将对奥斯卡有利，那么这种想法也不切合实际，因为我也可以与他分享利益。说到底我的顾虑是：我们不得不住在一间房内，我将不能直到11点还半醒半睡地躺在床上，我便不得不比以往多散步，他将在我们共同的房内工作，我不得不常常打扰他，我给父亲那封刚刚开了个头的信将无法完成。最终，他将给我带来一个可怕的“答复”，马克斯已经向我介绍过几分关于这个答复的情况。但是这一切顾虑也可能全无必要，实际上一切都可能简单得多：我们可能各有各的房间，他可能同别人一起散步，他可能喜欢躺在床上，致父亲的信可能仍能写完——也可能即使奥斯卡不来，这封信也写不完，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他毕竟无论如何会带来答复。

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动机，请做出决定吧。无论做何决定，如果你去奥斯卡处，请代我向他问候，代我邀请他。我的一切尚可，因为没有什么压力，还算可以吧。马克斯当然仍在这里。

别给我写信了。

弗兰茨

〔邮戳：19年1月初—里博赫〕

代向父亲至沙娜一一问候。

根据第75号信推算出此信的日期。

1919年11月，卡夫卡再度到舍莱森，初时与马克斯·勃罗德一起（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70页和第182页）。奥特拉当时住在布拉格父母家。

奥斯卡是否应该来：与在苏劳逗留期间一样（参阅第53和54号信），卡夫卡此次亦邀请盲人奥斯卡·鲍姆一同在舍莱森小住数日。奥是否成行，无从得知。

给父亲那封刚刚开了个头的信：这件著名的资料（《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162页）系在舍莱森所写，可能在下半月写毕于布拉格（参阅第74、75号信和《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449页）。

74.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由于一心困扰于奥斯卡之行的顾虑，我自然地忘记了你反正必定会

来的，无论你对奥斯卡作何抉择。因为，即使为了评价那封信你也该来（这封信目前几乎完全还在我的脑子里酝酿）。不过，如果你按原来的计划星期六才来，本身已经太晚；我要到星期一才能把信发出，要是我到了布拉格后信才寄到也无妨。

施蒂德尔小姐很友好，我还没有同她说信的事。她很受特蕾泽小姐的气，却表现得让人觉察不出。客栈里新鲜事很多。

这里还有两位年轻的先生和一位特普利策姑娘，名叫艾斯纳。我本来并不喜欢她，她有着一个不幸少女的一切歇斯底里，然而她事实上很出色，她这样的人显然都很出色。你应该为你是姑娘而感到高兴。

别忘了结婚礼物，价格可以达到200克朗，写上一些友好的话。向全家问候！

F.

〔约1919年11月10日—舍莱森〕

要是我到了布拉格：参阅第75号信。

两位年轻的先生：根据《卡夫卡书信集》第278页的介绍，他们是施特兰斯基先生和科皮特兰斯基先生。

艾斯纳：闵策·艾斯纳，此后几年与卡夫卡保持通信往来。他在农业经营方面为她出谋划策（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56页和勃罗德著《卡夫卡》第370页）。她曾在1921年秋来布拉格访他（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349页和353页）。

结婚礼物：显然是指约瑟夫·达维德之姐安妮与施沃杰克先生的婚姻。

75.致奥特拉

但愿此信赶不上你，因为你已经单独或与奥斯卡一道启程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迟至星期六才出发，这封信还能赶上你。星期日晚上，我们再一起去布拉格。

我之所以抱怨你没有来信，只是担心你的事出了什么重要不测（那里的一切都是重要的），我想与你分享甘苦。

只要我独自一人，一切就还过得去；要是同别人一道，我会十分感

伤。不过，你会亲眼看到我的身体状况。快来吧。阅信时的父亲一定是一幅伟大的画面，我从小就没有见到过。

你一个字也没提w.小姐。

F.

〔1919年11月13日—舍莱森〕

向全家问候，尤其感谢母亲那亲切的明信片。

卡夫卡本应于11月17日——星期一即重新上班，但他于14日书面要求续假4天，最终于当月21日回到办公室（参阅J.Louzil著《卡夫卡》第72页），因此此信肯定是在13日——星期四所写。

W.小姐：尤丽叶·沃利泽克，或更可能是她妹妹。卡夫卡于1919年11月24日给她写了一封长信。

1920年

76.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找房找得好累！房子很多，但主要问题是：大的膳宿旅馆（比如我现在的住处，相当舒适，素食精美没有仔细想，反正不错），还是小的私人膳宿公寓。前者的缺点是价格较贵（我尚不知道总费用是多少，我不在旅馆内用餐），也许没有小公寓那么好的卧床休养条件。小公寓内的个人照顾好些，比如素食者可能得到更多的关照，而大旅馆相形稍逊。不过，大旅馆有大优点，自由空间大——住房大，饭厅大，前厅也大，即使有熟人也很自由，不受压抑；小公寓则相反，有点像家庭陵墓，不，这个表述不对，有点像乱墓群。要是小楼的原貌保持下来该多好（可是并非如此，我都看得出来，客人初来乍到就会坐下来数落它的狭窄憋气），空间是那么的窄小，客人们人挨人地坐着，眼对眼地看着，跟施蒂德尔那里一样。所不同的是，梅拉诺这个城市比舍莱森宽广得多、华丽得多、大度得多、干净得多、阳光明媚得多。这就是我面临的选择问题。你觉得奥托堡膳宿公寓怎么样？这是我整个下午（在梅拉诺的第三个下午、第一个没下雨的下午）唯一有效的成果。价格为15里拉，这是此类公寓的通常价格。小楼很干净。女主人是个很胖的、红脸

蛋的、成天乐呵呵的、陶西斯书商式的女人，她马上就听出了我的布拉格德语，对我的素食主义颇感兴趣，却又显出完全缺乏素食主义幻想的底里。房间相当好，阳台上可以一丝不挂，还可以看到共用餐厅：一个漂亮而廉价的餐厅，座位拥挤，用过的餐巾歪七扭八地摆在席上，就连白雪公主都不会有兴趣前来凑热闹。怎么样？也许在你回答之前我已做出决定，我许过诺，明天上午就会回来。

此行印象平平。那位南美人原不过是米兰人氏，但乐于助人、虑事周全、英俊潇洒，是一位穿着时髦的男士。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鉴于这种实际上拥挤不堪的恶劣环境，也可能是一个冷酷的、甚或十分糟糕的选择。法朗我没有用，原因很明显，旅行者习惯了某种币制后很难立即转入新的币制。其他票可以用奥地利克朗支付，从边境到因斯布鲁克的票价是多少？近1300K？我没有这么多克朗。在因斯布鲁克很容易兑换里拉。

暂时写到这里，现在我必须去喝橘子汁了（根据我的规定）。来信详告你的情况，尤其是你的烦恼。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告诉你的梦中情形，对预示未来亦有意义。向全家问候，包括马克斯或弗利克斯，如果你见到他们的话。

你的F.

〔邮戳：20.4.6—梅拉诺〕

〔信笺上端文字：普拉克泽湖，梅拉诺，埃玛客找〕

跟施蒂德尔那里一样：参阅第70号信的注解。

奥托堡膳宿公寓：卡夫卡因肺病未见好转，于4月初前往梅拉诺休养，在这所公寓里住到6月28日。

陶西斯书商式的女人：此处显然是隐喻之意。参阅第17号信的注解。

77.致奥特拉

我亲爱的奥特拉：

我信中提到的烦恼，当然不是当真的。一个好脑袋是没有烦恼的，一个坏脑袋却永远摆脱不了烦恼。人在异乡时，总与家乡保持着特殊联

系。人在遥远之处，看事物难以透彻，对危险并无感觉，因而显得格外坚强、格外冷静。我本认为，如果你有烦恼，我在这里就可以一举手把它除去。因此，实际上我之所以让你把烦恼告诉我，并不是为你排忧解难，而是事关我的支配欲望。既然你没有烦恼，当然很好，再说我的一掌也许并不那么强有力（现在外面园子里有人在喊“哈罗”，声音同马克思惊人地相似）。

你在信中十分详尽地描述了父亲第二次阅读我的明信片时的情景。如果他是在逍遥之后偶然抓起桌子上散放着的纸片字条，那么第二次阅读远比第一次更为重要。写信时时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就好了。记不清我是否向父亲口头请求过寄糖来，写信是肯定的。大致内容是：“那里有你那宝贝的儿子。他又爬进了那种下等肮脏的住所，那地方连糖都没有。”要不是前一天晚上弗勒里希夫对我说她常让人从布拉格带糖来，要不是第二天就买到了令人讨厌的糖精，我到现在还想不到会写信要糖呢。也就是说，我写信不是出于食糖危机，而是出于偶然一念，没有任何过多考虑。即使在起初几天内，当我无法喝饱房东夫妇用自己的食糖配制的橘子汁时，我也没有生过这种念头。还是彻底澄清一下这件事吧：旅店里有的是糖，但质量较差，因为食糖是统一调拨的，膳宿公寓里严格定量供应，而食用面食是需要食糖的。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波希米亚拥有这么多糖。说来话长了。不过，我已经说过，我不再需要糖了，用蜂蜜取代糖。几个星期以来我也已经喝腻了橘子汁。

除此以外，膳宿公寓棒极了。如果我现在坐在桌旁，从敞开着的阳台门向花园望去，田边是一片茂密葱郁的灌木丛，远处缕缕炊烟袅绕在一簇簇村庄上空——有点夸大了，不过是铁路而已——我想不起来是否在戏剧中见过类似的场景（电灯已经把现在的一切装点出戏剧般的灯光效果），除非某位王子或至少是一位很高级人物的宅第才会拥有这样的景观。

饮食对我来说过于丰富。例如，我昨天在给母亲信中所描述的晚餐，几乎牺牲了我整夜的睡眠和其他任何乐趣，因为我已经以不太引人注目的方式胖了许多。为了避免误解，我今天又吃了很多。一个人无法体会别人的胃口，如同难以了解别人的肺脏一样，对二者应作同样客观的理解。没有人会说：如果你有一分爱我之心，就请你停止咳嗽。另一方面，素食者常有一种孤独、荒唐的自我感觉（在陌生人看来，素食主义者已经有点特别的职业味道了），这是一种细腻而可靠的感觉。然

而，人们又很容易肤浅地忽略一点，即素食主义是一种完全无辜的现象，它是源自许多深层原因的伴生现象，人们必须去探求那些深层的、然而又是不可回避的原因。

我之所以变得这样喋喋不休，是因为我的上封信本想逗引你的乐趣，没承想引起了母亲的忧虑。我的信中没有多谈自己的其他近况。此外，我在梦中读到了你在《自卫》上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一封信》，长长的四栏，语言铿锵有力。这是一封致玛尔塔·洛维的信，信中就马克斯·洛维的病情对她进行安慰。我不理解这封信为什么刊登在《自卫》上，但我很高兴读到它。祝你一切顺利！

弗兰茨

〔1920年4月17日—梅拉诺〕

菲莉斯回信了吗？如果没有，就请再写一个详细地址寄去。

趁我还没忘记，你现在一定非常忙吧，那位小姐当然也很忙，甚至更忙？就是那位女仆。

素食主义：参阅第76号信，以及第9号信的注解。在卡夫卡生命最后数周内料理过他的医生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见第91号信），曾在卡夫卡开始接受人工营养赖以维生时从基尔林致信布拉格家人：“他对这种方式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以致我难以再去进行劝说。他的精神负担十分沉重。但是你们知道，在他而言已经二位一体，身体状况决定精神状况，反之亦然！”

《自卫》：布拉格的犹太复国主义周刊。卡夫卡至少从1917年起开始订阅该刊，后嘱人寄往梅拉诺（之后又转寄马特里亚利和柏林）。自1919年秋天起，卡夫卡的朋友费利克斯·韦尔茨成为该刊出版者。有关细节请参阅宾德尔所著《卡夫卡》和《自卫》周刊（《德意志文学思想史季刊》第41期，1967年，第2册第283页），并参阅第78和91号信。

玛尔塔·洛维：参阅第54号信的注解。

菲莉斯：卡夫卡的第一位情人。

78.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我相信这是个误会。当然，由于他的工作，由于他的索科尔组织和政治，他确实使你失去了很多。从我的角度看，我也无法理解他无端不露面的表现（F.第一次来布拉格时，我本来很容易请假，却宁可泡在办

公室里，只是下午陪陪她。直到她很久以后在柏林埋怨我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但是，原因并不是不相爱，也许是有点怕在一起），从他的角度看，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相信这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这份工作和这份兴趣本并不该成为疏远的原因。如果你能够主动地把这二者纳入自己的怀中，至少部分地接近它们，那么它们也可以成为你的成就，一份疏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份贴近。我只能再举一个F的例子：她本来毫无疑问是能够对劳动事故保险事业产生兴趣的，以理解和爱心全力接纳它，可是，她可能是在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的邀请，只不过是等待那短短的一个字。当她久等无果时，自然会感到疲惫，她一直想工作，想寻找一条道路，但现成的道路并不存在。当然，现在的情况并不一样，他喜欢他的职业，他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之中，他很高兴，很健康，从根本上说（而不是从局部观点看）是有权力感到满意的，对他周围的大环境感到满意，有权力（就像大树有权力植根于土壤之中一样，并无其他的表述良方）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他事感到不满意——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你朝思暮想的“庄园”，是你所希望得到的坚实土地、古老家产、清新空气、自由自在。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勇于争取。你常常说：“他不需要我。”“没有我，他会生活得更好。”这些都是戏言。当真严肃的是，你曾经犹豫多虑。你现在抛弃了犹豫，但仍有几分多虑，它存在于你伤心地发现他与陌生人——为什么是陌生人？——共同度过的时间内，存在于你从伏尔塔瓦河边望见的办公室里不自然的灯光之中——为什么是不自然的灯光？当然，他本来是应该能在星期天和星期四之间给你传递信息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但更重要的是别的收获，即他以自己的行为（并非故意所为）给了你一点教训。

我说得过于严厉？奥特拉，我对你并不严厉；我对自己都那么心慈手软，怎么会对你严厉呢？我今天有些激动。我睡觉不好，当然也对增加体重起到了消极影响。总的来说还算说得过去：9月6日：57.40，9月14日：58.70，9月16日：58.75，9月24日：59.05，9月28日：59.55（最后一次称体重前，我补喝了一杯牛奶）。此外我的一切均好，几乎没有更好的可能性了，只是睡眠表明尚有欠缺。越是睡不着觉，睡觉就越重要。肉食和疗养院对睡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昨天去找过大夫，他认为我的肺脏很好，也就是说，他认为肺部无碍。他也没有反对素食，给我提了一些有关饮食和用缬草茶治疗失眠（不是失眠，而是常常惊醒）的建议。我身边没有缬草茶。另外，这是个体贴人的好医生，从布拉格来的约瑟夫·科恩大夫。

我今天梦见了你，还是老题材。梦中，我们三人相对而坐，他的一番言论颇令我欣赏。他并不认为女人对工作的兴趣和男人的特性是天生的或命中注定的，而是“历史证明”的。我的回答是用在特殊情况下对普遍性问题的兴趣来转移话题：“恰恰相反。”

你想找差事吗？今天有两件：第一，买一张游泳学校的门票。第二，从陶西斯书店为你买一套朗格出版社的女社会家莉莉·布劳恩回忆录，2卷精装本，记在我的账上。第三件差事是去找所长，我稍后还会写信给你的；如果我的身体继续好转、睡眠改善，我大概会在这里住两个月以上。

有关大选的事，我只是从《Več^{er}》上读到一点消息，这里有零售。我请费利克斯寄《自卫》来，但迄今没有寄。我从科恩大夫处听说，费利克斯去慕尼黑了，他看见他乘车启程的。有没有关于家庭和店里的新鲜事？

再见！

你的 弗兰茨

〔约1920年5月1日—梅拉诺〕

我的上封去信谅已收到？

日期系根据第79号信的日期和本信内容所推算。

索科尔组织：Sokoltum，1862年由Miroslav Tyr所创立的捷克第一家体操协会，在某种程度上与1860年成立的“德意志体操联合会”分庭抗礼。其主旨除体育教学外亦意在发展民族意识。卡夫卡信中所提及的约瑟夫·达维德，为能在此协会中任教员而感到自豪。为便于理解后面的段落，请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36页。

F.第一次来布拉格时：菲莉斯·鲍威尔1914年5月1日至5日来访卡夫卡（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570页和第769页）。有关后文中这位情人的嗔怪之事，请参阅第20号信的注解。

“庄园”：参阅第41和71号信的注解。

今天有些激动：由于此前不久与捷克女记者米莱娜·耶森斯卡开始的书信往来。

我身边没有缬草茶：为便于理解，请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99页和本书第81号信。

游泳学校的门票：卡夫卡让奥特拉在游泳季节开始时为他买一张民间的游泳学校的年票，

卡夫卡从小就是该校的常客。（参阅第119号信的注解和《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201页）

一位女社会家的回忆录：莉莉·布劳恩的回忆录由慕尼黑的阿尔伯特·朗格出版社于1909年2月首次出版（2卷本）。卡夫卡在1916年将此书寄给菲莉斯时附信写道：“这套回忆录我还曾在不久前赠送过马克斯，后又赠送给奥特拉，如此左右分送。据我之浅见，此本是当代之佼佼者，不仅最为客观，而且最为生动。”（《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95页）有关细节，请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38页和宾德尔所著《卡夫卡与〈自卫〉周刊》（见《德意志文学思想史季刊》第41期第2册第289页）。（卡夫卡亦曾赠此书予闵策·艾斯纳，参阅第74号信的注解）

»Večerník«：捷克农业党的机关日报。由于该报的文学副刊品位要求颇高，故在知识分子界亦拥有读者。

79.致尤丽叶、赫尔曼和奥特拉·卡夫卡

亲爱的父母亲：

衷心感谢你们的来信。前几天天气很好，很热，以致我产生了随便上哪座山去的念头，但是今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暴风雨一般，我只好在这里再待一阵子。这里对我的照顾也很好。——我有两个月病假，5月底将要期满，但我想申请5周的正常假期。我本想在秋天再休正常假的，不过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可接着再休正常假，全部休完或至少休一部分。医生也认为这样更好，你们也这样认为吗？当然，首先要经过所里批准。现在，我想请奥特拉去当说客。

亲爱的奥特拉：

你病了？根据母亲的来信，目前我设想你是“咽炎”，4月30日发病，现在“已经好多了”。若是，那么今天5月4日应当已经病愈。但是，奇怪的是你虽然给我写过信，却只字未提生病。人在远方，很容易对一切都感到奇怪，除非意识到没有奇怪之处才会消除奇怪之感。尽快给我写信！我的两封信谅已收到？

去找所长的差事，我马上就在信中写明缘由，但是，去找所长自然要等你完全康复以后再说。这件事实际上很简单，我的申请肯定也会获准，只是我想在手续上做到无可指摘，因为所长曾经在类似的一件事上因手续不全而生过我的气。我获得了2个月的病假，此外所长还非常明确地答应我再休5周正常假，我本来想在秋天休正常假，因为当时我只想的是梅拉诺而没想过上山去，据说梅拉诺的6月天炎热难挨。但是，

我现在倒宁愿把假期连起来休。此事在所长那里也不会有困难，因为第一，他本人曾在医生鉴定的强烈印象下对我说过：“如果您在那里身体状况好转，可写信到所里来，您在那里的假期可超过2个月。”这意味着，病假可以（不影响正常假期）延长；第二，我并不是要求延长病假，而只是申请获准在病假结束之后连休正常假，对此所里本应无需询问任何理由即行批准才是。顺附我写的申请书，尚须经过你的修改。原因很简单，一是我想把这件事过于渲染；二是我的语言水平与捷语无懈可击的所长相比不足于稍事理论；三是因为你想找一差事。如果你不愿亲往，也可以寄去，而后去取答复。我的设想是，你可以去找大个子菲卡特，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这样做是否会打扰所长，而后根据咨询结果或将申请放在他处（吓唬他一下，说你一两天内就去问结果），或直接找所长递申请，施以恭敬的屈膝礼（我早就为你多次示范过屈膝礼），并说我向他致以美意（我曾给他寄过信，不过是一封德文信），说我的近况良好，我现在每天体重上升100克，说这里的天气相当糟糕，医生认为我不中断假期继续休养为好（所里的医生也建议我休养3个月），说现在这里里拉的比价不太贵（当然我买东西时并不太便宜，因为减价期已经过去了），秋天物价就会高得多，说我已经旅行过一次，等等。我没有把申请直接寄到所里，因为我想尽快得到答复（你或可用电报发来“批准”等字），以便适时准备。谢谢，祝你一切顺利，衷心问候小姐。

弗兰茨

〔1920年5月4日—梅拉诺〕

有机会时请代问特雷姆尔先生好，并看一看那里是否有我的邮件。

所长：Bedřich Odršal博士，布拉格高等技术学院社会保险学讲师。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他是一位十分友好的好人，对我尤其好，当然其中也有政治原因。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对德国人说，他对待德国人中的一位是多么的友善。但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

申请书尚须经过你的修改：由于卡夫卡对所长那“充满创造性的语言能力”十分惊讶，并“正因为他”而开始喜欢上“生动的捷克口语”，因此他请捷语说得比他好的妹妹（参阅第1、37和53号信的注解）篡改申请书中的拼写错误（重音）。奥特拉篡改过的申请书刊登于Lou Odršal所著《卡夫卡》第73页，其德文译文如下：“尊敬的工人事故保险所领导！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我获准享受为期8周的特假，此假将于5月29日到期。此外，我当享有为期5周的正常假期。据医嘱，若我能将两段假期合并使用，将对身体的康复大有裨益。因此，我恭请尊敬的所方恩准此建议；若获准续假，我将于7月3日来所上班。F.卡夫卡博士。”参阅第89和90号信的注解。

大个子菲卡特：参阅第98号信。

特雷姆尔先生：系卡夫卡的办公室同事（参阅Janouch著《与卡夫卡的谈话》，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39页、92页和第86号信）。

80.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还没有康复？还没有消息？究竟是怎么啦？我在这里不得不再抵御那些劝我吃肉和喝啤酒的建议，如果无言以对时，我总是说：“没错，我是拿不出什么不吃肉的强有力证据来（我已经胖了3.25公斤），但是我妹妹……云云。”可是你现在病了，你们都不写信告诉我。再说，我还有许多差事要有人办，现在谁来办这些事呢？譬如今天就有差事：请帮我从Klenšetě大街的Borovský出版社购买20本《Kmen》第6期，每本价格只有60h，以后就买不到了；这种杂志可以作为便宜的礼品送人，这期刊有《司炉》一文，是米莱娜翻译的。

F.

〔邮戳：20.5.8—梅拉诺〕

〔邮政明信片〕

吃肉和喝啤酒的建议：参阅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我在这里的新同桌昨天在谈到那位沉默不语的男人的素食习惯时说：‘我认为：脑力劳动者必须吃肉。’”

Borovský：František Borovský 于1912年建起了以他命名的出版社，下设书店和旧书铺，位于布拉格老城内（Na Příkopě 27）。不过，也许Klenšetě大街上开有一家分店。《Kmen》杂志系由捷克共产党作家斯坦尼斯拉夫·K·诺伊曼所办。

《司炉》：弗兰茨·卡夫卡所著，刊于《Kmen》第6期（1920年4月22日）第61页至72页。米莱娜对卡夫卡小说的兴趣是她结识他的动因（参阅《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10页和21页，并阅O.F.巴普勒所著《卡夫卡早期捷文作品》中“弗兰茨·卡夫卡的布拉格所见”，1966年柏林版第149页）。亦请参阅第82号信。

8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谢谢你的两封信和电报。我本应早些回信，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几乎不再存在的失眠现象，近日来又严重出现了。你从中可以设想，我为

了与之斗争而几乎徒劳地一会儿喝啤酒、一会儿喝缬草茶，现在面前摆着安眠药。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也许这与梅拉诺的空气有关，有人这样说），但有时无法写东西。

当我给你写那封说教信时，我当然没有想到这些说教寄到时才会有现实意义，我只是不排除它重新符合现实的可能性。再说，这根本不是说教，而是一些问题而已。

我之所以对你的病情一时感到惊讶，因为我当时读完你的信之后不久遇见了弗勒利希先生，他告诉我布拉格正在流行天花传染病，这当然是有些言过其实了。我坚信，自然的生活方式能够抵御天花，但我不愿意由你来证明这一点。

婚礼将在7月间举行——这个消息怎么会让我吃惊呢？我只是本以为会在7月底举行。有时你提及这事时的口气似乎是在干不正当的行为，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认为我们俩都不应该结婚，那是荒唐的。我们二人中，你更适宜成家，你尽可以为了我们成婚吧。这件事本来很简单，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我则会为我们俩而保持独身。

我大概会在6月份回来，一部分假期先存着——当然，如果失眠问题不影响疗养效果的话。最近我的体重增加了3.5公斤，近几天一直没有称体重。你的安慰很有道理。我的去信相当有规律，不过可能也有疏漏。

请代我感谢父母的惠函。我将很快回信，仍按他们提供的地址。父母何时去温泉？也许他们因婚礼而推迟？阿尔弗雷德舅舅来吗？

现在的天气很好。以往最怕的雨水，现在成了盼望的甘霖，目前也确实时常降临。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几乎裸体，但无法帮助那些从近处两个阳台上偶尔投来目光者，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也许我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住数周，但不是因为酷暑，而是由于失眠。很遗憾，这么好的膳宿公寓和医疗条件别处难以再觅。

不过，我想埃玛旅馆的条件也相似。父亲会说：“如果人们不打他并把他赶出去，就算是个大度的公寓了。”他说得有理，但我的话也在理。

你去过奥斯卡家吗？替我多多致意，并对他解释一下我没有去信的原因。当然，你现在忙于筹备，也许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给菲莉斯去信

了吗？

此外向全家问好，并特别向小姐致意。我们至今还没有女丫环？

F.

〔1920年5月中旬—梅拉诺〕

此信错装在邮戳为1920年6月21日的信封内（参阅第84号信的注解）。信纸特点（卡夫卡此前所用的信纸与之相同，6月份却换用了其他信纸）、信中提到的与第78号信有关的“说教”（自5月初以来肯定已过去了两班邮期）、有关电报的说明（事关保险所批准卡夫卡延长假期，通知系5月15日下达，参阅第79号信和《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3页）和卡夫卡写到的体重增加范围，均可证明此信写于当月中旬。

失眠：由于与米莱娜之间的通信往来。

弗勒利希先生：参阅第84号信。

婚礼：奥特拉于7月15日与约瑟夫·达维德成婚。关于奥特拉的“不正当行为”之说，请参阅《卡夫卡与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55页。

阿尔弗雷德舅舅：母亲的一个兄弟，任马德里铁路局长，他于7月7日抵布拉格。（参阅第88和第84号信）

我的去信相当有规律：指尤丽叶·沃利泽克。

去温泉：参阅第84号信。

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卡夫卡可能想去博岑附近的克洛本施泰因（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74页和《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第72页）。

我没有去信的原因：卡夫卡曾对马克斯·勃罗德暗示过，他担心给奥斯卡的信会落到他妻子手里（参阅《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86页）。由于这位朋友是盲人，所以收到的邮件当然由他妻子代读。卡夫卡写道：“我决定，不管这个阻碍的存在。不得不成为公开信是一件难为人的事。”（《卡夫卡书信集》第275页）事实上，卡夫卡仍给奥斯卡去过信，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42页（该书错把此信归入“1918年6月”一节和本书第84号信）。

82.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我收到你寄来的两个包裹，《自卫》（现在费利克斯也开始给我寄《自卫》）和一大堆捷文报纸，均为5月16日的，后一包是何原因？起初我以为其中有我爱读的保险业之类的文章，可是里面并没有这

类文章。反正我先把这些报纸保存好，直到你来信说明为止。后来我突然想起，你也许误解了我的最后那张明信片。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写着是买Kleinseik大街Borovy出版社的20本（不过10本也够了）»Kmen«杂志第6期（4月22日），但不必寄来，只需保存着。

衷心问候父母和全家！

F.

〔邮戳：20.5.21—梅拉诺〕

〔邮政明信片〕

《自卫》：参阅第78号信的注解。

均为5月16日的：有关真情的解释参阅第83号信。

83.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干得很出色。换了我的话，我会坐等菲卡特先生病愈，因为我会担心他见怪，怪我绕过他行事。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在这儿多待一些时日。也许我会在6月份去波希米亚任何地方待上几天，作为过渡，而不是因为这里太热。从劳动角度看当然很热，连报纸上都抱怨炎夏过早降临，晚间在花园里干活我都挺不住（早晨尚可，诸如刈草、给马铃薯培土、为玫瑰花剪枝、掩埋死鸟等很轻的活计）。不过，对卧床而言尚属凉爽，不比布拉格热。在高山旁的隘口处，横置有一张板凳，凉风习习吹过，可以将大部分正午炎暑驱尽。

所长没有多看你几眼，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你，这一点我本应早提醒你作好思想准备。他的举止体现了一种演说家的效力，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放弃对演说效果的自我欣赏。优秀的演说家，或者自认为是优秀演说家的人，在自信的驱使下全然不去观察他人脸上对演说效果的反应，抑或根本无须观察，坚信其演说的效果，不再需要此种刺激。再则，所长确是一位绝顶出色的演说者，也许在这种礼节性的场合不太理会其说话的效果。

我还要补谢你的那些报纸。那一天我没有睡醒，以致没有理解这么

多报纸而无一定之目的，则可能是权供消遣阅读。后来我确实从中找到了乐趣。《评论》不必再寄，这里用不着它。

从所长的话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决定允我退休。挽留一位如此需要休养、不得不再准予假期的职员，实无意义。或许这是世界继续走向末日的征兆？最近，有人说起一位前军队物资商人的话，此人抱怨自己保存的战时公债太多了。然而，有一位战争买卖做得最大的商人，却说他没有一点战时公债。他对此解释道，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的报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所以他没有签字。难道有些人不能对世界这样说吗？

没有开化的脑袋？现在时代变了，脑袋开化了。

那位将军——我在信中已经提到过他，是吗？——今天在啤酒园里十分有把握地表示，相信我会结婚，并把我未来的妻子描述了一番（我用手指旋转着一小杯啤酒，端坐旁听）。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岁数，以为我还相当年轻。跟他在一起很自在，我很喜欢他，所以不告诉他我的年纪。他在这方面年轻得多，只是我无法在智慧上当他的爷爷。他年已63岁，但有一副苗条、挺拔、沉稳的身材，在园子的暮色之中，他身穿短外衣，一手支着腰际，一手将香烟移近嘴角，外表有如昔日奥地利帝国时代一名年轻的维也纳少尉。

祝一切顺遂！

弗兰茨

〔1920年5月底—梅拉诺〕

请郑重其事地向埃莉和瓦莉转致我的特殊问候。当然也要以另一种口吻问候小姐。奥斯卡？菲莉斯？一位女社会家的自传？游泳学校？

去波希米亚：卡夫卡原打算首先与尤丽叶·沃利泽克在卡尔温泉会面，而后与父母（他们拟于6月间前往弗兰岑温泉）见面（参阅第81、85号信，《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52页和本书第75号信的注解），但这一计划很快即被放弃（《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53页），卡夫卡因而能够在梅拉诺多待数天（《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66页），并改变行程于6月28日从梅拉诺前往维也纳（《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76页）。

在这种礼节性的场合：卡夫卡在致勃罗德的信中谈到过所长的演说能力：“自从他担任所长以后，演说的力量几乎丧失。办公室的官僚主义使这种力量无法体现，他不得不说不太多的话。”（参阅本书第79号信的注解）

84.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保持沉默？情况有点不明朗，因为现状出现神奇色彩的可能性大于可怕色彩。我并不要预言，而是等待你的下一封信。是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会轻而易举，好事尤其多磨，甚至真正的幸运之星——闪电、光束、上峰的命令——也是一种可怕的负担。但是，这一切不适于见诸信件，只适于“浴室窃语”。

如果你能去看望奥斯卡，我将十分感谢，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信，要是每封信都必须成为公开信，还怎么给他写信呢？如果有机会，向他作一下解释。或许还是不解释为好。不过，你还是去一趟，替我致以问候，也请向夫人和男孩致意。

你不需要帽子之类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找个借口让你驻足。我已经对她作了最糟糕的举动，别无其他更糟的可能性了，很可能此事到此告终。我就是这样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做游戏。

弗勒利希先生已经死了，前天我无意中听到这个消息，你们也许早就知道了，我不打算吊唁，只当作没有听说。但愿他那看似十分幸福的一生是毫无痛苦地走到尽头的，我并不知道一切细节。

如果父母不去弗兰岑温泉——因为6月6日还在悠闲地打牌，看起来不会去了（母亲当晚在哪儿？）——我将于6月底直接回布拉格。现在天气很有利，但愿不是一张多变的脸，但愿一切顺利。

你的 弗兰茨

〔1920年6月11日—梅拉诺星期五〕

请专门向小姐问候！我该给她带些什么？给菲莉斯写信了吗？汉娜？游泳学校的门票？回忆录？阿尔弗雷德舅舅？

请在陶西斯书店订购柏林杂志：《世界舞台》第23期，出版者为雅各布佐恩。

一个盖有1920年6月12日邮戳的信封判为此信原封（参阅第81号信的注解），在盖有同日邮戳的另一张邮政明信片，卡夫卡对费利克斯·韦尔茨写道：“多谢。不，我尚未阅过《世界舞

台》；如有可能，请帮我保存好。”（《卡夫卡书信集》第277页）韦尔茨提示他的朋友注意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对小说《在流刑营》的评论文章，此文以彼得·潘特尔为笔名刊登于柏林《世界舞台》第23期（1920年6月3日）上（此文现在很容易找到，参见J.博尔恩等人所著《卡夫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柏林1965年版，第154页）。“星期五”令人费解，很可能是指6月11日。

保持沉默：卡夫卡于6月间致函马克斯·勃罗德：“你也许偶有奥特拉的消息？她很少来信。据悉婚礼将在7月中旬举行。”（《卡夫卡书信集》第277页）

帽子之类的东西：（以及后文）暗指新开了一片帽子沙龙店的尤丽叶·沃利泽克。

汉娜：埃莉新近出生的第三个孩子。卡夫卡于1921年11月在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的信中所写的一段轶事，描写了这个小女孩易受惊吓的特点。

85.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启程前收拾行装前匆匆数笔，谢谢你的好消息。当我（周末）回家时，你的审视不要过于严格。我从衣柜镜子中看，发现自己与以前十分相似。我多少有些担心，怕人家说，要是我在舍莱森住14天也能达到这个水平。不过也可能发生其他情况，或许根本没有这么糟糕。在我离家一个半月之后，有权力担心许多责备。总之，请不要过于严格。再见。此外，有可能你的事情太多，以至于没有时间仔细看我，而除你之外没有别人在家。

你的 F.

〔邮戳：20.6.28—梅拉诺〕

〔邮政明信片〕

没有别人在家：父母直到7月7日才从弗兰岑温泉回家。

86.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你问了三件事，即我的事业、特雷姆尔先生和健康问题。从健康角度看，顺序是：特雷姆尔、事业、健康。我这样写并不是说我不健康，完全不是，只是因为特雷姆尔的状况无可指摘。至于我什么也没有失去

么，这我早就知道，难道你婚后连耳朵都丢了？因为你的耳朵还在，也许再也不许我玩它们啦？书归正传。我本有十分有趣的政治新闻告诉你丈夫，但这没有必要缩短你们的旅行（恰恰相反，母亲因你们的住房问题宁可让你们延长一些时日）。新消息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它足以与旧消息完全颠倒。旧消息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向他透露过。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你的 F.

斯卡尔小姐向你们问候。

我和父亲多多问候你们俩。

此明信片寄往埃森施泰因（波希米亚森林），新婚夫妇当时在那里度蜜月。

斯卡尔小姐：伊尔玛于1916年7月6日致函奥特拉：“斯卡尔今天给我打过电话，她想要你和弗兰茨的地址，这就是说，她起初并不知道你已去旅行。她本周去马里安温泉附近看望一位女友，为期一天，也许会去看望弗兰茨，但她说可能性很小，因为她只能逗留2小时。这件事可能有点脱离实际，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准确地作了解释。”参阅第93号信。

我和父亲多多问候：这句话出自母亲的手笔。

87.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在这里一切均好，我不再咳嗽。我明天早晨回来，大致轮廓都已口述完毕。

弗兰茨

〔1920年8月14日或15日—格明德〕

〔风景明信片：格明德〕

他的身体难以胜任。衷心问候您

从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中各种情节看，二人在格明德的会面当是1920年8月14日或15日。

密伦娜在附笔内容之后曾签名，后被涂去。卡夫卡认为这一安全措施（密伦娜已婚）仍不保险，所以将此明信片作为密封函件寄往布拉格（明信片上既无邮票又无邮戳）。有关内容亦可参阅《勃罗德论卡夫卡》第203页。

88.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寄去我的报告。这个报告当然也是给父母的，但我宁愿先寄给你。如果文中存在有失体统之处，你即可在转达时加以美言。

一路上十分顺利，但抵达塔特拉洛姆尼策时箱子还没有到，不过我得到了可信的解释，相信箱子明天就可以到。它果然到了，完好无损。

雪橇在等我。月光下，穿过雪原和山林，一切还是那么美。我们来到一幢旅馆样式的、被灯光照亮的高大建筑旁，但没有停歇，却又向前行了一段距离，停在一所相当昏暗、外表令人生疑的房前。我步下雪橇，走进冰凉的前厅（暖气在哪儿？）。没有人在。车夫不得不长久地寻找、呼喊。终于来了一位姑娘，把我们引上二楼。已经备好两个房间，一间带阳台的归我，隔壁那间是你的。我踏进带阳台的房间，不禁大愕。这里都准备了些什么？虽然已经供暖，但炉子的臭味大于暖意。其他设备呢？一张铁床没有床罩，一床垫子，一条被子，衣柜的门已经破裂。阳台门只剩下半扇还是耷拉着的，给我的感觉是“一有风吹就呼啸”。那位把我引入房间的姑娘，也无法忍受上述气味，企图安慰我，比如说有什么必要有两扇门？白天反正躺在阳台上，可是晚上我也开着门睡觉？有道理，我心里暗忖，最好把剩下的半扇门也拿走。——炉子取暖比中心供暖好得多？只有那边客满的主楼里是中心供暖。“可是这里连炉子供暖也谈不上呀。”我反驳道。只是今天这样，因为房间还没有烧暖，——姑娘一再辩解道，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我知道她没有能力把施蒂德尔寓所的坚实、暖和的房间变过来。

然而还有更生气的事。因为，我直到现在毕竟只是对房间感到失望，而女房东的招徕信还在我的口袋里。她终于出来欢迎我了，一个大个子女人（不是犹太人），身穿渐渐泛黑了的丝绒外套，操着一口不中听的匈牙利德语，面带甜甜的但又生硬的笑意。我当然情不自禁地以粗鲁的口吻表示，这房间对我来说太差劲了。她总是表现得格外友善，但这丝毫无补于任何兴趣和能力。这是你的房间，就住在这儿吧，过了圣诞节主楼就有空房间了。后面的话我再也听不进去了。她对饮食的介绍，也远远不如信中那么悦耳了。我对她极感讨厌，以至于后悔不迭，悔不该把行李票委托给她（她打算过几天差人去车站打听打听，箱子是

否已经到达)。唯一的安慰是听说住地有一位医生，甚至就住在同一条走廊里，离这儿只有几扇门远。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不可信。

当她走后，我的计划已经成熟：当夜我就用自己的暖脚套和被子对付过去，上午打电话到斯莫科韦茨（但愿紧急状态已经结束，又允许通电话了），下午（如果箱子已经抵达）支付退房费，随她要多少钱都行。我不想与电打交道，还是乘雪橇为好，穿越高山峡谷。我一再设想明天晚上如何轻松地投身于斯莫科韦茨的柔软长沙发之上，以此聊作自慰。

我相信，你要是遇到这种惊愕见面礼也会头晕的，也许你今晚就会设法找雪橇。

这时，那位姑娘突然生一个主意，问我如果这么不喜欢这间房，是否愿意看一看隔壁房间（为你准备的），白天可以在有阳台的房间里躺着，晚上住在隔壁。我不抱任何希望地走过去。但是，由于我早已受不到宠待，所以居然很喜欢那一间。实际上那一间也好得多，大得多，暖和得多，亮堂得多，一张完好的木床，一个新衣柜，窗户远离床位。我住在这间里。

由此开始了向好的一面转变（部分原因要感激你，因为如果你没有预订房间，这间房就不会生火；如果不生火，那位姑娘就几乎不会想起来引我入住）。于是，吃饭须到主楼。那里也相当令我满意，设备虽简陋（一间新的大饭厅明天才开张），饮食却精美。交际全是匈牙利语（少有犹太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安详地躲在阴暗处。直到第二天，一切才看上去好得多。我住的寓所楼（名叫塔特拉）突然变成一栋漂亮的建筑，一丝风儿也刮不到，阳台正好沐浴在阳光下。当房东第二周向我提供主楼的一间房时，我已经索然没有兴趣，因为“塔特拉”与主楼相比具有很大优越：首先，我被迫每天三次去主楼用餐（确切地说并非被迫，也可以差人送饭），从而不至于太懒、不活动，例如若在谢莱森住，吃住在同一个楼里，只需从二楼踱到一楼，再回到二楼。其次，有人向我证实，主楼很嘈杂，钟声不绝于耳，厨房有噪声，修房有噪声，近旁通过的雪橇道有噪声，一切都有噪声。我们这里却很安静，我以为根本没有钟声呢（钟声当然是有的，只是我还没有听到过）。再次，那边只有一个共用的新鲜空气卧疗室，况且并不躺在阳光下，不像我这里的阳台直接向阳。最后，炉子供暖也优越得多。每天两次，早晨和晚间，只烧木头，这样我就可以考虑添多少柴。例如，现在晚上暖和到我

不穿上衣半裸体坐着。此外，要是再算一条优越的话，那么就是医生真的住在我的走廊里，左边隔三个门。

就连弗贝格尔夫人第二天也完全变了个样，她脱去丝绒外衣（也许是皮的？）的同时也解脱了所有恶气，遇事显得温和友善。饮食颇有新意，我根本分辨不出美味中含有什么成分，有些饭菜是来为我烧的，尽管住客近30人。医生也给我提过各种建议。首先，他当然从砵疗法开始，后来我用一笔总金额使他温和下来，于是他每天——费用为6克朗——为我诊视。他让我每天喝5次牛奶加2次鲜奶油，但我尽了最大努力

才能喝 $2\frac{1}{2}$ 的奶和1次奶油。

总而言之，一切有利于身体康复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剩下的只是脑子里的敌人。

父亲真的想上这里来？只有在母亲一同前来，而且白天变得长了以后，他才肯定会感到这里舒服。因为，这里一共也找不到一两位他看得上眼的男人，此外都是妇女、姑娘和年轻男子，大多数人会说德语，但最爱说的是匈语（包括打扫房间和做饭的女仆、车夫等人。我记得迄今只有一次在火车上——当然我坐的是二等车厢——听到两位年轻的姑娘在说道地的斯洛伐克语。她们说得很努力、很纯正，但是当其中一位将别人告诉她的某件事叙述给另一位时，她们还是冒出了 oioioioi 的惊叫声！）。对父亲来说，这些当然都不屑一顾。不过，此外马特里亚利的一切都还能让他瞧得上，今天就开张的各个厅（餐厅、台球厅和音乐厅）相当“体面”。

你现在都在干什么？蜂蜜？体操？起床时还晕吗？为我读报纸？多多问候你和你的丈夫（感谢他为我订的马车好位置），以及全家所有人，尤其要一个不漏地问候到地上的毛毛虫。

你去过马克斯那里了吗？

你的 弗兰茨

〔约1920年12月21日—马特里亚利〕

千万不要给父母看这封信，我常给他们去信。

关于此信的书写日期：卡夫卡于1920年12月18日启程去马特里亚利疗养，这份报告肯定

是在此后数天内所写。亦请参阅第98号信的注解。

斯莫科韦茨：在距此1小时路程的新斯莫科韦茨，有一个疗养所（Dr. von Szontagh），卡夫卡曾在该所接受体检。参阅第89号信，以及第95号信的注解。

紧急状态：由于政治骚乱导致12月第二周布拉格等地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

如果你不预订房间：奥特拉本打算一同旅行数日（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83页）。

医生：莱奥波尔德·施特雷林格大夫。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特别批评过此人。

千万不要给父母看这封信：卡夫卡因此而删去了此信第一段，只保留了第一句话。

1921年

89.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为了节省时间，我坐在躺椅上写信。首先有一个请求，不是“差事”。你现在也许已经不再喜欢差事。事关一封致所长的信，我想把它译成漂亮的捷语。我现在把它组合起来：

尊敬的经理先生：

现在我已在这里度过四周，对一切已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因此谨向尊敬的所长先生作一简要汇报。我的住处良好（塔特拉马特里亚利的塔特拉寓所），价格虽比美兰高得多，但与当地价格相比还算适度。我的疾病和病情的好转，只能通过体重、热度、咳嗽和呼吸强度来衡量。外观和体重已大有好转，体重已增加若干公斤，并可能继续增加。偶尔有热度，但常常数日不发烧，或有热度亦较微。当然，我大多时间卧床，避免任何劳累。咳嗽频度几乎没有减少，但程度较轻，已不再有全身振动之感觉。从呼吸强度看，几乎没有好转。诚然，这是一件长期的疗养之事，医生说我会在这里完全康复。当然，我不敢对这种断言有过高指望。

从整体上看，我觉得这里比美兰更好，但愿能以较好的结果回家。此外，我可能不在此久住，据说这里春天十分喧闹，而我对安静的需要甚于饮食和空气，因而我很有可能转到新斯莫科韦茨的另一个疗养所去。

尊敬的经理先生，在此再次感谢您的美意，感谢您对我假期的关照。顺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忠实属下

这就是那封信，你必须正确理解它。这封信尽管基本准确，但却有意识地流露了忧郁感。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

必须延长假期，几乎没有别的途径。否则，我将回到布拉格，尽管比从美兰回来略强，但无法呼吸到一口合乎人类尊严的空气。为此，这封信可以使经理先有一个初步的思想准备（信中提到的热度，原本同布拉格不一样，因为这里测体温是在舌头下边，大约高0.3至0.4度，根据这里的测法，我在布拉格时天天有热度，而在这里却没有一点儿布拉格热度）。关于斯莫科韦茨，你也可以看出，我的态度并不坚决，这里暂时优越得多。各种报告可以证明，这里唯一能够把我赶走的就是噪声。最后，此信当然还有一个目的，所以信写得这么详尽。据说菲卡特先生有几分异议。

（午饭钟响了！白天变得这么短。每天测7次体温，还没等人把结果写进病历，白天已经过去了。）

我认为，光靠你翻译还不够，不得不请你丈夫帮忙，至少把你的译文校读一遍。我在这里把捷文都忘掉了。主要的要求是标准的捷语，即根本不是逐字直译，而是优美的意译（如果你想起什么来，可以再作补充）。

你写了许多关于我的话，却很少谈你。下一次要倒过来。你只需设想一下，要是我在这里长久住下去，就一次也看不见那小东西醒来的神态。本来还有许多这类话要写，但是太晚了，下次再叙。衷心问候你丈夫，亦请专门问候埃莉和瓦莉，当然也包括小姐。

你的 弗兰茨

〔1921年1月第三周—马特里亚利〕

必须延长假期：卡夫卡在1921年1月13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此外，我的计划（以保险公司为后盾）比你的想法大方得多：在这里住到3月，在斯莫科韦茨住到5月，在格里门施泰因过夏天，至于秋天么，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这样做是为了父母的缘故，现在也是为了你的缘故，最终是为了我的缘故（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是一致的）。遗憾的是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去斯莫科韦茨，可是，由于我已经到了这里，何故再冒易地不利的风险？何况在这里刚刚住了4周，大家都不断地努力为我提供着必需的一切。”（参阅第88号信）

我在这里把捷文都忘掉了：系指在以匈牙利德语和斯洛伐克语为主的塔特拉高原。为了不在经理面前出丑（参阅第79号信的注解），卡夫卡请有语言纯正癖者约瑟夫·达维德——他对周围人们发音上的不严谨绝不容忍（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39页和本书第99号信）——对他的申请书作形式完美的翻译。卡夫卡为了使申请书达到绝对可信的程度，后来曾去信指出其中一个小小的拼写错误，此信发表于Louzil著《卡夫卡》第74页。这封信的书写日期是1921年1月27日。因此，卡夫卡在最终文本中有“已超过5周”和体重“增加了4公斤”之说。此信以捷文译为德文的译本，见于K.赫尔姆斯多夫所著《保险公司职员弗兰茨·卡夫卡的书信集》，

小东西：奥特拉的女儿 Věra 于1921年3月27日出生。

90.致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佩帕：

出色，你译得出色。现在我只是再指出几个小小的错误，请原谅。这根本不是说其中有什么错误，而是所长也能从你的信中找出错误，他会从任何人的信中找出错来。我这样做，只是使错误的数量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內。

在这里，我努力做到安静地生活。我几乎不看任何报纸，连《Tribuna》也没读过。我既不知道共产党人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德国人在说什么，我只听见匈牙利人在说话，但我却听不懂。遗憾的是他们说话太多，要是少说一些我就愉快了。佩帕，为什么写诗？不要太劳累了！为什么写一首新诗？霍拉茨已经写了那么多美诗，我们才读过其中一首半首。再说，我已经有了你的诗。这儿附近有一个军队医院的科室。晚间，那些伤病员们顺着大道唱歌，除了“豹子”就是“转起来吧”。捷克士兵还不算最恨人的，他们一路滑雪一路笑，像孩子一样用军人的噪音大声吼叫。然而还有几个匈牙利士兵，其中一位学过“豹子”里的5个字，显然因此而忘掉了理智，只要他一出现，就会嚎这首歌。周围的青山绿林全都严肃地看着他，就好像喜欢这首歌一般。

不过，这一切并不算什么糟糕，每天只会持续一小会儿。更可恶的是楼内恶魔般的噪声，不过这些噪声我也能克服。我不想抱怨，这里是塔特拉；世外桃源不在此处，也许根本不存在。

请代我问候你的父母和姐妹。国家歌剧院现在怎样？停止演出了？

你的F.

〔1921年1月第4周—马特里亚利〕

佩帕：约瑟夫的昵称。

»Tribuna«：此报于1919年创世，由亲马萨利克的出版商Bedich Hlaváč 主办。该报是捷克犹太人报纸，具有自由进步倾向，对现代德国文学给予了特殊重视。可以理解的是，达维德

对此报不太喜欢，自然而然地爱读《*Národní Listy*》。后者是长期以来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日报，1918年后成为捷克国家民主党的喉舌。达维德对此报持偏爱态度。

霍拉茨：此信提到的有关章节，请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41页。

“豹子”：指当时的流行歌曲（曲名为《*točte se pardálové*》），其第一段歌词德文译本为：

转起来吧，豹子，转成圈，

转成圈吧，用你们的节律，

你们玩得多么畅快，汗流如泉，

哈特亚巴特亚，这就是音乐！

此诗可从勃罗德所著《弗兰齐还是第二档的爱情》（1922年慕尼黑版）中找到（第6页）。当时，人们称有流氓习气的青少年为豹子，亦有称巾帼英雄为豹子的。

9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第一个好天的第一个时辰是属于你的。前些天我的身体不太好，尽管情况并不比我给父母信中所说的严重多少（且不论记忆中的其他小小不然的故障），但我毕竟不得不始终关注增加体重问题。有时候我设想自己胳膊上长了些许肌肉，有如《金冠鬼王》中的父亲。也许危险性没有那么大，但胳膊也没有那么坚硬。

尤丽叶姑姑的近况如何？母亲信中从不提她，我也不想问。奇怪的是，她竟然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的感觉是，似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不过，她对我来说并非毫无意义。

你说过，我很难“获得安宁”。此话不假，但是你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对付神经衰弱的极好方法，此着出自《胡格诺派教徒》中韦尔茨父亲之口。在那可怕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巴黎的所有胡格诺派新教徒惨遭杀害，所有钟声大作，到处听得见武装格斗声，拉乌尔打开窗户（我记得没看过这场歌剧），愤怒地喝道：“……难道在巴黎得不到安宁？”声音在安宁中益发高亢，你让费利克斯唱给你听（我至今还没给他写信，我

是那么地喜欢他；奥斯卡那里也没去信）。这就是我说的办法。以楼下的假牙技师为例，每天同他的病人一起唱三重唱——我并不要夸张，至今只发生过一次：他自己独唱，还吹口哨，像一只小鸟。太阳刚刚照到他，他就开始学鸟叫，直到月亮出来了还在鸣，有时在黑暗的夜空中一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声，十分突兀、短促、时断时续。他现在倒是妨碍不了我什么。他的一位卡绍来的朋友对我也很好，帮了我很多忙。但是，他给他邻居（一位重病号）的痛苦生活雪上加霜——每当发生这类事时，我就俯首想道：如果在巴黎，那就更严重了。如此一想，也就释然了。

你问起朋友的事。目前，我愿意、也能够完全独自生活，以后则又当别论。在交女朋友方面，我根据你的建议相当克制。对我来说，费不了多少精力；在她们来说，没多少遗憾。此外，初时倒是有几位捷克人在此，这是一种极不幸的组合，有3人根本不适于为伍：一位重病老汉、一位重病小姐和一位也许病不太重的年轻姑娘。现在虽然有了第4位捷克人，一位年轻的先生，格外讨人喜欢，尤其在女人面前是一位毫不自私、富有献身精神的楷模。他善于周旋，使我的存在失去必要性。他曾经外出较长时间，我骤然感到面对三位邻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简直是三种不同的不幸。从昨天起，他又回来了。于是，在匈牙利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再度若有所失；厌恨所有这些人，尤其是那位重病的姑娘，并非易事。虽然不乏来自附近临时野战医院和洛姆尼策的捷克军官，但他们总的来说偏爱匈牙利女人和犹太女人。而那个小姑娘，为了那些英俊的军官是多么精心地打扮哟！我不想描写她为什么显得那样不值得追求，因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有时他们也会同她说话，其中一位军官还曾给她写过信。但是，同她正在读的玛莉特爱情小说中可能发生的情节相比，这里每天的浪漫色彩太少了。

昨天是星期三，下午写信太冷，晚上我太难过。今天呢，今天天气又太好，阳光灿烂。昨晚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吃了鳎鱼，烧得很好，色拉油加黄油小块，土豆泥，但那毕竟是鳎鱼。几天来，我一直饿肉，这可是个良好的教训。我像一条鬣狗似地悲哀地穿过树林（轻微的咳嗽是我区别于他人的标志），像鬣狗似地悲哀地度过了一夜。我设想自己是一条鬣狗，发现一只被骆驼商队遗失的沙丁鱼罐头后，用爪子踹开铁皮罐，把鱼肉吞噬干净。鬣狗与人的区别也许是，它的行为并非出自意愿，而是迫不得已（为什么它们那么悲哀？为什么它们在悲哀时总是半闭着眼睛？）；而我们都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自意愿。大夫曾经

劝过我，何必悲哀呢？是我吃了鳃鱼，而不是鳃鱼吃了我。

还是接着写人吧：那位小姑娘给我带了一点事情可干。比如说，当她晚饭前见到饭厅里坐着二位军官，立即跑回房间梳妆打扮起来，吃饭时来得太晚，以致那两位可恶的军官已经去了。难道她就这样白白地穿上最漂亮的衣裳，马上又回房睡觉？不，她至少希望有人安慰她。在场的还有那位重病的小姐。这是个可怜的人儿，我在第一天晚上有过对她不公平的想法，我对这位新邻居（她大约是在14天以前进住的），大感惊讶，以致晚上在自己房内还为这段不愉快的回忆忍受着肉体的折磨。具体细节我就不想叙述了。

她只有一句格言令我恼火不已，不过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那位令人喜爱的先生。她说她最爱读的报纸是《venkov》，而且是因为这份报纸的社论出众。我决定，直到她说出绝不友好的话时再揭露她（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够从一开始就看透对方），届时我就可以摆脱她了。然而事态表明，我以往从未详述过那些可恶细节的初步印象，居然过于夸大了，她实际上是一位可怜的友善者，非常不幸（疾病在她全家肆虐）、却也非常乐观，即使在我揭露她之后仍然没有对我“恨之入骨”，反而比以前稍微友好一些；我也对她友好了一些。当我听说了她的不幸之后，当她带着永不消退的热度在她那冰凉的北屋（并非每人都敢住在我那充满阳光的屋内）睡了一周之后，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这件事也有助于我接近其他病人：人们对疾病的态度太过严肃了。我的病虽然未被视为传染性疾病，在我而言也不相信此病会传染，但是，再美好的信任也无助于改变事实。患有此病者如果去吻小孩或与人同桌共盖用餐，那就太不公平了。）

此外还有那位年纪较大的先生，他很喜欢与人聊天，却又不能在咳嗽方面自我挑剔。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同两位女士打交道的。不过，独自一人他也不会去女士的房间。哎哟，那位令人喜欢的男士又来了，他的应酬确是周全出色。

此外这里还有两位年轻人，一位是卡绍青年，一位是布达佩斯青年，二人真的如同我的朋友一般。例如，在我卧床3天期间，那位布达佩斯来的医学大学生直到晚上9点还从主楼过来（实际上并无必要），极为小心地为我敷冷湿布巾。无论我想要什么，他都会为我取来，设法为我办到，精心为我摆放好，一切都那么准确和及时，全无半点过分殷勤。他们都是犹太人，但不是复国主义者。卡绍青年是匈牙利社会党

人，带有匈语的重音；布达佩斯青年信仰耶稣和多斯托耶夫斯基。我想给那位文学味儿很浓的布达佩斯人一点喜悦，借给他几本对他比较重要的书籍。如果你在我的书箱内找到以下图书，就请挂号寄来（或可先寄二本，而后再寄二本或随你意愿）：kierkegaard的《恐惧与颤抖》、普拉托的《盛宴》（由卡斯纳所翻译）、霍夫曼的《多斯托耶夫斯基传》（我记得是霍夫曼所著，你是知道这本书的）、布罗德的《杀死死者》。《评论》先不必寄来，感谢你寄来的书目，我本来以为：你也许沉溺于自家的大事而忘记寄书目了。不，你没有忘记。

差事？你想要差事？此话不是戏言？我倒是需要二三把吉烈刀片，你也许可以夹在信中，如果买不到吉烈牌，麦姆牌也可以。不过此事根本不必着急办。请你用顺附的缴款通知单给《自卫》寄去56克朗。给Ewer的明信片，你真的已经寄走？

此外，你很会买东西。你上一次给我从Prochaska买来的香皂（我当时还做过鬼脸），如今给我带来了名气，大家都知道我的房间里气味最好，好到了令人注目、玄妙莫测的程度。先是女管理员在清点财产时发现了这一点，后来是打扫房间的女工，最终到处传开了。从我的虚荣心来说，我希望把这解释为不食肉的缘故，但是真正原因确是香皂。

还需要差事？也许所里还有一宗差事，但我还没有最后决定。另外，你已经把钱取来了，有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事？所里据说收到了我的一笔马克汇款，大约是125马克。

什么时候到日子？

祝你一切顺利、幸福、美满！

弗兰茨

〔约1921年2月10日—马特里亚利〕

代向埃莉问好，还有瓦莉和孩子们。问候小姐。陶西斯书店的账单没有来？

闵策只来过一封信，她的事业干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出色，能够养活自己了。我为她感到自豪。

日期推算：卡夫卡从1921年1月31日到2月3日因重感冒卧床不起。由于他在前一天的信中

提到了“连续14天不间断的”风暴，所以他给闵策·艾斯纳的信（信中提及“三周来稍有间歇的风暴”）大约是从2月10日开始动笔的。如果他在“许多天”之后续写的信文中写道：“不过现在已经连续数天晴朗，白天阳光明媚”，那么致奥特拉的这封信可能是在这一晴天阶段之初书写的。由于那场风暴结束后很可能立即就是晴天阶段，所以推断结果是：此信第一句话表明，其构思早于致闵策的短信，但起笔至少是当天的晚些时候（从卡夫卡的其他实际做法来看，他喜欢同时给不同的地址写信，“在我卧床三天期间”这句也说明此信的书写时间很可能紧挨着2月3日）。

《金冠鬼王》：奥特拉能够背诵歌德的许多诗。

尤丽叶姑姑：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一位姐妹。

《胡格诺派教徒》：在麦耶比尔斯的歌剧中，玛加利特·冯·纳瓦拉女王在骑马回宫时遇见正在械斗的团伙，于是唱了以下歌词——怎么？在巴黎这里也得不到安宁？

至今还没给他写信：卡夫卡后于6月5日致函费利克斯·韦尔茨，于4月间致函奥斯卡·鲍姆：“亲爱的奥斯卡，看来你没有忘记我。我几乎想向你作自我谴责，因为我没有给你去信。”

卡绍青年：此人很可能是卡夫卡在致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的函中多次提到的Sznay先生。卡夫卡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描写道，他对卡夫卡“关怀备至，有如母亲关怀孩子”。在另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卡夫卡的描写更为清晰：“……25岁，一副畸形的牙齿，一双常常眯缝着的无神的眼睛，一副常犯病的肠胃，神经质，也只会德语，德语是在这里方才开始学的，一点也没有斯洛伐克语的痕迹——但他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人，东部犹太人意义上的可爱。说话充满冷嘲热讽，忐忑不安，情绪化，可靠，也很贫困。”

根据你的建议：这也是卡夫卡本人的决心！卡夫卡在1919年11月乘火车前往舍莱森的途中（此行旨在与尤丽叶·沃利泽克结婚，结果未能遂愿），对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详细叙述了克努特·哈姆宗所著长篇小说《地球的恩赐》中何以会有对女人为罪恶之源的描写，其中部分说法甚至与作家的原意相悖（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82页）。

直到她说出绝不友好的话时：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有着更详尽的解释：“……一位新的邻桌，是一位年纪较大的小姐，脂粉和香水令人恶心，也许病情严重，思绪紊乱，喜欢饶舌……她今天（不是对我说的）竟说最爱读的报纸是《Venkov》，尤其因为它的社论出类……最阴险的方法也许是作出声明，一直等待她说出无法收回的怪论为止。在谈到格里门施泰因时，她说：‘店主是个犹太人，但经营得挺出色。’这句话难道还不够吗？”

一位是布达佩斯青年：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卡夫卡与他的友谊保持到逝世。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描述了2月3日与他首次见面时的情景：“这是一位21岁的医科大学生、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很有追求、聪明，也很有文学气质。此外，他的外表虽很粗壮，但有几分像韦尔弗（弗兰茨·韦尔弗，奥地利作家，与卡夫卡和勃罗德均为好友。——译注），像天生的医生一样善以待人，反犹太复国主义，信仰耶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晚上9点以后还从主楼过来为我数毛巾（几乎没有必要）。”

如同我的朋友：此后三行被卡夫卡涂去。

以下图书：Søren Kierkegaard所著《恐惧与颤抖》，第2次再版，由H.Gottsched作编后语，耶拿1909年版（在E.Diederichs的全集中为第3卷）。卡夫卡在1921年6月致克洛普施托克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书中基督教亚伯拉罕释语的看法。——普拉托所著《盛宴》，由R.卡斯纳译成德文，莱比锡（托伊普纳）1902年第2版；卡夫卡曾于1916年9月为奥特拉朗读其中章节。

——N.霍夫曼所著《F.M.陀思妥耶夫斯基》，系传记体论文，柏林1899年版。——马克斯·勃罗德所著《杀死死者！》，1906年斯图加特版。

《评论》：系指《新评论》，卡夫卡自大学时代起定期阅读之读物。参阅H.宾德尔所著《卡夫卡与〈新评论〉》，见于德意志席勒研究会年鉴第12期（1968年）第94页。

Ewer：柏林的一家书店。

约是125马克：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稿酬。

92.致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佩帕：

你对我的警告很有道理，但为时已晚，因为我已经参加了波利昂卡的滑雪大赛——你肯定是从»Tribuna«上读到的消息——并已被撕去右手小指的指甲盖。没关系的。后来我乘雪橇回到了马特里亚利。我在克里瓦河上请人照了相，此信背面即是。我在河上思忖……

〔邮戳：21.3.4塔特兰斯克—马特里亚利〕

〔风景明信片：克里瓦河畔。背景是利普陶河阿尔卑斯山〕

此明信片原文为捷语，附有德文译文。此信写于两张明信片上，第2张已遗失。——在卡夫卡的年代，塔特拉高原的这一地区显然没有什么滑雪比赛，达维德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型的、对体育几乎不感兴趣者也不可能从»Tribuna«上读到比赛的消息。其他细节见于H.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42页。

93.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只是寥寥数笔。本来早就有一封给你的信，一直放到过时了才投出去。

首先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一切都做得很好，——除了陶西斯书店！很糟糕，把忠告者称为骗子！——就好像你还没有成长为大姑娘似的，因为大姑娘只有时间干大事。这一年来，你的地位发生了多么大的变

化！

一张照片上是捷克圈子，我身边是18岁的姑娘，她身边是病小姐，下边是令人喜欢的先生。为什么我那么萎萎缩缩地站着？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另一张照片上，持滑雪鞋站立者是卡绍人，希伯来文题词就是他写的。大意是：“作为我对你伟大尊敬的标志。”虽然有点费解，但是他的用意很好，就像他对我做的每一件事一样。总而言之，这里的人对我好得出奇。

再附上我的两张画像。其中一张是18岁姑娘的作品，遗憾之处要怪我自己，以至于看上去不像我本人那么甜、那么坚强。

那几本书给医学生带来了巨大喜悦。当我把书给他时，他的第一句感谢话是：“博士先生！”惊呼一句以后就拿着书跑开去了。此外，最近他给我找了不少事干。

你提到的保险所和巴勒斯坦，简直是在做梦。对我来说，保险所是一床羽绒被，其温暖至为重要。如果我爬出被窝，马上就会面临受凉的危险，因为世界并没有加温。

现在，当我即将离开这里时，我变得心里不太踏实，就像平时每次告别时一样（只有在梅拉诺时例外，我当时认为离开那里的山沟沟、离开那个从任何角度看都是盆地的山沟沟就是最大的快活）。在战胜了冬天、度过了美好时光后的现在，留下去的吸引力攫住了我（这里的气候有时候确实对我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折磨）。医生每天吓唬我，说我只要离开就会有百般噩运，只要我待到秋天就会有百般佳运。但是，我对这种劝留感到厌倦，对这种感谢在此度假的客套感到厌倦。如果所长来信劝留，我才会乐意接受，譬如所长这样写道：“亲爱的同事先生，昨夜我突然萌生一个念头，您或可在外地多休养一些时日。我迫切请求您再接受一年的假期。您只需来电报示意‘同意’，即可得到假期，您不必费神写捷文请假报告和道谢函，此事只需由令妹女士和令妹夫先生代劳即可。但愿您能笑纳此建议，并祝尽快或稍晚康复，顺致提前之谢意，云云。”是的，我一定会乐意留下。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愿意留下，那就是这里的肺病患者（和其他患有类似疾病而病情更加糟糕者）比以前变得更加令人疑虑了。我仍然不相信会传染。这里的厨房女工吃这类病人的残

羹剩菜，却没有染病，反而更加滋润，而我同这些病人同桌用餐时都会有几分惧怕。厨房有一个可爱的小孩（母亲在厨房里干活，父亲情况不明），他虽然靠剩饭维生，却肯定没有染上病。（此外，这是个衣衫最褴褛、却又最快活的生灵，也很聪明，但我无法与他沟通，他只说鸟语。当有人看见他在离雪橇道太近处玩耍、有被雪橇压倒的危险时，劝他小心一点儿——他才刚满5岁——这小男孩却说：不许压我，我是个孩子呀！）这就是说，我不相信健康人会受传染。但是，这个城市里没有人完全健康，至少没有强壮到能在任何情况下抵抗传染病。我不理解这种传染的可能性（医生的种种解释——凡是我听得懂的——我统统不喜欢），但我相信这种可能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愿再回到我那鸟巢般的房间里去，那里有那么多只小鸟张着嘴，也许是在承受我施发出去的。

如果我近日内不回家，便会写信回去。在星期日之前，所长是有时间来信的。但是，我也很愿意回去见你和埃莉、瓦莉。

请特别感谢斯卡尔小姐对我的问候。你在信中谈到的她的情况令人感伤。不过，早就可以从这一态势中（而不是她的脸上）看出这种不幸。

你现在也不提尤丽叶姑姑的事了。好吧，等我回来。

你的

〔1921年3月9日—马特里亚利〕

另外，我可能于星期一或星期二即从这里启程，因为从洛姆尼策到波普拉德的火车自3月15日至5月15日停驶，改建电气铁路。

此信是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之前两天构思的。

你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系指1920年7月结婚后的变化。

我的两张画像：另一张像的作者很可能是卡夫卡在致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的信中一再提起的伊雷妮小姐。

你提到的保险所和巴勒斯坦：奥特拉显然是在建议卡夫卡从保险所辞职并移居巴勒斯坦。有关他多次酝酿的移居巴勒斯坦的计划，参阅H.宾德尔所著《卡夫卡学习希伯来文》一文，见于德意志席勒研究会年鉴第2期（1967年）第544页。

星期日之前：指的是3月19日。因为卡夫卡只获准休养三个月，假期于这一天结束。

94.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

我的几封去信并无特殊的合乎逻辑的想法，先是想离开，后又想留下，而后又想离开，最终还是留下了。但是，这并不完全表明这里的总体情况令我十分满意，即使在最近的美好日子里亦非尽然。另一方面，一个季度的时间相当长，这样寄居下去这里都快成为自己家了，饮食也变得单调起来了。现在，因为奥特拉的好意——我不明白她是以何种方式，医生的证明我是后来才寄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为我说情续假二个月，所以我暂时留下。下周我将去波利昂卡——那里一个优美疗养院的主任医生——当然几乎像斯莫科韦茨一样昂贵——现在外出，直到下周才回来。——我将请他为我检查身体，听听他对疗养、尤其是疗养时间的看法。而后，如果我被接受，就会搬过去（前提是我如果有力气从这里抽身）——并不是每个人都被接受，疗养院里已经客满。舅舅的建议——夏季避暑、花园劳动——当然要比所有疗养院更让我喜欢，只是现在避暑有点太早，我也不知道何处避暑为宜。如果你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请来信告我。

如果我在这里再待下去，将会慢慢地需要各种东西，如夏季衣裳等等。一实际上我这里只有一件衣服，已经每天穿着它四处走动并卧床达一个季度之久，再也算不上是礼服了——怎样才能把衣服带来？不过并不急用。还有一点令我费神，即如何处置冬天的衣物？这些衣物已经一冬天没有敲打过了——这里没有这种习俗。

不过我这周还是胖了，体重为63.50，增加6.10公斤。

衷心问候全家！

你们的 弗兰茨

〔约1921年3月13日—马特里亚利〕

因为奥特拉的好意：卡夫卡顾忌到妹妹的状况，既没有详细告诉她自己的近况，也没有请求她找所长谈话。尽管如此，卡夫卡立即猜测到，她可能在接到他3月9日的信后采取过什么行动（第95号信）。他后来于3月11日明确请求马克斯·勃罗德为他口头续假，因为假期的期限是3月19日，已经来不及写书面申请。由于奥特拉捷足先登，勃罗德已无必要再去办公室。卡夫卡

只能补交申请和证明信，并致信经理感谢他同意延期。他于4月3日写道：

尊敬的经理先生：

我本应早就去信，但一直病卧在床、高烧不断，直到现在仍未痊愈，今天亦然。至少在我个人看来，难以确定究竟原因何在，究竟是暂时的肠炎，还是更严重的病症。虽然对我的增加体重计划造成许多影响，但据医生今天的检查和诊断结果，我的肺部并未因此而受损，近日子里甚至继续好转。

我之所以再次请求续假，实出于对肺病的无奈。实际上，我直到在这里承受肺病的痛苦之后，才首次真正认识到此病的厉害。申请续假之举使我得到宽慰。尊敬的经理先生，感谢您的耐心和宽容，感谢您对舍妹和属下的关怀——我根本不敢计算这已经是第几次续假了——衷心感谢您恩准我的申请。

敬颂安康，尊敬的经理先生

您的

F.卡夫卡博士

我将去波利昂卡：古尔大夫的疗养院设于该地，海拔1100米以上；卡夫卡而后却在马特里亚利住到8月底。

舅舅的建议：舅舅指卡夫卡最爱戴的舅舅西格弗里德博士，他是梅林地区特里施的一名乡村医生。卡夫卡在同马克斯·勃罗德的谈话中也提到过，“在农村里从事一份轻闲工作”是最好的生活。

95.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几天前，有一位熟人问我是否还想在这里住下去，我回答说是的，我愿意住下去。我给布拉格写信时也是这样说的，但这不过是出于玩笑，况且为了使这件事全无当真的可能性，我有意识地把启程日期定得很紧，以致所里几乎不可能有时间作出任何反应。这位熟人问，一封这样的信有什么意义？这使我想起了一位犹太教拉比的故事，不过我对这个故事的详情并不完全了解。故事大意是：一位犹太教拉比说，他在小酒馆里大大地见识了两位喝醉酒的农民。二位农民对面相坐，其中一人感到伤悲，另一人用肉麻的语言劝慰他，到头来伤悲者吼了起来：“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你说你喜爱我，可并不知道我为什么难过。”这一切都是醉话，连伤悲者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伤悲。

我本以为你不会为我办事的，因为主要原因是你无法办事，所以我在两天后写信给马克斯，打算绕过你，可是你没有让我绕过去。

申请续假是很难的，原因很多，其中大部分你是清楚的。如果你站在他面前，他给你重新来一套如此这般的准假阔论，他几乎就变成了天使一般，于是你不由自主地垂下目光，那感觉简直是令人作呕。从总体上讲，人们可以容忍旷野上的天使，但是在所长办公室里呢？这种地方人们完全有理由以极粗鲁的地下方式予以诅咒。作为埃莉的兄长，我宁可堵上耳朵去承受他的“同意”。即使你那份书面申请报告也给我带来了类似的感觉。唯一给我一点儿安慰的是那份南非计划。我似乎听到了他的话：“我给他假期去那美丽的国家，那里生长胡椒。”但这都是胡思乱想。他的好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仅仅考虑到我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多余的人，也不足于成为唯一的理由呀！

我被打断了，就像现在常常发生的那样：那位不幸的医学生。在附近这一带，我还从未见过这样恶魔般的闹剧。谁也不知道正在指使的是好势力还是恶势力，反正这些力量非常厉害。若在中世纪，人们会称他为着了魔。他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身材高大魁梧、强壮有力，红光满面——格外聪明，真正的大公无私，对别人体贴入微。详情以后得闲时在浴室内再叙——当小宝宝睡着之后。

黑茨岛当然比上边那令人悲伤的胡同漂亮。但是，吸引你的是贫困相，有钱人就不会贫困，从外界很少有幸能接触到贫困。一般而论，置身于贫困之中的只能是痛苦与不幸。暂且把它搁置一旁，不过以后我会全力开动脑筋来谈这个岛子的。

如果医生只是一个朋友，倒还可以打交道，否则无法理解他们。比如说，我一共有三个医生：当地的医生、克拉尔大夫和舅舅。如果他们的医嘱各异，这并不足为怪；要是他们的医嘱恰恰相反（克拉尔大夫赞成打针，舅舅反对），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他们自相矛盾，那就难以理解了。例如，克拉尔大夫建议我来这儿，因为这里地势高，他常在这儿晒太阳，可是当现在太阳开始暖和起来时，他又劝我去地势低的普莱施。此外，他很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匈牙利和捷克的疗养院达不到德国的水平，可是他却建议我去普莱施。我并不固执（只是食肉的折磨我还是不愿意承受，不过现在已经部分地停止了这种折磨），我也打算去普莱施，我只是希望在离开这里之前先能保证找到一个任何地方的位置，以免在布拉格浪费掉你如此大度为我赢得的几周假期。此外，过几

天我将去斯莫科韦茨和波里昂卡检查身体。如果克拉尔大夫已看过证明，我这里还有一份抄件，可以寄给他。

转移？我不知道。去巴伐利亚？没有一个医生向我提过这个建议（尽管这样的医生能够找到），再说他们那里很不愿意接受陌生人，他们要是接纳犹太人就是为了置之于死地，那可不行。

现寄去证明，并附上申请报告。我把它寄给你，是不想再找人重写一份证明。这里的捷克人只剩下那位18岁的姑娘，我对她的水平感到怀疑，因为她居然对我的捷语感到惊讶。我也许会用德语写信。

你难道还有时间和兴趣去干那件大事以外的差事？真的如此？

你的

〔1921年3月16日—马特里亚利〕

向埃莉、瓦莉问候，还有小姐。

我也把证明的誊抄件附上，再说抄件要比原件清晰一些，或许可把抄件给卡拉尔大夫或舅舅，申请报告上当然要附原件。我的做法有点像是在对一把珍贵提琴的内在质量作鉴定，实际上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

从此信结尾处看出，经理曾请奥特拉转告卡夫卡，应再写一份简短的书面申请报告，连同医生证明（卡夫卡已将证明寄给马克斯·勃罗德，后者又转交给奥特拉），一同由奥特拉转交公司。由于此申请与Louil著《卡夫卡》第74页中所刊的署有1921年3月16日的申请报告内容相同，因而此信可能是于当天所写（参阅“并附上申请报告”）。保险所后于3月25日以文书形式批准卡夫卡的申请，将其假期延长两个月至5月20日（参阅Loužil 著《卡夫卡》第75页）。

犹太教拉比的故事：这个故事名叫《萨索沃是怎样学习爱人的》，内容如下：“拉比莫舍·莱普讲述道应当怎样爱人的道理，我是从一位农民那里学来的。这个农民和其他农民一道，坐在一个小酒馆里喝酒。起初，他和其他人一样沉默不语良久。但当葡萄酒打动他的心之后，他对邻座说：‘你说，你是不是爱我？’那人答道：‘我很爱你。’他却说：‘你说你爱我，但不知道我有什么愁。如果你真的爱我，你肯定会知道的。’那人无言以对。然而，那位发问的农民却又沉默如故。我却明白了：这就是对人的爱，即应体察人之需要、共患人之疾苦。”（M.布贝尔著《犹太故事一百则》，1933年柏林版，第41页）

旷野上的天使：暗指卢斯所著《圣诞故事》第2册。卡夫卡曾对马克斯·勃罗德说，他于1920年12月18日开始在塔特拉高原的度假后，前几周内读了许多圣经故事。

南非计划：所长显然向奥特拉提出建议，卡夫卡可以移居南非，去南方干燥国度休假，是当时治疗结核病的主要手段之一。

黑茨岛：布拉格新城和卡尔林以北的伏尔塔瓦岛，该岛于卡夫卡时代还有一个集市广场。

胡同可能是指伏尔塔瓦河对岸高处工人们居住的城区Žižkov。从奥特拉致达维德的信中看出，她时而去那里散步。亦请参阅本书第40号信的注解。

卡拉尔大夫：卡夫卡一家在布拉格的家庭医生，卡夫卡时常在信中他作出消极评价。（可参阅本书第96号信以及第88号信的注解。卡夫卡信中批评的医嘱，见于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3月9日通知他的那封信中：“卡拉尔大夫对我说，马特里亚利根本不适合你，他已经向你推荐过一所专门的肺病疗养所。这样的疗养所在维也纳、柏林市郊都有，舍莱森也有一所，在波希米亚的普莱施。卡拉尔大夫知道这个疗养的几个很好的治愈病例。卡拉尔大夫认为，只有始终不渝地治疗结核病才能有助于你的健康。他从个人的实践中得出经验，注射针剂可以促进全面康复。”此信真迹影印于马克斯·勃罗德所著《卡夫卡的病》，刊于医疗报告39集第264号〔1967〕，第270页）

舅舅：指西格弗里德舅舅，特里施的乡村医生。

很不愿意接受陌生人：卡夫卡原打算不去梅拉诺，而在巴伐利亚找一处申请休养，但1920年初未获入境许可。

为了置之于死地：喻指慕尼黑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建立，仅存在两周。——译注）的命运。卡夫卡对1919年5月2日古斯塔夫·兰道被杀事件等十分了解。

我也许会用德语写信：参阅第94号信的注解中引录的致所长的感谢信，并参阅第98号信。

大事：奥特拉的女儿维拉于5天后出生。

96.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和维鲁斯卡：

（？母亲信中是这样写的，这是个什么名字？也许是维拉或维杰拉，就像科帕尔夫人的女儿一样的名字？这个命名出于什么考虑？）好吧，请你接受一件差事！弗尔贝格夫人想为她弟弟（集邮者）买邮票

100 枚	2 赫勒	快邮邮票	} 胡斯画像
100 枚	80 赫勒	邮票带	
100 枚	90 赫勒	邮票	

〔1921年4月—马特里亚利〕

请你从我的钱中支出，她将在这里付我钱。这些邮票将在5月底失效，必须马上去买，听说只有布拉格能买到。

对你来说如果两件差事太重（怎么能推着婴儿车爬坡去中心邮政大厅呢？你有一辆漂亮的婴儿车吗？也许韦尔茨夫人有几分妒忌？），那么或可烦请佩帕（他不去巴黎吗？）帮忙。你也可将信中所附的小品文交给他，请布尔诺的Lidov^e Noviny报社审阅；如果他认为此文尚可。当然还需要找一下克拉尔医生，他也许可以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定到疗养游船的位置，总费用是多少。你们先别马上告诉他，遗憾的是那条消息刊登在4月1日的报上，里面刊有相当严重的内容。一个可怜的病人今天满怀信心地把它拿给大夫，请他评价。大夫又把它拿给我，叫我看一遍，因为他不懂捷语。我当时因为肠炎十分虚弱，以至于实打实地用了一两个小时。

这些是外部原因。本来我早就想给你去信，但我太累了，或者太懒了，或者只是因为太难了，实在是很难区分。再说，我常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现在又长了一个大脓包，我正在与之斗争。听说你们俩很灵巧，我很高兴。但是，你们可别太灵巧了。这里有一位年轻的村姑，病情中等程度，平时很快乐、可爱；穿着一身深色的民族服装，很漂亮，是一件飘来飘去的芭蕾舞裙。她婆婆总是让她干太多的活，尽管家乡的医生一再给予警告，并说：

必须爱护年轻的姑娘

就像对待金色的柠檬一样

这话虽然不太顺耳，但一听就很明白，所以我在编造新的差事时比较克制。

尽管如此，有一件差事还是必要的，即去找所长；这事实在是难以启齿。假期将于5月20日到期（他真的通知你可以批假？），说了些什么？我该去哪儿？或许我应当在这里住到6月底？这些都是次要的想法。（自从患肠炎后——我认为是因为食肉而引起的——厨房里专有一位小姐考虑我的饮食问题，我相信她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这方面。早饭时，她给我提出午饭的建议；下午用点心时，她又提出晚饭的建议。不久前，她的思想开小差，我想她大概是在梦中回到家乡布达佩斯，而后突然惊呼道：“我可真的感到很紧张，不知道晚上的色拉是否合您的口味。”）我怎么能够要求再次续假？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实在为难。也许要求休半薪假？也许请这样的假容易些？如果我能够对自己和他人说，我的病是坐办公室坐出来的或者加重了病情的，或许请假还能容易

一些。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办公室的工作阻止了病情的进一步发展。续假难以启齿，但我不得不再次请假。我当然可以附寄一张证明，这很容易。怎么样，你的意见如何？

你可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成天想这种事，例如昨天我就笑着度过了半个下午，虽然不是开怀大笑，却也是安详温馨的笑。遗憾的是，此事只能意会，不可能言传其详。这里住着一位总参上尉，他被分配在临时医院就治，但像某些军官一样住在我们山下，因为山上的临时棚屋太脏。用餐时让别人去山上取饭。山上积雪多时，他成天滑雪，几乎滑到山顶，常常独自一人，简直太勇敢了。现在，他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做铅笔和水彩画，二是吹笛子。每天固定的时辰内，他会在室外作画，在另一固定时辰内去他的小房间里吹笛子。他显然愿意孤身独处（只是每当他作画时，似乎很愿意容忍旁观者）。我当然很尊重这一点，迄今只同他说过5次话，而且都是在他从远处对我打招呼或是与他他不期而遇时。如果我在他作画时遇见他，便会夸他几句，况且他的手笔确实不坏，属于业余爱好者中好的或很好的。在我看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说过，我知道没法尽述其详。也许我可以试着描写他的外貌：每当他在街上散步时，总是挺着腰板，悠闲缓慢地踱着步子，总是把眼睛望着洛姆尼策山顶，风衣随风飘动，有几分像席勒。如果你走到他的近旁，瞥见他那张瘦削多皱的脸（部分原因是吹笛子吹皱了一脸纹），以及他那苍白的木色，加上那段脖颈和全身都像木头一般干朽，令人忆起从墓堆中爬起来的死者（就像西格诺雷利笔下的人物，我记得这是一张大师级作品）。此外他还有第三个相似之处。他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在他的画作中——

不，扯得太远了。我指的是他的内心。简言之，他是在展示一个包罗万象的展览会。医学生在一张匈文报纸上写了一篇评论，我在一张德文报纸上也写了，这些都是秘密运作的。他拿着一张匈文报纸来找餐厅领班，请他为他翻译；领班觉得文章太深奥，完全无辜地把上尉领到医学生那里，称他会作最佳翻译。医学生当时发有低烧正卧病在床，我正在访他，于是事态就开始发展了。行了，不提它了。既然我说不详述，何必再详述呢？

另外，还得接上前文的主调。你可不要以为我天天在笑，真的不是如此。

现附上陶西斯书店的账单。还有一段是写给埃莉的，关于费利克

斯，包括你的小不点儿也应该给予这样的考虑：10年之后，这并不很长，只需在躺椅上从左翻身向右，一看表就已经过去10年了。只有当人运动时，时间才会变得长久。

埃莉和瓦莉处，当然还要请你特意致以问候。你意下如何？我让你代为问候而不写信给她们，是因为问候容易写信难？完全不是。我让你代为问候，是因为她们是我亲爱的姐妹；而我不专门给她们写信，是因为我已经给你写了！最后你还会说，我让你代向你的女儿问候，是因为写信难。不过，写信并不难，跟其他所有方式比起来，写信还略微容易些。

祝你们母女愉快！

F.

〔1921年4月—马特里亚利〕

〔信笺上端印有塔特兰斯克—马特里亚利高原气候疗养地的一幅图片〕

请代我向小姐问好。

维鲁斯卡：维拉的昵称。此系奥特拉的女儿，生于3月21日。

韦尔茨夫人：伊尔玛·韦尔茨，与卡夫卡的朋友费利克斯·韦尔茨结婚，当时有一个出生10个月的女儿。

信中所附的小品文：被称为“四月幽默”的这篇文章题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治疗结核病》。文章以外行人看来很难渗透的独特方式，将传统致肥疗法中要求的病人增加体重，与爱因斯坦在一定条件下强调的人体长度增加相提并论。在一位柏林教授、F.韦尔盖斯特医学博士和他的对手、慕尼黑黑人克罗普夫迈埃尔之间化名文章的学术争论中，争论焦点是：一位致肥疗法不能奏效的病人（如当时的卡夫卡），应当从的里雅斯特出发，乘船向东南方向作海上旅游，从而根据物理学规律达到最大可能的增肥效果，使肺部因结核造成的空洞得以封闭。据称布拉格此间已组成一个康采恩，将在最短时间内装备几个海上疗养所。由于提供奖学金，即使不太富有的病人也能参加这种以自然疗法针对阴险的大自然的结核病疗法航行。详尽描述参阅H.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47页。

一位年轻的村姑：即第100号信中提到的加尔贡夫人。

一位总参上尉：他的姓为霍卢普，瓦根巴赫所著《卡夫卡》第280页中亦刊有对他的批评言论。

西格诺雷利：系指卢卡·西格诺雷利在奥尔维耶托大教堂内所画的湿壁画《最年轻的法院》。

关于费利克斯：卡夫卡希望刚满10岁的费利克斯转到德累斯顿市郊海莱芳寄宿学校读书。

97.致奥特拉

这么说是真的呀！我那可怜的小妹妹被她那大维拉牵扯了那么多精力，以至于义无反顾地让我乘四月幽默疗养船去往远洋。然而，我却想揪你的耳朵，根本不想去远洋。你写信说，这篇小品文出自4月1日的报纸，也许你写到这里时维拉哭起来了，吐着她那小舌头。

避暑。诚然，避暑是最美不过的事了。我当时之所以没有答复，是因为我像今天这样感觉到力不从心。每当我想起自己将在布拉格做如此令人作呕的姿态时（并不是轻率地自尊，而是厌恶那令人作呕的做派），心里就会犯呕。现在，如果我避免与维拉的任何接触，就不会有真正的危险，医生会证明这一点。但是，脑子里仍存有风险感，不仅我如此，别人也是这样想。因此，我认为我们无法见面。

母亲今天又给我来了信，令我高兴。是关于船的事。你们在陷入四月幽默方面真的十分执著，大概只有佩帕例外，但是你们不会让他独自清醒的。我只是仍然担心你们拿我开玩笑。

你不必为维拉过于担心。你只需想一想，大人们在为生存自卫时无需多作辩解，尽管如此还那么难于接受新事物。你提到了小家伙对桌子的反应，并表述了掺有几分恐惧的希望。这个希望我也一直存有。如今维拉离开了天上的桌子，从你的胳膊上方向下看到地上的桌子，她不喜欢它，或许更有可能的是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她不得不去适应它，而这对她来说一定是一件苦劳，我们却对此难以理解。只是为了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她必须“吃”这么多；也许她不过是为了时常地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个世界令人难以忍受，”她内心时常暗忖，“只能快点喝个饱吧。”于是，她大口喝奶，你呢，大声啼哭。——不久前，我不得不搬到邻室，反正我已经在这个房间的阳台上躺了4个月，几乎所有的家具也已经搬过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努力适应这个新环境，直到几个小时以后突然发现，这个房间的阳台门比较大，空气和光线比原来的房间好得多。维拉也会有这么个经历。——你必须替维拉设想一下，食物是她在这个大世界上离得最近、最容易占领的部分，于是她就充分利用之，而你就必须忍耐之。

附上医生证明。也就是说，请你接受这一苦差事，并请尽快。我的意见是要求现在立即开始享受半薪。我有半薪即可维持，而且这样做受之少愧。

尽管我的话上次说重了，但还是请你代问埃莉和瓦莉好。我有时确实容易激动。也问小姐好。

你的

〔1921年5月6日—马特里亚利〕

祝佩帕旅行愉快。

此信结尾处提到的莱奥波尔德·施特雷林格大夫的证明，所署时间为5月5日。卡夫卡于5月6日附有一封短信将其寄出，该信的德文译文是：“尊敬的理事会！鉴于前附的今年5月5日医生证明，谨申请我获准休至5月20日的假期再予延续。”（Louzil著《卡夫卡》第75页）此申请于5月13日获准，卡夫卡的假期遂延至1921年8月20日（参阅本书第98号信）。

搬到邻室：参阅本书第88号信。

98.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你又一次完成了任务。你还愿意干几次这种差事？一直干到最温和的所长也吼起来为止：“够了！滚出去！别再说一个字了！”一直干到那个时候？这本来真的是一个独特的岗位。说它独特，一是因为他把两件原本难以结合的事结合在一起了，即职员的绝对冗余与病人的绝对良好治疗；二是如果我不是现在这样的可有可无，我就不会受到这样优越的医疗待遇。当然^啰，这么优厚的休假待遇，如今几乎不须我提出申请即可获得；而我接受的，只是一种施舍、一种羞愧。我本不想说的是，我在整个休假期间都为此而感到尤其痛心。不，只有在我提出申请并获准后才会感到痛心。而这一次，我所获准的居然超过了我所申请的。遗憾的是我无法用捷文向所长致谢，这一次还是得用德文，况且用德文亦非易事。

我不太相信菲卡特先生的个子变小了，也许是因为你当上了母亲，一下子变得大多了，所以在你看来一切都变小了（你是知道相对论和船的）。只是，维拉会变大的，她会感受到地平线（和她自己）。她的长

相如何？额头上写着什么字？当然^罗，你在读这些字时不应只满足于表面文字，因为额头上自然只会写着：“我要吃东西。”

很遗憾，因为她的拖累你不能来。也许以后情况会有变化，比如明年春天就有可能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这里，如果你不来接我的话。我成天躺在阳光下的树林中，躺在家里的阳台上，清晨在沐浴着朝霞的林中散步，或者欢笑，或者无聊，或者悲伤，或者有时还会喜悦，每天两次为饮食哭泣（昨天午饭时我情不自禁地怨叹道：“我的上帝哟！”事后才发现自己失态）。我也稍微胖了一些，体重增加了近8公斤——简言之，这是个封闭的世界，人人在这里入了籍。如同来自地球世界的公民们一样，唯有天使来接他时才能离开这里。那么等到明年春天？

如果不太费事的话，请你在启程之前去访一下克雷齐西——可别当面说他矮了！——（对这位资深老职员来说，便会增加失落感）和特雷姆尔，行吗？也许凑巧有邮件。

请你下次来信时写几句关于埃莉、瓦莉和孩子们的事。

你的

〔邮戳：21.5.21塔特兰斯克—马特里亚利〕

向佩帕问好！

向小姐问好！！

如果包裹还没有寄出，请加上3件左右衬衣，软质的，尽可能好些的。

根据卡夫卡1921年5月18日致所长的感谢信，致奥特拉的这封信最大可能亦是这天所写（参阅第95号信的注解）。但是，盖有5月21日邮戳的信封中，如今误插着第88号信，而实际上只有第98号信在时间上与之相符。因此，此信或是延误数日才送到邮局，或是18日开始写信，两三天后方才结束（信中的间隔横道可作此理解）。

超过了我所申请的：从第97号信看出，卡夫卡请求在半薪条件下的续假，所长显然没有接受这个申请。

这一次还是得用德文：参阅第95号信。1921年5月18日的信中写道：

尊敬的所长先生！

衷心感谢您，恩准再次续假，尊敬的所长先生，感谢您准假的此种方式。我本当致函所方道谢，这一点我必须承认缺乏常识，对此深感内疚。

近两个月内，我的状况似乎并未如前三个月那样明显好转。体重增加了整整8公斤。总体来说也仍然没有发烧。咳嗽、多痰、疲乏现象有所改善，而在两个月前我不会相信会有这种好转。当然，这一切改善，包括呼吸力的改善，都与美好的气候、宜人的空气、轻薄的衣裳直接有关。

敬颂尊敬的所长先生大安

您的F.卡夫卡博士

(见于 LouŽil 著《卡夫卡》第76页)

相对论：参阅第96号信的注解。

克雷齐西：卡夫卡于1917年底从苏劳致奥斯卡·鲍姆的信中可能谈到的就是此人：“他是我的亲密同事，我在这里更加想他。”

99.致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奥特拉：

我很久没给你去信了，因为，当我身体好时，漫步于林间，沉溺于安宁之中，与小鸟、溪水和微风为伴，于是也就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当我绝望时，困于寓所内，仰卧于阳台之上，徘徊在充满噪声的树林中，于是也不想写信，因为父母也会看到我的信。遗憾的是，绝望的时候为多；不过心境好的时候也会有，比如前两天的下午就是如此，今天则不尽然。但是，我并不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们所需要的那么多安静而感到惊讶，由此延伸下去，人们也不应该指望太多的安静。尽管这里已经爆满，自一月以来甚至满上加满（已经有人住在洗澡间、临时棚屋里，而我却有一间带阳台的漂亮房间），但是仍然会有些许的安静时间。对我的住房环境，我颇感谢忱，所以这成为我迄今没有离去的种种原因之一。比如，现在已是晚间7点左右，我仍躺在一个三面有墙的小屋旁的躺椅上，椅子蒙有一层皮面和一层软垫。小屋前是一方草坪，大小有若苏劳街心广场的三分之二，被知名或不知名的鲜花点缀成黄、白、紫三色，周遭是一围古老的云杉林。小屋背后，溪水潺潺。我已经在这里躺了5个小时，今天稍有人打扰，昨天和前天则独自一人，唯有奶瓶相伴。对这一切，当存谢意，因此我不想对今日的不快多加评说。另外，如果每天下午如此，如果世界允许我在此待下去，我会躺到别人不得不

抬着躺椅把我搬走为止。最近你会来看我吗？

你提到去陶斯，这使我想起了几句诗：“尽情地去享受人生吧，只要你进入人生，你便会生出十个顾虑。”所监大人没有什么诗意，却有强有力的权限。第一，该地位于波希米亚森林的北坡，过于荒凉（我已经是倒着发育为一个儿童，但还不至于像维拉一样的婴儿）。第二，那里缺乏安静。林中可能很安静，但距离不会近到搬着躺椅就可以走到的地步。第三，那里离施皮恰克太近（有人因为不想接近我，所以没有去塔特拉，而是改去施皮恰克。难道我现在应该也去那里？）。第四，疗养机构急切地询问我是否在这里住到7月1日以后（7、8月间只能以月为单位出租房间），我已答复住下去，而且我真的想住下去。第五，如果我经过布拉格，就必须去所里一行，那将有十分折磨人的一套礼仪，因为对我来说，保险所已经比月球还遥远（除了所里发的钱），但又充满威胁和责备。第4、第5个顾虑和第3个顾虑之一部分，我可以自己克服。但是，关于前两个顾虑，只有当你住到那里后才能有发言权。因此，最好还是把房间租到那时候再说，对吗？

令人注目的是，你很少提到对特雷姆尔和克雷齐西的拜访。尽管你缄口不谈，但这也是重要的迹象。难道他们俩对我生气了，说了什么难听的话？那里没有邮件么？此外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你对我的外貌没有表示特殊的指摘，这很好。我虽然增肥8公斤（再重就不行了，宁可体重下降），不再发烧，但是——在苏劳时我的身体好一些，我真想说，在我来这里之前一切都比这里好，但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冬天就比这里差太多了。我之所以写这些，是想在回来之前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是想在回家时即能见到炒鸡蛋，而不是像从梅拉诺回去时的情形。

好吧，先不要生我的气，去看看维拉，在喂她之前多吻几下，其中一下是替我的。

你的

〔1921年6月初—中旬—马特里亚利〕

亲爱的佩帕：

你真好，还想着我，从巴黎寄来了风景明信片。以后你一定要给我

多谈谈巴黎，谈谈舅舅和舅妈。你向他们全都转达了父亲的问候，一个也没落下？我为维拉感到高兴，她很有天才，据你来信说已经会说希伯来语了。Haám 即是希伯来文，意思是：人民；不过她的发音不太准确，应当念成 haám 而不是 haám。请你纠正她的发音，小时候习惯了的错误，就会陪伴终身。

衷心问候你的父母和姐妹！

你的 F.

因为父母也会看到我的信：奥特拉同父母住在同一栋楼内，但是，父母像每年6月一样，当时正在弗兰岑温泉疗养。

你提到去陶斯：奥特拉曾向哥哥建议，让他7月底同她和孩子们一道去陶斯消夏。参阅本书第97和100号信。

尽情地去享受人生吧：喻指歌德著《浮士德》中的诗句：

尽情地去享受人生吧！

人人都在生活，但并非人人都认识人生，

只要你进入人生，便会体味到人生之乐。

谈谈舅舅和舅妈：卡夫卡母亲的兄弟约瑟夫勒维娶了一位法国妻子，生活在巴黎。应当念成 haám，而不是 haám：一则幽默，喻达维德的民族主义（他从不容忍孩子接受犹太教育）和语言纯正癖。参阅宾德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45页。

姐妹：安妮和埃拉。^[3]

100.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

你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我已经相当胖了，至少右脸颊上是这样。你们可能能够认出格劳伯尔先生，除此之外照片上你们只认识戴着头巾的加尔贡夫人（修帽匠）。但是，你们从照片上想象不出来她的真实情况。衷心问候舅舅和舅妈。

你们的 F.

〔1921年6月—马特里亚利〕

〔风景明信片：卡夫卡在马特里亚利，与病人和管理人员们合影〕

你们在弗兰岑温泉没有照相么？

此信寄往弗兰岑温泉（父母通常疗养的地方）。

格劳伯尔先生：照片上左边坐者。卡夫卡在后来致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的信中一再提到格劳伯尔，称之为他在马特里亚利结识的病人中两位最快乐者之一。格劳伯尔死于1923年8月。卡夫卡在第91号信中提到的假牙技师可能即是格劳伯尔。有关加尔贡夫人的情况，参阅第96号信。

10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当然已经习惯了D的生活，怎么会有别的可能性呢？那是个城市。跟农村相比，人在城市里生活自然感到比较孤独。另外，你在信中写道，你知道一个叫巴比伦的地方。我已经不再想去任何地方了。这里也不像我担心的那样嘈杂。孩子们的噪声比大人的容易承受，一是因为这种噪声在所难免，二是这种忍受可以由于孩子的存在而得到补偿。在维拉而言，大概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要告诉你，我将于8月20日假期结束时回到布拉格。不仅仅因为我不能永远地乞求，何况你这位说情人不在布拉格，而且也因为医生认为病情不大可能继续好转，至少他有时这样认为，而我也认为很可能确实如此。——目前，我的胫骨上的大脓包火辣辣地疼痛。它已经令我痛苦到现在了，我还是躺下为好。

你的

〔邮戳：21.7.28塔特兰斯克—洛姆尼策〕

多马日利策有着对Božena Němcová的回忆！

D：即多马日利策（Domazlice）的缩写字母。

巴比伦：陶斯附近的一个村庄。

回忆：即指著名捷克女诗人，其主要著作是《Babika》（《小奶奶》）。卡夫卡对她十分推崇。她于1845—1847年住在陶斯（=多马日利策）。

102.致奥特拉

我的第一次郊游我一下子就认出了维拉，你倒有点难认，但是你的自豪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它写在这张图片上（我的自豪不亚于你）。她似乎有着一张坦率的、真诚的脸蛋。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坦率、真诚和可靠更宝贵的东西。

你的

〔邮戳：21.8.8〕

〔风景明信片：塔特拉山脉〕

安妮·尼特曼

伊莱娜·罗特

103.致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佩庇：

抱歉，抱歉，先是裤子的事，现在又是这件事。告诉你，我当时的状况相当不佳，发着高烧，彻夜咳嗽。当我早晨开始给所长写信时，心情不太好。因此，请原谅我。另外，奥特拉当时不在家吗？为什么由你代劳呢？当然，这件事你办得很出色。理事先生是一位很敏感的人，你做得很对，同他进行了严肃的谈判，这也十分必要，因为我同所方打交道时如同孩子跟父母对话，毫无勇气。

我不会再申请假期，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要么有必要在这里继续治疗下去，亦即要么有希望康复（这将由医生们决定），但是短短的假期无济于事；要么我根本不需要假期。我将会把医生证明带来，证明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这就足够了。

佩庇，多谢你想来接我的美意。在我来说这全无必要，对你来说当然是件好事。现在几乎已近秋凉，四处漫步的惬意在某种角度上超过了阿尔卑斯山，人们不需导游即可轻易地登上最高峰。不过，如果你来之后，每天早晨告诉我想去哪里，晚上告诉我去过了哪里，那对我来说可有可无。你既然已经休假，为何还在布拉格？

我很可能于星期五回来。再见，佩庇，向奥特拉和维拉问好。

〔1921年8月22日或23日，马特里亚利〕

1921年8月14日，卡夫卡突然发烧，不得不卧床休息。由于无法预知当月22日能否按计划重新上班，他于16日致函所方：

尊敬的所长先生！

我是在床上写这封信。我本想于本月19日回布拉格，但现在担心难以实现。数月来，我一直几乎没发过烧；但是，星期日突然发着烧醒来，热度超过38°，直到现在仍未退烧。这一次，很可能不是因为受凉引起发烧，而是肺病复发。如同以往病发一样，非人力所能抗拒。医生已为我作过检查，认为我的肺脏状况良好，只是左肺叶尖尚有一小块顽疾。医生认为，这次急性发烧并无大碍。尽管如此，只要热度未退，我当然还是必须卧床。也许星期五可以退烧，于是我便可以启程；反之则仍须再住几日，届时我会带来医生证明。

经过此次发烧，我的体重将严重受损。对我来说，给我带来更大不快的是，因为此病我无法在长期休假之后至少准时上班以尽微薄之义务。

恭顺的

卡夫卡博士

（据K.赫尔姆斯多夫所编《保险公司职员弗兰茨·卡夫卡书信集》摘引，见于»Sinnund Form«第9期〔1957年〕第645页）

由于卡夫卡此次原想用捷文写信（参阅第95和98号信），但因时间关系无法让达维德在布拉格翻译原文（参阅第90号信），所以他决定直接用捷文书写（也许在说捷语的熟人帮助下所写，参阅第91号信），而后寄给妹夫，请他过目并纠正拼写错误。卡夫卡嘱奥特拉将修改后的信件转交他的上司并加以解释性的美言。由于她当时不在家，故由达维德代劳此行。

若按卡夫卡于8月29日重新上班计算（参阅louzil著《卡夫卡》第76页，该处刊有经达维德润色的卡夫卡捷文致歉原件）——他本打算于26日回布拉格（正如他在致达维德的信中所述）——由于他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盖有8月23日邮戳的明信片包含有类似内容，所以可能是同时所写（参阅本书第84和108号信的注解），故而卡夫卡此信肯定是在这一天或前一个星期一所写。

佩庇：捷文形式为Pepicku，是佩帕的昵称。

理事先生：系指卡夫卡的上司Jindrich Valenta，他于1920年成为损失清算处的理事（参阅Louzil著《卡夫卡》第71页）。

1923年

104.致奥特拉

目前暂无必要写亲密信，但是这封信也不至于糟糕到不足一读，只是求策问谋而已。然而，此信已是我这次旅行中大部分时间的唯一劳动。我现在当然也有几分迟钝，因为昨夜是最糟糕的夜晚之一。大约分为三个阶段：先是猛然惊醒，其恐怖状之甚，世界历史上无一支军队能够抗衡；而后我起床唤醒那位可怜的好小姐（她因为电气铁路铺线而睡在我的房内，经过大规模整理行装后十分疲惫），取来安眠药匆匆服下，迷糊了大约一刻钟，药劲已过；于是，当夜的剩余时间内，我就在腹中构思给柏林房东的辞房电报，并绝望地苦挨到天亮。但是，当我清晨起床动身后，在小姐的安慰下，在佩帕的担忧下，在父亲善意的责备下，在母亲悲伤目光的注视下，我居然没有晕倒（感谢你和舍莱森）。

埃拉·普罗赫小姐可好？

路过贝尔科维茨时，因为你和孩子们以及芬尼没到车站来，我颇感伤心。

〔邮戳：23.9.26柏林—施台格利茨〕

〔邮政明信片〕

此信系寄往舍莱森。

昨夜：卡夫卡于1923年9月24日乘车去柏林，打算与他7月间在波罗的海米利茨浴场结识的多拉·迪曼特一道开始新的生活。在他看来，与她之间建立关系的决定“极为大胆，如此勇敢的壮举只能在历史记载中可以找到，例如拿破仑远征俄国”。

在佩帕的担忧下：约瑟夫·达维德在度完暑假后又回到了布拉格（参阅第101和103号信），而奥特拉则在舍莱森待到10月中旬（参阅第107、110和111号信）。

埃拉·普罗赫：即指第106号信中提到的埃拉·普罗哈茨卡。

贝尔科维茨：该地离舍莱森约步行45分钟的路程。

孩子们：奥特拉的第二个女儿海伦娜已于1923年5月10日出生。

105.致奥特拉

奥特拉：

附言：黄油这里有的是，只是不能吃。如果你能不时地寄来一小包样品，那倒不错，甚至很好。因为，只有黄油能够使我略微增肥，而舍

莱森的致肥效果已在临行前夜丧失一部分（如果我没有可以丧失的肥胖度，当然也不会外出旅行）。你愿意寄吗？我们以后再算账，大约一个包裹价值5克朗。我曾经往这里寄过一次黄油，作为尝试，结果安然寄达。姑娘说，她在此之前以为当地的黄油很好吃，收到包裹后才知道还有好吃得多的黄油。祝你、佩帕和孩子们，以及芬尼一切都好。

F.

〔邮戳：1923.9.26柏林—施台格利茨〕

〔邮政明信片〕

莱森的致肥效果：卡夫卡于8月中旬至9月21日在奥特拉所在的舍莱森疗养。参阅第104封信。

106.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刚才，在我收到你那可爱的信后不久，得到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据说，女房东对我感到满意。但是，遗憾的是房租不再是20克朗，9月份的租金是70克朗左右，10月份至少是180克朗。房价攀爬速度有如你们那里的小松鼠。昨天，我差一点被租金吓得晕过去，城内的房租对我来说也很可怕。但是，除此之外，这里郊外暂时还很平和、优美。每当我在这些温暖之晚踏出小楼时，茂密的花园中便会迎面扑来一股清风，其柔和、其强劲似乎从未感受过，无论是在舍莱森、梅拉诺，还是马里恩温泉，以及其他所有去过的地方。是的，这是一次苏劳之行。当然时间刚刚过去8天，如果你问我是怎样工作和分配时间的，我就无言以答了。更详细的情况很难写，在给父母的信中我将努力去做。此外，你是否有兴趣也读一下那封信？我希望，你不至于见到我在台阶上伸展四肢躺在孩子们中间。——直到星期二尚未收到黄油。快断顿了，必须寄来。这里的黄油，包括牛奶，我都几乎难以忍受。

我亲爱的佩帕现在都在干什么呢？我一共漏看了多少结局！向孩子们和芬尼问好。

你一个字也没写埃拉·普罗哈茨卡。

〔邮戳：23.10.2柏林—斯特克利茨〕

女房东：卡夫卡本应于11月15日自Miquelstrasse8号搬到Grunewaldstrasse13号（参阅第113号信）。但他此时已接到解约通知。根据多拉·迪曼特的回忆，与女房东的矛盾对他的《小女人》的构思产生了影响（参阅《勃罗德谈卡夫卡》第172页和174页）。

差一点被租金吓得晕过去：卡夫卡于同一日致信马克斯·勃罗德：“我在郊外正在找房，以避免房租那真正的折磨。这里人很愿意帮我，城里人缺乏这点。例如，昨天我被房价吓得暴发数字幻想症。”

结局：约瑟夫·达维德是英国狂热者和足球迷。

107.致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佩帕：

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劳你驾写几行字来。今天是星期三晚，十天以来我只得到过总共两次家里的消息。本来两次完全够了，但是时间分配得不理想，两封信是先后挨着收到的。因此，要是家里有什么事，你就会来信告诉我，对吗？既然你无法让别人害怕柏林，又何必顾虑其他呢？佩帕，若想让我害怕柏林，有如画蛇添足。不过，在这里的内城生活，确是一桩可怕的事，必须为食品而斗争，为看报而心惊。当然，这一切与我无关，换了我连半天都抵抗不住。然而，郊外这里却很美，只是偶尔传来一条消息，一种莫名的恐怖传染到我，于是我不得不与之争斗。难道布拉格不是这样？那里，每天有多少种危险威胁着一颗如此胆怯的心灵。除此之外，这里一切均好，我的咳嗽和体温情况也因此而有所好转，甚至比在舍莱森时更佳。——那20克朗我已移交给一个托儿所，详情我会告诉你的。——如果你打算作一个关于柏林现状的报告，尽可写信告诉我。当然要付柏林的价钱！这可是个昂贵的报告。另外，你读一下最近一期《自卫》。福格尔教授在此刊上又写了一篇反对足球的文章。也许现在应当全面停止踢足球了。

替我问候父母、姐妹和Svojsik先生。

另外，刚刚收到埃莉的信，家里一切均安。

〔邮戳：23.10.3柏林—施特克利茨〕

当然，这一切与我无关：至少在10月1日这一天，事实与之不符，参阅第106号信和J.P.Hodin所著《我曾爱过弗兰茨·卡夫卡——访多拉·迪曼特》，见于《新报》（Dieneue Zeitung）1948年8月18日第13版。至于读报时的恐惧心理，则是每天必不可免的（参阅第114号信）卡夫卡隐瞒真情的目的是不让父母无端担忧——达维德当时与他们住在同一个楼内，自然会给他们看信。（参阅第117和119号信以及第99号信的注解）。

这可是个昂贵的报告：达维德于1923年9月5日（星期三）给在舍莱森的奥特拉去信说，他将因周末的一场体育盛会而在布拉格多待几天：“于是我又生出了那个老念头，即去找弗兰茨。事关一个报告，至少可以让他报销火车和汽车旅费；这个报告也值得作此开销。告诉他，Hakoah队在伦敦以5：0击败West Ham United。这个消息登在今天的»Tagblatt«上。或者是报社弄错了，或者是Westhams被日本大地震吓坏了。”（宾德尔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557页）尊敬的英国足球俱乐部的失败，无疑对他是一打击，就是在足球通来说也很意外（参阅《布拉格日报》第207号[1923年9月5日]第6版上的报道）；信中戏称的地震发生于9月1日，因为各家报纸连日报道，所以达维德的指责不无道理。维也纳协会当时是最大的犹太人体育俱乐部。卡夫卡与达维德之间经常引用的固定词汇“报告”，以及两位伙伴之间反唇相讥常变花样的内容中，均也包括足球这个话题。参阅第115号信。

福格尔教授：争论始自福格尔7月27日的一篇文章，后又续于8月31日和9月28日的两篇文章（《打击足球瘟疫》，刊于《自卫》第38期第5页）。最终，编辑部以一篇反对性论文和结束语作为补充。早在卡夫卡和达维德同在舍莱森度假时，二人之间的舌战由头和材料就已具备。关于《自卫》杂志，可参阅第77号信的注解。

Svojsik先生：安妮·达维德的丈夫。

108.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不是“知己信”，只是经过略有不安的一夜之后的几句知己话：

关于你是否会打扰我的问题，我们根本不要谈。即使全世界的一切都在打扰我——几乎已经是这样了——，你却没有。除了能在这里见到你的喜悦之外，也许我还可以省去一次旅行。

这是关于你的事。但是，我不得不说除了你之外，其他的事都颇令我担忧。谈这种事为时过早，我还不能确信自己能够适应这里，为此梦中常在困扰着我。你能够体会些许：它与意愿无关，它与是否受欢迎无关，原因不在客家，而在东家。柏林的整件事具有柔性特点，我以剩余之力去感知，因此也许具有很大的敏感性。你知道的，别人有时是用什么样的语调在谈论我的事，显然这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其中没有什么恶意，更多的是同情、理解和教导心等等；它并不是恶意，但这是在布拉格，我不仅有爱而且有怕。直接阅读和聆听这种好心肠的、友好的

评价，对我来说犹如布拉格传到柏林来的谆谆之音，它给我带来悲伤，带来不眠之夜。告诉我，你能够丝丝入扣地体现其中的悲伤情感。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来，也不知道我是否该去布拉格待几天。由你决定，给我提建议。如果存在某种可能性，我想在柏林度过整个冬天。也许我事先应当回布拉格一趟，趁天气还能忍受得了，看看父母，正式告别，商量着把我的房间租出去，等等。另外，我还得取各种冬季用品（风衣、外衣、几件内衣、睡袍，也许还有暖脚套），否则这些东西托人带来或寄来都很费事。最后，我本来也该同所长谈一谈；不过，如果你坚持要代劳的话，我也可以把这件事毫不犹豫地交给你来办。如果我回去，无论如何我要在20日左右回到这里。

你看，我又把自己的担忧推诿给你了。这样一来，也许我又会像昨天那样自由、那样瘫软了。昨天，我虽然像每天一样7点以后才起床，但是9点来钟就感到累了，累得瘫软了，一点也不发烧，但就是挺不住了，于是纳头便睡。午前点心和午饭，我就像海伦娜一样在半睡眠状态中细嚼慢咽下去。傍晚5点前，我才勉强地爬了起来，因为据说有客来访。晚间，除了你的明信片外，我还收到了母亲的明信片。母亲说，克洛普施托克那个可怜而又可爱的不幸青年（眼下又很不幸）今天就要贸然来访，事先根本没有给我来信。现在看来他不会来了；要是我能帮他一把就好了，他没有住房，学校的免费午饭也难以保证，他的手受了伤，很快又要有一场重要考试，也许他钱也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他前来柏林访我的理由。现在看来他可能不会来了。当然，布拉格对他来说并不好，然而柏林的求学机会更加渺茫。在这点上，你本应劝劝他，你这个大母亲！——再见，向佩帕问好，还有孩子们和芬尼。维拉又有什么名言？海伦娜可有进步？

对了，在百般困难的干扰下，我忘了感谢你的黄油。星期三收到的。也许这只是第一只包裹？味道好极了。

〔1923年10月8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日期推算：从卡夫卡1923年10月8日书写并盖有当日邮戳寄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看出，卡夫卡在前一天有一位叫恩斯特·魏恩（参阅第21号信的注解）的客人来访。由于第109号信的内容介于第108和110号信之间，即介于10月2日和13日之间所写，而且理应在中间时段，因为两头均经过柏林与舍莱森之间的两条邮路往返，所以魏恩的来访很可能是在10月7日。

带来不眠之夜：卡夫卡于1923年10月16日致函马克斯·勃罗德：“但是更糟糕的是，最近夜鬼老是缠着我。不过，这也不足于令我返回；如果我被夜鬼击败，与其在那里，不如在这里。

当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步田地。”

给我提建议：奥特拉反对此计划，卡夫卡遂改变主意，打算最早于年底回布拉格（参阅第109号信）。母亲也劝卡夫卡放弃此计划。

取各种冬季用品：冬季用品后由马克斯·勃罗德于11月份带去（参阅第114号信）。

交给你来办：参阅第115号信。

海伦娜：奥特拉的第二个女儿。

细嚼慢咽：原文为fletchern（根据美国健康布道士Horace Fletcher命名，现意为特别彻底地咀嚼）。

克罗普施托克：自1922年夏季学期开始，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在布拉格学习医学专业。

109.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也许已经到了布拉格，但我还是试着向Sch.发一张明信片，而后
再往布拉格写信详告。如果我没有记错，迄今已经收到你的3个小包
裹，第3个寄的是Danbaer，你星期一寄出，出奇的快，星期四就到了。
为了便于算账，我们必须坚持记数，我可不想从维拉先生的面包上舔去
黄油（尽管他会有不计其数的黄油可吃）。在此期间，我也收到了母亲
的一个小包裹，使我受到了出色的照顾。不过，寄其他东西则全无必
要。关于你信中谈到的旅行之事，我还会去信详谈，今天只说一点，我
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再回去，同时我也承认佩帕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这里郊外至今一切平安，我认为你也可以睡在我屋里，不过城里当然随
时都可能出事，对小不点们的母亲来说会带来铁路的风险。有关这方面
的情况，我下次还会写到。好吧，暂时：František pozdravuje a
jezdráv。向佩帕、孩子们和芬尼问好。

〔邮戳：23.10.13柏林—施特克利茨〕

〔邮政明信片〕

向Sch.发一张明信片：奥特拉计划于10月15日才离开她在舍莱森（Schelesen）的消夏住
房。

维拉先生：戏言！

Frantšek pozdravuje a je zdrav：弗兰茨致以问候，他很健康。

110.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这么说你还在布拉格？15号之前不走？是牙齿的缘故？现在牙齿还疼吗？很少有东西令我完全充满信心，而我对你的牙齿却满怀信心。不过，你在这种尚能忍受的气候下仍未离开布拉格，这一点很异乎寻常。——所有包裹都已收到，标有第1号的，包括今天（星期日）从布拉格寄到的未标号的，此前也收到了母亲寄来的第2号。对我的关怀真是无法再好了。——关于你的旅行。当我从窗户望出去时，但见蓝蓝的天空和满目翠绿；当我把目光收回室内，又见水果、鲜花、kefir黄油；于是我又沉于遐想：美丽的设施、植物园、绿林；我的思绪继而进一步延伸：极昂贵的戏剧欣赏（我至今还没有过体验）、参观Kersten和Ticteur的展览精品（参观太多了我们的钱就会不够了）等等，或者这些都免了，只需在一个陌生城市里共处两三天。这些都是我的建议，不过，当然、当然是有风险的。此事我还会去信详谈。无论如何，若对风险自我承担，则万万不可行！！问候佩帕、孩子们、芬尼。

〔邮戳：23.10.14柏林—施特克利茨〕

〔邮政明信片〕

Kefir：由酒精和奶酸发酵方式从牛奶中获取的食品。[4]

111.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请你策动一下给我寄钱来。我带得不多，当时母亲没有钱，无法给我预付到10月份，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在这儿待多久。可是她答应过我，从10月1日起在每个信封里夹寄一小部分钱来。如今我已多次请求过，但是一个钱也没寄来。今天是16日，这个月我一共只收到70克朗；也许是所里的钱没有寄到，还是寄钱的信丢失了？或许是想用这种方式教育

我懂得挣钱？可是本不应让我失去这么多时间呀！比如说，昨天有几位家具搬运工从我的房内把老住房的一架巨大的三角翼钢琴搬走了。要是有一所家具搬运学校，可以培养出那种搬运工来，我一定会充满激情地去求学。可是目前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学校。——黄油已经安然寄达，今天还收到了克洛普施托克代转的一个大包裹。不过，我还需要别的东西。比如我想买一盏煤油灯，又怕支出太大。我的房间里现在只有一盏对我来说光线不足的煤气灯，还有一盏太小的煤油灯。

〔邮戳：23.10.16柏林—施特克利茨〕

公司的钱：参阅第115和116号信。

家具搬运工：多拉·迪曼特也记得卡夫卡有一次“张大了嘴，惊讶地跟着两位家具搬运工走到楼梯口”（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226页、附注之559页）。

买一盏煤油灯：此事之所以具有必要性，主要因为卡夫卡与女房东为了煤气费过高之故吵了一架（参阅J.P.霍丁著《回忆卡夫卡》，见于《Der Monat》第1辑〔1949年〕第8/9号第93页）。此灯也可以用来做饭（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第176页）。[5]

112.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新居里的第一封信是属于你的，因为你也许很快就会同它建立直接联系，这一理由就足矣。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至于搬家么，我不能说自己很忙累。大约是10点半左右，我从旧居出门，乘车进城，到了大学，而后想去吃饭，打算饭后即去施特克利茨，参与一点搬家的事。但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突然有人叫我，原来是勒维博士（我们家里的米利茨人都认识他）。我在柏林还从未见到过他。他当时非常友好、热情，邀请我立即去他父母家吃午饭——他正要去父母家。在这个价值万亿美元的礼物面前，我稍事犹豫——我本来是想去施特克利茨，但最终还是去了，来到一个殷实之家的平和与温暖之中。当我按响施特克利茨花园门口的门铃时，已是6点钟，搬家已经进行完毕。哟，我忘了，快没地方了，还有一个请求：母亲的无微不至关怀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请往这里寄些钱来。我这里已经阮囊羞涩了。

如果你来，请带上你的床上用品，最好是能留在这里的。这里给你准备的床棒极了。

暖脚套有时会十分需要的。

第9号已于数日前安然寄达。

〔邮戳：23.11.17柏林—施特克利茨〕

〔邮政明信片〕

建立直接联系：参阅第106、108、109和110号信。奥特拉后于11月25日抵柏林，卡夫卡于1923年11月15日从Miquelstrasse 8号搬到Grunewaldstrasse 13号。

到了大学：11月和12月间，卡夫卡在“犹太教科学大学”参加会议和学习班。详情参阅H.宾德尔著《卡夫卡的希伯来文学习》，刊于《德意志席勒协会年鉴》第11期（1967年）第555页。

我们家里的米利茨人：系指1923年7月和8月陪同卡夫卡前往米利茨的埃莉·赫尔曼及其孩子们，以及后去米利茨接家人的卡尔·海尔曼。^[6]

113.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很遗憾，这一次我没有在28日回到布拉格。我本来有一系列伟大的计划，不像以往那样只准备些小里小气的棉纸包装物品等，而是略微大手笔的礼品，显然受到了柏林鉴赏力的影响，如同时下报章上常见到的说法：“欧洲乐此不疲。”这本来应当是仿制舍莱森游泳池的杰作，它曾经给你带来过喜悦。我本来只需把我的房间腾空，摆上一大堆收藏品，而后灌满酸奶，使它成为泳池，牛奶上再撒上黄瓜片。根据你的岁数（本应打听一下才行，因为我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变化，在我看来你永远不会老），我本应在四周建起同样多的小房间，建筑材料是巧克力板（因为佩帕通常也能分享你的生日礼物，所以我也可以借此还清欠他的巧克力账）。小房间内都将充满利佩特的最佳礼品，每一间的礼物都不一样。房顶上，倚墙斜角再挂上一轮巨大的光芒四射的太阳，是用Olmützer Quargeln饶铸成的。这本来是一件神奇的礼物，没有人能够忍得住长久观望，此外，我和小姐在配制它时还会生出多少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哟！

如今，这一切并不存在，这辉煌的一切都在一记生日爱吻中融化了，无论它有多么坚实。这一切，确实也比任何一次在布拉格为你过生日

日时都更丰富。

关于你旅行的事，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可以设想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我只需设想一下《布拉格日报》的标题即可！如果我当时不离开，现在感觉可能有所不同。然而，我真的已经离开了吗？我曾经在那些标题面前浑身颤抖；我现在几乎每天仍在颤抖，每当我在施特克利茨市政大楼广场的报摊上浏览各报的第一页时（作为当地寄居者，我只是星期天才买报纸）。这些消息通常都是千真万确的，特殊情况下却有例外，于是我就会想，但愿好事能够继续下去，坏事当然最好突然发生变化。然而怎么变呢？变于远方世界？

因为我的冬季用品由马克斯带来，所以你就可以在全家毫无干扰顺利旅行的情况下，根据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从容决定旅行的日期。

关于我所需要物品的清单，将紧附于后，请你把它交给母亲和小姐。我不想把它直接寄给父母亲，因为父亲根本一窍不通。物品清单大致是：

3件软质衬衣、2条长衬裤、3双普通袜子、1双厚袜、1条擦手毛巾、2条薄手绢、1条床单（软质的即可，就像我带来的这条）、2个被罩、1个枕套、2条睡衣。

上述是内衣、床单类。外衣类：厚风衣、一套西服（如黑色的那套，它的薄兄弟我已经带来）和任何一条我可以在家里穿的裤子。此外，或许还可以把睡袍带来。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请把那件旧的、蓝色的芮格蓝式运动大衣带来，我可以让人改成室内穿的外衣。（这件大衣已被证明卖不出去了，再说居家老穿日常大衣实在令人难堪）如果我以后敞着窗户躺在长沙发上——我极有可能不这样做——或躺在我这里也拥有的阳台上，那么就得考虑还需要暖脚套、腕套和帽子。不过，这些物品是为今后准备的。如果决定把它们寄来，那将是个了不得的大包裹。

也许还应装入白天戴的随便哪副手套，然后还有一个外衣架，二个大衣架。

就这些了。一大堆，装在哪个箱子里呢？

还有一个特殊困难的包裹内容，即拜访所长。你真的愿意代劳？也

许我还会另写信谈这件事，你或许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今天我只写一个草案（所里的钱寄来了吗？母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要告诉她一下，我去年秋冬两季因肺病发烧、胃肠痉挛而几乎一直卧床，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春天以来，肺病好转了，但整个状况糟糕得多，因为开始了常常令人难以忍受的失眠，随之白天便会处于最可怕的头昏脑涨状态，以致我失去了干任何事的能力，尤其无法走访保险所）。我认为，如果我想继续活下去，就必须采取某种极端措施。我想去巴勒斯坦。本来我并不具备此行的条件，在希伯来文和其他方面的准备也相当不够，但是我必须拥有某种希望（关于巴勒斯坦的事，可以补充几句：由于肺病和那里生活维护费用比较便宜而选择了它。费用低符合实情，可以多次强调）。然而，在我妹妹的帮助下前往米利茨，也许还有柏林作为中转站，对巴勒斯坦之行做好各种准备。我试图从柏林开始（这里的朋友值得一提，还有生活费用），目前一切还能忍受，不要过分夸奖！现在我有点担心：如果我长久住下去，各项费用会接近1000克朗，这将剥夺我在柏林的可能性（实质上所有可能性都将不存在），因为这里的物价上涨很快，有些商品的价格甚至超过布拉格，而我的有病之躯则比其他人消费更高。我的目标仍然是有朝一日完全摆脱对退休金的依赖；但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我却完全依靠它（此外，这是一个危险的篇章，因为它隐喻着我将不回去，含意隐瞒，游离于字里行间）。目前看来，似乎就是这些内容。当然还包括致谢和友好之辞。可怜的奥特拉，这些任务很繁重，但对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说，这一切也许尚能胜任（也许谈一点我这里的行动为好，这一点我正在考虑，不过你也可以说你对此一无所知）。

最后，我多么希望知道维拉、海伦娜的一些小故事（信中说维拉没有忘记我，这一点写起来当然容易，但谁能给我保证呢？），我也很想知道全家的情况，尤其是小姐的近况。不过当然不要像上次你的来信一样，是在午夜写就的。我现在也几乎已经到了午夜了。再见！

F.

〔1923年第四周柏林—施特克利茨〕

向佩帕问好！

这一次我没有在28日回到布拉格：奥特拉的31岁生日应是29日。卡夫卡在其他场合也时常弄错日期。

利佩特：布拉格城内当时的一个精美食品商店。

Olmutzer Quargeln：一种酸奶酪。

几乎每天：卡夫卡在1923年10月2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最近我看了那份几天来一直避免见到的《施特克利茨广告报》。糟糕，实在糟糕。但是，其中确有公理所在，其中与德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有如你与我。”

旅行的日期：参阅本书第106、108、109、110和112号信。

要告诉她一下：有关后文参阅第115号信。

我想去巴勒斯坦：甚至10月份即将启程，但他于7月份即已看出：“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巴勒斯坦之行，而是在精神意义上成了某位贪污巨款的出纳员的美国之行；如果与您们同行，此案的精神刑事犯罪程度将变本加厉。”此信是写给其同班同学胡戈·贝格曼之妻的。贝格曼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于1923年春来布拉格作报告。他对卡夫卡的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对这位朋友说，去耶路撒冷后可以住在他的宅内。

在我妹妹的帮助下：参阅第112号信的注解。

退休金：卡夫卡于1922年7月1日正式退休，因为他的肺病已经无望好转。

114.致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

最亲爱的奥特拉：

你看，我又回信晚了，也自愧没有亲自去找到所长。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多谢你了；你信中说一切都如此顺利，我几乎不敢相信。你没有对我隐瞒实情？实际上它比那了不起的包裹更令人难以置信。你们给我寄来的包裹，据通知书说竟有15公斤重，我几乎有点害怕呢。我不再敢向父亲致谢，对母亲的谢意也只能在你的信中表达。从需要的角度看，15公斤似乎太多了；里面究竟会是些什么呢？况且都是出自你家的财政？我在记忆中审查了你的家当，你可根本没有这么多家产哟！当然，有时父亲上午来看望你，你的房间里便会有许多家当，但其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寄出去的。这包裹给D.造成了最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擦桌布。她说，她恨不得快要叫起来了，事实上她几乎已经叫出声来了。——信中附上草稿一份，请佩帕作尽可能完美的翻译。不过，先请你过目并润色，内容应当涵盖所有须同所长谈的话题，语调应当恰如其分。关于巴勒斯坦之事，你们可只字不提。我在柏林的情况也可以不提。如果能在信中保持缄默，当然对我十分有利。此信应当直接交给所长吗？抑或交给所里？后者则要求对信文稍作修改。不过，此信若经交所长则足矣。

除了这封公开信外，我是否应该再给所长写一封个人致谢短函（使用德语即可）？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取决于你同所长谈话时得到的印象。

为什么你这个月情况这么好？显然是把玩具用高额利润卖出去了。否则维拉当然会在你身边，让你写信告诉我，她正紧张地把耳朵贴在娃娃肚子上，听里面正在说些什么——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到的。无论如何，如果那个娃娃足以使维拉获得柏林的印象，那将对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别再总是说你欠我的钱。我有几天是靠你生活的（我真想用希伯来语的说法来表达：是靠你的脂肪生活的）。我写作用的纸，是你的，我的羽毛笔，是你的，等等；如果有人想以特殊昂贵的方式作柏林之行，那他应当作为我的客人前来。祝你一切安好！但愿我的事不使你焦头烂额！另外，你不必替凯瑟博士担忧，他有钱。

F.

〔1923年12月中旬柏林—施特克利茨〕

向克罗普施托克致以问候！他能吃饱吗？他的健康状况可好？

我得抓紧机会写上几句，但我没什么妙语可写。我对维拉的柏林印象十分感兴趣。衷心问候！

多拉

盼你来信！

尊敬的经理先生！

我不揣冒昧地通知您，我希望能在柏林附近的施特克利茨再住一段时间。请允许对此作简短说明：去年的秋冬两季中，我的肺脏状况不佳，肺疾因肠胃痉挛疼痛而加剧。近半年来，这样的痉挛已几度严重发作，其病因不甚明了。在肺热和痉挛的作用下，我曾在数月内卧床不起。春季以来，上述痛苦虽有缓解，但代之以格外严重的失眠。作为肺疾的先导和伴生现象，我已失眠多年，但迄今多是阵发性的、不甚严峻的，况且均有一定的诱发原因。然而，如今的失眠并无诱因，且持续不断，安眠药亦几乎无效。数月来的状况已濒临难以忍受之程度，并对肺病起到恶化作用。夏季，我在舍妹的帮助下——无论在决断还是行动方面，我已无独立能力——前往波罗的海畔的米利茨。虽然我的状况在那里根本没有得到改善，但在那里却找到了今秋来到施特克利茨的可能

性。柏林的朋友们愿意为我提供些许帮助，而在当时柏林的困难状况下，这一帮助是我前往柏林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以我的现状无法在一个陌生城市里生活。

从希望的角度看，我在施特克利茨暂时生活的主要原因似有如下几点：

1.我期望通过完全改变环境以及与此有关的条件，对神经疾病产生有利的影响。我对肺疾的考虑则退居第二位，因为立即针对神经疾病采取措施的紧迫性大得多。

2.地点的选择——这是我的医生在布拉格提出的建议，他本人了解施特克利茨——恰恰对肺疾并无不利影响。施特克利茨是柏林近郊一个半乡村味儿、类似花园城市的地方，我住在一座拥有花园和玻璃阳台的小别墅内，在花园间步行半小时便可到达绿林，最大的植物园只有10分钟路程，附近还有其他园林，我们这条马路四周都可穿过花园。

3.对我的决定同样起到影响的最终因素是，我希望以我的退休金在德国生活比布拉格容易一些。当然，这一希望已无法满足。前两年情况或许可以如愿，但今年秋季的物价上涨达到了国际市场水平，甚至大幅超出，以至于我只能非常节俭地维持生计，况且是在朋友们的规劝之下，在尚未找到医生就治情况下才勉强维生的。

总体而言，迄今的施特克利茨逗留对我的健康状况有所裨益。因此，我很愿意在这里继续生活一个时期。当然，前提是这里的物价上涨速度不要把我提前逼走。

尊敬的经理先生，我谨请所方批准我在此逗留，并附上申请函。我的退休金仍请寄到家父家母处。后一请求的原因是，其他任一邮寄途径都将使我蒙受经济损失；而在我目前的阮囊羞涩状况下，任一损失都会带来极大痛楚。之所以强调任一其他邮寄途径都会造成损失，其缘由是无论以马克（我将损失兑换差价和成本）或克朗（我将损失更大成本）邮寄都无法避免，而家严家慈却随时有可能托熟人将钱免费带到德国来，即使两个月一次亦无妨。将退休金寄到父母处，当然不会妨碍我定期向所方提供也许十分必要的生存信息。请所方指示我当以何种方式证明我的生存。

借此再次敦请惠准这一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申请。

佩底，请你不要因为这一繁重劳动而生气，我的报酬是，Hakoah队输给了Slavia队。向你父母和姐妹问候。请奥特拉向父母作一解释，我现在每周只能写一至两封信，这里的邮资实在太贵。不过我给你们附上捷克邮票，以便我也能得到你们的一点支持。

从卡夫卡致约瑟夫·达维德的这段附言中，可以判断出此信的书写时间：信中提到的足球赛，系于11月25日举行，比赛结果刊于11月30日的《自卫》（第47至48号信），而卡夫卡只能从《自卫》这一途径得知（参阅第107和114号信以及第77号信的注解）。他得到这期报纸的最早时间是12月3日（星期一）——此报系从捷克寄到柏林卡夫卡处。另一方面，信中使用了“本月”这一概念，而其妹走访所长后写来信时12月肯定已过去大半；达维德将卡夫卡致经理的报告译完后，卡夫卡是于12月20日才从柏林寄出的。由此判断，此信的书写时间很可能是12月中旬。

个人致谢短函：卡夫卡于1924年1月8日写了这封信（在柏林逗留和退休金寄到父母处的申请，系于1923年12月31日获准。细节亦请参阅第116号信），但与1921年时这类信件（参阅第95和98号信）不同的是，此信系用捷文所写（发表于J. Loužil 所著《卡夫卡》第81页）。约瑟夫·达维德受托将卡夫卡的信文（见于第116号信）进行翻译（参阅第90和103号信）。

娃娃：卡夫卡为奥特拉的女儿维拉买了一个玩偶娃娃，在奥特拉11月底结束柏林之行回布拉格时作为礼物送给了她。

我得抓紧机会写上几句：由于信笺位置缺乏，多拉·迪曼特将致奥特拉的问候语写在卡夫卡给妹妹信中最后两段文字之间的空白处。

尊敬的经理先生：由达维德翻译的捷文信发表于J. Loužil 所著《卡夫卡》第80页。此信的德文回译件见于K. 赫尔姆斯多夫所著《保险公司职员弗兰茨·卡夫卡的书信》，刊于»Sinn und Form«第9期（1957年）第648页。

生存信息：卡夫卡在基尔林居住时期的一封此类信件见之于《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文物展》（Catalogue，耶路撒冷1969年版，第30页）中的影印件。

Hakoah队输给了Slavia队：达维德当时是布拉格Slavia足球协会的追随者，该队处于中游水平，是赛十分幸运地以4：2获胜。

邮票：达维德是集邮者。^[7]

1924年

115.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照片很美，维拉还是那副无辜和安详的神态。你说得对，我感觉得到她的目光仍然认得我。海伦娜要求生存的方式多么伟大！（德语可以完全容纳外来语的各种比喻）关于芬尼，D.在第一眼瞥见照片时就作出了正确的评论，说她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果酱真的是你制作的？这是一份偏离目标、却又正中情怀的殷勤礼物！这完全是我的肺腑之言。不过，你当然是不会制作林茨蛋糕的。此外，还有一个并非自私自利的问题：那些莱茵克洛德李子长得怎么样？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多少干过一点活。——我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悲伤得多的问题：小姐的圣诞夜过得可好？（字迹写得下意识的小，蜷缩在一起。）去年，她强迫性地请求我接受一半礼物，我当时收下了；今年可别再强迫我啦！不惭愧么？——保险所的来信很友好，一点也不复杂，这要感谢你的功劳。有两封短信需要翻译，一是：“尊敬的公司领导，竭诚感谢惠函赐教，特遵示声明，家父赫尔曼和家母尤丽叶·卡夫卡受全权委托接受我的退休金。”此外还有一封致谢短信：“尊敬的经理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尊敬的经理先生，衷心致谢，感谢您对我的申请特予友好的惠准，尤应感谢您热情接待舍妹，感谢您对我近年来或许看似特殊实则完全属实之经历的明察。

恭顺的属下

以上是两封译件，不算长，对吗？（前一封信也许是件苦差事？既然我已经向世上抛出过华丽捷文的谎言，如今我这位可怜人又有什么其他方法呢？这个谎言很可能没有人会相信；佩帕也许跟我一样可怜。）由于它们都不长，我能否尽快得到译作？作为酬劳，现附上《我最漂亮的射门得分》一文剪报。——克洛普施托克现在怎样？也许状况不佳，很糟糕？能够在这种严寒条件下为毫无保障的生计四处奔波，确是了不起的英雄。此外，他在困境中总是有着可以理解的某种奢望，如同维拉想买玩具等等——这一次是想前来柏林。我应该鼓励他吗？D.说，给他找一个住处睡两天并不困难。两天的食品也好找。可是，我是否应该鼓励他为此次旅行花费诺大盘缠吗（即使他以优惠价参加至博登巴赫之行）？不，也许我不会这样做。——你问我的营养如何，我要说仍然棒极了，丰富多彩（不过，这个月的支出大概不会重复超逾1000克朗的奇迹，尽管家里给我如此大方的支持）。此外也没有任何障碍。烹调很容易。除餐前后买不到酒精，尽管如此我吃饭时还差一点烫了嘴；饭是用蜡烛火苗加温的。

顺祝一切安好！

F.

〔1924年1月第1周柏林—施特克利茨〕

只有一个非常、非常衷心的问候。太累了！我快睡着了。

晚安

日期推算：卡夫卡至迟于1月8日得到了达维德的译本。

D.：多拉·迪曼特，此信最后一段话是她写的。

这要感谢你的功劳：所长以亲切的口吻给卡夫卡回了一封公函（参阅J.Lou'il著《卡夫卡》第81页）。

华丽捷文的谎言：参阅第90号信。

《我最漂亮的射门得分》：可能刊登于《施特克利茨广告报》附刊，此文在柏林各档案馆中无法找到。

博登巴赫：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之间边境铁路站。

116.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亲：

通往这里的邮路似乎很长，从这里起始的邮路也很长，请你们不要因此而感到迷惑。目前的治疗主要是十分舒服的敷布和吸入疗法——肺热限制了其他疗法。我反对砷注射法。昨天收到舅舅从威尼斯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它几经周折姗姗来迟。那里并不天天下雨，更多的时候恰恰相反。你们不要把我的肺热想象得太严重，现在清晨只有37度。衷心问候。

F.

〔1924年4月底—基尔林〕

〔邮政明信片〕

此信在一张邮政明信片的地址那面保存下来，当时是由多拉·迪曼特寄往布拉格的卡夫卡父母（“弗兰茨会埋怨我的，我只给他留了这么一点空白处”）。1924年4月中旬，维也纳的一家医

院确诊卡夫卡为喉头结核病之后，多拉将这位重病号于当月19日送到附近基尔林的霍夫曼医生疗养所。从此信的开头内容和多拉的附言（连同她4月15日致卡夫卡父母的一张明信片）可以推算出，第117号信肯定是初到基尔林时所书。

肺热限制了其他疗法：在多拉大约同期寄给埃莉·卡夫卡（她丈夫显然去维也纳看望过卡夫卡）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卡夫卡的健康状况，其坦率程度显然超过致卡夫卡忧心忡忡父母的信。信中写道：“咽喉并不疼痛，至少从外表看不必为此担忧。令人不安的是顽固的肺热，晚间为38.6至38.8度。中午之前几乎没有热度。重要的是，弗兰茨从昨天开始因为发烧而十分沮丧。”

基尔林：维也纳附近的一个小镇，卡夫卡最后死在这里的一家医院里。

117.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我利用了你们的“懒于动笔特别许可”。再说D.已经写了一切情况。

衷心问候！

F.

〔1924年5月5日—基尔林〕

〔邮政明信片〕

卡夫卡的这些话写在多拉致尤丽叶·卡夫卡的邮政明信片上，此信很可能是5月5日交付盖戳的。信中写道：“遗憾的只是，弗兰茨的恢复因天气而受阻。一旦完全克服寒冷之后，但愿他能从现状基础上最佳康复。尽管这里的天气糟糕得让人感到无聊，但是空气棒极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伙食也无可指摘，尤其因为他获准根据兴趣和心情自己做饭。”

118.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亲：

要写的是你们时常谈起的旅行之事。我每天都在考虑，因为此行对我十分重要。此行一定会很美，因为我们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了。我不指望能有布拉格团聚的美满，因为那会扰得阖家不宁；但我希望能在一个漂亮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团聚几天。我记不清自己何时在弗兰岑温泉单独待过几个小时。正如你们信中所说，于是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好地喝一杯啤酒”。从这句话看出，父亲对新酿的葡萄酒并不以为然。就啤酒而言，我也同意这个想法。我现在常常于炎热之中回忆起，我们以前曾经定期地一同喝过啤酒——许多年前，每当父亲带我去游泳学校时。

上述原因和许多其他因素对此行有利，但不利因素也太多了。第一，父亲可能会因护照困难而来不了。这当然会使他的旅行兴趣索然，但更重要的是对母亲的影响。无论何人陪她旅行，她都过多地关心我、教诲我，而我现在仍然外表欠佳，羞于见人。在维也纳时和在这里初时的困难，你们是知道的。这些困难导致了我的体质下降，妨碍了肺热的快速退除；而肺热又导致了我体质的进一步虚弱；喉结核带来的精神刺激，在初时对体质的影响甚至超过病情本身。

直到现在，我才在多拉和罗伯特的帮助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后果不堪设想！）从衰弱中挣扎出来，这种帮助是你们在远方难以想象的。现在仍然还有干扰，例如前几天病发的肠炎至今仍未完全治愈。这一切产生的综合效应，使我仍然没有调养过来，尽管我有那么出色的帮手，尽管这里的空气那么清新、费用那么昂贵，尽管我几乎天天接受蒸气疗法。我现在甚至都不能在花园中稍事站立，还赶不上不久前在布拉格时的状况。你们还应该考虑到，我现在只允许轻声细语，即使轻声说话也不太经常。你们一定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正在良好的开端之中——一位教授不久前诊断认为，我的咽喉有了明显好转。尽管我对这位可亲、无私的教授——他每周开车来一次，却几乎不收取任何钱……但他的话对我来说仍不失为一大安慰——如上所述，一切正在良好的开端之中；然而，最佳的开端也于事无补。如果不能向来访者——甚至像你们这样的来访者——展示巨大的、明显的、以外行的目光亦能看得出来的进步，何不放弃此行？我们不应该暂时放弃此行吗，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不必以为来访会有助于我的治疗或丰富我的生活。尽管这个疗养所的所长是一位有病的老先生，无法对我的治疗起到多大作用，尽管与一位不太可人的助理医生打交道与其说是医疗关系，不如说是友好交往；但是，这里除此之外时常有专家前来探视，尤其是罗伯特，他常常厮守在我身边，尽全力为我着想，却不去考虑他的各门考试。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对他充满信任（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如同对待前文提到的教授，他的姓名叫阿尔希·埃尔曼），他每周来三次，但不是开车前来，而是节俭地乘火车或公共汽车。

〔约1924年5月19日—基尔林〕

马克斯·勃罗德所著的卡夫卡传记中收录了此信，将其判为卡夫卡临死前一天所写（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83页）。但是，从多拉5月26日的一张明信片看得出来，卡夫卡此信系给父母的回信，而父母的信很可能是5月19日即星期一收到的（最多是一至两天后）。因此可以推断，此信的书写时间可能是14日之前，即5月19日。

布拉格团聚：卡夫卡于3月17日从柏林回到布拉格，在父母家逗留了三周。

就啤酒而言：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在从基尔林寄往布拉格卡夫卡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弗兰茨吃得很多，大进营养，甚至现在吃饭时还喝啤酒（常常也喝葡萄酒）。多拉瞒着弗兰茨在啤酒中搅入So-matose——尽管他觉察出啤酒味不太正，但还是喝下去，这一点要特别感谢多拉。因为她总是在饭菜上作出改善，比如增加几个鸡蛋等等。——如果他不把饭菜统统吃下去，她不会罢休。”（参阅第118号信）

一同喝过啤酒：卡夫卡曾向多拉详细介绍过当时的情景：“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不会游泳，有时跟着同样不会游泳的父亲去不会游泳者区学习。于是我们裸体席地用餐，每人一根香肠半升啤酒……你设想一下看，一个好大的人手中抓着一块小小的木板学游泳，我们在黑暗的小房间里脱衣服，他把我全身脱光，因为我自己害臊，然后他想用他那所谓的游泳姿势来教我，如此等等。还有那啤酒！”（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80页）

过多地关心我：克罗普施托克在致卡夫卡父母的信中，谈到了多拉想送卡夫卡去波希米亚旅行的打算：“对弗兰茨来说，母亲若来看他是一件可怕的事（每来一个客人都会使他十分激动。我认为，即使不谈医疗的效果，只要来一个客人即意味着对其生命的一次问候，尤其是在这春季时分），甚至是后果严重的大事。”但是，若回捷克斯洛伐克也会有同样糟糕的后果：“没有一个借口能瞒得住他的目光。”

甚至超过病情本身：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士罗德的信中写道：“如果有人能够承受喉结核这一事实，那么我的现状就不足为奇了。”

罗伯特：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于5月初来到基尔林，对卡夫卡进行医疗护理。

一位教授：马克斯·勃罗德曾经说过：“多拉对我叙述道，当恰斯尼教授（在卡夫卡病情晚期时）对他说，咽喉的状况看起来有所好转时，弗兰茨高兴得哭了起来，一再拥抱她，并说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生活和健康。”（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82页）

一位年轻的医生：克罗普施托克曾向卡夫卡家谈到过此人：“这位新来的医生特别重要，特别具有安抚作用，弗兰茨对他充满信任，以致他自然而然地关心弗兰茨的一切事务。”

119.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亲：

只有一点需要更正：对水（就像我们在家里喝完啤酒后用大杯子盛水端上桌子一样）和水果的欲望不小于啤酒，不过目前的身体状况只是缓慢地好转。衷心问候！

〔邮戳：24.5.26—维也纳〕

〔邮政明信片〕

此信见之于多拉·迪曼特致卡夫卡父母的一张明信片上（由于位置紧短，信文只好写在明信片

片边缘处)。多拉的信中第一段内容如下：“我想回复您在星期日寄到的美丽明信片，尽管已经有些晚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交换方式，即您的明信片与弗兰茨的书信往来。要是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就好了。明信片带来的喜悦效果不亚于特别快信。弗兰茨已经几乎能够背诵全文了。他特别自豪的是，能够同他尊敬而可亲的父亲一同喝啤酒。我想在远处观望，就是在一旁常常聆听别人对啤酒、葡萄酒、（水）和其他美好事物的随意评价，也会令我陶醉的。弗兰茨已经成为一名豪饮者，几乎每餐必喝啤酒或葡萄酒，当然量并不大。他每周喝掉一瓶托考伊甜酒或其他的精制葡萄酒。我们拥有3种葡萄酒，都是相当精美的牌子，以便他经常更换口味。”根据多拉此信的下文和克罗普施托克的一封信来判断，父母的特别快信可能于5月17日（星期六）寄达，信中谈到了埃莉全家出游的经历。“当他听说这些事时，瞪大了眼睛，像太阳一样炯炯有神，他说：‘他们也喝了啤酒’，他的口气那么激动，那么亢奋，使得我们在座者对他们所喝啤酒的意念享受，甚至超过了他们实际喝酒时的乐趣。正如我曾经写过的那样，他现在每餐必喝啤酒，那享受的神态使得旁观者也感到赏心悦目。”（克罗普施托克1924年5月17日致布拉格卡夫卡家人的信）

120.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亲爱的尤丽叶：

我已于星期四晚上到达此地，因为我在德累斯顿只逗留了几个小时。一路上天气晴朗，我却觉得这儿天气有些阴暗——物价有些昂贵，除此之外我对柏林是满意的。我在策伦多夫弗兰茨的寓所里写这封信，他在这里安顿得很好。别的事情他自己会写信告诉你们的。

最衷心的问候！

西格弗里德

〔24.11.23—柏林〕

最亲爱的父母亲：

舅舅对我的担忧已有所缓和，他去剧院，他喜欢柏林，和我们一样气恼这物价，但是对他这趟旅行的一丝怀疑却依然存在。

[1]夏洛特·冯·施泰因（1742年12月25日生于埃尔纳赫，1827年1月6日卒于魏玛）；歌德的女友。——译者注。

[2]实际为9——译者注。

[3]给佩帕的附信原文为捷克文。——译者注。

[4]此信没有落款。——译者注。

[5]此信没有落款。——译者注。

[6]此信没有落款。——译者注。

[7]附言原文为捷文。——译者注。

致父母亲（1922—1924）

张荣昌 译

1922年

1.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多谢寄来好消息。我很想知道详细情况，不过这些情况用两行字便可说清：现在躺卧情况如何，母亲你去那儿多少次，在那儿待多久，什么时候拆线，可望什么时候返回。要我等到父亲到家后再来，但是有人说要去疗养院疗养12天，今天大概满12天了吧。——我们很好，奥特拉和维拉散步去了；她（也就是奥特拉）一天说好几回她要写信，但是她却是家庭主妇，一只手拿着煮锅，另一只手拿着尿布，第三只手拿着糖果哄那些孩子，她不得不引诱、请求、喝骂他们离开我窗户下面那块儿童游戏场地，她还怎么写信呀。况且：假如我不起码给她当当秘书（我正是主任秘书嘛）代她抄抄写写，那岂不就太不像话了。所以我所写的，也正是她想说的话。

最衷心的问候。

亲爱的埃莉，据你对我所言，这封信你在布拉格也肯定收不到的了。所以我给你写到布伦斯霍普滕，写了信和明信片，请你为我到埃韦尔书店那儿做些补救性的工作。有三个可行的办法：要么在柏林去他们那儿一趟（柏林NW7多罗滕街35号），现在在归途中也许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办法值得一试，因为面谈最好，更便于做出决断，要么你书面订购并让他们把书给你寄往布拉格，或者采取最后一个办法，你让他们把书给你寄往布伦斯霍普滕，这样你就可以比采用第二个办法节省大约25%的费用。瞧，埃莉，不是说你要去订购一大批书，而是只订购几本书，不是为了要去扶埃韦尔书店一把，它的两条腿相当稳健，而是为了向它表明，我没撒谎，我不是爱闹着玩的还在念书的小男孩，诱使书店寄来了信、说明书、估价表，随后便通知他们你将亲自前往（征得了

你的充分同意抑或甚至是按照你的建议，这我就知道了），就算了事，就算把事情了结了。所以求你了，亲爱的埃莉，你照顾一下我的名声吧。怕第一张书单也许已经丢失，我给你寄去了第二张，现在我从中摘其要再次抄录如下：

特姆普尔版席勒文集——你要是觉得这太贵，那么有很好的、价格便宜一些的科塔版或更便宜、然而较蹩脚的博恩版，他们还会给你举出别的版本来的。

世界史，乌尔施泰因出版社，但是他们还会给你提出别的版本来的，家里有一本插图世界史挺美的吧，是不是？或许也来一本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布雷姆的动物世界？或者甚至来一套百科全书。

或赫茨尔日记，该日记的第一册现在已出版，一本内容很丰富的、卡尔也会感兴趣的、感人至深的书。

或几本杂色多彩的书：格林童话（全集三卷本，乔治·米勒出版社，一种珍藏本）或杜布诺夫的近代犹太人史或里夏德·代默尔书信集或席勒书信集（朗格维舍出版社一卷本）或歌德书信集（同一家出版社两卷本）或泰纳：法兰西革命或高尔基自传（迄今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出了两卷，给卡尔和费利克斯）或——或——或——我贪书成癖，不能这么无休止地把这张单子开列下去了，否则会没有个完的。

总的来说，只要你给埃韦尔书店这样写：“我无法去柏林登门拜访您们，我订购随便哪本书价约十马克的书并请给我开具我的兄长不是无赖的证明。”你若订购得更多，我的无赖行径就因此而相应地缩小。

我从你的来信中获悉，你不让盖尔蒂去上那所学校了？我已经不清楚我是从你来信中谈到的，还是我这个兄长有心灵感应，还是也许只是听卡尔说的。这真是让人感到难过，我们实在是力不从心，我们大家都是力不从心。

问候你，问候大家！

你的 弗兰茨

〔1922年7月26/27日—普拉那和卢兹尼西〕

最亲爱的母亲、父亲和埃莉！问候你们大家。埃莉，来这儿玩一两

天吧。你们的奥特拉。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埃莉到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

1923年

2.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如果我没记错，已经10天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这是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因为我经常成为通信中的主要谈论对象，如今家里的许多小事（但愿没发生大事）我都不知道，而这种小事是肯定每天发生的。这就不应该了。我的状况仍然很好。由于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事”，所以补充一个饮食通知单的新鲜事。在我的要求下，第一顿增加了精美蜂蜜的早餐甚为丰盛，当然这也需要破费，而且花钱不少。早点增色不少，女房东问我要配方，但是我说，光有配方不行，必须经过小姐的手工。由克洛普施托克代转的包裹已于昨天星期二安然抵达。多谢。

衷心问候你们和全家！

F.

〔邮戳：23.10.17柏林—施特克利茨〕

收到公司的钱了吗？我迄今只收到第1号附钱的信。

3.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我刚才收到你们18日的亲切来信和50克朗。这一回好像真的丢失了一封信了，丢失了星期六的那封信，那封你们称之为“内容详尽”的信。可惜，可惜。信里写了些什么？信里兴许也有钱吧？你给这封信标上了号，如此我就会以为信里有钱，可是从最近这封来信来看，信里似乎没有钱，因为您们在信里要我去找格罗斯太太。我重述我昨天的明信片里的话，我已经从格罗斯太太那儿得到1000克朗，加上今天的这50克朗，

现在我简直快成了大富翁了，我在认真考虑我是否要去看一场电影。可是眼下我光顾饮食，我悄悄告诉你们，譬如今天午饭我就吃鸽子肉。反正我的伙食比格罗斯太太的疗养院里的强多了，不过格罗斯太太对我还是很好的。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兰茨

〔1923年10月19日柏林—施特利茨星期五〕

4.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的这封宣布亲爱的母亲你可能来访的信今天来得正是时候。倘若不是在这个季节里、在德国的境况或者你们家里那方面有什么障碍不便作这样一次旅行的话，那么，我这方面，自今天上午以来，便不存在丝毫障碍，而我还根本不能很好想象的这次来访——迄今你只是到杜勃列肖维茨来看望过我——对我来说将会是一桩盛大而隆重的事情。迄今要说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就是住宿了。我现在的房间是豪华的，只是由于你们不喜欢谈冗长的描述我才没有给你们描述过这间房间，而且你们永远失去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我将于11月15日迁居。即便在我现在的这间房间里你本来也可以睡的，房间里有一张漂亮的沙发榻，但是睡起来会不舒适的，况且，我虽然与女房东相处得很好，但是摩擦还是一直不断。产生这些摩擦的原因是，就她那柏林式的精力和她那柏林式的理解力而言她无限优于我。这也导致了我的搬迁。我认为，在我们初次见面的头半个小时里她便已经探听出我有1000克朗退休金（当初是一大笔钱，今天一笔小得多的财产），而后她便开始提高房租和别的各种费用，没完没了地提价。如今当然一般物价的涨幅都是大的，但是我的房租是在暴涨，即便我把这居所的极其特殊的优越性考虑在内也罢。譬如这间房间，月底租给我时每月的租金是四百万，今天就要五亿，连这也不算太多，但是月月都涨，而别的费用也会这样涨，这就让人有一种不安全感，这却是令人不愉快的。所以我搬家。女房东还不知道，我可以到15号才告诉她，然后我就立刻搬走。不远，隔两条胡同，在一座带漂亮花园的小寓所里，在二楼，两个（两个！）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房间，

其中的一个，那间起居室，它和我现在的这间房间一样阳光充足，而且另一间较小的卧室则只有早晨才有阳光。其余的优点，集中供暖和电灯（我在这里只有燃烧得不是很好的煤气灯，冬天供暖可能也不很容易，因为这是转角上悬楼里的一个房间，门窗关不严实），在这方面那儿好多了。我不想再作什么别的赞词，因为当然只有在那里至少住了一年才会了解一个居所。但是主要的优点是，房租虽然并不比我现在的这间房间低，但是比较稳定，不会月月涨，也没有别的占你便宜的事。而最大的优点则恰恰正是——说了半天这才说到点子上——你，最亲爱的母亲，如果你有兴致来的话，你现在确实可以来了，你会有一个舒适的房间的（此外，我也曾附带着想到，倘若西格弗里德舅舅要来小住几日，他就可以住在那儿并——正是求之不得的——负担一部分房租费用）。

可是我重申：只是作为游览消遣性旅行这趟旅行才压根儿有意义，你和我才会感到开心；作为关怀性旅行，那么这趟旅行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受到极好的照料，而作为运送行李性旅行，它同样也是多此一举，因为马克斯11月1日来，据他给我来信所述，届时他将把那只手提箱带来（附带说过冬用品：我想，恐怕有必要也附带往箱里装几双暖和的拖鞋，我这里现有的拖鞋老是扯破。女管家知道这种拖鞋，她经常花费很大力气去补缀，我看它们是无法修补了）。

像拖鞋之类这样的小玩意儿我本来是宁可购买也不愿意写信来要的，可是不可能去买，近几个礼拜物价涨幅大得惊人，也许从总体上来说这里过日子还始终要比在布拉格便宜些，但是恐怕已经相差无几了，可是我觉得除食品以外的其余一切物品都几乎比我们那儿贵。譬如去戏院看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本想进一家戏院的，当然是要最好的戏院之一，可是最整脚的座位也要14克朗，人们坐在这样的座位上既看不见也听不见，所以倒可以不受干扰地再数一遍为买这张门票而付出的几十亿马克的钱。另一家戏院我也挺喜欢，这家戏院的票价便宜些，可是这家戏院的门票总是许多天以前就预售一空。我看是，已经不再有零售价低于1.50克朗的报纸了。这种涨风有时波及食品，最近我好得意地买了50芬尼1个的鸡蛋，今天一个鸡蛋1.60克朗。但是已经说过了，总的来说日子还可以过得去，生活水准和在布拉格一样，不会更贵些。

但是现在我东拉西扯瞎聊了好半天了，就像集市上的妇女们。赶快言归正传吧：3号小包裹今天与信同时到达并且已被怀着感激的心情收纳了日历今天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表示，它对搬入新居一事无可奉告，但

是希望能把它带走。

鸡蛋一个也没打破，而睡眠（你们也问睡眠情况，这睡眠比鸡蛋敏感得多）则可能会出问题，如果人们对它谈论得多的话。

多保重，替我问候大家。

你们的 弗兰茨

〔1923年11月初柏林—施特克利茨〕

5.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今天有客来访，我和来客作了一次长久（但愉快）的交谈，所以就晚了。——7号和8号包裹已到，妥善存放在专放特别精美物品的餐室里了，这就是说放在窗户之间了。迄今为止什么也不曾丢失过，这也为汇款单提供了一线希望。眼下不困难，我已经向一个熟人借了一点钱，不过还是现在就开始寄钱来吧（趁我没忘记，从星期五起我的地址：柏林—施特克利茨，格鲁纳森林街13号，赛弗尔特先生寓所）。因为譬如今天早晨，当我听说下个月取暖用煤的金额时，我一下子简直头发懵了（我经常动不动就这样，倒也没什么别的后果）。煤的费用和房租一样，我将设法把第二个房间租出去。再者，这种极大的涨价幅度部分是人为的，这里的汇兑率由官方压低，（譬如昨天正式汇率是约180亿马克换1克朗，黑市上则是250亿，但是在布拉格远远超出1000亿，也就是高出5倍），但是可惜物价却按实际汇率浮动，所以现在在这里用克朗过日子费用十分昂贵。又聊开了。

衷心问候！

弗

这张旧明信片写好一星期后寄出的，大概内容已经陈旧了吧？

〔1923年11月17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6.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赶快发张明信片道个歉。你们一定为9号信补付邮资了；不管我多么留神，这一回我还是忽略了这（而且是极凶猛的）邮资提价，对不起！但是也许你们明智地没接受那张明信片，那么现在我就根据记忆重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7号和8号包裹已到。——我的地址从16日起：柏林—施特克利茨，格鲁纳森林街13号，赛弗尔特先生寓所。——钱我已经借到了，所以目前没什么困难。由于官方汇率低（譬如星期六180亿换1克朗，黑市约250亿，而在布拉格则超出1000亿，而可惜物价却是按德国境外的汇率变化的），在这里兑换就很吃亏，所以生活费用就昂贵得不合理，用别的方式，譬如用信用证或用别的什么手段也许可以少吃点亏，然而那就得向当地的一位银行经理，譬如一家布拉格银行支行的经理递交一份个人介绍信。但是也许这样做也没什么价值或者只有暂时的价值，我只是模模糊糊听到过一些这样的说法而已。这种事亲爱的父亲你比我懂行多了。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3年11月18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7.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不，邮戳是（11）星期四的信受拖延不是邮局的过错，9号信没贴足邮票，为了避免让你们补付邮资，邮局把那封信退回新居了，虽然明信片上没写寄信人姓名，只在正文里把地址告诉了你们。唔，柏林不是挺有秩序的吧？——第三次通知新地址：柏林—施特克利茨，格鲁纳森林街13号，赛弗尔特先生寓所——奥特拉来吗？她将会受到热烈欢迎。可是佩帕果真会让她来吗？无论如何她会在我这儿住得很舒服的。别的事情我迁入新居后再向你们报告。——多谢女管家（还有克拉尔博士）。那张证明够用的了，不必去办理新的医生证明，这正合我意。这不费什么钱就办成了，克拉尔博士做得对呀，这完全是徒劳的，需要时得由市里去办。柏林不是挺有秩序的吧？——如果东西能寄来，那就很好，可是这事确实不急。大家都这样关心我。譬如有人竟借给我一件毛

皮背心供我天冷外出时穿。

衷心问候你们。

你们的 弗

你们最近这张明信片是用稍稍有点惶恐不安的笔迹写的。

〔1923年11月19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8.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这一回谈到你们俩的来信，得知亲爱的父亲身体健康，我特别感到高兴。可惜我没有足够的邮票，不能给你们写一封详尽的回信，也许下一回吧。从1号起就实施价值稳定的收费标准，届时就不必为邮票的事操心了，不过那时的邮资大概会昂贵得让人写信也写不起的吧。——寓所是如此漂亮，以致我担心，我将会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久就失去它。房租自然是贵的。——包裹今天寄到，明天我将让人去取。这花了许多钱吗？——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寄克朗，别寄美元。为什么？因为寄美元兑换两次只会损失钱。——10号小包裹还没到，我也是该受这个报应，月初我有大量黄油，我不用人造黄油，而用黄油烧菜。再者，昨天我买到了相当好的黄油了。——亲爱的父亲，你问，我在这里是否“为今后有什么打算”，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直到现在我还没看到有可能去挣钱的一线希望。我在这里的确像对待疗养院里的一个病人那样对待我自己。我的确也不能平平安安地住在城里，尤其是现在我已经让施特克利茨的空气娇惯坏了，每天不管什么天气都坐车进城去我这身体也会受不了的。从前我本该在城里租一寓所的，但是最后我退缩了。

〔1923年11月20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9.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包裹已完好无损地寄到，什么也不缺，什么也没遗忘，便鞋比从前

的鞋暖和多了。寄送要花掉多少钱，费掉你们多少辛劳！这事不急，不过什么都准备齐全了，这也是件好事，今年这秋日真漂亮，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遇见过这么漂亮的秋天，今年将会有有一个严酷的冬季，我已从各方面为过冬做好了准备。——11号包裹已到，10号还没到，托布格施小姐备办的包裹里据说有黄油，这很好，但是有格莱汉姆面包吗？我常写信告诉你们，到现在为止我在这里一直有一种和这一样好吃的面包，这种面包我曾在布拉格徒劳地寻找过。啊，你们似乎还一直不完全相信我的话。——格罗斯先生的钱我今天拿到了；请不要再寄支票来，只寄克朗，我将在一封信里向奥特拉作详细说明。——亲爱的母亲你不必煞费苦心竞相照料我，你将保持你的位置。毕竟，在最近几天里我又得到什么啦？一瓶极好的红葡萄酒，我开心地在瓶子上嗅来嗅去，一大瓶家酿覆盆子果汁和四个盘子。不坏吧，嗯？

衷心问候你们。

你们的 弗

〔1923年11月23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10.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收到这样一封信，看到你们度过星期天下午，安安静静，父亲精力充沛准备到波多尔去（多尔菲在干什么？），看到你洗完澡躺在沙发榻上看报（可惜光线半明半暗），这真叫人感到高兴。这些都是美好的信件。后来瓦莉带着那两个希伯来女人来了（她们什么时候用希伯来语给我写信？），佩帕当上了襄理，我衷心祝贺他！美好的消息，这样的事情引起我的兴趣。——80克朗已如数寄到，我弄得你们精神有些紧张了，这我看得出来，装钱的信封袋是封闭的，并不如你所担心的那样是开着的（这样装着自然和放在保险柜里一样安全）。——我已在信中写明，1月10日以前我什么也不需要，而且在这之后我实际上也只需要黄油（如果女管家往包裹里放一小块奥地利林茨黄油或别的什么黄油，我就会在这里对她感激不尽）。所有其他东西都不值得费邮资，连鸡蛋也不值得，这里鸡蛋价格贵得惊人，但肯定比布拉格鸡蛋加邮资便宜，尤其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鸡蛋都完好无损。麦糝儿、大米、面粉肯定不值

得寄，只有黄油值得。可是还有别的事情：洗衣很贵，尽量节俭两个月也得花费120—160克朗，而且衣服是没熨过的，洗涤剂也不是很可靠。值不值得每隔一个半月往布拉格寄一次衣服呢？对此人们自然会说“那简直是要我们钻到桌子下面去吃饭”。——你们抱怨天气不好，而这儿的天气迄今一直不坏，干燥而且不是很冷，稍许有点雾，有那么一两回我破例地整天在户外。现在下雨了，可是没关系。——我委托我的房间，令它十分友好地接待并照顾好舅舅。衷心问候大家！

弗兰茨

除了钱以外别拿任何别的事去麻烦莉瑟太太。

〔1923年12月19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11.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谢谢寄来钱，再者，莉瑟太太真是一片好意，给我带来信和钱，去她那儿一趟路程遥远，而且现在天气相当寒冷。昨天是零下十几度，现在柏林有极漂亮的冰花而且十分便宜，我渐渐开始极度赞赏起这东西来了。过些时候我坐车去莉瑟太太那儿，让她给我讲讲你们的事，眼下她只是通过电话把维拉来信的内容给我说了说。你在汇款单上提及的那封长信我还没有收到；要么有人总是想剥夺我的长信，要么是圣诞期间邮件急增，所以延误了这封信，我的最近几张明信片显然也是遭到了这样的命运。那只曾预告过的小木箱将为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所接受，但是正如已说过的，1月10日以前我什么也不缺，在这以后也只要黄油，至多还有那已经遐迩闻名的奥地利林茨大蛋糕（蛋糕上有一层多么神奇美妙的果酱？）、苹果和甜橙一加上邮资就比这儿贵，这是肯定无疑的。——保险公司的钱这一回大概不会准时寄来，因为现在适逢节日期间，我的申请不会这么快就被批准的；这一点你们务必谅解——舅舅大概已经来了吧，他大概是舍不得离开特里施的吧，这一点我可以想象得出来，我要是在一处地方待了这么许多年也会割舍不下的，所以我必须相当频繁地更换我的逗留地，不管花费多少费用，可惜，可惜这都是你们的费用。

衷心的问候！

〔1923年12月27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1924年

12.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那封长信是丢失了，总是只丢失你的长信，我不知道邮局和我有什么过不去的。昨天倒是收到了明信片，今天收到了包裹，多谢这些众多的、预告过的和寄送来的东西。令人感到不快的是，邮包1月10日前寄到了。但是邮包里的东西却又抵消了我的不快，不过我原有的黄油确实还够吃到10号的，黄油现在很好保存，它冻在窗户后面，吃时只需先扯一块下来。天气确实冷得厉害，但是盖着轻柔而暖和的高级鸭绒被我感到很温暖，有时在这里阳光下一座公园的斜坡上甚至会有一个温暖的瞬间，背靠着暖气片也是相当舒服的，如果两只脚偏偏还套在暖脚套里那就更美啦。当然在你们房间里炉边也是很美气的（不算当初你于手术前在那儿烤火）。——公司回信今天收到，非常友好地带有美好的新年祝愿。我必须寄一封授权委托书给经理，还要寄一封简短的感谢信，这两封短信我恳请佩帕翻译成捷克语，这也是今天我浪费邮资写这封信的原因。——顺带说及，现在新年刚过显示出了降低物价的微弱征兆，只盼着政治事变别又来横插一杠，他们似乎对政治事变都很有兴趣。坐市郊铁路到波茨坦广场，新年前是1克朗20芬尼，现在是80芬尼，1公升酒精，新年前6克朗40芬尼，现在是3克朗60芬尼。其余的此类现象可惜我未能观察到，但是即使这几样也已使焦虑不安的心感到欣慰了，这颗心在这之前不多一会儿还曾因看到一家小饭馆挂出的一张菜单而惶恐地跳动过，这家饭馆的维也纳龙须菜炸肉排标价是20克朗。——我在前一些时候给埃莉寄去了几个地址，她可能和犹太妇女联盟有什么联系，这个组织正展开献爱心活动向德国寄送包裹。她没有给我回信，可能她与这个联盟没有什么联系。我最近见到过一个这样的包裹，相当大相当丰富，一个确实值得尊敬的举动，但是却令人沮丧，只有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且恰恰又是像麦糝儿、面粉、大米之类在这里肯定不比在布拉格贵的东西。要是他们向你们学习组配献爱心包裹那该有多好，当然你们的配方会昂贵一些。——舅舅已经在特里施度过这么许多个冬天，他居

然还会觉得布拉格的冬天太冷，真奇怪。米兰，这地方倒是不错，不过目前我还是待在这儿吧，但是我很想知道那儿情况怎么样。现在那儿的生活费用大概也不会很便宜，因为德国人按其国内物价现在出国旅行很有利，所以他们一定会像在和平时期那样蜂拥着去南蒂罗尔和加尔达湖，当地人好久没有逢上一个旅游旺季了，他们定会趁机捞一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想法还是可以考虑的。衷心问候你们，你们在一起好好烤烤火吧（你们晚上坐在哪个房间里？）。

你们的 弗

〔1924年1月3/4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13.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不，这确实是太多了，说这没有“破费”什么，这是不对的，这是确实花了不少钱的。最近的那个邮包简直了不起，这么多好东西、甜食、果品和纸币，挑选、搭配得这么好，但是如今我也请求给我一个好好休整的时间，好让我能够安安宁宁地把这一切吃掉，而不致让新到的包裹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譬如黄油我现在就有——又是专家鉴定——够吃到月底的；如果现在再来一个有黄油的包裹，那就太多了嘛，太贵太阔绰，太使人感到羞耻了嘛，当然一切费用我将“付还”，但是你们切莫寄得太多让我消受不了。顺带说及，整个包裹中，D.（即多拉·迪曼特，她是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的伴侣）最喜欢那“善良的仙女”。——这里的涨价真糟糕（有一只盒子包着一张旧的《布拉格日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在柏林的外国人的困窘》，情况就是这样的，市郊铁路票价减价的消息甚至是讹传，只有酒精减价的消息是真的，如果在布拉格一公斤黄油22克朗的话，那么在这里就在两倍以上），但是涨价却也有其好的一面，它可以教育人，人们变得更简朴了（不是在吃的方面，这我做不到，我得到最好和最昂贵的东西，但总算学会珍惜它们了），此外也还有好的效果，只有这倔强的身体有时会与之抗衡。——你们那盛大的除夕庆典（在场人当中我没发现舅舅）和舞蹈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也庆祝除夕了，即使只是躺在床上庆祝。虽然我住在花园丛中，施特克利茨市区相当远，柏林市区更远，但是开着窗嘈杂声便一连数小时不绝于耳，毫不顾忌这严寒，天空充满焰火，方圆好大的圈子里全是音乐

声和喊叫声。——至于说到发烧，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热度快得出奇地在第二天便退掉了。从其表现方式推断，这大概不是感冒。如今，这已经过去了。寓所里的寒冷也不是如你们似乎想象的那样糟糕，我靠近集中供暖的暖气片坐着，那儿是相当舒服的。曾想出租一个房间，这只是一个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已经作罢。（顺便说及，我现在也不是没有邻居，起居室与卧室之间是房东太太的卧室，所以我无论在哪个房间里都与她为邻，当然她也总是与我为邻）。我将不出租房间，而是大概将搬走，房东太太的钱不够用，所以她也将会把自己的卧室租出去，这就是说把这整个一层租给一户人家，这样她肯定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钱。但是你们的来访却完全不会因此而成问题，我已经物色好另外一个寓所，这样我就可以熟悉柏林周围这一带的环境，这一点也不坏。这个寓所异常漂亮，但是它也有些不足之处，而由于每个寓所都有一些优越性，所以常常更换住所我也就可以逐渐品味到许多的优越性，不过我得相当快地更换，以便可以品味到每个寓所的优越性。在布拉格迁一下居那简直会麻烦死的，在这里却不费我什么事。——多谢你对女管家表示的好意，但是简简单单给点钱，这恐怕不好。我也是没辙儿，这一回我态度恶劣，对她一点也不优雅，也许以后会有机会弥补这个过错。——请代我支付改良期刊的订费，我想，订费是10克朗。我忘了我还应该感谢你寄来从《布拉格晚报》上剪下来的文章。你们也可以总是附上几张旧的《日报》，它们总是很有意思的，当地的报纸我反正不读，《柏林日报》2克朗一份，但印量不大，印量越小，售价越贵。——这封信以一个请求开头，如今它又以一个请求告结束。衷心问候并感谢你们和大家。

弗兰茨

亲爱的奥特拉：

多谢信件译文，它们几乎和果酱一样好，多能干的一对夫妇，我也多能干，我能让每一个人为我效劳。把我和这位新房客相比，这令我极其感动，首先你们为这位房客而感谢我，简直好像是我送给佩帕这身运动衣——（不要感谢，我受不了感谢），其次就好像是我在两年前花20克朗给维拉买了一本画册。原来如此！——就这里的物价而言，黄油的价格贵得惊人，这里一磅肯定不怎么好的黄油2马克70芬尼；如果人们不能吮吸真正的柏林的芳香，或者如果人们没有也许大体上能做到这一点的希望，那么人们就必须立刻离开这儿。——我还忘记告诉母亲：这

里的肥皂够便宜的，请别寄肥皂来，劳动力昂贵，所以洗衣价格也昂贵，房东太太不让在厨房里洗衣，用蜡烛头是没法烧水洗衣的，但是洗衣也许会便宜一些。我当初写信说要邮寄换洗衣服，那只是受价格惊吓后的初步反应，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现在这样的物价你们还可以维持吧，还一直紧巴巴的吗？衷心的问候。最近卡茨纳松博士偕夫人来过我这儿，她给我讲了不少有关维拉的事，奇怪的是她也一看照片就愣住了，也有那么点意思，把你当作菲妮了。顺便说及，她也得了一个圆台形蛋糕，她以为自己吃得太多了，她为自己开脱说，因为那是布拉格蛋糕，其实那是块柏林—波兰—俄罗斯风味的蛋糕。

你没听说克洛普施托克有什么消息？现在他大概在布达佩斯。

今晚方才才收到你们的共同的亲切来信，我过些日子再写回信。

再者，我想起来，在这里出卖一点黄油，哪怕只是几公斤，是否会有一些赚头，寄下一个邮包时我们不妨试一试。

〔1924年1月5—8日柏林—施特格利茨〕

14.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只匆匆涂几句，马克斯给我打来过电话，他将于下午来我这儿，届时可以把这封信带走。是呀，现在还要省什么邮资，我的钱包里鼓鼓囊囊的，我不知道，我是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呢，还是颓唐，因为严格来说我已经从你们那儿把四月份的养老金都领走了，我这是凭着并不存在的债款接受了一笔贷款，现在竟还要我收进这全部并不存在的债款，另外，我从奥特拉那儿得到100克朗，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在信里提到电话，可是与她的电话交谈是账上最微不足道的，一笔极小极小的费用）。最后我不声不响从埃莉那儿得到500克朗，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接受了这笔赠款，我是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可是我压根儿就不愿意打听，因为我在卡尔（卡夫卡妹妹埃莉的丈夫，维拉和盖尔蒂是卡尔的两个女儿）面前感到羞愧，他平白无故地被牵扯进这样一桩破费钱财的事务中，因为我咬了一口维拉的嫁妆之后，现在竟还要把触角伸向盖尔蒂的嫁妆。

现在谈点别的吧，包裹今天已收到，既漂亮又丰富。不顾钟点早晚也不顾肚子饥饱，我打开来就要吃。这一回苹果似乎没受损伤，鸡蛋就不完全是这样了，苹果压在它们上面大概分量太重了吧。

多谢快要织成的毛线背心，可是这不是太费工夫了吗？这不是要妨碍玩牌，妨碍饭后小睡，妨碍读报，妨碍和维拉玩耍以及你的种种琐碎杂务，我老是要包裹，在你繁忙的杂务之外不知又添了多少麻烦。

公司要求我每月寄一份警察证明，证明我在此地，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们，我将每月寄去。但是也许这个要求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因为如你来信所说，一月份我没寄去证明，他们照样把钱寄来了。也许二月他们也会这样做的，请写信告知我这方面的情况；他们不寄，我再寄证明。

你抱怨写信时觉得没什么好写的，我恰好想起一个主意，要我赶快三言两语告诉你吗？如果你一时不知道要写什么，那你就写——我总会对这极有兴味的：你们这一天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你上午吃了什么，父亲干了什么，上午，下午，他是否责骂过我（他若没责骂，那就说明原因，他若责骂了，那我知道原因），什么时候，哪些孩子去过你们那儿，埃莉、瓦莉、奥特拉讲了些什么，女管家干什么，你读什么，父亲读什么，等等。唔，这下你就得每天写一封长信啦。但是我现在还得去晒晒太阳并且不得不告别施特克利茨。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但是也许那500克朗根本不是给我的，也许是搞错了，这也太奇怪了嘛，为什么埃莉一句话也没说呢？

〔1924年1月底柏林—施特格利茨〕

15.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这是一封了不起的、内容丰富、充满着钱的信。你们大家对我这个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却还一点也没胖起来的人多好啊。——正好是现在我从窗户朝外面的花园和树林看了很久，为了从那儿找到一个聪明的主

意，告诉我对舅舅的慷慨相赠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好是悄悄说声多谢便把这钱放进我的口袋里去，但是可惜这样的事我干不了，这钱恐怕我是要收下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总是要张扬一番。一种尤其是对别人来说很不幸的资质，无论如何我现在很感激舅舅。再者，现在这里的情况也许会稍微好一些，我也还是没有哪个月没有特殊开支的（这大概是没有哪个人会有支出，是根本就没有的支出）。这些支出也许可以稍许缩减一些；如果你们来这儿，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日子过得多么阔绰。我会给舅舅写信的，也会给埃莉写信，今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亲切的长信。

自星期六起我就住在新居里了。搬迁的扫尾工作十分顺利，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最后虽然还有一个困难，天气不好，烂泥，下雨，刮风，各种琐碎物件还需用一辆小车运到火车站上去（这些物件我扛不动），D.不费什么力气便将它们运到车站，扛着它们上下楼梯，搬进车厢等等，然后在策伦多夫下车从车站坐小汽车行驶一刻钟将东西搬进屋里，但是首先要设法冒着这样的天气把我运送走，橡皮套鞋已经在策伦多夫——我手头有几个钱，便当机立断，要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刷地一下子没过几分钟我们便连人带行李到了新居，6马克变出来的神奇魔术。

在新的寓所里一定会很舒服的，第一天它似乎比从前那个极其安静的寓所吵闹一些，但是可能会渐渐安静下来的。某些方面要更好些，充分受到日照的大房间，比在施特克利茨更有乡村风味的周围环境，比别的房屋更好的独门独户特性，火炉取暖也颇有情调。我以为，你们会喜欢的。要是你和舅舅愿意来的话——现在年初当然还太早——你完全可以住在这里（你大概不会如奥特拉受以前那位房东太太利用那样受这位房东太太利用的，顺便说及，我们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以前那位房东太太告别的）——肯定也会给舅舅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所的。吃饭你们俩反正都可以在我们这儿吃，D.很乐意露一手她的手艺，而她的手艺确实高超。我当然不知道舅舅是否住在这儿离柏林这么远的地方，到火车站有一刻钟的路程，然后坐半小时火车到波茨坦广场。去夏洛滕堡区这些地方，据说有更方便的交通联系，我现在还不了解情况。

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布拉格黄油价格提到30—36克朗了，之所以高兴，是因为这表明两地价格已经大体相等，我们也许不久就可以停止邮寄黄油。这里人们可以（不受限量地）买到2马克1磅（也有低于此价）的普通乳酪厂黄油，2马克10、2马克20的茶黄油。它的质量也许次

于布拉格黄油，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很久不吃当地的了，但是差别大概不会很大的。鸡蛋约1克朗50。

从莱特梅里茨寄来的信没解决什么问题，人们只获悉，婶母身体不是很好，她愁绪满怀，没时间去操心像我的搬迁这样不着边际的事情。但是也许我也没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不需要有合用厨房的寓所，两三个带家具有电灯的尽可能独门独户的房间完全足够了，既不需要厨房也不需要与人合用厨房。这样三个房间那儿怎么会没有的呢？那儿有相当多的领取养老金者住在漂亮的郊外寓所里，不时会有一个如命运所安排的那样逝去，另一个就可以迁入。离莱特梅里茨三公里远的斯卡里茨村自然是太远了。婶母似乎对我的经济状况也一无所知（对于一座小城市来说这也是一件值得商议的事情），并且也不知道我根本不会给她添什么麻烦。

你们去听了哈尔特的朗诵了，是他的忠实听众之一？他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一大厅的票子预售一空，D.去过那儿，哈尔特曾从布拉格给我拍来电报，要我们之中务必有人去听一听。

羊毛背心我高兴地期待着，但是这根本不着急，我有一件裘皮背心，你尽管慢慢织吧，每天织三针。如果女管家织几针进去作为向我的问候，我也很欢迎。女管家身体好吗？

最衷心地问候大家。

你们的 弗

去找警察开生命证明之前，我先等候你们的消息，看公司的钱是否已汇到。

我的房东太太叫布塞博士太太，并非是一定要提及她的名字，但是如果提及，那就是布塞博士。

〔1924年2月2—7日柏林—策伦多夫〕

16.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新寓所似乎不错，它还可以再稍许安静点，从其他各方面来说新寓所是漂亮的，比起旧的来还有新的优点。我已经躺在窗口摇椅里晒太阳了，不久我就敢壮起胆来到阳台上去。——我收到舅舅的一封信。我关于戏剧所写的话，他虽然有点儿误解了，但是这丝毫也不重要。他在我们家里过得愉快，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最后你们也许还会觉得他是个比我更讨人喜欢的儿子哩。我突然想起，他不是已经在我们家过了生日了吗，在1月里？——警察证明我会设法弄来的，但愿我能弄得来；如果弄不来，那就又要和捷克当局联系，这正是我和别人都惧怕的事。——我的电话号码是策伦多夫2434，但是还是请你别打电话，不仅是因为我害怕，我没能力去听什么，而且也是因为这里接电话挺麻烦。我住在二楼，电话机在楼下，在厅里，相当不方便，却又令人感到很舒服，因为这几乎阻止打电话。我怎么办，如果布拉格打来电话而D.又不在家？

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

寄邮包来时请写我的名字，这样比较简单些，衷心问候。

迪

〔1924年2月12日柏林—策伦多夫〕

17.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刚才我极感意外地收到了西格弗里德舅舅寄来的明信片。在别的情况下这会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可是如今我却不太清楚，我该怎么看待它。我把它和你们从前的那些信一比较，亲爱的母亲你在那些信里表示想和舅舅一道来，或者和舅舅的那封信一比较，他在那封信里既没有说以后也没说现在要到柏林来，或者和女管家的信比较，按那封信里所述舅舅是想去维也纳——我想起这一切，我就不得不感到十分惊讶。考虑到你们的包裹信里的一段表示某些忧虑的话我便不由得要担心，这些毫无道理的忧虑已经令我很感遗憾地导致可怜的舅舅在这隆冬季节作一趟旅行到这昂贵的柏林来，甚至还要到这偏僻的、在这个季节对一个外国

人来说极其没有意思的策伦多夫来，而他本来大概是很想平平静静待在布拉格或者至多去他十分喜爱的色彩更明朗的维也纳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那我就感到极大的遗憾。我们将设法打电话——如果我们找到电话号码的话，这一搬家不知把它放到哪儿去了——劝阻他。对你们的两封亲切的来信和这美好的今天到达的包裹我改日再写信致谢。

我现在在阳台上美不胜收地晒太阳。

〔1924年2月20日柏林—策伦多夫〕

18.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谢谢寄来明信片，你们别为黄油担忧，这里货源充足。但是主要是我大概根本不会在这里久住。舅舅劝我走，D.劝我走，而我却很想留下。安静、自由、阳光充足、空气流通的寓所，令人愉快的房东太太，风光绮丽的周围环境，离柏林近在咫尺，开始到来的春天——这一切我都要抛下，仅仅是因为我由于这不平常的冬季体温有点升高，因为舅舅来这里时天气恶劣，只看见我晒了一回太阳，却好几次看见我卧床不起，就像去年在布拉格那样。我很不愿意离开这儿，通知解除租约对我来说将是一个艰难的决断。我已经答应舅舅了，他对我的一片好意当然我也不好拂却。但是如今我也许也就要去费用昂贵得惊人的疗养院了。偏偏是在现在这个时候，经历了这个有些艰难的冬天我定会得到酬报，在任何地方我的健康状况都可望得到改善，我完全可以过上一种自由一些的生活的，在这里北方我只有在春天和夏天才能过上这种日子。艰难的事情，艰难的决断。

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兰茨

谢谢费利克斯和汉内的来信！

你们是怎么收到公司的钱的？

〔1924年3月1日柏林—策伦多夫〕

19.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这简直不是背心，这是一个杰作，这么漂亮，这么暖和，你是怎样亲自一针一针编织起来的呀？D.也觉得不可思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它都比这件我迄今所穿、也已经被我认为是很好的背心好不知多少倍。也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与背心有着适当的差距——寄来的黄油。自两天以来我就又不能吃当地的黄油了，它大概是很好的，总是有那么一股生嫩熏制火腿的味道，但是我不能总是吃生嫩熏制火腿的呀。——我可能会和马克斯一道来，但是也许星期一以前我的旅行准备工作不能就绪，那我就晚几天动身。千万别让罗伯特来；我知道他愿意来，我也凭经验知道，人们在他那儿就像在保护天使的怀抱里那样定会受到很好的照料。但是这段路程既短又熟悉，他根本没有必要来嘛，劳驾，你们务必要劝阻他。你对各房间所作的安排当然是最佳方案，我感谢女管家腾出房间，不会超出两三天的时间的——星期一晚上不必让舅舅的仆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是否来，这还一直是桩没准的事。顺便问一句，这还是半年前给我扛过箱子的那同一个仆人吗？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乐于助人的人。

星期一或此后不久再见。

你们的 弗

〔1924年3月15日柏林—策伦多夫〕

20.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眼下我将不作任何夸奖，用夸奖的办法我永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将只谈事实，只谈不值得称道的事实。体重50公斤，体温将降下去，因为我每天服用三次去痛退烧药，咳嗽会好转，因为我服用一种止咳药，检查了脖子，情况似乎不严重，详细情况我当然还不知道，再者，这也是一种治病的药。最后夸奖几句，房间是好的，周围环境优雅。

我们再看看吧。

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

要是我们当中谁能和多拉说上话，让她写信把她在维也纳的地址告诉我，请她在未接到我向维也纳写给她的信之前别去佩尼茨（维也纳西南40公里的一个小镇，维也纳森林疗养院所在的奥特曼村坐落在这小镇附近）。

若没人能和多拉说上话，这也无伤大雅；这只是我的过分的谨慎罢了。

〔1924年4月7日奥特曼—维也纳 森林疗养院〕

21.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

原谅邮件一开始不按时寄达，这里有点偏僻，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正常了——除咳嗽外脖子还一直是最不好受的，不过我服用各种药物，今天服用两种新药，明天第三种，总会成功的，这自然也要花费许多钱。也许你们可以写信告诉舅舅，答应他的那10%没有给我减免掉，我自己在这里不愿提起这件事。再者，舅舅认识的那位医生昨天就度假去了。——D.在我这儿，这很好，她住在疗养院附近的一幢农舍里，只小住几天，然后她就回家去。

衷心问候大家。

弗

多多地衷心问候。还没确定我是否回家。如有可能，我将推迟行程。多谢寄来美好而亲切的信。

迪

〔1924年4月9日奥特曼—维也纳森林疗养院〕

22.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多谢来信和邮件。可惜自今天起我的地址变了。他们在这里治不了我的脖子，我得接受神经酒精注射，这只有一个专家可以做，所以我迁往：

大学附属诊所

M.哈谢克教授、博士

维也纳IX军医院街18号

糟糕的是这种注射必须反复进行多次，所以得在那儿逗留几个星期。我在那儿立刻被接纳，这要归功于建筑师莱奥波德·埃尔曼的鼎力相助，他这次也一如既往对我极其热情。要不我就得住进城里的哪家昂贵已极的疗养院并请一位专家来诊治。这样，至少就这一方面来说情况还算可以，为这里这几天而破费的钱也还值得。当然，整个儿这一行动没有D.我是没法进行的，不过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我将定期写信，邮件从维也纳来得快些了，一个优点。衷心问候。

弗

D.问候你们，她在收拾行装。

劳驾，把我的新地址告诉马克斯·勃罗德。

要是舅舅或别的什么人有可能来这儿那就好了。

〔1924年4月10日奥特曼—维也纳森林疗养院〕

23.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我在这里被安顿得很好，受到在维也纳能受到的最好的医疗看护，受到医生的治疗，譬如我若是在一家私人疗养院的话，那么我就得自己掏钱请医生诊治（我没法写信，多拉不断打搅我，问我要她带什么东西来）。现在的问题是，这事儿要延续多久，因为这里的景色尽管很美，

维也纳森林里的景色无疑更美。但是只要我不能好好吃东西，我当然就必须留下。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4年4月17日维也纳—哈谢克教授医院〕

24.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今天上午收到你们寄往佩尼茨的明信片，我顿时便从半醒半睡状态中醒了过来。如果说我理所当然地对那些老问题不能答复的话，那么我也没什么坏消息要报告的。我已经很好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如果说我理所当然地也可以不用一些小物件的话，那么这多半是因为，这里的活动比在维也纳森林疗养院里更适应我的情况，只不过就是从窗户吹拂进来的不是森林空气罢了。从星期二至星期四多拉总是在我身边，过了星期一她就来，我担心她会把医院里的整个组织工作都搅乱的。今天我将接受注射，然后我们再看情况如何。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4年4月12日维也纳—哈谢克教授医院〕

25.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昨晚探视时间快结束时，卡尔突然从走廊里漫步走来。这真是一场惊喜。然后是你们那亲切的、明智的信，信里只有威尼斯天天都下雨令我感到极不愉快。如果舅舅毫无理由、尤其是对我来说毫无必要地打乱自己的旅行日程的话，那么这就毫无意义，这会让我感到很难过的。但愿他没收到你们的电报，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对w.博士你们不必太过于气愤，一般的医术他还是懂一些的，可是他竟懒得把喉镜带来，他推荐的橡皮糖当然也不是对症的良药。昨天给我注射了一针薄荷脑，相当有效果。刚才卡尔又来了。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4年4月13日维也纳—哈谢克教授医院〕

如有可能请寄一条鸭绒被，或一条普通被子和一个褥子。在诊所里他只有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他却是有一点受娇惯。买很贵。

衷心问候。

多拉

26.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刚才收到寄来的第二批报纸，非常感谢，但是下一回稍许包装得好一些，寄到时太脏了。我身体相当不错，卡尔也可以向你们证实。已经给我注射了三针，今天没注射，这自然是件特别令人愉快的事。现在天气转暖，我的房间的优点便显得特别明显，大窗户开着，满屋的阳光。再者，也已经为更美好的天气做好了准备，届时可以把床搬到屋顶花园上去，由于这医院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所以据说可以从那儿俯瞰整个维也纳。这的确不坏。伙食也无可指摘，譬如今天中午鸡汤加蛋，母鸡炖菜，奶油蛋糕，当然还有香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是医院里所有的人，而是只有多拉为之当厨的人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最衷心的问候。

弗

我已获准在这里为弗兰茨做饭。皮大衣今天已到。病情好转多了。没有理由不安或灰心丧气。晚上我详细写（这段话是多拉的附言）。

27.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已经相当长时间没听到你们的消息了。天气已经变得很好，窗户整天敞开着。今天我第二次停止注射，这也对美化时日颇有好处。如果你们愿意采纳一个好建议，那么你们就多喝水吧，我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耽误，现在我不能弥补这个过失。一般来说我对这里的生活也还比较满意，我没有过过军事生活，现在这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小小的事后的补偿吧。早晨5点半起床，6点半做好一切准备，盥洗盆旁边倒没有挤了一大群人。（房间里有热的和冷的自来水）别的方面可能也有某些不同于军队的地方，譬如人们的睡眠。每逢我去吃饭，饭菜总是做得好极了，菜肴的品种也总是相当多。衷心问候。

你们的 弗

〔1924年4月16日维也纳—哈谢克教授医院〕

克洛斯脱诺伊堡—基尔林

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这期间，这家大疗养院已经开业。弗兰茨每星期六去疗养院。离维也纳25分钟的路程。医生去那儿进行治疗。我今天去过那儿，要了一间很美丽的朝南有阳台的房间。这是一个林区，风光旖旎。自星期六起的地址：霍夫曼博士疗养院，克洛斯脱诺伊堡——基尔林。

我不能弥补这个过失：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几周与口渴进行了悲惨的搏斗，这里显然是预示这场斗争的开始。

28.致父母亲

终于顺利搬迁了。这里看来确实很美。就是还有点冷。如果弗兰茨能得到羽绒被，那就太好了。这儿疗养院里弄不到羽绒被。普通被子不能完全代替它。也许，可能的话，也寄一个褥子来。弗兰茨想要一个硬的马鬃毛褥子。然后就一切就绪了。弗兰茨之所以写信，是因为他心里不好受，他没听到家里什么消息。况且也累了。

最衷心的问候。

多

最亲爱的父母：

回到从前的那家疗养院，我是不能了，至少现在不能，我在心头对它萦绕着极其可憎的回忆。再说那儿的医生一个专横一个软心肠，可是两个人都笃信医学、遇到困难束手无策。还有就是离维也纳距离太远（4小时），我若想再去那儿很不方便，那儿的伙食也不是很令人满意，调味很浓，缺少蔬菜，糖煮水果，——所以也就只是位置确实无比优美罢了。所以我就，我们就选择了这家可爱的小疗养院。最要紧的是，现在至少要稍稍取得一些进展。

你们的 弗

〔1924年4月21日基尔林—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多：这一段是多拉的附言，破例地放在开头了。

29.致父母亲

可惜我们还一直没收到包裹，也没收到附在其中的美好的信。会不会出什么差错了呢？我当然已经把弗兰茨的地址告诉医院了。我估计，包裹已经退回去了，可惜弗兰茨很需要褥子，而另一个包裹却已经寄出，我们期盼着它。弗兰茨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他总是有的时候发烧。天气，天气！但是我们不想诉苦。今天弗兰茨又在外边晒了晒太阳。星期六有一位维也纳医生要来，一位很出色、很著名的主治肺病的医生。他受费利克斯·韦尔奇的一位朋友的鼓励而来，大概会采取某些措施的。一旦他来了，我就写信。脖子情况没变化。吃东西或其他功能均不受妨碍，只是嗓子有点儿沙哑。

今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躺在阳台上，还相当舒服。费利克斯和多拉没有让步，那位主治肺病的大专家、维也纳主治肺病医生的权威，明天来给我诊治，我很怕他，有一回他原本要到这儿的疗养院里来诊治一个病人，但是这事告吹了，因为他要300万出诊费。

衷心的问候。

弗

〔1924年4月25日基尔林—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只是嗓子有点儿沙哑：这一段是多拉的附言。

30.致父母亲

我想，我可以经常不断地谈天气写天气。现在天气真好，以致所有力量中的这股最强大的力量终于可以产生效果了。弗兰茨几乎光着身子在外面阳台上躺了几个小时，如今刚上床。现在他大概想睡一会儿。所以我得赶快写几句，以便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给您们写信。我很想听到，您们身体可好，您们气色是否又好起来了，等等。请接受我向大家致以衷心的问候。

多

最亲爱的父母亲：

多谢你们亲切、美好、善意的来信。今天我已是几乎半裸着身子躺在阳台上的阴影里，这真舒服极了。来了一位客人克罗普施托克，他很关心我。听不到一点舅舅的音讯，他旅行快有五个星期了吧。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4年4月底、5月初基尔林—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31.致父母亲

我已经感到很内疚。由亲爱、善良的克洛普施托克写信，这越发让我感到于心不安，尽管这同时也让人感到欣慰。也没有多少事好报告的。如果您来这儿一趟，亲眼看到弗兰茨在这儿受到多么亲切和妥帖的照料，那么一切就会让人安心得多、令人信服得多。从早晨7点至晚上7—8点他躺在阳台上。阳光照耀到中午2点，然后太阳离去，它去照耀另外那些躺在另一边的人。代之以太阳的是从山脚下渐渐升腾起一股神奇而醉人的芬芳，它发出像香膏一样的气味。这股芬芳的气味渐渐浓郁，到了晚上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远处景色和周遭的响声，它们使视觉和听觉也具有呼吸器官的功能。各种官能变成呼吸器官，种种官能一起吸入痊愈之中，吸入在周围浓郁弥漫着的祈福。可惜我没有这个天赋，不会给您们把这描绘得更美，以还其本来面目。但是通过舅舅、奥特拉和马克斯，他们很有天赋，您们会通过他们而渐

渐获得正确的印象的。由于抗病斗争全有赖于此，所以人们无论如何必须相信斗争会成功，必须有这个信心。哪儿一出现隐患，警惕的眼睛便立刻发现并尽可能将其消除。有时轻微出现脖子疼痛，这完全不重要，更何况，脖子一直在治疗中，所以绝对没有理由惶恐不安。我之所以在最近几封信里很少提及此事，是因为怕您们在远方会为此而产生抑郁的想法。现在该吃饭了，我在楼上克洛普施托克这儿，弗兰茨睡在楼下。但愿我不必去叫醒他。体温和其他情况，听克洛普施托克方才对我说，他已经在信里写过了。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人！您们在信里对我表示的好意每一次都重新让我感到无比快乐。只是，我不知道，我是否配得上。我愿意尽心尽力去做。——致衷心的问候。为回报您们的深厚情意，我可以也这样伸出双臂拥抱您们吗？这多美好！再次衷心问候。

多拉

最亲爱的父母亲：

如今我的懒于写信的毛病确实已经超出一切限度了，连对你们那封给我带来极大快乐的、你们共同写给我的亲切的来信我都还没表示过谢意。但是不光在写信上是这样，我这一辈子自婴儿时代起就一如现在这样避开一切哪怕只要付出一点点辛勤和劳苦的事；干吗不呀，我有多拉和罗伯特呢。至多是吃饭比当初可能是静静吮吸稍稍多费点劲。但是即便吃饭我也没法偷懒，譬如，亲爱的父亲，这也许会中你的意的，我喝啤酒和葡萄酒。施韦夏特麦芽啤酒和亚得里亚珍珠葡萄酒，现在我不喝后一种，改喝托考伊甜酒了。当然，喝的量以及喝的方式，你不会喜欢的，我也不喜欢，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顺便问一下，你没有在这一带当过兵吗？你也亲口喝过新酿的酒了吗？我真想和你一道痛痛快快地喝几口这样的酒。因为尽管喝水饮酒的能力不是很大，在口渴程度上我却不比任何人逊色。这样我也就已经倾诉了我思饮的衷情了。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钱我们暂时不需要；我听说有一大笔赠款，我不敢明白地询问这件事。

〔1924年5月19日基尔林—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32.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有时来信说要来看望我。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件事，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将会多美好啊，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布拉格的相聚我不算在内，那是一种住宅扰乱，但是平平地和地在一起待几天，在一个风光绮丽的地方，单独在一起，我根本记不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有一回在弗兰岑温泉我们一起待过几个小时。然后在一起“好好喝一杯啤酒”，如你们在信里所写的那样，我看得出来，父亲不很瞧得起新酿的酒，就啤酒而言我也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如今在这炎热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有一度我们曾定期在一起喝啤酒，那是在多年以前，是在父亲带我去平民游泳学校学游泳的时候。

这次来访有这方面以及许多别的方面的有利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利之处。首先，父亲大概将会因办理护照有困难而不能成行。这自然就使这次来访失去一大部分意义，但是主要是不管此外谁来陪伴母亲，母亲的注意力都将过于被引到我的身上，过分盯住我，而我则还一直不是那么很好看，根本不值得一看。最初在这里维也纳郊外和在市里遇到的麻烦，你们是知道的，它们使我的健康受到些损害；由于这些麻烦，热度未能很快降下来，这使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意想不到的喉头事件在最初使身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现在我才在这种远方完全无法想象的、多拉和罗伯特的帮助下（没有他们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尽力克服这种种虚弱状态。各种障碍现在也还有，譬如近几天里出现了一种至今还未完全痊愈的肠炎。这一切造成的后果就是，尽管有人鼎力相助，尽管空气和伙食均好，尽管几乎天天有空气浴，我却还总是没怎么恢复过来，从整体上来说甚至还没恢复到前不久在布拉格时那个状况。如果你们再考虑到，现在我讲话只能低声耳语，而且连这也不能过于频繁，那么，你们也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正处在良好开端的阶段——最近一位教授诊断出喉头大有好转，如果说我恰恰对这个和蔼可亲、不谋私利的人——他每周开着自己的车出诊一次，却几乎不要求什么诊费——也满怀感激的话，那么他的话对我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如前所说，一切正处在良好开端阶段，但是良好的开端还不等于就是好转；如果人们不能向来访者——况且是你们这样的来访者——显示出大的不可否认的，用外行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进展，那么人们就应该宁可不做这样

的事。我们不应该暂时把这事搁一搁吗，我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也许可以在这里改善或加强对我的治疗——你们千万别存这样的想法。疗养院的拥有者是个年老有病的人，不太过问治疗方面的事务。和那位很令人愉快的助理医师的交往中友谊色彩多于医学成分。除了不时有专家来诊治外，主要还有罗伯特在这儿，他不离开我一步，不想自己的考试，一心只想着我。而且还有一个年轻医生，我很信任他（多亏建筑师埃尔曼我才认识他和上面提到的那位教授），他一星期出诊三次。

由于我对来访采取这样的态度……

当然不是坐小卧车，而是简朴地坐火车和公共汽车每星期出诊三次。

我从他手里拿过信来，总算写成了。只要遵照他的请求再添上几句，这几句话似乎很重要。

态度：写到这里，卡夫卡显然已没有力气把信写完，这句话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后来勉强再写时，便写成这样的结尾。

似乎很重要：最后这几句是多拉附言。

致父亲

黎奇 译

致父亲

最亲爱的父亲：

你最近曾问过我，为什么我声称在你面前我感到畏惧。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一部分正是出于我对你的畏惧，一部分则是因为要说明这种畏惧的根源牵涉到非常多的细节，在谈起它们时我只能把握一半左右。假如我试图在此书面回答你，答案将是很不完整的，因为在写下来时这种畏惧及其后果也会使我在你面前障碍重重，因为素材之大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记忆和理解力。

在你的眼里事情总是显得非常简单，至少你在我面前和不加区别地在其他许多人面前是这么说的。你大体上觉得是这样的：你一辈子艰苦工作，为你的孩子们，首先是我牺牲了一切，结果我得以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学习专业，丝毫不必为吃饭问题担忧，也就是根本无须有任何忧虑。你并不为此要求我们感恩，你是知道“孩子们的感恩心情”的，但我们至少得做出某种迎合姿态，一种同情的信号。我不是这样，反而从来就躲着你，躲进我的房间，躲在书本里，躲在疯疯癫癫的朋友们那儿，躲在偏激的思想中。我从来没有同你坦率地交谈过，我没有去教堂站到你的身边去。在弗兰岑斯巴德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你。除此之外，也从来没有家庭观念，对商店和你的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我把工厂套在你的脖子上，然后扬长而去。对奥特拉我支持她的固执，我从不为你哪怕动一下小指头（甚至从来没给过你一张戏票），却为了朋友什么都干。如果你把你对我的评价加以归纳，就会显示出，虽然你没有指责我下流或恶毒（也许我最近这次结婚意图是个例外），但分明在说我冷淡形同陌路，忘恩负义。你这样责备我，好像那是我的责任，好像我只要转一下方向盘就可以使一切都改观似的，而你对此连一点责任都没有，要有就只有一点，也就是你对我太好了。

你这类习以为常的描述只在一点上我认为是对的，那就是，我也相信，你对我们之间的隔阂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我也同样是完全没有责

任的。如果我能说服你承认这一点，那么虽然不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生活，对此我们俩都已经是太老太老了，但可能会出现一种和平；不会终止你的没完没了的指责，但会使之温和下来。

奇怪的是，你好像多少预感到了我想要说些什么。比如你在不久前对我说过：“我一直是喜欢你的，虽然表面上我对你的态度不像其他父亲习惯做的那样，但这正是因为我不像其他父亲那样会装腔作势。”父亲，整个说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我的善意，可是我认为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你不会装腔作势，这是对的，但从这个理由出发断言其他父亲装腔作势，那么这不是赤裸裸的、无须进一步讨论的自以为是，就是（依我看真是这么回事）一种隐蔽的表达，认为我们之间总有什么不正常，而你参与了这种情况的造成，但却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你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们的看法就是一致的了。

我当然不是说，我仅仅是在你的影响下才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么说就太夸大其词了（而我甚至很喜欢这种夸大其词）。非常可能，即使我是在一点都不受你影响的情况下长大的，我兴许也不会成为你所希望的那种人。那样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性格懦弱的、谨小慎微的、犹疑不决的、内心不安的人，既不是罗伯特·卡夫卡，也不是卡尔·赫尔曼，但总是同我现在这样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我们可能会相处得非常好。如果有你作为我的朋友、头头、叔叔、祖父，甚至（尽管那样我会更加犹豫呢）作为我的岳父，我都会很高兴的。但正是作为父亲，你对于我来说是太强大了，尤其因为我的哥哥们很早就死了，而妹妹们隔了很久才来到人世，我不得不一个人承受第一次冲击，对此我的力量是太弱了。

比较一下我们俩：用非常简短的话说，我是一个带有一定的卡夫卡根系上的略韦，推动我的不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活意志、经商意志、占领意志，而是略韦家族的马刺，它显得比较神秘、羞怯，促使我跑向别的方向，甚至经常停止对我的戳刺。而你却是个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说会道，自满自足，有优越感，有韧性，沉着果断，有鉴别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慷慨大度，但也带着与这些优点共生的所有缺点和弱点，有时你的情绪起落，有时你的突然暴怒使你的弱点立即暴露出来。就你的世界观而言，你也许并不是个百分之百的卡夫卡，把你同菲利浦叔叔、路德维希叔叔、亨利希叔叔相比就能看出这一点。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我在这里也并不能看得很清楚。他们全都比你更快乐，更精神饱满，更无拘无束，更逍遥自在，而不像你这么严肃

（在这一点上我受到了许多你的遗传，而把这种遗传因素管理得太好了，不过我的本质中却没有你所具有的那些平衡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你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给你带来失望之前，在家庭空气因而给你带来压抑之前（如果有外人来，你就表现得一样了），你也许曾经是比较愉快的。而现在你也许又愉快些了，因为孙儿孙女们和女婿又把你的孩子们（也许瓦莉除外）所不能给予你的那种温暖给予了你。无论如何，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又使我们互相间都对对方那么危险，以致如果人们能够事先估计到我这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和你这个成人之间将怎么相处，就会想，你会一脚把我踩到地底下去，使我一点都不能露出地面的。这种事没有发生，活的东西会怎么样是难以估计的，但也许事情更糟糕。而我不断地请求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认为你有什么过错。你就这样影响着我，就像你必然会做的那样，不过你应该停止认为这种影响毁了我是我的恶意的表现。

我曾是个腼腆的孩子；但我当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是执拗的；当然母亲也很宠我，但我不能相信，我是特别难以操纵的；我不相信，一句亲切的话，一次默默的握手，一道善意的目光不能使我顺从人们对我的一切要求。而你其实是个善良的、心肠软的人（下面的话并不能否认这一点，我将谈到的仅仅是你对孩子施加影响的现象），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韧性和毅力，去长时间地寻找，直到找到善意所在。你只会像对你自己那样对待孩子，用力量、咆哮和暴怒，而你也觉得这种方法很适用，因为你想要把我造就成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最初那些年中的你的教育方法我今天当然不可能凭直接经验加以描述，但从后面那些年经历的反思中和你对待菲莉克斯的方法中想象得出。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你那时比今天年轻，因而比今天更精力充沛、更具野性、更淳朴，更无所顾忌，而且你完全被商店业务拴住了，一天到晚几乎就不在我面前露面，因此你给我的印象反而更强烈，这种印象几乎从未平淡下来，化习惯为自然。

最初几年里我记住的只有一件事，你可能也还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不停地要水喝，不过不是出于渴，而可能一部分是为了要惹恼你，一部分是为了寻乐。在一些强烈的威胁不生效后，你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抱到阳台上去，关紧了门，让我独自一人穿着衬衣在那儿站了一阵子。我不想说这是不正确的做法，也许当时除了这样没有办法使夜间的安静得

到恢复。但我想要以说明你的教育方法及其对我的影响的特点。自那以后，我当然是听话了，但这事却给我造成了一种内心的伤害。以我的天性，我根本无法把我认为很自然的那次荒唐的要水的哭闹同极其可怕的被抱出去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当时这件事还只是个小小的开端，但这种经常笼罩在我心头的无足轻重的感觉（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当然也是一种高尚的、有益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你的影响中产生的。我需要一点儿鼓舞、一点儿亲昵、一点儿走自己路的自由，但你却拧歪了我的道路，当然是出于好意，希望我走另一条道路。可是我却没有去走那另一条路。比如，当我一本正经地敬礼并行军式地走路时，你就鼓励我，但我并不是未来的士兵；或者当我大口大口地吃饭时，或甚至还能喝一喝啤酒时，或唱起并不理解的歌时，或模仿你习惯的讲话腔调时，你总是鼓励我，但这一切都与我的未来无关。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直到现在你也只有在你自己对事情本身也产生热情时，只有当事情关系到你的自我感觉，而这感觉受到我的伤害（比如通过我的结婚意图）或者在我身上受到伤害（比如当培帕辱骂我）时，你才会鼓励我去干什么事情。这时你勉励我，把我的价值告诉我，指出我肩负的重任，把培帕批得一无是处。且不论以我现在的年龄鼓舞已经对我起不了作用，而且在不是主要牵涉到我的事情上对我进行鼓舞，于我又有什么帮助呢？

当时那样做就好了，当时我倒是很需要鼓励的，而且是无处不需要。仅仅你的体魄那时就已经压倒了我。比如我常想起我们常在一个更衣室里脱衣服的光景。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是对全世界，因为你在我的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然后我们走出更衣室，去人们面前亮相，我牵着你的手，作为一副小小的骨头架，光着脚站在木板上站都站不稳，怕水，又没有能力模仿你的游泳动作。你出于好意，但真的使我深深羞愧地不断做给我看，那时我绝望极了，而我在所有方面的坏的经验在这样的时刻出色地合成了交响乐。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是，有时你自己先脱了衣服，我得以一个人留在更衣室里，尽可能拖延到公众面前去献丑的时间，直到你最后亲自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并把我赶出更衣室。我为你似乎没有觉察我的困境而感激你，而且我也为我父亲的体格感到自

豪。直到今天，我们俩之间仍然存在着类似的差别。

与这个差别相适应的还有你精神上的统治权威。你以自己的力量单枪匹马奋斗到这么高的位置，因此你对自己的见解抱有无限的信任。这一点对童年时代的我还不像后来对正成为成人的年轻的我那样耀眼眩目。你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任何见解都是发病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之强，使得你的思想根本不必前后一贯，也照样永远是正确的。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对一件事根本就没有观点，这就导致对这件事可能产生的任何观点统统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而是什么都包括在内，到最后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未被骂到。你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现象，这是所有暴君共有的现象：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身上。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但在我面前显得常常是有理的，真是令人吃惊，在谈话中自不待言，因为我们几乎就不谈什么话，而在现实中竟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我的一切思想都处在你的压力之下，那些与你的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同样如此，而且尤其突出。所有这些似乎与你无关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等待你即将说出的判断的负担；要想忍受住这个负担，直到完整地、持续地形成这种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高层次的思想，而是童年时代任何小的举动。只要是对任何一件事感到高兴，心里只想着它，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把这事说出来，回答就会是一声嘲讽的叹息、一个摇头的表示、一个手指敲桌子的动作：“世面我见得多了”，或“你最好把你的烦恼告诉我”，或“我的脑袋可不是这么给脸的”，或“这对你有什么用”，或“这也算回事吗”？当然，你在烦忧和辛劳中生活着，自然不能要求你对小孩子的每件小事都抱以满腔热情。问题也并不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出于你那与孩子截然相反的天性，你始终如一地给孩子带来这种失望，再加上这种天性的对立通过物质的堆积不断加强，以致最后甚至在你偶然同我的看法一致时，这种对立仍然带着习惯的惯性继续发挥成功，以致孩子的失望最终已不再是寻常生活中的失望，而由于它是由你那决定一切的自身造成的，触及到了核心。勇气、决心、信心和对这对那的愉快都不能坚持到底，只要你表示反对，或只要能够估计到你可能会反对，一切便都告吹；而我做任何事情时几乎都能够估计到你可能会反对的。

无论牵涉到想法或人都是如此。只要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就我的天性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你就会毫不考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地对这个人破口大骂、诬蔑、丑化。比如像伊地语演员略韦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我已忘了是何种方式）把他同虫相比。你还经常在谈到我所喜欢的一些人时，脱口而出地用上那个关于狗和跳蚤的谚语。关于那位演员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曾经用自己的话把你对他的说法记录下来：“我的父亲这样说我的朋友（他根本就不认识他），只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当他指责我缺乏孩子的爱和感恩之情时，我完全可以据此加以反驳。”我始终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你对你的话和论断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耻辱怎么竟会毫无感觉，好像你对你的威力竟是一无所知似的。我的话当然也经常伤害你，但我总是会意识到的，它使我痛苦，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没法不说出来，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但你却是毫无顾忌地把你的话抛出去，你什么人都不怜惜，说出时不怜惜，过后也不，人们在你面前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防卫能力。

可是这就是你的全部教育方法。我相信，你有一种教育天才；你的教育对一个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是有效的；他会看得出你对他说的话中的理智所在，从而对其中别的因素不必关心，安安静静地照此行事就是了。但对于我这个孩子，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方法，尤其是判断你自己的最重要方法。你在我身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我童年时主要在吃饭时同你在一起，所以你给我上的课一大半是关于吃饭时的行为的课。凡是端上桌子的东西，都必须吃光，对伙食的好坏不可说三道四——可你自己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之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它给弄坏了。因为你不是由于特别饿就是由于特别喜爱某个菜而不管烫不烫，总是迅速地、大口大口地吃个精光，所以孩子也必须快吃，饭桌旁笼罩着阴沉沉的寂静，只有一些训诫不时打破这种寂静。“吃完再说话”，或“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或“你看，我早就吃完了”。骨头不可以咬碎，你却可以。醋不可以咽下去，你却可以。关键要把面包切好切齐，但你拿着一把滴着汤汁的刀来切却无所谓。必须当心别让残食落在地上，但你的脚底下却落得最多。坐在饭桌旁只可以一门心思地吃饭，但你却修剪指甲，削铅笔，用牙签挖耳朵。父亲，请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些本来都是完全不足称道的小事，只是由于这个对我来说具有极大权威的人自己并不遵守他给我规定的条条，这些小事才给我造成心理阴影。这么一来，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这个

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定的法律，但我又（我不知原因何在）从来不能完全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发布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最后是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它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比如说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技巧，尽管你是把这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向我提出的，这无疑是最大的耻辱。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的不是孩子的想法，而是孩子的感觉。

假如我把我当时的处境同菲利克斯的处境加以比较，情况也许就更清楚些了。你对待他的态度同对我是相似的，甚至对他用了一种特别可怕的教育方法，如果他在吃饭时在你看来弄脏了什么，你就不光像那时对我说的那样，说“你这个大蠢猪”，而还要加上一句“一个地地道道的赫尔曼”，或者“跟你父亲一模一样”。但这也许（在此顶多只能说“也许”）对菲利克斯确实没有多大伤害，因为对他来说你只不过是个特别重要的外祖父，但你对他并不具有你当时对我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再说菲利克斯的秉性是沉着的，现在已有些男子汉的气质，一个雷鸣般的吼声也许能使他吃惊，但不会长时间地抑制他的情绪，但更重要的是，他同你在一起的时间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他也受到其他影响，你对他来说不如说是个亲爱而又滑稽的人，他从你这里可以有所选择地接受。你对于我却不是滑稽的，我没有选择余地，必须照单全收。我也不可以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因为你从来就不可能对一件你不同意、或仅仅不是由你的意思产生的事情平静地发表议论，你的发号施令的性格不允许你这么做。近年来你把这归咎于心情紧张，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什么时候不是这样的，顶多你是把心情紧张看成了一种更严厉地施行统治的手段了，因为统治的思想窒息了所有由其他想法产生的反驳论点。这话当然不是谴责，而只是确定一个事实。比如对奥特拉，你习惯这么说：“根本没办法跟她讲话，一开口她就冲着你暴跳如雷。”但事实上她根本不会暴跳，你把事与人搞混了；是事情冲着你暴跳如雷，而你听都不听人家说什么，马上就对此事做了决定；要是事后再向你解释，只会更激怒你，从来说服不了你。这时只能听到你嗓音沙哑地这么说：“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我随你的便；你算是长大了，我是不需要再对你说什么了。”而这些话是带着一种充满愤怒的、可怕的弦外之音说出来的，而且还是百分之百的先入之见。我今天对这种弦外之音之所以不像童年时代那样害怕得

浑身发抖，是因为童年时那种绝对的负疚感已部分地被我们俩同样可怜的认识所取代。

由于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疏了。不错，本来我也成不了伟大的演说家，但是正常的流畅的人类语言能力我总还是掌握得了的吧？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在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而我得到的却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讲话。由于你是我的真正教育者，这一点在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你认为我从来不服你，那真是个奇怪的误会。跟你所想的和指责我的不同的是，“总是一切相反”真的不是我在你面前所持的生活准则。恰恰相反：假如我对你不那么听话，你也许会对我满意得多。应该说，你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贯彻，我从未想过要逃出你的掌心；以现在的我而言（当然要撇开生活的基础及其对我的影响不谈），我是你的教育和我的服从的产物。但尽管如此，这么一个产物却使你深感不快，你甚至无意识地否认这是你的教育成果，原因是你的手和我这块料互相之间形同陌路。你说：“不许顶嘴！”是想压服我这儿令你不快的反对力量，但你这句话的力量对我来说却太强大了，我太听话了，于是我完全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而只有在我离你很远，在你的力量至少不再能直接达到的地方，我才敢动弹一下。可是你站在面前，于是一切在你看来都是“相反”的，而其实那些只不过是你的强大和我的孱弱的理所当然的结果罢了。

你在教育中运用的效果特别好的，至少在我身上从未失效过的语言手段是：斥骂、威胁、讥讽、冷笑，还有（这是奇怪的）自责。

我记不起你曾经直接用骂人的字眼骂过我。这也没有必要，你拥有那么多其他手段，再说在家里的谈话中，尤其在店里，你的骂人的字眼在我身边层出不穷，落在其他人头上，我这个小男孩有时几乎被它们震得麻木了，没有理由不把它们同我自己联系起来，因为你骂的那些人肯定不比我坏，而且你对他们的不满肯定并不超过对我的不满。这里你那谜一般的无辜和不可侵犯又显示了出来，你骂人时从来不会疑虑、踌躇，而你却谴责别人骂人的行为，并加以禁止。

你用威胁来加强斥骂的威力，这就对我也直接运用了。使我感到恐

惧的比如有“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尽管我知道，此后并不真会出现那么可怕的事（童年时我当然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它几乎与我对你巨大力量的想象相符，我认为你也确有能这么做。可怕的还有，你吼叫着围着桌子跑，做出要抓住谁的样子，很明显你并不想抓住他，但最后总是像那么回事地碰到他，而母亲则最终做出救他的样子。在孩子的眼里，生命由于你的慈悲才又一次得以存在，并作为无功受赏的你给的礼物而继续下去。这方面也包括因不听话而引起的威胁。假如我开始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你就用失败来威胁我，由于对你的见解的敬畏是如此之甚，以致失败（即使也许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生）成了无法遏止的事。我失去了做自己的事的自信。我动摇不定，疑惑不已。我年龄越大，你能够拿出证明我的无价值的材料也就越多；渐渐地，你在有些方面还真是说对了。我又要留神不能断言仅仅由于你我才变成这样的了；你只是强化已经存在的因素，但你强化得很厉害，因为你在我眼里是非常强大的，并为此而动用了一切力量。

你在教育中特别喜欢讥讽，它也最能表达你在我面前的优势。你的训诫常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你就不能这样和这样干吗？这样你是不是认为已经做得太多了？你当然是没有时间来做事^①。”等等。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总伴随着恶意的笑和恶意的表情。人们在还不知道做了件错事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到了惩罚。令人气愤的还有那些作为第三者对待的指责，也就是说连直接受到恶意训话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比如你表面上对母亲讲话，但实际上是冲着坐在一旁的我来的，如：“这事当然不能要求儿子先生去做了。”等等。（这种话的后果是，有母亲在旁，我就不敢直接向你问话，后来习惯成自然，我连直接问你的念头都不会产生了。对于孩子来说，向坐在你旁边的母亲问你的情况，危险要小得多，比如问母亲：“父亲好吗？”这样就防止了任何答复可能会带来的震惊。）当然，有时人家会非常赞同最刻薄的讥讽的，也就是说，如果牵涉到的是别人，比如埃莉，我有好多年一直生她的气。当几乎每次吃饭时都这么说时，对于我来说堪称是恶毒和幸灾乐祸的节庆：“那个胖姑娘喜欢坐在离桌子十米远的地方。”然后你生气地坐在你的椅子上，毫无喜悦或带感情色彩地、像个死敌般地夸张地模仿她那不合你胃口的坐相。这种动作或类似的动作你经常重复，事实上你这么能达到的目的非常之少。我认为原因是，对一件事耗费怒火和生气与事情本身是格格不入的，人家不会感觉到，这种怒火是由于坐得离桌子太远这样的小事造成的，而是它早在这之前已经存在，程度也那么深，只不过偶然地把这件事当成了导火线，由于人家确信，无论如何总会出现一个导火线的，人

家便对事情的进展不十分在意，再说人家在不断的威胁之下脑子也变迟钝了；至于不会挨打，这一点人家渐渐放心了。人家变成了一个闷闷不乐的、精神涣散的、不听话的孩子，老是想逃跑，多半是一种内心的逃避。你是这样地受着折磨，我们是这样地受着折磨。当你咬牙切齿地、带着咕噜咕噜的喉音笑着，第一次向孩子描述地狱景象时，你习惯于痛苦地说（最近收到一封来自康士坦丁堡的来信时你也是这么说的）：“那里是一个社会！”你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你的公开诉苦（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同你对你的孩子们的态度是很不相称的。我承认，我童年时（当然是稍大一些时）丝毫无法感受和理解，你怎么竟会需要别人的同情。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巨人，我们的同情或甚至帮助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你本来必然是蔑视这种同情或帮助的，就像蔑视我们一样，所以我不相信你的诉苦，总想找出潜在其后的某种秘密意图。后来我才懂得，孩子们确实给你带来了许多痛苦。但当时，这些诉苦如果换个地方就会得到一种纯真的、坦率的、毫无顾虑的、随时准备加以伸援助的反应，但它们在我的心目中却只是再清楚不过的教育和压抑手段，它们本身并未强烈地显示出这种功能，但它们具有一种有害的副作用：孩子习惯于对恰恰应该认真对待的事情不能非常认真地对待。

所幸还有例外的时候，这多半是，当你默然地忍受着痛苦，用爱和善良的力量来战胜一切对立现象，并立即产生了感人的力量之时。这种时候是罕见的，但确实是美妙的。比如当我以前在炎夏正午时分饭后在店里看到你疲倦地打瞌睡时，你那胳膊肘支着台子的样子；或者当你星期天风风火火地赶到避暑地来看我们；或者当母亲一次重病时你紧抓住书橱，全身在抽泣中发抖；或者当我最近那次得病时，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奥特拉的房间来看我，站在门槛上，只探进脖子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因怕打扰我而只用手势向我问候。在这种时刻，人们就会扑倒在床上，幸福得哭起来，而且现在写到这里也禁不住又哭了起来。

你也有一种特别美的、但很罕见的微笑方式，这是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许的微笑，它能使它的接受者深感幸福。我不记得童年时这种微笑是否曾赐予过我，但很可能有过这种事，因为你为什么要拒不给我的这种微笑呢，我那时在你眼里是无辜的，并且是你的莫大的希望所在。再说从长远看这种亲切的印象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我的负罪意识扩大了，世界在我眼中变得更不可理解了。

我宁可要那些真实的、持久的东西。为了在你面前显示我还是有点能力的，还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我很快就开始对我在你身上发现的一些小小的可笑之处进行观察、搜集和夸张。比如你很容易被那些多半只是好像地位很高的人弄得眼花缭乱，并总是津津乐道着他们的事情，如某个皇室顾问或类似的人物（另一方面，你，我的父亲，你竟认为你的价值需要这样一些毫无价值的证明，并以它们来炫耀自己，这类事情也是使我难过的）。或者我观察你对那些不正经的讲话方式的偏爱，你最喜欢大声地说出它们来，并为此开怀大笑，就像你说的是什么特别出色的言论似的，但实际上那只是些庸俗的、小小的不正经的话（当然这同时又是你的生命力之令我自惭形秽的表达）。这类观察当然多的是，我为此感到愉快，这些观察给了我窃窃私语和寻求乐趣的机会，有时你发现了这一点，对此十分恼怒，认为这是恶毒、不尊重，但请相信我，这对于我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维持的不中用的手段。这是些玩笑，就像是人们对天神和国王们所散播的那种玩笑，这种玩笑是含着最深的敬意的，这种敬意不仅使开玩笑的人深受约束，而且可以说这些人已成了这种敬意的一部分。

而且你同我对你的做法一样，也在寻找一种反击手段。你经常指出，我的日子是怎么好得太过分了，我受到的待遇是怎么好。这是对的，但我不相信这一点在我过去的处境中给过我什么真正的帮助。

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同跟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不好的联系。母亲无意中扮演了狩猎中轰赶者的角色。一旦你的教育在某种未必真实的情况下使我产生了抗拒心理、反感甚至仇恨（这些因素本可迫使我自立的），母亲便以温柔体贴、谆谆劝诫（在童年的思想杂乱中她是理智的象征）以及说情，把那些因素消弭于无形之中，于是我被赶回了你的圈子，而本来我也许可能会突破这个圈子的，这无论于你于我都有好处。或者就是这样：谅解无法达成，而母亲只是在你面前悄悄地保护着我，私下给我些东西，允许我做什么事，于是我在你面前又变成了怕见天日的东西，成了骗子、知罪者，由于自身的毫无价值，这个人连到他认为是他的权利的地方去，也要偷偷摸摸。当然我渐渐习惯于在这些偷偷摸摸行进的途中，也顺便寻找些即使在我看来也是我无权得到的东西。而这么做又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

确实，你几乎从未真正地打过我。但是那种吼叫，你涨红的脸，那

种迅速解下裤子背带，放在椅背上备用的动作在我眼里几乎比打更可怕。就好像是要把人吊起来似的。如果他真的被吊上绞架，他接着就死去了，从而一了百了。可是如果他不得不亲身经历上绞架的一切准备活动，直到套圈在面前晃动时才得知他被宽恕了，那么他将一辈子摆脱不了这个阴影。而且，那么多次我听到你明明白白地表明我应该挨打，但总是在最后关头由于你的仁慈而逃脱了这种命运，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自然越积越深。无论我从哪个方向走来，都进入欠你的罪疚之中。

你自来这样指责我（有时面对我一人，有时当着其他人的面，你对后一种场面的侮辱性压力毫无感觉，你的孩子们的事从来是公开的事情），说我由于你的劳作而得以在充满安宁、温暖、应有尽有的环境中生活。我还记得你的一些话，它们显然在我大脑中刻下了沟纹，如：“我七岁时就不得不拽着小车走村串户了”；“我们大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有山芋吃我们就高兴死了”；“多少年我因为冬装单薄，腿上的伤口裸露在外面”；“我还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到皮谢克的商店里去做事了”；“家里没有给我任何东西，就连当兵时也不例外，可我还得寄钱回家”；“但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父亲对我来说总是父亲。今天有谁知道这一点！孩子们知道什么！谁都没受过这份罪！今天有哪个孩子懂得这些吗？”换一种环境，这些叙述满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教育手段，他们可以鼓舞孩子们，增强孩子们的信心和力量，去顶住父亲曾艰苦地经历过的同样的磨难和饥寒。但这根本不是你的本意，你努力的结果已使环境完全变了样，像你做过的那样，通过同样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才干的机会已不复存在。只有通过暴力和剧变才会产生这样的机会，人们必须闯出家门才行（前提是：人们有这么干的决断力和力量，而且母亲也不用其他手段横加阻挠）。但这一切绝非你之所愿，你把这种行为称为忘恩负义、偏激、不听话、背叛、发疯。你一方面用事例、叙述往事和揶揄来诱人，另一方面却严厉地绝对禁止别人这么做，否则，比如说你（撇开一些次要情况不谈）对奥特拉的苏劳冒险应是极其欣赏的。她想到农村去，你就是从那里来的；她想要经受劳动和贫困的考验，这些都是你经历过的；她不想享受你的劳动成果，你就是脱离了你父亲而孤身奋斗的。这是些那么可怕的意图吗？距离你这个榜样和你的教导就那么远吗？好吧，奥特拉的意图最终是失败了，也许变得有点好笑，搞得太兴师动众，她为她的父亲考虑得也不多。但这难道完全是她的过错吗？这不也是环境的过错，尤其是你对她这般疏远的过错吗？她在商店里时（就像你后来说出来想让自己相信的那样）对你不像后来在苏劳时那么疏远吗？而且你难道没有力量（当然你必须首先说服你自己去这么做）

通过鼓励、出谋划策和监督，也许甚至仅仅通过容忍，使这次冒险产生某种非常好的结果吗？

谈完这些经历之后，你总是习惯用酸涩的玩笑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但这种玩笑从一定程度上看并非玩笑。你当时必须靠艰苦奋斗得来的东西，我们轻而易举地从你手中拿来，但那种为外在生活进行的斗争你是很早就进行了，这种斗争当然也免不了要把我们卷进去，只是要比你晚，也就是说在进入成人年龄后才以孩子的力量去斗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么一来我们的处境与你相比就是绝对不利的，可以说它们是相等的（当然这里并未将基础条件加以对比）；我们的不利之处仅仅在于：我们无法以我们的磨难吹嘘自夸，也不能像你利用你的磨难所做的那样以此压得别人低声下气。我并不否认，我是有可能从你那伟大的、成就非凡的劳动果实中得到享受，加以利用，并为讨取你的欢心，利用它们继续开拓的，但我们对这种做法却是异化了的。我能够享受你的给予，但只能是怀着自惭、疲乏、孱弱、负罪感来享受。所以为此一切我只能以乞丐的方式表示感谢，却不能以行动来感谢。

整个这种教育的最直接外露结果是：我躲避着能使身在远方的我联想到你的一切。首先是那商店。尤其在童年时代，那时它只是一个街头小店，它使我很愉快的是，它是那么活跃，晚上有灯光照明，人们看到、听到的甚多，不时可以帮个手，显示自己，但最重要的是欣赏你那些伟大的商人才干，你怎样售货，怎样接待人，开玩笑，不知疲劳，遇疑难情况马上就知道该如何决断，等等；还有比如你怎样包装或打开一个箱子，这是一场值得一看的戏剧，而且一切从整体而言无疑并不是最差劲的儿童学校。可是由于你渐渐在各个方面都给我带来恐惧，而且在我眼里商店和你重叠起来，于是商店在我心目中不再是舒服的了，那里一些最初在我眼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开始使我痛苦，令我羞愧，尤其是你对商店职工的态度。我不知详情，也许这种态度在大多数商店中都是一样的（比如在保险总公司中，对待职工的态度就十分相似，我辞职时对那里的经理说的也许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也不完全是编造，我说我无法忍受那里的骂人，尽管这种待遇从未冲着我来；我在这方面有一种痛苦的敏感，这是在家里就已形成了的），但其他商店如何，童年时的我是毫不关心的。可我在店里看到的却是你在吼叫、怒骂、暴跳如雷，我当时认为全世界都不会有类似的情景。而且不仅是骂人，还有其他粗暴手段。比如看到你如何把你平时不希望与其他商品搞混的正品猛一下从柜台上掠到地上——只有你愤怒时的丧失理智可以稍稍为你开脱——

然后命令店员拣起来。再如你对一个身患肺病的店员常说这样的话：“他死了算了，这只病狗。”你把职工称为“受雇的敌人”，他们确实是这种人，但还在他们成为这种人之前，你在我心中似乎已成了他们的“雇主敌人”了。在那里我也受到了伟大的开导：你也会做出不公正的行为；我在自己身上并未马上发现这种现象，于是我身上积聚起越来越多的犯罪感，这种感觉使我觉得你是对的；但根据我那后来有所改变、却又改变不大的孩子观念，那里是一些陌生人在为我们劳动，因此而不得不始终生活在对你的恐惧之中。当然我这些话是夸大了的，这是因为我对你对那些人心灵的影响同对我的影响一样可怕。如果他们真像我所想的那样，那么他们也许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但由于他们是有着多半很出色的神经的成年人，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咒骂从身上抖掉，以致最终〔咒骂〕给你带来的伤害比给他们带来的要多得多。但我对这个商店却无法忍受，它太逼真地使我联想起与你的关系了：完全撇开企业主的利益，撇开你的统治欲不谈，仅仅作为商人，你已比所有在你手下学艺的人高明得多，以致他们的任何成绩都不能使你满意，同样，你也必然永远对我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被划入职工一边，此外，由于我至少出于害怕而不能理解，人们怎么能这样骂一个陌生人，因此，出于害怕，我仅仅从自身安全考虑，也要在我觉得已是怨怒深积的职工和你与我们的家庭之间居间调停，以求得相互谅解。为此目的，取通常的、正直的对待职工的态度已经不够了，甚至更谦逊的态度也不够，而是我应该低声下气，不仅是抢先问好，而且要尽可能阻止对方回报我的问好。即使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下面舔他们的脚，也不足以弥补你这个主人在上面对他们的大砍大劈。我在这里与人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影响超越了商店的范围而伸向未来（与此有点相似的，但并不像我这样的危险、深入的现象，比如表现为奥特拉对与穷人交往的偏爱，她那使你如此恼火的同女佣们和其他人促膝而谈的行为）。说穿了，我几乎畏惧这个商店，当然，还在我上中学之前，它早就不是我的事业了，上中学后，我离它就更远了。而且它在我看来也是我的能力所无法应付的，因为就像你所说的，它把像你这样的人搞得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于是你试图（现在想起这事觉得它既令人感动又令人羞愧）从我对商店、对你的事业的那种使你深感痛苦的反感中提炼出一点儿甜味来，你的做法是扬言我没有做生意的意识，而是头脑里怀着更崇高的思想等等。母亲当然对你强加于我的这种解释感到高兴，即使是我，由于我有虚荣心，且处境不佳，所以也愿让这种说法来影响我。但如果使我离开商店（我现在，但也仅仅是现在，真正地、确实地恨着它）的仅仅是，或主要是“更高的思

想”，它就会以别的办法表达出来，而不是让我平静而又害怕地游过中学和法学学习阶段，直到最终在公务员的办公桌旁登岸。

如果我要逃离你，我就必然也要逃离家庭，甚至包括母亲在内。人们虽然永远可以在她那里得到保护，但必然是在与你有关的前提下。她太爱你，太忠实于你了，以致在孩子的斗争中她未能成为一股独立的、持久的精神力量。这可以说是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直觉，因为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你结合得更紧密；一方面，她在有关她自己的事情上始终美妙地、温柔地、在本质上不伤害你的前提下维护着她自身最低限度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她一年比一年更彻底地（与其说出于理智不如说出于感情）对你关于孩子们的论断和裁决盲目地加以接受，尤其在奥特拉这一无疑是重大的事件上。当然，人们永远记得，母亲在家庭中的位置是多么痛苦，多么吃力。她为商店、为家务辛苦操劳，家里每个人每病一场她都比病人多受一倍的罪，但这些与她在我们和你之间的中间位置上所受的折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你对她一直是爱的、关心的，但你也像我们一样，给她的体贴少之又少。我们毫无顾忌地对她轰击，你在那边这么干，我们在我们这边这么干。这是一种方向偏转，人们心中并不怀恶意，想着的只是你同我们、我们同你的斗争，但却在母亲头上大吼狂叫。像你那样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折磨她（当然你是毫无过错的），并不是为教育孩子而做出的积极贡献。这种做法甚至为我们本来无法在她面前自圆其说的行为作了辩护。她为了你在这里和为了我们在那里受了多少折磨啊，这还没有把那些被你言之有理地称为对我们的娇惯的情况计算在内，当然，这种“娇惯”有时只是对你的体系的一种默默的、无意识的“反示威”。自然，如果母亲没有从对我们大家的爱和这种爱所带来的幸福感中汲取忍受这一切的力量，她就无法承受这一切。

妹妹们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同路人。在与你的关系中最幸运的是瓦莉。她与母亲的关系最亲近，因此也没费多大劲就建立起与你之间的亲近关系。你见到她也就联想到母亲，所以也比较亲切地对待她，尽管她身上卡夫卡血系的因素很少。可是也许正是这样才见容于你；在没有卡夫卡素质的人身上，即使是你也无从要求有这种素质；在那儿，你也不会有在对我们其他人的那种卡夫卡血统淡化的感觉，那种必须强力挽救、不使素质失落的感觉。再说你对在女人们身上体现出的卡夫卡素质从来就不是特别喜欢的。要不是我们其他这些人有所干扰，瓦莉同你的关系也许甚至会更亲切些。

埃莉几乎是完全成功地从你的圈子中突围出来的唯一例子。在她小时候，我最想不到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她。她那时是个迟钝的、疲劳的、胆怯的、乏味的、知罪的、过于谦卑的、恶毒的、懒惰的、贪吃的、小气的孩子，我简直不想看到她，根本不愿同她搭讪，她太使我联想到我自己了，她与我处在同样教育的魔力之下，情况太相似了。尤其是她的吝啬使我厌恶，因为我的吝啬也许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吝啬是大不幸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把握，以致我实际拥有的仅仅是已攒在手中或含在口中或至少快要达到这种地步的东西，而处于相似处境中的她恰恰总是最喜欢把我快要拿到的那些东西拿走。但这一切都改观了：她年轻时（这是最重要的）便离开了家，结了婚，有了孩子，她变得快乐、无忧虑、勇敢、慷慨、不自私、充满信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你竟然没有发现这一变化，没有给予它应有的评价，你对埃莉的恼怒自来存在，不加更改，它使你眼花，看不见这一变化；不过这种恼怒现在已不再那么现实，因为埃莉不再与我们住在一起。此外，你对菲莉克斯的爱和对卡尔的喜欢使这种恼怒隐退了下去，只有盖尔蒂有时还要遭到它的袭击。

关于奥特拉我几乎不敢写；我知道，写奥特拉，就等于拿写这封信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开玩笑。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她没有陷入困境中或危险中，你对她只有仇恨；你自己对我承认过，照你看，她说是故意给你制造痛苦和烦恼，一旦你为了她的缘故而痛苦，她就感到满足和高兴。这就是说她是一个魔鬼了。这是多么深刻的隔阂啊，你与她之间的隔阂必定是比你与我之间的更甚，否则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误解。她离你这般遥远，远得你几乎看不到她，于是在她的位置上你以为见到的是取而代之的一个幽灵。这种非常复杂的情况我也不能完全洞察，但那里无疑是个像略韦那样的形象，用最好的卡夫卡家族的武器装备着。在我们之间没有存在过真正的斗争；过去的斗争，都很快就被解决了；残存的只有逃亡、痛苦、悲哀、内心斗争。但你们俩永远处在斗争状态中，永远精力充沛，永远力量无穷。这是一幕既雄壮、又无望的场景。首先你们俩一定是挨得很近，因为直到今天奥特拉在我们四兄妹中仍然是你与母亲的婚姻和连接你和母亲的力量的最纯的体现。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们失去了父女间和睦之乐，我只是几乎相信，你们关系的发展同我这里的情况是相似的。你这边是你的本性的专横，她那边是略韦血统的固执、敏感、正义感、不安，而这一切则是由对卡夫卡血统力量的意识支撑着的。当然我也影响过她，但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有意的行为，而是通过我的存在这一简单的事实。而且她是作为最后一员出生，进入已经形成的

权力关系中来的，可以根据那些众多的、现存的材料来构造她自己的判断。我甚至可以设想，她的内心本质曾有一度摇摆不定，不知她是投入你的怀抱好，还是投入你的对手们的阵营中好，显然你错过了某种机会：你把她推了回去；而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本来是满可以成为出色的、和睦的一对的。这样我虽然会失去一个同盟者，但看到你们俩这样，我的损失便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你也会由于至少在一个孩子身上得到了完全彻底的满足而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变化。在今天看来这一切只是梦想，奥特拉和父亲之间没有关系，她必须单独寻找她的道路，就像我一样；但由于她的信心、自信、健康、无所顾虑这些素质都比我强，所以她在你的心目中也比我更坏、更离经叛道。我是明白这一点的；你对她的看法不会是别的什么样的。甚至她自己也有能力用你的目光来看她自己，共同感受你的感觉，并对此（不是绝望，绝望是属于我的）十分悲伤。你似乎怀着反感看到我们经常在一起，我们窃窃私语，开怀大笑，你还不能听到提起你。你感到我们是胆大妄为的阴谋集团，奇怪的阴谋家。你当然从来就是我们的谈话和思考的主题之一，但我们坐在一起，真的并不是想要想出什么对付你的办法来，而是为了以全副精力，以幽默，以严肃，以爱、抗拒、愤怒、反感、服从、负罪感，以脑袋和心脏的一切力量来详细研讨那在我们和你之间晃悠的可怕的诉讼，谈一切细节、一切方面，利用所有机会，无论相距远近都来共同透彻地谈论这个问题。在这场诉讼中你总是声称自己是法官，但实际上，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在此不把话说绝，以防出现我当然也可能造成的失误），你同我们一样，是既弱小而又诚惶诚恐的一个当事人。

从你的教育方法所产生的影响的整体上看，它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那就是伊尔玛。一方面她是个外来人，到你的店里来时已经是成年人，同你之间主要是主仆关系，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已有抗拒力量的年龄才部分地受到你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她也是你的一个亲戚，她对你的尊重是对她父亲的兄弟的尊重，所以你对她的威力远远超过一般上司的威力。尽管如此，尽管她那包容在弱小躯体中的禀赋是那么能干、聪明、勤劳、谦逊、可信赖、不自私、忠实，尽管她将你作为叔父来爱戴，作为上司来钦佩，尽管她在以前和以后的其他工作岗位上都工作得很好，但她在你眼中却不是一个很好的职工。她在你面前（当然也是在我们的影响下）的地位相当于孩子的位置，而你的天性的塑造力在她的面前是如此之大，以致在她身上（当然只是在你面前，但愿这些未给孩子带来更深的折磨）逐渐产生了健忘、疏忽大意、辛酸的幽默，甚至产生了一点抗拒心理，假如她有抗拒的能力的话。我在此还没有把这些

因素算进去，她体弱多病，而且并不很幸福，并有沉重的家务压在她身上。你同她那种举一反三的关系被你归纳成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我们心中已成经典语言，它几乎是亵渎神明的，但恰恰能很好地证明你所持的待人方法是无罪的：“这个伪善的信徒给我留下了一大堆臭狗屎。”

我还可以描述你的影响所及的其他圈子和反抗你的影响的斗争，但写这些我就没把握了，有的地方也许还得虚构。再说，你从来都是离商店和家庭越远，你就越和气，越迁就、客气、体贴人、关心人（我说的也包括表面上），这就像一个君主，一旦出了他的国家的边界，就没有理由仍然摆出暴君的架子来，于是，甚至可以和善地同最低贱的人打交道了。确实，你在弗兰岑巴德拍的集体照中总是那么伟岸而又愉快地站在一些闷闷不乐的小人物中间，犹如一个巡访的国王。你的孩子们本来显然也可以从中获益的，只是他们必须在童年时就有能力（而这是不可能的）认识到这一点。比如我就不应该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居于你的影响的最里面、最严格、最牢固联结的圈子之中，可惜我就是这么做了。

这么一来，我并非仅仅失去了家庭观念，就像你指出的那样；相反，我对家庭还是有观念的，但这种观念主要的成分是不利于（当然是永无止境的）解脱你的内心愿望的。与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在你的影响下也许受害更深。你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你认为我对其他人出于爱和忠诚什么都干，而对你和家庭出于冷漠和背叛则什么都不愿干。我愿不厌其烦地再重申一遍：换一种环境，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怕交际的、胆小的人，但在那种环境中，比我到达现在的境地所走过来的路，还得多走一段长长的、黑暗的道路。（至此，在这封信中我避而不谈的相对来说还不多，但现在和将来我将不得不对一些事避而不谈，那些事要我对你和对我自己承认，是我所难于启齿的。我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使你不要以为，在什么地方出现整体图像模糊不清的现象，必是我缺少证据的表现，恰恰相反，是因为一些证据能使图像鲜明刺眼得令人难以忍受。要找到一个中间途径确非易事。）这里只需回忆一下以前的事就可以了：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换来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负罪意识。（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时，有一次我在描述一个人时说得很正确：“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我不能突然间摇身一变，当我同其他人相遇在一起时，我在他们面前会陷入更深的负罪意识之中，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必须弥补在商店里你把我牵连进去的，对他们犯下的罪过。此外，你对任何我所交往的人总有令人不快的言论当着人面或背地里说出来，而这也是我必须向当事人求得原谅的。你在店里和家里教

我对大多数人不能信任（你能举得出一个在童年时对我有重大意义的、而没有至少一次被你说得体无完肤的人来吗？），奇怪的是这并未给你带来多少心灵负担（你确有足够的承受力，再说这种行为事实上也许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标志），这种不信任在我这小人物的目光中从未得到证实，因为我到处看见的都是遥不可及的出色的人；到头来，这种不信任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对其他所有人的永无止境的害怕。在这方面我无法把自己从你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你在这方面之所以会误会，原因也许是，你对我的人际交往其实一无所知，却不信任地、妒忌地（我难道否认过你是爱我的吗？）估计，我离开家庭生活圈子，必然会在别处寻找补偿，因为要我在外面像现在这样生活是不可能的。此外，恰恰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这方面而言，我对我的判断有所怀疑，从而得到了一定的自我安慰；我对自己说：“你一定是太夸大了，在你的感觉中，你过分地把小事看成了大的特例，这是青年时期的普遍现象。”可是以后随着我对世界观察的视野的扩大，我几乎失去了这种安慰。

我在你身上找不到多少获得拯救的希望，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这里本来是应该有获救的希望，但本来可能性更大的是：我们俩在犹太教中相逢，甚至我们意志一致地从那里出发。但我从你那儿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犹太教啊！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它先后采取了三种姿态。

孩提时代，我同你一样，为我到教堂中去得不多、不持斋戒等原因而责备自己。我认为我这些行为不是对我自己，而是对你不公正，而无所不在的负罪意识一阵阵穿透我的身心。

后来，作为青年人，我不明白，你自己对犹太教持可有可无的态度，却为什么会指责我不努力去追求（像你所说的，仅从虔诚出发也该如此）一种与你相类似的可有可无。据我所见，那真是一种可有可无态度，一种开玩笑，甚至连开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中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是近于那些认真信教的人，不如说更近于那些满不在乎的人，你耐心地走形式地做完祷告，有时你竟然能抽闲向我指出祷告书上正读到了什么地方，使我深感惊讶。此外，只要我在教堂里（这是主要的），我想转悠到哪里就可转悠到哪里。在那漫长的好多个小时中我不停地打哈欠和打瞌睡（我想，后来我只有在上跳舞课时才感到这么枯燥过），并不断尽可能在那里的一些小小的变化中寻找欢乐，比如人们打开约柜，这总使我想起游艺射击棚，在那里若有人击中黑心，一扇小门

就会打开；所不同的是，那些出来的总是些有趣的东西，这里出现的却永远是一些无头的木偶。此外，我在那里心中总是怀着许多畏惧，不仅是因为那里有许多人，我将与他们有更接近的接触，而且也是因为你有一次曾顺口说道，人们也有可能会把我叫上去朗读托拉的。为此我战栗了好几年。除此之外，我的枯燥烦闷未受到什么值得一提的干扰，顶多是巴尔朱茨弗经，但它只要求可笑的熟记，也就是说只要达到一种可笑的考试标准即可；再就是与你有关的一些小小的、不太重要的插曲，比如你被叫上去朗读托拉，而你出色地经受住了这个在我的感觉中完全是社会活动性质的事件；或者是你被留在教堂中参加悼灵典礼，而我被打发走，于是在我心中，显然是由于被打发走和无任何深深的关心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种几乎不曾为我意识到的感觉：这件事办得不太地道。

——这是在教堂里的情况。在家里，敬教的行为更其稀少，仅局限于那第一个塞德尔晚上，这个晚上一年较之一年更成了一幕充满痉挛的笑的喜剧，当然这一幕是在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影响下产生的（你为什么会顺从于这种影响？因为是你造就了这种影响）。这些就是提供给我的信仰素材；在这之外顶多还能加上你那伸出的手，让我读《百万富翁富克斯的儿子们》，他们在崇高的〔宗教〕节日里与父亲一起进入教堂。至于如果不是尽快把这些〔信仰〕材料抛弃，就要用这些材料做些好事，我可就不知该如何下手了。

再往后一些，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我懂得了你为什么认为我在这方面也背叛了你。你从那小小的、犹太聚居区的村镇中来，确实曾带来了一些犹太教的东西，但本来就并不多，在城市和军队里又失落了一些。尽管如此，青春时的印象和回忆还勉强可以凑成一种犹太生活，尤其因为你不需要这类帮助，你生于一个非常强大的家族，宗教上的疑虑如果不是同社会上的疑虑混杂得难分难解，那么你，你的人格就几乎不可能被动摇。事实上，引导你一生的信仰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人的社会阶级的观念是绝对正确的，由于这些观念是你的本性的组成部分，于是你便产生了对你自己的信念。这里面确还有足够的犹太教，但要把它继续传给孩子就太少了，当你传下来时，它已经几乎滴完了最后的一滴。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可留传的青年时的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生畏的本质。同时，可不可能使一个出于满心害怕而观察得非常仔细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相应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搞的那些全不相干的事情有着崇高的意义。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对以往的年头的小小的回忆。尽管你想把它们传给我，但由于它们连对你都失去了自身价值，于是你只有靠说服或威胁来这么做：一方面，这么做是不

会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你根本认识不到你在这方面的虚弱的处境，你自然会由于我看上去顽固不化而大动肝火。

这一切并非单独的现象，从崇尚虔诚的农村拥入城市的过渡的一代犹太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只不过它在丝毫不乏尖锐性的我们的关系上又加上了一重痛苦的尖锐性。在这一点上，你虽然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的无辜，但应该通过你的本质和时代环境来解释这种无辜，而不是用外在因素来解释，比如说你其他工作和操心的事太多，以致你无法抽身来干这件事云云。你惯于用这种方式，把你无可置疑的无辜转化为对其他人的不公正的谴责。你最近读了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回忆录。我确实是故意给你读的，但不是像你开玩笑地说的那样，是为了关于素食的一小段，而是为了让你读读那里描述的作者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和这本本来就是写给他的儿子的回忆录中所表达的作者和他的儿子之间的关系。我在此不想具体举例了。

我从你在最近几年中的行为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个后到的证明。在这些年中，你感觉到我比以往更多地从事于犹太人事业了。由于你从一开始就对我的一切活动、尤其是对我产生兴趣的方式甚为反感，在这里你的反感自然也一样存在着。但尽管如此，人们却可以抱着一线希望，等待你对此作为例外看待。这里活动着的正是与你的犹太教同根的犹太教，因此也有可能成为连接我们之间关系的纽带。我不否认，如果你对一些事情表现出兴趣，就会使这些事情在我心中变得可疑。我根本就没打算说我在这方面要比你好。但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检验谁好谁差。经过我的中介作用，犹太教在你眼中成了讨厌的，犹太文献成了不可卒读的，它们“使你厌恶”。——这也许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在我童年时向我展示的犹太教是唯一正确的，此外再没有别的犹太教形式。但你坚持这一点，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那种“厌恶”（且不论它首先针对的不是犹太教，而是针对我来的）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的犹太教和我所受的犹太教教育是虚弱的，你绝不愿意旧话重提，并对所有回顾报之以毫不掩饰的仇恨。此外，你从消极方面出发对我的犹太教的高度的估计是非常夸张的。首先，我的犹太教中充满了你的诅咒；其次，人际的根本关系对于它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就我的情况而言，这种关系能使犹太教的发展走上绝路。

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

这有点让人联想起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我在此获得了一些安全，得以松口气。你一开始就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却例外地受到我的欢迎。你对我的书的欢迎方式已为我们所熟悉，它虽然伤害了我的虚荣心、我的抱负：“放在床头柜上！”（每当有书送来时，你多半正在打扑克）但实际上我感到舒服，这种舒服感并非仅仅产生于突然生出的恶作剧的想法，并非仅仅产生于关于我们之间关系的观点得到新的证实，而引起的我心中的快乐，这种舒服感其实也完全是自发的，因为你这句常说的活响在我耳中犹如“现在你自由了”！当然这是一种误解，我没有获得，或最乐观地说还没有获得自由。我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怀里不能发泄的。这是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种告别虽然是由你逼出来的，但却是朝着由我选定的方向发展着。但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说到底，这事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中，若在别处我便会根本就看不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在我童年时作为预感，后来作为希望，再后来作为绝望笼罩着我的生活，而且——这是做得到的，当然又是以你的形象出现的——是它指使我做出了一些小决定。

比如职业选择。当然，你以你那宽宏大度的、甚至可以说是宽容忍让的方式，在这方面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自然你在这方面是遵照对你具有制约力的犹太人中产阶级通常的教子方式行事的，或至少是根据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念行事的。最终，在此起作用的还有你对我个人的一个误解。也就是说，你自来就是从做父亲的自豪，从对我本身存在的无知，从联系回溯到我的孱弱这些方面出发，认为我是特别勤奋的。童年时，你认为我在不断地学习，后来又不断地写作。这种看法与事实何止相距千万里。如果说我学得很少，并一无所成，那么夸张的程度倒要轻得多；如果说多年来我以中等的记忆力、不算太差的理解力毕竟把一些东西留在了脑子里，这也并不奇怪，但无论如何，与在一种特别无忧无虑、平静泰和的生活里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相比，尤其是与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相比，在知识上、尤其是在知识的打基础问题上的全部收获那真是少得可怜。这些收获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自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对精神存在的维护问题怀着极深的忧虑，以致其他一切于我全是无所谓的。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生往往很古怪，我在这儿常常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以我这么个奇想迭出、但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怀着冷冰冰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不可摧毁的、像孩子般不知所措的、近乎可笑的、像动物般感到满足的淡泊冷漠心态，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当然它也是防止我因恐惧和负罪意识而产生

精神崩溃的唯一保护工具。我心里只有对我自己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却是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对我的健康状况的担忧：这种担忧很容易出现，不时产生对消化、落发、脊骨弯曲等的小小的担心，这种担心害怕上升而形成无数层次，直到以一次真正的疾病而告终。由于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每时每刻都需要证实我的存在，我没有任何本来就属于我的、属性无可置疑的、归我一个人独有的、唯我可以调动的所有物。由于我实际上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所以我当然对最接近的物体、即自己的身体也感到无把握了；我越长越高，但不知该怎么对待我增加着的高度，负担太沉重了，背脊因而弯曲；我几乎动弹不得，更何谈做体操，于是我永远是孱弱的；我把我仍可支配的一切都视为奇迹，比如我那良好的消化；仅这种心态就足以使我失去它〔良好的消化〕，于是通往所有忧郁的道路全部毫无阻挡地展现在我面前，直到在想要结婚的超人的紧张压力下（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说到）血从肺里涌出，逊伯伦宫中的寓所对此也是有相当一部分责任的——我之所以需要这个寓所，是因为我需要它用于我的写作，所以它〔写作〕也应该在这封信中得到描述。也就是说，不像你一直认为的那样，这一切都是由工作过度造成的。有几年我在健康状况很好的情况下在长沙发上荒度的时间比你在一生中荒废的更多，我这么说是把所有患病的养病时间计算在内了。每当我极其匆忙地离开你时，多半是为了到我的房间里去躺下睡一觉。我的整个工作成绩无论在办公室里（在那里，偷懒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且由于我的畏惧心理，偷懒也是有限度的），还是在家里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能全面地了解一下，必会感到震惊。也许我的素质根本就不是懒惰的，但是我无事可干。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抛弃了，被宣判了，被打倒在地；为逃往别的地方我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这不是工作，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除个别小的例外之处，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我还有能力去利用这种自由吗？我还能相信我有获得一种名副其实的职业的能力吗？我的自我评价之取决于你的看法，远甚于其他因素，如一次外在的成功。一次成功只是对一个瞬间的强化，没有其他作用，但另一方面，你的重量却越来越重地压下来。我曾以为我是永远通不过小学一年级的学习的，但却成功了，我甚至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想我必然通不过升中学的考试，但又成功了；我想这回我在中学一年级非被淘汰不可，不，我没有被淘汰，我仍然是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向前走。但由此产生的并不是信心，相反，我始终坚信（从你那拒绝的表情中我更得到了证明），我成功得

越多，结局就越惨。我脑子里经常出现教师大会的场面（中学只是个最完整的例子，但对付我的形势在哪里都差不多），如果我通过了一年级，他们就在二年级集会，如果我通过了二年级，他们就在三年级集会，以此类推。他们开会的目的是审查这一奇怪的、骇人听闻的案例，探讨我这个最无能、至少最无知的人怎么竟会溜进了这个年级，由于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身上，这个年级当然会马上把我排除掉，从而使所有摆脱了这场噩梦的正义者弹冠相庆。——带着这种设想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不轻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会对上课感兴趣呢？谁又有能力在我心中激发出关心课堂的火花来呢？课堂使我感兴趣的情况（不仅仅是课堂，而是在这个关键性的年龄中我周围的一切）就像小小的正常银行业务使一个侵吞公款的银行职员感兴趣的情况，他还在职，由于担心被发现而发抖，还必须一如既往地处理银行业务。除头等大事之外，其他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遥远。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中学毕业考试，我真的是在一些地方耍了些手腕，才通过了它；然后这种情形停止了，我自由了。我本无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在我面前，一切与头等大事相比都是无足轻重的了，就像中学里所有的教学素材在我心中的分量一样，主要的事情是：找一个在不太伤害我的虚荣心的情况下最能允许我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存在的职业，那么法学是最顺理成章的。出于虚荣心和荒谬的希望而进行的一些小小的相反的尝试，比如两周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语学习，它们只是加强了那种基本看法。于是我学起了法学。这意味着，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内，我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精神上靠吃食木粉度日，这种木粉在我之前已为千万张嘴巴咀嚼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吃得津津有味，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职业，因为这一切完全与我的处境相符。不管怎么说，我在此显示了令人吃惊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时，我已对学习和职业有了相当清楚的预感。在这方面我并不期待什么救星，对此我早就放弃了获救的希望。

但在我的婚姻的意义和可能性上，我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先见之明；这场我一生中至今最大的灾祸几乎是完全出乎意料地突然降临在我的头上。孩提时的我是慢慢发育成长着的，外表上这些事情在我心中是完全被撇在一边的；当时根本看不出，这方面正酝酿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事关重大的、甚至是最艰难困苦的考试。事实上结婚的图谋变成了最了不起的、最有希望的自救尝试，尝试是惊心动魄的，其失败当然也是惊心动魄的。

由于在这个地方我一切都失败了，所以我担心我也不能够把这些结婚意图解释清楚。然而我这封信的成败是取决于这方面的解释之成败的。因为，一方面在这些尝试中集中着我所能支配的所有正面力量；另一方面所有反面的力量也怒气冲冲地会聚在这里，也就是我描绘成你的教育的副产品的那些因素，如虚弱、缺乏自信、负罪意识，这些因素在我和结婚之间划出了一条警戒线。我之所以很难作出解释，是因为我在那么多日夜中反复深思、掂量一切，以致我现在看到的景象使我也觉得杂乱无序，无所适从了。只有你那照我看来对事情的全盘曲解使我的解释任务轻松了些？稍微纠正一下一种彻底的错误似乎并不算太难。

首先你把各次结婚的失败归纳在我其他方面的失败的系列之中；我对你这种看法本来并无异议，但前提是：你必须接受我迄今为止关于失败的解释。它确实属于这个系列，但这件事的意义你却低估了，你低估得如此之甚，以致当我们相互谈论时，其实说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我敢说，你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其对你的意义像结婚尝试对我的意义这么大。我并不是说，你没有经历过这样意义重大的事情，恰恰相反，你的生活比我的要丰富得多，操心得多，紧迫得多，但正因为如此，你身边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好比是有个人要走五级较低的台阶，而另一人只需走一级，但这一级至少对他来说同前面的五级加起来一样高；第一个人不仅将走上这五级，而且还将走上其他的几百级、几千级，他将度过的是伟大而紧张的一生，但他走过的台阶中没有一级像第二个人的那一级，高高的、竭尽全力也不可能走上去的那一级台阶有着那么大的意义，他走不上这一级，自然就谈不上继续行进了。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将要到来的孩子，并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至于那么多人成功地完成了此事，并不足以引为反证。因为第一，事实上并没有许多人成功；其次，这些不太多的人并不是“做”出来的，而只不过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这虽然还不是那种最高境界，但终究是非常伟大的，非常可敬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是很难黑白分明地加以区分的）。而且归根结蒂需要达到的也不是那种最高境界，而只需达到一种离之尚远的、但却是正当的接近状态；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上去，但应该爬到地球上一块纯净的地点，只需那里不时有太阳照耀，使人得到一些温暖即可。

我对此有何准备呢？准备之差到了极点。从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中

已可看到这点。但只要是在对某一具体问题上直接准备或对普遍的基本条件有直接创造的情况下，你表面上并未作很多干涉。其实也只能如此，因为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普通血统的等级的风俗、民族风俗和时代风俗。你在这些场合当然也插手了，但不多，因为这种干涉的前提只能是很强的相互信任，而我们俩之间很久以来就缺乏在关键时刻的这种信任了。我们不很愉快，因为我们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深深吸引我的事情一定是无法使你动心的，反之亦然；在你那里是无咎可指的事，在我这儿就是罪疚，反之亦然；在你那儿毫无后果的事情，对我来说也许就是我的棺材盖。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同你和母亲散步，走在今天的州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上时，我开始愚蠢地、大言不惭地、自视高明地、骄傲地、冷静地（这是不真实的）、冷漠地（这是真实的）、结结巴巴地——我同你说话时多半是这样的——谈起有趣的事来，责备你不让我知道，直到同学们发现并估计我处在很大的危险边缘时，才由他们对我说（在此我以我的方式恬不知耻地撒了谎，意在表现得勇敢，因为由于我的胆小怕事，我对所谓“很大的危险”并无准确的了解），最后我却暗示说，所幸我现在已知道了一切，不再需要别人为我献策了，一切都很好了。重要的是，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是开始谈论这件事了，因为我认为至少谈谈此事很有意思，再就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还有个因素，即想以某种方式为某件事向你报复。你的应付办法十分简捷，这是与你的素质相符合的，你仅仅大体上这么说，如果我想不担风险地进行这类事情，你也许可以为我出个主意。也许我正是诱你作出这样的答复，它同我这个喂饱了肉和其他好东西、但肉体上无所作为的、永远与自己搏斗着的孩子的性欲是一拍即合的。可是这个答复却仍然严重地损伤了我的羞耻心，或者我认为我的羞耻心一定是遭到了伤害，以致我（尽管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再也无法同你谈这个问题了，以致我高傲而放肆地中断了这次谈话。

评价你当时的这个回答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它具有某种不言而喻的性质，某种原始性质，另一方面，就这教诲本身而言，从现代的角度看也是无可置疑的。我不记得当时我多大了，但肯定不会比16岁大多少。对这么一个青年人来说，这毕竟是个很奇怪的答复，而我们俩之间的差距也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是我第一次从你那里获得的、直接的、牵涉到广泛的生活内容的教诲。其根本性质当时已经沉入我的心底，但很久以后才浮现在我的意识中，那就是：你为我出主意的那种事情在你看来，

而且也在我当时看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至于你打算防止我在肉体上把这种污秽带回家去，这是次要的，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的家。主要的是，你置身于你的建议之外，你是个丈夫，一个纯洁的男人，所处位置高出这类事情。这一点当时通过下面这个因素而更尖锐化了：我也觉得婚姻是可羞可耻的，所以我不可能把我就婚姻听到的一般情况延伸到我的父母身上。这么一来，你就更纯洁，更高高在上。要说你在结婚前也给自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么算下来，你身上就分明没有一星半点儿污秽了。但你却用几句直截了当的话把我推到这种污秽中去，仿佛我命该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由我和你组成的（这是个我几乎相信的假想），那么世界的纯洁就到你为止，而由于你出的主意，〔世界的〕污秽从我开始。你这样看待我，这是无法解释的，只有旧的罪孽和你的极深的藐视才可能是原因所在。而这事又一次给了我的内心最深处以打击，而且是沉重的。

这里也许最清楚地显示了我们俩的无辜。A给B一个坦率的、与他的人生观相符的、不太美的、却是今天在城市里很有普遍意义的、也许能防止健康受损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B在道德上没有多大鼓舞力量，但他难道就不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从这种损伤中摆脱出来吗？再说，他并不是非听从这个建议不可的，何况仅仅在这个建议中也看不到促使B的整个未来世界行将崩溃的因素。但事情偏偏还是这样发生了，原因仅仅在于：你是这个A，我是这个B。

这种双方的无辜我之所以能看得一目了然，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后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之间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冲突，作为事实，它是可怕的，但就其本身而言，却是无害得多，因为，还有什么东西能给我这个36岁的人带来什么伤害呢？我指的是在我告诉你最后那次结婚意图后，我有几天心情紧张，在其中的一天，你对我发表了一通小小的言论。你大体上是这么对我说的：“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那么你当然就下决心要娶她了。而且想尽可能地快，一星期后，明天，今天。我不懂你是怎么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要是你害怕，我可以陪你去。”你讲得更详细，更清楚，但我记不起细节了，也许当时我的眼前也有点模糊了。是母亲使我更感兴趣些，她虽然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还是从桌上拿起什么东西，并以此为借口走出了房间。

你几乎从来没有比这次用言语对我的侮辱更深的了，也从来没有比这次更清楚地表示出你的蔑视。当你二十年前对我说类似的话时，从你的眼睛里甚至还看得出对一个早熟的城市青年的一点敬意，依你看来他可以被毫无周折地引导上生活之路。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只能使轻蔑的程度显得更甚，但当时开始踏上征途的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在那里动不了了，在你眼里，他今天没有增加丝毫经验，而只是减少了二十年年华。我为一个姑娘所做的决定在你看来毫无价值。你始终（无意识地）压制着我的决断力，现在却（无意识地）自以为知道它有多少价值了。你对我在其他方面所作的自救尝试一无所知，所以你对引导我进行这次结婚尝试的思路也就一点都不知道，于是你必须猜我的思路，从你对我的整体看法出发，猜测的结果便是最可恶的、最生硬的、最可笑的了。你毫不迟疑地以这种方式把它说出来。你这么做给我带来的耻辱，在你眼里是不能与我通过结婚会给你造成的耻辱来比拟的。

你可以以我那些结婚尝试为依据来回答我，而且你已经这么做了。在我两次解除了与F.的婚约，两次重新订约之后，在我把你和母亲白白地拽到柏林去参加订婚仪式和其他一些事情之后，你当然不能够十分尊重我的决定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却是怎么产生的呢？

两次结婚尝试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建立一个家庭，获得独立。这个思想是为你所同情的，但它在实际上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就像那个儿童游戏，一个人抓着另一个人的手，甚至使劲压着，同时却喊着：“喂，走啊，走啊，你为什么不走呢？”当然，在我们的情况中，事情复杂化了，那句“走啊！”你从来是发自内心的，但同样是从来如此的：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仅仅是由你的天性抓着、制约着我，或说得更准确些，把我压在下面。

两位姑娘虽说都是偶然的选择，但都是选得非常好的。你竟会相信，我这个胆小的、踌躇的、多疑的人是心血来潮地决定要结婚的，比如由于被一件女上装迷住而心血来潮；这又一次证明了你对我彻头彻尾的误解。两次婚姻本来都会是理智的婚姻的，可以这么告诉你，我曾经日日夜夜地竭尽我的思维力量来考虑计划，第一次长达数年，第二次长达数月。

两位姑娘中谁也不曾使我失望，而是我使她们俩失望。我对她们的看法一如既往，今天仍同当初想要同她们结婚时一样。

也不能说，我进行第二次结婚尝试时忽视了第一次尝试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变得掉以轻心了。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正是以前的经验在第二次尝试中（它比第一次更有希望）给了我希望。细节我在此就不加详述了。

为什么我没有结婚呢？这里当然像所有地方一样，有种种障碍，但生活就是由越过这些障碍组成的。最重要的，可惜超脱了具体事例之外的障碍却是：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并不是担忧，虽然与我的忧郁和迂腐相应地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的无所不在的压力。

我想进一步作番解释：在我的结婚尝试中，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对的因素激烈地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碰撞，比其他任何场合都更激烈。结婚当然是对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独立的担保，那样我就会有家庭，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所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暴政将永远成为历史。这可真不啻为美妙的童话世界，但其中却有大可怀疑之处。所获太多了，要获得这么多是不可能的。这就有如有人被囚禁了，他不仅怀着逃跑的意图（这也许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还要同时把这座监狱改建成一座避暑行宫。但如果他逃跑了，他就无法改建；如果他改建，他就无法逃跑。如果我想要在我所处的与你的关系中获得独立，我就必须做某种同你毫无关系的事情；结婚虽是最伟大的事，并赋予人以最可敬的独立性，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从这里脱身，是某种接近狂想的东西；几乎每一次尝试都会因而受到惩罚。

但也正是这种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诱惑我去结婚。我之所以把我们之间可能产生的、你对其理解之深会甚于任何现象的平等想得这般美妙，是因为那时我将成为一个自由的、知恩图报的、无罪的、正直的儿子，而你会成为一个毫不郁闷的、不粗暴的、有同情心的、心满意足的父亲。但要达此目的，必须将一切已发生的事情抹去，也就是说，必须把我们自己抹去。

以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看，结婚算是与我无缘了，它正是你最堪称独

领风骚的领域。有时我突发奇想，觉得在打开的世界地图上，你四脚八叉地躺着。于是我感到，只有那些你的肢体未曾盖住或尚够不到的地方才是我的生活可以插入的空地。根据我对你魁梧身材的遮盖面的设想，留给我的地方是不多的，那些有限的地方也不是很令人鼓舞的，尤其是婚姻并不在其中。

仅这个比较就足以证明，我绝不是认为你通过你的例子把我从婚姻领域驱逐出去，就像从商店中驱逐出去一样。尽管情况从很多方面看确实像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从你们的婚姻中看到的是一场在许多方面堪称楷模的婚姻，在忠诚、互助、儿女数量这些方面都堪称楷模。甚至在儿女们长大成人并不断破坏和平宁静之后，这场婚姻仍不为所动，依然如故。我对婚姻所抱的崇高信念也许正是由这一例证产生的；至于对结婚的要求会使我晕眩，是有其他原因的。这些原因存在于你同孩子们的关系之中，这封信从头到尾谈的就是这种关系。

有一种看法认为，对结婚的恐惧心理有时是这么来的：人们自己对父母犯下的罪过，将来会由子女来施还在自己身上。这种看法对我的案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的负罪意识本是由你而来，充满了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这种意识折磨人的本质的一部分，重复它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有这么一个愚蠢、迟钝、乏味、堕落的儿子，我会受不了的，假如没有别的办法，我会逃走，迁居，就像你在我一旦结婚后想做的那样。你这种想法也参与影响了、促成了我的无能力结婚现象。

这方面重要得多的是我为自己而生的恐惧。这点可以这样理解：我已经说过，我通过写作和与此有关的事情做了些小小的独立尝试、逃亡尝试，获得了微乎其微的成功，但这些将无所进展，许多事情已经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守护它，不让任何我能挡得住的危险，甚至不让任何产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接近它，乃是我的义务，或不如说是我全部生命的寄托。婚姻就是这么一种危险，当然也可能是最大的促进，但对我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危险这一点便够了。如果它真的成为一种危险，我该怎么办呢？我又怎么能够怀着对这种危险的也许无法证实的、但却也是无法反驳的感觉继续过这种婚姻生活呢？虽说在这种感觉面前我可以犹豫三思，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疑的，我必须放弃。关于手上的麻雀和屋顶上的鸽子的比较用在这里并不很贴切。我手中一无所有，而屋顶上应有尽有，而我必须（这是斗争形势和生活欲望所决定的）这样

一无所有。我在职业选择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最重要的结婚障碍是那已无法消除的信念：对于赡养家室乃至照管家室来说，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品质缺一不可，各方面的无一例外，好的和坏的，就像它们有机地在你身上组合成的那样：强有力和对他人的嘲弄、健康和一定程度的无所节制、说话天才和知识欠缺、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高于世俗和专制粗暴、识人经验和对大多数人的不信任，再就是一些没有任何反面作用的优点，如勤奋、韧性、专注、无所畏惧。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品质我都没有，或只有很少一点，凭这么一点我就想要结婚吗？何况我看到，即使是你，也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艰苦搏斗，在孩子们面前甚至落到失败的境地，不是吗？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曾明确地想过，因而也不曾明确地答复过，否则寻常的思索便可使它迎刃而解，并使我看到别的男人，他们与你不同（就近即可举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为例：里查德叔叔），但却也结了婚，并至少没有因此而崩溃，仅这些就相当说明问题了，对我来说正是完全足够了。但我并未提出那个问题，而是从小经历着它。我并不是遇到婚姻关系才检验自己，而是每逢一件小事都检验一下；在每件小事面前你都以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这我已试着描述过）使我充分认识我的无能，在每件小事上符合实情的并证明你有理的，自然最大的事上——亦即婚姻——更是极其符合实情的。在进行结婚尝试之前，我是像个商人一般成长起来的，这个商人虽然怀着忧虑和恶兆预感，但从不做细账，糊里糊涂地过着日子。他偶然有些小赢利，但由于这是罕见，他在想象中不断对这些赢利百般爱抚、沾沾自喜，越想越多；但除此之外，他每天却不断地亏着血本。一笔一笔都记在了账上，但从不算。现在可到了非结算不可的关头了，这个关头就是结婚尝试。这里需要计算的数目十分巨大，以致简直连一点儿有过赢利的迹象都看不出来，一切汇成了一笔大亏损。现在要是结婚，那不是非发疯不可了吗！

我至今与你共同度过的生活大致讲完了，这种生活的未来前景如何呢？

你若注意看一下我对你畏惧的根由，你就会回答说：“你声称，我简单地以你的罪责来解释我与你的关系，那是图省事，但我认为，尽管你表面上花了很大力气，但实际上并不很费劲，这事例反而使你大为得益。首先你也拒不承认负有任何罪责，在这方面我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我那样坦率地、一如心中所想地认定你单独负有全部罪责，而同时你却

打算表现得‘特别聪明’和‘特别温柔’，并宣布我也是无辜的。当然后面那点你只是似乎做到了（你的意图也不外于此），而在品质、天性、对立和绝望这些方面尽管有种种‘说法’，但字里行间却透出这么一层意思：我是进攻者，而你干的一切都是自卫。现在你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因为你证实了三点：第一，你是无辜的；第二，我是有罪的；第三，你纯粹出于慷慨胸怀，不仅要原谅我，而且多多少少还想证明，并且想要使自己相信：我也是无辜的（当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于你本来应该够了，但却还不够，你满脑子塞着的是完全依靠我生活的想法。我承认，我们在相互斗争。但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阵，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蜇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你对你在生活上不能干又何必担心呢？反正我有责任，你尽管放松四肢，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任我拽着穿过生命之河。一个例子：当你最近想要结婚时，你同时不想结婚（这点你已在信中承认），但为了不多花自己的精力，却希望我帮助你结不了婚，也就是说，使我认识到这一结合将给予我姓氏以‘耻辱’，因而禁止你们结婚。但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首先，我在这方面永远不想成为‘阻止你获得幸福’的绊脚石；其次，我绝不愿听到我的孩子对我发出那样的指责。我克制了自己，给你以做出婚姻决定的自由，但这么做对我又产生了什么益处呢？一点都没有。反感，我对这场婚事的反感也许阻止不了它，而且反而成为促使你娶那位姑娘的因素，因为这么一来，‘逃亡尝试’（你是这么表达的）将是万事俱备了。而我即使允许你结婚，也无法阻止你的指责，因为你在此证实，无论如何我都对你的结不成婚负有责任。但实际上你在这方面，以及其他诸方面，对我来说什么也未曾证明，只证明了我的所有指责都是对的，这些指责中还缺少一个特别合乎情理的指责，即对你不正直、阿谀逢迎和寄生的指责。我想不至于搞错，即使这封信也是你靠我过寄生生活的一个明证。”

我的回答是，首先这一大段插话（一部分是反对你的）并不真是你说的，而是我写的。你对别人的不信任还没有这么严重，还不像我的自我不信任那么严重，我的自我不信任是在你的教育下养成的。我不否认这段插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也为表明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做出了一些新的贡献。在现实中，事物间的关系当然不会像我的信中所证明的那样，生活并非仅仅是磨砺耐心的游戏；但这段插话对此作了一些矫正，

这一矫正我既不能、也不愿详加阐释了。我认为通过这一些矫正，情况已表达得非常接近事实了，使我们俩都能得到一些安慰，使我们的生与死都变得轻松起来。

弗兰茨

这次婚姻意图是个例外：这一年（1919年）卡夫卡曾和一位名叫尤丽叶·沃里泽克的姑娘热恋，并打算同年秋结婚，但因父亲嫌姑娘出身低微激烈反对而告吹。

根系上的略韦：卡夫卡母亲原姓略韦，是富有且有知识的家族，而父亲则出身于贫穷的劳动家族。

培帕：卡夫卡的一个亲戚。

狗和跳蚤的谚语：这句谚语是：“和狗一起睡觉的人总是满身跳蚤。”

人家：德语中第三人称这个代词有时也可以用于第一人称，此文几个“人家”均指卡夫卡自己。

附录1 《致奥特拉》原编者序

这部书信集当属断简残篇。一方面，这是一部残缺的家庭通信录，因为卡夫卡不仅同他的小妹奥特拉飞鸿传书，也同大妹埃莉有着通信往来（一部分信件在战争中得以保存下来，但现在暂时下落不明），并且肯定还给二妹瓦莉写过信。从本集中为数不多的引例看，卡夫卡给父母双亲写的，在本集中很少，他一般只单独给母亲写信，却似从未单独给父亲写信——除了那封未曾寄出的《致父亲》的信。致父母的书信显然未被保存起来。父母既没有把这个儿子视为掌上明珠，亦未把他看作一名作家。致埃莉和瓦莉的信件，（大部分）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佚失；卡夫卡的妹妹们当时都被驱逐出境或杀害。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部残缺的兄妹对话录。因为，这里搜集的只有卡夫卡与他最钟爱的妹妹之间几乎长达二十年的对话中可供阅读的一部分。至于兄妹俩在无数次散步远足、周末郊游和浴室窃语中的对话内容，我们却不得而知（“浴室”是背着父母交换秘密的场所）；兄妹俩共同阅读过的书籍和共同欣赏过的戏剧，我们则所知寥寥。

即使作为兄妹两地书，也仍是残缺之集，因为尚缺收信人的回信。当然，这与卡夫卡的其他书信集亦无二致，统统算不得书信“往来”，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诚然，卡夫卡没有把所有写给他的信都保存起

来，然而有案可查的信件也为数不少。致奥特拉的书信直到卡夫卡死后才遗失，留存下来的是占多数还是少数，一时难以断言。有人传说，卡夫卡本人销毁过信件，也曾劝妹妹不要把他的信到处乱放，建议她把信撕成碎片从阳台上抛向鸡群。兄妹们之间谈话时，要比同父母谈话时直率些。卡夫卡有过一次经验：母亲曾经看过他情人菲莉斯的一封来信，后来偷偷地同她通过信。

不过，奥特拉给其他人的一些信件曾经被搜集到，例如致她的情人，即后来的丈夫约瑟夫·达维德（1891—1962年）的书信。在这些信中，奥特拉常常提到她的哥哥。编者在注解中根据史实关联尽可能详尽地引述了与卡夫卡有关的段落。

奥特拉信中的德语显得烦冗琐碎，带有几分忧郁，令人再次回忆起卡夫卡一家在布拉格时的境况：父亲原本是来自南波希米亚省份、大约以说捷语为主的犹太人；母亲则出身于以德语为主的城镇小资产阶级犹太家庭。在奥匈帝国时期的布拉格，唯有操德语者才可能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地位才可能上升。因此，在这个93%居民说捷语的城市里（大约1900年前后），德语成了卡夫卡家几个孩子的母语。赫尔曼·卡夫卡的妇女摩登服饰店里，顾客们操的也是捷语。奥特拉就在这个店里工作了很多年。在家里说德语，在外的交际语言用捷语——本书中搜集的家书便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状况。

奥特拉（学名奥蒂莉）出生于1892年，是弗兰茨·卡夫卡的小妹，比他小9岁。8年制公立学校毕业后，在父亲的店里帮工，刚刚年满25岁就成为姐妹中唯一自主选择职业者：她在一个庄园里工作，后来进入一所农业专科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她认识了法律大学生达维德。1920年，她与这位信奉基督教的捷克人结婚。她在婚姻大事上也一反当代年轻姑娘的时尚做法，不顾朋友和亲戚的反对自己做主。奥特拉的固执与她的矜持、谦恭和沉默寡言融为一体。在纳粹时代，奥特拉也以同样的态度来面对犹太人的命运：为了不危及丈夫的前途，她断然决定来到特雷津，自愿报名护送儿童前往奥斯威辛（1943年10月初）。她护送的孩子们，把卡夫卡写给她的信件保存了下来。

这部书信集的出版由于各种原因几经推迟，最终原因是柏林法官克劳斯·瓦根巴赫同时审理两宗案件（“您正在审理案件？”成为编者之间频度超过卡夫卡引语的对话内容）。因此，哈特穆特·宾德尔担起了出版的主要任务——转译和注释，克劳斯·瓦根巴赫则不得不局限于校勘、协助

和补充。编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毋庸讳言：宾德尔意欲旁征博引，瓦根巴赫力主简言赅意——本文稿成为妥协之产物。凡认为本书过于详尽者，请责备宾德尔；凡认为过于简略者，当批评瓦根巴赫。书中错谬，责在双方。

编者衷心感谢承担了致约瑟夫·达维德捷文书信翻译任务的玛丽安妮·施泰讷女士（伦敦），衷心感谢对布拉格情节中若干特殊资料不吝赐教的库尔特·克罗洛普先生（哈雷）。

哈特穆特·宾德尔

克劳斯·瓦根巴赫

王建政 译

附录2 《致奥特拉》原出版者跋

本书发表的弗兰茨·卡夫卡的119封书信中，有101封是致其爱妹奥特拉的；4封致奥特拉的男友、日后的丈夫约瑟夫·达维德（第27、90、92、103和107号信），达维德亦是其他两封信（第99和114号信）的共同收信人；8封致父母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第22、94、100、113以及117至119封信），此外他们还曾与幼女共同收到过信（第79封信）。与此同时，还有2张风景明信片系致奥特拉及其姐姐瓦莉（第11封信）和致奥特拉、瓦莉以及父母的（第14封信）。只有第6封信，才是卡夫卡给大妹埃莉及其丈夫卡尔·海尔曼的。在第89、115和116封信中，含有卡夫卡致其公务上司的函件，嘱其妹夫达维德将信译成捷文。

卡夫卡致父母的两封信（第22和119号信）以及并致两位妹妹的一张风景明信片（第14号信），系摘引自马克斯·勃罗德所著《卡夫卡传》（出版于1937年）和《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纽约/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58年版，参阅第94页）。《卡夫卡书信集》中主要收集了卡夫卡与朋友和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通信录，从收信人和事件本身来看，作此说明便于对上下文关联的了解。

除上述三封信外，本书均基于奥特拉遗物中的原始信件。奥特拉的遗物中，还包括奥特拉致达维德的信和明信片，她父亲致情人尤丽叶的信件，母亲致小女儿和儿子的信件，伊尔玛·卡夫卡致女友奥特拉的信件，以及多拉·迪曼特和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在卡夫卡于基尔林疗养时致

其布拉格家人的病情报告信件。凡此种种，只要对本书所收信件内容的理解有裨益的重要资料，均在注解中引述。由于奥特拉自1917年起以捷文给达维德去信，因此从这些信件中摘引的内容大部分作了翻译。

此外，已在《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中发表过的信件包括第20、64、66（日期有误）、90（德文译件、日期有误）、96和102号信。已译成捷文的信件包括第45、53、54、67、68、69、72、78、81、99、101以及第116封信的第二段和第115封信的附件；此外，直接以捷文致达维德的信件为第92、103、107和第99封信中有关他的一段内容（《*Neznámé dopisy* Franz Kafka》，见于《Plamen》第6期[1963]第84至94页）。第115封信中致达维德的一段内容的真迹影印件和德文译件（已收入本书）发表于《论坛·奥地利文化自由月刊II》（1964年）第130号498页。第64封信中卡夫卡所作的漫画，曾被K.瓦根巴赫发表过（《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柏林1966年版第78页）。第27、28和63封信的影印件，均曾刊于J.鲍尔、I.波拉克和J.施纳德合编的《卡夫卡和布拉格》一书中（斯图加特1971年版第90、131页）。此外，本书所收卡夫卡与奥特拉的通信中，还有一些章节分别在其他一些出版物中刊用过：K.瓦根巴赫所著《弗兰茨·卡夫卡的自我见证与图片资料》一书（莱恩贝克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页，收有第117封信的影印件）、H.宾德尔所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和《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等文章（见于《德意志席勒协会年鉴》第12册[1968年]第403页和第13册[1969年]第536页）。

致奥特拉及其丈夫的明信片 and 信，看来基本上得到了完整保存。原因之一是，1909年以前卡夫卡不大可能给妹妹写很多信。其二，书信保存比较完备也基于另一事实，即卡夫卡在后来的大多数旅行中都会寄来度假问候的信卡。不过亦有例外情况：如1913年圣诞节，1914年年初和复活节时的柏林之行，1915年年初在博登巴赫与菲莉斯·鲍威尔会面时，1916年11月在慕尼黑二人会面时，以及1917年夏季二人在布达佩斯一同度假时。以上例外均是在与菲莉斯聚会之时，卡夫卡显然只想以口头形式将他试图结婚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告诉奥特拉，而不大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其三，卡夫卡的某些便条本不重要，只是叙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即时插曲。这些便条从客观角度看本无保留价值，但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须归功于奥特拉对哥哥的内心感情至深，以至于把来自卡夫卡的一切都妥善保存下来。

从现有信件中可以推断出，卡夫卡给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给母亲去信十分频繁（参阅第19、77、88和115号信）。尽管如此，这些信和明信片上只有相当少量部分得以保存下来。在一段时间内，当卡夫卡的病情并不危险时，家庭中显然没有刻意保存他的信件。此外还有一点原因是可以推测的，即这部分信件之所以得以幸存，也许是由于母亲1934年去世时奥特拉偶然地得到了它们；或许是由于马克斯·勃罗德为了研究他的朋友而在30年代得到了这部分信件的真迹或影印件（参阅《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514页）。所有其他信件，尤其是卡夫卡致妹妹瓦莉和埃莉的几乎所有信件，很可能是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遗失。

由于本书所收录的信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系卡夫卡在旅行期间所写，因此风景明信片的数量达到37帧之多便不足为奇了。引人注目的是，卡夫卡有三次是在两张明信片上连续书写的（第17、32和92封信，其中92封信缺第2张明信片）。

第27封信的正面，卡夫卡画了一幅有趣的漫画；第100封信则附有卡夫卡与马特里亚利的病友和医护人员的合影照片。第87封信由于特殊原因而未作明信片寄出（参阅注解）。第1、3、6、7、9、10、11、12、16、26、30和33封信为着色或彩色明信片。

邮政明信片共有35张，不包括第24封信的战地军邮通信片。卡夫卡只将此卡作为便笺使用，未经邮局盖戳寄发。第48封信系在两张明信片上连续写就。第64封信则是卡夫卡以自己创作的一幅漫画作为某种明信片使用。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卡夫卡的某些信文是在其他收信人的信件上保存下来的。例如第27封信源于奥特拉致达维德的明信片，第34封信是她致男友的信中摘引的，第38封信附于埃莉致奥特拉的信中，第57封信附于母亲致小女儿的信中，第117、118封信则是附于多拉·迪曼特致卡夫卡父母的明信片上。

其他的信件中，也远远谈不上都是通常意义上的书信。第24、31、35、36和61号信，都是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父母家中或在炼丹师小巷与奥特拉共用的斗室内给妹妹留言用的便条，因为他无法遇见她或不愿与她见面。第59封信虽然称得上是书信，但它未经邮局投递，而是托人捎带的。

本书收集的家书、便条和明信片，在时间顺序的判断上并不容易。因为，卡夫卡通常不注明书写时间。只有第20封信上的时间要素齐全；时间要素多多少少不够齐全的有第37、53、77和84封信；由于信件转手的特殊方式而间接获知时间要素的则有第27、31、34和57封信。许多明信片的邮戳有助于确定时间，但部分邮戳很难辨认，加盖不完整或根本无法判读。一些风景明信片的正面图案也有助于确定时间，但有的明信片书写或投递地点与画面并不相符（如第55封信）。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信是经过转交并随意抽出、插放的，因此信封的判断依据常常不可靠，甚至某些通过邮局投递的正常信件也缺乏信封或难以辨认。有些信或明信片缺少邮戳，因为达维德是集邮者，事后将明信片或信封上的邮票剪去收藏了。

在时间顺序的表述上，本书采取以下方式：凡卡夫卡所标明的时间，均原封不动地采用；所有补充的时间要素或完全系推断的时间要素，均用方括号标示；凡有邮戳的，均按邮戳的原始形式采用；若邮戳部分内容无法卒读，均用连接号标明；凡是有把握的时间要素，则以圆括号标示；若所有时间要素均系判断，则年代注明四位数字，“月”、“日”等字也悉数标明。

并非所有邮戳都能准确地表明实际书写地点，读者遇有疑虑时可以参阅收信人的逗留地点、信件的注解，尤其是后附大事年表。年表中包含了卡夫卡及其妹妹的详细生平经历。

第37封信的全部和第60封信的局部系用打字机书写，其他信件均系手书，尽管书写风格迥异，常常显得比较潦草，有如草稿一般，但是这些信基本上都能辨认得清。然而，每当卡夫卡用明信片写信时，几乎次次都有纸短之虞，以至于只能想办法把明信片的边缘处统统加以利用，尤其是补上不同的附言。当有若干段内容并无关联的附言时，其前后书写的顺序便无法确切地判明。有时，卡夫卡在审阅信文时将一些解释性的插言写在行间或边缘。此类插言统统没有标明应当插于何处。

卡夫卡喜欢用墨水写信。但是，如果时间紧迫（如第39封信），如果在旅馆房间之外旅行时（如第26封信）或在炼丹师小巷的房内写作时（如第36封信），他也会使用铅笔，因为当时手头显然没有羽毛笔或自来水笔。他从马特里亚利寄往布拉格和苏劳的信，从梅拉诺发出的信，以及后来从柏林发出的信，几乎均用墨水所书。之所以有时也用铅笔写信，卡夫卡对此有过两次解释：1919年初，他曾认为奥特拉“用铅笔书

写”是具有她独特风格的模仿（第68封信）——奥特拉通常均用铅笔写信。两年之后，他在给她的信中致歉道：“为了节省时间，我坐在躺椅上写信。”（第89封信）——以这种方式写信自然难以使用墨水（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58页）。

本书信集的编辑原则是，尽可能不改动原稿的面目。首先，这意味着所有收编的明信片 and 信函内容未作任何删减；其次，他的拼写方式和段落安排均予保留（在明信片上写信时，由于篇幅有限，他常以破折号代替分段）；同时，卡夫卡信件中捷语部分的重音符号欠缺亦未予改正，因此与官方出版的卡夫卡书信略有不同——后者中，部分业经约瑟夫·达维德翻译，部分则经过卡夫卡本人润色，从而可能给人以他对捷文的掌握臻于完美的假象（参阅第91和第116封信）。因为本书中致妹夫的信件可对卡夫卡的捷文水平作出明确的审视：卡夫卡的捷文十分出色。

用当今的标准看，卡夫卡的书信中欠缺的标点符号相当多。但是，他的原文基本上予以保留，只是在少数情况下给予改正。如他在某些段落中明显地打算加入句号，但在将后边字母改成大写后因时间仓促而忘记将句号置入。（如果他用圆括号将句子明确地断开时，则未予改正。）

不应当说卡夫卡没有注意到标点的规范化，因为从许多处可以看出，他重新消除了错误的标点符号；然而他在这一点上显然不想遵照学校中的严格规范。

本书予以纠正的只是那些明显的前后矛盾之处（如省略号的使用）和因卡夫卡匆忙疾书或事后修改句法时产生的语法疏漏之处。

卡夫卡手书中在文字下边划的加重语气线，一概未予采印。卡夫卡的明信片或信函中，常常会有其他人对收信人的问候语等，此类章句通常用黑体字以示区别。

本书的注解部分，当比《卡夫卡全集》中迄今已经出版的书信集详尽得多。卡夫卡致菲莉斯和密伦娜的文件中，内容相对封闭，题材大致集中，从信件的横向关联角度看涉及面小得多；特别是由于卡夫卡与她们是在通信中发展了爱情关系，因此至少在关键性的初始阶段，除了信件往来之外几乎没有口头交谈（如通信者之间的直接交往）等可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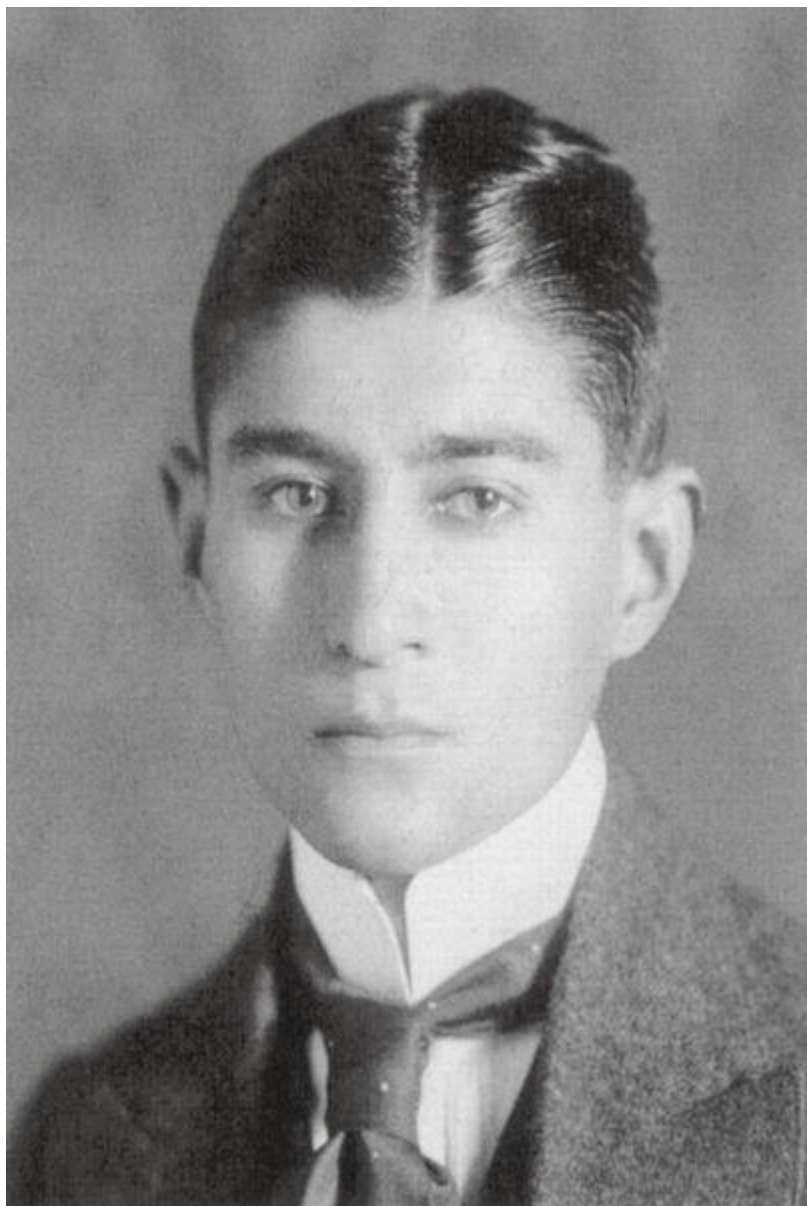
其特殊关系的其他途径。卡夫卡致朋友们的信件较易理解，因为那些重要的收信人在编发此书时仍然在世，他们的回忆或现存的回信有助于理解信件内容和判断书信日期。这些信件的题材也常常与文学问题有关，其中的不明之处可通过对当时一般文学历史的研究得到澄清，以当时的资料帮助今日的理解。

而致奥特拉的信件则大不一样，一则卡夫卡致妹妹的信件只是兄妹间一生中私下交谈无数内容的冰山之一角。这类交谈，只是在某一方离开布拉格或双方凑巧同时旅行外出时才会突然中断。此外，他们之间的对话常常围绕着完全属于个人范围内的、十分短暂的生活琐事，而卡夫卡在大部分信件的产生日期内并未写日记，因而我们今天对奥特拉的了解便受到很大限制，何况约瑟夫·达维德也已去世多年。最后，这些书信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通常读者所不了解（从出版的角度来看）和不理解（因为大多是用捷文书写的）的病假延续报告；卡夫卡自1917年以后不得不经常向就职单位呈交这样的报告。所有这一切，要求借助对具体生活日程的必要了解。而在当今随处可得的《卡夫卡全集》中，并未详载这些日程的资料，从而使得对家书留传和布拉格经历的研究回顾日趋必要。而对这些有关卡夫卡生活证据的只言片语的搜集、分析与定义，仅仅浏览一遍还不足以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哈·宾德尔

王建政 译

第八卷 致菲莉斯情书（I）



1910年，27岁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小妹奥特拉于1920年结了婚。1922年夏育有一岁女儿的奥特拉一家租下了一套二居室的度假房。位于南波希米亚路希尼茨附近的普拉纳。6月末卡夫卡也来这里住下，直到9月他在这里完成了《城堡》的最后9章



卡夫卡的小妹奥特拉的丈夫约瑟夫·大卫



上图是位于普拉纳的房子。在顶层带有两个窗户的房子是卡夫卡的住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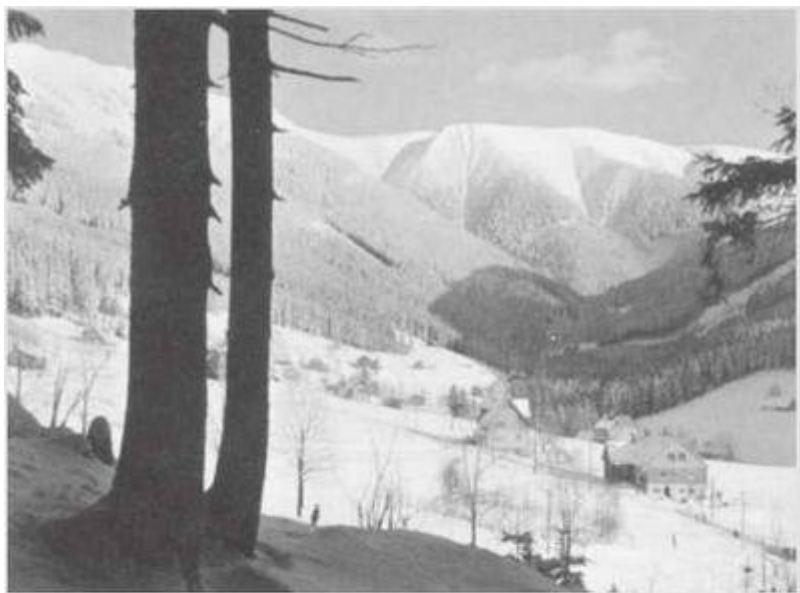
下图是发自路希尼茨河畔的普拉纳的明信片普拉纳村中心景观



发自路希尼茨河畔的普拉纳的明信片

上图是当地火车站（位于布拉格至维也纳铁路线上）。

下图是路希尼茨河畔



上图是圣彼得谷

下图是施品德尔磨坊入口处的易北河上游的一座桥



上图是卡夫卡在前往施品德尔磨坊的路上（右一）

下图是卡夫卡住的王冠宾馆



上图是卡夫卡与他第二个未婚妻沃里采克经常散步的里格尔公园（布拉格区的王家葡萄园）卡夫卡自1917年咳血以后，常请病假外出休养。1920年4—6月赴意大利小城美兰就是这类病假内容之一。 下图即是当时的捷克斯拉伐克共和国为其签发的出国护照



1917年7月初，第二次订婚时的卡夫卡与菲莉斯



维也纳“壕沟”街；下图为布达佩斯的弗兰茨·约瑟夫大桥。1917年7月卡夫卡从他与菲莉斯第二次订婚的布拉格经过维也纳来到布达佩斯



卡夫卡喜欢朗诵自己的作品。但在外地朗诵平生只有一次：1916年9月在慕尼黑朗诵他的新作《在流刑营》。菲莉斯也赶来聆听。可惜这次活动不太成功，其间有好几个听众走掉。卡夫卡朗诵时的画像（系上世纪50年代人们根据回忆画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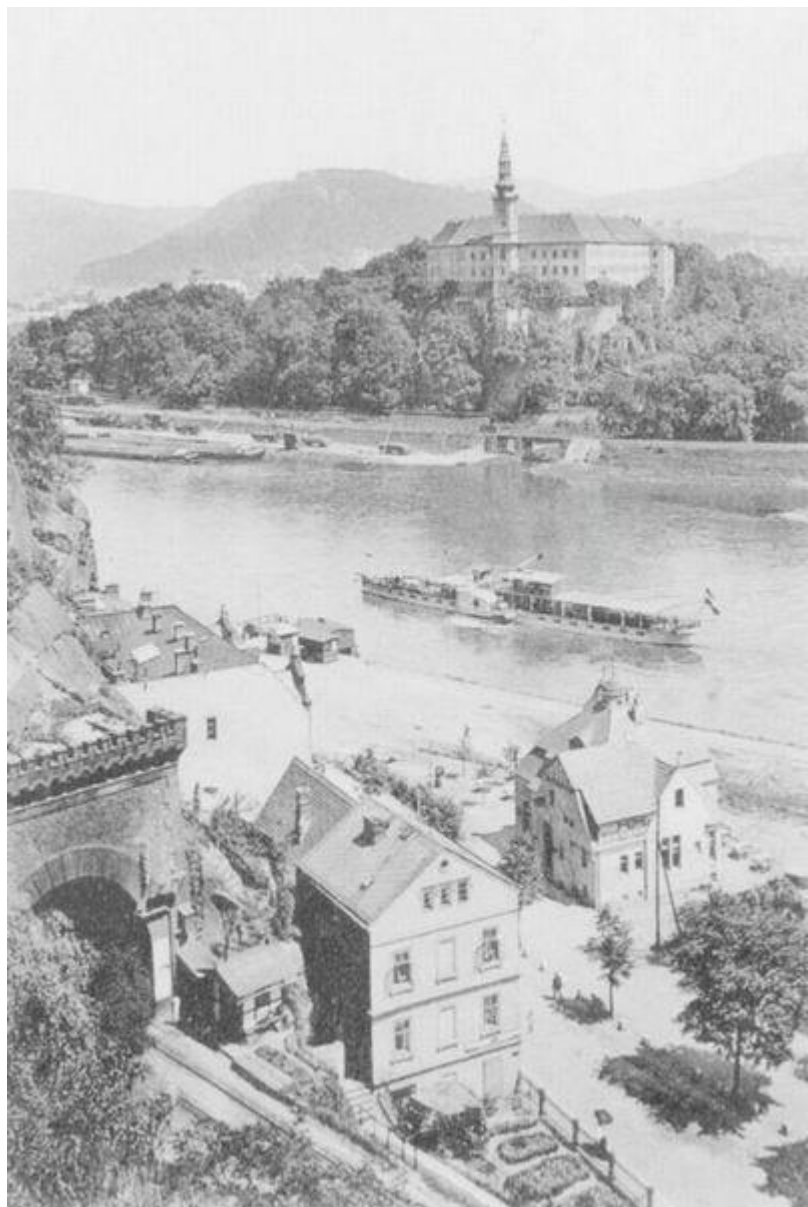


上图是卡夫卡和菲莉斯于1916年7月住过的一家饭店

下图是马利恩浴场的十字泉大厅



1913年7月卡夫卡在北波希米亚的卢姆堡附近的弗兰克施坦疗养院待了两周。自1917年5月起这家疗养院在卡夫卡所支持并鼓吹的一个协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战士和人民神经治疗所”。因此卡夫卡此后也经常来卢姆堡。卢姆堡市场（1915年7月卡夫卡致菲莉斯的明信片）



卡夫卡与菲莉斯解除婚约后第一次在这里——泰卿博登巴哈——相遇



上图是作家恩斯特·魏斯和他的女友演员拉赫尔·珊察拉。卡夫卡解除婚约后和他俩去丹麦的波罗的海浴场玛丽吕斯特

下图是卡夫卡寄给三妹奥特拉的明信片上的玛丽吕斯特



阿斯卡尼宫饭店，1914年7月12日在G.勃洛赫和E. 魏斯的见证下，卡夫卡与菲莉斯解除了婚约



卡夫卡未婚妻菲莉斯单位的两位经理



菲莉斯的女友格蕾特·勃洛赫，在一家工厂工作



菲莉斯·鲍威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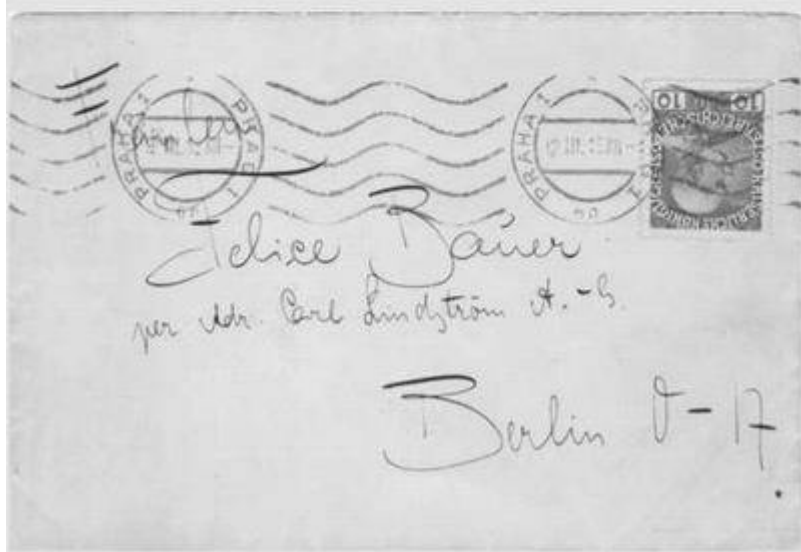
Lindströms *Parlograph*



Diktiermaschine

gewährleistet
50 % Zeitersparnis
 bei Erledigung
 der Korrespondenz.

Alleiniger Fabrikant:
CARL LINDSTRÖM AKTIENGESSELLSCHAFT
 BERLIN SO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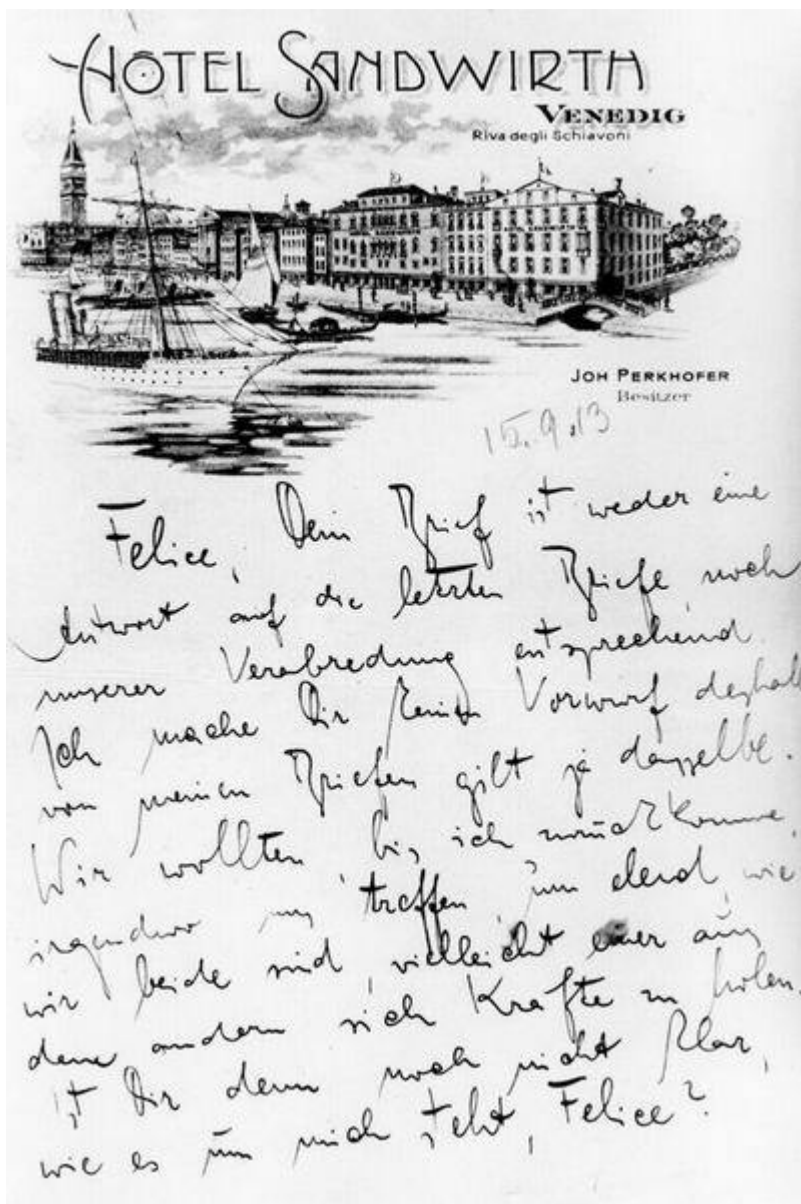


上图是卡尔·林德施特罗姆股票交易所的广告，卡夫卡未婚妻菲莉斯作为其代理人在那里供职

下图是卡夫卡从布拉格的自己办公室发往柏林菲莉斯办公室的信



与卡夫卡第一次订了婚的菲莉斯·鲍威尔（1914）



1913年9月15日卡夫卡从威尼斯致函他的订婚不久的未婚妻菲莉斯。这是手稿



卡夫卡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与其母亲的合影



奥随格市的市场（卡夫卡于1913年3月27日寄给菲莉斯的明信片）



奥随格一带的易北河河谷景观（卡夫卡于1913年4月22日寄给他的未婚妻菲莉斯的明信片）

编者前言

这是卡夫卡的著作的一大特色：无论是想象虚构的创作，还是抒情记叙的文字，作者无不是全身心投入，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这赋予他的每种体裁的作品——不管小说、杂文，还是书信、日记——以鲜活的灵魂和强烈的脉搏，从而使他那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不仅获得文学的品格，而且也获得了生命哲学和悲剧美学的价值。

书信，特别是情书也是卡夫卡生命燃烧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数量之多，在现代大作家中实属罕见。它们约占卡夫卡全部文字的一半左右，而先后给两个热恋对象写的情书又占了其中一半以上，译成汉语，不少于八十万字，仅致菲莉斯的信件就达五百二十七封之多（其中夹有几十封给另一女子即菲莉斯女友的信），这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卡夫卡与柏林姑娘菲莉斯·鲍威尔的爱情经历可以说是传奇性的。从1912年8月13日相识，到1917年12月下旬告终，整整五年零四个月。其间两次订婚（1914年5月30日；1917年7月3日），又两次解约（1914年7月12日；1917年12月26日），婚约期均未超过半年。导致这种局面和结果的根由是复杂的，但也是不难理解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卡夫卡整个儿是“由文学构成的”。他把文学创作视为“巨大的幸福”，而这一内在世界的自由却需要他付出外部世界即现实生活的牺牲。但生具的作家的精神素质决定了卡夫卡也是一个“多情的种子”，他先后对好几个女性发生兴趣并有暧昧关系，他常常抵御不了爱情和婚姻的诱惑和欲望。但是，他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如愿以偿，那么八小时以外的有限时间和精力就不能保证他在创作上的成功。于是现实世界的欲望与精神世界的追求发生“内”与“外”、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激烈争斗，以致把他“撕裂”了！1917年的大咯血就是这种撕裂的象征。对此，奥地利著名的卡夫卡研究专家、卡夫卡致菲莉斯情书集汇编者之一艾里希·海勒写的《引言》作了精辟的分析，特此将他这篇长文附录在书后，供读者参考。

照理说，一个年近四十的人，在经历了一场如此马拉松似的、拉锯似的、而且以失败告终的恋爱挫折以后，纵使有多大热情都该消耗殆尽，何况，危险的（至少在当时是危险的）病魔又纠缠不放，创作更需要精力……不想，经过两年之后，生命力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磨损而衰竭，相反，仿佛得到养精蓄锐，性爱的情感又开始喷涌了！驱动力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少妇，一个小有才气的作家——密伦娜·耶申斯卡（第十卷收入致密伦娜情书）。仅在相爱的半年时间里（1920年初夏至同年秋末），两地飞鸿，在卡夫卡这方就写了十七万字之多，感情之热烈，可以说超过了以前，不啻是卡夫卡爱情生命的绝唱。人们往往把它与歌德的不朽之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相媲美。对于一个生命已经走进黄昏之年的人来说，能唱出如此美好的情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就爱情本身而言，这一页“速战速决”的恋爱史，其过程和结局对于卡夫卡来说既是幸福的狂欢，又是灵魂的磨难，具有悖论意味的悲壮性，读来尤为令人感动。但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与他致菲莉斯情书形式上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前者的落款均不注明时间、地点，这可能出于对方是有夫之妇的考虑，尽管对方的婚姻正在解体之中。

而第9卷《致密伦娜情书》是出自卡夫卡笔下的又一本情书集，是他继前三次订婚失败后又一次巨大感情波澜的真实记录，是这位不幸的犹太人和单身汉生命后期的一次最为动人的灵魂绝唱！

但如果把这本书仅仅视作是一般的谈情说爱的情书，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一部文学作品。正像卡夫卡把文学创作视为“内心世界向外部的巨大推进”那样，书信也是他“向外推进”的手段。这不奇怪，书信的数量在卡夫卡九卷文集中占五分之三的比重，其中情书又占了一半以

上！而致密伦娜的情书尤见分量。因为与卡夫卡交换“两地书”的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女子，不仅是个性格爽朗、感情热烈、果断勇敢、行为不羁的女性，而且是一个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三十七岁的卡夫卡在信中既要充分表达对她的灼热爱情，又要保持着一个被对方所崇拜的作家形象，这就不能不发挥出他全部的文学才华和写作技巧：或者是热烈的赞美，或者是优美的描述；有时来一段幽默的速写，有时作一番梦境的记叙；今天是转弯抹角的暗喻，明天是襟怀坦荡的畅谈；这封信在作自怨自艾的自我解剖，那封信又在笔锋犀利地针砭时弊；憧憬中笼罩着恐惧的阴云，绝望中仍以美好的回忆作慰藉……仿佛这位堕入情网的恋人在精心创作一部爱情小说。无怪乎人们说它堪与歌德那部不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媲美。

密伦娜不愧为是个有眼力、有识见的作家，她不仅深明这些信件的文学价值，而且也珍惜她和卡夫卡间的那一段感情。虽然她后来几易其夫，但她一直精心保存着这批信件达二十年之久，并在罹难前夕，顺利地把这些信件转移到她的友人——即本书的原编者手中，从而使卡夫卡这本珍贵的抒情散文得以和全世界的读者见面。

《致密伦娜情书》也是一份重要的文献，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通过这本爱情书简，我们还可以窥探卡夫卡那深广而丰富的“内宇宙”及其不停歇的颤动情状，尤其是他那几乎无处不在的“恐惧感”和关键时刻的犹豫心理。长达七年之久的感情纠缠，仿佛都不是为了真正的爱情，而是为婚姻在奋斗，结果弄得他心力交瘁，败下阵来。照理该歇息了，但不想，爱神丘比特的箭再一次射来，“灵台无计逃神矢”——他被射中了！他抵挡不住这位青春焕发而又才华横溢的女性的“袭击”，尽管对方是一位有夫之妇，也在所不顾。

虽然卡夫卡在思想上并不承认现存的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他在行动上却是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理”与“法”的矛盾之中：真挚的爱火使他寝食难宁，“偷情”的行为又使他“恐惧”不已，使他受着良心的谴责，感到自己的“龌龊”。在这种内心矛盾的折磨之下，最后当他看到密伦娜对她丈夫并没有恩断义绝（几年后还是离婚了），他终于后退了！在密伦娜方面，当然也有其特殊的考虑——对此，书里都留有明显的痕迹。

由于卡夫卡的创作都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出发而加以升华的，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因此我们撰写了《卡夫卡生平 and 作品中的爱情关系》一文，附在书后，作为读者阅读此书时的参考。另外，本书的原编者维利·哈斯是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者，译者认为他为本书所写的《编后记》是一篇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在此一并译出。

读了《致密伦娜情书》这些忠实记录了两颗真挚的心的热烈跳动的书简以后，读者一定会对这位曾为卡夫卡那样深深钟爱过的女性后来的生活和命运表示关切，译者也设法满足读者这一愿望。我们请黄曼龄女士翻译了密伦娜女友的女儿写的一篇回忆录（专谈密伦娜的家庭生活及其命运），一并附在书后。

这两部情书注文，除注明者外均为原编者注。凡方括弧者亦为原编者所加。原文每封信的时间、地点均放在信首，译文则按照中国的习惯款式一律移至最后。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篇幅浩瀚的《致菲莉斯情书》，由于承担翻译任务的卢永华先生中途奉命出使国外，不得不仓促约请多人共同完成任务。由于各人翻译水平、经验不一，致使全书译文质量和文字风格不尽统一，错误亦在所难免，包括我与黎奇译的《致密伦娜情书》，切望读者见谅并予批评指正。

参加《致菲莉斯情书》（本卷及第9卷前半卷）翻译的除署名者外还有庞斗非、龙丽芬、刘霞、夏林荫、张军辉、莫晓慧、吴彬、肖君。

致菲莉斯情书（I）

（1912.9.20—1914.11.3）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尊敬的小姐：

考虑到您可能一点儿也记不起我是谁了，为此，我再作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弗兰茨·卡夫卡，是那天晚上在布拉格马克斯·勃罗德经理先生^[1]家里第一次问候您的那个人。当时这个人隔着餐桌把塔利亚旅行^[2]的照片一张接着一张地递过去，最后他用他现在正在打字的这只手握住了您的手，当时您曾答应，来年和他一起作一次巴勒斯坦之行。

如果您现在还是要作这次旅行的话——您当时说您不是优柔寡断的人，我那时也认为您完全不是这种人——那么，咱们从现在开始来谈论这次旅行，不仅有益，而且非常必要。因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对于巴勒斯坦之行来说太短暂的假期时间，也只有在我们尽可能做好准备工作并对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尽管这一点听起来很糟糕并且与我上面所说的有些矛盾，那就是我是个写信没准的人。假使我没有打字机的话，情况会更糟糕，因为如果没有心情写信的话，总还可以用我的手指写信。作为报应我也从末期望能准时得到回信。即使我每天都在紧张地企盼来信，但如果它没有到的话，我也不会失望，如果它最终还是来了，我会高兴得大吃一惊。每当我把信纸重新放入打字机时，我觉得是我自己让我自己为难。即使我犯了这个错误，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因为我何必在六个小时的公务之后还要写这封信，而且是用我非常不习惯的打字机。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如此——使用打字机的唯一缺陷就是必须按部就班地行事——即使对此有所顾虑的话，我指的是实际的顾虑，在旅途上把我当做陪同、导游，视我为累赘，认为我霸道，如此等等，反对我当通信者——眼下正是为这事——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坚决反对的，您或许可以试试看。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敬上

〔19〕12.9.20于布拉格

尊敬的小姐：

我没有用打字机写信，望谅。但是，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写，打字机就放在过道，尽管我们波希米亚这里今天是节日，但我觉得这封信十万火急，就是用打字机打也还不够快。窗户开着（我的窗户总是开着），天气风和日丽，温暖宜人，我哼着歌来到办公室（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样了），取到您的信，我要是今天没来就坏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在这节日的今天还来办公室。

我是怎么得到您的地址的？如果您想问，最好还是别问了。我刚刚讨要到您的地址，开始人家告诉我一个什么股份公司，真让我扫兴。后来我搞到了您的住址，但是没有门牌号，最后才得到了门牌号。现在我满意了，却没有提笔写信，因为我觉得地址已经意味着一些收获了，此外我还担心，地址会不会搞错，谁是伊玛努埃教堂？没有什么事比把一封信寄给没有把握的地址更令人悲伤的了，那将不是一封信，而更多是叹息。当我知道在您居住的巷子里有一座伊玛努埃教堂时，我心里轻松多了。如果我现在还能知道您住处的方位就好了，因为在柏林找地址总是这样。我自己希望它是在北部，尽管我相信这是一个贫民区。

地址问题的顾虑（布拉格这里不清楚您到底是住在20号还是30号），使我这封信尚未开始，就不得不承受所有的苦恼。这个问题先暂且不谈。既然现在我们之间的这扇门已经开启或者我们至少已经握住了门的把手，我的确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非这样说不行的话。小姐，您了解我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吗？我感到异常的紧张。我现在想做的事，一会儿就不一定想做了。假使我已站在楼梯上面，但我仍然还无法知道，如果我进入房间，我将会处于什么状态。在这些毫无把握演变成稍有把握或一封信之前，我必须把它们埋在心里。经常如此——毫不夸张地说，我说有十个晚上，我在入睡之前都在编织着第一封信。现在我的一个痛苦就是不能把已经井井有条编织的内容流畅地书写出来。我的记忆力极差，但即使是最佳的记忆力也无法帮助我详细记录下我事先想好并且记住了的一小段内容，因为在每句话里都有在落笔之前把握不定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每当我坐下来想把记住的东西写下来时，我眼前出现的是片言只语，既看不透它们又没法无视它们，如果按我那淡漠的心情的话，我只有搁笔了事。但是，尽管如此，我的思维还是萦绕着那封信，因为我根本就还没有下决心写那封信，这样的思想正好也是阻止我

去写那封信的最好办法。记得有那么一次，为了把考虑好的想法写下来，我甚至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但我还是马上又钻进了被窝，我指责自己心神不定的愚蠢行为——这也是我的第二个痛苦——并自以为，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会把脑子里记住的东西写下来。快到午夜时，又是这种想法占了上风。

在这条路上我总是走不到尽头。我不在给您写我想给您写的那许许多多，却在瞎聊我寄给您的上封信。请您记住，那封信对我具有的重要性是从何而来。它来自于您为了给我回音而写了这封信，它给我带来了一丝快乐，它就在我的身边，为了感觉对它的拥有，我的手正放在它的上面。尽快再给我来封信吧！一般看来，写信是会花费精力，请您不要费心，您给我写一小段日记，可以事半功倍。当然，您给我写的，必须比您自己认为够了的内容要多一些，因为我毕竟还不了解您。您在日记中必须写上，您何时去上班，早餐吃的是什么，您办公室窗户的朝向，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您的男女同事的姓名，为什么人家送您礼物，谁给您送了不利健康的甜点，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对它们的存在和可能根本不了解的东西。——对了，巴勒斯坦之行怎么办？下次，再下次，明年春天或秋天一定去。——马克斯的轻歌剧现在已经停演了[3]他现在在意大利，不久就要在你们德国出版一本惊人的文学年鉴[4]。我的书，小册子，小本子很幸运地出版了[5]。不过这本书写得并不很好，还要写更好的。向您发誓。再见。

弗兰茨·卡夫卡 上

〔19〕12.9.28于布拉格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尊贵的小姐：

十五天前的上午10点，我收到了您的第一封信，几分钟之后我就坐下来给您写了四大张信纸[6]。我没有任何抱怨，因为我当时感觉没有使我感到更高兴的事了。要抱怨的只是，当我决定搁笔时，我只写了我想写的很短的一个开场白，而没有写出的内容好几天都在充斥着我的头脑，使我坐立不安，直到盼望得到您的回信和这种期望变得越来越渺茫的心情替代了这种不安。

您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难道我信中有什么不妥之辞使您感到

迷惑不解，这是可能的，而且在这种书信中是很可能的，但信中每一句话所表达的良好意愿您不会看不出来吧。——要么是信寄丢了？但是，我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把我的信寄出的，不可能把信投错了，而您的信我是急切盼望着的。是不是信都丢了，除此心神不定的期待就没有别的什么解释了吗？——是因为没有同意巴勒斯坦之行而没有把信交给您，难道在一个家庭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甚至是在您的面前？根据我的推算，那封信应该在星期天上午就到了。——那么，只有令人悲伤的可能性，就是您生病了。但我对此不相信，您一定是健康快乐的。——那么，我的理智也失去作用了，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履行针对我自己的义务，而不是期望您的回信。

要是我是伊玛努埃教堂大街的邮差就好了，那我就会把这封信送到您的住宅里，对感到诧异的您家里其他人的阻挠不予理睬，径直穿过所有的房间，直到您的面前，把信交到您的手里；或者我站在您家的门口，没完没了地按门铃，并感到这是一种享受，一种能够消除所有紧张的享受，那就更好！

弗兰茨·卡 上

〔19〕12.10.13于布拉格

致索菲·弗理德曼夫人的信 [7]

慈爱的夫人：

今天晚上我偶然地而且没有经过主人的许可——您千万不要因此而生我的气——看了给您父母大人的信，信中提到说，我和鲍威尔小姐来往书信活跃。虽然这并不完全正确，但倒也十分符合我的本意。所以，尊敬的夫人，请您对上述说法做出一些解释。我想，这对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您肯定与鲍威尔小姐有着书信联系。

您称之为“活跃”的书信实际上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在您双亲大人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那位小姐，大约两个月之后，我给小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在这里不值一提。之后，小姐写了一封很友好的回信。这封信没有回绝的意思，从它的口气和内容看，完全可以认为是希望以后保持友好书信往来的表示。当然，我的去信和她的回信之间差不多相隔了十天，现在看来，我当时应该马上意识到这封回信与其

说是对我的答复，倒不如说是对我的忠告。出于不同的，同样不足挂齿的缘故——我好像已经向您，尊敬的夫人，提到了够多的好像不值一提的东西——我没有这样做，而是从一些方面看来没有认真理会那封信的内容，就挥笔复函，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封信显然是一时的冲动和愚蠢的表现。无论如何，在承认对我那封信的所有指责都是有道理的同时，我可以发誓说，指责我不诚实是不公正的，这对那些对相互关系不持偏见的人们来说是关键所在。今天距这封信已过去十六天了，我并没有得到回音，而我真的不晓得，现在还有什么因素会促成事后的回信呢，特别是我的那封信是一系列书信中的一封，这些信之所以发出去了，仅仅是为了创造机会，以期不久得到回信。我一点儿都不想对您隐瞒，在这十六天中，我还有两封给小姐的信[8]一直没有发出。诙谐地说，唯独这两封信才可以称之为“活跃来往的书信”。最初我应该能够相信，可能是偶然的情况阻碍了小姐回信或使她没有能够回信。但是我经过方方面面的考虑后不再相信有什么偶然情况了。尊敬的夫人，如果不是您信中的那些评论深深刺激了我，如果不是除此之外我还知道，所写内容不是为了别人知道的这封信落到了心地友善和善于应付的人的手中的话，我肯定没有勇气对您做我这个小小的忏悔。

向您和您的亲爱的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卡夫卡 敬上

〔19〕12.10.14于布拉格

致索菲·弗理德曼夫人的信

慈爱的夫人：

正如我期待的那样，您16日的来信亲切、完美而明了，尽管信中引用的话我读了十遍仍然迷惑不解。但给您回信，重要之至，我甚至把公务都撂在了一旁。您在信中评论说“来往书信活跃”，这真的是轻率和毫无根据的。我是这样看的，并为此感到耻辱。当然，上封信中没有承认这一点，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封信就是多余的了。

那么，这种活跃的书信来往应该在10月3日或最早在2日就确实存在了，也就是在我那封未得到答复的倒霉的第二封信肯定已经到了柏林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写了回信，因为引用信中的话表明知道那封信？是

的，那些信是否压根儿就丢失了，否则处于心神不定的等待中的人怎么找不到别的解释呢？尊敬的夫人，您应该承认，我给您写信是对的，而且这是一件非常需要善神相助的事情。

向您和您尊敬的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卡 顿首

〔19〕12.10.18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尊贵的小姐：

即使我手下所有的三个经理都围站在我办公桌的周围，注视我写字，我也必须立即给您回信，因为您的信对于白白仰天企盼了三个星期之久的我来说犹如从天而降（有关我直接上司的愿望刚好得以实现）。如果我对您就您这期间生活的描述做出同样的答复的话，那么我的生活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期待您的回信，当然我把最近三个星期里给您写的三封短信也算在内了（天哪，恰好在这时有人向我询问关于刑事犯的保险问题），出于无奈，其中两封信现在可以寄出去了，而第三封，实际上是最先写的却不可能寄出。据说您的信是寄丢了（不得不向您做出解释的是，有关卡塔琳娜贝格官员约瑟夫·瓦格纳的事我一无所知），我当时提出的问题将得不到答复，但信的丢失我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我现在心神不定，不能控制自己，我的心情总是处于不停地抱怨状态，尽管今天已不是昨天，但积聚的东西会在好一些的日子里倾倒出来并自我解脱。

我今天要写的不是答复您的来信，也许明天或后天要写的是对您来信的答复。我的写作方式当然不是本来就可笑的，而是和我当前的生活方式一样可笑。有关我的生活方式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您描述一番。

总是有人给您送礼！这些书、糖果和鲜花都摆放在您的办公桌上，是吗？我的写字桌上却是一片凌乱，我把您的鲜花，我吻它就像吻您的手一样，很快放进我的公文包，虽然您那封无法取代的信已经丢失，但在我的公文包里已经有您的两封信了，因为我向马克斯讨来了您寄给他的信，这种做法虽然有点可笑，但并不一定可恶。

咱们之间通信第一次出现的不顺利也许正是件好事，我现在知道，尽管信件丢失，我仍然可以给您去信。不过不能再丢信了。再见，请您想着那一小段日记。

弗兰茨·卡 上

〔19〕12.10.23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首页上面边缘〕

由于担心可能会丢信，我非常紧张。另外，您没有把我的地址完全写对，正确的写法是这样的：Pörrsch, r和c上面都应该打上小勾，另外，为了保险起见，最好还写上工人事故保险公司。

索菲夫人的生日我明天写信时再告诉您。

尊贵的小姐：

昨天夜里可真是一个严重失眠的夜晚，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最后两个小时才强迫自己勉强入睡，可做梦不像做梦，睡觉不像睡觉。刚才在门口又一头撞在卖肉摊的木架子上面，我的左眼现在还有撞在木头上的感觉[9]。

这些情况肯定不会使我处于较好的状态，以克服给您写信时所遇到的困难，它们昨天夜里还不断以各种形式闪过我的脑海。这些困难不是在于我无法表达我想写的东西，这些都是极其简单的东西，但它们是如此的多，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我都无法把它们容纳。有时候，当然都是在夜间，我真想对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管了，也不写信了，情愿为了没有写出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写出的东西而走向终结。

您在信中写了您看戏的事，这使我颇感兴趣：其一，您身处柏林，那里是所有戏剧大事的发源地；其二，您选择的剧院都不错（除了都市剧院，那里我去过，很乏味）；其三，我对戏剧一窍不通。可是，您对戏剧的了解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对其他一切能够想象的事情一无所知，如此前怎么样，之后又怎么样，您是穿的什么衣服，是星期几，天气如何，您是看戏之前还是之后用的晚餐，您坐在什么位置，您的情绪如何，等等。当然您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写信告诉我，所以，一

切事情也都是不可能的。

3月18日才是索菲夫人的生日——作为一个纯粹的完整的通知——顺便直截了当地问一下，您的生日是哪天？

刚才办公室里的混乱使我写信时心猿意马，思路无序，所以我现在要问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您那天晚上在布拉格讲的话我顺便都记在脑子里了，因为我相信您说的。只有一点我还不十分清楚，那就是我在读您的信时想起来的，这里还需要您加以补充。当我们从住宅里走出来和勃罗德经理先生一道走向旅馆时，说真的，我当时六神无主，心不在焉，无聊得很，但至少根据我的意识，这不是经理先生在场的缘故。相反，我对感觉自己被冷落一旁倒相对感到满意。当时还谈到您很少在夜里乘车去市中心，即使您去看戏，在回家时也是通过一种在巷子口拍巴掌的特殊方式向您母亲发出信号，然后您母亲就叫人给您开门。用这种有点古怪的方式对吗？去都市剧院时，是否也有因为散场特别晚，才自己带钥匙的例外情况呢？这些问题可笑吗？我的脸部表情是严肃的，如果您要笑，那就请您友好地笑并详细回答我的问题。

至晚到春天，马克斯编辑的[10]《创作年鉴》将由莱比锡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判决》，里面的题词将是“献给菲莉斯·鲍小姐”。您是否认为我这样做太鲁莽了，特别是这个题词写在书上已有个把月，而且书稿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写这个题词的“目的是为了让她不是总是得到别人送的礼物”，如果我强迫自己去掉这个附加语（献给菲莉斯·鲍小姐），您会谅解我吗？此外，据我看，这个小说的主要内容和您没有一点儿关系，除了书中匆匆出现的一个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姑娘，后来我才发现，她名字的起首字母与您的一样。这里唯一有关联的是在于，这篇小说试图从遥远的地方使之对您有价值。这也正是题词所要表达的思想[11]。

不让我知道您对我的上上封信是怎么答复的，使我感到心情沉重。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得到您的音讯。现在却以完全多余的方式还要被忘却一个月。当然，我可以向邮局询问，但要想从那里获得比您还记得的那封信的内容更多的东西，看来希望不大。您能用十句话把您所记得的内容写给我吗？

今天就写到这里，就写到这里吧。在我写上页时，就连我躲藏的这间安静的房间也开始出现干扰了。您会感到惊讶，我在上班时怎么

会有这么多空闲时间（这是逼出来的例外情况）并且只在办公室写信。对此也有解释，但我现在没有时间给您写。

再见。请您别为每天接到挂号信签字而感到烦恼[12]。

弗兰茨·卡 上

〔19〕12.10.24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致索菲·弗理德曼夫人的信

慈爱的夫人：

非常感谢您处理此事所持的温和态度，此事现在已完全解决了。我的上一封信本来也不需要特别的答复，您没有给我回信，我并没有认为是对任何愚蠢的惩罚，因为由于紧张或其他什么缘故，我的两封信里很容易掺杂某些愚蠢。可是，您现在知道了，慈爱的夫人，由于没有收到您的回信，我是多么的痛苦，我情愿让您写信惩罚我的愚蠢，也不愿意收不到您的回信。出于这种考虑，我现在并不一定希望能得到您的回信，而是想继续得到像您最近给予我帮助的这种友好情谊。我也很希望能向您的亲爱的先生特别表示谢意，但我没这样做，一是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二是我知道，您和您的先生和如琴瑟，形同连理，向您表达的谢意也会传达给他的。

顺致

最衷心的问候

弗·卡夫卡博士 上

〔19〕12.10.24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尊贵的小姐：

今天是星期日，终于到了晚上8点，我可以提笔给您写信了。今天一整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尽快坐下来给您写信。您星期日都过得

愉快吗？在您进行过于繁忙的工作之后，我想肯定是这样的。至少一个半月以来，星期日对我来说是奇迹，在星期一早上醒来时我就能看到它的出现。问题是还得熬过一周，星期日才能到来，而且还得坚持干完一周的工作，一般来说，到了星期五就干不下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熬过去，即使在白天也像夜晚失眠那样心神不定，面对这无情的机械的一周时间，当您看到这样组成的绝望的时光不会倒流重现，而是似水流转，您最终为夜晚的开始松口气时，您真的会感到高兴。

我也是性情快活的人，但今天不是，今天我是在绵绵秋雨中进行我的周日散步的。我今天有半天时间是在床上这个伤感和思考效果最佳的地方度过的，这与信头的话似乎有些矛盾；土耳其人输了，这会使我作为一个冒牌预言家不仅主张军队，而且主张所有的一切都撤退（这对我们的殖民地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别无选择，只把自己当做聋子瞎子钻进他该做的工作中去^[13]。

我是怎么在和您谈哪！亲爱的小姐，要我站起来，不再写下去了吗？也许您会洞察一切，看到我毕竟很幸福，那我就留下继续写信。

您在信中提到，在布拉格那天晚上，您感觉不快，但您不愿意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您可能是因为我才产生不快的，因为此前马克斯几乎没有谈及根本没有使他感到忧虑和产生想法的那出轻歌剧，我还没有用我的那可笑的书信打破社交的同一性。此外，那时正好是我经常十分开心的时候，我常到奥托·布罗特家做客，布罗特习惯准时上床睡觉，每次我去时就把表往前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寻开心，布罗特也无法按时睡觉，直到他们全家一道，当然是友好地把我赶出他们家。所以，我出现得很晚，往往都在9点以后，这意味着某种威胁。家里人头脑中呈现出两个来访者：一个是您，他们总是希望向您表达尽可能的友好和礼貌，另一个就是我这个职业所决定的睡觉扰乱者。譬如，主人总是给您弹钢琴，而对我呢，比如奥托总是用手敲着壁炉的护热板，以示睡觉的时间到了，这对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看上去简直就是愚蠢和无聊。在那里会遇到客人，我没有丝毫的准备，那天只是和马克斯约好，8点钟去（和往常一样，我晚到一个小时）与他一块依序讨论稿子的事，尽管稿子第二天就要寄出，可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问过稿子的事^[14]。这时又有客人来，我真感到有些不快。与此相反的是，我对这次做客并不感到意外^[15]。在我被介绍之

前，我就隔着大桌子向您伸出手，但您几乎没有起身，好像也没有兴趣把您的手伸给我。我只是扫了您一眼，又坐了下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几乎没有因为您而产生一丝的兴奋，原本在熟悉的社交圈子里出现新人总会令我产生兴奋感的。虽然我无法再和马克斯继续讨论稿子，但给您传递塔利亚之行照片倒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消遣（为了这个非常精彩地描述了我当时印象的词汇，在远离您的今天，我真想打我自己）。您非常认真地看着照片，只有当奥托发表言论或我又递过去一张照片时，您才抬一下头。在介绍照片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我记不得是谁了，发生了滑稽的误解。为了观看照片，您连饭都没吃，当马克斯就饭菜发表高论时，您却说，您最憎恨的就是那些吃个没完没了的人。这时，电话铃响了（已经过了好一会儿，现在是晚上11点钟，一般我在这个时候开始工作，但我今天不能不继续写这封信）。对了，刚才写到电话铃响了，您正在讲述您在王宫剧院看的轻歌剧《汽车女郎》序幕的情节（有个王宫剧院吗？那是出轻歌剧吗[16]？）：有十五个人站在舞台上，从一间传出电话铃声的前厅里走出一个人，向那十五个人走去，以同样的方式挨个请他们出去接电话。我还记得这个方式，我当时不仅很清楚地听到了它，而且也从他们的口形变化中看出来了，打那以后，它多次从我的脑海里闪过，并一直在追求它的正确的构成。尽管如此，但我仍不好意思把它写出来，因为我不能正确地把它念出来，更甭说正确地写下来了。我不知道，后来（不是先前，因为我仍然坐在门旁，就在您的斜对面）谈话的题目怎么转到了打架斗殴和兄弟姐妹上面。还提到了我从未听说过的几个家庭成员的名字，还有个叫费利的（也许是您的兄弟？）[17]，您谈到，您小时候常常遭到兄弟和堂兄弟的打骂（弗理德曼先生也打您吗？），而您却没有自卫能力。您用手抚摩着当时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左臂。但您看上去并不伤感，当然我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我不能理解，即您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有人敢动手打您。——后来，您一边看着什么，一边读（您当时很少抬起头来看，当然那天晚上本来就是很短暂），还顺便提到，您学过希伯来文。一方面我对此感到十分诧异，另一方面我（这些都是当时的想法，并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觉得您不应该只是这样附带地一提。当您后来翻译不出特拉维夫这个词时，我心中暗自高兴。——同时我还发现您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觉得这很好。——还是在这间房间里，我们谈到您的职业，勃罗德夫人说起在您的旅馆房间里看到一件漂亮的麻纱连衣裙，可能您是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我更多的是猜测而不是记忆——一个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婚礼[18]。当您站立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您穿着勃罗德

夫人的拖鞋，因为您的靴子需要晾干。那天白天的天气很糟糕。您穿着这双拖鞋走起路来好像摇摇晃晃的，穿过黑暗的中厅后您对我说，您习惯穿带后跟的拖鞋。带后跟的拖鞋，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新鲜事。——在琴房里，您坐在我的对面，我开始谈论我的稿子。当时有人向我提出了关于邮寄稿件的滑稽的建议，我现在搞不清楚哪个建议是您提出的。我现在倒回忆起在另外一个房间发生的事情，为这事我当时惊讶得直拍桌子。您说，誊写稿件对您来说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您在柏林就曾帮助一位先生（没有姓名，没有解释，光是“先生”这个词真难听！）誊写稿子，您还请马克斯把稿子寄给您。——那天晚上我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我恰好带着一期《巴勒斯坦》杂志[19]，为了它，其他所有的事我都无所谓。后来，我们谈到去巴勒斯坦旅行，您把手递给了我或者说我凭借一种灵感把您的手引诱过来了。——在弹钢琴时，我坐在您的后侧面，我看到您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并好几次揪自己的头发。从正面看，我无法想象您的发型是什么样子的，在听琴时，我只看到您边上的头发微微翘起。——后来，大家四散开来，各行其是。勃罗德夫人靠在沙发上打盹儿，勃罗德先生在折腾书箱，奥托在摆弄壁炉护热板。接着，大家又聊起马科森的著作，您谈到阿尔诺特·贝尔[20]，提及《东方与西方》中的一篇评论[21]。最后，您一边翻着一本哥德编辑的艺术杂志合订本，一边说，您也开始阅读《诺内匹格城堡的故事》[22]，但没能读完。在您说这话时，我确实为我，为您，为大家感到惊讶了。这难道不是毫无作用、不言而喻的侮辱吗？当我们大家都把眼光投向您那仍在看书的脸庞时，您却像一位英雄似的做完了这件似乎是无可挽救的事。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侮辱，甚至连一种看法都不是，而只是连您自己都感到惊讶的事实，因此，您想有机会重新拿起这本书。这是使误会烟消云散的最好办法，我想，我们大家在您面前多少会感到羞愧的。——为了换换口味，经理先生拿出那本大型画册，并宣称，他将向您展示身着内裤的歌德。您引用别人的话说：“即使他身着内裤也是国王。”[23]引用这句话是我那天晚上唯一对您反感的地点。这种反感使我感觉好像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本来倒是应该自问，是什么驱使我参与此事。但我茫无所知。——最后，您快步走出房间，穿上靴子后又返回了来，动作之快，我简直无法理解。勃罗德夫人两次把您比喻成羚羊，这个我并不喜欢。——我还相当仔细地观察您是如何戴上帽子，别上胸针的。您的帽子很大，下边部分是白色的。——走到巷子里时，我立即陷入了我经常发生的迷离恍惚状态，此时此刻，我十分明白自己在这种状态下的无用。到了佩尔巷，可能是为了使我从无言的尴尬处境中

得以解脱，您问我住在什么地方，并想知道我回家是否与您回旅馆同路，可是我这个笨蛋却反问您是否想知道我的住址，显然我以为您一到达柏林，就会用火一般的热情给我写信谈去巴勒斯坦旅行的事，所以要避免由于没有我的地址而陷入失望的窘境。当然，在后来的路上，我所做的蠢事还一直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这也是当时让我不知所措的一件事。——在楼上第一个房间里和后来在巷子里都谈到您在布拉格分公司的一位先生，就是那天下午在荷拉查尼堡上和您一起坐在车里的那位。这位先生做得太过分了，那天他很早就拿着鲜花来到车站，而这正是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想做却未做的事。您很早启程并很快就得到了花束，倒使我轻松地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在奥布斯特巷和墓地旁主要是勃罗德经理先生在高谈阔论，您只是在叙述您母亲如何在听到您拍手后让人开门的故事，顺便提一下，对这个故事您还没向我做出解释呢。除此之外，时间就在比较布拉格和柏林的交通状况中被消磨掉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还谈到你们下午在旅馆对面咖啡馆吃点心^[24]。最后，勃罗德先生还为您的旅行提出了一些建议，向您推荐了几个途中可以进餐的地方。但您有意在餐车里用早餐。我还听说，您把雨伞忘在火车上了，这点小事（对我来说是一件小事）更丰富了我对您的印象。——您还没有整理箱子并且还要躺在床上看书，使我深感不安。在此之前，您看书一直看到凌晨4点。您带的路上看的书有：比昂松的《飘扬在海港和城市上空的旗帜》、安德森的《没有画的画册》。我的印象里，我是猜到了这些书，这还是我一生中沒有做到过的事情。步入旅馆时，由于拘谨，我居然挤进了您已经在里面的一扇转门里，差一点儿踩到您的脚。——之后，我们三人来到电梯旁，您马上就要消失在里面了，这时，电梯门开了，您仍在与后面站着的服务员聊天，显得很自豪。您当时说话的声调至今在我耳边萦绕。您不大相信去附近的火车站不用乘车。当然，您想您是从弗兰茨·约瑟夫车站乘车。——然后，我们作最后的告别，这时，我很可能是以笨拙的方式再次提及去巴勒斯坦旅行的事，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太多地提到去巴勒斯坦旅行的事，除我之外，恐怕再没有人如此认真对待这事了。

这些都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顺便想到的，也省略了不少但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是我这期间在勃罗德家度过的三十多个夜晚后的今天还能回忆起来的事情，可惜有些事恐怕已经记不清了。我把它们写下来，是为了回答您认为那天晚上您很少受人注意的看法，另外也是因为我好久都不愿意把尚在记忆中的那天晚上的事写下来。不过，当您吃惊地看着眼前堆着这么多涂写了的信纸时，首先会懊悔促使写成这些

东西的那个看法，然后抱怨自己还得读这些东西，也许是出于一点点好奇心，最终还是把它们读完了。这时，您的茶已经完全凉了，您的心情也变得很不好，以至您宁肯发誓，绝不用您的记忆去补充我的回忆，但是，由于气恼，您没有想到，加以补充并不像初次写下时那样费气力，我最初收集有关您的材料时感到很高兴，而您的补充将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愉快。——但现在您一定不愿意我再继续打扰您了，只是再表示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卡 上

〔19〕12.10.27

还没有完，甚至还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巧克力能保存多长时间而不坏？又及。

尊贵的小姐：

虽然时间很紧，但今天有点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谈（已经不在办公室写信了，因为办公室的工作反对我给您写信，它们对我根本就不了解，对我所需要的一无所知）。您不要以为，我又会用像前天那封冗长的信——为这封信我已经对自己进行了足够的指责——除了来占用您读信的时间还要占用您歇息的时间，并要求您详细地及时回信，要是我在您紧张工作之余还给您带去烦恼，我会感到羞耻。这就是说，我的信并不想这样，肯定不想这样，虽然最终还是这样的结果，但您不要往别的方面理解。只是请您——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如此的重要，以至匆忙之中成了喋喋不休的套话了）——不要在晚上长时间地写信，即使是您不是为了给我回信的缘故而是自己有兴趣写信的话。我想，要是能在您的办公室该多好啊——您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吗？——我不想在那里耽搁您一直到很晚。五行字，是的，您晚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写上五行字的信。尽管有反对意见，我还是不能压制不成熟的看法，即长信不行，总可以经常写写五行字的信吧。每当看到您的信到了的时候——现在邮件都是将近中午时送到——都使我忘却对您所有的顾惜，但是看到信的日期或是预感到我可能又骗走了您一次散步的时间，又使我无法忍受。如果我对您的头痛症也有责任的话，我是否有权劝您不要再服用匹拉米酮了？您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去散步？一周两次体操，三次看教授——您提到他的那封信肯定丢了——哪还有什么空余时间了？星期天还要做手工活，为什么要做这个？如果您母亲知道您把休息时间用来

干这些，她会高兴吗？特别是从您的信中看出，您母亲好像是您最要好和最快活的朋友。——假如您用五行字的信告诉我这一切，并使我感到心安的话，我们就不必再为此写信和思考了，就可以问心无愧、平心静气地互相观看，互相倾听，您用您的善意和明智，我做我该做的。

弗兰茨·卡 上

〔19〕12.10.29

尊贵的小姐：

您看，在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竟然有这么多想象不到的事。我能够揭开一个请求，即像我要您写五行字信的请求那令人作呕和虚伪的慷慨假象吗？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我的这个请求不是诚心诚意的吗？我认为它确实是诚心诚意的。我是否也可能认为它不是诚心诚意的呢？当然我认为它不是诚心诚意的，我认为它是那么的不诚心诚意！当我终于收到一封信时，那是在我的房门无数次被打开，但进来的不是拿着信的仆人，而是无数带着使我感到痛苦的面部表情平静的人，他们觉得应该来到这里，而这里只有拿着信的仆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都有权进来——后来当这封信到了时，过了好一阵我才相信，现在我可以平静下来了，我将从信中得到满足，这一天将会顺利地度过。但读完信后，我觉得信中内容比我能够要求获悉的要多，为了写这封信，您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可能没有时间再去莱比锡大街散步了，我读完一遍信，把它放到一边，然后再拿起来读，我拿出一份文件，可是眼睛看的仍然是您的信，我站在应该口述的打字机旁，但手又慢慢去摸您的信，我还把信拿出来，同事就向我问事，我完全明白，此时此地我不应该想您的信，但这又恰恰是我唯一想的一件事——当这一切过去之后，我又和以前一样饥饿，和以前一样不安，房门又嘲笑般地开始活动了，好像又有仆人拿着信进来了。用您的话说，这就是您的信给我带来的“小小的愉快”。这也回答了您的问题，即我每天去办公室收到您的信是否会感到不快。当然，把收到您的信与办公室的工作任意联系起来，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一边工作一边徒劳地等待来信或一边工作一边想着，也许信会寄到家里。总之，方方面面都会有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事情也没那么严重，因为最近我就通过办公室的工作办成了其他不可想象的事，人要是能被小的不可想象的事情吓倒，那就不会看到大的不可想象的事情。

另外，今天我十分满意，因为您最近的两封信先后在两个小时内到了我的手上。我当然要咒骂邮局昨天的混乱，但也要夸奖邮局的今天。

但我根本不回答，也基本上不提问，这一切只是因为，我没有马上意识到给您写信带来的快乐，正是由于这种快乐把所有给您写的信都计划得很长远很长远，既然这样，当然在信的首页上就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不过，您别急，我希望明天有足够的时间（我自己这样希望），一口气回答所有的问题并且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至少眼下使我的心情可以轻松些。

我今天还想说的是，我上次在写到关于您的帽子时，我咬了一下舌头。对了，您帽子的下部是黑色的？我的眼睛长哪儿去了？我观察得不仔细。那么，帽子的上部完全是白色的，我也许搞错了，因为由于我的个子，我是从上往下看的。当您戴帽子时，您还略微低着头。简而言之，和往常一样，表示歉意，但凡是我不完全清楚的事，本是不该写的。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如果允许的话，吻您的手。

弗兰茨·卡 上

〔19〕12.10.31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至少这一次您不要由于我这样称呼您而生气，因为如果我——您曾几次要求我——要写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我可能得谈谈对我来说尴尬的事，而面对一位“尊贵的小姐”，我又难于启齿。再说，这个新的称呼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否则我就不会挖空心思地想出来并感到十分的心满意足了。

从根本上说，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历来就是试图写作，但多数都是不成功的。但是，如果我不写作，那么，我就会倒在地上并被扫地出门。我的力量一直是弱小得可怜，即使我没有公开承认，自然而然地我会尽可能地积蓄力量，处处留意减少消耗，为了我追求的主要目标而保存必要的足够的力量。但是，凡是我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我的上帝！就是在这个假日值班的时候，在办公室也不得安宁，来访者一个接着一

个，就像敞开大门的小地狱），或是在想超脱一下自我的地方，我都会自我压制，自我伤害，自我羞辱，并且永远地被削弱了。但正是这目前使我感到不幸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了我信心，我开始相信，有那么一个地方，即使很难找到，肯定有一颗吉祥之星，在它下面可以继续生活。我详细地列过一个清单，记录我为写作所做出的牺牲和为了写作而失去的东西，或者确切地说，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承受这些损失

[25]。

确实，我这么消瘦，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瘦的了（我曾去过不少疗养院就能说明这一点），同样，我也不具有人们对写作方面称之为多余的和积极意义上的多余的东西。假使存在一种想利用或正在利用我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那么我就是它手中起码是明显经受过锻炼的工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也就什么都不是，突然剩下的是可怕的空洞。

对您的情思扩大了我的生活空间，当我清醒的时候，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您，有许多时候，我除此之外别的事什么都不干。就连这个也与我的写作有关，只是写作的此起彼伏决定着我，的确，当我乏力写作时，我从未曾有过勇气向您请教。这是真的，就像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有一种感觉那样真实，这种感觉使我仿佛觉得我的胸部打开了一个口，通过这个口在有力地并且是随心所欲地吸入、呼出，直至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通过回忆《圣经》中的一个故事来同时证实那种感觉的必要性和《圣经》故事的真实性。尽管我一直以为，我在写作时一点儿都不想您，但最后我还是吃惊地发现，您与我的写作密切相关，如同手足。我写过一篇短文，其中谈到与您和您的信的关系：有人送给某人一板巧克力。还谈到某人在工作时休息了一会儿。接着有人打来电话。最后某人逼迫另外一个人去睡觉并威胁说，如果他不服从的话，就一直把他带到他的房间。这些只是对您母亲因为您工作时间过长而生气的回忆。——这几处是我最喜欢的，我把您保留在其中，使您既感觉不到，又不会反抗。即使您什么时候读到这类文章，您肯定会忽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您可以相信，您可能不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而是在这里轻率地被捕捉。

我的生活方式完完全全是为了写作，如果它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写作，因为时光是短暂的，力量是有限的，工作是可怕的，住房很吵闹，如果生活的道路不是美好和笔直的话，那就只有试着依靠技巧迂回前进。一个人的满足可以通过时间安排这种技

巧来获得的，而写作成品比本来想写的更能体现辛劳，面对这种永恒的痛苦，那种满足是微不足道的。除了最近几天因为无法忍受的虚弱而造成的干扰外，我一个半月以来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8点到2点或2点20分在办公室，3点或3点半吃午饭，然后上床睡觉（多数情况下是想试着入睡，整整一周的时间，我在这样的睡眠中只看到蒙特内格人，他们那清晰可见的复杂服饰的细节使我感到非常厌烦和头痛）到7点半，之后做十分钟的体操，赤身裸体，窗户开着，接着散步一个小时，或自己一人，或和马克斯或者其他一位朋友，回来后和家人一道共进晚餐（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已经出嫁，一个已经订婚，单身的那个，在不影响爱别人的情况下，是我最喜欢的）^[26]，10点半（经常甚至是11点半）坐下来写作，视劲头、兴趣和运气的不同，写到1点、2点或3点，有一次写到凌晨6点。然后又是和此前一样做操，当然是尽量避免疲劳，漱洗，上床睡觉时经常感到有些心痛和腹肌抽搐地疼。现在是想方设法入睡，也就是说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睡不着（主甚至要求无梦觉）而同时还在思考着工作上的事，此外还想一定要解决肯定不能解决的问题，明天是否会有您的信，信什么时候能来。就这样，夜晚一般是由头脑清醒和无法入睡两部分组成的，我想给您详细地写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您愿意听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写完。因此，当我早上在办公室使出我最后一点气力开始工作时，也就不足为怪了。不久前，在去打字员那里所经过的走廊上放着一副担架，是用来运送卷宗和文件的，每当我从它旁边经过时，总觉得它对我特别适用而且在等待着我。准确地说，我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公务员，同时还是一个工厂主。因为我的妹夫^[27]拥有一所石棉工厂，我是股东（当然是我父亲的投资）并已注册登记。这个工厂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和担忧，但我现在不想讲这些，至少较长时间以来，我尽可能地忘却这个工厂（就是说，我不再进行我那无用的合作）。

今天我又只讲述了这么一点儿内容，根本还没来得及提问题就不得不收笔。但是，回信不能再丢了，毫无疑问，更不能再去丢信了。虽然现在有了一种妙法，用它，两个人既不用会面，也不用交谈，就可以了解对方的至少大部分的历史，简直是一下子，不必再互相写信，不管怎么说，这几乎已经是一种高级魔术（看上去不是这样），人们并不是从来索取报酬，更肯定地说不是从来不受惩罚地接近它。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把它讲出来，您得把它猜出来。就像所有的咒语一样，它特别特别地简短。

再见，请让我以长时间吻您的手来证实这个愿望吧。

弗兰茨·卡 上

〔19〕12.11.1

怎么，您也会疲倦？当我知道您晚上疲倦而又孤独地待在办公室时，我有一种几乎是恐惧的感觉。您在办公室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您是自己书写还是口述？您不得和那么多的人谈话，想必您的职位很高，因为低级职员都是默默坐在办公桌旁的[28]。您的办公室附近有一个工厂，这我已经猜到了，但那里是生产什么的呢？只有口述录音机吗？有人买这东西吗？我很幸运（如果在例外的情况下我自己不需要打字的话），可以口述，让一个活人去打字（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有时我一时想不出话来时，这个人可以偶尔打个盹，伸个懒腰，或者抽支烟并让我得空不慌不忙地向窗外眺望？或者像今天我骂他打字打得太慢时，他为了平息我的怒气便提醒我曾收到一封信。有没有胜任此事的口述录音机？我想起，不久前曾有人向我们展示过一种口述录音机（那时我还没有现在对你们竞争对手的偏见），但这东西非常无聊，也不实用。对做生意我不能设身处地的去想，我只是希望，就像我想象的那样，做生意在实际上也是不那么认真和严谨的，这样，您做生意时也可以无忧无虑，轻轻松松。另外，根据您讲的，你们布拉格的分公司在奥伯斯特巷或是费尔迪南特大街，但我没能找到。我找了好多次，按理说，从公司的名牌上总可以看出来一点关于您的迹象。

我并不太乐意谈我办公室的工作。工作本身并不值得您去了解，也不值得我写信告诉您，因为它从来没有给过我时间和安宁，好给您写信，反而使我变得现在这样烦躁和扫兴。

再见！明天很可能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天，到时我会给您写许多。您工作的不要太劳累了！不要使我悲伤！——在您收到我那封苦恼的信的那天我再给您写这些内容。我们有多么软弱的人啊！

弗兰茨·卡 上

〔19〕12.10.2

〔1912年11月2日〕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我的小外甥^[29]（妹妹埃莉的儿子）现正在我身旁哭呢，我母亲总是用捷克语称他是“乖孩子”，后来称他“小伙子”。我抬头看了一下表，发现已经是晚上6点了，不，已是6点半了，今天下午我在马克斯那里待的时间太久了，他给我朗诵了新作《走出裁缝学校》^[30]里的两个章节，故事情节非常美，充满少女般的情感，尽管如此，由于我要写这封信，有些段落我完全没有听进去，如果我细细算起来，从昨天夜里2点开始，也就是我停止写别的东西时，就打算要写这封信了。可现在已经这么晚了，根据我强制性的时间安排，我得睡上一个小时，再说现在是我真正夜间休息之前房间里唯一比较安静的时候，还有，桌上的校对稿^[31]已经搁了好几天了，我还没看呢，明天就必须送走了，看来，这需要占去我夜间的好几个小时；由于所有这些大部分是愚蠢的原因，这封信将不是我所希望的和星期天应该写得有条理的信。所有这些，包括最后这一条原因，使我很不满意，而且很悲伤，我听到厨房里那只娇小可爱的小猫发出的哭泣声，就像是我心中的哀鸣。对了，正如我预料的，我今天没有收到您的信，因为您的信一般都是每天第二趟邮差送来，而星期天只送一次信，最好的情况也是在熬过漫长的夜晚后第二天一早才能收到您的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一个小小的补偿，有人能够阻止我像上面那样称呼您吗？难道这种称呼在个别情况下或总体上是如此的不协调，以至别人一旦用了，就无法改掉吗？

亲爱的菲莉斯小姐，今天这个美好却十分短暂的星期天您是如何度过的？如果一个人在想另一个人，就会打扰他的话，那您在半夜三更一定会被惊醒，您早上在床上看书时一定是心神不定，吃早饭时一定是几次都没有找到可可和面包，甚至没有看到妈妈，您要带到新住宅的兰花肯定在半路上就枯萎了，也许直到此时此刻，当您在浏览《席林之逃亡》^[32]时，您才感到心安神泰，因为这时我没有在想您，而是在您的身旁。可实际上我并不在您的身边，我刚才听到，刚刚回到家的父亲在隔壁房间里讲到生意上的极坏的消息，我就过去和父母亲伤心而又心不在焉地站了一会儿。

最近几天里，对于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晚上，我又想到要补充两点，一点是我偶然在您的信中找到的，另外一点是我自己想起来的。您那次确确实实谈到，住旅馆让人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不明白我当时怎么忘记了这事。相反，当时我好像还说，我觉得住旅馆特别惬意。现在

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特别是去年深冬时，我不得不去波希米亚北部的城市作较长时间的旅行时更是感觉如此^[33]。我下榻的旅馆房间四面墙壁一目了然，房间可以锁上自成一体，衣柜、桌台和挂衣架等有数的家具摆放得井然有序，至少给我一丝崭新的、从未使用过的、注定会变得更好、尽力而为的生存感，但这也也许不外乎是一种超越自己的绝望，它在一家旅馆房间的冰冷坟墓里寻觅到了合适的归宿。不管怎么说，我在那里一直感觉良好，我住过的每个房间都给我留下了极佳的印象。总的来说，咱们两人可能都较少涉足外面的世界。您那种夜间连楼梯都不敢单独上的感觉怎么样了？您应该尽量住在低层，否则怎么能够听到您站在街上拍巴掌的声音呢（我完全不明白，关着窗户怎么听得到拍巴掌的声音）。您自己不愿意一个人走这矮楼梯？您，看上去如此镇定和自信的您？不，您写的关于如何打开房门的情景对我来说都是不够的。

那天晚上还曾谈到通俗剧。您虽然曾看过几次这类演出，但记不清剧名了。我知道，现在正好有一个这种剧团在柏林演出，剧团中有我一个好友，他的名字叫伊·略维^[34]，还有就是在我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后和第二封信前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是他给我带来了一条关于您的小消息，尽管他是无意识的，但我却很感激他。他经常给我写信，给我寄图片、广告招贴画和剪报等等。有一次，他给我寄来一张他们剧团在莱比锡巡回演出的海报。我几乎没有正眼看它一下，就把它扔在写字台上了。但和以往写字台上的情况一样，压在最下面的东西有一天到了最上面。有一次，这份海报（而不是别的什么）就摆在了最上面，而且完全打开着。无独有偶，我还比较认真地看了起来，因为上面有些十分有趣的东西（有一位女演员，年纪稍大，已婚，被称为“主角”，我对她还很欣赏，略维称自己是“剧中人”），但令人惊异的是，海报下面的角上有柏林伊玛努埃教堂大街，这海报是在这条街上印刷的。在我有幸不再以这类关于您的消息而满足的今天，出于感恩报德的心情想到，您是否愿意看看这些我可以没完没了地讲述的演员。我现在不能完全肯定，这个剧团是否还在柏林演出，但根据略维给我的一张票，不知道放在桌子的什么地方了，我可以这样认为，略维这个人至少会给您带来片刻的快乐。如果您愿意的话，您还可以在演出前或之后叫他找您一下，您一提到我，您就会认识他并听他侃一会儿。这个剧团很不错，去年他们演出我看了不下二十场，而德国剧一场都没看过——不过，我写的这一切决不是为了请您去看这个剧团的演出，不，真的不是。您在柏林有许多更好的剧院，而这个剧团演出的剧院很可能是破烂不堪，使得您不可能进去

看这个剧团演出。我甚至真想把刚才写的这些通通撕掉并请您相信，我真的没有劝说您去看这个剧团演出的意思。

就这样来结束星期天我给您写信的这部分时间？时间越来越晚了，如果我在我的夜间工作开始之前还想睡一会儿的话，我得赶紧了。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还没有写完这封远不能令人满意的信之前，我是不可能入睡的。

就此搁笔吧！拖拉的邮局，您的信或许已经在布拉格放了一天了，就是不给我！再见！

弗兰茨·卡 上

〔19〕12.11.3

现在已过午夜时分，真的，我只把校对搞完了，没有睡觉，也没有为我自己写东西。现在再开始写是太晚了，何况我还没有合过眼。这样，我只好怀着压抑不安的心情上床，争取入睡。您一定早已进入梦乡，我不应该还用简短的讲话影响您睡眠。不过，我又开始琢磨您的上一封信了，我想，您是否应该放弃在教授那里的工作。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但既然他天天晚上还要给您作重要口述，表明工作并不使您感到疲倦。现在我还要向您道一声晚安并心平气和地想念您。

弗兰茨·卡 上

现在是星期一上午10点半。从上个星期六上午10点半开始我就在等待一封信，可又是一无所获。我每天写信（这完全不是指责，因为这使我感到愉快），我真的不应该得到任何的回音吗？没有一个字？哪怕回信上只有“我不想理睬你”一句话，那也是好的。我相信，您今天的这封信中包含着一个小小的决定，这封信到现在还没有到也说明是一个决定。假使信来了，我就会立即回信，一开始就诉说等待的这两天是如何的漫长。好了，现在您就让我绝望地坐在我绝望的写字台前吧！

〔19〕12.11.4

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如果您愿意我像实际上那样不断给您写信，那您对宽恕我昨天写的

那封糟糕而又多余的吓人的信就不会感到为难了，因为正如信上写的，逐字逐句都是确实确实的。当然，今天您的两封信都来了，一封是清晨到的，另一封是上午10点半来的。我不但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而且还得到了每天收到您一封信的许诺（我的心哪，听着，每天一封信！），如果您谅解我的话，我会感到很高兴的。我只想恳求您，如果您写好一封给我的信，就不要让我遭受您手头没有邮票的折磨，即使是没有贴邮票的信您也要大胆而有力地投进邮筒。

令人遗憾的是，只要不是星期天，我几乎只能在我一天中脑子最迟钝的时候，就是清晨3、4点钟时给您写信。在办公室写信的时候很少——当我读完您的信后又怎么能克制自己给您写信呢？——假如我不是现在给您写信，在未得到满足之前我根本无法入睡，而且第二天您就收不到这封信了，再说晚上我的时间安排是非常紧张的。

您在信中说，我在节假日也写作，这是不明智的。比较起来，我的心脏是很健康的，但正是一个人的心绪是很难经得住糟糕作品带来的沮丧和精彩作品带来的喜悦。我以前住疗养院只是因为胃病和一般的身体虚弱，还有自作多情的忧郁症。关于这一切，我还记得详细给您写过。不，我不相信什么名医，我只相信那些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医生。此外，我还恨他们（但愿您也不喜欢他们）。当然，我很愿意听从医嘱，把柏林作为我享受自由和宁静生活的地方，但上哪儿去找这样能干的医生呢？对于疲惫不堪的人来说，伊玛努埃教堂大街是最合适的地方了，我可以给您描述一下这条大街。您听着：“从亚历山大广场开始延伸着一条很长但并不繁华的大街，它是普伦茨吕尔大街，也叫普伦茨吕尔林荫大道。这条街有许多横向小街道，其中一条叫伊玛努埃教堂街。它幽静、偏僻，远离熙熙攘攘的市中心。街口是一个教堂，对面的37号房又细又高，这条街很狭窄。每当我去时，那里总是那样的寂静，我禁不住地问，这还是柏林吗？”这就是我昨天收到的略维来信中对你们那条街的描述。我认为，整段的描写都是写实，而最后提出的问题很有诗意。我是不久前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向他提出这个请求的，他在信中描写了这条街，也没有问为什么。不过，我本来是想听听30号房子的情况的（如果我没有弄错，您现在住在29号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谈到37号房子。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张海报的印刷厂可能是在37号。从最后一封信看，这个剧团在柏林的最后一场演出已经在星期天结束了，不过从信中可以判断出，剧团下周可能还有演出。写这些只是为了更正上封信中所说的，完全没有劝告您去看剧团演出的意思。

这个有魔力的字眼（指“劝告”）碰巧在您最近的一封信中已经出现了，但我没有在意。由于其他许多事情，这个词被淹没了，我担心，这个词在我们的信中将永远上升不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因为我决不会首先讲出这个词，即便您猜出来了，您当然也不会首先说出它。也许这样最好，因为如果这个词的作用出现了，那一定是您在我身上发现了您不愿容忍的事情，那我该怎么办呢？

对于我的写作和我与写作的关系，您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不会再劝我要注意“适度”吧。“适度”已经给人造成了足够的弱点。难道我在我这唯一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上还不能使出我全身的力量吗？如果我连这点都做不到，那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瓜！我的写作可能一事无成，那么我也肯定毫无疑问的什么都不是。如果在这一点上我爱惜自己，那么我——正确地说——根本就不爱惜自己，而是摧残自己。对了，您以为我多大了？或许咱们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了，我不知道，也许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再见，请您继续保持对我的良好印象。请您把您已经开始的给索菲夫人的信搁在一边吧。我很喜欢弗（弗理德曼）夫人，但还不到愿意让您给她写信的程度。不，我和她没有书信往来。我只给她写过三封信：第一封是由于您的抱怨；第二封是因为您的不安；第三封是为了您的谢忱。再见！

弗兰茨·卡 上

〔19〕12.11.5

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人们当着我的面在撕碎着您呢！您不要和太多的人交往，这也没必要，好吗？如果您只是为此花费了一些时间，倒也无可指责。您不要干这么多的工作，进行这么多的拜访，不要去参加那些毫无益处、只能是令人不安的娱乐活动，好吗？我有点说教，尽管我对事情了解不多，懂得也很少，但是您最近的一封信流露出那么紧张的情绪，我真想把您的手紧紧抓住片刻不放。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一些具体的事，不是反对教授的善意引诱，如果我也被“水 and 气”惊讶得目瞪口呆的话。我也不反对基金会的庆祝活动，在这些场合经常要拍集体照，照片可以很容易四处散发，却不能明显表现自己。如果人们愿意，可以以此给外人带去很大的快乐。

对通俗剧团，我肯定没有讲过冷嘲热讽的话，即使嘲笑过，但也是出于对这个剧团的热爱。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还曾在许多人面前作过简短的开场白，而后略维还进行了表演、演唱和朗诵^[35]。但是，从这么多的人中赚的钱却并不多。关于柏林的演出，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昨天写的那些。此外，略维在最近的这封信中流露的都是怨言和苦衷，还谈到在柏林除周末外很难挣到钱。在您这位柏林人面前，我不应该隐瞒这种指责。还有，如果让略维随心所欲的话，他就是一个激动不已的人，就像东部人说的，一个“满腔热血的犹太人”。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谈起这些原因虽说不无聊却也没完没了，略维现在非常不幸，糟糕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帮助他。

我星期天期待着您的来信，这很容易解释，我去了办公室，看了看，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感到失望，我没有满怀期望，而是随便地翻着堆在那里的邮件。我住在尼克拉斯大街36号。您的住址呢？我在您的信封后面看到三种不同的地址，那么是29号了？接收挂号信您不觉得是一件麻烦的事吗？我寄挂号信不仅仅是由于紧张，尽管多少有那么一点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信可以更直接地到您的手中，不会像可怜的转来转去的平信那样由于疏忽大意而没个着落，我经常看到柏林身材魁梧的邮差伸着手，必要时即使你拒绝，他也会把信强迫塞给你。如果你是依赖别人的话，再多的帮手也嫌不够。——再见！我感到很自豪，这封信里没有抱怨，虽说对您抱怨也是件很美好的事。

弗兰茨·卡上

〔19〕12.10.6

〔1912年11月6日〕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最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昨天我声称为您感到担忧并竭力想说服您。但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不是在折磨您吗？虽说不是有意的，因为不可能是有意的，如果说是有意的话，那必定是因为您的上封信使我失去了知觉，如同魔鬼遇到了善人，但由于我的存在，由于我的存在，我在折磨着您。从根本上说，我没有变化，仍然在我的圈子里打转转。与我其他没有得到满足的东西相比，我只得到一个崭新的未能满足的愿望和一种崭新的人道的

安全感，可能是我最强烈的，作为礼物得到的，是对我失去的其他东西的补偿。可您感到不安和反感，在梦中哭泣，这比睡不着，眼睛瞪着天花板还要气人，您现在和那天晚上判若两人，那时您的眼光十分平静地从一个人投向另外一个人，掠过所有的东西，有时您在信中提到二十个人，有时又一个都没有，简言之，盈利在我们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十分不合理（真见鬼，在这个当然是属于您的寂静的房间里，是什么东西把您置于我的对面！）。

我再说一遍，不是我对此负有责任——我到底算什么呢？——但是，如果我的思想不想失去您的话，它一开始就针对的东西以及它瞄准的方向现在也是唯一的并不得不把您推向这个方向。人们指责我给您带来的是一种令人悲伤的暴力行为！

长时间的中断后（要是我有时间就好了！要是我有时间就好了！那我就能得到安宁，就能对所有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我知道，给您写信要谨慎一些。我永远不想伤害您，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尽管我想避免发生更难堪的事。我如果得到安宁，就会像刚才那样在楼上我的办公室里思念您，而不是看着公文发抖和呆坐在这个静得出奇的房间里并透过下垂的窗帘缝隙向窗外眺望。即使我们每天相互写信，也会遇到与今天不同的日子，也会经历另一种命运，而不是做办不到的事，是使出浑身解数分道扬镳，还是竭尽全力同舟共济？）。我只是能够指出中断，而不是别的什么。现在已是下午了，已是傍晚时分了。现在我再读您的信，发现对您昔日的生活不甚了解，只能从常春藤中分辨出您的面孔，您那时还是一个小姑娘，正透过常春藤望着田野。除了通过飞鸿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帮助我更多地了解您。您别信这个！假如我自己来了，会让您受不了的。我就是像上次和您一起去旅馆路上的那个样子。我的生活方式——以此我治愈了我的胃病——您一定会觉得滑稽可笑和无法忍受。数月之前，在我用夜宵时，我的父亲由于不习惯只得用报纸挡住自己的脸^[36]。多年来，我一直不讲究穿着。不管是去上班，还是上街或是坐在家里的写字台前，我都穿着同一套制服，甚至严冬酷暑都是这样。我的御寒能力几乎比木头还强，但即使是这样，也没有理由像我这样四处奔波，譬如像眼下已是11月的天气，我连一件大衣都没有，不管是薄的还是厚的，在大街上裹得严严实实的行人中，我简直像个身着夏装头顶凉帽的小丑，而且我原则上不穿马甲的（我是穿制服不穿马甲的发明人），且不谈我内衣方面不能细致描述的稀奇古怪的地方。假如您在您住的那条街的路口教堂附近遇见这么样的一个人，您

不知会被吓成什么样子！关于我的生活方式（且不管自从我采取了这种方式以来我身体比以前健康多了）需要做一些解释，不过这些对您都不合适，因为我由此获得的健康（当然我烟酒不沾，也不喝咖啡和茶，一般情况下——我以此打破了一个欺骗性的沉默——也不吃巧克力）由于睡眠不足而被破坏得荡然无存。最亲爱的菲莉斯小姐，请您不要因此摒弃我，也不要试图改变我，请您在我们彼此相互遥远的地方友善地容忍我。您看，像昨天晚上，我穿着往常的衣服，冒着严寒回到家，坐下来吃几乎天天都一样的晚餐，一边听我妹夫（不久就要成为我妹夫了）调侃，当 he 去前厅与其他人告别时，我独自一人（我现在吃晚饭的时间在9点半到10点之间）留在房间里，产生一股对您的情思，真恨不得把脸靠在桌子上，以得到一点依托。

您觉得我比我实际上要年轻，我几乎差一点就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因为这么大的年纪会使我本来就让您不满意的所有的方面更为严重。我比马克斯几乎大一岁，到7月3日就满三十岁了。不过我看上去还是个小伙子，根据不知情人的判断，我的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

昨天我好像谈到了那位教授的事，这可能会被误解为傲慢，不，这只不过是嫉妒而已。直到今天，至少是在我的意识中，我才对他有些反感，因为他向您推荐宾丁的著作，我虽然不太了解此人，但他的著作都是虚伪和过分的赞颂辞藻。他却在您的睡梦中带去这些颂词！——而且现在还很快。您为什么从电车上跳下来？如果您下次还这么干，我就会大吃一惊地出现在您的面前！还有眼科大夫？头痛？如果您下一封信不回答这些问题，我就不看信。

弗兰茨·卡 上

〔19〕12.11.7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您的上上封信（不是您信中说的最近几封信）把我搞糊涂了，这是肯定的，但我没想到事情会像您在最近一封信中说的那么严重。我真的这么没把握？隐藏在我身上的不耐烦和不可救药的不满意居然在看得见的字里行间发抖？我的看法难道还要由我的信告诉我吗？您看我的事是多么令人悲伤，我要使尽全身的力量把您也拉扯进来。

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正确想象我的生活并理解我的敏感，我的敏感是神经质的，并且无时无刻地存在，什么时候诱发了，剩下的我就犹如一块石头。我把您的信大约看了二十来遍，刚收到时看了几遍，坐在打字机旁又看了几遍，有个投保人坐在我的桌子旁时我也在读您的信，好像是刚刚收到似的；我在街上时就看了信，现在我是在家里看。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而且感到无能为力。假使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会沉默的，可我们现在相隔遥远，我只有写信，否则我就会悲伤死了。谁知道我是否比您更需要那只手的压力，不是那只安抚的手，而是那只给予力量的手。由于疲劳，我昨天非常难受，难受得要死，昨天夜里，尽管我多次下决心，最终还是没有写成信。我昨天晚上在街上走了两个小时，直到揣在口袋里的两手都快冻僵了才回来。后来我几乎连续睡了六个小时，只恍惚记得做了个梦，是关于您的梦，反正梦到的是件什么不幸的事。我梦见了您并能记起这个梦，这不是第一次。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这个梦在那天夜里唯一一次唤醒了我（哪怕是短暂的）。此外，清晨时，我比往常更早地被叫醒了，我们的小姐^[37]闯进房间，大喊大叫，半睡半醒的我觉得好像是母亲的叫喊声，她告诉我说，我妹妹午夜后不久生了一个女孩^[38]。我还是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一般来说，即使发生紧急情况，家人也不故意叫醒我，更多的是由于门外的嘈杂声——我无法理解我们的小姐为什么对我妹妹生孩子那么的高兴，可是我，作为哥哥和舅舅，没有一点儿喜悦的心情，有的只是愤怒的嫉妒，对我妹妹或更多的是对我的妹夫。因为比较肯定的是，我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我不想毫无用处地谈论更大的不幸）。

由于昨天夜里充足的睡眠和经历了一个由于愚蠢的谨慎而错过的晚上，今天我感到十分高兴。最最亲爱的小姐！

弗兰茨·卡 上

〔19〕12.11.8

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现在是深夜1点半，我没法去拿信纸，信纸放在我隔壁的房间里，那是我妹妹的卧室，现在家里有些混乱，因为我父母的孙子，也就是我的外甥由于他妹妹的降生住到我们这里来了。所以信就写在这张吸墨纸上，同时也给您寄去了我这本小书的清样。

现在您听着，最亲爱的小姐，对我来说，我的话好像在宁静的夜里

更加清晰。咱们还是把今天下午我那封信忘掉，不要把它当作一封信，而当作一个警告记住。当然要首先征得您同意。今天下午写完信之后的时间将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可怕时光，在写信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难受了。我就是这样，如果我不能给自己写点什么的话（当然即使这不是单独完成的话）。如果我活着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冷漠或习惯和存在的东西，并让它们用它们的冷漠和活生生的现实力量来替代我的缺陷，那样的话，生命对我来说就会悄然而去。但当我接近别人并全身投入时，苦恼将是不言而喻的。那时我就什么也不是，那我还能干什么呢。我甚至认为，上午收到您的来信对我来说是合适的（下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需要的正是这些话。但是我还是没有休息过来，我发现，我写得不够清楚，您今天的指责即使针对这封信也是对的。我们还是让睡眠和上帝去决定吧。

您觉得清样的字体如何（到时候当然用另外不同的纸）？它显然是有点过分的漂亮，它更适合于摩西的十戒，而不是我的小小的托词[39]。但现在就这样付印了。

再见！我对友情的需要比我应该得到的更多。

弗兰茨·卡 上

〔19〕12.11.8

〔在《马路上的孩子们》清样的背面[40]〕

最亲爱的小姐：

您不能再给我写信了，我也将不能再给您写信了。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不幸，我是无可救药了。为了认识到这一点，我本来是无需昨天夜里默数钟声，彻夜不眠的，我在写第一封信之前就知道了。可我还是眷恋着您，我是该遭受诅咒的，假如我还没有被诅咒的话——如果您要您的信的话，我自然可以给您寄回去，尽管我非常愿意保留它们。如果您真的一定要，您就给我寄一张空白明信片，我就会明白。然而，我却恳求您保留我的信件——您尽快地忘记我这个幽灵吧，愿您生活的像以前那样快活和宁静[41]。

〔1912年11月9日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稿〕

最亲爱的小姐：

上帝保佑！我也这么说。您要知道我通常星期五、星期六是如何度过的，特别是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六的夜里。那真是没有一刻钟的钟声我不是在数着，下午，我在极度的自我责备下写了上上封信，然后溜达了一会儿，躺下时已经很晚了。也许——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是由于极度的悲伤睡着了。晚上我为自己写了三四页的东西已经相当不错了，我曾徒劳地问我自己，当我的心境与平静无缘时，居然在我身上还存在能够写出这样东西的平静的角落。后来我觉得我是一个完整的人并在吸墨纸上写了那封信，那封信在我的手下又变成了一封恶意的信，我盯着它，好像我不是写信者，而是收信人。然后我躺了下来，显然是很快地就入睡了，尽管睡得一点儿也不深。但一刻钟之后，我又醒了，半睡半醒的我仿佛听到有人敲门

〔信在此中断〕

（现在我要办一件紧急的、可恶的、搁置已久的、一周以来一直威胁着我的事，而不允许我自己想一下您，在这件事上您必须支持我，也许之后作为奖励我会得到空闲和安静来写这封信，这封信对我来说犹如心脏跳动一样重要，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信，好像我并不是坐在一家公司里，我已经把半天或更多些的时间卖给了这家公司，他似乎也有权力不断地向我提出要求，所幸运的是，尽管我还没有完全睡醒，但并没有把重要的工作搞错，不过现在不再写信和工作了。）

没人表扬我，我的工作却没完没了地追着我，而脑子里想的仍是您，只是朝另外一个方向想。您最近的三封信我几乎是今天一下子收到的。您的善意是无穷无尽的。眼下我先寄去这封信，今天我可能还要写几封信。我将向您详细解释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写信。这封信我就这样把它投进邮筒里了，因为没有一封我的信在往您那儿去，这使我感到很痛苦。

几个小时后再见。

弗兰茨·卡夫卡 上

〔19〕12.11.11

最亲爱的小姐：

这么说我并没有失去您。对这一点我一直确信不疑。您声称我一

封信是陌生的，那封信使我感到吃惊。从中我看到了无意的、然而更加肯定证实的灾情，至少在最近我自以为躲过了这场灾情的大部分，但现在又遇到了并一下子被它吞没了。我不能克制自己，我不知道给您写什么，星期六写的两封信人为地从一个终结走向另一个终结，我确实确实认为，一切都完了——这是否也意味着什么：正在我写这个字的时候，我母亲哭泣着，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即使这样，她还得去店里，她每天都在店里，三十个春秋，天天如此）来到我的房间，她抚摩着我，问我有什么不舒服的，问我为什么在饭桌旁不说话（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因为我必须顶住），并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可怜的母亲！不过我还是非常理智地安慰她，吻她，最后还是使她露出了微笑，甚至在泪水未干时对我下午不吃点心（我已经多年来不习惯吃了）进行了狠狠的斥责。我也知道（她不知道我知道，或者说她不知道我是后来知道的），她为什么对我特别担忧。不过这些事情下次再跟您说。

现在又是这个问题，即我有好多话要想跟您说，却不知从何开始。尽管如此，我把最近三天看作是不幸和继续等待的预兆，并且在工作日的不安中将不会给您写一封较长的信。您必须同意而且不要生气或指责我，因为您知道，不管您愿意否，我是如此地拜倒在您的脚下。我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您，却不给其他任何人留下半点的痕迹和丝毫的思念，不过我不想再看到像那封信中的指责，不管是有过还是无辜的。我不仅是因此从现在开始只给您写短信（当然星期日我还是会兴奋地给您写特别长的信），而且也是因为我要竭尽全力写我的小说，这部小说也属于您，或者说是我对您表达的情意，这种方式可能比最长生命的最长书信中的仅仅是文字的表达到要清楚。我正在写的，当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的故事叫——为了使您暂时有个概念——《失踪者》，是讲美国的事^[42]。眼下已经完成五章，第六章也差不多了。各章的题目如下：第一章：司炉；第二章：舅舅；第三章：纽约近郊乡村别墅；第四章：通往拉美西斯之路；第五章：西方饭店；第六章：鲁宾孙事件。——我点出这些标题，好像人们借此可以想象出点什么，这当然是不行的，但我要把这些题目保留在您这里，直到这成为可能。这是第一件较大量的工作，一个半月以来，在我经历了十五年的、有些时候感到绝望的痛苦之后，我在这项工作中有一种安全感。这项工作必须完成，您可能也这样认为，托您的福，我要把这不多的、本来可以用来给您写那些不详尽的、不完整的、不小心的和重要的信的时间用在那项至少已经稳定下来并找到正确途径的工作上。您同意吗？尽管这一切，您不会让我陷入可怕孤独的处境中吧？最亲爱的小姐，现在让我好好看着您的眼

睛。

星期天我将以尽可能的明智态度来回答所有的问题，也包括我昨天为什么没有给您写信的问题，这可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如果不是因为眼睛痛去看眼科大夫，那就必须详细说说这件事！

三天来，我失去了从电车上跳下去的快乐，这是因为担心您在任何一次转达想法的过程中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我的警告。现在我终于得到了您的坚定许诺，所以我又可以从电车上往下跳了。这里我回想起星期六发生的一件事。我和马克斯一起外出，称我自己不是一个十分幸福的人。路上，由于我不小心，一辆车擦着我身边驶过，我脑子仍在思考着，同时用脚踩着地，嘴里喊着模糊不清的话。那一刻，我真的恼火了，怎么车子没有从我身上压过去，马车夫当然是误解了并不无道理地谩骂了起来。

不，我不会完全离家去过隐居生活。附上的这篇描写我们家住房声响情况的文章就能证明这一点。这篇文章对我们家进行了有些令人心痛的公开指责，它刚刚发表在布拉格一家小杂志上^[43]——除此之外，我最小的妹妹（也已经二十多岁了）是我在布拉格最好的女朋友，另外两个妹妹对我也很好并很关心我。只是父亲和我，我们之间的积怨甚深。

要是您用“你”称呼我一次，听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哪怕是一句引用语！

快点，在我搁笔之前，您是否能告诉我一种办法，使我在办公室读您的信时不至于像个小丑激动得浑身发抖，以便使我能继续在那里工作而不至于被开除。我能够心平气和地看信，不是吗？然后把它忘掉几个小时。这还是能做到的。

弗兰茨 上

{19} 12.11.11

菲莉斯小姐：

现在我要向您提出一个请求，乍一听起来，这个请求的确是荒唐的，如果我看到这封信，也会有同感。但这已经是对一个心慈好善的人能够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了。我想请求您，每周只给我写一封信就行

了，并让我每次都是在星期天收到您的信。因为我受不了每天都收到您的信，我无力承受它们。比如我每次给您写回信后就躺在床上，表面上很平静，但实际上心怦怦直跳，就像怀里揣着一只兔子，满脑子想的都是您。我是属于您的，真的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表达这一点了，别的方式都显得软弱无力。但正因为如此，我不想知道，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我不会生活，这使我很苦恼，所以，我不想知道你对我的好意，否则我为什么还傻待在办公室或家里，而不是闭上眼睛，一头钻进火车，等到了你身边，再敞开我的心扉。是的，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里有一个可怕的原因，很简单：对我自己来说，我的身体还算健康，但不能结婚，更不能当父亲。但是，当我看到你的信时，我似乎还能够看到比无法忽视的东西更多的东西。

要是我已经得到你的回信那该多好啊！是我在折磨你，强迫你在你安静的房间里写这封信，这是多么的可憎，你桌子上再没有比这更可憎的信了！有时候，我真的感觉我好像是一个鬼怪，正在吞噬你那吉祥如意名字！星期六写的信里我向你发誓，请你不要再给我写信了，也为我向你做出同样的许诺，要是我把这封信寄出去了就好了[44]，我的上帝啊，是什么阻止了我把这封信投出去呢？这也好。现在还有没有可以和平解决的办法呢？要是我们每周只通一次信是不是会有帮助？不，要是用这种方式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这就只是微不足道的痛苦了。我预感到，星期日的信我也承受不了了。信写到这里结尾时，我已感到浑身有气无力，为了弥补星期六错过的东西，我请求你：让我们算了吧，如果我们还热爱自己的生命的话[45]。

我想用“你的”来署名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不，我的和永远与我连在一起的，这就是我，并且我只能试图满足于此。

弗兰茨

〔19〕12.11.11

〔11月17日，星期日，和一束玫瑰由邮差一并送上〕

〔1912年11月13日〕

可怜的企图：寄去罪恶的话语后还要送上清白无辜的玫瑰！然而，正是这样：对于在一个人心中占据位置的东西来说，外界的确是太窄小，太清晰，太真实了。——好，但这个人至少在面对他以为要依赖的

人时应该保持理智——那就是说，正是在根本完全不可能的地方？

最亲爱的，最亲爱的，假如这个世界上有那样的心慈好善的话，人们就不用担惊受怕，不用心绪不宁了。收到来信时——我正在上司那里谈采石矿井的保险问题——我又用往日颤抖的手抓住你的信，眼睛盯着像是一个幽灵的上司。当我刚把信读了两三遍后，正像我长久以来所希望的并在三天前夜里祈祷过的那样，我心里十分平静。你的信封——这么说不不对，应该说这个信封，但“你”和“你的”都要突出——上面写着安慰话语的信封不会起这个作用，因为我是后来才看到它的，而信中所写的只能使我摇头，因为越往下看就越使人在这个旋转的地球上感到恐惧——而紧紧抱着我的只能是你，为了这个你，我跪在地上感谢你，是围绕着你发生的混乱迫使我这样做的，现在你又把它还给了我。你，最亲爱的！现在我可以对你放心了吗？像穿着冰鞋在滑行的“您”可能在两封信之间的缝隙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得不在清晨、中午和晚上带着信和想法去追赶它，而“你”却站着不动，像你的信一样一动不动，任凭我吻了又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啊！再没有什么东西像它那样把两个人天衣无缝地联结在一起了，尤其是如果他们两人和我们两人一样，有的只是话语。

今天我是办公室里最平静的人，平静的就像最严厉的人在一周时间之后对他自己所能要求的那样，我还会给你讲它的事。是的，我只是在想，我看上去还蛮不错，我办公室里总有那么几个人，把每天对我品头论足当成一件正经事。这是他们自己说的。我没有急于给你回信（再说今天也根本不可能），但我丝毫没有不给你回信和不向你表示谢意的意思。

最亲爱的，最亲爱的！要不是我担心会有人闯入你的房间，发现你正在看信，看到你正在研究长达数页的单调的内容，我真想把这个词一连串写上几页。昨天的信我只写了几行字，这封信你星期天会收到。如果现在要取回这封信，会花费我很大气力，但也没必要这么做。提到这事，目的是不要你感到吃惊——不使你感到吃惊，但迄今为止我总是这么干的——这几行字的信没有日期、标题和署名，想通过这些企图在可怜的疑惑不定中重新获得占领的地位。请怀着善意看信！

不过请告诉我，你是从哪里知道我最近给你写信所表达的是痛苦，而不是胡说八道。但看上去却很像后者，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我会竭尽全力扔掉这封信。比如最后一封信，它不是写出来的——请谅解这种

表达方法——而是呕吐出来的。我躺在床上，想写的内容不是顺序排列的句子，而是唯一的处于极度紧张之中的、如果我不把它写下来会置我于死地的一句话。当我真的写下来时，内容就不那么贫乏了，我已经可以找到更多的词汇，跟随着记忆，信中有些地方还穿插着一点令人慰藉的假话。但是，我太轻率地把它们送上了路，又过于急躁地把它们抛了进去，如同我虽然作为一个不幸的人回到了家，但最终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直到入睡前可怕的两小时又使我产生另外的想法。

不谈这些了。我还会得到你的信的，你什么时候写都可以，或更好一点，什么时候能写就什么时候写，可不要为了我在办公室一直待得太晚，如果收不到信，我会受不了的，如果再来一封信，它会在我的手中变得栩栩如生，我感觉还从未有过一封信是这样的，它对我的眼睛和嘴唇来说等于代替所有没有写的信。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如果你不是急着去排练的话，可以在这美好的晚上出去散散步（昨天晚上我和我的小妹从10点散步到11点半，我们晚上10点出发了，11点半才回来。你可能还不能想象我妹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二十岁，长得又高又大，但十分天真幼稚）。祝你扮演“幽默者”成功[46]！我是在折磨马克斯，为了你，我处处给他找麻烦，而这个笨蛋对打电话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就知道评论你的笑声。在打电话之前，你那么开心地笑，说明你非常懂得打电话。而我呢，只要我一想到打电话，就笑不出来了。还有什么能阻拦我去邮局向你祝晚安？但邮局那里乱糟糟的，站在柜台旁要等一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跑到电话机旁，浑身开始哆嗦，然后低声细气地问你在不在，终于听到了你的声音，但又没有力量回答，谢天谢地，三分钟过去了，现在急不可待地要回家，真的和你谈谈——不，还是算了吧。此外，可能性总是美好的希望，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担心，马克斯把它给忘了。

好，现在我要好好地睡觉了。最亲爱的，我最亲爱的，我完全没有音乐感，但音乐与此无关！

你的 弗兰茨

[19] 12.11.14

最亲爱的：

请保持镇静，我只是想向你祝晚安，因此，信写了一半就搁笔了。我担心，我过不了多久就不能再给你写信了，因为要给某人（我不得不

点出所有的人名，所以就称为“某人”）写信，就必须想象眼前有一张可以注视的面孔。我可以很好地想象你的脸庞，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但是，更强烈的想象开始越来越经常地阻止我把我的脸放在你的肩膀上，我冲着你的肩膀，你的衣服，冲着我自己在说，但说话不清，难以理解，所以你也无法知道在说什么。

你现在睡了吗？或者你还在看我会谴责的东西？或者你还在排练，我可不希望是这样的。根据我的总是在走、从未偷懒的表看，现在差七分钟1点。记住，你需要比别人更多的睡眠，我是睡的少，但比常人睡觉少不了多少。我认为，我要把我通常睡眠时没有使用的部分作为最好的东西保留起来，那就莫过于你那双可爱的眼睛。

不要做凌乱的梦幻！我的思想围着你的床转了一圈，又下令止步。我把这里进行整理后，可能还把一个醉汉赶出了伊马努埃基尔希大街，然后我也带着一切就绪的心情回家继续写信，或者也可能就上床睡觉了。

最亲爱的，你在接到我的信时都在做些什么事情，请每次写信时都告诉我。我将据此控制我的想象。你要尽可能使事实接近我的想象，经过多次的尝试，事实与想象终于汇合了并成为唯一伟大的现实，对这一现实人们完全可以放心——现在钟楼正好敲响了布拉格1点钟。

再见，菲莉斯，再见！你的名字是怎么起的？它不愿离我而去！又闯入我心扉，可能是通过拥有飞翔能力的“再见”这个词。我想，如果飞向天空可以摆脱身上的负重，就像我是你的负重一样，那一定是非常怡然自得。你不要被向你招手的轻松愉快所引诱。保持“你需要我”的错觉。考虑的再深刻些。这对你不会有任何损害，你想抛弃我，你会拥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这期间你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件我这辈子做梦都寻觅不到的礼物。就是这样，尽管你做梦也会摇头。

弗兰茨

〔19〕12.11.14

和我之前想的一样，你，这个“你”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今天，也就是第二天，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我应该可以做到心平气和，今天没有来信，没有什么比这更说明问题的了。我可怎么办呢？我坐立不安，在楼道里转来转去，眼睛盯着每一个侍者的手，吩咐他们去做并不是非

做不可的事情，目的是为了使人专门到楼下去取邮件（因为我在四层楼，而信箱在楼下，邮差送信又没准儿，此外，我们要选举董事会了，而准备工作十分费劲，还在从邮件中找出我的信之前，我在楼上已经不耐烦了），我最终忍耐不住了，谁都不相信了，自己跑下楼，当然是一无所获。我吩咐过三个人要首先把你的信给我拿上来。由于三个人担负这个任务，我应该介绍一下他们：第一个是侍者梅格尔，谦虚恭顺，乐于助人，但我特别反感他，因为我注意过，每当我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时，就极少收到你的信。每当这时，一见到他那无意中表露出来的残酷无情的外表，我就感到毛骨悚然。今天又是这样，我真想至少把他那双空手抽打一顿。但他看上去还有同情心，因为有好几次没信时我问过他，是否明天可能会来信，他总是毕恭毕敬地点头称是。但我不愿意承认他有同情心，我为此感到羞耻。我现在想起来了，有一次我断定会收到你的信，那可能是在最糟糕的第一个月，这个侍者在楼道里告诉我说，东西来了，在我桌子上。当时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办公桌旁，看到的却是马克斯从威尼斯寄来的一张名片和一张贝利尼的照片，上面写着：“爱情，地球的统治者”。但是，对我面临的绝无仅有的、自我折磨的状况，这种空泛的辞藻又有什么用呢！——第二个是发送部经理沃塔瓦，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光棍，脸上布满皱纹，点点色斑，满腮短髭，湿乎乎的嘴唇上总是吧嗒吧嗒地叼着一根弗吉尼亚雪茄，但他也有时像下凡天女一般，那就是当他站在门口，从怀里掏出你的信递给我的时候，因为——可以理解——这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他肯定是察觉到什么了，因为他只要有空，总是想法赶在另外两人前面，不顾爬四层楼。当然，有时本来可以在这儿或那儿早些把信给我，但他为了能把信亲自交给我，在侍者面前就不把信拿出来，这使我哭笑不得。当然，没有点乱也不行。——第三个希望是伯姆小姐。她把递信看作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她来时光彩照人，把信递给我时，流露出一种表情，好像这虽然是一封别人的信，但实际上只是关系到我们两人，她和我。如果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个拿到信给我，我告诉她，她几乎要哭出来，决心第二天要多加注意。但公司很大，有二百五十多名员工，很容易有别人抢在她之前拿到信。

今天这三个人都无信可取。我真想知道，这种情况我还要遭遇多少遍，今天不可能有信。也只有在今天，在这个过渡的日子里，我坐立不安。如果你在明天的信之后不再写信了，我就再也不管了。我以前对自己说过“她不写信了”，这太可怕了。现在我要说“最亲爱的，你去散步了”。对此我只能感到高兴。你本来是几点钟收到我的信的？

〔19〕12.11.15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最亲爱的，今天我先给你写信，然后再写公文，好使我不要有让你等待的感觉，使你不是在我的对面，而是和我在一边，使我能够平静地为我写信，因为——可别告诉别人——最近几天我在写作方面收获甚少，是的，几乎是毫无所获，我和你的联系太多了，想你想得太多了。

那可能根本不会及时寄到的两本书，一本是为你的眼睛，另一本是为你的心。第一本真的或多或少是随便和偶然找出来的，这也好[47]。有好多书应该先给你，而不是这本书，但这也表明，我们之间也可以发生随便的事情了，因为它已经变成必要的了。《情感教育》一书多年来如同仅有的几个朋友陪伴着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翻开这本书，都会使我激动不已，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一直感觉自己是此书作者的精神之子，尽管是一个可怜的愚笨的[48]。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懂法文。如果懂，我再给你寄去最新的法文版。告诉我，你懂法文，即使这可能不是真的，因为法文版的语言非常华丽。

对你的生日（它正好和你母亲的生日同一天，你的生命就这样直接地延续她的生命？）我不能有任何表示，因为即使是有很急切的祝愿，那它们也同时是针对我的——但我不能说出来，如果我有能讲出来的，那就是自私自利。为了使我完全有把握保持沉默和不表达愿望，请允许我，然而只是在想象中，而且仅此一次，吻你可爱的嘴。

弗兰茨

〔19〕12.11.15晚11时30分

马克斯·勃罗德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亲爱的小姐：

多谢亲切友好的来信。我今天下午和弗兰茨谈，当然不提你的信，然后立即给您回信，如果情况不是像我希望的那样，问题已经在此期间得到解释，从而使这次谈话成为多余的话——我只是请求您，在一些事情上宽恕弗兰茨和他常常是病态的过分敏感。他完全被眼下的气氛所左

右。他也是一个入，想得到非得到不可的东西，万物之中的极限。他从不甘心妥协。比如：如果他感觉不能全神贯注地写作，他就可以一连数月只字不写，而是满足于只写了一半，倒也还不错的作品。正如对文学一样，他在这方面也是全身投入。由此常常产生一种假象，好像他喜怒无常，神经过敏，如此等等。我十分了解他的性格，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这样过，而在选择实用物品时，他甚至很聪明，很灵活。只是在理想的东西方面，他很严肃认真，这方面他十分严格，首先是对他自己，由此而造成他虚弱的身体，由于他外部的生活环境（办公室！）不是最有利的，面对这些冲突，人们应该通过理解和友善帮助他加以摆脱并认识到，对待像他这样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奇特人物，应该不同于对待成千上万的平庸之辈。我相信，您不会错误理解我的意思。我请求您，再遇到今天这种情况就来找我——弗兰茨每天在办公室要待到2点，这使他很痛苦。下午他休息，只有晚上才精神饱满。这真是件苦恼的事！此时，他在写一本小说，据我所知，这本小说将使所有文学作品相形见绌的。要是他是自由的并受到好心对待，他会创造多少东西啊！

再最诚挚地请求您，不要告诉任何人说我在柏林。我没有找过任何人，只同您谈过。——祝您一切安好，万事如意。

最衷心的问候！

马克斯·勃罗德 上

1912年11月15日

最亲爱的，不要这样折磨我！不要这样折磨我！今天是周六，但你也不给我来信，正是在今天，我想，就像夜晚之后是白昼一样，肯定会有信。但是，谁要求得到信，只有两行字，一句问候的话，一个信封，一张名片，寄去的四封信，这是第五封，我还没有收到你一封回信。不是吗，这不好。我应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日子，工作，讲话，和要求我做的其他事情。也可能根本就没写，因为你没有时间，排练演出或者开会占用了你的时间，不过告诉我，是谁占用了你的时间，使你不能到旁边一个桌子，用铅笔在一小块纸上写上“菲莉斯”并给我寄来。对我来说这已是很多了！这是你生命的信息，是对眷恋一个活人的勇气的安抚。明天或许，是的，肯定会来信，否则我将不知所措；那样一切同样会好的，我就不再经常给我写信的请求来折磨你了，但如果明天早上有信，那就不用星期一大早就在办公室用这种抱怨来欢迎你了。但我必

须这样做，因为如果你不回信，我会有一种理智也无法克服的感觉，你不理睬我了，你与他人调侃，却把我忘记了。难道我会默默地容忍这一切吗？我这可是头一次等你的信（尽管我总是说服自己，这不是你的过错），所附以前的信可作证。

你的

〔19〕12.11.15〔1912年11月16日〕

〔附信〕

尊贵的小姐：

刚才我去了地方政府，慢去慢回，这段路还挺远，要过默岛河到对岸。今天不会再有你的信了，我认了，因为我一直在想，如果早上没有，就不会再来了。由于各种各样的缘故，最近两天我感到有些悲伤和健忘，在回来的路上，我在贝尔维德勒大街停住——大街一边是住宅楼，另一边是瓦尔德施塔因伯爵花园^[49]异乎寻常高的墙，没有经过很多的思考，就从包里拿出你的信，把我当时没想看的而在最上面的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放到后面，看了你信的几行字。可以肯定，当时大部分是睡觉的动作，因为我睡觉很少，但并不感到疲倦。后来我回到了办公室，发现出乎意外的信，你那漂亮的信笺及其令人激动的分量。

我现在写的还不是回信，让我们把问题和答复随便合在一起吧，超出您的来信的所有美妙之处的最奇妙的事是允许我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给您写信，因为我还是在考虑，是否应该停止每天重复的写作了，我认为您在这方面不是这样，可能您会觉得每天收到信是尴尬的，但由于我干什么都不守时，我对于给您，就是无忧无虑地给您写信情有独钟。现在我得到了许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同样，即便没有回信，我也可以写信并希望，假使我失去写信的能力，我仍然可以由于怜悯而得到信，因为我太需要它了。

今天只答复一点。扔掉匹拉米酮和所有这类的东西！好好找找头痛的原因，而不是去药房！令人遗憾的是，我不能够较长时间观察您的生活，以便了解头痛的根源所在。您不觉得这些还十分有效的人造之物比起受到自然打击的头痛来更无法忍受吗。此外，正如只有人才能把痛苦传给别人一样，只有通过人才能治愈人的疾病，就像您的头痛与我这种情况一样。

再见，请保持友好。

卡夫卡 上

〔没有注明日期〕〔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弗兰茨·卡夫卡的母亲给菲莉斯·鲍威尔的第一封信

尊敬的小姐：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封寄给我儿子的信，上面注明的日期是11月12日并有您那女性特有的署名。我非常喜欢您写信的风格，以致我一直把信读完，而没有考虑到我不应该这样做。

我向您保证，只是为了我儿子幸福的动机促使我这样做的，我可以肯定，您会谅解我的。

我虽然没能认识您，但我仍然很信任您，愿意向您，亲爱的小姐，吐露一个做母亲的担忧。

您信中的这句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您说，他应该与肯定爱他的母亲倾心吐胆。亲爱的小姐，您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般来说，每个做母亲的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是怎么样爱自己的儿子的，我无法向您做出描述，我情愿付出我生命的几年时间，如果这样可以换取他的幸福的话。

要是另外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那个人将是凡人之中最幸福的，因为他父母满足了他的每一个愿望。上大学时，他对什么有兴趣，就学什么，由于他不愿意当律师，而选择了公职人员的道路，这对他来说倒也完全合适，他上班到下午两三点^[50]，下午其余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他从事坐办公室的工作，这个多年来我就知道。但我认为这只是消磨时光。如果他像同龄青年人那样睡觉和吃饭，这是不会损害他的身体健康的。但他睡眠不足，吃饭很少，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我担心，只有当上帝向他招手时，他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到那时为时已晚了^[51]。鉴于上述情况，我请求您，适当地让他注意这个问题，问问他，是怎么生活的，吃什么，一天吃几顿，总之，就是他每天是怎么度过的。但是，不能让他知道，我给您写信了，更不能让他知道，我已得知他和您有通信来往。如果您能够使他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我将不胜感激之至，将是最幸福的人。

钦佩您的

尤丽亚·卡夫卡

如您有意给我写信，请将信寄到以下地址：布拉格老城环路金斯基宫16号，私宅。

最亲爱的，最最亲爱的，我这个完全该死的家伙有幸把你健康的身体搞病了。你听着，爱惜你自己，爱惜你自己吧，我所欠下的，变成了对你的爱！因为你我不给你写信，我敢对你进行指责，我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并要求自己，不要感觉你是病了，而是应该可笑地猜测你是在排练或者娱乐。真的，即使我们各处地球两端，你在亚细亚的什么地方，我们也不会是远隔千山万水。对于我来说，你的每一封信都是无穷无尽的，尽管它是这么的简短（天哪，我满脑子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指责你的话，你今天的信就不短，它比我应该得到的要长上上万倍），我一直把信看到最后的署名，然后又开始从头看，就这样循环往复，妙不可言。但最终我还是得看到，信是有句号的，看到你站了起来，离开了写信的桌子，为了我消失在黑暗中。这时，人们会大吃一惊的。

但今天无论如何是应该有信了。我还没有像你那样下定决心，我不想去柏林，我只是下决心，信来之前不起床，下这样的决心不需要特别的气力，我是悲伤得起不来床。我觉得，昨天夜里写的小说愈来愈差，我的灵感已经到了最低点，但对收到那封挂号信时的幸福心情仍记忆犹新，当我抬头向上看时，我看到了的确是可怜的我真的还在空中享福呢。前天夜里我做梦第二次梦到你。邮差交给我两封你的挂号信，而且是一只手拿着一封递给我的，其手臂的动作非常的准确，就像汽轮机里的曲轴转动一样。天哪，这是充满魅力的信。我从信封里抽出许多写了字的信纸，但信封总是不空。我站在楼梯上，不得不把读过的信，请不要生我的气，扔到楼梯上面，好继续从信封里面拿信。整个楼梯上上下下堆了厚厚一层读过的信纸。松散堆落在一起的有弹性的信纸簌簌作响。这真是一场美梦。

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对邮差另眼看待了。我们的邮差总是不准时。12点15分信才来，在这之前我从床上不下十次地派不同的人到楼梯上，似乎这就可以把信引诱过来，而我自己不能起床，12点15分时，信真的到了，立刻拆信，一口气读完。你生病使我感到十分不幸，但是——此时此刻暴露了我的天性——要是你身体健康时不给我写信的话，我会感到更加不幸。但现在我们又重新互相占有，在友好握手之后，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恢复健康，然后健康地继续生活下去——我的信又什么都没回

答，但回答是口头上的事，写信并不能使人聪明，顶多会得到一种幸福的感觉。另外，尽管今天我还得东跑西颠，而且还有一部在床上苦恼时想到的并使我内心感到压抑的简短故事要写，但今天我可能仍然还会再给你写信[52]。

你的 弗兰茨

[19] 12.11.17

〔在空白处〕

不要慌张，我绝不会打电话的，不会这样做的，我不会骗人这样做。

我最亲爱的，现在是夜里1点半，上次提到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完成，今天没有时间写小说，上床时我的情绪十分低落。要是夜里有空，不间断地一直给你写信到明天早上，那该多好！那将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但我不得不上床睡觉，因为我昨天夜里没睡好，今天白天几乎没有睡，在充满苦恼的状态下，我不能去上班。明天，你的信，最亲爱的，最亲爱的！当我半睡半醒的时候，它们会给我力量，但当我昏睡时，我宁肯躺在沙发上，坐在它们上面，谁来打扰，我就把谁的牙齿敲掉。不，说到工作，我一点儿都不激动，我已经历了五年的办公室生涯，在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7点，8点，甚至8点半，在头一年里肯定是非常可怕的，见鬼去吧[53]！在通向我办公室的小过道有一块地方，我每天早上经过过道时，都感到极不耐烦，足以导致像我这样具有比较坚强、执著性格的人寻求极乐自杀。现在当然好多了，人们甚至主动对我表示和蔼可亲，包括我的顶头上司[54]。最近有那么一次，在他秘书房间里有许多工作人员、办公室主任和投保人焦急地等待着召见，也可能有什么十分紧急事务要请示，而在他办公室里，我和他正在头靠头地欣赏一部《海涅诗集》。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够令人烦恼的，也没有劲去忍受这种烦恼。

我现在想到，你不会在最后对使用这种信纸而生气吧？我妹妹的信纸几天前我就用完了，而我自己几乎不曾有过信纸。就这样，我从今年旅行日记本上一张一张撕下纸来用，并毫不羞耻地寄给你。为了试图再次进行平衡，我把正好从本子里掉出来的一张纸一块寄给你，上面有今年在疗养院疗养时早上经常合唱时唱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支歌，就把它抄了下来[55]。这是很有名的一首歌，你肯定也知道，只是没太注

意。请你无论如何再把这首歌给我寄回来，我不能没有它。虽然十分激动人心，歌词写得还是很有规律，每一段都有一个口号，然后是点头。我可以发誓，歌词表达的悲伤是真实的。要是我哪怕是光把曲子记住了也好，但是我没有音乐细胞，我的小提琴老师出于对我的失望，在上音乐课时宁愿让我跳过他举着的棍子，音乐方面的进步表现在他举的棍子一节课比一节课高。所以，我认为这首歌的曲子很单调，实际上只是唉叹之声。最亲爱的！

弗兰茨

〔19〕12.11.18〔11月17日至18日夜〕

亲爱的，这封电报我受之无愧！你星期六肯定有事，无法动笔，因而我根本没指望今天收到信。这毫无快乐可言的星期日已成为我们通信的障碍，长时间的等待使我有些神魂颠倒。昨天收到的信并不令我满足，特别是因为信中提到了你痛苦的处境。你曾以肯定的口气答应我以后每星期一让我收到你一至两封信，结果一封没来。我在办公室里发疯似的转着圈子，上百次地把本该看的材料扔在一边（都是行政法院的判决，这是你知道的），又上百次地捡起来，但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一位正在和我谈判展览一事的工程师一定把我当傻瓜，因为我站在那里想的是邮差该第二次来送信了，甚至担心送信时间已经过去。在神志恍惚中，我一直紧盯着工程师小小的、有点残废的手指，这多么不礼貌啊！亲爱的。我不想叙述了，越说下去越糟，令人无法卒读。即使打电报也不如想象的容易。我两点半发出加急电报，一直到夜里11点1刻才收到回电，也就是说花了九个小时。坐车去趟柏林也不要这么长时间，而且肯定能到。而等回电却越等越绝望。终于听见门铃声，邮差来了！他表情友好、高兴，电报里不会有什么糟糕的消息。当然不会，里面有的只是爱情和好消息。这封电报现在打开着放在我面前。亲爱的，人去哪里汲取力量，如何保持清醒头脑，如果人从逼人发疯的痛苦一下子达到幸福的境界？

我刚才正想坐下来写我昨天的经历，当时受绝望的刺激很想把自己写进小说。这么多事困扰着我：你杳无音讯；完全没有能力应付办公室的事情；面对着这篇一天来没有动笔的小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继续写新的、启发人的故事，几天几夜几乎完全失眠，脑子里想着一些不太重要、但却令人心烦意乱的事。总之，当我今晚出去做仅为半小时的散步时（当然一直张望着看邮差是否来送报，并且在离住处较远的地方碰

到了一个邮差)，我决定给一个人写信作为我唯一的解脱。我和这个人今夏结识并成为好朋友。当时，他用好几个下午想说服我皈依耶稣。现在我收到了你的电报，给那个朋友的信也就不着急发。你这个妖精！现在我不知道是继续写小说呢还是去睡觉。我也不知道如何请求原谅，让你原谅我的电报给你带去的忧虑和不安。

弗兰茨

〔电报，发出时间和地点：1912年11月18日2点30分，布拉格〕

亲爱的，这不是指责，而是请求解释。我会很伤心的，因为我了解情况。我们不再写那么多信，这是对的。我昨天就此动笔写信，准备明天发出。但改变通信的约定时间只能经过协商一致，必须事先商量和通知对方，否则会让人等得发疯。我该怎么解释，你自己说星期五上午收到我上封挂号信或至少知道有这封信，但为什么等到星期六才回信？你在星期六的回信中写道，你星期六还要再写一封，但为什么没有写，以致我星期一没收到你允诺的第二封信？你为什么星期日没写信，哪怕是片言只语，而等到半夜才写了一封令我欣喜若狂的信？如果不发电报，你星期一就根本不打算给我写信，因为你的加急信是我星期一唯一收到的一封信。但最奇怪和最令人害怕的是：你病了一天半，但仍坚持一个星期的排练；星期六晚上仍去跳舞，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回家，而夜里1点仍毫无睡意；星期一晚上又去参加家庭舞会。我的天哪，这是怎样的生活啊！请解释一下，亲爱的！让鲜花和书本一边去吧！剩下的只有我的麻木！

弗兰茨

〔19〕12.11.19

〔在一附页上〕

我现在读到，你在星期日的信中肯定地答应我星期一能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我怎么得罪你了，这样折磨我？今天又没见信，第一次邮差来没有，第二次又没有。你让我多痛苦！你只要写一个字就会让我快乐起来！你对我厌倦了，除此没有其他解释。这也并不奇怪。不可理解的是你不给我写信。如果我想活下去，就不能像这几天徒劳地等待你的音讯。我已不再奢望能得到你的消息。我不得不重复你默默向我告别的

情景。我想把脸放在这封信上，以便它无法发走，但它必须发走。我已不再等信了。

弗兰茨

〔19〕12.11.20

亲爱的，我最亲爱的，已是夜里1点半了。我上午的信伤害你了吗？我怎么知道你与亲戚和熟人有应酬！你折磨我，我又用指责来报复你。亲爱的，请你宽恕！送我一枝玫瑰表示你已宽恕我。我并不疲劳，但迟钝和沉重，我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我只能说，待在我身边，别离开我。如果我的任何一个敌人用我的名义给你写这样的信，就像今天上午那封，那不要相信它，而是通过它看我的心。生活是多么困难和艰苦。怎么能仅用由文字组成的信来留住一个人呢？要留人需要用手抓。我手里抓着你的手，我生活中需要你的手。你的手我仅三次有幸握住，一次是我进房间的时候，第二次是你向我保证去巴勒斯坦旅行，第三次是我这个傻瓜送你上电梯。

我可以吻你吗？在这粗糙的信笺上？我也可以打开窗去吻夜晚的空气。

亲爱的，不要生我的气！我对你没有任何其他要求。

弗兰茨

〔可能写于1912年11月20日至21日夜〕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亲爱的，可怜的孩子！你有一个可怜的和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情人。他只要两天收不到你的信，就会不假思索地用文字来发泄一气，而且不明白这样做会伤害你。当然事后他很后悔。你不必担心，他给你带来的任何不安都会受到报应的。亲爱的，读了你的两封信，看来你还想宽容我一段时间。我请你看了我昨天的信也不要改变你的主意。另外，我今天可能仍要打电报请你宽恕。请理解我对你的担忧，我的令人可怕的烦躁，我无法同时想和干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请理解办公室的生活，眼睛一直盯着门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入非非；梦游和在巷子里麻木地跌跌撞撞；心脏已不再跳动只不过是一块搐动的肌肉；已经毁了一半的书信。请理解这一切，不要生气。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写信，但听

着：星期一我未曾收到一封信。你认为应该星期一到信肯定是星期六晚上投寄的。看来这封信肯定丢失了。我只在星期日收到了你星期六上午的信。那封星期六晚上发出的信是什么内容？如果你还记得就写信告诉我，这样我至少可以用回忆使这个令人沮丧的星期一变得美好。这样，我星期一没有信，星期二只有你星期日发出的信和迫使你写的加急信，星期三又没有信了。这对我来说太少了。我昨天写了一封信，就是为了发泄一小部分快让我爆炸的感情。你想，对我来说没有其他解释，要不就是你诅咒我，打算与我一刀两断；要不你母亲不允许你写信。我还清楚地记得，你母亲在你最初的信中显得多么和善，她站在阳台向你挥手告别；抱怨你早餐吃得太少；打电话催你回家，因为你在办公室里工作时间太长。但对她来说慢慢地变得黯淡无光了，她要求生日时送她手工艺品；不能正确评价你的办公室工作；她强迫你去做你看来多余的串门；她会在你晚上躺在床上写东西的时候，走进你的房间把你吓个半死，等等。我坚持认为只有这两种解释，所以写了那封信。现在我知道，只要看一下日历就明白，是忏悔节使我直到今天，也就是星期四才收到你星期二的信。这又是我的责任，又是你的好心才得以弥补。我可以用吻你来忘记这些悲伤的日子吗？

我几乎觉得不知哪封信肯定已经丢失。根据我不完全统计，从星期五（11月8日）以来我肯定写了十四或十五封信。听说你星期二只收到一封信？为了便于抽查，写信告诉我是否收到我附有东西的信，因为我只对这些信有印象。其中一封信附了一封很早写的、但没有发出的信，用了“尊敬的小姐”这样一个比较滑稽和老派的称谓。第二封信附有一张纸条，描写了我的住房如何嘈杂。

《斯特林德贝格言论集》我已阅读，但一点也不理解，所以不该和你谈这些。书里都是些可怕的真理。值得欣赏的是不拘泥于形式。但有时候人们担心感受到内心更为可怕的真理。关于相爱的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保护自己的真理很伟大，人们会避开很多想法，不想听很多话，有些话在轻松的时候可以接受，现在则被认为是追根刨底。食物已经很清淡了，葡萄酒已被水果汁代替，而且已很少喝了。

我每天吃三顿，其间什么也不吃。早餐是水果、饼干和牛奶；中午饭2点半，和其他一样完全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总的看吃得比别人少，尤其是肉，但蔬菜吃得比别人多。晚饭9点半，主要吃酸奶、面包、黄油、各种栗子、枣子、无花果、葡萄、杏仁、葡萄干、香蕉、苹果、梨

和橘子。当然是有选择地吃，不是混在一起，像从牛角里一下子倒进肚子里那样。没有比这个更能引起我胃口的东西了。

不要为你的信担心。尽管我的书桌乱成一团，但你的信是唯一整理得最整齐和锁起来的东西。我经常把信拿出来读，读后总是整整齐齐地放回原处。天哪，我还有那么多事要说和回答，但又不得不放下笔，因为现在已是下午3点了，那就明天再写一封吧。好，如果你星期六上午投信，我星期日就能收到，这一天将比其他日子要美。

弗兰茨

〔19〕12.11.21

〔在抬头上首补充几句〕

我最好还是不拍电报，否则又让你无谓地吓一跳。你今天收到的四封信好坏持平抵消。你是不是举止幽默？能否描述一下？明天我描述一下我自己的形象。

亲爱的，我收到你的电报，看到了我造成的伤害。当我离开办公室时，就给你发了一封很厚的加急信，但在不经意中忘了挂号。你的电报让我害怕这封加急信你收不到，因为邮局在迫害我们，那个女邮差受理我信时态度很随便和大意。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不幸了。所以我急忙又发了这封挂号信，因为我不能再打电报了。但愿你能两封信都收到并友善地收下。真可怕，我们通信将在困难中继续下去。两人相距遥远已经够痛苦了，为什么还有这种打击，你拍电报说星期一也给我写了一封信，你肯定指的是另一封，而不是那封我已确认收到的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仅你星期六写的第二封信，而且星期一写的第一封信都已丢失。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可以让人查找这些信的下落。第一封信丢失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做，但为了不给你添麻烦，就没去查找。这次也算了。在邮局官员询问情况的时候，你又可以写信简单地问候一下。再怎么问，丢了还是丢了。

但问题严重的是，不仅我被这一切弄得六神无主，直到今天读了你的来信才慢慢地开始振作起来，而且我也粗心地把你拉入痛苦之中。

你会再给我写信的，是不是？

弗兰茨

亲爱的，上帝保佑，两小时前我没有动手给你写信。否则我会写关于我母亲的事，你读了以后一定会恨我的。现在我已静下心来，可以充满信心地给你写信。我内心并不好受，但会好起来。虽然不会自动好起来，但出于我对你的爱，一切会好起来的。我让母亲看了你其中的一封信！这个过失无法原谅，活该挨揍。我曾写信提到过，我有个习惯随身带着你的信，它能给我力量，能使我变得更出色、更能干。当然我现在不是把全部信带在身边，而是把最新的一封或两封。结果造成过失。我在家穿另一件衣服，把出门穿的衣服挂在我房间的衣钩板上。我的房间是一个过道，或者说是连结父母起居和卧室的必经之路。当我母亲穿过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她看到信从我衣服前胸口袋里露了出来。出于母亲对孩子的爱，她把信抽了出来，读信后给你写了信。她对我的爱和她的不理智一样强烈，这种不理智和爱引起的无所顾忌可能更厉害，对我来说有时完全无法理解。

我把你今天的几封信当作一个整体，你关于饮食和睡眠的建议并不特别让我吃惊，因为我已写信告诉过你，我很高兴找到了目前的生活方式，它是我身处矛盾唯一的、尚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当今天马克斯轻轻地提到信件的保存以及他的东西瞒不过父母时，就想起你在今天的信中所提的这方面内容，因为你的信一直很形象，就像与我说话人的面部表情。我虽然不知道全部情况，但足够逼迫马克斯说出全部情况。

我不能请求你原谅，因为你那么善良，怎么能原谅这一切呢。这是我的过错，由我自己承担。一切曾是那么美好。我很高兴能静静地享受你给我带来的幸福。我在你关于圣诞节假期的言语中读到一种无限的希望，这种希望是我在尘土飞扬的办公室里写今天早上的信时不敢有的。我母亲又来干扰我了。我一直把父母当跟踪者。直到一年前，我对他们就像对整个世界无所谓，就像任何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我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被压抑的恐惧、担忧和悲伤。父母只希望把一个人拉回过去，让人喘不过气。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但这正是最可怕的。我搁笔了。最后写一句忠告：一切都太杂乱无章了。

你的，你的，你的

随信寄上一张我的照片，当时我可能五岁，这张生气的脸曾带来乐趣，现在我认为这是隐藏心中的严肃。你得把照片寄还给我，它属于我父母。他们总想占有一切、干预一切（今天我不得不写写我母亲！），等你寄回后，我再给你寄另一张，照得不好，但是现在照的。如果你想可以留下来。这张照片上的我可能还不到五岁，或许才两岁，不过你比我更有判断力。你喜欢孩子，而我看见孩子宁肯闭上眼睛。

弗兰茨

〔19〕12.11.21

请你给我或借我一张你的照片，现在时机不是最好。我只是说说而已。

亲爱的，我没有时间请求你原谅我星期四给你带来的痛苦。从你今天的信来看，即使一个失去理智的笨蛋也会同情你的痛苦。而我没有予以同情，而是继续犯错，我做的一切变成了对你的敌视。而另一方面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同甘苦，共命运。我把信放在衣服口袋让我母亲看见并给你写信，这是我的过错。但我没有就此吸取教训，而是一错再错。昨天在马克斯面前发生的事情虽然糟糕，但还能忍受。我向他保证，如果我没发过誓，就什么也不告诉我母亲。但即使我没发誓，为了你，这样做也是理所应当的。我如何保持镇静来照顾我最亲爱的呢！但我离开马克斯去散步时，我内心开始沸腾，满脑子怒气。当我回家时，我确信，如果我不说出自己意见，就再也无法对母亲说一句话了。家里有客人，是妹夫和他的一个朋友。我径直回到我的房间，因为我预见自己忍受不了他们。我吃惊房子没有四分五裂，我对一切都好奇。在前厅，母亲开始拖着鞋踢踢跄跄地来回走，好像有什么预感。我们刚才在一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告诉她我的想法，情绪很激动，几乎没有控制。我确信这对两个人，母亲和我，都有好处。我记不得以前是否那么友好地和母亲交谈过。我从没有在亲戚家里或熟人家里看见那么多的冷漠或虚假的友好。但由于我的和她的过错，我一直用冷漠和虚假的友好对待我的父母。我看出母亲尽管仍有些忧虑，但对在昨晚辗转反侧之后建立的关系感到满意。你肯定是一个好天使，对我来说无处不在。但问题不在这儿，因为我本不该告诉母亲，但还是告诉了。亲爱的，你能原谅我这一点吗？我在你面前将承担许多责任，仁慈的法官将为此把我视为你的奴隶，实际上我早就是了。

我是否还有权力接受你在信末给我的吻呢？因为这吻不允许我和你
搁笔。

弗兰茨

{ 19 } 12.11.22

马克斯·勃罗德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尊贵的小姐：

弗兰茨收到您的信后看来已有所准备，因为我刚向他暗示，他很快就猜到了。我不能再否认，他的母亲读了您的信。除此，事情的结果还算不错，他从此将更加小心。

关于信的事，我不必多说了：弗兰茨的母亲很爱他，但她一点也不了解她儿子和他的需要。文学是“浪费时间”！我的天！好像文学要吃了我们。但我们很愿意牺牲自己。我和卡夫卡夫人经常意见相左。没有理解，爱再多也没用。这信再一次说明这一点。弗兰茨经过多年的尝试，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食物——素食。多年来，他一直犯胃病。现在他前所未有地健康和精神饱满。当然，他父母用空洞的爱来逼他吃肉，让他旧病复发，还让他把睡眠时间分开。他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睡觉方式，可以睡觉，在无聊的办公室工作和搞文艺创作。但他父母……我不得不生气。谢天谢地！弗兰茨很倔强，坚持对他有利的东西。他父母不愿意看到，对像弗兰茨这样不同寻常的人需要创造不同寻常的条件，不使他的智慧枯竭。最近我不得不就此给卡夫卡夫人写了长达八页的信。他父母要弗兰茨每天下午去商店。为此，弗兰茨决心自杀并已给我写了告别信。在这关键时刻，我通过全面干预成功地从“爱子心切”的父母手中救出了弗兰茨。

父母既然这样爱他，为什么不给他三万盾，就像给女儿的嫁妆一样，好让他辞职，去河边任何一个小地方写书，写上帝让他写的书？弗兰茨只要一天达不到这一点，就一天感觉不到完美的幸福。因为他的整个身体要求过一个祥和的、醉心于文学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今天的条件下，他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艰难，但带有幸福的闪光点。这样，您也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烦躁不安。

目前正在出版卡夫卡的一本出色的书。也许他从此吉星高照，可以开始他的文学创造生活。他也在写一部大部头小说，已写到第七章，我希望他取得成功。

关于《诺内匹格城堡的故事》一书我不愿意谈了，这是唯一的一本使我自己感到陌生的书。感谢您的兴趣。

〔邮政总局1912.11.22—布拉格〕

亲爱的，我的上帝，我是多么爱你啊！现在是夜深人静。我放下了我的小故事，我已为此花了两个晚上，但一字未写。这小故事开始悄悄地生长成一个长篇故事了。给你阅读，这如何使得？即使写完了也不行，写得字迹潦草，看不清。即使你习惯我潦草字迹，没有任何障碍，我也不想寄给你看，我想给你念。这太好了，一边念，一边不得不拉着你的手，因为故事情节有些可怕。故事叫《变形记》，可能让你吓一跳，可能你会感谢这故事，因为我每天的信都让你吓一跳。亲爱的，我们用这一较好的信笺开始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发现我在写上一句抬头望了一下天，好像你在天上一般。但你实际上并不在天上，而是在我心灵深处。的确是在心灵深处，不要自欺欺人。从现在起，我们越是心平和地通信，你越会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如果你看到这一点并仍留在我身边就好了！也许平静和力量决定要待在不平静和虚弱的地方。

现在我太忧郁，也许不该给你写信。我小故事中的主人公今天日子也不太好过，已写到他不幸的最后一段。我怎么能特别地高兴起来呢！如果我的信为你做了个榜样，使你不再把给我写的小纸条撕掉，那么这就是一封好的、重要的信。你不要相信我一直那么伤心。我可不是那样的人。除了一点之外，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除了那个黑点，我可以高兴起来，为你的好心而兴高采烈。星期日，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就要向你倾诉，你可以袖手旁观这一赐予，亲爱的，现在该上床了。愿你过一个美好的星期日，愿能得到你的一些看法。

弗兰茨

〔19〕12.11.23

亲爱的，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我现在再一次放下它来，以便再在对你的思念中振作起来。这个故事已写一半了。总的来说，我对它不是不满意，但它太恶心了。你看，这两种想法共存一颗心。你不必太伤心，因为谁知道，我写的越多，越解放自己，可能对你就越纯洁，越高尚。当然，我内心里肯定还有许多东西要说，几个夜晚都不算长。

在我现在去睡觉前（已是夜里3点了，一般我只工作到1点。你看来

误解我在上封信中提到的时间，那是下午3点。我是在办公室给你写的信），根据你的要求，我想简单地对你说我爱你。菲莉斯，我爱你。只有你和我好，我想永远活着。当然不能忘记，要作为一个健康和与你一样的人活着。就这样，你知道就行了。这几乎已超过了接吻，我现在只能抚摩你的手了。所以我宁肯称你为菲莉斯，而不是亲爱的，宁肯称你，而不是可爱的。但因为我想把一切都和你联系起来，所以也喜欢称你为亲爱的，并且很高兴能称呼你。

12.11.24

〔1912年11月23日夜至24日动笔〕

两封信！两封信！哪个星期能让我收到两封信！亲爱的，你不仅宽恕了我，而且有了认识。菲莉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保持镇静，不受干扰地相爱。我很想用信让你振作和快乐起来。但遗憾的是，我的信只能让你疲倦和伤心地哭。我几乎已经相信这一点。如果我现在能让你振作和快乐起来，那是因为我意识到你是我的女朋友，你是我可以信赖的人。

不过请你，亲爱的，不要再在夜里写信。我读着你用睡眠换来的信，心里充满幸福和悲哀。不要再这样了，好好睡觉，这是你应该的。如果我知道你彻夜不眠就是为了给我写信，我就无法静下心来工作。知道你入睡了，我工作起来就大胆了，因为我觉得你在甜甜的睡梦中，好像无忧无虑、不知所措和需要帮助，好像我的工作是为了你和你的幸福。有了这种想法，工作怎么会停下来呢！快睡吧，白天你干的活要比我多。明天无论如何得睡觉，不要再在床上给我写信，今天就不要写。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睡觉前把阿司匹林扔出窗外。总之，晚上不要再写信了，让我夜里写信，让我保持能“开夜车”这一小小的自豪。这是我在你面前唯一的自豪。要不我也太低三下四，你肯定也不会满意。请等会儿，为了证明“开夜车”在世界、包括在中国属于男人的专利，我去隔壁房间书箱里取本书，给你抄一首中国小诗。噢，找到了（我父亲和侄子在干什么，怎么发生那么大声！）：这是诗人Jan—Tsen—Tsai[56]（1716—1797）的诗。我找到了关于他的注释：“禀赋好，少年老成，官运亨通，多才多艺。”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诗，有必要说明一下富裕的中国人就寝前都用香料熏房子。另外，这首诗可能不太适合，但用美代替了繁文缛节。下面就是这首诗：

寒夜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怎么样？这首诗必须细细品味。读它的时候，我想起三件事，当然我不想深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很高兴你是一个理智的素食者。真正的素食者我并不喜欢，因为我自己几乎也是个素食者，觉得没有什么可效法的，而是很自然的东西。我喜欢那些理智的素食者，他们吃肉或带肉的菜肴，或出于健康原因，或觉得无所谓，或根本不把吃饭当一回事。太遗憾了，我对你的爱情发展如此神速，以致我不可能再表示，我爱你，就是爱你的饮食习惯。你是否也有开窗睡觉的坏习惯？全年睡觉开窗？冬天也开吗？而且窗户大开？这样的话，你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冬天我开一条缝儿。当然我的窗冲着—个空旷的工地，工地后面流着摩尔岛河。在河对面是一片高地，有几个公共花园。这里空气新鲜，风大，而且比较冷。你现在在伊玛努埃——教堂大街住，夜里把窗户完全打开。但如果你住在像我的房间里，就不一定这样做了。我还胜你一筹的是我房间里没有暖气，但仍坚持写作。现在我发现（我就靠窗而坐），内窗完全敞开，外窗虚掩着；窗外桥的栏杆已有露水。所以，你就不要和我较劲了。

你的女同事写的诗很美。我当然寄还给你，我已抄了下来。为了惩罚那个叫布吕尔的小姐在你和那个姓名带“冯”的男士之间乱点鸳鸯谱，在她生日之际，我希望从今天起一年内每天晚上下班后有两个心急火燎的商务代理站在她左右两侧，不断和同时向她口授信件，直至深夜。只不过是因为她写的诗句很美，我想根据你的请求把对她的处罚缩短为半年。由于你喜欢她，她也善于找乐，我将从克拉兹奥（位于赖兴贝格后面，山上。明天我得去一趟）发一张明信片。我让别人写，也不署名。上面仅写：衷心祝福！但这祝愿者是谁呢？

我早就想问你了，但一再错过机会。你在第二封信中提到每天收到不少报刊，你怎么会订阅那么多种类的杂志？你已在那封信中罗列了不少，后面还有若干。如果这是真的，就是说，如果我理解对的话，我们之间可以进一步加强联系。你手里有的东西，我拿到手里根本不过瘾，也不能把与我有关的东西都寄给你。我早就有计划，但仅因为疏忽不得不再停止实施。我剪下和收集了不同报道，或因为什么原因很令人吃

惊，或使我悲伤，或对我个人未来重要。大多数东西初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为二十二名信仰基督的乌干达青年行宣福礼》（我找到了这篇报道并随信寄给你），几乎每两天就可以在报上找到类似的、对我个人来说有用的报道，但我没有耐心去收集。我很愿意为你这么做。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为我收集。每个人都能找到不是面向全体读者，而是专门提供给特定读者的报道。你特别感兴趣的短篇报道对我来说比我收集的更有价值。我可以毫不遗憾把我的东西寄给你看。别误解我！我指的是日报上的小文章，都是一些关于真实事情的报道。而杂志上很少有类似的文章。你可不能认为我想把你的小册子撕碎。另外，我自己只读《布拉格日报》而且很快地浏览一遍。我看的杂志是《新周报》和《巴勒斯坦》。但后一份已不再给邮寄，虽然我一直在订阅着。我随信寄上一篇关于一件可怕案子的报道，作为对收集作出的贡献。因为我曾提到去克拉兹奥，所以这一令人生气的想法始终在我脑子里萦绕。我的小故事本来明天肯定写完，但现在明晚6点必须上路，10点左右到达赖兴贝格，第二天早上7点去克拉兹奥上法庭。我已决定在这件比较复杂和冒风险的案子中让自己丢丑，这样别人就再也不会让你接这种案子。我也希望星期二下午4点就回到布拉格，然后立刻跑去办公室，不露声色地看一看是否有你的信，然后拿着你的信回家，有一封就够了。回家后躺在床上读你的信。如果这个计划可行，我必须至少在三个小时内结束我在克拉兹奥法院的事情。我在想，如果三个小时快过去，事情还没完，我就装晕过去，然后让别人尽快把我抬上火车。在法庭记录上，在我的签名处将写着：“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代表失去知觉，必须抬走。”而我坐上火车是多么地活蹦乱跳，随着列车向布拉格奔驰。

我还有许多事要说，许多事要问。但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今天上午，我像往常星期日一样去看鲍姆（你认识奥斯卡·鲍姆吗？），向他（马克斯和他的未婚妻也在场）朗读了我的小故事的第一部分。后来又来了一位小姐，她的举止不知什么地方让我想起了你（让我想起你，是很容易的）。我如痴如醉地看着她，看够了她与你的相像之处后，很想靠近窗户往外看，谁也不见，就想和你单独在一起。

我和母亲相处得很好。这一良好关系和我们血缘有关。她看来很爱你。她也给你写了封信，但我没让发。这封信太谦恭，就像我在心情糟糕的晚上所写的，不够好。我想，她不久将给你写一封平静和友好的信。

你不给我寄张照片？没有把你的心境用照片固定下来？你们一伙人怎么会错过这样的机会？没有你们办公室的集体照片？没有办公室附近的风景明信片？没有工厂的说明书？没有布拉格办事处的地址？你到底干什么工作？你办公室里的每个细节都让我感兴趣。你们那儿有什么好的谚语？你在档案室，那是什么地方？你如何同时向两个女孩子口授信件？只要我从办公室给我随便寄点好看的东西，我就寄给你我公司的年度报告，其中有我写的有趣的文章。

最后拥抱你与你告别。

弗兰茨

星期日〔1912年11月24日〕午后

出于特殊的精明，同时也为了在恋人前表现自己的聪明，我把星期日的信每页放一个信封寄出，共五个信封。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迫害我们的邮局再把星期日无法挂号的信弄丢了。当然用这个方法，丢一页两页的危险性要大了。但我只能尽我所能，不想说太多的担心，把危害给招来。

亲爱的，星期三你可能收不到信，而是一张明信片。这明信片最好送你房间，以免引起那位小夫人的注意。

请来信详细地告诉我你身体如何！头痛！哭和焦虑不安！我多次要你好好睡觉，散步。如果你读着我的信就生气，那么就毫无顾忌地撕了它，但要安静，安静！因为我原本是要帮助你消气的。撕了没关系，你撕十页，我可以写一百页作为备用。

你的 弗兰茨

〔19〕12.11.24

你不想夏天的时候去疗养院。我将向你描述那里有趣的生活。

你注意了没有，是否有犹太人在柏林演戏？我想肯定有。至今我仍未给略维回信。我曾在给你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不守时的写信人，这一点至今没有任何改变。

年鉴(《阿卡迪亚》)最早2月份出版，我的书(《观察》)下个月或1月份出。一出版，你当然会得到它们。在福楼拜(《情感教育》)的书

里，我有意识什么也不写进去。因为这是一本书，不应该有别人的笔迹。此外，我不知道是否还能给你写些像样的东西。

你的

最亲爱的，我今天不得不把我的小故事放下来，因为要去克拉兹奥，停写一两天。我昨天和今天都没怎么动笔。虽然这对故事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我觉得很遗憾。我还需要三四个晚上才能完成故事。我说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是因为这个故事由于我的写作方式已受到足够损害。这样的故事最迟必须在两个十小时之内写成。这样，故事才自然流畅，跌宕起伏。上个星期日我就有这样的灵感，但我没有两个十小时的时间，所以只能尽力而为，因为最好的灵感已经过去。我不能给你念一下，太遗憾了。下午不行，我没有时间，我得给你写信。今天我写到晚上6点45分，然后躺到床上。尽管我原本应先寄信，但我担心上床太晚入睡不了。因为一旦隔壁人手凑齐，就开始大声地打牌（打牌是唯一让我提不起精神的东西。即使父亲逼我，也不行），这样我就没有安静可言。今天就不必有什么担心，因为我父母和小妹妹晚上去看我已结婚的妹妹，二妹和未婚夫去农村看未来的公公婆婆。但我原先不知道他们不在家。但我仍睡不好，显然是惩罚我没有在临睡前把信发出去。除了安静不出声的十七岁小保姆，没有人吵我。我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由于房间里很冷，我连伸手抓钟的力气都没有。当我抓住钟时，吓了一跳，已经是9点半了。现在投信晚了，完全是上帝的旨意。很快做了两分钟的体操，我已经解释过，是开着窗户做。然后穿衣服，赶火车。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偏，9点左右就锁大门了。我在门前急速拐弯，成功地避免了被正回家的家人看见，然后飞快奔向列车。我穿着新靴子，狠命地踩在空无一人的小巷路上。但愿信至少准时到达。我快步回来后，总是晚餐的时间。我妹妹坐在一边压碎核桃，她吃的比给我的要多。我们的交谈大多数情况都很愉快。这就是晚餐。但也有的时候，我们互相不满意。

弗兰茨

〔19〕12.11.25，星期日夜

亲爱的，一个人如果心里有事，总是坐立不安。曾有那么几天，我静静地等着你的信，静静地拿起你的信，读一遍，放好，然后再读一遍，再放下，一切都静静的。但也有日子，比如今天，我在无可忍受的期待中颤抖；你的信一到，我就一把抓住不肯放手，好像抓住的是活生

生的你。

亲爱的，你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信有感应吗？一个想要什么，另一个就会在第二天早上通过信送来。比如你上次要求听我说我爱你，我不得不在信中补上我的回答。而这个回答早就写在我第一封信里第一行，或写在我们相遇那个晚上我盯着你看的目光里。这种感应已有很多，以致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最好的例子是今天发生的。

我昨天已写信告诉你，我今晚上路，一个人深更半夜进山。但你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寄了一个可爱的小照片。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削尖的肩膀！她很孱弱，既谦虚又文静。那时她还从来没有折磨过人，让人流过泪，心静如水。你知道吗，如果多看她一会，人很快就会流泪。是不是该把她送回去？好，可以。但这小姑娘暂时必须在我的上衣口袋里作一趟小小的、不太舒适的火车旅行。她说害怕一个人待在饭店里，但没有说明原因。是的，她带的表带依稀可见，胸饰也很漂亮，头发是卷的，发型几乎有点太严肃。尽管如此，还是能从她身上看出你的影子。你当时以和她差不多的表情坐在桌旁，这一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你当时手里拿着一张塔利亚照片，先看了看我，因为我正在说什么愚蠢的话，然后眼光绕着桌子转了一圈，停在奥托·希罗德·哈尔特身上，他才对这张照片作了正确的解释。我难忘你慢慢转头的姿势和你不同的脸部表情。现在有了这张照片，上面的小姑娘对我很陌生，但她证实了我甜蜜的回忆。

我又想起一件有感应的事。昨天我写信请求你给我搞些关于林特施特罗姆公司的介绍材料，你今天来信就答应了我。我们互相感应到对方的心跳，亲爱的！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你的心在跳，我怎么能保持平静呢？

你的弗兰茨

〔19〕12.11.24临行前

〔1912年11月25日子〕

衷心祝愿！可怕的旅行，但有一个好旅伴。

弗·卡夫卡

〔明信片邮戳：1912年11月26日—克拉兹奥〕

亲爱的，对方律师正在斤斤计较最高出价（如果你不懂什么叫最高出价，没有关系），而我满意地坐在桌旁，给你写上我衷心的祝愿。

弗兰茨

12.11.26

克拉兹奥，区法院

小小旅行欢快地继续进行。致以最好的祝愿。

弗·卡夫卡

〔明信片邮戳：1912年11月26日—克拉兹奥〕

菲莉斯，我向你宣告：你将收到一封我过去写的信，你可能刚看两三句就会把它撕了。菲莉斯，现在是撕的时候了，也是我不该写这封信的时候。但我已经写了并已寄出，你读到这封已是不可避免了。

我刚出差回来，当然先去办公室，收到你星期夜里写的信。我在门房里就读了起来，看门的矮小女人抬头看着我。你的信写得很可爱，很好，也很真实（仅猜错了照片上我的年龄，当时我才一岁。这我也刚知道）。你想让我分享你的生活。天哪，我很想分享你每时每刻的生活。尽管如此，你还是尽力而为。仅仅因为你的善良我就不得不爱你，更何况你有很可贵的本质。为什么我收到一封信还不满足，还在门房桌上找第二封信？虽然你告诉我星期一再给我写信，但这封星期一写的信没有来。你不是已经几次向我保证对我守信用，而我自己也写信保证，在办公室收不到信也要保持镇静。现在我收到了你星期日的信。你是不是星期一晚上排演，所以你的信投寄晚了一些？当然，星期一的信没到并不是我激动的原因。为什么我吃惊地跑回家并相信在家能找到你星期一写的信，同时又为收不到的信而感到绝望？为什么这样，亲爱的，你知道吗？这看起来难道不像是我爱你的天使吗？如果不是对你健康担忧增加我不安的话，对你爱的担忧要大得多。我会一再重复几句可怜的词句，如：你应该再忍受我一小会儿；我应该知道你的一些想法，等等。如果有一回信没来，那么打电报对我来说也太慢。上次我被吓了一跳，以致你觉得我写信都变了调，但仅有一次。但其他小小的提示也让我吓得够呛。我害怕读到你母亲想让你不失望；害怕读到我几个星期来一直克制自己不问的布雷斯劳熟人；害怕听到你爱我，但如果听不到，我想去死，你已经写过类似的感受。我当时不能理解你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

结论。你的感觉很好，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的感觉不会错，这点我知道的。

这一切矛盾的东西都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因，我重复一遍，因为我也很容易忘记，这就是我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其他原因。我不能再多写了，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你面前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我情绪波动很大，为什么让你也遭罪的原因。所以，我不顾一切，甚至不顾对你的爱，要求你写信，然后恨不得把信吃下去；所以我不太相信你的好言好语；所以我才用可怜的请求在你面前搪塞。即使性格坚强也无济于事。我将永远不能缺少你。这在别人身上，我认为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却是我的最大罪孽。

这是一次糟糕的旅行。我错过了昨晚的机会，使我感到很沮丧。一路上，我始终郁郁寡欢。虽然夜里下雪了，但山上也太湿了。我房间里暖气没法关掉，整夜敞开着窗，雪从外面飘到了我的脸上。火车刚启动时，我前面坐着一位令人讨厌的妇人，每当她张嘴打哈欠时，我总是烦躁不安，强忍着往她嘴里打一拳的欲望。你的照片在旅途中不时地被拿出来看看，聊以自慰。晚上睡觉时它就放在我床边的沙发椅子上，陪伴我入睡。如果家里有事，而且这事很耗费精力，真不该出门，最好在办公室里拒绝这种差事。我始终担心我的公差会影响我小故事的质量，也许我根本写不下去了，等等。除了担心，我还不得不面对这恶劣的天气，在泥浆中奔波，必须5点起床！为了报复克拉兹奥，我在书店里买了克拉兹奥目前仅有的一本好书，这是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在前言中写道，巴尔扎克多年来一直按照一种特殊的时间安排来生活，我觉得很合理。他每晚6点上床，半夜12点起床，然后工作十八小时。他做得不对的仅是咖啡喝得太多，毁了他的心脏。在这样的旅途中没有什么有趣的地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我不喜欢。在火车报纸上我读到据说是歌德的一句名言，实际上是胡说八道：布拉格是世界屋脊上一颗最璀璨的宝石。一路上最有趣的就是在布拉格下车，使我对布拉格的印象有所改变。当我下车时，一个小孩拉了一下我的衣领，我转过身看见我后面有一个手里抱着小孩的年轻妇女。她又让我想起你，至少看第一眼的时候。这不是能指出来的是脸像或任何哪个地方像，而是总体上像，因此也就更不可抗拒。也许你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极其小心地扶着这位少妇下了车，这种小心翼翼这位少妇可能从未体验过。她确实需要帮助，因为她抱着孩子，无法看见阶梯。

当然想听你的旅行经验，最好尽可能详细！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休假旅行，既不在乡村停留，也不游览有趣的或令人陌生的城市。如果亲戚想有人去他们那儿做客，他们先去雷维拉邀请客人。那次旅行路上，我有点跟踪你，当然并没有纠缠不休。我在布莱斯劳有一个很好的熟人（不是我上次写信提到的。我现在说的人是在农村，测量专家，他的地址一定在他送给我留作纪念的《圣经》里），一般我比较懒得动笔，所以我们的良好关系在互不通音讯中继续存在。那时我猜你在布莱斯劳，所以在几个月不通信的情况下突然给他去了一封信，这样我至少和你所在的城市有点关系。当时，我没有这么明确地对自己说，但也没有其他理由非写这封信不可。

你记日记吗？或者说，你曾记过日记吗？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在信中从不提你的女友，而你曾称她是你的好女友。

再见，亲爱的！在第一页上提到的危险，我们最好不要动它，直到我们真的说上第一句话，而不仅仅是写信的时候。难道你不也是这样认为吗？

我求你不要把今天的信当作倒退。这是新开端，只不过受我的信干扰变得暗淡一些。

吻你的手，菲莉斯！

弗兰茨

〔19〕12.11.26

是不是我们双方母亲同时开始关心我们俩啦？你母亲对我的印象是好还是一般？为什么一提到布莱斯劳的熟人，她就想起我来呢？请回答我这一切问题！

〔在一附页上〕

我不能忘记我这次出差使命是如何完成的，因为这也说明了这次出差的敌对性质。我取得的成功比我公司想象的要大。原来我想最多不过拿回五百克朗，结果我带回来四千五百克朗，比原来多四千克朗。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乌鸦在白雪皑皑的田野，不禁感慨地说：“要想失败，你必须拒成功于千里之外。”

现已夜深，我突然自己安慰自己，你星期一的信也许已经到了，但被忘了送给门房。这样的话，我明早就能收到，到10点也许又有一封！办公室和你的信相比越来越丑陋了，但因为你的信的到来，又变得漂亮了。

〔19〕12.11.26

亲爱的，现已上午11点45分。我刚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又像过去很激动，开始给你写信。刚写第一行就放下了，因为你带照片的明信片到了（你星期一的信我也是今天才收到的）。亲爱的，这太好了，正是我要的。一直像保证的那样至少互通信息，但照片，虽然很小，也是必需的。我不想让你夜里给我写信，这一点我不会让步的。我想，我昨天写了一封中等长短的信，是因为你昨晚也给我写了一封。现在，你夜里写信，那么我也要写一封。你在明信片中写道，你星期一夜里给我写了一封。现在，你看，这封我没收到。我怎么办？我是多么需要你的一句一行啊！收到明信片后，我可能明天能收到两封信。我肯定能收到一封或一封也没有。在绝望中，在对你的期望中，我的双手也不听使唤，从桌上掉了下来。

我的那些信肯定也都遗失了：发自克拉兹奥和赖兴贝格的信，今天早上写的信，平信，挂号信，加急信都丢了。你说，你星期日夜里给我写了几行，但实际上至少八页，充满了无穷的叹息。亲爱的，如果信函不能让我们心心相印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不会走到一起了。

有了你的新照片，我日子好过多了。我感到照片上的姑娘就在我身边，我可以向她述说一切并非常尊重她；我想，如果她是菲莉斯，那么她已是个大小姐了。她欢乐，从不忧伤，但非常严肃；她看来两腮丰满（这可能是晚上灯火产生的效果），但有些苍白。如果让我在小姑娘和长大后的小姐之间选择，我绝不会不假思索地向小姑娘跑去。我会很慢地走向小姑娘，同时四处寻找大小姐，盯着她不放。最好的方法是让小姑娘把我带到大小姐面前并把我介绍给她。

你给我寄的照片是剪下来的？为什么我不能得到完整的照片？是照片照得不好吗？你真的不相信我在拍得不好的照片上看到的仍是一个完美的你吗？根据照片上一块白色褶边，也可能是从女式衬衣上掉下来，我怀疑你在这张照片上的形象是个男丑角；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太不客气，不把这张完整照片给我看。另外，剪照片简直是一种罪孽，尤其收

到这张照片的人是多么渴望看见你完整的形象。

我顺便想象了一下你们的生意，你们每天生产一千五百台留声机，造成多大的噪音啊！我一点也没想到。你想过没有，亲爱的，这么多噪音，这么多人因此神经衰弱，你也有一份责任。有段时间，我老在想，如果我们住房附近出现一台留声机，那必是我的末日。但至今平安无事。你们布拉格分厂（厂的地址我不知道，但厂长曾和你去过Hmshìn，这我不会忘记）看来工作不够卖力。你应该对他们好好地进行一天、一星期或一辈子的审查。不管如何，每天一千五百台留声机！这东西出厂前肯定听试过。可怜的非莉斯！有没有隔音墙让你听不到一千五百台留声机同时试唱，所以你吃阿司匹林。我不必听留声机。它刚出世，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危险。只有在巴黎我还喜欢它。在那里，Pathé公司在一条路边建了一个沙龙，设有投币留声机，有很多曲目供挑选。如果柏林没有，你们应该在那儿也搞一个。你们也卖唱片吗？我订购一千张录有你的噪音的唱片。你不必说什么，只要给我很多很多的吻，让我忘却一切悲伤。

你的弗兰茨 上

〔附开头数行，捷克文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亲爱的，我请求你尽可能接受这样的习惯：如果你没有时间详细写，就在明信片上用三句话告诉我你是否一切都好。

亲爱的，为什么只在信尾吻我？信本身不重要。在你面前，纸和笔一钱不值，它们本身就一钱不值。真的，非莉斯，现在我一个人夜里坐着，两天已没有写点像样的东西了，心里有点忧郁和冷漠，只有那么一会儿才感到有些清醒。如果我在这不是最好的状态下想象我们重逢的场面，我有时担心无法承受你的出现，不管是在小巷里，办公室里，还是在你的住处；无法承受别人或你注视我。只有在我精神不集中和被浓雾包围时，不配站在你面前，我才能承受你的出现。幸运的是你不是座像，而是有生气地生活着。也许，只要你把手伸过来，一切就会好的，我的脸也许很快就恢复了原样。

你问我我怎么过圣诞节。可惜我手头没有日历。我只有两天节日假。但我今年还有三天休假（这是宝贝。几个月来，每当想到休假，就精神振奋），如果再加上星期日，那么我圣诞休假时间就不短了。我曾

决心把这假期用在我的小说上，也许能写完小说。到今天为止，小说已一个多星期没动了。新的故事虽然已结束，但最近两天我一直觉得自己太固执，我是否有必要坚持我原来的决定呢？圣诞假期有一天要花在我妹妹的婚礼上，这是12月22日。另外，我想不起来是否曾在圣诞节出去旅行过。随便去那儿，过一天再返回，这种毫无意义的旅行一直令我窒息。亲爱的，你怎么过圣诞节？不去休养而是待在柏林？你想上山，去哪儿？去你能去的地方？我曾决心在完成小说前不见任何人，但我问自己，当然仅是今天晚上，如果我完成了小说，难道我在你面前就显得更高大或不太坏了？与其在今后六个日日夜夜挥笔疾书，还不如让我可怜的双眼充满你的身影？你回答，我自己说个大写的“是”。

弗兰茨

〔19〕12.11.27

亲爱的菲莉斯，邮局在捉弄我们。昨天我收到你星期二的信时还抱怨你星期一夜里的信丢失了，但今天星期四早上又收到了。在这一井井有条的邮电系统内，好像有一个恶魔般的官员坐在那里，玩弄我们的信件，并根据他的情绪决定是否发信。另外，星期二夜里写的信是邮差夜里送来的，这简直是在善意地嘲讽我曾请求你不要熬夜写信。不要再熬夜了，菲莉斯，这才让我高兴。至少在你神经衰弱症痊愈之前，不要熬夜了。你还哭吗？你怎么啦？没有任何理由？你坐在桌子边上，突然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噢，亲爱的，这时候你应该上床，而不是去排练。哭泣尤其让我害怕，我不会哭。别人哭对我来说像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陌生的自然现象。多年来，我只在两三个月前哭过一次。我坐在靠背沙发椅子上颤抖，紧接着两次，我担心自己无法控制抽泣声会把隔壁的父母吵醒。这是在夜里，原因是我写小说写到了伤心之处。但你的哭让人感到疑虑，亲爱的。你一直很容易哭吗？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我的过错？我肯定有过错。告诉我，有没有一个对你感激不尽的人像我这样让你备受折磨？你不必回答。我知道这不是故意的，你也清楚，菲莉斯，或你也感觉到了。但这哭声追着我不放。它不是因为一般的内心不安，你也不是很娇气。这一定有特殊的、明确的原因。告诉我，求你了。你也许根本不清楚，你的一句话会对我产生多么大的作用。你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作用，如果你的不安和哭泣和我有关，你在回这封信的时候，必须说清楚。也许原因真是我们通信太频繁。我随附一封我打电报那个星期日开头，但因为两次送信时间过去也没有收到你的信而不敢写完的信。你把它作为过时的资料读一遍，我想说的和里面的内容并不一

致，但你的哭声让我想起了这封未完成的信。

我写得很快，还有很多事要说。但别人有事找我，今天下午，或许今后几天时间，我可以吻一下你漂亮、晶莹的眼睛吗？

弗兰茨

〔19〕12.11.28

〔附：1912年11月18日，一封未写完的信〕

亲爱的，我今天到办公室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这封信。对我们俩来说，现在没有比下面的事更重要了。请快回答我，但愿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如果你不理解，可惜我抵制不了你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考虑一下，你能忍受的，我不一定能忍受；如果我不能忍受，就会用我弱点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你拉入我的圈子。这你上星期已经看到。总之，听着，只是害怕和担心才使我作了这样的准备。几天前开始每天写两封信这是一个甜蜜的疯狂，没有任何其他意思（现在第一次送信时间到了，没有你的信。我的天，你还在生病吗？）。不应该这样下去了。我们用这些频繁的信鞭打我们自己。这样带来的不是面对面，而是面对面和遥远的混合体，令人无法忍受。亲爱的，我们不能听任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无论如何不能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为了你更是不行。如果今后这样通信的话，我会在你未来的信中又会读到对我的信提出微弱的、温柔的指责，这将会使我担忧和绝望。我们的关系将不会像前一阵那么坏，但也一直够不好的了。我们互相爱护，等待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时光。但我至今仍无法看到希望。让我们用爱情，而不是绝望把我们联系起来。所以，我请求你，让我们不要再如此频繁地写信，因为这样做只会产生让人头皮发麻的虚假。虽然你的信对我来说必不可少，但我还是这样请求你。如果你同意，我将慢慢习惯少写信；如果不同意，当然不会少写。因为这是留在心窝里的毒汁。你提个建议，该如何遵守。我听你的，而不听我的。记着，如果想写的话，不在于写不写。这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不过又一次鞭打，因为想写信，想读你的信，是我每时每刻的渴望。我想，暂时的限制（未完）〔下面的内容写在同一张纸上〕

〔下面的补充在同一页上〕

我多大，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时我还完全属于我自己，我也觉得很满意。我是老大，所以照了不少像，有不少变化。从现在开始，每张照

片都比上一张要丑，你自己会看到。下一张照片里我像我父母的猴子。

我面前已为你准备了马克斯的《情感的顶峰》^[57]，很漂亮，用绿色的、尽管不太纯的皮革装订。我可以寄给你了（这是刚出版的，是马克斯最新的书），但我想先去马克斯那儿，让他写几句友好的话，然后你很快就会收到。

你还没有读过鲍姆的书吧？那我得立即给你寄些去。他七岁后就失明了，他的年龄也像我这么大，已婚，有一个很棒的男孩。不久前，鲍姆刚在柏林举办了一次讲座，对此，柏林报纸对他作了许多报道。

[19] 12.11.28

很累，亲爱的，像个劈柴工，但我还想写几句，因为我欲罢不能。下午完全泡在办公室。我没睡觉，所以现在也写不多。但写信的欲望以它惯有的狡黠占了上风。去它的！美好的时光是否将要来临？菲莉斯，睁开你的眼睛，让我看着它，如果我存在于你眼睛之中，那为什么在里面看不见我的未来呢？

我今天和不同的人进行交谈，特别是和一位柏林的画家^[58]。我发现自己整天埋头于自己的小天地，可能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无声无闻的人（是我无声无闻，不是你，最亲爱的），很可能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如果一个人和别人打交道，第一个好的作用就是失去相当一部分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在与自己交流中则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这样，他就开始希望一个人承受的负担也许私下里是大家共同拥有，必须由大家来承担。多么错误但又美妙的想法！到处遇到的是关心和同情，大家从四面八方跑来帮助一个人，即使勉勉强强的人或犹豫不决的人也在周围热烈的、特有的气氛感染下感到幸福。如果别人让我感到高兴，我会高兴得没有止境，激动得没个够。尽管看来不太礼貌，但我喜欢干涉这样的人，摆弄这样的人。我始终想让他们说话，不是想听他们想说的，而是我想听的。比如这个画家（信里附有他的自画像）很想详细讲述那些内在真实、外在却暗淡无光，像蜡烛光一吹就灭的艺术理论。但我只想听，他已经结婚一年了，生活幸福，每天上班，住在维尔默斯村带花园的房子里，有两间房间等等这样让人羡慕和催人奋发的东西。

晚安

弗兰茨

亲爱的，我今天仅收到你星期三夜里写的信，只了解你星期四投寄这封信的情况。自此又已过了很长时间。但我一定不烦躁，因为这是你要求的。我的镇静能保持多长时间，取决于你的镇静能保持多久。你现在在排练，一定生活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为你高兴，直至一切成为过去。你是否登台演出？扮演什么角色？你简直把我弃置不管，亲爱的，如果我有机会演一回幽默大师，我早就把这个角色送给你了。如果我能从你那儿得到一个角色，我会克服记忆力差的毛病，把台词背出来（因为除了记忆力还有许多力量会帮助我），夜里在我房间里大声朗诵。但这些都是我给你带来黑色的、不幸的梦想，它们让我思考。是不是我折磨你的决心让你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

你给我的第一张照片，我太喜欢了，因为照片的小姑娘已不复存在，但照片永存。另一张照片仅展示了一个可爱的模样，渴望的目光早已越过了这张令人不安的照片。“天才”就像梦中说出的一个字，没有意义，但涵义是对的。我一点也不吃惊在第二页找到梦中的故事。为什么第一张照片充满了小洞？

现在我得停笔了，亲爱的，并寄出这写了一半的信，因为我不知道今天夜里之前是否还有时间写信。

又一次不谋而合，你在上封信提醒我别忘了我的照片。在我收到这封信的同时，你可能也收到我昨天的信，里面有我的照片。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兑现的事。我们在两封信中都打算见面，但没有实现。

布吕尔小姐昨天写的小诗又写得不错，比那位先生写得要美得多。她干了什么事，非得臭骂她一通？请顺便看一眼小姑娘（我估计她在你的房间里），默默地代我问候她。你进入Fa公司就开始生产口述记录机，并一开始就在生产该设备的部门工作，这是不是巧合？我问你的问题不算太多吧，还有成山成堆的问题要问你。你不必急于回答。我永远不会停止问问题。再见。今天的字体很漂亮，是吗？

你的 弗兰茨

〔19〕12.11.29

〔捷克文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肯定很疲倦吧，我的菲莉斯。所以我必须努力把字写清楚，这样，你睡得睁不开的眼睛就不用太费力了。你不想把信先放在一边，躺下，再睡几个小时，来解除这一星期的劳累？信不会长翅膀飞走，而是静静地在床单上等你睡醒。

我无法准确地说写信的时间，因为表放在离我几步远的沙发椅子里。我也不敢去取和去看，肯定已经快天亮了。我是午夜之后才坐到写字桌前的。春天和夏天里，人们将不能像其他季节那样不受干扰地度过不眠之夜（我还没有什么亲身感受，因为我夜里失眠只是近来的事），因为黎明的到来将驱使人赶紧上床休息。但在现在这样漫长不变的夜晚里，世界忘记了人们，虽然人们不会忘记世界。

我现在写作这样不顺利，根本没有资格睡觉，而是注定在往窗户外东张西望之中度过长夜。亲爱的，你理解吗？写不好东西，但又必须写，否则我真要彻底绝望了。这就是你为好作品而高兴的代价！感到不幸，还不是真正的不幸；真正的不幸是在活页纸上书写让自己恨的、令他人恶心或至少感到冷漠的东西，目的仅是为了生存。呸，魔鬼！难道我不能销毁我最近四天写的东西，就像它们从来没有过一样吗？

这是早上问好吗？难道在一个美好的星期日这样接待睡醒的情人？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你肯定也没有什么其他打算。如果我的抱怨没有完全破坏你的睡眠，你也又能入睡，我就满足了。告别前我还要告诉你，一切肯定会好起来的，你不必担心。别人无法让我完全停止写信，因为我多次想起自己已感受到写信的温暖。

现在不再写一个字了，只给你吻，很多很多，原因有上千条，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因为节日已经过去，因为今天天气好，或因为也许天气不好，因为我写作不顺利，因为我希望写得更好，因为我对你了解得太少，而仅仅通过接吻才体验到一些严肃的东西，或因为你睡得睡眼惺忪，你根本无法抵抗。晚安，祝你过个好星期日！

你的 弗兰茨

12.11.30

1912年11月29日至30日夜

〔捷克语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亲爱的，应该到处都想念你，所以我在上司的桌子上给你写信。他不在，我替他代班。今天收到你一封长信和两张明信片，太让我高兴了！两张明信片又比晚发的星期五夜里写的信晚到，真是岂有此理！我（经理刚好来电话，让我吓一跳。他没有办成事），我刚才在烟纸店买邮票，只要邮局帮忙，你可以星期天收到（亲爱的，有信在邮寄途中遗失，或这是我得了被追踪妄想症）。邮差现在就在我旁边，第一封就是你的来信，我一把抓了过来，整捆信差点儿掉在地上。

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出色！纪念文章我不久将会收到。为什么讨论俄国芭蕾？会在艺术节上讨论吗？不要为我担心，我暂时还可以，至少我不哭了，不再倒在沙发榻上。我只担心你有什么事。你啊，世界上有那么多漂亮的疗养院。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再写。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你的演戏伙伴同情你，原谅你的神经质？你倒不是一直很紧张，但大家在节日准备工作中都很紧张，紧张是不认什么同情的。不要紧张，你建议我们为了照顾对方要保持平静，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无意识地这样做，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很少成功。从你的不安中，我发觉自己很少成功。我完全信任你，不要误解我。我怎么能爱一个人，但又不相信这个人呢？但我这边是恶魔横行，不断扩散，令我害怕。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们俩一起反抗，这恶魔就抵挡不住。这时我又自以为是。

现在我真的必须停下来了，当经理的不允许给情人写信。我们部门共有七十名职员。如果大家学经理写情书，那就太糟了。

那位矮小的布吕尔小姐在干什么？我的明信片是不是很让她头痛？或者根据我的老观点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她根本没收到？

随信寄上朗诵会邀请信[59]，我将朗诵你的小故事（《判决》）。你即使待在柏林，你也将去那里，相信我。带着你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和你一起出席朗诵会，将给我带来一种特殊的感觉。这故事情节悲伤、令人揪心，听众不会理解我朗诵时为什么眉飞色舞。

弗兰茨

〔19〕12.11.30

〔在一张附页上〕

亲爱的，我着魔了！夜里稀里糊涂地把本该寄到你住处的信写上了

你办公室的地址。寄给你住处的信，我不敢写上“快递”。这封信不太可能星期日到了。这样邮局至少有机会来表现一下自己。请原谅！

弗兰茨

亲爱的菲莉斯，在结束与我小故事的斗争后——第三部分，也肯定是最後部分已开始动笔——我无论如何要向你道声晚安，虽然我明晚才投寄这封信。亲爱的，我很吃惊自己是多么依恋你。这是我的罪过，我一再对自己说——但愿你永远不这么说——但又摆脱不了。如果我在你身边，恐怕会永不让你孤独——但我又会要求一个人待着——我们俩将会很痛苦，但这是幸福，是用痛苦也买不回来的幸福。

我对你房间知道得太少，亲爱的。如果我在想象中随你走进，我不知东西，空手无援。如果我回忆你的信，你仅提到过一张可爱的写字桌，你经常用床代替它；还有一次提到暴雨之夜中的百叶窗；装信的盒子一定也在这里，还有书籍，你曾在书中翻到那张可爱的照片（谁知道那儿是否还有其他照片。你小时候肯定照过多次相片，十二岁后肯定还照过。几个姑娘在一起，会有集体照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好了，不再写了。今天我把表装在袋里了，现已是2点45分（我又是12点后才坐到写字桌旁的），今天必须比你早点睡。就像看见你在交谈，我看见你和代理人萨罗蒙在跳舞，然后又和那位做诗的先生，然后又和六位昨天围着你桌子看你写信的先生。尽管不太可能，但两位哥本哈根的代理人也来参加公司庆典并跳了舞。看着你们跳舞，我非常头晕。大家无疑跳得都比我好。如果你看见我跳舞，那简直糟透了！你可能会祈求上帝不要让我跳了！你们跳吧，我可去睡觉了。不管怎么样，我将在睡梦中——如果上帝行行好的话——把你从嘈杂的舞场中拉到我的身边。

菲莉斯，这里和办公室都没有信（我想我们都有些心不在焉）。星期五正是没完没了的排练，我被迫放弃你的信，所以你们的成功也有我的功劳。你不要把精力全部耗在排练上，那样到节日你不是太疲劳了吗？

今天下午的时间整个儿被剥夺了，亲戚拜访，听奥伦贝格的讲座（你了解他吗？）和来回走路。什么结果都没有，我心不在焉。隔壁房间的叫喊声（正在排列出席婚礼人的名单，每个名字都是一声喊叫）让

我感到筋疲力尽。

你怎么过星期天的呢？这星期天一开始不错，尽管我自己吓了自己。我必须把信作为快邮寄出，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这很愚蠢，那就原谅我；如果做对了，也不是我的功劳。真不知道该怎么才好。最后我问自己该选择什么，是你的信和因此带来的担心和不愉快，还是不要你的信图个清静？结果仍是跑邮局。另外，我们至少两清了：你现在收到了一封让你吃惊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我认为，我们应该超越遗失或正在途中的信件，对我们的爱情始终不渝。这是我内心的命令，你愿意吗？再见，亲爱的，你得调养一下，不必考虑工作、家庭和我。你尽情地伸开四肢躺在沙发榻上，这种家具就是让你休息的，而不是趴在上面哭的。

弗兰茨 上

1912年12月1日

亲爱的，就几句话。已经很晚了，明天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才开始为我的小故事投入战斗。我的心想让我进一步卷入这个故事，但我必须试图把我尽量放在故事外面，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要过几个小时才会有睡意，因此我必须抓紧上床休息。

亲爱的，几乎整个星期日我都在想念你，想开心的事，也想不开心的事。奥尔伦贝格的讲座很快就对我无所谓了，而你则又充满了我的脑海！我马上要出去散步，走到火车站就可以投寄信了。亲爱的，我还拥有你，还很幸福，但这能延续多久呢？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对你有任何的不信任，亲爱的。但我挡了你的道，妨碍了你。我应该往边上靠一靠，什么时候这样做，将由我的自私自利的程度而定。我觉得，我不可能用一句开诚布公的、大丈夫的话来做到这一点，我始终考虑的是自己。我永远无法隐瞒这样的事实：如果我失去你，我也就无可救药了。亲爱的，我的快乐看来就在面前，离我只有八个小时的火车距离，但又可望而不可即。

亲爱的，不要害怕这些永远的同样抱怨又卷土重来，不会像过去那样再给你去信。我必须无论如何见你一次，尽可能长时间地和你在一起。夏天行吗？或者春天就行？有时候晚上，我得对着自己叹息，因为这比沉默地受苦要强些。

亲爱的，我很想说些快乐的事情，但一时想不起什么自然的事情。在我故事的最后一页，四个主人公都哭了，或者至少很悲伤。10点肯定来一封快乐的信，为此，我应该得到一个吻。带着这个吻，我上床睡觉。

〔19〕12.11.1〔12月1日〕

〔在另一纸上，可能是附在1912年12月1日写的几封信中的一封〕

亲爱的，麻烦你看一下广告柱，犹太人在哪儿演戏，尤其在哪儿可以写信找到我的略维。他又给我写信抱怨自己，也抱怨我，因为我不给他写信。遗憾的是，我把他的信封丢了，所以不知他的地址。

亲爱的，我们双方的心不在焉和邮局马虎终成事实。我在办公室刚收到原本星期日就该收到的信。这是一封星期五夜里写的，很长时间了，但愿一切都好。你圣诞节留在柏林？走亲访友，唱歌跳舞，四处奔走，你打算就这样休息？你太需要休息了，陌生来客发现你气色不好。另外，星期六照相了，我马上可以看见你气色是多么的不好。

我圣诞节旅行更成问题了，因为我妹妹的婚礼推迟到25日，有可能影响我先前的圣诞节旅行。婚礼虽在家庭范围内进行，但场面也很大。你也有客人，使我来不了柏林，我应该去哪儿呢？当然现在还有时间，所以还有希望。

如果能收到你身体状况的好消息就好了！那个晚上，你看上去精神焕发，红润的脸颊，压不垮的身体。那时我不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你了吗？不是已经写信告诉过你了吗？我第一眼看去，你就特别显眼，不可思议地自在，因此不觉得陌生。我当时觉得一切都很理所当然。当我们起身离开餐厅的桌子时，我吃惊地发觉时间过得很快，令人悲伤，人们必须抓紧时间。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为了什么目的。在钢琴房里，你正去取鞋，我最终对大家说了一句不太聪明的话：“您（当时称你为“您”）很让我喜欢。”当时我紧紧抓住桌子。

从那天晚上一直到你的客人问你不幸的恋爱之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啊！脸红意味着同意，即使你不知道这一点，但在这种情况下，脸红意味着：“是的，他爱我，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因为他认为，他爱我，所以就可以折磨我。他很自负地充分利用这个权利，几乎每天来一封信折磨我。然后再来第二封想把第一封忘得一干二净，但又怎么能

忘记呢？他说话一直神秘兮兮，听不到他说一句开诚布公的话。也许他说的根本写不下来，那他应该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再说了，而是像一个有理智的人一样写下来。他肯定不想折磨我，因为他爱我，这我感觉到胜过一切。但他不应该这么折磨，应该阻止他的爱让我感到不快乐。”亲爱的女演说家！我可以把生命交给你，但我不能停止折磨。

你的 弗兰茨

〔19〕12.12.2

〔捷克语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这是一封多么绝妙、多么厚实的信啊！亲爱的，你太让我高兴啦！还有里面的照片，初看很陌生，因为你的姿势和环境，我都不太熟悉。但越看越清楚，在写字桌台灯光以及当时的阳光照射下，照片上看到的是一张可爱的脸庞，很生动，以致看的人想去吻那只放在船沿上的手并且也这样做了。那时，你的气色比今天好多了，也许出于高兴，你脸上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你手里拿着什么？一个特殊的小口袋？谁把叶子插到你的腰带上？你多么小心和怀疑地看着我，你好像看见一个纠缠不休的人四年后又来纠缠你。你出门穿戴得很严肃，你哥哥也同样。有人已经告诉我了，说你哥长得很英俊。我站在他旁边肯定显得特别年轻，但也许我比他年龄大。照片上的他刚二十五岁，你很为他自豪吧！

你还允诺寄其他照片，亲爱的，你必须说话算数。从信封上看不出有没有照片，打开信封，好像只有信（有些信收到的时候信封正敞开，这是信封设计有问题），但里面有照片，照片上的你滑溜了出来，就像你从火车车厢里下来一样。这些照片也属于我的了，亲爱的，不管是暂时还是永远。为了解除你的顾虑（不是为了给你带来顾虑），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照片很恶心，不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而是为公司接受监督委托时用的，已用了两三年了。我实际上没有一张迷糊的脸，只有在闪光灯前才会有先知般的眼神，我早就不穿带高领子的衣服了。相反，西装就是那多次提起过的唯一的一套（唯一一套当然有些夸张，但不是离奇的夸张），我和当时一样今天仍喜欢穿它。我穿着它曾在柏林剧院的前排座位上引起注意，一连几夜坐在火车车厢里的凳子上过夜或打盹。它和我一起衰老，它已不像照片上那么漂亮。西服上的领带很漂亮，是我去巴黎时带回来，不是我第二次去，而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具体哪一年我已无法记清。巧的是，我现在写信的时候正戴着这领带。它也变老了。总之，我只请求你在照片前不要吃惊。我只有一张好的照

片，是最近拍的（所谓好照片，就是照片上的人应该至少是本人愿意看到的），但这张照片和其他全家照放在一个镜框里了，拿不出来。如果行的话，我让别人再洗一张。我很想变成照片留在你手里，留在你真正的手心里，因为我早已在你那张无形的手里了。

这是傍晚写的，现已是深夜。亲爱的，虽然昨天没有信，但我的行为难道不是很完美吗？我相信你，感激你，好像你就在我身边，只是没有说话。你绝不会有这样悲伤的日子，因为你尽管会哭——这是你唯一的缺点，也是引诱立刻把你抱在怀里的可怕手段——但你的自制力肯定比我好得多。你好好地考虑一下，你能否忍受一个有几天和经常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的人。这样的日子，尤其在一个星期前经常出现，我不知道你是否从我的信中看出。告诉我，你没有注意到，我患了妄想症。从你的嘴里，我希望听到一切关于我的决定，这样我才会安下心来。

你们的节目太精彩了！我不知为什么，尽管有许多理智的理由，尽管你可以作为无懈可击的证人，尽管我所掌握的细节，整个工厂让我觉得不太现实。原因也许在于，我用愿望和希望把你团团包围，而这些东西和现实的企业格格不入，只适用于非现实的企业。所以我很想听你介绍你的办公室。如果我确信办公室整天围着你，让你干活，那就让我感到厌恶。我能得到关于你办公地点的明信片吗？如果你给我寄，我会给你寄一份我公司的年度报告，其中有我的一篇关于圆的安全刨刀轴的文章，带有图片；或者关于车间保险的文章；或者关于安全铣刀头。亲爱的，还有许多让你高兴的事在等你呢！

我现在得上床了。最近，我睡眠太少，散步太少，什么也不读，但有时候感觉并不是太差。我正在想圣诞节旅行的事，想很长的假期，想今后的岁月。如果前景暗淡，我就闭上眼睛。别忘了，我现在一般一天只写一次，下午时间都属于别人。但别人给我吻，所以还能忍受一切。

弗兰茨

〔19〕12.12.3

〔1912年12月3日至4日凌晨〕

亲爱的，就两句话。可能写信告诉过你的董事会选举已经结束，我可以自由支配的办公时间已经成为历史。我只能在匆忙之中问候你了。另外，我现在总犯困，一切都像笼罩在浓雾中。亲爱的，你今天给我送

来精美的礼物，你上午的信就像你的手把我吸引到你身旁。

夜里再见。很难改变每天写两封信的习惯。告诉我一个办法。让我用吻来请求和感谢你的办法。

你的 弗兰茨

〔19〕12.12.3

年度报告已寄出。你熟悉以后，将得到其他的。

亲爱的，我本该今天通宵写书的。这是我的义务，因为我正在写我的故事的结尾，而集中时间，一气呵成，从创作的统一性和激情来看，对结尾是有很大好处。而且天知道明天我听完我现在就在诅咒的讲座后能否继续写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停笔，不敢再写下去了。虽然我这样系统地写作时间并不长，但我正从一个虽称不上模范却还有一定能力的官员（我目前的头衔是策划）成为我上司的累赘。我办公室里的写字桌从来没整齐过，现在堆满各种纸张和公文。我只大约知道堆在上面的是什么，下面的，我只知道是否有疑难案子。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被写作和办公室工作折腾死了。但也有时候，我巧妙地把两者摆平，尤其是在我回家写作不顺利的时候，但这种能力（不是蹩脚的写作能力），我担心自己将逐步失去。我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四处张望，那眼神在办公室里过去是看不到的。我的打字员是唯一一个能在这种时候能温柔地把我唤醒的人。此外，就是你的信，自从我们开始平静地相爱以来，你的信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支柱。有人，不仅是有人，而且是最亲爱的人关心我，使我从你的信中汲取力量，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去投入我的工作。但尽管如此，尽管如此——

今天我写得这么少，但有很多事情要对你说。你站在样品厅里多神气！但很想看看你的办公室。不，你今天给我寄的东西，我要问你几个月，耐心的菲莉斯，才能问明白。首先给我简单解释一下两处涉及你的地方。一处是关于你的犹太复国主义，另一处是关于文学和冻肉？我的上帝，这些人，从所罗门到罗森鲍姆，都认识你，他们天天能见到你，和你一起坐车，他们只要在经理室一按电钮，你就跑着过来。亲爱的，亲爱的，哪儿有大钟能把你呼唤到我身边？我要用吻来袭击你。好了，搁笔了。我的故事使我彻底难眠，但你给我带来充满美梦的睡眠。昨天，我和你在草地上商谈一起去农村度假的计划。

感谢上帝，亲爱的，你写到信尾的时候又平静了下来。我不知道在自责中该怎么办，所以我向你保证尽一切努力。我很想象布吕尔小姐那样在你身边，在你写信的时候吻你，再一次明确告诉你，我永远不再在信中折磨你，而是把一切都保存起来，等我们重逢的时候再进行弥补。

你自己说，我不想折磨你。你虽然是我自己的自我，我也不时地折磨自我，这对自我有好处，但你是我内心最深处的、最温柔的自我，我要尽全力保护，使它处于绝对的宁静之中。尽管愿望是好的，但我手中的笔不一定听话。

亲爱的，请原谅，从现在起写信要心平气和，因为给恋人写信是为了安抚而不是鞭笞。

昨晚的信也有些过失，我想起来了。好像讲的是我办公室，我坐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收到和阅读了你的信后，我像一个巨人一样站了起来，像一个忙碌的官员走到打字机旁，就好像你把我引到那里，并允诺给我一个吻以奖赏我出色的工作。不要悲伤，亲爱的！你已成功地让我高兴起来。再见，亲爱的，难道我今天无法告别吗？现在就去找打字机！这已是今天最后一封，也就是第二封信，现在一直只来一封。马上会有解释的。我今天离不开你，亲爱的。如果我傻里傻气的话，你就抽回你的手。

弗兰茨

啊，我最亲爱的，正像我担心的那样，对我的小故事来说，真的已经太晚了，到明天晚上才能写完。但现在正是我给你写信的时间。我把你的电报当作一个吻，味道好极了，令人快乐、自豪和高兴。任何一个晚上都比今晚重要，但今晚能给我带来快乐，而其他晚上是用来解脱我自己的。亲爱的，我很喜欢朗诵，往有准备、认真听的听众耳朵里吼叫，这对治疗心情郁悒很有效。我冲着听众大声朗诵，盖过了隔壁房间传来的、快要让我无法继续朗诵的音乐声。你知道吗，指挥别人或至少相信自己的指挥力量，这是人的最大满足。小时候，几年前还是这样，我梦想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当然要比今天有更多的激情、更洪亮的

嗓音和更深邃的智慧——几天几夜、不间断地用法语朗诵整部《情感教育》（哦，你，我心爱的发音！），并聆听四周墙壁发出的回声。我不知什么时候说过，演讲比朗诵还要好（很少满足过）。我感觉到两者之间谁高谁低，至今也不后悔。这是我三个月来唯一公开的爱好。这期间，我几乎没有与任何陌生人交谈过，只和施多斯尔一个人。你的施密茨，本来约好十四天前见面，但我睡过时间；仅仅因为他与你的关系才使我对他有点兴趣。你认识施多斯尔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面色红润，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很像一个犹太籍屠夫，但他的脸流露出的是人类的智慧（等一等，我在目录册中有他的一张照片，随信寄上）。我说得有点啰唆，如果我不能在你面前，亲爱的，那么在谁面前呢？这个习惯肯定来自朗诵，一时很难改掉。为了在身边保留一点你的东西，但又不那么惹人注意，我把你的照片带着，准备在朗诵的时候把手放在上面，用这种小魔法来接受你的指挥。但我对故事倒背如流以后，开始拿着你的照片玩，然后不假思索地又挤又折。亏得我折的地方不是你那只可爱的手，否则你明天无法给我写信，这一晚上的代价就太昂贵了！你对你的小故事（《判决》）一无所知。这小故事有点混乱，没有内容。如果它没有内在的事实（这绝不可能泛泛地肯定下来，而必须一再由读者和听众重新确认或否认），它就什么也不是。而且这故事尽管篇幅不长（十七页打印机纸），但错误很多，难以想象。我不知怎么会把这么一个不成熟的故事发表了呢。但每个人都愿意展示自己的东西，我展示那个小故事，你展示你的爱。亲爱的，有了你，我是多么幸福。在读完你的小故事后流下的眼泪中也有这一幸福的眼泪。

告诉我，我该怎么配收到你今天的信，尤其是信的第二页。这里面充满了我给你带来的痛苦。当第三页写到你那次旅行的回忆时，你恢复了一些平静，我才松了一口气。你看，别人是怎么捉弄我们这些人的。你抱怨，当你离开布拉格时，没有人来火车站送你。我，至少今天回头想想，很想站在车厢的踏板上随你同行（这太危险了。我完全可以慢悠悠地上车，但在这样的深夜，为了恋人，再难的事也变得不那么难了）。我想起，你在上一封信中曾把“我”写成“你”。如果这书写错误能变成事实就好了（安静，安静！我已经闭嘴不说了）！关于分公司的事，我终于抓住你了，不要否认，不要否认！你们在布拉格并没有自己的分公司。我早就发现FaAdler公司了，每次我经过该公司的时候，我都蔑视地吐一口唾沫，因为我认为这是你们的一个竞争对手。我蔑视它就像我蔑视任何一家留声机公司的商店一样。顺便问一下，遵照我的建议去办了吗？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开了留声机沙龙了吗？如果划算

的话，可以在西城区什么地方开一个。在巴黎那家留声机沙龙里，一个女人坐在中间一个高出来的座位上，负责把客人的钱换成筹码。如果在柏林建一个沙龙，你作为这件事的倡议者可以担任卖筹码的角色，怎么样？我这样建议，是因为你一边卖筹码，一边可以给我写信。亲爱的，对你的渴望让我产生了多么愚蠢的念头。亲爱的，我将对我自己感到悲伤。假如我有时间给你写信，如果我有时间去柏林，我早就在你身旁，看着你的眼睛。但现在，我只能用愚蠢的想法填满我的信，好像生活一成不变，一点不会变短似的。

不，我现在不再写了，失去了全部兴趣。我上床了，默默地念诵着你的名字，菲莉斯！菲莉斯！这名字无所不能，既让我激动，也让我心平如镜。晚安，做个好梦，我们这里习惯这么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床上怎么写信？墨水瓶放哪儿？纸放在你膝盖上？我做不到，我坐在写字桌旁写的字还不如你这样写的字更稳健。床单上没有留下墨汁的痕迹？那可怜的背！那眼睛也必须被毁坏。与中国相反，这里是男人想夺走女友的灯。所以，这个男人不会比中国的学究更理智（在中国文学中，对学究的嘲讽和尊敬共存），因为他虽不想让女友在夜里写信，但夜信到的时候，他却迫不及待从邮差手里夺过来。

好，再见，亲爱的，最后一个吻。我还要签上我的名。

弗兰茨

〔1912年12月4日至5日夜〕

我一个人，但并不觉孤独，因为我签名后仍可以吻你。亲爱的，如果我们真的重逢后仍像现在这样依依不舍，你就会认识到，我的信给你带来的痛苦和真正与我相处所带来烦恼相比，简直是算不了什么。再见，亲爱的。写完这一段，我要求你再吻我，并将它刻骨铭心。

〔在边沿上写着〕

今天不会有信了。

亲爱的，向你问好并感谢向我描绘了你的房间。但缺少后墙，那儿应该还有一扇门。你有许多书吗？

我没有写信告诉你选举的事吗？不，不。可能是在几封遗失的信中写的。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向你抱怨，你的信先得从一大堆选举邮件中挑

出来，要花很长时间。这是我们公司董事会选举，由于在我们这里投保的企业家（近二十万）和全部工人（近三百万）都参加选举，所以工作量很大。今天我旷工，我桌上堆积的工作已经很多，不时有人在抱怨。

亲爱的，不要否认，照片的我对你显得很陌生。你不打算承认，但你的信已说明了一切。只要用怀疑的目光来读你的信，就像我这次这样，就能感觉到你的想法。我该怎么办？我的模样就是这样。照片拍得不好，但很像我。我实际的模样比照片上还差。这是两年前的照片，但我年轻的外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自从我经常熬夜以来已经有了一些讨厌的皱纹。亲爱的，你能习惯这张照片吗？照片上的人还能吻你吗？或他写信结尾时不能吻你？你想，这照片最终还能忍受，如果他真的在你面前出现，你吓得非跑不可。你想，你亲眼只看见他过一次，而且是在煤气灯下，当时也没怎么特别注意他。他白天几乎不出门，那张脸终日不见阳光。我很理解你。也许你能习惯他，亲爱的，因为我，一个受你友好相待的写信者，也不得不习惯他。

在上面，我写得有点夸张。你的信和往常一样可爱。但我内心的情绪波动忽上忽下，今天正是最坏的时候。请原谅我们两个人，一个写信者和一个照片上的人，让我们也从接吻中受益。亲爱的，再见。我很平静，希望你也是这样并继续爱我。

你的 弗兰茨

〔19〕12.12.5

这是今天第二封，也就是最后一封信。我的上帝，我又得去出差了。

哭吧，亲爱的，哭吧，现在是哭的时候！我的小故事中的主人公不久前刚死去。如果你需要安慰，那告诉你，他是在平静之中，在与众人和解之后死去的。故事本身并没有完全结束，但我现在对故事已没有兴趣，所以把结尾放到明天再写。现在也已很晚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来克服昨天的干扰。很遗憾，故事中的某些情节明显地反映了我的疲劳状态、其他干扰和不必要的忧虑；它们原本是可以清除掉的。正是从甜蜜的章节可以看出这些。这正是那种永远钻心的感觉。我作为一个感觉到自己有创造力的人，暂且不论这一创造力的强度和耐久力，在生活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创作的作品可能比面前的作品要更纯洁、更有感染力、更有条理。这种感觉不会被任何理智所消除，尽管如此，理智还

是最高明，它说，人不应该指望现实以外的生存环境，因为不现实的生存环境并不存在。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明天结束这个故事，后天就重新着手写小说。

我最亲爱的，你想知道你的信什么时候到我这儿，以便有所准备？现在邮局送信时间无法估计，就是奥地利邮局工作起来也没有计划。你第一封加急信是星期一11点送到我住处的，第二封是9、10点之间送到办公室的。你的电报是下午4点半送到住处的（如果电报晚来一会儿就好了，这样正好唤醒我，我也不会睡过了）。你想让我星期三下午收到的信星期四上午才送到住处。当我3点拿到这封信时，我觉得我们是多么亲密无间啊！你给我发电报，就是想让我带着电报去听讲座。我也几乎真的把它放进袋里，但又考虑了一下，因为我带着电报绝不是就想放在衣袋里，而是要想放在讲台上，这样做太显眼，所以我宁肯随身带明信片。

因为你误解了，所以我必须非常清楚地介绍我的办公室。我们没有七十个部门，而是在我工作的部门里有七十个职员。每个部门领导是一正三副，我就是三副之一，不幸的是负责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是这样。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照片上显得陌生、但内心最忠心于你的人给你一个长长的吻。

你的 弗兰茨

〔19〕12.12.6至7日夜

〔约为12月5日至6日夜〕

亲爱的，当我为自己的照片犯愁的时候，我又成了一个大傻瓜了。你沿着环城铁路散步时，肯定对我的照片已习以为常，否则不会想起我。只是你的头痛也许是吓一跳的后遗症，或是你给我写长信的结果。记住，我最多只配经常收到你的信；而长信，我觉得自己不配收到，我没法改变自己。为了能心安理得地收到你的长信，比如那封游记式的长信，我在这世界上寻找我能做的事，但徒劳无益。我别无他法，只能颤抖着、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信。

我曾在信里为自己的外表表示遗憾，至今我还在为那封信害怕。天知道你会怎样嘲笑我呢！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收到你的电报，上面写到：“弗兰茨，你很英俊。”这样，我会羞得趴到桌子底下。

你看，快乐的小姑娘，你在随信寄上的剪报中可以看到有人在一个私人聚会上公开和夸张地赞扬你。写这篇文章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作家、评论家保尔·维格勒。你认识他吗？他写几本很好的书，很优美地翻译了一些法语书。令人妒忌的是，他2月份就来柏林，而我呢？当然他来柏林是来《柏林晨报》新任戏剧评论员的，这也不太令人羡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唉，亲爱的，是结束和吻你的时候了。否则我的上司就要干预了，这必须防止。亲爱的，亲爱的！让我再叫你两声。

你的 弗兰茨

1912年12月6日

昨天是倒数第二封，今天是最后一封。

我刚写完一封信，收信人就是你那位旅行伴侣的丈夫。他妻子曾称你是小天使。

关于那张对我来说很重要和具有教育意义的照片，我夜里给你写信。

星期一，我得去莱特默利兹。那个小个儿布吕尔对我的明信片又说了些什么？你收到我的两张明信片了吗？

现在我想起来了，你的信是4号的，它怎么会星期三……真笨，我搞错了日期。我想起来了，你那时还没有收到我的照片。

亲爱的，听着，我的小故事已经完成，但今天的结尾一点也不让我高兴，可以写得更好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想法当然总是这样的：我有你，亲爱的，这是生活的第二个理由。但从恋人的存在中寻找生活下去的理由，这依然是耻辱。现在我及时地回想起，这应该是星期日的信，最好还是把抱怨放到星期一。亲爱的，我不知为什么，但你沿城市铁路的散步让我万分感动。如果人们也许同时把你孤独的散步和我的相比较，把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那么在高处会响起什么样的嘲笑声呢？

亲爱的，这张照片又让我向你靠近了一大步。我认为这是一张较老的照片（你没有写下片言只语来说明这张照片，也许想把我引入陷阱；

但幸福和感激让我大胆，我一点不怕）。从灯光、组合和上面人的情绪来看，这张照片显得很神秘。那把神秘的钥匙就在前面的桌上，放在装钥匙的盒子旁边，这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你笑得很忧郁或者是我没有根据地强加给你的。我不能正眼看你，否则目光会死死地盯着你。你穿着一件装饰很特别的衬衣，在左下臂上，你戴着绿带或者手镯。除了我个人不太重要的看法外，别人也会认为你处于照片的中心，不仅是因为你站的位置，而且是因为你母亲在你胳膊下拉了一把，或因为是看上去这样，这使你显得有些特别。另外，你目光和全家人看的方向相反。靠我最近的是你母亲（即使有可能你母亲根本就不在照片上），由于变化多端的灯光大多集中到她脸上，所以对她的判断有点不太肯定。她是不是长得高大、有点瘦？在我父亲的家族中有些女人长得稍微有点像她。她看上去很明事理，我又几乎回到我最初对她的看法，我有胆量和她谈谈。你父亲看上去很威严，站在他面前，我会变得局促不安。他做什么生意？你弟弟，我已在寄自宾茨的照片上认识，他身上看不出有什么新变化。边上站着你的姐妹（由于你弟弟尚未结婚，所以很容易猜准），你的姐姐，我称之为布达佩斯大姐，称站在旁边的那个有趣的男人为你的布达佩斯姐夫。唯有他们俩在笑，所以他们属于一家人。站在另一头的姑娘，根据她怡然自得的、有点疲倦的微笑，可能是你冷漠的妹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坚决不阅读任何东西，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一知半解地阅读更可怕）。你们都在哪间房间？是你们现在的起居室吗？这张桌子是你在信中曾提到的，你父亲和你弟弟玩六十六点牌的那张桌子吗？谁给拍的照？是过什么节日拍的？父亲和弟弟看来穿着深色服装，戴着白色领带，但姐夫系着一条彩色的领带。亲爱的，人面对照片是多么强大有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又多么软弱无力！我很容易想象，全家人都已走开，唯独你自己留下来，我隔着大桌子朝你那里凑过去，想找你的目光。我找到了，幸福得要死。亲爱的，照片是很美好的东西，不可缺少，但它也是一种折磨。

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去看时间，已经3点45分，太可怕了。我12点过后才开始写信的。晚安，亲爱的。继续爱我！你下星期将收到我的一本小册子，我能因此得到几个吻？这是梦中最美的事情。亲爱的，这是第一句话，亲爱的！

你的 弗兰茨

为了便于监督邮件的运行情况，我提一下，今天，我收到装有照片的加急信。

亲爱的，出于种种原因，我今天什么也没写。白天，为办公室写了几封信，一份申请书，为讨厌的莱特默利兹之行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另外，我晚上7点后才睡觉，11点才睡醒。尽管准备工作做得很快，但莱特默利兹之行还是让我失去了一个工作之夜，尚未动笔的小说也不得不再次放下。总之，有几个原因让我今天没法接着写小说。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内心充满了对你的渴望，让我烦躁不安。你好吗？你是否觉得我一无是处？你是否今天也很想我？亲爱的，我今天在整个睡梦中都梦见你，但只记得其中的两个梦。我一醒就尽力忘记它们，因为梦中出现的可怕事实令人讨厌，清晰明了，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尽管这些梦错综复杂，充满了我心里现在还记得的细节，但我还是想简单地讲述一下。第一个梦起源于你的一句话，你说，你们可以直接从办公室打电报。我从我房间也可以直接打电报，机器就在我床边，就像你习惯把桌子拉到床边一样。这是一台特别粗糙的机器，就像我害怕打电话一样，我也怕打电报。但我必须给你打电报，因为我十分担忧你，希望听到你的消息，这一渴望让我发疯。使我无法入睡。幸运的是，我最小的妹妹来了，开始为我发电报。我对你的担忧使我富有创造力，可惜这只是在梦中。机器设计得很简单，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来自柏林的回答马上就会出现在纸带上。我想起，当时因为紧张，呆呆地看着空转的纸带。这很正常，因为只要别人没把你叫到机器旁，就不会有答复。当第一行字出现在纸带上时，那是多么令人兴奋，我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对此我记忆犹新。这是一封完整的信，我可以一清二楚地阅读。如果我有兴趣的话，我也许可以回忆起信的大部分内容。我只想说，信中痛骂我烦躁不安，但骂得令人舒服，令人高兴。信中称我是“贪得无厌”，列举了我最近收到或将要收到的信和明信片。

你在第二个梦中是个瞎子。柏林盲人学院组织集体郊游，去的村庄正是我与母亲避暑的地方。我们住的是一座木头房子，窗子仍记得一清二楚。这房子处在位于山坡上的庄园的中央，房子左边是个玻璃走廊，大多数盲人姑娘就安置在那里。我知道你就在她们中间，但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见到你，和你说话。我一再离开我们住的房子，跨过门前铺在泥泞地上的厚木板，没看到你后，又一步一回头地往回跑。我母亲也毫无目标地四处溜达，身上穿着一件很单调的衣服，一种叫修女服的服装，

把手放在胸前，但没有交错。她要求盲人姑娘提供各种服务，这方面特别喜欢一位身着黑色衣服、圆脸蛋的姑娘。这姑娘的脸颊有一边留下很深的疤痕，好像曾经破过相。母亲在我面前也夸这姑娘聪明和勤快，我也特意注视她了一眼，点头表示同意，但脑子里只想着她是你的同事，应该知道你在哪里。突然，四周的寂静结束了，也许已吹号要出发了。不管如何，学院应该继续前进了。我也作出决定，跑下了山坡，穿过了一扇打通墙壁的小门，因为我觉得自己看见队伍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在下面，我遇到一些失明少年，排着队，由老师领着。我跟着他们，沿着高高低低的山路走着，因为我想，整个学院的队伍现在将要到来，我将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你，和你打招呼。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肯定有点太长，也错过机会询问队伍是怎么出发的，我一边看着一个失明婴儿——学院里有各个年龄层次的孩子——在石头底座上被从襁褓中打开，然后又捆绑好，一边打发时间。我终于觉得四周的宁静有些可疑，便向老师询问，学院其他人为什么还没来？我这才吃惊地了解到，只有这些小男孩才从这里出发，其他人现在正从山上另一个出口离开。他还宽慰我说——他冲着我的背影喊道，因为我已疯也似的跑了——我还能及时赶到，因为失明姑娘们排队当然要花很长时间。我顺着一堵光秃的墙，沿着无比陡峭的、充满阳光的小路往山上爬。我手里突然拿着一本厚厚的奥地利法典，很难拿，但可能对找到你并和你交谈有帮助。路上，我想起你已失明，所有我的外表和举止不可能影响你对我的印象。经过这番考虑，我真想把法典这个不必要的累赘扔掉。我终于到达山顶，时间的确绰绰有余，最先的一对尚未离开进口处。我作好准备，好像看见你在姑娘们中走来，眼睑低垂，表情僵硬而又平静。

这时，我醒了过来，浑身燥热，对你如此远离而感到绝望。

〔19〕12.12.6—7夜

〔可能是1912年7日至8日夜〕

唉，亲爱的，虽然我的虔诚已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但为你今天的信，我要下跪来感谢上帝。我怎么又为你感到烦躁不安！我感到待在没有你的房间里是多么无聊！我太需要你！明天要出门，所以必须好好地作些准备，这次出门的唯一好处，就是坐几小时火车后离你近一点。另外，如果一切顺利，我明天下午就回到布拉格，从火车站到我们的门房，我会一阵狂奔。为了信，你的信！

今天，我计划了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表。现在是下午3点。今天夜里，我是4点上床的，一直睡到11点半。这又是你信的过错，否则我必须躺在床上等信。今天来的信是快递邮件（有了这么一次，我几乎想说，以后星期天的信必须作为快递邮件寄发），我很快就收到了，还没有到起床时间。我一边回味着信，一边高兴地舒展四肢，又躺了几个小时。

这几天以来，我没有作过真正的散步，所以我现在先散步，然后6点钟躺下就寝，如果可能的话，睡到夜里1点或2点。也许我又要接着写小说，舒舒服服地写到早上5点，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我的火车是早上5点45分的。

亲爱的，请爱护自己。又是3点才睡。把你搞得筋疲力尽，这不可能是圣庙落成典礼的本来意思。你发表演说啦？你看一看吧！我难道没有说过？开场白是不是提到了“鲁特”？“鲁特”是我上次疗养期间在疗养院住的空中楼阁，门上写着“鲁特”。在楼阁里住了三个星期，对这个名字产生了感情，我很想听你公开提到并称赞这个名字。——还有一点，我不去求婚；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就不必妒忌画家（画家在自画像上看上去像个犯罪的猴子），而是让全世界妒忌我。

弗兰茨

〔19〕12.12.7，星期日

〔1912年12月8日，星期日〕

亲爱的，当你在我星期天收到的信中劝告我不要把你应在星期天收到的信作为快递邮件发出时，你对我们思想一致已确信无疑了（事实上完全是这样）。但这只不过是甜蜜的睡意，所以对远方的人来说，这是你生活热情的十分明显的标志。

亲爱的，就想吻你并请求你允许我靠在你胸前哭诉一番。由于发生了一些不幸的巧合，我7点半才到家。睡觉或者至少入睡已不可能了，因为隔壁邻居马上就要热闹起来，我也得为法庭审判研究资料，还得写那份长长的申请书。总之，今夜的时间再次拱手让给这个强盗般的世界，只有你，亲爱的，才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累了，四肢无力，脑袋嗡嗡作响，所以请你——这非常高傲无礼，我知道——请你吻我，就在我结束这封伤感的信的时候，亲爱的！亲爱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明天

会发生什么，不值得一谈。

弗兰茨

〔19〕12.12.7

〔1912年12月8日〕

您^[60]知道〔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中篇小说《孤独》吗？它以前曾让我陶醉。除此以外，我还看过《哥特式房间》的节选，我很喜欢，尽管或许出于什么特殊理由。

顺致问候！

弗·卡夫卡

〔广告明信片邮戳：莱特默利兹，1912年12月9日〕

写于返回之行前，感谢上帝。最重要的信件原封未动地等着我。致以衷心问候。

弗·卡

〔明信片邮戳：莱特默利兹，1912年12月9日〕

我最亲爱的，这些倒霉的干扰对我的写作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太令人沮丧了。我昨天还尽力克制自己的创作欲望，然后就上路出差，而今天写的东西非常一般，所幸的是写得不多。不，不再提它了！

唯一使我顺从地上路出差的原因，是这次出差对保险公司也毫无意义；当然这在另一方面又伤害了我。这次出差倒是给我提供了访问亲朋好友的机会——我在莱特默利兹有亲戚——因为我要代表公司参加的法庭审理已于三天前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而法院办公室由于出了差错没有通知我们的公司。从这一点看，这次出差是有特殊意义的，我匆匆忙忙，几乎在半夜离家出发，在寒冷中穿过大街小巷，走过亮着灯、但仍拉着窗帘的“蓝星饭店”早餐厅，虽然有人从外面渴望地往里看，但没有人从里面往街上看；然后我坐上了夜车，周围的乘客都在睡觉，虽然仍有知觉，但已麻痹，从睡梦惊起，把我调到“冷”的暖气又转回“热”，反复多次，使已经很热的空间变得热不可耐，最后我又坐了半个小时的马车，穿过雾蒙蒙的林荫大道和白雪皑皑的田野或草地。我心里变得越来越不能平静，也许仅仅是因为我注视的目光变得冷漠、毫无表情。上午

8点，我终于来到我亲戚在莱特默利兹朗根街开的一家商店前。站在孩提时代就熟悉的叔叔的账房里（他是我的继叔叔），感到自己的朝气和优势，而我叔叔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穿着毡拖鞋，在几乎密封的、冰冷的店堂里想使自己暖和起来，但无济于事。这时，婶婶来了（确切地说，这是我四年前去世的亲叔叔的妻子。亲叔叔死后，她嫁给了商店经理，也就是我现在的叔叔），她现在一脸病态，但始终非常活跃，身材矮小丰满，嗓门大，喜形于色，我一直很喜欢她。

我现在必须让她一个人在这里大声说话，因为，隔壁房间的钟已是凌晨3点，孩子必须上床睡觉了。亲爱的，我对你今天的信有很多话要说！请你不要把我看成一个奇迹，为了我们的爱情，请不要这样！否则就像你要摆脱我似的。关于我，只要我不在你身边，我其实是一个可怜的、不幸的人；我身上的特殊东西大部分是不好的、可悲的。就像你在信里开始提到，但没有想下去那样，我的主要弱点就是宁愿去莱特默利兹徒劳地走一趟，也不能明确地去一趟柏林。亲爱的，抱紧我吧，如果我这可悲的外部习性还允许我这样请求的话。不要再提我内心里有什么过人之处了，或许你认为，我这两天因出差不能写作，一直担心自己不能再写作，就是我的过人之处吗？另外，从今晚看来，这一担心不是完全没有益处。我们在一起的夜晚，摆弄纸板跟那种卖弄风骚、谨小慎微、社会绝望和舒心惬意并不是一回事。你一定当时就认识到了，虽然可能是下意识的。今天，你的记忆已变得模糊，这不应该。我几乎想说，这一切都是这张愚蠢的照片引起的。我犹豫很长时间，才寄出这张照片，它一方面给我造成损害，另一方面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我还没有收到你最新的照片，尽管它可能早就拍好了。亲爱的，你应该抱紧我，抱紧，就像我一直渴望的那样，在整个路途上，在火车上，马车上，在亲戚那里，在法庭上，在大街小巷里和在田野上。我在想象中把火车车厢里的邻座推开，让你坐在他的位子上，然后各坐一角，静静地注视着对方。

你气色不好怎么回事，菲莉斯？你母亲要求你干什么啦（你必须立即详细地回信告诉我！）？她认为气色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她想作什么改变？你认为什么是理由？你和母亲已和好了吗？我觉得你在今天的信中烦躁不安，尽管如此，我还是那么迟钝，在上面几页作了一些无用的说教。现在我把自己也说得烦躁起来。亲爱的，你感觉没有特别不舒服吧？请你非常详细地回答这些问题。上面几页的东西无关紧要，你权当它们已经划掉，你只要回答问题！如果你真的病了，我该怎么办？亲爱

的，我必须知道一切，这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我还没有烦躁不安，但我会的，如果你回信说得不清楚。你可是我最亲爱的人啊。

弗兰茨

〔19〕12.12.9—10

我下班后那么晚了给你写信，不是为了让你到10点还收到我的信，因为，如果我没有时间，你也不想让我写信。我写信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让我明天10点获得一种感觉，好像有一瞬间来到你身边，令人快乐和幸福。亲爱的，让我最吃惊的不是我们在梦中的盲目，而是你在星期天似乎感受到的真正痛苦。当时，我特别为你担心，尽管这担心并没有在你星期天写的信中得到证实。

你们那儿星期天发生了什么事？你星期天晚上写的信充满了谜。你在以前的信中说，你不想对我保有什么秘密，但现在有了，有关你的痛苦，我觉得自己有特殊权利知道。给我写信吧，亲爱的，几行字就行。你从我星期天的信中看到，尽管不知道你在受苦，但我和你一样在受苦；而不知道受苦的原因，却和别人一起受苦，这是苦中加苦。我今天10点以来就平静下来了，因为你星期一写的信充满了爱意、善意和清新气息，使我又恢复了正常（我刚看了几封信，来了一个木匠，请求我给他在企业上保险，我匆匆地同意了他一切要求，将在别人，尤其在上帝面前无法交差）。但关于星期天的事，我还得搞清楚。你一整天为什么不去散步？你为什么星期天晚上还那么疲劳，并希望星期一工作日给你带来饱满的精神？我已从星期天上午的信中看出来，事情有点不对头。但这是什么呢？什么呢？这就像一个盲人，他面前发生的事情与他关系最大，但他只听见杂乱的声音，他却看不见，别人也不给他解释。你今天的第二封已让我彻底安下心来，但我很想知道，你未来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折磨和痛苦。

一个长长的吻吻在照片上的姑娘悲伤的嘴唇上，撮起嘴来准备吻未来的黑人姑娘。

弗兰茨

〔19〕12.12.10

终于看到这个可爱的姑娘！一点也不像黑人，而是和想象中的一样；一点也不悲伤或气色不好，而是比大家都快乐。可惜她被两边的人

紧紧抓住，必须有巨大的力量，才能把她从他们那里夺走。可惜她站得太靠近一位先生，如果想吻她，就必然要把这位叫罗森鲍姆的捎上（看来已经是换了一位了）。

另外有一点很特别，在这张夜里用自然光拍的照片上，大家看上去都像是一夜没睡，衣帽不整；而在我台灯光线的照射下，整张照片又让人肃然起敬，这在社会中简直不能想象。我已很长时间没有穿燕尾服了！最后一次穿是大约两年前参加我妹妹的婚礼。这件很老派的燕尾服是我得博士学位时做的，已有六年历史，胸围还不算太紧。你旁边的先生燕尾服穿得多么得体，他的西装背心裁剪得是多么大胆！

你戴的奖章和戒指是什么样的（你关于黑人面孔的说法让我想起还存在着第二张照片，是不是这样，不细心的亲爱的？）？你旁边的夫人肯定是一个经理夫人，你们中间的那只手应该属于她的吧？那你的第二只手在哪儿呢？为什么左右两边那儿挤靠着你？你裙子上面镶有花边，是不是？

关于照片，你可以尽可能多地作些解释。这些人中的哪些人和你一个办公室？我想我能认出布吕尔小姐，就是那位穿着奇特的、也许很美的黑色衣服，胸前带有引人注目的镶边的女士。唯一真正面带愁容的人站在你后面一侧靠在柱子上，他带着黑色领带，一副杞人忧天的表情。施特劳斯经理站在哪里？代理人沙罗蒙站在哪里？你曾和她跳过舞的那个姑娘是谁？格罗斯曼女士站在哪儿？写这首诗的先生是哪位？

昨夜，我在信中索要照片，今天就得到了。亲爱的，我们不能以此满足，我们必须把一切安排妥当，当一方向另一方索取什么东西的时候，邮差应该立即赶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邮局也正想和我们重归于好，今天邮差送来了我出版的小册子（《观察》）的第一样本本（我明天寄给你）。为了表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把带有你照片的卷纸插入了书的封面。但这样，我的愿望仍得不到满足。

弗兰茨

〔19〕12.12.10—11日

你想，我今天又没有写作，因为我下午只睡了一小会儿，头的左上方嗡嗡作响，警告我不要再写了。星期六、星期天只字未写；星期一写得很少，而且一般；星期二又只字未写。多么美妙的周末！多么美妙的

周始！

你啊，对我可怜的书客气一些吧！这就是你看见我在我们起的晚上整理的那本书。当时，认为你不配看这本书，你这傻里傻气、报复心很重的情人。今天，这本书就属于你一个人，除非我出于妒忌把它从你手上夺回来，这样，你就占有我一个人，我也不必和这本又旧又小的书瓜分在你心中占有的位置。你是否已经发现各个段落写作时间上有先有后。比如有一部分是八至十年前写的。整本书尽可能少给别人看，不要让他们败坏你对我的兴趣。

晚安，亲爱的，晚安！

〔19〕12.12.11

〔附《观察》一书〕

亲爱的，我觉得很特别，我必须忍受。今天我休息得很好，从半夜1点到早上睡得很好，下午也能睡得着。我现在坐下来写作，写得不多，不好也不坏。尽管我觉得自己状态不错，但还是停下了笔，整整一个小时，一动不动地靠在靠背沙发上坐着，穿着睡衣，就像我现在坐在冰冷的房间里一样，用一条毯子裹住了双腿。为什么？你问，我也在问。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俩就这样手挽手地站着，如果对你合适的话，你站在我面前，注视着我，而不必理解我。我今天由于长时间地不能写作，内心非常焦躁，下午既是因为没有时间给你写信，又是因为你10点就能收到我的书，而且每天通一次信对我们来说是最佳的选择。但主要原因是我无法写作后产生了一种常有的厌恶感和沉重的疲劳感，因为我对自己说，没有必要把我每时每刻的不幸劈头盖脸倾倒在你这个受尽折磨的姑娘身上。到傍晚时分，我才有机会写作。这机会是我的本性在内心绝望毫无阻拦地不断扩大的时候所要求的。我写得不多，刚好够我挨过明天，然后懒散地靠在椅子上，悠然自得，好像快要流血而死似的。亲爱的，如果我没有你，没有你倾听我虚弱的心声，没有你增强我的勇气，我将会以多么昏暗的心情上床睡觉啊！不管如何，我现在每个晚上都不会离开工作，明天就开始埋头写作。

亲爱的，你每次来信，请告诉你在哪里，你的服饰，你写信的环境如何。你的电报使我靠得更近了，你是怎么发的？电报纸放在膝盖上，你写的时候是不是把腰弯得很低？电报在柏林走得很慢，是不是？要排队，一封接着一封？你过去是步行上班？你把信扔进哪个信箱？

你在这封信中把星期天描写成一个安静的日子，这怎么能与过去的说法协调起来？丰盛的宴席！11月份的芦笋！你不去散步，而是捆书，这什么意思？捆书？为什么？噢，亲爱的，我难道想用这些问题来抓住你？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因为纸上已无处可写，所以在角落上写道）在角落上吻你！

弗兰茨

〔19〕12.12.11—12日

亲爱的，你不应该这样！允诺我有第二封信，但又没有守信。我知道你没有时间，我也不要求你写第二封信。但如果你明确允诺，就像在今天收到的、星期一写的信里那样，结果又没有来信，我肯定会担心的。不担心可能吗？当我担心你晕头转向的时候，我也一样，并比平时更失去价值。今天没有那么糟糕。你中午的信很可爱，让人放心。如果你读《曙光》这本书，那么你至少在这页上免遭攻击。但如果你允诺的信不来，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谢谢赫尔措格的文章。我已读过他的一些东西，他的笔调很弱，很沉闷，他一直试图（在每个句子中）消除单调乏味，增加文章的生气，但屡屡失败。我太累了，已无法明确表达意思。他的基本思想很值得赞赏，是符合事实的。他一直注意克服的写作不稳定性和思维的不连贯性以及他无法深入写作的性格，使他的文章比一些杰出作家的作品更富有特色。如果他想推荐好书，那么他推荐这篇文章就很好。如果他想给“现代派”下定义，他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对这样的结论，除了陈词滥调以外，没有作任何准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韦尔弗在文章前所作的详细评判。你知道吗，菲莉斯，韦尔弗真是一个奇迹般人物；当我第一次读他的《世界之友》一书时（我以前就听他朗诵过诗），我想，对他的崇拜将使我发疯。人是能作出惊天动地的事的。他已有一份工资，在莱比锡过着天堂般的生活，担任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审稿人（我的小册子《观察》也由该出版社出版），二十四岁就有生活和写作的充分自由。他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啊！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此信，因为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已挤到我们中间来了。

弗兰茨

〔19〕12.12.12

亲爱的，我最终还算不错，在迫不得已中删去了小说中一段比较陌生的文字后（小说老是想摆脱我的思路，我牢牢把握住它，但它暗中反抗，我不得不大段大段地任其驰骋），又可以给你写信了。你对我的态度要比我的小说好得多。

只要你不老是这样折磨自己，只要你不是这么晚上床，那就好了。否则，我和一个精疲力竭的情人还能干些什么呢？你就以我为榜样，亲爱的，我每天晚上都在家。虽然过去我也是（特别是在我为一家私人保险公司工作的那一年）一个就像你所说的游荡者，但我绝不是一个狂热的游荡者，而是一个悲伤的游荡者，想用昏昏欲睡和明确的忏悔来减少第二天肯定无疑的不幸。这一切已过去很长时间了。你前天晚上肯定是累了，当时你问我还想知道什么，以便对你过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可是，亲爱的，我是一无所知。你太低估了我想了解你一切的好奇心！当你的信对我来说仅是一种安慰，就像一个人抚摩另一个人的额头，当我意识到你生活的日日夜夜已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我很遗憾对你的过去，对没有收到你信的日日夜夜缺乏了解。比如：对于你的假期，我只粗略地知道两个，一个是布拉格之行，一个是宾茨之行。假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人们可以过一小段丰富多彩的生活。我记得，你曾写信说你在柏林度过了三个假期，那其他假期是在哪儿过的？如果我可以和你一起作夏日之行的话——今夜，我由于昏昏沉沉和迟钝，根本不敢想这件事——我就必须知道，过去的旅行是怎么样，你是否很娇气，我是否合适做你的旅伴。

晚安，亲爱的，祝你生活安宁！

你的 弗兰茨

〔19〕12.12.12—13

亲爱的，几天来，你的男孩又感到疲倦和不高兴，以至别人无法和他交往。他也许现在比任何时间都需要有一个可爱的、办事果断和活跃的人在他身边；也许有这样一个也不能用他来做伴，他最好一个人坐在那里打盹儿。我的小说进展虽慢，但不断在前进，只不过小说和我的脸一样疲惫不堪、愁容满面。我认识你以前，我也有反复无常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消失，我的生命已经中断，身体在上下沉浮。现在我拥有了你，亲爱的，觉得自己受到很好的照顾；即使我倒下了，我也知道这是暂时的，我相信至少知道这点，并能安慰你我以后的

日子会好起来的。亲爱的，不要因为这星期天早上问候而对我生气！

我解释你的照片并不出色，我把你的舞伴（根据你们相册的照片）当作了布吕尔小姐。我记得，我在信中很偶然地提到了电报中的姑娘，或者打算提起她，这就是你的小伙伴！我马上就非常喜欢她，她鼻子形状在照片上很有法国味，她的目光充满快乐，布吕尔小姐在她面前就显得相貌平平。但她们俩与你的关系都不错，我因而对她们也没什么可挑剔的，除非她们整天地占有你的时间，而我却没有一天时间。

那天晚上，除了你的舞蹈还上演了什么节目？你没有在另外哪个节目参与演出？这个年轻人已经当上了经理？那个年长一些的只是代理人？由于我把经理的年龄估计太高了，所以必须把你在信中介绍的那个晚上的情况，在记忆中再过一遍，以便在一些重要的地方纠正这位先生的年龄和外貌。

尽管我的《观察》一书还有很多不妥之处（只有篇幅短是无可指责的），但我很高兴知道我的书已到了你的手中。布吕尔小姐说得对，姓名缩写最好解释了。事实上，也许你能回忆起来，我是当着你的面，在你的目光下写下了这个姓名缩写。我完全能写姓名全称马克斯·勃罗德，因为他的姓名，他和我的友谊和善意不是什么秘密；同样也是事实的是，B是鲍威尔的第一个字母。我在不高兴地喋喋不休，现在急迫需要用吻来把我的嘴堵上。

你的 弗兰茨

〔19〕12.12.13—14夜

亲爱的，我今天太累了，对我的写作也太不满意了（如果我有足够的力气按自己内心的想法行事，我会把已完成的小说部分揉成一团，扔出窗外），不想多写了；但我还得给你写信，这样的话，我临睡前写的最后一个字是写给你的，不管是醒着还是躺下，一切在最后的一刻才获得真正的意义；而这个真正的意义从我写作当中是得不到的。晚安，可怜的亲爱的。我的信上都带有咒语，即使最可爱的手也无法把它驱除。虽然我的信给你带来的折磨已经过去，但它们会再次振作起来，用新的、卑鄙的手段折磨你。可怜的、可爱的和永远疲惫不堪的孩子！用开玩笑似的回答来答复你开玩笑似的问题，我简直无法忍受你这个可爱的姑娘。外面刮着狂风！我慢悠悠地坐在这里写信，无法相信你将这封信拿在手里，我们之间的遥远距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要哭，亲爱

的！我那天晚上看见的文静姑娘为什么哭了？我怎么让她哭，而又不在于她身旁！但亲爱的，你没有理由哭！等着，我明天肯定会有绝妙的、最能宽慰人的、最聪明的主意，来解决你母亲可能看了我们信的麻烦。如果我充满爱意和魔法、指向柏林的手能产生什么作用的话，就请你至少在星期天保持镇静！我达到什么效果了吗？我是不是最后，不管是对小说还是对你，一事无成地上床睡觉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让我见鬼去吧，就借着外面大风的力量。不，也许你今天又跳舞了，继续劳你的筋骨。我不指责你，亲爱的，我太想帮助你了，但不知道该出什么主意。当然，真正的出主意者看上去不会像我这样。晚安！我发现，我疲劳的时候写的东西都是车轱辘话，只是图自己痛快，不考虑你那双疲倦的、哭肿的、被吻红的眼睛也要读它们。

〔19〕12.12.14—15

亲爱的，没有片刻的时间和安宁给我和你。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对你昨天和今天的四封信（你想，你11日从城市火车站发出的信昨天才到，比你12日给我介绍照片的信还要晚到一天）。我有很多问题要回答。正是现在，我是多么需要你的信，因为我是那样的麻木和无聊。当今天早上有人给我送来了你的快信，我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晚上都在等待这一唤醒。拿着你的照片，躺在床上，这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一切忧愁被挡在一边，必须等在床前；只要待在床上，我就免除了一切忧愁。

这是我从你那里得到的一张最生动的照片。这个一岁的自愿者应该得到祝福！一手放在臀部，一手放在太阳穴上，这就是生活。由于这也是我的生活，所以看几眼是耗不尽的。这是你的房间吗？这不是你的？两者都有可能。这张小桌子放的地方正是你的桌子放的地方，然后对面是床。但这挂着很多东西的墙又使我感到糊涂，你在描述你房间时也没有提到它。你为什么把啤酒杯挂在那么高的墙上呢？为什么前面放着一把可以看到手把的男人手杖？也许这是你们客人的书房。你的姿势太妙了，我叫你的名字，你没有冲我转过身来，尽管我期望你这样做。在墙上的照片中（除了那张男人跳芭蕾的照片），我在找你的影子，暂时在三张照片上找到了你。如果我找对了，请确认一下，如果我看错了，就让我将错就错吧。你是多么柔顺地站在那里！难道我看见你跳舞啦！你很早就开始练体操啦？

你今天的快信写得平心静气，我可以相信这一点吗？我某种程度上

从各个角度读它，看一看是否信中有可疑的地方。但一个人在痛苦和疲惫之后，怎么突然变得精神饱满和跃跃欲试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我，为了不让我担心？不，亲爱的，你的处境还没有那么坏，以至于你想向我隐蔽什么。我的作用就是倾听一切。人们一般只需在父母面前掩饰自己。如果我的作用不是倾听你的烦恼，那我就不配与你在一起。

亲爱的，关于信的事，开始的时候很糟糕，不可救药，让人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这里也是这样，尽管这一切对我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也许有些母亲不拆孩子的信，虽然她们很容易拿到孩子们的信。但我想，你我双方的母亲不属于这一类母亲。为了简短地描述我们的思维和担忧，我们说，母亲看了信，也许不仅她一个人，而且妹妹也看了，至少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她们在电话里的询问出奇地简短和肯定。所以我认为，由于你母亲很少去你房间，是妹妹先发现了信，然后把你母亲叫去了。当她们读你信的时候，你打的电话干扰了她们。谁先接电话的？一般谁接？全部信都被发现，还是一部分，哪些呢？我目前（根据我的精神状态，我无论如何该上床睡觉了。除了你，我是不敢再给别人写信了。我的一切状态，最好和最坏的，都属于你，不是吗？）不能想象这些字迹难辨的信会对你母亲和妹妹留下什么影响，尤其是她们的确会相信，而且可能在信中也得到证实，我们一生中真正在一起的时间没有超过一小时。她们如何把这些事实和信的内容联系起来，至少按通行的办法联系起来，这是我在不了解情况的条件下无法猜测的。最明显的、最简单的，因而不完全可信的猜测是，她们把我看成一个快发疯的人，你因受传染，所以需要加倍的保护，你必须——这也许是我的信的不坏的成果——得到细心对待，当然，这在一个家庭内可能包括最粗暴的伤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等待。我们之间的平衡也不完善，因为我尚未收到你母亲一封信。可怜的亲爱的，你被挤在中间，一边是一个纠缠不休的人，一边是看护很严的家庭。如果你母亲打算说明白一些，那么递交我星期天写的信就是下一个最好的机会。明天，我就可以听到有关情况了。

我现在搁笔了，不是为了睡觉，因为已经过了时间，今晚我什么也不干。我只想去车站寄信。然后我必须无论如何去趟勃罗德家，这非常必要。索菲〔弗理德曼〕夫人突然很早就来了（晚上是马克斯的订婚典礼），我已和她说几句话。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准备工作。我担心，以我目前的状态，我什么事也办不成。当我听到她到来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你到来的气息，心中充满了期望。这一切将肯定会一成不变。

星期日〔1912年12月15日〕

亲爱的，门已关上，一片寂静，我又回到你的身边。什么叫“回到你身边”呢？我一天没有睡觉，整个下午和傍晚，我都耷拉着脑袋，迷迷糊糊地四周游荡。现在正是夜深人静，我反而兴奋异常，感到心中有很强烈的写作欲望。但这写作欲望来得不是时候。不管它，我去睡觉了。但如果我能在写作和睡觉交替之中度过圣诞节，亲爱的，那就太幸福了！

今天下午，我一直不断地跟着你跑，可以说毫无用处。也许并不是完全无用，因为我一直尽量地靠近弗理德曼女士，而她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和你在一起，你们互相关系密切，她还为你保存信件，我真嫉妒她。但她为什么只字不提你，而我一直瞪眼看着她的嘴，希望马上就能抓住她吐出的第一个字。你们互相不通信了吗？她不知道你的最新情况？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她不知道最新情况，为什么不说说过去的事情？如果她不想说你的情况，为什么连你的名字也不提呢？她过去总是有机会提到你的。不，她没这样做，而是让我呆呆地等着。我们谈的东西很无聊，比如：布雷斯劳市、咳嗽、音乐、围巾、胸针、发型、意大利之行、乘雪橇滑雪、珍珠手袋、配燕尾服的衬衣、袖口扣子、赫尔伯特绍特兰德、法语、室内游泳馆、淋浴、女厨师、生意兴隆、夜间旅行、皇家饭店、布雷斯劳大学、亲戚。总之，我们谈了一切可以谈的事情，唯一和你有关系的，是提到了匹拉米酮（一种去痛退烧药）和阿司匹林。别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抓住这个话题不放，并喜欢说这个词。当然，我对这样度过一个下午是不满足的，因为我脑子里一直在呼唤着菲莉斯。我最后强制地把话题转到柏林至布雷斯劳之间的铁路线，并咄咄逼人地看着她——没有用。

此外，我因为马克斯的订婚典礼也有些心神不定，他一订婚，等于是离开我，投入了别人的怀抱。我认识他的未婚妻已多年，一直很喜欢她，有时候特别喜欢，她有许多优点（如果要一一列举，这张纸肯定不够写，尤其我写一些套话的话），她的性格总体上是温柔、体贴、谨慎、对丈夫绝对忠诚，等等。再见，亲爱的，我希望这世界只有我们俩。

弗兰茨

〔19〕12.12.15—16夜

亲爱的，没有信，8点没有，10点没有。你跳舞跳累了，下午又参加社交活动，连一张明信片也没给我寄。当然，我没有理由抱怨，昨天和前天已各收到两封信。人们在两件好事之间很难作出选择，谁会说，我宁肯每天收到恋人一封信，而不是一下子收到两封，然后就一封也没有了。正是定期性才使我心里感到畅快。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收到信，这使我感受到安宁、忠诚、井井有条和远离恶性事件。亲爱的，我不相信你遇到了什么糟糕事情——因为这样的话，你会更急迫地给我写信——但我一个人坐在写字桌边，面对我的打字员，面对自顾不暇的当事人，面对着比我高出一头的官员，怎么能确信你在柏林过着平静和比较满意的日子？也许母亲昨天折磨你了，也许你头痛或牙痛？也许你过度疲劳？这一切我都不清楚，只是在脑子里转来转去。

再见，亲爱的，从现在起，我每天只写一封信，至少要等到我的写作有所进展。因为，只要写作没有进展，我的信也会显得很灰暗。虽然你自己否认，但你对每天一封信也已经厌烦了。

再见，亲爱的。说这句话的时候，阳光突然照到了我的信纸上，你过得不会不好，我也心平如镜。

你的 弗兰茨

〔19〕12.12.16

亲爱的，已是夜里3点半，我花在写小说上的时间太长，也可能太短了。我几乎有点犹豫，是否现在回到给你写信的思路上来，因为我刚用心地用极其自然的笔法写了一段难写的情节，手指已被笔墨完全弄脏了。亲爱的，今天没有你的音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由八小时火车增加到十六小时。难道在递交我星期天写的信时发生了什么难堪的事？我明天就会知晓一切的。如果我没有这个安慰，我宁肯在房间里踱步到明天，也不会上床睡觉的。好，晚安，我可爱的姑娘，请对我保持忠诚，只要这对你不会造成什么过大的损害。你知道，我和你房间里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属于你的。

你的 弗兰茨

〔19〕12.12.16—17

我可爱的姑娘，我今天写小说，完全是因为我压制了给你写信的欲望。现在我两边受罚，我写的东西太差劲了（我不想不断地抱怨，昨夜

就过得很好，我原本能够和应该延长这美好之夜的），为此，我也很生气，觉得对不起你。

我还能在你漂亮的办公室里再待一会儿吗？我觉得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我能替代那些姑娘中的任何一个一天吗？这些姑娘一直很随便，只要她们愿意，就可以跑到你那儿，吻你，拥抱你（当书到的时候，她们当时为什么吻你，为什么特别激动地吻你？这只能是一种潜意识的、深深的同情，同情她们的大女友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做情人——不说下去，我在伤害你，也伤害了我）。但我多么需要你的亲近，亲爱的。我可以待在你的办公室里吧！每当我站在忧伤的办公室写字桌前——它比你那张大好几倍；它必须这么大，否则装不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想到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也不是不可能，就很想掀翻桌子，打碎柜子的玻璃，大骂上司。由于我终究缺少把这种短暂的决心付诸实际的力量，所以仅是骂骂而已，和过去一样静静地站在那里，手里抓着任何一份可能已经看过的公文，而实际上懒洋洋地抬头往门看去，等送你信的人推门而入。请你在你办公室里往四周看一看（你还没有给我描述过你办公室情况），在角落里有没有我坐的地方，详细告诉我那个位置，我要天天坐在那个位置，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但我的态度是坚决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可以在我办公室里给你安排个位子（我认为没有比紧靠我的位子更合适的了）。这样，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但在两个办公室都有座位。这对你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你一人留在办公室里给我写信，我会让围着你桌子转的老鼠不要碰你并把它们赶走；相反，对我只有坏处：我可能在这样的晚上再也不能安静地考虑，是否让你写完给我的信。我会走到你面前，抓着你写信的双手不放。

你那儿的小姑娘干得不错，很令人感动，而又不令我吃惊，因为这一切正合我意。关于你的办公室，我永远听不够在姑娘多的办公室里，气氛与坐满男人的办公室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的打字员绝不会拿着玫瑰在裁缝那里等我（你不可能觉得这个想法很滑稽，你必须先亲眼看见这位我很喜欢的先生）。但他会做出另外的举动，比如他在可信赖的证人面前先后吃下了七十六只小面包，另一次吃了二十五个鸡蛋。只要有吃的东西，他每天都会兴致勃勃地表演这手绝活。令他特别赞不绝口的是，吃完二十五个鸡蛋后会产生一种舒适的温暖感觉。

我的上帝，我该怎么度过我和你在信中相会的时光！我在昨天的信中委屈了你，你这个可爱、善良的姑娘（除了让你受委屈，我还能干什

么呢？）！你星期天疲劳了（没有做饭，没有履行你上星期对母亲许下的诺言），就像我在自己脑子里感觉到的，你至少星期一还头痛（是不是也嗓子痛？惭愧！惭愧！一个自然疗法专家的情人居然嗓子痛！），尽管如此，你星期天还是给我写了信，只不过信和明信片另外一个暂时情况不明的邮件可能星期一才送到我办公室。总之，我星期二在下面门房收到了信和明信片。我的上帝！我是跳着舞走上楼梯的！

你在信中没提一件重要的事情，亲爱的！我没读到一个字提到你母亲，也没找到一个字提到我星期天提出的关于书信往来的理论。这是一个好的，还是坏的兆头？节日的贺卡不在我手头，我把它忘在工作服里了，上面没有签托尼·鲍威尔的名字，并在名字旁边附上了问候？这是你妹妹吗？其他人是谁？我很愿意相信，你的舞伴当中没有人比得上我。我不会跳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也许我该更多地独自练习，每次和姑娘跳舞，我总是不要太拘谨，要不就太心不在焉。我想起，我们上跳舞班的时候，有一个年青的、很有朝气的男士，当大家成双成对翩翩起舞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个人在角落里练习舞步。他是否用这种方式学会了跳舞，我不得而知，但我只知道自己经常往他那边看，羡慕他的决心和自在。

索菲·弗（弗理德曼）又走了，她们过完了假期，我想，回赛默林去了。你已很长时间未给她写信，这使我打心眼儿高兴，另外，为了这份我已向你描述过的喜悦，她拼命地进行了报复。搁笔不写了，我又回到独自一人的天地。

弗兰茨

〔19〕12.12.17—18夜

亲爱的，已是深夜2点半，下午和马克斯去看家具，晚上是家庭一起度过的，上半夜匆匆忙忙工作，现在是在给你写信，可爱的小姑娘，我真正的一天开始得比较晚。

这应该就是这个愁容满面、身材矮小、来自白湖的打字员吗？但她快乐、精神饱满，弯曲着右膝盖，几乎使整排僵硬站立着、看上去像是基督教徒的姑娘抬腿出发了。你们当中有女朋友？告诉我，我会很快就喜欢上她们的，即使那些又高又大、让人害怕、穿着黑色衣服的，我也会喜欢，成为知己。你从照片上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们。你右边的女士紧紧地搂住你的腰，好像她知道得很清楚，她搂住的是谁。你手里

拿着一本书，什么书？在白湖，你们过得是真正的乡间生活，照片背景的灌木丛、篱笆和玻璃门看上去不像是办公室。我很想听你介绍那段时间的情况，当时你为办公室受累还感到很高兴。你那时的女上司怎么样？如果她生气，你不会拿着玫瑰跟着她去裁缝那儿吧？你和原来坐在你位子上的女秘书的斗争情况如何？是什么决定了这场斗争的结局？

亲爱的，我暂时不给你寄照片了。下一张应该是我已写信告诉过你的那张好照片，我还没有去冲，因为去照相馆比较繁琐，但过几天我要去的。我没有最新的照片，集体照至少不在我手里，而且我生活的集体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姑娘生活在一起比男人生活在一起要好、要温暖）。其他照片我暂时不想寄了，因为我担心自己在照片上显得有点儿怪。我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必须对你说，让我们在星期天的那些习惯时间再聊吧。

亲爱的，我还是只管写下去，你是不是病啦？你在席林逃跑后写的信中曾说有可能是流感。我的天，亲爱的，我的生命属于你，请你保重！我承认，每当想起你生病了，首先想起的不是你在受苦，而是我可能听不到你的音讯，在绝望的驱使下，我会对四周的东西拳打脚踢，直至自己受伤。星期二，喉咙痛已变为流涕，这是这种我非常陌生感冒好转的迹象。但头痛还是抓住你不放？我看见，你写完上封信后如何拿出阿司匹林吞服的，我不寒而栗。

我今天去了勃罗德家。我原来就要去，但收到你第二封星期一写的信后，我有特殊理由赶去了，因为我——这无疑很愚蠢——想赶上看你写给索菲·弗理德曼的明信片，我永远看不够你写的东西。我感到欣喜万分，能拿着你写给别人的明信片，哪怕就一会儿，慢慢阅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出自可爱姑娘之手。”一切进展顺利，我把问题编排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小心翼翼地迫使大家作出决定性的回答，最后听说勃罗德经理把索菲的信件，其中包括你的明信片，已在半小时前转寄给在维也纳的索菲，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不拍桌子。

由于外面刮大风——片刻前，不太好关的起居室门在大风的震动下自己打开了——我没有听见外面的钟报时，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个钟，我只在夜里听到钟报时。现在已是3点半，好，再见，亲爱的！不，我说的和你一人在想、和你认为的不一样。如果我想要什么不可能的东西，我就要百分之百的。亲爱的，我想百分之百地单独和你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苍穹下，不受干扰地、聚精会神地在你心中度过我

我可爱的姑娘，又到了晚上了。下午一直没睡（一下午不能入睡比彻夜不眠还要糟糕），小说一字未写，只给你这个姑娘写信。真想不断给你写信，不断收到你的信；真想一直和你耳鬓厮磨，融为一体。

我求你，亲爱的，快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怎么回事？你曾写信告诉我，你从未生过病（我根本没问你，因为别人从你的脸颊和眼睛看出你是否健康）。你现在却在医生之间来回奔波，你几个星期来每天都在受苦，别人对你开玩笑，但一半又是当真地说，你看上去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这个说法，如果不是用在你身上，我是很喜欢的）；你前不久头痛、喉咙痛、四肢无力，周而复始，一刻不停。亲爱的，我们不能这样束手待毙，是不是？我们必须努力建立秩序，是不是？那么你将怎样开始保重自己呢？你必须立即详细地写信告诉我，因为你的病痛就是我的病痛。这并不是说你头痛我也头痛，而是当我听说或预感到或担心你有病痛，我为此受的折磨绝不会比你少；如果你疲乏和头痛，我比你还难受。当你服阿司匹林的时候，我身体里也感到难受。今天整个夜晚，从3点半到7点半，还有早上的时候，我感到内心有一种异常的压力，这是我活了三十年从来没有发现的；它不是来自胃部，也不是心脏和肺部，但也许和它们都有关；天一亮，这种压力就消失了。如果你昨天服了阿司匹林，这肯定是服药后的症状；如果昨天没服，那就是前天服药后的症状；如果这也不是，那也许是我自己写作不顺的结果；如果最后这也不是，那也许我是一个傻瓜，经常在想象中把手放在你的太阳穴位置，希望我的吻产生一种力量，把你过去和未来的头痛病一扫而光。请回答，亲爱的，你将采取什么措施，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必须要有充足的睡眠和散步时间，尽情享受。你必须下班后立即离开办公室，你必须去散步，不是独自一人沿着城市铁路散步，而是与合适你的朋友结伴而行（你不去进行折磨人的训练啦？我很长时间没听说体操的情况了）。如果中止在教授那儿的工作，这肯定也不错；你可以晚上给我写信，白天肯定没有时间。我没有一点勇气强迫自己接受不能每天听到你的音讯的事实。但我想咬紧牙关，每天能收到一张明信片也就满足了，直到你完全、彻底、持续、令你母亲信服地恢复你过去的精神和健康。我希望我的建议能得到响应（我还准备了其他意见），你也可以用其他同等价值

的建议补充我的建议。

等你康复后，我当然想多多地了解你的童年，你上封信已使我对此产生很大兴趣。做弟弟妹妹当然有坏处，但在哥哥姐姐面前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我就是个做哥哥的消极例子。这些弟弟妹妹一出生，周围就充满了丰富多彩的事情，有些已经体尝过，有些有待经历。他们姐妹的认识、经验，发现和恋爱，这样一种密切的亲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教训和鼓励是巨大的。对他们来说，家庭比过去得到更细心的培育，父母已尽可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当然错误使他们更固执）。这些弟弟妹妹一开始就生活在温暖的环境之中，对他们的关心要少些，这时好处和坏处发生了变化，但坏处永远不会超过好处。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关心，因为一切都在无意识地、因而特别强有力地、无副作用地关心他们。我有五个弟弟妹妹，排行老大。两个比我小一些的弟弟很小的时候因医疗事故而死亡。有一阵，家里很安静，我是唯一的孩子，直到四五年后，我三个妹妹出世，互相间隔一两年。因此，我很长时间独自一人，与奶妈、年老的保姆、尖刻的女厨师、忧郁的家庭教师打交道，因为我父母整天泡在生意之中。这方面有很多东西要讲，但不能在今夜，钟已经敲了12点，让我吓了一跳。再见，亲爱的，尽管有可能要吵醒你，但还是吻你。

弗兰茨

〔19〕12.12.19—20

亲爱的，你这种急躁不安从哪儿来的？我们在绝望之中只能和平共处，不是吗？你感觉怎么样？你既使我平静又使我激动，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你就能想象我心跳得多么快。我经常涨红着脸读你的信，希望和平、快乐出现。这肯定是变化无常的不幸之夜，连我一快寄上的、从办公室拿来的碎片也成为过去，因为我知道，明天又会收到我坚强姑娘的一封充满信心的信，它仅为了午夜一小时而被疲倦和可怕的折磨所击倒。

我怀着好意，每天不再写第二封信了，因为我想，我们会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安宁和信任。每天两次开始和结束与你的对话，对我来说太折磨人了，不断驱使我度过了上午和下午，惶惶不可终日。对不可能的事，比如希望你在身边，作徒劳的努力，不仅使你，而且也使我一再感到吃惊。但也许你说得对，我必须每天给你写一封信，否则的话，我宁

肯什么也不干，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但这样也不能使你到来。如果能给你带来一丝安宁，我又要开始每天写两封信。我是否有心思给你写第二封信，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我写第二封信时对周围人的要求还有没有心思。因为我内心的与你息息相关的感觉，通过每天写两封信，变成一阵春风吹拂着我的面孔。这也许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因为我不得不身处遥远的地方，徒然悲伤。

现在我又能跑了，因为我必须去马克斯处，帮助他处理公证事务。你今天在法庭前已发誓，又碰到了麻烦事。让我吻你，亲爱的、苍白的、受尽折磨的孩子！落款的人不像你房间里的东西属于你，但只要我愿意，就永远属于你。

你的 弗兰茨

〔19〕12.12.20

亲爱的，仅仅为了能减轻一下我对你的担心，我就随手抓了一张纸，给你写几句。请你不要这样烦躁，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能让你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抱着你，注视着你还吗？这像是在疯人院，我被关进这个城市，而不是疯人院隔离病房，是无辜的，当然也可能自己有责任。我给可爱的姑娘打电话，想让她清静和幸福，但实际上我只与墙和纸通了话，而我可怜的姑娘却在受苦。

弗兰茨

〔附在一个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表格上〕

亲爱的，已是第三个晚上了，我仍只字未写。圣诞节前没有开好头，圣诞节假期本身又成问题。我妹妹的婚礼——我想，我还没有写信告诉你——虽然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而被推迟了，但不能肯定是否能休我所期望的两天假期。我不断地有很多事情要做，事情越多，我的兴趣也就越小，或者说，我的反感情绪越强烈。只要我自己也在办公室里，我还能竭尽我个人的影响，保护我的堆满积压公文的办公桌；如果我待在家里，我的办公桌对大家开放，一天之内将不断发生积压公文倒塌的情况，等我回办公室可能已是乱作一团。但尽管如此，我觉得浪费两天时间不能忍受，因为这两天里除了守护我的办公桌，什么也干不了。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你工作怎么样？我的小姑娘（我今天觉得，你现在比过去平静和满

意了，从你那双可爱的眼睛里又流出了那种友好、迷人的目光。这一目光使我今生今世永远难忘）？你总是能完成任务吗？有没有信件掉到桌底下而遗失了？有没有秘密抽屉，里面放着旧的、未经处理的公文，就像令人恶心的动物挤在一起？你记忆力好吗？我没有好记忆力，而我的值得钦佩的上司有广博的记忆力。如果他真的忘记了我需要的东西，我就开始用不清楚的、泛泛的表述来引起他的回忆，他不用花很长时间就能想起。有些人只要看见一张助人为乐的脸，即使这是一张昏迷人的脸，就会回忆起一切事情。我不能像你那样独立地工作，我像一条蛇一样逃避责任。我有很多公文要签字，但能逃避一次就是胜利。我只用我名字的简写FK签字（尽管这是不允许的），好像这能解除我的责任，所以我倾向于用打字机打一切公文，因为由打字员打出的公文千篇一律，不分你我。但这种值得称道的谨慎还是被补充和抵消，因为最主要的公文我也不通读一遍，就签上名字缩写。由于我健忘，公文一旦离开我的办公桌，就忘得一干二净。我曾谋求在你办公室里的一个位子，我这样的话是否还值得推荐呢？

你今天的信是否提到了日记本？它还存在吗？今天还记日记吗？你十五岁就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爱他，永远不会再爱其他路遇的人……”亲爱的，我那时认识你就好了！我想，我们相距并不遥远。我们可能坐在一张桌边，一起从窗户往外看大街小巷。我们不会为对方担心，没有发生不成体统的事。然后我又对自己说，这也表明了事情的客观性，十年前，就是两年前，或者一年前，我在很多方面要比今天好得多，但在性格上更不稳定、更不开心，现在也许该出现那个将成为我恋人的人了。

今天，我在家里的写字桌上找东西（这张写字桌也无法整理；只有一个抽屉整整齐齐，上着锁，里面摆着你的来信），找到了一封旧信，这封信写于那个近一个月的等候时期，写给你的，所以，尽管信已经破旧，但还是寄给你。当我读这封未署日期的信时，我从那些空洞的希望中看到，一切都已好转；别人也相信，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在我们头上不会熄灭。孩子，你今天的信写得太棒了！我可能当逃兵吗？逃谁的兵？最多逃避我自己的生活原则，这肯定不会发生。尽管怨声载道，但我觉得正在战斗，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好，再见，姑娘，姑娘！我祝你过一个美好的星期天，陪伴友善的父母，吃精美的佳肴，做长距离的散步，放松神经。明天我又要开始写

作了，我要全力以赴。我觉得，如果不写作，我就会被残酷无情的手从生活中排挤出去。我明天收到的信也许要比今天的信开朗一些，但要一样的真实，因为照顾比事实更能刺伤我。

弗兰茨

〔19〕12.12.20—21

〔附写于“一个月的等待时期”的那封信〕

尊贵的小姐！虽然您对是否回复我上封信仍疑惑不定，但请您让我给您写信；不写信使我头痛，使您和我都晕头转向。我内心已形成习惯，必须给您写信，我怎么能因为您不回信就摆脱这一不可克制的义务呢？有一天夜里，我在半睡半醒中不断地给您写信，这是一种不停的、轻轻的感情跳动。

弗兰茨·卡

〔1912.9.28—10.23〕

新的补充：请你从星期天起无论如何把信寄到我的住处，下星期五以后再寄到办公室。我该把信给你寄到哪里呢？

〔19〕12.12.21

先祝你早上好。我刚才准备好去做一次长距离散步；我记不清这几个星期是否去作过这样的散步。也许散步要持续一小时。我也要尽力在炼丹术士胡同走一走。这里有这胡同的照片。

弗·卡

〔明信片〕〔19〕12.12.21

〔右上角，在贴邮票的地方〕

唉，亲爱的，没办法，我不能把空着那么多地方的明信片寄给你。如果我在傍晚不随信寄上我的吻，又不能接到你的吻，那这个夜是多么令人难熬啊！

弗兰茨

上午

你知道吗，亲爱的，假如内勃勒先生的事是你最近几天垂头丧气的唯一原因的话，那么它却让我欣喜若狂。就这些吗？可能是很糟糕。你能继续获胜，我也能预计到；我很羡慕海纳曼经理演的出色角色，我想我能演得更好。我也会说：“请您把门关上，鲍威尔小姐！”事情发生后，你也应该给我说说，结果你对我就像对你经理一样保持沉默；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在事情发生的当天就了解内勃勒先生这件事呢？如果我是你经理的话，你应该如何向我叙述呢？经过黑夜，别人早上又去上班，开始新的工作；你面对我连珠炮似的问题，不得不作出不断的问答。只有一点我可能不如你的经理：只要你一哭，我可能必然要跟着流泪；尽管我平时不流眼泪。这不太符合经理的身份。为了保持尊严，我不得不把我的脸靠在你的脸上，这样，眼泪就流在一起，分不清你的和我的。亲爱的，亲爱的菲莉斯！你还将忍受多大的痛苦啊！

你很容易发火吗？我不会。一旦我发火，就觉得真的离上帝很近了。当鲜血一下子从上到下沸腾起来，拳头在衣袋里抽搐，情绪失去自控，而这种缺乏自控力从另一面，也就是真正的一面看意味着力量，人们才知道，火气只有在开始的时候才能避免。就在昨晚，我差点扇了一个人的耳光，不是用一只手，而是用两只；不是打一下，而是连续抽打。最后，我说几句就算了，但很冲人。我脾气这样坏，是不是想起了内勃勒，这不是不可能的。

下午

我亲爱的菲莉斯，我又回到你身边了。昨夜，我原想独自散步一大圈。当我散步回来走在通向火车站的路上时，我遇到了一大帮亲戚，他们正从我已结婚的妹妹那儿来，我的最小妹妹和一个堂妹不管我怎么求饶也不让步，非让我带上她们。当我散步后回家，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长时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你是不是为我星期六写的、充满急躁情绪的信对我生气呢？或者并不生气（因为我没有写什么不对的东西），而是感到失望，觉得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不能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这是最痛快的、最解气的抱怨——抱怨自己和环境？我昨晚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相信从你的快信中可以看出这点。那封信上写道：“当你的信今天10点送来的时候，我比先前更悲伤，更感到压抑。”我这个情人太不称职了，给恋人写这样的信，增加了恋人的痛苦。不，听着，亲爱的，你不离开我，这是你经常对我说的，我很想紧紧地靠在你身旁。你无论如何不要离开我，即使你有对我有很多抱怨，也不

要离开我。留在我身边，亲爱的，留在我身边。我不想折断你头上一根头发。如果你不保持原样，我不会感到高兴。要高兴，光有决心不行，此外还需要愉快的人际关系。如果你长相再好些，我不会更喜欢你，我只会像现在一样喜欢你。我觉得自己与你的距离是那么相近，你情绪和长相的任何变化都不会影响我与你的关系。当你不快乐的时候，我也会不高兴；你的爱，也出于自身利益，我会试图去扫除那不快乐，除此，不快乐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这不包括白天匆忙写就的信，这里面尽是一些一时的、毫无意义的冲动。这又是告诫我们不要每天写两封信。

难道我就不抱怨了吗？几乎是哭诉！比如昨天，我在办公室里昏倒了。我昏昏欲睡，头重脚轻（我已经好几个夜里没写作了，除了给你写信），我在那儿一靠就动不了了。我害怕坐到我的靠背椅子上，怕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我只抓住自来水笔的下端，这样看文件时还能用笔挤压自己的太阳穴，使自己保持清醒。下午，我睡了一会儿，但到晚上仍不见好，所以我去散步，但后来睡得仍很浅，就像在值班。如果我们不能用手臂，那么，亲爱的，我们就用抱怨来拥抱我们自己吧。

弗兰茨

〔19〕12.12.22

亲爱的，我有点迷惘，不要怪我写得不清楚。我写信给你，因为我心中只有你，我无论如何必须把这点告诉外界。星期天，我心情不好，到处游荡，大多数时间和别人在一起，毫无睡意，不打招呼就去拜访熟人，然后又不辞而别。这种情况已好几个月没有出现了。我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写作了，觉得自己有点儿从写作当中解脱了出来，就是觉得自己内心很空虚。另外，盼望已久的圣诞节假期现在就在眼前，我准备放落地度过假期。尽管如此，有一个想法不时地闪现，我本来是可以去柏林的，去你那儿，得到最好的保护。但我没有去，而是待在布拉格，好像我害怕失去最后的安全感，似乎我就在布拉格。

亲爱的，当我昨晚高高兴兴地回家，看见你的电报放在桌上，你这个可爱、富有同情心的宝贝，我一点也不吃惊，知道信里写的尽是安慰的话。打开一看，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闭着眼睛，长时间地吻着那陌生的信纸，但这还不过暇，我把脸也紧紧地贴在纸上。

亲爱的，你可能猜不到，上面那些是什么时候写的。可能是4点。在电报的作用下，我很早就躺下睡觉了，9点以前（我对自己有点任

性)；2点就醒了，虽然睁着双眼，但仍睡眠惺忪，在连续不断的、魔术般的想象想着你和可能的柏林之行。在想象中，我们之间的联系很容易建立起来，没有任何干扰，汽车像情人一样在飞，电话一接就通，就像我们手拉手一样。我一点不愿意再想下去了——我越清醒，就越不安。将近4点，我就起床，做操，洗漱，然后写了两页信，在烦躁之前放下了笔，然后又写了前面两页，又放下笔，最后带着嗡嗡作响的脑袋回到床上，一直死睡到上午9点。你也在我睡梦中出现了，你去一个朋友家作一短暂的谈话。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有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我很长时间没有写作了；二是我很空闲，一点没有思想准备。

亲爱的菲莉斯！你的 弗兰茨

1912年12月22日至23日

〔由于没有空地方，两个姓名靠得比较近，所以卡夫卡在纸的边沿上写道〕

这样，我们至少可以相拥在一起了。

〔附页〕

刚才收到你星期六的信，我下午就回信，否则你不能在9点准时收到信。从这封信看，现在一切真的要好转啦？但愿有上帝保佑！此外，你在信中透露的坚定性和喜悦令我吃惊。我也会高兴起来的。如果琳德纳小姐知道像我这样写得这么少是多么困难，那就好了！

上次你提到一个要爆炸的炸弹，母亲进来打断了你写信。那个炸弹怎么样啦？让我用吻，而不是语言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

弗兰茨

〔1912年12月23日〕

最亲爱的菲莉斯，这珍贵的两天我是这样分配的，我用上午的一点儿时间步行去办公室，看看有没有你的信，其余时间自由自在，无所事事。除了晚上写的那封短笺外，星期六和星期日整整两天都被我浪费了，不过这还不算十分恶劣，最亲爱的，说说看，这还不十分恶劣。

另外，我渐渐开始沉溺于舒适的生活，昨天白天和夜晚的迷惘已渐渐消失。不知你对于我将你昨日的电报镶入镜框、悬置于书桌上方的突

发奇想作何评价？回顾你星期六晚上的信后发现，其实你在星期六就有了给我发电报的念头，尽管如此，不过——很想知道你发电报时的想法，因为你根本不能猜到你的电报对我的意义，而且我记忆中你上午收到的信是比较平和的。此外，你原打算上午给我发电报的。若我上午收到电报，它对我来说仅仅（仅仅！仅仅！）是你的爱情和善意的象征，但是晚上（你好像是4点钟发的报），它却令我重新振作。电报之快捷比之信件所要经历的漫长旅程完全不一样。虽然现在我尚未收到你星期日的信，但我知道，直至下午4时，你，或者说我们俩过得很好。你的信可能稍晚才到办公室，早些时候还没来，但无论如何我要再去看一遍，也有可能你把地址写错了。今天的夜信已寄往你住处。你的决心好极了，最亲爱的，如你严格遵循，我将拥有一个模范爱人。但你恐怕也必须这样，因为你有一个堕落的爱人。如果你没有红润的面颊，我应怎样使你变得苍白，因为这正是我的职业。如果你不是精力充沛，我应怎样使你变得疲倦；如果你不快乐，我应怎样使你悲伤。最亲爱的，我最亲爱的，出于爱，只是出于爱，我要与你共舞，因为我觉得跳舞、拥抱和旋转与爱紧密相连，是爱真实的、疯狂的表现形式。哦，上帝！我写了这么多，我的脑海里全是对你的爱，就如同我要告诉你的一样多。

你的 弗兰茨〔19〕12.12.23

最亲爱的，如果我不能再写作，那该怎么办？这个时刻好像已经到来。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什么都没干完，过去的十个夜晚（当然工作总是被打断），只有一天我专心写作了，只有一天。我总是感觉疲劳，总想睡觉，脑袋上部左、右两边总觉很紧张。昨天我动手写一个构思了很久的小故事，文思如泉涌，可今天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61]。如果我问那将怎么样，我想到的不是自己，反正我已经经历过较坎坷的年代，现在只是继续苟且生存下去而已。如果我不能为自己写作，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写信给你，享受臆想的、刻画出的、全心奋争得来的与你的接近。可是你，你将不再爱我，并非因为我不能为自己写作，而是不再写作我将更加松垮不安，成为你不喜欢的人。最亲爱的，如果你能使大街上可怜的孩子开心，就请你也这样对我，我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强。你根本不知道，我其实与傍晚带着卖剩货物回家的老头没有两样。所以请你像对其他所有人那样对我，即使你的母亲无论由于别人或我本人而生气（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痛苦，父母亲同样总是为子女无恶意的天性行为烦恼）。这长长的请求只有一个含义，我只要你告诉我，你将继续爱我，无论我变成什么样，你将始终爱我。没有我不能接受的有失身份的

做法——但是我究竟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在假期里之所想，没有想这些该多好！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没有理由像风一样冲破一切阻力地、规规矩矩地守在办公室，做一个本分、细心、一心投入工作的官员？你可能认为是假期的头两天使我迷惘，使我在匆忙中不知所措，但去我确实不记得有哪个圣诞节过得比这次好（明天我将为你翻查一下旧日记本），但这个异议不难接受。“或者……或者”的公式在此也适用，或者我能或者我不能，这次是我不能。但如果在“你爱我吗，菲莉斯？”这个问句后紧跟的是一连串直至永恒的大大的“是”字，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弗兰茨

〔1912年12月〕23—24

昨天，星期一，我只收到你星期六的信，今天，星期二，什么都没有。这怎能让我甘心，即使是最小的卡片问候我也很高兴呀！最亲爱的，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只想表达我的爱及由爱而产生的不安，它们充满了我所写的一切（昨天傍晚在办公室我没有找到你的只字片语）。

弗兰茨

〔19〕12.12.24

因为我的写作终于又有了点进展，所以我有勇气握住你的双臂（我还从未像在这即将开始的审问中轻柔地握住你一样握住其他东西），盯着你充溢了爱的双眼问你：“菲莉斯，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可有一天你没有得到我的消息？想想，有这样一天吗？可是今天，星期二，我却没有你的任何消息。自星期日下午4时至今早邮局送信已不下六十六个小时，这期间我对你一无所知，对我来说这段时间充满了各种好的和坏的可能性。”最亲爱的，请不要为我的这番废话生气，可六十六个小时确实是漫长的，我甚至想到了你可能遇到的所有耽搁理由：正在过圣诞节，你们有客人来访，邮局出了问题（也许我的信未准时到达），但毕竟是六十六个小时啊！尽管如此——睡觉之前有一点我还得说明——相比而言，在休息的日子里我较能忍受收不到信的痛苦，因为我虽没有你的消息，但我是自由的，没有东西能阻止我不断地想你，思念就像一根单行线，几乎一直延伸进你的闺房，构成它的力量是强大的，迫切的，专制的。最亲爱的，如果你哪天不能给我写信，就请放在星期日或节假日。因此，今天我能接受未收到信的事实，事情并不如你看了此信开头后可能想象的那么严重。得不到期待中的消息的滋味只有在工作日才最令人

难以忍受，因为那时我无法想你，烦人的各种要求包围着我，而你的信和明信片却能给我安全感，我无需想你，只需将手插入口袋，摸一摸你书写的纸片，就知道你在想我，你为了我的幸福活着。如果口袋是空的，我就会始终想着你，想着办公室的工作，最亲爱的，请相信我，结果形成强烈的对立，难以突破。以前有一次我没收到信，当时我写到，我将不再等待来信，一切都该结束了。可今天我要说：我们固然应停止书信往来，但我们必须相距很近，以至于不仅不必写信，而且由于距离过近连说话的可能性都没有。突然想起今天是圣诞夜，可除了这个告别的吻，圣诞夜对我来说并不神圣。

弗兰茨

〔19〕12.12.24

〔在边上〕

星期五起我又要去上班。

最亲爱的，我现在给你写信，并非因为应该给你写，反正这几句话将和后一封较详尽的信同时到达你手中，我之所以写是为了重新体验与你的联系，并为此种联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今天，当我暴怒地向邮递员索要我的信件时，我把他所有的圣诞邮件狠狠抖摇一番；我已经站在了台阶上并准备离开，放弃了一切希望，当时是中午12时15分。终于，终于在圣诞节的头一天收到了你美妙的邮件：两封信，一张明信片，一张照片，还有鲜花。最亲爱的，我要狠狠地吻你，最亲爱的，为什么我只能用我无力的手向你表示感谢呢？

现在我要和一个朋友去散步，可能我从〔未〕向你提起过他，他叫韦尔奇^[62]。我必须走了，刚才来了一帮叽叽喳喳的亲友，房屋都颤动了，我轻轻地、不被任何人发现地穿过了前厅。如果是与你去散步该多好啊！我将为你放慢从楼梯上跑下来的速度^[63]。我习惯于用让上楼的人害怕的速度跑下楼梯；这是我唯一自己发明且从事的体育运动。外面的天气非常好，最亲爱的，你要好好休息。一想到你能得到休息和恢复，我就感到圣诞节的每一时刻给我的快乐都是双倍的。不要写信，如有可能就打电话吧！你母亲整晚熄灯的做法正合我意，她若知道此事，也许会让灯一直亮着，不过那恰好又合我意。

弗兰茨

〔19〕12.12.25，星期三，下午3时

〔又及〕寄往你住处的两封信想必已收到了吧！我觉得，这些信对别人来说一定没什么可读性。

长篇小说又有了些许进展，当那个故事继续不下去的时候，我坚持写小说。刚开始写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对自己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开头就让四个人物发言并充分参与一切。可这么多人，只有他们随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出现和发展时，我才能全面、彻底地加以认识。在故事开头我遗憾地只把握住了两个人物，由于我只顾得上两个，因而当四个人竞相登场时就出现了可悲的、生硬的社交窘境。有两个人始终不愿露面，但由于我的眼光四处游移，也可能会抓住他们的影子，另两位则由于暂时受冷落而不安，最终乱成一团糟。真可惜。

现在我疲倦之至，白天各种各样的杂事搅得我一会儿都没睡，工作日我反倒睡得更多些。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可疲劳阻碍着我。假如我能

不写小说而给你写信，那该多好！我要在准备写信之时吻遍那信纸，以此为写信的开端，因为它终将到达你手中。现在我累了，脑袋昏沉沉的，除了吻我更需要你炯炯有神的目光，正如今天收到的照片上的那样。令我不满的是，这张照片上你的目光总不愿与我的相遇，总是越过我去。我将照片转向各个角度，可你总是不看我，平静地、好像经过深思熟虑后故意决定望着别处。不过我总算可以将你的脸贴近我，让我吻你，我这样做了，在我入睡之前我还要这样做，醒来的时候我依然要做一遍。我要告诉你，我的嘴唇完全属于你，我不会吻其他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内，阿姨们即便非吻不可，我也只让她们在我躲闪的脸颊上吻一下。

弗兰茨

〔19〕12.12.25—26

终于我有了你的照片，就像看见了你本人一样，照片中的你不像我初次见你时那般随意（没穿夹克，没戴帽子），而与那次咱俩在旅馆门廊走失时一样，和我们并肩跨过沟渠时一样，当时我感觉不到与你的联系，渴盼你我间最紧密的联系。突然想起你似乎有把头发从额头上捋去的习惯，特别是当你一手拿照片想低头看的时候。我的记忆可有错？因为我有时看到你这样做。对，就是这顶帽子，当时我像突然患了色盲似的认为它的里子是白色的。衬衫好像是另外一件，在布拉格你穿的是件白色的衬衫。现在让我吻吻你，你的微笑似乎比原来更多了一丝善意。最亲爱的，最亲爱的孩子，你如何解释你的照片的姿态？至少在今后的几天，我将不把荷包和照片放在口袋里，而是作为支柱、保护神和强壮剂拿在手里。这样一张照片的主人如果还不能承受一切的话，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你呢，最亲爱的，是否有所恢复？亲戚们是否总追着你不放？如果我去柏林，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陪我。瞧我在说些什么呢？我想以此结束自责吗？但，我没去柏林难道做得不对吗？可是我究竟什么时候能见你一面？夏天吗？如果我不能在圣诞节见你，为什么恰恰要在夏天呢？今天上午阳光明媚，我睡足了觉，但我此时比深夜更觉不安。关于你的母亲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留着下一封信再写。奇怪的是，我竟能很愉快地接受你信中涉及的有关你母亲对我的评价。这喜悦一部分是由于被别人充满敌意地攻击（尽管是出于最好的意愿）后受到了你全力、好意的维护。不过，这还不能完全解释我的喜悦之情。我很愿意在你家中被不断提起。多么荒谬的要求！

已近中午。起来，起来！再见，菲莉斯！将照片放进荷包里！信装进信封，赶去火车站寄信！

弗兰茨

〔19〕12.12.26，星期四晨

〔又及〕附上我上次住的疗养院^[64]寄来的圣诞贺卡，它与你的照片同时到达。看，我竟然想让一个陌生的信念用魔鬼般的诡计来治疗自己，然并未奏效。

〔附条〕

突然想起一件不容再拖的事：最亲爱的，你是否最终将你在布拉格穿的那件衬衫送给了你的妹妹？

你寄给我的小荷包简直是一个魔包，它使我变成另外一个更安分、更美好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欣赏你的照片或至少将小荷包拿出来看看（将它们始终拿在手中的办法行不通），我要感谢你赐予我的新的幸福。每次看你的照片——我将其立在我面前——看着看着就会想，到底是什么力量把咱俩联系到一起。在你可爱的面容、安静的双眸、淡淡的微笑和瘦弱的令人急于拥抱的双肩后面蕴藏着对我来说如此熟悉、如此不可缺少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看不见的秘密，面对秘密他们只能空手而归。

哦，我简直不能继续写信了，我看照片入了迷，最亲爱的，你在送我照片时一定没想到这一点。我想，这张照片将在各方面都对我有所帮助，明天我将在可怕的办公室举止更得当，尽管我只能用指尖从文件柜里翻出一些陈旧不堪的东西。另外，我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有可能就决不在晚上10点以后才开始写作，并坚决在深夜两点之前就寝（除非第二天休息），最后（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能配得上你的礼物），我特别后悔写了那封你于圣诞节第二天收到的信，你尽管在我明天将收到的信里责备我吧，一个毫无缘由指责其恋人，还用愚不可及的废话搅扰其恋人节假日上午的美梦的人，除了受责备，还该（只是为了举一些严重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例子）被罚两天得不到回信。不要感到不安，最亲爱的，我不会再如此没有信心，请原谅我，我对你恶言相加只是出于我对你的爱。也许有时我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伤害了你，请你一定从我的爱中找到理由，通过任何一条复杂的途径都一定能找到它。唉，这一次我又

是什么都没写，有关我每天的生活我仍然什么都没写，不过，你的照片知道一切。如你路过摄影师处，请告诉他，他的作品从没有哪张像这张一样被吻了这么多次。

弗兰茨

〔19〕12.12.26—27

我最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小荷包，如它能长时间经受住我频繁使用考验的话，它就是一个优质的小荷包。有时我对你的渴望都涌到了嗓子眼，我就打开荷包，照片中友善、美好的你立即呈现在我不知足的目光前。在街灯下，在灯火通明的橱窗旁，在办公室的书桌前，在走廊上突然停住时，在打瞌睡的打字员旁，在起居室的窗前而身后的朋友和亲友挤满房间时，最亲爱的，最亲爱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即便这么短的词我也不能常说出来，因为我经常只能咬紧牙关思念你。这张小照片魅力如此无穷，它给我的痛苦与欢乐等量。它不会消失，不会如真人一样远去，它永远存留在那里，是我永久的安慰，它不会融进我心里，但也不会抛弃我。

当然，我马上告诉自己（出于自私自利！出于狡猾！出于果断！），鉴于照片的如此魔力，我也一定要让你身边有我的照片。我立刻跑到摄影师那里，要他给我拍一张同样尺寸的照片，但我们这里的快照比你们的慢，一星期以后才能拿到。另外，你的突发奇想勾起了我的贪欲，最亲爱的，我建议咱们每月交换此类照片。因你总在变，季节更替，你的衣着也不断变化——不，最亲爱的，我要求得太多，我错了，我应很满足拥有这张照片，在每一封信里我都要为此向你表示感谢。

你星期四那封只写了五个字便中断的信乍看上去很吓人，就像有只邪恶有力的手抓住了你的手，甚至更恶劣地冒犯了你。不过我对自己说，你还是写了信封，将剪报装进去，也许还寄出了信，一定不会有更糟糕的事发生，我又可以期待明天的信了。

你的母亲在这事上对你如此专制我认为没有道理，但在别的方面我很理解她。你是否由于自食其力在家里的地位较你妹妹特殊？据我所知，你妹只操持家务。难道你的这种特殊地位不受别人尊重？看来你母亲在低估你的工作这一点上犯了大错，但在其他方面她还是正确的。在泳池边她不离你左右，她做对了（那个年轻人究竟要干什么？离开他！），当她由于我的来信生气时（有可能这封信也不例外，尽管我在

信里为她辩护），她做对了，现在我顶多只能在梦里让她相信此信的必要性；她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婚姻其他任何生活方式都无意义，这一点上她又对了，何其正确！我不是经常声明自己的存在无意义吗？

你默默地将《柏林日报》的民意调查装进了信封。这态度确实是最好的。问题提得多愚蠢！报纸通过此种方式让人觉得很有人情味，然也很荒谬。所有没体现问题愚蠢性的回答都不好，因为它们根本不切题。而且那些问题很易于回答，我可以立即说出两个答案：“他”一定要英俊。“她”则恰恰相反，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多一分或少一分都不可以[65]。

她就是那样，人们在深夜还不能与她分离，抱着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不断地给她写信，希望通过写信能使她完全地、活生生地呈现在自己面前。马克斯·勃罗德的《情感的顶峰》一书你已经有了吧，其献词里之所以有两段文章，只是因为这本书是印有马克斯亲笔签名的二十本精装书之一。但这看上去有些冷漠，因此我让他根据事实对此书进行增补。

今天我收到一封略维的来信，随信附上，让你看看他的文笔怎样。我没有告诉你，我已在早些时候找到了他的地址，此间我已收到他的数封来信。这些信都是一个模式的、满篇诉苦之词，这个可怜的人是无药可救了，他现在总是徒劳地往返于莱比锡和柏林之间。以前他的信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比现在的活泼多了，充满了希望，他可能真的要完蛋了。你曾认为他是捷克人，不，他是俄罗斯人。

再见，最亲爱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彼此深爱，不是吗？你的唇在哪里？

弗兰茨

〔19〕12.12.27—28凌晨

最亲爱的孩子，我在小说里正写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你见过美国某些城市在举行地方法官选举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游行示威吗？你肯定和我一样知之甚少，不过我的小说目前正进展到此处[66]。

暂时插几句话，我最亲爱的。现在已近凌晨两点，一星期以来，只要我迟于两点睡觉，脑袋就常常嗡嗡作响，难道我不能习惯于熬夜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它了吗？在办公室我打哈欠真是丢尽了脸，我冲着几个理

事、主任和同事们，简而言之——我冲着遇见的每一个人打哈欠。我希望每晚两点按时睡觉能对我有所帮助。

最亲爱的，我是否应该告诉你我是怎样一个可怜的人呢？难道我不该就此缄默，以免损伤你心目中我的形象吗？但我们彼此相系得这般紧密，我不应该说吗？难道非得等到人们将时空对立之时吗？我一定得说。

你今天的第二封信令我嫉妒心起。你感到诧异，以为看错了是不是？没错，是嫉妒。所有像今天这样提到许多别人的名字的信都无法使我不嫉妒。我想起来了，曾经有那么一封信使我嫉妒得渐渐发狂，并写了一封恶心的回信，那封信令我一直感到有愧于你。是的，我嫉妒你信中涉及的所有人，提名的和未提名的，男人和姑娘，商人和作家（当然特别是作家）。我嫉妒那个华沙代表（也许说：“嫉妒”并不合适，我可能只是“羡慕”他），我嫉妒那些给你提供更好职位的人，我嫉妒林德纳小姐（布吕尔和格罗斯曼是小女孩，我还不说她们好话），我嫉妒韦尔夫、索福克勒斯、里卡达·胡赫、拉格雷夫和雅各布森。我的嫉妒心理可笑地得以满足，是因为你把赫尔伯特叫成奥伊伦贝格·赫尔曼，而弗兰茨这个名字则毫无疑问深深地印在了你的心里（你喜欢《影之图》？你认为它简洁明了？），我只知道其中的一篇《莫扎特》，奥伊伦贝格（不，他不是布拉格人而是莱茵人）曾在此朗诵它，但我几乎不能忍受这篇作品，一篇令人窒息、不清不爽的散文。他的戏剧应该不错，但我没读过。对了，现在我想起来了，在《包罗万象》里我曾读过一篇他较好的作品，好像叫做《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67]。当然，以我现在的心绪，我毫无疑问要大肆诋毁他。但你不要看《影之图》。现在我甚至能感到，你已为他倾倒（你们都听着，菲莉斯已为他倾倒，完完全全倾倒，在这午夜时分，我对他极为恼怒）。但你的信里还出现很多别的人，我要和所有这些人打架。我并不想伤害他们，只想把他们从你身边拉开，让你摆脱他们；只想读到你的信，仅仅涉及你，你的家庭，那两个小孩，当然还谈到我的信！当然！但最亲爱的，我没疯，我愿聆听一切，对你无尽的爱使我太了解你，以致我事实上根本不会因你的行为产生嫉妒（我相信，如你读《影之图》，我们最终将分享源于我的厌恶和源于你的欢欣，这就是说，你手里拿的书也将鼓舞我，不会有其他结果），但我只是想让你全面地了解我，才写信告诉你，你的来信在今天下午，也就是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给我的感觉。

我得到这封信恰是在我从办公室回来之时，它竟是随着11点的那批邮件到达的，这看上去像是奥地利邮政的一项功绩。但再想想，咱们的邮局也太情绪化了，信没有送到我住处，而搁在距住所一公里左右我父母的商店里。就其本身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因为我的邮件不会受到指责，而你的信也马上被送至家中，但这向你表明，我有时毫无顾忌的、让你心急的不安是这情绪化的投递引起的。

今天下午的消沉也与此有关，我对自己说：今天收到两封信，真好；但谁知道明天——星期天，我是否还能收到信？菲莉斯似乎本想让这封信星期天到达，可它现在已经来了，也许明天我将呆坐在那里，什么消息也得不到，或者，我还是蜷缩在床上的好。但愿别这样！

你信中道：“在写长信方面我现在已经超过了你很多。”这句话简直让我无法忍受。重申一遍：我没有发疯，最笨的人也知道，这些话无足轻重，是我信手写来的。但请相信我，菲莉斯（我念信的时候正处于梦游状态），当时我想这就意味着说再见；因为我写得不够多，所以结束了。最亲爱的，我要紧紧地拥抱你，胜过以往任何时候，在经历了时常折磨我的病态敏感之后，我要确信又完全拥有了你。

我这喜怒无常的脾气一定是源于你我间的距离，也可能是我某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所以它们并未就此结束，而是一起出现在我下午做的梦中，这个梦我明天再告诉你（尽管明天会有很多会被遗忘）。现在祝你晚安，最亲爱的，还有一个长长的、静静的、满怀信心的吻。

弗兰茨

〔19〕12.12.28—29

我最亲爱的好心人，终于又收到一封你的来信，这样一封信比其他所有的信都更美好。11点半钟的时候，门铃响了，这个时候除了邮递员不会有别人，但我还是站在房间的玻璃门后，试着预先安慰自己。“不会有信来，”我对自己说，“今天怎么还会有信呢？菲莉斯不可能写这么多呀！你一定得耐心地等到明天。”在焦躁不安中我真的全身颤抖。

最亲爱的，又是一封信，一封让人欣喜得脸发热的信。信里面不再提起那些熟人和作家，那里——

我的信被打断了，当时还是下午，现在已经这么晚了，我都不敢向

外看。我将悄悄溜出已上锁的大门，赶往火车站寄这张纸片（哈，要是被我的父亲和亲友们知道就惨了，从上午起我就一直没见到他们）。为了让自己心安，我不能让你在星期一得不到我星期天的消息。我很好，只是不知不觉被别人占去很多时间；只要你爱我，我怎么会不好呢？现在我要跑去火车站！

弗兰茨

〔1912年12月29日〕

最亲爱的，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星期天。好像知道这天不会安静似的，我清晨一直躺在床上不起来，尽管我通过那个给我造成烦恼和悔恨的工厂（别人看不到）本该使自己飞黄腾达。由于一直无谓地躺在床上（你的信11点才到），其他所有事都被推迟了，我两点半钟才吃饭，之后开始给你写信。那正是惯常的午睡时间，屋子里静悄悄，我很高兴能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可那位韦尔奇博士却打来电话，他不仅仅与我有点头之交，而且是我真正的朋友。还有，他名叫费利克斯，我很高兴已与这个名字有了长期的友谊；当然，目前这个名字最后几个字母已略有变化，且含义令人难以置信。就是这个费利克斯在我给菲莉斯写信时打来电话，提醒我与他、他妹妹和一个女孩（当然是她妹妹的朋友）已约好一起去散步，上周四我们同样去散步了。尽管我并不喜欢上周四的散步（我有时且大多数情况下害怕女孩子），尽管那封牵挂重重的信刚开头；尽管我与马克斯也有一个约会；尽管我有理由担心散步后至睡觉前我不再有足够的时间干自己的事，我仍立即以极大的热情答应了他，因为我面对电话，即便是家庭电话，也总是不知所措，另外我也不愿让姑娘们等候。但是，当我顾虑重重走下楼来，站在人前而非可怕的电话机前，看见那三位及此外另一位姑娘和一位青年时，我立刻决定，陪他们走到桥那儿就告别，分手时我扰乱了收过桥税的小房子前的秩序，还踩了后面一位女士的脚^[68]。解脱之后我去了马克斯那儿。但我不再继续说这个星期天的事了，否则将出现我今天什么也写不成的悲哀结局，因为现在11点早过了，且我又开始头疼，一星期以来情况一直这样。不写了，内心却充满欲望，写下去的强烈欲望。

另外，我现在更清楚，为什么你昨天的信让我如此嫉妒：你不喜欢我的书（《观察》），正如同你那时不喜欢我的照片一样。这并没有什么，因为那上面的东西绝大多数都很陈旧，但它们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对你来说比较陌生的一段。不过这没什么，因为抛开那些，我感觉

到你在我近旁，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如果你紧靠我身边，我愿先用我的脚踢开那本小小的书。假如你喜欢现在的我，我的过去将随意停留在何处；如果非得给它选一个驻足之处，那么它将停留在与对未来的恐惧一样遥远的地方。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你对我只字未提，你不喜欢那本书——当然，你不必说不喜欢它（这也可能不是事实），它只是不太合你的口味。那里确实是一片无可救药的混乱或者更甚：无尽迷惘之中投下几束希望之光，人们必须走得很近，才能看见一些。如果你觉得对此书无从下手，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只有当你经历一个多小时软弱无助后仍能被此书吸引，那么才有希望存在。我现在和原先都很清楚，没有人会知道如何读这本书。这是那个大手大脚的出版商给我带来的精力和财力的牺牲品，而这本书的彻底失败令我痛心疾首。出版这本书纯属偶然，有机会我会告诉你，我可不愿意专门去说它。我说这一切是想让你知道，无论你对此书作何无把握的评价在我看来都很自然。但你什么都没说，有一次曾表示想作些评论，却仍然没说。这就像雾，长久以来我一无所知的雾。最亲爱的，你看，我愿你了解我的一切，任何东西，哪怕它极其微小，也不放过，因为我想，我们是紧密相连的。也许你喜欢的衬衫就其本身而言我并不喜欢，但由于你穿着它，我对它便有了好感；我的书本身你不喜欢，但因为是我的作品，所以你一定喜欢——现在都说出来了，而且双方因素都在内。

最亲爱的，你一定不会因我的长篇大论生气，因为你毕竟清楚咱俩，而且在我看来，我所了解的一切都在8月那个傍晚得于你的眼中。我没有学到太多，这你可以从我昨天做的梦中发现。

不，我不描述我的梦了，因为我突然想起，最亲爱的，你生病了，最起码星期五晚上生病了。难道这就是你在家中烦恼的原因吗？对此我至今一无所知，不过这可能是因为我理解有问题。如你被卷入烦恼，最亲爱的，可怜的孩子，那就糟了。我家不是这样的，我母亲是父亲钟爱的女奴，而我父亲是我母亲钟爱的暴君，这归根到底是家庭和谐统一的缘由。我们在过去几年里经历的不幸全都源于我父亲的病体，他患有动脉钙化症，但这不幸却由于我们的和谐不能侵袭家庭的内部深层。

正巧身边的父亲在他的床上重重地翻了个身。他长得又高大又壮实，幸运的是近来他感觉好多了，但病痛仍然是个威胁。这个家庭的和谐其实总是被我破坏，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程度不断加深，我知道自己无药可救，我对父母亲 and 所有人怀有深深的负罪感。我最亲爱的远方的

姑娘，我在这个家庭里也同样痛苦，原因也在于这个家，只不过我的收获比你多。小时候，我不只一次在夜晚站在窗前，玩弄窗把手，我觉得打开窗子把自己扔出去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些事情都过去很久了，如今，我确信了你对我的爱，前所未有的成了一个稳妥的人。

晚安，最亲爱的！即便悲伤的吻也是好的，由于悲伤，我的唇愿一直停在你的上面，永不分开。

弗兰茨

1912年12月29—30日

〔又及〕最亲爱的，我再告诉你一遍，每天我只正正规规写一次信，那些我白天仓促而就的信件令我很不愉快，想到你十点钟徒劳地等信，我就十分焦躁不安。请不要等信，最亲爱的，不要在意布吕尔夫人悲伤的目光。另外，我很想向她表示谢意，却不知选择哪种方式。

新年你在办公室吗？请把信写到我家里，我也将把信写到你家里。

〔在边上〕《柏林日报》的笑话是什么意思？你想告诉我什么？我要详细的回答。

最亲爱的，我真高兴，终于听到你出去散步的消息了。这难道不是数月来你在户外度过的第一个钟头吗？在这让人精神高度紧张的生活里，你真的感觉很好吗？现在我出奇地平静，仿佛从未感到过疲劳。但今天清早，在你的信尚未到达之前，我简直就像处在一个漩涡里。自然毫无缘由。情况总是这样的：写信时感到彼此在一起，相互支撑，然而这一切却虚幻缥缈，因而有时定会失望之至。但是，最亲爱的，我们不会抛弃对方，不是吗？如果一方跌倒，另一方一定会扶起他。从你的信里看出，林德纳小姐仿佛是审判我的法庭，尽管她并未给我写信，可我能感到她强烈的谴责。最亲爱的，你已经通过那一封封长长的信表达了对我的爱，现在就请你用短信来表达你的感情吧！如果电灯关了，请不要就着烛光写信，否则这想法会让我极为担心。你在经济界工作，你和父母不和，你为生活在布达佩斯的妹妹哭泣——唉，如果我能随时在你身边，每时每刻与你分担这些烦恼，我有多么幸福。可现在我独自坐在这里（手表在外套口袋里滴滴答答，声音仍旧很大，我把它放在那里就是因为它太响了）绞尽脑汁地想找出帮助你摆脱烦恼的办法。

你妹妹的一封信怎么会令你潸然泪下？她出了什么事？想家了吗？只是想家？可她还有丈夫和孩子呀！布达佩斯有十万人说德语，且她在这两年里也该学会一些匈牙利语了呀。她的丈夫不在她身边吗？他经常外出吗？究竟什么使她悲伤，令你同情？另外，我突然想起，她在布达佩斯不止两年了，难道还没有习惯吗？更何况她有孩子，哪里有心思悲伤呢？

你把那些都告诉了打字室里古怪的夫人们。而我很清楚地可以给自己下判断，且那些话都在嘴边，已被我重复了很多遍，因此我很愿说好。正巧星期天下午马克斯在类似的情况下对我说：“你说话就像姑娘一样。”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一段时间以来我一有空就钻研那部精彩的拿破仑名言录^[69]其中有一条是：“无子而终是很可怕的”，可拿破仑自己却一点也不悲哀；再比如朋友对他来说可有可无，无论是他自觉自愿还是出于无奈，有一次他说：“我除了达鲁外没有朋友，达鲁冷酷无情，对我来说正合适。”还有一句话可让我们看出这个人的深谋远虑：“开始便知去向的人行而不远。”人们可能相信他惧怕无子，可若把这加之于我，我却必须使自己做好准备，因为除却其他一切，我任何时候也不想冒险做父亲。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总是写着写着信就伤感起来。这种时刻时来时去，我要跪在地上请求你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突然想起，这封信将在新年第一天送到你手里，并将领我们进入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一年，可是太晚了。将功补过，我今天找到一个你我之间新的联结物。我将买一本日历，每一页都带有美丽的图案，我要将信件到达日的那张放进信封里，让它总是在清晨摆在你的书桌上。这样，我的时间总是提前一些，你每天照日历度过的日子我其实已过完，但尽管如此，我们都一次次面对过相同的日历，我会更喜爱这样的生活。

除夕你将在哪里？去跳舞？喝香槟（下午你在古雷森林喝了葡萄酒，对不对？）？我本想坐在书桌前继续我的小说（小说今天还停留在昨天中断的地方），但别人邀请我去那个韦尔奇博士的叔叔家，我挺喜欢那家人，因此我很犹豫，到底做什么好。我相信，最终我将留在家里，尽管自从我得到了你的小荷包之后，它使我有能力出席那样的社交场合（手插在兜里，握住小荷包），但缺席是很不好的，我会于心不安。现在，头部绞痛在警告我不要睡得太晚。

好吧，最亲爱的，再见！愿我最心爱的姑娘新年愉快；新的一年应

是不同往常的一年，如果过去的一年让咱们天各一方，也许新的一年会尽一切力量，奇迹般地把咱们聚在一起。来吧，来吧，新的一年！

弗兰茨

〔19〕12.12.30—31夜

我今天晚上8点还躺在床上，不累也不精神，只是起不来，四周正开始庆祝一年一度的除夕，我却闷闷不乐，像一只被遗弃的狗悲伤地躺在那里，那两个与要好的朋友共度今宵的可能性只使我更加绝望和消沉（正好放午夜礼炮，街上、桥上人声鼎沸，而我却看不见一个人，打钟了，表也敲响了），我的目光只在天花板上来回游移，此时此刻我想，我本该多么开心，可我不在你身边又是多么不幸。被你凝望的幸福，与你第一次交谈的幸福，将我的脸埋在你怀里的幸福——我将须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我付出的代价将是，你从我身边跑开，肯定是哭着跑开，因为你善意地认为眼泪可以帮助我。我可以追你吗？恰恰是比任何人都忠实于你的我可以这样做吗（那些人竟在这远离主干道地区的大街上叫嚷，吼声震天！）？不过，这一切我不须自己回答，请你回答，最亲爱的，就你自己，在你不留犹疑的深思熟虑之后。我从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开始问起，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度将逐步升级。

我们来做个假设，一个特殊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城市共度几天，可能是法兰克福吧。我们约好第二天晚上一起去看戏，之前我会去展览馆接你。你为了能准时下班，就尽最大努力匆匆完成了重要的工作，等候我的到来。可你白等一场，我没来，不可能是偶然的迟到，这个友善的人允诺的时间早过去了很久。没有一个可以让你释然的消息到来，此间你可能早已彻底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从容地穿好衣服，反正去剧院已晚了。你根本不能设想这纯粹出于我的失约，也许你会担心，可能我出了什么事，你立即决定——我听见你吩咐马车夫——乘车来到我住的旅馆，让人引你到我的房间。在那里你发现了什么？我（此处抄录本信第一页）8点钟还躺在床上，不累也不精神，声称无法离开床铺，又怨天尤人，并让人觉得心中未散的怨气更烈。我试图通过抚摩你的手，通过寻找你在昏暗的房间里游移不定的目光来弥补我犯下的严重错误，但所有的举动又预示着已准备好，无所顾虑地在那一刻不大不小重犯上述错误，当时我甚至没有特别多的话要说。至此我已完全清楚咱们之间的对立，若我是站在床前的你，我会出于愤怒和绝望毫不犹豫地举起伞，使劲打在我身上。

最亲爱的，请不要忘记，我以上描述的事在现实中绝无可能出现。在法兰克福（打个比方），如果不许我一直待在展厅，我也将整天蹲在门口，我们一起去观戏我也会做出类似举动，但只会更殷勤而不是懈怠。但我要让我的提问有个特别明晰的回答，一个不依赖于任何方面，也不依赖于现实的回答，因此我也如此明了地提出问题。回答我，最亲爱的女学生，回答你那出于无尽的爱和不幸有时变得完全荒唐的老师。

你的上封信中有一句话你已经写过一遍，我可能也写过：“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整体。”最亲爱的，这千真万确，举个例子说明，在这新年伊始的几个钟头，我没有更大更愚蠢的愿望，只想把你的左手腕和我的右手腕牢牢地拴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也许是因为我面前正巧有一本有关法国大革命及其时人报道的书，而且一对恋人就是这样被绑着送上绞架的，我从未在哪儿读到或听到过这故事，但那极有可能。我脑子里都是些五花八门的东西，今天它却对我可怜的小说无动于衷。它把十三放进了新的年份里。但这最美丽的十三不会阻碍我把你，我最亲爱的，拉向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你现在在哪里？从哪个欢乐的人群中我可以把你找出？

弗兰茨

〔19〕12.12.31—1913.1.1

最亲爱的，这个元旦下午只几句话。你知道什么是我目前最大的担忧吗？你原以为我昨天（星期二）会收到的那封长长的、美妙的信，我直到今天（星期三）才收到，而且它是随着第二班邮件来的。你还写道：“你在星期日早晨一定还会收到一封信。”你的那个“星期日”显然是指今天，元旦。很好，可是第二封信我没收到，办公室也没有。很可能明天早晨会被送到住所，可那时我在办公室。我将委托别人把信立即送到办公室，但别人会不会忘记此事呢？他会将信及时送到吗？还会有另一封你的信送到办公室吗？最亲爱的，这就是我的烦恼。可恶的邮局！可恶的距离！

你在今天的来信里对我真是太好了！你竟原谅了我，理解了我的忧虑！你等着瞧吧，为此我还要在今天晚上竭力感谢你。最亲爱的，再见，今天下午我的脑袋昏沉发胀，左眼有点跳，笨到了极点，因此我要和大家在一起。为什么不呢？对他们来说我气色总好，因为一旦我处于我自认为的最佳状态，我就不属于他们了。

战胜了奥伊伦贝格，我欣喜若狂，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只管沉醉于他的席勒奖^[70]和每年从罗沃夫特出版社领取的一万二千马克（韦尔夫说的）。我恭喜他取得成就，因为我把你——菲莉斯，拉到了我身边。就请留在这里吧！

弗兰茨

12.12.1〔1913年1月1日〕

最亲爱的，我都糊涂了，刚才我都要去睡了，却收到你的电报。柏林的邮局在搞什么鬼？元旦那天你在住所收到一封信，对不对？还有，除夕我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在元旦的上午寄出，那封信你应在今天，2号的9点收到。另外，元旦下午收到信后，我特别高兴便又写了一封信给你，并立即投进邮筒，你应在今天10点收到。最后，今天凌晨我写了一封，你将在明天，3号9点收到。最亲爱的，你看，我一点都没错。我们这里的邮局也够荒唐，我今天（2号）才收到你30号和31号写的信，不过你的除夕贺卡倒是准时送到了办公室。为什么人们这样迫害咱们？难道咱们除此极其幸福吗？现在我跑去邮局以快件发出此信。

弗兰茨

〔19〕13.1.2

时间太晚了，我的可怜的、受折磨的、最亲爱的人，做完并不太坏却历时很短的工作之后，我又靠在椅背上坐了很久，现在天已经很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这般不在乎我的信未寄到你手中，即便你的电报就放在我面前，而我恨不得迈开最大的步伐跑到柏林，立即亲口向你做解释。可是这些信无论如何应该在下午寄到呀！两封信的收信人地址绝对正确，并附有寄信人地址，且在同一天发出，即便是装在不同的邮袋里又怎么可能丢呢？这简直让我难以想象。若真是这样的话，就再无安全可言了，那么所有信都将丢失，这封也不例外，只有电报还能行得通。还有唯一的一条出路，即我们都扔掉笔，走到一起来。

最亲爱的，无论如何我举双手请求你不要嫉妒我的小说。如小说中的人物觉察到你的嫉妒，就会离我而去，我则只不过捏着他们的衣角而已。你想，如他们从我身边跑开，我必须在后面追，如果他们一直跑到阴间老家怎么办？小说就是我，所有的故事就是我，你哪里有一丝一毫

嫉妒的余地呢？我求你了！如果其他一切都不出差错的话，所有我笔下的人物都将为了最终能为你服务而手挽手奔向你。即使有你在，我也不会和小说分手，如果我能和它分手就糟了，因为写作让我得以生存，让我跟上有你——菲莉斯身影的小船^[71]悲哀的是我没能跃上小船。不过，最亲爱的菲莉斯，你要知道，一旦我失去写作，我就将失去你的一切。

请不要为我的书（《观察》）烦恼，我上次的荒唐之言只是一个忧伤夜晚^[72]忧伤情绪的体现。当时我以为，让你喜欢我的书的最佳办法就是愚蠢地指责你。你只需在有时间的时候安静地读它，你怎么会觉得它依然陌生？

如果它是我称职的使者，即使你克制自己不再读它，它也一定会牢牢地吸引住你。

弗兰茨

1913.1.2—3

〔又及，写在每页的边上〕我一点都不知道，到底是哪封信丢了，是提到拿破仑及孩子们的还是提到法兰克福的？

哎呀，最亲爱的，如果你为了写信而在深夜起来，你可受罪了，真的受罪啊！

30日你和哪位女同事一起走回家的？一个出于嫉妒的问题：你父亲如何评价〔勃罗德的〕《阿诺尔德·贝尔》？

最亲爱的，当然我不应该现在就结束写作，这显然为时过早，现在1点钟刚过，即便兴致很高，即便偏爱更多于反感，但似乎我的反感比兴致更多一些，因此我放下了笔。最亲爱的，念到这里，请你冲我点点头，以证明我做对了，请快点，那么我真的做对了。

我觉得，咱们好像在交换彼此的不安。今天我便是那不安的一方。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收到我的信。今天有好几次，我觉得如果不能立刻将你带到我身边来，自己将无法忍受。昨天晚上，在我写完前一封信并封上口之后，我躺在床上突然想到，我的信没有到达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即办公室的某个年轻姑娘出于好奇和想看笑话将信藏了起来，直到晚上才交给你。很想知道我猜得对不对。

你和人赌一瓶香槟酒，这令我吃惊不已。因为我想起很多年前同一个很好的朋友打的一个类似的涉及我婚姻的赌，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我甚至给他写了个书面保证，至今他仍然保留着。要不是恰巧前几天这个熟人偶然记起了这件很多年没提的事，我还真想不到呢。那也是赌香槟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赌的是十瓶上好的香槟。当时我可能想在十年后筹备一个美妙的单身汉晚会，并以为这些年里能学会喝香槟酒，谁知这一切至今都未实现。你肯定能猜出来，这个赌是源于那些逝去的所谓闲逛年月，那时有许多夜晚我都是坐在小酒店消磨掉的，不过我不喝酒。从名字上看，那都是些绝好的地方：特罗卡德罗、埃尔多拉多等诸如此类。如今呢？如今我于夜晚站在美国一个城市的街道上，像灌水桶似的，灌自己各种各样的饮料[73]。

我还需讲述以前那个梦吗？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梦见你，干嘛还要说旧梦呢？想想看，今天晚上我梦见咱们庆祝订婚了。那看上去极不可能，我也不记得多少了。我只记得半明半暗的房间里，人们都围坐在一张长木桌边，黑色的桌面上没铺桌布。我坐在桌子末端一群陌生人中间，你远远靠前，笔直站着，与我遥相斜对。我出于对你渴望将头靠在桌上向你那边窥望。你把眼睛转向我，它们很黑，但每只眼眸中间都有一点闪闪发光，如火似金。以后这个梦就乱了，我发现那个站在客人身后、听候吩咐的女仆偷吃了一口一个棕色盆子里将要端上来的稀糊的菜，然后又将勺子插回菜里。对此我勃然大怒，我将那个姑娘——我想起来了，所有一切发生在一家饭店里，那个姑娘是饭店的雇员——领到楼下，穿过一间间宽敞无比的饭店营业厅，向权威人士投诉那个姑娘的行为，然而没起什么作用。后来，这个梦消失在无休止的跋涉和匆忙中。你觉得这个梦怎么样？其实我脑海里那个旧梦比这个更清晰，但今天我不再讲述它了。

冒着毁掉你这个星期日的危险，我给你寄去我的近照，而且三张一样，因为我觉得多寄几张会使照片不那么可怕。我知道自己无药可救，闪光灯总使我看上去不正常，脸歪、眼斜且呆滞。不要怕，最亲爱的，我实际长相并非如此，这张照片不算，你别把它带在身边，我将很快给你寄一张更好的。事实上，我比这张照片至少漂亮一倍。你若不满足，最亲爱的，那就太糟了。我该怎么办呢？你另外还有一张与我的实际完全相符的照片；我真正的长相正如小说《观察》中的那样，至少最近我是那样的。无论你要不要，我都属于你。

工作又糟糕透了，最亲爱的！为什么它自己不继续下去，而像活物一样被人指挥得团团转！

你看，连快件也不能让人相信了。你的快信昨天傍晚才送到办公室，而我今天早上才拿到。这封信怎样使一个人加快了上楼的速度呀！又怎样促使他将上半身紧贴在窗户上读信（已8点45分，但天仍然很暗）呀！此举引得人们争相观望，疑问重重，读信人原来的忧虑早已烟消云散，向他们点头释疑。

紧接着第二封信到了，我们相会在法兰克福，相互拥抱，而不像现在只有空荡的房间。但你居然巧妙地令我的问题不那么锋芒毕露，最亲爱的。如果我们与她一起游戏，那么就要游戏到底，你必须看到我好坏两面。这样我会生活得更轻松些，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可人儿！

我要对你说实话，此前我情绪恶劣极了，唯一正常之处就是生自己的气。我的写作不如意，其结果是我陷入麻木状态。我不觉疲惫，不觉困倦，不觉悲哀，亦无兴致，我没有力量依我的愿望将你请来，尽管恰巧我的右侧有一张空沙发像早已准备好似的放在那里，但我身陷包围，挣脱不开。

咱们在法兰克福的故事亦同样如此。正如你设想的一样，我什么事都没有，一点事都没有，只想静静地躺在床上，此间，床边沙发椅上方的钟告诉我约会的时间近了，到了，又过了。我没有道歉，什么都没说，只知道自己错了。这种情况下我给你的印象与我一些信给你的相似，而你在回这些信时，开头会说：“弗兰茨，让我拿你怎么办呢？”或诸如此类的问句。

我在用固执折磨你吗？可是除了固执还有什么能让一个固执的人相信他拥有让人难以置信、自天而降、产生于一个8月傍晚的幸福呢？

弗兰茨

〔又及〕你不清楚你三王来朝节那天是否去上班，所以我将这封信寄到你的住处，明天我再寄一封到办公室。

只有几句话，我的可怜的最亲爱的人！已经非常晚了，所以我必须迅速动作，否则就不能给你星期日的问候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仅让我拥抱你，而且还要让你感受到我的拥抱。但我突然想起，也许我们不能碰面，因为我有种强烈愿望，在拥抱之后立即吻你，因此过一会儿我要向主宰一切的上帝解释，若能允许我首先抚摩你的手，我将心满意足，我的可怜的最亲爱的人。

弗兰茨

〔19〕13.1.5

可怜的，可怜的最亲爱的人，你以后千万不要勉强读这本粗劣的小说，它是我麻木状态下的作品。更可怕的是如何才能改变它的面目；货物都在（我是以怎样的激情写这本书的呀！墨水用得飞快！）车厢顶上，我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沉浸于啪啪的马鞭声中，感觉自己是个万能的主人；可货物突然从顶上坠落下来（这情况我不能预见，不能阻止，也不能就此罢休），昨天和今天都如此，它们对于我瘦弱的双肩显得那样沉重，我想，我最好什么都别干，而应立即给自己挖个墓。归根结底，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小说更美丽，更与他彻底绝望相称的地方能埋葬他。两个自昨天起就非常疲乏的人于深夜3点钟站在九层相邻的阳台上聊天^[74]，你猜怎么着，当我在街上冲他们喊了声“再见”，然后连头也不回离他们而去时，他们竟然晕倒在各自的阳台上，苍白如死人的脸隔着栏杆相互对望。但我只是想这么做而已，最亲爱的，我并没有这么做。假如——没有假如，我又糊涂了。

今天下午我确实试着让自己睡觉，但没怎么睡着。隔壁屋里——这我事先未想到——我未来的妹夫正指挥大家做六七百张请柬，下个星期天我妹妹结婚，我的这个妹夫呀，他其他特点都很可爱，就是嗓门太大，隔壁屋里想要睡觉的我一听见这声音就觉得有人把锯子放在我脖子上。这种情况下，我当然睡不好；我总是被惊醒，然后接着睡。为了睡觉，我放弃了悠闲的散步。但我也确实睡了个够，因此不能将我工作低效归咎于此。

最亲爱的，你父母是如何评价我的？我要知道每一个字和每一个表情。快点，长久以来你总是向我隐瞒这些。若我知道这些评语，我会觉

得你在我身边，无论这种感觉令人欣喜还是忧伤，它都如此强烈，如此令我神往，因为身体接近完全不可能。这感觉对我是一种享受，我沉浸其中，长久时时注视着信，不去读它，不去思考，唯一的感受是你的存在。我完全站在你那边，与你一起同你的父母攀谈，我融进了曾孕育了你的血液里。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比这方式更亲近，再亲近一些的也许是彼此渗透。

那个“长得挺和善”的儿科医生的话题咱们还没有结束，菲莉斯。我仍然坚持认为他和法兰克福的故事稍稍对立，并且从根本上来说，无论你有意或无意，它都是你给我提的一个问题。这问题我必须回答。最亲爱的，假如我只是嫉妒，除却嫉妒还是嫉妒，那么我在看了你的叙述后便妒心愈烈。因为这个儿科医生是个如此重要的人物，以至于你为了保护他不得不对他撒谎，那么——但，最亲爱的，这只是一个嫉妒者的思维，而非我的，尽管我也非常理解这种思维。我的思路是：你和这位医生聊得十分投机，又与他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试图为自己建立这种联系，至少能在下午一起聊聊天，这看起来对你和你母亲都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拒绝建立这种联系便意味着拒绝了今后进一步接触或至少不太可能再有联系，而按你的叙述，我将单独承担这责任，菲莉斯，这些责任完全是我应该承担的。我怎样担负这责任呢？是自豪还是满意？抑或引诱别人继续增加我的责任？不，我只想抱怨，只想悲叹，我愿意这个儿科医生拜访你们，一直像在除夕之夜一样那么可爱，我希望他幽默风趣，能被你们愉快地接受。我是什么？怎么敢妨碍他？我只是一个永远爱你的影子，是见不得光的。我真无聊！——自然现在又是让漩涡反转的时候了。若我在远方得知我在前页所述的迫切希望，这儿科医生全部成功地实现了，我将被嫉妒吞噬。如果你的谎言不是纯粹发自肺腑，而是因我之故，我差不多会认为，你那一刻的声音是个小小的不和谐音——这个观点和前一个衔接得怎样？（我的回答又给你提了个问题。）只是作为漩涡，我可以从这个漩涡抽身出来吗？我根本不这样认为。

另外，我已从亲身经历过的自然疗法中得知，一切危险皆来自医药，无论这涉及眼科医生还是牙科医生，儿科医生也不例外。这支笨笔！总不知羞耻地写出如此愚蠢的东西，从不会写些理智的话，它应该写“最亲爱的你”，重复一遍“最亲爱的你”，然后又是“最亲爱的你”，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写。

我对你的思念比我写给你的信更理智。昨天晚上我很长时间不能也不想入睡，躺了两个钟头，像是睡觉，其实醒着，我一直在与你进行最亲密的交谈。没有具体内容，这只是一种亲密交谈的形式，只是相互接近和倾心的感觉。

弗兰茨

〔19〕13.1.5—6

不要笑，最亲爱的，不要笑，眼下我这个愿望是非常认真的，你若在这里就好了！我经常计算，在最便利的情况下，我最快需多少钟头能到达你身边，你需多少时间来到我身旁。所需的时间太长了，太长了，长得令人绝望，即使没有别的阻力，一想到需要这么长时间我就下不了决心去尝试。今天傍晚，我从家一直走到费尔迪南大街上你们的代表做生意的房子前。看上去挺像我要和你在那里约会。但我独自围着房子走，又独自离开。在公司的黑板上我没有找到一处有关林特施特罗姆公司的事项。这个男人只称自己为一个留声机公司的总代表。为什么？我经常抱怨在布拉格只有这么少的几个地方与你有关，至少我只知道这几个：勃罗德的住所，沙伦大街，科伦广场，佩尔大街，水果大街和那道渠。还有议会大厦里的咖啡厅，蓝星酒馆的早餐屋及饭店前厅。太少了，最亲爱的，但就这几个地方对我来说，它们在城市图上是那样的醒目！

有关你今天的两封信我有太多的话要对你说，以至你的母亲可能会看厌这封信，那时她一定会作出如下感叹：一个人如果有这么多话要说，而且又知道，要说的那些话只能使笔画出一道没有把握的、纯属偶然的线条而已，那他怎么可以只写信？

你把我的照片装入了你的心形饰盒里（不是心形饰盒，比这更讲究！），装入了你的项链挂坠里，给你的小侄女安排了个并不十分讨人喜欢的邻居，我没看错吗？你要日日夜夜戴着它？你难道没想过要扔掉这张丑陋的照片？难道照片上的我不是那么面目狰狞地看着你吗？它配得到你给它的荣誉吗？值得想一想的是，我的照片嵌在你的项坠里，而我却独坐在冰冷的房间里（看来这两天我在屋里有些着凉，真让我惭愧）。等一下，你这张难看的照片，我要亲手将你从项坠中取出，这一刻定会受到赞美。我不会只是因为菲莉斯可能会浪费在你身上的眼光而将你扔掉。

就此搁笔，已经很晚了，我的信永没有写完的时候。如果造就双手只是为了抓住你而非他物，那么写信对于手来说是怎样一项工作呀！

弗兰茨

〔19〕13.1.6—7

我最亲爱的菲莉斯，今天我在下午给你写信，因为我不知道，晚上我是否能起得了床。也许最好的选择是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很显然我感冒了，而且很严重；我简直不能相信，然而确实如此。即使我不感冒，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要喝热柠檬片，要在额头上敷热毛巾，要退出尘世，要梦到菲莉斯。要让热气驱走我的伤风和房间里的魔鬼，让我能专心致志地想你，最亲爱的。

针对邮局我不该再发怨辞吗？听着，你星期天晚上写的信我星期一上午就收到了，而你星期日上午的信我却在今天，星期二上午才收到（寄往办公室的信比较准时，我家太偏僻了）。只能是由于你的这些照片，它们不愿让我通过邮局得到。最亲爱的，你的这张照片美极了！也许不在于细节，但在于你的眼神、微笑和姿势。一些无用的东西钻进了我的脑袋，但当我看你照片的时候它们停了一会儿。我看着你，几乎如那时我第一次看你一样。我早已忘记了这个手势，但现在，我感到它又重现在我的记忆中。你友善的目光对全世界万物都合适（正如我呆滞的眼睛也适于世界万物），但我只把它给自己，并感到很幸福。

请你，最亲爱的，请不要为我的感冒伤一丝脑筋，我提到它，只是因为我愿意告诉你每一件小事，当两人面庞如此接近之时，它是怎样产生的，在现实中它应是怎样的，在梦里它常常又是怎样。一个很快就会过去的小病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我自童年时代起可望而不可即的乐事。它中断无情的时间进程，帮助这个“耗尽心血的”、“完全被磨钝的”人，这个人就是我，获得一个小小的新生，这正是我目前真正渴求的。所以我感冒了，最亲爱的，你将得到一个更可爱的写信者，他终会认识到你是如此可贵，因而不能总让你牵肠挂肚。

弗兰茨

〔19〕13.1.7

〔又及〕现在是早上7点45分。治疗已结束，我前往办公室。

出于多种原因我今天没有写信，而是与那个韦尔奇博士散步去了。在那之前，我与他的家人在一起坐了一个半钟头，他的父亲，一个对诸事都感兴趣的、聪明的小布商，给我讲述了很多早年发生在布拉格犹太城和他祖父——曾是一个大布商——时代的古老而美丽的故事。我不得不和陌生人在一起，可面对陌生人我又觉得很不舒服。这种矛盾时常在我身上出现，比如别人正向我讲述什么，而我却不能一直注视着他，假如我听其自然，我的目光就会从陌生的脸上移开；假如我强迫自己看他，则我的目光不再是自然的注视，而显得呆板。难道我要描写整晚的情形吗？不，然而由于思维的迟钝，那些专制的、次要的东西总是首先从一大堆待说的话中钻出来。此外，我觉得自己近来很少对你说什么事，即使是一些最紧要的事情，也很少回答你的提问，以至于有时我感到自己正渐渐失去你这个听众。不能这样，菲莉斯。我没有回答个别问题，这并不说明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对我不利的地方，载着我的波浪是深暗浑浊沉重的，我慢慢向前，有时也停滞不动，但之后它又继续把我推向前，一切都很顺利。这些你一定在我们相识的前三个月就发现了。

我也会笑，菲莉斯，别不相信，我甚至以爱笑大大出名，但正因为如此，以前我显得比现在更傻气。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次与我们董事长的隆重会谈上——事情已过去两年，但相信将会被作为逸闻在我们公司永远流传下去——我突然笑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向你描述这个男人的重要性实在太麻烦了，但相信我，他非常重要，以至于一般的职员都认为他不是生活在地球上，而是高居云端。由于我们平时没有机会与皇帝交谈，因此，普通职员都把与董事长交谈当作与皇帝交谈一样。所有大企业里都是这样。当然这个男人与每一个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地位与其功绩不完全相称的人一样，身上总有那么多无法摆脱的可笑之处，但如此不假思索地、如此自然地、甚至当着这个大人物的面让自己放声大笑定是绝无仅有。当时我们——两个同事和我——由于刚被提升了一级，正穿着正式的黑礼服向董事长致谢，同时我还不能忘记，自己有义务在一开始就向董事长致以出于特殊理由的特殊的谢意[75]。我们三人中最有威望的那位——我是最年轻的——致了简短、得当又中肯的感谢词，一如他的作风。董事长也仔细听，一边摆出他惯有的、专在正式场合作出的姿势，那有点让人想到皇帝召见，事实上（假如人们愿这么想，除此之外又别无选择）滑稽之极。他的腿微微交叉着，左手握成拳放在桌子的外边角上，脑袋低垂，以致他花白的络腮胡子弯翘在胸口，不很大却仍稍前凸的肚子微微摇晃着。我当时的情绪一定极难控制，因为我很熟悉他这个姿势，也根本无须时时低声笑起来，

虽然这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想咳嗽，特别是在董事长根本不抬头的情况下。同事清晰的声音也牢牢控制着我，他目光前视，虽然他可能已注意到我的情形，却丝毫不受影响。董事长在我的那位同事发言结束后抬起了脸，有那么一刻，一种恐惧攫住了我，吓得我笑不出来，因为董事长现在也能看见我的表情并很容易断定，那令我心中不安的、从嘴里发出的声音是笑声，而根本不是咳嗽。接着他开始发言，又如往常一样老调重弹，我们对此早已深谙熟知，他的发言胸音浓重，毫无意义，无所根据，我的同事试图用他的余光警告我，我也恰好正试图控制自己，他的警告适得其反地令我想起先前畅快的笑，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所有我可以克制自己的希望都烟消云散。开始我只笑董事长那时不时穿插进来的精致的小笑话；按理对于这类笑话人们只是抽动一下脸部肌肉以示尊重，我却笑出声来，我看到我的同事们由于怕被此举传染而惊慌失措，相对于己，我更同情他们，但我无法克制自己，我没有试着转移目光或抬手掩饰，而是无助地紧盯着董事长的脸，无法转过脸去，也许感觉告诉我，一切都不会好转而只能更坏，所以还是避免一切变化为好。当然后来我又笑了，因为我已经笑出声一次，我不仅仅笑当时的那些笑话，还笑以前的和将来的，笑所有的笑话，谁也不知道我到底笑什么；大家都开始觉得很尴尬，只有董事长还比较平静，作为一个大人物，他对世界上很多事情习以为常，另外，下属对他的不敬也根本不会对他有何伤害。若我们在这一时刻溜了出来，也许董事长会缩短一些他的发言，若一切都较顺利，我的行为虽然毫无疑问不太礼貌，但也不会被挑明，事情将像那些表面不可能却又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通过我们与此事有关四人间达成的默契得以解决。不幸的是，至此尚未提及的那位同事（一个约四十岁、长着圆圆的、幼稚却布满胡须的脸的男人，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啤酒消费者）开始了一个简短的、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的发言。那一时刻，我完全不能理解，他已被我的笑弄得六神无主，站在那里，为了屏住笑两腮都鼓胀起来，现在居然又开始一番严肃的发言。不过，这在他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他平素爱激动，却徒有激情，最能积极附和别人早已承认的观点，如果没有他性格中可笑又可恨的成分，他那无聊的演说简直无法让人忍受。董事长这时又无关痛痒地说了些什么，让这位同事不太舒服，而且也许受我不停地笑的影响，他有点儿忘记自己说到哪儿去了，他马上觉得，这刚好是一个推出自己与众不同观点、说服董事长（推翻别人说的一切，自然即便死亡也在所不惜）的有利时机。当他手舞足蹈地讲些愚不可及的话（平时这话就让人难以忍受，现在就更不适宜）时，一切在我都成了多余的，到此

此时此刻一直呈现在我眼前的世界完完全全消逝了，耳边只剩下我响亮的、毫无顾忌的笑声，也许只有坐在长条凳上的公立小学小学生才会有那种肺腑之声。周围一切都沉寂下来，大笑的我最终成为焦点。我笑的同时两膝也因我内心恐惧颤个不停，为此，同事们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但我酝酿已久的笑中埋藏的恐怖他们却领会不到，也没有引起注意。我用右手拍着胸口，此举一部分是表示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过（想起悔过日），一部分是为把抑郁胸中的笑全部抒发出来，就这样，我为自己的笑向大家多次致歉，也许每次都显得分外真诚，但其间我又屡屡笑起来，令人费解。自然连董事长也糊涂，与生俱来的感觉使他认为该竭尽全力恢复一切，他随便说了一句，为我的号叫作了个合乎人情的解释，现在我想起，那和他很久之前闹的笑话有关。胜利了，我第一个大笑着却又倍感不幸地踉踉跄跄跑出房间——这事是通过我后来立即写给董事长的一封信，通过跟我很熟的董事长的公子转达我的歉意，而最终大部分则是随着时间流逝才宣告平息的，自然我没有也永远不会获得彻底谅解。可是没关系，也许我当时那样做只是为了以后可向你证明我会笑。

现在——对董事长犯下的老罪过又遭新报应了——我写了许多却言之无物。睡觉之前再最后匆匆回答你的问题：勃罗德的《感情之巅》自然属于你，完全属于你。献辞《作为朋友》是为你而作，你不接受吗（我当然还有一份献辞）？如果这献辞还可能有其他小小的含义（实际没有，但现在我赋予它），也就是说，马克斯也是我的朋友，因此这份献辞让我有了靠近你的可能（我要充分利用想象中的靠近你的可能了），这样的话，你会不高兴吗？

不，已经太晚了，不能再写了。附上一枚今晚散步时拾到的赫勒。当时我正为某些事抱怨连天（没有我不能抱怨的事），怨气之中，我比平时更使劲地踢着什么，用脚尖把这枚赫勒从石板上踢了起来。这样的赫勒带来好运，可我不需要，而你也没有，所以我把它送给你。现在是我发现了这枚赫勒，如果是你发现的，你不是也会寄给我的吗？

弗兰茨

〔19〕12.1.8—9

〔1913年1月8日—9日〕

我最亲爱的人，今天只写几句话，很晚了，而且我很累，下午没能

好好休息，也许今后几天都是这样。这将一个星期，或许更长一点时间不能写作，因为我要丝毫不受干扰地写作（目前它过多地受到了来自内心的干扰），长时间的睡眠将是唯一的补偿，但这对我来说还不够。不过我今天写的都不算数，因为我现在绝对应该去睡觉，但毫无疑问我又是属于你的，于是我徘徊在你们两者中间。

我可怜的、最亲爱的人居然写报价信！尽管我不是买主且惧怕口授记录机，却也得到了一封。在我看来，一架机器以其无声然而严肃的要求给劳动者造成的压力比人更强大、更残酷。一个活生生的打字员是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易于控制、打发、震慑和责骂，那么轻易就可以向他打听事情，让他赞叹不已，发出命令的人就是主人，然而在口授记录机面前，他失去了尊严，成了一个必须用头脑操作嗡嗡作响机器的工厂工人。怎样才能迫使那些可怜的、天生缓慢运转的头脑接受这一连串思想呀！高兴起来吧，最亲爱的，因为你无须在报价信里回答这个不容反驳的异议；至于机器的运转易于调整，且若人们没有兴趣口述命令，可把它弃之一边等等理由都不能反驳这个异议，因为提出异议的人有一个特点，即任何东西都不能让他改变己见。我注意到你的介绍材料上措词不卑不亢，没有乞求的意味，而奥地利工厂的广告，至少是此类广告却不然，另外，你的广告里也没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不是说笑，你的广告让我想起了斯特林堡，当然不是因为广告的措词，也不是因为它的产品和风格。我几乎不认识施特林特贝格，但对他我一直情有独钟；更加奇怪的是，正因为我在最初的几封信里提到了死人舞蹈和哥特式房间给我的印象，我才赢得了你的心。

你等着，下次我一定告诉你有关《回忆斯特林堡》的情况，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新周报》上^[76]，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完全被震撼了，我发疯似的在屋里跑来跑去。

明天或后天你将收到日历和福楼拜。日历我现在才收到，可惜与我的想象差距甚远。我曾打算每天撕下一张，叠起来并给你寄去，看来这不太合适。但现在日历有了，且由于我不愿将计划中给你的东西给别人或让别人看，我还是把它寄给你。请把它挂在角落里！它的难看使福楼拜相对美丽，我曾非常想（无须申明！）亲手将其放入你手中。

好吧，现在我要跌跌撞撞去睡觉了，这个词是有意说给你听的，把你的思绪牵向我这边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是否因为给我写信而特别辛苦，最亲爱的？其实你只写一行字我已非常高兴，以至于五行字可令我忘乎所以。

弗兰茨

[19] 13.1.10—11

[可能是1913年1月9至10日]

最亲爱的，首先请你不要因为信写得太少而自责。其实就你仅有的那点时间来说，你写得太多了，太多了。

只要你一如既往坚持每天写信，那么在写信这方面我便别无他求了，因为其他愿望目前或者说永远都不可能得以满足，这样就可以了，尽管不是最佳状态。

和亲友们说完话我就坐在桌前给你写信，这让我很不安，因为以前我总是先写作，而当我提笔给你写信时，无论幸与不幸，我都已处在更高级状态中。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星期一我该重新开始写作了。我有很多故事要写，最亲爱的，它们都呼之欲出呢！

但有时我以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悲伤为借口，其中经历了两次订婚——马克斯和我妹妹的——就是一个不小的原因。今天我躺在床上向你发表了一个长长的、抱怨这两个订婚的演讲，你一定会觉得我的演讲有道理，但我现在回忆不起下午说的一切，还是算了的好。你不知道，我躺在床上要对你发表什么样的讲话呀！我仰面朝天，脚抵床杆，为了我最亲爱的听众，我是怎样轻声地劝自己呀！我们的天赋如此迥异，我是躺在床上的大演说家，而你是坐在床上的写信专家。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你从未向我描述过你如何在床上写信。

这两个订婚没一个让我满意，但我却为马克斯的订婚出了不少主意，也许有一些还被采纳，我妹妹的订婚至少我也从未劝她放弃。另外，我是一个糟糕的预言家，且很不会看人，这通过艾莉——我已婚的妹妹——的婚姻得以证实。她订婚时我同样觉得前景暗淡，因为我的妹妹以前是那么笨，从不能令人满意，总是闷闷不乐、急急忙忙地做一切事情，而现在，她的婚姻很幸福，她的存在已在形式上扩展到两个孩子身上[77]。尽管如此，我不能怀疑自己鉴别人的能力，因为它不觉与事实相悖，反而还非常有道理，虽然也许我以此赋予了这所谓的鉴别人的能力一个暗藏愚蠢的假象。为什么我不能忍受这些订婚的方式这样特

别，好像我马上就要遭受不幸似的，其实每个预料都只与未来有关，而主要的参与者们自己都出乎意料地高兴（难道是这个“出乎意料”刺痛了我？），更何况我压根就不参加此类订婚和结婚活动（昨天晚上我未来的妹夫毫无恶意的、并未影射我不参加他们的订婚仪式的无礼行为，只是无意间开玩笑似的对我说：“晚上好，弗兰茨！身体好吗？在家里都干了些什么呀？”唉，只要人们存心，那么说话的方式也是意味深长的）。

其实我参加了，我感到两个陌生的家庭向我涌来，我妹夫的家庭甚至闯入了我自己的家中——

不，今天我不再写这些了，眼下它并不十分让人信服，也许你能猜到我大体的想法，但具体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远方的你可惜就不能理会了。

你读这信的时候，也许我正身穿旧燕尾服，足蹬开了缝的漆皮靴，头顶过小的圆筒帽，带着一张异常惨白的脸（因为现在我需要很长时间方能入睡），作为男傧相和一位怡人、美丽、高雅、特别温柔体贴又十分谦虚的表妹一起乘车去那将要举行一个隆重婚礼的教堂。这种婚礼总令我不安，因为按照犹太习俗，至少在我们这里宗教仪式只限于举行婚礼和葬礼，由此这两件事变得如此靠近，人们简直可以看见一个正渐渐消逝的信仰的惩罚目光。

晚安，我最亲爱的人。我真是太高兴了，因为至少有一次你的星期天毫无疑问过得比我的宁静。你的母亲把这封信交给你的时候又说了些什么？

弗兰茨

〔19〕13.1.10—11

〔又及〕我又看了一遍你的信，其中有些引起我的好奇心，所以我提出下列问题：

一、“我还未取下项链上的装饰盒”是什么意思？

二、你曾在哪个朋友家？天知道这是哪一家，姓名可以使我明白一切。

三、在私家游泳池玩得怎样？这里有一句话我不能说（是关于我在

游泳池的形象的，有关我的瘦弱）。

〔“异常苍白”在下面几行中被划去。〕这就是卖弄风情，我和平常完全一样，和8月份那时一样。

在泳池，我看上去像个孤儿。曾经有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在易北河畔的一个避暑胜地，那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河边浴场是绝好的去处。但浴场很小，男人、女人都混在一起，我现在根本记不起，那里是否被分为两片。所有在那儿避暑的人都非常风趣，尽情欢愉。我却不行，有时我也鼓足勇气到女人们中去，可这种时候非常少。当然我总想下浴场，而且这种愿望膨胀得毫无限度，但大多数时候我像一只迷途的狗徘徊在河边山丘的羊肠小路上，一连几个小时盯着那小小的浴场，看它是否终于空了些并愿接纳我。我诅咒那些晚来的人，他们又把可能已松快的浴场填了个满；而当异乎寻常的炎热之后下了一阵暴雨，从而夺走我全部的游泳希望时，我悲叹不已，所有人都已享受了游泳的乐趣。我一般在傍晚时分才能游泳，但那时空气已凉爽，乐趣也不大了。有时我也会因灼热的阳光不顾一切地跳进人满为患的浴场。当然，我可以随意游水，和别人一起嬉戏，没有人会注意这个小男孩，但我不愿相信这些。

四、若有机会，我想多听一些有关你父亲的事。

你看，现在又是很晚了。但婚宴上的娱乐活动我还一点都没准备，最可恶的是，我想不出什么，也不愿想。

弗兰茨

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

仅有的问候。

弗·卡

〔明信片邮戳：1913年1月1日，布拉格〕

〔写在边上〕这儿还有一句话：你醒来时，没有吓得浑身是汗吗？

最亲爱的，刚才我绞尽脑汁仅仅为了想出三句至少可以欢迎参加婚

礼的客人的话。终于我想好了三句话，三句话都不关痛痒。是的，如果允许我对客人们发表一番演讲，我根本不需要准备，演讲一定会脱口而出且条理清楚，我敢通过诉说我真实且可怕的感觉将大多数客人赶出大厅，而不是通过咒骂。这样，我也注定要将自己赶出去，那个坐在桌边，站起来，说三句学生用语和举杯的不是我，这一切将由我可悲的躯壳来完成。

其实我根本不想给你写这些，我给你写信原本是由于害怕。听着！我昨天的信里是否写了些会令你不安、伤害了你或甚至委屈了你的言词？这个念头吓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写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写作，所以好像手掌握不了这类东西的分寸。也许我的话里没有恶意，但我写时毕竟情绪很糟，现在看来那是又粗鲁、又冷酷、又肆无忌惮、又无耻。最亲爱的，请为了让我安心无论如何将信寄还与我；不，请不要寄回来。嗨，我简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陷入了怎样的境地呀！我将必须爬很长时间才能重新走出来。要是我能得到你对我上一封信，也就是你星期天收到的那封信的回信该多好啊！信里其中一段也许令你生我的气而从床上跳起来。最亲爱的，如果你生我的气，就请原谅我——就我目前的境地而言，乞求同情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我的处境早已很不光彩；你若已经原谅了我，就请视此信为迟到的道歉；若你根本未觉得我的信有错，就取笑我吧，还有什么比这更令我开心呢！

弗兰茨

〔19〕13.1.11—12

〔又及〕我最小的妹妹的美丽评语：正如你所知，她非常爱我，不假思索地认为一切我所说、所做或我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但她又有那么一点点诙谐的智慧，使她能同时取笑一下我，当然还有她自己（因为她总站在我这边）。毫无疑问，这个婚礼显然令我很悲伤，尽管我的妹妹不言而喻只能体会到极少的一点点，但从她对我的态度来看，她一定会觉得我的悲伤有道理。今天晚上，我们的女管家在为瓦莉（结婚的那个）收拾东西时哭了起来，引得瓦莉也哭了；她带着哭肿的眼睛跑进起居室，奥特拉（就是那个最小的妹妹）几乎还没看见瓦莉哭肿的眼睛就叫了起来：“她是聪明的，她也哭了！”这话说得半认真半玩笑，意思是哭得很是时候，因为这与我的情绪相符，而瓦莉之所以聪明，是因为她凭着自己的感觉做了些符合我心情的事情。

现在我去睡觉，我不愿明天也睡过头。

第一眼看见那个从开罗来的男人时我吓了一跳。他肯定是十足的德国人，但我把他看成阿拉伯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室，他穿着舞动的袍子在后面追我。你的写字桌旁有我的座位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样一位远方的人更愿做你们工厂的守夜人。

我最亲爱的孩子，婚礼已结束，前景将更加美好，一种相对而言的满足感油然而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摆脱了陌生的人群，若真能这样，那么怎样的牺牲都不能算大，即便是为我妹妹牺牲自己。当然你不能这样想，你也不会想到确有与这种感觉相符的事实存在，但这种感觉是赶不走的。

收到你的信、明信片 and 照片时，我正站在参加婚礼的人群中，当时我们正准备出发，我觉得像是你在握我的手。

最亲爱的人啊，你的照片使我获得了怎样朝思暮想的快乐呀！每张照片都展现我最亲爱的人，每张又都不一样，所有的照片都紧紧地扣住我的心弦。这些照片中的你很像你寄给我的第一张照片中的那个小姑娘。你静静地坐在那里，左手完全闲着，却又让人握不住，你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那仿佛是人们为了亲吻你的嘴唇而精选出来的照片。你是在办公室拍的照片吗？不同的相机接口有什么不同？这张照片是否要用作广告？或者用作明信片？难道不是吗？

最亲爱的，若你今天看见我在婚礼上的情形，你会对我说些什么？和我想的一样，一切都平平淡淡，唯一令我惊喜的是婚礼真的结束了。但我没料到自己重又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垂头丧气的境地，在那里，我远远不及所有客人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位，对此，我始料未及。我曾想，此类境地已永远属于传说时代而与我无关。但现在它们再次出现，清新如一长串永无止境的日子中的第一天。只有后来当我独自在咖啡厅待了一会儿并看了道米尔的四张照片（屠夫、音乐会、评论家、收藏家）后，我才总算勉强重新回过神来。

弗兰茨

〔19〕13.1.12—13

你没有因我星期天的信而生气，我最亲爱的菲莉斯，而且，居然你

十分疲倦且特别需要午睡，你还是为我牺牲了一部分午睡时间。至少你睡得很熟、很好吧？不过你根本没溜冰？没散步？当然你也没时间看书。在你认识我这个以你的书信为生、靠你的书信而活的人之前，你一定把时间分配得更好。告诉我，最亲爱的，以前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要说实话！有关你在写了第一封信后就一直收到很多杂志，你还没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有关婚礼我宁愿什么都不写，若一定要我描写那些新的亲戚和他们的朋友们，那将会把我送回我已摆脱的时日里去。我的堂妹叫玛尔塔，她具有一些好的品质，其中之一是简朴，但只有我一人注意到。我的父母（我不能抵制诱惑，在这里我要说“我可怜的父母”）居然很心疼地花了那么多钱，但还是为婚礼的隆重倍感欣喜。每顿饭后我父亲都要坐在摇椅里睡一会儿，之后他总是去商店（心脏病不允许他在饭后躺下来）。今天他又坐在摇椅里，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我刚吃了午饭），半梦半醒之间他忽然说：“有人告诉我，昨天瓦莉穿着婚纱时看上去像一位侯爵夫人。”他是用捷克语说这话的，所有的怜爱、赞叹和温柔都凝聚在knězna一词中，而“侯爵夫人”一词丝毫体现不出，因为这个词是专为形容华贵和排场而设置的。

最亲爱的，你有点误会我妹夫的话了。如果存在一丝评论你的来信的可能，那么不可否认他的话含有某种恶意。但现在恰恰是他对你的信一无所知，因此可以排除这种关联。大家可以对我妹夫的潜台词[78]作出的唯一但尚不存在的解释是：他想说我很少顾家，仿佛我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而与家庭只有书信往来。他连我真正的故乡在哪里都不知道。

弗兰茨

[19] 13.1.13—14

最亲爱的，写着写着就又很晚了，我总是在深夜2点钟左右想起那位中国学者[79]。可惜，可惜唤醒我的不是女友，而是信，是我要写给她的信。有一次你写道，当我写作的时候，你愿坐在我身边；你只要想想就会知道，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写作（即便不是那样，我也写不了太多），但那样我根本无法写作。写作就是敞开心扉直至超越极限，外在的坦诚与献身使人们以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失去了自己，而且只要他还拥有理智，那么面对坦诚与献身他一定会望而却步——因为一个人只要

活着，他就要生活——因此，这种坦诚与献身对写作来说远远不够。从这个表面现象里被吸收到写作中的——若没有别的情况发生且深泉干涸——是虚无的东西，它将在真实感情震撼其上层土地的那一瞬间崩溃。因此当一个人写作的时候，无论怎么让他一个人独处他也不会满意，当一个人写作的时候，他的四周无论怎么安静他也觉得不够，夜晚还嫌不晚。因此，他的时间总是不够，因为路是那样长，而且很容易迷路，有时他甚至会害怕，并在没有强制力和诱惑的情况下有了往回跑的欲望（一个以后不断遭重罚的欲望），就像从前当一个人意外地得到了他最亲爱的人的吻似的。我经常想，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即带着我的书写工具和台灯住在一个大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有人给我送饭，饭只需放在距我房间很远的地窖最外层的门边。我身着睡衣，穿过一道道地窖拱顶去取饭的过程就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回到桌边，慢慢地边想边吃，之后又立即开始写作。那时我将会写出些什么来！我会从怎样的深处将它们挖掘出来，毫不费劲！因为表面的精力集中并不等于使劲。只是，也许我不能长期这样干，我将在遇到第一个在这种状态下也许不可避免的挫折时精神发生错乱。你觉得呢，最亲爱的？请不要不理睬我这个地窖居民！

弗兰茨

〔19〕13.1.14—15

今天比较早，但我也很快就要睡觉，因为昨天写得较顺利，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天的头痛（这头痛是近两个月的产物，不是1913年才开始的）和被梦魇搅毁的睡眠。我已经很久没能接连两个晚上好好工作了。这是怎样一部在毫无规律的工作时间里写下的小说！这是怎样一项艰难的、也许完不成的工作呀，也许写完第一部分之后不可能再留有后半生时间来写完死亡的章节。小说里肯定有许多不实之处，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予这方面的帮助。

尽管昨天我一直想着，但还是忘了问，你星期天晚上的信中写道，你的背疼了一天，你感觉不很舒服，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在你本可以休息的星期天你也感觉不舒服吗？这还是我那健康的姑娘吗？这还是我那理智的姑娘吗？为什么整个星期天（从信中看来是如此）在家里与阿姨一起度过，而没去户外呼吸冬天洁净的空气？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最亲爱的，告诉我真实情况！我仿佛总是听见你母亲的责骂声：“这把你毁了！”但她若仅仅考虑到写信的因素——联系起来想想，她可能就是指写

信——那么这一次她就不对了。对我来说，只要我最亲爱的人给我写五行字我就很满足——请在你母亲午睡的时候把我的话告诉她，让她安心——五行字虽说是很高的要求，却不致搞垮一个人的健康。可是，若那最亲爱的人总是写长长的信，那肯定是这样。可这不是我的错，妈妈，我打心眼里也要为此责备她。也许你的母亲不是指写信的事——那么我自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曾答应告诉我，为什么你不放弃或至少不能缩减在教授处的工作。你到底怎么到教授那儿去的？

我还要给你写有关我妹夫的事，还有马克斯和略维的事。其实我根本无所谓写谁，真正意义在于我每写一个字都觉得触摸到你，最亲爱的。这里并没有演“秘密爱情”，但我们那只新来的金丝雀却在这夜晚（尽管雀笼被布蒙着）开始了一曲悲歌。

弗兰茨

〔19〕13.1.15—16

我现在就给你写信，因为不知道今晚我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且有多么疲倦。你只要想一想，我今天晚上——一个月以来，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时刻一步步临近——不在家。我现在就已后悔，若今晚有一刻钟的时间不令我后悔，我就满足了。布贝尔要作一个有关犹太神话的报告[80]；仅是布贝尔肯定不会让我离开我的房间，我早已听过他的报告，他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相当乏味，他所说的一切都欠缺什么（当然，他也懂很多东西，他懂中国故事）。

（正巧我手边没有吸墨水纸，我一边等纸干，一边看放在旁边的《教育》中的《感情篇》，第600页至第602页。天哪！你看，最亲爱的，你看这句话：“她承认，她希望在大街上能依偎在他怀中。”这是什么句子呀！这是什么形象呀！被撕去的那几页并不意味着无力的黑夜，最亲爱的。他恰巧完全投入到那几页中并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在第三个记录里，他经历了无尽的幸福，正如你在书的附录里读到的一样。）

〔接着第一段括弧的内容〕（他，布贝尔，出版了《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一书，据我所知，这些故事精彩绝伦[81]。）布贝尔之后有艾索德的朗诵，我是因为她才去。你听过她的朗诵吗？我看过她演的奥菲莉娅和《每个人》[82]中的信徒。她的气质和声音吸引了我[83]。很可能

我在布贝尔作完报告后才入场。

最亲爱的，我又想起了星期天信中的那句话，虽然无益，但我必须重提旧话，那句话很令人反感，不是吗？不，不会只你一人这样看。告诉我，一个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最亲爱的，我再次请求你原谅我，把一切都说出来，不要把任何对我的不满埋藏在心里，请再次明确地告诉我，你原谅了我，用墨水把那句话抹掉，写信告诉我，你已经原谅我了。我将松一口气。我当时撞见什么鬼了，写下这种话！

想想看，菲莉斯，3点已过。我看到很多，听到一些，但没有什么值得我放弃香甜的睡眠。晚安，我最亲爱的。当你静静入睡的时候，那个属于你的人还在远方游荡。你喜欢此类照片吗？随信附上的照片中那个站在角落里没穿衣服的就是奥特拉。

弗兰茨

〔19〕13.1.16，星期四下午

〔又及，写在边上〕这张照片我还要收回，它是我从奥特拉处偷来的。

最亲爱的，我又一次度过了一小时愉快的阅读时光，已经很久没体会过这种心情了。你一辈子也猜不到我看的是什么书，是什么让我如此高兴。那是一本1863年的《园亭》杂志合订本。我没有细细地看，只是慢慢将二百页厚的书浏览了一遍，看其中的照片（当时由于翻印照片很贵，杂志上照片很少），有时也看一些特别有趣的文章。这本书总是把我带回旧日时光，那真是一种享受，它让我从拗口的、但仍能使人完全理解的措词（我的天呀，1863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中了解当时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思维方式，遗憾的是我不能细细体会这一切，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随心所欲地剖析它们，——对我来说，这种充满矛盾的感受难以用文字形容。我总喜欢读旧报纸和杂志，特别是上世纪中期出版保存下来的、深入人心的《德国》杂志！它与读者紧密相连，就在读者的身边，人人之间都心有灵犀，出版者和订阅者，作家和读者，读者和时代的伟大诗人都心心相印（乌兰德、让·保尔、索伊默、吕克特、《德国行吟诗人和印度教祭司》）。

今天我一点也没写，一旦我把书放到一边，因未写作而产生的不安就像恶神一样准时侵袭我。只有一个善神可以驱逐这个恶神，前者必须

紧靠我身边，用有分量的话向我保证，一个晚上只字未写——即便是不好的也没有——并非不可弥补（确实如此，但这些话必须出自那张在星期日上午讥笑这几行字且让我完全信任的嘴巴）。另外，我的写作能力尽管值得怀疑，但不会如我一人在桌边（在有暖气的起居屋室，这个家庭主妇！）异常担心的那样，因浪费一个夜晚而丧失。我太累了，不能写作（其实并非很累，但我担心会太累，现在已经1点了），昨天我3点才回到家，那种时候居然还很久才入睡，后来我那异常警觉的耳朵又听见了5点时的敲钟声，这绝对不是钟的错。明天又有一个新的、但早已安排好的干扰，明天晚上我要去剧院——是的，这是真的。娱乐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但在这之后将停止很长时间。我差不多已一年没去剧院，以后我还会有一年之久不去，但明天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两年前我曾看过一次，近几个月我一直盼望这场演出，特别想看看那个任性的舞蹈演员爱德华多娃^[84]。这次她没来，可能她只是次要角色，那个大舞蹈家卡萨维娜也没来，她病了，令我很失望，但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看。你曾在信里提及俄罗斯芭蕾舞团，说在办公室人们曾就此进行过辩论。当时是怎么回事？你跳的探戈怎么样？是叫这名字吗？是一种墨西哥舞蹈吗？怎么没有有关这种舞蹈的画片？比俄罗斯人的舞蹈和个别舞蹈演员的个别动作更美的舞蹈我只在达克罗兹^[85]见过。你观看过他的学校在柏林的演出吗？我想，他们经常在那儿跳舞。

可我怎么不会不去睡觉而谈论这些舞蹈演员呢？临睡之前，菲莉斯，我要让你的头靠在我的胸口，它比你想象的更需要你。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许多问题要回答你，但要说的话比咱们之间的距离还要多，还要难，两者看来都是不可克服的。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如果你的母亲在给你此信的时候意外地说了些友好的话，那么事情将会怎样？不过，也许这是不可能的，这封信不应得到友善，可能它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尽管在这世界上它别无他求，只要能到你的手中，它就心满意足了。

弗兰茨

〔19〕13.1.17—18

〔又及〕刚才我写收信人地址的时候错将你的门牌号码写成了我的，我周围的七张空沙发都亲眼目睹此事。

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母亲晚上待在起居室，而你的父亲却在卧房看

书？你母亲一人在起居室做什么？

还有一件事。你夏天和冬天的工作时间是否不同，因为你写到，夏天你总是星期五下午去教堂（近几年来我只去过两次教堂——都是因为我的妹妹们结婚）。我猜想，你因为怕老鼠闹了笑话。真有老鼠吗？可怜的孩子！

3点半回到了家。早上好，祝你也祝我！

弗·卡

〔明信片邮戳：13.1.19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不，你的上上封信不应该那样写。虽然你在今天的信中说要涂去那些话，但它们毕竟存在过，且我二十四小时以来一直想着那些话。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读那些话的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有多软弱，多可怜，在那一刻我是多么茫然。即便是今天，已是第四天我只字未写，我也没有如此痛苦。你一定知道的，最亲爱的，否则我不会感到你我如此接近，但我还是要特意写下来：当我看完你昨天的来信时对自己说：“那些话不是菲莉斯的意思，她一定比其他人更认为你好，你真诚、自信，你以此满足吧。若你不能令她满意，那么你还能令谁满意呢？而且你当时所写和现在菲莉斯的答复，其实都是你的肺腑之言。你需要一个地窖，即使今天在你看来它永不会给你带来益处^[86]。菲莉斯没有看出这个必要性吗？难道她看不出来？难道她不知道你不善和太多的人及物打交道？难道她不知道，即使你住在地窖，那个地窖也毫无条件地属于她（在此必须承认，再没有什么比只占有一个地窖更令人悲伤的事了）？最亲爱的，我最亲爱的人，难道这一切你都不知道？但最亲爱的，如果事实如此，我将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即使一切如梦中所想一样顺利。越是一切顺利，痛苦就越大。我允许自己这样做吗？即使我的自卫意识命令我，我可以这样做吗？有时不可能性会像波浪一样压过可能性。

最亲爱的，不要低估那位中国妇女^[87]的坚强！直到凌晨——我不知道书中是否注明了钟点——她一直醒着躺在床上，灯光令她难以入睡，但她一声不吭躺着，也许试图用目光把学者从书本中拉出来，然而这个可怜的，那么忠实于她的男人没有觉察到这一切。天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察觉，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更高一层意义来说，所有理由都听命于她，只听命于她一人。终于她忍受不住，把灯从他身边拿

开，其实这样做完全正确，有助于他的健康，但愿无损于他的研究工作，加深他们的爱情；这样，一首美丽的诗歌就应运而生了，但归根结底，不过是那个妇人自欺欺人而已。

最亲爱的，让我靠近你的身旁，留住我，不要迷惑，岁月把我抛来抛去，你要知道，从我这里你永远得不到纯粹的快乐，恰恰相反，纯粹的痛苦倒是要多少有多少，但尽管如此——请不要让我走。联系你我的不仅仅是爱情，只有爱情还太少，爱情萌发，来了，走了，又来了，但我必须完完全全融入你的内心，这种必要性始终存在。请你也留下来，最亲爱的，留下来！不要再像你上上封信那样写了。

从星期四晚上至今的这几天我只字未写我的小说，今天也不可能了。下午我必须和马克斯在一起，还有韦尔弗，他明天又要去莱比锡。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欢这个年轻人。昨天我也和布贝尔交谈了，从他个人来说，他生气勃勃、简朴且优秀，看起来和他写的那些温吞吞的东西不相干。昨天晚上俄罗斯人的演出棒极了。尼金斯基和奇雅斯特简直是两个完人，我指的是他们艺术的内涵，和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精通自己的艺术。

然而不管怎样，从明天晚上起我又将会很长时间留在家里，不再出去。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东游西荡给你——我最亲爱的人带来了不安。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正是布贝尔和艾索德的报告晚会后大家聚会的时候，我正在享受难得出一趟家门的乐趣，我把这误认为是乐趣，因而举止特别夸张，特别引人注目。要是我再次坐到桌边写我的小说^[88]多好啊！要是我最亲爱的人已恢复平静并决定再次接受我带给她的、令她一度呆立的不幸多好啊！

弗兰茨

〔19〕13.1.19，星期日下午，痛苦的时刻

〔又及〕你母亲在给你此信时说了一些什么？你父亲在写什么？你们什么时候搬家？你关于《观察》的提问我下次再回答。不是有两天我写作顺利，只有一天。整个星期只有一天！就这样你还阻止我去地窖！

我可怜的最亲爱的人（每当我状态不佳时，我总是说“可怜的最亲爱的人”，并且最希望能让自己满怀不幸投入你的怀抱中，你真正是我可怜的最亲爱的人，你呀），现在我疲惫如一只小鸡回到了家，头脑中除了

睡意一无所有。隔壁房中又有客人，我没有躺下睡觉，如果那样，我便可以在午夜的静谧中起床、吃饭，然后给你写信，写一句美好的，请求原谅（我有什么事要请你原谅吗？最亲爱的？对此我从来都不知道，但总是觉得有），前后连贯一致的话，而是夹着这份嘈杂吃晚饭，我只能这样做，然后如有可能，我将很快在10点以前上床睡觉。

现在我又求救于你，起床给你写信。隔壁屋里妹妹和一个堂姐在说她们的孩子，母亲和奥特拉也不时插话，父亲、妹夫和堂姐夫在玩纸牌，哄堂大笑声、嘲笑声、叫喊声和扔纸牌声交错更迭，只有我父亲模仿他的外孙时这些声音才得以中断；而那只金丝雀的歌唱声压住了所有的声音，这只雏雀是瓦莉的，暂时寄养在我们这里，还分不清白天和黑夜。

星期日过得糟透了，我很不满意，隔壁屋里的噪音正是一个合适的结束曲。明天又要去上班，上周六我在那儿经历了一些特别不愉快的事情，另外还有那些永无止境的日常琐事，只要明天一踏进办公室，它们还将继续下去。离明天晚上还有那么长时间！最亲爱的，我特别想知道你在办公室工作的情形（为什么我收不到你的报价信？这些信的结果如何？）。那个把你接去厂房的师傅有什么事情？人们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克莱因家的人问你什么？你有哪些销售渠道？哈尔斯泰因先生是什么人？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公共留声机沙龙已经成立了吗？如果还没有，你准备什么时候办这事？除此之外，我还想给你的生意出个主意。饭店应为客人们准备一台口授记录机，这和电话机一样必要，你不觉得吗？试一试这条路子！如果获得成功，我会多么自豪。那样，我还会突然想出一千个别的主意。既然我可以坐在你的办公室里，难道我不应该这样做吗？如果我白天将脑袋靠在你的肩上，晚上想起一个小小的、可能很好笑或早已付诸实践的主意，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弗兰茨

[19] 13.1.19

最亲爱的，白天布拉格与柏林的距离与实际相符，可是大约晚上9点开始，这一距离就延伸开去，延伸得令人难以想象。不过，我却在晚上更容易判断你在做什么。你吃饭，喝茶，与母亲聊天，然后上床，摆出殉道者的姿势给我写信，最后安然入睡（但愿是这样）。茶对你身体有益吗？它不使你兴奋吗？你居然每天晚上喝这种让人兴奋的饮料！我

从不想吃喝那些饭菜饮料，迫不得已时也只好为之，我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们所想。我宁愿吃这些东西。若我和十位熟人围坐在桌边，所有人都喝黑咖啡，看到这一切我便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放在一旁的肉热气腾腾，一杯杯啤酒会被我大口喝干，多汁的犹太香肠（至少在布拉格这种香肠很普遍，圆圆的像水老鼠）可以让在座的亲友们分而食之（香肠皮很紧，切的时候吱吱作响，这种声音我自打小时候就听惯了）——所有这些，还有很多更恼火的事情都不会引起我的反感，正相反，它们让我觉得很舒服。这绝对不是幸灾乐祸（我甚至不相信有害食物的绝对有害，假如一个人受了香肠味的诱惑却不听其自然，那他简直是个傻瓜），更多的是平静，不掺丝毫嫉妒地平静地欣赏别人的好兴致，同时惊叹于离我最近的亲友和熟人竟拥有令我难以置信的口味。不过，这一切与我的担心没有根本联系，特别是当你由于开票员生病白天工作很繁重时，菜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至少它令你不能安安稳稳睡觉，而你又是那么需要睡眠。通常我也爱喝茶，我正沉浸在你所描述的你妹妹晚餐的氛围之中。你能不能以牛奶代替茶？就像你那时许诺父母的那样，若我没记错的话。正如你自己承认的那样，办公室的饭菜也不好。你难道上午和下午什么都不吃？

真奇怪，你居然买了布贝尔的书[89]，你定期买书还是根据心情好坏买书？你竟买了一本这么贵的书？我对这本书的了解只限于读过一篇详尽的评论，那里引用了很多原文。至于它不知为什么让人想起卡萨洛娃，我简直无法想象。你还写道“他的”方式，难道是译文吗？抑或是恰如其分的分工？这让我难以接受他的传奇作品[90]。

是的，一个月来韦尔夫一直在这里。他确实是一个好懒汉，他从莱比锡来到布拉格已有一月。他在这里公开作过报告。那是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我宁愿让别人把我埋葬也没兴致走出家门。

很高兴你喜欢奥特拉。你说得很对，她确实很高大，这来自我父亲方面的遗传，那个家族的人都很高大强壮。另一个没穿衣服的是瓦莉，你可能没认出来。

晚安，最亲爱的。很晚了，金丝雀在我背后不停地唱着悲伤的歌。

弗兰茨

最亲爱的，我要一再感谢你的来信。在此之前，我莫名地感到如此悲伤。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我最反复无常。我不仅仅永远爱你，我的爱比永远还永远，因为你不害怕我的反复无常。你的阿姨克拉拉的例子对今天来说正合适，我也是那样或者类似。唯一不同的是，我不是那个姨妈，姨妈的行为人们可以忍受。今天早上起床之前，我因为没有睡安稳很悲伤，以至出于悲伤我不是想把自己扔出窗外（这对于我的悲伤来说显得太快乐了），而是倒出窗外。

现在我收到了你的信，最亲爱的，我赶紧给你提一个建议，即我们以后不要再为什么事情生气，因为我们两个是无辜的。彼此相距这么遥远，永远去克服这段距离是折磨人的，有时候我们会松懈，一时不能控制自己。另外还有我虚弱的体质，它只知道三种情况：拼命写作，消瘦和久病不起。这三种可能的交替组合构成了我的一生。可怜的、最亲爱的人，你敢于闯入这样的生活真是值得钦佩。纵观我三十年来的生活我可以说，我完完全全属于你。

弗兰茨

〔19〕13.1.21下午2点半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我可怜的最亲爱的人，如果说这首中国诗^[91]对咱俩的意义很大，那么我倒有一件事要问你。你是否注意到，这首诗是说学者的女友而不是他妻子，尽管这位学者肯定上了年纪，博学和年纪这两样看来与和女朋友相处这一事实相矛盾。但诗人却义无反顾追求最后的结局，忽视了不可信的一面。难道因为他宁愿要不可信性而不要不可能性吗？他可能害怕如果不这样写，那么学者与其妻类似的对立会剥夺诗歌的明快，而留给读者的只是对诗中妻子悲叹的同情。诗中的女友很顺利，这次灯真的熄了，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她心中充满乐趣。如果这是学者的妻子，且那个夜晚不是某个偶然的夜晚，而是代表所有夜晚，这样当然也就不仅仅是所有夜晚，而是代表整个共同的生活，是围绕灯而斗争的生活，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哪位读者还笑得出？诗中的女友因此显得无理，因为这次她胜利了，而且除了这一次胜利她什么都不要；但也因为她的美丽，她只要求一次胜利，且一个学者从不会一次就被征服，因此即便是最严厉的读者也原谅她。相反，一个妻子总是有道理的，她要求的不是胜利，而是她的存在，这是她的丈夫因读书所不能给她的，即便也许他只是假装在看书，而白天、黑夜除了他胜过一切、却以他与生

俱来的无能爱着的妻子外什么都不想。在此，女友的目光一定比妻子的更为敏锐，她没有完全陷入其中，而是头脑清醒。妻子呢，她本身是可怜的、不幸的生物，她盲目地斗争着；她看不见眼前的一切，冥冥中觉得有一堵墙，那里拴着一根绳，人们可以从绳子下爬过去。至少我父母的婚姻中是这样，尽管这个中的原因与中国诗中的完全不一样。

并非我的诗集中每首中国诗都像这首似的对学者持善意态度，只是在情况类似的诗中他被称为“学者”，别的时候他叫做“书呆子”，与“无畏的旅行者”——一个战胜了危险山民的战争英雄——形成对比。等待英雄的是他的妻子，尽管她不安，但一看见他就特别高兴，他们相互凝望，像互相爱恋且可以互相爱恋的忠诚的人一样，那里没有女友出于好意和内心强迫而注视学者的尴尬目光，等候着的还有孩子们，他们围着归来的父亲欢呼雀跃，而“书呆子”的屋子空空荡荡，那里没有孩子。

最亲爱的，我从未想到这是一首那么可怕的诗！它向读者敞开大门，也许人们可以随意践踏它、忽略它，人类生活有很多楼层，而眼睛只能看见一个可能，但心里聚集了所有可能性。你认为呢，最亲爱的？

弗兰茨

〔19〕13.1.21—22

又是两封信，最亲爱的，你不害怕吗？难道你不知道，若我们总是每天写两封信，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就此垮掉，前提当然是我们恰恰现在还没有令人难以相信地垮掉，且很高兴没有人看着我们，因为那样我们会觉得害羞！再说，你昨天的午饭在哪里呢？我徒劳地在字里行间寻找它。你一定没有吃，这真是太糟糕了！寄给我新的查询单！当然，我要参与你做的一切事情。那个内伯勒不满意这个单子？你听着，我们必须狠揍他一顿。等着，今天晚上（现在已经太晚了）我要给你出一个新的主意，它将重振^[92]你的生意。好好的，最亲爱的，我跑着去吃午饭，也同样要求你。

弗兰茨

〔19〕13.1.22

很晚了，最亲爱的，我将一无所成地去睡觉。其实我也不是睡觉，只是做梦。就拿昨天来说，在梦中我跑向一座桥或者一个码头，捡起碰巧放在栏杆上的两个电话听筒，把它们放在耳边并不断要求收听“庞图

斯”的新闻，但电话机里除了一首悲伤、强劲、无言的曲子和海涛声外什么也听不到。我明白了，人的声音不可能穿透这些声音，但我没有放弃，没有离开。

三天来我的小说进展缓慢，我以有限的能力写了这么点东西，也许我的能力只足以去伐木，根本连伐木都不成，最多只能玩玩纸牌。近来（这不是自责，只是自我安慰）我完全脱离了写作，现在我又必须重新钻进去。

最亲爱的，你哭了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对我绝望了。你真的对我绝望吗？不，最亲爱的，请不要这样。我的生活是周期性的，对此你不乏经验。我是在一个固定的、反复出现的地方绊倒并喊叫。不要跳过来（你能看清我的书写吗？一个迟到的问题），不要让自己迷惘，我已经又站直了，我总是这样。不要哭，最亲爱的！即使你什么都没写我也应该知道的，你哭过了。我就像一个印第安人对待他的敌人那样折磨你，也许昨天的那封信也有责任。饶恕我，最亲爱的，饶恕我！最亲爱的，私下里你也许认为，与你相比情绪变化无常的我，出于对你的爱，应该能够控制自己。是的，但最亲爱的，你可想到也许我已经这样做过了吗？而且竭尽我毫无疑问很可笑的全部力量？

现在我是该去睡觉还是在此之前给你的生意出主意呢？不，我还是要写，因为不能实施这些想法的每一天都是可惜的。看看，我进步有多快。不久前我建议你办一个音乐沙龙，事实证明，多年来柏林一直有两个音乐沙龙（若每一个较大的城市都有一个音乐沙龙就没什么意思了）。然后我给你出了个有关饭店的主意，后来发现，首先那主意不好，其次已过时。不管怎样，人们在半年前才尝试过此法；也许我今天的建议人们在三个月前才实行，如此，我渐渐接近了现实。

顺便提一句，有关饭店的希望不应就此放弃，作为一个勤勉的商人应在半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尝试一次。没有几个饭店买口授记录机吗？也许为个别饭店无偿提供口授记录机并以此迫使别的饭店购买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饭店间的竞争通常非常激烈。

我的新主意是：

一、建立一个打字机办公室，在那里将林特施特罗姆生产的口授记录机里的记录以成本价格，或为打开销路初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转换为

打字文件。如果你们为此与一个生产打字机的工厂建立起联系，也许这一切会更便宜，工厂出于广告和竞争目的一定会提供优惠条件。

二、发明一种投币后才记录的口授记录机（给工厂师傅下命令，最亲爱的！），这种口授记录机将像现今的自动售货机、小电影机^[93]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一样随处可见。每台机器上像邮筒似的标明钟点，告诉人们记录何时转换为打字文件，何时交付邮局。我仿佛已经看见林特施特罗姆股份公司的小汽车在回收口授记录机用过的滚筒并带来新的。

三、与帝国邮政局建立联系，在所有较大的邮局安装这种口授记录机。

四、另外，这种机器还应安装在所有人们虽有时间且需要写东西，却没有必需的安静和舒适环境的地方，例如在火车车厢里，在轮船上，在齐佩林飞船上，在电车里（如果是去教授那里）。在你的饭店民意调查里你有没有特别想到那些避暑旅馆？在那里，因惦记着生意而坐立不安的商人们可能会包围口授记录机。

五、要在电话与口授记录机之间发明一种连接物，这应不是很困难。相信后天你就会告诉我成功了。这毫无疑问对编辑部、通讯办公室等有巨大意义。更难一些，但也许能做到的是建立留声机与电话的联系。之所以更难是因为人们根本听不懂留声机，而口授记录机不要求清晰的发音。建立留声机与电话的联系的意义不如前者重大及普遍，只有对我这种畏惧电话的人来说是一种解脱。但我们这种人也同样害怕留声机，根本无药可救。另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即在柏林有一个口授记录机连在电话上，在布拉格是一个留声机，两者进行一个小小的对话。最亲爱的，无论如何一定要发明口授记录机与电话的连接物。

唉，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为你的生意牺牲了夜晚。详详细细答复我，但不要一次说完，否则我会被一个个主意淹没。不要每天写两封信，最亲爱的！要按时吃午饭！平静些！不要哭！不要绝望！把我当作一个傻瓜，他的傻气在窘况中还看不出！现在郑重说声“晚安”，吻你，因为爱情我无药可救。

弗兰茨

没有，没有，一整天什么都没有。11点之前，我每隔一刻钟就在走廊奔跑一圈，查看每个人的手，什么也没有。我想，可能寄到家里了，回到家，还是没有。而且这恰恰发生在我们的小船有一丝摇晃的时候，当然是我的过错，你是彻底被折磨的、最可爱的姑娘，就是你。

你没有写信意味着什么？发生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你呀，我的贴心人现在竟专横到在柏林生活了一天而不让我知道些许情况。上封信是星期几？星期二中午你最后一次给我写信。晚上你不能写，好；星期三白天你不能写，好；然后你写了，求你，你写了（我以过去时请求你），星期三晚上你写了，明天清早随着第一批邮件我将收到你的信并读到，你不愿离开我，即使你不把我看作人，而当成一个（我的某些信可让人有这种感觉）生病的、变得野蛮的猴子。

有时我会想起你周围的人——克莱因一家，林德纳小姐，你母亲和你妹妹——对咱们书信往来的错误想象。他们一定想象布拉格有那么一位可爱又忠诚的青年，他每天都给菲莉斯写信，只写令人感到亲切和美好的事情，这是菲莉斯应该得到的，没有人会为此感到惊奇。如果他们中有人把窗子打开一点点并在菲莉斯到来之前将信从窗口扔出去，他一定不知道，他经常帮菲莉斯的大忙。

这就是咱们之间的区别，菲莉斯。若我境况不佳（我几乎为自己近来一直这样感到高兴，这是我应得的），那是我的过错；受打击的是我，打击人的又是我，你有一丝一毫的错吗，菲莉斯？

今天我什么都没写，到马克斯家去了，他写信请我去，还当面指责我，说我们之间生疏了，不言而喻是由于我的过失，由于我的生活方式，我一周最多只去他那儿一次，且每次我看上去都像刚从沉睡中被吵醒似的。我该怎么办？我拼命抓牢时间，可时间还是被夺走。星期六我又得去马克斯那儿。他有一种不为情绪所控、即使内心痛苦不安表面也依然快乐的丈夫气质——最亲爱的，但愿明天你出现在可怕的办公室。

弗兰茨

[19] 13.1.23—24

我从未见你像这次生这个克拉拉姨妈的气那样愤怒。太棒了！我太爱你了！显然这个克拉拉阿姨是个怪女人，既然她的这种思路已经定型，她一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省剧院。我不认识你表妹，那次索菲的

婚礼我没参加，不是因为我没时间（那时我只在别人要求我做事情时才没空，这之外我不知道该怎样摆脱不幸，打发过剩的时间），而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我害怕陌生人。当时我站在教堂入口处，后来才知道那个和奥托·勃罗德走在一起的姑娘是个演员，我只记得她当时戴了一顶引人注目但并不漂亮、顶部插满白花的帽子，且姿态傲慢。真可惜我没有参加婚礼！否则也许我会与你的兄弟交谈，且在这本身并不重要的谈话中一定会说到一些能让我今天回忆起来的事情，这会被看作你——素不相识的姐姐——对我之重视的预言。总有预兆出现，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预兆，但我们只有在亲身经历时才能发现。

你为你的饮食作了很好的辩护（当我清早第一遍读你的信时竟想咬一口你夹好的面包，和你争着吃，有可能的话再喝一杯淡淡的柠檬茶，以前我很喜欢喝这种酸酸的茶），但你却不能说服我，最亲爱的。如果说我出于对你极大的爱愿意你吃香肠、肉片和类似食品，因为在我看来那种改革既不美、不好也无益，我却不喜欢你喝这么多茶，特别是有规律地喝茶。但你像所有对毒药习以为常的人一样为此辩护：你说，茶根本不浓，很容易忍受，你母亲交给你此信并称咱们的通信毁了你时，你可能也这样回答她。你没有低估茶的效力？（有关通信我就不说了，因为这即使是毒药，我也会喂你吃，在此我对自己无能为力）也许可以少喝一些。我仿佛已听见你母亲在问：“又有什么新鲜事呀？”我不敢再猜下去。星期天愉快！休息一下！

弗兰茨

〔19〕13.1.24—25

〔又及〕我已结束了此信，时间也已很晚，但还有一些话我必须说：

首先是对你的责备，你没有把为你妹定购的事交给我。我非常自豪地开始读信里相关的地方，越往下读，自豪感越少，直到我从下封信中得知我根本没有希望做此事了，已经让别人做了。你怎能如此让我感到羞愧。你难道不知道，能为你做事的想法正好可使我变得机敏，而且我会迅速无误地将货物寄出吗？为你效劳的喜悦将胜过所有的辛劳千百倍。

我当然很想看那个小家伙的照片，我总得知道我是与谁共同居住在你的项链饰盒里，且是怎样一个小人儿如此有权要求你的吻。邮局又和

我开了一个大玩笑。你星期三在牙医处写的信，星期四下午才到办公室，我星期五早上才得到它，我咒骂邮局，同时沉浸在幸福之中。

告别之前再写一点：你写日记吗？这问题多余，你现在没有时间写日记。但你写过吗？有多长时间？有一次你叙述十五岁时的那次伟大恋爱时曾提及一个记录，后来就再没说过此事。现在真的说晚安了。书信往来真是太美了，结束一封信时没必要像结束一个会谈那样郑重其事地注视对方。想想，我马上还要给一个熟人写信。我将草草而就，相信只要是人的眼睛就一定认不出字来。再次下定决心：我不再继续这封信了，我去睡觉。

弗兰茨

〔再及〕你寄给我的剪报那么少，而我又给你寄了一个这么好的。难道最终你没有丢掉那关于为二十二个乌干达黑人少年行宣福礼的剪报[94]？

星期六1点钟回到家。

你知道吗，最亲爱的，我总是怀着这样的爱和忧虑想起你，仿佛上帝已用最明确的话将你托付与我。

弗兰茨

〔19〕13.1.26

是什么，最亲爱的？是什么驱使你穿过大街小巷？难道你真是今天照片上的姑娘，那个笑意不深不浅、恰如其分、令每个身处困境想获得安宁的人都愿意端详的姑娘？你哭了，是吗？你声称我被你打扰，其实暴露出来的只是我的无能，这你早已在我身上体验过，我怕以后还有足够的机会让你体验它，可怜的人。不过请你坦率告诉我，自从你认识我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请你就在下封信里详细告诉我，在我的信迫使你落泪之前你最近一次哭泣是在什么时候，当然除去个别情况下你生那个愚蠢的姨妈和该打的旅行者的气等等。星期五怎么了，出了什么事？难道我的信中隐含了一些折磨人的东西，而我却不知道？难道以前的一封信里可恶的内容现在才发作？也许根本不是我的原因？那是什么呢？工作太累了？你不是那种没有特定的、一时有影响的原因就迷惑的姑娘。最亲爱的，告诉我！想想看，你是在对自己说！

我的小说呀！前天晚上我宣布自己完全被它战胜。它从我身边逃开，四分五裂，我不再能把握它。我最好还是不要写那些与我不再相关的事情。近来太放松了，以致错误环生，不愿消失。我继续工作的危险比暂时放置工作的危险大。另外，这一周来我睡觉就像在站岗，时时刻刻都受到惊吓。头痛已成规律，轻轻的、时常出现的神经质不停地给我压力，简而言之，我已完全停止工作，并暂定一星期时间除了休息什么也不干，实际上也许会长得多。昨天晚上我没再写作，就已睡得很好，哪天也没有过。假若我知道你也在休息，那么休息对我来说将更美好。

照片中你穿的衣服美极了且做工简洁，下面是什么样的？你是怎样站着或坐着？你的右胳膊没照进去。那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是项链饰盒吗？——照片是怎么照的，你看上去神采奕奕，圆圆的脸颊，清澈的双眸，这正是你母亲和我愿意看到的，然而事实上你却在深夜还醒着，在床上哭泣。

有关《拿破仑周围的女人们》一书我已经听说过^[95]。这种类型的书我从不相信，即便我有兴趣且有时间去读它。里面那些事实的查证必须靠夸大其辞。拿破仑和女人们肯定不像一个观察家认为自己看见的那样有那么多事，观察家只长期观察拿破仑，他慢慢地但肯定从所有普通的人情世故角度出发拔高自己。我曾读过一篇有关拿破仑尸体的解剖报告，其中只粗略提及拿破仑对他关系密切的女人们的态度之克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除了表面的对立，他写给约瑟芬那些出于爱而感伤的信件的风格及他有关性生活的言语之粗鲁也说明了这些。

为什么你认为我和马克斯关系不好？我们自相识以来从未红过脸，这算来已有十年了。当然这种关系也经历波动，就像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一样，特别是其中有我的时候。所以这些年来和他相比我总是指责自己，相反，他也许什么错也没有。以后我还要详细和你谈这事，今天不行，我不能确切表述它。

现在正好是下午4点，我收到了你的快信。最亲爱的，最亲爱的，不要徒劳无益地烦恼！我的情形比我所写的要好十倍，我的笔总是不听使唤，这就是原因。我又写了些什么可怕的内容呀！从中你可以看出，我是怎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我要安慰我最亲爱的姑娘，但我却使她激动。这是我的不幸，我甚至得不到吻。

我坐在那里看了很久赫贝尔书信集[96]。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他是一个懂得忍受痛苦并说真话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内心最深处是有分寸的。他性格中没有哪条模糊不清，他从不发抖，自三十岁起他一直生活在两个女人中间，有两个家，在有些地方觉得自己是行尸走肉。有关他所作所为的报告他总是这样开场：“如果良心的安宁可以检验行为……”我与这种人相距太远了！若我也尝试一次良心的检验，我必将留意良心的波动来度过一生。那我宁可走开，对于检验我什么都不想知道，除非我对背地里的事情预感太强，它才会对我有一点损害。

正因为如此，我不言而喻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有过失的，在我与马克思的关系上也不例外。出于爱、软弱、胆怯和其他很多（其中一些是不知道的）原因我对于他并不总是心怀真诚，在小事上我对他并非处处以诚相待，即便在大事上也不总是——但我不愿意继续写下去，我写不下去，最亲爱的，今天不能，不要因此生气，请你理解这一切。

你无须为我和他的关系忧虑，你真该看看昨天晚上我和他坐在咖啡屋里是怎么开怀大笑，他对我的友谊不会改变，同样，我对他的友谊也不会变。只是我与他友谊的重心只落在我这方面，因此，当我们的友谊波动时，只有我一人知道，并痛苦地补偿过失（痛苦是我独自从中体验到的，过失也同样只属于我一人）。我告诉你并让你焦虑的马克思的话只是他随便说的，他就是这习惯，很多根本与他无关的话他都不加思考、不负责任地说出来。你了解他还不够多，对我夸张的、难以驾驭的写作手法也认识不足，所以受惊了。嗨，这正是我用吻解除给你造成的惊吓之时。

弗兰茨

〔19〕13.1.26—27

最亲爱的，现在你应该在这里（一个奇怪的邀请，午夜早已过去），我们要度过一个美好、宁静的夜晚，那么寂静，以至你最终甚至会感到害怕。可怜的最亲爱的人，请告诉我，这样被爱恋感觉如何？我不要别的，只想握住你的手，感到你在我身边。愿望不大，是吗？可它却不能冲破黑夜和远方。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查询单。那个内伯勒对它不满意？难道没有人好

好踢他一脚？这本书我还没看完，你们未来的顾客肯定没患疑心病，它却令我害怕这小小的压力，我曾整天为这个连接口授记录机和电话机的主意感到骄傲，不过我已看出，这主意来得太晚。难道连接两者之物早已存在但没有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利用？银行、通讯社等重要的、须准确记录的会谈一定少不了口授记录机，因为那取决于最详尽的记录或有证人到场。一个话筒可让职员拿在手中，另一个可以和口授记录机连在一起，这就赢得了含有说话人自己声音的不容辩驳的证据。——查询单一目了然且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许再加一张按企业类别排列的客户名单会更有说服力，同时简要介绍一下口授记录机，可根据客人指示为他们做些什么——总体说来，那个单子做得很好，它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我骄傲得简直不能克制自己要热烈地吻你，以致事实上做这个单子会让你感到遗憾。但这是不可预见的，特别是领导预见不了。

昨天我就想告诉你，你给索菲写信我有多高兴。我请求她讲你的事，没完没了地纠缠她，当然方法温柔且巧妙，这对于我的灵活和说话技巧来说并不意外。且如果不是这样，我喜欢你也不是坏事，对不对？不要问得这么直接！

弗兰茨

〔19〕13.1.27—28

最亲爱的，我又是看了赫贝尔的信集后给你写信。我不知道，那些被市民阶层的职业和烦恼围绕的人怎么看这些信，这些信中，一个人从他被诗歌创作振奋、永远（即使是失去知觉时）奔流不息的内心世界中站了起来，充满激情地表述自己——我真的感觉他（尽管我用平静的眼睛测量，我和他相距仍像最小的月亮和太阳那样遥远）就在我身边，在我颈旁悲叹，直接用他的手指触碰我的缺点，有时候，很少，他拉我和他一起走，就好像我们是朋友。

我不能详细描述他的影响，从第一点推论出第二点我不行，在这样稀薄的空气里，生活对我来说很难，为了冷静旁观安定自己，我逃离现实战争。我思维能力的局限令人难以置信。我能在结局中体会发展，却不善从发展上推到结局或从结局一步步往下想。正好像我掉到了事情上面，但只在坠落的迷惘中瞥见了它们。

赫贝尔的思维很精确，没有任何推诿可让人试图借他的绝望来解救自己。他不仅靠一种从小就拥有的力量（他受教育很偶然，可怜地组合

在一起)来思考问题,而且还靠一种也是从小就有、显得幼稚的方法。若我仔细试想这一切,他的信给我满具人情味的印象就立即中断,他干脆来践踏我。

最亲爱的,特别感谢你今天的信。天知道你在如何疲乏的情况下写的信,但你写了,当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兜里有一张你昨天书写过的纸,我可以握着它,抚摩它,爱它。你想,我甚至吃了巧克力,当然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细细咂摸,但那种尽可能参与你的生存和兴致的引诱太强烈。它也没给我造成损害,因为所有源于你的东西(在此你与我不同)都可爱、美好且无害。

弗兰茨

[19] 13.1.28—29

我终于和别人一样经常患感冒了,这大概也属于去年夏天以来的所有新生事物之列。我感冒了,不知什么原因,尽管我的皮肤经过千锤百炼。难道最终是因为我没喝热茶,那种我认为(现在由于感冒,我的意见不再有分量了)我最亲爱的人喝了易兴奋的饮料?你知道吗,曾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从不会感冒的事实中看到了自己越来越快毁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总是坚信不疑,自己在越来越快地毁灭。我告诉自己(不能感冒当然只是众多标志中的一个)如此这般,我渐渐脱离了人类共同体;我注意所有可以找到这方面证据的地方,在每件小事上,我都失败;并非所有恐惧都得到验证,但每个希望都成泡影;若我与某人说一件最无关紧要的事,而他稍稍瞥向别处,我就觉得自己遭到摒弃,且没有办法让他的脸转向我并定睛不动。有一次我成功了,我让马克斯——对于这种情况他一般都视而情况越来越严重,即使有人仍喜欢我,坐近我身边,望着我的眼睛来鼓励我,甚至拥抱我(这更多是出于绝望而非爱),他用任何方式也解救不了我。我必须放任自己,我也最乐于如此,另外,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长时间地忍受下去。那时候,我们两个曾单独去多布里乔维奇郊游,那是布拉格附近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过夜。有一个下午因下大雨完全荒废了,我躺在马克斯屋里的长沙发上(我们有两间房,因为我必须单独睡在一间屋里,最终你甚至会把这看作勇气,其实这只是胆怯,它源于:正如一个人若躺在地上就倒不下一样,一个人若单独待着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完全麻木,却睡不着,也不想睁开眼打扰马克斯,他正在桌边开始他的小说《捷克女》(可能你后来在柏林日报上读过这篇小说)并要完成它,于是我闭着眼

睛躺在那里，听着雨声，十分无聊，雨点落在木质房顶和平台上形成一种特殊的噪音，我焦急地盼望马克斯最终完成他的故事（顺便提一句，他写得很快，笔尖仅在纸上划过），然后我可以起来，稍微舒展一下筋骨，我没有其他目的，只希望能又有兴趣重新躺到长沙发上去，继续呆呆地躺在那里。我就是这样度过很多年，若我仔细回顾一下，那是无止境的很多天。把你的手给我，最亲爱的，这样美好的日子会无止境地到来！我简直不敢握你美丽、可爱的手。

弗兰茨

〔19〕13.1.29—30

最亲爱的，不要勉强自己再给我写这么详尽的信，你的时间不宽裕，不允许你这样做，我愿意做你的好人，而不是惹你讨厌的人。只要一声问候并保证你是我的——这种情况下我就相当满意了。现在除了开票员和格罗斯曼小姐已是第三个姑娘病了，她的工作由你承担，难道你在办公室的工作负担不过于繁重吗？领导毕竟应该知道你的工作太多了。

我的境况比你好多了或者说还可以更好！若你像我一样有这么多自由时间，你会过一种美好有益的生活，你和所有人都会从中获得乐趣，实际上现在你的生活差不多是这样，尽管你直到晚上7点45分还被拴在办公室里且没有午休，这真是太可怕了。我其实什么都不做，没有哪个办公室应该忍受满腹情绪的人，况且他的情绪影响工作，你若看见我今天在办公室的所作所为定会摇头。我桌上摊开各式各样陈旧的什物——虽不如前一段时间多，因为这期间有一周工作较好——但今天我首先应该完成交给部里的一份昨天才起头的无关紧要的报告。但不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另外，今天办公室进行大整理，我不得不把打字员也贡献出去，我自己却坐在机器旁，觉得自己除了会将手抱在怀里外什么都不会做。在这种时刻，连打字机也丧失了它写字的能力，若人们就这么看着它，它就像一个古老、早已过时的发明，只是一堆废铁。我差不多写了八页，明天极有可能把它们当作废纸一堆，然后重新开始这份预计二十页长的报告。像荷马史诗中英雄演讲那样滔滔不绝口授的时候极少，因此就存在危险，连少有的口述有一天也会永远停止。但是，我还活着，血液循环尽管很困难，但仍在进行。你想，除了办公室的工作我几乎什么都不干，由于我不关心工厂，我几乎不敢看我的父亲，更别说和他交谈了。最亲爱的，现在请你就我美好的生活方式表扬我一下吧！

什么消息也没有，我最亲爱的，我在办公室说，如果下午有信来，请给我送来，但什么都没有。昨天收到两封信，要是分摊一下就好了！但我未觉不安；若你还像前些天那样辛苦，你可安心漏过一天，我会在心里紧紧抓住你，而且我了解你。

我还有点感冒，或者根本就没感冒，只是我整个背部觉得特别冷，就好像一直有一个灌满了凉水的喷射器对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或站在哪里，它都能找到我，这也许大部分是由于心中多疑。即便现在，我在温暖的屋子里写信，仍觉得阴森森的。

若人们处于这种状态下，那么没有什么比收到一封满篇都是这种令人讨厌的事的信更让人开心了，正如我今天收到的施托索^[97]的信。他也写到我的《观察》，但他完全理解错了，以至于我有一刻曾认为我的书确实很好，因为它能令施托索这样明智、文字造诣颇深的人产生这种误解，这种对书的误解人们认为不该也不可能产生，这种误解只可能对生气勃勃因而不容易看透的人产生。唯一的解释是：他粗略地或部分地（因此他每种观点不可能给人留下忠于原文的印象）或根本没看这本书。在此，我抄录相关地方给你看，他的书写根本没法认，即使你费了好大劲认为可以看懂他的字了，你也一定会搞错很多意思。他写道：“我一口气读完了您的书，您的书内容和形式安排得同样恰到好处，您书中特有的飘忽不定却掌握分寸的方法，为大大小小事件塑造的标志之轻快、其内涵之明朗，让我如沐春风，心旷神怡。书中具有妥帖适度、可谓内涵深刻的幽默，就像人们美美地一夜睡醒之后，为了提精神沐浴一番，换上舒适的衣服，满怀热切的期待和莫名的力量，开始了一个晴空万里的假日。这是敝人根据自己理解作的幽默比喻。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他创作中明朗的文风更好的东西用来成就一位作者，并为他担保。”对这一评价我还有一个解释，我刚才忘记了：他不喜欢这本书，只要想想他的性格，这轻易便可想到。另外，这封信和今天发表的一篇褒扬过分的评论刚好相配合，评论认为这本书满含悲伤^[98]。

今晚索菲（弗理德曼）来过，如果不是满背的寒气和那“根据自己理解作的幽默”，我很愿意到车站去接她。我没有你的消息时，特别愿意看到曾经和你对视过几星期的眼睛，也愿意提到你的名字，即使这一切只

发生在电车短短的行程中也是好的。但下星期若我得不到你在布莱斯洛停留期间消息的话，尽管你曾答应告诉我，我便要围攻她，让她给我谈谈你。最亲爱的，她是你多好的替身呀！那样我便要拥抱所有关于你的谣言、谈话、回想和任何一件哪怕只提到过你的事，就这样。

为了不让你在法院一事中孤独无助，下星期一我将再去法院。真是麻烦！但这次没有故事来搅扰我。我更想绕道柏林去温暖的南方，马克斯和妻子星期日下午便启程去那里。该怎么办呢？

妈妈，今天请说句好话[99]！

弗兰茨

〔19〕13.1.31—2.1

下午写信[100]之后我才第一次坐到书桌旁。现在是几点（我把答案写在下一页，就像为了让人大吃一惊的分期小说那样）？整个下午我和韦尔弗、晚上和马克斯一起度过，现在脑子已被今天达到极限的劳累和紧张搅得够呛，8点钟才睡觉。那时隔壁和往常一样，谈笑声很大，每每我才睡沉一些，那声音便又把我拽出睡梦，使我比睡前还清醒。不过我毕竟在各种睡眠方式中，像迷盹、做梦以及完全清醒状态一直在床上待到现在，刚刚起来，给你，最亲爱的，写信，并且为我的小说把才在床上突然产生的想法记下来，尽管我对未来发生事件的顿悟害怕大于希望。我破例在桌子上发现了一顿精美的晚餐（很复杂，一定很难做），却没吃便撤走了。和我整个人一样，我的胃几天来不舒服，我想试着用饿的法子治治。比如今天我只吃了中饭。我提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我期望获得成功的每件小事。

韦尔弗给我朗诵了新诗，毫无疑问，那些诗又出自于惊人的禀赋。这样一首开始便暗含了结局的诗是怎样以奔涌不断的情潮写出的啊——人们又怎样蜷坐在沙发上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个小伙子已长得十分英俊，总是带着野性来朗诵（我却不赞成野性的单调）！他可以背诵自己写的所有东西，朗诵时要把自己撕裂一般，这时火焰包围了他那沉重的躯体，宽阔的胸膛，圆圆的脸颊（2月份他将在柏林朗诵，到时你一定要去）。自然我们也谈到你（虽没提你的名字），没有你下午对我来说是怎样难熬啊，他在《世界之友》[101]的（一个陌生人）之前为我加了一小段赠辞，为此林德纳小姐有些愠怒。我将把这本书寄给你，首先包装和邮寄的方式不让我担心。所以〔情感的顶峰〕〔勃罗德〕也放在我

这许久了，当然这本书也属于你；我早答应过的。还有那本准备给你的法国福楼拜几星期来让我在桌子上摆来摆去，我总想找到理想的包装和邮寄方式。

星期天寄去的略维的信可否一读？他星期天在柏林演出，至少我认为可以从信中读出来，所以我施了一小计，把有关之处画出来。后来我因此自责，现在很高兴你没注意到那些记号或由于别的原因没去看戏。我已让你把你的短短的自由时间为我花费得够多了，多得过头了！和略维一道来的韦尔弗讲，《柏林日报》驻莱比锡记者，一个叫宾图斯博士[102]的，我也认识他（是个很迟钝的人，对他期望不可太高），很喜欢此剧团，准备在《柏林日报》的某个专栏里写写[103]。假如你看到的话，请寄给我，我总是很关心演员的。

你的几条建议，最亲爱的，建议重新分配时间，我不敢遵从。事情原本怎样就怎样。我不能接受的话，就不高兴，但我会接受的。一到两小时用来写作是不够的（除非你没将给你写信的时间安排进去），十小时正好，既然达不到理想的时间，至少得尽可能接近而不应想自我宽恕。而最近几天我却把写作时间利用得糟糕之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它在葬送我，今天我又什么也没写，晚上躺在床上，对自己的疲惫和短暂的时间感到万分绝望，半梦半醒中我祈祷，让我掌握世界的存在吧，不要让我为它困扰。啊，上帝！啊，最亲爱的！

弗兰茨

〔19〕13.2.1—2

最亲爱的，你可知道，你的饱经锻炼、不会感冒、铁打一般的傻瓜此刻在哪儿给你写信吗？不在空寂的冬夜，而是（不好意思）在温暖的厨房。只有起居室才有暖气，我们这么高的楼层大风天是不可能给其他房间供暖的，我房间就不曾有暖气，因为下午我想去莱特默里茨（不过也许明天去），起居室里家里人一个个都睡了，厨房里没有其他人，很安静，如果不是冰冷的瓷砖、响亮的钟声的话，这便是一间完美的书房。

马克斯的婚礼举行过了，明天他就去南方，婚庆却没有特别之处，可能你也会猜到，只不过在饭店里举行个结婚仪式，其他没什么，没闹房，没婚宴，我怕人多的心情也没有经受考验。不过我经历了特殊的婚庆之喜，原因是我和索菲讲了几句话，她说要给我讲些事情，我又可以

听到些什么，真不错。今明天我不能去勃罗德那儿，但星期二我走着去。其实我不想听特别的事情，只想在索菲身旁，因为你肯和她在一起。

最亲爱的，没办法，我得搁笔了，尽管好像人硬把我从你身边拉走。星期二你会接到我的明信片。最亲爱的，不要被噩梦惊吓，一切保重。

弗兰茨

〔19〕13.2.2

衷心问候。差不多已准备好出发。我妹妹同行，在亲手签名向您问候。

弗·卡

奥特拉·卡夫卡

〔明信片邮戳：莱特默里茨，1913年2月13日〕

火车里很暗，没法写字，我也累了，周围的一切都沉睡了，妹妹在走道上正向窗边观望，现在转身望着我。雨很大。很高兴我正在返途中，之后可以给你写信，睡觉，可以写作了。

生活愉快，最亲爱的，生活愉快。

弗兰茨

〔莱特默里茨回布拉格途中，1913年2月3日〕

我到家了，最亲爱的，你拥有我了。旅行使我筋疲力尽，我则把自己搞得更疲劳，晚上还到过勃罗德家。我讲了些什么呢？自己的事讲得很多。在索菲身边我坐了两小时，就在8月份曾经坐过的位子上，你在索菲身边也曾经坐过的。我们两次提到你的名字，而我对此贡献甚微，很可能还起过负作用。你的名字首先是在另一场谈话中突然提起的。索菲说，你问候所有的人，“从勃罗德夫人开始直到卡夫卡博士”。我觉得问候的顺序正合我意，因为所有的人接受问候之后，便只剩我一个人，我可以留住你，不必让你到其他人那里去。而且使我感到温馨的是，在一群提到你的陌生人中间，我觉得自己与你更亲近，我比他们优越，我对此感到很满足。每次提到你的名字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如果忍受不

了，那我非得失态不可，一定会因为你和所有人都有关系感到难过。所以我试图忘记你，在大家不再谈论你之时，你的身影才又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最亲爱的，你一定累了吧！我想，柏林的生活不会有所不同，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而你又是怎样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承受办公室里工作的呀？不用说，不加倍努力，不损害健康，那是不可能的。亲爱的，这是远在千里之遥的我的担心。你不要以为，我认清了这一切的必然性。我知道，柏林一切都比这里更热闹、有趣（而我们这里的热闹气氛、趣味对我来说无法体味）。这种情况下，像马克斯那样的以此方式在我影响下在熟人圈子里举行一个柏林式婚礼恐怕不可能（在不修边幅、无拘无束方面我是行家）。星期一你曾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啊！我该如何评价这一切，我根本不会给人家消遣，哪怕顺带一下也不会。我不能与人长谈。一个熟悉面孔随意一瞥也会很快使我心慌意乱。

弗兰茨

〔19〕13.2.3—4

你赢得这么多东西，幸运的心上人，自然很好，我也很高兴，但是给我写信不必用自来水笔，像以前那些信我也同样喜欢。可是人们怎样抛给你绳索把你拖来拖去！我未曾躲在角落里，想牵住你，不把你给别人。

有你母亲签名的明信片今天下午我收到了。母亲叫什么名字？安娜？你知道吗？明信片看起来很严肃，什么都有，像“问候”和“夫人”，但这是给我的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布鲁恩夫人何如此做作？那是个什么节日？大家都坐在大桌子旁边么？你和母亲坐在哪里？

今天有个叫奥托·皮克^[104]的人（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他编辑了一本名为《友好经历》的优秀诗集。也许你通过韦尔弗在《时代精神》里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我这儿有个对口授记录机有兴趣的主顾，所以我想请您再给我些材料（可能的话，告诉我价格）。”因我刚好在收到你的参考资料单那天碰到他，就马上抓住他（因为我认为他很会做生意，而且和编辑部及银行都有来往，这样，我想即使单子上没有列出编辑部或银行，也一定容易把口授记录机卖给这两种地方），晚上给他单子，派他处理这些事。现在他向我汇报。可怎么将机器送过去呢？谁知道，也许我可以找到个代理。给我点时间。现在布拉格谁有口授记录机？略维和温特贝格无疑是大公司，据我所知它在波门木材业排

名第三；生意上我和它有所往来。把口授记录机给他们，最亲爱的女老板。对口授记录机我没有可推荐的，但如果就证明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证明你是最好、最可爱的姑娘，而且你将一台不实用的机器卖掉，这机器也便因此拥有了价值——那么他们该来问问我。

弗兰茨

〔19〕13.2.4—5日

最亲爱的，在家里见到你的来信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快事。但愿这快乐不因我的某些想法带上一丝痛苦，我想如果你把散步时间也用来给我写信，如果可能写两封，没有任何理由，那该多好啊。为什么我们不经常写信，彼此靠近，直到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挽着对方的胳膊。可事实不是这样，我们被分开。最终只留下明天不会有信、至少不会马上来信的恐惧。而这封信早上就放在桌子上，没让人等得心焦，可真是一大安慰。

你星期一写信给我时，我已不在火车上，而在勃罗德家，也许还正提到你的名字，我正默念着你。

旅行还可以。开始我很反感，又得和前不久一样4点半起床，接着在湿冷的空气中心灰意冷地乘火车，换汽车，然后去亲戚家，然后去法庭，然后又一声不响地乘火车回家——结果我最后决定，傍晚启程，在莱特默里茨过夜，这样我可以顾及刚刚好转的感冒，之后在饭店里睡一觉，到星期日傍晚人头攒动的异地餐厅里坐一会儿——这使我觉得挺惬意，在那儿我愿意沉默不语。可那天晚上韦尔奇一家^[105]却突然拉我去看戏，非去不可，我们的一个熟人第一次上台，在《尤赛特小姐——我的妻子》中扮演个角色，自然是配角，只是在第一场她突然大笑起来，做出自我陶醉的样子，胳膊弯起来，姿势有些夸张，大多数情况下她背朝观众，紧靠着房间墙壁布景，尽管如此那布景仍勾画出一个尖刻、骄傲又聪慧的女主人刻意布置过的房间，对此我总有种畏惧感。第一次上台就让她演这样的角色，有些欠考虑。

自然这出不怎么样的戏里也有几处颇具人情味，挺吸引人，也许有一天我会耐着性子把它从头到尾看完，那天第二幕之后，尽管他们一再挽留，我却没有告别就回家了，舍弃了尤赛特的一两幕和一出滑稽戏《在公民中》，取而代之的是我早早退场，回家睡觉。在家里我发泄一通对妹妹同行的不满，既然她极有兴趣同行（不仅仅以此向我证明这趟

旅行不可怕)，我很愿意答应带上她，虽然这一决定在10点半才作出，父亲却出人意料没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就是说，我们在莱特默里茨有亲戚，而保持亲情在父亲来说是件大事，实现这一目的妹妹似乎比我更合适。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当时天不错，可途中雨水便浇在脸上，雨下个不停。2点之前我一直在法院（没有任何决断，事情又得拖下去，可我宁可挨打而不愿走出来），妹妹则一直在亲戚家。她不擅长写作（根本上来讲和我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她只写自己名字。可她不像你想的那样，她不懒；懒姑娘是另外两个妹妹，准确说是大妹。你总能在距离最近的沙发上找到她。奥特拉在我们店里干活，早上7点15分开门时她就在那儿（我父亲8点半才去），守到中午，有人给她送饭去，直到下午四五点她才回家。赶上旺季，她便守到关店门。

但是工作毕竟不累，归根到底我认识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像你那样操心劳神，也没有一个我愿像你那样替她分忧解难。可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吻你，是的，从千里之外吻你！请告诉我，最亲爱的，就在下封信告诉我你怎样回答林德纳小姐，如果她不问一般性问题，而偏偏问：“这人前三个月来到柏林没有？没有？为什么？他星期六中午离开布拉格，如果不成就在晚上，到柏林过星期天，晚上再回布拉格。虽然有些紧张，可也算不了什么。他干嘛不这么做呢？”可怜的你，最亲爱的，你怎么回答呢？

弗兰茨

〔19〕13.2.5—6

最亲爱的，天色已晚，我累了。下午待在办公室没睡觉，做些傻乎乎的事，事故统计（你知道了我的工作，每件我做的小事里都溢进你的气息，这样我便才有了兴致），之后的时间过得也不好（你知道吗？因为劳累我的双颊都热了）。于是我兴致百倍地走出办公室散步，路过韦尔奇的住所，看到里面亮着灯，也就是说他正在工作，我想，这倒不失为一个打扰他的好机会，因为我已很久没和他交谈了（对了，你还不知道他的职业。他是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大学图书馆的公务员，那儿他没什么事可做，便和马克斯一起编一本名为《观点与概念》^[106]的哲学著作，这本书也许本月出版）。于是我上楼，和往常一样又在空气污染而热烘烘的房间里见到他，因为他总怀疑自己一叶肺里和喉头有病而不开窗，我发现他正兴致勃勃地读一本极难的孔恩著作——纯粹认识的逻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很高兴打断了他，却没能把他拉出令人窒

息的空气去散步。假如我们只一般聊聊，也许一会儿我就能达到目的，而他总有一种令我无法理解的满足感，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我朗读新新旧旧的私人信件。而今天偏偏机会来了，所以他拉开保密抽屉，那里面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暇放在一起。这些全都是个人最为秘密事情的书面保存记录，信件，有别人写给他的，也有他寄出之前速记下来的大致内容，以及所有事情进展的准确情况，还有谈话速记，很久以前的思考速记。除了马克斯和我一定不会有人知道这些，你可不要认为韦尔奇爱讲话，事实正相反。但今天他要讲，他由此而生的满足和惬意越不能使我理解，我却越能忍耐他的朗读。当他为了挽留我，勉强为我打开冰冷隔壁房间的门时，我完全无法拒绝，又穿着大衣躺在沙发上，静静地听他讲下去。我爱他，但不在这种时刻——不写了！一个疲惫的、不止于困倦的吻。

弗兰茨

〔19〕13.2.6—7

我有些迷茫地坐下来写信，胡乱读了些东西，互相混杂在一起，假使有人希望用这种读法给自己找条出路那就错了。人们站在一堵墙边，无法前行。你的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番样子，最亲爱的。不考虑与旁人关系时，你可曾有过不安的心情，你可曾看到各种机会只为你敞开而不光顾他人，而由此也便不能光顾到你。你可曾在丝毫未念及旁人的情况下感到自己绝望？绝望到你欲超越于所有世界法庭之上，躺倒下来，再不起身？你是否十分虔诚？你经常去神殿，但最近你一定没去过。你信奉什么思想，犹太教还是上帝？主要的是，你是否体会到自己与一个令人心平气静、距离遥远、很可能永无尽头的巅峰或深谷之间的关系？总能体会到这一点的人一定不会像一条迷途狗一样到处乱窜，凄苦难言地四面张望，一定不会自愿进入坟墓，仿佛坟墓是一只温暖的睡袋，而生活像冰冷的冬夜，也不会在通往办公室的楼梯上，觉得看到自己从楼梯间烦躁地摇着头急闪着翻跌下来。

有时候，最亲爱的，我真的认为，自己在与人交往上十分迷惘。我喜欢妹妹，现在我也为邀请她同去莱特默里茨感到高兴，通过旅行使她愉快，我觉得是件乐事，可以好好照顾她，因为能照顾别人是我心中秘密、也许不为周围人所知、所相信、永远的心愿——然而在莱特默里茨三四个小时的一同旅行、乘车、共进早餐之后，我向她告别去法院，那时我很高兴。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独处让我十分舒畅，妹妹则从不

喜欢独处。为什么，最亲爱的，为什么？你可有过与你所爱的人一点相似的感受？我们没发生异常情况，因为我们友好地告别，六小时后又友好地会面。这可不只一次，明天、后天都有事情，同样的情况又要重复。最亲爱的，静静伏卧你的脚下是最好的。

弗兰茨

〔19〕13.2.9—10

〔可能写于1913年2月7日至8日深夜〕

昨晚我为什么不写信！现在在熙攘的车厢里什么也做不成。一整天我烦躁不安、不满，好像自己打断了与你的联系，这种联系恰恰是我生活需要的。为什么我听任别人拉我去散步，我原本就知道自己是陪客。然而天气这么好，我的心情又那般灰冷，就对自己说，和他们去吧，也许你的心情会好些。有个人带着自来水笔（我正用来写信），当时我想，到时候会有机会静下来给你写信。可错了，我错了。只有一会儿我扯了扯柏林，又谈了谈口授记录机便没话了。我是这么需要和你在一起，和你联系，这些却让自己给搅了。为此我真想当着四个姑娘的面打自己一顿。但等一等（这个“等”说给你听），晚上我们又可以写信，又可以心结一体。至少我已得知我属于你，在城里，在铁路和公路上，在陌生的祖父母身旁，在森林，在所有我去过的地方——最后一站。星期天的信就写到这儿。我回到人群中，但仍悄悄地握住你的手。

弗兰茨

星期日下午6时于车厢内

〔19〕13.2.9

最亲爱的，又这么晚了，责任实在在我（说一句，这段漫长时间之后我又靠近菲莉斯了，我的菲莉斯），可我没其他办法。散步后我沮丧地回家，无精打采，好像非得有个人使我振作不可，或者我干脆让自己毫无感觉。晚上我给妹妹朗读心情舒畅时写的作品^[107]（父母今天去科林亲戚家，晚上才回来，迎接他们耽搁了我一会儿），那也许是我作品中最好的，她还不知道，我想，那是在我等你第二封信时写的。朗读使我激情荡漾，如果下午没在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多好啊，也许坐下来可以写些正经东西，把自己从明显的消沉情绪中掣入高峰，而这样我便不会写东西，由自己去睡觉，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写，对我，对你和

这个世界都是一种痛苦。

昨晚我没给你写信，因为读《米歇尔·科尔哈斯》读到很晚（你知道他吗？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读他的作品。我以后给你读），那本书除一小部分前天读过之外，其余是在火车上读的。这也许已是第十遍了[108]。那是一部历史，我真的是怀着敬畏心情读它，它妙笔环生牢牢吸引着我，如果不是略显单薄、某些部分大跌大落的结尾的话，那便是部完美的作品，是我想说从未有过的完美事物（因为我想，即使经典之作也有某些因人性弱点而产生的遗漏，像条小尾巴似的，如果人们愿意瞥它一眼，它便开始轻轻摇动，从而损害整部作品的特色和完美）。

最亲爱的，告诉我为什么你偏偏爱一个不幸而且注定永远不幸的青年？今天郊游时我和一个很有头脑的姑娘一起走，她很乖巧，是我一向可以忍受的。她向我报怨她的处境（每三个月我见她一次），让我很反感。然后我们坐在桌边，一个很活泼的男孩开始拿她打趣，她则机敏地反唇击败他，就像人们受嘲弄时希望的一样。我必须划定一个我不幸的影响范围。但不要怕，最亲爱的，待在我身旁！紧紧地靠着我！

弗兰茨

〔19〕13.11.9—10

今晚我又在勃罗德那儿，没回家作正经事或让随便什么正经事迷惑一下，而是在那儿待了很久，即使错了，我也感到舒畅，我这个在众人中鲜有舒适感的人下不了决心从沙发上站起身，马上告辞。另外威尔茨也在，我们笑得很开心；现在，即那以后两小时后，我一点儿不明白当时怎么笑得出，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一丝笑的理由。在那儿有什么使我如此快乐呢？

索菲一向对我很友善，且有个习惯，谈话时她抚摩我，用两手抓住我，无恶意地使我尴尬。今晚她只字未提你，而总谈她丈夫，谈电报、快信和长途电话。“菲莉斯呢？”我用目光问，可她没懂我意思。只有一次提到你，却没人注意。所以另一场谈话中我对索菲说：“我想问你什么来着？”我又重复了几遍，看起来有些蠢，但我似乎真的想不起。可我又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突然大叫：“到此为止吧！现在我只想听菲莉斯的事，其他什么也不想听。”我就是这样想的，相信我。今天收到你的长信（读信时我的心自然因幸福和舒畅怦怦直跳，同时我看到星期天你窗前的好天气，你在房间里伏身写信），由此我成了显赫的主人，可显赫的

主人越发贪得无厌。

最亲爱的，你回避了重要问题。我愿无意中再次感受与你共度时光的幸福。假如一切都自然而然出自我情绪最佳时对你的感情，那我们将并肩身处的柏林便不在柏林，而在云彩中。可林德纳小姐不该问这个，她只该问，为什么总给你像雪片般写信的我，不自己做呢？你该透露给她答案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缄口不语。很可能她会问的。那时你会只说、只想“我不知道”吗？

我按照片和耳闻想象的你妹妹托尼与你描述的完全不同。我曾想她们懒洋洋、沉闷且忧伤，现在她则正相反。而且她机敏，有个性，我很惊讶，同时在她面前我躲避这一点。对你妹妹艾尔娜我还知之甚少，只知道那些美丽的儿童故事。——最亲爱的，你愿把你的书目借我一天吗？我现在熟悉了你的房间，也要钻一钻你的书柜。

弗兰茨

〔19〕13.2.10—11

〔又及，写在边上〕今天收到信上的地址未写清楚，我的恐惧感难消。

最亲爱的，天又晚了；我从老习惯中清醒过来，却没有完整地做什么事，好像在等迟迟未下的雨。

对我们的柏林相会你几乎未作描述，我却盼望它已久。我有各种各样的梦想，却不知该如何说清楚，只有对梦想混合着感伤和幸福的普通感情。我们也曾在小巷里散步，那一带和布拉格老街区出奇地相似，那是晚上6点以后（很可能是梦想中确切的时间），我们虽未挽臂，可靠得那么近，就像挽着臂一般。天啊，将我想象中不挽臂、不明显地和你紧紧走在一起的景象描述在纸上是多么难啊；走过深沟时，我本可以给你演示一下，只是我们没想到。你急急忙忙径直走进饭店，我则在两步开外沿人行道边沿磕磕绊绊前行。我该怎样描述梦想中的同行呢？通常的挽臂是两人的胳膊接触于两点，我们的肩膀和胳膊则完全靠拢在一起。等一下，我把它画出来。挽臂是这样：但我们走起来是这样：你喜欢我的画吗？你也许不知道，我过去画得非常好，只是后来跟一个拙劣的画家开始按部就班地学画，埋没了我的才能。你想想看！但是我下次给你寄几张过去的画作，你便有笑料了。当时作这些画时，那是多年以

前，没有比它们更让我心满意足的东西了。

最亲爱的，你一点儿不相信我的生意才干吗？在口授记录机一事上你难道不期望可以获益于我吗？我对这件事给你的问题你还未作答。你不知道你这样使我难堪吗？好像你还未请我坐就又要将我赶出你的办公室。皮克今天又给我写信来。我附上他的信，你可以看到他催我有多紧，而你对我不理不睬。即使上面所言尽是玩笑（写在纸上看起来的确很严肃），我也得给皮克一个答复。也许他希望多挣钱，他真的很卖力，最后作成几桩买卖。好吧，到此为止，最亲爱的！去工作吧！不管什么力量促使你为我费心，我都受益，因为我拥抱着你。

弗兰茨

〔19〕13.2.11—12

〔附信〕

奥托·皮克致弗兰茨·卡夫卡的信

亲爱的博士先生：

对您的《观察》一书商榷文章第一句改好后我就送去发表。随信附上《佩斯晚报》像您看到的一样，裂了个口子^[109]，请您不要生气！

函授记录机一事进展如何？请您留心一下可否再搞些介绍材料。波米亚——基希^[110]对此很有兴趣。银行的人很想在谈判开始前看看函授记录机实物操作。

21日我将朗读L·舒勒的东西，但达尔曼不来。她那天没空。希望您一定来，此前也欢迎您。

衷心问候您的 奥托·皮克

〔19〕13.2.10于布拉格

如果你的信像今天一样一早就到，那是最好不过的，其后一整天从晨起开始便属于你。你的信晚到一点或者回家才见你的信，则半天不知到底属于谁，恍惚不定，搞得我头痛。不过头痛一定还有其他原因，因为这现在几乎是家常便饭。我很少散步，很少睡觉，这可怜的一点儿睡眠质量不高，时间短，这种情况下我只要写出好作品就能生活，假如写得出好作品，便有了治疗全部痛苦的良药，便是幸福。可我什么也没写，像一匹困在马厩里的老马。

你看，晚上我们都在互相答复对方或者料知对方的问题。星期五晚上，我没有意识到那是星期五，却问自己，你是怎样作祈祷的，星期五你定要去神殿。昨天我问，何时我能拿到介绍材料，今天我就得到了不令人满意的答案（假如皮克一定要做生意，他该怎么做呢？他是否该和阿德勒联系？怎么联系？）。昨天的信我最终谈到拉斯克·舒勒，今天你就问起她。她的诗我无法忍受，那些诗卖弄辞藻，除了空洞、令人反感之外就只有无聊，再无他物可言。她的散文同样让我厌烦，文章里活动的是一个精神过于紧张的大城市女人未经筛选、毫无条理的思想。可也许我完全错了，有许多人都喜欢她，比如韦尔夫谈起她来神采飞扬。是的，她生活得不顺利，据我所知，她第二个丈夫离开了她，也有人在我们这里交流她的种种传闻；我不得不花五克朗，却毫不同情她。我不知

根本的原因在哪里，但我总认为她贪食，每晚她都穿梭于各咖啡店之间。从皮克的信里你可以得知他要作个关于舒勒的报告，那也是为她而作。

你知道吗，最亲爱的，我得提防那些不了解我、尤其是我不喜欢的人在你的信里说三道四。为了报复我给他们的评价，他们默不做声任人将他们评论个够，当别人无力抵抗他们时，他们忽然蜂拥群起，想以他们丑陋又平庸的言行向你诋毁我。去吧，你这个拉斯克·舒勒！来吧，最亲爱的！没人横亘在我们中间，没人围住我们。你说的对，一个做姐姐的不能完全属于另一个人，别人对她来说可能都是多余的。可假如一个人缺乏赢得他人的力量，他该怎么办呢？

弗兰茨

〔19〕13.2.12—13

〔附言〕

你为你妹妹艾尔娜的事而向教授建议的时候，他说什么？

我在阳台门旁站了许久，在外界寻找问题的答案，我该去德累斯顿吗？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德累斯顿做什么，我是否和你一起去，你有特别的事情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突然出门，你是否要在德累斯顿过夜）？假如我在饭店门口等你，找个可以看到你吃中饭的座位，是否会妨碍你。可事实上所有的顾虑都不会阻止我去德累斯顿。在家里我的精神状态让我偏爱漆黑的房间而不是明亮的起居室，这状态使此次旅行成为一大壮举，同时也是危险的举动，因为，你，最亲爱的，是此次旅行的目的，你的妹妹第一次见到我会说什么，你会说什么？不，不不。我就待在我现在这地方，只是比以往低沉、不安，因为你离我更近，却让我见不到。老人们，我们的母亲们也许会一言不发决定旅行，我下不了决心。

生活愉快，最亲爱的，度过一段平静的时光。原谅我，你在德累斯顿我还拿信追踪着搅扰你。柏林有封星期天写给你的信，没新鲜事，只是上星期中一些没完没了的乏味的琐事。

弗兰茨

〔19〕13.2.13

今天第二批邮件才接到你的信。这是不是说上午你的眼睛仍在发炎，你没去上班？可你在一段短小附言中告诉我就好了。真的是因为一粒尘埃或短发钻进眼睛吗？虽然这会使眼睛不舒服，却不会发炎。难道你们那里没人知道把眼皮翻开可以清洁眼睛吗？我会清洁眼睛，但血淋淋的大手术总让我难以忍受，而我偏偏从未自己动手治疗身体小疾，也几乎未观察过别人操作，因为那使我想起了手术，将它清晰地显现在我脑海，让我相信，人体构成的确残忍原始，在机体里储存有那么多机理。你难道一点儿不害怕翻眼皮吗？一想到别人得给你小施手术，我就不寒而栗，自然他们完全出于好意。

最亲爱的，今天是让你作出下列承诺的好机会：你有责任履行下面的义务，而且还要作出令人信服的保证：你要把每一丝不适都清楚、如实写信告诉我，千万不要给真实描述以说明解释，我想在远方为你清除痛苦，哪怕一点儿也好。你看，我不要求你夸大其辞，夸张不要让人识破，但我时常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出于天性，并非不考虑你。

昨天我收到关于你的小说改稿(《判决》)。我们的名字排写在一起多好啊！你会在读小说时后悔同意了其中提到你的名字(自然只写为 Felice B.)吗？因为不论你给谁看，谁都不会喜欢这部小说。你的慰藉及其方式在于我不管你的阻拦都加上了你的名字，虽然献辞微不足道且尚存疑点，却标志着我对你毋庸置疑的爱，它的存在不依赖于应允，而是强迫。另外，书的修改还需要些时间，此书编辑已耽搁了，出版恐怕还需等几个月。

最亲爱的！看，时间似乎在我面前无限延长，不写作的时光将我抛来掷去。整个晚上我盼望给你写信。现在我在写，累了，或者好像写累了，眼睛无神，打着哈欠，就此搁笔。

弗兰茨

[19] 13.2.13—14

即使几天前我未打算今天去看《希德拉》^[111](魏德金德和他妻子自然登台表演)，今天收到你第二封信后我无论如何也得去。你看，虽然我们相隔遥远，很少有人注意或愿意相信，上帝不愿借链条将我们缠绕在一起，我们却通过坚固的绳索相互联系。最亲爱的，你如现在去看《贝尔哈迪教授》，那这条不容怀疑的绳索也会一起牵着我，我们两人都有坠入这出拙劣剧作的危险，施尼茨勒大部分作品给我这种印象。为

了自我保护，我有责任不随绳索而动，而去看《希德拉》，稍稍让你少受《教授》之影响，保护你，给你因《贝尔哈迪教授》激烈跳动的心带去魏德金德台词的精彩片段，让我心灵免遭伤害，忍受施尼茨勒的影响，它今晚向我飘来，而我贪婪地接受，只因为它来自于你，最亲爱的。我根本不喜欢施尼茨勒，几乎不敬慕他；他一定小有才华，但他的伟大剧作和伟大小说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堆平淡无味的文字。人们无法深读。我看过他的几部剧作（《插曲》，《人生的名誉》，《梅达图斯》）如过眼云烟，我一边仔细听，却一边忘。只在看到某些场景，看到虚幻梦境，看到连我手指尖也不想轻触的柔情蜜意时，我才明白，他怎会从开始写一部优秀作品（《阿那托》，《轮舞》，《古斯特少尉》）发展至此。这封信里我根本没谈魏德金德。

够了，够了，我怎么又说开施尼茨勒了，就像上次那个拉斯克·舒勒，他定要横插在我们中间。最亲爱的，你是一人看戏吗？为什么这般突然？你的眼睛好了吗？痊愈了吗？现在，也就是晚饭之后，我在晚报上见到你们那里未婚王子夫妇的照片。两人正在卡尔斯鲁厄一所公园里散步，挽着胳膊，却还不满足，又将手指勾起来。我足足盯着那紧勾的手指有五分钟，否则就是十分钟。

中午真想找个洞钻进去，原因是读到马克斯在新一期《三月》上给我的书作的书评。我早知道，那会发表，却不知内容。已有几篇关于我的书评发表，自然都出自熟人之手，他们的过誉、注释毫无用处，只能解释为误入歧途的友情，高估我的书，误解公众与文学的关系。这些文章最终归入文学批评之大流，但愿它们不是可悲的、为虚荣心所日渐磨损的尖刺，人们是会听任虚荣心发展的。马克斯的书评简直登峰造极。他对我的友谊最具人情味，其根基还远远未达到文学水平，即使如此，这友谊也强大无比。他盛赞有加，其方式令我羞愧难当，又纵容我的虚荣和骄傲，而他却理所当然地将根据自己艺术积累和能力作出的真实评判，将这纯粹的评判掩藏起来。尽管如此他还那样写。如果我自己写文章，处于写作的长河并随波漂流，我一定不理睬书评的好坏，我会在思想上吻他、感谢他的厚爱，书评本身则与我无关！但可怕的是，我得对自己说，我对马克斯文章的评价与他对我的评价并无两样，只是我有时意识到这一点，而他不会。

最亲爱的，最亲爱的，我这星期天愚蠢的脑袋里真的没有好主意可以给你！我无意中传达给你的坏想法在最具美好本质的你面前都定会变

成好事，假使我不知道这个，我便不会将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地写给你。

随信附上我住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雷德·略维)(他六十岁，铁路督导员)的信，随你怎么想他。最亲爱的，你不愿让我有机会读读你亲戚的信吗？比如你住布达佩斯或德累斯顿妹妹们的信。这样我可以了解包括我在内的你的生活圈。我还没有你的书目。一个人可以向他爱的人要求很多吗？最亲爱的，如果我要求太多，你就告诉我。我知道许多你的情况，而你心中对此却感勉强，这种交换可不好。

弗兰茨

[19] 13.2.14—15

最亲爱的，只匆匆写几句，这封信才赶得上你的第一批邮件。请你忘掉昨天那封讨厌的信吧。假如昨天时间不晚，我还有力气再另写一封，我不会将那封信寄走。但我们定期写信，我顾不得其他。也许当时我也反感——巧妙道歉——就如同你星期天收到信的感觉。像往常一样，我今晚就那封信和其他可能引你反感的邮件向你谢罪，最后右肩疼痛难忍，我不得不祈祷，那些信一大部分都是我在疼痛引起的昏沉倦怠中熬夜写出的。现在好了，我愿以忍受疼痛来赎罪。于是又说些胡话，为下次赎罪作准备。我是个真正的不幸者，你，最亲爱的，一定被卷入到平衡不幸的进程中来了。

弗兰茨

[19] 13.2.16

最最亲爱的，再给你匆匆写上几句。我睡了一小会儿，又醒着躺了许久，天色便晚了。但愿你度过一个比我愉快的星期天。我面前有一张马克斯和艾尔莎(勃罗德)从里维艾拉或者最好说是蓝色海岸边的圣拉斐尔寄来的明信片，因为我请求他们帮我寻一个秋天还依旧炎热的去处，在那儿可以吃素食，可以永远健康，可以不觉得孤独，即使子然一身，无人交谈(当然不一定非得子然一身)，那里连白痴也通晓意大利文，简言之，一个妙不可言的去处^[112]。现在马克斯讲，圣拉斐尔便是这样一个地方。你说呢，最最亲爱的？

现在我向你跑近些，当然只能到火车站。

弗兰茨

最亲爱的，今晚我独自一人冒着严寒（难道我又感冒了？我的脊梁或真或幻地感到了寒冷）散步，走了很远的路，我穿越整个城市，穿过赫拉德欣，绕过大教堂并横穿贝尔维德拉，我在脑海中给你写去无数封信，纵使这种笔耕无法使你得知细节，你也想必已再次心领神会——若非如此，我会茫然不知所措的，你会知道我在贯穿我生命的那些喜怒无常和虚弱无力的状态下写给你的一切中可能很容易显示出一种令人厌恶的、做作的、肤浅的、卖弄的、虚假的、恶意的、不连贯的外表，抑或根本不仅仅是看似如此，而是的确如此，然而，然而，在内心深处，在有时连自己都难以进入的内心深处，我能意识到并正确地评价我所做所写的一切坏的东西，我无助地哭泣。菲莉斯，你爱我，这是我的幸运，但我对此没有把握，因为你可能弄错了，或许我在信中卖弄了一些迷惑你的本领，你几乎没有看到过我，没有听到过我讲话，没有被我的沉默所折磨，并对我在你身边可能会给你带来的偶然和必然的种种丑陋一无所知。不如说我敢肯定的是我爱你，我在那个短暂的晚上认出了你，我被你所感动，我不比这种爱情更软弱，相反我经受住了这一考验，此爱同我与生俱来，就仿佛它随我一同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而我只是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最最亲爱的，切莫低估了当你听说你母亲偷读我的信时我所受到的惊吓（你父亲可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他看起来粗壮又严肃，喜欢轻松的生活，读小说时会哭泣，当你在这一看似不光彩的事情上受到你母亲责备时他又替你说话！）。这实际上并非是对母亲的恐惧。我觉得不是的，你好好想想。你在家中已足够独立，你母亲也曾读过我给你的信，据我所知这并未造成特别的后果。不如说那个消息的真正后果是，你亲那道陌生而冷漠的目光穿进了你，最最亲爱的，向我奔来的（正如你刚才在梦中带着梦幻般的惬意越过栏杆跳向那行将沉落之物一样）那个小小的（上帝，实际上无比巨大的）空间，这目光让你不寒而栗，令你沉思，因为它让你得以从远处看看你迄今为止只从最近处看到过的东西。我们要又能单独相处并不受干扰该多好！

弗兰茨

〔19〕13.2.16—17夜

最最亲爱的，想象一下我的不幸，我的愤怒，我的不安，我的忧虑和我的爱情。晚上我去了勃罗德家的新居（索菲早已不在，马克斯星期

四回来)。然后我静静地去散步，顷刻便很高兴可以静下心来给你写信，接着便睡觉，睡上一大觉以驱走我的疲劳和感冒。正想着便遇到了皮克，他拉着我，拉着我（由于我根本不与人接触，除非是作为机构的代表，我便想我大概得向所有人屈服），于是我便跟他去了。我们在一间空荡无人、没有生火的咖啡屋里坐了一整夜，倒也不是太无聊。现在已是凌晨3点半，我坐在屋内，尽管屋子很暖，却感到有股冷气穿过脊梁，我说不清这冷气来自何处。最最亲爱的，我还得对你说，你只是粗略地读了我星期的那封信^[113]，否则这是不可能的，那封信中有太多令人讨厌的东西（这个有机会我还将对你解释），所以我很高兴你只是粗略地读了此信并请求你不要最后又去把它再读一遍——但是信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有片言只语讲到了我们之间存在的、可能正在断裂的纽带。最最亲爱的，我还不至于疯狂到对自己加以宣判或诅咒那个比你胸前我的相片更多地属于你的我的地步。你怎么可能在我的信中读出此类意思，你又是用怎样的眼光读到这一切的呵？

而你又是用怎样的手，在怎样的梦中写下我完全获得了你的句子？最最亲爱的，你可以在某一瞬间，在远方相信这一点。但在近处的、长久的获得则需要不同于驱使我的笔不断写下去的肌肉游戏的力量。你好好考虑一下，自己不也相信这一点么？有时候我觉得，我几乎总是超越其上渴望现实的这一信中交往是唯一符合我的不幸的交往（当然我并不是总觉得我这种不幸是不幸），觉得逾越这一为我划定的界限会导致我们共同的不幸。最最亲爱的，我有足够的想象力对自己说，如果我替自己考虑，就得留在你的身边，依偎着不放开你，相反，我如果替你考虑（我们如何融为一体，而我脑海中又是一片模糊，这正是其糟糕之所在），我就该竭尽全力远离你。上帝啊，这会是怎样的结局！可是现在你看，我最亲爱的菲莉斯，我本该寄出这封可怕的信，但3点钟已过，我不能再写另外的信了。我只想说，上封信中所有你不喜欢的地方都不是真实的，也不是那样的意思；尽管这是完全真实的，也是那样的意思，但我是如此地爱你，以至我也会说假话——甚至——相信这些假话，如果你的目光说你愿意。菲莉斯，有时候我觉得你完全控制了我，请把我变成一个胜任不言而喻之事的人。

弗兰茨

〔19〕13.2.17—18夜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最最亲爱的，我昨天的信刺痛了你。开信箱前我就想把它收回，但告诉我，如果那样一个时刻像昨天那样在深夜向我突然袭来，我该怎么办？难道我不该把它写出来，或者该把它留给我自己？过去几天我的确有些不对劲，我本不想写的一些来自外界的但其根源想必是在隐秘的心底深处的句子总是挤进我的信里。最最亲爱的，请不要理会它们，平静地容忍它们或者责备我吧，我只求你留在我身边，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让我留在你身边。

弗兰茨

〔19〕13.2.18

请帮助我，最最亲爱的，我请求你补救我在过去几天里惹下的麻烦。或许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事情，而如果不是我大惊小怪，你也不会注意到什么。但是这闯入我麻木不仁的心灵的焦虑却困扰着我，于是我便写下不负责任的话，或者说我担心自己随时都可能这么做。这些错误的句子窥视着我的笔，盘绕在我的笔端，如此便一同写进了那些信中。我认为一个人绝不会没有能力去完全地表达他想说或想写的东西。有关语言欠缺性的说明及文字局限性和感情无限性之间的比较是完全错误的。无限的情感体现在文字上一如在内心深处一样无限。内心清晰的东西反映在文字上也必然是清晰的。因此我们永远不必替语言担心，但在看到文字的时候则常替自己担心^[114]。有谁能自己知道自身情况如何呢？这汹涌的、辗转的或者泥泞的内心便是我们自己，但在文字从我们心中涌出的那条悄然形成的道路上，我们的自我认识便显现出来，纵使这一认识依然是隐蔽的，但它毕竟呈现在我们面前，看上去或令人愉快，或令人恐惧。最最亲爱的，请为我辩护，原谅我在前一段时间自己写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的话。告诉我你洞察一切，但依然爱我。前不久我写下了针对拉斯克·舒勒和施尼茨勒的污辱性文字。我那时是何等正确！但他们两人还以天使的身份飞越了我在这个地球上所处的高度。还有马克斯的赞扬！他称赞的实际上并不是我的书，这本书已经出版了，这一评价尚有待验证，如果有谁对此感兴趣的话。但他赞扬的首先是我，而这正是最可笑之处。我在哪儿？谁又能够对我进行验证？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只有力的手，只为能认真地进入自己那不相连贯的思想中去。而我之所言甚至不完全是我的意见，甚至不完全是我当时的意见。当我窥视自己内心深处时，我看到那么多模糊的东西在乱窜，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解释和完全地接受我对自己的反感。

最最亲爱的，如果你面临这种迷惘会说什么。这对于旁观者而言，难道不比对当事者更悲惨和更令人厌恶么？当然是悲惨和令人厌恶得多。我能够想象得出需要多少勇气才不至于仓皇而逃。正如我承认的那样，我平静地写下了所有这一切。

弗兰茨

〔19〕13.2.18—19夜

我是如此习惯于沉醉想象之中，以至在现实生活中也改不掉这一习惯，纵使我的心跳在提醒我这一次是现实——最最亲爱的，你对我南方之行所持的态度让我伤心。我并非像你似乎觉得的那样把计划告诉你只是为了听听你有何评价（因为就我本人而言，去哪儿都是无所谓的，除了某些意外的时刻，在哪儿我都不会感觉舒服）。如果早知道最终得到的也仅仅是你的评价——我愿将其作为对我此次旅行的祝福并接受它——那么在第一次评价和第二次评价之间便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没有这一环节我的想象便无法平静下来，因为它们本想带你一同去，带着坚执而绝望的请求。

糟糕的一天过去了么？你是否已不再受折磨？你是如何富有同情心，而同情心又使你如何感动！在完全相同甚至更糟糕的情况下，我肯定只会漠然而坐，自然也不会像你所做的那样——我心中感觉得到，尽管你缄默不语——让那姑娘的痛楚得到这样的宣泄并由于我在她身边而有所抚慰。最最亲爱的，你具有何等的力量！你本人也对这力量感到不知所措，这只能证明它是何等巨大。我无法同任何人交谈，因为我找不到适当的话语，而话语并不是以情绪的变化为转移的，它们不因情绪的变化而匮乏。以前我对自己所知甚少并且认为，一刻也不能忽视这个世界，因为我天真地以为那恰是危险之所在，而我自己将毫不费力、毫不迟疑地去适应我自己所做的观察。那时候，不，实际上那时候也不是，更确切地说，那时候和现在我总是幻灭。只是现在有时候（这取代了那时那些错误的看法）我觉得，或许我也能够在山脚下，在山野的冥冥中写下此类话语，可以登上那山，向山顶飞翔。

一段时间以来我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不再写任何真实的东西，因为正是这不真实试图掩盖最美丽的真实而我便不得不力图通过写作消除它。最最亲爱的，请耐心些（刚才我听到已经快两点了，炮声不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颤抖，我的面颊冰凉，仿佛那炮击中了我们，击中了

你和我)。现在静下来了。最最亲爱的，耐心些。我不该奢求太多，但这已足够了。

弗兰茨

[19] 13.2.19—20夜

夜深了，夜深了。又同许多人度过了一个不必要的晚上。我没有写信，而你远在柏林，没有了依靠，我便任人将我拖向人们想去的地方。一位年轻的妇人在讲她那任性的幼子，这已经是最不错的了，而我却连这也不能完全忍受，我漠然地注视着她——尽管我挺喜欢她——我那呆板的眼部运动许是令她大惑不解，我紧咬嘴唇，为的是使自己能集中注意力，但却徒劳无益，依旧心不在焉，也不在别的什么地方；莫非我那两个小时不存在了么？想必是这样的，否则我会在沙发上睡着的，而我当时在场也便会更令人信服了。

不过我倒是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上午。我一早往办公室走的时候，还觉得一切都那么可憎和无聊，以至于尽管根本不晚我却在去往办公室的路上突然开始跑起来，而我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把这世界的可憎稍微带一些到运动中去并借此使之令人可以忍受一些。但当我接到你的信，读到昨天夜里我希望读到的东西，说你想跟我一起去拉斐尔或者至少在考虑此事，的确还存在此种可能性的世界在我眼中就变得美好起来，已经数星期没有这样了。这么说你将同我一起去，我们一起待在那里，相偎伫立在海边，拥坐在棕榈树下的长凳上，将发生的一切都是“相依偎”。我一直渴望抛弃一切永远相属的这颗心将在我身边跳动。我的脸在战栗，想到绝无可能之事时想必就是这样的，你也只是把这写成了童话：“我为你寻一个美丽的地方，尔后便将你一人留下。”听我说，最最亲爱的，此事的绝无可能正同这种语调相吻合，因为即使那些作为共同旅行的前提的奇迹一一实现，即使我们已站在即将开往热那亚的火车面前，我也不得不留下来，那将是我理所当然的义务。我永远不可以在我目前的处境下，或者在预计到这样一种处境的一直存在着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贸然想做你的旅伴。我理应独坐车厢一隅；我应该待在那里。我绝不可以因为充当这样的旅伴而影响到我竭尽全力想维系住的与你的联系。

弗兰茨

[19] 13.2.20—21夜

今天我在想，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除了我们真正在一起的、对你来说短暂的那一个小时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只有前几个星期的信，我会如何看待自己。这些看法或许足以驳倒并使人忘记以前信中所写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虽然我在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无力地渴望它们在这个意义上的影响更加深刻，实际上我只是满怀反感地粗略地阅读了每一封信，主要是由于我觉得它没能足够深和足够经常地刺痛我，且不说所有别的更易理解的原因。这些信现在想必已消除了你对我的所有想象，对么？如果你面前没有这证明，你能够凭你通常的经验想象出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但又的确是在活着的人么？他活着无所作为，只是围着一个大洞在跑，在守这个大洞。最最亲爱的，你一定以为给你写信的不是人，而是一个伪装的幽灵吧？

但给你写信的千真万确是个人，最最亲爱的（他在斗胆得出这一结论后却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表述做人的后果，这些后果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向你靠近，使出了他可怜的那点儿力量，他觉得到柏林的距离远不如将他与你隔开的高度那样遥远。虽然他怀着良好的愿望，但却只能“一次次地总是令你失望”，正如你今天在信中说的那样（当然是在别的方面，但是这些评论同我的联系是自己形成的，完全不是你的本意）。他只能如此，因为我们只具有与生俱来的力量，即使事关我们的生死，我们也无法从神秘的储备中获取新的力量。

你说在办公室和有轨电车上都无法给我写信。要我告诉你怎么办，最最亲爱的？你不知道该给谁写信。信不是写给我的。如果我将，如果我能够畅言我的悲惨处境，静静地向你走去，你会感到害怕的。纵使看不见你，我也会像发疯的松鼠一样在笼子里转着圈儿四处乱窜，只为能在我的笼子前面抓紧你，只为知道你就在我的面前。什么时候你能明白这一点，而当你明白了以后，又会停留多久？

弗兰茨

〔19〕13.2.21—22夜

〔以下可能是附加的〕

当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睡时，便产生这样的想象或愿望：

我是一块被女厨子顶在其腹部的粗木，她双手持刀从硬木的边上（大约是我的臀部）使劲地切下生火用的木屑。

最最亲爱的，就写几句话，已经不早了，去马克斯那儿以前我还想稍微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白天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床上度过的，理应如此（因为我要么睡觉，要么便去德累斯顿）。我唯一的两次（自然是可怕的经历）是被父亲用他逗一个大侄子玩儿时的喧嚣、单调、持续和一再精神抖擞地重新开始的喊叫、歌唱及拍手慢慢地推向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尽管我百般不情愿。下午逗孙子玩时他又是老一套。最最亲爱的，忍受这样的行为而不对其大发成年人的诅咒是要有美德的，如果这种行为虽然是可以理解的（它是父亲唯一的快乐），但你内心深处却完全不能理解。如此对人大声喧哗！特别是下午，每一声喊叫都仿佛往我眼上猛击一拳。再想想许多年前他们也曾用同样的方式逗我开心。不过那时没人躺在隔壁房间受此折磨。如此折磨我的或许根本不是这叫喊声，受得了家中有孩子根本就是需要勇气的。我受不了，我无法忘却自己，我不愿别人身上流着我的血，它是那么固执，而血的热望便表现为对孩子的爱。我在考虑是不是该在别处找一间自己的房子从家里搬出去，因为目前我侄儿侄女住在家里，他们正在成长期，一天比一天吵人。数年前，当然是出于别的原因，我差点儿就搬出去了，但最后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你今天在哪儿，最最亲爱的？你从我眼中消失了。你要待在德累斯顿，还是晚上就回来？我今天过得很愉快，半睡半醒中我常漫步在德累斯顿。可是醒后我却历数了我目前或真实或虚幻的痛苦（如有足够的想象力，其效果自然毫无区别），我数到了六。如果没有还能忍受所有这些苦难的你，最最亲爱的，这便足以令人愠怒，使人垂头丧气，为了感谢你，同时也为了惩罚你，我只能送你无限的吻。

弗兰茨

〔19〕13.2.23

最最亲爱的，首先把你小侄女的相片寄还给你，以免一再拖延（你大概担心了吧）。是的，这孩子的确招人爱。那恐惧的目光就仿佛她在摄影室里看到了地球上所有的恐怖！她像个成熟的妇人那样把手放在坐椅的靠背上和臀部。我要说我喜欢小维尔玛坐在椅子上的那副样子，尽管这同我下午那封信中所写的相矛盾（可谁能说这不是仅仅因为你的缘故？）。你装饰盒里还有别的相片么？可不可以也让我看看？

读了你妹妹的信我很高兴，我几乎想说，那封信深深地感动了我，

请不要误会。倒不是因为她将孩子完全置于自己之上，她这么做的方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而是因为在这由琐屑的、一致的、特别是极其协调的细节组成的无际的波澜中真实地显现出一种坦率。对兄弟姐妹的看法，历数各种礼品和各种海关费用。最最亲爱的，请不要误会，我这些看法同我对你妹妹应有的尊重和敬意毫不相干。恰恰那些按常理似乎没有任何可以享受之物的地方总能打动我。我正在想，前天晚上我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就在这时，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熟人走出了房门，他是一家犹太人书店的店主，更确切地说是那店主的儿子。他大概年已四十，数年前曾同一个高大丰满的姑娘订了婚，后来由于没得到足够的钱又取消了。再后来，这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娶了一个娇小玲珑的女人。我还记得他们到我们以前的家中做客，那女人说起话来异乎寻常地不连贯。现在我几乎觉得她大白天也穿着拖地长裙，她总是用脚把长裙的后襟往边上踢。那女人几星期后便发了疯，听说主要是那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男人的父母造成的，她进了疯人院，两人离了婚，那男人虽是百般不愿意，也不得不退回大部分彩礼（这使我父亲得到了满足，他一直关切又不无幸灾乐祸地注视着这个家里发生的事情）。那男人重又自由了，却没有再婚，或许他父母不再要求他这么做了，而他对父母是绝对顺从的。他从来没有自立过，自打离开学校，小半生就待在那家小书店里，店里没什么活儿，他便在佣人的帮助下把换下的祈祷用的面纱上的灰尘弄干净。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便站在敞开的店门里（以前他和他父母轮流站在那儿，现在他父母常常是疾病缠身），天冷了他便站在挂满书籍的门后，透过大多不严肃的书籍间的空隙朝胡同外边看。他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是本地德国俱乐部的成员。那虽是一家极普通的俱乐部，但本地的德国人却觉得它是最好的一家，他现在大概每晚都到“德意志之家”去。他前天晚上又去了，我碰巧瞥见他离开家。他朝我走过来的样子正是我记忆中一如往昔的那个年轻人。他的后背极其宽阔，走起路来也特别笔直，以至无从得知他是走路笔直还是长得畸形。总之，他是个瘦骨嶙峋、下颌骨极大的人。最最亲爱的，现在你明白么，你能明白么（告诉我），为什么我简直是贪婪地跟踪这个男人穿过了蔡尔特纳尔南同，在他身后拐进了路旁的明沟，并津津有味地看着他消失在“德意志之家”的大门里？时候不早了，有句习惯语你是用不着的，把它给我，让我说：“爱我！”

弗兰茨

你妹妹？总是执拗地为我自己的不幸而辗转的我对此一无所知，在我给你寄到德累斯顿的信中我祝愿你度过“平静的时光”，我可怜的心。如果我在今天这样的正常状态下对你德累斯顿之行的目的有所了解，我会不顾疾病缠身同你一道去德累斯顿的，因为我虽愚钝，也无法忍受你一个人孤苦凄凉地待在那里。前一段时间我就有点觉得你姐姐突然放弃了德累斯顿那个很好的位置，而你则在柏林帮她谋一份在教授等处工作的极特殊的差事，但我就那么看过去了。如果要你告诉我会让你为难，那我便根本不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想必是还存在着最渺茫的可能性，或许我能出出主意或帮帮忙（这是为了你，而这又给我力量和敏捷）。最最亲爱的，你必须马上——我是说马上！——告诉我你现在怎么样。今年秋冬我真的刚好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抓住你，但迄今你此次德累斯顿之行的收获及归程情况依旧一无所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我本该同你一起去德累斯顿的，说不定什么地方你用得着我，而看到你受苦会使我有能力去做许多事情。

我几乎不敢再往下写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星期六和星期日那段时间你全部心思都在此次旅行上面，那时我正坐在马克斯的新家里，实际上我并不比以往更不幸。你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仿佛并不是我脚底下的那块土地同那块显然你正极度不安地在其上来回徘徊的土地连结在一起——天知道你现在怎样了，而我则在冷漠地一句句地写着。最最亲爱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懂得挥鞭长驱直入的人才真正把握生活。我不想劝你不要陷入这种惊恐之中，即使这些惊恐是毫无意义的——我怎么可能要求你不跟从心灵的呼唤呢？因为我自己除了同样行事外，不知道其他更好的良策。但眼下你在柏林，你就放纵些，要好自珍重。不妨暂且容忍你母亲的那些会议，你姐姐的跳舞晚会，那些手工活，还有你的姨妈，你只管睡觉，睡觉！只有在睡梦中我们才属于善神，太多的失眠会摧垮你。

弗兰茨

〔19〕13.2.24—25夜

最最亲爱的，现在我真是一筹莫展了。我看到你陷入不幸，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你又哭了，我却无言相劝；你说你需要人帮忙，我却不能给你出任何主意。现在连你也被牵扯进我不清楚的不幸之中，这千真万确是缠绕着我的不幸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取得的进步的一种了。最最亲爱的，我真的想同你一道远走高飞。我们为什么要容忍被人从天上抛到这

个黑暗的、折磨人的地球上来呢？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满怀钦佩地站在一家图片商店橱窗里的一幅印得不好的彩色图片前，图片上描绘的是一对情侣自杀的情景。那是一个冬夜，只在这最后的时刻可以从巨大的云朵间看到月亮。他们站在一个小小的木制登陆跳板的尽头，正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那姑娘和那男人的脚同时向深处迈去，可以屏气感觉到他们已被重力吸住了。我只记得那姑娘赤裸的头上戴着一面薄薄的浅绿色的面纱，那面纱在轻轻地随风飘舞，而那男人的深色大衣则被风吹得紧紧地贴在身上。他们相拥着，说不清是她在拉他，还是他在推她，他们那么协调而又匆匆地向前走着。尽管后来才认识到，但那时大概就已经模糊地感觉到除了图片上所描绘的，爱情别无其他出路。可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更喜欢的自然是通常挂在上面那幅图片旁边的一张图片，上面描绘的是一只野猪猛然从森林深处跳出来，由此搅了森林深处猎人的早餐，猎人们躲到了树后面，盘子食品满天乱飞。

最最亲爱的，除了静等你重新镇定下来，我别无选择。你父亲又外出么？我觉得你本可以同他讲讲所有意外事件的；他或许不像你母亲对此那么关心，但正因如此你便更容易得到他的指点，纵使得不到指点，也能得到安慰。但他想必是在家的，因为你在信上说，你必须哄骗你父母。或许有必要再去一次德累斯顿？我会像你一样安排好并愉快地去做这次旅行的，因为我想你第二次离家出远门要比第一次难吧？可是与其说我这些问题减轻了你的痛苦，倒不如说它们更加剧了你的痛苦，可我只能如此；所有人都渐渐地从我眼前消失了，我只看见你，而你却是如此不幸。

弗兰茨

〔19〕13.2.25—26夜

你真的已不再烦恼了么？从早晨的信上看似乎是的。但你不会只是在我面前克制着自己吧？收到电报后我并没有马上打开，而是在手里揉了一会儿。上面会写些什么呢？我很清楚你是那么善良，而我又那么竭力利用你的善良（我现在全部的生命已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在消磨时光）——你给我发电报是想驱除我所有可能的担心，这一点我想是毋庸置疑的。有那么一刹那，我想电报上也许写着：“快去火车站，我一刻钟后即到。”我承认这样一封电报会吓坏我的。我甚至只会感到恐惧（有一瞬间我真感到了），仿佛被人从漫长的夜晚突然惊醒一般。这许是我的低烧所致，这把整幢房子乃至整个城市变成一张床的恼人的低烧。但电

报中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我的孤独一如从前，只是有时候我的脸从我正写信的信纸上呆板地望着我，以至于我真想扔掉那支笔，这样便不必总依恋着你，征服正直的人，便可以沉醉于我的思绪之中，我感觉得到这思绪在我下面慢慢地辗转反侧。

我对电报内容的第二个想法则完全相反。“这么说明天我可能收不到信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一担心。最最亲爱的，你是不是有点误解了我说你妹妹的意思？我甚至觉得她很有个性，只是她对孩子的爱略显单调，让人觉得她教育不好孩子。另外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中没有提到那个男人，就是你妹夫，那封信同上封信之间隔了好长时间呢。

最最亲爱的，今天这是第二封没写完的信了，别忘了写完！第一封写到你上三年级时发生了一件显然很意外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绘画课，这一封写到西里西亚，你正帮你妹妹做作业。

最最亲爱的，我也很想知道你如何评价和解释前不久那个书商的儿子带给我的满足。你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都会让我感到进入了你心灵的更深处，重新允许我活在你心中，使我暂时抛却虚假的生活，置身于火热的现实中。

弗兰茨

〔19〕13.2.26—27夜

今天晚上我被人羞辱了。我同韦尔奇一起散步（他那本书〔《观点与概念》〕已经出版了。你感兴趣么？我想不会的，这书太富哲理了，连我都得强迫自己读懂它；如果那儿没有可搁手的东西，我便极易走神）。我同韦尔奇一起去散步，不知不觉地他便开始说起并批评起我的忧郁来——这也没多久时间，或许只是一时心血来潮。令我感到羞愧的并不是他试图提醒我。我愿意听人提醒，一片空白的脑海中想想这些事是很舒服的，况且韦尔奇今天讲话又极睿智。令我感到羞愧的是他认为这一提醒是必要的，尽管实际上我以不被人察觉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要求他这样做，尽管他眼下自顾不暇。但最令我羞愧的是他一直试图不让我察觉到他在提醒我——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已不重要，我是在讲我的羞愧；他泛泛地讲着，我感到他思路变化很快，议论很简短，这是他极喜欢且认为极自然的。

羞愧又于事何补！那晚有雾，他是怕雾的，把他送回家后，我想到

咖啡馆去（在那儿本可以碰到韦尔弗和其他人），却又有些害怕，几经反复之后我想回家去。就在这时我碰到了一个人，是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大学生，他理智、勤奋、活跃、亲切，却又沉静得令我不解。他停下来同我说话，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重要的集会（他已在我身上浪费掉了多少诸如此类的邀请呵！），我当时对他这个人和各种形式的犹太复国主义都丝毫不感兴趣，但你得相信我，最最亲爱的，我找不到社交上可行的借口同他告别，虽说默默地握握手也便足矣。出于这个原因我说可以陪陪他，并且真的陪他走到了我先前想去的那家咖啡馆门口。但我没有进屋，而是出乎意料地潇洒自如地同他握了握手，然后便溜之大吉。

时候不早了，而今晚的事却几乎什么也没讲给你听，虽说孤独的我
有那么多话要对你说。

弗兰茨

〔19〕13.2.27—28夜

夜深了，最最亲爱的，夜深了。我给办公室起草了一个文件，夜已深了。我觉得冷，莫非我又感冒了？这真讨厌，我的左半身总是冷痛。

你怎么能说我如果哪次收不到你的信就会为此生你的气呢？我要你理解并记住，你给我的一切让我对你满怀感激，你写给我的每一句亲昵的话对我而言同在上帝面前一样都比我所有的信的总和更珍贵。现在你时间很紧，就不要挤时间写信给我了，如果写信会占用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对你来说必不可少的睡眠时间，一天不写信也不要紧的。我要你知道，不管中间可能空过多少封信，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等着你的下一封来信。不管身边的一切如何改变，我对此的态度都不会改变。今天晚上，白天也是，我较以往平静和镇定一些，现在一切又都过去了。此外，我还想看看那个能够不伤害自己且能忍受我生活方式的人，尤其是我每晚都要独自一人散步。在家里我几乎不跟任何人讲话；同我妹妹主要是写作上的联系现在也很松懈了。你我目前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你身边总有人在，而我身边却几乎没有任何人。办公室的同事令人难以捉摸，特别是眼下，一段时间以来我觉睡得多了，工作也不感觉太吃力了。这份工作同我一样无足轻重，我们挺相配。过几天我甚至要做副干事了，对我完全合适^[115]。

前不久我走过艾森胡同时，听到旁边有人说：“卡尔怎样了？”我转

过身来，看到一个男人自言自语着走远了，根本没有理会我，那问题也是他自言自语地提出来的。可是我那部不成功的小小说的主人公就叫卡尔，那个毫无恶意地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不自觉地完成了嘲笑我的使命，因为我无法认为他是想哄我开心。

关于我伯父的那封信，前不久你问我有些什么计划和希望。这问题是我始料不及的，现在听到那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提出的问题我又想起了你这个问题。我当然没有任何计划和希望，我不会走进未来，我倒是能够冲进未来，滚进未来，能够踉跄地走进未来，而我最拿手的是可以驻足不前。但我的确没有任何计划和希望。如果过得不错，我就会完全沉醉于现在，如果过得不好，我就会诅咒现在，哪里顾得上未来！

弗兰茨

〔1913年2月〕28—3.1夜

最最亲爱的，就写几句。晚上在马克斯那儿过得很愉快。我快速朗读着我自己的著作[116]。后来我们便惬意地不停地笑着。如果我们把通向这个世界的门窗关上，便会看到一种美好的生活现实的虚幻影像，甚至其开端。昨天我开始写一篇短小的作品[117]，刚刚开始，连标题还没有，没什么可讲的。今天打算写得虽好，我却并没有去写它，而是去了马克斯那儿，便更觉是种罪过了。不过要真是值得写的东西，或许也能够等到明天吧。

弗兰茨

星期六〔1913年3月1日〕，〔凌晨〕2点

现在是星期天下午，我心不在焉。鲍姆因有关出版的事儿去柏林待了几日刚回来，我在他那儿听他们七嘴八舌杂乱无章地说了好些个新鲜事，但我还是粗鲁地喝住了我挺喜欢的鲍姆夫人并把她从屋里赶了出去，她沉浸在柏林之行的成功之中，总是打断奥斯卡的话。我头痛欲裂地上了楼，现在坐在那儿，头依旧很痛。对了，奥斯卡4月1日在科林特沃特礼堂讲课，我是否该同他一道去柏林？

头痛是夜里引起的。昨天晚上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总是走神，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人的理智告诉我，应该起床，趁夜深人静之际写点东西，但我做不到。

最最亲爱的，你说的那封信没有到。最最亲爱的，得不到的东西，事先不要告诉我，不要告诉我。我对一切都知足，你发自内心的一句话也会使我满足的，但不要告诉我得不到的东西，最最亲爱的。我还没有收到你妹妹的地址^[118]，是时候了。如果包裹到最后不能及时寄到，你会说这是我的过错，并不再信任我，而我是多么乐于接受这样的任务呵！我为此感到骄傲。请马上寄给我一张小纸条儿，我好把它塞到包裹里，否则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你妹妹明白东西是你寄给她的。要么你直接跟她说。我在冰冷的房间里给你写信，所以信写得快而潦草。再见，最最亲爱的，我要你属于我。

弗兰茨

〔19〕13.3.2

我妹妹、妹夫们都走了，已经10点半了，但父亲又坐下来，硬让母亲打牌。我因为最近有些着凉，他们便让我去了客厅，我便听着打牌的声音给你写信。母亲坐在我对面，我右面是坐在桌子一端的父亲。刚才父亲把一个水瓶搬到阳台门儿前边的时候，我边继续写信边对她耳语道：“去睡吧。”她大概也是想去睡觉的，但这太难了。

“两圈儿加磅。”父亲说，这就是说至少还要再玩两圈儿，有时候得打好长时间。我刚才又同我妹妹一道散步去了，我们在说别的事情，那时我感到一种恰恰是在与人交往时常有的孤独感（别人想必也常有同感）。我在想，你是不是还能像从前那样受得了我，最最亲爱的（我总称你为最最亲爱的，因为除了你，我再没有别人，将来也不会有的）。从你的信中我没太看出来你对我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更确切地说，我根本没有看出任何变化。

（最最亲爱的，已经1点了，这期间我几乎完全被从我的故事中〔未完成的《里曼的故事》〕抛出来——决定是我今天作出的，结果我却写不下去了——如果你要我，我会小心翼翼地再回来接着给你写信的。）我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你的看法有了变化，主要是由于我前一段时间的表现，我对自己说我已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待在你身边。前一段时间我所经历的其实并不是什么特殊状态，我处在这种状态中已有十五年了，我借助写作得以较长时间地摆脱这种状态，并在没有认识到这种“摆脱”是何其短暂的情况下鼓起勇气找到你，在对自己虚幻的新生的信念中，相信比任何人都应对此负责，于是我试图争取得到我一生中找到的

最亲爱的人，那就是你。可过去几个星期我在你面前又是怎么表现的？如果你还理智，又如何受得了待在我身边？我毫不怀疑你通常是有勇气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的，哪怕改变只是初露端倪。可是最最亲爱的，你的善良远胜于你的直率。因此我担心的是，即使我令你反感——你毕竟是个姑娘，你想要的是一个男人，而并非这世界上一个可怜虫——即使我令你反感，你的善良依旧会一如既往。你知道我整个身心都属于你，即使对自己的理智的怜惜在命令着我们，又有谁会无所顾忌地扔掉一件如此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尤其是你，你会这样做吗？你能战胜自己的恻隐之心么？总是被身边每一个人的不幸所深深打动的你会这样么？我则不然，我不否认可以靠别人的同情生活，但我却绝对无法容忍去享用会毁掉你的同情的果实。最最亲爱的，好好想想，好好想想！相对而言，其他一切都比这容易忍受，一句无论带有何种感情色彩的话都比那种同情更易忍受。本是为了我好的这种同情到头来会害了我。你离我好远，我看不见你，可是如果你在忍受着同情的煎熬，我还是会知道的。所以，最最亲爱的，为了让我放下心来，我请你不要回避，请你今天就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你至少是毫无疑虑地、清楚地、纵使是可能有些依恋地发现你可以没有我，如果你认为我妨碍了你对生活的安排（为何我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你觉得善良、勤奋、活泼与自信的你同迷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糊涂的我不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或者只能是有损于你的共同之处的话，那么你是否会，最最亲爱的（不要轻率地回答我，你要明白你得对你的回答负责！），那么你是否会坦率地告诉我而不理会你的同情心？再说一遍：这里说的不是对真理的热爱，而是善良！如果你的回答只是否认我的问题的前提的可能性，那这一回答是无法令我满意的，它也无法消除我对你的担心。更确切地说这已经是令人满意的回答了，因为我们承认对同情心无能为力。可我为什么要问这些，为什么要折磨你呢！我是知道答案的。

晚安，最最亲爱的。就写到这儿吧，我该去睡了，实际上倒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心不在焉和绝望。

弗兰茨

〔9〕13.3.2—3夜

最最亲爱的，今天没有你的信。理由很简单，昨天你妹妹在柏林，所以你没有时间写信。可我还是没有布达佩斯的地址，如果明天还收不到的话，生日可能就赶不上了。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倾诉，如果可能，我只想把我整个的生命托付给你，而现在我却握着举起的笔，静坐良久。昨天的信说到底是一个问题，我在等着你对此的回答。由于今天没有你的信，我便荒谬地觉得昨天的信你还没有回，其实我那封信你明天才能收得到。我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一扇紧闭的门前，门后便住着你，可那门却永不会开启。唯有通过敲门才能够沟通，但这样一来门后也静了下来。不过有一件事却是我可以做到（我怎么如此紧张！墨水瓶里的墨水不多，所以瓶子便靠在了一个火柴盒上，我突然把笔浸入墨水瓶，它便从火柴盒上滑了下去，我全身上下一阵战栗，两只手伸向空中，仿佛要请求什么人的宽恕）——有一件事却是我可以做到的，那便是等待，虽然重重攥住我的紧张似乎与此相矛盾。对我而言，失去耐心只是等待时的一种消遣，但等待的力量是不会因此受到损害的，即使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力量，而只是软弱和根据最微不足道的命令对使用过的极少力量进行的恢复。最最亲爱的，我这种性格会将你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对你说这个是对昨天信的补充，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最最亲爱的，即使我命中注定——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最悲惨的事情——内心深处同你有一种与其外部过程相符合的关系，即使我只能永远站在你家侧门前等待着你，而你则从正门进进出出。不要因此而动摇了你对我的评价，即使我俯身对你行吻手礼，我也请你说出你真实的看法而不必理会我！太容易做出估计了，你绝不会说出任何令我吃惊的话来。我已不再是我们通信头两个月时的那个我，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变化，而是重新变回，也可能是持续的。如果那时你感到被那个人吸引住了，那想必你会厌恶现在的这个人。如果你隐瞒这一点，那是出于同情和受到欺骗的回忆。如果你能明白，那么现在已变得面目全非的这个人不改初衷并理所当然地比以往更深地迷恋着你的事实，在你看来只能觉得他更令人厌恶。

弗兰茨

[19] 13.3.4—5夜

最最亲爱的，过去一段时间你得承受许多，你承受这一切的方式我一方面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却盲目地认为你必会如此。无论你在信中抱怨、疲惫甚或哭泣，我透过你的那些信看到的你却是那么坚强，那么生气勃勃，以至于我因为惭愧和对这种对比——一边是你，一边是我——的伤心恨不得躲起来。因为我并非存在于自我中，我并不总是“存在”的，如果什么时候我“存在”了，我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数月的“不存在”。如果我不能及时清醒过来，深受其害的便是我对人的评价及我对整

个世界的评价；这个世界之所以令我绝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歪曲评价，虽说这种评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可以自行得以纠正，但也只是徒劳的一瞬间。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今天晚上我同马克斯、他的夫人以及韦尔奇一起去了影剧院（这提醒我马上就到2点了），影剧院的前厅挂着许多电影《另一个人》[119]的剧照，你想必读过此书，巴塞尔曼参加了该片的演出，下周这里将上演这部片子。有一幅宣传画画的是巴塞尔曼一个人坐在靠椅上，那幅画使我又激动起来，就像当初在柏林时那样[120]。不管是马克斯、他夫人或者是韦尔奇，我逮着谁，便把谁拉到这幅画前，弄得人家都很烦。这些电影剧照令我大为不快，完全可以看得出他参加拍摄的是部苦戏，拍摄的都是些年代已久的虚设场景，不管怎么说，一匹奔腾的马的瞬间照片几乎总是漂亮的，而罪恶的人的鬼脸的瞬间照片却很容易是毫无意义。所以我对自已说，巴塞尔曼至少是在这部剧中扮演了同他身份不相符的角色。但是他用心感受着剧情，他的内心自始至终经历了剧情的起伏，而这样一个人所感受到的无疑是值得人喜欢的。我对此尚能作出正确的评价，虽说这实际上已有点超出了我的范围。等着开大门的时候，我在下面站了一会儿，长夜里我环顾四周，又想起那些电影剧照，开始同情起那个巴塞尔曼来了，觉得他是最可怜的人。我想象着表演时的自我满足已经过去了，电影拍完了，巴本人不再对片子有任何影响，他甚于不必弄清楚自己被人利用了，但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会意识到他为此耗费的巨大的精力是毫无意义的——我并没有夸大我的同情心——他会变老，体力也会衰弱，会坐在靠椅上靠边站并终有一日会在时间的长河中埋没。这是何其错误！这正是我判断错误的原因。片子拍完后回家的也还是巴塞尔曼，而不是别人。如果他要起身，便会完全站起来，不再留在那里，不会像我那样试图把这说成别人的过错，不会像我那样围着自己飞来飞去，像一只被咒语咒得无法靠近自己巢穴的鸟儿一样不停地绕着早已空空如也的巢穴飞来飞去，紧盯着它的巢。晚安，最最亲爱的。我可以吻你么？可以拥抱你的身体么？

弗兰茨

〔19〕13.3.4—5夜

最最亲爱的，已经10点多了，我像你前天一样疲惫不堪。我回到了自己这间冰冷的屋子（嘘，现在我听见父亲正在隔壁屋里讲有关工厂的事情），我在隔壁已待累了。你要知道从今天起我会在一段时间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它到目前为止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或许现在会不同了；如果朝左躺着睡不着，人就会翻过身来（但经常又会后悔

的，所以便没完没了地翻来覆去）朝右躺着，我的生活便如同是在床上睡觉（隔壁还在说着有关工厂的事情，我真听够了，看来我走得还真是时候）。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于：我——

信写到此中断了，隔壁房间没人了，我跟父母道了“晚安”，父亲正站在长沙发上给挂钟上弦。我于是便去了客厅，却下不定决心继续写信，便取来马克斯和费利克斯的书（《观点与概念》），把引论部分又重新读了一遍，有些地方堪称大家手笔，仿佛出自素不相识但很有名望的第三者之手。信被我搁在一边，因为我突然觉得我总是翻来覆去地写我自己，甚至总是不停地在重复着老一套，觉得我总是在你面前吹嘘自己却又不知道你心里是否厌恶、不耐烦或无聊地发抖，这真令人作呕。最最亲爱的，我说这些时并不因此而对你有丝毫的怀疑，相爱的人还是可以这样说话的，你今天赠送给我的序诗中也是这么说的，我很喜欢这首诗，尽管它不够完整，有些地方也略显太粗浅。还有，最最亲爱的，我责怪自己完全是因为那些信的缘故，请你理解我，不要生我的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你就坐在旁边那张沙发上（我正用左手把它拉近一些），那我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些可能性，即使我要对你讲的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比我信中写的还要糟糕得多，这是极有可能的。（这是对日后相聚的一个小小的诱惑，对么，菲莉斯？）是的，或许我明天会收到你给我的一封糟糕的信，但你还是应该坐在这张沙发上，桌子也得挪开，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只顾遐想，都忘了往布达佩斯寄包裹的事情，包裹当然已经寄走了。

弗兰茨

〔19〕13.3.5—6夜

不，这不能让我满意。我的问题是你尤其是对我的感情是否是一种怜悯，而且我也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你却只是说：不是。给你写第一封信时的我是另外一个人，几天前我草草整理写字台时（我总是草草整理写字台的）发现了复写的那封信（那是我仅有的一封复写的信）。你将无法否认那时的我和现在不一样，虽然间或有些颓丧，我还是稍微找回了一点儿自我。莫非是我把你引入了这伤心的阶段？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你仅仅是同情我，那我为何要渴望你的爱情，堵住你所有的退路，强迫你天天给我写信，逼你思念我，用一个软弱无能者的软弱无力的爱去折磨你，而不是宁愿去寻找一种可能性，以便能小心翼翼地让你从我的爱中得以解脱，独自一人静静地享受被你同情的感觉并以这种方

式使自己至少值得你同情。或者你不仅仅只是同情我，而是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被迷惑住了，对我悲观的性格缺乏正确的认识，避而不读我对此所作的坦白，下意识地使自己无法相信我这些坦白，虽然另一方面你的天性迫使你相信这些。为什么我不鼓起自己尚有的全部勇气把情况向你说明，为什么我不选择那些不会被忽略、误解和遗忘的最简短、最清楚的话呢？是否我还有希望或者我幻想着能让你留在我的身边？如果是这样——有时候看来也似乎如此——那我就有义务从自我中走出来无所顾忌地保护你免受我的伤害。

但的确还是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的：或许你不仅仅只是同情我，你也正确认识到了我目前的处境，但你依然认为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以为可以同我进行和谐、平静和富有生气的交往。如果你这么认为，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目前所处的状态（相比较而言，今天已经很不错了）不是什么特殊的。菲莉斯，不要被这些假相迷惑住！若同我一起生活，用不了两天你就会受不了的。今天我收到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的来信，我在鲍姆家见到过他二三次。他在信的结尾处称自己是我“极忠实的追随者”。我一想到这个就不舒服。这是何等错误的看法！我如何才能将我的心全部撕开，让人看清一切，把他们都吓回去。不过我得说，即使我是个英雄，我也想把那个高中生吓回去，因为我不喜欢他（或许是因为他太年轻了），但极其脆弱的我却想得到你，最最亲爱的，还是你，最最亲爱的。

弗兰茨

〔19〕13.3.6—7夜

最最亲爱的，我疲惫地去了小歌舞剧院，现在是休息时间，我坐在这儿给你写信。音乐让我心烦，烟雾扑面而来，一个舞女（天哪，我太理解这舞蹈了！）刚跳过水手舞（那摆动，跺脚，身体的舒展以及重新开始时微垂的头），她站在剧场走廊，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能专注于这一纸属于你的信笺，在这种地方写信看起来实在奇怪，但正因如此——这谁也不知道——我才得以成为人中之人。

我1号是否去柏林自然是个诙谐的谜，虽然说得不是特别诙谐。但广告博览会的票没什么问题吧？

最最亲爱的，今天这样的信只能放松我让你了解我并说服你相信同

我不可能有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努力，为此浪费掉的每一天都是对我的责备，虽然我今天受了你那封信的影响——临出门前我又在家里把它迅速读了一遍，现在它装在我的上衣内袋里——铃声响了！天黑下来了。

已经这么晚了。我早早便离开了剧场，倒不仅仅是因为总觉得疲惫——今天一整天我都在盼望着把眼睛闭上——也是因为在全面散场之前从拥挤的人群中逃脱总让我感到舒服。你明白么？

现在请带上我，最最亲爱的，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在适当的时候推开我！

弗兰茨

[19] 13.3.7—8夜

亲爱的菲莉斯，为什么你的信让我变得软弱并使我无法再提起那支总是不断地写着真实的我、不断令人悲哀地揭露着我的笔？

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一点你也承认，这也没什么不好。只是从那到这，我经历的并非笔直的发展过程，而是被完全抛回到我过去的生活道路上，这中间既没有直接的也没间接的联系，有的只是伤心的空中和幽灵之路（以上是饭前写的，现在吃过饭了，保姆刚刚抱着小费利克斯穿过我的房间到卧室去了，父亲跟在保姆身后，父亲身后是我妹夫，我妹妹紧随其后。他们把费利克斯抱到他母亲床上。父亲在我屋里，贴着卧室的门在听费利克斯是否还会再喊他，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他。费利克斯还真的又喊外公了，父亲高兴得直发抖，又好几次很快把头探进卧室里去，逗得那孩子又喊了他好几声“外公”。菲莉斯，你的变化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过去几个月展现在我面前的你的内心依然圣洁无瑕。

关于我那些诉苦，你在信中说我不信，你自己也不信。你这种看法恰是不幸之所在，对此我是有责任的。我不否认（可惜我有最充分的理由）自己在练习诉苦，以至于我像街上的乞丐一样总在诉着苦，即使并不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但我意识到自己每时每刻都有义务说服你，因此便不自由自在地抱怨着，虽然脑子里什么也没想，而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你在信上说“你不信”，结果我真的抱怨时，你也不相信了。

不说这个了！至少在结束这封信前不说这个了！昨晚由于各种原因我感到格外孤独，其实这是最美妙的事情，因为这样便没有人能够打搅我了（虽然我正跟许多亲戚一起散步）。我身边空荡荡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到来精心准备的。你真的来了，离我很近，尽管我看似那么孤独，甚至几乎是莫名其妙地孤独。

弗兰茨

〔19〕13.3.9，星期日，饭前

不，我过的是一种多么不理智、多么松懈的生活！我根本就不想说这些。今天这个星期天我是怎么过的——垂头丧气却并非不幸，闲坐着但并不十分无聊，先跟马克斯、继而又独自一人（几乎如释重负般）散步——却总觉得有压力！

“我感到可能会失去你”，我又怎么可能不失去你呢，最最亲爱的！因为我自己剥夺了留住你的权利（但用“权利”这个字太轻了，“剥夺”也太轻了！），因为我自己剥夺了留住你的权利。最最亲爱的，不要以为万恶之源是我们相距遥远，正相反，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一距离，我才拥有对你的权利，至少是这种权利的假相，我紧紧抓住这一假相，只要还可以用无把握的手去抓无把握的东西。

还有，昨天晚上我有个发现，这发现本是可怕的，但它却几乎使我如释重负。我从鲍姆那儿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我不想再写信给你了，尽管对于我反复无常的情绪而言，只为稍稍变变花样而偶尔不及时给你写信太不值得了。如此说来，我本可以好好写封信给你的，也可以享受这一善行，但我还是没有写，也不想去睡觉，因为刚才稍微散了会儿步，我到现在还觉得很不舒服。我早早就同马克斯夫妇和费利克斯道了别，然后到咖啡厅去接我亲戚，接着便和他们一起散了会儿步。我面前正好放着我一部小说的底稿（这些稿子已好久没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找了出来），我便拿起稿子读起来。刚开始时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信任，仿佛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善—半善不恶—恶的次序，可越读越惊讶，到最后便坚信整部小说只有第一部分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其他部分除了或长或短的几个段落外，都是在对一种强烈而恍惚的情感的追忆中写下的，所以尽可扔掉，也就是说，四百页底稿将只剩下五十六页（我认为）。除了这三百五十页稿子，去冬今春我还写了大约二百页完全不能采用的底稿，这样算来，这故事有五百五十页纸是白写了。现在

晚安，我可怜的最最亲爱的，愿你梦到比你的弗兰茨好的东西。

弗兰茨

〔19〕13.3.9—10

我如何配得上这盒可爱的花儿^[121]？我不知道自己有何功劳，我想我更配得到一只里面装着魔鬼的盒子，他牵着我的鼻子不肯放开我，我不得不一直背着它。知道吗，我以前对花儿实际上一窍不通，即使现在我也只是喜欢你送给我的花儿，为了你对花儿的爱。打小时候起我就总是为了自己对花儿一窍不通而苦恼，这同我对音乐的一窍不通有某些相同之处，至少我常常感到它们之间是有这种联系的。我看不出花儿美在哪儿，在我看来，一朵玫瑰太冷漠，两朵玫瑰太单调，而一束一束的花儿则过于随意和无益。正像人无能时常常要做的那样，我也常常努力给人造成一种我很喜欢花儿的假相，我真的蒙骗住了一些人，这些人对花儿有一种呆板的、绝非与生俱来的偏爱。比如我母亲就觉得我是个喜欢花儿的人，因为我总爱送人花儿，看到被铁丝网围住的花儿便几乎要不寒而栗。但实际上我并非因为花儿的缘故讨厌那些铁丝网，我想的只是我自己，也正是这个原因我讨厌缠绕在生气勃勃的花儿上的铁丝网。要不是高中快毕业及大学时代的那个朋友（他叫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是他的姓，几乎是一个花儿的名称，对么？），我或许还没有特别注意到自己对花儿一窍不通。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是特别温柔，甚至毫无乐感，却极爱花儿，当他赏花、剪花（他有个很漂亮的花园）、浇水，把花儿插到花瓶里，在手上拿着或者送给我时（我常常问自己该怎么处理这些花，又不想说得太明白，但一般来说我总是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方面我骗不了他），他对花儿的这种喜爱便使他变成另一个人，以至于他说话的声音也变了，我甚至要说变得悦耳了，虽说他发音上有些小缺陷。我们常常站在花圃前，他望着那些花，我却无聊地视而不见。如果他现在看到我那么小心翼翼地把花儿从盒子里拿出来，把它贴在脸上，而且久久地注视着，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我该怎么感谢你给我的爱和善良，菲莉斯？

弗兰茨

〔19〕13.3.10—11

这真叫人伤心，菲莉斯，你在诉苦，而我却只能像一个又瞎又聋，四肢不能动弹，只还能听得见的人一样听着。最糟糕的是我在错怪着

你，至少是曾经错怪过你，因为由于你在信中不再提这件事情，是的，你对此避而不谈，所以我就想经过你和你妹妹的这次旅行，要么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要么至少也不会再有什么恶化和新的混乱。写前几封信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还并无恶意地要求对我的事情感兴趣，你却在受着长久以来的痛苦的折磨，当然你对此只字不提。最最亲爱的，我不知道这些，因为这不是你的秘密，而是你妹妹的。但如果你说“你已精疲力竭”，我却是要知道的，为的是不再因为对你的处境一无所知而加剧对你的残忍，我对你已经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残忍了。你能不能把你姐姐的相片借我看两天，也好让我知道你在为谁担心？你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一不幸的人么？托尼什么也不知道吗？

这多叫人伤心！而我又是那么一筹莫展！最好是到柏林去，把你拥入怀中，将你抱回来。可是，如果我能够，我早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在想，是否可以叫你“菲”？以前你有时候也是这样署名的，这也让人想到“仙女”，还有美丽的中国，这毕竟是适合耳语的一个字。那就叫你菲了？要是你喜欢，就同意吧，不管你叫什么，我都爱你。

今天你在信中做了异乎寻常的自我表白！照此说来你是一个平平静静时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的软弱的人。听我说，你不会是想把自己伪装起来让我自己吓唬自己吧？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认为，为什么过了星期六晚上又烟消云散了。你不应如此，至少是在你觉得自己“无所适从”时，相信我，我在这方面还是有经验的，你看起来不像这种人，你的目光也和他们不一样。造成你目前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只能是，你承担他人痛苦时比承担自己的痛苦还沉重，因此是外因使你陷入一种内因不可能使你陷入的迷惘。

弗兰茨

〔1913〕.3.11—12

最最亲爱的，就几句话，这样挺好。已经很晚了。我去马克斯那儿了，后来又去了咖啡厅，独自一人读了所有能读的东西。或许我该早些回家，进咖啡厅的时候我还在犹豫，但我还是进去了，回家吃晚饭已经来不及了，加上我又那么渴望看看杂志。往长沙发上坐下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该不该再待会儿。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只能用指尖抚摩你。晚安，晚安！

弗兰茨

心儿平静点儿了么？是否已不再痛苦？从你今天的信来看好像是这样，我希望如此，但我没有把握。你无法看书？这并不奇怪，你什么时候有时间看书了？不过菲莉斯，最最亲爱的，你怎么想起要看《乌里尔·阿科斯塔》这本书^[122]的？我也没读过这本书，我想我也不会去读它的，虽然你说的有关你脑子的玩笑话是我的真实情况。但或许得把这样的脑子晒干弄硬，以便有朝一日可以用它打出火来。我正要这么写，就听到看完电影回家的妹妹按门铃，当时就我一个人在客厅里，我便给她开门去。这样一来思路给打断了，我便放下手头正写的信。妹妹给我讲起电影，更确切地说，是她在问她，因为我虽然很少去影剧院，但大部分情况下我对每周的节目却十分熟悉。我的消遣只是看看那些电影海报，通常我是带着内心的反感，带着这种永恒的临时的感觉在海报前休息。每当我避暑完毕——结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回到城里，我便迫不及待地想去看那些海报，坐电车回家时，我便不连贯地、吃力地看着从我们身边快速掠过的那些海报。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有千言万语要迫不及待地向你诉说，就像一大群人同时想通过一道极窄的门进去似的。而我却什么也没对你说，压根儿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写的都是错的，当然不是完全错的，因为从根本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可有谁能够透过这表面的混乱和错误看到里面去呢？你能够么，最最亲爱的？不，你当然不能。不说了，已经很晚了。我妹妹耽误了我一些时间，她看的是《浪荡女》。有本科学书我已读了好长时间。最最亲爱的，以后我不给你寄信，改为日记如何？现在不写日记了^[123]，我觉得有点儿遗憾，虽说也没事儿，或只是些微不足道的事儿，而我把一切也看得都无所谓。但你读不到的日记也不会是我的日记，写给你的日记中自然有些改动和省略，这些只是为了启发和教育我，你同意吗？日记有别于信函之处在于，日记的内容可能比信要丰富一些，但同样也会比信无聊和粗糙一些。但你不必太害怕，日记中不会少了我对你的爱的。你问我该读些什么书？我不清楚你都做些什么书，跟你要了好几次书名索引，但到现在也还没收着。那就随便说吧：读读《维特的烦恼》！奇怪的是，前一段时间我真的经常想起你父亲，也一直想问问他（施特塞尔）的那本《曙光》他是否已经看完了。你看，菲莉斯，很多事儿你想不到我，昨天我听说前不久《柏林日报》上登了一篇关于施特塞尔的《情感的顶峰》的评论，你却没寄给我。我寄给你两份剪报，是今天刚刚发表的，我手头刚好有。虽说那小说不能代表奥斯卡（鲍姆）的风格，那文章也不能代表费利克斯（韦尔奇）的风格，他们两人都能写出

比这好得多的作品，奥斯卡的更精彩之作会令你惊讶，而费利克斯的更精彩之作你却看不到（我也一样）^[124]。

星期天你那样却还是做了饭，而且烧得如此美味。很遗憾今天上午我按自己的原则不能吃任何东西，听你将那美味佳肴——道来，使我兴致大增。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兴致，我根本就是喜欢看别人吃饭。

再见，菲莉斯，特别感谢你今天这封长信。

弗兰茨

〔19〕13.3.13—14

刚开始写便把墨水洒在信纸上了，我没有换纸，或许这可以使我越来越不真实的（你难道看不出来么，最最亲爱的？）杜撰出来的信有点儿真实感。就写几句话，又不早了。我跟费利克斯一起去看了电影《另一个人》，然后又去散步。所以我不想写太长，免得明天上午又跟今天上午一样。知道么，最最亲爱的，我们办公室的头儿是个极坚强的人，这赋予我力量，我比不上他，但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觉地模仿他，在更高的程度上不自觉地模仿他，在再高的程度上，至少也可以看着他，以他为榜样。如果他没在办公室，早晨和上午我便分发他办公桌上的普通信件。现在我像被溶解了一般坐在靠椅上，我看不见也听不到进来的人，我呆呆地盯着那些无关紧要的信件，心里在想是不是回家睡觉去，可你想想看，就连睡觉和安静地躺一会儿我也指望不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比较容易解释了，我睡觉少了，规律了，但睡得不好，也不那么闲逛了，我从一开始就对自己一点儿也不满意，于是我又一筹莫展地坐下来。我不明白今天为什么没有你的信，我太虚弱了，既生不起气来也无力不安（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没有时间写信，最最亲爱的，我丝毫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有些不明白，也没有多想，想必正因如此才无聊地良久地坐在那儿，而且整个上午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我像个生病的人一样往家走去，脑海中总在想着还要走多远。但我没有生病，实际上根本看不出我生病了，只在鼻子上有道皱纹，再就是白发越来越多，已经很明显了。

稍微睡了一会儿，巴塞尔曼的片子也使我略有改变，今天晚上有时候甚至感到挺舒服的，我们，我是说我和费利克斯，今天谈得很投机。我可以给你讲许多有关巴塞尔曼的事情，尽管这部片子拍得一塌糊涂，尽管他在片中被人糟践，并在其中自己糟践自己。晚安，最最亲爱的，

祝你星期天过得愉快。问候你父亲。

弗兰茨

〔1913〕12.3.14—15

今天星期天，没有你任何消息，这真叫我伤心。我最亲爱的，或许你只想或只能隔一天写一封信，那样也好，我一直觉得一切都比现在这个样子要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我还是每天都给你写信。

最最亲爱的，我最亲爱的菲莉斯！昨晚我是那么认真地对你发誓！我是那么有理由得到你（你无法对此作出评价），我又是多么需要你（这一点想必你有时也能感觉得到）！但功劳和必然性却有如梦幻和清醒，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扭曲的。

我又觉得“菲”不如“菲莉斯”好听，这个字太短了，吐字时间不够长。菲莉斯，如果我能够有一次（因为一次便意味着永远）靠你很近很近，以至于说话与聆听都融为一体，融入寂静中，那该有多好！他们在厨房里为一根被偷吃的香肠争吵起来，真让我心烦。不只是他们让我心烦，在我心中也涌动着令我心烦的力量。

但是，最最亲爱的，为什么你要如此受我影响，说什么你觉得一场车祸是摆脱烦恼的最好的解决办法。该遭车祸的不是你，最最亲爱的！实际上坐在这车里，坐在你身旁的是我。如果真有这个危险，你该活下来，我会与自己的影子纠缠，如果我不是个影子，那倒是令人难以理解。我不知道除了用我的身躯止住那辆你在其中会遇到危险的汽车外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而看到你在信上这么说，那渴望便愈加强烈了。这将是外形上的联系，我是配得上它的，但愿我也有这个能力。

你姐姐（艾尔娜）只知道她同你长得很像，但如果她长得不像你，并且我只知道她是你姐姐，我也会爱她的。她眼神及眼睛同鼻子的搭配是令我伤心的典型的犹太姑娘的长相。她的嘴部极其温柔，但总的说，她看起来是坚强的，不容易被不幸压倒。她现在有个女友，她照顾她，还要为了她的缘故去柏林么？她的发型有点太大了，不过这张照片可能是流行烫发的时候拍的。

最最亲爱的，复活节你打算做什么？你待在柏林么？如果你留在柏林，会不会有许多事要做？你父亲这次怎么在柏林待这么长时间？你姐

姐复活节想必也要回家吧？布达佩斯那边还没有回信么？会不会是那个美食商人把包裹给弄丢了？现在定下来了，鲍姆4月14日讲？不过那时你大概已经不在柏林了[125]。可惜，太可惜了！

弗兰茨

[19] 13.3.16

菲莉斯，坦率地问你一句：复活节，也就是星期天或星期一，你没有一小时的时间陪我？如果你有空，希不希望我来？我再说一遍，随便什么时候都行，只一小时，我在柏林什么也不做，就等着这一个小时的到来（我在柏林熟人不多，就是这不多的熟人我也不想见，因为他们总让我去跟各种各样的文人见面，而我却有那么多烦恼，我根本受不了这个），即使你没有一个小时整的时间，四个一刻钟也可以，我不会错过的，我会一直守着电话机的。那么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你觉得这么做好不好；你要明白来看你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最最亲爱的，我不想见你的亲戚，现在见他们还不太合适，在柏林就更不合适了。再说我前些年几乎连一件可以穿着去见你，就连能穿着去见你的西装也没留下。但这真的是次要的，可为了避开你将能看到和听到的主要的事情，我便不由得拿些次要的事情来做遮挡了。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菲莉斯！或许你没有时间，那就用不着考虑了，反正复活节时他们都在家，父亲，哥哥，还有在德累斯顿的姐姐。马上就要迁居了，你会很忙的，还得为法兰克福之行做准备等等。总而言之，如果没有时间，我会理解的，我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这边还定不下来，如果你愿意，我更会争取4月份去一趟法兰克福，请尽快给我个答复。

弗兰茨

[19] 13.3.16—17

最最亲爱的，就说几句。首先得好好谢谢你的信，是今天到的，到的正是时候，它使一个整个心思都远在柏林的人又稍微回到现在的位置上来。其次要说点令人不快的事，这倒很适合我。我不知道是否能去得成，今天还定不下来，但明天就可以定下来了，做出决定之前我不想告诉你原因，星期三上午10点你就能得到确切消息了。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会知道的。爱我，虽说我总是这么翻来覆去的。

弗兰茨

你说得对，菲莉斯，前一段时间我确实经常强迫自己给你写信，但给你写信已和我的生活密不可分，我也在强迫自己去生活我不该么？

几乎没有一个字是我刨根究源写出来的，而是偶然地极费力地在半路上紧紧抓住的。在我完全沉浸在给你写信和生活中时，我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每一种真实的情感都不必去寻找可以表达这种情感的话语，感情是和话语相碰撞的，或者根本就被话语所驱动着的。或许这并不完全对^[126]。

虽然我的手还能紧紧握住笔，但我又怎么可能通过给你写信达到我想达到的一切呢——我想说服你相信我的两个请求都是认真的，那就是“爱我”和“恨我”！

我说你想我想得不够多，却是当真的。因为如果你很想念我，便会寄给我一缕白发。而我不仅鬓角发白，整个头顶也白了，想到你可能仅仅因为一个人是秃顶便不能忍受他，我的头顶便更白了。

你布达佩斯的妹妹相片上看起来有点儿疲倦和伤心，你说呢？她那时就结婚了么？她不太像你，似乎更像你在德累斯顿的妹妹。

菲莉斯，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给你写日记（我又不想称你为“菲”了，这么称呼女同学倒挺不错，或者不熟的人；菲莉斯的内涵则更多，已经是正式的拥抱了，我现在在写信，依靠的是话语，这也是我的天性，我不能错过这些机会）。最后我还是会在日记中写一些让人无法忍受的，根本无法忍受的东西，那么，最最亲爱的，到时候你能把它们只当作日记而不是当作信去读么？你事先就得向我保证。

我今天下午的信让人觉得此次柏林之行只是取决于我，那是由于我写得太仓促，此次旅行当然主要取决于你的态度。

再见，最最亲爱的，明天白天我再写信告诉你关于此次旅行的障碍的有关情况。

弗兰茨

[19] 13.3.17—18

弗利克斯和奥斯卡写的东西你读过了么^[127]？《蒙特卡罗》这本书

我没读过，马克斯不想给我看，因为编辑做了很大改动。复活节那一期会刊登有评论马克斯《奥地利家族》一书的文章[128]。

我此次旅行的障碍本身依然存在，恐怕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它已经失去了障碍的意义，如是可能的话，我可以去柏林，我只想赶紧告诉最最亲爱的。没有你的信（为避免到头来你把这理解为是我请求你别再写信了，我要告诉你这只是我的叹息）！

弗兰茨

〔19〕13.3.18

最最亲爱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做任何事情，虽然有那么多要干的活儿，我前面的办公桌堆满了东西。好吧，是我没有早些决定去柏林。读你的信时，我止住了呼吸，读完好一会儿也还如此。那当然是我的一个弱点，我总是利用每一个机会大谈特谈我自己，但这一机会也确实太有利了。以后这几天我该怎么度过！昨天晚上——那时我还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我就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有关复活节的事情我才能认真去听。

但还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压抑住所有的喜悦和期待的，我只需弄明白此行的目的就可以了。我想，关于此行的目的，我对你对自己都没有任何隐瞒，只是尽管我很清楚这一点，我还是无法把它全部想象出来。这一无能实际上却是我的运气，我去柏林别无他意，只为告诉你，让你看看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你被我的信蒙蔽了。我亲自去是否会比写信要清楚些？通过写信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总是有意无意地阻拦着自己；但如果我真的站在你面前，纵使竭力想隐瞒，也隐瞒不了多少。当面看到的是无法否认的。

那么，星期天上午咱们在哪儿见面呢？如果还是无法成行，我最晚在星期六拍电报给你。星期六你一天都在办公室吧？

开始写信时我是那么兴奋，但必要的第二段却拦住了我，让我清醒过来。

弗兰茨

〔19〕13.3.19

〔又及〕你知道伊丽莎白·巴雷特和罗伯特·勃朗宁之间的书信往来么？

没有你的信，而我却是如此渴望你。除了原来的障碍外，现在这次小小的旅行又面临新出现的可能的障碍。现在过复活节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各机构团体通常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这些有关事故保险的事情，机构的代表讲讲话，或者至少要参加讨论，今天还真的收到两份这样的邀请。捷克碾磨业合作社联合会星期一在布拉格开会，苏台德地区的捷克建筑工程师星期二在布吕恩开会。所幸都是捷克人开会，而我的捷克语实在有限，但他们向我提出了很严肃的要求，其实根据公司内部的工作分配这完全是我的事儿；放假期间也没多少人可被派去参加这种会议。但是我必须，我必须看到你，为你也为我（即使为你和为我的原因不同）。昨晚我是多么需要你！每层台阶都那么吃力，因为攀登这些台阶和此次柏林之行毫不相干。

弗兰茨

〔19〕13.3.20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你不给我写信了么？办公室里没有你的信（我们这儿的办公室从来不放假，所以我把信寄到你办公室了），但家里也没你的信。菲莉斯！我还根本不能肯定能否成行，要到明天上午才能定下来，磨坊主那个会可能还是要去的。要是明天还没有你的信，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和你见面。如果去柏林，我很可能住在科尼希格莱策大街的阿斯卡尼亚饭店。我昨天得知皮克那天也要去柏林，这对我此行的目的没有丝毫影响。跟他一起坐车倒是很不错，但到了柏林我希望他别再打搅我，尽管也正因为认识半个柏林文学圈，而且要去拜会那些人。但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能见到你，你，菲莉斯？星期天上午有可能么？见你以前，我得把觉睡足了，这星期我觉又睡得很少，我的神经衰弱和白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睡眠不足造成的。但愿见到你时我已睡足了！希望那时我的双腿不要发抖！要是现在这个样子去见你，我一定会发抖的。我可真是太蠢了，竟然拿这些自言自语吓跑我或许还会保持的那点儿镇定。菲莉斯，就让写信人暂时说声再见，半年前见过面的那两个人即将重逢。别再像忍受那个写信人一样忍受这个真实的人了（劝你的是一个极爱你的人）！

弗兰茨

不管我在不在柏林，星期天你当然都会收到我的信的，更确切地说，是你母亲收到这封信。写完这些以后，我觉得这像是丑陋的欺骗，但你马上就要看到真人了。

还是定不下来。

弗兰茨

〔信封邮戳：13.3.22，布拉格〕

菲莉斯，这是怎么回事儿？你星期五就该收到我那封快信了，我在信中告诉你我星期六夜里到，总不至于偏偏是这封信走丢了吧。现在我到了柏林，下午四五点就得回去，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着，我却没有任何消息。请让邮差捎个信给我^[129]。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保险起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在阿斯卡尼亚饭店等你。

弗兰茨

〔1913年3月23日于柏林〕

〔柏林阿斯卡尼亚饭店信笺〕

写于莱比锡发车前。致以衷心的祝愿。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3.3.25，莱比锡〕

〔附有弗兰茨·韦尔弗、伊兹查克·略维、

奥托·皮克和弗兰提赛克·柯尔〕

写于德累斯顿火车总站，致以衷心的问候。难道我曾忘记过？

〔明信片邮戳：13.3.25，德累斯顿〕

亲爱的，非常非常感谢，我确实需要安慰，需要这种发自你可爱的、极其善良的心底的安慰。我今天就写这几句。由于困倦、疲乏和烦躁，我几乎失去知觉；但为了明天在奥西格的谈判，我还得处理一大堆公文。至于睡觉，我无论如何必须睡觉，明天一早我又得4点半起床。如果明天我还无法开始忏悔，因为我忏悔需要勇气，也就是安静，

那我一定后天开始。

你知道吗，我回来之后，你现在对我来说已成为一个比过去更不可理解的奇迹？

弗兰茨

〔19〕13.3.26

为了使在奥西格的日子有一个好的开端并为我的工作寻求保护，我祝你早上好，致以衷心的问候和感谢。千言万语归于一句话，就是感谢。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奥西格，13.3.27〕

一切都很顺利，只是有点累，头部神经抽搐。我刚才读到几句话，是歌德在去世那天10点左右（他去世时间是1832年3月22日上午11点半）在高烧中说的，令我无法忘怀，他是这样说的：“你们看那优美的女人头，髻曲的头发，鲜艳的色彩。”

〔在有画面一面的上部〕

由于困倦，同样也是因为考虑太多，我拿着这张明信片看了很长时间，现在才寄往柏林。去柏林只有六个小时路程，而不是原来的八个小时。

弗兰茨

〔19〕13.3.27

〔明信片〕

亲爱的菲莉斯：

不要因为我信写得少就生我的气。这不意味着我很少有时间给你写信。自从我离开柏林以来，很少有时间不是完完全全地属于你一个人的。我昨天还在奥西格，很晚才到家，我真的精疲力竭，像一个木偶一样坐在桌边。我经历了很可怕的疲劳状态，觉得自己身体顶着的脑袋已不是人的脑袋。在星期三至星期四的夜里，也就是去奥西格的头天晚

上，因为必须研究公文，我11点半才上床。尽管已经很累，但仍无法入睡，还听见钟敲了1点，而我4点半就该起床了。窗开着，我的思绪断断续续，有十五分钟时间里不断地跳出窗外，接着又来了火车，一列接着一列，碾过了我躺在铁轨上的身躯，不断加深和扩大颈部和腿部的两处伤口。我为什么写这些呢？就是想用同情把你再次拉到我身边，并再次享受这一幸福，因为我的如实忏悔将会破坏一切。

柏林之行使我与你靠得更近了！我只和你同呼吸共命运。你对我了解还不够，亲爱的，尽管我也不理解你怎么能对身边发生的事视而不见。仅仅出于善良？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其他不就都可能的吗？关于这一切，我还要详细阐述。

弗兰茨

〔19〕13.3.28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今天没有信，也许它在家里。我急不可待地想知道，这也是我停下来的一个理由。

菲莉斯，你能否写信告诉我，我的信和我本人给你的印象是否相符？

我不想再抱怨，这七个星期——或许只有六星期，我手头没有日历——太短和太长，太短，无法把一切说清楚，也无法完全相信你对我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你并不想回答我准备承认的东西）；但又太长，以致无法充分享用。我到处都在寻觅你的身影，小巷里不同人的细微举动，不管像还是不像，都让我想起你，但我无法把我内心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想法太多了，以致我没有力气把它们表达出来。

我太长时间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你（我至少充分地利用了时间），所以你的照片现在对我已没有用处。我不想看它们，照片上的你很呆板、一般。但我看见你那张真实的、具有人情味的、带来必要缺点的面孔，我就陶醉了。我已无法自拔，无法习惯那些呆板的照片！

只有当听不到你的音讯，我才保持固有的那种敏感。我缺乏信任感，只有在写作的快乐时刻我才有，否则整个世界都和我过不去。我总是考虑你不来信的种种可能性，考虑个上百遍，就像找东西的人会在绝

望之中在同一个地方找上一百遍。你是不是可能遇到了什么严重的问题啦？难道我在这里四处游荡会真的碰到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些想法整天慢慢地但又不停地在我脑子里转悠。亲爱的，如果从明天起，我把日记式的记录寄给你，请不要把它视为是一出喜剧。里面的东西，我真的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只能对自己自言自语。你即使在我我身边默不做声也是一样。我如果给你写信，当然不会忘记你，因为我也无法忘记你。但我不想用呼唤你的姓名把自己从昏昏沉沉中唤醒，因为只有我还能在昏沉中写信。请你，菲莉斯，请宽容你将听到的一切。我现在还不能写，我将不得不全部说出来。你前几天说你承担一切责任，这远远超过了耐心地倾听这一切。我将试着把一切都写下来，除了那些我自己羞于写下来的东西。好，再见，亲爱的，上帝保佑你！我对柏林了解得很少，写信告诉我你去过的街道和地方的名字。

你的

〔19〕13.3.28

我始终没有开始，我太不平静了，我太爱你了。我对你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你说的？上帝在哪里？从我内心发出这么一声吼叫，我真该用手把这声吼叫扼杀。

我在今天整个睡眠中，总是在想为什么今天没有收到信。信本来就送来，我还没听懂保姆说话，就早感到嗓子口里快要蹦出这句话了。我该免除你写信之劳吗？亲爱的，这没什么。但把你从我这里解放出去，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但我就是不能放弃你的来信，我充满了想得到你消息的欲望。只有你的信，才能使我有能力表现我哪怕是细小的生命力。为了能正确地活动小拇指，我需要你的信。

我怎么能仅仅放弃你的消息，因为我听说你身体不好，一直咳嗽，觉得身体状况很坏。如果这一切发生在我感到很放松、能全力以赴写作的时候就好了！那么，我在写信的时候就会觉得比平时靠你更近。为了不失去与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如果可能的话，我今天根本就不想离开写字桌。有时候在绝望之中，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用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来聊以自慰。当我比如在办公室里到了第二次分信时间仍未收到信，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集中精力，哪怕是口述；整个事故保险公司，尽管它暂时留在我脑海里，但已完全从我身躯里退出；每个小小的见习官员都比我了解情况和称职。这时候我有时对自己说：“不要伤心，

你下午给她写信要因此写得更长，你要更加感谢她。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但现在这一切都是非常错误的。当我不给你写信的时候，我觉得离你很近；当我上街，到处有东西不时地让我想起你；当我独自或面对众人把你的信贴在我脸上；吸入你信上留下的你颈子上香气的时候，这时候我比任何时候更紧紧地把你抓在心上。我的上帝啊，事情还要糟糕，我那不幸之手不断摸向深处：在阿斯卡尼亚饭店打电话时，我就离你很近，比过去在绿色森林的树枝上更能感受到心连心的幸福。

亲爱的！亲爱的！与此相比，一切都黯然失色，包括我的

名字 弗兰茨

〔19〕13.3.30

〔在下面边上〕不是胡同，而是大街。

天色已晚，我去睡觉了，但我仍想问候你并给你写上几句，亲爱的，令人无法理解的情人。我发觉自己多年来睡眠太少，这不断撕裂般的头痛只能用睡觉来驱除，或许也不起任何作用。我独自一人，揣着你昨天的信，做了一次长长的散步。我本来是能和两类人同行散步的，但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过去，我是出于卖情弄俏，出于无聊，出于懒惰才想一个人独处，像一个稚嫩、健康的少年一样，百无聊赖地四处闲逛。今天，我独处是出于一种必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你的思念。我散步出城，走得很远，在一个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昏昏欲睡；两次渡过了摩达维亚河，多次阅读你的信；从高处往下扔石头；远眺前方，一片春天的景象；打扰了情人们嬉闹（他躺在草丛里，恋人们则在他面前忽上忽下）。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无聊，我身上唯一有生气的东西就是放在我口袋里的你的信。

只要你健康，亲爱的，我有这样的担心。你请求我免除你写信让我怀疑你已不去办公室上班。这是真的吗？亲爱的，为了我，请你保持健康。如果你保持健康，我再也不想抱怨了。不要那么晚睡觉。你曾光彩照人，面如桃花，富有朝气；但也可以看出来你睡眠太少。亲爱的，让我们互相保证，在圣灵降临节以前每天晚上9点就寝。现在虽已9点半，但还不是太晚，写信又让我振作了起来。好吧，晚安，亲爱的，我们以后每晚9点都祝对方晚安。

弗兰茨

我原来的担心——不可能听说比这更为可怕的事了——就是我将永远无法占有你，最好也只能像一只盲目忠诚的狗，吻一下你漫不经心伸过来的手，这不是爱情的表示，而只是天生注定保持沉默和保持距离的牲畜表示的绝望。我担心，我将坐在你旁边，就像经历过的那样，感受到你的呼吸和生命，但实际上离你比我现在房间里还要远。我担心永远无法控制你的眼神，一旦你往窗外看或者把手捂着脸，我将真正地失去它。我担心我们手拉手走过整个世界，看上去已经是密不可分，但实际上全是虚幻。总之，我担心被你永远排除在外。你是否也会这样深深地弯下腰，使你陷入险境呢？

如果这是真的话，菲莉斯，——我觉得已完全毫无疑问了——那么我完全有理由在半年前就果断地与你告别，完全有理由担心与你保持任何表面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我对你的思念已摆脱一切虚弱的力量，而正是这些力量至今使我这个生活在世界上的窝囊废留在这个人世上。

我不写下去了，菲莉斯，我今天已写得够多了。

弗兰茨

〔19〕13.4.1

我正想脱衣服，母亲因为一个小事进来了，走的时候，吻了我一下并说晚安。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了。“这太好了，”我说。“我一直不敢这样做。”母亲说，“我原想，你不会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也很喜欢这样。”

亲爱的，难道我该疏远你？我，一个坐在写字桌旁，因为思念你而要死要活的人？我今天在外面过道上洗手，不知怎么地涌起对你的强烈思念之情。我不得不走近窗户，想至少在灰色的天空寻找安慰。我就是这样地生活着。

弗兰茨

〔19〕13.4.2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菲莉斯，有可能是巧合，今天没收到你的信，因为你昨天搬家，可能没有片刻空闲时间。但另一方面，今天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巧合，而可能意味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必然（你星期四收到我的信后，必然不会写信，我还有什么可企盼的呢？）。但我总可以任由性子给你写信，因为想给你写信的欲望是我生存的根本。我将不断地写，直至我的信原封不动地退回。你看一下给你写信的人，他的头发已被搅得凌乱不堪！

弗兰茨13.4.4

〔可能是1913年4月3日至4日夜〕

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刚搬来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捷克作家。他是教师，写色情小说，至少他上本书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的。封面上印有一个女人在玩弄几颗滚烫的心。我记得这本书就叫《滚烫的心》。我原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把与我不相干的人想象成一个卑微的、黑色的伪善者。最近，我听一位捷克作家针对我的邻居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至少没有反驳我的观点。他说，如果一名教师没有周游世界的阅历，用肤浅的手法，从他狭小的生活环境出发写小说，他的作品自然只可能是一些可笑的色情小说。我现在第一次在电梯里碰到他，他是一个光彩照人、令人羡慕的人！你知道，捷克人特好学法国人的举止，尽管这种模仿一般总是落后于时尚，接受的总是心爱国家过时的东西，因为只有那些臭遍大街的东西才会传到国外，——所以这对法国的模仿者来说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因为法国充满传统，一切进步都在那里逐步地流入不排斥任何东西的河流，然后继续前进。因此，模仿者几乎总能跟上步伐，而不显得心急火燎，或者至少始终保持一种可爱。那里就有一个人，留着颇有生气的法国山羊胡子，戴着一顶从蒙特马德买来的宽边软呢帽，手上搭着一件随风飘动的外套，举止优美得体，眼睛炯炯有神——看他简直是一种享受！

我现在就站在这里，回到了你的身边，菲莉斯，亲爱的菲莉斯。我站在这里，匆匆忙忙地讲述着这些小故事。亲爱的，我已收到你的电报，初看一遍，我觉得好像是用暗语写的。你星期四收到了我的信，就给我发了电报。你太好了，我不得不强制地克制自己，让自己不要相信那些话，让自己平静下来。特别是今天晚上，马克斯也试图从另一个、但很相近的方面安慰我，并使我目前几乎平静下来。亲爱的，你星期四收到的信是完完全全当真的。我现在太草率了，自己也可能对这封信产生怀疑，觉得它不太认真，很值得怀疑。噢，不，亲爱的，这信是当真

写的，里面没有画面，只有事实。事情就是这样，完完全全是这样。

弗兰茨

〔19〕13.4.4

〔在下面的信纸边缘上〕

我忘了祝贺你乔迁之喜。

前天或大前天夜里，我不断梦见牙齿。这些牙齿不像人的牙齿排列有序，而像孩子们玩的耐心游戏一样，组成一堆，在我的颌骨的操纵下移动。我使出全力，想表述最想说的话。牙齿的移动，牙齿间的缝隙，牙齿摩擦的咯咯声响，以及我操纵牙齿的感觉——一切都和一种思想、一种决定、一种希望、一种可能性有那么一种固定的关系。我想用不断咬牙来抓住、保持和实现这种思想、决定和希望。我尽力而为，有时候看来行了；有时候我想，我已取得成功。当我清晨终于醒来的时候，我半睁着眼，觉得一切已经成功，整夜的工作没有白费。牙齿的排列最终没有变动，这无疑意味着幸福即将来临。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在夜里没有早点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感到没希望，认为清晰的梦影响睡眠质量。以后我就完全醒了（这时，我们的小姐总是用怨天怨地的语调叫问几点了），一事无成，这不幸的上班时间又开始了，你，亲爱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在牙痛中度过了漫漫长夜。

你知道吗，亲爱的，这幸福和不幸的混合物构成了我与你的关系（幸福——因为你还没有离开我和如果你离开我，只要对我好过就行。不幸——我没有很好地经受你表示的对我的考验），同时也使我忙得团团转，好像我是这世界上多余的人似的。一切至今阻碍我的障碍（每个人都要经常经受考验，我经受的考验很少，从来没有这个考验那样艰巨和关键），看来已经烟消云散。我怀着一种虚无的绝望和怒气，四处漂泊，也许不是针对我的环境，我的命运，和处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上帝，而仅是针对自己而已。我心境最坏的时候也许是在办公室，这种恶魔般的办公室工作让我心力交瘁，我一事无成。有时候我真想跪倒在上司的脚下，请求他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不要解雇我。当然无人对这一切有丝毫察觉。也许一切从后天起都会好转。我下午去园林劳动！有关情况下次再写。

弗兰茨

〔可能是4月4日至5日夜〕

菲莉斯，昨天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你的来信。晚上7点，当我回家的时候，楼下的女管理员递给了我这封信。邮差偷懒，没有自己上四楼。你写得太平静和怡人啦！好像在作出这一最后步骤之前保护天使在伴我左右。当我决心说出大部分情况的时候，我使用了矫揉造作的、不明了的语言，并认为它们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已没有退路。如果这最后一步是当真的话，并且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必要的话，我是不能把它视为儿戏的。我在你昨天收到的信里和你可能今天收到的信里说了已经够多的啦。我今天没有收到你的信，可能就是这个的缘故。不，你的加急信已经到了。我害怕你不理解和无法理解那封信，你可能觉得我很愚蠢。但这是一种很有理由的害怕。

不，菲莉斯，我的长相不是我最坏的缺点。“快圣灵降临节啦！”这个愿望现在（现在！）从我内心突然迸发。愚蠢之极，此刻，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无聊的愿望了。前天，我走过国家火车站的接待厅，我既没想坏的，也没想好的，也没有注意那里站着几个工作人员，都已身为人父，身着简陋，像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一样，揉着眼睛，打着哈欠，四处吐痰。我稀里糊涂地开始妒忌他们（这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羡慕每个人，很愿意为每个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想起，这羡慕当中也包含着对你的思念。当你第一次把脚踩到站台的时候，这些工作人员就站在那地方，看着你租车，支付搬运工报酬，然后上车走了。在什么地方冲过拥挤的车辆，跟着你的车奔跑，紧追不舍，毫不气馁，这也许是我能胜任的工作？不是的话，那又是什么呢？什么呢？

弗兰茨

〔19〕13.4.5

你可以从附上的信中看到我有一个多么可敬的出版商。他英俊，大约二十五岁，上帝已赐给他一个漂亮的妻子，几百万马克，对出版业的兴趣和很少的出版商气息。

〔附录〕库尔特·沃尔夫致弗兰茨·卡夫卡的信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先生

布拉格

尼古拉大街36号

尊敬的卡夫卡博士先生！

我非常诚心和非常急迫地请求您最好马上寄来您小说的第一章让我一读。就像您以及勃罗德博士先生为的那样，第一章可以单独出版。请您最好同时把臭虫故事的复影件或原迹一并寄来。我星期日出国几个星期，很想在这之前能拜读两部作品。

如果您能满足我的愿望，那就太劳驾您啦！

但愿我们不久相见，比上次在莱比锡还开心。

库尔特·沃尔夫 敬上

1913年4月2日

〔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信笺〕

菲莉斯，亲爱的，终于又能写信了，隔壁也没有什么贵客。一个半小时前，我就跑回我的屋子，好像你在里面似的。你从我的笔迹上是否已经看出我今天已干过重活了，羽毛笔对我来说已经太轻了？是的，我今天第一次在努斯勒，一个郊区，帮助园艺工干活了，在凉凉的雨中，只穿着衬衣和裤子。这对我身体有好处。能找到一个地方不是很容易。那里周围虽有许多蔬菜园，但都散落在房子之间，没有栅栏。晚上下班后，当我想劳动的时候，周围很吵闹，有美国跷跷板、转马、音乐。不管这里怎么好，但我不喜欢这里的劳动环境，尤其这些蔬菜园都很小，属于贫困阶层，种植的品种单一，所以学不了很多东西。我原本并不想学什么，我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从自我折磨中解脱出来几个小时，和阴森可怕的办公室工作形成对照。这办公室工作看得见摸不着——办公室才是真正的魔窟，其他的我就不再害怕了。这一说法也不是因为我完全不认为我一直搞的自我折磨是多余的，而是认为很有必要；在与你的关系

中，这种折磨应该为了你的幸福而把我穿透。但我想在两个小时内摆脱折磨，在宁静和幸福之中思念你，最后也许整夜不能入睡。但我的这些表白也许让人吃惊，没人能接受我。所以我说，我在不久的将来将拥有自己的花园，因此想学一点园艺。

但已太晚了，菲莉斯，明天我再继续叙说，由于要远行，你今天会睡不安稳，可怜的人儿，一切都会好的。这里有一个满脑子只装有对你的良好祝愿。

弗兰茨

〔19〕13.4.7

你拔了一颗牙，又感到疼痛了吧。你怎么一直那么倒霉，老是疲惫不堪的样子。你真该好好休息一下，你会成为最精神饱满的人。很显然，我总是把你遭受的痛苦与我联系起来，并因此怪罪自己，尽管这样做和你牙疼时一样没有任何作用。你现在法兰克福找到清静了吗？布鲁恩夫妇也同去了吗？布吕尔小姐呢？这下你可以好好休息了？不要像在布拉格那样长时间地在床上阅读！最好只念一些诗，不要那些让你无法入睡的小说。我明天给你寄韦尔弗的诗选，以此奖励韦尔弗，他当之无愧。我今天收到他的一张明信片。尽管他不拘小节和懒惰有名的，但他一收到我的信就回了这张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和另外两个也给我写信的人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为略维尽力。略维这次身体状况很糟，躺在医院里，那撕心裂肺的头痛是鼻子做手术引起的后遗症，每三个月就要发作一次。他已离开了原来的剧团，又不顾我的劝阻，带着最美好的愿望组成一个新的剧团。新剧团本该比老的好，比老的上演更好的剧本，但却比老的还差劲，因为剧团的人都是偶然和仓促凑起来；而且由于略维幼稚的经营方式，剧团收入大大减少，因为他与剧团不断地在莱比锡和柏林之间奔波，几乎不休息睡眠。现在剧团快接近破产，与原来那个比较好的剧团的竞争也损害了新剧团的生存，使新剧团看不到任何希望。略维以个人名义为剧团承担的债务极高（这些债权人是怎么的！）——现在略维又病倒了（他写信给我说：“上帝是伟大的，如果他施舍的话，谁都有份。”），剧团当然早就散伙了，只有他留下了，一副病骨，身无分文，债台高筑，看不到任何希望，经历一场彻彻底底的失败。这已经不是新鲜事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写信告诉过你。我收到他很多信，也许他现在上路找我，去了巴勒斯坦。

亲爱的，我该收尾了，但我还没有痛痛快快地与你说完呢！我今天上午在想象陪了你一程。没关系，我下午第二次坐车去了法兰克福。

弗兰茨

〔19〕13.4.8

现在在法兰克福啦！亲爱的，你太乖了，在一大堆工作中还是给我写信。假如我用吻手的方式表示我的谢意，我的嘴唇恐怕就离不开你的手啦。我觉得，随着你乘坐的列车启动，我整个灵魂也逐渐离开柏林，向法兰克福走去。只要你在柏林，我就特别关心奥斯卡的柏林之行；尽管我知道，他下次去，你可能已不在柏林了。不管怎样，你还在柏林，所以很愿意谈柏林。当我昨天拜访奥斯卡时——他正在朗诵一些作品，试试在柏林会产生什么效果——我承认这些作品部分是很出色的，但我对在冷漠的柏林搞朗诵会并不感兴趣，所以感到很疲倦！亲爱的。我下封信给你说说我的母亲。我现在得快点写。当然，我已给她讲了一点柏林的情况（你会惊讶我讲得很少），只不过那个在绿色森林让我闭嘴的障碍，在布拉格也让我保持沉默。

再见，亲爱的，祝你办展览会顺利，住饭店有胆量。

弗兰茨

〔19〕13.4.8

〔信封邮戳：13.4.10〕

正要去睡觉。天已不早，感到疲劳，脑子里又是乱糟糟的。亲爱的，你今天不想听我说些什么啦？你在法兰克福过得还开心吧？我的上帝，我让你这样孤孤单单地周游世界。

弗兰茨

〔信封邮戳：13.4.10〕

我终于知道你在哪儿了，菲莉斯。虽然我就一天没有收到信，但我还是敢用“终于”两字。哎，何苦再把一切重复一遍。你没有见怪我对你迫不得已施加的压力，因为你一定至少预料到，我想和你保持尽可能连续的通信联系，原因不在于我对你的爱，而在于我不畅快的心情；如果是因为我爱你，早应该想办法让你休息，从前一阵的疲劳之中恢复过

来。

菲莉斯，我不要你回我的信，我想听听你说话，就听你一个人，我想看见你悠闲自得，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一样，或就像我是另外一个人一样。想到我可能会收到回信，我情不自禁地会颤抖起来。菲莉斯，请就告诉我这一点，以便我能清楚地看到，决定最终必须从哪里来。告诉我，你是否从你上星期四收到，我又多次提到的那封颠三倒四、矫揉造作、糊涂愚蠢的信中看出是怎么回事了吗？我本不该说其他什么事，休息一下，看着你，忘记自己，这不是很好吗？但这不负责任。

你现在汉诺威，我没有想到。我原以为你从法兰克福坐车去那里。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曾在信中也这样写过。你的妹妹在汉诺威？突然去的？一切不幸是不是都已过去？你曾说在五至六个星期内作出决定，现在时间快要过去。你在汉诺威住在你妹妹那儿？不是住饭店？

关于我参加园林劳动，你不必指望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好结果。今天我已经是第四天劳动了，肌肉当然已有些紧张，整个身体重了，也直了，自信心也有所提高。一个人如果没有天生好的身体素质，坐在写字桌旁和长沙发上工作，很容易受到病痛的袭击；如果他拿起铲劳动，这对他身体就不会不产生一点作用。但这种作用的有限性是明显的。有关情况我还会给你写信，今天天色已晚。傍晚我在马克斯那里，和两个知足常乐者待得时间太长。对这桩婚姻，我起先判断不对，原因我心里太明白了。

弗兰茨

[19] 13.4.10

菲莉斯，我们现在相距这样遥远。看来你星期三晚上寄出的明信片，我今天，也就是星期五才收到。我感觉到这样的距离（不是现在，因为我读了弗里德里希·胡贺在《新江报》上刊登的糟糕故事后，已完全发呆了。但也有例外，比如看见你来的明信片放在桌上）。不，我不马上走。你看到了吧，有时候我总是那么倒霉。我原来只想叙述一下自己怎么会偶然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可能住在维也纳，这样可怕的空间距离使你我天各一方；相比较而言，在布拉格的距离还能忍受。维也纳，这个处于南边的小地方，虽然半年前，它离布拉格比柏林还要近。

明信片是4点写的，你坐在餐车里，我看的是如此的仔细，以至我

可以告诉你坐的位子：根据列车的行驶方向，我认为你坐在很后面的位置，最后或倒数第二排的一张桌子的右边，而且靠窗、目光逆着行车方向。我原可以画下来，但必须空出你的沙发椅子，所以不想画了。如果你说坐在其他地方，我不会相信的。此外，我现在发现，我肯定搞错了，因为在我的想象里，餐车里除了你没有他人。我得把给你送明信片的服务员想象出来。

不久前，我活灵活现又一团糟地梦见你、马克斯和他夫人。梦见我们在柏林，找到了所有的绿色森林湖，全在市区内，一个接着一个。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许是我一个人发现的，也许真想去找你，几乎是故意走迷路的，看见一个奇特的、灰黑色的、不明不白的码头轮廓，问一个行人才知道这就是绿色森林湖。我虽然就在市区，但离你很遥远。以后，我们去了万湖，你不喜欢（这句话在梦中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走过一扇铁门，就像走进了公园或墓地；看到很多东西。时间太晚了，没法再叙述下去。我也得刨根问底才能回忆起来。晚安，多做好梦。

弗兰茨

〔19〕13.4.11

菲莉斯，你星期三下午就到了法兰克福，这是我今天星期天上午收到你的明信片后才知道的。菲莉斯，你一定明白，这不是对你的指责，在我与你的关系中没有指责栖身的地方，但愿你也明白另外的关系。有时我想，你去了法兰克福，离开了你第一次收到我的信时的环境，有可能更好地考虑我这个人并在法兰克福收到我的信，这一切都可能使你对我有更正确的了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你完全有理由进行这次法兰克福之行。我现在的感觉很不好，为了维持生命和继续思考，我所耗费的精力足以修造一座金字塔。

弗兰茨

〔19〕13.4.13

五天了，菲莉斯，我对你的情况一无所知，不知道该给你写些什么？那么就让我向你致以问候并在不愿流露的想象中用我的手把你那可爱的手握一会儿。星期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几乎没有睡觉。也许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对世界不满所能表现出来的最极度和最异乎寻常的做法。在这种平躺的状态中，好像每个毛细孔都充满了

〔可能是1913年4月13日至14日夜里〕

菲莉斯·鲍威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都会独家饭店又没有你的消息，请，请告诉我一句诚心的话。

〔电报。1913年4月14日发自布拉格〕

我不得不在正玩牌的父母亲那里写信。我对平常的和非同寻常的事情都有些不耐烦了，不过，菲莉斯，——非常幸福。因为“一切照旧”听起来优美动听，这声音远远胜过“请不要瞎操心”那句生硬的话！我感到疲惫不堪，最近以来我总是有这种感觉，现在我几乎要瘫了。我不得不对自己发问——但为什么笔的墨水要溢出，真的一切照旧吗，菲莉斯，真的是一切，真的是照旧吗？

你一定会感到惊讶，我在信里总是担心你会离开我，但如果我的担忧真的应验的话，我反而会感觉好极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法兰克福整整一个星期，我只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不明白你怎么只有那么少的时间，尤其是当我想起你以前在信中提到过我们有可能在法兰克福约会，谈到在那里时间宽裕，还可以乘车去陶努斯山游览等等。尽管如此，对你不来信，我也就忍了，就这样结束这一切吧，就像我走向终结那样，昨天我去了马克斯家里，在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匆匆说起了什么，并还和其他人说的什么事混淆在一起，这不由得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你可能在法兰克福，正在这个你拍发电报的大厅里，你和一个老相识或新朋友相遇，这个人在纠缠你。是的，出入那里的肯定是各家公司的代表们，他们都是有名望的人，西装革履，身强体壮，还有愉快诙谐的年轻人，在这些人的面前，如果要把我和他们相比较，我简直会感到无地自容。我扪心自问，假如你对他们当中的某个人产生好感，那是很自然的，这样你也就满足了我信中无数次提到的要求，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我去我该去的和好像要去的地方，就是说，被从你的周围抛弃了。这是我罪有应得，因为我没有像对恋人那样拉住你的双手，而是拽着你的双脚，使你无法行走。那我为什么还不满意的呢，为什么由于失眠，脑袋昏昏沉沉的，还要硬撑着起床，直到发出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呢？

〔19〕13.4.14日晚9点1刻

昨天晚上我无法给你写信，你的信我是今天早上在办公室收到的，你的明信片现在家里。我感觉浑身无力，像是着凉感冒了，嗓子发哑，觉得很累。假使有那么一天，我们之间要了结了，我该怎么办呢！一个女裁缝的出现，使我的小外甥感到十分可怕，号啕大哭，到现在已经足足哭了一刻钟了。这几天以来，我也觉得好像要哭，尽管我自己远远没有像我那健壮的外甥哭得那么有劲。——我通过信所没能得到的，通过语言也不会得到，真可怕。——那么，每天寄一张明信片？可怜的非莉斯！旅馆的哪个窗户是你的房间？当我看你的信时（读到最后时，我总要喘几口气，才能又开始从头看），我相信，对于我和所有的一切来说，只有你才是救世主。

弗兰茨

〔19〕13.4.17

我给你去信是不是打搅了你，非莉斯？我不得不打扰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必须完全投入做生意，展览会对于你今后一年的生意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那我就不要以与此无关的事情和主要是我的烦恼来打扰你了。但是我看到，现在展览会可能已经结束了，我想它是20日结束。现在这种想法铺天盖地向我涌来，我本应更好地进行抵御，但我屈服了。譬如现在，我心情平静极了，但这当然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写作，非莉斯！要是我能一心写作就好了！你应该同我分享欢乐！但我我不敢晚上11点才上床睡觉，最晚10点钟我就得睡觉，这样才能让紧张的神经顺便、仅仅是顺便松弛一下。我还能再写作吗？

我又用与你无关的事情来打扰你的生意了。我得搁笔了。

弗兰茨

〔19〕13.4.18

你怎么返回柏林？22日星期二可惜我又要去奥斯西了。我们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握握手或者至少能够互相离得近一些？那将会使我欣喜万分。

长时间地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伤脑筋的事，星期二在奥斯西的谈

判每次都要进行不可缺少的准备，真让我心烦意乱。我不知道，我最近谈到奥斯西的一封信你是否收到了。就是说，我们星期二是无法见面了，不过这没关系，菲莉斯，只要你已经离开那可怕的法兰克福就好了。它使我不能与你接近，我觉得好像你对你自己保护得不够，同时我又觉得，你又对自己保护得过于严密。现在你可能已经在去柏林的路上了，现在是6点半。你知道，发电报的确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这总是而且毫不例外地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躺在床上伸出手拿电报来看，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片刻摆脱了头脑中令人恶心的东西。我要是能够写作就好了，菲莉斯！对此的渴求使我心力交瘁。要是我首先在这方面有足够的自由和精力，那该多好。我想，你没有完全理解，写作是我唯一精神生存的可能。不足为奇的是，我总是表达错误，只是在精神形象中我才是清醒的，对此以及对于我的行为举止，我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进行描写和叙述。假如我完全只是另外样子的话，这也就没必要了。现在离圣灵降临节还有三个星期，谁会高兴呢？你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我要当心，不要失去什么。

弗兰茨

〔19〕13.4.20

现在是星期天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了，而对奥斯西的谈判还真的没有任何准备，明天几乎也没有时间进行准备，而为准备这场复杂的谈判，我的脑子里要装进上千项内容，以使谈判有一点成功的希望，或至少有几分把握不至于出丑。但我无法做到，我无法做到。是的，需要做的只是研究文件，但为了强调我的反感，我感觉我与这项工作之间像是隔着一座山，我必须首先移山。但我做不到。菲莉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在我的信里原本不是向你表达爱情，否则我应该只是想着你并只是写你。我的本意是请求你，期望在最荒唐的事情上得到你的帮助和祝福。否则会有什么理由使我信中提及奥斯西之行。

我今天下午写的信在你收到时将是一封被撕破的信，这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把它撕破了，因为我气恼之极，我不能真实、明确地给你写信，不能真实、明确地写信，就像我虽努力，仍不能通过写信留住你，和以某种方式向你表达我真实的心情并告诉你我除写作之外不允许有别的期望。譬如，在下午的信中我写道，我只有在精神形象之中或类似的情况下才是清醒的。这当然是错误和夸张的，但的确是真实的和唯一真实的。但这样我永远不会使你明白，反而使我反感。然而，我不能

扔掉手中的笔，尽管这是最好的办法，我要不断地努力，但又不断地失败，然后又返回到自己这里。就因为这，我把信撕破了，我应该把它完全撕了，对每封信都应该这样，因为即使你收到的都是我的信的纸片，结果都是一样或者会更好些。

现在你可能已经到了柏林了，它使我感到充实，在我想象中又占据了半年以来已经占有的那种值得尊敬和几乎是崇高的地位。

弗兰茨

〔19〕13.4.20

〔首页左边空白处〕

听说星期三的柏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观察》一书的很不错的评论，我没有看到，是今天才听说的^[130]。

我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在今天谈判时是证人，而我将成为原告一类的人，他坐在我对面，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我说，我首先要（他正在向我读材料）写一张明信片，否则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衷心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奥斯西，13.4.22〕

结果确实很糟糕，尽管谈判还没有完全结束。那怎么办，又不是我的责任，不要因此而生气！我反正不很介意，因为在布拉格有信，那才是正事呢。

弗·卡

〔明信片邮戳：奥斯西，13.4.22〕

我没有时间给你写信吗，菲莉斯？不，不是这样，我的身体也不比往常差。我肯定不是故意使你感到不安，故意不给你写信，更不是有意不愿得到你的回信。但——请好好听我说——我愿意给你时间，使你搞清楚你与我的关系，因为根据我复活节后得到的关于你的消息（可能不算头两封信），我不得不相信（菲莉斯，请眼下站在我的一边，像我这样看待这一切吧），我只有通过人为的方式才能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即

一封接一封地给你写信，使你无暇思考，迫使你在急迫之中使用旧的话语，但赋予新的内涵。我现在不想说什么最终的话，尽管我怀有最坚定的信念，但每次收到你的信，都使我感到迷惘和彷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确实这是唯一使我感到失望和能够使我感到失望的一次，因为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期待从你那里得到一片诚意。你会与我分手，我对此并不感到诧异，因为你没有能够马上认识我，甚至也不可能，我完全是从侧面接近你的，过了一阵后，我们才把脸转过来，面对面地看着。现在我不了解你最后是怎么决定的，而只是从你最后的信中猜测出你的决定，我只是不理解，菲莉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回事。你不应该相信，我所说的一切只是想指出，你的信简短而稀少，你以前有时也给我写过简短的信，那些信却使我感到幸福和满足。但最近的一些信却不一样了。我的事对你来说不再那么重要了，更令人生气的是：你不再关心给我写信谈关于你的情况了。我可怎么办呢？我无法就你最后的那些信回信了，星期四那天我在想，你上午在办公室确定没有我的来信后是如何松了一口气。

弗兰茨

〔19〕13.4.26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等着写信，那是不可能的，面对着一堆书籍和稿纸，我正在准备有关《预防工伤事故的组织工作》的报告，但脑子里空空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先给你写回信。菲莉斯，难道我想伤你的心吗？伤你的心？但我的任务只是尽我力量所及减轻所有不是由于我的责任但由我给你造成的烦恼。而现在你的这封信是这么的疲倦和伤感。你现在怎么样？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你这个可怜的？难道我是一个如此极端的傻瓜吗？你以为，我在第一次预感到恐惧时马上就会给你这样写信吗？我相信拥有许多证据，我现在不想一一说出它们。现在也不是时候，当我看完你的信后，我有一种被动的感觉，好像长时间逍遥在外后又回到了这个世界。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就像昨天没有收到信一样。我可以毫无羞耻地说，我以为这是你束手无策的表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束手无策。

在家里

菲莉斯，告诉我，这不可怕吗？你在忍受痛苦，而我却被排除在痛苦之外。难道对于纠缠着你的痛苦我不该嫉妒吗？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你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个痛苦。我几乎都把它忘记了。你在信里只是总在说“着急”或者“又着急了”，当我看信时，这个词在刺痛着我的眼睛。

现在，没有你的来信，没有给你的回信，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在忍受着。我应该还有精力。我会很好地关照自己的。勿用明言，我比以往活动更积极了，无所事事和屈服顺从都是可怕的。我想象了许多许多，但我根本不愿说出来。我所能谈及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下决心，如果收不到信，我就给你写信，告诉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你（当然是最好的情况下）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不是完全离开我的理由。我想向你建议，我们之间可以再以“您”相称，我想把你的信退还给你，但条件是，你得保留我的信——但你不用因此而离开我。尽管如此，你应该允许我在圣灵降临节时去柏林看你，因为这次旅行完全是有用意的安排，改变它会打乱我的一生。你在最近给我的信中好像说，我们之所以不能见面，是因为你要在那天接待你未来的弟妹，但如果有真心的话，你还是可以有半个小时时间的。此外，你说要接待几天，我感到难以理解。

当然，我以往的决定不是绝对不变的。比如我昨天想无论如何要给你打电话，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我觉得，如果你连回信都不愿意写，肯定更不愿意接电话了。但我还是要打，随便在一个偶然的下午听听你的声音！但是，尽管我相信我能够记得住，我还是找不到你告诉我电话号码的那封信。也可能只是记在一个信封上了。但公函上面的电话号码我不敢打，因为可能会正好挂到你的经理那里去了。

这样，我又做出另外的决定，我放弃了打电话。我想晚上去马克斯那里，请他给你写封信。我要给他看你最近的三封信并告诉他我给你写了些什么，讲述我就你的行为所想出来的一套很笨拙的理论并请他问问你。我想，你对他一定会说实情的，在他的面前你不会有什么障碍。我要让他马上就写，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把信投到邮车上。我是9点半到的马克斯家，但家中没人，我在下面转了三刻钟；但马克斯家仍然没有人回来，即使他们现在回来了，再让他写信也太晚了。我又回到了家里，尽管昨天晚上事情没成使我感到十分伤心，但我现在对于你今天上午没有收到本应收到的马克斯的信感到很高兴。

最亲爱的，你会再次接受我吗？第多少多少次？我仍然不得不承认，即使我手里拿着你今天的来信，可以重蹈这个月的时光，但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知道，在顺利的交往中，这种不信任是接人待物中最为糟糕的。这一点是我在几个月前知晓的，那时你在信中写了一些不信任的话，不过，只发生了那么一次，但我却收不住了。

菲莉斯！那么圣灵降临节呢？我根本不再敢吻你了，也永远不会再吻你了。我不配。

弗兰茨

〔19〕13.4.28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首页信头上方〕

星期四我能得到你友好的话语吗？那你就应该寄快件。那天是节日，邮差只送一次信。12点以前我都在办公室。

时辰已经晚了。我和马克斯、他的夫人和韦尔奇一块儿在看通俗剧，但为了给你写上几行字，戏还没结束我就离开了。能够这样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面对这个我只有在夜里写信时才敢于感觉的可怕的世界，能够在你那里得到关怀，那是什么感觉。今天我在想，如果生活在这种双重感觉中，根本就不应该再抱怨，对于心爱的人是一番好意，除此之外，偏偏随时有可能把自己赶出这个世界。——最亲爱的，圣灵降临节时去看你，你觉得怎么样？最近，我入睡之前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想法，但它只是在入睡之前是美好的，只有在白天才能实现。只有你回答了我下面的问题后我才告诉你。要我在圣灵降临节时到你家作客吗？你是怎么考虑的？

在给你制造了这些困难后，我上床了，心情相当平静，如果不是看来一直压抑着你的痛苦的话。

你的

〔19〕13.4.29—30

早上我匆忙之中（现在该我用这个词了并且不再还给你）拿错了信，现在不得不用快件寄这封信。之前还要吻你可爱的手，尽管它们昨

[19] 13.4.30下午

没有信。是我把电报看错了，尽管我把电报读了好多遍，尽管夜里它就放在我的床垫下面。最亲爱的，我给你的信中光是指责你，我是个讨厌的忘恩负义的家伙，这就是我，你不要在意。但是，你知道吗，我人在办公室，心却在信上，相信它在家里。然后我跑步回家，却什么都没有，这也就宣判了我至少还得等上一天一夜。我并不想使你烦恼，现在是夏季，你不应该写的太多，即使你有一次没写信，也不应该感到心烦意乱——好，那我们就说好，不管是你搬家还是有展览会还是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是不幸的事，我每个星期，就在每个星期天，都收到你的一封信，这封信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有兴趣就什么时候写，不过一定是在星期六早上投进邮筒。你愿意这样吗？为了使我不再等待，为了使时间不要像凝固了似的走得那么慢，因为这里的时钟只有在你的信到的时候才敲响。我的头痛现在也好多了，虽然看上去好像是我现在为了强调我的请求而故意说头痛，实际上我真的头痛。不过也许这更多的不是头痛，而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紧张。我应该写作，我最亲近的大夫对我这样说。写作，尽管我的头脑这样的没有把握，尽管我刚才有机会认识我写作的欠缺。对了，我还没有告诉你，下个月我有一部短篇拙作（它有四十七页）出版，我刚好改完第二遍。这是运气不佳的小说的首篇，它的书名叫《司炉·残篇》。它将由沃尔夫出版社发行，书名有些古怪，叫《末日审判》，是一本廉价书，只卖八十分尼。整个讲我并不很满意，就像对所有毫无意义而人为凭空制作的作品一样。但是，第一，我对沃尔夫出版社有义务，第二，我多少是受出版社的引诱才写这本书的，第三，出版社很客气地表示同意，以后在《司炉》这本书中加上你的，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并以大册形式出版^[131]。——只要我像谈论你那样谈到其他的人，我就有一种失落感。

弗兰茨

[19] 13.5.1

菲莉斯，你总是错误地看待我，即使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如果你寄给我的信亲切和善，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只是那些从法兰克福发来的短信，它们看上去——看上去既不是通知也不是说明，几乎没有问候，而只有仓促，只有仓促，是对烦恼感叹的开始，对轻松感叹的结束——因为你是我最亲爱的，我必须向你抱怨一切，包括抱怨你——只

是这些短信使我十分气恼。

现在看来，你为你弟弟订婚的事非常忙碌，——我根本还没向你表示祝贺呢，但你可能对你弟妹很嫉妒吧，那就没什么好祝贺的了——由于圣灵降临节两天的假非常短暂，确实使人感到伤心。我们在那两天做些什么呢？你应该明白，我已经不仅仅是在考虑这两天了，而更多的是想到之后那可怕的时光，因为那时，如果不是发生伟大的奇迹的话，我将很长时间见不到你，除非你和我一起去意大利或至少到伽尔达湖或甚至去西班牙我舅舅那里^[132]。我请求你，菲莉斯，赶快好好考虑一下。我本来不想拜访你的父母，因为我同两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表现和应酬的能力，本来这方面就不行，但我首先更担心的是，只有片刻时间能够同你在一起，在柏林在你的沙发上躺五个小时，但总是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又来电话。你弟弟有点认识我，你那时有没有告诉他我是谁，或者你是怎么向他解释我们的约会的？此外，你现在住的不那么遥远了，一切都变得好起来^[133]。尽管如此，请你好好考虑，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脑子不愿意考虑了。

弗兰茨

〔19〕13.5.2

当我现在坐下来给你写信时，我自言自语地说“最亲爱的”，但当时没有意识到，而是后来才察觉的。我什么时候能使你明白，你对我意味着什么！要做到这一点，在你的周围比在遥远的地方更难。

下午，我独自一人外出散步，双手插在裤兜里，沿着河边往上游走了很远。我当时的感觉并不惬意，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可能我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越来越感觉不佳，工作时总是浮现出同样的幽灵，我的抵抗能力本来是很强的，但它变得愈来愈脆弱，不久将仅仅是形式上的抵抗，最终连它也不得不停止抵抗。的确，我一直对我脑袋的坚固感到惊讶，它好像是出于完全不理解而超凡脱俗，但这并不是不理解，而只是早已逝去的坚固。我现在已经和家人坐在一起一个小时了，为的是从孤独中找回一点自己，但我寻觅不到自己。

我散步的终点是河边一间破烂的茅草棚，这个地方我有好几年没来了。棚顶已经破烂不堪，没有什么样子支撑在那里，小园子整理得稍微好一些，土地看上去还是潮湿的。而现在在我的回忆中，它奇怪地呈现一片黑暗，它的地势较低，当我仔细看过去时，天已完全暗下来了，因

为开始下雷阵雨了。这一切看上去并不令人陶醉，尽管如此，我还是计划着。房子肯定不会太贵，可以把整座房子买下来，再建一座像样的房子，把花园整理得更好些，再修建一座阶梯通向河边，那里的河面很宽，河岸那边视野开阔，河边还可以停靠一只船，总而言之，在这里可以比在城里生活得更安闲更舒服，乘电车到城里也很方便（令人担忧的只是附近的一座水泥厂经常烟雾腾腾）。在长长的散步路上，这些想法是唯一令人感到慰藉的。

弗兰茨

[19] 13.5.3

为什么给你写信对我产生的作用不那么强烈，为什么不能对我有时想到你离我那么远而产生的绝望给予安抚，现在，在启程去柏林之前，这种绝望更加令人无法忍受，因为我不知道，圣灵降临节之后将会怎么样？

那么，要我去拜访你们吗？那就请及时回答我下面的问题：你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在电话簿里查不到？需要我穿深色制服或者作为偶然的访问者穿平常的夏装就可以了？后者对我来说更方便，或者说前者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要我给你母亲带花吗？带什么样的花呢？

我还要住在阿斯卡尼亚。可能我还是11点（晚上）到，但我没把握（我办公室的工作很多，这些工作别人可能轻而易举地就干完了，而我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此外，我向你发誓，不要想着去接我。我到达时的样子肯定是一塌糊涂，不堪入目，你总不会愿意看到，我在火车站上一副六神无主、心不在焉、疲惫不堪、陷入绝望的样子，但又被爱情驱使而扑向你的怀里。千万不要想着去接我！

你在信里说，圣灵降临节的上午还要举行招待会，那么星期一也要搞[134]。这太可怕了。因为星期一晚上我就得离开，我不能待得更久。

简而言之，我“美好”的想法是：如果你同意，我将向你的父亲说出一切，一是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向你当面表露的一切，二是我已经跟你谈过和在信里说过的一切，但这一切你都没有予以重视。这就是我的打算。根据你对你、对你父亲和对我的了解，这是否可行？昨天费利克斯在一个什么场合告诉我说，我需要一位牧师。这个主意不错，如果不是已经太晚了的话，为了这普通而又至高无上的目的，我的确需要一位牧

〔第一和第四页信笺上空白地方〕

请回答所有的问题！星期五你是否收到我的两封信？对我的一个建议你没有作答。

不要像上上封信那样用嘴唇湿润复写铅笔！

这个菲莉斯，无缘无故地感到烦恼和震惊！你了解我对此的抱怨，我不再重复了。

那么星期天上午我见不到你了，菲莉斯？只能听你的声音？当然，这可以使我高兴一个上午，要是能使我两个或更多的上午都高兴就好了。去参加招待会，的确有点不可想象，你不觉得吗？我对那里不熟悉，即不认识主人，也不认识客人，向一对在祝贺的时候才认识的未婚夫妇恭喜订婚——尽管如此，我原则上并不反对，因为即使在平常的场合我肯定也不会应酬得更好，却只能是相反。如果从社交场合来说是可能的话，那么从我来说肯定也是可能的，因为那样我可以多看你一会儿，这些理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也见不到你的话，而你很可能被许多人拉来拉去，那我情愿放弃这次见到你的机会，尤其是我不能想象，不会发生什么对你来说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总还是提到了这次访问的可能性——但是不，你考虑得还不周全，放在你桌子上的海外来信使你六神无主。但有一次你写道，我可以陪你去海尔布恩斯（是4？）^[135]，这是最好不过的^啰，我请求这样做。

你当然可以给我挂电话，什么时候都可以，9点以前你肯定不行，9点开始我随时恭候，但如果你想早上7点钟打电话，那〔你〕必须先写信告诉我，我会在7点钟的时候在电话亭里等候，就像哨兵守卫在岗楼里一样。不管怎么说，我很希望得到你的电话号码。

当然，我想向你父亲叙述一切，那只不过是一个想法，无法实现，是一个梦。

我只是担心，可能正因为拜访了你的父母亲，我得到你的机会将更

加渺茫，要是我只见你可能会好些。

弗兰茨

〔19〕13.5.7

〔第二页信纸下边空白处〕

请把你准备星期六发给我的信寄到我的办公室，我整个上午都在那里，我肯定星期天才回家。

给你的信，菲莉斯，对我来说应该在所有可能的方面都是有益的，比如，刚才我那刮胡子用的漂亮的小镜子被打破了，而写这封信使我忘却了因此带来的气恼。

菲莉斯，我并不想惩罚你，尤其是不管我怎么发挥想象力，都无法想象我不写信会是一种惩罚，是的，我还没有给你写过许多令你感到愉快的信，即使有那么一封使你感到不快，真的也并不是惩罚。我之所以没有给你写得更多，是因为我发现，徒劳地期待你的来信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如果我给你去了信，而你却没有回信，似乎就出现了破裂，来到的不是信，而是回荡在空中的“够了、够了”的声音，同时，即使我没有写信，一切都可以保持着良好的、原本的、出色的平衡，恰恰令人伤心的是没有任何消息。因为我现在是那么敏感和女人气十足，我头脑周围的紧张气氛总是不能消失，好像容纳的范围太小了，我珍惜自己，没有写信。这是不对的，而且也没有提供多大的帮助。

为什么生意方面的事总是没完没了？难道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客户对口述记录机的需求就没有够的时候？

当我今天从办公室回家时（和一个同样和蔼可亲但又性格古怪的同事一道，他刚刚披上外衣，我就抓住他的袖口跑过格拉本大街），看到一个小姑娘，她正全神贯注地和别人聊天，一张天真、可爱、活泼的面孔在微笑，与你的微笑是那么的相像，我几乎把它当作是你对我的问候。世上有如此之多相似的事物，其中有的令人心泰神安，当然也有的令人激动，因为人们在寻觅它们。

菲莉斯，看，你把我们的家庭搞混淆了！你们那里玩66，而在我们那里完全是另外的玩法。此外，只有一点点的痛苦，因为在最后一轮更

多的是我的父母让着我，而不是我让他们，当然只是他们有能力更多地忍耐。

比如今天我又感觉十分痛苦；如果我搬到柏林后精神状态仍然不佳，那么——！你必须承认，我很善于使自己具有吸引力。

弗兰茨

〔19〕13.5.8

一个晴好的星期天早晨，菲莉斯！在布拉格和在柏林都会证实这一点。

弗兰茨

〔19〕13.5.10

我真的能够单独见到你吗？最好没有别人知道此事。

我刚回来，菲莉斯，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我还得给你写信，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想念你，我在路途中所看到的一切都与你有关系，耳闻目睹所留下的印象好坏取决于与你关系的好坏。我们还有那么多要说的，菲莉斯！我脑子里乱哄哄的。这只有通过旅行我才领悟到，如果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体会到的。你知道吗，我现在本来是信心十足的，我们还有一些要紧的事情需要仔细谈谈，不过还是在外面为好。你知道，即使附近就有一个风景优美的湖泊，但我还是常常把你带到崎岖坎坷的道路上。这一切的一切带来的只是夜晚的时光吗？当我在柏林收拾行李箱子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另外的话语：“没有她我无法生存，和她在一起我也无法生存。”就这样，我一件又一件地往箱子里收拾东西，不知什么东西几乎要使我的胸口爆炸了。

但现在我不能再揭开这个谜了，你不相信，现在正好是1点钟。在想象中我只能找来这可爱的手。当人乘电梯上楼时，是像发誓那样伸出手指吗？

弗兰茨

〔19〕13.5.12—13

〔最后两页信纸下边空白处〕

有个请求！一个对疑惑不定无法忍受的可怜人的请求。你愿意每周多写几封信吗，如果愿意，那么就星期三写一封，星期日再写一封，好吗？

谁知道，我明天早上是否有信，而你，最亲爱的，最亲爱的菲莉斯，对我这两天在柏林对你所做的蠢事是怎么看的？你不知道，菲莉斯，你不知道，是什么束缚着我并使我成了最不幸的人，尽管我好像离你，我在地球上唯一的目标，是那么的近。啊，我的主，我真希望，你不存在这个世界上，而完全在我的心中，或者更好些，是我不存在这个世界上，而完全在你的心中，依我的感觉，咱们当中有一个是多余的，两个人的分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在，菲莉斯，为什么我不马上把你拉到我的身旁，至少使你离我尽可能近些，为什么实际上非但没有这样，我反而像令你恐惧的动物一样蜷缩在森林的土地上。这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吗？但另一方面，我的确不是中了魔法的王子，尽管王子们习惯隐藏在这类丑陋之中，假使我只是一个中了魔法的能令人忍受的人的话，那就好了，那就太妙了。那你也许满意了吧？

但是，如果我在我这方面不得不同这些几乎无法使用人类语言翻译的东西进行斗争的话——几个星期以来我没有一丁点儿气力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我对你没有把握，如果你使我感到六神无主，那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听天由命的话，那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会去世界的另一端，但你不是我，你是做生意的，你办事积极，思维敏捷，记性极佳，我在家里看到过你（你在作解释时是如何抬起头的！）我在布拉格看到过你和陌生人在一起，你总是富有同情心，但又十分自信——但在我面前你却是没精打采的，眼睛往别的地方瞟或盯着草地，不理睬我谈到你时的拙嘴笨舌和许多有理由的沉默，不愿认真地了解有关我的情况，你总是隐忍着，隐忍着，只知道忍受痛苦——菲莉斯，如果我与你分手，那我会怎么样呢？你以为，我和你没有感情？你以为，除了你我的生活还会有什么意义吗？

当马克斯在柏林和你通电话时^[136]，我完全可以想象，你非常快乐和自信并且开心地在笑，此外你还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给我写过很多的信，但信中却没有表达什么思想，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们没有互相靠近，也没有什么希望，眼下就是这样。”但这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在这期间已经大步相互走近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确存在着遥远的、明显的、人人可以理解的距离。尽管这样，你那时已经在这么想，

而我当时对一下子就接近了这位孚众望的人，内心感到十分高兴。你今天还像当时说的那样那么想吗？你的眼光，你的话语，你的沉默证实了这一点，而其他的一切几乎都在反驳这一点。但前者更显而易见；我怎样才能摸到头绪呢，在听天由命的时候，我能哪怕碰一下你的手指尖吗？

你的（要是我无名无姓，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你的”该多好）

[19] 13.5.13

埃伯斯树林在什么地方？距离柏林远吗？当你写明信片时，你是否已经收到我的挂号信了（当然我已经都收到了，因为离开火车站后我径直到了办公室，看看有没有信，我从今天清晨5点钟离开家时迈出第一步开始，整个路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太好了，给我寄来两张明信片——现在我想，我们之间再不需要说什么感谢的话了）。但这些明信片当然并不是对那封信的答复，我还要得到答复，菲莉斯，不是吗？我求求你了。你应该看到，得到答复是十分重要的，最亲爱的，最亲爱的！否则，我关于你的想象将会破灭。好，你会答复我的，我不再谈这事了。

你家人可好？我对你家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了，这可能是因为你家给我的印象是对我完全无可奈何的样子。我觉得我是那么的渺小，你的家人都围站在我的周围，是那么的高大，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除了你的妹妹艾尔娜，我觉得一下子离她近了）。这一切都符合当时的境况，他们拥有你，所以他们是高大的，而我没有拥有你，所以是渺小的，但只有我是这么看，他们不这么看，他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尽管那么的盛情好客，他们仍然被这种做法所左右？我肯定给他们留下了十分丑陋的印象，但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你妹妹艾尔娜说了些什么，哪怕是指责和恶意的话。你愿意告诉我吗？

弗兰茨

[19] 12.5.15

〔下面空白处〕

正好我手头有马克斯以前的评论^[137]，我带着一声叹息把它寄给你。请比较比较！

最亲爱的，请听我说！不要离开你曾走向我的道路！假如你非这样做不可，那么你就走回头路！告诉我，你感觉到我是如何地爱你吗，尽管现在是在柏林，而不是在遥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把我在你面前隐匿起来，你还是感觉到了这一点，是吗？我要说的话卡在喉咙里，要给你写的字被淹没了。

弗兰茨

〔1913年5月16日〕

没有收到信，可能因为是假日的缘故。

星期五晚上[138]。我可能把在这里与你分开度过的日子搞混淆了，它们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假使整个世界都闯入你的心里，那我会怎么样呢？起码要喜欢我嘛。菲莉斯，你对我的爱就是流入我心脏的血液，我没有别的血液。

你父亲何时回来？我对那封信考虑了很多，因此它会变得糟糕，同其他一切——我要通过思考达到的一切——一样糟糕，就是说是清晰和模糊的糟糕的混合。即使这样——对我来说，眼下没有更重要的了。我要这样写这封信，使你能够看到它，我先把信寄给你，请你评价。你父亲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间最合适？

但这也会由于明天一早我在办公室收到了希望得到的信而失去其重要性。

你的 弗

我最亲爱的菲莉斯：

继续忍受不明不白的折磨，这还有什么意义（我是从我这方面讲），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在这种折磨当中还有一点点荒唐的、第一眼看上去就开始消失的慰藉？我不要等到你父亲回来，我可能今天晚上就写信，明天一早寄给你先看，然后再寄给你的父亲，不管他是在柏林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它将不会是一封可以取决于心境而随便给予答复的信，不管回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写的，回信的结果可能都是出乎意料的，等待是没有意义的。

可能确实有什么意义，但我并不想知道。最亲爱的，我应该并且可

以“盲目地信赖”你，这是可以肯定。不过你知道，你能够信赖你自己吗？你能否在所有你将遇到的事情中信赖自己？你起码对此没有预感。你不晓得，是什么使你吸引着我。你不是“一个愚笨的孩子”（在你身旁，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只是屈服于你），是大自然本身挽留着你。但你还要为此给我写信（我牢记你的许诺！）其实我能够让自己相信你在微微摇头。

对于未来幸福的一些想象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无法想象出来的可能性。正如可以以对上帝的理解去解释上帝的存在，然而也可以以理解不够而予以反驳。要是我在八年或十年前就认识你（过去既是肯定的又是失去的），我们今天会多么幸福，不用痛苦地推脱，不用感叹和绝望地沉默。但事实不是这样，我找姑娘幽会——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并轻易地就爱上了她们，和她们寻欢作乐，然后更轻易地离开她们或心平气和地看着她们离开我（只是多数才显得数量多，因为我不称呼她们的名字，因为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这些情人当中使我内心动情的只有一个女人，那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139]。从那时开始，在没有任何这类关系的情况下，我几乎摆脱了一切的一切，愈来愈局限于自己，我可怜的身体状况——我该怎么说呢？——走在我消失的前面或跟在后面，并使我继续往下沉，此时此刻，当我几乎绝望的时候，我遇到了你。

弗兰茨

[19] 13.5.18

〔附信〕

今天，我找到了如下一封在幸福与不幸时期写给你的信[140]。你对此有何评论？请像当时你打算回答的那样作答。

弗兰茨

[19] 13.5.8

我的小姐，为了将您抓住片刻，我现在中断了午夜1点半的创作。我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我眼下需要。相反，我现在恰恰感到很健康，否则也不会中断创作。只是我周身都在颤抖，如同电影摄影机的灯光在开初几天使幕布抖动一样，如果您还能记起来的话。我过分幸运，而一个多星期以来却又感到十分苦恼。有几个夜晚，前半夜写起来没完没

了，而后半夜却诅咒不已。白天则是办公室，还有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这个孱弱而可怜的人儿哟。现在，我除了向极其安详的您诉说，能够感到慰藉之外，还能再向谁去诉说呢？

您的 弗兰茨·卡

〔1912年9月底至10月初〕

因为人们这几天夜间过于迷信，对于曾经写下的东西的力量容易估计过高，认为写下的错误复制后继续有效，而我却认为，宁愿将痛苦缩小，而不是幸福，上帝保佑。可是，如果其他方式行不通，那么就保持原貌。您那遥远的目光对我具有何等神奇的力量哟！

我的菲莉斯，我最亲爱的，据说对你的一封来信，我没有立即作答。你确实相信吗？这是可能的吗？不，不可能，因为我对你的来信感到无比喜悦，会情不自禁地立即回信，倘若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很糟，或者理智认为或许不复信更好，可是请想一想，你星期日晚上寄发的这封信，今天星期五才到了我的手上。邮戳表明，它曾经过维也纳。我在此地备受折磨之际，它却由于邮差的差错发往维也纳，后来又慢慢地转了回来。在这漫长的几天里，我在想：菲莉斯对于我那封原则性的信件没有作答，由于给父亲的信而不答复这一问题，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都不来信，她去了汉诺威，但丝毫也不告诉我此行的目的，也不通知我在汉诺威的地址，在旅行期间也不想知道我的任何消息，最后也只字不提此次旅行情况。——如此说来，我也不能写信，况且我今天刚刚收到一信。值得庆幸的是，这封信改变了最坏的处境。这段时间并非美好，我不时告诫自己，你对我虽说残忍却倒无恶意。然而，残忍而无恶意达到如此程度，则是最无望的。

然而，菲莉斯，现在这样子是不行的，一切都应改善，都必须改善。给你父亲的信仍没有结束，这就是说，已经完稿若干次，但总是不能用。此信应该非常简短明了，而要做到此点却并非易事。我并不打算利用你的父亲，你事先应该看到此信。可是，出于以下原因，这封信却必须写：目前，我遇到一些障碍。对此，你多少也有所闻，但却并没有怎么严肃对待之。即使你完全了解，也不会加以严肃对待。谁人也不会为了我而严肃对待它们，或者出于喜欢我而不加以严肃对待。这件事已经重复多次了：大约十年来，我愈来愈感到不十分健康，缺乏一种健康的舒服感，一种在各方面都听从使唤、无需时常加以注意和担忧而工作

的体魄的舒服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舒服感能够不断产生出快感，尤其是落落大方。我缺乏，缺乏各种生命的表现形式。这一缺陷并非因为我曾患过什么特殊的疾病。恰恰相反，孩提时代患病后，我有些过分强调，因此才要躺在床上，其实根本无病，至少我已根本记不起自己曾患过何种疾病。然而，这一可悲的现状现在却显现了出来，并且几乎每时每刻都有表现。远处看去，它尚可容忍；与朋友临时相聚，他们并不予以理会；在家庭内部，因为对此讳莫如深而并不发作。相反，倘若最为密切地直接相处呢？这一状况妨碍我无拘无束地交谈，无拘无束地吃饭，无拘无束地睡觉，妨碍我在各种场合无拘无束。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东西面前不会如此恐惧，以及其合乎经验的根源。请告诉我，难道我会眼睁睁地给我所拥有的至爱之人增添更多负担。即使对无缘之人，即使对时间和内心上有限的接触，我自己也是尽量避免那样做的，更何况这里一切却没有限制。我能否如此冒昧地请求你同意进行一次谈心？对此，我早已急不可待，然而却迟迟没有提及。我能够吗？请允许我仅仅请求你，当我看到，你发生了何种变化，当你同我在一起（这种变化与其解释为我的福分，毋庸说是我的耻辱），你这个平日里自信、思维敏捷、自豪的姑娘，如何染上了黯淡的冷漠。在这种状态下，倘若人们尚有一丝责任感，也根本不能要求或者接受对其命运作出决断，如同关于你的命运那样。在那里，在格鲁纳森林，这种冲突是如何将我压垮，此外还有你：什么都允许说，而不允许说。——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不能承担这一责任，因为我认为它过大；而你也不能承担，因为你几乎看不到它。当然，奇迹还是有的，例如你对我好，这便是其中之一。在同你结合之后所产生的奇迹顺序中，为何不能包括我的康复呢？这一希冀并不小，如同它不能缩小责任一样。然而，就整体来看，责任则太大，并且今后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想给你父亲写信。我的父母或者朋友并不能给我足够的建议。他们很少考虑你，只能提出一些显然已经足够的建议，即承担所有责任，更多的就提不出来了。他们劝我（即使我不讲，我的眼神中也表现出了自己愿意听什么），尤其是我母亲，她仅仅考虑到我，目光很短浅。她什么也不知道，即使知道，出于母亲的自豪感和母爱也不理解，因此也提不出什么建议，只有你父亲才能提出建议。为此，我的造访将十分有益，因为有利于我的最起码的偏见也不会影响他的建议。我将把现在告诉你的话再告诉他，只是更加明确。如果他不完全嫌弃我的话，将请他——听起来可能有些滑稽，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一种可怜的临时辅助手段——找一名他信得过的医生，为我进行检

查。

弗兰茨

〔19〕13.5.23

现在来谈论马克斯的新作《妇人当家》^[141]，为时已经很晚了。过几天我将给你寄去。短篇小说《缝纫学校》也包括在其中，我只读过它的开头部分。现在，我将不再顾忌时间与失眠而继续将它读完。

最亲爱的，这是怎么搞的，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你可曾知道，你来电中的“内心”这个字眼，尽管仅是客套话，而我却从中吸吮了我所希望的一切？我上封去信是否有什么伤害你了？对此，我不太相信，因为即使愚蠢，表面上矫揉造作，如此泛泛地谈论早已过去的事情，我们相互了解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你本应该知道，将大量的素材溶入一篇正常的小说，不会有什么话会伤害于你。

难道是此次旅行安排不当？但我也没有收到一张小明信片，星期五你也应该回家了，他们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如此惦记着你，你肯定已经写过信了。

我的菲莉斯，不要再责备了，决不要生我的气，或许这是起因，但绝不是罪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根本不会相信，倘若我的手真的握着你的手，那么我的内心将会感受到你的指引。

弗兰茨

〔19〕13.5.13—24

允许我问候你的母亲和姐妹，请告诉你的母亲：此行有意义，有目的，却没有谁来实施。

你是否收到我的快信？

〔信笺左下方边缘〕

这位“业已报到的勃小姐”妙极，请能经常从办公室里寄点东西来。

天晓得，你为何不给我写信？已有一个星期没有来信，可怕之极。

菲莉斯，这乃是结束，你以如此沉默将我打发走，毁灭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可能拥有唯一幸福的希望。然而，为何如此可怕的沉默，为何没有一句坦诚的话语，为何几个星期以来如此明显而明显得可怕地折磨我？这已不是你的怜悯了，因为即使我是一个你非常陌生的人，你也应该看一看我在这种不安全的状况下受到何种痛苦，我间或会丧失思维。这并非怜悯，以沉默告终的怜悯。大自然有其运行轨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愈是了解你，便愈是爱你；而你愈是了解我，我便更会令你难以忍受，在你束手无策之前，无法克服自己之前，你确应认识到这一点，坦率地讲出来，不要等待如此之久。关于五天旅行，你哪怕是告诉我一句话，对于我请求你作出决断的信，你哪怕只答复一行字，你应该以某种方式抚慰我因如此长的时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的不幸。昨天，当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当然由于听到你的声音，耳边嗡嗡作响，只能听清几句话。你说：你星期日晚上给我写信，至迟今天，即星期二我就可以在家中收到来信，没有，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你既没有在星期天写信，也没有在打电话之后的星期一写信。你无法写信，可是你却也不能明说你无法写信。现在我回想一下，昨天你所能告诉我的唯一单独的事是询问我近况如何。接下来我的理智真的紊乱起来。长此以往，我难以再生活下去。或许我不需要再要求你，但尽管如此，我特别请求你不要再给我写信，你也再听不到指责，也不再受到干扰，只有一点请你记住，不管沉默的时间有多久，应最轻微但却是真正的召唤，我便属于你，今天到永远。

弗兰茨

〔19〕13.5.27

菲莉斯，不，我并非焦躁不安，并非是这个字眼。然而你不愿意拥有我，没有比这一点更明确的了。可是倘若你真的愿意拥有我，那么这个愿意却因为不那么坚定而完全黯然失色了。整整十天时间，你完全离我而去。让我表面上握住你的手，这一点我难以忍受。对于法兰克福的沉默，我忍受了下来，但却没有得到你的解释。最近这次沉默，对我说来太过分，即使对于坚强十倍于我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我最终承认，自己并不理解你，但却也不想预言今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有一点我错怪你了，即你星期日晚上确实写过信（今天我才收到这封信，邮差应该感到我双手在颤抖），可是此信内容却又完全补偿了我的错怪。

你星期一收到的那封信中，我绝望地呼喊，你没有什么可写。星期二又没有任何消息。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你今天来电，我要感谢马克斯的一封信。现在，除了告别，别无他事，因为你在来信中行与行之间、信与信之间间隙中早已进行过告别。菲莉斯，我重申，我完全属于你，你再也没有什么像我这样迷恋了。然而，以目前和近几个星期的情况来看，我不能再属于你了。因为要维持这种状况，你在其中只能痛苦，我在其中被毫无意义地追逐，这不可能是你的真正天性，你肯定不会如此残忍。这一点，我必须跟你讲。

弗兰茨

〔19〕13.5.28

我的可怜的最亲爱的，我们怎么办？你可曾知道，倘若不是略维在这里，我不给那可怜的人组织报告会（附上由我发起，皮克撰写的提纲[142]，还要做一些此类工作），并且出售入场券，操心找报告场址，略维那难以压抑的火焰感染着我，迫使我处于表面上的忙碌与活动之中，我真不知道这些日子如何度过。你瞧，我们属于一个整体。在我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你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健康的，因此在深层次也是安静的，而我却身染疾病，或许并非通常意义上，却是更加严重的疾病，因此表现为急躁、精力不集中、缺少兴趣。你最初的信件与几个星期的信件之间肯定有差别。这些差别或许并不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重要，或许具有我所不能发现的意义。你对我的态度或许具有我没有意识到的意义，或者肯定已经具有这种意义，因为你自己也曾说过。事情就是如此，你为我而痛苦，也正如你所说，确也对我满意。我为你而痛苦，并且必须原样而没有丝毫改变地拥有你。例如，请记住你从动物园给我写的那封信。那不是一封信，而是信的幽灵。我几乎能够背诵它。“我们在动物园坐了整整一下午之后，又一起来到动物园饭店。”是的，然而为什么，为什么你必须在动物园坐着呢？你并非女奴。你可以躺在家中，清除旅途的疲劳，安安静静地给我写上五行文字。“现在，我是在桌子下面写信，附带谈论着夏季的旅行计划。”就是这几行文字，八天间歇之后，你不得不在难以想象的情势下才写出的最初的几行文字。对我说来，它们几乎意味着一种指责，即八天之后，我才终于想听到你的一点消息。可是接下来，你就将此信不贴邮票扔进邮筒，结果迟到了三天。这样，你就又可以以为三天之内用不着给我写信了。——好啦，我现在跟你说点亲切的话，在内心最深处，我对你除去爱情没有别的任何东西，然而从中产生出来的

却总是痛苦，流出来的宁愿是眼泪，而却相互拥抱在一起！

弗兰茨

〔19〕13.6.1

略维坐在我身后，正在看书。不，菲莉斯，并非因为我被他缠住，才没有给你写信。还有什么东西会缠住我，让我的思绪离开你？不是，我在等你的来信。现在我多么想向你发誓，我们安安静静地、不受任何影响地相互致信，可是我对自己却没有把握。最亲爱的，可是现在请接受吧——当然不要有什么毋庸置疑——不仅是遥远的距离把我变成这个样子，而且咫尺之距也会如此，并且持续时间很长，一方面更加绝望，另一方面更加恍惚。我在考虑这件事的同时，仍在琢磨给你父亲去信。

最亲爱的菲莉斯，请你像过去一样，再给我讲讲你的情况，讲讲办公室，女朋友，家庭，散步。你不知道我的生活多么需要它们。

你发现《判决》有何意义，我是说，是否有什么直接的、相互关联的、值得追踪的意义？我认为没有，并且也不能解释。然而，它却有许多奇特之处。仅看一下其中的名字吧！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虽然已经与你相识，世界由于你的存在而价值增加，但尚没有通信^[143]。现在你瞧，盖奥尔格（Georg）的字母与弗兰茨（Franz）一样多；“本德曼”由本德（Bende）和曼（Mann）组成，本德与卡夫卡（Kafka）的字母一样多，两个元音的位置也相同；肯定是出于怜悯，这个“Manm”（译者注：意为男人）肯定会为这个可怜的“Bende”的斗争助威。“Frieda”（译者注：弗里达）的字母也同“Felice”（菲莉斯）一样多，开头的字母也相同，“Friendte”（译者注：意为和平）与“Glück”（译者注：意为幸福）也相去不远。“Brandenfelod”（勃兰登菲尔德）由于有“feld”（译者注：意为田野）而与“Bauer”^[144]就有关系，并且开头字母相同^[145]。此类情况还有几处。当然，这些巧合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此外，这篇小说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即晚11点至清晨6点。当我伏案创作时，我曾经历过一个极其不幸的星期日（当时我妹夫的亲戚第一次到我们家，我呆呆地围着他们转了整整一个下午），本打算写一场战争：一名年轻人透过窗户，看到一群人越过桥向他逼近，可是后来笔下的一切都开始旋转起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倒数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应为“掉下去”（hinabfallen），并非“摔下来”（hinfallen）。好吧，一切又都好了吧？

菲莉斯，你瞧，这有何等伤心。你星期一写信告我，从今往后又可以每天都给你写信了。我星期二收到此信，你星期三得到复信。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而我却连一行字也未收到。难道我不应该感到惋惜，你“并非出于同情”，而是出于其他原因才打算给我写信的，因为倘若你出于同情，那么我也早该收到你的信了。你总是开些空头支票，而你却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弗兰茨

〔19〕13.6〔6日和〕7

今天早上，我把信遗忘在家里了（现在，我总需要匆匆离家，因为我的父母去了法兰岑斯巴德，我早上要去店里，下午也是如此。奥特拉现在因喉咙疼痛而躺在床上。——可是，我为何要讲这些，难道也是试图以这种方式影响你吗？不，我不愿如此。特别是当我知道，这也无济于事时，更不会如此此）。当然，我也感到高兴，无需这样早就将信发出，因为今天肯定会有东西来的。可是，任何消息也没有。我写信告诉你，仿佛你不知道似的。可是，你是知道的，并且希望如此。我再也不去想，来信可能会丢失了。写了信不会丢，丢失的只是那些没有写出的信。可是，为何会发生这种事呢？为什么？你为何如此毫无意义地折磨我呢？

〔翌日，即1913年6月7日〕

现在已是深夜12点半，我刚结束郊游回家，看到了企盼已久的你的来信，或者毋庸说是不再企盼的信。你写的一封信确实丢失。由于没有收到这封信，我折磨自己达数星期之久。这期间，你那里有何幽灵出现，表面看来竟会让你开口？对此，我明天再详写。我只能感到幸运，你的嘴里竟对我还有不少好话——今天乃至永远，我只敢并且只能从远处亲吻你的唇。现在，祝你晚安。你的怀疑不至于是退缩吧？你终于说话了，我感到何等高兴哟。纵然你没有意识到，尚未说出藏在心底的真心话。可是，开头的话已经讲了，我们应该以它们引导出其他的话来。以便我们能够完全自由地做出最好的决断。现在睡觉吧。不，我仍不能睡觉，并且睡得越来越少。或许今天能睡个好觉。

那封丢失的信都写了些什么内容？请将地址写得更加认真些！

我很想向你的妹妹艾尔娜致以问候。你能告诉我她的地址吗？

你病了，并且还在带病四处奔波？你最好不要去看医生，而是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你呀，我真想去护理你。

此外，我们两人都需要安静。我们两人有着同样的需求，如果能够同去一个地方，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

至于我是否喜欢你，你无需问及。有时在我看来，仿佛一切的一切都变得空荡荡的，只有你独自坐在柏林的废墟上。

你星期五的来信当然尚未答复。我正在为复信作准备，但准备工作尚未结束。原本不是由于时间问题，而是由于虚弱和脑袋的糊涂。脑袋早就不听使唤了。

通过一个什么偶然机会，我找到了关于略维的消息，现在他就在我面前^[146]。报告会的听众并不太踊跃，但略维总算又有些钱了，暂时可以不再帮助他。有他讲话时，我真想也让你参加旁听。他们叙述要比所有报告朗诵和歌咏更漂亮，因为他的火热感情确实能够感染别人。

《判决》无法解释，或许我会让你看一看与此有关的几处日记。尽管没有承认，但这个故事却是充满抽象成分。朋友几乎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更多地像是父亲和盖奥尔格的共同性。故事或许是围绕着父与子在转，朋友这一角色的变换不定或许是父与子关系的透视中的变幻。可是，这些连我也没有什么把握。

今天我给你寄去《司炉》。请友好地接待这个小鬼，让他坐在你的身边。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样，能够夸奖他几句。

明天，我期待着医生关于这一蠢事的准确报告。此外他究竟是何许人也？是你们的家庭医生吗？他姓甚名谁？

你呀，我当然不想通过这封信阻挠你来布拉格。来吧，尽管来好啦！你是如此受欢迎的人。

因为犹豫不决，我几乎难以动手写信。如同最近几个月来信不断发生的那样，你的来信又出现了问题。不像几个月来我请求得到你的消息一样，你仿佛完全像个陌生人，难以设身处地地为期待消息的人着想。即使责任或许不在你，但间歇却往往是你造成的。现在又是如此。你或许患病了，像你已暗示的那样？对此我也难以再正确地加以理解了，我还记得，在最初的日子里，我曾向家中发过一份电报——“您生病了吗？”结果做了一件傻事。最近为了等待电话线路打通，我花了两个小时，在这期间，在那所简陋的邮局的简陋候话室里，我想出了一封说服你母亲的信，打算迫使她告诉我关于你的近况的消息。后来，我终于听到了你那健康、响亮的声音，你却不疼不痒地问我：“你还好吗？”自从今天清晨，我都在想给布吕尔小姐发份电报，最后却或许不能那样做。菲莉斯，请求你，如果你安然无恙，给我写一句话来吧。当然倘若你病了——这当然是可能的，我早已不再相信自己的预感了，那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么我只能处于恐惧和惊慌之中，因为我不知所措，我的愿望还能有什么价值吗？可是我或许还能得到你的一点消息，那就是通过你的妹妹。可是，我该找谁去诉说呢？或许你根本收不到这封信，我也只好将它束之高阁了。

弗兰茨

〔19〕13.6.13

这是为你准备的星期日专信。我无法写得再好啦。现在，我躺在床上收到了这封星期三写就，星期五傍晚投寄的快信。我几乎感到满足。对于所有坏事，我十分健忘。在我看来，关于收集材料和业余作家的故事最为突出。一方面，这故事很可怕，另一方面却奇怪地发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这都是些什么习俗哟！

亲爱的菲莉斯：

今天我难以写信，并非因为什么天色已晚，而是因为那封信明天即使能到——它真的能到吗？也是你被迫写的，是我的电报逼迫你写的。你的美好，妨碍了你写信，即使漫长的星期日也是如此，而我却违背了你的美好想象。倘若这真的是一个胜利的话，那么也是可耻的，我究竟

是打算让你干什么呢？究竟是何物使我紧追你不舍呢？我为何不肯放弃，不理解一些示意呢？我这是在借口使你摆脱我，而使自己靠近你。界限或者出路何在？倘若我必须相信，你对我说来已经失去，那么一种粗暴的未来幻觉便会立即出现，一条或许在哪儿存在着的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决不会遇到的出路便会梦幻般地现出其巨大而美妙的形式，我又会去追赶你，没过度便重会中止。然而，我不仅感到自己的痛苦，而且更感到我给你带来的更多的痛苦。

弗兰茨

〔19〕13.6.15

最亲爱的菲莉斯：

我刚和躺在床上的妹妹以及身边的一位小姐聊了几句。我的妹妹乖巧且善良，这位小姐也是最谦恭的人。这几句话也是我在极其愤怒的情况下讲的，因为她们喋喋不休地用提问纠缠着我，我只要求她们离开房间。愤怒的原因丝毫不在我妹妹和那位姑娘方面，发泄愤怒也没有可能性。因此，我只能坠入这种可耻的状态，并且写信给你，以求得某种洗涤。然而，对此我也没有把握，因为今天没有收到你的来信，指望不上你的一句清新的话语。我仿佛处在荒漠之上。

现在，你的父亲又来了，而信却始终没有写成。可是你最近的来信或许也是长期以来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听一些“坦率而真诚”的东西，本身也抛弃了某种拘谨和沉默。你肯定是已了解到了我的特殊处境。别的且不说，你我之间却有位医生。他将要说的话，是令人怀疑的。对于此类决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是什么医疗诊断。倘若如此，则不能予以接受。我说过，我本无病，现在却是真的。变换一种生活环境可能会使我康复。可是，这种另外的生活环境却不能招之即来。医生决断时（正如我现在想说的，并非一定是关于我的决断），只能取决于这位不知姓名的医生的性格。例如，我的家庭医生以其愚蠢和不负责任，不会受到丝毫障碍，恰恰相反，其他医生，比较好的医生，或许会斟酌再三。

菲莉斯，你想想看，鉴于这种捉摸不透的情况，我实在难以下笔。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特别。现在要说点什么，看来为时尚早。可是，以后再说却又太迟。正如你在最近来信中所说，以后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谈论这种事情了。可是，拖延下去又没有时间。至少我感觉如此。因此，我想问你，在上述可惜无可改变的前提之下，你愿意考虑做我的妻子吗？

你愿意吗？

几天之前，我在此处搁笔，没有继续写下去。我很清楚，自己为何就此搁笔。因为从根本上说，我向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问题（从你今天的来信中，我又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主张提出这一问题的一方却占了上风。

你所说的般配之类话，如果没有掩饰着其他想法的话（当然你并不感觉），那么只能是幻想而已。我什么也不是，一无所成。我难道“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你吗？评判芸芸众生，感受他们的感受，我尚懂得一些。然而我并不认为，我所要相处的一个人，从长远来看，平均起来看，即在生活方面，在人与人的交往方面（难道还有其他事情吗？），会比我更加蹩脚。我记性甚差，记不住所学到的和所读到的，所经历过的和所听说的，记不住人和事。在我看来，自己仿佛什么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也没有学过。确实，我对多数事情的了解还不如一个小学生。我所知道的如此肤浅，以至于难以再适应第二个问题。我不能思维。在自己的思维中，总是遇到限制。在跳跃中，我还可以把握住某些东西。然而，连续思维，发展性的思维，我却完全不能。我本也不能叙述，甚至几乎不能讲话。在叙述时，我在多数情况下有一种像孩童初学走步那样的感觉，孩童初学走步并非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是因为成年且业已学会走步的家庭希望如此。菲莉斯，你天真、活泼、自信、健康。你难道不能同那样的人般配？我所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某种力量。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力量对文学和钻研并看不出来，但却相当集中。可是，在目前职业和身体条件之下，我却不敢将自己托付给这种力量，因为针对这种力量的所有内在劝告，至少有同样多的内在警告。倘若我将自己托付给这种力量，它会一下子将我从所有那些内在痛苦之中解救出来。对此，我确信无疑。

仅就“般配”这一问题的理论方面而言，正如所说，它实际上是不值一提的，至少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意义——我还必须补充指出，对于一桩幸福婚姻来说，像你看来所要求具备的那种学历、知识、更高追求和观点的一致，我认为第一几乎不可能，第二是次要问题，第三甚至并不好，不值得追求。婚姻所要求的乃是人的协调，即所有观点更深刻的一致。这种一致并不能加以测检，而只能感受，即一种人团聚的必要性。可是，个人的自由却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妨碍。只有那种不必要的人的团聚才会妨碍它，而我们生活的绝大部分则是由这种不必要的人的团聚

构成的。

你说，可以设想，我会难以忍受与你共同生活。在此，你几乎涉及了一点正确的东西，不过是你所讲的完全相反的一面。我确信自己业已丧失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我根本不能与别人进行连续的、活跃的交谈，但某些例外，可怕的例外时间除外。例如，自从我与马克斯相识以来，经常单独相处，有时几天，旅行时几个星期，并且几乎不间断。但我已记不清楚——如果有这种事情，我会很好地记起来的，我曾与他进行过长时间的、连贯的、突出自己本性的谈话。倘若两个人各自拥有一系列独特的、活跃的观点和经验，那么进行那种交谈本属十分自然的事情。马克斯的独白（还有许多其他人），我已经听得很多。对此，却仅仅缺少与之大声争辩、多数情况下也是沉默的对话人（最亲爱的，天色已晚，此信还没有写完。这很不好。更糟的是，它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地写就。这并非没有时间，而是由于不安与自我折磨）。在熟悉的房间里，与二三个熟人在一起，最能令我忍受，因为我是自由的，不存在需要不断引起注意和进行合作的压力。可是如果我有兴趣，我愿意什么时候参加就可以参加共同谈话，愿意多长多短都可以，谁也不会在意我，我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不快。倘若有一个陌生人在场，且能激发我，那么更好，我甚至可以像借用外力似地完全活跃起来。可是，倘若我处在一个陌生人家，处在几个陌生人中间，或者令我感到陌生的人们中间，那整个房间对我说来如同压在胸膛上，自己一动也不能动，表面看去我这个人成了别人的负担，一切便很可怜。例如，那天下午在你们那里是如此^[147]，前天晚上去封·魏尔契叔叔家也是如此。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人却都很喜欢我。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那里靠在一张桌旁，身边是房主的女儿——在布拉格，我还没有遇见一位如此让人喜欢的姑娘。在这么多好朋友的注视下，我甚至不能说出一句理智的话来。我呆呆地注视着前方，前言不搭后语地尽说些无聊的东西。即使有人将我捆在桌子上，我也不会感到更受折磨和更不自然。我还可以列举很多，但这暂且也就够了。

从此以后，人们会以为我生来就孤僻。当我独处在自己房间里，虽然会对一切表示绝望，但相对而言却也幸运，决定至少一个星期不再去见好朋友费利克斯，并非出于什么羞愧，而是由于疲惫。可是，除了创作之外，我也对自己不知所措。倘若我对待自己也像对待别人那样，我早已分崩离析。不过，我已经经常濒临此境地了。

菲莉斯，现在请考虑一下，我们的婚姻会带来何种变故，每人将失去和得到些什么。我将失去多数情况下可怕的孤独，而得到我比任何人都热爱的你。可是，你却要失去几乎完全满意的迄今的生活。你将失去柏林给你带来欢乐的办公室、女友、小小的娱乐，失去与一位健壮、活泼、善良男子成婚以及生育漂亮、健康儿女的前景。倘若你仅仅思考一下的话，你是渴望这些的。取代这一根本无法估量的损失的是，你会得到一个疾病缠身、虚弱、孤独、少言寡语、伤感、僵化、几乎没有希望的男人。这个男人的唯一优点或许在于，他是爱你的，你将不是为真正的孩子做出牺牲——作为一名健康的姑娘，这本是符合你的本性的——而是为一个十分幼稚的人，不过是最糟糕意义上的幼稚，或许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是要向你咿呀学语的人。在任何一件琐事上，你都将会失去，任何一件琐事。我的收入或许并不比你高，每年刚刚四千五百八十八克朗，当然也有权力退休，但如同在公务部门服务的其他人一样，工资很少有增加的可能。从父母那里，我不指望太多。从文学创作方面，更难有什么指望。与现在相比，你的生活将更加简朴。为了我，为了上述那个人，你真的愿意和忍耐吗？

菲莉斯，你现在说话呀。请考虑一下我从一开始给你写过的所有信中所说的一切。我相信，我对自己的描述决没有多大出入。几乎没有夸大之辞，但有些事情讲得过少。关于外部的账目，你无须多言，因为它足够清楚，并且严禁说出一个“是”来。就是说，现在仅有内部的账目。你对此有何看法？你愿意详细答复我吗？或者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也可以不必太详细，但却应明确，正如你从根本上说是清晰的，仅仅由于我才变得有点浑浊的本性那样。

弗兰茨

[19] 13.6. (10—) 16^[148]

亲爱的菲莉斯：

你收到我厚厚的信了吧？我曾经很不小心。晚上，我很晚才下班（我父母下个星期才回来，奥特拉早已恢复健康，饭菜还和以前的一样，对我来说还是那么无所谓）。因为我还是想把信寄走，所以我得去火车站，但是有个熟人叫住了我（他看到我手中的信，问是什么，我开玩笑说求婚书，他也是这么想的，实在说不出比这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来）。如果还想寄出这封信，那么我就得到站台上。但当我想从一

台自动售票机里买票时，硬币却掉了出来，因为自动售票机已经空了。我正想走向另一台，这时从黑暗空荡荡的头等车候车室中走出来一个嘴上长着白胡子的老者，可能是个铁路职员，也可能不是，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大概再也不能认出他来。他说愿意帮助我寄信，没等我同意，在我恍惚之中拿走了信和硬币。我经常处在这种状态里。我听从他做了这一切，还在半睡眠状态中说：“我可以信赖您吧？”那个男子和信都离去了。

今天，收到你的信和明信片我多么高兴啊（所有的东西寄到家里都很晚，明信片我今天中午才收到）！你觉得我不准时写信，写信不是出于自愿，是吗？不，不是这样，对你不是！或许你认为根本还有比书信更好的沟通方式，那么你对了，当然也不是绝对正确。你说我的信也变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变化在哪里？这我想知道。也许你指的是我在写作时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太理解你的假期计划。你非得8月份动身吗？我9月份才有空。为什么您想作的小旅行要花那么多钱？你旅行不能少花点钱吗？你有时要吓我一跳。比如你在布拉格曾经住那么昂贵的地方！你打算在巴勒斯坦花多大一笔钱？你不能乘坐三等车吗？我就只坐三等车！旅行是那么必要和便宜，怎能是另一种样子呢？所以我建议你去加得湖，到那儿之后，我会给你解释为什么。

弗兰茨

[19] 13.6.17

我想要结婚，却又这么懦弱，以至于为了一张明信片上的一个小词而双膝颤抖。明天我能收到这样一封信吗？从中我能看到，你对每个细节都已深思熟虑，完全明了一切。虽然如此，仍然愿意与我结合（可怕之极！很好理解，这是不可反驳的）。你内心尽管有许多矛盾，最终你战胜了或至少出于某种想法而坚信，可以战胜它。

弗兰茨

[19] 13.6.19

你何时收到我的信？你能帮我弄一份上星期一柏林出版的《德国晨报》吗？据说里面有关于《司炉》的报道[\[149\]](#)。

亲爱的，最亲爱的菲莉斯，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你不应该陷入可能给你带来的不幸之中，而应该是，如果上帝不反对的话，去设想，去思考。如果我把自己现在的行为看做饶舌，这一点我在介绍自己时可能忘记说了，我不能不这样做。你对我说的那个词，字面上是关于我打算怎样确认我的生活，但我看不出它是不是我所要的。菲莉斯，我暂且用手堵住你的嘴不让你说，你也就权当没说。你并没有完全理解我所写的（菲莉斯，求你，求你，不要因为我如此说而认为我不好，我必须如此，我不得不如此）。我看不出你已经仔细认真地考虑过了，你只是笼统、粗略地想了想，谁知道你遗漏了什么。你尽管没有说出来，但从字里行间我感到你仍存有疑虑（因为你等了一天之后才写来明信片，两天后才回信）。我所说的有关医生的话，令你不安，这你也有误解。本来这很自然，但你却没有继续坚持说：“算了吧！”我认为，医生的决定其实并非对我的裁决，除非它对我有利，更多的我就不说了。你承认，在我的信中有丑陋的东西，因为“如果我胆小的话……”但最亲爱的，最爱的人，我向你要求的不光是勇敢，更不愿强行给你一件只要求勇敢的任务。勇敢而缺乏思考即自我牺牲。你相信我说的一切，但只是我所说的关于自己的事太“生硬了”，所以你的整个来信都充满不信，但因为它谈的都是我的事。我该怎么做呢？要是能让你把不相信变成相信最好不过！你见过我本人，听到我的声音，不仅是你，而且你的全家也接纳了我，但是你还不相信我。而且涉及的远不只是“柏林及其有关的事情”。你对你将会失去的只字不提，而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好的可亲的男人？”

在上封信中，我用其他的话形容了自己的特点，但你却根本不相信我。相信我吧，想想这一切，并告诉我，你是怎么考虑的。如果你今天，星期天，还有点时间，并且想给我写一封详细一点儿的信，那么，与一个像我所描述的人在一起过日子，你有何设想？这么做吧，菲莉斯，作为在最初的刹那间就与你定下终身的人，我请求你。

弗兰茨

〔1913年6月20日〕

最亲爱的，你无法想象，我是如何从你的信中吸饮我的生命。但是那种想法，那种非常明确地肯定答复却不在其中，也不在你的上封信中。如果它在明天的信中就好了，或者说特别应该在于我明日信的答复之中。明天的信业已基本完成。它对我来说这么重要，以至于我不想今

天通过平信把它寄出，而到明天再寄挂号。菲莉斯，千万要对这封信给予一个详尽的答复！然后，这种刨根问底，这种如此重要的刨根问底，你并不想充分承认它的必要性，会暂且停止。菲莉斯，你不会相信，我从对你的折磨中获得乐趣吧！那么好，请想一想，我坚持这么做必有其必要性。你务必仔仔细细地回答我明天的信！

如果不是布吕尔小姐后来帮忙，那个手势就是一个美丽的艺术品，特别有时候预言“永不富有”可惜无可置疑，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动听极了，而不是正确极了。我想，但也极其令人兴奋。再给我写点儿这方面的事儿吧，如何？

也就是说星期二你收到了我的信。我想让你永远坐在书桌旁，不停地写信给我。

弗兰茨

〔19〕13.6.22

亲爱的人，虽然我们已写了很多信，但还有这一点或者说主要这一点你考虑得不够，即创作其实正是我与生俱来的好本质。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那么这就是，倘若我没有这一点，没有把这个想要解放的世界装在心中，我绝对不敢起想要得到你的念头。你现在对我创作所说的话，不怎么实际。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起你会很快看到，如果你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不喜欢我创作，你将失去支点，你会孤独得可怕。菲莉斯，你将发现不了我多么爱你，而我虽然当时可能特别想属于你，今天直至永远，但我将表现不出来我多么爱你。慢慢地我将被办公室与创作磨碎（现在也如此，虽然我五个月来只字未写了），如若没有办公室，那么一切自然就全然不同了。这种警告恐怕无须那么严厉，但我得尽量挺住。但你，最亲爱的菲莉斯，对这么一种婚姻生活说些什么呢？那个男人，3点、3点半从办公室回来，吃饭，躺下睡到七八点，赶快吃点什么，散一小时步，然后开始写作直至一二点钟。你能忍受这种生活吗？对于丈夫，除了知道他在他的房间里坐着创作以外一无所知？并以此方式度过秋天和冬季？春天到了的时候，在书屋门口迎接这个半死的人。春季和夏季看着他怎样试图为秋天养精蓄锐？这种生活可能吗？也许，也许可能的，但你还是必须思考，直至最后一道怀疑的阴影，但同时别忘了其他与上述有关不幸的独特之处。一个陌生人或者即使是一个朋友到我的房间里来，一直使我感到尴尬或至少不安。而你不管怎样喜欢与

人相处，可能还喜欢聚会，但我却只能以极大的努力，甚至痛苦才能在我的——我斗胆用我们的这个词——住宅里接待亲戚或即使朋友。在布拉格居住，根本不见我的亲戚，对我来说最轻松，虽然他们完全是最乖的人，特别对我是最乖的人，他们大家给我做的使我受之有愧的好事比我一生能给他们做的都多。我暂时尽量在城边找一幢房子，越偏僻越好，下一个目标是为了将来用省下来的钱在郊区买一幢带花园的小洋房。但是菲莉斯，你想一想，你那时的处境其实将与你布达佩斯的姐妹相似，你那么同情她，只是你的处境因为我将更困难，而且你的姐妹所拥有的另一种安慰，你也没有。

现在你说什么呢？这方面我需要十分明确的答复。这你肯定已经看出来了，或需要非常明确的答复。

菲莉斯，我知道迅速并有利地对付这些问题的一种简单的办法，即你不相信我或至少对未来不相信或至少不完全相信。我担心，你快要这么做了。但这将是最糟糕的。那样，菲莉斯，你就对自己并因此也对我犯下了最大的罪过。那样，我们两个就都被毁灭了。你必须相信我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这是一个三十岁的人的切身经验，由于内心最深处的原因他曾几近疯狂，即到达过自己的生存极限，即对自身及其在这限度内能够怎样有了全面的了解。

弗兰茨

〔19〕13.6.21〔22—23〕

这是星期六晚上写的，现在是星期天下午。我和韦尔弗及其他人有个约会，6点半我得去接我的父母。晚上我只睡了很短时间，脑袋昏昏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把我所想的正确地表达出来。无论如何，你考虑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处在我的位置，我在办公室根本坐不住，那里的工作，这种我生活中的可怕的障碍造成的绝望状况不断地重复，并将更加强烈。由于完成任务几乎不可能建立平衡的力量愈来愈削弱。我已经几近辞职。某些做不到的事，可能由于我无法完成，有时已很可怕，在上司密切监视下工作则更甚。但以后可怎么办呢？

但即使、只要我还工作，即在有利的、相对有利的情况下，我的妻子和我也将穷困潦倒，不得不仔细地分配这4588克朗。我们将比我的姐妹们更加贫穷，她们比较富裕（从我父母那儿，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我将得不到什么）。我们将比马克斯和奥斯卡更差。这不会使我的妻

子，并因此，仅仅因此而羞愧吗？她能够忍受得了吗？如果出现什么大的花销，因为生病或其他缘故，我们立刻就得上债。这个她也能忍受吗？

你多次提及从前在家里经历并忍受过痛苦。这是何种痛苦？也许能够从中得出对其他痛苦的承受力？

〔这几行间写着〕

如果我睡觉的时间能像思念你那样长，也许就相当不错了。

〔19〕13.6.22

星期一，没有收到来信，可惜，没有。——我刚和父亲走进隔壁的房间，小费利克斯刚刚醒来。如果我不跟去的话，那就太伤害父亲了。但父亲与娃娃玩的游戏，所有人与他玩的游戏，多么令人厌烦啊！昨天下午，大家在父母到达后聚在我们这里逗这孩子玩耍。当大家，我父亲首当其冲，简直疯了似的，毫无顾忌地深深陷入谈论性器官而不能自拔。我感到何等反感，好像我被判处在牲口圈里生活，虽然我一方面完全知道我或许过于敏感，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这整个是像在道德上十分引人注目，从远处看则很美。但那里坐的自然还有我可怜的母亲，她从未有过时间也从不知道去修饰自己。由于生了六个孩子，她的身体已发胖、变形。父亲的脸庞通红，弗兰岑斯巴德的平静生活并未减轻他的痛苦。还有我的大妹，两年以前她还是个小姑娘，但生过两个孩子以后，由于忽视和无知，而并非缺少时间，体形的确与我母亲相似，穿着奇怪的紧身衣，身体肿胀，仔细看去，连我二妹已经和大妹相差无几。最亲爱的，我是怎样投奔于你的！而你昨天却没有想我，没有回音，虽然回答是如此地不可避免。但我必须得到答复，准确的答复。正如你不想以任何方式伤害我一样，你也不应该因为我而觉得受到伤害。不只如此，你也不可以出于执拗而沉默（像你有一次因为韦尔夫的作品所说的那样），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做的空间。你也绝不可因为马克斯当时在柏林告诉你的什么而受骗。你必须只听我现在写给你的，菲莉斯，你只需回答这个，但是对所有的，而不仅仅针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但我向你保证，不管在什么意义上，如果你这么做，当我面对你父母求婚时，我只写非常简短的信。这真的只是我们之间的事，但你得对它负责。

弗兰茨

亲爱的菲莉斯，我今天阅读你的来信时，当然不止一遍，我觉得我们的状况如此可怕，以至于我隔着桌子要求我那滑稽又可爱的同事，请他对我以“你”相称。现在，他正陷在一个不幸并像他一样滑稽的爱情故事里，但一定会有好的结局。他诉苦不迭，我不得不安慰他，而且还得帮助他。我辗转于你的信带来的幸与不幸之中。面对他目前不知所措的窘境，虽然没有更多地信任他，或者也没想到这样（顺便说一句，他极忠诚、实在），但却向他伸出了以“你”相称之手。实在有点过分，事后我也感到很后悔。

菲莉斯，我今天状态不佳，头痛，没法好好给你写信。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一言难尽。你没有回答所有的，没有回答所有的，但是你的答复很亲切，如此详细，尽了你目前的可能，我不能要求得更多。事情本身的一个进展是通过这些信件，对象更加明确，主要是界限更加清晰。

我有两天没给你写信，因为第一想让你安静地思考，第二我对你星期一的明信片感到伤心，既对它的内容，也对你保证晚上还要写信。虽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做，你真的没有这么做。你已经屡屡许诺，只对某些事情做出某种许诺。

今天，我从自己的愚蠢状态中发现，我们全部幸福的到来取决我信中的一些“可能”能否实现。怎样确定呢？长期厮守就能得出结论吗？这不一定。甚至也没有较长时间在一起的可能。假期时间和地点不尽一致，柏林不是厮守的适当地点。短时间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却没用。无论时间长短，统统无济于事。因为这里最重要的只是你那一方的想法、勇气和可靠性。想法是重要的，因为，我想，菲莉斯，你的估计是不对的。我与创作以及与人们的关系是难以改变的。此乃我的本质使然，而不是某一时间的状况。我为了创作需要超脱，不能像个“迁入者”。这将是足够的，而得像个死人一般。创作在这个意义上是深眠，即死亡。正像人们不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深夜也不能把我从写字台前拉开。这与对人的关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我只能以这种系统的、连贯的严格方式创作。因此，也只能这样生活。但这对于你，如你所述，将是“很难的”。我一直怕见人，其实不是害怕其本身，而是担心他们侵入我虚弱的本性。即使最亲密的朋友进入我的房间，也会使我吓了一跳。这不只是这种恐惧的一种象征。虽然不能摆脱于此，但完全置此

于不顾，人们和父母亲在所描述的秋天和冬天到我们这儿来，他们怎能不打扰我和我的妻子呢？但这么隐居地生活，我能否习惯，你尚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取代你所有的人，我尚不知道。”这算作答复，还是问题？

办公室吗？让我最终放弃它，这种可能完全排除。但我是否必须放弃，这种可能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我难以再继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内心的惶惑和不安很可怕，这也是创作的唯一和根本理由。对你和我的忧虑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将最终与办公室的工作相融合。但创作和办公室相互排斥，因为创作的重点在于深层次，而办公室却在生活的表面。如此起伏，人非得被它撕碎不可。

也许通过你的来信，唯一能够永远排除的是对于金钱不足的担心。如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你是否认真地想过？时间就这样伴着问题逝去。我不记得写过“这很紧急”，但我是这么想的。

弗兰茨

〔19〕13.6.26

〔上页左边〕

星期一的报纸？如果没有关于《司炉》的内容，我当然就不需要了。

如此众多问题，我看不到出路。我如此悲伤，如此可怜和软弱，一直躺在长沙发上，睁开还是闭上眼睛，全无知觉。我吃不下，睡不着。在办公室每天都有烦恼和指责，总是因为我的错，我们之间是这么不稳定，或者并非我们之间，但是在我们面前，当我现在从窗子望出去——事情微不足道，但还是这儿的一部分，因为我感觉到喉咙里的愤怒——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男孩把我的船儿划来划去（在过去的三个星期，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因为我决定不了是否应该换上丢失了的船缆）。

特别是现在，在办公室争吵以后，虽然各方面都极友善，但由于我的过失，此事必定经常重复，一再发生。因为我毫无秩序可言，一会儿文件找不到了，当我用两只手拿着它的时候。如果对一个案件特别反感，我就不愿去办它。倘若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承受它所发出的威胁，我什么也都不能隐藏、制止或道歉，而必须自己消化，像大地对于雷雨

（我再说一遍）。尤其现在，我特别要扪心自问，这么明显地无法胜任现在乃至将来的责任更大的职位，仅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否有权利，向你求婚，使你有勇气嫁给我。

你的行为给我任何一种权利了吗？但我必须从自身获得这个权利。其实必须告诉自己，我获得你——我的幸福的权利只能从对我身体和精神状况、从我的内外安全感、从我的财产状况和我的未来的评价中获得。如果自身评价否定了这个权利——它现在看来是如此，那我从哪里获得第二个权利呢？从你的勇气、你的善良当然不能，甚至不能从你的爱中，即使它并不只是你杜撰的（一个你在上封信中没有提及的可能）。这样的权利——它决定于权利与义务的无责任的边界，只有在你说：“虽然如此，我别无选择”我才能得到。但一切迹象表明，你不能也不可这么说。尤其当你思考过一切之后。通过书信，这更明确，但也更可怕了。

弗兰茨

〔19〕13.6.27

〔在第一页的边缘〕

谢谢寄来的报纸。它使人从头到脚发痒。星期天我大概只能用快件给你寄信了。

昨天和今天都没有信来。这次我几乎弄懂了。如同在尼古拉斯湖畔我的讲话和没有讲话一样，我的创作你也不能容忍。我也失去了一点对全局的了解。注意太阳穴的跳动和疼痛，这或许对我已是一种足够的工作。对于所有其他事情，我则无能为力。在办公室里，今天比昨天更令人恼火。

昨天下午和傍晚6时许，我目光茫然地坐在房间里的躺椅上。我的妹妹从商店下班归来。她打开门，停在那里。在过去的几天里，她对我产生了某种同情。她也知道，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吃，想知道我这回是不是吃点夜宵。但我却没有兴趣开口，只是望着她，她也注视着我，这样持续了一会儿。我脑海里想的只有，如果站在那儿的不是我的妹妹，而是我的妻子，那该怎么办，她能忍受这种场面吗？

我的母亲今天中午说：“你肯定有什么心事。我不想干预你的隐私，

但我希望你诸事满意。”然后又很不恰当地说：“你根本不知道，父亲多么爱你。”我说，我不能比这说得更多：“但我没有烦恼，只是些办公室里不愉快的琐事。”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结束了。但我知道，她和我的妹妹开始一遇到机会就谈论你和我。她对于我的无奈不比我自已小很多。

今天就到此吧，我不想写更长的信，把你的星期天变得更糟，正像不可避免的那样。我想起的都是些悲伤的事。我很想用今天收不到你的信来解释。但不只是这个。菲莉斯，至少对待这张纸是亲切的（菲自行涌出了我的笔端），再抚摩它一遍吧，这么想着，我会觉得幸福一些。

弗兰茨

〔19〕13.6.28

一片纸也不写？你星期五和星期六收到我的信之后，你竟然只字也不给我写？今天，星期日我公事在身，现在才回到家（我家在农村）。我开门的时候，心跳个不停，仿佛我将见到的不是期望的、误以为十拿九稳的信，而是至爱的、活生生的——然而什么也没有。这肯定是有意思的，我对自己说，断定这个并不难。

弗兰茨

〔19〕13.6.29

我最亲爱的菲莉斯，确是这样的，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回答。这是一篇冗长的、担心与可笑程度一样的文章。我们等会儿还会对此发笑。我知道是我母亲弄来的。就在你的上封电报抵达的那个晚上，我让母亲看了我准备给你父亲的信。她认为事不宜迟，没有问我就让人了解情况，毫无疑问要瞒着你。第二天她向我承认了，我认为这不再重要，也没有再管这件事。现在信到了，好像是一个爱上了你的人写的。其中连一个字都不真实。非常程式化，也许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甚至连办公室都知道的起码情况也不清楚。虽然如此，我父母还是觉得比我的话放心一千倍。——请想一想，那个写信人甚至无耻地撒谎说按他的看法是为了你好。“如果人们听说你有什么特长？”你认为如何？“听说你擅长烹调。”如此而已！当然他不知道，这在我们家根本用不上。或者至少你得完全改学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我还是认为——我的确认为自己受到了干扰，而且我只有一小会儿时间，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将吃素食，是吧？亲爱的厨娘，“听说她特别会做饭”。

你呀，我这么可怜，如果他们在南方那儿不再把我收拢好，我就不知所措了。我不能去魏斯特兰德。上司已去休假。即使我有假期，也几乎不能休，我得把全部假期花在上进上，也是为了你——你觉得这个顺序怎么样，我先给你父亲写信，然后我和父亲去你家或者我们根本不让我父亲参与？你有时间考虑。努力让我康复吧，但不必完全康复。

弗兰茨

〔19〕13.7.1

那么，菲莉斯，虽然如此，你还要背起这个十字架？试图干一些不可能的事？你把我误解了：我并非是说，通过写作一切会变得更加明确，但更加糟糕，我说的是创作会使一切变得更加明确和更加糟糕。我是这么想的，你却不这么认为，还是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的反证还没有结束，因为它绵绵没尽头。不可能不断地得到证实。

但你也不停地表现自己（当然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像它那样连贯），我抵抗不住希望的诱惑，只能让所有反证作罢（我不能缄口不语，因为我清楚它们很可能在盲目中发生）。我想，你的来信对我的反证一点儿也没有触动。你只从感情出发，把我的巨大障碍化为“微不足道”，非常“微不足道”（这是好心，但却是距离遥远的感情，从善意上理解是缺乏经验，你只相信依靠勇气来架设它们之间的桥梁）。但是，我期待着反驳吗？不。只有三种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想”；或“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暂时不想”；或者“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想”。我认为你的回答属于第三种（不完全符合，使我够担心的），并把你当作我亲爱的未婚妻。随后（它可能难以保持下来），但我有可能最后一次说，我对我们前途的担忧毫无道理，没有必要害怕由于我的性格和过失而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变得不幸。它必将首先并且完全涉及你，因为我归根到底除了所有弱点之外，乃是一个冷面的、自私的、没有感情的人。弱点把它们掩盖而不是减少。

菲莉斯，现在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好吧，我将给你的父母写信。但我先得告诉我的父母。通知即使只有五句话，也许是我几个月来与我的母亲，几年来与我的父亲进行的最长的谈话。它会因此而获得我不喜欢的某种庄严。在我得到此信的答复以后，我再和他们谈，因为你的话在我看来总是显得有些游移。你的父母会对我的信作出何种反应？从照

片看，我想象中的你母亲本来是另外一种样子，但这与我害怕她无关。除了冷漠，恐惧其实是我对他人的基本情感。对你全家，我也充满恐惧（可能你的妹妹艾尔娜除外）。我直言不讳并不感到羞耻，因为这既真实又可笑，认真说来，我其实几乎对自己的父母也感到害怕，对我的父亲毫无疑问。你的母亲奇特得很，穿着黑色衣裳，显得悲伤、冷漠，充满偏见、严厉、不灵活，在陌生家庭之中，和后来对我都一样。我特别害怕她，我想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她。而另一方面，我害怕你家没有人对我满意，我做的事在他们看来无一是处。害怕我的第一封信就不符合他们的意图，害怕我作为未婚夫他们认为并不称职，害怕我对你的爱外人或亲戚永远发现不了，不是他们概念中的爱，害怕这种不满（由不满而产生愤怒、蔑视和恼火）会不断继续下去，并且可能也会传染给你，对我和对他们一样。这方面你可有勇气？

弗兰茨

〔19〕13.7.1

菲莉斯，我把目前不禁产生的想法都写信告诉你。还不是所有的想法，但如果你注意的话，几乎可以料想到一切。尽管如此，你还敢于这样，或者你大胆得令人难以置信，或者你对统领我们的事物有所预知。你相信我，这点我不再有疑问，尽管你在今天的信中有点躲闪我（通过信，其实不能准确，如若不武断的话）。我不怀疑你对我的信任，因为否则你就不是我爱的那个人，我就会怀疑一切。不，从现在起我们就确定，正式地相互把手放在对方手中。你还记得我的长长的、骨节突出的、长着孩子和猴子一样手指的手吗？你就是把你的手放进这样一只手中。

我不是说自己是幸运的，我有太多的不安和忧虑。或许根本无法承受人类的幸福，其结果（你的电报收悉，我凝视着它，仿佛它是一张脸，唯一的我在所有人中间熟识和想念的面孔），我和你从第一个晚上起就紧密相连，完全彻底地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真的无法估量。在这之前，我多想在你胸前合上双眼。

你馈赠与我太多。支持了我三十年之久的力量，理应得到这份礼物。但这力量的结果，这存在真的不配，你会发现的，菲莉斯，今天是伟大的生日。生活在没有失去所赢得的情况下，围绕自己的轴线转了特殊的一圈。应该如此。

今天午饭时刻，作为对我生日祝福的回答，我告诉母亲我有了未婚妻（很简短，她在家时间很短促，我回家时，她总是已经吃完了饭；父亲今天一早就下乡去了）。她没有特别吃惊，听后非常平静。她没有担心，只有一个请求，说，父亲肯定从头至尾和她一致。她请求让我允许她了解你家情况，在得到消息以前，我仍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将再也不能阻挠我，但不管怎样我应当等一等再给你父母写信。我随即表示，我们其实已经订婚。母亲坚持她的要求，要给你父母写信。我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可能因为我对父母一直怀有负疚感，所以我终于让步，把你父亲的名字写给我母亲。我觉得有点可笑。当我想到，如果你的父母也有同样的愿望，也想得到关于我们的情况，没有一个咨询机构会说出我的真相。顺便说一句，你的父亲知道《判决》这本书吗？否则，可以给他看看。

我想，你何等勇敢啊！难道我不是一个陌生人？我的信不使自己更加陌生？我的亲戚不使你感到生疏？风景明信片上的我的父母看起来是不是和所有的陌生人一样捉摸不定，也许只有我们是犹太人而陌生感会有所减少？而你（我想，我将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惊讶）却不怕这个人。而他自己却对什么都害怕，害怕自己更加可怕。难道你一点儿都不怕？毫无保留？这样一个奇迹，人们之间对此已无话可说，只有感谢上帝了。

弗兰茨

〔19〕13.7.3〔卡夫卡30岁生日〕

此外，菲莉斯，我们差点躲过了首次争吵。没有人应该去的地方（事实比说的还严肃），你邀请了一些什么人？但布吕尔小姐的确是个例外，可以邀请她，但她是唯一的。我喜欢她，代我抚摩她的双颊。

你呀，现在可得加紧了，如果信明天才到。现在是星期六7点1刻。

我今天没收到来信，即没有得到对我昨天去信的答复。是否你的理解与我的愿望不同？你认为我允许母亲不对？我写信告诉你不对？我之所以向母亲让步，乃是出于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另外，还由于对一般人，尤其与我母亲有着强烈的交流困难，特别由于虚弱。我看她很为我担心，这也是促使我这么做的一个理由，尽管远非决定性的。但当我做过以后，我得把它告诉你。这在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涉及我们的共同体，我们应该尽可能互相开诚布公。我们将来生

活在一起将会有许多这样的机会，难道我现在会隐瞒这种小事吗？它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件小事。并非我在打听你的家庭，而是你的家庭现在和将来也许与你的愿望相反，将距离我们更遥远——我如此为你担心，我已跟你说过。那么，我现在怎能从内心关心你的家庭呢？如果我们想要在一起生活，决定性的只有心灵最深处东西。其方向和判断，需要我们各自为自己做出。我的父母，你的也一样，信赖的只是外在的东西，因为他们归根到底是局外人。他们只能从办公室略知一二。我们知道的更多，或许认为知道得更多，不管怎样我们知道的是其他的，更重要的——办公室根本不关我们的事，这是我们父母的事，为了让他们有所事事，可以任他们去，这触及不到我们，至少我这么想。但是现在我却没有得到回答。

昨天晚上我在我所梦想的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踱步。已经开始建房，但部分场地上还住着吉普赛人。我围着那儿走了许久，对一切做着鉴定。那儿将变得很美，地势相当高，离城市比较远，雨后空气特别清新，我在那儿感到很舒适，和现在完全不同，始终如此。

弗兰茨

〔19〕13.7.6

〔1913年7月5日〕

菲莉斯，你生我的气了吧？你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但不是因为我做了那事，也不是因为我写信告诉你。我可以为一切事情道歉，而且也已经部分地这么做了，最好的道歉则是这失眠的大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失眠，但如此持续的难熬状态却是应该有些原因吧），但是，菲莉斯，请你不要听任何道歉，接受这件事吧，无须道歉地原谅它，就像我无罪地懊悔。

现在，今天我没有信。昨天晚上在紧急之中，我差点去找你。我们，马克斯及其夫人和连襟，以及费利克斯和我去了，一个我妻子不应去的场所。一般地讲，我很能理解这类事情，从根本上加以相信，从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上加以理解，用心跳去享受。但昨天，除了对待一个载歌载舞的黑人以外，我几乎完全失灵了。

书归正传。菲莉斯，请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可不能几乎还没在一起，就固执起来。

你看到了吗？菲莉斯，你已经在为我而受苦。业已开始，上帝知道，如何结束。我现在看得很清楚，这痛苦比至今我令你遭受的更切身、更恼火、更广泛。我是否有过错在此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甚至几乎可以忽略其原因。无论如何，作用于你极不公平。我对此持何种态度，这意味着什么，仅仅这个就值得思考一番。

我的母亲对错与否全不重要。肯定，她的正确比你所认为的要多。除了当初你给她写的那封信以外，她对你几乎一无所知。此外，她只从我这儿听说我想结婚。其他的她一概不知，因为从我这儿是一个字也弄不出来的。我跟谁都不能说，与我父母尤其不能。我虽由他们所生，但他们的样子却仿佛引起我的恐惧。昨天在昏暗之中，我们大家，父母、妹妹们和我偶然被迫在一条肮脏的乡间小路步行了一个小时。母亲虽然费了好大劲儿，还是显得很笨拙，把靴子、肯定还有袜子和裙子都弄脏了。但她自己却想象着没有料想的那么脏。回到家后，当然是开玩笑，让别人承认，她要我看她的靴子，说它们其实根本不那么脏。请相信我，但我却根本无法朝下看，只是由于反感而或许不是对于肮脏反感。相反，昨天整个下午，我对父亲产生了些许好感，或者说对他赞赏，他能够忍受这一切，即母亲、我以及妹妹在乡下的家庭。那里的别墅杂乱无章，棉花在盘子边，床上所有东西都恶心地搅在一起。一张床上躺着二妹，因为她嗓子有点发炎。她丈夫坐在她的身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她为“我的金子”、“我的一切”。小男孩在房间中央，当别人跟他玩耍的时候，他忍不住就在地上大便，两个女仆挤过来收拾，母亲忙来忙去。面包上的鹅肝油不停地顺着手指往下滴。我在作解释，是吗？我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从事实中而不是从自身去寻找原因，于是陷入了完全错误之中。整个场面令人讨厌的程度比我在这一儿和以前描写的少一千倍，但我这一切的反感却比所能描述的强烈一千倍。不是因为他们是亲戚，而只因为他们是人，使我无法与他们在同一房间中待下去，为了再次证明这一点，星期日下午我便乘车离去。值得庆幸的是，并不是非得如此不可。昨天我厌恶心理快要窒息。我几乎在黑暗中摸索到了门。直到离开房子很远，到了公路上，我才感到舒服了一些。积聚了这么多，直到今天还未能完全排除。我无法与他人在一起生活，我绝对憎恨我的所有亲属，并非他们可能是坏人，并非因为我认为他们包藏祸心（并非像你所说彻底消除“可怕的羞怯”），而单单只是为了他们是人，

生活得太近。我恰恰无法容忍与人们共同生活。的确，我甚至无力把这视为不幸。在毫无相干的情况下，所有的人会令我兴奋不已。但这种快感还没有大到使我不想在一个荒原、一个森林、一个岛屿上，在身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无法形容地更快乐地生活，而不是在这儿，在我父母的卧室和起居室之间的我的房间中生活。我肯定没有使你痛苦的意思，而事实上却这么做了。今后我将永远不会故意伤害你，并且将永远如此（咨询的事暂时已没有什么意思，母亲星期五什么也没做，因为她还想和父亲商量。星期六没有从你那儿得到回答。我意识到自己对你的过失，已告诉母亲让她等一等，因为星期日还没有来信，下午我把母亲的允诺重又收回了）。

菲莉斯，请珍重，不要轻易地认为生活平庸，如果平庸意味着单调、简单、小气。生活只不过是令我感到可怕，比其他任何人更甚，我经常怀疑——可能在内心从未中断过，自己是不是一个人。我带给你的伤害，其实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使我意识到这一点。我真的已无计可施。

弗兰茨

〔19〕13.6.7

〔1913年7月10日〕

菲莉斯，当我今天阅读你如此亲切的来信的时候，我感到困惑。当我追溯这善良的起源时，我的这部分依然如我昨天所写的那样，而且更加强烈。

没有人能够说，我们未经考虑就订了婚。并非可能产生欺骗的近距离发挥了作用，也并非可能产生欺骗的一瞬间，也并非可能欺骗的一个辞藻——虽然如此，我们还在一起，菲莉斯，难道你还看不出你究竟干了些什么吗（从上件事的启发看一看），你还可以收回自己的决定。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绝望地向它伸出手，它也不属于我。这并非每时每刻迷惑我的犹豫不决，而是一种从未中止过的信念。我蔑视它，因为我爱你，虽然我爱你，但它最终不容蔑视，因为它直接来自我的本性。

几个月以来，我是否像有毒的东西一样始终缠绕着你？我是否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我的存在还不使你感到可悲吗？你还看不出，我必须一直把自己封闭在自我当中，这样才能避免不幸，你的，你

的不幸？菲莉斯，我不是一个人，我能够横下心肠折磨你，我在所有人中最倾心的人（我认为自己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不能拥有，不想拥有他们），并且冷酷地接受痛苦的道歉。如果我清楚地看透这一切，预感到得到证实和继续预感到，我还可以容忍这种状态吗？像我现在的样子，苟且生活，我向内心发火，只在信中折磨。一旦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将变成一个应为人们烧掉的危险傻瓜。我会干什么呢？我将必须干什么？倘若我什么都不做，那我才真正失去了自我。因为这将违反我的本性。谁要跟我在一起，将被碰得头破血流。菲莉斯，你不知道有的文学在某些人脑子里是什么。它像猴子在树尖上荡悠一样，而不是在地上行走。它迷失了方向，并且别无选择。应该怎么办呢？

我读到你们描写你兄弟婚礼的情况，岳父岳母何等宠爱他，何等宠爱他们的女儿，而又充满牺牲精神。你认为我能分享这种人类的感情吗？相反，当我读到你写的关于我父亲的话，仿佛你走到他那一边，以便联合起来对付我，我感到害怕。

弗兰茨

〔19〕13.7.9

最亲爱的菲莉斯，如果你不能够写信就不要写，但让我给你写，日复一日，你知道得很清楚，我爱你，我竭尽全力爱你，只要我活着，就想要，必须为你服务。

弗兰茨

〔19〕13.7.9

菲莉斯，我要是在你身边该有多好，要是我能够给你把一切讲清，是的，要是我能够将一切看清楚有多好。一切都是我的错儿。我们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心心相印，来自于双方的肯定具有着极其巨大的力量。但真正支持我的，是上天的指令，是消除不了的恐惧。以前对我似乎最重要的东西，诸如我的健康，我微薄的收入，我可悲的性格，所有这些，这些也有某种道理的东西，在这种恐惧面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并非因为它，而是被它当做了借口。坦率地说（我对你总是如此，按照当前自我认识程度），为了最终被你看出来是疯子，我甚至害怕与最亲爱的人结合，恰恰是和她的结合^[150]。我该如何向你解释，对我来说是这么明确，以至于我不想隐瞒它，因为它使我双目眩晕！当我看了你的亲切的

充满信任的来信，当然又变得糊涂了。在你的信里，一切看上去都非常正常，幸福似乎正期待着我们。

菲莉斯，你能理解吗，即使只能远远地观察？我有某种感觉，婚姻、结合、消除我的这种虚无，将导致毁灭，不是一个人，而是还有我的妻子。我愈爱她，愈快愈可怕。现在，你自己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如此密切，没有另一方的认可，以至于我们两个人谁也无法再单独行动，我这么想，请也考虑一下没说出来的！提问题吧，我注意回答一切。上帝呀，这个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爱你，肯定还从未有一个姑娘受到如此多的折磨，如同我不得不折磨你那样。

弗兰茨

〔19〕13.7.10

夜晚，我们的阳台上很美。我在那里坐了一小会儿。我很疲劳。经过一夜，我反而给弄得更累。今天早晨，当我应该起床的时候，我真的把我周围的一切都诅咒遍了，特别是我自己。如果我不能正常地睡觉，那我又怎能创作呢？如果我不能如此，一切将成为梦幻，而且是一场被识破的梦。

我的新计划当然并非最佳。最佳的计划或许应该是用什么聪明的办法弄点儿钱，和你一起去南方的小岛或者去湖滨，永远不复返。我想，在南方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里隐居，靠青草和水果充饥。但我无须深刻地审视自己，我甚至连南方也不想去。我只想用创作度过每一夜。即使因此而沉沦或发疯，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早已感受到的必然结果。

然而，我的新计划是这样的，我为咱们俩找好的房子到明年5月才能搬进去。前提是我必须得到它。它在建筑合作社的一幢房子内，我是该合作社的成员。所以，菲莉斯，我现在不给你父母写信，并不浪费时间。让我们照现在这个样子维持到2月、1月或圣诞节。你将更多地了解我，我还有一些你尚不了解的可怕角落。夏天你将去旅行，通过旅行，以及通过那时我给你的书信，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我。但主要的，只要健康允许，到秋天我便终于可以屈从于创作的诱惑了。那时，我也将会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在潜力。我才干了这么一点儿，我什么都不是，或许秋季我也能干成点什么，我不想节制自己。那时候你将看得更加清楚，你将是与何人结合，有哪些需要顾虑的事情。到那时，我自然会像今天一

样属于你。对此计划你意下如何？

弗兰茨

〔19〕13.7.13

在别墅的平台上^[151]。眼前视野美丽而宽阔。房间里却不美观，我的内心也如此。陀螺在那里不停地旋转——星期二你将收到一封写有新计划的信。问候你。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3.7.14，布拉格〕

我回到家才能够写作，但是我的耐心却不允许。你不给我写信。你看不起我吗？你可不应如此。你瞧，我至爱的人，我不把她给自己，让她在自己生存中苦恼地徘徊，不去把她娶来，或者至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限期以后。最亲爱的，不要因此看不起我，我身上有足够的可鄙之处，但不是这一点。

弗兰茨

〔19〕13.7.17

星期日我没有收到你的信。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得而知。我的信肯定伤害了你，否则没有其他可能。但倘若它是伤害了你，那你则误解了它。虽然这又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你认识我整整一年，肯定知道，我绝对无意写下一个你有理由认为伤害你的字。你自己说过，我们不想怪罪对方。现在，你又想开始吗？菲莉斯，请你给我写个只言片语来，无论好坏，不要使我的不幸变得比已有的更大，沉默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最严厉的惩罚。

弗兰茨

〔19〕13.7.19

又一个没有你的星期天！生活何等丑陋。可怕的是，因为你误解了我的快信，所以没能够给我回信。今天你收到的信试图将此解释清楚。然而，我们之间可以有误解存在吗？我不是你的，你不是我的吗？我在自己家里难过得要死，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所以我能够从中跳出，就更加伟大。另外，有谁知道，倘若不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三十年，我这个

没血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总的来说并不存在严重障碍，我们属于一体，并将在一起。我们只是必须怎样告诉父亲。我们一旦结婚（一分钱也不要他的），他的财产决不会有一个硬币进入我们家。仅仅这么设想，就使我舒适不已。

当然，我还是不知道你的父母会怎么说，怎样叫他们开口。

但是现在，最亲爱的菲莉斯，尽可能每天来信，而且寄到办公室，否则我收到的时间就太长。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却还是一再给我往家里写信（一再如此，但在过去十四天中总共只有一次）。

鼓起勇气，相信我，不要误会！

弗兰茨

〔19〕13.7.27

又没有来信。你怎么能够如此折磨我，菲莉斯，如此毫无意义地折磨，何处有几句能给我以慰藉的话语，减轻一点儿我的头痛，我的头痛得像被一个罩子套住。你可以就写你还没有决定，或者你不能够写，或者不想。仅仅三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弗兰茨

〔19〕13.7.28

本来我昨天、前天就该得到你的信，菲莉斯，即便没有信，昨天也该发封电报答复我昨天的信。你不应该把我置于这个状态而不理会。你知道，当我看到自己无缘无故地至少在信中被你遗弃，我将如何是好？在这整个奇妙而可怕的一年之中，我严酷地折磨你，但总是出于内心的逼迫，而从没有外部的原因，如同你从法兰克福对我那样和现在这样。这些拜访和亲戚们！我将分辨不出他们，并且担心他们都会变成我的敌人，相互敌视。倘若聚会的人们表示些许惊诧，或者你不在，只给我写了五个字，倘若他们对此有些许不快，倘若这些对你比我在这一日日夜夜更为绝对，头痛和亢奋使我几乎分不清昼夜，倘若他们的表示比我更使你担心，那么我该如何看待他们呢？

在我成为你公开的未婚夫之前，菲莉斯，我能在你心中占有更多一点儿位置吗？没有人仅仅因为聚会就有权把你从给我写信中拉开，如果

这封信像星期天的那么必要——同样，今天也没人有此种权利。如果他有，你则不能承认它。你没有给我写信或发电报，令我不幸之至，比你所能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并非怪罪，也不是误会，菲莉斯，但它却不触及我对你的爱，爱情是不可侵犯的。这只是独有的悲伤。

弗兰茨

〔19〕13.7.30

我又读了一遍那封信。我最亲爱的菲莉斯，哪怕你认为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怪罪这封信，那么你想一想，你根本不知道，由于没有任何消息，我——简直无法形容，在近几年，最近几天的情况又是如何。

我现在是在和何人交往！他不是大傻瓜，就是小先知。但是在这里他无权干涉！

我最亲爱的菲莉斯，你看懂我今天的信了吗？此外，你是否已经知道，你将得到的是一个白发老头儿？我是怎样在沉沦哟！伴随着这封信，心儿是如何地在跳动！

最亲爱的人，现在，你又离我更远而去，你一点儿也不伤心。相反，你的住宅叫做无忧宫。告诉你的姐妹，如果她不让你给我写信，就根本不是我的朋友。我父母逐渐习惯了新的烦恼，开始把它们归到其他烦恼之列。为什么你认为你不在的时候，我给你父亲写信会更好？其实我觉得，当我第一封不是给你的信抵达你们家时，你在场会更好。

我该和马克斯商量些什么呢？我们之间的婚事责任重大，没有人能在本来的意义上承担责任，也没法提建议。难道我应该学习马克斯的财政经济，但那就太傻了。马克斯拥有的金钱比我多些，进项也多，毫不吝啬，毫不浪费——但是，对方还是侈谈金钱和匮乏，恰恰这无休止地谈论，肯定是妻子造成的，倘若不是全部，使金钱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即使真的囊中羞涩，也可以很容易地加以避免。我还记得，当他的妻子在镜前围上尖领斗篷的时候（她穿着有点儿刺眼，不甚和谐，虽然她全无过错），我倚在镜边。我没话找话地说：“这看来多贵重啊！”她一甩手回答道：“但它跟其他东西一样便宜。”可悲之极，毫无意义，甚至带侮辱性。我无意效仿。

弗兰茨

我亲爱的，亲爱的菲莉斯！今天没有信，今天很正常。但我，一旦事关你的信，我就无法区别正常与例外。我就是想得到它，必须得到它，我以此为生。

我有个想法，如果你喜欢它最好，等你的复信到来，我就可以给你父亲写信了。如果你的父母不害怕——归根到底也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理由，因为你的父母不认识我，不得不由你推销我，然后当然——也就是说如果你父母不害怕，我们或许十四天之后就可以在我父母面前订婚。如果这不可能，这时我记起来了，你能否途经布拉格回返？不是让你失去一部分假期，并非如此，只要你返程路上在布拉格停留片刻。可能在最后一个星期日或星期六。如果是星期六，我也许可以陪你一起回柏林。这样好吗？如果我仅考虑自己，那就糟糕透了。因为你与我的亲戚们说的每句话，交换的每道眼神，都令我感到受到伤害。不仅出于嫉妒，而主要因为我已把自己与他们隔离开来，在这自我封闭之中寻求快慰。但现在因为你，作为我本身一部分的你，与他们虽未建起，却也隐约暗示着一种新的联系。菲莉斯，如果你不想使我不幸，你必须永远铭记着这一点，当你与他们或者其他人交谈的时候。在这方面，我的确很了解自己。有时候我会使自己的一切都超脱出来，并非故意，但结果却如此——尽管如此，一切终又完全收回自己心中，我很陌生，尽管我也许说出过最重要的意见。我恐怕在你那里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对我重要之极，如果你与他们闲谈，那我就将与你一起陷入他们之中。但是，不管我多么悲伤，你还是得和我的亲戚们见上一面。那么，你能来吗？你在场的欢乐会让我可以好受一些。

弗兰茨

〔19〕13.8.2

你的丹青格小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最亲爱的菲莉斯：

在我没有得到你的消息的那天，除此不幸之外，还发生过一个很特别的不幸。从此你就可以看出，我是何等需要你的来信。避免这不幸全取决于你，今天我真的很伤心。又没有来信。老实说几个星期以来，清早不去乡下，就是为了能够尽早得到错以为十拿九稳的星期天的信。几个星期以来，我如此小心翼翼，收获的却只有悲伤。当然，今天电报已到。但或许这根本不是寄给我的。那里写着“卡夫塔”，而不是“卡夫

卡”，那上面是“普利奥尔”，而不是“菲莉斯”。不管怎样，我感到非常满意。

菲莉斯，请你表现出对我的信任，向我保证你一定并丝毫不差地满足我的请求。只有你答应以后，我才告诉你这个请求。这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坏事情，所以向我保证吧，以庄严的言辞向我保证。

你为何认为这时候我父亲到柏林会对我们两人有益？你是如此说的。你是怎么想的？

我几乎每天夜里都梦见你。我要到你身边去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但同样强烈的却还有恐惧，而且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我想，在我们订婚以后的时间，即使我们直到5月份才结婚，我可能没有任何机会去柏林。这会合你和其他人的意吗？你能够同意我这样做吗？

你带书没有，什么书？

弗兰茨

〔19〕13.8.3

最亲爱的菲莉斯：

我收回一切，收回我也许昨天说的话。不让我现在去见你，不让我希望你现在来布拉格，这担心是有理由的。但是，远远超出这个担心的巨大恐惧，却更有道理，那就是如果我们不立即相聚，我就会垮掉。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立即相聚，那对你的爱，它使我心中容不下其他的想法，我对你的爱就会转向一种想象、一种思想，转向虚无缥缈、无法实现的东西，而它又决不可少，但这将足以把我从这个世界拽走。我写信的时候在发抖。所以来吧，菲莉斯，来吧，只要可能，你应途经布拉格。

与此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其他的、或许最重要的真情。特别由于你长时间没有问过我，似乎已无声地容忍，这个问题从我们往来信件中才被排除。以前我老是说，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允许结婚。从那以后这种状况的确没有改善。我在给你写那封具有重大意义的信以前，即约一个半月，我看过医生，我们的家庭医生。我跟他接触不太舒服，但也不比其他医生更不舒服。其实我并不相信他，但他像其他任何医生一样让我放心。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医生当草药来使用。当时，经过繁缛

的大规模检查，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对我内心感知的安慰。当天下午，我写信给你。我前一段时间心跳过速，后来心区针扎一样的疼。这如果不是全部，也部分地是由于与你分离引起的。这简直无法忍受。另外，它们也是我在过去一段时间游泳过多，走路太多太快的缘故。所有这一切又使我疲倦，从而战胜了想要去找你的要求。但这仍无济于事，我仍又心痛不止。今天我又去看了医生。他说，脏器没有问题，尽管他觉得什么地方心音不太纯净。但我想最好立即去休假（这不行），或者干点什么（这也不行），或者好好睡觉（这也不行）。我不想去南方，不想游泳（这也不行）。我愿举止平和（这愈加不行）。在我给你父亲写信之前，这一点你必须知道。

你会定期地来信，如果不是明天，那么肯定星期三会开始，我为此感到何等高兴啊！

你的 弗兰茨

〔19〕13.8.4

〔在信笺边缘〕

一封信也没有丢失吗？这是写给魏斯特兰德的第四封信吧？

第五封寄往魏斯特兰德的信。

最亲爱的菲莉斯，我昨天写道，我期待着星期三才来信，这过于夸张了。我更期待今天来信，确实如此。即使不是一封信，也应是一张有关旅行的明信片。即使不是明信片，也应是一份电报。我如此乞讨，被人看不起，但我除了期待你的来信，很少在重要的事情上难以自持。此时此刻，一种预感使我心烦意乱：你不愿意给我写信，你不想着我，你爱我也许只是出于一种什么回忆。可怜的，无法控制的乞求！

顺便说一句，现在恰巧来了一份电报。我当然一下子就想到是你来的，投递的女孩得到了幸福的一瞥。其实它是来自马德里。那里的舅父（阿尔弗雷德·略维）是我最亲近的亲戚，比父母还要亲近，但这当然是在一种非常特定的意义上。前段时间，我收到过他三封信，我没有兴趣给他写信。五天以前（一封信抵达马德里需要四天，如果把这和布拉格——魏斯特兰的联系相比，并不太多），有一次夜里，我给他写了一封有关《阿卡迪亚》的附信，并连同书寄给他。我在信中着实抱怨了一

番，用了一个优美的过渡，同时告诉他我不久就要正式订婚（这位舅父其实应该在我父母之前得知我们订婚的消息）。过后，我想起这封信与《判决》惊人得相似。的确，在《判决》里，也有许多舅舅的情节（他是个单身汉，马德里铁路经理，除俄国以外，几乎了解整个欧洲）。现在，我在一封类似的信里，像盖奥尔格对其朋友那样，告诉他我订婚了，而且在《阿卡迪亚》的附信中。——而我的舅父肯定误解了我的信，以为我们已经公开订婚，因为我面前的这份电报这么写着：“非常高兴，衷心祝贺未婚夫妇，舅父阿尔弗雷德。”如此说来，我们的事已在马德里公开，而你的父母却还蒙在鼓里，对吓人的威胁他们的女婿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弗兰茨

〔19〕13.8.5

我终于又看到你亲切的笔迹了。汉堡的明信片我根本没有收到。你该不是没有写清让一般人都看得懂的地址吧？比如今天的明信片上就写着尼克拉斯大街6号，像这种错误有时会给我造成极大痛苦[152]。

我们不必再谈论我父母，他们的警告已经销声匿迹了。关于写给你父亲的信，我却没能从你那里得到明确的建议，更多的是三种相互矛盾的主意。但我也需要什么建议，一旦你回答了我的心中的故事以后，我就寄走给他的信（但信只写给你父亲，你母亲只被提及，我无法找到写给你父母的信的方式）。比如今天，我根本就没睡觉，丝毫没有，大部分钟响我都能听到，其余时间在似睡非睡地打盹。一个有关我的什么想法，我已记不清楚，像飞梭单调而飞快地在我的困顿状态穿行不止。

午夜时分，在无奈之中产生了一种疯狂的感觉，想象力像脱缰后的野马，一切都在分裂。在这极其危急的关头，一顶拿破仑元帅的黑色帽子救了我。它把我的知觉罩住，迫使它聚集在一起。同时，心怦怦地剧烈跳动。我揭掉被子，尽管窗子完全开着，夜里相当寒冷。虽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奇怪的是，一大早我就去了办公室。除了心脏及其周围有点儿作痛，感觉并不特别糟糕。当我在办公室收到你的明信片和信时（星期一下午写的信，星期三早晨到达），痛又好了一大截。——我的状态完全错乱，典型症状是每天的情绪都不一样。当然是在无法改变的可怕的基本状态的基础之上。

什么，我关于你来布拉格的想法完全愚蠢？菲莉斯，这不是真的

吧。你当然得由我的父母邀请。但在这种前提下，它的确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除此以外，关键在你。这样多好。

关于假期，我特别走运。开始我曾想旅行十四天，另外十四天在一家疗养院度过。现在看来，绝对有必要整个时间都待在疗养院。为此，我选择了一家在佩格里地区热那亚附近的疗养院（距热那亚不远）。这意味着旅行和疗养同时进行。但现在我才得知，该疗养院这一季节到10月1日才开张，而我必须9月份休假。这样，我很可能只有去里瓦的圣·哈通根的伽达湖了[153]。可惜！关于马克斯的经济，我还得给你写几句。否则，你也许误解我。

嘿，在海滨有那么多人照相。比如，我愿意看到你坐在海滨的阳篮里，或者在沙丘之间，我难道不能得到一张玉照吗？

弗兰茨

〔19〕13.8.6

请代向丹青格小姐问好。我们虽不认识，但她生活在我所有的最亲爱的人身边，这关系还不够吗？另外，她写的字何等遒劲啊！

我最亲爱的菲莉斯：

怎么了？头痛，睡眠不好，奇怪的梦幻，而上述一切都发生在你应该从许多烦恼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其原因都在于我们的关系一直还不明朗，其余的都不是。明天，收到你的来信以后，我将给你的父亲写信。从此，我们俩都可以平静和踏实了。我们必须如此，尤其是你，因为从那以后等待你的才是巨大的窘境。和我这个不能自制的人生活在一起，你的设想有可能和他大相径庭。可怜的、最亲爱的菲莉斯，在你知道了所有这些以后，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为了感谢你的勇气，我恨不得整年拜倒在你的脚下。待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有表达感谢的机会的。但是，菲莉斯，你愿意在一切当中都看到这种谢意吗？即使它不是恰好对你，即使它正好珍藏在我心中。简而言之，你愿意得到礼物而不失望吗？

菲莉斯，给我写一写你在魏斯特兰德生活的详细情况吧。总体上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想在细节中得到满足。有关你的堂姐妹，你从未详述过。可能你们仅仅在最初几天单独相处，因为大家在一起吃饭，所以你

们至少该和退休人员相识。他们姓甚名谁？你喜欢谁，不喜欢谁？坐船旅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我现在正在阅读罗宾逊·克鲁索的一本闲书，在那儿，乘船旅行总发生意外。“此时，风雨急骤，我看到了罕见的景象：船长和其余的人全心地祷告着，他们比任何人更痛心，等待着那一时刻的降临，因为船即将沉没。”）你每天具体是怎样过的？你也读点书吗？什么呢？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游泳一点儿也不危险吗？

此外，我收回给你的承诺，为此我多次感谢过你，是有关《磨坊》一书的。我很快就把《女人系列》寄给你，你将开始每天（你是答应过的，是吧？）慢慢地、系统地、仔细地、认真地阅读《磨坊》^[154]，并且不断将进度告诉我，使我欢心。

〔在信笺边缘〕你的两封信已同时收到。就这样有规律地写下去，我的心情也会变得有规律起来。你不想寄给我一封你父母给你的信吗？让我看一看，他们怎样给你写信。你对于将来吃素为何沉默不语？我等待着欢呼呢。

弗兰茨

〔19〕13.8.7

我要感谢你，因为到昨天好长时间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天收到你的信。今天却又没有了音讯。我要求每天一封信，这或许可以被称为专制主义。但其实不然，可能你不想我，这也许才是专制。你知道得很清楚，没有来信我何等悲伤。你知道，我目前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按时收到你的来信。你知道，对于我说来，实在不行的话，寥寥几行字也就足矣。你知道，你曾向我保证经常介绍魏斯特兰德的情况。你知道，我期待你回答的那封信对我特别重要。你知道，如果你一封信里向我抱怨头痛、睡眠不佳，第二天却什么消息都没有，这不得不使我超乎寻常的不安。尽管如此，你总是不给我写信。难道我每天的信不使你感到紧迫，必须给我写几句话吗？但是归根到底，我也不是让你每天都给我写信。如果不可能，这我已经经常告诉过你。我只要你有规律地给我写信，连这一点你也拒绝我。并且你心安理得地度过星期三，连一张小小的明信片也不给我寄。尽管你知道，每次星期五的邮班都使我颤抖。唉，你梦中念叨我，而我有证据，你整个白天却没有想念我，这于我何补。而且这并非第一次。菲莉斯，你做得欠妥，不管你由于内心还是外部原因而不能给我写信。

今早收到了你星期三写来的两封信，又听说，其中一封本应昨天晚上就到的，于是我打算发电报请求你原谅我昨天写去的信。可是，当我读了你这两封信后，我又放弃了这种想法。这种挤出时间、强迫自己写出的信令我失望。说实话，如果我根本没收到信，反倒不会这么不快，现在的情况使我加倍地沮丧。这样的情绪你给我写明信片好了，这样能使……

在办公室就写到上面那儿，当时伤心极了，对着这些信呆坐着，就是再读上一百遍，再欺骗自己，从中也不会找出我需要的东西。如果格式上做些改动，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写给陌生人的信。不，它们不是写给陌生人的，不是因为给陌生人不会写得这样仓促和不用心，而是陌生人不会体味到它们的仓促和不用心。最亲爱的菲莉斯，我并不是缺乏理智的人，理解我的神经过敏，特别是现在，特别是在你面前，因为对我来说你是不可替代的，可是，我的确从你的信中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而实际上它们也根本不存在。又是那种让我吃惊的感觉，我们在一起的某些时候就会体会到，这种时候你在我面前好像很疲惫，又由于内心的约束而显得难以接近。每当你离开柏林，我也会奇怪地有这种感觉。你在法兰克福时是这样，在哥廷根和汉堡时也是这样。外出旅行让你迷惑还是让你清醒了？这都是些不可否认却可以解释的事实。如果我回忆起你第一封写给我的信，并把它和最后一封作个比较，菲莉斯，那么我要说，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第一封要比现在这封更让我高兴。当然，这也只是个别的一封，倒数第三封信中，你无数次地表明了对我的爱，比我应该得到的要多。但毕竟还有这两封，这里面谈不上应得的奖赏了。你能向我解释一下吗，从好的方面，而且不要仅指出我的自负傲慢作为理由，求求你，菲莉斯，求你对你所写的这种信和许多没有回的信做个解释，“这种信”包括从法兰克福和动物园（在桌子下面）写来的，以及最后这封星期三晚上的，这里面空洞无物，只写了：“艾尔娜整天都在骂我，她说，我不去户外，却整天待在屋里写信。”亲爱的菲莉斯，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说明什么？

看着在家里找到的这张照片，我必须承认，我对你充满了莫大的感激之情。是这个难熬的上午使我回忆过去的事，能够把上面这些绝对必要的东西写下来，否则，我的心里只会充满感激，每当我看到你的照

片，就抑制不住这种感情。

你的 弗兰茨

〔19〕13.8.9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菲莉斯，你看，电报我已收到。万分感谢，并请原谅我不公正的责难，或许是我扫了你度假的兴致，也请原谅。今天我从办公室取回了你星期五写来的明信片（不知你星期四写来信没有，反正我还没有收到，也许写了住处的地址，那么就要等到明天了）。但这些其实完全无关紧要，我可并不是监督你写信的恶魔，我只是对你信的内容感到惊讶。你信中的我需要设法安抚，否则就要去折磨别人，倒真的像是个恶魔。菲莉斯，你这几天的来信中都是同样的内容，诸如上上封中：“这样你就一定不会抱怨了……”上封信中：“艾尔娜在骂……”今天收到的明信片：“待在房中可真是罪过……”但是亲爱的菲莉斯，难道我们不是像其他人谈论金钱那样在谈论写信吗？这两者之中前者比后者更糟吗？如果你只是为了我才写信那就太可怕了。

我不敢寄出这封信，因为也许我不太具有判断能力。可无论我是不是这样，这一切仍然还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是有依据的。为什么？是将你我分隔的遥远的距离，还是你真实的，因我而间或麻木的感情？你可是个有毅力的人，又有良好的认识能力，能够控制自己。而正因如此，这些总是不断出现的间歇就显得愈发严重，愈发含义深刻。

弗兰茨

〔19〕13.8.10

今天收到了从卡姆普寄来的明信片。（星期四的那张难道同汉堡发出的一样也被弄丢了？）说实话，这样的明信片比上几封信更能让我感到高兴，从中你不会读出什么不好的内容，然后便可自欺欺人地往好处去想。你做了一次愉快的郊游，有人（是谁！）还认为这次郊游令人“身心怡然”，你有点想到了我。如果没有先前的事这本应令我十分心满意足的，而我现在要谈的也关系到目前，首先是你的幸福。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打算做出牺牲成为我的妻子（实际上我在许多小的方面都证明了这是一种牺牲），那么，如果你不想使我们双方遭受不幸的话，你就不可以轻率地评判你对我的感情，更不能听任他人这样做。谁也不能要求你

对我的感情清清楚楚，但你必须对这感情有信心。你这几次的来信并联系你前一段类似的情况使我怀疑在你身上是否能找到这种信心。一定是什么地方隐藏着某种迷惑，否则我无法解释这一切。这种迷惑时隐时现，你起码应该有所察觉。但你却莫名其妙地没有去找出问题之所在，当然对问题也就一无所知。而这恰恰是你最应该做的。也许这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容易克服的偏见，只是瑕疵，但这也可以成为像它现在这样妨碍我们接近的因素，今后会完全使你离开我。或者根本就没有妨碍我们什么，但又怎么解释你用这样三句话答复了我们见面的问题呢：“我现在绝对没有可能去布拉格，你怎么会觉得你根本不能来柏林呢？圣诞节休假期间不行吗？”（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而现在才只是8月份呀。菲莉斯，我知道，也许表面上看，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很可怕，这也许是我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但这同时又是必须的。你不想听到你的言外之意（不要仅局限于某一件事），那么，我就大声地将它向你再重复一遍。

弗兰茨

[19] 13.8.11

菲莉斯，每当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美丽的清晨，你睡眠惺忪地坐在早餐桌旁，期待着惬意的一天的到来，却日复一日地收到我如同地狱中发来的被诅咒的信，一种自我反感就会袭上心头。可我应该怎么办，菲莉斯？你的上几封信中，我感受不到你的亲近、帮助和令人信赖的果敢，我如果不能把握住它们，就不能同你父母进行任何联系，因为你，只有你自己，构成了我同他人交往的唯一的、根本的纽带，今后也只有你才应起到这样的作用。我还必须耐心等待你对我昨天那封信的反应。你不理解我的处境吗，菲莉斯？我所忍受的痛苦比我带给别人的痛苦要多得多，虽然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本身却不带有丝毫自我辩解的含义。

你的 弗兰茨

[19] 13.8.12

最亲爱的菲莉斯！上封信中我才找回了原来的你。这以前你像躲在云雾后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第一封信中还是这样（星期一的信今天才收到，可能是没有贴足邮票）。我扪心自问，是不是我太苛刻了，以至于所有这些信都满足不了我。总是提到乌尔施泰因房子的许多缺点，谁

认为那里不能好好写信，谁又要求你要在那里写呢？乌尔施泰因房子的照片就总让我的眼睛发疼了。你反正总是用铅笔的，那么难道不能吃早饭的时候或在沙滩上给我写几行吗？种种迹象还使我发现，你只是漫不经心地读我的信，举个例子：我信中曾提到过马德里的舅舅，你却将他错弄到米兰去了，这件事本身当然无所谓，但你同样可以将我的某一个极重要的想法张冠李戴，这一切你又可能并没有说出来，而我则没有丝毫的察觉。

你星期二的第二封信才使我的心略放宽了些，我感到这才是我原来的菲莉斯，她终于又出现了。也许你只是累了，菲莉斯，如果不累反而奇怪了。我不想其他的可能性了，寄出此信的同时也给你父母发了封信，它们同时去向柏林。你们旅店里的的那个人应该放弃笔相学的研究，我完全不是什么“态度举止坚定果断”（这点你可能已有所了解），另外，我也非“极其贪图感官享受”，相反却具有了了不起的、天生的压制欲望的能力，我不是好心肠，虽然节俭，却正是因为“迫不得已”又不能这样，可又与慷慨大方无缘。而你沒有记住的他说的其他内容也不会好多少。就连所谓的“爱好艺术”也是不对的，这甚至是他一派胡言中最错误的判断。我不是爱好文学，我整个身心都是由文学构成的，我不是其他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前不久我在《魔鬼信仰的故事》中读到这样一段：“一个牧师的嗓音异常圆润甜美，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讲话。有一天，另一个牧师也听到了这悦耳动听的声音，于是说：这不是人的声音，是魔鬼的。当着所有被这声音迷住了的人的面，他用法术祛出了那魔鬼，被其附体的那副人的皮囊瘫倒下去，发出臭气（这还是人的躯体，只是不被灵魂支配而被魔鬼附身）。”^[155]我同文学的关系与此何其相似，只是附在我身上的文学没有那牧师的嗓音那么甜美。恐怕只有很老道的看笔相的人才能从我的笔迹中看出这一点。

说完笔相学再谈谈文学评论。《文学回声》近期发表了对《观察》^[156]的讨论。这种讨论十分让人喜欢，但此外就其本身而言也没什么特别出色之处。只有一处值得注意，讨论中提到：“卡夫卡的单身汉艺术……”对此你有何见教，菲？

再简短地谈一下其他几点：我坚持磨房主；书今天发出；如果你没有兴趣就不会做得好，尽力认真准确地去做（当然要十分小心谨慎去做），你会因马上可以感觉到它的功效而不再没有兴致；不要为做饭的事发愁；你表姐说梦话，那就在她睡着时小心地在她脸上盖一块手巾。

菲莉斯，现在算是平静了。是假期又是夏季，这个时候无论是屋内屋外都不应该有躁动不安。对你父母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将必要与真实相统一，又要让他们读得懂可并不那么简单，但我总是能够办到，虽然不一定十全十美。不管怎样我们将不再去谈论恐惧和忧虑，残余的部分我们必须自己消化。前几封信中我的责难无疑绝大部分是不公正的，但我不打算再详谈此事。但这些责难并非只是对你来信的个别内容的批评，它来源于我内心深处的恐惧。还是不谈这个了吧！我找到了不再用这些事折磨你的办法，我将不吐不快的事写下来，但不寄出去，或许今后我们会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安安静静地一同来读它，也许，也许一个抚慰的眼神，或相互握握手，就会使一切烟消云散，这比一封从远方用很长时间才能寄到的信能更快、更容易地解决问题。菲莉斯，前一阵我带给你的烦恼就权当你做出牺牲的第一步吧，同我的关系对你意味着牺牲。我只能这样讲。如果你父母问及我给他们的那封信，回答时将这些一并考虑进去。

别再给我写那么多信了。信多意味着有反常的事发生，和平不需要信件。不是因为我将世人面前成为你的新郎才有了这样的变化，但这却意味着将不再有怀疑和恐惧带来的种种影响。因此没有必要再写很多信了，必要的是毫厘不差的规律性。你会惊讶地看到，成为新郎的我，虽然仍然按时来信，却写得如此之少。到那时我们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相形之下，信变得可笑。

最亲爱的菲莉斯，你不会是因我而病的吧。你感觉不太好？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说清楚些？难道要我自我谴责，你是因为我不断的烦扰而病的吗？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原因是什么？你还总是睡不好？我们两人中我一个人失眠难道还不够吗？你能安静休息吗？吃得好不好，合适不合适？你感觉不太好，单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别给我写信了，只写明信片吧。但是菲莉斯，有关你感觉不好这样的消息请再附上些简短的说明，或给我小小的希望。如果你只写感觉不太好，那么我就会好几个小时对着这句话发愣，找不到答案，至少是找不到令我满意的答案。

另外，不要寄给我这种图案的明信片，而要名副其实的风景明信片，由此能让我想象你是在什么地方，是如何生活的，这对我可是最重要的。

邮局又同我们开玩笑。你星期五的信我今天，也就是星期一才收到。福楼拜本应上周一就到你那里，看来也是今天才到。那本书可真精彩！如果你抓住它不放，它就会同你融为一体，无论你是谁。

昨天，马克斯外出归来，我去看了他，他父母也在，听到了一大新闻：据说某人——他们大约绝不会告诉我是谁的——从某地问候了布罗德夫人。当时我听而不闻，不知所云，不眠之夜把我搞得头昏脑涨，只能毫无意义地左顾右盼。虽然这只是件令人尴尬的事，但同时也说明，外人介入我的事或打算介入我的事是多么让人不快，即使我充分地顾及到他们的友好情谊，关切之心，乐于助人和善良可爱，也永远不能认可这一点。

照片！菲莉斯，照片！我等着呢！

看，我得到了多么美的一首诗，发表在这期的《三月》上^[157]。记得寄还给我。两年前我们曾到过那里，我忘了那个村子的名字，离卢加诺很近。多保重，快点好起来。你表姐和女友现在只应做一件事。那就是服侍、照顾你。对我有什么吩咐吗？

弗兰茨

[19] 13.8.18

菲莉斯，你看，我指责你不太把我放在心上是多么正确。你胆敢这样做直到你面临危险，难道这是把我放在心上了吗？没有，你根本没有想到我。现在好些了吗？总还是感到心跳！不，菲莉斯，那里我不需要你对我的亲近，就让我的心脏按照我已损坏了的神经系统的意愿去跳吧，可你却要保持你心脏天生的、平稳的节奏。嗓子痛怎么会是惊吓引起的呢？这可有点没解释清楚。医生来过了吗？菲莉斯你说说看，你认识我之前不是有更强的抵抗力吗？我的责任比其他所有的感情波动都更大吗？这一年里，我对自己的折磨比给你带来的苦恼多一倍，而我恰恰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今后会遭受的惊恐而愁白了头发。你曾在信中说，你对秃顶的求婚者感到害怕，那么现在，你未来的丈夫却可能是个头发花白的人。

你今天这封信让我悟到，我们至少在一点上是完全不同的。你需要口头表达，谈话使你愉快，你更愿意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写信使你迷惑，你觉得这只是一种不完善的替代方式，多数时候甚至根本无法替代谈话。我的不少信你都没回，而对某些内容你可能很愿意当面发表看法，以你的善良和热心无疑只是因为你对写信有抵触心理罢了。

而我则恰恰相反。我十分讨厌讲话，且不管说什么都词不达意。在我看来，这种交流方式使我表达出的东西丧失了意义和重要性，而且我认为也只能是这样，因为讲话要受到无数形式上的琐事和表面上迫不得已要做的事的干扰。所以我沉默着，不仅是出于无奈，也是因为确信这一点。只有写才是适合我的方法，即使我们在一起后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但对于天性就喜欢讲话和倾听的你来讲，我这种基本的、也是唯一的（或许只是为了你的）表达是否足够了呢？

弗兰茨

〔19〕13.8.20

亲爱的菲莉斯，我昨天回家太晚了，没法给你昨天的电报回电报。你昨天肯定也已收到我的信了。

因为以下的原因，星期天我没法给你写信：星期日我独自在小巷里徘徊，我想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对这件与最重要的有关的事，我们怎能谈得、写得这么少呢，而且大多还只是暗示（我的手今天怎么抖得这么厉害。你看，我也能够平静地写字！）。我大步转回家，以便把一切尽可能清楚地写下来，交给你看，有什么比这更顺乎自然呢？那是夜晚，对于清楚地写东西很有利。我在睡眠时梦见什么了！我遇到了一个熟人，我们相互平静地、散乱地、毫无意义地交谈，当离开他时，我更富有人情味。想到我在整个时间里给你造成的痛苦，我暂时将最重要的置之不写。不写是罪过吗？肯定是。但我出于好意。当我从信中看到星期一你躺在床上，全然不需要烦恼，我要谢谢我的那位熟人。

你是否应该给我母亲写信？首先你父亲得先给我回信。这以后倘若情况好，那就干你喜欢干的事吧，给母亲写信或者等她回信，对此我无所谓。如你想让她先给你写，那她会写的。

菲莉斯，休假以前我基本上去不了柏林了。首先，在我现在的状

态，你不会对我感兴趣（我不想把以后的印象抢先说出）。其次，我们两个人都不喜欢订婚的时间（可能原因不同）。东方的婚俗也有对的地方，新郎直至结婚之时才能见到新娘，揭开面纱“这就是菲莉斯！”随后他拜倒在她脚下。她却吓得向后一跳，这个白头发的人吓得她够呛。第三，我想把假期集中一下，我几乎没剩下星期天了。这就是一般的原因，你同意吗？

〔写在信边上〕

照片！把这封信给你的妹妹！

弗兰茨

〔19〕13.8.21

菲莉斯，也许没什么难以启齿的了。别害怕，但是，你或许恰恰没有完全理解最重要的事。这并非责备，一点责备的意思都没有。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但你所不曾拥有的，也就无法理解，没有人能。只有我内心充满忧虑与恐惧，它们像蛇一样活生生的；只有我不停地观察它们，唯有我知道它们的状况。你只通过我、通过信件才得知它们，它们带给你的恐惧的持久性、大小和无可抗拒性与真实的情形相比，甚至连我所写的与事实相差的程度都达不到，而这里已经产生了大得无法估量的误解。你昨天的信可爱又充满了自信。从中我清楚地看出，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在柏林获得的有关我的印象。等待你的不是你在魏斯特兰德遇到的幸福人们的生活，不是手挽手愉快的谈天，而是在一个呆头呆脑、郁郁寡欢、沉默寡言、不满意、病怏怏的人身边，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这个人在你看来像个疯子，看不见的锁链把他束缚在无形的文学之中，要是有人接近他，他就大声嚷嚷人们触碰了这锁链。

你父亲迟迟没有答复，这很自然，但他提问也很犹豫，似乎证明了，他的疑虑很一般，没必要通过我的回答来消除。他恰恰没有注意我信中自我暴露的那些地方，因为这完全出乎他的经验以外。今天，一整夜我都在对自己说，不能这样并起草了一封信，以便给他讲清楚。信没有写完，我也没把它寄出，这只不过是一次感情上的决口，一点儿也没使我感到轻松。

弗兰茨

〔19〕13.8.22

最亲爱的菲莉斯！女仆把我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喊醒，把你的信递给我。它仿佛是刺眼的想法的补充，这想法在我无尽的、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在我头脑当中萦绕。现在我所有的夜晚都是这么度过的。不管女仆夜间几点钟把你的信拿来，总能自然而然地与我的思路相吻合。我想的全都是你和我们的未来。

可怜的最亲爱的菲莉斯！没有人让我如此伤心，我没有像折磨你这样地折磨过任何人，这两者的结合可怕又公正。我简直快要精神分裂了。我蜷缩在自己的拳头下，老想着同一件事。这难道是厄运呈现给我们的前兆吗！

最亲爱的菲莉斯，爱好写作，不，不是爱好，写作完全就是我自己。爱好可以戒掉，或被抑制。但写作就是我本身；当然我也可以被撕裂、被压抑，但你怎么办呢？你将孤孤单单，却生活在我身边。如果我按照自己不得不采取的方式生活，你将觉得孤独。倘若我不那样，你会真正的孤独。我小小的心声将被支配，被绞杀。最亲爱的人，你写道，你将习惯于我，但要承受何种、也许难以忍受的痛苦啊。你能够真正设想这样的生活吗？像以前我已经写过的那样，至少秋天和冬天，我们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在一起，而且，你当了妻子后将比现在做姑娘时在你熟悉、适应的环境里，只从遥远的地方设想，更加难以忍受孤独。在修道院前，你将被笑声吓退，你愿意和一个天生有义务过修士生活的人一起过日子吗（他的其他情况都是次要的）？让我们平静一点，菲莉斯，镇静！今天我收到你父亲一封平静、经过深思的信。他的安详与我的状况相比，使我觉得自己是个不通人情的傻子。但你父亲的来信之所以平静，只因为我欺骗了他。他的信友好又坦诚，我的信掩盖了极其不幸的背后的想法，我不得不一再用它们来攻击你，我诅咒它们。你父亲当然没有决定，而有所保留地说要与你和你母亲商量。我已经蒙蔽你父亲了，菲莉斯，你对他真诚一些吧。告诉他，我是个什么人，给他看信，在他的帮助之下跳出这该死的圈子，我过去和现在都被爱情冲昏了头，是我用书信、请求和誓言把你逼进了这个圈子。

弗兰茨

[19] 13.8.24

我问我的情况如何？我的情况是这样的。自从四天以前收到你的电报以后，我就写好了给你父亲的信，并把它放在抽屉里。

当我今天看了你的信以后，我马上去到隔壁房间——父母吃过午饭后，总在那里玩一会儿牌，我立即问：“爸爸，我想结婚，你看怎么样？”这是我和父亲第一次谈起你，当然，从母亲那里，他知道了她所知道的一切。我告诉过你我敬佩我父亲了吗？他是我的敌人，我也是他的对头，这是我们的天性决定的，这你知道。但除此以外，我对他个人的崇敬或许与对他的恐惧一样大。不得已时，我可以绕过他，但超越他却不可能。像每次我们交谈一样（但这次与我们之间所有的所谓交谈一样，完全是我这方面站不住脚地评论几句，他那方面强有力地发言），这一次也以他那边慷慨陈词，我这方发觉这种激动的情绪而开始。我觉得现在没有能力、太虚弱了，无力描述这一切，并非由于受了这次谈话的影响过深，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相对于父亲的无能，对他的打击比对我自己沉重得多。重要的是，他给我描述了我这样的收入结婚以后肯定会陷入贫困当中。由于无能，我无法承受或消除这种后果（他强烈地指责我，引诱他参与失败了的石棉厂，现在自己又撒手不管了）。另外的一个根据——它与我的事有什么联系，我记不清了，但当时是有关的。他半泛泛、半对母亲、半对我责难我第二个妹妹的婚姻，在金钱方面他不满意（是有道理的）。这样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像大多数这种场合的结尾一样，他变得温和了，并非真正的温和，但相比之下，温和得让人对他手足无措，尤其是我，我对他本来就没有自然而然的话（但我极清楚，我与他关系最奇特的地方或许是，我不是伴随他，而是在他心中与他一道感觉、一起痛苦）。所以，他最后说（我的叙述少了过渡部分），如果我有这种想法，他愿意去柏林，去你们那儿，把他认为无可反驳的反对意见说出来，如果尽管有这些反对意见还是同意结婚，他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菲莉斯，现在你参与到我和父亲的谈话中了。你必须得帮我一下，让我挺住。对于你，我父亲是个陌生人。如果他去柏林，开始就这样，好吗？现在这个时间恰当吗？要不，怎样开头才好呢？在此急需如同长蛇一样明智和迅速的答复。

弗兰茨

[19] 13.8.24

最亲爱的菲莉斯，中午我可能写得不完全正确，我很受当时的情况和他的威力的影响。正确地理解我吧！父亲说的话，就是以他的方式表示同意了。如果他能够对我的愿望表示同意，他就这样。他说起子女们

的幸福，这事他很牵挂。他几乎没有真正说过谎，对于这个，他的个性过强了。但是，他所担心的，还有其他的事。在这一点上他和你的母亲有点儿相似，他预感到危机四伏。过去，当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健康充满了自信的时候，尤其对待自己所着手做的和自己正在做的事，从没有这么不放心。现在他什么都担心，这恐惧至少在大事上往往得到证实。其实，这种经常性的提醒只是想说明，幸福极少，可惜事实如此。父亲一生都在艰苦劳动，从一无所有到有所成就，这种进步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自从女儿们长大就停止了，现在由于女儿们的出嫁，开始可怕地持续不断地倒退。父亲觉得，他的女婿、孩子们一直是他的拖累。我现在除外，可惜这种感觉完全有道理，而且父亲的病——动脉硬化症加剧了。他想，现在我又结婚，迄今为止，我本不在他担心范围之内的。照他估计，即使不立即，两年以后肯定也得陷入困境，无论我现在如何否认，到时候肯定会向他求救，他很发愁，却没办法。或许，即使我不求援，他还是得设法帮我一下。因此，他和他认为依赖于他的许多人将沉沦得更快。菲莉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现在，让我长时间地，尽可能地平静地亲吻你吧，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敢这么想了。

你的 弗兰茨

13.8.25〔可能是自24日起〕

如果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对他有所安慰就好了！我不会用钱（如果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斤斤计较的毛病，但挣钱的爱好的确没有），对于生活的要求没有什么。倘若父亲说，我们将陷入窘境，则我就信，如果你对我说，我们不会贫穷，我更愿意相信你。不管怎样我无力与父亲争辩，这得巧舌如簧的人才行。

菲莉斯，在这难挨的日子里，经常给我写信吧。

布吕尔这个人很可怕。他有时候贪污，有时候与什么人发生暧昧关系，也许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孩子们大部分已经可以挣些钱了吧？

假如你是我的天使，我愈来愈相信，你就是。那么，我现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天使的保释了，我想，对于明天的来信，我肯定有许多话要回答。但是得让我先看一看，那信里面写了什么。

弗兰茨

菲莉斯，今天我收到你的信、明信片和你父亲的信，你收到我星期

日和星期一的信了吧，从你的信中看它们已经到了，但是你却并没有做答复。你恐怕已经和你父亲谈起过这个婚姻对你冒险的一面，而你父亲的信对此也只字未提。但是，他必须知道，这不光间接地，而且直接与他有关。要是我能够去柏林当面谈就好了。但我不能够，所以得写信，我把想要说的，尽量简短地、粗略地写在你父亲所附的信中了。最亲爱的菲莉斯，请你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他。非这样不可[158]！

弗兰茨

〔1913年8月28日〕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我的母亲吗？自从她感觉到我的忧虑，三个晚上以来，她一直在恳求。我无论如何还是想结婚，她想给你写信，她想要和我一起去柏林，还有什么她不想的！而对于什么对我重要，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的父亲卡尔·鲍威尔先生的信

尊敬的鲍威尔先生：

承蒙您给我写了第二封信，我不知道您是否有耐心并愿意再听一听下面的情况。我知道自己非把它倾诉出来不可。我必须得述说出来，即使来信没有使我获得我现在对您的信任。

我第一封给您的信中写道的关于我与您女儿的关系是实情，并将继续下去。但您也许没有留意，其中缺少一点关键性的东西。也许您认为不必讨论此事，因为您觉得，研究我的性格完全是您女儿的事，并且也已经完成了。事情并非如此，我老是感到到时候了，但是事实一再表明，这没有发生，这没有能够发生。我的信蒙蔽了您的女儿，多数时候我不想欺骗她（有时候想骗她，因为我一直爱着她，而我又知道这多么不协调），也许正是因此蒙住了她的眼睛。我不知道。

您了解您的女儿，她是个活泼、健康、自信的姑娘，她活着，周围要有开朗、健康、活跃的人们。您只通过我的拜访了解到我（我几乎想说，这也该足够了），我也不能够重复我写给您女儿大约五百封信中都写了什么。所以，请您只考虑这最重要的一点：我把全部生命都献给文学，这个方向我认真真地坚持到了三十岁，倘若我离开它，自己也就

不存在了。我之为我或不为，原都在此。我沉默寡言，不合群，郁懣，自私，爱猜疑，并且真的有病。其实，我对这一切并不抱怨，这是至高无上的必要性在世间的反映（我真正能做的，在这里当然不存在疑问，与此无关）。我生活在自己家中，处在最好最亲切的人们中间，比陌生人还陌生。过去的几年，我和我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父亲甚至有时只相互问候一句。和我出了嫁的妹妹和妹夫们我根本不说话，并非对他们怀有什么恶意。家庭对我失去了任何共同生活的意义。

您的女儿将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她是个健康的女孩，她的天性能保证婚姻生活真正幸福吗？她得忍受在一个男人身边过一种僧侣般的生活。虽然这个男人爱她，他还从未这样爱过任何一个人，但是，由于不可更改的事实，他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房间里，或者甚至一个人出去游荡。她不得不忍受与自己的父母、亲戚完全隔绝，几乎与其他人没有任何来往的日子。因为我这个人，即使对待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也宁愿把他们锁在门外。另外一副样子的婚姻生活我根本无法设想。她能够忍受这些吗？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在她甚至在我看来都是极可疑的文学？就为了这个她得孤独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过一种婚姻生活，而这婚姻可能更多是爱和友情，而并非真正的婚姻。

我把自己想要说的讲了最少一部分。首先，我不想对任何事情抱歉。您的女儿和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太爱她了，她太不会保护自己，可能出于同情想要干不现实的事，尽管她一再否认。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了，请您评判吧！

弗·卡夫卡博士 敬上

〔19〕13.8.28

最亲爱的菲莉斯，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坏的一面，这坏的一面也是来源于你可以称之为文学，或不管你如何称呼的那个核心。我是个多么糟糕的作家，我在我之外多可恶，以至无法让你信服这一点（在这以前并且现在也这样，我用手按住太阳穴，没别的办法）。

不是事实阻止我，而是恐惧，一种不可战胜的恐惧，害怕得到幸福；是一种乐趣和命令，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折磨自己。最亲爱的人，你不得不和我一起被碾到轮下，这命运本来只注定给我，这可太可怕了。内心的声音把我驱向黑暗，而实际上你却吸引着我，这两者不可调和，倘若我们坚持这么做，那你和我将遭到同样的打击。

最亲爱的人，我不想让你变个样儿，我爱的是你而非虚构的形象。但是随之专制又来了，仅仅由于我的存在就得对你形成专制，这矛盾让我心痛欲裂。这一点也表明了我们的不可能。

假如你在这里，假如我看到你受苦（不光如此，你在这方受苦，使我愤怒），假如我能帮你，假如我们能够毫无顾忌地马上结婚，那我愿意放弃一切，不幸就任它不幸去吧。但目前，找不到这样的出路。看着你今天可爱的、自杀性的信，我可以向你保证，一切就按你的想法吧，我不再折磨你了。但是，我保证了多少回呀！我不能为自己打保票。在你的下封信中，或许今天夜晚，这种恐惧又袭来，我无法避免它，熬不到结婚的时候了，现在每个月周而复始的，将每个星期重复出现。我将从每两封信中找到令人担忧的迹象，我心中的这个可怕陀螺又开始旋转了。这不是你的过失，菲莉斯，从来不是。这是一种广义的不可能的过错。比如说，我谈了你的上一封信。你无法想象我心中充满了多么可怕的想法。是何种考虑使得你的父母同意。这考虑与我又有何相关，我恨这考虑。你写到，你母亲可能喜爱我，让我拿这喜爱怎么办，我这个人从不能，也不想回报或适应这种爱。甚至连和你父母进行一次详谈我都怕。甚至订婚与节日之间的联系，说出这种联系我都怕。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这是精神错乱，但同时是根深蒂固的错乱，这我知道。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整个个性的表现，它会不断地摇撼你。认识到这一点吧，菲莉斯，我匍匐在你面前，请把我踢开吧，所有其他的都是我们两个人的末日。这就是，我想，我在一月写过的话，它又冒出来了，不可抑制。如果我能在你面前崩裂，你就会自己说出来了。

弗兰茨

〔19〕13.8.30

菲莉斯，我平静多了。星期日我躺在森林里，头痛得很，因为疼痛把头在草丛中扭来扭去。今天已经好多了，但我的自制能力却并没有比以前增强，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在思维中，我可以把自己一分为二，可以安静而满足地站在你的身边，同时观看自己此时毫无意义的自我折磨。在思维中，我可以站在我们两人之上，面对我施加给你——这位最好姑娘的痛苦，请求给自己以特别的折磨，这我能够办到。最近，我给自己立下了以下的愿望：“在经过时，脖子被人套上绞索，毫无顾忌地从底层窗口拉进，鲜血淋淋，衣衫破碎，穿过所有房间顶棚、家具、墙壁

和天花板。及至房顶，绞索却空空如也。原来当绞索穿过房顶瓦片的刹那，我的最后残留物却失落了。”^[159]但是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做，完全封闭在自我之中，只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你那可爱的声音。上帝知晓，这无尽的、单调的、辗转反侧的忧虑是依靠何种源泉滋养的。我已无法对付它们。我想（你也这么想），倘若给你父亲写信，事情可能会变得平静一些。事实恰恰相反。更强的袭击无限地加大了担忧和恐惧的力度。在这里发挥威力作用是强迫。它统治着所有的弱者，要求作出极度的忏悔和完全彻底。为了创作，放弃人间最大幸福的乐趣，不停地切割自己所有的肌肉。我无法解脱自己。万一自己不放弃担心，一切将黯淡无光。

最亲爱的，你对我所说的，我几乎在不停地说，稍有一点离开你的行为就会灼伤我。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在我心中不断重复，令我更加恼怒。在你的来信和照片面前，我甘拜下风。然而，你瞧，我感到在心理上至亲的是四人（无须通过力量和广博来把我与他们相比较）：格利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和福楼拜。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了婚，可能只有克莱斯特，当他在内外交迫的压力之下，在万湖自杀时，才找到了正确的出路。这一切其实对我们毫无意义。每人的生活各不相同，即使我生活在投射到我们这个时代阴影的核心。但它却构成了生活和信仰的基础，上述四人的行为由此意义更大。

最亲爱的人，与我给你造成的烦恼相比，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我只是为你将来的痛苦担心。你如此可爱，一旦我拜倒在你面前，我想就再不能离开。对于我针对你上封来信所写的有关你父母的回信，你恰似一位天使（刚好你的电报来了，最亲爱的人，不要折磨自己吧！我今天中午才收到你的信。寄到这里，邮递情况不好，这你是知道的。现在已经6点半，我无法发电报了）。

我根本不要求你把那封信交给你父亲。我只是在情绪激动之余，为了万一才写的。最终的决定权既不在你父亲，也不在我，而只在于你。你父亲也许不应该决定。我被矛盾所束缚，动弹不得，从一开始就处在这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如果你不愿意，就无须将信交给你父亲。但我现在也未能给他另写一信，事实上我没时间，请转告你父亲，你对我有些事不清楚，也许有什么需要澄清，你不想让我给他写信，两者都是事实。你不可能始终明澈不误！否则你就不会让我像现在这样写下去。就如此跟他说，你看行

吗？

当然，两人晤面，在德累斯顿或者柏林，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最佳方案。即使我什么也不说，仅仅站在你的面前。并非为了我好，从更高层的意义上说，像我现在这样，但这无所谓。我星期六将要外出。我向你提过国际救助和健康事业大会吗^[160]？昨天在最后一刻，我决定还是前往。为此，我将失去几天假日，却会获得另一些好处。所以，我星期六赴维也纳，可能在那里待到下周六。然后去雷瓦疗养院，住一段时间，最后几天也许去意大利北部小游。如果雷瓦过于凉爽，我就到更南方去。

菲莉斯，利用这段时间使自己平静一些吧！等你平静之后，你会理解我的。在你安详的目光前，我像磷火一样飞过，试想一下，你在匆忙混乱之中所见，能否长期产生决定性影响。作为使你不受干扰的代价，我打算一封信也不写。在这段时间里，除非有极其特殊情况，我再给你写信。我也不给你写真正的信了。在旅途中，我将把观感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积攒起来，每周给你寄两三次。这样，我们之间就没有个人的，由于我的过失被搞糟的关系了，但也并非全无联系。

等我归来，我们再见面（在你愿意的地方），分别这么一大段时间之后，再次平静地面对面相聚。但愿你能同意。

你的 弗兰茨

〔19〕13.9.2

衷心地问候你。我住在马查科夫霍夫饭店。格利尔帕策曾在这儿吃过午饭。他的传记作家劳伯说：“简单但好。”^[161]尽管如此，我明天还是要搬家了，所以地址是雷斯坦特总邮局。我失眠得厉害。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3.9.7，维也纳〕

今天早晨我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摸不着头绪。我知道具体的，总体的也知道，但实际并不懂。

还没有时间写日记。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3.9.9，维也纳〕

目前无法写日记。如果我不感谢经理带我去往维也纳，而求他不要带我来就好了。失眠，失眠！第一次旅行当中遇到这么多麻烦。夜晚，冷敷着头，但无济于事，我还是辗转反侧，希望能躺到地下几层的地方去。我尽可能地拒绝与人来往，但还是和多得可怕的人在一起，在那里坐在桌边，我就是只魔鬼。

弗兰茨

〔19〕13.9.9

〔维也纳H.麦勒德的马查科夫霍夫饭店信笺〕

我不再接着写关于维也纳的日记了。如果我想在维也纳这几天无所事事——而且彻底的，那这是最好的办法。明早8点45我去特里斯特，9点10分抵达。星期一前往威尼斯。我睡得好些了，但内心里惶恐不安。顺便提一句，现在我一人旅行，看看我对于单独行动、对外国语、对幸运的巧合的无能为力，对旅伴，哪一个更反感。电报收到了。我的地址是：威尼斯一邮局信留处；即使我也许在那里待不长，人们会给我寄过来的。

弗兰茨

〔19〕13.9.13晚9点，维也纳

〔议会大厦信笺〕

〔1913年9月6、7和8日写在四张双面写字的记录纸页上。在第一页的上端〕

1913年9月10日

我站在议会大厦前厅的柱廊之间，等我的经理。天下着大雨。面前耸立着头戴金盔的雅典神帕藤诺斯。

9月6日出发去维也纳，与皮克愚蠢地闲聊文学，相当反感。像（皮克）那样，挂在文学之球之上，无法摆脱，因为把指甲插进去了。其他方面却是个自由人，向慈悲方向挣蹦着，观看他的工艺品。他声称我對他专制，借此来操纵我——旁观者站在角落里。圣城车站空荡荡，列车里空荡荡。远处，一个男人在查行车表（我现在正坐在一个特奥费尔·汉

森神首柱的一个台阶上。弓着身子，蜷缩在大衣里，脸朝着黄色的纸版。路过一家阶梯形小饭店，一个客人举起一条胳膊。愚蠢的不稳定，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它。马查科夫霍夫饭店。两个房间一条过道。请选择第一个。难挨的生意。还得和皮一起到巷内去。走得太多了，太快了。空气刮过。把遗忘的重新认出。睡不好，充满忧虑。讨厌的梦（日记的问题同时是全部的问题，包含全部的不可能）。在火车上，在与皮的谈话中，我想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可能不把一切说出来。捍卫自由和不捍卫它都不可行。过唯一可能的生活不可能，即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为了自己，既不形式上，也不真正结婚，只是在一起，这样跨出了男人之间的友谊的最后一步，临近为我设定的界限，脚已经抬起来了。这恰恰是无法实现的。上个星期有一天上午我想起来，我想下午写信，作为一种解脱。下午我收到格利尔帕策的一个传记[162]。他这么做了，正是这样（刚才有个人打量特奥费尔·汉森，我坐在那儿，像他的克里奥。但不管这生活多么无法忍受、充满罪恶、令人厌恶，而至于我或许比他的痛苦还大，因为我在某些方面很弱。以后再接着谈）。晚上还见到了丽莎·威尔士[163]。

9月7日，讨厌皮。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人。性格中永远有一点令人不舒服的地方，如果长时间观察，正因此，才形成了他完整的性格了。早晨在议会大厦。事先在大厦的咖啡厅从丽莎·威那里拿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入场券。去艾伦施坦那里，在奥塔克环形街。我不知拿他的诗怎么办[164]（我很不平静，因此还有点不真实，因为我不单为自己而写）。与两个人一起在塔利西亚素菜馆[165]。和他们和丽莎·威在普拉特。同情加无聊。她去柏林，犹太复国主义办公室。抱怨她家里过于敏感，但只像条被钉住的蛇扭来扭去。她没救了。对这类女孩的同情（间接地关系到我），兴许是我最强烈的社会情感。照相、射击，“原始森林里的一天”，玩转椅（她手足无措地坐在那里。连衣裙被风吹得鼓起，做工很好，穿得却寒碜）。与她的父亲在普拉特咖啡馆。贡多拉池塘。头痛不止。威去莫娜瓦纳。在床上躺十个小时，睡了五个小时，放弃了戏票。

〔9月〕8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一个圆头、双腮结实的那种人。那个巴勒斯坦的工人代表不停地喊叫。赫尔茨勒的女儿。耶拿的前文科中学校长。笔直地站在一个台阶上，胡子乱糟糟，裙子舞动。毫无结果的德国式讲话，许多希伯来语，主要的工作在小组会上进行。丽莎·威让自己被这一切拖着走，心不在焉，绝望地往大厅里抛纸球。泰因夫

人。

〔在《梦幻》之下〕（马雷克）

〔关于“接着谈”〕《梦幻》

终于到了威尼斯。不管雨下得多大，我还是得现在冲入雨中（正好把维也纳的日子从身上洗去）。尽管我的头脑由于有点晕船颤抖得厉害，这是我在短得可怜的一小段路上（从特里斯特至威尼斯），当然是在狂风暴雨中得的。

弗兰茨

〔明信片上的邮戳：1913.9.15，威尼斯〕

菲莉斯，你的信既非对上几封信的答复，也不符合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我并非因此而责怪你，因为我的也一样。等我回来之后，我们应在某个地方见见面，这样，一个人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汲取力量。说起来，我们都够可怜的。菲莉斯，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在如此压抑的状态中，我怎能给你父亲写信？重重心理障碍制约着我，令我寸步难行，根本无法把内心的障碍抑制下去。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此感到无比悲伤。在征得你的同意后，并且完全发自我的内心，我可以给你父亲写信。但是，稍稍接近现实，我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自我控制，并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去寻找孤独。菲莉斯，这只会导致比我们现在更深、更深的痛苦。在这里，我独自一人，除了旅馆服务员，几乎不与任何人说话。我悲伤得快承受不住了。然而，我觉得自己仍处在一种与自身相符的、由公正超凡力量给予我的、而我自身却无法超越、不得不终生承受的状态之中。并非我“不得不放弃自身的许多东西”阻碍着我。如若从狭义上看，这的确存在，我则更像一只倒在地上的畜生，人们既不能通过谈话，也无法通过劝解来帮助我。我无法避免这两种情况，特别是后者。我仿佛被捆住手脚，无法前进。我努力前行，却更多地被拉了回去。这是眼下人们能够从我这里获得的唯一明确而坦诚的回答。清晨起床，我抬头仰望威尼斯的天空，上述想法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我惭愧，难受至极。但我又能如何，菲莉斯？我们不得不分别。

弗兰茨

〔邮戳〕〔19〕13.9.16〔威尼斯山特维斯饭店信笺〕

在维罗那圣阿纳斯塔西亚教堂里，我疲惫地坐在长凳上，面对着一个真人大小、愉快地背负着圣水盆的大大理石雕像。通信联系完全与世隔绝。后天在里瓦才能收到你的信。在这里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切都很难过。

弗

〔明信片邮戳〕〔19〕13.9.20—维罗那

菲莉斯，我试图不只为你，也为自己而尽量把事情弄清楚。

当从威尼斯给你写信时，我尚无法确定，那是否就是多年来一直不间断通信的最后一封信。后来证实，那确是如此（维罗那的明信片是在无奈的心境下写的，算不上真正的明信片）。我感到自己干了长期以来最正确的事。你杳无音信，使我的决定更容易一些，心情更轻松一些，你最后的音讯是发到威尼斯的电报，其中说将有一封信，但却没有出现。你以后又往威尼斯发信，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也许我没有收到，因为那个意大利邮局的工作人员把我交给他写有我在里瓦地址的纸片，像废纸一样扔进了一个角落，来信再也不会重见天日。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再写信，不，我还是又写过一次，就在维罗纳寄出明信片之后。那时，我在德森查诺，躺在草丛中，等待着即将驶往加多纳的汽艇。当时我给你写过一信，但却没有寄出。它可能还在某个地方，我已记不起来了。信写得相当马虎、草率，其中的连词也是我临时杜撰的，实在令人生厌。在德森查诺，我确是山穷水尽。

菲莉斯，你现在收到了我从维也纳寄出的便条和从威尼斯寄出的信了吧？你不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这是唯一正确的？如果你不想把我一脚踢开，我必须将自己拽开。你不这么想？今天也没有这种想法吗？你如这种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与我家的关系十分松散，与任何人都不往来，我怎能进入一个新的家庭，而且此后又建立一个家庭呢？像我这样的人，也许只能与人一起享受，即使付出努力却也不能与人共同生活。我不敢保证自己能持久地保持共同生活的真实性，而不真实共同生活又让我怎好忍受？你看，我无法写日记，除了寄给你的几页纸外，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对我来说，没有谎言和没有真诚的共同生活都是不可能的。我看到你父母的第一眼就将是欺骗。

但我考虑的不仅是这些。我非常想见到你。这想法像泪水一样积聚在我心中，却哭不出来（但不是脑袋疼痛，不是心动过速，只是一般性

失眠——今天这一切重又开始了)。昨天在课堂上，我盯住一个女孩看了一个小时，因为她长得有点像你^[166]。几个星期以来，我就在制订与你共度圣诞节的计划，在最后一刻我如何才能把整幸福都集聚在一起。不，现实使我清醒，我又恢复了理智。倘若你现在发问，我为何要写出这些计划，而我的真实想法恰恰相反，我恐怕只能回答：“这是卑鄙无耻。在内心深处，我只想被你吸引，我这么说仍属无耻的行为。”菲莉斯，我们遭此不幸，你一点过错也没有，过错完全在我。你也许不知道，我的责任有多大。如果你想一想，你前几个月的来信其实全都是惊讶。人怎么能像我这样？你无法相信，却又无法否认。若非如此，你就不会那样写：你的双亲把对你的爱转移到我身上，你就不会在最后一句话里叙述你父母亲的这种感受了。所以你只倾向于结婚，否则，你就不会将我们的订婚日期和假日联系在一起了。你必须相信，我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弗兰茨

〔邮戳〕〔19〕13.10.29，布拉格

格蕾特·勃洛赫，1892年3月21日生于柏林，她作为以下信件的回信人在这封信中第一次出现。她在那里上了小学及中学，并毕业于贸易大学。从1908年至1915年，她在柏林、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当速记员。1915年以后，先在柏林一家生产办公器械的公司任秘书，后任代理人。她有一个比她年长一岁的哥哥——汉斯·勃洛赫，在以下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他。

格蕾特·勃洛赫和菲莉斯·鲍威尔可能于1913年4月相识。她们之间的友谊要比她们与卡夫卡之间的关系持续的时间长得多。1935年，格蕾特·勃洛赫在流亡途中还去看望过她的这位女友；她先流落到以色列，最后到意大利。当时，她把卡夫卡写给她的信部分转交给了菲莉斯，后者及其全家住在日内瓦。

卡夫卡第一次见到格蕾特·勃洛赫是1913年10月底。应菲莉斯的请求，格蕾特去看望卡夫卡，并为卡夫卡和菲莉斯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解。此后，他们开始了历时一年的通信。凡是保存下来的信件，都刊印于后。

马克斯·勃罗德在他撰写的卡夫卡传记新增第三版中记载过格蕾特·勃洛赫1940年4月21日从佛罗伦萨写给她在以色列的朋友的信件的几个片段。当时，她在佛罗伦萨生活，信中提到，几年之前，她有一个私生子，是个男孩，“1921年，孩子在近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夭折。”那孩子无疑是在1914年出生的。虽然其父亲的名字在这封信中没有提及，但收信人明显可以看出——这件事的唯一证人是马克斯·勃罗德，格蕾特所提孩子的父亲乃是卡夫卡。

但是，在这里刊印出来的从1913年10月29日至1914年10月15日的信件，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语调都丝毫不能证明两人之间关系业已达到上述程度，于1914年或最迟1915年上半年生了一个孩子。熟悉格蕾特·勃洛赫的有关人员关于她在佛罗伦萨时期精神和心理状况的描述，让人有理由怀疑这位女证人的可信性。此外，1915年5月24日，卡夫卡、菲莉斯和格蕾特三人一起前往萨克森的小瑞士远游（出版者有一张这三人签名，署着这个日期，写给卡夫卡妹妹奥特拉的

明信片)。订婚者的女朋友在这之前不久已生下一个卡夫卡的孩子，或者即将分娩，看来极为可疑。从1940年佛罗伦萨的来信和其他格蕾特与卡夫卡的通信中，都看不出他们之间有更加密切关系的迹象。在当时，即1916年中可能是菲莉斯告诉过卡夫卡，格蕾特的处境很窘迫。因为，1916年8月31日卡夫卡在致菲莉斯的一封信的边注中写道：“勃洛赫小姐怎么样？这对她意味着什么？”1916年9月1日的信中写道：“格蕾特小姐的痛苦使我深受感动，现在你一定不要离开她，以前你有时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地这么做了。如果你对她做些好事，那你也代表了我。”假设格蕾特·勃洛赫当时的痛苦是由于怀孕造成的，肯定只不过是大胆的猜测。但是与格蕾特·勃洛赫后来的陈述相比，看来只是猜测。但是，除了时间上的差异，卡夫卡作为一个快要出生孩子的可能父亲，对于其未婚母亲的状况如此无动于衷，确实令人无法想象。

据英国红十字会的消息说，希特勒占领意大利以后，格蕾特·勃洛赫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捕，可能在被放逐中或在一座集中营里死亡。

致格蕾特·勃洛赫

仁慈的小姐：

我感谢您的邀请，我肯定会来，由您选定时间吧！请您在守门人那里给我留个信儿，明天我去取。

有一点我现在不得不说，当时我若与您见面，我会很高兴。但今天我得告诉自己，还从未有一次谈话帮我弄清楚过问题，而往往让我更加迷惑。您肯定已感觉到了我并不缺少迷惑。

弗·卡夫卡博士 敬上

〔19〕13.10.29〔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菲莉斯，我星期六来，下午3点钟，我从这里出发，星期日4点或5点就得离开柏林。我将在阿卡尼森霍夫饭店下榻。

我认为我们必须见上一面。原来我想圣诞节再去，后来你的信和你的朋友（格蕾特·勃洛赫）来了，促使我决定本星期六就去；后来你的朋友走了，你也不来信了，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这时我想把行期推迟到十四天之后的星期六（下星期六马克斯赴柏林，我想单独去）。但是，根据我这一周的经验——我如此百无聊赖——你今天的来信收到后，我遂决定这星期六就去。如果突然有事耽搁，我会发电报给你。

菲莉斯，你真的希望我们的会见能把问题弄清吗？我也认为，这绝对必要，但是会使我们弄清楚吗？哪里有我，哪里就没有清楚。你不是说过，每次会见之后，你都比以前更加六神无主了吗？你忘记了我们只

有在书信中才能消除一切怀疑吗？书信中包含了自身的较好部分。

现在让我们等着瞧，但愿上天理解我们。

弗兰茨

〔19〕13.11.6

我找到德森查诺的两张纸片了，现把它们随信寄去。你知道吗？我从去冬以来没有写过一行值得存留的文字？

〔两张附上的便条〕

德森查诺位于加德湖畔。星期日（1913年9月21日），我躺在草丛中，面前的芦苇丛荡漾起伏，我的视线远及右边的西尔莫沙嘴，左边至马纳巴湖岸，阳光灿烂，有两个工人现在近旁的草丛中歇息。

我唯一的幸运感在于，谁人也不知道我在何处。但愿自己能够知道一种可以永远延续这种感觉的可能性！这将比死亡更加公正！在自本性的所有角落，我是空虚而无意义的，即使在不幸的感觉中也是如此。现在，最好不要去疗养院^[167]，而是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

然而，抱怨丝毫不能使我轻松。我全身一动不动，像一块巨石，在其最核心部位闪烁着一个卑微灵魂的一丁点儿亮光。今天，我梦见了你和你的父亲，我甚至还能记起许多细节。但我不愿再去想它。我只知道，我在门里就回答他：“可是，或许我仅仅是病了。”

我根本不记日记，我不知道为何要记日记。我从未遇到过能够令我内心激动的事情。即使我昨天在维罗那电影院里哭泣，也是如此。对我说来，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的，但却未曾经历过。我可以经常验证这一点，昨天在维罗那的人民节上，过去在威尼斯的婚旅者面前。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昨晚我从柏林返回，在菲之前我先给您写信。这次能够成行，在很大程度上我应该感谢您。此行本是您促成的，我只有向您略述一二，来表达我的谢意。

首先，我想表白一番，当然并非因为表白能够给我带来欢乐，而是因为这封信如果没有彻底而尽可能的真诚将毫无意义。

当我收到您从奥斯西寄来的信时，我期盼着与您相会，虽然我从菲那里收到了一封意外的、令人迷惑的信。无论如何，我的第一封信并不太真实。我期待着（我只知您勤于经商，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与一位富于母性的较年长的女士相会，并且她——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可能会又高又壮。对于这样一位女士，我想，确实可以尽可能敞开自己的心扉。单此一项来说已是一件幸事，或许还能得到好的建议（相信一个成年男子能够得到好的建议，乃是最愚蠢的地方之一）。如果得不到建议也许能得到安慰，如果连安慰都得不到的话，那至少还能听到一些关于菲的消息。然后您就来了，一位柔弱、年轻，并且稍许奇特的姑娘。在此之前，我曾在家里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清理了一下我要叙述的主要事情。可是临到谈话，我不是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只能说些只言片语，您或是听不懂，或是觉得无足轻重。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在谈话中说得太多了。这种感觉在回家的路上变得更加强烈，回到家时它已化为对自己的愤怒和绝望，我臆想，我对菲犯下了巨大错误，甚至背叛了她。我自言自语道，您不能成为她的朋友。我只是忙于业已准备好的表白，而没有好好地对您进行观察。您怎么可能是菲的朋友呢？我在信中几乎就没有听说过您，您最后也说，您认识她不过才九个月，后来弄清楚是半年。起初，您在探讨我们不幸的原因时方向完全错误。此外，您还详细地叙述了菲的牙病（但是那天晚上，我并非关心这个，对此您也许无法知道），而牙病在我看来属于最最可恶的疾病之一。只有最亲近的人染上此病，且情势危难，我才有动于衷。您还给我讲了菲兄弟解除婚约之事，把整个家庭描写得绘声绘色。而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感畏惧；我想最好还是把它忘记——简而言之，我是一个傻瓜，我把一切都想错了，并决定——起码这种决定与我的愚蠢还是一致的，次日晚间不再来了，以书信的形式告诉您，在信中……现在天色已晚，我今天已写不完，早上也不可能将信发出。没有回信，您肯定会

生我的气。您那可爱的来信所表达的善意十分明了，只有在谈及玫瑰时有些令人费解（同情？您所指何为？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非谬误，我确同情所有女孩。此乃我唯一无可争议的社会情感。这种同情从何而来，我也没弄清楚。也许因为她们都将变为妇人，一个她们必须屈服的角色。如此说来，我的这种同情——如果不是别的，不过是一种童贞式的感情而已）。

在这封信中——我继续着自己的表白，我想解释一下，我在那天晚上所说的一切均属不确。这都是由于自己的笨拙以及与之相联的不诚实。您就权当我说的全是废话，它只能使您本来正确的观点变得混乱。如果在次日晚上还重复这些（此点肯定无疑），它肯定还会继续扰乱于您。因此，第二天晚上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

我已写下此信的标题，也许还有开篇几行文字。后来却又放弃了，又从头开始。至于我在一天一夜之间对您所犯下的丑陋的，尤其是毫无意义的错误，已有何种后果或者将有何种后果，则是很明显的。

我现在来谈谈柏林。我的决定总是非常严肃的。如果它们没有付诸实施，我会无休止地责备自己。但相反的是，我的这些决定总是实现不了。我相信，如果没有收到菲的一封信，星期六我是不会走的。这封信提醒我想起了对您的承诺。后来我则很愉快地上路了。

可是，后来却发生了经常发生的那种事情：每当我去柏林，在每次出发之前总是有意无意地忘记的那种事情。我必须事先说明，我所认识的菲其实有四副面孔，她们互不相同，但对我来说却差不多都是同样可爱的四个女孩。其一在布拉格；其二是给我写信的那个（这个女孩的性格既丰富多彩又十分和谐）；其三是在柏林和我在一起的女孩；第四个则是和一些陌生人交往的那个，这个女孩我在信中或者在其自己的讲述中听说过。第三个女孩对我并没有太多好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自然了，我认为再也没有更自然的事情了。每次从柏林返回，我总吃惊地自言自语，此次总算还有感觉，这对我来说何等公平。这要归功于菲的好天使。小天使带着她，在我面前一晃，也许还不足一瞬间。

我本来还想对此多写一点，但却担心自己步入歧途。现在，我需要简要向您介绍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菲星期五应收到我的去信。在信中，我通知星期六晚间11点半到达。我却没有收到回音。我担心信或许未到，想拍封电报，但最终还是希望晚上在旅馆里至少能收到几句问候

的话。我难道不该指望能在火车站看见她吗？您想想，我必须在星期日4点半离开。即使我能待到午夜，晚间返回，再从火车站直接去办公室，也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个小时停留时间。然而没有人接站，旅馆里什么也没有。看来，我的去信肯定丢失无疑，糟糕透顶。尽管如此，我还是等到早上8点半钟。后来不能再等下去，便派遣一名信差去菲处。他9点返回，带来菲的一封信。菲告诉她一刻钟后即给我打电话。10点钟左右她打来了电话。请您注意，如果没有发生下述事件，所有这叙述可能不值一提。我们一起去动物园散步。我先讲了自己的证据。菲必须去参加一个在12点举行的葬礼，我们便匆忙赶去并及时到达。最后，我从车窗玻璃后看到她走在两位知名先生中间，穿过公墓的栅栏大门，然后消失在人群之中。我现在才想起来，自己为何这样傻，没和她一起进去。我们约定，她3点钟给我打电话，然后到火车站来。我4点半钟无论如何也得离开。另外，她也不能保证晚上有空闲。她必须在6点去火车站，为她赴布鲁塞尔的兄弟送行（对于解除婚约之事，我一无所知）。我吃过午饭，赶回旅馆等候电话。但那时才1点，外面慢慢地、没完没了地地下起雨来。我有些绝望，便去了舍内具格区的一个好朋友处^[168]。因为在旅馆里实在无法忍受。2点45分我勉强告别这位朋友，因为我不想品尝错过电话的不幸滋味。3点钟准时返回，什么也没错过，还没有人来过电话。于是等待便开始。我坐在旅馆前厅，看着外面的雨滴；然后上楼，将几件衣物塞进提包；再下楼，坐定。时间飞逝。4点过后，我必须赶赴火车站。菲现在也许会在火车站，但这只能是个奇迹，没有发生的奇迹。而可能她不能去火车站，却没有人能阻止她打电话。我就这样离开了柏林，像是完全不该去似的。当然意味也在其中了。

然而，语言正在变形，我已不能再写。您在如此不幸的时刻认识了我。如果您没有巨大的生活勇气，我则很难理解，您在以这种方式认识我之后，怎能认真忍受哪怕只有两分钟的时间。然而还不仅如此，我甚至说不清，此信是表达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还是正派的思维，虽然我自己感受并相信是前者。就此搁笔，几近午夜。

弗兰茨·卡 上

〔19〕13.11.10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我现在侵占您几个夜晚，感觉到您那超出我想象及能

力的同情心。这些天来，它一直在温暖着我，但我却没有作答。我不能写，请别误解，这不是道歉。也许您并没有期望收到我的回信，但我却盼望着给您写信。我要径直给您回信，并且讲上很多，或者做点什么，相当于亲吻您的手，但我过去和现在却都不能这样做。倘若时机不当，我便讲不出真话。此外，自从我造访以来，就没有给菲写过信，也未收到她的任何消息。后者是否有些奇怪？

然而，我不想再继续下去。我在信中的表现如此丢脸，但在平日可决不如此。因为我感到十分疲倦，难以再写，难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无恙的体魄。我竟忘记了在给谁写信，如同坠入雾中。

我明天将接着写，不会重新开头，因为前两天我已扔掉了两个类似的我认为不错的信的开头。然而您必须明确对我说，对于我没有立即回信，您并不生气，您也不会因为我只讲了一些不太值得一提的琐事而生气。

睡觉之前，我还要把昨天做的梦写出来。您瞧，在晚上我起码比清醒的时候忙碌^[169]。您听：在一条向上伸延的道路中间，主要在车行道上，从坡下往上看，从左侧开始，有一堆凝固的垃圾或黏土。由于风化的缘故，右侧逐渐变低，左侧高得像一截篱笆栅栏。我走在右边，路上几乎空荡荡的。一个骑三轮车的男人从下迎面向我驶来，又好像径直朝那堆障碍物驶去。他仿佛没长眼睛，其双眸至少像模糊的黑洞。三轮车的车架松垮，摇摇晃晃，行驶起来险象环生，但却又毫无声息，简直静得出奇。我在最后一刻抓住了他，就好像抓住这辆车的扶手，把车扭向我刚才经过的那个缺口。于是，这人便顺势倒向我。我身材高大，必须调整一下姿势才能将他接住。这时，车像脱缰的马，开始慢慢地带着我向后滑去。我们经过一个两侧有栅栏的马车，上面挤站着几个人，全都身着黑色衣服。其中一人是名开路少年，头上戴着淡灰色卷边帽子。我老远就看到了这个少年，希望他能帮我一把。但他却把脸转过去，挤进人群。后来，三轮车继续下滑。我必须弯下身子，把腿叉开。这时，马车后面闪出一人帮了我，可我现在却已记不起他来了。

我就是这样在夜间帮助骑三轮车的人的。

亲爱的小姐，在您的来信中主要有两个错误。当您讲到菲的牙病以及她兄弟解除婚约时，我感兴趣的模样并非佯装出来的。这些事情使我极感兴趣。我几乎都不想听别的，而您却讲得太少。我就是这样一个

人，其实也并不特别奇怪。例如，牙床化脓和牙床断裂等情形，我都想仔细了解，并且就此在柏林向菲请教过。您对痛上加痛不感兴趣吗？在我看来，这往往是生性柔弱的人排除痛苦的唯一办法。正像善良的本性所相信的医术那样，人们会将伤口烧灼。当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那一瞬间——恶劣而软弱的天性则没有时间操心更多——已经很有趣了。此外，其他因素可能也发挥了作用。不管怎样，我并非虚伪，相反，此时此刻我则特别诚实。

第二个错误与菲的信件有关。对此，您并非不太了解。最近半年来，在我们之间，我确实抱怨过来信不及时、不完整，并且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特别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信与最初几个月的来信很不一样。恰在这种无法忍受的状况下，我觉得与您更亲近些。我肯定有许多去信，差不多都是胡言乱语。但最为糟糕的是，后来两方面的书信接踵而至。它们什么内容都没有，只是为写而写，纯属空洞和浪费时间，除了对通信的抱怨没有别的。实际上，人们并不需要写信，只需两句话。对这种写信的渴望只能是担忧和恐惧。在这方面您是正确的。然而，新的担忧和恐惧却不断产生。它们往往占据着我的全部心灵，使我忘却了旧的。即使记起来，却也想象不出。

好吧，我现在再次衷心问候你，并把此信寄出，尽管它是如此无把握和混乱。当然，您将会看到，这种无把握的心情仅出于一个原因，即我写下的每个字——并非仅仅为您而写，我都想收回，或者干脆全部抹掉。

弗·卡夫卡 上

〔1913年11月18日〕

您写道，您在维也纳的活动非常成功。这些成就表现何在？这是否意味着您已习惯了维也纳？您住得可好？我之所以问及此事，因为我也已搬家^[170]。我发现自己很快就适应了新居。这仅仅证明，我对旧居毫不留恋，尽管对此总是深信不疑。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好的视野。如果在您的记忆中曾经有过测量的感觉，那么或许您能够顺便想象得出。我住在四五层，透过窗户能看到带有两个塔尖的俄罗斯教堂的圆顶，在教堂圆顶与最近的银行大楼中间，可以看到远处劳伦茨山的一个三角画面，山上也有一个小小的教堂。窗子左侧，是带有尖塔的市政厅，高高耸立在云端，并且汇入一个也许从来没有人真正看到过的远景之中。

现在趁我还没有忘记，告诉您这位妹子：马克斯·勃罗德现在在柏林，他很赏识您兄弟的干练^[171]。他究竟干何种工作？他是否早上7点离家，直到晚上才回来？他的伤疤从何而来？

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一封信的草稿

小姐，我迄今为止无法给您写信的主要原因，甚至在我写前几封信之前也曾遇到过，便是出于顾忌，即其一是担心无论我写什么，都总想打听菲的消息，即使只是想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其二是我感到或许会对您不太公正，即无力压抑自己提问的欲望，从而会迫使您不得不违心地作答——这对您也许是不公正的；其三是担心给人造成假相，仿佛我写信只是为了提问。然而现在，任何顾虑都不能够再阻止我给您写信。因为我不想用“不可思议”这个词，但它确实令我苦恼之极，我一点儿关于菲的消息都没有。我实在太苦恼，因此才写这封信。您可曾知道菲的消息？也许她染病不起？但是从您上一封来信看（拆信时着实使我大吃一惊。此信已是三周多以前写的），您至少在11月底还收到过菲的明信片，其中并未提及生病之事。当然，即使没有暗示，我也不相信她会生病，我的不安并非由此而生。现在，在收到您的来信的前一天晚上，我又给菲写了封信，次日早晨，即11月28日寄出，而且是挂号信。两天之后我得知，马克斯夫人，即在柏林时曾与菲一起，并且当时曾邀请菲到她那儿去过圣诞节的那位，现在又去信再次发出邀请。上礼拜天，我又给菲寄去一封加急信。但这三封信却如石沉大海。这难道不是——我不愿再次说“完完全全”，但起码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她的本性相违背吗？此类事情究竟应该通过何种原因和何种思维加以解释？您或许知道，并且愿意告诉我？如果您也说不清楚，我也不愿要求您出于同情而勉强作答（像现在这样，在写此信时，无论谁看到我都不会对我寄予丝毫同情：深夜1点半钟左右，用被子裹住双脚，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百无聊赖的寂静）。如果您有难言之隐，那么您就如实告诉我，我也不必再蒙在鼓里东奔西突了。

〔19〕13.12.15—16

菲莉斯，在过去的十天里，你四次对我许诺，说你在许诺的当天定会给我写信。一次是托魏斯博士转来的信里说的，一次通过电话，两次通过电报。据最后一封来电所说，你给我的信已经写完，而且就在发报当天，即上礼拜天肯定已经发出。然而我却连一封也没有收到。你已经

表面看来，这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你知道，在我周围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上你许诺要写的那封信的百分之一重要。你也知道，你非但不给我写信，而且还一次次那样确切地许诺，给我带来的痛苦可谓与日俱增。你知道，至少现在我是完全无辜的，而且（我在这里提及这些只是为着完整起见，其实毫无意义，甚至十分可笑），只要你稍一张口，我便会立即给你的父母写信。你甚至几乎否认你在生我的气，而且你一次又一次的许诺使我在诺言之外还看到了些许希望。我再重复一遍，表面上和第一眼看去，这可是十分不人道的呢！

从自己内心深处来说，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你。可是，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我相信你是一个绝对真诚的姑娘，这种不真诚的举动只是在你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你是想要安慰我，因此才总许诺要给我写信。你确实做过努力，但是由于内外原因实在做不到。由于你又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姑娘，很可能是出于你自身的原因，而这对我来说更加糟糕。

倘若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会如此作答。现在我恳求你，只给我来信，告诉我上述解释正确与否。你不要拍电报，而要写信给我！我要亲眼目睹你的笔迹，以便确切相信并且实实在在地把握住它。我还请求你，用快件将信寄到我的住处，以便新年早晨能够收到。请相信我，我已迫不及待。如果你除了“是”与“不是”之外还想解释些什么，那将真是大发慈悲。但是，如果解释会给你带来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麻烦，或者会耽误哪怕只一小会儿发信时间，则请求你丝毫不要解释。你看，我需要的仅是一封短短的、毫不费力的、对你也完全没有约束的来信。如果你认为其中体现的不是我对你的一片情爱，那么就不要再给我任何衷心的问候。只求一封短信，要求已很可怜。

我还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我一定会保持安静，决不会再以任何方式打扰你。只是，即使希望渺茫，却也依然在等待着你。

弗兰茨

〔19〕13.12.29下午〔至1914年1月2日〕

写完附信，便上床躺了一会儿（夜里我几乎没睡，这并非责备。我

睡眠通常很糟)，然后到办公室里去，那里有很多事情要办。晚上打算去找魏斯博士。他现在布拉格，想同我一起到郊区剧院去看戏。剧院看来是去不成了，因为现在已经7点，我还坐在这里写信。快5点时收到你的信，我还没有入睡。要不是躺在床上，我会马上回信。现在我很高兴我没有那么做，而是在床上躺了两个钟头，思考了两个钟头。不过不是思考自己，关于自己我已想得够多的了，而是关于你。

从你的来信看出，我求你来信给你造成了莫大痛苦，尽管不像你不写信给我所带来的痛苦那么大，但也还是够大的。也许你之所以不给我写信，因为你已尝试过，但却想避免其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婚后，我们二人很可能都不得不放弃许多东西。我们谁也不愿反复权衡，挑出较重一端，这对我们来说委实太难。”然而，你却没能写出这样一封信来。上述这段话的确很可怕，如果它真的如此斤斤计较，那么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但尽管如此，我仍觉得你能将它写下将会很不错，甚至对于咱俩达成一致大有裨益，尽管从这段话上并看不出如何才能达成一致，因为斤斤计较不可能取得进展。但这只是初步意见。人们甚至还是应该算一下，你说得很有道理，也许应该如此。因为算计并非没有道理，但却没有意义，也是不可能的。这乃是我的最终观点。

如果你认为，我之所以不想与你结合，仅仅是因为从你这儿所得到的不能弥补我结束单身生活所必须放弃的，那你可就误解我了。我知道，你口头上曾这么说过，我也进行过反驳，但看来不够彻底。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要放弃什么，婚后的我仍是现在的我，那可能正是你将要面临的坏消息——如果你愿意的话。阻止我与你结合的是一种无端的感觉，即单身一人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更高的责任感，并非是一种得失或乐趣（至少不是你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义务与痛苦。我再也不相信这是一种幻想或别的什么（也许这种认识还会继续帮助我），因为仅凭一点便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推翻，即没有你我将无法活下去。就是你，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即使还有来信中那段可怕的话语。我就需要你，而且不是为着给我带来安慰或乐趣，而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这儿伴我生活。

给你父母写信时，我尚未谈论如此之深。这一年之中所积聚起来的数不清的幻影不时出现在脑海，简直震耳欲聋。从威尼斯回来，一切便都打上了句号。我真的再也忍受不了脑海中的噪音了。

我认为，在这里应该颇为真诚地与你说些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

情。在疗养时，我曾爱过一个姑娘，一个孩子，大约十八岁，瑞士人，但生活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附近。她的气质对我说来十分陌生，很不成熟，却引人注目。尽管我在病中，但那段恋情却很珍贵，也很深沉[173]。当时，我正感到空虚无望。即使一位微不足道的姑娘也可以征服我的心。我从德森查诺发出的信你已收到，那是大约十天之前写的。那时，我和她都清楚，我们俩并不般配。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甚至连一封信、一行字都没有留下。然而我们还是都感受到了对方的重要。我不得不想尽办法，以免她在分别时当着众人号啕大哭。我自己的情形也差不多。随着我的离去，一切都告结束。尽管这件事看上去很荒唐，却也使我更加看清了自己对你的感情。那个意大利女孩也知道你，而且明白我所努力追求的实际上并非别人，只是能与你结合。后来我到了布拉格，与你失去联系，并且也日益失去了勇气。然而，我还是想圣诞节或许去柏林，去把一切都解决掉。

〔19〕13.12.29晚

菲莉斯，首先祝你新年快乐，如果你愿意的话，也祝愿我们两人。给你回信实在不像我开始所想象的那般容易。其中一段话如此刺眼，对它不予理睬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想等有时间安静下来再回信。可昨天不成，今天其实也不成，因为我很疲倦。而且一刻钟之后费利克斯和奥斯卡将来接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写几句，以便能够与你交流。因为这会令我快活，甚至感到幸福。而现在，下午4点1刻，天知道你在何处，在想什么，这与我毫不相干，也将永远无关。尽管如此，我这么晚才回信，并不感到担忧，因为你盼我的信与我盼你的信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你或许还正盼着我晚些回信呢。

这里（你知道，我其实用不着提及你曾谈到过损失，但此点必须加以强调），不仅指柏林的告别，更主要的是指与我结合可能会给你带来的损失。现在，你不仅谈到这种损失的可能性，而且认为它确定无疑。你的来信终于提到了“哪一头儿更重”的问题，根据你的想法，它很可能对你不利[174]。

这和一年来我一直试图说服你的一样。如果这是这种做法的成果，那我可以满足了。但不管怎样，它应该逐渐地来，不要这样突然。但也许它是在不写作时来到的，就是说还是逐渐的，只是我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但这却与你上星期天（1913年9月9日）在柏林所说的相矛盾，这也与你至今整个想法相矛盾。你不在乎我以及与我共同生活，对于你是

否意味着好事。你不愿将任何对你具有广泛深刻而又不可或缺的东西留在柏林。但也许你迄今弄错了，现在对自己的状况才认识得清楚一些了。或许我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我的存在使你明白了这一点。这是可能的。有时我有这种印象，柏林有你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对我行为的细微之处可以证明这点。最后还有，你在柏林对马克斯夫人所说的，那里的办公室和生活对你非常重要，你的经理提醒过你，未经深思熟虑，务必不要离开柏林。这些话还一直在我耳畔萦绕。

〔19〕14.1.1

（你把这话转述给一个与你刚刚相识几个小时的陌生太太，对我来说，其实几乎与你明确赞成那位经理的话一样糟。）

此外，菲莉斯，我也得承认你是对的。冷静而全面观察，你肯定会失去许多，柏林，你的办公室给你带来的快乐，全然无忧无虑的生活，特有的独立而又适合你的愉快社交生活，你的家庭生活，等等——这只不过是所知道的损失。为此，你将去布拉格附近的一个语言陌生的乡镇，与一名公务员过一种小气的生活。他收入低微，烦恼肯定不少，你虽然仍是独立的，但不可能不受制约。代替社交和你的家庭生活的，是一位大多数时候（至少现在）忧郁、沉默的丈夫。他整日里忙于你陌生的工作。这些事情，或许只有爱情才能战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在此奢谈这些）。

正如所说，你的超负荷理论肯定是错误的。在我这方面从未有“损失”的问题，只有一个“障碍”，这障碍不再存在了。我甚至敢这么说，我如此之爱你，即使你明确表示，你对我只不过是有点喜欢，这喜欢甚至也不能确定，即便如此，我也愿意与你结婚。如此滥用你的同情，实属可恶的骗子，但我别无选择。反之，我承认，只要从你信中可以看出，你对损失的认识和预见得多么清楚，结婚便不可能。清楚地意识到损失而再去结婚，我承认这不可取，即使你愿意我也不允许。因为在我唯一希望的婚姻中，妻子和丈夫作为人必须从根本上平等，这样才能在一个整体中独立存在。但这点做不到，仅仅因此，就不能结婚。

〔19〕14.1.1午夜

但是菲莉斯，你的这种想法是认真的吗？你真的害怕失去什么吗？你真的如此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吗？不，你一定不会这么做的。说得明确些吧，这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不想理我，要么就是你对我的信任

动摇了，只因为这个缘故才把那番考虑说了出来。前者我无法制止，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样也就一切都告完结，我将失去你，被迫要考虑自己如何才能继续生活下去，并且知道得很清楚，痛苦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对于后者，相反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们肯定会很好，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在有些时候多么软弱，但我能够从总体上赢得你的每一次信任考验。

所以，事情究竟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你。如果是前者，那我们必须分手；如果是后者，那么尽管考验我好了！我不相信还有第三种可能，即你没有怎么深思熟虑就估算损失。

但是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不再想结婚的事，只还像以前一样相互写信。你提的建议，我同意了，因为我不知道更好的办法。现在我知道了，让我们选择较好的解决吧！结婚是唯一能维系我们之间关系的方式，我非常需要它。我也认为我们不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好，但这只是因为，如果我们还是想结婚，时间又比现在晚，因为我们之间距离这么大。会有怀疑、拖延的可能出现，时间将在悲伤的心境中白白地流逝。其实，它现在就在大量地流逝。

但你也对保持书信来往不太认真。结果将如何呢？期待的熬煎和写信时的抱怨，这将是这一切。这样下去一切将慢慢崩溃，最后的痛苦将更大，更不纯净。我们不会这么做，这超乎于我们的力量之外，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请你看看只有相互书信来往的时间已经造成了什么后果吧。从你上次给我写信还没有过去两个月，你没有意识到，在小的地方已经有几乎敌意的东西潜入到你信中。不，菲莉斯，我们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了。

我爱你，菲莉斯，以我的一切，以我人性中的长处，以一切能使自己混在活的生命中的有价值之处。如果这太少了，那我本身就很少。你是什么样我就爱你什么样，包括在我看来好的和不好的，一切的一切。可你就不是这样。你对我不满，对我有许多责难，想让我成为另外一副样子，不是现在的我。我应该“更多地生活在现实当中”，“应当从现实出发”，等等。难道你没有发觉，如果你从真实的需求出发，想要这些，那你想要的不再是我，而是从我身边擦掠而过吗？菲莉斯，为什么想改变人呢？这不合理。要么，就要人现在的样子，要么就放弃它。人是不可以改变的，至多只能干扰他们的本性。人不是由一个个零件组成的，以至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它们取出来，换上一些其他的。人实际上是个整体，你牵动了一头，事与愿违，另一头也动。尽管如此——甚至连

你对我多有指责，并想改变我，甚至这些我也爱，我只想让你也知道这些。

现在做决定吧，菲莉斯！你上封信还不是决定，它还包含着疑问。你對自己愈来愈清楚了，胜过我对于自己。现在在做决定上你不应次于我。

让我亲吻放下信的那只手。

弗兰茨

[19] 14.1.2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你在布拉格时，我不得与你交谈，我很遗憾。我简直无法想象，怎么您给我打电话时，人们没有叫我去接。但也许根本由于线路受了干扰。不管怎样“叫不动我去接电话”的说法不对。我不仅可以被叫动，我甚至会真正跑过去接。我倒可以说，您不认为与我谈话有多么重要，这是最可理解的解释。

请您不要怪罪我写信不积极，这也并非漫不经心。尽管您的上上封信比上上上封信更友好，但我不能回信[175]。我对于与菲的关系过于敏感，在这封信中我品尝出一点苦涩，一些（尽管有许多不光在外表的好意）对我近乎敌意的东西。我只是觉察出，但其实并不相信。在布拉格我可能已经对您太有失公正了，不能再相信那些了。尽管如此，我写信不能不写错。我又写下这封错信，并把它装在衣兜里两天没发，当您上上封信来时，我庆幸自己没有先寄出此信。这无疑是我这方面的可恶的把戏。我其他时候也根本不这样，从不多疑，知道珍惜最微小的友情，从您那里感到的只有好处，以忘我精神贡献的好处。我与菲的无法忍受的、弄不清楚的、永远活生生困扰着我的关系，使我也处理不好与您的关系。除此之外，对我的感觉别无其他的解释。如果坦率地说出什么使我没有回答您上上上封信，那是因为里面没提菲，——不仅仅因此，但这是主要的，而您在以前的信中，如果您没有菲的消息，您还是把这个告诉我的。我不想说您打算用这种沉默来惩罚或折磨我，不，我当然根本不想这么说，但它对我意味着两者。也许您也真不知道菲，也许您只

想被问到——这些可能对我改变不了什么。

但今天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了万一您不知道（我估计，圣诞节您也在柏林），我可以说，因为这本不是菲的秘密：我又向她求婚了（在此我只想简单说一下，那是一个星期的辗转），没有或几乎没有得到回答[176]。从我的角度我倒可以理解菲的做法。我觉得我了解她的性格，但这沉默，这暧昧，我不懂。

现在我只想求您做一件事（并且认为您上封出乎意料的信是您会回复我的好迹象——尽管我不太值得，并且请您尽快，出于某种原因请您务必尽快回复），菲怎么样？她好吗？还是她不高兴？还是两者皆有？

卡夫卡

[19] 14.1.23[177]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我突然对菲和与她有关的事失去知觉。除此以外，无法找到其他解释。这更恼人，因为我原以为对此知道得很清楚。我是怎么对待您的，老是抱怨，周而复始。但我不能自拔，心中充满自己行为所能引起的一切反感，直至最极端的，我把它品尝了个遍，结果只是我在这件事上变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无与伦比的气恼，无耐地像被一只陌生的手来回拨弄得发晕。

您也知道这些，因为在信中您使我特别惊奇的是，一个指责的词都没说，甚至连对我又向菲求婚的惊讶都没有。我这么做了，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解释。

菲给您写的信是好的、真实的（我为此非常感谢您，您再把它放在我这儿一会儿，当然菲不会知道），在有关我的事实上基本正确。“粥”的确很“热”，关于“可怜的家伙”也属实。但菲从那以后再没给您写过信，很糟糕，简直令人愤慨。我和菲通信的日期，至少准确日期，我记不得了，如果它没有正巧在当时写给您的，没有发出的信中，这封信现在又恰好找不到了[178]。自我去过柏林以后我第一次写信给菲，奇怪的是菲在同一天晚上，11月27日写信给您。回答，我没有得

到。十四天后我又写了一封信，又没有回音。后来我又干了什么，自己也记不清顺序了。我肯定又写了两封信，发了两封电报。在我在这么做了并且仍然一行字也没收到以后，我实行了下面这一有点梦幻般的，实际也在半睡眠状态中想出来的计划^[179]（我提及此事主要为了向同时寄来《帆桨大战船》表示歉意）。

我在柏林有个好朋友，E.魏斯博士，就是《加雷勒》的作者。以前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对他的小说根本不了解。直到我11月去柏林，我和他在一起大约待了一个小时。自那以后（在布拉格）又在圣诞节期间好长时间在一起。12月初，我就请这位魏斯博士带我的一封信去菲的办公室。信中只写了我必须得到她的和有关她的消息，所以派魏前往，以便他可以把她的消息写给我。她读这封信的时候，魏将坐在她的书桌旁，四面看看，等她把信看完，然后，他因为没有受其他的委托，也肯定得不到什么回音（为什么他该得到，因为我都从未得到），离开，写给我她样子怎样，从外表看上去她情况如何。这计划也完全这样执行了。魏为我得到了几行字，菲在其中向我保证当天给我写一封详细的信。这封宣布了的信没有来。我写了一封信，作为回答来了一封电报，其中告知写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来；我打了电话，又向我肯定地保证了一封信，又没有来；我发了封电报，来了封电报说给我的信已经准备发出了。尽管如此它还是没有来。我想，我又写信了。终于信来了。字很少，其中夹杂着悲伤，明显的悲伤，此外还有对整体不明朗的伤感。为此我写了一封长达四十页的信^[180]，四个星期以来我就等待着答复，或最好不再等。人们不可能比这封信里所做的更谦卑了。但有点矛盾的是有一页，在半清醒中写的一页，但是它真的在信中，也许是它阻碍了回信。但这不可能，因为这一页与前面和后面的密切相关，使人不能只孤立地看待它，尤其是菲莉斯不应这么做。倘若她这么做了，那即使这一页不在信中，她也不能回信。

这几乎就是所发生过的一切。圣诞节时您在维也纳？一个人？我曾深信您会去柏林，我也曾同样地深信，我会在柏林的。我本来也想去的，但从电话交谈中我得到的唯一明确的通知是请求我不要去柏林。顺便说一句，一个在后来电报中又得到重申的请求。当我请您尽快回信时，我曾想也许星期日去柏林，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我不会这么做，在这封信以后不会。如果我对菲过去时间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就不能去。一点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便不能再向菲超出我上封信以外再做什么证明了，我没有强到那个程度。这样，就保持着以前的安静而非平静

吧。

小姐，请您不要因为我愚蠢的不信任或信任而生气。我差点也想以菲的名义请求您原谅了，因为看起来真的这样，好像菲和我自从我们自己放弃了相互直接并且（由我来）不断地把艰苦施加给对方，我们就转向了您，不是为了抱怨，而是为了给您痛苦。

让我看看，您通过愉快地接受《加雷勒》而原谅了我，把它寄去不光为了以两人的朋友们的作品来换取菲的信，能把这本我所喜爱的书送给您，这本身就使我特别高兴。

还有一个请求：我想您认识艾尔娜·鲍威尔，您或许知道她办公室的地址吧？

顺致友好的问候！

卡夫卡

〔19〕14.1.28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按我的推算，我给您的信是星期天发出的，最迟星期二一早（星期一是节假日）您就收到了，今天已经是星期四。给您提个醒的机会我原本是一点都没有的——当然，提醒的权力就更谈不上。要是我能确切地知道出于随便什么原因您才至今没写回信，而且迟早会回信的话，我就不这么做了。然而我却没这个把握，我的境况与一切能称之为把握的东西相去甚远，因此，现在我必然考虑到不回信的两种可能性，由于您一向对我恩宠备至总是尽快回信的，这次就更容易想到了这两种可能。那就是：或者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或者您没有好消息向我报告。两方面的可能性都太大了，因为我是那样的心不在焉、优柔寡断，肯定会做出些十分可笑的蠢事得罪了您，而带给我坏消息的可能也许会更些。然而不给我写信却既非由于第一种原因，又非由于第二种。恰好相反：即使我写了可能会得罪人的话，那只不过是外表的、因此也是容易见谅的错误；如果把我上封信再看一遍，您就会明白这一点；要是仍旧没明白，就写信告诉我，这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谈到不吉利的消息嘛，

您应该知道，我等消息已经等了那么久，即使最坏的消息对于我都有一种美好的含义。请费心给我写封回信，好吗？

您的 弗·卡夫卡

〔19〕14.2.5

有个问题我很早就想提的：办公用品展览会是在布拉格开吗？届时您会来参加吗？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我一定要马上给您回信，倒不是想告诉您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是对您本人有什么意义的事，仅仅是想给您写信而已，想为您做点随便什么，即使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事情都行，我甚至觉得，我同您之间的根本谬误的关系，一部分是由于如下原因造成的：我总是超越自己（表面听起来这是说大话，内心觉得没有一个词大到够用的程度）、被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排挤着、攫持着，使我不能尝试以任何方式接近您，而且尽管我很有自知之明，仍把那种失败归咎于您了。这事的起因也只可能是由于您没有通过菲结识了我，当我在布拉格初次遇见您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同一位我完全陌生的人谈论起菲来，甚至有意识地（意图是个结果，它并不是行为的出发点）指望这位陌生人会同情我，便喋喋不休地谈论起这些事情（我的饶舌虽然只需几句话也就够了，可是出于不得已），欲罢不能了，这让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之极——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事情就构成了我日后不附加这些讨厌的辩解（其实我是多么愿意这样啊）就不会写信的原因。

我不相信同情能使人更舒畅些，肯定也不会使局面改善。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一般地或者对于某个特定的人还能产生同情心的话，就我所知，则同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它就能塑造出善良的人。然而世上并没有一架天平能使两端的秤盘同时翘起。人对痛苦了解得越透彻，痛苦就越深刻，如若不是更深刻，那就更污秽。但痛苦肯定会更深刻、更有切肤之痛，因为那是用别人的眼光从其他角度来观察的。而且，如果说过去可能一直是用狭隘的眼光独自坚韧地去观察并且经受住了这一切的话，那么现在在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面前就不得不去认真的揣摩、去

屈就、直至毫无保留的地步。但是如果痛苦不是更深刻，而是更污秽的话，那或许更令人憎恶，因为现在会由于反感而失去克服它的任何希望。

当时我在“黑马”^[181]所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每当我同什么人，哪怕是我最好的朋友进行这种谈话时，总是会产生这种感觉（比如同我母亲谈话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样一种反感会如此地震撼着我）。更有甚者，进行这类谈话时还会使我同时产生一种从内心散发至体表的愉悦、快感，就连我那虚荣心都不令人生厌了——然而，即使我把一切都置之脑后（尽管仍然那样地具有欺骗性），对自己说：那是别人的不是，对于我却不一定就是一个解脱。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内容，我是不可以总作如此这般的思考的，我永远也不会得出什么结果，只是感情上觉得这事（这封信之后可能会再来信）还有些把握。但是对于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稍作解释，或许这就足够了，不必再谈论下去。

可是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您对于我来说——特别是从上封信以后——已经不再陌生；那痛苦，那种与我的供述（虽然它不是完全被迫、不是片面的）交织在一起的痛苦，毕竟属于人类交往中都会遇到的痛苦；人活着，就不应该设置一条不死不活的疆界——为此，也因为许多类似的理由，在我们之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也希望您会同意）一切都应该是完美的，我们之间的对话也应该能够坦诚相见，因此您今后写信再提及自己的时候，就不要附加“您可能对此不感兴趣这一事实”的字样了。

我以后不会再给艾尔娜·鲍威尔写信了。我认为她确实是费里森的未婚妻；但即便她就是费里森的未婚妻，我也不会写信给她的。我怎么会迂回地迫使菲到我身边来呢？我不得不容忍您为了我才给菲写信，而我还得为此感谢您，难道这还不够吗？只是您没必要隐瞒我给您写过信；您本来就可以有什么写什么，不只是因为对于这么做是否还有什么帮助这一点本无太大把握。反正菲对我已经失去了信任，言之有理的原因嘛，可以有一大堆，而那封四十页的长信中我提到过的那一页恐怕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了。菲过去对我的看法也因失去信任而随之消失了。菲还能怎么样呢？不过她不给您写信，我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

菲的这封信为什么很伤感？这里我抄下一句话给您：“我们两人如果

结婚，则不得不放弃许多东西，我们不想认真权衡怎样做会更有利，那对我们俩都太沉重了。”不过，这句话是那样可怕（即使它还有如此多真实的成分），所以绝不会是菲能感受到的。这不符合菲的本性，肯定不符合，然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能够写出这样的话是令人伤心的，而且使我几乎不能往任何好的方面想。再说，这不是一封不假思索而写成的信，在它之前应该（正如给您的信中所表明的）还有几封未发出的信。谈到菲和我有什么共同的未来嘛，那似乎只体现在您现在所写的这封信里面。

如果您愿意，请告诉我慕尼黑那位男士是谁？他看不见也听不见吗？他对于您或是您对于他的重要性在哪儿呢？您甚至都没写过信或直接告诉他，您明年就要到您公司设在南德的商店去就职？您信里谈起关系到“一桩婚姻的根本条件”而我又没太明白的那个职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顺便想起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有一次您写信说您的房间很暗，好一点的又租不起。怎么会这样的呢，您的工资不是还凑合吗？您瞧，我成了个多么爱写长信、多么爱问东问西的人了！就此停笔吧。顺祝平安。

您的 弗·卡夫卡

〔19〕14.2.7

那本书本来应该与我的信同时寄到的。明天我再去书店打听一下。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看在我们一切一切的份上道一声对不起，当然特别对不起您的，是您不得不给菲写信、甚至发了电报（每次我都该怎样感谢您呀）向她说谎。但是糟糕的当然不在于谎话的内容，而在于这件事情本身，在于人们会拿它去节外生枝。

您说得对，菲信里的那句话很不妙。表面看来虽然只是对一年来我一直在试图说服菲相信的事情产生的误解，而实际上那句话却似乎比一般的误解含意要更多。信里虽然不只说了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的分量却是最重的。最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一方面信中谈到的没有任何一点与我所了解的菲相符，另一方面它又没谈到任何地方能明确表现出什么根

本的变化。

您说您很喜欢《加雷勒》，我真高兴。人们肯定是用脑袋顶穿了那道像樊篱一样将小说处处围绕、环环围绕起来的结构（我的确不甚明白，这一点是如何从魏的本质中得到解释的），可是后来真正看到了活生生的事物，却看得头昏目眩了。不久之后我可能还会给您寄去他写的一些东西^[182]。

顺便问一句，您都是怎样消磨星期天的？在度过紧张的一周之后？如此紧张值得吗？长期这样您受得了吗？您不久前提到过的疾病是怎么回事？写上封信您一定是挤占了您的午休时间；这虽然令我感动，可是您真不应该这么做。再说，也不会有更多的意义了；因为现在您已经就是我全部的牵挂了，任何人都无法相比，尽管我牙痛得（是不是一切都得颠倒到可笑之极的程度？）脑袋都麻木了，但仍然十分清楚这一点。

您的 弗·卡夫卡

〔19〕14.2.8

不管那一切的一切，菲，不管那一切（这个“一切”可意味着太多的内容了）——我收到你的明信片的时候，情况和第一天一个样。在这张你当作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塞给我的明信片里有你再次写给我的几句话，善意多于恶意，虽然有的话是含沙射影的，但总还是你写给我的话呀，总还是露面了，总还是要同我打些什么交道了，无论动机是什么——在我读信的时候，可怜那只刚要张口吃的苹果兴奋得还没等得及放回去，干脆从我手上滑掉了。可是后来，过后很久，当我要进行口授的时候，只要一开始专心进行口授，脑子里就会立即闪现出：“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完全变了？”而且我立刻明白，我为什么完全变了。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写信给我，但谁知道是什么意思。仅仅是表示你由于上几封信几乎没能写成而不得不写这张明信片的，对吗？是这样吗？不，不完全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但不管是怎样的吧，菲，不要把你的手，你那尽管不很热情、毕竟伸了过来的手抽回去。把它留给我吧，就像你曾经做过的那样。

然而，我现在又想起了你最后一封信和“更有利”那几个字。在这之后我还能够作此请求、还能试图把你从一种你感到舒服，当然是比较舒服的境况中（如果说我没把你的另一种观念打消的话，却似乎终于说服了你相信这一点）拉到我身边来吗？但是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个的时间。

现在这时间我只能用来请求你，菲，不要再这样销声匿迹而使人在布拉格（对于我来说柏林确实在布拉格之上，就像天空在大地之上）这儿一点主意没有、绝望地东奔西跑，什么都看不到、听不到、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想些什么，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个的时间。我只请求你这一点，不求你别的。坦率地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我同样会作出回答。我是怎么想的就不必告诉你了，那最好的部分你都了解。

弗兰茨

〔19〕14.2.9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收到菲的一张明信片，一张小小的总还算友好的明信片；顺便说一声，那是一种我早已停止了对它信任、对它信赖的友好，因为本来菲给我写信从来也没有不太友好过。但是对于您来说，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也不在于面对这张不得不接受的明信片我内心是怎样的感受（明信片上那几乎是显而易见的结尾语句是：“我不得已才写了这张明信片”），这里更重要的只在于：明信片寄来了，而我又并非求之不得，菲又不会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写的，那我只能把这事归功于您了。您有多大力量来支配菲呀！

也许明天我会从您那儿得到一条消息，可能他们也已经知道了明信片的事。那么，因为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大大地感谢您，倒使我语无伦次起来，我感到自己在您面前是那样卑微、而且不仅是卑微，这还不太糟糕，还可以自我解嘲，而是那样一种感觉，就好像由于我请求您用这种方式（我说用这种方式是什么意思？方式？根本不可能用别的什么）诱使菲给我写明信片，而使您也降低了身价似的。请您对此事什么话也不要说，我知道，这事会过去的。在这方面我的敏感只比我的忘性稍许大一点点，但是我必须说这话，要在感谢您之前、远比感谢重要的是请求您的原谅。

您的 弗·卡夫卡

〔19〕14.2.9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不，我不相信，您写信给她的时候也并不相信这一点。没有您的信，菲莉斯是不会写信给我的。请您不要误会，她没有主动写信给我，我对此很满意。我希望她如此，或者说得更好更简单些，我正是希望她仍像原先那样。虽然，如果我想要诡辩的话，那我必须说（我不会说，但也不会对此沉默），她现在给我写了信，这对我反而更糟糕了，比她不写信给我更糟。因为这表明，存在一种可以克服的阻力，您能克服它，我却不能。您关于相互帮助的话，并不完全正确。假如一个人掉进水里，另一个人听到呼救把他从水中救出，这种帮助是很自然的，在好朋友中间也许不会产生一种“义务感”。而您为了帮助我，却不得不说假话，不得不做一些即使为了拯救您自己是不会去做，连我为了拯救自己也许——虽然只是也许——也不会去做的事。正因为如此，我对您就负有一种“义务”，因为您必须不仅为了我，而且同时也针对自己做些事情。也许您出于好心对这些并不感到很沉重，这越发使我难以忍受。请允许我请求您（不是为了消除我的“义务感”，这是不可消除的），在您下次写信给菲莉斯时对我不要有丝毫姑息，而坦率地承认，我知道您的第一封信，是我给您写的，是希望通过它，正如已经得到证实的那样，得到有关她的消息。亲爱的小姐，请写信把这些告诉她，而不要考虑菲莉斯将如何答复我，也不要考虑那些尽管早该发生但到今没有发生的事[183]。

通过您的上一封信我对您的生活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这里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但下午2点钟时，只有在像您那样阴暗的房间里才需要点灯。至于您弹钢琴和喜爱音乐，这我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也不相信。您和谁一起弹钢琴，又和谁一起到山里去远足？我很羡慕您的嗜眠症。星期天下午在那昏暗的房间内，您该怎样屈服于它的诱惑力啊！假如我能这样就好了！假如睡眠能以某种方式光顾我就好了！牙疼的时候，由于它使我的头脑变得迟钝（疼痛本身已经消失，假如我早知道有甘菊茶，我早就喝了，但人们不能劝我服药），我睡得很少，这两天则几乎不能入睡。我的这种睡眠，做着浅薄的人一点也不离奇而只是不断重复白天所思的梦，要比醒着更费神更劳累。在办公室时，有时我一边讲话或者一边口授反而睡得更好。而您却有这样的嗜眠症！睡觉比阅读好，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向您推荐一本书，虽然是一本出色的包括维也纳一

切美好事物的书。您读读它吧！这就是露露蒂尔海姆伯爵夫人的《我的一生》，米勒出版社，第二卷^[184]。您肯定可以在大学图书馆找到它。书很贵。我想大概是12马克。

即致

亲切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夫卡

〔19〕14.2.11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您已经非常疲倦，可还在工作——没有仍然工作这个意思——以至于您领取的薪金相对于您年龄来说是异乎寻常的，您毫不忌讳，把您的全部生计都转移到了维也纳，又准备着重新离开这里，到一个能够更多工作的地方去，您的身上必定蕴藏着一股您今后也能依靠的力量。您觉得精力没有减退，但您不应该这样表达，青年人也会有疲倦的，只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而对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了解。当有人在歌剧院的顶层楼座哭泣时，它并不是精力的减退，您不再相信它。在布拉格时，正是在一些很容易列举的时刻（由于我的责任而如此容易列举）您比较欢乐（从活跃和理智意义上说您一直比我欢乐），脸上流露出纯朴健康的孩子般的表情。这种表情同您的其他天性并不完全相称，特别是不适合于您在我面前那种优越感。但它似乎又是您所特有的表情。例如，有几次在咖啡馆里您谈起学校的时候，还有一次在手工工艺艺术博物馆前，您跌倒在地的时候，都有过这种表情。

维也纳对此要负许多责任，尽管您现在又在赞扬它。这种自我满足并不总是最好的。去柏林我不能想象您会如此忧伤，当您去那里时确定也并非那样。而在这里，人们有时认为，快乐的人会变得忧伤，忧伤的人将更加忧伤。我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一点，其实也并不需要，因为这并不真实，它只是表明，忧伤是多么缺乏判断力。我不想再去维也纳了，5月也不去。对我来说那里太可憎了。我不想再为进入议会之路付出代价，不想再见到克恩滕纳大街，斯特劳广场，不想再去贝多劳咖啡馆或者博物馆，更不用说市府酒馆了，甚至不想在一个虽然凉爽却阳光

明媚的上午独自一人去美泉宫花园中散步。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我都不想再次经历，它们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只有市府里的格利尔帕策室我还想看一下，过去我未能看到它，因为我很迟才知道它。您知道格利尔帕策的《可怜的军乐队员》吗？去维也纳可以遭受真正的苦难，这可以从格利尔帕策那儿得到证实。

我虽然会再要求您给菲莉斯作出解释。我之所以请求您写信给她，是因为我曾想明信片意味着好时光的开始。我不能通过我自己的和强加给您的谎言来骗取这种好转。但现在看来，明信片有着完全另外的含意。我现在把它全文抄录如下，它是用一种很差的铅笔写的，不久将难以辨认。“柏林，安哈特火车站，1914年2月8日，晚上10点30分，弗兰茨，我现在坐在候车室里，我是来接从德累斯顿来的姐姐的。让这张明信片带去我对你的亲切问候。你将会再次听到更多关于我的消息。我不能不写这张明信片，衷心问候你，菲莉斯。”看来菲莉斯星期六收到了您的信，但未能下决心写回信，星期天晚上正好她在安哈特火车站里，出于某种偶然性写了这张明信片，第二天又被迫也给您写了明信片，而通过写给我的明信片无非是想重新强调过去的沉默。因为我当即回复了一封信，本来她应该写回信，但却没有。是好是坏，恐怕一切猜测都是徒劳的。

即致

亲切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夫卡

[19] 14.2.14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今后将永远这样（假如您不像您原先那样准时回信给我，或者假如您不从一开始就确定，要走一周或两周之后才回信给我，而我虽然只能表示同意），同时我必须警告或至少是提醒您，因为很遗憾我就是被这样教育出来的，害怕在任何沉默的背后都有一个可能套在我脖子上的钩子。但愿不是如此，只是您的许多工作，当然这也够糟糕的，或者更好一些是蒂尔海姆的《我的一生》这本书占据了您一个又一个夜晚。

此外，自从我给您写了最近一封信以来，我遇上了一件特别的喜事，过去我对您没有少用我的痛苦打扰您，这件事当然也不应该对您隐瞒，我最后一个比较接近的尚未结婚或者说尚未订婚的朋友〔费利克斯·韦尔奇〕订婚了，他们最终会订婚，这一点我三年以来一直就知道（对于局外人来说这算不上什么伟大的洞察力），但他和她则是十四天以来的事。当然这样一来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一位朋友，因为一个结了婚的人是不能做朋友的。人们对他说的话，他的夫人也会或明或暗地知道。在这个过渡中，或许没有一个女人不是在其脑子中把一切都扭曲的。此外，即使不是这样，人们也不能再只想到他一人，或者从内心指望得到他的安慰和帮助，甚至不能想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不管怎么说人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共同体，我当然祝愿他一切顺利。但除此之外，这件事对我也有好的一面，至少现在是这样。虽然我们都还不算太老，他甚至比我还年轻半岁，但我们之间却有着单身亲兄弟般的情谊，某些时候这种情谊就像幽灵一样，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在这种情谊中止了，我自由了，每个人都可以愿意怎样就怎样，对这样一个单个的组合，没有人包括其主人在内能看到它的内部，以使自己大吃一惊，而对一个团体来说，就比较容易进入和作出判断。祝贺我吧，尽管这只是我要您回信的一种伪装的请求，您怎么看待菲莉斯的明信片？

即致

亲切问候！

弗·卡

〔19〕14.2.19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您不能从我这里拿走“羞于启齿的境地”这样难听的话，它们是属于我的，在您的信中用不着这些。在共同经历了另外一个人的处境（不是同情，在人面前它没有区别，在上帝面前才有）之后，有时我认为可以达到一个人精力的极限。您不要把一个同我关系密切的人的处境称之为“羞于启齿”。虽然人们对他有说不够的坏话，但无论是讲述还是听到这些的人，都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在戒备方面，在这里也许有必要走得再远一点。毫无疑问我写给您的第一封信完全是因为菲莉斯的缘故，我想得到帮助，在这方面放肆得像一个不幸的孩子，因此也招致您有一次对我的柏林之行的激烈指责，但这些纯粹是通过我的信强加给您的想象，您有一次写到“十一月事件”。是什么事件？在这一年半期间，几乎没有不间断地重复，就像鼓点一样，而鼓正握在我这不幸的手中。

我曾在其中请求您帮助的那些信件都已成为过去，您做了能做的一切，出于好意甚至比能允许的更多，您把其中的一切痛苦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在布拉格时您不得不容忍我的“不”（我当时能用我的第一封短信的粗鲁激怒您，说明我身上必定还有些别的什么）。而现在您又听到了来自菲莉斯的对您来说关系更密切但也不明确的“不”字，因此，我不再请求帮助，这虽然是个很大的转变。要不是那种早已不再有根据的假相，似乎我写信给您只是为了提出请求，在以前我会更迫切地提出请求的，我甚至承认，这种假相有根据的时间比我对外承认的早得多。我不再需要帮助了，只想听到（如果您也多少愿意）您现在怎么样？如果能捎带些关于菲莉斯的消息，那肯定非常好，但即使那样，也不是最主要的，如果我们两人，菲莉斯和我可以帮助的话，那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您的努力和这一努力的结果就表明这一点。事情不在于那些可以给予帮助的外表，而是这里那里的责任，这里虽然更多一些，多得无穷无尽，也许有一天这种自我帮助能够成功，即使我为此变得满头白发，反正头发变白的速度也是很快的。您愿意给我写这样的信吗？

〔开始写于1914年2月21日或22日，2月25日完成〕

上封信是在三四天前写的，开始时我想不停地写下去，后来不得不停止，这封信就像已开始的事情那样，在桌子上放了几天。今天我无论

如何要把它写完。

您看，亲爱的小姐，这有多奇怪！菲莉斯的信和我的信大概是同一天写的，您把它们比较一下。

您把菲莉斯信里的句子抄给我，您没有做错，正相反您做得很好、很可爱、很明智。糟糕的不是您所做的，而是您目前在这件事上由于菲莉斯同样也由于我的过失所处的处境。菲莉斯的信一开始使我很痛苦，不是因为信的内容，主要是因为它偏偏这个时候寄到，假如我对这封信一无所知，对我来说显然会更加难堪。当然这已经不是什么难堪不难堪的问题了。

今天我要写完这封信，尽管我相信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下次吧，现在是晚上7点，我仍在办公室里，我已经预计到将再工作一会儿，带上了已经开头的信，不久我将再写信给您，给您的信菲莉斯当然什么也不知道。

去一个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睡觉有什么意义？做这样的试验是没有道理的，您一直在睡觉，要灯做什么？难道灯光不妨碍您的睡眠？尤其是您用的似乎是煤气灯，还有怎样才能做到使窗户在夜里稍微敞开一点？我个人不会用这些问题来为难自己，只有按自然疗法的人才会对我这样做。

即致

亲切问候！

弗·卡

〔19〕14.2.25

致格蕾特·勃洛赫

最最亲切的问候。德累斯顿火车站。去了柏林。糟糕透了，现在只能说些梗概，您将收到一封详细的信。

您的 弗

〔明信片邮戳：14.3.1，德累斯顿〕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我刚刚给菲莉斯写了一封长信^[185]，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是否适合向您报告我的旅行（您收到我的明信片了吗？），但有一点是真的，如果说我有责任向一个人报告，而且催促自己这样做，那这一个人就是您，而且只有您，如果说这两天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到愉快的话，那就是想到您，想到您有可靠和真诚。

根据您今天的明信片，看来您并没有从我的信中得知我想去柏林，我决定这样做大约有十天了，因此我曾在给您的信中说过，菲莉斯在这个时刻写信给我真不是时候，因为这会给人一种印象，我是因为这封信才去的，由此又会使菲莉斯认为，您把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告诉了我。但事情并非这样，我曾谎称已经十四天没有听到您的消息了，菲莉斯完全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她也没有得到您的回答，而这又不是她星期六（我和邮差同时到达）期望得到的。菲莉斯认为“您在报复”，而我却幸灾乐祸（我没有多少机会高兴）。

我请了一天假，星期五夜里到了柏林，当时还不能肯定菲莉斯究竟是否在柏林，星期六早晨我去办公室找菲莉斯，寄给她一张明信片（一张我正好带在身边关于某个神的明信片，我想让这位姑娘一旦根据名字认出我来时，不至于目瞪口呆），然后就等着。我面前就是电话总机，但它在我需要时从未经受住考验。在那里我感到很幸福，随后菲莉斯来了（在她房内恰好有许多人），有点但并不过分吃惊，非常友好，我俩在那儿站了一会，中午时我和菲莉斯在一家甜食店度过了一个小时。离开办公室（这里我也看到了她的房间）后，我们转悠了两个小时，晚上菲莉斯去参加了一个舞会，她说，由于业务上的原因她不能不去。星期天上午我们散了三个多小时步，并到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下午我离开那里，菲莉斯当时曾很肯定地答应送我来，但结果没有来，今天她在一封电报中对此表示歉意，说当时无法来，因为名叫玛尔塔或类似名字的婢女来了。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菲很喜欢我，但是她认为，这对一桩婚姻，对这一桩婚姻还不够。她对共同的未来有着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她也许不能忍受我的脾性，她不能没有柏林，她担心会失去漂亮的衣服，坐

三等车，看戏时只有比较差的座位等等（把这些都写出来，是很可笑的），另一方面，她对我虽然很友好（自然不是在谈话时，她并不答话），我们手拉着手像最幸福的情侣一样穿过大街小巷，相互用“你”称呼，即使在碰巧遇见的魏斯医生面前也是这样。正如菲莉斯拿给我看的那样，在一个圆形雕饰里，她11月作为礼物得到的，放着我的相片，她说她将不会同另外的人结婚，永远不会扔掉我的信，不会退回我的照片，也不会要回她的照片，很愿意继续给我写信，当然也会同意不再继续写信——就这样，我度过了星期六至星期天的夜晚，就这样度过了往返的旅程。

您的 弗·卡

〔19〕14.3.2

〔在第三页的边缘写着〕

寄往慕尼黑的信虽然已发出，并非没有顾虑。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您有头疼病，这对于自然疗法者来说丝毫不奇怪，但对于朋友来说却非常痛苦。在您的生活方式下，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头疼呢？因为您工作得如此之多，几乎不出门，更谈不上做操，晚上躺在沙发上，然后又换到床上，睡在紧闭窗户的房间内，点着煤气灯，几乎每天（您有一次这样写道）都得到折磨人的消息，有一种被您的家庭抛弃的感觉，并为此感到痛苦（曾经经常去过您家的菲莉斯告诉我说，您的母亲渴望见到您，如果您在柏林得到了一个工作岗位，她会非常幸福）。如果从各方面对它进行打击，即使最好的脑袋也受不了。作为改变您的生活方式的第一步也是最柔和的一步，您能接受我的劝告，在一段时间内改吃素菜吗？我简直不能想象，您在这样一个乡寓的小地狱中，一切都看得很清楚，由此倒也没有什么危险，会被照料得特别好。也许那位“笨拙的人”饭菜做得很好？肉食在您这样过度疲倦和受尽折磨的身体内（天哪，每天到11点还在办公室）只会造成破坏，头疼就是身体对此发出的呻吟，现在我认识一家最好的素菜馆，位于胡浮堡皇宫剧院附近的奥波尔比大街，干净，待人友好，一家非常令人舒适的家庭餐馆。它离办公室

甚至比离您的宿舍还近，我猜想，您每天吃完饭都是走回家的，“塔利西亚”（这家餐馆就叫这个名字）的公寓房肯定比您现在的公寓房便宜，而这对您是很重要的，因为您（我以前根本没有想到，谁还会向您要钱？）还必须寄钱给别人。您在那里肯定会吃得更好些，愉快些，也许在头几天还是这样，睡得也更好，而且是在黑暗中，醒来时更清醒，但愿不再有头疼，这些对我来说是毫无疑义的，您还是试一试吧。

（现在我的父母就坐在桌旁，我不能再这样安静地写下去了，父亲用嘴沉重地呼吸着，还读着晚报，然后像通常那样开始和母亲玩纸牌，伴随着叫喊、笑声和争吵，不要忘记还有口哨。）

寄往慕尼黑的信我立即就发出了，但我不知道我做得是否对，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我不能对此做出判断，这样我就学您的样子了。进行一次拜访总能把事情弄清楚，我徒劳无益地思考着。是在柏林吗？当时，当您星期天上午把对我和菲莉斯的最后看法写下来的时候，我们，菲莉斯和我，正在动物园内散步，菲莉斯大概正在说：“请你不要再请求了，你总是想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她也许这样说：“就是这样，你必须相信，你不必遵守你的每一句话。”或者：“我完全能够忍受你，但这还不能导致结婚，只做一半我是不会干的。”对此我回答说：“另外一方也只是一半。”菲莉斯回答说：“是的，但那是较大的一半。”当您写信的时候，也许菲莉斯什么也没有说，而是眼睛呆呆地看着一边，让我说出了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和许诺，昨天，我在一封信中把它们又统统都收回了[186]。

您将会从我的德累斯顿明信片 and 昨天的信中发现区别，这可以通过一个很好也很坚决的决定得到解释，它使我得以在没有菲莉斯（至少没有菲莉斯作为我生活的积极内容）的情况下，只要生命允许，就一个人继续生活下去。直至从中真正发生什么，我会立即写信告诉您，但到那时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您不能出差来这里，这很遗憾，展览真会举行吗？我为此问过菲莉斯，她根本不知道此事，只知道明年在杜塞尔多夫可能有一个展览。

一般情况下，7点钟时我在办公室已无事可做，只有当我纯粹是由于思想不集中，上午什么也未做成，或者我想象上次那样休一天假，才有所不同，如果人的签名同以前有什么不同，那么它所表达的意思同您认为的正好相反，或者最好您不要相信，而把它当作笑话，我不喜欢看

到自己的签名，就不由自主地猜想我所亲近的人也一样，一个人名字所包含的东西对这个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最亲切的问候！

弗兰茨·卡夫卡

〔19〕14.3.3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一直写下去，人们很有可能突然来把我接走，尽管这样，我还是立刻开始写，虽然这封信里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我不能让您白白等着，我不想让您因得不到回复而表现出哪怕是最轻微的最短暂的惊讶，特别是对于我——现在我们可以说——太重要了。日期请您随便决定吧（现在我接到了电话，再过一会我就必须停止了），从现在起我们在期限内相互定期通信，而不管可能造成拖延的情绪和偶然事件，当然特别重要的消息不在定期之内。从我这方面来说，认识您我感到很幸福。我想对您来说这种交往也将不是坏事，特别是令我在您面前一直散布的令人压抑的忧伤情绪也许最终将得到克服，我在这种状态下需要多长时间才了解您啊！我去旅馆里怎么能够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干巴巴的伪君子，坐在您身旁半心半意地听您讲话啊^[187]！

从您的信中我不能肯定，您是否收到了我探访菲莉斯后写给您的第二封信，或者只收到了第二封信，因此我也不知道您对菲莉斯已经知道了哪些，还想确切知道些什么。菲莉斯的外形经常变化，在室外时往往精神焕发，在室内有时则很疲倦，粗糙斑纹的皮肤使她显得苍老，她的牙齿的状态还很不好，很可能都补过了，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她又要经常去看牙医，镶上新的金牙，所有这一切和其他的一切我都能发现、看到和仔细地观察，它丝毫不影响我对菲莉斯的感情。

正如我上次告诉您的那样，她反对同我结婚的理由是很严肃地说出来的。甚至提到了坐火车、看戏等等这些超出事情本身却又明显针对我的事情，不，我不认为这是些肤浅的观点，我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它们就一定没有深刻的道理？我爱这整体，也爱这一贯性，在这方面有时人们会龇牙咧嘴，影响不了什么。但从这里，亲爱的格蕾特小姐，您一定了解菲莉斯了吧？

我看了一下表，是时候了，明天我再回答您的信的其余部分。

愿您生活愉快，继续作为好朋友。

您的（您说呢？）弗兰茨·卡

1914.3.4

这个为报答太阳而只拥有他房内冰冷的人，宁可把冰冷留给自己。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却是那么不肯定。只要还没有谈及您的旅行，当然就还是不那么肯定，而我则可以感到满足了，您来吧，来吧，只要有某种可能。但是——如果时间只能有一个下午而不能更多，请您别在像今天这样的下午来，由于夜里不舒服而头疼，我竟不知不觉直挺挺地在沙发上睡了两个小时。其样子一定很可怕，但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下午，您无论如何要来，我的头疼会消失的，我将完全能够忍受。要是您不来，我才不能忍受。您肯定会来的，否则您不会通过预告对我开这样的玩笑，您不会这样做的。

当我知道您要来之后，我不再想写下去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您的旅行路线是什么？只去伯门？或者真的也去布达佩斯？您旅行时会从这里或那里寄一张明信片给我吗？无论如何我有一个感觉，您的旅行（当然除了到我这儿来）有一点令人担心，因为迄今为止对于我来说您去维也纳是那样保险，随时可以联系上，而现在您将处于旅行的不确定状态。头疼病消失了吗？您对我的劝告只是感谢，而没有至少去试一试，使我很不满足。很遗憾，布拉格的素菜馆又脏又破，我根本无法邀请您到那里去。您有事要告诉我，而把它推至下次。这是不是说您将会告诉我？好吧，从星期一起我期待着您的到来。

致以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对了，我的地址：老城环城路6号。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您最终还是不来！您不该唤起我的希望，现在又让我如此失望。或者您还是会来布拉格，只是要过一些时候，先去布达佩斯？总要有人到这里来把机器修好，一切都处于可怕的混乱状态，请您相信这一点。我们将不就通信的日期作出规定，也许您是对的，但不管怎样，我要规定下面这个相反的日期：在您从维也纳启程前，在您现在这样忙乱的情况下，您不要再写信给我，但可以发一明信片，在您抵达布达佩斯后，立即就发出，现在去布达佩斯终于成了现实。

您在前一封信中有关您家庭的话，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我们本来可以在星期天下午在某辆汽车里，在旷野上平心静气地把话说完的。今天在房间内，忍受着后脑剧烈的疼痛，只能说上短短的几句，我认为一般情况下，父母反对孩子总是比反过来更有道理，甚至在某种深度上，存在相互对立的假相，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一旦通过某种生活环境使一直存在的矛盾激化，首先产生的是这方面或另一方面的傲慢。父母是彻底了解孩子的，他们并不理会这些，而孩子们同样认为他们在父母面前是有理的，自我贬低是困难的，特别是在这样一种明确限定的关系中，但这对作出判断并不是决定性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只有那些特别危急的瞬间，这时候父母——据我从熟人那里所见，我自己只是有所预感——会迈着如此正直的步伐从人们毫无根据地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可憎、粗鲁和奸诈的混合体走出来，使人们觉得好像面对一个幽灵。被人们判断错误或至少长期被看错的父母比被看错的孩子要多得多。您自己一定也承认对您的父母有某种过失，因为您称自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儿。沉默寡言和情绪不佳意味着回避而不愿公正待人，因为公正待人需要人们投入整个生命，它是不会嫌长的，当然我也承认人们也许有时在父母面前不能保持公正，至少我完全不可能，但是人们应该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能够感觉到爱的可能性，——您知道我附寄给您的故事〔《判决》〕吗？这是从一本年鉴〔《阿卡迪亚》〕中选出的单行本。您旅行时把它带上，也许它比海策尔更令您喜欢。

关于菲莉斯同您的关系我不能提供什么真实的情况，我对她的判断力已变得如此之差，以致对所有判断我很快又觉得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在一起时也很少谈到您，因为——我重复一遍——在我们总共在一起度过的七个小时中，至少据我的回忆，菲莉斯说话总是半吞半吐、断断续续的。我看不出她对您很亲近，但也不疏远。我现在在写信时想起来，她的处境可能不那么自然——没有得到您的消息看来使她很不安。有一次，在魏斯医生面前（只有那一次她很活跃，对我也很亲切）她开玩笑说（我告诉她，您很喜欢《帆桨大战船》）：“看来你对勃洛赫小姐很感兴趣。”对此我只能表示认可。关于菲莉斯同您的关系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讲的，比关于她同我的关系还少。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3.7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勃洛赫小姐：

我不能如此确切地了解您的状况，以便理解您谈到您工作时为什么要写“恶心得要死”这句话。正是这一工作给了您完全的自主性，以防止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费利克斯最关切地问候您。

我的小侄儿正在这里，我让他也把问候写上，也许这样一个纯洁的人的问候和祝愿比我的震颤的脑袋更有力量。

对柏林和慕尼黑的完全的独立性这一点无论如何对您想必定是有价值的。此外，它也是很有希望的。您自己曾经说过，您想着以后去英国或者美国，在您的公文本上有一系列令人向往的分店，其中只有一个您不想去，很遗憾正是您现在所在的地方，而且各种迹象表明不仅是因为城市本身，也有老板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通过工作的单调（在柏林不会这样压抑）换取这一自主性、自由以及拥有这些的愉快心情并非太昂贵。在这件事上我仍然坚持上次的建议：离开维也纳，如果不能在布拉格开一个分店或至少开一个小分部，让您来领导（在我看来，不充分利用像波希米亚这样的业务地区是荒谬的），那么，比方说马上去法兰克福，是不是更好？我几乎不相信，您在维也纳能为您以后的工作学到

什么，虽然或者正因为是在维也纳的业务也许比在其他地方都困难。尽管如此，看来您愿意做在维也纳待较长时间的打算。顺便问一下：从您的办公桌看出来是邮政储蓄大楼还是从您老板的房间才能看到它？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幢楼是奥托瓦格纳建造的，以前曾备受称赞。就我来说完全可以想象面对这样一幢令人生厌的充满企图的大楼该是怎样地令人绝望。看来对此除了离开维也纳没有其他结局了。

对于我们应在复活节见面，我没有什么异议，尽管离那时还有四个星期时间，但如果我现在要去谈论将来，我必须非常坦率，这样也好，我不想在您面前保守暂时的秘密，但您也不应该谈论对我们友谊的担心，除了担心一切是人之常情这一点，它没有任何最微小的进一步的根据。不，亲爱的格蕾特小姐，我们不再谈论这些了。我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上星期一我给菲莉斯写了一封信——很愚蠢，但不想把它记录下来。我未来会很幸福，星期天能向您亲口讲述这一切。

您再给我两三天时间，那时反正一切都明朗了，在这方面更多不是菲莉斯，而是我本人和那个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的决定。不管怎样，如果我复活节期间去布拉格，我们两人必须见面，或者在维也纳，或者在布拉格，或者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在中间的某一地点，在波希米亚森林或其他什么地方。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更不要因为我没有写完上面那句话而生气，我自己也因此很伤心，因为它向我表明，为了把决定付诸实施，我自身还必须克服多少东西，好在很快就必须作出决定了。

即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3.9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我们当初要是规定了我们通信的日期就好了。那样我就没有必要反复考虑和一直有一个邪恶的念头，总认为您因为什么事生我的气，而不给我写信，而实际上您不给我写信是因为业务上太累，或者已经动身去

布达佩斯了。我在最近给您的信中连我想对您新近来信要说的最重要的话都没有说，我自己在最近一封信结尾时的失败，把我继续写信的所有兴致都破坏了，想必这一决定使您感到困惑？想必它对您仍然不如对我那么清楚，这就是虽然无法把我们同菲莉斯的关系从我们的关系中分离出去，因为它太坚实，也许是不可分解的，但它现在至少不再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如果我不同意某句话，我可以很好地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但这不应使我们作为好朋友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手有丝毫的松动。对我来说，菲莉斯的事是如此不明确，或者说得更好些，是出于我的眼睛根本看不到的某一个最后的原因，它又是如此可怕的明确，以致我引用她的每一句话对我都变得更加模糊，更加混浊，更加折磨人，但现在期望离结束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估计是这封信的继续）。

越过星期天去布拉格，以便晚上离开，您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做，连想都不要去想，我怎么能够忍心看到您这样辛苦，何况对于您来说平时就少不了劳累。反过来也许倒有可能，因为您星期六下午3点就有空，如果您有兴趣，在复活节之前，我们可以乘车去相对的方向，星期六晚上，在中途的某一地点会合，在一起度过星期天。您愿意这样吗？我很想这样，您写信告诉我吧，然后我们可以查阅地图，找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即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4.3.12〔估计为1914年3月11日〕

您在读蒂尔海姆伯爵夫人的书吗？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只写几句话：今天我收到了菲莉斯的一封信（我羞于说出它是被什么手段逼来的，假如人们能够把我为此使用力的量集中起来，人们将能够从天上把太阳摘下）。也许这封信没有解释一切，但解释了许多，包括菲莉斯对您的态度。菲莉斯在家庭中遭受了很多不幸，她的兄弟昨天

已乘船去美国，我从信中未能了解有关详细情况，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秘密，对您肯定不是。这一不幸可能非常严重，我却自私地因祸得福，很久以来第一次又听到菲莉斯充满人情味的声音，是大约半年来的第一次。要是我用以达到这些的手段不是这样卑劣就好了！也许我明天能得到您的消息，您不要生我的气，您不该这样，在上一封信的结尾我不是对您而是对信纸说不出话来。

此外，我今天向菲莉斯建议，我们明晚在德累斯顿见面，想必我明天早上能得到她的电报回音。

即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3.12

你真不幸，菲，我打扰了你。这同样也是我的不幸，能给你一个安慰，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安慰，那将是我的幸福，但我却不能，一方面是我同你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你的家庭中的不幸，你把它们分开，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而第一个是次要的。如果你这样对待它，那它也就是这样，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在这方面我不想说什么很肯定的话，这是你的事，菲莉斯。我不知道已经把你的两封信读了多少遍。信中有令人高兴的，这是肯定的，但也有许多令人伤心的，而多数则是一个混合，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伤心，你今天的电报使这一切变得更加暗淡，或者借用你的一句话，不这样或许我无法说清楚：更加痛苦。我做得并不特别聪明，也许并不特别体贴人，请你明天到德累斯顿去，因为你现在在遭受不幸的最初几天里不能不留在你的父母身边。如果这是一个错误，那么你那电报的七个字就是重重的惩罚^[188]。但也许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错误，而更多是无法在你的家庭不幸和我之间作出选择，就像你所做的那样。

让我们丢开这件事，菲莉斯。但是现在该做些什么？无论如何，菲莉斯，无论如何你不能把我重新抛回无把握的状态，通过你昨天的信我至少已经从中走出了一步。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我是不会再走回那里去的，我宁可牺牲掉最好的东西，而带着其余的一切远走高飞。如果我们想前进，我们就必须在一起谈一下，你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菲莉

斯，不是吗？毫无疑义，这在德累斯顿可以最好、最容易、最不受阻碍，最详细地进行。你自己最近在柏林也顺便提议过，你以前也经常提到。为此不存在严重的障碍，下个星期六你愿意这样做吗？近来你不能写信，现在它还在给你带来痛苦，我部分地看出了这一点，这为我们需要碰面又多了一条理由。请你不要，菲莉斯，再把它推迟到下个星期天之后，你设想一下，我是个外人，只在布拉格见过你一次，请求你帮一个忙，这件事对你只是小事一桩，对他则必不可少。你肯定不会拒绝帮他这个忙的。都说些什么蠢话！如果你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性而且知道在你看来更好的办法，请你把它说出来，我服从，只是它必须能把我们引出这种状况。一切能做到这一点，都是好的。我也可以去柏林，当然除了那里肯定没有德累斯顿好之外——只要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明朗，我就害怕去柏林，我害怕见到最先见到的郊区，害怕见到我扭转脖子看的站台，害怕火车站的入口，那里我曾看到迎面开来的汽车，我害怕一切。现在不去柏林！你来德累斯顿吧！给我这样的幸福，和你共担痛苦而不是我一个人独受煎熬。

弗兰茨

〔19〕14.3.13

我忘了告诉你，我母亲对你的来信非常高兴，根本没有必要为你说什么好话，她让我最亲切地问候你，她本想立即回信给你，我请她暂时不要这样做。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你首先使事情明朗化，对此我的母亲只会影响你，但愿她没有通过她的第一封信已经对你产生影响。

弗兰茨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如果我前天收到您最近的来信，我本来可以很好地反驳它的一部分，即想在不了解我的决定的情况下反对我的意见。而今天收到菲莉斯的信和电报——“无法来德累斯顿，菲莉斯问好”之后，尽管原则上今天也可以这样做，但我至少在目前做不到。好吧，不再捉迷藏了，我将非常高兴向您讲述，听您说话，同您一起散步，能够坐在您的对面顺便说一句，我那么经常地看到您喘着粗气躺在学校勤杂工家的格纹被上！格蕾特小姐那时候还有一点不知所措，后来把它克服了，变得越来越好。

尽管她不愿相信这一点。现在同菲莉斯的会面明天显然不可能了，如果同菲莉斯的会面可以安排在下一个星期天，那么，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您，格蕾特小姐，愿意把我们的会面推迟到再下个星期天吧？我已经查过火车时刻表，难道您不渴望看一下格明特吗？它恰好位于路途的中心，火车正好迎面往那儿行驶，每个人，我和您，大约在8点半抵达格明特。第二天晚上我们按同样的路线返回，只是交换一下乘坐的火车。我认为这一计划非常好，当然这样一来我只能迫使您的旅程同我的一样长，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个地方既合适又离维也纳近一些。现在说说您的意见！

您认为不应该给我写信，在您的想法中可能有它的道理，但它却不是能为我争光或带来安慰的道理。听到绝望的事和经历绝望的事是两回事，这就像强迫一个人把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听到的也再经历一下一样。当然，人们也可以在一个完全绝望的时刻，把对绝望的忍受解释为一个人宝贵的优点。如果一个遭受痛苦的人对另一个我平时就有重要意义，那么他的信任就是一种优点，本身就是一种安慰。

如果我说的关于维也纳的话不对，那位同您有过那场争吵的职员不是也证实了吗？尽管您还根本没有看到维也纳的美丽，因为看来您还没有读过蒂尔海姆伯爵夫人的书，但不知怎么的似乎维也纳还是吸引住了您，您知道格利尔帕策的《可怜的军乐队员》吗？我不是已经问过您一次了吗？在您读过这本书，然后再读过他的自传，还有他从德国、法国和英国写的游记之前，就去参观市博物馆里的格利尔帕策厅，也许没有多少意义。如果您做了这些并且写信告诉我，我将会非常高兴，在您做完这些事之前，不要离开维也纳，然后就尽快。

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 14.3.13

最近几天大概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使您如此无精打采？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如果您想让最近一封信丢失了，因为信中写道：您不能给我写信，由于您太悲哀。那可能是信的这部分丢失了，但这不是最好不要发生，信件至少很少从里面丢失，就像很少在邮局丢失一样。

现在我是真正被耽误了，时间已经太晚了，因此只写一些最重要的，尽管这些也就是一个人在时间很多情况下所想到的那些事。对我的“但愿”，亲爱的格蕾特小姐，您理解错了，它是指作出一个明确决定的必要性，而不是指决定的方式。当然就是这个希望也没有能实现，一封信已经没有得到回复，第二封信明天也不会有回音，就这样一直下去，当然也不可能持续很久。现在我对此的态度自然和以前已经有些不一样，但尽管如此——不，我们现在不谈这些。我对她兄弟的印象和您所描述的有些类似。菲莉斯很爱他，曾为他感到自豪，至少我相信是这样的，您必定了解得更确切——现在必须永远以爱来追随这样一个人，这是怎样的一个不幸啊！这几天我想起一件事，在他的兄弟完全甩手不管之后，不是菲莉斯必须（或者她不认为必须）赡养她的父母或至少从根本上支持他们吗？您了解这些情况吗？她父亲已经年老，不能再工作多长时间了，也许他现在必须在这方面让儿子以某种方式承担义务——您不认为，这里面或许有着对菲莉斯的态度的（不是唯一的，远不是！）可能的解释？这很可能是一个障碍，我现在还看不出它是否能够克服，但是，如果对此继续长期保持沉默，它将变得完全不可克服。好，今天就此搁笔，已经太晚了，我还想把信投进邮筒，以不给您留下信被丢失的错误的幸灾乐祸的感觉。

致以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3.16

不，菲莉斯，你现在不应该对我不做回答，现在比以前更不应该，又有两封信我没有收到回信，而对这两封信写回信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至少应对我们必须见面和坦率地相互交谈作出答复，至于信任，像我一直给予你的信任，你给予我太少了。你可能有种种理由不回信给我，你不会这样毫无意义的折磨我——至少你是这样写的——折磨你自己。但

是没有任何理由能坚持到底，它们都是一些托词，是幽灵。你说吧，菲莉斯，让我接近这些幽灵。你在动物园里所谓你对我没有足够好感的话，可能过去和现在都是真的。但其他事情则不是真的，就像现在所表明的，你的沉默就不是真的，菲莉斯，你应该了解我是谁，了解我由于对你的爱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弗兰茨

[19] 14.3.17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千万别报复，千万别这样！我已经在给您的办公室写信。我过去更愿意给您的住处写信，这有好多原因，其中一条是，我写到办公室的第一封信没有收到回信。由此得出结论，在办公室读信的情绪不好，实际情况肯定也正是这样。此外，我在第一封写到办公室的信中如此卖力地（当然完全是白费劲）劝您离开维也纳，事后我很害怕信碰巧被其他人拆开，被一家想咬您一口（这并非没有可能）的对方公司得到。

您证实了我关于菲莉斯的一些猜测，鼓励我去理解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当然按照您的说法，通过她兄弟的出走，如果不再有其他后果，她的家庭的处境并没有变得多坏，因为他有家时也没有能把它改善多少。至于说是旅费阻碍了菲莉斯去德累斯顿，当然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过于友好的解释。不，亲爱的格蕾特小姐，对此您自己也不会真的相信。至少旅费不会阻碍菲莉斯写信告诉我她不能来，事实上已经不是一封信而是两封信，很快有三封信没有得到回信了。母亲也不是真正的障碍，菲莉斯自己曾经常谈到在德累斯顿会面的可能性。不，不，这些都不是障碍。

但现在对我来说，同菲莉斯会面关系很大，以便——我曾经写信告诉过您的菲莉斯的信给了我一个比以前好得多的辅助手段——为我获得最大程度有明确性和作出决定的自由，为此我在一小时前向她发出一份电报，询问她是否同意我星期天去柏林。通过电报仍然是最容易迫使她回答的。如果我不去柏林，您又不必去布达佩斯，那我们——不是吗？——就在格明特相聚。并不是从您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很高的角度来

看，我无条件地理应得到在格明特的星期天。您只要看一下附件[189]，就知道人们今后想如何照料我们。

星期一的拜访是一次重要的拜访吗？它有没有使您变得愉快些？当您写信的时候，我可能正从床上起来去关上窗户，因为狂风吹得我的房间四面墙在晃动。它们没有吵醒我，因为我没有睡，但我想要安静。后来只听到很远处过道里或其他地方不知那一扇门有规律地发出一阵阵响声。

您信中不再谈到头痛，是否说明通过严格吃素它已经消失了？由此您给您的一直受头痛折磨的自然疗法朋友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弗兰茨·卡

[19] 14.3.18

现在是晚上9点钟。你对我今天电报的回电，如果信下午很快发出的话，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收到了。我不知道你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你认为我不值得回话。我本不想向你家里发电报，以免惊吓你的父母，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到处寻找你，这是我对于自己或许甚至也是对于你的责任。你将会看到这一点。菲莉斯，要是这种认识现在就有该多好啊！我今天发了一封电报：“如果你不去德累斯顿，星期六我来柏林。你同意吗？你会来车站吗？”这就是电报，我在此重复了一遍，并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停地重复。

弗兰茨

[19] 14.3.18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菲莉斯·鲍威尔

我确认收到了您的第一封信，将在下周给您回信。今天我只写上短短的几行字，为的是请求您立即给弗兰茨回信，因为我看到您的沉默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忧虑。我今天寄给您的信，不能让他知道。

谨致

亲切的问候！

尤丽亚·卡夫卡

〔信笺上方印有赫尔曼·卡夫卡妇女时装礼品商店地址〕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我不是请求您这个星期六不要想见我，为此不需要请求。对您来说乘车去格明特是要做出牺牲的，这些我知道得很清楚——正相反，我请您在放弃这个星期天的同时不要放弃整个会面的想法，这次见面预先已经给我带来的欢乐比最近任何其他事情都多。我将让您看到一个体面的会在中途就已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人，而不是现在的我，他的开始状态（只是最初时候！）。您去布拉格访问时已经了解。我真的没有收到我电报的回电，第四封信（自星期六以来）也无回音。您在您最近一封信中似乎不完全理解，我为什么要和菲莉斯谈话。也许是因为我对菲莉斯的最近一封信说得不够清楚。这封信也许不完全但几乎像来自我们两人相好的时候的信，把我们两人之间最近发生的一切几乎全部否定了。因此它给了我如此沉重的打击，用书信和等待把我重新推回到了令人最不愉快的时候。

此外，今天我还给她的父母写了信，不管是好是坏，事情该有个结果了。

即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年3月19日〕

致菲莉斯·鲍威尔的父母

尊敬的鲍威尔先生

尊敬的夫人：

当我现在出于无法忍受的处境请求你们给我一个消息，我当然不是指你们最近那封如此亲切友好而我以闻所未闻的借口尚未回信，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否应该这样。不管怎么说，你们当

时就认为我对于菲莉斯并非完全是不相配的，请允许我今天由此怀有一线希望，即你们将满足我得到有关菲莉斯状况的消息，一个非常简短的消息的请求。

我是在星期六得到有关菲莉斯的最后一个消息的，自那时以来我已经给她寄了四封信和一封电报，部分寄到办公室，部分寄到住处，所有这些都没有回音，从我们最近一次通讯看不可能存在这种沉默的丝毫理由，相反，从已经发生的事情看，回信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只能认为，而且朝思暮想，菲莉斯生病了，或者自星期六以来她遇到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如果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而且你们也愿意满足我的请求，那么我衷心地请求你们发几个字的电报给我，从明天中午起我除了等待消息外，将什么事也不干，就像很久以来无法做其他事一样。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敬上

〔19〕14.3.19

布拉格，老城环城路6号

外部的偶然事件又插进来。使我们的处境毫无必要地更加混乱，我的电报在你不在办公室的下午送到，你的电报又错了地址，最后就像我现在看到的那样，我写给你父母的信又迟到了一天（星期四就已发出，这你可以从附上的单据看到）——这一切当然很糟糕，但现在完全在于我们，即使最坏的偶然事件也不能把一切变得更糟。

当我今天得到你要打电话的通知时，我无法再很从容地离开办公室，心里只急着尽量让车子走快点也怀着某种荒唐的希望想着，你想做的，就是通过电话去掉你快信中某种东西的锋芒——因此才从店里给我打电话。很糟糕，我们没有电话亭，电话在的院长办公室内，总是有很多人，恰巧站在我后面的是一位主任，一个令人厌恶的人，他开着玩笑，我恨不得踢他一脚，我因此听不太清你的话，最主要的是，有一阵我根本听不懂你说的话的意思。我只能猜想，寄给你父母的信昨天已收到，你是在给我写信之前知道的。除了我听懂很少外，我打电话时不得不思考着，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你要打电话给我。此外，通过听到你的声音——正因为这一点我很害怕打电话——又产生了见到你的渴望，向你讲清我的一切，把一切都弄清楚，去你那儿是最简单的办法。

因此我说过，我乘车去柏林，我竭力不理睬你反对的理由，不理睬你回答的犹豫，不理睬你违心地和完全不肯定地答应去车站接我，我完全忘记了必须回答你今天的来信——只是说，后来我跑出办公室，在雨中转悠了一会，思考着，似乎一切对我都毫无希望，我会很高兴去你那里，但对回程我却非常害怕，我不再肯定是否会去。后来我在家里找到了你父亲的电报：“菲莉斯身体很好，刚收到您的信，菲莉斯对我说，昨天已写信给您。”现在我很快就下定决心不去。我看到你的父母今天才收到我的信，也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知道你所说的一切，包括我没有听清的。之所以是一种责备，是因为我给你父母写了信。这使我想起那次在动物园里，当我针对你连续不断的半沉默状态说我要去找你的父亲，把一切都弄清楚，你恼怒的态度变化——就这样我没有去。我给你的办公室发了一份电报，并发电报对你的父亲表示了谢意。

我在讲下面的这一切的时候，菲莉斯，我清楚地意识到，你在家中遭到了巨大的对于我来说当然还不完全明白的不幸，我看到，它搞得你完全晕头转向，我也看到你像一个姑娘必须承受的那样不折不扣地承受着它，我很喜欢你的这一点。我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是完全意识到这些的。

在我今天读了你的快信，一遍、十遍和更多遍之后，使我觉得你似乎根本没有读过我最近写给你的信。自星期六以来的四封或五封信可能你真的没有读过，不然你怎么会没有一句答复我的话呢？你又怎么会想到责备我，因为我在没有得到你对这么多信和一封电报的答复之后，在连续不断的担心你的情况下，找到你的父母（你并没有给我你妹妹的地址）以便了解你的近况（此外，我在你上次沉默间歇期间曾写信告诉你，我将要写信给你的父亲，而且这次沉默比已往任何一次都更没有道理，你也没有试图解释一下，我也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恰好想回答我的电报，而且最终也真的回答了，而对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我的处境的四封或五封信却置之不理）。但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些信，还有那封我从柏林返回后立即写给你的信，信中我告诉你我母亲将写信给你，你可能也没有读过。菲莉斯，你看我并没有让我的母亲写信为我去征服我的夫人（假如在我的脑海中某一个角落有着这样一种希望的预感，我对此不负责任）。我让我母亲写信，是让她直接 from 你那里证实一下你在动物园对我说过话。我为什么允许母亲这样做，也许我会在这封信中告诉你。

你今天写道：“我们要一笔勾销在动物园里的谈话。”这真是太好

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好。但在另一页你又说：“你对我说过，我对你的爱对你足够了。”菲莉斯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可能出于绝望讲出这一类的话，但永远不可能为你所最终接受。你的话实际上意味着，说得简单一点。无异于你想牺牲自己，因为你看到“我必须拥有你”，我会接受这种牺牲，而且是最亲爱的人的牺牲吗？如果我这样做了，你必定会恨我，不仅如此，如果真像你信中写的那样，那你现在已经在恨我。为了能够自愿地同他在一起生活，你必定会恨那个你并不深深爱的人，这个人却通过某种手段（尽管这些手段无非是出于他对你爱）把这种共同生活强加给你。你的上一封信很亲切，我看得出来，你还沉浸在不幸之中；你在动物园里的话，看来是在这种不幸中说的，除了你的痛苦之外，你对所说的话没有经过思考；在信中你给了我虽然不那么确定但能更加激起美好想象的希望。在这封信中有着肯定的希望，但此前又给了我当头一棒。

在你最近一封信中也可以找到两个不明之点。它们是这一几乎是不朽的希望的最后最微小的可能性。你还一直是那么不幸，一直不能进行思考，此外你也承认对此当然不需要自我承认你在动物园里没有“说出一切”，如果其他的信不是这样明确的话。我本来可以坚持这两个不明之点！我多么想这样！请告诉我，菲莉斯，你为什么强迫自己，你为什么想强迫自己？自从在动物园里散步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也没有，你这样说。而自从我们相好以来你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一切都变了，这也是你说的。那么你为什么想牺牲自己，为什么？不要总问我是否想得到你！读到这些问题，真使我伤心透了。这些问题都出现在你的信中，却没有一个字，一个小字，是关于你自己的，没有一个字有关你自己期待什么。没有一个字有关结婚对你意味着什么。一切都很吻合，对你来说它是一种牺牲，关于这一点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我当时肯定不能把我现在所写直言不讳地告诉你，而更可能拜倒在你的面前，把你永远抓住。因此，我没有去，这很好。

你问到我的计划，我不能确切地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我相信，我现在可以把它们坦率地告诉你。当我从里瓦返回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出于各种原因辞职，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我已经看出，我的职位只有在我同你结婚（自从我认识你之后，其他人都不在我考虑之列，也不会去考虑）的情况下才对我有意义，有好的意义。那样我的职位才有意思，甚至变得可爱（类似的话我也对魏斯医生说过，正如你在咖啡馆也

听到的那样，他现在对此非常坚持）。如果我不同你结婚，那我的职位，不论它对于我是多么轻松（除了例外情况）都是令人厌恶的，因为我挣的钱比我需要的多，而这是毫无意义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对此我想还是不说为好。当我从柏林回来之后，我才第一次对我母亲谈了这一切。她对这一切都能较好地理解，但请求我允许她先给你写一封信，也许她所以这样理解我，是因为她不相信我所讲的关于你的话，因而对她写给你的信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让我母亲给你写信。现在怎么办，菲莉斯？我似乎已站在安哈尔特车站的月台上，你好像破例到车站来了，我似乎看到了你的脸，而要同你永远告别了——星期一我还期望得到一封快信，一个奇迹；天知道我得到的是什么。从星期二起我将不再期待什么。

弗兰茨

〔19〕14.3.21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要是我想今天就把这封信发出的话，那我就只剩下很少几分钟了。从星期五以来，您办公室里还有一封信。星期五当天我没有写信，因为我思想太不集中。今天这一天将是决定性的。好，它已经是决定性的了。在经过一个星期毫无所得的等待之后，今天一天——我把它算在一起——我从柏林收到了三封电报，一次电话和一封快信。中午时我几乎已经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今天我给菲莉斯写了一封长长的也许或者说很可能是最后一封信。菲莉斯今天来信的明确性几乎是完整无缺的。关于这些我们最好还是在下次见面时再谈吧。完全没有必要把它都写下来。您的小明信片比从柏林得到的所有东西都更使我高兴。您——现在我要说一句惊人的蠢话或者更甚：不是我说的话愚蠢，而是我把它说出来——您是最好、最可爱、最正派的姑娘。

菲莉斯也是这样的，无疑，我将永远这样认为而不会改变——这也是无疑的——永远不会。但是她在我面前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必须相互适应。也许这是同一种力量，把我紧紧地同她联系在一起，而又阻止她同我相联系。对此实在没有办法。

即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3.20〔估计为3月21日〕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和春孩子：

外面环城路正在举行盛大的没完没了的葬礼。我房间的一扇窗户开着，我的妹妹和一个表妹躺在里面，我真想去扯她们两个人的裙子，但是不行，我就这样坐在这里挨冻（现在表妹甚至说：“让我们唱点什么！”她们已经唱起来了），不，我现在不能再继续写下去了。

在维也纳您会收到一封信，当然不是贺信，因为当您如此经常地有着其他伤感季节的思想时，我怎么能知道您是一个春孩子呢？但整个看来不知怎么的它对您倒是很合适。

人们是怎样把您调来调去啊！一会儿到特罗保，一会儿到布达佩斯，就是从未来过布拉格。还有，您将到菲莉斯的妹妹那儿去吗？我在给您的寄到维也纳的信中曾说过，我昨天对菲莉斯的快信回了很长的很可能是最近的一封信。我这里补充一句，最后的但看来已毫无意义的限期是明天，明天，星期一，如果收不到菲莉斯的任何一封完全无法回的信（在收到最后一封信和星期六菲莉斯的电话之后），那我们两人，菲莉斯和我就都自由了。当然只有菲莉斯能立刻和完全享受其自由，我却只有在以后并且也许只能部分地享受。但如果我将不能得到，那对我将更加糟糕。

收到了这么多来信和电报？您不是有这么多朋友和熟人吗？“符合期望的方面”某些误解不是在这些问题和您之间来回传播吗？在有着这些偏见的情况下澄清它们是不可能的，它们或者能够带来愿望，或者把期望的加以消除。您也许能告诉我，比方说您的母亲在您生日时都给您写了些什么？一切都是“可爱和很好”，就像您写的那样？菲莉斯没有写信给您，这也许是我的并非有意的责任，正好在星期五她收到了一封信寄给我但写错了地址无法投递而退回的电报，又重新发电报，后来又写了一

封信，还有其他事要做，为他的兄弟担忧，因为还未得到他消息，“我是多么烦躁和疲倦啊”！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以前的信也有类似的开头，现在是把我给予她的过多的指责从她身上收回的时候了。

现在您旅行得足够了，也许比您喜欢的更多，肯定也比您认为恰好的多。我不会再让您到格明特来。但复活节期间，如果您在维也纳而且又没有其他来访，我能再到那里去。

即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3.22

最亲爱的菲莉斯，在你最近的信中（我在这个词上面停留了多久啊！我把你盼望来了！）有一句话，对我来说从各方面看都比较明确，这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这句话谈到你对同我一起生活的恐惧，你不相信，或者说你也许只是怀疑，或者你只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即你将从我这里找到你绝对需要的支柱。正是对这一点我不能作出回答。也许我目前太累（我不得不等到下午5点才收到你的电报，为什么？而同你的许诺相反，为你的信我不得不等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为什么？）而且在极度疲倦中又对你的来信感到过于幸福。

现在很晚了，即使最重要的今天我也不能再写了。你想得到的关于我的确切消息，最亲爱的菲莉斯，我不能给你；只有当我在动物园里跟在你后面奔跑，你总是匆匆忙忙地想走开，而我则急于拜倒在你面前，只有在这种连狗都不能忍受的屈辱时，我才能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向我提出问题，现在我只能说：我爱你，菲莉斯，在于我精力的极限，对此你完全可以信任我。除此以外，菲莉斯，我不完全了解自己，在我身上连续不断地存在着意外和失望，我是说，这些意外和失望我将只留给自己，我将用一切力量，只把我本质中好的和最好的意外献给你，对此我可以担保，我只是不能担保能够一直做到这一点。鉴于我信中的混乱，你长时间以来从我这儿得到了这些，我又怎么能对此作出担保？我们很少在一起，这是真的，但即使我们曾多次在一起，我也会请求你（当然是为了以后无法做到）根据我写的信而不是根据直接的经验来评论我。隐藏在信中的各种可能性，同样隐藏在我的身上，既有坏的也有好的。

直接的经验看不到全貌，而凡是涉及我，总是在对我不利的意义上。如果你回忆一下我写给你的许多信，你肯定会承认，我至少不会诱使你那样做。

此外我还认为，我本质中的这种不受约束性，这种可能是幸运地可能是不幸运的活动性，根本不会对你同我一起生活的未来的幸福有决定性的影响，你根本不会受到这些特性的影响，你不是不自主的，菲莉斯，你也许说得更好一点，肯定有兴趣成为不自主的，但你不会长期顺从于这一兴趣，你做不到这一点。

对你最后一个问题，我能否那样对待你，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只能说我不能这样。但我能够而且也有必要带着曾经有过的一切对待你，并且一直坚持到它失去意义。

〔附页〕

你还必须注意到一点，菲莉斯，我和你的处境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两人分手了，或者允许我现在说“已经分手了”，你可以必须或者说无论如何将暂时继续你目前的生活。我却不能继续我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我到达了一个死点。我是通过你才认识到这一点的，我将永远不忘[190]。像这样确定无疑的需要作出一个决定的标志我一生还没有过。我必须挣脱出我目前的生活，或者通过同你结婚，或者通过辞职和出外旅行。要是我星期一没有收到你的电报，也许我星期二，无论如何会在星期三已经发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他将如我希望的那样，为我在柏林找到一个小职位，一根财政上的小支柱，此外，我也会试图在某一个地方最基层的新闻业中坚持住，而不在这方面抱有野心[191]。我肯定会成功，对此不存在疑问。但是我不相信我能成功地把你和失去的结婚可能性（预计至少将失去好几年）遗忘掉。我必须结尾了，否则这封信今天发不出去了，而我是不能让你等信的，因为我一直没想我坐在你的桌子旁，等待着（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我还将回答你最近一封信，只是请立即回信给我，哪怕只有几行字。不要让我等待！你看，菲莉斯，假如你愿意同我结婚，不要忍心让你未来丈夫的心在邮局时刻和那以后很长时间内痉挛。

你说，我应该去柏林，但你也看到在我同你的父母会面之前，我们，我和你和你和我，必须先谈一谈。这是绝对必要的。这个星期天真的不能去德累斯顿？你反对的理由是对的；但我主张的理由同样也是对

的，而且你自己以前曾经常甚至最近在柏林还主动建议到德累斯顿见面。那时肯定有一个合适的安排可能性曾浮现在你的面前。

再试一试，菲莉斯，不管怎样，很快给我回信。

弗兰茨

〔19〕14.3.25

星期一我收到一张明信片“穆齐·布劳恩，祝你好”^[192]。这有点不对头，你的电报晚上才收到。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您能否在布达佩斯收到我的去信，甚表怀疑。您的明信片途中辗转两天有余。现在已是星期四——干脆，我径寄维也纳，以便让它在您房间的办公桌上欢迎您。期待亦属美好，房门开启，疲惫的游子蹒跚而入。

我不知穆齐的愿望是否奏效。无论如何，菲与我的事情现已有所好转。我告诉过您关于星期一的期限吗？我相信将会如此。不过时至今日，又有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任何信息了。现在已是大约5点钟。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一名刑满释放者，从正反两方面理解都如此。一份电报忽至，声言星期二将有一封来信。然而，星期二已至，信件却未到。菲将不遗余力地让我望眼欲穿。信件星期三才到，且并非坏消息，或许预示着一个崭新而良好的开端。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现在我却再想听到关于您的一些消息。新的一岁如何开始的？匈牙利的起步可好？您是如何应付那许多工作的？记得蒂尔海姆伯爵夫人，她亦到过布达佩斯（“布达乃是无数毫无风格和寒酸房屋的大杂烩。古堡则另当别论，它自成一体。佩斯稍许强些，不过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巢穴和商人的杂居地。街道宽阔，偶尔也能见到几幢漂亮的房子。然而，那里的牲畜比人还多。我估计，老牛和猪猡要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她在那里也忙碌不堪，然而总的说来并不满意。亲爱的格蕾特小姐，因为我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您引见给伯爵夫人，并且迄今您们两人仍然保持着联系，所以我怀疑布达佩斯会十分讨您欢心。但

愿我能立即知道您在那里的感觉。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3.26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今天仅仅廖寄数语。您纵然在布达佩斯，但仍没有将我忘怀。对此，我深表谢意。我仅有片刻时间。整个下午，我陪同一位来自古老的哈尔伯施塔特的老妇游逛。现在，与那留在哈尔伯施塔特的七间房屋里期待这位老妇的巴儿狗和鹦鹉相比，我更有被遗弃之感。当然，并非被这位老妇所弃，绝对不是。

除此之外，我便没有任何新闻可言。菲那里仍然杳无音讯。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您在布达佩斯收到过那封信吗？

〔19〕14.3.28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究竟发生了何种不测？据估算，我今天本应收到您寄自维也纳的信件。或许星期日您仍在布达佩斯，或许您因劳累过度而病倒，或许您最终生我的气了？然而，即使您因为某事而生我的气，那么正确的做法应是更快地给我来信，我则可以有机会更快地向您道歉。而现在，我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胡思乱想，寝食难安。尤其是我知道，倘若您能够，定会给我来信。此种不安则更甚。

无论如何，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菲，难道你未能理解我的电报？我估计邮局不会错发。电文应为：“我对上信难以作答。你应告我，除打算羞辱我之外，已无其他感情可言。否则，上信又能作何解释，从未言明的无端间隔又作何解释。”

（你昨天的来电，我已收悉。尽管看来像是中午发出，到达之时却奇晚。晚间8点我在房间，电报却尚未到达。后来我外出，凌晨1点半钟返回，方收到来电。）

你未看懂电报，对吧？菲，还记得我们那次最后的晤面吗？其时，我从你那里得到的羞辱，胜过他人几筹。当然，别人也不会像我当时那样，去挑起更加深刻的羞辱。羞辱并非在于你的拒绝。这是你当然的权利。羞辱在于你根本未答复我，仅有的答复又是那样云雾罩。你对我表现出来的仅仅是阴郁的愤懑与厌恶。这种情感如此可怕地逼真，以致我心中对于我们美好时光的回忆也受到伤害，并且令我记起了若干往事，它们极易暗示出目前你我之间的关系。你虽然少言寡语，但其中许多言辞却准确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你说过去可能（可能！）爱过别人，却又不愿谈及他；你做事从不愿半途而废，而拒绝我们结合则已属多半决定之事（我表示疑义，这亦算半途而废，因为你曾断言，我对你并非完全陌生）；你实难容忍我的脾气；我应该最终停止执著追求不可能之事；完全可以按照我的要求中止书信往来，但你却也同意继续通信（你像我一样清楚，如果果真如此，你将难以复信于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倘若还有遗漏，那么我可以将遗漏部分从答复中舍弃。当然，即使如此答复，也足以证明我何等粗野。我有时也曾否定自己，并且扪心自问，或许我的素食主义有碍于你，或许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你难以成婚。对于接受公司领导职务，自己毫无愧意。

或许根本没有必要重复上述，尤其因为你当时处境特殊，而我对此却并不了解。可是你说你没有理解电报。我的首封去信（从柏林算起）业已收回自己所说过的大多数过激言辞，倘若可以并且允许收回的话。我所忍受的羞辱却并未到此完结。如果说你在动物园保持缄口沉默，那么现在则在书面上也已开始。你甚至连我母亲的去信也不立即作答。然而，解释终于不期而至，你受到如此沉重的痛苦。可是，最令人难堪的日子已经过去，尽管如此，你却依然成星期保持沉默，对五封去信均不

作答。难道这不算蔑视？尽管你非常清楚，我会如何痛苦，而你却对自己的沉默毫无解释。这难道不比动物园更为恶劣？有一次你曾写道：“倘若你已厌倦我的爱情，那好吧。”此类言语，你甚至在动物园都未曾讲过。还有一次，你曾写道：“我在柏林所说的一切都属真情。或许并非全部，但就事情本身而言却都是真的。”然而，这个“全部”我却从未听你说过的。

提及上述，似乎也没有必要，菲莉斯，因为后来来过一信，似乎可以重新修好如初，即倒数第二封来信。所有一切似乎均令人满意，更加美好的时光似乎就在眼前。我幸福地复信，从未那样迫切地请求，不要让我盼望回音太久，描述我如何痛心疾首地忍耐着杳无音讯的时光，并且提出请求，如果实在来不及，让我次日得到你的只言片语也好——然而却翘首等待了四天。结果如何？结果等来了你的最后一封来信，饭后在旅馆匆忙留下的几行字迹，并没有解释为何不作答复，赴德累斯顿旅行被断然拒绝（却没有解释你过去为何数次表示愿作这样一次旅行），你妹妹式的训斥，你打算简短捷说（还要简短！还要简短！）。如此而已。倘若在四天时间里，你仅能在饭后挤出一瞬给我，并且根本不提我的去信内容，仅把这件事极不情愿并且随意地塞进你的其余生活之中，那么我还能够奢盼答复乃至更多吗？如此说来，从动物园的第一步开始，所有一切不是重又活跃起来了吗？我怎能作答？现在你该明白，我实难作答。

菲，这一解释不仅为我而作，而且也是为了你。如果你认为我作出这一解释之后应该去你那儿，我当招之即来。我可以明天，即星期六晚上11点半去你那儿，但必须下午4点半钟返回，因为如同眼下一样，星期一还有沉重而可恶的工作在等着我。如果你同意让我去，并且到车站去接站（我仅想陪你回家，你在中午12点半钟即可到家），那么请立即给我发报，以便我能在中午12点前接到电报，然后径去火车站。

弗兰茨

〔19〕14.4.3

致格蕾特·勃洛赫

〔此信上半部分遗缺〕

邮件肯定是从慕尼黑寄发的（他不可能去布拉格吧？）。在办公室的激动心情，着实令人莫名其妙。您在布达佩斯肯定不会干推销，这应是已派代表的任务。他们果真如此顽固刁钻？面对您付出的巨大努力，他们竟然没有（……），我也有其他的（……）而耽搁，因为我可能明天去柏林，但愿明天上午有一份电报。此外，格蕾特小姐，您对我是不公正的，至少有一点不公正，因为您把当时的期限称为“神秘莫测”。当然，我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或许因为我提出过一个又一个的期限。如果您认为是后者，则其实并非如此——对此，我倒更容易理解些。可是您并不清楚，我写那封信预订期限（另外，此信丝毫未加考虑，完全出于必要而写就了十二页），是答复一封什么样的信件^[193]。菲在那封来信的主要意思和内容为：“你曾亲口说过，我对你的爱，你已经厌倦，那好吧。”如果您认为我有过错，我将感到遗憾。即使您对我多有好感，也难于平衡这种遗憾。

不，我不会忘记格明特，也不会忘记维也纳。我亦有一些事情相告，并会提出若干问题。现在，如果柏林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将意味着彻底的终结。复活节期间，我打算去维也纳。或者，如果您在复活节期间能去柏林，而我可以在布拉格登上您的双座马车，您意下如何？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您在布达佩斯收到过那封信，在维也纳收到过三封信吗（我希望更好地理解您对我的评价）？

〔1914年4月3日或4日〕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在阴暗的光线下匆匆写就，菲和我昨天电话商定（我原打算今天5点半钟离开柏林，虽然我对公务精疲力竭，但办公室里却仍有许多可恶的活计急待完成），我只能等到复活节才能再去柏林。在我看来，并且据我对这一新发明的判断——虽然我几乎不知应该如何应付，上述电话协议还是相当不赖的。本周之内，菲已给我来过三四次电话。电话机在二楼，而我却在四楼。因为我往往不在办公桌旁，有时出于必要，有时

则为逃避，往往待在三十位同事之一处，或者坐在两台打字机之一旁。于是电话铃响之后，人们一方面传呼，一方面还要到处找上一阵子。我便飞跑到二楼，气喘吁吁地坐到电话机旁。电话机就裸露在经理办公桌上，根本没有隔音设施，周围总有一些神态各异和多嘴多舌的窃听器：你虽然可以通过跺脚使他们安静下来，但由于忙于通话，对他们在远处窃听却毫无办法。如同往常通话那样，由于我缺乏应付自如的能力而不知所措，并且由于陷于自己的无能的思索而几乎什么也听不清楚（当面交谈也相差无几），在进行咬文嚼字的通话时，更是什么也听不懂，至少什么也说不出，并且也根本无法作出判断。大约一个星期之前，菲也给我来过一次电话。在我听来，自己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以至面对全体同仁无地自容。可是菲来信却说我的声音听来“气恼得令人可怕”，原因可能在于那次通话时滑稽的经理恰在我的背后。他毫不留情地提醒我注意不要把眼睛老盯住话筒，而应该把嘴巴对着话筒（毫无疑问，他说的一点没错）。

只有天才晓得，我为何会对这一微不足道的痛苦而如此喋喋不休。亲爱的格蕾特小姐，我将去柏林，而您却不能，如此说来我们将再次失之交臂。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糟了。昨天我还在想（甚至在通话时还在想），您肯定会去柏林，因为您已经很长时间未探家了。难道生意方面没有这种必要？除此之外，我在绞尽脑汁地思索，您经常提到的“私人商业事务”究竟为何物。每天需要起草三封重要函件，委实太多（其中之一可是因访问没能成行而写？）。您需要解脱一下才好。到维也纳森林去兜风一次可好？

您关于我和菲所说的话，均完全正确。我连自己也不明白，在最后一刻自己为何如此放肆，尽管您与菲并无联系，却竟要求您作出某种判断。而作为我自己除不可能叙述的外表之外，本应将所有一切如实相告，但不管我有意与否，在叙述过程中肯定会有歪曲和隐瞒。当然，因为您不同意所以菲对您也一无所知。此外，就某些个别事件而言，我对您也仅仅略知一二。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4.5

菲，说真心话：昨日曾徒劳而激动地等待着你的来信（菲，这是我

徒劳等待多少回了？）。我下定决心，即使今天有信来也不去拆看。这封信本应星期日就到的。自然，对我说来，对我上次去信的答复是急迫的。整个星期日，我也在盼着来信。此外，复信今天来也是不可能的。为何恰在今日？我今天收到的这封信，几乎在口袋里没放片刻（我没有读懂，其内容也难以让人理解），尽管如此它仍使我感到幸运。但与你的来信相比，此信明天到、后天到，甚至根本不到也无关紧要。事情本身并不紧急。菲，我的电报并非出于恶意，可能从形式上看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在我看来，我的上封去信却十分可恶。你没有感觉到，或许事实也是如此，可是在我看来却令人生厌。在电报中，我仅表示自己不可能作答。但在去信中，我却谈及其中原因，即我感到我们之间尚存在着些许不清不白。事情确实不少，或许你会说，事情并不复杂，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菲，请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欺欺人！你家在你最后一封来信中所起的作用，暗示了一种假相。请你不要上当！菲，你不必讲你希望或者不希望我遭受羞辱。你只需对我最近一封去信所列举的所有一切作出解释，其余问题将不言自明。而你却连这件最容易做的事情都没有做（把解释拖延至摊牌，将于事无补。你很清楚，在你的身边，我会对所有事情都表示满意，并且必须表示满意），或许你不能为之。那么，你只能将这种解释权留给我。倘若你真的想羞辱于我，那么事情还不算最糟。我之所以仅能如此认为（说正经的，真的是说正经的），因为这对我说来确是最为有利的一种情况。如果这一假设错误，你并非成心想羞辱我，那该怎么样——对此我宁愿缄口不言。

好吧，我将于复活节去你那儿，但不是星期六中午，而是星期六晚上，如果我没弄错，应是6点51分。对我说来，你当然最好无论如何去接站。但据我昨天获悉，不排除马克斯夫妇将与我同行，可能还有奥托·皮克（他们均为我的文友）。对你说来，在车站同他们相遇，可能会有些尴尬。否则，我们必须到你指定的地点晤面（尽可能早些，例如8点半，我将再次下榻阿斯汉旅馆）。

菲，你愿意每天收到一信吗？本来你无需提出也会如此。然而，你的请求却与我最近时常的梦境不相吻合：我寄去的信件，你根本不屑一顾，至少不予答复，而将它们一封封叠起，或者一封封丢弃。即使在我朦胧的梦幻中，你也不应该如此。

〔疑为1914年4月7日〕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最近好些吗？您果真打算为您我而前去参观格利尔帕策纪念馆？我将派遣您这位“可怜的军乐队队员”去充当这纪念馆的向导。

倘若您染有嗜睡的毛病，这恰是健康的征兆。我并不贪睡，却也没有什么益处，因为尽管如此，每星期天12点钟之前也不会起床。部分出于懒惰，部分出于不知所措，部分在于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并非什么更美好的时光），那时我可以一直躺到12点、13点甚至更晚，或几小时几乎纹丝不动。或许，如果我出生在维也纳，也根本不会去参观格利尔帕策纪念馆。对于我的柏林之行（您肯定已收悉我昨天的去信），倘若您已最终决定不打算同行的话，那么您有何种嘱托，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将以极大的热忱和全部的智慧（虽然并非过分聪慧）去完成。例如，代去探望您的高堂、令弟或者别的什么人？转达问候或祝愿？当然不仅如此，而是任何事情，任何事情。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您何时搬家？

〔19〕14.4.7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您星期一的来信和昨天寄来的包裹，我于今天一并收悉。这一来自柏林的动议，实为一大幸事，确实如此！您无论如何也应去柏林。如果我有此种权力，那么这页信笺必定简单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您必须去柏林！”这句话当在您的办公室回荡，并且引起隔壁房间上司们的注意。不管您在柏林曾经有过何种经历——我对此一无所知，也不管您与家庭的关系如何（现在肯定要比过去有所改善），无论如何，您由于接受了目前岗位而获得了补偿。与那座行将破落的巨大村落——维也纳相比，柏林则胜其几筹。由于人们有求于您，您在工作中的地位将明显改善。

您必将理直气壮地回归故里（人们不应放弃这一难得机遇）。无论如何，您在柏林会得到一份更美好、更舒适的工作（告别眼下的上司，您只能获得遗憾之后的解脱）。您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旅行，并且肯定会给您带来欢快。当然，倘若您打算再次离去，那么也总比您在维也纳再行联系为好。正像您离开柏林到维也纳，可物色到更好的职位一样，而从维也纳则甚难，如同您本人也承认的那样。您的维也纳上司吝啬、不通情理，曾经令您吃惊，而此类事情在柏林至少不会如此过分。或许您在那里也会获得更为丰厚的报酬。届时您自己可以提出条件。无论如何您可以同令尊在一起。倘若您必须出面帮忙的话，您可以以更简单、更有效，并且更方便——对所有人都方便的方式做这一切。请您接受这一建议吧！您无论如何都应该接受！请来信告诉，您业已接受。那么，我将打电话祝贺您，也好让那些窃听您的电话的上司们高兴高兴。

倘若您接受，您就有可能复活节去柏林。这样，一方面令尊打算阻止您的理由可以排除，另一方面，或许您也好现在就向公司提出请求。好了，您对此要比我得更清楚。但就接受上述建议而言，倘若您仅靠自己苦思冥想，那么任何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或许会葬送一切。而这种感觉既不能在维也纳的孤独之中持久，也难以使您长期振作起来。千万不能如此。请您接受，格蕾特小姐，请您接受。

我相信，您会对我的旅行，当然不仅仅是对我的旅行表示良好的祝愿。这一信念已深入我心，我已难以再将它分离出来而单独表示谢意。我应该感谢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

如您所嘱，包裹将转交给菲。如果您不能成行，我愿期待您更多的嘱托。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4.8

菲，现在确实有所改善。今天，我等待你的复信仅仅用了四个钟点。然而仍是四个钟点啊。每人都在寻求优势，这是完全自然的。我希望在来信中得到书面答复，而你却只愿给予口头答复，因为口头上你其实无需答复。可是，你是否认真考虑过，这果真属于你的优势吗？你应该告诉我的，当然也应该告诉你自己。你对我所保密的，也当对你自己

保密——我至少希望如此。但你不必如此，为了我们两人起见，你不必如此。

请不要以为我对你要求过于苛刻。我所认为属于爱情而应该做的事情，也只会有益于你。你瞧，我们相处已经一年半。而头个月刚过，我们仿佛已经亲密无间。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相处如此之久，经过如此之长的跋涉，相距却依然如此之遥远。菲，只要有可能，你应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去了解自己。倘若我们最终能够结合，那么我们不应将自己毁掉。否则，对我们两人说来都将是憾事。

至此，我的话与当时在动物园所说有所不同。我承认，你的妥协才使我有可能反思我们两人的事情，当然这也不可避免。但我并不承认事情已经足够明了。倘若你离我而去，我会失去再反思的任何能力。而你离去之后，却也并不存在这种危险。

你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你为何不愿与马克斯夫妇交往。我现在特此说明，我之所以仅作以上假设，因为我也感到尴尬。当然，危险已不复存在。我原来误以为只有马克斯会来，而今天他告诉说不来了。现在仅剩皮克。你最好在8点半左右去阿斯汉旅馆，但需准时，我请求你。

对了，勃洛赫小姐也不来了。我颇喜欢她。

弗兰茨

〔19〕14.4.9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菲没有给您写信。倘若她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我几乎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并就我对菲的了解而言，她没有写信令我不安，我现在甚至宁愿说，我颇感困惑。然而，或许明天我可以从您那儿得到只言片语，告知菲已经给您复信，我将感到欣慰。

我未能得到您的嘱托，即是说您不想通过我了解您的家中情况。迁居本身（即或是4月和复活节）并不妨碍我去造访，任何人也不妨碍我

转达您的问候。当然，在未得到您的首肯之前，我或许只能谎称，我不久将见到您，但却不会在最近。

然而，倘若我认为您是对的，即我不去造访令尊，那么您也应该同意我的看法，即离开维也纳。值得庆幸的是，您似乎已经有意于此。您即使仅仅屈服于我的自私目的也成。但愿我对维也纳的憎恶，不致使您产生错觉而继续留在那里。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祝乡下休息惬意！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4.10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菲莉斯·鲍威尔

亲爱的女儿：

虽然我们业已知晓小儿此次赴柏林的目的，但你们将要订婚的喜讯[194]仍然出人意料。我们今天才获悉此事，亟愿以电报形式向你们表示祝愿。亲爱的菲莉斯，可是我只知道你的办公地点，因此你明天才能收到此电。全家皆祝你们两人幸福，此乃我们的衷心祝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不久将能拥抱你。请尽快把你的亲切来访通知我们。对于你那可爱父母的问候，我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与你亲爱的父亲在精神上紧紧地拥抱你。

你的妈妈 尤丽亚·卡夫卡

我们的孩子代致最衷心的问候。

〔19〕14年4月13日于布拉格

菲，我敢肯定，过去做任何事情从未有过如此决心和感觉，尽管我已做过一些善事和必不可少之事。而我们的订婚以及事后和现在，却是如此。从未有过置疑。你呢？对你说来如何？你可有同感？下次回信，请以答复这一问题为开篇。

近两天来，我甚感疲惫、精力分散、心不在焉、仓促，甚至漫不经心。对此请不要介意。这恰恰表明，我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自己，而总以

某种方式完全在你身上——不管你愿意与否，容忍与否，或者感觉到与否。

当然，我也不想说那些日子很美好，再也没有可能超过之。我们的首夜完全按照我的预料进行，外表如此，内心亦是如此。次日即与乃父谈话，我早已知道，并且根本没有以昨日谈话为条件。我甚至没抱希望谈话还能在平静的气氛之中继续。菲莉斯，我完全相信你，完全相信，你尽可以此为满足。而我之所以一再追问，更多地出于一种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逻辑需要，而并非出于心理上的需要。诚然，如此尖锐地发问是欠妥的。附带说明一下，在上述逻辑背后，也还有些许痛苦的因素。

（勃洛赫小姐意下如何？我刚好收到她的一份来电。电报说：“令您满意的格蕾特·勃洛赫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然而，最恶劣、最野蛮的则是，我们从未有机会单独相处——哪怕仅在巷子里一小会儿，也从未在亲吻中从你那里得到宁静。你本应给我此种机会，但却没有。而我又太漫不经心，以致难以强求此种宁静。订婚的习俗所赋予的所有权利，对我说来却那么讨厌和无用。就目前而言，订婚不啻是完婚之前演出的一幕婚姻闹剧，以取乐他人罢了。我实在无能为力，相反只能感到莫大的悲哀。有时，我也想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尚未同居同一城市。然而我却又不想感谢它，因为倘若我们同居一市，那么我们肯定早已完婚，而无需去考虑什么就业庆典^[195]。当然，无论如何，现在只希望它快点到来。你给我父母亲写信时，或许可让乃母附上几句。届时她自然会被热情邀请。你是否在办公室谈起过订婚一事，并就尽早脱离公司已同公司经理达成一致，已同医生取消合同，并已结束在杂志社的工作？但愿你同意我的请求之一，即工作不要过量，应到户外散步、做操，随心所欲做点什么，唯独不要再承担办公室以外的事情。在你工余，我要让你为我服务，由我负责支付报酬，你愿意多少多经常都可以。我可以自己的签名担保。

弗兰茨

〔19〕14.4.14

〔在信笺旁〕

向母亲和姐妹们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我宁愿握着您的手，而不是电报，那样更加美好。

我在柏林好坏参半，但却按照一种无疑对我说来是必要的情感而度日。一个人不能抱有奢望。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何事会让人如此执著地去做。当然，我仅指自己所认为的必要，而并非菲的意思。

格蕾特小姐，今天我本不想再给你写信，因为我委实太累，在柏林几乎没有合过眼，今天到办公室唯有拼命，请不要忘记，我现在还需要工作数小时。可是，有件事我不能不尽快告诉您，即我的订婚或者婚姻，丝毫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它至少给我带来过美好而不可或缺的机会。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再重复一遍，如果不是已经说过的话：我和菲（作为未婚夫，我所能讲的话）就我们的共同事业而言对您感激良多。但所有一切与此无关。

菲告诉我，您给她寄过一封挂号信，告知今后两三个月内将去布达佩斯。我理解得对否？您不是打算去柏林吗？这二者应作何解释？

菲4月底、5月初来此，您可否也真的来布拉格（或许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当然，她会根据您的计划作出安排。我本想阻止菲信告您此事，因为这似乎仅是说说而已，而您前来的现实可能性却几乎并不存在。当然，我们或许可以一道去参观格明特？您可写信给菲。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4.14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我十分明显而确实地想念您。今天，我去办公室的路上，在过道里首次发现一则办公展览广告（6月20日至29日），我兴奋之极。您会来

此吗？停留一个星期？妙极，妙极，妙极！您打算在此之前，即5月2号、3号就动身作一次长途旅行？当然菲会作出相应安排，届时也来。我明天就给她写信。您肯定也已给她写信。您、我的愿望或许真的可以实现，我们三人届时到格明特相聚。我只是不知未婚妻同意与否。未婚者要自由得多，他们可以允许一切，而无需勉强。

在您的来信中，这是一个何等的新闻哟！您涂掉了一句话，别人已无从辨认，致使另一句嘎然而止，因为它涉及您的隐私？您瞧，我昨日的去信何其必要。您无需跟我叙说，因为这毫无意义，况且我亦不会领情。并且根本也没有理由那样做。我想知道，您生活得如何，您乘坐哪班火车，您涂掉的是些什么。

从最近寄来的明信片看，您似乎又打算放弃柏林。人们无需坐在废墟面前欣赏世界。在洪德凯伦湖畔同样可以欣赏，甚至更为好些，因为它离维也纳更远。难道您不相信？我不知道“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什么。我故意未跟菲谈及此事。她仅仅总是跟我唠叨，令母如何盼望您的归去。菲还要在柏林住一段时间。直到9月份，她不愿过早结婚。从现在算来尚有将近半年时间。

我记得曾经数次讲过某种决心，它只能意会，并且可以赋予我反抗的力量。这种决心表现在，倘若我不与菲成婚，我会放弃这里的工作，或者可能的话，会不计报酬地去度长假，到柏林去（并非因为菲，而是因为柏林及其众多机遇），去当记者或别的什么。格蕾特小姐，您会对此作何评论？

《可怜的军乐队队员》颇有意思，对吧？我还记得，我曾经读给我的小妹听。在此之前，我从未朗读过任何东西。我全神贯注，以防重音、间歇、音调、情感和理解产生谬误。当时，我内心确实油然而生一股超常的当然感。对于自己所读出的每个音节都感到幸福无比。此种感受难以重复，后来我也断不敢再朗读什么东西。

在废墟的草丛之中，您感到悲伤不已？在我看来，这再也自然不过了。我在乡下时也总感凄凉。适应自己周围如此广袤的田野，需要何种力量哟。而适应柏林的街道，对我说来则易如反掌。当然，您在表面上也应表现得安详自如和心平气和。顺致最衷心、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这次要好得多。当然我很清楚，您会写些什么。您曾不只一次地暗示，并且不只一次地尝试欲逃离绞索。然而，它并非绞索，而仅是——现在，倘若您打算松开它，那么我会无论如何用所有牙齿咬紧不放。您甭想松开它。而信札呢？您当然可以拥有过去（但却不会拥有将来！），您为何不愿将它们留给我呢？为何还要作丝毫改动呢？人与对待他人的规则究竟又有何用？今天我仍然要说，我不愿接受陌生之人，同时也要说，对于您将同我们共度的每时每刻，我都感到幸运（当然，时至今日，这个“我们”仍与一则童话差不多）。倘若您不同意，菲将看不到这些信件。何况这根本没有必要，您是何许人，菲早已清楚，或者用不到看信也会清楚。倘若她不清楚，那么信札对她说来也无济于事。

柏林有人如此器重您，您难道不引以为豪？无论如何，对于您那非凡的工作劲头，我颇感惊奇。我本人甚为缺乏此种品德，因此也实难设想其细微之处。然而，我曾听说过，这次在柏林也如此，并且深信不疑，但即使绞尽脑汁，也难以完全同我给她写信的格蕾特小姐对上号，只能感到相差无几。

您为何非要等到8月1日才到柏林不可？为何还要缓期执行？天晓得，在柏林究竟还有谁会您的头颅感兴趣，除去抚摩它之外，您宜及早赶来！例如在大喜的日子，对您说来也可称作欢迎日，即圣灵降临节[196]。

至于信中所提鲍太太（鲍威尔），在我看来，她现在有些可怕，而我在她的眼中则更甚。我同她谈话有如对牛弹琴，而与他人，即使借助某些误解，或多或少尚可相处。我颇喜欢托尼，还有艾尔娜。可惜星期六晚间只见到艾尔娜几分钟，她星期天和星期一将去汉诺威。凡是女人的怀疑目光，我总以为是射向我的。当然，倘若我为女人，我的目光则会更加充满怀疑。即使现在在我的地位，我的目光同样充满怀疑。在女人眼里，我显得时而病态，时而无聊，更多的是愚蠢，但却极少精明。由于判断如此之混乱，相互关系不会太好，即使对于未来的姑爷也是如此。总而言之，他们在我身上没有发现多少可爱之处。我疲惫有加，漫

不经心，心不在焉，有时既心不在焉又过于敏感（此乃鄙人最丑陋最通常的状态之一），有时会毫无必要地为自己的素食主义洋洋得意，仅吃蔬菜，无聊之极。为了洞穿我内心的宁静和言谈举止的必要性，或许需要一种上帝似的目光。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4.16

最亲爱的菲，我仅有十分钟时间，甚至还不足十分钟。时间如此仓促，我该怎么办，该如何下笔？首先感谢你将8月作为脱离工作的期限，该日期不应再有改动。我看来“相当可怜”，并且肯定原本如此，眼下这副模样还是近半年来奋斗的结果。照料对我无用，唯有时间才能救我。你让期限接近的每日每天都有帮助。你向我表示的任何信任和宽容，都将有用，尤其是后者。我们两人（在如此短暂的时刻作出如此刺眼的注释，着实危险得很），我们两人的外表确实截然不同，因此一方需对另一方表现出宽容，必须用几乎是上帝似的、最最高尚之人的情感目光，去看待对方的必要性、真谛与归宿。菲，正因为我拥有这种目光，所以才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每当你的双眸中放射出此种目光，哪怕只有极少的一缕扫视到我，我便会因为幸运而颤抖不已。

弗兰茨

请立即复信，哪怕只有几行字也好。

我能否以某种方式让布吕尔小姐高兴起来。我不忍心听见姑娘的哭泣。

〔19〕14.4.17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致三位叔叔和一位阿姨的信件均已书就。现在，我有幸再给您写信。

您如此赞同我移居柏林的计划，确实妙极。我一定要去柏林，在我看来柏林处处皆好。当然，放弃目前尚有保障的工作岗位，至少现在就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假若我尚孑然一身，大概还能挺住，或者说必须挺住。可是现在已有了菲，该如何是好？难道要我劝她放弃自己所钟爱的美好工作，而同我一道去柏林，或许还要去受罪？如您所知，我的自信心并不甚足。即使拥有过去和现在官员似的经历，仍然未有明显长进。

太迟，太迟。今天余下的唯有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倘若每天如此，对我说来则幸甚。

您的 弗兰茨·卡

菲尚未来信谈及您致她的信。

[19] 14.4.17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读罢您的第一封来信，我便立即意识到应该如何答复您：从根本上看，您并非像来信所述，完全明确地理解菲与您的关系。信件本身往往容易误导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句子均有重点，人们不会忽略至此。您用来概括菲对您的所谓态度的言语，我根本不想援而引之。倘若我果真如此，您肯定会生我的气。那话并非那么糟糕。像您本人一样，它也是好意。那话远不如不久前我在朦胧之中辱骂菲的下流话恶劣（菲是知道的）。然而，您应当收回那话，即使不是马上，也应该在次日。即使菲的信未到，您也应当收回。可是，我上午9点半钟提出的问题，您11点半就来信作答。当然，倘若您问及我对您与菲关系的看法，我也难以给予完全适当的答复。然而这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我也并不知道其他答案，诸多其他答案。

至于信件，您要求我在婚姻前毁掉。这仅是您暂时的意见而已。然而，我迄今尚未成婚，您今后的意见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您还是暂时让这些信件保留在我处为好。它们曾经给我带来过何等欢乐哟。您让我再享受一下保留它们的欢乐吧。此外，请您相信，我们，即菲与我会达成很好的协议。倘若我们不能就这样一件从人情上看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事情达成一致，正如您的来信所说，那么我们哪里还有颜面以同一双眼睛去阅读它们呢？

关于您勤奋工作的赞美，也应该留给我。倘若我处在您的位置，那么在准确工作之前，早已把精密仪器弄得不再那么精密了。还有颁发专利的事情，难道还需要我一加以称道吗？当时在旅馆里，您似乎尽力给我作些解释，可是我却丝毫没有在意[197]。

当然，您至迟应于7月1日抵达柏林！不能有误。在生意方面，您的感觉肯定也会改善：甚至连我也能感到，柏林可以使人强壮，或者我更知道，倘若自己移居柏林，那么也将感觉到那种作用。然而对我说来，风险却很大，因为创作的能力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它像幽灵，来去匆匆。近一年来，我根本没写什么东西，并且知道也根本写不出。近日，根据您所颁发的专利，我也遇到一桩幸事：一篇小说[198]，我所创作的最长的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一年之前完成，被《新评论》所采用，并且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颇为善意的要求。倘若我今年写过什么东西，那么可能就不敢贸然去柏林了。如是，我们的行为将会十分令人绝望：菲将脱离其目前舒适的环境，而被拖入毫无保障的生活中去。您肯定也会承认此点。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信笺边缘〕

最为迫切的乃是我们的晤面问题。

〔19〕14.4.18

致菲莉斯的母亲——安娜·鲍威尔夫人

亲爱的母亲：

现在，我可以对那两天的回忆稍加整理，并且安静而肯定地向你、父亲和你们大家致谢。确实，在那两天里，我仿佛在不断接受馈赠。你们把菲莉斯托付给我，这是你们对我所要求的爱的最伟大之标志。对此，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所有其他事情则无足轻重。亲爱的母亲，你或许对我的某些方面并不满意，并且今后还会发现这样一些地方，但却无法改变。这些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大家都自觉不是完人，更何况在别人眼中呢。亲爱的母亲，但请你不要首先考虑这些，而应首先想到你将菲莉斯给了一个人，他爱菲莉斯不亚于你爱她（当然此乃两种不同的爱），他将凭尽全力给她带来幸福的生活。

现在，日期日趋迫近。大家都企盼着你们的到来，任何拖延将是没有道理的，并将给我带来痛苦。你们的尽快到来，对寻觅住处亦很重要。最亲爱的母亲，倘若菲莉斯在拖延，那么她那是在悄悄地催促你们哩！

向你及所有亲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和亲吻。

你的 弗兰茨

〔19〕14.4.19

最亲爱的人，因为书信而受责怪，这是何等的快事。当然，我本应早给乃母写信，可直到今天才写。我本应星期二立即将书寄给乃父，可直到星期五才寄出。然而首先，我写信根本就不守时（致你的信件并非书信，而是乞求与怒吼），并且手懒。倘若像最近那样得不到你的信息，我的双手甚至会变麻木，连包装一本寄送乃父的书的力气都没有。

至于我是否意识到已经完全属于你？我无需意识到，因为一年半以来就业已知道。订婚与否对此毫无影响。这一意识无需再予强化。相反，我有时在想，菲，你尚没有完全明白，我是多么愿意并以某种特殊方式属于你。然而，请耐心等待，菲，所有一切都会明白，婚后一切都会明白，我们将成为和谐的伉俪。最亲爱的，最亲爱的菲，对此，我们早有准备！在柏林的几个星期日和在布拉格的几天，那种露水关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虽然从根本上来讲所有问题均已解决，或许从我瞥见你的眼睛的那一时刻开始。

每个人的信仰各不相同。我以为你会答复我母，而自己却忘记给乃母写信。你应该写，你应该自我邀请，如何写法？你未收到我母上星期一的去信，她在信中已对你发出邀请，并且肯定非常热情。

我在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雷德·略维〕有个朋友，他在奥地利驻马

德里使馆任职。他来此地，我陪他散了一会儿步。奇怪，现已傍晚，我们走了很多路，由奥特拉和一表妹陪同，途中还遇到过其他人。经过此次不寻常的活动（近年来，我白天只身一人，间或同费利克斯，另一个费利克斯散步），现在坐下来给你写信，我发现自己丝毫无需改变思路，因为在整个散步过程中，在电车上，在公园，在湖畔，在音乐会上，在品尝黄油面包时（今天下午，我甚至还吃过一块黄油面包，真乃怪事不绝！）以及在归途，我总在思念着你，思念着你。我与你在思想上已经结为不可分解的整体，来自远方的犹太法师的任何祝福都难以与她媲美。

明天是星期二，我即去报馆刊登启事。经理明天结束旅行返回公司。我不希望报纸启事出现在我与他谈话之前。后天，你便可以看到报纸。当然，几乎所有有关人士其时都已知晓。你的亲友是怎么说的来着？他们都是从理发师那里听说的。除此之外，我打算今后每信结尾都写上：你应快来。菲，究竟何时，何时？

你的 弗兰茨

请即告我关于头痛之事！

〔19〕14.4.19

我的最亲爱的，直至傍晚我才归来。此前我在毫无目的地漫游，在网球场，在小巷里，在办公室（似乎那里会有你的信息），现在才见到你的来信。倘若仍得不到你的信息，我将任何事情也干不下去。我甚至无力将小小的启事送给报馆，尽管今天已同经理谈过，现可刊登启事。然而我却不能，此外《柏林日报》也不可能刊登。

我甚至已不记得自己最近在忙些什么。好在并没有什么特别要事。如同今天一样，要谈论非重要事情已经太晚。没有你的日子，是何等难熬哟！

我当然同马克斯在一起，甚至每天都在一起。但据我仔细观察，我们之间已非像过去那么亲近，虽然那种亲近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从未像旅行时那样亲近。稍候，我马上附上两篇关于我们旅行的小文章，其中可读性较强的一篇出自我手，另一篇味同嚼蜡，乃属两人合作[199]。我并不像你那样乱开空头支票，你曾许诺给我母亲写信，为你的上司和《柏林日报》作广告，取消女医生与我签订的医疗合同。我间或

也开空头支票，但并非无边无沿）。由于我的缘故，我们（为安全起见再次重申：马克斯和我）之间的关系大不如从前密切。他虽然无故，但并没有觉察。例如，他将自己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蒂休·布拉赫通往上帝之路》还题赠给我[200]。作品内容乃是其亲身经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自我折磨的故事。而我的过失并非本来意义上的过失，或者仅是一小部分过失。在马克斯看来，我并不单纯；而我在单纯之时，他却又错误地理解于我。近来，外部对我流传诸多喋喋不休的议论（你根本不了解此种恶习，本人也未曾沾染，因此我爱你），我变得日趋内向，日益腼腆起来。由于闲言碎语的侵袭，即便正当的趣话，我也难以挣脱内向。这也并非真正的腼腆，而是在他们身边颇感不适，难以同他们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因此，我总以陌生的目光对待他们（你懂吗？）。我敢断言，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默默地若即若离，但却也没有简单地迫使相互关系终结。两位舅舅来此，其一来自迈恩的特雷施，其二是一名布拉格人[201]，真乃怪事，只是不致使你因为开头的句子而担心，我必须就此打住。不必要的担心，请相信我，我们相互信任，对吧？为了不至使你担心，现在我把话说完——我愿意尽力去用即使令自身难堪的力量全面理解他人。我能够做到此点。当然，倘若我不写出来，那么这个“能够”对我说来几乎可以构成某种危险。因为我拥有你，所以对我也就没有危险可言。最亲爱的，对你说来也应如此。

弗兰茨

不要头痛，千万不要！

取消与女医生签订的合同！即来！

请准备嫁妆！

〔19〕14.4.20

菲，愚蠢，病态，倘若收不到你的来信或者一丁点儿消息，我会无所适从，甚至也懒得将启事送报馆。我并非像过去那样激动，我们已经融为一体（如同《柏林日报》大肆渲染的那样，但我内心却轻声而更加坚定地祈祷但愿如此）。任何消息都没有倒也无妨。倘若你能够利用百忙的喘息之机真正地喘口气，而不去用来写信，却也是好事。可是尽管如此，启事我明天才能送去，星期五你就可以看到[202]。菲，我们之间并非没有商量。根据自我感觉，报纸与我们的事情并没有多大关系。（柏林）日报刊登的启事甚至有些荒唐。在我看来，关于招待会日期的

启事似乎在说，圣灵降临节星期日那天，菲·卡将要在杂耍剧院上演一场“8”字形游戏。当然，两个名字却亲热而和谐地并排在一起，漂亮之极，并且理应如此。

时间已经甚晚。你的挂号信我9点才收到，肯定是两点过后才送到办公室的。致以最衷心的问候，感谢你的吻，但我却难以回报。倘若远距离亲吻，那么即使吻再热烈，却也会坠入黑暗和无聊，而并不能触到远方的可爱的唇。

弗兰茨

〔1914年4月21日〕

致格雷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雷特小姐：

我并未完全明白您所描述的对人一般态度的意义何在。您说的颇为肯定，并且颇为笼统，但它既不适于一般，也不适于我，仅仅适于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则始终纠缠着您那可怜而不安的脑袋，对此我却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对我说来，您所讲的根本不对。在我面前，您的态度如此准确无误，此乃您、我共同努力的结果。您仿佛并非他人，而是我自己充满独立、美好、可爱生命的天才良知。请您相信我！或许，您通常总对自己表示失望。或许，您太不考虑自己，待人过好，过分好强。有时让人看来确是如此。不少人肯定应该感激您。难道您也将他们划为第三者？那样，我需当心，莫要去感激您。

我最近的信件决非“要尖刻地算总账”，决非如此，而仅想紧握住您的手，别无他意。您自然也是明白的。您与菲的关系不甚明朗，责任并不在您。当然，前提乃是关系确实不甚明朗，而并非仅是我愚蠢而警惕的眼睛的观察。

关于柏林一事，您是否已在塞莫林作出了决断？明确而毫不后悔？即您决定不去布达佩斯？5月2日将到布拉格？格明特似乎好得多，我尚未写信告菲。困难可能在于菲只能住几天，抵达格明特当天将不能安排参观，还要过夜，母亲只能留在布拉格，我可能又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旅行只能定在星期日，而这天我父母亲恰恰全天没有任何安排。——无论如何，在格明特将会过得美好而自由。至少迄今为止还是值得

考虑的。

您对那“故事”（《变幻》）还喜欢吗？我并不知道您讨厌《司炉》。不管怎样，“故事”是喜欢您的，对此请勿置疑。此外，女主人公芳名格蕾特，至少第一部分可能会令您尴尬。可是后来，由于痛苦不堪，她便自暴自弃，离开需要她的人而去，开始独立生活。这不过是个陈旧的故事，一年有余，当时我并不怎么珍视格蕾特这个名字，随着故事的发展我才学会了这一点。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此一形容词理应足矣，因为人们并非漫无边际地发信，形容词正确与否尚属其次，重要的是收信人不应有误）。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4.21

我的亲爱的菲，所有信笺都已用尽，只有你来信的这截纸片。你，我想通过订婚给你创造更多的闲暇时间，谁知却使你的工作明显增多。非常遗憾！我收过乃父的一封非常友好的来信；至于你给我父亲写的简信，我母亲感到有些担心。这都是些什么琐事哟！快来吧，我们成婚之后，此种局面定会结束。我提过的那套漂亮住房，据说2月份方能腾空，当然也还不确定。一套漂亮别致、地势便利而价钱适中的住房，优点和缺点兼而有之，已预订至5月2日晚。即你最迟须于1月1日抵达布拉格。

你认为格蕾特小姐的来访如何？

弗兰茨

〔19〕14.4.22

这是我今天开始写的第三封信，今天，你那位来自布列斯劳的相识总在不断干扰于我。并非因为执拗，而是出于某种必要，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尽管他的一帧相当大的照片挂在他的闺房，但我却连他的相貌也记不起来。相反，我却不能忘记其人。这其中有你的部分责任，因为你很少明确地谈及他，而更多的则是暗示。

今天，我未收到你只言片语，这似乎并不糟糕。更为糟糕的是，最近九个月来，我根本没有收到你安安静静地写下的哪怕一页信笺。感谢

你给父母亲写信，他们二老深感足矣。我在此信中再次发觉你们的语言何等奇特。诸如“可怕、巨大、惊人、出色”之类辞藻，你们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宁愿舍弃能够正确表达意思的“很”，取而代之的则是不固定的、有保留的“相当”。

菲，星期日你将收不到我的信，请不要生气。因为我不愿直接往家里寄信。过去作为家庭成员之外的陌生人，我可以写信，甚至可以开玩笑，不过那些玩笑并非出于善意。可是如今只能开开善意的玩笑，而恰恰是善意的玩笑，却令我为难。

你致我父母亲的信，尤其是你的来访日期令人感到失望。怎么？你打算5号才来？为何5号才来？你的上司业已返回。房间如何处理？我费尽周折才预订到2号的。

我今天都告诉你一些何等沮丧的消息哟！至少让我吻你的手吧，也好把我的脸藏起来。

弗

〔19〕14.4.24

最亲爱的菲，有两件事情你没有提及，尽管你知道，这两件事情，因为你（现在将我撇在一边！），恰恰是因为你而使我非常挂念。其一，我迄今根本没有问及，他竟是乃弟。你曾在一封来信中声称，我可以在柏林听到详细情况。然而，我任何事情也没有听到，只是看到一封信，并且从中推断（我是指从信的内容推断），关于你的事情，我重复一遍，仅仅关于你的事情，你对我隐瞒了多少。然而现在你可以继续保持沉默。

第二件乃是你那来自布列斯劳的相识。我并不害怕坦率地询问，因为如果它仍是一个在起作用的幽灵，那么它会不请自到；如果它已不再生效，那么即使我千呼万唤，它也不会再苏醒过来，请不要让我再去等待交谈，因为你过去的此类许诺也都没能兑现。坦率地说，或者坦率地告诉我，你为何难于启齿。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或者出于自身的弱点，或者由于听者的弱点，许多事情不能说出口。正因为如此，人们更应该有义务，本来可以讲清楚的地方就应该讲清楚。那帧照片完全可以照常挂在你的闺房，然而你也应该让我在自己的卧室里心平气和一些。

所谓炫耀力量，那不过是你对我有些许误解而已。此种表现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你们一方面选择了一些貌似庞然大物其实无非空话（在姑娘们看来，它们似乎气喘吁吁，好像小嘴里窜出来的地老鼠），另一方面则偏好模糊而捉摸不定的字眼。这样，欲速则不达，相反却错过了正确的表述。

诸多来访肯定给你带去不少麻烦，却也乐在其中，对吧？各得其所，你接待的是客人，而我接待的却是幽灵。

我亦收到不少祝贺，当然肯定不会有你多。第一批业已拆阅，迟到者则置之一旁。倘若对他们和我们说来皆属自然之事，那么贺信也就无须一一拆阅。附寄的名片请转给你的婢娘，她声称与该男子相识。

你星期五抵此，当属确定无疑。如你打算勘查房间，那么这是最后期限。房间很漂亮，假如参观那天天气也像现在这样，你肯定会接受下来，否则可能会产生怀疑。那幢房子远离市区，非常自由，周围绿地环绕，三个房间，两个阳台，一个平台，一千二百克朗，房租昂贵，超过我们的支付能力。我如此自信，仿佛对我们的支付能力了如指掌。

你是否有兴趣抽出一天工夫去格明特？我的兴趣倒蛮大。

请把乃妹艾尔娜的地址寄我！乃母对我的去信可满意？你可收到（勃罗德的）《妇人当家》和韦尔弗的作品？

〔19〕14.4.25

〔疑为1914年4月26日〕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小姐：

好吧，我们暂且不做定论。菲到来之后，让我们时时刻刻抱着希望恭候您。迄今为止，此种希望皆成泡影，但愿这次不致如此。关于格明特一事，菲尚未回音。她可能1号或2号来此，当然我还会写信告您确切日期。

现在，您移居柏林的决心看来已经下定。不过，促使您做出目前决定的原因不知是好是歹？我想，事关共同旅行，现在不能犹豫不决，而肯定要结伴而行。能够在火车包厢与您对面而坐，无须言语——因为我不擅长于此，然而能够坐在那里，颌首或摇头，正大光明地与您握手，自己也感到温馨。何等令人心旷神怡！祝您一路平安！

告别之时，您可能会喜欢上维也纳。请您不要忘记格利尔帕策纪念馆！此外，我并不相信，告别时的伤感，是因为人们曾经喜欢过所要告别的東西。或许，伤感的原因更多出于相反的情感。即人们感到分离过于轻率，自己也被轻易地离别。平日里所建立的外部联系，无意之间仿佛几乎变成了自己的内在联系，而现在却忽然变得如此无足轻重。人们伤感地回忆起业已证实了的浮浅联系，并且预见到将要被证实的此种联系。自由与联系，两者缺一不可。然而两者却各有其位。倘若它们的位置被颠倒，那么其中之一将会大为光火。我本人即常如此，不过这并无大碍。能够离开维也纳，您将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令弟所援引的注释意在何为？注释颇为特别。他们是柏林的何等怪人，竟然劝阻于您？我对您知之何其之差！我想知道的何其之多！甚至连您所接待的来访也令我好奇。

您所提建议，我很需要。不过，书面上却难以实行。您不了解住房，怎能对此提出建议？菲用我那几个克朗几乎无法度日，您怎能对其使用提出建议？当然由于平时比较注意，这不会给我带来丝毫担忧。我只是缺乏这方面的幻想。或许平日忧虑过度，便再也不能容忍更多的苦恼。此外，与过去相比，我的头疾已经明显减轻。您呢？您不久之前还在叫苦，现在可好些？您仍在食素？您现在肯定很少再读蒂尔海姆。您是否还要去特普利茨？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4.26

菲，你误解我了。关于布列斯劳的相识，你所告诉我的，我并不感兴趣。他姓甚名谁，婚姻状况如何，与我毫无干系。他本人也根本与我无关。

关于乃弟，你似乎间接地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消息。为了我们大家起

见，我亦感到高兴。我本期望你已能告知你抵达的准确日期。倘若你星期五不来，那么将会失去一处住房。你不在场，我不愿负责接受住房，因为它那讨你喜欢的优点，可能会平抑其不足之处，例如它距离市中心较远，你必须生活在捷克人中间，等等。切盼尽速成行。明天，我将到另外比较舒适的地区，再去物色其他住房。这样，你就可以无须花费太大气力而择其最佳者。昨天，我看过一处三间一套的住房，租金仅为七百克朗，位于市中心，直接在温策尔广场顶端的博物馆后面。不过，住上这套房子有时会做噩梦。先从楼梯说起，各种气味扑鼻；然后需要穿过黑洞洞的厨房；一堆孩子在墙角哭泣；窗子装有栅栏，闪烁着铅色与玻璃的幽光；多种害虫躲在洞穴里期待着夜幕降临。在此下榻，人们只能理解为避难。上班不在这里，犯罪也不在这里，而在其他地方。这里只可栖身，却又几乎无法居住。菲莉斯，我们不仅要看希望得到的住房，而且也应一道去了解此种所在。

弗

[19] 14.4.29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您究竟在为何人备受折磨？并且如此沉重，您令我难过，您平时不总在关心我吗？在您面前，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只有双重纯洁、无泪而又跳动在我们力量极限的幸福：有一个人，他忠诚于对方，自己也得到忠诚，那么他自身是忠诚的，并且完全可以加以利用，而自己又不会化为灰烬。

您的来信写得如此潦草，我并未完全看懂。倘若有人愿意在柏林接收您，那么就应该为您提供在那里安家的可能性。您的全家都在那里，这当与任何人无关。可是，如果您必须立即开始工作，尤其因为您仍在同一业务部门，那么人们本来不应如此反对您提前，即大约在圣灵降临节前一个礼拜离开维也纳。格蕾特小姐，您是在何种场合看到那封信的——而不是书就，其中宣称：你现在在何处，就应在何处——

总而言之，现在似乎可以这样说，圣灵降临节期间您将不在柏林。在车厢里，坐在我对面的将是我的父亲。他和我都将感到遗憾。糟糕！

糟糕！在柏林，我只能用自己的四肢来上演一场独角戏，而没有您的帮助（菲将忙于她自己的作品）。事到如今，我必须死心。令人欣慰的是，您将终于摆脱维也纳的狭隘与无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重新获得对自身的天生乐趣。或许从根本上说来，您我两人的处境并没有多大区别，对您说来仅仅更加突兀，您并不完全适应，但最终将为您所出色地突破。

圣灵降临节期间，您可能不会到柏林来了。对我说来，这一坏事或许可以变成好事，即您现在应该与菲晤面。当然，菲何时来此，我尚不得而知。原先估计星期五，现在却又有怀疑。昨天，我收到一信。她在来信中写道：“这期间格蕾特给我写信，称她不能去布拉格，因为她将于6月1日离去（漂亮得可怕的柏林方言！）。可是，我将于明天再给她去信。”倘若菲不是弗的话，您应该在今天收到一信，其中也应该谈及格蒙特。对此，菲尚未写信给我。无论如何，一俟得知菲的准确日期，我将发报给您。然后，您就可以爽快地回电：“我来也。”我便会飞快地在菲下榻的旅馆里为您预订房间。

当然，我很理解，此行也将很辛苦（星期六来，星期日返回，难道别无选择？）。除此之外，还有我所不能完全帮您释去的烦恼。因此，不言而喻，您将受到我更加周到的接待。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您去否特普利茨？或许柏林的公司会赴布拉格参展？

[19] 14.4.29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室内已无其他纸张，完好纸张都已用尽。不过，这正合我意，因为我不是想给您写信，而希望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超越那数百公里的距离，与您亲近。

莫非我被误解？非也。尽管如此您仍然不想来此？所有反对去格明

特的理由，则正是主张去布拉格。倘若鲍（威尔）夫人不能容您——我本人倒没有这种感觉，那么我们两人之间却又增加一个新的共同点，然而却构不成影响您来访的障碍。如果您能来，我本人将会感到非常高兴，菲肯定也是如此：她已经以极其喜悦的表达方式，向我通报了您的来访。我尚不懂得如何正确表达，但有时对我说来，您的出现从形式上看也是必要的，倘若菲初登我家家门。当然，您有足够的理由加以反对：长途跋涉，与陌生人寒暄，虽然为数不多，但总归要同一些人交谈，还有其他难以逆料的琐事。我并不要强求于您，但必须强迫自己割舍您。或许菲有更好的主意，她尚未曾与我谈及格明特的事情。倘若她要去，我当然必须随行。

现在，菲的来信比较正常，虽仍觉少，但却每天都有信来，今天除外，今天尚未收到任何东西，可是昨天——就此打住，天色已晚。此外，数小时之前已经搁笔，现却收到了菲的来电。在一定程度上，她仿佛想在最后时刻抓住我那只写下抱怨之手。天已太晚。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年4月底〕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一对新婚燕尔夫妇处于极其荒唐的匆忙之中，四处奔波，甚至为着寻觅住所。然而，我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今天不写信问候您。您所寄来的爱与美当中，您的玉照最为可爱而美丽。我发现，我已完全忘却了您的容貌。从那一刻起，您的容貌在我的记忆里完全模糊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合成了一个新人的面孔，而这个人对我说来如此重要，因此我认为，他的面孔如何则无关紧要。现在面对玉照，上述一切自然也就根本不复存在。倘若得到您的一张玉照，我自然高兴。既然仅有一张，我则要考虑您与那两位小姑娘究竟摆在何处为宜。并非出于什么感激，那将十分可笑，而是出于自身的冲动，我将那张斜照的丑脸也放在旁

[203]。

今天就此打住。可以跟您讲述的事情很多，苦楚也不少，幸亏您没

有在场，您没有出席。倘若您来此，此种复杂心情仍会产生。正因为如此，您未能来此，我原本相当伤心。当初实应加倍约请您才是。昨天下午，我们给您打电话，但您的办公室已经关门。

明天或后天，我再写信给您。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5.3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玉照收悉，它们就在我的面前。在纪念碑前面的那张最美（您竟然如此疲倦地倚靠在邻人身上？），“孤独之路”尚有性格，其余皆仅为辅助之物，并非帮助。然而，所有照片对我说来都十分珍贵，请您相信此点。您这是在哪个漂亮公园？抑或别墅？总的说来都很有趣。这是您的女友？

太迟，太迟。菲今天已经返回。明天我会多写一些。对于些许琐事，我并不感到不幸。过去我可曾写过此类东西？我唯一感到不幸的是没能立即向您道谢。否则，虽然成不了“最为幸福的新郎”，那不可能，那不可能，最为幸福的新郎仅指那些也对自己感到幸福的人们。不，不。

明天再见！

您的 弗兰茨·卡

〔估计为1914年5月5日〕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不管我以前一直是怎样的，总之，目前我涣散怠懈。每天都背着手，在公园或小巷中徘徊，然后回家，吃您的那些鲜美的水果，又出门去接着找房子。租下一套很糟的，于是担心再也摆脱不掉。总是喜欢上

一次租到手的，不是试着习惯新的房子，而固执地喜欢以前的那套，结果不可避免地被扫地出门。所有人都将我从第一套、也是最漂亮的那套房子中逼了出去，我自己将门在身后关上。

摆脱新房子的努力又失败了。且不说这两套房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本身的结构就相去甚远。我租下的这套以厨房为中心绕了个四分之三的圆形；而我想要的、并早已熟识的那套，则是宽阔敞开地朝向东面。会成功吗？我准备最后一试。您将在此信中知道结果，都迫不及待了，是吗？

亲爱的格雷特小姐，应该再聊些什么呢？没有什么新鲜事。菲莉斯看上去挺好，噢，是的，她很开心，看来对这里感觉不错。我的家人们似乎比我更喜欢她。很显然，柏林相聚的那段时间以来，您同她的关系没有丝毫的改变。您说您观察事物很细致，可这次看来并非如此嘛，否则，您怎么会对菲的缄默感到惊讶呢？对菲的缄默不应就事论事，是其本性使然。如果我们爱她，那么无论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都必须爱她本性的全部，而我们也准备这样做。我不想再多谈此事，否则就扯远了，不是因您——您知道的——是因我自己我不想就此再多说什么了。

真高兴，终于摆脱了那套环着厨房的房子。不过，那套楼层极高且绝顶漂亮的房子还没到手。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壁纸很糟，利息高，没有佣人住房，只有一条通向房间的走廊等等。正当我想着这一切的时候，邻居人家似有妖魔开始在另一个鬼怪架起的钢琴上卖力弹奏，空荡的房里顿时回响不绝。没有比屋中回荡的乐声更恐怖的了。于是，我又缓缓地走下那二百个台阶——也许是三百个吧。

您那里近来有什么新鲜事吗？或许我误解了您上封信的意思，还认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呢。对我头等重要的是，圣灵降临节期间或节前您是否能来柏林？这之前是不是还要去特布利茨？

钟敲9点了，想快把信送上火车，可它却内容空洞。别生我的气，我只是有点感觉像是在漩涡之中，却并不想脱身出来，在旋转中让头微微昏沉地低垂着，这感受难道不是比完全实实在在地站在地上更好些吗？

您的 弗兰茨·卡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每当我看到，您为不能理解我目前的状况而不安，而这正是因您天性善良所致时，我就会感到很沉重。的确，我理所应当去做一个幸福的人，而菲则自然是这幸福中最重要的部分。有一类的不理解，比如我对某些事的不理解，会演变为厌恶，只是这不会发生在您身上。虽然我没有阐明理由，但也请您相信，如果我说：“一切都会轻而易举地进入最佳状态。”那么，事实上的情况只会比我说的更加乐观。这甚至与我从经验中悟出的我的人生基本规律相符合。迄今为止，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一切，但并非唾手即得，无一不历尽曲折，甚至往往是在回程的路上，在最后的努力甚至是最后的关头中。这成功来得不算太迟，但又几乎是太迟了，那一直是心的最后一次搏动。而且，我也从未得到我想得到东西的全部，又常常不能保留曾经拥有的一切；即使拥有了，也往往不能够把握它们。但是，我又总能得到许多，总能得到最重要的部分。这些人们自己找出的规律就其本身来说本是没什么意义的，可它却能反射出人的性格，特别是因为这规律一旦被确认，人就会受其支配。还要说的是，您将会亲眼目睹我们的悲欢离合，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结婚前不短的时间里，您必须同我们在一起，而且从现在开始。因为您现在无法享受假期，所以决定冬天放您的假。您别想逃掉。如果我得到了上封信中提到的那套房子，我们就有足够的地方，我们就去过美好的日子。为了能监督我，您要握着我的手，而为了能够思考，允许我也握您的手。

办公室的同事怎么能那样对您！真是厚颜无耻。今天您本应收到我的一封信的。但也好，同他们分别您不会感到难过。可也许您同您的女友们难舍难分，您是有女友的。

关于哈特^[204]我想说两点，这是事实。第一，我不喜欢他。他早期曾写过不少好东西，我读过的这个中篇即出自这个时期。弗劳伯特的那三个中篇也译得极好，起码符合我当时的口味。但后来他做了许多有害无益的事，且至今如此，所以我不再读他的东西。第二，对我来说，您所领悟到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因此，源于您的一切对我也都是宝贵的。

家庭中的晚间时光是否也是一种特殊的陈设？我现在一心只想着相见的那个日子——圣灵降临节的星期一。

顺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三茨·卡

〔19〕14.5.8

另外，您读法语作品吗？格利尔帕策纪念馆呢？

〔信纸边缘〕

最好将信寄到我办公室，否则它往往要在家中的书桌上空等很长时间。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有那么累吗？居然打算在那个临时住处再住三个星期，而且还睡不好觉。太照顾房东的情绪了吧，怎么不多想想您自己。我感到不安，为您不平。

感谢您去了博物馆，我本来倒也并没想要再了解些新东西（可实际上还是有所收获），我想知道的是：您到了格利尔帕策纪念馆了吗？您是否由此找到了我同那屋子之间的某种切肤的联系？而其他的感受我想就不会再有了，至少不会有很多，更何况我没有亲自前往，只是从您那里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情况。您寄来的那张画上的房间是真的那间还是市政厅的那间？那的确是间漂亮的屋子，在里面住一定会很惬意，在夕阳西下时分斜在躺椅上睡去——很舒服。对了，我一直有一个无法实现的心愿：坐在一扇大窗子前的桌子边，窗外景色宽广，在太阳落下时静静地睡去，感受不到光线及景物的干扰，无声地、均匀地呼吸。这是什么样的心愿呀！我的表达太笨了！不是这样的。

读完《可怜的军乐队队员》之后，您自己是否也很想看一看那屋子？他的命运真可怕。如果厄运被我们摆脱，在我们周围徘徊，那么这厄运一定像他。每一个不幸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他是活生生的不幸的化身。下面是他日记或是信件中记录的一件事：他们的婚约早已解除，只

有那些愚蠢的亲戚们还在认为，有朝一日他们还会结婚。卡特琳娜早已年过三十。有一天晚上格利尔帕策像往日一样去姐妹家串门。卡特琳娜待他很好，他就将她搂到了怀里，他这样做多半是出于同情。而其他两个姐妹大约是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一下感到，自己的心中完全没有她，他只是在勉强自己，想在对她并不深刻的爱情中沉湎下去，但他能做到的，只是将她搂在怀中，一会儿又放开。他这样做又不仅仅是出于同情，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努力和尝试。更令人恼火的是，他清楚这一切，却还是这样去做了[205]。

我的上两封信您一定已收到了？我想知道您将在哪里度过圣灵降临节。您问：我们什么时候见面？这样看来，您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真是这样就太好了！

您想想，我还没有房子呢。我已经在考虑只租两室一套的，市内的房子都那么贵，而开始一段时间，F.应住在市内。您的意见呢？

我手头有给恩斯特·魏斯的一部新小说的手稿[206]，和《战舰》一样精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您想先睹为快吗？最近您有时间吗？多半没有，最后再问一遍：您读法语作品吗？

即致

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5.12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牙痛显然表明，在维也纳这段时间您是够倒霉的，连这种事都碰上了。但也说明一旦您离开那里，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除此之外，牙痛就只有害人的作用了。为什么您要忍受这种无谓的折磨？至于您提到的失眠和“头昏脑涨”又是怎么回事？对此我目前可是深有体会，而且看来一时是无法摆脱了。不过那最最痛苦的牙疼我还未曾经历过，所以，当我读到您信中的有关描述时，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束手无

策。您是怎样治疗的呢？饭后要刷它们吗（很抱歉我这样同一位女士说话，但我想，由于牙痛，她已不在意形式和别人礼貌与否了）？那些可恶的牙医又是怎么说的？一旦你有一次听命于他们，就必须一直忍受到底。我相信，菲因有几乎是全副的金牙，所以不必受此痛苦。您是否也能用这种办法来解除痛苦呢？说实话，最开始时我的目光总是尽量避开菲的牙齿，那光灿灿的金色和陶瓷的黄灰色使我惊恐（在那不恰当的地方闪出的光亮真如同地狱之光），后来，只要还能忍受，我便有意地去看，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为了折磨自己，以使自己最终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在有些不理智的时候，我甚至问过菲，问她是否为此感到羞愧，也幸亏她不会如此。而现在，我则几乎认可了这一点，并不只是因为习惯成自然，从视觉上讲，还真是完全谈不上习惯呢，但我不会再会希望这些金牙不复存在了——我说的并不准确——其实从前我也不曾这样想过，只是现在它们似乎挺适合我，那么精细，作为一个明了的，令人愉快的，总是被呈现的，不会被视而不见的人为的错误，它也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十分可怕的健康牙齿更能使我与菲接近。我不是一个为自己新娘的牙齿辩解的新郎，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地表达出我想说的，此外，我还想给您打打气，如果没有其他方法的话，至少还可以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治住牙痛。不过在您到柏林之前最好还是忍耐一些。

请您原谅这封信潦草的字迹，前天不小心将右手拇指切伤，伤口很深，血流不止，竟接满了一个小罐。而后，我做了让伤口自然愈合的处理，即没涂药膏也没包扎，这样虽然愈合的速度会慢上十倍，但效果却要好一百倍，不会发炎，不会肿胀，你会欣喜地看到它慢慢地长合。

在您准备动身的这段时间，我看最好还是不要给您寄那本小说了。另外，您似乎理解错了，还只是手稿，正式出书要到今年秋天，但如果您还是想看，我当然马上寄出。圣灵降临节看来是见不到您了，不过可能会有替代的：我马德里的舅舅6月初会来我这儿，我可能会同他一道再去柏林，但只待一个星期日。如果是这样我就能见到您了，我再把魏斯博士介绍给您，好吗？

房子已经有了，三间一套，朝东（早晨有阳光），在市中心，煤气、电灯、女仆住房、浴室俱全，房租一千五百，这是优点。缺点是：在五层，没有电梯，窗外是丑陋且喧闹的小巷^[207]。您肯定会了解这一切的（因为您已接受了邀请，为此请允许我吻您的手）。

即致

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5.16

〔信纸边缘〕

是否已经可以给穆奇寄本儿童画册了？她有多大了？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昨天我还认为马上就会过去的事，竟变得这样严重起来。您是躺在家里吗？都做了哪些治疗？治疗时一定很痛。医学只知道用疼痛治疗疼痛，并美其名曰“战胜了疾病”。您的信我今天才收到，昨天我们这里放假^[208]，只送一次邮件，否则我肯定已将手稿寄给您了。明天我会将其寄出，但我怀疑牙痛时是否适合看小说。满嘴疼痛，并且要如此挨过每时每刻，真是太可怕了。您的两位女友还去您那里吗？鉴于您目前的状况，恐怕还要在那临时住处再住一段了。

我的上司要去维也纳参加一个会议，要去十四天，我想把对您的问候写在他后背上，让他穿过彼波巷和格拉斯巷来回走几趟。但现在这也许徒劳的，因为您总是待在家里，也许那个胖女人（我拿不准这个词写得对不对，还是从您那儿学来的），会告诉您，有个男人在楼下巷子里溜达来溜达去，后背上满是对您的问候。

现在已经很晚了，想想看，很久以来，我第一次睡了整整一下午，比过去的三百个夜里睡得都好，夜里我总是睡得很糟。

关于手稿我还想多说一句，您不要把它借给别人，这不是针对您的，没有这个必要，但在魏斯博士那方面，我有义务提醒一句。

致衷心的问候，并祝一切病痛早早痊愈——比任何人都快。

您的 弗兰茨·卡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您的牙痛已经好了，这真让人高兴，那么，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平静地回过头来谈论它，你也可以平静地来听了。每一个病人都会觉得健康人都是那么迟钝，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医生出于职业要求尤其是这样，您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但尽管如此，也请您不要剥夺我谈论此事的权力。有一点我能肯定：火车上的空气是不会使健康的牙齿疼痛起来的，健康的牙齿只有在火车的空气中才会感觉良好。如果牙齿闹毛病不是由于疏于保护的话，依我的经验那就一定是因为吃肉的缘故。人们坐在桌边，一边吃一边又说又笑（我至少还能够以不苟言笑来保护自己），而这个时候，牙缝中的那些细小的肉纤维便开始腐败，其程度并不亚于夹在两块石头间的一只死老鼠的腐烂。只有肉才有很多纤维，往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它们搞出来，而且还不能做到彻底和及时。要想完全瓦解它们必得有猛兽的牙齿，还需将它们磨尖锐，排整齐。

但最终，这一切也都无济于事。您还没去奥博策巷[209]吗？现在正是蔬菜上市的季节，为什么还不去？如果是有关他人的事，如格利尔帕策纪念馆，您就很友好地去做；而如果涉及您自己，您则既不友好也不做了。

您百般努力，终于进了利希滕施泰因画廊，这使我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您拥有自信心，依您的性格您是应该具有这样的自信的，否则在那种情况下，您就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我现在十分客观，并不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进行评论）。当时您对自己说：画廊关门了，这太不公平了，您，只您一个人，也应有权力参观这画廊，而您就这样争取到了这个权力。我不知道如果换了我，会不会有能力为我或为其他人说服别人放我进去，但我知道我是不会有这样好的主意的，甚少不会想得天衣无缝。所以要是我的话结果肯定比您的要糟。

今天，我已给您寄出了那本小说〔《战斗》〕，寄到那个地址去了。魏斯博士那边您不必担心，万一有什么不妥的，我也会自己先行解决的。但我没发现有什么。他是一个可亲、可信的人，在某些方面——只是在某些方面——十分理智，且高兴的时候热烈、活跃。他还是菲的

故人。为了让您高兴，我毫不犹豫地撕坏了一本菲舍尔出版社的书目（有些夸张了，那张照片很容易就撕下来了），现将魏斯的照片寄给您[210]。他的眼睛并非如此凝滞，戴惯了眼镜的人，一旦把眼镜摘下来，就会由于惊慌而睁大眼睛。

即致

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5.18

这里的天气同样很好，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充分利用它。这种天气里本应躺在森林中的。但也没有谁像你一样，在宝贵的星期日下午同爱米莉姨妈躲在屋里商量房间的布置，竟如此地浪费这大好的时光。如果真的能商量出个结果，尽快完成房子的布置，使我们能早日住上房子的话，那么如此度过星期日下午的时光倒也不算可惜，但事实恰恰并非如此。

这样的天气里，我们房子的缺点更加明显了，而这房子我已租了下来。明年夏天看来必须搬走。冬季这房子可能还很不错，被关在房中，暖暖的，有充足的阳光和空气。但与其他季节就不怎么样了：窗外看不见绿色，只有一条喧闹、杂乱的小巷。房子位于巷子延伸出的一个空场旁边，总能看到对面的住户，别人也总能看见你。因此，至少应该为那两间临巷的房间准备一样家具，这家具在别处是用不上的，什么家具（此为机智问答题）？

我还会再画一些草图，上次画的仍可以参考，只是你不要让表面的形式妨碍你的思考，妨碍你完全进入其中，你只需设想你从图上的那些房间走过，倚在房前等等，你就会完全能够想象出房子的样子。要想更详细地知道，最好来布拉格一趟，亲眼看看这房子[211]。关于我手指的情况暂且保密[212]，你只能从我的笔迹中试着去了解了。但我已经可以给你母亲回信了，我不该拖了一段。

出于信任（既是对你也是对你亲戚们的信任），提个问题：我想让奥特拉早些去柏林，也许就是这个星期日，她对我的这个想法还一无所知，其他人也还不知道。这次旅行应该能给她带来快乐，如果她星期四

才动身，最迟星期一离开，而在这以后的整个六月里，从早到晚都要代父母照料生意，那么这种快乐只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她连婚礼都无法参加了）。另外，有没有可能找一个最好是与她同龄的，不必上班的亲戚或朋友，能每天抽出几小时陪陪她，或给她提些建议，使她能够独自愉快且有意义地度过这几天。她住在旅馆，其他的事也不会带来太多麻烦，我想她有足够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对我的这个想法你应该完全独立地进行判断，看怎样做会更容易一些。如果你认为困难很多，实现不了，也许除了我在刚刚听说“不行”时会有点失望外，其他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无人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无论结果如何请尽快答复。

衷心地问候！

弗兰茨

〔19〕14.5.19

假如你认为此事可行，必须寄快件，因为星期四这里是个节日。

〔第一页右侧信纸边缘〕

你忘记了《柏林日报》的事^[213]。

致格蕾特·勃洛赫

我不需要喝缬草煮的水，格蕾特小姐，不要。自然愈合法的基本思想是：“糟糕的东西就是糟糕的。”失眠虽然已经够痛苦的了，但失眠后起床时的感觉则更糟（我现在几乎天天如此），但至少目前我对此不负有责任。事情既已如此，只好默默忍受，但有意识地去喝缬草水，且喝时还可能要不停地看茶杯里还剩多少，一方面希望能马上喝光，另一方面盼望它能有些疗效，这样则太残酷了，我可不是因为身体里缺乏缬草茶而睡不好的，我失眠的原因有许许多多，但肯定不是因为这个。

有件事前一阵我就想写信告诉您，但又忘记了。知道吗，菲在这儿时的时候，我偶然间明白了我当初为什么会对您产生错觉（另外要说明的是：这可能并不是件坏事，一件对我来说如此美好的事因此而开始了）。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的毛皮衣物。当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我曾跟您提起过，根据“干练”这个词给我的感觉，我想象中的您是另外的样子，我以为会见到一位高高的、强壮的、年纪较长的女孩，但这

完全错了，我的想象同现实中的您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现在想来，主要是您的毛皮衣物造成了这个错觉。那不是一条毛皮围巾，人们好像把这种衣物叫做披肩什么的。它不适合您，确切地说，不是我觉得它不适合您，只是我不喜欢。在旅馆大门口时，一眼看去它是那么显眼醒目，从此我对毛皮服装的这种加工方法——将毛皮铺开，缝上丝质衬里——就有种深深的反感，也许是因为它总使我联想到：游牧的猎人倒是可以穿这样的衣服，但也不会用丝绸做衬里的。它还使我联想到贫穷和不公正；为什么上层是毛皮，而下层只是丝绸，虽然我知道，它很贵重，而且上下两层都是毛皮也根本不可能，但这种毛皮的加工方法总使我感到有些厌恶，一看到它，我就感到窘迫。以前我姐妹的这些东西就曾折磨过我，而对您本人的想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摆脱它的影响。在我们还没开始通信的日子里，我总看见您被裹在毛皮当中，您玩弄着它的两端，它们的摇来晃去和适应能力让我更加生气。雾大的时候，您还将它的一端挡在嘴前。现在我还记得，当我在火车站看见您穿着漂亮的旅行外套，终于没戴那毛皮披肩时，我是怎样地舒了一口气，没有它，您显得那么自由、纯净、光彩照人，但这也未能改变您给我的最初的错误印象。而现在，您尽可以裹在五百条这样的毛皮披肩中，我自信可以将您从中解脱出来。

弗兰茨·卡

〔19〕14.5.21

〔第一页下边〕

由于多种原因（以后我会告诉您是什么原因），我迫切地希望知道您读《战斗》后的印象如何。另外，您不想也给魏斯博士写几行吗？

在打算明天给你发这封信时，我想：明天你来的信中写了些什么倒无所谓，但如果我没收到信，这封信我也不发了——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关于我妹妹的旅行计划你只字不提，平时某些时候你短暂的沉默，以及你上封信中的一些事都不是我想说这些话的原因，只是由此而引发出来了。特别是我妹妹旅行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本来只需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地说声“不”就可以解决了，但我想说的与这一切都无关，因为对我们俩来说，这已经具有普遍意义，已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

独自坐在这张写字台前的时候，我比你一起时更有自主性，我现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并非更无所拘束，也并非因此而更符合实际，但至少应与我在不能自主的情况下所说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两种情况下我说的都是真话，至少就我的判断力来说是真话。如果你很想弄清楚我关于你的这些想法——你也应该想弄清楚——那么你最好在我上上次去柏林之后给你写的那封信中去寻找答案^[214]，我想我没记错。也许你还保存着那封信，并能找到它。我不想、也不能重复那上面的内容。但那上面我说的一切都将为我们关系中最终的基础性的东西，是我们双方都不能解除的。

我知道，这个基础并非十分牢固，至少你还没有明确地承认这种说法，为此我也十分担心。我们想相互牵紧双手，但也许我们脚下的土地并不稳固，而是在不断地、无规律地变动。我们“手牵手”的稳固性是否能弥补这一点我目前尚不清楚，但从我这方面讲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

弗

[19] 14.5.22

我最亲爱的菲莉斯：

我遵守我许下的诺言，虽然收到了你上次寄来的信也还是寄出了内附的信，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即使它是针对一时一事，但也绝不会随着这一时一事的消失而失去意义，况且它们也根本不会完全消失。而且，信中没有一句话让我感到羞愧，从本质上讲，也没有一句话不包含了对你的关心。

出于信任我向你问起了那件难办的事。你认为困难是有的，但还是可行的，而且你显然同你母亲谈起过此事。这样做很对。而我也没有做错：读了你的上一封信后，我并不觉得你完全同意此事，而后我就一直等待你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你说了要再给我写信的，可是至今没有）。总之我还没让我妹妹上路。我们都做得很对。可是，你母亲却给我母亲写了信（顺便说一句，她太客气了，这也使我痛心地想起，我至今还未给她回信）。她信中说——原话我不记得了——她也曾很希望奥特拉能早些去，但只是没敢贸然提出邀请，等等。我原本是想，这件小事如果不能实现只有我知道，可现在看来，它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家庭事务了，而这就不对了。这个请求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除了我别人不

应遭受拒绝，这是很清楚的。

另外奥特拉本身也根本不想去，我并非完全不赞成这种想法，这倒也不错。如果我订婚这件事没能使她有兴趣在柏林玩几天，那么至少她应该有兴趣反抗，当然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父亲的，这已牵扯到我们家庭生活中的不和谐部分，没有能搞清楚其中的的是是非非。

因你在信中提到了戏剧，还说想去看戏，于是我就看了一下节目表，只发现有两部或许会让我感兴趣，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而这两部戏我们也都看不成。《雷尔大帝》星期六上演，我虽然7点钟能到柏林，但刚到的第一个晚上多半不大可能出去看戏吧。韦德金德的《弗兰西丝卡》也看不成，因为是首场演出，肯定买不到票，而且多半会要求穿晚礼服，这我很难做到。

另将我舅舅的信附上，这封信也关系到你。我想，我六十岁的时候将不会有他这样美好的心境。难道你不觉得他很可亲吗？如果你愿意，给他回封信，先寄给我，我可以接着再写，他的原信请再寄还给我。

如果有人问起你，你的未婚夫长什么样，那你就说你给他拍过照片，再拿随信寄上的这些小云彩给他们看。我就是云，你不是也的确为它们拍过照？

弗兰茨

〔19〕14.5.24

〔随信附寄〕

卡夫卡的舅舅阿尔弗雷德·略维从马德里的来信

亲爱的弗兰茨，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你们一同写来的真诚的来信使我万分高兴。信中没有注明日期，想必是沉浸在幸福中的人们是不去计算时间的。这封信像一首爱情二重奏，我将不把它当做一封普通的信，而是作为音乐好好保存起来。

再一次衷心地祝贺并真诚地祝福你们，愿你们今日的幸福天长地久，不要忘记，幸福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

我多么想能像你们希望的那样，去参加你们不久将在柏林举行的订

婚仪式，遗憾的是，越是临近假期我这里的事就越多。现在看来，我最快也要到6月6日才能动身，路上要耽搁几天，在巴黎还必须待几天，你们看，这样的话6月15日前我是到不了布拉格的。别生气，人常常是身不由己。

关于我，我未来的外甥女发了一些议论，对此我非常感谢，在这方面你可比我们的弗兰茨宽容得多，他在我身上找到了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对此我没有丝毫不快，我本来就不是完美的，这一点你以后也会发现的。

热烈地拥抱你们俩，永远与你们在一起。

你们的 老舅舅和新舅舅

阿尔弗雷德

1914年5月14日于马德里

〔西班牙铁道部信头〕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今天早上，我还躺在床上时，收到了您的信（我不爱起床的老习惯还是以前能美美地睡个好觉的时候养成的，现在越来越没实际意义了）。在床上我舒舒服服地躺了整整一个小时，心里默默想着如何给您回信。这样炎热的下午写的信一定不会像已往的信那么深刻和正确，特别是有关F的事（写完信后我就去游泳）。

人在心灵深处，有一些坚定不移、根深蒂固的想法，人们根本无需费心去证明它们的正确性。而且这些想法充满了人们的大脑，于是人们也不再有多余的空间用来阐明理由，人们不知道该把理由放在哪里。只有在有人提出要求的时候，人们才会去阐明理由，但其说服力与那些自然的、不可辩驳的理由是无法相比的。我本人并没有很多这种心中根深蒂固的想法（从表面看完全可以把它们称为成见）。我们现在来讨论其中的两种成见：一是认为今天的医学一无是处；一是认为毛皮披肩丑陋。不过因为关系到您，所以这两个想法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不喜欢缬草水，即使您喝它，也改变不了这一点。而关于毛皮披肩则相反，我丝

毫不反对您用它，我说这番话是认真的（我从未怕过那些被说得很可怕的衣服，我只是好奇，会是什么呢？五米长的拖裙？还是奥地利少女的民族服装？）。

您说得很对，失眠也是一件残酷的事。如果能让人看看我的大脑经过昨晚的失眠目前处于什么状态的话，肯定会令人大吃一惊。我清楚地知道，我失眠的原因主要是三十年来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也可以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比如有规律的、较早的睡觉，但我没有这样做，这是我的过错，我必须承担它带来的后果。我们俩都讨厌蹩脚的毛皮制品，为什么我们不能都去讨厌错误的失眠治疗法呢？自然疗法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尽量避免用其他物质去干扰肌体的运转。你是不能完整地了解其内部是如何工作的，也不清楚在特殊情况下它是如何变化的，所以不可能有什么万无一失的特殊疗法，而每种试图治愈病痛的东西都该被枪毙掉。人的肌体是不能被分割的，除非它受到严重的干扰。我有一大块煤塞不进炉门，那么把它打碎是极合情理的。但如果是我想穿过一道狭窄的门，为了能过去把自己分成两半，这恐怕就不那么聪明了。如果我都由睡眠细胞组成的，慢慢变成了失眠，我自然会毫不犹豫地喝缬草水进行治疗，我甚至会大灌溴或者佛罗那安眠药，以治好我的失眠。但我并不只是由睡眠细胞构成的，我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这样做无疑就大错特错了。

〔估计以下为此信的后半部分〕

关于这件事，我今天还不可能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

我认为，在我和菲的关系中，菲知道的所有的事，您，亲爱的格蕾特小姐，都可以知道，而且我感觉您也应该知道。您信中提了一个问题：“您订婚前我一直知道，……后来又说明可能会同意。”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您是不是指同订婚前比，我和菲关系中的变化？那么，我的回答可能有点奇怪：什么也没有改变，也许从外表看有一些变化，但内在的东西没有变，至少我没有发现，或许说还没有出现足以引起重视的改变。您问菲信中都写些什么。她写信比较有规律，只是因为工作很忙，所以信的内容只局限于商量房子的事等等。这有两次收到了令人高兴的消息：她终于抛弃了大夫并代之以学习游泳。她兄弟那里有了好消息，他找到了工作，而且看来他靠这份工作可以过活。就我所见，菲肯定为他做了不少的事。再多的消息就没有了。

相反，关于您的信我却有很多想说的，但下次吧，现在很晚了，笔也不愿再动了。只是再说一下那地址，因为您问得那么迫切^[215]。当时我把手稿拿到我们家的店里想封好，我本打算自己写地址，但我最小的妹妹奥特拉却想写（她几乎一整天都在店里做事），她总是这么孩子气（她二十岁，是个可爱的好孩子）。于是我念地址她写，最后她挨了我的骂，她将地址写得太小、太不清楚了，特别是维也纳的第一个字母写成那样，更加让我生气。不过不管怎么说，邮件总还是寄到了。

即致

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 14.5.24

明天我将听到些什么消息？为什么柏林会使您沉默？

您也许还是会想给魏斯博士写信的，但他的地址已与寄给你的手稿上写的不一样了，新地址是：莎洛滕堡，格劳曼街61号。

知道吗，我还没给布达佩斯写信，我还没下决心这么做。我是这么懒于写信，尤其是给不熟悉的人。这很有些不公平，是吗？您和菲都试图使我和这个姐妹能更亲近些，奇怪的是这反而使我有些不愿写信了，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我对写信的反感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大约一年前，在我的要求下，菲寄给了我这个人的一封信^[216]，那八页的信几乎只包含了家庭财务等诸如此类的琐碎小事，显得很古怪。您上次引用的她信中的那段话也很空洞。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她的，但暂时还不能给她写信。

我的胸中跳动着愤怒，这本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读了印第安人的故事后才应有的情绪。而我曾是因读了几页贝罗茨的回忆录。但现在先不谈这个。

怎么了，菲莉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已经5月底了！真的已经这个时候了？那么好，我现在正坐在摇把旁边，如果你愿意，我来将时光倒转。我应该把时间倒回到前两年中的哪个月呢？回答得明确些。

你使我感到羞愧，你信中说，从笔迹上看，我的手或许已经好些

了。好些了？我的手早已痊愈了，上封信的字几乎可以说是我能写的最漂亮的了。你还使我感到苦恼，你的思维应该更敏锐些。需要什么样的家具？当然是西班牙式的隔板或垫子，好能干“那件事”，好能光着身子敞着窗干“那件事”，以免让对面的人利用这个机会也干起来。

戏单我已经看过了，正如我昨天信中所说，我没有机会去看戏，但母亲和奥特拉能去，不过最好能在星期六父亲到达之前。他可没兴趣去看戏，如果他去，他就要强迫自己，所以最好给他随便看些其他的什么东西，比如你曾提到过的电影之类的，反正这种票随时都能买到。我认为母亲和奥特拉最好能去看星期五上演的《你们都如何》，不行的话就不要再买其他的票了，千万不要。

是的，奥特拉已不再固执，她很愿意一道来。又是家里的这些事，搞不清楚。

她们应该住在哪里呢？你们附近可没有旅馆，即使有，房租也一定很贵，没必要住那么贵的地方。是不是又要考虑阿斯卡尼亚旅馆了？我的幸福与不幸都与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我把根留在了那里，如果我再回去，我会将自己接种在那条根上。那里的人们也喜欢我，虽然陈设不那么舒适讲究，而且也够贵的，但我还是认为可以考虑住在那里，对我来讲这是最佳方案。

你只要在每封信中写上：婚礼的准备工作正在一一完成，我就很满意了。但我不明白，准备一次婚礼怎么会那么繁琐。另外别忘了，在你陪嫁的财产中，比家具和衣服重要得多的，是你的游泳技能。你答应过我要向我汇报学习游泳过程中的每一个进展。而至今你对此还只字未提，这是不是说明你一点进步都没有？我可不相信是这样。顺便说一句，圣灵降临节时可要进行游泳考试。你是抓着杆子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学？

房子的平面图寄给你。我并不在意阿德勒^[217]也住在这幢房子里，只要林特施特罗姆公司的电话机还没有被改进得让整幢楼都听得见就行，否则所有住户都要向他买电话机了。而我们俩在这个巨大的共鸣箱上应该怎么住，我可就不知道了。

弗兰茨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母亲安娜·鲍威尔夫人的信

亲爱的母亲：

听说你受了伤，而且挺严重。你本可以像我希望的那样，在布拉格再待一段时间的，布拉格可没有环城车，即使有的话，我也一定会将你的手指及时地从车门处拉开的。但现在，我们只有纷纷前去探望你手指的情况，如果它能承受的话——希望是这样——我们将用一个吻来彻底治愈它。

向所有的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上

〔19〕14.5.25

捷克语小课文：

〔信头：úrazová pojistovní dělnická pro království české v
praze[218]〕

办公室的事情很多。我并没有发怒，我是很生气，不开心，还有其他别的坏心情，但我没有发怒（如果不是我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那么，这也许会使人睡不着觉的）。为了准确起见，我补充一点：你已有三天而不是两天没有写信了。

如同在整个世界历史中一样，到处都不停地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努力为自己寻找一块地方，好去战斗。我也将别无选择，也会为自己去占领一席之地，这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过几天你将遭到两方面人的骚扰，是有关买家具的事，而且看起来好像还都是我让他们来的。一是德国工业协会，他们已经给我写了好几封信，现在我终于要答复他们了。我觉得他们的家具的确是最好的，即是最合适、最简洁的。此外，还得有一家布拉格公司的代表要来，你尽可以快些将他打发走。我有一次在办公室遇到了他，我当时昏昏欲睡，不知随口讲了些什么，他马上递上名片，说，因为曾是柏林人，所以他了解你的口味，一定保你满意，然后就走了。后来有一天，他又来了，穿着比上一次讲究了一些。我对人的记忆力很差，于是我把他认成了一个有名的律师，就十分热情地走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这才知道了他

到底是谁（他公司的家具极贵且卖不出去，这一点你必须心里有底）。可我又总不能马上换一副脸，变成态度恶劣的买主，于是只好应其要求，给了他你的地址，因为他恰好要去柏林。同时，他还请我写信向你事先打个招呼，我不可能拒绝我曾那么热烈地握过手的人，于是就现在这种方式做了手脚，完成了我的使命。

问候大家，包括你的和我的家人[219]。吻你可爱的脸。

弗

[19] 14.5.28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当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两人——但愿是我们俩——已都在柏林了。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好极了。因为当着您的面，我也许不能完整地表达我的意思，所以，我还是很快地将我想说的写出来吧（如同您对相见时的穿着做了个保留，我也先不解释我为什么要沉默，沉默打击过我，也拯救过我）。

您的上上封信是星期三到的，读了好几遍我才发现，或者说我才自以为发现了，您认为您的这封信星期二就能到，那么，星期三即可收到我的回信了。不是不是，星期三的早晨才到，紧接着我在办公室里又收到了您的上一封信。假如您来了布拉格，我肯定会在星期六中午走，6点51分到柏林。但现在我又觉得有些不妥，可能3点离开，晚上11点半才能到。失眠、胃胀、头昏、左脚痛将是我带来的行李，但无论如何，重逢都是快乐的，相形之下，它们就不算什么了。您尽快去菲那儿，不必顾及穿着，不必再做任何修饰，看她的将是最温柔的眼睛。

您的弗兰茨 上

[19] 14.5.29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只写几句，下午必须试着睡一会儿补回晚上的失眠，晚上要帮父母照看生意，时间不多，但写下面这几句话还是够的：您不会知道，对我来说您意味着什么。但您所知道的那部分已足以使您能够相信，对于我，有某种您完全不可能一清二楚，但却完全能有所感受的情况下，您可能会为我做一个人可以为别人所能做到的一切。而您所做的一切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这一切十分有效，是很有效，格蕾特小姐，是很有效。吻您高贵的手。

弗兰茨·卡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旅途顺利，睡得却很差，办公室中，在鸡叫三遍后描写了一名官员的幽灵般的形象。这凭记忆就可完成，因为这已是过去的事，而现实中，在一件事情结束之前的每时每刻似乎都是不保险的。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是终于能得一场伤寒或诸如此类的病该有多好，好将我在众人面前击倒，使我有理由让人抬着送回家。而现在我却正口述一篇关于第五危险级专家鉴定的冗长的报告，而面色红润、年轻快乐的打字小姐却在不时地抱怨今天很困，因为昨天晚上直到1点才（才！）睡。

今天感觉好些，睡了一会儿。而最糟的，几乎是最糟的是我的时间太少了。我没告诉您，节前我已开始写东西了吗（对此您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错话：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从昨天上午和晚上开始，我发誓10点半要上床。写作几乎停滞了，此外晚上还要在店里浪费时间。夜又来临了，马上又将去办公室继续口述那篇报告。也许您是对的：在布拉格，写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

我读了那些传说^[220]（立即实现诺言是多么令人快乐呀！这种快乐已远远超出了实现诺言本身）。相比之下，你兄弟本人比这些传说更让我喜欢，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写得挺不错，也有一些地方写得挺有新意，尽管如此，我感觉还是不能笼统地说他写得很好，这还只是些幼稚的作品，东拼西凑出的不和谐的整体。很奇怪，他竟责备过您过于热情，而他自己就很善于运用过分热烈的、空洞的词汇（生命在我心灵的深处反抗着，如受伤濒死的野兽，大声嚎叫，诸如此类），不，不能用“好”或

其他赞美的词来评价它，这是“幼稚”，它有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他肯定会写出更好的东西，或者他已经写出了更好的东西。总之，他将更有作为，因为他使人感到他十分专注，思路清晰，沉稳，有毅力而又有些锋芒。要想成为有用的人，这可是些必不可少的品质，我对这些品质的评价很高，因为我自己不具备其中任何一条。另外，那天在桌旁，他同您说话时的确应该更礼貌些，更何况您是用那么温和的目光在看他。但也许他本已很有礼貌了，只不过一旦关系到您，我就显得特别敏感罢了。

弗兰茨·卡

〔19〕14.6.4

〔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我们还有机会再谈柏林的事。

〔信头上方〕

随寄一张夹在书中的小书签。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昨天又是完全不得脱身的一天，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法给您写信，而我生命中残存的一切都迫使我急于写信给您。有时，我真是不知道如何才能保证在婚姻中保持原来的我，通过一个建立在女人坚定决心上的婚姻吗？——目前您是唯一知道我这种想法的人。那将是一个倾斜的建筑，是吗？它会倒塌，还会从地中将地基都拔出来。

天啊，我能理解您对我的写作的想法，但纵使理解，这想法也是错误的，更别提真的要那么做了。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将自己从地狱中解脱出来，我是通过写作。如果我想解脱自己，不能通过安宁的生活和充足的睡眠，只有写作，我在写作中得到安宁，而非在安宁中写作。

我一直在谈自己，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目前的处境。我知道，在柏林时我也是这样的，虽然我心里清楚，只有将关系到我的事情尽量压制下去，我才存在，我才活着。

我说过，您在柏林会比在维也纳更愉快，您当时还不信，而我说对了，这让我很开心。您过得比原来更快活，有了一个更好的职位，但愿意工作了（没有“钢”了），家人就在身边，不再有遥远的、痛苦的挂念。柏林使您像其他人一样有了抵抗的力量。您提到母亲“过分”地关心，什么意思？我对您兄弟的评价并不涉及您，否则我必须再增加些内容，而这部分内容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即使可以表达，我也不会将它们写出来。但有一点您可能是对的，你们可能是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因为涉及令兄弟，我自然就看不出来了，甚至在他写的东西中就有一些迹象，只不过被我忽略了，比如关于犹太居住区居民的那一小部分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但却是普遍的，对犹太复国的向往，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能够实现的。尽管这样，我认为总的说来这东西还是不错的。但令我始终不满意的是整个情节结构的枯燥无味。它只停留在表层，所有要说的话都说了，却没有一处深入下去，引深下去。您提到了令兄弟还写些中篇小说，毫无疑问它们会更个性，因为写传说时，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寓意的限制，而写其他东西他就一定会更自由、更直率、更有自信心。况且像写传说这类东西，只有一个人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倾其所有力量，而且有勇气自始至终尽力保持这种力量，而不是在刚刚开始后便失去信心才有可能成功。不过，您兄弟也正是这样做的，不必因我的话而对他的坚定产生怀疑。

衷心地问候！衷心地握您的手！

弗兰茨·卡

〔19〕14.6.6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我真的在信中把自己写得那么可怜吗？其实没有那么糟，至少不总是那么糟。只要一坐下开始写信，一切就都涌上笔端，什么也不想被落下，因为这信是写给您的，而您对一切的反应都是那么友好和善意，使我安心的是，我最终还是忍住没有把一切都写出来，这样我就有权力从您信中完全为我自己汲取一些慰藉。

7月份我将住到森林中去，随便哪里，好在忙碌中尽可能地休养一

下。在我们这儿，父母们常爱说：从孩子身上最能感到自己有多老。可如果没有孩子，就只有从自己的灵魂上去感受了，而这样的感受会更加透彻。年轻的时候，我是那么千方百计地引诱他们出来，可他们却不来，我于是更加努力地去引诱他们，没有他们我感到无聊，可他们还是不来，于是我想，他们根本不会来了，为此我曾常常几乎想诅咒生活。可后来他们却来了，总是居高临下的拜访。尽管他们很小，可必须向他们鞠躬致意。他们常常并不小，只不过看上去如此或听上去如此。一旦他们真的来了，倒很少对我十分疯野。你不会为他们感到十分自豪，他们扑向你时的样子，也只是像一头小狮子扑向一只雌狗。他们会咬人，但只有用手指固定被咬的部位，并用指甲用力压一压才会感到一点疼痛。过一段时间他们会长大，来到你这里。按自己的意志或留下或又离开，纤弱的小鸟的脊背变成了巨人的脊梁。他们来自所有的门，关着的门被他们推开，那是成群的，巨大的、瘦骨嶙峋的无名的鬼魂。你可以同其中之一斗，可不能同你四周所有的斗。你要是写，那么他们就是些很好的神灵，你要是不写，那么他们就是些鬼怪。在他们的拥挤中，你只将将能把手抬起来，好让人知道你在何处。至于如何扭曲那高高举起的手则不用你来管了。

您现在过得比原来更好了，本来就应当如此，这快乐是您应得的。前几个月您受了很多苦。而且我还不断地给您写信，开始时甚至自私地一直在谈自己的事。您在家中的不快我不了解，但您不认为，曾使您苦恼及现在您正为之苦恼的一切创造了良好的反抗力，这种反抗力使您现在能够自如应付世上的一切。此外，〔施特林堡的〕《死之舞》我没读过，所以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故事是发生在一座灯塔里吗？

我还想说的是：不要过于费精力给我写信，另外早点离开办公室。只要给我写几行就够了，两句话加上您的签名足矣，但我需要它们。如果我抱怨得太多还请原谅，一切尚还可以忍受，痛苦虽然没有消失，可新的一天不断来临，痛苦的表现形式在变，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也在变，就在这变化中苟且偷生吧。

弗兰茨·卡

〔19〕14.6.8

〔信纸边缘〕

我没收到星期日寄出的明信片。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这真是一封奇怪的，十分奇怪的信。

您并不认为现在好些了，而且“说不出原因”，这使我更加多了一层担心——当然这并不是您的本意。如果您有理由这样说，但这理由并非十分充分，那么，根据我的性格，最好还是彻底打消我的担心。

而同第一句话相反的是：您认为找不出理由相信我目前这样做的必要性。您先不要考虑我作为个体的人在性格上有哪些明显的特性，而把这个整体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例子。这是一个因其生活环境及天性而完全非社会性的人，其健康状况不稳定而且目前尚还不知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因他生为犹太人却不赞成复国主义，且不信教，所以被所有重要的大的集体排斥在外（我对犹太复国主义又是惊服，又是厌恶）。办公室中迫不得已的工作也在不断地折磨他——这样一个人决定要选择结婚这一社会性举动——当然，他这样做也是十分勉强的，即使这样，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最后，您在信中还粗声大气地说：“三个月您总还能活得过去吧！”这真的让我很开心。但格蕾特小姐，如果有人说：三个月很长，那么他言下之意一定是认为三个月很短，就是这么回事。最近一次，您还问起了奥特拉，她很好，只是整天都要待在店里。她的心思不在店里，一心只想着盲人院。几周以来，特别是近两周，她在那儿有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她与其中之一交往尤其密切。那是一个年轻的藤编艺人，他一只眼睛看不见，另一只则肿得老高。他是她最好的朋友，温和、善解人意而且忠诚。她每逢星期日和节日便去看他，给他朗读，多半是些有趣的东西，可这种快乐中带着些冒险和痛苦。正常人用目光表达的情感盲人用指尖来表达。他们抚摩衣服、胳膊、手，而那样一个高高的，健康的，被我有些引离正路的女孩称这为最大的幸福。知道她是怎么说：每天她醒来都感到如此幸福，是因为她想到了那个盲人。一个星期她都在攒纸烟和雪茄（用的是省下的饭钱），星期日就给那个盲人带去，她甚至不知从哪儿找出了一个旧的装烟的口袋，准备今天带过去。她同盲女孩倒没有交往，那些盲人朋友也同盲女孩交往，他们说她们太傲慢，“被我们呵护的女孩们太傲慢了”。

由于忙于这些事，奥特拉至今还没给柏林写信。她不知在信中应如何称呼，不写“亲爱的父亲、母亲”这我同意，但“我亲爱的”她也不要写，她认定只有年迈守寡的、感情充沛的、老实却常写错别字的、身形庞大且忍受着无人相信的巨大疼痛折磨的姑妈才会这样写，而且应该从她手中剥夺原本属于她的“我亲爱的”这种称呼方式。对此您有什么高招吗？

即致

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6.11

〔信纸边缘〕

宫桥那张卡片我没收到，上面写了些什么？

致格雷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雷特小姐：

首先，我既没有生气，也没有理由生气，如果生气，也是因为上封信没能说服您，而且也是生我自己的气。确切地说，那是一种病态的过度刺激（一个睡得特别糟糕的夜晚就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因为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每个夜晚、每个对睡个好觉的希望对我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今天又必须特别小心，因为昨晚的情形又如同那个恶劣事件后的第一个夜晚，不断地被惊醒，在短短的默默的祈祷中又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当然，这段时间有时也能睡得不错了）。总之，当时可能是由于受了一种过度的刺激，我几乎是有意识地读出了信中本没有写着的东西，即使写在上面的，我也读出了它们更深层的涵义。这些都符合您善良、宽博的心怀。但是，不知怎么，您对我说些难听的话也使我开心——虽然有时我也不一定能成功。我很坏是吗？被这种想法所吸引。

从整体上看，您大体上能理解我每次的“表白”，您的惊讶反应也是正常的。只是这“表白”的核心您理解得不够准确，而如果做一定的限定，且不考虑细枝末节的话，这核心是十分简单的，很遗憾，十分简

单。在能列举出的几点中，有一定统协着其他的一切（奥特拉现在正在我这里，拿着要送给那个盲人的玫瑰花，讲着他的故事，打乱了我的思路）。这就是被您称为“无关紧要”的我的健康状况，您以后会很容易地发现我说的是对的。如果我能更健康、更强壮，那么所有的困难都会被克服，我也早就不再上班了，对整个世界、对菲，我也会有十足的把握，我所缺少的一切，都可以用健康之躯来弥补。而现在呢，我干一切事都要顾及身体，对此我还需再多说什么吗？这种身体状态还使人产生错觉，甚至使我自己产生错觉，这错觉随时到来，极为精确，而恰恰是在最不适当的时候。这真是种十足的疑心病，但它却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缠绕着我，让我不能解脱。您把我的“固执”当做一个好征兆赞扬了一番，这不无道理。但“固执”也许因怀疑而起呢？

打个比方：天平的一头是我的身体状况，而其他所有的一切则在天平的另一头，总有一天，这天平会失去平衡，而且结果不明。或者是健康一边强大得将另一边高高抬起，上面所有的一切都被抛得无影无踪，或者是健康这一头坚持不住了，被抬了起来，并被天平另一头的东西所消融。最后孕育出一个幽灵。

爱米莉姑姑[221]的病我是听您说了才知道的。而我自己很清楚，我还没给艾尔娜回信。我会给她回信的（有时我觉得艾尔娜几乎是了不起），我还应该给托尼也写封信，虽然我很喜欢他，可不知怎么却总懒得动笔。而我克服了这种懒惰，终于给爱丽丝写了信。

您因为我而睡不着觉，这让我很不安，不要这样。而您终于能在5点半离开办公室又使我很满意。同菲一道去学游泳，如何？

您的 弗兰茨·卡

[19] 14.6.14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我现在正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只写几行，耳边是喷泉的哗哗声和孩子们玩耍时祥和的嬉闹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刻我体味到了那些老夫妇们快乐的真谛，体味到了观赏一片草坪，静坐在落日余晖中，或观察麻雀的一举一动的快乐的真谛，我的大脑连续四个夜晚几乎没有

得到睡眠的休息——这比有时还强些呢——现在它终于得到了松弛。您想知道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今天是特别的、休养生息日，您坐在办公室，敲打学生的手指，而我先是徒劳地躺了一个小时，希望能睡上一会儿，然后又去了游泳班，游了泳，又做了体操，散步之后又去乳品店喝了酸奶，现在正坐在公园中给您写信。一个小女孩是不是都能比我更好地照顾人？那么晚上呢？晚上我常常只能在噩梦中很轻很浅地睡上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时也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却总是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且再也不能真正入睡了。然后所有钟楼上的钟都准时敲响，告诉我时间过去了，可怕的夜晚过去了，但可怕的清晨又过来了……您看，我的抱怨真是无聊！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还不会因此而垮掉。

另外，今晚我会特别晚才上床睡觉。魏斯博士今天11点从柏林来，他昨天写信告诉我的。这使我有些不快，他原本也是说要来布拉格的，但说是7月初，现在他却来得这么突然。他是因我而来，我又能怎么办。这也不是不可以，但让我感到有些厌烦。

这几乎又要让我牢骚满腹了，但我知道，类似的抱怨昨天已引起了您的不安，为此我一整天都受着良心的折磨，今天收到您的信后，这折磨又开始了。不知上帝是如何忍受这许多悲叹怨言的？为什么他不将我打垮？但我心中那个抱怨的声音在说，他是已经把我打垮了。

是的，我肯定会给艾尔娜写信，我还想送艾尔娜和托尼一点礼物。这又是我的一个弱点，不善于直接地与人交往。一旦我真的想和谁接近，就只有送他礼物。我打算送艾尔娜一本书，菲本要以我的名义给托尼买点什么，但显然是忘了，我在信中曾提醒过她这件事，读信时她大概故意视而不见。您能给我出个主意吗？事无巨细，您都曾是我的好参谋。

天已经晚了，就此结束今天的“光、水、空气疗法”，收起铅笔，散步回家。

即致

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年6月16日或17日〕

您还想再给我寄点令兄弟写的东西吗？对糟糕的一周开端的抱怨是指什么？自然不会有其他人一起读信，而且也不会再有人去读它们了。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还是简单写几句。

魏斯博士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根本没有空闲，但我依然很喜欢他（我曾担心他是因为我而来的，看来这是多余的）。他把柏林带来了，而这正是我需要的，他浑身都散发出柏林的气息，这使我暂时摆脱了办公室的烦恼和痛苦，虽然只是短暂的，可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对我的情况，他比我更感到担忧，但使他忧虑的有一部分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在许多方面，我都十分拘泥形式，幼稚且刻板，而他消除了我的一部分忧虑，帮我找回了一部分被弃在地上的希望，激活了它们，并将它们放在了我的手中。明天他就要走了。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好多了，睡眠虽然还很差，但还是好些了。

谨致

问候！

弗兰茨·卡

〔19〕14.6.18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连续两个晚上，我睡得好多了（魏斯博士走后，又曾经有过几个可怕的夜晚）。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静静地思考一下我的处境。关于她的事情太特别了，所以在我今天这样头脑清楚的时候，根本不能谈这件事。

几天前，我同一家很大的内衣及床上用品厂的一名负责人谈了谈，

这家厂有两名负责人：约瑟和勒文施泰因，我是同后者谈的。我们说起工厂的组织问题，他正委托一个美国人重新组织他企业的生产和技术设施。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您的机器，这家工厂也有这种机器，但他们打算淘汰这些机器，因为工人们不愿使用它们，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我当然说这些工人们显然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这些机器，这些机器的性能依我的“经验”是很不错的。只是应该由一个能干的人，比如由我认识的柏林的一位小姐来教他们如何正确操作。他说好的，完全可以考虑，他非常乐意请这位小姐来，并承担所有费用，无论多长时间，当然他还要先同办公室主任说一声。因为他曾多次给雷斯提[222]写信，又多次被回绝，所以公司会不高兴，但没有关系。另外，勒文施泰因先生出差去了，7月份也不在，要到8月初才会回来，然后我再去问他，如顺利就可以开始办理了。您愿意做这事吗？有可能行吗？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很高兴的。虽然我还不知道，您现在能否管理波希米亚地区的业务，但如果他们强调只想要您来，而不是其他的人，那么出于生意方面的考虑，我想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顺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6.20

〔估计写于1914年6月24日〕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母亲安娜·鲍威尔夫人

亲爱的母亲：

你寄来的卡片我没能及时收到。没写我办公室地址而是寄到家里的信件总会被送到店子里，然后就找不着了，特别是我母亲不在的时候，只是很偶然的才又会被发现。前一阵我曾听到传言，据说有一张写给我的明信片，说虽然读了那上面的内容，却记不清写的是怎么了，现在，您的明信片也有了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母亲，谢谢您善意的关心。写给菲莉斯的信虽然也有些重要的内容，但并不紧急，放一阵子没有关系的。

你提到一直在等我的信，却迟迟没有收到，这让我很不安。你当然有理由这么想，这是顺理成章的。你们万分周到热情地迎接、款待了我

的父母、姐妹和我，我完全应该心有感激之情，并向你们致谢，给你们写信。而我却没有这样做，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亲爱的母亲，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而你永远也不会赞同我这种做法。我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涉及一封信，而且这封信也完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心。尽管如此，我还是没写——但我不比会写这封信的人要差，相信我。

衷心地吻你的手，并请代我问候柏林及其他地方的、你方面所有的亲人们。

你的 弗兰茨

〔19〕14.6.24

致格蕾特·勃洛赫

您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写信，想知道我近来是怎么了。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许多事很难说得清楚。比如，我现在虽然睡得还是很糟，但比我上一次抱怨失眠的那段时间要好多了。我自认为找到了失眠的原因，并相应地采取了措施，可这样一来，又有其他一些东西来折磨我了。我开始害怕这一切只不过都是假相，而在这假相后面，潜伏着最大的不幸的根源，我还不能直接地知道它是什么，只有它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危害才让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您认为我沉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脚痛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从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我给艾尔娜写了信，但从您信中所述来看，已经太晚了。明天我可能要去海勒劳^[223]，已经通知了那里。下星期是否能动身还不清楚，到时写信再告诉您。董事长的到来是否使您感到荣幸？我不能再写了，有很多事情都急待要干，但有一件事比其他所有的都更加紧迫。

为了安慰一下自己的心灵并能给您写点什么，我翻了三次《圣经》，它就在我手边，终于找到了下面这段话：“因为他手中拥有地球尘世上的一切，所以高山的巍峨也属他所有。”怎么我现在又觉得这话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致

最衷心的问候！

〔19〕14.6.26

正打算封信的时候，偶然看到桌上的一张明信片，邮戳是夏洛滕堡。开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总是把信件清理得井然有序。仔细一看，原来是您提到过的宫桥的那张卡片，也不知是谁，放在了桌上不显眼的地方。现在我第一次拿到了它。我的桌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在两行之间〕

另外，我记得前一阵还是给您写过两封信的，虽然都很短。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不打电话，而是眼睛注视，您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被抛来丢去，而且手撕裂般地疼，我就用这只伤手，去握您健康的手。请您对我有些耐心吧。女人们都是有耐心的，但可能我让最好的女人也筋疲力尽了。后天您会得到一封内容充实的信，今天已经太晚了。因德累斯顿之行我给菲写了信；我十四天后到柏林。不是菲，是您使我打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星期日动身去德累斯顿。

即致

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兰茨·卡

〔19〕14.6.30

致格雷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又很晚了，看来这不会是一封内容充实的信了。我近来常在户外和水中活动，感觉却不好。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感到疲倦甚至疼痛。在家时就躺在沙发上，心中不由惊叹您的工作能力，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有

这样的能力。如果开始去做一件事，又几乎抬不起胳膊将它继续下去。抱怨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多余的东西了，可我恰恰也只有抱怨的一点力气了，而且正像您看到的那样，这抱怨也没有一回是完完整整的。

记得前不久，您曾提到合写明信片的事，我考虑了一下，您说得既正确又不正确。诚然，我在柏林所得到的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但目前我还只是下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我还有这样一个附加要求：希望独自拥有每一个，而不要让我接受全部；我爱每一个独立的，但不一定爱他们的整体。我不善交往，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这不仅关系到我，还关系到所有我爱的人。这是一种病，或许是可以治愈的病吧。

菲可能已对您说了，我下星期日要去柏林，更确切地说是途径柏林去度假，但我还不知道这个星期日是否会在德累斯顿。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很容易履行的义务——度假前去看望我沉浸在夏日愉快当中的姐妹。但最有可能的是，我将留在布拉格。我没有机会让大家看到我了。下星期日您在柏林吗？

就此停笔，明天再写。

即致

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兰茨·卡

〔19〕14.7.1

脚痛好了吗？到底什么毛病，董事长是如何嘉奖您的？

致格蕾特·勃洛赫

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希望信的频繁能够弥补它内容的空洞，但或许我弄巧成拙，不但没能消除一个不足，反而更增添了一份不快。其实我很想给您写信，只是太累了，写不了别的，只想衷心地问候您。如果这星期日在德累斯顿见不到您，无论如何下星期日必须在柏林见到您。这个星期日我可能会在游泳学校的地板上躺一整天，闭着双眼，感觉着四肢和肌肉中一起一伏的疲倦（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格蕾特·勃洛赫致弗兰茨·卡夫卡一封信的副本或底稿 [224]

这封信我前天就写了，可您今天才收到，因为我昨天才将它寄出，以便使自己有一点时间，好再思考一下，虽然没必要，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我的担心难道没有道理吗？您自己难道不是证明了我完全有理由担心吗？您昨天的信，以及今天没收到您的信这种种情况，都让我感到恐慌，而且鉴于您经常都是很守时的，我更认为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不知应该如何表达。如果您很清楚自己的处境的话，您能否告诉我，虽然有这种种不祥之兆，我现在是否还能对这件事抱希望呢？真是不妙。我一下子看清楚了一切，而这一切使我迷惑。我一直武断地认为婚姻会给您俩带来幸福，认定应该如此，这种想法不可避免地给我自己带来一种巨大的责任，而我现在感到不再能够承担这种责任了。

我几乎想请求您，在您还没搞清楚，没作最后决定，且没能完全高兴起来之前，请不要来这里。我只简略地同菲说过几句，这些信使我几乎不敢看她的眼睛。如果您对我发火，也只能是因为我在以前的信中表现的可笑且不负责任的软弱。

弗

〔19〕14.7.3

致格蕾特·勃洛赫

我亲爱的格蕾特小姐：

这可是一封非常明确的信。可以说，我终于说服了您。这比说服菲要快，因为我们是11月份才认识的，而第一次说服菲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当然也要补充一句，那一年年初时，我的状况很特别，以至于说服菲所需要的时间自然也就长了些。

在我们的关系中，格蕾特小姐，几乎只涉及了一件事，即说服您（当然是以我们不可动摇的——希望如此——友谊为基础）。您完全不必引用我信中的话，更确切地说，仅仅引用那些话是不够的。在涉及我

的问题上，我们一共度过的时间可分为三种而不是两种，我是指您没有提及的在布拉格度过的那两天。信中的那些话，我当时就试图对您说，而当时我既没订婚，也没为争取订婚而进行努力，只是内心有些不平静而已。而因为不能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我更感到双倍的不安：第一，如果不再同菲联系了，她会怎么样（当时您来时我同时收到了菲的一封信）？第二，我又会怎么样？这两个问题所展现出的前景使我感到无法接受，而如果我们保持联系又会怎样？当时我却没能踮起脚尖，越过各种障碍，去展望这后一种前景。

现在，我终于说服了您，格蕾特小姐，您已经开始不把我看成是菲的新郎，而是她的一个危险因素了，这一点看来已经明确了。可让人不理解的是您信的结尾部分，您真心希望菲能有一位从各方面都能与之相配的丈夫。格蕾特小姐，一个人或者是“开朗、热情、智慧而善良”，但或许正好相反，悲观、迟钝、自我封闭，追求美好却力不从心。人不可能有意识地去改变这种情况，人的性格不是水，可以从一个杯子倒到另一个杯子中去。而事实上还有更糟的，他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至少患有不可救药的神经衰弱，是的，的确如此，这几天的情况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我最近虽然以各种方式进行休养，减少了办公室的工作，可仍疲惫不堪，假设我原本是快乐的，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这快乐怎么可能持久呢？您问我将如何去面对菲，您就把这个问题丢给我，如果不是您否认了，我会认为菲知道您的这封信。

另外，今天是我的生日，这样，偶然之间，您的信还有了特别的庆祝色彩（今天除了您的信和两件小礼物外，还收到了一封使人非常不快的信，但没关系，不快使我坚强，很奇怪，是吗？）。我完全相信您的善良和真诚，并充满信任地吻您的手。

您的 弗兰茨·卡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安娜·鲍威尔夫人

〔信头的花押字为“HK”〕亲爱的安娜：

你美好、善良的来信使我感到不安，请不要因我这么长时间没回信而生气。我一直都很忙，实际上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写信。我们俩的情形真是差不多，你为经济而烦恼，我则因店子而忙碌，但重要的是我们都很健康。听说爱米莉姨妈要找地方避暑，我们也都很高兴，布拉格天气

炎热，柏林大约也是如此。这种天气，只有在乡间能最好地消除疲劳，弗朗茨巴德不是很不错吗？但无论如何她应先请教一下医生。

在弗朗茨巴德我们休养得很好。十二天前，我在马德里的弟弟来看我们也使我们很高兴，大家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为没能去拜访你们感到很遗憾，他很希望能见一见我们亲爱的菲莉斯，并拥抱她。但他已经保证，明年一定再来——上帝保佑能够如此——明年他要去柏林参加一个会议，于是想借机将愉快的拜访与必须的工作联系起来，顺路去看望你们。我们还收到了你先生卡尔真诚的来信，我将争取尽快回信，并请你转给他。

我很有兴趣去布置那套房子，可惜的是，房子可能8月14日之后才能腾出来，在此之前我什么也安排不了，而这以后，我就该着手把它布置得漂漂亮亮的了。我记不得卧室或书房家具中是否包括一张可睡觉用的长沙发，应该考虑一下日后的实际，如果有客人来睡在那儿。如需要我就再给弗兰茨购置一张客人用的睡床，包括垫子、鸭绒被、床罩。请你来信讲一下尺寸，好使这些床上用品也适合菲莉斯买的那些床的大小。我当然会选白天可以收起来的那种沙发床。

我看了看钟表，发现现在已是夜里11点了。我亲爱的海尔曼去拉德索维茨孩子们那里了。我坐在这里写信，思绪却将我带到你们身边。白天我根本不可能静下来写私人信件，如果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在房中，可以不被打扰，写起来就快多了。奥特拉已经睡了，弗兰茨在他房间里工作。我进屋时吓了他一跳，当时他正幸福、快活地端详菲莉斯的照片，那照片照得的确很成功，很像她本人。这页纸快写满了，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必须停笔了，我、孩子们的父亲及孩子们衷心地问候你们，祝健康、愉快、永远和睦。衷心地拥抱你。

尤丽亚·卡夫卡

1914年7月4日于布拉格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鲍威尔父母的信 [225]

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如何称呼你们，不知道你们允许我如何称呼。

我不去了，否则对所有人来说，那都将是一种无谓的折磨。我知道你们会对我说什么，你们也清楚我的反应会是怎样的，所以我还是不

去为好。

今天下午我也许会动身去卢卑克。我想，我们仍能够继续很好地相处，也会去这样做，即使我们都希望能建立的那种关系看来已不可能存在了。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毕竟是个安慰，虽然同目前的境况相比它显得很微不足道。相信菲莉斯已说服你们接受了这个现实。我将这件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祝你们幸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尊重你们的，特别是看到了你们昨天的态度。不要将我留在痛苦的记忆中。

谨致谢意！

弗兰茨·卡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安娜·鲍威尔夫人

〔信头花押字为“HK”〕

亲爱的安娜：

我不能不这样称呼你，因为我喜欢你。即使我们的孩子分手了，但这也不应影响和动摇我们的友谊。我不能理解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一切，真是弄不懂。星期二我们收到了弗兰茨从柏林寄来的信，当时我们正忙着。海尔曼将没开封的信交给我，于是我放下手里的活计，走进里屋，好在读信时不被打扰。假如有人看到我读信时的表情，肯定会吓一跳，我惊得目瞪口呆，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这之后的一整天里我都感到虚弱无力，只是心里暗暗庆幸我丈夫没有问起弗兰茨都写了些什么，由于忙碌他忘记了弗兰茨的来信。直到第二天，他睡了一个好觉后，我才问他难道不想知道儿子来信都写了些什么，然后就给他读了信。你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反应。你能否帮我个忙，将那封信寄给我[226]，我不能理解，那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可怕的东西，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弗兰茨喜欢菲莉斯，但方式与其他人不同，这我是知道的，他从来没有能力像其他人家的孩子那样表达他的爱。正如我深深地相信，他爱我，爱得体贴入微，尽管他从未向我显示过这种爱。对他的父亲及姐妹们他也是如此，可他是你能想象出的最好的人。他把自己的钱分给穷困的同事，他对物质方面的要求很低，不需要太多的钱[227]。可能婚

姻就根本不适合他，他一心追求的只有写作，只有写作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而我把希望寄托在菲莉斯的聪慧上，我对自己说，一个聪颖明智的女人有能力去改变一个男人，而我的希望落空了。也许我们也还不必灰心丧气，孩子们不应完全中断他们的友谊，他们应该再相互考验一年，结婚并不着急，他们还年轻，还可以等待。这是我的想法，请说说你是怎么看的。

今天收到我弟弟阿尔弗雷德自马德里的来信，使我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他附寄了一张一千克朗的支票，作为给弗兰茨和菲莉斯的结婚礼物。我马上也给他回信，问一下我该如何把钱寄还给他。现在已是晚上10点了，白天我一分钟时间都没有。我送给菲莉斯的手镯让她留作纪念吧，记住她有一个慈母般的朋友。我必须停笔了，纸已经写满了。忠心地问候你及你的家人们。愿我们永远友好和睦。

你的 尤丽叶·卡夫卡

1914年7月20日于布拉格

代我丈夫及孩子们向你们问好。

尤丽亚·卡夫卡夫人致安娜·鲍威尔夫人

〔信头的花押字为“HK”〕

亲爱的安娜：

你友好的来信早已收到，很抱歉一直拖着，好久了也没回信，但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因为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烦恼太多，我的大脑似已失去了正常思考的能力。我们的两个女婿都入伍了，我们的女儿埃莉同她的两个孩子住在了弗兰茨的房间，弗兰茨则住进了贝雷克巷佩波^[228]的房子，因为瓦莉和她的孩子还待在波米施——波德她公婆那儿。你们的女婿没参军吗？你们的亲属^[229]中有没有人参军？布拉格的情况很不乐观，我们的店子虽然还开张，可一整天也见不到什么顾客。不过只要孩子们能很快健康地回到我们身边，所有其他的一切也就无所谓了。在这种情况下，弗兰茨的事也就自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近来还要花些钱，因为必须为那套房子付半年的房租。你的孩子们都怎么样？他们已经去度假了吗？或者已经回了柏林？今年夏天的假期根本没能好好过，局势混乱，于是所有人都从疗养地、浴场和度假地赶了回来。亲爱

的爱米丽姨妈怎么样？她大概还同你们住在一起吧？你的卡尔现在一定在家，因为目前所有商店的生意都不景气。我现在几乎不看报，看得越多心里越紧张。这个月3号还收到了我两个女婿的来信，而这以后就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也许已从他们入伍的地方开拔了，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通邮。我的女儿们就更加心神不宁，战场上的事是不可能安心得下的，只有将一切都交给万能的上帝了。你说过要来看我们，想必因这场战争而推迟了，还能成行吗？你必须遵守诺言，来我们这儿一次，所有的人都将张开双臂欢迎你。

祝愉快，衷心地问候所有的人，热烈地拥抱你们。

你的尤丽亚·卡夫卡

1914年8月7日，布拉格

代我丈夫及孩子们向你们问好。

致格蕾特·勃洛赫 [230]

真是太巧了，格蕾特小姐，恰恰今天收到了您的信。我不想说出巧在什么地方，这只关系到我，以及我今天凌晨3点躺在床上时的一些想法。

您的信使我很吃惊，并不是因为写信这件事本身，为什么您不该给我写信呢？但您说我恨您，这可就不对了。就算所有的人都恨您，我也不会的，一方面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另一方面，虽然您是作为审判我的人坐在阿斯卡尼亚旅店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另外要说的是，对您、对我、对所有的人，那一幕都是令人厌恶的），而实际上是我坐在了您的位子上，而且直至今日也没有离开。

在菲的问题上您完全错了，为了引出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我暂且不说为什么。我不能想那些细节——这次危机大大激发了我的想象能力，使我可以相信这种能力——我说我不能想那些细节，因为它们也许能够证明您并没有错。您所说的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不愿意相信是菲自己弄错了，出于某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认为您的参与和关心是真实的，且丝毫没有考虑自己，就是这一封信对您来说写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了，对此我要衷心地感谢您。

1914年10月15日

〔1914年10月27日由布拉格发出的电报〕

菲莉斯·鲍威尔，柏林，林特施特罗姆，法兰克福街137号

信即到现在慢慢感觉好些祝安。

前几个月中，菲莉斯，我们关系中涉及我的那一部分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变化既不能用“好”也不能用“坏”来评价。我自然是一直准备着接你的电话，而且如果收到你的信，自然也马上会回的，可我却并没有想过先给你写信。在阿斯卡尼亚旅店发生的一切，充分地表现出了信及所有写出来的东西是多么没有价值。但因为我的头脑还是原来的（虽然头很疼，今天正恰恰如此），所以它依然存有关于你的思维、关于你的梦。只是在我头脑中我们共同生活的情景有时有些苦涩，不过大多还是愉快、幸福的。有一次，虽然不是想给你写信，却想让别人给你带个信儿，你不会猜出那是为了什么，那是一个特别的事，入睡的时候想出来的，将近凌晨4点，这是我通常的睡第一觉的时间。

我没有想到写信，首先是因为我自认为很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关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常常以没有说出口的东西为依据，那么，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犯了一个错误，这里缺少的不是表达，而是信任，正因为你你不相信你听到的和看到的，于是，你就想肯定还有没说出的东西。你就不能认识左右着我一切的我的写作的力量，你也认识到了，却很不完全，正因如此，你就必然会错误地理解引起我对写作工作担忧的原因，仅仅是对写作工作的担忧，这使你迷惑，而且，你比其他人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也承认，这让人讨厌，我对此尤其厌恶），这是很自然的，并非只因为固执。看呀，对于我的写作来讲，你不仅是最重要的朋友，同时也是最大的敌人，至少从写作的角度看是如此。因此，出于自我保护，我的写作会竭尽全力反抗你，尽管它从根本上是无条件地爱着你的，而且这会表现在任何一件小事上。比如，我想起有一天同你的姐妹们一起吃饭，几乎只有肉，假如你在场，也许我就会要点炒杏仁。

在阿斯卡尼亚旅店，我也并非是因为固执而一言不发的。当时你的话说得非常明了，这里我不想重复了，但有一些深层的东西，即使只有

两个人也几乎无法出口，尽管如此，在我长时间的沉默，或张口结舌不知所云之后，你还是将那些难以启齿的话说了出来。而在这之后，你也等了很长时间，好让我能说点什么。我现在也不再反对你带上了BL〔勃洛赫〕小姐，在给她的信中，我几乎是侮辱了你，她有权在场，但我不理解的是，你让你妹妹〔艾尔娜〕也去了，我还不怎么认识她呢。但她们两人的到场也并没有太多地干扰我。我很有可能在能够说出一些关键性的话的时候因固执而沉默，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当时我根本没有什么关键性的话可说。我看到，一切都已失去了，我也看到，即使在最后的一刻，我也能够以任何一个意外之举挽救这一切，但我没有什么意外之举。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同样喜欢你，我看见，你沉浸在痛苦之中，我知道，因为我，你无辜地忍受了两年，即使有责任的人也不应忍受这么多。但我也看到，你不能理解我的处境。我还能怎么做呢？也只能像当时那样，一同坐车，一路沉默着或说些蠢话，听那个有趣的马车夫讲故事，边注视着你边想：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说你不能理解我的处境，其实是说明我不知道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我知道，我不会不告诉你的。我总在不断尝试着向你解释我的处境，你其实也理解了，但却不能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去面对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心中一直有两个人，在相互斗争。一个几乎与你希望的一样，他所缺少的、用以满足你愿望的东西，可以通过以后的发展去弥补，你在阿斯卡尼亚旅店的责难没有一条是涉及他的。而另外一个则一心只想着写作，写作是他唯一关心的事，为了写作，他可以去做最无耻的事，假如他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他最先想到的竟是他的写作会因此受到阻碍，即使这只是一瞬间的想法，也可被称为是很无耻的行为，而作为弥补这种无耻行为的，则是他为了写作也能够忍受痛苦。这两个人在斗争，但那不是挥拳猛击对方的、真正意义上的斗争，前者依赖于后者，因为内部的原因，他永远没有能力打垮对方，而实际上，他会为对方的高兴而高兴，一旦对方露出失败的迹象，他就会跪倒在他对手面前，除了他不想再看到任何东西。就是这样，菲莉斯。他们是在斗争，你也可以同时拥有他们俩，只是你无法改变他们，除非将他们毁坏。

而实际上，你当时本应完完全全地认识到这一切，本应认识到，所有的这一切也是因你而发生，明白我的写作所需要的东西既非执著、也非好的情绪，而是帮助，一部分是其本身所需，另一部分是写作造成的特别恶劣的生活境况所要求的。另外，看看我现在是如何生活的吧：我现在独自住在我大姐家，因姐夫上了战场，她住到了我父母家。如果其

他的因素，特别是那家工厂不来打扰我，我一天的时间安排如下：2点半以前上班，然后在家吃午饭，接着看报、写信或做办公室里的工作，大约一至两小时，然后上楼去回到我自己的房间（你知道的），或睡觉或睡不着躺着，直到9点，再下楼和父母共进晚餐（多好的一次散步），10点又能力量充足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毫无睡意地待在那里，直至气力耗尽，承受不住对明天上午的恐惧，对办公室里头痛的恐惧。今天晚上是我近三个月来第二次没有写作，第一次大约是一个月前，那天我太累了。前一阵我还休了十四天假^[231]。在这期间，我的时间安排当然有所变动，在这短暂的十四天的忙碌之中，只要时间允许，我就尽量安排得紧凑，但心里仍担心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平均起来，我在办公桌前要坐到凌晨5点，有一次到7点半，然后去睡觉，假期的最后几天，我已能成功地真正入眠，能一直睡到下午一两点钟，然后我就有了真正的空闲时间，下午到晚上都是我的假期。菲莉斯，从我假期这段日子的安排中，也许你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但我其余时间的生活方式你却不能认可，或者说至少迄今为止还不能自觉自愿地认可。我或坐或躺，按照我自认为适当的方式过着每一天的每一小时。我独自待在这三间一套的静静的房间里，身边没有任何人，我的朋友也不在，每天，只有在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的几分钟才同马克斯在一起。我不快乐，这毫无疑问，但有时我很满足，毕竟，在这种情况下，我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

我一直不讳言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它一直是一个问题，一种尝试。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你没有说“不”，但你说的“是”并没有包括这个问题的全部，而这个漏洞你是用“恨”来弥补的。也许这个词过于激烈了，或者得说是用“厌恶”，那是从你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直接的起因是什么，也许根本也就没有，反正在你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信中开始有了这种厌恶。表现在你对我对你的担心的反应上，表现在你的冷淡上，也许当时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后来你应该看出来了，那是恐惧。后来有一次在动物园，你多次提到了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往往不是让你忍不住去谈论它，而是使你绝口不提，而有时，它则表现为对我生活方式的厌恶，进而也是对我目标的间接的厌恶。你是不能接受我的这些目标的，因为它伤害了你。我看到了，你是怎样地眼噙泪水地听W.〔魏斯〕博士讲话——那是恐惧；我看到了，我去你父母那里之前的那个晚上，你是怎样地在答话的时候词不达意——那是恐惧；我看到了，在布拉格，你是怎样地抱怨我——那也是恐惧（当然，有的例子也许并不完全恰当），我用“恐惧”一词代替了“厌恶”，但这两种情感是相

互交融的。在阿斯卡尼亚旅店，你最后所说的，难道不是这一切，一切的总爆发吗？当你听到自己所说的一切的时候，你还能怀疑我说的这一点吗？难道你不是甚至应该说你可能迷失了自己，如果你……就是在你今天这封信中，菲莉斯，我也找到了许多地方，那字里行间似乎仍流露出了这种恐惧。菲莉斯，你不能误解我。这种厌恶是存在的，但在所有人面前，你决心抗拒这种厌恶。在快乐的时候，我自己也曾希望这一切能有个好的结局，但这一点我现在不打算谈。你想让我对我最后的行为有个解释，我一直看到了你的恐惧、你的厌恶，这就是解释。我有义务管好我的写作，是它给了我生存的权利，而你的恐惧告诉我，或者说使我（带着百倍的、不能忍受的恐惧）担心，这对我的写作是个巨大的威胁。正像你所写道的：“我心情焦躁，精神崩溃，感到精疲力竭。”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心中，这两方面的思想还从未如此激烈地斗争过，于是，我给勃洛赫小姐写了那封信，但也许在那封信中，我还是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我为什么会那么害怕，而这以后，在阿斯卡尼亚旅店，你对此作了自己的解释，在此我不应再重复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在房子问题上的分歧，你设想中的每一点都使我感到吃惊，而我又提不出新的建议，自然只好承认你是对的。只是你自己却不应自以为正确。其实你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无非是一个宁静的、布置温馨的家，像你我双方亲人们所拥有的那样的家，除此之外，你并不要求更多（你今天的来信中又提到了这一点），但这些普通家庭所拥有的一切你也都想完全拥有。记得我曾请求你不要在教堂举行那些仪式——那几乎已是我最后的一个顾虑了，可你却不置可否，我担心地认为你生气了，而在阿斯卡尼亚旅店你真的提到了此事。你对家的种种设想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你与其他人都能和谐统一，与我却不能。别人心目中的家与我想象中的不同，这无可非议，但这些人一旦结婚基本上就满足了，婚姻对他们来说只是最后一次盛大而美好的事情，而对我却并非如此，我不会满足，对我来说，婚姻并非是一桩年复一年、不断发展的生意，我不需要这样一个归宿，好在这宁静的港湾中经营这桩生意，我之所以这样想不只是因为我不需要这样一个家，更因为它使我感到恐惧，我如此地渴求进行我的写作，这想法使我软弱，而我将要做的一切却是与我的写作相对立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按照你的想法安置一个家，则意味着我要将这种与写作相对立的情况永远维持下去——这即使还没变成事实，至少也已显现出这种迹象了——而这是我所能做的、最糟的事了。也许我该将我的话退一步说，以便使它们更加确切。你完全有理由问我，我希望你对这个家有个什么样的设想，而我却答不上来。对我的写作最适合

的、最好的是将一切都抛开，在随便什么地方找一个五层以上的房子，但不要布拉格，在其他地方，但是，你我无论如何是都不可能适应这种自讨苦吃的生活的，但或许你还会比我更适应一些呢，只是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去尝试过罢了。我希望你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吗？不会的。虽然我会为这样的建议而高兴，但我并没有指望你会这样做。也许会有一条中间道路，肯定会有，如果，是的，如果不是因为那种恐惧，因为那种厌恶，使你不能把握对我及我们共同生活至关重要的东西，你一定会毫不费力地找到那条中间道路。我仍然可以寄希望于我们今后也许能够协调一致，但那只是希望，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我所希望的，这当然使我害怕，我必须保护自己，也只有这样，你才会得到一个有生命的我。

那么，你也许会说，这一切感受你也曾有过，同我一样，你也曾觉得没有安全感，也有理由感到恐惧，但我却不这样认为。从我的本心讲我是爱着那个真实的你的，只有当我的写作受到妨害时，我才会感到恐惧。因为我很爱你，才只有帮助你去保持自己。至少这种假设的说法并非完全符合事实，你没有安全感，但你是希望有完完全全的安全感吗？一直希望吗？是完完全全的吗？

我说的这一切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也许略微重新组织了一下，但不是新东西，唯一不同的是，它不是在我们曾有过的定期的书信往来中写成的，而且，是你希望我能写出这些想法，所以我期望着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盼望着你的回信，你必须回信，菲莉斯，即使你在信中反驳我。我焦急地等待着。昨天直到很晚的时候，信还没有写完，我就睡下了，睡了一小会儿，醒来后直到清晨就基本上再也没睡着，于是，我们在那最难熬日子里的忧虑及痛苦——这的确是我们共同的感受——再次涌上心头。这感受完整地保留着，一旦将它们唤醒，就会发现，这痛苦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减退。它们不断地折磨你，挥之不去。曾有几回我几乎在想，我可能是干了件蠢事，可又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你要回信给我，收到信后最好还能打个电报过来。

你还提到了同艾尔娜通信的事，你说给你回信时，我应该不考虑和她的通信。我不明白你指什么，而恰好明天我就要给埃尔娜写信，我还会告诉她，我给你写了信。艾尔娜一直对我很好，对你也是如此^[232]。

弗兰茨

1914年10月底或11月初

〔1914年11月3日由布拉格发出的电报〕

〔信头的花押字为“HK”〕

菲莉斯·鲍威尔，柏林，法兰克福街137号

信已寄出顺致问候。

[1] 马克斯·勃罗德的父亲阿道尔夫·勃罗德是布拉格联合银行经理。勃罗德的父母亲当时与他们的两个儿子马克斯和奥托居住在沙棱巷1号；女儿索菲嫁给了菲莉斯的堂兄马克斯·弗理德曼，他是居住在德国的商人。

[2] 可能是指1912年夏卡夫卡和马克斯·勃罗德一起进行的魏玛之行，由于魏玛的“音乐名胜古迹”，所以称为“塔利亚（希腊神话中一位主管喜剧的女神——译者）之行”。参见1912年6月29日日记。

[3] 可能指计划上演的但一直未演出的轻歌剧《希尔克和她的猪群》（发表在尤勒斯·拉弗格所著《有趣的男丑角》，弗兰茨·布莱和马克斯·勃罗德选编，1909年柏林出版）。

[4] 《阿卡迪亚》，马克斯·勃罗德编辑的创作艺术年鉴，1913年6月由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卡夫卡为该书写了短篇小说《判决》。

[5] 卡夫卡的处女作《观察》，由莱比锡恩斯特·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参见库尔特·沃尔夫的《一位出版商1911—1963年书信往来》，伯恩哈特·蔡勒和埃伦·奥滕1966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发行，第25页（以下简称《沃尔夫书信往来》）。

[6] 卡夫卡指的是他9月28日写的长达四页（33.3×20.7厘米）的信。

[7] 马克斯·勃罗德的胞妹。

[8] 卡夫卡后来把第一封信附在了他1912年12月20日夜间写的信上，第二封附在他1913年5月18日写的信上。

[9] 参见一个月后出版的短篇小说《变形记》：“……然后又从它上

面越过去，脑袋撞在一个卖肉摊的木架上……”

[10]参见1912年9月28日致菲莉斯信的注释②。

[11]参见1913年2月11至12日日记和卡夫卡1913年6月2日给菲莉斯的信。

[12]那时卡夫卡寄信多以挂号方式。

[13]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等国结成的联盟战胜了土耳其。强大的塞尔维亚使奥匈帝国，尤其是1908年占领的波黑巴尔干地区，深感受到威胁。

[14]《观察》手稿，参阅卡夫卡1912年8月14日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在这位小姐的影响下，我昨晚站着整理小东西，由此很可能发生一件愚蠢的事情，一件只能在暗地里笑的事情。”并参阅同一天给恩斯特·罗沃尔特的信。

[15]参见日记1912年8月20日：“她是谁，我一点儿也不好奇，并且很快就容忍她了。”

[16]简·吉尔伯特的轻歌剧《汽车小情人》，柏林王宫剧团演出。

[17]菲莉斯的弟弟费迪南特，昵称“费瑞”。

[18]菲莉斯的妹妹埃莉丝在布达佩斯完婚。

[19]介绍巴勒斯坦的月刊，维也纳阿道夫·博姆出版社出版。

[20]马克斯·勃罗德的小说《阿诺尔特·贝尔——一个犹太人的命运》，柏林〔1912年〕。

[21]马蒂亚斯·阿赫的评论，发表在《东方与西方》XII，第8期（1912年8月），775—776栏。

[22]马克斯·勃罗德的小说《诺内匹格城堡的故事》，一个冷漠者的小说，柏林，1908年。

[23]路德维希·富尔达的童话剧《塔利斯曼》中的引语。

[24]位于布拉格哥拉本大街东北端的“市政大厅”，里面有饭店、咖啡厅、舞厅和礼堂。

[25]比较卡夫卡的小说《美国》、《失踪者》一书中的《西方旅馆》一章的倒数第一段。

[26]卡夫卡的妹妹埃莉（伽布利勒），瓦莉（瓦勒丽）和奥特拉（奥蒂丽）。埃莉生于1889年9月22日，与卡尔·赫尔曼结婚；瓦莉生于1890年9月25日，1913年1月嫁给约瑟夫·波拉克；卡夫卡最心爱的妹妹奥特拉生于1892年10月29日，直到1920年才结婚。

[27]指卡尔·赫尔曼，卡夫卡的妹妹埃莉的丈夫。

[28]菲莉斯·鲍威尔自1909年8月在柏林卡尔·林特施特罗姆公司任速记员。1912年后在该公司口述录音机推销部当负责人。

[29]费利克斯，妹妹埃莉（赫尔曼）之子。

[30]小说《走出缝纫学校》刊登在马克斯·勃罗德的《妇人经济》，《三篇短篇小说》，柏林1913年出版。

[31]卡夫卡的《观察》。

[32]格哈特·豪普特曼的剧本《噶布利尔·席林之逃亡》。

[33]有关卡夫卡的法学论文及其从事职业的情况请参见克劳斯·瓦根巴赫的《弗兰茨·卡夫卡，1883—1912其青年时期传记》，1958年伯尔尼出版，第141页，以下简称瓦根巴赫的《传记》。

[34]从1911年到1912年冬天开始，卡夫卡和来自俄罗斯的通俗剧演员伊茨查克·略维结为朋友。以后卡夫卡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这个剧团巡回演出的情况。参见瓦根巴赫的《传记》第179页。

[35]卡夫卡这里提到的依地语报告晚会是于1912年2月18日在布拉格犹太人的市政厅礼堂举行的。卡夫卡开场白的全文见《乡村婚事》一书，第421—426页，亦可参见1912年2月13和25日日记。

[36]卡夫卡的父亲出身屠夫的家庭，对于他儿子仅食素的生活方式一直不理解。参见马克斯·勃罗德关于卡夫卡1912年11月22日给菲莉斯·

鲍威尔的信中谈到的素食主义的注解。

[37]玛丽·韦尔娜小姐，起初作为家庭教师来到卡夫卡家，后来就留了下来。参见瓦根巴赫《传记》第26页。

[38]盖缇，卡夫卡妹妹埃莉（赫尔曼）的女儿。她在1947年8月27日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对卡夫卡作了回忆。参见马克斯·勃罗德的《布拉格社交圈》，1966年斯图加特出版，第116页。

[39]印《观察》一书用的字体格外的大，这是卡夫卡强调要这样的。参阅1912年9月7日和10月18日致出版社的信，参见沃尔夫的《书信集》，第25页和27页。

[40]《马路上的孩子们》是1912年12月由恩斯特·罗沃尔特（莱比锡）出版社出版的《观察》中的一篇小故事。参见卡夫卡接到清样后给出版社的信（1912年10月18日）。

[41]这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是在卡夫卡的遗著中找到的，并且已由马克斯·勃罗德发表。参见《弗兰茨·卡夫卡传》扩大第三版，1954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171页，下面引用简称“勃罗德著《传记》”。

[42]这部小说1927年由马克斯·勃罗德以《美国》为题发表。在卡夫卡与菲莉斯的所有书信中，凡卡夫卡谈到长篇小说时，就是指的这部作品。

[43]《喧闹》这篇作品发表在布拉格的《海尔德学刊》第一期（1912年10月），第44页。该作写于1911年11月，初稿参见1911年11月5日或6日日记。

[44]参见1912年11月9日给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45]可能这封信促使菲莉斯给马克斯·勃罗德写信，请他解释卡夫卡的行为。参见勃罗德1912年11月15日的回信。就在几天前，为了在菲莉斯和卡夫卡之间进行调和，勃罗德在柏林逗留时曾打电话给菲莉斯。卡夫卡在1912年11月13日给勃罗德的信中说：“你在那里为善意、理智和担心说出了的最极端的话，但如果那里不是你，而是一个天使在打电话，也比不上我那封充满恶意的信。”

[46]菲莉斯在其公司庆祝会上表演的一个角色。

[47]无法了解指的是哪本书。

[48]关于卡夫卡崇拜福楼拜，参见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的信仰和信条》（《卡夫卡和托尔斯泰》），1948年温特胡出版，第20页，和瓦根巴赫的《卡夫卡传》，第159页。

[49]位于在布拉格克莱因赛特的当时地方政府附近带有围墙花园的瓦尔德施塔因宫殿。于1623—1630年为皇室男爵阿尔布莱希特·封·瓦冷施塔因所建。

[50]通常的工作时间（中午不休息），2点或2点半下班。

[51]在与卡夫卡母亲的一次谈话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她对卡夫卡的这种看法，参见1911年12月19日日记。

[52]第一次提到正在创作的《变形记》。在一直到1912年12月6日的信里，卡夫卡所指的“故事”就是《变形记》。

[53]卡夫卡1907年10月至1908年7月工作的联合保险总公司。参见瓦根巴赫的《传记》第141页。

[54]罗伯特·马施纳博士，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一位经理。参见勃罗德1910年在《书信集》中的注解5，瓦根巴赫《传记》第148页和《乡村婚事》一书中第426—428页和454—455页。

[55]1912年7月卡夫卡在一家自然疗法疗养院，即坐落在哈尔茨地区雍伯的鲁道夫·约斯茨疗养院度过三个星期。这首歌是阿尔勃特·格拉夫·封·施利彭巴赫的《再见，小路》。卡夫卡在1912年7月22日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已经提到过这首歌。

[56]即袁子才，名袁枚，我国清代著名诗人，著有《随园诗话》等。——编者

[57]马克斯·勃罗德的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莱比锡。

[58]即以后的信里还经常提到的画家和版画家弗里德利希·菲格尔（1884—1966），中学里和卡夫卡同学过一年。

[59]指布拉格赫尔得联合会的邀请函。

[60]这张明信片寄到菲莉斯的办公室，故用“您”称呼。

[61]参见12月25—26日的信第一段。显然，这篇未完成的故事没有保存下来。

[62]费利克斯·韦尔奇，1884年生于布拉格，1964年逝世于以色列，哲学家，时事评论家，大学图书馆馆员，著有《宠爱与自由》、《中间道路之冒险》和《观点与概念》（与马克斯·勃罗德合著）。

[63]比较《判决》：“在楼梯上，他像越过一个斜面似地跨过一级级台阶，向正准备上楼的女仆冲去……‘上帝啊！’她叫出了声，用围裙蒙住了脸，可他已离开了。”

[64]容波恩（在哈尔茨）的尤斯特疗养院。

[65]民意测验的题目是：“他必须英俊吗？她必须聪慧吗？”其中弗兰茨·布莱、弗兰茨·韦尔弗、马克斯·道滕迪、雨果·萨鲁斯和鲁道夫·赫尔措格的回答均被刊登出来（《柏林日报》，1912年12月25日增刊第四版）。

[66]参见《美国》（即《失踪者》——编者）第278页和此后几页以及《日记》第279页。1912年6月1日卡夫卡出席捷克政治家索库布题为《美国及其官员队伍》并附图片讲解的报告。从中卡夫卡了解了一些此类游行示威的过程。促使卡夫卡写这本小说的其他一些缘由也源于索库布的各种资料。这些资料同年出版并配有众多插图，名为：Frantisek Soukup, Amerika, Rada Obrazu Amerického Zivota, 布拉格，1912。

[67]赫尔伯特·奥伊伦贝格，《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发表在杂志《包罗万象》I、II期上（1911年4月1日），第358页。《影之图——给德国文化需求者的启蒙读本》，柏林，1910年。

[68]1918年前，过布拉格各座桥（卡尔桥除外）都须纳税。参见瓦根巴赫的《传记》第67页；理查德·卡茨的《布拉格的桥税》，刊登在1921年1月5日《弗丝日报》第二、三版。

[69]《拿破仑著名格言语录，从科西嘉到圣海伦娜》，罗伯特·雷伦收集出版，莱比锡，1906年。

[70] 赫尔伯特·奥伊伦贝格于1912年因其剧作《贝林德》获人民席勒奖。

[71] 船图显然是指卡夫卡在1912年12月3日的信中描述的菲莉斯的照片。

[72] 参见卡夫卡1912年12月29—30日的信。

[73] 指小说《美国》（即《失踪者》）中的一段描写。

[74] 这是长篇小说《美国》（即《失踪者》）中的一个场面。

[75] 当时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为奥托·普利勃朗博士。这位董事长的儿子艾瓦特·普利勃朗是卡夫卡中学末期和大学时代的朋友。参见卡夫卡写于1913年3月10日至11日的信。

[76] 奥拉·汉森的《回忆斯特林堡》刊登在《新周报》上，1912年第11期第1536页和第12期第1724页。

[77] 参见《致父亲的信》

[78] 这里指约瑟夫·波拉克说的“晚上好，弗兰茨！过得好吗？在家写些什么？”参见卡夫卡写于1913年1月10日—11日的信。

[79] 参见卡夫卡写于1912年11月24日的信。

[80] 在“巴尔·考赫巴”协会的庆祝晚会上作的《犹太人神话》。其中一部分刊登在《谈犹太教选集》中，这部书由布拉格犹太大学生的“巴尔·考赫巴”协会出版，莱比锡1913年，第21页。

[81] 《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马丁·布贝尔出版并作序，法兰克福，1911年。

[82] 胡果·封·霍夫曼斯塔尔的《每个人》于1912年5月12日在布拉格的新德意志剧院（柏林德意志剧院的巡回演出）上演。

[83] 柏林莱因哈特剧团的女演员盖尔特鲁德·艾索德。

[84] 1910年初，俄罗斯芭蕾舞团曾被特邀在布拉格新德意志剧院演出。关于舞蹈演员爱德华多娃参见1910年卡夫卡日记。

[85]艾米尔·雅克·达克罗兹（1865—1950年），音乐家，一种教育改革性韵律操的创始人，著名的海勒劳尔学院院长。1914年，卡夫卡参观了达克罗兹学校。参见卡夫卡1914年6月30日日记。

[86]参见卡夫卡写于1913年1月14日至15日的信。

[87]参见卡夫卡写于1912年11月24日的信。

[88]这里可能是重提以前信中所说的“长篇小说”《失踪者》。

[89]显然这里指的是《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

[90]到那时为止，布贝尔出版的书还有：《拉比·那哈曼的传奇故事》，1906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和《巴尔什姆的传奇》，1908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91]参见卡夫卡写于1912年11月24日的信。

[92]奥地利语这个字的习惯用法为“使活跃”、“使行动”。

[93]西洋镜似的机器，里面图像通过一个转运装置连续快速放映，这样人们会以为图像中的物体在运动。

[94]参见卡夫卡写于1912年11月24日的信中附的剪报《为二十二名信仰基督的乌干达青年行宣福礼》。

[95]盖尔特鲁德·克尔西艾森：《拿破仑身边的女人们》，慕尼黑，1912年。

[96]《赫贝尔书信集》由库尔特·库西勒编选并作传记性注释，耶拿，1908。

[97]奥托·施托索（1875—1936），奥地利小说家和评论家。

[98]奥托·皮克于1913年1月30日发表于《波西米亚》报上关于《观察》的书评。

[99]此处指菲莉斯的母亲，她也在悄悄地读卡夫卡的信。参见卡夫卡写于1912年12月14—15日的信中有关言论。

[100]未保存。

[101]弗兰茨·韦尔弗的诗集，柏林，〔1911年〕。

[102]库尔特·宾图斯，生于1886年，出版家，批评家，当时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编辑，编辑了1919年初版的存在主义诗歌集《人类的黎明》。

[103]这篇文章是《犹太戏剧》，早在1913年1月17日的《莱比锡日报》发表。

[104]奥托·皮克（1887—1940年），布拉格记者，抒情诗人和文学家，捷克语翻译家。

[105]指卡夫卡朋友费利克斯·韦尔奇一家。

[106]此书为费利克斯·韦尔奇和马克斯·勃罗德所著，1913年在莱比锡出版。

[107]可能是《司炉》，小说《美国》（即《失踪者》）第一章。

[108]1913年12月中旬卡夫卡在布拉格托因贝宫当场朗读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见1913年12月11日日记。

[109]奥托·皮克对《观察》的书评，发表在1913年2月9日布达佩斯的《佩斯晚报》上。

[110]埃贡·艾尔文·基希（1885—1948），捷克杰出的报告文学奠基人。——编者

[111]弗兰克·魏德金德的话剧《希德拉或存在与拥有》1913年2月12日在新德意志剧院举行首演。

[112]参见卡夫卡1913年2月4日写给艾尔莎和马克斯·勃罗德的明信片。

[113]指卡夫卡2月14日至15日夜里写的信，菲莉斯应在星期天收到此信。

[114]参见卡夫卡1913年3月17—18日信中对这一信任的合理性的

怀疑。

[115]卡夫卡于1913年3月1日被任命为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副干事。亚洛米尔·卢奇尔在8月的《Sbornik Narodniho Musea v Praze》杂志第2期第65页（1963年）上发表了卡夫卡1912年12月11日要求加薪升职的申请书全文。

[116]可能是指《变形记》的结尾部分。

[117]指未完成的《里曼的故事》。参阅1913年2月28日日记。

[118]指菲莉斯嫁到布达佩斯的妹妹艾尔娜。

[119]指根据保罗·林道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阿尔伯特·巴塞尔曼第一次以电影演员的身份在其中扮演主角。1913年1月30日的《布拉格日报》刊登了巴塞尔曼的“电影演员和舞台艺术家”一文，此文同奥托·皮克所写的对卡夫卡《观察》一书的第一篇评论发表在同一版。

[120]1910年12月，卡夫卡在柏林观看了阿尔伯特·巴塞尔曼担任主角的话剧《哈姆雷特》。参见1910年12月9日写给马克斯·勃罗德的明信片。

[121]〔插入〕（括弧中答案：因为今天没消息。）

[122]卡尔·古茨科夫的一部悲剧。

[123]在卡夫卡的日记中，1913年2月28日至5月2日这段时间没有写任何东西。

[124]奥斯卡·鲍姆的中篇小说《陌生女人》发表在1913年3月13日的《波希米亚报》上，同日，费利克斯·韦尔奇写的一篇关于亨利·柏格森的文章也发表在《布拉格日报》上。

[125]卡夫卡的朋友在克林特沃·沙文卡礼堂朗读自己的诗作。参见Th.T.1913年4月15日发表在《柏林日报》晚间版上的评论。

[126]参见卡夫卡1913年2月18至19日的信。

[127]指1913年3月13至14日信中所附的奥斯卡·鲍姆的中篇小说《陌生女人》和费利克斯·韦尔奇写的一篇关于亨利·贝格尔森的文章。

[128] 马克斯·勃罗德《论奥地利家族的特性》一文，载于1913年3月23日《柏林日报》副刊第4页。

[129] 此信系通过邮差投递。

[130] 阿尔贝特·艾恩施塔因发表在1913年4月16日《柏林日报》副刊第4页上关于卡夫卡的《观察》一书的评论。后收入《卡夫卡讨论文集》第135页。

[131] 参见库尔特·沃尔夫1913年4月16日致卡夫卡的信，沃尔夫在信中答应，把《变形记》、《司炉》和《判决》三本书合为一册出版（沃尔夫，《书信集》，第30页f）。

[132] 卡夫卡的舅舅阿尔夫雷德·略维在马德里。

[133] 与以前的住房相比，鲍威尔家的新居离卡夫卡在柏林常住的“阿斯卡尼亚”近了很多。

[134] 举行菲莉斯弟弟费尔迪南特订婚招待会的日子。

[135] 原文如此。——译者

[136] 参阅卡夫卡1912年11月13日致马克斯的信。

[137] 估计是马克斯·勃罗德关于《观察》一书的评论。

[138] 星期四〔划掉了〕。

[139] 指的是卡夫卡1905到1906年在楚克曼特尔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参见瓦根巴赫写的《卡夫卡传》，130f页。卡夫卡在191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就像在楚克曼特尔和里瓦一样，和一个可爱女人有过甜蜜关系……”并在1916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除了在楚克曼特尔，我还从未信任过一个女人。后来在里瓦还有一个瑞士女子。第一个女子，我没有经验……”参见卡夫卡1916年7月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

[140] 此信系在“一个月等待时期”（1912年9月28日到10月23日）未寄出的第二封信。在卡夫卡1912年10月14日致索菲·弗理德曼夫人的信中，曾提及这一时期。

[141] 马克斯·勃罗德：《妇人当家》，三篇短篇小说，柏林，1913

年。

[142]参见年表。

[143]短篇小说《判决》是他在给菲莉斯·鲍威尔写第一封信之后两天创作的，即在1912年9月23日夜。参见1912年9月23日日记。

[144]德文Bauer音译鲍威尔，意译为“农民”。——译者

[145]参见1913年2月11日日记。

[146]可能是已经提到的《布拉格日报》6月1日上所发表的消息。不管怎样，并没收到其他材料。参见年表。

[147]参见卡夫卡1913年5月15日致菲莉斯的信，即他在圣灵降临节拜访柏林之后三天。

[148]卡夫卡至迟是在6月10日开始写这封信的。参见他在1913年6月10日信中的解释：“……我更多的是在准备，但还没有结束。”

[149]指海因利希·埃德华·雅考普1913年6月16日的谈话。

[150]参见1913年7月日记：“害怕结合，害怕随波逐流。我从此再也不会孤单。”（《赞同与反对结婚的所有理由》）

[151]卡夫卡家的别墅当时在拉德索维斯（明信片上展示的是拉德索维斯的风光和别墅），这是个位于布拉格东南的小地方。

[152]当时卡夫卡的地址是尼克拉斯36号。

[153]1909年9月，卡夫卡曾与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在意大利的小城里瓦度假。

[154]大约自1909年秋天起，卡夫卡经常按照丹麦体操老师J.P.米勒的体系练习，参见1910年3月10日和18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明信片和信（1919年春？）（上述信件的日子更正为“1910年春”，这是可信的说法，详见库特·克罗罗甫的《关于“表现主义的十年”的布拉格，德国文学史和史前史》，载《世界之友》，布拉格，1967年，第83页，注解106），1913年出版了为妇女写作的《磨坊》系列。

[155]摘自古斯塔夫·罗斯科夫所著《魔鬼的故事》第一卷（1869年莱比锡）第326页。括号中为卡夫卡加的注释。

[156]保尔·弗里德里希所著《比较与思考》，见《文学回声》15年度第22期（1913.8.15）第1547页及后页。

[157]马克斯·勃罗德献给弗兰茨·卡夫卡的诗《卢加诺湖》，发表于慕尼黑的周刊《三月》号第七期（1913.8）第247页上，另见勃罗德写的《传记》第100页。

[158]参见下封信。——1913年5月16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给菲莉斯的父亲写信的打算。以前过复活节他去柏林时，可能跟她谈到过这一点。卡夫卡在5月23日至8月14日与菲莉斯的通信中，多次提到他想写这封信。这一天他写道：“写给父母的信使我很为难……”8月15日致菲莉斯的信中写道：“我和你父母说了不可避免的事。”8月21日他抱怨她的父亲还没有回信。直到8月24日，卡夫卡才收到卡尔·鲍威尔的回信。“今天，我收到你父亲一封平静、深思熟虑后的信……但你父亲的信之所以平静，只因为我欺骗了他……”1913年8月21日，他就已经起草了一封显然更明确的信，但却没有发。现在看来菲莉斯在卡夫卡的催促下让她父亲卡尔·鲍威尔给他写了第二封信。卡夫卡觉得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恰恰是“这场婚姻对于她冒险的一面”她没有对父亲说。所以，卡夫卡把下面的一封信附上给卡尔·鲍威尔。以后的通信表明，菲莉斯没有把此信转交她父亲，卡夫卡最后只得作罢。参见1913年9月2日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

[159]与日记稍有出入（1913年7月21日或22日）。

[160]与第二届世界救助事业和事故预防大会同时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1913年9月2日至9日），卡夫卡与会。

[161]海因利希·劳伯所著《弗兰茨·格利尔帕策的生活》，斯图加特1884年，第164页。

[162]海因利希·劳伯的格利尔帕策的传记，卡夫卡在他1913年9月7日的明信片引用了其中的话。

[163]作家罗伯特·威尔士的姐妹，卡夫卡的表姐妹费利克斯·威尔士的朋友，以后成为丽莎·卡茨内尔逊。

[164]抒情诗作家和小说家阿尔贝特·艾伦施坦（1886—1950）。参见古斯塔夫·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1951年美茵茨河畔法兰克福，第51—52页。

[165]维也纳的素菜馆。

[166]教室里的那个姑娘，在后来的日记中曾提过。那时，卡夫卡有时上克里蒂安·封·爱伦弗尔斯的课。他是布拉格德语大学的哲学教授。参见1913年12月14日日记。

[167]次日，卡夫卡离开德森查诺，去雷瓦的哈通根大夫疗养院。

[168]恩斯特·魏斯（1884—1940），医生兼作家，生于布吕恩，后在柏林居住，1913年6月底在布拉格结识卡夫卡，同年9月在维也纳与卡再次相遇。其时，卡同阿尔贝特·埃恩斯坦、费利克斯·施托辛格以及奥托·皮克一起。魏斯1913年12月中在柏林结识菲莉斯，始终劝阻卡与菲结合（在1914年5月18日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信中，卡称其为“菲的敌人”）。1914年7月12日，魏在“阿斯卡尼亚旅馆”参加了解除婚约仪式，接着与卡夫卡一起去波罗的海共度暑期。卡于1915年1月与菲恢复联系后，在日记中写道：“魏博士劝我说，菲很可憎，而菲却劝我说魏很可憎。我相信他们二位，并且喜欢他们二位，或者努力这样做。”参见1915年1月24日的日记。

[169]参见1913年11月17日日记。

[170]卡夫卡在奥佩尔特大楼中的住所，尼克拉斯大街拐角——阿尔特施泰特环形马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在布拉格》画册中关于该幢大楼和对面尼克拉斯教堂的照片，由彼特·德迈茨出版，布拉格，1947年，图13（后文中仍有几处提及《卡夫卡在布拉格》）。

[171]汉斯·勃洛赫博士（1891—1943），在柏林行医。早在中学时代，他便同情犹太复国运动，后来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172]估计其中丢失了卡夫卡11月27日至29日致菲莉斯的四封信。参见卡1914年1月28日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信：“自从造访柏林之后（1913年11月8日至9日），我于11月27日首次给菲写信……却无回音……十四天之后再次写信，又无回音……我还写过两封信，发过两封电报。”

[173]关于同这一瑞士女人在里瓦的邂逅，曾在日记（1913年10月15日、20日和22日）中提过数次，并在与马克斯·勃罗德通讯中（1913年9月28日）提过一次。卡夫卡一直以缩写W.或G.W.来称呼她。从1913年10月20日的日记看，他曾向这位瑞士女人许诺对这一邂逅保密。

[174]参见1914年2月7日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信和1914年2月9日致菲莉斯的信。

[175]1月26日才寄出，参见1914年1月26日日记。

[176]参见1914年1月24日日记。

[177]参见1914年1月2日致菲莉斯的信。

[178]参见在卡夫卡遗物中找到的1913年12月15至16日给格蕾特·勃洛赫写的没有发出的信。

[179]参见1913年12月14日、15日和17日日记。

[180]1913年12月29日至1914年1月2日的信。

[181]旅馆的名称。格蕾特·勃洛赫在布拉格停留期间（1913年11月初）在此下榻。

[182]参见1914年12月8日和9日两天的日记。

[183]被（格蕾特·勃洛赫）剪开的总共十二封信中，第一封信在此处被拼合在一起。其他被剪开的地方在书中均用直线标明。

[184]参见1914年1月23日、26日和1914年2月日记。

[185]这封信未能保存下来，卡夫卡后来又两次提到。参见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信，1914年3月3日和3月9日。

[186]系指星期天在柏林的争论，1914年3月1日，参见日记1914年3月和1914年3月17日、21日、25日和4月3日至9日致菲莉斯的信。

[187]指1913年11月初在布拉格的第一次见面。

[188]卡夫卡同一天收到了来自柏林的电报：“无法来德累斯顿，菲

莉斯。”参见他1914年3月13日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信。

[189]附件未附上。

[190]这一想法的响应在《诉讼》这本小说的最后一章中可以找到。这本小说——在解除婚约之后——的大部分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写成的：在去行刑的路上约瑟夫·卡再次遇到了比斯特纳小姐，或者一个至少同她相像的姑娘（在手稿中卡夫卡把她的名字缩写为F.B.）。当陪同他的刽子手允许他选择道路的方向时，他决定根据“那位走在他们前面的小姐所走的方向走，不是因为他想赶上她，也不是因为他想尽可能多看她一会，而只是因为不要忘记她向他预示的警告”。

[191]参见1914年4月5日日记，1914年4月15日至17日期间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信；估计为1916年3月致菲莉斯的信，和1917年7月27日致库尔特·沃尔夫的信。

[192]在后来的信中又多次提到的穆齐或维尔玛是菲莉斯的外甥女，是她在布达佩斯结婚的埃尔泽姐姐的女儿。

[193]卡夫卡1914年3月21日致菲莉斯的信。

[194]1914年复活节（4月12日和13日），在柏林举行非正式订婚。

[195]1914年8月，是菲莉斯在卡尔·林特施特罗姆公司就职五周年纪念日。

[196]同亲朋一起举行正式订婚庆典。

[197]1913年11月初，在布拉格初次相识。

[198]估计为《变形记》，在1915年10月才刊登于《白页》月刊。

[199]《布列斯齐亚观飞记》，1909年9月28日刊登在《波西米亚》；与马克斯·勃罗德合著的游记《里夏德和萨姆埃尔》刊登在《赫尔德尔从刊》，创刊头年，第三期（1912年5月），第15页起。后被收入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与散文》，柏林，1935年，第264页。

[200]马克斯·勃罗德的长篇小说《蒂休·布拉赫通往上帝之路》首先

在《白页》上连载（1915年1月至6月），1916年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作品扉页题道：“献给我的朋友弗兰茨·卡夫卡。”

[201]卡夫卡的舅父西格弗雷德·略维，在特雷施当乡村医生（迈恩的伊格劳附近）；鲁道夫·略维在布拉格当会计。

[202]星期五，即1914年4月24日，一则不起眼的启事在《布拉格日报》上刊出：“弗兰茨·卡夫卡博士，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副秘书长，同柏林的菲莉斯·鲍威尔小姐订婚志喜。”参见缩印本第577页。

[203]估计又是那张在瓦根巴赫所摄的照片，参见《自由》第57页。

[204]恩斯特·哈特（1876—1947），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兼翻译家。

[205]见格利尔帕策遗著中发现的笔记，它曾被海因利希·劳伯在他所著的传记《弗兰茨·格利尔帕策的生活》（斯图加特，1884年）第65页中引用。“中午在弗勒利希处。僵局打破了，像每次和解之后一样，我有种要求，于是拥她在怀，爱抚了一番，很久都没有这样了。但却没有什么感觉。我很想再次激起热情，但是没有用。”

[206]《战斗》，柏林，1916年。

[207]该房屋的图片（朗格巷5号，户籍号923）见古斯塔夫·亚诺荷著《弗兰茨·卡夫卡和他的世界》（维也纳，1965年）第146页。

[208]圣·拿波姆克斯日，5月16日。拿波姆克斯是波希米亚人的保护神。

[209]指维也纳的塔利西亚素菜馆。

[210]《第二十七年》，S.魏斯出版社，柏林，1913年，第289页。

[211]参见1914年5月16日写给格蕾特·勃洛赫的信。

[212]参见注①中提到的信。

[213]大概是指1914年5月9日的《柏林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霍夫曼·卡米评《司炉》的文章。

[214]这封估计写于1914年3月1日后不长时间的信没有能收到。

[215]〔下面的两行之间〕您为什么要这么问？

[216]参见1913年2月23日给菲莉斯的信，第312页。

[217]是曾被多次提到的卡尔·林特施特罗姆股分公司驻布拉格的代表。

[218]捷克语：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

[219]当时卡夫卡的母亲及妹妹奥特拉已在柏林。

[220]估计卡夫卡读过汉斯·勃洛赫写的这些传说的手稿。这些作品从未印出。

[221]菲莉斯的姑姑，其父亲的姐妹。

[222]格蕾特·勃洛赫在维也纳的约·雷斯提公司工作。

[223]参见1914年6月30日日记。

[224]估计是给卡夫卡1914年7月1日来信的回信。

[225]写于阿斯卡尼亚旅店解除婚约的第二天。解除婚约时在场的有格蕾特·勃洛赫、恩斯特·魏斯及菲莉斯的妹妹艾尔娜。一名信差送交了此信。另见1914年7月23日及22日日记。

[226]估计是指1914年5月初至6月底写给格蕾特·勃洛赫的一封信。这封信中的一些话表达了卡夫卡对与菲莉斯结婚的可能性的巨大怀疑。格蕾特·勃洛赫可能为了在“旅店法庭”（指阿斯卡尼亚旅店）引用，而用红笔勾出。另见卡夫卡1914年7月3日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信：“您不必引用信中的话……”

[227]参见瓦根巴赫的《卡夫卡传》第149页。

[228]卡夫夫的姐夫约瑟夫·波拉克。

[229]“亲属”一词原文为希伯来-依地语。

[230]参见1914年10月15日日记，《日记》中本信根据记忆被重写

出来。

[231]1914年10月5日—19日，参见10月7日—15日日记。

[232]在菲莉斯的亲戚中，卡夫卡对艾尔娜的评价最高。在他第一次去鲍威尔家做客时（1913年圣灵降临节），她待卡夫卡就比其他人更加友好。婚约解除后他离开柏林时，艾尔娜送他到莱特火车站：“E.虽然目睹了法庭上〔阿斯卡尼亚旅店〕的一切，对我仍然很好，甚至不可思议地信任我。”

第九卷 致菲莉斯情书（II） 致密伦 娜情书



1923年，40岁的卡夫卡。所谓“柏林肖像”（1923年10月摄于柏林维尔特海姆商

场的遗像)



维也纳雀巢原野街113号，最上一层系密伦娜的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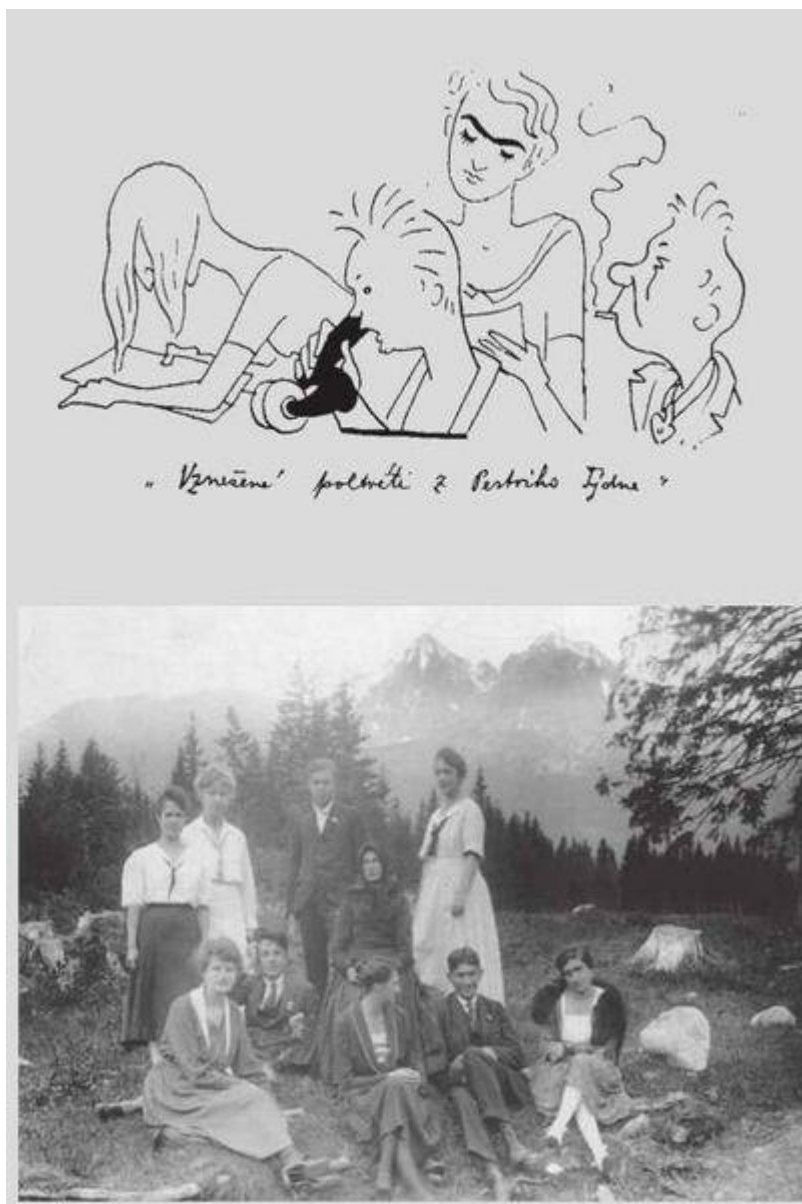
密伦娜的丈夫思特·波拉克经营的维也纳中坚咖啡馆“申土宫”格蒙德——1920年8月卡夫卡与密伦娜见面的地方



密伦娜·耶申斯卡



密伦娜（左）和她的女友斯塔萨·吉洛斯卡



上图是V.H.布鲁诺的漫画：密伦娜和斯塔萨在捷克文报纸的办公室里（左二打电话者为密伦娜；其后为斯塔萨）

下图是位于坦特兰斯克-马特利阿雷疗养院里的客人或工作人员，前排右二为卡夫卡



密伦娜



位于坦特兰斯克-马特利阿雷疗养院里的客人或工作人员，前排左为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匈牙利药剂师，后成为卡夫卡的密友并在卡夫卡病危期间陪伴卡夫卡至死；前右即卡夫卡

3-12

Der Vizesekretär Dr. F r a n z
K a f k a ist an einem ärztlich
konstatierten Lungenspitzenkatarrh
erkrankt und seit 11. September l.J.
aus dem Büro weggeblieben.

Prag, 14/9 1917.

Antonín

Ist dem Krankheitszustand
sicherer zugewandt.

19 2/9 17

Berchard

1917年9月14日医生给卡夫卡开的病假条：“经医学上查明：弗兰茨·卡夫卡副秘书长博士患肺炎，自9月11日起告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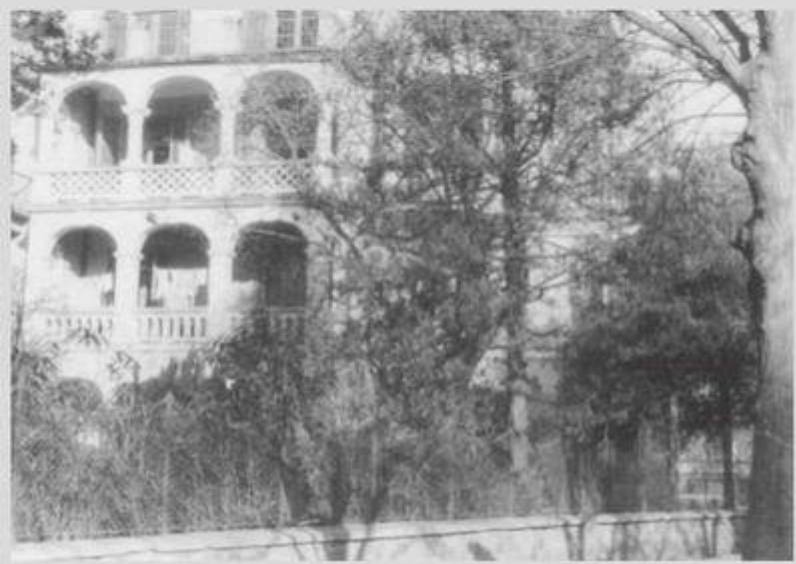
密伦娜的丈夫恩斯特·波拉克



上图是疗养院的“塔特拉别墅”，其下面靠前的阳台属于卡夫卡的房间，上一层阳台即属于他朋友克洛普施托克的房间

下图是克特拉特拉高地远足的地方，这是卡夫卡于1921年8月8日寄给奥特拉的明信片

Hier habe ich Ihnen schon so lange nicht geschrieben
Frau Milena und auch heute schreibe ich nur im-
folge eines zufälligen Entschlusses. Müste ich mein
Vielbeschriebenes eigentlich nicht, wie waren ja, wie ich
hoffe, alle Möglichkeiten meines Lebens - wovon ich
nicht klagen, sondern eine allgemeine belehrende
Feststellung machen will - kommt, wenn man will,
von Trübsal oder von der Möglichkeit der Trübsal-
schreibens her. Menschen haben mich schon einmal
betrogen, aber Trübsal immer und zwar auch hier
nicht fremde sondern meine eigenen. Es ist in meinem
Fall ein besonders Ursprung, von dem ich nicht weiter
reden will, aber gleichzeitig auch ein allgemeines.



上图是卡夫卡于1922年给密伦娜写的最后几封信之一

下图是奥托堡旅馆朝花园的一面



密伦娜在一次游泳后放松



两幅图片反映的就是卡夫卡说的“每天进树林的路”



上图是位于南提洛尔区的巅峰林荫道

下图是当时卡夫卡下榻的奥托堡旅馆。在这里他给他的小说《司炉》的女译者、后来的女友耶申斯卡·密伦娜写了第一批信件



卡夫卡大妹艾莉（右）和她的“小姐”（佣人）及女儿格尔蒂（留辫子者）1923年7月在波罗的海畔的莫利茨度假



这两幅图片即是卡夫卡在信中抱怨的锯木厂，今天犹在



上图是卡夫卡一家下榻的格绿克考夫宾馆（左边第一幢）。右后挨着树林的那幢房子是“柏林犹太人民之家”夏令营的驻地。在那里卡夫卡认识了多拉·狄芒，后两人一起迁往柏林

下图是莫里茨的登陆桥



四张明信片上的图景都是卡夫卡喜爱的游览景点，它们作为明信片被卡夫卡先后分别寄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1908）、女友菲莉斯（1915）和情人密伦娜（1923）



多拉·狄芒



狄芒早年照片



海德大街25—26号（今布塞大街7—9号），卡夫卡与多拉在这里从1924年2月住到3月



柏林施特格里茨区绿林大街13号，卡夫卡与多拉在这里自1923年11月住到1924年1月



卡夫卡喜欢教堂的“新植物园”



犹太教科学高校：“在狂乱的柏林和内部狂乱的地区的一块净土。”



绿林大街与施特格里茨议会大厦拐角处橱窗里的地方报纸成了卡夫卡在昂贵的通货膨胀冬天里的读物



当时柏林市内的电车



卡夫卡父母于1930年在波地布拉德浴场



卡夫卡父母和西格弗里德舅舅1926年在波希米亚美兰



卡夫卡逝世不久，他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出版，卡夫卡病重期间还亲自看过它的校样

Josefine, die Sängerin.

Von Franz Kafka.

Unsere Sängerin heißt Josefine. Wer sie nicht gehört hat, kennt nicht die Macht des Gesanges. Es gibt niemanden, den ihr Gesang nicht fortreibt, was umso höher zu bewerten ist, als unser Geschlecht im Ganzen Musik nicht liebt. Stillen Frieden ist uns die liebste Musik; unser Leben ist schwer, wir können uns, auch wenn wir einmal alle Tagesorgen abzuschnüßeln versucht haben, nicht mehr zu solchen, unserem sonstigen Leben so fernem Dingen erheben, wie es die Musik ist. Doch beklagen wir es nicht sehr; nicht einmal so weit kommen wir; eine gewisse praktische Schlaueit, die wir freilich auch äußerst dringend brauchen, halten wir für unsern größten Vorzug und mit dem Lächeln dieser Schlaueit pflegen wir uns über alles hinwegzutrusten, auch wenn wir einmal — was aber nicht geschieht — das Verlangen nach dem Glück haben sollten, das von der Musik vielleicht ausgeht. Nur Josefine macht eine Ausnahme; sie liebt die Musik und weiß sie auch zu vermitteln; sie ist die einzige; mit ihrem Singen wird die Musik — wer weiß für wie lange — aus unserem Leben verdrängt.

卡夫卡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约瑟芬，女歌手》的开头一段，首发于《布拉格日报》1924年的复活节副刊上



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公墓的卡夫卡墓，1931和1934年父母亲也先后葬在这里



上图是维也纳郊区基尔林镇的霍夫曼博士疗养院，卡夫卡于1924年6月5日在这里病逝

下图是卡夫卡的父母于6月11日在布拉格的几家报纸上分别用德语和捷克语发布讣告

致菲莉斯情书（II）

（1915.1.25—1917.10.16）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尤丽叶·卡夫卡夫人于菲莉斯的父亲去世之后写给鲍威尔一家的信

亲爱的：

我们已向你们电致哀悼，但我的内心深处却还催着我提笔对你们所遭到的痛心损失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哀悼^[1]。言语是如此的苍白，它难以形容我们在收到这个噩耗时的悲痛。亲爱的安娜，为了可爱的孩子们你务必节哀。因为如果人们把一切都想通的话，那么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像你亲爱的丈夫那样没有任何濒死痛苦地离去。这对你们大家一定是这一段艰难日子中的一个安慰。

也许这场死亡事件有很大部分应归咎于战争，因为人们天天在担惊受怕。

我们也是忧心忡忡。我们的女婿佩普三个星期前带着一处手伤回家了，痊愈需要多长时间，我们也不清楚。从亲爱的卡尔那里我们经常得到消息。我的全家都要来分担你们的悲痛。尤其是我的丈夫，他像对待一位真正的朋友一样一直爱着已故者。六个星期前我们也遭到了痛心的损失，我丈夫最年长的、在科隆的哥哥菲利浦·卡夫卡在病后不久就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这已经是他最后的一位兄弟了，两个弟弟都已先他而去。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都去了。

请向亲爱的埃米莉阿姨转达我们的哀悼。对她来说，这也是一个不易挺过的巨大损失。

好了，就此搁笔，愿我们的友谊长在！

你们的 尤丽亚·卡夫卡

1914.11.27—布拉格

我有时甚至能感觉到这种对我的信赖所带来的影响……[2]

我该作个总结吗，菲？让我先作一个既贴近又久远的观察吧。我提起了笔，离你近了，我站到了沙发旁，离你更近了。这儿你不会让我不知所措，这儿你不会闪避我的眼睛，我的想象，我的问题，即便你沉默不语。在这所宅子带教堂尖顶大钟的阁楼上我们难道是落地大座钟吗？可能。

我们都认为，我们俩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未曾有过美好。这话还不是很确切。也许我们在一起不曾有过完全轻松的一分钟。我想起了1912年的圣诞节。那时马克斯在柏林，他认为，你必须得对一封可恶的威胁你的信作好思想准备。你答应要勇敢地挺住，但还是说了下面的这段话：“这真是奇怪，我们互相定期经常地写信，我也已经收到了他的许多封信，我很想帮他，但太难了，他让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太难了。我们无法再靠近一些。”对此我很能理解，两个人的情况总是如此。一个人早认识到这一点，另一个却更慢，一个人能马上忘却它，另一个却会想着它。但人们应该相信，如果彼此不能靠得更近的话，就得离得更远，这也许是一个容易的补救。但现在这也是不可能了，路标只是指着一个方向。

这是第一个冷酷之处，第二个在我们俩身上。我发现，我们俩互相铁石心肠，这绝不是因为一个人太不重视另一个人，但我们的确铁石心肠。也许你毫无责任，因此也就没有过失感，当然也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带来的痛苦。而我则完全不同。我不能争吵，这也许是一种不幸。我简直是在期待我内心渴求的那种确认的实现，希望毫不费劲顺利地得到这种确认或者宁可付出些努力。但是，我在那方面是那样的力不能及却从来不曾被注意到。因此我们表面上没有争吵，我们融洽相处，但这种无能不时在我们中间闪动，就像有人不停地用刀截开我们之间的空气。为了不要忘记它，你也不争吵，你也容忍，也许这种容忍是为了调和，但因为它是毫无过错的，所以比我的容忍要困难得多。

我以前的预言也就理所当然地应验。我不是自愿去那里的，我知道什么在威胁着我。威胁着我的是靠近的诱惑。这种巨大的诱惑简直在缠绕着我，即使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也不放过我。早晨你是在搁着两个包的那条长凳旁，下午你站在通往咖啡屋的几级台阶前。尽管在以往几年

里我一直从事着大量艰苦的脑力锻炼，但去想这些东西还是让我几乎难以忍受。我不知道，照此下去是否还能应付得了工作，但情况就是如此。

我将会很少写信给你，信件走得太慢了，人们在写信时也不能像以往那样随便了。我也不会催着要你回信。我们通过信件很少能取得什么结果，我们必须试图寻求另一种有效的方式。也许我又会把下午用来工作，尽管现在看来这不太可能，但无论如何我要试试。这项工作在某些意义上适合你，尽管好像是某个魔鬼在逼迫着你去取得这个评价。我应该尝试去干些工厂里的事，为什么你对工厂就比我懂得多！

行了，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女房东病了，我必须得把早上弄坏的床重新安顿好。我还得打扫房间，抹去灰尘。但女房东也总是拖拖拉拉的，所以今天也不用急着收拾。估计女房东也不会叫醒我，如果你在清晨8点半左右想以一个甜甜的美梦及时地唤醒我，那真是太好了。或许这个梦在叫醒我之前，还会走向一个但愿在某个地方正等待着我们的美好而真实的结尾。

问候你。

弗兰茨

[19] 15.1.25[3]

[页边空白处]

韦尔弗的著作我已经寄给你了。

我要诉苦，菲，直到我觉得舒服一点。你不会发笑吧？到博登巴赫的几天前我的工作状况相对来说还不坏，但那时我姐夫的兄弟就必须得赶来。那座工厂，它的惨状令我十分痛心。它所带来的痛苦述说不尽（毫无意义，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好处），但现在我真的必须要去接近它，每天都要去那儿。我不再考虑工作了，尽管我动用了最后的意志力。工厂停顿了，但货仓还在，必须得去敷衍债主和顾客等等。我必须要把刚刚在前一段时间特别上手的工作放开。但情况不久会好转的，至少这是暂时性的。我妹夫的兄弟现在在布拉格干活，他可以来工厂照应一至两小时，对我而言这马上是个引退的信号，我又坐到了宁静的屋子里，试图重新把自己埋掉。但在作了一个停留之后要重新找到以前的路

对我来说相当困难，就像一扇好不容易撞开的门又悄然合上了。这其中确实也存在对我自身能力的怀疑这个原因，但最终我总是还能走进这扇门，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在那里想找到的是你，而不是被解决的工作，为什么我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种幸福只维持了两天，因为我必须要搬迁了，寻找住房意味着什么，我们俩都很清楚。现在我又目睹了怎样的一个房间啊！大家得相信，这儿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肮脏不堪，至少他们容忍这种龌龊。我的满满的餐具柜，窗前的地毯，没有得到正确使用的书桌上的照相架子，床上的一堆堆衣服，角落边的咖啡屋棕榈叶，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们看成了奢侈品。但我对这些毫无兴致，我只需要宁静，但这些人却对宁静缺少概念，很容易理解，没有人会在一般的家居生活中需要我用来读书、学习和睡觉的宁静，人们没必要需要宁静，而我则要，为了写东西。我从昨天起搬入了新屋[4]，但在昨晚就产生了绝望感，我都觉得，从这个房间里逃脱出来的必要等同于从这个世界逃脱出来，此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我的女房东因为我的缘故悄然躲入了暗处，住在我隔壁的年轻人晚上带着疲倦下班后，走动几步就上床了。尽管如此，这个屋子还是太小了，大家可以听到门的开启。女房东整天保持着沉默，但临睡前还得跟其他的房客低语几句，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但能听到房客的说话声。墙壁也是薄极了。很令女房东遗憾的是，我使房间里的挂钟中止了运行，这是我搬进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但我隔壁的挂钟为此就敲得越响，我试图不去理会它的走时，但每半个小时它就会大声报时，尽管报时是旋律式的，我也不喜欢。我不能扮演一个暴君的角色，也不能要求让这座座钟也中止运行，这也帮不了什么忙，因为总会有一些窃窃私语，总会有门铃的响动。昨天那个房客咳嗽了两次，今天更频繁了些，他的咳嗽给我的痛苦比给他自己的还多[5]。我不能生任何人的气，女房东早晨为她的低语向我道歉，她说，这只是个例外，因为那个房客要换房间（为了我的缘故），她想把他带到新房间里去。她还要在门前挂一个厚厚的帘子。女房东非常友好，但我多半会在周一解约。诚然，我住惯了安静的房子从而十分挑剔，但在此外的其他地方我确实不能生活。不要笑，菲，不要轻视我的痛苦。当然，人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痛苦，造成他们痛苦的东西远不止是隔壁房间的轻声低语。但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为自身的生存或更正确地说，为自身生存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作的抗争也无异于我，无异于任何一个人。请带着美好的祝福伴随着我去寻找住房。

我还要回复你的来信，什么时候你将再次出门？最近在一家报刊的

小品栏中登载了一段关于一家唱机厂转产为录制厂的文章，毫无疑问写的是你们的工厂，我非常高兴读到这些。因为我与这样一家工厂比与我自己的工厂更有诚挚的关系。致以衷心和美好的问候！

你喜欢韦尔夫的作品吗？

弗兰茨

〔19〕15.2.11

〔明信片：1915年—布拉格〕

今天，菲，你的信到了，有一封丢了，或许是你的，或许是我的，真是可恶。从现在起，我会每十四天定期给你寄一封挂号信。是啊，有许多的话要说，可是在公开的信件上说，这几乎不可能。我对写信甚至也可以说有厌恶感，如果写信能达到目的而其他的一切都不行的话，那么这又有什么用呢？你的信对未来作了种种设想，它是亲切而友好的。你在博登巴赫并没有误解我的心意，但作为对我的奖励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更为正式而美好的决定，这个决定只能去做而不必写出来。

弗兰茨

〔1915年3月3日—布拉格〕

〔在明信片的反面〕

今天信走了。

现在寄发底稿[6]非常困难，等它写出来或印出来吧。

电报和卡片已寄发了。我对工作毫无兴趣、头痛欲裂以及许多念头长久地在脑子里徘徊的那几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头疼也很剧烈（我睡得太少了），但以往它会好一些，以后也会更好一些。其实我并不缺少坚韧，只是它在需要出现的时候总会被它的对立面所取代。

我已经把房间〔比莱克胡同〕退了。作这个决定真费了不少气力。几乎每天早晨那个老妇人都来到我的床边，向我低声提出新的、她想借此使屋子更为宁静的改进建议。我得感谢自己在脑海中早已作好了解约的酝酿。当我前天最终开口解除租约时，她正从箱子里取出她女儿看戏时穿的外套（有一种黄色尖领的看戏时穿的外套，这种外套总弄得我极

其阴郁，这件外套就是这种类型），打算晚上与女儿一起去参加一个小小的节日。因此我不想败坏她的兴致而把解约推至第二天。此外，情形也并不像我预计的那样糟糕，至少她向我吐露，她以为我至死都会待在她那儿（关于时间她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我现在租的这个房间也许好不到哪里去，但毕竟是另一个房间^[7]。也许在把我驱赶出来的那个屋子里并没有很多的嘈杂，因为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在工作上几乎一无所成，根本不可能去体验这个屋子宁静与否，一切倒不如说是我自身的不安，一种我无法再说清楚的感觉。

但我却想来诠释你的梦。如果你不是身在大地的群兽之中，那么你就看不到带星星的天空，就不会得到解救。你也许本来完全承受不了笔直站立的恐惧，我也是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共同的梦，是你为我们两个人做的梦。

在你的信中你一会儿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来柏林，一会儿又严肃地谈我们的将来。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请你坦率地告诉我，你相信我们在布拉格能有一个共同的将来吗？如果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原因完全不在于布拉格，也不在于外在的局势。恰恰相反，如果战争只进行了一半就平静地结束的话，那么预计这种局势会相当有利。你只要想想，我刚刚拿到了一千二百克朗，一笔很可观的钱，但在这儿却让我丝毫也高兴不起来，我几乎想宁可不要它，就像它会增加我的阻碍一样。你觉得呢？

还有一些问题，为什么你的睡眠很坏，原因是什么？你怎么会用那样一个信封？为什么你要读像《思考》这样陈旧而糟糕的书？一个建议：你只想读我寄给你的书吗？但要完整地看。总而言之，你必须开始看福楼拜和勃朗宁的信册。夏天我们将作一次旅行。

弗兰茨

〔19〕14.3.3〔1915.3.23〕

还是没有消息，菲，这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你怎么开始过春天？好久没有散步了，今天我去了，因为今天是星期天而且天气也很好，同时法庭的安排变更了，作了最可笑的推迟。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人们都认为自己能得到别人很好的对待，所有的账单尽管有着确凿无疑、显而易见的错误，那也应该是对的。但是，这种感觉找错了位置，至少是一种过多的良好感觉的堆积。在那个上午我不需要它，它也许应该出

现在昨天和前天以及马上来临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上午常常想要把疼痛欲裂的头在手中转动的那一刻，因为不去管它看来是不可能的。今天上午这种感觉也许会弥补这种痛苦，但昨天我不会知道它，明天我又忘记了它。

你们已经搬家了吗？我搬进了一个房间，这儿的噪音几乎十倍于原先的那间，但此外又比原先的那间漂亮多了。过去我不去考虑房间的地势和外形，但现在却不是这样。没有更开阔的视野，没有从窗户中看到一大片天空这种可能性，如果这儿不是空旷的田野的话，甚至也看不到远处的塔楼，那么我将会是个痛苦的受压抑的人。尽管我无法指出，这种痛苦中有多大部分应归咎于这样的一个房间，但一定是不会少的。我在这个房间里居然还能看到早晨的太阳，由于周围有许多较低的屋顶，它会完整地，直直地冲着我，而且我也不仅仅只能看到早晨的太阳，因为这是一间边屋，有两扇窗是朝着西南方向的。但为了让我不至于得意忘形，直到晚上总有人在我头顶的一间（空着的，未曾出租的！！）工作室里穿着厚重的靴子踏来踏去，此外还在那儿放置了一个毫无目的的制造噪音的东西，给人一种在玩九柱戏的错觉。一个大球被推着很快地滚过整个房间的地板，碰到了角落，又吱吱呀呀慢慢腾腾地滚回来。我向她租房的那位妇女尽管也听到了这种声音，却想试图合情合理地否认噪音的存在。因为人们为了留住一个房客总会千方百计地想出理由。她说，这间工作室是空着的，并未被租出去。对此我只能回答，这种噪音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毫无理由的痛苦，因而也是无法消除的痛苦。

此外我决不是住在农村里，因为如果我站在我的平台上的话，几乎能看见那座房子的窗户，对它的设计图你和我曾经研究过。今天，在这座房子的所有三个靠街的窗户中都能看到早晨的太阳。我不知道，对这些窗户该说些什么，你会怎么说呢？我在晚上也能看到这些窗户，通常三个都亮着灯，但不会亮得像我窗上的灯光那样长。我完全在独自生活，每天晚上都在家，已经有一个月没去周六夜晚聚会[8]了，有两个月不能胜任任何能承担得起的工作了。现在我对自已说得够多了，该轮到你了。

你的最衷心的 弗兰茨

〔19〕15.3.21

〔信到达邮戳：1915.3.23—布拉格〕

又是一个星期天，菲莉斯，一个美丽宁静的星期天，屋子里只有我和金丝雀是醒着的。我现在是在父母这儿。我的房间那边也许正经历着地狱般的喧嚣，在右墙的后面好像要堆放一些树干。可以听到，树干是怎样在车上被松开，然后被举起来，它像一个生命体似地呻吟着，然后是一记咔嚓声，它掉了下来，引起整个讨厌的水泥屋的共振。在房间头顶的地板上升降机的器件嗡嗡作响，空旷的顶层使它发出回音（这就是以前我所猜测的工作室里的幽灵，在那儿还有一些女仆，她们晾衣服时踩着拖鞋简直就像踏在我的颅骨上）。在我的下面是一间儿童游戏室兼晚上的公共社交室。白天孩子们在那儿尖叫和奔跑，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扇门在被猛力打开时总像吹笛一样。保育员想用大声叫喊来迫使孩子们安静下来。晚上成年人在那儿乱七八糟地闲聊，就像他们在下面每天有一个节日似的。但在10点钟时它会结束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有时候9点时就静了。这时如果我的神经还不曾崩溃的话，那么它就可以享受到一种美妙的宁静。

为了应付白天的喧闹，我已经寻求到了来自柏林的援助——我总是要提到柏林，奥罗帕克斯，一种裹上棉花的蜡，尽管它还比较润滑，但在有生之年就堵上耳朵也是很讨厌的，而且它也不能挡住噪音，只能降低噪音——毕竟还是有点用处。前几天我看了斯特林堡的小说《在公海上》，里面有一个精彩之处，你知道吗？那位主人公为了对付像我这样的痛苦，他备有在德国买的据称是睡球的东西，一种小铁球，人们可以让它滚进耳朵，可惜这似乎只是斯特林堡的一个发明。

战争是否让我痛苦了？通过这场战争人们能亲身体验到什么，现在根本还不知道，从表面上看它是让我痛苦，因为我们的工厂走向了崩溃，当然对这一点猜测的成分大于确切的消息，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月不曾去那儿了。我妹夫的兄弟在这儿接受培训，可以暂时去照应一下。我妹妹的兄弟〔丈夫〕在喀尔巴阡山脉受训，可能不会有直接的危险。你知道，我另一位妹妹的丈夫受伤了，他在前线待了几天，已经和伊兹阿斯一起回来了，现在在特普利兹^[9]治好了伤。此外在战争中经常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不能亲身在那儿。但是把这种念头不假思索地写出来看来只是愚蠢的，此外也许还并不排除我会去那儿的可能性。一些重要的东西阻碍着我自愿报名，当然其中的部分也是到处阻碍我的东西。

也有阻碍我们，菲，在布拉格生活的东西，这儿的条件是这样的，也许在若干年之后回想起这些还会津津乐道。但这儿并不适合我，

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并不会与环境抗争（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比你给予我的更亲切更衷心的帮助了），我只是在与我自己做斗争，而且把你也拉入了这场斗争。为了我们俩我不能这样做。当我失去理智想这样做后，我几乎马上为此受到了惩罚，在一个人感到和拥有爱另一个人的权力时，他要么就必须比我走得更远，要么就不要去走我所竭尽全力的那条路。但在布拉格，以我的情况看我好像根本就不可能走得更远一些。

看来你误解了我有关钱的解释。它是指每个月工资上涨一百克朗，我当然不必担心怎样去花这些钱。你只要想一想，我是在以我的全部所有为我的工厂作抵押。我不喜欢的地方是指这些钱使我现在坐的这个坑又被挖深了一些。

关于你自己你写得太少了，菲，你在干什么？你在工作上是否比以前干得少了？新的职位意味着什么？你在和谁交往？为什么在星期天下午一个人坐在家里？你在看什么书？还去看戏吗？你的工资少了吗？你都穿些什么（在博登巴赫你的衣服很美，那件短上衣）？你与埃尔娜的关系怎么样？所有的这些我都听不到，但又时时地让我牵挂。还有，你的兄弟怎么样了？你的姐夫呢？

还有一点，我们不必为我对面那座房子的损失感到伤心，这是一座无法远眺的房子（相反我的房间向两面都有宽阔的视野。我想，如果不做更详细的描述，这很难理解）。里面住着一位妇女和她的女儿。对那个女儿我只记得一件刺目的黄衬衣、颊上的长发和摇摆的走路姿势。对这座房子人们不应抱有希望。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邮戳：1915.4.5—布拉格〕

有多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了，菲莉斯！出什么事了么？如果有人长久地不曾答复你，那么他就像默默地坐在你的对面，你就会情不自禁地问他，你在想什么呢？

现在是回忆去年的时候了。此外，要去想些什么也是时候了。当她进来的时候，穿着蓝色的衣服，美妙极了。但那个吻并不完美，没有完

美地给予，也没有完美地接受^[10]。没有完美地给予，因为他对这个吻没有权力，他爱她这一点并没有给予他这种权力，他爱她这一点应该使他放弃这个吻，因为他会把她带往何处呢？他自己又站在哪里呢？通过父母（他还为此恨过他们，当然是不公正的）和其他一些人的共同努力在他的身下被塞了一块木板，至今他还站在上面。由于这块板还能承受得了两个人——出于这个糟糕和可笑的事实他行使了把她带到身边的权力。但实际上他的脚下并无坚实的地面。他至今能在这块板上保持平衡并不是一种成就，而是一种耻辱。告诉我，他想把她带往何处？这真是无法想象。他刚爱上她就已经贪心不足了。今天，他爱她并不少一分，即使他最终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就算她同意的话，他也不会这么轻易这么简单得到她。我只是不明白，她这样一个聪明而敏锐的姑娘怎么会以无穷无尽的痛苦来教训我。我不明白，她怎么会一直觉得在这儿，在布拉格这件事才有可能，才会有利。她曾经来过这儿，虽说没有看到全部，但也看到了这儿的许多东西，读过许多有关的介绍，但还是一直相信这一点。她对此是如何设想的？她至少不止一次感受到正确的所在，她在阿斯卡尼旅馆中带着孩子般恶意的话^[11]是足够的证明。

——还有另外一些事情：

我们在圣灵降临节能见面吗？我将会很高兴的。谁知道，那个你看来是不想过问的夏季旅游会不会因为假期的取消而无法成行。但在圣灵降临节我不想来柏林，总而言之，来德国总会碰到令人讨厌的困难。你知道，我为了护照等了多长时间，但它还是没有及时地到我这儿。此后我就再也没去过那儿。附件还在那儿，不知道是哪只老鼠在啃着你的两封给我的电报。类似的游戏现在必须又得开始。一封你寄来的信，一个有关紧急家事的证明也许会有用，然后又得漫长的等待。你有一个护照，你想来博登巴赫吗？我们在圣灵降临节可以待在波希米亚的瑞士。如果你能一个人来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不行的话，随便带谁都可以。马上来信告诉我你对此的意见。

竭诚的 弗兰茨

两本书在去往你处的途中，它们其实早该到了。

致以衷心的问候。即使这些卡片只到了一部分，它们也已经代表了同样的意思。我带着一种荒唐的想法在旅行，那就是，我要举起一只垂着的手，吻它。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5.4.24—沙托拉廖伊赫利〕^[12]

我在陪我的妹妹去看妹夫。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并希望你能中断这长久的缄默。我已把日期定在圣灵降临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来德国。但你必须事先给我来一封信确认。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5.3.25—哈特万〕

一步一个祝福。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5.4.26—纳基米哈利〕

我已经把妹妹移交并返回，很可惜。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

〔明信片邮戳：1915.4.27—布达佩斯〕

最后一站。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

〔明信片：1915年4月底—维也纳〕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对，对。但你不应该问，也应该知道你在问谁，谁会回答。圣灵降临节怎么样啊？信需要太长的时间了，你从弗赖恩瓦尔德来的信被耽搁得太过分了，它恰好是在我动身后到的。你的第二封信相当准时。昨天那本书^[13]，我充满感激地在我上面躺了半个下午。今天一大早起我就在农村了，一个人带着俾斯麦的一本传记，但几乎没怎么看。在布拉格，几乎只有独处才能相对给我带来一些愉快的感觉。

竭诚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5.5.3韦塞诺利—多布日霍维采〕

不要这么写，菲莉斯，你说得不对。这是我们之间的误会，但我确

信并期待它们会消除，即便不是在信中。我并没有改变（很可惜），天平，我要描绘它的晃动的天平也保持着老样子。只是重量的分配有些变化。我认为要更多地去了解我们两个人，我有一个暂时的目标。如果可能的话，在圣灵降临节我们谈谈这些。菲莉斯，不要以为我并不把所有起阻碍作用的思考和忧虑都看作是几乎无法忍受的讨厌的负担。我想最好能抛弃这所有的一切而选择一条捷径，现在马上就在一个简单的小圈子里享受幸福，当然首先是创造幸福。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承受着这种负担，不愉快的感觉包围着我。我也应当相当清楚眼前的失败，不仅是失败，此外还有一切希望的落空和一切过错的更正——我也许不能克制自己。此外，为什么你会相信，菲莉斯，看起来至少你有时会相信，这儿在布拉格我们有可能共同生活？可是以前你对此却是深深地怀疑，是什么原因使怀疑得以消除？我对这一点一直还不明白。

现在又得说说书上的几行字^[14]。看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幸。结尾什么也没有，没有黑暗，没有寒冷。我几乎害怕把这些写下来，因为那样就仿佛我在证明这一事实：这些东西确实是能够被写下来的。这样的误解又是越来越多。

瞧，菲莉斯，唯一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我的信件越来越少，也不一样了。以往其他那些频繁的信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你很清楚。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但这里的我们不是指你，因为如果这件事独独取决于你的话，那么你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15]。这儿的我们更多的是指我和我们的联系。信件不适合于这样一个新的开端。如果它们是必要的话——它们是必要的——也必须与以往不同，彻底的，菲莉斯，彻底的不同。你还记得大约两年前，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月份左右我给在法兰克福的你写的信吗？请相信我，其实我根本无意于重新就在现在写这些信。它们已等在我的笔尖，但我是不会写的。

为什么你不知道，对我这会是一种幸福（我们的幸福，也许不是我们的痛苦，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幸福是——在一起，尽管是在萨拉姆伯，对这个地方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你其实不可以把这些写进教育里），即当兵对我是一种幸福，当然是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我也希望如此。这个月底或者下月初我去作体格检查，你要祝我能如愿以偿地被接纳。

我们将在圣灵降临节见面。太可惜了，我还未从你那儿得到任何消息。如果你对坐车来博登巴赫有一丝反对的话，那么我就会尝试去弄护照并来看你。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我会去做，即便不是在柏林。

《回忆录》[16]不该对你的思想有所塑造或有所影响。这不是我的本意。但这个人的生活确实值得我们去共同体验。他是多么想也多么能作出牺牲啊！这是有生之年一种真正的自杀和一种复活。他为了什么而作出牺牲呢？哪个读者能看到从这本书中透出的或含有的成功。我很高兴，你读了这本书。但愿穆兹在桌边拧水龙头时不会太打扰你。

问候你和她。

弗兰茨

〔抵达邮戳：1915.5.6—柏林〕

信走得太慢了，有一封在路上。担心你不安我写了这张卡片，把它只当做是一次握手吧，余下的东西都在信里。今天我得知，〔4月〕24日你在布达佩斯，我们当时也许都在那儿，这真是一个有利的而又不相宜的巧合啊！回程中在那儿我只在晚上停了两个小时，但应该很容易能待到第二天的。真是太傻了。我在布达佩斯最大的乐趣就是想着你，想着你曾经到过那儿（看来那个时候对我们俩更为合适），想着你在那儿有个姐姐等等以及所有可能的东西。总而言之，这些都给了我一种亲近的感觉。但一想到，你确实在那儿，可以突然地在我的咖啡房的桌边出现！太笨了！

〔明信片邮戳：1915年5月4日—布拉格〕

至少三星期没有你的消息了，没有你对我的信件和许多明信片的答复。我相当不安。但表面上我还是平静地坐在一个高高的花园平台上，在我的眼前是一个宽阔的山谷，田野和草原，一条河流和林木覆盖的山丘。是晴朗凉爽的一天。你在哪儿呀？不管你在哪儿，都向你

致最衷心的问候。

〔19〕15.5.9星期日

〔明信片：韦塞诺利—多布日霍维采〕

亲爱的菲莉斯：

最近你问了我一些有关F.的新郎的离奇的问题。现在我能更好地作出回答。因为回程中我在火车上观察了他[17]。这非常容易，因为拥挤使我们俩几乎坐在了一个位置上。我认为他完全迷恋着F.。你应该来看

看，他在整个长长的行程中是怎样在丁香中（在其他任何一次行程中他从来没有带过这种东西）寻求着对F和她的房间的回忆，在他的另一边坐着年老的、背诵着海涅的诗篇的W.先生^[18]。但他的听众虽然喜欢W.先生，却并不喜欢海涅的诗，只有一小行让他感兴趣。但这一行也许根本就不是出自海涅的诗作，我认为，它是许多次以海涅的字体出现的名句：“她是可爱的，他爱着她，他却并不可爱，她不爱他。”（旧的片断）但我不想写海涅，而是想告诉你看来你所希望得到的不同的答复，终究是这样。我认为，那个人对我比对F.还要信任。

〔明信片邮戳：1915.5.26—布拉格〕

〔页边空白处〕

吻你平坦而柔软的戴着薄薄手套的手。

亲爱的菲莉斯：

看，他说，他忧心忡忡，他说，他在那儿待得太久了，两天太多了。一天后人们很容易分开，两天就会产生联系，要去除这种联系就会带来痛苦。在同一个屋顶下睡觉，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两个白天在一起共同度过，这也许已经是一种隐含着命令的仪式。至少他是这样觉得的。他很害怕，他恳求用欧若南属的照相技术，他想知道关于牙疼的答复，他不安地等待着消息。此外我不想说，他现在是不快乐的，他正欣喜地希望有可能被接纳^[19]。如果事情有些糟糕，他没有被接纳的话，那么他会尽快地扭头前去参加东海边那个共同的远足。

弗

〔明信片邮戳：1915.5.27—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我事先估计过一些糟糕的情况，但没想到是那样的结果。在胶片上什么也没有。我们用盖纸代替胶片照相了。我把胶片放到你的房间，你又把它扔回我的房间——一切都毫无意义，犹太人从你的相机前跑掉。我在厄尔伯根〔在卡尔温泉旁〕^[20]仰望着你，以为会长此以往。一切都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对你，什么没发生，你拥有相机和你，但你会怎样来安慰我呢？

〔明信片邮戳：1915.7.10—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从现在起你会经常得到我的消息。请原谅我的沉默。回到布拉格后我觉得难以忍受，我必须离开，被迫离开。失眠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东西也赶我走。我屈服了，我想要么远远地离开去湖边的沃尔夫岗，要么按照我的变得越来越稀落的老习惯进疗养院。最后，远途火车的行程把我吓住了（去沃尔夫岗要十七小时），因此我现在在疗养院，这是可耻的，但也是顺理成章的，很适合我一贯的生活，就像盖子配相称的锅子似的。此外我可能不会待很长时间。秋天有一个星期的空闲，这是最坏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我的主要病症到底是急躁还是有耐心。

竭诚致意。

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5年7月20日—鲁姆堡〕^[21]

有一点习惯了，这儿有大大的、美丽的森林，是一个简洁的、有着小山丘但还没有山脉的地方。它非常适合我的现状。此外星期天我都坐车回家，今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一个包裹。我很高兴。也许里面会发现你的东西。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5年7月底—鲁姆堡〕

亲爱的菲莉斯：

我已按你的意思和他谈了，非常坦诚，他也坦诚地回答了我^[22]。

我说：为什么你不写信？为什么要折磨菲？从你的卡片中显而易见你在折磨她。你许诺要写信，可又不写。你打电报说：信在途中，可是根本没有信在途中，而是在两天后才会被写出来。这种事情也许例外地可以由姑娘们做一次，如果她们的性格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不算是什么过错，但对你而言，这是一种过错，因为你的沉默只能表示一种隐瞒，

因而是不可原谅的。

他回答说：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中说出来与隐瞒没有多大的区别，我的痛苦是多方面的：

我不能在布拉格生活，我是否能在别处生活，我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是我不能在这儿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我因此现在不能拥有菲。

此外：我必须要去羡慕陌生人的孩子^[23]（这甚至已经被刊印出来了）。

最后一点：有时候我认为我会被各方面的痛苦所碾碎。但现在的痛苦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时间在流逝，这种痛苦让我越来越不幸，越来越无能，而前景也是不断地黯淡。

这还不够吗？上次与菲相聚后我的痛苦，菲是猜想不到的。几个星期里我害怕一个人待在我的房间里，几个星期里我把睡眠只当做是在发烧。我乘车去疗养院，又确信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去那儿干什么？在那儿难道就没有黑夜了吗？那儿还要恶劣，那儿的白天也像黑夜。我回来了，浑浑噩噩地度过了第一个星期，脑子里只想着我的或者是我们的不幸。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与人谈话，我只能在头部的疼痛和紧张之中听懂最浅显的东西。我坠入了一种愚笨，在卡尔温泉难道我不是这样吗？我还记得在博登巴赫的最后一夜，我在4点裹上了被子。我在想，现在菲在这儿，我拥有了她——整整两天——幸福啊！然后就是卡尔温泉还有那个我所指的确实讨厌的去奥斯赫的行程。

对于这方面不是说得很多，但提起过一些。我也可以写信给菲，但她的回答肯定是相当的简短：“这是你自己的过错。”去招惹这样的个回答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不写信，如果发生了一些新的事情，我当然会马上写信给她的，但是这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旧事她都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听说过。我不知道什么药物能治这种病。下个星期天在博登巴赫见面？这不应该管用。

非常奇怪，菲写出来的话总是和她说的完全不一样。如果她口笔一致，那么一切就会大不一样，我不是说，这样会更好一些，但是一切就会不一样了。她说，我吝于言辞，可能吧，可是她做得更厉害。如果我

把现在讲的话当着她的面说，她很可能这样回答：“看一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吧，你把在博登巴赫见面说成是不管用，你还说，如果我写的和说的一样，不会更好一些。”我不会在意这些话，我认为：“如果我去年处于类似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毫无疑问今天菲会在布拉格，第二个痛苦或者连同第三个痛苦都会被消除，但第一个痛苦和第四个中的半个痛苦就会滋长到把我们都埋掉。”

他是这么说的，他的外表也证实了他的状况。他在热度中，完全是冲动而涣散的，目前看来只能给他两种药，这儿的药不是能使他对过去视而不见，而是能使他免除将来的痛苦。第一种药是菲，另一种则是去当兵。这两种东西都离开了他。因此如果他不写信的话，我不能说他是错的。写信难道不比沉默更能引起苦痛吗？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由于去柏林旅行我没有收到你说的那封信，但它可能暂时只是对一个星期天具有意义，因为最近所有的受指责者都被取消了假期。

〔19〕15.8.9

一个清新的夏日夜晚。致以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地址：S.Fr〔索菲·弗里德曼〕

瓦尔登堡，普鲁士—西里西亚菲斯腾施坦大街66号

马克斯，勃罗德致最美好的问候。

〔明信片：大约于1915年夏季—里察尼〕

亲爱的菲莉斯：

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很高兴，头部针扎的感觉不再更剧烈了。所以我也就不写信了，对此我已经解释过了，它本身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你一定还记得我在卡尔斯巴特时的样子吧。可能我现在比那时还要糟糕些。但我现在不想把这样一个形象给你，你也不能这样看待我。此外我还不知道，你是否能来博登巴赫？我当然不能来柏林，因为我没有

护照。但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在博登巴赫我也不想露面，我甚至不会在布拉格露面。但我不想说我已经完全绝望了，没有希望我怎么活呢？

但是，对你而言，写信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障碍，为什么我不能时时得到你的消息？你对我感到伤心吗？我该做什么？我觉得，即使是来自天国的小天使的真切的声音都不能使我振奋，我都已经陷得这么深了。如果你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只能给予一个表面的解释。那也许就是失眠和头疼的缘故。它们真的太严重了。

寄给你姐姐的包裹明天发出。最近我会把我非常喜爱的马克斯的新小说《特洛·布朗通向上帝的路》寄给你。

即致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埃尔娜的地址是什么？我想把《变形记》寄给她。

你的可爱的明信片到了，如果它们一齐到达的话，那该多好啊，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这只能重新成为暂时的快乐，而这种暂时的快乐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已经受够了。我只能又给你，甚至现在也是，给你带去失望。我现在是一个源于失眠和头痛的怪胎。但这次我决不离开布拉格，而要在整个节日期间爬行在老路上。

你在邮局里怎么样啊？你有B弟的消息吗？你的家人？我的寥寥数语的空泛的回信不足以表达我收到你的消息之后的欣喜。

弗

〔邮戳：1915.7.5—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今天只写几行。今天肯定会到一张卡片，我的头部又在火辣辣地作疼，我只想回答你的主要问题。战后我当然想重新安排生活，尽管我对将来有公务员式的惧怕，但我想迁往柏林。因为在这儿不可能再发展了。但那时迁移的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从我目前的状况看，那时我最好能在整个星期都为自己工作，这样才能最充分地迸发能量。今天

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是怎样的一天啊！在1912年我就该离开这儿。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到达邮戳：1915.12.24—柏林〕

〔在另一页上〕

有关冯塔纳奖我还是刚刚从报纸上得悉。以前只是有一次由出版商为我做过准备，但不是很明确。施特海姆这个人我既没见过也没有与他通过信^[24]。《变形记》已经成书出版了。装订后显得很漂亮^[25]。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寄给你。埃尔娜的地址呢？包裹是完好无损地抵达了吗？

亲爱的菲利斯：

去加米施的旅行非常值得赞赏。无论如何都让我觉得比以往几次更有利于健康。我也不止一次像这一次一样考虑过你来布拉格旅行这个问题，但只要把所有的顾虑都合起来看，你最好还是不要来。给穆兹的生日礼物明天我会按照我的品味以及短时间内必须搞到一些好东西这个限制条件所能达到的结果配置好（特别要有图画书）。我想收到在加米施拍的每张照片。我现在住在一位S.施泰先生那儿，他目前正在看他的女婿，司法顾问S.弗里德伦德尔先生，住在夏洛滕堡的凯泽达姆大街113号，把照片寄给他，那样我就会马上收到它们。但他肯定只待到31号，即使可能的话，他也不太会待得更长。

最诚挚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5.7.26—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大概这是十天之后的第一次提笔向你写我的情况。我就是如此地生活。

我不能马上回复你的上一次的来信。我没有预料到它会这样。你在

雪中的玉照与你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理解，这真是可怕。我知道会这样，但我不知道怎样帮你，不知道你在哪儿会看到一个过去无法得到的帮助。现在要去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后，如果条件最有利的話？在最合适的情况下我会来柏林，我不想再做一个被失眠和头痛撕裂的人（前不久我意外地听到一个好消息，它绝不是直接地关系到我，如果是前几年的話我会对此高兴上一会儿，但现在我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对这个消息我的脑子一下子一片空白，一天一夜头部就像被一根细细切碎的绳索织成的密网所缠绕）。我不想做这样一个人，我想在战后来柏林。菲莉斯，我的最首要的任务是找个洞钻进去，听听我自己到底患了什么病？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心中那个充满活力的人当然希望如此，这并不令人惊奇，但那个评判者却并不这样希望。那个评判者也会说，即使我在那个洞中结束了自己，我也会完成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一切。但你呢？菲莉斯？只有我从洞中走出来，不管怎么走出来，我才有爱你的权力。与此相一致，你也才会正确地看待我。因为现在我给你的并且你认为是最正确的形象是在阿斯卡尼旅馆，在卡尔斯巴特，在动物园。我在你的眼中是一个坏小孩，一个傻瓜或者其他什么，你毫无道理地喜欢他，但是你应该寻找到一种道理去这样做。

这是我发热的头脑的展望。如果人们踮起脚尖，那么他们会很有希望，但是他们不可能这样坚持下去，因此他们的前景就会黯淡，这一点我不否认。

昨天我收到你姐姐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对寄给穆兹的包裹我并没有作任何精心的安排，只是作了很普通的挑选（两个包裹付二十马克自然是太多了），其中还有一张穆兹的很漂亮的照片，是一张带些想象力的照片。穆兹拿着调色板站在一张画前（仙鹤与孩子）。她真是一个聪明、漂亮、健康成长的孩子。看着那张照片我就觉得我寄的东西太少了，太不好了。

你在上封信上说附寄了一张照片，但我却没有找到，这对我真是一种会产生精神匮乏的打击。

你抱怨我写得也太少了，除了上面这些话我还该写些什么呢？难道每个字对写信者和读信者不都是一种神经的扭曲吗？而神经需要宁静，更确切地说是需要工作，另外的工作，能带来幸福的工作。现在当我考虑如何写这封信时，就好像是在把它小心地凑起来以制造痛苦，我不想这么做，我宁可做任何其他事情。

〔邮戳：1916.1.18—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这本书被带着谢意接受了（我没有见过这本书，只知道那个人是魏斯博士的一个好朋友），但又会有什么样的批评呢？难道我的信不比我的沉默更可怕吗？或者我的生活比此更糟糕？总之我所给你的痛苦是雷同的。但在我的能力和你的帮助范围之内我只有等待，即使直至化为灰烬。我不知道其他有什么办法。相对这封信而言，沉默意味着什么？那样不是更好吗？我想打开脚下的一扇活门，让自己随便找个地方陷进去，在那儿我的力量中那些可怜的残存会为今后的自由而保留。更多的我就知道了。

致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邮戳：1916.1.24—布拉格〕

最亲爱的菲莉斯：

把感冒当做我沉默的原因只是简而言之。我是感冒了，在床上也躺了一天，出去了两天，不喜欢在外面，又重新躺了两天。但感冒绝不是我待在家里的原因，我躺在那里，是因为整个一片混沌和无助。我希望那种力所能及的改变，即轻松。因为我绝望得像一只被关住的老鼠，失眠和头痛让我发狂，我真的无法描述我如何在打发时光。我唯一拯救自己的可能，我的第一个要求是从办公室解放出来。对此存在着阻力：即工厂。表面上好像在办公室缺不了我，那儿现在有许多事要干（附言：工作时间从8—2点，从4—6点），但相对于自由的必要性，相对于这种越来越倾斜的平面，这种形式的所有障碍都不应该存在。但我的力量还不够，再小一点的阻力对它而言都太大了。我对办公室外的生活毫无惧意，这种日夜在我脑海中燃烧的热度是因为得不到自由的缘故。但如果我的上司开始抱怨，如果我走的话，这个部门就会垮掉（无稽之谈，我很清楚地看到这很可笑），他自己也在生病等等，那么我就不能走，我心目中的公务员形象使我却步。那么就重新回到以往的日日夜夜。

菲莉斯，如果你对我们俩共同的不幸有任何责任的话（现在我不谈我的不幸，它已经完全被克服了），那么这就是你想把我固定在布拉格。尽管如此你也有责任看出，正是办公室和布拉格对我及我们俩意味着不断膨胀的不幸。我根本不相信，你不是有意想把我定在这儿，你的对未来生活的设想比我的更为勇敢，更为灵活（我的设想至少已被压到了奥地利官僚主义的腕部之后，此外还有我性格的障碍），因此你也没有迫切的需求去更精确地预计未来。尽管如此你还应该以我的心态去评价和估计这些，而且你自己要来反对我，反对我的言语，我其实应该一分钟都不要来反对你。那么取而代之的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柏林为一个公务员的布拉格之居购买了家具，这些笨重的家具一旦被安置好，就好像人们永远也不会再去搬动它们。它的坚固正是你最欣赏的。餐具柜紧压着我的胸部，就像一个完美的墓碑或者说是一座布拉格公务员生活的纪念碑。如果我们在观看家具店远处的某个地方时听到了丧钟，那么这就最适合不过了。和你，菲莉斯，当然要和你在一起，但必须是无拘无束地在一起，我会用你猜想不到的力量去竭尽所能。如果你想象过要使用这些家具的话，那么至少在我的想象中不应该如此。都是些旧东西，对不起。但在用新的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们之前它们就会是说不完的话题。

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兰茨

〔估计在1916年3月〕

〔大概是这封信的附言〕

我所写的一切看上去是这样的冷酷，但我不能回避这些，因为我觉得它们并不冷酷。我是如此深深地被伤害，如此蹒跚，所以我不应被认为对此负有责任。就如我在信中读到你感冒的消息而半天都没看懂一样，在我的身边紧紧缠绕着那些幽灵，那些因为办公室而阻止着我离开的幽灵。它们日日夜夜地附着我。如果我能自由的话，那么能按照我的意愿去驱赶它们将会是我的快乐。但是它们已慢慢地沉聚在我的心头。只要我还未曾得到自由，我就不想被别人看到，也不想见你。菲莉斯，如果你寻找另外的原因的话，那么你就完全搞错了，伤心地搞错了。

那本书我刚刚才开始看，但大体上我已不想干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当然也不想看了。这本书太繁复了，总会不断出现一个富有特征的人

物，但我又看不出这个人会带来很多新的开端。此外我也不是批评家，不太知道如何去分析，很容易造成误解。我经常只是扫过重要的部分而对整篇文章没有明确的印象。

你收到《特洛·布朗》这本书了吗？很久以前我从出版社让人把它寄给你。还有《世界末日——出版年鉴》[26]这本我以挂号信方式寄给你的书？

〔在页边的空白处〕

感谢你给我的那个片断。Asbest（石棉）这个词我必须要拼出来才会念，它对我而言真是太陌生了[27]。

未获护照，衷心问候。

弗兰茨

〔致菲莉斯·鲍威尔的电报，技术车间，柏林，马尔库斯街52号，
1916.4.6 —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因公我在卡尔温泉待了两天，奥特拉也在。我们昨晚走的第一条路很像我们俩在魏玛的第一个午夜去歌德故居[28]的那条路，它通往塔霍斯别墅。这儿的一切包括我所经历的糟糕的夜晚都与去年不一样了。昨天起程前收到了你的信。写这样的一封信好吗？对你好还是对我好？显然不是。它对目前的这种状况毫无用处。我不能来瓦尔登堡，因为你知道我没有获得护照，除非我能出示一张官方的柏林旅行必要证明。

即致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4.9—卡尔斯巴德〕

〔页边空白处〕

最美好的问候。

亲爱的菲莉斯：

你的信伴随着第一个好天来临了，你的信读起来也很不错，只是你不该隐讳你所喜欢的家具，不该否认你不喜欢那些家具，而是喜欢它们周围的东西，喜欢处于家庭舞会和邻里和睦之间的东西，喜欢就像你在瓦尔登堡觉得是如此美妙和舒适的东西。对我而言，这既不是咬文嚼字，也不是什么坏的东西，这使你的手握成拳而被我紧紧抓住。其实不买家具不是你的事情，而是我的事情。我也做到了，尽管做得很不完全。对于会面我要提醒你我，我太强烈地想着能够提前会面，而你并不希望如此。幸中之不幸——你不再牙疼了，我不再能经常为你去取阿司匹林，不能再在走廊里面对面地给你关爱。总之没有机会和你在一起。那位与我中断了信件联系的魏斯博士前几天在布拉格，他还会来的，然后坐车去柏林。我们现在分歧很大，至少目前暂时是。也许一切情形直至细节方面都与阿斯卡尼旅馆的那几幕相似，这并不特别奇怪，我指的是那些相似点。其实我们总在作类似于最初的责备。它的最高的和下一个的代表是我的父亲。给姐姐的生日礼物当然已经寄走了，你得到假期了吗？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估计在1916年4月初〕

亲爱的菲莉斯：

从现在起我会经常给你寄明信片，信走得太慢了[29]，而且现在关键不在于通知一些事情，而在于要弄清楚其他的一些事情。复活节我将在玛丽恩巴德，复活节周二我要在那里办点事，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五月份度假，我已经不能再忍受了。此外既不是在这儿也不是在那儿，在卡尔斯巴德的头痛不比在布拉格的轻。在野外也许会好些，今天穆西尔[30]来我这儿了，你还记得他吗？那个步兵部队的中尉，他病了，但还是整洁利落。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亲爱的菲莉斯：分

令人愉快的是一切进展得很快，我也感谢你给我的那个片断。至于魏斯博士，你误解我了，只要我的感觉不能再好一些的话，我们就不想同在一起干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解决办法。但最近他的新书[31]的寄法有点破坏了这个办法。他是一位多么与众不同的作家啊！一定要读一下他的书！尽管他现在在柏林，但是我觉得你与他会面并不能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有益。恰恰相反。复活节我在玛丽恩巴德，因为星期二我在那儿有点公事。近来我去看了一个神经医生，这是一次毫无用处的就诊。诊断：心神经机能症。疗法：电疗。我回家写信拒绝了他。对一种连续性病症的治疗会有什么意义呢？祝复活节快乐。我的快乐总是会在旅行前消失。

即致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4.19—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我没去玛丽恩巴德，出差必须被推迟，也许会在5月中旬。我将把它和我的假期连在一起，这样就能在玛丽恩巴德待三个星期。在头痛和自责许可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在哪里安安静静地生活，然后重新回到布拉格，我注定可能会发现那儿不再像以前那样值得一住。你呢？你的复活节？你的假期？你的上司？复活节的这些日子我完全是一个人过的。我自己光在乱涂乱写，看看是否在两年之后还能写出一个成句。我游离于胡同、桌子和长沙发间，直至有一天感觉到自己过得还可以，直至有一天又感觉到不安狠狠地在鞭逐着我，头痛在锯开我的脑袋。好了，我就此结束我的喋喋不休的诉苦。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4.25—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今天来了三张卡片，两张来自于阿尔特瓦斯，这是什么地方？一张来自于瓦尔登堡，卡片上的内容很明朗，我很高兴。我当然记得那位姨妈，即使是在其他人都有对人的记忆力，而我在这方面的记忆力则是一个空白的情况下。从她的脸上我几乎看不出什么，但我知道，她曾经非常活跃，富有同情心，爱说话。我真希望曾经预言过她有一个生气勃勃的长长的人生。她到底死于什么原因？有两个情景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在这两个情景中她毫无疑问地唱着主角，一次是在胡厄德克伦湖，另一次是在一间咖啡屋，我想是在陶恩车宫。我们三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坐在一张桌边，她给了你对未来的一些建议，不是真的建议，不对你，也不对我。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4.28—布拉格〕

信今日才到请勿责备因此不声张不保密。

衷心问候。

弗兰茨

〔致菲莉斯·鲍威尔的电报，技术车间，柏林，马尔库斯街52号，1916年5月6日—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又是明信片了。我有一个星期觉得写信实在是一种被滥用的行为。非常感谢你的来信，请原谅我记忆上极度的混乱，在柏林时亲戚们就像影子一样在我失眠的眼前晃动，从那时起我的记忆力就真的没有好转。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把克拉拉夫人（大概是莱菲尔）当成了丹齐格姨妈，此外又把她与瓦克斯曼夫人混为一体。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无论如何我都注意到，我丝毫也想不起纳塔利姨妈。我只记得当我们坐在柏林的房间里，把房屋设计图摊开时她椅子边的一种半明半暗的情景。

最衷心的问候。

〔明信片邮戳：1916.5.7—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还有其他的一些记忆上的混乱。比如索菲夫人的意见以及我应该给她写信等等。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请她找你，她是那么热心地做了，从那时以后我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而抱怨过我。你可能已经收到魏斯的小说了吧，仔细地看一下它，试试去辨认各种人物。我们的分离是先由我后由他造成的，而最后是由我导致的。这次分离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是基于一个完整的毫无疑问的决定之上的，这个决定就是他肯定不会经常地在我这儿。我的假期又成问题了。尽管星期六我坐车去玛丽恩温泉，但可能是公事。关于这个下次再谈。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5.11—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我在卡尔温泉和玛丽恩温泉出差，这次是一个人。在这世上，与人交往和独处时都会有幽灵的存在。现在正轮到了后者，尤其是正当天下着雨，很冷，马车夫在院子里闲聊的时候。尽管如此我还很想在这儿一个人待几个月，看看我会变得怎么样。时光流逝，人们也无谓地随着时光度日。这是非常悲观的。人们甚至不必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来完全毫不间断地注意这些东西。我真想把你的头发从额上撩开，就此问一下你的眼睛。但我的手在你的身旁落下了。我迄今为止所作的最大的尝试——这个尝试还要加强——即我要离开办公室这件事几乎已经不再提起了，而且几乎也是毫无成果的。受指责的人据说最近只能得到一个很短的假期，而且这个假期还是一个大发慈悲的例外。我利用这个诱因——这很聪明——向上司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在列举了详细的理由之后提出了两个请求，这些理由我在这儿就略过不谈了。一个请求是：因为战争在秋天结束，接下来应该有一个无薪的长假，另一个请求则是取消指责，你肯定会看出其中的捏造部分（那些理由更含虚构成分），这些捏造当然也使我丧失了成就。上司认为第一个请求非常奇怪，对于第二个他置之不理。如果他遵循了我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理由（三次是完全加了

标题)，那么这两个请求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这只是对例行的假期的索求，他马上就给了我，并声称历来都是有意如此。我回答说，假期从来不是我最根本的愿望，它几乎帮不了我，我可以放弃它。他不理解这些，他也不可能理解，他也不懂我的神经疼痛究竟来自何处，他开始像一个神经医生那样说话。此外在他提及各种压迫过他或正在压迫他而与我毫不相干的神经折磨的痛苦之后，他以他那种特有的方式说：“以你的职位和经历你丝毫都不必有忧虑，而我在初期还有敌人，他们竟想锯开我的生命枝。”生命枝！我的生命枝长在何处，谁锯开了它？但是如果它真的被锯开，用另外的锯子，在不同于上司所认为的那种树上，那么我会继续以孩子式的不负责任来撒谎，但这是被迫的。我只能以宏大的感伤的场景来完成最简单最实际的问题，但这是多难啊！为此需要怎样的谎言、技巧、时间的浪费和悔恨啊！如果失败的话，人们只能表示同意。但我只会这个而不会其他了。如果我想向右走，我会先向左走然后悲哀地向右（这种悲哀存在于任何的自身参与者中，也是最矛盾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紧张。我不必害怕向左走，因为我根本不想去那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辞去第一个职位。我辞职并不是因为我有更好的职位。不管它是多么正确，而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一个老公务员被厉声责骂。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太阳开始出来了。

顺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估计是1916年5月14日—玛丽恩温泉〕

〔海王星旅馆的信笺，玛丽恩温泉〕

亲爱的菲莉斯：

信是紧接着暴风雨的来临而写的，而这张卡片则是在出发之前写的。卡尔温泉相当舒适，而玛丽恩温泉是难以言传的美。我真该早一些去回应我的本能的召唤，它告诉我最胖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人。因为即使没有对温泉的喜爱，人们也到处可以变瘦。但要在这样的森林里漫游只能是在这儿。当然现在因为宁静和空旷，因为所有的生物和非生物都在跃跃欲试地摄取营养，这儿显得更美了，几乎不曾受阴郁的多风的天气的影响。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坐车回家的话（其实我是中国人，也马上能坐车回家），那么今后我必须要强求重新回到这儿。你一定会喜欢这儿的！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5月中旬—玛丽恩温泉〕

亲爱的菲莉斯：

暂时先简短地表示一下谢意，尤其是因为那张照片（脸是否变瘦了），另外的照片会给我如何的感觉呢，我把它们送给马克斯。我从玛丽恩温泉回来差不多有十四天了，也没有写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样来来回回地被驱赶，只是头痛还是如旧。我不可能得到护照。我还在写有关魏斯的东西，你对叔叔的询问让我感到很愉快，你一直认为他在米兰，其实他生活在马德里。这个错误虽然不能与我对待瓦克斯曼夫人的情况相提并论，但毕竟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偿了。长假正是你所理解的那种，但也绝不仅仅是挣脱后的轻松，也不仅仅是对未来的保证。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5.26—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现在是下午，我在办公室。因为头疼我根本干不了什么，不能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安静地坐着。“那就写信给我吧！”你会这么想。但这个想法不应该成为你的一种责备。当然事情也并不总是那么糟糕，但三天来一直是这样。

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只是在其他的照片上你的脸更显得快乐。那个领子也使照片有所减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梅菲斯托是穿这样的领子的，在斯特林堡那儿我也看过这样的领子，但是如果你穿，菲莉斯，尽管如此这还是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它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快乐。阳台花的栅栏，远景，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们试图穿过黑暗时光的挤迫——你的假期怎么样啊？上司已经走了吗？你们家在干些什么？还有埃尔娜，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她写信了。

最衷心的问候。

〔明信片邮戳：1916.5.26—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又下雨了，又是星期天，只是我不在玛丽恩温泉，稍稍远离了些。我在坟墓里，在布拉格，五天来脑子里又是长久所没有的翻动。

你十分小心地评价了魏斯的长篇小说〔《战争》〕，这很对，宁可这样也比一种不确定的感动好。我也做不到半是喜爱半是钦佩。我知道，这本书实质上的光辉是它真实的因素，而要说这个因素完全是服务于一种陌生的因素的话，那么这是精神错乱（失眠和头痛仅是前兆），但奇怪的是，一部从这样的起源走出来的小说，不少人认为它只能算是消遣小说，他们没有感觉到那种犀利的效果^[32]。你感觉到了，“也许我不能承受这个事实”。你这样写。如果要我来描述这种效果的话，那么我会拒绝。我还做不到这样的深思熟虑，至少目前做不到。

我也相信我会在书中出现，但不会比其他人多。因为在里面我真的不是个别的人物，这是一个与西欧的犹太人相似的典型。当他向后靠着，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就几乎是以最主要的角色的身份出现的，如果这样的人物还能“力量无比”的话，那么他们完全是魔鬼，这儿表明了善良的天意。

但我还想多听听你对弗兰齐斯卡的看法。这是书里的要求。如果人们能抓住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掌握了作者的意图。

你从中并未发现许多新的东西，这令我感到很奇怪。我发现了许多，以至于都穷于应付。那看上去的单调其实只是一种半明半暗的模糊，必要的是要使人的眼睛能忍受某些东西。

此外自从我上次读了底稿之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等到我看了书之后，我会继续给你写信的。

十四天以后，尤其是如果我的状况没有好转的话，我会去玛丽恩温泉待三个星期。我本来想稳定地待一段时间，并且与写给上司的那封信相一致暂时不去度假，但是我忍受不了。此外办公室里的人容忍我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所有的公务员传统。

菲莉斯，你在空闲时间里干些什么？你好久没写这些了，你去看了《特洛伊妇女》^[33]了吗？几天前我在这儿看了。韦尔弗的作品是与众不同的，对此我不想说什么。但是在看了演出后（莱辛剧团），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进那家剧院了，我坚持这样做也有很长时间了。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估计是1916年5月28日〕

亲爱的菲莉斯：

我给你寄去两本印刷品以供消遣，作为快乐的消遣的是一本《回声》，里面有马克斯的一篇文章^[34]（他为了讲述这个基本观点在冬季作了十一场巡回报告，此外每星期两个小时要在春季学校的五十多位姑娘前作报告，我近来曾在一次郊游中和她们在一起，还有一个小时在一家犹太复国主义的姑娘俱乐部），作为痛苦的消遣的则是上次的教育机构报告，其中的第十页到八十页是我的大作。我不会用大约一百页的慷慨激昂的周年纪念日报告来打扰你，此外也不会用那篇我连名字也想不起的年终报告来打扰你。你在弗里德曼的照片我很喜欢，尤其喜欢那些爱情的场面。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5.30—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对此我当然是非常同意的。但是去疗养院这个建议意味着什么？是我自身一个奇特的需求吗？或者是对我的一种让步吗？就我而言，我去年就与疗养院最终断绝了关系。我现在的想法是严肃的，一个病人最好还是避开疗养院。但这种想法只适合我单独的时候，如果你和我在一起，那么我在哪儿都会觉得很合适。只是我不能去德国，而你也许能来玛丽恩温泉，你想来吗？在波希米亚没有什么好的疗养院，鲁姆堡最好的疗养院也不怎么样。我想在圣灵降临节就能带着我的不幸的脑袋前往

玛丽恩巴德，不过就时间和地点我还要等待你的决定。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5.31—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一上午我们只能浅浅地谈有关疗养院的问题。我反对疗养院的主要理由是它无谓地需要许多时间，许多思考，我想在这个短短的假期里干些工作（或多或少地干些，只要这个脑子还能冒出些东西），如果你在那里的话，我想和你在一起，但我不想被诊断，被包装起来，被电疗，洗温泉，被检查，通过特别好的会诊而得到特别精确的有关自己病情的报告。这几乎是身体工作部门的又一新办公室。但目前非常重要，为什么你想去疗养院？如果在波希米亚也没有好的疗养院的话，那么在西里西亚，在奥地利？施蒂利亚会有的。我很紧张地等待着你的回信。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5.31—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根据那封信你的假期应该从7月2、3日开始，但根据那封离现在更近一些的电报看来假期大约从7月中旬才开始。如果我在星期一得不到更确切的消息，我会打电报的。在那本我领你看的书里，我的感冒以及“繁重的工作”都被记到了你的账里，这不应该是坏事。不好的是你这样地折磨自己，而我对你和我自己则不得不束手无策地旁观。施特海姆的短篇小说^[35]看来对我很有意义，尤其是那部从文学性上看也许是最弱的小说：《舒林》。这是一篇很受欢迎同时也很令人讨厌的作品。我们也许会谈到这方面。但愿你能告诉我，我们俩将会有一次愉快的会面。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年6月3日—布拉格〕

为什么没有回音？

〔致菲莉斯·鲍威尔的电报，技术车间，柏林，马尔库斯街52号1916年6月9日—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我们暂时达成了一致，选择了玛丽恩巴德。现在在德国已经不需要医生的证明了，你肯定能来。你要求来疗养院的理由以前我也曾考虑过，尽管我很少有编造这方面谎言的才能。它们其实也正是反对进疗养院的理由。也许我们——我也不知道，能通过痛苦，通过时光的流逝和其他的特殊之处来越过这些理由。我想大约在十天前知道我们假期的开始时间，因为我在泰普（离玛丽恩巴德非常近）有一桩小小的生意，想在办完后直接去那儿，但我必须要提前十天来预告我到达的时间。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年6月14日—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我其实不想比你去得早，相反我宁可等到你能去为止。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晚于8月份。因为8月份我必须在布拉格。如果你6月底去的话，那真是太好了。也许明天我就能从你那儿获悉最终的日期。我也应该因为泰普方面的生意而感到高兴。另外昨天马克斯决定和他的夫人也坐车去玛丽恩巴德，时间还没定下来。他夫人最小的妹妹死于肺病，你不要去吊唁，因为她太悲伤了，不想听任何东西。我不想比你早一个星期去，因为我的三个星期的假期也不是很确定，而且我在等待你来临时的焦躁不安更甚于我对假期的兴奋。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年6月19日—布拉格〕

直到周日7月2日晚 玛丽恩巴德海王星旅馆

〔致菲莉斯·鲍威尔的电报，技术车间，柏林 O27，马尔库斯街52号1916年6月27日—布拉格〕

弗兰茨·卡夫卡和菲莉斯·鲍威尔共同致安娜·鲍威尔的信

亲爱的妈妈：

并不是过去的时光赋予我对你这样讲话的权力，而是近来的这一段时光给了我这种权力。就像我们经常所做的那样，菲莉斯和我在这儿，在玛丽恩温泉会面了。我们发现，在几年前我们错误地处理了那件事，要看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圆满的结果并不是尝试了一两次之后就能得到的，也许要千百次，对此我们现在要把握住，我们还想保留住它。从你在阳台上带着友好的示意陪伴着我穿过莫蒙森大街的最后一次散步起，我就相信对此我肯定得到了母亲的赞许。从那时起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好转的成分不多。这我知道，但在这很少中包括了菲莉斯和我的关系以及将来的这种关系的保证。今天我就想对你说这些。

恭敬地吻你的手，对埃尔娜和托尼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兰茨

亲爱的妈妈：

我希望你能真正理解上面弗兰茨的话，你现在正有机会重新把你的爱给予他。如果你想写信给弗兰茨的话，那么我得告诉你，他暂时还待在这儿。而我在周末就必须回来。

好了，我希望一切顺利，让这封信寄去我衷心的问候。

你的 菲莉斯

1916年7月10日

〔施洛斯·巴尔摩拉和奥斯伯纳旅馆信笺玛丽恩温泉〕^[36]

我的最可怜见的：

我在用你的笔，你的墨水写信，我睡在你的床上，坐在你的阳台上——一切都很不错。但通过那扇简单的门我听到了过道里和左右两边房客의 嘈杂声。底下那些该死的家伙和顶上的那个小女魔把房间弄错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住了一个有两张床的房间，因此我认为他们是搞错了^[37]。现在我没有精力去找房子了，因为你已经走了，这儿有FrL.埃尔娜给你的两张卡片，格蕾特小姐的一张卡片和一封电报。在电报里没有什

么特别的事情，最多是埃尔娜小姐告诉你她因为裁缝的问题必须要跑很多路。我现在去蒂阿娜旅馆，为了能看着黄油盘而想到你。

问候你。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年7月14日—玛丽恩温泉〕

我的亲爱的菲莉斯：

我一个人在这儿，没有宁静的房间能给予我安慰，这太坏了，我绝望了，害怕面对房屋里的嘈杂。昨天晚上我绝望地穿梭在城市的公园——城市公园，穿梭在林荫大道——林荫大道！然后像一位收罗所有噪音的窃听者一样过早地回来了。你在这间屋子里是怎么忍受的！今天早晨我去找房子了，但没有找到，因为没有人会把一个好房间只出租一个星期。我没去出席奠基仪式而是和埃德姆特^[38]在蒂阿娜旅馆。不要因为我不能向你描述奠基仪式而生气。在蒂阿娜旅馆我和那个小小的圆脸颊的莉泽洛特谈上朋友了，昨天还为她固定在胸前的一朵玫瑰而劝说了她半天。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年7月15日—玛丽恩温泉〕

最亲爱的：

最可怜见的，唉！（旁边的那对老夫妻在闲聊些什么啊。）我一个人在那条老路上，如果我什么也不做，只是享受这份宁静，那该多好啊，因为只要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目前能拥有保证，那么鉴于你的保证我也得到了保证，我请你也为你的幸福而利用这个保证。在躲避甜熟干香肠的诱惑的同时请开始吧。通往高处的路是无穷无尽的（现在那位年迈的丈夫踏着沉重的脚步从床上走下来），我和小海伦告别时的谈话是：“您给我们出了个坏主意，火车没有中转车。”“啊，我想成了自行车。”“我们没有自行车。”“啊，本来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埃格，非常美丽。”“但我们通知了是11点。”“啊，那么你们本来应该是走路去，非常漂亮的路。”“但我们没有行李。”“啊，那么你们本来应该坐车去，非常漂亮的行程。”“谢谢，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把给你的小费丢了。”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年7月16日—玛丽恩温泉〕

最亲爱的：

——我想先说的，先写在最前面的是：两天来的头疼。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都是些虐从吗？或者是永久的伴随？瞧一瞧那位在玛丽恩温泉疗养的头等要人吧，我是指那位集中了最多的人的信赖的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这个贝尔兹·拉宾，现在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成员，他在这儿有三星期了，昨天我第一次列于他晚上散步的十名随从之中，就此可以说许多，但我现在要详细地把这些写给马克斯，拉宾会在场这个消息是他通知我的^[39]——你过得好吗？我的最重要的玛丽恩温泉的疗养者。我还没有收到你的消息。我很满足于对那些老路的叙述，比如今天是固执和秘密的林荫道。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7.18—玛丽恩温泉〕

我最亲爱的：

在我们的老朋友看来要和你继续旅游之际（真的有可爱的卡斯特莱兹这个人吗？），来了些新朋友。他们昨天在我从森林的最里面往家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吓，当时简直让我目瞪口呆。因为我的上司迈着舒适的卡斯特莱兹式的步伐朝我走过来，我无法回避。他不是你认识的老是咳嗽的那位，而是职位最高的上司。我和他相处得很好。在他后面跟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我看上去是什么样的一副模样啊！不需要去抱怨我确实存在的头痛，不需要解释我总是得一个人在森林里漫步，我的样子就足够了。三重同情的目光环绕着我。尽管我有一个小时和他们待在一起，但下一次的会面还没有说定。因此我又一个人了，可惜还得不到你的消息。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6.7.19—玛丽恩温泉〕

〔写于1916年7月18日晚〕

最亲爱的菲莉斯：

我的睡眠更差了，头疼也一直折磨着我，让我忧心忡忡。我不知道

目前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因为有了你，我已经变得很安静也很愉快。是四年里我为自己干得太起劲了吗？这就是回报吗^[40]？或者这只是森林的空气所引起的暂时的影响。这种空气还让我饥肠辘辘。给我一个安慰的回答吧。我目前的状态不能去工作，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情。在八天之后我突然发现应该做的事情也不会在我的工作时间之内。但将来会变得怎么样呢？给你的邀请^[41]已经寄走了。我非常渴切地想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和怎么样来处理它。父亲托我在一封用打字机写的卡片里向你问候，我把这些问候融在我的问候之中，现在让我把这一大堆的问候都送给你。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7.19—玛丽恩温泉〕

最亲爱的菲莉斯：

一位真正的（或者正在成为正式的）埃尔斯特夫人偷走了我能和你在一起的一个下午。今天睡眠稍稍好一些，稍稍轻松一些，但吃饭之后，我没有睡觉。昨天晚上我开始喜欢这个房间了（天暖和了些，我可以坐在阳台上），今天一个有着年轻人的新的家庭搬进了我隔壁的屋子（那对年老的可爱的夫妇！），他们肯定是一群机灵活泼的年轻人。他们五分钟就钉入了一枚钉子或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失眠和头痛我还是变胖了，不像我的上司那样胖，但也是在相应的下属所该有的重量级。昨天的菜单是：10点半——两份牛奶，蜂蜜，两份黄油，两个小面包；11点——四分之一千克樱桃；12点——凯撒肉，菠菜，土豆，香草面条，小面包；3点——杯装牛奶，两个小面包；5点——巧克力，两份黄油，两个小面包；7点——蔬菜，色拉，面包，艾门塔干酪；9点——两个蛋糕，牛奶。怎么样？

弗兰茨

〔明信片：1916.7.20—玛丽恩温泉〕

最亲爱的菲莉斯：

为星期二的信我要特别地感谢你，此外我在过去的几天里还收到了三张卡片。菲莉斯，你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也是很好的影响。缘于我们相处的那些天——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小小的不愉快，我相信，你会很好地利用这个影响，但愿对你而言，和我在一起也有这样的感觉！有许多事

情要做，我的要比你的多。但我们双方都有许多事，如果现在就因为头疼而精疲力竭，那未免就过早了。如果我们不久以后又能见面，那就太好了。我现在坐在蒂阿娜旅馆，天在下雨，我不能离开，我有一点忧郁，就只有一点点，我也认识到我有必要去观察一种手工活，不是我邻桌的那个小姑娘制作的那种。但除此以外我还是不喜欢一切手工活。

一再的问候。

弗兰茨

7.20

〔明信片邮戳：1916.7.21—玛丽恩温泉〕

最亲爱的：

又稍微好了一些。没有完整的睡眠，但至少有了十分之一带梦境的睡眠。毕竟能入睡了，头部也好多了。如果还能待得长一些，每天还能增加些“更好”的话，那么最后我就能从这儿直接去你那儿，这将是一条快乐的人生之路。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在这儿得为饮食花许多钱，通知给我们的菜单每天以怪诞的方式重复。我当然早就给马克斯写过信了。我非常急切地想听到犹太之家给你的印象以及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没有去菲莉斯那儿。他的第一张写自于卡尔温泉的卡片是这样开始的：“天很冷，有雾，下着雨。我冷，爸爸冷，我的妻子也冷，东西昂贵，面包很糟，空气阴冷，我没长疖，我的妻子喉咙疼，等等。”你看，那儿的生活也不轻松，但愿在疗养院的这些日子能让他轻松一些！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7.21—玛丽恩温泉〕

最亲爱的：

我又要像以前那样夸张地写这张卡片吗？对不起，我坐在你的阳台上，在桌子的曾经属于你的那侧，就好像桌子的两侧是车厢的护板。我们在美好的夜晚所拥有的平衡好像被打破了，我独自在一面护板上，在沉醉，沉醉。因为你在远方，为此我写了这张卡片，当然也因为脑子里嗡嗡作响，尽管在过去的两天里我的头疼有所好转。通过写信我的手至少能触摸到在你身边的平和。这儿现在几乎是我所希望的那种宁静。在阳台的小桌上亮着夜光，其他所有的阳台都已空无一人，因为有些冷。

只是从凯撒大街那儿传来了有规律的轻声细语，它们不会打扰我的。

祝你健康，但愿你比你的弗兰茨有好上一千倍的睡眠。

你的 弗兰茨

〔19〕16.7.21

〔明信片邮戳：1916年7月22日—玛丽恩温泉〕

最亲爱的菲莉斯：

人们当然是无法预计到，收信人是怎样拿到这张卡片的。很可惜我也根本不会知道——毕竟两天来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人们已经因为能在一起而变得如此娇弱，向左走两步就能获得消息），今天菲莉斯和他的妻子、兄弟和父亲在这儿。每一次邮差来我都跑回家，终于找到了这张可爱的，尽管值得去吻一下，但无论如何是等得不耐烦的卡片。当然，在陌生的房屋里人们是不会受到打扰的。但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向你屈膝诉苦，把这个作为表白吧。还有莉泽洛特的事？我经常念到那部分，如果我是认真看待这件事的话，那么我真还害怕要丢丑。你会相信我是如此毫无口味，会去以此自我炫耀？更不必说去关心它了。

她是一个圆圆的、三岁小姑娘，我们在蒂阿娜旅馆曾经笑过她。她得到了一朵玫瑰。谈的就是那朵玫瑰，最亲爱的菲莉斯！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7月22日—玛丽恩温泉〕

我在我们熟悉的埃格兰德^[42]，如你所知，许多次的邀请之后我们终于见面了，但对你而言太晚了。

问候再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年7月23日—玛丽恩温泉〕

也该送去鲍姆先生和夫人的问候！

伊尔玛·韦尔捷的最美好的问候！

现在我们真的来了，可惜太晚了，只是那个阳台还在。因此我们的问候诚意更重。

费利克斯·韦尔奇

老韦尔奇致以衷心的问候！

保尔·韦尔奇

我又在埃格兰德了，这儿有许许多多的客人，你看人们在安慰我，所有的人都对我很好，包括那位卡斯特莱兹朋友，他隔着两张桌子，冲我友好地笑着，他不知道自己显然是想要我转达对你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年7月24日—玛丽恩温泉〕

向你和你所爱的人们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尤丽叶·卡夫卡

如果我是那个卡斯特莱兹^[43]……如果他朝着我的耳朵大喊大叫的话……

感谢你的亲切的问候，回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瓦莉

我的最可怜见的（可怜，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可怜，人们如果帮不了别的忙的话，就只能抚摩着可怜人的面颊）：

我又在办公室了，在痛苦的沉淀处。我找到了出版社〔库尔特·沃尔夫〕的一封信，在里面——不，现在这是件毫无意义的东西，在两三年前它也许会有令人惊异的意义^[44]。我在玛丽恩巴德的最后一件事是想在阳台上给你写信，但时间只够做一个小小的追忆，只够吞下二分之一千克的樱桃。最后一夜是最好的一夜，大概有六个小时（我觉得是）连续的睡眠，这是我的神经从未取得过的成就（总是有人打扰我并站在我的桌子周围），在这儿我的脑子开始比在那儿还要受到震动，我不知道将来会变得怎么样。当然我们相互依附是好的。——《司炉》不可能被拿错，它到了玛丽恩巴德，但是很晚了，我把它送出去了。关于埃德姆特下次再谈。这本书对我们是够重要的了。犹太人之家？问候你，请

接受一个永恒的亲吻。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7.25—布拉格〕

最亲爱的：

我的一些卡片一块到了你那儿，这很好，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目前我克制不住写信的欲望。——如果你相信，我对你不吃午饭的生活满意的话，那就搞错了。相反这是一个很坏的饮食结构。如果你寄给我一份有关你每天菜单的详细的设置的话，我才会感到满意。在你的附近会有一个酒店，里面做吃的东西。无论如何要给我写写这方面的事。对你整天吃可可和小面包的设想（即使不是接近弗兰舍尔^[45]的要求），使我几乎情绪低沉，尤其是我想到与此相对你拥有繁重的工作的时候。我现在不寄故事^[46]了，这太麻烦了。它在我这儿就跟在你那儿是一样的。你必须亲自跑到工厂来吗？不能由那儿的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过来一趟询问吗？

问候你。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7月26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又干了一下午。我脑子里唯一留下的感受是我认为我的口述室与玛丽恩温泉森林完全不能比拟。扩大工厂意味着什么？它重要吗？它与专利有关系吗？它使你增加工作了吗？——你问起我的上司，不，我已经不再和他谈话了，但可能经常看到他们一家。不过就像一个中学生一样我总是避开他们，有一次竟在五步之遥。最后一天我寄给他夫人五朵长长的玫瑰，此外还写信告诉她我的讨厌的（一个富有价值的但无法解释的词）状态使我丧失了荣誉和快乐，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不坏吧，怎么样？也不是完全是不真实的——问候你，为了让我的因为口述而疲惫的嘴唇恢复生机吻你的手。

弗兰茨

〔下面在旁边的空白处〕

犹太人之家？

〔明信片：1916年7月27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到达后的四天里我还受到那种内在和外在于宁静的影响，那种我在玛丽恩温泉因为你的和大森林的帮助而拥有的宁静的影响。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弱，头痛、噩梦、旧有的睡眠中断将会重新出现。但我毕竟相信，少许的旅行和许多的宁静和自由也许还能合拢我撕裂的脑子。不过这是将来的事了。在办公室的生活中每增加一分体质只会带来坏的结果，因为先会有一种新的更为强烈的渴求，然后又会更陷得更深。我很想知道玛丽恩温泉给你留下了什么，你现在的的生活是否与以前有所区别，好的还是坏的，是什么样的区别。

问候你。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7月28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工厂扩大了而你又是一个人了。如果你增加了工作的话，那么我也会有更多的工作。我真的不知道，带着这种感觉在卡尔斯霍尔斯特^[47]生活会是什么样呢。现在唯一的安慰是这不是真正的工作上的增加（除了给上司的报告），而仅仅是责任的增加，但这也是够糟糕的了。你写信时特别要告诉我，你是否增加了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增加工作，它在时间上是如何表述的。我很伤心，这些事情越来越缠绕着你。你还为林德施特雷姆工作吗（关于酬金的争执的结果如何）？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留给疗养院的只能是很少的时间，我非常渴切地想知道你是否参与了。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犹太复国主义（对你也不是），而只是事情本身以及其中的东西。

问候你。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7月29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我又看了一遍昨天的卡片，你给雷曼博士^[48]写了什么？无论如何你要为他尽力。对于留给你的极少的时间你不可能使用的比在那儿好（我把散步和做体操排除在外），它比起剧院，比起克拉邦德、盖尔松和其他东西都来得无可比拟的重要。它还是最自私自利的事情之一。人们不去帮助什么，而在寻求帮助。从这项工作中能比从玛丽恩温泉的所有花中吸取出更多的蜂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只有大学生才予以考虑，当然那些男女大学生作为普遍的最无私的、最坚决的、最不安分的、最热切的、最勤奋的、最独立的、最有远见的人已经开始了这件事并且正在进行。但是每个活着的人都能干得这么好。

问候你。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7月30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已经有几天没有消息了（我宁可说几天，其实只是三天），关于你现在承担的工作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消息了。但是我的头痛还是老样子（我的睡眠几乎不超过一小时，停顿之后又会入睡，但重新又不会延续太久），一个凉爽的、宁静的脑子看起东西来与一个发热的疼痛的脑子完全不同。讨厌，太讨厌了，居然在这样美妙的一天头疼。昨天这个周末还可以忍受（我在床上待到12点半），我以散步、坐在草地、喝牛奶、看书（鲁比林斯克：《犹太民族的产生》）度过了美好的下午。你呢？你知不知道，“等等吧，以后吧……”这些话其实不是祝福。即使它们是的话，“以后”这个词也是靠不住的，或者恰恰相反，它是完全靠得住的？

问候再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7月31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四天没有消息了，这几乎让我有些害怕了，此间还过了一个星期

天，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娱乐：躺在草地里。时间和兴趣都不足以让我到城郊去（就像星期天给我的印象一样，布拉格附近相当美），我就躺在穷人和他们的孩子坐着的儿童游乐场上，那儿一点都不吵，比在克罗兹布鲁（在玛丽恩温泉）安静得多，最近当一个相当高贵的、我与他在公事上有过交往的先生坐着一辆双套马车去参加一个更为高贵的节日而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几乎正躺在公路的排水沟里（今天在排水沟里的草也很高很密），我伸展着四肢，感受到失去社会地位的快乐（也就剩下这种快乐了），你呢？星期日你是这么活泼地在我这儿。现在这儿很宁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1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已经是第五天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想相信你沒有写过信，我也不想相信你病了或其他类似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也不能安慰我，我的写信也失去了意义。昨天我给你寄了一期犹太评论，马克斯的文章表明了他正在干什么，信上的那几段表明了这是关于什么样的一个小姑娘的事，那篇小品文章表明了（不是写得很好）一种奇怪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气氛[49]。无论如何你都不要因为你不是很熟知的犹太复国主义而对犹太人之家感到害怕。通过这个犹太人之家另外一些力量正在进行并起着作用；对这些力量我相反更放在心上。犹太复国主义现在至少处在一种外在的顶峰，它对大多数的活着的犹太人来说是可达到的，但是它仅是通往更重要部分的一个过程。写这些有什么用呢？你在沉默。

问候你。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2日〔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你在8月1日写的卡片让我一星期都为之高兴，但里面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是关于你自己的。我要求得到的是关于你的消息，而不是关于那件小外套的消息（对它的丢失你不必感到生气，给我必要的购买指南和乃姐的地址，我会把小外套寄去），我知道，你有太多的事要做，但你

不能把写小外套的那十行文字换成谈你的工作，你的饮食，你的健康状况吗？这样我就可以感受到，你在急于做某种方式的靠近而来超越现在根据新的护照法规而变得远不可及的距离。抱怨这些，写这些有什么帮助呢？让我们重新回到以前的十四天一信吧。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3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那位要帮助你的姑娘万岁！你的因为你的邮局而承担的责任有什么样的或坏的结果？你要去吃饭是什么意思？去哪儿？——还有雷曼先生？在7月26日你写道：“无论如何明天我要给雷博士写信。”8月1日：“我将给雷博士写封信。”然后现在在2号：“我将会十分精力充沛地去关心这件事。”加起来你就此谈得很多，但也没有呈现出一种逐渐上升的趋势，我完全不知道你想给他写些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自己去那儿一趟。它在夏洛特堡^[50]，可能不是很远。真正的协会晚会目前在夏天可能很少——其他呢？你在看什么书？星期日是怎麼过的？星期五你怎样才能坐车去那位画家处〔菲格〕？你曾去过卡尔斯霍尔斯特吗？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5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宁可这样而不要别的做法。宁可我们在书信往来中存在着分歧（在你的最后几张卡片里我觉得少了些什么，这些是用套语写成的报告，部分还写得很勉强，你的过重的工作也许应对造成这种现象负主要责任），宁可这样说，也比我们在口头上不能理解强。鉴于此我们至今还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误会，玛丽恩温泉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如果你以前想把一切书面的东西都推至口头来往的话，我那时会觉得这是一种逃避。现在我相信，你是有道理的。我们将控制书信往来，以免打扰你的工作（这对我也很重要），以免写信这件事会打扰你，你不必被迫写上冷冷的、仓促的、心不在焉的十行，来代替原来应有的美好的、生动的、令人快乐的十行。我觉得这样不坏。

〔明信片：1916年8月7日—布拉格〕

亲爱的菲莉斯：

因为我在想你，而且没有去玛丽恩温泉前那么忙，所以就想到埃德姆特中的一处。不只因为书中的某一处，我才说这本书对于我们很重要，我只是认为这一处是书中最有教育意义的，因此我要帮她这个忙。当二十二岁的女伯爵婚礼之后来到她在德累斯顿的新房时，她热泪盈眶。齐岑多夫的祖母已经为一对新人将房子收拾得舒舒服服。“祖母所做的一切给了我好大的安慰，”她写道，“只有上帝知道我们是认真的。他的仁慈使我能够以别种形式证明我是他的孩子，因为我不能如我所愿用现在的形式来证明这一点。他紧紧抓住我的灵魂，将我的视线从世界的种种愚蠢拉开。”^[51]

把它刻在一块黑板上并且放入一间家具储藏室里。

弗兰茨〔19〕16.8.7

〔明信片：1916年8月8日—布拉格〕

我最亲爱的：

近日可好？每当情绪好的时候，只要一有空，我就溜达到城外。这附近的果园后面是一片小树林，我特别喜欢在小树林的边上休憩。左面有河水流过，河的那边是一片树木稀少的高地，我的对面是孤零零的土坡，土坡上的那些房子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就是一个谜，老房子的周围是寂静的、波浪一样起伏的土地。坐在小树林边上，夕阳抚慰着我的面颊和胸膛。——母亲和瓦莉——就是你信中提到的奥特拉，昨天来了，妹夫在这儿度假。——特尔乔夫我不认识。——我写东西的时候，既不会太吝惜笔墨，也不会下笔千言，——向格蕾特小姐致以问候。她对犹太人之家评价如何？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9日—布拉格〕

尤利叶·卡夫卡夫人致安娜·鲍威尔夫人

亲爱的安娜：

我们已经两年多没有互相写信了，而我们在这艰难的时代的经历的，痛苦多于快乐。现在我们只想希望命运能使我们的孩子们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去除我们的所有烦恼。

在弗兰岑温泉我就想给你写信，只是找不到时间，又不能静下心来。在疗养期间活动安排得很多，另外还得时常给家里写信，因此一天老是匆匆忙忙。我是7号下午4点和亲爱的瓦莉乘车回布拉格的，晚上10点到达。我们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已经等在火车站了，彼博也在。我们的彼博意外地得到十四天假期，并且给我们打了电报，于是我们提前两天返回。在弗兰岑温泉没有治好的头痛病，也许这一兴奋倒好了。医生说，疗养结束后六至八周就会见效，希望是这样。

再说说我们其他的几个孩子。你知道当我收到弗兰茨从玛丽恩温泉寄来的卡片时是多么的惊喜，因为那上面有菲莉斯的亲笔问候。尽管我一直觉得他们俩的友谊没有中断，但看到这张卡片我仍然十分惊喜，特别是他们来弗兰岑温泉来看我们，这真是令我们高兴极了。从他们俩的眼中我看到了两颗和谐默契的心。我真希望他们在战争后找到他们的幸福，我亲爱的丈夫也非常希望菲莉斯能够成为他的女儿。眼下生意兴隆，家里的男人全都过来帮忙，这么一来我倒觉得比在弗岑斯巴德感觉还好。操劳惯了，倒受不了清静和闲暇。我们一切都好，望不久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代问你的孩子们，特别是菲莉斯好，也祝你安好。

你的 尤利叶·卡夫卡

1916年8月9日于布拉格

我亲爱的丈夫和孩子们也向你们致以衷心的问候。

最亲爱的：

你知道你对乃母的责难是一种什么样的责难？是一种令人头痛的责难。从这一点来看，最好还是平静下来。来信告诉我近来情况如何。——你并没有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你为什么不一大早开车到乡下去？这么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没有几个了。我和奥特拉去散步（碰到我们的一个公务员，竟以为她是我的新娘），最后还在一个花园里喝了酸牛奶。——你在信中写到，你刚吃午饭回来；在哪里吃的？女佣人星期一去了吗？本来星期天她就该到那里。——建议你该读些什么，这不大容易。如果要我说的话，我想建议你读与犹太人之家重建有关的那本回忆录[52]，我曾经给你寄过这本回忆录。“如果她放下手中的……最最讨人喜欢的工作……”可是，当她刚刚找到最漂亮的新颜色时，怎么可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呢？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10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你写给雷博士的信很好，我不希望它是其他的样子。你给他写信我怎么能知道？此外我搞错了住址——应该是在夏洛特堡。非常赞同去弗里德里希哈根郊游；这种活动难道不能常搞吗？不久前我带菲莉斯和他的太太去了那片我曾经向你描述过的稀稀拉拉的小树林，他们觉得还不错。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每当独处，都觉得你就在我身边。此外没有什么能够提起兴趣的。最近有这么三四天头没有痛，因而能够好好地考虑考虑问题，昨天反倒严重了，今天也不见好转。吻你的手，并把这个吻作为这封信的结尾。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12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如果读一读这些无可争辩的东西，人们就会愈加糊涂：冯塔纳于1876年接受了在Kgl艺术学院任秘书的职务。而三个月后在与其妻子激烈争吵之后放弃了这个工作。他在给女朋友的信中写到：“全世界都在评

论我，说我孩子气，说我自负，糊涂，一切都必须顺我的意。类似的话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后来又写到：“我已经上了三个半月的班。这段时间内我从没有过快乐。记忆中也并没有留下任何好的印象。不管是从主观还是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工作不适合于我。一切令我窒息；一切令我变得愚蠢；一切令我作呕。我清醒地感到，我永远不会幸福，我将会患忧郁症，我将变得闷闷不乐。”“我度过了一段非常可怕的时光。会发生的事情，就尽快发生好了。或许我还有能力将事情重新搞得和交给我的时候一样好。人类的智慧于我无补。这些至理名言所能告诉我的，我已经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早就自己讲过了。最终我还是得振作起来，用艰苦的工作日来交换舒适的日子（虽然这些日子的深处有令人恐惧的东西，但仍然是舒适的）。”“任何人不能违背他的本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么一种对于某事的特殊爱好，这种爱好是无法控制的。我必须做出决定，是要过一种有外在安全感但却麻木不仁，没有快乐没有希望的生活，或者……”^[53]今天寄给你的东西不是我写的，而是冯塔纳写的。

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两张明信片〕〔1916年〕8月13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你所遵从的那种责任感，我仍然不能理解。如果这样做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可以从中找到乐趣。为何要有责任感？责任感的表现是什么？没有责任感，那么又会怎样？——午饭吃巧克力搞得我很不舒服，特别是咽下这黑块前要先忍受嘎嘣嘎嘣嚼碎它的声音。或者干脆不吃巧克力了，以免听到那不愉快的声音？其他的午餐也很差劲儿。那个餐厅叫什么？我倒是愿意想象一下那里的样子。应该牵着你的手的手，由于激动而正在颤抖。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14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关于你纪念我们初次相识的信^[54]，我必须坦白，我确实记不起具体日子了，甚至哪年我也记不清了。如果就这么让我说出那个日子，我

可能会说：那是五年前。这当然不准确，因为那不是五年前，不是四年就是四千年前。除此之外任何一个细节我都比你记得更清楚。因为那时你没必要去记住这些，不是吗？如果你说我不该陪你进饭店的话，那么你就歪曲了历史。我陪你进饭店，勃罗德先生也在。我记得每一个细节。另外我还记得在护城河边，由于激动和渴望，我无数次在人行道和车道之间来回徘徊。然后你就轻盈地闪入电梯，不是对我轻轻地耳语，相反毫不在乎勃罗德在场，大咧咧地说：“和我一起去柏林吧，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一起来吧。”^[55]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15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在哪儿，从谁那儿，你是怎么打听到这件事的？关于这件事情是谁，在哪儿，告诉了你些什么？不应该，不应该，对我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怎么也应该详细一点告诉我。遗憾，星期四后拿到报告还得有好长一段时间，星期一前看来没什么希望了。——我一时记不大清楚坐在“西方咖啡店”那张桌边的情景了。我所看到的只是乌烟瘴气的一团，以及那些彼此认识的陌生人，他们将小店挤得水泄不通。我曾经有一次一个人去过那里，寂寞孤独又沮丧。于是我想起那次和你与托尼一起在维兰达吃午餐的情景。不过，那次也并不是很有意思。竟是四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还是个可爱的，黑发，意志坚强，好睡懒觉，固执的毛躁小子。写信时你一定要描述一下我那时的样子，在你的描述中我也许还能找回年轻的我。

顺致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16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别再用星期六明信片中那种含糊的词句令我担心。你怎么会突然想起弗兰岑温泉^[56]和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你都想了些什么？什么事令你不解？是些什么事情这么难于下笔（但却极易令人担忧）？想要说的还有许多，是什么？与其这样盲人摸象地瞎猜，我们还不如开诚布公

地谈谈。对此我诚恳地请求你。不要有任何顾虑和想法。在一起生活，就有可能沉默；沉默虽然会折寿，但平均来看，生命却延长了。不能经常在一起，那么就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坦率地交流思想。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是各自在一个岛上，邮船每年才靠岸一次，而这个时候你却一定要用暗示来写信吗？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17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昨天没有收到你的信；“她”星期四没有时间和兴趣给我写信，我这么想；今天就来了信和明信片，真高兴。——你终于和犹太人之家有了接触，我真高兴。你在那里和哪个女士谈过话？——那些文件，是的，这不大容易。特别是那些名册副本很难搞到。而且我出生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一直觉得，两年前在柏林你们把那些文件给了某个人，也许是在教堂或某个机构，我记不得了。我无论如何会找一找的，不过，这得先打起精神。——想到时间的漫长，我们俩是一样的，过去的每一分钟不仅在震颤着你，而且也震颤着我，对于这一点我毫无疑问。不过这样也好。——一个请求：你知道，我堂兄结婚了。他希望我父母送他一张画作为结婚礼物。我给费里茨·菲格尔写了一封信（我觉得他很了不起，过去聊天时我们也曾谈起过他），他的地址是：威墨斯多夫，维格赫斯勒大街6号。为了压低价格，我撒了个谎，当然很不绅士，我说，是我要送这幅画。他回信说，我提到的画，在科隆，而柏林的画也又不知道应该为我选择哪一张。（另外他问，二百克朗是不是太贵了。是太贵了。）是不是我给他写封信，让他和你取得联系，告诉他，你（用你那很有鉴赏力的眼光）会去选出一幅适合于犹太人的结婚礼物？你将会借这个机会看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他本人，他的画，他夫人，以及他的家。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两张明信片〕〔1916年〕8月18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关于那个画家菲格尔。在得到你的答复之前，我不想让他等太久。我向他出价一百五十克朗（我把这件事情完全看成一种心意，而不是买卖，尽管二百克朗贵了一些，不过也只是个意思罢了），并请他给你打电话，当然，如果他同意的话。请他和你一起选出合适的一幅。我之所以不等你的回音，是想在他打电话时，你也好有个回旋的余地，如果你不去他那里，就说，和我已经商量好，由他自己挑出一张好了。就看你自己的意愿和情绪了。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19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没有回音，但是这种不太规律的联系并非没有好处，因为这样，没有收到信的时候，就会想到信只是迟到了。——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令自己眼下高兴的事情去做的话，我的高兴的事情就是：了解开始和犹太人的犹太人家园发生关系的你。你曾经写信提到过乃母，这件事我早就想谈谈我的看法。不管是乃母想了解你的事情，还是你不愿意和她讲，你们这两方面我都能理解（特别是你这方面我更能理解）。但是一个折衷的办法还是必要的。不需要给她讲所有的事情，但可以讲些我们共同关心的事情。涉及我们的关系，这已经是绝对肯定的了；时间还没有完全确定，至于我们今后生活中的细节（除了在布拉格这一点以外），取决于将来的具体情况，尽管把这事告诉母亲对我会是很大的压力，那也没什么，告诉她好了。只是乃母对我们的将来所关心的与一般母亲们通常所关心的不大一样，这是为什么？眼下，未来还很模糊。——我不能理解的是，母亲为何会要求你星期天待在家里。怎么能这样要求你，况且你晚上大多都陪着母亲，而且星期天你出去也不过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如果你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会亲自给乃母写信说说这事。虽然听起来令人很不愉快，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最好。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19〕16.8.19

〔两张明信片邮戳：〔19〕16.8.20—布拉格〕

最亲爱的：

星期四早上你想好这天晚上不去德罗根大街^[57]，而去弗里德里希大街，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风景，主意不错。但是，听说你打算星期天搬到西方咖啡店那边去之后，我却感到有点失望。显然，星期一有关斯洛提女士的消息说明原来的消息并不确切（这里的人们对她看法不错。你对她印象如何？），我想提醒你的是，如果能够参与一件会成功、但尚未完成的事情，经历它的失败与教训，这对你会是十分有益的。等待你的消息。——是的，关于冯塔纳。你没有必要如此对待那位女士，事情对她已经很不公平了。我虽然提到是哪年，但是没说，冯塔纳当时是五十七岁，也就是说他有权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但是他没有承担起五个孩子之家的责任。我想是这样的。他虽然有他的道理，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还有一处写到他太太：“如果我不是想到她会用那句著名的‘人能够适应一切’的日常用语来安慰自己，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她的要求。这句话是错误的。我不是伤感的人，但我还是觉得，许许多多的人，无论年老的还是年少的，悲痛、渴望或疾病都会使他们心碎。每天人们都会发现，人并不能适应一切。同样，我也不能，假如我必须努力去适应一切的话，要么我就会变得十分忧郁，要么就是经历了一回由清新变得污浊，由精神生存变成精神死亡的转变。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称之为‘适应’。可这又能算作适应吗！”^[58]说比想容易，想又比做容易，冯塔纳远远地超越了从前的自己。但是他要求妻子能够理解（并能也像他一样去做，我个人这样认为），却是勉为其难，因此，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而她呢，也应该信任他，但是如果她在结婚这么久后都没能学会（我是指信任和沉默），那么，现在也就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另外，我们没有对他们书信进行规范评价的依据。今天就写到这里。希望明天有你的信。我去拿你的卡片就像小老鼠去抓肥肉，今天一只小老鼠真把我吓了一跳。顺致问候。

弗兰茨

〔三张明信片〕〔19〕16年8月21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我刚刚坐到打字机旁，试图写点什么。帮我打字的小姐正在休假。眼下我很想念她，因为接替她的人实在缺乏耐心和热心，而且他很紧张（我时常能听到他的心跳声），紧张得让我觉得，那咚咚的声音直接敲

打在我的神经上。明天，不，是后天，她就回来了。突然有一个念头：你给我写信时也用一回打字机。那肯定能多写不少，比如上星期天的卡片（从星期五到星期六没有你的信），用打字机可能会快一些通过检查。——还有，星期天在办公室很不公平，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问题出在哪里？没有来自犹太人之家的新消息，很遗憾。我一直在想（看到打字机突然想起来的）：能给我寄几张你的照片吗？你已经答应过了。——马克斯和他的太太在我的建议下，由咱们那个导游陪同去玛丽恩温泉了。对我们来说，这是如此遥远，如此不可能（坐在打字机旁几欲落泪）。致问候，当然也代我向格蕾特小姐问好。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22日〔布拉格〕

你有没有看犹太周报^[59]？

非常满意，菲莉斯，我对你非常满意，只是你离我太遥远了，不能亲眼看到我是多么地高兴。希望不久能收到雷曼博士的消息，要等这么长时间。你的计划我认为不错：你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很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你所投入的精力和热情最后要有结果，这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总而言之，一开始不要接太多的工作，一方面由于你会负担过重，另一方面也要为自己留些时间全盘考虑这事。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24日—布拉格〕

〔边旁〕

我没有收到你星期五、星期六的信件，是丢了？

最亲爱的：

当准时还是可能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千方百计去维持它，也就是说现在不应该抱怨。可是早上有时还是要抱怨。——施瓦本小姐是谁？我不记得你提起过她的名字。如果你对画家的家以及他妻子不甚感兴趣的话，那么施瓦本小姐大概对他没有友好的评论。事实上我也只了解他和他的画，他的妻子我只是认识，至于他的家我一无所知。我认为对你来说，值得参观的是总体的模式以及众多的真实与较少的抽象的有机结

合。另外在他今天来的明信片（“我们非常高兴能结识您未来的新娘”）说到，画主要是在八张布拉格的画中来选，这些画我在布拉格见过，但是回忆不起来都是哪些，我只记得当时是十分吃惊地盯着那些画。眼下那些画都在科隆，但似乎正在去柏林的路上。（他明确讲过）等画一到，他就给你打电话。现在我从这冷冰冰的打字机转入十分有人情味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25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一张漂亮的照片当然会赢得最衷心的感谢，特别是这张照片是你主动寄来（事实上我的请求正在路上），你的姿态显得与众不同，格蕾特小姐皮肤白皙，舒尔曼小姐表情有些呆板，好像非得让一个人说他不愿说的话，她的脸，眼睛，鼻子，以及她的微笑都不大自然，特别是站在她漂亮的小弟弟旁边，就更不耐看。这可不是在品头论足。——我提的一些问题你还没有答复，比如，你突然想起了在玛丽恩温泉的最后一个晚上，这意味了什么，另外，乃母对我们的将来到底持什么态度。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8月26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多日不见你的来信。前几日我这里也是一团糟，不过这在我是常事。——我很想知道，你对费格尔印象如何。你记性不错，在信中我确实提起过他，只是没有到柏林拜访过他。非常遗憾，去拜访他耽误了你一个非常美妙的星期天的下午。好在只是一个下午，因为中午有客人，你才没能到乡下去。另外，下次再有机会你还是会的，即使瓦尔登堡来人[60]早上就离开的话，你也还是会去的。只是，如果为了那些画你才没去成乡下，我感到十分抱歉。——犹太人之家？对此我只想说：或许某些工作将会是必要的。这些事情你应该全部交给我来做，也好使我除了能够分享你工作中的快乐以外，还能以另外的方式和你贴得更近。

弗兰茨

最亲爱的：

非常感谢你如此详尽的来信。用打字机写信看上去确实不舒服，所以人们就试图在冰冷的打字机字后寻找有生机的东西。当然，用打字机写信的确很方便。我有这样的感觉，你似乎已经习惯用打字机。——画家，他妻子，和这些人相比，我当然喜欢你。我认为，只有首先和一个人单独交谈，和他交往，才能真正地了解这个人。

你对画的了解多吗？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有这么几幅费格尔的画我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我想，这几年他肯定又画了许多。——费格尔夫妇结婚已经有三四年了。费格尔太太看上去不大热情，但我也注意到，在咖啡馆聊会几天，再散散步，你就会改变对她的看法，他们俩看上去虽然有些不大般配，但不难看出，他们俩对自己的小家庭还是很满意的。我几乎记不起他上学时的样子了。只记得上学的时候，最后一排有一个挺笨的大高个儿，似乎是他。——他讲话以及思维方式给我印象很深，虽然有点逻辑不清，但却铿锵有力。他的处世态度你称之为“瞬间乐观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看法完全一致，尽管喝茶的时间很短，你还是发现了这一点。为什么在他太太面前表现出来如此的孩子气，我也解释不清。不管她多么冷冰冰，多么傲慢，她是他的妻子，是他喜欢的类型。我是这样认为。你觉得表现巴黎的画适合于做结婚礼物吗？是怎样的一幅画？有多大？他会不会帮助运输？我们付一百五十克朗，就一幅画来讲很少，但就一件礼物来讲，已经很不少了。有空的时候再讲一讲那天下午的事情。你在那儿感觉如何？

弗兰茨

〔两张明信片〕〔19〕16年8月31日〔布拉格〕

〔边旁〕

这事勃洛赫小姐怎么能忍受？这对她又意味着什么？

最亲爱的：

我一直沉浸在昨天信件的快乐中，特别是其中的两件事情：对人的观察和对他人的尊重。再给我写一些关于那天下午的事情，着重写一些你所看到的東西。他（弗里德里希·费格尔）不是有一项伟大的计划吗？

——他要为米勒出版社将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作画。他有没有把完成的作品拿出来给你看？你在信中写到，他们夫妇的情绪不大好，上次我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也十分低落。今天费格尔的兄弟来办公室看我，解释了他们情绪不好的原因。（我对格蕾特小姐的痛苦深感同情。你现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当一个人决定帮助他人之后，他就会全力以赴。）你给她以帮助，当然也代表了我。有三天我感到头脑特别清爽，可今天又开始发烧，从昨天起我就已经从头到脚感到不大舒服了。大约十四天前我去看了大夫，一位无法形容的大夫（我的各种疑难病症不仅没能得到治疗，反而加重了）。我会再给你讲这天的事情的。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9月1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只写几句话：我回信晚了，奥特拉在游泳学校等我，头涨得厉害，我得到外面透透气。——我还没有给你妹妹写信，在一张电报上记有她的地址，可我还没有找到。我只想告诉你：如果危险已经危及到她的话，那也就失去了一切。我绝对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现在还不应该让这些烦恼搞垮。我肯定会给她写信的。——我想知道乃母对我们将来的明确态度，这不只是因为我的原因（我认为，住房是最大的问题），另外，为了母亲的原因^[61]好也还是讲清此事。在我看来，你的节俭简直令我大吃一惊（别生气）。下封信我会再谈这事。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9月3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三天没有你的来信，代之是今天的信和这许多照片。照片的效果虽然不是很好，其中的一张好像是在排演特洛伊妇女挽歌队时照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照片离我如此之近，我可以随时端详抚摩。多给我送来诸如此类的快乐。——你提出来的关于孩子们的问题，是最最困难，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几乎和我的病同属一类。它一方面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是一

根无情的皮鞭！——此外，你对这一转变所提出的疑问，并不难解释。这三次婚姻中的任何一次显然都有它的道理。没有任何人愿意让自己显得无理，多半要努力使自己显得有理。那些女人们本身有缺点而且有责任，而男人们只允许有责任，然而他们受到的惩罚却多得多。这个问题现在清楚些了吗？

就在我马上要写完明信片的时候，看到面前的《柏林日报》上有一则关于在柏林举办“母亲和婴儿”的展览和讲座的消息。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9月7日〔布拉格〕

〔边旁〕

我一点也不反对用打字机。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5日、6日的来信，非常感谢。你信中提到房子。昨天我是如此的渴望宁静，渴望绝对的宁静。你相信吗，只要我有耳可听，有可以证明生命存在意义的头脑，我就要拥有它们。我想我不会有宁静，就如同被冲到岸边的鱼儿得不到水一般。昨天下午我读一本奥托·考斯[62]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个小时我很快乐。在玛丽恩温泉我给你看过一幅布莱的照片。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那就是考斯。不想向你推荐这本书，因为至少开头看起来不大让人理解，但对那些整天和那一时期及那时期文学打交道的人来说，也许就很容易理解了。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9月9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你妹妹的地址我还没有找到，不过，你最初的激动也许已经平息下来了。我们所要做的，并不十分急切，只是表达一种心意。——因为你和费格尔夫妇相处很好，所以在他们出发前，你或许能去和他们告个

别，慰问慰问。你也可以给他们写封信，或者给他们寄张合适的卡片，这样也许更好。他还没有给我写信，那些画也还没寄来。此外，考虑到他作为国家美术馆长的绘画成就，他也该得到一封特别讨人欢喜的信函，主要是为了让他减轻心中的不快。另外，只要一个女人对服装有感受力，那么就不会太难和她相处，另外，你当时穿的又不是丧服。你特别提到妇女平等是不是故意吓唬我？作为相互信任的标志，我接受你的提示。——关于星期四晚上的描述令我十分高兴。——文件吗，我就只需要出生和原籍证明。我听说，这些东西很容易搞到。我必须抽出几个小时办这件事情。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9月9日〔布拉格〕

〔边旁〕

费格尔的弟弟（恩斯特）刚给我拿来他的诗作，不大容易理解，不过是个很严肃的东西^[63]。

最亲爱的：

忙碌的星期天。我又和奥特拉去散步。前天，星期五，我们去了两个很棒的地方，是我最近刚发现的，还是在特洛雅附近，不过这比那个树林^[64]更美。那儿有一块空地，草很高，周围忽远忽近隆起一圈斜坡，斜坡和密草将太阳挡在另一个世界。还有一处，离那处不远，是一个很深很窄、变化无穷的峡谷。这两个地方都很静，静得就像无人的乐园。我请奥特拉打破沉静，教我唱歌。尽管我的嗓音不好，可那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变成了金嗓子。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9月10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时间还早，等待我的是工作和上司。由于睡眠不好，头很痛，也许

该在椅背上靠一会儿。可我还是坐到打字机旁给你写信。你的信所给我带来的快乐根本是无法用简短的语言表达的。你带给我一个家，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就听其自然好了。你对我们将来的家的设想，我完全赞同（只是我并不认为一定要把钢琴当作我们家摆设的关键之物），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人，只有人才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我还很想听些其他的事情。顺便提一下雷曼博士和他的报告。你说听他的报告一点不感到吃惊（这话听起来有些让人觉得你并不喜欢他的报告），但你又说，很久以来你就不赞同报告中的观点（这实际上是惊奇有余，而表达不足吧）。就这个报告而言，应该说你很走运，因为这篇报告所涉及的中心问题是要动摇犹太复国主义的决心，依我来看，这样的观点和争论不会平息，它们会时常出现，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免受这种观点的干扰，这也是你要做的。或许，这话不该由我来说。不管怎么说，首先要做的是澄清认识，有关的问题在我寄给你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答案，而且我也一直想让你关心这件事，做好这些已经是很多工作了。我还想听你讲讲那天听众的情况，还有那些按你的说法，我会觉得非常漂亮的姑娘们的情况。犹太人之家的孤儿们也在场吗？讲座当中有没有引起强烈反响的争论？勃洛赫小姐也在场这很好。她对讲座怎么看？这件事情整个儿就让我高兴，因为我预感到（我本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但是这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们的距离也太近了，我实在已经顾不到这么多了），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一定会从你正在经历的事情中认识到，部分来说（只是部分来说，因为没有人能完全否定自己，我想，如果你还信任我的话，你就应当同意我的这个意见），至今为止，你还没有发现真正重要的那些东西，而只有这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能唤醒你力量中的最善；你一定会认识到，工作、家庭、文学、戏剧，这些东西从根本上说只能唤醒你这种最善的一部分；也许，真正的结合点在这里，这种最善反过来又会有益于所有其他的方面，例如家庭之类。在这里，我有意识地避开了我们俩和我们俩的关系，我们说过我们将不讨论这个。不过，如果这些思想的余晖——不仅是在某个不期的晚上，而是整个儿的这些思想以及它们的那些可能性——落到了你的身上的话（而且，为了充塞你现在的的环境，也落到了勃洛赫小姐的身上的话），我将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的头痛病前一阵是时好时坏，所以还能忍受，只是有这么几天痛得非常厉害。给我看病的医生极尽其所能给我做了检查。这个医生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冷静，然而有些滑稽，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年龄，他大块头的身材（正像我这样的瘦高个能使你有一种信任感一样，不

过，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明白），他的外形（厚嘴唇和宽厚的、好像能碾碎一切的舌头），他对病人发自内心然而并不过分的关注和同情，他在医学方面的谦虚谨慎，以及其他方面，这一切能够唤起人们对他的信任。他说，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太紧张了。他的建议很有意思：少抽烟，少喝酒（不过，偶尔还是要喝一点），多吃蔬菜少吃肉，晚上最好不吃肉，游游泳，总之，锻炼锻炼，晚上上床时保持心情平静，然后入睡。特别是最后这一条他认为有助于食欲增加。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必须停笔了，这中间我被打断好几次，而且事情一次比一次急。

提起过的那个施瓦本小姐也在犹太人之家吗？我有一个请求，你那边凡是与犹太人之家有关的必要的花费全由我承担。此外，前不久，我也送给马克斯一本回忆录，我还要再送给奥特拉一本，我把这本书送给我最亲近的人。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们是最客观，最实实在在，也是离我最近的读者。

最诚挚的问候。

弗兰茨

〔19〕16年9月11日

最亲爱的：

你问及我的事情，在我昨天的信中提到了，不过，这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不能用嘴表达的意思，用笔我也不能。按照你的性格可能你有理由要讨个明白，可是我却不能，我想，我或许是害怕把这事弄得太清楚。通过书报杂志把你领向一个在我看来适合于你的精神归宿倒是可能的。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意义也不大，那些本身就十分微弱的力量它们所做努力的结果也只是微乎其微的，更不用说，你只要一转头就可以避过这些力量。我要补充的是：你有权避开它们，因为这种努力缺乏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所以，当你在玛丽恩巴德认真考虑寄宿学校的事情时，我多么高兴，当时我根本没有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想法。只有真实可以给你带来最大的帮助，哪怕是最微小的真实。不要对自己有任何偏见，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对我也不要抱有任何偏见。这样你会发现有人需要帮助，而且，理智的帮助——你有给予这种帮助的能力——正如雪中送炭。这极其简单，然而又比任何

主导思想都深奥。其他所有你问的都会自然由这简单的事情中得出结论。至于我，我有这种顾虑：你可能会由于这一工作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与我有分歧，因为我至少目前没有能力献身于这项工作——倒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然而，总的来看，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情更能使我们在精神上的联系更加紧密的了。你在那里所做的任何努力，你在那里所承担的任何工作（但不应让这些工作搞坏你的身体），以及你的上封信都给我带来无比的慰藉。我看，这是通向精神自由的唯一之路。那些帮助别人的人会比被人帮助的人更早地走向这条自由之路。不要听不进反面意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在寄宿学校你能在哪些方面给他们以帮助？因为一个人的一生全都包在皮下，至少是用自己的手包在其中，而缝合之处无法改变，因此就要努力使那些被照顾的孩子们在保护他们自身个性的前提下和帮助者的精神世界及生活态度逐渐接近，也就是说，要让孩子们与我们时代受过教育的，带有柏林特色的西部犹太人的状况接近，应该承认的是，或许他们是犹太人中最优秀的样板。在这方面成效并不大。如果我可以 在柏林寄宿学校和另一个寄宿学校中进行选择，而在后者中那些柏林的帮助人以及来自克罗米亚和施坦尼斯劳的普通的东部犹太人帮助人就曾经是被照顾的孩子们，那该多好。我肯定会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不过我想，这样的选择不存在，没有人享有它，一些对于东部犹太人同样重要的事情，是不能够在寄宿学校传授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甚至由亲人所进行的教育都做不到，这是一些不可传授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希望它们是一些可以通过努力掌握的东西。掌握它的可能性——我这样认为——只有在寄宿学校帮助人才会有。因为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自身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们所能够做的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当他们对事情理解之后，他们会使出他们的一切力量，尽他们的一切所能，这又是很多的，只有这才是不可估量的。在寄宿学校的工作得到一种新生的强有力的方法，总而言之，是一种新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激励了民族向上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别处可能会被遗忘，这种力量还会使人们想起久远的过去，然而，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没有这种力量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就不会存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你是不是能处理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这是你的事情，在你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发生的任何意见分歧（漠不关心不在此列）都会令我感到高兴。现在且不论此事，但是你应该先体会一下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感受（你已经有过一次体验，仅仅是体验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加入进去），然后才会承认，我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拥护者——考查的结果会是这样的——于是，我就不

再恐惧，你也不应该恐惧，犹太复国主义不会分裂它的拥护者。

天已经很晚了，而且，两天来我的头和血液又不愿意保持平静了。

弗兰茨

〔19〕16.9.12

最亲爱的：

今天没有来信。如果你想知道的事情在我的两封信中提到的都不多，那倒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我们在信中肯定就还会时常提到这些事情。找房子事情进展如何？这件事我当然十分关心。还留着老房子的想法我认为不现实，尽管这一想法确实发自内心，而事实上常常不过是一种幻想，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你星期五必须去参加的是个什么样的检查活动？那个牙医怎么又冒出来了，一提他我就紧张。——我当然对你如此地节俭赞叹不已。你的手指肯定是被施了魔法，不然怎么能这么神奇地把流出去的钱又弄了回来。在这方面我有一双典型的平庸无奇的国家公务员之手。

弗兰茨

〔明信片〕〔19〕16.9.13〔布拉格〕

〔边旁〕

我希望最晚在星期五能收到你讲述星期一情况的信。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11、12、13号的明信片以及13号的信。尽管头和牙还很痛，心情也仍然不佳，但一下来了这么多的信件，低落的情绪以及不好的消息也就被冲淡许多。我代表自己，也代表你，代表我们俩感谢你定期去犹太人之家（上星期的信可能有些过激，但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你喜欢那里的一切，这很好。因为很有可能，一件并非坏事之事会令你特别反感。这次没有考查你，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考查你都能逃过。关于你上次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今天我坐在一台不好用的打字机前，而且时间很紧。——另外，不久前我接到一封邀请，邀请我参加《新文艺之夜》丛书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朗诵会。这倒不是件坏事，我喜欢朗读，或许你也能来（10月6号或者11号）。为此办签证应该不会

太困难，只是对于我的能力和时间而言却是个问题。也许最后我还是得放弃这次朗诵。不过，我是很想晚上能和沃尔芬施坦^[65]坐在一起朗读。

顺致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9月15日〔布拉格〕

仍然是简短数语，但却如就在身边交谈。是寄宿学校使我们联系更加紧密。在那些姑娘的问题面前你不必害怕，或者为了不损害寄宿学校而把这种害怕藏在心里。不仅是那些问题让你害怕，而且那些沉默也让你受到压抑。不仅是那些姑娘的问题让你害怕，而且那些咄咄逼人的和对你唱赞美歌的“有用之人”们的问题也让你害怕。你曾经这样醉心地写到过他们。此外，把他们的信任从崇拜上引开，这是你的事情；在这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让标准的犹太教黑色情结——这里面有许多不可解的东西——起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以抹去任何东西，这里的人却很乐意抹去点什么。我想这样做是很不公平的。我想不到要去教堂。教堂不是轻易能够靠近的。我们现在不可能，就像我们还是孩子时一样不能；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对上教堂是多么地感到无聊；那种经历对于以后的办公室生活简直是一种学前教育。那些只是出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仰而拥入教堂的人，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那些一定要从约柜^[66]后面和约柜中间穿过去进入教堂之门，而不是规规矩矩地正常地从大门进去的人一样。但是就我来看，你那里的情况和我这里不大一样。当我必须告诉孩子们（当然挑起这样的谈话是很不明智的，而这个问题孩子们一般不会自己想出来。因为大城市的孩子们见多识广，他们明白，如果他们是东部犹太人的话，一旦有人挑起这一话题，他们就会立刻起来保护自己并攻击他人，当然这很不好），由于我的出身，教育，天资，环境的不同而和他们在信仰方面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遵守宗教戒律不只是表面的形式，而是犹太信仰的中心问题）时，当我必须向他们承认这一点时（我会很坦率地这样去做的，失去坦率，一切也就全无意义），你也许就不是与这一信仰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很可能是一些已经模糊了的记忆，这些记忆被城市的喧嚣，被疲于奔命的生活，被多年繁杂的各种对话和各种想法所淹没。我不愿说你还站在门外，但远处还会有某个闪亮的门把手在向你呼唤。我的意思是，你至少可以给孩子们一个悲伤的答案，就是这一点，我也很难做到。但这就足以赢得他们

对你的信任。亲爱的教师，你什么时候开始上课？

我已经给乃妹写信了。因为你没有对我的反对意见提出异议，另一方面也没有不让我写信，所以，我就给她写了一封语气和缓，但具有说服力的信。

弗兰茨

〔四张明信片〕〔19〕16年9月16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午饭还得等一会，我先简短地回答你的问题，——你立刻热心而有条不紊地着手此事，这很好。星期天的郊游对你来说会很有意义，另外，这些天天气很好。我和奥特拉坐的地方可以俯瞰一条蜿蜒曲折的狭谷，这条狭谷并不宽，但很美，尽管太阳很足，而且正对着我们，但我们还是觉得有点冷。我们阅读斯特拉乔夫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67]。眼下，我正读福斯特的《青年教程》[68]。我不认识福斯特，但听到过许多对他的溢美之词，仅是我听到过的一些书中的例子（费利克斯对此评价很高），已经令我很感动了。从为犹太人之家所做的工作我们分析一下教育理论：教育学不能纯粹作为指导具体工作的理论来学，而是要通过一本优秀的教育学书籍唤起认识并衡量自己的施教能力。一本书所能给予人的不会更多，人们也不应期待一本书会给予你更多。你的第一个被接受了的建议我觉得很正确，第二个我觉得有些问题。如果福斯特的书在课上读过了，那么课后学生也许就不再看了，顶多也就是草草地看一下，而普遍被采纳了的教学方法是，每个想要跟上教学进程的人，不仅要阅读教师指定的内容，而且要阅读全书。因此你的顾虑并不过分。每个人必须通过福斯特其人了解福斯特，如果除了福斯特的报告还能从其他人，比如菲莉斯那儿得到一些闪光的东西，肯定不会有有什么有异议的，特别是当我想到我上面提到的能够拥有一本指导具体工作的教育学书籍的意义时，就更坚信这一点。另外，是不是你接过了这个题目中最难讲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困难，别人不合作吗？——关于维也纳犹太人之家书籍我将尽力搞到，或许你能给我一些这方面的具体信息。我也非常想再听一些关于上次那个宗教教育报告方面的情况。

[69]——勃洛赫小姐当时也在场吗？

我可能要求你写的太多了，因为你还有许多其他工作。我只是想说，我给你带来的工作很多，但是你的信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无法用语言

描述的，只是想到你要用很多时间来回信，我总感到有些内疚。你的上司在柏林吗？你有没有找一个帮手？

弗兰茨

〔19〕16.9.18

最亲爱的：

今天没有你的来信。昨天我给你寄去福斯特的青年教程，但没有订成册，这样，就是你已经有了成册的书，也还有一份可以随便拆开，而不必带着一本沉甸甸的书到处跑。昨天我翻了一下这本教程，你的那章我详细读了一下（尽管我当时头痛得要命）。就这本书来讲，十分值得钦佩，尽管依我来看在各方面还可商榷。昨天我竟然在床边坐了一个小时而没有躺下，甚至都没有想要躺下。而现在坐了一上午办公室之后就觉得没这么大劲了。你的这一章可以用三十句话来概括。给我寄一份讲稿的复写件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一章。也写几句对我写给你的信的看法。——怎么会呢，你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而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房子？这样看来以后找房子不会太容易。或许我还是能去^[70]。但是我今天听说，邀请是在马克斯的影响下发出的；因此我参加这次活动的兴趣减少许多。你愿意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吗？倒不是为了来听朗诵，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主要是想有这么几个小时，大约五个小时，你能和我在一起，但是一切还都没有定下来。

弗兰茨

〔明信片〕〔19〕16.9.19〔布拉格〕

最亲爱的：

很好，你和大家一起去郊游了，这太好了。只是对于一个累了一个星期的姑娘来说走四小时的路太多了点，尽管这可以代替寄宿学校晚间的户外活动。总之：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别太好强，一个晚上研究福斯特，一个晚上上课是无论如何要做的，如果每两个星期天再安排一次活动的话，那就全排满了。如果能像我们在玛丽恩温泉提到过的，每星期抽出一个晚上做做体操，那我会很高兴。你有没有听到（费里德利希）费格爾的消息或给他写信？他可能要来布拉格，不过他既没有写信来，又没有寄来画，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我没有接到你星期六的信件，是丢了？

〔明信片〕〔19〕16.9.20〔布拉格〕

〔边旁〕

牙医在做什么？

最亲爱的：

你又去参加一个培训班，我真的认为大可不必。一方面不要把你累坏，另一方面不要影响你的吸收能力和工作效率，你想，这可能吗？你讲到的那个辩论，很有特点，说心里话，我更欣赏邵勒姆先生那类的建议，它要求人们要通晓一切，从而达到无所求的目的。这些建议及其意义绝不能和一个人所面对的实际结果去比较。另外，我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就邵勒姆先生的建议本身来看也是不可行的。——你和那些姑娘们相处很好而且希望和她们接近，这令我很高兴。你信中所流露出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自满情绪都是有害的，比如信中有这样一句：“能够公平地对待她们并且愿意也能够给予她们。”是由于这些孩子们才有所成就，只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回报她们。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可感激的，那么他就处在一个无法弥补其精神折磨的中学女教师的可悲境地。地狱中的人物——说到这儿我想起：你的那些老故事就要出新版了。我把过去的题词改为：“致菲”，你看如何[71]？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年9月22日〔布拉格〕

最亲爱的：

又没收到你的来信，这星期只收到星期一的明信片 and 信。今天，天气很好，明媚的天空令我快活许多。你和孩子们也会再有一个快乐的星期天，只是希望不要太紧张。我真希望也能坐在车里紧挨着你并且不时地问，我可不可以问问题。然后，无休止的吵嚷也许就会停止。我常想，人的身体就如一艘即将报废的海船，当无情的海浪肆意袭来的时候，它是多么地不堪一击。——有件事我好几次想写信告诉你：你还记得那首本来应该作为马克斯一篇文章的附录发表在《犹太人》上的小诗

吗？稿件在寄送的时候丢了，后来又寄了一份，我自认为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首小诗，可是，最后布勃在提出保留意见的情况下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却没有登我的小诗《梦》，但他在一封极尽溢美之词的信中却说，这首小诗本来是应该能够发表的[72]。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封信令我很高兴，其次，我也想利用公职人员谨小慎微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告诉你，我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的存在都是不稳定的，不管是否我将来会有所成就（乱哄哄的时候我什么也写不出来），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些善意的人们会否定我的文章，恶意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

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9.23〔布拉格〕

最亲爱的：

多么美好的一天，早上起床后顺便到办公室问一下有没有我的信，没白去，那儿竟然有22号和23号两封信。我真不知道怎样描述这两封信给我带来的快乐。那种感觉就像是，那些小姑娘是我的孩子，她们终于有了母亲（不会耿耿于怀吧？），又如，你是我的孩子，经过许久的孤独，你终于得到一个母亲，或者，我坐在一处安静平和的地方，看着如油的春雨撒向我的田地。而所有这一切的最妙之处在于，我没有刻意追求这一切，因此按照神秘的自然法则，由于我的无为也就不会惹来任何麻烦。明天我会写得详细些，并给你寄去一份报告，那上面记录了我的想法。把施勒米尔作为开始我认为很好。明天我会让人寄去十份摘自《世界文学》的《施勒米尔》[73]（带插图）。我幻想着与你并肩走向缪贝克。

弗兰茨

〔明信片〕〔19〕16.9.24〔布拉格〕

最亲爱的：

希望你能及时收到那篇文章。今天早上我有许多事要做并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自从第一次读福斯特时就没能和他交换我的看法，现在为了能赶出关于你那一章的一篇东西，还有头四十八页的内容，我不得不

紧咬嘴唇拼命地赶，由于时间仓促，所以会有许多地方不很成熟。我们这就开始吧：不，这之前还有一些要做的事情，我认为，整个报告有四分之三照本宣科，而四分之一现场发挥，这一构想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十分详细阅读过这篇文章并想把他文章中的思想传达给他人的报告人，首先应该把整篇报告简明扼要地概括一下。此外，利用这一机会对福斯特作品的合理性提出疑问，我认为，这不是报告人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单独安排一个晚上，或者在培训班结束之后专门搞一个讲座，也可以在讨论会的理论部分结束之后各抒己见，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我很想按照我的想法为你设计一个方案。下面是报告内容：

到现在为止已经阐述了伦理学方法的基本观点，即：大致分为两大类，引导孩子们从生活上升到伦理道德的法则；引导孩子们从伦理道德的法则去指导生活。不管是把它作为纯理论的伦理学还是作为常识课，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可以统一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一节是对在知识课中独立的各个问题范围之内的伦理课进行研究。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生理学、天文学；再有，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史，声乐课；地理课只是附带提一提。

自然科学与伦理道德法则的联系比其他学科与之的联系更为重要，因为这里包含了解释本来并不必要然而确实存在的与伦理道德法则相悖现象的原因。有两个表明道德的反作用力的例子：例子之一（适合于十一至十四岁的孩子），如果没有合乎道德准则的人操作机器的话，那么一切的发明和发现都是无意义的。例子之二适于高年级的学生，通过普罗米修斯所作所为以及他因此而受到的惩罚来说明在反抗更高秩序时所能获得的权力以及为此所必然会降临的惩罚。

道德伦理与天文学的联系大致为：哥白尼学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敢于对亲眼看到的事物提出疑问，同样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时，人们仍应该敢于提出疑问。能够认识到天文学研究中存在主观干扰因素，那么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时候，也应该承认导致错误的主观因素。

语言课和道德伦理学的联系是这样的：语言是促进人类之爱的基础，通过语言可以表达心中的好恶之情，改变自己狭隘的认识，扩大自己的视角，使自己变得更加宽容更加谦虚。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美德，只是通过学习语言也不能改变什么。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讲同样语言的人们之间，比如，地位不同的人们，或者，不同的两代人之间不可调和

的矛盾得到证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会一门语言也只是对于那些有共同语言的人才有意义。

在通常的历史课中不只是伦理学，就是历史本身也常常被滥用。人们常常试图把历史作为这样一句话的佐证，即：应该把世界历史看作世界法庭。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人们应该更多地放弃做无谓的历史证明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表述历代衰亡的心理因素上，比如，强权对于施暴者以及受害者的心理影响，只有用这种方法人们才能够揭开历史事件模糊的外表，看清事物的本质。（总之，目的使手段神圣化。看66页，第二段，该段作为重点课堂朗读！）容易得到别人赞同的争取自由的暴力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基本错误，这一点可以通过基督的例子说明。

继续写下去时间有些来不及。我大约看到第77页，而文学、艺术、音乐课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我只是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至少还是有些用途的：《第二个声音》^[74]一定要朗读。最后也许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大家可能自己还会找出一些与书中讲到的内容相关联的例子，这些例子在实践部分会更多（这部分会常常提到），切忌丢了西瓜，拣回芝麻。所有的例子都必须以解释主题为目的。

弗兰茨

[19] 16.9.25

不要接太多的工作，菲莉斯！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由你来写那篇报告^[75]？

最亲爱的：

昨天和今天都没有收到你的来信。首先是几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你现在每周要在寄宿学校待几天？多少小时？寄宿学校有多远？你怎么去，坐车还是走路？雷曼博士的关于宗教教育的讲座涉及了哪些方面的内容？你信中写到，学生们的辅导老师由她们自己选择。她们到哪去自己选？你不会是这么选出来的吧？或许你的任命只是一种试验？为什么蜜丽莲不再是那里的头儿？你认识她本人吗？那位自己要求带这个组的女士在做什么？说不定就是你叫她红石头的那位女士。你们之间是怎么分配工作的？你的朋友们，姐妹们，以及你母亲是怎么看寄宿学校的？你都两个星期没能和她们在一起了。你为什么接下写年终报告的工作？这件事肯定会有人来做，尽管只需写出一页，但这对你仍然是一种不必

要的负担（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出于我自己的利益，因为，不是写这么篇报告的话，这张纸也许就是为我而写了）。你的上司在柏林吗？你現在有助手了吗？她干得怎么样？为什么你又得搬家？经过第一次的失败就不再找房了吗？写有关于但泽先生情况的信到了吗？你最近有没有听到费格爾的消息或给他写信？（我一直没给他写信）——今天就问这些吧。

我昨天给你寄去了十篇施勒米爾的文章，是从《世界文学》上搞到的，纸很好，希望能如我所愿——上面的插图比较容易弄下来。顺便说一下，这个小册子我没看过。此外，你还会收到两本由莎夫斯坦出版的施勒米爾。这两本小书可能会比从《世界文学》搞到的那些漂亮，特别是那些老的画会使整个书增色不少，但我认为，这两本小书中的文字内容不完整。我觉得，姑娘们在听课的时候不应该看书，而是在你讲完施勒米爾之后把书发给她们，用来加强记忆。由于故事中各种复杂的关系，我认为你的首讲内容选得很好。非常遗憾的是，我想象不出这些十一到十四岁无忧无虑的孩子们的能力和要求。你有没有注意到，至少是在开始的时候，福斯特没大注意如何给女生上课？在这个问题上你就可以用你的经验去加以补充。我还没有和马克斯正面谈到过你那个组的课堂读物的事情，我担心，为这个年龄组推选读物，他也不一定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夏洛姆·阿施出版的圣经故事^[76]也许比较合适，这是我目前能够提出的唯一建议。这本书我没有读过，尽管我读过的这个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其他东西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这本圣经故事应该还不错。这本书我随后给你寄去。我想，你和小姑娘们就李希特瓦科^[77]的这本小书进行看图练习，从某种意义上讲与福斯特的理论非常相似，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值得提出疑问了。李希特瓦科的书我也会寄给你。如果我建议你少做一点寄宿学校的工作的话（你接过的工作显得确实多了点），主要担心，很快跳进水中的人会很快又从水中钻出来。在这方面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做的。我只是担心，你的工作负担太重，从而会削弱你的工作成绩。告诉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第一堂课以唱歌开始，又以唱歌结束我觉得很好，只是不明白，你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唱歌。在卡尔斯温泉你唱得不是很好吗，毫不夸张，我当时和你一比真觉得无地自容。要唱些什么歌？至于自由练习，我提醒你注意米勒舍的体系。你还记得那本书吗？我建议你在作自由练习时，不要让她们任意发挥，而是要好好研究这些练习，特别是在做练习之前好好研究。我可能要到慕尼黑去朗诵。你若能来，对我是强大的动

力（不然，我可能不去参加这次朗诵）。由于某些原因绕道柏林不大可能，另外，我也不打算这样做。尽管我不愿看到你受旅途之苦，我还是希望在慕尼黑而不是在柏林看到你，至于寄宿学校我也想通过你去了解，而不是看到它实实在在的样子。由于我这里的各种情况，可能也由于我的性格而作出的如此决定，见谅。

弗兰茨

〔19〕16.9.26

最亲爱的：

前天，昨天，今天都没有你的来信，太久了，是吧？不过我能理解，星期六，星期天你都没有时间。另外，这里今天天气也很不好，昨天倒好得多，看天气这么好，我就出去走了走，一个人，到那块视野很好的高地，就是上回我信中写到的那块高地。当时的感觉有如到了另一个世界。你享受过独处，独自散步，独自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快乐吗？我这么说没有任何反对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在一起的意思。但是你知道一人独处对于受折磨的心和疼痛的头是一种多么大的抚慰！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你有没有一个人独自走过很远的路？独处的能力是经过已往的痛苦和快乐培养出来的。我知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常处于孤独之中，而当时更多的是不幸，很少有发自内心的快乐，现在我走向孤独，就如水流入大海。

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19〕16.9.26

〔明信片邮戳〕〔19〕16.9.27〔布拉格〕

我已经和马克斯谈过了，他现在唯一能推荐的是施勒姆·阿莱夏的一本书。不过，我认为，他也有同感，孩子们读这本书似乎复杂了点儿。我倒是想给你寄去一本好的猜谜的书或者一本教孩子们做手工的书，只是我得先找一找。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星期六写的信，你的贺卡还没到。照目前情况看，我的

文章是不能按时到了，不过你可不要搞错了，朗诵会是不会在新年举办的。令我烦躁的常常是你给孩子们搞的讲座已经过去了许久，我才能得到任何有关的消息。施莱伯[78]我当然认识，尽管我和他只相处过一两次，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很好。一个时常沦落但最后总能崛起的人物。我想，他在婚姻方面也很不幸。当然请代我向他问候。寄宿学校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它所达到的目的已经超出了最初的设想。把孩子们交给你再合适不过了。

弗兰茨

〔明信片〕〔19〕16.9.28〔布拉格〕

最亲爱的：

我以为今天会特别静，福斯特的书就放在我身边，我本打算把文章写完，尽量的使之具有整体性，谁知，今天这里特别热闹。如果能让我把这几行写完，我会很高兴。今天收到你星期二的信。尽管与过去的最好的时期最好的信件相比，我仍然觉得，你现在的信把我们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联结得更加牢固更加紧密。我在回答你的问题时不简洁明了，就是说，我的回信不符合我的性格，比较啰唆，我感到很抱歉。我的信之所以不简明扼要，啰唆，主要还是由于打字机的缘故，尽管打字机使你的信更加明了。好了，用打字机书写的必要性就要成为过去。每当我想到会有信件丢失，我就感到非常的紧张。比如你写到，上个星期一没有写信，而且特别强调是由于索菲的原因。可是我也没有收到你星期天写的信，或许你在星期天的信中提到了给姑娘们搞的第一次讲座？因为在星期二的信中你只字未提这件事，也没提星期天的郊游，我真的想象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丢了一封信而且我知道它是丢了，那我也就甘心了，如果没收到信，却又不知道为何，会令我非常不安。最好让我心中有个数。你有没有收到我关于信仰问题的啰唆回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莱姆选这么个题目，似乎是大了点。谁是听众？你能给我讲讲关于那个讲座及讨论的情况以及雷曼过去那个关于宗教教育的讲座吗？当然数语即可。我认识莱姆[79]只是通过他的诸多作品。他这个人除了文体有些繁冗以外，其他都很了不起（不知道你听说过他关于中间国家的学说吗？），诚实，坚定，各方面能力都很强。他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有多大年岁？你在那里都和谁聊天来着？

接下来由你继续读《巴恩黑尔姆的女佣》，这可不是件好差事。小

姑娘们能理解这么复杂的戏剧语言吗？朗读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中止朗读，用适当的词语来解释呢？肯定是这样的，你的前任——肯定不是蜜丽莲——在姑娘们中间唤起了对于该作品的感受。不过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做法。如果小姑娘们已开始接触戏剧作品的话，那么阿施的书对于她们来说就有些太幼稚了（这并不一定是错误），因为能够读戏剧作品，那么她们也应该能读圣经。尽管从我本意并不愿意让她们读圣经。无论如何我会给你寄一本佩雷斯^[80]的书以供挑选，这本书的名字是《民间故事》。

在课时安排中有一个词“集体活动”我不能理解。星期三的时间安排不同于星期六的朗读和游戏吗？怎么会这样，星期三你6点就要开始工作，甚至于星期六5点就要开始；这么早你能到那里吗？星期六工作，报酬怎么给？勃洛赫小姐找到了干涉此事的办法，这很好。费格尔的两幅画昨天到了，其中正有我想要的那一幅，这样，就不用凭着记忆去描述了。

你的贺信今天到的。用花做礼物不符合我的家庭环境；如果我一定得买花的话，这之前我必须先把自己打碎。你不愿这样吧？而且就是我把自己打碎了，也不一定就能买花。不管怎么说，我祝你新年能好好休息两天。

弗兰茨

[19] 16.9.29

最亲爱的：

今天没有你的来信。去慕尼黑旅行的事情我们还得彼此常通着点信儿。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只知道是在11月份。我最后是不是能去，也不能保证。这次出差我总共才有两天时间，时间很紧，特别是去慕尼黑的交通也不很便利，坐一天的车，晚上到达后立刻就得开始，第二天一大早又得起程。应该把朗诵会安排在周末或是节日的前后，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我们自己安排出一天的时间。——这才是这次出差的真正愿望。你在贺信中提到可能有机会来一趟布拉格。真的吗？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不过，我不得不向你承认，你可别生我的气，我更希望在博登巴赫见到你，而不是这里，但是，在这儿见到你，总比见不到的强，你是怎么想的？

〔明信片〕〔19〕16.9.30〔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仍然没有你的信件。晚上睡得很不好，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这是我夜里做的一个可怕的梦：公司的门房给我打来电话，说是那里有我一封信。我跑下去，没看见看门人，却见收发室主任，信件每天先到收发室。我就向他要我的信。那个人在小桌上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可那封信刚才还在桌上呢，他说，这都是门房的错，因为他应该让送信人将信交给收发室，而不是交给他。反正，我得等门房回来，得等好长时间。最后，他终于回来了，一个高大而单纯的巨人。他也不知道，信在哪里。我非常失望，便去找经理告状，想要和送信人以及门房当面讲清，让门房保证，再也不拿信了。我在楼道和楼梯上糊里糊涂地转来转去，想要找到经理，结果是白费力。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布拉格〕

最亲爱的：

终于收到你的来信，是29号写的。——使用第二册《青年教程》我知道了，这一做法当然很正确。你尽可以把书拆开，如果在实践或者思考过程当中产生任何想法，你就把它们写在和书一样大小的纸上，然后夹在书中适当的位置，以后我们将书连同这些附页一起装订起来。你要想的只是，这样装订起来之后，这才是一本精美的书！我差点写成：（只是留作纪念）你每次听报告时作的记录或许能给我寄来？——你曾经提到过的寄宿学校能够牢牢地吸引一个人的特点，我在如此遥远的布拉格都已经感觉到了。——或许下回你给我说说你们女院长的情况。如果能有张远足或任何集体活动的小照片是最直观最能给我加深印象的。——我给你寄去的那本夏洛姆·阿施的书虽然难了些，但非常适合儿童阅读。为什么不从读沙米索开始？“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狂风大作。虽然有困难，但困难也不会大到非找罗塞格尔的境地不可。”现在最合适的是赫贝尔，你有他的书吗？——朗诵会如果能开的话是在星期五，11月10号，星期六就会是我们的了。快作决定！

弗兰茨

最亲爱的：

今天又什么都没有，我简直都快无法忍受了。寄宿学校^[81]就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而那里有那么多不吉利的纪念物。不是经常，但也有很多次我在此穿行，在此徘徊，甚至梦中也来过此处。我又回忆起给你打电话的情景，当时电话的这端是一个关在电话亭中的可怜的犯人：我不愿重复我们当时说过的话。确实希望这段往事随着时间被淡忘，不过，如果刚好愈合的伤口又遭创伤的话，重提旧事也是未尝不可的。不过，这事不能和头痛一样，刚有几天舒服日子这头又开始痛。——刚才那些牢骚话都是不理智的打字机写的，每个星期理智的笔都表白它的满意之情而且认为通往寄宿学校之路和信同样重要。——你有希尔施^[82]的信吗？我认为，这是一部正统的德国犹太人的主要作品，我对它一点都不了解。是哪一版的？深切的问候。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3〔布拉格〕

马克斯让我转达他的谢意。他和我一样对你在寄宿学校的工作感到高兴（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最亲爱的：

今天又什么都没有，以后我最好是不再强调又没有信之类的，因为没有你的信倒是正常的了。

这不过是早上的想法，早些时候我还是等到了你星期日的信。我本人，就是说，最深层的我，完全赞同知足常乐，不过，当一个人经过无数个痛苦之夜而全无所获的话，他又怎能知足常乐。我举这个例子，你可别生气。你信中写到，在柏林我们可以更多地在一起，在慕尼黑属于我们俩的时间则不会太多。我想象不出其中的理由，而且，事实也并非如此。如果朗诵会能如期进行而且你也有时间的话，星期六，也就是11月11号，一整天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去柏林的话，就找不到这么完整的时间。——今天收到一封令妹的来信。她说，她当然不愿离开，目前感到相当满意，就像当初你请我帮她消除恐惧一样，她现在请我帮你摆脱恐惧。另外，使我不解的是，尽管我经常提起过那事，但自从第一次情绪特别激动之后，你就再也没写过有关的事情。我也是这么想，她眼

下待在那里最好。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4〔布拉格〕

最亲爱的：

终于坐到打字机前，不过头疼得厉害，不知道我这身体里的血是按个什么规律运动的，已经有好几天了，各处的神经又开始捣乱，不让我睡觉。昨天我去了贝尔格曼那里，他正在这里度假。贝尔格曼是我过去的同窗，我喜欢他，很想和他在一起聊聊。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影响很大。雨果·贝尔格曼^[83]。不过，这里我只是想说，昨天晚上在他那里，我感觉就像一个被审判者。有的时候我感觉会好一些。不，我现在不敢去想工作。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根本不能如我所愿，通过书信在工作方面给你更多的支持。你说感谢我，而我想做的远远超过这些；而我真正做的，几近于零，而且做得并不好。

我在打听但泽格尔和我的施坦尼兹，这也是我头痛的一个征兆。可以得到安慰的至少是，这件事情自己迎刃而解。

昨天我才听说，世界文学出版的施勒米尔故事集印制较好的版本搞不到了，而普通的版本不能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无论如何我会搞到五本给你寄去，另外，我再去茵泽尔书店看看，那里有没有合适的版本。我想知道一下，你班上到底有多少姑娘。

你对那个展览^[84]的夸奖，大概是写在我的一封赞美孤独的明信片的同一天。我只是想补充说明一点，人间之爱的美丽和孤独的美丽不一定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那个展览所展示给人们的，是很美丽，但并不一定全面。比如，作品中缺少一个小黑屋，描写小黑屋的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一定不能脱离集体，就像我的一个外甥女和她的丈夫、孩子所组成的那样的一个集体。一个好姑娘，尽管特别聪明，也会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的贫乏而变得迷惘，不知所措，于是她就得嫁人，然而必须首先得到各路亲戚们的认可，而她所嫁之人，在她理智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考虑的。我对他没有什么不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很可笑，可笑到让人觉得，做他太太会感到很丢脸。可笑之处简直无法理解。如果我想仔细描写描写他的话，会很费劲儿。就这么说

吧，他长相还可以，倒是挺健康，总是很满足的样子，而且看上去一点都不比她老。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大约两岁，特别结实，白白的皮肤，清澈碧蓝的眼睛，满头的金发，长得和爸爸、妈妈很像，不过比两个人都可爱。但是，这孩子一点都不活泼，躺在小车里一动不动，眼睛来回瞎看，没有灵气。这么大了还不能坐，脸上也没有笑容，说什么也逗不乐他。如果夫妇二人带着孩子去散步，路上遇到熟人（比如说我）而不情愿地停下来的时候，母亲含泪的双眼就会在熟人和孩子之间游移不定。有时也会强打笑脸，以使丈夫的笑不致过于尴尬。——总而言之，这一幕在那个展览中不应被忽略。

我们还是离开这样的话题。

最诚挚的问候。

弗兰茨

〔19〕16.10.5

最亲爱的：

昨天收到你星期一的信，星期三的信今天到的。你上封信的结尾提到，你的房门正对姑娘们的房间，在这个房间中是我的祝福一直伴随着你。——今天又令我想起我们的爱尔德穆瑟，因为这本书大学图书馆催还。爱尔德穆瑟也应该列于展览之中，尽管它会处于和我外甥女完全不同的地方。她有十二个，也许更多的孩子，除了一个活了二十几岁，其他的都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就是那一个活了下来，也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除了这一群孩子，她还掌管了当时在整个欧洲乃至北美很快壮大发展起来并传播十分广泛的兄弟会的全部财政和部分的精神工作。她在五十六岁离开了人世。在她死后不久，她丈夫就娶了一个女子，他实际上很早就和这个女子在精神上紧紧地联在一起。——我今天在茵泽尔书店给你寄去施勒米尔的故事集。可惜的是，没有一版能够令人满意。夏夫施坦的不全，世界文学的印得太小，费舍尔的又太贵。不带插图的还有一些好的版本。看一看你还需要什么，来信告诉我。如果你想要的话，有机会我可以把布勃的信给你寄去。

挚爱你的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6〔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没有你的来信。关于第一次寄宿学校晚间讲座的情况我当然想知道，只是，别来得太快，这也正是今天没有你的信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的，那最好。若能向姑娘们明确，讲座过程中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论，那么，效果会更好。或许，就是这样搞的，只是我没有正确理解你的意思。——在写报告时，一味的抄袭，最令我恼火。誊写员哪儿都可以找到。不过，如果你面对当事人的时候，也许就严厉不起来了。——关于马克斯的文章：《我们的文人及其团体》这篇东西可能会在下一期的犹太杂志上发表^[85]。你难道不想也对我做番评论吗？在上期的新评论上提到了《变形记》，当然是加以否定，不过说得合情合理，后来又做如下评述：“卡夫卡的叙事艺术带有一些古老的意志叙事艺术的风格。”马克斯的文章中却说：“卡夫卡的小说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具犹太风格的文献。”^[86]

这真是个难题。我难道是马戏团骑在两匹马上的骑手？遗憾的是，我不是骑在马上，而是躺在地上。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7〔布拉格〕

最亲爱的：

我今天真高兴，收到了星期四的信、明信片和照片。人们往往过分夸奖他刚刚得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孩子们站在你左侧，你身后是个（车窗？）窗子的那张太好了，你给我的照片这是最好的一张。只是你有些暗（是不是别人不大会使你的相机？），正确理解我的意思，这样画面效果再有意义不过了。还有一张类似的照片，只是没有你，有你的那张照片显然是站在你位置上穿毛衣的女孩照的了。你是不是也在维尔卡诺兹小姐那班照了一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有一张娇嫩的、五官紧凑的小脸庞，然而，这张脸由于它清晰的轮廓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小莎宾娜让我想起一个和她很像的，但比她要大些的美丽的小姑娘，奥特拉已经教了她很长时间德语。——恳请你再给我讲些关于这第一个晚间讲座的事情。

〔边缘〕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天天写信。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8〔布拉格〕

尤利叶·卡夫卡夫人致菲莉斯·鲍威尔小姐

亲爱的女儿：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及祝福，虽然回信晚了些，但我们全家人向你致以最衷心的问候。放假前店里很忙，所以我没能早些给你回信。

我们对待犹太节日就像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一样。新年我们的店关门两天，我们非常认真地做了祷告。斋日我们没觉得很难捱，因为整年我们都在为此训练。不过，在布拉格，吃不饱饭的情况还不是太严重。如果你不久能来我们这儿，我们会非常高兴的。或许你能休几天假。

感谢上帝，我们从大卡尔和佩波那里得到了好消息。八个星期前佩波休了十四天的假，卡尔不久也能得到假期。我们希望不久能再见到你。我，还有父亲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拥抱你。

你忠诚的母亲 尤利叶·卡夫卡

1916.10.8—布拉格

我们的孩子们问你好。

最亲爱的：

今天没有你的信，不过记着，第一个寄宿学校晚间讲座报告的结尾一定给我寄来。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或许就是教育不听话的赫尔塔。她之所以变成这样肯定是有原因的。你给姑娘们布置的任务几乎等于零，因为她们不愿和她讲话。如果你直接给她写封信，是不是会好些？而其他姑娘们在那天晚会结束时的举动，我却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也会那样做的。提前辞退巴恩海尔姆的女佣的事情你事先已经征得了我的同意。这当然最好。孩子们根本不能理解的事情不能强迫她们去做。虽然不能忘记强制有时也能起到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是无法估计得到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教授，在读《伊利亚特》的时候他常说：“很遗憾，必须和你们一起读。尽管你们认为，你们已经理解

了，实际上你们还没有理解，你们一点都不理解。只理解其中的一点，也需要事先了解很多东西。”^[87]这段话（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他全部的激情）当时给我的印象比全部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多得多。当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可能会激发人的上进心。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9〔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又没有你的信，真悲伤。我还不知道俱乐部晚会的一切，对你的报告一无所知，对你的星期天一无所知。上星期天或上上星期天你是和孩子们在一起过的吗？在上个星期天，而后直到在这次大雨中（《对他毫无秘密》）你大概淋湿了吧，而我们，我和奥特拉看见天快下雨的时候，没有像夏日行军那样，因为奥特拉当然是根本不怕下雨的。其实我也是不怕的，只要在泥浴疗养地前的任何地方有个顶篷，顶篷下有一只板凳，板凳上坐着你。——谈谈慕尼黑吧，以便及时进行准备。你什么时候抵达那里？住在什么饭店？必须什么时候乘车回去？我呢，如果可能的话，我将阅读你还不知道的那篇故事，它叫《在流刑营》。——昨天我给你寄去一本少女运动游戏手册，也许你用得着它，看起来是写得挺理智的。过些时候我还要用这种方式给你寄点什么。我还要给你一些适合于和孩子们一起读的书籍（除了想必你已经开始读的施勒米尔之外）供你考虑：黑贝尔、托尔斯泰的大众小说集、幸运的雨鞋，安徒生。选择一下，然后我寄给你。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0〔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的信。——你的生活受到影响我是不是有责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别生我的气。我不大能控制自己，另外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再次请你原谅——和这件事不同，我不能为没有寄去新年问候而请你原谅。我想象得出，乃母肯定会摇头表示不满的，可能比这更严重。做我本性以外的事情我做不到。你不必要理解，也不会与我有同感，你只要知道情况是这样就可以了。你母亲不会也不能理解我，而且她也没有必要去这样做。不得已，这里我不得不这

样说。我希望这种非我的能力所能消除的隔膜能够保持下去，对此我感到遗憾，但这种感觉并不很强烈。另外，新年的时候在家我也没有说一句新年好，对你也什么都没说，因为这个日期现在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再要就节日说出各种各样的祝福，那简直是在撒谎。不过，在你母亲看来这肯定是不能原谅的。我在玛丽恩温泉给她写的信她没有回，所以她也就不应该收到我的祝福。假如她当时回了信，我也不会向她致以新年祝福[88]。亲爱的，我就是这样。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1〔布拉格〕

最亲爱的：

这样很好，尽管我知道，长此以往是不可能的：今天收到你星期二的信。——如果我的旅行能和你的一样顺利，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还有许多麻烦，所以还不能决定。另外，去慕尼黑的交通也不好。我想，我可能会坐早上8点的车（唯一的一趟车），晚上6点24分到达，就是说，星期五晚上。回来怎么走我还不清楚，恐怕，星期天早上7点我就得坐上回程的车，晚上没有车，我又不能多请两天假。以后我们再谈圣诞节旅行的事情，我不想躲避任何人，我也不怕任何人，只是我父母，他们挺难办。和父母坐在桌边对我来说简直是最大的折磨（我指的是现在，以后可能会容易些）。但是能单独向你展示布拉格，和这一幸福相比，与父母在一起的折磨又算什么，——寄宿学校不好的消息，这，我们要放在最后来说。你觉得我没有音乐细胞吗？“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很快乐，甚至于比在办公室快乐许多。”这话听起来比任何音乐都入耳。勃洛赫小姐怎么忍受她们？

我还不知道那个学校，请你下次详细说一下有关情况。这方面的情况你没有给我寄来。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1.12〔布拉格〕

〔1916年10月12日〕

[边旁]

年度报告我还没有收到。

最亲爱的：

今天没有你的来信，年度报告也还没有到。看了你所陈述的理由，我当然同意你信中的观点，如果只有趴在写字桌边才能迫使自己有效阅读的话，那么要想使结论全面就还得摘抄一些福斯特或者——作为永久的并且在现在看来全不合时宜的用以抨击的工具——回忆录[89]上的一些东西。此外对于我来说，由于经常如此，所以这还只是一剂很弱的药方。但是对于那个很令你失望的福斯特培训班，就不得不找点更强劲的良药以唤起众人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通读福斯特，而不是每个人分其中的一部分阅读。自己读一下福斯特并不会搞乱培训班，更何况是这么个糟糕的培训班。真希望我的头能一直清醒，也好和你共同一章一章地讨论福斯特。不容置疑，福斯特很重要。——今天我给你寄去一本字谜书，我真心地希望，在我的真真切切的大朋友指导下，这本书会令小姑娘们开心。——没有雷曼、雷姆，或许再加上威尔卡诺兹，会怎么样？我现在必须在折磨人的药剂师的阴影下生活，以求得平安，求平安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3〔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一张卡片和那份报告[90]。你知道，这篇报告对于我来说是多么亲切。于你来说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眼下，我只是粗略地读了一下，不过已经感到这是一篇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文章。只是那段描写和男生班谈话的文字不太真实。不过，这是可以谅解的，特别是，这是第一个报告。我觉得还应该更加突出管理和其他工作人员，只突出重建犹太人家园和各种旨在振奋人心的东西还是不够的。战后，抚养人及那些被照看的孤儿应该更亲近地在一起生活，文章中对此表示歉疚的暗示同样令人感到并不可信。眼下，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还缺少很多东西，你的各种抱怨，我很想一个一个地去了解，你的抱怨也证明了这种疑虑。另外，人们还注意到，女生的发展落后于男生的发展。总而言之：报告的立意及文笔都很不俗。事情总是这样的，一旦你没有工作缠身的时候，时间就会多得令你无所适从。——我给你寄那些书没有影响你吧？我没有占用你太多的读福斯特的时间吧？顺便问一下，是什么使你认为我并不是早就看过爱尔德穆特？去玛丽恩温泉的时候就已经看过

了，甚至连那些不太重要的注释都读过。不久我会寄去一些郊游时的照片，以惩罚这种不公正的责难。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4〔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天气很好，现在我坐在办公室。你在米伦贝克，这对我是一种安慰。——今天又没有你的来信。你信中常说没有收到我的信，可是，却不说我的信第二天就到了。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每天都给你写信。——如果不是马克斯借去的话，那篇报告我肯定还得再看一遍，他借这份报告是为了那个还很脆弱的但并非没有意义的女子俱乐部^[91]。你抱怨道：一切都太注重个别人的意见了，特别是这次制定俱乐部座右铭。在那篇报告中我特别注意到，那个有关年纪较大的男生班的部分，这部分不错，显然，是雷曼搞的。这部分当中包含事实描述和结论两个部分，而其他部分的内容大多是人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了解的，但却仍然占去了报告的篇幅。另外，幼儿园也应该相当不错，只是报告中这一块写得很少。——今天奥特拉去乡下了，我一人在家，我可以去把菲莉斯和他太太接来，我曾经答应过他们，或者一个人去散步。我作何选择呢？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5〔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很不顺利，是你13号的信才使这一天变得好起来。——为了不让你猜对，我昨天还是选择了一个人去散步。我走了很远，大约走了五个小时，一个人，但并不孤独，在空寂的山谷中，但并不失落。有时，我会感到各种困扰，似乎它们要将我的血液从太阳穴中全部吸尽。——小萨宾娜的情况确实很麻烦。只是有一些事情我不明白。钱一般用于哪些地方？借了两马克之后才和别人说起这件事情？由谁来决定，账上的钱怎么使用？钱是哪来的？过去的管理人员不知道这事吗？我当然一点不怀疑小萨宾娜的诚实和她乐于助人的品格，但是，如果不按照程序出借钱物的话，那么在面对其他姑娘的时候人们就必定会有想法，其他的姑娘们和她一样诚实，乐于助人，只是不愿因为跟钱打交道而受到任何误解。但是，千万不要让小萨宾娜因为这事而丢面子。不过，彼此之间

能完全信任，也是不大可能的。我知道，你会有许多工作要做。应该先去看看小萨宾娜和海尔塔。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6〔布拉格〕

最亲爱的：

简直是奇迹，虽然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目前看来，我能去慕尼黑的可能性很大。克服了可预见的重重障碍后，并不是说就不会再有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另外，也不能排除朗诵会从11月10号推迟到17号举行的可能。下星期就会最后决定下来。如果朗诵会在10号举行的话，那么你最好能够为了我放弃参加米兰[92]的朗诵会，我想，他的朗诵会是11月9号在克拉利奥大厅举办，如果不是10号举行，你就为我去听一听他的朗诵会。他的这个朗诵会也许不是最能表现他的长处的节目（埃伯纳—埃申巴赫，克勒尔，施托姆），也许会有克勒尔的作品，不过，也是为了和朗诵雅可布森的小说相呼应，这篇作品我听过，并不十分成功（当然只是相对而言），尽管如此，菲莉斯，我还是建议你去听一听。——我非常同意你朗读《幸运的雨鞋》，你还可以从安徒生童话中选更多的作品来读，但是，千万不要读那些你下次不愿意读完的段落。为了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把孩子们带到巴恩海姆的女佣那里，这种事以后不应该再发生了。——今天没有你的来信。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7〔布拉格〕

最亲爱的：

可怜的补付欠资邮件的人儿，对不起，我可以说不是有意的，你一定要允许我详细向你叙述这事，以说明我的无辜，就是马克斯，邮递员也给他送过这类信件。今天早上先收到你星期六的信，晚上又收到星期一的信。特别是第二封信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昨天装有来自柏林邮件的邮车起了火，我今天一早上心神不定地到处转来转去，一直因为邮车起火而担心，因为我想，在这辆车上会有你给我讲述学校去郊游的信。后来信到了，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马克斯根本没有获得去慕尼黑的许可，如果朗诵会能办成的话，我或许会在朗诵会的前半部朗诵他的诗。我虽然不是很好的诗歌朗诵者，甚至，可以说很不好，但是，如

果找不到他人，我还是很愿意代劳的。不过，我要说明：如果你不能去的话，那我也就不去了。已成定式了，只要一提及慕尼黑，我想到的首先是去那里见你。22号你的上司度假回来后，你应该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了——这次旅行到底能否成行。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18〔布拉格〕

最亲爱的：

关于母亲，父亲，鲜花，新年，全家人围坐桌旁，我和你说的这一切真的不这么容易应付。你信中写到，在我们家，和我的全家人坐在桌旁对于你也会很不自在。你当然是想通过这事说明你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事是不是令我高兴并不重要。现在讲明，这事令我不高兴。不过，你如果信中不是这样说的，而是正相反，我会更不高兴。请尽量明确地告诉我，你在哪方面会感到不舒服，原因在哪里。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时常交流各自的想法，但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应该经常从新的角度去探索。扼要概括，我可以这样描述一下我的态度：从前那个事事依靠别人的我，对独立、自由的强烈渴望表现在各个方面；宁可戴上眼罩走我的极端路，也不愿被家乡的羊群牵着鼻子到处跑而最终扰乱我的视线。所以，不管是我对我父母，还是他们对我说的话，尽管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话很重要，但谁也不会让步接受对方的观点。任何不是由我自己联结的人际关系纽带，只要它们违背真实的我，都会阻止我的前进，我讨厌这种纽带，对这样的纽带我特别容易产生反感。道路还很长，而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痛恨这种纽带。我由父母生养，和他们，和姐妹有着不解的血缘之联系，这种血缘关系在平常的生活中，以及在我偏执的人生观中，我没有感受到，但内心深处对于这种纽带的敬仰远远地超过我所能感知的。一方面，我痛恨这一切；每当我看到父母的床，看到用过的被单床罩，以及那些小心翼翼放在那里的睡衣，我就会感到无比厌烦，就会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出生，而是重复着从这令人窒息的房子中的窒息生活中降临人世的过程，似乎我必须不断地证实一点，即，我无法摆脱这些令人作呕的事情，因为我的一双想走路脚还没有形成。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我又明白，他们毕竟是我的父母，在很多方面他们又是我力量的源泉，他们不只是我前进的障碍，而且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于是，我想拥有他们，拥有他们最可爱的部分；而同时，由于我一直很顽皮，自私，没有

爱心，所以我害怕面对他们。——尽管我明白这一点，但我不能改正自己，常言道，本性难移。——而我的父母，父亲站在一种立场，母亲站在另一种立场，他们总是想要改变我，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们值得我尊敬（奥特拉对于我来说，有时就像我想象中的母亲：纯洁，真诚，不虚伪，干事合乎逻辑，不卑不亢，敏感但不过分，自立但不自封，内向但很勇敢。我这里提到奥特拉，是因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母亲的影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愿意尊敬他们。这种愿望的结果就是，他们的简单和粗暴，他们的刻板与可笑在我看来就百倍地明显。所以我觉得自己被他们欺骗了，然而却无法抗拒自然的法则。这是一种非恨非爱的感觉，总之，很难说清。现在你属于我；我想，任何童话中所描述的为得到自己心上人所付出的努力，都比不上我为了得到你而付出的努力，不只过去，现在是这样，而且永远会这样。你属于我。所以我和你父母的关系就像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当然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你父母也可能会给我设置许多障碍（尽管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一句话），如果这样，他们不会像我父母一样，仍能在我心中受到尊敬。我这里如对自己一样向你直言。你不会生我的气，也不会觉得我非常自大，对吧。至少，你不会在不应该的地方发现我有任何自大情绪。如果你得来布拉格和我父母坐在同一张桌边的话，你和我父母之间的对立，肯定要比我和他们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我和全家人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会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并且他们试图让我感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然而我并没有加入）；他们不顾我的抗议，认为从你这里找到了帮助（他们没有得到帮助），他们的不满在加剧，因为在我的眼中他们发现更强烈的不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为你上次说的话感到高兴？因为我手中握着刀站在这个家的前面，总是用这把刀同时伤害并保护这个家。让我在各个方面维护你，而你不在你的家人面前为我开脱。亲爱的，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牺牲过于沉重？确实有些沉重，放弃这沉重包袱的唯一办法是，你给我力量，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我故意两三天没有给你写信，以便你可以好好想想，然后给我一个答复。我非常相信你，所以你的答复有一个字就够了。

弗兰茨

〔19〕16.11.19

（估计为1916年10月19日）[93]

最亲爱的：

我现在又坐在这里。前天和昨天我收到你星期二、星期三的信，不过信中都没有讲有关郊游的情况。你会给我描述郊游的经过的，而且还会给我寄来好多我盼望已久的照片，其中好多你的照片（我刚刚去接了一个电话，说，我的护照和过境证都批了下来，现在就差签证）。你问起豪施奈尔女士^[94]。我没见过她，只是有一次读过她的一部篇幅特别长但写得还不错的小说，不久前，马克斯给我看了老妇人写给他的二三封信，写信的原因是她引起了一场混乱，而这场混乱最终被她以十分奇怪、但却十分诚实的方式解决了，信写得很感人。从马克斯那里我还听说，她很富有，待人友好，乐善好施。从这一点（不过，她不主张犹太复国主义）来看，她会对寄宿学校感兴趣，在合适的时候可以邀请她参加寄宿学校在晚上或下午安排的一些有特色的活动，争取一下她的支持。另外，她在布拉格一直待到11月初，星期二和她谈完之后，我给你写信。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21〔布拉格〕

最亲爱的：

这么一大早，特别是在一夜没休息好醒来之后。因为我和奥特拉要去乡下。不是去参加结茅节，而是去看望奥特拉过去的一位老师。奥特拉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想用她来树立一个榜样，我只是想说，与母亲相比她有许多特别优秀的品质。不过，我不想隐瞒，她很自负，特别是精神方面。但是考虑到我自己的情况，我觉得，自己没有批评或表扬他人的权力。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22.7点〔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星期四的信。也应该让我听你抱怨抱怨不能按时收到信，这样就能扯平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天天给你写信，上个星期五例外。——过去和菲莉斯所作的约定，让你猜对了。只是提问的方式比你想象得要容易。怎么，你现在想威胁我？幸运的是，令我吃惊的

是我所得到的安慰，而不是威胁。菲莉斯，你的威胁是得不实现的，除非你借助一件束缚衣。你肯定不会这样做的，不管是遗憾也好，还是幸运也好，你会让我保持本来的我。昨天去乡下，简直太美了。这些年来，我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由一个城里人变成一个乡下人，至少是很像一个乡下人了。我们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乡间气息很浓，真是美极了。我们在一个中学教师家做客，她年收入大约六百克朗，看来她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客观地说，她只读过高中，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另一方面学校也需要人，于是她在那里教课，另外上些德语课每月还能挣五十克朗，由于偶然的机会上半年她还得到一处免费住房。她一共有五十五个十到十一岁的男女学生。——你有没有收到茵泽尔出版的施勒米尔的那本猜谜书？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23〔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又没有你的信。——昨天信中有一处我看了特别高兴：“你是一个对自己分析得太透彻的人，因此，孤独的你比任何其他时候的你变得更加忧伤。”这是不是就是说，孤独或者真正平心静气地看清自己（人类至高无上的优点）肯定会使我忧伤。看起来我这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真是这么看的吗？也许你是对的。——顺便告诉你，有一个审判官对我进行评判（在玛丽恩温泉我曾提起过她，按照她的说法，我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95]，昨天我又听人提起她了。她前几天说，我首先很不自然，意思就是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发自内心的冲动，而是在考虑了后果之后才说的。另外，她还说我不是好人。这确实是个聪明的姑娘，她说的话，我刚听到的时候，真觉得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发出的声音。——所有的姑娘都去郊游了吗？那个翰甫也去了吗？——你的上司是不是延长了假期？——去参加朗诵的最后日期还没有定。又有了新的麻烦。——我给你寄了四本茵泽尔出版社出版的歌集，小册子装订得很漂亮。另外，还有一本蓝白相间的歌集^[96]。——寓言故事晚会搞得怎么样？——现在谁在主管福斯特教程？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24〔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星期六的信。小姑娘们把你从我这里拉开。如果她们不把你还给我的话，我就要生她们的气了。今天不多写了，我有好几件令人神经紧张的急事要做。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10.25〔布拉格〕

马克斯昨天和豪施奈尔女士谈过了，并且和她提了去参观的事情。现在她只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当面诚心邀请她出席一次精彩的活动，也许她还会再做些什么。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星期一、星期二的信。过了相当长一段没有头痛折磨的时候，最近我的身体状况又很糟。如果这只是偶尔的情况，我也就忍受着了。——你们去郊游时什么都不缺，你们甚至带上并不属于郊游应带的东西，这很好。不，你没有和我提起过布鲁姆斯坦小姐。看了那些照片后就都清楚了。——朗诵会是在星期五，11月10号8点开始，我到慕尼黑的具体时间我明天写信告诉你。你也来信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住在哪里。朗诵会的事情终于最后定了下来，只是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麻烦（不是我的原因造成的），也许是我过虑，这点小事根本不成问题。——你定期去参加报告会，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甚至于，你自己还得写关于斯特林堡的报告！我们几乎和他是同时代的人。只要闭上眼睛看一下自己的经历，就能写出关于斯特林堡的报告。尽管如此，如果你真去听报告的话，来信时给我讲一些有关的情况。——我没有和豪施奈尔说过话，因为她不认识我，不过，马克斯已经和她说起过你们要去拜访她，对此她很高兴。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26〔布拉格〕

最亲爱的：

非常感谢你星期三信中那些溢美之词。总的来说，我不怀疑，在这件事上我们是一致的，而且我们将会十分协调地生活，不过，时不时地

在家里敲响这种警铃或许是好事。——朗诵会10号举办。我和马克斯每人应该有一个晚上要朗诵。因为马克斯一家这两天想要去度假，所以推掉了这次活动。他不能去，于是，由我代他读几篇他的诗，我将尽力而为。朗诵会中他不应该完全不出现，我虽然读得差一些，也总比根本没有他的作品强。影响我去朗读的唯一障碍可能会是慕尼黑检查机构，他们可能会制造点麻烦。不过，我猜不出他们会提些什么反对意见。——你在临行前的头一个晚上还去听米兰的朗诵会，这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他每年的冬天都搞几次朗诵会，另外，不管他的艺术魅力有多高，睡好觉同样重要，再者，你也不应该刚刚听了他的朗诵，然后就带着如此高的要求来听我的，除非你一定要这么做，你还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6点24分到达慕尼黑，星期天7点又要坐上回程的车。——邮递员满意了吗？他对我可不公平。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27〔布拉格〕

[边旁]

还在看弗斯特尔的书吗？

最亲爱的：

又是漫漫的长夜和折磨人的头痛，你也许会说，是因为头痛夜才显得如此之长，随你怎么说，总之，我又忍受了难熬之夜。——前不久我看了茨威格的一部喜剧，名字是《匈牙利的宗教谋杀》；作者挖空心思去描述尘世之外的情景，然而读起来却显得很贫乏，就我对茨威格作品的了解，这和我预料的差不多。与此相反，世间情景的描写就显得非常有生活，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案件审理档案。总之，几乎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紧紧抓住案件的审理过程，所以在写这部分时，他就非常得心应手。现在我对他的看法和以前不同了。在读到某一处时，我不得不停下来坐到沙发上大哭一场。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哭过了[97]。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0.28〔布拉格〕

[边旁]

最后的一段路我们是不是会乘同一辆车？我途经伊格。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星期四的信。你说得有道理，我们是得好好谈谈了，只要朗诵会能开成。除了已经定下的，我没有其他节目，我也不想再读别的。如果上面不批准，我就得取消这次慕尼黑之行。所以我特别担心这种事发生，要不我就不会说这件事了。如果我们在路上就能在一起的话，那该多好；对于我来说当然好，因为你得到我的三等席来。——不久前我和费格尔谈过了，文章他肯定登。你的信以及其他信件他们没有收到，因为他们把房子租出去了，而他们留在邮局的新地址又不清楚。——你要关于那所中学的资料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搞到。——照片还没到，没有带着包装就把胶卷装上了吧？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10.29〔布拉格〕

最亲爱的：

请别要求我写长信；如果我也有像你上封信中那么多工作方面的事情可以写，那我的笔也会飞快不停地给你写信。可是我的生活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完全由于你的存在而变得充实、幸福，我本人看上去也像个挺不错的人，而另一部分就像一张破碎了的蜘蛛网，不漂泊动荡，不受头痛之苦是它的最大愿望，然而，这种愿望很少能实现。我们有何办法对付这第二部分？他最后一次去上班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对于这个工作他一是没有能力，二是没有兴趣。换个话题，希望很快我们就能在10、11号两天在一起了，也是由于这一份幸福的期待引起了许多不安，而没有写很多。这期间千万不要冒出任何阻碍。

随信寄去几样东西：

1) 奥特拉的一张照片，但是效果很差。修版之后的牙和咧着的嘴角是最失败之处。

2) 布勃尔的信，我今天再读这封信的时候发现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出众之处。我的看法可能会给你带来先入之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下去。这封信你多次要，所以我给你寄去。

3) 我的另一部分工作的例证[98]。在签字的地方你会看到我的名字，本来我应该在筹备委员会成员中，可是后来，没费多大力气我就跑到这个大组中来了。那篇文章（和许多其他的一样）也是我的。这件事不再多说。

4) 朗诵会的节目安排。在倒数第二页你会看到标题《判决》。沃尔夫在没有给我只言片语的情况下，看起来又要把它压下[99]。如若我自己没有对生命的追求，而听任生命浑浑噩噩，那么一切也就无所谓了。

亲爱的，你千万不要多想我那个女法官的事[100]。这倒是一副安定剂（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当成不安定剂），她竟能通过半年前五至十次简短的谈话中总结出这么一个事实。

再见，再见。

弗兰茨

[19] 16.10.30

最亲爱的：

前几天在办公室我一直没有时间写东西。我收到的你的上一封信是星期五写的，今天没有你的来信。——在你的领导之下儿童图书馆当然不能这么贫乏，所以，今天我给你寄去夏夫斯坦那些蓝色的小集子作为一小块基石。这些小集子和你的彼得·施勒米尔一样是硬封皮，装订当然更好，只是太贵。或许这些书在用之前，可以拿到寄宿学校的校办工场装订。这些书各个年龄组的人都能看，没有必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和其他书分开。绿色的夏夫斯坦的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书，给那些男孩子们看最好，不过，我不想一下子全寄去，这些下回再寄。比如，其中有一本我读起来觉得特别亲切，讲的就好像是我的故事，或者说是我的生活准则，而我正在摆脱或已经摆脱这种准则（我常有这种感觉），这本书的书名是《糖果男爵》，书的最后一章是最主要部分[101]。另外，很难判定哪些书算儿童书。如果一定要我根据我的经验说出一些最好的儿童书的话，那么霍夫曼兄弟的小集子[102]该不算是好书，若阴间能出版我们现在读的书该有多好！

对于图书馆的具体建议下封信我还要再写。

〔明信片〕〔19〕16.10.31〔布拉格〕

最亲爱的：

怎么，现在你也用不能去慕尼黑来威胁我？这么多的小困难之后，怎么又会出来个大困难？绝不能这样。你上司的假期早就该定下来了。——我今天收到那些照片和你星期一的信。森林中的那张合影很漂亮。这可能就是你的九个女学生，那个翰甫也在。这次就S.一人没笑。最漂亮的是左边穿系腰带的衬衫的俏姑娘。照片最前面一些杂乱的东西使照片的美感受了点影响。高个子姑娘中有这么二三个长得很个性。不过，有一些面孔也许得看上一千次才可能记住。站成两排的那张也有你的学生，虽然看上去不像，但仔细辨认一下，还是可以肯定是她们。那张有好多花的照片我看不出来到底在干什么，不过，由于你在其中，其他的也就不重要了。在第五张照片上我只认出了S.，你一定得给我讲讲她们都是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把卡奴卡剧^[103]写出来。我当然会立刻试试看。在我给你寄去的纸页上你看到了自卑的我（如果谎言只是自卑），你对这怎么看？这并不是我自卑情绪的最低点，在其他方面还有更为严重的，不过在这方面已经够严重的了^[104]。千万别再用不去慕尼黑来威胁我。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1.1〔布拉格〕

最亲爱的：

那不过是为了制造恐慌的威胁。它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你该来了吧。批文还没有最后下来。稿子得到星期一才能到那里。这事仍然一直令我不安。说实话，我真不敢想象这事这么轻易地能批下来。如果有什么麻烦，我会立刻给你打电报，眼下，我还是希望立刻能见到你。我们也许能在车上碰上——我手头没有大的时刻表，我只是根据手里的票估计出的——可能会在维骚，大约在中午一二点钟的时候。如果我在车里能见到你，那我们就赢得好多时间。我当然也住在巴伐利亚霍夫（按照迷信说法，我也在这留点余地）。——卡奴卡节演的那个剧我是肯定找不着了。我本以为从一个女孩那里我可能会得到一点希望（她去年和这里的东犹太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起排练过这个戏；我当时和我外甥在那

儿，这个为很小的孩子写的剧她根本用不上，不过，小姑娘相当不错），她应该有这方面的东西，结果，她也什么都没有了。在犹太出版社应该出版过卡奴卡的书，他们也许会给你找一找。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1.3〔布拉格〕

最亲爱的：

又是一大早去乡下之前。昨天没有你的信，不过，我也没给你写。去慕尼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总之，星期三或星期四我再给你发电报向你报告好消息：“我们可以去了。”或者坏的消息：“去不成了。”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1.5〔布拉格〕

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的母亲安娜·鲍威尔女士

亲爱的母亲：

听菲莉斯讲，你真诚友好地接受了像我从玛丽恩温泉给你写来的信，所以，今天在你生日之际我可以比以往更坦率地给你写信。就像我经常看到、听到的，我自己也常说，和我相处并不是件容易事，我自己都有这种感觉。所以，即使是把女儿交给我的你，即使是有权力向我提出任何要求的你，也在尽力接受我容忍我，这是多么的大度。这里，请你今后同样能对我宽容忍让（在生日祝贺中提出这种自私的请求），祝你青春永驻，在我的记忆中你有着年轻人的朝气。

恭敬地吻你的手并向爱尔娜和托尼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兰茨

〔19〕16年11月14日

最亲爱的：

已经好几天没有你的信了。为什么？我寄去的几张明信片你难道没收到[105]？这几张卡片大多提到了我们今后共同生活的核心问题。我不能允许你总是这么旁敲侧击，这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是用威胁的方式

批评我自私。这种指责之所以令我如此痛苦，是因为它正中要害。这一点我承认。但有一点我却不敢苟同，你批评我自私，但你对于自私的否定不过说说而已，你做得又如何呢？更何况，这种自私涉及的是具体的事情，而不是某个人。不再需要外界提醒，我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有多么严重，遗憾的是，我的机体过于孱弱，因而无法承受更多的指责。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1.21〔布拉格〕

最亲爱的：

即使在这种状况下（包括头痛），我还是能继续活下去，这一点我还是相信的。我虽然不相信这样的争吵（可怕的糕饼店）^[106]还会再发生，然而它们将不会再充满因短暂相会而带来的、含含糊糊的和妖影幢幢的那种紧张，这样，它们就不会加重我们的忧伤，而只是作为一种普通的人类的弱点而受到宽容。你可以以拳击石，而石头只不过会有点划痕。它只要不提前破裂，它就必须像手一样承受这划痕。——现在让我伤脑筋的是，除了从慕尼黑以来就一直有停过的（今天特别厉害的）头痛之外，我最关心的是搬家的事情，还有就是那些小小的希望，虽然我本身从来总是生活在沮丧之中的，而且这些希望和沮丧也是密不可分的。我能走进房屋介绍所，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从那一刻开始，有三个女人无比殷勤地围着我团团转：一个是房屋介绍所的主人，一个是我准备住进的房屋的管理员，还有以前占用这个房子的那个党的女佣人。从昨天开始，我的慈祥亲爱的妈妈也加入了她们的战线。我不能透露更多的秘密了，等到后天决定之后再说吧。——明天那些给你的书也寄出了。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1.23〔布拉格〕

最亲爱的：

早上拿起笔给你写一张明信片，刚开头就被什么事打断了，现在那张已经开了头的明信片不知放在何处。一般只有办公室的文件才会找不到。实在令人不快。——我最亲爱的，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看来你确实没有收到我祝贺生日的电报。邮政系统现在是越来越不可靠了。那封电报我是17号晚上发出的。内容是：——在远方拥抱你。——或许电文

有些不寻常，所以邮局没有发。我也许会去投诉。眼下我的全部心思又都回到我的房子的问题上来了，虽然这事令人很伤感。又得再过几天才能做出最后决定，这个房子我能不能得到现在又有点成问题了。你应该知道，这是一套由两个房间组成的房子，没有厨房，这套房子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梦想。如果我得不到这套房子，我会非常难过。这套房子虽然不会使我重新得到内心的平静，然而，却给我提供了工作的可能；天堂的大门不会突然打开，但是，在天堂的围墙上说不定我会发现两条小缝向里面窥视。——今天我看了步兵雷曼给马克斯的一封信，信中他特别提到你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圣诞节？我不能去旅行。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1.24〔布拉格〕

最亲爱的：

今天收到那封退回给你的信。我们还是可以彼此信赖的。我坚持我对于圣诞节的看法，我知道，如果我最后得知我们见不了面我会很伤心，但是我不怀疑我的观点的正确性。——你也头痛，真令我不安。难道我们两个分享的是同一份安宁，不然，怎么会我舒服的时候，烦乱就又会找上你？原因又何在呢？一个月前你也并没有感到比现在更不安。寄宿学校的情况如何？难道那不再使你感到充实？——那个剧本我读不成了，前几天马克斯什么都没说就把它寄了出去。他认为这个剧本一般，我当然是非常想看一看，因为你希望我看一下，可是现在它已经寄了出去，因而也就没有意义再把它要回来，我的建议或者评论对于作者已经不会再有什么意义。另外，前一阵有好多人请马克斯看稿，所以他也就不太愿意过于仔细地过目。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2.4〔布拉格〕

最亲爱的：

已经好几天没有你的信了。千万别以为我可以一直生活在天堂之中。那种相对的平静也许只是为了聚集更多的痛苦，然后这种痛苦便在一夜之间，比如昨晚全部爆发出来，于是你就想大吼，你就要在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像在自己的葬礼上一般茫然。——你问起关于朗诵会的评论。我只从慕尼黑-奥格斯堡报上又得到一篇[107]。这篇比上篇温和

许多，然而，因为它在基本观点上与上篇一致，所以，这种温和的语气就更加突出了整个朗诵会的失败。我不想再费任何力气去搞其他的有关看法了。不管怎么说，我应该承认这些评论是正确的。我有两年没写作了，在这两年之后我竟然有勇气在慕尼黑公开朗读自己的作品，而这种勇气在我布拉格最好的朋友面前都不曾有过，这令我自己都很吃惊。不过，在布拉格我记起了里尔克说过的一句话，他十分善意地评价了《司炉》后讲道：不管是在《变形记》还是《在流刑营》中都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这话虽然有些不大容易理解，但弄清真正含义后，你会发现它很有见地[108]。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12.7〔布拉格〕

最亲爱的：

你提到你的上司圣诞节要去旅行的那张卡片很晚才到，这张迟到的卡片使你给我写信的间隔显得小了一些。收到这张卡片之后我的头痛病又开始犯了。你现在陷入沉默之中。寄宿学校情况如何？夏奴卡剧搞得怎么样了？随后我会给你寄几本犹太人的书。你收到那个装着书的邮包了吗？明天我就把给姆兹的书寄出去，不，也许我应该先问一下，你是不是委托我这么做。邮包中我已经装好如下东西：两本书，一副玩具，糖果，卡尔温泉的薄饼，一些巧克力。除此之外我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再装上一件小衣服或者这一类的东西？不过，这类东西你得事先告诉我尺码，另外，我得请奥特拉帮忙去买。对了，还应该寄些可可粉；我会准备好的，然后我就只需等着你的回信了。——我现在白天待在奥特拉的小房子里[109]。不管怎么说，这里比过去那两年的情况好多了。还要再做些小的改进，住处远离此处使一切更近完美。绝对完美只有守夜人才能享受得到。在一天中最美好时光开始之际我便踱步回家，开始是在8点，后来又推迟到8点半，以至到现在的9点之后，当你披着星光走进狭窄的胡同，然后轻轻锁上自家房门的时候，不觉会生出一种奇特的感觉。最近，我的邻居诺尔先生常在这个时候站在胡同口，手里拿着一口袋圣诞甜食，等着胡同里的孩子们。

衷心问候。

弗兰茨

最亲爱的：

今天，9号，因为手套的原因我才得以收到你的信。因为那个亲戚10号起程，所以我想，把手套寄过去就没什么意义了，另外，手套我是星期一才拿到的。也许，星期一我会把它作为样品寄过去。应该没有问题。——你的信写得这么短是不是说你也头痛？如果不是正在看你的信，我是不会相信，我的身体对你的信任是如此之大（其他方面同样）——或者，是你生气了才写这么短？我也不知该怎么办了？白天我还待在那个房子，只是时间分配将会有些不同，我会在那里待到更晚。——柏林搞了几个很有价值的讲座，米蓝，伯夏特，布吕姆内尔（艾斯希的《路希》）^[110]，我总是很晚才能读到讲稿。——现在我必须离家去为一个会议作记录。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12.9〔布拉格〕

不，没有这么严重，两天后你就不会这么写了。你信中没有说是不是还头痛。我白天还待在那个房子里，这儿的环境有时很好，有时差点，不能要求太高。——福楼拜我没读过，我会立刻补读的，你熟悉的人我也应该有所了解。——青年杂志目录还没到。不过，不会等很长时间的。明天我给你寄去一本可供朗读的书。——手套我已经拿到，只是，寄不大方便。有个熟人下星期要去柏林，可以托他带去，给姆兹寄包裹的事情我还等着你的指示呢。

弗兰茨

〔明信片邮戳〕〔19〕16.12.13〔布拉格〕

最亲爱的：

是的，那些书，它们马上就到。犹太书商是很特殊的，印刷品的邮寄也是很特殊的，所以，会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我希望这个星期能把它们寄出去。——昨天我给你寄了一本《克莱茵·多立特》。你肯定知道这本书。我们怎能忘了狄更斯。当然不能和孩子们通读全书，不过其中的个别部分读一读会给你和孩子们带来乐趣的。——祝你们夏奴卡节快乐。节日期间肯定会照相的（我不知道具体日期），我有权力要些照

片。——在我的房子里我被一些不可想象的事情所纠缠，而这些事情恰恰是我某一日一手制造出的，而另一日却要以十倍的力量全部划掉。不过，待在那里挺好，每天午夜经过旧的皇宫小路进城回家也别有一番情趣[111]。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2.14〔布拉格〕

如果没有收到我的信，千万别伤心。我真的不是有意如此，这令我不安，现在我很敏感。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千万别伤心。没有信至少比硬拼凑出的信要好。——我的生活一如既往，眼下还得再把我与生俱来的三部分不幸加上。如果我不能做事情的时候，就会感到十分忧郁；当我能做事情的时候，又总觉得时间不够；如果我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我仍然会有和现在一样的忧虑，我首先担心的是不能工作，无法逃避的深渊。但是，——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一切都很糟。——这回给姆兹的礼物特别可爱，是奥特拉选的。十分愚蠢，就像我叔叔的地址一样，这个地址也老让我拿不准。“Azstalos utca 2古特曼女士处”，希望这样是对的。

你前不久提到解决我们的中心问题的办法。不能讲一讲到底是什么吗？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2.20〔布拉格〕

最亲爱的：

已经好几天没有你的信了。昨天寄出给姆兹的包裹，非常可爱，唯一的缺陷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玩具，所以只寄去一副积木。不过，其他的東西肯定会弥补这一缺陷的。今天又找到一本儿童读物，一点一点还是能找全的。但是手套还在我这里。那个熟人下星期才走。我的住处现在又有了麻烦，这件事我得从头到尾把它的来龙去脉给你讲清[112]。除了房子的事情，我一切都好，最重要的是身体状况不错。昨天科威尔寄来三首诗[113]，这令我想起慕尼黑。这些诗绝对发自一颗纯洁的心灵，不过，在慕尼黑时这些诗显得更美。关于上次提到的“无耻”（这里布鲁姆施坦的名字让我想起：温和和强硬密不可分，两个字母之差，温和就变成了强硬），从这个意义上看，演员洛维的一封信已经

使我由于“无耻”而受到了惩罚（我和你提起过他）^[114]。他现在在布达佩斯名气不小，并且正在对我施以猛烈攻击，真希望我只是和他做做游戏，而没有为他做过太多的事情。

弗兰茨

〔明信片〕〔19〕16.12.22〔布拉格〕

尤利叶·卡夫卡夫人写给安娜·鲍威尔夫人

亲爱的安娜：

正值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提笔致信给你，衷心地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事事如意。但愿万能的上帝快快结束这场战争，让我们重得安宁，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重新过上幸福生活。感谢上帝我们都很健康，大家工作的也很努力，对未来我们还是充满希望的。你和你可爱的孩子们怎么样？我很想念你们。我本来以为，亲爱的菲莉斯会在圣诞节来这里，让我们惊喜一下，或许，她脱不开身。我们非常想见到她，希望她不久能来。

感谢上帝，我们的女婿们也都很好，战争期间能够如此已经很不错了。亲爱的埃米丽姨妈好吗？请代我们向她问好。

盼尽快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顺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朱利叶·卡夫卡

1916年12月31日—布拉格

也代问你亲爱的孩子们好，特别向我们亲爱的菲莉斯问好。

我老伴和孩子们也向你们问好。

最亲爱的：

首先是我的房子的问题，一个太大的题目。吓了我一跳，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向你讲述全部事情的千分之一，而现在写在纸上又只剩下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而我所能向你讲清楚的又只是这剩下的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了。尽管如此，

我还是要听听你的建议。现在仔细看，然后好好给我参谋参谋：你深知我两年来的苦衷，和世界的苦难相比，我的苦衷虽然微不足道，然而对于区区的我已经是苦不堪言了。一间带两扇窗子和一扇通向阳台的门的舒适温馨的角屋。从屋里望去可以看到远远近近高低不一的房顶和教堂。那里的人们并不难相处，因为，我也几乎看不到他们。只是胡同内十分嘈杂，每天一大早就有车辆驶过，不过，这些我几乎已经习惯。尽管这间房子有个进深很大的前厅，我还是认为不能住。因为，这房子是水泥结构，每天10点多了你还能听到隔壁大声叹气的声音，熟人聊天的声音，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叮当声。特别不能忍受的是，不定哪一天，当我下午正要干点什么的时候，楼上打扫卫生的姑娘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晾晒衣服，鞋跟敲在薄薄的天花板上，就像直接敲在我的头上。有时，不知从哪里传来弹钢琴的声音，夏天还经常能听到前边那片房子里传出的歌声、小提琴声和留声机的声音。每天到夜里11点之后才能真正安静下来。总之，在这种无法达到平和的情况下，你就会感到没有自己的家，一切都只是空想，你会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无望。这方面还有好多要说的。夏天，有一次，我和奥特拉去找房，尽管我不大相信能找到真正安静的房子，我还是和她一起去找。我们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看了几处，甚至，我在想，如果在旧皇宫的某处或者某个角落有个安静的洞，我也会为了最终得到安宁蜗居其中的。没有一处，我们没有发现一处合适的地方。为了找乐，我们跑到那条小胡同去问。11月那里还真有一间小屋要出租。奥特拉也是个好静的人，她非常想租下那房子。只是由于我天生的弱点，没让她那样做。我甚至不敢想象，自己去住到那里。又小，又脏，总之，一无是处。可是她却坚持，说，请原来的住户搬走时，把房子收拾干净，重新粉刷，再买几件钢管家具（我真不知道还有哪种家具会更舒服），这件事她一直向家里的其他人保密。我从慕尼黑回来的时候带着极大的勇气又去了介绍房子的公司，这个公司一上来就向我介绍一处在一个最漂亮的大楼里的房子[115]。这套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前厅，前厅的一半被装修成一间浴室。每年房租六百克朗。这真像是在梦中。我去看了房子。房子很高很漂亮，墙壁是金红两色，很像凡尔赛那种。四个窗子朝向一个极静的院子，一个窗子朝向花园。那个花园简直无法描述。当你沿着入口向里走的时候，你难以相信你看到的一切。第二道门是由女像柱装饰的拱形门，穿过这道门你可以看到大花园的一侧是个平缓宽阔的斜坡，沿着斜坡是由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头组成的台阶，这些石阶一直通向最高处的观景台[116]。现在说一下这个房子的唯一一点不足。现在租用这个房子的是一个和太太分居的年轻

人，他和他的佣人虽然在这里刚住几个月，可是他突然要调动工作（他是个公务员），得离开布拉格，房子的装修他们下了很大功夫，不想就这么白白放弃。他之所以还没有退掉房子，是想找到一个能补偿他在这套房子上所投入资本的新用户（安了电灯，建了浴室，装了墙柜，安了电话，地上绷了很大的一块地毯），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不是他要找的人，因为他要六百五十克朗（当然并不多）。不过，这对我还是个不小的数目，另外，那高大冷清的房间对于我来说太过奢华，还有一点小顾虑就是，我也没有家具。就在那同一个宫殿内还有一套房子，在三层，房间矮一些，窗子面向胡同，这套房子由管理部门直接出租。这套房子装饰布置得简朴亲切，一位曾在这里客居的伯爵小姐在这套房子里住过，说不定那是个生活十分简朴的小姐。少女味很浓的旧式家具仍然摆放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当时，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这房子。就在举棋不定的时候，我来到奥特拉的房子，当时房子刚刚弄好，房子刚开始装修的时候有许多毛病，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描述装修的整个过程，如今这房子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最重要的：上坡的路很美，那也很静，与隔壁相邻的墙虽然很薄，但这个邻居很安静；晚上我把晚饭拿到楼上，然后一般都待到午夜；然后，在月色中走向我的住处：我必须下决心住下，让夜风清醒我发胀的大脑。至于那里的生活：在那里确实与众不同，当你想与世隔绝的时候，你不是锁上房门或者单元门，而是直接锁上整座房子的门；走出房门你就可以踏在小巷中的积雪上。所有的这一切每月只需二十克朗，用这二十克朗，小妹妹就可以应付一切开支，房子由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奥特拉的学生）稍微整理一下就非常整洁漂亮。就在现在，宫殿中那套房子可以让我使用。那里的一个管理员对我相当友善。靠近胡同的房子六百克朗就可以租下，但不带家具，我本来希望能带家具的。这是一套有两个房间一个前厅的房子。有电灯，但是没有浴室，没有浴盆，反正这些东西我也不需要。现在简单总结一下现在待的房子和宫殿内房子相比的优点：1.一切依然如故的优点。2.我现在挺满足的，为什么去做有可能让自己后悔的事。3.白白空置自己的房子。4.省去了晚上的回家之路，而这段路恰恰能使我更好地入睡。5.我得把家具从现在住在我们这里的妹妹那儿临时搬出来，不过，在那么个大房子里，我有个床也就够了。可以省去搬家的费用。6.现在我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我想，宫殿的房子坐西朝东，只有早上有太阳。和现在的房子相比，宫殿内房子的优点是：1.改变一下环境本来就是优点，而且这种改变在某些方面有较大不同。2.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房子。3.在现在的地方工作我并不完全独立，因为，事实

上我是占了奥特拉的房子；她对我很好，而且非常具有献身精神，然而，时间长了，当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也会情不自禁的表现出来。4. 我就不用每天晚上回家了，在家，夜里就很难出来走走，因为家里的大门不能从外面上锁，但是，在曾经为王公贵族们享用的大花园里，即使在夜里，我也可以尽情地散步。5.战争结束后我一定争取先休一年的假，这个愿望马上变成现实是不大可能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如果能成为现实，我们两个在布拉格就有一处我所能想象得出的最棒的房子，不过，这处房子也只是短期住一住，因为，住在这儿你就必须打消自己做饭的念头，另外，洗澡也成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在这儿你能好好休息两三个月。而且，春夏（主人不在）秋三季花园肯定非常美。如果我不立刻弄到这房子的话，就是每个季度付一百五十克朗，我都不一定能得到这房子了，而事实上是，这房子我已经租下，而且管理人员当然希望结果是这样的了，因为房子租给谁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能租出去。我讲给你听的，还是太少了。好了，现在就听你的看法了，尽快回信。

〔1916年12月底/1917年1月初[117]〕

最亲爱的：

对你我不需要托辞，慢慢地一切都会搞清。今天才给你写信，这是我唯一的托辞。并不是因为你的沉默我才沉默。你保持沉默这是理所当然的，令人吃惊的是你亲切的回信。我的上两封信[118]虽然都内容丰富，不平淡，但令人难以置信，这封信既无法回答又不能不予理睬，这些我都知道，只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睡着了，我虽然很快醒来，但还是太晚了。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我最大的缺点。我这么久没写信的原因是：我写完上封信后两天，就是说，整整四个星期前，半夜5点，我肺里出血。挺严重的，血从喉咙里涌出，大约持续了十几分钟，我当时想，血是止不住了。第二天我去看医生，做了检查，后来又做了多次检查，照了X光片，后来在马克斯的催促下去找了一个教授，这里我就不讲具体细节了，检查的结果是，我两边的肺尖都已形成结核。突然发病并不令我惊奇，咯血我也没觉得吃惊，因为这许多年以来的失眠，头痛已经埋下大病的隐患，而这病是肺结核却令我十分吃惊，我们家根本没人得过这种病，而一夜之间，它却来拜访刚刚三十四岁的我。现在，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咯血之后，头痛好像被冲跑了。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什么发展，将来会怎么样不得而知，也许在这个年龄它还是有所顾忌

的。我要到乡下待段时间，至少三个月，下星期就动身，到屈劳去奥特拉那里，我本来想就此退休，大家认为，从我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退休，另外，想到我无法推辞按照老的传统一定要搞的伤感的告别喜剧，我也就放弃了原先的想法，那就还做我积极的公务员，现在我只是去度假。我一方面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什么秘密，另一方面这事我却没跟父母讲。开始，我根本不相信真是这样。可是，当我试图和我母亲讲这件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紧张，我告诉她要去休一次长假，听我这么说，她一点没有怀疑，并说我应该休息休息，于是，我就没再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也没和父亲多讲。

这就是我四个星期，准确地说是一个星期（确切的诊断刚做出不久）没写信的原因。可怜的非莉斯上次我是这么写的；这难道会成为我信中经常的结束语？这不是一把只刺向前方的尖刀，它还会划圈，会反戈一击。

弗兰茨

〔1917年9月9日—布拉格〕

为了不让你觉得我现在感觉太差，我再补充一点：我一点都不难受，而且正好相反。虽然从那天晚上我开始咳嗽，但并不厉害，有时低烧，夜里盗汗，觉得有点气短，除此之外，我总的觉得比前几年都好。头不痛了，而且从那次以后，我夜里的觉比过去睡得也好了。头痛、失眠是我知道的最讨厌的事情，至少目前是这样。

亲爱的非莉斯：

昨天收到一封你的信。我当时问自己，这么快就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我半天没看^[119]。后来一看才知这是9月11号的一封信，信中你并不很肯定地说起旅行的事情，这封信之所以走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你地址写的是佛列奥·迈伦，而不是波希米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你上次没有收到我的信的原因。

可是今天，星期天，我一下子收到你9月24日、26日写的两封信，信是早上到的，我没有立刻打开（其中还有一封别人写来的信，也没有打开），白天母亲在这里（她说，她问你，我是不是情绪好些了，你说，没注意到），晚上的时候我还是不想看那信，而是先让自己松口气，先给你写信，信的内容要和你来信的内容无关。可最后，我还是先

看了那两封信。

在信中，我看到了一定会有内容和令我感到惭愧的内容，正如你所能体会得到的，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做你现在做的事情，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做现在的你。

正如你这次所看到的我，这同时我也看到了我自己，只是更真切，更深刻，因此，这里我可以向你剖析真实的我：

两个我一直斗争很激烈，这你知道。两个中较好的一个属于你，在过去这几天中我对此就更坚定不移。在过去的五年中你体验过我的喋喋不休，也体验过我的长期沉默，通过所有的这一切你了解了我的内心斗争，而大多数时候它们给你带来的是痛苦。如果你问我这是不是都是真实的，我只能说，我克制自己不向别人故意撒谎，更确切地说，对你我就更加克制。有时有些闪烁其词，但很少撒谎，前提是，本来就没有什么谎可撒。我是一个爱编造故事的人，我没有其他的方法保持平衡，我的小船非常脆弱。当我反省自己的最终目标时，发现，我并没有努力去做个好人，没有努力去附和最高法官的要求，而是相反，通观所有的人和动物，以了解它们的基本爱好，愿望，理想，探究它们的一般规律，并且尽可能快地朝这个方向发展，于是我就会令所有的人感到满意，令所有人满意（这是一个大的飞跃），以至，为了不失去大家常说的爱，作为唯一没被煎熬的罪人最后把内心的卑鄙展现给所有人。总而言之，这于我只和人性的法庭有关，在这方面我撒的都是没有诺言的谎^[120]。

现在再来说我们俩，我们俩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情况，在我最具有代表性。你是我的人类法官。在我的内心斗争的两个我，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它们在时常变换着彼此的面具，这就使本已十分混乱的斗争愈加混乱；最后我终于相信，最不可能的情况（最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永远的斗争），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是最后的感情，然而却仍然动人，会最终到来的，而我虽然经过这多年之后已经十分虚弱，可我终于能够得到你了。

突然之间，失血过于严重，而那些血是那个好的我流的，流血是为了得到你，鲜血帮助了坏的我。当坏的我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东西时，好的我给它提供了方便。我暗地里认为这种病根本不是什么肺结核，或者说，至少首先不能把它看做肺结核，而是整个我的崩溃。我想，这一切会如此继续下去的，然而，情况并未如我所

愿。——血不是从我的肺中流出的，而是从一个战斗者的伤口中流出的。

这个坏的我现在有了肺结核做掩护，就像一个小孩子藏在妈妈宽大的裙褶里。另一个我又会怎么样？难道不能辉煌地结束战斗？最后的战斗是肺结核，而肺结核又是整个战斗的结束。

弗兰茨

〔1917年9月30日或10月1日—屈劳〕

亲爱的菲莉斯：

这里我把马克斯给我的上封信的开场白抄录下来，因为他道出了我，或者说我们的目前状况：

“如果我不担心由此会使你不安的话，我就会对你说，你的信证明你很平静。好了，现在我已经说了，这就证明，我从不担心，肺结核或任何其他事情会使你不安。你虽身处不幸之中，但你却是幸福的。”

在我告诉你我给他复信的内容前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虽然并不这么笼统，但也隐含着潜台词？如果是这样，我就在这里给你举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傍晚时分你站在屈劳的房子前，不久你就要启程回柏林。我在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然后来到院子里找你，没找到，回到房间听奥特拉说，你在房前，我于是来到房前，对你说：“我刚才还听见你在房间里说话。”我们彼此只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这么默默无语地在阶梯上站了很长时间，望着远处。这次毫无意义的旅行，我无法理解的态度，以及一切的一切使你感到不快。而我并没有感到不幸。福。“幸福”这个词，实际上对我的目前状况极不合适。我体验折磨，但并不觉得不幸，当我看到并体验到这种痛苦的时候，我比较平静地接受了它存在的现实，于是，我感到这全部的痛苦在减轻。在这件事上我也许还有点耍花招，对此请你能给予一点谅解，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事情的观察（当然这不是第一次）过于悲观，就好像人们希望台上的人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背景音乐；不管演出成功与否，演出都要进行。给马克斯的信的内容大致相同，我当然只是说：意思大致相同。他的“身处不幸，但并非不幸”的结论超出了现实，是一种当代人惯用的评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他的这一看法写进文章，这种想法他早已有之。他还常说：“不管是别人的观点，怜悯还是对某事的劝告他都非常看

重，而抱怨、责难他却认为十分不齿。”“身处不幸，但不觉不幸”同时也意味着“幸福之中仍感不幸”（但是，或许前者是最为重要的），这说不定就是印在该隐额上作为标记的箴言吧。这一标记意味着不再和世界同步，也意味着，带有这一标记的人就是曾经毁灭过世界，然而无法使世界重新复活，最终被碎片追袭的人。但是，他并非不幸，因为，不幸是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既已战胜生命，又何言不幸？现在他不过是在用更加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在这件事情当中与不幸类似的东西会意味着什么。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相当不错，我不大敢问你身体如何。

下个星期六马克斯在离这很近的科摩陶去作一个重建犹太家园的报告，我也去，星期天中午我们一起乘车回屈劳，晚上全都回布拉格，我吗，得拜访教授，去看医生，去办公室。这三件事都挺麻烦，特别是来回的路程。希望两三天我就能回来。

只是由于这次科摩陶的报告马克斯才来看我，因为我很早就向马克斯、费利克斯和鲍姆讲明理由，请他们不要来。

坎特我不认识，但那句话对百姓却非常适合，这句话指的是民族战争，跟“内心的战争”几乎没有关系，这里平和只是对那些即将化为灰烬之人才有。

弗兰茨

〔弗略奥邮局 邮戳〕〔19〕17.10.16〔屈劳〕

附录1 原版前言

1955年，舍肯出版社从菲莉斯·鲍威尔处得到了弗兰茨·卡夫卡给她的书信。此外，她把她收藏的卡夫卡给其女友格蕾特·勃洛赫的那部分书信也交给了出版社，这部分书信，大约这里是出版的弗兰茨·卡夫卡给格蕾特·勃洛赫信的一半，是收信人1935年离开德国流亡国外时留给她的。在佛罗伦萨逗留时，格蕾特·勃洛赫把卡夫卡寄给她的信的其余部分托付给她的私人律师保管。格蕾特·勃洛赫去世后，律师把这些书信的复制件交给了马克斯·勃罗德，经过勃罗德的斡旋，这部分书信最终也交给了舍肯出版社。

出版社决定把卡夫卡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信和来自卡夫卡家庭和朋友的，有关订婚的以及由菲莉斯保存的书信一并按时间顺序收入此书，它们也是这段恋情史的一部分并如实反映了卡夫卡当时的处境。本书概略介绍了菲莉斯·鲍威尔和格蕾特·勃洛赫的生平，对书信提及的其他人物在有关篇页里均作了注释。

卡夫卡给菲莉斯·鲍威尔所有信的原件和复制件均为舍肯出版社所拥有，本书收纳并全文收编了所有的这些书信。对卡夫卡在语言文字上与标准德语不同的用法未作任何改动。做过修改的仅是个别显然由于疏忽而造成的拼写和语法错误，书名和刊名以及专有名词方面的差错。为了便于理解内容，对一些错误的标点符号做了修正。

出版者看到的都是信的原件。大部分书信是易于辨认的卡夫卡手笔，其余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从书信本身可以看出，卡夫卡给菲莉斯·鲍威尔的信并没有全部得以保留：从作者注明的参看条目中可以看出，缺少一些、但似乎为数不多的信和明信片。与卡夫卡致菲莉斯·鲍威尔完全无损的书信不同的是，他给格蕾特·勃洛赫的信中有十二封被莫名其妙地剪成好几部分，数年间散落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一部分在菲莉斯·鲍威尔处，一部分在格蕾特·勃洛赫的律师那里。唯一幸运的是，它们后来得以重新合为一体。

菲莉斯写给卡夫卡的信显然已经散落遗失，下落不明。

有些信卡夫卡甚至没有注明日期，有些信根据上下文判断，是写错了日期。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试图研究出正确的日期，并把它们同出

版者对其他作的注解一样排在方括号里。这些日期是否完全正确无误，我们也没有把握。有些信还在信封里，信封上面可以清楚看出邮戳日期，修正这些信的日期当然也就易如反掌。但这类信为数甚寡。其他情况的注明或更正日期基于何种考虑，以下例子可略见一斑：

1.有一封信卡夫卡注明的日期是14.3.7.，我们更正为1914年4月7日。因为卡夫卡在此信中谈到复活节去柏林的情况。这里，他准确地提到了他所乘火车的抵达时间，并请菲莉斯到车站迎接。可见，他即将开始柏林之行。而1914年4月22日才是复活节。此外，他在信中还提到一封电报，在4月3日的信中他逐字逐句地复述了这封电报的内容。另外得以保留的还有一个带有14.4.7.邮戳的信封，而相应日期的信却没有。

2.另一封信卡夫卡注明的日期为14.3.13.，我们更改为1913年3月3日。卡夫卡在此信中提到，他退掉了在比勒克巷的住房。而他在1915年3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经过数周的准备和恐慌之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退掉了……”在这封令人疑惑的信中他还写道：“要是战争不再那么残酷打下去……”这里毋庸置疑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注释中引用了马克斯·勃罗德在费舍尔出版社（经纽约肯舍出版社同意的德文版）出版的全集之后的卡夫卡的作品。

此书编纂过程中，承蒙约翰·南·布洛赫，克丽丝蒂娜和薇拉·博恩，马克斯·勃罗德，约瑟夫·塞尔玛克，艾杜瓦特·高尔德施蒂克，恩斯特和玛丽亚·海因尼茨，古斯塔夫·雅诺施，奥恩根·蒙特，保尔·拉贝，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沃尔夫冈·舍肯，克劳斯·瓦根巴赫，费利克斯·维尔奇以及罗伯特·维尔奇等的协助，谨此致谢。

多蒙克努特·贝克，约阿希姆·博克，库尔特·克罗洛普，约瑟夫·普卡尔特，蒙诺·施潘，玛丽阿娜·施比格尔，和恩斯特·彼得·维肯贝格不舍朝夕，给予宝贵指点，特此表示诚挚谢忱。我们要感谢菲莉斯之子及其妹艾尔娜提供的重要提示，因为这是他人所不能的。

还要致谢丹弗基金会和美利坚哲学社会研究所为出版该书进行的必要研究工作所做的积极贡献。在查阅部分十分困难的资料方面，马尔巴赫德意志文学档案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自始至终给予了诚挚的帮助。同样要衷心感谢马凯特大学、西北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图书馆。

艾·海勒

于·博尔恩

1967年8月

附录2 原编者序

“……任何童话中所描述的为得到自己心上人所付出的努力，都比不上我为了得到你而付出的努力，不只过去、现在是这样，而且永远会这样。”

——摘自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以下情歌是20世纪上半叶一位不知名的宫廷抒情诗人的作品。”就用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吧！因为假使这句话完全是真实的话——虽然还需要作一些说明——那么，对本书信集的出版者来说也就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不仅是因为弗兰茨·卡夫卡在遗嘱中要后人把其遗物付之一炬，而且还因为尽管有过不顾弗兰茨·卡夫卡的遗嘱，依然出版其著作的先例。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仍无法消除存在的疑虑，因为在伦理学中并没有不成文的习惯做法，更没有使恶习可能成为规范的习惯做法。不能让那些把读者置于书已出版的既成事实面前的人再去散布与此有关的道德方面的忧虑，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宽恕他们的良心的话。关于弗兰茨·卡夫卡“意志”的讨论超出了讨论的初衷，但可能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不易理解的作者。作者正是弗兰茨·卡夫卡，其作品在整整一个时代里都是一个谜，这是其作品的需要，作品本身虽然不能揭开这个谜，但它们从中又认识了自己，这当中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点点自我理解。加深这一理解和减少一点儿时代的随意性——就像发表这些书信本身最终可能的——的确是自我辩解的做法。

这些“情歌”就是弗兰茨·卡夫卡的爱情书信。这些书信是他在1912年9月20日到1917年10月16日期间写给他当时确信要鸾凤和鸣的女子，他和这个女子两次你恩我爱，又两次分道扬镳。这样的书信应该公开吗？虽然没有明确禁止公开这些书信，仍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反复思考。因为在文艺此起彼伏时期，把为丰富人们精神境地而作的作家和那些唯利是趋的作家加以区别的能力日益衰弱。而卡夫卡书信的发表使这一状况恰似久旱逢甘露。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正如我们面前的这种情况，即使是收信人自己决定或者确信在她仙逝之后人们会把这些用内心自白撰写的成册成卷的书信公布于世，而它们的作者却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成千上万的半大不小的学生和怀有好奇心的成年人在他们书写私信时会在他的书信中寻求灵感和情趣。卡夫卡生时聪明却大器晚成，死后闻名遐迩。在罗曼蒂克传统的影响下，他有着最神秘、最隐蔽和最内向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内心世界被公布于世，是他万万没有料到

的。这些书信说明，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读者，对自传、书信、日记和自叙体裁的作品爱不释手。如果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诗人或作家，比起他们的本来的著作，他更钟情上述这些体裁的作品。例如，他十分喜欢格里尔帕策的中篇小说《可怜的吟游诗人》，更多是出于非常个人的缘故，而不是仅仅从文学角度出发。至于格里尔帕策的其他作品，可以肯定地说，卡夫卡更偏爱、也更经常阅读的是格里尔帕策的日记，而不是那些剧本。

不愿意让后人看到他的书信和日记（包括他未发表的故事和未完成的小说），是卡夫卡的遗愿。但他那时远远没有今天享有的令闻广誉。由于时代的风气，文学研究和其他文学活动的陈规陋习，这种名气甚至使哪怕是卡夫卡写的只言片语都要被公布于众。尽管他当时发表过一些作品，但仍属无名之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的遗愿得以满足，那么，公众是否还会对他的个人言论怀有兴趣？那么，他的《失踪者》（《美国》）、《诉讼》、《城堡》等代表作也会被毁于一旦。如果这些杰作不能流传后世，肯定也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卡夫卡的崇拜者了。然而，卡夫卡一直是想亲手毁掉自己的作品，但又感心不忍，力不足。他请求不够顺从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把他遗物中所有的“日记、书稿和信件”之类的东西统统烧掉，片纸不留。马克斯·勃罗德在其为保留下来的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说《诉讼》初版写的《跋》中写道，这个遗嘱是卡夫卡用墨水写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纸条上，纸条和“其他许多纸张”胡乱放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没有一丝一毫人们习惯上对遗嘱细心保存的痕迹。马克斯·勃罗德看了卡夫卡遗留的每一张字条，没有发现卡夫卡留下正式的遗嘱。而卡夫卡曾于1922年给勃罗德看过一份遗嘱，并告诉勃罗德他在遗嘱中委托他的事情。而他，勃罗德，斩钉截铁地拒绝扮演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但在卡夫卡的写字桌里还发现了第二张字条，这是用铅笔写的，是一份同样没有注明日期的遗嘱。勃罗德经过判断认为，这张铅笔字条是在1921年用墨水写的字条之后写的。梅诺·斯潘则确信（见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1955年11月《月报》），卡夫卡这最后的意愿产生于1922年。这份遗嘱虽然没有流露丝毫的激情，但具体提到了书名，使得一些作品免遭焚为灰烬的命运。这里涉及六篇短篇小说，因为他们当时已经付印成书并公开发行，或如同最后提及的故事那样是作者自己决定公开发表，这样，也就无人能够把这六篇作品付之一炬。这六部小说是：《判决》、《司炉》（小说《失踪者》的第一章）、《变形记》、《在流刑

营》、《乡村医生》和《饥饿艺术家》。是的，在这里，小说残稿、书信、日记没有逃脱被烧毁的命运。对于上面提及的作品，作者表示：不愿意再版，“也不愿意留给后人”；“相反如果它们全部消失的话，这才符合我的本意。既然它们已经出版，我只是不想阻拦任何人去得到它们，如果人们对它们怀有兴趣的话”。非同寻常的是，作者自己——显然是在此之后不久——对此同样感兴趣：卡夫卡致力于最后的文学工作是校对《饥饿艺术家——故事四篇》一书的清样，1922年10月在《新评论》上首发了这部作品，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此书包括《初痛》、《小妇人》和《女歌手约瑟芬》，其中一篇，即在《饥饿艺术家》之前撰写的《初痛》，根据铅笔字条是“不算数”的，应该烧掉。尽管如此，卡夫卡在去世前不久还是公开了这些作品。

当马克斯·勃罗德下决心不去履行两张字条所赋予的使命时，他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或至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疑虑。他在《诉讼》一书的《跋》中已经提到过一些原因。然而还有其他的、更强烈的理由，他当时对这些理由视而不见，有意不提。1922年6月26日——大约在写第二张遗嘱字条时——卡夫卡给马克斯·勃罗德写信，论述他“自我谴责”极其自相矛盾的本质，对卡夫卡这种“自我谴责”的倾向，勃罗德进行过开诚布公的批评。卡夫卡在其信中写道，对自己和其所有作品采取消极态度有两个原因：其一，表明他对自己产品的真实看法，也就是“现实性”；他刚刚把《令人讨厌的小故事》一书递给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这是《初痛》的一部分——如果他能够把这份书稿“从沃尔夫的抽屉里拿出来并使沃尔夫永远忘掉它”，他会感到十分“幸运”。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方法”问题，即如何使沃尔夫无法说出，您说的对，这个稿子不行，我还是把它给您寄回去吧。不让出版商这么说并不是出于通常的礼貌，而是“利用这个办法”把他引导到本来的现实中；这个现实就是他正因为如此才会真心鉴赏作者自己谴责的作品。“这是什么样的调查啊！”卡夫卡信的结尾还有这样的话。

是的，这是什么样的调查啊！卡夫卡在其信中谈论这些调查时如同谈论他的“托辞”，使每位看到要求焚烧其作品的遗嘱的人，不管是用“现实的”还是不那么现实的“方法”，都感到进退维谷，难以决断，而这正是卡夫卡的本意。这将会使其最亲密的朋友感到十分为难，因为这决定了他精神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是欣赏另外一个人的作品。此人还警告他说，不要不执行那个判决！海茵茨·波利策在其《艺术家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卡夫卡“让马克斯·勃罗德成为其遗嘱的执行人，坚

持他的原则决定，即把其作品全部烧毁。但同时他对马克斯·勃罗德其人也非常了解，他知道，勃罗德不会尊重他的决定”。但无从判断的是，这一“原则”到底有少原则。卡夫卡最后一部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耗子女歌手约瑟芬只想得到一样东西，就是“公开地、明确地、超越时代地、高于一切地承认她的艺术”，难道比使她充满情感的这一原则还要原则吗？为达到她梦寐以求的目的，她有时甚至拒绝再演唱，甚至完全失去踪影，目的是让人们去寻找她，恳求她再登台演出。但她的如意算盘却未能如愿，“这个自以为聪明的算计却大错特错，因为人们认为，她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完全被命运所操纵”：老鼠们并没有逼迫她去演出，而是“继续走它们的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如此说来，她可能正是想“在如释重负中被人们遗忘”？谁知晓这一点，有谁能够知晓这一点？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约瑟芬嘴上说的，原本并没有准备去付诸实施。”1914年7月10日，也就是去柏林与菲莉斯解除他第一个订婚婚约的头一天，卡夫卡给事先了解这一棘手的关系、也知道卡夫卡柏林之行目的之所在的妹妹奥特拉写信，卡夫卡在信中写道：“我所写的并不是我所要说的，我所说的不同于我所想的，我所想的又有别于我应该想的。这样，循环往复，一直到最深邃的暗处。”

那么，究竟什么是卡夫卡的“真正意愿”呢？在给菲莉斯最后的一封信中（1917年10月1日），他提到在他头脑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种思想，而他体现了它们之间的斗争，他将在它们的斗争中走向死亡。至于他心中有多少互相争斗的灵魂（由于争斗的斗士甚多，互不相让），他常常计算错误，过多地估计了自己这边的力量。尽管如此，每当关系到作品问题时，总是爆发两方之争。至于这些作品，好像反方中间就分成了两派，扮演两个著名的角色，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尽管它们后来争论时显得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甲方问道，这些作品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它们完全索然寡味。乙方则在怀着含有一丝希望的疑虑答复道，如果他的人间时光痕迹可能的确不会消逝在万古永恒之中，那么，这要归功于这些作品。甲方又问，这有什么可怕的。“那又怎么样！”卡夫卡同时代和同语种的人用行话这样说。然而，卡夫卡除了反对这种无所谓的做法外，没有别的高招。由于他倾向徒劳无益，一无所获，同样倾向热情奔放的性格和追求珍惜时光的品德，在其艺术和生活中片刻都没有产生过这类疑虑，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是一个“和”字在发挥作用。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和”字仅仅是在语言的强迫下连接实际上即是一个和同一个、也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卡夫卡一而再，再而三，不知所措地面对无法协调的可能性——比如，诗人的名声或者可避免的遗忘，婚姻

或禁欲——之所以这样，仅仅是因为对他，正是对他来说，好像为了得到满足而把两者都放弃了；为什么他经常如此激烈地摇摆不定，远远看上去，他的摇摆不定似乎又如同稳坐钓鱼台。卡夫卡的奇才正是扎根于这种互相矛盾的悖谬之中，这促使首先发现这个奇才的马克斯·勃罗德没有逐字逐句地遵照卡夫卡的意愿去办。卡夫卡的意愿？但是卡夫卡的意愿并没有字句，他的字句没有意愿。

他之前的哈姆雷特处于类似的境地。因此，哈姆雷特的“自我谴责”源于同一源泉，也就是预先决定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向一个越来越脱离外部生活的方向运动。1915年9月底，卡夫卡在日记中问道，福廷布拉斯怎么能相信，“哈姆雷特真的证实了自己是尊贵之至的？”正是基于内外协调一致的“现实生活”成为幻想，举棋不定成了唯一“真正”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去证实自己的尊贵？这些道德上十分敏感的行为把精神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把人与世界的疏远归咎于己——黑格尔则认为世界精神的历史现状应对这些行动负责——，指责自己沉湎演戏，甚至虚词诡说，欺三瞒四，在这里，每个外部标记——不管是对家庭的挑战，或是放弃一个令人厌恶的工作，或是成家立业，或仅是书写的文字——似乎都是对内心状态粗糙和错误的描写。在卡夫卡1917年10月1日给其恋人的那封令人可怕而又使人感动的信之前——他在信中介绍自己病情时说，仅从外表症状看好像是肺结核，而在“内在的”是一件追求生活的武器，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康复”的原因，现在，在他写这封把“外表”的肺病看作是“欺骗”的标志的信之前，她一定问过他，他是否一直真的反感她。如前所述，他甚至把自己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弊病视为道德上的过失，他以其对道德上的疑虑回答说，他“很少”撒谎，前提是他“根本就‘很少’有谎可撒。但我是一个好撒谎的人，我不得不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平衡，我的小船经不起风浪”。没有谎言就无法维持的平衡大概是指内外条件之间的平衡，小船之所以经不起风浪，是因为这只船不是按照同样适用他命中注定只能在其中行动的环境的自然规律修造的。但是，只要能够使用语言文字描述早已无法描述的东西，这个“表面上”简单的对谎言虚伪的承认之后却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更接近事实的并发症”。是的，卡夫卡写道，他要撒谎，“当然是不带欺骗的”。

正如哈姆雷特的“伪装”不过是适合演戏的事实真相的代号，这一事实真相迫使一个人在内在方面变成另外一个人，只要他在外表上扮演角色，这样，卡夫卡“没有欺骗的谎言”如同是在内外之间深渊边缘仍老老实实交纳过桥税一样。“没有欺骗的谎言”——这是他三年多以前，也就

是1914年7月23日，在日记中写的较温和的说法，当时他是这样描述在柏林第一次解除婚约情景的：“多么清白无辜啊！”

这就是这些书信一再提出的问题：这个人 and 被普遍一致——他自己也以自我折磨和近似于宗教虔诚的坚定所赞成的——称之为世界或真实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如何？他的内心，也就是他的意愿是与外部存在着“自然真实”的关系吗？是一种不同于通过“艺术真实”可表达的关系吗，而正是仅仅由于这点，即独一无二方式的艺术也是独一无二的关系吗？由于卡夫卡的最后意愿可能并没有一定所指，“真的”想要什么或干什么，谈论满足或违背其意愿，尽管是最后的，还有什么意义吗？假设这位女收信人在两个城市进行两次徒劳的婚礼准备之后很久，在婚约最终解除之后很久，也可能在卡夫卡过世之后很久才问道：他“真的”想娶我为妻吗？他认为喜爱的是否就是“我”？要是她鼓起勇气一口气读完这些信，她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问题忽略了现实或更多的是非现实？信笺上有“她”吗？虽然他当时很清楚，在1917年9月，当解除婚约已近在眼前时，她“极度的不幸”演变成了“真正”的不幸，而他本人，即诗人，能够按照哥德的塔索方式谈论自己时说，在他人遭受痛苦而沉默寡言时，他也处于“不幸之中，也可能由于针扎般头痛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在五光十色之中……对此进行简单的或有比较的或浮想联翩地一番幻想”。由于他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她就不一定会感到是上当受骗了吗，尽管她在读信时似乎觉得，好像在炽热、闪烁和渐弱的光照之下一切黑暗都无法存在。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把克尔凯郭尔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恋人的一句名言以非同寻常的“无私”的措辞和变化多端的形式不断地纠缠她：“嫁给我，你会后悔的，不嫁给我，你同样会后悔。不管你是否嫁给我，你都会后悔莫及的。”——“在这种心情下与一个女人结婚，世上有这样的事吗？”莎士比亚的这句话是讲给一个大无赖听的。但令人惊奇的是，以另外的语调说出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这位撰写这些情书的非凡圣人。

弗兰茨·卡夫卡对待婚姻如同对待著书作诗的成功与荣誉一样，因为他遗嘱的真正执行人必须是一个魔术师，一个神话剧的导演，在这出剧中有一个场景是，经过一场烈火的燃烧和锻炼，作品以无可比拟的完美脱颖而出，一部完全表演“充满光明、充满自由、充满才干，没有阴影，没有框框的作品”。德意志文学史上的另一位伟大的纯粹派艺术家曾这样描述他作为诗人怀有的最崇高的夙望，为了实现之，他准备发挥他“全部的力量和他非凡的天性”，“尽管他这当中可能会被消耗殆尽”，席勒在

1795年11月29日给威廉·冯·洪堡的信中这样写道。卡夫卡1917年9月底完成小说《乡村医生》后在日记中写道，写作上的成功固然会给他带来“暂时的满足”，但只有当他把“世界升华到完美无缺、名副其实、永恒不变的境地时，他才会感到幸福”。经常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卡夫卡唯一的意愿是，针对一个否认意愿世界的世界，针对那个他曾认为除了这个世界再没有其他什么的“精神世界”：“我们称之为淫荡的世界是精神世界的邪恶……”这正是他对艺术永不满足的追求，就是通过语言内涵的尽善尽美，把邪恶从唯一真正的世界，即精神世界中清除出去。语言固然是人类最普通之事，人人都会讲，如同每只老鼠都会叫一样。但只有当卡夫卡的女艺术家、老鼠歌唱家约瑟芬叫唤时，她的叫声才是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桎梏，从而也使我们获得片刻的解放。福楼拜对卡夫卡来说十分重要，他1916年10月26日致菲莉斯的明信片上对斯特林堡的谈论也适用于福楼拜：“只需要闭上眼睛，用自己的鲜血作关于他的报告。”福楼拜曾梦想撰写一本书，一本没有任何内容、与外界毫无关系的书，仅仅是由于其风格的内在力量而存在。但是，福楼拜认为是纯粹唯美主义的东西，卡夫卡揭掉了其绝对艺术的面具，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其宗教的面孔：卡夫卡曾称他的信是祈祷的形式，当他想说服菲莉斯相信他不能结婚时，他几乎总是把他的作家生涯作为理由，似乎这种生涯决定了必须像和尚那样一辈子不得结婚。他不厌其烦地向菲莉斯发誓说，只有当他写作顺利时，他才能有力量生活下去。过了不久，即1912年11月1日，他向她承认，“在他精神萎靡，厌倦写作时，从没有勇气”去接近她。但如果有那么一回难得的精神振奋时，又不允许他把它挥霍在生活上面。因为如果他抛弃了艺术，那么，他就会感觉是被上帝抛弃了，也就不再具有能力与他人交往了。假使有过循环往复的话，这就是。在来往飞鸿的最初几周里，她就开诚布公地以一个受到强大竞争对手威胁的女性的直觉劝阻他在写作时要适度。不，他在1912年11月5日信中答复说，如果他对她的话百依百顺，那他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痴汉”，“如果我在这方面只顾保重自己，那么，正确地来看，我就不是在保重自己，而是毁灭自己”。当然，他的创作也可能最终一事无成，那么，他自己肯定也就一事无成。他害怕结婚有时也是因为害怕性无能，同时也是畏惧对他是禁区的生活方式和忍受痛苦，即赤裸裸地做爱行为将被内心当面鼓、对面锣的声音证实是欺骗，譬如，1916年7月5日日记中的这段话：“共同生活是痛苦的。强求得到的是生疏、怜悯、淫欲、胆怯和空虚，只是似乎在内心深处有一条称得上为爱情的潺潺溪流，却寻觅不得，仅在片刻的瞬间倏忽而过。”这是他与菲莉斯在玛丽温泉时写的。正

如他在1922年1月底的一篇日记中记载的，1916年他与她——似乎是第一次作为他的情人——共同度过几个夏日，当时他感到是在神秘的幸福之中度过的，后来，每当回忆这段时光时他感到的只是恐惧。后来，他到了波希米亚冬季休养胜地施品德勒米勒，当时他琢磨着，如果当时是密伦娜——一个当时对她的爱占据了他生活的女人——去了玛丽温泉，又会怎么样呢？他想，可能会带来一些欢快，但也会是令人可怕的，因为我会坠入一个“我无法生存的世界”。那就“只有解开谜团，为什么在玛丽温泉的十四天我感到很幸福……”不管会是什么答案（其中一种可能的答复是，根据日记，他当时并没有感到那么幸福，另一个比较有把握的答复是，即使他感到幸福，也没有持续十四天）；正如对待所有昔日往事一样，现在为时已晚。让别人去爱吧，他自己已经不行了：“我走得太远了，我被赶出去了……”虽然那“下面”也有他的代表，但他的“主食”是来自于“另外的空气中生长的另样的根茎”。

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吹拂的是另外的空气吗？他的写作是来自另样的根茎吗？他常常有这种自我感觉。对他来说，他“真正的”生活就是保卫他的写字台，唯有当写作成功时，他才会感到幸福（否则就沮丧），如果写作不顺利，则意味着灾难。当写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抱怨，如同抱怨失去了幸福的爱情：抱怨它们躲避他，拒绝他，违抗他。一段时间不写东西，他就感觉“十分空虚”。只有“写作才能在内心深处产生平衡力量”，他在1913年6月26日对菲莉斯这样说，他不得不伤害她是有意，但同时又是无意的。她与他的这种关系犹如一种令他不喜欢的职业，她也是浮在“生活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与她的婚姻可以纳入公务范围，与写作在内心深处产生平衡力量截然不同。为了写作，他需要“离群索居”：不，可能是受了他常常向她引用的那首中国爱情诗的影响，并不是像她似乎说过的，是一个隐居者的离群索居，而是一个死者的孤身只影。这种意义上的写作是深沉的睡眠，也就是死亡，而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一个死者从坟墓里拉出来，人们也不会夜深人静时把我从写字桌旁拉走。是的，早在半年以前，在他1912年除夕之夜给她的那封长信中，他在写作与婚姻，这种与那种生活，这样和那样的死亡之间摇摆不定的爱情上诡计多端使她心惊胆战。针对她那天真无邪的话“我们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他在回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你所言千真万确，譬如，此时此刻，新年伊始之际，我没有更远大和更新奇的愿望，我一心一意祝愿你的左手和我的右手能够紧紧地握在一起。”为什么他恰恰想到的是这样的情景呢？可能是在他面前正好是一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书，可能这确实是可能的，即一对恋人手挽着手被带上绞架。当时他已

经醒悟，这封信变成了一封多么糟糕的情书和新年贺信：“那时我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啊，”他说，同一个脑子，今天在写正开始形成的美国小说时却没有一丁点儿灵感。“看来，新年的年号是不吉利的十三了。”看，他就是这样考虑生活与爱情的。

他“真正”的生活是扎根于写作之中的吗？这样评论他是很容易的。菲莉斯在休假地结识的一位业余笔相学者根据卡夫卡的笔迹向菲莉斯“占卜”卡夫卡的性格，她把占卜结果告诉了卡夫卡。“住你们公寓的这位先生最好不要再绞尽脑汁琢磨什么笔相了”，卡夫卡在1913年8月14日回信时说，因为笔相的结论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他卡夫卡既不“行为果断”，也不是“好色之徒”，相反，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天生的苦行能力”，如此等等，这位先生的结论无不是信口雌黄。笔相占卜结论中的绝对错误就是声称他对文学感兴趣。这就大错特错了。卡夫卡抗议说：“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我就是文学组成的，除了文学外我什么都不是。”然后，他讲述了神鬼故事中的一段情节，讲的是一个和尚擅长唱歌，歌喉优美动听，听者都十分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歌声。有一天，来了一个和尚，他声称这动听的歌声是一个魔鬼的声音，他可以当众驱魔。这时，那个只是因为着魔才具有活力的身躯倒了下去并立即开始腐烂。卡夫卡写道：“我与文学的关系与这个故事相似，只是我的文学不像那位和尚的声音那样甜蜜。”这样，正如他告诉菲莉斯的那样，她将与一个情绪愠怒、心情伤感、沉默寡言、不知满足、体弱多病的人共度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这个人被一条无形的锁链束缚在无形的文学上，她肯定会觉得这种想法是毫无理性的。两天之后，他还向她发誓说，他并不是像她所说那样是“嗜好写作”。不，这不是嗜好：“嗜好应该克服或受到克制。如果说是嗜好，那这嗜好就是我自己。”从中可以看出，这无异于是帮忙死后再自杀，这也是他对其遗嘱执行人所期望的。

卡夫卡说，他不是别的什么，只是文学。他经常这么说，说得很坚定，很富诗意，还没有人对他说表示不相信的。然而，他是话里有话，而且以几乎同样的固执和肯定毫不逊色的风格说：他因此实现了灵魂的解脱。似乎只有写作给予了他生活中“内心深处的力量”，似乎只有艺术才能使世界升华到完美无缺、名副其实、永恒不变的境地，似乎婚姻和职业，乃至整个性爱生活在唯一“现实”的世界中，即精神世界中——荒谬绝伦之极！——它是邪恶，使艺术，仅使艺术易受淫荡的影响。而自己本身不会因此成为邪恶的牺牲品，魔鬼已经在那里窥伺它的猎物：相信此事的人。艺术高于一切，卡夫卡只是瞬间觉得可信。更使

他相信的倒常常是相反的观点。

在卡夫卡1922年7月初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长信中，不仅他的艺术家风度的“自我谴责”，还有黑格尔理论的艺术自我注解的历史都达到了它们的顶峰，并且以歌德的《托夸多·塔索》，他的《潘多拉》，他的《欧福里翁》，格里尔帕策的《萨福》和他的《贫穷的乐师》，施蒂夫特的《晚来的夏日》，托马斯·曼的《托尼奥·克略格尔》和《浮士德博士》为例最清晰地指出了德意志文学领域的各个阶段，一个随着艺术的终结方才找到自己的终结的历史。“写作支撑着我的生活”，卡夫卡在那封信里对菲莉斯这么说，而且常常对她这么说。但这是什么样的、由写作支撑的生活？一种极其腐败堕落的生活。因为“写作是甜蜜的报偿，但报偿什么呢？夜深人静时，我感到像上儿童直观教育课那样清楚明白，这是对为魔鬼服务的报偿。”这是对卡夫卡写作着魔所做的精彩而准确的描写，随之而来的是：报偿“这种降格与黑暗势力为伍，这种对被缚精灵的本性的释放，并与之大成问题的拥抱。报偿一切在光天化日下撰写小说时，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下面还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也可能还有另外方式的写作，但我只知道这种方式……”他要是想到尼采，他就会教育这位伟大的“价值重估者”，通过这样的描述，狂热的东西——这就是他所描述的东西——多么容易被“重新估值”为犹太—基督的东西，陶醉的上帝多么迅速地变换成清醒的撒旦。不明确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在光天化日下写作的”是谁？是他自己？《判决》——和阳光？《变形记》，这个“令人作呕的故事”，如他一次对菲莉斯说的（1912年11月24日）——和阳光？阳光——和《诉讼》、《城堡》？假如“上面”结出这样的花朵，那么“下面”又该是怎样呢？

看来，卡夫卡在指责写作方面的词汇也是取之不尽的，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颇为敏感的情况下针对最晚自克尔凯郭尔以来人们所熟识的，针对济慈早已记述过的艺术家的“生存忧虑”，他们是克莱斯特、格里尔帕策、福楼拜、波德莱尔、里尔克等其他许多艺术家，一直到托马斯·曼。卡夫卡认为这一生存方式上“着魔的”东西是建造住房和宫殿的美学的创造精神，目的即是自我欣赏，也是让别人欣赏，但同时也要看是否有人搬进去住。卡夫卡在那封信里对勃罗德说：“不断琢磨自己的或别人的形象并以此为荣，正是虚荣心和享受欲的表现——这种运动不断重复，形成了虚荣心的太阳系。”较所有凡人生命更凡俗的是诗人生存的非现实性，它比一切其他易逝的生存更易逝，它“根本没有存在过”，“连尘埃都不是”；“而只是一种享受的结构”，在他人认为是“我”者，在诗人看

来是不可能经历永生的，因为它甚至根本就没有过生命。“……我仍是泥土，”卡夫卡写道，“我没有把火星变成火焰，而只是用来照亮我的尸体。”1914年8月初——可能因为当时欧洲的“现实”是如此的非同寻常，似乎它越来越会变得“更加现实”——卡夫卡在日记中明明白白地记述了他对现实的痛苦感受：“我的梦境般内心世界的意义和表现把其他一切都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其他一切都可怕地萎缩了，并不断地萎缩着。”为了以他认为唯一合适的方式向备受纠缠的菲莉斯保证这一爱情的“真实”，他越来越要求她多写信（如果不是恳求她少写信的话，因为每收到她的信都使他无法继续写作）。有一次，当她就一封该写而没写的信向卡夫卡表示歉意时，他说（那是1913年2月21日到22日的夜晚）：“你既不可能在办公室，也不可能在电车上给我写信。要我向你做出解释吗，我最亲爱的？你不知道该给谁写信，我不是写信的目标。”因为事实上他并不存在，他认为，他只存在于写作的非现实中。

这是一种无可挽救的局面。因为他是一名作家，所以，他失去了世界。但他为此赢得了——除了一个现实世界有效的规律外，还有什么能证实卡夫卡的语言如此忠实这些规律呢？——但在这个这样赢得的世界中，他越来越产生地狱般的幻觉。筑造他这个世界的语言符合哪种现实呢？甚至可能连自我感觉、自己内心世界的现实都不是。卡夫卡在1917年9月19日日记中写道，语言才是拯救，它“在痛苦明显地耗尽了我所有的力量，直到我生命所拥有的最后一点精力”的时候以宽恕的方式给予我充沛的力量，它是被从外部生存驱逐出去的内心世界的避难所，可在那里，它同时又再次迅速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剩下的只是欺骗。“有一次，当我精力充沛时，”1913年3月17至18日深夜卡夫卡给菲莉斯写信时说，“我给你写信说，每次想表达内心真实感情时都为找不到适当的措辞而感到迷惘，我不是与它们发生冲撞就是甚至被它们所驱赶。”是的，他大概是这么说的，那是在不到四个星期以前，也就是1913年2月18至19日的夜里。当时他说，尽管他落笔时总是出错，错话缠绕着他的笔尖不放并且都写到信纸上，尽管如此，他永远不会缺乏表达完整思想的力量：“完全没有指出语言的弱点以及比较语言的局限性和情感的无限性。无限的情感在语言中如同内心世界一样是无限的。内心世界清楚的，在语言中也必然是清晰的。”他就是这样写的，一个充满期望的白痴，相信至少有一个外部的标记反映内心的真实：语言的标记。因此，对生活中其他所有行为采取拒绝态度的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寻觅到：外部标记的真实性。但现在这也什么都不是了。他觉得好像“几乎没有一个词是凭灵感而得”，每写一个词都是“从很远的什么地方、偶然

地、异常费力”地抢夺过来并紧紧地抓住不放。

这是一种厄运：当他不写作时，他就毫无价值，当他难以深入写作时，就是另外一种的毫无价值。在他较早给菲莉斯的一封信中（1912年11月1日）——明白无误地暗示当时正在诞生的“极其令人厌恶的小说”：《变形记》，小说最后描述了女清洁工费力地用扫帚清扫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尸体，然后笑着对其父母和妹妹说，他们不用担心“怎么弄走旁边这东西”——他告诉菲莉斯，如果他写作不成功，他“就会躺在地上并被扫地出门”。同年同月底，也就是1912年11月30日夜里，卡夫卡写作不顺，彻夜未眠，挥毫疾书告诉菲莉斯，当他成为爱人者和求婚者时就会改邪归正，因为“我多次想到，我已经深入到写作之中并感受到其中的温暖，人们已无法把我完全从写作中抛出去”。但就在几周之后的1913年1月14到15日夜间，卡夫卡写作时明显顺手，他向她吐露了她无法理解的想法：他将是一个难尽忠心的丈夫，因为每天夜晚他将以写作蒙骗她。她怀着一片忠贞然而又一无所知地对他说，他写作时，她会坐在他身边陪伴。不，他回答说，这将会使他无法写作，因为即使是万籁俱寂的深夜也仍还不能满足他写作所需要的安谧。因为写作需要全心全意地投入，“甚至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要求一个想生存的人，“当他在思考时”，如同他人打交道时，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要克制“襟怀坦白”。一旦有助写作创造人物的较为真切情感出现时，当上面站立一个或两人同时站立的地面开始晃动时，“我常常想到，对我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带上我的书写工具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和与外界隔离的地下室最里面的房间……我会痛痛快快地写作！我将从深处汲取灵感！毫不费力！因为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就会忘却辛劳。只是我可能不会长久这么干下去，在头一次遭到可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无法避免的失败时，我会发疯的”。

真正的现实存在于写作之中，除此之外，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有了。谁与这种现实共存后一旦失去，谁就会变得疯狂。而生活本身，即世界，比如这里要结婚嫁娶，这就是失去了现实。她会怎么看呢，亲爱的和受骗的女士？她会毫无保留地告诉这位“地下室居住者”！但这完全不需要她费心劳神。半年之后，在已提到的1913年8月22日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他所创作的现实取决于所写的与“真实”的关系如何（请注意，这里真实又完全站到了现实一边），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根本无法控制的不协调”。在1922年7月20日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他给这种不协调冠以“撒谎”的称号。他刚刚读完斯托姆的回忆录并重复斯托姆和默里克

两人关于他们共同欣赏的海涅的谈话。默里克说：“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诗人，但他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欺骗，正因为这一点，我一时一刻都无法与他共生。”卡夫卡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说，这一论断“至少从一个方面是我对作家看法绝好的并仍是十分神秘的概括……”是对所有的作家，而不是仅仅针对这位特殊的海涅，默里克对他的评论不过是道出了“普遍的看法”。

刚才还服务于完美无缺的、震惊所有欺骗性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自己却也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求从事文学的人牺牲现实世界。由于文学是欺骗，看上去“真实”本身完全被“现实”所占有。在他看来，文学和现实显得越来越格格不入了，对此已毋庸置疑。遗留的问题只是翻来覆去极其迅速的交替转换，即真实是否存在于在他看来只是有时候——那就只能是基于迷惑——被认为是真实的写作方面或“现实”方面，或他说的关于现实的话时，这些话如同饥饿的艺术家软弱无力的双腿走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一样：“似乎这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他们还在寻觅之中”，——那么，现实是在他所说的话中还是在他说话时丢失的那个世界里？正由于这些书信的缘故，有关解释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果，因为这部小说不仅是“内心”饥饿和“外部”可觅食物之间的不协调的完美的譬喻，更是那个要命的阴差阳错使饥饿艺术家成为饥饿汉的比喻：要是他找到可口的食物，他也会同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饱餐一顿”；而且《饥饿艺术家》也是一个大胆的然而看上去却是轻而易举获得成功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卡夫卡同时表达了肯定与否定，他对饥饿艺术家的肯定与否定，因为如果当时没有人在场，他也不会把食物吃掉的——“其艺术的荣誉感不允许这样做”——正如马戏团的那只豹子，马戏团经理对它那强健的、“为了撕咬”已装备好必要的一切的躯体感到心满意足，尽管他难以“抵挡它那复仇的火焰”，还是给了它一个最后饿死过人的笼子。

在《饥饿艺术家》一书里，蓝色的八开本上并列的三句互不谐和的格言看起来好像确实为它们疑似之间的和解弹冠相庆。那句孤零零的精神世界的格言说：“我们称为淫荡的世界乃是精神世界之邪恶。”在这句前面的另外两句中的一句是：“勿骗人，勿向世界骗取胜利。”第三句是过分自我折磨和卡夫卡过分热忱尊崇的命令句：“在你与世界的争斗中，我要为世界充当帮手。”因为谁要想“以健康男子的好恶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即一边围着老婆孩子家务转，一边又想正经从商，谁就存在于‘现实之中’”。卡夫卡十分喜欢福楼拜的这句话，福楼拜和他一样，从

文学的“灾难中”渴望得到“真实的”现实，尽管他不像卡夫卡那样不顾一切。在《饥饿艺术家》中，这些矛盾达到了思想上无法研究透彻的艺术的统一，同样是这些矛盾使这些书信成为难以理解的爱情故事。正像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七首末尾用同一个动作同时招来并挥走了天使一样，卡夫卡在这些信中也追求爱情和“生活中”的生活，其执著不亚于他对埋头写作的“地下室居者”孤身只影苦行生活的追求。1913年3月17日至18日卡夫卡给菲莉斯的信中谈到语言拒绝服从内心世界的问题，卡夫卡写道：“尽管我们已经订婚，但我怎么才能够通过给你的信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呢：使你同时相信两个严肃的请求：‘爱我吧’和‘恨我吧’！”同年5月12日至13日夜里，他向她表示，当他前一天过完圣灵降临节后准备从柏林返回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她，我无法生活，和她在一起，我同样无法生活。”

不足为怪的是，在这种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中，他试图在它们与外部世界之间斗争中充当世界的帮手，甚至超过了试图在渴望摆脱世界饥饿语言的世界那里自己一心期待这一解脱。在卡夫卡的帮助下，有时世界的处境非常好！比它所应得的还要好得无可比拟！作家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先于他人预见到欧洲现实中正在酝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这些书信也证明，作家不言而喻准备以现实态度接受这一残酷。还有，这里他看到了摆脱头脑和内心中进行的“非现实”战争的痛苦而进入“现实”的机会：“下一个任务是无条件的：当兵去。”他在1916年8月2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为了履行这项任务，卡夫卡花费了不少气力（以其惯用的努力方式，尽管明知是徒劳的）。此前，他像君主制下每个忠实于王室的臣民那样接受并肯定了晚期奥匈帝国极端贫乏和十分脆弱的“现实”。当巴尔干政局朝着不利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方向转变时，他颇有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为了一切，主张撤退”（1912年10月27日给菲莉斯的信）。当然，战争爆发后，他并不喜欢在战争爆发时进行的爱国主义游行。他在日记中写道，它们是最可憎的战争伴随现象并几乎是以卡尔·克劳斯的方式使战争变成反犹太主义的战争。他认为，造成这可憎局势的责任在那些“忽而称自己是德国人，忽而称自己是捷克人的”犹太商人。他从感情上反对战争，他认为这是自身的缘故，而不能归咎于事件本身。他称自己是一个“空桶”，“里面充满了欺骗、仇恨和忌妒”，他发现自己身上尽是可怕的东西，“胸襟狭窄，优柔寡断，对参战者忌妒仇恨”以及对他们“强烈地诅咒”。后来，当1915年4月5日菲莉斯直率地问他，是否是战争使他担惊受怕。他答道：“战争给人们带来什么，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一无所知。”但如果说他遭受战争之苦，“多半”是因为

他“自己不能”亲临战场。两个月之后，就是1915年5月6日，他说，如果能够去当兵，他会感到很幸运。不久他将去体检，菲莉斯应该和他一样希望他能够“顺利通过”。

人们重视卡夫卡对时代的理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人们对于指出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声的、博学的、明白易懂、深入浅出的分析不妨装聋作哑，片刻，聆听一下一个由于世界异化而感到绝望的智者在选择一个除了自行毁灭而别无他途的精神荒凉的世界时发出的呢喃。1912年9月20日卡夫卡给菲莉斯写第一封信，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他试图在菲莉斯那里躲避“非现实”对他的逼迫。但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同年元旦除夕之夜，他已预料到这一试图的结果不妙，便给她写了一封令人诧异的信，信里从头至尾大谈特谈“文学”和“真正的”文学（而且远远超出了衡量所有写得好的可成为文学标准的尺度）并要求她答复一个问题，这不是问题，而是他自己如同对待所有“现实”一样与她难乎其难的关系：他说，他再清楚不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期待的答复也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并应排除其他方方面面包括现实方面的影响（“从十二分的清楚直至非现实的”——这是对他本人作品的特性多么精确的刻画啊！）。在信的结尾，他要求她向他“靠近，靠近，再靠近”，但他突然意识到，这个要求可能是无法兑现的，因为他和她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在他所认为的“非世界”，而她，是的，她在柏林。“你现在什么地方？”他问道，“我在哪个聚会中才能找到你呢？”——他认为，表面的“上面”只是柏林的一个除夕晚会，但当他从这封信毫无顾忌的深思中猛醒时，他感到，他的问话有损无补：“不管是哪个聚会，都是人的聚会。”

“从十二分的清楚到非现实”——在1912年11月28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向菲莉斯叙述了三个半月之前发生的事，即8月13日晚上的情景，那天晚上他与她初次相识。难道这是一见钟情的见证吗？是爱情使目光变得敏锐的见证吗？是对突然萌生的爱慕之情记忆犹新的见证吗？这是可能的。但这也是那种有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文学现实主义的见证，是在顽固不化的学究气氛中宣称愈来愈害怕针对自己的幻觉的见证。如果她忽略了哪怕是很微小的细节，她最终会完全失去“现实”。在这类“现实”的描述中没有一点儿荷马在描述阿格里斯的盾牌时所表现的泰然自若。同时知道，可靠的信赖就是对盾牌这个现实的信赖，也是对表达信赖的语言现实的信赖。这里对每个措辞都应该向说者进行证实，这个“现实”也同样适用内心感受，“应予考虑”。波德莱尔已对巴

尔扎克的小说作过评论，如果他的注重每个细节的总结不是真的成为拿破仑的战争计划，这些战争计划幻想试图重新征服和巩固它担心完全失去的现实，那么巴的小说将是何等的无聊。

一副毫不掩饰地流露毫无表情的“毫无表情的面孔”，卡夫卡在日记里这样形容初遇的菲莉斯。毫无表情：就是说像一张白纸那样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这位小姐情窦初开，而在布拉格钟情柏林那张可爱的、毫无表情的面孔而释放出来的柔情蜜意在翻滚，在沸腾。1912年9月20日，也就是初次的、当时唯一的、在大庭广众之下仓促相遇后的第五个星期，卡夫卡以“尊敬的小姐”之称开始写信——按时间顺序看，是进入文学的陶醉状态的序幕，因此，两天之后，用了八个小时的夜间工作创作完成《判决》。这部小说是献给F.B.的，书中弗丽达·勃兰登费德的起首大写字母与“毫无表情”的F.B.是一致的，就像它在《诉讼》一书改换成毕尔斯特娜小姐一样，开头用的也是组成“弗丽达”的起首字母，和小说《城堡》里的弗丽达一样。——最初使用的称呼是“尊敬的小姐”，后来在幻想并在文字中上升到了“亲爱的菲莉斯小姐”、“最亲爱的小姐”直到1912年11月14日信中以“最亲爱的”开始并以心醉神迷的“你”相称。然而，幻想之中的和纸面上的拥抱并没有变成圣诞之夜柏林郊外的相会。虽然这是菲莉斯所期望的，但卡夫卡反对，理由是他要利用仅有的几天假日进行写作。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所写的主要都是给她的信。

就这样开始了年复一年的痛苦和烦恼的斗争：不，斗争不是为了这位他随时可以带回家的小姐，假如他真的想有这么一个家的话。斗争是为了世界的“现实”：婚姻和家庭。令人感动同时又使人吃惊的是，明知是徒劳之举，他仍寄书传情追求她这个“现实”：为了他通过她的书信而获得的一点儿现实，这个“真实”和“文学”之间符合其现状的未定现实。最现实的倒是通过书信试图创作和忽而可笑、忽而可悲的“神话化”。他带着“现实”的痛苦盼望着她的飞鸿，这种真实的痛苦演变成了创作一部吸引人的喜剧的灵感。在这出剧中，最滑稽的是他的三个情书的传递使者，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梅格尔、沃塔瓦和伯姆小姐，他训练她们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来自柏林的消息传给他。要么他一再要求菲莉斯，最详细地告诉他她每天是怎么度过的，甚至各种日常生活琐事，如她在夜里是用什么信号告诉她母亲她已经家门口的，这些都很快成了神话的因素。要么他恳求她寄相片来，而且越多越好，这些是时时刻刻都在贬值的现实的纸币。他刚刚得到这些现实，就在虚拟——现实中又失去了它

们，正如他的面孔流露的毫无表情，这种虚拟——现实能使内心的目光进入幻想的深邃，并恍惚觉得他一直在面对这个如此从“现实”写照下来的现实，而且是非常的迫不及待，好像所有机械产生的相片都是朦胧的萨伊斯的肖像，应该向他揭开世界形成的秘密，或是愈来愈逼近的结婚住房和房间陈设的现实。菲莉斯置办了许多家具，但它们却如同魔鬼一般地阻挡骑士去寻找他的心上人。或是他全心关注她的职业：她当秘书的公司向市场推销口授记录机，这就如同一首写在信纸上面的实用爱情抒情诗，他在信中就发展口授记录机业务而高谈阔论，并在口授记录机的促销方面给她出主意，想点子，相形之下，现代的广告艺术都显得大为逊色。这一切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文学上圆满的成功和现实上完全的徒劳。

这些信纸上的抒情诗只有一次变成了短暂的“现实一些”。那是1916年夏天在玛丽温泉共同度假之后，当时她在柏林刚刚建立起来的犹太人之家帮助照料东犹太的难民和儿童。而他头脑里想的全是她面临的教育难题，他鼓励她，帮助她，向她和她所保护的人推荐读物，邮寄书刊，并且周密审慎地考虑着“现实”。初次交往——当然是通过她的职业，绕了一个弯儿——是经过“现实的”，甚至是社会一民族的努力才实现的，他认为，所付出的努力是十分有意义的，虽然他在1916年9月12日的信中说，经过调查可以证实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次交往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心安神泰。但这好像是有其原因的，他看到了正是他最赞赏的犹太教的精华，即东犹太人特有的精神——宗教的，所谓确实是“非现实”的品质，正在遭到民族国家中民族“正常化”的威胁。尽管如此，卡夫卡和菲莉斯在“现实”中度过的时光是短暂的，而且两人之间越来越不和谐。1917年7月两人仍决定再次订婚后不久卡夫卡开始吐血，从此病魔缠身，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康复了。他在1917年10月1日的信中写道，他得的病并不“真的”是肺病，而是他的“全面破产”，鲜血不是简单地流自生病的肺部，而是他心中两个斗士中一个给予的致命一刀。

两个斗士中的一个……是哪个好呢？大概是“现实”的这个，因为卡夫卡确实因此而仙逝。然而，称“现实”最终比文学——或比我们依据卡夫卡的做法给予微不足道的名称“文学”的东西——要现实，那就过于草率了。事实上，尽管他坚定不移地向文学提出毫不留情的怀疑，对他来说，文学正是我们现实的另一面的完美形象，对此，仍然可以说，它是有意义的或至少允许具有这种意义，即在居其之上的毫无意义中倏忽而过，就像在一张刮去旧字的羊皮纸上字迹仍依稀可辨一样。是的，卡夫

卡对菲莉斯说，他只不过是文学，这并没有错。因为卡夫卡所创作的一切几乎都是无法解释的，但都有其内涵。比如他的情书。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同他一样是“文学”。没有任何东西，包括爱发脾气、任性执拗、“私下秘密”和公开一些其他私情书信使人尴尬和“见不得人”的东西。它们与宫廷抒情诗人的抒情诗有共同之处，即没有“真正地”要被歌颂者为妻。

在我们这个20世纪，如果希冀公开这些书信会促使许多读者宁愿研究宫廷抒情诗，而不是去背诵早已倒背如流的弗洛伊德的定理，那肯定是太冒失了。是的，甚至令人担心的是，已经多次冤枉儿子的老卡夫卡将把他曾十分“现实”的人格完全输给绝对超我的“思想”并变成威严的俄狄浦斯父亲拉伊奥斯的布拉格老城的阴影，只要还在流传说，儿子1913年8月30日写信给菲莉斯称，阻碍他给她和他自己带来幸福的不是“事实”，而是无法克服的胆怯，害怕得到幸福的胆怯，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折磨自己的乐趣和命令。当人们浏览1913年7月10日的信时，会伸出指头高喊：“性无能！”因为，卡夫卡“害怕交往，哪怕是与最亲近的人交往，尤其害怕同自己交往”，这种害怕使他不能与她结为连理。人们比书信者本人更了解：“这个无法安抚的害怕”的根源，和这个根源一样，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害怕，好像这“简直就是天意”。

简直是天意：在一个由于它的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而觉得无所不知的世界里这样认为，这对这一不幸的爱情是否多少作出了一些解释？可能多少甚至是卡夫卡给菲莉斯带来的不幸，像他所说，菲莉斯同他一道钻到了“这部车的车轮底下”？假使他不是在即将过去的19世纪的布拉格，而是在第十一省出生的，他可能会成为阿基坦尼亚的一个公爵，一个首创爱情语言的人，并认为在陶醉中轻信地期待天堂般的、但并非因此不现实的幸福欢乐超过了对爱情的心满意足，在那里，情人的面庞那样的毫无表情，她的身体那样的“不现实”，因为一束光照上面——可能是他同一封信提到同一束光，它把一切照得“如此明亮”，“我真想把它遮挡住，因为我感到炫目”！在这种意义上，这些书信的确是一部迄今陌生的宫廷抒情诗人的作品。情书？1922年2月1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他在内心里从未知晓“我爱你”这句话。知道的“仅是期待着的寂静……我应该说‘我爱你’，以打破这种寂静，但我只是知道了，仅此而已”。这是一位宗教诗人令人厌烦的抒情诗，因为不是上帝，这位诗人也没有获得爱情，或他的爱情不可阻挡地上升到上面的空间，错过在地面上与情人的约会，就像卡夫卡在1912年除夕信中出奇地准确地想象的与菲莉斯在

附录3 原版附录

附于卡夫卡1912年11月24日信中：

摘录于1912年9月25日《布拉格日报》

为乌干达殉难者举行的宣福礼

在8月13日为“乌干达烈士”举行的宣福礼仪式上确认了二十二位在二十六年前因信仰基督教而被第一批烧死的黑人青年为殉道者。从罗马的圣佩鲁斯-克勒威团结会传来的消息说，那些讨论这件事情的红衣主教们都为这些年轻的烈士们的英勇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些烈士被确认为殉道者的消息使所有的黑人们，尤其是那些北维多利亚——卢安扎地区的黑人——那些黑人出身于该地区——欣喜若狂，他们用跳舞和跳跃来表达他们的欣喜。

附于卡夫卡1913年6月1日信中：摘录于1913年6月1日《布拉格日报》。

一个东部犹太演员

6月2日（布里斯多饭店，晚8点）布拉格人有机会了解一种在中欧很少引起如此直接影响、不大受人重视的艺术的重要代表。很多人还会记得去年在老城的一个小礼堂简陋的舞台上演的一出白话话剧，这个剧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简陋。人们当时陷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人类是靠着儿童似的强烈的幻想生活的，对于那些狂热的幻想者们，脚下能有一方土地，身上能有几块花布，已经非常满足了——于是人们就在舞台上用一把靠背椅作为御座，外加一张小桌，便开始执着地表演他们的故事。人们普遍认为伊萨克·列维是投身戏剧白话文学中最具表演艺术典范的代表人物。人们还没有忘记他去年所扮演的形象，不可救药的恶棍，悔过的骗子，他扮演的狡猾的东方桑波·班查的仆人角色，动个不停的双手，满是皱纹的脸，在这张脸上你随时可以看到迷人的微笑，他走路的样子，他那多变的，唱歌时非常男性化的动听声音，这一切人们还都没有忘记。6月2日我们有幸再度欣赏朗诵者、歌唱者和

戏剧表演者伊·列维的表演，再一次了解远方艺术家那不可比拟的气质。

附于卡夫卡1916年10月30日信中：

由卡夫卡起草的一篇名为《建立并维护布拉格波希米亚的德语地区士兵及百姓精神病院的德国人组织》的呼吁文章。

人民大众们！

包含了人类各种痛苦的世界大战，还是一场精神战，这场战争中的精神战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的都多。在这场精神战中有太多的人遭受折磨。就如上一个世纪和平时期高强度的机器大生产企业给在这些企业中劳动的人们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以往的企业，这些大机器生产企业使劳动者的身心都受到危害，另外，当今战争中急剧增长的机器部分也对参战者的精神带来无法描述的危害和痛苦。造成这种危害和痛苦的程度是任何没有亲身经历的人都无法想象的。1916年6月以波希米亚保守的统计数据来看，仅在波希米亚德语地区就有四千患有精神病症的战争受害者。我们还将面临的会是什么？在波希米亚以外的医院中还躺着多少患有精神病症的人？有多少患有精神病症的人将会从战俘营中返回？这里有无法估计的痛苦的人们等待帮助。我们城市的街道上神经质战栗的人以及到处乱跑的人，只是痛苦大军中不会带来危害的代表。

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有如下的选择：对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听其自然。我们可以旁观，从前线下来的患有精神病症的人如何拥入战地医院，而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进入专门的有限的精神病科，而其他的人只能住进普通的战地营房。在各种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这些专门的科当然也要尽一切可能达到治疗和恢复健康的目的。然而又有多少幸运者能够接受这种治疗呢！而众多的住进普通医院的患有精神病症的人又会怎样呢？最美好的愿望以及最伟大的医术今天不能帮助他们。在他们曾经用生命保卫的家乡，在他们为之献出自己以及家人前途的家乡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只有在现代设立的医疗机构的小心护理下才能给他们带来帮助。因为不具备这一切，也就注定了这些不幸者的命运。他们将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被送回家乡，扩大着来自于和平时期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作为永无休止的、不断加剧的痛苦的牺牲者，作为家庭的拖累，作为德语波希米亚人民力量的损失，作为精神病院的候补人。难道德语波希米亚就是以此来奖赏他的儿子吗？

“不过还是有其他的可能！”德语波希米亚人，就是说，所有讲德语的人民大众，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所治疗精神病的人民医院，但是要由不管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都对这样一个机构特别表示关注的政府提供相应的资助，还要有社会保险机构，私人保险公司，铁路部门，大的地产所有者，大企业，以及所有愿意提供哪怕是最微小帮助然而却怀着十分热心的人的资助。按照德意志模式建造起来的具备一切必要设施的人民医院会造福于德语波希米亚人的。现在以及战后一段时期内，必要的时候，这所医院可以用于治疗来自于德语波希米亚地区的战争受害者，而从长远来看，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德语波希米亚贫穷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住院和治疗的可能。这里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不管是战争中还是和平时期的苦难，人们都可以运用人类之爱和科学的武器去控制住，即使不能完全控制，也会控制住大部分。

我们可以在这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或者确切地说，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选择。尽管我们提供的帮助所可能达到的成功不一定显著，而且我们大家都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用全部力量来参与此事仍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人道的、爱国主义的、人民大众的义务，因为是这样，就更应该加紧。

已经开了头。10月14日在布拉格的德国公司举办了一个由所有德语波希米亚各党派、阶层、机构代表参加的大会。大家以少有的一致和牺牲精神达成提供实际帮助的共识并决定，建立一个总部设在布拉格的“建立并保障德语波希米亚地区的治疗精神病的人民医院的德国协会”。这一协会是作为德语波希米亚大众救济的一部分考虑的，这一协会暂时由在那个大会上经过选举产生的筹备委员会代理。

“第一步的工作是要筹集资金”。为了这一目的向您发出一个由衷的请求，请您尽可能地参与这项伟大的德语波希米亚工程，并能在您所在地区对此予以支持，这样一项工程在奥地利还没有出现。

这种参与可以按照下述章程规定进行：

1.通过自愿捐款的方式。

2.作为创始人加入协会。入会需要捐赠五千克朗或更多；捐赠五千克朗并加入协会的“创始人”可以获得推荐一个病人接受医院护理的权力。

3.通过一次性一千克朗或更多的捐赠作为协办人加入协会。“创始人”和“协办人”的名字将被刻在树于精神病院的纪念碑上作为永久纪念。

4.通过每年交纳不低于五克朗的会费作为正式入册的会员加入协会。这一连续的年度会费可以通过一次性交纳代替，一次性交纳的最低限额为二百克朗。

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我们向您提出的请求，“这同时也是我们可爱的祖国的请求”，不会一无所获。

汇款可以通过附上缴款单汇出，信件请暂时寄往以下地址：“建立并保障德语波希米亚地区的治疗精神病的人民医院的德国协会，布拉格一波利奇七号，工伤保险公司”。

1916年11月于布拉格

在这一份呼吁书上有上百德语波希米亚公职人员签了字，其中有罗伯特·马施奈尔、奥托·普里布兰姆以及弗兰茨·卡夫卡。

附录4 菲莉斯·鲍威尔简历

菲莉斯·鲍威尔1887年11月18日生于上西里西亚的诺斯塔市。她有四个兄弟姐妹：伊丽莎白、艾尔娜、安东尼和费尔迪南德。艾尔娜在卡夫卡的日记以E简称频繁出现，尤其是在1914年下半年的日记中，也就是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之后。父亲是地地道道的维也纳人，与在家乡定居的一个染匠的女儿结为伉俪。1899年，当菲莉斯十二岁时，父亲举家从上西里西亚的小城迁居到柏林，父亲为一家外国保险公司充当代理人。在1904年到1910年的六年期间，鲍威尔夫妇分居。1908年，为了

帮助伶仃孤苦的母亲养家糊口，菲莉斯学校毕业后在奥德恩唱片公司谋职当速记员，1909年又换到生产口授记录机和录音机的卡尔·林德施特罗姆股份公司工作，并且在数年时间里就擢升为代理人。

到1913年3月，鲍威尔一家一直住在柏林东部伊玛努埃基希大街，一条僻静而不引人注目的街道。后来，他们搬到了位于柏林西部环境比较优雅的住宅区的威尔默大街。1914年11月，菲莉斯的父亲逝世。

1916年9月，菲莉斯听从卡夫卡的建议，到柏林犹太人民之家从事志愿工作。这是当年5月建成的犹太人民工作中心，坐落在亚历山大广

场附近主要是犹太战争难民和移民的居住区。马克斯·勃罗德、马丁·布伯和古斯塔夫·兰道尔都是中心的赞助者。中心的任务是对生活拮据家庭的孩子和青年人进行民族和宗教的教育。在中心从事教育的，即所谓的“助手”都是大学生、年轻商人和犹太文化社的妇女们。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来自柏林西部富有的家庭，他们仍有意衣着简朴，以使他们的学生感觉不出社会的差异。

菲莉斯总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这项社会工作，受到同仁们的称赞。她在授课的女生班里颇受爱戴。卡夫卡从布拉格为她的新工作出主意，想办法，给她寄去她自用的师范教材和供她学生使用的读物。总之，他十分关注中心的工作。

菲莉斯·鲍威尔获得的证书和有关她的报道都强调她勤奋、实干。卡夫卡曾提到这些品质他都不具有，一生中只是非常并且常常是过分地赞赏他人的这些品德，也包括对菲莉斯和后来对在他与菲莉斯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格蕾特·勃洛赫。菲莉斯看上去是一个热爱生活、心地直率的人。卡夫卡曾称她是一个“生性快乐、身心健康和颇有主见的姑娘”。她钟情文学、艺术和住宅的审美观符合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由此可见，她对卡夫卡的文学创作理解甚寡。

1919年3月，与卡夫卡最终分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菲莉斯嫁给了柏林的一个富商，后生育一子一女。从卡夫卡给密伦娜和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是知道孩子出生消息的。1931年，菲莉斯与全家移居瑞士，1936年又定居美国并于1960年10月15日在那里溘然长逝。

[1]1914年11月5日卡尔·鲍威尔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卡夫卡把这场死亡事件与他婚约的解除联系起来。他认为卡尔的死是他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幸的一个标志。参看1914年12月5日日记。

[2]参看1914年7月28日日记。1914年7月26日卡夫卡在从丹麦的东海浴场马里列斯特回布拉格的归途中与埃尔娜·鲍威尔再次在柏林会面。参看弗兰茨·卡夫卡《给奥特拉及其家庭的信》，由H.宾德尔和K.瓦根巴赫编辑出版（纽约/法兰克福/M.1974），25页。

[3]1915年1月23和24日，一个周末，卡夫卡和菲莉斯在柏林至布拉格铁路线旁的、位于波希米亚部分的边境城市博登巴赫相会。这个约

会的由来从现存的信件中不能明显地看出。在博登巴赫的停留期间卡夫卡给她朗读了1914年下半年创作的一些作品。其中有守门人的传说《在法的门前》，它同年9月7日首版于布拉格的《自卫》上。参看1915年1月24日日记。

[4]卡夫卡第一个自己的房间在比莱克胡同，它与其二妹瓦莉·波拉克的住房是在同一所房子里。参看1915年2月10日日记。

[5]这些描述参看作家在《邻居》一文中的境况，取自《一场战斗纪实》，131及以下几页。根据帕斯雷和瓦根巴赫注上的日期看这篇文章创作于1917年6月5日。参看《卡夫卡——学术讨论会》，82页。

[6]估计是小说《诉讼》的选段。

[7]在长巷卡塔斯特拉705号的房子“通往金鱼”里，第18号（今第16号）。那儿他作为转租房客住在一位萨拉姆·施泰先生处。他的房间是5楼一个带阳台的边房，从那儿越过布拉格老城区的屋顶和钟塔向摩尔达那边的劳伦兹山看去，风景格外优美。参看1915年3月21日的信，以及1915年3月17日日记。

[8]每星期几个朋友勃罗德、韦尔夫和鲍姆的聚会，通常卡夫卡也会参加。

[9]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也就是他大妹埃莉的丈夫，当时是在匈牙利的喀尔巴阡山脉当兵，他二妹瓦莉的丈夫约瑟夫·波拉克受了轻伤。

[10]对此参看卡夫卡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对订婚时的吻发表的看法。见1916年7月中旬致勃罗德信。

[11]参看1914年7月23日日记：“……说了一些深思熟虑的，可以长期保存的敌对的话。”

[12]卡夫卡陪他的大妹埃莉去看她在匈牙利当兵的丈夫。

[13]估计为斯特林堡的《破裂》。参看1915年5月3日日记。

[14]可能是以后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几行，菲莉斯把它们写在一本作为礼物寄给他的福楼拜的《萨拉姆伯》上。

[15]卡夫卡在这儿一字一句地翻译了福楼拜的一个措辞dans le vrai（意为在正确中），作家的侄女卡洛琳·克曼维列在她的卡夫卡非常熟悉的《秘密的纪念品》一文中引用了这句短语。卡夫卡也经常谈话中使用福楼拜的Ils sont dans le vrai，以此他把自己看作是生活在“正确”以外的一个人。参看勃罗德《传记》，121及以下一页，以及他为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作的《首版的后记》484及以下一页。

[16]大概是里列·布朗的《一个女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第2卷，慕尼黑1909—1911年。

[17]卡夫卡在圣灵降临节假日期间从波西米亚瑞士的共同郊游回布拉格的归途中（5月23日和24日）。

[18]可能是他的朋友菲利克斯·韦尔奇的父亲。

[19]卡夫卡非常希望能应征入伍，尤其是因为想从公务员的恪尽职守和公务员的禁锢中逃脱出来。参看他1915年4月5日、5月3日、1916年5月14日写给菲莉斯的信以及1915年5月14日、1916年5月11日、8月27日日记。

[20]很显然，卡夫卡和菲莉斯在1915年6月在卡尔温泉会面了。参阅1915年8月9日和12月5日、1916年1月18日和4月9日写给菲莉斯的信。

[21]卡夫卡于1915年7月20至31日在鲁姆堡（北波希米亚）的一家疗养院里。

[22]这封信对话中的第一～第三人称参照在《一场战斗纪实》这册书中用第三人称写的心理活动，通过这封信心理活动的自传特征更为明显。在其他卡夫卡以第三人称表达的心理活动中也是如此。甚至在小说《诉讼》的结尾中，我们通过最后一页的手迹可以看出，作者突然从第三人称过渡到第一人称。参看海因茨·波里兹的《一本卡夫卡的传记》，收在《文章》中，布吕因，I，1935年，94及以下几页。

[23]是指收在《思考》中的文章《单身汉的不幸》。

[24]1915年的冯塔纳奖由卡尔·施特海姆以他的短篇小说《布塞考夫》、《拿破仑》和《舒林》获得。百万富翁施特海姆根据弗兰茨·布莱

斯的介绍把与此项奖有关的八百马克转送给卡夫卡。参看沃尔夫《信件往来》，34及下面几页。

[25]卡夫卡的小说，已经在《白色篇页》的第10期（1915年10月）上发表了，1915年11月作为图书馆的双月刊（22/23）在《世界末日》上问世（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莱比锡）。

[26]《世界末日丛书》，新作品年鉴，莱比锡，1916年，它包括了《在法的门前》一书的一个复印件（126及以下几页）。

[27]卡夫卡是一家小型石棉工厂的股东，他不想回忆这家工厂。参看卡夫卡1912年11月1日致菲莉斯的信，以及勃罗德的《卡夫卡传》112及以下几页。

[28]卡夫卡在1912年夏季与马克斯·勃罗德一起游览了魏玛。

[29]由于军队对邮件的检查，从布拉格到柏林的信件通常需要五至六天。明信片在通过检查站时较快一些。

[30]罗伯特·穆西尔在1914年2月想让卡夫卡参与一份文学杂志——大概是《新观察》的工作。参看1914年2月23日日记，在1914年《新观察》8月份的期刊上穆西尔评论了卡夫卡的《观察》和《司炉》。

[31]《战斗》，这本书早在付印前卡夫卡就知道了。魏斯把书寄给他，希望卡夫卡能在《白色篇页》上加以评论，但根据恩斯特·魏斯1916年6月27日给拉舍尔·桑沙拉的一封信来看，卡夫卡拒绝了这件事。

[32]参看卡夫卡1904年1月21日给奥斯卡·波拉克的信：“我认为，人们就应该只读那些让人感到被撕咬和刺戳的书。〔……〕一本书必须是能破开我们内心冰冻海洋的斧子。”以及在1913年12月9日的日记中对恩斯特·魏斯的《战舰》的评论性意见。

[33]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由弗兰茨·韦尔弗作德文改编。这个剧目在1916年5月24日和25日由柏林莱辛剧团在布拉格作客串演出。

[34]马克斯·勃罗德的《当代文学的三大主流》，载《回声》（慕尼黑）第二年度（1915—1916年）第13号，196及以下几页。

[35] 卡尔·施特海姆，三个短篇《布塞柯夫》、《拿破仑》和《舒林》，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莱比锡，1916年。

[36] 1916年卡夫卡和菲莉斯在玛丽恩温泉共同度过了他们的假期，从7月3日至13日他们住在施洛斯·巴尔摩拉旅馆。菲莉斯离开之后，卡夫卡在玛丽恩温泉又待了10天。他的健康状况日渐好转。头痛以及使他备受折磨的失眠消失了。卡夫卡在1916年7月12至14日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说：“从在泰普的上午〔7月18日〕起这些天是这样的美妙和轻松，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会享受到这一切。”——他在日记中写道：“除了在楚克曼尔特外，我还从来不曾与一位妇女很熟，从来不曾熟悉过里瓦的任何一位瑞士女性。第一位是个女士，我对她一无所知，第二位是个孩子，我完全糊涂了，我对菲的熟悉只停留在信件上，而感性上的认识这两天才获得。当然我对她不是很清楚，还存在着疑问。但她那柔和的眼睛中的目光，她那打开了的女性的心扉是美丽的。”（（1916年7月）《日记》以及瓦根巴赫的《专著》101页），对此参看给马克斯·勃罗德信中的部分：“其实我从来不熟悉任何一位妇女……”卡夫卡还在1922年在日记中写道，他在“玛丽恩温泉的十四天是幸福的……但是在痛苦地打破了界限之后”。参看1922年1月29日和1916年7月3日至6日日记。

[37] 在卡夫卡不在时——前一天他陪菲莉斯去弗朗兹巴特——他一直住的房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租出去了。他被安排到菲莉斯以前一直住的房间里。参看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7月中旬，1916〕。

[38] 埃德姆特·多蕾西亚是齐岑多夫伯爵夫人，母姓罗斯·楚·普劳恩。她一生对虔信主义和兄弟教区历史作出过贡献。威廉·雅拿施《兄弟历史杂志》（亨胡特兄弟会教）第8年度（1914年）（整一年都致力于这项长达507页的艰苦的工作）。

[39] 参看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1916年7月中旬〕，以及尤利乌斯·埃利阿斯对贝尔兹·乌尔德拉宾在玛丽恩温泉的停留期间所写的文章《玛丽恩温泉》，载《柏林日报》1916年7月20日晚间版。

[40] 参看1916年7月20日日记。

[41] 邀请参加犹太之家的工作。参看1916年7月中旬信件。

[42] 玛丽恩温泉附近一个很受欢迎的郊游地点。

[43]这个词的后半部分无法辨认。

[44]参看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信，1916年7月28日。

[45]因美国健康劝诫者荷拉斯·弗兰舍尔的姓名而得名，他尤其推荐饮食中彻底的咀嚼。

[46]大概是短篇小说《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岁的单身汉》，他在玛丽恩温泉曾经给她朗诵过。

[47]卡夫卡打算与菲莉斯结婚后在柏林的郊区卡尔斯霍尔斯特居住。

[48]西格弗里德·雷曼在犹太人的教育中起过重要作用，他先在柏林，后到以色列，1917年3月初他发表了《关于犹太人定居和犹太人之家的观点》，《犹太人观察》22年度第9期76及下一页和第10期83及下一页。

[49]《犹太人论坛》第21年度第29期（1916年7月21日），其中发表了马克斯·勃罗德的文章《从加利兹难民在布拉格的应急学校中出来》以及卡夫卡提到的信件检查（241及下一页）。

[50]鲍威尔一家当时住在柏林—夏洛特堡，威尔蒙斯多夫大街73号（莫蒙森大街街角），就像卡夫卡后来解释的那样，他在这儿把犹太人之家和犹太定居所搞混了，后者在夏洛特堡。

[51]埃德姆特·多蕾西娅，齐岑多夫的伯爵夫人。

[52]《一个女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

[53]冯塔纳1876年6月17日和7月1日给马蒂尔德·V.罗尔的信件。见《台奥多尔·冯塔纳书信集》第二版。出版者奥托·普尼奥威尔和保罗·施伦特，1910年柏林出版，第一卷第360页和363页。卡夫卡在这里没有对引文作大的改动。

[54]菲莉斯为纪念和卡夫卡首次相识（1912年8月13日）所写的一封信。

[55]见1912年10月27日的信。

[56]在玛丽恩巴德的邂逅之后，卡夫卡曾陪同她前往弗岑斯巴德。

[57]在拜德罗根大街22号（现在的马克斯—比尔大街5号），曾经是犹太人之家。

[58]冯塔纳于1876年7月1日致马蒂尔德·冯·罗尔的一封信。

[59]1916年8月2日卡夫卡的明信片。

[60]菲莉斯的亲戚马克斯和索菲·弗里德曼，他们有时住在西里西亚的瓦尔登堡。

[61]卡夫卡于1916年8月19日和26日写的明信片。

[62]奥托·考斯，这里说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批评》，参见《试验》，慕尼黑，1916年。

[63]参见沃尔夫的《通信集》，第40页。

[64]参见1916年8月9日的明信片。

[65]诗人阿尔弗雷德·沃尔芬施坦（1888—1945）。除了卡夫卡1916年11月10日晚上在慕尼黑朗诵了自己作品之外，参加这个活动的还有：9月8日是S.弗里德伦德（迈诺纳）；9月26日是E.拉斯克—舒勒；10月10日是A.沃尔芬施坦；10月27日是TH.多伊布勒；11月17日是J.R.贝歇尔和W.赫兹菲尔德；12月4日是G.科尔韦尔。

[66]犹太人保藏刻有摩西十诫的两块石板的木柜——译者

[67]这里指的可能是N.N.斯特拉乔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作的引言；见F.M.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第二部第十二卷，慕尼黑1913年出版。

[68]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斯特的《青年教程》。这本书是写给父母、教师和神职人员的，柏林1914年出版（在以下的引文中名为《福斯特，青年教程》）。在犹太人家园的一份手稿中有这样的文字：“作为教育学方面的进修，教辅人员目前正在一个短训班中学习F.W.福斯特的《青年教程》。选中这本书的原因是缺乏以犹太教理论为基础的教育学著作。在礼拜日的晚上……可以将在福斯特讨论会上讨论过的教育学问题用犹

太教的观点再作分析。”参见《柏林的犹太人之家》第一篇文章，1916年12月5日；1917年柏林出版，第15页。

[69]《犹太教育问题》，这是西格夫里德·雷曼为犹太人之家教辅人员和来访者所做的一个报告。

[70]去参加9月15日信中提到的慕尼黑的诗人朗诵会。

[71]在ARKAD I A年鉴中首次发表时的献辞为：献给鲍·菲莉斯小姐。参见1912年10月18日的信。

[72]这里指的是从《诉讼》中摘出来的小诗《梦》。这首诗本来应当和马克斯·勃罗德的文章《我们的文人和团体》一起发表在《犹太人》月刊（1917年10月）上，但最后是发表在马丁·布勃编辑的另一本文集《犹太人的布拉格》（自卫出版社，1916年12月出版）里面。1916年底，这首诗又发表在《1917年新青年年鉴》（柏林新青年出版社出版）上，在第172页。1917年1月6日，这首诗还出现在《布拉格日报》的娱乐版上。

[73]这里指的是阿达尔巴特·冯·沙米索的小说《彼得·施勒米尔的神奇故事》。

[74]这是福斯特著作中一章的标题，见《青年教程》第78页。

[75]菲莉斯正在写上面提到过的犹太人之家领导们出版的小册子的有关报告。

[76]这里说的是夏洛姆·阿施所著的《圣经小故事》，柏林，犹太出版社1914年出版。

[77]阿尔弗雷德·李希特瓦科《小学中试验过的艺术观察练习》，由教师协会出版，用于艺术教育的辅助材料，德累斯顿1898年版。

[78]音乐家阿道夫·施莱伯（1883—1920）。马克斯·勃罗德写过一本关于他的书，书名是《阿道夫·施莱伯，一个音乐家的命运》，柏林，1921年版。

[79]作家阿尔弗雷德·莱姆[作家阿尔弗雷德·雷曼（1889—1918年）的笔名]是刚才提到的西格夫里德·雷曼的兄弟。他写过一系列的短

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文艺和政论文章，并因此而闻名。卡夫卡这里提到的关于“中间国家”的书是《关于中等国家的思想》，参见阿·莱姆的《我们这些德国犹太人》中的“做过的事情”。原文见“德意志文化社会宗教月刊”第七卷第11号（1916年2月出版），第946页。

[80]见依兹约克·莱普·佩雷斯所著《民间故事集》第三卷的犹太故事集《来自始祖》，柏林1913年版。

[81]犹太人之家位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个贫民区。参见克拉拉·埃申巴赫的《居住问题》，发表在《新犹太月刊》第五卷第11/12期。

[82]这里指的是本·乌西尔（西蒙·拉法尔·希尔施的笔名）的《关于犹太教的19封信》，西蒙·拉法尔·希尔施1836年出版，1911年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第四版。

[83]雨果·贝格尔曼，布拉格的一位哲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国家图书馆的专家和希伯来大学的教授。

[84]这里大约指的是在1916年9月7日的明信片中提到的柏林的“母亲与婴儿”展览会。

[85]勃罗德的文章发表在《犹太人》第七期（1916年10月）第457页。

[86]罗伯特·米勒在他的评论文章（发表于《新观察》1916年第二卷，第1421页）《幻想》中写道：“卡夫卡本来是个无目的的小说家，他擅长于写作原始德意志风格的、独具一格的、叙事大师式的东西。但是，因为对他的美丽的长袍上的修修补补，他已经堕落了。”在马克斯·勃罗德的文章《我们的文人及其团体》中，他对卡夫卡的评价是：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你永远找不到“犹太”这个字，他的著作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犹太文献。

[87]这也许是卡夫卡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艾米尔·格什温的一句话。参见瓦根巴赫的《传记》第39页。

[88]显然卡夫卡不愿在犹太人的新年向菲莉斯的母亲致以祝福。

[89]《一个女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

[90]这里指的是已经提到过的小册子《柏林的犹太人家园》的第一个报告，1916年5月12日（柏林，1917年出版），这份20页的出版物的献辞是：“谨向一直支持我们的工作的马克斯·勃罗德博士、马丁·布伯博士、古斯塔夫·兰道尔先生、西格伯特·斯特昂先生、拉宾纳先生和华绍尔博士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91]这里说的是布拉格的犹太复国主义俱乐部“犹太女性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人数很少，但卡夫卡的妹妹奥特拉有时参加她们的活动。布拉格的《自卫》周刊时常报道这个俱乐部的活动。

[92]演讲家艾米尔·米兰教授（1850—1917）。

[93]参见1916年10月18日日记。

[94]女作家奥古斯特·豪施奈尔（1853—1924年）。这里谈到的小说可能是《洛沃西兹一家》，柏林，1908年出版。

[95]参见从玛丽恩巴德写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

[96]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联合会的蓝白歌集。

[97]这里说的是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匈牙利的宗教谋杀》，载于《犹太人的悲剧》，五卷本，柏林1914年出版。

[98]参见附录。其他和附件没有收到。

[99]卡夫卡多虑了。《判决》10月底就以库尔特·沃尔夫《末日审判》丛书第34册出版了。

[100]参看1916年10月24日明信片：“此外，这里有一个关于我的女法官……”

[101]奥斯卡·韦伯《糖果男爵》。讲述的是一个前德国军官在南非的经历。由马克斯·毕尔格尔插图，夏夫斯坦绿色丛书，第54卷，科隆1914年出版。卡夫卡特别喜欢读这些丛书，除了在瓦根巴赫提到（《传记》，第263页）的那几卷之外，他还读过：第18卷，《森林管理员弗莱克斯1812至1814在俄国的经历》；第32卷，《1870—1871的这一代》。参见1915年9月16日以及1913年12月15日日记。

[102]这里说的是亨利希·霍夫曼的儿童书籍。

[103]显然指的是那些反映夏奴卡历史的剧作中的段落。参见附录。

[104]这里说到的纸页没有保存下来。卡夫卡也可能说的是他附在10月30日信中的名单。

[105]这里说到的在这张明信片之前发出的几张明信片显然丢失了。

[106]这里讲的是他们在慕尼黑的见面。这次见面的时间是1916年11月10日至12日。

[107]这里说的是对卡夫卡慕尼黑朗诵（高尔茨艺术沙龙，1916年11月10日）的批评，载《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午间号外，1916年11月13日，第2页。（卡夫卡读到的第二篇批评载于《慕尼黑新闻》，1916年11月11日，第3页。）另一篇批评载于《慕尼黑报》，1916年11月12日，第2页。参见《卡夫卡研究》，第151页。

[108]里尔克和卡夫卡可能从未见过面。卡夫卡很可能是从欧根·蒙特那里听说里尔克对他的作品的评价的。里尔克是怎么看到那时尚未出版的《在流刑营》的，已经不可考了。他也许读的是手稿，因为手稿9月30日就到了慕尼黑，然后和欧根·蒙特谈起过它。参见欧根·蒙特的《慕尼黑一达骚，文学回忆录》（慕尼黑市立图书馆），第42页。——里尔克在1922年2月17日写给库尔特·沃尔夫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对卡夫卡创作的重视：“……卡夫卡的创作是您一定要替我注意的。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他的最坏的读者。”见沃尔夫的《通信集》，第152页；洛乌·阿尔伯特·拉萨德说，里尔克曾给他朗诵过《变形记》（《与里尔克同行》，法兰克福/美茵，1952年出版，第43页）。

[109]他的妹妹奥特拉在安静的炼金术士胡同修了一间小房子。她把这间房子给了她这个对噪音十分敏感、想在那里找到清静来创作的哥哥。不过，卡夫卡并不在此过夜。他晚上——有时在凌晨——回到他在朗格胡同（后来是在舍恩波宫附近）的住处。参见雅诺施的插图《卡夫卡和他的世界》，第130页。

[110]前面提到过的艾米尔·米蓝12月7日在科拉利昂大厅演讲；鲁道

夫·伯夏特同日在柏林爱乐乐团的大演奏厅作了一个报告：“战争和德意志的决定”；12月6日晚上，鲁道夫·布吕姆内尔在“狂飙”艺术展上朗诵了赫尔曼·艾斯希的中篇小说《路希》。

[111]参见雅诺施插图本《卡夫卡和他的世界》，第127页。

[112]参见1916年12月底至1917年1月初的信件。

[113]参见1917年1月3日给哥特弗里德·科威尔的信。卡夫卡在信中对科威尔寄来的诗表示感谢。《通信》，第153页。

[114]谈到这次“无耻”事件的明信片显然是没有收到。

[115]参见《卡夫卡，一个布拉格人》插图，第28号

[116]市场胡同一侧的美泉宫，365/15。卡夫卡1917年3月初到8月底住在这里。参见雅诺施《卡夫卡和他的世界》插图，第132页。

[117]这封信的副本——或者说是底稿——在卡夫卡的遗稿中发现，并立刻由马克斯·勃罗德（《传记》，第192页）发表了。

[118]未收到。

[119]菲莉斯刚刚——也就是9月20日至21日——才到屈劳看望了卡夫卡。关于菲莉斯的告别参见下一封信和1917年9月21日日记。

[120]参见1917年9月至10月日记，以及1917年10月初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

致密伦娜情书

叶廷芳 黎奇 译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我在布拉格和美兰曾先后给您写过一封短信，至今未得到您的任何答复。这些短信并不是非马上答复不可的。人在生活比较优裕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写信，因此，假如您的沉默仅仅是表明这种迹象的话，我便满意了。但也有其他可能（因此我才写这封信），即我的短信中有什么话伤害了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真要恨死我这处处跟自己意愿作对的粗笨的手了）；或者（那就更糟了）您心平气和地书写的时刻已经过去，而现在又处于一个恶劣的时期。对于第一种可能，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在这方面比其他任何方面都要笨；对于第二种可能，我不想作任何猜测——怎么去猜呢？——我只想问：您为什么不离开一下维也纳，出来走走呢？您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走投无路呀。在波希米亚小住几天难道不会给您增添新的力量吗？假如您出自什么我所不知道的原因而不愿意到波希米亚去，那就到别的地方去好了，也许美兰就不错。您知道这地方吗？

我期待着两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要么您继续沉默下去，这意味着：“别担心，我过得不错。”要么写几行字来。

卡夫卡 谨上

于美兰—翁特尔麦斯，奥托堡公寓^[1]

我突然想起，其实我已记不起您的面容的确切模样了。只有您从桌子中间走过、离开咖啡馆时的模样，您的形象，您的服装，还历历在目。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您在维也纳浑浊的环境里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不知为什么，这总叫我既感动又羞愧。您大概已经收到沃尔夫^[2]的信了吧，他在前些日子给我的信中提到，他曾给您写过信。书目中出现的中篇小说《杀人犯》不是我写的，这是个误会；也许由于这是最好的一本，所以那种说法可

能是对的。

从您上一封和再上一封信中看出，您已完全、彻底地摆脱了不安和忧虑，那么这跟您的丈夫一定有关吧，我由衷地为你们两位祝福。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弗兰茨凯大街沿着墙壁行走时，碰上您的丈夫迎面走来，他的风度并不比我像样多少，我们俩都是“头痛专家”，当然性质完全不同。我已想不起来，当时我们是一起走呢，还是让过对方，各走各的，这两种情况的区别想必不很大。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应该完全把它置于脑后。您在家过得好吧？谨致衷心问候。

您的 卡夫卡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一连下了两昼一夜的雨刚才停了，也许只是暂时的，但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便以给您写信的方式来庆贺。再说，这雨本身也是好受的，它在这儿有一种异地味道，尽管只有那么点儿，却也叫人心里舒坦。假如我的印象正确的话，零星地回忆那多半默默无语的、短暂的共同生活，显然是回忆不完的。您也曾因维也纳的异地风味而喜悦，这风味以后可能会被笼罩着那儿的气氛所污染，但是这污染了的异地风味也会使您喜悦吗？（也许这是个不妙的迹象，本来不该这么写。）

我在这儿过得挺好，凡人的肉身几乎不能领受大自然更多的赐予了，我的阳台淹没在花园之中，周围、头顶长满了鲜花盛开的灌木丛，还有骄阳的照耀（或者像一周以来那样，为乌云密布的天空所笼罩）。这儿的植物很怪，在布拉格积水潭都快结冰的天气里，我阳台前的花朵却慢慢地绽开着。壁虎和鸟，姿态各异、成双结对地来拜访我。我多想把美兰赐给您啊！最近您在一封信中提到您“呼吸困难”，象征和实际含义在这儿十分接近，假如您到这儿来，在这双重含义上事情总会有所缓解的。

谨致

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F.卡夫卡

美兰—翁特尔麦斯，奥托堡公寓

哦，肺的问题，我脑子里整天想着这件事情，别的什么也不能想。并不是说我对这种病特别害怕，也许（您的暗示似乎也这么表明）它在您身上只是轻微的，但愿如此吧；而且就算是真正的肺病（其实有半数西欧人的肺多少都有点儿毛病），就像三年来我自己所领教的，给予我的好处还是比坏处多。大约三年前我半夜突然咯血。我站了起来——就像一切使人们激动的新鲜事那样（照理说我应该躺着，这是我后来从医嘱中才知道的），当然有些惊恐，我走到窗前，探出身去，然后走向盥洗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坐在床上——不停地咯血。但我没有伤心，因为我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来：在长达三四年几乎连续失眠之后，我将第一次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当然前提是不再吐血。咯血果然停了（从此就没再犯过），我在当夜剩下的几个小时内睡了一觉。早晨侍女来了（那时我住在逊伯伦宫中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位好心的、几乎具有献身精神又特别实在的姑娘。她看到了血，说道：“博士先生，您的日子不会长了。”^[3]可我的感觉却比以往好。我到办公室去上班，下午才去看医生。接踵而至的事情就不必多说了。我要说的只是：惊吓我的并不是您的病（尤其是我不断联系自己的经历去想，搜索枯肠地回忆，从您的状况的全部柔和性质看到的那种几乎是田园般的清新，并据此断言：不，您没有病，这只是一种警告，但不是肺病），惊吓我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我对引起您这一状况的几种因素的考虑。首先我将您信中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如：一文不名——茶和苹果——每天从2点到8点。这些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显然只有当面才能解释清楚。于是我便刨去这些（当然仅仅指在信中，要忘掉这些是不可能的），而只去想当时在我发病时能说得通，并且对许多情况都说得通的那种解释。也就是说：大脑已不再受得了压在它上面的忧虑和痛苦，它说：“我干不了啦。这里还有谁愿意为保持整体而出力的，它便可以从我的负担中取走一份，这样便可以再坚持一会儿。”肺自告奋勇，它自己不会因此而损失过多的。大脑和肺之间的这种谈判（是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是很可怕的。

您现在怎么办呢？只要人们对您稍许照料一下，可能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您必须得到些许照料，这是每个爱您的人定会明白的；至于其他一切则不必管它。那么这也是一种解脱^啰？我曾以为是的。——不，我不想开玩笑，我根本不是个快活的人，在您写信告诉我您将怎样更健康地重新选择生活方式之前，我不会变得快活的。接到您上一封来信后，我明白了您为什么不离开维也纳略事旅游的原因，我也不想再提这个问题了，但就在维也纳附近也有很美的去处，也有一些使您得到照料

的可能性。今天我不写别的什么了，目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需要向您说的了。其他一切明天再写，包括对那令我感动又羞愧、伤感又高兴的本子的感谢。不，今天还得说一点：只要您哪怕将一分钟的睡眠时间用于翻译工作，那就意味着您将对我进行诅咒。因为假如有一天走上法庭，人们将无须作进一步的调查，便可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他夺去了她的睡眠时间。这样我便会被判罪，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如果说我请求您不要再这么干，这是因为我自己也在斗争。

您的 弗兰茨·K.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今天我本想写点别的，可是做不到。这并不是说我真的那么想写别的事；假如我真的这么想，那就会写别的了。但是总该在园子里的阴凉处为您放个躺椅，在您的手够得着的地方放上十来杯牛奶。在维也纳也可以，尤其是这样的夏日，不过这地方必须是个安静的去处，且不愁饮食。这不能办到吗？难道就没人为您张罗这些事吗？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当我从大信封中抽出这个本子时，我几乎失望了。我想听您说话，而不是想听从旧沟壑中冒出的我已经熟透了的声音。这声音为什么要插入我们中间呢？直到后来我突然想起，这声音曾在我们之间起过媒介作用。此外，您对自己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这使我感到难以理解，而您怀着如此真诚的感情干了这件事，这又使我非常感动。您来回调整句子的顺序，这真诚的感情显示出的可能性和美妙的、天然的合理性，使我在捷克语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德语和捷克语竟是如此相近吗？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几乎逐句逐行地给您指出来；只是如果这样做，那就太使我反感了。您喜欢这个故事，这自然赋予它以价值，但却使我眼前的世界稍稍黯淡了一些。不说这些了。《乡村医生》^[4]将由沃尔夫寄给您，我已写信跟他说了。捷克语我确实懂得。有好几次我曾想问您，您为何不试试用捷克语给我写封信来。我并不是说您的德语不熟练。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德语熟练得令人吃惊，偶尔出现错误的时候，德语会自觉地向您鞠躬赔礼，而后它就显得特别美；就是一个德国人也不敢奢望他的母语会给他这样的待遇，他们不敢无所顾忌地写自己的感受。我想读您用捷克语写的东西，是因为它是您的母语，在那里密伦娜才是完美无缺的（您的翻译已经证实了这点）；而在这里，即在您写的德语里，则只有

来自维也纳、或者为维也纳准备的那一部分密伦娜。因此用捷克语写吧，我请求您，还有您信中提到的那些小品文，就算它们是些鄙陋的东西吧。您不也通读了这个鄙陋的故事了吗？读到哪里为止？我不知道。也许我也会这么做的；但如果我不能这么做，我就会抱住我那最好的成见不放。

您问我订婚的事。我曾两次（说具体点是三次，因为两次与同一姑娘）订婚，三次解约时都离婚礼只有几天。第一门亲事已经完全过去（我听说她现在已结婚，并有个男孩），第二门婚事还存在着，但没有任何成婚的希望，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它独立存在着，但却要人来为它付出代价。总之我从这里和别的地方都发现，男人在这种情况下更遭罪，或者说（如果要这么看的话）比女人更缺乏抗拒的能力。女人却总是无辜地受罪，诚然不是说她们对此“无能为力”，而是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这显然最终仍要汇入到“无能为力”之中去的。再说，反复思索这些事是没用的。就好比您费尽力气要打烂地狱里的锅炉一样。首先，这是办不到的；其次，即使办到了，砸锅炉者虽然在飞快流出的热体中被焚为灰烬，而地狱却仍丝毫不为所动，堂而皇之地照样存在。此事必须另辟途径。

不管怎么说，首先应该在一个花园里躺下，尽可能地享受这疾病（特别是假如这不是真的病的话）的甜美。这里面有许多甜美的滋味呢。

您的 弗兰茨·K.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首先，我坦白地告诉您，免得您与我的愿望相违。从我的信中可直接觉察出来：大约两周以来，我忍受着日复一日的失眠。我并不把它看成完完全全的坏事。这样的日子反反复复，总还有一些原因（可笑的是，照贝德克的说法，连美兰的空气都可能是起因），即使有时那些起因几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总是令人目瞪口呆，使您像林中野兽一般烦躁不安。

有一点对我却是很大的安慰：您睡得很好，尽管是“奇怪地”，尽管昨天还有些“失常”，但毕竟睡了个好觉。当夜间的睡意从我身边掠过时，我知道它此行的去向，也予以默认。对此进行反抗是愚蠢的，睡眠

是最无辜的事情，而失眠者则是罪孽深重的。

而您在上封信中恰恰对这么一个失眠者表示感谢。假如一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读到这儿，一定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像完成了移山填海的伟业似的。”其实他在这期间什么也没干，连指头都没动一动（握笔的指头除外），靠牛奶和好东西度日：眼前并不总是放着“茶和苹果”（尽管经常如此），此外，一任事物自由发展，一任山和海躺在它们的老地方。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吗？这是个归纳了很多道理的故事，我在此引用它，仅仅因为引用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能使人快乐，而一个发生在周围的、甚至更近处的故事往往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故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更别提人物姓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时，同一个文人朋友格里高列夫住在一起。这位朋友尽管数月之久一直看到桌上摊着写过的纸，却直到小说写完才得以一读。他读着小说，被深深地感动了，未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就带着文稿去找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涅克拉索夫。夜间3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铃响了。来人是格里高列夫和涅克拉索夫。他们闯进房间，热烈地拥吻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认识他的涅克拉索夫称他为俄国的希望。他们谈着话，主要谈这部小说，共谈了一两个小时，直到早晨他们才告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后来总把这一夜称作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靠在窗旁，看着他们的背影，抑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他的基本感觉（我已经想不起来，他在什么作品中写到过）大体上是：“多好的人啊！他们多么善良而高尚！而我是多么卑贱。假如他们能看透我的内心，他们会怎么想啊！假如我如实告诉他们，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我的故事到此结束了。至于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下决心向他们看齐，则是无须赘言的，这只是不可战胜的青年时代必不可少的结束语，而不属于我意欲引用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您觉察到了这个故事的匪夷所思的神秘之处吗？我想大概是：格里高列夫和涅克拉索夫肯定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尚，这是从总的方面而言的。现在您不去看总的（陀在那个夜晚也并没有要求这一点，而且这在具体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用处），而只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话，您就会相信格和涅确实了不起，而陀则不纯洁，卑贱得不得了。这当然使得他即使从远处看格和涅也不可企及，永远谈不上报答他们那宏伟的、受之有愧的壮举。他只能从窗台上看着他们远去，以此喻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可惜这个故事的含义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伟大的名字抹去了。我的失眠将把我引向何处呢？肯定引向子虚乌有，假如这“子虚乌有”含义不怎么好的话。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只写几句话。明天我一定再写信给您，今天仅仅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而写，亦即为了我本人所做的某件事情，为了想将您的信造成的日夜压着我的印象稍稍减轻一些。您很特别，密伦娜夫人，您住在维也纳那边，要忍受种种痛苦，却有时间对别人（譬如我）这一夜比上一夜睡得差一点表示惊奇。我这儿三位女友（三位姐妹，最大的五岁）的看法比您理智，只要一有机会，不管我们是否在河边见面，她们就要把我扔到水里去，而这不是因为 I 干了什么坏事，根本不是。假如大人这么吓唬孩子，这当然是开玩笑和爱的表示，它意味着：现在让我们说说最最不可能的事情来开心一下吧。但孩子们是严肃的，她们不懂得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十次扔不动，她们也不会相信下一次还会成功，她们甚至不知道，这十次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假如用大人的知识来理解孩子们的意图，孩子们便让人感到无名的恐惧。这么一个四岁的小孩只能吸引人们去吻她、抱她，而她像个小熊一样强健，婴儿时期给她还留下个鼓鼓的肚子。假如她向您发起进攻，而两个姐妹一左一右地帮助她，而您身后又是栏杆，这时她那和善的父亲和温柔、美丽、胖胖的母亲（站在第四个孩子的摇篮边）在远处向您微笑，却不想插手助你一臂之力，这就差不多算完了，已经几乎不可能想象你会得救。明智的、或者说是感觉敏锐的孩子们要把我扔下去，没有任何原因，也许她们把我看成是多余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您的来信和我的回信的内容。

您不必为上封信中的“好意的”而害怕。这是一段对我来说并非少见的完全失眠的时间。我写下了这个经常与您不无关系的故事，但当我写完时，我左右太阳穴均处于紧张状态，以致我已不能清楚地思考一下为什么要叙述这故事了。此外，当时我还有一大堆形象模糊的事要向您叙说，我在阳台的躺椅上曾想要向您说的，于是我只能把我的基本感觉写下来，现在我好像只能这么做了。

我以前出版的全部作品您都有，只有我最近出版的《乡村医生》一书您还未拿到手。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沃尔夫会寄给您的，至少我在一星期前已为此事给沃尔夫写了信。现在没有什么书在付印，我也不知道今后会出版些什么。您为这些书和翻译本所做的一切将是正确的，可惜我自己并不觉得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因此将它们交给您才是真正表达了我对您的信任。能对《司炉》写几句您所希望的说明我很高兴，因为

这样我真的可以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了。这将意味着预尝一下那种地狱刑罚的滋味，即：以睿智的目光重新审核一遍整个生活之路，从而看到，最坏的事情并不是识破那些显而易见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善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写作总是好事。我的心情已经比两小时前拿着您的信躺在外面躺椅上的时候安宁些了。当时我卧在躺椅上，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有一只摔了个底朝天的甲虫，正在绝望地挣扎着，翻不过身来。我很愿意帮它一把。帮它倒很容易，只要跨出一步，用脚尖碰它一下就行了，但是您的信使我忘记了它的存在，我也站不起来，直到一只壁虎出现才使我又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个小生命。壁虎爬的路正通向甲虫那儿，甲虫则一动不动，我想：这不是遭难，而是在同死亡作斗争，是天然的动物装死的罕见景象。当壁虎从它身上擦过时，顺带地使它翻了个身，它仍然一动不动地趴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竭尽全力地沿着墙爬了上去。不知怎的，我好像从中又汲取了一点勇气，于是站起来，喝了牛奶，便开始给您写信。

您的 弗兰茨·K

明天我要寄给您的说明，只有几页篇幅，内容空空洞洞，译文那不言而喻的真实性（假如将“不言而喻”从我身上抖落下来）不断使我惊讶，几乎没有误解之处。仅仅这样恐怕还算不了什么，更令我惊讶的是如此强劲而坚定的理解。我只是不清楚，是不是捷克语给了您忠实的翻译能力。对我来说，这是翻译的最理想的语言（不是因为故事本身的要求，而是因为我的缘故）；我的捷克语感（我也具有这么一种语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这是由于带有特别强烈的偏爱。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挑您的毛病，我的感激之情可抵消您所受到的刺激。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是的，这样的抬头成了累赘，但这却是病人们在这不安定的世界中可以赖以支持自己的扶手之一，假如病人们感到这扶手变成累赘，那还不是他们病症痊愈的证明。）我从未在德国人民中生活过，德语是我的母语，因此对我来说是自然的。然而捷克语却使我感到亲切得多，所以您的信将某些不安定的因素撕得粉碎，通过它，我对您看得更清楚了，看到您的身体、手的动作那么迅疾，那么坚定，简直像我们互相见了面一般；当然，在我试图将目光抬到您的面孔的高度时，信中便喷射

出火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于是我眼前看见的只有熊熊的火光了。

这可能会诱使我去相信您所提出的生活法则。您不会因为自己据称是处于其中的法则而感到遗憾，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提出这种法则只能意味着高傲和自大（*já jsem ten, Ktery plat*）[6]。对您为这法则所作的尝试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能静静地吻您的手。就我而言，我是相信您的法则的，我只是不相信，它会永远这样赤裸裸地残忍而昭著地悬于您的生活之上，这虽然是一种认识，但只是在道路上的一种认识，而这道路是无穷无尽的。

您生活在烧得太热的火炉中，这对一个其理解力限制在凡人范围内而不受上述影响的人来说，生活在其中是可怕的！我希望能有一回只谈我自己。假使将整体作为一道习题来看，那么您在我面前曾有三种解法：比如说您可以根本不谈自己，那您就使我丧失了认识您的幸福，更不幸的是，您将使我失去以此来检验我自己的可能性，您也可以向我隐瞒或者美化一些事情。您现在还可以这么做，但我在目前状况下对这些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即使我不说出来），而这会使我们倍感痛苦。那么这个您也不能去做。于是剩下的只有第三种可能性了：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拯救自己吧。你在信中已显示出一个小小的可能性。我从您的信中经常读到安宁和稳固，当然还经常读到一些别的什么，如在结尾处则读到：“*reeln hruza.*”[7]

您对自己的健康所谈的（我的健康状况是好的，只是在山野空气中我的睡眠情况不佳）不能使我满意。医生的诊断我并不认为特别有利，不如说既不是有利也不是不利，只有您的举止可决定人们应如何理解这一诊断。无疑，这些医生是愚蠢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他们并不比其他蠢人蠢，但他们的自负是可笑的。因此必须估计到：从人们请他们帮忙的时刻起，他们就越变越愚蠢，而这位医生目前所要求的，既不是很愚蠢也不是不可能。不可能的是您真的会得病，这种不可能性将保持不变。您同这位医生谈过后，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主要问题。

下面请您允许我再提一些次要的问题：为什么您没有钱花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如您信中所说）以前在维也纳同许多人交往，而现在同谁都不往来？

您不想将自己的杂文寄给我，这就是说，您不相信我能将这些文章在我对您的整个看法中置于正确的位置。那好吧，在这一点上我对您生气了；当然这并非不幸，因为如果在心灵的一角还留有为您生点气的余地，这样，作为一种平衡倒是很不错呢。

您的 弗兰茨·K

首先^[8]，密伦娜：您星期天是在怎样的一套住房里写信的？宽敞而且空空荡荡？您独自一人？日夜如此？

在一个美丽的星期日下午，独自坐在一个“陌生人”对面，他的脸只是“写满了字的纸”，当然是令人心情阴郁的。我的情况却要好得多。我的房间虽小，但是真正的密伦娜在这儿，她显然是星期天从您那儿跑来的。请您相信，同您在一起是多么美好！

您抱怨自己没用。在其他日子里情况并不是这样，今后也不会是这样。这个句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说出来的？）使您惊骇，但它是这么清楚，因此它曾经是说过、想过无数遍的了。一个被他自己身上的魔鬼折磨着的人，无意识地向身边的人作报复。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您想要完全解脱出来，但不成功，您就说自己没有用处。谁可以做出如此可笑的事情呢？没有人成功过，比如就是耶稣也没有成功。他只能说：“跟着我。”然后说出这句伟大的话（可惜我一定会引错）：“照我的话去做，这样您就会看到这不是一个人的话，而是上帝的话。”至于那些魔鬼，耶稣只是将他们从跟着他走的那些人身上赶走。但这也持续不了许久，因为他们一旦离开他，他也就失去了作用和“用处”。当然——这是我向您承认的唯一的一点——他也经受不住诱惑。

星期五

今天傍晚我独自去散步，一个人走这么长时间实际上还是第一次。平时我总是同其他人一起走的，要不，通常就在家躺着。这是怎样的大地啊！您，可爱的天空，密伦娜，要是您在这里该多好啊。哦，您那可怜的、无力思索的头脑！这时假如我说，我惦念您，那不是谎言才怪哩，这是多么完美、多么令人痛苦的魔幻啊！您就在这里，和我一模一样，并且比我强壮；我到哪里，您便在哪里，和我一模一样，比我强壮。这不是玩笑，我设想着：您，确实在这里的您，因我不在而怅然，并问：“他到底在哪里呀？他不是写信说，他在米兰吗？”

我的两封回信您收到了吗？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这一天是这么短，与您一起再加上几件小事，就这么度过了，结束了。几乎没有片刻时间让我给真正的密伦娜写信，因为更真实的密伦娜从早到晚都在这儿，在房间里，在阳台上，在云雾中。

您上一封信中的清新气息、舒畅心情、无忧无虑由何而来？发生什么变化了吗？或者是我搞错了，要不，就是那几篇散文所起的作用？或者说，您善于自我控制，因而心绪显得很好？到底是什么原因？

您的信的开端带有审判的语气，我这么讲是认真的。您的责备“c ne tak docela pravdu”[9]是有道理的，就如您对“dobrěmíněno”[10]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是有道理的一样。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我恰如我信中所说的那样，心中始终充满忧虑的话，我在躺椅上便会再也待不下去，什么也阻挡不住我，一天之后我就会出现在您的房间里。这是对真实性唯一可靠的检验，其他一切都是空话。或许还有对基本感情的呼唤，然而这感情实际上是沉默着的，未派上用场而已。

您怎么会对那些您所描写的可笑的人们（您是爱描写的，因此写得生动极了）、还有那个问话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不感到厌烦呢？您有裁决的权力，妇女是最终的裁决者（关于巴黎的传说使这一点黯淡了些，但哪怕是巴黎也只是对女神的最终裁决中之最强者作出裁决）。这也许与可笑无关，可能只是一时的可笑，而从整体上讲它将会变得严肃而和善的，是否这一希望促成您留在这些人那儿？谁也不能声称自己知道女法官暗在想什么，但我却有这么个印象：您对这些可笑现象采取了宽容的、理解的、爱的态度，并通过您的爱使它们变得高尚。这些可笑现象不啻是一群狗在东奔西窜，而主人则横贯着行走，并非正好走在中间，而是恰恰朝着那条小路所延伸的方向走去。尽管如此，您的爱将具有某种意义，我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只是我对此不得不发问，并感到奇怪），这还使我想起我那公司里一个职员说的话（在这儿只是为了强调他的意见的可能性）。几年前我常去莫尔道河上的西冷特伦克，在那儿逆水划船，然后伸展四肢平躺在船上，顺流而下，从桥下穿过。因为我

很瘦，从桥上看一定很可笑。那个职员有一次从桥上看见了我，在充分强调了我的可笑样子后，可把他的印象归纳为：我看上去就像是在审判的末日时刻那样。这或许可以说像棺材盖已打开，而所有死人仍躺着不动的那个时刻。

我作了一次小小的旅游（不是我提到过的那次大型的旅游，那次大型的旅游吹了），回来后累得我几乎有三天什么事都不能干（但这种累却并非不舒服的），甚至不能书写。三天里我只能阅读，读那封信，读那些文章^[11]。我认为，这样的散文并不是为它们本身而存在，而是通向一个人的路上的一种路标。人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兴，直到在光线明亮的一瞬间才发现，根本没有向前走，而只是在他自己的迷宫中来回乱跑，只是比平时跑得更加激动，更加迷乱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写这些东西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作家。读完之后，我对您的文笔的信任感与我对您本人的信任感几乎没有区别了。捷克语我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一种语言的音乐，如波契娜·涅姆科娃^[12]使用的那种语言；而您的却是另一种音乐，但在坚定、热情、可爱，特别是目光敏锐的聪明方面与那种语言相近。这是近几年来才开始的吗？您以前也写吗？您当然可以说，我事先便怀着可笑的偏爱，您说的也有道理，我确实是有偏爱的，但是偏爱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我在这些文章中（这是些不相同的、部分风格已被报纸破坏了的的作品）初次发现的一些东西，而是重新发现。有两处迷惑了我，使我将那篇支离破碎的时装介绍文章也当成是您的了，从这一点上您便可以发现我的判断是没什么价值的了。我很想把这些剪报留下来，至少让我的妹妹们阅读，但因为您急着要，我只好随信附上了。我也看见边上的计算公式了。我对您的丈夫的看法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在咖啡馆里的人们之中，我觉得他是最可信赖的、最明智的、最冷静的人，几乎有点儿过分慈祥的味道。当然也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但这后一点并不至于取代前面那些。我对他一直是尊敬的，但没有其他机会能使我对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不过朋友们（尤其是马克斯·勃罗德）对他评价很高。只要我想起他，这些评价就会在耳边回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他的一个特点：晚上不管在哪家咖啡馆，总有几次接到别人打来的电话。我想一定有什么人不睡觉而坐在电话机旁打瞌睡，头靠在椅背上，每隔一段时间便惊醒过来打电话。我很理解这种状况，这也许是我写这些的原因吧。

您的 弗兰茨·K

您是怎么看的？星期日之前我还能收到一封信吗？要能收到多好啊。但这种对信的奢望是荒唐的。一封信难道还不够吗？心中有数不就行了？这确实够了，尽管如此，人们却伸展四肢地躺着，吮吸着信，除了不想停止吮吸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您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吧，密伦娜，我的老师！

现在我别的什么都不谈，只想谈一点（您的信我还没有仔细看，只是浏览了几遍，就像蚊子围着火光飞舞，小脑袋多次被烧灼。此外，我还发觉，这是两封截然不同的信，一封叫人吮吸不止，一封则令人惊恐，但后一封大概是后来写的）：

假如有人碰见一个熟人，紧张地问他：二乘二等于多少，这可是一个属于疯人院性质的问题了，但在小学一年级这却是很正常的。密伦娜，现在我对您提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它两种性质都有，疯人院的和小学的，幸亏这儿还有一点儿小学的性质呢。假如有人因为我而伤脑筋，我总是感到完全不能理解，我出自一种合乎逻辑的、总是相信别人的谬误甚于相信奇迹（对我来说仅仅是奇迹的东西）的精神机制，破坏了一些人情关系（魏斯^[13]便是个例子了）。

我想过，为什么还要用这样一些东西把本来就混浊的生活之水搅得混浊不堪呢？我看见我面前有一段路，我认为是可行的。我知道，在离我现在这个地方十分遥远处，有我根本达不到的地方。我得到仅仅是偶尔的一瞥（我的一瞥，怎会是别人的呢！），我只配得到偶尔的一瞥（这不是谦虚，假如您仔细想一想，便会发现这是由于高傲），而我现在得到了——您的信件，密伦娜。我应该怎么说明这个区别呢？一个人躺在他临死的床上，肮脏得很，散发着臭气，这时死亡天使来了（在所有天使中，她是最善于施恩的），注视着他。这个人难道敢去死吗？他转过身去，这才真地埋在床里了，死亡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简而言之：我不相信您在信中对我说的，密伦娜，不管以任何方式都不能向我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个夜晚也不能向任何人证明，而我的生命只有一夜之久），这只能由我来加以证明。我可以设想自己是有能力的（犹如您有一次设想一个男人躺在躺椅上一样），可是我也不相信自己有这种能力。因此这个问题是一种可笑的应急手段（您当然可以马上发现），正如一个老师有时疲倦了，充满期望，想通过学生的一个正确回答来欺骗自己：这个学生对此是真的懂了吗？其实该学生只是由于某种不重要的原因知道了答案，并没能从根本上理解，因为只有这位老师能

告诉他应该怎么理解。但要达到这一地步，不是通过呻吟、抱怨、抚摸、请求、梦想（您还保存着最近的五六封信吗？您应该重读一下，它们都属于整体）获得的，而只有通过——听之任之。

我匆匆读您的信时，看到您也提及这位姑娘^[14]。不容置疑的是：撇开暂时的痛苦不谈，您对这位姑娘表示了最伟大的善意。我只能以此方式设想：假如她从我身边走开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尽管她会产生一种痛苦的感觉，但她的目光丝毫不会注意到我身旁座位的温暖（虽令人害怕，但对她来说却没什么可怕的）从何而来。我记起：在乌勒索维茨的一套单间住房里，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记得是11月份，这间住房再过一个月将成为我们的共同住房了），她至少会为付出许多精力后终于能占有这间住房而高兴，而且身边坐着未来的丈夫（我重申一遍：正是我突然起了结婚的念头，正是我把这事和婚姻牵扯在一起，而她一开始就震惊不已，违心地顺从，后来当然对这一想法也习惯了）。只要我想起这一幕的种种细节（多得胜过发烧时心跳的次数），我便相信人类所有头脑发昏的事例（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曾头脑发昏达数月之久，但不仅仅是头脑发昏，也有其他考虑，由此可见这本来也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理智婚姻的），我对这些事例理解得非常透彻，所以害怕把牛奶杯举到嘴边，害怕它不是出于偶然、而是蓄意在我面前炸开，让碎片扎得我满脸都是。

一个问题：人家对您的责备是什么？我也给一些人造成过不幸，但是他们并没有不停地责备我，他们只是沉默不语，我觉得，他们内心并没责备我。我在人与人之间就处于这么一种例外的地位。

但是这一切与我今天早晨从床上起来时想起的一个主意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主意使我入了迷，以至于我洗完脸、穿上衣服时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做的，要不是一个来客唤醒了我，我还会在这种情绪中把胡子刮完呢。

这主意简要说来就是：您离开您的丈夫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已经有过一次先例了。理由是：您的病，他的神经质（您这么做也能使他轻松一下），再就是维也纳的状况。我不知道您要到哪里去，最好能去波希米亚任何一个安宁的所在。要是我自己不插手，也不表态，那是再好不过了。需要的钱您暂时从我这里拿（关于怎么偿还我们还可以商量。我在此只提一个也许我能从中得到的次要好处：我将成为一个热衷于工作的职员——话说回来，我的工作轻松得可笑又可卑，这

您也许无法想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赚到钱)。假如每个月这笔钱有时不太够，所缺的零头您总有办法轻而易举地解决的。

我暂时不再夸耀这个想法了，但是您可以对此作出判断，从而向我表示，我是否可以信任您对我以往的主意的判断（因为我确知这个主意的价值）。

您的 卡夫卡

星期四

在读完这封可怕的（但不是连骨子里都可怕的）信后，现在要我对刚收到信时的喜悦表示感谢就不那么容易了。今天是节日，一般信件是不会来的，明天星期五是否会收到您的什么，仍很难说，所以这是一种令人沉闷的寂静，但只要有您的消息，就毫无凄凉之感。您在前几封信中是那么强大，我从这儿看着您，就好比我从这躺椅上认出雪峰上登山者的身影后便会紧盯着他们一般。现在，信在午饭前来了，于是我可以带上它，再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又塞进口袋里。与一封信嬉戏是多么有趣，看着它们，就像看到孩子们一样高兴。我不能总是注意到坐在我对面的将军和工程师（他们是很好的、很和善的人），更顾不上听他们说话、吃饭（我今天又开始吃饭了，昨天什么也没吃），不再使自己厌烦。在饭后通过谈判解决的算钱游戏中，我觉得简短的问题比长长的解答要清楚。与此同时，我从敞开的窗户望出去，自由自在地望着枞树、太阳、山峦、村庄，以及在这一切之上屹立着的对维也纳的预感。

然后我便仔细地读起信来，就是说我仔细地读星期天的来信。星期一的来信我推迟到接到您的下一封信时才读，信中有些事情使我不能仔细地读下去。我显然还没有完全康复，再说这封信也有点过时了。我算了一下，已有五封给您的信正在途中，即使又有一封丢失或者挂号信走得较慢，现在至少应该有三封已经到了您的手中。我只想请求您，马上再给我回封信，寄到这里来，一句话也就够了，但必须是一句能够消除这封星期一来信中所有责备的果断的话，使一切变得可以细读。再说，那个星期一正是在这儿（以并非毫无希望的方式）使劲地摇撼自己的理智的时候。

现在读另一封信。——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我曾多次不确定地答应了那位工程师以后，今天肯定地答应到他那儿去，去看看他的孩子们那

些了不起的、不能带到这儿看的照片。他年纪不比我大多少，是巴伐利亚人，工厂主，懂得很多科学知识，也很风趣、明智，有过五个孩子，只有两个还活着（为了他的妻子，他将不再要孩子了），男孩十三岁，女孩十一岁。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而他将他们置于同样分量的天平上。不，密伦娜，您别说什么反对平衡的话。

您的 F

明天再写。假如拖到后天，不要再“恨”，不要，我求求您。

我将那封星期天来信又读了一遍，它比我第一次读完所想的更可怕。密伦娜，人们应该双手捧着您的脸，盯着您的眼睛看，这样您会从别人的眼睛中认出您自己来，从此对您在那封信中写下的那些东西连想都不会去想。

什么时候才能将这颠倒的世界稍稍端正过来呢？白天带着枯竭的脑袋胡乱转悠（山上到处有美丽的废墟，我想我的大脑也可以变得这么美丽），躺在床上则不能入睡，最好的奇思妙想倒纷纷出现。譬如说今天我在补充昨天的建议时想起，您可以到施塔萨^[15]那儿去过个暑天。您曾在信中提到过她，说她在乡下。昨天我写过这样的蠢话，说有些月份钱可能会不够，这是荒唐的，钱将永远是足够的。

星期二早晨和晚上的信证实了我的建议的价值，这并非特别偶然，因为这个建议将被一切的一切证实是有价值的。假如说这个建议中有诡计——哪里又没有诡计呢？这是头庞大的野兽，需要时它也可变得很小，我会牵住它的鼻子的，在这方面连您的丈夫也尽可以对我放心。我夸大其词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可以依赖的。我不会去见您，现在不会，到时也不会。您将生活在您所喜爱的乡村（在这点上我们很相像，我说的是人烟稀少的乡村——整个中部山区还不是我最喜爱的，有树林，有湖泊）。

您错看自己的信的作用了，密伦娜。星期一的来信（jen strach oVàs）^[16]我仍然没有读完（今天早晨我试了一下，好一点了，我的建议使其中的内容部分地变成了历史，但我还是不能把它读完）。星期二的来信则相反（还有那张奇怪的明信片，是在咖啡馆写的吗？您对韦尔弗^[17]的谴责我会作出答复的。其实我根本不会答复您什么，您答复得更好，这很有意思），它使我在度过星期一来信引起的几乎不眠之夜后

已能安静下来，重新充满了信心。确实，星期二来信也有它的芒刺，它为了开路划开了自己的身体，但是您引导着它，您的所作所为中又有什么难以忍受的东西呢？（这当然只是一个瞬间，一个幸福与痛苦同时颤抖着的瞬间的真实性。）

F

星期五

假如对您不是什么难堪的事的话，您能否在谈到韦尔夫时为我的缘故说一些好听的话。——有些事可惜您不予回答，比如因您的信所引起的问题。

最近我又梦见您了，这真是个好梦，但我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在维也纳，但我根本不知道，然后我又到了布拉格，忘了您的地址，不仅忘了路名，还忘了您在哪座城市，一切都忘了，只有写信者的名字还不时在我脑海中出现，但我不知道应该拿它怎么办。也就是说我完全失去了您。我绝望地作了种种十分狡猾的尝试，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尝试都未进行下去，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尝试：我在一个信封上写上密伦娜，在下边写着“请你们把信送到，否则财政当局将蒙受巨大的损失”。我希望通过这一威吓把一切国家机器调动起来去找您。狡猾吗？您不要因此而对我有看法。只有在梦中我才这样令人难以捉摸。

我再一次将信从信封中抽出，这里还有位置：再用“你”^[18]称呼我一遍吧！（我不是要求您永远这么称呼，这我根本不需要。）

我算了一下：星期六写的信，尽管隔着个星期天，星期二中午便到了，星期二从侍女手中迫不及待地夺了过来，多好的通讯联系啊！星期一我应该坐车离开，把它发出去。

您在担忧，您真好，您少不了这些信。是的，上星期我有几天没握笔，但从星期六以来每天都在写，这样您现在应该相继收到三封信了，为此您将赞美那段无信的日子。您将看到，您的一切担忧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对您总的说来确实很生气，特别是您信中有许多东西令我不喜欢，那些小品文使我恼火，等等。不，密伦娜，对这一切您不必害怕，假如事情反过来，您倒应该为之战栗！

我收到了您的信，必须以我不眠的大脑答复您，这真不错。我不知

写什么好，老在字里行间转悠，在您的目光下，在您的呼吸中，就像在一个美丽的、幸福的日子。这日子在脑袋生病的时候，在人们极端疲倦之际，而且将于星期一出发，经过慕尼黑后，依然美丽而幸福。

您的 F

星期二

为了我的缘故您才跑回家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么，您并没有病，而我也不再为您担忧^喽？果真是这样，那我一点忧虑都没有了——不，现在我又像当初一样言过其实了。不过这种担忧就像您在我的看护之下，我用自己喝的牛奶喂您，向您灌输我呼吸着的、从园子里带来的空气，给您以新的生气。不，这么说太不够了，应该说，与我相比，您已成倍地吸进了新鲜空气。

也许由于种种原因，星期一我可能还不能启程，而要稍晚一些。那时我就将直奔布拉格，最近新开了一列从博岑经慕尼黑到布拉格的直快火车。假如您还想给我写几个字，尽可写来；假如我已经走了，别人会转寄到布拉格去的。

好好为我保重！

F

真是愚蠢的典范。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读到对西藏边境山中一个村落的描写时，我的心突然痛楚起来。这村落在那里显得那么孤零零，几乎与世隔绝，离维也纳那么遥远。说西藏离维也纳很远，这种想法我称之为愚蠢。难道它真的很远吗？

您看，密伦娜，度过一个几乎不眠之夜后，我躺在躺椅上，上午，光着身子，一半在阳光下，一半在阴影中。我怎么能入睡呢，我的睡眠轻飘飘的，总是萦绕在您的周围。我真像您今天信中所写的那样，会被“落到我怀里的东西”吓一跳，就像预言家们受惊时一样。他们说，他们是弱小的孩子（不管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听见有个声音呼唤他们，就会吓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他们把脚落在地板上，恐惧得大脑都快裂了。在这之前他们也听到过呼唤声，却不知道那可怕的音响是怎么进到这声音中去的——是他们耳朵神经太脆弱呢，还是呼唤声太强？——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不知道这呼唤声已经获得胜利，而且正是通过他们对这声音的预感性的恐惧而留存了下来。但这并不能给人以预言

的本领，因为许多人都听到过这声音，只是他们是否都配听到这声音。客观地说这是值得怀疑的；为保险起见，对此，还是坚决否认为好——当您的两封信到来时，我就这么躺着。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怯懦，每封信几乎都面目全非，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很容易看出，这不是出自您的天性，甚至可能不是出自我的天性，但几乎化成了我们的天性。这种怯懦只有在绝望中、顶多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

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像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

折磨人的误解正是由此产生的。密伦娜，对我的有些信您抱怨说，把它们朝各个方向都抖落遍也没有任何东西掉出来。但正是这些信，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它们里面我的心离您那么近，浑身血液是那么驯服，那么驯服于您。在那么幽深的密林深处，在寂静中憩息，这时人们除了说说诸如“透过树丛可以看见头顶上的天空”之类的话外，别的什么也不会说，而在一个小时后人们又会重复一遍同样的话。这些话中肯定“没有一句是未经过深思熟虑的”^[19]。这样也不会持续很久，顶多一会儿，马上不眠之夜的鼓声又会响起。

您想想看，密伦娜，我是怎么走到您身边来的，我已经走过了怎样的三十八年的人生旅程啊（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旅程实际上更要漫长得多）。如果说我是在一个拐弯处偶然看见您的话（我从来没有指望过会见到您，到了现在这般年纪更不会有这指望），那么，密伦娜，我不能叫出声来，我心中已没有叫喊声了；我也不会说千百句傻话，我心中也没有这些东西（当然在其他时候我干过的傻事够多的了）。我会跪下来，也许这样我才会得知，您的双脚就在我的眼前，那么近，我会去抚摸它们的。

您不要要求我正直，密伦娜，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再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了。很多东西正从我身上消失呢，一点不假，也许一切都正在从我身上消失。虽然这在狩猎场上能鼓舞士气，却鼓舞不了我的心。正相反，我会因此而迈不动步子。突然间一切都会变成骗局，被猎者会把猎人掐死。我就是走在一条如此危险的道路上，密伦娜。您站在一棵树旁一动不动，年轻、漂亮，您的眼睛把这世界的苦难反射到地上。人们在玩“小树、小树，换换个，小树”^[20]的游戏，我在阴影下从一棵树下潜行到另一棵树下。我正走在半路上，您向我呼叫，叫我当心危险，想给我以勇气，对我不稳的脚步感到惊恐，提醒我（我！）不要忘了这是游戏——但我不能，我倒下了，我已经躺下了。我不能同时倾听内心可怕的声音和您的声音，但我能听见那个声音并信赖您，您，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能信赖了。

您的 F

星期四

您这两页信纸上的言谈，密伦娜，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出自一颗受伤的心（to mrozbolelo^[21]写在那儿，作恶的是我，是我伤害了您），听上去是那么纯洁而自豪，宛似击中的不是心，而是钢，要求的是最不言而喻的东西，也误解了我（因为我那些“可笑的”人们真的恰恰是您的那些人，还有：我在哪里表示过我在你们两人中站在哪一个的立场上了？这个句子在哪儿呀？我那丑恶的主意在哪儿？我又怎么会对你们的事加以判断呢？我这人在任何现实方面——结婚、工作、勇气、牺牲、纯洁、自由、自立、真实——在你们两人中我陷得如此之深，以致要我对此发表任何看法都令我恶心。我什么时候胆敢表示给予积极的帮助呢？即使我有这个胆量，我又怎么能付诸实施呢？问题提得够多的了，它们本来在地下睡得正香，为什么要把它们召唤到地面上来呢？它们是灰暗的、悲凉的，它们的作用也是如此。请您不要说两小时生活无疑要比两页文字丰富吧，文字虽更贫乏，可是更清楚）。——所以您误解我了，不过，尽管如此，这番话却是跟我有关的，而我不是无辜者。奇怪的是，我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那种人，恰恰是因为以上问题只能用“不”和“哪儿都不是”来回答。

然后收到了您的可爱、可爱的电报，这是对付夜晚这个死敌的安慰剂（假如其作用不够大，那么这不是您的，而是夜晚的责任。这些短暂的尘世之夜几乎可以教会人们去害怕那永恒的长夜）。尽管那封信也包

含着很多美妙的慰藉，但它毕竟是一个整体啊，但却有那两页信纸在其中肆虐。电报则是独立的，它与此毫无关系。但是，密伦娜，我可以对着电报说：假如我不顾一切来到维也纳，而您面对面地对我说了信中这番话（这番话正如我刚才说的，不是从我身边擦过，而是向我身上撞来的，而且是撞得有理的，虽说不是撞个满怀，却也很有力），这番话无论如何也得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即使不是说出来的，那也肯定想过，用目光表示过，颤动过，或至少也设想过。不管以何种方式，我听到这番话便会像挨了当头一棒，直挺挺地摔下去，那就通过什么样的急救，您也无法叫我重新站起来了。假如事情不是这样，那么它只会更糟。您看吧，密伦娜。

您的 F

星期日

密伦娜，您对人的认识怎样？有时我对此怀疑过，比如当您写到韦尔弗的时候，话语中也带着爱，也许只有爱，但却是误解的爱。假如撇开韦尔弗其他方面不谈，只就您对他的肥胖的责备而言（这一责备我同样认为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韦尔弗一年比一年漂亮、可爱，当然我很少碰到他），难道您不知道，只有胖子是值得信赖的吗？只有在这种外壳坚厚的容器中，一切才可能煮熟、煮透。只有这些占有空间的资本家（就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而言）才不至于被忧愁和疯狂所侵扰，能安静地去干他们的事。正如有人曾经说过，只有他们才是全球可以通用的真正的地球公民，因为在北方他们会发出热量，在南方他们可给人遮阳（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过那样就不真实了）。

再有便是犹太教。您问我是不是犹太人。也许这只是说笑，也许您想问的是：我是否属于那种战战兢兢的犹太教。不管怎么说，您作为布拉格人，在这方面不会像海涅夫人玛蒂尔德那种人一样天真（也许您不知道这个故事。我觉得我应该向您叙述些比这更重要的故事，而且我无疑会受到伤害，不是由于这个故事，而是由于叙述本身；但您毕竟想听我说些有意思的东西。一个叫麦斯纳尔的波希米亚德语诗人，不是犹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玛蒂尔德老是大骂德国人，这使他恼火：德国人恶毒、狡猾、爱强词夺理、咬文嚼字、纠缠不休，总之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民族！“您根本不了解德国人，”有一次麦斯纳尔终于忍不住了，“亨利^[22]只跟德国记者打交道，在巴黎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不，不，”玛蒂尔德说，“您是在夸大其词，犹太人当然可能会有那么一个两

个，比如说赛弗尔特……”“不，”麦斯纳尔说，“他是唯一的非犹太人。”“什么？”玛蒂尔德说，“比如耶特勒，”——这是个高大、健壮、满头金发的人，“难道是犹太人？”“当然是的。”麦斯纳尔说。“可是班贝格呢？”“也是。”“阿伦斯坦？”“同样是。”于是他们把所有熟人都数了一遍。玛蒂尔德终于火了：“您拿我当猴耍，最后您会声称，科恩是犹太人的名字，但是科恩是亨利的一个堂兄弟，而亨利是个路德教徒。”^[23]这回麦斯纳尔无言以对了）。不管怎么说，看来您是不怕犹太教的。这是有关我们这些城市最近或稍近的一个犹太教的某种英雄行为，而这绝不是开玩笑——一个纯洁的姑娘对她的亲属们说：“让我走！”并迁到犹太人那儿去，这就比一个奥尔良的少女离开她的村子还要庄重。

这样一来，您还可以谴责犹太人那种独特的畏惧心理。尽管如此，这种一般性的责难所包含的对人的认识，其理论上的意义多于实际上的意义。说它理论上的意义更大些，是因为首先这个责难压根儿不适用于您以前所描绘过的您的丈夫^[24]；其次，根据我的经验，这对大多数犹太人不适用；第三，这只适用于个别人，这个别人却是非常坚强的，譬如我。最奇怪的是，这种责难普遍不适用。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内心的不安全，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站在这一切之上就可以把事情解释得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只有握在手中、咬在牙齿间的东西他们才认为是自己所有的。此外，为什么只有触手可及的财产才使他们感到拥有生活的权利；为什么他们的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这些东西却在欢欣地永远告别他们，漂流而去。从根本想不到的方面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让我们把危险二字去掉，以便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有些威胁在威胁着他们。”随便举个例子。虽然我好像保证过对此保守秘密（当我刚刚认识您的时候），只告诉您我没有什么顾虑，因为这对您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也表明亲戚们对您的爱。我不说名字和细节了，因为我已经遗忘了。我的妹妹兴许要嫁给一个捷克人，他是个基督教徒。一次他向您的一个亲戚谈起要与一个犹太女人结婚的意图，她回答说：“这可不行，就是不能同犹太人结合！告诉您：我们的密伦娜等等。”

我说这些话想把您引向哪里呢？我有点迷路了。可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您也许是与和我一起走的，而现在我们两人都迷路了。您在翻译上的美好之处是忠实原意（您就为“忠实”二字责骂我吧。您什么都会，但是最拿手的也许是责骂，我愿当您的学生，不断地出错，这样便可以荣幸地不断被您责骂。我坐在学生的板凳上，几乎头也不敢抬，您则俯

身看着我。您的食指不停地上面晃动，进行着种种指摘，是这样的吧？）这就是“忠实”。我有这么个感觉，仿佛您在我后面，我拉着您的手穿过地下那黑暗、低矮而丑陋的历史通道，几乎没有尽头（因此这些句子也没有尽头，您难道没有看出来吗？），几乎没有尽头（您说，只有两个月？），这样在出口处出来，进入光天化日之下时或许不会丧失马上溜掉的理智。

一个警告：今天该结束了，今天应该解放这双带来幸福的手了。明天我又要动笔，我将在我可以担保的范围内说明，为什么我不去维也纳，为什么我不等到您说“他说得有道理”时就不能安下心来。

您的 F

请将地址稍稍写清楚一点，您的信一进入信封，它几乎便是我的财产了。您对待别人的财产应该更细心些，责任感更强些。Tak[25]。

此外，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但还不能进一步确定：我的信也许有一封丢失了。犹太人的恐惧性！却不是担心信安全到达！

现在我就此事还要说一些蠢话。我说蠢，是指我认为正确的就说，而不管是否损害我的利益。而后密伦娜还要说恐惧性，当胸给我一拳，或者问道（这句话在捷克语中无论在动作还是在声音方面都是一样的）：Jstezd？[26]您看见吗，在“Jste”中拳头收了回去，为了积蓄肌肉的力量。而在“zid”中我们则看到欢快的、不偏不倚的、向前迅疾的一击。捷克语言在德国人的耳朵中经常产生这样的附加效果。譬如有一次您问道，我怎么会让一封信决定了我是否在此逗留，然后您马上自己回答道：nechpu。[27]这在捷克语中也就是在您的语言中是一个有陌生意味的字，它是那么严厉、冷酷、淡漠、简洁，尤其像是咬开核桃那样。在一个词中颚骨三次碰撞，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第一个音节试着咬住核桃，但没有成功，第二个音节把嘴撑得大大的，现在核桃已经放得进去了，第三个音节终于咬开了核桃。您听见牙齿的声音了吗？特别是结束时，嘴唇的最终闭合禁止另一个人再作出任何相反的解释。有时候这倒真不错啊，譬如，假使另一个人像我现在这样地唠叨着[28]。唠叨者会对此再发表言论，以求原谅，说：“一个人只有当他有点高兴时才会唠叨呢。”

显然今天不会有您的信了。原来我想在结尾时说的话还是没有说

出。下回吧。我非常想在明天能听到您的一些话。在门碰上之前（所有的门碰上时都是讨厌的）我听您的最后几句话是可怕的。

您的 F

就谈谈昨天许诺的说明吧：

我不想（密伦娜，您帮帮我吧！您要从我说的话的深层意义上理解我），我不想（这不是口吃）到维也纳去，因为我受不住那种精神上的极度紧张。我的精神处于病态，肺病不过是精神疾患“漫过堤坝”而已。从我头两次订婚那四五年以来我就这么病了（我当时对您上封信的快乐情绪不能马上作出解释，后来我才想起该怎么解释，我总是忘了这一点：您是那么年轻，可能还不到二十五岁，也许才二十三岁。我已三十七岁，快到三十八了，几乎相当于过了小半辈子了，以前那些夜晚和头痛使我头发差不多白了）。我不想将那漫长的故事完全在您面前铺开，叙述那茫如烟海的细节。我对这些始终很害怕，就像个孩子一样，所缺的只是没有孩子的易忘性。这三次订婚史有个共同之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毫无疑问的罪过，我给两个姑娘^[29]带来了不幸。我只想谈第一个姑娘。我不能说第二个姑娘，她很敏感，每句话，即使是最善意的也可能严重地刺伤她。我知道这一点。我给她带来不幸的表现形式是：我在她身上（就她而言，假如我需要，她也许会牺牲自己）不能持续地寻找到快乐和安宁，不能坚定起来，不具备结婚的心理条件，尽管我完全出于自愿地不断向她作出结婚的保证，尽管我有时爱她爱得要命，尽管我把结婚视为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我给了她几乎五年之久的打击（或者，她也打击了我，假如她想的话）。幸亏她是不可摧毁的。她是普鲁士-犹太人的混合种，这是一种强大的、必胜的混合。而我则没那么强大，当然她只需受罪，而我则又打击又受罪。

完了，我再也写不了什么，再也无法解释。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描写我的精神疾病，陈述我不能去的其他原因。一个电报来了：“勿忘在卡尔斯巴德见面，务请书面答复。”我承认，当我拆开电报时，它向我露出了可怕的面孔，尽管如此，在这面孔的后面却是个最无私、最宁静、最谦虚的生物。尽管如此，这一切本来就是我的愿望。这问题现在我已无法解释清楚，因为我已不能引证对疾病的描述。确定无疑的是：星期一我将从这里启程。有时我看着电报，几乎不能读它，我觉得这像是一封密件，把上面那两句话擦去，可以读成：“车经维也纳！”这分明是一道命令，但没有任何命令的可怕性。我不坐经过慕尼黑的车（听上去便

很荒唐)，而多绕一倍的路取道林茨，这样还是要经过维也纳。我做过一个试验：阳台上有一只麻雀，它等着我把桌子上的面包掰一点扔到阳台上，可我却将面包扔在屋子中间我身边的地板上。麻雀站在外边，在半昏暗中凝视着它的生命食粮。诱惑力极了，它抖动着，它的心在这儿，但这里是一片黑暗，而我——神秘的势力——站在面包边上。尽管如此，它还是跃过了门槛，又向前蹦了几下，但是不敢再向前了，一下突然的惊吓，它便飞走了。但是这可怜的鸟身上潜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啊，过了一会儿它又来了，审察着形势。为使它方便起见，我撒出一点面包屑，假如我不是故意地——我也确实是无意地（神秘势力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以一个小动作惊走了它，那么它已经取走面包了。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假期到6月底结束，为了过渡一下（那时这里已将很热，这我倒不怕），我将去别处乡下待一阵。她也要去，这样我们便将在那儿见面了。我在那里待几天，然后也许到我父母所在的康斯坦丁巴德去待几天，然后回布拉格。当我综览这一旅行计划时，将它与我的脑袋的状况结合起来看，我便感到，这就像那时的拿破仑，他在制订进军俄罗斯计划的同时，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结果将是怎样的了。

那是您的第一封来信到达时——正在那本来要举行的婚礼前夕（有关计划完全是我制订的），当时我真高兴，把那封信拿给她看。以后——不，什么也没有了，我也没有撕掉那封信，我们有共同的特性，只是我手边没有炉子。我似乎看到了征兆，担心在第一封写给您的信的背面有我写给那位姑娘的一封信。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没有这封电报我何尝不能去维也纳？恰恰相反，这封电报就像是给我此行提供了理论依据似的。我完全肯定是不来的，假如我真的（这是不会的）可怕地出乎自己意料来到维也纳，那么我既不需要早点，也不需要晚餐，而只需要一副担架，以便我可以在上面躺一会儿。

别了，将在这里过一个并不轻松的礼拜。

您的 F

星期一

愿意的话，您就写一句话通过邮路寄到卡尔斯巴德——不，还是先寄到布拉格吧。

您执教的那些学校真是庞大，二百个学生，五十个教师。我想在最后一排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一个小时，然后我便不再与您见面（即使想与您见面也不会见到您的），不再作任何旅行，并且……够了，这张似乎不愿终结的白纸把眼睛都眩花了，而我正是为此而写。

现在将近11点。下午我已根据目前唯一的可能性作了安排。我给布拉格发了电报，说不能到卡尔斯巴德去，对此我只能以精神紊乱来解释。这一方面是非常真实的，另一方面则有些前后矛盾，因为我以前正是由于精神紊乱而想到卡尔斯巴德去。我这是在玩弄一个活人。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在卡尔斯巴德我也许会既说不了话，又沉默不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在我沉默的时候，我也在说话，因为我现在自身只是一句话。但我现在肯定不会取道维也纳了，而将于星期一走慕尼黑那条路。到哪里去我不清楚，去卡尔斯巴德也好，玛丽亚巴德也好，不管怎样总是单独一人。我会写信给您的，〔也许^[30]〕到布拉格后，起码三星期才会收到您的信。

我不断自问，您是否已经理解我的答复是根据我的全面思考作出的，是不得已的。当然这个答复还太温柔，太容易给人以错觉，因它被美化得太多了。我日日夜夜不停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想到您将来的回信便不禁颤抖。我毫无用处地自问着，好像我负有义务要花一周时间日夜不停地把一个钉子钉进石头里去。我既是工人又是这钉子。密伦娜！

风传（我不能相信）因罢工之故，今天晚上去梯罗尔的铁路将中断。

星期六

您的信来了，它带来了幸福。把它所包含的其他一切撇开不谈，主要的一点是：您也许不会再往布拉格给我写信了。我首先突出这一点，以便一切，包括您，都给它以特殊的惠顾。于是人们以此来威胁一个人，并且知道（至少从远处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此外，人们还借口说，他对这个人来说可好呢。

但您不再给我写信也许是有道理的呢，您信中有些地方指出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我对这些地方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来。正是在那些地方我清楚地知道，也非常严肃地认识到：我处于很高的高处，正因为如

此，那儿的空气对我的肺来说过于稀薄，我必须休息。

您的 F

星期六

明天我再写。

今天找到一些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事情的东西。密伦娜（这是内容多么丰富、多么有分量的名字啊，由于它的充实而让人几乎举不起来。开始时我不怎么喜欢，觉得像个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名字，误入了波希米亚，被捷克的特点所强奸，在重音上受欺骗，但在色彩上和形象上那是个美妙的女郎，被人托在手上，从世界上，从火里托了出来。我不知道，而她则心甘情愿地、信赖地紧靠在你[31]的手臂上，只有那强大的“i”音是令人不快的[32]，这名字不会从你的怀里蹦下来逃走吗？或者这也许只是幸福的一跃，是你自己为甩掉负担而促成的）：

你写的信有两种，我不是指用钢笔和铅笔写的两种，尽管用铅笔写的文字也有某些寓意，对之值得侧耳倾听。但这一区别不是决定性的。譬如夹有住房明信片的上一封信虽是用铅笔写的，却使我很高兴。使我高兴的是那些安泰的信件（你应当明白，密伦娜，我的年龄、我的暮气、特别是我的恐惧；你应当明白，你的青春、你的朝气、你的勇气；我的恐惧与日俱增，它意味着在世俗面前的退避，而世俗的压力却因此而增强；你的勇气意味着一种进逼，因此压力也随之减轻，勇气益发增长），我能坐在这样的书信面前，感到无穷的幸福。这是朝火烧火燎的脑袋淋下的雨。但假如另一种这样的信件到来，密伦娜，即使其实质比第一种带来更多的幸福（但由于我的弱点，总要过几天才能领会这种幸福的存在）。这是些以呼喊开头的信（但我也确实离得那么远），结尾总是给我以一种莫名的惊恐，那么，密伦娜，我真的开始发抖了，就像在警钟下那样。我不能读啊，但读还是要读的，就像一头渴得半死的牲畜在饮水，恐惧阵阵加剧。我寻找一件能让我钻进去的家什。我毫无知觉地躲在角落里，颤抖着祈祷，希望在这封信中呼啸着闯进来的你重新从窗子里飞出去，我不能将暴风留在屋子里呀。在这些信中你一定长着梅杜莎[33]那个了不起的脑袋，恐惧之蛇一条条盘在你的头上抖动着，而盘在我的头上的一定是更加凶险的恐惧之蛇。[34]

你星期三、星期四写的信。可是小宝贝，小宝贝（我就是这样读出梅杜莎这个词的）！你对我所有愚蠢的玩笑（zid, nechápu 和“恨”）

都认了真，我只不过想以此逗你笑笑——出于害怕，我们误解了。不要逼我用捷克语写信吧，这些玩笑并没有任何责备的成分。假如要责备，我倒可以责备你。你对所认识的犹太人（包括我在内）的看法太好了。有时我真想把正是作为犹太人的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全部塞到衣柜的抽屉里去，等一会儿，然后把抽屉拉开一点，看看他们是不是都窒息了，假如没有，就把抽屉再关上，如此往复，直至终了。——我对你的“言谈”所说的当然不是严肃的（“严肃的”这个词不断地往信里钻。我对他^[35]〔我无法细想〕也许很不公道。另一个感觉也同样强烈：我觉得现在同他联系在一起了，而且越来越紧密，我几乎要说“生死与共”了。我要是能同他谈谈多好！但是我怕他，他所处的地位比我高得多。你知道吗，密伦娜，你到他那里去时，已从你所处的平面上向下跨了一大步，但你到我这里来时，却是跳进了深渊。你知道这一点吗？不，我那封信里提到的我的“高处”，其实不是我的，而是你的）——我所说的“言谈”，也是严肃地指你的言谈，这我可不会弄错。

我又听你说到你的病了，密伦娜。假如这是因为你需要卧床休息的话，也许你也应该躺一会儿了。也许在我写这封信时你正躺着。我一个月前不是比现在好吗？假如说我那时为你担忧（当然只是在我的脑子中），知道你在生病，那么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现在我只想着我的疾病和我的健康，当然这两者（甲也好，乙也好）都是你。

F

星期日

我今天作了一次小小的出游，这是为了摆脱同那位心爱的工程师在一起时那种叫人无法入眠的空气。我从那里也给你写了一张明信片，但却不能签字寄出。我再也不能像给一个陌生人写信那样给你写信了。

今天早晨醒来前不久，也是刚睡着不久，我做了一个讨厌的梦，且不说它是可怕的梦吧（幸亏梦的印象消退得很快），也就是说做的只是个讨厌的梦。也多亏它我才能睡一会儿——做起这样的梦来，不到梦结束人是不会醒的，要想提前躲开它是办不到的，它抓着人的舌头不放。

梦境在维也纳，犹如我在醒着做梦时设想我到哪里去的情景一样（在这些醒着的梦中维也纳只是一小块场地，一边是你的住房，对面是我将要下榻的旅馆，左边是我即将到达的西火车站，火车站的左边是弗兰茨·约瑟夫车站，是我离开时所要进入的车站。哦，在我的房子的底层

倒不错，有个素食餐厅，是我吃饭的地方。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回布拉格时能保持一定的体重。我为什么要陈述这些呢？这其实不应该属于梦，我对这些显然一直很害怕）。夜里的梦并不完全一样，那是座真正的大城市，傍晚，潮湿、昏暗，繁忙得难以形容的交通状况，一座狭长的长方形花园隔开了我俩的住处。我突然到了维也纳，赶在自己的几封信的前面，这些信自然还在寄往你那儿的途中（这后者使我特别痛苦），信中告诉你我要与你会面。走运的是（其实我同时也感到讨厌），我不是独自一人，有一伙人（我相信也有个姑娘）和我在一起，但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我的陪同。他们要是安静些就好了，可他们偏偏唠叨个没完，很可能是在议论我。我只听到他们在轻声说话，叫人神经紧张。我什么也听不出来，什么也不想弄明白。

我站在我的房子右边人行道的边缘，察看着你的房子。那是一座低矮的别墅，有个美丽而质朴的圆顶前廊石柱，与底层一般高。

突然就到了早饭时间，前廊中的桌子上摆好了餐具。我从远处看见你的丈夫走来，坐在右边一张钢管椅上，睡眼惺忪地伸展着胳膊。接着你来了，坐在桌子后边，这样我可以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当然谈不上看得清楚，距离太远了，你丈夫的轮廓倒显得清楚得多。不知为什么，你的形象总是保持着蓝、白两色，流动多变，样子像鬼魂。你也伸开了双臂，但不是为了舒展肢体，而是一种庄严的举动。

没过多久又到了傍晚。在小街上，你和我在一起，你站在人行道上，我有一只脚踩在行车道上。我握着你的手，我们进行着一场语句短促、速度快捷得近乎荒唐的对话，一顿一顿地进行着，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梦的结束。

我复述不了，我只记得头两句和末两句话，中间是整体的、不可言说的折磨。

见面时我没有问候便迅速说道（受你脸上什么因素的影响）：“你想象中的我不是这样的。”你答道：“要我老实说的话，我想象中的你要帅些。”（你用的是一个更具维也纳方言特点的词，但是我忘了。）

这是头两句（这使我想起：你知道吗，我是完完全全没有音乐细胞的？据我所知，没有什么人在这一点上超过我的了），这样一来，一切

都已决定了，还想怎样？然后就再次见面的问题开始了谈判，在你那方面是用最不肯定的表达方式，而我则不断地以提问进攻。

现在我的陪同们插手了，他们扬言，我到维也纳来是为了进维也纳附近的一所农业学校学习。现在看上去我有时间了，人们显然是出于慈悲要把我拽走。

我看穿了他们的居心，可还是跟他们一起去火车站了，也许是因为我希望我这样一本正经地做出要离开的样子会引起你的注意。我们一起到附近的火车站去，但这时才发现，我把那学校所在地的地名忘了。我们站在大张的列车时刻表前，他们不停地指着一个个站名问我，会不会是这个或是那个，但哪个都不是。

这期间我偶尔可以瞥你一眼，对你的外貌我是毫不在意的，所关心的只是你在说些什么。你不那么像你自已了，至少黑多了，脸瘦瘦的；假如你的脸颊还是圆圆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冷酷了（是真的冷酷吗？）。奇怪的是，你的服装料子跟我的一样，非常男性化，我一点也不喜欢。后来我想起了信中的一段（诗句：

dvoje šaty mám a přece slušně vypadám^[36]），从这时起我便非常喜欢这衣服了。你的话对我的威力真大啊。

但这时已接近尾声了。我的陪同们还在时刻表上查找，我们站在一边谈判。谈判的最后一段内容大致如此：明天是星期天，我竟然认为星期天你会有时间陪我，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不可理解，简直叫你反感。最后你似乎让步了，你说，你愿意挤出四十分钟来。（这次对话的最可怕之处不是这些话，而是那个出发点：一切都毫无意义。你嘴上不说，但心里不住地说着：“我不想去。我去对你又会有什么帮助呢？”）你什么时候能挤出这四十分钟来，我还不得而知。你自己也不知道，你似乎竭力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来。于是我不得不问：“要我整天等你吗？”“对。”你说着便转过身子，向等着你的一伙人走去。这一回答的含义是：你根本不会来，你对我的唯一的让步是允许我等待。“我不会等着的。”我轻声说。我估计你没有听见，而这却是我最后一张王牌，于是我又冲着你的背后大叫了一遍。但是你毫不在乎，你对此不再关心了。我神思恍惚地回到了城里。

但是两小时后收到了信和花，善意和安慰。

密伦娜，这次地址又写得不清楚，是经邮局填改后才寄来的。我第一次请求你后，那地址写得漂亮极了，那是一张美丽的、但也是难以辨认的各式字体的字帖。假如邮局有我的眼力就好了，那他们一定只认得你写的地址，而对别人的一概不知。不过邮局毕竟是邮局——

可惜我晚上很晚才收到你的信，而明天一早我就要同那位工程师一起去博岑游览，因此确实如你所说，当我此刻读到你为“小宝贝”这一称呼而责备的那些话时，我真的自忖道：够了，这几封信你今天不能读了，既然明天一早就要旅游去，你总得睡一会儿呀。稍过了一会，我又继续读了下去，并且读懂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现在假如你在这里（这不光指身体的接近），我便会深深地吸口气，一头扎进你的怀里。这就叫生病，对吗？但我是知道你的，而且还知道，对你来说，“小宝贝”并不真是那么可怕的称呼。我也懂得玩笑，但一切对我也都可能成为威胁。假如你在来信中写道：“昨天我数了数你信中的‘和’字，竟有如此之多，你怎么能在给我的信中写上‘和’字，而且如此之多呢？”假如你保持认真态度，我也许会慢慢地相信，我这么写确实侮辱了你，因而我伤心不已，但最终会不会真的是一种伤害呢，这是难以验证的。

你也不能忘了，玩笑和严肃本身虽是易于区分的，但对那些能决定自己生活的重要人物来说，这便不那么容易了。这里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人们的眼睛会因此变成显微镜似的。一旦如此，人们就糊涂了。在这点上，即使在我强大的时刻也不强大。比如在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的女厨子每天早晨领我到学校去。她是个瘦小干瘪的女人，尖鼻子、高颧骨、黄脸，但却有主意、有热情、有头脑。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内环城路与外环城路之间。我们先要穿过环城路，走入泰恩巷，再走过一个拱门进入肉市巷，一直朝着肉市场的方向走下去。这样每天早晨重复一次，持续了足有一年之久。女厨子在走出家门时说，她要告诉老师，我在家是多么淘气。那时我也许并不很淘气，只是固执，不听话，好伤感，爱生气，但这一切综合起来在老师眼里却有某种可爱的地方。我知道这一点，但对女厨子的威胁不敢掉以轻心。开始我确实以为到学校去的路长得不得了，而且路上还会发生许多事（由于路并非长得不得了，这种表面性的孩子的轻率便渐渐衍成了一种畏怯和死心眼似的认真）。至少在旧环城路上行走时，我怀疑这女厨子（她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但这只是在家庭范围内)在老师这种为世人所尊敬的人面前,会不会连话都不敢讲。记得我对她说过这样的话,这女厨子总是启合着她那毫无怜悯心的薄嘴唇,简短地回答道,信不信由我,反正她会说的。大约在肉市巷的入口处(它对我具有一种小小的历史性的意义——你童年时在什么样的地方住过?),对这威胁的畏惧占了上风。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而现在女厨子还要对我加重这种威吓。我开始央求她,她摇头。我央求得越厉害,我所求的事便越使我感到可贵,而同时感到的危险也越大。我站着不走,求她原谅我,她拽着我走。我用父母的报复来威胁她,她大笑了。在这里她是万能的。我抓住商店的门,抱住墙角的石头不放,她不原谅我,我就是不走。我抓着她的裙子往回拽(这对她来说也不轻松),但她仍然拽住我往前走,嘴里还说,也要把这些说给老师听。时间晚了,雅阁布教堂的大钟敲了八下,学校的钟声也响了,其他孩子都奔跑起来,我最怕迟到,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跑起来。我一边跑一边想:“她会去说的,她不会去说的吧。”——后来呢,她什么也没有说,自始至终没说过什么,但这种可能性始终握在她的手里,而且在不断上升(昨天我没有说,今天我一定要说),而她永远不放手。有时候(你想想,密伦娜)她发火了,在我前方的路面上跺脚。有时有个卖煤的女商贩在旁边什么地方看着我们。密伦娜,这是些什么样的蠢事啊,我和这一切——女厨子、威胁和那纠缠了三十八年之久、如今躲在我的肺腑中作怪的全部尘埃同你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啊。

但我本来根本不想谈这些,或至少应该谈谈别的什么。时间不早了,我该就此打住,睡觉去了,但我将无法入眠,因为我停止了给你写信。假如你想知道我以前的日子,我可以把我在大约半年前写给父亲、但至今未寄给他的一封长信寄给你。

你的信我明天再复,万一晚上没时间,那么就后天回复。我在这儿要多待几天,因为我放弃了去弗岑斯巴德看望父母的打算,当然,“算了”^[37]并不等于“干脆永远躺在阳台上”。

再次感谢你的信。

F

星期一

今天早晨我又梦见你了。我们挨着坐在一起,你推开我,不是生气地,而是和和气气地。我很伤心,不是为推开我而伤心,只是对我自

己，觉得我不该像对待一个哑女那般对待你，没有听见你所说的——而且正是对我说的声音。或者我并非没听见，而是无从回答。我走开了，比在第一个梦中更悲伤。

我想起我读过谁写的这么一句话：“我的爱人是穿越地球的一道火柱，现在她把我拥抱住了。但引导她前进的不是被拥抱者，而是旁观者。”

你的

（现在我连名字都丢了，它越来越短，只成了：你的）

星期二

这两封信是中午一起收到的。它们不是供阅读的，而是让人把它展开，把脸埋进去，从而失去理智的。现在看来，失去大半理智倒是好事，因为余下的那部分会长时间聚合在一起。因此，面对你二十四年的基督徒生涯，我的三十八年犹太人生涯说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人间的法律和天堂的警察在哪里？你三十八岁，已如此疲倦，这怎么可能是年龄造成的呢。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你根本不是疲倦，而是不安，是在这随处有失足之虞的地球上害怕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因而你总是双脚同时悬于空中；你不是疲倦，而是唯恐在这巨大的不安后面将有巨大的疲倦跟随而来（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而这种巨大的疲倦就像是痴呆的凝视，说得更好一些，就像在卡尔广场后面的疯人院里常见的那样。

好啊，这就是你的现状。你参加了一些战役，给朋友和敌人都带来不幸（甚至可以说你只有朋友，一些善良的可爱的人，而没有敌人），而自己则成了残废者，成了那些看见儿童手枪就发抖的人中的一个。而现在，现在你好像是突然应召前来参加伟大的解救世界的斗争了。这很离奇吧，对吗？

想一想吧，你对谁都还没有真正谈起过的也许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即约两年前在一个村子里度过的那8个月。当时你以为已经与世隔绝，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结束了与柏林间长达五年之久的通信往来[38]。在你疾病的保护伞下，这并未使你身上发生多大变化，只是不得不将你那本来就窄小的生命轮廓勾勒得更加紧凑罢了（自从这第六年以

来，你那灰白头发下面的脸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可惜你在最近一年半中得知，这并不是一切的终结，在这个深渊中你几乎不能坠得更深了（去年秋天除外，那时我正为建立婚姻而全力以赴[39]）。你不能拽着一个人，一个为无私的境界献出一切的可爱的姑娘一起坠向更深处，不能再往下坠了，任何方面都没有出路可寻，包括向深处坠落。

好吧，现在密伦娜在呼唤你，她的声音以同样的强度浸入你的理智和心灵。当然，密伦娜不认识你，几篇小说和一些书信弄得她眼花缭乱。她有如大海，有如烟波浩渺的大海一样强大，但却在遥远而死寂的月亮召唤下，带着误解，以全副力量向前冲去。她不认识你，如果她想要你到她身边去，那也许是出于一种对真实的预感。而你真实的莅临不再会使她眼花缭乱，这你大可放心。你啊，柔弱的心灵，你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到她那里去，正是因为你害怕这一点吧？

但必须承认，你不去那里还有上百条其他内在的原因（这些的确存在着），此外还有一条外在原因：就是去后将不可能与密伦娜的丈夫说话，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同样你也将丧失跟密伦娜说话或直面看她的勇气，即使她的丈夫不在——承认了这一切，就产生了下面两种考虑：

第一，假如你对密伦娜说你要去，她也许压根儿就不再愿意让你去了，这不是由于变化无常，而是因为自然而然的疲倦。她将遂你所愿，让你乐意并宽慰地离去。

第二，真的到维也纳去！密伦娜一心想着让门自己打开。门显然是会自行打开的，但是然后呢？然后那里将站着一个瘦高个子和蔼地微笑着（他总是这么做的，这是他从那个也总是脸挂微笑的姑妈那儿继承来的，但他们俩这么做都不是出自什么动机，而是出自尴尬），然后朝着可以让人看清自己的方向坐下。到此，庄重的仪式便结束了，因为他几乎不会讲话，他缺乏讲话所需的生命力（昨天我的一个新的同桌餐友在谈到沉默的人的食素问题时说：“我认为，吃肉对于脑力劳动者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连愉快情绪都不会产生，为此他也缺乏必要的生命力。

您看，密伦娜，我说得十分坦率。但您是聪明的，您一定发现，我虽然说的是真话（彻头彻尾的、毫无疑问的和准确无误的真话），却过

于坦率了。我完全可以不作这番通报就到你那儿去，并在转瞬间让你清醒过来。我没有这么做，这正是我的话的真实性和我的弱点的一个明证。

我还要待两星期，主要是因为我感到羞愧，不好意思带着这样的疗养成效回去。家里的人，更令人恼火的是我的公司里的人期待着这次休假会使我基本康复。这样的问题真叫人头痛：你又长了几公斤？而我的重量恰恰减轻了。别那么省！（这是针对我的吝啬而言的）而我的钱却全部用来支付房钱了，什么也没吃。

还有许多这类话要说，但这样信便没法收住了。噢，差点儿忘了说：再过两星期左右假如您仍像星期五那么坚决地要我去，那我准去。

您的 F

星期三

这种“两地书”应该停止了，密伦娜。这简直把我们搞疯了，都不知道写了些什么，答复了些什么，不管怎么着，总是颤抖不已。你的捷克语我能完全懂，也听到里面的笑声，但我还是在信上的话语和笑声中钻来钻去，后来便只能听到话语了。此外我的本质是：恐惧。

你在收到我星期三与星期四之间写的信后是否还想见我，我无从捉摸。我对你的关系我是清楚的（即使我将永远见不到你，你仍然属于我），只要这关系不陷入错综复杂的恐惧区域，我对它便是清楚的；你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仍茫无所知，它全然处于恐惧的笼罩之下。你也不认识我，密伦娜，我想重申这一点^[40]。

所发生的事情于我是难以置信的。我的世界在坍塌，我的世界在建立起，看吧，看你（这个“你”指我）这当儿怎么办。对于倒塌我不抱怨，我的世界的确坍塌过。但我抱怨它的建立，抱怨我的软弱无力，抱怨它的诞生，抱怨太阳的光芒。

我们将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呢？假如你对我回信中的意见说声“是”，你便不可以在维也纳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办不到的。

密伦娜，问题不在这里，你对我来说不是夫人，而是一位姑娘，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具姑娘特性的一位。我不会斗胆地向你伸出手去，姑娘，这是我肮脏的、颤抖的、爪子般的、局促不安的、又冷又热的手。

说到布拉格那个公务人员，这是个糟糕的打算。你只会找到一座空房子。它是我们的办公室。而那时我将在旧环城路六号四楼，坐在写字台旁，两手捂着脸。

说真话是困难的，因为真话虽然只有一种，但它是活的，因此具有一张活生生的变幻不定的脸（snak někdy hezká, Krásná oubec nikdy vážné ne^[41]）。假如我在星期一夜里至星期二凌晨之间给你回信，那将是封可怕的回信。那时我躺在床上，像夹在刑具里，整个晚上我一直在回答着你，向你诉苦，试图把你从我面前吓跑，自己咒骂自己（全部起因是，我在晚上较晚时才收到你的信，而在快入夜时听到这些严肃的话太容易激动，太容易当真了）。第二天一早我便到博岑去。坐电力车去克罗本施坦，在一千二百米高处，呼吸着纯净的凉丝丝的空气，当然神智仍昏昏沉沉。对面不远处是山脉边缘的一排白云岩峰，然后我在归途上写下了一些话，现在将它们抄录如下。现在觉得这些话（至少在今天看来）过于尖锐了，每天的情绪就这么变化着：

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工程师留在博岑，我坐车回去。工程师和周围的人插入我与你之间，这并不叫我怎么难受，因为甚至我自己都不在我身上。昨天晚上12点半，我先是写作，接着更多的想念你了。6点之前在床上迷糊了几回，然后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就像一个陌生人把另一个陌生人从床上拽起一样。这是件好事，否则我就会无望地在米兰于昏睡和书写中度过这一天的。至于这次旅游本身我本来就是稀里糊涂的，它只会像一个不太清晰的梦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倒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夜晚就是这么度过的，因为你以你的信（你有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光，这本身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人在街上跑来跑去，这就吸引着过路人的目光。但是你有注视的勇气，尤其是有超越这道目光继续注视下去的力量。这种继续注视是关键所在，而你是做得到的）唤醒了那些闭一只眼睡觉而睁着另一只眼以捕捉时机的老魔鬼。虽然这么做是可怕的，能叫人冷汗直冒（我向你起誓：我对什么都比不上对他们这些不可捉摸的势力这般害怕）。但这是好事，是健康的，剥下他们富丽堂皇的戏装便知道他们在这里了。尽管如此，你的解释与我说的“你必须离开维也纳”的话并不完全相符。这个我不是轻率而言的，我也不怕承受明显摆

在那里的负担（我赚钱不多，但我相信，够我们俩花的了，当然这期间倘碰上生病又当别论），再说我也真正尽了我思索和表达的能力（这一能力以前也挖掘过，可是你是第一个真正地、长时间地看到这一点的人）。我所担心的、瞪大眼睛担心着的、使我莫名其妙地坠入恐惧深渊中的（假如我能像沉入恐惧之中那样入睡，我也许早就死了）仅仅是那种内心深处对我反叛的力量（这种内心反叛你通过我致父亲的那封信可以理解得深刻些，当然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因为这封信为达到它的目的而作了过多的虚构）。这种内心反叛大体上可以这么解释：我在大棋盘上甚至连一个小卒的小卒都算不上，离这个地位也还远着呢，现在却一反棋规，打乱一切棋路，想要占据皇后的位置（我这个小卒的小卒，一个根本不存在、根本上不了棋局的棋子），也许同时还想占据皇帝的宝座，以至占据整个棋盘，而这一切（假如我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必须以其更不人道的方式来实现。

因此我向你提的这个建议对我的意义比对你的意义要大得多。这在目前是无可疑的、高尚纯洁的，并且一定会带来幸福的。

这就是昨天的思想，比如今天我也许会说，我一定会到维也纳去了。因为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我还是给自己留下余地。我不会给你来个“突然袭击”的，也不会在星期四以后去。假如我到维也纳来，我就会给你拍一封管道邮政^[42]信（除你之外我谁也不想见，这我自己明白），但星期二之前肯定不行。我想在南站下车，还不知道在哪里乘车离开。也许会住在南站那儿，可惜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到南站来，我或许可以在5点钟到那里等你（我想必是在一个童话中读到过这么一句话：假如他们没有死去，那么他们今天仍活着）。我今天看了一张维也纳的地图，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难以理解：怎么人们建起这么大一个城市，而你却只需要一个房间。

F

星期三

我补读了关于饮食的一段话，假如我有朝一日成为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我也会作这样的安排——我读这两封信时就好像一只麻雀在我的房间里啄食面包屑那样，颤抖着，侧耳倾听着动静，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全身羽毛耸起。

不睡醒要比睡醒聪明得多。昨天我睡得清醒了些，便就维也纳之行

写下了某些蠢话。此行毕竟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不是可以用来取乐的。对你进行突然袭击，我当然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哪怕动一下这一念头我都会发抖。我根本就不到你的住处去。假如到星期四你还未收到管道邮政信件，那就是我去布拉格了。此外，我听说，我的抵达站将是西站（我想我昨天写的是南站吧），不过这倒无所谓。我也不是超过一切常人那般地不切实际，那么执拗死板，那么粗心大意（前提是睡过一会觉），对此你不必担忧。假如我上了开往维也纳的火车，那么最大的可能是我将在维也纳下车。麻烦的仅仅是上车。那么再见吧（不一定在维也纳，也可能是在信中再见）。

F

星期四

说到密伦娜，那么这与德国人还是与犹太人这一点是毫无关系的。最懂捷克语的（捷克犹太人当然除外）是Našeréc的先生们，其次是杂志的读者，第三是订阅者，而我就是订阅者……作为这样一个人，我告诉你，捷克语中密伦娜只是milénka^[43]这个词的小写。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语言学上是这么解释的。

假如我去维也纳，我就事先打电报或写信给你。当然我在所有的信上都贴上了邮票，难道你没有发现信封上邮票被撕去的痕迹吗？

今天早晨我写了一番蠢话，现在你的两封厚厚实实而又令人心爱的信来了，我将口头答复。假如内心或外界不发生什么意外，我星期二将到达维也纳。假如我（星期二我想是个节日，假如我要从维也纳给你打电话或者拍电报，也许邮局都关门了）今天便告诉你我将在哪里等你，也许是很理智的；但是假如我今天（现在）就说好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会三天三夜一直在我眼前，空空荡荡，而我不得不等待着，直到星期二规定的时间我才走过去，那么到不了那时候我就会窒息的，密伦娜，世界上有足够我支配的那么多的耐心吗？礼拜二告诉我。

F

星期五晚

12点之前这封信也许还到不了，或者说肯定到不了，现在是10点。那么明天才能到了，也许这样倒好些，因为我人虽在维也纳，坐在南站旁的一家咖啡馆里（这算什么可可、什么糕点？你就靠吃这些过日子

吗？），但又不是完全在这里。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不知道第三个晚上在南站旁的利瓦饭店（我住在那里）能否睡好（在一个汽车库旁边）。我没有更好的主意了：礼拜三上午10点起我在旅馆门口等你。密伦娜，不要“从一边来”或“从后面来”吓我一跳，我也不想这么做。今天我也许会去看看一些名胜：L大街[44]、邮局、从南站到L大街那条带状路段、那个贩煤女人等等，尽可能隐身不现。

你的

星期二，10时

〔明信片加封，邮戳日期：6月29日20时—维也纳〕

今天，密伦娜，密伦娜，密伦娜——别的我什么也写不了。噢，不，可以的，今天，密伦娜，只是匆匆写几笔，由于疲乏和你不在跟前（后一点明天也依然如此），怎么会不累呢。本来向一个有病的人许诺要给他一个季度的假期，结果只给了他四天，从星期二到星期天只是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连晚上和早晨都计算在内。我说得不对吗？——我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我说得不对吗？密伦娜！（从你的左耳送话进去，而你躺在可怜的床上，睡得那么香甜——你有良好的睡觉根底，不知不觉中慢慢地从右向左翻身，向我的嘴巴转来。）

旅途？一开始很简单，站台上没有卖报的，这是个出去跑跑的理由。你已不在那儿了，这很好。然后我又上了车、火车开了，我开始读报，这时还一切正常。过了一会儿，我停止了读报，这时你突然不见，倒不如说你还在，我感到你在我身边，一刻不离，但是这种存在与那四天中却是如此不同，我不得不从头开始熟悉。我又开始读报。巴尔的日记[45]，以描写多瑙河畔格莱茵的克略岑休养地开始。我放下报纸，当我向窗外看去时，正好有一辆火车开过，车厢上写着：格莱茵。我的目光回到了车厢里，对面一位先生在读《民族报》，我看见那儿有一篇路切娜·耶申斯卡[46]的小品文。我向他借来读了一会儿，毫无收获，放下了。现在我坐在那儿，眼前出现了你的脸，就像在火车站告别时那样[47]。在那里的站台上，我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自然景象：阳光不是被云翳所遮掩，而是自行阴暗了下来。

我还能说什么呢？喉咙不帮忙，手也不帮忙。

你的

明天再叙述下一段旅程的美妙故事。

这封附加的信将由一位公务人员带去（看完后请连同马克斯[48]的信一起撕掉），望即给予答复。我在信中写道：我将于9点到达那里。我要说什么，这很清楚；我将怎么说，还不知道。亲爱的上帝，假如我已经结过婚，回到家里找到的不是那个公务人员而是一张床，钻进被窝里，与世隔绝，找不到通向维也纳的地下通道，那该是多么糟糕啊！我对自己说这些，是为了使自己清楚，我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是多么容易对付。

你的

星期日，稍晚[49]

我给你寄这封信，是想借此实现这一幻想：当我在你的房子前来回踱步时，你那时就在我的身旁。

3) [50]我至少要给这些信

编上号码，不能错过一封，使你不致收不到它，

正如我在小公园里，

不能错过你一样。

没有结果，尽管一切都这么清楚了，而我也这么说过。我不想向你叙述每个细节，只想讲明一点：他们没有说你或我的任何坏话，哪怕挨边儿的话也没有说。由于我感到事情十分清楚，因此我连同情心都没有产生，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一点：我和她[51]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并且很难说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仅仅——这仅仅是令人讨厌的事情，是一种类似刽子手的工作，不是我应该干的工作，仅此而已。只有这一点，密伦娜，假如她病重（她看上去身体很不好，完全陷于绝望之中，明天下午我必须再到她那里去一次），假如她生病了或者出了别的什么事，我便没有力量不断地把真实情况告诉她。这情况不仅仅是真实的，而且有更多的含义，同时意味着我虽然与她并肩走着，我的心却已融化在对你的爱情之中——假如发生什么事。密伦娜，那么你必须来一下。

星期日，11时半

蠢话。基于同样的原因你是来不了的。

明天我把致父亲的信寄到你的住处去。望你能妥善保存，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把它交给父亲的。尽可能不要让别人看到。展读时要理解其中一切律师式的手法，这是一封律师信件。绝不要因噎废食。

今天我把《可怜的乐师》^[52]寄给你，并不是因为他对我来说有多重大意义，若干年前倒确实如此。我把小说寄给你，是因为他有着那么浓重的维也纳气息，是那么毫无乐感，那么催人泪下。因为他在人民花园^[53]中俯视着我们（看着我们！你走在我身边，密伦娜，想想吧，你曾走在我的身边！），因为他是那么官僚气十足，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姑娘。

星期一，晨

4) 一早我收到了你星期五的信，稍晚了又收到了星期五夜里的信。第一封是那么悲伤，正如你在火车站上那悲伤的面容。悲伤不完全因为它的内容，何况那内容已经过时了，就是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共步的树林，同游的城郊，同乘的旅车。但这些是不会消失的：那笔直的、我们共同的旅途线，沿着石子路往上漫步，穿过林荫道归来，在夕阳中沐浴，永无休止。但说它无休无止，却又是个愚蠢的笑话。公文袋横七竖八地堆在这儿，还有一些我现在读完了的信。与经理互致问候（我没有被解雇）。再就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与此同时，我耳朵里有一只小钟在鸣响：“她已经不在你身边了。”当然，天上什么地方还有一口大钟在鸣响：“她不会离开你的。”但那小钟确实是在耳中鸣响着。接着那封夜里写的信也来了，难以理解，怎么能去读它，难以理解，胸脯需要多大幅度的张与缩，才能呼吸这种空气，难以理解，怎么会离你那么遥远呢。

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抱怨。这一切都不是抱怨。我记着你的话。

现在叙述旅途的故事，完了还要说一句：你不是天使，因为我早就知道我们的奥地利签证其实（而又不能说“其实”）在两个月前就已到期。但是美兰有人告诉我，过境根本不需要签证。果然在进入奥地利时确实没有受到刁难。所以我在维也纳把这一错误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在

格蒙德的边防站上，一个官员（一个年轻人，很强硬）马上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我的护照被放在一边，别人都可以继续往前，走到海关检查站去，只有我不能走。这已经够糟了，还老被人打扰。这是我第一天上班，本来没有义务来听公务上的瞎扯，但是不断有人来找我，要把我从你身边推开，不，是把你从我身边推开，但这是办不到的，密伦娜，对吗？谁也办不到，永远办不到。情况就是这样。但你早就开始工作了。一个边防警察走了过来，友好、坦率，以奥地利方式同情而诚恳地领我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入边防站长室。有个在护照上犯了同样错误的罗马尼亚犹太女人也站在那儿。有趣的是，她也是被你友好地打发前来的，你这犹太人的天使。但是反对力量却要强得多，大个子站长和他的小个子助手都是一副固执相，因而越发显得又黄又瘦，至少当时如此。他们把护照接过去，站长只翻了一下，马上作出决定：“回维也纳去，到那儿的警察局办理签证！”我除了反复说几遍“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别的什么也说不出。站长讥讽而生气地同样说了几遍：“对你来说只能如此。”“不能打个电报取得证明吗？”“不行。”“一切费用由我负担呢？”“不行！”那个女人一直很镇静，她看到我这么苦恼，便请求站长把我放过去算了。多软弱的手段，密伦娜！你就是这样让我过不了关的。我将不得不沿着那漫长的路重返验证处去取我的行李，今天离开的打算彻底破灭了。现在我们一起坐在边防站长室里，除了延长车票的有效期外，这警察也不知怎么安慰我才好。站长说过决断性的话后，已回到他私人办公室去了，只有那个矮小的助手还在这儿。我算了一下：下一班去维也纳的火车晚上10点发车，将于夜间2点半到达维也纳。利瓦饭店的大虫子差点没有咬死我，我在弗兰茨·约瑟夫车站旁的房间又如何是好呢？但是在那里我不会找到任何房间的，那么我就（在2点半的时候）到L.大街去请求给个房间（是的，那将是凌晨5点了）。不管最终情况如何，反正我要到星期一上午才能去办签证（我能马上得到吗？或者要到星期二才给我？），然后到你那儿去。你打开门看见我一定会吓一跳。老天爷。我的思路中断了一下，稍事休息，便又继续下去，但是我还是度过这么一个晚上。这样长时间徒劳的坐车后将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当天晚上我又将坐上火车，再行驶十三个小时。我将怎样到达布拉格，又怎么对经理解释呢（我现在又得给他打电报请求延长签证了）？这一切你一定不希望发生，但是你究竟希望什么呢？别无他法。我突然想起，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我心情稍稍轻松一些：在格蒙德过夜，早晨再坐车去维也纳。我疲惫地问那安静的助手，早晨什么时候有去维也纳的火车。5点半开，上午11点到。好吧，我将坐这辆车走，那个罗马尼亚

女人同样如此。这时谈话中突然出现了转折，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反正突然间这位矮小的助手表示愿意帮助我们了。假如我们在格蒙德过夜，他早晨单独在办公室里时将偷偷地放我们去坐开往布拉格的客车，那么我们便可以在下午4点到达布拉格。对站长我们则应该说，我们乘早班车去维也纳。太妙了！当然只是相对的妙，因为我还必须给布拉格拍电报。不管怎么样，站长进来了，我们围绕去维也纳的早班车演了一幕小小的喜剧，然后那助手就叫我们走。约好晚上我们再悄悄地来找他，商谈下一步的计划。在黑暗中摸索着的我觉得，这是你的神通在发挥作用，而实际上这只是敌对力量的最后一次进攻。现在我们——这女人和我——慢慢地向车站外走去（那辆本来应该载着我们继续前进的快车还在那儿，行李检查持续时间很长）。从这儿到城里有多远？一个小时。真是祸不单行。但是我们发现车站旁也有两家旅馆，我们就向其中一家走去。旅馆旁边有一条轨道，我们必须跨过这铁道，但这时开来一辆货车，我还想跑过去，那女人拦住了我。好吧，这列货车干脆停在我们面前不动了，我们只能等着。这是不幸之上附加的一个小小的不幸，我们想。而这一等待恰恰是个转折，没有它，我星期天就到不了布拉格了。就像你当时在西站旁从一家旅馆跑到另一家打听一样，现在一定是你从天堂的一道门跑到另一道门为我请求，因为这时你的警察沿着这足够长的路跑出车站，向我们跑来，叫喊着：“快回来，站长让你们走了！”这是真的吗？这个时刻我们的呼吸真的噎住了。我们请求这位警察足有十次之多，他才收下了我们的钱。现在该跑回去了，把行李从站长室取出来，带着它跑向护照检查处，再跑向海关检查处。可是现在你已安排好了一切，我不用提着行李走了，一个行李搬运工正好来到我身边。在护照检查处我挤进了人流中，不经检查警察就放我通过。在海关检查处我那装着一些金质衬衣扣的皮夹子掉到地上，我没有发现，一个官员看见了，把它交给了我。我们一上去火车就开了，我终于可以擦擦脸上和胸前的汗水了。你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F

星期一，上午

5) 我相信当然啰，我应该去睡了，现在已是午夜1点了。晚上本来我早就想给你写信的，但是马克斯来了。我对他的来访非常高兴，那个姑娘和由她引起的忧虑使我至今未能去看他。8点半前我同那姑娘在一起，9点时马克斯前来通报，于是我们一起散步，直到12点半。想想看，我以为在给他的信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说的是指你，你，你

（我的笔又一次停滞了）。他没有搞清楚，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你的名字（我当然没有轻率地写得那么明了，因为那个女人是有可能读到我的信的）。这个姑娘：今天好些了，但是代价是高昂的——我允许她给你写信。这真使我后悔。今天我发往你那边邮局的那份电报是我恐惧心理的一个表现（“姑娘将写信给你，友好地答复，”——在“友好”前我本来想加上“非常”的——“严厉点，但不要抛弃我”）。总的说来今天的过程平静了一些。我克制住自己，平静地向她叙述米兰的事，紧迫的气氛减弱了些。但是在触及关键问题时（在卡尔广场，姑娘站在我身边浑身发抖，足有好几分钟），我却不得不说，你身边的一切——即使其本身不变，都在消逝，而什么也不会成功的。她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我对此总是无言以对，那就是：“我不能走开，可是你要是打发我走，我就走开。你打发我走吗？”（我复述这些话，除了自大外，还有十分可怕的性质，但我复述是因为我为你害怕。除去为你害怕的原因，我又有什么可做的呢？[\[54\]](#)看吧，这又是一种离奇的新的害怕。）我答道：“对。”她说：“我不能走。”现在她开始说话，对她来说一口气说那么多是超出她力所能及的。这个善良、可爱的人，她说她完全不能理解，你爱你的丈夫，怎么又会暗地里同我窃窃私语云云。老实说，她说到你时也夹带着一些难听的话，为此我真想揍她，也应该揍她，但是难道我不应该让她埋怨个够吗？至少在这一件事上。她说她要给你写信，我出于对她忧虑和对你的无比信任，允许她这么做。我同意她这么做，尽管我知道，这将给我带来几个不眠之夜。这一允许使她安静下来，恰恰是这一点又引起了我的不安。你应该友好而严厉，不过严厉应多于友好。我这是在说些什么呀，难道我不知道你会正确地回复，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吗？但我害怕的是，她必要时会写一些耍心计的话，挑拨你与我的关系。这种害怕岂不是太看不起你了吗？的确，这对你几乎是侮辱，可是这种害怕取代了心脏在我胸中的跳动，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应该答应她的。明天我还会见到她。明天是个节日（胡斯）[\[55\]](#)，她苦苦求我下午跟她去郊游，她说，这样的话，整个剩下的一星期我就可以不必到她那儿去了。也许我还可以劝阻她别写这样的信，假如她还没有写的话。但是，我又想：也许她真的只想看你怎么解释，也许你的话通过其友好而严厉的力量恰恰会使她平静下来，也许她甚至（现在我的所有思路的走向都是如此）会在你的信面前跪下来。

弗兰茨

星期一

我允许她给你写信还有一个原因，她想要看看你写给我的信。但是我不能给她看。

6)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打击：巴黎来了封电报，我一个年老的舅舅明天晚上要到这里来。当然说到底，我是很喜欢他的，他住在马德里，已经多年没来了。之所以是个打击，因为他将占去我的时间，而我却愿将一切时间，比一切时间要多一千倍的时间，能用使用的一切时间都用于你身上，用于对你的思念，用于为你的呼吸。这么一来，我的住房也将安静不了，夜晚不安静，我真想到别处去。许多事我都想改变一下，而办公室我想完全放弃。但是我又想，假如我超出目前的限制而说出我的愿望来，我是该挨些耳光的。

我除了向你写那些仅仅属于我们的、属于夹在这拥挤世界中的我们的事情之外，什么也不能写了。一切陌生的终究是陌生的。不合理！不合理！但嘴在蠕动着，而脸贴在你的怀里，怀里。

维也纳的日子留下了一段苦涩的回忆，允许我说吗？第二天在山上树林里，我相信，你约莫说过：“与前厅的斗争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而如今你在倒数第二封米兰通信中写到了疾病。我怎么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出路呢？我说这些不是出于忌妒，密伦娜，我不忌妒，不是世界太小就是我们过于庞大，总之我们把世界塞得满满的。我又应该忌妒谁呢？

星期二，晨

7) 你看，密伦娜，现在我自己把这封信寄给你，却根本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我答应今天下午3点半到她家门口。本来打算坐汽船游览的，但是我昨天很晚才上床，几乎没有睡着，所以今天一早给她写了一封管道邮政传递信：下午必须睡一觉，6点才到她那里去。任何信和电报上的保证都无法消除的不安心情促使我补充了一句：“等我们讨论后再寄那封发往维也纳的信。”但是她一早就迷迷糊糊地写了这封信（她也说不出写了些什么），而且马上投进邮箱。这可怜的人一收到我的管道邮递信，马上惊恐万状地向中央邮局跑去，竟然还截住了那封信，兴奋中把身边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邮差，过后她才为花费那么多钱大吃一惊。晚上她把信交给我。可我怎么办呢？只希望事情能马上得到美满的结局。我把这个希望完全寄托在这封信和你的答复上，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荒唐的希望，但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假如

我现在拆开这封信，先读一下再寄出，那么首先我将伤了她的心。其次我可以断定，那时我就不可能再寄出它了。所以我将其原封不动地交给你，就像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你一样。

布拉格有点阴沉，到现在一封信未来，心跳有些沉重：虽然明知现在还根本不可能有信来，但把这解释给心听，试试。

F

星期二晚

8) 刚把信投进去，我就想起：怎么能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且不说对此采取正确的和必要的措施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你来说，给一个陌生人写这样的一封回信，并向她交心，或许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密伦娜，请原谅这些信和电报吧，把这看成是我由于与你别离而智力减退的表现。你不答复她也毫无关系，总会找到别的解决方法的，不要为此发愁。散步使我疲乏得要命，今天去了武什拉德·莱那，仅此而已。再说明天舅舅要来，我的时间将更少了。

谈点快乐些的事吧：你知道吗，在维也纳时你什么时候穿得最美而又是美得太厉害了吗？这恐怕是不容争辩的：星期天。

星期二，更晚

9) 仅为我的新宅剪礼说几句最紧急的话。说最紧急是因为父母10点从弗岑斯巴德来，舅舅12点从巴黎来，双方都要我去接。住新宅，是因为我搬进了妹妹（她现在在玛丽恩巴德）的空房子，以给舅舅腾出地方来。空而大的住房，这很好。但街上热闹了些，不管怎么说，还不是太不合算的交换。我必须给你写信，密伦娜，因为你也许会从我最近几封抱怨的信中（最糟的一封我今天上午撕掉了，出于羞愧；想想，我现在还未得到你的回信，就抱怨邮局是愚蠢的，我和邮局又有什么关系呢？）得出结论，认为我对你不放心，担心失去你。不，我并没有不放心，假如我对你不放心的话，你能像历来对我那样来对待我吗？唤醒这一现象的，是我们躯体的短暂接近又突然分离（为什么偏偏在星期天？为什么偏偏在7点钟？到底为什么？），这自然会使神智稍稍迷离。原谅我！在这晚上，为了好好睡一觉，接受奔涌而来的潮流中的一切吧：我与生俱来的和我所拥有的以及因为能在你心中栖息而感到非常幸福的一切。

星期三晚

10) 街上吵闹得很，斜对面也在大兴土木，正对面不是俄国教堂，而是一些塞满了人家的住宅。尽管如此——单独住一间房子也许是生活的一个前提，单独住一套房子——准确地说：暂时地——是幸福的一个前提（一个前提，因为假如我不生活着，假如我没有可以安憩的家园，比如说两只浅蓝色的、因难以理解的仁慈而生气勃勃的眼睛）。这样的住房就是幸福的住房，一切都很安静，洗澡间、厨房、前厅，其他三间房间，没有那些杂居的住房所特有的那种嘈杂，那种淫乱，那种意志薄弱的、早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思想和愿望的乱伦行为。在那儿，在所有角落里，在各种家具之间发生着天理难容的关系，有碍观瞻的、偶然而发的事情，私生的子女纷纷出现，这种事不断发生，不像你那供星期日利用的安静、空寂的郊外，而像是在一个无穷无尽的星期六晚上，在那纵情狂欢、人山人海、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郊外。

妹妹走了那么远的路，给我送来早饭（这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我本来是要回家去的），她按了几分钟电铃，才把我从信中和尘世外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F

星期四晨

这套住房不属于我，我妹夫就是夏天也常住在这里。

11) 你的信终于来了。我只想马上言归正传，匆匆写上几句，匆忙中也也许夹杂着不正确的因素，而我过后会懊悔的：这是我们三人关系中我还未曾见过的一种独特的情况，因此大可不必根据从其他情况中得出的经验（尸体——三者的痛苦，或是二者的——以任何一种方式消逝），把它看得太灰暗。我不是他^[56]的朋友，我没有出卖过任何朋友，但我也并不仅仅是他的熟人，而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出了朋友的意义。反过来说，你也没有出卖他，因为不管你怎么说，你是爱他的。假如我们能达成一致（我想的是你们，你们的肩膀！），那就将是在另一个水平线上，而不是在他的范围内。这样的结果将是：这件事情真的不单是我们应该保密的事情，也不单是折磨惶恐痛苦忧虑（你的信以它相对的安宁使我非常恐慌，这一安宁还是来自我

们的共同生活，它也许又将被卷入米兰的漩涡中去，不管怎么说，一些强大有力的障碍阻挡对米兰的状况重现），而是一件公开的，公开得十分清楚明了的三角恋爱，即使你还将保持片刻的沉默也罢。我也很反对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一遍，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我有了你。假使我是单独一人，那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进行透彻的考虑。当前人们已使自己成为未来的战场，那么这钻掘得稀烂的土地又怎么承受得住未来的房子呢？

我的脑子现在一片空白，我坐在办公室里已是第三天了，还只字未写。或许现在可以写了。顺便说一句，在我写这封信时，马克斯到这儿来看我，他沉默不语，这可以理解，我走林茨这条路线是为大家着想的，但我的妹妹、父母、姑娘和他除外。

F

星期四，上午

我可以寄钱给你吗？比如通过L。我可以对他说，你在维也纳借了钱给我，那么他会把这笔款子与你的稿费一起寄给你的[57]。

12) 我觉得好像一切书信都毫无价值，它们也确是这样。最好的办法或许是：我坐车去维也纳，把你带走。也许我真会这么做的，尽管你不愿意。确实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比另一种更好，要么你到布拉格来，或者到利贝西切去。昨天我怀着犹太人天生的不信任感悄悄向L走去，在开往利贝西切的火车快启动时我找到了他。他带着你写给施塔萨的信。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开朗、聪明，挽住人的胳膊就滔滔不绝地说了。此人无所不为，无所不知，懂得极多。他打算同他的夫人到住在布吕恩的弗洛里安[58]那儿去，再从那里继续往前走，去维也纳找你。今天下午他将重回布拉格，到时带来施塔萨的回音。我将于下午3点与他面谈，然后给你拍个电报。原谅十一封信中的啰嗦话吧，把它们扔在一边，现在你将看到真实，它要伟大一些，美好一些。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恐惧，那就是你对你丈夫的爱。至于你信中提到的那个新任务自然是沉重的，但是不要低估你在我身旁时给我的力量。虽然我暂时睡不着，可是比起昨天晚上面对你那封信时要安宁得多（马克斯当时碰巧在场，这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我的私事。嗨，不忌妒的人开始忌妒了，可怜的密伦娜）。你今天的电报又给我带来了一些宽慰。现在，至少是现在，我对你丈夫的忧虑不是深得不得了，不

是深得难以承受。他接过了一个艰巨的任务，部分地出于自己的本质，也许完全出于荣誉感而去执行它。我觉得他没有能力继续承受下去，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这样做的力量（我的力量跟他能比吗？），而是因为至今发生的一切给了他太大的负担和压力，从而使他失去了干这件事所必不可少的那种聚精会神。也许这倒可以使他从其他事务中稍稍解脱出来，轻松一些。为什么我不能给他写信呢？

F

星期五

13) 仅对施塔萨的信说几句。那位舅舅在等着我，他平时那么叫人喜欢，现在却有点烦人。好，现在谈施塔萨的信吧，这封信写得十分友好和真挚，只是有那么点说不上来的缺陷，总有那么一点，也许只是表面上的缺陷（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缺陷这些信的内容就发自内心了，事情或许恰恰相反），总之缺少一点什么，或者是多了一点什么，也许是思考力，这似乎往往只是男人才有的。因为她昨天正是这么对我说话的，可是我对这些真正善良的人说了些什么啊！忌妒，真的是忌妒，但我向你保证，密伦娜，永远不用它来折磨你，只折磨我，只折磨我。可我总觉得这封信中确实有一个误会，你不想听施塔萨的意见，也不愿意让她与你丈夫谈话，你要的目前还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她在你的跟前。我有这个感觉。

但愿我今天还能得到你的消息。一个不知道他拥有一切的人是个资本家。现在在这午后的时光，当我在办公室里不抱希望地询问有没有我的信件时，有人交给我一封你的信，这是我刚离开这里去米兰时到达的，读着它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你的

星期五

14) 真糟糕，前天来了两封令人不快的信，昨天只来了那份电报（这虽有叫人宽心的作用，但总让人感到像是什么拼缀而成的东西，电报也是这样），而今天却一无所获。那些信对我并不能起多大的安慰作用，从任何方面看都不能。信上写道，你会马上写信来，可你却没有写。前天晚上我给你发了一个要求即复的急电，复信本该早就到了。我复述一遍电文：“这是唯一正确可行的，放心。你在此犹如在家里。J.八

天后可能携妻赴维也纳。我怎么寄钱给你？”没有回音。“到维也纳去，”我对自己说，“但是密伦娜不希望你去，非常坚决地不让你去。你或许是决定问题的关键，可她不要你，她有忧虑和疑惑，因此她要施塔萨。”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去，只是由于身体不好。平静，我比较平静，这是我在近几年来做梦也不敢想的，可是白天我一直咳嗽得很厉害，而晚上经常一咳就是一刻钟之久。也许仅仅因为重新适应布拉格生活头几天都得这样，也许只是由于我认识你，有幸看着你眼前那段杂乱无章的美兰日子的后果。

维也纳变得如此昏暗，曾有四天是那么明亮的。我坐在这儿，一手写信，一手托着脸的时候，那边正在为我煮些什么呢？

F

星期六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通过敞开的窗户望着外面的雨景，想起了种种可能，也许你病了，疲乏了，躺在床上；K.夫人也许能够从中斡旋；再就是（奇怪地觉得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而然的可能）：门打开了，你站在那儿。

15）那两天，至少应该说是可怕的两天。但现在我看到，对此你是完全无辜的，不知哪个恶魔把你星期四以来的一切信件都截住了。星期五我只收到你的电报，星期六什么也没有，星期天亦如此，今天四封信，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的。我太累了，已无力写信，已无力从这四封信中，从这绝望、痛苦、爱与不爱的大山中马上找出为我留下的东西。假如人累了，在可怕的想象中消耗了两天两夜之后，他就会这么自私的。可是尽管如此——这又得归功于你给人以生命的力量了，慈母密伦娜——尽管如此，我的精神却不像最近整整七年中（在乡村度过的那一年除外）那么紊乱。

为什么至今还不答复我星期四晚上的急电，这个我总是理解不了。过后我又给K.夫人拍了电报，也没有回音。至于我给你的男人写信，不用害怕，我对此也没多大兴趣。我只有兴趣到维也纳去，但是这我也不会付诸实践的，即使没有种种障碍，比如你对我此行的拒绝，办签证的困难，办公室，咳嗽，疲乏，我妹妹的婚礼（星期四）。当然^啰，与其度过这样的下午，像度过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下午那样，还不如去你那儿。星期六：我到处乱逛，有时同舅舅，有时同马克斯，每隔两个小时

到办公室去一下，问问有没有我的邮件。晚上好一些，我到L.那里去，他只知道你的好处，提到你那使我欣喜的信，打电话给《新自由报》的K.，他也一无所知，不想打电话给你的丈夫询问你的情况。我便这样坐在L.那儿，经常听到你的名字，为此十分感激他。当然，同他谈话既不容易也不舒服。他像个孩子，像个没有完全被唤醒的孩子；他同样爱自夸，爱撒谎，爱演喜剧。他安然地坐在那儿倾听我的谈话，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自己也变得狡猾得过于做作，滑稽得叫人恶心，尤其因为他不仅仅是个孩子，而是善良的、富于同情心的、乐于助人的、一个高大而又非常严肃的成年人，陷入这种不调和的物体之中，令人难以自拔。假如不是不停地对自己说，“再一遍，我只想再一遍听到你的名字”，那我早就走了。他以同样的声调谈到他的婚礼（星期二）。

星期天更糟糕。本来我想到公墓去——这样做就对了，可是整个上午我却躺在床上，下午我不得不到我从未去过的我妹妹的公婆那里去。直到6点，我回到保险公司，询问有没有电报，可什么也没有。现在干什么呢？看看剧院节目表，因为J.匆忙中提到过，施塔萨将去看瓦格纳的一出歌剧。我看到，演出6点开始，而6点我们有约会。糟糕。那么现在呢？到奥卜斯特路去看看房子。那儿很安静，无人进进出出，等了一会儿，先在街上靠房子的“一边”，然后在对面的“一边”，但什么人也没有。这样的房子比那些死死盯着它们的人要有头脑得多。现在怎么办？

到鲁切那商场去，那儿原先有Dobré dlo^[59]的橱窗，现在已经撤走；那么要不就去施塔萨那里，这很容易，因为她现在肯定不在家里。一座幽静、漂亮的房子，后面有个小花园。住房门前挂着外保险锁，那么按电铃就不会受罚了。在下面同房子的女保管谈了一会儿，意在说说“利贝西切”和“J.”这些名字，可惜没有机会说“密伦娜”。现在呢？最蠢的事发生了。我走进了阿尔可咖啡馆^[60]，我已经好多年没到这里来了，目的是想找到一个认识你的人。幸亏什么人都没有，我便马上走了出来。再不能度过这样的星期了，密伦娜！^[61]

F

星期一

17) ^[62]在星期六晚上的信中你是多么疲倦啊！我就这封信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不想对那疲倦的人说什么，再说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到达维也纳那天以来，脑袋受到睡眠不足折磨的第一次。我什么也不对你说，只将你放在靠背椅上（你说，你没有给我足够的爱的表示，难道还

有比让我坐在那儿，而你坐在我面前，在我身边表现出更强烈的爱和尊敬更重要了吗？）。现在我将你放在靠背椅上，不知道该怎样用语言、眼睛、双手和可怜的心脏来容纳这种幸福，这幸福是，你在这儿，属于我。这时候我爱的却完全不是你，而是比这更多，是你赠予我的那种存在。

今天我对L.什么也不想谈，也不谈那姑娘，这一切都会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的，这一切是多么遥远。

星期二，稍晚

你谈到《可怜的乐师》的话都是对的。我说过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仅仅是出于谨慎，因为我不知道你将怎么看，也因为我为这故事感到害羞，就好像是我自己写的一样。再说它的出发点确实是错的，有一大堆不正确之处，可笑之处，半通不通之处，极端造作之处（尤其在朗读时会发现这些毛病，我将告诉你具体的段落）；特别是那样的音乐操作是一种可怜而又可笑的杜撰，这只能让那姑娘激动起来，粗暴地破坏她在店里所有的一切。整个世界都会被激怒，而我是第一个。我要抓起随手取得的东西去追击这个故事，直到它由于自身的因素而毁灭为止，它也只能有这样的下场。当然，对这个故事来说，以这样的方式销声匿迹，恐怕是最佳的命运了。那位小说作者，那个滑稽的心理学家对此将会十分赞同，因为可能他就是那个可怜的乐师，他给故事定下的音乐基调毫无乐感，却接受你眼睛里溢出的过于慷慨的感谢的泪水。

你写道：“Ano m^áprardu, m^{áš}m ho r^áda.Ale F., I Tebe m^ám r^áda.”^[63]我十分仔细地读了这句话，读了每个词，尤其在读到“i”^[64]的地方才停下来。一切正确，假如这不正确，你就不是密伦娜了；假如没有你，我又会怎样呢？你在维也纳写这些话也比你当初在布拉格这么说来得强。这一切我知道得很清楚，也许比你清楚；由于某种弱点，我跟这句话一起陷进了没完没了的纠缠之中。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阅读，而我最终又在这里将它抄上，以便让你也看到它，我们一起来读它，太阳穴贴着太阳穴（你的头发贴着我的太阳穴）读它。

你那两封信到达时，这封已经写完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会有这些信来吗？但我只在内心深处知道。人却不会始终生活在内心深处的，而宁可以可怜的形象生活在地球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老是害怕我会盲目

地干出什么事来。我在信中写的难道还不够清楚吗？给K.夫人我只发了一份电报，那是因为我几乎三天——而且是三个糟糕的日子——没收到任何音讯，没收到对电报的答复，当时我几乎认定你病了。

昨天我到我的医生那里去，他觉得我的状况与去米兰前一样，这三个月几乎没有给肺部带来什么受到影响的痕迹，在左肺叶尖上病菌还像当时那样生气勃勃地盘踞在那儿。他对这一结果非常失望，我却认为已相当不错了，因为假如这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布拉格，现在会成什么模样呢？他还认为我的体重根本没有增加，但是据我估计增加了约三千克。秋天他将试图给我打针，但我不相信能忍受得住。

假如我把这一结果与你也在破坏你的健康状况相提并论（你当然是出于无奈，对此我也无须补充了），有时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共同生活，而是好好地、心满意足地躺在一起等死。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始终在你身边。

此外，与医生的见解相反，我知道，假如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健康，需要的只是安静。但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安静，假如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安。

今天是法国国庆^[65]，街上的部队已结束阅兵，正列队回营（我在你的信中呼吸着，感到具有某种伟大的意义）。阅兵的意义不是其富丽堂皇，不是其音乐，不是其列队行进，不是那种老式的、放在（德国的）蜡像馆中的法国人——穿着红裤子，蓝上衣，在一列军队面前正步走过，而是各种力量的某种宣言。这些力量在深处叫喊：“尽管如此，你们这些不做声的、剃光了头的、踏步行进的人们，你们这些狂热的人们，我们是不会抛弃你们的，在你们干最大的蠢事时也不会抛弃你们，尤其在那个时候。”而人们却闭着眼睛向着那个深处，几乎在对你的思念中沉了下去。

他们终于把为我攒下的一堆文件给我送来了。你想想，自从我重返办公室后，仔细算一下，我一共写了六封公函，而人们对此却能容忍。等待着我的大量工作，由于为我保管这些文件的那个部门的懒惰，而至今尚未送到我手里，我对此很满意。可是现在它们来了。尽管如此，我其实毫不在乎，只要我晚上能较好地睡上一觉的话。今天当然还是相当糟的。

星期三

我去办公室前匆匆写几笔。我本想沉默，三天来这几乎令我窒息，至少现在如此。你在进行这个可怕的斗争时，我想保持沉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互相依附的呀，这也是我的斗争。你也许已发觉，我有几个夜晚不得安睡了。简单说来是“恐惧”在作怪。这东西真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眼看它围着我抛来抛去。我不再知道上下左右……你最近几封信中夹杂着两三句话，它们使我愉快，但却是绝望的愉快，因为你对此所说的话使理智马上说服身心，但此地有一种更深刻的说服力，我不知道它的所在，它什么也说服不了。再说，你身躯的临近所发生的那种使人又安心又不安心的奇妙作用一天天在淡漠下去，这与其他因素一起在削弱我的力量。要是你在这里多好啊！你看我什么也没有，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恐惧，它和我死死地缠在一起，一夜又一夜地滚来滚去。围绕着这恐惧，事情在某些方面变得十分严重（奇怪的是，这恐惧总是对着妹妹，不，这是不对的）^[66]，这恐惧不断地告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密伦娜也是人。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使恐惧本身也变得易于理解了。你对此说得那么美，那么好，听了这些话，别的话根本就不想听了。但这是不是就道出了其最精辟的定义，却是很成问题的，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当然它同时也是，而且就这点而言十分可怕），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

给你写了这些，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你的

星期四

那封“白公鸡”^[67]夜函和星期一的来信到了。第一封显然写得晚一些，但不能完全肯定。我只匆匆读了一遍，便马上给你回信，请求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那不是忌妒，只是围绕着你转，因为我想从一切方面观察你，也包括从忌妒方面；但这是愚蠢的，而且我也不会这么做，这只是单独存在时的不健康的梦幻。你对马克斯的揣测也是错误的，昨天我终于向他转达了你的问候，带着气恼（见上！），因为他总是被人问候。由于他通常对任何事都有办法解释，于是他说，你经常向他转达问候，是因为我还从未向你转达过他的最衷心的问候，只要我这么做，也许你的问候就终止了，而我从此可以安心了。这是可能的，那

么我就试试吧。

此外，你不必为我产生任何忧虑，密伦娜，你还会有机会为我担心的。假如没有这几天其他事的纠缠，今天早晨我又会出现向你诉苦的“恐惧”，你可以说是完全健康的。何况你当时在林子里怎么会说，你也并没有不同想法呢？那是第二天在山上树林中说的话。那些天我区分得很清楚：第一天是不安的，第二天是过于安稳的，第三天是后悔的，第四天是良好的一天。

现在我必须去参加我妹妹的婚礼了。为什么我是一个在充满着可怕责任感的状况下受着这种最模糊不清折磨的人呢？譬如说为什么我不是你房间中一个幸福的大橱呢？当你坐在靠背椅上，或者在写字台旁，或者在你躺下时，或者睡着时（祝福你的睡眠！），作为大橱能一点不漏地看着你。为什么我不是呢？因为假如我看见你最近几天的烦恼不安，或者甚至看见你打算离开维也纳，我会因痛苦而崩溃的。

F

星期四，较晚

我感到你马上会得到一张护照的，想到这点我很舒畅。

下午，纽扣眼里插着桃金娘，尽管脑袋难受得很（分离，分离！），还是昏昏沉沉地和我的妹夫的好姊妹们一起吃完了婚宴。现在我却完蛋了。

假如我们在一起——我怎么写到这上头来了，我这傻瓜！——一问一答，目光对目光，要是那样生活将是多么轻松啊。从现在开始我必须一直等到星期一，等待你对我上午的信的答复。好好理解我吧，好好待我吧。

F

星期四

有几件事你误解了，密伦娜：

首先，我病得并不那么厉害，假如我能稍稍睡一会儿，便会比在美兰的任何时候都感到更舒服。肺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切疾病中最可爱的一种，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不例外。我将怎么度过晚秋，则是以后的

问题。目前我只有小小的苦恼，比如在办公室里什么都干不了。在不给你写信的时候，便躺在我的靠背椅上，望着窗外。从这里可以看到的东 西够多的了，因为对面的房子只有一层楼。我不是说，我在往外望时心情特别忧虑，不，一点也不，我只是不能制止自己向外望。

第二，我根本不缺钱，倒是太多了，看到一些钱（比如供你休假用的）还在那里没动，我反而感到不高兴。

第三，你为我恢复健康已经做出了最关键的举动，而且无时无刻不在重新开始这么做，那就是：你想着我。^[68]

第四，你稍带疑虑地就布拉格之行所说的那些话是完全正确的。“正确”我在电报中也提到，但在电报上是指同你的丈夫谈话，这当然也是唯一正确的。今天一早我突然害怕起来，怀着爱害怕起来起来，揪心地害怕：你也许受到什么突发性小事的引诱而突然地到布拉格来，是你生龙活虎地生活在如此深的内心深处，难道一件小事就会对你产生关键性的作用吗？即使维也纳的那些日子也不至于引你误入歧途的。即使在那儿，有些事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你的潜意识的希望吗，即晚上能再见到他？对此我不想再谈了。要么再说说这个：我刚从你的信中获悉两件新鲜事，第一是那个海德堡计划，第二是到巴黎去和避开银行的计划^[69]。第一个计划向我表明，我是在“救星”和暴力施行者之列，但我并不在这行列中。第二个计划向我表明，即使在那里也有未来的生活，计划、可能性、前景，还有你的前景。

第五，你的可怕自我折磨的一部分（这是你唯一令我难受之处）是你每天给我写信。少写些吧！我写给你，假如你愿意，我可以每天写，即使是一片小纸条，这样你工作时心情将更加平静，对此你会高兴的。

谢谢你的《多那狄》^[70]（我能否寄书给你？）。目前我几乎不可能去读它，这是第二个小小的苦恼：我不能读，可是又不觉得特别痛苦，只是对我来说不可能而已。马克斯的一部伟大的手稿（《犹太教·基督教·异教》——一本伟大的书）有待阅读，他几乎在催促我了，可我刚刚开了一个头。今天有位年轻的诗人带来七十五首诗给我，有些长达好几页，我又将使成为我的敌人，这事已发生过一次了。

附上姑娘的回信（用这封信的语言你也可以拼缀成一封我写的

信)，以便让你看看人们是怎样拒绝我的。他们这样做不是没有通过脑子的。我不再答复了。

昨天下午并不比上个星期下午好多少，开始时虽然很好，当我走出房子去公墓时，阴影中的气温是36℃。电车因罢工停开了，但恰恰是这点使我特别高兴，能沿着道路向那儿走去使我特别高兴，那个星期六我走上交易所旁小花园的那条路时也是那么高兴。但我到了公墓后，却找不到那个墓，询问处关门了，没有一个侍者，没有一个女人晓得。我在一本册子上查找了一下，但那不是应该查的那本。我在那里转了几个小时，读碑文已把我搞得头昏脑涨，糊里糊涂，我于是走出了公墓。

F

星期一

这儿是你的两封电报……但关键是，在度过了一个几乎不眠之夜后，我坐在这封信面前，它对我来说重要极了。所有我从布拉格写给你的信本来都不必写，包括最近几封在内，而只有这封是应该存在的。或者说那几封是可以存在的，这无所谓，但这封必须置于它们之上。可惜我一点也说不出我昨天晚上对你说了些什么，或昨天夜里以及早晨说了些什么。不管怎么说，关键是不管你周围广阔的圈子里的其他人以高尚的智慧，动物的（但是动物并不是这样的）迟钝，魔鬼般的好心，置人于死地的爱情对你说些什么——我，我，密伦娜，我彻头彻尾地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做得对的，不管你是留在维也纳，还是到这儿来，还是继续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徘徊，还是一会儿这么做一会儿那么做。假如我不懂的这一点，我同你还有什么关系可言呢？就像在海底深处没有一块地方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样，你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种耻辱，并使我反感。我至今一直认为，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忍受不了人，而我为此十分羞愧，你现在却向我证实了：在我看起来那不可容忍的东西，不是生活。[71]

你的

星期二

我成功地迫使自己在办公室里不去碰这封信，也没有在其影响下把任何工作搞错，为此我几乎耗尽了一切力量，而没有任何精力来干公务了。

致施塔萨的信：T.昨天上午到我这儿来过，提到从你那里来了一封信，他一早离开家时在桌上看到的，但是不知道里面写着什么，晚上让施塔萨告诉我。面对他的友好态度我却感到十分不舒服，因为在你的信里（由我共同促成的）什么话不可能出现呢？但是晚上我们看到，它写得很好，至少就其友好的调子而言（我没有读它），使两者都满意。首先，那里给那个男人提供了一个思索的句子。这句子的来源只能追溯到提供的消息，它真使施塔萨愉快，并使她的眼睛比平时更亮一些。他们是好人。当施塔萨由于真的不可理解而长时间地、全神贯注地、默不做声而严肃地看着你的照片时，在这一分钟内她真是美极了。也许我还会叙述这个晚上的，我疲倦、空虚、无聊、该揍、漠然，从一开始就想上床（附一张条子，施塔萨的画——我们说着你的房间的状况——写有T.的解释，现在我寄上给你）。

昨天我劝你不要每天给我写信，今天我还是这个意见，这也许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今天再一次，并且更强烈地劝你——只是，密伦娜，千万不要听我的，还是每天给我写信吧，可以很短，可以比今天的信更短，只要两行，只要一行，只要一个字，但这个字我只有在受着可怕的烦恼折磨时才能缺少它。

F

下午

假如有勇气，便会产生一定的结果：

首先，就我的理解，格罗斯[72]也许并非没有道理，至少有一点对他是有利的证明：我还活着，而照我体内的力量分配状况，我本该早就活不了啦。

其次，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还要多，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它倾注。

由于我在维也纳的态度，你一恐惧的名义责备我是正当的，但它的真正特别之处是，我不知道它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它卡着我脖子的手，这才是我在任何时候所经历过的、或者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

结果很可能是：我们俩现在已经结了婚，你在维也纳，我怀着恐惧待在布拉格，不仅是你，我也攥着这婚姻之绳的一端拽来拽去。不信你就看看，密伦娜，假如你在维也纳完全被我说服了（直到步伐一致，你对此本是不信服的），那么尽管这一切，你必定已经不在维也纳，或者没什么“尽管这一切”，你已经到了布拉格，而你在上一封信中用来安慰自己的一切仅仅是安慰而已。你不信吗？

假如此后你马上就到布拉格来，或至少马上对此作出决定，这对我来说不是对你的证明，我不需要对你的证明，你对我来说比一切都清楚和肯定，但这将是对我的一个大证明，而我现在缺乏这个。恐惧有时也是赖此为生的。

是的，事情也许比这更可恨，而恰恰是我这个“救星”把你定死在维也纳，超过了以往任何人。

好，暴风雨就是如此，在林子里不停地威胁着，但我们感觉良好。我们只能继续在他的威胁下生活，没有别的办法。

你为什么反对那小姐的信，我觉得难以理解。它想使你产生忌妒情绪的目的看来是实现了？那么我将每隔一段时间写上这么一封信，而且自己写，比那些信写得更出色，而不会得到最终的拒绝。就你的工作写几句吧！Cesta？Lpa？kmen？politika？[73]

本来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又有一个年轻诗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人来，马上就会使我想起我的文件夹，在整个接客时间内从头到尾只想着它——我困了，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只想将我的脸埋到你的怀里，感觉着你那抚摩着我的头的玉手，直到永远永远。

你的

星期三

对了，原来我还想说，你的信里有一句大实话（除了其他实话外）：^ěle vlastn^čJy jsi^ěiov^囉k, který nem^átu^šeni o tom.....[74]这里每个字都是真实的。那一切只是污秽，最卑劣的事，像地狱的沉沦。而在其中我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站在你的面前，这孩子干了很坏的事，现在站在母亲面前，哭着，哭着，我发誓再也不做坏事了。但从这一切之中恐惧在汲取着力量：“正是，正是！”它说，“nem^átuen！[75]还是什么

事都没有发生！那么他还是可以挽救的！”

我猛地跳起来——电话！到经理那里去！我回到布拉格后，这是他第一次为公务打电话来！现在好戏终于开演了。18天来什么也没干，光是写信，读信，更多的是向窗外看，把信拿在手里，放下，又拿起来，再就是接客，别的什么也不干。但当我走进的时候，他很友好，微笑着，说一些我听不懂的公务上的事，然后向我告辞，他要休假去了，这真是个好得叫人难以理解的人（当然我含含糊糊地嘟哝着，我几乎干完了一切，明天开始口述文件）。现在我还要赶紧将此向我善良的神灵报告。

你对我有点误解，密伦娜，我实际上是与你完全一致的，细节我一点也不想陈述。

我如今还说不上，我能否去维也纳，但我相信我不会去的。假如说以前我有许多理由说明我为什么不能去，那么现在只有一条，即这超越我的力量，此外也许还有一条十分次要的理由：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我还想补充一下，假如你在你所描述的状况下（

nechat člověka ekat[76]）到布拉格来，那将同样甚至更加超越了我的力量。

我必须知道你就那六个月想对我说些什么，这种必要性不是暂时的。我深信那将是可怕的；我深信你经历过可怕的事情，或者甚至亲自干过；我深信我作为与你同时生活着的人对这些也许会忍受不了（即使说七年前或许我对什么都能承受的话）；我同样深信，我作为同时生活着的人将来对此也会忍受不了的——好吧，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呢？难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经历和行为，而不是你本身吗？即使没有那番叙述，我对你的认识也远远胜过对我自己的认识，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对我的双手的状况没有认识。

你的信并没有站在反对我的建议的立场上，而是相反，因为你写道：“Nejraději bych utekla třetcestou, která nevede ani k Tobě ani s nim, někam do samoty.”[77]这是我的建议，而你在同一天也写了。

当然，疾患到了这个阶段，你也就不能离开你丈夫了。但正如你写的，这不是没完没了的疾病，你说只会持续几个月，现在一个多月已经过去，再过一个月你将暂时成为多余的，然后才是8月，最晚9月。

还有，我承认：你的信属于我不能马上阅读的那一类。这回我一连四次把它掉在地上，这样我至少不能马上说出我的见解。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上面那些话是有效的。

你的

星期六

对你昨天那封信再谈几句：

对你这封信我试着从另一个方面去看整体，这是我一直来小心避免让自己去看的方面。从这方面去看问题，事情显得很奇特：

我并没有为了你而与你的丈夫去斗争，这一斗争只在你心中进行；假如事情取决于我与你丈夫之间的斗争，那么一切早就决定了。在此我并未过高地估计你的丈夫，很可能我倒是低估了他，这我是知道的；假如他爱我，这便是一个富人对穷人的爱（在你对我的关系中也有点这样的味道）。在你与他共同生活的气氛中，我实际上只是“大家庭”里的一只耗子，一年之中人们顶多只准许它公开地从地毯上跑过去一次。

事情就是如此，一点都不奇怪，我对此毫不惊讶。我感到惊讶并觉得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你，生活在这“大家庭”中的你，在所有意识中觉得自己是属于他的，从他身上汲取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那里伟大的女王，尽管如此——这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却不仅有可能喜欢我，而且有可能成为我的，在你自己的地毯上跑过。

但是这还不是最惊讶的，最惊讶的是：你，假如你要到我这儿来，也就是说假如你（从音乐的角度看）想要放弃整个世界，屈尊到我身边，下降得如此之深，以致从你那里不是只能看见一点，而是什么都看不见：为达到这一目的，——奇怪，奇怪，——你不是往下爬，却是以超人方式向远处高于你的地方抓去，如此使劲，使得你的身体可能会撕裂，你会掉下去，消失掉（而我当然是同你在一起的）。而这仅仅是为了去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什么有吸引力的东西，只有我坐在那里，既无幸福又无不幸，既无功又无罪，只是因为人们把我放在了那儿。在人类的阶梯上我大约相当于你的郊外的一个“战前小贩”（连卖艺乐师都不是，连这都不是），即使这地位是我斗争得来的——可这并不是我斗争得来的，这也不是什么功绩。

关于根你写得特别清楚，事情确是这样。在图尔瑙主要任务是找到并排除所有次要的根，只要找到主根，工作便告完成，因为从这时开始，人们便用铲子铲根部，整个地挖出来。那撞击声还在我耳际作响。当然人们可以从那里好好地挖出这棵树来，因为人们知道，这棵树在其他土壤中同样可以长得很好。然而这并不是树，而是一个孩子。

昨天我又同L.谈了话。对他的看法我们意见一致。有些事表明他的好处，比如当他说到你时他能稍稍集中精神。是的，他的心灵深处是善良的。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吗？告诉你吧，我两次同他在一起，谈到主要的事情时他每次都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加上许多旁枝细节。一个姑娘，另一个人的未婚妻到他这里来，尽管他反感到极点，她毕竟还是一坐就是八至十个钟头（这个姑娘上午在他的私人住宅里，另一个姑娘夜里去编辑部，他就这么分配时间），说自己一定要嫁给他，假如他拒绝，她就从窗口跳出去。他真的拒绝了，也不去守着窗户。这两位姑娘虽然没有往外跳，事情却也很可怕，一个姑娘抽筋般地狂叫起来，另一个姑娘——我忘了她怎么了。我不否认这一切在事实上是这样的，或者甚至更糟糕，我只是弄不懂，听来怎么会这么枯燥无味。

在关于他的未婚妻的许多故事中，有一段很有意思。她的父亲得了两年抑郁症，她照料着他。病房里的窗户必须始终敞开，但当下面有车驶过时，就必须迅速关上，因为父亲受不了那噪音。女儿的工作便是负责关窗开窗。L.说到这里便发表议论：“您想想，一个艺术家！”（她是一个艺术史家。）

他还让我看她的照片，一张看似美丽、忧郁的犹太人的脸，塌鼻子，浓眉大眼，细嫩的手，贵重的服装。

你问那姑娘的情况，我不知道她最近的情况。自从她那次把给你的信交给我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当时虽然同她约过时间，但正好收到你关于同你丈夫谈话的第一批信，我感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精力同她谈话，于是取消了这次约会，理由基本与事实相符，但我认为表达得很婉转。以后我给她写了张条子，但她显然误会了，因为我收到她一封母亲般教训人的信（在这封信中她还请求我把你丈夫的地址告诉她），我马上以管道邮递信给了她相应的答复。从那时至今已一个多星期了，这期间我一直没有她的音讯，因此也不知道你给她写了什么，对她产生了什么影响。

你信中说，下个月你可能会来布拉格。我真想请求你：别来吧。给我留下这么个希望吧：在我特别需要你而求你来的时候，你马上赶来，现在最好别来，你来了又要走的[78]。

关于那个女乞丐，事情说不上有什么好，也说不上有什么坏，我只是过于心不在焉了，或是过多地纠缠在里面，以致我不能以别的方式采取行动，而只能根据模糊的印象。比如印象告诉我：“不要赐给乞丐太多，以后你会后悔的。”在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有一次得了个塞柯色尔[79]，我很想把它给一个坐在外环路和内环路之间马路上一个年老的女乞丐。但我觉得这钱数目大极了，也许人们还从未一下子给过乞丐那么多钱呢。想到要作出如此的壮举，我感到难为情了。但我却又必须给她钱。于是我把这个塞柯色尔换成零钱，先给这乞丐一个克罗采，然后绕着内环路的市政府大楼和拱廊这一套建筑物跑一圈，以一个全新的善人的面目从左边出现，再给这乞丐一个克罗采，然后又跑起来，愉快地重复了十次（也许不到十次，因为我好像记得那乞丐后来失掉耐心而躲开了我）。总而言之，最终我筋疲力尽（包括在道义上），我马上跑回家去，不住地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一个塞柯色尔。

你看，我在同乞丐打交道时多么不幸，但我仍然宣布：我愿意将目前的和以后的一切财产换成最小面值的维也纳货币，在歌剧院前慢慢地交给一个女乞丐，前提是：你站在一边，而我可以感到你就在近旁。

弗兰茨

星期日

趁口述（为此我今天一早就挣扎着爬起来）间歇写几句。

像今天的两封信，这样短小、愉快或至少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信，已经几乎（几乎几乎几乎）是树林，是你袖中的风，几乎让人看见了维也纳。密伦娜，在你那儿多好啊！

今天姑娘给我寄来了你的信，未加任何评论，只用铅笔画了几道。显然她对这封信不满意。不错，它同任何画着道道的信一样是有缺陷的，我由此悟出，我在那封信中向你提出了多么荒诞的、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啊！我千百次地请求你原谅。我或许也必须求得她的谅解，因为不管信写得怎样，事情本身是对她有伤害的。比如，假如你写下，非常谨慎地写下：“poněvadž o Váš nikdy ani nepsal ani nehovořil.”[80]这便

会使她难过，而反过来写同样会使她难过。再一次请求你的原谅。

你另一封信——致施塔萨的信——给了我很大帮助。

星期二

施塔萨写的便笺是很美的一封短信。但不能说当时这便笺中的她与现在有所不同，她自身并不在这便笺中，她为你说话，这是她与你之间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合，几乎是宗教式的，就像是一个自己毫不动感情的人，他只能作为一个中间人，转达他所听到的话，而这些当然（对这一点的了解也是起作用的，并且使整个事物蒙上自豪和美丽的光彩）只有他可以听到，可以懂得。但她与当时并无不同之处，我相信：这种便笺今天她也许能写出来，假如情况相仿的话。

至于那些故事，说来真奇怪，它们之所以使我心情压抑，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犹太故事，不是因为一旦这些盘子放到桌上，每个犹太人都可以从这共同的、可怕的、有毒的、古老的、从根本上说永恒的食物中抓取自己的一份，它们使我心情压抑并不是因为这些。现在你不想越过它们把手伸给我，并久久地、久久地放在我的手里吗？

昨天我找到了那个墓。如果畏畏缩缩去找，那真是找不到它的。我不知道这是你母亲亲属的墓，只有弯下腰去仔细看，才能看清碑文——镏金已差不多完全脱落了，我在那儿待了很久。墓很美，石头的光泽没有随岁月而消逝，当然一朵花都没有，但有什么必要在墓上放那么多花呢？我对此从来不能理解。我将一些丁香花放在边上。我觉得在公墓里要比在城里舒服，它令人流连忘返，我长时间地穿过城市就像穿过一个公墓。

燕尼切克，是你的小弟弟吗？

你身体健康吗？从新瓦尔德克拍的照片上看，你明显是生病了。这张照片当然照得夸张了些，但毕竟只是夸张了一些。我还未得到你真正的照片。有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年轻、高雅、温柔、有家教的姑娘，看上去就像人们不久——大概过一两年吧，便要把她从修道院寄宿学校接出来的那副样子（当然嘴角有点下撇，但这是高雅和对宗教虔诚的表现），而第二张则是一张夸张的宣传画：“在维也纳人们现在就是这么生活的。”此外，在这第二张照片上，你与我的神秘的第一个朋友相像极了，以后我将告诉你关于他的事情。

不，维也纳我是不会去的。但只有撒个谎才能办到，也就是让人告诉我的办公室，说我病了；要么就只有在两个节日连在一起的时候。但这还仅仅是外部障碍，可怜的家伙（这是自言自语）[81]。

电报，谢谢，谢谢，我收回一切责备，其实那也不是责备，而是用手背（它已妒忌很久了）抚摩。刚才那作家兼版画家（但他主要还是音乐家）又到我这里来了。他老来，今天他给我带来两副木刻（托洛茨基和一个宣言场面，你看，他的世界不小），为了让他高兴，为了使这事物与我之间产生一点关系，我马上在这事与你之间搭上了桥，我说，我将把它寄给维也纳的一位朋友，结果（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他不是给我一幅，而是两幅（我为你保存你那幅，或者，你是否想马上得到它？）。接着来了电报，在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满怀喜悦和感激，总是读不够的时候，他毫不受影响地继续说着（他并不是想打扰我，不，完全不是的；我说我现在有事，说得很响，唤醒了他，于是他便将说了一半的话吞了下去，跑开了，一点没有生气）。整个消息都很重要，但细节将会更重要。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你将怎样保重自己呢？这纯粹是瞎说，假如一个医生这么对我说，那就没有比这更没有意义的了。噢，这真糟糕。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谢谢。

星期四

这两封信和明信片我已经读了足有半个小时了（信封可不能忘了，我很惊讶，邮局的整个邮递班子怎么没有都跑上来，向你请求原谅），而现在才发现，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笑逐颜开。难道世界历史上有哪一位皇帝会比我现在的感觉更好吗？他走进他的房间，只见那里放着三封信，他只顾把它们拆开（那动作缓慢的手指！），往后仰靠着，并且——不能相信，这幸福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不，我并没有一直笑逐颜开，对搬运行李一说我什么议论也没有，也就是说我不能相信；假如我相信，我便不能设想；假如我能设想，你是如此美丽——不，这已不再是美丽，而是上天的迷误——就像在“星期天”，而我对那位“先生”是理解的（他一定拿出二十K，并要求找三个K[82]）。但我却还是不能相信，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我承认，这事既了不起又可怕。但对你什么也不吃、饿着肚子（而我在这里却不受任何饥饿的折磨，肚子塞得快要溢出来了），眼皮下出现了黑圈（这是不能修饰掉的，它使我对这张照片的喜悦心情减去了一半，但余下的喜悦还足以叫我为你在今生不用再翻译或在火车站搬运行李而吻你的手）——这

我不能原谅，永远不能，即使我们一百年后再坐在我们的小屋前，我也要为此而絮絮叨叨地轻声责备你。不，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多大的矛盾啊，你一边说你喜欢我，也就是说为了我，一边又饿着肚子，以示反对我，同时，这儿有多余的钱，那儿有“白公鸡”。

我原谅你对姑娘的信所说的话是个例外，因为你称我（终于！）为秘书（我叫tajemnk[83]，因为我在这儿三个星期的工作很tajemník[84]），你在这方面说的其他话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光有道理就行了吗？首先，我没有道理，你也愿意（这是不行的，我知道，这事关意志）在我们的没道理中随波逐流吗？也就是说，你对姑娘的信漫不经心地读下去，而只注意读那些以又大又粗的字体醒目地写着我的不对之处。此外，我不想再听你提那无疑由我促成的书信往来。你的信我又寄给了她，附上了几句温和的话。从那以后，她便音信全无了。我无法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而建议一次会面，但愿一切能无声无息地善始善终。

你为致施塔萨的信辩护，而我已经向你表示过对此信的感谢了。

你去过新瓦尔德克吗？我是常去那里的。奇怪，我们怎么就没有在那里碰到过呢？是的，你爬山、跑路的速度是那么快，你一定会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过去，在维也纳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吗？这算什么样的4天呢？一个女神从电影院中走出来，一个小小的行李搬运女工站在站台上——而竟长达四天时间？

那封信马克斯今天就能收到。我从中没有读出比暗中可以猜到的更多的内涵。

是的，在兰道威尔[85]的事情上你真是不幸。读德文本时你仍觉得很好吗？你是怎么处理的，你这受着我的信折磨和迷惑的可怜的孩子（不是小丫头，记着）！我说信会打扰你的，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吗？但是有道理又有什么用呢？假如我收到信，那我总是有道理了，并拥有一切；假如我一封也收不到，那我就会既没有道理，也没有生命，更没有别的。

是的，到维也纳去！

把译文寄给我吧！我对你的一切都是贪得无厌的。

你总想知道，密伦娜，〔我〕是否喜欢你，但这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不能在信中回答的（甚至在上星期的信中也办不到）。假如我们下次能见面，我会告诉你的（假如届时我的喉咙不会全哑的话）。

你不必提我去维也纳的事，我不会去的。但每次提到这事，就像你拿着一小把火贴着我的皮肤在烧，这已是一堆小小的死刑火堆了，它不会熄灭，而是保持着同样的甚至不断上升的力量。这不会是你所希望的。

你收到的花使我感到很遗憾，我已分辨不出那是些什么花了，而它们现在放在你的房间里。假如我真是那么一个大橱，我会在大白天突然把自己移到房间外去。我将待在前厅，至少直到那些花枯萎为止。不，这不好。一切是那么遥远，但你门上的把手却又像我的墨水瓶与我的距离一样近。

噢，当然^啰，我有你昨天的，不，前天的电报，但那时花也还没有枯萎。为什么你为得到它们而高兴呢？假如说它们是你“最喜爱的”，那你应该对所有的都感到高兴，因为地球上这类东西多的是，为什么偏偏对这几朵感兴趣呢？但这或许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并只能口头回答。是的，但是你到底在哪里呢？你在维也纳吗？维也纳在哪里？

不，我不会忘掉这些花的。凯伦特纳尔大街，这只是一个鬼故事，或者一个在黑夜般的白天里做的梦，但这些花则是真实的，插满了花瓶（你说marně^[86]，而将它贴在你的胸前），甚至不容人把手伸上去，因为这是你最喜爱的花。等着吧，等密伦娜走出房间，我就把你们一把抓出来，扔到院子里去。

你为何心情不悦？发生了什么事了？你不愿跟我说吗？不，这是不可能的^[87]。

你问马克斯，但他早就给你写了回信，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可是星期天他就当着我的面把信塞进了邮筒里。你收到我星期天的信了吗？

昨天是特别不得安宁的一天，不是折磨人的不安宁，只是不安宁。也许我，首先，我口袋里装着你的电报，揣着它走路是另有情趣的，有一种人所不知的特别的善意。比如说人们向切齐桥走去，掏出电报读起来（它总是那么新鲜，在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后，纸便成了空白，但刚

把它塞进口袋，那上面又以最快的速度写满了字）。然后人们便环顾四周，想到将会看见凶恶的表情了，并不一定是嫉妒，但总是人们的目光，这些目光在说：“什么？偏偏是你收到了这封电报？我们马上就往上呈报。至少马上会有花（一大捧）送到维也纳。无论如何，我们已决定，不能就这样容忍这封电报。”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目光所及，万籁俱寂，垂钓者在继续垂钓，旁观者在继续旁观，孩子们在踢足球，桥头那个人在收罗着克罗采。假如仔细观察，会发现有一缕神经质似的空气在游动，人们强迫自己干自己的事，不暴露任何思想。但他们强迫自己这一点是十分可爱的，这一切汇成一个声音：“这是正确的，这电报属于你，我们对此没有异议，我们并没有调查你是否有得到它的权利，我们对此不闻不问，你可以放心地留着它。”过了一会儿，我又把它掏出来，这时人们会不会想，这实在叫人恼火呢？因为我至少应该保持安静，并躲起来。可是没有，这没有叫他们恼火，他们还像原来那样。[88]

晚上我又一次同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谈话。在信中让你理解他——我想：大概就他对我的重要性而言——是办不到的。这是个小小个子，几乎小极了，虚弱，大胡子，只有一只眼睛。但他却使我花了半个夜晚来回忆他。下回再谈谈这件事。

那么你现在没有护照，而且还弄不到一本？

星期五

密伦娜，勤劳的人，你的房间在我的记忆中变化着，那张写字台和其他一切看上去不太像是为工作服务的。但现在却有那么多工作，我能感觉得到，它们使我信服。房间里温凉适宜，快乐无比，只有那个大橱保持着其迟钝笨重的特性，有时锁坏了，它便什么也不许往外拿，竭尽全力合着门，尤其不让拿走你在“星期天”穿的那件衣服。这不是橱，有朝一日你重置家具，我们就把它扔出去。

我为最近写的一些东西深感遗憾，不要生我的气。不要老是认为你不能离家出来只是你的，或纯粹是你的责任，不要老是用这种想法来折磨自己，这不如说是我的责任，以后我会在信中谈到的。

星期四

这样一来疑虑一扫而光，密伦娜：

现在这也许不是最佳状况，也许我还能承受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安全，更多的充实感——尽管这些根本不保险，何况在布拉格——总之，与我的平均状况相比，我现在过得很好，很快乐和自由，这大大超出了我所应该得到的，好得叫人害怕。假如当前的先决条件能再保持一会儿，不发生突变，假如我每天能收到你的三言两语，并从中看到你不怎么受折磨，那样也许足以使我的病体恢复一半。密伦娜，求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物理我从来没有懂得过（顶多懂得火柱，这也算物理，对吗？），*Válha světa*^[89]我同样不懂，而它对我肯定也不懂（这么巨大的天平拿我这55千克净体重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一定毫无察觉，纹丝不动），我在这儿就像在维也纳那样，而你的手愿意在我的手里放多久就能放多久。

韦尔弗的这首诗就像一幅肖像，它看着每一个人，也看着我，首先是看着恶人，即使是他也写过这首诗也罢。

你关于休假的意思我没有完全明白。你要到哪里去呢？

星期四，稍晚

不，事情真的不那么糟。再说，心灵不是只能通过一点恶毒才能摆脱负担吗？我今天认为我所写下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有的你误解了，比如关于那唯一的苦恼；因为你的自我折磨是一种唯一的苦恼，而不是你的信。你的信每天早晨都给我以度过一整天的力量，从而使我不想放弃其中任何一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同样不想放弃其中任何一天。我一点都不忌妒，相信我，但是要想认识到忌妒的多余性，那确实十分困难。不忌妒我总是能够做到的，但认识忌妒的多余性则只是偶尔才能办到。

现在我终于有话可告诉马克斯了，即你对他的伟大的书所作的显然简短的评断。他不断地问到你，问你过得好不好，发生什么事情没有等等，他关心这一切。但我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幸亏我在这时候总是连话也说不出。我当然不能对维也纳任何一个密伦娜信口开河，说“她”这么那么想着，说着，做着。你既不是“密伦娜”，也不是“她”，这纯属胡扯，反正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是如此的不挑自明，因此我从不感到遗憾。

是的，同陌生人谈论你，我是做得到的，这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假如我让自己在此时用上一些喜剧手法（这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么这乐趣就更大了。最近我碰到鲁道夫·福克斯^[90]。我很喜欢他，但假如平时遇见他，我是不会这么欢喜的，也不会这么卑鄙地紧紧握着他的手。我当然知道收获不会很大，但我想，只要有收获就行啦。话题马上就转到了维也纳和他与之打交道的那个圈子里的人。我很愿意听到人名，他开始一个个列举出来，不，我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我愿意听到女人的名字。“对了，那儿还有密伦娜，您是认识她的。”“是的，密伦娜。”我复述了一遍，向下看着费迪南特大街，似乎要听听这条街的见解。接着又提到了其他名字，我咳嗽的老毛病又犯了，话声变得若隐若现。用什么办法让他重提到你呢？“您能告诉我，我在大战中的哪一年在维也纳吗？”“1917年。”“那时E.P.^[91]还没到维也纳吗？那时我没有见过他。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吗？”“没有。”完了。我本来还可以叫他再谈谈你，但我没有这个勇气。

你现在和最近一段时间内服药片的效果如何？这是你第一次又提到头痛。你能就巴黎计划再对我说几句吗？

现在你将到哪里去？（一个邮政条件好的地方吗？）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六个月？

一旦你有什么作品发表，马上告诉我在哪一期。

你是怎么安排你那两天巴黎之行的（纯粹是好奇的问题）？为“尽管如此”这个词而谢谢你，这是一个有魔力的词，它直接进入我的血液。

星期五

到家后我看到了这封信。这姑娘我认识已久，也许我们有点亲戚关系，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亲戚，即她提到的那个表哥。他在布拉格，重病卧床，几个月来一直由她和她的姐姐照料着。就身体而言她几乎给我以不舒服的感觉，长着一张大得过分的圆脸和红面颊，矮小而滚圆的身体，说话悄声悄气，简直叫人恼火。但我也听到她的长处，即亲戚们在她背后骂她。

假如在两个月前，我对这样一封信一定会简单地回答：不，不，不。现在我则认为我没有权力这么说。我并不是认为我可以帮助她。当然罗，俾斯麦不是指出过吗：生活是一顿安排得很笨拙的盛宴，主菜已经悄悄地过去了，人们却还在焦急地等待着饭前佐食。俾斯麦以为这样

就能把这些信统统打发掉。人们也应该照此处世——这种小聪明是多么愚蠢，愚蠢得可怕！——我将给她写信，与其说是为她的缘故，不如说是为我的缘故，我愿意与她见面，某种东西通过你，密伦娜，交到了我的手里，我想，我不能紧握着不放。

舅舅明天走。我又将作些呼吸新鲜空气之旅行，到水里去，到城外去，这对我是必要的。

她写道，只有我可以读此信，我把它寄给你，这样便满足了你的要求。撕掉它。有一处很美：*ženy nepotřebuj mnoho* [92]。

星期五，下午

不管怎么将这封可爱的、忠实的、愉快的、带来幸福的信翻来覆去，它都是一封可称作“救星”的信。救星中间的密伦娜（假如我也在他们中间，她是否已在我的身边了？不，那就肯定不会了）！救星中间的密伦娜，她从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要救一个人，只能通过其自身的存在，别的都没有用。她已经以她的存在拯救了我，现在却还在尝试用其他小得多的方式来使之圆满。假如一个人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这当然是个壮举；但假如他在这之后赠给被救者一张参加游泳训练班的证件，这又算什么呢？为什么这救人者要拈轻怕重，为什么他不愿始终以自己的存在，以他那始终愿意为他人效劳的存在继续拯救人呢？为什么他要把任何推给游泳教练和达渥什的旅馆老板呢？此外我的体重是55.4公斤！我们手挽手时，我又怎么飞得走呢？假如我们俩一起飞走，过后又干什么呢？此外，这是前面因素的真正基本思想——我永远不愿离你太远。我不是刚从美兰那铅顶地牢中脱身出来的吗？

星期六，稍晚

我今天本来还想写点别的，但它现在变成无关紧要的了。我回到家里，在昏暗的房间里看到这封出乎意料的信放在书桌上。我匆匆读了一遍。他们不断地叫我吃晚饭，我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可惜这些东西你不把它吞下去便不会从盘子中消失。完了我便读这封信，彻底地、慢慢地、迅速地、狂乱地、幸福地、有一会儿惊讶地读着——完全难以置信，但确实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就是不能相信，但身子却朝那儿下倾，其实这已是一种相信了——终于绝望了，心怦怦地跳，绝望了。“我不能来。”这我从头几行就知道了，在读最后一行时也知道，在这期间我的心当然已多次到了维也纳，就像在一个失眠之夜有十次做了个半分钟

长的梦。然后我去邮局，给你打电报，心境安宁了一些。现在我已坐下来。我坐在这里的倒霉任务是向你证实，我为什么不能来。现在你说我并不弱，也许我会成功的，首先我也会成功地挨过下几周，这下几周的每一个小时已经在向我狞笑了。它们问道：“你真的没有到维也纳去过吗？你收到这封信也没到维也纳去过？没有到过维也纳？没有到过维也纳？”我不懂音乐，但这段音乐，可惜我却比所有音乐行家都懂得更加透彻。

我不能来，因为我在公司里不能吹牛。我可以在公司里吹牛，但只能出于两个原因：出于惶恐（这是一种办公室工作的自然现象，与办公室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吹牛不用准备，熟练而灵感丰富），或者由于迫不得已（也就是说假如“爱尔塞病了”^[93]的话，爱尔塞是爱尔塞，不是你密伦娜，你不会病的，这将是最万不得已的情况，我对此根本不愿谈及）。迫于万不得已我会马上就撒谎的，这时电报也没有必要了。万不得已是一种可以顶得住办公室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管是否得到获准都会来的。但是假如我借以撒谎的原因中的主要原因是幸福，是幸福的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撒不了谎，我撒不了，就像我举不起二十千克的哑铃一样。假如我带着一份“爱尔塞”电报到经理那儿去，这份电报一定会从我手里滑落；假如它掉在地上，我一定会用脚去踩它，踩这个谎言；假如我这么做了，一定会不提任何请求就从经理那儿跑开的。想一想，密伦娜，办公室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愚蠢的机构（确实是愚蠢的，而且太愚蠢了，但现在这不是我们的话题，再说它还是美妙多于愚蠢呢），而是我至今的生活，自然我可以摆脱它，这样也许一点都不坏，但至今它毕竟是我的生活。我可以吊儿郎当应付它，我可以为它干得很少，比其他任何人都工作得少（我做不到），可以对工作随随便便（我做不到），可以照样摆架子（我做不到），可以毫不羞愧地接受一个职员能得到的最佳待遇，但是吹牛，为了突然作为一个无牵无挂的人（而我明明只是个受雇的职员）到那里去，到那除了不言而喻的心跳“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驱使我去的地方去，那么，我是吹不了牛的。但是我在收到你这封信之前就想写信告诉你，我在本周内就想去换个新护照或者延长有效期，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尽快地赶到。

我读的时候把它漏掉了，我并不“强大”，我也根本没有说过这个意思，只是由于我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法（还有：换一个人，一个——大多数职员都这么认为——认为自己不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一个竭尽全力地工作的人——假如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可以说我已经坐上通向

维也纳的快车了，一个把办公室看成一台被人愚蠢地领导着的机器的人——要是他自己来领导会好得多，在这台机器上，这个人正是由于领导的愚蠢而被安放在不适当的地方——照他的能力，他，是个最上面，最上面的齿轮，在此却不得不作为最下面，最下面的齿轮来工作，等等，换这么一个人，他撒谎一定会比我圆满，可是在我的眼里，办公室，——以前小学、中学、大学、家庭，一切，也都是这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管我在哪里，他都用他那清白纯洁的眼睛看着我，我不知怎么会与这个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对我来说比那些我现在听见他们坐着车穿过环城路的人更陌生，他对于我来说陌生得叫人失去理智。但正是这一点叫人留意，我几乎不掩饰我的陌生感，但是它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这种清白无辜的特点呢——我便不能撒谎了）。不，我不强大，我不会写，我什么都不会。现在，密伦娜，你也疏远我，不会很长的，我知道。但是看吧，长时间心不跳是受不了的，在你疏远我的时候，它又怎么会跳呢？

在这封信后你要是能打个电报给我多好啊！这是呐喊，不是请求。只有在你能毫无困难地这么做的时候才这么做，只有在那时。你看，我在这几行下面并没有画道道。

我忘了可以叫我撒谎的第三种情况：你在我的身边。可是这就将成为全世界最纯洁无辜的一种撒谎，因为那时站在经理室里的将只有你，没有别的任何人。

星期六晚

你对星期六晚上的信会说些什么，我还不得而知，并且在很长时间内也将无从知晓。总之我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值班（也是这个机构的一个奇怪之处，坐在这儿就够了，故其他人星期天值班时工作比平时少，而我却同样多）。天阴沉沉的，一会儿像要下雨，一会儿云层中透出的光亮又干扰我的书写。这天就和现实一样：悲戚而沉重。你写道，我有生活的乐趣，而今天我则几乎没有；它应该给我什么呢？给我今天的夜晚，今天的白天？从根本上看我还是有这种乐趣的（这话说得多好：时时再现），但在表面上却很少。我对自己并不怎么欣赏。我坐在这儿，在经理的门外，经理不在，但是我不会惊讶的，假如他从里面走出来，并且说：“我也不喜欢您，所以我解雇您。”“谢谢。”我会说，“我急需被解雇，以便去一趟维也纳。”“是嘛。”他会说，“现在我又喜欢您了，我收回解雇令。”“啊，”我会说，“那么我又不能去了。”“噢不错，”他会说，“您现在又不叫我喜欢了，我宣布解雇您。”这故事会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

我相信，今天是我回布拉格后第一次梦见你。是凌晨时做的一个梦，短而沉重，经过一个恶劣的夜晚之后还算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我记得的不多：你在布拉格，我们沿着位于维利麦克斜对面的费迪南大街朝河堤方向走去，你的几个熟人在街对面走过，我们向他们转过身去。你谈论着他们，好像也说到了克拉萨^[94]（我知道他不在布拉格，我会打听他的地址的）。你像平常一样说话，但话中有一种难以琢磨、难以名状的反感。我对此根本不提，而是咒骂自己，只是在咒骂我自己。然后我们到了一家咖啡馆，好像在咖啡联合会（这是我们经过的地方），一个男人和一个姑娘坐在我们的桌旁，我已经完全想不起他们的样子了。后来又来了一个男人，长得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个年轻人，深黑色的胡子和头发，他的一切，比如眉毛，隆起的眉棱显得异常突出。然后是你和我在那儿。你的反感一点都没有暴露出来，可是你的反感却是明摆着的。你的脸——这种折磨人的奇怪现象吸引住我的目光——搽了粉，而且搽得太明显了，笨拙而不体面；天气好像很热，因此你的两颊现出了搽粉的线条，我现在想起来仿佛还历历在目。我不断向前欠身想问你：为什么搽粉；当你察觉我要问的时候，你就抢先问我——一点不露出反感——“你想说什么？”但是我不好开口了，我不敢再问，而我隐约地觉得，你搽粉是对我的一次考验，一次最关键的考验，要看我敢不敢问。我也想问，但是不敢。这个悲伤的梦就这样压在我身上。那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男人也在折磨着我。他对我的姿态就像你

那样，但稍有不同。当我问他什么事时，他显得非常和气、热心，向我俯过身来，十分爽朗，但是当我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或说些什么时——这随时都在发生——他就一下子缩回身去，埋头读一本书，与世界，尤其是与我隔绝开来了。他消失在他的胡子和头发之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忍受不了这种场面，我不断地——我没有别的办法——以提问题把他引过来，但又不断地因我的过失而失去他。

有一点我可以借以得到一点小小的安慰，今天你不能禁止我去读它。《论坛报》^[95]就在我的面前，我不必违反禁令去买这份报纸，我是从妹夫那儿借来的。不对，是妹夫借给我的，让我享受这幸福。起初我并没关心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我听见了一个声音，我的声音！在世界的喧嚣声中，让我享受这个幸福吧。再说它的整体是那么美！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分明用眼睛在读，但我的血液是怎么得知的呢，并把它溶于一身，以至热血滚滚？而且很有意思。我当然属于第二类：脚边的这一重量正是我自己的财产，我全然不同意公开纯属我个人的事情。有一次有个人对我说，我像只天鹅似地在遨游着，但是这不是恭维。不过这也叫人激动。我觉得我像个巨人，张开胳膊挡住拥向你的观众——巨人这样做并不容易，他既要挡开观众，同时又不想漏掉你的哪怕一句话，不想失去对你的注视，哪怕只有一秒钟之久——这些似乎是执迷不悟的，未开化的愚昧。此外还有婆婆妈妈的观众，他们也许在喊叫：“时装在哪儿哪？时装到底在哪儿哪？我们至今看见的，‘只是’密伦娜。”“只是”，我是靠这个“只是”生活的。我本来已将世界的其他部分夺了过来，就像闵希豪森^[96]夺了直布罗陀海峡的炮台，并把它们扔到了大海中去。什么？所有其他部分？撒谎？你在办公室里不能撒谎？好吧，我坐在这儿，天像刚才一样阴，明天没有信来，而那个梦是关于你的最后消息。

星期日

那么要快，机会来了，每个礼拜都有，只是以前我没有想到。当然，我首先必须得到护照，这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简单，没有奥特拉^[97]几乎不可能。

我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坐上快车，大约（我明天去打听准确的时间）于半夜2点到达维也纳。在这期间，你要在星期五买好星期天去布拉格的火车票，并给我拍个电报，说你买到了。没有这份电报我不能离开布拉格。你在火车站等我，我们可以共度四个小时，星期天早晨7点我离

开那儿。

这便是我说的机会，虽说有点凄凉，只能一起疲乏地度过夜间的四个小时（在哪里呢？在弗兰茨——约瑟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但总还是一种机会。假如你——可以有这种机会吗？——你坐车到格蒙德，而我们在格蒙德过夜的话，这一机会便将美得多。格蒙德在奥地利吧？那么你就不需要护照。我大约晚上10点到达，也许还要早些，星期天大约乘上午11点的快车离开（星期天想必容易得到座位）。假如有一辆合适的客车更晚离开那儿，便更迟些离开。当然，你怎么坐车去，坐什么车离开，我就知道了。

那么你怎么看呢？奇怪吧，我跟你谈了一天，而现在却不得不问你了。克拉萨的地址是玛丽恩巴德明星旅馆。

星期日，晚

那么，那份电报不算答复，星期四晚上的信才是答复。因此，“彻夜不眠”是千真万确的，今天早晨可怕的伤感也是千真万确的。你丈夫知道吐血的事吗？不必夸大，也许没有什么问题。吐血有种种原因，但毕竟是吐血，要忘却是不可能的。而你英雄般快乐地活着，任你的生活之流朝着这个方向流去。你活着，就像你在对血说：“来吧，为什么还不来啊。”于是它来了。至于我该怎么办，你根本别管。你当然不是nemluvně[98]，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故意在我眼前沉入维也纳的海中。假如说你没东西可知，这不就prosebe[99]是一种需要吗？要不是你认为，这与其说是你的需要，不如说是我的需要吧？哦，你这么认为也是有道理的。钱我不能再寄给你，因为中午我将回家，把钱塞进厨房的炉子里。这样我们就完全分手了。密伦娜，我们共同竭尽全力保持的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到这儿来，你的脸离我尽可能地近些。当然还有死的愿望。“舒服地”死去的愿望也是我们共有的。不过，这愿望本来是小孩子就有的。比如，当我在上算术课时，看见老师在讲台上翻着他的笔记本，大概在找我的名字时，我就产生了一种愿望，那是恐慌和真实的体现，与我的知识一样不可捉摸，一样虚无。我由于恐惧而半梦半醒地希望，自己会像鬼魂般站起来，鬼魂般从板凳之间择路而逃，就像我的数学知识一样轻盈，从老师的身边飞过，不知怎么就出了门，到屋外才定下神来，自由自在地享受着美好的空气。这空气，在我认识的整个世界中，都不像在教室里那么紧张。是的，这是“舒服”的。但是事情没有这样发展。我被老师叫起来，他交给我一道题。要解答它须有一本对数

表，我忘记带了，却撒谎说在凳子上，因为我相信老师会把他那本借给我，老师却叫我到凳子那儿去拿。我带着绝不是装出来的恐慌——我绝不能在学校里装作恐慌——发现那儿没有，而老师——前天我还碰到过他——对我说：“您这条鳄鱼！”我马上得了及格的分数。这本来很好，因为这只是形式上的，而且不公正（我虽然撒了谎，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是谎话，所以不公正吧？）。首先，我不必暴露我不知羞耻的无知了。整个说来，这也是相当“舒服”的。在有利的情况下，即使在房间里，也可以“死去”。这种可能性是无穷的。人可以“死去”，其实还活着[100]。

只有一种可能性不存在（干脆别啰嗦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你现在走进来，待在这儿，我们彻底地讨论一下你怎么恢复健康。这恰恰是最迫切的。

在读这封信之前，今天我本来要跟你谈许多，但现在面对这鲜血又能说什么呢？请马上写信告诉我：医生说了什么？那位医生是怎样一个人？

在火车站的后悔，你描写得不准确。我一刻也没犹豫过，一切是那样不言而喻的悲伤而美好，我们是那么孤独，以致那些本来不在那儿的人突然抗议起来，要打开站台的门。那一幕景象显得多么滑稽。

但是旅馆前的情景完全如你所述。你在那儿的模样多么美啊！也许那根本不是你？假如你那么快就站了起来，那倒是十分奇怪的。但假如那不是你，你怎么能对经过情形知道得如此清楚呢？

星期一

唉，恰恰现在来了这么多文件。我是为什么工作的呢？何况根本没有睡醒，脑袋昏昏沉沉。为了什么呢？为了厨房里那个炉子。

现在又加上了那个诗人，即第一个诗人。他还是木刻家，蚀刻师。他不走开，充满了活力。他把这一切往外向我扔来，看着我怎样由于焦躁而颤抖，我的手怎样在这封信上面颤抖。我的头已经垂到了胸前，他还不走开。这是个好心的、活跃的、又快乐又不快乐的、非同寻常的年轻人。但恰好现在我烦得要命，而你的嘴角正流着血呢。

实际上，我们写的是一回事。有一次我问你是否病了，于是你写了

这方面的情况；有一次我想死，接着你也这么表示；有一次我想象个小男孩一样在你面前哭泣，接着你也想象个小姑娘似地在我面前哭泣。我一次，十次，一千次，始终不断地说想来到你的身边，而你也这么说。够了，够了。

那医生怎么说的，至今不见你来信相告。你这个慢性子，你这糟糕的写信人，你这鬼东西，你这亲爱的，你——哦，怎么啦？没有别的，只想静静地躺在你的怀里。

星期一，稍晚

假如我不比今天早晨在信中多说一些，那我是骗子了，何况是对你说。对你，我可以比对其他任何人说话都更坦率随便。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知心，而且自愿地站在我这边，尽管那一切，尽管那一切（要把这伟大的“尽管那一切”与伟大的“尽管如此”区别开来）。

你信中最美的（这是多余的话，因为它们就整体而言，几乎每一行都是我生活中所经历过的最美的）是那些承认我的“恐惧”具有合法地位，同时又试图向我进行解释的话。这大可不必。因为我虽然有时看上去像受了自己的“恐惧”贿赂的卫士，但我内心深处好像确实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其实，我就是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因为它是身上最好的东西，所以它兴许也是你最喜爱的东西。否则，在我身上找得到什么值得你爱的东西呢？它确是值得爱的。

也许有朝一日你会问，我既然心里怀着恐惧，怎么又会用“好”字来形容那个星期六呢？这不难解释。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啊，你这死心眼的人，有如大海爱它海底的一颗小石子，我对你的爱就像海水淹没着你一样——而我在这里却又像一颗小石子，假如上天允许的话）。假如说我爱整个世界，那么也包括你的左肩，不，首先是你的右肩，我因此而在想吻它的时候便吻它（而你是多么够意思，把你的衬衣往一边拉开），还有左肩，更有在树林里你贴在我上身的脸蛋和你埋在我身底下的脸蛋，还有我贴在你几乎裸露的胸脯上的脸。因此，你说我们已合而为一是有道理的。我对此毫不害怕，这正是我唯一的幸福，唯一的自豪。我根本不将这局限在树林的范围内。

但是，恰恰在这白昼世界和那“床上的半小时”（你有一次在信中轻蔑地把它说成是“男人的事情”）之间，对我来说是条鸿沟，我无法跨

越，也许是因为我不愿意。对面那边是黑夜的事情，从任何意义上看都完全是黑夜的事情，而这边是尘世，我占有着它。现在，我为了重新占有黑夜的事，却要跳过去，跳入黑夜之中。有什么东西能够重新被占有吗？这是否意味着失去？这里是我所占有的世界，我却应该到对面去，为了玩一个可怕的魔术，一种变幻的魔术，一块炼金石，一种炼金术，一个魔环。去它的吧，我对此害怕极了。

竟想通过魔术在一个夜晚抓住它，急不可耐地、气喘吁吁地、困惑而迷乱地抓住它，用魔术抓住白天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东西！（也许不可能以别的法子获得孩子，也许孩子们也是魔术。先不去管这个问题吧！）因此我便有这般感激（对你和一切），于是一切便是这般 *samožřejmě*^[101]：我在你身边最平静，也最不安，最窘迫，也最自在。这正是我放弃了其他一切生活方式的原因。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吧！

通过K.夫人我才得知，那些书从床头柜上转移到了书桌上。在这之前无论如何应该问问我是否同意这一转移，那我一定会说：不！

谢谢我吧。我本想在这最后几行中再写一些激烈的话（一些激烈妒忌的话），但是我愉快地把这个欲望压下去了。

但是，现在够了，现在你谈谈艾米丽吧。

星期一下午

度过了一个不管怎么说总有点阴沉的日子。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明天又会有你的来信。星期六那封我已收到了，星期天那封要到后天才能收到。明天不会受到某一封信的直接影响。多奇怪，密伦娜，你的信是这样令我头晕目眩！自一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以来，我总感到你出了什么事，某种突如其来的或者慢慢袭来的事，某种必然的或者偶然的事，某种意识到的事。反正我确信出了事。这并不完全是从来信的细节中发现的。当然这样的细节也存在，比如：信里充满了回忆（而且是非常特别的回忆）。你虽然像以往一样回答问题，但又不是回答一切问题。你有着莫名的悲伤，叫我去达渥斯，突然又愿意与我这么相会了（你马上就接受了我劝你不要到这里来的建议，宣布在维也纳会面不合适。你曾经说过，在你此日之前我们不要会面，而在现在这两三封信中，你却如此急切。我本该对此高兴，但办不到，因为你的信中有某种隐藏着的惶恐，是向着我，还是反对我，我不知道。反正这惶恐流露在

你想要会面的突然性和迫切感之中。能找到一个会见的机会，无论如何我很高兴。这确实是一个机会。假如你不能在维也纳之外的地方过夜，那么无非牺牲几个可以共处的小时，而目的仍能达到。你坐星期天早晨7点的快车前往格蒙德——就像我当时那样，10点到达那里，我在那儿等你。我下午4点半才离开那儿，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总共还有六个小时。你坐晚上的快车回维也纳，11点1刻到达那里。这可以算一次小小的星期日郊游）。

我心神不宁，或者倒不如说，我并没有怎么不安，你的力量就是这么大。我的心并没有更加不安，因为你沉默不语，隐瞒着什么事情，或者是必须瞒着，或者是无意识地瞒着，我没有为此而更加不安，而是保持着镇静。我对你的信任如此强烈，不管你的表情如何。我想，假如你瞒着什么事，这种隐瞒也必定是正确的。

不过，我面对此事仍然镇静，还有一个真正非常特别的原因：你有一个特性——我相信，这是深深地融合在你的本质中的，假如它不能处处得以发挥，那一定是其他人的罪过——我还从未在别的人那儿发现这种特性。我唯独发现了它，真有点不敢相信。这特性就是，你不会给人制造烦恼。你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出自同情心，而是因为，你不会。——不，这是奇妙的，我几乎整个一下午都在琢磨这件事，现在却不敢写下来。这一切，也许只是为拥抱你而想出的一种或许很高明或许不很高明的借口。

我现在上床睡觉啦。此刻，即星期一晚上11点，你在做什么？

星期一晚

你太不通达人情世故，密伦娜，我一直这么说。好吧，爱尔塞是生病了，这看来是可能的，也许必须因此而前往维也纳，但是老姨妈克拉拉（病）重吗？你难道以为我可以撇开其他一切因素到经理那儿去，告诉他克拉拉姨妈的事，而不笑出来吗？（这里当然又牵涉到对人情世故的认识，犹太人谁都有个克拉拉姨妈，但我那位去世已久。）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吧，我们不再需要她了。即使她死的时候，她也并非孑然一身，奥斯卡在她身边。当然^啰，谁是奥斯卡呢？克拉拉姨妈是克拉拉姨妈，但是谁是奥斯卡呢？无论如何，他在她身边。但愿他没有生病，这个骗取遗产的人。[102]

真的收到一封信，而且是这一封！我开头写的那些话不适用于晚间的信，但这种（正如我说过的：安宁）不安因素——由于它已经出现——即使在晚间的信面前也不会消失。我们互相能见面该多好啊。也许我明天或后天（奥特拉今天已经去为护照奔走了）会打电报给你，告诉你我是否能在本周六就到格蒙德来（去维也纳这个星期无论如何太仓促了，因为还必须去买星期天的快车票）。你用电报答复我，你是否也来。我还是傍晚去邮局，这样你能马上收到电报。这样吧：我在电报中称：“不可能。”就是说本周不能来。那就不必给我回电，我们继续在信中商谈（今后四周内会晤的可能性取决于你将到什么地方的小乡下去，或许你会走得比现在离我更远。那么，我们也许将有一个月之久不能见面）。假如我在电报中称：“周六可到格蒙德”，你就要回电，或者说“不可能”，或者说“周六到格蒙德”，或者说“星期天到格蒙德”。如果是后者，那就算定下来了，不必再发电报（不，为了使你放心，表明我已收到你的电报，我还将回电），我们俩都到格蒙德去，在本星期六或星期天便可见面。这听起来十分简单。

浪费了几两个小时，不得不将信放在一边。奥托·皮克^[103]来过。我很累，我们何时见面？为什么在一个半小时内只能有两三次听到你的名字？你在哪里？在前往那茅屋所在的村庄的路上？我也在路上，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但是不要因此而折磨自己吧，无论如何我们已坐在车上。除了坐车上路，别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

星期二

医生在哪里？我把这封信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并未读它，只是想找到那个医生的名字。他在哪里？

我睡不着。我不想说，我是因此而睡不着。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人来说，真正的忧虑其实比其他东西更能催他入眠，但我就是睡不着。维也纳之行距今已经很久了吗？我对我的幸福称颂得过分了吗？牛奶、黄油和色拉都无济于事，而我需要的不正是你在我身边陪伴我养神吗？也许这些理由一个都不是，但这些日子不能说是美好的。三天来我也失去了住在空荡荡的居室中的福气，现在住在家里（这也是我会这么快收到电报的原因）。使我感到那么舒服的也许不是居室的空空荡荡，或者说这不是主要因素，而是由于同时占有两套住房，一套白天用，另一套僻静些，供晚上和夜间用。你明白吗？我不明白，可是事情就是如此。

是的，那个大橱，我们将为它进行我们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争吵。我会说：“我们把它扔出去。”你会说：“留着别扔。”我会说：“有它没我，有我没它，你二者择一吧。”你会说：“一回事，弗兰克和施兰克[104]，是押韵的。我选择施兰克。”“好吧。”我会说。然后我慢慢地走下楼梯（哪一个楼梯？），接着——假如我还没有找到多瑙河，那么我今天一定还活着[105]。

此外我对那大橱是很同情的，只是那件衣服你不应该穿。你会穿破它的，这么一来还能给我留下什么呢？

奇怪，那坟墓，我本来就是在那地方找，但只是畏畏缩缩地，把范围扩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终大得不得了，终于把一个毫不相干的礼拜堂当作了那个礼拜堂。

这么说，你将离开而又没有签证。你在必要时马上会得到的保险性因此便不复存在。现在你还希望我睡觉。而那个医生呢？他在哪里？他还没有来吗？

没有特种会议邮票，我也曾相信有这样的邮票。人们今天给我带来的“会议邮票”真叫我失望。这都是些普通的邮票，只是盖上了会议的戳。尽管如此，这个邮戳也会使这些邮票十分值钱，但是那个小伙子是不会明白的。我将每次只附上一张邮票，一是由于其珍贵，二是为了每天都能得到一声谢谢。

你看，你需要一支笔。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好地利用维也纳的时间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始终待在纸张店里？那里是那么美，而我们离得那么近。

你没有把那些愚蠢的笑话念给那大橱听吗？我几乎对你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爱得发昏。

那么那医生呢？

你经常碰到那位集邮者吗？这不是别有用心的问题，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如此。睡得不好，就爱提问，但不知道自己问了些什么。人人都想永远地问下去。不眠就意味着提问，一旦得到答复，便会安睡了。

以神经错乱来解释未免太过分了。护照你已经得到了吧？

收到一封星期五的信。假如星期四没有写，那也无所谓，只是一封也不要失落。

你信中所说我的话聪明得可怕，我对此不想补充什么，且让它原封不动地留着吧。只是里面有一点，我想说得更坦率一些：我的不幸在于我把一切人——当然首先是那些我认为是出色的人——都看成好人，我的理智和心都叫我这么去看（现在进来了一个人，吓了我一大跳，因为我正在自言自语，做出表达这些观点的表情），只有我的身体不知怎么让我无法相信他们（在必要的情况下）真的会变好。我的身体感到恐惧，宁可慢慢地爬上墙去，也不愿等待那就此意义而言真能拯救世界的考验。

我把昨天晚上那一封信撕毁了。你因为我的缘故而非常不幸（其他因素当然也在起作用，一切都在起敌对的作用），一次比一次更坦率地说出来吧。总有一次会突然行不通的，这是当然之事。

昨天我去看医生。与我的估计不同，无论他还是秤都没有发现我的状况有所改善，当然也没有发现恶化。但医生说我必须离开这里，到瑞士南部去。他马上从我的解释中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不需要我提醒，立即举出两个奥地利疗养院是最理想的去处：格里蒙施泰因疗养院（弗兰克福特博士开的）和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当然他目前不知道这两处的邮政信箱号码。你是否能顺便打听一下呢？比如在某个药房，从某个医生那儿，在一本邮政簿或电话簿中？事情不急，也并不是说，我就一定会去。这是些专治肺病的地方，病人们没日没夜地咳嗽着，发高烧。人们在那儿必须吃肉^[106]，当病人拒不打针时，那儿还有犹太医生拄着胡子在一边看着，对犹太人和对基督徒一样强硬。

在最近的某一封信中，你说（我不敢把最近几封信抽出来仔细引证，也许我在匆匆阅读时误解了，这是最可能的），你的事业正面临彻底的完蛋。其中有多少成分是一时的烦恼，有多少是持续的现实呢？

我把你的信又读了一遍，决定收回“可怕”二字，这话不全面，又有些过分，其实仅仅“聪明”便够了。对于人来说，同幽灵玩“捕捉”的游戏是困难的。

你同布莱^[107]在一起。他在干什么？我乐于相信这一切是愚蠢

的，我也相信人们是矛盾的。这里边有些美好的东西，只是距此约五万英里之遥，而且拒绝前来，一旦萨尔茨堡所有的钟全部鸣响起来，它会出于谨慎而向后退几千英里。

星期二

你知道卡萨诺瓦^[108]逃离铅皮顶监狱^[109]的故事吗？是的，你知道的。故事中草草描写了监禁的最可怕的方式。在黑暗、潮湿的地牢里，在海水所及的高度，人们蹲在一块狭窄的木板上，水已经快淹到脚跟了，随着海的涨潮水也真的涨了上来。但是最可怕的是那些野蛮的水老鼠，它们在夜间的叫声、拖拽声、撕裂声、啃啮声（我想，它们是为了觅食而与人们作斗争的），尤其是它们焦躁的等待，等着人们精疲力竭，从木板上掉下去。你知道吗？这封信里的故事正是如此，可怕而又不可思议，尤其这么近，又这般遥远，就像自己的往事一样。人们蹲在上面，脊背会变得不那么美，脚也在抽搐，怀着惊恐，除了注视着那些又大又黑的老鼠之外，无所事事。它们在半夜里使人头昏眼花，使人最终搞不清他们是依然坐在上面呢，还是已经掉进海里；是在吹口哨，还是龇牙咧嘴。去它的吧，不要说这样的故事，到这儿来吧，这算什么呢，来吧。我把这些“小动物”赠给你，条件是：你将它们撵出这座房子^[110]。

难道就再也不跟我提及医生了吗？你明明许诺过你要去看医生的，而你从来是说到做到的。因为没有再咯血，你就不去了吗？我不愿你效法我，你比我健康得多，简直不可相比。我将永远是那个自己扛着箱子走的先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位的高低，首先是那个招手呼唤搬运工的先生出场，接着搬运工来了，然后才是请求搬运工为他扛箱子，因为他快要支撑不住了。我最近——最近！——从火车站回家时，本来没有说什么有关的话，那个扛着我的箱子的服务员便开始安慰我，说我无疑懂得许多他办不了的事情，扛行李是他的义务，对他毫无妨碍，等等。一幕幕往事在我脑海中闪过，服务人员的话可以作为对这些往事的答复——完全能令人满意的答复。但是说穿了，我并没找到合适的例子）——是的，我在此不能与你相比，但我总不得不想我自己当时的情况如何。想这些使我产生忧虑，得出的结论是：你应该去看医生。此事发生在三年前，以前我的肺从未患过病，干什么都不觉得累，走路有无穷无尽的劲，从未达到我力量的极限（在想问题方面却总是如此）。事情是突如其来的，大约是8月份——天气炎热美好，除了我的脑袋外，一切

正常——我在平民游泳学校吐出一口红红的东西来。这又奇怪又有趣，对吗？我看了它一会儿，很快就忘了。这以后便经常如此，而且只要向外吐痰，我就可以看到红色，真是随心所欲。这就不再有趣，而是枯燥了，我又将它忘了。假如我当时马上去求医的话——那么，也许一切同样如此，就像不找医生一样，只是当时无人知道这血的事。我本来也不知道，没有人担惊受怕。但是现在有人担忧了，所以求求你，去看医生吧。

奇怪，你的男人说，他将给我写信，写这写那。还要殴打和绞杀吗？我对此真的不懂。我当然完全相信你的话，但对我来说完全不能想象。读到这些我没有产生任何感受，就好像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遥远的故事似的。就像你在这儿，对我说：“现在我是在维也纳，这儿在叫喊着。……”我们俩都会向窗外看去，看着维也纳的方向，这当然不构成任何足以引起激动的因素。

但还有一点该说的：你有时在谈到将来时，是否忘了我是个犹太人？（jasné nezapletené^[111]）作为犹太人，这始终是危险的，即使是在你脚下。

星期三

你信中对我出门一事所说的话（cekàs, azto Toběbudenutné^[112]），我宁可省略不读。首先，这已经过时了，其次，这叫人痛苦。里面当然也有合乎道理之处，否则星期六晚上至星期天早晨的信为什么这般绝望呢？第三，我们星期六也许就能见面（好像你在星期一早晨还没收到三份电报的第一份，但愿第三份你能及时收到）。

关于父亲的信^[113]所引起的你的绝望情绪，我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事情已经持续那么久了，那最折磨人的关系每一次新的体现，都使你重新陷入绝望。从这封信中你找不出什么新东西。你父亲的信我一封都没有读过，但在这封信中我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他是忠心的，又是暴戾的，并且认为只有暴戾才能使心灵得到满足。签字确实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是暴君的体现而已，上面写着“lito”和“strasnsmutn”^[114]，这抵消了一切。

当然，使你惊恐的也许是你的信与他的信之间的不平衡。你的信我

没有读过，再便是另一方面，想想他的“不言而喻的”谅解精神与你的“不可理解的”抗拒态度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现在，你拿不定主意该怎么答复？或者不如说曾经如此，因为你写道，现在你知道应该怎么答复了。这真奇怪。假如你已经答复了，却又来问我：“我回答了些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你已经照我的意见回答过了。

自然这是不容置疑的，在你父亲眼前，你的丈夫和我之间是根本没有区别的，对欧洲人来说我们都长着一样的黑人的脸。假如撇开你目前对此说不出什么肯定的话这一点不谈，你又为什么把这写到回信中去呢？为什么一定要撒谎呢？

我相信，你只能这么回答，就像一个几乎别的什么都不看，只是心情紧张地注视着你的生活的人必然会对你父亲（假如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谈论你的话）说的那样：“一切‘建议’，一切‘确定无疑、不可动摇的条件’，都毫无意义，密伦娜过着她自己的生活，不会去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密伦娜的生活诚然是悲凉的，但总还是像住疗养院那样‘健康和平静’。密伦娜只请求您终于能看到这一点，其他什么请求都没有，尤其不会请求得到任何‘舍施’。她只是请求您不要千方百计与她隔绝，而是去体谅她的心情，像一个人与另一个同样地位的人说话那样与她说话。只要您一旦这么做，您便会在密伦娜的生活中消除许多‘可悲性’，您也就不必再为她感到遗憾了。”

你说你给父亲的答复落到生日的话题上了，这是什么意思？为这个生日我确实开始害怕了。我们星期六能否见面？无论如何请于8月10日晚上打电报给我。

假如你有可能于星期六，或至少于星期天到格蒙德来，那多好啊！

这的确非常必要。

这样的话，在我们面对面互相看着之前，这便将是最后一封信了。

这双一个月来实际上一直无所事事的眼睛（哦，当然^啰，也读读信，看看窗外）将能看着你了。

这篇文章比德文写的那篇好多了，当然还有漏洞，或者不如说，人们在它里面走着，就像走在一片沼泽地里，每一次拔出脚来都那么艰

难。最近，一位《论坛报》的读者对我说，我一定在疯人院里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只是在自己的那个里面。”我说。他为此还试图恭维我“自己的疯人院”这一说法。（译文中有两三个小小的理解错误。）

星期三

现在是晚上10点，我在办公室。电报来了，来得这么快，我几乎要怀疑这是不是对我昨天发出的电报的答复。但那上面确实写着：8月4日上午11时发出。甚至7点钟就到了，也就是说只用了八个小时。这电报带来的安慰之一是：我们离得够近的：几乎在二十四小时内我便能收到你的答复，而且答复不总是：不要来。

还有一线希望：我在一封信里向你解释过，你不必在维也纳之外的地方过夜，可以到格蒙德去。也许你还没有收到那封信。但是这点你自己也是可以想到的。不管怎么，我总是在想，我是否应该根据这微弱的希望去取来有效期仅仅三十天（你的休假旅行）的签证，并把快车票办妥。但我大概不会这么做。电报的语气是那么肯定，你对此行总是抱着不可能克服的顾虑。看吧，密伦娜，这没有关系，我自己还不至于胆大包天（当然，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察觉，见面的可能性会是那么简单），才过了四个星期就“已经”胆敢想要见你了。假如我们见了面，我也认为全是你的功劳。那么，你自然也有（除非你不来，事情无论如何总会是这样的，这我知道）权力把这一由你造成的可能性一笔勾去，我完全不必为此白费笔墨。这情况就像是：人们钻出自己的居室，挖一条通向你那里的通道，高兴极了，以致逐渐全力以赴地进行挖掘，深入这条也许（愚蠢却马上说：不是“也许”，是一定！一定！一定！）通向你那里的通道。可是突然间，这挖掘突然碰到了“请勿来”这块不可穿透的岩石。于是，人们现在又全力以赴地沿着这条曾挖得那么快的通路，慢慢地往回撤，并重新把土填上。这有点令人痛苦，但既然有能力就此作这般复杂的描述，那么看来事情就不会太糟。最终人们又会开辟新的通道，人们——老鼯鼠。

糟糕得多的是：根据我昨天指出的原因，这次会见或许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它，因此电报便使我感到悲伤。不过你后天的来信或许会带来安慰。[\[115\]](#)

我只有一个请求：在你今天的信中有两个很强硬的句子。第一句

(a

Ty nepřijedeš, poněvadž čekáš, až to Tobě jednou bude nutné

, to, abys přijel[116]) 还有一些合理之处, 但远非完全合理。第二个句子 (Měj se pěkně, Franku[117], 为让你能听清句子的音调, 把跟着的话也抄录在此: Telegrafovat Ti ten falešný telegram nemá tedy smyslu, neposiám ho[118]。那你为什么又发出了呢?) 这个“Měj se pěkně, Franku”, 一点都站不住脚。就是这几句话, 密伦娜, 假如你愿意的话, 你能够以某种方式明确地收回这几句话吗? 第一句话只须收回一部分, 第二句话则全部收回。

今天早晨我忘了附上父亲的信了, 请原谅。而且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是三年来的第一封信。现在我才明白它会给你造成什么印象。这样一来, 你致父亲的信当然也显得重要得多了, 那里面必定有完全新的内容。

对了, 在你的信中还有三个针对我的句子, 比起上述那两个也许更站在反对我的立场上, 就是那个有关弄坏胃的甜食的句子。

星期三晚

今天该是出乎意外地成为我担心如此之久的无信的日子了。星期一的信中你说第二天不能再写信, 口气多么郑重其事。但是现在, 我总算还有你的电报赖以支撑。

星期四

我本想在您面前表现自己, 显示我的意志力, 先了结一件公文, 等一下再给您写信。但是房间空空如也, 没有人关心我在干什么, 就像是有人在对我说: 让他去吧, 你们没有看到他的事情把他的身心塞得满满的吗? 就像他嘴里塞着一拳头似的。我只写了半页, 便又回到了您的身边, 俯在这封信上, 就像当初在树林中躺在您身边一样。

今天没有信来, 但我并不惊惶, 密伦娜, 求你不要误解我, 我从未为您害怕过。假如有时看上去如此 (经常是看上去如此), 那也只是一个弱点, 是心里在闹脾气。尽管如此, 心却对它为什么跳动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巨人也有弱点, 甚至赫克力斯[119]。我相信, 有一次我也曾昏过去。但是我紧咬着牙, 面对您的眼睛 (我在大白天也能看到) 便能忍受一切: 遥远、惧怕、担忧、无信。

我多么幸福，你使我多么幸福啊！来了一个当事人，你想想，我也有当事人。这个人打断了我的写信，我很恼火，但他长着一张好看的、亲切的、胖胖的、符合德意志帝国标准的面孔，乐于承受对他开的玩笑，就像对待公务程序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打搅了我，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还不得不站起来，同他一起到别的部门去走走，这对于你来说已经过分了。而正在我站起来的时候，勤杂工来了，带来了你的信。我在楼梯上打开了它。老天爷，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种完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一封可以读一年的信，一封永恒的信，而且这张照片真好，好得不能再好了。一张可怜的照片，只能透过泪眼，伴着剧烈的心跳才能看清它，用别的方式都不行。

一个陌生人又坐在我的桌旁。

接着上面的话说，我一切都能承受，只要有你在心中。如果说我曾经在信中说过的，不见你来信的日子是可怕的，这说得不对，这样的日子只是沉重得可怕。小舟是沉重的，吃水深得可怕，但却是漂游在你的潮水中。只有一点，密伦娜，没有你的帮助，我承受不了“恐惧”。和它作对我太弱了，这些庞然大物我连俯瞰一下都不能，是它们夹带着我漂游而去的。

诚如你谈论雅尔米拉时所说的，正是由于心中的某种弱点，有一瞬间你的心停止了对我的忠诚，于是你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我们还是两个人？难道我的“恐惧”与对自我污损的恐惧大不相同吗？

又被打断了，我在办公室里没法再写信了。

要不是这封信那么令人宽慰的话，你预告的那封伟大的信差点儿没叫我害怕起来，信里会写着什么呢？

马上写信告诉我钱是否寄到了。假如丢失了，那么我再寄一笔。假如第二笔钱也寄丢了，我还会再寄去，永远寄下去，直到我们一无所有，那么才一切正常了。

F

星期五

花我没有收到，看来它使你在最后一刹那确实为我感到遗憾。

目前你的状况比我认识你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坏。我与你之间不可消除的地理距离和你的苦恼加在一起，使我感到就像是置身于你的房间里，而你几乎认不出我来。我困惑地在床与窗之间踱来踱去，对谁都不信任，对哪个医生都不信任，对任何治疗方法都不信任，什么都不知道，看着阴沉沉的天空。早年天空只是开玩笑，而今却是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绝望的面孔，对你就像我一样爱莫能助。你躺在床上？谁给你送吃的？吃什么？还有你的头痛。可能的话，你写信把这些告诉我。我曾有过一个朋友，一个东方犹太人，话剧演员，他每个季度都有几天头痛得要命，除此之外，他是完全健康的。这些日子一到，他就必须靠在马路边的墙上，人们没办法帮助他，他只能来回踱步达半小时之久，等头痛过去。——病人被健康人抛弃了，但是健康人同样被病人抛弃了。是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头痛吗？医生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你现在或许也在服药片^罗？糟糕，糟糕，我连“宝贝”都不敢说了。

可惜你启程的日子又一次推迟了，现在你得在下星期四才走。现在，看着你在那儿的湖泊、森林和群山之间重新恢复的幸福，这个幸福我是享受不到了。但我还想要许多幸福，贪婪者，贪婪者。可惜你还不得不在维也纳忍受长时间的折磨。

关于达渥斯^[120]我们还会谈到的。我不想去，因为那儿太远，花费太多，

也太没有必要。假如我离开布拉格（这或许是我必须做的），那我最好是随便到某一个村庄去。当然，那里是否有人接纳我呢？这我还要考虑一下。但是10月份以前我是不会走的。

昨天晚上我碰到过一个叫施坦因^[121]的人，也许你在咖啡馆里见到过他，人们总是将他与阿尔封国王相比。他现在在一个律师那里承担起草工作。遇到我他很高兴，并说他有公务要跟我谈，不行的话第二天他还会打电话给我。“哦，是什么事呢？”“一桩离婚案，我似乎介入此事了，就是说，他请求我插手。”“怎么插手？”我真的不得不把手搁在心窝处，听他讲完，才知道，这是一个作家父母的离婚案。那位母亲（我根本不认识她）向他——施坦因请求，要他让我对那个作家施加点影响，叫他对母亲好一点，不要老是这样骂她。

此外，这还是一次奇怪的婚姻。想想看，这女的已经结过一次婚，在第一次婚姻中同现在的丈夫生了一个孩子，就是这个作家。这个作家

因此而姓女人前夫的姓，而不是跟着自己父亲的姓。然后他们结婚了，在过了许多年后，在现在的丈夫——作家的父亲——的推动下又离婚了。离婚手续已经办完，由于现在住房紧张，这女人得不到住房，仅仅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依然同床共枕。这同居生活（由于住房紧张）却不会调和她与丈夫的关系，更别提放弃离婚判决了。我们难道不是一些可怜得叫人发笑的人吗？她那个丈夫我认识，是个有理智、很能干、待人随和的好人。

当然，应该把愿望单寄给我，单子开得越长越好。我愿爬到你想要的每一本书、每一件东西里面去，让它们载着我驶往维也纳（而经理则什么也办不到）。给我尽可能多的行驶机会吧，已经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你可以借给我吧。

此外，我几乎为你的休假感到高兴，甚至通信不便也不在乎。你会简短地向我描绘那儿的情景，对吗？包括你的生活，你的住处，你的道路，窗外的风光，伙食，这样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你的生活。

星期五

目前我精神涣散而伤感，我遗失了你的电报。它不会丢失的，但必须去找它这一点就已经够糟的了，而对此有责任的只有你，假如它不是那么美，我就不会老是攥在手里了。

只有你就医生所谈的话给我以安慰，这么说来，咯血不说明任何问题。怎么样，我根据猜测不也是这么说的吗？我可以算是个老医学研究了。那么，他对肺病是怎么说的呢？他在诊断书上一定没有写下饥饿和扛箱子吧？你应该继续对我好下去这一点他予以肯定了吗？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我？但是，如果医生没有找到任何我的迹象，我又怎么能满意呢？要不他在肺中找到的是我的病？

事情真的不糟糕吗？他没有说别的，只是叫你到乡下待四个星期？这本身太妙了。

不，比起你在维也纳的生活，我并不特别反对这次旅行。去吧，真的去吧，你在某处写到过你对此行抱着的希望，这也足以成为我愿你成行的原因。

到维也纳去一事，再提一遍，假如你是严肃的，那就是最坏的情

况。那样，这里的土地就会真的晃动起来。我紧张地瞧着，看它是否会把我抛出去。它没有这么做。关于外界的障碍（关于内心的障碍我不想谈，因为它们尽管更大，但它们挡不住我。不是由于我强大，而是由于我弱小，弱小得不能让它们挡住我），我已经写过，我只能通过撒谎来达到成行的目的。但是，我对撒谎很害怕，不是像一个老实人那样害怕，而是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害怕。此外，我有这么个感觉，或者至少有这么个预感：有朝一日我可能会由于我的缘故或者你的缘无条件地、不可躲闪地要到维也纳去。但是即使我是个轻飘飘的小学生也撒不了第二个谎。这一次撒的谎是我的储备，我靠它生存，就像靠你马上就来的诺言生存一样。所以我现在不来，我没有感到过这两天是肯定不变的（不要描绘这两天，密伦娜。那样你就近乎是在对我施刑了，必要性没有到来，但却是一种无穷的需要性），我倒是看到了持续的可能性。

那些花呢？它们早该枯萎了吧，你是否曾让花朵“塞错了喉咙”，就像这些花对我一样，这真不那么好受。

你与马克斯之间的斗争我不插手。我站在一边，认为双方都有道理，而我则安然无恙。你说的话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现在交换一下位置。你有你的家乡，也可以放弃它，这或许也是对家乡最好的做法，特别是由于人们正是不放弃对家乡来说不可放弃的东西，他却没有家乡，因此也无物可弃，必须不断地想着去寻找它，或者建立它。不断地这样做，不论在衣帽钩上拿下帽子的时候，在游泳训练班躺在烈日下的时候，还是在写供你翻译的书的时候（在此他也许最轻松——但是你这可怜的、亲爱的，你出于负疚心理给自己压了多少工作量啊。我看见你俯在那里工作，裸露着脖子，我站在你身后，而你不知道——当我的嘴唇接触到你的后颈时，你可不要惊慌，我不是想吻你，这只是无可救药的爱情），——是的，马克斯，他必须不断地想着这个问题，包括在他给你写信的时候。

奇怪，尽管你整个说来是正确地抗拒了他，但你在细节上却怎么会输给他呢？他显然写到了住在父母家里和达渥斯的情景。两者都对。当然，在父母家里生活得很糟，但并不仅仅是居住，还有那生活，那在好心的、爱的圈子里的沉沦。你没有读过那封父亲的信：苍蝇在胶粘杆上颤动。此外这也有好的地方，一个在马拉松竞赛中奋斗，一个在餐室里，战神和胜利女神无处不在。但是那种机械的迁居异乡的方式有什么意义呢？我目前在家吃饭，我觉得这是我的最佳处境。下一次谈达渥

斯，我觉得在达渥斯时唯一值得回味的，是离别时的吻。

亲切并且有耐心，我是这样的吗？这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样的电报叫人舒服，在一定程度上叫人感到浑身舒服，但毕竟只是一份电报，而不是伸出的手。

但是听上去也伤感、疲倦，像是躺在病床上说的，确实是悲哀的，而且一封信也不来。又是一个无信的日子。也许你的状况很坏了。谁能向我保证，电报是你自己发出的，而你而不是一整天躺在床上，在上面那房间里（我在那房间里度过的时间要比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更多）？

今天夜里我因你之故杀了人，一个凶杀的梦，糟透了的夜，详细的情形我几乎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现在信还是来了，这封信写得很明了。其他信在明了性上当然不比它差，但是却叫人不敢向它们的明了性逼近。顺便说一下，你又怎么可能吹牛呢，你并没有长着吹牛的前额呀。

马克斯没有归罪于我；当然，不管他信里写了些什么，他总是不对的。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最好的人，可以插入我们之间。也正是为此，我今天夜里杀了人，某人，一个亲戚。他在与我交谈，谈话的内容我记不起来了，可是意思大概是：这个人和那个人不能完成某件事，一个亲戚最终在谈话过程中插了一句讥讽的话：“那么，或许密伦娜能办成。”于是我便以什么方式杀死了他，然后激动地走回家去。母亲一直跟在我后面跑，谈的也是类似的话题，最后我暴怒地大叫起来：“要是有人说密伦娜的坏话，比如父亲（我的父亲），我同样会杀死他，或者杀死我自己。”接着我就醒了，但我实际上根本没有睡，所以不存在醒不醒的问题。

我又翻阅起以前的信来。它们从根本上说像那封致那位姑娘的信，而晚上的信一律在对早晨的信表示遗憾——有个晚上你写道：一切都可能，只有我失去你不可能——其实只需轻轻一压，那不可能的事便成为可能了，也许还真有过这么一种压力，并且也许它还取胜了呢。

无论如何：这封信使人得到休息。人们本来已经被活活地埋在以前的信中，认为不得不静静地躺着了，因为自己可能真的是死了。

这一切并非完全出乎意外，我知道这日子会到来的，尽可能地做好

了准备，以便在它到来时能够忍受住。可是它现在真的来了，自然我始终还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当然^啰，还不至于叫我震惊。你对其他情况和你的健康情况所写的，真是太可怕了，我受不了。等你休假回来，我们还要好好地谈谈。也许那里真的会发生奇迹，至少你所期待的恢复健康的奇迹。在这方面我对你非常信任，以致我根本都不盼望奇迹出现，而是将你——美妙的、受到强力胁迫的、又不可能为强力所胁迫的自然静静地交给森林、湖泊和饮食，当然，假如其他一切不来干扰的话。

我仔细推敲一下你的信——只读了一遍——你就你的现在和将来所写的，你就你父亲所写的、你就我所写的，便只能发现（这也是我曾经说过的，而且说得很清楚），你的真正的不幸只是我，不是其他人，只是我——在此我要声明：你的外界的不幸——，因为假如不是我，那么你或许在三个月前就离开了维也纳，假如不是三个月前，那么现在总该走了。你不想离开维也纳，这我知道，你也不会动这个念头的。但正因为如此，人们会说（这已经是从最高点鸟瞰了）一些闲话，其中包括：我对你的感觉的含义是，我尽可能让你留在维也纳。

至于其他完全不必想入非非，陷入复杂的细节中去。只要想一想，就会觉得事情是明摆着的：你已经离开你丈夫一次了，在目前这大得多的压力下，离开他更容易。当只是由于要离开的缘故而离开他，而不是由于另一个人的缘故。

可是，所有这些思维只能帮助你直截了当地来看问题。

为你寻那些东西自然是叫我高兴的。只是我想，在维也纳买那些紧身衣或许更合适些，因为寄送紧身衣也许需要得到出口许可证（最近在一个邮局寄书，他们竟也非要出口许可证不可，而在另一个邮局，人们却没提出任何要求就接受了）。也许可以在商店里问一下，——钱我将在每封信里夹一点。只要你说“够了”，我马上不再寄。

谢谢你允许我读《论坛报》。最近一个星期天，我看见一个姑娘在温策尔广场旁买《论坛报》，显然是为了那篇关于时装的文章。她穿着

并不特别好，应该说是还没有穿得很好，可惜我以前没有发现她，因而未能观察她穿着的进展。不，我不该把这些文章看得太低下，它们是可以公开读的。我真的很感谢你（以前我偷偷地，也就是说以卑劣的方式经常读这些文章）。

我早就知道这封信里会写些什么了，几乎写在所有信的背后，写在你的眼睛里——从它们纯净的底色上又会有什么叫人看不出来呢？——写在你额头上的皱纹里。这我早就知道，就像一个人整个白天沉浸在某种似睡似梦、惊恐交加的心境中，躲在关上的百叶窗后面，晚上打开窗户，一点都不惊讶，早就知道现在天黑了，美妙的漆黑。我看见你在折磨自己，辗转反侧，不能脱身。而且（让我们把火种扔入火药库里吧！）永远不能脱身。我看见了这种情况，却又不能说：你待在原地吧。但相反的话我也不说。我站在你对面，看着你可爱而又可怜的眼睛（真是可叹，你寄给我的那张照片。看着它是一种折磨，这是一种叫人甘愿一天上百遍接受的折磨。可惜这又是一种所有。为保护它，我有能力与十个强壮的汉子对抗）。我真的强大，如你信中所说，我有某种强大之处，要想简短而明了地指出这强大之处是什么吗？——我的“不懂音乐的存在”。但多么强大也说不上，还不足以让我至少现在能继续写下去，某种苦恼和爱的潮流席卷了我，把我冲走。

F

星期六

你的论据中有一点一开始就使我感到不安，这在上一封信中显得特别清楚。这无疑是个错误。不信你可以检验一下：假如你很爱你的丈夫（这也是正确的），因此你不能离开他（看在我的面上也不能这么做，我是说：假如你真的这么做，那么对我来说也是可怕的）。我相信你，也认为你是对的。假如你说你虽然可以离开他，但是他内心需要你，没有你活不下去，因你不能离开他，我也相信，而且认为你是对的。可是假如你说，表面上他没有你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你因此而（你把这看成是一种主要的原因）不能离开他。你这么说，要么是想掩盖以前说过的理由（不是为了加强那些理由，因为加强本身是不需要那些理由的），要么是大脑开的那些玩笑中的一种（你在上封信里写到过的那些），你的身体，而且不仅是身体在它们下面痛苦地辗转反侧。

星期日晚

我正想顺着上封信里的思路给你写下去，这时来了四封信。不是一下子来的。先来的那封写的是你为告诉过我你晕过去那件事而感到遗憾。稍过了一会儿来的那封，是你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马上写的，同时来的是那封，噢，那封美妙的信。又过了一会儿来了那封谈到艾米丽的，它们的先后顺序我分不太清，你没有再写日期。

我将回答那个关于“strach-touha”^[122]的问题。要想一下子回答好几乎不可能，但是假如我接连在几封信中谈到这一题目，或许会成功的。假如你读了我的（顺便说一下是糟糕的，没有必要的）致父亲的信，我们就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了。也许我会把它带到格蒙德去。

假如像你在上封信中做的那样，对“Strach”和“touha”的意义这般限制，那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很简单，但是并不容易。这样我就只有“Strach”了。是这样的：

我记得第一个夜晚。那时我们住在蔡尔特纳路，对面是一家成衣店，门后总是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在上面的房间里，当时刚过二十岁的我不停地踱来踱去，为第一次参加国家考试，拼命往脑子里装一些我觉得毫无意义的东西，真是令人神经紧张的学习。那是夏天，天很热。这季节就是这样，简直叫人受不了，牙齿间咬着那讨厌的罗马法律史，一直站在那儿。后来我们终于交换了信号，定在晚上8点我去接她。可是当我晚上下去时，已经有另一个男人在那儿了，这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我本来就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害怕，当然也害怕这个男人；即使他这时没有出现在那儿，我照样是怕他的。这姑娘虽然挽着他的手，却给我打了个手势，要我跟在他们后面。我们便这样走到了苏岑岛上，在那里喝啤酒，我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们慢慢向姑娘的住处走去，我跟在后面。在肉市的某处那个男人与姑娘道别了，姑娘跑进了房子。我等了一会儿，她又向我跑来了，然后我们到克莱因赛特的一家旅馆去。还没到旅馆，一切就已是那么诱人，令人激动而又厌恶，到了旅馆里还是这样。凌晨时分，天气还是那么热，那么好，我们走回家去，走过卡尔大桥。这时我自然深感愉快，但是愉快的仅仅是因我那永远可怜不堪的身体终于获得了平静。令人愉快的首先在于：这一切没有更叫人厌恶，没有更龌龊。我后来又同这个姑娘相聚过一次，我相信，是在两天以后，一切像第一次一样美好。没过几天我就到一个避暑胜地去。在野外同一个姑娘稍稍玩了玩。从那以后我在布拉格不敢再看那姑娘一眼了，没有再跟她说过一句话，她是（以我的眼光看）我的凶恶的敌人。可是她实际上是个好人，一个友善的姑娘。她总是以茫然若失的眼光看着我。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敌意的唯一来由（肯定不是那么回事）是这姑娘在旅馆里全然无意识地做了一些什么令人讨厌的事（这根本不存在的事不值一谈），说过什么脏话（不值一谈），但是记忆抹不去这些。我当时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时刻。当时我就知道或以为自己知道，这讨厌的、肮脏的一幕就外部来说不是必要的，就内部而

言却是必要地与整体缠在一起了。而正是这讨厌的肮脏的一幕（它的小小的记号仅是她那小小的动作，小小的言谈）用强力把我拖到这个旅馆里来，本来我一定会全力反抗的^[123]。

当时是这样，后来一直也是这样，我的身体几年之久常常处于静止状态，可又不断被震撼。对这么一种小小的，但确实可厌的事的渴望，对某种让人有点反感、痛苦的肮脏的事情的渴望往往把我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即使在我所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刻，也有某种东西在作怪，某种淡淡的难闻的气味，某种硫磺味，某种地狱味。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也有那样的时期，身体处于非静止状态，什么都处于非静止状态，但是我又感觉不到任何压力。这是一种美好的、安宁的、只有希望才能使它不安宁的（你见过比这更美好的不安宁吗？）生活。在这样的时期（只要它能持续哪怕很短的时间）我总是单独的。在我的生活中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时期，而我又不是单独的，因此不仅是你在我的身边这种情况，而且你自己本身就是既给人安宁，又叫人不安的。因此我对肮脏没有欲望（在美兰的前一半时间里我违背着我那经常出现的意志，不分昼夜地构思着如何去征服那清扫姑娘的计划——还有更恶劣的——美兰的日子快结束时，一个非常愿意和我相好的姑娘自愿地跑到了我的手中。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将她的话先译成我的语言，才能听明白她的意思），我竟然也看不到肮脏，没有这类东西，有外部吸引人的因素，也有一切在内部带来生命力的因素。简而言之，有着在天堂犯下原罪前呼吸的那种空气，不过只有一点儿那种空气，因此没有“touha”，不完全是那种空气。因而有“恐惧”——现在你知道了吧，所以我虽然对度过一个格蒙德之夜感到“恐惧”，但只是那种通常的“恐惧”——噢，通常的也就够了——，是我在布拉格也有的那种恐惧，不是独特的格蒙德的恐惧。

现在谈谈艾米丽吧，我还能在布拉格收到这封信。

今天我信里什么都不谈，明天再说。但这封信很重要，我希望它能平安到达你的手中。

昏厥只是各种信号中的一种。请千万到格蒙德来。假如星期天一早下雨，你就不能来了吗？无论如何，星期天上午我总会在格蒙德火车站

前等候你的。你不需要护照吗？你已经打听过了吗？要我捎带什么东西给你吗？^[124]

你提到施塔萨的意思是说，我应该到她那儿去吗？但她很少来布拉格（她在布拉格的时候到她那儿去更困难），我等着你下一次提到她，或者在格蒙德向我解释。

关于L的话（这是什么记性——这不是嘲讽而是忌妒；不是忌妒，而是愚蠢的笑话），你误解了。我感到奇怪的只是，他提到任何人时，不是称为“蠢驴”，就是称为“骗子”，或者“爬窗的坏蛋”。而你密伦娜，是个叫人肃然起敬的人。想到这一点，我很高兴。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些的原因。并非为了挽救你的名誉，而是为了挽救他的名誉。顺便提一下（为了不致边提边漏），也有一些例外。他那时的未婚妻的父亲，未婚妻的兄妹，未婚妻以前的未婚夫，所有这些人对他来说都是真正“了不起”的人。

你今天的信是这么悲伤，尤其是把痛苦深深地锁在里面，以致我觉得自己完全被关在门外。一旦需要离开我的房间，我就循着楼梯跑上去跑下来，仅仅希望隔一段时间再回到那里后会在桌子上发现一份电报：“星期六我也到格蒙德。”可是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晚

电报。是的，最好的办法或许莫过于见面，否则谁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使一切恢复正常呢？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我顶多只能看到一步之内的东西，你受了多少罪啊，还有其他种种乌七八糟的事情。也许我早就应该阻止事态的发展。目光是够短浅的了，但是懦弱更占上风，我难道没有自欺欺人吗？——我明明看到那些信不属于我，却像属于我那样答复了。但愿这个意义上“自欺欺人的”答复没有在你的格蒙德之行^[125]中起过胁迫作用。

读了这些信，人们也许会认为我很悲伤，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只是目前没有别的话可说而已。四周变得这般安静，叫人一句话都不敢说，深怕打破寂静。好吧，星期天我们将有五个小时在一起，对于交谈来说太少了，对于沉默不语，对于手一握一着一手，对于眼睛一看着一眼睛来说是够了。

星期日

从列车时刻表看，比我想的还要好得多。但愿这个时刻表没有错处。情况如下：

①比我想的可能性差得多：

星期六下午4点12分我从这儿启程，晚上11点10分抵达维也纳。我们有七个小时可以在一起（因为我将于星期天早晨离开那儿），前提是，我在这之前的夜里能好好睡一会儿（这可不是轻松的任务），否则出现在你面前的将是一头可怜的病恹恹的动物。

②按照列车时刻表而来的非常美妙的可能性：

我4点12分从这儿启程，7点28分就已经（已经！已经！）到达格蒙德。即使乘星期天上午的快车离开，也要到晚上10点40分才抵达，这样我们便有十五个小时左右，还可以睡上几个小时。还可以安排得更好些，我不必坐那班车回来，下午4点38分还有一班慢车开往布拉格，我可以坐那班车。这样我们便可以共同度过二十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想想看！）——至少在理论上——每个星期都享有它。

只有一个缺陷，但我相信没有什么大不了。无论如何你得打听一下。说起来，格蒙德的火车站是属于捷克的，这个城市却是属于奥地利的，难道护照上的公文就愚蠢到这个地步，以致一个维也纳人通过捷克火车站竟然需要一份护照？这样的话，假如格蒙德人要到维也纳去，那也就需要带上一本办好捷克签证的护照^啰？这我实在不能相信，因为这正是针对我们的嘛。说不定我在格蒙德海关检查处要等上一个小时才能走出火车站，这样我们的二十一个小时就被缩短了。仅这一点就够糟的了。

关于那些重大事情，显然是没有什么可写的。无论如何要谢谢你，让我今天也能收到信。但是明天呢？我不会去打电话。首先，这太叫人激动；其次，这也是不可能的（我已经打听过一次）；第三，我们马上就可以见面了。可惜奥特拉今天没有时间到警察局去办理护照，只能明天去。对了，邮票你处理得好极了（可惜我忘了把那些加急邮票放在哪里了。当我告诉那个人时，他几乎要哭了）。你对我的邮票的感谢有点轻描淡写，但这也叫我高兴，因为我还将（你想想）寄军团邮票给你。——我今天没有兴趣讲童话故事，我的脑袋就像个火车站，一列列火车开进开出。在海关检查处，那个边防站长窥伺着我的护照，但是这一次

无懈可击。请吧，拿去看看吧。“对，很好，从这儿出站吧。”“边防站长先生，还劳您一下驾，帮我把门打开，我打不开。我这样没有力气，莫非是因为密伦娜在外边等着？”——“哦，好的，这我可不知道呀。”于是门打开了……

星期一

在生日临近之际，我没有做好准备，比平时睡得更少，头脑暖烘烘的，眼睛火辣辣的，太阳穴难受得很，还咳嗽。我相信，如果不咳嗽，就无法表达完一个较长的愿望。幸亏不必有什么愿望，只有一种谢意：感谢你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从一开始（你看，我对世界也没有多少认识，我只是为了与你有区别才承认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看不出会在这世上找到你。为此我感谢你（这算感谢？），就像在火车站上那样给你一个吻，尽管那时你不喜欢这个吻（今天我多少有点固执）。

我的情况最近并不总是这么坏，有时候还很好。我的主要荣誉日却大约在一个星期前。我感觉麻木地在游泳学校的游泳池里没完没了地乱转。那时已是黄昏，人已经不太多，但也不少。这时，第二游泳教练迎面走过来。他不认识我，东张西望的，好像在找什么人。他发现了，显然选中了我，问道：“Čtěl byste si Zaježditi[126]？”原来有一位先生从索菲亚岛下来，想要到犹太岛去，我相信他是个什么大建筑企业主，犹太岛上在搞什么大建筑物。眼下可不能把事吹过了头，这位游泳教练是看到了我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愿意恩赐我一次驾驶小艇的机会。但是，考虑到那是建筑业的一个大企业，于是必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小伙子，有劲，又灵巧，还要在完成送人任务后不会利用这只船游逛，而是马上就回来。他认为我具备这一切条件。那个大个子特伦卡走了过来（游泳学校的老板，我还会告诉你有关他的事情的），问道：“这个小伙子会不会游泳？”这个游泳教练（他也许一直在观察我）说了几句叫他放心的话；我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于是那位乘客走过来，我们便开船了。我作为老老实实的小伙子，几乎什么话都没说。他说今天晚上真美，我说ano[127]。然后他说，可是已经凉快了，我说：ano。最后他说，我开得很快，这时我由于感激而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当然以最佳风格驶抵犹太岛的岸边。他下了船，向我表示感谢，可是令我失望的是他忘了给小费（是的，因为我不是姑娘）。我笔直地开回去，大个子特伦卡对我这么快回来表示惊讶。——我已经很久没有像这个晚上那样心中膨胀着自豪感。我觉得我在你面前的价值只稍稍上升了一点点，但毕竟

是上升了。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在游泳学校等待着，看有没有乘客来，但是谁也不来了。

今天夜里我在短暂的半睡眠状态中想起，我可以在对你来说重要的场所中搜索一遍，以此来祝贺你的生日。没有任何下意识，我马上就来到了西站前。那是一座很小的建筑物，里面好像也很小，因为这时正好来了一列快车和一个火车头，由于里面没有足够的地方，车身就露在车站外面。使我深感满意的是，在车站外站着三个穿着很可爱的姑娘（有个梳着辫子），都很瘦，是三个搬运工。我想起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是这么不同寻常。尽管如此，我为你现在不在这儿感到高兴，但同时又为你不在这儿感到遗憾。我发现了一个旅客遗失的小公文包，从这个包里抽出来的却是件衣服，使围着我的旅客都吃了一惊。

《式样》的第二部分特别出色，尖锐、凶狠，而且精彩。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过出版是桩多么狡猾的事情。你写得那么平静，那么令人信赖，那么恳切地对读者说话。世界上的一切你都忘记了，只有读者引起你的关注。结尾你却突然说：“我写得美吗？是吗？真是美？好，这使我高兴，但顺便说一下，我离得很远，我不会因感激而吻你的。”然后真的结束了，你走开了。

你知道吗？你是在行按手礼时（犹太教也有一种按手礼）赠给我的礼物。我是1883年出生的，你出世时我13岁。13岁生日是个特别盛大的节日，我必须在教堂里背诵一遍我十分吃力才学会的祷文，在上面的圣坛前，然后再在家里作一段小小的（也是刚学会的）发言。我也得到了许多礼物。但是，我在想，我并不很满意，还缺点什么，我恳求上天赐给我。上天一直踌躇到8月10日才发善心。

我尽管对最近这十封信已经很熟悉，但自然地还是很高兴重读它们。假如你也把我的那些信重温一遍，你会发现那是一座由问题构成的完整的姑娘们的公寓。

关于父亲的事，我们到格蒙德再谈吧。

在“格蕾特”面前，我就像在大多数姑娘面前那样，不知怎么办才好。难道我有过某种与你有关的思想吗？我想不起来了。我乐意握着你的手，看着你的眼睛。这就是一切。去它的格蕾特吧！——至于“未能赢得”，*nechápů, jak, takový, člověk.....*^[128]我又处于同样的谜语前

了，这个谜语相信我们在一起时也猜不出。而且这是麻烦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想让格蒙德为此浪费一分钟。——现在我看出来了，你必须撒谎的

情况比我还多，这压抑着我的心。如果有严重的障碍，也要平静地待在维也纳——也不必领会我为什么这么说，——那时我已经完成了格蒙德旅游，而且能有三个小时离你近一些。签证我已经得到。给我拍电报（至少在今天）完全不可能，因为你们那儿在闹罢工。

星期二

我不懂你为什么请求我原谅。假如事情已经过去，那么要我原谅你是很自然的。只有在事情还没有过去的情况下，我才是固执的，而你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假如事情已经过去，你又有什么不可原谅之处呢？你竟会这么认为，可见你的脑子里有多么乱。

我不喜欢同你父亲作比较，至少在目前。我也应该失去你吗？（当然我没有你父亲为此所具备的力量）如果你坚持这么比较，那么就把那套紧身衣寄回来吧。

购买和寄出那套紧身衣花了三个小时。这真的使我（这在当时对我很有必要）精神抖擞。我为此很感谢你。我今天太累了，不能跟你细说，第二夜几乎没有入睡。我能不能克制一下自己，暂时不提，以便在格蒙德能受到一些表扬呢？

真的妒忌那位阿姆斯特丹的旅游者？假如她是带着自信这么做的，那么她的作为真好。可是，你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对于这样生活的人，生活是压力，对于不能这样生活的人，生活便是自由。到处都是如此。这么一种“妒忌”归根结底只是死的愿望。——

同马克思的关系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现在知道了你托付给他的任务。因此，如果事情行将结束，我将同意到他那里去，与他讨论一下一起出游几天的事。“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浑身是劲。”然后慢慢爬回家去，在那儿最后一次四脚朝天。

只要事情不太坏，我当然仍这么说。一旦我体温达 37.5°C （下雨天 38°C ），送电报的邮差会一个接一个在你的长长的楼梯上跌跌撞撞地奔跑。但愿到时候他们正好罢工，而不至于在现在——生日——这样不合适日子送去。

我曾威胁说，我不把邮票给那个人了。邮局对此太信以为真，那封加急信到我手里时，邮票已经掉了。顺便说一下，你对那个人要正确理解。他大概不是每一种邮票都只收集一张。每种类型的邮票他分别放在一些大张的集邮页上，所有的集邮页收订为大本的集邮册。假如某一种贴满了一页，他就另起一页，以此类推。他每天下午都扑在他的邮票上。他胖胖的、乐呵呵的，精神愉快。每弄到一种他都会高兴一番，比如今天弄到面值五十分的邮票时就是这样。现在邮费将要提高（可怜的密伦娜！），五十分的邮票将变得罕见。

你说的克洛岑的情况我很满意（阿芙乐尔则不然，那是一座真正的肺病疗养院，那儿要打针，天哪！我们这儿有个职员认为这是肺病死亡的前哨站）。我喜欢这样的国家也有历史纪念意义。可是，晚秋时节那儿还开吗？接受外国人吗？对外国人收费不贵吗？除我之外有没有人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到这饥饿的国家去寻求大吃大喝的快乐呢？可是我会写信去的。

昨天我又同那个施坦因谈了话。他属于那种处处遇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取笑他。他认识每一个人，知道人家的一切私事，然而却很谦虚，发表看法很谨慎，具有聪明的调和色彩，带着恭敬的口气。那些人的虚荣心有点过于明显，过于露骨，这反而增加了他的价值。前提是，人们要认清那种暗中虚荣心强的人，那种带着好色、罪恶的虚荣心的人。我突然从哈斯^[129]谈起，扯到雅尔米拉，过了一会儿又扯到了你的丈夫，最后终于……（认为我爱听人家谈论你，这是不对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希望不断听到你的名字，整天如此。）假如我问起他，他便会说起许多关于你的事；由于我没有问他，他仅谈到那使他深感痛心的看法：你几乎已经不活在世上了，可卡因毁了你（当时我对你活着这一点真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然后他小心而谦虚地（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补充说，这他没有亲眼目睹，而是道听途说。他把你的丈夫说得像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他还提到了与你布拉格时期有关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名字：好像是克莱德诺娃。——他本来还可以谈很久，可是我告辞了。我感到有点恶心，首先是对我自己，因为我竟如此愚蠢地走在他身边，去听我不想听、也丝毫引不起我关心的事情。

我重复一遍：如果存在任何障碍，如果可能引起你任何小小的痛苦，你就留在维也纳吧。假如没什么办法，也不必非通知我不可。假如

你来的话，一到那里就突破边防关卡，如果发生某种现在料想不到的疯狂的事情使我来不了，而又来不及向维也纳（如果来得及我会打电报给K.夫人的）通知你的话，格蒙德站前旅馆里会有一份电报给你的。

六本书都收到了吗？

我读Kavárna[130]时的感觉同听施坦因叙述时的感觉一样，只是你叙述得比他好得多。还有什么人叙述得这么好？可是，你为什么向每一个买《论坛报》的人叙述呢？我读着它，感到自己像在这家咖啡馆门口走来走去，日日夜夜，年复一年。每当有人进去或出来，我便通过打开的门，确信你还在里面，然后我又踱起步来，等待着。这既不悲伤也不累人。在这家咖啡馆门前又怎么会悲伤或者吃力呢？当你在里面坐着的时候！

星期三

闵希豪森把事情办好了，这使我异常高兴。当然啰，他完成过更难办的事情。玫瑰花也会像上次那些花一样受到很好的照料吗？那是些什么花？谁给的？

格蒙德的事我在你问以前就已经回答过你了，尽可能少折磨自己，这样也能尽可能少地折磨我。我对你必须撒这样的谎这一点没有设想得那么充分。可是你的丈夫又怎么会相信，在我见过你一次以后，我又怎么会不写信给你，怎么会不想见你？

你写道，有时你真想考验考验我，这不过是开玩笑，对吗？求你别这么做，认定你要花我很大的力量，谁能设想不知道你会耗费多大力量呢？你觉得那些广告好吃，真使我高兴[131]。尽管吃吧，尽管吃！假如我现在开始存钱，而你愿意等二十年的话，而且皮货那时会更便宜些（因为那时欧洲将是一片荒芜，而毛皮动物就在大街小巷里穿行），那么我们的钱也许会够买一张皮了。

你猜得出，我将在什么时候终于能睡一觉，比如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夜里？

这样，你便知道了，得到这些加印面值的邮票正是他的本来愿望（他有的是“本来”愿望）。To je Krása, to je Krása[132]！他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啊！

现在，我要去吃饭了，然后去外汇中心——办一个上午的公。

星期四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可能是由于神经紧张，就像我今天一早对昨天晚上收到加急电报作了笨拙的答复，也是由于神经紧张一样。今天上午，在我向申克尔打听过后，我急着要回答你。

一般来说，通过对此事交换信件总是不断得出这个结论：通过一个正是神圣不可解除的婚约（我是多么神经质，我的船一定是在最近的几天里不知怎地弄丢了舵），你同你的丈夫结合在一起。而我也通过这样一桩婚姻，我不知道同谁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可怕的妻子的目光经常注视着我，这我有所感觉。奇怪的是，尽管这两桩婚姻每桩都是解除不了的，也就是说本来是无须对此多言的。尽管如此，一桩婚姻的棘手造成了另一桩婚姻的棘手，或者至少是使它变得更棘手。反过来同样如此。只有这个宣判存在着，正如你写下的nebude toho nikdy^[133]，而我们永远不愿谈未来，只谈现在。

这条真正千真万确，不可动摇，是支撑世界的中流砥柱。然而我承认，在感觉中（仅仅在感觉中），这个真理却继续存在，毫无疑问将继续存在。你知道吗？假如我想写下下面将写的话，便唤来了许多宝剑，它们围成一圈向我的躯体逼近，这是最完善的刑罚。假如他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我没有说刺入），假如它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那就可怕极了，我会立刻随着第一声叫喊就出卖一切，你、我、一切。我只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承认，关于这些事情的信件往来仅仅在我的感觉中（为了我的生命，我再重申一遍：仅仅在感觉中），就像我是生活在非洲的什么地方，而且一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现在却要向一直住在欧洲、生活在欧洲中心的你谈谈我对今后的政治动态的坚定的见解。但是这只是一个比方，一个愚蠢的、笨拙的、错误的、感伤的、可鄙的、装聋作哑的比方，不是别的什么，噢，他们的宝剑！

你把你丈夫的信摘录给我看是对的（但不要把信寄给我）。我虽然没有全弄懂，可是我看明白了写信个“单身”汉子，他想要“结婚”，他有时“不忠实”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不忠实，因为你们仍然走在同一条路上，只是在这条路的范围内他有点偏左。这“不忠实”意味着它不停地向你最深的痛苦和最深的幸福倾注着，这“不忠实”与我的永恒的受束缚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关于你的丈夫，我并没有误解你的意思。你们为什么会牢不可破地抱成一团？这是一种丰富的、不会枯竭的秘密。你总是抱着这个秘密，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他的大皮靴。这里有某种东西折磨着我的心，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本来很简单，假如你离他而去，他或许会跟另一个女人共同生活，或许会搬到一个公寓去住，他的皮靴会擦得比现在更亮。这是愚蠢的，又是不愚蠢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中有什么东西弄得我心里这么难受。也许你知道。

你本来不至于把生日过得那么糟的，你可以在这之前写信给我提出钱的问题嘛。我会带给你的。——但是我们也许根本见不了面，在这种思想混乱的状态中这是非常可能的。

事情也确是这样。你写道，有些人能够共同度过晚上和早晨，而有些人则不能。后者的命运我倒觉得不错。他们肯定或者可能干了些不好的事情，你说得很对，这污秽的一幕主要来自他们的陌生的存在。这是人间的污秽，是一个从来没有住过的、现在突然被打开门窗的住房里的污秽。看上去这很糟糕，但是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什么在天上或人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这正如你说的，只是一种“玩球游戏”，就像夏娃虽然摘下了苹果（有时我认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原罪是怎么回事），但只是为了给亚当看，因为她喜欢他。咬苹果才是决定性的，玩玩它虽然没有获得允许，但也不曾明令禁止。

星期四

这封信寄出后，我要等十至十四天才能收到回信，与历来的通信相比，简直像是被人遗弃了，对吗^[134]？正是现在，我感到有些难以言传、难以下笔的话要对你讲，不是为了弥补我在格蒙德的过失，不是为了拯救什么被淹死的生灵，而是为了让你深深地理解到，我现在的身心状况如何，以免你被我吓坏了，而这在人与人之间是可能发生的。不管各种情况怎么好，有时我觉得我的身体如此沉重，好像一眨眼工夫就会不由自主地沉入海底最深处，而又有一种力量想要抓住我，甚至救我，不让我沉下去。它这么做，不是出于虚弱，更不是出于绝望，而纯粹是出于恼怒。这当然不是指你，而是指你的一个淡淡的幻影，我这疲惫的、空虚的头脑（不是不幸的或者激动的头脑，要是这样，人们或许会感激不尽的）勉强还能认出它来。

昨天我到雅尔米拉那里去了。由于你把这事看得那么重要，我便一

天也不敢耽误。说老实话，想起我这回无论如何总要跟雅尔米拉交谈，还真使我心慌意乱。我宁可马上把这事办完。尽管没有刮胡子（这样鸡皮疙瘩倒不会露在外面了），只要能够完成任务，倒也无所谓了。6点半左右我到了楼上，门铃不响，敲门没用，NordnListy[135]插在信箱里，显然没人在家。我转过身去，稍站了一会儿，看见院子里有两个女人走来，一个是雅尔米拉，另一个也许是她的妈妈。我一眼就认出了雅，尽管她跟照片几乎对不上号，而且跟你一点都不像。我们马上就一起出门，在军官学校旧址后面来回走了约有十分钟。我最感意外的是，与你事先说的相反，她话很多，当然只是在这十分钟里。她几乎不停地讲，使我想起你寄给我的她那封信滔滔不绝的特色。这种滔滔不绝的特色就像是某种脱离说话者本身独立存在的东西，这一点此刻更明显，因为这次不像当时那封信里那样牵涉到那么具体的细节。据她说，她已经有好几天为那件事[136]激动不已，为韦尔弗的事给哈斯打了电报（连回音都没有），给你打了电报，写了加急信，并根据你的要求马上烧掉了那些信，不知道还应该做些什么来安慰你。因此下午已经动了到我这儿来的念头，为了至少能同这件事的一个知情人谈谈。这些话多少说明了为什么那样活跃，那样滔滔不绝（她相信她知道我的住处）。是这样的：我想是在一个秋天，或者已经是早春，我记不清了，我同奥特拉和小露琴卡——那个在逊伯伦宫预言我快完蛋了的姑娘——去划船，在鲁道芬努姆前面我们碰到了哈斯和一个女人，我当时根本没有看这个女人一眼，她就是雅尔米拉。哈斯把我介绍给她，于是雅尔米拉发现，她几年前在平民游泳学校曾和我妹妹说过话。由于平民游泳学校是基督徒的去处，她对我妹妹，一个犹太人到那儿去感到很奇怪，因此便记住了她。我们那时住在平民游泳学校对面，奥特拉曾把我们的住房指给她看过。整个过程便是这么一段长长的故事。所以她对我的到来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这也是她这么活跃的原因。此外，这纠缠不清的事情使她深感不快，这事情肯定、千真万确已经过去，她几乎是热烈地保证说，这事肯定、千真万确地不会造成任何后果。可是我的虚荣心却没有得到满足，我多想（我并没有完全看到其重要性，但是你交给我的使命是我维持生命的空气）亲自烧掉这些信，亲手把纸灰撒在百尔维德勒。

她很少谈到自己，比如说到她总是坐在家里（她的脸便是明证），不同任何人交谈。她偶尔出门要么是去书店看看，要么是去发一封信。通常她都谈到你（也许是我谈到你，事后这已经很难区别了），我提到，有一次你在一封柏林来信中谈到，雅尔米拉可能会来看望你，你是多么快乐啊。她说，她对快乐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指望了，尤其不能理解

的是，她竟会给什么人带来快乐。这话听上去朴实而可信。我说，过去的日子并不是那么易于抹去的，它们重新在记忆中活跃起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她说，是的，假如人们聚在一起，也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她很盼望与你见面，假如你出现在这里——她多次指着面前的地，她的手竟也是这么活跃——，出现在这里，她觉得将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在她的房子前我们匆匆地道了别。

在这之前她^啰嗦地说到你一张特别美的照片，说本来要拿给我看，后来发现，在她柏林之行前烧毁所有废纸和信件时，这张照片还在她手里，偏偏就在今天下午怎么竟找不到了。这冗长的叙述有点叫我恼火。

然后我给你发了一份夸大其词的电报，说使命已经完成。可是我能为你做得更好些吗？你对我满意吗？

由于你十四天后才能收到信，所以提出请求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也许这个请求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而这只是在这无意义上再加上一点无意义：如果在这个站不稳脚的世界里还存在那么点可能性的话（人们正是被强力从世界这儿拽开了，由于被拽开了，人们便无法自救），不要被吓坏了，即使我有一次或者上千次地或者正是现在或者也许永远正是现在使你失望。其实这不是请求，也不是向你提出的，我不知道这是向谁提出的。这只是受压抑的胸腔的受压抑的呼吸。

星期二

你星期一早晨的信。从那个星期一早晨起，或者不如说从星期一中午起，从那次旅行的舒适印象（不说别的，每次踏上旅途本身就是一种休养，如同把压着脖子的东西解开，浑身上下被颠得好轻松）已稍稍淡薄下去的时刻起，从那时起，我翻来覆去不停地给你唱着一支歌。它不停地变换花样，但又始终是同一支，内容丰富。就像睡了一个无梦的好觉，枯燥而使人疲倦，以致我自己有时唱着唱着也睡着了。你应该为不必听到它而高兴，你应该为这么长时间免受我的信件的干扰而高兴。

啊，人情世故！我有什么理由反对你真的把那双皮靴擦得锃亮呢？擦吧，把它们擦亮，然后放在角落里，让事情成为过去。只是你成天地想着擦靴子的事，有时使我感到痛苦（而且这样也不会使皮靴干净）。

我总想听到另外一句话，而不是你这句：jsi muj[137]。为什么偏偏是这句呢？它连爱的意思都没有，不如说意味着接近和夜。

是的，这是个大谎言，我是撒谎同案犯，但比你更恶劣，是在角落里对我自己撒的，撒了谎却依然清白无辜。

可惜你总是给我一些那样的任务——每当我到那儿去，这任务已经完成了。假如说你对我没有多少信任，而只是想帮我树立一点自信心，那么你也做得太不加掩饰了。

雅尔米拉的电报（这是在我们见面前已经发出了的）同我，甚至同忌妒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懂了。我的出现确实使她高兴（因为你的缘故），可是，我的离开更使她高兴（因为我的缘故，或者不如说是因为她的缘故）。

对感冒的事你本该多谈几句的，它是在格蒙德还是在从咖啡馆回家的路上得的？顺便告诉你，这里目前还是美好的夏天，即便是星期天也只在南波希米亚下了雨。我很自豪，全世界都可以从我被雨水浇透了的衣服上看出，我是从格蒙德来的。

看信时眼睛离得太近，对你目前生活的不幸根本不能理解，必须把它拿得远一点，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行。

关于“紧紧抓住”的说法你误解了。当然这说法本身就无法理解。你对格蒙德所说的是正确的，而且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是正确的。比如我记得你问过我，我在布格拉是否有过不忠实于你的举动。你这样问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又有点无所谓，恰恰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你拿着我的信，还这么问。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问题吗？但是这还不够，我给它弄得更站不住脚了。我说，不，我对你是忠实的。人怎么会这么说话的呢？我们经常长时间地一块说话，听对方说话，就像陌生人一样。

雅尔米拉昨天傍晚到我这儿来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现在的住址的），我不在家，她留下了一封给你的信，还有一张铅笔写的条子，请求我把这封信寄给你，因为她虽然有你在乡下的住址，但又觉得没有把握。

现在看来，用不着等那么长时间，来自萨尔兹堡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但愿在吉尔根会一切顺利。秋天无疑已经到来，这是不容否认的。我的情况不好不坏，就是这样，但愿这健康状况还能在秋天支持一段时间。关于格蒙德，将来我们还一定会写到或谈到，这是事情不顺利的一部分。附上雅尔米拉的信。我打长途电话答复了她的来访。我说，我当然很愿意转寄她的信，只是不太急的话才行，因为我得一个礼拜后才能知道你的地址。她没有答复。[138]

星期一

我刚读完那封铅笔写的信。星期一那封信只匆匆读了下面画了道道的一段，便宁可放下不读了。我真是太怯懦，不能用全部身心去体会每句话。那又是多么糟糕：如果这句话是进攻性的，读了之后就不能保护自己的整体，或者不能整体地被消灭。但是这里不信会有死亡，而且不信会有疾病。

还没有读完这封信，我就想起（你在结尾处也写到了类似的意思）你是否有可能在那里待得久一些，在秋天所允许的的时间内，这是有可能呢？

从萨尔兹堡发的信来得很快，从吉尔根发的慢一些，但我总也能从这里那里得到一些消息。报纸上登了波尔加的随笔，写的是一个湖，一片悲凉，使人心情灰暗，因为那里的气氛始终还是那么快活（这篇文章本身没有那么多快活气氛，然而后面是关于萨尔兹堡，关于戏剧节和不稳定的天气的报道）。这气氛也不快活，你离开得太迟了。有时我叫马克斯谈谈沃尔夫冈和吉尔根，他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那是很幸福的，在过去的日子里那里一定要好得多。可是如果没有《论坛报》，那么这一切就太少了，《论坛报》提供了每天能找到一点你的东西的园地，然后便真的能在这儿那儿找到一些你的踪影了。我说这些你会感到不快吗？但我是那么乐意读它。而且假如不是我——你最好的读者——来谈这些，那么又该由谁来谈呢？以前，还在你说你写作时偶尔会想到我之前，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么一种关系。应该说，是我把它抱过来搂在胸前的；在你明确地说了这句话以后，我在阅读时几乎变得更畏惧了，比如我读到雪地里的一只兔子时，就好像看见自己在那里跑。[139]

我总算读了另一封信，但却是从Nechci, abys na to odpovidal[140]

读起的。我不知道在这之前写了些什么，但是你的信无可争辩地证实了
你在我内心深处的形象。为此，我可以读都不读就在下面签字，承认其
真实性，即使在其最深远之处有着反对我的因素。我是肮脏的，密伦
娜，肮脏得无法形容，所以我这样大声疾呼纯洁。谁也不如那些处于地
狱最底层的人唱得那么圣洁，我们以为是天使们在歌唱，其实那是地狱
底层的人在歌唱。

几天前我开始了“士兵”生活（说得正确些，是“演习”生活）。多年
前，我曾发现这对我来说暂时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下午尽可能长地躺在
床上睡觉，然后出去逛两个小时，使头脑保持清醒——能保持多久就保
持多久。可是这个“能多久就多久”有点棘手。“持续不了多久”，下午不
行，夜里也不行，早晨到达办公室时更是萎靡不振。真正出成果的时间
是凌晨2点、3点和4点。现在，我如果不最迟在午夜时分上床睡觉，那
就完了，白天黑夜都睡不着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所谓。即使没有任何成果，这种“当兵生活”也
不错。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果。我需要这样过半年，才能“松开舌头”。那
时便会发现，事情结束了，当兵的可能性结束了。可是，正如我说过
的：这样本身是件好事，隔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咳嗽就会粗暴地闯进
来一次。

当然，这些信并不那么坏。可是，这封铅笔写的信所给予我的，不
是我应得的荣誉。有资格赢得它的人到底在哪里呢？在天上还是人间？

星期四

今天我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干，只是坐在这儿，胡乱读点东西，正事
什么都没干，或者说，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一种轻微的疼痛在太阳穴不
停作响。全天都沉浸在你的信中，怀着艰苦，怀着爱情，怀着忧虑和对
捉摸不定的东西的一种完全捉摸不定的恐惧。之所以捉摸不定，是因为
它远远超出了我的力量。因此，这些信我根本不敢读第二遍。而且有半
页连一遍都没有读。为什么就不能委曲求全，在这种完全特殊的、不断
使人产生自杀念头的紧张空气中生活，并将这视为正确的生活方式（你
有时也有过类似的说法，而我还企图嘲笑你），却又肆意诱发这紧张空
气，像一头没有理智的动物一样从那里面钻出来（而且还像一头动物一
样喜欢这种无理智），把全部因此而搅乱了的、变得乱七八糟的电流引
入体内，使自己几乎要燃烧起来呢？

我说这些本来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只是想以某种方式堵住怨言，不是书面的那些，而是没有说出的那些。这些怨言，从你的信中可以感觉得出，我也随时会发的，因为从根本上讲，它们是我自己的怨尤。我们在暗中竟也那么一致，这再奇妙不过了。对此，我每隔一段时间才能相信一次。

星期四晚

夜晚我不是在睡眠中，而是在与信件相伴中度过的（当然不是完全自愿的）。尽管如此，现在情况还没有坏到极点。当然，一封信都没来，不过这件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不再每天写信，这比每天写信要好得多。这一点你比我发现得早，只是不说罢了。每天写信，与其说是加强，不如说是消耗人的精力。以前人们喝干了信的水分，便感到（我说的是布拉格，不是美兰）强壮了十倍，焦渴也增加了十倍。现在问题却这么严重，以致在读信的时候，人们会咬破自己的嘴唇，而最肯定的感觉莫过于太阳穴的疼痛。但是这也无关紧要，只有一点：不要生病，密伦娜，不要生病。不写信是好的（我需要多少天时间才能攻克像昨天那样的两封信呢？愚蠢的问题，怎么能以天来计算攻克的时间？），但是不写信的原因可不能生病。在此我只想到自己，我会采取什么行动呢？顶多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但是，我将来怎么做呢？不，我不愿想这个问题。这时只要想起你，我眼前浮现的最清晰的景象总是你躺在床上，就像你在格蒙德的晚上躺在草坪上那个样子（我在那儿对你讲我的朋友的事，你心不在焉地听着）。这种想象根本不使人痛苦，而且可以说是我目前可以实现的最佳想象：你躺在床上，我照料着你，隔一会儿去看一下你，把手放在你的额头上。当俯视着你时，我便沉醉在你的目光之中；在屋里来回走动时，我感觉到你在注视着我。当我知道，我是为你活着，可以为你活着，我心中的自豪感便总是抑制不住。于是，我想到你曾经站在我的身边，把手伸给我时的举动，一种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这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病，它会比你比以前更健康，让你重新挺直身子站起来，而我呢，马上将会——但愿无声无臭、无痛无苦——钻到泥土下面去。——这种想象一点不使我痛苦，只是不敢去想你一旦在远方生病……

你也喜欢售票员，对吗？是的，那个风趣的、如此富有维也纳风韵的瘦瘦的售票员！不过，这里也有好人呢。孩子们想当售票员。当售票员那么神气，受人尊敬，可以坐车东游西逛，站在车门踏脚板上，可以

低低地向孩子们俯下身去，手里拿着剪票夹和好多好多车票。我想当售票员（上述的一切动作其实只能令我害怕），这样可以成天高高兴兴，对什么事都插上一手。有一次我跟在一辆缓缓行驶的电车后面走，那个售票员（那位作家来办公室要接我走了，让他等一会儿吧，等我先写完这位售票员的故事）站在后面平台上欠出身子来对我喊了什么话，由于约瑟夫广场太喧闹，我没有听见他喊什么。他同时激动地挥舞双手想要告诉我什么，但是我没有弄懂。电车开远了，他的努力越来越无望了——终于我明白了：我领子上的金色安全别针松开了，他想提请我注意。今天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当我度过了这么一个夜晚，像一个残废的幽灵一般坐上电车后，售票员找给我五克朗，为了逗我高兴（并不是为了逗我高兴，因为他没有看我，而是为了活跃气氛），就他给我的钞票说了一句令人愉快的话。我倒没听见说的是什么，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先生为我获得的这个荣誉而朝我微笑。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也只能报以微笑，这样一切都会好些。但愿这也能使圣吉尔根乌云密布的天空变得晴朗！

星期五

那么美，那么美，密伦娜，那么美！这封信里（星期二的信）并不是什么内容都那么美，但这安详、这信任，这信的清晰都是美的。

清早什么也没有来，对于这事情本身我本来是很容易处之泰然的。现在对于收信的热情已经完全不同以前了，而写信的热情却几乎未变，必须写信的急切心理和幸福感依然存在。对此我本来很能泰然处之。我要一封信干什么呢？譬如昨天整个白天、整个晚上和半个夜间，我都是在与你对话中度过的。在这场谈话中，我像一个孩子那样诚实、严肃，你像一个母亲那样宽容、严肃（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孩子或者这么一位母亲），这一切都还过得去，只是你不写信的原因我必须知道，我不能老是看见你卧病在床。在那小小的房间里，外面下着秋雨，你一个人，发烧（你曾写到过）、感冒（你写到过），夜里盗汗、疲倦（这一切你都写到过）。假如一切都不是这样，那就好了，我现在没有更高的企求了。

我不想答复你的信的第一段，我甚至连上一封信的第一段写的是什么都还不知道。这全然是些盘根错节的事情，只有在母亲和孩子的对话中才能解开，也许只是因为这些事物不会在那儿出现，才能听得出来。我不去回答它，因为疼痛在太阳穴中潜伏着。难道爱神之箭射中了我的

太阳穴，而不是射中了心脏？关于格蒙德我也不会再写些什么，至少不会有意识地去写。对此也许有许多话要说，但最终会归结为：假如我在维也纳也是晚上告别的话，那么维也纳的第一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维也纳比格蒙德还有个优越之处：我到那里去时，由于惶恐和劳累而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到格蒙德去时则相反，我也没有意识到我那时是多么蠢，竟然那么自信，就像永远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似的——我去时就像一个房屋主人。奇怪，尽管种种不安不断袭击着我，这种对占有的疲乏可能正是我根本的错误所在，不管是在这些事情中，还是在其他事情中。

已经2点1刻了，我在2点之前才收到你的信，现在我该搁笔去吃饭了，对吧？

结尾那句译得很好。在那个故事中^[141]，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每一段（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音乐都同“恐惧”联系在一起。当时是在一个漫长的夜里，伤口第一次破裂，我感到译文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关系，用的是那只神奇的手，那正是你的手。

看到了吧，收信时是什么因素在折磨着人，现在你知道了吧。今天在你的信与我的信之间（在这强大的不安定中这已经算是到了极限了）有着清楚的、良好的共同之处。现在我该等着对我以前的信的答复了，我心里为此惶惶不安。

顺便说一下，你怎么会在星期二等我的信呢？我不是星期一才收到你的地址吗？

星期六

昨天闹了个奇怪的误会。昨天中午我为你的信（星期二的信）那么高兴，可是当我晚上重读一遍时，发现它在本质上与前几封信几乎没有区别，比它本身所承认的要阴郁得多。我抓住你能让我抓住的东西就再也不放开，恨不得抓着它跑到什么沙漠里去，不让任何人夺走它。由于我在口述完文章后跑回自己的房间，由于你的信出乎意料地摆在那里，由于我喜不自禁地、如饥似渴地浏览了一遍，由于信里没有用粗体字写下什么反对我的话，由于太阳穴里血管碰巧在平静地跳动，由于我正好为你安静地、舒适地躺在树林中、湖边和山上遐想而心满意足——由于这一切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一切与你的信和你真正的状况绝无

丝毫的关系)，我感到你的信是愉快的，便写了一封荒唐的回信给你。

星期日

看吧，密伦娜，这么身不由己地在大海中被浪头抛来抛去，大海只是出于作弄人的恶意才不把人吞噬下去。上次我求你不要天天写信，这是实话。我对信是害怕的。假如有一天一封信都不来，我的心境反而会更平静些；一旦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我就必须调动起全身力量来读，这还远远不够——今天假如没有这些明信片来（两封都收到了），我说不准会郁郁不欢的。谢谢。

在我迄今读过的一般谈论俄国的读物中，这篇附来的文章，给我——或说得准确些，给我的身体、神经和血液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当然，我没有原封不动地接受它，而是把它投入到我的乐队中去（我把文章的结尾撕去了，文章包含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这与整体没有联系，而这整体也只是一个残篇）。

星期一

收到了星期天、星期一的来信和一张明信片。你来作出正确的评价吧，密伦娜。我坐在这儿，这般与世隔绝，这般远离尘嚣，心静如水，有些东西在我脑海中穿行而过：恐惧不安。我就这么动笔写起来，即使没有多大意义。同你说话时，我便忘却了一切，也包括你在内，只有在又有两封信来到的时候，我才重新意识到整个情况。

你对冬天的种种害怕心情中，有一点我没有完全弄懂：既然你的丈夫病得这么厉害，甚至有两种并发症，如果确实如此，那他就不该去上班，而作为正式雇用的职员，他是不会被开除的。由于他的疾病，他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将使一切变得很简单，至少会在表面上使一切变得轻松，尽管一切都那么悲伤。

可是这地球上最荒唐的事情之一是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罪责，至少我这么觉得。不是责备使我感到荒唐。当然，在急迫的情况下，人们会向四面八方发出责备之辞（尽管这自然还不是最紧迫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会责备的），在某种令人激动、心潮起伏的时刻，人们也会容忍这样的责备的，这也可以理解。可是人们要是认为自己有能力就此进行谈判，就像讨论一个普通的计算问题一样（而这个问题却是那么清楚，你可以从中引导出日常行为的规律来），这个我可就一点都不

懂了。的确，你是有罪过的，但如果是这样，你丈夫也便是有罪过的了，于是你是有罪过的，然后他又是有罪过的。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可是，在这永恒的罪愆中胡搅一气，对我今天的日子，或者对去伊斯勒的医生那儿看病又有何益呢？

外面雨不停地下，根本就没有停的意思。这对我毫无妨碍。我坐在干燥的地方，只是为我坐在擦窗工人面前吃着丰盛的早餐感到羞愧。擦窗工人站在擦窗悬架上，冲着雨水发火（现在雨又小一点了），为我正在往面包上涂那么多黄油发火，毫无必要地往窗上喷那么多水；而这也只是我自作多情，他对我的关注可能比我对他的关注要少一百倍。是的，他毕竟是在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中干活啊。

我后来又听到了魏斯的消息，他可能没生病，可是缺钱用，至少在夏天如此。人们在弗兰茨巴德为他筹集了一笔款子。大约三周前我给他寄了封挂号信回答他的来信，当然是寄到黑森林去的，这还是在我听到这件事之前的事了。他没有回信。现在他同他的女友一起在施塔伦贝格湖，他的女友给鲍姆^[142]写了张情调阴郁、一本正经（她的性格就是如此）、但也并非抑郁不快（这也是她性格的一部分）的明信片。在她离开布拉格之前（她在这里的剧院成就卓著），大约一个月前吧，我跟她匆匆谈过几句。她看上去情况很糟，虚弱不堪，像是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演戏使她劳累过度。她提到魏斯时大体上是这么说的：“现在他在黑森林，情况不太妙。不过，现在我们将要在施塔伦贝格湖边共同生活了，情况会好起来的。”

星期四

密伦娜，这里就是你原来想要写下来的头等大事而不是秘密吗？有一次你也曾写到过它，就在寄往美兰的最后一批信札的某一封信里，我当时已来不及回信了。

瞧，鲁滨孙曾不得不应人招募去作危险的旅行，遭受翻船等等各种各样的苦难。我只要失去了你，就成了鲁滨孙了。但我也许比鲁滨孙还要鲁滨孙，他还有那个小岛和礼拜五以及各种东西，最后毕竟还有船来接他，几乎使一切又变成了梦；而我则一无所有啊，连名字我都给了你。

因此，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无依无靠地面对你的，原因就在于依赖性超过了一切界限。

“要么……要么”的选择余地太大了。“要么”你是我的，这很好，但“要么”我失去了你，那事情就不是什么糟糕的问题了，而是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永远没有忌妒，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什么也不再有了。对一个人信赖到如此程度，确实有点儿卑下，因此事情之糟在围绕着基础而产生的恐惧方面也表现出来。但那不是因你而产生的恐惧，而是指敢于这样去建立基础的恐惧。因此才有如此多的神圣的东西流露在你凡人的脸上（但也许原来就是如此）。

好，现在西姆孙·达里拉已经讲了他的秘密，她能够把他的头发剪下来。为了准备这一着，她一直跟他争吵，但由他去吧。如果她没有一种类似的秘密，那么她怎么做都无所谓了。

我已经三个夜晚不知什么原因睡得很不好，你的健康状况还算过得去吧？

真是快速的答复，假如这算是答复的话。我刚收到电报，它是那么突如其来，而且那么公开，我连害怕都来不及了。真的，我今天有些需要它。你是怎么知道的？真是不言自明，你总是雪里送炭。总是这样。

星期日

误会，不，这比单纯的误会更糟，绝对更糟，密伦娜。当然，只有在你对表面现象也能正确理解的情况下。可是，在这里什么叫理解，什么叫不理解？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误会，在美兰时就已经出现过一两次。我没有向你询问该怎么办，犹如像我会对坐在桌子对面那个人问该怎么办那样。我是对我自己说话，我问我自己该怎么办。在一场美梦里，你唤醒了我。

我不知道你是否正确理解了我对那篇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文章的看法。作者在文章里所指摘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地球上所能受到的最高颂扬的东西。

假如昨天晚上（8点钟我从街上向犹太区政府大厅里张望时，看到那里有许多俄国犹太移民，起码有几百，在那里等待美国签证。大厅里就像举行一次民众集会那么拥挤。夜里12点半我看见他们全在那里睡

觉，一个挨一个，在椅子上也有人四脚八叉地躺着，咳嗽声此起彼伏，有人在向另一边翻身，或者在人体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走过，电灯通宵地亮着），假如那时人们让我想当什么就当什么的话，我希望当一个东犹太族小男孩，待在大厅的角落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忧虑，父亲在男人堆里谈话，母亲身上裹得厚厚实实，在破破烂烂的行李中翻寻着什么，姐姐在同姑娘们聊天，搔着她美丽的头发——而再过几个星期就到美国了。事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骚乱场面已经在那里出现，马路上站着一些人，向窗子里面骂人。即使在这些犹太人中也有人在争吵，有两个已经亮出了刀子。可是假如人少一些，能很快综观一切，判断一切，又怎么会出事呢？那里有许多这样的男孩子在跑来跑去，爬上垫子，钻入椅子下，等待着面包。任何一个都会把什么东西——什么都可以吃——抹在面包上给他们（这是一个民族）。

星期二

今天来了两封信和那张明信片。我迟疑不决地把信拆开，不是你好得叫人难以理解，就是你能令人难以理解地控制自己。一切都证明是第一种可能性，也有一些东西证明是第二种可能性。

我重申：你完全有理。假如你——这是不可能的——以类似肆无忌惮、愚昧顽固、幼稚可笑、自我陶醉，甚至漫不经心的态度加害于我，就如我通过与V.谈话加害于你那样，我就会昏厥过去，而且不仅在收到电报的一刹那^[143]。

这份电报我只读了两遍，刚收到时匆匆读了一遍，然后过了几天，在撕毁它之前又读了一遍。

很难描写读第一遍时的滋味，那么多事情都凑在一起了。最清楚的是：你在打击我，我觉得，那是从“立刻”开始的，这便是你的一击。

不，我今天还不能详述，并非因为我太累了，而是因为我“沉重”。我曾经在信中说过的“一无所有”，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假如我相信上述一切是我以罪恶的方式做的话，那么这一切便叫人难以理解了，我就完全应该挨打了。不，我们俩都有罪责，又都没有。

也许你能够克服一切确实有道理的反感，然后与V.的信（你将在维也纳收到）达成谅解。我在收到电报的当天下午就去你父亲的住处找

她。下面写着Schody[144]，我一直以为这是第二层楼的意思。到了楼上，一位年轻、漂亮、乐呵呵的女佣人打开了门。V.不在家，这我早已料到。我只是想找点事做，也想知道她早晨什么时候来。早晨我站在屋外等她。我挺喜欢她，她聪明、实在、坦率。除了在电报里告诉你的那些话外，我没有跟她说多少话。[145]

雅尔米拉前天到办公室找我。她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对发大水一无所知。她来打听你的消息，这就很不错了。她只待了一会儿。我忘了向她转达你请求她写信的事了，事后我给她写了几行字。

两封信我还没有仔细看，过后我再给你写。

现在电报也来了。真的？真的？那么你不再追着我要打我了吧？

不，你想为此高兴是不行的，这办不到。同上一封电报一样，这是一封暂时有效的电报，而真理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有时候，当人们一清早就醒来时，会相信真理就在床旁，其实也就是一个坟墓，旁边有几朵枯萎了的花，墓敞开着，恭候人们进去。

我几乎不敢看这些信，只在休息时溜一眼。我受不了看信时的痛苦。

密伦娜——我又一次分开你的头发把它捋向一边——我是一头如此凶恶的野兽吗？对自己凶恶，对你同样凶恶？还是应该说，有一头凶恶的野兽在追赶我？我甚至不敢说它是凶恶的。只有在给你写信时，我感到是这样的，便说了出来。

其他事真的像我对你说的那样。假如我给你写信，那么在等信之前和之后都无法入睡；假如我不给你写信，那么我至少可以稍稍睡上几个小时。假如不写，那么我只是疲乏、悲哀、心情沉重；假如我写，不安和惶恐就会撕裂着我。事情正是这样，我们在互相乞求同情：我求你现在允许我躲起来，你求我——可是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便是最可怕的咄咄怪事了。

但这怎么可能呢？你问道。我想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

情况大致如此：我，林中之兽，那时很少待在林中，只是躺在某处一个肮脏的沟壑中（肮脏自然只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看见你在外

面，你是我见过的生物中最美丽的，我忘记了一切，甚至完全遗忘了自己，站了起来，走近些，我的心在这新鲜的、可仍然是属于家乡的自由空气中颤抖着，但还是走近了，一直走到你的身边。你是那么和善，我在你身边蹲了下去——好像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把脸贴在你的手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自由！多么强大！如同在家里一样，我总是这么说：如同在家里一样——可是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而能够待在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我从你的眼睛里寻找我的命运，而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忘掉了一切）。但这持续不了多久。尽管你用最仁慈的手抚摩着我，你总会发现我身上的某些奇怪迹象，表明我来自森林，表明森林是我的老家，我真正的家乡。我们不得不谈到，不得不一再重复着“恐惧”，它折磨着我的每一根裸露的神经（也折磨着你，但不是故意地），它在我面前不断增长着。对你来说我是怎样一种不洁的祸害，怎样一种到处干扰你的障碍啊！有关对马克斯的误会也来凑热闹了，在格蒙德这已经很清楚了，然后发生了雅尔米拉理解和误解的事情，最后终于在V.那儿发生了愚蠢、粗暴、冷漠的事情，其间还发生了许多小事。我想起了我是谁，在你的眼睛里，我发现我的错觉已经消逝，我怀着噩梦般的惊恐（在某个不该来的地方凑热闹，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我真的怀着这种惊恐，我必须回到黑暗中去。我受不了目光，我绝望了，真像一只迷途的野兽，奔跑起来，尽快地跑呀，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要是我能带走她该多好！”还有一个对立的想法：“她去的地方还会有黑暗吗？”你问我是怎么生活的：我就是这样生活的。

你的信到达时，我的第一封信已经发出了。不管这里面可能会写着的一切（里面会有“恐惧”等等），不管使我恶心的一切——不是因为什么东西令人恶心，而是因为我的胃太弱了——不管这一切，这话由你说出来也许会简单一些。大致如此：孑然一身时，人们对不尽如人意的的事物必须忍受，每时每刻地忍受；两个人的不尽如人意就不是非忍受不可了。难道人们没有长着眼睛，不能及时把不尽完美的事物消灭掉吗？难道心也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吗？在这方面，事情并不那么糟糕，这是夸张和谎言。一切都是夸张，只有欲望才是真实的，是无法夸张的。但是，甚至欲望的真实性也不完全确实，而多半是一切其他谎言的表现。

听上去似乎颠倒了，可是事情就是如此。

当我说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时，这也有可能不是真正的爱情；爱情也

者，你对我乃刀子也，我拿着它在我心中搅动。

此外，你自己也说：“nemáte/sly/milovat^[146]。”这难道还不足以成为“野兽”和“人”之间的分水岭吗？

密伦娜，你不能准确理解问题在哪里，或者部分问题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在爆发的火山下面颤抖，折磨得自己快要发疯，可是上面发生了什么，远方行将如何，我都不知道。只知道近处所要的是：安静、黑暗、藏匿。这我知道，而且必须遵从，舍此别无他途。

这是一次爆发，会过去的，而且一部分已经过去了，可是那引起爆发的力量还始终在我心中震颤，事前和事后始终如此；可以说，我的生命、我的存在就是由这种地下的威胁构成的，一旦这种威胁终止，我也就终结了。这是我参与生活的方式，它一旦停止了，我也就放弃了我的生命，那么轻松自然，就像合上眼睑一样。自我们相识以来，这事儿不是一直如此存在着的吗？你不是只有在它偶尔不在的当儿才匆匆瞥我一眼的吗？

当然不能把它翻转过来，然后说：现在事情过去了，我在新的共同相处中只感到安宁、幸福和感激。不能这么说，尽管这与事实相去不远（感激是完全真实的，幸福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是真实的，而安宁永远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会不断地吓人一跳，最多的是吓着自己。

你几次提到订婚和诸如此类的事，事情固然很简单，痛苦却不简单，不过其影响却是简单的。就像一个人过着轻浮的生活，突然被抓了起来，要他为一切轻浮的行为承受惩罚，脑袋被塞到一只螺旋式虎钳中，一个螺丝顶住右太阳穴，另一个顶住左太阳穴，现在螺丝越拧越紧，这人不得不说：“好吧，让我继续过轻浮的生活好了。”或者说：“不，我不这样了。”这个人当然会大声地吼出“不”字来，吼得肺都炸裂了。

如果你把我现在的所为归入过去的一连串事情中去，你也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永远只能是这个样子，只能过这种生活。只有另一种可能性能使情况不同，我已经有经验，不是等人们拧紧螺丝逼供才大声叫喊，而是人们把虎钳拿出来就开始叫喊，在远处有动静时就开始叫喊。我的良心已经变得这般清醒，不，不是清醒，还远远不够清醒呢。但是，还有一点情况不同：人们能为他和你的缘故对你讲真话，对你说那些不可

诉诸他人的话，人们甚至能直接从你这里得知所需的真实情况。

假如你这么尖刻地说，密伦娜，说我怎么乞求你不要抛弃我，那你就不对了。在这方面，我彼时此时没有什么不同。我靠吮吸你的目光而活着（这还不是对你的人格的特殊的神化，看着这样的目光每个人都会变得圣洁），我足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我对此很害怕，却不甚了了。我完全不知道我在离地面多高的地方晃悠。这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很不妙。一句真话，一句不可回避的真话就够了，就能将我向地面扯下一截；再来一句，又扯低一截；最终将无物可倚，便坠了下来，即使到了这时还会感到掉得太慢。我有意不说出这种“真实的话”的具体例子，这类例子只会把人弄糊涂，而且绝不会是完全正确的。

密伦娜，请发明一种我怎么给你写信的新的可能性吧。邮寄写着谎言的明信片过于愚蠢，应该寄些什么书给你，我也并非总是知道的。想起你有朝一日跑到邮局却一无所获，我简直受不了。发明一种新的可能性吧。

星期二

星期三你去邮局，会发现那里一封信都没有——噢，有的，星期六那封。在办公室里我不能写，因为我要工作，可我又不能工作，因为我想着我们的事。下午我不能起床，因为我不是太累，而是太“沉重”了。总是这个词儿，这是唯一适用于我的词儿，你懂得它的意思吗？这好比一艘船的“沉重”，它丢了舵，对波浪说：“对于我来说我太沉重了，对于你们来说太轻了。”可是这么表达也不够充分，用比喻是难尽其意的。

我没有写信的主要原因是：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感到我有那么多特别重要的话要对你说，以致闲暇时再闲也不足以让我为此调动起全部力量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对目前我没什么可说的，更不用说对未来了！我真的就像是现在才完全离开了病榻（指从外部看去是病榻），还抓住床架不放，希望最好还能回到那上面去，尽管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这张床。

密伦娜，你写的关于那些人的话，nemáte sly milovat^[147]，是对的，即使你在写下这些话时并不这样认为。也许他们的爱的力量仅仅在于：可以被人爱。在这点上这些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又削弱了这一点的力量。假如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对他的情侣说：“我相信，你是

爱我的。”这就完全不同于另一种说法，力量也要小得多；或说“我被你所爱”。但是这样的人就不是情侣，而是语法学家。

“双方的不完美”在你的信中是一个误解。我这么说的意思仅仅是：我生活在污秽中，这是我的事情。而把你也牵连进来，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就不仅仅是对你犯下过失，这还是次要的。我不相信，对另一个人犯下的过失（假如只牵涉到另一个人的话）会使我夜不能寐。因此并不是这么回事。可怕得多的是，通过你，我对我肮脏的意识看得更加清楚，尤其是，这么一来，对我来说拯救工作就要艰巨得多，不，应该说可能性更小了（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可是这样一来不可能性更升级了）。这使恐惧的冷汗渗满我的额头；至于你的罪责，密伦娜，那是无从说起的话。会使我夜不能寐。因此并不是这么回事。可怕得多的是，通过你，我对我肮脏的意识看得更加清楚，尤其是，这么一来，对我来说拯救工作就要艰巨得多，不，应该说可能性更小了（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可是这样一来不可能性更升级了）。这使恐惧的冷汗渗满我的额头；至于你的罪责，密伦娜，那是无从说起的。

错误的是，我十分后悔，我在上封信里把情况与以前的事情作了比较。让我们一起把这些话一笔勾销吧。

那么你真的没生病¹？

星期一晚

的确，密伦娜，布拉格这里有你的一笔财物，对此也没人表示异议，除非夜晚也在争夺它，不过夜晚对一切都是在争夺的。但这是一笔什么样的财物啊！我不愿贬低它，它是某种东西，可以说很大，大得可以遮蔽满月，就在楼上你的房间里。而你不会因为这么黑暗而害怕吧？黑暗，却没有黑暗的温暖。为了让你看看我的“工作”，我附上一幅画。这是四根柱子，中间两根有木棍穿过，“违法者”的双手被捆在这根棍子上；外面两根柱子上插着的棍子是用来捆脚的。这个人被这样固定后，人们就慢慢地继续往外扳这几根棍子，直至这个人从中间裂为两截。柱子上靠着发明者，叉着手叉着腿，显得洋洋得意，好像这一切是前无古人的发明创造似的。可是实际上，他不过是从卖肉屠夫那儿偷看来的，屠夫就是用这种方法撑开内脏已经掏空的猪的躯体，把它挂在店门口。

所以我问你会不会害怕，因为你写到的那个人实际上并不存在，也

没有存在过。在维也纳的那个没有存在过，在格蒙德的那个也没有，后者就更是子虚乌有的了，并且应该受到诅咒。知道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假如我们重新相聚，维也纳那个人，甚至格蒙德那个人又将粉墨登场，那么天真无邪，没事人似的，而下面那个真实的人，那个大家和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比其他人存在的可能性更小。可是在他所显示的威力中，他比一切都更真实（为什么他不自己升出地面，现出真身来呢？），他向上发出威胁，并将重新粉碎一切。

是的，密兹·K.来过，谈得很投机。可是只要有可能，我将不再写到其他任何人。他们插入我们的通信中间是破坏一切的根源所在。可是，我不想写到他们的原因并不在此（他们实际上没有破坏什么，只是为真实性和想要跟随他们而去的事物打开了一条出路），我不打算以这样的话来惩罚他们，如果这些话可以视为对他们的惩罚的话。我只是感到他们不再适于在这里占有一席位置了。这里为黑暗笼罩，一座黑暗的住宅，只有当地人才能勉强习惯这个环境。

我是否知道这终将会过去？我知道，这是不会过去的。

小时候。假如我干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但在大家眼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或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可是在我自己的心目中却是很坏的事了（大家眼里不是坏事，这不是我的功德，而是世界的盲目和沉睡），那么我就会很惊奇，怎么一切还是一成不变地循着自己的道路走？那些大人，当然脸色显得阴沉了一些，并没有特别的变化，还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我从懂事时起就一直钦佩他们的嘴巴怎么老是那么安详，老是那么理所当然地紧闭着。这时他们的嘴也依然如故。观察了一会儿以后，我从这一切中得出结论：我显然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对此害怕是一种幼稚的误会。我又可以捡起刚才吓了一跳而停下来的事情，继续干下去了。后来这种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慢慢地发生了变化。首先我开始相信，其他人对一切都洞悉了，他们的意见也表达得足够清楚，只是我至今还没有足够敏锐的目光来洞察这一切。打那以后我很快就获得了这种目光。第二，我感到其他人的坚定品格（即使这是真的存在的话）虽然还总是那么令人吃惊，但再也不是可以用来为我开脱的证明了。

好吧，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我的本质中什么也进入不了他们的世界，在他们看来我是无可指责的，我的本质的道路，也就是说我的道路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假如我的本质是一条大河，那么至少有一条强壮的

胳膊从他们的世界伸展出来。

不，密伦娜，我求求你发明另一种写信的方式吧。你不该徒劳地跑邮局，甚至你的小邮差（他在哪里？）也不该这么做，甚至邮局小姐也不该听多余的问题。假如你找不到别的方式，那么只能一切照旧了，可是你至少得努力动动脑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

昨天我梦到了你，细节我几乎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不断地变换位置，我变成了你，你变成了我。后来你身上不知怎么着了火，我还记得人们用布把火扑灭，用一件旧上衣拍打你。可是变形又开始了，你不再是那个人了，身上着火变成是我了，而用上衣拍打的也是我。可是拍打没有用处，只是证实了我由来已久的担心：这类东西对救火来说是毫无用处的。这时消防队来了，你不知怎么又被拯救了。但是你与以前不同了，像幽灵一般，用粉笔在黑暗中描画。也许仅仅由于得救而高兴得晕了过去，你倒在了我的怀里，毫无力气。可就是这个时候也有那种变化无常的不稳定性在作怪，也许是我倒在什么人的怀里。

现在A.在这儿，你认识他吗？只要不再有人登门拜访就好了。所有人都是永远这么生气勃勃，长生不老，不是真的向着超凡入圣的方向，也许是在坠入他们目前生活着的深渊里。我是这么惧怕他们。由于害怕，我多么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的每一个愿望来，假如他不提出要我回访的要求就离去，我会感激得去吻他的脚的。我独自一人时还能活着，可是只要有人来，实际上就是杀死了我。尽管来者意在以其力量重新使我复活，可是他又没有这么大力量。说好星期一到他那儿去。我头都晕了，不知它是否还在肩膀上。

密伦娜，你为什么写到共同的未来呢？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或许这正是你这么写的原因？当我们有一天晚上在维也纳匆匆谈到这一点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在找一个我们熟识的、非常惦念的人，因此我们用一些最美好的名字呼唤他，可是没有回音。他又怎么能回答呢？他根本不存在，在最广阔的范围都找不到他。

可以肯定的东西很少，而这便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生活在一起，不会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身子挨着身子，不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永远不会，连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也不可能。我现在恨不得想说，这在我看来如此确定无疑，就像我明天早晨会起不了床（我应当独自坐起来！看见我在我之下，好比在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下面，肚皮朝下，背上被压得很

重。在我至少能够蹲着、背上的尸体能自行抬起来以前，我难以着手工作），去不了办公室那样确定无疑。这也对，我肯定会起不了床。不过，起床站立起来，只需超出人的一点点力量，这点力量我还有。总的说来，我勉强还有超出人的那么一点点力量。

对于起床一说，不要咬文嚼字，事情并不这么糟，我明天将起床，这一点总比我们共同生活那一最遥远的可能性要肯定一些。再说，密伦娜，如果你检验一下你和我，看一看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之间的“大海”上那不可逾越的滔天巨浪，那么你也一定不会得出别的看法的。

关于污秽，为什么我不能对它——我唯一的所有物（这是所有人唯一的所有物，只是我对此知道得不很确切）再三谈论呢？由于谦虚么，哦，这倒是唯一有理的借口啦。

你联想到死亡时感到害怕吗？我只对痛苦怕得要命，这是一个坏迹象。想死，却不想痛苦，这是个坏迹象。否则的话，人是敢于去死的。人们正是作为圣经中的鸽子被派遣出来的，还没有找到一片绿地，便又缩回到黑暗的诺亚方舟里去了。

关于两个疗养院的介绍我收到了，里面没有能令人吃惊之处，顶多在价格和与维也纳的距离方面有些出乎意料。这些方面两个疗养院相差不多。贵极了，每天超过四百克朗，也许达五百克朗，这还须看情况而定。离维也纳的距离约为三小时火车路程，再坐一小时马车，那么也很远，大致如格蒙德距维也纳那样远，当然是指慢车。看来格里门施坦要便宜一点点，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会这样，可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选择它。

你看，密伦娜，我总是只想着自己，或者说得正确些，只想着那窄小的、我们共有的、根据我的感觉和意志对我们具有决定意义的世界，而忽视了周围的一切，甚至没有为《克蒙》和《论坛报》对你表示感谢，而你又一次干得那么出色。我将把我的一份寄给你，这份我放在桌子的抽屉里。可是你也许要听我说几句意见，那么我就不得不再读一遍，而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真爱读你译的别人的文章。这篇托尔斯泰谈话录是从俄文译过来的吗？

你得流行性感冒了？这样我至少不必责备自己这段时间在这里过得太快活了（有时我不懂，人们是怎么找到“快活”这个概念的，可能人们

仅仅为了把它选来作为悲伤的对立面的吧)。

我曾确信你不会再给我写信，可是我对此既不惊讶，也无伤感。不伤感，是因为我觉得其必要性已经超出了一切悲伤的范围，因为在整个世界上也许没有足够的重量可以托起我这可怜的微小的重量；不惊讶，是因为假如你以前说：“到现在为止我对你友好的，可是现在我停止这么做，并且要走开了。”我可能从来就不会感到惊讶。世上是有许多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件事却是最不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比如人们每天早晨起床这件事就要令人惊讶得多。那么，这就不是什么能给人以信心的惊人消息，而是一件在有的情况下会叫人恶心的奇事。

你问你是否配听我说句好话，密伦娜？显然是我不配对你说这样的话，否则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我们见面的时间会比我估计的要早吗？（现在我写的是“见面”，而你写的是“共同生活”。）可是我相信（而且看到我的观点到处都得到证实，到处，从那些完全与此无关的事情上，一切事情都证明这点），我们永远不会，也不能一起生活，比“永远不会好一些”，归根结底还是永远不会。

格里门施坦在其他方面还好一些。价格差别每天在五十克朗左右，而且要到另一个疗养院去进行卧床疗养的话，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带（毛皮脚垫、软枕、毯子等等，而我什么都没有）。在格里门施坦这些东西可以借，在“维也纳森林”要付一大笔保证金，而在格里门施坦则不用。格里门施坦地势也高一点，如此等等。再说我现在还不回去。有一个礼拜我的情况够坏的（有点烧，呼吸如此困难，以致我从桌旁站起来都害怕，咳嗽也频繁），不过这看来只是一次长时间散步的后果，那次散步时我多谈了一些话，现在好多了，于是疗养院又变得无关紧要了。

现在我手头有介绍单了：在“维也纳森林”住朝南带阳台的房间价钱起码三百八十克朗，格里门施坦最贵的房间六十克朗。区别就是这么大，尽管两者都贵得叫人反感。要获得打针的可能性须预付钱，打针本身则由自己付钱。我愿意到农村去，更愿待在布拉格学一门手艺，最不愿意的是到疗养院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让主任医生从两膝间取走，让他用那满是石炭酸味的手指把肉团塞进我的嘴里，然后顺着咽喉硬往下推，噎得我难受得要命。

我已经在长沙沙发上躺了两个小时，几乎始终在想你。

你忘了，密伦娜，我们并肩站着，看着地上那个生物，我就是那个生物，而这个往地上看的我当然就失去了生物性。

连秋天都在戏弄我：我有时觉得暖和得可疑，有时候又觉得冷得可疑。可是，我不去管它，事情不会太糟的。事实上我也考虑过是不是坐车经过维也纳。这么考虑的原因仅仅是：肺部确实比夏天糟糕（当然这是自然的），在街上谈谈话，肺就给我带来了困难，而且会产生不舒服的后果。假如我应该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到了，我就愿尽快地跑到格里门施坦去，一下子把自己放倒在躺椅里。而且，也许正是旅行会使我感到舒服，还有维也纳的空气，我觉得它好像就是我生命的空气。

“维也纳森林”也许近一些，可是距离上的差别肯定不大。这家疗养院不在列伯多夫，而是更远一些，从火车站到疗养院也要坐半小时马车。假如说从这家疗养院出发直接到巴登去很容易（当然是违反规定的），那么从格里门施坦到维也纳新城不也同样容易吗？这不管对你还是对我来说都没有多大差别。

怎么会呢？密伦娜，你怎么会到现在还不对我感到害怕或者厌恶或者什么呢？你的严肃和力量达到了什么样的深度啊！

我在读一本中国人写的书《bubácká kniha》^[148]。因此我想到，这里全是有关死亡的故事。一个人躺在临终的床上，死亡的临近使他摆脱了一切依恋，他说：“我的一生是在抵御欲望和结束生命的斗争中度过的。”然后是一个学生在嘲笑一个老唠叨着死亡的老师：“你老是说死，却总也不死。”“我会死的。我在唱我的送终歌，一支歌唱得长一些，另一支歌唱得短一些，只需要用几句话便可以概括它们之间的区别。”

这是正确的，嘲笑这位英雄是不对的，他带着致命的创伤躺在舞台上，唱着咏叹调。我们躺着、唱着，年复一年。

《镜中人》^[149]我也读了。充满了何等的生命力啊！只有一处有点病态，可是其他地方都很丰富饱满，连疾病都是丰满的。我如饥似渴地仅用了—一个下午就读完了它。

现在在“那里”折磨着你的是什么？以前我总是以为得了此病我会浑身无力，现在我才真的这样了。你也这么爱生病。

我刚才也去了经理那里，是他让人叫我去的。原来奥特拉违背我的意愿，上个礼拜去找过他。我违背自己的意愿接受了公司医生的检查。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将获得休假。

密伦娜，原谅我，上次我也许写得太简略了，那是由于要预订房间

而感到不安（现在我发现，根本不必预订）。我还是想到Gr.[150]去，可是还有些犹豫不决。只要具有常人的力量的人早就会把这种犹豫克服了（当然这种人也不会到Gr.去），而我却没有。现在我还得知，与疗养院声称的不同，我还得去取得州政府的居留许可证。这个也许会发给我，但在我把申请书寄出之前就绝无此可能。

现在每天一整个下午我都在街上闲逛，沐浴在悠闲的气氛之中。有一次我听到人们称犹太人为“*Prašivé premeno*”[151]。人们离开那备受仇视的地方难道不是合乎自然的吗（可是犹太复国主义或者民族情绪对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种我非待在这儿不可的英雄气概就像浴室里那消灭不掉的蟑螂一样。

我正好从窗口望出去：纵马而行的警察，准备让刺刀见红的宪兵，叫喊着四散跑开的人群，而待在这楼上的窗里真是一种可厌的耻辱——总是在保护下生活。

已经在这里站了一会儿了，可我还没有去把信寄出。我完全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对你不写信的原因也只知其一。

给州政府的申请书我已经寄出，只要收到许可证，其他一切很快就能办完（订房间和办护照）。办完了我就去。我妹妹想去维也纳，也许她会与我同行的。她想在维也纳逗留一两天，想赶在孩子出世前抓紧时间作一次小小的旅游。她怀孕已三个多月了。

从爱伦施坦[152]写给你的信中看，他的眼光比我想象的要好。我愿意修正对他的印象，可是由于我再也见不到他，这也办不到了。我在他那儿（当然只待了不到一刻钟）感到很轻松，没有一点陌生感，当然也没有崇高的家乡感，这就像我当小学生时从我的同桌身上感到的那种轻松和熟悉感一样。那位同桌觉得我好，我觉得少不了他。在学校里面临一切吓人的事情时我们都是盟友，我在他面前要比在其他任何人面前更少装腔作势——可是实际上，我们之间的联系却是多么可怜啊。在E.[153]那里情况也是这样，我感觉不到他有攫人的力量。他待人和善，善

于言谈，勤奋刻苦，但是如果在每一个街角都站着这么一个说话人，那么他们虽然不会加速世界末日的到来，却会使目前的日子变得更令人难以忍受。你知道“坦嘉”吗？知道俄国牧师和坦嘉的对话吗？他们的对话有违于他们的初衷，成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救助的典型。坦嘉显然是死于寻求慰藉的噩梦里。[154]

E.的内心确实是十分强大的，他晚上朗读的东西美极了（应该视为例外的，当然又是克劳斯一书[155]中的一些段落）。正如刚才说的，他的眼光也很好。

顺便说一下，E.几乎变成了胖子，至少是变得结实了（而这正是美的地方；你真是看错了！）。关于瘦子，他只知道他们是瘦的。这种认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比如对我来说。

杂志来迟了，有机会我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可是它们总会来的。

不，密伦娜，我们当初认为可以在维也纳相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绝无可能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从我们的篱笆上”看出去，只用手抓着篱笆上部，手被扎得稀烂，我又掉回了地面。当然还有其他相聚的可能性，这世界充满了可能性，只是我还不认识它们。

你开列的时间表给我带来了快乐。我像研究一张地图那样在研究它。这至少是一种保障。可是在两周内我肯定去不了，看来晚一些才行。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事情拖着我的后腿。那疗养院不久前曾写信给我表示欢迎。在我打听食素的事宜后，它便沉默了。即使我像一个民族一样蓦地站起来踏上旅途，这里那里总还缺乏那么一点决断的力量。这个人或那个人还须加以鼓舞，到头来，所有人都耐心地等待，因为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大家就走不成了。我对这么一次旅行几乎有点害怕。举例说，假如我住到一家旅馆里，就像昨天那样（多年来第一次9点1刻就上床了）从9点1刻不停地咳到将近11点，然后睡着了，12点时在从左向右翻身时又咳了起来，一直咳到1点，这样旅馆里谁能受得了我呢？我前年坐卧铺车厢还毫无问题，现在却无论如何也不敢再问津了。

并不完全如此，密伦娜。你是在美兰认识现在给你写信的这个人的。然后我们成了一体，再也认不出自身来，后来我们又分离了。

对此我还想说几句，可是我的喉咙哽住了，什么话都出不来。

我也是这样。我常常想：我要写信告诉你，可是到头来却还是写不了。也许是因为波金中士抓着我的手，只有在他松开一会儿的时候，我才能抓紧时间偷偷写下一句话。

你正好译了这一段，这表明我们的口味是相似的。是的，刑罚对我来讲特别重要，我所干的事情无非是受刑和施刑。为什么？出于一个与波金相似的原因，像他那样未加考虑、机械地、循规蹈矩地做：要从这该死的嘴里挖出那该死的话来。这么做的愚蠢性（认识到其愚蠢性是没有用的），有一次我是这么表达的：“畜生夺过了主人的鞭子鞭挞自己，意在成为主人，却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幻想，是通过主人皮鞭上新打的一个结产生的。”

当然，刑罚也是可怜的。亚历山大在哥尔提亚斯的绳结解不开时，并没有施以刑罚^[156]。

这里看来也是一种犹太传统在起作用。《农村报》^[157]，这份现在登了许多攻击犹太人的文章的报纸，最近在一篇社论中证明，犹太人败坏了一切，搅散了一切，甚至（！）中世纪的自苦行也是犹太人败坏了的！可惜文章对此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只是引用了一本英文著作中的话。我太“沉重”了，到大学图书馆去一次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可是我很想知道犹太人同这一（在中世纪）离他们非常遥远的运动有什么关系。也许你有什么博学的熟人知道这件事。

书我给你寄出了。我明确地声明：我没有恼火，这可能还是我很久以来做过的唯一有点理智的事情。《阿列斯》^[158]卖完了，要到圣诞节时才再版，我用契诃夫代替了他。《巴比斯长》却印得几乎难以卒读，也许你看到这个样子就不会买了。但是我是负有使命的……

有没有看到关于那场疗养院火灾的进一步的消息？无论如何现在格里门施坦一定会塞满了人，那里的态度也会因此而变得傲慢起来。H.怎么会到那里去看我呢？你信中不是说过他在米兰吗？

你希望我不要同你的丈夫会面，你的希望不可能比我同样的希望更强烈。如果他不是径直跑到我这里来——他显然不会这么做——那么我和他互相见面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

启程的时间还要推迟一点，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还有点事。你看，我毫不害羞地写下我“有点事”。当然这可能是跟别的任何工作一样的一种

工作，而我却处在半睡眠状态中，与死亡这么近，就像睡眠接近死亡一样，《农村报》说得很有道理。迁徙，密伦娜，迁徙！

你说，密伦娜，你对此不能理解。假如你把它看作疾病，你就试着去理解它吧。这是心理学自称揭示了奥秘的许多病理现象中的一种。我不把它叫作疾病，我把心理分析学的治疗学那一部分视为一种不可救药的迷误。这一切所谓的疾病（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悲惨）都是信仰上帝的事情，是处于危难中的人在任何一片感到亲切的土地上落脚扎根的现象。心理分析学者认为可用来解释每个人的“疾病”的东西，按照他们的看法也同样是宗教的起因，当然今天我们这里多半没有宗教团体。教派多如牛毛，可都局限于个人，也许这只是因为人们的目光受到当前环境的束缚，看不到那么多。

这些真正在土地上落脚扎根的现象，不是人们可以互相交换的个别财物，而是在人的本质中事先形成的，而且在事后还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塑造人的本质（和身体）。人们想要在此得到治疗吗？

我的境况可以设想有三个圈子，最里面的一圈是A，往外是B，再是C。核心的A向B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必须折磨自己，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他必须放弃（不是放弃，放弃将是很难做到的，这只是一种必须放弃），为什么他不能活下去。在这层意义上狄奥根尼斯^[159]不也病得很重吗？我们当中又有谁在亚历山大的目光终于俯视着他时会不感到幸福呢？狄奥根尼斯却固执地请求他释放太阳，那可怕的、在希腊不断燃烧着、逼得人发疯的太阳（这个桶里装满了鬼魂）。C，这个行动的人却什么解释都得不到，B，只是对它下达命令。C在最苛刻的压力下行动，恐惧的冷汗直流（在别的情况下能看到这种从额头、面颊、太阳穴、头皮——一句话——从整个头盖骨周围一起流出来的恐惧的冷汗吗？在C那儿就是这样）。C行动着，与其说出于理解，不如说出于恐惧。他信任，他相信A把一切向B解释清楚了，B则正确地理解和转达了一切。

我不是不真诚的，密伦娜（当然我有这么个印象，我写的东西没有以前的坦率，清晰，是这样吗？），我是在“狱规”容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真诚，这就够意思了，而且“狱规”也越来越宽松。可是，“凭这个”我不能来，“凭这个”来是不可能的。我有一个特点，它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等级上把我与其他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俩都见过西方犹太人许许多多性格典型。就我所知，我是他们中最标准的西方犹太人。说得夸张一些，我没有获得哪怕一秒钟的赠予，我的一切都不是赠予

的，一切都必须靠努力夺取，不仅当前和未来，就是过去也同样包括在内。也许每个人都是顺带得到了过去，而我却必须去争取，这也许是最困难的工作。如果地球向右旋转（我不知道它是否会这么做），那么我就必须向左旋转，去攫取过去。可是我却一点没有完成这些义务的精力。我不能把世界扛在肩上，我连自己的冬装都扛不动。倒不一定为没有力气叫苦，又有什么力量足以完成这些任务呢！每一种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一切的尝试都是神经错乱，也只能得到神经错乱的报答。所以像你所写的那样，“凭这个来”是不可能的。靠自己我走不了想走的道路，甚至连走这条路的念头都不能有，我只能静静地待着，不能想干别的，别的我什么都不想。

就像是有个人每次散步前要梳洗一下（这已经够麻烦的了），而且由于他每次散步前一切必要的东西都不齐全，他不得不缝衣服，钉靴子，补帽子，削正拐杖，如此等等。他当然不能将这一切做得很好，也许可以坚持走完几条马路，可是比如说在格拉本^[160]那儿一切又突然散开了，他便赤裸裸地站在那儿，身上挂着碎布条。从旧环城路^[161]上跑回去是多大的折磨啊！最后他在爱森路又碰到一大群人，他们追逐着辱骂犹太人。

不要误解我，密伦娜，我没有说这个人完了。完全不是。可是他如果走上格拉本大街，那他就算完了。他这是侮辱自己和世界。

你的最后一封信我是星期一收到的，也在星期一马上写了回信。

那么你的丈夫说了他要搬到巴黎去^啰？这是老计划里面的什么新内容吗？

今天来了两封信。当然你是对的，密伦娜，由于对我自己的信感到羞愧，我简直不敢拆开你的信。现在我的信却是真实的，或者说至少是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假如我的信是编造的谎言，那么我在你的回信面前会如何呢？答复很简单：我会发疯的。说真话并不是多么伟大的功勋。这算不了什么。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叙述一些藏在我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也许其实这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地谈到的、但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和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当然，这种恐惧也许不仅仅是恐惧，而且也是对某种东西的渴望，这东西比一切引起恐惧的因素还要可

怕。

“O mne rozbil”^[162]，这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胡话。只有我负有罪责，它表明在我这方面真话太少；真话还总是太少，绝大多数总是谎言，是对我自己和对别人的恐惧所引起的谎言！这个罐子早在到达井边之前便已经打碎了。

现在我要闭嘴了，这样至少还有些真话可以保留着。撒谎是可怕的，没有比这更强烈的折磨精神的东西了。所以我求你：让我沉默吧——现在在信上，到维也纳后在谈话里。

O mne rozbil，你写道。可是，我只看到你在折磨自己。正如你信中所说，你只有在街上才能找到安宁，而我却穿着睡衣、拖鞋坐在这温暖的房间里，这般安宁。只要我的“手表发条”允许，就可以一直这样（因为我总要“报时”）。

得到居留许可证，我才能说我什么时候上路。现在逗留三天以上就必须得到州政府批准，为此我在一周前就提出了申请。

O mne rozbil，我又想起了这句话，这话就像设想相反的可能性一样错误。

这既不是我的缺陷，也不是人类的缺陷。我的归宿是最寂静的寂静，这对于我来说才是正确的。

这段故事我为你剪下来了。列维涅^[163]在慕尼黑被枪毙了，对吗？

今天是星期四。到星期二为止，我还真的下了去格里门施坦的决心，虽然有时想到此事就感到有一种内在的威胁，也感到行期的拖延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可是我相信一切都是容易克服的。星期二中午我听一个人说，不必在布拉格等待居留许可，在维也纳满可以得到的。这么一来道路便已经畅通了。我在长沙发上折磨了自己整整一个下午，晚上给你写了一封信，可是没有寄出。我还是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我在痛苦的折磨中辗转反侧，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心里有两个人，一个想去，一个害怕去。两个人都是我的一部分，两个人也许都是无赖，在我身上厮打。我一早起来，情况就像在我最坏的日子里那样。

我没有动身的力量；一想到站在你面前的情景，我现在就受不了，

受不了脑子里的压力。

你的来信就已经给我带来了遏止不住的、无边无际的失望，再加上这些话。你写道，你没有任何希望，可是你希望能一劳永逸地离我而去。

我无法向你，也无法向任何人解释清楚我心里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解释得清楚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甚至无法向我自己解释清楚。可是，这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问题很清楚：在我周围的环境中要像人一样生活是不可能的；你看到了这一点，但还不愿相信吧？

那封黄信封的信我还没有收到，我将原封不动地寄回去。

假如说我们现在停止通信不是好事，那么我一定是犯了可怕的估计错误了。我不会搞错的，密伦娜。

我不想谈你的事，并非因为这不是我的事情，这是我的事情，只是我不去谈它。

那么只谈我吧：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密伦娜，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背后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没有在我每天写给你的废纸上表现出来。这些信除了起一种折磨人的作用，别的什么作用都没有。假如它们不折磨人，那么事情就更糟糕。它们的作用只是让格蒙德的那个日子重现在我们眼前。那是误会、耻辱，几乎是不可磨灭的耻辱。我想凝视着你，就像第一次在街上那样，可是这些信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比整条喧闹的L.大街更强烈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我随着信件的多而不断加重的晕眩无力，想要从信堆里爬出来的绝望的挣扎，在你面前和我面前都感到的无能为力。哪怕你写一千封信，我说一千个愿望也否认不了这一点。决定性的还有（也许起因是这种无能为力，可是这里所有原因都难以辨认）一个不可抗拒的强大的声音，全然是你的声音，它要求我沉默。

有关你的一切这里都没有提到，这些当然多半可以从你的信中读到（或许也可以在那封黄信封的信中，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在你要求收回这封信的电报中。你这么做当然是有道理的），它们经常出现在我所害怕的那些段落中。我避开它们，就像魔鬼避开圣地。

奇怪，我也想给你拍电报。我长时间地玩味这一点，下午躺在床上在想，晚上在百乐威也在想。可是，电文只不过如此：“请对上一封信中画线的句子作出明确的、以示同意的答复。”后来我感到这里面包含着无缘无故的、丑恶的不信任，于是我便没有发出电报。

现在我无所事事，在这封信上一直趴到深夜1点半，看着它，并透过它看着你。有时候（不是在梦里），我想象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你的脸被头发遮盖了，我成功地分开了你的头发，向左右两边撩开头发，你的脸现出来了，我的手抚摩着你的前额和太阳穴，双手捧住了你的脸。[164]

星期六晚

我本想撕掉这封信，不寄出去，不回答那份电报。这类电报总是让人能从许多方面去理解。但是现在这张明信片 and 这封信来了。这么一张明信片，这么一封信。但是，即使在它们面前，密伦娜，即便把想要说话的舌头咬破，我又怎么能相信你还需要这些信呢？其实你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安静，正如你经常有意无意地说出的那样。而这些信只是烦恼，来自不可救药的烦恼，造成不可救药的烦恼。在这样的冬天为什么要这样呢（而烦恼至今还在加深）？保持沉静是活着的唯一手段，不管在这里还是那里。满怀悲伤，好吧，这有什么作用？这让人像孩子般深沉地酣睡。可是烦恼呢？这无异于扶着犁耙在睡眠中耕耘（在大白天），这是难以忍受的。

星期一

没有一条法律禁止我继续给你写信，并为这封信感谢你，也许这封信里写着你能写给我的最美好的语言，像：“我知道，你……我。”

但从另一面来说，你我长期以来就取得一致了：我们现在不应再写信。至于这话正好由我说出，则完全是偶然的。我不说你也同样会说的。由于我们观点一致，就没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说不写信好。

糟糕的只是，这样我（从现在起你不必去邮局打听了）便没有、几乎没有给你写信的可能性了，或者还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即我寄给你一张没有写字的明信片。这便意味着，在邮局有一封信。只要有一点必要，你就写信给我，这当然本身是不言而喻的。

我在V.那儿把事情弄得很糟，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还不像你刚听到吓一跳时想象的那么糟。首先我不是作为一个乞求者，或甚至是以你的名义去的。我去的身份是个陌生人，跟你很熟，对维也纳的社会状况有所认识，而且还收到你两封悲伤的信。

我没有说辞别的话。这不是告辞，而像是有一股强大力量埋伏在那里，把我一把拖了下去。可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它怎么敢这么做呢？

星期三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165]：

我想，还是不要多谈掩护和与它有关的事情为好，这就像在战时谈叛变一样。有些事情人们是难以完全理解的，最后只能进行猜测。在这些事情上人们仅仅是“民众”。人们对事件是发生影响的，因为没有“民众”什么仗也打不成。除此以外，人们对事件也有发言权。可是要对这些事情作出判断和决定，则只有通过等级制统治当局那不可及的最上层。假如人们一旦真的用自己的言辞影响了事态，那么只会带来损害，因为这些言辞是外行的，是非克制的，就像睡梦中脱口而出一样，而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间谍在窃听。在这方面安静、尊严、不为挑衅所动乃是最好的秉性。这里一切都是挑衅，就连长长的运河边上您坐着的草都是（有一段时间，我躺在烧热的炉子旁的床上，抱着热水袋，盖着两层被子，床是弹簧床，我却以为自己着凉了，这是多么不负责任）。最终人们只会得出一个看法，就像大家看到表面现象都会产生的那种看法：我的病要比你可怕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散步强得多。因为假如我在那种意义上来谈论我的病，实际上没有人会相信我。事实上这也不过是开玩笑。

《多那狄》我马上就开始读，不过也许还是先寄给您好，我知道这么一种欲望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一个把这么一本书加以藏匿的人是会怀恨在心的。比如说我就对一些人抱有成见，因为我毫无根据地怀疑《夏末秋初》在他们中谁的手里。而奥斯卡·鲍姆的儿子从法兰克福那儿的野外学校那么匆忙地赶回家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把那些书带去，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基普林写的《瘦高个和同志们》，这本书我相信他已经读了七十五遍了。假如《多那狄》会引起类似的情况，那么我就寄去，可是我也很想读它。

假如我拿到副刊，我也许不会去读那些时装介绍文章（这个星期天它们登在哪里？）。如果您不断把日期告诉我，我会非常高兴的。什么时候我能出门了，我就去取《魔鬼》，眼下我还有点头疼。

乔治·凯瑟尔——他的东西我读的很少，也没有兴趣去多读，舞台上我还没有看到他的任何作品在上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两年前的诉讼案，我读了塔特拉上刊登的报道，尤其是那雄辩的辩护词，他宣称他有拿别人东西的不可辩驳的权利，把他自己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路德相比，并且要求说，一旦判他徒刑，德国就应该下半旗。在我的床边他谈的主要是他的大孩子（他有三个孩子），那是个十岁的男孩，他不让他去上学，也不给他上课，所以他还不会读，不会写，画画却很好，成天在林中、湖上玩（他们住在一幢寂静的别墅里，在柏林近郊的格伦海德）。我在告别时对凯瑟尔说：“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而他说：“这也是唯一伟大的事业，其他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看见他站在面前，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不太舒服的感觉，半个柏林商人，大大咧咧，乐呵呵的，半个疯子。他看上去身心没有完全垮掉，可是有些方面却垮得太厉害了，据说也只是热带摧毁了他（他年轻时在南美受雇，得了病，回到家里，将近八年无所事事，躺在家里一张长沙发上，最后在一家医院里恢复过来），没有别的因素。从他的脸上也能看出各占一半的特点：一张扁平的脸，浅蓝色的眼睛空洞得叫人吃惊，它们像有些人的眼睛那样在脸上抽一抽的，而脸的其他部分却一动不动，就像麻木了似的。马克斯对他的印象却完全不同，觉得他能使人愉快，为此他可能是出于友好的感情硬要凯瑟尔到我这里来一趟，而且他现在还把整封信都占着。我本来还想说点别的，下一次吧。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非常妒忌一个人，因为他被人爱着，在理智和力量的无微不至的保护下，平平安安地躺在花丛下面。这种妒忌到现在还是一呼即来。

我没有经常阅读《论坛报》，可还是读过几次，从中我相信可以得出结论：您夏天过得很好。有一次在普拉那的火车站得到了一份《论坛报》。一位避暑的女人在同人家谈话，背后握着报纸，正好对着我，妹妹帮我把它借了来。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上面登着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内容是批评德国浴场的。有一次您描述了远离铁路度过的夏日生活的快乐，这也很美，要不就是同一篇文章？我不相信。像以往一样，

只要你踏入《民族报》^[166]，甩掉犹太人（时装）方面的教育题目，你的文章就会非常出色。这回是关于陈列展品，然后你译了那篇关于厨师的文章，为什么呢？姑妈真怪，有一次她写的是应该怎样正确地贴邮票，后来又写到不该从窗口把任何东西扔出去，都是无可辩驳的事情，却又都是毫无希望的斗争。可是，如果很留神的话，会发现她有时也会写到一些可爱的、动人的、美好的事情，只是她不该这么恨德国人。德国人是了不起的，并将永远如此。您读过艾兴多夫这首诗吗：“啊，山谷深远，啊，高地！”或者尤斯提努斯·凯纳尔那首关于锯子的诗？^[167]如果您没有读过，我可以抄给您。

关于普拉那本来可以说几句，可是现在已经提不起兴致来了。奥特拉对我很好，尽管她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孩子。我的肺（至少在室外时）还过得去。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到医生那儿去过。我在外面（神圣的虚荣心！）劈一个多小时的木柴也不感到累，而且一直很愉快。这么看来我的情况不会太坏的。其他方面，睡眠及跟着而来的失眠则要坏得多，某些时候。

而您的肺——这个自豪的、强壮的、备受折磨的、不可动摇的生命体呢？

您的 K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密伦娜夫人。今天我也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才提笔的。我不想为不写信道歉。您也知道，我对信是多么痛恨。我一生的一切不幸（我在此并不想抱怨，只是想总结出一条普遍的教训来）都来自信件或者来自写信的可能性，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人们几乎没有欺骗过我，但是信总是在欺骗，并且不是别人的，而正是我自己的信。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幸，对此我不想多说了，但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不幸。单单从理论上讲，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在信件的连续性中，即在一封信证实着另一封信，并可将另一封信作为自己这一封的见证的连续性中成长。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幽灵们吮吸得一干二净。它们

正是通过这种丰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也在与此斗争。为了尽可能把幽灵似的东西与人隔绝，为了达到自然的交往，获得心灵的安宁，他们发明了铁路、汽车和飞机，但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显然是些在毁灭过程中产生的发明；其对立方面则更平静、更强大，它为邮政发明了电报、电话。幽灵们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灭亡。

我感到惊讶，怎么您还没有写到过这一点？并不是说要通过公开见解来阻止或者达到什么，这已经太晚了，但是至少要向“它们”显示，您是认出了它们的。

此外，从一些例外事情上可以认出“它们”来。有时他们让一封信不受阻碍地通过，这信会像一只友好的手那样到达目的地，轻柔而和善地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兴许也只是表面现象，这种情况也许是最危险的，对这种情况应比对其他情况更警惕。但如果这是一种错觉，那么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觉。

我今天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正是我想起来要给您写信的原因。我今天收到了一位您也认识的朋友的来信[168]。我们已经很久不通信了，这本来是最明智的。同上面说的有关的一点是：信是了不起的催眠药。它们是怎么到达的啊！心中干涸、空虚、激动，片刻的快乐，跟着是长时间的痛苦。在忘我地读着它们时，本来已经来临的那一点点睡意从洞开着的窗口飞了出去，久久不再回来。所以我们互相才不写信。我经常想到它[169]，但这思想一闪即逝。我的整个思想都是一闪即逝的。但昨天晚上我久久地想着它，长达几个小时，夜晚躺在床上那些时间（这段时间正是由于其敌意对我来说才特别珍贵）我都用来考虑如何在封打算要写给他的信里，不断用同样的句子来重复我当时觉得特别重要的、需要告知的事情。早晨果然来了一封他[170]的信，信中有一条说明，说这位朋友一个月来，或者说得准确些，一个月前，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应该到我这儿来。这条说明与我的遭遇竟如此奇特地巧合。这个关于信的故事给了我写一封信的机会。而既然我已经写了那一封，那么，密伦娜夫人，我为什么不能给您，也许是最愿意给的人，也写一封呢（只要还愿意写信，何乐而不为呢？这话当然只是说给那些贪婪地包围着我的桌子的幽灵们听的）[171]。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报纸上找到您的文章了，除了那些介绍时装的文章外。最近一段时间里除了个别例外，我觉得这些文章写得令人欢快而

安宁，包括最近那篇关于春装的文章。在此之前我有三周没有读到《论坛报》（但我会想办法弄到手的），我到施宾德米勒家去了。

然后来了您的信。现在写信的事弄得有点怪：您必须（以前您什么时候又不必呢？）有耐心。三年来我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信，在这方面我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传达信息的愿望。我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也不属于其他任何世界，就像是那么多年来我都是人家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心不在焉，而实际上一一直在倾听有没有人叫我，直到疾病在隔壁房间叫我，我赶紧跑过去，越来越深地委身于它。可是房间里很黑暗，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疾病。

不管怎么说，我想问题、写东西变得非常困难，有时在书写时两手空空地从纸上滑过去，现在也仍然如此。对思考问题我根本不想谈（我不断为您的思想闪电般的敏捷所叹服，一大堆句子不知怎么就聚拢来，闪电般猛击下来），无论如何您要有耐心。这朵蓓蕾在慢慢地绽开，它也只是蓓蕾，因为人们把闭合着的就称为蓓蕾。

我开始阅读《多那狄》了，但只读了一点，还没有被吸引住。读过的他^[172]的少量作品也没有给我多少亲近之感。人们称赞他的简朴，可是简朴本来就是德国和俄国文学的特色。他，这个祖父，是可爱的，可是他却没有力量阻止人们在阅读他的时候草草掠过。到现在为止我所读到的最美的（我才读到里昂那里），我觉得具有法国的特色，而不是飞利浦的特色，是福楼拜的反光。譬如在一个街角突然产生的快乐（您也许还记得这一段吧？），译文像是由两个译者合作译的，一会儿很棒，一会儿糟得简直看不懂（一个新译本将由沃尔夫出版）。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乐意读它的。我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可是阅读速度非常慢的读者。读这本书时阻碍着我的，是我在姑娘们面前会变得很困窘的弱点。这甚至使我不相信作者所描写的姑娘的真实性，因为我不相信他胆敢去接近她们。就好像作家做了一个洋娃娃，称它为多那狄，目的只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多那狄那里吸引过来。这真正的多那狄是完全不同的，身处的地方也完全不同。我的头脑中对这种小姑娘岁月（尽管非常可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从这个模式看问题，就好像这里所叙述的一切并没有真正发生，而是以后的事情，而这一段只是按照音乐规则补充创作的前奏，并按照真实的乐章调定了调子。在有的书中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到结束。

Na velké cestě^[173]我没有读过。契诃夫我却非常喜爱，有时爱得完

全发狂。《离开磨坊》我也不知道。史蒂文生我根本没读过，只知道您喜欢。《弗朗齐》^[174]我会寄去的。可是除了个别地方，您一定不会喜欢它的。这可以用我的理论来解释：活着的作家同他们的书有一种活的关系，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捍卫它们，或者反对它们的斗争。一本书真正独立的生命要在作者死后才表现出来，说得更正确些，要在作者死去一段时间后才表现出来，因为这些血性的人在死后还会为他们的书斗争一番。然后书就慢慢地孤单下来，只能依赖自己的心脏的搏动了。所以，譬如说麦耶贝尔就做得很理智，他为了支持这种心脏的搏动，把他所有的歌剧都留给了蕾加特，也许还根据他自己的信任给它们分了等级。对这种理论还可以加一些补充发挥，即使没有什么重要的可以补充了。用在《弗朗齐》这儿便意味着：这位活着的作家的这本书真的就是他那套住房尽头的那间卧室，供他亲吻用——如果这房间是供亲吻用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怕了。假如我说我喜欢它，或者您说（也许您不会这么说）相反的话，那么这简直算不上是对这本书的评价。

今天我读《多那狄》，读了较长一段，可是我吸收不了（但看来今天不能用那个理由来解释，而是谓为妹妹在隔壁跟女厨师谈话。我只要轻轻咳几声就会打断她们，可是我不愿这么做，因为这个姑娘——到我们家来才几天——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强壮得像巨人一样，说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么说没有理由，她只是因不幸而不幸，她需要妹妹安慰。我妹妹也从来就是这样，就像我父亲说的：“最喜欢跟女佣人坐在一起不管我在表面上说什么批评这本书的话，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一切责备都来自核心，却不是来自这本书的核心。如果一个人昨天杀了一个人（这个昨天什么时候会变成前天呢？），他今天就不敢听任何杀人的故事。所有杀人的故事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痛苦，枯燥，刺激。书上那庄严的不庄严，那拘束的不拘束，那赞赏的讥讽——我都不能忍受。假如说拉斐尔诱惑了多那狄，那么这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作者在那学生的房间里待着干些什么呢？还有第四者——读者，直到他的小房间变成医学系或者心理学系的大教室。除此之外，这本书充斥着绝望，别的东西很少。

我还经常想着您的文章。我奇怪地相信——将虚构的对话变成真实的对话：犹太教！犹太教！——如果不是由于寂寞中产生的绝望才要求结婚，那么结婚是可能的，而且会是在头脑高度清醒的情况下结婚。我相信，天使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那些由于绝望而结婚的人会赢得什么呢？假如把孤寂放到孤寂之中，那么永远不会产生家乡，而只会产生

一个卡托加。一种孤寂反映在另一种孤寂之中，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也是如此。假如把孤寂与安全放在一起，那么对于孤寂来说情况将更糟糕（除非是一个温柔的、姑娘般无意识的孤寂）。如果对结婚的前提准确而严格地下个定义，那么结婚意味着：安定。

眼下最糟的却是（连我都没有想到）：这些信，甚至这些重要的信，我都写不下去了。写信的恶魔又开始作怪了，把本身被自己摧毁的夜晚摧毁得更甚了。我必须停笔，再也写不下去了。咳，您的失眠与我的不同。请不要再写了。

感谢您的问候。关于我：我离开那儿几天，布拉格日子过不下去了。可是这还不能算是旅行，只是胡乱拍打了一阵长得很不合适的翅膀。

K

〔发自多布里乔维茨的明信片，邮戳日期：1923年5月9日〕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我从多布里乔维茨寄出的明信片谅已收到。我还在这里，可是两三天后就回家。这里东西太贵，太难入睡……其他方面当然好极了。关于进一步的旅行：也许通过此行，我对旅行比以前更适应一些，尽管还要坐着朝与布拉格相反的方向走半个小时。我首先担心的是价格——这里的价格是那么贵，看来人们只能在临死时到这里来待几天，到死的时候便正好把钱用完。第二，我担心——第二——天堂和地狱。除此之外，世界对我是敞开着。

致

衷心的问候！

您的 K

〔发自多布里乔维茨的明信片，邮戳日期：1923年5月9日〕

〔用铅笔在行间，在明信片上方和下方写着〕

钱都不会找，一会儿太多，一会儿太少，简直看不透，真是个机灵的跑堂。

此外，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的第三次，您在一个算得非常准确的关键时刻突然给我写来几行告诫的话，或者说是宽慰的话，或者是随便什么话吧。

在我们最后一次相会后，你突然（但并不是出乎意外地）失踪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你的消息，恰恰是在我狼狈不堪的时候，在9月初。这期间的7月我完成了一件有点伟大的事情（世上有着多么伟大的事业啊！）：我在大妹妹的帮助下到波罗的海边的缪利茨去了一趟，无论如何是离开布拉格，走出了这四壁紧锁的房间。刚开始时我的情况很不好。后来在缪利茨萌生了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去柏林的愿望。我本想10月去巴勒斯坦，我们还谈到过这件事呢。这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个幻想，就像一个明知自己永远下不了床的人所抱的幻想一样。既然我永远下不了床，我为什么不能至少到巴勒斯坦去一趟呢？可是在缪利茨我碰到了一个柏林犹太人大众疗养院的度假旅游团，多半是犹太人。这很吸引我，路就在我前面。我开始考虑搬到柏林去住的可能性。那时这个可能性不比去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大多少，后来却越来越大。无论从哪方面看，一个人住在柏林对我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仅在柏林，在其他地方一个人生活同样是不可能的。可我在缪利茨找到了一位有着难以想象的好心肠的助手^[175]。然后我于8月中旬到布拉格去，接着还在什雷森我的小妹妹那里度过了一个月。在那里偶然听到烧毁那封信的事，我绝望了，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你，为了减轻我心灵的负担。可是我没有寄出，因为我对你一无所知，后来在去柏林前也把它烧掉了。你提到的另外三封信我至今一点不知道，我对给任何人带来的任何耻辱都感到绝望，不清楚这三者中涉及哪一个。可是，我当然绝不会因为绝望（即使它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而迁来迁去，就算我在缪利茨及时地收到那三封信也不会这样。

接着，9月底我来到了柏林，出发前不久收到你寄自意大利的明信片。说到出发，我是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进行的，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像被抬进坟墓那样。

现在我在这儿了。在柏林，迄今为止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是乡下，在一个有花园的别墅里。我好像还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地方，诚然，我也会很快就失去它的。对我来说它美丽过甚了，这已经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处住宅。伙食至今与布拉格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只是我的伙食，健康状况同样如此。这便是一切。我不敢再说

下去了，已经说得太多了，空中的幽灵们贪婪地把它们吞进了那贪得无厌的咽喉。而你自己在信中说得更少。你的整个状况是好呢，还是堪可对付？我无法拆解这个谜。诚然，人们对于自身的谜也是无法拆解的。没有别的，唯有“恐惧”。

F

亲爱的密伦娜^[176]：

给您写的一段信已经在这里放了很久了，可是却写不下去，因为过去的烦恼又在这里找到了我，袭击了我，几乎把我摔倒在地上。于是，我举止艰难，每一笔都很艰难——我写下的所有的话我都感到太伟大了，与我的力量较量着。当我写下“衷心的问候”时，这问候还真有力量出现在那喧哗、混乱、充满城市灰暗色调的L大街上，而我和我的一切却连气都喘不上来。所以我根本不写，等待着更好、或者更糟的时辰的到来。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受到了人间最大限度的温柔与周到的照料。对于世界我只是通过涨价，而且是深受震动地通过涨价去了解的。布拉格的报纸我收不到，柏林的报纸对我来说太贵，您能偶尔给我寄些《民族报》剪报吗？用以往那种使我欣喜的方式。我用下列地址已经好几周了：施台格利茨，格鲁纳瓦尔德街13号，赛福尔先生转。现在又该致“最好的问候”了，如果它们刚到花园门口就摔倒了怎么办呢，或许您的力量会更大一些。

您的 K

附录1 原编者跋

写信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到不了它们的目的地，而在中途即被幽灵们吮吸得一千二净。

——卡夫卡致密伦娜

弗兰茨·卡夫卡结识密伦娜时，她正在将他早期的短文译成捷克语。他们的关系演变成热烈的往来，此过程可在1920年发自美兰的书信中找到踪迹。事情仅仅发生在一个瞬间——在那个瞬间，卡夫卡发现自己不再能自由地决定，是取道慕尼黑还是其他什么路线从美兰回到布拉格去，或回到波希米亚的某个温泉疗养地去，而依照密伦娜的要求，他该取道维也纳——在那里她生活在一种逐渐解体的婚姻关系中。卡夫卡也不是自由人，他的处境与密伦娜颇为相似。布拉格有个未婚妻[177]在等待着他，她期待着尽快完婚，但她的婚姻前景同样很渺茫，正如这之前卡夫卡的另一位未婚妻[178]的命运一样。关于这个未婚妻我们只知道她是“柏林人”。唯一的区别是：卡夫卡两次——其实是三次，因为他与同一位姑娘已经两次订婚了——婚约的破裂对这些姑娘来说显然都是严重的危机。而密伦娜一旦脱离她的丈夫，看来不会产生任何悲剧性效果，若干年后事情果然如此。

卡夫卡的日记（马克斯·勃罗德整理编辑，1951年绍肯和S.费歇尔出版社出版）展示了这一关系的深度。她的名字（或只要与密伦娜有关的提法）在1921至1922年间反复出现。事情开始于1921年10月15日，卡夫卡写道，他将所有日记都给“M.”看了。通过此举，他真的将他的心灵和良知全部裸露在她的眼前。12月1日他这样记道：“她来找过我四次（显然是在他父母家里），她即将离开布拉格。”“‘内心备受折磨的日子中较为平静的四天，’他补充道，‘从我对她的离别未感到悲伤，未感到有真正的悲伤，到我为她的离别感到无限的哀伤，这过程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当然，悲伤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情。’第二天他又写道：‘总是M.，或者不是M.，但都是一种原则，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1月18日：“你用胜利的赠予干了些什么？最终可以说是失败了……但本来这是很容易成功的……M.说得对：畏惧即不幸……”1922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的显然是一封未曾寄出或对方未曾收到的信的草稿：“从一些我羞于引述的小事件中找到这么个印象：最后几次来访和以往一样，是亲切的，值得骄傲的，但多少有点儿疲乏，有点儿迫不得已，就像探望病人一

样。这个印象对吗？你在日记中可以找到什么可以据以对我作出裁决的东西了吗？”

1月23日他对她（大概是书面的）“讲了那个晚上”。另一次他分析了她对他的评价；还有一次，1月底在施平德缪勒他记道：“比如假使说M突然来到这里，该是多么可怕。”但这将会（真正的卡夫卡，而不完全全是幽默之辞！）在这风景秀丽的山沟沟里显著地揭示他的市民形象。他还写道，以前他同M在玛丽恩巴德是过得幸福的，因此要重温那段幸福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要“在痛苦地突破界线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到此已开始解体：“以前炽热的纽带所在之处，如今是一道墙或一群山或说得更确切些是一座坟墓。”4月6日有一段十分奇异的记载：“打算给密伦娜的信。三个爱林尼亚人。逃入小树林。密伦娜。”1922年4月他们肯定又在布拉格相会过[179]。

这些记载虽然富有特色，但是倘若没有这些书信构成一段完整的震撼人心的爱情小说，没有这绝望、幸福、自我啃啮和自我作践的狂放的盛宴，那些记载便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残简断片而已。因为，不管他们会面多么频繁，这种爱情就其实质而言只是一种书信上的谈情说爱，如同少年维特[180]或克尔凯郭尔[181]的那种爱情。

密伦娜出生于一个老布拉格的捷克人家庭，一个属于人们可称之为真正的捷克斯洛伐克爱国者的家庭。她的家族祖姓用拉丁文镌刻在布拉格旧市府大楼的巨大的青铜牌上，以纪念她的一个祖先，他作为捷克爱国者，白山战役后被哈布斯堡王朝处以极刑。她自己有时就很像16或17世纪的贵族妇女，是司汤达取材于古意大利编年史的小说中那种气质的妇女，犹如桑塞维林娜公爵夫人或玛蒂尔德·拉·穆尔作决定时所表现的那种热烈、勇敢、冷静、机智，然而在选择她们的手段时则无所顾忌——只要是出于她炽热的情感所要求的话，而这种要求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青春时期。作为朋友，她是取之不竭的源泉，有着取之不竭的善良，取之不竭的救助手段，而这些手段的来源又常常是扑朔迷离的。她对朋友的需求同样也是取之不竭的，这对她或对她的朋友们来说似乎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作为情人呢——这只能由少数几个男人来述说，他们肯定知道，但他们差不多都已故世。在1918年后那些动乱的年头里，她成了维也纳咖啡文学家沙龙的座上客，一个色情和才学混杂的场所，她不适应这个环境，所以颇多痛苦。她的黄金时代显然是年轻时在布拉格度过的那些日子。那时她令人难以置信地挥霍无度：生命、金钱、感情

——她自身拥有的和她所获得的感情，她视之为自己自由支配的固有财产。可是卡夫卡却称她为“密伦娜妈妈”，这并非没有理由。他在这些书信中说，她具有“不会惹人不快的”特性——这也是事实；在她无所顾忌地发怒而他不得不默默忍受之后，这话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这些悲喜剧的混合穿插充斥着这些信件。

美兰书简是基于一种个人和职业上的互相同情，并在这种纯友谊的气氛中开始的。那是1920年，卡夫卡在那里疗养，医生已诊断出他患有肺病。

卡夫卡的生命是由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牺牲和逃避组成的巨大的漩涡，假如向这个漩涡俯视，会令人几乎忘却这期间发生的、秋毫难察的内在喜剧性。就连卡夫卡这个为时人不知的伟大的幽默家（这批信件中就有两个令人着迷的例子：关于旧市府大楼前那个女乞丐的故事和在女佣人陪同下去上学的描述），他显然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工夫加以注意：她施行的打击，她琢磨出的诡计，她作为爱的一方想要达到而且总是能够达到的目的。卡夫卡在美兰的最后一周里，她阻止了已经迷恋上她的卡夫卡仓惶逃避的企图，并迫使他踏上有决定性的维也纳之行。这7天活像在演出一幕充满无可比拟的、显然也是鬼使神差的机智所导演的喜剧——只可惜那个对白的角色当时不在场。当然，她不是庸俗意义上的那种勾引者，想诱骗男人，或由于她尊敬作为作家的他，并比他和她周围的大多数人更早发现了他的天才而一心想要诱惑这个男人。她这么干是因为爱情；即使她的对象是个毫无价值可言的笨蛋，她肯定也会这么干的。她备受心灵痛苦，她肯定痛苦得可怕——首先是因为他在痛苦；其次是因为她也许察觉到，这是有可能与他进行一种心灵对话的唯一方式，好像在维也纳近郊幽静的马路上，在旅馆里，在令人陶醉的夏天的草地上，在维也纳和格蒙德四周的森林里，虽然彼此的灵魂也有可能接触，但真正谈得上对话的却只有在地狱之中。她也毫不奇怪地得了肺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或者她在想象中至少强烈地感觉到血已从嘴里涌出来了。

“你的生命甚至活跃到这样的深度。”卡夫卡有一次在信中对她说。这评语再正确不过了，无论如何，她“不是为了受苦而来到人世”的，从这批书信的作者笔下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她在此受苦，为他而受苦，依然只能说这种痛苦是她强大的生活欲望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她生活欢乐的组成部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对斯拉夫女人那仿佛

是传统的甘愿受苦的特性（对今天来说这已属于历史了）熟视无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密伦娜心爱的作家，这是不无来由的。

这个爱情故事的两个主要阶段反映在卡夫卡两个象征性的梦里，做这两个梦的时间正是在两个关键的转折关头。第一个梦在美兰初期，那时他明白了，他必须到维也纳她那里去——梦中他在维也纳她的房子前，在火车站与她相见了，在一起的有几个喋喋不休、乱出主意、打扰着他们的朋友，密伦娜作出完全拒绝的姿态（这是他潜意识中一个清楚的、坦白的、恰恰是绝望地表达愿望的梦）。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个梦可以作此解释。另一个更深刻的梦是在他们关系结束时，此梦形象地描绘了结束这一恋爱史的最终决断。在这个梦中，他和她不断地互易角色，同时燃烧着，然后把火扑灭。正如同卡夫卡的所有作品，这两个梦通过寓言般的叙述道出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以其他方法是根本不可能表达出来的，不是表达得差一点或不太准确，而是根本不可能表达——真实的象征的特征（而不是马克斯·勃罗德在他的卡夫卡传记中所说的寓言）。在此我也为我的见解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几十年来，自从我第一次接触卡夫卡的著作以来，这个看法就不断在头脑中出现，卡夫卡的作品至少在其萌芽状态中是“梦发”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天才在他独特的梦境现实主义、在他独特的梦境作品、他的梦境逻辑甚至在他的整个建筑结构和纤维结构中以“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是就“作家梦”的不确定意义而言，而是世界文学真正的伟大的梦者的体现——如凯维多，或更像斯威登伯格（在他的《梦的日记》中）——那种完全具体的意义。这里也自然绝不能排除作家有意识地对这些梦的因素作一番天才的、意义无比深刻的整饬。通过这番整饬，这些梦的因素才能赋予作品以确定的、不可改写的、真正富于象征的“意义”。无论如何，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比这两个梦在开头和结束时将这段心路历程的轨迹交代得更深刻，也不可能在表达的精确性上堪与其匹敌的了。

卡夫卡的作品和行动中（包括这些信件）论奇异和古怪莫过于此。在这一切之中，不论想说什么或说了什么，都是完美的。完美的象征，完美的（几乎是警句式的）措词（甚至包括表现出最深刻的矛盾之处），完美的线条、色彩、细微差别、句号、逗号，一切标点符号——不无奇怪的是，卡夫卡的天才头脑永远对自己不满，永远不了解自己：根本不想越雷池一步，除非（如果想这么做）反其道而行之。我始终感到既古怪又有特色的是：卡夫卡是欧洲唯一的、毫无疑问地用地道的措词，完美、精确而绝妙的悖论语言，用真正的“最后一句话”辞别世界的

天才。当他无法忍受疼痛时，他提醒他的朋友和医生克洛普施托克博士兑现在最后时刻给他一针致命的鸦片针剂的诺言。当医生犹豫不决时，卡夫卡对他说：“杀死我吧——否则您就是凶手！”除了他以外，还有谁在身体备受折磨的临终挣扎时刻，关心将如此闪光的智慧火花投入空中——且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一点人们可在卡夫卡写下的每一句话中察觉到；在这些信件中也一样：精确性、尖锐性、完备性，每一句话里意蕴的丰富性。

这些信件中的其他因素情况也相同。内心痛苦、自我痛恨、自我谴责、内心矛盾是否能找到如此完美的、分析性的、形象化的、文学性的、譬喻性的表达呢？这即是说，假如它们真的是些最深重的、致命的内心痛苦，而不是诸如出于羞耻心（或近似羞耻的感觉），而不能继续与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下去，从而产生了摆脱他的愿望。在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在第二次会晤（在格蒙德）前，卡夫卡同样既清楚又极富象征性地谈到性。在一封信里，他将性行为称为“黑色魔法”——这对于爱着一个男人的密伦娜来说，肯定是一种十分陌生的观念，即便她是出于喜欢随声附和而以不屑的口吻来谈性生活也罢。在卡夫卡的著作中——如果要举出名字，则特别是在他最深刻的《城堡》一书中（那几年他正好在写这本书——他对于性生活这一棘手的问题有十分透彻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了）^[182]。尽管我们有时（甚至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密伦娜在这里显示出一个比他更善良、更坦率、更健康、更有人情味的形象（他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这种感觉的）。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尽管他有种种生活的天赋，也不能在那充满高压电流的超凡脱俗的空气中自由呼吸。她虽然深深引发了他的激情，并且——假如我们相信他信中的话——她赋予他以新的生命，但毫无疑问，她也时常弄得他烦躁不安，最终使他觉得小睡片刻要比密伦娜炽烈的信还重要一些。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在卡夫卡的信札中，他那令人惊悸的自我啃噬经由同样夸张了的、但也合情合理的自我认识而取得了平衡。两者在一个奇特的句子中找到了共同的归宿。在这个句子中，他为他的恐惧（不为其他任何东西，只为此）而要求爱的到来：“对我来说它是值得爱的。”他这么说，仅此而已。他有时会言过其实，比如说他在开头，后来在结尾时将自己描写成一个在臭气和污浊中打滚的生物（这种姿态在我眼中显得太原始，太简单，难以使我相信），而我们大可不必信以为真。“爱情意味着你是我用来在我体内搅动的刀子。”——这话应该是在他有意结束他俩关系时说的。可是仅仅几个月前，事实完全与此相反。另一次他说：“有时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这也只有在他将所有罪过都理解成原罪

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人只可能从中“拯救”出来（是可能，而不是即将），却不能避免甚至纠正它。在他的著作中，无论是天国还是地狱，哪有避免或纠正一种罪过的一席之地？于是他完全可能像对以往的恋爱史一样来结束这段故事。他可以给一个同样热烈地堕入情网，然而不像密伦娜这般富有生气的女人一个决定毕生命运的打击，而不必给予她更多的慰藉。他所给予的无非是受责的良心、自我的折磨、无穷的自践自怨——大体上如同克尔凯郭尔对蕾吉娜·奥尔森的关系，当然同样出于那些极其复杂又极其简单的理由。他们最后意见一致，提出“她太爱她的丈夫了，以致难以离异”的观点，这无疑是一种信手拈来的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在这个借口下谁都不至于感到自己的虚荣心受到过深深的伤害。她以前和以后都经常抛下她丈夫一人在家；他对她同样如此。

“我不得不承认，”卡夫卡有一次以此作为结束语，“有一次我非常妒忌一个人，因为他得到了爱，备受爱护，处在理智和力量的保护下，静静地卧在鲜花之中。这种妒忌之情时时涌上我的心头。”卡夫卡在他“卧在鲜花中”之前，在他生命的黄昏中终于也享受到了这种引起妒忌的幸福。他的结局要比他对密伦娜的骤然窜起闪亮的火焰又骤然熄灭的热情来得幸福，来得平静。

关于密伦娜的结局，玛加莱特·布伯·诺伊曼在她震撼人心的回忆录《作为斯大林和希特勒的俘虏》（“十二”出版社，慕尼黑）中作了报道。玛加莱特·布伯·诺伊曼是密伦娜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难友。那时她们俩同汉堡的妓女和惯犯关在一起。

玛加莱特·布伯·诺伊曼像其他人一样被密伦娜的魔力所迷住，即使在以后的年头，密伦娜年事已高且微微发胖之时。她叙述道：“密伦娜一开始就和我成了朋友，在四年集中营生活中出生入死，始终不渝。我感谢命运将我送到拉文斯布吕克来，使我与密伦娜相遇。从第一天起，只要我看着她受难的脸，心中便出现一种模糊的恐惧。她从德累斯顿的收审监狱转来时已有病在身。她认为那是风湿病。她双手肿胀，总是感到疼痛，在长达几小时之久的集中营点名中，她穿着褴褛的囚服冻得发僵，晚上单薄的被子不能给她带来暖意。但是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她总是懂得怎样来驱散我的忧愁。1940年她仍然不气馁，勇敢，积极进取，与囚徒的精神状态毫无共同之处……密伦娜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囚徒’，她不会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变得冷漠和残忍……”

密伦娜果然避开了那些直接把病人送入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病人输送

员”。“想到她将死去，恐惧攫住了我的心，”玛加莱特·布伯在另一处叙述道，“我听得见她晚上在草袋上啜泣的声音：‘唉，假如我不必经过死亡过程便死了多好。……别让我像一条狗一样丧命啊……’在我趴在她身边安慰她时，我自己也相信，她将会活到自由的日子，会重新健康起来的。然而在牢房的黑暗中我恍然大悟，她是无救的了。”

出于对那些杀害病人的“病人输送员”和杀害病人的“针剂”的害怕，她还坚持挺了一段时间。

密伦娜在一次肾脏手术后于1944年5月17日死去，手术显然做得太迟了。“这时生活对我便失去了意义。”玛加莱特·布伯·诺伊曼说道。

6月10日集中营被解放了。“既然密伦娜不得不死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玛加莱特·布伯·诺伊曼以此结束了她对密伦娜最后几年生活的回顾。“密伦娜在世时，自由意味着同她一起重新经历一番第一座城市的生活，一起重新步入第一座树林……”自由对密伦娜来得太迟了。

很高兴回忆此事。

维利·哈斯

1952年5月于特洛伊斯多夫（莱茵州）

附录2 原版后记

为作家和弗兰茨·卡夫卡遗作的编纂者马克斯·勃罗德让我来编辑出版这本书信集，我首先表示朋友式的感谢。这些信件是1939年春天由我尊敬的朋友密伦娜在布拉格赠予我的——那是在德国军队进驻布拉格后不久。由于我不能携之流亡，它们由我在布拉格的家人在那些险恶的年头忠实地保存了下来，直至1945年。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密伦娜不会反对在她身后发表这批信件的。另外她当时的、不久前逝世的丈夫通过遗嘱形式也同意我发表这些信件，他在这些通信中扮演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角色。

给这些信札排出时间上的顺序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们几乎都没有署明日期。通过长达数月的工作（不仅是我一个人），我们根据数以百计的提示，横向联系和少数时间依据（布拉格胡斯纪念日，法兰西共和国国庆，密伦娜的生日，一些信的编号等）对它们进行编排，并不断重

新编排。我绝对无意宣称，这一工作已做得天衣无缝了。搞一个日期清楚的校勘版，对于一个可以借助一种包含数千条目的常用词汇表的德国文学研究班来说并非难事。然而这不是本质的目的，本版只想提供一本可读的、尽可能细心地加以编排的、无可比拟的生活文献。这一工作包括将捷克语的话系移植过来。假如有读者或评论家以为在这些信的顺序安排上有错处，最好还是先将自己的见解细致地检验一番：那么他们便会发现，一种被认为具有关键性的横向联系往往会被两种另外的横向联系所否定。不过，编者对于顺序掉换的有根据的建议将十分感谢，并可在第二版中加以采纳。

就此请允许我向出版者和卡夫卡著作的出色的专家萨尔曼·绍肯先生致谢，感谢他提出了丰富的、非常值得注意并且也受到了注意的见解。

关于信件内容，卡夫卡无疑在他的信中涂去了很多话，密伦娜也一样。在她将这个卷宗交给我之前不久，也显然用墨水将若干处涂抹得无法辨认。假如要出个校勘版，用化学手段或射线工艺使这些地方重新变得可以阅读兴许也是办得到的。可是在这里这种做法不言而喻是不可思议的。一批（不很多）信页或信件一定是丢失了，从这些信中某些不知所指的提示和残片般的段落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由于考虑到今天依然活着的人，本版中有些信的部分可惜不得不删去。编者尤感遗憾的是，在这些被删信件中有一些地方反复提到此书编者的名字——可以预先告诉未来的任何编纂者，本书编者丝毫不反对发表这些信件中被删的部分，尽管卡夫卡就一起可悲的事件作出的结论带有很大的幻想色彩，不符事实。这些情书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男友们并无妒忌之心，相反倒是妒忌她青年时期的那些老女友们。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某些人所怀的这种忌恨的原因显然并非总是明白可鉴的；于是在这些信件中出现了一些文学肖像，或不如称之为漫画，它们与事实毫无相符之处，因此目前不能发表。但愿将来会有完整的版本，为此我们现在就要在这里强调这些肖像的严重失实性质。同样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凡提及密伦娜家庭的一切几乎都删去了。

与此相反，尽管十分犹豫，却还是保留了信中大多数与犹太民族有关的部分。对于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来说，他对一个非犹太女子的爱显然是个重大的、悲剧性的、受到灵魂和遗传心理的重压的问题。这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身为犹太人的自卑自贱会可怕地爆发。要想删除这些地方，必然会将整个信件系列的特征摧毁殆尽，可是这些地方为一

切形式的误解敞开大门。所幸信中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在那里他有力地表达了对犹太民族未来的自豪和信念。

为了进一步强调本版所追求的不是科学性，而是良好的可读性，故对书中被删去的部分没有详加注明，对于今天已有些过时的拼写方法（奇怪的是，在1920至1923年间，亦即写这些信时就已经有点过时）一般保持原样。

如果说这本书与马克斯·勃罗德编的其他有关的书籍有所出入，那么签了字的编者只能据此为唯一合法的辩解理由：他与密伦娜和她的捷克朋友圈子多年交往并与他们关系密切。除此之外，他与马克斯·勃罗德竞争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勃罗德是卡夫卡的几十年的朋友，他发现了这个天才人物，并促使他闻名于世，同时以无可比拟的忠诚和可靠从事他著作的编纂工作。编者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他能勾勒出卡夫卡伟大的女伴密伦娜的肖像的轮廓。她事实上也值得人家将她的肖像公诸于世，而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是，她的信未能保留下来。

自然，马克斯·勃罗德关于卡夫卡的传记性或资料性工作成果（其他人的几乎未予注意）这里用得很多。最后，编者有一切理由对在这些信中经常被提到的施塔萨夫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维·哈

附录3 密伦娜、施塔萨和波希米亚的生活

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密伦娜就认识我了。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母亲作为密伦娜的最要好的朋友又跟我谈起过她俩年轻时的友谊，这种友谊诞生于共同的意愿，即要以另一种方式生活，不同于其他一本正经的姑娘们。

施塔萨·日洛弗斯卡和密伦娜·耶申斯卡是在米内尔娃女子中学认识的。密伦娜比施塔萨高一班，她俩虽然性格各异，但很快就互有好感。她俩都拒绝过平庸、虚伪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两人甚至在外表上也与众不同。她们都很苗条、漂亮，拒穿当时尚在流行的束胸紧身衣。她们理想中的人是依萨多拉·登康^[183]。

那时，许多妇女都不喜欢密伦娜。在30年代，上流社会的一些太太都劝自己的女儿不要和她们来往。

埃伦斯特·波拉克在当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笔杆子，而且还因其在情场获胜而引人注目，一旦密伦娜决定嫁给他的时候，家庭纠纷就开始了。使耶申斯卡教授不高兴的是，女儿的求婚者是个犹太人。耶申斯卡教授十分重视纯正的捷克籍。于是他作出决定：应该消除女儿的精神痛苦，送她去瓦莱斯拉维精神病院进行医疗监护……

当密伦娜在瓦莱斯拉维逗留期间，她的女友们坚定不移地效忠于她，充当了她和埃伦斯特·波拉克之间的媒介，并且监督他忠于被关起来的未婚妻。1918年密伦娜获得自由以后，就和波拉克一起动身去维也纳了。

接着就开始了密伦娜和弗兰茨·卡夫卡的通讯时期，这期间，施塔萨起了作用。卡夫卡总是到我们在斯特庞斯卡大街41号的家里来找信。

很久以后，我母亲对我丈夫伊方·弗莱茨曼回忆起她自己和弗兰茨·卡夫卡之间的交往时，曾说卡夫卡非常钟情于密伦娜。他的一举一动处处表现出他对密伦娜的爱。对我的母亲，卡夫卡既不羞怯也不孤僻，他是一个很开朗、很外露的年轻人。

我个人对密伦娜的最初回忆是与共产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密伦娜那时经常到斯特庞斯卡大街来看我们，而且几乎总是有一位男朋友陪

她一道来。有一天，她和一位非常漂亮的男青年来到我们家，姐姐和我都跟他打招呼说：“先生晚安！”密伦娜就纠正我们说：“这位是尤里乌斯·伏契克，人们从来不跟他道‘晚安’，但是说：‘同志，劳动光荣！’”

在那些年里，密伦娜曾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和施塔萨一起，她正在布拉格最大的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当她因“轻率地进行有利于苏联的宣传”而被解雇时，我母亲就以辞职表示声援。

密伦娜是当时的“左派先锋队”的一分子，那些人即使不是出于对苏联表示赞赏，至少也是对她表示同情。为什么对密伦娜的错误要感到惊奇呢？今天不是有人仍有支持苏联想要西欧裁军的意愿吗？

密伦娜穿着朴素，讲究实际，不戴首饰，梳着短短的环形髻发。那些自己什么也不干，专等丈夫来侍候的女人使密伦娜感到厌恶。

一见倾心

马乃斯艺术家团体曾在普里马托尔·狄特里希船上组织过一次周末晚会，就在那次晚会上，密伦娜结识了一位名叫雅罗米尔·克列依查尔的建筑师，两人一见钟情。她的朋友施塔萨气得要死，说：“他们叫一辆出租汽车，动身去舒马瓦山了，住在斯皮卡克的普罗科克饭店。”这肯定是密伦娜的主意。

密伦娜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说了心里话：“作为一个女人，我是太典型了，因此不可能去忍受我所知道的那样一种生活，那是最艰苦的苦行僧所过的日子。我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强烈愿望，那就是要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现在所过的日子，而那种日子我也可能会永远都过不上，即希望过一种有一个孩子的世俗生活。”研究卡夫卡的权威们为什么不来读一读这封信呢？然而，就在这封信中，密伦娜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究竟为什么离开了卡夫卡。早在许多人之前，她就认识到了这位自己无限崇拜的人物的伟大。卡夫卡的爱情使她感到骄傲，可是她懂得拒绝它。也许就在这种高尚的放弃中，人们反而可以找到卡夫卡所以爱这位女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密伦娜的最大愿望终于在1927年实现了，她嫁给了克列依查尔，并且等到了一个孩子。她那时很幸福，其父耶申斯卡博士也一样。在密伦娜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一个“规范的”男人，一个捷克人，而且，还是一位有才华的建筑师。在密伦娜怀孕期间，她继续按自己的习惯生活，

她照常滑雪，摔断了一条腿，并且产生了并发症。分娩也非常困难，她盼望一个男孩，但生了一个女孩。密伦娜给孩子取名叫雅娜，但是大家只叫她翁扎，好像她是个男孩似的。密伦娜拖着一条病腿，发胖了，常感神经痛，开始习惯于打吗啡。

克列依查尔夫妇搬家了，新居是维落赫拉第的一套很漂亮的房子。整层房子是按照克列依查尔的设计建造的。四壁都是玻璃窗的大房间，装了一个壁炉，阳台环绕一周，楼顶的平台能环顾布拉格全景。室内家具不多，只是必不可少的几件，倒是有许多花。紧挨着套房的是克列依查尔的工作室。

1930年夏天，我们曾到比利时的海边去度假，有一位名叫沃勒克的建筑师陪伴我们。我的姐姐、翁扎和我一起用沙子建造城堡。当时常常刮风，海边很冷，但这些并没有阻挡密伦娜到离海边很远的地方去游泳，这是她拖着一条残腿所能进行的唯一的运动了。她和施塔萨一起半裸着身子在沙丘上晒太阳，丝毫没有感到沃勒克和当地居民会对她们有所妨碍。有一次，她俩发现村里的神甫在远远地观察她们，这使密伦娜感到好笑，而施塔萨则用道地的法文把那个神甫骂得个狗血喷头。克列依查尔终于开着一辆车——他以前打牌赢来的司机座和客座隔开的大轿车——来接我们了。我们带着满满两箱子贝壳回到了布拉格。

当我和姐姐快十二岁的时候，密伦娜决定有必要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课程”就在她的房间里进行。她屋里除了一张很宽的长沙发以外什么也没有，她就躺在那张长沙发上，而我们则坐在沙发的边上。

密伦娜一边织着毛衣，一边说着话，还时不时地给自己注射一针吗啡。她说的是从曼彻斯特手工作坊到十月革命一类的内容。当她觉得我们对此感到厌烦的时候，就让我们去看翁扎，并且一起到平台上去玩沙盘。对于这样的教育，我承认自己什么也没有记住。

直到今天，我还敬佩密伦娜追求梦想的那种热情，赞赏她的自觉、朴实以及她能够做到的那种忠诚。

我是在被占领时期加入共产党的。后来，当我不得不解释自己怎么会入党时，我本想回答说：“那是因为密伦娜当时常在施杰潘斯卡伯爵的陪同下去维也纳车站帮旅客提行李。”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这确是发生于密伦娜在维也纳逗留期间：她当时为了赚钱去

提行李，就这样认识了施杰潘斯卡伯爵，是伯爵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

密伦娜希望她的女儿翁扎是个勇敢的、经受过锻炼的、爱好体育的姑娘。有一次，她强迫女儿从一只凳子上跳下来，翁扎照办了，并且摔断了一条胳膊。翁扎还很小的时候就会游泳了，我们决定要看看她是不是有本事横渡伏尔塔瓦河。我们游在四周，四岁的小翁扎游在我们中间。此事，我们对密伦娜只字未提。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年轻时的密伦娜也曾横渡过伏尔塔瓦河。

投身共产主义

当密伦娜认为我们受够教育以后，就介绍我们认识了那些在上次大战期间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学生们。其中有一位后来在纳粹占领时期成了我的丈夫。那时，我们在斯特庞斯卡街的家里常常开会。后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改组成青年文化组织，它的目的就是集中全体大学生进行反法西斯战斗。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死在集中营了，有的因为是犹太人，有的因为是共产党员。这些人中有我的丈夫，他被押送到奥施维茨集中营。

在大宅子内过日子，生活是很昂贵的，密伦娜又不是个节省的人，一有钱就拿来花，而且还常常把帮助一位有困难的女友看得比付电费更重要，因此债台高筑，终致婚姻破裂。1933年雅罗米尔·克列依查尔动身去了莫斯科。在很多回忆录里，我读到的是：“他的出走是由于对苏联的狂热崇拜。”而在家里，我听到的只是：“他走是为了躲债。”

密伦娜，她的新朋友艾夫岑·克林格尔和翁扎搬到奥尔尚墓地附近的一套小房子里去住了。弗兰茨·卡夫卡就安息在那个墓地。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艾夫岑·克林格尔。大家的印象是：这是和密伦娜“合得来”的第一个男人。密伦娜的父亲不是太高兴，但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一挥手——“又是一个犹太人。”艾夫岑是位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他智慧、敏锐，善于帮助密伦娜。战后，艾夫岑到了英国，成了外交部长弗拉季米尔·克莱芒蒂斯的秘书，后因斯朗斯基案件与他一起被捕。艾夫岑活下来了，而他的朋友克莱芒蒂斯的情况就不同了。

我不知道第一个动摇密伦娜对苏联的绝对忠诚的是艾夫岑·克林格尔呢，还是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克列依查尔回到了布拉格，这只是证实了密伦娜的担心。昨天，她兴致勃勃地维护苏联，如

今，她怀着同样的热情开始谴责苏联了。她有时还来参加我们“青年文化组织”的会议，并且试着说服我们。

但是，为时太晚了。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或同情者们什么也不想再听了，因为他们看到苏联是自己和希特勒交战的唯一支持者。现在，我们知道他们那时错了。但是，今天谴责我们盲目信仰并过分站在密伦娜一边的那些人对这一历史圈套是一无所知的。

1937年，密伦娜开始给《存在》周刊写文章，该周刊当时由自由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费尔迪南·珀鲁特卡主持。密伦娜的文章是很出色的。

《存在》周刊全面参加反法西斯阵线。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希特勒。

那是困难时期。密伦娜工作得很艰苦，她还同意接受了一次痛苦的戒毒治疗。有一阵子，我们很少看见她，时不时地，她还给我们送来一个需要紧急援助的德国流亡者。

慕尼黑事件发生以后，艾夫岑及时去了伦敦，而密伦娜本该陪他一起去，但未能下此决心。她当时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而且有那么多同事受的威胁比她还大。随着德军进驻布拉格，搜捕就开始了。在最初几批被捕的人员中，有密伦娜的一个朋友伊凡·赛卡妮娜律师，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她曾是季米特洛夫的辩护律师之一。密伦娜曾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场不公正的官司。

我本人最后一次见到密伦娜是在1939年11月她被捕之前。那是在“冶金”出版社，那里有我和我姐姐的一个摄影间。她向我们介绍了莫斯科的那些案件，但当时我们很难接受。捷克斯洛伐克被西方出卖了，国家被希特勒占领了。在那种情况下，谁会相信呢？只是当她死在拉文斯布吕克以后，我们才觉得她说得有理，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M·布伯·诺伊曼的著作中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情况。

雷斯塔·翁扎没有从密伦娜的名望中得到任何好处。再说，也没有人来顾及密伦娜的独生女所处的困境。翁扎在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里，只不过是淹没在一群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战后，翁扎从她外祖父耶申斯卡博士那里继承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一百万克朗。可她在一年之内全花光了。她在一群所谓超现实主义

的年轻人陪伴下，搬进了外祖父的那套布置得古色古香的住宅。住宅门口还停着一辆整日租用的出租汽车，谁想用，谁就可以去用。翁扎养着那一帮人，挥金如土。

钱用光以后，她就卖了家具到外祖父在多布里斯地区的乡间住宅去了。有一次，当她在森林中漫游时，以流氓和“寄生”罪被捕了。出于命运的嘲弄，警察派她到作家协会使用的多布里斯别墅去收拾屋子。

翁扎是一个有着真正的文学天才的聪敏女人，但她绝对不可能承受任何指令性的约束。她结婚，离婚，和几个男人生活过。她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她本人曾从事过多种职业：当看门的——不是看管房屋；到一辆电车上当轧票员，有一天当她决定不再去上班时，又忘了交还挎包、票子和钱。她曾遭受过难以令人置信的贫困，而且很难帮助她。她很宝贝自己的孩子，但又不懂得照顾他们。她一直忧心忡忡，生怕孩子们会从她身边被夺走。

翁扎的不幸

1968年，翁扎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是回忆她母亲的。很少有人对这本书感兴趣。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是一个原因。然而，几乎所有卡夫卡学者对密伦娜女儿的著作都不感兴趣，这倒是件令人惊讶的事……

翁扎在晚年生活中找到了某种平衡。她在布上作画。后来，她和新丈夫一起在布拉格郊区的一个小型车间里生产老式方砖的模型。1981年1月，她死于车祸，终年五十二岁。

密伦娜·耶申斯卡特别因为她是弗兰茨·卡夫卡的女友而芳名远扬，而实际上她远远不止是一位著名作家生活中普通的女主人公。她的遭遇反映了本世纪上半叶捷克知识分子既丰富多彩又很罕见的错综复杂的悲剧性命运。她的理想、失望、信仰和错误是和她的时代、她的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密伦娜的命运不仅惊人，而且富有象征意义，同时也和卡夫卡的命运分不开。显示永恒的还是规律的主宰，不可理解的规律，巴比塔^[184]的规律。

密伦娜的女儿翁扎曾经反对发表《致密伦娜情书》。她说：“密伦娜要是在世，她本人也不会愿意的。”她是在给维利·哈斯的一封信中说这番话的，后者想必明白翁扎是在问他要酬金。维利给她的回信不是太亲

切。一天，翁扎收到了一份请她去国家银行的通知。然而，她只是在很久以后，当她偶然路过银行时才进去了一下，人们给了她一叠钞票，并且指出：这是卡夫卡名下的。

这笔钱正好够她还清几笔债务。

施塔萨·弗莱施曼

（黄曼龄译）

附录4 卡夫卡生平和作品中的爱情关系

爱情关系——这在卡夫卡那里既是生活，也是作品本身，既涉及一些与爱情直接有关的作品，也涉及许多乍看上去与爱情毫无关系的作品。因此卡夫卡的爱情经历往往成为解开他的许多作品之谜的一把钥匙。

卡夫卡自己的生平本身就是一个谜。就爱情生活而言，他先后与两个姑娘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一直到四十一岁辞世始终是孑然一身。卡夫卡研究者们对此众说纷纭。

卡夫卡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和常人一样，对异性始终有着热烈的向往。年轻时他就注意观察女性，并记载在日记中。他一度曾暗暗爱慕着一位名叫科露格的女演员：“一见她歌唱，我就兴奋起来；只要她在台上出现，我就眉开眼笑，目不转睛……”他为科露格把他看成孩子却没有看出他的爱而暗暗伤感。他还热烈地爱慕过另一个女演员齐西克，捧着鲜花去看她演出，谢幕时把花献给她。有时因开演时间太晚，部分观众提前离座，此时，卡夫卡说，他“真恨不得把手里的杯子向他们摔过去”。他哀叹说，他想通过花给心中的爱带来慰藉，然而却是徒劳的。

卡夫卡生性内向，不善与女性接触，在与年轻姑娘说话时，需要有年纪大的人在场。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害怕姑娘们。但他的容貌和为人却使许多女性为之倾倒，因此他短暂的一生中却也留下了许多罗曼司。

1905年7月卡夫卡到一个疗养院休养，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姑娘，度过了一段爱情生活。1913年他在另一地又认识了一个姑娘。后来他在给勃罗德的信中写道：“我基本上同女性还没有过深厚的感情，只有两次例外。”这两次例外指的就是上述的两个。他的《乡村婚事》就写于那个阶

段，人们认为是他为第一次爱情所立的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1912年到1917年期间是他一段痛苦的爱情生涯，他与菲莉斯·鲍威尔在这期间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1919年春他认识了一位叫尤丽叶·沃里切克的姑娘，同她也订了婚，但翌年又解除了婚约。在这整个期间，他写下了《诉讼》、《乡村医生》等充满了精神创伤的作品。

1913年10月末，当卡夫卡与菲莉斯的爱情生活中出现危机的时候，菲莉斯委托她的女友格蕾特·勃洛赫居中调解。格蕾特与卡夫卡也建立了友谊。格蕾特于1914年间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后来断言这是卡夫卡的儿子。这个儿子共活了7年，还在卡夫卡去世前就死去了，而卡夫卡生前从未得知他有过一个孩子。格蕾特于纳粹期间流亡意大利，后来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捕，可能死于纳粹的集中营里。

1920年初，卡夫卡认识了捷克女作家密伦娜·耶申斯卡，他们之间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可是在通信近一年之后，这段爱情史也告终了。在这次爱情失败之后，卡夫卡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城堡》。

1923年夏，卡夫卡同他的妹妹一起在波罗的海海滨一个休养地休养时，认识了一个叫多拉·迪曼特的姑娘。当时多拉只有19岁，而卡夫卡已经40岁了，可他们之间的爱情却是那么真挚。多拉很快认识到了卡夫卡的天才，她自己的生平（她也是犹太人）使她对卡夫卡的恐惧心理十分理解。卡夫卡也为找到这么一个知心朋友而十分高兴。他从她的朗诵中发现她很有演员的天赋，后来多拉也确实根据他的建议和指导去学习演艺。他们在柏林合租了一套房子，生活在一起。卡夫卡曾写信给多拉的父亲，要求他同意他与多拉结婚，多拉的父亲是个虔诚的犹太教信徒，他拿着该信去找他最崇拜的教士，那教士否定了这一婚姻，于是多拉的父亲也拒绝了卡夫卡的要求，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卡夫卡与多拉之间深厚的爱情。当时卡夫卡的肺结核已经进入了后期，但爱情给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投入了一线绚丽的阳光，他留恋生活，向往着幸福的未来。偏偏这时他的病的严重性被确诊了。在车子送卡夫卡去维也纳一家疗养院时，多拉一直站在卡夫卡身旁，用自己的身子遮挡沿途的风雨。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日子中，多拉一直守在他的身边，精心照料他，尽可能减少他的痛苦。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多拉悲痛欲绝，晕倒在地。可惜对于卡夫卡来说这样甜美的爱情来得太晚了。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一爱情早一些发生，卡夫卡也许就不会写下那些震撼人心、充满心灵创伤的名篇了。多拉后来于1952年亡故于伦敦。

在与多拉认识之前，卡夫卡的爱情生活可以说一直是不幸的。难怪他哀叹道：“我对爱情所懂得的跟我对音乐所懂得的一样多。”（卡夫卡认为自己音乐一窍不通。）卡夫卡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如果算上断片《乡村婚事》则是四部）和一些短篇小说中都描写了女性，但她们都不是道道地地的女性形象，却像是幽灵一般地穿插在故事中间。有的评论家说，卡夫卡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妓女的变形。这种说法固然近于刻薄，但卡夫卡的小说中确实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爱情。

卡夫卡日记中有一篇小说草稿，他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卡夫卡的一生都没有放弃为此奋斗，而三次订婚则更是典型的例子。

.....任何童话中所描述的为得到自己心上人所付出的努力，都比不上我为了得到你而付出的努力，不只过去，现在是这样，而且永远会这样。

——《致菲莉斯情书》

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在马克斯·勃罗德家里见到了勃罗德的一个亲戚，那是一位姑娘。从这一天起开始了卡夫卡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卡夫卡在两天后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我坐下来时才仔细地看了看她，坐定以后我作出了不可动摇的决定。”这个“她”就是菲莉斯·鲍威尔小姐。

菲莉斯于1887年11月18日生于德国上西里西亚，12岁时随家迁居柏林。她有四个弟妹，父亲在柏林任一家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人。1904年到1910年，菲莉斯的父母因不和而分居，为帮助母亲承担家庭负担，菲莉斯于1908年中学毕业后便在一家唱片公司找了工作（任速记员），1909年她又转入一家生产录音机的公司，几年后她就成了那家公司的襄理。（1919年3月，即与卡夫卡的关系终结一年多以后，她嫁给了柏林一个富有的商人，生下一男一女，卡夫卡生前对此也是知道的。1913年，菲莉斯一家迁居瑞士，1936年迁居美国。菲莉斯于1960年10月15日在美国去世。）

卡夫卡与菲莉斯的爱情关系断断续续达五年之久，是卡夫卡爱情生活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五年中，双方，尤其是卡夫卡受尽了心理上的折磨，所以卡夫卡称之为“心中的斗争”。

1912年9月20日卡夫卡给菲莉斯写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就开始了频繁的通信。1913年初，卡夫卡在发表《判决》时题上了“献给菲莉斯·B的故事”，他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声明，这一行为是表明他对她的爱的一个确切信号。

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关系一开始就充满了悲剧的因素，卡夫卡心中交织着爱、彷徨和惶恐不安的情绪。在4月份的一封信中，卡夫卡向菲莉斯表明，要给她充分的时间来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觉得他只是人为地拖住菲莉斯不放。可是在6月份，他就问菲莉斯：“你愿做我的妻子吗？”

1913年8月是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月份。8月13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也许一切都完了，我昨天的信也许是最后一封了，一年来我们哭泣、互相折磨，已经够了。”可是时隔几天，也是在这个8月，卡夫卡把他与菲莉斯的关系告诉了他的父亲，并给菲莉斯的父亲写了第一封信，请求他把女儿许给他。两个父亲的回答都是冷静的，都没有异议。偏偏在这之后，卡夫卡与菲莉斯的爱情关系出现了第一次危机，通信一度中断。菲莉斯让女友格蕾特·勃洛赫居中调解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卡夫卡在10月末与菲莉斯见面后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太晚了。悲伤和爱情的甜美，在船中她给我的微笑，这是最美的。赴死和自持的愿望交织，这一切就是爱。”可是在这之后，通信却又中断了。

直到1914年初，新的转机才出现了，卡夫卡再次写信向菲莉斯求婚，但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在2月的日记中描写了自己的想象：他将揣着一封诀别书走入菲莉斯的房间，向她求婚，如果她拒绝了，他就向阳台跑去，跳楼自尽。菲莉斯终究是回信了，虽然没有马上答应与他结婚，却也使他欣喜若狂。2月底，卡夫卡再赴柏林，寻访菲莉斯。菲意外地见到他时，倒也很高兴，菲莉斯说她很喜欢他，但却怕与他结婚，怕那共同的前途。

可是事情却发展得很快，4月份双方分别在柏林和布拉格的报纸上刊登了订婚启事。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大声呼吁：“快来吧，让我们结婚，把事情了结了！”6月1日，卡夫卡与父母一起在柏林参加了订婚仪式。可是在订婚前后，卡夫卡的心情却非常矛盾。

订婚启事刊登后，卡夫卡收到许多贺信，可是除了头几封外，他都

不打开阅读。他说，他不是什么“最幸福的未婚夫”，“只有自己确实感到最幸福的人才会是最幸福的未婚夫”。

在5月6日的日记中卡夫卡描写了那次订婚仪式：未婚妻被女友和熟人围在中间，而未婚夫却独自一人靠在通向阳台的门口，向外面凝视着。未婚妻的母亲发现了这一情况，走到他身边问，怎么，你们吵架了吗？他答道：“没有。”未婚妻的母亲说：“那么到你的未婚妻那儿去吧，你这样已经引起人家注意了。”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描写了卡夫卡当时矛盾、孤独的心情。

举行完订婚仪式回到布拉格后，卡夫卡觉得自己“像罪犯一样被捆住了手脚”。

7月12日，时隔仅一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两个星期，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婚约便解除了。卡夫卡在日记中描写道：“旅馆中的法庭。坐在马车中的路程。F.〔菲莉斯〕的脸。她把手插入头发中，打着哈欠，突然振作起来，说出一串深思熟虑、蓄谋已久、充满敌意的话来。”

7月31日，卡夫卡写道：“现在我得到孤独的报酬了。这当然谈不上是报酬，孤独只会带来惩罚。”8月3日，卡夫卡叹息道：“本来再过一个月我就该结婚了。”8月，卡夫卡开始写长篇小说《诉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动、解除婚约的痛苦，在小说中投下了阴影。10月4日至10月18日间，卡夫卡写下了短篇小说《在流刑营》，痛苦和受惩罚的心情在这里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恰如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一封信中所表达的：菲在受刑，刑具操纵在他的手里，可是双方都在受罪。

1915年1月，卡夫卡与菲莉斯又见面了，他们是怎么重新联系上的，人们都不得而知。卡夫卡在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同F.在博登巴赫。我认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结合，但我既不敢对她说，在关键的时刻也不敢这么想。于是我还是瞒着她，哄着她，这是多么荒唐，这每天都在使我苍老、僵化。”

尽管如此，卡夫卡这次却采取了比较冷静的态度，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比较平静地发展着。1916年7月，卡夫卡与菲莉斯共同度假，在休假地的一个旅馆中一起度过了十天。菲莉斯走后，卡夫卡在给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间的协议简单说来是：战争结束后就结婚，在柏林

郊区租二三间房子，经济上各管各。”

1917年7月初，菲莉斯来到了柏林，第二次订婚仪式举行了。7月中旬卡夫卡与菲莉斯一起去匈牙利看望菲的妹妹。

但是这一对注定结合不了的情人，他们之间有那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订婚后，卡夫卡的结核病初次发作了。同时他心灵的创伤也难以愈合了，只要菲莉斯有信来，他就不吃饭，也不拆信。

1917年12月底，卡夫卡与菲莉斯再度在布拉格会面。勃罗德写道，他们25日在他家里做客时，两人情绪都很低落，不言不语。第二天，卡夫卡告诉勃罗德，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了。12月27日上午，卡夫卡在火车站送走菲莉斯后，来到勃罗德的办公室。他脸色苍白、严肃，突然哭了起来。勃罗德说：“这是我看到他哭的唯一的一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时刻。他抽泣着说：‘为什么非发生这样的事不可，这不是太可怕了吗？’”持续了五年之久的这篇爱情史最后终于以悲剧告终。

与卡夫卡和菲莉斯的爱情关系相比，现存有关卡夫卡第三次订婚的材料少得可怜。卡夫卡写给尤丽叶的信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卡夫卡致勃罗德的两封信。1919年11月那一封估计是卡夫卡写给尤丽叶的父母的信（只残留片段），再就是联邦德国的卡夫卡专家克劳斯·瓦根巴赫在《卡夫卡传》中认为是了不起的发现的那封卡夫卡致尤丽叶妹妹的信。

1918年底到1919年初，卡夫卡在布拉格北部的小镇什累申养病，在那儿认识了也患病的年轻姑娘尤丽叶·沃里切克。她的父亲是鞋匠和犹太教教堂仆人，她曾订过婚，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卡夫卡这么描写她：“普通却又令人惊奇。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非德国人，热爱电影、轻歌剧和喜剧。搽着粉，罩着面纱，说话时口若悬河，无所顾忌，整个说来颇不通世事，快乐并不悲伤。”

卡夫卡称他们的认识过程是“奇事”，他们俩每天见面，在散步的路上，在饭桌旁，在面对面坐着时，他们总是相视而笑。卡夫卡觉得这种无缘无故的笑是不舒服的，“折磨人的，使人愧疚的”。尽管这一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很自然，而且自从与菲莉斯两次订婚失败后卡夫卡已对自己

的婚姻前途丧失了信心，可是爱情还是产生了。尤丽叶先离开那里，三个星期中他们没有通信，但卡夫卡一回到布拉格，他们就“像被人追赶着似的飞到了对方的怀抱中”。

关系发展得很快，卡夫卡的决心也下得很快，半年后他们就订婚了。可是卡夫卡的父亲不同意他们结合。卡夫卡自己心中本来也矛盾重重，在“外部的事实和内心的虚弱的赛跑”中，这次订婚也很快失败了。当年夏天，他们打算租一套房子成家，可就在结婚的两天前，他们突然打消了租房子的打算，而卡夫卡反而暗暗庆幸，他说，否则的话，降临在他们头上的也许将是更可怕的崩溃，也许那时被埋葬的就将是一对夫妻了。此后卡夫卡就一任关系恶化下去，直到第三次解除婚约。这次婚约拖到1920年夏天才解除，但自1919年11月后便已名存实亡了。

二

这世界（F.是它的代表）和我的自身在难解难分的搏斗中，看来非撕碎我的躯体不可。

——卡夫卡：《八本札记》

也许有人会说，卡夫卡对婚姻的态度未免太不严肃了。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倒有理由责备他严肃得过了分：他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是真正活着，而只是像珊瑚虫一样粘附在礁石之上。他不愿意像大多数人那样为了生活而生活，为了养儿育女而结婚。他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真理”和“纯洁”，他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以此为基准的。

卡夫卡写道：“通过婚姻可以拓宽和提高自我生存。这是说教。但我几乎感觉到了其真实意义。”他经常说对安宁和家的追求是他想要通过结婚达到的主要目的。他所说的“家（Heim）”指的并不是家庭（Familie），而是归宿、安身之地。从这点出发，他把成家看成是在可怕的父子关系、可怕的家庭关系中，在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与家庭威权、社会威权之间解救自己的一种办法，他要通过婚姻争取自立、争取安宁和安身之地，但是他马上发现，他走出了牢房，想要跨入的却是另一个牢房。

在《致父亲的信》中，他这么形容他要通过结婚摆脱父亲的统治的打算：“这要求得太多了，人是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的。就好像一个人被关押起来，他不只想逃出去（这也许是做得到的），而同时又想为自己把这监狱改建成一座宫殿。假如他逃跑，他就不能改建；假如他改建，

他就不能逃跑。”《致父亲的信》是在第三次订婚失败后写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订婚的失败引起了卡夫卡心中这次火山爆发。他从1912年到1919年整整7年尝试统统以失败告终。他试着闯出令人窒息的社会空间，进入自立与自由的天地，可是他不能如愿。他认识到菲莉斯是“这世界的代表”，而这世界与他斗争的激烈程度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以致觉得要突破出去自己就会被撕得粉碎，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导致他的事业——创作被葬送。于是他宣布不打算结婚了，他认为婚姻是他“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

在三次订婚的漫长七年岁月中，卡夫卡感到幸福的时刻很少，几乎从头到尾他都认为这种关系是对双方的折磨。他后来回顾与菲莉斯这段关系时说：“当然她只是受罪，而我则是既大打出手同时又受罪。”卡夫卡总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女方，把她们推上了绝路。他的名作《在流刑营》也可以看作是这种罪疚意识的一种体现。

这七年之所以成为折磨双方的七年，是由于卡夫卡的斗争与失望的交错，由于他既想结婚，又害怕结婚的矛盾心情造成的。他说，安宁和家是不会从天而降的，必须是斗争的成果，必须是“有权利说：这是我的成绩”的东西，他为之斗争，可是他失望了。他说：“爱情总是造成创伤，这创伤永远不会完全治愈，因为爱情总是由污秽伴随着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失望的是在他的追求中找不到爱情的纯洁性——他一生的理想，为此他一次次自认失败，给自己，也给对方带来痛苦和折磨。

现在应该来看看伴随着卡夫卡的爱情关系的是什么样的污秽了，也就是说，什么是导致卡夫卡订婚一再失败的具体原因。

1913年7月21日，也就是说还在卡夫卡与菲莉斯爱情关系的第一个阶段，卡夫卡在日记中总结了有利于与不利于结婚的七个因素：

1. 没有能力单独承担生活的担子……没有能力单独承担一切：我自己生活的风暴，我自己人格的要求，时间和年龄的进攻，一阵阵的写作冲动，失眠，面临发疯的边缘……与F.的联系会赋予我的生存以更大的抵抗力。

2. 一切都会使我深思……昨天我妹妹说：“所有结了婚的人（指我们的亲戚）都很快乐，我理解不了这一点。”这句话也使我深思，我又惶恐起来。

3. 我必须尽可能单独生活。我获得的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成绩。

4. 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我厌烦与人交谈，厌烦串门拜访……

5.怕联系，怕屈从于对方。那样我就永远不能再单独生活了。

6.我在我的妹妹面前经常表现为与在其他人的面前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无所畏惧、坦率直爽、强大有力、令人吃惊、爱动感情。如果通过找妻子的中介作用我在所有人面前都能成为这么一个人就好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放弃写作呢？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7.独自一人我也许总有一天会真的放弃我的职业、工作。如果结了婚这就永远不可能了。

在这个全面的总结中，我们看到卡夫卡与菲莉斯之间的矛盾的一些轮廓，尽管是不很全面的轮廓。他们两人的思想观点、处世哲学相距甚远，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家里人对他还多少有所理解，可是菲莉斯“也许一点都不能理解”。

卡夫卡视写作为生命，可是菲莉斯对这一点不能理解。卡夫卡写的作品如《判决》、《变形记》等都曾寄给她看，朗读给她听，可是她毫无兴趣，有时也明说看不懂。一次卡夫卡写道：“我的书〔指《观察》〕你不喜欢，就像你当初不喜欢我的照片一样……这是我使你感到陌生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不说，不用简单的两句话挑明：你不喜欢。”卡夫卡的母亲对卡夫卡的写作也不理解，认为纯粹是浪费时间。一次她从卡夫卡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封菲莉斯的信，得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写了一封信给菲莉斯，要她帮忙劝卡夫卡改变生活习惯，她认为卡夫卡用写作来消磨时间，每天写得很晚是不利于健康的。菲莉斯果然给卡夫卡写了一封信，要他改变作息时间。卡夫卡得知此事后，同母亲吵了一架。他在给菲莉斯的回信中写道：“你关于饮食起居的建议并不使我特别吃惊。我必须这么生活。我已在信中告诉过你，我对找到目前这种生活方式是多么高兴。”在上面引的七点总结中和其他许多场合，卡夫卡都声明他绝不会为婚姻而放弃写作。担心婚姻会影响写作成了他解除婚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卡夫卡在总结的第七点中说，他一个人生活的话有可能达到弃职不干的目的，而结了婚就永远不可能了。在对待职业的态度上，卡夫卡与菲莉斯的观点也是截然不同的。菲莉斯看上卡夫卡，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是门当户对，卡夫卡的父亲十分赞同这一结合，出发点也是一样的。菲莉斯和卡夫卡当时都是高级职员，菲莉斯的地位甚至更高一些。她是个重实际的人，当然决不会同意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放弃现有的工作和地位。卡夫卡则相反，他十分厌恶自己从事的这种官僚化工作，一心想放弃这一工作，专心从事文学创作，这便水火不相容了。卡夫卡写道：“正是办公室和布拉格是对我，因而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不断加强威胁的破坏

因素。”后来卡夫卡告诉妹妹，当初菲莉斯对他的保险业务很感兴趣，急切地盼望他同她商量这方面的问题，可是他却绝口不提，使她很失望。此外，菲莉斯对卡夫卡家的工厂也很感兴趣，常劝卡夫卡多管工厂，做出点成绩来，卡夫卡却从不隐讳自己对工厂的厌恶，他不无气愤地问道：“为什么你对这工厂就比对我懂得多！”

在1915年第二阶段的第一次见面后，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两人都在暗中想，那个人还是那么顽固，那么不讲情面。我要过一种美好的、一切为我的工作〔指写作〕设想的生活，我对我这个要求毫不让步；而她呢，好像对我的一切无声的请求都听不见似的，要的是同一般人一样的生活：舒适的住房，要我对工厂感兴趣，保证充足的饮食，晚上11点上床睡觉，带暖气的房间……”菲莉斯还怕与卡夫卡结合后会“穿不上美丽的服装，会坐三等舱旅行，会坐不上戏院中的好座位”。这两个人的要求实有天渊之别，虽然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但一个是这个社会阶层的背叛者，他厌恶这里的一切，抱着自己的理想，要开创自己的天地；另一个则要维护这一切，要的是物质利益、金钱生活和“一般人”的享受。两个人之间相对地“异化”了。

在第三次订婚中，我们看到的同样是“异化”现象。尤丽叶的父亲是教堂仆人，是犹太人中社会地位最低下的，难怪卡夫卡的父亲对这一结合暴跳如雷，责骂卡夫卡还不如去娶一个妓女。卡夫卡虽然是个理想主义的叛逆者，行动上却是个弱者，他想闯出去，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只能绝望，只能顺从父亲的愿望。

异化在父子关系中表现为彼此陌生化，在婚姻关系中带来的也同样是陌生化。卡夫卡说：“同F.生活是不可能的。同任何人共同生活都是不可忍受的。”他虽然正确地认识到菲莉斯代表的并不是她自己，而是“这世界”，但他对此却一筹莫展，只能投身于孤独的河流之中，只能力图在自己心底建筑与这世界隔绝的壁垒，用他的话说：“我在笼子中……我心中始终围着铁栅栏。”

三

“下面的歌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不知名的骑士爱情歌手的作品。”就让我们用这句话作为开头吧！

——E.海勒：《〈致菲莉斯情书〉导言》

一个文学家的作品，人们谈到的往往首先是他的散文、诗歌和剧作，但不少作家的书信不仅是研究其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文学作品。在20世纪的奥地利，这样的作家除大家熟悉的里尔克和茨威格外，至少还有卡夫卡。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致菲莉斯情书》和《致密伦娜情书》等都是他书信中的精华所在。它们自成体系，风格各异，充满了文学意味。

书信集《致菲莉斯情书》篇幅最巨，共收入625封信、明信片 and 电报。从日期上看，这些信应该说是保存得相当齐全的。这应当归功于菲莉斯。当时卡夫卡曾在信中对别人说：“她说她不会嫁给另一个人；她永远不会扔掉我的信……”第一个诺言她没能去实践，但第二个她却做到了。是因为她意识到卡夫卡是个天才吗？未必。但在长年的接触中她也许确实感受到了一点卡夫卡的奇异光泽。

卡夫卡致菲莉斯的第一封信写于1912年9月20日，在这封信中，他先作了自我介绍，怕菲莉斯已忘了他，还提起了一个月前他们在勃罗德处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从11月初开始，他把称呼由“尊敬的小姐”改成了“亲爱的菲莉斯小姐”，以后又变成了简单的“最亲爱的”，通信迅速频繁起来，变成了一天两封，有时甚至三封，觉得这样还不够，有时干脆拍电报，写加急信，如此等等。

卡夫卡当时似乎完全沉浸于对菲莉斯的爱情之中。他说在他醒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一刻钟，其间不曾想到过她；在创作方面，他好些日子几乎没有动过笔，因为太想她了。而在睡着的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梦到她。他在信中不断表达自己等待菲莉斯来信的迫切心情，有时一封信他至少读二十遍。他多次描写自己坐在办公室里盼望邮差的情景，如果邮差未送来信，他甚至会马上跑回家去，看看信是否寄到家里去了。他还让家里人收到信马上给他送来。有时一天半天没收到信，他会急得恨不得去打长途电话，又千思万虑，生怕自己在什么事上，或在语言上得罪了对方。他甚至在梦里见到，楼梯上下都铺满了菲莉斯的来信，因而高呼：“真是好梦！”他自己写信是为了摆脱这些快要把他炸开的感情。他经常在信中写道：自从遇上你后，一切都变得光明了；我在快要完蛋的时候遇上了你……

可是在这些信中热烈的感情表达并非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低沉的调子时常出现，随着感情危机的发生，“最亲爱的”称呼一度变为“我的小姐”等。有时卡夫卡写下这样的话：“我与你的关系是幸福与不幸的混

合；你应该抛弃我，因为我不像一般情人那样握着你的手，而是拽着你的脚，使你寸步难行；我听到你在叫：‘够了！够了！’我这两年中遭的罪比世界上同时发生的灾难要小得多，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够受的了。”他不时以形象的语言写下自己这种负疚的心情：“我始终引导你走在最丑恶的路上，即使旁边就有一个美丽的湖。”他们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疏远一直十分担忧、害怕，当 he 从梦中惊醒时，他绝望地发现，她离他是那么遥远。他们对他们关系的前景经常陷入绝望之中，经常认为，他在与人打交道方面已经彻底失败了。

起伏的调子，爱与失望的交织，构成了《致菲莉斯情书》的基调。

在《致菲莉斯情书》中，我们经常看到卡夫卡心中激烈的斗争，他的许多话前后矛盾，有时同时表达出两种矛盾交织的心情。

他对这一爱情关系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明明日夜期待着菲莉斯的来信，半天不来信都受不了，却写道：“您最好一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我受不了您每天的来信。”他还这么说过：“假如我听到你说你爱我，我会惊恐万状；假如我听不到这样的话，我就会想一死了之。”他们关系的客观内在条件在他的眼中总是那么的矛盾，似乎可以结合，但实际上又不能结合：“我们现在也许可以紧紧地握住手了，但我们脚下的地板不是固定的，它不停地、不规律地移动着。”

他们对他们俩是否该结合的心情也是矛盾的。一会儿说：看来我们只能分手了，一会儿又问：你想做我的妻子吗？他说过，他真想放下笔不再给菲莉斯写信，“不再老是拖着你不放，叫你老弯着腰。听任洪流把我冲走吧。”可是他仍然不断地写信，向菲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在痛苦的精神折磨中，他只能想出这样的建议：“最亲爱的，带着我走吧，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及时把我推开。”

痛苦、矛盾的心理斗争始终贯穿在《致菲莉斯情书》中。

卡夫卡专家艾利希·海勒在《致菲莉斯情书》前言中说了一段含义颇深的话，他说这些信和卡夫卡本人都是“文学”，“它们[这些信]有一点是与骑士爱情歌手相同的，即被歌颂的对象并没有‘真正地’被追求着。”这段话道出了这些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信的作用在卡夫卡那里确实是奇异的，它并不是建立实际关系的桥梁，而是寄托理想、表达自我的一种手段。

卡夫卡早在1902年致当时的朋友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过信的作用：“假如我们试着用笔来写，我们就会比面对面地谈话感到轻松自在。”卡夫卡对他那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特别敏感，越是亲近的人他越感到陌生，在与菲莉斯的关系上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把他致菲莉斯的信和卡夫卡同时期的日记对比着看，我们会看到卡夫卡与菲莉斯之间的每次会晤几乎都使卡夫卡感到窒息、难受、无话可说；可是在信中他却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宣泄着自己的感情，不管是爱恋也好，抱怨也好，牢骚也好……都无拘束地倒了出来。“既然不能用臂膀，那就让我们用抱怨来拥抱吧！”这是卡夫卡信中的一句话。信与实际中的卡夫卡判若两人。但不能说卡夫卡口是心非，而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化”现象，一种心理的变态。在生活中，卡夫卡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因而是陌生的人；在信中，卡夫卡面对的是一个虽然实际存在，但在这儿实际上只留下了一个空洞的名字的对象，一个他自己设想出来的、从现实中异化出来的，借以倾注感情的“她”。这样才不难理解卡夫卡为什么说给菲莉斯写信的欲望扎根在他的生存的中心，也才不难理解卡夫卡为什么“只有在动笔的幸福时刻”才有自信。在第一次与菲莉斯见面后的日记中卡夫卡这样描写菲莉斯：“颧骨突出的空虚的脸，其空虚显而易见。”“空虚”这个形容词告诉了我们菲莉斯脸上的什么特征呢？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这形容的不是这张脸，而是卡夫卡的心情。卡夫卡就是在这张空洞无物的脸上驰骋他的想象力，憧憬他理想中的爱人。同样，菲莉斯曾先后寄给他一张近照和一张小姑娘时的照片，他告诉菲莉斯，他更喜欢那张小姑娘时的照片。为什么呢？显然因为小姑娘的照片象征着未来，给他留下了充分的想象余地；而近照则把当时的、现实中面临的人推到了他面前，填死了一切空隙。

实际生活中的、面对面的这一对恋人始终是疏远的，于是他只能“享受我想象中的、笔下的、用心灵的全力斗争得来的你的亲近”，正因为这是理想中的爱人和理想中的爱情关系，他才会写下“婚后一切都会明了，而我们将成为最协调一致的人”这样的话来。

对爱人的理想，对爱情生活的理想围绕着卡夫卡一生最大的理想目标：真理和纯洁性。

除了寄托理想，卡夫卡这几百封信还是表达自我的重要工具。他曾说过：“与人交往会导致自我观察。”确实，他在信中是进行了大量的自我观察的，他观察自己的能力，观察自己的地位，观察自己的世界观。

卡夫卡对菲莉斯说：“你是我的自我，”这句乍看不易理解的话说明卡夫卡正是把想象中的、异化了的“她”作为自我观察的工具。在信中卡夫卡名义上是对菲莉斯说话，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自己对自己说话，他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他往往不需要收信人说话，自己便已经作了回答。

他虽然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也是希望听到菲莉斯的回答的，当然他希望听到的是与自己的心声相应的答复。他说：“你是我的法庭。”他希望菲莉斯仲裁他心中激烈的斗争。他甚至说过：“最亲爱的，你想象不出我是怎样从你的信中汲取生命的源泉啊！”当然，这个“生命的源泉”对他来说是相对异化了的，他到头来发现自己汲取的只是自己的对立面，是生活的苦汁，他当然难免要失望了。

他失望的是，他发现他与菲莉斯之间频繁的通信“就像是一种骗局”。他有时觉得自己的信“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呕吐出来的”。他深知自己以信寄托理想的做法是空虚的，得不到任何实际效果的，“我没有被关入牢房，但是被关押在这城市中，我呼唤着最亲爱的姑娘……但是实际上呼唤的是四周的墙和面前的纸，而我的姑娘在受罪”。

他失望的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爱情与婚姻的纯洁性遥不可及，而在现实生活中，即在他与菲莉斯的爱情关系中，不存在这种纯洁性。他在给格蕾特的信中说：他对他与菲莉斯的关系看不清楚，但也许又看得太清楚了，以致他的每一句话都会使这关系“更暗淡，更不纯洁，更折磨人”；他在回顾与菲的订婚之吻时说：“这吻不纯洁，吻得不纯洁，接受得不纯洁。”

他的失望慢慢地变成了绝望，转化成了对书信的痛恨。他在192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他长年来一直“用书信欺骗自己”；在给密伦娜的一封信中他甚至说：“我一生的一切不幸都来自信件或者说来自写信。”

回顾写信过程中理想的进击、现实的失败自然是痛苦的。但恰恰是这些信所留下的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理想有着其特定价值。《致菲莉斯情书》所显示的对写信对象寄托理想、表达自我的这一特色，在世界名作家的书信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四

现在，《致密伦娜情书》公之于世了……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书信之一，堪

——M.勃罗德：《弗兰茨·卡夫卡传》

与《致菲莉斯情书》相比，评论家们对《致密伦娜情书》的评价要高得多。他们称之为“震撼人心的爱情小说”，把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同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的爱情相媲美。确实，《致密伦娜情书》非常优美感人。尽管由于这些信都没写日期，给编者留下了安排顺序的困难，也许很多次序是颠倒的，但读来仍然如同一部美丽的爱情小说。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相比，《致密伦娜情书》似乎更真挚感人一些。谓之真挚，是因为它本身不是小说，而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谓之感人，也许是因为它产生的年代离今天要近得多，牢牢交织在其中的恐惧心情至今仍是西方世界的普遍心理状态，因此读来容易发生共鸣。

密伦娜·耶申斯卡生于1895年，比卡夫卡小12岁。她是捷克人，不是犹太人，这在卡夫卡一生的爱情史中是个罕见的例子。她父亲是外科医生和布拉格捷克的教授。她有文化，很聪明，也很有个性。当初她爱上了犹太人波拉克，父亲非常反对，为此把她关入了医院，但她从那儿跑了出来，毅然与波拉克结了婚，定居维也纳。但是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波拉克另有所欢，经常在外鬼混，使她精神上十分痛苦。她是个颇有才华的作家，当时经常给布拉格一家报纸撰稿。她也是当时就发现了卡夫卡的天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她于1920年初写信给卡夫卡，询问可否由她将他的小篇小说译成捷克文。他们就这么认识了。她爱上了卡夫卡，就主动进攻。卡夫卡说过，她是“一团火”，这团火甚至一度烧融了卡夫卡心中的坚冰。与菲莉斯的关系不同，卡夫卡同她在一起时确实感到十分幸福。勃罗德说，卡夫卡从维也纳密伦娜那里回来时，容光焕发，俨然像换了一个人。他在密伦娜身边时甚至能够摆脱一直紧紧地缠着他的恐惧情绪，他们俩还一起嘲笑这种心情。可是密伦娜虽然痛恨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时却还下不了决心断绝与丈夫的关系而与卡夫卡结合。他们的这一关系便很快陷入了绝境，双方都痛苦地努力要结束这一关系，努力地减少通信。后来关系终于断绝了，但双方的思念之情却难以割舍。密伦娜在给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将不给弗兰克[指卡夫卡]写信，一行也不写。如果您能隔一段时间给我写封信，告诉我他的近况，我将非常高兴。”后来卡夫卡病重时密伦娜还去看过他。卡夫卡死后没几年，密伦娜终于离了婚。她因思想激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捕，死于法西斯集中营。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一直锁在银行的保险柜中，直到战后才由维利·哈斯公诸于世。

优美的文笔，热烈而真挚的感情和含蓄而曲折的表达技巧，使《致密伦娜情书》在艺术上确实胜于《致菲莉斯情书》。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抒发：“直到现在你还没有告诉我医生是怎么说的，你这慢性子，你这糟糕的写信者，你这狠心人，你这亲爱的，你——哦，怎么啦？一点也没有怎么，静静地靠在你的怀中。”感情一泻如注，爱得不知怎么表达才好。这在《致菲莉斯情书》中是见不到的。

我们还可以见到对爱的这样的形容：“你这迟钝的人，我爱你，就像大海爱它海底的一块小石头一样，我的爱就像大海一样地抚摩着你。”

爱甚至会引起如此奇想：“为什么我不是像你房间里一个幸福的大衣柜呢？它可以看着你的一举一动，不管你是坐在椅子上或者俯在写字台旁，或者上床睡觉，或者正在睡眠之中（祝你做个好梦！）。”

也许密伦娜抱怨卡夫卡有些信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卡夫卡辩解道，正是在这些信中“我的心离你那么近，周身血液是那么驯服，那么驯服于你。在那么深的森林深处，在寂静中憩息，这种时候人们除了说诸如‘透过大树可以看见上面的天空’这类话外，别的什么也不会说，而在一个小时后人们又会重复一遍这同样的话，这话中肯定‘没有一个词是未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些信真是一首首动人的爱情诗。如果要把这样的抒情段落都摘引在此，恐怕将等于翻译全书了。

但是如果仅此而已，那么卡夫卡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出色的爱情诗人罢了，也就不成其为卡夫卡了。他书信日记中使人们震动的更有其他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感情，在这些信中最突出的则是贯穿始终的恐惧情绪。

恐惧感在卡夫卡的小说、书信、日记、札记中无所不在，它的生成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当时欧洲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严重破坏性在人们头脑中记忆犹新，战后革命与反革命、夺权与反夺权接踵而来，使许多人感到前途莫测；理想的幻灭、安宁生活的消逝、看不到真正光明的前景，使欧洲的小资产阶级彷徨不安，恐惧难宁。加上社会、家庭中的异化现象，仇视犹太人主义……这种种因素加深着卡夫卡心中的惶恐情绪。《致密伦娜情书》中的恐惧感自然不光是就爱情关系而言的，但它与爱情关系交织在了一起，难解难分。《致菲莉斯情书》中自

然也有恐惧感，但《致密伦娜情书》中更盛，这是因为卡夫卡与密伦娜爱情中有几种因素是卡夫卡与菲莉斯爱情中所没有的，其中主要的是，一、密伦娜是已婚女子；二、密伦娜不是犹太人。

卡夫卡这么说过：“在你与他共同生活的氣氛中，我真是‘大家庭’中的一只老鼠，人们一年中最多容许它公开从地毯上跑过去一次。”这段话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爱情关系的性质和卡夫卡的心情。

正是由于密伦娜是已婚女子，卡夫卡与她会面只能偷偷进行，他们在通信中一不写日期，二不写收信人姓名，署名一般也只写个缩写“F.”（代表弗兰茨），或者干脆只写“你的”，而更多的只写星期。卡夫卡给密伦娜的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一般寄邮局，由密伦娜去取。尽管采取了这些“安全措施”，卡夫卡还是十分惶恐不安，他对密伦娜说：“写信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幽灵面前把自己剥光。写下的吻到达不了应到达的地方，而在半路上就被幽灵吮吸得一干二净。”这里显然暗示了他的不安，唯恐他的信到达前就被密伦娜的丈夫等人偷拆。

至于卡夫卡是犹太人这一点，密伦娜本人并不忌讳。可是卡夫卡却总感到不安，他在信中不断提醒密伦娜注意这一点。在一封信中，他把自己比作一头林中兽，有一日走出森林，遇到了密伦娜，密伦娜待他很亲切，使他感到非常幸福、自豪、自由自在，“可是从根本上说我还是那只野兽，归宿只能是在林中，只是由于你的仁慈才得以在这野外待着”。在与密伦娜相处的幸福时刻，卡夫卡可以忘掉一切，但一旦离开她，他就会想起他对她来说实际上只是个陌生的人，一头“林中兽”，一个受歧视的民族的成员。这又怎能叫他不惶恐不安呢？

面对密伦娜这么一个为爱情而生的、火一样热烈的人，他也十分惶恐不安，他不知这一关系将把他引向哪里。他觉得自己在通信中处于一种不断上升的昏迷状态，面前有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会无限制地超越他的力量。

这一爱情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注定要失败的性质，卡夫卡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也一直对此惶恐不安。他说：“只要失去了你，我就成了鲁滨孙了。但是我将比鲁滨孙更鲁滨孙。他还有那个岛、星期五和其他许多东西……而我将一无所有，连名字都没有，因为我把它也给了你了。”

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笼罩着他俩爱情关系的全过程，他们既想接近，又想回避。就这种痛苦的折磨卡夫卡描述道：“有时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个门的门把，只要一个人的眼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已经站在了这个人的门后；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人就带上了身后的门而再也看不见了。”

关于恐惧感卡夫卡写过这么一段理论性的阐述：“生活的乐趣不是生活本身的，而是我们对升入一种更高的生活的恐惧；生活的折磨不是生活本身的，而是我们因那种恐惧而进行的自我折磨。”严酷的现实使卡夫卡对前途无法乐观，而对将要升入“一种更高的生活”，譬如说与密伦娜的爱情的升华只能感到恐惧。这就是卡夫卡对他一生的不幸，包括爱情生活的不幸所作的哲理性总结。这也是笼罩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惶恐情绪的一个重要特点。

《致密伦娜情书》便是这么一种惶恐的追求、绝望的斗争，这恐怕是这些平常的爱情书信为什么会使人感到惊心动魄的原因所在吧。卡夫卡的恐惧并不完全是手足无措的恐惧，它也是忧虑的变形，睿智的结晶，为理想而激动地颤抖；卡夫卡的绝望并不是束手待毙的绝望，它也是卡夫卡独特的斗争方式的一个特点。让我们听听卡夫卡在给密伦娜的一封信中的呼声吧：“什么时候才能把这颠倒了的世界稍稍矫正过来一些呢？”

五

目标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谓之路者，不过是彷徨而已。

——卡夫卡：《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从1912年底卡夫卡与菲莉斯建立爱情关系到1924年卡夫卡去世这十二年间，是卡夫卡一生中遭受痛苦折磨最多的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卡夫卡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都是在这一阶段写成的。看一下现存作品的写作日期，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卡夫卡创作的高潮都发生在卡夫卡爱情危机发生时或发生后。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四次创作高潮：一、1914年，第一次解除婚约前后，作有长篇小说《诉讼》、短篇小说《在流刑营》等；二、1917年，与菲莉斯的关系最后崩溃的前夕，这是短篇小说的丰收年，写下的著名的短篇有《乡村医生》、《在楼座上》、《豺与阿拉伯人》、《中国长城建造时》、《为

某科学院写的报告》、《猎人格拉库斯》等；三、1919年，与尤丽叶的关系面临危机，即遭到父亲的反对之际写下了著名的《致父亲的信》；四、1921—1922年，与密伦娜的关系失败后，写下了长篇小说《城堡》和一些短篇名作，如《饥饿艺术家》等。这些作品的诞生期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正所谓“悲愤出诗人”，细读之下，这些作品多半在思想内容上与卡夫卡当时面临的爱情危机或失败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

1915年1月23日至24日卡夫卡与菲莉斯在博登巴赫重聚时，卡夫卡给菲莉斯朗读了他在1914年下半年写的几篇小说，其中便有《在法的门前》。这篇小说，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个从长篇小说《诉讼》中抽出来的小故事应写于第一次婚约解除之后不久。卡夫卡1914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写有一个故事：一个富商的儿子约瑟夫·K.同父亲吵架后，走到了码头边的商会门前，门房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而K.只是瞥了他一眼；当他又一次转过身来看那门房时，“这人向大街转过身去，仰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这故事与《在法的门前》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不是《在法的门前》的灵感来源，也是姐妹篇。

《在法的门前》这个小故事的内容大家是熟悉的：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大厦的门前，要进去，门警说，你可以试着往里走，但里面的门警一个比一个厉害，他被吓住了，一直坐在门口。直到弥留之际，门警才告诉他，这个门本来是专为他而开的。这个故事与那些年卡夫卡的爱情生活是多么相似啊！乡下人追求的是“法”，卡夫卡追求的是真理、真实性和纯洁性以及安宁和归宿；乡下人被吓住了，不敢往里走，卡夫卡也被吓住了，在眼看快成功的时刻解除了婚约。在法的门前站着个门警，而且里面每一个大厅门口都有一个门警，一个比一个强壮。那么在卡夫卡的婚姻生活中站着什么门警呢？让我们读读卡夫卡后来写下的这段话吧：“我曾爱着一位姑娘，她也爱着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她就像是被一群武士围在中间，他们矛头向外。只要我向她走近，我就会撞在矛尖上，被刺伤，而不得不退回……我身边也围着一圈武士，他们矛头向内，也就是向着我。假如我向那姑娘挤过去，我就会首先撞在我的武士的矛头上，从这里我就迈不出脚去。”他“身边的武士”其实就是他自己心中的门警，心中的“铁栅栏”。《在法的门前》中的看门人其实也只是作者自己在心理中设置的障碍，并非外界的看门人。“乡下人”和它的作者一样，目的都是有的，就是不知怎么走去，因而不敢走去，只能“彷徨”而已。

《中国长城建造时》写于1917年三、四月间，也就是卡夫卡与菲莉斯的爱情关系面临最后崩溃的时刻。这篇小说在卡夫卡生前未全文发表，卡夫卡只从其中抽出一段发表在小说集《乡村医生》中，题名《皇帝的圣旨》。这个小故事说的是：皇帝临终前凑着一个信使的耳朵传了一道旨意，信使听完后马上向外奔跑，人人向他让路，可是庭院套庭院，宫殿复宫殿，他几千年也走不出紫禁城，即使有一天他终于走了出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庞大无比的都城，他永远不可能穿过这都城而跑出来，可是在黄昏降临之时，他却坐在窗前梦想着圣旨的降临。

这“圣旨”指的是什么呢？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1917年春正是卡夫卡心中激烈地斗争着的时刻，经过几年危机起伏的爱情生活，最后的结束时刻即将来临了。他深深地知道，一切已不可挽回，幸福是永远不可能降临的了；可是又不甘心，总盼望奇迹的出现。他自嘲地写下了“你却坐在窗前梦想着圣旨的降临”这样辛酸的句子。

《乡村医生》也写于1917年。这个短篇说的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乡村医生乘马车赶往外村急诊，到达以后，他发现躺在床上的少年其实并没有病。但是病人的亲属苦苦哀求他一定要给治好病，于是他又一次走到床边，这回他看见在他的臀部右侧裂开一个碗口大的伤口，样子非常可怕，他知道治不好了。可是病人家属一定要他治，为此把他的衣服都剥光了，关上门，大家退了出去。他来不及穿衣服，就跳上马车逃命，两匹马拉着车，慢慢悠悠地走着，怎么也催不起来，而他光着身子，冻得要命，“这样我永远也别想到家……受骗了！受骗了！一旦听从了夜间误响的门铃声——那就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看上去这纯粹是一个噩梦，许多评论家都觉得它过于神秘，不可解释。当然，要逐字逐句地进行解释确实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可是卡夫卡自己（虽然他自己也往往解释不了自己的作品）却总是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作品的钥匙。

《乡村医生》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点：一、病人的伤口；二、永远到不了家的流浪。

真是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年——1917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卡夫卡也写到了伤口：“如果真如人所断言的，肺部的伤口只是一个象征，伤口的象征，F.[菲莉斯]是它的炎症，辩护是它的深处，那么医生的建议（光线、空气、太阳、安静）也就是象征了。正视这个象征吧。”读了这

段话，对《乡村医生》中的伤口问题恐怕都不用解释了。在9月初的一封信中卡夫卡在谈到菲莉斯时就曾问勃罗德是否记得《乡村医生》中的伤口。因此小说应写成于9月之前，但又不会相隔很远。我们看到，小说中把伤口的边缘、深处、颜色等分开来写，与日记中这段话的风格十分相似。

关于长篇小说《城堡》的具体写作日期并没有确切的材料加以说明，我们只知道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给勃罗德朗读了《城堡》的大段开头部分，因此该小说开始动笔的时间应在1921年下半年或1922年初，停笔的时间应在1922年9月。在9月11日的一封信中，卡夫卡写道：“看来我必须永远撂下那个城堡故事了。”他说他在不久前疾病再一次爆发后，思路已经接不上去了。也就是说，卡夫卡这部代表作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年或将近一年的时间。

《城堡》的中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目标之不可抵达。一座高高矗立在山上的城堡，阴森庄严，可望而不可即。当土地测量员K.来到山脚下的村庄时，城堡已经看不见了。“雾和黑暗围住了它，没有一星半点微弱的灯光示意这个庞大城堡的存在。K.久久地站在从公路到村庄之间的木桥上，仰望着前方那似乎是虚无缥缈的夜空。”进入村庄后，K.曾想徒步走到城堡那里去，但村子里那条主要的路并不通向城堡所在的山上，到了山的附近，路就似乎有意识地拐弯了，走多远都与城堡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当他决定离开道路，从无路的地方走上山去时，他马上陷入了深深的积雪中，举步难行。城堡里的官僚机构也是可望而不可即，高高在上，一个个成了神秘的人物，打上去的电话成了那儿的娱乐，送下来的信是从庞大的公文堆中抽出来的陈年旧账。这个土地测量员名义上是由城堡请来的，可是始终无人承认他，无人叫他测量什么，直到最终他还是个陌生的外乡人，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

目的可望而不可即这一思想在卡夫卡的爱情生活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在与菲莉斯的爱情关系阶段，卡夫卡就不断地哀叹目的之不可实现，不可达到，他说他就像一个攻克不下城府的“可怜的将军”，他有时觉得菲莉斯“就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在与密伦娜保持着热烈的爱情关系的1920年，卡夫卡写了一个小故事，出版者认为这是《城堡》的雏形：K.想要使自己融入一个地主之家，但他“不走社会性的道路，却只管拣直路走去。也许那条路他觉得绕得太远，所以走直路确实不错，可是他所试图走的这条路却是一条走不

通的路”。这小故事向我们透露了：卡夫卡一年后描写的“城堡”就其直接来源而言就是“融入一个陌生人的家庭”——即寻找安宁、归宿这一目标。写这个小故事时，卡夫卡正处于同密伦娜的爱情之中，所以他还只是检点自己走的道路不对。在写《城堡》时，卡夫卡与密伦娜之间的爱情已经结束，卡夫卡对建立家庭已经绝望，因此就连明明通向城堡的路也接近不了城堡，城堡完全不可抵达了。

1921年4月，也就是在卡夫卡与密伦娜爱情结束之后，小说《城堡》动笔之前，卡夫卡在一封信中总结了他与菲莉斯、与密伦娜等人的爱情关系，然后说道：“显然我所爱的总是那些我将其高高置于我的上方的东西，那些对我来说不可获得的东西。这自然就是整体的核心，这整体可怕地增长着，直到叫人‘恐惧得要死。’”经过多年的痛苦生活，卡夫卡那目的遥不可及的思想至此已经发展成熟。瓜熟蒂落，《城堡》应运而生。《城堡》的核心自然就是卡夫卡从一系列失败，包括爱情生活的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核心。

目标虽有，无路可循，这是卡夫卡这一阶段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但是目的之不可即并不意味着瘫软的绝望，并不等于说卡夫卡因此便裹足不前了。即使在上面提及的这几篇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卡夫卡一生的宗旨：寻找道路，永远探索，永远奋斗。

在写于1917年三、四月间的《皇帝的圣旨》中，卡夫卡又一次嘲笑了自己，但这是另一种自嘲，是悲观的自嘲——圣旨明明来不了，他却在梦想着。这期间卡夫卡心中正值矛盾交织之际，他知道与菲莉斯肯定无成功希望，但却不肯放弃。这种自嘲却也说明了他心中并未完全绝望，总还是抱着希望与理想。这么一个梦想圣旨的人也象征着卡夫卡的一生，他悲观，但并不放弃希望。《乡村医生》是这几个作品中气氛较沉郁的一篇，也许是可以冠以“绝望”之称的一篇。但是绝望这个词其实并不十分合适，一个裸体的医生在马背上向无边无际的雪原中走去，此情此景倒是更让人想起“凄凉”和“悲愤”这两个词，这是卡夫卡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这同时又使我们联想起卡夫卡在1916年10月写下的一段话：“我是个多半不能自立的人，对完全的自立、无依赖性和自由怀着无穷的渴望。宁可蒙上眼罩走我的路，直至路的终端，也不愿让家乡的人群围着我转，分散我的目光。”乡村医生不也是夺门而出，一直向前走去，“直至路的终端”吗？虽然不知终点何在，但毕竟也是一种斗争。这篇小说也说明卡夫卡面临爱情关系的崩溃，心情固然凄苦，但他又觉得

这是为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所必须做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城堡》无疑是目的不可即这一思想延伸的终极，但恰恰又是这部小说、甚至是卡夫卡所有小说中斗争性最强的一部。K.为争取进入城堡，争取社会的承认，自始至终不懈地斗争着，从未屈服过。K.争取社会承认的目的也就是卡夫卡一生为之奋斗的目的，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叫做“辩护”。卡夫卡说过：“每个人当然都必须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或死）辩护，这个任务是不能回避的。”

本章分析的这几篇小说当然是卡夫卡爱情关系的直接或间接产物，不联系其爱情关系恐怕对它们是难于全面和深刻理解的。但是它们又远远地超出了爱情关系的范畴，目的不可及的思想，永远斗争、为“辩护”而奋斗的思想，是指导着卡夫卡一生的哲学思想。卡夫卡的作品是多重性的，有多重解释性。

六

《文学回声》杂志最近刊载了一篇对《观察》的评论。此文很讨人喜欢，但没有太大意思。只有一处很醒目，即评论中提到的“卡夫卡的单身汉艺术……”你对此怎么看，菲莉斯？

——卡夫卡：《致菲莉斯情书》

不知菲莉斯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本文倒是愿意说上几句。

卡夫卡的小说中有个明显的特点，即所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单身汉。许多评论家注意到了这一点，有的还冠之以“单身汉文学”、“单身汉艺术”。

从几部长篇小说看，《失踪者》（《美国》）写作年代较早（1912年），小说中的卡尔·罗斯曼才十六岁，卡夫卡当时也还不到三十岁。罗斯曼当然是未婚的，他在爱情方面还很无知，甚至受到比他大二十来岁的女佣人的勾引。两年后开始写作的《诉讼》中，约瑟夫·K.也没有妻室，独自一人为证明自己无罪而奋斗。写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时，卡夫卡已年近四十，他已经饱尝人间的痛苦辛酸，至此依旧孑然一身。小说一开头“拦腰抓来”，K.从天而降——从公路上走了下来，人们不知他从何而来，年龄多大，仿佛就根本没有家，小说中从未提及他的任何亲人。

更有趣的是，卡夫卡一生中也许只在两篇小说中写到过订婚的事，

这两篇却都写于卡夫卡订婚之前。一篇是被人们遗忘了的“长篇小说”断片《乡村婚事》，写于1907年，这部长篇小说卡夫卡只写了一个开头就撂下了。另一篇就是短篇小说《判决》。但这两篇写的也只是订婚，主人公还是单身汉。

卡夫卡有五个舅舅（他的母亲是老二），这五个舅舅中竟有三个终生未娶，而恰恰是这三个对卡夫卡影响最大。他们是：大舅舅阿尔弗莱德，住在西班牙，即卡夫卡日记、书信中常提到的“马德里的舅舅”，他后来成了西班牙铁路总经理；四舅西格弗里德，是个乡村医生，是卡夫卡最喜欢的舅舅，卡夫卡经常去看望他；小舅舅鲁道夫是性格最怪癖的一个，卡夫卡称他为一个“猜不透的、过于谦逊的、寂寞的并因此而近于啰嗦的人”。卡夫卡的父亲常说卡夫卡将会成为“第二个鲁道夫”，卡夫卡自嘲地说，为什么不可能呢？卡夫卡的性格受这几个舅舅的影响很深，他曾说大舅舅是他“感到最亲近的亲戚，比父母要亲近得多”。除了亲戚外，卡夫卡在社会上也见到不少老单身汉。在一封信中他记载了结识一个老单身汉的事：这个六十二岁的单身汉，未结婚的原因是家里人老是反对他的婚姻选择，使他最终对结婚失去了兴趣。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还说到一个书店老板，他因为没钱结婚而解除了婚约。这人走出门后，卡夫卡也不知是在什么情绪驱使下，竟跟着他走了一段路。

孤寂和阴森可怕的气氛是卡夫卡作品的一大特点。造成这一气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卡夫卡周围及他自身的单身汉生活。

1915年，卡夫卡写下了小说《一个上了年岁的单身汉——布鲁姆费尔德》。小说一开始写布鲁姆费尔德回家的情景：“他最近一段时间走上楼梯时经常感到，这寂寞透了的生活真是讨厌，弄得他不得不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七层楼，然后进入他那些空空荡荡的房间。在房间里又是那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穿上睡衣，填上烟斗……”正在布鲁姆费尔德因无伴侣而苦闷时，卡夫卡笔下的怪诞法术又出现了：两个球在房间里不停地蹦跳，主人公怎么也制服不了他们，蹦得他晚上睡不好觉，白天上班不安心。本来寂寞中出现伴侣是好事，但这么两个“伴侣”，叫人哭笑不得。这怪诞之笔表面上冲淡了寂寞的气氛，回味中却感到更突出了寂寞中的痛苦。

小说《判决》写的也是寂寞的单身汉生活。卡夫卡在小说写成几个月后发现，彼得堡“那个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们是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彼得堡那个朋友是个单身汉，他的生活十分孤独、寂寞，卡夫

卡对他的那段描写具有典型的卡夫卡气氛：“格奥尔格仰视着父亲可怕的形象。父亲突然声称非常熟悉的那个彼得堡朋友揪着他的心，产生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他仿佛看见他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时隐时现，看见他站在空空荡荡、被洗劫一空的商店门口，站在砸烂了的货架、破碎的货物、倾斜欲坠的煤气壁灯中间。他何苦跑那么远去呢！”而就是这么一个人是父子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这么寥寥数笔构成了《判决》的核心气氛——孤独、寂寥。

卡夫卡曾说，《判决》中有许多方面与马德里那个舅舅有关。其实这一联系不光在《判决》中有。看到那个孤孤单单向雪原中走去的“乡村医生”，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卡夫卡的四舅、单身汉西格弗里德不就是一个乡村医生吗？这些联系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卡夫卡笔下的彼得堡朋友、乡村医生等并不是舅舅形象的照搬，而与鲁迅笔下的阿Q等一样，是集合图像，其中主角还是卡夫卡自己。

卡夫卡一生中有许多关于寂寞、孤独的言论，比如：“那快乐泉是他的寂寞之泉，他喝得越多便越想喝。最后他的干渴再也无法遏止了，他嗜饮成癖，再也不管是否解得了渴。”这段话与他所说的“寂寞的小溪汇成大河”的话一样，并不是真正把寂寞看成了自己的“快乐泉”。是的，不愿与人交往，交往反增痛苦，使他宁守住寂寞、孤独，甚至向往这种孤寂，但这种“向往”比之厌恶更其痛苦，所以，“快乐泉”流出的是涓涓苦水。

卡夫卡在早年写的小段散文《单身汉的不幸》（小说散文集《观察》中的一篇）中说，单身汉老了后总要请求人们接纳他，与人相处总感到特别难受，他只有资格看着别人的孩子，而自己不得不反复说：我没有孩子。

《观察》中还有一篇名为《窗外所见》的小散文，文中写道：夕阳照着一个稚气的姑娘的脸，她边走边向四处环顾，同时可看见一个匆匆在她后边走来的男人，他的影子遮住了她脸上的光，男人走过去了，姑娘脸上又亮了。这样的“观察”随笔在卡夫卡的日记中是十分常见的。他担心男人是冲着那姑娘去的，男人走过去后，姑娘脸上亮了，作者心里也才亮堂了。

现存卡夫卡最早的一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写于1903至1904年间。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小说主人公有个熟人，是个情场老手，这人还以

此自豪，主人公亲眼见到许多女人先后吻了他。走在路上时，他得意地问主人公：你看到那姑娘是怎么吻我的吧？这时，“我说不出来，泪水顺着脖子往下流，为了打破老不说话的尴尬局面，我发出邮差号角那样的哀鸣声”。

写于1917年初的《在楼座上》是一篇文笔优美的小小说。一个坐在楼座上的年轻观众幻想着：假如一个病弱的杂技女演员受到虐待，人们不让她休息，不停地让她骑在马背上绕场疾驰，音乐不停歇，掌声不停歇，那么他就会不顾一切地从最高层直奔而下，冲入场子中间，大喝一声：停！但情况并非如此，入场的是个美丽、健康的女子，杂技场负责人对她非常尊重，看她的眼色行事，扶她上马……“由于事情竟是这样，那楼座观众把脸埋在栏杆上，在圆场进行曲中像是沉入了一个可怕的梦境，他哭了，而自己却不知道。”

不能简单地把这类作品中表达的情绪称之为妒忌。妒忌固然有，但超过妒忌的却是一种痛苦——一个弱小无力的孤独者的自怜。

卡夫卡说：“塔尔蒙经（犹太教典）中也写着：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不是人。”犹太教典中的这句话的意思或许是：凡是人都应嫁娶成婚，传宗接代。可是卡夫卡引用这句话却扭曲了其本意，而是用以表达一个单身汉的酸楚，一种在结了婚的人面前见人矮三分的痛苦的自卑感。卡夫卡悲愤地说：单身汉“退得离活着的人们越远，他所需要的生存空间就越少。他不得不为这些活着的人干活，就像一个懂得自己身份，却又不可说出自己这一理解的奴隶……这单身汉似乎出自自愿地在生活的中途即把自己限制在越来越小的空间，有朝一日他死了，棺材对他倒正合适”。这是酸还是痛？毫无疑问，同《在楼座上》这类作品一样，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痛不欲生的凄楚感情。

卡夫卡说过：“我并不妒忌具体的某一对夫妻，我妒忌的只是所有的夫妻。”也就是说，卡夫卡羡慕世上的婚姻生活，并由此而联想到单身汉生活的孤单、寂寞。但在他的周围，他在所看到的具体的夫妻生活中发现的却多是不幸。他留下的文字中有许多谈到周围人婚姻生活的不幸。密伦娜自不待言，勃罗德、奥斯卡、妹妹埃莉……离婚、破裂、不和，种种现象不断呈现在他的面前。这些也是使他对自已面临的婚姻生活心怀恐惧，以致屡屡退却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所有这些婚姻关系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莫过于他父母间的关系。他描写过这种关系：当妻子的总是盲目地斗争，看不见眼前立着什么，“明明立着一堵墙的地方，她

却暗地里断定只有一根绳子拴在那儿，可以从下面钻过去。至少在我父母的婚姻生活中情况就是这样的”。

1922年底，卡夫卡写了短篇小说《夫妇》，这也是卡夫卡小说中比较著名的一篇，颇受评论家重视。有些人认为它是卡夫卡作品中最具自传性质、因而也最感人的小说之一。小说写的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去拜访一个老主顾，在那儿遇到了另一家公司的职员，两人在病危的老人面前抢起生意来。老人的妻子是个体弱个小的人，对他十分顺从、体贴。拜访者在病床前滔滔不绝地大谈生意经，直至老人的儿子用拳头威胁他时，才发现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了。老人就这么死了。老人的妻子进来时，见这么安静，微笑着说：他睡着了。她吻了吻他，于是大家都大吃一惊：老人居然动了。他说他只是由于感到烦闷而睡着了。临走时，拜访者对老太太说，你有点像我母亲，她能创造奇迹，我们所破坏的，她能修复。他这些话讲得很响，可那老太太显然聋了，她的回答是：“那么我的丈夫看上去怎么样？”

这里写的是别人的婚姻生活，主人公是个闯入别人家庭，几乎破坏了这个平静生活的不速之客。这里更多的是卡夫卡父母的形象。但这篇小说似乎和其他与家庭有关的小说（如《判决》、《变形记》）十分不同，这儿是一幅多么安宁、和谐的生活图画啊！老人对妻子那么顺从，让她扶自己上床，盖好被子。读到这里，不禁令人想起《判决》中儿子给盖好被子的场面。生活真是这么安宁吗？老人真会又一次站起来，扔开被子，宣布“判决”结果吗？熟悉卡夫卡作品的读者读到这里恐怕就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卡夫卡式的平静总是那么叫人胆战心惊！作者把希望寄托在母亲身上，希望这个贤妻良母会“创造奇迹”。她也确实创造了奇迹，把一个死人吻活了，犹如真的从本来钻不过去的墙底下，像绕过一根绳子一样地钻了过去。

卡夫卡本身可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情绪有着惊人的代表性，他的惶恐病是西方的世纪病。人们不必具有他的性格，却同样倍感胁迫而忧惧不宁；人们不必有他同样的经历，却同样为异化的可怕而震撼；人们不必是寂寞无期的单身汉，却同样可以感同身受。

他说过：“这种恐惧不是我个人的恐惧。”

他还说过：“我们大家在进行着共同的斗争。”

大事年表

1883年

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出生。其父赫尔曼·卡夫卡（1852—1931）为商人，其母名尤丽叶，婚前姓略维（1856—1934）。弗兰茨为卡夫卡家长子。

1889年

9月16日：上“肉市旁德语男生小学”。对其童年教育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是：法语家庭女教师拜莉、女佣玛丽·维尔纳、一位女厨师和教员莫里茨·贝克。

9月22日：大妹艾莉出生。

1890年

9月25日：二妹瓦莉出生。

1891年

9月1日：约瑟夫·达维德出生。后来为奥特拉丈夫。

1892年

10月29日：奥特拉出生。

1893年

9月20日：上“金斯基皇宫”的“老城德语文科中学”。班主任是埃米尔·格施温德。卡夫卡在中学时代早期即开始写作。

1896年

6月13日：施坚信礼。

1897年

与鲁道夫·伊洛维结谊。

1898年

与胡戈·贝格曼（终身）、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直至大学时代）、尤其是奥斯卡·波拉克（直至1904年）结谊。受到社会主义、尼采和达尔文的影响；受到自然史教员阿道夫·戈特瓦尔德的影响。

1900年

至1904年在费迪南德·阿费纳利乌斯的影响下出版《艺术守护者》。在罗兹托克（谢尔玛·科恩）度暑假。

1901年

7月：中学毕业。

8月：在诺德尼和赫尔戈兰度假。

秋天：开始在布拉格德语大学的学业，先学两周化学，然后转学法律，并兼听艺术史讲座。

1902年

春季：在奥古斯特·绍尔处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

夏季：在里博赫和特里施（舅舅西格弗里德处）度假。

10月：前往慕尼黑。卡夫卡打算与保尔·基施一道在那里学习德国语言文学。后在布拉格开始冬季学期的学习，并初识马克斯·勃罗德。

1903年

7月：参加法律史国家考试。

1904年

秋/冬：开始写作《一场战斗纪实》。

1905年

7/8月：在楚克曼特尔（西里西亚）疗养院疗养，初恋。秋/冬季：开始与奥斯卡·鲍姆、马克斯·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奇定期见面。

1906年

3月16日：博士论文答辩。

4月至9月：在母亲的异母兄弟里查德·略维的律师事务所实习。

6月13日：国家考试。

6月18日：获博士学位，导师为阿尔弗雷德·魏伯尔。

8月：在楚克曼特尔疗养。

10月：法律实习（至1907年9月），先是在州法院，后在刑事法院。

1907年

春季：写作《乡村婚事》（一译《乡村婚礼筹备》）。

6月20日：从采特纳尔街3号搬到尼克拉斯街36号。

8月：在特里施，与黑德维希·W结识。

10月：进入私营AssicurazonGenerali保险公司任临时职员

1908年

2月至5月：在布拉格贸易科学院参加工人保险法习班。

3月：在《徐佩里昂》杂志上发表《观察》。

7月底：在半国立的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任临时职员；上正常班（8—14时）。

9月：在切琛、采诺西和尖山（波希米亚森林）度假。

1909年

5月24日：卡夫卡观看了来自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的一

场演出（《奥珍妮·埃得瓦多娃》）。写作《日记》。

9月4日：与马克斯和奥特·勃罗德一起去加尔答湖畔的里瓦旅行（至9月14日）。

9月11日：参观布雷齐亚航空表演，写了《布雷齐亚观飞记》。

12月：去北波希米亚出差。

1910年

与弗兰茨·韦尔弗进一步结识。

5月1日：卡夫卡成为保险公司职员。

8月：在萨茨度假。

10月8日至17日：去巴黎旅行。

12月3日至9日：去柏林旅行（看戏）。

12月中旬：艾莉与卡尔·赫尔曼结婚。

1911年

1月30日至大约2月12日：出差弗里德兰；写旅行日记。

2月底：去北波希米亚出差。

4月：去瓦恩斯多夫出差（与自然疗法专家施尼策尔相识）。

8月26日至9月13日：与马克斯·勃罗德一道去卢加诺、斯特雷扎、米兰、巴黎度假旅行。之后，卡夫卡在苏黎世附近的埃尔伦巴赫自然疗法疗养院逗留一周。

秋季：写作《里查德和萨姆埃尔》（与马克斯·勃罗德合作）。

10月4日：首次观看来伦贝格的东犹太人剧团的演出；该团在布拉格演出至1912年初；与演员依茨恰克·略维结交。

10月15日：全体店员向父亲辞职。

10月22日：与奥特拉和依茨恰克·略维一同散步远行。

11月底：卡夫卡为奥特拉朗诵《默里克自传》。

12月：研究卡尔·施陶费尔—贝尔恩和歌德的《诗与真》。

12月8日：艾莉的儿子费利克斯出生。

12月14日：赫尔曼·卡夫卡斥责儿子对家产中的石棉厂关心不够，卡夫卡答应在下午空闲时帮助照料工厂生产。

12月21日：韦尔弗在朋友圈内朗诵诗歌。

1912年

冬季：《失踪者》的第一稿问世。

2月18日：J.略维的朗诵之夜，由卡夫卡组织并致开场白。

3月6日：赫尔曼·卡夫卡因石棉厂而斥责儿子，卡夫卡产生自杀念头。后几周内，卡夫卡重又时常去工厂。

4月3日：奥特拉被“哈姆雷特剧社”接走。

5月26日：与马克斯·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奇一同作圣诞节旅行。

6月1日：卡夫卡参加了捷克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蒂赛克·索古普关于“美国及其官员”的幻灯报告会；激起《失踪者》的再创作热情。

6月28日至7月7日：与马克斯·勃罗德前往魏玛度假旅行。

7月8日至29日：在哈尔茨山区施塔佩尔堡附近杰斯特的容波恩自然疗养院疗养。

8月上半月：卡夫卡将《观察》付梓。

8月9日：卡夫卡为奥特拉朗读格里尔帕策的短篇小说《贫穷的乐师》。

8月13日：在布拉格马克斯·勃罗德的父母家与菲莉斯·鲍威尔初次见面。

8月15日：奥特拉为卡夫卡朗诵歌德的诗歌。

8月24日：韦尔弗在Arco咖啡馆朗诵自己的诗作。

9月15日：瓦莉与约瑟夫·波拉克相爱。

9月20日：卡夫卡初次给菲莉斯写信。

9月22日至23日：彻夜写作《判决》。

9月25日：着手写作《失踪者》（第二稿）。

9月28日：卡夫卡收到菲莉斯的回信。

10月7日：因木棉厂爆发家庭纠纷，奥特拉站在父母一边反对卡夫卡；卡夫卡再度萌生自杀念头。

11月8日：艾莉的女儿格尔蒂出生。

11月17日：卡夫卡开始写作《变形记》。

11月25日至26日：去克拉茨奥出差。

12月4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赫德尔联合会作家晚会上朗诵《判决》。

12月6日至7日：《变形记》脱稿。

12月9日：去莱特迈里茨出差。

12月15日：马克斯·勃罗德与埃尔莎·陶遂希相爱。

1913年

1月11日：瓦莉结婚。

1月18日：卡夫卡观看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在布拉格的一场演出。与马丁·布伯相遇。

1月24日：卡夫卡临时中断《失踪者》的写作。

2月1日：韦尔弗为卡夫卡和勃罗德朗诵其新诗作。

2月3日：卡夫卡与奥特拉去莱特迈里茨；当晚住在正于该地庆祝婚礼的马克斯·勃罗德处。

2月9日：卡夫卡与众妹一道去农村亲戚家。当晚，他为奥特拉朗诵《司炉》。

2月/3月：与奥特拉的关系暂时疏远。

3月1日：晋升为副书记官。

3月23至24日：在柏林与菲莉斯会面。认识阿尔伯特·埃伦施泰因。

3月25日：途经莱比锡返回。卡夫卡在该地邂逅弗兰茨·韦尔夫和J.略维。

3月27日：去奥遂希出差。

4月7日：开始在布拉格市郊特洛亚的花园劳动。

4月22日：去奥遂希出差。

5月11至12日：前往柏林看望菲莉斯。

5月底：约瑟夫·达维德去英国旅行数月。

6月2日：J.略维在布拉格举办诗歌朗诵晚会。

6月7日：奥特拉生病，父母前去弗兰岑温泉疗养；卡夫卡不得不照料父亲的店铺。

6月10至16日：卡夫卡写信向菲莉斯求婚。

6月22日：与弗兰茨·韦尔夫会面。

6月28日：首次与医生、作家恩斯特·魏斯在布拉格见面。

7月13日：去Radešowitz远足。

7月23日：与费利克斯·韦尔夫去罗兹托克。

8月28日：给菲莉斯的父亲去信。

9月6至13日：与经理马施纳一道去维也纳参加救生与事故预防国际会议；参加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与阿尔伯特·埃伦施泰因、莉塞·韦尔奇、费利克斯·施特辛格和恩斯特·魏斯聚会。

9月14日：经特里斯特去威尼斯旅行。

9月15日至21日：旅行至威尼斯、维罗纳和加尔答湖畔的德森察诺。

9月22日至10月13日：在里瓦的冯·哈通根医生疗养院疗养。与瑞士姑娘G.W.相爱。

11月：卡夫卡一家搬到旧城环行大道6号的奥佩尔特公寓居住。

11月1日：与菲莉斯的女友格蕾特·勃洛赫相识。

11月初：阿尔伯特·埃伦施泰因来布拉格访卡夫卡。

11月8至9日：卡夫卡去柏林访菲莉斯。

11月11日：卡夫卡在托因比大厅朗读克莱斯特的作品《米歇尔·科尔哈斯》。

12月中旬：恩斯特·魏斯受卡夫卡之托去菲莉斯所在公司找她，请她解释长期不回信的原因。

12月底：恩斯特·魏斯来布拉格访卡夫卡。

1914年

2月15日：奥特拉向卡夫卡叙述了她在“犹太妇女俱乐部”某晚活动的情况；她是该俱乐部成员。

2月底：罗伯特·穆西尔请求卡夫卡协助出版《新评论》。

2月28日至3月1日：在柏林与菲莉斯会面。访马丁·布伯。

3月底：卡夫卡决定，如果菲莉斯不准备宣布与他结婚，他将留在柏林当记者。

4月12至13日：在柏林与菲莉斯非正式订婚。

5月1日：菲莉斯前来布拉格，共同找住房。

5月26日：卡夫卡的母亲和奥特拉前往柏林。

5月30日：卡夫卡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往柏林参加6月1日的正式订婚。

6月：奥特拉在一所盲人学校帮忙。约瑟夫·达维德在“布拉格市立储蓄所”任职员。

6月中旬：恩斯特·魏斯前来布拉格。

6月24日：“奥特拉和我是怎样发泄对人际关系不满的。”（《卡夫卡日记1910—1924》第404页）

6月27至29日：前往莱比锡附近的赫勒劳旅行。

7月2日：卡夫卡决定于11和12日去柏林与菲莉斯面谈。

7月12日：在柏林阿斯卡尼庄园旅馆与菲莉斯谈话，格蕾特·勃洛赫、埃纳·鲍威尔和恩斯特·魏斯在场；解除婚约。

7月13至26日：度假；先在吕贝克和特拉弗明德，后与恩斯特·魏斯和拉埃尔·赞沙拉同去丹麦的东海岸浴场玛丽利斯特。

8月初：卡夫卡被拒绝应征入伍。“我自愿报名，但由于某些关键原因而被拒，部分原因当然仍是妨碍我一切行动的那个因素。”（《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33页）

8月3日：初次独居于瓦莉在毕莱克街的住房内，因为她正在波希米亚—勃罗德的婆家休假。约瑟夫·波拉克和卡尔·赫尔曼均已于7月底应征入伍。

8月：开始写作《诉讼》。

9月：独居于艾莉的住房内，因为她和孩子们在战争时期住在卡夫卡的父母家，卡夫卡为了大妹妹而腾出自己的房间。

10月5至18日：卡夫卡休假突击《诉讼》；在此期间，还写就《失踪者》的一章（《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和短篇小说《在流刑

营》。

10月25日：卡夫卡收到格蕾特·勃洛赫的一封信，信中通报菲莉斯将写信给他。

10月27日：卡夫卡收到菲莉斯的一封信，信中请他解释自己行为的原因。

10月底/11月初：卡夫卡回信。

12月18日：开始写作《乡村教师》。

圣诞节：与马克斯·勃罗德在库滕贝格。

1915年

1月初：与来自加利岑的东犹太难民（马克斯·勃罗德为他们施教）建立联系；之后的数月内，与来自伦贝格的范妮·赖斯建立友谊。

1月6日：中断《乡村教师》的写作。

1月20日：放弃《诉讼》的写作。

1月23至24日：与菲莉斯在博登巴赫会面。

2月8日：卡夫卡开始写作《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岁的单身汉》。

3月1日：在朗根街的金梭鱼楼内租了自己的房间。

3月14日：卡夫卡与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同去兄妹俩在布拉格最喜欢的去处肖特克公园。达维德于当月应征入伍。

4月14日：卡夫卡在难民学校中旁听了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堂课。

4月底：与艾莉同去匈牙利喀尔巴阡山区探望她的丈夫。

5月9日：与奥特拉和范妮·赖斯同去多勃雷乔维奇。

5月23至24日：与菲莉斯和格蕾特·勃洛赫同去波希米亚小瑞士。

6月：与菲莉斯同去卡尔温泉。

7月20至31日：在鲁姆堡（北波希米亚）附近的弗兰肯施泰因疗养院逗留。

9月14日：卡夫卡与马克斯·勃罗德探访一位神奇拉比。

10月：卡尔·施特恩海姆获得冯塔纳奖金，但在弗兰茨·布莱的建议下，将奖金全数转交卡夫卡。《变形记》作为冉奈希克勒发行的《白色书页》杂志第10号出版。

1916年

4月14日：罗伯特·穆西尔来布拉格造访卡夫卡。

4月中旬：卡夫卡在神经科医生林德隆处询问其神经衰弱的病因。

5月9日：卡夫卡打算辞职，但遭到拒绝。

5月13至14日：去卡尔温泉和马里恩温泉出差。

约6月20/21日：赫尔曼·卡夫卡前往弗兰岑温泉疗养。

6月29日：奥特拉与卡夫卡一同阅读叔本华的作品。

7月初：奥特拉前往埃森施泰因（波希米亚森林）度假。

7月3日：卡夫卡前往马里恩温泉疗养，与菲莉斯同住在“巴尔默拉尔宫”旅馆。

7月12日：尤丽叶·卡夫卡与瓦莉前往弗兰岑温泉，父亲从此地返回。

7月13日：卡夫卡与菲莉斯前往弗兰岑温泉探望尤丽叶·卡夫卡。菲莉斯返回柏林。

7月24日：卡夫卡从马里恩温泉返回。

7月底：莱比锡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欲聘卡夫卡任审校。

8月：奥特拉接管布拉格父亲店铺的经营管理。

8月7日：母亲和瓦莉从弗兰岑温泉返回。

8月13日：奥特拉在卡夫卡的指导下开始阅读普拉顿的《学术讲座会》（鲁道夫·卡斯纳的译本）。

8月18日：访米尔施泰因大夫。

9月：约瑟夫·达维德调到东部前线。

9月8日：卡夫卡为奥特拉朗诵普拉顿的《学术讨论会》。

9月10日：卡夫卡为奥特拉朗诵N.N.施特拉霍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文集导言》。

9月17日：卡夫卡再次朗诵施特拉霍夫的作品。

9月20日：在卡夫卡的推荐下，奥特拉阅读了哈姆森的《蔷薇色》和弗尔斯特的《青年指南》。

10月22日：卡夫卡与奥特拉一同访问奥特拉的一位前乡村女教师。

11月5日：卡夫卡与奥特拉来到艾尔贝坦尼茨。

11月10日：卡夫卡启程前往慕尼黑，在戈尔茨画廊朗诵其《在流刑营》；与戈特弗里德·克尔维尔、马克斯·普尔韦尔和欧仁·蒙特相识。

奥特拉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愿望，即离开店铺去学农业。

11月11日：卡夫卡与菲莉斯抵慕尼黑。

11月12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

11月26日：自这天起，卡夫卡在奥特拉租用、装饰的小房（即炼丹师小巷）内写作；至1917年4月底，卡夫卡在这里写就了《乡村医生》集内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

1917年

2月24日：奥特拉在奥特尔巴哈—薛尔定报考农业女子学校，被录取登记为1917/18学年的正式学员。

3月1日：卡夫卡兄妹的一位熟人鲁岑卡建议奥特拉去一个农庄工作。卡夫卡在集市街的美泉宫租了一套二居室住房，但只作过夜之所。

3月8日：奥特拉决定去奥特尔巴哈，遂于之后的数日内坚持要求放弃父亲店铺的经管。

4月中旬：奥特拉前往屈劳。

5月27日：赫尔曼·卡夫卡前往弗兰岑温泉休养。

6月初：卡夫卡前往屈劳访奥特拉。

6月10日：尤丽叶·卡夫卡与瓦莉去弗兰岑温泉。由于艾莉同意照料店铺，奥特拉得以留在苏劳。

初夏：卡夫卡开始学习希伯来语。

7月初：卡夫卡与前来布拉格的菲莉斯再次相爱；二人经布达佩斯前往阿拉德访菲莉斯的一位姐妹。卡夫卡独自经维也纳返回。与奥托·格罗斯、安东·库以及鲁道夫·富克斯会面。

7月22日：奥特拉的女友伊尔玛前来苏劳休假。

7月23日：卡夫卡为奥托·格罗斯的一个杂志出版计划感到振奋。

8月5日：卡夫卡与奥斯卡·鲍姆前往拉德索维奇。

8月12至13日：卡夫卡夜间咯血。

8月13日：访米尔施泰因医生。

8月13至14日：再次咯血。

8月14日：请米尔施泰因医生看病。

8月24日：与马克斯·勃罗德谈到病情。

8月28日：请米尔施泰因医生看病。

8月31日：卡夫卡搬出美泉宫的住宅和炼丹师小巷的住房。

9月1日：卡夫卡搬到老城环行大道6号父母家中的奥特拉房间。

9月3日：再去米尔施泰因大夫处就医，这位医生根据X光照片确诊为肺尖浸润。

9月4日：在马克斯·勃罗德的催促下访医生弗里德尔·皮克教授，教授证实了米尔施泰因大夫的诊断。

9月6日：卡夫卡去办公室，根据医生诊断书要求退休。

9月7日：工人事故保险公司批准卡夫卡休养三个月。

9月10日：卡夫卡再访皮克教授。

9月12日：卡夫卡前往屈劳看其三妹奥特拉。

9月21日：菲莉斯前来屈劳，当晚与奥特拉同往布拉格。

9月24日：奥特拉返回屈劳。

9月30日：尤丽叶·卡夫卡前往屈劳看望孩子们。

10月19至23日：奥特拉回到布拉格。与父亲在良好的气氛中谈话。

10月27日至大约11月1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看牙医，访皮克教授，并去办公室，意味着他即将重新上班。与马克斯·勃罗德谈话。

11月初：卡夫卡的办公室同事和他的女秘书前来探望他。

11月8至11日：奥特拉的女友伊尔玛在屈劳。

11月22日：奥特拉回布拉格，向父亲透露了对全家保密的卡夫卡真实病情。

11月23日：奥特拉受哥哥之托去保险公司谈话。卡夫卡打算隐居乡村，以小农身份度过余生，因而请求退休，但再度未获准。

12月22日：卡夫卡前往布拉格与菲莉斯会面。

12月25日：卡夫卡与菲莉斯访马克斯·勃罗德夫妇。解除婚约。对外界宣布的原因是卡夫卡的病情。

12月26日：上午在勃罗德家。谈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下午与勃罗德、鲍姆、韦尔奇夫妇和菲莉斯前往希普卡巴斯远足。

12月27日：卡夫卡送菲莉斯去车站。访米尔施泰因医生。

12月28日：卡夫卡不得不去保险公司，因为他被免除兵役的期限将到1月1日结束。

1918年

1月1日：卡夫卡向公司要求退休，但只获准延长假期。

约1月6日：卡夫卡与盲人朋友奥斯卡·鲍姆前往屈劳。

1月12日：开始阅读克尔恺郭尔的《非此即彼》。

1月13日：奥斯卡·鲍姆在奥特拉的陪同下回布拉格。

2月底/3月初：卡夫卡阅读克尔恺郭尔的《重复》；因兵役事回到布拉格的保险公司。

3月底：卡夫卡开始在奥特拉上一年开辟的田园内劳动。

4月18日：奥特拉在一次布拉格之行后带来消息：保险公司拒绝再度延长假期。

4月25日：奥特拉自数日来一直在阅读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

4月29日：卡夫卡与前来探访奥特拉的约瑟夫·达维德之妹埃拉相识。与黑德尔一家告别，黑德尔是当地最出色的农民，颇令卡夫卡兄妹佩服。

4月30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于5月2日重新上班。

5月：奥特拉不愿去园丁学校，但打算拜一位园丁为师。

夏季：在布拉格郊区特罗亚从事田园劳动。

7月：卡夫卡的母亲在弗兰岑温泉。

8月/9月：卡夫卡给各个家政和农业学校写信。他建议妹妹去利卜魏尔达的农业科学院或弗里德兰的冬季农业学校学习。

9月下半月：卡夫卡在图尔瑙疗养，并从事田园劳动，学习希伯来语。奥特拉在布拉格与父亲谈到自己的职业未来。

10月：奥特拉终于从屈劳回到布拉格。前往土尼采旅行。

10月14日：卡夫卡染上当时流行全欧的西班牙感冒，病重垂危。

11月2日：奥特拉来到弗里德兰，申请在冬季农业学校当进修生。

11月中旬：尤丽叶·卡夫卡向家庭医生克拉尔建议，希望让卡夫卡去舍莱森疗养。

11月19日：卡夫卡再度上班。

11月23日：卡夫卡再度病倒。

11月27日：退役后在布拉格市立储蓄所重新谋到职位的约瑟夫·达维德，首次正式拜访卡夫卡父母。

11月30日：尤丽叶·卡夫卡送儿子前往舍莱森，住进施蒂德尔膳宿公寓。

12月2日：奥特拉搬进弗里德兰郊区林根海姆的Alt-deutsche Bierstube（老德意志啤酒馆），因为她愿意住在乡村环境中。

12月9日：奥特拉在卡夫卡的影响下，开始练习丹麦人J.P.米勒所创的体操。

12月11日：约瑟夫·达维德再度拜访卡夫卡家。

12月21日：奥特拉返回布拉格。

圣诞节：卡夫卡在布拉格。

1919年

1918年12月底至1919年1月初：奥特拉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十分不协调，因为父亲对奥特拉与约瑟夫·达维德的恋爱关系持保留态度，认为他

不般配，太穷，作为基督徒也不太适宜。

1月6日：奥特拉回到弗里德兰续学。

1月中旬：约瑟夫·达维德在法院工作。此间，他的高等教育结束，获得博士学位。

1月22日：卡夫卡再度去舍莱森疗养。与尤丽叶·沃利切克相识；她是一位布拉格鞋匠、镇上的犹太仆人的女儿。

1月23日：奥特拉搬进另一间朝向较好的房间，以便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学习。

2月12日：奥特拉在图尔瑙与约瑟夫·达维德秘密会面后返回。

2月28日至3月5日：奥特拉在布拉格与母亲谈到找一个农业职位的可能性。

3月：奥特拉通过了各项规定的考试。

3月底：奥特拉与哥哥回到布拉格。

春/夏季：卡夫卡与尤丽叶·沃利切克经常在一起。

5月12至15日：卡夫卡生病。

秋季：卡夫卡欲与尤丽叶·沃利切克结婚未遂。

11月：再度前往舍莱森住进施蒂德尔膳宿公寓，与马克斯·勃罗德会面。与闵策·艾斯纳相识。《致父亲》的信写就。

11月15至16日：奥特拉来舍莱森探访。

11月21日：卡夫卡上班。

12月22至29日：卡夫卡失去工作能力。

1920年

1月1日：晋升为保险公司书记官。

1月6日至2月29日：《他》的格言问世。卡夫卡很可能在此期间首次给捷克女记者密伦娜·耶森斯卡去信，她正为他的《司炉》做翻译。

2月21至24日：卡夫卡因病不能上班。

3月：与古斯塔夫·雅诺施相识。

奥特拉打算去科隆附近的奥普拉登参加一次农业预训班，为移居巴勒斯坦预作准备。她的计划受到卡夫卡的鼎力支持。

4月初：卡夫卡前往梅拉诺疗养，先在艾玛旅馆小住数日，后搬到翁特尔麦斯的奥托堡膳宿公寓。与密伦娜保持通信。

5月第2周：奥特拉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争取到卡夫卡病假的续假。

6月23日：卡夫卡去博岑附近的克罗本施泰因远足。

6月29日至7月4日：卡夫卡在维也纳的密伦娜家。

7月7日：卡夫卡借住大妹妹的住房，后者当时正在马里恩温泉疗养。卡夫卡的父母从弗兰岑温泉返回。

7月15日：奥特拉与约瑟夫·达维德结婚。

7月下半月：奥特拉去埃森施泰因（波希米亚森林）度蜜月。

8月8日：卡夫卡回到父母家自己的房间内。

8月14至15日：与密伦娜在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境小镇格明德会面。

8月底：辍笔逾三年之后，重新从事文学写作。

10月：奥特拉在保险公司为卡夫卡申请到病假。

11月8日：与阿尔贝特·埃伦施泰因会面。

12月18日：卡夫卡开始在高地塔特拉的马特里亚利进行卧床增肥疗法，以治疗病情有所发展的肺结核。

1921年

1月：密伦娜寄来告别信。卡夫卡在回信中请求中止通信，并拒绝再次见面。

1月31日至2月3日：卡夫卡因重感冒卧病在床。

2月3日：首次与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相见，二人后成为好友。

3月10 /11日：奥特拉在未得到卡夫卡直接委托的情况下在保险公司申请到续假。

3月第3周：卡夫卡得知在波利昂卡疗养的可能性。

3月27日：奥特拉的女儿维拉出生。

3月底/4月初：卡夫卡身患伴有高烧的肠炎。

约5月10日：奥特拉再度申请续假，于13日获准。

5月下半月：约瑟夫·达维德在巴黎。

6月：前往塔兰卡远足。

8月：奥特拉在陶斯度暑假。

8月8日：卡夫卡远足。

8月14至19日：卡夫卡高烧卧床。

8月26日：返回布拉格。

9月：与恩斯特·魏斯、古斯塔夫·雅诺施、闵策·艾斯纳和密伦娜会面。

10月初：卡夫卡与他所崇拜的诗朗诵者路德维希·哈尔特相逢。他将所有日记转交给密伦娜。

10月15日：重新开始写日记。

10月17日：卡夫卡的父母瞒着儿子与O.赫尔曼医生约定日程，请他为卡夫卡体检并开具系统治疗的证明。

10月24日：与阿尔贝特·埃伦施泰因会面。

10月29日：保险公司批准疗养。

11月：卡夫卡在布拉格接受一次系统的治疗。之后，密伦娜多次来访。

1922年

1月中旬：神经崩溃。

1月27日：卡夫卡前往巨人山区的施乒德尔缪勒疗养。

2月3日：卡夫卡晋升为秘书长。

2月17日：从施乒德尔缪勒返回。之后，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问世，并开始写作《城堡》。

6月底：前往卢施尼茨河畔的普拉那；奥特拉当时在那里租有一套夏季住房。

7月1日：卡夫卡退休。之后几周内《一条狗的探索》问世。

7月14日：卡夫卡的父亲在弗兰岑温泉身患重病，遂即被送回布拉格做手术。卡夫卡亦立即返回布拉格。

7月19日：再度前往普拉那。

8月初：卡夫卡前往布拉格逗留数日。

8月底：卡夫卡神经崩溃，因为奥特拉打算9月1日即回布拉格，于是卡夫卡不得不独自留在客栈达一个月之久，并自己开火做饭。放弃长篇小说《城堡》的写作。

9月初：卡夫卡在布拉格逗留四天。

9月10日：神经再度崩溃。奥特拉以天气阴冷为由劝卡夫卡离开此地。

9月18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

9月底：神经再度崩溃。

12月2日：路德维希·哈尔特在布拉格朗诵卡夫卡的作品。

12月17日：卡夫卡再度阅读克尔恺郭尔的《非此即彼》。

1923年

冬/春季：卡夫卡大多卧病在床。之后，他在巴勒斯坦姑娘普娅·本图温姆处学习希伯来文。

4月底至5月初：与胡戈·贝格曼会面，后者向他介绍了巴勒斯坦的情况。卡夫卡计划移居巴勒斯坦，住在贝格曼家。

5月初至大约11日：在多勃雷乔维茨疗养。

5月10日：奥特拉的女儿海伦娜出生。

6月：与密伦娜最后一次会面。

7月初至8月6日：与艾莉及其孩子们在波罗的海岸浴场缪里兹。与多拉·迪芒相识。

8月7至8日：在柏林逗留。

8月9日：回布拉格。

8月中旬至9月21日：与奥特拉及其孩子们在舍莱森疗养。

9月22至23日：在布拉格。

9月24日：搬到柏林多拉·迪芒家。

9月25日：卡夫卡住进施台格利茨的米盖尔8号。之后，与普娅·本图温姆和勃罗德的女友埃米·萨尔维特会面。卡夫卡在犹太高等学校听课。

10月7日：恩斯特·魏斯访卡夫卡。

10月第2周：奥特拉与母亲有效地规劝卡夫卡放弃于月底去布拉格向朋友、熟人告别的计划。

11月15日：搬至格林街13号。

11月第3周：马克斯·勃罗德在柏林看望卡夫卡。

11月25日：奥特拉看望哥哥。

12月中旬：奥特拉去保险公司诉说卡夫卡的病情，并要求延长在国外的逗留期。

圣诞节：卡夫卡发烧卧床。

1924年

2月1日：搬至柏林采伦多夫区25—26号。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3月17日：与马克斯·勃罗德一同回到布拉格。

3月下半月：《女歌手约瑟芬，或者鼠众》问世。

3月：病灶转移到喉头，卡夫卡只能低声说话。

4月第2周：卡夫卡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森林”疗养院。确诊为喉结核。

4月中旬：卡夫卡在维也纳M.哈谢克教授大学医院就诊，病情得到证实。

4月19日：搬至克罗斯特新堡附近基尔林的霍夫曼医生疗养院。如同在维也纳一样，由多拉负责照料。

5月初：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接管了一部分对卡夫卡的医护工作。卡夫卡开始校对短篇集《饥饿艺术家》的校样。

5月12日：马克斯·勃罗德看望卡夫卡。

6月3日：卡夫卡病逝。

6月11日：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的犹太人墓地下葬。

[1]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所有信件都未署日期。——译者

[2]沃尔夫（Kurt Wolff），沃尔夫出版社的老板，最早出版卡夫卡的作品出版家之一。

[3]原文为捷克语：“Pane doktore, s Vami to dlouho nepotrv.”

[4]卡夫卡于191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乡村医生》等十四篇短篇小说。——译者

[5]卡夫卡的署名越来越简化，从这封信起不再是K.，而是K。此后逐渐地干脆连任何字样的署名都舍弃了。——译者

[6]捷克语，意为“我就是付钱的人”。

[7]捷克语：“真正的恐惧”。

[8]上封信一开头，卡夫卡就说写抬头是一种“累赘”，所以从这封信起，除极个别外，他一般就不写抬头了。——译者

[9]捷克语：或者说并不完全合适。

[10]捷克语：好意的。

[11]指密伦娜用捷克语写的杂文、随笔一类的文章。

[12]波契娜·涅姆科娃（Božena Němcová 1820—1862年），伟大的捷克女小说家，代表作为《祖母》。

[13]指小说家恩斯特·魏斯（Ernst Weiss）。

[14]指尤丽叶·沃里切克，卡夫卡曾与她订婚，主要因卡夫卡父亲的反对（门户不当）而失败。

[15]施塔萨（Staa），密伦娜的女友。

[16]捷克语：纯粹是为她害怕。

[17]韦尔弗（Franz Werfel），奥地利著名表现主义作家。——译者

[18]欧洲人的习惯：异性成人间一般关系均用“您”，只有相爱的人或同辈亲属以及长辈对小辈才用“你”称呼。——译者

[19]原文是捷克语：ani jedine slovo , Kter é by nebylo velm ě dobve uváveno.——译者

[20]原文是捷克语：skatule , skatule , hejbejte se , 有名的儿童游戏。

[21]捷克语：这伤害了我。

[22]指海涅。——译者

[23]亨利希·海涅是犹太人，但他加入了路德创立的新教。——译者

[24]密伦娜的丈夫也是犹太人，密伦娜是与家庭决裂后才与他结合的。——译者

[25]捷克语：仅此。

[26]捷克语：您是犹太人吗？

[27]捷克语：我不理解。

[28]这三个音节也可能意味着布拉格大钟上耶稣弟子的动作：到达、现身、倒霉的下场。——译者

[29]卡夫卡先后两次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然后于1919年又与尤丽叶·沃里切克订婚。

[30]“也许”二字在原信上被划掉了。

[31]从这封信开始，卡夫卡对密伦娜不再称呼“您”，而用“你”称呼。——译者

[32]指Milena（密伦娜）的名字重音在第一个音节“i”上。

[33]梅杜莎（Medusa），希腊神话中的女性怪物，脑袋上长着毒蛇，谁看了她的脑袋，谁就化成石头。——译者

[34]〔左侧边上写着〕：“星期五的信，星期三才到，加快信和挂号

信比平信还慢。”

[35]“严肃的”，德语为ernst，密伦娜的丈夫正好叫Ernst，所以在此一语双关。

[36]捷克语：我有两身衣服，穿着真漂亮（也许出自一首捷克民歌）。

[37]卡夫卡晚年写过一篇题为《算了吧！》的短篇小说。

[38]指与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的通信，菲莉斯住在柏林。——译者

[39]指他1919年与第二个姑娘尤丽叶·沃里切克的婚事（后又解约）。——译者

[40]〔左边边缘写着：〕“是的，你也确实不理解我，密伦娜，‘犹太人问题’只是个愚蠢的玩笑啊。”

[41]捷克语：从来就不美丽，真的不美丽，有时也许还算作漂亮。

[42]用压缩空气的办法输送信件的一种装置。1865年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试制成功，并在柏林投入使用。——译者

[43]卡夫卡认为“Milena”（密伦娜）是个拉丁语化了的名字。其小写词“milenka”则毫无疑问是捷克语，意思是“情人”。按卡夫卡的意见，这个名字的纯捷克语形式是“Milada”。

[44]密伦娜的住处。

[45]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的日记当时每星期天登在《新维也纳日报》上。

[46]密伦娜的姓也是“耶申斯卡”。

[47]这期间他们已在维也纳见过一面。

[48]指作家马克斯·勃罗德。

[49]信都是从布拉格发出的。

[50]但不见1）、2）——译者

[51]应指卡夫卡的第二个未婚妻尤丽叶·沃里切克。——译者

[52]《可怜的乐师》（Armer Spielmann）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兰茨·格列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年）的中篇小说。

[53]人民花园（Volksgarten），维也纳市中心一座古老的公园。

[54]〔右边边缘上写着〕虽然如此，有时我认为：假如可以因为得到幸福而死，那么我情愿去死，假如一个已经注定要死的人可以因为得到幸福而活下去，那么我愿意活下去。

[55]捷克民族英雄胡斯（Jan Hus）的忌辰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法定的节日。

[56]指密伦娜的丈夫。

[57]〔左边边缘上写着〕你说你将出于恐惧而写信，这也使我有点恐惧。

[58]弗洛里安（Florian），有成就的天主教作家和出版家，是列昂·布洛依（Léon Bloys）的女婿，施塔萨（Staa）当时在他那里工作。

[59]捷克语：工艺品商场。

[60]位于胡伯纳巷（Hybernergasse）的文学艺术家聚会的咖啡馆。

[61]〔左边边缘上写着〕昨天我不能写，维也纳的一切对我来说太昏暗了。

[62]未见16。——译者

[63]捷克语：是的，你说得对，我喜欢他。但是F，你我也是喜欢的。

[64]捷克语中的“也”。

[65]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这天在当时的布拉格也举行庆祝。

[66]这句在原信中被划去。

[67]维也纳一家饭店的名称，密伦娜有时去那里吃饭。

[68]〔左边边缘上写着〕至于我，你完全可以放心，我在最后一天就像在第一天那样等待。

[69]密伦娜丈夫的计划。他是银行职员，但不喜欢这一工作。

[70]《玛丽·多那狄》（»Marie Donadieu«）是查理-路易斯·菲莉浦（Charles-Louis Philipe）所著的长篇小说。

[71]〔左边边缘上写着〕我很赞成芝加哥计划，前提是，那些不会跑的跑步选手也包括在内。

[72]指维也纳的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奥托·格罗斯（Otto Gross）。

[73]为当时捷克的一些报刊杂志的名称。

[74]捷克语：你本来就是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75]捷克语：对此一无所知。

[76]捷克语：让人等待。

[77]捷克语：我最向往的是在第三条路上跑去，既不向你那儿跑，又不同他一起跑，而是通向某个孤寂之处。

[78]〔左边边缘上写着〕我知道你会怎么答复，但我希望在你的信中读到。

[79]奥匈帝国时期的货币单位，一个塞柯色尔相当于十个克罗采。

[80]捷克语：因为他从未写到或说到过您。

[81]〔此页上方斜写着〕我每天都写。你还会收到这些信的。

[82]在那饥荒年代中也有妇女在维也纳各个火车站当搬运工。

[83]捷克语：秘书。

[84]捷克语：神秘。

[85]兰道威尔（Landauer），慕尼黑苏维埃政府成员，出色的杂文

作家，1919年被谋杀。

[86]捷克语：徒劳的。

[87]〔左边边缘上写着〕你为什么伤心呢？

[88]〔左边边缘上写着〕那么你为什么伤心呢？

[89]捷克语：世界之天平。

[90]福克斯（Rudolf Fuchs），布拉格诗人，捷克诗歌的一位杰出翻译家，所译布雷其那（Březina）和贝茨鲁斯（Bezru）的诗尤其出色。

[91]密伦娜的丈夫。

[92]捷克语：女人不需要很多东西。

[93]估计是约定在电报中使用的暗语。“爱尔塞病了”可能意味着“来！”

[94]克拉萨（Hans Krasa），作曲家，后来死在集中营。

[95]布拉格一家进步日报，密伦娜曾为该报工作过。

[96]闵希豪森（1720—1797年），德国军人及冒险家，因R.E.雷斯朴搜集的他的冒险故事而闻名于世。——译者

[97]卡夫卡的小妹妹，对卡夫卡的生活有重要影响。——译者

[98]捷克语：婴儿。

[99]捷克语：就其本身而言。

[100]〔在这一页和前一页之间用蓝笔写着〕我这样瞎扯，仅仅因为无论如何我在你身边总是感觉舒适的。

[101]捷克语：不言而喻。

[102]显然，密伦娜想给他发一封假电报。

[103]布拉格作家，《布拉格日报》编辑，卡夫卡的老朋友。

[104]施兰克，德语为Schrank，意为大橱，与卡夫卡的名字弗兰克（Frank）是谐音。——译者

[105]这里是幽默地模仿一些童话的结尾：假如他们还没有死，那么他们今天一定还活着。——译者

[106]那时卡夫卡在坚持素食。——译者

[107]布莱（Franz Blei），作家。——译者

[108]卡萨诺瓦（Cassanova），意大利中世纪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善于猎取女人心灵的英俊男子，是欧美众所周知的文学形象。——译者

[109]威尼斯古代一处监狱。——译者

[110]〔左边边缘上写着〕在这些信上那“尽管如此”真是必要的，但这作为一个词本身不是也挺美吗？在“尽管”中人们撞在一起，“尘世”还在，在“如此”中人们沉了下去，一切便统统不存在了。

[111]捷克语：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112]捷克语：还是等到对你来说是必要的时候吧。

[113]估计是密伦娜提到她父亲的来信。密伦娜的丈夫是犹太人，当初密伦娜父母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密伦娜从此与家庭闹翻。——译者

[114]捷克语：“遗憾”和“伤心极了”。

[115]〔左边边缘上写着〕我一点都不反对你的休假旅行。我怎么会反对呢，你又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116]捷克语：你不来，因为你在等待对你来说必须来的时刻。

[117]捷克语：一切顺利，弗兰克。

[118]捷克语：给你发这个不该发的电报是没有意义的。我不发出。

[119]赫克力斯（Herakles），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译者

[120]瑞士东南部的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胜地，托马斯·曼《魔山》故事的地理背景。——译注

[121]施坦因（Paul Stein），布拉格的律师。

[122]捷克语：恐惧、渴望（或渴慕）。

[123]卡夫卡在这里说的事和他经常说到的“污秽”、“肮脏”等意思和犹太教教义认为“性的接触是肮脏的”有关。但卡夫卡没有局限在这里，而是把当时整个世界看成是污秽的。——译者

[124]〔左边边缘上写着〕你9点一过就来。你是奥地利人，不要跟海关检查处纠缠，我总不能数小时之久地反复默诵准备问候你的话。

[125]这里说的涉及在布拉格发生的一件怪事，好几个人同时收到来信，不容置疑是密伦娜的笔迹，但又不是密伦娜写的。

[126]捷克语：你想过过驾驶瘾吗？

[127]捷克语：是的。

[128]捷克语：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

[129]哈斯，即本书原编者维利·哈斯。——译者

[130]捷克语：《咖啡馆》，这是密伦娜写的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

[131]显然是指维也纳皮货公司的广告。

[132]捷克语：太美了，太美了。

[133]捷克语：永远成不了。

[134]这时密伦娜到圣·吉尔根去了。

[135]《民族报》。

[136]显然是指上星期天信中注解里提到过的伪造事件。

[137]捷克语：你是我的。

[138]〔右边边缘上写着〕假如可能的话，望寄一张你的住处的图片来。

[139]〔左边边缘上写着〕是的，我知道，我那时漏读了什么，我忘不了，却记不起具体是什么：发烧？真的发烧？量过体温吗？

[140]捷克语：我不要你对此作出答复。

[141]指短篇小说《判决》。——译者

[142]鲍姆（Oskar Baum），卡夫卡的老朋友，盲人作家，住在布拉格。

[143]卡夫卡为密伦娜调停了一次家庭纠纷，而且显然做得很有步骤，很机智。我们找不到他为什么如此严厉地责备自己的任何理由。

[144]捷克语：楼梯间。

[145]〔左边边缘上写着〕对你父亲害怕的心情我可以克服一部分，下一次吧。

[146]捷克语：你们没有爱的力量。

[147]捷克语：你们没有爱的力量。

[148]捷克语：鬼的故事。

[149]是弗兰茨·韦尔弗的一个剧本。

[150]Grimmenstein（格里门施坦）的缩写。——译者

[151]捷克语：讨厌的种族。

[152]爱伦施坦（Albert Ehrenstein），维也纳作家。

[153]指爱伦施坦。——译者

[154]卡夫卡在这儿说的是恩斯特·魏斯（Ernst Weiss）的剧本《坦嘉》。

[155]爱伦施坦写的评论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小册子。

[156]相传哥尔提亚斯系了个解不开的绳结让亚历山大大帝解，亚历山大大帝后来用剑把它劈开了。——译者

[157]当时捷克农民党的反动报纸。

[158]阿列斯，捷克画家和雕刻家。

[159]狄奥根尼斯（Diogenes，前412—前323年），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译者

[160]布拉格一条大街名。

[161]卡夫卡父母的住房就在这条路上。

[162]捷克语：它是在我这里打碎的。

[163]慕尼黑苏维埃政府成员。

[164]〔右边边缘上写着〕如果找到哪个疗养院，我自然会写信告诉你的。

[165]最后几封信是直接寄到密伦娜住处去的。

[166]捷克一家报纸。——译者

[167]这是卡夫卡心爱的诗，作者是凯纳尔（Justinus Kerner），诗名为《水轮锯木厂旁的旅行者》。

[168]指密伦娜自己写的信。

[169]指信。——译者

[170]仍接着前面提到的“朋友”（阳性），所以用“他”。——译者

[171]这也许是暗示：还有一封信在邮局。

[172]指《多那狄》（Donadieu）的作者查理·路易斯·菲利普（Charles-Louis Philipe）。

[173]捷克语：《在大路上》。显然是书名。

[174]马克斯·勃罗德的长篇小说。

[175]卡夫卡这里指的是他生前最后一位女友多拉·迪曼特。多拉忠诚地爱着他、照拂他，直至他病逝。——译者

[176]这是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最后一封信。

[177]指卡夫卡的第二个未婚妻尤丽叶·沃里切克，1919年订婚，翌年解约。——译者

[178]指卡夫卡的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1912年至1917年间，卡夫卡与她先后两次订婚，两次解约。——译者

[179]密伦娜某些方面也以“拒绝的形象”（见1922年2月12日日记）出现，这个形象对卡夫卡说：“你不能爱我，尽管你是很愿意这样。不幸的是你爱着我的爱情，而对我的爱情却不爱你。”

[180]少年维特，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早期的寒名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的主人公。——译者

[181]克尔凯郭尔（1813—1855年），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卡夫卡曾受他的影响。——译者

[182]马克斯·勃罗德在给我的信中不无道理地指出密伦娜与《城堡》中弗丽达之间有一定的类比关系。

[183]依萨多拉·登康（1877—1927年），爱尔兰血统的美国舞蹈家。

[184]《圣经》故事中没有建成的通天塔。